

中信出版社2021年度好书

(套装共22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信出版社2021年度好书

(套装共22册)



中信出版社2021年度好书

（ 套装共22册 ）

[美]比尔·盖茨 等 著

陈召强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人口大逆转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羽来信：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

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无字史记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中国村落史

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

利益相关者

幻兽之吻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

美人图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希腊三百年

成为波伏瓦

微积分的力量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比尔·盖茨

气候经济与 人类未来

揭示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机会
助力碳中和目标，
开启「零碳」新经济。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

【美】比尔·盖茨 (Bill Gates) 著 陈冠强 译
比尔·盖茨
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中信出版集团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美]比尔·盖茨 著

陈召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第二章 艰难之路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第七章 交通运输

第八章 制冷和取暖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后记 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致谢

献给作为开路先锋的科学家、创新者和活动人士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

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1\]](#)

“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这听起来很难，实施起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从未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每个国家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种植、制造和出行）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转向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气候必将持续恶化，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大的假设，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有了我们需要的工具，至于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以我个人对气候和技术的了解，我很乐观地

认为我们可以发明它们，并对它们加以部署。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那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一灾难，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20年前，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公开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别提写这么一本书了。我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而不是气候科学。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梅琳达一起经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在这个高度聚焦的机构，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

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能源贫困问题，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

21世纪初，在盖茨基金会刚刚起步时，我开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儿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他一些我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的心思也并不总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飞去大城市，伫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会想：“为什么那里一片漆黑？我在纽约、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灯光都去了哪里？”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我走过没有灯光的街道，看到人们就蜷缩在用旧油桶改装后点燃的炉火旁。在偏远的村庄，梅琳达和我遇到过一些妇女和女童，她们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捡拾木柴，以便在家中生火做饭。我们见过借着烛光做作业的孩子，因为他们家里没有电力照明（见图0—1[2]）。

我了解到，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在的情况较彼时已

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约有8.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我想到了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诊所因冰箱不能运转而无法做到疫苗的冷储存，那么要过上健康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办公室、工厂和呼叫中心没有规模庞大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那么那里就绝无可能构建一个人人都拥有就业机会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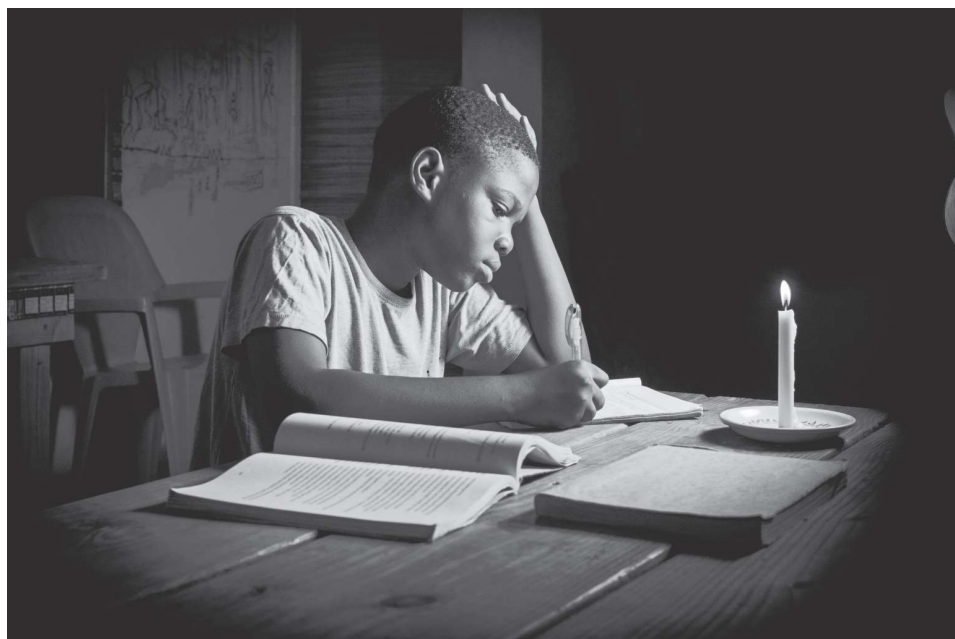


图0-1 借着烛光做作业的9岁男童乌卢贝·奇纳奇，梅琳达和我在拉各斯经常见到像他这样的孩子

大约在同一时间，已故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给我看了一张图（见图0—2[3]），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的横轴标示着各国的人均收入状

况，纵轴标示着各国的能源消耗情况，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随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积聚和沉淀，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贫穷国家的民众用上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能源。让盖茨基金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它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但这时我开始同一些发明家朋友讨论我的想法，并进一步阅读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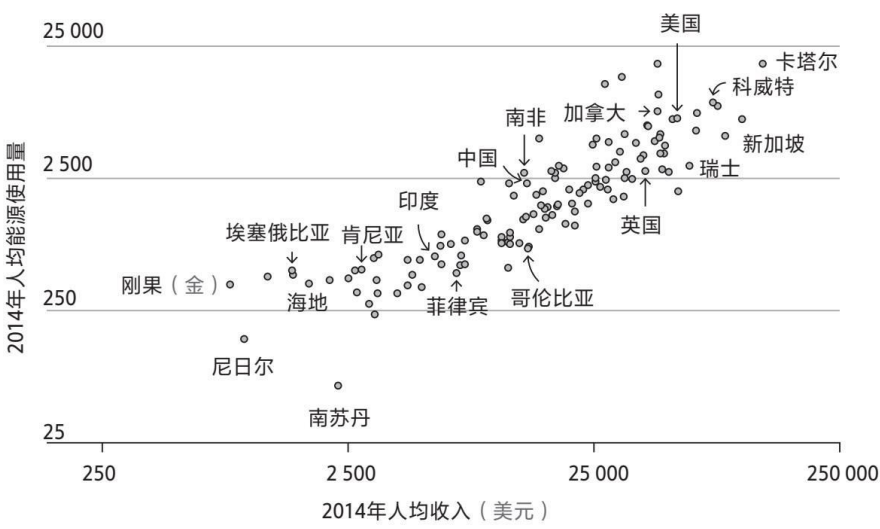


图0-2 人均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资料来源：IEA；World Bank

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我认为这已经足够。在我看来，我要做的就是发起倡议，帮

助贫困群体用上他们可负担得起的可靠能源。

首要的一点是，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拥有更廉价的能源不仅意味着他们在夜晚可以开灯，而且意味着他们种田时可以用上更廉价的肥料，建房时可以用上更廉价的水泥。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贫困者是最大的输家，他们大多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经受不起更多的旱灾和洪灾。

2006年年底，我遇到了微软的两位前同事，当时他们正着手成立专注于能源和气候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正是从那时起，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开始发生变化。他们邀请了两位非常精通能源和气候问题的科学家，一起向我展示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数据。

我知道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但我以为周期性变动或其他因素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气候灾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是我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我多次带着后续问题跟这个四人组会面，最终达成共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才能使贫困群体走上富裕道路，但在提供这些能源的同时，我们不能以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代价。

现在，问题看起来更棘手了。仅仅为贫困群体提供廉价、可靠的能源还不够，我们也很难保证这都是清洁能源。

我不断学习一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我会见了气候、能源、农业、海洋、海平面、冰川、电力输送等领域的专家，翻阅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正是在该委员会的推动下，全球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我观看了《地球气候变化》（*Earth's Changing Climate*），这是理查德·沃尔夫森（Richard Wolfson）教授在“伟大课程”（Great

Courses) 平台推出的一系列精彩视频讲座。我阅读了《天气傻瓜书》(*Weather for Dummies*) , 我现在依然认为它是关于天气问题值得称道的著作之一。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但我们在部署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4]

另外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仅靠可再生能源, 我们并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风不会一直吹拂, 太阳不会一直照耀, 而我们也没有可负担得起的、可长时间存储大量能源(比如足够供一个城市使用的能源) 的电池。再者, 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即便我们在电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仍需要减掉另外的73%。

几年下来, 我确认了这样三件事情。

1. 要避免气候灾难, 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2. 我们需要以更便捷、更聪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 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
3. 我们需要开发和推广突破性技术, 并借此走完剩余的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除非我们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否则全球温度会一直上升。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用的类比: 气候就好比一个正在被缓缓注水的浴缸, 即便我们把水调到涓涓细流的程度, 浴缸早晚也会被注满, 而浴缸水满之后, 水自然会流到地面上。这就是我们必须阻止的灾难。设定一个仅仅减少而不是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不够

的，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0”。（关于零排放目标及气候变化影响的更多内容，参见第一章。）

但在我了解到这一切之后，我并没有打算投身其中，担起解决这个议题的责任。早前，梅琳达和我已经选择了两个领域——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要聘请专家团队，还要把我们的资源投出去。另外，我也看到很多名人把气候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

虽然我对这个问题的介入越来越深，但我并没有把它作为我的首要任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参阅了相关资料，并会见了该领域的专家。我投资了一些清洁能源公司，同时斥资数亿美元成立了一家致力于设计下一代核电站的公司，力求在开发清洁电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核废料的产生。我在TED大会发表了题为“创新到零排放”的演讲。但大多数时候，我重点关注的是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然后，到2015年春，我决定多做多讲。我看新闻报道说，美国各地大学生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要求学校从化石燃料项目中撤资。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英国《卫报》发起了一项活动，呼吁盖茨基金会撤出投在化石燃料公司的资金。实际上，这部分投资在盖茨基金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在《卫报》拍摄制作的视频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要求我撤资。至于《卫报》为什么单单把盖茨基金会和我拎出来，我理解其初衷，我也很钦佩活动人士的热情。我见过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后来也见过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学生，我知道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看到这样一种力量是令人鼓舞的。

另外，我也一直在想我在旅途中目睹的一切。比如，印度有

大约14亿人口，极端贫困人口规模庞大。如果跟印度人说，他们的孩子不能在电灯下学习，或者告诉他们，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死于热浪是应该的，因为安装空调对环境不利，我想无论是谁，说这样的话都有失公平。我能想出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开发廉价的清洁能源，廉价到让每一个国家都优先选择清洁能源而不是化石燃料。

尽管我欣赏抗议者的热情，但我不认为撤资行动能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到贫困国家的人。通过公司撤资行为来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确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但仅仅靠抛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变世界能源体系是不现实的，要知道能源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

时至今日，我依然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找到其他理由，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换句话说，我不想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因我们没有开发“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涨，我也不想因此获利。如果利益的获取是以延迟实现零排放为代价的，那我会觉得这很糟糕。所以，2019年，就像管理盖茨基金会捐助款项的信托基金一样，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气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资。（我已经多年没有投资煤炭公司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这并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实现零排放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动彻底的变革，包括政府政策、现有技术、新发明、私人市场向广大民众交付产品的能力等。

2015年年底，我们迎来了一个有利于创新和新投资的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

21)。这是联合国2015年11—12月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大型气候变化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会见了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对邀请私人投资者参加会议很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是把创新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我们彼此都看到了机会。他认为我可以帮忙拉到投资者。我说这可以，但如果各国政府也承诺加大能源研究投入的话，那么事情会好办得多。

这件差事未必轻松。即便在美国，能源研究领域的投资也远低于其他重要领域，比如卫生和防务。尽管有些国家适度加大了研究力度，但整体水平仍然很低。他们不愿增加投入，除非他们知道私营部门有足够的资金把想法带出实验室，进而转化成实实在在能帮到国民的产品。

但到2015年，私人资本趋于枯竭。很多先前投资绿色技术的风险资本公司选择了退出，因为这个领域的回报太低了。他们习惯投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在这类领域，成功往往来得很快，需要应对的政府监管也相对较少。清洁能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私人资本已经在退场。

显然，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金及一种专门为清洁能源定制的新策略。2015年9月，也就是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我给二十几位熟识的投资人发去电子邮件，希望说服他们投入风险资金，弥补政府新增研究经费的不足。他们需要作长期投资——在能源领域取得突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还要承担高风险。为避免风险资本家重蹈覆辙，我承诺帮助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焦点小组，对相关公司进行审查，并助力他们应对能源行业的复杂局面。

我对后续的反应感到高兴。不到4个小时，第一位投资者就回复我表示同意。两个月后，也就是到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召开时，另有26位投资者加入了我的倡议计划。我们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突破能源联盟”。时至今日，突破能源联盟已经通过其所发起的慈善项目、倡议机构和私募基金投资了40余家富有创意的公司。

政府也站了出来。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20个国家的首脑齐聚一堂，承诺将研究经费增加一倍。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推动这一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印度总理莫迪的提议，这项倡议被命名为“创新使命”（见图0—3）。今天，“创新使命”包括24个国家和欧盟委员会，每年新增清洁能源研究资金达46亿美元，短短几年时间增长就超过50%。



图0-3 世界领导人在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启动“创新使命”倡议

这个故事的下一个转折点，对本书的每位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灾难随之发生。对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并

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我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兴趣，我对疫情暴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深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准备，比如1918年那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年，我在TED大会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此后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用于监测和应对大规模疾病暴发的体系，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内的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期间，虽然我没有放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梅琳达和我已经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列为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同时把它列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会跟高等院校和初创公司的科学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交谈，看看盖茨基金会在病毒检测、疾病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能提供哪些帮助。到2020年11月，我们对这场疫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4.45亿美元，我们还开展了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确保疫苗、检测试剂和其他关键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低收入国家。

因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少于2019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左右。按实际值计算，这意味着全球将排放480亿或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5]，而不是510亿吨。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降幅。如果我们每年都能以这样的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这5%的降幅是怎样取得的？100万人死亡，数

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继续或重复的境况。再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达到5%，甚至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飞机和少开车，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减排。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测试手段、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样，在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以“零碳”的方式发电、制造产品、种植粮食，以“零碳”的方式为建筑物保温降热，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转移人员、运送物品，等等。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种子，需要开展多种创新活动，帮助这个世界上的极端贫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户农民）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

当然，这里还存在其他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与科学或资金扶持毫无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政治问题，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已经被边缘化。有时候，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人看不到希望。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我更像一名工程师而非政治学家。对于气候变化中的政治问题，我没有解决方案。相反，我想要做的就是将对话的重点放到如何实现零排放上：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的热情及它的科学智商，部署到现有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上，并投资新的解决方案，进而阻止温室气体排放。

我知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既有钱又有想法的人。对于其他人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而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我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我承认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钱、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见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其次，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别人给我一个问题，我会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气候变化而言，我知道创新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但若没有创新，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地球的宜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技术解决方案却是万万不能的。

最后，我个人的碳足迹[\[6\]](#)出奇的高。这是事实。长久以来，我对此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已经意识到我个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写本书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有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对像我这样担心气候变化并公开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减少碳足迹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从2020年开始购买可持续航空燃油，到2021年，这将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过一家公司购买这方面的抵消量。该公司目前在运营一种消除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设施（关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我还资助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它在为芝加哥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安装清洁能源升级设备。另外，我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力求减少个人的碳足迹。

我还投资了“零碳”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种投资当作另外一种补偿措施，用以抵消我个人的碳排放量。在该领域，我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我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实现零排放，我的投

资覆盖可负担的、可靠的清洁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钢、肉类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方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多的人。

当然，这些企业投资并没有减少我的碳足迹，但我的任何一项减排投资的成功，其所带来的减排效果都将远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减排努力。再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补偿他的碳排放量，而是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所以，我支持清洁能源早期阶段的研究，投资富有前景的清洁能源公司，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有助于实现相关技术突破的政策，并鼓励其他拥有资源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下面是要点：虽然像我这样的重度排放者应该减少能源消耗，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能源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更多的能源并没有错，前提是不产生碳排放。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清洁能源变得跟化石燃料一样廉价和可靠。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借此实现这一目标，也希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0。

本书给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便于人类最大限度地避开气候灾难。具体来说，它分为五个部分。

为什么是0？在第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我们已知的（以及未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

坏消息：实现零排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有望取得成就的计划，首要一点就是要对面临的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会就当前所需应对的挑战展开讨

论。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开展有见地的对话？在第三章中，我会剖析一些你可能听过但又让人感到困惑的统计数据，并与大家分享我每次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避开歧途，而我希望它们对你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好消息：我们可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我会逐一讲述当前技术可以发挥效力的领域，以及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一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部署，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

我会在书中介绍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但对于很多公司，我不会提及具体的名称。一方面，因为我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支持那些于我有经济利益的公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把关注点放到这些创意和创新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业务。有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尖端技术工作，就会理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它未必就是失败的标志。关键的一点是，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新的创业项目，就像我们在微软所做的那样，也好比我认识的每一位创新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仅因为我看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无论面对何种重大挑战，我们都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第一，我们有战胜挑战的雄心，这源于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运动的热情，而这项运动是由深切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的年轻人领导的；第二，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目标，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致力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实现目标的具体计划。

就如我们的雄心是由气候科学驱动的一样，任何切实可行的减排计划也必然是由其他学科驱动的——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政治、经济、金融等。因此，在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依据所有这些学科专家的指导给出一个计划。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会重点讨论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第十二章，我会给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全球实现零排放的措施。无论你是政府领导人、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几无自由时间的选民（或上述全部），你都可以贡献力量，帮助这个世界避开气候灾难。

以上，是为前言。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

[1] 510亿吨是根据最新数据得出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在2020年略有下降，幅度可能在5%左右。但由于我们尚不知道2020年的确切数字，所以我使用“510亿吨”作为一个总排放量。在本书中，我们会时不时地谈到新冠肺炎疫情。

[2] 图片来源：James Iroha.

[3] 该图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数据，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收入指标采用的2014年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按当前国际美元计算。能源使用指标采用的是2014年人均千克石油当量，依据《世界发展指标》中的国际能源署数据。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4] 水电，即通过大坝水位落差产生的电力，是另外一种可再生能源，实际上也是美国可再生能源中的最大构成部分。但问题是，现在大多数可用的水电资源

都已经被开发，增长空间有限。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清洁能源，我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5] 二氧化碳当量，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编者注

[6] 碳足迹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编者注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净零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

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温室气体捕获热量，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温室气体越多，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幅度越大，一旦进入大气，温室气体就会存留很长时间。今天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万年之后仍会存留大约20%。

我们持续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碳，这个世界却不再变热——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地球温度越高，人类的生存越艰难，因而很难再谈人类的繁荣发展。对于某一给定幅度的温度上升所造成的破坏，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表示担忧。而且，温室气体会长期留存在大气中，所以即便实现了零排放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球还是会处于暖化状态。

我承认，使用“0”是不准确的。我应该把我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在前工业化时代，也就是在18世纪中期以前，地球上的碳循环可能处于大体平衡的状态——植物和其他物体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同全球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基本相当。

但自18世纪中期起，我们开始燃烧化石燃料。化石燃料是由储藏在地下的碳构成的，这得益于远古时代死去的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压缩和演化，它们转变成石油、煤或天然气。当我们把这些燃料从地下挖出来燃烧使用时，我们排放了额外的碳，增加了大气中的碳总量。

通过完全放弃化石燃料，或停止其他所有会产生温室气体的活动（比如生产水泥、使用肥料或燃气电厂的甲烷泄漏），达到零排放的目标，并不现实，而且没有可行的路径。相反，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在“零碳”的未来，我们仍然会排放一定量的碳，但我们有办法消除它。

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

排放”，而是“近净零排放”。这不是一场要么及格要么不及格的考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想：如果实现100%的减排，一切都会很棒，但如果只实现了99%的减排，一切都是灾难。当然，减排越显著，效益就越大。

减少50%的排放量并不能阻止温度上升，它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只会延迟而不会阻止气候灾难的到来。

假设我们减少了99%的排放量，哪些国家和经济部门可以使用剩余1%的配额？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如何做决定？

其实，要避免最糟糕的气候状况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且需要切实行动起来，着手消除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步骤被称为“净负排放”。它意味着，最终我们从大气中消除的温室气体将多于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遏制地球温度的上升。回到前言中提及的浴缸类比：我们不仅要关掉流入浴缸的水，还要打开排水阀，让水流出去。

对于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而产生的风险，我想你不会是在本章中第一次看到。毕竟，气候变化的问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新闻中。原本就该如此，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配得上每一个头条位置。但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令人困惑，甚至其中还存在相互矛盾的内容。

在本书中，我将设法消除这些噪声。多年来，我有幸跟随一些世界顶尖的气候和能源科学家学习。对话永无止境，因为研究人员对气候的了解是不断深化的，而这又得益于新数据的出现及用于预测不同情景的计算机模型的改进。我发现，这对判断什么有可能发生及什么不太可能发生大有帮助，而且这也让我深信避

免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方式就是实现零排放。在本章中，我想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东西。

小变化，大影响

当得知全球温度的小幅上升（升高1或2摄氏度，也就是33.8或35.6华氏度）确实会造成很多麻烦时，我感到很惊讶。^[1]但这是真的，在气候领域，仅仅是几摄氏度的变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上一个冰河时代，全球平均温度只比今天低6摄氏度。在恐龙时代（中生代），全球平均温度比今天高大概4摄氏度，那时北极地区还生存着鳄鱼。

这些平均数字可以掩盖相当大的温度变化，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虽然现在全球平均温度只比工业化时代之前高1摄氏度，但有些地方的温度增幅已经超过2摄氏度，而全球20%~40%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有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热呢？在一些大陆的内部地区，土壤更干燥，这意味着土地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凉下来。基本上，大陆不会像过去那样潮湿了。

那么，地球变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见图1—1^[2]）？让我们从基础知识说起，二氧化碳是最常见的温室气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温室气体，比如一氧化二氮和甲烷，你可能在牙科诊所用过又被称为“笑气”的一氧化二氮，甲烷则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从单一分子的对比来看，很多温室气体造成的暖化效应都超过二氧化碳。以甲烷为例，其在大气中的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20倍，但它不会像二氧化碳那样长期存留在大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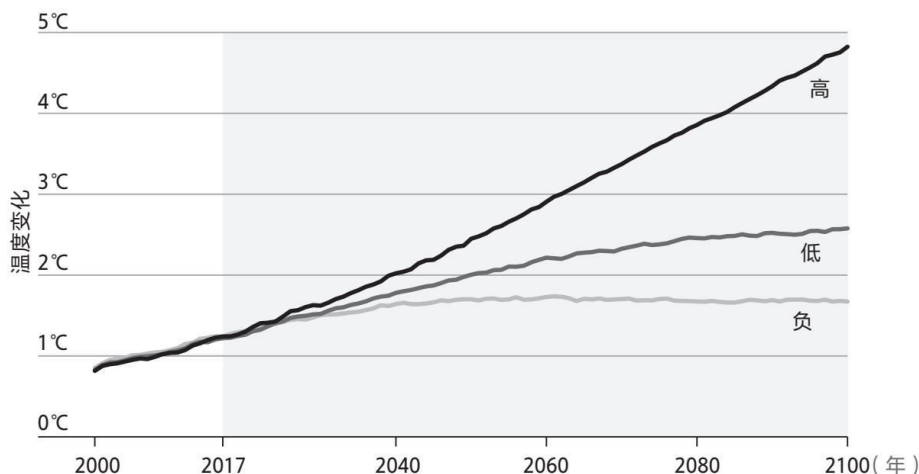


图 1-1 你应该知道的三条线

注：图上三条线展示了未来地球温度在三种情况下的可能变化：如果排放量大幅增加（高）、如果排放量减少（低），以及如果我们消除的碳逐渐超过排放的碳（负）。

资料来源：KNMI Climate Explorer

为简便起见，大多数人会使用单一度量单位，也就是“二氧化碳当量”，来表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温室气体。（你可能见过它的缩写，即CO₂e。）我们之所以使用“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术语，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温室气体在捕获热量方面的能力高于二氧化碳，但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又短于二氧化碳。令人遗憾的是，二氧化碳当量不是一个完美的度量标准：从根本上来讲，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是升高的温度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在这方面，像甲烷这样的气体要比二氧化碳糟糕得多，它会使温度迅速上升，而且升幅很大。但使用“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术语，无法完全解释这种重要的短期效应。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用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佳方法，而且它经常出现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讨论中，所以我在本书

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我不断提到的510亿吨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你在别处可能会看到370亿吨或100亿吨等数字，前者只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没有将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计算在内，后者则只是单纯的碳排放量。为了体现表达上的多样性，因为读100遍“温室气体”会让你变得目光呆滞，我在本书中有时会使用“碳”来替代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比如燃烧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大幅增加。如图1—2所示，左图是185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情况，右图则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情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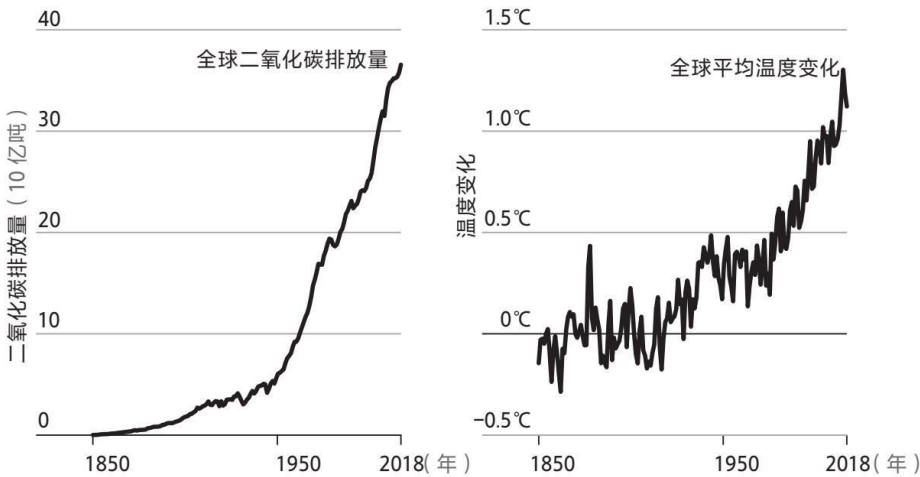


图1-2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也在上升

注：在左图中，你可以看到1850年以来，由于工业生产和化石燃料的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在右图中，你可以看到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也在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19；Berkeley Earth

温室气体是如何导致全球变暖的？简单来说，它们会吸收和

捕获大气中的热量，因其工作原理跟温室一样，故称“温室气体”。

当你把车停到太阳底下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另外一种迥然相异的温室效应：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射入车内，车内气体会捕获一些能量，这就是车内温度远高于车外温度的原因。

但这一解释只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太阳的热量能够穿过温室气体抵达地球，怎么又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捕获了呢？二氧化碳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就像一面巨大的单面镜？就此而言，如果二氧化碳和甲烷可以捕获热量，那么氧气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一些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你可能还记得曾在物理课上学到的：所有分子都是振动的；分子振动得越快，它们的温度越高。当特定类型的分子在特定波长范围内受到辐射时，它们就会屏蔽辐射，吸收辐射的能量，并加快振动速度。

但并不是所有辐射的波长都能产生这种效应。比如，阳光就可以直接穿过大多数温室气体，其热量不会被它们吸走。大多数阳光都能抵达地球，并温暖这个地球，自远古以来就是如此。

问题在于地球无法永远留存所有这些能量，如果能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星球的温度之高，早已变得无法忍受了。相反，地球会把部分能量辐射回太空，而这其中的一部分能量会在合适的波长范围内被释放出来，进而被温室气体吸收。这些未能以无害方式遁入太空的能量转而撞击温室气体分子，加快这些分子的振动速度，使得大气升温。（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感谢温室效应。如果没有它，地球会变得寒冷无比，将不适于人类居住。问题是，这些额外的温室气体已经导致温室效应过度。）

为什么不是所有气体都这样呢？因为由两个相同原子组成的

分子（比如氮气分子或氧气分子）会让辐射直接穿过它们，只有由不同原子组成的分子（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组成方式）才具有吸收辐射并在辐射的作用下开始升温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就是问题答案的第一部分：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任何一点点碳都会强化温室效应。物理是绕不过去的。

这个问题答案的第二部分涉及所有温室气体对气候及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对于气候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变化，科学家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全球温度上升的幅度和速度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而升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至今也不完全清楚。

问题之一是计算机模型远不是完美的，气候异常复杂。我们对气候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比如云是如何影响全球变暖的，再比如额外的热量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哪些影响，等等。研究人员已经在研究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

目前，科学家对气候的了解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如果我们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以下是几个关键点。

地球正在暖化，这种暖化源于人类活动，并且会产生糟糕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恶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某个时间点，这种影响会演变成灾难。这个时间点是30年

之后还是50年之后，我们并不清楚。但考虑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50年之后，我们也需要现在就行动起来。

相比于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平均温度已经因人类行为升高了至少1摄氏度。如果我们不着力减少排放，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上升1.5~3摄氏度，到21世纪末将上升4~8摄氏度。

额外的热量会导致各种气候变化。在我解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必须先提醒一下：虽然我们可以预测总体趋势，比如“炎热的天气将会增加”“海平面将会上升”，但对于某些特定事件，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变化。举例来说，当热浪来袭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它是不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但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概率。就飓风而言，目前尚不清楚升温的海洋是否导致了风暴次数的增加，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导致风暴更“潮湿”，发生强风暴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极端事件之间会不会发生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我们还知道什么？

首先，异常炎热的天数将会增加。我可以给出美国各个城市的统计数据，但在这里，我挑选的是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因为我跟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正是在这里，保罗·艾伦和我于1975年创办了微软。（“Micro-Soft”才是创立之初完全准确的拼写。创办微软几年之后，我们明智地去掉了中间的连字符，并将大写的字母S改成了小写s。）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们创业的起步阶段，阿尔伯克基平均每年约有36天温度超过90华氏度。到21世纪中叶，该市每年温度超过90华氏度的天

数将是之前的两倍。到21世纪末，这样的高温天气每年可能会达到114天。换句话说，当地居民每年经受炎热天气的时长将从1个月增加到3个月。

不是每个人都会同等程度地遭受更炎热和更潮湿的天气，比如西雅图地区（保罗和我在1979年把微软迁入该市）可能就不会遇到很多麻烦，到21世纪早些时候，这里每年温度超过90华氏度的天数可能为14天，而在20世纪70年代，如此炎热的天气每年也就一两天。有些地方实际上可能受益于气候变暖。比如，在寒冷的地区，死于低体温症和流感的人数将会减少，家庭或企业采暖方面的支出也会减少。

但从整体趋势来看，气候变暖是弊大于利的，而且额外的热量会产生连带效应，比如风暴会越来越猛烈。风暴是否会因这些热量而变得更频繁，科学家在这方面仍存在争论，但总体而言，风暴似乎越来越强。我们知道，随着平均温度的上升，更多的水从地表蒸发到大气中。水蒸气是一种温室气体，但与二氧化碳或甲烷不同的是，它不会在大气中存留很长时间。最终，它会以雨或雪的形式降落回地面。在冷凝成雨的过程中，水蒸气会释放大量的能量。任何经历过雷暴雨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即便是最强劲的风暴，通常也只会持续短短几天，但影响长达数年之久。它会造成人员伤亡，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幸存者会因失去亲人而悲痛不已，灾难往往也会使他们一无所有。飓风和洪水还会破坏那些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建起的建筑物、道路和电力线路。当然，这些设施都可以重建，但重建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原本是可以用于新的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的。我们总是试图回到原点，而不是迈步向前。据一项研究估计，2017年的飓风“玛利亚”致使波多黎各的基础设施建设倒退了至少20年（见图1—3[4]）。[5]下一次风暴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又会让所到之处

的基础设施建设倒退多少年？我们无从知晓。



图1-3 飓风“玛利亚”让波多黎各的电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倒退约20年

强风暴正在制造一种奇怪的景象——“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有些地方的降水越来越多，另外一些地方则经历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旱灾。空气温度越高，其所容纳的水分越多。随着温度的升高，空气变得愈加干渴，进而从土壤中汲取更多水分。到21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地区土壤中的水分将减少10%~20%，遭遇旱灾的风险概率将至少增加20%。旱灾还会危及科罗拉多河，这条河不仅为近4 000万人提供饮用水源，还灌溉了全美超过七分之一的农作物。

全球气候变暖意味着山火的发生会变得更频繁、更具破坏性。暖空气从植物和土壤中吸收水分，使得一切都易于燃烧。世界各地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因为每个地方的条件变化都很大，

但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是一个代表未来趋势的显著例子。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加利福尼亚发生山火的频率是那时的5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山火季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森林中易燃的枯木干柴也越来越多。美国政府表示，这其中一半的增长要归咎于气候变化，到21世纪中叶，山火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将是现在的两倍，甚至更多。[\[6\]](#)对记得美国2020年毁灭性山火季的人来说，这难免让人感到忧虑。

额外的热量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海平面上升，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极地冰的融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海水升温后会膨胀。（金属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如果你的戒指摘不下来，可以将手指伸入温度较高的水中轻松摘下来的原因。）全球海平面整体的平均上升幅度听起来并不是很大——到2100年可能会比现在高几英尺[\[7\]](#)，但对某些地方来说，涨潮的影响会非常显著。海滨地区首当其冲，这并不意外；渗水特别严重的城市也会受到威胁。以迈阿密为例，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海水也会从排水通道里涌出来，这被称作“干季洪水”。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会有所好转。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等情景，到2100年，迈阿密周边海平面将上升近2英尺。另外，该市的一些地方正在下陷，这可能还会增加1英尺的水位。

对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海平面上升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更严重。孟加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贫困国家，它在脱贫的道路上已经取得良好的进展。但是，这个国家经常受恶劣天气的困扰：它在孟加拉湾有长达数百英里[\[8\]](#)的海岸线，大部分国土位于地势低洼、易发洪水的河流三角洲，每年都会遭遇强降雨。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使当地人的生活难上加难。在气旋、风暴潮和河流洪水的冲击下，孟加拉国20%~30%的国土经常被淹没，在这些淹没区，农作物绝收，居民家破人亡。

最后，额外的热量和导致额外热量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引用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升温2摄氏度会让脊椎动物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8%，植物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16%，昆虫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18%。[\[9\]](#)

至于我们吃的粮食，情况更为复杂，形势异常严峻。一方面，空气中存在大量的碳时，小麦和其他很多植物生长得更快，需要的水分会减少。另一方面，玉米对热量特别敏感，而玉米又是美国的主要农作物，每年产值超过500亿美元。[\[10\]](#)仅在艾奥瓦州，玉米的种植面积就超过1 300万英亩[\[11\]](#)。[\[12\]](#)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将对我们从每英亩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需要区分来看，因为这里面存在多种可能。北方地区的收成可能会增加，但大多数地区的收成会下降，下降幅度从几个百分点到50%不等。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欧洲南部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减产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可能缩短20%，另有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将出现严重的干裂现象；在贫困地区，粮食价格可能上涨20%甚至更多，而在这些地区，很多人原本就已经将超过50%的收入花在了吃饭上。中国的极端干旱可能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粮食危机。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体系在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小麦、稻米和玉米。

额外的热量对那些我们可食用的动物以及能够为我们提供奶产品的动物来说也会产生副作用，降低它们的生产能力，甚至缩短它们的寿命。反过来，这一情况会进一步抬升肉、蛋和奶的价格。依赖于海产品的地区同样会遇到麻烦，这不仅仅是因为海水变暖了，也是因为洋流出现了分岔：各海域氧气含量不一，导致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被迫迁移到不同的海域，否则就会灭绝。如

果温度上升2摄氏度，珊瑚礁可能完全消失，这相当于破坏了10多亿人的一个主要海产品来源。

要么不下雨，要么倾盆大雨

你可能觉得1.5摄氏度和2摄氏度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气候科学家对这两种情景进行模拟运行后得出的并不是好消息。在很多方面，全球升温1.5摄氏度和升温2摄氏度所造成的影响远不是33%的差别，而是近100%。与升温1.5摄氏度相比，在升温2摄氏度的情况下，受清洁水短缺影响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在热带地区，玉米将减产50%。

在气候变化引发的所有这些效应中，每一种都非常糟糕，而且一个人不会只遭受其中一种而不遭受其他，比如仅仅遭受炎热的天气或洪水，这不是气候的运行机制，气候变化的效应是叠加的——一种摞着一种。

比如，在气候变暖之后，蚊子开始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它们性喜潮湿，所以会从干燥的地方飞往潮湿的地方），结果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先前从未出现过的疟疾和其他虫媒病[\[13\]](#)病例。

中暑将会是另一个主要问题，首先它跟湿度有关。空气中只能包含一定量的水蒸气，达到上限（也就是饱和湿度）之后，它就无法再吸收更多水分。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人体的降温能力取决于空气吸收蒸发的汗液的能力。如果空气无法吸收汗液，那么无论你分泌多少汗液，你的体温都不会降下来。因为汗液无处可去，所以你的体温会一直处在高水平状态。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内，你就会死于中暑。

当然，中暑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如果天气越来越热，

空气越来越潮湿，那么中暑将演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最危险的地区，比如波斯湾、南亚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年将有数亿人面临死亡威胁。

这些效应叠加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气候变化对个体的影响。假设现在是2050年，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农场主，在内布拉斯加州种植玉米和大豆，还养牛。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你和你的家人呢？

你生活在美国中部地区，远离海岸，所以海平面上升不会对你造成直接伤害，但高温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你还是一个孩子，这里每年大概有33天的温度超过90华氏度；而今，这样的高温天气已经多达65天或70天。降水量也变得极不稳定：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年降水量约为25英寸^[14]；而今，年降水量或少至22英寸，或多至29英寸，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

或许，你已经按照炎热的天气和不可预测的雨量调整了先前的业务结构。多年前，你投资了耐热的新品种农作物，也采取了变通方法，可以让自己在一天中最糟糕的时段待在屋里。你不想在这些农作物或变通方法上投入更多资金，但问题是你找不到比它们更好的替代方案。

一天，一场强风暴不期而至，河水漫过几十年前修筑的堤坝，淹没了你的农场。在你父母的那个年代，这被称作百年一遇的洪水，但现在，你觉得这样的洪水能十年一遇就非常幸运了。大水冲走了你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你存储的谷物也完全被浸泡腐烂，你不得不把它们处理掉。理论上，你可以通过卖牛弥补这些损失，但问题是所有牛饲料也被冲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继续饲养它们。

最终，洪水退去。这时，周边的道路、桥梁和铁轨已被冲毁，不能再用。如此一来，你不仅无法将保留下来的谷物运出去，而且很难找到运输车运来下一个种植季所需的种子——当然前提是你的田地还可以继续耕种。洪灾造成的这些因素的叠加可能结束你的农场主生涯，迫使你卖掉家族几代人赖以生存的土地。

你可能觉得我挑选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尤其是那些贫困的农民，他们已经在遭受类似的灾害，几十年之后，必将有更多的人因此受到冲击。尽管这听来很糟糕，但从全球视角来看，你会发现世界上10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情况更糟糕：他们终日为生活苦苦挣扎，艰难度日，随着气候变化，他们的生活无疑将更加艰难。

现在，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印度农村地区，你们夫妻俩是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民，这意味着你们一家人几乎会吃掉你们种的所有粮食。遇到收成好的年景，可能会剩下足够多的粮食，卖掉这些粮食之后，你就可以为孩子买药或送孩子去上学了。不幸的是，热浪一波接着一波。由于这种情况太常见，你所在的村庄已经不适合居住和生活——温度连续几天超过120华氏度已是见怪不怪。除了热浪，现在田地里又多了你从未见过的害虫，两者叠加导致你种的那些农作物很难存活。虽然雨季的降水淹没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但你所在区域的降水量远低于正常年份。这样一来，获取生活用水又成了新的问题，你只得靠一条一周只开几次水的管道过活，而那里的水只是稀稀拉拉地流。现在，要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难上加难。

你早就把家中长子送到几百英里外的大城市打工，因为家里已经养不起他了。你的一个邻居因不堪生活重负而自杀。你们是应该留下来继续种地，还是应该抛弃土地搬往市区并在那里谋

生？

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决定，但世界各地面临这种选择的人不在少数，最终的结果令人悲伤。2007—2010年，叙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农区，前往城市，为始自2011年的武装冲突埋下了隐患。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发生旱灾的概率较早前高出了3倍。^[15]截至2018年，约1 300万叙利亚人为生计背井离乡。

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有人专门研究了天气冲击与欧盟庇护申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即便是中等程度的升温，到21世纪末，欧盟收到庇护申请的数量可能增加28%，至每年近45万份。该项研究还预计，到2080年，受农作物减产影响，2%~10%的墨西哥成年人会试图穿越边境进入美国。^[16]

现在，全球正在经历新冠肺炎“大流行”。让我们把这一切放入与这场疫情相关的语境，如果你想了解气候变化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那么你可以看看这场疫情，然后把它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时间（也就是它的流行期）进一步拉长。如果不消除碳排放，那么我们所要承担的后果会跟这场疫情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灾难一样。只不过，在气候变化的世界里，这样的后果会定期出现。

先从生命损失说起。会有多少人会死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又会有多少人会死于气候变化？因为我们想要比较的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事件——比如2020年的疫情和2030年（或其他时间）的气候变化，但到那个时候，全球人口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无法比较绝对的死亡人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用死亡率这一指标，即每1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

使用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然后按照一个世纪的长度计算平均值，我们可以估算出全球流行病导

致的全球死亡率：每年每10万人中约有14人死亡。

与气候变化相比如何呢？到21世纪中叶，全球升温预计会使全球死亡率增加同等比例，即每10万人中约有14人死亡。到21世纪末，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量继续维持在高水平，那么每10万人中，气候变化可能会额外造成75人死亡。

换句话说，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变得跟新冠肺炎一样致命。而到2100年，它的致命性可能达到该流行病的5倍。

就经济领域来看，形势也很严峻。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可能性影响，基于你所使用的经济模型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但结论很清楚：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相当于每10年爆发一次与新冠肺炎规模相当的流行病。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仍延续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模式，那么到21世纪末，情况会更加糟糕。[\[17\]](#)

如果你一直关注气候变化新闻，那么对于本章中的很多预测，你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但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这些问题都会更频繁地出现，它们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也会波及更多的人口。另外，也有可能发生相对突然的灾难性气候变化，比如，在受到足够高的温度影响时，地球上的大部分永久冻土层会融化，进而将原本贮藏于其中的巨量温室气体（主要是甲烷）释放出来，引发气候灾难。

尽管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我们非常清楚，等待我们的并不是好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

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可以设法把已经出现的和已经预见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降到最低。因为气候变化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而且极端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农民，所以适应气候变化是盖茨基金会农业团队的工作重点。比如，我们资助了大量的

农作物研究项目，旨在培育抗旱耐涝的新品种，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旱涝灾害的发生会更频繁，而且造成的损失将更严重。我会在第九章进一步解释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并给出一些我们在该问题上需要采取的措施。

减缓气候变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而是关于另外一件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不再向大气中增排温室气体。为避免灾难的发生，世界上的碳排放大国（一些富裕国家）必须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其他国家最终也需要实现这一目标。

富裕国家应率先实现净零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过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首当其冲的必须是我们？”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尽管这是事实），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那些建立起伟大的“零碳”企业和伟大的“零碳”产业的国家，无疑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引领全球经济。

富裕国家具备开发创新型气候解决方案的最佳条件：它们有政府资金，有研究型大学，有国家实验室，也有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初创公司，所以它们需要率先行动起来，引领发展。无论是谁取得重大能源突破，只要证明这些突破性技术能以一种可负担的价格推广到全球，那么它都会在新兴经济体中找到很多有需求的客户。

我了解很多可帮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目标的路径。在就此展开详细探讨之前，我们需要估量一下实现这一目标有多么艰难。

[1] 大多数气候变化报告都采用“摄氏度”来表示温度的变化，我在本书中也遵循这个惯例，因为大多数新闻报道使用的都是“摄氏度”。但由于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使用“华氏度”，在提及日常温度时，我会使用“华氏度”。摄氏度 = (华氏度 - 32) ÷ 1.8。

[2] 荷兰皇家气象局“气候探索者”模拟计算的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五阶段（CMIP5）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情况。温度的计量单位为摄氏度。

[3] 与1951—1980年的平均温度相比，以摄氏度为计量单位的气温变化数据出自伯克利地球组织，参见berkeleyearth.org；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计量单位为公吨，出自勒凯雷、安德鲁等人的《2019年全球碳预算》，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essd.copernicus.org/articles/11/1783/2019/>。

[4] 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5] Solomon M. Hsiang and Amir S. Jina, “Geography, Depreciation,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2015.

[6] Donald Wuebbles, David Fahey, and Kathleen Hibbard,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4: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2017).

[7]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8]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9] R. Warren et al., “The Projected Effect on Insects, Vertebrates, and Plants of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1.5°C Rather than 2°C,”*Science*, May 18, 2018.

[10] World of Corn website,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orn Growers Association, worldofcorn.com.

[11] 1英亩约为0.004平方千米。1 300万英亩约为5.2平方千米。——编者注

[12] Iowa Corn Promotion Board website, www.iowacorn.org.

[13] 虫媒病是以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的一类传染病。——编者注

[14]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15] Colin P. Kelley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Syrian Drought,”*PNAS*, March 17, 2015.

[16] Anouch Missirian and Wolfram Schlenker, “Asylum Applications Respond to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Science*, Dec. 22, 2017.

[17] 我们来看计算方法，最近的模型表明，203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

占到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5%~1.5%。而按当前的预计，2020年，新冠肺炎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占到美国GDP的7%~10%。如果我们假设类似的破坏活动每10年发生一次，那么平均下来，每年造成的损失将占美国GDP的0.7%~1%——这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大致相当。

第二章

艰难之路

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请不要因本章的标题而感到压抑。我希望我现在已经说清楚了，那就是我相信零排放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试着向你说明为什么我这样认为，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但是，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及我们需要克服哪些困难方面，如果不讲求会计诚信，我们是无法解决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的。因此，带着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的想法，其中包括加快从化石燃料到清洁能源过渡的方法，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当前面临的障碍。

化石燃料如同水资源。我是已故作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的忠实粉丝，我正在看他的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慢慢品读他写过的所有文字。2005年，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现已广为人知的精彩演讲。在演讲开头，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条小鱼在水里游，碰巧遇到一条迎面而来的年老的鱼。那条年老的鱼朝它们点了点头，然后说：“小朋友们，早上好，水怎么样啊？”两条小鱼听后继续游了一会儿，其中一条终于忍不住问另一条：“水到底是什么东西？”^[1]



图2-1 水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华莱士解释说：“在关于鱼的故事中，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那些显而易见、普遍存在和至为重要的事实往往最难以觉察，也最难以言表。”

化石燃料就是这样，它们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都难以全面了解它们（以及其他温室气体来源）对人类生活的种种影响。我发现，要在这方面讲清楚，最好还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说起。

你今天早上刷牙了吗？牙刷的主要材料是塑料，而塑料是由化石燃料石油制成的。

你早餐吃的面包、喝的麦片，其谷物原料是使用肥料种植

的，而生产肥料的过程会释放温室气体。收割谷物的拖拉机是用钢制造的，炼钢的过程会排放碳，而且拖拉机行驶烧的是汽油。再看你午餐时吃的汉堡，我中午偶尔也会吃汉堡，其所用牛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为牛在打嗝和放屁时会释放甲烷；制作汉堡胚要用小麦，在种植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也会排放温室气体。

你穿的衣服可能是棉质的，种植和采摘棉花会使用肥料和机器；也可能由聚酯纤维制成，聚酯纤维是用乙烯制造的，乙烯则来自石油。你使用的卫生纸，涉及树木的砍伐，而这一过程也会释放碳。

如果你今天上班或上学乘坐的是电动交通工具，很棒——尽管这些电力可能也是用化石燃料生产的。你乘坐的火车的运行轨道是用钢制造的，在隧道的修建过程中也会用到水泥，水泥的生产同样会用到化石燃料，也会释放碳。你驾驶的汽车或乘坐的公交车是由钢和塑料制成的，跟你在周末骑行的自行车的制造材料相同。铺设你开车走的道路会用到水泥，也会用到沥青，而沥青也源于石油。

如果你住的是公寓楼，那么你四周可能都是水泥；如果你住的是木屋，那么木材的砍伐和修剪会用到气动机器设备，而这些设备是由钢和塑料制造的。你家中或办公室里可能装有供暖系统或空调系统，它们不仅会耗费相当多的能源，而且空调设备的冷却剂也是一种强力温室气体。如果你坐的是由金属或塑料制造的椅子，那么还会造成更多排放。

另外，这些物品（从牙刷到建材）几乎都是用卡车、飞机、火车或轮船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的，这些运输工具本身都是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源，而且在制造过程中也用到了化石燃料。

换句话说，化石燃料无处不在。仅以石油为例，全球每天至少消耗40亿加仑[3]石油。无论是哪种产品，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下，人类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停用。

更重要的是，化石燃料之所以无处不在，背后有很好的理由支持——价格低廉。正如人们所说，石油比软饮料还便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还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我们来算一下：一桶石油大约42加仑，2020年下半年，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约42美元，所以每加仑石油的价格约1美元。同一时期，在Costco超市，8升装苏打水售价6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每加仑2.85美元。[4]

即便把油价波动考虑在内，结论也是一样的：作为一种产品，全球日消耗量高达40余亿加仑的石油，其价格还不及健怡可乐。

化石燃料的价格如此之低，并非没有道理。它的储量非常大，而且易于运输。我们已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全球性产业，用于化石燃料的钻探、开采、加工和运输，并通过运用不断开发的创新成果维持它的低价。显然，它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所造成的危害，也就是在提炼和燃烧过程中对气候变化、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第十章中详细讨论。

就化石燃料而言，光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广度，就已经让人眩晕了。不过，它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束手无策的地步。一方面，我们要部署已有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我们要在“零碳”能源领域实现突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找出有助于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这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使之变得和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一样低，或者两者大致相当。

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因为……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富裕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比以前活得更长，也更健康。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对汽车、道路、房屋、冰箱、计算机和空调的需求日益增长，对维持它们正常运转的能源的需求量也更大。因此，人均能源使用量将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生产我们所需的能源，需要建造相应的基础设施，比如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核电厂、电力存储设施，甚至在这个建造过程中也会涉及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每个人都将使用更多的能源，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全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21世纪末将迈上100亿的台阶，而这其中的增长大多数来自高碳排放城市。城镇化的步伐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到2060年，世界建筑存量（与建筑物数量及面积相关的一个指标）将翻一番，相当于连续40年，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见图2—2[5]）。究其原因，主要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有关（见图2—3[6]）。



图2-2 这相当于连续40年，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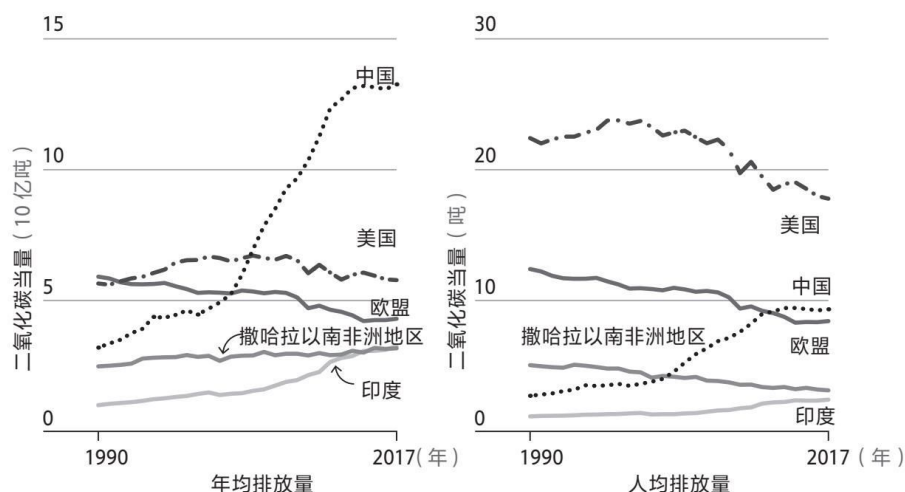


图2-3 按地区划分的排放量

注：美国、欧盟等先进经济体的排放量基本处于持平状态，甚至有所下降，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很快，部分原因是富裕国家将高排放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UN Population Division；Rhodium Group

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但对气候来说无疑是坏消息。想想看，世界上最富裕的16%的人口产生了全球近40%的排放量（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地区生产但在富裕国家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的排放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像最富有的那16%的人一样生活，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50%，而如果其他的一切未有改变，那么全球碳排放量也会增加大致相同的比例。即便富裕国家今天就能神奇般地实现零排放，也无济于事，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是会越排越多。

试图阻断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人的上升通道是不道德的，也

是不切实际的（见图2—4[7]）。我们不能因为富裕国家已经排放太多的温室气体就要求贫困群体一直穷下去，更不要说即便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也做不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创造条件，在不加剧气候变化问题的情况下，让低收入群体沿着经济阶梯向上攀爬。我们需要尽快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甚至要生产比现在还要多的能源，但前提是必须不再向大气中增排任何碳。



图2-4

注：很多农民仍采用古老的耕作方式，这也正是他们身陷贫困泥潭的原因之一。他们应该得到现代化的装备和技术，但从当下情况来看，使用这些工具意味着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

不幸的是.....

历史并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仅从早前能源转型所用的时间来看，“尽快”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从依赖一种能源转向依赖另一种能源，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持续几十年。（关于这个话题，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是瓦科拉夫·斯米尔的《能源转型》和《能源神话与现实》。）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是我们自己的肌肉，是可以帮我们干活的动物——比如那些用来拉犁的，以及我们燃烧的植物。19世纪90年代末之前，化石燃料在世界能源消耗中的占比还未超过50%。中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成这一能源转型。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地方，这一转型甚至还没开始。[\[8\]](#)

你可以想一下，石油在人类能源供应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花费了多长时间。[\[9\]](#)要知道，石油的商业化生产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半个世纪之后，它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比例仅为10%。这之后又过了30年，这个数字才达到25%。

天然气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1900年，它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为1%，而把这一数字提升到20%，用了70年。核裂变比它要快得多，从无到有，到占比10%，总共用了27年。[\[10\]](#)

图2—5显示了人类生活中的不同能源在60年间的增长情况：1840—1900年，煤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从5%上升到近50%；1930—1990年，天然气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才达到20%。[\[11\]](#)简而言之，能源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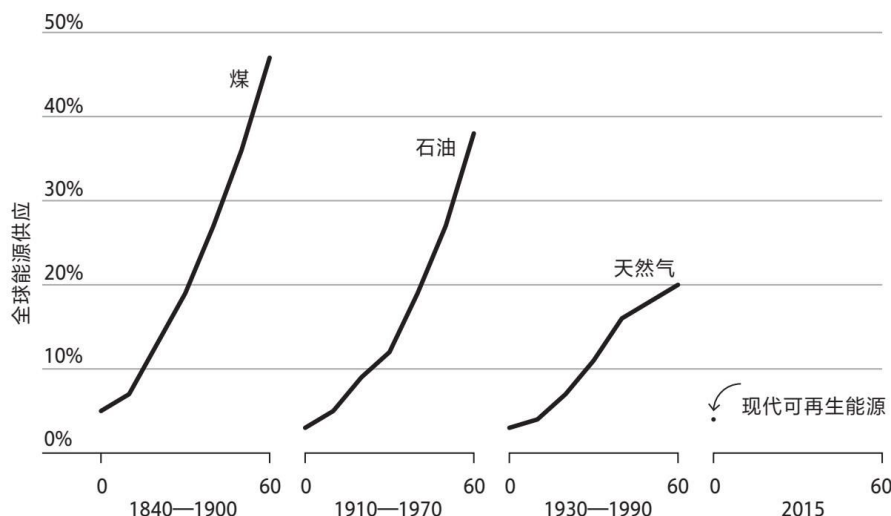


图2-5 新能源的采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资料来源：Vaclav Smil, *Energy Transitions*

燃料源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采用新型交通工具方面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内燃机是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而让50%的城市家庭拥有汽车用了多长时间呢？美国用了三四十年，欧洲用了七八十年。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能源转型是由先前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的东西驱动的。过去，我们之所以从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能源，是因为新能源的价格更低廉，因此转换动力更大。比如，我们不再燃烧数量庞大的木柴转而开始大量烧煤，原因就在于1磅[12]重的煤提供给我们的光和热远超1磅重的木柴。

举一个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例子，美国电力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天然气，煤的用量则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新的钻探技术大大降低了开发天然气的成本。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环境问题。其实，天然气和煤孰优孰劣，取决于二氧化碳当量的计算方

式。部分科学家宣称，天然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大于煤，这与天然气在加工过程中的泄漏程度有关。[\[13\]](#)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然会转向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放任其自行发展，我们就无法达到期望的转型速度。再者，我们会在第四章中看到，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也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能源转型。这就在公共政策和技术等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恰恰是我们从未应对过的。

为什么能源转型需要如此漫长的过程？

燃煤电厂跟计算机芯片厂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听说过摩尔定律——戈登·摩尔在1965年预测微处理器的能力每隔两年会提升一倍。事实证明戈登是对的，而摩尔定律也是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一路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处理器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可以开发更好的软件，它驱动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对计算机需求的增加又为硬件公司提供了持续改进机型的动力，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持续开发更好的软件。如此循环往复，也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环。

摩尔定律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硬件公司一直在寻找制造晶体管（驱动计算机的微型开关）的新工艺，以不断缩小它们的尺寸，这样就可以在单一芯片上封装更多的晶体管。人们今天制造的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是1970年制造的计算机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100万倍，因而其性能也强大了100万倍。

你有时会听到人们引述摩尔定律作为理由，认为人类在能源领域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指数级进步。如果计算机芯片可以以如此快的速度取得如此大的进步，那么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不能呢？

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确不能。计算机芯片是个例外，它们的性能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可以把更多晶体管封装在单一芯片上的方法，但我们无法通过技术突破让汽车的耗油量降到先前的百万分之一。我们来看一下亨利·福特的生产线：第一台T型车是1908年下线的，每加仑汽油行驶里程约为21英里。在我撰写本书时，市场上顶级的混合动力汽车，每加仑汽油可行驶58英里。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燃油经济性的提升不到此前的3倍。

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也没有提升100万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时，其光电转换率约为15%，今天这个数字大概是25%。进展很大，但你很难说它符合摩尔定律。

能源行业无法像计算机行业一样实现快速变革，技术只是原因之一，还涉及规模问题。能源行业规模巨大，也是全球最庞大的业务之一，其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任何大而复杂的事物都会抗拒变革，自觉或不自觉地，我们在能源行业内养成了很强的惰性。

我们对比看一下软件行业是如何运营的。在软件行业，你的产品不需要任何监管机构批准。即便你发布了一款不甚完美的软件，但只要它的净效益足够高，客户依然会对其给予热烈回应，并积极给出改善意见。而且，在这个行业，成本几乎都是预付成本，完成一款产品的开发之后，生产更多该产品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我们再看看药品和疫苗行业。新药上市远比新软件上市难。事情本就应该这样，如果药品损害身体健康，那么其后果比存在缺陷的应用软件要严重得多。一种新药在最终被用到病人身上之前涉及基础研究、药物开发、药物测试的监管批准等诸多步骤，

这一路下来需要很多年。然而，一旦证明新药是有效的，那么在之后的成药制造过程中，其成本极其低廉。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行业同能源行业进行比较。首先，在能源行业，你要投入庞大的资本成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设你花10亿美元建了一座燃煤电厂，那么接下来你再建一座燃煤电厂，其成本不会有丝毫的减少。你的投资者拿出这些钱是期望建起来的电厂能运营30年乃至更长时间，如果在该厂运营到第10个年头时有人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技术，你是不会打算就此关掉旧厂进而再建一座新厂的。你至少没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比如巨大的财务回报或政府监管机制的强制要求。

其次，我们这个社会对能源行业的风险容忍度很低。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可靠的电力。在用户每次按动开关时，电灯最好立刻就能亮起来。我们还担心灾难，事实上，对安全的担忧几乎扼杀了美国新建核电厂的计划。自三里岛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以来，美国仅建设了两座核电厂——尽管一年之中死于燃煤污染的人比死于所有核事故的人的总和还要多。

在坚持固有事物方面，人类有着强烈且可以被理解的动机，尽管我们知道这一事物是致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些动机，进而打造一个能源体系，使之全面涵盖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比如可靠性和安全性），并摒弃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这并非易事，因为……

我们的法律法规已经严重过时。“政府政策”这个词并不会让人产生一种火烧眉毛的紧迫感。但毋庸置疑，政策（从税收条例到环境法规的一切政策）对人类和企业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除非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我们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这里讲的是美国的情

况，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很多国家。）

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今很多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在起草时并没有把气候变化考虑在内，它们的施行是为了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试图用它们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比用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尝试开发人工智能。

比如《清洁空气法》，这是美国政府制定的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最知名的法律，但它几乎没有提及温室气体。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它最初是在1970年通过的，目的是减少当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而不是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全球温度。

再比如被称作“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该标准是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因为当时油价大幅飙升，美国人希望开上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燃油效率高是好事，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大电动车的推广力度，在这方面，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它不是为此设计的。

过时的政策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应对气候和能源问题的策略一直在围绕选举周期变化。每隔4~8年，入主华盛顿的新政府就会提出自己的能源优先事项。优先事项的改变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每届新政府都会这样做。问题是，这会严重影响那些依靠政府拨款的研究人员，也会严重影响那些依赖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家。如果每隔几年就不得不停下手上的工作，再从头开始另外的研究，那么不管是什么项目，都很难取得真正的进展。

另外，选举周期还在私人市场中创造了一种不确定性。政府提供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旨在推动更多公司开展突破性的清洁能源研究。但这些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因为能源创新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很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修成正果。为了一个创意，你可能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你原本指望的激励政策却全被废除了。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当前的能源政策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把所有有案可查的联邦政府政策和州政府政策汇总起来，然后把它们在2030年前可贡献的减排量相加，看看它们的影响有多大。合计起来，这个数字是3亿吨，约为美国2030年预计排放量的5%。这没有什么可嘲讽的，但话说回来，仅仅依靠现有的政策，并不足以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14]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拿出可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和《清洁空气法》均发挥了它们所应发挥的作用：汽车燃油效率提高了，空气也变得更清洁。目前，在与排放相关的领域，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颇为有效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之间并不具有关联性，从整体效果看，它们也还不足以对气候问题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

虽然我相信我们可以改变现状，但这必然是一条艰难之路。首先，修改现有法律比引入一部重要法律容易得多。从新政策的制定到公众意见的获取，从与法律挑战相关的法院裁定到政策的最终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不用说现在还存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

人们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大约97%的科学家的共识——在他们看来气候正在因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确，仍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被科学说服，而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强有力的声音，甚至是与政治相关的声音。但即便你接受气候变化的事实，也未必就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应当大规模投资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突破性技术。

比如，有人会说：“是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但这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钱去阻止或适应这种变化。相反，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到那些对人类福祉影响更大的事项上，比如健康和教育。”

对于这样的论调，我的回应是：除非我们迅速实现零排放，否则糟糕的事情（或许有很多）极有可能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则会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即便气候没有恶化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它也会让大多数人的境况变得更糟，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更甚，他们会更加穷困。在我们停止向大气中增排温室气体之前，这种情况会持续恶化。因此，它理应受到与健康和教育同等程度的重视。

我们常听到的另一个论调是这样的：“是的，气候变化是真的，它的影响也是糟糕的，但我们有阻止它的一切手段。凭借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其他一些工具，我们足以应对气候变化。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是看我们有没有意愿部署这些工具。”

在第四章到第八章中，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不认同这一观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是具备一些所需的工具，但还远远不够。

在建立气候共识方面，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众所周知，国际合作是个大难题，无论涉及什么事情，要让世界各国达成一致很难，特别是当这些事情会产生新的成本时，比如控制碳排放的开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为碳减排买单，除非其他国家都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就此而言，《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简称“巴黎协定”）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超过190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旨在限制排放的协定。所以说它意义重大，并不是因为现有的承诺将实现大幅度减排（如果各国都兑现了各自的承诺，

那么到2030年，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可减少30亿~60亿吨，尚不及当前总排放量的12%），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起点——一个证明全球合作存在可能性的起点。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的事实表明，维持全球契约跟当初建立全球契约一样困难重重。新一任美国总统拜登后来又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15]

总之，我们需要以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快速度完成一项从未遇到的艰巨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实现众多突破。我们需要着手建立新的共识，并制定新的公共政策，推动若非如此就不会出现的转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能源体系，既能阻止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又能帮助我们去做我们喜欢的东西——换言之就是在不变中寻求彻底改变。

切勿绝望。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们已经有很多想法，其中也包括一些很有前景的想法。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会解释我是如何区分这些有前景的想法的。

[1] 可以通过网站搜索阅读这篇题为“这就是水”的演讲稿，内容非常棒。

[2] 图片来源：dem10/E+ via Getty Images and lessydoang/Room via Getty Images.

[3] 1美制加仑约等于3.79升。——编者注

[4]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gov.

[5] 图片来源：Paul Seibert.

[6] 温室气体的计量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公吨，数据来自荣鼎咨询。该图采用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数据，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7] 图片来源：©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Prashant Panjiar.

[8] Vaclav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2010), 136–37.

[9] Vaclav Smil, *Energy Myths and Realitie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2010), 138.

[10] Vaclav Smil, *Energy Transitions* (2018).

[11] 现代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现代生物燃料。Vaclav Smil, *Energy Transitions* (2018).

[12] 1磅约为0.45千克。——编者注

[13] Xiaochun Zhang, Nathan P. Myhrvold, and Ken Caldeira, “Key Factors for Assessing Climate Benefits of Natural Gas Versus Co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Nov. 26, 2014, iopscience.iop.org.

[14] Rhodium Group analysis.

[15] 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2021年1月13日，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重回《巴黎协定》。——编者注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

在刚开始研究气候变化时，我总是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事实。一个问题是各种数字太大了，大到令人难以想象。谁知道510亿吨气体是什么样子？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看到的数字往往缺乏上下文，没有相关背景可查。比如，有一篇文章称，欧洲的一项碳交易计划每年可使航空部门的碳足迹减少1 700万吨。1 700万吨听起来的确很多，但果真如此吗？它在总量中的占比是多少？这篇文章并没有说，类似的遗漏情况可谓司空见惯。

最终，我为我正在学习的知识建起了一个思维框架，这个框架让我明白了多少是很多、多少是很少、某个东西可能有多贵，等等。它帮我梳理出最具前景的想法。我发现这个方法大有帮助，对于我深入探讨的每个新话题几乎都有帮助：我先试着掌握了整体情况，因为这可以让我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便于我理解新的信息。另外，这也让我更容易记住这些信息。

我提出的这个包含5个问题的框架至今仍派得上用场——无论是听取能源公司的投资计划还是跟朋友在后院烧烤时讨论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读到有关气候解决方案的评论性文章，肯定也会听到政客兜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这些都是可能让人感到困惑的复杂问题。我的这个框架会帮助你厘清思路、直抵要害。

1.我们谈论的吨数在510亿吨中占多大比例？

每当读到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关的数字时，我都会迅速换算一下，看看它在总计510亿吨的年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于我而言，这比那些经常看到的其他类型的比较更明确、直观，比

如“这么多吨相当于在路上少开一辆车”，谁知道一开始路上有多少辆车？或者，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少开多少辆车？

我更喜欢把一切同一年消除510亿吨温室气体的主要目标联系起来。你不妨想一想我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航空部门的例子，那项计划一年可减少1 7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用这个数字除以510亿吨后换算成百分比，这一幅度的减排量约占全球年排放量的0.03%。

这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答案取决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还是保持不变？如果该项目的起始点是1 700万吨，后续还有巨大的减排潜力，这是一回事；如果该项目只能维持1 700万吨的量，而且之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令人遗憾的是，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我阅读有关这个航空项目的文章时，我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为突破能源联盟资助的技术项目设定了门槛：在相关技术研发成功和全面实施之后，每年至少可以减少5亿吨的排放量，约为全球年排放量的1%。减排幅度永远都达不到1%的技术，不应该占用我们为实现零排放目标而安排的有限资源。对于这类技术的研发，可能还有其他很好的理由，但其中并不包括可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顺带提一句，你可能看到过用以表述温室气体量的单位——千兆吨（gigaton），1千兆吨是10亿吨（如果你更喜欢科学计数法，那这个数就是 10^9 吨）。我不认为大多数人能直观地了解1千兆吨气体是什么概念。另外，消除51千兆吨听起来比消除510亿吨要容易——尽管这两个数字一样大。我会继续使用10亿吨这个单位。

小贴士：无论何时，当看到与温室气体相关的吨数时，你都要把它转换成占年总排放量510亿吨（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百分比。

2.你在水泥方面有什么计划？

在谈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时，你需要考虑人类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些东西（比如电力和汽车）会受到较多关注，但它们只是话题谈论的浅层次。乘用车在交通运输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不到50%，交通运输排放总量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的占比仅为16%。

相比之下，钢和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的比例达到10%左右。因此，在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时，问“你在水泥方面有什么计划”只是一个提醒，让你知道你要考虑的远不止电力和汽车。

表3—1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人类活动的细分情况。[\[1\]](#)不是每个人都会采用与之完全相同的分类，但我认为这种细分是最有帮助的。这也是突破能源联盟所采用的细分方法。

表3-1源于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占比

生产和制造（水泥、钢、塑料）	31%
电力生产与存储（电力）	27%
种植和养殖（植物、动物）	19%
交通运输（飞机、卡车、货船）	16%
取暖和制冷（供暖系统、冷却系统、制冷系统）	7%

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意味着所有这些类别都要归“0”。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电力生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刚刚超过四分之一。在最初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也吃了一惊：因为我读过的大多数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都把重点放到了发电上，这也让我觉得它一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罪魁祸首。

好消息是，尽管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27%，但它所代表的解决方案的作用远超27%。有了清洁电力，我们就可以不再用碳氢化合物作为燃料。要知道，燃烧碳氢化合物会释放二氧化碳。想一想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我们家中和公司里的电力供暖系统和电力制冷系统，以及用电力而不是天然气生产产品的能源密集型工厂。仅靠清洁电力本身，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清洁电力是关键一环。

小贴士：记住，温室气体排放源于5种不同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领域，我们都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3.我们谈论的电能有多大？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与电力有关的文章中。你可能会看到某座新建的电厂发电量将达到500兆瓦，这个产能规模很大吗？兆瓦到底是什么？

1兆瓦等于100万瓦特，而1瓦特等于1焦耳每秒。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知不知道焦耳无关紧要，记得它是个能量单位就行了——就是一点点的能量。你可以这样想：如果要测量厨房水龙头

的水流大小，可能会计算每秒流出了多少杯水。电力测量与之大同小异，只不过测量的是能量的流动，而不是水的流动。在这里，瓦特相当于“杯每秒”。

1瓦特是非常小的，一枚小小的白炽灯的功率为40瓦特，电吹风的功率为1 500瓦特。一座电厂可能会生产数亿瓦特。世界上最大的发电站——中国的三峡大坝，可以生产220亿瓦特。（记住，1瓦特的定义中已经包含了“每秒”，所以不存在瓦特每秒或瓦特每小时等说法。瓦特就是瓦特。）

因为这些数字增长很快，所以使用一些简略的表达方式是很方便的。千瓦（KW）表示1 000瓦特，兆瓦（MW）表示100万瓦特，吉瓦（GW）则表示10亿瓦特。你经常会在新闻中看到这些缩写，所以我在本书中也采用了这种表述方式。

表3—2是一些粗略的对比，有助于提供一种直观印象。[\[2\]](#)

表3-2它需要多少电能

全球	5 000GW
美国	1 000GW
中等规模城市	1GW
小城镇	1MW
美国普通住宅	1KW

当然，无论是以天还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这些类别当中都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家庭的用电就是比其他家庭多。在有的季节，美国纽约市的用电超过12吉瓦。人口超过纽约市的日本东京平均季度用电为23吉瓦，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甚至超过50吉

瓦。

假设你想给一个需要1吉瓦的中等规模城市供电，就建设1吉瓦的发电站，你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电力供应正常吗？不一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用的电源是什么，因为有的电源的波动性大于其他电源。核电厂可以连续24小时运营，只有在维修保养和换料时才会关闭。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在吹，阳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风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的有效容量可能只有30%，甚或更低。平均而言，它们会生产你所需的30%的电力。这意味着你还需要利用其他电源才能将这1吉瓦的可靠电力的缺口补齐。

小贴士：当你听到“千瓦”的时候，想一想“住宅”；听到“吉瓦”的时候，想一想中等规模城市。听到“100吉瓦”或“超过100吉瓦”的时候，想一想“富裕大国”。

4.你需要多大的空间？

有些电源比其他电源更占空间，所以考虑这个问题很重要，原因也很明显：全球土地和水资源有限。当然，空间远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我们应该经常谈论的重要问题。

在这里，功率密度是一个相关数，是指在给定数量的土地（或水域，如果你在海上装有风力涡轮机的话）上不同电源可产生的功率（见表3-3）。

表3-3每平方米土地（或水域）所能产生的功率

能源	瓦特 / 平方米
化石燃料	500~10 000
核能	500~1 000
太阳能 *	5~20
水能（大坝）	5~50
风能	1~2
木材和其他生物质能	低于 1

*理论上讲，太阳能的功率密度可达到100瓦特/平方米，不过至今还没有实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的功率密度远高于风能。如果想使用风能而不是太阳能，那么同等条件下需要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孰优孰劣，而是说使用它们有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小贴士：如果有人告诉你某种电源（风电、太阳能电力、核电等）可以供应全世界所需的能源，那么你要计算一下，生产这么多能源需要多大空间。

5.这需要投入多大成本？

全球之所以会排放如此多的温室气体，原因就在于现有的能源技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当然前提是忽略了它们造成的长期损害。所以，要将庞大的能源经济从造成污染的、产生碳排放的技术转向零排放技术必然要投入一些成本。

成本有多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给出差价。如果分别有一个造成污染的能源技术和一个清洁的能源技术，两者本

质上又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它们的价格。

相比于化石燃料解决方案，大多数“零碳”解决方案成本投入更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化石燃料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使它们看起来比“零碳”解决方案更经济。（我会在第十章中进一步探讨碳定价及其挑战问题。）这些额外的成本，即我所称的“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s）。[3]

在每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绿色溢价都会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时常提到这个概念，所以我想先在这里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绿色溢价不止一种，它包括很多种：针对电力的溢价，针对各种燃料的溢价，针对水泥的溢价，等等。绿色溢价的规模取决于你要替代的是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来替代它。比如，“零碳”航空燃油的成本同太阳能电力的成本并不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绿色溢价是如何在实践中运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国内航空燃油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2.22美元，在可获得的情况下用于飞机的先进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5.35美元，那么“零碳”燃料的绿色溢价就是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每加仑3.13美元，溢价幅度超过140%。（我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解释。）

也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绿色溢价为负值，也就是说，转向绿色能源可能比坚持使用化石燃料成本更低。比如，依据居住地的不同，用电热泵系统取代天然气炉和空调系统可能会让你省钱。在奥克兰，采用电热泵系统可帮你节省14%的开支，而在休斯敦，这个数字是17%。

你可能会想，绿色溢价为负值的技术肯定早已经被世界各地采用。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在新技术的引入和新技术的部署

之间通常存在滞后性，尤其是像家用炉一类的设备，居民更换频率并不是很高。

在计算出所有重大的“零碳”选项的绿色溢价后，就可以在各类物品的权衡取舍方面展开严肃的对话了。我们愿意为绿色环保投入多大成本？我们会购买价格是航空燃油的两倍的先进生物燃料吗？我们会购买价格是传统水泥的两倍的绿色水泥吗？

顺便说一句，当我问“我们愿意投入多大成本”时，这里的“我们”是指全球意义上的我们，并不仅仅提问美国人和欧洲人能够承担什么。你可以设想一下，对于一种绿色溢价极高的能源，美国可能愿意也有能力支付，但发展中国家呢？未必有支付能力。我们需要的是非常低的溢价，低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脱碳”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可否认，绿色溢价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指标，对它们的估算涉及很多假设。比如在本书中，我就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合理的假设，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会给出不同的假设，进而得出不同的数值。比具体价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种特定的绿色技术的成本是否与其基于化石燃料的同等技术的成本相近，而对于那些成本相差太大的技术，要想一想怎样才能通过创新的方式压低它们的价格。

我希望本书中的绿色溢价能为一场关于“零碳”能源成本的长篇对话拉开序幕，希望大家各自计算一下绿色溢价。如果结论是某些绿色溢价并没有我计算得出的那么高，我会特别高兴。我在本书中计算的绿色溢价是一个用于成本比较的非完美工具，但即便它不完美，也总比没有工具强。

就像一个神奇的透镜，绿色溢价在决策领域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会得到充

分的利用。通过了解各种不同的绿色溢价，我们可以决定现在应该部署哪些“零碳”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应该在哪些领域追求突破，因为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的成本在这些领域内还不够低廉。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

哪些“零碳”解决方案是我们现在应该部署的？

绿色溢价低的或根本就没有绿色溢价的“零碳”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还没有部署这类解决方案，就说明成本并不是推广壁垒，阻碍我们做出大规模部署的障碍在其他方面，比如过时的公共政策或缺乏应有的意识。

我们的研发投资、我们的早期投资者、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发明家应该专注于哪些领域？

绿色溢价过高的领域。这些领域存在的额外绿色成本会阻碍我们的“脱碳”行动，因而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擅长研发的国家可以创造新产品——可负担的新产品，然后把它们出口到无力支付当前溢价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一来，在避免气候灾难问题上就不会有人争论是否每个国家都在尽自己的责任。相反，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将加大竞争，着力创造和推广可负担的创新产品，进而推动零排放目标的实现。

关于绿色溢价理念，我再讲最后一个好处：它可以作为一个测量体系，展示人类在阻止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进展。

同时，绿色溢价让我想起了梅琳达和我刚开展全球健康工作时遇到的一个问题。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每年有多少儿童死亡，但并没有说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儿童死于痢疾，但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患上痢疾。如果我们

不知道儿童的死亡原因，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创新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呢？

为此，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道资助各种研究，力求找出导致儿童死亡的原因。最终，我们追查到了与儿童死亡相关的更多信息，而这些信息为我们实现重大突破指明了道路。比如，我们发现肺炎是造成每年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之一。虽然市面上已经有肺炎疫苗，但由于它的价格过高，贫穷国家不会采购它。（他们几无采购动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死于这种疾病。）不过，在看到相关数据及捐助者同意支付大部分费用后，这些国家马上将该疫苗列入其卫生计划。之后，我们又资助研发了一种更便宜的疫苗，现已被世界各国采用。

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绿色溢价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计算得出各种能源的绿色溢价后，我们可以从排放量的原始数据中得出不同的洞见。如果单看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只知道人类距离零排放的目标还有多远，而无从得知实现这个目标有多么艰难。使用现有的“零碳”工具要负担多大的成本？哪些创新对排放量的影响最大？针对这些问题，绿色溢价给出了答案，并对各部门实现零排放的成本进行测算，着重指出了我们需要开展创新的领域——就像相关数据显示我们需要大力推广肺炎疫苗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我前文中提到的航空燃油的例子，估算绿色溢价的直接方法其实很简单。但如果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有直接绿色当量，比如“零碳”水泥（至少现在还没有）。如果缺乏直接绿色当量，我们该如何弄清“零碳”解决方案的成本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思想实验：“直接从大气中把碳吸走，需要付出多少成本？”这个想法其实有一个名字，前文也提到过，

即“直接空气捕获”。（简而言之，直接空气捕获就是让空气吹过一个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设备，然后再把二氧化碳作为浓缩气体收集起来。）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是一项昂贵的技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尚未得到验证的技术，但如果它能被大规模应用，那么无论二氧化碳在何时何地产生，我们都可以捕获它。目前，在瑞士投入运行的一座直接空气捕获设施，可能正在吸收10年前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座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

要计算这项技术的成本，我们只需要两个数据点：一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是利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吸收温室气体的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510亿吨，至于从空气中消除1吨碳的成本，还无法完全确定下来，但清除每吨碳至少要花费200美元。通过某种创新，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降到100美元，这是切实可行的。所以，我在这里使用每吨100美元这个数字。

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等式：

$$510\text{亿吨/年} \times 100\text{美元/吨} = 5.1\text{万亿美元/年}$$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还在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如果要利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解决气候问题，每年至少需要投入5.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与关闭各经济部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相比（就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做的那样），采用这一理论上的技术，我们付出的成本其实低得多。荣鼎咨询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所承担的消除每吨碳的成本为2 600~3 300美元；在欧盟，该成本超过4 000

美元。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我们期望达到的每吨100美元的25~40倍。[4]

正如前文提到的，基于直接空气捕获的“脱碳”技术其实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在现实中，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尚未做好在全球部署的准备，即便做好了这种准备，在解决全球碳问题方面，它也是一种极为低效的方法。我们能否安全地存储数千亿吨碳，不得而知。另外，我们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筹集每年高达5.1万亿美元的资金，或确保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是在责任分担问题上，也会引发严重的政治斗争）。仅是为应对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我们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超过5万座直接空气捕获工厂。再有就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并不适用于甲烷或其他温室气体，它只能用于处理二氧化碳。这很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在源头就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本会低得多。

即便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最终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要知道，在技术问题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一点也几乎是肯定的，其开发和部署速度并不足以阻止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可怕损害。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我们不能仅仅坐等某种未来技术来拯救我们，就比如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我们现在就要为拯救自己行动起来。

小贴士：牢记绿色溢价，同时要问它们是否已经低到让中等收入国家愿意支付的水平。

以下是上述全部5个小贴士的总结：

1.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吨数转换为占总排放量510亿吨的百分比。

2. 记住，我们需要为5种产生温室气体的活动寻找解决方案：电力生产与存储、生产和制造、种植和养殖、交通运输、取暖和制冷。

3. 千瓦 = 住宅，吉瓦 = 中等规模城市，数百吉瓦 = 富裕大国。

4. 考虑一下你需要多大的空间。

5. 牢记绿色溢价，同时要问它们是否已经低到让中等收入国家愿意支付的水平。

[1] 这些百分数代表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占比。对不同来源的排放量进行分类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对于那些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均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要采取何种计算方法。比如，炼制汽油时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后期燃烧汽油时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在本书中，我把生产和制造部门产生的所有排放量放入了“生产和制造”一类，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则被归入各自相应的类别。由此，炼制汽油就被归入“生产和制造”，燃烧汽油则被归入“交通运输”。对于汽车、飞机和轮船，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分类，制造它们所用的钢的排放被归入“生产和制造”，它们使用燃料过程中的排放则被归入“交通运输”。

[2] 表中数字为平均用电量，高峰需求会更高。比如，2019年，美国的用电高峰需求达704吉瓦。更多信息参见the U.S. Energy Administration website (www.eia.gov)。

[3] 我同很多人探讨过绿色溢价问题，包括荣鼎咨询和进化能源研究公司的专家，以及气候科学家肯·卡尔代拉（Ken Caldeira）博士等人。关于本书中绿色溢价的计算，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breakthroughenergy.org。

[4] Taking Stock 2020: The COVID-19 Edition, Rhodium Group, <https://rhg.com>。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总排放量

27%

“零碳”电力的十大创新举措。

我们热爱电力，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电力。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确保路灯、空调、电脑和电视时刻都能工作；它为各种工业工艺提供动力，而对于这些工艺，我们大多数人平时并不在意。然而，就像生活中有时发生的那样，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重要。在美国，断电非常罕见，以至于人们都还记得自己10年前因停电而被困电梯里的场景。

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多么依赖电力，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它是多么重要。我真的很感激人们为实现这一奇迹付出的一切。其实，平心而论，我对所有的物质基础设施都感到敬畏，因为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电力价格如此低廉、如此普遍地存在又如此可靠。在富裕国家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打开开关，灯就会亮起来，而这只需要支付极少的费用。说它神奇，一点儿也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讲，在美国，一个40瓦的灯泡持续亮一个小时，只需要支付0.5美分。

在我们家中，我并不是唯一对电力有此感触的人：我和儿子罗里经常参观发电厂（见图4-1[1]），这纯粹出于兴趣，我们就是想知道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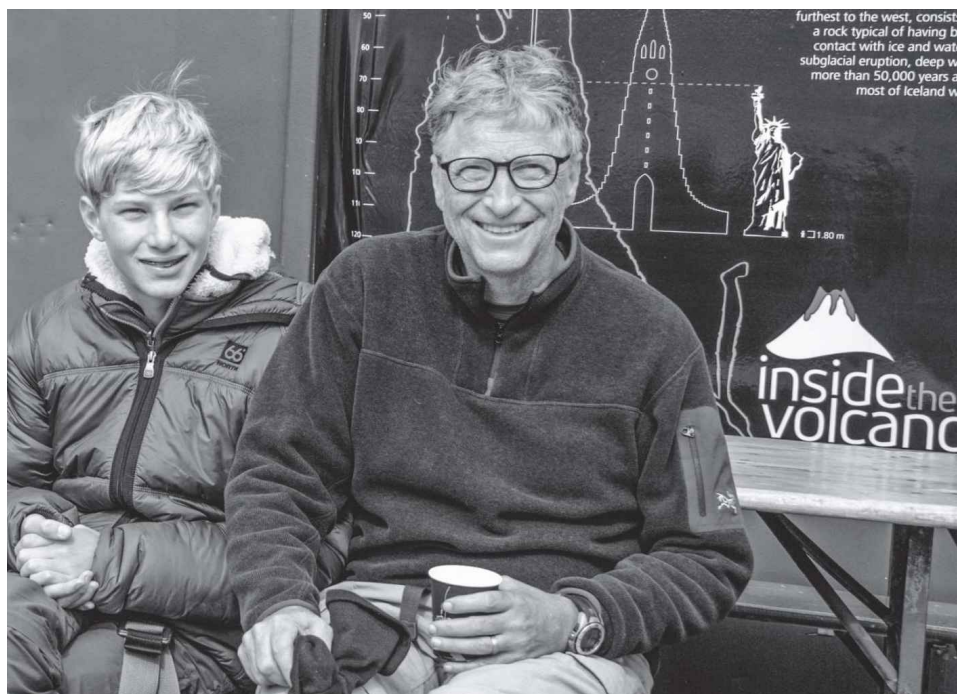


图4-1 2015年，我和家人前往冰岛的瑟利赫努卡吉格尔火山观光。随后，我陪罗里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厂

我很高兴自己投入那么多时间来学习电力知识。首要的一点是，这是一项很棒的亲子活动。（我是认真的。）另外，要想避免气候灾难，弄清楚如何在不释放温室气体的情况下获得廉价而可靠的电力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力生产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获得了“零碳”电力，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帮助处理其他很多活动的碳排放，比如交通运输和生产制造。我们如果不使用煤、天然气和石油，那么势必会失去一部分能源，而要想把它们补回来，清洁电力将是主要来源。这就是我首先论述电力的原因，尽管制造业部门产生的排放量超过了电力部门。

此外，应该有更多的人获得和使用电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家中用上可靠电力的人口尚不足总人口的一半（见图4-2[2]）。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电可用，那么即便是给手机充电这种看似简单的任务也很难达成，而且花费高昂。你必须去外面的商店，支付25美分乃至更多，才可以给手机充电，而这个价格是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手机充电所支付的金额的数百倍。



图4-2 全球有8.6亿人没有用上可靠的电力

资料来源：IEA

我并不期望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对电网和变压器感兴趣。（我想，如果你写出了“我对物质基础设施感到敬畏”这样的句子，那你一定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书呆子。）但我认为，如果人们都停下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是如何获得的，那么自然会更珍视这些服务，而且也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放弃这些服务。未来，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实现“零碳”电力，它们都必须跟当前我们所用的方法一样——既可靠又让我们负担得起。

在本章中，我想要解释的是，在不产生碳排放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继续从电力这种廉价且随时可用的能源中获取我们想要的所有服务，并让更多的人享有这些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未来的发展之路讲起。

时至今日，电力已是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在

进入20世纪几十年之后，它才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早期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煤、石油或天然气，而是水——以水力发电的形式获得。

水力发电有很多优势，比如价格相对便宜，但也存在一些重大弊端，比如修建水库涉及当地社区的搬迁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且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如果土壤里存有大量的碳，那么它会转化成甲烷，最终逃逸到大气中。[\[3\]](#)有研究表明，一座大坝在修建之初的50~100年可能是一个比燃煤更糟糕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当然这还取决于修建大坝的地点。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大坝需要运行多长时间才能抵消修建过程中排放的所有甲烷。[\[4\]](#)另外，大坝的发电量受季节影响，因为雨季和旱季的河流水流量大小不同。当然，水力发电站的选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在有河流的地方建大坝。

化石燃料则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从地下开采出煤、石油或天然气后，运送到发电厂作为烧水的燃料，然后利用沸水的水蒸气驱动涡轮机发电。

基于化石燃料发电的优势，在美国，当电力需求在“二战”后爆发式增长时，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石燃料的发展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新建的发电厂装机容量中，化石燃料占了大头——总计约700吉瓦，是“二战”前发电厂装机容量的近60倍（见图4-3[\[5\]](#)）。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价越来越低。一项研究发现，1900年的电价至少是2000年的200倍。今天，美国电力部门的开支仅占美国GDP的2%。想一想我们对电力的依赖程度，相比之下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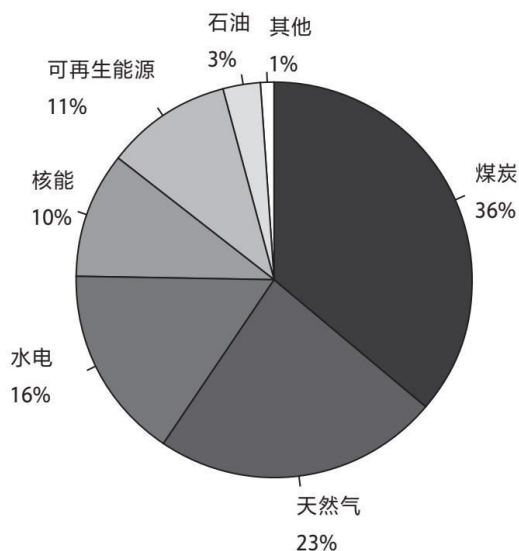


图4-3 化石燃料发电占全球发电量的三分之二，实现清洁电力并非易事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电价之所以如此低廉，主要是因为化石燃料便宜。它们是广泛可用的资源，而且人类已经具备更好、更高效的开采和发电技术。另外，政府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维持化石燃料的低价格，并鼓励加大生产。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一直采取这种做法：国会于1789年率先推出了有关煤炭进口的保护性关税政策。19世纪初，在意识到煤炭对铁路行业的重要性之后，美国开始免除部分税收，并采取措施激励煤炭生产（见图4-4[7]）。在1913年确立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美国允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在收入所得中扣除特定费用，而这其中就包括钻探成本。1950—1978年，美国用于支持煤炭和天然气生产企业的各项税式支出总计约420亿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而且这些税收优惠措施至今仍在施行。[8]另

外，在租赁联邦土地方面，煤炭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也享有政策优惠。



图4-4 宣传页上的煤炭设施

注：地点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康奈尔斯维尔，时间可追溯到1900年左右。

美国并非特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维持化石燃料的低价格。据国际能源署估算，2018年全球政府在化石燃料消费领域的补贴总计多达4 000亿美元，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化石燃料在电力供应中一直占有稳定的比例。^[9]燃煤发电量在全球电力供应中所占份额（约40%）已经30年没有发生变化，石油和天然气发电量占比约26%，同样是30年没有发生变化。总之，化石燃料提供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电力。与此同时，

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占比约7%。

截至2019年年中，全球在建燃煤电厂总装机容量约236吉瓦。煤和天然气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选燃料，其需求在过去几十年里呈急剧上升趋势。2000—2008年，中国的煤电装机容量增加了两倍，总装机容量超过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总和。

我们能否扭转这一局面，在不产生任何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所有电力？

这取决于你说的“我们”指谁。如果采取合适的政策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并大力推动相关领域的创新，那么美国可以很快接近这一目标，但全世界都能得到“零碳”电力吗？这就难得多了。

让我们从美国电力部门的绿色溢价说起。这实际上是个好消息：只需要一个适度的绿色溢价，我们就可以消除温室气体排放。

就电力而言，绿色溢价是指从非排放源中获得所有电力的额外成本，这里的非排放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装备有碳捕获设施的燃煤电厂和燃气电厂，等等。（记住，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只使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而是实现零排放。这也是我把其他一些“零碳”选项包括在内的原因。）

绿色溢价是多少？若把美国的整个电力系统转变为“零碳”来源，每千瓦时的平均零售价将增加1.3~1.7美分，与当前大多数人所付的电价相比，上涨幅度约15%。对普通家庭来说，每月的绿色溢价总计18美元——这是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金额。当然，对低收入的美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们已经把十

分之一的收入花在能源上面了。

（如果你付公用事业费账单的话，你对千瓦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是家庭用电的计费单位。但如果你感到疑惑，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千瓦时是一个能量单位，用以衡量你在一定时间段内所用的电量。如果1千瓦用1个小时，那就是你用了1千瓦时。典型的美国家庭，每天用电为29千瓦时。平均而言，包括美国所有类型的客户和各州在内，每千瓦时的费用约10美分。不过，在有些地方，电费可能是这个数字的3倍。）

美国的绿色溢价这么低，自然是好事。欧洲也处于类似的有利位置。欧洲一家行业协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就电网而言，“脱碳”90%~95%会导致电费平均上涨约20%。^[10]（该项研究使用的计算方法与我计算美国绿色溢价的方法不同。）

令人遗憾的是，其他国家很少有这么幸运。美国有庞大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水、中西部地区的强风、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长年不断的太阳能，等等。有些国家可能有一些太阳能而没有风能，也可能有一些风能而常年缺乏太阳能，或者两者皆缺。另外，有些国家的信用评级可能比较低，难以获得融资，因而缺乏建立新电厂所需的数额庞大的资金。

非洲和亚洲的处境最为艰难。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之一——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这一成就部分得益于廉价建造的燃煤电厂。中国企业大幅降低了燃煤电厂的建设成本，降幅达到惊人的75%。现在，它们想要更多的客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在不遗余力地吸引下一波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以及整个非洲地区的国家。

那些潜在的新客户会怎么做呢？是建造燃煤电厂，还是转向

清洁电力？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目标和选项。对贫困农村地区的人口来说，小型太阳能项目是一个可选项，因为他们需要给手机充电，也需要夜间照明。但对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永远无法为其提供启动经济所需的规模庞大、廉价且随时可用的电力。它们希望效仿中国的做法——通过吸引制造业、通信服务业等产业助推经济发展，但问题是这类业务所需的电力规模及可靠性是时下小型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无法提供和保证的。

如果这些国家选择建造燃煤电厂——就像中国及世界上每个富裕国家所做的那样，那么必将迎来一场气候灾难。但就目前来看，这的确是对它们来说最经济的选项。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出台绿色溢价之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燃气电厂只要运转就必须不断购买燃料，而太阳能发电厂、风电厂和水力发电站的燃料是免费的。再者，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一项技术应用越广泛，它的成本越低廉。那么，为什么发展绿色电力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呢？

原因之一是化石燃料太便宜了，它们的价格中并没有计入气候变化的真实成本（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清洁能源难以与之竞争。而且，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涵盖从地下开采化石燃料并利用化石燃料生产和输配能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成本都很低。

还有一个原因是前文提到过的：世界上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合宜的可再生资源。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比例要实现近100%，需要把大量清洁能源从其生产地（阳光充足的地区，最好是赤道一带，以及多风的地区）输送到需求地（多云、无风的地区）。这需要架设新的输电线路——一项成本高昂且极耗时间的工作，特

别是当它涉及跨越国界的时候。而且，我们架设的输电线路越多，电力的价格就越高。事实上，在电力的最终成本中，输配电成本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1\]](#)另外，在电力供应方面，很多国家也不想依赖其他国家。

但廉价的石油和昂贵的输电线路并不是电力部门推高绿色溢价的最大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出在我们对电力的可靠性要求及可再生资源的间歇性问题上。

阳光和风都属间歇性资源，也就是说，它们很难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连续发电。我们对电力的需求却是非间歇性的，希望时时刻刻都有电可用。所以，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结构中占据重要比例，为避免发生重大断电事故，在没有阳光、没有风的时候就需要其他选项。我们要么把过剩的电力存储在电池中（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讲到，但其成本极其高昂），要么增加其他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比如建造以备不时之需的燃气电厂。无论哪种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不站在清洁电力这一边。在我们接近100%地使用清洁电力时，间歇性会转变成一个更麻烦、更昂贵的问题。

在间歇性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太阳能电力供应会中断。对于这个问题，假设解决方案是将白天生产的多余的一千瓦时电力存储起来，留待晚上使用（你需要的远不止这点儿，我在这里使用一千瓦时是为了计算方便），那么我们的电费会因此增加多少呢？

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电池的成本，二是电池的使用寿命。就成本而言，假设使用一千瓦时的电池要花费100美元（这是一个保守估计，我暂时先不考虑其他情形，比如为购买该电池而不得不贷款）。至于电池的使用寿命，我们假设充放电循环为

1 000次。

所以，这个一千瓦时的电池的资本成本是100美元除以1 000次充放电循环，即每千瓦时为10美分。这是发电成本之外的费用，利用太阳能发电，每千瓦时成本约5美分。换句话说，与日间用电成本相比，购买存储起来供夜间使用的电力需多付两倍的价钱——5美分的电力生产成本和10美分的电力存储成本，总计15美分。

我认识一些研究人员，他们表示可以制造出5倍于上述使用寿命的电池。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成功，但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原本10美分的额外费用将降到2美分，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降幅。总之，只要你愿意支付一笔高额费用，那么太阳能电力供应的夜间用电问题在今天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通过创新研发活动，我相信我们可以降低这一额外费用。

令人遗憾的是，夜间间歇性并不是我们所要应对的最大难题，夏冬之间的季节变化是更严重的障碍。当然，这个问题也有诸多解决方案，比如通过核电厂或装备有碳捕获设施的燃煤电厂来增加电力供应。任何现实场景都将包含这些选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本章后面谈到，在此为简便起见，我仅使用电池来说明季节变化的问题。

假设我们想存储一千瓦时电力，但不是为了供一天使用，而是为了供一个季度使用。我们在夏季存储电力，然后在冬季用来驱动一个空间加热器。这次，电池的生命周期不再是问题，因为每年只需要给它充一次电。

但假设我们需要通过融资来购买电池。现在，我们已经占用了100美元的资本。（显然，你不会为100美元的电池融资，但如果你想购买足可存储数吉瓦电力的电池，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融

资了。) 如果我们需要为资本支付5%的利率，那么在电池成本为100美元的情况下，存储一千瓦时则需要额外付5美元。这里还要记住，我们为日间太阳能电力所支付的成本仅5美分。谁会花5美元存储价值5美分的电力呢？

季节间歇性和高昂的电力存储成本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对太阳能的大用户来说尤为明显：夏季产能过剩，冬季产能不足。

由于地球的自转轴是倾斜的，所以任何一个地点的日光量都会因四季的变化而不同。日光强度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变化的幅度有多大，取决于该地离赤道有多远。在厄瓜多尔，日光的变化幅度几乎可以忽略；在我居住的西雅图地区，一年中日照最长的一天的日光量是一年中日照最短的一天的两倍；在加拿大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该差值会达到12倍之多。[\[12\]](#)

为什么这种变化很重要？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城镇想发展太阳能，希望每年生产一吉瓦电力。我们姑且称它为“日光城”。那么，日光城的太阳能阵列要有多大呢？

选项之一是安装足够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充裕的夏季生产一吉瓦电力。但到了冬天，日光城就不那么走运了，因为这个季节的日光量只有夏季的一半。如此一来，也就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对于电力存储的高昂成本，当地议会非常清楚，所以排除了电池选项。）另外，在日短夜长的冬季，日光城需要安装更多的太阳能电池板，以生产足可满足冬日需求的电力。显然问题是，随着夏季的到来，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产能又会过剩。由于电价非常便宜，所以对日光城来说，要收回安装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压力很大。

在电力产能过剩问题上，日光城可以选择在夏季时关闭部分太阳能电池板，但这样做意味着资金投到了一年只使用一半时间的设备上，这会进一步推高该地居民和企业的用电成本。换句话说，这将提升日光城的绿色溢价。

日光城的处境并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命题，类似的情况已经在德国出现。通过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项目，德国计划到2050年将使用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到60%。在过去10年里，德国投入数十亿美元，大力推广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装机容量在2008—2010年增加了650%。但是，德国在2018年6月生产的太阳能电力是2018年12月的10倍左右。^[13]事实上，在夏季，德国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生产的电力实在太多，以至于整个国家都用不完。出现这种情况时，德国会把一部分过剩的电力输送给邻国波兰和捷克，而两国领导人抱怨说这给他们本国的电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造成了不可预测的电力成本波动。^[14]

间歇性还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日常或季节性变化问题更难解决。如果发生极端事件，一座城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任何可再生能源可用，那么它靠什么坚持下去？

假设将来东京的电力生产完全依赖风能。（日本确实有相当丰富的陆上和海上风力资源。）假设在8月的气旋高峰期，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东京，由于风力强劲，若不关停风力涡轮机，它们则会悉数被毁。该市领导人决定关掉风力涡轮机，同时寻找性能最好的大容量电池存储电力，希望以此应对这场风暴。

问题在于他们需要多少电池才能满足东京整座城市3天的电力需求？因为风暴要持续3天，也就是3天后他们才能重启风力涡轮机。

答案是至少1 400万块电池，其存储容量超过全世界10年的

产能，购买价为4 000亿美元。考虑到电池的生命周期，这些电池平均每年的成本超过270亿美元。[\[15\]](#)而这还仅仅是电池的资本成本，不包括电池的安装和维护费用。

这个例子完全是假设的，没有谁会真认为东京应该百分之百依赖风电或将所有电力存储在时下的电池中。我举这个例子是为说明至关重要的一点：大规模存储电力极其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但在未来几年，如果我们依赖间歇性资源提供相当比例的清洁电力，那么这将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且，在未来几年，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清洁电力。大多数专家认为，随着我们对其他碳密集型流程进行电气化改造，比如钢铁制造电气化和汽车动力电气化，到2050年，世界电力供应需要增加一倍乃至两倍。而这甚至还没有把人口增长因素考虑在内，也没有考虑人们会逐步走上富裕道路并会使用更多电力的情况。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的电力将是我们现在所生产电力规模的3倍以上。

由于太阳能和风能是间歇性资源，所以电力生产能力需要进一步扩大。（装机容量是指在太阳照射最强或风力最大时能生产的电力。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值。发电量是实际生产的电力，这当中计入了资源的间歇性、电厂因维修和保养而暂时关闭的情况，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发电量通常小于装机容量，而在资源不稳定的情况下，比如依靠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大。）

算上我们将使用的额外电力，并假定风能和太阳能将发挥重要作用，那么要想在2050年以前实现美国电网完全“脱碳，”需要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年增加约75吉瓦的装机容量。

这个数字大吗？在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增加了22吉瓦。

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倍以上装机容量，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保持这一步伐。

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制造成本越来越低，而且效率越来越高。换言之，我们发明了新的方法，可以从给定数量的太阳能或风能中获得更多电力。（时下最好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将不到四分之一的照射阳光转化为电力，而市面上常见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理论上限为33%左右。）随着转化率的不断提高，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获得的电力更多，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应用这些技术。

但仅有更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还不够，因为美国在20世纪所建造的设施与21世纪的需求不匹配。地理位置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电网运营伊始，公用事业公司就将大多数发电厂建在了美国高速增长的城市周边，因为这可以相对容易地利用铁路和管道将化石燃料从开采地运送到发电厂。结果就是，美国电网依赖铁路和管道进行长距离的燃料输送（将燃料运至发电厂），然后再依赖输电线路进行短距离的电力输送（将电力输送到各个用电城市）。

这个模式并不适用于太阳能和风能，我们不可能用轨道车把阳光运送到某个发电厂，阳光必须现场被转化为电力。但美国的大部分太阳能都在西南地区，大多数风能集中在北美大平原地区，远离多个大都市圈。

简而言之，在我们越来越接近“零碳”电力的道路上，间歇性是推高成本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试图走绿色环保路线的城市仍在用其他电力生产方式补充太阳能电力和风电，比如可按需生产电力的燃气电厂。而这些所谓的“尖峰负载发电厂”无论

如何都不可能是“零碳”的。

事先澄清一点：太阳能和风能这类间歇性能源在实现零排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我们确实需要它们来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在任何经济上合算的地方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在过去10年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降幅令人惊讶。比如，2010—2020年，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已经降到接近先前的十分之一，而整套太阳能系统的价格仅在2019年就降了11%。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一个主要原因是“边学边做”：道理很简单，就某种产品而言，我们生产的次数越多，生产它的熟练程度越高。

我们确实需要消除那些阻碍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障碍。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电网是单一连接网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美国的电网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它们极度分散，因而基本不可能将电力输送到生产地以外的地方。亚利桑那州可以把过剩的太阳能电力卖给临近的州，但对于输送到那些相距遥远的州就无能为力了。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全国范围交叉架设数千英里的特种长途输电线路，用以输送高压电。该技术早已存在，事实上，美国已经架设了一些这样的高压输电线路。（最长的输电线路从华盛顿州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州。）但要对电网进行大规模的升级改造，现在还面临相当大的政治障碍。

想想看，如果要架设输电线路，让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客户用上西南地区的太阳能电力，那么需要把多少土地所有者、公用事业公司、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召集到一起？仅仅是选择路线和确立道路通行权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如果你想架设穿越公园的大型输电线路，往往还会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跨西部快速传输电力项目（TransWest Express）计划于

2021年开工，该项目旨在将怀俄明州的风电输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和西南地区各州，预计2024年开始运营——这与最初的规划时间相比延后了大概17年。

但如果能圆满完成这个项目，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目前，我资助了一个项目，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美电网的计算机模型。通过这个模型，专家研究了西部各州如何才能在2030年以前赶上加利福尼亚州、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60%的目标，以及东部各州如何在2030年以前赶上纽约州、实现清洁能源占比70%的目标。他们发现，除非强化电网建设，否则上述东西部各州根本不可能实现目标。该模型还显示，在电力输送方面，若采取统一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策略，而不是让各州自行其是，那么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每个州都可以节省多达30%的可再生能源。换句话说，在最佳地点建造可再生能源设施，建立统一的国家电网，并在全国范围内按需输送“零碳”电力，可以降低成本。[\[16\]](#)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电力在整体能源消费结构中 will 占据更大的比重。对世界各地的电网来说，这样的模型是大有助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在某一给定地区，哪种清洁能源组合最高效？应该在哪里架设输电线路？哪些规定会成为障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总之，我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项目。

再看另外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家庭将更少地依赖化石燃料，转而依赖电力（比如电动车和冬季用电取暖）。届时，每个家庭都需要进行电气服务升级——成本较先前至少增加一个量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远不止于此。很多街道会被挖开重新铺设线路，电线杆上会安装更粗的电线、更重的变压器及其他各种设备。因此，几乎每个社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而政治影响也将下沉到地方层面。

技术或许有助于克服一些与上述升级相关的政治障碍。比如，如果把输电线路铺设在地下就不会那么碍眼了。但就目前来看，把输电线路埋到地下，成本将增加5~10倍。（问题在于热量的散发：在电力输送过程中，输电线路在电流通过时会发热。如果输电线路架设在地上，这不成问题，因为热量会随之消散在空气中，但若在地下，热量则无处散发。如果温度过高，输电线路在地下就会熔化。）部分公司正在研发下一代输电技术，该技术将解决输电线路的发热问题，以大幅降低在地下铺设线路的成本。

部署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并提升输电技术是当前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整体上显著升级电网，而是让各州自己去做，那么绿色溢价可能就不是15%~30%了，它可能是100%甚至更高。除非我们大规模使用核能（我会在下一节谈这个问题），否则在美国，任何实现零排放的路径都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在美国的电力结构中，最终会有多少来自可再生能源，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必须以比当前更快的速度（5~10倍的速度）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

另外要记住，在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美国幸运。事实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力供应结构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虽然我们一直在不停地部署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及传输设备，但这个世界仍需要一些新的清洁电力发明，原因就在于此。

很多伟大的研究已经在开展。如果问我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的回答是它让我有机会见到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企业

家，并向他们学习。多年来，在投资突破能源联盟及其他项目的过程中，我见识了一些潜在的技术突破，而这些突破可能就是可在电力部门实现零排放的革命性技术。目前，它们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有些已经相对成熟且经过了多方面的测试，而其他一些，坦白地说，一文不值。但在一些“疯狂”的想法上，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不敢下注。要知道，这是保证我们至少有一些突破的唯一方法。

生产“零碳”电力

核裂变。关于核能的一句话概括：它是唯一能够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提供可靠电力的无碳能源，几乎可在地球任何地方建厂，并已被证实可大规模应用。

没有任何一种清洁能源的发电规模能够接近核能。（这里讲的核能是指核裂变——通过分裂原子获得能量的过程。在下一节中，我会讲解与之相对的核聚变。）美国有大约20%的电力是由核电厂提供的。在法国，核电占比高达70%，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相比之下，太阳能和风能总共才为全球提供了7%左右的电力。

可以预见，如果未来不扩大核电规模，我们将很难以可负担的方式推进电网“脱碳”行动。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实现零排放的近1 000种场景。所有成本低廉的路径都涉及随时可用的清洁能源，比如核能。如果没有像核能这样的能源，实现“零碳”电力的成本将居高不下。

在有效使用材料方面，比如水泥、钢和玻璃，核电厂也是首屈一指的。图4-5显示了不同能源生产单位电力所使用的材料

[17]。相比之下，核电厂非常高效，其每单位发电量所使用的材料比其他能源（除天然气）少得多。

这意味着投入核电厂建设和运营的每一磅材料都能获得更多的能量。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生产这些材料的过程也会排放温室气体。（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第五章中详细说明。）另外还有一些事实没有考虑进去：与核电厂相比，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通常需要占用更多土地；核电厂可以在90%的时间里发电，而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只能在25%~40%的时间里发电。所以，它们之间的差距比图4-5显示的还要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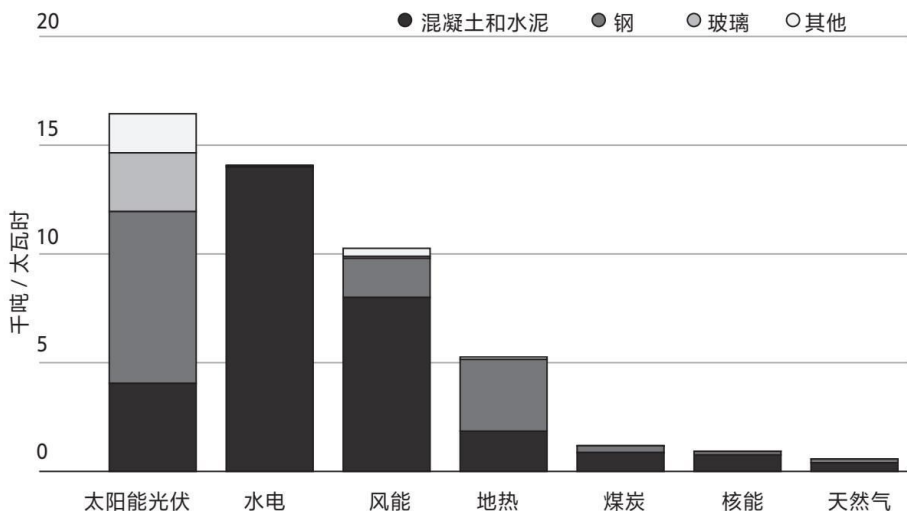


图4-5 建造和运营不同类型的发电厂需要使用的材料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Energy

核能也有其自身问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核电厂的建设成本非常高，人为失误会造成事故，核电厂所用的燃料铀可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核废料非常危险且难以存放。

美国三里岛、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发生的备受瞩目的核事故，将这些风险都推到了公众面前。在这些灾难的背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它们，而是停下了在这一领域前进的步伐。

假设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说：“汽车会撞死人，它们太危险了。让我们停止驾驶并放弃这些车吧。”当然，这会让人觉得荒谬可笑。我们不仅不会这样做，相反，我们还会通过创新提升汽车的安全性。为防止人们因撞破挡风玻璃而飞出去，我们发明了安全带和安全气囊；为保护乘客免受交通事故的伤害，我们为汽车开发了更安全的材料，并采用了更安全的设计；为保护停车场内路人的安全，我们为汽车安装了后视摄像头系统。

死于核事故的人远比在车祸中丧生的人少得多。就此而言，核事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少于任何一种化石燃料（见图4-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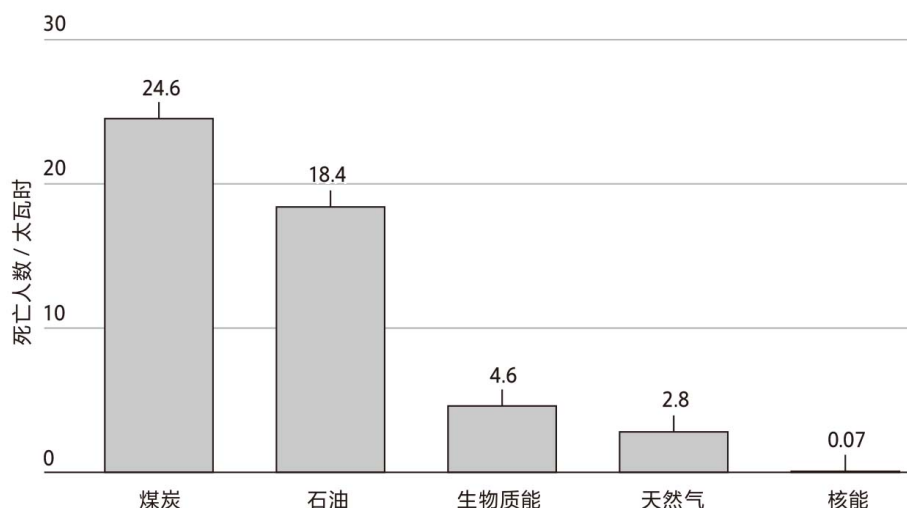


图4-6 各类能源每太瓦时造成的死亡人数

注：如果按照每单位电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计算，核能并不危险。图中数字涵盖了作为能源的燃料从开采到发电的整个过程，以及它们造成的环境问题，比如空气污染。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因此，我们应该对核能加以改进，就像我们对待汽车一样：逐一分析问题，并通过创新方法解决它们。

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非常看好泰拉能源给出的方法，泰拉能源是我于2008年创建的一家核技术公司，它会聚了全球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和计算机模型专家，致力于设计下一代核反应堆。

因为没有人会让我们在现实世界建造实验反应堆，所以我们在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设立了一个超级计算机实验室。在那里，团队成员对不同的反应堆设计进行数字模拟。通过利用一种名为“行波堆”的设计，我们认为我们创建的模型可以解决所有关键问题。

泰拉能源的反应堆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燃料，其中也包括其他核设施的废料。该反应堆产生的废料将远少于今天的核电厂。它可以全自动运行，从而消除了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可建在地下，免受攻击威胁。而且，该反应堆的设计非常安全，同时采用了创新技术控制核反应。比如，放射性燃料会被保存在燃料细棒中，温度过高时，燃料细棒会膨胀，进而放缓核反应的速度，避免出现过热现象。物理定律完全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到目前为止，泰拉能源的设计还仅存在于超级计算机中，我们离真正动工建设新厂还有很多年。但我们正在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打造首台样机。

核聚变。在核能利用方面，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

法，这个方法很有前景，但要用它来为消费者提供电力至少还需要10年。跟核裂变分裂原子获取能量不同，核聚变涉及原子的聚合，或者说融合。

核聚变所依赖的基本过程与为太阳提供能量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你首先要从一种气体开始——大多数研究专注于某种类型的氢气，让它变得非常热，温度远超5 000万摄氏度，同时使其处于一种被称为“等离子体”的带电状态。在超高温下，粒子飞速移动，并在相互碰撞中聚合到一起，其过程就跟太阳中的氢原子的聚合一样。氢粒子发生聚合后会转变成氦，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可被用来发电。（科学家已经掌握许多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强磁体或激光来约束。）

核聚变虽然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前景广阔，因为它使用的是氢等常见的可用元素，所以燃料廉价且充足。在核聚变中，常用的氢可从海水中提取，其储量足可满足全球数千年的能源需求。核聚变产生的废料的放射性会持续数百年，而核裂变的废料钚和其他元素的放射性长达数十万年之久。核聚变产生的废料的危险程度（与放射性医疗垃圾相当）远低于核裂变的。另外，在核聚变中不会出现失控的连锁反应，因为只要停止供应燃料或关闭约束等离子体的装置，核聚变就会停止。

然而，在实践中，形成核聚变异常困难。在核科学家中流传着一个经典的笑话：“距离核聚变还有40年，而且永远都是40年。”（我承认，在这里用“笑话”这个词有些随便。）最大的障碍是启动核聚变需要大量的能量，而最终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能量通常大于从中得到的能量。对于另一个障碍，你可能也已经想到，那就是温度问题，这对建立核反应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挑战。在现有的核聚变反应堆中，无一是为客户提供电力

而设计的，它们只是用于研究。

目前在建的最大项目是位于法国南部的一座实验设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这是欧盟和6个国家参与的合作项目，工程始于2010年，至今仍在建设中。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ITER有望产生第一束等离子体；到21世纪30年代末期，有望产生剩余能量——10倍于其运行所需的能量。这将是核聚变的“小鹰号”[19]时刻，而这一重大成就也将推动人类走上建设商用示范核聚变反应堆的道路。

而且，随着更多创新技术的涌现，核聚变也将更加实用。比如，目前一些公司正在利用高温超导体制造用于约束等离子体的强磁场，如果这种方法奏效，就可以建造规模远比现在小的核聚变反应堆，其成本不仅会大幅降低，工程速度也将大大加快。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哪家公司拥有核裂变或核聚变领域所需的唯一突破性理念，而在于人类要再一次认真对待发展核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极有前景的领域，容不得任何忽视。

离岸风电。在海上或其他水域安装风力涡轮机有很多好处。因为美国许多大城市都靠近海岸，所以我们可以在离它们更近的地方发电，这样也就避免了很多电力输送方面的问题。另外，相比于陆上风力，离岸风力更稳定，所以其间歇性问题也不突出。

尽管存在这些优势，但离岸风电目前在全球总装机容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2019年这个比例是0.4%左右。离岸风电多分布在欧洲，其中北海[20]地区最为集中。美国只有一个海上风电项目，位于罗得岛州，总装机容量为30兆瓦，要知道美国人的用电量约1 000吉瓦，所以离岸风电仅为这个国家提供了1/32 000的电力。

对离岸风电行业来说，只有加快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行业公司正在寻找制造更大尺寸风力涡轮机的方法，这样一来单台风力涡轮机就可以生产更多电力。他们还致力于解决一些工程挑战，比如如何更好地在海洋中安放大型金属物体。这些创新降低了成本，各国也开始安装更多的风力涡轮机。在过去3年里，离岸风电年平均增长率达25%。英国是当今世界离岸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这得益于其政府明智的补贴政策，受此鼓励，各公司纷纷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地投资离岸风电，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离岸风电第一消费大国。

美国拥有丰富的离岸风能，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及五大湖地区，理论上可以依此生产2 000吉瓦的电——足够满足全美当前的需求。^[21]但如果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潜在资源，那就必须打破与项目开发相关的条条框框。今天，要想拿到政府许可，不得不接受严峻的官僚主义考验：要购买数量有限的联邦租约，要花几年时间拿到环境影响报告书，然后再去申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许可证。而且，在这条路上的任何一步都可能遭到海滨地区业主、旅游业部门、渔民和环保组织的反对。当然，有些反对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则不然。

离岸风电行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它越来越便宜；二是在许多国家的“脱碳”行动中，它可以发挥关键的助力作用。

地热。地下深处（从距离地面数百英尺到一英里）埋着可用来生产“零碳”电力的热岩。我们可以用高压把水注入这些岩石，注入的水会吸收岩石的热量，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口排出，其所获能量可用来驱动涡轮机发电，或以其他方式发电。

但开发地下热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它的能量密度很低，所

谓“能量密度”，是指每平方米储存能量的多少。戴维·麦凯在出版于2009年的精彩著作《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中，估测地下热能仅能满足英国不到2%的能源需求。[\[22\]](#)虽然占比不高，但要完全获得这些能量需要开发这个国家的每一平方米土地，而且钻井还得是免费的。

地热的开发需要钻井，但问题是我们很难提前知道某一口井会不会产生我们需要的热能，或者产生热能会持续多长时间。在地热钻探方面，成功打出地热的井约占60%。另外，地热仅存在于全球的某些特定地区，最佳钻井地点往往位于火山活动地带。

这些问题意味着，地热在全球电力消费中只会占较小的比例，即便如此，逐一解决它们也是值得的，就像我们逐一解决汽车的安全问题一样。相关公司正在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在过去几年里，这些活动所依赖的技术进步也大大提升了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效率。比如，有些公司研发的先进传感器有助于确定有前景的地热井的位置；有些公司采用水平钻井技术，可以更安全、更高效地开发地热资源。这充分说明，原本为化石燃料行业开发的技术，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电力存储

电池。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在有关电池的知识方面投入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也从没想到自己会在电池类初创公司上面亏掉那么多的钱。）让我惊讶的是，锂离子电池（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用的就是此类电池）存在局限性且改进空间非常小，发明家研究了可用来制造电池的所有金属，但目前看来，要想找到可大幅度提升电池性能的制造材料似乎不太可能。就电池性能的提升而

言，我认为可实现的是提升3倍，而不是50倍。

当然，绝对不能低估优秀的发明家。我遇到过一些杰出的工程师，他们正在研发可为一座城市存储足够电能的经济适用型电池，也就是电网级电池，而不是用于手机或电脑的小型电池。此外，电网级电池还能长时间储存电能，足可确保城市度过可再生资源的季节间歇性阶段。我很钦佩的一位发明家正在研究一种使用液态金属的电池。这背后的理念是液态金属可以快速存储和输送更多能量，如果你想为整座城市供电，这正是你所需要的。该技术已经在实验室得到验证。这位发明家的团队正在想方设法降低电池成本，使之足够经济实惠，同时验证其在现实场景中的工作状况。

另外还有一些发明家正致力于研究液流电池，即把液体存储到不同的容器中，然后通过泵送系统使液体流到一起，进而产生电力。储液容器越大，可存储的能量越多，而电池尺寸越大，其经济性就越明显。

抽水蓄能。这是一种可满足城市需求的大规模储能方式，其工作原理是：在电力便宜的时候（比如一股强风大大加快了风力涡轮机的转速），把水抽到山上的水库里，在电力需求加大的时候，再把水库里的水放出来，利用水力驱动涡轮机，使之产生更多电力。

抽水蓄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网级电力存储形式。令人遗憾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说说而已。美国十大抽水蓄能设施的储能总量尚不及全国一小时的用电量。你可能会猜到这个行业还没有真正起飞的原因：把水抽到山上，需要一个储量庞大的水库，当然，还需要一座山。缺少任何一项，都是无米之炊。

多家行业公司已经在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一家公司正在研

究能否把水以外的物体移到山上，比如卵石。另外一家公司则在研究一种不利用山体的方法：把水抽到地下，使之保持压力状态，待需要驱动涡轮机时再将水释放出来。如果这个方法奏效，那可以用神奇来形容了，因为这几乎不涉及地面设备，减少了后顾之忧。

热能存储。这背后的理念是，在电力供大于求的时候，用它加热某种材料，然后在需要更多电力的时候，再通过热机将这些热能转化为电力。使用这种方法，发电效率可达50%~60%，还是不错的。工程师知道，很多材料都能长时间保持高温且不会损失太多能量。目前，最具前景的方法是将热能存储在熔盐中，一些科学家和相关行业公司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泰拉能源正在努力寻找利用熔盐的方法，如果后期能成功建厂，那么我们就无需再争用白天产生的太阳能电力。这背后的理念是，把白天产生的热能存储起来，然后在夜间（也就是在无法使用廉价太阳能电力的时候）将其转化成电力。

廉价氢气。我希望人类能在存储领域取得一些重大突破，但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随着某种创新的出现，这些存储理念都会变得过时。比如，个人电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让打字机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电力存储方面，廉价的氢气可能会扮演这一角色。

原因在于，氢气是燃料电池的关键原料之一。燃料电池从两种气体（通常是氢气和氧气）的化学反应中获取能量，而其唯一副产品就是水。我们可以用太阳能电力或风电制造氢气，再以压缩气体的形式或以其他形式将其存储起来，并置入燃料电池中，待有需求时用来发电。实际上，我们是用清洁电力制造无碳燃料，而这些燃料可以存储多年，并且随时可以重新转化为电力。

这样一来，将解决前文提到的地点问题：虽然不能用轨道车运送阳光，但可以先把阳光转化为燃料，转化成燃料后，想把它运到哪儿就运到哪儿。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在零排放的情况下制造氢气的成本高昂。它不像把电力直接存储于电池中那样高效，因为你得先用电力制造氢气，再用制造的氢气发电，这意味着每一步都在损失能量。

另外，氢气是一种非常轻的气体，很难存储于常规尺寸的容器。如果对氢气进行增压处理（在同等容量的容器中充入更多氢气），它会更易于存储。但由于氢原子实在太小了，一旦受到压力，它就会透过金属迁移出去。这就好比加满了的气罐，虽然加满了，但里面的气体会慢慢逃逸出来。

最后，制造氢气的过程（即电解）还需要各种成本高昂的材料（即电解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燃料电池的汽车已经上市，氢燃料的成本转化为每加仑汽油的价格约等于5.6美元。所以，科学家正在试验可用来制造电解槽的廉价材料。

其他创新

碳捕获。我们可以继续像现在这样用天然气和煤发电，同时可以在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前把它吸收掉，这被称作“碳捕获和封存”（CCS），涉及在化石燃料发电厂安装特别装置，用以吸收排放物。这些排放点捕获装置已经存在几十年，但它们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都很高，通常也只能捕获所涉及的90%的温室气体，而电力公司安装这类装置并不会给自身带来任何收益，因而使用者甚少。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明智的公共政策鼓励安装碳捕获装

置。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谈到。

前文提到过一项名为“直接空气捕获”的相关技术。正如该技术名称的隐含意指出的，该技术的作用是直接从空气中捕获碳。相比于排放点捕获技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更为灵活，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它。在实现零排放的道路上，直接空气捕获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1世纪中叶，美国每年需要消除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而到21世纪末，这个数字是每年约200亿吨。^[23]

但直接空气捕获技术面临的技术挑战远大于排放点捕获技术，主要是因为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很低。在燃煤电厂的排放物中，二氧化碳浓度很高，约为10%，但其一旦进入大气，也就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应用领域，二氧化碳就会广泛分散开来。在大气中随机挑选一个分子，其是二氧化碳的概率只有1/2500。

相关公司正在研发可以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的新材料。若研发成功，这些材料将降低排放点捕获和直接空气捕获的成本，并提升它们的效率。此外，在安全捕获和存储温室气体方面，目前所采用的直接空气捕获技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做功是不可能的。物理定律设定了做功所需能量的最低值，但从最新的技术来看，它们所用的能量远超该最低值，因而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节电。我过去常常嘲讽这样一个理念：以更高效的方式使用电力会减缓气候变化。我的观点是：如果用于减排的资源有限（情况也的确如此），那么取得最大成效的方法就是走零排放之路，而不是花大力气降低对能源的需求。

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观点。但当我意识到用太阳

能和风能发电需要用到大面积的土地时，我的立场有所动摇。就占地面积而言，在装机容量相当的情况下，太阳能发电厂是燃煤电厂的5~50倍，风电厂更是太阳能发电厂的10倍。针对实现100%清洁电力的目标，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增加成功的概率，但如果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电力需求，那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会更容易。因此，任何节电措施都是大有帮助的。

这里还有一个相关方法，叫“负荷转移”或“需求转移”，即通过调整用电负荷，增强一天中用电的稳定性。如果负荷转移能够被大规模应用，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用电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现在，我们通常是什么时候用电就什么时候发电，比如启动发电厂为城市夜间照明提供电力。然而，通过负荷转移，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电价最低的时候多用电。

举例来说，家中的热水器可设定在下午4点而不是晚上7点开启加热，或者，某天你回到家就给电动车插上充电线，但要到凌晨4点才会自动充电，因为这些时段用电需求小，电价低。在工业层面，能源密集型工艺可以在电力最容易获得的时候开展作业，比如污水处理和氢燃料制造。

如果负荷转移会带来重大影响，那么我们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也需要取得一些技术进步。公用事业公司要全天更新电价，以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举例来说，你家中的热水器和电动车必须足够智能，可依照价格信息及时调整用电时间。在极端情况下，也就是在电力特别难获得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减少需求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要对电力分配实行配给制，优先满足最重要部门的用电需求（比如医院），并切断非必要活动的用电需求。

请记住，尽管我们需要重视所有这些想法，但在实现电

网“脱碳”方面，我们可能并不需要把它们全部付诸实践。有些想法与其他想法存在重叠之处。例如，如果能够在研发廉价氢气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可能就不必过于担心如何获得神奇的电池了。

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电网开发计划，以确保随时获得可靠的、可负担的“零碳”电力。如果有精灵给我一个许愿的机会，让我针对影响气候变化的某种活动选一项突破性技术，那么我会选择电力领域内的突破：对实体经济领域的其他部分来说，电力在“脱碳”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五章，我会讲述我们是如何生产和制造产品的，比如钢铁和水泥。

[1] 图片由盖茨家人提供。

[2] 基于IEA (2020)的数据，SDG7: Data and Projections, IEA 2020, www.iea.org/statistics. 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3] Nathan P. Myhrvold and Ken Caldeira, “Greenhouse Gase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al to Low-Carbon Electricity,”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Feb. 16, 2012, iopscience.iop.org.

[4] 该计算涉及对大坝生命周期的评估。生命周期评估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记录某一特定产品自生产时起至生命结束时所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生命周期评估可用于分析不同技术的气候影响，但其过程颇为复杂，所以在本书中，我将把重点放到直接排放上，因为这更容易解释，而且通常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5] 可再生能源部门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现代生物燃料。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https://www.bp.com>.

[6] Vaclav Smil, *Energy an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7), 406.

[7]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8]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Incentives Used to Stimulate Energy

Production: An Executive Summary,” Feb. 1980, www.osti.gov. 煤炭和天然气补贴按2019年美元调整计算。

[9] Wataru Matsumura and Zakia Adam,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Subsidies Bounced Back Strongly in 2018,” IEA commentary, June 13, 2019.

[10] Eurelectric, “Decarbonisation Pathways,” May 2018, cdn.eurelectric.org.

[11] 可以把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分别想象成高速公路和地方道路。我们使用高压输电线路把电力从电厂输送到城市，所输送的电力会进入当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也就是街区中随处可见的电线。

[12] 风也存在季节性变化的问题。在美国，风能通常在春天达到顶峰，而在仲夏至夏末跌至低谷（加利福尼亚州是个例外，情况刚好相反），这之间的差别可能会达到2~4倍。

[13] Fraunhofer ISE, www.energy-charts.de.

[14] Zeke Turner, “In Central Europe, Germany’s Renewable Revolution Causes Fri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6, 2017.

[15] 这些数字的计算方法：2019年8月6—8日，东京用电量为3 122吉瓦时。对于基载电力，我假设有540万块铁液流电池，系统寿命为20年，单位成本为3.6万美元。对于峰值需求，我假设有910万块锂离子电池，系统寿命为10年，单位成本为2.33万美元。

[16] 该模型对公众开放，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reakthroughenergy.org。

[17] 材料的计量单位为公吨，按每太瓦时电力生产计算。“太阳能光伏”指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它会将日光转化为电力。U.S. Department of Energy, *Quadrennial Technology Review: An Assessment of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2015), <https://www.energy.gov>.

[18] 该图“死亡人数/太瓦时”的数据来源：Markandya & Wilkinson ; Sovacool et al.，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death-rates-from-energy-production-per-twh>。

[19] “小鹰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隶下的一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小鹰级航空母舰的首舰。——编者注

[20] 北海，大西洋东北部边缘海，位于欧洲大陆的西北边。——编者注

[21]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Computing America’s Offshore Wind Energy Potential,” Sept. 9, 2016, www.energy.gov.

[22] David J. C.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 Without the Hot Air* (Cambridge, U.K.: UIT Cambridge, 2009), 98, 109.

[23] Consensus Study Report, “Negative Emissions Technologies and Reliable Sequestration: A Research Agenda,”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9.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总排放量

31%

创新生产材料与生产工艺，实现“零碳”制造的四个路径。

从华盛顿的梅迪纳（梅琳达和我居住的地方）到盖茨基金会的西雅图总部，总共8英里车程。从家到办公室，我要穿过华盛顿湖上的常绿岬浮桥。常绿岬浮桥是正式名称，生活在这里的人从不这么叫它。对当地人来说，它是520桥，是以穿越该桥的520号州道命名的。这座桥的长度超过7 700英尺，是世界上最长的浮桥（见图5-1[1]）。

有时驶过520桥，我会多花点儿时间欣赏它的神奇之处：它之所以神奇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浮桥，而是因为它是一座浮动的桥。用大量沥青、混凝土和钢建造起来的庞大结构，再加上上面穿梭的数百辆汽车，它还能漂浮在湖上，没有沉下去，到底是为什么？

答案是：这是神奇材料展现的工程奇迹，这个神奇材料就是混凝土。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沉重的混凝土砌块是不可能浮在水面上的。混凝土是可以用来制造砌块，比如医院的混凝土墙就足够坚固，坚固到可以吸收核辐射，但也可以用来制造空心物，就比如支撑520桥的那77个防水的混凝土充气浮筒，每个浮筒重达数千吨，有足够的浮力让自身浮在湖面，而且足够坚固。它们支撑着桥梁和在桥梁上高速行驶的所有汽车，当然，在每天的交通阻塞时段，则是如蜗牛般行驶的汽车。[2]



图5-1 位于西雅图的520桥

注：每次从家开车到盖茨基金会总部，我都会穿过这里。它是现代工程的奇迹。

你不用刻意去寻找，在你身边还有其他很多由混凝土造就的奇迹。因为抗锈、抗腐且不会燃烧，所以大多数现代建筑都用混凝土作为材料。如果你是水电迷，那么应该感谢混凝土，因为正是它的存在才让大坝的出现成为可能。下次见到自由女神像时，你看一看她的基座——那可是用2.7万吨混凝土建造的。[\[3\]](#)

即便是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也无法抗拒混凝土的魅力。托马斯·爱迪生想把整个家都建成混凝土的，他梦想着打造混凝土家具，比如卧室家具组合，他甚至还尝试设计混凝土唱片机。

[\[4\]](#)

尽管爱迪生的这些想象从未成为现实，但它并没有妨碍我们大规模使用混凝土。每年，为改造或修理现有道路、桥梁和建筑物，或建造新的道路、桥梁和建筑物，仅美国一个国家就生产超过9 600万吨水泥，而水泥正是混凝土的主要组成成分之一。在美国，这相当于人均近600磅。即便如此，美国也算不上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消费国——排名第一的是中国。在21世纪的前16年里，中国的混凝土用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混凝土用量（见图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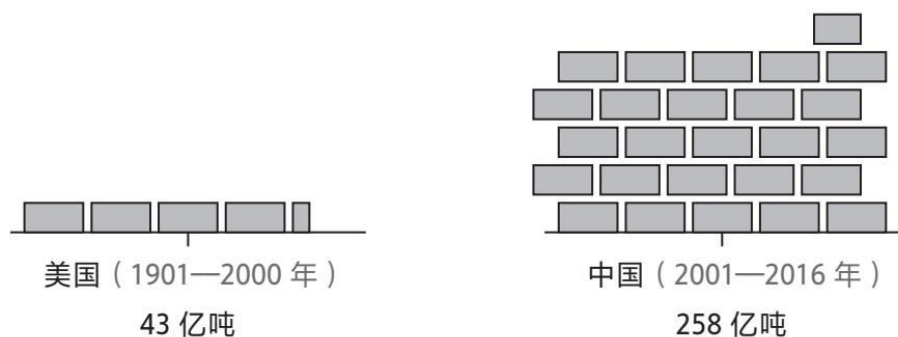


图5-2 中美混凝土用量对比

资料来源：U.S. Geological Survey

显然，人类所依赖的材料并不仅限于水泥和混凝土，还有用来制造各类产品的钢，比如汽车、船舶和火车，冰箱和火炉，工厂机器，食品罐，乃至电脑。钢坚固、便宜、耐用，而且可以无限循环利用。钢和混凝土还是一对完美的搭档：将钢筋置入混凝土，会得到一种神奇的建筑材料，它不仅可以承受极大的重量，而且不会因扭曲而破裂。这就是大多数建筑和桥梁内部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原因。

美国人消耗的钢量同水泥量基本相当——每年人均600磅，

这还不包括回收后再利用的钢量。

塑料是另外一种神奇的材料，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产品，从衣服和玩具，到家具和汽车，再到手机，不胜枚举。时下，塑料的名声并不是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评价。但它也有许多优势，所以我们才会广泛应用它。在撰写本章时，我坐在桌前环顾四周，到处都能看到塑料，比如我的电脑、键盘、监视器和鼠标，我的订书机，我的手机，等等。燃油效率高的汽车之所以轻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塑料：塑料约占汽车制造材料总量的50%，其重量却只占汽车总重量的10%。[\[6\]](#)

再接下来是玻璃——我们的窗户、各种瓶瓶罐罐、绝缘材料、汽车、为我们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光纤电缆等。铝被用于易拉罐、箔、电力线、门把手、火车、飞机、啤酒桶等物品当中。肥料助力增产增收。多年前，我曾预测，随着电子通信越来越普遍、电子屏幕越来越普及，纸会消失，但从目前看，还没有迹象显示这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简而言之，我们生产和制造的材料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丝毫不亚于电力。我们不会放弃这些材料，相反，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消耗更多的材料。

这个论断是有大量数据支撑的。比如到21世纪中叶，钢产量将会比现在增加50%。不过，我觉得图5-3中的两张照片[\[7\]](#)也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两张照片看起来像两个不同的城市，对吧？事实并非如此，两张照片拍摄的都是上海，而且是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左边的那张照片拍摄于1987年，右边的那张拍摄于2013年。当我看右边照片中的那些新建筑时，我看到的是成吨的钢、水泥、玻璃和塑料。



图5-3 1987年的上海（左）和2013年的上海（右）

注：这两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发展，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这样的场景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尽管大多数地方的发展并不像上海这样引人注目。我要重申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这种进步是好事。这两张照片折射出城市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提升，他们赚了更多的钱，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再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死去。对任何关心脱贫事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在这里，让我们重申本书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便是银色的云彩，背后也会有一丝黑暗。在生产和制造所有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事实上，这些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具体到某些材料，我们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零碳”生产工艺，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的工艺，这一点在水泥生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让我们来看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怪圈。也就是说，如何做到在继续生产这些材料的同时，避免导致气候恶化到人类无法居住的程度？为简便起见，我们将重点放到三种最重要的材料上——

钢、混凝土和塑料。同第四章中所讲述的电力一样，我们也将回顾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为什么这些材料会给气候带来如此大的麻烦？然后，我们将计算利用当今技术减少排放量的绿色溢价，并考察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的种种方法及生产这些材料的“零碳”方式。

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 000年前。从铁器时代到今天我们能用上廉价的、种类繁多的钢产品，这几千年间出现了一系列迷人的发明。但依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人不会对高炉、搅炼炉和贝塞麦转炉的炼钢法之间的区别感兴趣。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人们主要应该了解的事情。

钢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令人满意的硬度及高温下的易塑性。生产钢需要纯铁和碳。就铁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很坚硬，但只要加入适量的碳（不超过1%，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钢），碳原子就会挤在铁原子之间，从而使钢获得其最重要的属性。

碳和铁不难获得，前者可以从煤炭中获得，后者是地壳中的常见元素。但纯铁非常罕见，在开采铁这种金属时，你会发现它几乎都是跟氧及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物就是铁矿石。

要生产钢，就得把氧从铁中分离出去，并在铁中加入少量的碳。这两点都不难实现：借助氧气和被称作“焦炭”的煤，只需在高温（1 700摄氏度或3 000华氏度以上）下冶炼铁矿石。通过高温冶炼，铁矿石释放出氧，焦炭释放出碳，少量的碳跟铁结合形成我们想要的钢，剩余的碳则与氧结合，形成我们不想要的副产品——二氧化碳。在这个过程中，二氧化碳的产量巨大。每生产1吨钢，会产生大约1.8吨二氧化碳。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做法？因为成本低廉，导致在我们开始担忧气候变化问题之前，没有动力改用其他方法。铁矿石很容易开采（因而价格不高），煤炭也不贵，因为它在地下的储量丰富。

所以，这个世界的发展仍保持着马力，并未放缓步伐。尽管美国的钢产量已基本进入稳定期，但全球钢产量还在不断增长。目前，多个国家的粗钢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到2050年，全球每年将生产大约28亿吨粗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气候友好型的冶炼方法，那么到21世纪中叶，仅炼钢这一个领域，每年就会释放50亿吨二氧化碳。

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再看看混凝土的生产，其挑战难度更大。要生产混凝土，你需要把石子、沙子、水和水泥混合搅拌到一起。在这些原料中，前面三种带给我们的挑战相对容易解决，对气候造成大麻烦的其实是水泥的生产。

要生产水泥，就得有钙。要想获得钙，首先得有石灰岩（石灰岩中含有钙，还有碳和氧），然后把石灰岩同其他原料一同放入窑炉中做焚烧处理。

因为有碳和氧的存在，所以你可能会猜到将发生什么。将石灰岩焚烧之后，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就是用以生产水泥的钙，外加你不想要的东西——二氧化碳。除此工艺外，没有人知道其他生产水泥的方法。这是一种化学反应：石灰岩加上热能等于氧化钙加上二氧化碳。情况就是这样，它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每生产1吨水泥，会产生大约1吨二氧化碳。

而且，同钢生产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会停止生产水泥。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其水泥产量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印度的7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总和还要多。

[8]2021—2050年，全球水泥年产量将小幅上升（中国的建筑热潮趋于减退，其他小型发展中国家则开始加速），然后回落到每年近40亿吨的水平，大致与当前的产量相当。[9]

同水泥和钢相比，塑料可以说是这个群体中的“婴儿”。尽管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使用橡胶等天然塑料，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合成塑料才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盛行起来，而这主要得益于化学工程领域的一些研究突破。今天的塑料有20多个类型，其中既包括你可能比较熟悉的用于制造酸奶容器等产品的聚丙烯，也包括一些你可能想不到的，比如涂料、地板蜡和洗衣粉中的丙烯酸，肥皂和洗发水中的微塑料，防水夹克中的尼龙，或者在20世纪70年代我穿过的那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衣服中的涤纶。

这些不同类型的塑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含有碳。事实证明，碳在制造各类材料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很容易与不同的元素相结合。就塑料而言，碳通常是跟氢和氧结合。

既然你已经读到这里，那么对于塑料生产企业的碳来源可能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提炼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对炼制品进行加工，以此获得碳。这也解释了塑料价格低廉的原因：同水泥和钢一样，塑料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化石燃料便宜。

但同水泥和钢相比，塑料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生产水泥或钢时，二氧化碳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被释放出来，而在生产塑料时，大约50%的碳存留在塑料中。（就不同的塑料而言，这个百分比其实差别很大，但50%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值。）碳很容易跟氧和氢结合，它们结合之后通常不易分开，因此塑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

这是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因为塑料被填埋或进入海洋之

后，仍会存在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漂浮在海洋中的塑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毒害海洋生物。但是，塑料不会导致气候恶化。单就排放而言，塑料中含有碳并不是特别糟糕的消息。因为塑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降解，所以其内部的碳原子不会排放到大气中，也就不会导致温度上升——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这项快速调查仅涵盖我们时下生产的三种最重要的材料，肥料、玻璃、纸、铝及其他很多材料均未包括在内。但关键点是一样的：我们制造了数量庞大的材料，并在此过程中排放出可观的温室气体——占每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510亿吨的近三分之一。我们需要把这些排放量降低到“0”，但并不能简单地停止生产和制造活动。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对替代选项进行考察，看看其绿色溢价到底有多高，然后再看看怎样才能通过技术降低绿色溢价。因为只有绿色溢价降下来了，人们才会有采取“零碳”方法的意愿。

要计算材料的绿色溢价，首先得了解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哪里。在我看来，这包括三个阶段：（1）利用化石燃料为工厂提供其运营所需的电力时；（2）利用化石燃料为不同的制造流程提供热能时，比如钢铁生产中的铁矿石熔化；（3）真正制造这些材料时，比如水泥的生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看看它们是如何抬高绿色溢价的。

就第一阶段的电力而言，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讲了该领域的大部分关键性挑战。在计入电力存储和输送因素以及很多工厂一天24小时均需要可靠电力的事实之后，清洁电力的成本大幅飙升。

升。大多数国家的这个升幅远超美国或欧盟。

再来看第二阶段：如果不燃烧化石燃料，怎样获得热能？如果不需要超高的温度，那么可以用电热泵或其他技术，但如果需要的是几千摄氏度的高温，电力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项——至少从当前的技术水平来看是这样的。你要么利用核能，要么燃烧化石燃料并安装碳捕获装置。令人遗憾的是，碳捕获不是免费的，它会增加制造商的成本，这些成本又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如何处理本身就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过程？要知道，生产钢和水泥是会排放二氧化碳的——这里说的还不是化石燃料的燃烧，而是一些产生二氧化碳的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应对钢和水泥的生产至关重要。

就当前情况来看，答案非常明确：除非关闭制造部门的这部分，否则无法避免排放二氧化碳。若想利用现有的技术消除这些排放，可选项跟第二阶段一样有限。我们必须使用化石燃料和碳捕获装置，而这同样会增加成本。

在了解了这三个阶段后，再来看利用碳捕获装置生产清洁的塑料、钢和水泥的绿色溢价区间（见表5-1[10]）。

表5-1 塑料、钢和水泥的绿色溢价

材料	每吨的平均 价格（美元）	每生产一吨材 料所排放的碳 （吨）	采用碳捕获技 术后每吨的价 格（美元）	绿色溢价 区间
乙烯（塑料）	1 000	1.3	1 087~1 155	9%~15%
钢	750	1.8	871~964	16%~29%
水泥	125	1	219~300	75%~140%

除了水泥，塑料和钢的绿色溢价看起来并不是很高。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能根本感受不到价格上涨的压力。举例来说，一辆售价3万美元的汽车，其制造材料中可能包含1吨钢，这种钢每吨的价格是750美元还是950美元，几乎不会对汽车的整体价格产生任何影响。即便是自动售货机里售价每瓶2美元的可乐，其瓶身所用塑料在整体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小的。

但消费者承受的最终成本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假设你是一名在西雅图市工作的工程师，你正在评估某桥梁修复的投标文件，一份文件中的水泥报价是每吨125美元，另一份文件中的水泥报价是每吨250美元（包含碳捕获的成本）。你会怎么选？在使用“零碳”水泥方面，如果没有激励措施，那么你自然会挑便宜的。

或者，假设你在经营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你愿意在钢的采购成本上多投入25%吗？可能不愿意，尤其是当你的竞争对手决定一如既往地使用廉价材料时。汽车的整体价格只会上涨一点点这个事实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安慰，你的利润率已经很低了；反之作为消费者，如果你需要的重要的商品的价格上涨了25%，你会乐于接受吗？在一个利润空间很小的行业内，25%的溢价可能就是维持经营和走向破产的临界点。

尽管少数行业中的少数制造企业可能愿意承担这一成本，以此表明其正在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仅仅靠这些努力，我们永远不可能推动系统性的变革，因而也就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到消费者身上：即便他们要求商家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绿色溢价也不会下降。毕竟，购买水泥或钢的是大公司，不是作为个体的消费者。

降低绿色溢价，还有其他方法，其中之一是利用公共政策为

清洁产品创造需求，比如制定激励政策鼓励购买“零碳”水泥或钢，甚至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人们购买此类产品。如果法律有要求，客户有要求，而且竞争者也遵守要求，那么企业就更有可能为清洁材料支付溢价。关于这方面的激励措施，我会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介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创新生产工艺，需要开发“零碳”制造方法。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机会。

在本章讲述的所有材料中，水泥带给人类的挑战最大。前面讲的那个简单事实是很难绕过的：石灰岩加上热能等于氧化钙加上二氧化碳。不过，有些公司已经有了出色的创意。

方法之一：把回收来的二氧化碳（可能是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捕获的）重新注入尚未使用的水泥。采用该方法的公司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客户，其中就包括微软和麦当劳。目前，这种方法仅能减少大约10%的碳排放量，这家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达到33%。

方法之二：这个方法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即利用海水和发电厂捕获的二氧化碳生产水泥。该方法的发明者认为，它最终可以减少超过70%的碳排放量。

然而，即便这些方法成功了，它们也无法提供100%的“零碳”水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必须依靠碳捕获装置和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如果实用的话）来捕获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对其他大多数材料而言，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大量可靠的清洁电力。在全球范围内，电力在制造业部门所用能源中的占比约为四分之一。要想用电力驱动所有工业流程，不仅需要部署现有

的清洁能源技术，还需要开发突破性技术，让我们能以廉价的方式生产和存储大量“零碳”电力。

很快，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电力，因为我们正在寻找另外一种减排方法——电气化，即在一些工业流程中用电力替代化石燃料。比如，一种非常酷的炼钢法就是用电力取代煤炭。我密切关注的一家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名为“熔融氧化物电解”的新工艺：不再使用焦炭和熔炉冶炼铁，而是让电力通过一个包含有液体氧化铁和其他成分的电解池，在电的作用下，氧化铁得以从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用来生产钢的纯铁及作为副产品的纯氧。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二氧化碳产生。这是一项很有前景的技术，类似于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铝纯化工艺。不过，同其他生产清洁的钢的想法一样，该技术能否实现工业级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清洁电力还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塑料生产。如果把足够多的步骤组合到一起，那么塑料终有一天会变成“碳汇”——一种消除碳而不是排放碳的方式。

下面来看我们的做法：首先，需要一种为精炼流程提供动力的“零碳”方法，我们可以使用清洁电力或由清洁电力产生的氢；其次，需要一种不用烧煤就能为塑料提供碳的方法。方法之一：消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提取碳，不过这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工艺流程。方法之二：从植物中获得碳，多家公司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最后，我们需要一个“零碳”的热能来源，这同样可能是清洁电力、氢或装配有碳捕获装置的天然气。

把所有这些步骤组合到一起，就可以生产净负排放的塑料。事实上，我们会寻找一种从空气中提取碳的方法（利用植物或采用其他方式），然后把获得的碳装入瓶子或其他塑料制品，这样

它就会在容器内留存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因而也就不会产生额外的排放。我们保存起来的碳会超过排放的碳。

除了寻找零排放的生产方法，还可以减少材料的使用。仅仅靠回收更多的钢、水泥和塑料远不足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但至少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回收更多的材料，同时也应该探索新的方法，降低回收过程中所需的能量。由于重复使用物品比回收利用物品所需能量要少，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方法在生产和制造过程中使用各种可改变用途的材料。最后，在建筑物和道路的设计方面，也可以尽量减少水泥和钢的使用。比如，由木材板胶合而成的交叉层压材就非常结实耐用，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水泥和钢。

总结来说，制造部门实现零排放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1. 尽可能实现所有工艺的电气化，这需要大量的创新；
2. 从已经“脱碳”的电网中获取所需电力，这也需要大量的创新；
3. 利用碳捕获装置吸收剩余的排放，这同样需要大量的创新；
4. 更有效地使用材料，这也离不开大量的创新。

要习惯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它会经常出现。第六章要讲的是农业，这里有20世纪伟大的无名英雄，还有满是打嗝的奶牛的农场。

[1] 图片来源：WSDOT.

[2]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www.wsdot.wa.gov.

[3] “Statue Statistics,” Statue of Liberty National Monument, New York, National Park Service, www.nps.gov.

[4] Vaclav Smil,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Chichester, U.K.: Wiley, 2014), 36.

[5] 水泥产量的计量单位为公吨。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 Geological Survey, T. D. Kelly, and G. R. Matos, comps., 2014, “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Mineral and Material Commod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 version):U.S. Geological Survey Data Series 140, accessed December 6, 2019; USGS Minerals Yearbooks — China (2002, 2007, 2011, 2016), <https://www.usgs.gov>.

[6] 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 “Plastics and Polymer Composites in Light Vehicles,” Aug. 2019, www.automotiveplastics.com.

[7] 图片来源：REUTERS/Carlos Barria.

[8]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19.”

[9] Freedonia Group, “Global Cement—Demand and Sales Forecasts, Market Share, Market Size, Market Leaders,” May 2019, www.freedoniagroup.com.

[10] 直接排放量，不包括电力生产的排放量。Rhodium Group.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总排放量

19%

给植物施肥、饲养牲畜、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饮食习惯的新方式。

芝士汉堡跟我们家颇有渊源。在我孩提时，跟童子军的伙伴一起远足，回程的路上，他们总想跟我父亲在一起，因为途中父亲会停下来请所有人吃汉堡。很多年后，创办微软时，我在办公室附近的汉堡大师（西雅图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汉堡连锁店之一）吃过无数次的午餐、晚餐和夜宵。

再后来，在微软取得成功之后、梅琳达和我创办盖茨基金会之前，我父亲开始在家附近的汉堡大师店办公。他把这个餐厅当成了非正式的办公室，一边在那里吃午餐，一边筛选我们收到的关于捐款请求的函件。一段时间后，他的这个习惯被传了出去，父亲陆续收到寄往汉堡大师店的信件：“汉堡大师店转老比尔·盖茨收。”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父亲把办公地点从那家汉堡大师店搬到盖茨基金会也有20年了。我虽然现在依然爱吃汉堡，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吃了——因为我了解到牛肉和其他肉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食用类动物的饲养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专家讲的“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领域，它是排名第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作为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领域，“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包括从动物饲养到农作物种植再到树木采伐的各种人类活动。此外，该领域还涉及多种温室气体排放：就农业而言，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二氧化碳，而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一氧化二氮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65倍。

合计来看，每年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相当于7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领域总排放量的80%以上。除非采取措施控制它们的排放量，否则这个数字还将

继续攀升，因为我们需要为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富裕的全球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要想接近净零排放的目标，就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减少并最终消除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种植和养殖并不是唯一的挑战，我们还必须应对森林砍伐及其他土地利用领域的挑战。这些领域每年净排放16亿吨二氧化碳，而且破坏了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1\]](#)

为与一个涵盖如此广泛的领域保持一致，本章的内容也就庞杂了一些，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我会讲到我心中的一位英雄：他是一位农艺师，曾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使10亿人免于饥饿，但在全球开发的圈子之外，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我还将详细讨论猪粪和牛打嗝（氮气的化学反应）的问题，以及植树是否有助于避免气候灾难。但在探讨这些话题之前，让我们先从历史上的一个已经被证伪的著名预言说起。

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描述了有关未来的恐怖场景，与《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等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场景颇为相似。“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埃利希写道，“无论现在启动何种应急计划，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将有数亿人死于饥饿。”埃利希还写道：“到1980年，印度不可能养活超过2亿人。”[\[2\]](#)

所有这些预测，无一成为现实。自《人口爆炸》出版以来，印度人口已经增加了超过8亿——当前人口规模是1968年的2倍多，但印度的小麦和水稻产量是那时的3倍多，其经济规模更是那时的50倍。[\[3\]](#)在亚洲和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当地农民也都见

证了类似的生产率收益。

结果就是，尽管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但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爆发数亿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事实上，食物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不是越来越昂贵。在美国，普通家庭现在的食物支出占预算的比重比30年前低。世界其他地区也陆续显现这一趋势。^[4]

我并不是说营养不良在一些地方不是严重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梅琳达和我的工作日程上，改善极端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我想说的是：埃利希关于大规模饥荒的预测是错的。

为什么？埃利希和其他世界末日预言者都错判了什么？

他们没有考虑到创新的力量，他们没有考虑到像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这样的人。博洛格是一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正是他发起了一场农业革命，最终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受益匪浅。他培育了品质优良的高产小麦品种，以此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就是农民所说的收成。（博洛格发现，虽然他培育出了大穗粒品种的小麦，但麦秆无法支撑它们的重量，于是他又培育出短麦秆的小麦。他培育的品种之所以被称作“半矮秆小麦”，原因就在这里。）

博洛格培育的半矮秆小麦被推广到世界各地，其他育种学家也培育出高产的玉米和水稻。得益于此，大多数地区的粮食产量都较过去增加了2倍，饥饿人口数量则呈直线下降趋势。今天，博洛格受到广泛称赞，被誉为“拯救了10亿生命的人”。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他所从事工作的影响：全球种植的小麦几乎都源于他培育的品种。（这些新品种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们需要大量肥料才能实现高产，而正如

本章后面部分将讨论的，肥料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我喜欢这个事实：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博洛格拥有自己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就是农艺师——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么，诺曼·博洛格跟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到2100年，全球人口规模将接近100亿，要养活这么多人，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因为人口到21世纪末将增加40%，所以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所需的食物也将增加40%，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增加的食物远不止这些。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肉类和奶类的消费量增长尤为明显，而肉类和奶类的生产需要我们种植更多的粮食。比如，一只鸡，它要吃相当于2卡路里的谷物才能提供1卡路里的鸡肉，也就是说，生产1卡路里的鸡肉需要2卡路里的谷物。猪肉的产出比例更低一些——生产1卡路里的猪肉需要3卡路里的谷物，牛肉的产出比例最低——生产1卡路里的牛肉需要6卡路里的谷物。换言之，我们从肉类中摄取的卡路里越多，需要种植的农作物就越多。

图6-1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肉类消费趋势[5]。美国、欧盟、巴西和墨西哥基本保持平稳趋势，中国表现出急剧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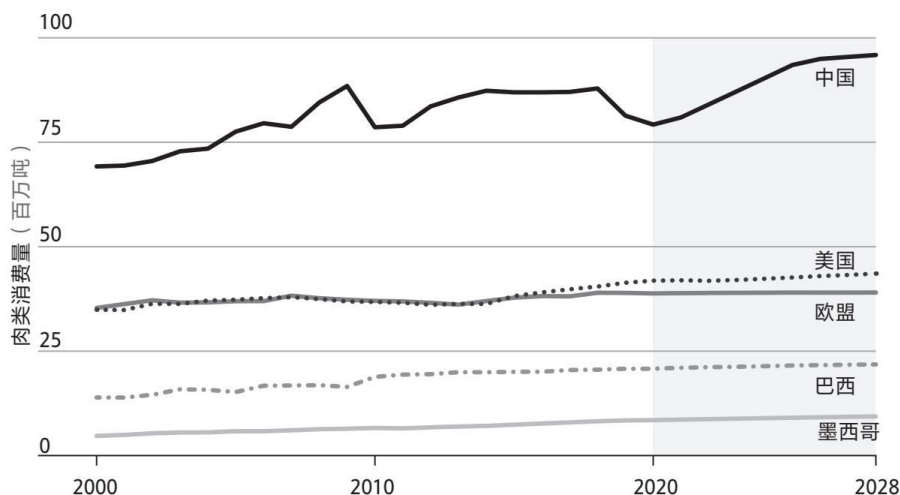


图6-1 2000—2008年世界各地的肉类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0

来看看这个难题：我们需要生产远比现在多的食物，但如果继续采用当前的生产方法，那么对气候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假设单位面积产量没有任何提升，那么要养活100亿人，与食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增加三分之二。

另一个担忧：如果大力推进基于植物的能源开发，那么可能引发农田争夺战。正如我将在第七章中讲述的，利用柳枝稷等植物制造的先进生物燃料可以以“零碳”方式为卡车、船舶和飞机提供动力，但如果把这些植物种在了原本种植粮食的土地上，那么必然在无意之中抬升了粮食价格，进而将更多的人推入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境地，同时会导致更多的森林被砍伐，而毁林造成的后果原本就很危险。

为避免落入这些陷阱，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实现更多的博洛格式的突破。在了解这些可能的突破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些

排放究竟来自哪里，进而探讨利用现有技术消除排放的各种选项。我仍将使用绿色溢价说明为什么在今天消除这些温室气体的成本如此高昂，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一些新发明的原因。

这让我想起了牛打嗝和猪粪。

观察一个人的胃，会发现它只有一个消化食物的腔室，消化后的食物则会进入肠道。再看牛的胃，它有四个腔室，正是由于这些腔室的存在，牛才可以吃那些人类无法消化的草和其他植物。在被称为“肠内发酵”的过程中，牛胃内的细菌可分解植物的纤维素，然后发酵产生甲烷。牛胃中的大部分甲烷会通过打嗝排到体外，也有一小部分会以肠胃胀气的形式从另一端排出。

（顺便说一句，在进入这个主题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奇怪的表述。每年，梅琳达和我都会就我们一年的工作发表公开信，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我决定写一写牛的肠内发酵问题。有一天，在审核草稿时，梅琳达和我进行了一场关于健康的争论，而争论的起因是我可以在公开信中使用多少次“放屁”这个词。结果，她让我减到了一次。现在，作为本书的唯一作者，我有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我打算继续使用这个词。）

在全球范围内，肉牛和奶牛的养殖规模大约为10亿头。它们每年打嗝和放屁所排放的甲烷，就所造成的温室效应而言，相当于20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4%。[\[6\]](#)

通过打嗝和放屁释放甲烷，这是牛及其他反刍动物（如绵羊、山羊、鹿和骆驼）特有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源中也包括所有动物共有的一个问题——排便。

粪便在分解时会释放强大的温室气体组合：主要成分是一氧

化二氮，另加一些甲烷、硫和氨。在与粪便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约有一半来自猪粪，其余来自牛粪。动物的粪便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类别，它实际上是农业中仅次于肠内发酵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

对于排便、打嗝和放屁这类活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是一个难题。研究人员已经尝试运用各种手段解决肠内发酵问题，比如用疫苗控制牛肠道内产生甲烷的微生物，采用自然饲养方式减少排放，在饲料中添加特殊物质或药物，等等。就这些努力来看，大多无果而终。不过，有一种名为3—硝基氧丙醇的化合物颇具前景，可以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问题是必须每天至少给牛喂食一次该化合物，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在大多数牧场不具备可行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任何新技术出现，即便不存在明显的绿色溢价，依然可以减少此类排放。事实表明，一头牛所产生的甲烷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饲养地。比如，南美洲的牛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是北美洲的牛的5倍，非洲的牛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北美洲和欧洲养殖的牛大多是改良品种，可以更高效地把饲料转化为奶和肉。另外，它们也会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和更高品质的饲料，这意味着它们产生的甲烷量更少。

如果能够把这些改良的品种和最佳饲养实践推广到世界各地，那么不仅可以减少甲烷的排放，还可以帮助贫困农民提高收入，比如对非洲牛进行杂交改良，以及推广可负担的高质量饲料。在粪便处理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或地区的农民已经掌握多种处理粪便的技术，可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这些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贫困国家或地区的农民也会引入使用它们，这样一来也就提高了减少排放的可能性。

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可能会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与其尝试所有这些减少排放的方式，倒不如完全停止饲养牲畜。我看到过类似的呼吁，但我不认为这是可实现的。首要的一点是，肉类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实在太重要了。在世界很多地区，即便是那些食物匮乏的地区，吃肉也是节日和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传统美食，包括头盘、肉或鱼、奶酪和甜点，已被正式列入这个国家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名录是这样介绍的：“法国传统美食强调团聚、味蕾的愉悦及人与大自然产品之间的平衡。”^[7]

其实，我们可以在减少肉类食用的同时仍享受肉的美味。选项之一是植物基人造肉，即以各种方式加工的、以仿造肉类味道为目的的植物产品。我投资了两家生产植物基人造肉产品的公司——超越肉类公司（Beyond Meat）和不可能食品公司（Impossible Foods），而且其产品已经上市。你可能认为我存有私心，但我还是要说人造肉真的不错，只要原料配比得当，它完全可以作为牛肉糜的替代品。而且，市面上的所有替代品都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它们的生产占用的土地更少，使用的水更少，而且温室气体排放量更少。此外，我们也可以减少在肉类生产方面投入的谷物，进而减轻粮食作物的产能压力，同时减少肥料的使用。就动物福利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被圈养的牲畜会更少。

不过，人造肉有很高的绿色溢价。平均而言，牛肉糜替代品的价格比真正的牛肉糜高约86%。^[8]但随着替代品销量的增长，以及投放市场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我乐观地认为它们的价格最终会低于真正的动物肉制品的价格。

然而，人造肉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味道。虽然用植物仿造汉堡的原材料相对容易，但要让人们真以为自己吃的

是牛排或鸡胸肉，那就难多了。人们是否真的喜欢人造肉并愿意为此做出改变？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此改变进而产生显著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愿意为此改变的证据。我必须承认，对于超越肉类公司和不可能食品公司取得的经营业绩，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成立初期的种种发展不顺。我参加过不可能食品公司早期举办的一项演示活动，当时汉堡被烤焦，甚至还触发了烟雾报警装置。现在，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真可谓无处不在，至少在西雅图地区和我访问过的一些城市是如此。超越肉类公司于2019年成功上市。让人造肉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10年，但在我看来，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下降，那些担忧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人必将给予支持。

另一个方法类似于植物基人造肉，但并不是种植植物后把它们加工成肉类的味道，而是在实验室内培育肉类。它有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名字——“细胞培养肉”“培植肉”“清洁肉”等。目前，致力于将该产品推向市场的初创公司有20余家。不过，要想在超市货架上买到它们的产品，最快可能也要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了。

记住，它并不是假的肉。无论是脂肪、肌肉还是肌腱，培植肉跟任何两条腿或四条腿的动物的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培植肉是在实验室培育的，而不是在农场饲养的。科学家从活体动物身上提取一些细胞，让这些细胞增殖，然后诱导它们形成我们常吃的那种肉的组织。整个培育过程只会产生极少的温室气体，甚至不会产生任何温室气体。当然，驱动实验室运转的电力除外。该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是成本过于高昂，而且现在尚不清楚怎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这两种类型的人造肉都面临另外一个重大难题：在美国，至少有17个州的立法机构试图阻止这类产品在商店出售时被贴上“肉类”的标签，有一个州提议全面禁止销售这类产品。所以，即便技术提高了，即便成本降低了，我们也还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公共辩论环境，以就这类产品的监管、包装和销售方式展开讨论。

如何减少人类食物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减少浪费。在欧洲、亚洲的工业化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超过20%的食物被直接扔掉任其腐烂，或以其他方式被浪费。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0%。对食不果腹的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对经济和气候来说也是如此。废弃的食物在腐烂时会产生大量甲烷，其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相当于每年排放33亿吨二氧化碳。

最重要的解决方案是改变行为——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除此之外，技术也可以提供帮助。比如，有两家公司正在开发隐形的植物基涂层，用以延长水果和蔬菜的保质期。这些涂层是可食用的，而且丝毫不影响食物的口感。还有一家公司开发了“智能垃圾桶”，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追踪一个家庭或一家企业的食物浪费情况。它会生成一份报告，显示你扔了多少东西，并附有相应的价格和碳足迹。这个系统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侵犯了隐私，但它的确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几年前，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处仓库，我看到了一个让人兴奋不已的场景：数千吨合成化肥高高地堆在一起，就像风吹聚成的雪堆一样（见图6-2[9]）。该仓库是新建的雅苾化肥配送中心的组成部分，也是东非地区最大的化肥配送中心。在仓

库内，我一边和工人攀谈，一边看他们往袋子里装白色的颗粒物。这些微小的颗粒物含有氮、磷及其他营养元素，并将很快施于这个世界上极度贫困地区的农田，帮助那里的农作物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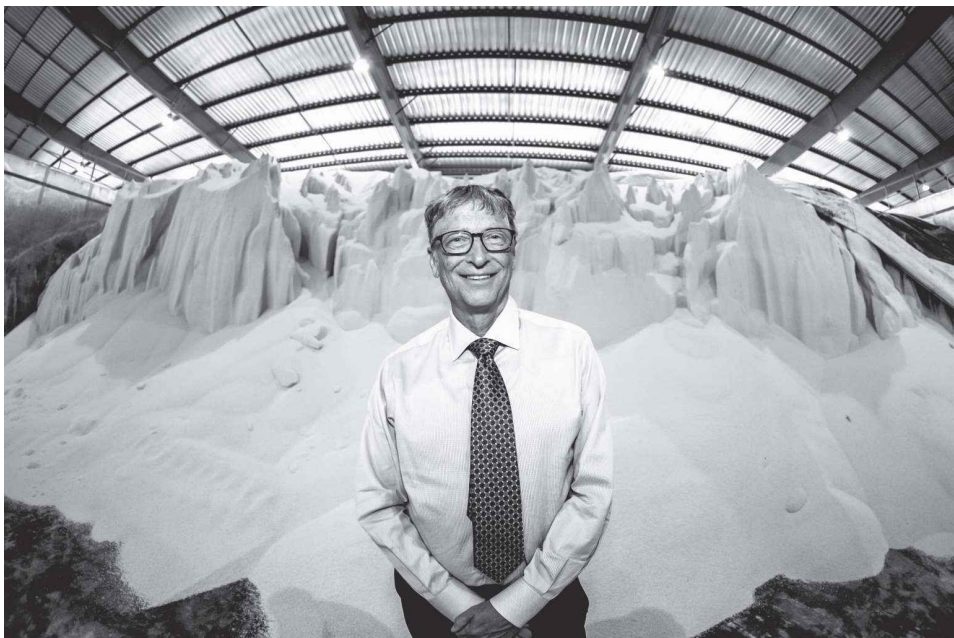


图6-2 比尔·盖茨在雅苒化肥配送中心

注：2018年，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参观雅苒国际集团在当地建设的化肥配送中心。那时，我甚至比照片上看起来还开心。

我喜欢这样的旅程。我知道这么说很蠢，但化肥于我而言非常神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庭院和花园变得更美丽。同诺曼·博洛格培育的半矮秆小麦及其他专家培育的玉米和水稻新品种一样，合成化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改变世界的农业革命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据估测，如果我们没有生产出合成化肥，那么世界人口可能比现在少40%~50%。

全球早已经在大量使用化肥，而贫困国家应该使用更多的化

肥。我提到的农业革命（通常被称为“绿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非洲。在非洲地区，一个农民通常从一英亩土地上获得的食物仅相当于美国农民的五分之一（见图6-3[10]）。因为在贫困国家，大多数农民得不到购买化肥的信贷服务，而且当地的化肥价格比富裕国家高得多，因为运送化肥到农村地区的道路实在太糟糕了。如果我们可以帮助贫困农民提高农作物收成，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这样一来，一些贫穷国家的数百万人口就不用再挨饿，也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营养。（我将在第九章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为什么化肥如此神奇？因为它为植物提供了其生长所需的基本营养元素，包括磷、钾以及与气候变化高度相关的氮。氮是一种利弊皆有的元素，它与光合作用密切相关，而植物正是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成能量的。所以，正是由于氮的存在，植物才能生存下去，而只有植物生存下去了，人类才能获得所需的食物。但氮也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讲一讲它对植物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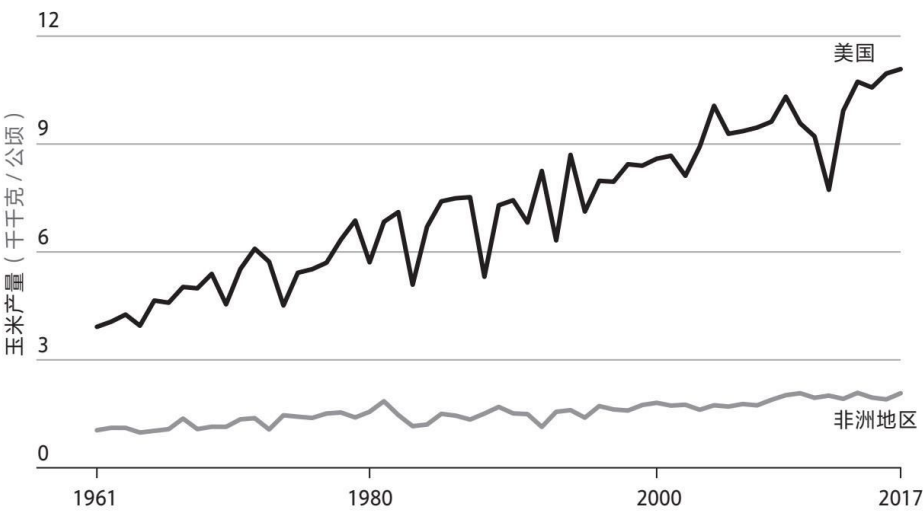


图6-3 1961—2017年美国 and 非洲地区的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对比

注：农业领域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化肥和其他改良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美国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非洲地区农民的收成与过去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缩小这一差距有助于拯救生命，有助于人们摆脱贫困。但如果没有创新技术，这就会让气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资料来源：FAO

种植农作物需要大量的氮，远超在自然环境中所能找到的氮。施加氮肥可以让玉米长到10英尺高，并大幅提高玉米产量。奇怪的是，大多数植物自身并不能制造氮。它们从土壤里的氮中获得氮，而这些氮是在各种微生物的作用下形成的。只要能够获得氮，植物就会继续生长，而一旦氮被消耗殆尽，它们就会停止生长。这也是施加氮肥能够促进植物生长的原因。

几千年来，人们通过施用自然肥料（如粪肥和蝙蝠粪）给植物提供额外的氮。重大突破出现在1908年，当时两位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施（Carl Bosch）发明了工厂中使用氮和氢生成氨的方法。对于他们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奖也不为过。现在被广泛称为“哈伯—博施法”的制造工艺使得合成化肥的生产成为可能，这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种植农作物的数量，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农作物的种植区域。时至今日，这仍是氨的主要生产方法。就像诺曼·博洛格是历史上一位被埋没的伟大英雄一样，哈伯—博施法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最重要的发明。[\[11\]](#)

我们来看一个难题：在制造氮的过程中，微生物会消耗大量能量，事实上，由于能量消耗实在过大，所以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周围土壤中已经不存在任何氮了，它们才会开动制造机器。如果觉察到有足够的氮，它们就会停止制造过程，以便将能量用在其他地方。所以，施用合成化肥后，土壤中的微生物

物会觉察到氮的存在，进而停止自我生产。

合成化肥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之处：首先，为制造合成化肥必须生产氨，这个过程需要热量，热量来自天然气的燃烧，而燃烧天然气会产生温室气体；其次，在把合成化肥从生产车间运送到存储仓库（比如我在坦桑尼亚参观的化肥配送中心）再到农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卡车运输，而卡车需要汽油提供动力；最后，施用到土壤中的合成化肥所含的大部分氮根本不会被植物吸收。事实上，在施用到农田的氮肥中，能被农作物吸收的不足一半，剩余部分要么进入地下水或地表水中造成污染，要么以一氧化二氮的形式逃匿到空气中。前文提到过，一氧化二氮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65倍。

合计来看，化肥领域于2010年排放的温室气体约为13亿吨。到21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17亿吨。拜哈伯—博施法所赐的，已经被哈伯—博施法收回。

令人遗憾的是，就化肥而言，目前还没有任何实用的“零碳”替代品。的确，我们可以用清洁电力取代氨合成过程中所需的化石燃料，从而消除化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但这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工艺，会导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比如，在美国，用这种工艺生产氨基化尿素会使产品成本增加20%。

这还仅仅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捕获施肥时产生的温室气体。对于一氧化二氮，还没有相应的碳捕获技术。这意味着我无法为“零碳”化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绿色溢价，而绿色溢价本身又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信息，因为它会告诉我们哪些领域需要重大创新。

从技术上讲，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以更高效的方式吸收氮，前提是农民要掌握相应的技术，在农作物生长季节仔细监测土壤中

的氮含量，并据此施用绝对适量的化肥。这是一个成本高昂又耗费时间的过程，况且化肥价格还很便宜（至少在富裕国家是如此），所以更经济的方法就是多施肥——至少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的量。

有一些公司已经在开发化肥添加剂，帮助植物吸收更多的氮，从而减少进入地下水或逃匿到大气中的氮。目前，使用这类添加剂的化肥仅占全球总量的2%，因为它们的功效并不是很稳定，而化肥生产商也不想投入太多资金来改进现有产品。

还有一些专家致力于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氮的问题。比如，有些研究人员正在对农作物新品种进行基因研究，希望通过基因技术让农作物“募集”微生物，提高氮的固定性，从而获得生长所需的氮。此外，还有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可用于固定氮的转基因微生物。也就是说，不用再通过化肥添加氮，而是往土壤中添加任何时候都会产生氮的微生物——即便土壤中已经包含氮。如果这些方法奏效，那么它们将大幅降低化肥的需求量，也就间接减少了化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你刚刚读过的这一切，即我描述的广义上的农业，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所排放温室气体的70%左右。如果让我用一个词组概括另外30%的排放，这个词组就是“森林砍伐”。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全球森林面积至少减少了50万平方英里。^[12]（这个面积超过了南非或秘鲁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3%左右。）森林砍伐既会产生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比如，如果林木被烧毁，它们很快就会释放其所含的所有二氧化碳），又会造成难以觉察的损害。当你把一棵树从地里挖出来时，就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环境，而这片土壤恰

恰又存有大量的碳。（事实上，土壤中存储的碳的总量超过大气和所有植物中存储的碳的总量。）当你开始移动树木，土壤中的碳就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逃匿到大气中。

如果各个地方砍伐森林的原因是一样的，那么这种行为就比较容易制止，但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巴西，在过去几十年里，亚马孙雨林被破坏的最主要原因是清理场地，建立养牛牧场。（自1990年以来，巴西的森林面积减少了大约10%。）由于食物是全球商品，所以一个国家消费的食物会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利用。随着全球肉类消费越来越多，拉丁美洲地区森林砍伐的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任何一个地方汉堡的增加都意味着另外一个地方树木的减少。

把所有这些排放量加起来，数字非常可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计入土地利用的变化，美国式饮食标准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美国电力、制造、交通和建筑四部门所用全部能源所产生的排放量总和。[\[13\]](#)

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森林砍伐并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汉堡和牛排。比如，在非洲，毁林是为种植农作物，也是为获取燃料，以满足当地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1990年以来，其森林面积至少减少了60%。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炭出口国，而木炭是由炭化木生产的。

与之不同，在印度尼西亚，砍伐森林是为了种植棕榈树——棕榈树产的棕榈油应用广泛，从影院的爆米花到日常用的洗发水，当中都有它的影子。印度尼西亚之所以位列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是主要原因之一。[\[14\]](#)

我希望能告诉你某种突破性发明可以确保全球森林的安全。

事实上，真正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先进的卫星监测技术，这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找到砍伐森林的地点或发生山火的地点，也更容易评估砍伐森林或发生森林火灾后的损失情况。我还追踪了一些正在研发棕榈油替代品的公司：如果能够通过合成方法生产棕榈油替代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砍伐那么多的森林，为棕榈种植园让路。

但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人类砍伐森林并不是因为人们是邪恶的，只有当伐木的动机比保留树木的动机更强烈时，人们才会去砍树。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包括在森林保护方面为相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强力执行旨在保护某些特定区域的相关规定，为农村地区创造不同的经济发展机会，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完全靠索取自然资源而生存。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与森林相关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植树，让树木捕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它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便宜、技术含量最低的碳捕获措施，而且对所有爱护树木的人来说也极具吸引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至少就目前来看，植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

就如同全球气候变暖一样，你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一棵树在其一生中可以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不同的树木情况各异。不过，我们也有一条很好的经验法则：40年吸收4吨。

这棵树会存活多久？如果被烧掉了，那么它存储的所有二氧化碳都会被释放到大气中。

如果你没有种下这棵树，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一棵树天生就长在那里，那你对碳吸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你会把这棵树种在哪里？总的来说，冰雪覆盖的地区的树木会更多地导致温度上升，因为它们的颜色比树下的冰雪深，而深色物体比浅色物体更能吸收热量。另外，热带森林地区的树木会更多地导致温度下降，因为它们会释放很多水分，而这些水分又会转变成云，反射阳光。在中纬度地区，也就是处于热带和极圈之间的树木，基本上，既不会导致温度上升也不会导致温度下降。

那个地方还长有别的東西吗？比如，你把原本种植大豆的农场改造成林地，这样一来，大豆的总产量就减少了，进而导致大豆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会砍掉其他地方的树木，然后改种大豆。这至少会抵消你通过植树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经计算，需要在热带地区种植大约50英亩的树，才能吸收掉一个普通美国人一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照这个数字乘以美国人口总数，需要种植160亿英亩的树。这约合2 50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世界陆地总面积的一半。我们必须将这些树保护好，而且必须一直保护下去。另外，这还只是考虑了美国的人口——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排放量都没有被计算在内。

不要误会，无论是从园艺还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树木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我们应该种植更多的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树木生长过的地方种树，这有助于抵消森林砍伐造成的损害。但要想通过种植足够多的树解决化石燃料燃烧所造成的问题，目前来看并不现实。就气候变化而言，与树木相关的最有效

的策略就是停止砍伐现有的大量树木。

重要的是，用不了多久，人类就得多生产70%的食物，同时持续不断地降低排放量直至完全消除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需要很多新的创意，包括给植物施肥的新方式、饲养牲畜的新方式和减少食物浪费的新方式。另外，富裕国家的民众也需要改变一些习惯，比如少吃肉——即便是作为家庭传承的汉堡也不例外。

[1] Rhodium Group internal analysis.

[2] Paul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8).

[3] World Bank, data.worldbank.org.

[4] Derek Thompson, “Cheap Eats: How America Spends Money on Food,” *The Atlantic*, March 8, 2013, www.theatlantic.com.

[5] 肉类消费量计量单位为公吨，包括牛肉、羊肉、猪肉、家禽肉和小牛肉。OECD (2020),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https://stats.oecd.org> (accessed October 2020).

[6]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ww.fao.org.

[7] UNESCO, “Gastronomic Meal of the French,” ich.unesco.org.

[8] 荣鼎咨询于2020年9月开展的美国零售价格在线调查。

[9] 图片来源：Gates Notes, LLC.

[10] 每公顷玉米产量的计量单位为千千克。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STAT.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0-2029.最新更新：November 30, 2020. Accessed: November 2020.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HIGH_AGLINK_2020#.

[11] 弗里茨·哈伯有着复杂的经历，除了制造拯救生命的氨，他还率先尝试使用氯和其他有毒气体制造用于“一战”的化学武器。

[12]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nk.worldbank.org.

[13] Janet Ranganathan et al., “Shifting Diets for a Sustainable Food

Futur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ww.wri.org.

[14]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Forests and Landscapes in Indonesia,” www.wri.org.

第七章

交通运输

总排放量

16%

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让我们从快速问答开始——只有两个问题。

1. 下列哪一项包含能量最多？

- A. 1加仑汽油
- B. 1根雷管
- C. 1枚手榴弹

2. 在美国，下列哪一项最便宜？

- A. 1加仑牛奶
- B. 1加仑橙汁
- C. 1加仑汽油

正确的答案分别是A和C——都是汽油。汽油包含着惊人的能量，把130根雷管捆在一起，才能赶上1加仑汽油所含的能量。当然，雷管是立刻释放所有能量，而汽油是缓慢燃烧——这也正是我们给汽车加汽油而不是加雷管的原因。

在美国，汽油非常便宜，尽管你在加油站加油时可能并不这样认为。除了牛奶和橙汁，还有一些物品的价格比汽油贵（以加仑为单位）：Dasani牌瓶装水、酸奶、蜂蜜、洗涤剂、枫糖浆、洗手液、星巴克的拿铁咖啡、红牛牌功能饮料、橄榄油，以及连锁食品超市Trader Joe's售卖的著名低价葡萄酒——Charles Shaw葡萄酒。是的，以加仑为单位，汽油比这款售价仅为2美元的葡萄酒还便宜。

在阅读本章剩余的部分时，记住如下两个与汽油相关的事实：汽油能量巨大和汽油价格低廉。[\[1\]](#)当谈到每花1美元可以获

得多少能量时，这两个事实会提醒我们：汽油是黄金标准。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柴油和喷气燃料等类似产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提供如此高的能量。

我们在为交通系统寻找“脱碳”方法时，每单位燃料所产生的能量和每花费1美元所产生的能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孪生概念。显然你也知道，汽车、船舶和飞机在燃烧燃料时会产生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为了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需要用其他能量密度相当且价格同样便宜的产品取代这些燃料。

我在本书如此靠后的位置讲这一问题，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要知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6%，排在生产和制造、电力以及种植和养殖部门之后。在最初了解这一信息时，我也感到惊讶。对此，我想大多数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人行道上随机拦下几个陌生人，问他们哪些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他们可能会说燃煤发电、驾驶汽车和乘坐飞机。

这种混淆是可以理解的：交通运输虽然并不是全球最大的排放源，但在美国的确排名第一，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略高于电力生产部门。美国人经常开车，也经常坐飞机。

总之，若想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就必须消除交通运输导致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这里讲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

这有多难？相当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人类历史99.9%的时间里，出行根本不靠化石燃料。我们步行，骑动物，乘坐帆船。到19世纪初，人类发明了用煤炭驱动

机车和轮船的方法，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火车穿越大陆，轮船则横跨大洋，把人和产品运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进入我们的生活，紧接着就是20世纪初兴起的商业航空旅行。如今，它们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化石燃料首次进入交通运输领域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200年，但我们已经对它们产生了根本上的依赖。如果没有同样廉价且可为长途旅行提供动力的替代品，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化石燃料。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消除的并不仅仅是今天交通运输领域产生的82亿吨碳，还有更多的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预测，即便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出行和贸易的影响，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仍持续增长，这一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50年。^[2]在该领域，导致排放量增长的是航空、卡车运输和海运，而不是客车。目前，以海运方式运送的货物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在碳排放方面则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3%。

交通运输领域的很多排放来自富裕国家，但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10年里已经达到排放峰值，自那时起，排放量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当下，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碳排放的增长基本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购买的汽车数量也越来越多（见图7-1^[3]）。中国照旧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1倍，而与1990年相比，增幅更是达到10倍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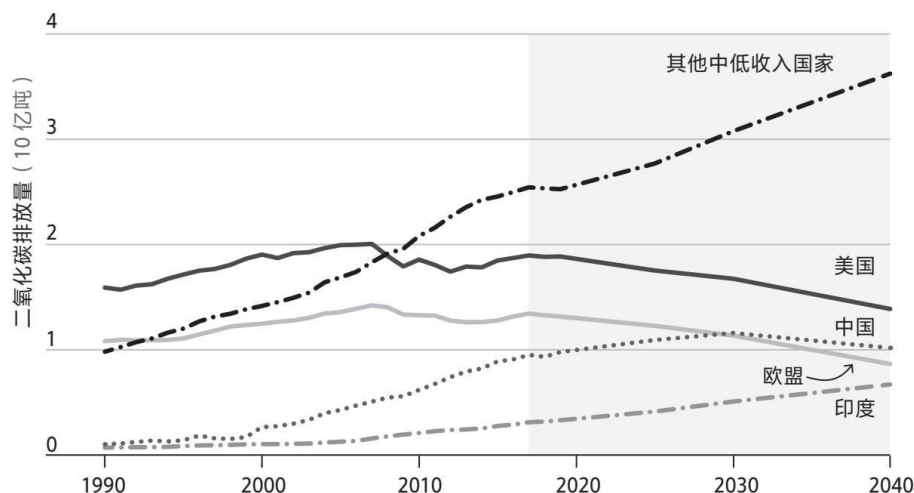


图7-1 交通运输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情况

注：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延缓而不是阻止了交通运输领域排放量的增长。尽管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排放量有所减少，但中低收入国家的排放量大幅增长。整体来看，该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呈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0; Rhodium Group

冒着被抱怨唠叨的风险，我在这里讲一下我对交通运输领域的看法——这个看法跟我对电力、制造及农业领域的看法是一样的：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员流动和货物流通，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是一种个人自由，更不用说贫困国家的农民为了谋生把收获的农作物拿到市场上交易了。国际航班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而这在一个世纪前还是难以想象的；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有助于我们理解共同的目标。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一年之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食物选择都是有限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喜欢吃葡萄，一年四季都喜欢吃。我能够吃上，完全是靠那些从南美运送水果到美国的集装箱船，而这些船又是靠化石燃料驱动的。

那么在不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的条件下，我们怎样才能继续享受现代旅行和交通的种种便利呢？我们是否拥有我们所需的全部技术，还是需要一些创新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计算交通运输的绿色溢价。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哪里。

图7-2展示了汽车、卡车、飞机和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百分比情况。[\[4\]](#)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交通工具都实现净零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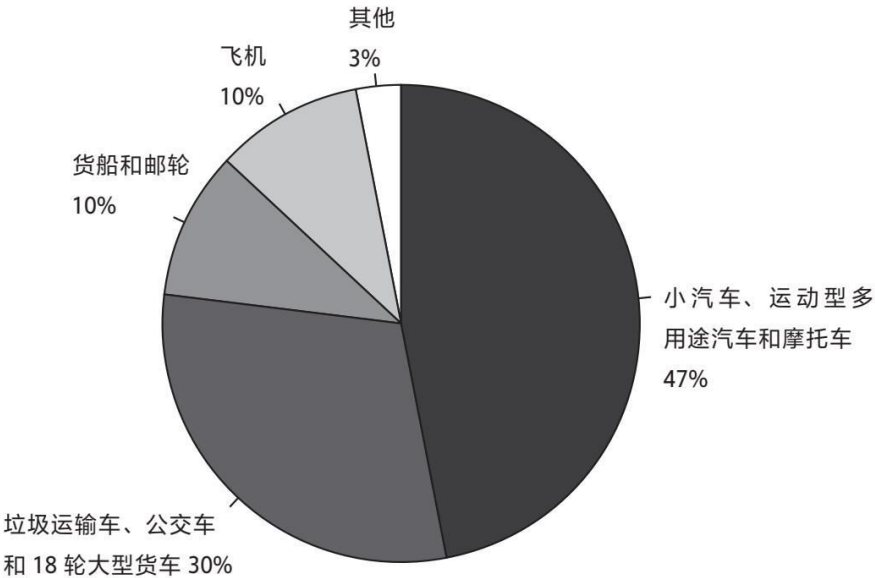


图7-2 多种交通运输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情况

注：汽车并不是唯一的重要排放源。在与交通相关的排放中，乘用车排放量占比接近5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需要注意的是，乘用车（小汽车、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摩托

车等)的排放量占比近50%，从垃圾运输车到18轮大型货车在内的中型和重型车占30%，飞机占10%，集装箱船和其他类型的船占10%，火车占剩余的3%。[5]

我们来逐一分析，看看当前都有哪些可以消除排放的选项。先从图7-2中占比最大的一块说起。

乘用车。全世界行驶在路上的汽车约有10亿辆。[6]仅2018年一年就新增了大约2 400万辆，而这还是扣除了报废车辆之后的数字。[7]因为燃烧汽油会不可避免地排放温室气体，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替代品：要么是由空气中的碳而不是化石燃料中的碳制成的燃料，要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能源。

我们先从第二个选项说起。幸运的是，我们的确拥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能源，而且已经证实它是有效的——当然还远谈不上完美。事实上，可能现在就能在你附近的汽车经销店里买到使用这种能源的汽车。

今天，许多汽车品牌提供纯电动汽车：奥迪、宝马、雪弗兰、雪铁龙、菲亚特、福特、本田、现代、捷豹、起亚、梅赛德斯-奔驰、日产、标致、保时捷、雷诺、斯玛特、特斯拉、大众，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汽车制造商，其中也包括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公司。我自己也有一辆电动车，而且很喜欢它。

尽管过去电动车比燃油车贵很多，而且现在仍有一些偏贵的电动车车型，但它们在价格上的差距近年来已经大幅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电池成本大幅降低——2010年以来下降了87%，以及政府为推动零排放汽车发展而出台多项税收减免政策和由此发起的承诺等。但电动车仍保持着适度的绿色溢价。

我们以雪弗兰公司生产的两款车型为例：燃油车迈锐宝和纯电动车博尔特EV（见图7-3）。[8]

迈锐宝，售价 22 095 美元起



每加仑英里数 (MPG):

29 (城市公路) / 36 (高速公路)

车厢容积: 15.7 立方英尺^①

发动机动力: 250

博尔特 EV，售价 36 620 美元起



续驶里程: 250 英里

车厢容积: 56.6 立方英尺

发动机动力: 200

图7-3 汽油驱动的迈锐宝和纯电动的博尔特EV

资料来源: Chevrolet

① 1立方英尺约为0.03立方米。——编者注

从发动机动力和乘坐空间（人数）等方面看，这两款车大致相当。虽然博尔特EV的售价（未计入任何可能使其价格下降的税收激励因素）高14 000多美元，但不能仅用汽车的购买价计算绿色溢价。重要的不是购车成本，而是购车和养车的总成本。你必须考虑实际情况，比如电动车所需保养较少，电动车是用电而不是用汽油来驱动的，等等。另外，由于电动车售价更高，所以需要支付更多的汽车保险费用。

在充分考虑所有不同因素后，我们再来看拥有车辆的总成本：博尔特EV每英里的行驶成本比迈锐宝多10美分。[\[9\]](#)

每英里10美分意味着什么？如果每年行驶1.2万英里，那么就会产生1 200美元的年度绿色溢价，这尽管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金额，但对很多汽车购买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是美国国内的平均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绿色溢价，主要因素在于电价和油价之间的差距。（电价低或油价高会降低绿色溢价。）在欧洲一些地区，由于油价过于高昂，电动车

的绿色溢价早已经降到0。即便在美国，随着电池价格的持续下降，我预计到2030年，大多数电动车的绿色溢价也会降为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电动车上路，因为它们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在本章结尾部分，我会进一步讲述这方面的内容。）但即便到2030年，电动车跟燃油车相比还是会有一些弊端。

首先，汽油价格变化很大，而只有在油价高于一定水平时，电动车才是更便宜的选择。2020年5月，美国国内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降到了每加仑1.77美元。在油价低的时候，电动车难以与燃油车竞争——电池的价格过于高昂。就目前的电池价格来看，只有在油价超过每加仑3美元时，电动车车主才会省钱。

其次，电动车充满电通常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给燃油车加满油所需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再次，就避免碳排放而言，只有当我们使用来自“零碳”能源的电力时，开电动车才有意义。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那些突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如果电力仍来自燃煤电厂，那么用它给电动车充电，无非就是用一种化石燃料替换另一种化石燃料而已。

最后，要让所有的燃油车不再上路也是需要时间的。平均而言，一辆车从装配线正式下线到最终走进汽车报废厂需要至少13年的时间。这样一个漫长的生命周期意味着，如果想在2050年以前让美国所有的乘用车都以电力驱动，那么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接近汽车总销量的100%。今天，这个数字还不到2%。

正如前文提到的，第一种实现零排放的方法是转向由大气中的碳制成的替代性液体燃料。燃烧这些燃料时，不会给空气增加

额外的碳——只是把先前制造燃料时所用的碳归还了而已。

看到“替代燃料”这个词时，你可能会想到乙醇——由玉米、甘蔗或甜菜制成的生物燃料。如果你在美国，那么你可能已经使用过这种生物燃料，因为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汽油大多含有10%的乙醇，而这些乙醇几乎全是由玉米制造的。在巴西，有些车100%使用由甘蔗制造的乙醇。目前，一点儿也不使用乙醇燃料的国家屈指可数。

问题在于：由玉米制造的乙醇并不是“零碳”的，而依照制造工艺的不同，它甚至都不是低碳的。农作物的种植需要化肥。把植物转变成燃料的炼制过程也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燃料类作物的种植可能会抢占原本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甚至可能迫使农民砍伐森林，垦荒种粮。

然而，替代燃料并不是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先进的第二代生物燃料，这类燃料不会面临常规生物燃料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们所用的原材料并不是粮食作物——除非你特别喜欢柳枝稷色拉。另外，它们还可以用农作物残留物（比如玉米秆）、造纸的副产品，乃至厨余垃圾和庭院垃圾生产。因为原材料不是粮食作物，所以它们不需要施肥或者只需要施用很少的化肥。另外，它们不是种在农田里的，因而也就不会挤占用以生产粮食或动物饲料的土地。

有些先进的生物燃料将成为专家所称的“可直接使用燃料”，也就是说，无须改进常规发动机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燃料。另外一个好处是这些燃料可以通过油轮、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运输，而在这些基础设施领域，我们早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建造和维护费用。

尽管我对生物燃料持乐观态度，但这的确是一个困难重重的

领域。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深知在这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异常艰难。几年前，我了解到一家美国公司开发了一项专有制造工艺，可以将树木等生物质转化为燃料。于是，我去参观了这家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番尽职调查之后，我向这家公司投了5 000万美元，但这项制造工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种技术挑战意味着工厂无法以经济合算的方式大规模投入生产，最终只得关门。虽然5 000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儿，但我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探索各种不同的方式，尽管我们知道其中有很多想法会以失败告终。

令人遗憾的是，在先进生物燃料领域，现在依然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的情况，而且这些燃料无法得到大规模配置，因而也就无法帮助我们实现交通系统“脱碳”的目的。如此一来，使用它们替代汽油将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选择（见表7-1[10]）。对于这些先进生物燃料及其他清洁燃料的确切成本，专家有不同的意见，但这方面有一个估算范围，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多项研究结果的平均值。

生物燃料从植物中获取能量，但这并不是制造替代燃料的唯一方法。我们还可以利用“零碳”电力将水中的氢和二氧化碳中的碳结合，进而合成碳氢燃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电力，所以这些燃料有时也被称作“电燃料”。电燃料有许多优势：它们是可直接使用燃料，而且由于制造原料是从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所以燃烧时不会增加总排放量。

表7-1使用先进生物燃料替代汽油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 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汽油	2.43	5.00 (先进生物燃料)	106%

不过，电燃料也有一个弊端：价格高昂。你需要用氢来制造电燃料，而正如第四章所讲的，以“零碳”方式制造氢的成本非常高。你还需要使用清洁电力来制造电燃料（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电网中还没有足够便宜的清洁电力可供经济合算地生产燃料。这些都会拉升电燃料的绿色溢价（见表7-2[11]）。

表7-2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汽油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汽油	2.43	5.00 (先进生物燃料)	106%
汽油	2.43	8.20 (电燃料)	237%

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美国家庭通常每年在汽油上的支出约为2 000美元。[12]所以，如果价格上涨1倍，那么就会多付2 000美元的溢价；如果价格上涨2倍，那么美国公路上行驶的每辆常规乘用车都要多付4 000美元。

垃圾运输车、公交车和18轮大型货车。令人遗憾的是，对长途客车和卡车来说，电池是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选项。车体越重，续驶里程越短，用电力作为动力源的难度就越大。因为电池很重，存储能量又有限，而且一次只能向发动机输送一定量的能量。（相比于轻型掀背车，重型卡车需要更大功率的发动机，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电池。）

垃圾运输车和市内公交车等中型车较轻，电力驱动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它们的行驶路线较短，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停在相同的地方，所以建立充电站也就比较容易。在中国，拥有

1 200万人口的深圳市已经实现公交车的全面电气化[13]（超过1.6万辆纯电动公交车，见图7-4[14]）以及近三分之二的出租车的电气化。随着中国电动公交车销量的不断增加，我认为在未来10年内，中国国内公交车的绿色溢价将降为0，而这也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能够实现公交车的电气化。

但如果你想增加续驶里程、提高运载能力，比如你要驾驶一辆满载货物的18轮大型货车横穿全国，而不是驾驶一辆满载学生的校车沿着街区环行，那么你就要装载更多的电池。然而，增加电池就是增加车身的重量，而且是增加很多。



图7-4 中国深圳的纯电动公交车队

同等重量下，目前最好的锂离子电池存储的能量是汽油的1/36。换句话说，要获得1加仑汽油的能量，需要相当于36加仑汽油重的电池。

我们来看看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机械工程师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续驶里程为600英里的电动载重卡车需要大量的电池，而受这些电池重量的影响，卡车的载重量将减少25%；续驶里程为900英里的电动卡车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它需要更多的电池，而计入这些电池的重量后，它基本上就不能载货了。[\[15\]](#)

要知道，一辆典型的以柴油为燃料的卡车加一次油可以行驶1 000英里以上。所以，要实现美国卡车车队的电气化，货运公司将不得不转向使用载重更少的车辆，更频繁地停车充电，并且要花上几个小时给车充电，而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可能很长时间都遇不到一个充电站。当然，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就短程行驶来看，电动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对重型长途卡车来说，使用电力并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由于我们无法实现的目前仅有的两种电气化解决方案是使用电燃料和先进生物燃料，令人遗憾的是，若应用于载重卡车，它们的绿色溢价都很高（见表7-3[\[16\]](#)）。

表7-3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柴油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 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柴油	2.71	5.50 (先进生物燃料)	103%
柴油	2.71	9.05 (电燃料)	234%

船舶和飞机。不久前，我和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谈起了飞机“脱碳”的可能性问题。沃伦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电池为大型喷气式客机提供动力？”他早就知道，飞机在起飞时所载燃料

重量占其总重量的20%~40%。所以，当我告诉他那个惊人的事实，也就是你需要36倍于航空燃油重量的电池才能获得相同的能量时，他马上就明白了。需要的动力越多，飞机就越重，到最后它可能会重到根本无法起飞。沃伦笑着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啊”。

当你尝试为集装箱船或喷气式客机等超级重的交通工具提供动力时，前文提到的那条经验法则就会成为定律：车体越重，续驶里程越短，用电力作为动力源的难度就越大。除非实现一些不太可能的突破，否则电池永远都不会轻到且强大到可以为飞机和船舶提供长距离动力源的程度。

我们来看看当前最先进的水平。市场上最好的纯电动飞机可以搭载两名乘客，最高时速为210英里，充一次电可以连续飞行3小时。[\[17\]](#)相比之下，中等载客量的波音787客机可以搭载296名乘客，最高时速为650英里，加一次油可以连续飞行近20个小时。[\[18\]](#)换句话说，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源的客机的飞行速度比当前市场上最好的纯电动飞机快3倍以上，飞行时长为纯电动飞机的6倍以上，搭载乘客数量更是达到后者的近150倍。

尽管电池的性能越来越好，但这一差距依然难以逾越。幸运的话，电池的能量密度可能会较现在提高2倍，但即便如此，那也只是汽油或航空燃油能量密度的1/12。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用电燃料和先进生物燃料替代航空燃油，但这涉及极高的绿色溢价（见表7-4[\[19\]](#)）。

货船也是如此。相比于两艘目前投入使用的电动船，目前最好的常规集装箱船的货物运量比它们中的任何一艘都多200倍，而续驶里程更是它们的400倍以上。[\[20\]](#)对需要穿越整个大洋的船来说，这些都是重要优势。

表7-4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航空燃油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 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航空燃油	2.22	5.35 (先进生物燃料)	141%
航空燃油	2.22	8.80 (电燃料)	296%

考虑到集装箱船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除了液体燃料，我认为其他任何能源都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转向替代燃料的确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因为仅是海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占了全球总排放量的3%，使用清洁燃料会显著减少排放。遗憾的是，集装箱船使用的燃料（即船用燃料）非常便宜，因为它是用炼油过程中的残渣制成的。由于当前的船用燃料价格极低，所以船舶的绿色溢价非常高（见表7-5[21]）。

表7-5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船用燃料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 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船用燃料	1.29	5.50 (先进生物燃料)	326%
船用燃料	1.29	9.05 (电燃料)	601%

概括来看，表7-6[22]是本章中的所有绿色溢价。

表7-6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当前燃料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零售价 (美元 / 加仑)	“零碳” 选项 (美元 / 加仑)	绿色溢价
汽油	2.43	5.00 (先进生物燃料)	106%
汽油	2.43	8.20 (电燃料)	237%
柴油	2.71	5.50 (先进生物燃料)	103%
柴油	2.71	9.05 (电燃料)	234%
航空燃油	2.22	5.35 (先进生物燃料)	141%
航空燃油	2.22	8.80 (电燃料)	296%
船用燃料	1.29	5.50 (先进生物燃料)	326%
船用燃料	1.29	9.05 (电燃料)	601%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类价格上涨，目前还不清楚。但你要知道，美国上一次提高联邦汽油税是在1993年，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一直没有变化。我不认为美国人会乐意为汽油多付费。

目前有4种方法可以减少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一是减少交通活动，比如少开车、减少飞行次数和减少海运。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出行替代模式，比如步行、骑行和拼车。有些城市正通过“智慧城市计划”推动低碳出行，这种做法很棒。

二是在汽车生产过程中少用碳密集型材料——尽管这不会影响本章中讲的基于燃料的排放。正如第五章中提到的，由钢和塑料等材料制成的汽车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排放温室气体的。因而，这类材料在汽车中使用得越少，碳足迹就越少。

三是更高效地使用燃料。这个议题得到了立法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至少在乘用车和卡车上是如此。大多数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制定了有关这类车的燃油效率标准。在推动汽车公司加大工程研发投入和制造高能效发动机方面，这些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只有这些标准还远远不够。比如，在国际海运和航空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排放的建议标准，但它们几乎没有强制执行效力。试想哪个国家的管辖权可以覆盖大西洋上一艘集装箱船的碳排放量呢？

另外，虽然生产和使用更高效的交通工具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仅靠这些仍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因为尽管你烧的汽油少了，但总归是在烧汽油。

这就引出了第四个减少此类排放的方法，而这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转向电动车和替代燃料。正如本章中所论述的，这两个选项目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绿色溢价。让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可以降低绿色溢价。

如何降低绿色溢价

乘用车的绿色溢价正一路走低，最终必然降为0。诚然，随着高燃油效率的汽车和电动车逐步取代常规汽车，汽油税收入将下降，进而减少用于道路建设和维护的资金。就美国而言，各州可以在电动车车主更新车辆牌照时向其收取一笔额外费用，以弥补损失的汽油税收入——在我撰写本章时已经有19个州在这样做了。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拥车成本方面，电动车要多花一两年的时间才会变得跟燃油车一样便宜。

电动车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美国人对大排量、高油耗皮卡

车的热爱。2019年，美国人购买了超过500万辆小汽车以及1200万辆皮卡车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而在这当中，电动车占比仅为2%。[\[23\]](#)

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需要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政府政策。比如，出台激励人们购买电动车的政策，还要创建充电站网络、提升电动车的实用性等。国家层面的承诺有助于增加电动车的供应并降低电动车的成本，中国、印度及欧洲的多个国家都公布了未来几十年淘汰燃油车（主要是乘用车）的目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承诺从2029年起只购置电动公交车，到2035年则全面禁止燃油小汽车的销售。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希望拥有的那些电动车跑起来，而这需要大量的清洁电力。我在第四章中讲述大力部署可再生能源、致力于实现电力生产及存储技术突破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我们还应该探索核动力集装箱船。尽管这方面存在非常现实的风险（如果船沉了，必须确保核燃料不会泄漏），但很多技术挑战都已经被突破，毕竟核动力潜艇和核动力航空母舰服役已久。

最后，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探索各种制造先进生物燃料和廉价电燃料的方法。行业公司和研究人员已经在尝试不同的开发路径，比如利用电力或太阳能制氢，或利用微生物制氢，因为有些微生物本身就能产生氢。我们探索得越多，实现技术突破的机会就越大。

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但在交通运输领域，“零碳”的未来基本是这样的：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

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第一个类别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轻型和中型卡车以及公交车；第二个类别包括长途货运卡车、火车、飞机和集装箱船。至于成本，电动乘用车的拥车成本很快就会降到比燃油车更低的水平，这是好消息；替代燃料依然很贵，这不是好消息，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手段压低它们的价格。

本章讲述的是我们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方式，接下来将讨论我们身处的地方（家、办公室和学校）以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这些地方的宜居性。

[1] 当然，对那些依赖汽车的人来说，汽油比我列出的其他产品更为重要。如果你留意自己的支出，就会更容易感受到汽油涨价带来的压力，这比橄榄油等产品涨价更为明显，因为对于后者，你完全可以选择不买。关键的一点是，在我们日常消费的商品中，汽油是相对便宜的。

[2]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3] 历史排放量采用荣鼎咨询的数据。预测排放量基于国际能源署《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www.iea.org/statistics。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4] 该图数据来自Beyond road vehicles: Survey of zero-emission technology options across the transport sector by Hall, Pavlenko, and Lutsey，其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协议文本（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theicct.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Beyond_Road_ZEV_Working_Paper_20180718.pdf。

[5] 提醒一下，我只是计算了不同交通工具燃烧燃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制造这些交通工具时产生的排放被归入了生产和制造领域，比如钢和塑料的生产工厂的运营，相关内容参见第五章。

[6] OICA, www.oica.net.

[7] 据OICA数据，假设每年增加6 900万辆车，报废约4 500万辆车，汽车生命周期为13年。

[8] 雪佛兰迈锐宝和纯电动车博尔特EV的相关参数，采用2020年车型数据。
<https://www.chevrolet.com.illustrations> ©izmocars — All rights reserved.

[9] 每英里行驶成本：假设车主支付的价格为汽车平均购买价，拥车7年，年均行驶1.2万英里。Rhodium Group.

[10]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1]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gov.

[13] Michael J. Coren, “Buses with Batteries,” *Quartz*, Jan. 2, 2018, www.qz.com.

[14] 图片来源：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15] Shashank Sripad and Venkatasubramanian Viswanathan, “Performance Metrics Required of Next-Generation Batteries to Make a Practical Electric Semi Truck,” *ACS Energy Letters*, June 27, 2017, pubs.acs.org.

[16]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7] 空速通常以节为计量单位，但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并不知道一节是多快。总之，你只要知道节跟英里/小时大致相当就可以了。

[18] Boeing, www.boeing.com.

[19]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0] Kyree Leary, “China Has Launched the World’s First All-Electric Cargo Ship,” *Futurism*, Dec. 5, 2017, futurism.com; “MSC Receives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Ship MSC Gulsun from SHI,” *Ship Technology*, July 9, 2019,

www.ship-technology.com.

[21]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2]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3]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

第八章

制冷和取暖

总排放量

7%

实现电气化、发展清洁燃料和更高效利用能源的解决方案。

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关注每年导致4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的疾病——疟疾。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进根除疟疾的行动。不久之前，我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疟疾也帮助催生了一个不错的“副产品”：空调系统。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同高温做斗争。古波斯的建筑物装有通风设施，又称“捕风塔”，以帮助保持空气流通和室内凉爽。^[1]但已知最早的产生冷风的机器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发明者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医生约翰·戈里（John Gorrie）。^[2]戈里认为，凉爽宜人的温度有助于疟疾患者的身体康复。

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疟疾是由瘴气引起的（所以又称瘴气病），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由寄生虫引起的。戈里发明了一台机械装置，让空气流过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巨型冰块，从而达到为病房降温的目的。但这台机器的用冰量很大，而冰又是从北方各州运来的，所以成本高昂。为此，戈里自己设计了一款制冰机，并成功申请了专利。之后，他离开医疗行业，全力推销这项发明。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商业计划无果而终。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之后，戈里于1855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但他的想法就此生了根。空调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性进展出现在1902年，当时一位名叫威利斯·卡里尔（Willis Carrier）的工程师被公司派往纽约的一家印刷厂，帮助解决杂志印刷过程中纸张起皱的问题。卡里尔发现纸张起皱是因为当地环境湿度过大，随后他设计了一款能够在降低室内湿度的同时降低温度的机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空调产业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私人住宅首次安装空调设备算起，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3]如今，90%的美国家庭都安装了某种类型的空调。如果你曾经在圆顶体育场看过比赛或听过音乐会，那么你应该感谢空

调。如果没有空调，很难想象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这样的地方会成为时下退休人士的向往之地。

空调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让人们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的奢侈品，现代经济也依赖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数千台计算机组成的服务器场（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今天的计算机技术进步才成为可能，比如存储音乐和照片的云服务技术）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如果不能保持凉爽的温度，服务器是会熔化的。

如果你生活在典型的美国家庭中，那么你会发现空调是用电最多的家用电器——超过照明设备、冰箱和计算机的用电总和。[\[4\]](#)尽管第四章中讲过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提一下，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空间冷却系统都是非常关键的排放源。另外，虽然空调设备用电最多，但在美国的家庭和企业中，它并不是耗费能源最多的，耗费能源最多的是暖炉和热水器。（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是如此。）我会在下一节阐述暖风和热水系统的问题。

美国并不是唯一喜欢及需要冷气的国家。尽管全世界在用的空调设备有16亿台之多，但它们的分布并不均匀。[\[5\]](#)在美国等富裕国家，90%以上的家庭都装有空调设备，而在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中，这个比例还不到10%（见图8-1[\[6\]](#)）。

这意味着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形势日趋严峻的高温天气，我们这个世界将需要更多的空调设备。2007—2017年，中国国内增加了3.5亿台空调。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空调市场。全球范围内，空调销量仅2018年一年就增加了15%[\[7\]](#)，其中相当一部分增长来自温度上升得尤为明显的4个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到2050年，全球在用空调数量将超过50

亿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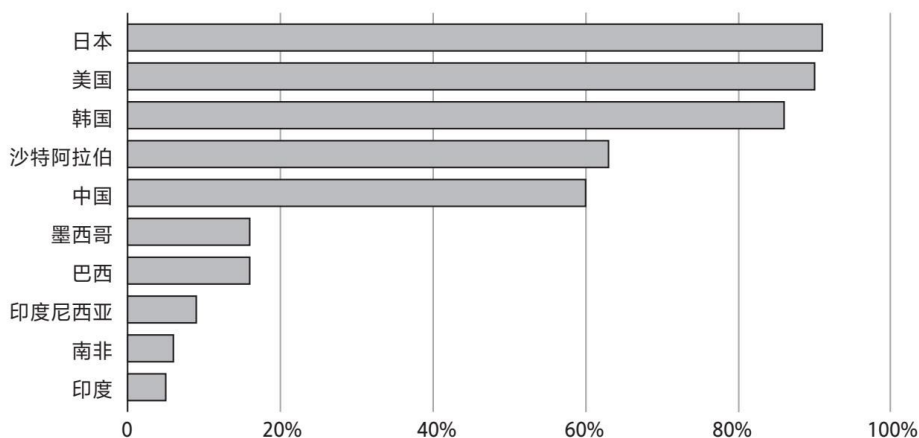


图8-1 各国拥有空调的家庭占比

注：在用空调数量正在逐渐增多。在有些国家，大多数家庭都已经安装了空调，但在其他一些国家远未普及。未来几十年，图上下半部分的国家会变得越来越热，也会越来越富裕，这意味着它们将购买更多的空调，也会更多地使用空调。

资料来源：IEA

讽刺的是，为了在一个不断温室化的世界中生存，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使用空调）可能会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因为空调是靠电力运行的，所以我们安装的空调越多，其运行所需要的电力就越多。事实上，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制冷的电力需求将增加两倍。届时，全世界空调的用电量将相当于中国和印度现在的用电量总和。

在用空调数量增加对遭受热浪侵袭的人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气候来说是坏事，因为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电力生产仍属于碳密集型。建筑物用电量（空调、照明设备和计算机用电等）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4%，其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空调对电力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所以计算制冷的绿色溢价比较容易。要想给空调“脱碳”，就得给电网“脱碳”。我在第四章中讲过一些电力生产和存储方面的技术突破，而这就是我们需要这类突破的另一个原因。否则，排放量将持续增加，我们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我们的家中和办公室里越凉爽，气候就越炎热。

幸运的是，我们不用等待那些突破，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减少空调的用电量，进而减少制冷导致的排放。这也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购买最具节能优势的空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市场上在售空调的平均能效仅为在售的高能效空调的一半，只有最佳机型能效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在挑选空调时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比如，一台低能效空调的售价可能会低一些，但长期使用成本很高，因为它耗电更多。然而，如果产品能效标识不清，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就无从知晓这些信息。（对于此类标识，美国有强制性要求，但并非全球所有国家都是如此。[\[8\]](#)）另外，很多国家也没有为空调设立最低能效标准。国际能源署发现，只要出台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全世界空调设备的平均能效就可以增加一倍，而到21世纪中叶，制冷领域的能源需求增长则将减少45%。

不幸的是，空调对电力的需求并不是它成为问题的唯一原因。空调还含有制冷剂（制冷剂因为含有氟，所以又称氟化气体），而随着设备的老化和分解，这些物质就会一点点地泄漏。如果你更换过汽车空调中的冷却剂，那么你一定注意到这种情况。氟化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它们造成的温室效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数千倍。如果你没怎么听说过氟化气体，那也正常，因为它们在温室气体中所占的比

例并不大。在美国，氟化气体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3%左右。

但氟化气体并未因此而被忽视。2016年，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承诺，到2045年将某些特定氟化气体的生产和使用至少减少80%。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一承诺，是因为许多行业公司都在开发新的空调技术，可以用危害性更低的冷却剂取代氟化气体。目前，这些方法尚处于开发初期，给它们标价还为时过早，但它们无疑是创新的典范，而只有通过这些创新，我们才能在不导致气候变暖的情况下享受室内冷气。

在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中，讨论如何保暖似乎有些奇怪：外面已经很热了，为什么还要打开恒温器呢？首要一点：当我们谈论热量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谈论气温的上升，还谈论水的加热——无论是淋浴、洗碗还是工业流程，都会用到热水。最重要的是，冬天不会消失。即便全球温度整体上升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会结冰、会下雪。而对任何依赖可再生能源的人来说，冬天都是特别艰难的日子。比如，在德国，可利用的太阳能最多可能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还会出现没有风的日子。但人们依然需要电，没有电就会冻死在自己家中。

暖炉和热水器两项相加，占建筑物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不同于照明设备和空调设施，暖炉和热水器大都依赖化石燃料而不是电力。（至于是用天然气、取暖油还是丙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地。）这意味着仅仅给电网“脱碳”，还无法实现热水和取暖的无碳排放。我们需要从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能源上获得热能。

供暖的“零碳”路径实际上和乘用车的路径颇为相似：第一，尽可能地实现电气化，淘汰燃气热水器和暖炉；第二，发展清洁

燃料，解决热水器和暖炉以外的其他所有热源问题。

好消息是，在电气化方面实际上是可实现负绿色溢价的。与售价普遍高于同规格燃油车的电动车不同，纯电动取暖和制冷设备可以为你省钱——它们既适用于新建建筑物又适合翻新后的老旧建筑物。在大多数地方，如果你放弃使用电动空调和天然气暖炉（或燃油暖炉），然后代之以电动热泵，那么整体成本将会降低。

对于热泵这个概念，你乍一听可能会觉得很怪。虽然我们可以抽水或抽气，但到底怎样才能抽热量呢？

热泵实际上利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气体和液体在遇到温度变化时会膨胀和收缩。热泵的工作原理是：让冷却剂通过闭环管道，利用压缩机和特殊阀门改变沿途压力，使得冷却剂在某一区域吸收热量，在另一区域释放热量。冬天，把热量从室外引入家中（除了气候极端寒冷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夏天，反其道而行之，把家中的热量排到室外。

这听起来有些神秘，实则不然。你的家中早就有了热泵，而且现在可能正在运行，它就是冰箱。正是冰箱底部散发的暖空气，把冰箱内食物的热量带走了，从而使它们处于低温状态。

一台热泵可以为你省多少钱？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城市，因为要看当地的寒冷程度、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以美国多个城市的新建建筑物为例，我们来看看热泵安装并运行15年的成本（见表8-1[9]）。

表8-1美国部分城市安装空气源热泵的绿色溢价

城市	天然气暖炉和电动空调的成本（美元）	空气源热泵的成本（美元）	绿色溢价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	12 667	9 912	-22%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	12 583	10 527	-16%
休斯敦（得克萨斯州）	11 075	8 074	-27%
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	10 660	8 240	-23%

如果是翻修老旧建筑物，那么热泵为你省下的钱可能没那么多，但在大多数城市，使用热泵仍是经济合算的选择。比如，在休斯敦，这会为你节省17%的开支；在芝加哥，成本实际上还会增加6%，因为那里的天然气价格异乎寻常的低。另外，有些老旧房子没有安装新设备的空间，所以可能也无法进行升级改造。

然而，这些负绿色溢价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热泵如此合算，那么为什么只有11%的美国家庭安装了这种设备？[\[10\]](#)

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每隔10年左右才会更换一次暖炉，大多数人手上没有足够的闲钱，所以也就不会用热泵来替换尚可正常工作的暖炉。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解释：过时的政府政策。20世纪70年代爆发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人一直试图减少能源的使用，所以各州政府出台种种激励措施，鼓励使用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来取代能效低下的同类电动产品。有些州还更改了建筑规范，使得房主更难将他们的天然气类设备换成电动产品。很多重视高能效而非低排放的政策仍在发挥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减排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你无法把天然气暖炉换成电动热泵——即便这样做会给你省钱。

这种“愚蠢的监管”令人沮丧，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好消息。这意味着除了给电网“脱碳”，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技术突破就可以减少该领域的排放。电动替代产品已然存在，而且可以广泛使用；它不仅具有价格竞争优势，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便宜。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政府政策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从技术上讲，我们可以通过电力手段实现取暖方面的零排放，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我们解决了前文提到的自缚手脚的监管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换成同类电动产品。这就好比让全世界的乘用车一下子都变成电动车，是不现实的。从时下暖炉的使用寿命来看，如果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到21世纪中叶淘汰所有的天然气暖炉，那么到2035年就得停售此类产品。目前，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暖炉中约有一半是使用天然气的。全世界范围内，化石燃料提供的热能总量比电力多6倍。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需要先进生物燃料和电燃料的另一个原因。关于这些燃料，我在第七章中论述过。实际上，它们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的暖炉和热水器，无须对产品进行改造，也不会增加大气中的碳。但就目前而言，这两个选项的绿色溢价都非常高（见表8-2[11]）。

这些绿色溢价对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该家庭原本用取暖油取暖，那么改用先进生物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至少多支付1 300美元；改用电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至少多支付3 200美元。如果该家庭原本用天然气取暖，那么改用先进生物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多支付840美元；改用电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多支付近2 600美元。[12]

表8-2使用“零碳”替代品替代当前取暖燃料的绿色溢价

燃料类型	当前零售价	“零碳”选项	绿色溢价
取暖油	2.71 美元 / 加仑	5.50 美元 / 加仑（先进生物燃料）	103%
取暖油	2.71 美元 / 加仑	9.05 美元 / 加仑（电燃料）	234%
天然气	1.01 美元 / 撒姆 *	2.45 美元 / 撒姆（先进生物燃料）	142%
天然气	1.01 美元 / 撒姆	5.30 美元 / 撒姆（电燃料）	425%

* 1撒姆天然气的体积约为2.74立方米。——编者注

显然，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替代燃料的价格，而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七章已经论述过。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给取暖系统“脱碳”。

尽可能地实现电气化，淘汰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用电动热泵取而代之。在有些地区，政府要更新现有政策，允许和鼓励进行电气化升级改造。

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加快部署现有清洁能源，同时加大投资，致力于在电力生产、存储和传输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进而实现电网“脱碳”。

更高效地利用能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儿矛盾，因为刚刚我还抱怨政府政策重视高能效而非低排放。事实是，这两者我们都需要。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波巨大的建筑浪潮。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到2060年，我们将增加2.5万亿平方英尺的建筑物——正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这相当于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而且是连续40年不间断。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很多建筑物将不会按照节能标准设计，在建成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只能

以低效的方式利用能源。

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如何建造绿色建筑——只要我们愿意支付绿色溢价。位于西雅图的布利特中心就是一个极端例子（见图8-2[13]），作为世界最佳绿色商业建筑之一，布利特中心本身就是按照冬暖夏凉的要求设计的，这样可以降低其对暖气和冷氣的需求，同时它也采用了其他节能技术，比如超高能效的电梯。得益于楼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有时它产生的能源比其消耗的能源还要多60%。即便如此，布利特中心还是接入了城市电网，因为在夜间及阴雨天，它仍需要外部电力供应，而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在西雅图很常见。[14]

尽管布利特中心的很多技术现在推广起来成本高昂（这也是它自开放起就被称作世界最佳绿色商业建筑之一，而且在之后的7年里一直保有这一头衔的原因），但我们仍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提高住宅和办公楼的能源利用效率。比如，可以采用开发商所称的超密闭围护结构设计，尽量隔绝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同时使用高品质的保温隔热材料、三层玻璃窗和节能门等。我对装有“智能玻璃”的窗户也很感兴趣，这种玻璃会依照室温要求自动变色：若室内温度过高，它就会变暗；若室内温度过低，它就会变亮。新的建筑规范有助于推广这些节能理念，进而扩大相关产品的市场并推动其成本下降。我们可以建造很多高能效的建筑物，尽管它们不可能座座都像布利特中心一样节能。



图8-2 位于西雅图的布利特中心

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温室气体排放的5个主要来源：电力生产与存储、生产和制造、种植和养殖、交通运输，以及制冷和取暖。我希望以下3点已经讲清楚了：

1.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
2. 我们手头已经有了一些现在就应该部署的减排工具。
3. 但我们还没有掌握所需要的全部工具。我们必须降低各个部门的绿色溢价，而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发明。

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我会给出具体的行动步骤。我认为，在开发和部署所需的工具方面，这些步骤会为我们提供最大可能性。但首先我想直面一个让我夜不能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本书所讲的内容全都是关于如何减少排放，以及怎样才能把温度控制在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对于已然发生的气候变化，我们能

够做什么呢？特别是，我们怎样才能帮助极端贫困人口？要知道，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负的责任最小，遭受的损失却最大。

[1] A. A'zami, “Badgir in Traditional Iranian Architecture,” Passive and Low Energy Cooling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conference, Santorini, Greece, May 2005.

[2]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istory of Air Conditioning,” www.energy.gov. “The Inven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Panama City Living*, March 13, 2014, www.panamacityliving.com.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he Future of Cooling,” www.iea.org.

[4] 电力占了全世界空间冷却系统所用能源的99%。在剩余的1%中，天然气占大头，主要用于驱动制冷设备。基于天然气的空调系统适用于独栋住宅，但占有的市场份额极小，以至于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都不采集这方面的数据。

[5]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ww.iea.org.

[6] The Future of Cooling, IEA (2018), www.iea.org/statistics. 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7] The Future of Cooling, IEA (2018), www.iea.org/statistics. 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8]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ww.epa.gov.

[9] 荣鼎咨询。该表显示的是新建住宅中空气源热泵相较于天然气暖炉和电动空调的净现值。成本按7%的折现率计算，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为截至2019年夏的价格，热泵生命周期为15年。

[10]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gov.

[11]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2]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3] 图片来源：Nic Lehoux.

[14] Bullitt Center, www.bullittcenter.org.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
金融市场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我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以及为什么需要很多创新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前文讲的那些绿色产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已经在遭受某种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适应不断暖化的世界。随着海平面和冲积平原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把家和企业安在哪里。我们需要强化电网建设，需要加固海港和桥梁。我们需要种植更多的红树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红树林，请继续往下看），需要改进风暴早期预警系统。

我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些我最先想到的、会在气候灾难中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以及最需要帮助的人。在电网、海港或桥梁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忧虑。他们是我在开展全球健康及发展工作中遇到的低收入群体，同时也是气候变化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同时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比如，2009年，我去肯尼亚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对象是耕地面积少于4英亩的农民，或者用开发领域的术语来讲——小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塔拉姆一家——拉班·塔拉姆、米丽娅姆·塔拉姆以及他们的3个孩子。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农场（见图9-1^[1]）：沿着肯尼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埃尔多雷特郊外的一条土路出发，走几英里就到。塔拉姆一家并没有多少钱，除了几间带茅草屋顶的圆形泥屋和一个畜棚，别无其他财产。他们的农场面积约为2英亩，比一个棒球场还小。然而，就是这一小片土地吸引了方圆几英里的数百名农民前来参观和学习。

拉班和米丽娅姆在他们家大门口迎接我，然后跟我讲起了他们的故事。两年前，他们还是从事自给农业的小农户，同大多数邻居一样，他们家也曾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种植玉米和蔬菜，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拉班还会外出打零工，以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为增加收入，他买来一头奶牛。这对夫妇一天挤两次牛奶，早上挤的牛奶卖给当地的商人，换取一些现金，但数额不多；晚上挤的牛奶留着给全家人喝。总共算下来，这头奶牛每天可以产3升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五口之家，每天卖出和喝掉的牛奶还不足1加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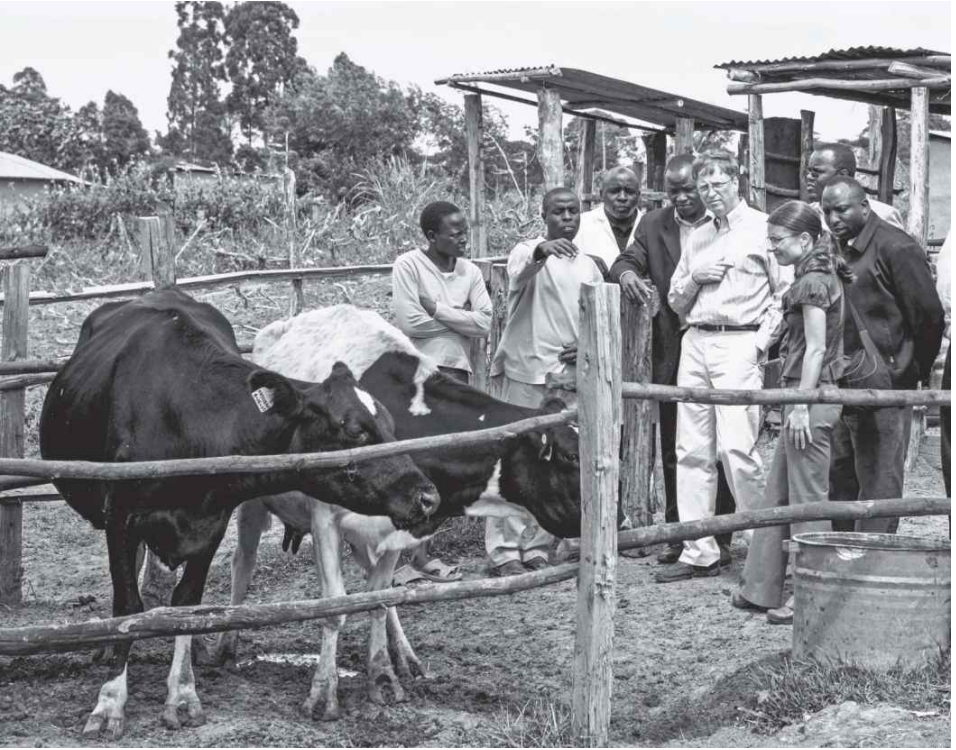


图9-1

注：2009年，我在肯尼亚卡比耶特的一处农场见到了农场主人米丽娅姆·塔拉姆和拉班·塔拉姆，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功故事，但气候变化可能毁

掉他们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塔拉姆一家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现在有4头奶牛，每天可产奶26升，其中20升出售、6升自用。这些奶牛每天可以给他们带来近4美元的收入，在肯尼亚这一地区，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够他们重建房子、种植专用于出口的菠萝，也足够他们供孩子上学。

他们说，生活之所以好转，是因为附近新开了一家牛奶冷却厂。塔拉姆一家及周边的农民可以把他们挤的牛奶卖给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则通过冷却设备将牛奶冷却存储后运送到全国各地，从而让牛奶卖出更好的价格。此外，这家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培训基地的角色。当地的奶农可以来这里学习养殖技术，了解怎样饲养更健康、更高产的牲畜，怎样给奶牛接种疫苗，以及怎样对牛奶进行污染检测以确保产品卖出好价钱，等等。如果牛奶不符合标准，他们还会获得关于提升质量的建议。

在肯尼亚，也就是塔拉姆一家生活的这个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全世界有5亿个小农农场，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 尽管从业人口庞大，但由小农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没钱使用那么多涉及化石燃料的产品和服务。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一个肯尼亚人仅相当于一个美国人的1/56[\[3\]](#)，肯尼亚农村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少。

但如果你记得第六章中讲到的牛的问题，你就会立刻意识到这里的困境：塔拉姆一家买了更多的牛，而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过其他牲畜。

就塔拉姆一家而言，他们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很多贫困农民在赚了钱之后都会投资高价值的资产，比如购买鸡、山羊

和奶牛，因为这些动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通过卖奶、卖蛋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这是明智的决定，任何关心脱贫行动的人都不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问题难就难在这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做的事情会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原因，即帮助贫困人口在不加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一个极其不公的残酷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基本没有做任何导致气候变化的事情，其所承受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却最大。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气候变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些麻烦，而对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来说，气候变化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旱灾和洪灾的发生会越来越频繁，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牲畜可吃的少了，产的肉和奶也就少了；空气和土壤失去了水分，植物赖以生存的水也就少了。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千万英亩的农田将处于严重干旱状态。各种农作物害虫泛滥成灾，因为它们要寻找更适于生存的环境。农作物生长季也会变得越来越短，如果升温4摄氏度，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长季会缩短20%，乃至更多。

当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时，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积蓄，而种植的农作物又全部死了，那么你没有钱再买多余的种子，等待你的将是一条绝路。再者，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使得穷人更难以承受。受气候变化影响，数亿人将面临物价飙升的挑战，而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原本就有超过一半花在了食物上面。

随着食物越来越匮乏，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本来就已存

在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拉大。目前，就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而言，乍得是芬兰的50多倍。受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将无法获得成长期所需的全部营养，这将导致其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他们就更有可能会死于腹泻、疟疾或肺炎。研究发现，受升温影响，到21世纪末，因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每年可能多达1 000万（大致相当于现在每年死于各种传染病的人数总和），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贫困国家。而在贫困国家侥幸活下来的儿童则更有可能会罹患发育障碍类疾病，也就是说，身体或智力无法得到充分发育。

因此，气候变化对贫困国家造成的最糟糕的影响是降低其国民健康水平，使得国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向极端贫困人口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营养不良儿童的生存率。这意味着要改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疟疾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以及继续为腹泻和肺炎等疾病提供疫苗。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知道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比如，作为一个疫苗项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2000年以来已经挽救了1 300万人的生命，这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4]（为这项全球事业提供捐助是盖茨基金会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们不能让气候变化打乱这一进程。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加快进程，为其他疾病研发疫苗，比如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并让每个需要疫苗的人都能够接种。

其次，我们还需要从源头着力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随着人口的增长，全球贫困地区的食物需求量可能会增加一倍，乃至两倍。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贫困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即便是在旱灾和洪灾来袭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将在下一

节做进一步论述。

我跟富裕国家负责监督对外援助预算的人打过很多交道，他们之中一些非常好心的人甚至曾告诉我：“我们过去资助疫苗，而现在需要建立气候敏感型援助预算。”他们这番话的意思是要帮助非洲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我告诉他们：“请不要把资助疫苗的预算拿去生产电动车。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非洲仅占2%的比例。你真正应该资助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我们能帮助贫困人口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他们足够健康，确保他们能在气候变化中生存，并实现繁荣发展。”

你可能从未听说过CGIAR^[5]，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组织大概是在10年前，那时我正着手研究贫困国家农民面临的问题。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在确保家庭，尤其是极端贫困家庭获取营养食物方面，没有哪个组织比CGIAR出力更多。在开展创新以帮助贫困农民适应未来气候变化方面，也没有哪个组织比它所处的位置更好。

CGIAR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研究组织，简单来讲，它致力于帮助培育更好的动植物基因。正是在墨西哥的一家CGIAR实验室，诺曼·博洛格（你可能还记得我在第六章讲过他）在小麦培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而引发了绿色革命。受博洛格启发，CGIAR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成功培育出了高产抗病水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组织在牲畜、土豆和玉米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帮助减轻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同时改善了他们的营养水平。

很多人都不知道CGIAR，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细想也不奇怪。首先，它的名称常被人误以为是“cigar”（雪茄），觉得它与烟草行业有关。（事实并非如此。）另外，

CGIAR不是一个单一组织，而是由15个独立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其中大多数都使用令人难以分辨的首字母缩略词来指代，它们包括CIFOR（国际林业研究中心）、ICARDA（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CIAT（国际热带农业中心）、ICRISAT（国际半干旱地区热带作物研究所）、IFPRI（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ITA（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LRI（国际家畜研究所）、CIMMYT（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P（国际马铃薯中心）、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IWMI（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和ICRAF（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等。

尽管CGIAR偏爱“字母汤”^[6]，但在为世界贫困农民培育新的气候智能型农作物和牲畜方面，它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最爱举的例子之一就是该组织研究人员培育的抗旱玉米。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玉米产量低于世界其他地方，但那里有超过2亿个家庭靠种植这种农作物维持生计。天气越是反复无常，农民面临玉米减产的风险就越高，而在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

为此，CGIAR的专家培育了数十种适于非洲不同地区种植的抗旱玉米新品种。起初，许多小农不敢尝试种植新品种。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你也不会冒险种先前从未种过的种子，要是它们死了，那你就没有任何后路可退了。但在专家向当地农民和种子经销商说明了新品种的种种优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改良的玉米品种。

很多家庭的生活由此发生改变。比如，在津巴布韦的干旱地区，相比于种植传统玉米品种，种植抗旱玉米后每公顷多收600多千克（即每英亩增产500多磅，足以维持一个六口之家9个月的生活）。对那些选择出售玉米的种植户来说，所获收入足够他

们供孩子上学，也足以满足家庭其他需求。CGIAR的专家还致力于培育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品种，以及抗病、抗虫害或抗杂草的玉米品种。他们帮助当地农民把作物产量提高了30%，同时也在帮助他们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

CGIAR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玉米种植领域，在该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新型抗旱水稻正在印度快速推广，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即便是雨季，干旱期也越来越长。CGIAR还培育了一种绰号为“潜稻”（scuba rice）的水稻品种（见图9-2[7]）。正如该名称巧妙所示，这种水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两个星期。一般来说，洪灾时，水稻会把叶子伸展到水面之上；如果被淹没时间过长，它们就会在试图逃离水下环境的过程中耗尽能量，最终因能量枯竭而死。“潜稻”不存在这一问题，它们被植入了一种抗洪涝的基因——SUB1，因此在遭遇洪涝灾害时，它们会停止伸展叶子，进入休眠状态，直至洪水退去。

CGIAR的工作重点除了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其旗下科学家还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便于农民使用手机上的相机识别危害木薯（非洲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的各种病虫害。他们还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利用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帮助农民确定农作物所需的浇水量和施肥量。



图9-2 一片种植“潜稻”的农田

注：作为新培育的水稻品种，“潜稻”一次最长可在水下生存两个星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因为洪灾将越来越频繁地爆发。

贫困农民需要更多类似的进步技术，但要提供这些服务，CGIAR和其他农业研究机构需要更多的资金。农业研究长期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加大对CGIAR的资助，从而使它帮助更多的农民，正是全球适应委员会[8]的主要建议之一——该委员会由我本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共同领导。[9]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样的钱花得值：就CGIAR的研究而言，每1美元的投入会产生大约6美元的收益。即便是沃伦·巴菲特，对这种回报率的投资也会举双手赞成，况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拯救生命。

除了帮助小农提高农作物收成，全球适应委员会还提出了3项与农业相关的建议。

第一，帮助农民应对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带来的风险。比

如，政府可以帮助农民种植更多种类的农作物，饲养更多种类的牲畜，这样即便某个领域出了问题，他们的生活也不会陷入困顿。政府还应该探索如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与天气相关的农业保险，帮助农民挽回相关损失。

第二，重点关注最弱势的群体。虽然妇女并不是唯一的弱势群体，但她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等，农村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艰难。比如，她们可能无法获得土地权，无法获得用水的平等权利，无法获得购买肥料的资金，甚至无法获得天气预报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推动女性财产权的实现，并为她们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建议，等等。这些做法的回报是巨大的：联合国下属某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多的资源，那么在同等的土地上，她们能多收获20%~30%的粮食，从而使全世界饥饿人口减少12%~17%。[\[10\]](#)

第三，将气候变化纳入政策决策。用于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非常少：2014—2016年，政府花在农业部门的5 000亿美元资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政府应该拿出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帮助农民在种植更多粮食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概括来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富裕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极端贫困人口所负的责任最小，但其所受的冲击最大。他们理应得到世界的帮助，也需要得到世界的帮助，而且是比现在更多的帮助。

* * *

我在过去20年里开展了一系列与全球贫困相关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贫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气候变化将

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因为我痴迷于植物育种背后的科学。

然而，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适应气候变化这幅拼图的其他拼块上，比如城市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或生态系统会受到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得益于我刚才提到的全球适应委员会，以及我在该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以下是我从科学、公共政策和产业等领域的数十位专家那里获取的一些洞见，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该如何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

大致来说，你可以把适应气候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

第一阶段是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相关措施包括建设气候适应型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保护湿地并将其作为防洪屏障，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鼓励人们永久迁离已不适于居住的地区。

第二阶段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天气预报和预警系统，以便更好地掌握风暴的相关消息。而在灾难爆发时，我们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应急救援队伍，以及处理临时疏散工作的应急体系。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灾难发生后的恢复期。我们需要为流离失所的人制订服务计划，比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计划；为各收入阶层的人提供灾后重建保险，同时设立建筑标准，确保灾后重建设施比先前的设施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

以下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点。

第一，城市需要改变发展方式。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且这个比例在未来几年还会上升。城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三。在扩张过程中，许多高速发展的城市最终会将建筑工地扩张到冲积平原、林地和湿地上，而这些地方原本

是用于调节水资源的：洪涝时排水，干旱时蓄水。

所有城市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海滨城市遭遇的问题最严重。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风暴潮的加剧，数亿人可能要被迫离开家园。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每年给全球海滨城市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仅仅说这会加重大多数城市原本就面临的问题，比如贫困、无家可归、医疗保健和教育，那显然是轻描淡写了。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城市规划者需要掌握最新的气候风险数据和基于计算机模型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数据。（当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许多城市的领导者甚至连标示哪些地区最易遭受洪水袭击的基础地图都没有。）在掌握了这些最新信息之后，他们就可以在相关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如何规划居民区和工业中心，如何建设或扩建防波堤，如何保护城市免受日趋猛烈的风暴的袭击，如何强化雨水排水系统，以及如何建设高水位码头平台以使其免受不断上涨的潮汐的侵袭，等等。

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准备在本地河上建一座桥，那么桥面高度应该规划为12英尺还是18英尺？从短期看，建一座更高的桥的建筑成本也更高，但如果你知道未来10年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洪水，那么建更高的桥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肯定宁愿建高成本的桥一次，也不愿意建两次低成本的桥。

这还不仅仅是翻新和改建城市已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气候变化还会迫使我们全面考虑城市的新需求。如果城市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而很多人又无力负担空调费用，那么它就需要建立“降温中心”——供居民避暑的设施。不幸的是，使用空调越多，温室气体排放就越多，而这也是我在第八章讲的突破性制冷技术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

第二，我们应该强化自然防御体系。森林有蓄水和调节水的功能；湿地可以防止洪水，又可以为农民和城市提供水资源；珊瑚礁是海滨社区赖以生存的鱼类的栖息地。但这些以及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正在迅速消失，仅2018年一年，遭破坏的原始森林就近900万英亩，而如果全球升温幅度达到2摄氏度——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地球上的大多数珊瑚礁都将会退化、消失。

从另外的角度看，恢复生态系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通过恢复森林和水域等生态环境，世界最大规模城市的水务部门每年合计可节省8.9亿美元。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尼日尔，农民发起的一项植树造林活动不仅提高了农作物收成、增加了森林覆盖率，还将妇女拾柴的时间从原来的每天3小时减少到30分钟；中国已经把大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划为关键自然资产，并将在这些地区优先推进保育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墨西哥对境内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实施了保护措施，以确保4 50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为榜样，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帮助更多的国家行动起来，那么 we 们将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中获益。

这里还有一项更容易获取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红树林。红树是一种适应咸水环境的低矮树种，生长在海岸线一带，它们可以帮助减缓风暴潮的冲击，阻止沿海洪灾，并保护鱼类栖息地（见图9-3^[11]）。总之，红树林每年可帮助全球避免800亿美元的洪灾损失；在其他方面，它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数十亿美元。种植红树林远比修建防波堤便宜，而且这些树木可以改善水质。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投资。



图9-3 红树林

第三，全球饮用水的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随着湖泊和地下蓄水层的不断缩小或被污染，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饮用水将越来越困难。全球大多数特大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如果再不改变，那么到21世纪中叶，每月至少有一次无法获得足够饮用水的人数将会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超过50亿。

在这方面，技术带来了一些希望。我们已经掌握了使海水析出盐从而把它转化为饮用水的方法，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能量，因为你需要把海水从海洋运到海水淡化厂，再把淡化处理后的饮用水送到需要的人手中。（这也就是说，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能源问题：只要有足够便宜的清洁能源，我们可以生产出足以满足每个人需求的饮用水。）

在我密切关注的技术中，有一种是从空气中提取水，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聪明。这基本上就是一台配有先进过滤系统的太阳能除湿机，之所以配有过滤系统，是为了避免你喝到空气中的污染

物。目前，这种装置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其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对贫困群体来说实在是太贵了，然而在水资源短缺问题上，贫困群体是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该方法变得足够廉价之前，我们需要采取更切合实际的行动：通过激励政策降低用水需求，同时加大努力提升供水能力。这包括从废水回收利用到按需灌溉（一种灌溉系统，它既能大幅减少用水量又能提高农民的收成）在内的一切措施。

第四，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金，用以资助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外援助——当然我们也需要国外援助资金，而是公共资金怎样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并让他们支持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这里有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人们先期支付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可能都无法获得经济回报。比如，你现在可以采取防洪措施保护自己的企业，但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你所在的地区可能都不会出现重大洪涝灾害，你的防洪投入不会产生有利可图的现金流，客户也不会因你的防洪投入（比如你采取了措施，确保污水不会在洪灾期间倒灌进地下室）而为你的产品支付额外费用。如此一来，银行也就不愿意为你的项目发放贷款，而即便发放贷款，也会向你收取高额利息。总之，你必须自己消化一些成本，结果可能就是直接放弃了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把这个例子扩延到整个城市、整个州或整个国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公共部门必须在为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融资以及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了。我们需要把这类项目变成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

这首先需要公共和私人金融市场把气候变化风险纳入考虑范

围，并对这些风险进行相应定价。一些政府和企业已经在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事实上，所有政府和企业都应该这样做。政府还可以在适应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并为未来的投资数额设定目标，同时制定政策，消除私人投资者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在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回报日趋清晰后，私人投资应该会有所增长。

你可能想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不可能为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但我所在的全球适应委员会列出了5个关键领域的花费情况（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建设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提高农作物产量，管理水资源和保护红树林），并发现在2020—2030年投入1.8万亿美元，将产生超过7万亿美元的收益。换言之，在10年的时间里，投入全球GDP的0.2%，将产生近4倍的投资回报。

你可以用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坏事来测算这些收益：因用水权而发生冲突，旱灾或洪灾导致农民绝收，城市因飓风而被破坏，以及因气候变化而逃难，等等。你也可以用一些一定会发生的好事来测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所需的营养，家庭摆脱了贫困并成功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以及即便全球温度越来越高，企业、城市和国家依然实现了繁荣发展。

无论你采用哪种测算方法，经济上的回报都是很明显的，从道德上看也是如此。在过去25年里，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从1990年占全世界人口比例的36%降到2015年的10%，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阻碍了这一发展进程。[\[12\]](#)但与之相比，气候变化更甚，它可能会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13%。

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的其他人渡过危机。这是我们欠他们的。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多加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气候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很多可显著加快气候变化速度的引爆点，比如，洋底含有大量甲烷的冰状晶体结构开始变得不稳定并最终喷发。在较短的时间内，灾难可能会蔓延全球，使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而全球温度越高，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引爆点。

如果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朝着某一个引爆点迈进，那么你将听到一系列大胆甚至疯狂的想法，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到一门名为“地球工程学”的学科下。这些方法尚未得到证实，还会引发棘手的伦理问题。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大把时间进行研究和讨论。

地球工程是一个尖端的、“在紧急情况下打碎玻璃”式的工具，其基本理念是对地球上的海洋或大气层采取干预措施，对其进行临时改变，从而达到降低全球温度的目的。这些改变并不是为了免除我们的减排责任，而是为我们采取共同行动赢得时间。

近年来，我资助了一些与地球工程学相关的研究项目（与我支持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相比，这些资助可以说微不足道）。在地球工程学领域，大多数方法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要抵消我们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升温，就需要把照射到地球的阳光量减少约1%。[\[13\]](#)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是在大气上层散布极细颗粒物——颗粒物的直径仅为百万分之几英寸。科学家知道，这些颗粒物可以散射阳光，从而起降温的作用，因为他们见过这种情况的发生：超级火山在爆发时，也会喷射类似的颗粒物，并会显著降低全球温度。

地球工程的另一个方法涉及提高云层亮度。因为阳光在照射云层顶部时会被散射，所以我们可以提高云层亮度来散射更多的阳光，从而达到降低地球温度的目的，比如使用盐雾使云层散射更多阳光。实际上，这并不需要大规模提高云层亮度。要减少1%的入射阳光，我们只需要把覆盖地球面积10%的云层提高10%的亮度即可。

除此之外，地球工程学领域还有其他降低全球温度的方法，它们在3个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第一，与所应对问题的规模相比，这些方法相对便宜，其前期投入成本不到100亿美元，而且运营费用极低；第二，对云层的影响会持续一周左右，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启动或停用，不用担心造成长期影响；第三，这些方法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问题，但在它们必定面临的政治障碍面前，这些问题显得不值一提。

一些评论人士抨击地球工程是就地球开展的大规模实验，然而正如地球工程的支持者所指出的，我们早已经在地球上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实验——排放巨量的温室气体。

平心而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工程在地方层面的潜在影响。这是一个合理关切，我们甚至在考虑在现实世界中开展大规模地球工程实验之前，就应该就此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大气层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地球工程实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达成一些共识。

目前，我们很难想象世界各国能在人为设定地球温度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里，要想在降低全球温度的同时避免经济严重受损，地球工程是我们唯一已知的方式。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我们最好从现在开始，为那一天做好全面的准备。

[1] 图片来源：©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Frederic Courbet.

[2] Max Roser, Our World in Data website, ourworldindata.org.

[3] World Bank, www.data.worldbank.org.

[4] GAVI, www.gavi.org.

[5] CGIAR成立时的名称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这下你该知道为什么它一开始就是这个缩写了。

[6] “字母汤”是西方常见的一道菜，是用字母形状的意面煮的汤。此处指代这些组织都是用缩写字母表示的。——编者注

[7] 图片来源：From the photo col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Los Banos, Laguna, Philippines.

[8] 全球适应委员会受34名专员和19个召集国的指导，其中专员为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科学界的领导者，召集国则代表了世界各个地区。一个由研究和顾问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为该委员会提供支持。全球适应中心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管理该委员会。

[9]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Sept. 2019, gca.org.

[1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Women in Agriculture, 2010–2011*, www.fao.org.

[11] 图片来源：Mazur Travel via Shutterstock.

[12] World Bank, “Decline of Global Extreme Poverty Continues but Has Slowed,” www.worldbank.org.

[13] 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方法：以年为单位，地球吸收的太阳热量约为每平方米240瓦特。现在大气中的碳平均每平方米可吸收约2瓦特的热量。如此一来，我们就需要减少2/240的太阳热量，约合0.83%。不过，由于云层会因太阳地球工程而发生适应性调整，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减少更多的太阳热量，即1%左右的入射阳光。如果大气中的碳含量增加一倍，那么每平方米将吸收约4瓦特的热量，这样我们就需要减少约2%的太阳热量。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应全力做好的七件大事。

1943年，在“二战”战况最为激烈之际，一股浓浓的烟雾笼罩了洛杉矶。浓烟的毒性很大，居民先是感到眼睛刺痛，然后开始流鼻涕，司机无法看到3个街区之外的道路。一些当地人怀疑是日本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了这座城市。

洛杉矶并没有受到攻击——至少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攻击。真正的元凶是雾霾，这是由空气污染和天气条件共同造成的一起不幸事件。

在近10年后的1952年12月，伦敦也遭到了雾霾的严重侵袭，持续时间长达5天（见图10-1[1]）。公交车和救护车全部停运。即便是在建筑物内，能见度也非常低，以致电影院都不得不关闭。抢劫犯猖獗一时，因为无论是哪个方向，警察都只能看到几英尺以内的东西。（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网飞剧集《王冠》的忠实观众，那么你会记得第一季中有一集正是以这一糟糕事件为背景的，剧情扣人心弦。）“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至少造成了4 000人死亡。



图10-1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期间，警察不得不靠火把来指挥交通

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空气污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和欧洲民众的广泛担忧，政策制定者也据此迅速行动。1955年，美国国会开始拨款，用于资助空气污染及修复方案等方面的研究。次年，英国政府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排烟控制区，区域内只允许使用更清洁的燃料。7年后，美国出台的《清洁空气法》为国内空气污染控制确立了现代监管体系——迄今为止，在监管危及公众健康的空气污染方面，它仍是美国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法律之一。1970年，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帮助推进法律的施行。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清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1990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氮排放量下降了

56%，一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77%，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88%，铅排放在美国已经基本绝迹。虽然我们仍需为此付出努力，但不可否认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空气污染之类的问题，这类例子甚至都没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因为现在就有一个：自2014年起，为应对各大都市市区不断恶化的雾霾问题和飙升的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政府发起了多项行动计划，包括为降低空气污染设定新的目标，禁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以及对大城市内非电动车的使用施加限制，等等。短短几年时间，在特定类型污染方面，北京降低了35%，拥有1 100万人口的保定降低了38%。

虽然空气污染仍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可能有超过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但如果没有我们实施的那些政策，这个数字无疑还会更大。[\[2\]](#)（相关政策也帮助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这并不是它们最初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们也清楚表明了避免气候灾难方面，政府政策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我承认“政策”是一个含糊的、听上去无趣的词。一项重大突破，比如新型电池的发明，可能比推动化学家发明该电池的那些政策更让人感兴趣。但如果政府没有通过税收资金资助该项研究，没有出台旨在将该项研究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政策，没有制定旨在创造市场并使其易于大规模应用的法规，那么这项突破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在本书中，我一直强调实现零排放所需的各种发明的重要性，比如存储电力和炼钢的新方式等，但创新并不仅仅是开发新

设备，还包括制定新政策的问题，政策能让我们尽快在市场上展示和推广那些新发明。

幸运的是，在制定这些政策时，我们并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在能源监管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事实上，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能源都是经济中受监管最严格的部门之一。除了更清洁的空气，明智的能源政策还给予了我们以下益处。

电气化。1910年，在美国，家中能用上电的人仅占12%，而到195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0%。这主要得益于联邦政府对大坝建设的资金支持，为能源监管而专门设置的联邦机构，以及政府大规模实施的乡村电力发展计划。

能源安全。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着手提升各种能源的国内产量。联邦政府于1974年推出首批重大研发项目，次年颁布与节能相关的重要立法，其中就包括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等。1977年，美国能源部成立。20世纪80年代，由于油价大幅下跌，我们放弃了之前的很多努力，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油价再次开始上涨为止。21世纪初的油价上涨引发了新一轮投资热潮，政府监管也随之收紧。通过这些投入及其他各种努力，2019年美国能源总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这是近70年来的第一次。[\[3\]](#)

经济复苏。2008年“大衰退”以来，各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力基础设施和铁路等领域加大投入，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投资。2008年，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绿色项目。2009年，美国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利用税收减免、联邦拨款、贷款担保和研发资助等方式提振经济，减少排放。这是美国历史上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所做的最大单笔投资，但这只

是一时的资金注入，而不是长期的政策改变。

现在该是把我们的政策制定经验拿出来应对眼前挑战的时候了：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

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阐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零碳”转型的愿景。反过来，这个愿景又可以成为世界各地的人和企业的行动指南。政府可以制定相关规则，规定电厂、汽车和工厂的最高碳排放量；可以出台监管政策，塑造金融市场，明确气候变化给私人 and 公共部门带来的风险；可以作为科研的主要投资者——就像现在所做的一样，并制定有关新产品多久可以上市的规则；还可以帮助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碳排放产品对环境和人类造成的隐形成本等。

就这些决策而言，很多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州和地方政府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很多国家，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当地电力市场，并制定建筑物能源使用标准。它们负责规划当地的大型建筑项目，比如大坝、轨道系统、桥梁和道路等，同时负责项目的选址，并规定所用建材类型。它们购买警车和消防车、学校的午餐和灯具。其中的任何一步，都将有人决定是否使用绿色替代方案。

我是在呼吁更多的政策干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讽刺。在打造微软期间，我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保持着距离，因为我认为他们只会妨碍我们做好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针对微软发起的反垄断诉讼使我意识到我们自始至终都应该和政策制定者打交道。我也知道，在大型事业项目上，比如建设全国高速公路系统、给全世界儿童接种疫苗或为全球经济“脱碳”等，我们需要政

府创建合理的激励机制，并确保整个系统惠及所有人。我们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然，企业和个人也需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我将提出一个实现零排放的计划，涵盖政府、企业和个人可采取的具体步骤。但由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过于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先列出它应当全力做好的七件大事。

1. 弥补投资缺口

首款微波炉产品于1955年上市，换算成现在的物价水平，每台售价将近1.2万美元。如今，你花上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非常好的微波炉。

为什么微波炉会变得如此便宜？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微波炉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用它来加热食物所需的时间远远少于传统烤箱。随着微波炉销量的快速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进而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要是能源市场也能这样就好了。电力不同于微波炉，后者完全靠产品性能取胜。“肮脏”的电子和“清洁”的电子一样，都可以驱动照明设备。因此，在缺乏政策干预（比如建立碳定价机制或要求市场上特定比例的电力为“零碳”电力等）的情况下，无法保证输送清洁电力的公司能够赚钱。投资清洁电力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能源是一个受高度监管的行业，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

能源研发领域之所以普遍存在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平均而言，能源行业公司用于研发的资金仅占其收入的0.3%。相比之下，电子行业和制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

例分别约为10%和13%。

我们需要政府政策和融资来填补这一缺口，特别是那些急需发明新的“零碳”技术的领域。当一个想法还处于早期阶段时，要有合适的政策和融资确保这个想法得到充分的落实，而这里所谓的早期阶段，是指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无法确定它是否有效，或它走向成功的时间超出了银行或风险投资者愿意等待的时间。这可能是一项重大突破，但也可能无果而终，所以我们需要包容某种意义上的彻底失败。

总之，在私人投资者因看不到获利方式而不愿开展研发活动时，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率先开展研发投资。一旦获利前景明朗，私人投资者就会接过政府的投资接力棒。事实上，你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产品几乎都是这么来的，包括互联网、拯救生命的药物，以及智能手机中用以帮助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等。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资金研发尺寸更小、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那么个人电脑行业公司永远都不会有成功之日，其中也包括微软。

在数字技术等部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接比较快。在清洁能源部门，这要花更长的时间，甚至需要政府做出更多的财政承诺，因为科研和工程工作既耗费大量时间也耗费大量资金。

政府投资研发还有一个好处：帮助一国建立生产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产品的企业。比如，A国研发了一种成本低廉的电燃料，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可以出口到B国。B国即便缺乏减排的雄心，最终也会朝着减排的方向发展，因为其他国家发明了更实用、更便宜的燃料。

最后，尽管研发本身会产生效益，但只有把它同需求侧的激励政策结合，其最大效力才能发挥。没有哪家企业打算把发表在

科学期刊上的想法转变成产品，除非它有信心找到购买者，特别是在产品价格高昂的早期阶段。

2.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如我一再声明的（你可能已经听得厌烦了），我们需要降低绿色溢价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绿色溢价的降低，一是可以通过我在第四章至第八章所讲的那些创新来实现，二是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把化石燃料造成的损害计入销售价格。

今天，无论是企业制造产品还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他们都不承担任何额外的碳成本，即便所涉及的碳对社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个人或企业对社会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确保责任人至少承担一部分外部成本，比如推行碳税或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措施等。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制造更便宜的“零碳”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涉及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提高碳排放产品的价格来降低绿色溢价（涉及政策创新），或者两种手段兼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惩罚人们排放温室气体，而是为了创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发明者研发具有竞争力的“零碳”替代品。政府可以逐步提升碳的价格，使其反映碳的真实成本，以此推动生产商和消费者做出更具效力的决策，同时鼓励开展创新活动，进而达到降低绿色溢价的目的。如果你知道你在使用一种新型电燃料时不会因异常低廉的油价损失利益，那么你可能更愿意去发明这种电燃料。

3. 破除非市场壁垒

为什么房主不愿意放弃化石燃料驱动的暖炉转而支持低排放的电动替代产品呢？因为他们不了解替代产品，也因为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合格的经销商和安装服务商，还因为这样做在有些地方是违法的。

为什么房东不把家用电器换成能效更高的产品呢？因为能源账单是由租户支付的，而租户通常不被允许变更这些设备，而且他们租住的时间可能不长，即便允许更换，租户也难以获得长期效益。

你会注意到，这些壁垒跟成本没有太大关系。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缺乏信息、专业技术人员或激励措施，而在这些方面，合适的政府政策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4. 紧跟时代步伐

有时候，减排的重大壁垒并不是消费者意识或市场失调，反而是政府政策本身增加了“脱碳”的难度。

如果你想在建筑中使用混凝土，建筑规范会非常详细地说明混凝土的性能要求：它必须具备的强度是多大，它能承载的重量是多少，等等。这些规范可能还会就混凝土的化学成分做出详细规定，而这些成分标准往往会把你使用的低排放水泥排除在外，即便这些水泥完全符合相关性能标准。

没有人愿意看到建筑物和桥梁因劣质混凝土而坍塌，但我们要确保这些标准能反映最新的科技进步，能反映我们致力于实现零排放目标的紧迫性。

5. 规划“公正转型”

转向“碳中和”经济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程，在转型过程中注定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在美国，经济上严重依赖化石燃料钻探及开采的州（比如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等）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以弥补转型过程中消失的就业岗位，还要保持原有的薪酬水平；它们需要新的税收，以弥补开采行业的税收损失，继续用于当前的教育开支、道路开支及其他基本服务开支。如果人造肉取代了传统肉类，那么养牛业发达的州也会陷入同样的处境，比如内布拉斯加州等。低收入人群将会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绿色溢价带来的压力，因为在他们的收入中，原本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花在了能源上面。

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被轻松解决。显然，在有些社区，高薪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作岗位会被太阳能等行业领域的工作岗位顺势取代。但其他很多社区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因为人们需要转到化石燃料以外的行业领域谋求生计。由于解决方案因地制宜，所以它们将需要由地方管理者来主导。不过，作为实现零排放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联邦政府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比如提供资金和技术建议，或者把全国各地面临相同问题的社区聚到一起，以便它们共同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煤炭或天然气开采占经济大头的社区，人们担心转型可能会让他们入不敷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表达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气候变化否定论者。你不必成为政治学家就能知道，对倡导实现零排放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理解生计将会受到冲击的那些家庭和社区的担忧，并认真对待那些担忧，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将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6. 迎难而上

在气候变化方面，很多工作都集中在相对容易的减排方法上，比如驾驶电动车以及更多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表明进展和展现早期成果有助于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动计划。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在所需的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相对容易的减排行动，所以现在有取得重大进展的巨大机会。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易于实现的目标上。现在，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峻，我们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到难啃的骨头上：电力存储、清洁燃料、清洁水泥、清洁钢材和清洁肥料等。这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政策制定方法，除了部署现有的工具，还需要加大关键领域的研发投资力度，同时利用专门制定的政策，深入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因为在我们的道路和建筑等物质基础设施中，这些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技术、政策和市场三管齐下

除了技术和政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方面：创造新发明并创立确保这些发明会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公司，以及寻找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的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由于未能找到更好的表达术语，我宽泛地把这个组别称为“市场”。

市场、技术和政策就像是三根杠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需要三管齐下，而且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

如果只是出台了一项政策，比如为汽车设定零排放标准，却

没有消除碳排放的技术，或者根本就没有公司愿意生产和销售符合这一标准的汽车，那么该政策并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拥有低排放技术，比如从燃煤电厂的废气中捕获碳的设备，却没有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来鼓励电力企业使用这项技术，那么也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行业竞争对手在化石燃料产品的销售上享有价格优势，那么很少会有公司下注开发零排放技术。

这就是市场、政策和技术必须协同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加大研发投资之类的政策可以帮助推动新技术的开发，塑造市场体系，进而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政策也应受到我们所开发的科技的影响。如果我们发明一种突破性的液体燃料，那么政策就应聚焦于投资和融资策略，把它推广到全球市场。这样一来，在能源存储等方面，也就不用于过于担心了。

我来举几个例子，看看它们协同发挥作用时会发生什么，以及未能协同发挥作用时又会发生什么。

要想知道政策落后于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就来看看核电行业。核能是唯一可以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运转的“零碳”能源，而且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目前，包括泰拉能源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研发先进反应堆技术，旨在解决现在存在的那些反应堆的设计问题——要知道那些设计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新的设计方案更安全、更便宜，而且产生的核废料更少。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政策和合适的市场推广方法，这些先进反应堆的科研和工程成果将无用武之地。

除非设计能够得到验证，供应链可以确立，而且能够建立一个试点项目来演示新的方法，否则任何先进的核电站都很难建成。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可行方法。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现在正直

接投资国家扶持的先进核能企业。如果政府愿意共同出资，帮助建立和运行示范项目，那么必然起到推动作用。美国政府最近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我知道我这么讲可能会让人觉得存有私心，因为我拥有一家先进的核能企业，但话说回来，这是推动核能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方式。

生物燃料的例子则是另外一种挑战：确保我们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据此调整政策。

2005年，鉴于不断上涨的油价和国家减少石油进口的意愿，美国国会通过了《可再生燃料标准》，为未来几年美国国内生物燃料的使用量设定了目标。仅仅是通过这样一项法规就向交通运输行业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号。随后，行业大举投资当时已经存在的生物燃料技术——玉米基乙醇。对汽油来说，玉米基乙醇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原因有二：一是汽油价格不断上涨，二是乙醇生产商从几十年前的一项税收减免政策中受益。

《可再生燃料标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乙醇生产量很快就超过了国会原本设定的目标；今天，美国国内销售的汽油中，每加仑可能含有高达10%的乙醇。

2007年，美国国会决定利用生物燃料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关注点不仅在上涨的油价，还有气候变化。政府提高了生物燃料使用量的目标，同时要求美国国内所售的所有生物燃料中要有大约60%来自玉米之外的其他淀粉质原料。（在减少碳排放量这方面，以这种方式制造的生物燃料是传统生物燃料的4倍。）尽管生物燃料提炼商很快就完成了传统的玉米基生物燃料的目标，但在先进替代生物燃料的生产方面离既定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先进生物燃料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要

想实现突破并不容易。再就是当时油价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规模投资生产成本更高的替代品并不划算。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可能生产先进生物燃料的公司以及那些可能对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的投资者对市场确定性缺乏信心。

由于行政部门已经预料到先进生物燃料的供应会出现不足，所以一再降低使用量目标。2017年，使用量目标从既定的55亿加仑降到3.11亿加仑。有时候，新的年度目标会拖到当年很晚才公布，以致生产商都不知道这一年能卖出多少。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由于预料到供应不足而降低配额，配额的降低又引发了持续的供应不足。

这里的教训就在于，政策制定者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想要推广的技术是什么。就减少美国所需的石油进口量而言，设立生物燃料目标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有一种现成的技术产品（玉米基乙醇）可以填补这个缺口。正是如此，这项政策激发了创新，开拓了市场，并扩大了技术的应用规模。但就降低排放量而言，设立生物燃料目标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考虑所适用的技术（先进生物燃料）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个事实，而且他们没有建立市场所需要的确定性，也就无法实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现在我们来看政策、技术和市场配合得当的一个成功案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美国和欧盟就开始为太阳能发电的早期研究提供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初，太阳能技术已经得到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制造太阳能电池板，但该项技术仍未被广泛采用。

德国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用户提供低息贷款，并为输送到电网的多余太阳能电力提供上网电价

补贴。[4]所谓上网电价补贴，是指政府为每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所支付的固定补贴金。2011年，美国利用贷款担保为其国内5个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提供融资支持。[5]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并通过创新手段大大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成本。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太阳能发电成本自2009年起已经下降了90%。

风电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10年里，风电装机容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现在风力涡轮机提供了全世界约5%的电力。风电行业持续增长的原因很简单：成本越来越低。中国是世界风电大国，而且所占全球份额仍在不断增长。中国已经表示将停止补贴陆上风电项目，因为它们的电力生产成本已经降到了跟传统能源电力一样的水平。

再看看丹麦（见图10-2[6]），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丹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广风能，同时减少石油进口。此外，丹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可再生能源研发。尽管丹麦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在俄亥俄州开始研发公用事业规模的风力涡轮机），但它采用的方法颇为不同：它把研发支持同上网电价补贴结合，后来又引入了碳税。

随着西班牙等国的跟进，风电行业开始进一步发展。公司现在有了开发大型转子和高装机容量机器的动力，所以新的涡轮机可以生产更多电力，由此也推动了产品销量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力涡轮机的成本大幅下降。风力发电的成本随之下降，比如在丹麦，风电成本在1987—2001年下降了50%。今天，丹麦约有一半的电力来自陆上和海上风电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出口国。



图10-2 丹麦萨姆斯岛上的风力涡轮机

澄清一点：这些故事的重点并不是说太阳能和风能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电力需求。（它们是解决我们电力需求的两种方式，详见第四章。）重点在于，当我们同时聚焦于技术、政策和市场这三个要素时，我们就能鼓励创新，推动新公司的创立，快速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任何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都需要了解这三者是如何协同

发挥作用的。在第十一章中，我将提出一个这样做的方法。

[1] 图片来源：Mirrorpix via Getty Images.

[2] 山火是一个单独却相关的问题，比如2020年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那场山火。2020年美国西部山火的浓烟引发了一系列安全问题，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3]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gov.

[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5] U.S. Energy Depart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Efficient Energy Loan Guarantees,” www.energy.gov.

[6] 图片来源：Sirio Magnabosco/EyeEm via Getty Images.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203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2015年，我在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时，禁不住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齐聚一堂，几乎每个国家都承诺削减碳排放，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场景。然而，一项又一项的民调显示，气候变化是一个边缘政治问题（往好了说），我担心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解决这一重大难题的意愿。

我很高兴地讲一点：公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兴趣增长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预期。在过去几年里，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对话已经显著好转。由于世界各地的选民纷纷要求采取行动，所以各级政府的相关政治意愿呈不断强化趋势，各个城市和州也承诺大幅减少碳排放，以支持国家目标。在美国，各个城市和州致力于填补空缺的国家目标。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目标同实现它们的具体计划结合。举个例子，在微软创建初期，保罗·艾伦和我设立过一个目标——“让每张办公桌上和每个家庭中都有一台电脑”，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制订出具体的计划，并付诸行动。对于我们为微软设定的目标，人们起初都觉得我们疯了，因为这个目标实在太大了，但相比于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要付出的努力，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后者是一项规模更加庞大的事业，涉及全世界的人和机构。

第十章讲述了政府为实现零排放目标上需要扮演的角色。在本章，我会提出一个如何才能避免气候灾难的计划，并把重点放在政府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上。（要想了解下面所讲的各个要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reakthroughenergy.org。）在第十二章，我将阐述作为个体的我们该如何支持零排放计划。

我们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科学告诉我们，要想避免气候灾难，富裕国家应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你可能听说过我们甚至还可以更快地实现深度“脱碳”——在2030年之前完成。

不幸的是，从我在本书所列的种种原因来看，2030年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化石燃料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根本不可能在10年内广泛停用它们。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以做的和需要做的就是采取相关政策，找到一条可以在2050年前实现深度“脱碳”的路径。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尽管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明显。“在2030年前减少排放”和“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的确会给人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2030年难道不是通往2050年途中的一站吗？

未必。若在2030年之前以错误的方式减少排放，那么它很有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为什么？因为在2030年之前减少排放量和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成功衡量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为2030年设定目标确实很好，但前提是要让它成为里程碑——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道路上的里程碑。

我们来看看原因。如果只是打算在2030年之前减少一定量的碳排放，那么我们会集中力量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即使这些努力会使零排放的终极目标更难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

举例来说，如果在2030年之前减少一定量的碳排放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那么燃气电厂取代燃煤电厂就会有相当大的诱

惑力，毕竟这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建的所有燃气电厂，到2050年时仍会处于运营状态——它们需要运营数十年才能收回建设成本。再者，燃气电厂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如此一来，虽然我们可以实现2030年的目标，但要想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则几乎没有希望。

另外，如果2030年的减排目标是通往2050年零排放目标的里程碑，那么花费大量时间或金钱把燃煤电厂改成燃气电厂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相反，我们最好同时推进两个策略：第一，竭尽所能地提供便宜、可靠的“零碳”电力；第二，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电气化——从交通工具到工业流程再到热泵在内的一切，即便是当前依赖化石燃料电力的地方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那么这个方法将会走向失败，因为它在10年内的减排效果可能非常有限。我们着眼的是长期目标，我们需要在清洁电力的生产、存储和传输等方面实现突破，从而助力我们一步步接近零排放目标。

如果你想通过一把量尺测量哪些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哪些没有取得进展，那你不仅要看其减排量，还要看其是否为自己设立了零排放的目标。与先前相比，尽管它们现在的减排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如果有着正确的减排路径，那么也是值得称赞的。

对于那些倡导设立2030年目标的人，我同意他们的一个观点：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今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处境，就跟多年前我们在大流行病问题上的处境一样。那时，卫生专家告诉我们，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一再发出警告，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突然之间它不得

不手忙脚乱地去弥补错失的时间。我们不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在2050年之前，我们需要实现众多突破，还要开发和部署新能源，所以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利用科学和创新的力量，同时制订有利于极端贫困人口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能避免重蹈疫情应对失误的覆辙。

创新和供求定律

正如我一开始就讲到的，任何全面的气候计划都必然涵盖众多不同学科。在经过前面各个章节的进一步论述之后，我希望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清晰。气候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应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在如何应对方面，我们需要用到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学科。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每一门学科，就像保罗和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擅长市场营销、企业合作或政企合作一样。微软所需要的以及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都是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不同的学科会引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能源、软件及其他几乎所有领域，仅以严格的技术意义来定义创新是一种错误观念。创新并不仅仅是指新机器或新工艺的发明，它还包括与商业模式、供应链、市场和政策相关的新方法的提出，这些新方法有助于催生新发明，并将发明成果推广至全球。创新既是设备的创新，也是做事方式的创新。

基于所讲的这些附带条件，我把我的计划中不同的要素分为两个类别。如果你学过经济学基础课程，那么你就会比较熟悉这

些类别：第一个类别涉及扩大创新供应（经过验证的新创意的数量），第二个类别涉及增加创新需求。这两个类别相互推动，协同共进。如果没有创新需求，发明者和政策制定者就不会有任何推陈出新的动机；如果没有稳定的创新供应，购买者就买不到这个世界为实现零排放所需要的绿色产品。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商学院的理论，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盖茨基金会拯救生命的整套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那就是我们需要推动创新，使其服务于贫困人口，同时增加创新需求。在微软，我们建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大型团队，而这也是我到现在都一直引以为豪的。他们的职责基本上就是扩大创新供应。我们还花了大量时间倾听客户心声，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软件产品的需求反馈。这是创新的需求侧，它让我们获得了有助于调整研发努力的关键信息。

扩大创新供应

扩大创新供应的第一步是经典研发，即由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思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解决方案，但就实现全球零排放而言，我们还未掌握所需的全部技术。在第四章到第九章，我提到了我们还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技术，为便于参考，我在这里重列一份清单（你可以在该清单的每一项技术前面加一个限定语——“便宜到中等收入国家也负担得起的”）（见表11-1）。

为尽快获得这些技术并让它们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做以下事情。

1.未来10年将与清洁能源和气候相关的研发投入增加4

倍。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
对研发活动进行直接公共投资，但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
整体来看，各国政府每年在清洁能源研发上的投入约为220
亿美元，仅占全球经济规模的0.02%左右。美国人单月的汽油开
支就超过了这个数额。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研发投入
国，美国每年的投入才70亿美元。

我们应该投入多少？我认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一个很好
的比较对象。年预算约为370亿美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美
国人乃至全球所有人研发他们每天都依赖的救命药物和疗法。这
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式，同时也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树立
了一个典范——我们需要这样的雄心。将研发预算增加4倍，听
起来像是很大一笔钱，但同这个挑战的规模比起来，它就相形见
绌了。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能表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
重视程度。

表11-1我们需要的技术

“零碳”制氢工艺

可维持整个季度电力供应的电网级电力存储技术

电燃料

先进生物燃料

“零碳”水泥

“零碳”钢

植物基或细胞基肉制品和奶制品

“零碳”肥料

下一代核裂变

核聚变

碳捕获（直接空气捕获和排放点捕获）

地下电力传输

“零碳”塑料

地热能

抽水蓄能

热能存储

抗旱耐涝粮食作物

棕榈油的“零碳”替代品

不含氟化气体的冷却剂

2.在高风险、高回报的研发项目上大力下注。这不仅仅是政府花多少钱的问题，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

先前，政府因投资清洁能源而一直备受指责（需要提示的话，不妨查一查“索林德拉”），而政策制定者也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对失败的忧虑让研发投资组合变得急功近利，政府倾向于投资更安全的项

目，而这些项目原本可以由私人投资者投资，也应该由私人投资者投资。在研发领域，政府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冒险在那些可能失败以及可能不会立即带来回报的大胆创意上下注。这一点在科技企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第十章所讲的，由于风险太高，私人投资者并不愿意投资这类企业。

要想知道政府以正确方式大举下注的结果，就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由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导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共同参与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计划，旨在绘制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并向公众公布结果。该计划历时13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它为数十种遗传疾病的检测或疗法指明了新的方向，其中就包括遗传性结肠癌、阿尔茨海默病和家族性乳腺癌等。^[1]一项关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独立研究显示，联邦政府在该项目中每投入1美元，就能给美国经济带来141美元的回报。^[2]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需要政府承诺为那些可以推动清洁能源科学发展的超大型项目提供资助（资助金额从数亿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特别是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方法和技术。政府还需要承诺提供长期资助，这样研究人员就知道他们在未来几年里会得到稳定的支持。

3.把研发同我们的最大需求结合。探索新颖科学概念的“蓝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又称“基础研究”）和推动运用科学发现的研究（即所谓的应用研究或转化研究）之间存在实质的区别。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基础研究就不会给我们带来有用的商业产品。有些纯粹主义者认为把基础研究同商业联系起来是对基础研究的玷污，这是不对的。其实，就一些最好的发明来看，科学家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到了它们最终的用途。比如，路易·巴斯德开展的生物学研究就给我们带来了疫苗

和巴氏杀菌法。在那些急需突破的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政府项目。

在这方面，美国能源部的“射日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1年，该计划的负责人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在10年内把太阳能电力的发电成本降到每千瓦时0.06美元。除了专注于早期阶段研发，项目团队还鼓励私人公司、高等院校和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削减太阳能电力系统的制造成本，打破官僚壁垒，以及降低太阳能电力系统的融资成本，等等。通过这一综合方法，“射日计划”项目团队在2017年实现了目标，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年。

4.从一开始就与产业合作。这里还有一个人为的区分：早期阶段的创新是为了政府，后期阶段的创新是为了产业。事实并非如此，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能源领域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对于任何一个创意，衡量其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得到推广应用。在早期阶段就与产业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为创新项目招揽专业人才。政府和产业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克服障碍，并缩短创新周期。企业可以帮助制造原型产品，提供市场洞见，以及参与项目投资。另外，企业是技术成果商业化的主力，所以提早把它们引入创新项目是合乎情理的。

增加创新需求

与供应侧相比，需求侧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它实际上涉及两个阶段：验证阶段和规模化阶段。

当一种方法在实验室经过测试之后，还需要把它拿到市场上

进行验证。在技术领域，这个验证阶段既快又便宜，不用太长时间，就能证明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是否好用以及是否会对客户产生吸引力。但在能源领域，市场验证困难得多，相关成本也高昂得多。

你必须弄清楚在实验室里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是否依然有效。（比如，你原本想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业废弃物的湿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所用的材料，那么它产生的能源可能就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你还必须降低早期采用的成本和风险，建立供应链，测试商业模式，并帮助消费者适应新技术的运用。目前处于验证阶段的想法包括低碳水泥、下一代核裂变、碳捕获和封存、离岸风力发电、纤维素乙醇（一种先进生物燃料）和肉类替代品等。

验证阶段是一个“死亡之谷”——各种好想法的葬身之地。一般来说，对新产品进行测试并将其引入市场的过程所涉及的风险都非常大，投资者会被吓退。这一点在低碳技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的开发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而且可能需要消费者从根本上改变先前的行为。

政府（以及大公司）可以帮助能源初创公司走出“死亡之谷”，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消费大户。政府和大公司如果优先采购绿色产品，为初创公司创造确定性，同时帮助它们降低成本，那么就可以推动更多的产品走向市场。

运用采购权。各级政府（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会购买数量庞大的燃料、水泥和钢，它们制造和使用飞机、卡车和汽车，还消耗数量庞大的电力资源。如此一来，在以较低的成本推广新兴技术方面，它们就占据了一个极佳位置；如果再把这些技术实现规模化后的社会效益考虑进去，那么这种优势就更

明显了。国防部门可以承诺购买部分低碳液体燃料，供飞机和船舶使用；州政府可以在建筑项目中使用低排放的水泥和钢；公用事业公司可以投资能源的长时存储技术。

任何拥有采购决策权的官员都应该尽可能地采购绿色产品，同时还要知道如何计算第十章中讨论的那些外部成本。

顺便说一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想法。早期的互联网就是以这种方式崛起的：当然，首先是利用了研发方面的公共资金投入，但另一端也有一个正在等待的承诺型消费者——美国政府。

出台有助于减少成本和降低风险的激励措施。除了购买产品本身，政府还可以为私人投资者提供各种激励政策，鼓励他们采用绿色产品。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工具可以帮助降低绿色溢价，推动对新技术的需求。由于很多绿色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比较昂贵，所以潜在客户需要长期融资服务，同时也需要信心——源于一致的、可预测的政府政策的信心。

政府可以采取“零碳”政策，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方式，进而发挥更大作用。下面是三项原则：一是政府政策应当是技术中立的（能使任何有助于减少排放的解决方案受益，而不仅仅是少数受欢迎的解决方案），二是政府政策应当是可预测的（而不是像现在常见的那样，一项政策动不动就到期，然后延期），三是政府政策应当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这样一来，各种不同规模的公司和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这些政策，而受益者将不仅仅局限于支付高额联邦所得税的大企业）。

打造有助于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基础设施。如果基础设施一开始就不到位，那么即便是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技术也无法抢占市场份额。各级政府需要帮助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风

电和太阳能电力的输送线路、电动车的充电站，以及捕获二氧化碳和氢的管道等。

改变规则，为新技术的竞争创造条件。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以增强新技术的竞争力。针对20世纪的技术设计的电力市场，通常会让21世纪的技术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大多数市场，投资长时存储技术的公用事业公司并没有因为它们在电网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合理补偿。现行监管规则使得先进生物燃料难以广泛应用于小汽车和卡车。另外，正如第十章中提到的，由于过时的政府规则，某些新类型的低碳混凝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

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章主要讲的是技术的开发阶段——鼓励开发能源突破技术的政策以及鼓励采用这些技术的政策。现在，让我们把内容转向技术的规模化阶段——快速、大规模的技术部署。只有在技术成本已经降到足够低，供应链和商业模式已经非常完善，而且消费者已经表现购买意愿的时候，才能到达这个阶段。陆上风电、太阳能和电动车目前都处于规模化阶段。

但实现规模化并非易事。在短短几十年里，我们需要增加至少两倍的电力供应，其中大多数将来自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在供应充裕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采用电动车，就像当年我们购买烘干机和彩色电视机一样。我们需要转变生产和制造及种植和养殖方式，同时继续建造和提供人人依赖的道路、桥梁和食物。

幸运的是，我在第十章提到过，在推动能源技术规模化方面，我们并不是门外汉。通过结合政策和创新，美国推动了乡村的电力发展计划，扩大了国内化石燃料的产量。对于其中的一些

政策，比如给予石油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化石燃料进行补贴，实际上，在部署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技术方面，它们是非常有效的工具。要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才首次被引入国家层面的辩论，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现在，我们可以从化石燃料的目标性增长中吸取教训，然后应用清洁能源。

如何实践呢？

第一，给碳定价。无论是实施碳税还是推行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系统（公司可通过该系统买卖碳排放权），为碳排放定价是我们在消除绿色溢价方面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短期来看，碳价的价值在于通过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向市场表明那些排放温室气体的产品是有额外成本的。至于碳价收益的用途，并不及碳价本身所传递的市场信号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笔钱可以返还消费者或企业，以覆盖能源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成本，但也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它应该被用于技术研发和其他激励措施，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长远来看，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净零排放，碳价可以根据直接空气捕获的成本来设定，收益则可以用来支付从空气中捕获碳的费用。

尽管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认为的商品定价方式，但碳价的概念已经被许多学派的、有着不同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接受。然而，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讲，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都是很难的。人们会愿意为汽油和生活中其他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吗？要知道，这加起来可是一笔高额支出。我不打算在这里就相关解决方案给出一

个“处方”，但核心目标是，确保每一个人都担起责任，为其碳排放支付应有的价格。

第二，采用清洁电力标准。美国的29个州和欧盟已经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的绩效制度，其理念是要求电力公用事业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获取一定比例的电力。这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比如，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多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向生产少的公司出售碳排放配额。但这一方法在实施中存在问题：它规定公用事业公司只能利用某些经批准的低碳技术（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有时也包括水力发电），核电和碳捕获等选项则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提高了减排的总体成本。

在美国，目前越来越多的州正考虑采用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清洁电力标准。这个标准并没有特别强调可再生能源，在达标问题上，它允许公用事业公司采用包括核电和碳捕获在内的任何清洁技术。由此来看，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第三，采用清洁燃料标准。这里的理念是：富有弹性的绩效标准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部门，以减少汽车、建筑物和发电厂的碳排放。比如，一项应用于交通运输部门的清洁燃料标准会加快电动车、先进生物燃料、电燃料和其他低碳解决方案的部署。像清洁电力标准一样，清洁燃料标准也将是技术中立的，同时允许受监管实体交易碳排放配额，而这两者都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成本负担。加利福尼亚已经出台《低碳燃料标准》，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美国已经有了制定此类政策的底本——《可再生燃料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内容修订，解决第十章提到的局限性问题，同时包括其他低碳解决方案，比如电力和电燃料等。如此一来，它就会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强有力的工具。欧

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也为欧洲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机遇。

第四，采用清洁产品标准。绩效标准还可以帮助加快低排放的水泥、钢和塑料以及其他碳密集型产品的部署。政府可以通过设定采购标准、创建标识项目等方式，向所有购买者提供有关供应商“清洁”程度的信息，并以此启动清洁产品标准。然后，我们可以将市场上所有在售的碳密集型产品纳入标准，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采购的物品。进口商品也必须符合标准，这一规定将有助于消除出口国的后顾之忧：制造部门的减排行动会增加产品成本，从而使得它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五，淘汰旧事物。除了快速部署新技术，政府还需要尽快淘汰效率低下的、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设施或设备——无论是发电厂还是汽车。发电厂的建设成本高昂，而它们生产的能源的价格却很低，这是因为它们的建设成本被分摊到了能源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由此，公用事业公司及其监管机构并不愿意关闭那些运营良好且还能正常运营数十年之久的发电厂。建立在政策基础之上的激励措施，比如通过税法或公用事业法规等手段，可以加快这一淘汰进程。

谁先行动？

对于我概述的这种计划，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府机构可以全面实施，政府决策权实在是太分散了。我们需要各级政府统一行动起来——从地方的交通运输规划部门到全国立法机关和环境监管机构。

尽管具体计划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在这里，我想谈一谈目前大多数地方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

地方政府在决定建筑物如何建造以及可以使用什么类型的能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是否采购电动公交车和电动警车、是否为电动车建造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如何管理废弃物，等等。

大多数州政府或省政府在电力监管、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规划、基础设施项目建筑材料使用要求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般来说，国家政府对跨越州界或国界的活动拥有决策权，所以它们制定可塑造电力市场的规则，出台污染法规，并为车辆和燃料设立标准。它们还拥有极大的采购权，是财政激励措施的主要源头，而且资助的公共研发项目通常多于其他任何一级政府。

简而言之，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将零排放定为目标：富裕国家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中等收入国家在2050年之后尽快实现零排放。

第二，为实现这些目标制订具体计划。要想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目标，需要在2030年之前确定政策和市场结构。

第三，任何有能力为能源研发项目提供资助的国家都要确保项目的目的是生产可负担的清洁能源，即竭尽所能地降低绿色溢价，让中等收入国家有能力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关于各级政府是如何协同工作的，我们来看看美国加快创新的“全政府”模式。

联邦政府

在推动能源创新供应方面，美国政府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

它是能源研究与开发的最大资助者和执行者，参与研究的联邦机构达12家之多（到目前为止，能源部所占资金比重最大）。它拥有管理能源研发方向及速度的各种工具：研究补助金、贷款项目、税收激励、实验室设施、试点项目、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合作等。

联邦政府在推动绿色产品和政策需求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修建的道路和桥梁提供资助，对跨州基础设施（如输电线路、管道和高速公路等）进行监管，同时帮助制定州与州之间的电力及燃料市场的规则。再者，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最多，这也意味着联邦财政激励措施将是推动变革最有效的工具。

在推动新技术规模化方面，联邦政府发挥着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它监管州与州之间的商业活动，同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方面掌握着最重要的决策权，这意味我们需要联邦政策来降低超越州界或超越国界的排放源。（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如果把美国消费的、产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产品计算在内，那么美国的排放量将增加8%。就此而言，英国的排放量将增加约40%。）尽管州政府都应该采用碳定价政策、清洁电力标准、清洁燃料标准和清洁产品标准，但如果把这些政策和标准上升到国家层面，那么实施起来会更有效力。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会需要为研发项目、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还需要为绿色政策及产品制定或修改财政激励措施，或延长这些措施的有效期。

与此同时，在行政部门，能源部需要开展自有项目研发，同时资助其他机构的研究项目；在实施联邦清洁电力标准方面，它将发挥关键作用。环境保护局将负责设计和实施扩大的清洁燃料

标准。负责监督管理电力批发市场以及州际输电线路和管道项目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将需要对计划中的基础设施和市场要素进行监管。

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罗列。农业部开展土地利用和农业排放的关键研究，国防部采购先进的低排放燃料和材料，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交通运输部为道路和桥梁建设提供资助，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为这项致力于实现零排放的行动计划融资。实现零排放这个目标到底需要花费多少资金，我们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这取决于创新的成功率、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部署效力，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笔规模极其庞大的投资。

幸运的是，美国有着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资本市场，可以抓住伟大的想法，然后迅速开发和部署。我在前文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联邦政府可以帮助推动资本市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以新的方式同私人投资者合作。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及很多欧盟成员国等）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私人市场，但仍可以为气候变化项目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世界银行以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机构也在寻求更多的参与渠道。

这里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为实现零排放目标以及为适应我们已知的、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灾害所投入的资金，累计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是长期投入。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政府和多边银行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利用私人资本，仅靠它们自己金库里的钱远远不够。

第二，气候变化项目需要长期投资，而且风险很高。所以，公共部门应该利用其财力延长投资期限——这反映了可能很多年

都不会看到投资回报这个事实，同时降低这些投资的风险。如何将庞大的公共和私人资本结合起来，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但也极为必要。我们需要融资领域最强的头脑来解决这个问题。

州政府

在美国，很多州已经率先采取行动。24个州和波多黎各已经加入了跨党派美国气候联盟，承诺按照《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至少削减26%。虽然这远未达到我们所需的全美减排量，但至少已经行动起来。在展示创新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州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它们可以利用公用事业和道路建设项目将长时存储和低排放水泥等技术推向市场。

在全美统一实施碳定价、清洁电力标准和清洁燃料标准等政策之前，州政府也可以先行试点。它们还可以结成地区联盟，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西部州正考虑把它们的电网连到一起，而东北部的一些州已经在实施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计划，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美国气候联盟及其加盟城市占美国经济规模的60%以上，这意味着它们拥有创建市场的非凡能力，同时表明我们可以推动实现新技术的规模化。

州立法机关将负责通过州级的碳定价系统、清洁能源标准和清洁燃料标准。它们还将指示州立机构及州立公用事业委员会或公共服务委员会更改采购政策，优先购买先进的低排放技术。

州立机构负责推动实现州立法机关和州长定下的目标。它们监督能源效率和建筑相关政策，管理州级交通运输相关政策及投资，执行污染标准，并监管农业及其他用地。

万一有一天有人走到你面前问：“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哪家机构的影响力最容易被低估？”对你来说，最好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或“我们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该机构名称因州而异。）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公用事业委员会或公共服务委员会，但美国的很多电力相关法规都由它们负责。比如，电力公用事业公司提出的投资计划由它们来审批，消费者支付的电价由它们来确定。随着电力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它们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地方政府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市长正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美国12个主要城市已经确立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另有超过300个城市承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虽然城市在减排问题上的影响力赶不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但它们并非无能为力。比如，虽然它们不能设定机动车排放标准，但可以购买电动车，可以资助建设电动车充电站，可以利用土地使用分区法来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减少人们的通勤时间，甚至还可以限制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车辆上路，等等。它们也可以出台绿色建筑政策，推动实现车辆的电气化，制定采购指导原则，以及为市政建筑物设定能效标准，等等。

有些城市，如西雅图、纳什维尔和奥斯汀等，拥有自己的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可以监督电力是否来自清洁能源。这类城市还允许在城市土地上开展清洁能源项目。

市议会可以像州立法机关或美国国会那样采取行动，为气候政策优先事项提供资助，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行动起来。

同州立机构和联邦机构一样，地方机构也负责监督各种政策优先事项。建筑部门执行能效标准要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推动实现电气化，亦可对道路和桥梁所使用材料施加影响；垃圾管理部门运营着数量庞大的车队，而且可以影响垃圾填埋场的碳排放。

让我们回到联邦层面讨论最后一点：富裕国家如何帮助消除搭便车的问题。

零排放的实现不是免费的，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且需要通过政策来推动市场朝着有利于清洁能源产品的方向发展。要知道，目前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高于产生温室气体的同类产品的成本。

但以提高当前成本来换取日后更好的气候条件并非易事。绿色溢价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拒绝削减碳排放的重要原因。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加拿大、菲律宾、巴西、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民众通过选举投票或其他方式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为汽油、取暖油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问题并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想让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他们担心的是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会让他们付出多大代价。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搭便车的问题呢？

方法之一是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就像2015年世界各国在《巴黎协定》上所做的努力一样。嘲讽国际协定很容易，但它的确是推动进步的一部分：如果你庆幸现在还有臭氧层，那么你可以感谢《蒙特利尔议定书》。

一旦设定了这些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之类的论坛就会把世界各国聚集起来，让各国报告行动进展，并分享切实可行的做法。作为一种机制，国际协定推动国家政府担起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当世界各国政府就减排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后，那么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都很难再以局外人的心态说“我不在乎，我就是要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拒绝合作的国家，我们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在碳排放这类问题上，要让一个国家切实担起责任非常难，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比如，实施碳定价政策的政府可以设立“边境调整税”，确保产品价格中包含碳价，无论这种产品是产自国内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它们还需要为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产品留出配额，因为那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减少原本就非常少的碳排放量。）

即便是那些没有设立碳税的国家也可以明确表示，它们不会同任何不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首要任务且不采取任何减排政策的国家签署贸易协定，也不会加入有这类国家参与的多边伙伴关系协定（同样，要在这方面为低收入国家留出配额）。其实，各国政府之间可以相互表示：“你如果想跟我们做生意，那么就必须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降低绿色溢价。要想降低中低收入国家的减排难度并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是唯一的路径。只有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率先行动起来，绿色溢价才有可能降下来。毕竟，世界上的大多数创新成果都来自这些国家。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降低全世界的绿色溢价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美国等国家不应仅仅将清洁能源研发投入视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它们也应该把这看作实现科学突破的机会，而这些科学突破将会催生由大型初创公司组成的新产业群，它们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不妨想一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医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科研结果的确惠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其所资助的科研项目也提升了美国大学的科研实力，反过来，这些大学又推动了初创公司和大公司的创立与发展。结果就是：美国先进医疗技术的出口不仅在国内创造了大量高薪工作岗位，而且拯救了世界各地的人的生命。

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国防部的早期投资不仅催生了互联网，也催生了驱动个人电脑革命的微芯片。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清洁能源领域。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正等待人们去发明低成本、低排放的水泥或钢，或净零排放的液体燃料。正如我一再提到的，实现这些突破并将它们推广到世界各地非常难，但机遇如此巨大，值得我们去努力，并走到世界前列。总会有人发明这些技术，这无非是一个由谁发明以及什么时候发明的问题。

从地方层面到国家层面，个人在推动气候变化议事议程方面也可以做出很多贡献。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1]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Potential Benefits of HGP Research,” web.ornl.gov.

[2] Simon Tripp and Martin Grueber, “Economic Impact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www.battelle.org.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面对气候变化这种规模庞大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但你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你不成为政治家或慈善家，也一样能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作为公民

当你问自己怎样才能减缓气候变化时，你会很自然地想到要开电动车或少吃肉之类的事情。这类个人行为很重要，因为它们会向市场传递信号——我会在下一节详细讲述这一内容，但更多的碳排放来自我们日常生活所处的大系统。

早上想吃烤面包片时，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但又可以提供面包、烤面包机以及为烤面包机供应电力的系统。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气候问题就告诉人们不要吃烤面包片。

要把这样一个新能源系统落实到位，需要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在帮助避免气候灾难问题上，参与政治进程是各行各业的人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原因就在这里。

根据我自己跟政客打交道的经历，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一点：气候变化并不是他们唯一关注的事项。政府领导人还关注着教育、就业、医疗保健、外交政策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也应该这样做——这些事情都需要关注。

但政策制定者一次所能处理的事情有限，他们会根据选民的呼声决定做什么以及优先做什么。

换句话说，如果选民提出要求，民选官员将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计划。多亏有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我们不必再提出

要求——数百万人已呼吁采取行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行动呼吁转化为压力，促使政客做出艰难选择和必要取舍，以兑现他们的减排承诺。

无论你有没有其他资源，你都可以用你的呼声和选票来影响和促成改变。

打电话、写信、参加市民会议。你要做的就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对他们来说，关注气候变化这一长期问题和关注就业、教育或医疗保健等问题同等重要。

尽管听起来有些老套，但给民选官员写信或打电话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参议员和众议员办公室经常会向他们提交选民舆情报告。但你不要简单地说“为气候变化做点儿事吧”，要知道他们的立场、问他们问题，并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的投票结果。你应该要求为清洁能源研发提供更多资助，要求出台清洁能源标准，要求实施碳定价政策或第十一章提到的其他任何政策。

放眼全国的同时也要着眼本地。很多相关决定都是在州级或地方级由州长、市长、州立法机关和市议会做出的，而公民个人在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在联邦层面产生的影响。比如，在美国，电力部门主要由州级公用事业委员会监管，而委员会成员要么是选举产生的，要么是任命的。要知道你的代表是谁，并跟他们保持联系。

竞选公职。竞选国会议员过于苛求，但你不必从那里开始。你可以竞选州级或地方级的公职，在这些职位上，你同样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集聚政府部门所有的政策智慧、勇气和创造力。

作为消费者

市场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作为消费者，你对这个等式的需求侧有巨大影响。如果所有人都在物品的购买及使用上做出个人的改变，那么就会聚沙成塔，最终促成有意义的改变。如果你有能力安装智能恒温器（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它会自动降低能源消耗），那么就一定要安装。这不仅可以减少你的公用事业账单支出，还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但减少你自己的排放量并不是你所能做的最强有力的事情。你也可以向市场传递信号，表明人们想要“零碳”替代品，并愿意为它们付费。当你多花钱购买电动车、热泵或植物基人造肉汉堡时，你就是在说“这种商品是有市场的，我们会买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传递了同样的信号，那么公司就会做出回应，而且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回应会很快做出。它们会把更多资金和时间用于生产低排放产品，这将会推动同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并有助于它们被大规模采用。另外，这会让投资者更有信心资助那些正在研发突破技术、帮助世界实现零排放的新公司。

如果没有消费者的需求信号，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创新成果将会被束之高阁，或者，它们一开始就不会得到开发，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刺激。

以下是你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

第一，与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签署绿色定价计划。有些公用事业公司允许家庭和企业为清洁能源电力支付额外费用。在美国的13个州，公用事业公司需要提供这一选项。（想要知道你所在的州是否已经推出绿色定价计划，可登录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网站查看，<http://www.c2es.org/document/green-pricing->

programs。) 参加绿色定价计划的客户会在电费账单中支付一笔溢价，用以覆盖可再生能源的额外成本。平均来看，每千瓦时需多支付一两美分，对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每月多支付9~18美元。参加绿色定价计划就相当于对公用事业公司说，你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

但这些计划并不能抵消碳排放，也不会显著增加电网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唯有政府政策和投资增长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减少家中的碳排放量。根据个人资金情况和时间安排，你可以把家中的白炽灯换成LED（发光二极管）照明灯具，安装智能恒温器，对窗户进行保温隔热处理，购买高效电器，或将取暖和制冷系统更换为热泵（只要你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适于热泵运行即可）。如果你目前租住房子，那么你可以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做一些改变，比如更换白炽灯等，然后劝说房东进行其他节能减排改造。如果你正在建新房或装修旧房，你可以选用再生钢材，并通过结构绝缘板、保温混凝土模板、阁楼或屋顶辐射屏障、反射隔热板 and 基础隔热板等材料提高住宅能效。

第三，购买电动车。就成本和性能而言，电动车已经取得长足进展。虽然它们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电动车不太适用于长途旅行，也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在家中充电），但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这是消费者行为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之一：如果人们购买更多的电动车，那么公司就会生产更多的电动车。

第四，尝试植物基人造肉汉堡。我承认素食汉堡并不总是很好吃，但新一代植物基蛋白汉堡无论是在味道上还是在肉的质感上，都较先前产品有了极大改善。你可以在很多餐厅、食品商

店甚至快餐连锁店买到植物基汉堡。购买这类产品会传递一个明确信息：生产植物基汉堡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另外，每周吃一两次肉类替代品（或者干脆不吃肉）会减少你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奶制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作为雇员或雇主

作为雇员或股东，你可以推动公司履行减排责任。当然，在很多领域，大公司都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不过小公司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并且如果它们通过当地商会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那么作用会更明显。

事情有易有难，即便是容易做的事也很重要，比如，无论是从环境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通过植树来抵消排放都是一件好事。它展现了你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但只做容易的事并不能解决问题。私人投资者也要勇于向前，知难而进。

首先，这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比如，为有可能失败但也有可能推动实现清洁能源突破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必须愿意分担这一风险，并明确向管理层表示他们支持明智的投资，即便这些投资会以失败告终。公司及其领导者需要获得奖励，因为他们下注的投资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其次，公司之间也可以相互合作，共同识别和努力解决最难克服的气候挑战。这意味着要找出那些最大绿色溢价，然后不遗余力地把它降下来。就私人投资者而言，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材料产品（钢或水泥等）用户能够联合起来，要求提供更清洁的替

代产品，并承诺投资产品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那么这就能加快相关领域的研发速度，推动市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后，私人投资者可以倡导解决重大挑战，比如，同意利用自身资源开发市场，要求政府设立有助于推动新技术成功的监管框架，等等。政府领导人是否在关注最大的排放源和最难克服的技术挑战？他们是否在谈论电网级的能源存储技术、电燃料、核聚变、碳捕获以及“零碳”钢和水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到2050年，他们将无法帮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以下是私人投资者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

第一，设立内部碳税。现在一些大公司已经在内部实施碳税政策，这些公司在减排问题上并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落到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它们帮助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因为内部碳税收入会直接流入那些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以及有助于创建清洁能源产品市场的活动，而这些能源产品正是它们自己所需要的。雇员、投资者和客户可以联合倡导这种做法，为负责实施该项行动的高管提供支持。

第二，优先开发创新型低碳解决方案。投资新创意原本是大多数行业的骄傲所在，但企业研发的光辉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平均来看，目前航空航天、材料和能源等行业领域的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到5%。（软件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15%。）公司应该重新开始重视研发工作，特别是低碳创新活动，因为其中的很多创新都需要长期投入。大型公司可以与政府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实践中的商业经验引入研发活动。

第三，做早期采用者。同政府一样，企业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产品采购加快新技术的采用进程，包括建立由电动车组成的

公司车队，购买低碳材料用以建造或装修公司办公楼，承诺使用一定数量的清洁电力，等等。世界范围内，很多公司已经承诺在运营中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迪士尼等。航运公司马士基已表示到2050年将净排放量降低为零。

即便这些承诺很难实现，但至少它们向市场发出了重要信号，表明开发“零碳”技术的价值。在看到这些需求后，创新者就会知道有一个市场正等着购买他们的产品。

第四，参与政策制定进程。企业不要害怕跟政府合作，就像政府不应该害怕跟企业合作一样。企业应该倡导实现零排放，并为那些有助于实现零排放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鉴于企业研发投入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下降，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建立联系。企业应该为政府的研发项目提供建议，使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转化为产品的创意上。（一个项目有没有可能成功，心里最清楚的莫过于那些整天研发和营销产品的公司了。）加入行业顾问委员会和参与项目规划活动，是影响政府研发项目的低成本方式。

企业也可以通过成本分摊协议和联合研究计划等方式为研发项目提供资助，即推动燃气涡轮机和先进柴油引擎研发成功的那种公私协作模式。

第六，帮助早期创新者穿过“死亡之谷”。很多研究人员从未把他们富有前景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险，而且成本高昂。老牌企业可以伸出援助之手，通过提供测试设施及成本指标等数据，助力他们走向成功。如果企业想多出一

把力，那么它们还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和孵化项目，投资新技术、设立专注于低碳创新的事业部，以及为新型低排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最后一个想法

不幸的是，气候变化对话已经呈现毫无必要的极化趋势，更不用说笼罩在该话题之上的那些相互冲突的信息和令人费解的报道了。我们需要就气候变化议题开展更具思想性和建设性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推动实现零排放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上。

我真希望有一种神奇的发明，能把气候变化对话转到更富有成效的方向上。当然，这样的装置并不存在。相反，决定权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里。

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跟我们生活中的人（家人、朋友和领导等）分享事实来改变这种对话局面。我们要分享的不仅仅是那些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的事实，还有那些向我们展示我们的行动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事实。而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激发更多富有成效的对话。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共同支持那些弥合政治分歧的计划。正如我试图表明的，这听起来似乎很幼稚，实则不然。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解决方案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无论你是私人投资者、政府干预、行动主义这三者当中谁的信仰者，还是它们之中某种组合的信仰者，你总会有自己支持的想法。对于那些你不会支持的想法，你可能会有很多话不吐不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所

支持的而不是你所反对的事务上。

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我们难以对未来抱有希望。但正如我的朋友、已故的全球健康倡导者和教育家汉斯·罗斯林在其超级棒的《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所写的：“当我们有了立于事实的世界观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它看上去的那么糟糕，而且我们会知道怎样做才能让这个世界不断变好。”^[1]

当我们有了立于事实的气候变化观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助于避免气候灾难的工具，但并不是全部。我们会发现是什么在阻碍我们部署已有的解决方案，以及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开发所需的突破技术。我们还会发现我们怎样做才能克服所有障碍。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知道技术的力量，也因为我知道人类的力量。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为我所见的热情而备感鼓舞，特别是年轻人身上的热情。如果我们继续着眼于零排放这个宏大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认真制订计划，那么我们是可以避免气候灾难的。我们可以让气候维持在人人都是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帮助数亿贫困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保护好这个星球。

^[1] 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with Ola Rosling and Anna Rosling Rönnlund (New York: Flatiron Books, 2018), 255.

后记

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是在一个动荡的年尾写完本书的，而在最近的记忆中，这也是最动荡的一年。2020年11月，也就是在我撰写后记的时候，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40万人死亡，并进入下一轮的病例和死亡高峰段。这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

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20年也为我们带来了保持希望的新理由。在拜登当选总统后，美国已经做好了在这一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中国宣布了要在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2021年，联合国将在苏格兰举办另一场重大的气候变化峰会。当然，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取得进展，但机会是存在的。

2021年，我预计会花很多时间同世界各地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我会向他们表明，这场疫情的很多教训，以及指导我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和原则，也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尽管前文已经讲过，但我在这里还是要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句话很容易被斥为陈词滥调，但事实就是事实。当政府、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时，这个世界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疫苗的研发和测试速度均创下纪录。而当我们不相互学习，反而妖魔化其他国家，或拒绝佩戴口罩、拒绝保持社交距

离以减缓病毒传播时，我们就延长了苦难的持续时间。

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如果富裕国家只想着降低自己的排放量，而不是致力于让每个人都切实用上清洁技术，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来讲，帮助他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也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都有实现零排放的理由，也都有帮助他人实现零排放的理由。除非印度的排放量停止增长，否则得克萨斯州的气温不会停止上升。

其次，我们需要让科学（实际上是很多不同门类的科学）来指导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新冠肺炎而言，我们要用到生物学、病毒学和药物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疫苗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像流行病学会告诉我们新冠肺炎的危险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阻止它一样，气候科学会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转变方向，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转变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工程学、物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及其他多门科学来应对气候变化。

再次，我们的解决方案应当满足受冲击最严重的人口的需求。就新冠肺炎而言，受罪最多的是那些可选项（比如可不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或者请假照顾他们的亲人等）最少的人。而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者。

在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群体感染与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口比例出奇的高^[1]，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也不太可能像白人学生那样普遍有条件上网课。在联邦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中，贫困群体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整体死亡率的5倍。^[2]弥合这些差距将是美国控制病毒蔓延的关键。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摧毁了我们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随着各国政府着手应对疫情，它们不得不将

人员和资金从其他优先事项上撤出，其中就包括疫苗接种项目。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2020年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3\]](#)在大约25周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25年的努力成果。

在全球卫生问题上已经伸出慷慨援助之手的富裕国家需要付出更加慷慨的努力，才能弥补这一损失。在强化全球卫生系统方面，它们的投入越多，我们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就能做得越充分。

同样，我们需要规划通往低碳未来的“公正转型”。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讨论的，贫困国家的人们需要得到帮助，以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富裕国家需要认识到能源转型对那些依赖当前能源体系的社区（以采煤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以及生产水泥、炼钢或制造汽车的地区）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此外，很多人的工作都间接依赖这些产业，随着煤炭和燃料运输量的减少，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会减少。届时，相当数量的工薪阶层人员将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提前为这些社区落实转型计划。

最后，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激发创新，以避免气候灾难。比如，政府投资清洁能源研发，有助于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就研发开支而言，其所产生的长远影响自然最大，但短期也是立竿见影的：这些资金能迅速创造就业机会。2018年，美国政府在所有部门的研发投资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过160万个工作岗位，为工作者带来了1 26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联邦和各州增加了390亿美元的税收。[\[4\]](#)

研发并不是经济增长与“零碳”创新存在关联关系的唯一领域。通过发布可降低绿色溢价以便绿色产品更容易同化石燃料类

产品竞争的政策，政府也可以帮助推动清洁能源公司的发展。政府还可以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资金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建造一体化电网等基础设施。

2020年是给世界带来巨大挫折的一年，也是充满悲剧的一年。但我乐观地认为，我们会在2021年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我也乐观地认为，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也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在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急剧下降。人们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应对两场危机。

这次不同了。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拖累了全球经济，但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力度与2019年相比依旧不减。在未来前行的道路上，碳排放似乎不再是一个我们想一脚踢开的问题。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势头？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在未来10年里，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关键的技术、政策和市场结构，因为它们会让我们走上“到2050年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道路。对于悲惨的2020年，除了在未来10年致力于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很难再想出其他更好的回应方式了。

[1] “Race, Ethnicity, and Age Trends in Persons Who Died from COVID-19—United States, May–August 2020,”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ttps://www.cdc.gov>.

[2] “Preliminary Medicare COVID-19 Data Snapshot,”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https://www.cms.gov>.

[3] “Goalkeepers Report 2020,”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

[4] “Impacts of Federal R&D Investment on the U.S. Economy,” Breakthrough Energy, <https://www.breakthroughenergy.org>.

致谢

在此感谢盖茨风险投资公司和突破能源联盟的工作人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的面世才成为可能。

乔希·丹尼尔是一位宝贵的写作合作伙伴，他帮助我以简明清晰的方式阐述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复杂性。如果本书能够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乔希的技巧。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鼓励这个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有效计划。就此而言，乔纳·戈德曼及其团队是再合适不过的合作伙伴了，其中包括罗宾·米利肯、迈克·布茨和劳伦·纳文等。他们在气候政策和相关策略上为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建议，确保本书中的想法能产生影响。

伊恩·桑德斯负责创意和制作流程，他是我在内容独创性方面的依靠。安努·霍斯曼和布伦特·克里斯托弗森设计的图表和挑选的照片，帮助提升了本书的生动性，当然，这也离不开超越文字工作室的专业帮助。

布里奇特·阿诺德和安迪·库克负责宣传推广工作。

拉里·科恩则以其一贯的冷静和智慧统筹管理所有工作。

特雷弗·豪泽和凯特·拉森领导的荣鼎咨询团队为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贯穿全书。

我还要感谢突破能源风险投资的所有人：穆克什·安巴尼、约翰·阿诺德、约翰·杜尔、罗迪·吉德罗、艾比·约翰逊、维诺德·柯

斯拉、马云、哈索·普拉特纳、卡迈克尔·罗伯茨和埃里克·图恩。

微软的两位前同事杰贝·布卢门塔尔和凯伦·弗里斯在2006年为我安排了首次气候变化学习会。在那次学习会上，他们向我引荐了两位气候科学家，一位是当时任职于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肯·卡尔代拉，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环境中心的戴维·基思。自此之后，我与肯和戴维进行了无数次对话，这些对话深深地影响了我。

肯和他的博士后团队成员坎迪斯·亨利、丽贝卡·皮尔和泰勒·拉格尔斯逐句阅读初稿，检查事实性错误。感谢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书中任何错误之处，均由我本人负责。

剑桥大学已故教授戴维·麦凯以他的智慧和洞见启发了我。对于任何想深入研究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人，我推荐阅读他的经典著作《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

曼尼托巴大学荣誉教授瓦科拉夫·斯米尔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系统思想家之一。他对本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中关于能源转型历史的内容，二是他帮我避免的种种错误。

多年来，我特别幸运能够遇到很多博学之人，并有机会向他们学习。感谢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乔希·博尔顿、卡罗尔·布朗纳、朱棣文、阿伦·马宗达、欧内斯特·莫尼兹、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亨利·保尔森和约翰·波德斯塔，感谢他们慷慨给予的时间。

内森·迈尔沃尔德对早期书稿提出了富有见解的反馈。内森从不讳言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品质。有时即便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也乐意听他直言相告。

其他一些朋友和同事也都特意抽出时间，阅读初稿并提出反

馈意见，包括沃伦·巴菲特、希拉·古拉蒂、夏洛特·盖曼、杰夫·兰姆、布拉德·史密斯、马克·圣约翰、马克·苏兹曼和洛厄尔·伍德等。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突破能源联盟的其他成员：梅根·巴德、朱莉·巴杰、亚当·巴恩斯、法拉·贝纳姆德、肯·卡尔代拉、萨德·乔杜里、杰伊·德西、盖尔·埃斯利、本·加迪、阿什利·格罗什、乔恩·哈格、康纳·汉德、阿莉娅·哈奇、维多利亚·亨特、安娜·赫利曼、克日什托夫·伊格纳丘克、卡米拉·詹金斯、克里斯蒂·琼斯、凯西·莱伯、李一帆（音译）、丹·莱文古德、詹妮弗·梅斯、利迪亚·马柯南、玛丽亚·马丁内斯、安·梅特勒、特丽莎·米勒、卡斯帕·穆勒、丹尼尔·穆德鲁、菲利普·奥芬伯格、丹尼尔·奥尔森、梅丽尔·翁德雷伊卡、朱莉娅·雷诺德、本·卢伊勒·德奥菲尔、迪利普·西瓦姆、吉姆·范德普特、德马里斯·韦伯斯特、夏柏南（音译）、徐奕星（音译）和艾莉森·泽尔曼。

特别感谢盖茨风险投资团队给予我的支持，感谢凯瑟琳·奥古斯丁、劳拉·艾尔斯、贝姬·巴特莱因、莎伦·伯格奎斯特、莉萨·毕肖普、奥布里·博多诺维奇、尼兰·扬·博斯、希拉里·邦兹、布拉德利·卡斯塔内达、奎恩·科尼利厄斯、泽菲拉·戴维斯、普拉特纳·德赛、皮亚·迪尔金、格雷格·埃斯凯纳齐、萨拉·福斯莫、乔希·弗里德曼、乔安娜·富勒、梅根·格罗布、罗迪·吉德罗、罗布·古思、戴安·亨森、托尼·霍尔舍、迈娜·霍根、玛格丽特·霍尔辛格、杰夫·休斯顿、特利西亚·杰斯特、劳伦·吉洛蒂、克洛伊·约翰逊、古瑟姆·坎德鲁、莉泽尔·基尔、梅雷迪思·金伯尔、托德·卡拉恩布尔、珍·克拉吉塞克、杰夫·兰姆、珍·朗斯顿、约尔丁·勒鲁姆、雅各布·利米斯托尔、阿比·卢斯、詹尼·莱曼、迈克·马奎尔、克里斯蒂娜·马尔泽本德尔、格雷格·马丁内斯、尼科尔·麦克杜格尔、金·麦吉、埃玛·麦克休、凯利·麦克内利斯、乔·迈克尔斯、克雷格·米

勒、雷·明丘、瓦莱丽·莫罗内斯、约翰·墨菲、狄龙·米德兰、凯尔·内特尔布拉特、保罗·纳文、帕特里克·欧文斯、汉娜·帕尔科、穆克塔·法塔克、戴维·菲利普斯、托尼·庞德、鲍勃·里根、凯特·赖兹纳、奥利弗·罗斯柴尔德、凯蒂·鲁普、玛辛·萨胡、艾丽西娅·萨尔蒙德、布莱恩·桑德斯、KJ·谢尔曼、凯文·斯莫尔伍德、杰奎琳·史密斯、史蒂夫·斯普林梅尔、雷切尔·斯特雷格、吉奥塔·塞里恩、卡罗琳·蒂尔登、肖恩·威廉斯、森赖斯·斯旺森·威廉斯、亚斯明·瓦齐尔、凯林·怀亚特、玛丽亚·扬和娜奥米·祖科尔等。

感谢克诺夫出版团队。鲍勃·戈特利布的早期支持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他拥有出色的编辑才华，你在这方面听到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凯瑟琳·胡里根以娴熟和优雅的技巧对本书编辑和制作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进行了指导。同时，我还要感谢已故的桑尼·梅塔，以及里根·阿瑟、玛雅·马夫吉、托尼·基里柯、安迪·休斯、保罗·博加兹、克里斯·吉莱斯皮、莉迪亚·比希勒、迈克·科利卡、约翰·高尔、苏珊娜·史密斯、塞丽娜·雷曼、凯特·休斯、安妮·阿肯鲍姆、杰西卡·珀塞尔、朱莉安娜·克兰西和伊丽莎白·伯纳德。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把这个项目引荐给她父亲的莉齐·戈特利布。

最后，我要感谢梅琳达、珍妮弗、罗里和菲比，感谢我的姐姐克里斯蒂和妹妹莉比，感谢我的父亲老比尔·盖茨——他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去世了。作为家人，他们给了我太多的爱与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 (美) 比尔·盖茨著；陈召强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4

书名原文：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

ISBN 978-7-5217-2833-0

I. ①气... II. ①比... ②陈... III. ①气候变化 - 影响 - 社会发展 - 研究 IV.

①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44064号

Copyright © 2021 by Bill Gate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著者：[美] 比尔·盖茨

译者：陈召强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11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7157

书号：ISBN 978-7-5217-2833-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英]

查尔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

马诺吉·普拉丹 (Manoj Pradhan)

著

廖岷 缪延亮 译

比较译丛
钱颖一 主编

人口 大逆转

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AGEING SOCIETIES, WANING INEQUALITY,
AND AN INFLATION REVIVAL

中信出版集团

人口大逆转

[英]查尔斯·古德哈特 [英]马诺吉·普拉丹 著

廖岷 繆延亮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比较译丛”序

中文版序言

导读 作者和译者的对话

第1章 导论

1.1 人口“甜头”：人口、中国和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如何塑造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

1.2 大逆转正在开启：“甜头”变酸

1.3 我们可能错在哪里？

第2章 中国：一场历史性动员的终结

2.1 三幕历史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2.2 经济权力集中，政治权力下放

2.3 中国的大逆转

第3章 人口大逆转及其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3.1 人口“甜头”正缓慢变酸

3.2 人口周期：地域特征统一，经济特征失衡

3.3 产出增长

第4章 依赖性、痴呆和护理危机

4.1 引言

4.2 老龄化的危害

4.3 痴呆的成本

4.4 痴呆的宏观经济影响

第5章 通胀卷土重来

5.1 通胀是储蓄和支出平衡的产物

5.2 部门平衡：私人部门的盈余将受到侵蚀，政府能减少赤字吗？

5.3 总体宏观经济影响

第6章 大逆转之下的（实际）利率

6.1 引言

6.2 低迷的增长会导致实际利率保持低位吗？

6.3 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的分部门变化

6.4 风险厌恶和安全资产的短缺？

6.5 政治压力

6.6 结论

第7章 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7.1 引言

7.2 不平等

7.3 不平等上升的原因

7.4 民粹主义的兴起

第8章 菲利普斯曲线

8.1 引言：历史的发展

8.2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

第9章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

9.1 引言：传统分析的缺陷

9.2 国内投资：繁荣与萧条

9.3 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变化

第10章 什么可以抵消全球老龄化的影响？

10.1 国内：自动化、劳动参与率、移民

10.2 印度和非洲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人口不利因素？

第11章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11.1 引言

11.2 债务的积累

11.3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第12章 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12.1 引言

12.2 拉平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净财务优势

12.3 改革企业经理人的激励结构

第13章 未来的政策问题

13.1 引言：未来的崎岖道路

13.2 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老龄化和税收

13.3 货币政策

第14章 逆（主）流而行

14.1 我们的方法论和主要判断

14.2 我们和主流观点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后记 新冠疫情后不完美的未来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中文版序言

人口趋势和全球化对世界尤其是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趋势的影响，应该得到比当下更多的关注，本书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本书的标题“人口大逆转”，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惊人的崛起一直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因此，中国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1章专门描述了中国近期以及当前的经济发展，我们在书中对中国的引用也远多于其他国家。中国规模庞大的技能劳动力群体加入全球化，使得全球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一度上升了120%。随着人口趋势的逆转，中国的劳动力并不会脱离世界劳动力市场，而是会在未来的30年里与西欧甚至东欧一道迅速萎缩。

人口趋势和全球化通常变化缓慢，并且是在全球层面而不是在国家层面起作用。由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分析关注的是周期性和国家层面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被严重忽视了，也许西方学者比亚洲学者更甚。对全球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足以写一本很厚的书。

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包括中国，还没有为老龄化带来的无数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社会保障、财政问题、医学研究的重心以及债务积压，都会随着全球老龄化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既没有实际上也无法涵盖所有影响长期经济走势的众多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技术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有许多比我们更

加专业的人士已经在讨论这些议题。另外，还有一些“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可能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我们认为，这些人口和全球化因素是造成过去30年通缩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力量正在发生逆转，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再次面临通胀压力。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的拐点何时出现？”当我们在2019年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也许5年内会发生。

当然，那是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之前；疫情的发生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疫情的总体影响将使本书概述的趋势加速发生。中国将更加关注国内，减少给全球带来的通缩压力，通胀本身将比我们预期的更早、更快地上升。由于这对我们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出版商欣然同意让我们在本书后面增加一个简短的结尾（后记）。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实证性的，如果没有帕特里克·德罗兹季克（Patrik Drozdik）和唐波（Bo Tang）给研究提供的宝贵帮助和对数据的洞见，以及玛丽娜·埃蒙德（Marina Emond）对手稿的组织 and 准备，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感谢他们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谢普拉坦查·帕德什（Pratyancha Pardeshi）对这些主题的早期研究提供的帮助。

然而，数据需要依据理论转化为叙事才易于理解和具有说服力。为此，我们当然要感谢许多在我们之前的人，例如，第8章中讨论的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撰写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疲软与工资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以及第7章中讨论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对不平等的研究。我们特别感谢

卡罗尔·贾格 (Carol Jagger) 纠正了我们在依赖性和痴呆方面的一个错误, 感谢卡米拉·卡文迪什 (Camilla Cavendish) 在第4章中提供的指导, 感谢卡罗尔·贾格及其合作者允许我们引用 PACSim 模型研究中的表格, 以及克里斯·林奇 (Chris Lynch) 和阿尔茨海默病国际组织允许引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中的表格。我们从阿尔茨海默病全球首席执行官倡议 (Global CEO Initiative on Alzheimer's Disease) 召开的会议上收集到的见解非常有用。我们要感谢乔治·弗拉登伯格 (George Vradenburg) 和德鲁·霍尔扎普费尔 (Drew Holzapfel), 还要单独感谢娜塔莉亚·谢尔维 (Natalia Shelvey)。同样, 我们感谢迈克尔·德弗鲁克斯 (Michael Devereux) 及其合作者允许我们引用他们关于“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 (Destination-based Cash Flow Taxation, DBCFT) 的论文的摘要, 以及他对本书文稿提出的有益评论。我们还感谢贝努瓦·莫洪 (Benoit Mojon) 和泽维尔·拉戈 (Xavier Ragot) 在劳动参与率数据方面提供的帮助。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感谢:

- 英格兰银行允许我们转载古铁雷斯和皮东 (Gutiérrez and Piton, 2019) 的研究报告中的图表, 以及2019年7月《金融稳定报告》中的两张图表。

-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允许转载埃尔南德斯·穆里略等人 (Hernández Murillo et al., 2011) 的研究报告中的图表。

- 泰勒和弗朗西斯 (Taylor and Francis) 允许转载米恩 (Meen, 2005) 的研究报告中的图表。

- 伦敦银行与金融研究所 (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允许转载《金融世界》(2019) 中梅休 (L. Mayhew) 文章的部分段落。

- 西班牙银行 (Banco de España) 允许转载阿克索伊等人 (Aksoy et al. , 2015) 的研究报告中的表格。

- Rightslink允许转载海瑟 (Heise , 2019) 的研究报告中的表格。

- Brookings允许转载雷切尔和萨默斯 (Rachel and Summers , 2019) 的研究报告中的图表。

- Marketplace Copyright允许转载格博豪等人 (Gbohoui et al. , 2019) 的研究报告中的段落和图表。

- 美国经济学会允许转载奥托等人 (Autor et al. , 2019) 的研究报告中的两张图表。

- Statista允许转载其中的一张图表。

- The High Pay Centre允许转载其中的一张图表。

更广泛地，我们要感谢申铉松 (Hyun Shin) 鼓励我们写作本书。我们特别感谢黄海洲仔细阅读了整本书，并大大改进了有关中国的章节。同样，我们也要感谢伊藤隆敏先生 (Takatoshi Ito) 对有关日本的章节提供的帮助。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 (Palgrave Macmillan) 的一些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特别是图拉·维斯 (Tula Weis)、雷切尔·桑斯特 (Rachel Sangster)、露西·基德韦尔 (Lucy Kidwell) 和阿扎鲁丁·谢里夫 (Azarudeen Ahamed Sheriff)。

我们非常荣幸该书中文版能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并特别感谢我们的出版人吴素萍女士，两位译者廖岷先生和缪延亮博士，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

然而，我们最感亏欠的仍是米菲·古德哈特 (Miffy Goodhart) 和普拉丹 (Pradhan) 的家人，他们不计较我们疏于

关心，还原谅了我们。

查尔斯·古德哈特

马诺吉·普拉丹

2021年5月于英国伦敦

导读

作者和译者的对话^[1]

廖岷：古德哈特教授，很高兴再次在网上与您相见。我还记得在英国与您几次见面的场景，其中一次是您在剑桥大学和我们讨论《巴塞尔协议III》及银行风险管理问题。马诺吉·普拉丹博士，您好！首先，我想说我们俩都非常喜欢你们合著的这本书。本书关于全球人口趋势大逆转及其影响的主题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赞同你们阐述的观点，即这一影响宏观经济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被严重低估。因此，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们写出了这样一本好书？在新冠疫情之前，主流观点都认为我们依然处于金融危机后艰难而缓慢的经济复苏中，利率还会继续下降或保持较低水平，一切都会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内保持不变。谢谢！

古德哈特：谢谢！很高兴与你们在网上见面！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较久以前，我们在伦敦摩根士丹利一起工作的时候。在我这个年纪，对事物的记忆并不如马诺吉来得好。所以，当初是什么促使我们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交了那份报告？马诺吉，你还记得吗？

普拉丹：我记得。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利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那时候，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10年期和2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都是负的。我和查尔斯（指古德哈特教授）都对世界永远不变的观点很不以为然，因为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之

中。我们的观点是，尽管市场正确地强调了周期性力量，但它们忽视了长期结构性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函数的一部分）即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可以相对确信地说，中国和其他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帮助降低了全球的通胀，因为这一现象已经发生30年了。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如果人口因素出现逆转，那些趋势凭什么还会继续保持不变？讨论就是这样开始的，接着我们讨论了该如何处理债务？日本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在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交报告之前，我们已经在摩根士丹利发表了关于人口的报告。我们将它们（人口和债务）联系在一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国际清算银行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申铉松建议我们深入研究并写成一本书。然后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更好地表达我们的观点，提高可读性。就是这样，我们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创作此书。

古德哈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最感自豪的是第4章，它起初不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里。这一章我们提到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以及这将如何使老龄化社会对政府来说更加昂贵且更加难以应对，甚至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加棘手。以上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马诺吉和我都因为家庭原因对痴呆的问题有更多了解。我们之所以为此感到自豪，是因为通过跨学科的联系，我们将宏观经济分析与人口统计学和老龄化的医疗影响结合起来。

廖岷：教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章节，正如您所说，它是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你们得出非常有力且有意思的结论，发人深省。当读到第4章时，我个人认为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一个例证。你们的书会让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更快、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挑战。人口结构变化很快，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等造成的问题正发生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里，我们也改

变了一胎、二胎政策。另外，我还想和你们讨论关于中国那一章（第2章）的几个观点。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指标都在体现通胀上升的预期。有人说大通胀已经来临，同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或者说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到底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认为你们书中的结论仍会得到验证，但不会这么快。所以我在想，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新冠疫情的暴发似乎给你们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你们如何看待最近发生的一切？你们认为利率和通胀上升会持续，还是说只是暂时的？我认为，也可能有一种情况，即便你们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会大概率看到未来通胀将出现一定的反复。很希望你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你们目前的看法，谢谢！

古德哈特：没人真正知道未来一两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片地区被封锁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正在走出这种状况。在封锁期间，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部分由于不能消费，储蓄急剧上升，并且是被迫储蓄，没人知道储蓄有多少，也不知道会维持多久。一旦恢复正常，人们会动用这些储蓄。除了大量储蓄，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给也急剧增加。在日本和美国等一些国家，货币的增长几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我们认为，这意味着经济重启后通胀会上行。在这之后，主流观点认为，在当局不施加更多刺激的情况下，一切都会回到更低的通胀水平，约每年2%。但是我们觉得通胀预期会相应调整，主要是因为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已经采取并将继续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例如在美国，失业救济金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愿意接受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宁愿保持失业状态。在英国，许多低收入的工作和服务基本上由东欧移民完成，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回国。因此，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我们认为工资会开始上升。同时，世界上许多国

家的最低工资都在急剧上升。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更少，我们认为，将会出现劳工地位提升导致劳工议价能力重新增强的情况，并且通胀会持续高于大多数央行当前的预期。

普拉丹：如果从金融市场看，我认为2020年的市场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有了很多变化，并且重要的是当前全球经济高度同步。在金融危机期间则相反，全球经济的复苏是极端不同步的。一开始，美国和英国出现大规模的房地产债务危机；数年后，中国经济开始放缓；大约一年后，欧洲陷入危机；然后新兴市场出现了“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所以，即便表面上显示经济经历十年的扩张，全球增长看似稳定，但其实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有一次巨大冲击。我们从不敢说每一个经济体都在持续地扩张。这一次，我们正在见证这辈子最同步的经济扩张。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增长，中国和北亚开始于2020年2月，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在6月重启。在那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问题，有些地区被重新封锁，但是产出再也没有降到2020年2月的水平。当每一个经济体都在增长的时候，正外部性溢出的概率会更大。如果某些经济体内部出现了问题，它们还可以从外需中获益。美联储继续扩大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甚至中国都大量使用财政政策。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大多数人都习惯于仅考虑本国的情况，很少考虑甚至直接忽视全球的影响。正如我们在书中所说，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同样，我认为他们也忽视了我们看到的大规模全球财政和货币扩张的影响。即便一个国家微不足道，当你把150个国家放在一起考虑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

廖岷：我想稍微挑战一下你们的看法。有些人可能会说，当下通胀的来袭并不是由人口结构变化这种长期趋势造成的，而是如您所说的，是由绝大多数经济体同时出现超量货币供给导致

的。你们如何回应这些观点？因为人口结构因素确实还存在，尽管有变化，但是中国现在还在一如既往地为全球提供着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增长，这一趋势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通胀的上升实际上比人口趋势的变化要快得多。因此，有些人会说，也许你们的观点并不十分准确，通胀主要是由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你们会如何反驳这种观点呢？谢谢！

古德哈特：我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事实上，当我们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写作本书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潜在的人口趋势会在什么时候产生影响。并且，我们在五年之内也不会知道。不过我们非常肯定，除非有重大的医学突破或者其他主要因素，到2030年世界的通胀会更高。只是我们还不太确定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的观点是，近期的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同步复苏将会推升通胀，一旦出现持续上升的通胀，由于潜在的人口趋势和全球化的影响，那个拐点会比我们预期的来得更快。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是，全球化会慢到什么程度，或者会不会逆转。我们也不知道，中美的贸易摩擦会持续多久，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出口。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一件事，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国家都开始意识到一些关键产业，尤其是生产疫苗的制药业，应该留在本土。我认为本次危机的教训，意味着许多国家都将面临压力，欧元区的国家也好，美国也罢，都会确保一些产业留在本土。举一个例子，我认为美国人担心中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资源，所以他们将努力尝试开发中国之外的稀土资源。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全球化都会面临政治阻力，这会抑制中国出口在全球占比持续上升的趋势。

普拉丹：我认为您刚刚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两天的研

讨会来解决。我们几乎不可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但是让我们试试。目前衡量中国对世界影响的方法严重低估了其真正影响。如果你仔细看看美联储的研究以及投行的研报，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中国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他们关心中国进口商品所占的份额和经常账户的情况。他们甚至关心中国进口商品如何影响通胀的一些度量指标。这远远不够，中国在其他方面也是抑制通胀的主力军。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一直讨论的技术转化。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技术转化。因为在1979年，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基本没有什么资本积累。不过好消息是，当你什么资本都没有时，任何引进的事物都是最先进的。如果你现在去看看纽约或者伦敦的地铁系统，它们很难维护，因为它们是一百多年前建成的。如果你在中国建一个铁路系统，它肯定是全新的。在一张白纸上，你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更容易在此基础上创新突破。现在你们有了世界上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几个世纪的知识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技术转化和廉价的技能劳动力，影响了发达经济体的各个行业。就像查尔斯经常说的，工资的问题是向中国外包的影响使工资处于低位。但是这很难被精确测度。如果我们对的，这些压力已经是过去时了，不影响我们对未来将发生逆转的判断。另外，您提到的出口是新冠疫情期经济的一部分。大家主要消费制造品、快递和外卖。北亚是世界上具有所有这些东西的地方，这也是这里的出口如此强劲的原因。当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出口增长就会放缓。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想过多依赖出口，而是想更持续地发展经济，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的重心会转移。我想说的第二点依旧是来自查尔斯的经历。就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我感觉我每天都在上经济学101课，不断从查尔斯那里接收信息。他分享了他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经历。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就是最初对抗通胀的胜利之后，央行并不需要年复一年地

积极对抗通胀，通胀几乎是自己回落的。如果未来通胀变得越来越难控制，逆转过去30~35年的故事，这将会是对我们观点的又一次佐证。最后，简单地说，央行控制通胀会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有二。第一，通胀是人口结构性和全球性力量的结果；第二，政府不会同意加息，因为加息危害经济增长，妨碍政府连任。

廖岷：我同意二位的观点。因为当前很多其他因素在全球发挥作用，例如像您说的，科技、竞争、地缘政治压力等，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未知区域，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当然，根据你们在书中的论点，你们至少对过去的30年或40年做出了强有力的解释。正如您所说，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带来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是我们看到的去通胀因素，是对过去的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同样，我们也十分确信，人口因素还会在未来发挥它的作用。也许它不能百分之百预示未来，但我们必须记住人口趋势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只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趋势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等造成的冲击。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本非常好和非常及时的书。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古德哈特教授学习，他总能一直把握时代的思潮。我把时间留给我的同事，缪延亮博士。谢谢。

缪延亮：谢谢，我必须承认当廖先生邀请我一起翻译这本书时，我通读了全书。起初我并不太赞同书中的许多观点，或许是受我咸水派经济学训练的影响。但越深入地读下去，我就越赞成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依然有些疑问。第一，本书把人口趋势放在最瞩目的位置，解释通胀和实际利率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传统上，正如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的，生产函数包括三个要素：技

术、资本和劳动，而劳动在大多数基准模型中只写在脚注中，例如典型的索洛模型，均衡状态下的GDP增速、人均资本、人均GDP，这些都不会随人口增速的改变而改变。在均衡状态下，劳动不起作用。那又是什么在驱动经济周期？是什么在推动经济的潜在增速？主流观点认为是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驱动。这也是人们关注的因素。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强调人口，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强调人口？我觉得你们在书中说的人口大逆转实际上是两个逆转，不仅是人口趋势的逆转，还有全球化的逆转。这两种力量在中国结合在一起，因为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是人口和全球化同时进行的。现在这两股力量看起来都在逆转。而且，说到这里，您刚才也提到了资本，中国的资本增加了，技术也发展了。中国的抚养比早在十年之前就见底了，2010年就已经是人口转折点了。你们为什么认为现在才是转折点？从根本上，我还是在问为什么要把宏观经济典籍和前沿研究一笔带过的人口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

古德哈特：我认为经济学课本忽略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是不妥的。在过去30年里，世界的劳动力供给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又要再次改变。您问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是因为这些趋势对工资的影响非常缓慢，捕捉到这些影响需要很长时间。另一个因素是生育率的下降，这与耐用消费品如冰箱、洗衣机等的普及相互作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几乎有一半的工作年龄妇女都在家里做家务，没能为GDP做贡献。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即女性工人占比，在过去四五十年中急剧上升。所以，如果你把中国的增长、普遍的全球化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结合在一起，它就成了极其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趋势变化既缓慢又平滑，以至于如果你展望未来两年——我们经济学家大多做未来两年的宏观经济预测——你完全可以忽略它，

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外生给定的值。而当你预测未来十年时，你就不能忽略它。这些潜在的全球变化和趋势有很强的惯性，从拐点出现到根本上影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新冠疫情是世界上的重大危机，它改变了全球的政策，会加速显现长期潜在因素改变带来的影响。

普拉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劳动力在新兴经济体比较便宜而资本在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比较便宜。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积累资本呢？它们通过扭曲资本的价格来积累资本，而这通常发生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比如，中国舍弃了“不可能三角”中的资本自由流动，这使中国可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控制汇率。当人口前景乐观时，这种快速增长会特别有力。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如果你读到本书中关于中国的章节，你会看到第一行问的是：是全球化成就了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崛起推动了全球化？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人口在过去30年里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一个真正的融合，合二为一。人们都不知道是该称为中国劳动冲击还是全球化冲击，它们或多或少是同一件事。最终，全球老龄化问题也发生了变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老龄化，美国在老龄化，西欧在快速老龄化，北亚和东欧也都在老龄化。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如果你去非洲、印度以及拉美地区看看，人们也会指出这个问题。正如查尔斯所说，经济学教科书需要重写。

缪延亮：对。我个人认为，如果考虑长期问题，人口结构因素确实有更重要的作用，它会出现现在经济模型中。刚刚你们提到全球老龄化，书中关于通胀会上升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抚养比会因为老龄化而上升。书里有一个比喻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说有太多的嘴在争夺太少的食物。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知道这是在类比有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我们都很清楚这一

点，却很少以这种方式看待通胀，虽然这看起来非常直观。您说工作是通缩性的，因为你必须生产出比消费更多的商品才能被雇用，这种说法非常直观。然而，在课本和模型中，很少有人会这么想。我想给您一个相反的论点，以农业为例，农业人口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依旧有能力养活70亿人口，并没有农产品的持续通胀。某种程度上这突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是技术进步在减少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如果说是人口驱动了通胀，言外之意就是您认为技术进步还不够快，其影响只能退居次位。是这样吗？否则，您无法将您的理论与农业或制造业领域发生的事相匹配，对吧？

古德哈特：是的，我同意。我们不是也没有试图成为技术领域的专家。技术确实有可能会大幅进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大多会迎刃而解。同样，也有罗伯特·戈登这类人，他们认为，所有通过最简单直接的技术就可以获取的经济果实已经被人类完全获取了。同时，在技术开发者之间依然存在技术进步是会慢下来还是会加速的争论。我们在这个方面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专业知识。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乐观的，但是这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比如，国家之间可以更加平等。出于某些原因，我们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比如，如果医学可以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那就太好了，这意味着照顾老年人只需要更少的人口，社会应对老年人问题会更加简单便宜。药物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想表达的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增长变慢，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普拉丹：首先，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我们非常需要科技。您提到了农业，制造业也是一样的。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之比已经上升了非常多，但这并没有减缓中国的增长，只是改变了增长的构成。美国变得更加消费主导，而中国变得更加投资主导。这些

趋势也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希望更高比例的消费，而美国不得不提供更多的投资。如果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引入更多的技术。其次，不管是在哪个部门，都有一些人认为技术是好的，因为这给了他们更多的工资，而其他人则认为技术是有害的，因为技术会替代他们的工作。服务业，特别是直接或者间接照顾老年人的行业很不同，因为有些工作不适合由机器人来做。即便面临的任務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应不同对待，每一个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人每次也不是接受相同的护理，所以我们需要人手。但是，如果政治原因使我们不能雇用移民，那么，我们就要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部门转移人手。因此，我们需要科技来替代其他重复性很强的工作。相较于您提到的农业，服务行业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不是重复性任务，也不是季节性的，或者通过编程就能完成的。日本有一家完全自动化的酒店，它大约在三年前开业，之后有将近50%的机器人都被淘汰并被替换成了人工，因为它们不能通过改变程序让自己变得足够灵活。现在它们依然可以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会很快发生吗？人们都在谈论无人驾驶汽车，好像未来五年每辆车都能实现自动驾驶一样。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在那之前，我们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劳动力的供需两端会变得非常不同。

缪延亮：好的。如果我理解的没错，您是在说随着人口趋势的逆转，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激增，尽管科技对制造业和农业有很大帮助，但是它并不能像之前一样作用于服务业，尤其是养老服务上。

普拉丹：完全正确。

廖岷：当你在分析全球化或全球经济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资本、技术、劳动每一个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在读

这本书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分析了复杂情况下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让我们用一个简单、清晰的逻辑思考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能用一个因素取代所有其他因素，我们不能有这种野心，这也不切实际。因此，正如我一开始说的，本书围绕自己的主题，有非常强的论据。而且，我们确实必须牢记在心，人口趋势作为结构性因素在长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这经常被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忙于短期决策时忽视。我认为这是本书的闪光之处。

缪延亮：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思考了很久，并且得出了与您不同的结论，这就是老龄化对储蓄和资金需求的影响。对储蓄的影响，你们说老龄化会带来更低的储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一点，老龄化实际上可能会提高储蓄，看看欧洲，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都延长了许多，人们必须储蓄更多。储蓄率实际上在上升。就算我们退一步讲，在供给端，正如您说的，工作人口在减少，储蓄率下降，储蓄总量下降。我们还要再看看需求端，在书中，你们说住房需求会一直在那里，因为人们更不愿意搬家。这种解释是不是比较牵强，在美国当人们有了孩子后会住在大房子里，退休之后会搬到两间卧室的公寓里住；也许在这之后，他们还会搬去护理中心这样的地方。所以，随着人口老龄化，住房需求和投资需求基本上都会下降。但是本书的观点完全相反。这也是你们得出实际利率会上升的原因。就算储蓄按照你们的推理会下降，虽然不少人认为储蓄实际上会上升，需求仍有可能下降得更快，这依然会导致利率更低而不是更高。

古德哈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地区会不太一样。也许英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但是，尽管他们的孩子已经离开，对老

年人的护理依然更多地发生在原有的房子里，因为搬迁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件艰难而又痛苦的事，到最后，他们还是大概率要搬到养老院去。但是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住房空间的严重错配时间也会变长，因为老年人那时候可能还会住在当初大到可以容纳他们孩子的房子里。在他们的孩子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会住在那。这可能会出现很大程度上的居住空间分配不当。还有另一重考虑是，我们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人口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没有考虑到，结婚年龄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都在快速上升。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二十几岁就结婚，30岁之前就会生小孩，在他们50岁之前，孩子就会离开家。他们可以用收入最高而且没有任何负担的15年来储蓄。现在结婚年龄上升了，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也在上升，很多人40岁之前都没有成家，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抚养孩子的时间在减少。人最没有家庭负担的时候是18~30岁。可是，当你25岁时，你很少会想到你能活到85岁以上，从而有十七八年的退休时间，需要你很早就开始储蓄。年轻时你只想着买一套房子，这确实需要很多储蓄。你也为此省了很多钱，但这差不多就是你储蓄的全部。年轻人不能足够地储蓄，因为在20岁时，你很难想象退休后是什么样子。你的主观贴现率实际上非常高。

普拉丹：在我们的书中，相较于均衡实际利率的上升，我们更加确信未来的预期通胀会上升。因为，正如您所说，问题是储蓄和投资会同向运动，我们在纠结到底哪一项会变化更多。如果储蓄相比于投资下降得更多，那么实际利率会上升，如果投资下降得更多，那么利率就会下降。所以，哪一种观点都没有太强的说服力。而通胀的路径则要清晰得多。假设我们接受主流观点，均衡实际利率保持不变。主流观点会认为，在去通胀的环境中，由于通胀下降，所以实际利率会上升。我们持相反意见。尽

管均衡实际利率保持不变，通胀上升也会压低实际利率。此外，我们还认为均衡实际利率甚至有上升的趋势，略高的实际利率加上更高的通胀，这意味着名义利率会上升非常多。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有了这样的结论后，我要补充一点，住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老人年纪大了，不想离开家。但是许多老龄化的家庭往往希望住得离医疗设施近一些，这会吸引他们住到市中心，看看意大利空荡荡的乡镇和村庄就知道了。最后，如果老年人住在家里，那么城市里的年轻家庭就需要新的住房。总的来看，在储蓄持续下降的时候，住房需求会依旧保持强劲。其结果是给实际利率带来上升压力。

廖岷：对中国而言，如你们所说，一方面，很多人都想搬进大城市，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很多人也开始想搬到郊区，住更多、更大的房子，这两种情形实际上都在发生，会对未来房屋的需求造成影响。

普拉丹：这与发达经济体中的一些趋势一样，很多人都想住进第二家园。总而言之，住房问题还是非常棘手。我觉得查尔斯大体上是对的，我父亲就不想离开他的房子。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美好，他只想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这意味着新的住房问题还很复杂。我们不觉得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缪延亮：即使在中国，很多老一辈人都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也不想去养老院，他们只想待在自己的家里。

普拉丹：当你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妻子对我说下次将会是最后一次搬家，之后就要别人把我们抬走了。（众人笑）

廖岷：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因为这本书是关于人口趋势，国家层面以及世界层面的问题。在与您

讨论中国这个具体案例之前，我首先要说，你们关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分析很有启发性。书中提到的三幕历史塑造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令人印象深刻。我想问问你们，因为中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还会持续发展并且融入全球化。考虑到外部世界如此动荡，根据书中的结论，您对中国政府有具体的建议吗？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古德哈特：我觉得马诺吉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合适。他比我更了解亚洲地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章节也是他牵头的。

普拉丹：我很高兴，当查尔斯说我在某一方面比他更懂时（众人笑）。如果您五年前问我这个问题，那么答案会大不相同。因为五年以前，我认为传统观点似乎依然是中国可以回到8%~9%的增长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路。因为这意味着决策者要试图继续保持旧的增长模式，这会在未来变得更糟，不过事情已经好转了。自2015—2016年以来，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决策者的愿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完全清楚，必须摒弃旧的增长模式。钢铁的生产受到打击，而国有企业也不能驱动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增长模式还在积极探索中。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中美的贸易摩擦实际上对中国有利。我们书中关于中国的那一章有一幅图表明，在向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转型过程中，中国似乎在走日本的老路。日本转型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投资之后，投资不得不停滞。虽然消费占GDP之比提高了，但消费增长缓慢，日本是被动地和机械地变成了消费驱动的经济。这就是中国面临的风险。不过，贸易摩擦带来了转机，我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因为这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别的增长模式，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消费（我认为这最后会以失败告终）。例如，对半导体产业前景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中美都想更加独立自主。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中国在展望未来时会被迫更加关注自

身，并且分配更多的资本用于保证未来的增长。我认为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过去的问题，即国有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如果这些债务不能被清算或者转化为股权，那就很难继续发放信贷。如果清算债务，那就必须对银行注资。所以，很难指望利益相关方自己会主动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将会使所有人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未来，除了社会保障性住房以外，我建议要长期重点关注社会护理体系。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很少关心未来老年人的需求。你越激励更多的工人护理老年人，或者让他们进入社会护理系统，未来的压力就越小。这需要得到政府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国。

廖岷：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每个社会都需要加快准备，以应对一个加速到来的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各种挑战。人们对此还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细致的思考。

古德哈特：是的，这是非常好的意见。我承认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我非常同意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正如我在开头说的，中国政府现在对此非常关注，但我认为很难扭转这样的局面，因为这是个长期问题。如果你想发展社会护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

廖岷：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给了很好的预警。我想说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以后，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人口问题永远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球被忽视已经很久了，尤其是对长期受益于人口红利的国家而言。长期因素、慢因素往往如此，会使全球各个国家为自己的疏忽承担后果。我还想和你们讨论一个问题，书中有一个关于中国杠杆率和债务问题

的讨论。实际上，正如普拉丹博士所说，您认为债务问题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同时，你们在书中又提出，由于杠杆的资产和债务双方都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上，因此，在中国，债务问题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个看法值得商榷。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看你有多少资产，而是要看资产能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或足够的未来现金流，如果不能，这些资产对应的负债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你还欠别人很多钱，而你的资产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让你偿还债务。因此，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普拉丹：您完全正确。您的推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指出的只是一个政策选择，如果你选择减记债务和相应的资产，那么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继续积累信贷。在讨论债务之后的段落中，我们说，这一策略的代价就是无法通过信贷刺激消费，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当你在消化过去资本错配造成的损失时，你就不能拥有足够的新资本来创造新的信贷增长。如果你想要新的信贷增长，那么你就不能保持现有的策略。中国现在的策略好像就是“有3%的增长就足够了”。中国只是想要以一种不造成更多问题的方式消化债务。如果战略是创造新的资产以促进更快的增长，那就必须做出改变。但只要这种更高增长策略不是政策优先目标，中国愿意接受低增长以控制债务问题，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处在可持续的平衡状态上。

廖岷：我想把您今天说的话放在本书的前面，好让中国的读者真正理解您的意思，因为我有点担心，当读到这部分时，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会由此觉得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古德哈特：我们本应该说得更清楚些，马诺吉，你能重写这段话并发过来吗？

普拉丹：可以，我可以做到。

廖岷：但不是这个版本，对吧？也许未来您可以重写这段话并把它发给我们，由我们来翻译。

普拉丹：是的，我们也可以做到。你们可以把对话放在书的开头，我也会试着在相应的章节中更清楚地阐释这点。既然您提出了这么好的意见，为什么不在两个地方都改进呢？

廖岷：非常好。另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在日本和中国，劳动力市场都不能作为减震器，在日本这是由长期存在的文化导致的，而在中国这是由关注社会稳定因素造成的。因为中国不喜欢解雇工人，实际上，我不太认同这一点。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也解雇了大量的国企工人，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国有企业以及商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都通过各种方法解雇了冗余员工。这次疫情期间，我们有很多人失业，但同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像西方企业那样大规模裁员。我们看到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由于新冠疫情，航空公司解雇了飞行员，其他行业解雇员工的报道。我们有的企业通过压减部分工资，员工会继续和企业在一起，因此他们不会被解雇。但是，我想说，因为你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中国的三幕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改革是我们建设市场经济的重要经验与教训，也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所以，当读者读到本书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这一部分时，这种印象可能会削弱你们一开始提出的观点。另外，中国的民营部门在就业、生产、税收等各个方面，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在1979年之前，我们是100%的计划经济，而现在已大不相同，这和本书中第一部分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的逻辑是一致的。

普拉丹：这一点容易协调。真希望在写书时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对话。很明显，中国民营部门的作用已经显著增加，绝大多数的就业都来自民营企业。实际上，如果观察中国应对疫情的政策，它必须更多是财政方面的，而不是货币方面的，因为货币政策通常会使大银行、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获得资金，但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而财政是唯一能使资金进入这些机构的方式。中日之间的比较也与此相关，因为大多数资源错配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大程度的资源错配。因此，民营企业裁员的呼声也没有那么大。通过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中国消除了八九十年代的资源错配问题。当前采取这种做法的呼声不高。思路似乎不再是对银行采取冲击疗法，通过制造“好的”或者“坏的”资产来改变资产负债表，而是通过两种方式吸收过去的资本错配：一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二是通过债转股。在物质资本方面，许多有过剩产能的部门（如钢铁部门）被直接关闭了，但你不能这样处理工人。由于过剩产能很多来自国有企业，有灵活的方式吸收过剩的工人，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和民营企业。这让我们的故事逻辑更一致了，您的评论非常好。

廖岷：好的，我们不想耽误你们太久了，你们那边已经是凌晨了，非常感谢。这是一次非常有趣并且充满思考的讨论，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你们的观点。我说过，我们真的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产生影响，这样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人口趋势的变化，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又极具敏感性的领域。我们既需要改革，出台一些激励相容的措施，让人们乐意工作更长一段时间，同时也需要循序渐进。比如，有人提议，一项可能的政策是让人们获得退休待遇的同时，继续通过服务社会来挣更多的钱，减少社保的压力。有人提议减免一部分退休后继续工作的人的个人所得税，让人们愿意为社会工作更长时间。对医疗保健系统而言，这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这次疫情期间，一些地方的医疗系统经受了超负荷的考验，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总之，我们希望读者朋友在读完你们的书后能有更多的收获。最后，再一次感谢你们，我们期待今后能继续保持交流，也希望你们的书在中国取得成功，谢谢你们！

缪延亮：谢谢，再见！

普拉丹：谢谢，这很好！

古德哈特：谢谢！

[1] 该导读为本书译者和作者于2021年4月16日的对话实录，原文为英文，由缪延亮和王帅翻译整理，廖岷核校。

第1章

导论

中国的崛起及其人口带来的“甜头”，强力影响了过去三十多年全球通胀、利率以及不平等的变化走向。然而，未来将完全不同于过去，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随着“甜头”变酸，几十年来由人口变化带来的趋势将发生戏剧性逆转。

我们的许多结论充满争议。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准备好应对通胀和工资的大幅上升，或者名义利率的上升。我们的其他预测则更为乐观：生产率会提高，劳动力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会增加，引发了诸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不平等将缩小。

无论我们是对还是错，“人口大逆转”都具有广泛的影响，涉及金融、医疗保健、养老保障体系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等方面。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

1.1 人口“甜头”：人口、中国和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如何塑造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

1.1.1 中国的崛起

1990年到2018年，经济发展唯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改变了此前失败的经济政策，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务实开放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口号，这最终促使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融入全球制造业综合体系使得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的可用劳动力供给量增加了一倍多。因此，本书第2章以有关中国的内容开启全书的讨论。

1990年到2021年，中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欧洲和美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的4倍还多，前者的新增量超过了2.4亿人，而后者的新增量不到6 000万人，且主要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就业的变化也使得天平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一方面，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城市，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或使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7亿人。同期，美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则失业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可能更高。

1.1.2 东欧重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是推动全球劳动力供给有效增加的另外一种力量。这使得从波罗的海国家开始的整个东欧国家，从波兰往南到保加利亚，也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东欧劳动年龄人口从2000年的2.094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2.097亿人，2020年预计为1.939亿人。

中国的崛起和东欧回归世界贸易体系这两个政治经济变化，

给世界贸易体系的可用劳动力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正向冲击。过去几十年里经济自由主义被广泛接受，从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到2001年的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增加了新增劳动力被利用的机会，其结果是，全球化突飞猛进，1990年到2017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5.6%，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2.8%。2004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为8.7%，到2017年，这一份额已经达到26.6%。

然而，中国与东欧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是导致可用劳动力数量剧增的唯一因素。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两个人口特征，也助推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1.1.3 发达国家人口的良性变化

人口的第一个变化特征是，这些年人口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第二个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

抚养比下降与出生率有关，出生率在二战后曾短暂上升，5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则在相对较迟的时候才开始了长期上升趋势。婴儿潮一代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直到2010年以后的10年内才开始进入退休年龄。1970年到2010年，年轻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减少超过了退休人口的增加，但日本和英国除外（表1.1）。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提高了劳动人口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1.2，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

中国崛起、全球化和东欧重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连同人口

因素，包括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和抚养比的改善、更多女性就业，使得劳动力供给受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正向冲击。1991年到2018年的2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贸易体系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一倍多（图1.1）。

表1.1 年轻人和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单位：%）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年轻人					
1970	28	24	23	24	40
2010	20	17	14	13	19
1970 年到 2010 年的变化	-8	-7	-9	-11	-21
2010	20	17	14	13	19
2019	19	18	14	13	18
2010 年到 2019 年的变化	-1	1	0	0	-1
退休人员					
1970	10	13	24	7	4
2010	13	17	21	22	8
1970 年到 2010 年的变化	3	4	-3	15	4
2010	13	17	21	22	8
2019	16	19	22	28	11
2010 年到 2019 年的变化	3	2	1	6	3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表1.2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单位：%）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1990	56.2	52.0	45.2	46.3	50.1
2010	57.5	55.5	52.8	50.9	48.7
2019	55.8	57.1	55.3	50.2	51.4
1990 年到 2019 年的变化	-0.4	5.1	10.1	3.9	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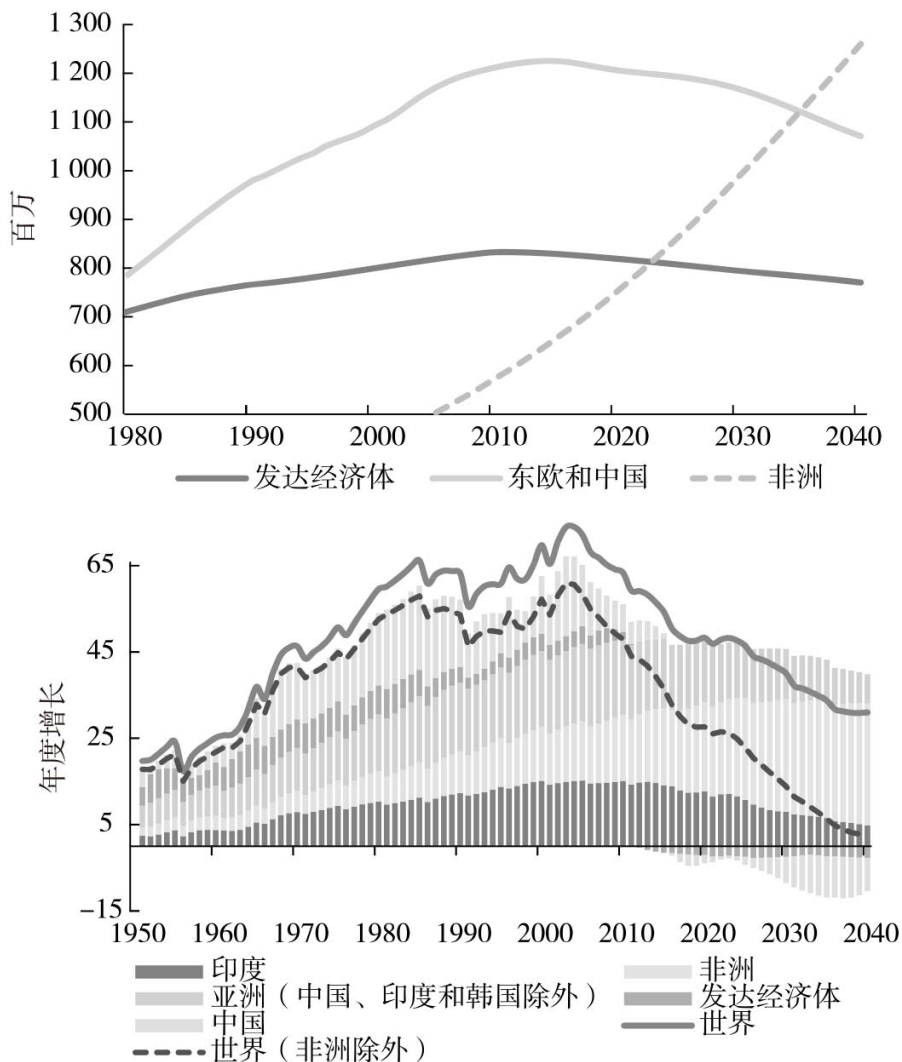


图1.1 老龄化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正在下降，增速正在减缓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1.1.4 对经济的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对全球经济而言非同寻常（第3章）。劳动力供给受到如此正向的冲击，其结果就是劳动力议价能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相对于资本、利润、管理人员和技能劳动力的报酬而言，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下降，经济状况恶化。

私人部门工会成员数量的持续下降，既是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的征兆，也是加深这一问题的原因，这两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共同存在的。图1.2显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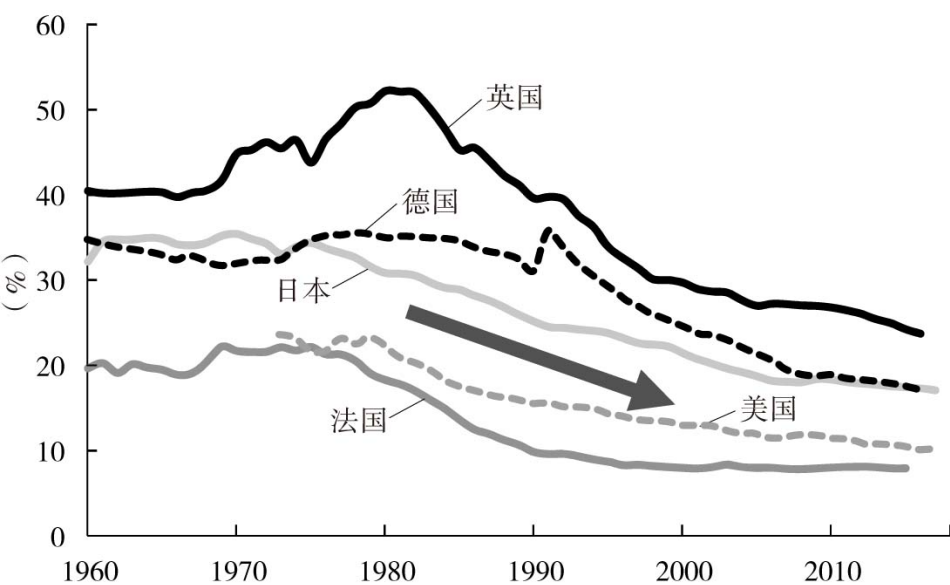


图1.2 几十年来，工会密度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OECD。

因此，通缩的力量如此之强就不足为怪了。28年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耐用制成品价格趋于有规律地下降，尽管最近几年下降幅度有所减少。相比之下，发达市场经济的服务业通胀率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90年代以来趋于稳定，接近2%的水平，尽管在最近几年又略有下降。奥布斯特费尔德（Obstfeld，2019）在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维度”中展示了一张与我们图1.3类似的图。

导致通缩的力量如此强大，使得通胀率在199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大多维持在2%左右（这是央行的政策目标区间），最近已经低于2%。即使采用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基本无法使全球经济再次出现通胀，而这些政策却导致公共部门债务率在和平年代里呈现最大规模、最持久的上升（除德国外，见表1.3和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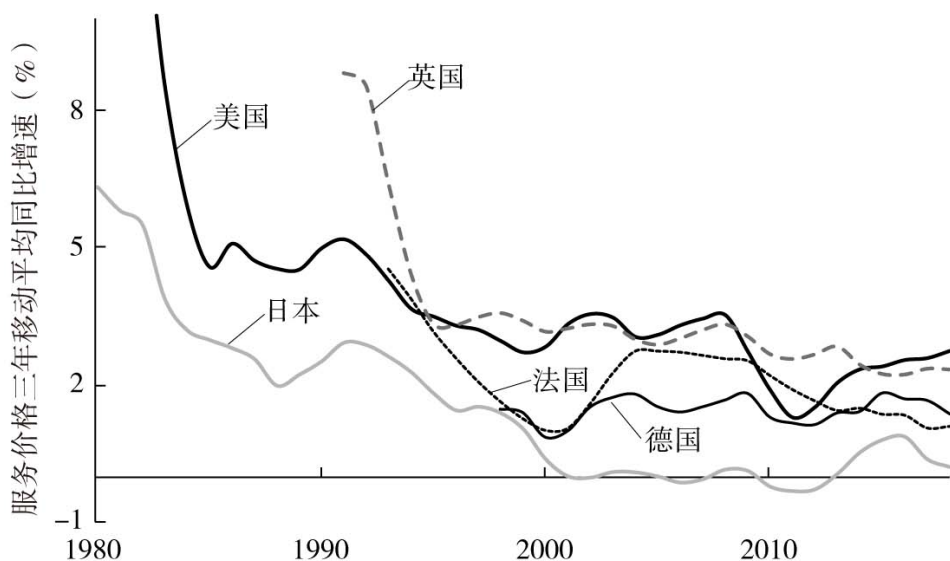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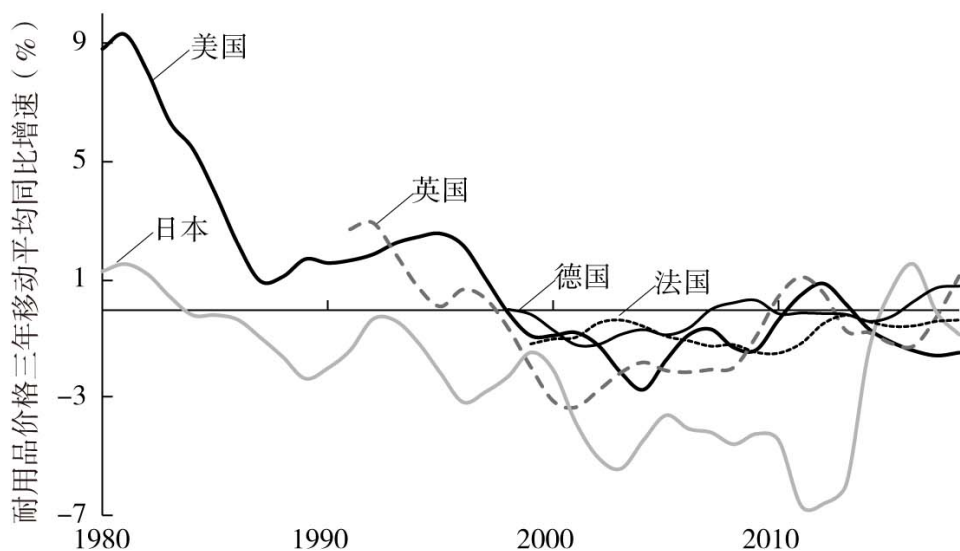


图1.3 发达经济体的通胀：耐用品和服务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LS），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以及各国数据。

表1.3 一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单位：%）

	1990	2000	2010	2017
美国	62.0	53.1	95.7	105.2
英国	27.2	37.0	75.6	87.5
德国	41.0	58.9	80.9	63.9
法国	35.4	58.6	85.1	96.8
日本	64.3	137.9	207.9	237.7
中国	N/A	22.8	33.7	47.0

注：N/A表示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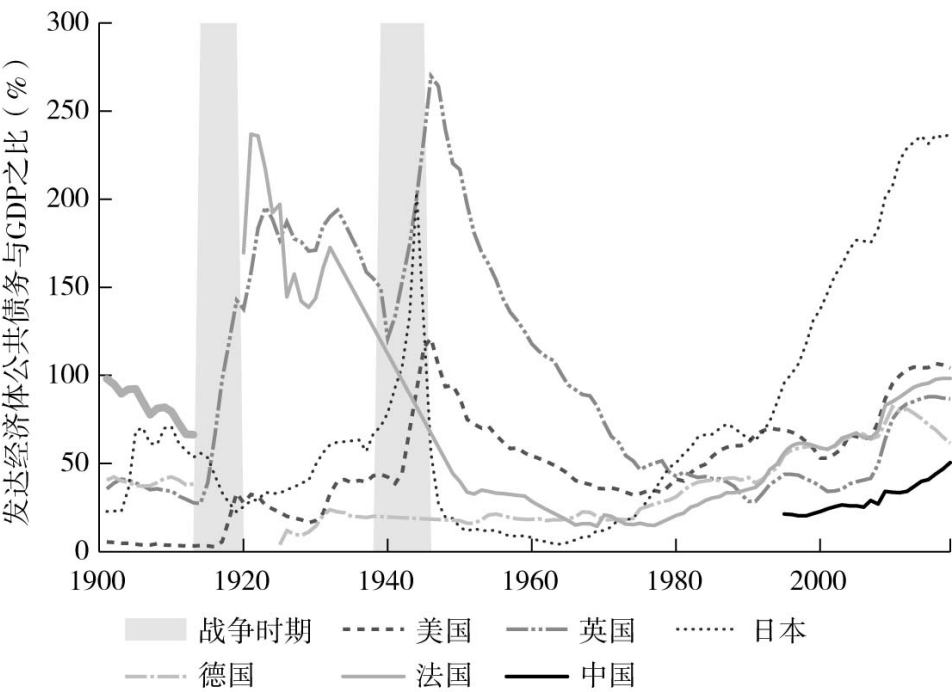


图1.4 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进一步上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人口变化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一些最为突出的影响。至少到2017年或2018年，利率呈稳步下降趋势（图1.5）。由于通胀率

维持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当前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也在下降。利率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虽然这一趋势因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所中断，但一直未变，尤其是在股票价格和房价方面。

1.1.5 对社会的影响：赢家、输家和不平等

在这一过程中，赢家是发达经济体拥有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那些人，以及中国和东欧的工人。因此，正如表1.4所示，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法国工人与波兰工人的工资之比迅速缩小。由于中国人口数倍于美国人口，因此，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的同时，国家之间以及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则得以改善。在大多数国家，用顶部10%与底部90%人口的收入比衡量的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财富不平等也是如此。第7章对此有详细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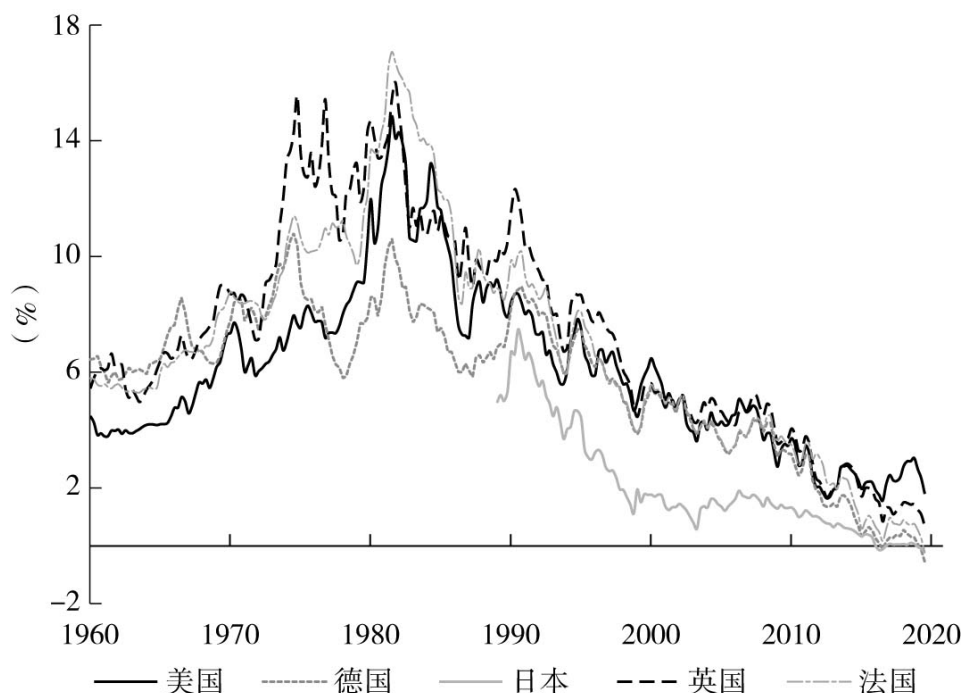


图1.5 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10年期债券收益率

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在许多发达国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缓慢增长，导致更高比例的选民对其政治制度失去信心，并深信精英阶层不再关心他们。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国家的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或孩子们的经济福利在未来几十年内有任何较大改善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暗淡的前景，他们主要归罪于全球化和来自海外的竞争，包括制造业生产的离岸外包；国内来自抢夺低技能工种的外来移民的竞争，以及精英阶层未能成功回应他们的担忧。其结局就是政治民粹主义泛起和经济自由主义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没有政治反弹的原因是，这一时

期国家经济总福利的增加对冲了不断加深的的不平等，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大缓和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总体取得成功的最好的15余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低失业率、稳定的通胀、脱贫人数比以往任何同等时期都要多。正如默文·金(Mervyn King，2003)所说，这是一个经济无通胀且持续扩张的“美好”年代，这自然抵消了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恶化的不平等。

表1.4 工人工资之比：美国/中国，法国/波兰

	美国/中国	法国/波兰
2000	34.6	3.9
2001	30.6	3.3
2002	27.4	3.5
2003	25.0	4.0
2004	22.9	4.2
2005	20.4	3.8
2006	18.1	3.7
2007	15.2	3.5
2008	12.2	3.0
2009	10.8	3.7
2010	9.7	3.3
2011	8.4	3.3
2012	7.5	3.4
2013	6.7	3.4
2014	6.3	3.3
2015	6.0	3.4
2016	5.9	3.4
2017	5.6	3.2
2018	5.1	2.9

资料来源：各国数据。

然而，一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种良性对冲就消失了。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的下降加剧了不平等。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对银行的救助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支撑作用，表明精英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对大多数劳动者日益恶化的境况做出反应。

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及其大规模劳动力正向冲击的影响是全球必须消化的，如果你也同样信服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没有普遍强调这一点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大多数金融、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都只与未来两年（最多三年）走势的预测有关。在这种较短的时间内，以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影响为代表的基本趋势，通常变化缓慢而稳定，无法影响短期周期性预测的主要特征。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因短期冲击及其政策应对，这些基本趋势才有可能成为主导因素。

我们在形成长期观点时，可能出现的失误是往往赋予影响短期预测的因素太大的权重，而像人口这样确实主导长期变化的慢变因素被赋予的权重太小。

1.2 大逆转正在开启：“甜头”变酸

但是，无论研究文献存在何种缺陷，这些长期趋势终究会决定经济的潜在基本面。过去30年，全球化和人口冲击导致非同寻常的通胀下行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的几十年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壮大，人口趋势改善了抚养比。

但是，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事实上，在许多关键方面，过去的趋势将出现重大逆转。

1.2.1 “甜头”正在变酸

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出生率稳步下降。未来30~40年，出生率将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增长会大幅下降。在有的国家，如日本、中国、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减少。同时，随着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会延长，65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数量将较快增长。第3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1.2.2 照顾老年人会大幅增加经济成本

我们对第4章情有独钟。我们试图通过引入人口学交叉学科研究来弥补文献的缺陷，该研究将老龄化的医学视角与急剧增加的身体依赖（physical dependency）和痴呆发病率的经济学研究相结合。该章探讨了痴呆患者的检测、治疗和护理的医疗进展及其成本估算。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疾病不同，痴呆不会缩短寿命。相反，它使患者丧失能力，因而需要大量资源去照顾他们。尽管医学对导致死亡加快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痴呆的治疗方面却几乎没有改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也不太可能在照顾老人这个传统领域带来很大帮助。当然，这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将把医药研

究经费转向智力衰退的治疗。但如果我们尝试用过去的趋势推演未来，则医疗费用、养老院和护理人员的前景令人担心。抚养比的恶化将给财政带来令人担忧的严重影响（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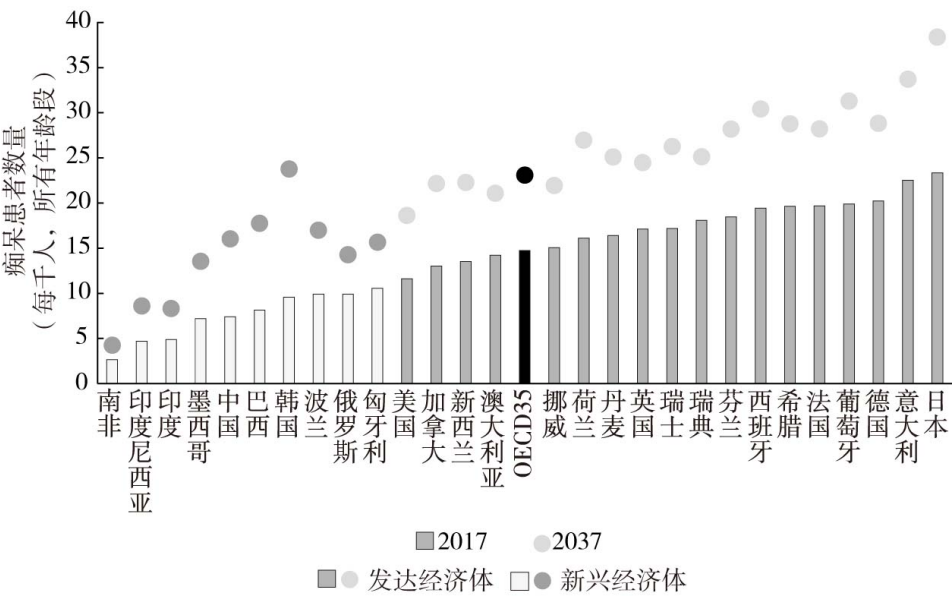


图1.6 发达经济体痴呆患者的数量将急剧上升

资料来源：OECD《2017年健康统计》。

1.2.3 全球化放缓

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放缓将加剧老龄化，就像过去全球化推动抚养比不断下降一样。全球化进程可能因遭遇两股逆风而放缓。

首先，中国不仅面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下降，而且从西部农业部门向东部制造业部门的内部人口迁徙也正在结束（第2章）。此外，随着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更受欢迎，以有利于

增强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人员迁移和资本流动为招牌的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威胁。

其次，虽然制成品和一些服务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目的地，但在照护老人方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发达国家将越来越依赖本国资源，尤其是不断萎缩的本国劳动力资源。

1.2.4 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首先探讨对经济的总体影响（第3章），然后探讨对通胀（第5章）、实际利率（第6章）和不平等（第7章）的影响。第4章扮演双重角色，既分析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也阐明老龄化给人口大逆转带来的严重影响。

那么，对经济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首先，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降低实际产出的增长，除非生产率出现意外的飙升。目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不会回升，即使真的回升，也不会超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年令人失望的缓慢水平（第3章）。

其次，我们坚定地认为，全球从通缩倾向转向严重通胀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大（第5章），为什么？简而言之，抚养比的下降具有通缩效应，因为工人的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否则雇用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言），而被抚养者只消费不生产。全球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则意味着，那些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其作用将超过导致通缩效应的工人。因此，通胀不可避免。

标准的经济学认为，随着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其议价能力将

增强，而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相对占比将再次上升。虽然这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将产生有利影响，但随着单位成本的上升，将引发通胀。由此，工人税负将加重（我们将在下文解释），他们很可能要求增加工资，以确保获得更合意的税后实际工资。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8）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工人不会受到货币幻觉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预期的未来通胀讨价还价，以获得合意的实际工资水平），税收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为解决养老金和医疗费用而必须大幅提高税率，工人是否会为税后实际工资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的，这将进一步加大通胀上行压力。

再次，由于事前（预期）的储蓄和投资行为，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利率，特别是收益率曲线长端利率可能会上升（第6章）。老年人储蓄将减少，这一点没有争议。那些认为实际利率可能会下降或保持在低位的人，显然相信投资将进一步低于储蓄，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相信，投资将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加活跃。首先，住房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老年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新家庭将创造对新住房的需求。其次，企业部门可能会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升生产率。按净值计算，我们认为储蓄降幅可能超过投资，从而推高实际利率。

与通胀的情况一样，金融市场的定价并未反映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名义利率可能上升的情况。

最后，我们相信不平等程度会降低（第7章）。尽管由于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实际已下降，但正如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已经上升到临界水平。对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我们研究了四种解释：(1)皮凯蒂(Piketty，2014)和其他人认为这不可避

免，(2)技术变革，(3)集中度和垄断势力，(4)全球化和人口。我们最不同意第一种观点，其他观点则更有价值。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劳动力激增，因此，它的逆转也将缓解不平等。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活得更久，即使不考虑额外的医疗负担，老年人退休后维持消费的资源从哪里来？有三种主要的选择方案，第6章将详细讨论。

第一个选择是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人们将来应该工作到70多岁。但是，正如本书后面描述的那样，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退休年龄正在显著提高（除了女性的退休年龄正在被提高到与男性一样的水平）。还有相当多的体力劳动职业，当体力下降到一定程度，超过特定年龄继续工作就不合适了，例如消防员、警察、建筑工人等。尽管如此，可能有人会说，务农是一项体力劳动，许多农民一直到70多岁还很活跃。

第二种选择是工人通过增加储蓄，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储蓄的多少既取决于个人对国家养老金的预期，也受限于在职者个人目光的短浅。25岁的人很难想象自己能活到（比如说）85岁，也很难想象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情况，但活得更长的可能性很高。当然，预期的国家养老金慷慨程度越低、退休后活的时间越长，个人储蓄率往往会越高。中国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中国过去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对年轻家庭成员依赖的消失（由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每四个祖父母只有一个孙辈），导致个人储蓄率非常高。但在西方，尽管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大幅扩大，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个人储蓄在增加，以满足平滑终生消费的需要。这也许是由于个人预期政府将提供支持，或者是个人自身短视所致。

更复杂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年龄在推迟。随着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工人为没有孩子支持的退休生活而储蓄的时间会缩短。带来希望的是，孩子本来需要支付的房租可能转变为未来家庭储蓄的一部分，但这是否会实现还有待观察。

第三个渠道是国家向工人征税，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老年人身上，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金。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将如何平衡现有劳动者（包括各种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管理人员、食利者和资本家）的高税收与养老金的慷慨程度。假定税率保持在当前水平不变，那么老年人数量的大幅增加意味着养老金的慷慨程度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当前劳动年龄人群增加的储蓄只能起到部分平衡作用。我们认为这个假定并不正确，尽管在若干有关长期人口结果的其他研究中，这是假设利率在未来几十年保持低位的原因。相反，我们认为更好的假设是，养老金的增长将与GDP的实际增长率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养老金导致的税负将随着老年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而上升。我们倾向于这种假设而不是税率保持不变有几个原因。首先，尽管近年来实际产出增长缓慢，但老年人的养老金总体上得到了保护。其次，老年人是主要的投票群体，他们比年轻人更有可能投票。老年选民在选民中占比的不断上升，将为养老金与实际产出保持一致的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承诺维持或增加养老金常常是民粹主义政党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18年的意大利。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即养老金水平将随着实际GDP的增长而提升，并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成为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那么工人的税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1.3 我们可能错在哪里？

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结论和预测充满争议。人们已非常自然地许多不同维度提出了质疑。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并在第8章到第11章解答这些疑问。

在第8章和第9章中，我们讨论两个经常被提出来反驳我们的论点。其中最突出的论点是在第9章，那就是劳动力的下降已经在日本出现了十多年，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日本的工资水平、通胀或实际利率面临任何上行压力。许多人认为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的样板，因此，如果我们的结论在日本没有体现，则可以怀疑这是否适用于全球经济。其次是在第8章中提到的观点：最近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在失业率与工资，或与价格、通胀之间的关系上（通常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尚未显现工资率随失业率下降而上升的趋势。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20世纪引发工资通胀的水平，但迄今为止工资没有相应上涨的迹象。最近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是平坦的，即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名义工资增长基本停留在低水平上。在许多国家，名义工资增长比2%高不了多少，尽管美国和英国的工资增长率分别在3%和4%左右，但这只发生在劳动力出现明显短缺的部门，如建筑行业。

对于日本，我们认为其劳动力的减少正好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大量增加的时候。日本企业利用海外劳动力蓄水池不断增长的机会，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日本“真正的”可用劳动力供给来自亚洲甚至全球，而不仅仅是日本自身。我们的看法与传统观点相反：考虑到海外的情况，日本企业的经营相当活跃，生产率得以最大化。传统观点则认为，日本受去杠杆的影响，企业部门处于休眠状态。而当今世界面临的情况正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中国和全球大部分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收紧，这种外包转移将更加困难。

更广泛地看，我们认为，劳动力供给遇到的巨大正向冲击给

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议价能力显著下降。这使得通胀开始加速的时候，失业率可能已大幅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用专业术语来说，非加速通胀失业率已显著下降。例如，在大多数国家，私人部门工会会员人数占比急剧下降。但是，随着劳动力再次稀缺，它将恢复魔力。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逆转会以多快、多剧烈的速度出现。

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普及了自然失业率这个概念。但是自然失业率不是恒定的。也许最好的定义是：工人对其生产率提高可能带来的实际工资增长感到满意时的失业水平。由此可以得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越弱，自然失业率就越低。随着劳动力和劳工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自然失业率也在下降。第8章将深入讨论。

劳动力议价能力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以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克鲁格（Krueger，2018）也提出了这一观点（2018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的午餐演讲，题为“对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和货币政策的反思”），另见图1.7。[\[1\]](#)

其他人并没有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而是认为由于有其他缓和因素的作用，实际的影响效果可能要弱很多。当然，我们有关未来三十多年人口因素的逆转将使全球趋势从通缩转向通胀的观点，会受到几个缓和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两个，它们被放在了第10章，包括进一步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以及为了限制税负的增加，未来降低国家养老金的慷慨程度。然而，我们在同一章中还讨论了另一种可能的缓和因素，即全球化非但不会逆转，反而可能会“柳暗花明”。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急剧下降，但印度次大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非洲尤其没有。这将使这些地区的可用劳动力大量增加。就像过去三十多年

产品生产从西方转移到中国，类似的转移有可能再发生吗？产品生产转移到印度次大陆，特别是转移到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刚果等国，其劳动人口增长率在未来几十年会十分显著。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从这些贫穷国家向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富裕国家进一步移民的浪潮。但大规模移民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唯一可行的是把资本和管理带到贫穷国家与其工人相结合，而不是让他们移民到富裕国家。我们认为，尽管全球化有可能出现这种新方向，但可能性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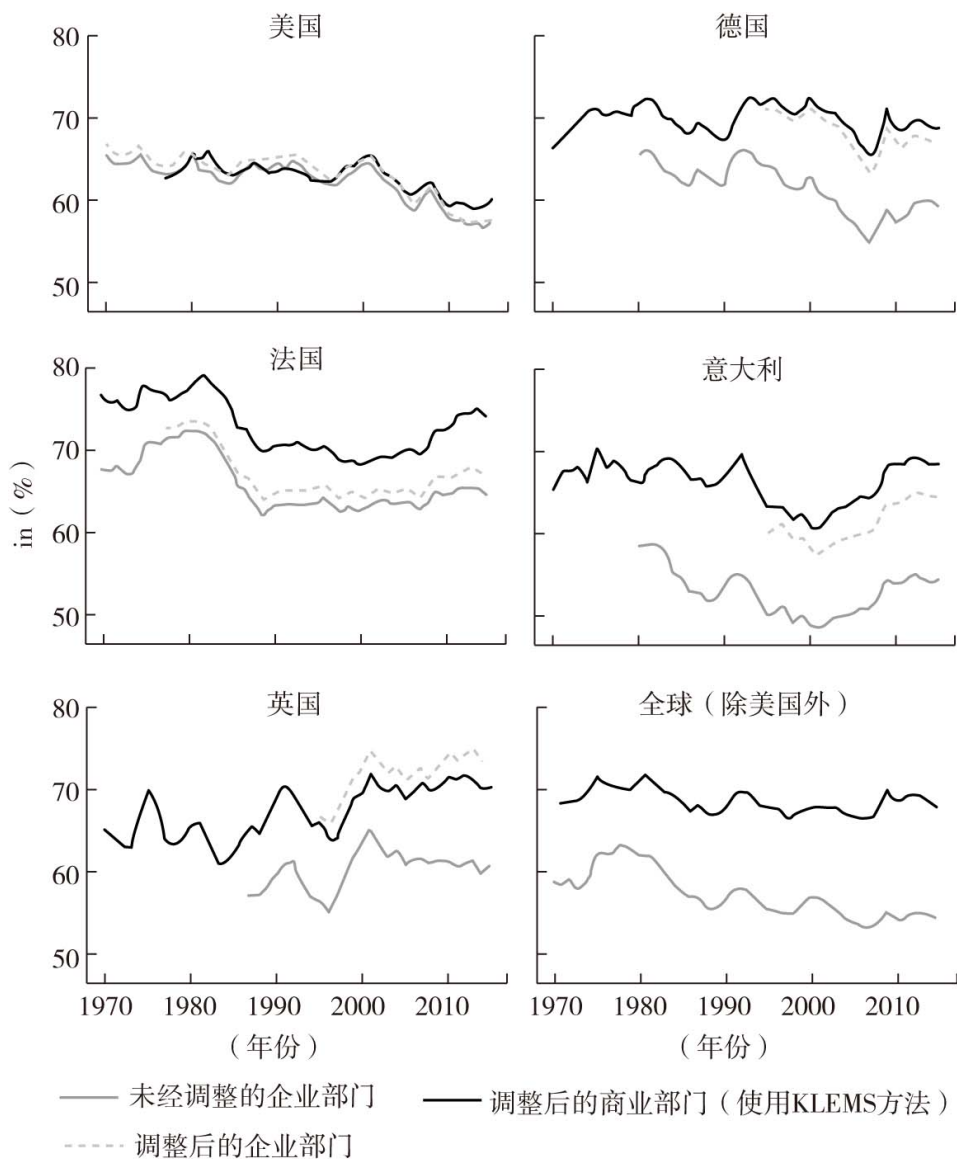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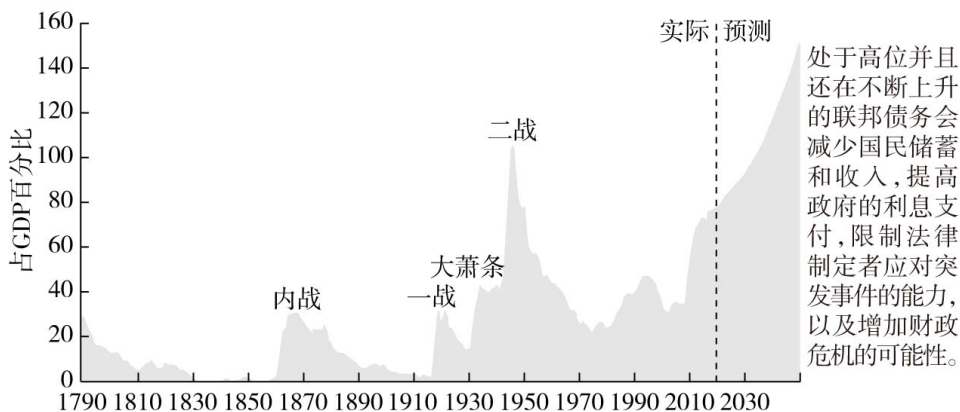
图1.7 1970—2015年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第811号工作人员论文。

我们认为，债务陷阱以及如何摆脱它是潜在和直接的障碍，

这个问题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第11章和第12章将分别讨论这个问题）。受全球金融危机驱动，近几十年来的通缩倾向被强化，导致出台了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名义和实际利率都降至历史上异常低的水平。正如预期的那样，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率急剧上升。近年来主要的例外是银行杠杆率的下降，2007—2008年银行杠杆率的危险水平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而在经历过住房危机的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尽管债务率大幅上升，但人们对杠杆率的关注度不够。这是由于债务率上升与利率下降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关系，所以偿债率并没有随着债务率的上升而增加。第11章对此展开了讨论。

同时，低利率自然导致资产价格高企。有时，人们指责央行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不平等。但是，如果其他政策保持不变，央行再不采取扩张政策，则失业率会更糟，通常对最贫穷人群的伤害最大。因此，总的来说，央行政策可能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有人建议的替代政策是更多地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部门债务率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以往任何和平时期，而且与健康 and 养老金有关的支出如此之多，至少可以预计，未来财政预算状况令人担忧，见图1.8和图1.9。



拓展的基线预测基本按照现行法律，CBO的10年基线预算预测是到2029年，预测延伸到其他长期期限（此处为2049年）时使用了基线预测的大多数概念。

图1.8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据预测也将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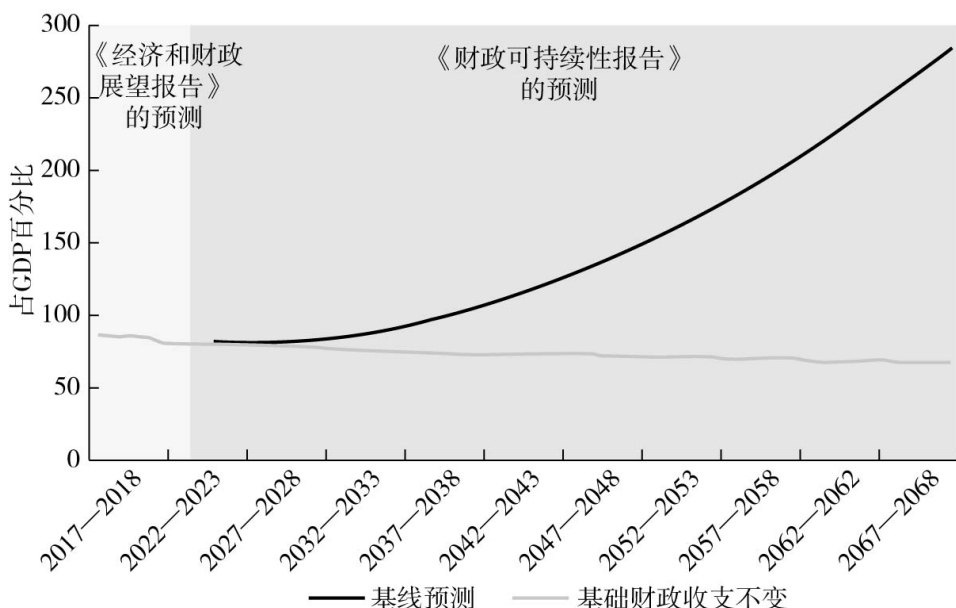


图1.9 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预测

资料来源：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而且，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未来的通胀压力将推高利率，进一步加剧财政问题。

实际上，我们陷入了债务陷阱。债务率如此之高，利率一旦上升，尤其是在低增长时期，可能导致有风险敞口的借款人难以持续经营。其结果是，货币当局如果大幅或迅速提高利率，就难以避免引发另一次衰退的风险，这本身会使一切变得更糟。但如果维持利率不变，由此伴生的流动性洪流仍然具有足够的扩张性（用央行的话说是“适度宽松”），则会使债务率进一步上升。

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债务陷阱？在第12章中，我们将讨论逃离债务陷阱的各种机制，特别是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外的通胀、违约、债务取消、债务重组或从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我们认为，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所有这些选择都存在问题。更何况经济增长充其量也只能维持疲软状态。当然，提高生产率是好事，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增长一直疲软得令人失望，原因尚不清楚。认为存在结构性供给侧政策可以无痛地提高生产率的想法是一个幻想。如果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能帮助提高人均生产率，那就更好了。担心世界上的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少，这很可能没有根据，因为照顾老年人的工作机会就足够多了！

1.3.1 这一切如何能让政策和政策制定者毫发无损？

过去几十年，央行行长一直是财政部长最好的朋友，并获得了如摇滚明星般的地位。财政部长一直在管控持续积累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债务率，好在与此同步的利率下降压低了利息负担。

央行的政策为政客铺平了道路，难怪央行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太多严厉批评，但那些更加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除外，因为它们似乎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

到目前为止，掌舵的一直是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各国央行将持续的通胀下行归功于其实施的通胀目标制。危机过后，各国央行因不能提高通胀率而受到批评，但它们的非常规措施有助于提高资产价格，使投资者和房主从中受益。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过去几十年的通胀下行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人口结构，这使得货币政策在决定通胀走向的有效性方面受到的质疑要大于危机后受到的质疑。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的巨大逆转将在短期内导致通胀和利率攀升。随着公共部门债务率上升到高位，以及人口压力的持续恶化，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目标可能很快就不再一致，并产生冲突。此外，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公共部门债务（包括央行的现金负债）的平均期限大幅缩短，这导致当利率攀升时，财政部的利息负担会更快增加。因此，我们在第13章提出，未来央行独立性面临的威胁比最近更严峻。

本书最后一章（即第14章）不仅回顾和总结了我们的论点，而且阐述和强调了我们与当前主流分析的不同之处。我们认为，有关更长期未来的主流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1]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近几十年来，企业价值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Schwellnus et al., 2018; IMF, 2017），但古铁雷斯和皮东（2019）指出，四个主要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声称，与美国依然明显的下降趋势不同，经过适当的统计调整后，这四个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基本不变。

第2章

中国：一场历史性动员的终结

是全球化成就了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崛起推动了全球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过去五年中，两者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容易回答。

在过去两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创新和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行业协会与吸收最初主要源于国内的创新，中国的劳动力接受了提高效率方面的培训。这种培训和组织文化，让中国以一种发达国家几乎不能与之匹敌的方式吸收国外技术，其政府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更一心一意、更不受约束地提供帮助。

如果有理由认为是中国推动了全球化，则其人口结构可能是关键因素。实际上，自1955年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中国人口的相对规模，而是中国劳动力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速率。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在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几十年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对称的。造成这种不对称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充足且价廉的劳动力，单个工人所能获得的资本和技术有限。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战略，即引导国内和全球资本投资于中国的经济特区。

一系列的摩擦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全球资本很大程度上难

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早期该市场的收益也不足以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全球资本流入了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严格的资本管制使中国在全球保持了比较竞争优势。同样的策略还包括：在国内实行金融抑制政策，以国有银行作为渠道，引导国内储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在过去35年里对全球通胀减速所做的贡献和即将到来的逆转，并在全球视野下理解中国的增长模式。

我们最好从两个角度出发观察中国的历史性动员：一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它们共同作用，让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以空前的速度融入全球经济。

2.1 三幕历史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三个时期及其重要事件，其中最早的是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重要的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当时中国进行了农业改革，接纳民营企业重新进入中国经济，建立经济特区（包括下文将讨论的珠江三角洲），允许外国资本投资。尽管取消了对城市工业的价格管控，但经济仍然由相当低效的国有企业主导。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始于第二阶段，当时关闭了一些中小型甚至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或将其出售给民营部门。这一时期的民营部门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在有关国家利益的关键部门（包括银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仍处于垄断地位。如图2.1所示，这两个阶

段的增长显示了这些战略的成功，在改革的每个新阶段，增长率都飙升至两位数。最近经济出现放缓似乎有些例外，但中国现在的转型更多的是改善增长质量，而非简单地追求增长率的持续上升。

第二阶段的成功还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上。尽管从1978年到2000年逆差急剧增长，但增长大多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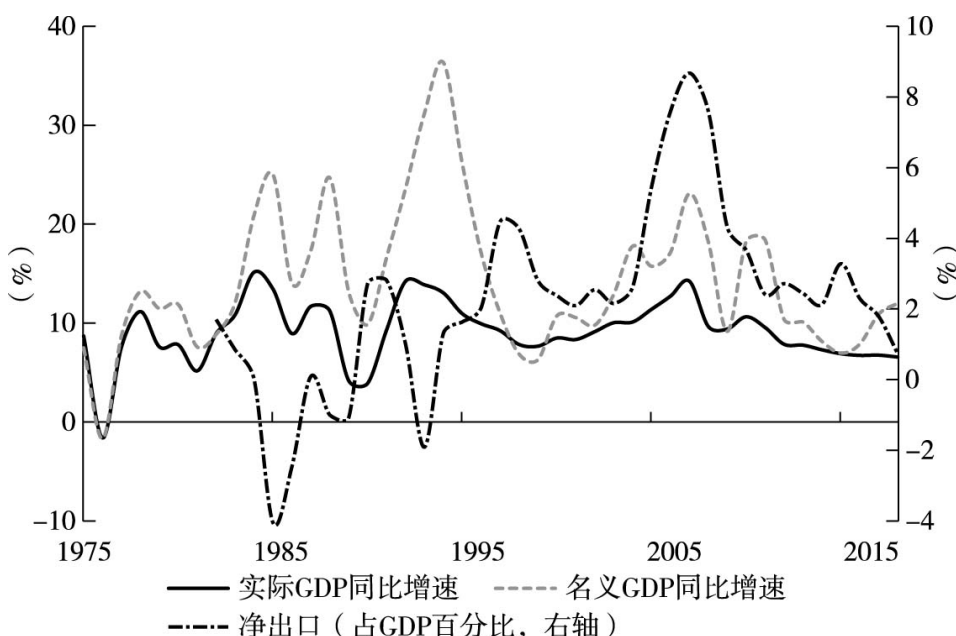


图2.1 改革和出口使得中国经济持续激增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反映了这一模式。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不足5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外商直接投资已接近500亿美元，但就在这10年的最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再次放缓。

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与中国今天的状况惊人地相似。就像现在一样，中国的改革似乎在失去动力。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甚至连增长率本身也普遍被认为高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库存较多。当时和现在一样，其他国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被广泛视为中国“重商主义”的证据，或者中国至少没有同等对待出口市场，并拒绝其他国家进入其国内市场的证据。

总的来说，中国在其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开启对外开放，而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国更为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到90年代末，对于这些改革是否还能持续支撑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担心。尽管国内和对外的许多指标似乎已呈现不平衡，但中国领导人仍聚焦于探索新的增长动力。正是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关注下，中国领导层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组事件是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一系列协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相当于最惠国待遇），都发生在2001年。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全球金融危机这段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的地位最终得以巩固。全球经济的强劲表现、围绕“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和新兴市场的乐观情绪、对全球化好处的赞誉，或多或少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扩张的衍生品。

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中国的加入是有条件的，包括一长串自由化和开放措施（主要由美国制定），以扩大中国的市场准入，提高透明度。宽泛而言，中国必须：

- 在五年内将关税水平降至10%以下，并将部分农产品进口关税基本降为零。

- 减少或消除非关税壁垒。
- 开放电信、银行等重点行业。
- 保护全球知识产权。

拉迪（Lardy，2001）研究了对中国施加条件的严格程度（他发现，这些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也比此后大多数申请的国家都更严格），对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要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稍有质疑。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证明了中国领导层寻求更多进入外国市场的战略是合理的。

20世纪90年代末，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改革正在失去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率从很高水平逐年下降，库存积压令人担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1999年，中国成立四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坏账银行”），以接管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贷款。据有关学者（Ma and Fung, IBS，2002）估算，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3.4万亿元人民币（约4 100亿美元），约占四大银行2001年底未偿贷款余额的42%，堪比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曾经达到的峰值40%~60%。由于这四家银行的贷款总额约占银行业的65%，如果按照这个不良贷款比例对中国整体银行业贷款组合进行估算，则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贷款总额就接近5.75万亿元人民币（略高于2001年GDP的50%）。中国当时无疑面临着与其目前类似的资本配置不当及不良资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领导层不顾烦苛的条件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大致对照上述这些早期条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降低主要关税壁垒方面成效显著。中国还向外国公司开放了许多经济领

域，因为国内缺乏发展这些领域的的能力。然而，对于国内有能力发展且发展良好的领域，非关税壁垒仍旧存在，这通常导致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很难在这些领域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美国则并未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任何新的让步。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向其他成员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这种待遇，中国仍然可以获得成员国身份，但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变得复杂。

皮尔斯和肖特（Pierce and Schott, 2012）论证了21世纪头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意外快速下降”（见图2.2），指出美国取消对中国未来的关税威胁是导致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两人认为，在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消除对中国未来征收关税的威胁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关税这类的壁垒，美国制造业部门就会放弃在本土生产许多商品，转而流向中国。两位作者列出了过去在美国生产、后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他们发现，这些商品的生产线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最多的领域。尽管美国企业的跨境生产和就业再分配导致本土制造业就业下降，但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仍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对于早已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欧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制造业并未出现这种下降。据推测，在更早些时候，欧洲（和其他国家）其实也发生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向中国的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可能要慢得多。

简言之，中国通过加入WTO获得了非对称利益。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凭借最惠国待遇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减少。以上两个方面使得中国劳动力快速与全球资本和全球贸易融合，给正在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受益的世界刮来一股更强劲的顺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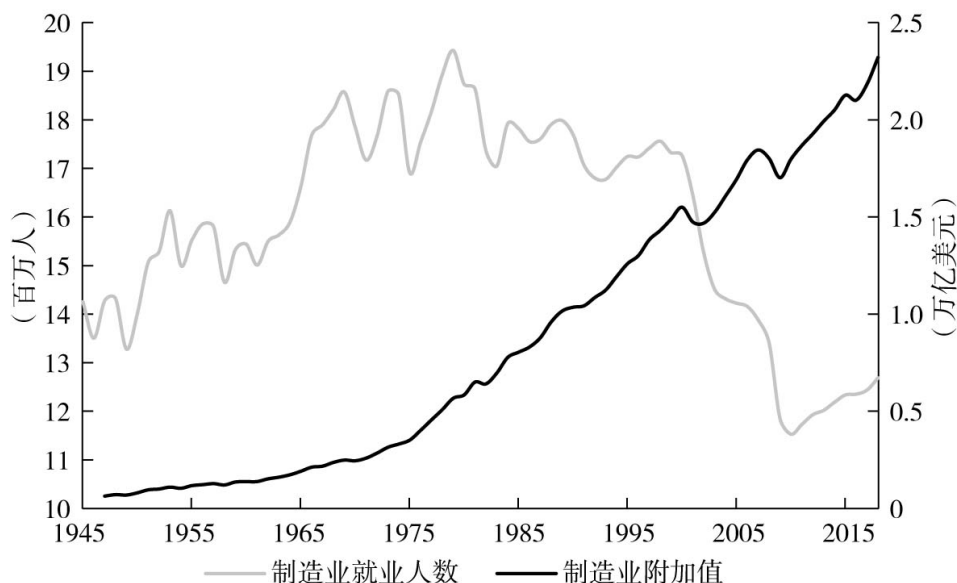


图2.2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意外快速下降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第三个事件是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应对是防止全球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图2.3可以看出，危机后中国的信贷增长了35%。如此规模的政策刺激自然提振了全球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后几年，中国和新兴市场在危机前的所有发展趋势不仅得以保持，甚至不断加速。这些经济体被视为替代发达经济体作为增长引擎的可行选择。从2007年至2012年，新兴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数字计算上还是在实际经济中，都是如此。

然而，2012年标志着中国人口对世界贡献终结的开始。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通常被视为向未来借款。之前的信贷激增导致中国经济提前出现放缓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经济的放缓应该会晚几年出现。2014—2015年，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出现大幅

放缓。中国经济减速，连同新兴市场和全球制造业的同步放缓，共同导致油价从每桶近150美元急剧下跌至2015年的每桶27美元，以及全球贸易的萎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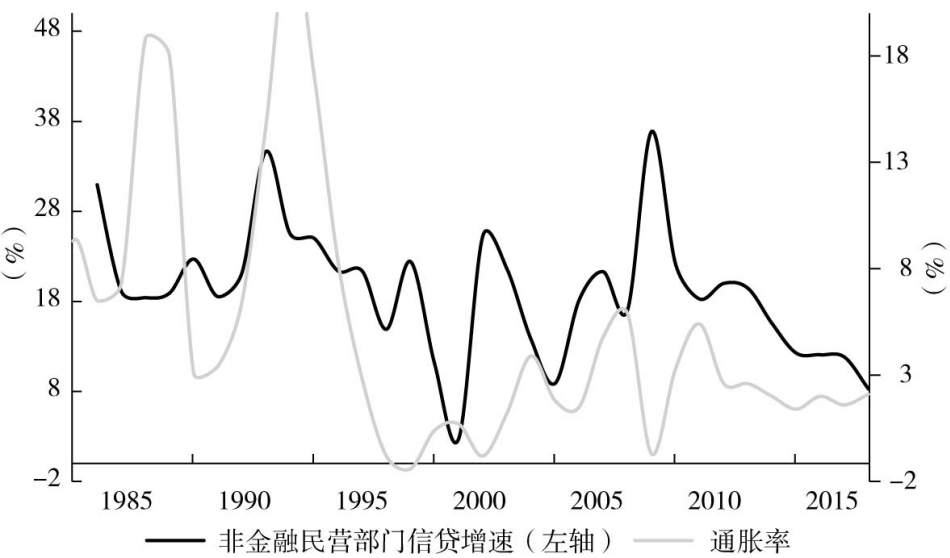


图2.3 20世纪90年代初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信贷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周期性下滑不容忽视，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由此受到的影响却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制造业扮演的角色非常不同。

2.2 经济权力集中，政治权力下放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11）曾指出，“与整体经济不同的是，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呈现出无条件的强趋同。

然而，尽管制造业本身具有强趋同的特性，但由于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所占份额较小，其工业化步伐缓慢，因此，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总体趋同”。[\[1\]](#)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些结果背后的直观认识是，制成品不会因产地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化。无论这些产品在哪里制造，它们通常都是可贸易品，必须符合全球质量标准，且相比其他地区的生产商，成本效益要更好。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在早期发展阶段成功扩大制造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其劳动生产率就会更快、更持续地与全球标准趋同。

几十年来，中国的增长战略旨在引导国内和全球资源加快发展制造业和投资。中国的基本优势在于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偏远农村地区。

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早期阶段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它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在过去10年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战略开始变得分散。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廉价，劳动力昂贵，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常与此相反。为了快速积累资本，资本成本要么下降，要么被故意扭曲。

在中国增长战略的较早阶段，货币政策旨在大幅降低资本成本。在这个阶段，即使民营部门迅速增长，国有企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指导的现代产业政策都是中国增长战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省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特别是那些拥有经济特区的省份。在特区扩大的过程中，这些省份的省长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逐渐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

生产函数中的各种要素都得到了积极的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中国的大动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经济特区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缩影。土地得到了大量补贴，企业得到了建立和有效运营所需的一切帮助。包括电力和配电网在内的基础设施被置于优先地位。

珠江三角洲是这些经济区域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自1978年以来，外资总额的近30%涌入该区域，其年均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水平3%以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还只是乡村风光中的一片村落，而现在世界银行将它描述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域。全区最大的9个城市的人口接近6 000万。

劳动力。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历史性人口迁徙，为城市区域和经济特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人口迁徙的出现不会给城市化地区带来太多负担。户籍制度实质上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张通行证。没有这种资格证书的迁徙者虽然可以在城市地区工作，但他们无法享受大多数城市服务，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因此，迁徙成本并没有转嫁到这些城市中心的管理上。其结果是，只有劳动者本人为找工作而流动，其家庭则继续留在农村，并在那里获得当地的服务。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可能会卖掉他们的土地，以更快的速度迁移到城市地区，这会导致城市劳动力，也许还有农村土地供应出现严重过剩。

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一直缓慢而持续地进行，从而保障了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给。

资本。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资本成本会由于全球因素或国内政策性扭曲而大幅下降，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资本。中国则同时

受益于全球因素和国内政策。几十年来，全球名义和实际利率下降有目共睹，中国还通过三种机制降低了国内资本成本。

首先，中国通过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固定汇率以及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于全球货币环境来应对“不可能三角”难题。“不可能三角”是指一个经济体必须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独立这三个因素中选择其中的两个，三者不能兼得。例如，假设中国将汇率固定（或严格控制汇率水平）。如果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将利率设定在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固定汇率就会吸引中国居民到国外寻求更高的利率。在资本可以迅速自由进出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从而对汇率构成巨大压力，使其无法再维持固定汇率。但如果资本不能自由进出中国，那么汇率可以保持固定，中国央行就可以设定利率，以适应国内增长战略的需要。中国央行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除了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的管制，中国人民银行还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投资基金的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在2001年至2015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干预外汇市场。据官方估计，干预额在2007年达到了接近GDP 18%的峰值，导致央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种持续干预保持了汇率水平的稳定，给中国出口带来巨大优势，贸易顺差由此迅速增加（见图2.4）。

其次，居民在国内面临金融抑制，他们的储蓄先转移到银行，再转移到国有企业。他们支付的隐性税收被用来补贴国有企业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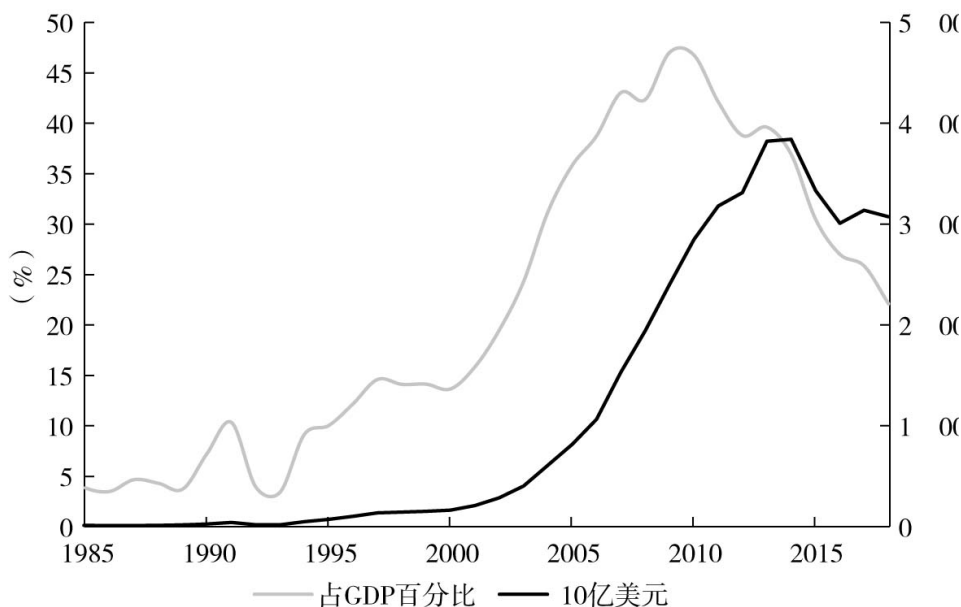


图2.4 中国通过针对资本流入的对冲操作，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由于受到资本管制，中国的利率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有效隔离。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银行业（国有银行主导）的借贷利率，直至今日，它还控制着经济中的信贷流动。

利率被设定在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水平。199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10%，而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均存款利率为-3.35%（年均名义存款利率为1.4%，年均通胀率为4.75%）。由于中国家庭无法通过国内外的金融投资来参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银行存款不但没有免受通胀的侵蚀，实际上还承受了经通胀调整后的两位数的损失。中国家庭在财务上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买房成了家庭的投资选项，其杠杆率因此上升。

换句话说，低利率实际上是对家庭的征税。由于家庭储蓄由银行汇集，再流向国有企业，这种“对家庭的税收”实际上变成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银行是其中的通道。

但是，为什么家庭要继续把他们的钱存放在银行而不是投向其他金融资产呢？家庭保护储蓄的选择本来就非常有限，而且一直都是如此。购买外国资产仍然只是极少数富人的选项，而大众能够获得的股权也极其有限。中国普通家庭实际上只有两种财富储存方式：房子和银行账户。

纳巴（Nabar，2011，IMF）发现城市储蓄与实际存款利率下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银行未能保护家庭储蓄时，家庭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储蓄，以实现一个既定“目标”，如教育支出或购买住房。中国家庭储蓄还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有关，更重要的是，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下，这与为退休而储蓄的人口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再次，正如我们之前论述的，全球资本部分被引导、部分被吸引而至实物资产而非金融资产。获得补贴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廉价劳动力、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水平以及进入发达经济体市场的机会（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都鼓励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

技能。西方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和实物资本，以换取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和对企业有利的营商条件。生产资料内嵌了最新技术，而更新的资本又带来更新的技术。实物资本流动，特别是在制造业的实物资本流动，为中国带来了更新的技术。此外，跨国公司还带来了将劳动力、资本和内嵌于资本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最先进方法。

中国的法规要求，只有外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才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和经营某些关键领域。有学者（Jiang et al., VoxEU, 2018年4月）发现的证据表明，来自外国公司的大量技术不仅转让给了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合作方，而且也转让给了同一行业的其他本土公司。不管这些转让是有意的还是纯粹的“消化吸收”，最终的结果是，外国公司持续向中国本土公司转让技术和技能。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获得了巨大好处。正如前文所述，全球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大多受到限制。相反，实物资本进入中国则受到鼓励。技术转让和信贷便利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得以迅速发展。

所有这一切本应导致中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并反映在投资的激增上。然而，由于中国国内金融抑制导致家庭储蓄率更高，使得中国的总储蓄额较高，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推动国民储蓄高于投资，维持经常账户顺差。

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对流入的外汇资金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冲交易，从而阻止了人民币升值。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购买的美元约相当于GDP的18%。如前所述，由于这些操作，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达到了仅略低于4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硬通货储备是资产，需要投资。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管理下，硬通货储备几乎全部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具有市场深度、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其中，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

因此，全球资本从中国（以及大部分北亚地区）出现“向上”流动，即流向发达经济体，推动形成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宣称的“全球储蓄过剩”。自20世纪80年代抚养比下降以来，发达国家的预期储蓄率超过预期投资率，本身就推动实际均衡利率走低。而来自中国和北亚的过剩储蓄的注入，则推动利率进一步

走低。

传说中无须鼓励消费的美国消费者却因此受益。利率下降提高了包括住房在内的资产价格。前面提到的21世纪头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建筑业就业增长迅猛。同期，随着进口强劲增长，以及中美双边经常账户差额在危机前大幅扩大，为消费激增火上浇油。

各国央行认为从1990年开始实行的通胀目标制取得了成功，这其实是对全球人口趋势的误读。各国央行对控制通胀、市场波动和金融稳定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了缺乏监管的房价大涨。如同大家所说，其他的都已成为历史。

2.3 中国的大逆转

中国给全球增长和全球化带来最大贡献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经常账户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步变为逆差。名义GDP增长率在2012年达到峰值，约为18%，2015年急速下降至略高于5%，之后略有回升。投资增长和房地产业也反映了这种下降，但自那以后一直呈现较为低迷的后危机状态。其硬通货外汇储备存量仍为3万亿美元，但随着经常账户进入逆差区域，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减少（图2.5），反映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为工业区提供似乎永无止境的劳动力供给的国内人口迁徙，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在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无法再通过人口迁徙的方式产生净经济效益（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在资本方面，中国与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相关的行业快速积累资本的阶段已接近尾声。2014—2015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遭遇困难，导致产业整合和削减产能，而非更多的资本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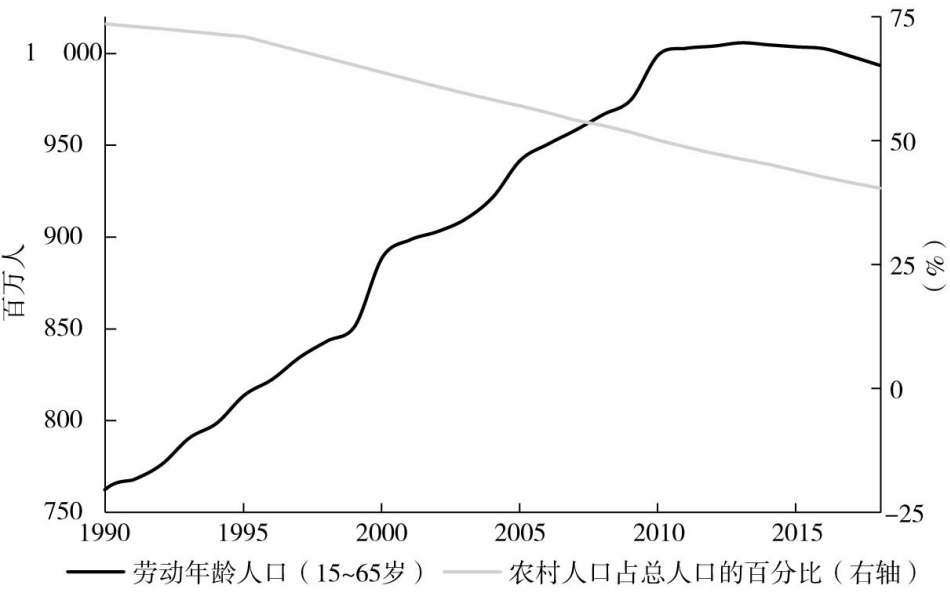


图2.5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减少；目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人口逆转正值社会潮流转向反全球化之际。这意味着全球不再鼓励实物资本持续流入中国。金融资本流量很小，但中国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将促使跟踪指数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约1 50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中国在该指数的占比将仅次于日本，这使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占比相形见绌。然而，仅仅因为这些资本的流入，实物投资不太可能重启增长，原因就在于下面将详细讨论的低投资回报率。

在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双双受限的情况下，中国目前转向了技

术升级，以此作为维持增长和弥补劳动力供给萎缩的手段。由于外国公司不再涌入中国，再加上当前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收购技术的严格审查，过去盛行的技术转让将不复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精神或者不再创新，恰恰相反，中国在电信业（其中相当一部分5G牌照来自华为和小米等公司）、电力行业甚至电动汽车等领域拥有一批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

有两个原因使得相对容易的技术转让途径不复存在。首先，在国内和国外，外国技术都更加难以获得。其次，中国企业的起点已经提高，达到全球标准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巨大提升。因此，创新必须在国内，而且规模要相当大。这看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创新和技术的重视，比较适合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但这不符合政府希望或曾经希望实现的“雁阵”模式（将投资转移到农村地区的战略）。创新自然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这是指那些已经居住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而不是内陆欠发达地区可提供的劳动力。中国未来赖以提高生产率的高技术产业不太可能转移到内地。

从理论上讲，全球受过教育的工人群体至少可部分抵消我们在此提到的一些风险。然而，由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主要制造业经济体都在经历类似的人口转型，因此全球对此类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有可能增加。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已经居住在沿海和城市地区，并靠近生产中心。

事实上，相比于向内寻求增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外向型举措更具前景。更具体地说，中国将向其他经济体出口潜在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主要源于中国国内对基础设施

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倡议不仅由中国大力推动，而且得到了项目途经的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近，人们非常担心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的盈利能力和融资状况。在增长一直乏力的世界，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活动能够使“一带一路”倡议持续下去，对此我们心存疑问。因此，中国通过这项倡议为自己创造增长的能力有限。

资本账户是否会导致经常账户的方向发生改变？如果资本账户持续逆差，那么经常账户就会被推回到顺差状态。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资本账户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居民部门在国内持有太多财富，一直试图增持外国资产。与此同时，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投资也会导致资金持续外流。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将激励全球投资者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这些趋势的强劲程度仍是未知数。

阿加瓦尔等人（Agarwal et al., 2019）认为，只要有10%的中国银行存款用于购买外国资产，就有2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海外市场。然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历史表明，放开居民部门的资本流动是资本流动中最不可预测和最难控制的部分。因此，这一举措通常是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的最后一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融资以及这一倡议能够实施的速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资产回报率一直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的意愿会受到抑制。净资本流动的方向以及经常账户的流向仍然不确定。

伴随着中国经济命运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大约10年前，中国的增长战略从集中促进增长转向经济决策的分散化。战略的分散突出体现为三方面变化：（1）全身心追求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2）放松管制促使民营部门发挥更大

作用，以及（3）通过削减过剩产能和降低杠杆率以提高生产率，改变国有企业的角色。

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正在实现。几个行业的过剩产能已大幅削减（钢铁是典型的例子），债务正慢慢转化为股权（详见第12章），国有企业通过整合提高了盈利能力。民营部门的作用显著增强。过去10年，民营部门贡献了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创新、90%以上的就业。

中国新的增长模式是什么？要看消费、投资和债务的情况。无论如何，中国未来的增长还需要实现更大力度的平衡，而不仅仅只看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的观点与通常的看法不同，中国在经历巨大调整之后，其消费增长和满足消费的服务业正在取代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在因结构调整而增长放缓的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就投资而言，陷入困境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将专注于提高生产率，并表现出危机后多数幸存者的那种自律。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风险要比许多人认为的低很多，但中国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方式未必有利于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来自日本的教训是：“历史从不重演，但常常押韵”，这是马克·吐温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用来比较日本转型与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很恰当。第9章详细追溯了日本的演变过程。我们的目的是想充分说明，日本20世纪90年代早期投资增长的崩溃使得消费增长显著放缓。但是，在每年的消费仅保持略高于零的增长而投资增长为负的情况下，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扩大了。这只是数字上的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再平衡。在那段时间里，日本企业部门通过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以及将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修复，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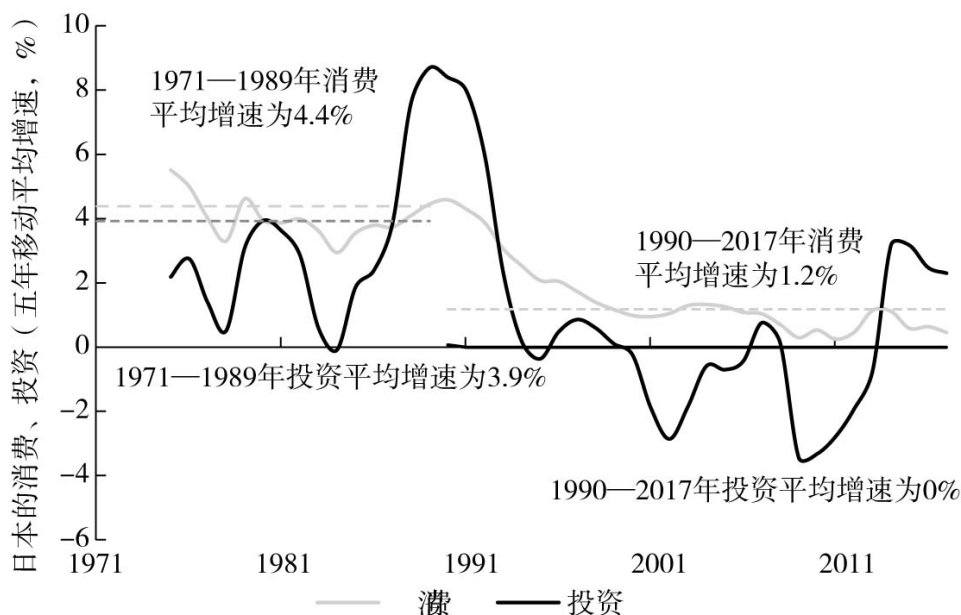


图2.6 如日本一样，中国将会出现数学上的再平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由于日本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和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的原因，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无法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因此，经济的其他方面不得不做出原本不该有的超调。

日本的教训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显然很不同，尤其是因为它相比日本还处于更早期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仍存在大量低效率现象，大量政策领域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生产率，这就是发展中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方式。然而，鉴于劳动力市场无法迅速调整，这一演变在本质上可能与日本有相似性。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将令人失望，而投资方面的经济表现将比许多人想象的好。债务消化过程会成为拖累因素（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解释），但现在以及将来它都不会带来危机。同日本一样，中国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型很可能只是一种数学上的而

不是经济上的再平衡。

制造业部门正在整合，尤其是国有企业。2014—2015年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硬着陆”，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大时刻。制造业，特别是钢铁部门的产能被严格削减，在其他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的产能整合主要以冻结新投资或者兼并的方式来推进。

然而，出于社会因素和政治风险的考虑，大规模裁员不是国有企业的有效选项。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无法承受调整的冲击。例如，尽管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信贷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产能过剩有关，但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不愿将其核销。即使政府可以对银行再注资，大量核销贷款的国有企业很可能再也得不到新的融资，从而不得不裁减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相反，银行对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进行了“永续化”处理，使得这些企业能继续运营。因此，“僵尸”企业在中国的存在，至少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和政治约束的影响。工人没有被大规模裁员，而是选择自愿离开企业去从事城市的零工经济领域的工作，或者只是在国有企业合并后被少量解雇。

由于产能已削减，制造业劳动力的缓慢释放实际上将提高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提高生产率。

然而，消费可能持续低迷。随着劳动力和人口增长出现逆转，总体的增长将放缓。家庭储蓄可能会下降，在缺乏完善和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消费将转向与老龄化和健康有关的服务。变化可能直接发生，也可能通过政府间接发生。政府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可能要求其以补贴方式提供这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的上行风险可能来自更高的工资，以抵消由此产生的对工人的税收，或可能需要通过更高的通胀，以减少名义医疗

保健支出负担。

无论是与医疗保健相关的工资增长或通胀率上升，还是由于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后导致的工资增长，都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能够推动强劲消费周期的可持续工资增长在中国似乎不会出现。制造业投资的急剧下降很可能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即只以非常慢的速度增长。随着工人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他们将转移到劳动力更加密集但生产率增长更慢的部门，正如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发生的那样。这两种变化都将使实际工资增长面临压力。

在中国，债务导致危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它可能限制民营部门未来的信贷增长。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其中相当大部分被用于支持经营业绩不足以偿还债务的资产。在这方面，最强硬的观点可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真是如此吗？难以确定，但中国人民银行从2017年开始采取行动控制影子银行，一直持续到2018年和2019年，即使特朗普总统启动了贸易战并愈演愈烈。尽管2019年后期中国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但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限制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流向房地产业。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坚定地致力于去杠杆化进程，只有在严峻的经济状况加剧、需要一定宽松政策的情况下，才会从这一激进立场上回撤。中国人民银行去杠杆化的努力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继续使人们担心未来某个时点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关于中国债务的传统观点是有误导性的。首先，简单地免除债务在大多数地方并不奏效，但在中国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即使债务是国内持有的，免除债务也很困难，因为债务是一个人的负债，也是另一个人的资产。免除债务有助于债务人，但会冲击

债权人的财富和未来收入。债务危机过后，债务人基于自身经历的教训，不会增加贷款，而债权人会大幅削减支出。其结果，总支出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这就是无法不惜一切代价免除债务的原因（第11章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快速浏览日本的债务状况可以获得大量信息。即使日本国内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务也不能免除，为什么？因为通过家庭造成的“泄漏”（leakage）太大。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几乎全部由国内持有，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养老基金持有。假设日本政府决定免除债务，这将给日本养老基金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造成损害，实质上使之无法偿还对家庭部门的债务。在未来退休收入遭受损失的冲击下，家庭会立即增加储蓄，“节俭悖论”将引发消费崩溃，推动日本进入大萧条。因此，日本免除债务通过家庭支出造成的“泄漏”实在太大了。

在中国，杠杆作用的双方都在同一资产负债表上（即政府资产负债表），因为出现问题的公司债务有很多是由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的。“泄漏”（即通过国有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情况会较少。中国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债务融资。如果银行要免除债务，会造成两个问题：首先，银行将不得不以分步的方式损失资本金，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一点；其次，难以继续向国有企业放贷。国有企业将不得不削减业务，并可能解雇大部分劳动力。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

劳动力的“泄漏”正在得到解决：中国（这里称为“老中国”，Old China）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早在2015年就已“硬着陆”。从那时起，“老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盘整，2018年和2019年，在治理影子银行和遭遇贸易战后，经济活动有所下降。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进入零工经济创造的巨大服务业。一旦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队伍逐渐减少（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但仍需数年时

间才能达到临界水平)，免除债务导致的负面溢出将更少。

其次，债转股正在进行，但债务水平的降低还需假以时日。我们认为债转股是解决杠杆问题的首选方案（见第12章）。免除部分债务可能会使整个债务存量的估值受到质疑，而债转股可以逐步而不是一次性地减记银行资本金。不幸的是，和其他许多建议的“解决方案”一样，这种方式也不能使用太多。放贷机构并不一定喜欢确认贷款损失，所有债权人当然也不会热衷于此。然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债转股执行速度缓慢的原因是这样做会影响贷款和就业的增加。债转股一旦实施，银行就不再需要“永续化”旧贷款，宏观经济稳定将得到改善。然而，围绕国有企业偿付能力的问题将增多，这些企业仍需举债才能继续经营。许多企业可能被迫对经营业务进行重组，并以更快的速度裁员。如果以过激的一次性方式推进，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引发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预计其实施最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再次，积累大量债务的代价是消费信贷和服务业企业信贷的短缺。尽管债转股可以使去杠杆更加平稳，但它们将吞噬银行的资本金，因为通过交换获得的股权价值将被慢慢减记，以反映最初靠债务融资的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变化。随着银行资本金被蚕食，以及通过资本积累能够实现的实际工资增长放缓，银行的放贷能力和意愿都会降低。因此，尽管消费者和民营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他们无法依靠未来的收益在今天实现更快的消费或增长。

总之，中国消费的发展前景要微弱得多，但生产率会有更强劲的反弹（尤其是那些积极减少不良资产和贷款额的国有企业）。债务流失可能会强化这些趋势，这虽然不会引发危机，但伴随银行消化之前的过度信贷，未来的信贷流会受到限制。

对中国而言，我们讨论的内容具有三重含义：

第一，中国将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胀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人口压力和刘易斯拐点意味着通胀压力将成为现实，并让我们措手不及，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第二，与人口老龄化和消除金融抑制有关的储蓄减少，将导致经常账户出现逆差。正如前面讨论的，资本账户可以推动经常账户重新实现顺差，但目前不清楚中国家庭财富的流动、“一带一路”倡议融资和外国在华投资在相互抵消之后的净流动结果是什么。如果没有中国早期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持续的“向上”资本流动，这种曾支持了美国和全球债券收益率（以及资产价格）的资金流动将出现逆转。

第三，中国引入提高生产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国内能够推动的重大创新。由于不再能得益于外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再加上中国企业收购外国技术型公司的政治敏感性，技术的有机改进将更加困难。

[1] Dani Rodrik, 2011.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NBER Working Paper

第3章

人口大逆转及其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3.1 人口“甜头”正缓慢变酸

本章的开头，我们将阐述在全球工业体系中持续了35年左右的人口“甜头”是如何变酸的。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长使得全球劳动力激增，而今中国劳动力规模的不断萎缩正在大幅扭转这一趋势。我们将在第3.2节中讨论这一现象对产出的影响，在第5章中讨论对通胀的影响，在第6章中讨论对利率的影响，在第7章中讨论对不平等的影响。本章数据除另有说明的，均来自联合国人口数据库。

人口“甜头”将迅速消失：全球抚养比正处于拐点，且有预测认为，现在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以及许多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抚养比增速都会上升，尤其是中国和德国（见图3.3）。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在1970—2005年间快速增长，而当前这一增速将显著放缓。在发达经济体和北亚，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大幅放缓将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之比大幅下降同时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趋于稳定，并在许多国家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现在也没有上升的趋势，但人口寿命持续上升（见图3.1和图3.2）。因此，这些经济体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将活得更久，但当地生育水平不足以抵消老龄人口的

激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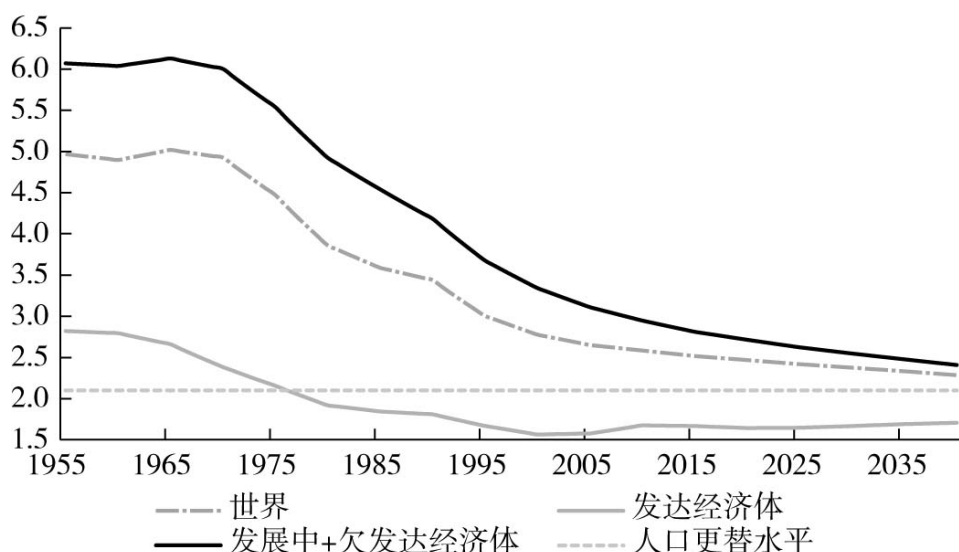


图3.1 新兴市场经济体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正快速下降，发达经济体生育率已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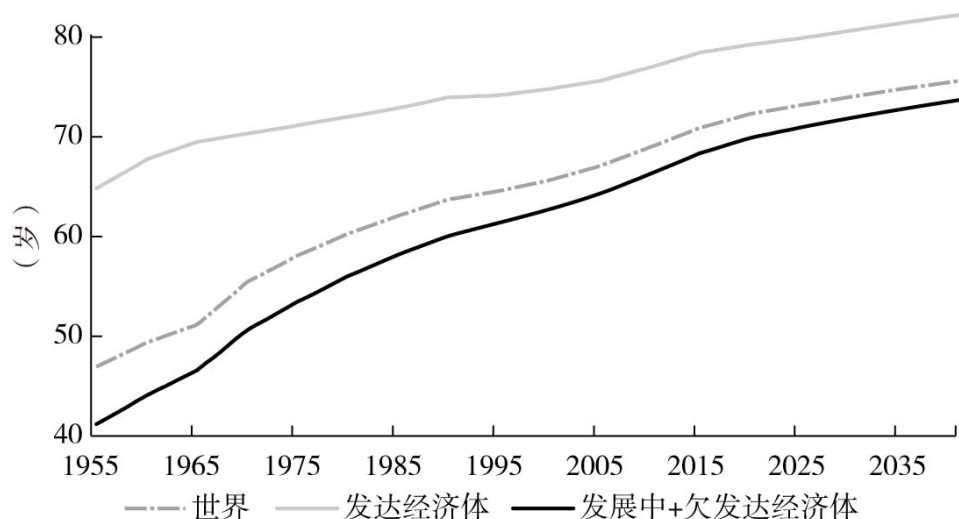


图3.2 全球人口寿命正在延长

注：发达经济体包括高收入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寿命正迅速赶上发达经济体（在一些国家，比如韩国，人口寿命已经赶上发达国家），但国家间的生育率仍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生育率与发达经济体相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亚和东欧以外的经济体仍处在生育率从更高水平稳步下降的过程中。这一现象本身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将比发达经济体来得更晚，它们在全球老龄化浪潮中尚有喘息之机。

因此，发达国家的抚养比必然大幅上升，部分北亚和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上升幅度将更大。众所周知，当前日本人口问题起到逆向作用，另一方面德国抚养比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显著的拖累因素。日本和德国的抚养比于20世纪90年代见底，随后，英美抚养比于2010年出现低点。中国和俄罗斯的抚养比与美国几乎同时见底，随后是韩国。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只有印度的拐点远未显现（见图3.3），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再次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北亚和东欧国家总体抚养比的上升均可归因于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即老年抚养比）的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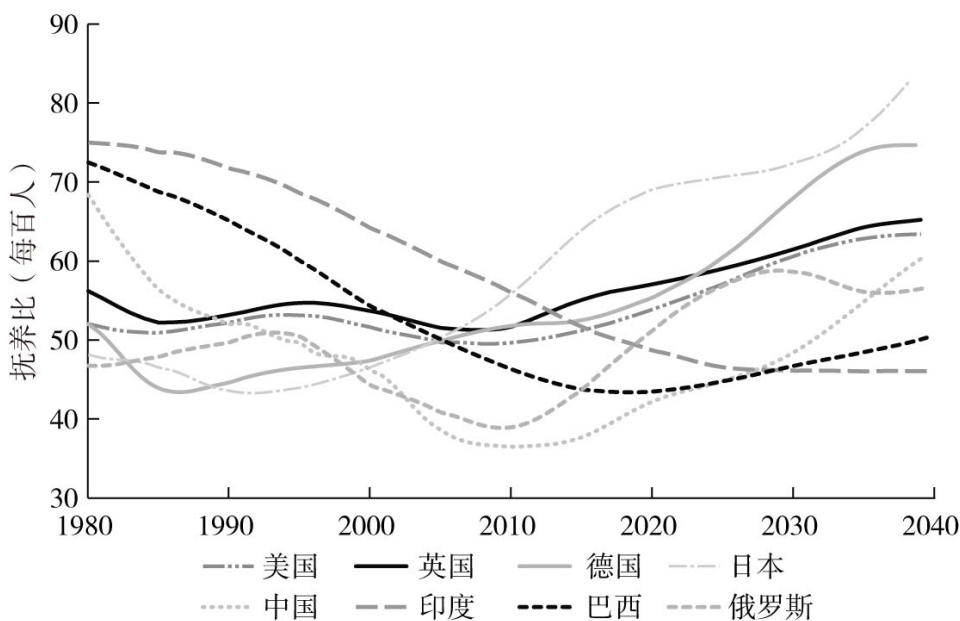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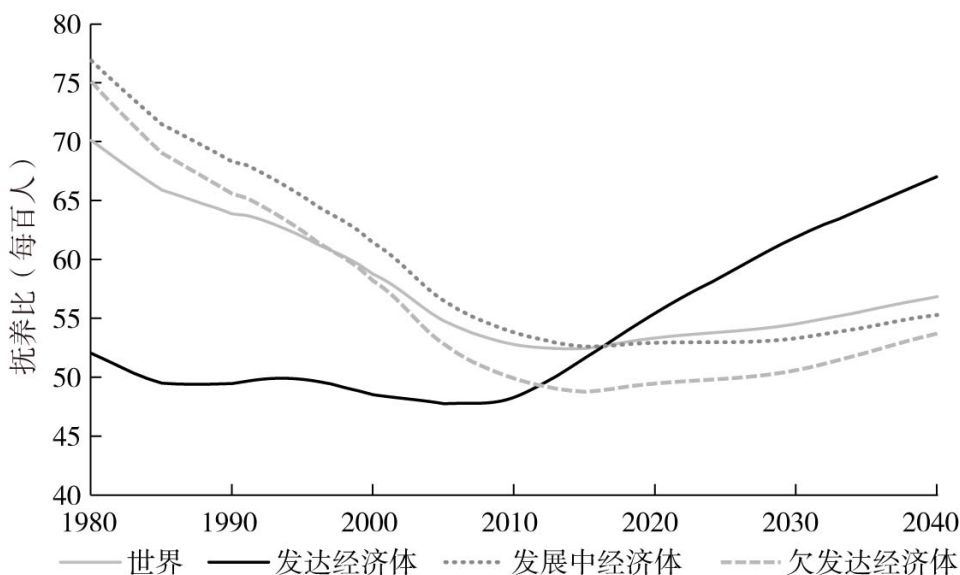


图3.3 发达经济体抚养比普遍上升，而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各异

该报告很好地概述了未来几十年世界将如何变化以及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预测表明，在未来15年内，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增加约4个百分点，即从2015年的12.3%升至2030年的16.5%。与之相对，自2000年至2015年，该比重仅上升了2.3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惊人增长：在2015年到2030年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从9.01亿增至14亿，增幅达56%。到2050年，全球老龄人口规模预计较2015年翻倍，达到近21亿。2015年，全球将有1/8的人口年逾60岁。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6。到21世纪中叶，这一比重将升至1/5。

年龄最大的人口规模增长最快：全球范围内，年龄在80岁及以上人口（即年龄最大的人口）的规模的增速甚至超过了总体老龄人口的增速。预测显示，到2050年，80岁及以上人口的规模将达到4.34亿，较2015年（当时有1.25亿80岁及以上人口）翻了3倍多。

据预测，全球80岁及以上人口占老龄人口之比将从2015年的14%上升到2050年的20%以上。

老年人之家：世界上什么地方的人口老龄化最快？从2015年到203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增长71%，其次是亚洲（66%）、非洲（64%）、大洋洲（47%）、北美洲（41%）和欧洲（23%）。

就相对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日本是世界上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2015年已有33%的

人口年龄在60岁及以上，其次是德国（28%）、意大利（28%）和芬兰（27%）。

至2030年，预计老年人口将占欧洲和北美洲人口的25%以上，占大洋洲人口的20%，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比为17%，非洲占比为6%。

在2050年，全世界44%的人口将生活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中（至少20%的人口年龄在60岁及以上），1/4的人口将生活在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的国家里。

3.2 人口周期：地域特征统一，经济特征失衡

世界银行为识别人口周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按照人口红利期是否结束来划分经济体。依此划分的四类经济体包括：未进入人口红利期（pre-dividend）、人口红利早期（early-dividend）、人口红利晚期（late-dividend）和后人口红利期（post-dividend），它们展现了人口转型下的全球经济图景。

经济体之间生育率和人口寿命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各自所处的人口周期阶段。生育率高而人口寿命短的国家尚未获得人口红利。按照其他地区的模式，可预见的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将为这些国家的未来创造人口红利。相较而言，处于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其生育率快速下降并维持在低点，人口寿命则逼近全球峰值（见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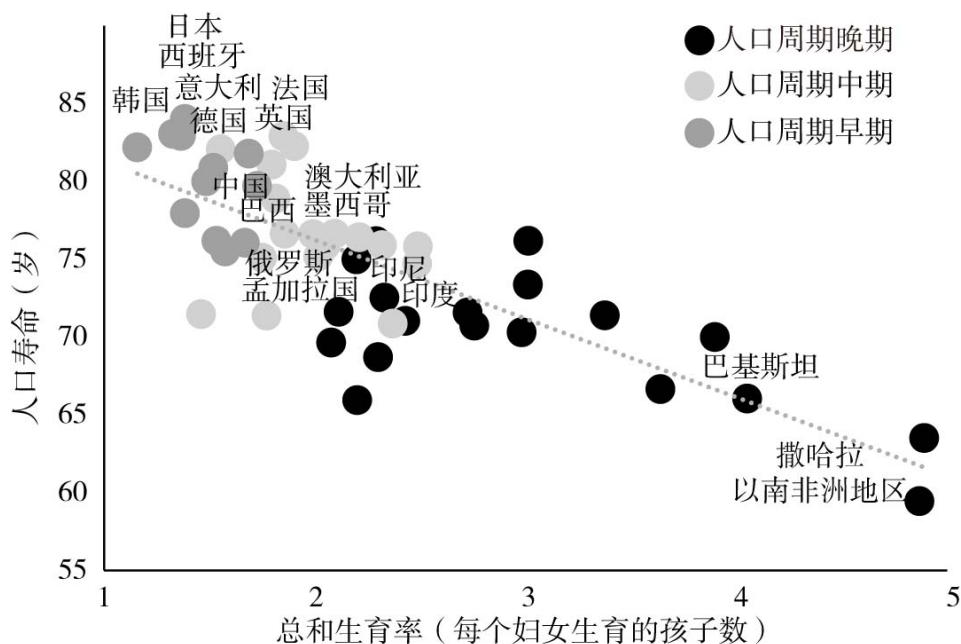


图3.4 预期寿命和人口红利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乍看之下，当前不同国家广泛分布于各个人口周期阶段，这似乎为全球人口状况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事实上，2040年世界人口增速将高于发达经济体或我们定义的新兴经济体，因为据联合国预测，那些被定义为最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大多数位于非洲）的人口将在这一时期维持高增长。

我们将各个国家分为三类（有时也单独区分中国和印度）：“早期”（仍能享受人口红利），“中期”（人口问题显现但未激化）和“后期”（老龄化明显）。表3.1列出了这三类国家。

这三类国家在人口规模（50，25，25）上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参见表3.2以及图3.5和图3.6）。不幸的是，当前人口相对均匀的分布掩盖了人口周期中各经济体在经济实力分布上的不平

衡。

表3.1 按人口周期阶段划分的国家/地区分组

分组	
早期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墨西哥、埃及、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尼泊尔、也门、缅甸、菲律宾、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
中期	美国、巴西、越南、土耳其、伊朗、哥伦比亚、加拿大、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秘鲁、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英国、法国、摩洛哥、印度尼西亚
晚期	中国、日本、德国、泰国、意大利、韩国、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智利、荷兰

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包含约50个经济体。

表3.2 早期、中期、晚期国家的人口数（2019年）（单位：百万）

早期	3 540	49%
中期	1 666	23%
晚期	1 966	27%
总计	7 172	

注：样本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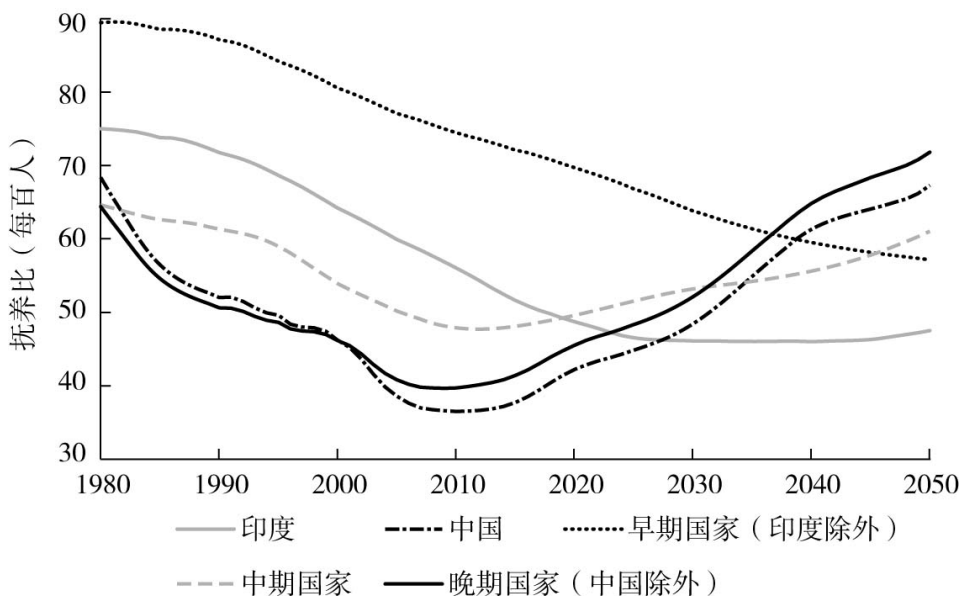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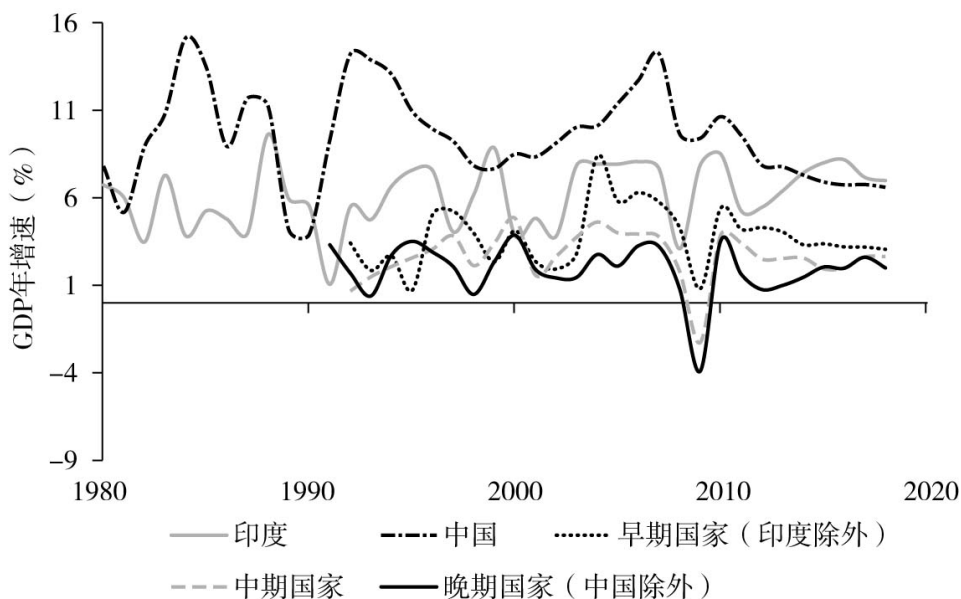


图3.5 人口周期各阶段的抚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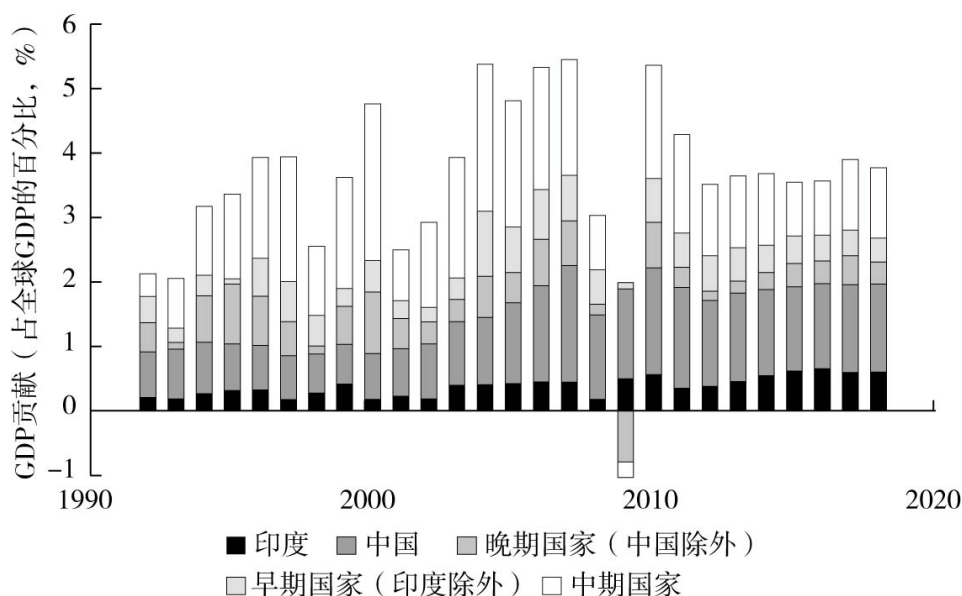


图3.6 人口周期各阶段GDP占全球GDP比重

大多数老龄化经济体（即处于后人口红利期和人口红利晚期）都较为富裕。如表3.3所示，经济实力主要掌握在正在老龄化且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的国家手中。

表3.3 处在人口周期不同阶段的国家的增长占比

2012—2018 年	GDP 增速 (%)	对全球 GDP 增长的 贡献 (%)	占全球 GDP 比重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早期经济体	4.9	27	21
中期经济体	2.4	28	41
晚期经济体	4.5	45	38

最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经济体不仅在全球GDP份额中占主导地位，过去15年全球经济增长也主要来源于它们。即使我们将

时间拉长至35年，情况也没有明显变化。

准确地讲，主导全球增长的经济体面临最严峻的人口挑战，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危险。这意味着，即使世界整体仍处于巨大的人口增长顺风期，但过去35年来领导全球增长的经济体却在人口逆风中首当其冲。换句话说，若要使人口问题仅小幅冲击全球经济，那么过去几十年对全球增长贡献很小的那些经济体在未来必须做得更多。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人担心的将给发达经济体带来冲击的技术进步却是增长必需的。否则，人口问题将给全球增长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

3.3 产出增长

产出增长率天然取决于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第3.1节中所述，在许多情况下，印度或非洲以外的潜在劳动人口增长率注定会急剧下降。除非潜在参与劳动的人口（包括继续工作的退休人员）出现急剧上升，或者人均生产率出现抵消性的增长，否则产出增速必然下跌。尽管人口变迁才刚刚开始，当前的增长率已经令人失望。

首先，我们回顾劳动参与率，然后考虑未来生产率的变化轨迹。莫洪和拉戈（Mojon and Ragot, IBS, 2019）研究了许多欧洲国家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如何提高的（尽管不如美国和日本提高的幅度大），以及几乎所有这些国家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是如何构成总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高度相关的。

他们的研究结论之一是，这个年龄段（55~64岁）的劳动参与者比年轻人的工资弹性更高，这是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变平坦

的一个因素，我们将在第8章中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如图3.7所示，将劳动参与率提高到65%以上可能要比从40%提高到65%困难得多。若果真如此，那么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提高必须来自65岁以上的人群。在图3.7中，我们给出了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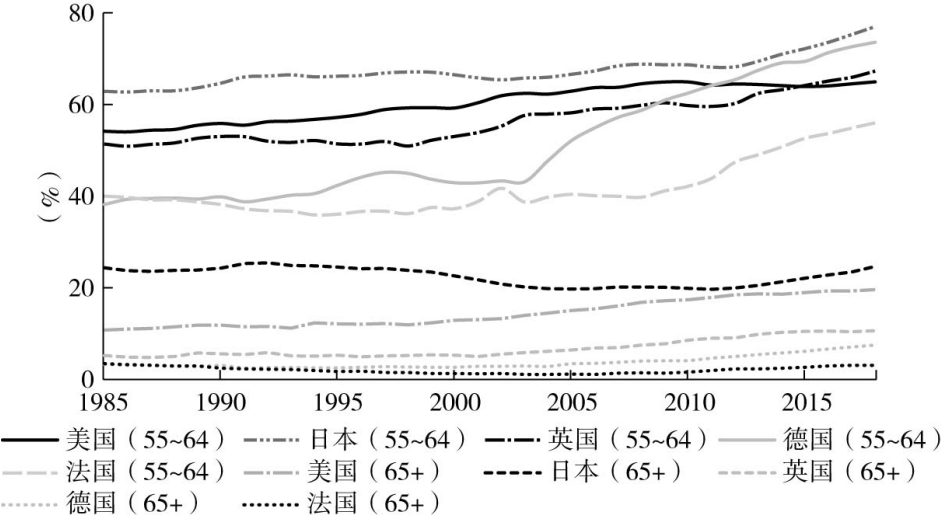


图3.7 发达国家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已大幅上升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老年人可以做或想要做的工作（参见 Maestas and Jetsupphasuk, 2019）。尽管几乎不能指望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和大多数体育运动），但英国农民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而与大多数工作相比，耕种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图3.8显示了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与国家养老金慷慨程度即养老金替代率之间的关系。有关美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讨论，参见伯顿（Button, 2019）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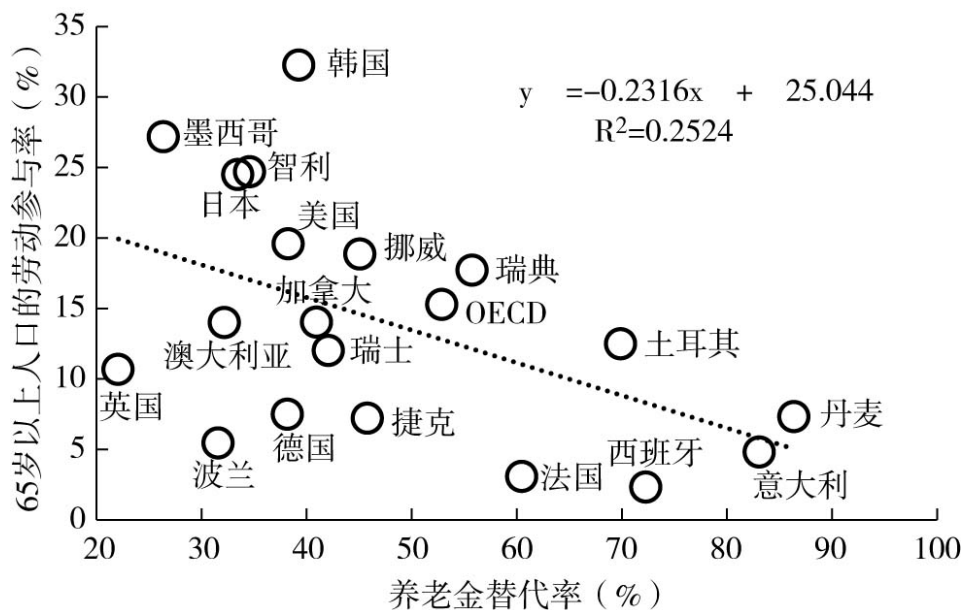


图3.8 养老金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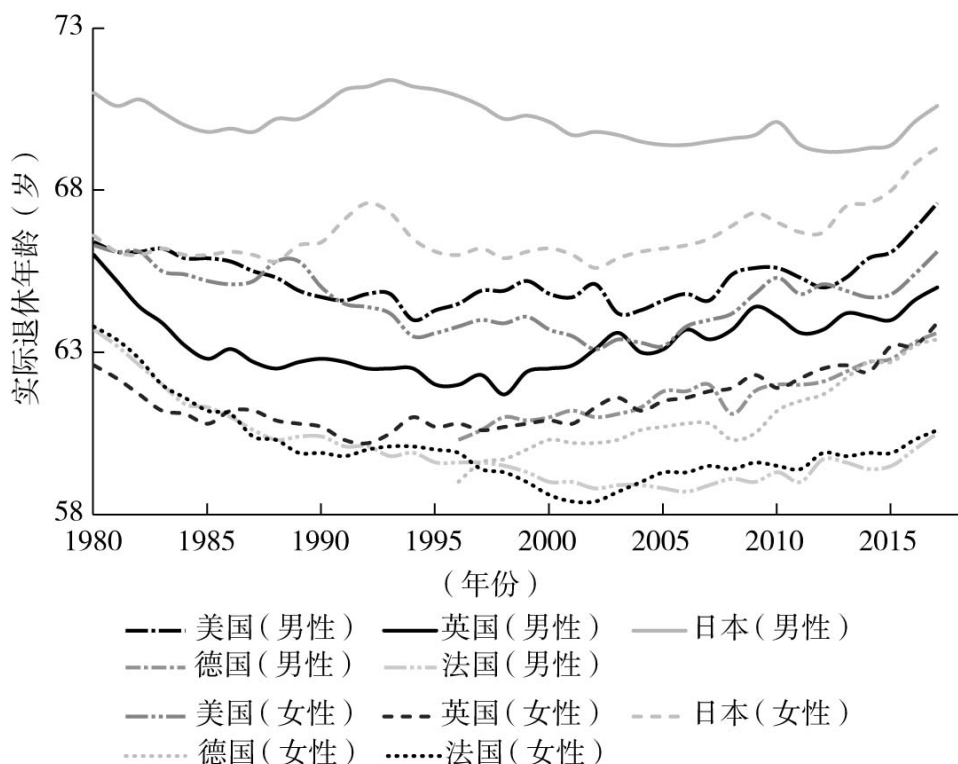


图3.9 实际退休年龄上升慢于寿命延长

从图3.9可以很自然地看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与养老金的慷慨程度负相关。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可以抵补增长中可能减少的部分。但实际退休年龄只是最近才开始勉强提高，而且通常不及预期寿命提高的多（见图3.9）。

无论怎样，我们可以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一路径？年龄较大的人生产率较低，这一看法一度被当作公理。确实，许多人用“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来部分解释近期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趋势。但是，第10章中更详细的讨论指出，这种观点正在被重新考量。即使生产率实际没有受到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高的拖累，也可能受到晋升的影响。如果我们给老人加压，使之继续工作，会

不会给年轻人造成晋升障碍？其次，宽裕的退休待遇被视为代际平等和公平的一部分。最后，老年人通常比年轻人有更高的投票倾向，设法将他们认为是正当的利益拿走在政治上是冒险之举。普京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掌控一向强势，但即使他也被迫放弃了削减养老金福利的计划（BBC News，2018年8月29日）。另请参见博尔舍-苏潘等人（Börsch-Supan et al.，2014）关于反对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研究。此外，马克龙2019年底推出法国退休和养老金改革亦面临困难。

许多国家都计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很早以前就应该完成的，尤其是对于某些情况下的公务员来说，巴西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迫使65岁以上（不久之后可能到70岁以上）人口重返正规带薪工作（可能）引起生产率下降和政治敌意加剧，这使我们怀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或许只能抵消一小部分正常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因此，如果要维持（更不用说提高）当前令人失望的产出增长趋势，我们需要显著提高工人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时，新冠疫情前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加上产出的缓慢增长，表明人均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令人沮丧。为了维持总体增长率，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必须强劲复苏。

这看似非常困难，但仍有些许希望。首先，如表3.4所示，近年来日本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多数发达国家，而其劳动力规模已连续10年下降。寻找和雇用有资质的工人越难，为保持竞争力，雇主越不得不提高他们能找到并持续雇用的工人的生产率；我们将在第5章中再次讨论这一点。

表3.4 每工时生产的GDP的增长率（单位：%）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2010	2.8	2.5	2.2	1.3	3.3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2010	2.8	2.5	2.2	1.3	3.3
2011	0.2	2.1	0.3	0.9	0.2
2012	0.3	0.6	-0.5	0.2	0.9
2013	0.4	0.8	0.3	1.4	2.1
2014	0.4	1.0	0.2	1.0	0.1
2015	0.8	0.6	1.7	0.8	1.5
2016	0.3	1.4	-0.6	0.1	0.3
2017	1.0	0.9	0.8	1.0	0.9
相对于2010年的变化	6.2	10.3	4.3	6.7	9.6

资料来源：OECD。

其次，过去几十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可能是由于技术变革导致很多工作岗位对工人的要求从中等技能转变为了低技能（正如随后在第7章中讨论的那样），以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这种技术变革趋势可能会持续，也可能不会持续，同时，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强的社会和政治阻力。最后，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对服务消费（例如护理和药品）的上升。而与制造业相比，提高这类商品的生产率更难（Cravino et al., 2019）。

因此，合理的预期应该是，未来几十年，印度和非洲以外的产出增速将显著放缓，可能降至每年1%左右。日本是这方面的先驱。自1999年以来，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速为0.87%。如果其他发达国家能够在接下来的20年（即到2040年）达到这一记录，则已属表现良好。

第4章

依赖性、痴呆和护理危机

4.1 引言

考虑老龄化对健康的影响时，第3章谈到了未来抚养比不断上升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将出现痴呆以及诸如帕金森病和关节炎等造成依赖性的病症（多症并发的现象时有发生），[\[1\]](#)并且需要护理。护理包括个人情感支持，可以在体能活动和看护方面起一定支持作用的机器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所以，更高比例的劳动力将投入护理老人的工作，他们可能是老人的家人或者护工。百健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Aducanumab）以及中国的同类药物

（Oligomannate）给了治疗痴呆的专业人士保持谨慎乐观的理由，但是就发现、诊断和治疗以及政策而论，这一领域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其他医疗领域（比如髋关节置换术和白内障手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医疗卫生领域把依赖性定义为需要外部护理和帮助，而在宏观经济领域，依赖性（抚养）一词只适用于某些具体年龄段人群，与体能状况无关。

本章将分三部分讨论抚养比和痴呆发病率方面令人担忧的预测。第4.3节和第4.4节将分别预估由此引发的成本和宏观经济后果。

4.2 老龄化的危害

早发性痴呆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正常活动的难度会不断提高，因此需要护理和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也是最为人所知的一种痴呆。痴呆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加会呈指数上升。65岁前发病率非常低，但是85岁及以上发病率比75岁或者E型载脂蛋白呈阳性的人群要高四倍。75岁年龄门槛和E型载脂蛋白呈阳性是名列第二、第三的风险因素（Kivipelto et al., 2006; Norton et al., 2014）。除了痴呆以外，其他造成依赖性的疾病，比如关节炎和帕金森病，发病率也与年龄正相关。金斯顿等人（2018b）的论文中提供了以下表格（见表4.1），将依赖性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给出了依赖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依赖性人口的数量。[\[2\]](#)

虽然老龄化是长期趋势，但我们的社会现在还相对年轻，而且也很了解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情况。这两种病症的死亡相对较早，甚至相当迅速，病重时期很少会延续多年，但是痴呆对患者及其看护者的影响经常是长期的。我们大多数人和我们的社会，对老龄化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概念，也许这就是人们在治疗痴呆和帕金森病方面还未出现医学奇迹时，对预期寿命的持续提升乐观有余而谨慎不足的原因。

表4.1 2015年英国老年人口中依赖性人口占比

		总人口 (千人)	依赖性人口 数量 (千人)	依赖性 人口占比 (%)
轻度老年	65 ~ 75 岁	5 276	1 621	30
中度老年	75 ~ 85 岁	3 130	1 539	49
重度老年	85 岁以上	1 318	1 023	78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Patterson，2018，第41页）指出：

鸟羽宪治（Kenji Toba）告诉我：“日本现在出生的婴儿中1/3将活到100岁。日本百岁老人患痴呆的风险高达99%。所有人都必须意识到，这个病影响的不仅是‘别人’，而是‘所有人’。认知退化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

如果活到100岁（Gratton and Scott，2016; Scott，2019）仅仅意味着要忍受更多年痴呆，也许并不是好事。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也许痴呆发病率并没有高达99%，有些人的痴呆是可以避免的。该组织最新发起的一项运动发现了一些可以降低痴呆发病率的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因素。但由于公众对痴呆带来的问题认知度不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有限，这一运动面临较大阻碍。2019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调查了155个国家大约7万人口，有如下发现：（1）1/4的人认为痴呆无法预防；（2）2/3的人认为痴呆是衰老过程的正常现象；（3）更让人担心的是，62%的医生也持相同的看法。所以，就算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有重要裨益，人们也严重怀疑建议的有效性，大力采用建议的意愿很低。早发现对癌症

患者的存活率仍然是最关键的。而对痴呆这种慢性病来说，现在在很多研究试图用生物指标来实现早发现，但迄今为止，成果寥寥。就算可以做到早发现，能否减缓该病恶化的速度还非常不确定，完全治愈更是遥遥无期。

数据里少有的一条好消息是，美国、英国、瑞典和荷兰与年龄直接相关的痴呆发病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势头预计可以保持。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 (Livingston et al., The Lancet Commission,2017)。英国发病率的下降几乎完全集中在65 ~ 75岁的男性 (kingston et al.,2018b)。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戒烟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3]除此之外，发病率基本保持不变，但重度依赖性人群的发病率预计增速将超过中度依赖性人群。表4.2（来自Kingston et al.，2018）给出了定义。

虽然在家里照顾轻度或者中度依赖性的痴呆患者是可能的，但是要照顾高依赖性的痴呆患者非常困难。按照金斯顿的分类数据（表4.2），表4.3预测了英国2035年的依赖性状况，包括各种依赖性人群占比以及相对于2015年的变化。

表4.2 基于需求区间的依赖性分类

	CFAS II	ELSA
高依赖性	MMSE 分数介于 0 ~ 9，或者上厕所、离开椅子或床需要帮助，或者失禁并且穿鞋袜需要帮助，或者进食需要帮助（从代理人面谈得知），或者经常失禁并且穿衣需要帮助（从代理人面谈得知）。	上厕所需要帮助，或者离开椅子和床有困难，或者有失禁的问题并且穿鞋袜需要帮助。
中依赖性	每一天或者大多数时候穿鞋袜或者烹饪需要帮助，或者没有帮助无法穿衣（从代理人面谈得知）。	穿鞋袜和烹饪需要帮助。
低依赖性	全身清洁或者沐浴或者剪脚趾甲需要帮助，或者做家务困难很大（从代理人面谈得知）。	沐浴需要帮助，或者推拉大型物体有困难，或者收拾房屋和花园有困难。
生活自理	不在以上类别之列的其他情形。	不在以上类别之列的其他情形。

注：CFAS：认知功能和衰老研究；ELSA：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MMSE：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资料来源：Kingston et al. (2018)。

表4.3 2035年英国依赖性人口的数据预测以及相对于2015年的变化

	总人口数（千人）			依赖性（千人）				
		变化 （%）	低依 赖性	变化 （%）	中依 赖性	变化 （%）	高依 赖性	变化 （%）
65 ~ 75	6 908	+ 31	967	- 15	98	- 49	241	- 15
75 ~ 84	2 778	+ 51	1 400	+ 29	171	+ 5. 7	378	+ 42
85 岁及以上	2 815	+ 114	1 537	+ 148	293	+ 73	446	+ 92

高依赖性人口数量将从78.3万上升到106.5万，上升36%。
 正像之前所说，痴呆的患病负担上升主要是因为预期寿命而非痴

呆发病率的上升。《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前言指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痴呆负担加重更明显。该报告还预计痴呆患者的数量将从2015年的5 000万上升至2030年的8 200万，进而上升至2050年的1.52亿，即35年间上升两倍。

但是痴呆现在还没有治愈的希望。2018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指出（第7页）：

自1998年，在已检测的100种药物中，只有4种获批使用，而且并非神药。它们虽然可以帮助管理痴呆的某些症状，但只适用于某些人，世界上大多数人连用都用不上。任何对这一疾病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找到治愈神药。

2019年10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没有通过最初检测的新药（Aducanumab）在进一步评估时，被认为在一小群患者中可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早发。英国媒体欢呼，称这是巨大的进步，但这种大肆宣传最多只是绝望中的挣扎，或是过早的庆祝。

虽然我们可以期待医学上的突破，但是，以它们即将发生为前提来制订计划是不明智的。虽然治愈、替换甚至再生大脑以下身体其他部位已变得相对容易，但修复大脑损伤迟迟没有进展。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和资金投入要比癌症单一领域少得多。2018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前言写道：

报告意在说明，呼吁提高痴呆领域的研究经费仍然非常重要。平均每3秒钟就有1个人患上痴呆，相对于痴呆患者的数量，我们在治愈痴呆研发方面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首先，原创研究不足。世界范围内有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文章

发表数量只有癌症的1/12。再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也不足。这背后虽然有各种原因，但过去40年该领域没有任何重大突破一定是原因之一。

2019年6月25日《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最新报告中附了下图（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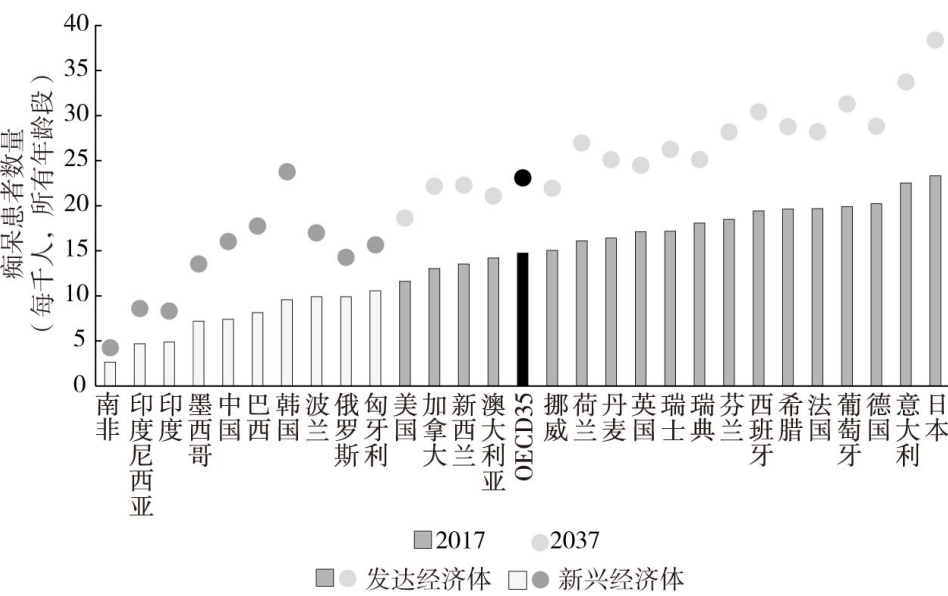


图4.1 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痴呆的负担一定上升

资料来源：OECD《2017年健康统计》。

4.3 痴呆的成本

最常引用的痴呆成本数据来自普林斯等人（Prince et al., 2015）：截至2018年，其成本将高达约1万亿美元。国际阿尔茨

海默病协会2012年12月发表的《击败痴呆：通向2025年的道路》指出，这一成本将于2030年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

痴呆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不计入GDP，不体现在可衡量的产出、收入或者支出中，但这部分成本是真实存在的。与痴呆相关的成本有三类：第一，患者自身承担的成本；第二，患者的护理人员承担的成本；第三，“包括沉淀成本在内的”研发支出和临床试验成本（临床试验成功与否均有成本，迄今为止几乎完全失败）。其中痴呆的第三类成本投入要比癌症治疗低得多，相对痴呆带来的巨大问题，更微不足道。

当然，主要成本由痴呆患者承担，既包括医疗费用等显性成本，也包括生活质量下降等隐性成本。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人试图明确衡量这些隐性成本（比如，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为调动更多资源投入痴呆研究和护理的方案做成本收益分析。翁笙和（Egglesstone，2019）曾简要讨论过“衡量健康衰老的经济价值”。但是，此类衡量可以而且也应该用诸如调查的方法来进行。[\[4\]](#)

第二大成本落在护理上。当护理人员不是职业人士时，他们经常是患者的家人（偶尔是朋友），通常是配偶或子女，他们至少在患者的痴呆或并发症变得异常严重需要进入医院或护理机构接受专门治疗前，无偿照顾这些患者。柳叶刀委员会在《痴呆的预防、干预和护理》报告（2017，第2710页）中指出，痴呆患者的家人倾向于在家中照顾他们以保证其生活质量，虽然这需要自我牺牲。这些家人往往会出现抑郁、焦虑、身体状况变差、工作生活的平衡被打破等情况。

我们认为，英国处理痴呆成本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达米安·格林（Damian Green, 2019）指出：

医疗体系不应区别对待不同的病情。包括癌症在内的一些长期疾病的患者是通过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进行治疗的，所以治疗是免费的。但是，诸如痴呆等其他疾病的患者则主要通过社保体系进行治疗，所以个人最终要承担巨额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新的社保体系，终结此种“患上痴呆就像抽中下下签”的情况。

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使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金斯顿等人（2017，第1681页）指出，离异、家庭成员分居多地、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家庭分裂，使得在家中照护患者变得更为困难。这可能使那些被划分为“低依赖性”的患者境况尤其窘迫。作者说道，英国当局为公费护理制定了过高的门槛，低依赖性的人不太可能符合资格，他们最终没有公费资助，同时家庭的分裂使得他们失去了家人的关怀。

普林斯等人加总痴呆的直接成本（私人和公共成本）和间接成本，估计到2018年总成本将高达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左右（2015，《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第6章，第56页）。

除了非正式护理（费用很大，但量化极为困难，不确定性很高），我们认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方面的总支出太小，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所以，普林斯等人于2015年估算痴呆的成本时指出：

人均成本可分为三类：直接医疗成本，直接社会护理成本（包括有偿的职业上门护理、住家护理和养老院护理）和非正式护理成本。

表4.4和表4.5列出了成本的划分情况。正如《金融时报》的报告所示，不同国家的成本差距非常大（图4.2）。总成本的构成情况见表4.5，来源于《金融时报》报告第60页的表6.6。

表4.4 痴呆的成本

国家	痴呆患者数量 (百万人)	成本 (10 亿美元)	人均 (美元)
G7	12. 9	508. 7	3 943
非 G7 的 G20 国家	24. 6	245. 5	998
非 G20 的世界其他国家	9. 3	63. 6	683
全世界	46. 8	817. 8	

表4.5 2010年和2015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痴呆成本

	直接医疗成本		直接社会护理成本		非正式护理成本	
	10 亿美元	百分比	10 亿美元	百分比	10 亿美元	百分比
2015 (《2015 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						
低收入	0. 2	20. 4	0. 1	10. 4	0. 8	69. 2
中低收入	3. 7	23. 9	2. 0	13. 2	9. 6	62. 9
中高收入	19. 3	22. 0	17. 7	20. 5	49. 3	57. 1
高收入	136. 0	19. 0	308. 1	43. 1	271. 1	37. 9
总计	159. 2	19. 5	327. 9	40. 1	330. 8	4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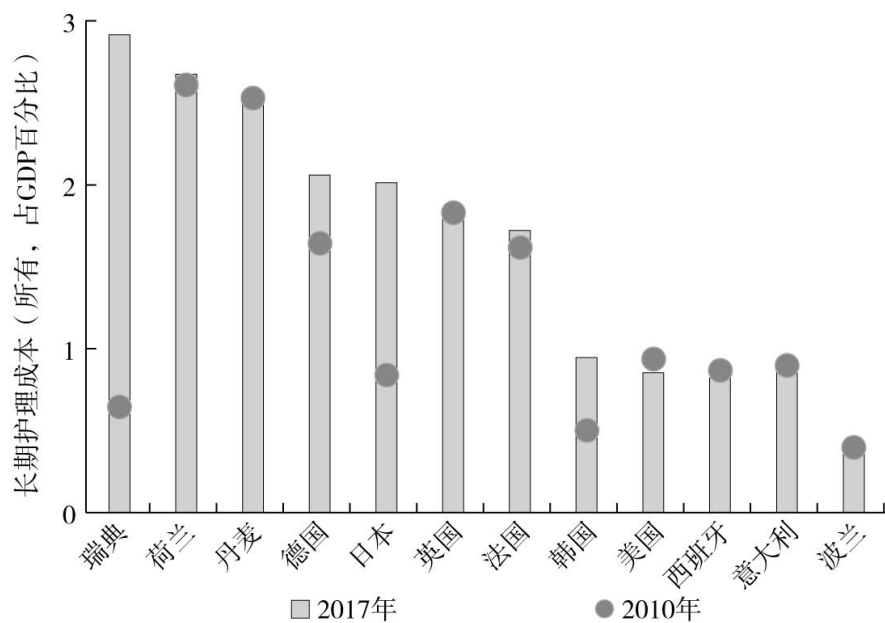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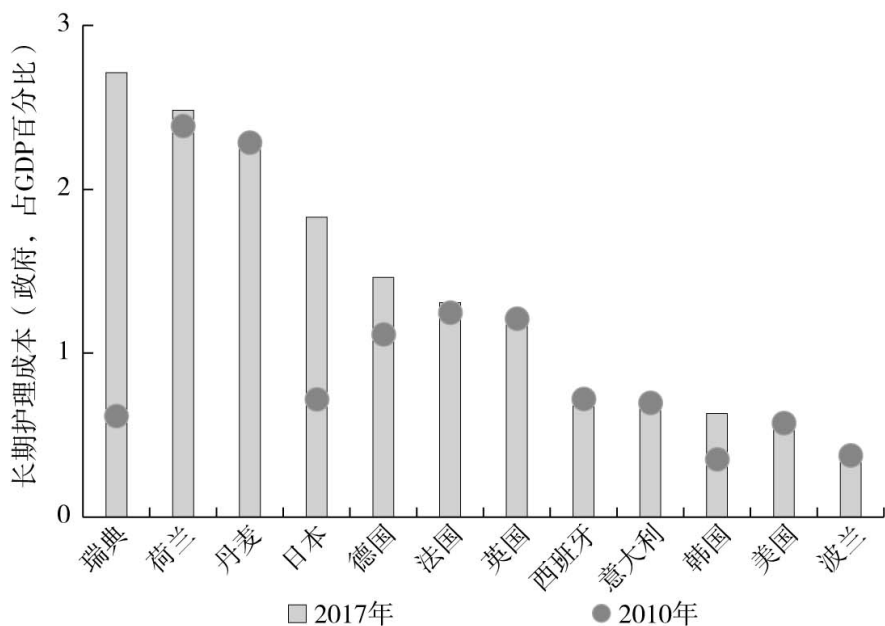


图4.2 富裕国家用于长期护理的公共支出的差异

资料来源：OECD。

后果就是，“在当前的初级护理中，痴呆的发现、诊断、披露、治疗和管理都严重不足”（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概要，第1页）。我们参考的主要痴呆研究（包括柳叶刀委员会的研究和《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用很多例子阐明了这些不足。[5]

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讲到“改善痴呆患者的医疗水平”时，作者尝试为痴呆医疗护理途径的成本影响建模（第7章，第110—121页）。该模型是为衡量痴呆患者接受医疗服务的成本设计的。

按该模型估计的成本，无论是占GDP的比例还是占总医疗支出的比例（表7.4），都微不足道，最高的是韩国，两项占比分别是0.04%和0.5%；最低的是墨西哥，两项占比分别是0.0003%和0.01%。做这些分析都是为了说明我们在痴呆领域正在做的或者打算做的都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将更多公共或私人资源投入痴呆的预防、阻断和逆转？

第三类成本，即痴呆治疗的研发支出，从所有标准来看迄今为止都非常低。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不管是药物还是简单的支持措施都没有实际效果。但百健的Aducanumab和中国的Oligomannate（也被称作GV-971，被寄予的期望低于前者）上市，让该领域的专家萌生了谨慎的乐观。

暂且不说使用这些药物会带来的结果，Aducanumab先被否定又被肯定的过程使人质疑其有效性，中国审批过程的不透明引发很多担忧。但是这是痴呆领域迄今为止唯一实现的医疗成果，有必要对此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应该谨慎。持乐观态度是为了能

激励更多资本和研发投入。

我们希望这两种药物都能够延缓痴呆的早发，但研发的生物标记物还未在临床实验中成功识别出痴呆，逆转痴呆的进展更是前路茫茫。

研发支出低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官方支持。正如之前所说，痴呆的相关治疗得到的公共资助非常少。公共部门支持私营企业的稳定财政资金非常有限。这方面现在有了一些好的变化，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太小、太慢。而且就像我们这里强调的其他所有问题一样，不同国家的官方支持存在很大差异。

在美国，痴呆被视作类似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慢性疾病。HCC51/52风险调整使痴呆患者可以获得额外的联邦医疗保险补助。所以，全球阿尔茨海默病平台估计“在这样的调整之下，2020年大约将有20亿美元被投入痴呆的发现、诊断和治疗中”（Dwyer，2019）。这是美国过去10年该领域的企业获得的约10亿美元风投资金的两倍。但是比起过去10年与癌症相关的药物研发吸引的165亿美元风险投资，这仍然相形见绌（Vradenburg，2019）。

痴呆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但我们在痴呆的认识和治疗方面进展太慢，挑战与日俱增，我们目前所做的对于彻底解决问题无济于事。

4.4 痴呆的宏观经济影响

未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增长的需求，这对痴呆患者和照护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大悲剧，也是社会的耻辱，同时，我们还可以从

可量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医疗支出的提升是其中的影响之一，[6]第11章和第13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三点。第一，投入老龄化人口护理的劳动力占比将提升，尤其是对痴呆患者的护理（第4.4.1节）。第二，护理人员的来源，这包括护理机构、老年人支持机构的护理人员，以及无偿照顾痴呆患者的家人（第4.4.2节）。第三，晚婚晚育和老年依赖性的叠加对个人生命周期的影响（第4.4.3节）。

4.4.1 投入老龄化人口护理的劳动力占比上升

最根本的问题是，老龄化意味着老年护理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将增加，但劳动力总量在收缩。这方面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照顾老人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服务产出是被即时消耗的，而不是耐用消费。正如第3章提到的，这样的服务不太可能被自动化取代。这意味着其他的劳动力必须提高生产率才能提高未来产出。第3章还提到，我们要在经济的其他部门大力推动自动化，充分提高生产率，以补偿护理老龄化人口造成的损失。

第二，这些异质化服务不能像制造业中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那样被离岸外包。制造业供应链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已经实现，这意味着随着全球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全球化的助力会减退。

4.4.2 护理人员的供给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对相关职业人士、老年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的需求将上升。除了财政约束和其他方面对资源配置的需求，原则上，高收入国家在满足此类需求方面应该没

有阻碍。但是中低收入国家要做到这一点会更难，而且高收入国家实际需求满足度仍然不足。[\[7\]](#)类似地，随着老年人及其需求的增多，在诊断和潜在治疗方面，初级护理人员、全科医生和参与手术的高级护士的认知和技能培训都会有所提高，这方面高收入国家会领先于中低收入国家。

虽然高素质职业护理人员在高收入国家的供给会持续多于中低收入国家，但后者的基本护理人员（不包括提供无偿护理的家人和朋友）则会高于前者。为痴呆患者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的日常生活活动（包括穿衣、沐浴、上厕所[\[8\]](#)、走路、阅读）提供帮助的工作并不引人注目，也不像教书育人一样让人有成就感，收入也不高。但是这样的工作需要几种关键能力，比如，同理心、耐心、善解人意和沟通能力。

卡米拉·卡文迪什（Camilla Cavendish）在《额外时间》（2019, 第97页）中写道：

护理是（或者应该是）一项情商最为重要的工作。[\[9\]](#)老龄化的加剧将导致对护理人员需求的上升，情绪韧性、直觉和同理心这些最需要的技能恰恰是机器人无法提供的。但是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却因为他们的技能是“非学术的”而经常被看不起或者被视作“低技能人员”。

2013年为了完成卫生部的一项独立评估，我到英国各地采访初级护士和护理人员，就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我见到上百个在医院工作或者上门护理的优秀人员，他们走进一个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家中，跟他们建立关系，帮他们洗澡，这需要无与伦比的成熟和韧性，也令我感佩。医院里有些高级护士和医生对他们认为“只是”端茶倒水、搀扶病人下床或喂饭的初级医疗助理颐指气使的态度让我震惊和失望。他们可

是在病床前陪伴病人最久的人，最有可能注意到病人的紧急情况，对病人的安全感至关重要。

在更早一些的《卡文迪什评估》（2013年7月）第7页的摘要中，她写道：

“基本护理”一词大大低估了这些人从事的工作。帮助老年人进食、吞咽，给他们洗澡但不伤害他们并且保护他们的自尊，和有早发痴呆的人交流，做这些事的同时做到善解人意、尊重人、关心人是需要技能的。在片区护士不给你任何指点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在陌生人家中照顾他，而且只能收取30分钟的护理费，这需要莫大的成熟和韧性。

和医疗助理一样，社工面临的任务也日益充满挑战，他们要照顾越来越多脆弱的老年人。但是他们接受的培训参差不齐。一些提供社会护理的企业不能满足其员工能够胜任这一最起码的要求。有些员工跟我反映，他们的雇主就让他们在家里看一张光碟，然后就直接上手提供服务。还有一些雇主要求员工自费接受必需的培训。所以，《卡文迪什评估》建议社工在无监督的情况下工作前必须达到基本的能力标准，要求他们获得“基本护理证书”，雇主要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

我们从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圣人从事这样需要高情商、收入低、被视作技能低、地位低的困难工作？这一领域仍然需要更多护理人员，这说明多年来建议的就业担保计划收效甚微。护理人员持续短缺，[\[10\]](#)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男性可能既不想也不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卡文迪什评估》第六章关于招聘和培训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谈及合适的培训对象从何而来的问题。

我们认为英国和其他很多高收入国家将长期缺乏适合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梅达（Mayda）在2019年6月于葡萄牙辛特拉召开的欧洲央行以“中央银行”为主题的年会上也有谈及。我们认为最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有目标的移民。签证中应专设一个类别，给予女性（相较于男性）和成熟的申请人（相较于年轻人）一定的优先。通过这一签证进入英国的人承诺在英国从事护理工作（比如，两年），而且只有在兑现这一承诺后才可在期满时继续留在英国。同时，他们可以获得初步培训（有必要的应包括语言培训），最初可以免费得到住房（如果拿不到资格证书，住房将被收回），期满后可以换工作并可以留在英国。《金融时报》的Lex专栏讲到“老龄化的日本”时指出：“政府在吸引外国劳工填补岗位空缺时也会失败。文化和语言障碍很大，且移民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治问题。”

4.4.3 变化的生命周期

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除了预期寿命延长，随之攀升的痴呆发病率外，还有另一个因素未被充分注意，即女性结婚和生育一孩的年龄在上升（见图4.3和图4.4）。

这两个趋势的结合使得现在的生命周期和过去（比如40年或50年前）的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生命按时间线大体分成四个阶段（见表4.6）。

痴呆发病率随年龄增加呈指数式上升，同时社会护理的供给有限，所以，比起40年或50年前的人，现在50~67岁的人最终不得不照顾无法自理的痴呆父母的可能性更高。再想想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1\]](#)每个小孩对应四个祖父母，其中两个很可能在

某个阶段会患上痴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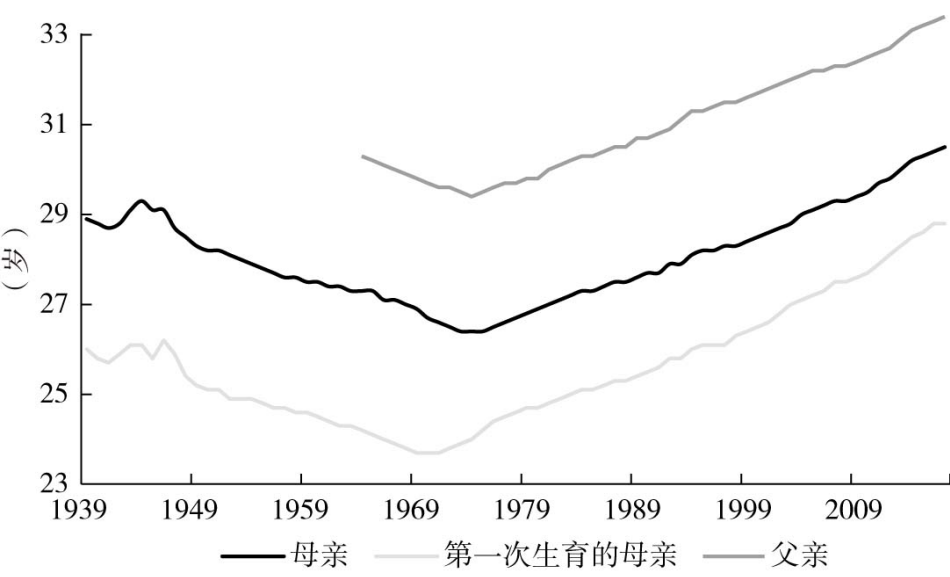


图4.3 英国：孩子出生时父母的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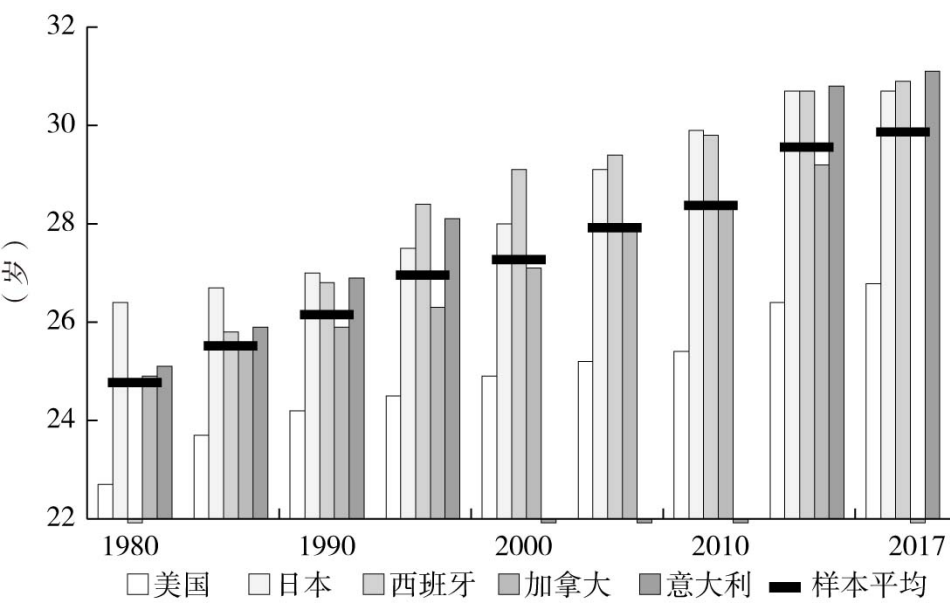


图4.4 第一个小孩出生时妈妈的平均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OECD。

表4.6 变化的生命周期

传统的生命周期是：				
0 ~ 20	20 ~ 40		40 ~ 60	60 ~ 70 +
青少年	结婚生子（工作）		工作，无抚养或赡养义务	退休
现在的生命周期由五阶段构成：				
0 ~ 20	20 ~ 30	30 ~ 50	50 ~ 67	67 ~ 80 +
青少年	单身 （工作）	结婚生子 （工作）	工作， 赡养父母	退休， 通常依靠他人

过去，大多数人从40岁左右到退休这段时间，收入最高，快进入退休而没有抚养或赡养义务，这有利于储蓄。现在人们一般在20 ~ 30岁时没有这样的义务，但收入较低，不会考虑活到90岁时的情况，因而不怎么储蓄。30岁以后直到退休，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照顾子女，[12]接着需要照顾父母（参见Bauer and Sousa-Poza，2015, 2019）。不管是照顾子女还是照顾父母都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但鉴于直接的情感纽带和时间贴现，我们认为人们会选择把精力和金钱用于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而不是用于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储蓄。

换言之，我们认为，生命周期的变化会进一步降低个人储蓄率并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因为公共部门不得不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和健康医疗。

[1] 所以，金斯顿等人（Kingston et al.，2018a，第3页）指出，2015年超过一半（54%）的65岁及以上人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正如预期，多症并发率随着

年龄增长而上升：2015年，该比率对65~74岁群体和85岁及以上群体分别是45.7%和68.7%；对65岁及以上群体，该比率在2025年和2035年将分别升至64.4%和67.8%。

[2] 当然，那些有轻度认知损伤（比如，忘记人名）和有轻度依赖性人群的界限比较模糊，但是英国的人口衰老和护理模拟模型（PACSim）是最前沿的模型，也是表4.1数据的来源。

[3] 女性肥胖率也高于男性。

[4] 找到一组成年人作为样本。向他们解释痴呆发病率随着年龄上升而上升。然后询问他们愿意每年投入收入的多大比例将发病率降低10%（比如，将82岁时40%的发病率降为30%），假设这样的投入肯定能降低发病率。这样的假设性测试具有主观性而且只有暗示作用，但也有一定价值。这方面也可参考Kydland和Pretnar（2018，2019）。

[5] 比如，柳叶刀委员会的报告（2017，第2690页）说到诊断时指出：“及时诊断是指，在医疗干预和支持对痴呆患者及其护理人员仍有帮助时提供的诊断，这是对痴呆提供良好护理的前提条件。很多痴呆患者从来没有得到诊断，只有20%~50%的患者的初级护理病历中有诊断记录，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低于高收入国家。很多人得到诊断时已为时过晚，来不及为自己或家人做打算或者寻求医疗干预。”

[6] Damian Green（2019）在《解决护理危机》一文中，建议引入由财政收入资助的新的全民护理福利，“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护理”，同时个人可购买商业性的“补充护理”保险。也可参见Kydland和Pretnar（2018,2019）。

[7] 201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第6页）指出：“中低收入国家的痴呆专业护理水平很低。老年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以及提供诊断和持续性护理的医院或社区服务都非常缺乏。高收入国家长期护理服务的覆盖率仍然较低，除低诊断率外，专业服务无法满足快速增加的痴呆患者对长期护理和及时护理的需求也是一大原因。”

[8] 日本老年人尿不湿的销量高于婴儿尿不湿。

[9] 机器人的情商为零。虽然机器人可以起到一定作用（见《金融时报》Lex专栏文章“Robots/aging Japan:I, careba”，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第22版），但是应特别注意到它们的作用是有局限的。

[10] 《金融时报》（Lex专栏，“Robots/aging Japan:I, careba”，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第22版）指出：“日本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低出生率已延续长

达30年。接近1/3的人口超过65岁。为了照顾这一人群，日本在未来10年需在现在150万的基础上将护理人员数量提高7倍。护工占比将超过劳动力的1/10。”

[11] 《金融时报》“Foreign Operators Take on Chinese Elderly Care”一文（2019年6月16日，第14版）指出：“据咨询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大约90%的老人仍然依赖家庭护理，7%接受社区护理服务，3%入住养老院。”

[12] 随着每户家庭需要抚养的孩子的数量下降，抚养孩子的时间缩短了数年。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孩子依赖父母的时间有所延长。这两个趋势正好相反。

第5章

通胀卷土重来

通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潜在的结构性趋势、人口、全球化、宏观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以及纯粹的货币现象。直观上说，工人的产出通常大于自身的消费，而被抚养者（老年人和年轻人）正好相反，因此工人和被抚养者之间的平衡对通胀影响很大。更复杂的解释是，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居民、企业、政府）如何通过改变储蓄和投资行为来应对老龄化。

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假设是正确的，即社会保障体系仍将存在，那么消费的年龄分布曲线将继续保持平坦，甚至向上倾斜。老年人将继续依赖（并投票支持）政府的援助，基本不会为更长的寿命进行储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为了实现从工人向老年人的资源转移，必须显著提高对工人征税的税率。

然而，工人并不是无助的旁观者，在发达经济体（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劳动力短缺将增强他们的议价能力，从而扭转发达经济体数十年的工资停滞状态。工人会利用这种较强的议价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也是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原因。

全球仍未准备好迎接可能的结构性上升的通胀，央行很快将不得不回归正常行为。零利率下限（ZLB）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效应、史无前例的人口背景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周期性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周期性冲击一次发生在金融危机期间，

另一次发生在最近的新冠疫情期间。

在人口结构变化的众多影响中，通胀卷土重来是我们最确信的，然而金融市场和政策制定者都无视自己面临的危险。但是，这种极为反传统的推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5.1 通胀是储蓄和支出平衡的产物

通胀上行压力重新抬头源于三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观点：

- 基于抚养比平衡的直观观点；
- 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又称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
- （非金融）私人部门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及其对公共部门和政策影响的观点。

5.1.1 通胀来自被抚养者，通缩来自工人

为了使雇用工人有利可图，雇主计划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必须低于他们产出的预期价值。工人获得的报酬必定低于其产出，在不动用过去积累的储蓄的情况下，工人是导致通缩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被抚养者只消费不生产，因此有导致通胀的效应。

按此理论，总体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有通缩效应，因为工作

的人超过了不工作的人。随着抚养比的下降，工人增加带来的通缩效应超过了被抚养者带来的通胀效应。同样，抚养比的上升具有通胀效应（太多的嘴在争夺太少食物）。通常情况下，通胀被视为一种货币现象，考虑到近几十年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用货币解释当前的通胀下行趋势非常困难。^[1]

当然，资本投入也有回报，即利润。但同样，相对更多的工人有助于提升利润。由于利润引致的消费低于工资引致的消费（参见Kalecki，1954），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具有通缩效应。

经验表明，老龄化也具有通胀效应。尤塞柳斯和陶卡奇（Juselius and Takats，2016）揭示了一个实证关系：“低频通胀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有令人费解的联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被抚养者）具有通胀效应，而劳动年龄人口具有通缩效应。”他们使用了从1955年到2014年22个国家的数据，并对这段时间进行细分，因此结果不受高通胀时期或低通胀时期偏差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1975年到2014年，美国抑制通胀因素中的6.5%可以由年龄结构解释。他们认为：“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可预见的，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增加通胀压力。”

这个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很简单。对于给定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消费增加本身会推升通胀。而给定消费水平，生产具有扩大商品和服务存量的能力，因此具有通缩效应。被抚养者（年轻人和老年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会产生通胀的力量，而工人可以通过生产来抵消这种力量。如果经济中工人的增长率超过了被抚养者的增长率（就像人口“甜头”一样），全球将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经历一段低通胀时期。未来几十年里，被抚养者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工人的增长速度。从数量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工人的数量仍将高于被抚养者，不过增长率始终在变化，这一点很重要。

5.1.2 菲利普斯曲线和即将上升的自然失业率

尽管失业率大幅下降，但工资增长率仍呈现令人惊讶的低增长趋势，我们将在第8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在这里只需说明的是，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自然失业率的下降。自然失业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议价能力逐渐减弱，以及工作岗位向低技能劳动力转移，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报酬都比较低。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将工资或价格增长和失业率联系起来）显得更加平坦。但是，这种趋势是有限度的。我们已经指出，要进一步提高那些即将退休人员的劳动参与率可能会越来越难，因为55~64岁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上升。在全球化进程放缓、反移民浪潮以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减少的共同作用下，面临人口挑战的国家的劳动力将减少。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将再次上升。自然失业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私人部门工会规模的缩小和力量的削弱将逐步趋于稳定，然后开始扭转。

自然失业率将再次在幕后悄然上升。和以前一样，这将出乎当局的意料。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界人士和官方机构都没能意识到自然失业率（ u^* ）在稳步上升，这导致了数十年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最近，他们同样未能意识到导致了几十年来通缩压力的趋势正在逆转。我们认为，当局极有可能再次忽视（人口）潜在趋势的变化，并试图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可持续水平之上，将失业率控制在可持续水平之下。

5.2 部门平衡：私人部门的盈余将受到侵蚀，

政府能减少赤字吗？

如果非金融私人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重新陷入赤字，那么宏观经济平衡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转向盈余。然而，当与年龄相关的支出飞涨时，从赤字转为盈余将是极为痛苦的，我们认为这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通胀将成为恢复宏观经济平衡的一种方式。

5.2.1 居民部门的盈余将受到侵蚀

众所周知，伯南克（2005）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利率的下降归因于“储蓄过剩”。“储蓄过剩”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第一，婴儿潮一代为将来的退休储蓄；第二，随着老龄化加剧，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亚洲（尤其是中国）日益富裕的工人为了其老年生活储蓄。结果是居民储蓄率很高。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老年人（不储蓄的人）与工人（储蓄的人）的比率上升，居民储蓄率开始下降。我们选取下面几个国家，将居民储蓄率与抚养比制图，结果表明随着抚养比上升，居民储蓄率下降（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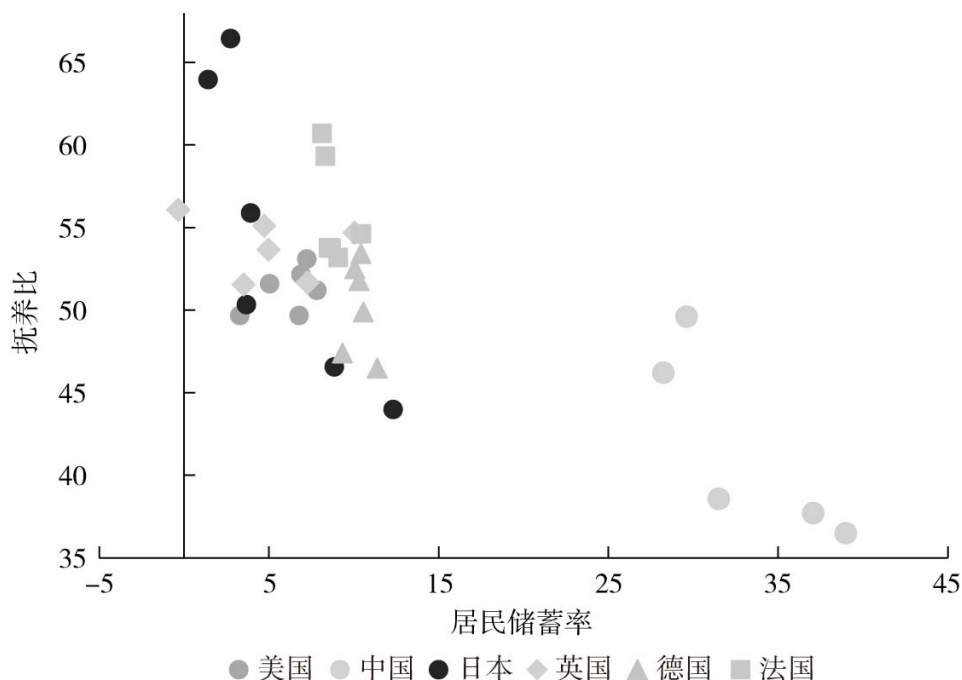


图5.1 居民储蓄率随着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

注：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OECD。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在抚养比不变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是因为，与不储蓄的退休人员相比，有工作的储蓄者会为自己的晚年存下更多的钱。但是，未来几十年抚养比很可能会恶化，并且产出增长率会下降。有人认为居民部门的储蓄将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实际利率和总需求维持在较低水平（即支持长期停滞观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基于以下假设得到该结论的：（1）退休年龄相对于预期死亡年龄会上升；（2）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福利相对于工人的平均收入会下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针对老年人的支出增长都会

低于工人的产出增长。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两者都不会发生。

要实现居民部门的平衡，还需要考虑其他两个因素：第一，经常被忽视的住房的作用；第二，推迟结婚、生育和离家的影响。

部门盈余取决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大多数居民部门投资与住房有关。多数国家的人口预测显示总人口仍在增加，其中，65岁及以下人口的占比在下降，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在上升，这将如何影响居民部门的住房投资（见表5.1和图5.2）？

表5.1 六大主要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的总数（单位：人）

	中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1990	66 260 464	7 953 776	11 784 388	14 776 819	8 997 978	31 837 211
2000	87 910 417	9 476 271	13 421 569	21 659 273	9 364 766	34 745 496
2010	110 523 965	10 596 478	16 612 172	28 919 547	10 515 123	40 115 166
2020	172 262 174	13 546 510	18 170 597	35 915 865	12 663 012	55 048 806
2030	238 692 673	15 721 999	21 232 513	36 371 963	14 767 610	69 676 851
2040	313 675 347	17 017 206	22 081 244	37 407 235	16 013 250	73 864 807
2050	306 142 560	16 773 107	20 827 136	35 869 447	16 447 864	74 265 283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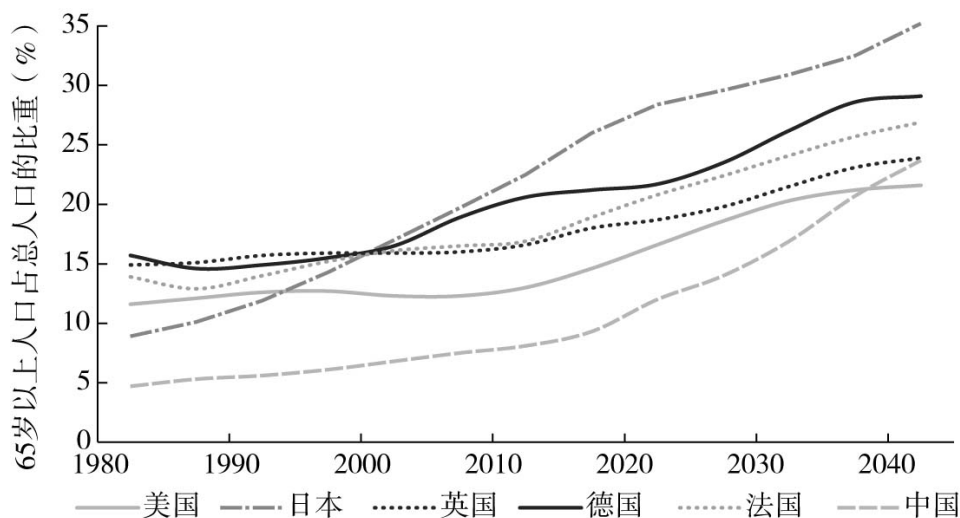


图5.2 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搬家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情，一些衡量指标显示，它几乎与离婚带来的压力相当。老年人通常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除非他们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否则没有必要搬家。因此，搬家的频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见图5.3和图5.4）。由于老年人仍居住在对他们来说过大的住房里，因此住房面积与人口之比可能会上升。结果是，住房投资下降的幅度不如劳动人口下降的幅度那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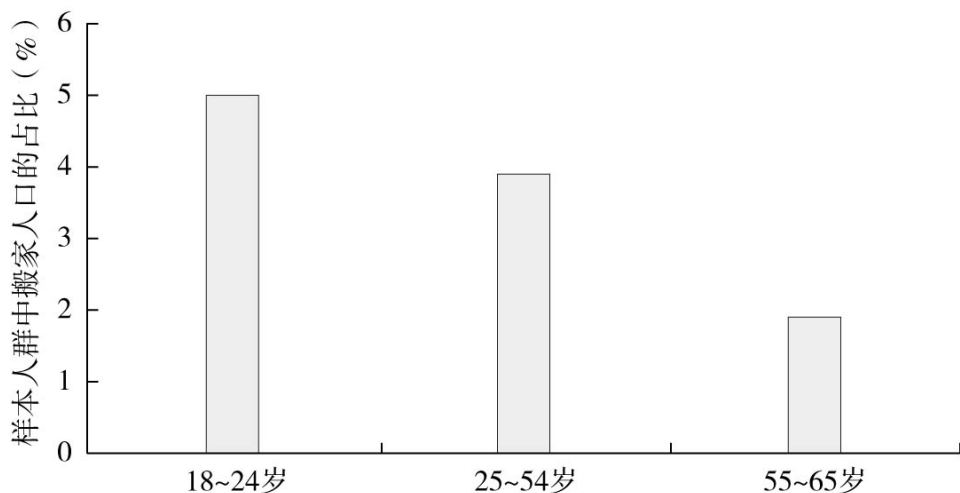


图5.3 在美国，老年人不太可能搬家

资料来源：Hernandez-Murillo et al.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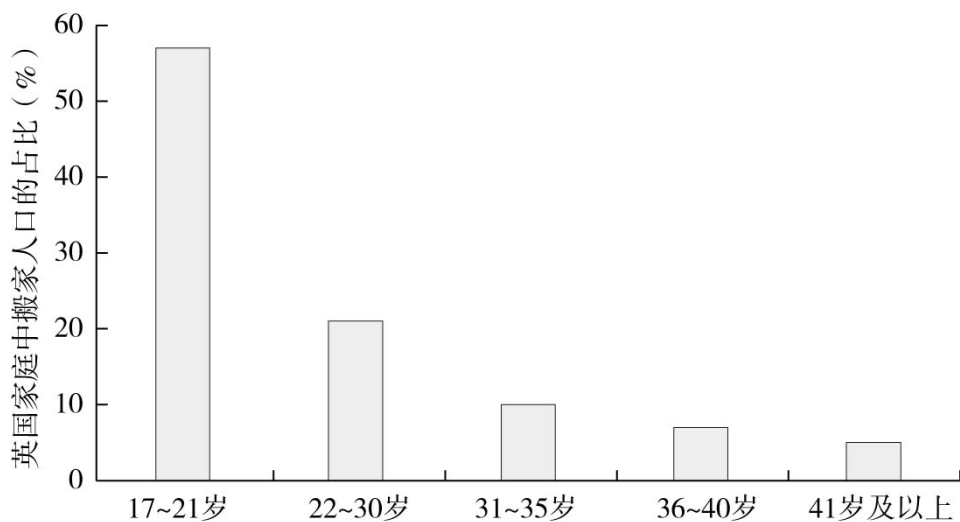


图5.4 英国与美国情况类似

资料来源：Meen (2005)。



专栏5.1 独居家庭增多 [2]

居住人数不足（Under-occupancy）被认为是关键问题之一。主要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家庭平均规模从1980年的2.48人下降到2018年的2.36人。如果今天的家庭规模与1980年相当，那么将会多出130万套住房可供使用。如果人们居住在更适合其需求的住房中，那么每年将减少5万套住房的建造。主要的发现之一是，到2040年，独居的人数将增加30%，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在2020年到2030年间，家庭数量将增加约200万户达到3 070户，但增加的35%将是老年家庭，其中61%将是独居家庭。2030年到2040年的前景展望与此类似，家庭数量将进一步增长160万户达到3 230户，预计38%的新增量为老年家庭，其中67%将是独居家庭。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住房存量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更不用说这么多寡居老人的健康和和社会保障问题了。

结婚（组建家庭）年龄的上升，特别是生育年龄的上升（见图5.5和图5.6），必然会影响家庭的投资与储蓄平衡。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四十多岁生孩子。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会在20岁出头时结婚，到35岁时已经有了大部分孩子，孩子预计会在父母45~50岁前陆续离开。这就留下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作为退休做计划和储蓄，其间没有照顾孩子的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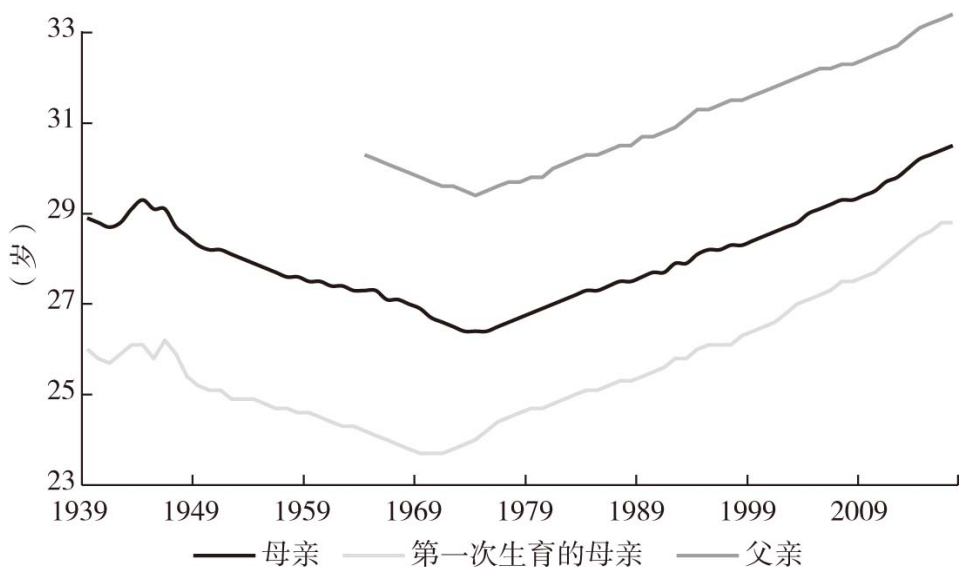


图5.5 英国：孩子出生时父母的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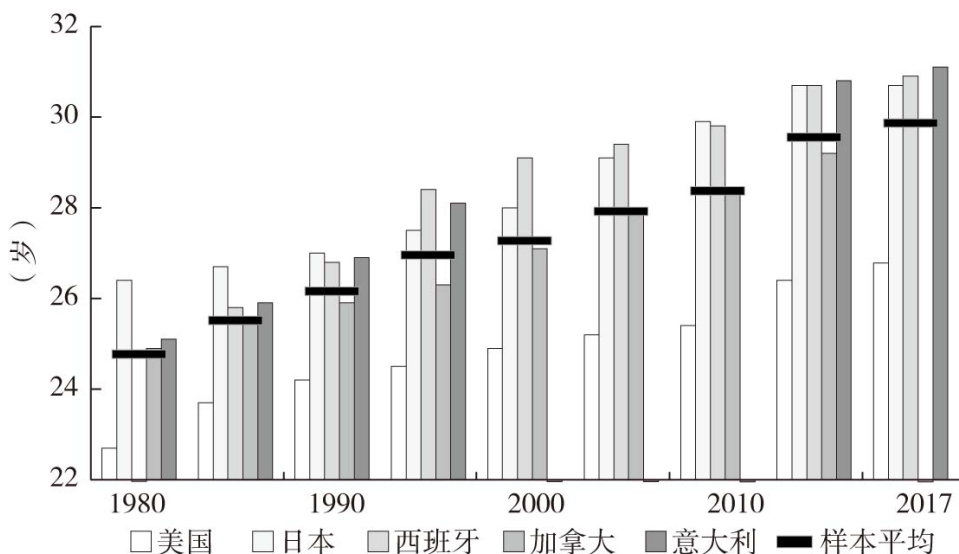


图5.6 发达经济体中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在上升

资料来源：OECD。

如今，所有这些日期都往后移了好几年。我们假设30岁以下的年轻单身人士倾向于低估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以至于没有为此储蓄足够的钱。此外，由于青年失业、住房成本上升和受教育时间延长，孩子们待在家的时间更长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待在家里意味着他们可以节省租金和其他生活设施支出。但是，他们需要将储蓄留在未来使用，例如支付住房首付款，或者间接积累人力资本。从父母的角度看，这些社会变化将大大缩短他们为退休储蓄的黄金时期（例如，从45~65岁减少到52~67岁）。不断上涨的住房和大学教育成本给父母带来经济压力，如果父母为子女提供了更多资金，那为将来退休预留的钱就少了。

有人认为，前瞻性家庭在关注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会减少消费，帕佩蒂（Papetti，2019）认为：

在完美预期的情况下，代表性家庭会意识到，养活全部消费者（人口规模）的有效劳动力的增长率正在逐渐下降。因此，在现行养老金计划下，为了平滑未来的人均消费，代表性家庭在预期到这种变化后，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即变得更加耐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实际利率。

[3]

最近几十年，这一情况显然没有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发生，有几个明显的原因，比如短视和缺乏想象力。人们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一篇论文中，伍德（Wood，2019）声称：

在这项研究涉及的六个经济体（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中，大多数男性退休人员的预期寿

命比他们退休基金可以支付的时间长10年左右。女性的储蓄不足更严重，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两年。

不同经济体之间也呈现显著的差异。日本的国民寿命较长，平均储蓄率较低，这使得日本退休人员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其中，储蓄率低的原因是他们投资于更安全的资产，随着时间推移，收益会减少。

伍德继续追问：

为什么人们活得比他们的退休储蓄可以支付的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医疗技术进步和医疗服务改善，且贫困减少了。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全球范围内对健康饮食和定期锻炼益处的认识增强了。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到21世纪中叶，全球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将达到22%，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

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和由雇主承担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压力，导致个人自行承担退休责任的趋势愈发显著。但是，储蓄未能跟上传统养老金计划的下降，导致当前退休储蓄不足。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未来个人储蓄不足的情况不会减少。相反，它们认为，在所覆盖的八个国家中，即上述六个国家再加上中国和印度，在2015年到2030年间，个人储蓄不足都将显著上升，这一比率从日本每年的2%，到中国每年的7%，再到印度每年的10%不等（参见WEF，2018，“我们如何为未来储蓄”，图1）。即使我们对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强调的退休储蓄不足的危险有所保留，结论也非常清楚，至少目前人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储蓄

来平滑他们在较长预期寿命内的消费。

长期以来，居民部门都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至少可以说，设想这种情况会突然改变是不可信的[4]（另请参见McGovern，2019；Button，2019，第10页）。

总而言之，我们预计未来几十年，居民部门的盈余将急剧减少。

5.2.2（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异常盈余应转为赤字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消退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部门的条件已变得极为有利。2010—2017年，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增长非常强劲（意大利例外），已经比1990—2005年的占比高出很多（见图5.7）。

最近几年，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都急剧下降，除了日本以外，股票估值都在持续的牛市中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固定资产投资会强劲增长。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经济体的投资率仍停滞不前，尽管中国的投资率仍然很高（见图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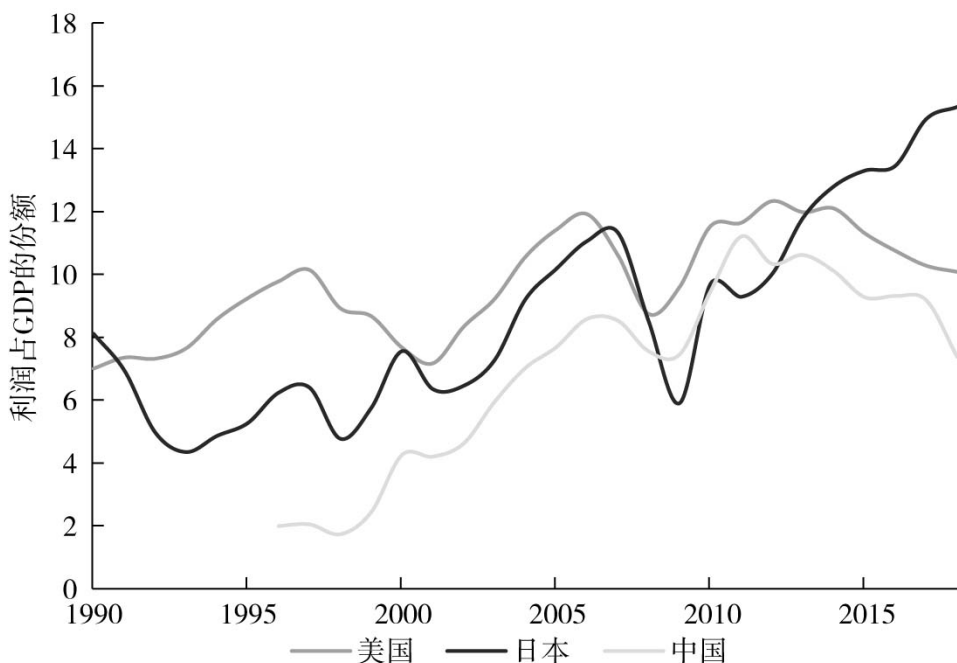


图5.7 利润占GDP的份额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中国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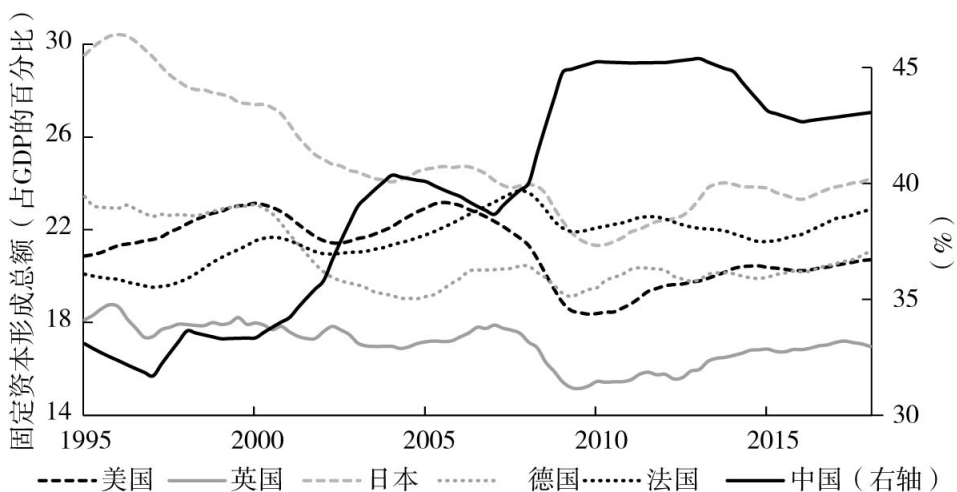


图5.8 发达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直停滞不前，但中国没有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结果是，近几十年来，西方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中国是明显的例外，中国的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较高的债务融资（图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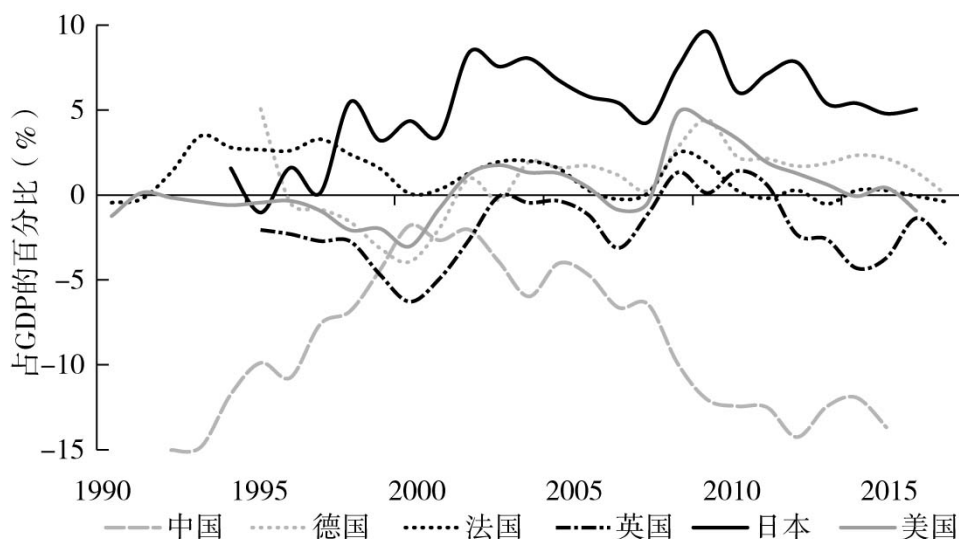


图5.9 企业部门净储蓄将进一步陷入赤字

资料来源：OECD。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尽管近几年来似乎有着其他有利的环境，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低的投资率。有几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不过没有哪一种是排他的，所有这些解释都可能在其中起作用。主要有四种解释，分别是：

1. 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度和垄断；
2. 技术变革；
3. 管理层激励；

4. 廉价劳动力。

1. 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度和垄断

有证据（主要与美国有关）表明，企业部门的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在不断提高。[\[5\]](#)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导致更高的利润率、利润在国民收入中占更高份额，以及更低的投资。在最近一篇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工作论文中，有学者（Liu et al., 2019年1月）认为，持续的低利率本身会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活力下降、生产率增速放缓（另请参见该论文第5页脚注2中引用的有关低利率与行业集中度上升，以及与较高的企业利润份额之间关系的早期文献）。

2. 技术变革

目前领先的行业主要由技术公司组成，这些公司对人力资本的依赖远大于对钢铁、建筑、重型机械等固定资本的依赖。例如，软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努力，但需要相对较少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技术正在将增长方式转向人力资本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固定资本支出与总收入和总产出的比率可能会下降，甚至有可能大幅下降。

3. 管理层激励

正如我们将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如果管理层激励与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激励相一致，那将很可能导致管理层把重点放在最大化短期股权价值上。这一点很容易通过回购来实现，即利用利润通过以债代股的方式来增加杠杆率。不过，短期盈利能力的提升也可以通过削减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研

发支出来实现，史密瑟斯（Smithers,2009,2013,2019）在几本书中都强调了这一观点。

4.廉价劳动力

全球化与人口“甜头”的结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内可用劳动力供给空前增加。当人们可以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比如中国、东欧）或者雇用移民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增加产出时，为什么还要在国内投资昂贵的设备以提高生产率呢？与此同时，这种潜在外包竞争和外来移民削弱了私人部门工会的力量，并在过去几十年里压低了实际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已经转移到那些劳动力特别廉价的国家，并且采取了多用劳动、少用资本的生产技术。

这四种解释孰重孰轻可能难以辨别，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潜在的解释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最后两种解释。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管理层激励一直是错位的，而且由于生产转移到中国和东欧，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投资都受到了抑制。

当前，全球化和人口结构的趋势正在逆转。在过去30年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经济体中，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已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导致劳动力大量增加和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甜头”正处在急剧逆转的边缘，就像日本已经发生的那样。这将提高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从而可能导致企业家增加单位劳动的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但是，管理层面临的激励结构使他们在经营时采取短期主义行为，而只要低投资率是由短期主义行为所致，那么低固定资产投资仍将继续。

在第12章中，我们会证明，摆脱债务（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过度累积的关键途径（也许是必要途径）是转变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鼓励用股权融资代替债务融资。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劳动力市场的紧张都会提升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因此，尽管还远不能确定，但我们认为未来单位工人的投资很可能会增加。目前尚不确定这是否足以抵消工人增长率的下降，后者往往会使投资下降。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我们相信，不会下降太多。

另一方面，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议价能力增强都将削弱企业的利润率，与之相比，1980—2020年辉煌的几十年间，全球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宽松货币政策造就了资本家的天堂。那样的日子很快将结束，未来资本家盈利会越来越难。

传统上，当（非金融）企业部门出现赤字时，投资通常会超过留存利润。正如本节之前所述，很多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已进入盈余状态，这很不寻常。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预计这将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现象，随着盈余逐渐减少，未来几十年很可能会重新回到赤字状态。

5.2.3 老龄化时代，公共部门真的能扭转赤字吗？

基于上述原因，最近几十年，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都趋向于进入大量盈余状态。因此，为了维持宏观经济平衡，基本算术法则要求公共部门不得不积累赤字。但是，对个别国家来说，这种赤字或多或少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经常账户逆差（即世界其他国家有顺差）或顺差。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国家，例如德国，可以通过较小的公共部门赤字实现平衡，甚至可能出现公共

部门盈余，比如荷兰；对于经常账户逆差较大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则正好相反。

你可能会认为，公共部门必须保持赤字以维持宏观经济平衡是一件好事，这为增加公共支出和减少税收创造了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过去20年中大规模的持续赤字（图5.10）只发生在战时，并且通常需要持续减支带来的财政盈余和意外通胀相结合来抑制。就和平时期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公共部门赤字和债务规模堪称史无前例。更糟糕的是，正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长期预测的那样，对当前收入和老人赡养趋势的推断表明，债务率很可能会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正如第1章导论中的图1.8和图1.9所示。这一点将在第13章中进一步讨论。特别是根据现有计划，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费用会不断上升。从某一方面来说，目前这些成本被大大低估了；这与老年痴呆和其他老年疾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有关，这一问题在第4章已经讨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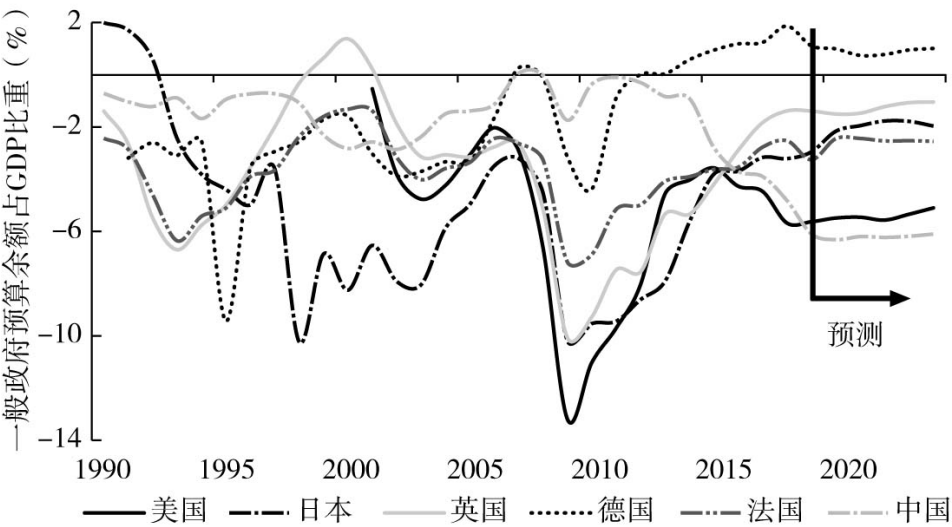


图5.10 一般政府预算余额一直处于赤字状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背景下，财政部长（民粹主义者除外）和许多谨慎的政客的本能是在逆周期政策上保持慎重，抓住当前出现的机会把赤字削减到一个更易管理的规模上并使之保持稳定，然后开始逐步降低债务水平。简言之，在这种形势下，财政政策将使宏观经济的通缩压力持续。特别是欧元区，德国的保守政策以及欧元区赤字国家受到的约束加剧了通缩趋势。

我们曾在上文中指出，先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总盈余将在未来几十年中转向赤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算术法则要求公共部门不得不从赤字转向盈余。这需要做出政治上非常痛苦的决定，包括削减公共支出或提高税收。由于减支的政治痛感更为直接（相比上升的债务和赤字水平），它往往无法实现，至少不足以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其结果几乎肯定是持续不断的通胀压力。在第13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不同的人口和宏观经济趋势对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5.3 总体宏观经济影响

我们如何得到宏观经济的总体结论？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幸运的是，一群伯贝克学院的经济学家（Aksoy et al., 2015）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研究。由于我们基本认可他们有关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的分析结果，因此我们简单复制了他们的主要表格（见表5.2）。

表5.2 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

	β_1 (年轻人, 0 ~ 21 岁)	β_2 (劳动人口, 21 ~ 60 岁)	β_3 (老年人, 60 岁以上)
增长率	0.04	0.10	-0.14
投资率	0.07	0.09	-0.16
个人储蓄率	0.33	0.23	-0.56
工作时间	-0.70	1.70	-1.00
通胀	0.75	-0.87	0.12

资料来源：Aksoy et al. (2015)。

他们的主要结论（我们也认同）如下：

-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总体经济增速将放缓，总工作时间将减少（我们可以看到，代表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β_3 是负的，对于总工作时间更是如此）；
-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占比对经济都有通胀效应，这可以从对通胀的影响系数 β_1 和 β_3 中清楚地看到；
- 由于人口结构的因素，投资和个人储蓄率均下降，这表现为对投资和个人储蓄率的影响系数 β_3 均为负值。

这些结论符合我们自己对人口结构影响的思考：

- 增长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总体增长率会下降；总工作时间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然而，除了人均GDP，人类的幸福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 年轻人和老年人占比较高都具有通胀效应，只有劳动人群能对经济产生通缩效应。前者是净消费者，只有后者能

生产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需求；

- 未来投资和个人储蓄率都会下降，同时我们还认为，储蓄将比投资下降得更快（如前文所述）。

[1] 关于1500年到1700年间早期欧洲通胀中人口因素和货币因素相对权重大小的论述，参见Melitz和Edo（2019）。

[2] 摘自“A home alone explosion”, by L. Mayhew（2019），Cass Business School, in *Financial World*, 2019年6—7月，第13—15页。转载得到了The London Institute of Banking and Finance的授权。

[3] 另请参见Schön和Stähler（2019，第24页），他们指出：“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老龄化世界时，由于储蓄受此影响会急剧（并且大幅）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全球利率下降。”

[4] 即使在较短的时间内，家庭通过借贷/储蓄来平滑消费的理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事实支持。因此，Hundtofte等人（2019）指出，“平均而言，当人们经历典型的短暂失业收入冲击时，他们不会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相反，他们会通过调整消费来解决信用卡债务和透支问题”。因此信贷需求是顺周期的，会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

[5] 例如，参见Autor et al.（2017，2019），Covarrubias et al.（2019），Crouzet and Eberly（2019），Philippon（2019）。

第6章

大逆转之下的（实际）利率

6.1 引言

我们研究的关键和核心结论是，人口结构和全球化的大逆转将导致更高的通胀。当通胀确实发生时，尽管需要好几年，预期便会调整，然后名义利率会上升。对此，我们十分确信。但是，更困难和有趣的问题是，名义利率上升是否会超过通胀，也即实际利率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相较于力求解释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内的实际利率变化，我们更应该关注全球因素。事后来看来，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储蓄必须等于投资，全世界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某个国家（比如中国）储蓄超过了投资从而导致经常账户顺差，根据定义，就会有另外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的储蓄低于投资从而导致经常账户逆差。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全球范围内事前储蓄与投资的动态，并把均衡利率看成是全球价格。

在分析实际利率的可能路径时，最大困难在于它包含了太多因素。例如，海瑟（Heise，2019）在《通胀目标制和金融稳定》一书中列出了四个类别的八种驱动因素（见表6.1）。

表6.1 实际利率的长期趋向在哪

驱动因素	对实际利率的冲击：小幅上涨
储蓄曲线的移动 · 人口结构：老年人口占比上升 · 新兴市场国家更低的储蓄	上涨
投资曲线的移动 · 私人部门去杠杆压力的减小 · 公共部门投资轻微上涨 · 无形投资依然重要	小幅上涨
投资组合的改变 · 对政府债券的监管偏好变化不大 · 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偏好不变？	不变？
生产率进步 · 信息和通信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	小幅上涨

资料来源：Heise (2019)。也可参见Brand et al. (2018), Rachel and Smith (2015)。

这里，我们分成六个部分展望未来实际利率可能的发展趋势。首先，我们在下一节讨论增长对均衡利率的决定作用。然后，我们将展望总投资和总储蓄在三个部门的趋势，首先是居民部门，之后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最后讨论公共部门应该做什么来平衡经济。接下来，我们会短暂偏离主题，讨论风险厌恶和非流动性厌恶（如果有的话）对无风险资产收益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否会（持续地）出现“安全资产”短缺现象。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讨论央行坚持2%的通胀目标是否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6.2 低迷的增长会导致实际利率保持低位吗？

在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关注增长率（ g ）和实际利率（ r ）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如果 r 超过了 g ，宏观调控就会变得困难。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乃至在许多国家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必定下降。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潜在产出增长和均衡实际利率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关系。劳巴赫和威廉姆斯（Laubach and Williams, 2003）的流行模型使用拉姆齐框架，并加入了一个同时影响潜在产出增长和均衡实际利率的长期因素。这个假设十分重要，使他们得出了估计期内实际利率的估计值。然而，这个假设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在一项旨在探究美国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汉密尔顿等人（Hamilton et al., 2015）发现，美国实际利率最显著的关系是：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利率联动。从1858年到2014年的数据看，与其他因素一样，增长的确很重要，但是没有表现出它是影响均衡实际利率的主导因素（也请参见Rachel and Summers, 2019，第11—12页；Rachel and Smith, 2015）。

从周期的角度看，我们推测，增长和利率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来自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下降之间的联系。相对于事前储蓄行为，实际利率的周期性下降与事前投资尤其是投资的波幅更相关。随着投资急剧下降至周期的谷底（而期望储蓄趋于稳定），利率也会如此变动。同理，在扩张期间合意投资相对于储蓄的增长也会导致更高的利率。这些周期性关系被（错误地）认为在更长期限上也成立。

6.3 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的分部门变化

相较于把增长视作均衡利率的决定因素，我们使用标准经典理论，在中长期（央行政策对短期利率的暂时性影响逐渐消散后），实际利率随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之差而变动，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率下降，反之亦然。1980—2015年这几十年来，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初步看主要是由事前储蓄大于事前投资造成的，但是这一情况很可能逆转。

6.3.1 居民部门：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鸿沟以及中国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变化对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有相同方向的影响。更慢的人口增长率会减少储蓄（假设抚养比不变），但是也同样会降低对资本、房屋、设备等的需求。然而，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劳动比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从而是提高还是降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随着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同向移动，界定两者之间可能的平衡变得更加棘手。在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居民储蓄行为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冲击解释了为什么储蓄会下降。

如果所有的退休消费都来自之前的储蓄，由于年轻一代受益于更高的终身收入，那么年龄—消费曲线应该是向下倾斜的，即年龄越大，消费越少。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会平滑消费，不会随年龄改变消费。目光短浅、对寿命的低估甚至会导致年龄—消费曲线出现更负的斜率。但事实上，数据（图6.1）说明了消费是平滑的，甚至随年龄上升。这必定意味着从工人到老年人的大

量转移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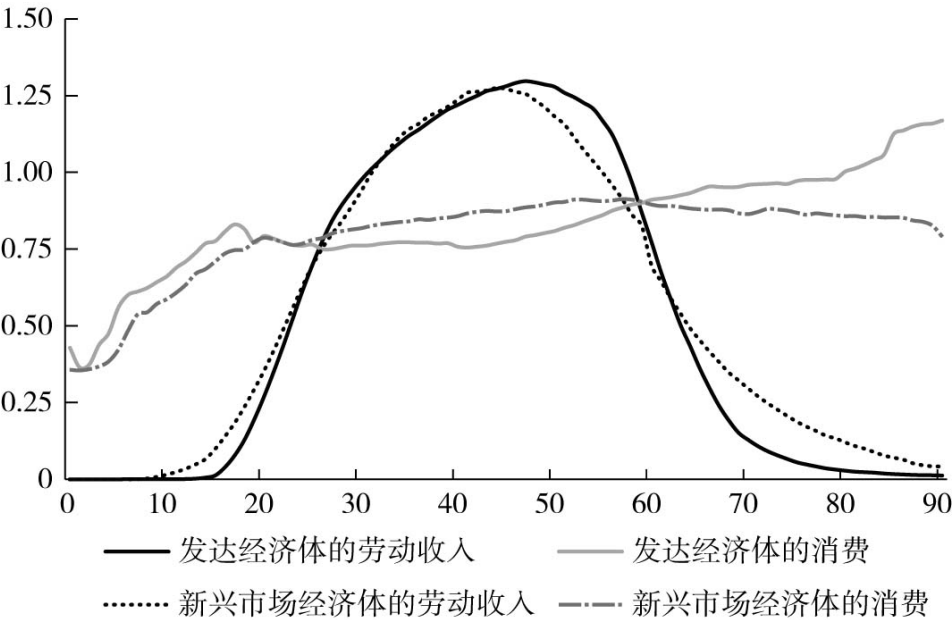


图6.1 消费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资料来源：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我们认为这由两点原因所致。第一，医疗服务消费逐渐主导了老年人的消费模式，尤其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图6.1显示了发达经济体的个人在生命尽头消费陡然上升）。这些资金大部分由公共部门免费提供（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美国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第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有社会保障措施，以防止没有积蓄支付医疗服务的老人陷入贫困（参见French et al.，2019）。

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安全网持续存在，这阻碍了储蓄随寿命成比例增长。尽管必然会对承诺做一定削减，但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或多或少会存在。这将融入人

们的储蓄习惯，阻碍他们为退休更多地储蓄。

医疗支出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上升（图6.2），而退休年龄却不能与寿命的增长保持同步。医疗支出和公共养老金转移支付（图6.3）会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社会老龄化而增长。迄今为止，除一些地区小幅提高退休年龄之外，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强制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方法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寿命会随着医疗进步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显著上升。其结果就是，寿命和退休年龄的差距随寿命的增加而变大（见图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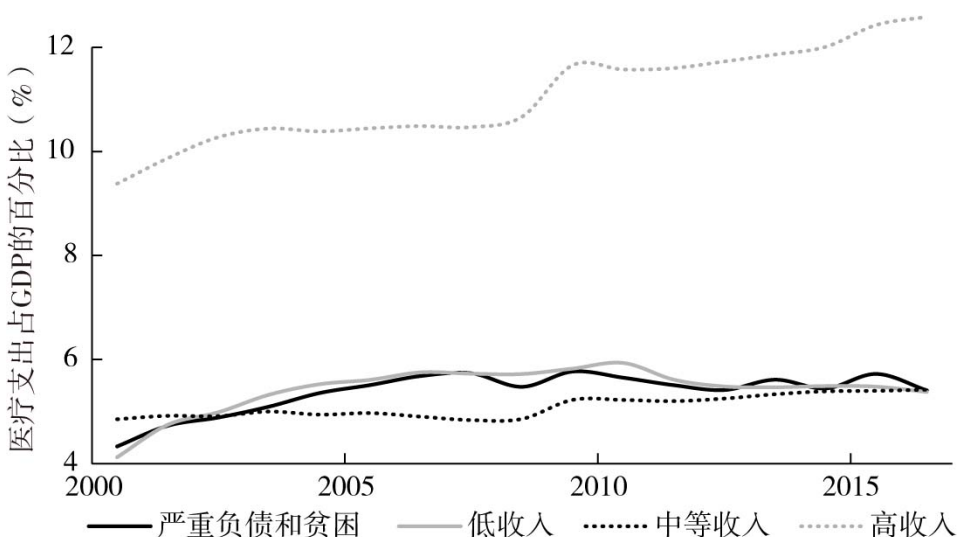


图6.2 全球医疗支出增长主要由高收入经济体推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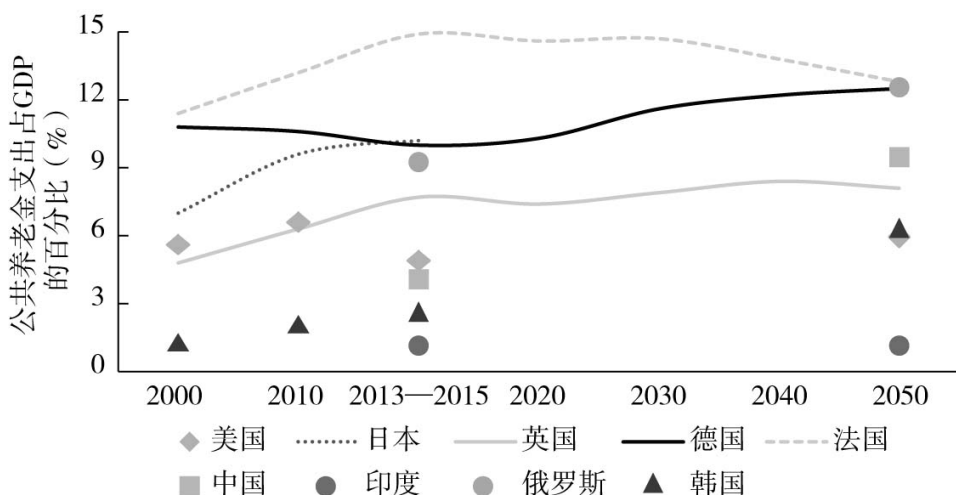


图6.3 公共养老金支出会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OE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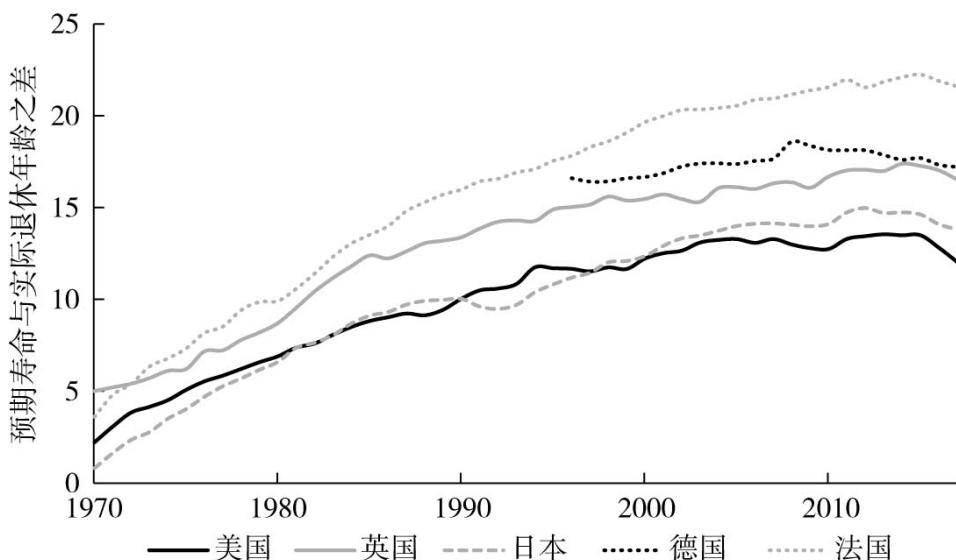


图6.4 发达经济体人口预期寿命和实际退休年龄之差正在增加

资料来源：OECD。

还有中国。中国的一切都体量巨大；如之前在第2章所说，它的人口动态已经并将继续值得关注，而且人口动态已经导致储蓄和投资比率发生超常变化。由于中国劳动力动态的转向，中国国内甚至国外的储蓄投资平衡都会随之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中国的超额储蓄减少。进入现代之前，中国的老年人（人数相对较少）在大家庭内得到照护。^[1]但是一孩政策实施过久，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个人需要为退休储蓄。再加上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是留存利润，而不是上缴利润，因此，超额储蓄率的原因显而易见。

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亚洲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欧美国家更高，但是，寿命的增长会提高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后果就是居民部门储蓄率的下降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事实上，如第2章提到的，这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老龄化也会减少石油出口国的超额储蓄。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给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价格带来了上涨压力。大部分石油都是由人口稀少的地区生产的（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和挪威）。随着中国增长的放缓和从石油燃料向新能源的转变，石油生产国的总储蓄会下降，经常账户顺差很可能会消失。

事实上，有经常账户顺差（有巨额净储蓄）的国家要么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德国），要么其相对优势正在减少（石油生产国）。

中国的总资本和私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与房地产或房地产相关的基础建设有关。许多人预测：随着人口增长减缓，对住房的需求会急剧下降。但是，这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偏好。由于

国家变得富有，老年人会居住在现有的房子里而不是已成年的后代的房子里。搬家很麻烦，而且如第5章所说，作为房主的老年人更没有激励重新安顿。随着年轻一代长大并取得经济独立，他们不会搬进老人们腾出来的房子里，而是会搬进未来新建造的房子里。我们认为，人口向更多老年人和更少工人发展的趋势，会扩大而不是减少对房屋储备的需求。这将支持对住房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社会行为会改变吗？老人会卖掉自己的住房和子女住在一起吗？这当然会发生。但是，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对于后者，打破固有的社会习俗需要人口压力不断加剧，在这之前很难有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6.3.2 非金融企业部门将如何应对？一个棘手的故事

人口结构冲击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对企业部门的表现，存在两个极端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企业部门在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时会减少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下降。我们的观点是企业部门更有可能通过投资来补偿劳动力的减少，也即增加资本劳动比。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会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

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资本成本会下降。我们想不出来在其他历史时期，这两个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会如此清晰地反向运动。在人口结构推动工资上涨之前，资本的价格早就开始下跌了。当工资上涨时，由于资本品的低成本，对昂贵的劳动力进行资本替代会变得相对容易。由此造成的生产率提高会以某种方式减缓工资上涨和通胀上升。储蓄和投资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这种反应的另

一种角度。由于资本品极其便宜，积累一定量的资本只需用上经济体中少量的储蓄。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不足并减缓利率和工资的上升。

石油冲击的历史教训为这种替代提供了证据。许多经济体的制造业在经历了投入品价格的正向/负向冲击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劳动比。1972—1988年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油价上涨冲击造成了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消亡。随着美国经济对当时和未来油价波动做出强烈的自我保护反应，工厂、就业和工资都萎缩了。相反的效应可以在能源净生产国看到。俄罗斯石油依赖型经济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空心化，充分说明了这一转变。

我们完全相信科技进步会显著提升生产率，因此会限制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但是我们更倾向于选择不可知论的视角，因为我们在预测创新速率方面没有特别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有关技术的讨论是否关乎创新速度，也不能辨别它是否被恰当地记录在统计数据中。例如，戈登（Gordon，2012）认为美国的生产率从1973年就开始下降，并且不太可能回升。但是莫克尔等人（Mokyr et al.，2015）认为，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记录科技进步，因此具有误导性。由于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解决，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对此抱持不可知的态度。

从结构上看，把制造业迁移到国外依旧处于早期阶段，并且直到最近，还是一个可行且吸引人的选项。人口大逆转及其导致的工资增长还没有影响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日本、中国和韩国，人口结构的压力虽已显露，但是仍处于相对较早的阶段，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有明显的工资压力，这三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萎缩。

就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新的资本支出周期已经在日本显现。中国和韩国仍然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不会出现这种反应。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两个方面和日本相似：（1）劳动力会变得昂贵，甚至在绝对和相对的层面来看都会变得更贵；（2）制造业既没有经历资本支出的大幅增长，也没有经历新兴市场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的增加。因此，发达经济体更有可能对人口大逆转表现出接近日本近期的反应，而不是中国和韩国的反应（同样也会经历日本之前的反应）。

从周期的角度看，企业为什么要储蓄而不是投资，这有点令人费解（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很可能的原因是，全球过剩产能正在缓慢出清，而同样缓慢的需求增长阻止了企业向实体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早期变化的迹象，这些国家的资本品进口（投资的一个领先指标）五年来首次回升。但重点还是美国投资周期的重启。到目前为止，美国企业部门更倾向于通过杠杆回购股票来提高资产净收益率（ROE），并且通过雇用更多工人来提高产出。如果工资增长像最近那样开始蚕食企业利润，那么企业应该会有更大的意愿进行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并保持盈利能力。这一经济逻辑是否足以启动投资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利率上升或者利润率下降都会使大量高杠杆公司的偿付能力面对巨大压力。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它们不得不在短期内大幅削减投资以自保，从而使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本书第11章的债务陷阱以及卡莱姆利-厄兹坎等人的研究（Kalemli-Özcan et al., 2019）。

总之，各种潮流和趋势使得描述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投资储蓄平衡让人头疼。

6.3.3 公共部门会做何反应？

在前两小节和第5章中，我们说明了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会比投资率下降更多。私人部门会因此从盈余转向赤字，根据定义，为了让整个经济达到平衡状态，公共部门会由赤字转向更多盈余。

但是如前面章节所讲的，由于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加，公共部门转向盈余会变得十分困难。减少支出和提高税收在政治上永远很难做到。

到目前为止，利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前景使得财政部长不愿意在世界储蓄率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超出事前投资（伯南克的“储蓄过剩”）的时候，让赤字上升到出清经济的地步。同理，我们认为未来财政状况很可能不会强劲地转向盈余从而抵消我们预计的私人部门赤字。

因为在过去30年里财政赤字不足以平衡经济，央行不得不降低利率配合财政部，它们别无选择。[\[2\]](#)同样，在未来，由于公共部门不会储蓄太多，我们预计实际利率为了起同样的平衡作用而会上升。

6.4 风险厌恶和安全资产的短缺？

在近几十年来许多揭示实际利率下降原因的研究中，侧重点放在了风险厌恶和追寻安全资产上；事实上，大量文献与卡瓦列罗（Caballero, 2017）的工作有关，它们认为安全资产短缺的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欧洲央行（ECB）的研究《自然利率：估

计、驱动因素和对货币政策的挑战》(Brandet et al., 2018, 第5页, 以及第16—20页专栏2)认为,“风险厌恶和对安全资产的追求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后利率进一步下降”。

在此期间,央行在它们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加入了大量无风险债券。违约和重组的潜在可能使得许多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债券更具风险。有一种观点认为(例如上述这些作者,还有Marx、Mojon和Velde 2019年的文章《为什么利率远在资本回报之下?》),一直以来,风险厌恶和流动性偏好加大了资本回报和无风险利率的差距。因为对资本的回报率要求很高,所以阻碍了投资,为了使宏观经济出清,必须降低无风险利率。

我们不相信这些观点。如果存在对流动性的担忧,那么低风险债券和高风险债券的收益率差距应该扩大,AAA级和BBB级公司债券收益率之差理应上升。表6.5显示了2006—2018年收益率之差,它在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上升,之后持续下降到现在的低水平。事实上,近几年货币政策的重要目的和特征就是鼓励经理人通过追求收益率来承担更多的风险,证据就是这些政策达到了其目标。雷切尔和萨默斯(2019,第2页)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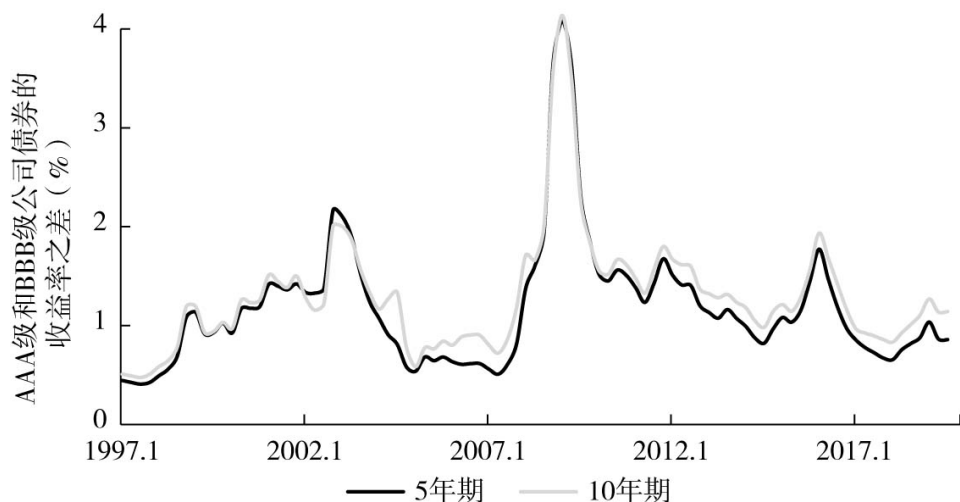


图6.5 AAA级和BBB级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之差

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这依然没有解开“资本回报率相较于无风险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我们认为，资产估值的上升是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自然结果；当利率下降时，资产价格必须上升，以使持有这项资产的风险调整的未来预期收益与无风险利率保持一致。所以不能用资产价格的变化来说明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导致了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利润率、资产价格这么高，利率如此之低，也没有带来更多的企业投资需求呢？我们认为，这与风险厌恶无关，而与企业经理最大化短期净资产收益率的行为有关。我们会在第11章深入探讨，同时可参见史密瑟斯（2009，2013，2019）的研究。

6.5 政治压力

我们的另一个主题是：过去30年来政客和独立央行之间融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对立。在过去30年里，央行行长一直是财政部长的老朋友。持续下行的利率完全抵消了债务率急剧上升带来的负担。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并且会让双方的日子更加难过。在增长前景不变时，名义利率上升某种程度上会恶化财政赤字，而节节攀升的负债率会使财政部长和首相更加棘手。此外，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上升，意味着保持通胀目标会使企业部门和宏观经济陷入更大的违约和衰退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但不仅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压力会变大。我们会在第13章进一步讨论，欧洲以外的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实际上相当有限。因此，各国央行不可避免地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灵活，它们抵御政治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

6.6 结论

短期利率由官方法令规定，至少短期内是这样，而长期利率更多由市场力量决定。我们认为，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短期利率在未来几十年很有可能持续低于观察到的通胀水平。然而，随着这个令人不安的新世界日益临近，长期利率将开始上升并很可能超过现有的通胀率。所以，我们的一个结论是，目前异常平坦的收益率曲线很可能会变得急剧陡峭。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对冲我们的赌注，意味着真实短期利率会继续保持低位，但是如10年期利率这样的长期利率的真实水平有可能上升。

[1]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大约90%的老人仍然依赖家庭护理，7%接受社区护理服务，3%入住养老院。

[2] 雷切尔和萨默斯（2019）认为最近的财政赤字是中性实际利率上升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如果财政赤字减少，利率将会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错的，如果财政赤字过低，就无法阻止利率的大幅下降。

第7章

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7.1 引言

过去30年的突出特征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在随后迅猛发展，这将一个人口稠密、劳动力贫困但受教育程度较高、治理和组织相对高效^[1]的国家与拥有更高技能水平、更多财富和资本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来了宏观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功：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了技术、管理和资本，而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了廉价商品。

从2000年左右起，以中国为首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增速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在之前两个世纪全球不平等水平的稳步上升，并不是由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的，而是因为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Milanovic，2016，第3章）。更早的时候，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实际收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亚洲和非洲的实际收入却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你在全球收入分布上的位置更多取决于你的出生地（即哪个国家），而非你父母的身份。

除了中国大陆及其周边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的农民和

工人阶层，过去30年的主要受益者还包括那些拥有优秀技能和资历的人、管理阶层以及拥有财富并能用于投资的人。正如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阐述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中国效应”）与高度有利的人口趋势相结合，带来了最近几十年来有效劳动力供给的空前增长，某些地区30年内劳动力供给的涨幅甚至超过一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为激增的劳动力供给提供管理监督、技能和设备的人注定能获得繁荣。

但是输家依然存在，也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下层中产阶级。正如我们将在第7.2节和第7.3节中看到的，他们的灾难不仅来自全球化的竞争和中国更廉价的产品，还来自技术进步。米兰诺维奇著名的大象图（他书中第11页的图1.1）描绘了这些因素。

在这两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中失败得如此彻底。考虑到全球化和人口趋势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整体益处——1988年至2008年是最好的20年，经济增速高，就业增长快，通胀率低而稳定——赢家本可以弥补输家的损失（Kaldor/Scitovsky界定的福利标准）。然而，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衰败的“锈带”，蔓延至城镇、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工人群体。

工人的数量远多于资本家。如果广大工人阶层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感到不满，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动变革。在第7.4节中，我们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这种不满情绪主要体现为对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非更多地支持（更传统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初探我们主要的答案，一个关键因素是左翼领导人与其传统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左翼领导人主要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政党通常得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移民的支持；他们倾向于对外来移民施以宽松的管

制。相反，典型的蓝领工人将移民视为竞争者，认为他们部分抑制了工资增长，并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右翼政客则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例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夺回控制权”等主张），反对大规模外来移民，这种立场引起了许多蓝领工人及其家人的共鸣。

7.2 不平等

尽管随着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大幅降低，全球不平等水平开始下降，但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有所上升，且其中许多国家的不平等上升幅度非常大，扭转了从1914年至1980年左右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趋势。因此，早前那个蕴含在库兹涅茨[2]曲线中的假说遭到了驳斥。这一假说认为，经济发展起初会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达到峰值后会下降。首先，我们将梳理这方面的变化情况，然后在第7.3节中讨论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原因。

主要的数据库有两个，即世界银行的PovcalNet数据库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在众多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中，我们最初选择了四个（它们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势）：（1）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基尼系数[3]（见图7.1）；（2）部分国家收入前10%和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见表7.1和表7.2）；（3）财富前10%群体拥有的财富占比（见表7.3）。对于以收入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巴西、印度、埃及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每五年的数据。对于以财富衡量的不平等指标，我们列出了美国、中国、英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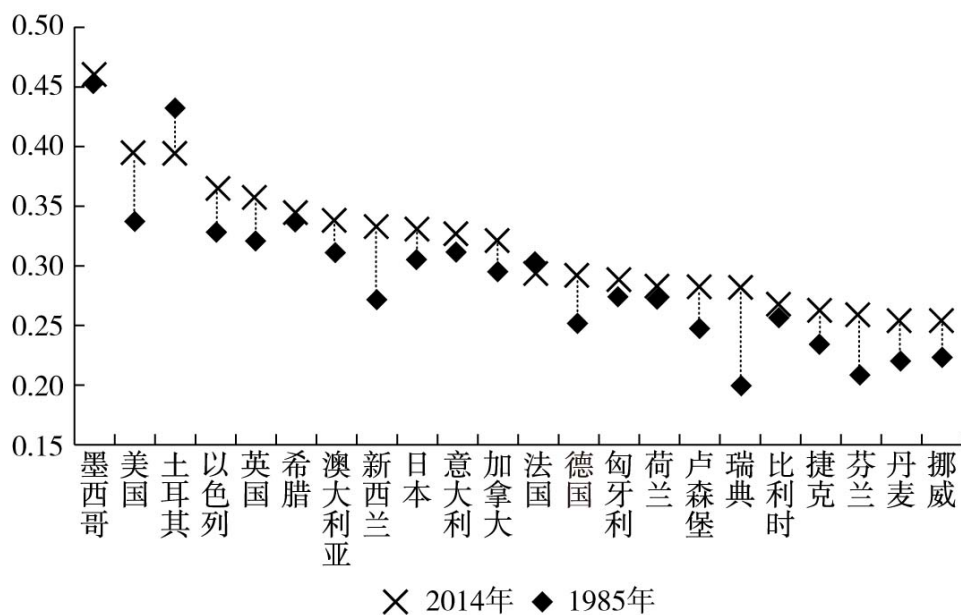


图7.1 OECD国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Rachel and Summers (2019)。

表7.1 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美国	0.39	0.41	0.44	0.45	0.46	
中国	0.30	0.34	0.36	0.42	0.43	0.41
德国		0.32		0.39	0.40	
英国	0.37	0.39	0.41	0.42	0.38	
法国	0.32	0.32	0.33	0.33	0.33	
日本	0.39	0.36	0.38	0.42	0.42	
瑞典	0.22	0.26	0.26	0.27	0.27	0.28
巴西				0.55	0.55	0.56
印度	0.33	0.38	0.40	0.45	0.52	0.56
埃及	0.51	0.51	0.51	0.49	0.46	0.49
意大利	0.26	0.28	0.29	0.29	0.29	0.29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表7.2 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美国	0.15	0.15	0.18	0.19	0.20	
中国	0.08	0.09	0.10	0.14	0.15	0.14
德国		0.08		0.13	0.13	
英国	0.10	0.11	0.14	0.14	0.13	
法国	0.09	0.09	0.11	0.11	0.11	
日本	0.13	0.09	0.09	0.11	0.10	
瑞典	0.05	0.08	0.07	0.08	0.08	0.09
巴西				0.28	0.28	0.28
印度	0.10	0.13	0.15	0.19	0.21	0.21
埃及	0.19	0.19	0.19	0.18	0.17	0.19
意大利	0.06	0.07	0.08	0.08	0.07	0.07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表7.3 财富前10%人群的财富占比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美国	0.64	0.66	0.69	0.67	0.73	
中国	0.41	0.41	0.48	0.52	0.63	0.67
英国	0.46	0.47	0.51	0.51		
法国	0.50	0.51	0.57	0.52	0.56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最新数据显示，在以上这些国家中，瑞典和意大利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而巴西和印度最高。中国、德国和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增幅最大，而日本增幅最小。

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中仍包含让人稍感安慰之处，即大多数国家中最贫困的20%人口（家庭）的税后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持续受到诸如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法和医疗支持等政策措施的保护。此类政策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较少，在欧洲和日本更多。

格博豪等人（Gbohoui et al.）在他们的论文《大鸿沟》以及《区域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中指出：

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已帮助减缓了国家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一趋势（IMF，2017；Immervoll and Richardson，2011）。对于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平均再分配效应（用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家庭收入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再计算二者间的差距）接近1/3（2015年，以市场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9，而以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31）。大约3/4的再分配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而累进税制贡献了剩余的1/4。在所有家庭收入类别中，福利金和转移支付比税收和社保缴费更有助

于缩小不平等。

虽然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从全国范围看仍然很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效果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已有所减弱。即使没有积极的政策措施，累进的财政政策也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提供了一种自动对抗机制，但近年来财政政策的再分配作用呈持平状态（在许多欧洲国家）或有所减弱（例如在美国）。在过去10年中，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再分配效应（以征税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的差距表示）已从53%降至约50%。这再次印证了先前的发现，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10年中期，财政的再分配作用减弱了（Immervoll and Richardson, 2011，见图7.2）。

造成这种不平等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已经在第3章中进行了讨论，即在这30年中，资本回报的趋势性增长远比实际工资的增长强得多。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回报与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同步上升。与之相对的是，依靠肌肉力量和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得的回报却停滞不前（见图7.3，美国数据取自Autor, 2019，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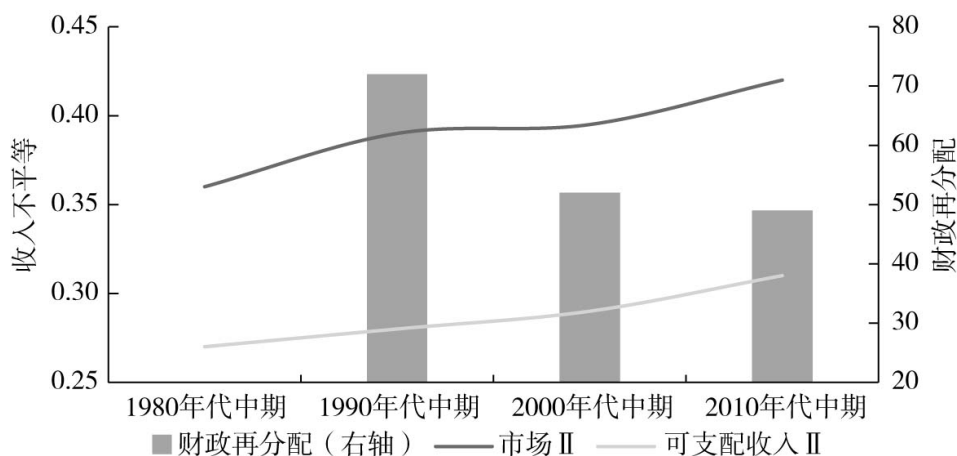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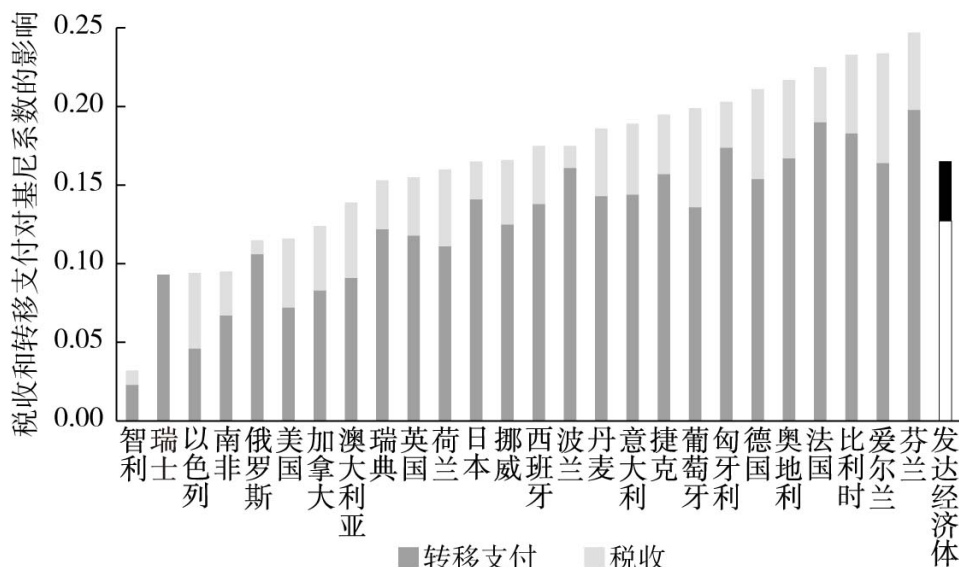


图7.2 财政再分配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正在下降

资料来源：OECD，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Immervoll and Richcordon（2011）。

所有这一切的含义是，最贫穷的人得到了保护，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回报相对于非技能或中等技能工人的回报在飙升，下

层中产阶级，即收入分布位于20%~70%区间的人受益最少。这种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中等技能的岗位相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岗位有所下降（见图7.4），从而迫使那些无法提高人力资本的下层中产阶级回归技能含量更低的职位（参见Autor，2019，第10页图5；Borella et al.，2019）。[4]美国有关这一现象的记录最为详尽，但我们认为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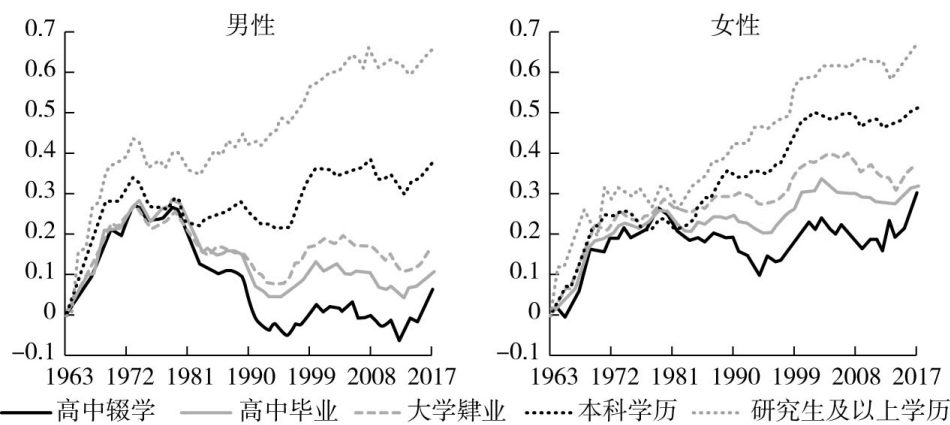


图7.3 1963—2017年，18~64岁（劳动年龄）劳动者实际周收入的累积变化

资料来源：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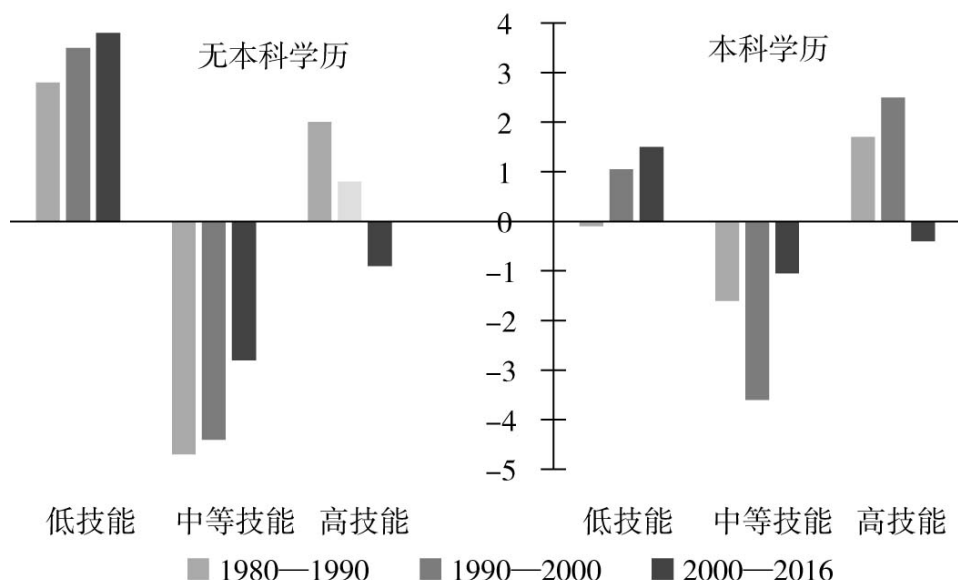


图7.4 1980—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份额变化（按职业划分）

注：低技能包括卫生、人力、运营、劳工、清洁和安保等；中等技能包括生产、职员、行政、销售等；高技能包括专业职业、技术、管理等。

专栏7.1 最低工资标准

对工人从中等技能岗位转向低技能岗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零工经济中工人议价能力丧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很可能是近期推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因素。在发达经济体中，以下国家最近提高或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

英国：2019年4月1日起，适用于25岁及以上工人的国家法定薪资（NLW，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4.9%至每小时8.21英镑。更年轻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幅也超过了通胀率和平均收入增速。

加拿大：2017年最低工资增长13%，涨幅创历史新高。过去几十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3.5%。

德国：近期引入最低工资标准。

在新兴经济体中，以下国家的政策变化值得关注：

波兰：执政党提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近80%！这一涨幅分五年完成，从2020年上涨15.6%拉开序幕。最低工资年均上涨6%（自2010年以来）。

匈牙利/捷克：过去几年最低工资增长强劲（两国都平均增长11%）。

墨西哥：最低工资2018年上涨10%后，2019年又提高16%。尤其是在距美国边界25公里的各个城市，最低工资上涨95%！

俄罗斯：过去两年最低工资年均增幅为31%，而过去七年年均增幅为5%。

韩国：2017年最低工资增加11%，2018年增加16%。此外，法定周工作小时数还有所缩短（从约60个小时降至50个小时）。

7.3 不平等上升的原因

对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恶化趋势，至少有四种解释：

（1）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

- (2) 技术变革；
- (3) 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
- (4) 全球化和人口趋势。

我们将逐一讨论。

7.3.1 不可避免的趋势性因素

对这一阵营的作者来说，反常的是1914年至1979年这段时期，许多国家（或许是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普遍改善。他们认为这主要是一系列特殊因素的结果，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战后通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格/租金控制，都暂时抑制了不平等的加剧。皮凯蒂（2014）认为，这是因为资本回报（ i ）通常被理所应当地假定为高于经济增长率（ g ）。舍德尔（Scheidel，2017）认为，这是因为强者始终欺负弱者，除非受到天启、战争、瘟疫或叛乱“四骑士”之一的阻止（另请参见 Durant，1968，第8章）。[5]

尽管我们无法反驳这种悲观的原教旨主义，但我们并不相信它。我们不认为皮凯蒂式的不平等是必然或自然成立的，在我们眼中，人类的本性、特征和未来也不像舍德尔宣称的那样黯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下面三种解释更有其长。

7.3.2 技术变革

正如奥托的研究表明的，技术进步无疑已经消除（或大大减少）了对某些类别（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速记员和法律文员

已经消失，秘书正在消失，焊工也正被机器人取代。GPS（全球定位系统，在英国是卫星导航SatNav）出现之前，在伦敦这样街道非常复杂的城市，出租车司机必须认真学习地图并通过考试（这一考试被称为“知识”）才能拿到执照。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此类资质的情况下当优步（Uber）司机。的确，手机上的谷歌地图软件正在削弱人们使用和阅读地图的能力。

但更大的问题是，技术对单个工种的显著影响能够多大程度上解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增长的整体相对停滞？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劳动节约型技术是主要原因，那么生产率的增速应该比过去20年的实际增速更快。但是，如果维持总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主要作用于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和零工经济呢？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分析此问题。为什么技术发展会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在总体失业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相关的总工资或价格会更低？与先前在中等技能领域工作过的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零工）的议价能力和工会组织可能更少。或许的确如此，但这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这些问题与雇员和雇主、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对议价能力直接相关。

7.3.3 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

有大量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私人部门中行业集中度和垄断力量一直在增强（请参见Stiglitz，2019，特别是第3章和与之前文献相关的脚注；Philippon，2019）。这种行业集中往往会在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参见Stiglitz，脚注20列出了有关该主题的过往文献）。通常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其

他发达经济体也有类似情况，但我们假设确实如此。

尽管这种额外的集中或垄断力量很可能是高利润率和低固定投资（至少在美国）同时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尚不清楚这一因素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位置。但是我们“再次”指出，若雇主的力量相对于雇员更大，为了获得相同的实际工资增长，劳动力市场必须变得更紧，自然失业率必须更低。

[6]但是，尽管作用方向似乎很明确，试图估计垄断和行业集中度提高对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总体影响仍然非常困难。

7.3.4 全球化和人口趋势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了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的经济影响，所以在此仅简短阐述。但是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在此需要重申雇主可利用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部分来自进入国内的移民，部分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生产获得（参见Boehm et al., 2019）。这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力及其工会的相对议价能力，因此在降低实际工资增长和自然失业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rueger, 2018）。

因此，有三种不同力量，即技术变革、集中化或垄断、全球化或人口变化共同导致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定量估算这些因素的相对影响很困难，缺乏相应的技术，但是我们仍尝试给出一些哪怕是主观的测度。如果导致工资增长疲软或劳动收入占比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认为是的全球化或人口变化，那么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逆转。如果主要诱因是技术进步，那么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诞生，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此外，未来私人部门的集中度或垄断是增强还是减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公共政策，往任一方向变化皆有可能。

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变动（第1章和第3章）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空前激增，进而导致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急剧下降（第5章）。若果真如此，皮凯蒂就成了历史。当然，我们有可能是错的。

7.4 民粹主义的兴起

过去30年，虽然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一起蓬勃发展，但与下层中产阶级相比，这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数量要少得多。尽管我们认为最贫穷阶层已经得到了政策措施较为合理的照顾，但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和劳动者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升，与此同时，老板们公开获得了令人垂涎的以百万美元计的薪酬。在大多数发达国家，CEO（首席执行官）与其麾下普通工人的薪酬比值一直在飞速上涨，仅日本存在部分例外。近几十年来，该比值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见图7.5和图7.6）。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并不公平，尤其是即使公司破产了那些管理公司的人也能全身而退：他们不仅怀揣着累积的巨额财富，还能在未来领取超丰厚的养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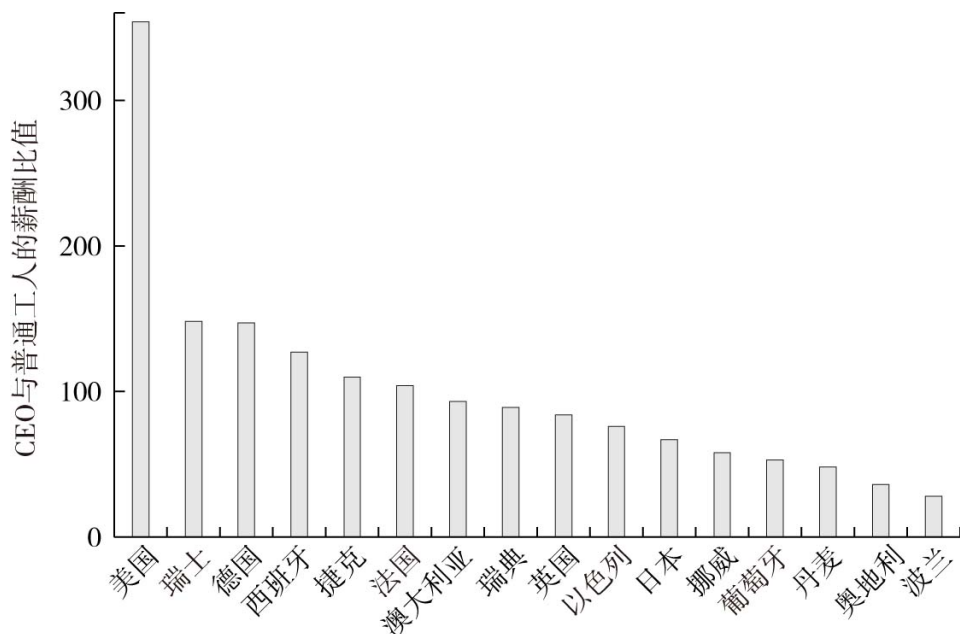


图7.5 2014年不同国家CEO与普通工人的薪酬比值

资料来源：《华盛顿邮报》，2014年9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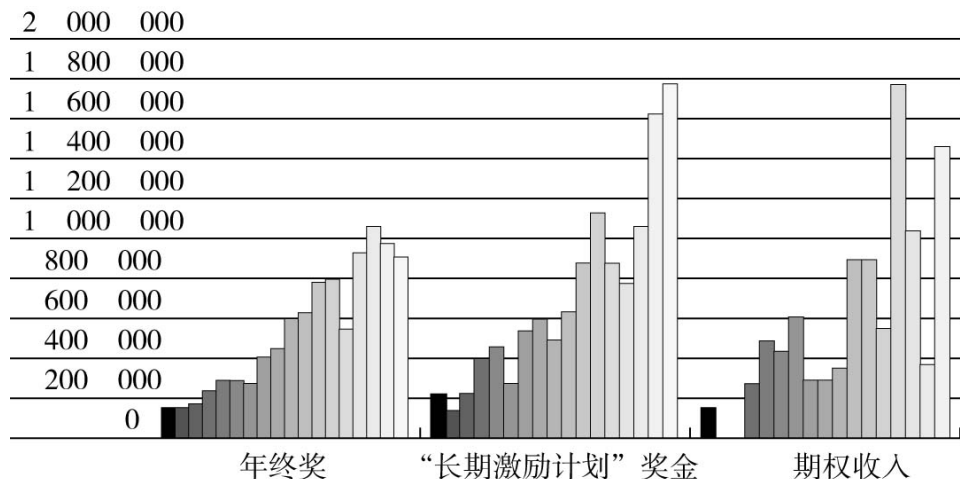


图7.6 富时100强主管的现金奖励中位数（1996—2013年，英镑）

资料来源：High Pay Centre。

全部薪酬通常包括除基本工资之外的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计划”奖金（LTIP）。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工资增长水平一直维持稳定，但与绩效挂钩的部分大幅度增加，促使同期总薪酬迅速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那些在过去30年中相对失利的人会在选举中投票支持本国的左翼政党。毕竟，这些政党建立的目的通常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提升他们的福利。尽管在拉丁美洲确实如此，但这种现象在欧洲和美国尚不普遍。相反，在欧洲国家，受损的阶层主要转向支持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此类例子俯拾皆是：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的国民议会（Rassemblement National）、德国选择党（AfD）、匈牙利的欧尔班（Orban）、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等等。有关此趋势的精彩讨论，请参见罗德里克的研究（Rodrik，2018）。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对待移民的态度”。左翼政党的政客和活动家通常是理想主义者，是支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者，对国籍、种族、性别或其他任何标签均一视同仁。请注意，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全球化实际上促进了全球平等，尽管它对单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如德斯梅特等人（2018）强调的，他们的“结果表明，充分开放移民将使社会福利增长三倍”。此外，移民一旦进入选民名册，通常会支持左翼政党。因此，与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更难推出严控外来移民的议案，而右翼政党更多地强调爱国民族主义和维护当地文化的优点。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全球化将工作外包出去给下层中产阶层带来了更多不利影响，但工人往往只看到外来移民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外来移民是否对当地工人的工作和

工资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在专业研究中尚存在争议 [例如 Mayda (2019) 指出了其有益影响] ，但细微的个人体验会胜过长篇累牍的专家建议。此外，推动舆论的往往是对增加移民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担忧，而非其实际情况。因此，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支持率与每个选区的移民数量负相关，但与近期移民数量的百分比变化正相关。于是，即使实践中人们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相对平稳地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种族差异，对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担忧会主导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的意见，尽管科莫佩等人 (Comertpay et al. , 2019) 认为，在欧盟，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是年龄的U形函数。

专栏7.2 公众对移民的反对

以下列出的一些示例，来自罗尔夫 (Rolfe , 2019 , 第 R1页，也可参见Bratsberg et al. , 2019) ：

在欧盟自由流动的原则下，雇主可以轻松地招募到欧盟移民，因此通常认为雇主更愿意招募移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降低当地人的工资，并以此代替培训。但研究一致表明，这些假设缺乏证据支持 (George et al. , 2012 ; Rolfe et al. , 2018 ; MAC , 2018) 。

此外，罗尔夫等人 (Rolfe et al. , 2019 , 第R5页) 发现：

媒体和公众间的辩论都会反映在民意调查结果中，结果显示，(移民的) 经济影响持续受到高度关注，与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受到的关注度持平。然而，移民咨询委员会 (MAC , 2018) 最近给出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些担忧。没有证据能证明移民使当地人的就业前景或平均工资整体降低

了，虽然低薪和低技能的当地人的就业和工资受到了影响（但也非常有限）。移民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对公共财政产生积极影响，而担心移民对公共服务存在潜在负面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移民通过增加创新等方式，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其他“文化”因素也被认为是公众反对移民的原因（Hainmueller and Hiscox, 2007, 2010; Kaufmann, 2017）。无论是单独还是放在一起考虑，无论是否基于证据，这些因素都导致人们不再支持欧盟的自由流动原则。

现有数据显示，英国公众普遍反对移民。历史上，人们已认定移民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是消极的，而且民意调查的结果持续表明，英国公众希望减少移民数量（Ipsos MORI, 2018; Duffy and Frere-Smith, 2014）。

确实，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大大高估了移民人口中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比例（Blinder, 2015, 引自Rolfe et al., 2019, 第R10—R11页）。

因此，与左翼政党更广泛包容的立场相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关于移民、加强民族主义的立场同被甩在后面的社会成员的基本观点更加一致。目前尚不清楚未来这种政治观点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是正确的。全球化是近几十年中导致他们生活更加困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更强的政党当权，可能会极大地阻碍全球化前进的车轮，甚至导致历史倒退。尽管这一趋势叠加前文描述的人口变化将使各国掉队的群体相对受益，但与此同时，它将对世界增长和平等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并导致国家和地区间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

找出问题所在很容易，但要摆脱这种正困扰美国和欧洲政治体系的混乱局面则要困难得多。

[1] 参见德斯梅特等人（Desmet et al., 2018），我们认为，对刺激创新和提升劳动生产率而言，高人口密度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将在第10章中以印度和非洲为例进一步讨论这一话题。

[2] 库兹涅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曾作为实证经济学家在哈佛大学工作。在1960—1961年，本书作者之一古德哈特曾短暂担任过他的研究助理。

[3] 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一种统计分散度的指标，旨在表现一国居民收入或财富的分布，它是最常用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数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来自从政府统计机构和世界银行驻各国分支机构获得的家庭调查数据。若想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和计算方法，请参阅PovcalNet。0代表绝对平等，而1代表绝对不平等，因此数值增加意味着不平等加剧。

[4] 奥托还表明，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流失越严重（Auto, 2019，第13—15页及图6），即中等技能工作流失的比例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最大。为什么如此，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也如此，这一点尚不清楚。Bayoumi和Barkema（2019）认为，更高水平的不平等和更高的住房价格减少了美国的内部移民，从而导致陷于衰败地区的人们处境恶化。

[5] 这里指威尔·杜兰特的名著《历史的教训》。作者在该书第8章“经济与历史”中指出，从人类历史看，财富集中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暴力或和平的再分配方式实现周期性的缓和。——译者注

[6] 参见克鲁格在堪萨斯联储“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讨会上的午宴致辞（Krueger, FRB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2018）。

第8章

菲利普斯曲线

8.1 引言：历史的发展

菲利普斯曲线揭示了失业率与工资或价格的关系。当失业率较低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工资或价格会快速上涨。当失业率更高时，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工资或价格就会下降（参见Phillips，1958，尤其是第258页图1对应的1861—1913年和第294页图9对应的1913—1948年）。

事实上，相同关系可以用就业率（可简化为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失业人口）与工资或价格表示。在早期的凯恩斯分析中，这种关系被认为表现出反L形曲线（如图8.1所示），工资或价格保持在现有水平不变，直到劳动力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被雇用。一旦发生，超额的劳动力需求就不得不表现为更高的价格，之前的水平方向上的关系，在达到那一点后会变成竖直方向（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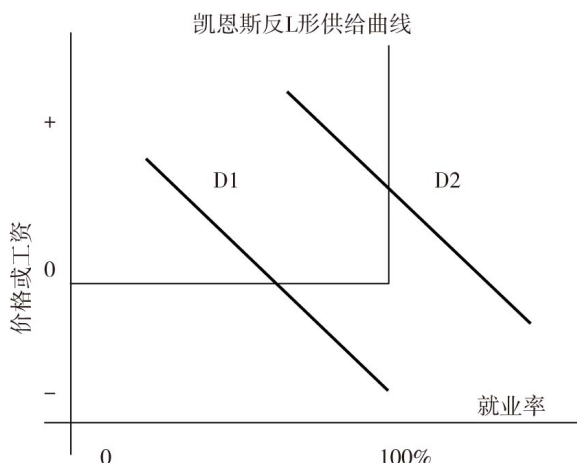


图8.1 凯恩斯反L形供给曲线

上述方法在当时不像现在看来那样过于简化。英国的工资或价格从1815年到1914年大体保持不变。那些短期波动主要是由农业收成的变化造成的，而长期趋势可以归因于全球因素，比如开拓北美（降低了食品成本）和发现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缩而不是通胀，又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趋势。在当时，通胀似乎是由战争和其他政治动乱造成的。凯恩斯在写《通论》时，焦点问题是如何恢复并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控制通胀。

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二战之后至少到21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同时取得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当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就业恢复更多归功于重整军备和二战，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最主要的担忧是发达经济体陷入停滞/通缩的泥潭。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通过凯恩斯需求管理来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的观点才被认可并广为流传。

但是，凯恩斯的反L形曲线显得过于简化了。由于产业和劳动的异质性，经济遭遇瓶颈时对应的总需求压力是不同的。总体上说，宏观经济中失业/就业与工资率/通胀率的关系显然应该是曲线状的，而不是固定的或角点状的。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应运而生。很快，在行政部门尤其是财政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找到了他们工作的目标：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帮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管理需求，达到菲利普斯曲线上可以最小化失业和通胀二者带来的政治负效用的点（见图8.2）。

从朝鲜战争到1973年左右是宏观经济学第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大型计算机（由IBM制造）使得我们可以构造能够量化经济的模型。良好的增长、高就业率和不太高的通胀率，（我们一度认为）这种状况或多或少可以通过操控菲利普斯曲线来同时实现。在那个时候，宏观经济学家开始觉得可以使用工程式的蓝图来引导经济走向最优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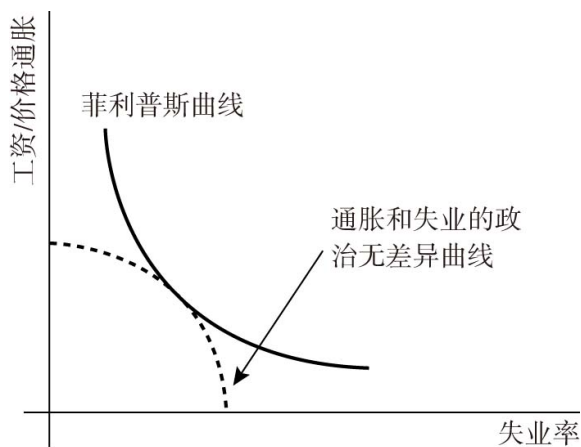


图8.2 在菲利普斯曲线上达到政治最优

20世纪70年代，事情变糟了，就像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黄

金时代（1992—2008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变糟了一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失业和通胀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向右上方移动，70年代这一状况出现显著恶化，我们同时面对持续的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即所谓的“滞胀”（见图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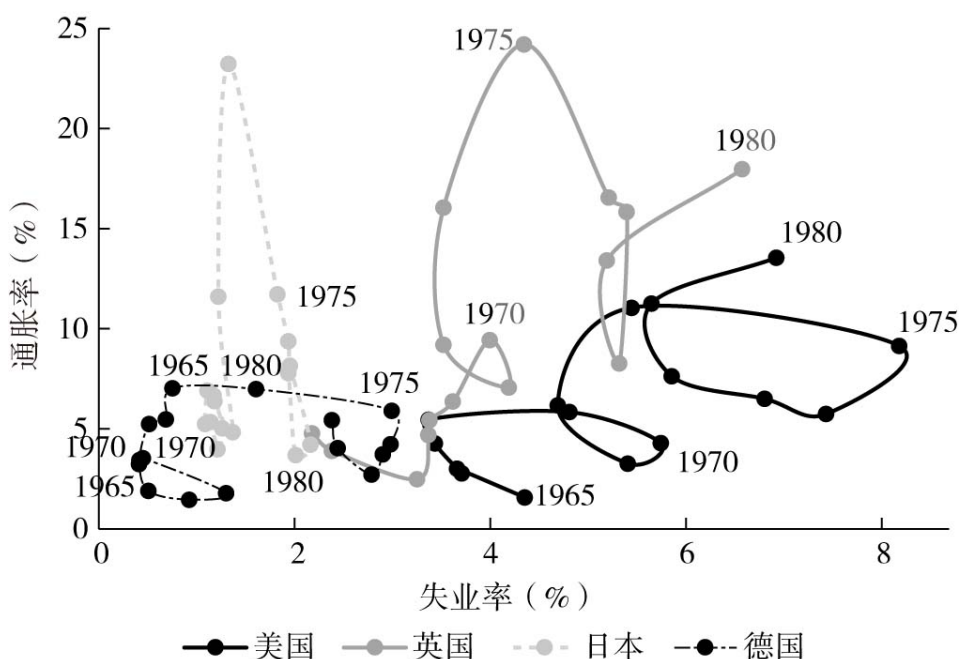


图8.3 发达经济体的滞胀率

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20世纪40年代之前，除了战时，价格预期保持稳定。但由于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心有余悸，以维持高就业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需求管理开始导致经常性通胀。1955—1970年5年期的平均通胀，见表8.1。

表8.1 1956—1970年恶化的通胀率（单位：%）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1956—1960	2.1	2.8	6.7	1.6
1961—1965	1.3	3.8	4.0	6.6
1966—1970	4.6	5.0	4.6	5.9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当然，工人和雇主更加关心他们合同中的实际收入，即经预期通胀调整后的收入。所以，当（最初较低的）通胀成为普遍现象，甚至融入了经济系统，参与工资谈判的工人也会把预期通胀加入合同中。由于政客、行政人员和经济学家都不愿在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上让步，这就导致了更高的通胀。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开始预期通胀率会加速上升，即一个正的二阶导数（Flemming，1976）。

当通胀预期的重要性被菲尔普斯（Phelps，196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8）纳入分析，这就引出了自然（非加速通胀）失业率的概念（NAIRU或NRU）。[1]从长期看，这是预期完全适应通胀之后通胀保持不变时的失业水平。评估认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处大致垂直。[2]在短期内，由于通胀预期基本是固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依然会是负的，即更低的失业率对应着更高的通胀率。但是，如果当局想持续利用这一点把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其代价可能就是持续上升的通胀率。

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一概念是随后央行走向独立的重要支撑，其任务是通过通胀目标制来稳定物价水平。有了这样的菲利普斯曲线，央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措施本身不会影响长期就业、增长和生产率，这些因素（长期而言）是由供给侧因素而不是由货币或短期的需求政策决定的。[3]因此，央行专注于通过

货币政策控制通胀是有益的，不会带来不利影响。

自然失业率这个术语似乎表明它是固定不变的。弗里德曼把它定义为一切都达到均衡时的失业率。尽管人们一直讨论均衡实际利率水平（ r^* ）和潜在可持续增长率（ g^* ）的可能变动，但通常假设自然失业率（ u^* ）是不变的。

但是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u^* 似乎比 r^* 和 g^* 随时间变动得更大。除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外，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率似乎各不相同，近几十年来每年为1.5%~3.5%，均衡实际利率为0~2%。相反，自然失业率却为2%~5%。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愉快经历之后，像贝弗里奇（Beveridge）和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起初认为4%~5%的自然失业率是个好的结果。但是二战之后充分就业政策的成功使失业率降至1.5%，且最初的通胀率也较低，这产生了将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的目标。[\[4\]](#)

需求管理和充分就业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工人和工会的议价能力。拒绝雇主提供的工资会给工人带来另一份工作而不是失业。此外，如第3章和第5章所述，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抚养比下降。工会的覆盖率在1980年之前普遍上升（见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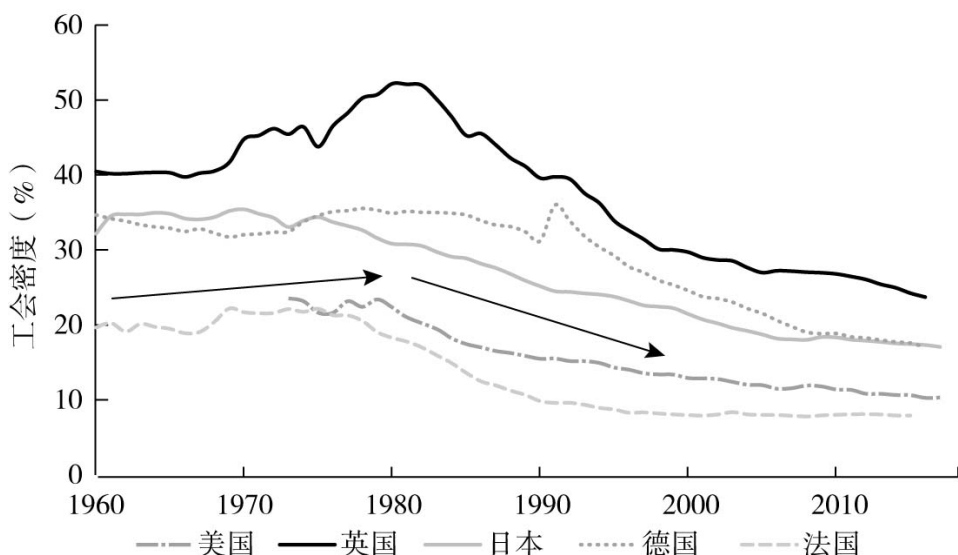


图8.4 工会密度从1980年以来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1980。

另一种描述自然失业率的方法是：工人对其生产率提高可能带来的实际工资增长感到满意时的失业水平。1945—1980年间持续增强的工人（相对于雇主）议价能力意味着潜在自然失业率的相应提高，可能高达5.5%。极其讽刺的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无情地提高了自然失业率。

最近，也即2007—2020年，这个故事有了新的变化。在（不愉快的）20世纪70年代，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在（同样不愉快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之后，情况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大约10年里，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几乎水平而不是垂直（见图8.5）。失业率变化了许多，从2009年的高峰到2019年的低点，通胀率却保持稳定的低位。首先，通胀率没能（如预测的那样）降下来（鉴于2009年和2010年高企的失业率）；然后，在失业率恢复到足够低的水平后，通胀率也

没有从之前的低迷状态上升。在2006—2018年，关于失业率和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表现得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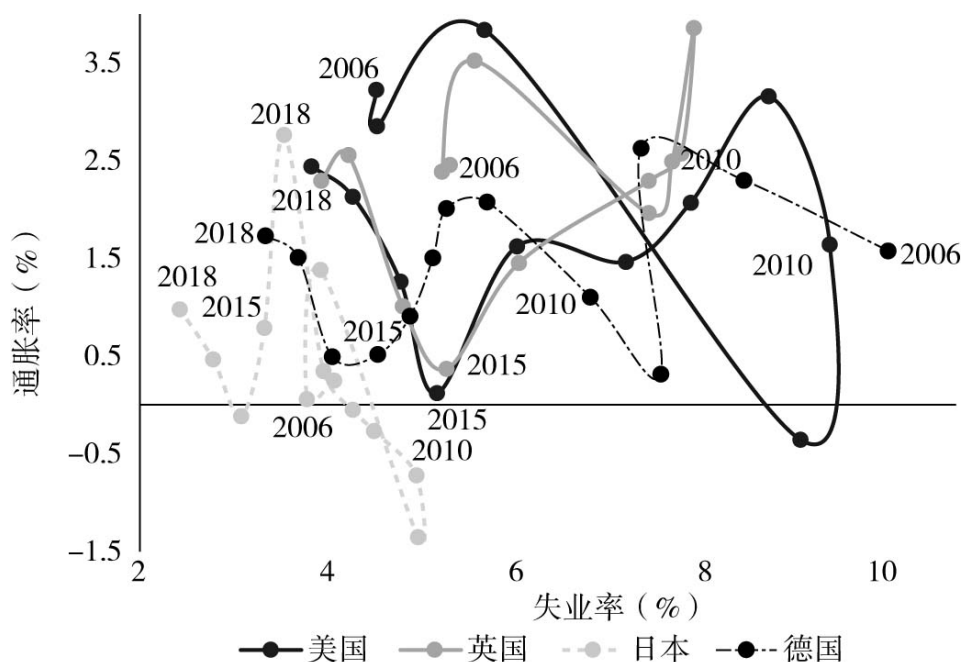


图8.5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2006—2018年

资料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这种状况使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感到讶异甚至困惑，随着失业率的回落，对通胀的预测系统性地高于实际情况。理解并解释这一点对展望经济长期前景十分重要。

在第8.2节，我们将总结至少六种不同的解释：

1.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
2. 预期才是最重要的；

- 3.成功的货币政策；
- 4.就业结构的变化；
- 5.全球因素的权重不断增加；
- 6.自然失业率的变动。

8.2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

8.2.1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

现在常说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我们的经济进入了名义工资增长率为2%~3%，实际产出增长率为1%，通胀率为1%~2%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把最近的状态向未来进行了无限外推。

这种推断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另外，菲利普斯曲线不可能消失，因为它反映的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理论上，这种平衡在极限情况下会回到凯恩斯早期分析的反L形曲线上，但实际上这基本不可能。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和斜率可能由于还有待评估和理解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它不可能凭空消失。

8.2.2 预期才是主导？

正是（部分）因为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最初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才变得十分不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强调预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有时这意味着，只要把通胀预期“锚定”在央行的目标水平上，工资增长和通胀也会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

但是从理论上讲，这是错误的。一旦每一个潜在的工人都被雇用，对劳动力需求的上涨就会表现为更高的通胀率。并且，由于产业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在实现全面就业之前，增长的瓶颈和通胀的上升几乎肯定会出现。

“充分锚定”的通胀预期让人们认为对通胀目标的偏离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此，当2009年和2010年价格下降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反之亦然，如在2008—2009年英镑贬值几年后，英国的通胀超过目标时（人们也认为这不会持续）。这确实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但是其本身不会改变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或垂直性。如果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那么过去10年就业率的持续下降理应导致通胀率持续上升，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林德和塔拉邦特（Lindé and Trabandt, 2019）认为，非线性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解释2008—2010年“消失的通胀”以及之后的缓慢恢复。“换言之，即使经济在深度衰退后可能恢复增长，价格和工资的通胀也只会温和上升，直到经济的疲软被充分吸收”（第3页）。但是鉴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自然失业率早已改变，这就把我们带到第8.2.6节的讨论。

8.2.3 成功的货币政策

麦克利和滕雷罗（McLeay and Tenreyro, 2018）在他们的论文《最优通胀率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识别》中指出，货币政策的意图是把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上。如果所有的冲击都是针对需求的，那么通胀和产出将共同变动，如果政策在稳定通胀方面是成

功的，那么，根据定义，通胀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还受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失业率与工资或价格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将为零。尽管劳动力市场缺口与通胀之间潜在的结构性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保持强劲和稳定，但情况依然如此。如果影响经济的是供给侧冲击，如油价变动、间接税、关税和（外部驱动的）汇率变化，那么政策就必须权衡产出缺口和未能达到通胀目标带来的损失。为了在这种共同冲击下识别菲利普斯曲线，我们需要评估和量化供给冲击或货币政策失误。[5]

这并不容易。我们知道的是，与之后相比，1970—1990年的供给侧冲击更为普遍，例如1973—1974年、1979年和1986年的石油冲击，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更加明显，尤其是与1992—2005年的大缓和时期相比，当时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似乎都保持稳定。因此，之后计算出来的失业率（或产出缺口）与工资（或价格）通胀的斜率变小可能是更好的货币政策和更少的供给侧冲击造成的，并不能表示潜在的结构性关系发生了变化。果真如此，那么对于单一货币区的不同地域，由于统一货币政策无法抵消区域性差异，计算出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应该（负的）更大。[6]当前的一些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例如McLeay and Tenreyro,2018;Hooper , Mishkin and Sufi[7]）。

8.2.4 就业结构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会压低工资。[8]现如今更准确的说法是，老年产业后备军在限制工资增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业的流入和流出分为两极，一极是工作和失业，另一极是从工作到退出劳动力市场。20~55岁黄金就业年龄段的工人主要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移动，而55~70岁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工作和不工作

之间徘徊，比如以提前退休为幌子。

正如第3章所述，由于近些年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尽管美国的增加极其有限），许多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上升，尤其是老年女性。在面对相对合理的工资时，他们有极高的弹性回去工作以应对职业岗位的空缺。事实上，莫洪和拉戈（2019）证明，如果把老年人从计算中剔除，调整后的菲利普斯曲线拟合得更好。

这一发现有几个启示。首先，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在工作和退休之间转换，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变得更加平坦，因为雇主可以从这一来源（以及移民）填补职位空缺，而不是被迫提高工资。其次，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失业率会下降，因为只要有后备军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经济就可以在更高的需求压力下运行。

但是这有一个极限。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一些不能，而另一些不愿意。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提高可能会缺乏弹性，也更难实现。当产业后备军全部应征入伍后，我们不得不再次缓解需求压力。

8.2.5 全球因素的权重不断增加

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2019）有一份详细的研究《全球化改变了通胀过程吗？》，但她更多关注价格而不是工资的通胀。以下是她在第30页的一个结论：

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因素的冲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例如，在菲利普斯曲线和趋

势—周期框架中，过去10年全球产出缺口和商品价格变化对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胀模型不仅要更仔细地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还应该让模型中的系数随时间推移而动态调整。

与此类似，斯托克和沃特森（Stock and Watson，2019）主张使用周期敏感通胀指数（CSI），以降低国际上（可能计量不当的）商品价格的权重。因此，在文章的第90页，他们总结道：

CSI指数为通胀率的变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因为CSI指数倾向于将权重更多地赋予价格由国内决定的部门，从而提供了一种办法将国内决定的价格与受国际环境严重影响的价格分开。

通过使用通胀成分和滤波消除趋势变动来更多地关注周期性变化，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尽管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的标准加速关系变平缓了，但加权的通胀周期性成分和周期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更加稳定。

8.2.6 自然失业率的变动

在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成功、不断上升的抚养比，增强了1945—1980年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有同样效果并且起辅助作用的是（私人部门）工会的成员数量的扩大、战斗性和力量的增强。要衡量这种战斗性，可参见美国和英国工人因罢工而减少的工作天数和罢工人数（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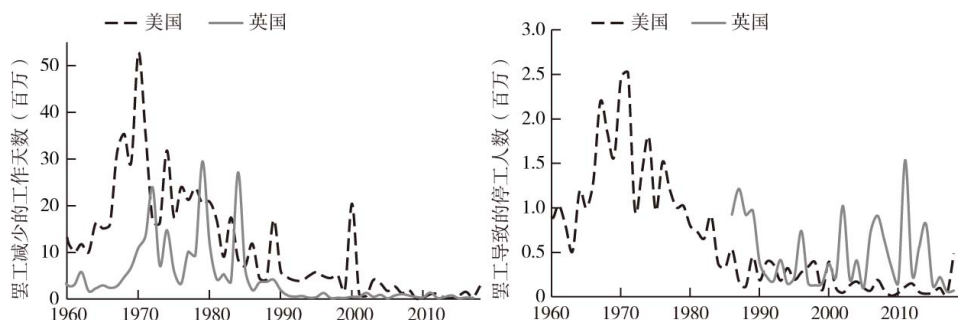


图8.6 罢工减少的工作天数；罢工导致的停工人数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LS），英国国家统计局（ONS）。

很难察觉到的是这种趋势会导致自然失业率持续上升。尽管平均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轻微上升，并且在70年代上升得更多，政客和选民一直都低估了自然失业率，之后通胀加速上升。直到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夫夫人、劳森/豪（Lawson/Howe）暂时放弃了设定总需求目标，代之以货币总量目标，才遏制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

本书上半部分的主题是，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结构改变（例如抚养比的改善）以及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等因素的结合，戏剧性地将时代大背景从通胀变为通缩。同时作为辅助原因的是（私人部门）工会成员人数减少和战斗性减弱。与上一时期（1945—1980年）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当局以及为他们提供建议的宏观经济学家没能意识到，自然失业率和工人的议价能力一样变得越来越低。

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在投票站而不是谈判桌上采取了报复性行动。正当人口因素转向对工人有利的时候，全球化也被民粹主义遏制。与此同时，那些将过去的经历外推到未来的人忽略了长期的力量，却断言我们会继续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

缓慢移动的钟摆将再次回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更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物价，但这不会长久。本章的观点是，不仅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垂直于自然失业率，而且由于长期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力量，自然失业率的位置也在不断地、系统地变化。忽视这些因素的后果是人们所做的预测会出现系统性和片面性的错误。

[1] NAIRU和NRU有技术上的差别，只有专家才关注这些。

[2]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和资源的投入来降低高通胀的破坏性，例如税收，它会有些弯曲。

[3] 永远会有一些例外，例如伤痕效应，因此短期仍有可能影响长期均衡。

[4] Dennis Robertson和Paish等经济学家因认为均衡利率可能要求平均失业率高于2%而饱受非议。早在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之前，就有人提出预期的重要性以及均衡失业率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让人信服。

[5] 由于政策措施的传导机制及其对工资或价格通胀影响的滞后性，（官方）对失业率和通胀的预期与实际（事后）通胀之间不可预见的偏差可能有助于估计潜在的结构关系。

[6] 尽管这似乎符合菲利普斯曲线中工资与失业率的关系，但是试图用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价格和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却不成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例如利润率的变化，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7] Hooper, Miskin and Sofi, "Prospect for Inflation in a High Pressure Economy: Is the Phillips Curve Dead or Just Hibernating?", May 2019.

[8] 引自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erve_army_of_labour)。虽然产业后备军的思想与马克思密切相关，但是这种思想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就广为流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境况》（1845）中讨论到了产业后备军，要早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产业后备军是在其1847年关于“工资”的手稿中，但是没有发表……把劳动力看作“军队”的观点也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参考Engels and Marx, 2018）。

第9章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

9.1 引言：传统分析的缺陷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简单有力地反驳我们的经济预测，即老龄化将加剧通胀，甚至可能提高实际利率。毕竟，日本人口同时面临老龄化和萎缩两大问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先行者。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日本是一个实验性大熔炉，为老龄化世界提供了一份权威的经济样板。

乍一看，日本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80年代暴涨的土地、住房和股票价格随之暴跌，劳动力的迅速减少伴随着企业去杠杆、投资和增长的崩溃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停滞甚至通缩。与我们认为的老龄化世界将要发生的景象几乎完全相反。

然而，上文所述的日本经验有两个不足之处。

首先，如果你仔细阅读对日本发展的传统分析（见专栏9.1），就会发现这是对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世界其他经济体并不存在。因此，几乎不得不只用国内驱动因素（资产泡沫破灭、本国人口结构）来解释本地经济结果（通缩、投资和增长疲软等）。

或许下面这个类比会有所帮助。假设纽约第六大道正在施工，导致交通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局部冲击，应该不会妨碍人们在上城区其他道路或在跨城区的街道上驾车行驶。这意味着在中心地带之外是可以寻求到缓解方式的。交通很快就会转移到这些替代路线上，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第六大道几乎不会出现拥堵。然而，高峰时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城区的每条路线都同样繁忙。这是一场全局冲击，交通拥堵无法缓解。第一种情景就是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状况。面对国内劳动力的不利变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日本在国外寻求缓解手段，并引进了全球充裕的劳动力。第二种，也是更令人沮丧的情景，就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摆脱人口结构的僵局。喝着晨间咖啡的读者或许会建议改乘地铁，但纽约人都知道，尽管有地铁网络，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状况还是一样糟糕。甚至将我们这一类比继续扩展，还能适用于我们在第10章中提出的有关技术能否抵消人口压力的观点。

专栏9.1 对日本发展的传统解释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人口结构推动了经济增速、通胀和利率的下降。该论点很简单，足以令人信服。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只能通过更快的资本积累来抵消，从而推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加上日本经济崛起期间积累的巨额债务的去杠杆，使企业部门陷入瘫痪。投资下降使信贷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利率下降。经济增速下降造成了持续的通缩压力，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下降。

日本经济增速下滑、通缩以及利率下降都是事实。然而，这些事实背后的因果解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未能考

虑全球力量的重大影响。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与这种不严谨的叙事相矛盾的其他事实，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生产率达到了不俗的水平，工资实现了相当不错的增长。

本章旨在修正这些缺陷，并提供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发展的修正史。

然而，很难想象有任何经济体，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开放经济体，能够摆脱我们看到的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力量。如果一个时代明确包含全球性因素，且全球性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么，对日本发展的诠释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难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崛起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却在日本变迁中未起到任何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向是追踪日本在全球的足迹。简言之，我们以这一原假设[1]为研究起点：日本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发展，正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时候，恰逢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日本企业采取行动，利用全球的人口红利来抵消本国的人口不利因素。研究日本企业对这些冲突因素的理性反应，帮助我们形成了真正基于全球视角的日本发展修正史。

其次，日本过去30年的发展，受到资产泡沫破灭后十年的影响。1991—1999年确实是“失去的十年”。1991年应对资产崩溃的政策措施有几个严重失误，导致危机持续蔓延，并在1995年左右达到第二次高峰，当年数家日本银行倒闭。此后不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此在这几年里，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产出停滞。

但是，把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视为一个单一时期

是错误的。

从2000年起，日本的情况有所好转，并至今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尽管劳动力每年减少1%，但总产出仍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两者的反差源于生产率。人均产出以平均2%的速度增长，而如果过去20年里能达到平均2%的生产率增长，那么几乎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会欢欣雀跃。由于劳动力萎缩，工资增长基本停滞，通胀率平均为0.5%。与此同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考虑到当地劳动力的减少，日本自2000年以来的成果确实不错。

那么日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产出增速在过去和现在都很糟糕。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总产出增长方面确实显得较差。虽然人均产出一直较低，但以人均产出衡量的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几乎比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好。

其次，通胀仍处于低位。尽管将通胀率保持在0.5%左右有无本质的错误还有待商榷，但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一直是2%，但未能达到这一目标。

再次，或许我们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失业率虽然从未高过，已经降到了按照西方标准来说非常低的水平，但其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因此，近20年来，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一直非常平坦。这就是标准分析现在对西方的预测。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呢？在这方面，为什么西方的未来情况不会与日本类似呢？

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关于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最后两个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否真的保持了平坦，还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比失业率指标显示的要更严重？在

我们的分析中，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后，稳健的整体失业率确实掩盖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

但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日本的生产率概况，这不仅是研究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为了理解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

9.1.1 日本生产率的飙升及其对外直接投资中蕴含的全球线索

日本1%的总产出增长率与其劳动力平均1%的降幅之间的反差，就是靠生产率的贡献。图9.1显示，在劳均产出方面，日本的表现几乎超过了所有发达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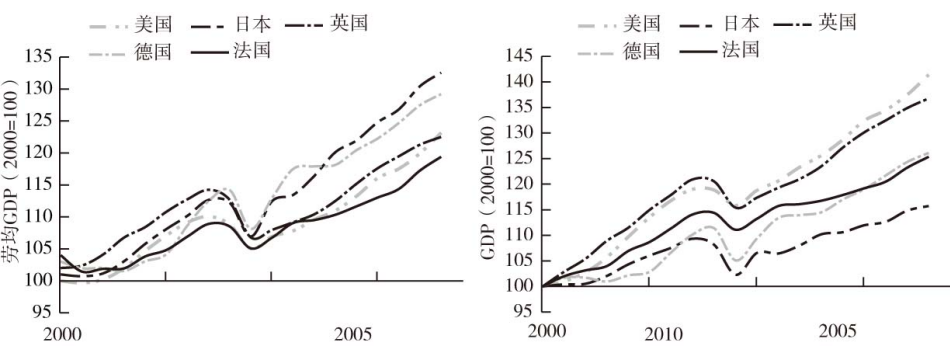


图9.1 日本的劳均GDP远超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事实上，企业生产率提升是解释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的两种有冲突的假说之一。另一种解释是，2000年出口激增及其在之后十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Ogawa et al., IMF, 2012）将出口函数分解为两部分，一部

分取决于日本贸易伙伴的收入流，另一部分取决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入成本。他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出口增长变化的50%左右，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收入仅能解释20%左右。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在重组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可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这正是我们从面临结构性逆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身上应该看到的，但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则可以看全球各地日本企业在生产率变化上的经验数据。

日本发展的全球印迹的第一个线索是，日本公司在其境外而非境内的大量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FDI）。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表现出活力，这与日本国内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外直接投资似乎是一种安全阀，旨在避开来自国内需求和昂贵劳动力的逆风，转而利用强劲的海外增长以及全球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利好。即使在“失去的十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强劲，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这一势头。

9.2 国内投资：繁荣与萧条

日本国内投资经历了两个时代。20世纪60—80年代经济扩张鼎盛时期的企业扩张，与“失去的十年”期间甚至之后数十年的缺乏活力有天壤之别。

9.2.1 鼎盛时期的企业扩张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激励着日本企业迅速积累资本。

首先，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奇迹”期间迅速积累资本，这一时期日本人口快速增长，通产省精心策划了日本从二战阴影中迅速崛起的过程。约翰逊（Johnson，1982）认为，这个奇迹实际上是从1962年才开始的。到1975年，制造业增长了3倍，到1978年则增长了4倍。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增长都发生在1966年之后。通产省从一开始就悄悄地引导了日本企业的扩张，但这一时期惊人的增速不仅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也与日本当时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良好的人口结构有关。通产省，即日本强大的通商产业省，在日本崛起期间提供了具体的激励措施，并引导了资本流动。约翰逊及其他人认为，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努力。该机构于2001年改组为经济产业省，其影响力依然很大，但主动性远不如其前身。

在日本的抚养比（每100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的人口）连续下降数十年、降至50以下的背景下，出现了这样的激增，这有助于解释产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日本的抚养比从20世纪40年代的70人左右下降到70年代末的略高于40人。约翰逊指出，大约在同时期（特别是从1946年到1976年），工业产出增长了惊人的55倍。资本快速积累、劳动力增长（人口结构以及通过内部迁移）与通产省的激励完美结合，帮助日本在引入资本的同时，也引入了内嵌于资本的制造技术。到1976年，虽然日本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3%，人口也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其产出占到了全球的10%。

其次，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资本积累大幅增加。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经济奇迹，那么协议签订后的那段时期则是典型的泡沫时期。随着日元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升值，政策制定者开始调整国内政策以应对日元升值。为抵消日元快速升值

而实施的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导致资金不仅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也流入了日本企业。其结果是，除了证据充分的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种种弊病之外，企业部门也出现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9.2.2 从数十年的繁荣到数十年的投资衰退

泡沫在1991—1992年间破灭，股票、土地和房产价值暴跌。日经指数从约40 000点的高位跌至10 000点的低位。在资产泡沫破灭后，整体经济和企业部门均遭受重创，经济中存在的过剩现象得以扭转。

日本企业积极降低之前在国内累积的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国内债务与GDP之比，由1994年147%的峰值下降到2015年的97%，但被同期公共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抵消。然而，从企业部门看，杠杆率必须降低。简单的计算可知，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减少借贷或偿还债务，意味着必须削减其他支出。这就是日本国内企业投资显示的情况（图9.2）。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变化，我们来看看平滑的投资数据。五年移动平均投资数据显示，在资产泡沫之前的20年里，投资增长率平均为4.4%，最高时接近10%。泡沫破灭后，平均增长率为0%，投资增长大部分情况下低于零，并在后危机时期和最近出现了短暂的爆炸式增长（图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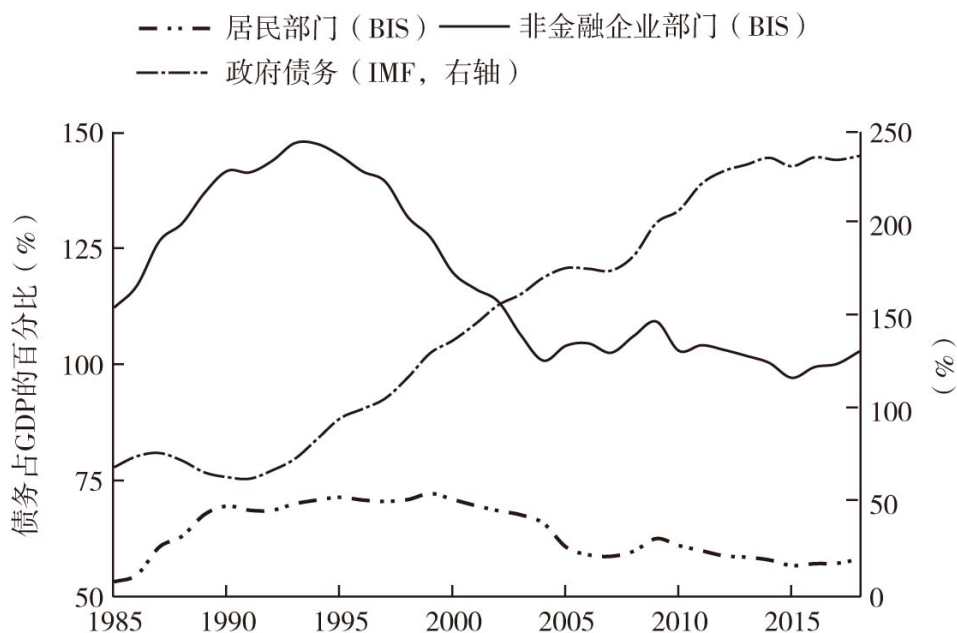


图9.2 日本企业部门去杠杆，公共部门杠杆上升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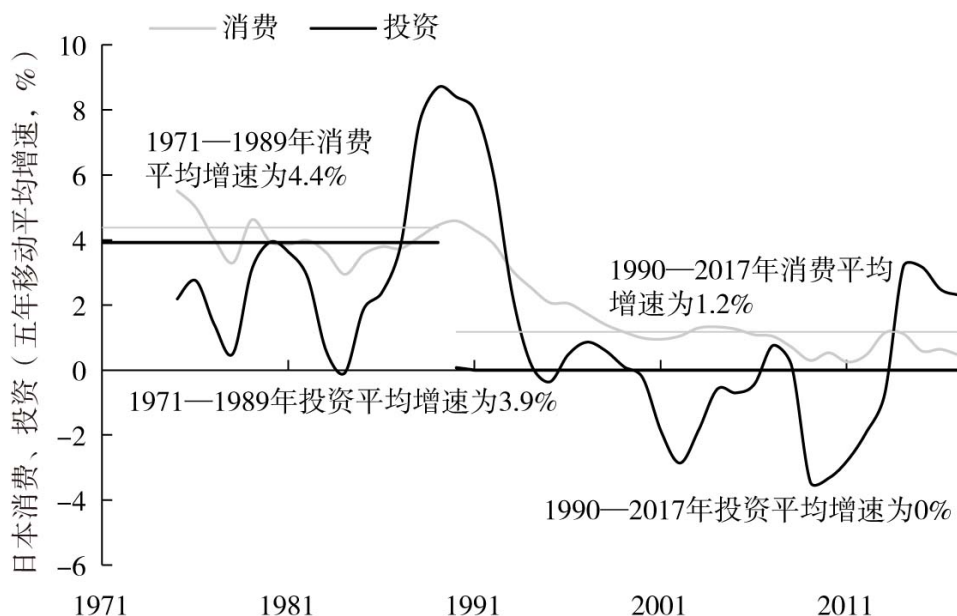


图9.3 日本的消费随着投资下降而下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失去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增长低于消费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部门的构成也随着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发生了变化。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对经济状况的敏感度要高得多。因此，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程度上经历了投资下滑，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5%下降到2002年的30%左右。制造业就业也未能幸免，就业人口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28%左右、资产泡沫破灭前夕的25%，降至2017年的略高于16%。

根据迄今为止的证据，传统分析为受到削减过高杠杆和过剩产能拖累的日本企业部门描绘了一幅悲观的景象。

然而，将日本企业部门描绘为对这些过高杠杆和过剩产能不战而降，并没有考虑日本企业通常被忽视但充满活力并具有全球眼光的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战略。

我们在下文指出，日本企业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积极拓展其版图。它们减少了对日本国内疲软的经济以及不断萎缩和昂贵的劳动力的依赖，并战略性地将业务转移到增长前景更乐观、劳动力也更廉价的外国市场。

9.2.3 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境外的投资热潮

制造业在日本国内经济中的比重从泡沫前的45%下降到21世纪初的30%左右。如上所述，这是在投资增速非常疲弱且不断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下滑反映了企业部门被债务负担拖累的

混乱局面。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情况却表现出与之相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直接投资在非制造业领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近期的增长中占主导地位。

日元在1985年的急剧升值引发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新变化。然而，完整的故事比这种简单的解释要复杂得多。这一趋势持续了数十年，表明其深层驱动力是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图9.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1，Japan Spillover Report），劳动力成本是企业考虑区位和生产模式变化的主要动机，而目的地国家的增长情况则排在第二位。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结果则与上述排序相反，而且主要动机和次要动机间差距很大。企业问卷显示，70%的企业认为目的地市场的需求是主要动机，而近年来，合格和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考虑到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即根据生产率调整的劳动报酬）的上升，以及日本国内单位劳动成本在生产率驱动下的稳定性，这两项研究结论可能并不矛盾。201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仅略低于20万亿日元，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长了6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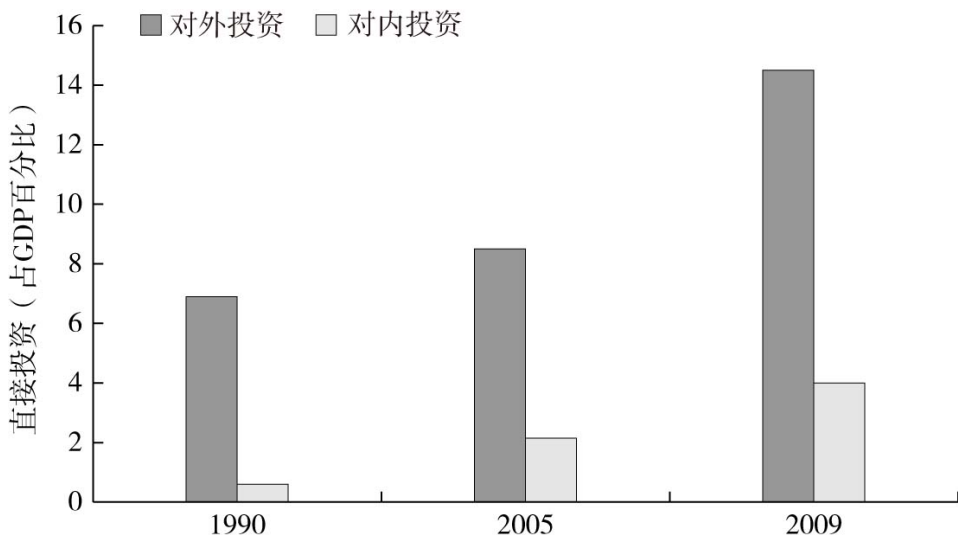


图9.4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对内投资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

20年来，经济产业省对日本公司海外业务活动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我们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追踪这些调查（2018年的最新调查为第49次年度调查）提供了有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丰富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剧烈的变化：

- 投资：1996—2012年，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倍，而1985—2013年，与对国内公司的投资相比，对外国子公司的投资增长了10倍。

- 子公司数量：1987年，日本公司拥有约4 000家海外子公司。到1998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至12 600家左右，在日本经济产业省2018年的调查中达到25 000家。

- 就业：1996年，海外子公司的雇佣人数为230万。2016年，该数字为560万。

虽然这些绝对数字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且意味深长，但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把它们与日本国内趋势相比，尤其是与国内大幅下滑的制造业相比，得到的结论更具吸引力。

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国内投资趋势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7%的速度增长，恰好与国内投资增速急剧下降的时期相吻合（Kang and Piao, 2015）。相比之下，1990—2002年，日本国内投资年均下降4%，而非制造业企业投资年均下降2%左右。

海外资本投资比率（外国子公司的资本投资与国内公司的资本投资之比）1985年为3%，1997年翻了两番至12%，2013年达到30%。近期日本国内投资上升、海外投资下降，这一比率出现下降，这是极少见的。在日本企业部门破产的关键时期，海外投资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国内投资（见图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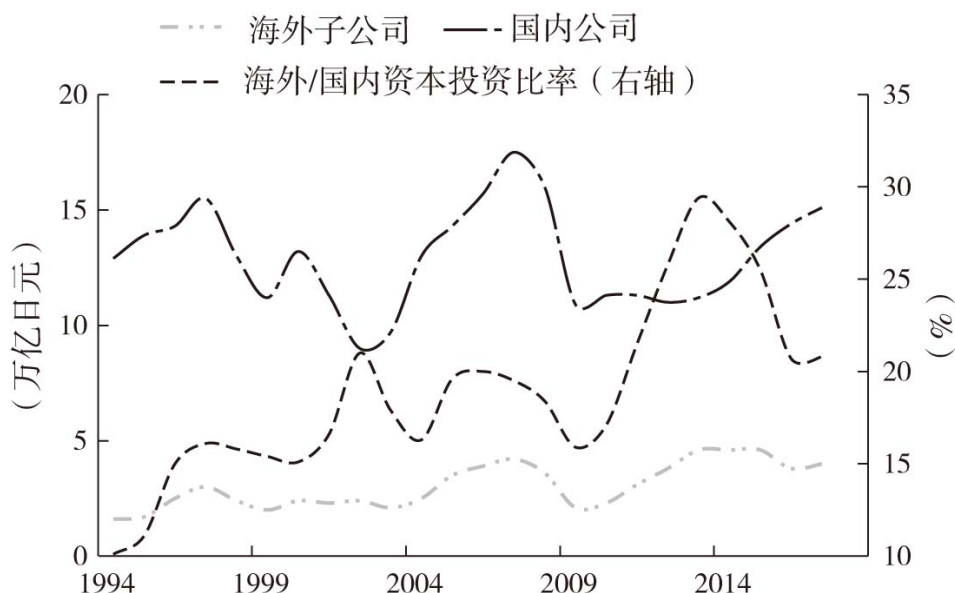


图9.5 (制造业) 海外/国内资本投资比率表明企业偏好投资海外而非国内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拥有海外业务的日本公司近40%的产出来自海外，而2017年海外生产比率（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产出与日本国内产出之比）为25%（图9.6）。就关键的交通运输行业而言，这一比率仅略低于50%。

制造业在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这仅仅是由于非制造业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投资。总体情况与国内截然不同，自1990年以来，海外直接投资增长了6倍，而海外与国内投资及生产的比率都大幅上升。

日本国内外的制造业就业也呈现类似的分化趋势，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9.2.4 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得到更多关注？

尽管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但至少从人口角度分析日本时，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孤立趋势。为什么？以下是我们的简单推测，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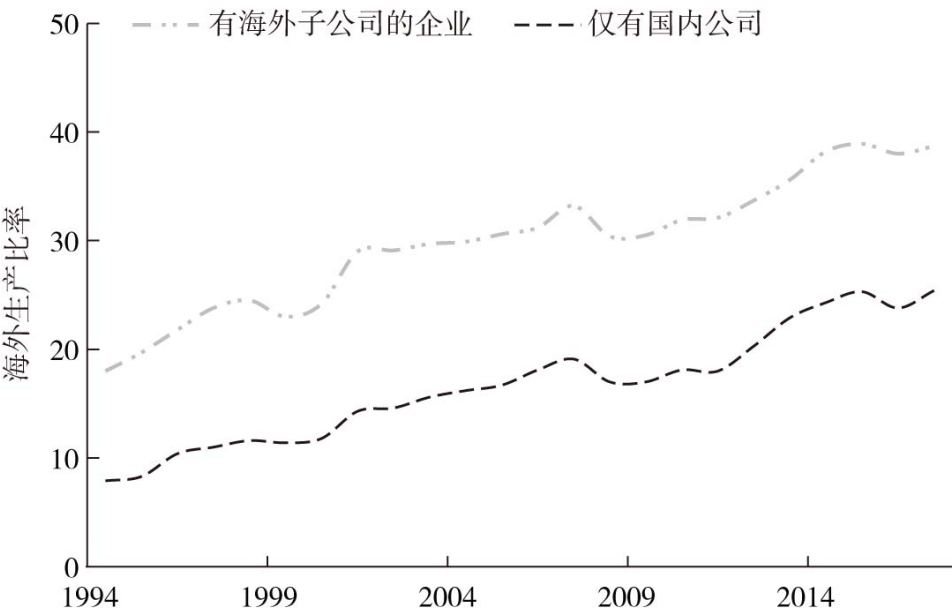


图9.6 海外生产比率显示日本企业更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生产

注：海外生产比率（制造业）= 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 / （国内公司销售收入 + 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第一，日本国内数据似乎与基于去杠杆化和人口结构的一贯看法完全吻合，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第二，海外业务似乎对日本企业部门的会计利润没有显著贡献。有研究者（Kang and Piao，2015）认为，“只有一部分海外

业务利润被汇回日本，很大一部分资金再投资到国外，以进一步扩大海外业务”。为何利润没有汇回国内？如果日本公司的部分目标是利用较低的海外劳动力成本和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则几乎需要留存海外产生的所有利润，以进一步扩张。海外产能和就业的大幅增加似乎表明，情况确实如此。此外，日本的“股息豁免政策”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将利润汇回国内（《日本经济产业省白皮书》，2011）。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海外业务仍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得日本企业趋之若鹜，但日本企业并未寻求将这些利润转回国内。

然而，在日本国内，这已吸引了大量关注，主要是作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趋势。许多人一直对海外直接投资感到担忧，因为海外生产将导致日本国内就业减少，产生“空心化”效应。经济产业省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海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具有负相关性，最近有研究强化了这一观点（Kiyota，2015）。

相关性是一回事，但因果关系会不会是双向的呢？“空心化”假说经常被检验，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是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的外生趋势。有研究者（Sakura and Kondo，2014）认为，经常在海外投资的那些日本企业往往是日本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也可以认为，扩大海外雇佣规模只是这些充满活力的公司希望开拓新市场并进一步利用海外成本优势，同时减少使用国内昂贵人力的结果。因此，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就变成是国内雇佣的减少导致了海外雇佣的上升。

9.3 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结构变化

日本国内工作岗位的重新配置。

日本制造业和农业吸收的劳动力占比直线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22%和5%下降到2018年的16%和3%。自然，越来越多的份额流向了服务业。

如果制造业无法维持其盈利能力，则其自保能力微乎其微，而盈利能力本质上与生产率相关。但是，服务业可以利用涨价在收入和成本之间形成一个本地的缺口来保护自己（例如，提高产品相对于工资的价格）。与制造业不同，许多服务业不能外包或进口，因此竞争也难以阻止服务业公司利用提高价格来保护自己。

日本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的一个原因，可追溯至制造业的逐渐萎缩和服务业的不断扩大，进而可追溯至导致这种重新配置的全球因素的重要性。这种重新配置背后的国内变化相对简单：

- 资产泡沫破灭和两大不利因素，即乏力的经济增长、昂贵且萎缩的劳动力资源，共同导致了投资衰退。
- 在国内自保能力最差的制造业，开始从三方面提高生产率。第一，冻结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长，然后慢慢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此过程中，每个工人的可用资本（生产率的粗略衡量）慢慢开始上升。第二，制造业生产开始缓慢向海外转移。第三，选择将哪些活动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将设计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部分留在国内，将生产线上机械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海外。
- 制造业不愿吸纳其历史上所占的就业比重，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消费的稳定性而保持稳定）开始面临劳动力供给增加的问题。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随之上升。

- 为了保护盈利，服务业随后通过压低工资增速，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制造一个缺口。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在寻求摆脱其体制惯性的方法时，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最终结果是：随着日本企业有策略和有目的地提高生产率以自保，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境内和境外被重新配置。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这些成就，不仅因为它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十年”，还因为它提高了人均生产率，使日本的人均生产率几乎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

为了做到这些，日本企业必须在日本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规范的约束下开展工作。其结果是虽然劳动力萎缩，但并未导致工资上涨。

菲利普斯曲线：劳动力萎缩为何没有导致日本工资上涨？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2014年的讲话中称：“与美国和欧洲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往往会上升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相反，工资却大幅下降。”

在这个事实简单的声明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这种复杂性为大多数分析难以调和的一个经济事实提供了线索。这个事实就是为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减少未能导致其价格上升？

我们认为，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并未导致日本发生通胀，其原因有三。

9.3.1 全球化

如前文所述，在日本劳动力逐渐萎缩的时候，世界上廉价而高效的劳动力却十分充足。因此，日本的可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制造业，将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尤其是中国。这意味着制造业吸收就业下降，主要是高薪的“内部人岗位”（insider jobs）减少，导致劳动力转向薪酬较低的“外部人岗位”（outsider jobs）。

9.3.2 “内部人”与“外部人”

在日本，内部员工的忠诚大多是对公司的忠诚，而不是对工会的忠诚，而雇主的对应承诺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维持雇佣关系。因此，经济周期的变化更多传导至工作时长的变化而非失业率或工资的变动，这一因素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十分平坦。日本当地长期雇佣的惯例使得大规模裁员和缩减工作岗位变得不可行。

外部人的议价能力明显不足，并承担了服务业反通胀压力的大部分负担，即通过压低工资增长，在价格和工资之间形成缺口。

有时，一个简单的情景颇具启发性。1993年日本资产价值崩溃最严重的时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上升到了5.5%，但也仅此而已。在其他时期，日本的失业率从未超过3%。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也慢得惊人。GDP增长率从1989年的6%下降到1994年的2%，失业率仅从1990年的2%左右上升到1995年的3%。直到2003年，失业率才达到5.4%的峰值。相比之下，美国在自身住房危机期间的失业率上升至10%。劳动力市场明确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日本经济中有一部分不参与经济调整，那就是就业，即菲利普斯曲线在日本一直是平坦的，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平坦。

日本劳动惯例的起源。二战改变了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在此之前，只有部分高级雇员享有长期雇佣合同。为确保就业和鼓励忠诚度，这种做法在二战期间得到推广。战后，雇主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做法对提升员工士气和忠诚度有好处，并将其变成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不仅扩展到长期雇佣，还包括在职培训、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以及基于资历的工资和晋升福利（即年工序列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整个社会都开始把工作保障放在首位。艾哈迈德吉安和罗宾逊（Ahmadjian and Robinson, 2001）写道：“工作保障在日本社会价值观中享有高度优先地位。除非是在非常罕见和真正特殊的情况下，否则雇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终止雇佣关系，都是令人不悦的，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令人反感的行为。”在如此严格的社会规范下，日本没有像大多数经济体那样出现经济增长衰退伴随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裁员的调整。由于日本的就业无法通过大量裁员来迅速调整，因此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时和工资不可避免的下行压力来调整的（见图9.7）。日本的长期雇佣习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年工序列制，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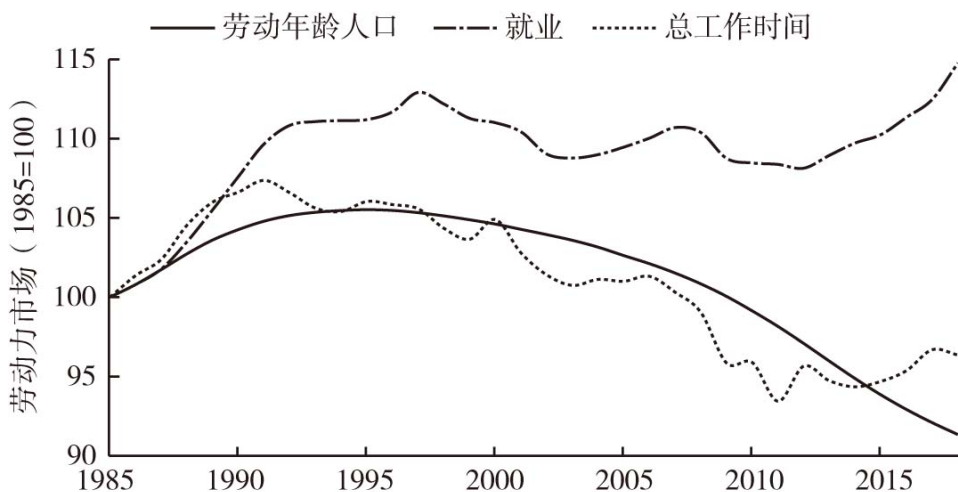


图9.7 劳动时间发生了调整，主要是由于日本劳动力市场惯例导致无法对就业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联合国。

“内部劳动力市场”允许员工在组织内部流动。经连会（Keiretsu，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体系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使得在这些庞大体系内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在长期雇佣合同以及年工序列制的双重制度下，在“内部”工作的人受益，但伤害了“外部人”。

在压力时期，偏向于“内部人”的雇佣倾向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当需求下降时，企业对成本上升的反应，改变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及其工资动态。

我们之前引用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2014年的讲话，尽管没有明确将日本惯例考虑在内，但很好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为了降低成本以应对收入低增长的压力，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求降低工资成本。面对黯淡的增长前景，雇员们宁愿接受减薪，也不愿冒失业的风险。对非正式雇员，即那些没有长期合同的雇

员来说，工资成本更容易控制（图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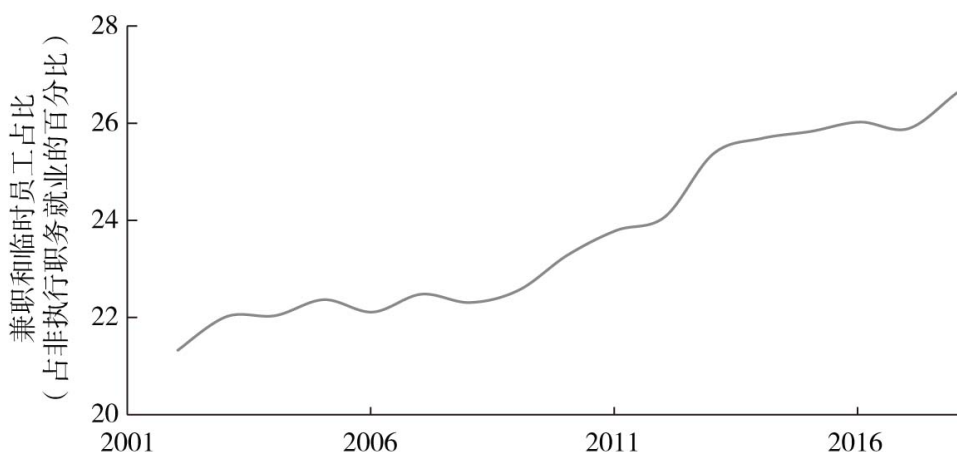


图9.8 兼职员工在劳动大军中的占比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

随着成本压力的增加，兼职员工（即非正式员工）的占比有所增加。他们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约13%上升到2018年的近30%。从企业的角度看，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比率的下降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外部人”没有长期合同，他们的工资更容易被压制。企业改变这一比率的动机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全职雇员实际上被裁员的时期，兼职雇员的就业增长率仍然是正的，甚至有所上升。

简言之，黯淡的增长前景迫使企业降低成本以自保。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惯例不允许日本企业出现西方式的快速调整，即裁员并迅速推高失业率。相反，日本企业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战略，改变了雇佣结构，并将大部分调整放在工资和工时方面。

9.3.3 劳动参与率

正如在菲利普斯曲线那一章（第8章）中单独指出的那样，当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并且5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时，关键的差距就是就业和退出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日本一直领先全球，近几十年来，年龄在55~65岁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日本，“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动员效率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图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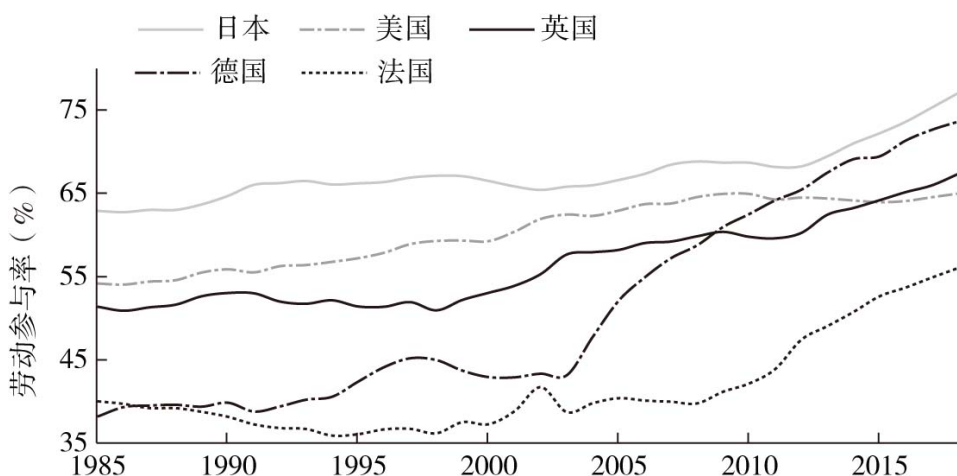


图9.9 日本55~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

资料来源：OECD。

过去几年，日本55~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快速上升，现在达到了75%，仅次于新西兰、瑞典和冰岛。

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临退休人群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造成这一普遍趋势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会活得更长，因此他们此前计划的储蓄似乎不足；其次，养老

金福利普遍下降（旨在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具体问题，并通过一个小型案例，详细说明德国的临退休人员对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不利的养老金福利变化所做的反应。

在65岁以上人口中，日本的劳动参与率仅略低于2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前列（图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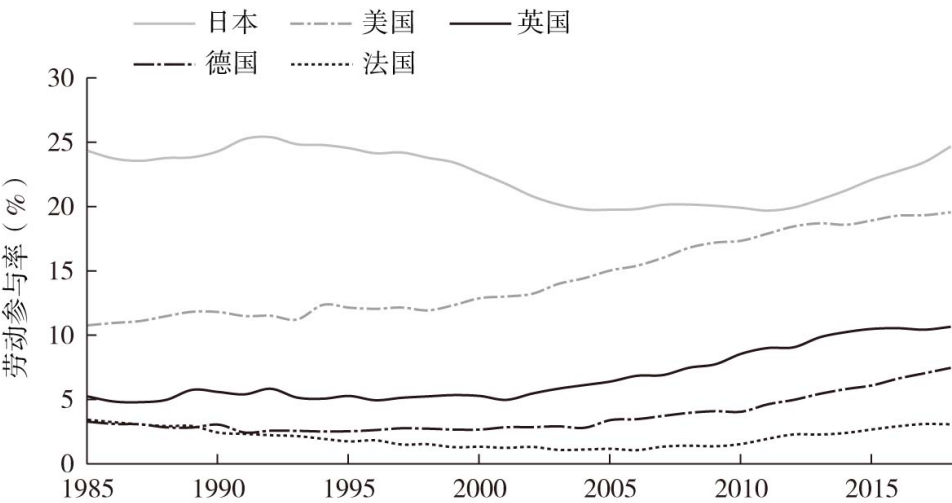


图9.10 日本65~7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居前列

资料来源：OECD。

更多的闲置劳动力和独特的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在2000年初的潜在富余劳动力远远大于日本失业率水平显示的规模。此外，考虑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即内部人员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外部人员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仅日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比其他地方平坦得多，而且日本的自然失业率也可能比其他地方低得多。

9.3.4 为什么西方不会步日本后尘

简言之，几乎大多数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后的情况都无法复制日本的故事。

首先，未来30年的全球大背景将与过去30年截然不同。过去30年是人口红利期，整个世界劳动力人口十分充沛，但未来30年里，人口结构的不利因素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简言之，日本在其本土劳动力萎缩的时候，还拥有全球逃生阀，但随着全球制造业的整体老龄化，这些选项根本不存在。

其次，日本式的劳动力市场惯例并不适用于西方。例如，在欧元区，裁员虽然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成本，但没有一个西方经济体面临像日本一样的社会约束。其结果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就业能够成为劳动力市场调整的主要渠道，从而减轻了对工资和工时的调整压力。

再次，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其他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仍远低于日本的水平，要接近日本的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与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成反比。拥有慷慨的养老金体系的经济体劳动参与率较低，养老金福利必须迅速下降才能推高劳动参与率。养老金福利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不同组合将使一些发达经济体在未来比当下的日本享有更大的灵活性。

[1] null hypothesis，统计学术语，指进行统计检验时预先建立的假设。——编译注

第10章

什么可以抵消全球老龄化的影响？

印度/非洲，劳动参与率和自动化

这个世界真的缺工人吗？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更高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印度和非洲人口友好型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抵消老龄化影响的因素。以上每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劳动力现有存量 and 未来流量将是充足的，或者至少远不像本书指出的那样令人担忧。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改变资本的性质，并使许多行业出现劳动力过剩。随着人们的寿命和工作年限越来越长，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越来越高。最后，印度和非洲似乎都将享受有充足劳动力支撑的强劲经济增长，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以上所述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变化方向。但我们发现，许多人认为的变化程度，是我们难以认同的。

老龄化经济体试图从国内和国外解决人口问题。在国内，老龄化经济体有三种选择：第一，利用技术来抵消劳动力对生产函数的负面冲击；第二，提高劳动参与率，让人们工作更长时间；第三，发达经济体可以利用一些海外劳动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如果从国外引进劳动力从政治角度看很不现实，那么或许可以将资本输出到国外。在那里，资本可以转换成商品和服务，并回流到输出资本的发达经济体。最近，德斯梅特等人（2018）发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指出，印度和非洲作为世

界上人口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进展。

我们将在下文论证，正如本书迄今为止描述的，这些途径都不足以抵消人口方面的不利因素及其影响。

10.1 国内：自动化、劳动参与率、移民

这三项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国内生产免受即将到来的劳动力萎缩的影响。自动化旨在通过替代劳动力在生产中的角色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老年人口更高的劳动参与率或增加移民则试图直接改善劳动力的流量。

10.1.1 自动化是对全球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

自动化仅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能够代替劳动力。从全球人口结构的角度看，自动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换句话说，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多的自动化。自动化不一定会让某种工作变得多余，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老年护理相关的工作肯定会增加。如果没有自动化，人口结构将产生比我们描述的更为不利的经济影响。

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疾病，第4章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都不会导致过早死亡。事实上，随着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许多老年人将长时间患有这些疾病。从广义上讲，老年护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但不一定能像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那样大幅增加未来的国民

产出。换言之，大部分病人护理都是消费品，而不是在未来能创造价值的资本品。

制造业就业可能会减少，转而流向服务业。这部分可能是由自动化造成的，但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劳动力再配置趋势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萎缩。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已面临种种困境，但在全球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张的时期，这些就业趋势保持了稳定（除周期性波动外）。除非科技的发展使服务业整体出现严重的失业，否则老年护理相关服务业需求的增长将抵消自动化的影响。根据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数据，到2032年，美国将面临12万名内科医生短缺的局面，这表明自动化尚未对医疗行业产生足够的影响。

我们更愿意对自动化的最终影响持怀疑态度。这就是持一种平衡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自动化的颠覆力，另一方面也反对将自动化带来的希望过分外推至所有时期或全部活动。由于自动化的颠覆性维度（有点太过）众所周知，以下论述试图指出目前有关自动化的常规观点的缺陷，并对之进行拓展，以得出更为平衡的看法。我们不是要对最终结果做出任何预测，而是试图提出一种平衡的观点，即什么情况下，世界上会出现工作岗位短缺，而不是劳动力短缺。

自动化被广泛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载体，过去几十年里，这个词被多次用于预示技术驱动的变革。自动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使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预见其未来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否实现，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延续早期的进展，并将其转化为广泛的应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动化将明显有利并广泛

适用的地区，恰恰是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不太需要自动化的地区，例如，在资本存量和资本劳动比均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自动化带来的损失非常小。相反，自动化可以帮助这些经济体避免付出整整一代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经济体中已变得多余），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提高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我们预计，未来的许多创新将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首先将现有技术调整到适合自己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最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自然拥有相对较高的资本劳动比，但它们大多位于北亚，人口老龄化迅速。那些最能从广泛采用自动化中获益的较贫穷经济体，其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尚不严重。

就全球范围而言，自动化的好处尚不明朗，还不足以抵消全球经济老龄化的影响。就目前而言，认为可以由机器人满足复杂的养老需求也不现实。

10.1.2 65岁以上人口能否工作到更大年龄？

简单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更困难的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劳动参与率。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都高于今天的水平。当时，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要小得多，预期寿命也低得多，所以真正上了年纪的人要少得多。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体呈稳步下降趋势。但从那以后的30年左右时间里，这一劳动参与率一直在稳步上升。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80岁人口的

劳动参与率。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人口中高龄人口增多，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更低。然而，随着高龄人口对6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上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意味着劳动参与率将持续下降（图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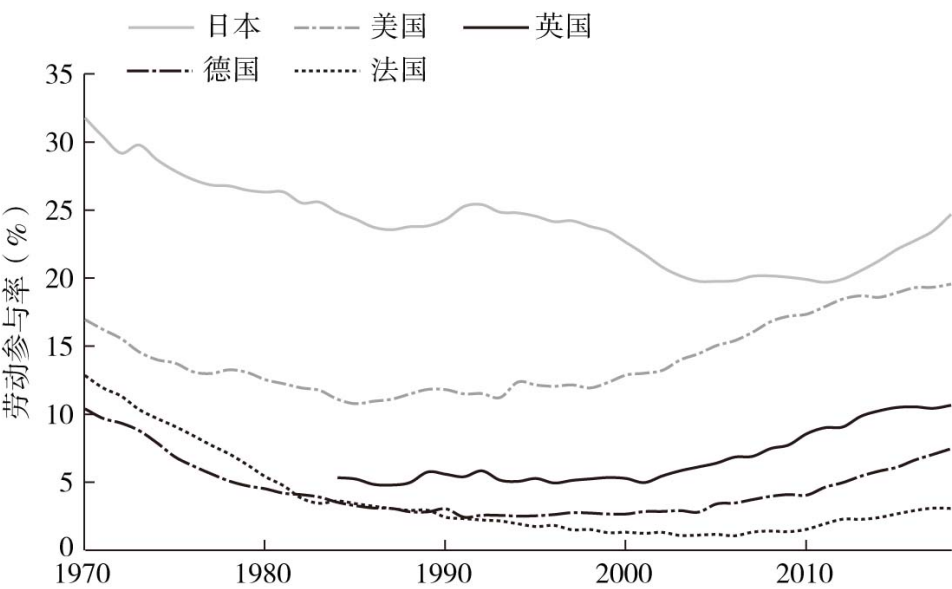


图10.1 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何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OECD。

那么，为什么按照上述构成变化，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应该下降，而实际上却上升了呢？我们怀疑这是两股相关力量作用的结果。首先，接近退休年龄的人一定是看到了预期寿命的增加。其次，随着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开始加重政府和养老金体系的负担，管理者也明显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为了提高这些体系的可持续性，许多养老金福利被削减或降级。较长的寿命和较低的养老金福利可能导致了劳动参与率上升。巴顿（Button，2019）以美国为例讨论过这些因素（图10.2）。目

前的养老金制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预期寿命的增速尽管在放缓，但仍在持续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必须继续上升，至少是对老年人口中较年轻的那部分人群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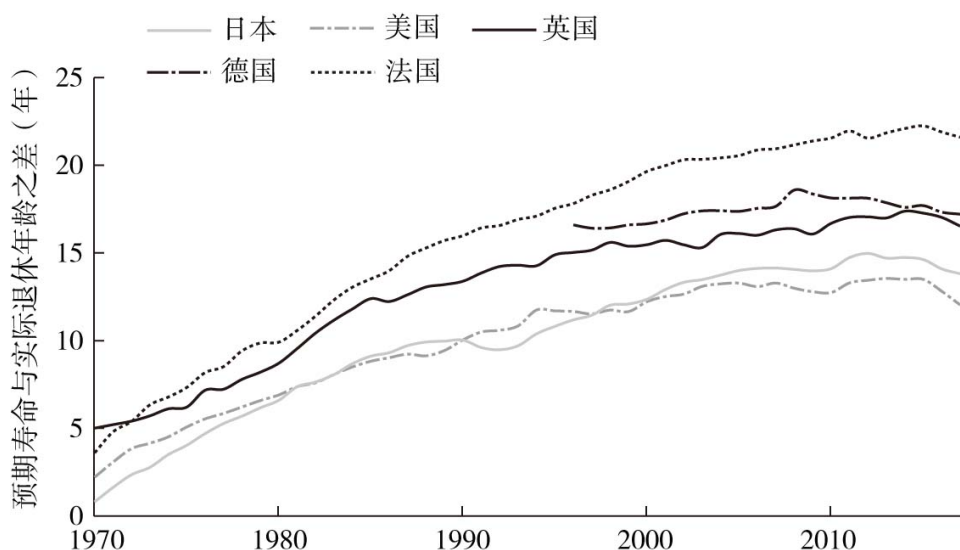


图10.2 预期寿命增加了，但退休年龄没有增加

资料来源：OECD，联合国。

不幸的是，未来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幅度有限。我们在下面列出的原因并不详尽，但已经很长了，而且我们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证明未来的劳动参与率不会有大幅的改善。

第一，由于55~64岁年龄段（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上升了。在未来还能上升多少呢？换言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所需提升的部分已经在今天基本实现，当人口结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时，未来改善的空间就更小（图10.3）。

第二，一国养老金制度的慷慨程度与其劳动参与率成反比，我们的关键假设是养老金/退休福利可以减少，但不会大幅减少。

图10.4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养老金制度越慷慨，劳动参与率就越低，下文探讨的德国养老金改革经验的案例也高度暗示了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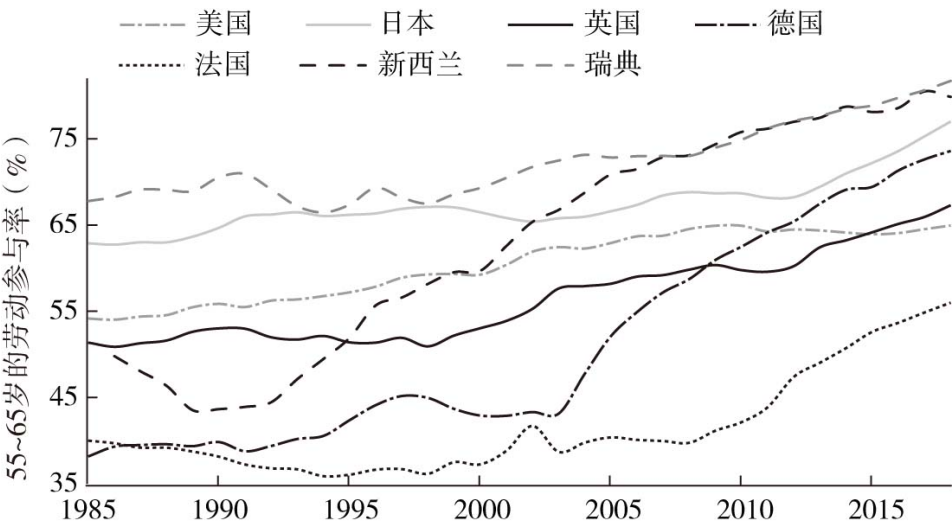


图10.3 退休前的劳动参与率已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OE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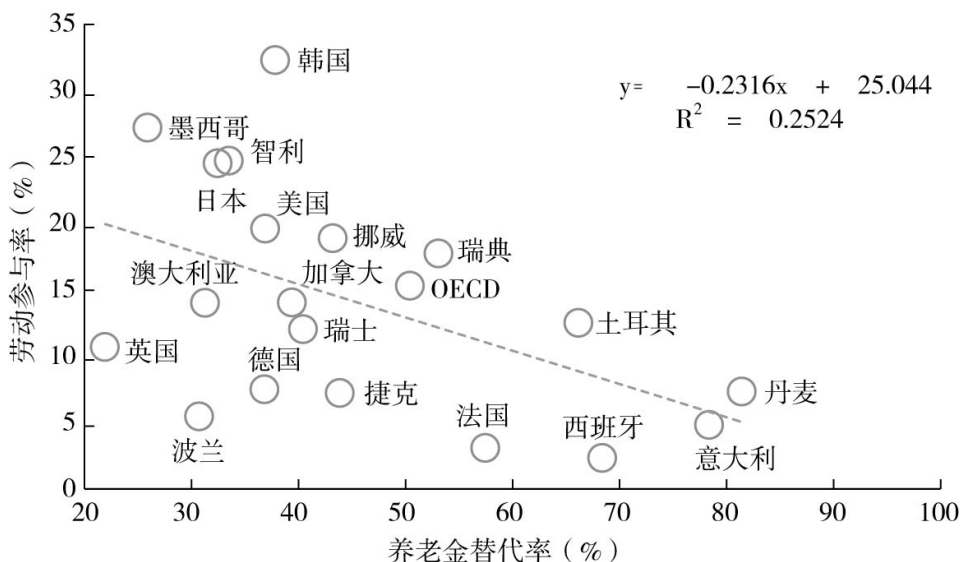


图10.4 当养老金福利较高时，劳动参与率往往较低

资料来源：OECD。

专栏10.1 迷你案例研究：德国退休前劳动参与率为何在2003年后增长如此迅速？

德国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的经验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尽管在大多数十国集团（G10）经济体中，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上升，但德国的该劳动参与率由于养老金改革法案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该法案于2003年年中提出并于2004年通过。

博尔舍-苏潘和威尔克（Börsch-Supan and Wilke, 2004）展示了1958年和1972年法规的早期变化如何使德国养老金体系在进入老龄化时代后变得不可持续。1958年的改革将养老体系由完全积累制转变为现收现付制。1972年的修订不仅保证了较高的退休金，而且还允许工人在63～

65岁之间的任何时间退休，且不会因提前退休受到任何惩罚（另请参见Börsch-Supan et al.,2014）。

1992年的第一次改革试图减少养老金负担（将基于总工资指数调整为基于净工资指数，并取消大多数人的“退休窗口期”），但改革力度太小，而且时间太长，难以产生实质性变化。随后，2001年将现收现付制转变为多支柱制，其中一个支柱是规模较小但不断增长的预筹积累制（pre-funded）。不幸的是，养老金预算在这个“世纪改革”通过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就经历了另一场危机。作为回应，吕库普委员会（Rurup Commission）在2003年8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于2004年通过成为法律。它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是：第一，将现收现付制支柱（2001年以来的制度）转变为缴费确定型制度，通过在指数化公式中引入可持续因子，使后者与前者在理论上是相同的；第二，建议提高退休年龄。

其结果是，5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从吕库普委员会提出建议前的约45%急剧上升到最近与日本几乎相同的水平。劳动参与率急剧上升的情况如图10.3所示。大约在2003年改革提案提交之际，劳动参与率开始大幅上升，并随着减轻行政负担、提高个人责任等更多改革的推行继续上升（就像其他十国集团成员国一样）。

德国的上述经验表明，确保更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可能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更好地反映预期寿命。然而，德国和希腊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在债务可持续性危机和相当大的市场压力下，政府才会采取这一不受欢迎的举措。在严峻的市场压力下，巴西经过数次尝试，终于通过了该国的养老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是一项极不受欢迎的举措，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国政府能够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岁以

上。

10.1.3 移民能否抵消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

劳动力流动（即从劳动力充足的经济体向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迁移）能否抵消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如果仍然维持目前的移民趋势，则答案是否定的。净流入发达经济体和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移民人数在2007年达到峰值，约为2 400万人。然而，如果与人口规模相比，这些流动规模太小，远不足以产生影响（图10.5）。

净移民已经转向。流入发达经济体和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移民人数已经减少。随着人口不利因素的加剧，更多的移民是必要的，但这仍然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如果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目前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通过引进劳动力来抵消当地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就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另请参阅博尔舍-苏潘于2019年6月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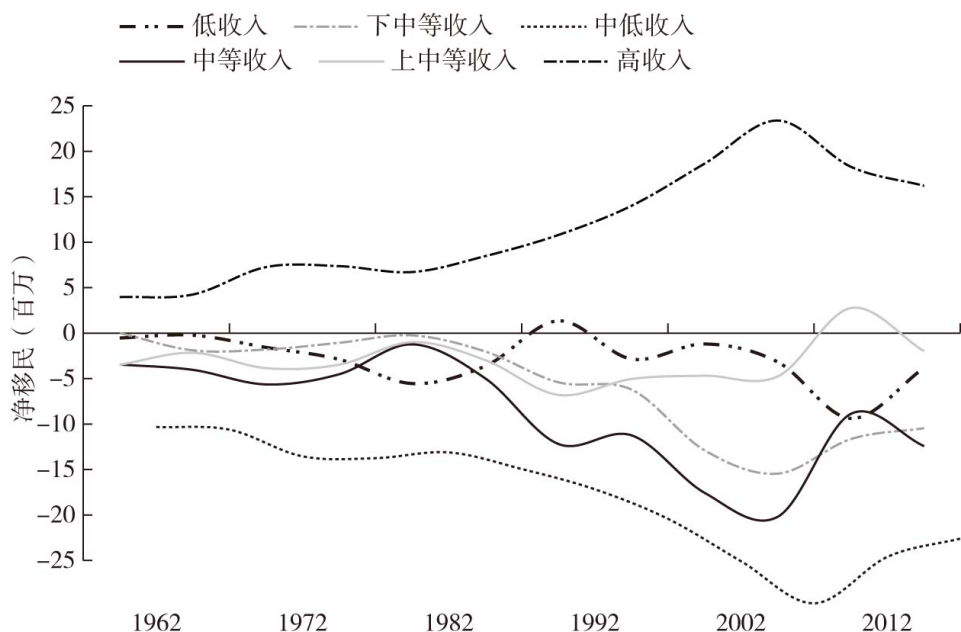


图10.5 净移民在需要增长的时候却正在消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鉴于发达经济体中民粹主义政府和反移民右翼政党的盛行，向老龄化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劳动力似乎不太可行。

如果劳动力不能轻易地跨境流动，那为什么不把资本输出到人口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在那里生产并从那里进口制成品呢？

10.2 印度和非洲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不利因素？

从数值上讲，可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极不可能。就数量上看，那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劳动力可能不断增长的经济

体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那些正在迅速老龄化的经济体中的人口不利因素。全球劳动力的增量可能来自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和一些其他新兴经济体（图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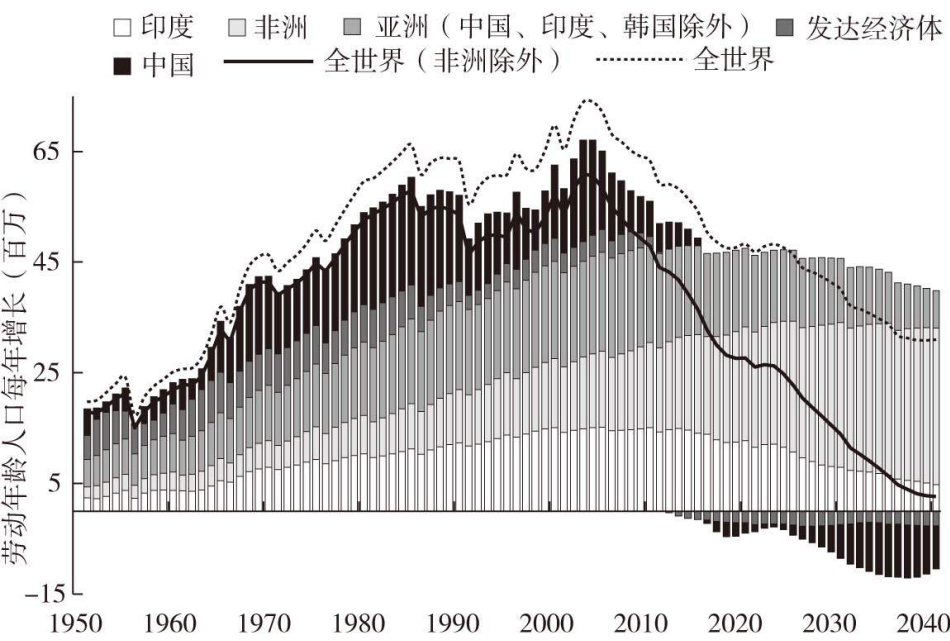


图10.6 印度和非洲将抗衡全球老龄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

世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这些经济体中的丰富劳动力。首先，从这些经济体向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移民可以直接抵消那里劳动力萎缩的影响。其次，如果在经济体之间转移劳动力这一更直接的方式不可行，那么资本则可以流向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这些资本可以与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中的本地劳动力供给相结合，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又可以被出口到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

10.2.1 印度能否像中国一样推动全球增长？

像几十年前的中国一样，印度得益于其有吸引力的初始条件，具有不少优势。

第一，印度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将在2050年之后继续增长，资本劳动比急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吸收新技术。第二，随着这些优势变得更加明显，资本可能会继续流向印度。考虑到极低的资本劳动比，任何这样的资本积累都将是变革性的。第三，新资本的流入也将带来内嵌于资本的最新技术。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会改善资本劳动比，还会提升这种相互作用的质量。使用过印度新旧机场或大都市地铁系统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第四，选举结果越来越取决于现任领导人能否说服有抱负的选民相信一个美好的经济未来。莫迪总理以压倒性胜利当选，许多邦的选举也都是在这个简单的主题下获胜或失败的。最后，监管机构正在利用科技来升级不堪重负的合规网络。例如，央行建立了一个银行和不良企业的数字化数据库。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Aadhar）意味着资金能被直接汇到目标收款人的银行账户，而不是在途中“丢失”。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增长在2018年和2019年受到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印度和中国在2018—2019年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放缓，投资者将这种放缓过多地（分别）归因于政治狂妄和贸易战，而很少归因于影子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在过去几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放贷后，印度银行部门正在对其公共部门的银行进行大规模整顿，并清理坏账。尽管目前的贷款限制造成严重的混乱，但如果印度要进入资本积累时期，那么清洁的银行体系至关重要。

印度破产法（IBC）对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它已经适用

于制造业的大量公司，亦适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逾期贷款人。它的解决机制已经帮助贷款人收回60%的本金（相较而言，历史回收率只有20%）。与此同时，它对逾期借款人施加的成本将抑制过度债务积累，从而有助于未来的金融稳定。

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甚至再下一个10年，印度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将超过中国。然而，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印度将无法像中国过去那样提振全球增长。

第一，全球环境在两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在中国崛起期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崛起引起）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中国的崛起不被视为零和博弈。社会舆论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印度面对的情况不仅是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北亚和东欧等制造业大国的劳动力供给也在萎缩。如果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幅、通胀和名义利率将上升，那么老龄化经济体的增长将难以改善，因此反对向印度转移生产的政治阻力也将更大。

第二，人口结构的球门柱（goalpost）发生了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出现另一个“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是中国的举国动员力，还有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全球经济的辉煌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基层创造出一个创业、生产和效率体系。这样的体系是非洲等小企业体系不够完备且高度分散的经济体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的。受绵延数百年的帝国影响，印度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但其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往往成为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障碍。鉴于人口结构面临的挑战之大，我们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中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印度虽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但

由于行政资本的缺乏及其民主制衡体系，无法实现一心一意的中国式增长模式。

印度的行政资本正从极其薄弱的水平起步，多党制内部以及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内部冲突，使协调增长的政策难以管理。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排名，印度在过去四年上升了73位，但仍仅排在第67位，而2015年印度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40位。在某些指标（许可证和跨境贸易）上，印度得分极高。然而，在基础设施质量和执行合同等需要更多协调和努力的指标上，印度仍然排在非常低的位置（例如，执行合同指标排在第163位）。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较容易取得进步。印度完全有可能在其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利用技术来保持发展势头，但我们认为，在需要广泛参与的变革中，实现这一目标更加困难。

由于邦与邦之间以及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内部政治摩擦，民主障碍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一些普通问题上也存在政治摩擦的情况表明，印度要制定和遵守一项国家战略，将财力和物力投入中国式动员的可能性非常低。

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印度增长的主体。反过来，私人部门增长能力和增长意愿的高低将决定印度的增长路径。与国有企业在国家支持下的发展不同，私人部门需要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蓬勃发展。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政府能否快速有效地改革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10.2.2 要抵消全球人口的不利影响，印度需要非洲的帮助

然而，跨越非洲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动员，可能远比促进印度的增长更困难。

一些非洲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得分确实比印度高，少数得分甚至比中国还高，然而，非洲存在两个关键问题，妨碍了其吸引和配置资本的能力，使其不足以抵消发达经济体人口结构方面的不利因素。首先，非洲是一组分散的经济体，这意味着通过协调机制建立一个能与中国匹敌的制造业综合体的可能性非常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它们缺乏印度所拥有的大量人力资本，也缺乏中国经过数个世纪磨炼的根深蒂固和广泛的学徒制、行会和效率体系。

2019年，非洲人口约为13.2亿，几乎与印度的人口相当，但其面积几乎是印度领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的10倍。在该地区，非洲由54个国家组成。因此，非洲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其分散性。54个国家都有其国内政策，每个国家都像印度一样存在着摩擦，这意味着协调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将困难得多。这也意味着，由于国家边界的原因，非洲各国家之间的移民比印度国内各邦间的移民要困难得多。

地理上的分散与人口结构相互影响。由于印度境内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其人口结构可以被视为单一的。劳动力可以相当迅速地转移到快速增长的地区，因此无论在哪里，劳动力都是对资本的有效补充。然而，非洲的边界没有印度开放的邦界那么宽松，而且其经济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因此，劳动力充足、经济效率低的经济体的劳动力无法无缝地跨越国界，进入劳动生产率 and 经济增长率正在提高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刚刚开始其人口红利期，但非洲许多地区已进入人口红利的后期，其行政效率已相当领先（IMF，2015）。

不幸的是，在人口丰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整个非洲，过去20年里，尽管许多地方经济显著增长，另一些地方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治理得分普遍下降。在非洲，只有在那些已经走上相对稳定道路的经济体中，政治稳定和暴力减少的情况才相对明显，而那些开始时政治就较为脆弱的经济体，情况则进一步恶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治理得分全面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善的方法。充足的劳动力很可能吸引资本，这反过来可能迫使这些经济体采取措施，保持领先于当地竞争对手的地位，以吸引这些资本流入。然而，与印度一样，不太可能通过充分利用非洲的劳动力，就足以抵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不利因素的影响。

除治理外，非洲快速增长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障碍是其人力资本。在世界银行2019年的人力资本指数中，印度排在第三个四分位。只有6个左右的非洲经济体排名在此区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排名在最低的1/4中。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国家层面的数据在最开始时可能会产生误导。在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初期，最有才华的劳动力通常会被最有利可图、回报最高的活动吸引。这就是非洲分散化造成的问题所在。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分布在仅占非洲1/10的面积上，辅以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市场。但非洲在这两方面都无优势。人口密度显然远低于印度，因此选择一个制造业基地，仍然意味着跨越50多个国家的远距离出口。人力资本的可得性仅限于少数确实有能力吸引资本的经济体。其他的国家将不得不从他国引进人才，或者通过发展教育体系在本国慢慢培养人才。这将继续严重阻碍将流入的资本大规模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总而言之，尽管印度和非洲拥有庞大且相对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但它们都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的崛起。它们自身的进步很可能是稳健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但很可能达不到老龄化的全球经济所需的动力。克特里考夫（Kotlikoff）的一般盖达尔模型（General Gaidar Model，GGM）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些进步，但同时也发现其程度令人失望，即“非洲、中东、印度和其他历史上缓慢增长的地区出现了追赶式增长，但速度非常缓慢”（Kotlikoff，2019；Benzell et al.，2018）。

德斯梅特等人（2018）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坚决主张采用第三条道路来实现这种趋同。他们认为，除非国际和国内的移民步伐加快，否则技术转移到当前生产率低、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将导致有利于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生产率逆转”。该模型的直观认识源于作者在全球不同地区发现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由于他们使用了非常详细的地理模型，甚至在经济体内部也发现了这种相关性。在当前的状况下，他们的模型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亚的许多高人口密度、低生产率地区正在变成高人口密度、高生产率地区，而北美和欧洲在人口和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了。”

然而，他们的模型有一个关键的不足之处，即行政管理基础设施的作用缺失。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它们执行复杂、需要协同的长期经济战略的能力。我们甚至会说，新兴经济体之所以无法转型为发达经济体，不是因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行政管理陷阱。德斯梅特等人的预测虽然令人鼓舞，但仍取决于这些经济体缺乏的行政资本存量的发展。

第11章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11.1 引言

政策制定者陷入了困境。长期低利率鼓励了加杠杆，并经常导致资本错配。经济增长的改善和对金融稳定的担忧将促使各国央行加息，不过利率上升会损害经济增长，然后周期性地推动通胀和利率再次走低。我们怎么才能摆脱？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债务陷阱，以及全球经济避免或走出债务陷阱的方法。

全球经济杠杆率的上升是利率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更广泛地说，是经济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人口结构变化最终将实现这种正常化。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我们是如何落入债务陷阱的，然后继续探讨问题的细节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基于前面第6章所述的原因，即使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财政政策也没有充分扩张以抵消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持续存在的通缩压力。因此，为了维持宏观经济平衡和通胀目标，货币政策逐渐变得更具扩张性，这强化了金融周期（Borio et al., 2019）。由此产生的名义（和实际）利率下降导致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住房和建筑业繁荣，这些行业不仅依靠国内银行提供融资，还

依靠主要来自国外银行的资本流入（伴随着经常账户逆差不断上升）。许多主要国家的银行杠杆率，以及许多经历过这种繁荣的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上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急剧上升（见图 11.1）。但这一危险并没有被预见到，直到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倒闭，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但为时已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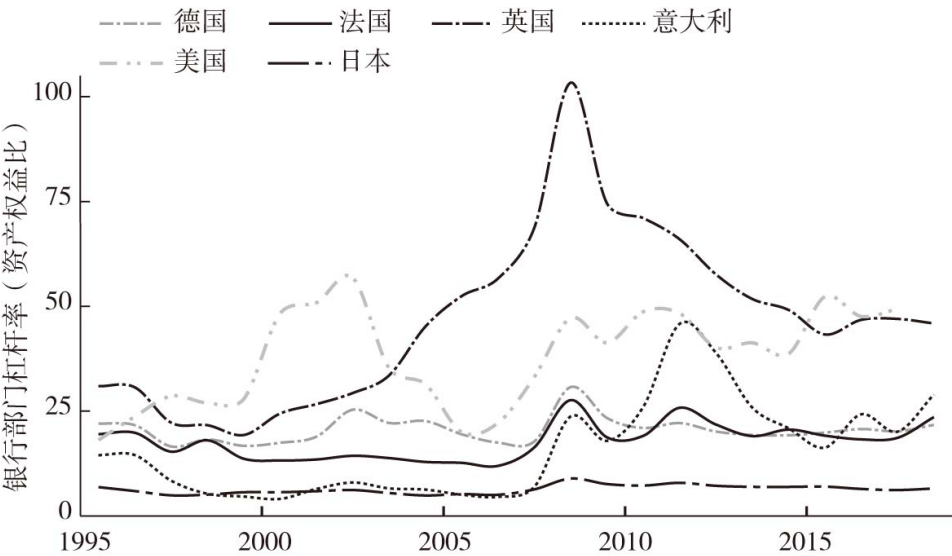


图11.1 繁荣时期，银行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OECD。

当局（主要是货币当局）随即采取了措施，成功引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在此我们无须一一列出。然而，从长远看，它们主要的审慎应对措施是要求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充足率（CARs），该计划在美国的实施比在欧洲更成功。因此，美国的资本充足率、信贷和存款增长，以及银行股本价值的恢复均比欧洲强劲。

专栏11.1 为什么美国在恢复银行业上做得比欧洲更好？

由于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资金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因此他可以建立可信的压力测试，并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以达到与压力测试时的存款水平相匹配的比例。当这些公共资金（TARP）应用于少数几个资本金低于合意水平的银行时，会在这些银行的诸如分红、回购和高管薪酬等方面采取限制性措施以保护公共资金，直到所有的资金全部被偿还，而这很快就实现了。

相比之下，欧洲没有相对应的公共资金可以用来为资本不足的银行注资。其结果是，由于没有对资本金低于合意水平的银行立即进行注资的办法，压力测试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因此，人们认为，几乎所有银行都能通过压力测试。银行仍被要求满足更高的资本充足率，但可以自由地选择以筹集新股或去杠杆〔即减少资产和（存款）负债〕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鉴于股票市场的疲软，以及银行家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关注，他们自然会选择去杠杆的方式。随着当局显性或隐性地向总部设在国内的银行施压，以维持对当地借款人的贷款，这种去杠杆自然会导致欧洲银行的跨境贷款大幅减少。

但是，当局是通过监管命令而不是试图改革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制度和结构，来建立资本更加充足的银行体系，这导致银行高管们将最大化短期股权价值的优先级置于长期投资和增长之上。其部分结果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显现的通缩压力在此

之后变得更加强烈。由于第6章所述的原因，财政政策受到限制，货币政策需要更具扩张性，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持续的压力，因此量化宽松（QE）和官方负利率成为“唯一的选择”。

尽管2009年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平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流动性恐慌方面是非常有益和成功的，但后续措施是否有很强的正面影响是有争议的，部分是由于对银行盈利能力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1]但是，极低的利率环境不仅有利于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延续，还加快了债务积累的速度。

因此，在第11.2节，我们首先说明，尽管金融危机被广泛归咎于过度负债，后果却使非金融企业、未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挥霍和危机影响的居民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积累了更多的债务。但是，正如我们指出的，由于债务规模的上升几乎完全与利率的下降相当，在大多数情况下，偿债率、还本付息与收入的比率几乎保持不变。

不仅利率已达到有效下限（我们不考虑取消现金政策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认为通胀和名义利率将很可能再次上升。问题在于，现在主要宏观经济部门的负债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利率的任何大幅或快速上升都会使大部分私人部门陷入债务偿付危机，并增加财政部长的财政困难。此外，为了避免破产风险，负债较高的企业会觉得有必要大幅削减新投资，从而加剧了之后的衰退；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卡莱姆利-厄兹坎等人（Kalemli-Özcan et al., 2019）的研究。为了防止未来经济衰退，利率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以至于不会阻碍债务的进一步积累，因此债务陷阱就会出现，我们将在第11.2节讨论这一点。

因此，我们在第11.3节中要问的是，是否有摆脱债务陷阱的切实可行途径。正如前面章节中已经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看

不到任何增长加速的希望，减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相反，我们看到通胀率大幅上升（目前尚未被预期到）的可能性更大；但央行的通胀目标呢？如果债务人不能通过通胀来稀释债务，但又几乎无法偿还债务，那么这些债务是否可以重新协商，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违约（或免除）？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过去和未来的宏观经济弊病不仅反映了人口趋势的急剧变化，而且也是公司治理和资本主义结构失败的结果。债务融资太容易被使用，而股权融资则没有吸引力。只要公司高管仍关注净资产收益率，而且继续和所有股东一样只承担有限责任，那么股权融资对他们就不具吸引力。伊斯兰融资[2]要求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这方面可以再探讨。关于所有这些，可说的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12章，讨论试图将整个融资结构从以债权融资为主转变为以股权融资为主的方法，其中，债权融资主要针对企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居民部门和公共部门。

11.2 债务的积累

表11.1和表11.2分别展示了2007年和2018年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债务占GDP的百分比，以及这10年的百分比变化。下述几点值得注意。

表11.1 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率

2007年12月		非金融			总计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私人部门	政府部门	
美国	99	70	169	65	233
欧元区	60	92	151	65	216
德国	61	57	118	64	181
法国	47	111	157	65	221
西班牙	81	124	206	36	241
意大利	38	75	113	100	213
英国	92	94	187	42	228
瑞典	65	126	191	39	230
日本	59	103	161	175	337
澳大利亚	108	80	188	10	198
加拿大	79	83	162	67	229

2018年12月	非金融				总计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私人部门	政府部门	
美国	76	74	151	106	256
欧元区	58	105	163	85	248
德国	53	57	110	60	169
法国	60	141	201	99	300
西班牙	59	93	152	97	249
意大利	40	70	110	132	242
英国	87	84	171	87	258
瑞典	89	156	244	39	283
日本	58	103	161	237	398
澳大利亚	120	75	195	41	236
加拿大	101	117	218	91	308

2007年12月以来的变化						
	非金融				总计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私人部门	政府部门		
美国	-22	4	-18	41	23	
欧元区	-2	13	11	20	31	
德国	-8	0	-8	-4	-12	
法国	14	30	44	34	78	
西班牙	-23	-31	-54	62	8	
意大利	2	-5	-3	32	30	
英国	-5	-11	-16	45	29	
瑞典	23	30	53	0	53	
日本	-1	0	-1	62	61	
澳大利亚	12	-5	7	31	38	
加拿大	22	34	56	24	80	

注：1.此处私人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不同色块标记可以帮助读者更便捷地查看各个部门和国家的债务规模 and 变化。颜色越深代表样本国家中某一经济部门的杠杆率越高或变化越大。例如，在10个发达国家的样本中，澳大利亚的居民债务占GDP的百分比最高，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百分比最低。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加总数据与各分项之和有出入。表11.2与此同。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表11.2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率

2007年12月						2018年12月					
	居民 部门	非金融 企业 部门	私人 部门	政府 部门	总计		居民 部门	非金融 企业 部门	私人 部门	政府 部门	总计
中国	19	98	117	29	146	中国	53	152	204	50	255
韩国	72	89	161	29	189	韩国	98	102	199	41	240
印度	11	42	53	74	127	印度	11	45	56	70	126
印尼	12	15	26	32	59	印尼	17	23	40	29	70
马来西亚	52	58	111	40	150	马来西亚	66	68	134	56	190
德国	45	46	91	36	127	德国	69	48	117	42	159
中国香港	51	126	177	1	178	中国香港	72	219	292	0	292
巴西	18	30	48	64	111	巴西	28	42	71	88	158
墨西哥	14	15	28	37	65	墨西哥	16	26	42	54	95
智利	29	66	95	4	99	智利	45	99	144	26	170
哥伦比亚	17	27	44	33	76	哥伦比亚	27	35	62	50	113
阿根廷	5	17	22	62	84	阿根廷	7	16	22	86	109
俄罗斯	11	39	50	8	58	俄罗斯	17	46	64	14	77
波兰	23	34	57	44	101	波兰	35	46	81	48	129
捷克	23	46	69	27	97	捷克	32	57	89	33	122
匈牙利	30	78	108	65	174	匈牙利	18	67	85	69	154
土耳其	11	30	41	38	79	土耳其	15	70	85	29	114
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	44	35	79	27	106	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	34	39	72	57	129

2007年12月以来的变化					
	居民 部门	非金融 企业 部门	私人 部门	政府 部门	总计
中国	34	54	88	21	109
韩国	25	13	39	12	51
印度	1	3	3	-4	-1
印尼	5	9	14	-3	11
马来西亚	14	10	24	16	40
德国	24	2	26	6	32
中国香港	21	94	115	-1	114
巴西	11	12	23	24	47
墨西哥	3	11	14	16	30
智利	17	33	50	22	71
哥伦比亚	11	8	19	18	37
阿根廷	2	-1	1	24	25
俄罗斯	7	7	14	6	20
波兰	13	11	24	4	28
捷克	9	11	20	5	26
匈牙利	-12	-11	-24	4	-19
土耳其	4	40	44	-9	34
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	-10	4	-7	30	23

11.2.1 居民部门

总体而言，在那些受先前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包括英国），居民部门债务率的增长幅度最小，甚至有所下降。那些当时未受影响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已经接手成为房地产热潮的先锋，并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心，比如斯德哥尔摩、多伦多和温哥华。

新兴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较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住房杠杆率上升幅度最大，所有这些经济体开始时的通胀率和利率水平均较低且稳定。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参与了全球经济的通胀下降过程，甚至超过了全球通胀下降的平均水平。结果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北亚、波兰和智利的居民部门债务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居民部门债务上升了20%~25%。现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居民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韩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与房地产危机前的美国差不多。

由于居民部门有大量盈余，而且资本市场非常强劲，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居民部门的财富增长远快于负债增长（危机前10年，即1997—2007年也是如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问题都不是居民部门债务的总体水平，而是特殊群体，主要是年轻家庭的债务要远高于其收入水平，尽管这是由年龄分布或失业率的暂时影响所致。对这类群体而言，即使在违约和贷款收回（这会导致房价进一步传染性下跌）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利率上升也会使他们的其他消费支出大幅减少，进而导致需求萎缩（Mian and Sufi，2014）。

试图平衡住房或房地产金融周期的主要新工具已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一部分，例如，在房地产繁荣时期提高贷款价值比（LTV）或贷款收入比（LTI）。尽管这些措施有帮助，但并不是万能药。房地产繁荣的心理冲动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局的监管举

措，特别是因为这些举措基本上通过阻止年轻家庭攀上自有住房的高枝来发挥作用，而这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尽管存在一些重要差异，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较为类似。在金融危机后10年的上半场里主要发达经济体黯淡无光，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和市场情绪成功避免了这一点。整个新兴市场主要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导致人们对房地产部门永不停歇的繁荣产生了泡沫式的预期，建筑业和抵押贷款融资都强劲增长。在商品生产经济中，这种商品生产迅速扩大带来的劳动收入增加和资本的迅速流入，共同推动了信贷增长和住房部门的发展。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非洲南部的主要城市地区的房价，以及对那些可以进入信贷市场的人的信贷配给都大幅上升。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但大宗商品进口商也从良好的全球环境中获益，这种环境允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宏观经济格局。结果导致了亚洲各地房地产部门的繁荣，不仅在北亚，还包括印度和菲律宾。

随后中国和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同时伴随着住房市场低迷和个人收入增速下滑。不同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住房市场是低迷而不是危机（土耳其和中国除外），不过居民部门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这抑制了住房需求，并限制了其他的消费选择。带来的后果是，负债严重的建筑公司受到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抵押贷款展期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受到了影响。

11.2.2 企业部门

在新兴市场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大幅上升，尤其是

中国。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大量借贷，带来了经济增速的大幅上升，再加上利率下降，二者共同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以及许多主要经济体的企业杠杆率上升。除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借款主体主要包括大宗商品公司和建筑公司。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都面临严重的杠杆问题，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半场过度扩张的结果。新兴市场中的大宗商品进口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比如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和土耳其，部分是由于建筑公司扩张过度。

早期的债务扩张被用于增加投资。在扩张的下半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宗商品生产商和建筑企业的许多投资的回报率大幅下降，但是债务基本都留在了相关企业的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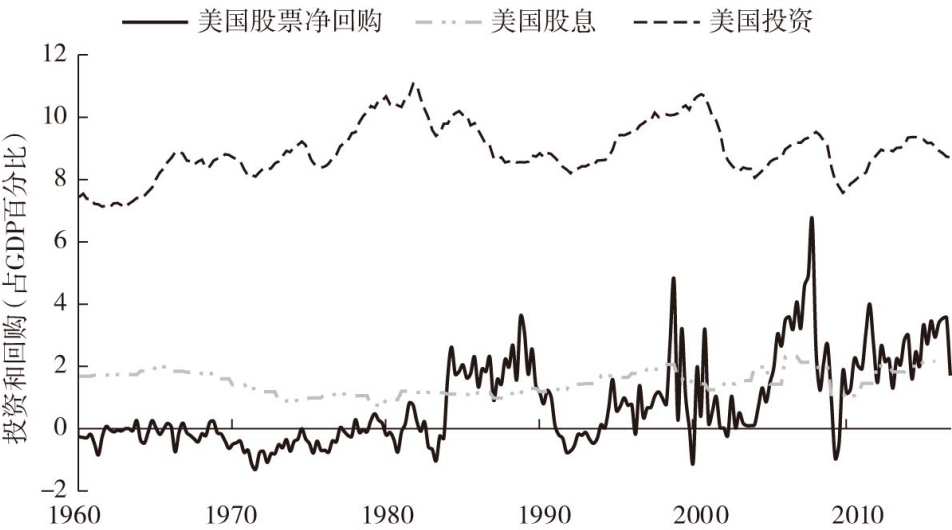


图11.2 由于企业更愿意用债务为股票回购融资，美国投资依然疲软

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相对低迷，相比于盈利或利润而言非常低，以至于出现财务盈余，正如第5章和

第6章所述。从股权融资向债权融资的转变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债务率上升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由不断增加的股票回购活动所致，尤其是在美国，在其他英语语系国家则相对少一些。图11.2显示了美国的情况。此类回购的强力杠杆作用是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最简单方法。福特（J.Ford）在他的《金融时报》专栏中讨论了私募股权在这方面的作用（2019年7月29日，第8版）。但是，正如提高银行部门的杠杆率会增加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广大公众）的风险一样，其他公司的股票回购也是一种风险转移活动。

此外，此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债务是质量较低的债务、杠杆贷款和BBB级债务（参见图11.3和图11.4）。[3]从根本上说，即使收入增速放缓，低利率和利率下降也会降低固定收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从金融的角度看，当“追求收益”主导了投资策略时，低违约风险使得购买高收益证券更具吸引力。二者的结合自然导致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发行迅速增加。

这也许是未来金融脆弱性中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假如利息负担加重，如果有大量此类公司违约，这本身不仅会导致通缩，而且还将对贷款人、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产生不利的次生影响[见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乔恩·康利夫（Jon Cunliffe）爵士的讲话，2019年5月7日]。

评级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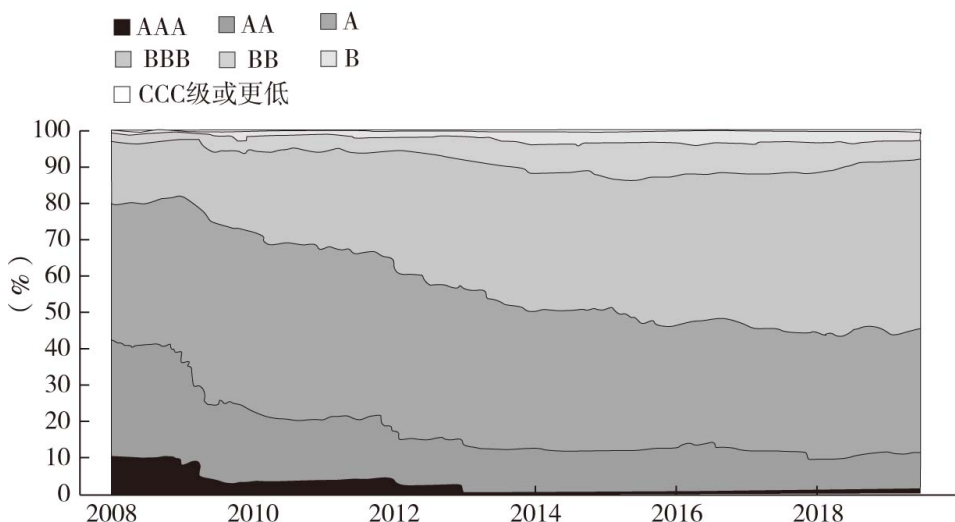


图11.3 2019年，BBB级企业债券的占比创历史新高

注：本图展示了ICE/BofAML本币企业债券指数的信用评级分布，这个指数可以作为本币企业债券市场的代表。然而，该指数可能没有涉及全部的本币企业债券，其他的替代指数可能会包含不同的分布。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报告》，201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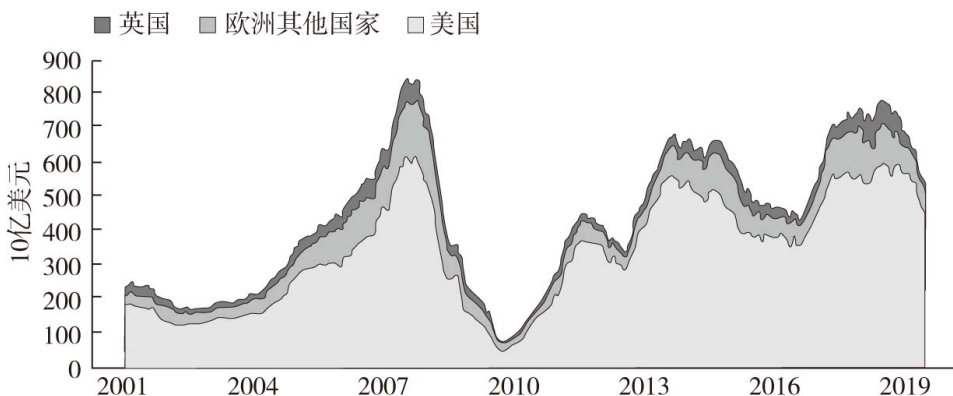


图11.4 尽管自2018年达到峰值后有所放缓，年来杠杆贷款市场增长迅速

注：图上为全球杠杆贷款12个月滚动发行总量，是基于公开银团统计的数据，不包括私人双边交易量。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报告》，2019年7月。

11.2.3 公共部门

在居民部门，财富增长一直快于债务增长。在企业部门，利润增长和利率下降或低企使得偿债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类似地，在公共部门，债务水平的上升几乎完全被利率下降抵消，使得偿债率在过去几十年几乎保持不变，即使日本也是如此（见图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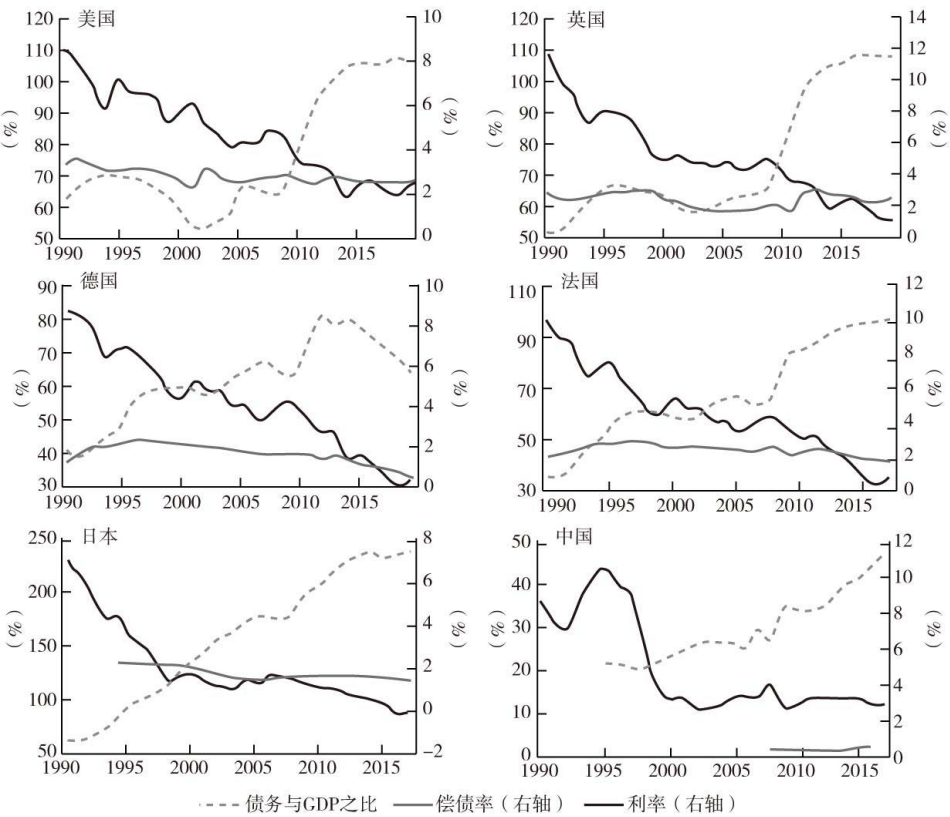


图11.5 债务与GDP之比、偿债率和利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OECD。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似乎还不错。但如果名义利率再次上升，会发生什么呢？很大程度上，由于利率极低，利息支出仅占政府一般支出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债务似乎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化掉。但是，每增加一点额外负担都会带来影响，特别是社会老龄化正在给政府账户带来不可避免的较大压力。

当然，如果乘利率水平极低之际延长公共债务的期限，那么即将到来的名义官方短期利率的上升，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是，人们感到有必要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反而导致了有效期限的大幅缩短。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和对商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付息采取的“地板模式”（floor system）[4]，二者的结合意味着，由这些存款支持的货币量化宽松部分的有效期限为零。

因此，公共部门的财政融资几乎会立刻感受到官方利率上调的全部痛苦。随着企业部门的财务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以及（民粹主义者）要求维持低利率的政治呼声，央行保持利率逐步有限上升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如果这种利率上升仍是渐进、小幅的，那么当前延长和扩大债权融资的动机就仍然存在，这就是现在许多国家落入的债务陷阱。

此外，正如阿尔法罗和坎祖克（Alfaro and Kanczuk, 2019）所述，近年来，“非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尤其是中国，已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的重要融资来源。与典型的主权债务相比，这些贷款协议并不公开，其他债权人没有关于其债务规模的任何信息”，这种协议“大大降低了传统的或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债务可持续性”。

11.3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债务陷阱呢？最好的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方法是实现更快的实际增长。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那么在公共部门新增赤字为零的情况下，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事实上，如果实际增长率相对于实际利率足够高，那么各部门赤字可以更高，同时债务率仍会下降。

11.3.1 增长

全球特别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当前基本不可能使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大幅超过实际利率。如前所述，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 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公共部门提供养老金、医疗保健支出的需求将强劲增长，同时对经济中占比不断上升的老年人口的支持也会增加。未来几十年里，这种额外公共支出的前景令人担忧（OBR，2018，第75—85页，特别是专栏3.3）。同时，劳动人口的纳税能力有限（参见Heer et al.，2018；Papetti，2019，第30页）。

- 人口结构不仅导致增长率下降，而且如前所述，在许多国家，例如欧洲和中国，出现了工人数量的绝对下降。即使生产率恢复到2008年之前几十年更有利的增速水平，劳动人口的下降也意味着总的实际产出将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增长。日本劳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比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要快得多（见第3章和第9章），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日本劳动

力的减少，日本实际总产出的增长一直很缓慢，每年增长约1%。在未来几十年中，类似的问题也将给许多欧洲国家带来沉重负担，不过，美国和英国的处境稍微好点，部分是由于最近几十年的外来移民。

- 实际利率已经变得非常低，部分原因是人口压力，特别是中国，导致储蓄“过剩”，而如前所述，中国以外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部分是受全球可用的额外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因素都在逆转。随着抚养比上升，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除非政府有意识地限制未来对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救助的慷慨程度，不过这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劳动力变得稀缺会恢复工人的议价能力，为满足公共部门的额外支出会增加税收，这都将导致实际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为了抵消这一影响，企业可能会增加它们的投资需求。因此，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即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很可能导致实际利率回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实际利率上升的同时，即将来临的压力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使得简单地通过增长来摆脱目前的高债务率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增长来摆脱目前的高债务，那么债务人可以通过尽可能不偿还最初隐性承诺的那部分债务来减轻债务负担，也许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11.3.2 预期外的通胀

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的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预期外的）通胀；请注意，目前通胀预期处在良好的控制中，并维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这种通胀预期的锚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

资者对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通胀目标的信心。但它们会吗？自通胀目标制被普遍采用以来，在过去的25年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呈下降趋势。这使得央行成为负债累累的财政部长及其上司（总理）最好的朋友。各国央行一直非常渴望将通胀的下降归因于自己成功实施的通胀目标制，而且评论员和政界人士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这一说法。如果现在名义利率再次处于上升轨道，即使逐渐上升，也将使它们与财政部长和其他政客的眼前愿望和利益相冲突，这在某些国家已经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印度和土耳其。几乎每个国家，央行的独立性都是由立法机关的法案来实现的；欧洲是例外，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体现在一份共同条约中。尽管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很难撤销，但其他央行的独立性可以由修订法案或颁布新法案来改变。如果政客们发现，央行稳定物价的政策阻碍了他们实现更快增长和降低税收的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寻求终止或大幅降低央行的独立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防止未来更高的通胀而言，这种自夸的独立性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有点像脆弱的芦苇。

11.3.3 重新协商

但是，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更为坚实。欧洲的情况是，包括成员国政府在内的债务人都无法以通胀的方式摆脱债务。在央行拥有坚实独立性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当偿债压力变得太大时，下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重新协商承诺的现金流，以便减轻偿债负担。这种重新协商通常被归入“债务展期，假装没事”的范畴，凭借这种方式，定期支付利息的现金流要么减少，要么进一步推迟（有可能二者都发生），从而减轻债务人的即时现金流负担。通常情况下，它的实现方式是，尽管债务人未来现

金流的现值减少，但会计人员能够使这些债务在债权人账簿上的面值不变。这样，对债务人的减免不一定伴随着债权人表面财务实力的下降。当然这就是一种“障眼法”，但由于许多金融依赖于信心和信任，“障眼法”也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手段。

11.3.4 违约

最后一种债务减免的方式是直接违约，分为部分违约和全部违约两类，即减记应付给债权人的名义现金流量。当然，这类违约会在一段时间内阻止相关债务人进入信贷市场。但是，历史表明人的记忆通常是短暂的，比如主权债务违约，因此违约债务人的预期复苏情况不会长时间阻止其重返金融市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明确违约，相关债权人必须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采取减记。因此，违约可能会比重新协商产生更大的系统性影响，银行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厄运循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由于违约会对借款人造成代价高昂的影响，对债权人造成不断扩大的系统性影响，所以，借款人违约是对过度债务负担的一种不愉快的极端应对方式，可能比重新协商或略高的通胀率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然而无论怎样，所有这三种选择，即预期外的通胀、重新协商和债务违约都是代价高昂和有害的。

最后，出于对问题研究的完备性考虑，而不是作为当前条件下的可行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可以消除沉重债务的方法，即债权人大赦欠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债务。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2018）证明了这是古代帝国，如巴比伦、亚述等帝国常见的做法，并在早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寓意。被免除的债务是家庭债务而不是商业债务，并且主要是欠国王和皇室的债务。国王不仅免除了欠自己的债务，而且有权要求

其他富有的债权人也这样做。这些债务大赦强化了帝国的社会结构和公共义务，例如在军队中服役，有助于延长帝国的存在，在新国王登基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都会有这种债务大赦。

随着更多的富有债权人的权力相对于中央统治者的权力上升，债务大赦的可行性下降。事实上，那些强大到足以蔑视其他债权人并重新实施这种赦免的统治者通常被称为“暴君”，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具有一些有趣的阶级内涵。现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通常由金融机构进行调解，因此债务减免可能会使它们破产。此外，如今的债权人类别已经扩大，比如通过半强制性的养老金安排，以至于对哪些债权人免除哪些债务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债务减免只能毫无区别地并入债务重新协商的过程，这一问题在第11.3节中讨论过，关于这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古德哈特和赫德森（2018）的研究。

[1]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请参见Altavilla et al.（2018），Borio et al.（2017），Brunnermeier and Koby（2018），Eggertsson et al.（2019），Goodhart and Kabiri（2019），Heider et al.（2019），Xu et al.（2019）。

[2] 伊斯兰融资是一种符合伊斯兰商业惯例和有关法律的融资形式，主要集中于中东地区，以伊朗、巴基斯坦、苏丹等国家为代表。伊斯兰融资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遵照《古兰经》等伊斯兰教义，倡导风险分担、公平分配和合同的神圣性，排斥商业投机行为，其核心是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根据李翠萍（《伊斯兰金融发展综述》，2015）的研究，截至2015年，全球约有4 000万人是伊斯兰金融业的客户。——译者注

[3] 2019年7月《金融稳定报告》，经英格兰银行许可转载。

[4] 2008年前，美联储采用“利率走廊模式”调控利率水平。2008年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得市场流动性过剩，利率走廊下限利率下调压力增大，因此，美联储推出利率地板模式，也称“利率下限体系”，通过在利率下限附近采用资产逆回购操作方式，确保美联储依然能保持对市场利率的调控。——译者注

第12章

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12.1 引言

戒除债权融资似乎并不可能，而债务人各种形态的违约又是市场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本书认为，本来能做、应做而又没有去做的，是大幅调增股权融资的财务优势，降低债权融资的财务优势，以实现新的平衡。

股权融资的益处显而易见，但仍值得在此重申。第一，股权不同于债务，没有到期日，因此也不存在日益逼近的清偿截止日期。第二，股利的发放由发行人自行决定，可以与收入或利润挂钩，这是固息支付无法实现的。一些债务工具，如利率互换、通胀指数化债券，其支付在本质上也是可变的，但债务工具绝大多数还是固定票息支付债券。未按时支付票息即构成违约，但不支付股利并不构成违约。第三，债务固定付息形成的现金流本来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在债务危机爆发时，债务即使不违约，最多也就是一笔可疑资产。历史上反复出现债务违约与宏观经济动荡的相互交织。因此，即使对债权人而言，持有债权相对于持有股权的益处也并不明显。

目前，全球已积累了巨额债务，相比将巨额债务做股权转让，在未来新增融资中实施向股权融资的转变会更易于操作。当

然，债转股已经在实践中用于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组合，如中国在这一方面已有过积极的探索。即使在未来，为机构设计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转换的方案，要比为家庭设计同类方案简单。或许最容易看到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的领域是企业部门融资，这也是最重要的领域。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居民部门融资和公共部门融资方面，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

如何鼓励家庭和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转向股权融资模式呢？为了购买住房，家庭主要以固定利息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融资。这也可以转向更接近股权融资的形式。在预期房价上涨速度超过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速时，金融机构或许会乐意在住房融资中融入股权元素，但借款人可能并不乐意。英格兰银行的贝内通等人（Benetton et al.，2019）的研究指出：

一些购房者并不使用英国政府提供的股权型住房融资工具，而是选择了贷款价值比很高的按揭贷款。对这一现象的反事实研究显示，由于预期房价将以每年7.7%的速度上涨，这样的融资选择就成了理性的选择。

但是，基于保护借款人的主要目标，监管者或许可以调整对贷款价值比的监管要求，从而在住房按揭贷款中增加股权融资相对于固定利息融资的优势。住房股权融资似乎需要房地产价格期货市场的发展，以帮助贷款机构对冲通胀风险敞口。通过购买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住房或商业地产作为基础抵押品），这一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实现对冲。

在预期房价相对CPI下跌（即使只是暂时下跌）的时期，贷款机构将不愿续做此类股权融资。此时，公共部门或许必须为住房股权融资提供支持。

长期看，房屋建造的技术创新严重落后于其他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而且，房价的大部分构成与土地价值相关，而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因此，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共同导致了较长时期内房屋价格一般会跑赢CPI。如果这一趋势在未来得以延续，那么从中期看，政府按英国已实施的“帮买计划”（“Help-to-Buy” scheme）模式提供的股权融资支持，实际上会成为公共部门未来的一个盈利机会。

在学生贷款领域也可做大体相似的论证。为支付高等教育的成本，学生主要基于固定利息借入学生贷款或债务，未来需要将更多此类学生贷款转为基于股权的融资模式，即贷款机构获得学生未来总的应税收入的一（小）部分。这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入学的一个强制要求，发挥类似于累进再分配税的功能（或将使一些富裕学生选择不上大学）。这一点，可参见古德哈特和赫德森（2018）的研究。

让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也可以通过发行名义收入债券而非固定利息债券，实现更接近股权形式的融资。过去，各类研究不时呼吁公共部门发行此类债券，且近年来这样的倡议更加频繁地出现（Sheedy，2014；Benford et al.，以及英格兰银行2016年《金融稳定报告》及其参考文献），然而，名义收入债券仍未得到大规模发行。鉴于未来几十年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可得性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重新考虑这一方式的良机。

正是在企业部门，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最具前景。若要在企业部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融资转向，需尽快解决两大问题：

其一，至少在企业部门，目前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享有较大

的财务优势。如果要成功地转向股权融资，必须纠正这一问题，必须使股权融资享有和债权融资同等的优势。我们将在第12.2节做进一步的讨论。

其二，所有股权持有人的有限责任，叠加经理人与股权持有人激励机制的统一，导致了短期主义行为，并使投资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点在前文已有论述，高德哈特和拉斯特拉（Goodhart and Lastra, 2020）以及胡尔塔斯（Huertas, 2019）的论文有更深入的讨论。

12.2 拉平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净财务优势

我们注意到，主要有两类建议，旨在消除企业融资中债权融资的财务优势，拉平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竞争优势。第一类，公司股权津贴（Allowance for Corporate Equity, ACE），如英国财政研究所于2011年出版的《税收设计：莫里斯报告》（*Tax by Design, Mirrlees Review*，以下简称《莫里斯报告》）就提及了公司股权津贴。第二类，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Destination-based Cash Flow Taxation，以下简称DBCFT），俗称边境税（Border Tax），如牛津大学企业税收研究中心奥尔巴克等人（Auerbach et al., WP17/01）2017年1月的同名论文对此进行了详述。这两类建议在下文中将做进一步讨论。

12.2.1 公司股权津贴：对股权的税收津贴？

税收问题是公司偏好债权融资而非股权融资的一个关键原

因。《莫里斯报告》第17章建议推行公司股权津贴，以纠正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税收不平衡。在公司损益表中，利息支出是明确的经常项目，可在税前扣除。而以股权方式为某个项目融资，则不能产生类似的税前可扣除支出。因此，公司倾向于将利润返还股东，转而借入更多债务。此外，在通胀走高时，发债的实际成本降低，此时债权融资的优势更加明显。由此导致的净效应是公司融资的风险上升、效率下降。

公司股权津贴通过引入可在税前扣减的直接股权津贴（尽管是估算的），试图在股权融资项目中复制债权融资利息支出享受的税收优惠。在公司股权津贴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莫里斯报告》对其进行了讨论。第一，通过规定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减，可以拉平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税收待遇，但这需要在全全球达成统一。否则，公司会转移至仍在实施利息支出税前扣减的国家或地区。第二，推行公司股权津贴意味着税收收入的减少。为弥补这部分税收损失，提高公司所得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对策，但《莫里斯报告》的建议是接受这部分税收损失，并通过重新评估国家整体税收结构来平衡这一损失。因此，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单边（例如仅在英国）废除利息支出的税前扣减是不可行的。为拉平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财务优势，必须对利润中的股权投资正常回报部分实施同等的税收扣减，而这将导致公司税基的收窄。比利时在2008年推出了上述改革，但其主要弊端在于，除非提高公司税率作为补偿，否则财政收入将显著下降。

提高公司税率的问题在于，这将使英国的公司税率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现行税率，从而使跨国公司有更强烈的激励将应税利润甚至业务活动搬离英国。因此，《莫里斯报告》建议，各当局应接受实施公司股权津贴后公司税收入的减少，作为补偿，可以在

其他领域增加税收，这可以成为对税收体系做整体更大调整的一部分。

本书认为，在全球已经积累了过高杠杆的背景下，对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实施再平衡益处良多，完全值得为此付出因税基调整所致的成本。然而，在其他领域加税的政治阻力也非常大，我们注意到，自《莫里斯报告》发布以来，无论是财政部还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都未曾表态要积极考虑这一建议。未来的某次危机或许会使人们更加关注非金融企业的过高杠杆率问题，但危机是否会重新激发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仍不得而知。

12.2.2 边境税

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试图实现债务和股权在税收待遇上的近乎对等，但我们认为这一建议会引发更大的争议。在边境税下，包括投资在内的所有公司支出都无须纳税。出口将不被课税，进口则需缴纳税款。对支出的税收豁免本质上等同于实施增值税（VAT）。在边境税下，公司所有支出享受相同的税收待遇，公司就会认为债务和股权是无差异的。边境税的实施比估算公司股权津贴要简单许多，也不会产生税收收入损失，几乎不会造成经济扭曲。此外，边境税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即增加公司避税的难度。如果各国实施相同的公司支出税收规则及出口与进口税收规则，则公司将无法实施包括企业间贷款和将资产转移至避税天堂在内的各种避税计划，因此，一家公司处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在税务上将变得不再重要。同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现实施边境税对本国的好处，可以避免税收收入减损，或许还可以显示与其他实施边境税的经济体同等水平的竞争力。



专栏12.1 边境税（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

2017年1月，牛津大学企业税收研究中心奥尔巴克等人（WP17/01）在其论文《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的摘要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如下描述^[1]：

DBCFT包括两大基本要素。

- “现金流”这一要素意味着对包括资本支出在内的所有支出给予直接的税收减免，但是对获得的收入征税。
- “基于目的地”这一要素引入了与增值税相同形式的边境调节：对出口不征税，对进口征税。

这一税种的经济影响与推出税基更宽泛的单一增值税税率（或通过现行增值税实现相同效果）且同时相应减少薪资税的经济影响相当。

本文通过下列五大标准对DBCFT进行评估：经济效率、反避税逃税的稳健性、管理便利度、公平以及稳定。评估既针对所有国家统一实施DBCFT的情形，也针对更有可能出现的一国单边实施DBCFT的情形。

不同于现行对公司利润征税的体系，DBCFT和基于增值税的类似税种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国际环境中：

- DBCFT的核心出发点是通过在相对不可移动的地点（“目的地”，即商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地）对营业收入征税，以实现提升经济效率的目标。DBCFT不会扭曲商业投资的规模和地点。DBCFT通过确保对债务或股权作为融资渠道的中性化待遇，消除对债权融资的税收优待。

- 在目的地对营业收入征税还有一个显著优势，即

DBCFT可以有效遏制通过公司间交易实施的避税行为。常见的避税行为包括：使用公司间借款、将无形资产置于低税率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对公司间交易的不实定价等。在DBCFT下将无法实现减少纳税的目的。

然而，DBCFT的统一实施和单边实施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如果只是一小部分国家采用DBCFT，则不采用DBCFT的国家可能会发现，其面临的利润转移问题加剧了：例如，在高税率国家经营的公司也许会试图虚报进口价格，而其交易对手如果位于实施DBCFT的国家，也不会因此面临任何额外的针对性出口税。

- 同样，DBCFT将带来长期稳定，因为各国普遍有推行DBCFT的动机：相对于采用传统产地税的国家，或可获得竞争优势；相对于已经推行DBCFT的国家，避免处于竞争劣势。这也将有助于减少国家在税率方面的竞争。

既然DBCFT具有上述各种优势和益处，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税种没有得到推行？2017年美国新就职的共和党政府曾慎重考虑过推出DBCFT，但最终并未实施。原因在于，DBCFT存在许多缺陷。

- DBCFT意味着税收方向和内容的重大变化。正如其他重大变化一样，DBCFT的推出必将产生较大规模的输家和赢家群体。通常，输家表达抗议的声音会高过赢家表达支持的声音。

- 主要的输家将是进口商。DBCFT将被视为类似于暂时性本币贬值，人们可对DBCFT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也会有一些人质疑DBCFT是否符合WTO规则。

- DBCFT将（暂时性地）提高国内物价，尤其是进口占比较高的商品或服务。

- 尽管DBCFT的本意是在提高增值税的同时降低劳动所得税，但并不确定这一举措是否能确保税后实际劳动收入保持不变。

- 更严重的是，非就业的贫困人口，如老年人群、失业人群以及患病人群，将得不到保护，除非实施普遍的福利再评估，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推出DBCFT的输家，当然这还取决于汇率效应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实施DBCFT计划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其潜在的高度累退性，DBCFT对穷人的影响会远大于对富人的影响。

- 由于投资的顺周期性和波动性，公司损失亦是如此，因此，DBCFT税收总量将比现行的公司税更具顺周期性和波动性。这一观点可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报告（IMF Policy Paper，2019）。

- DBCFT可能引发公司的“假亏损”操作，尽管德弗鲁克斯和维拉（Devereux and Vella，2019）反驳了这一观点。

因此，如果要在不引发政治风暴的前提下推出DBCFT，可能必须辅之以大幅调整转移支付和福利支付的结构以及薪资税政策。因此，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足以消减大多数财政部长推出这一改革的热情。

面对当前许多跨国公司实施的避税行为，相比于推出DBCFT，财政部长们或许更愿意探索其他反逃税方式。

尽管DBCFT的好处一目了然，但推出DBCFT意味着要大步迈向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新体系，其间的成本成了巨大的障碍，使得

DBCFT未能被各国接受。

12.3 改革企业经理人的激励结构

当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评包括许多方面，如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导致经理人让公司承担过多的风险；经理人薪酬过高；经理人未能充分开展长期投资，尤其是研发方面的投资。^[2]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成了前两项指责的主要批评对象。为抑制或防范此类功能失灵，各方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建议。其中的一类建议聚焦于限制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结构，如不同形式的狭义银行建议，将核心零售金融业务与其他业务隔离的结构化建议，以及其他各种监管举措。

我们的建议在古德哈特和拉斯特拉（2020）合作的论文中有更详细的阐释，就是要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应承担多重责任，“外部人”则按目前的做法承担有限责任。这一方案显然需要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而这样的区分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一定的随意性。

如何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呢？原则上，两者的区别并不复杂。相比于“外部人”，“内部人”能够获取多得多的企业经营信息，从而有可能运用这些信息防范过度的风险行为。当然，在实践中，这一区分并不容易。“内部人”包括所有的董事会成员，也包括外部董事。就员工而言，我们建议采用双层区分法，既要考虑他们在公司的职位，也要考虑其薪酬高低。因此，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部门负责人都应包括在内。但公司核心员工通常反映在其薪资水平而非正式职位上。因此，如果某员工的收入超过了CEO收入的50%，也应被视为“内部人”。但是，如果由于“内部

人”因为经营失败可能承担多重严重责任，或许会出现试图调整职位和薪资的操作，以避免被归入“内部人”类别。因此，监管当局必须有权将特定公司的特定人员定为“内部人”，当然，这一权限要受制于司法审查。

大股东的地位使其同样能够获得内部信息，对公司经营发挥影响力。因此，任何持股比例超过一定限额（如5%）的股东都应被视为“内部人”。没有特定的关键门槛来决定持股比例高过该门槛的大股东就应被视为“内部人”。有观点提出，对于持股占公司股票总价值2%~5%的股东，应允许其自行选择成为“内部人”或“外部人”。若选择作为“外部人”，则必须放弃所有的投票权，在年度股东大会等场合不参与公司政策讨论。

确定责任的基础应该是所有“内部人”自其成为“内部人”之日起的薪酬，应包括所有形式的薪酬，唯一的例外是以“自救安排型债务工具”（bail-inable debt）形式发放的薪酬，其后与此类债务工具相关的所有交易都应发布公告。这应适用于董事和员工。股东则应依据其所持股份的购入价值确定责任。

不是所有的“内部人”都生而平等。其中特别是CEO，掌握的信息和拥有的权力远胜其下属、其他董事会成员或审计人员。或许可以认为，CEO的责任可以是其履职以来薪酬（剔除自救安排型债务工具）总值的三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许应承担所有薪酬两倍的責任，其他“内部人”的责任则与其累计获得的收入相当。同样，持股比例超过5%的大股东或许要在所持股份之外，额外承担两倍于其股票购入价值的责任；持股比例在2%~5%的“内部人”股东，或许要在所持股份之外，额外承担与其股票购入价值相当的责任，这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之前国民银行体系中的要求大体一致。

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内部人”不再是“内部人”，如员工离职，大股东出售股份，应该做何调整？第二，如果某“内部人”注意到公司正在进入危险的领域，但又不能成功劝说管理层改变方向，在此情况下，如何让“内部人”避免因其本人不同意的政策而受到处罚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内部人”离职的问题，一个合适的处理方式是根据“内部人”的信息和权力逐步降低责任。假设CEO承担三倍的责任，则可以在其离职后的三年内，按一个固定的比例逐步降低责任，最终在离职三年后不再承担额外责任。同样，承担两倍责任的“内部人”，也应在离开后以固定比例逐步降低责任，直至两年后不再承担额外责任。承担一倍责任的“内部人”离开后的处理方式亦如此。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内部人”反对但未能阻止公司某项政策的实施，那么，这些承担额外责任的“内部人”如何避免因此类政策而遭受的惩罚？我们的建议是，处在这种情境下的“内部人”应正式致函相关监管部门，陈述其对公司要采取的某项政策的担忧，当然，这样的信函应该是机密的。监管部门必须正式确认收到此类信函，未来在公司失败的情况下，可用以减轻或免除对来函“内部人”的责任追究与处罚。此外，在公司确实由于此类信函中指摘的问题而失败的情况下，这又可以成为监管者问责的一种形式。在公司失败的情况下，所有此类信函都必须对外公开。若监管部门不公开任何一封此类信函，将构成违法。

还有一个更具难度的问题，监管部门收到机密的警告信（写信人或许是审计人员，或许是某个不开心的员工）后，是否应该公开信件内容。我们认为，此类警告在公开之前，需由一个独立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可以是监管部门或者是金融监察专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信中的警告或许毫无根据，公司采取的政策或许

是恰当的。但如果监管部门在调查后认为信中警告是有道理的，则第一步就是要与公司管理层就信中提出的警告及其依据进行私下讨论，如果公司管理层坚持不调整，监管部门下一步就可以公开警告信内容（匿名），并附上监管评价，同时也给公司管理层就此事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经过上述流程之后，“外部人”将在这一事件及其缘由上获得与“内部人”相同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监管部门收到警告信，却未能采取相应行动，而事后又证明该警告预先点明了真相，那么，监管部门将被置于风口浪尖，至少会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失。

上述建议的目的是要在公司失败时，对拥有“内部人”信息和权力的主体采取恰当的问责和处罚。前文提及的示意性的责任倍数，显然具有主观性。但在实践中可以不断校准，以实现对所有此类“内部人”的准确制裁，无论是针对大股东、核心员工，还是监管者。我们认为，这将是一种更优形式的治理。

[1] 原文引自Auerbach,A.,Devereux,M.P.,Keen,M.and J.Veua,“Destination-Based Cash Flow Taxation”，本书转引得到了授权。

[2] 在《金融时报》2018年12月12日《对公司目标的反思》一文中，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批评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咒语，指出在高度杠杆化的银行业，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是无效的。马丁·沃尔夫在文中提及了多部书籍，包括科林·迈耶（Colin Mayer）2018年出版的《繁荣》（Prosperity），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被明显破坏。

第13章

未来的政策问题

老龄化、税收及货币与财政的冲突

人口变化是公共财政面临的长期关键压力。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2018年7月。[1]

未来我们去哪里筹集资金支撑老龄人口的支出需求？如果你认为当前全球债务总量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官方对未来老龄化相关支出的预测会让这一情形雪上加霜。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对富人或穷人增税都是极其艰难的。而完全不承担对老年人的责任更不可行，因为在民主社会，老年选民比重的上升就决定了这行不通。

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路径必须发生重大变化。财政创新正在实施：我们已经推出了一些很有希望的税收制度，包括当代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正如诺曼人在1086年开展的土地赋税调查一样。然而，所有这些创新税制在执行方面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难，我们认为，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绝望最终推动了这些税制的实施。同时，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将推动通胀上升，正如我们在之前章节讨论的那样。

货币政策同样将面临严峻考验。政府鼓励央行独立性的强烈

意愿将开始逆转。在过去几十年间，各国央行过于相信通胀下行是其实施通胀目标制的结果，而较少将之归因于人口的变化。过去，通胀和利率保持下行，财政部长是愉快的。然而，未来随着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推动通胀和利率进一步上行，情况还会是这样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两者间的冲突已经开始，但现在还仅仅是开端。

13.1 引言：未来的崎岖道路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人口趋势会对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产生巨大压力。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2018年7月发布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第二章，第7页），英国公共财政基本收支和净债务的基本预测如图13.1所示。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的公共财政出现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尤其是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第7页，第24段）：

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继续假设，为应对中长期非人口成本的压力，医疗保健支出将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我们假设，在2038—2039年之前，过快增长的成本将从最新的一级和二级医疗保健支出的预估值（高于1个百分点）稳步回落到1个百分点的长期假设水平。我们选择的方法和估值类似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使用的方法。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对医疗保健支出的预测并非基于自下而上对“需求”的估计，而是代表了一种判断，即对“不变的政策”的最好诠释就是，假设支出的上升是为了应对人口和非人口成本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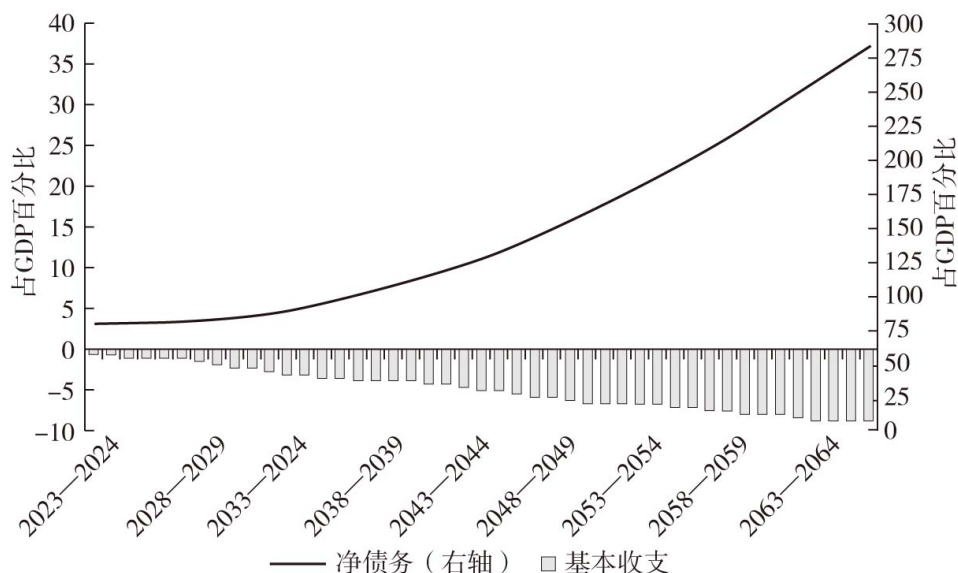


图13.1 对基本收支和公共部门净债务的基准预测：英国

资料来源：在开放政府许可框架下转载自OBR报告：<http://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licence/version/3/>。

此外，鉴于劳动人口增长率的预期下降，以及近期生产率的发展趋势，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报告对生产率的假设在我们看来似乎过于乐观了。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观点，“在稳定状态下，全社会的生产率会年均提高2%”（第7页，第22段）。

请注意，我们认为生产率的确会增长，但这一观点更适用于企业部门，尤其是企业能够有效提升资本劳动比的部门。医疗保健行业更难实现生产率增长，因为老年人（事实上是所有病人）的需求是高度异质化的。有人认为美国医疗保健行业是“最低效”的行业，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这一领域的任务目标无法实现复制和自动化，教育也是如此，在生产率统计上也是“低效”的。因此，总体效应是企业部门中的大部分领域生产率的确会提升，但由于日益扩大的医疗保健行业的特质，整体的生产率

只能实现缓慢提升。因此，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关于生产率的变化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生产率的起点较弱，通往全社会更高生产率的道路或许比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良性假设要更为崎岖。

美国罹患相同的综合征。《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2019）展示了完全相同的财政趋势（图13.2和图13.3转载自该报告的图1.4和图1.8）。

一方面，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不利得多，因为美国财政状况的起点（经商业周期调整）更糟糕。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下图13.4（原报告的图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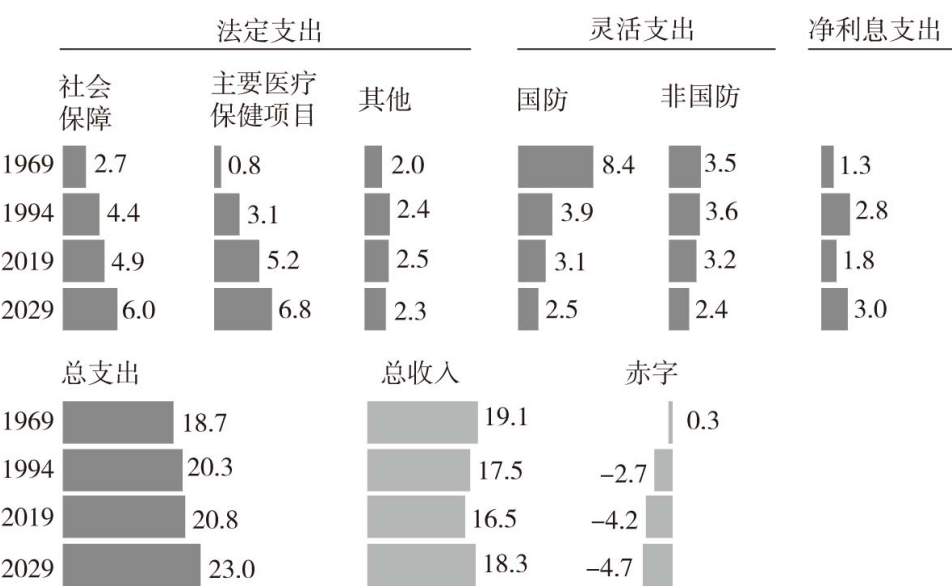


图13.2 CBO 25年前和50年前的收支基线预测与实际值相比：美国

注：1.主要医疗保健项目支出包括医疗保险支出（剔除保费和其他抵消收入的净支出）、医疗救助支出、儿童健康保险项目支出，以及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下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补贴和相关支出。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加总数据与各分项之和有出入。
资料来源：CB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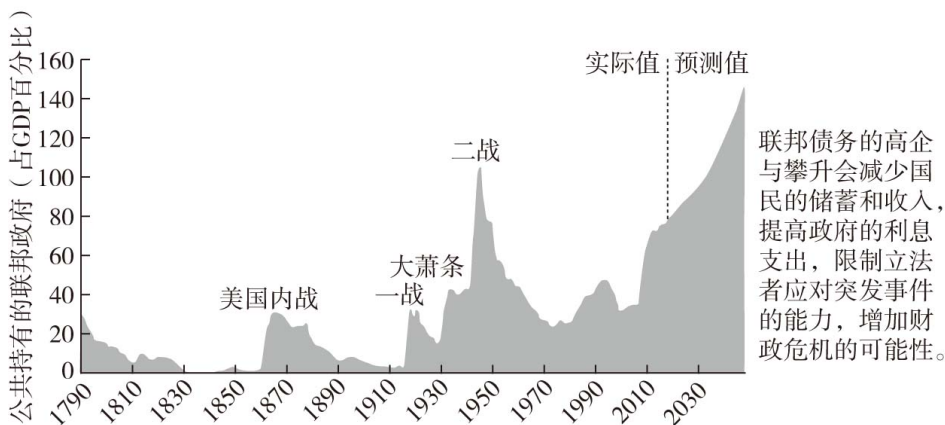


图13.3 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美国

资料来源：CB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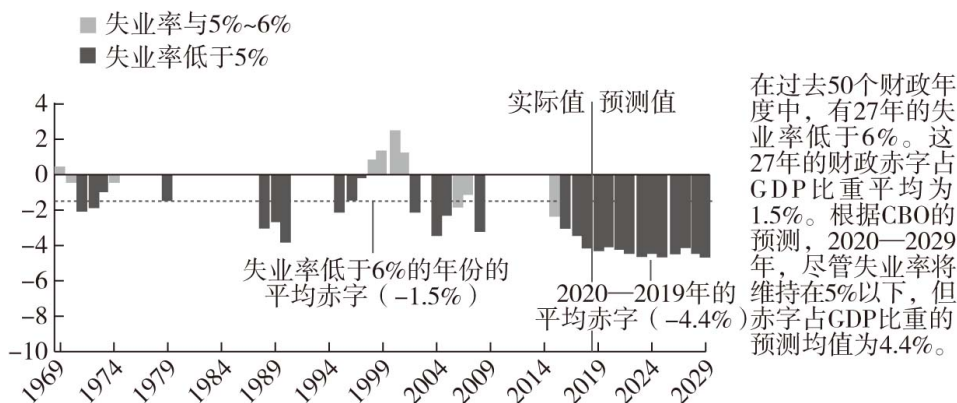


图13.4 基线预测中的赤字与低失业率时的赤字和盈余的比较：美国

资料来源：CBO。

另一方面，美国却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情况要好很多，因为美国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处于相对低位，且增速更为缓和。

13.2 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老龄化和税收

因此，从目前在人口和医疗方面的假设出发，当前的财政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当然，这也许并不会发生。医学或许可以找到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可以延缓人体衰老过程，从而让我们都能工作到85岁（也许可以在100岁生日之后任意选定一个夜晚，通过程序死于心脏骤停）。然而，依赖未来的科学突破来解决所有问题似乎过于乐观了。即使目前的趋势仅仅持续20年或30年，就能将我们的公共财政置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事实上，为了控制后金融危机时期居高不下的赤字和债务率，许多国家采取的紧缩政策已经触及了公众政治接受度的极限。此类紧缩政策大多表现为削减医疗、养老和国防之外领域的公共支出。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削减举措还能走多远。此外，我们相信，社会和政治压力将继续推动医疗和养老成本按目前的预测持续上升，而新旧超级大国的角力将推高军费支出。

因此，看似不可避免的是，要维持公共部门的偿付能力，就必须提高税收。但提高什么税呢？技能人群、金融财富和公司总部都可以用脚投票，因此，陡峭的累进所得税、普遍的财富税，以及更高税率的公司税，大体只能成为自我伤害的举措。另一方面，如果对收入谱系中的低端群体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则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导致工人提出更高的税前工资要求。

尽管我们并不是财政专家，依然在此提出四项可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公司税、土地价值税、碳税以及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DBCFT，在12章已有讨论，见第12.2.2节）。

专栏13.1 对劳动人口征税的上限

希尔、波利托和威肯斯（Heer, Polito and Wickens, 2018）尝试预测对劳动人口征税的上限。三位作者在第40—41页给出了结论：

国家养老体系可持续性的主要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尽管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发达经济体的抚养比（养老金领取人口与养老金缴费人口之比）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且在未来的85年里预计还会翻番。在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来缓解养老保障体系窘境这一问题上，许多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正在接近征税的上限……

不同国家的征税上限、到上限的距离以及达到上限的可能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前景尤其令人担忧。与美国不同，欧洲各国的平均财政空间更小，养老金体系更为慷慨，老龄化更为严重，且预测的老龄化速度比美国更快。因此，欧洲国家在2010年时远比美国更加接近征税上限，预计在2050年前就会达到上限。而美国，预计在2100年之前都不会达到上限。

相反，克特里考夫的一般盖达尔模型得出了相反的结论（Kotlikoff, 2019，第34—35页）：

因此，一般盖达尔模型非常令人吃惊地指出，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西欧国家不会由于老龄化产生长期财政问题。事实上，在上述国家，世纪末的消费税率比世纪初的税率要低得多。根据一般盖达尔模型，主要由老龄化产生巨大财政问题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目前的老龄人口占比为17%。到2100年，这一占比将上升到27%。在一般盖达尔模型中，美国并不会经历后发式的生产率增长，因为所有的后发追赶都是相对美国发生的。[还可以参考布卢姆（Bloom, 2019）

编辑的《长寿与繁荣》（*Live Long and Prosper*）一书中收录的文章（比如Conesa et al., 2019；Laitner and Silverman, 2019；Börsch-Supan, 2019）。]

13.2.1 改革公司税的基础

侵蚀税基和转移利润（BEPS）的许多活动一直存在，利润转移源于国际竞争，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通过避税天堂的利润转移，典型例子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提供数字服务的公司通过避税天堂转移利润。这严重降低了公司税收入，尤其是大型经济体的公司税收可能已经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经合组织的主要建议是，将此类公司税收的核心从公司的物理存在地转向销售所在地，这一转变至少应适用于数字公司。上述建议可参见经合组织2019年10月发布的《秘书处关于支柱一“统一办法”的提案》（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这一改革是否能得到实施，截至本书付梓时尚不可知，若改革实施，则将大幅增加大多数大型经济体的公司税收入，减少避税天堂的吸引力。

13.2.2 土地税

阿姆斯特丹运河巡游常常会让游客大吃一惊。不仅是因为那些著名的斜楼，当游客了解到这些建筑是根据宽度和窗口大小缴税时，也会惊诧不已。运河沿岸缴税最少的房子就是那些正面只有几英尺宽的房子。背后的思路（可能）是要针对居住者接入的

公共道路，以及因私人使用而占据的阳光进行征税。今天看来这一思路有些可笑，但其中是否有正当公平的元素呢？

我们的提议包含了一些荷兰式元素，但并不多。

我们之所以建议对土地征税，是因为土地所有者“睡着”就获得了财富，但我们不建议对土地上的建设成果征税。土地和地上建设受益于基础设施以及附近的其他土地和地上建设。换言之，它吸收了正面的溢出，因此对这样的溢出征税是可行的。城市和乡村土地应区别对待。这样的土地税制度将创造社会效益，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避免不动产价值的突然跳涨。

土地税思想的演变

进入农业社会后，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和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一情况基本保持不变，直到工业革命来临。尽管权力和财富更广泛地分配于人力、金融和技术资本，但土地所有权仍然是一个社会地位的核心指标。房地产仍然是整个经济中的最大资产，其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国家银行信贷的80%左右都投向了房地产，巨量信贷又推高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价格，增加了这些经济的债务积压。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土地是固定且不可移动的。对其他财富形式征税可能减少相关生产活动，或使其向海外转移，但土地税不会产生此类负面效应。土地与其他财富形式不同，除了极少数特例（如荷兰的围海造田），土地并不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就使土地税相比于对大多数其他形式的财富征税而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合乎道德。任何地点的土地价值中的一大部分，都是由正外部性创造的，而正外部性主要源于公共支出，如交通、公园、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也源于同一社区内

其他私人开发商的投资。

此外，国家通过法律、国防和警察提供了和平与安全。没有国家提供的这些服务，就会如霍布斯指出的，生命会变得野蛮而短暂，土地价值也会走低且不确定性增加。霍布斯的必读经典《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2014年收录在华兹华斯世界文学经典文库（Wordsworth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中。总之，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不动产和社区的价值都取决于上文提及的学校、医院、道路和轨道交通的质量。最终，土地价值还是取决于他人愿意在该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程度。

亚当·斯密（1776， 现版本1982）^[2]、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现版本2016），以及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史中一直强调，城市土地或未开发的生地上或许会建房，但土地所有者对原地块的价值没有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正如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二章第五小节指出的，地主“睡着”^[3]就享有了不断上涨的土地租金收入 and 市场价格。当然，还有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71，现版本2016）著名的《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Our Land and Land Policy*）。

相反，在建设和相关开发中的资本投资需要实际支出，因此，相比土地更不适合作为征税的对象。对原土地价值征税，而不是对整体不动产（土地加建筑）征税，将有效降低单位土地的税额，从而刺激投资开发，加快新房供给。

这样的论证并不适用于乡村土地。以欧洲为例，乡村的形态和面貌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创造的产物。对国家公园征税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可行的办法是，评估不同形式的乡村土地用途的广义社会价值，从而确定是否征收土地税。这听起来似乎颇有难度且

有些官僚，然而，这实际上只是农业补贴流程的一种延伸，而许多国家已经在实施农业补贴，如英国的农村支付局（Rural Payment Agency, RPA）。鉴于农地价格已经在下降，这或许可以使一批更加年轻和多元化的农民进入并从事农业。原地价格的估值确有难度，但它不会比许多其他物品更难，如艺术收藏品等。此外，为了土地保值增值而发生的支出，如扎篱、挖渠、施肥、除草、造园等，在这样的土地税制度下应可以抵扣。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年）之后的第一批财政和政府措施之一，就是对土地所有权开展全面调查，形成了《末日审判书》（1086）。不仅在英国，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都需要一次现代的土地所有权调查。卫星图像经常被误读，如将碉堡看作原子设施，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借助卫星图像，能以低成本、高效率 and 广覆盖的方式，更有效地辨别建筑物和土地。此外，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并记载相关的土地附带数据，如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的可得性、气候细节等。

因此，我们倾向于根据纯粹的土地价值征收土地税，不动产税则可作为退而求其次的备选方案。

对土地和不动产价格的积极影响

这样的土地税将带来两大直接益处。第一，将迅速降低土地的市场价格，带动住房和商业地产价格下行。第二，若不对建筑物征税，将鼓励土地所有者加大建设，以降低单位土地的税负。由于这一税种存在扭曲和扰乱估值和交易的风险，合理的实施路径似乎是在初期针对（纯粹）土地（或不动产）价值推出可承担但稳步提升的税率，不能采用迅速随机跳升的税率。

有人担心，未来的税率提高会立即贴现到当前价格上。这是

有可能发生的，但迈阿密的例子证明了相反的结论。迈阿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城市土地，将在未来50年后不可避免地沉入地平线以下。但这既没有拖累建设速度，也没有拉低迈阿密的房价。

除非出现普遍的金融危机，否则要在遭遇最小阻力的情况下推行土地税，税率就必须是渐进且稳步上升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有同样的建议。基于土地估值的低税率定期税，需要有持续更新的估值，虽然流程烦琐费力，但技术上并无难度，而且远比试图推行更大范围的财富税要简单。由于土地不可移动，因此土地税对经济的扭曲效应更小，却又能够实现财富从土地所有者向不动产所有者的再分配。

13.2.3 碳税：让环保女孩格雷塔重绽笑颜

对于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关于人类生存的主要担忧不是恶化的抚养比或人口变化，而是气候变化以及可能导致气候变化的所有问题。出生率下降（除了非洲）和人口增长减速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因此受到了气候变化活动家的欢迎。

但碳税可以同时服务于这两项事业。碳税可以筹集资金解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抚养需求，同时又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在化石能源能效较低的领域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许多顶尖经济学家都支持碳税，如克特里考夫等人（2019）最新的提议——“让碳税成为代际的双赢”。但是，碳税并没有成为环保活动家的战斗口号，或许他们认为相比于基于税收或补贴的体系，直接管控更不易造成扭曲（或管控只会落在一些不特定的其他群体身上）。这是一个常见的谬误。

然而，加税总是不受欢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面临的“黄马甲”之困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例子。人们认为，法国农村的穷人享有较低的公共交通水平，油税上调将对其造成较大冲击，而富裕的巴黎人则可以搭乘地铁。

这又是一个应该开展当代“末日审判书”式调查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公共交通水平划分不同等级的区域，如卓越、满意、较差、几乎为零。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等级的地区设置不同的汽油税率。在美国，各州不同的汽油税使得加油站集中在某些州的边境附近，但这种市场扭曲似乎相对微小。同样，对取暖费的税率也可以根据平均温度设置地区差异。在许多国家，已经考虑了老年人的取暖需求。

我们需要的是碳税，但碳税必须有更明智的设计，以缓解贫困人群、老年人群以及生活方式使其无法适应新碳税的人群面临的压力。

13.2.4 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

前文已就DBCFT进行了探讨（见第12.2.2小节），在此仅做简单讨论。DBCFT的巨大优势在于，公司无法通过现在采取的一系列避税行为实现避税，因此在需要增加额外资金来源时可提高税率而不必担心企业转移到海外。DBCFT的主要劣势在于，由于采取了对消费间接征税的形式，即泛化的增值税形式，因此对富人的影响要小于对穷人的影响。

因此，要推出DBCFT，必须辅以细节化的举措，确保穷人不会因此税而处于不利地位。在实施DBCFT的同时降低薪资所得税是不够的。实施DBCFT会导致物价上升，尤其是进口食品价

格，即使DBCFT只是导致价格短暂上升，也要保护老年人群、失业人群、单亲母亲以及其他救济领取人群的（相对）收入不因此而下降。

综上，本节内容主要讨论了可能推出的新税种，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财政不确定性危机。然而，各税种都会遭遇反对意见，尤其是受到负面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会反对，因此，在推出新税种时既要循序渐进，又要精心设计，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补偿和保障。

鉴于公众对加税的反对，我们怀疑当政者是否会做出足够的努力，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重回赤字时保持宏观经济平衡，解决公共部门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正如前文强调的，最终的结局将是通胀压力的回潮。这就又回到了在新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央行能有何作为的问题。

13.3 货币政策

政客及其经济顾问一直低估了过去30年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的合力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通缩压力。同时，在维持物价稳定的成功中，他们又高估了其中可以归因于央行通胀目标制以及对通胀实施总体控制的部分。

在这一方面的成功国家，尤其是德国，过去非常倾向于通过经常账户的大幅顺差而非公共部门赤字和债务积累来实现经济平衡。当然，这给对应的赤字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此类赤字又部分或大多归咎于它们自身的财政无节制（而不是归咎于那些“更审慎”的债权国的政策）。

在全球财政赤字水平次优的背景下，必须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平衡全球经济。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利于社会上最有权力的各个部门，所以此类政策产生了额外的影响。央行行长成了各界的挚友，上至财政部，下至公司、有按揭贷款的家庭、富人以及老人。央行拉低了债务的利息成本，刺激资产价格攀升。只有年轻人和穷人在此间的直接受益相对较小。即使如此，也可以说（的确也是如此），扩张性货币政策推高了总需求，提高了就业水平，因此年轻人和穷人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但是，如果潮流转向，大逆转开始，又会发生什么？

正如全球财政政策在过去30年间呈现系统性的扩张不足，在未来的30年间，即2020—2050年，财政政策很有可能也会紧缩不足。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必须要承担起压降需求的重任，以实现其通胀目标。这意味着更高的名义和实际利率。但这显然不利于在过去几十年宽松货币政策中受益的人。

同时，正如过去几十年间央行在去通胀中的作用比其声称的要少，现在，央行要在不进一步损害增长的前提下将通胀水平控制在低位，其成功的可能也极小。过去和未来数十年长期通胀趋势或是一个非货币现象。

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推断就是，央行独立性可能会滑入危险的境地，但各国情形不一定相同。在左翼政府执政的国家或地区，央行独立性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究其原因，左翼的政府更少关注受益于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人群的福利，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希望出现金融恐慌、信用风险溢价扩大、在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消失等情况。对于这些左翼政府，独立的央行能在通胀上行环境下提供金融稳定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正是市场急需的。对于右翼政府，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府，并没有保护央行独立

性的需求，因为富人和有权势的群体一般来说已经是他们的支持者。因此，如果右翼政府执政，央行独立性可能会受到最大的伤害。

事实上，右翼和民粹主义对央行独立性的抨击已经发生，这一点可参考比安奇等人（Bianchi et al., 2019）的论文。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人》在2019年4月13—19日这一期有篇社论，题为“干预日：独立的央行正在受到威胁。这对世界是个坏消息”。央行独立性在多数情形下是纸老虎。独立性通常源于某部法案，而一届议会通过了法案，下届议会可以废止该法案。即使保留原法案，政府一般可以通过改变对央行的授权，或更换央行管理层，让央行服从政府的意志。无论央行当前的宪法地位如何，央行在本质上是政治机构，央行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欧洲央行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受条约保护，而要修改条约需要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即使如此，欧洲央行也知道，如果推出的政策受到几大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则其自身也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央行独立性的光荣岁月也许正在走向一个不愉快的结局。

[1] 在开放政府许可（Open Government Licence）框架下转载：<http://nationalarchives.gov.uk/doc/open-government-licence/version/3/>。

[2] “地主喜欢不劳而获，即使对土地的天然产物也要求地租”（《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第八小节）。土地所有的特权“建立在最为荒谬的假定基础上，即每一代人并没有相等的土地权利……当代人的不动产应该由……500年前……过世的人的设想来规范”（第三篇第二章第六小节）。

[3]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现版本2016）一书的第五篇第二章第五小节，穆勒描述了对不动产收取租金，不动产持有人作为所有者“无须做任何努力或牺牲，就可以向社会要求租金支付……地主……变得更加富裕，似乎在睡着时不用工作，不用承担风险，也不用节约，就实现了。在社会正义的普遍原则下，他

们又是基于什么获得财富的增加呢？”

第14章

逆（主）流而行

理解过去方能筹备未来。政策、金融市场条件和筹谋未来都是当时主流看法的自然结果。趋势维持的时间也是一个因素，维持的时间越长，大家就越相信它会继续下去。主流想法一旦确立，就很难动摇，尤其是在转折点上。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上，且主流模型不能或者不愿意转变方向。我们和这些模型有什么不同？如果主流观点是错误的，会有什么后果？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通胀和利率这两个名义变量经历了两波连续且强大的趋势。图14.1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一点，该图显示的是1694年至2018年的英国长期债券的名义利率变化。1694年至大约1950年，利率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5%~5%的水平。但是自那时起便逐渐连续上升至1973/1974年15%左右的最高点，之后转头逐渐下降至现在低得不正常的水平。

二战之前的几个世纪，年度通胀主要因战争和农作物收成不确定而波动较大。但是人们一般估计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虽然有时像1914年一样会估计错误），且农作物的收成多少也是随机的。所以，图14.1显示的这几个世纪的长期通胀预期和实际利率保持较稳定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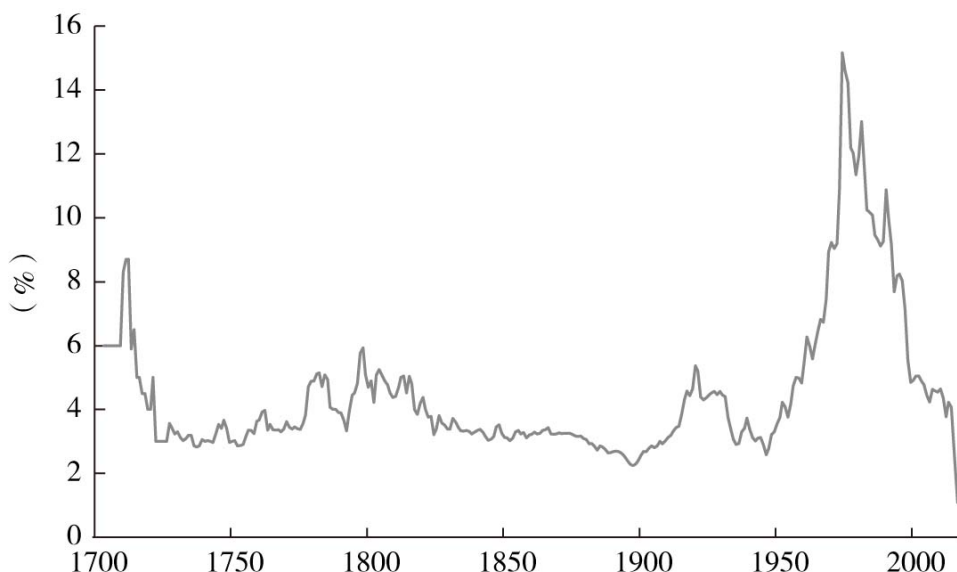


图14.1 英国长期债券收益率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美联储经济数据库。

那么，二战之后到底是什么变化使得这两个名义变量展现出持续的两波趋势，为什么这两波都很强大的趋势方向正好相反？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会回到战前的稳定状态，或者是否会出现第三波趋势。如果有第三波趋势，未来又会如何？

主流通胀理论基于货币主义或者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对一个货币主义者或者信奉金本位制的人来说，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即发达国家以法定货币体系代替了金本位制。政府财政的支配地位使得政客可以印钱贿赂选民，这便引发了通胀。20世纪70年代滞胀大行其道，情况非常严重，最终不得不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从而稍微恢复了对政客印钞冲动的限制。

这样的分析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在上升曲线的第

一阶段，即1950—1979年，经济学界认为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控制来自需求侧的压力，从而在全社会实现菲利普斯曲线上的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最优取舍。战后的决策者在20世纪30年代还年轻的时候经历了高失业率的痛苦，战后便希望在可行失业率区间内尽可能降低失业率。如果这些政策引发了过高的通胀，他们就直接采取价格和收入政策来应对。这意图虽好，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

同时，这种几乎保证充分（或者过于充分）就业的政策加强了劳工的议价能力，英国的国家矿工工会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工会成员数量上升，劳工变得更为激进。加强劳工议价能力的一个违背初衷的结果是自然失业率的悄然上升，这是采用凯恩斯需求管理提高平均就业率的副产品。

但是1950—1979年发生的事情和出现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将聚焦二战后岁月的下半段，即1980—2018年，以及未来的趋势。

对这段时期，尤其是2007年后，主流货币主义理论就更缺乏说服力了，金本位制信徒的理论更是如此。“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可以创造货币”已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但为什么我们的通胀持续低于目标？

当然，有人将此归咎于名义利率的零下限或者有效下限。但是当通胀像2019年处于1%左右的水平时，只有在实际均衡利率 r^* 转负，远远低于之前一贯的2.5%~3.5%的水平时，有效下限才成为严重的限制。这将不再是一个名义货币而是实际货币问题。

现在的主流解释便是如此，即 r^* 已经转负。长期停滞理论采用一系列论点（包括不平等甚至老龄化社会的投资需求下降

等) 解释 r^* 下降而且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低位。对 r^* 的实证估计总是得出负值或者非常接近零的数字，进一步佐证相信长期停滞的人士的观点。

有人进一步提出，世界已陷入低总需求和低通胀的困局。低通胀和更低的 r^* 意味着总需求永远无法真正恢复，各经济体因为存在未能充分利用的产能而持续面临低通胀。

这样的理论大行其道是有理由的。美联储屡次试图加息的努力总以被迫尴尬降息结束，各大央行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推高通胀无果，都与这一理论非常吻合。

但是，细看之后，这一理论至少在三方面站不住脚：

第一，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更像是与中国相关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问题。这一理论也无法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情况，当时增长强劲，通胀和实际利率都在下降。所以，理解危机前后的情况就需要两个不同的解释，这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解长期趋势的方法。

第二，用所谓的无法观察成分的模型或者卡尔曼滤波模型生成 r^* 估计值的方法基于如下假设： r^* 的路径和潜在增长的路径由一个共同因素决定，该因素为生产率。但关于增长和实际利率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这样的联系（Hamilton et al., 2015）。所以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估计值，其准确性值得怀疑。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解释 r^* 的路径时将不平等和低投资视为外生给定的。但是，这两个现象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全球化和人口因素。将它们直接视作利率下降的原因不能识别出真正的决定因素。

14.1 我们的方法论和主要判断

本书的主要判断是：经济中实际趋势的演变，即实际产出持续上升以及同时存在的通缩压力是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劳动节约型技术，造成了劳动力供给面临迄今为止最大的上行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与资本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之外，其他劳动力的实际回报几乎不可避免地下降，而资本回报，即利润率，得以上升。在外包和移民的威胁下，劳动力不断失去议价能力。自然失业率 u^* 悄然持续下降。

也许除了认为自然失业率 u^* 的变化不仅更大而且在重要性上能和实际自然利率 r^* 或增长率 g 相匹敌（见第8章），我们对过去30年的长期趋势的分析是相对主流的。本书和主流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视野更加全球化，尤其是将世界宏观经济事件发生的根源追溯到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我们在第2章中记录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高度重要性。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他们自己身处的国家或地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来自北美或欧洲。他们的分析只是象征性地谈及全球性因素，对中国的讨论也仅限于只言片语，国内事件在分析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的分析框架如今看来太过狭隘，无法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大局。

在第3章和之后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未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包括东亚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曾经拥有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这一情况正在急速逆转。由于过去人口结构的变化，各种各样被时代抛弃、深感前途渺茫的工人开始支持右翼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客。这些政客宣扬的限制移民与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与这些大失所望的工人产生了共鸣（第7章）。工人们也许失去了议价能力，但是他们仍然握有政治权力。这就

是我们书名中所谓的“大逆转”。

虽然全球化退潮进行到了哪个阶段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这个“大逆转”的基本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所说的，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迅猛的全球化是过去30年快速增长以及低通胀与低利率背后的主要（非全部）原因，那么预测未来30年增长放缓、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就顺理成章了。

14.2 我们和主流观点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虽然我们认为人口和结构性因素是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背景，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转折点上，但是大多数的经济预测（预测区间不超过两年）并未提及它们。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口和结构性因素通常可以假设为常量。所以，不管各种预测使用的数学模型多么新潮高级，它们通常都体现出两点：当下结果的延续（动量）和部分回调到估计的均衡水平（恢复常态）。但是如果均衡水平本身在发生变化，模型的常态水平又如何确定？在大逆转发生时，传统的预测方法可能存在缺陷。

幸好有一小群但正在逐渐壮大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口变量并做更长期的预测。但是这些人（Papetti，2019）

预测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利率开始回升的时间也比我们的预测更加延后。

在该领域，我们的方法至少在三个重要的问题上和主流有所不同：

第一，我们对未来个人储蓄的趋势不如主流观点乐观。主流模型对消费的假设与老龄化社会将出现的消费格局完全不符。

第二，我们对劳动力总量收缩条件下的企业投资更加乐观。我们同意安德鲁·史密瑟斯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治理问题阻碍了投资，尤其是在美国。

最后，主流观点认为，债务和人口因素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压低增长、通胀和利率。我们却认为这两个因素将起相反作用，债务就像巨大的路障，但不可抵抗的人口趋势终将绕过它。这也意味着货币和财政当局将出现冲突。

主流观点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完美的前瞻性，因此消费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将保持平稳。我们并不认同。这种假设的理论意义大于实践。当然消费确有平滑的趋势，但不能完全保证整个生命周期的平稳。比如，中国的个人储蓄率从过去很高的水平降至如今的水平；而按照主流观点，中国的储蓄率本该大幅上升。

因为未来人均实际产出会继续上升，生命周期的平滑理论意味着相对消费将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但这样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并不会发生，发达国家的人们在生命的最后10年消费会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医疗支出的上升集中于生命终点附近。这些医疗和护理成本的负担会不断上升，除非医疗领域出现奇迹，而这样的奇迹还遥遥无期。因为抚养需求，尤其是出现痴呆的情况时，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指数性地上升，而且现在痴呆方面的护理资金严重匮乏。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一因素，而且考虑到家庭在持续延后生育第一个孩子这一因素（据我们所知，其他论文均未探讨过后者的经济影响）。

就算不考虑抚养需求给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额外负担，随着实

际增长放缓，政府征税能力下降，养老金和医疗护理的负担也必将上升。所以，主流观点一般认为，退休年龄会提高，甚至比预期寿命提高得更快，而且养老金的相对给付水平将下降。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经济体正快速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认同各国面临巨大的压力，最终将不得不采取主流观点预测的走向，但是这在政治上将遇到巨大的阻力。我们还认为，退休年龄的提高和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都将是缓慢而有限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这一点肯定能感同身受！

大多数主流模型假设所有的投资发生在企业部门，忽略了住房投资。老年人安土重迁，不愿搬家，而且他们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无须搬家。所以，老龄化社会将出现住房数量增加、空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当下，住房的总数量是稳定的，因为更多老年人分开居住导致住房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多年轻人因为独自居住的成本太高而选择和父母同住，两者之间相互抵消。父母的这种支持也导致子女减少为退休而储蓄，第5章和第6章对此也有阐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观点对未来的个人储蓄率太过乐观。

在企业部门，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投资近些年持续低迷。毕竟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在过去几年高利润率和极低资金成本的环境中，按理说投资应该远远高于现在的实际水平。

发达国家投资低迷的部分原因是，投资像生产一样，被外包到新兴的亚洲国家（见第9章中谈及日本的部分）。如果真的如此，全球化受阻将对发达国家国内投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再者，劳工议价能力的下降使得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的雇主通过

雇用零工、降低工资的方式而不是更艰难地提高员工生产率的方式（主要通过加大投资，见第5—7章和第9章）提高利润。如果这点成立，劳工议价能力的恢复、最低工资的上升（见第7章专栏7.1）可能起到鼓励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的效果。所以，我们并不像主流观点那么悲观，认为劳动力总量的潜在收缩将造成企业投资同等程度的下降。

但是我们同意安德鲁·史密瑟斯精妙阐述的观点，即投资率停滞的另一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存在的治理问题。当企业高管成功提升短期股市估值就可以获得极度丰厚的奖金时，他们就更有可能会加大企业杠杆，发债回购股票，利用闲置资金派发红利，而不是进行长期（有风险的）投资。在大环境好的时候想自肥的心思是自然而强烈的。结果就是企业债务率的大幅上升，尤其是在亚洲，虽然亚洲企业债务率上升的原因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原因有显著不同。但不管如何，目前世界各地的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均比2008—2009年的水平高得多。

债务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具体的途径不像主流观点想的那样。如果名义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极低水平，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担心企业债务，因为偿债率会继续保持低水平。公共部门债务也是如此，也许压力更低。居民部门持续保持盈余，现在企业部门也很难出现盈余，公共部门为了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必须积累赤字（第3章、第5章、第6章和第11章）。这一点在英、美等有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尤其如此；对德国和中国这样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必要性稍微低一些。除了德国极端反常的情况，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率过去数十年上升的速度比任何和平时期都要快（见第1章、第3章、第5章、第6章和第11章）。

再者，老龄化同时意味着对公共支出的需求会快速上升。但

同时通过实际收入的上升提高政府税收以满足该需求的能力在下降。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名义利率的下降掩盖了，因为偿债率保持在稳定水平。但是基于现有政策对这些债务率的预测（包括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做的预测）让人恐惧（见第1章和第11章）。债务是否已经膨胀到央行稍稍提高名义利率就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崩溃的水平？我们是否已经陷入债务陷阱：低利率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使得债务上升的同时，利率上升受到限制，从而鼓励进一步的债务积累？

主流观点不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对未来长期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的预测意味着债务再融资和赤字积累几乎不会引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总结了逃离债务陷阱的办法，包括降低债权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的财务优势，防止企业通过避税天堂逃税等。也许还需要加征其他种类的税收，比如，对土地价值而非财富课税，对空气污染物征收诸如碳税之类的税收（见第12章和第13章）。企业高管（尤其是CEO）的薪酬标准也需要重新审视。

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即工资成本和通胀未来会大幅上升，决策明显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的预测也面临各种论点的驳斥。第一，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变得非常平坦（第8章）。第二，这样的情况并未在日本发生（第9章）。第三，中国为世界大规模生产可贸易的廉价商品，使其他地区保持低水平通胀和低工资成本，这样的角色未来可能由印度和非洲这些人口条件仍十分有利的国家和地区继承（第10章）。第10章还讨论了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和使用自动化、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手段弥补劳动

力增长放缓的可能性（第3章也有谈及）。

那么，最终我们的预测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第13章）以及实际利率（第6和第13章）意味着什么呢？

政策制定总是困难的。而且如果我们的预测正确，它将变得更加困难。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养老金支出和医疗护理成本上升，从而推高总公共支出。但是同时实际收入和政府税收的增长都在放缓。第13章探讨了提高税收收入的可能方式。

近几十年来，各国央行对国家财政鼎力相助，通过降息减少财政负担并稳定偿债率。但是如果通胀压力高企（我们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前的和谐便会变为针锋相对，因为央行想要捍卫通胀目标，但政客要追求高增长和低偿债水平。两者之间谁能更胜一筹？如果后者如愿以偿（这是我们的预测），实际利率会保持低水平，因为通胀上升速度将高于名义利率。如果央行更加强势，结果则相反。但就算是政客笑到最后，我们并不认为央行会轻易放弃它们致力于实现的通胀目标。这必将带来一段时期的政策不确定和动荡。

主流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债务和老龄化将使通胀率以及名义和实际利率保持在低位。这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的错误结论，这个错误我们在第9章中有所探讨。

我们认为人口和债务是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调和的两个因素。随着通胀率和利率在人口因素的作用下上升，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经济体或经济部门将一个个地倒下。债务冲击毫无疑问将引发一定时期的低增长，甚至衰退和危机，正如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遭遇，同时还有周期性的低通胀和低利率。但是，在周期性放缓背后，通胀和利率仍会结构性地上升，突破债务的压制。这些挑战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能否成功应对，都很难说，

我们需要十足的运气才能不断向前。

后记

新冠疫情后不完美的未来

本书英文版主要写于2019年，并且在人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付梓了。疫情的总体影响加速了我们在本书中概述的趋势。中国将变得更加关注国内，减少给全球带来的通缩压力，通胀本身将比我们预期的更早、更快地上升。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对我们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医疗卫生后果，而是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必要和正确的）政策措施产生的重大冲击，即使这些冲击有可能只是短期的。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冷酷的经济学家，他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GDP或者人均GDP，那么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方式是什么都不做，完全无视它，任由它发展。新冠疫情主要影响老年人；到目前为止，英国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80岁；相对年轻一些的死亡者主要是伴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用行话来说是并发症患者。死于新冠疫情的群体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他人的帮助维持日常生活，从而阻止了他们的看护者生产商品和其他服务来增加人均GDP。当时有人认为，约翰逊首相最初的“群体免疫”计划可能使英国的死亡人数在2020年增加25万。不过，与每年近50万的正常总死亡人数相比，这意味着一年内死亡人数增加了50%~60%。考虑到那些可能死亡的人的年龄和脆弱性，2020年死亡人数的增加几乎会被随后10年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完全抵消。

虽然人们应该认识到有这种分析，但这种冷酷的政策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没有了体育头条，新闻界每天都在向我们报告全国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因此，隔离和封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正如在危机中通常发生的那样，国际合作让位于国家间的人人为己（sauve qui peut）。这相当于一种自我施加的巨大的供给冲击。这种供给冲击降低了产出，提高了价格。这段时期的需求也不能完全恢复，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一些消费永久性地损失了，如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或者自己在家理得糟糕的头发，即使生活恢复正常，这些需求也不会重来。

政府当局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被这场疫情的突然到来搞得措手不及，并迅速采取了限制不必要死亡的恰当措施。但是在这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供给冲击。

为减少封锁给收入和支出造成立竿见影的毁灭性冲击（这一目标值得肯定），政策当局非常正确地打开了直接财政支出和间接鼓励银行向所有现金流有问题的借款人放贷的闸门。如预期的那样，这将减缓收入和支出的下降，不过很自然地，它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在短期内，这种大规模的不利供给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将被非食品类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抵消，而灾难性的石油价格战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另外，需求会相应下降与之匹配，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永久性的，有的只是推迟了而已。无论如何，当我们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突然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时，从2020年3月开始的几个月中，几乎不可能为CPI、RPI（零售物价指数）或者任何其他通胀指数提供合理而有意义的数字，直至接近恢复常态才可以。

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之后，随着封锁解除、经济复苏接踵而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如许多战争的后遗症一样，答案是通胀飙升，通胀很可能在2021年超过5%，甚至达到10%左右（假设疫情在2020年底得到控制，而控制疫情花费的时间越长，随之而来的实际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恢复就越弱）。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时，也发出过关于通胀的预警。那些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现在有可能成真？原因有三。第一，量化宽松的设计意味着大部分注资仍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留在银行体系内。它们永远无法渗入影响通胀的更广义的货币总量。今天的政策措施是注入现金流，这将直接提高更广义的货币总量。第二，全球经济恢复到疫情暴发前产出水平的速度。经济复苏越强劲，这些注入资金的政策看起来越顺周期。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已经从对外输出通缩的国家，转变为现在更加中性，未来通胀会越发严重的国家。

那么当局的反应会是什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它们会说这是暂时的一次性现象。第二，货币当局会说，这正是非常希望的一种情况，是对之前几年未达到的通胀目标的一种再平衡，可以与平均通胀率或价格水平目标完全一致。第三，疫情冲击如此之大，将失业率降到2019年的水平需要时间，而且大量行业（航空公司、游轮、酒店等）可能仍处于困境。2020年以如此广泛的方式扶持企业之后，在2021年又让它们因利率上升和财政紧缩而倒闭，这有什么意义吗？无论如何，借贷游说团体（政府、行业、抵押贷款者）在政治上比储蓄游说团体强大得多。

但是，如果要（迅速）制止这种通胀上升，那么一些人的实际收入就必然遭受损失。那可能是谁呢？过去30年来，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其归因于由

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因素造成的巨大的正向劳动力供给冲击。除非工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否则雇主将威胁把工作岗位转移到亚洲，或者威胁让更多合适的移民来到本国；这是一个可信的威胁。

特朗普式的政策、民粹主义、移民壁垒以及现在的新冠疫情综合起来，已经削弱了对工人的威胁。

议价能力的天平现在正转向工人，而不是雇主；当前更加社会主义的政治趋势正在强化这一点。只要经济复苏发生，工资趋势就会发生变化。尽管在通胀出现“暂时性波动”的背景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呼吁不要急着涨工资，但届时工资很可能仍会赶上甚至超过通胀。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供给冲击，将标志着过去三四十年的通缩力量与未来20年通胀再起之间的分水岭。

输家将是储户、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那些主要金融资产为现金的公司。在财政上，保护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不受通胀侵蚀将不再可行。为了应对2007—2009年的过度债务危机，当时鼓励所有借款人（银行除外）承担更多的杠杆和债务，这一行为的愚蠢之处将变得显而易见。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胀将大大高于我们的政治领袖能容忍的名义利率水平。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中的过度债务将被高通胀稀释。由于在全球化逆转和就业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增长放缓，负的实际利率很可能是出清经济所必需的。即使各国央行会对更高的通胀感到不安，它们也必须意识到，债务水平的持续高企仍使经济十分脆弱。如果它们试图在这种背景下提高利率，将面临政治上的阻力，甚至可能威胁到它们的独立性。只有当债务恢复到可承受的水平时，才可以加大对通胀的治理力度。下一次，我们是否可以按照理想的方式（如第11章和第12章所述）

改良资本主义，这样就不至于每次经济陷入困境时只能靠举债来饮鸩止渴？

在过去几十年中，任何此类的通胀效应都必须面对中国融入世界带来的通缩效应。然而，中国不再是全球通胀的拦路虎。2018年特朗普总统贸易战之后的艰难地缘政治形势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变得更加棘手。各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内顾，全球物质资本可能会紧随其后，尤其是在涉及中美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塞，即全球技术主导地位。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中国必须从现在起主要依靠国内创新来提高生产率。

从经济上讲，保护国内经济已成为首要任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意味着必须确保稳定的经济和就业。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的财政扩张将要求它利用自己的储蓄池。就中国而言，这可能最终意味着要利用国有企业的大量储蓄，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储蓄一直是中国国民储蓄的主要来源。

无论哪种情形，中国都有资源保护自己的未来，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不再像过去那样。

随着去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会把世界看作不同地方实体的集合，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全球化趋势的放缓会与各类冲击在全球的传播完全保持一致，特别是当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对老龄化这一共同冲击时。

当这本书最终出版时，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Stansbury and Summers）发表了一篇重要且相关的新论文，题为“工人力量下降假说：美国经济近期演变的解释”（NBER工作论文27193，2020年5月）。这篇论文和我们一样，非常强调工人议价能力的下降，并且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研究相似，并支持我们

的结论。

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他们否认这种议价能力的下降是由于全球化。关于工人的议价能力，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引用彼得·肖特等人（Bernard、Bradford Jenson and Schott，2006）的研究论文《适者生存：暴露于低工资国家和美国制造业工厂的（不均衡）增长》（*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以及他们的其他研究（Pierce and Schott，NBER工作论文18655，2012年12月）。令人惊讶的是，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没有参考后者。这些论文表明，在那些从低工资国家进口增长最明显的行业中，工厂和就业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但是，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接着认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这种竞争将导致“资本回报率随劳动力租金的下降而下降，同时该行业的总租金（利润加上劳动力租金）将会下降”。然而，有的公司总部设在低工资国家，只有当来自国外的竞争采取销售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这种形式时，上述情况才会发生。

与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的观点相反，全球化主要采取了公司驻地于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即美国将商品或服务的物质生产外包到国外，但保持对最终销售、整体基础设施、资本、管理技能和知识产权的控制。事实上，皮尔斯和肖特（2012）提供的微观经济证据非常确凿地表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意外快速下降”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在iPhone生产中占据了整个供应链的大部分，但苹果的总部仍然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企业的崛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它们在占据国内市场方面做得远比占据全球市场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预计，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相对于那里的劳动力租金会上升。

因此，我们认为斯坦斯伯里和萨默斯对全球化的假说验证完

全错了。相反，他们只能说明，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的驱动力是商人越来越冷酷无情。的确，商人更为无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可以把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从而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全球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伴随着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大幅上升。当全球劳动力在未来几十年里出现萎缩时，这一点仍然适用。

总而言之，由于这场疫情，一个通胀会来临的不完美未来将来得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全球老龄化趋势下的全球化放缓将使未来与过去完全不同。

参考文献

第1章

-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9).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9 to 2029*.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file=2019-03/54918-Outlook-Chapter1.pdf>.
- Friedman, M. (1968, March).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17.
- Gutiérrez, G., & Piton, S. (2019, July). *Revisiting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Non-Housing) Labor Share* (Bank of England Staff Working Paper No. 811).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October).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IMF.
- King, M. (2003, October 14). Speech, Bank of England, East Midlands Development Agency/Bank of England Dinner, Leicester.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edia/boe/files/speech/2003/east-midlands-development-agency-dinner>.
- Krueger, A. B. (2018). Luncheon Address: Reflections on Dwindling Worker Bargaining Power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anging Market Struc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pp. 267–282).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 Obstfeld, M. (2019, July 22). *Global Dimensions of U.S. Monetary Policy*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DP1388).
-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18). *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https://obr.uk/fsr/fiscal-sustainability-report-july-2018/>.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nus, C., Pak, M., Pionnier, P.-A., & Crivellaro, E. (2018, September). *Labour Share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lobalisation and “Winner-Takes-Most” Dynamic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1503).

第2章

- Agarwal, I., Gu, G. W., & Prasad, E. S. (2019, September). *China's Impact o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311).
- Jiang, K., Keller, W., Qiu, L. D., & Ridley, W. (2018). *Joint Ventur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Vox CEPR Policy Portal, voxeu.org.
- Lardy, N. R. (2001, May 9). *Issues in China's WTO Access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issues-in-chinas-wto-accession/>.
- Ma, G., & Fung, B. S. C. (2002, August).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115).
- Nabar, M. (2011, September). *Targets, Interest Rate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11/223).
- Pierce, J. R., & Schott, P. K. (2012, December).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655).
- Rodrik, D. (2011, October).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7546).

第3章

- BBC News. (2018, August 29). *Russia's Putin Softens Pension Reforms After Outcry*.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45342721>.
- Börsch-Supan, A., Härtl, K., & Ludwig, A. (2014). Aging in Europe: Refo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5), 224–229.
- Button, P. (2019, May). *Population Aging, Age Discrimination, and Age Discrimination Protections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850).
- Cravino, J., Levchenko, A. A., & Rojas, M. (2019, September). *Population Aging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327).
- Maestas, N., & Jetsupphasuk, M. (2019). What Do Older Workers Want?, Chapter 5.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United Nations. (2015).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dev/c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ageing/WPA2015_Report.pdf.

第4章

- Bauer, J. M., & Sousa-Poza, A. (2015). Impacts of Informal Caregiving on Caregivers: Employment, Health and Family.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8(3), 113–145.
- Bauer, J. M., & Sousa-Poza, A. (2019). Employment and the Health Burden on Informal Caregivers of the Elderly, Chapter 3.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Cavendish, C. (2013). *The Cavendish Review: An Independent Review into Healthcare Assistants and Support Workers in the NHS and Social Care Settings*. Department of Health, London.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36212/Cavendish_Review.pdf.
- Cavendish, C. (2019). *Extra Time: 10 Lessons for an Ageing World*. London, UK: HarperCollins.
- Dwyer, J. (2019, Novembe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lzheimer's Research, Treatment and Cure*. Presentation at the 6th Annual Lausanne Conference on Preparing the Alzheimer's Ecosystem for a Timely, Accurate and Compassionate Diagnosis.
- Eggleston, K. (2019). Understanding 'Value for Money' in Healthy Ageing, Chapter 12.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UK: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Financial Times*. (2019, June 25). *How the World Deals with Alzheimer's and Dementia—In Charts* (Financial Times Special Report: FT Health—Dementia Care).
- Financial Times*. (2019, July 16). Foreign Operators Take on Chinese Elderly Care, p. 14.
- Financial Times*. (2019, June 10). Robots/Ageing Japan: I, Carebot. *Lex Column*, Monday, p. 22.
- Gratton, L., & Scott, A. (2016). *The 100 Year Life—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 London: Bloomsbury.
- Green, D. (2019, April 29). *Fixing the Care Crisis*.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 Kingston, A., Comas-Herrera, A., & Jagger, C. (2018). Forecasting the Care Needs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in England Over the Next 20 Years: Estimates from the Population Ageing and Care Simulation (PACSim) Modelling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3(9), e447–e455.
- Kingston, A., Robinson, L., Booth, H., Knapp, M., & Jagger, C. (2018). Projections of Multi-Morbidity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in England to 2035: Estimates from

- the Population Ageing and Care Simulation (PACSim) Model. *Age and Ageing*, 47(3), 1–7.
- Kingston, A., Wohland, P., Wittenberg, R., Robinson, L., Brayne, C., Matthews, F. E., et al. (2017). Is Late-Life Dependency Increasing or Not? A Comparison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geing Studies (CFAS). *The Lancet*, 390(10103), 1676–1684.
- Kivipelto, M., Ngandu, T., Laatikainen, T., Winblad, B., Soininen, H., & Tuomilehto, J. (2006, September). Risk Score for the Prediction of Dementia Risk in 20 Years Among Middle Aged People: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Lancet Neurol*, 5(9), 735–741.
- Kydland, F., & Pretnar, N. (2018).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aring: Aggregate Burdens of an Aging Popul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5498).
- Kydland, F., & Pretnar, N. (2019). Who Will Care for All the Old People?, Chapter 2.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Lancet Commissions. (2017, December 16). On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The Lancet*, 390, 2673–2734.
- Lex. (2019, June 10). Robots/Ageing Japan: I, Carebot. *Financial Times*, Monday, p. 22.
- Livingston, G., Sommerlad, A., Orgeta, V., Costafrida, S. G., Huntley, J., Ames, D., et al. (2017, December 16).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The Lancet*, 390, 2673–2734.
- Mayda, A. M. (2019, June 19). Discuss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by A. Börsch-Supan, D. N. Leite, & J. Rausch, European Central Bank Sintra Forum, Portugal.
- Norton, S., Matthews, F. E., Barnes, D. E., Yaffe, K., & Brayne, C. (2014, August). Potential for Primary Preven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 Analysis of Population-Based Data. *Lancet Neurol*, 13(8), 788–794.
- Patterson, C. (2018).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8: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Dementia Research: New Frontiers*. London, UK: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 Prince, M., Wilmo, A., Guerchet, M., Ali, G.-C., Wu, Y. T., & Prina, M. (2015).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An Analysis of Prevalence, Incidence, Cost and Trends*. London, UK: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 Scott, A. (2019). A Longevity Dividend Versus an Ageing Society, Chapter 11.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Vradenburg, G. (2019, November). 'Welcome Remarks' at the 6th Annual Lausanne Conference on *Preparing the Alzheimer's Ecosystem for a Timely, Accurate and Compassionate Diagnosis*.
-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6).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An Analysis of Prevalence, Incidence, Cost and Trends*. London, UK: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8).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Dementia Research: New Frontiers*. London, UK: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9). *Attitudes to Dementia*. London, UK: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 World Dementia Council. (2012, December). *Defeating Dementia: The Road to 2025*. worlddementiacouncil.org.

第5章

- Aksoy, Y., Basso, H. S., Smith, R. P., & Grasl, T. (2015).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Trends* (Banco de Espana, Documentos de Trabajo No. 1528).
-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Patterson, C., & Van Reenen, J. (2017). Concentrating o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7(5), 180–185.
-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Patterson, C., & Van Reenen, J. (2019, May).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396).
- Bernanke, B. S. (2005, March 10).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Speech.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5/200503102/>.
- Button, P. (2019, May). *Population Aging, Age Discrimination, and Age Discrimination Protections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850).
-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9).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9 to 2029*.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9-03/54918-Outlook-3.pdf>.
- Covarrubias, M., Gutiérrez, G., & Philippon, T. (2019, June). *From Good to Bad Concentration? U.S. Indus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983).
- Crouzet, N., & Eberly, J. (2019, May). *Understanding Weak Capital Investment: The Role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Intangibl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2586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394650>.
- Hernández-Murillo, R., Ott, L. S., Owyang, M. T., & Whalen, D. (2011, May/June). Patterns of Interstate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3(3), 169–185.
- Hundtofte, S., Olafsson, A., & Pagel, M. (2019, October). *Credit Smoothin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354).
- Juselius, M., & Takáts, E. (2016, April 6). *The Age-Structure-Inflation Puzzle* (Bank of Finland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4/2016).
- Kalecki, M. (1954).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An Essay on Cyclical and Long-Run Changes in Capitalist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Liu, E., Mian, A., & Sufi, A. (2019, August). *Low Interest Rates, Market Power,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505).

- Mayhew, L. (2019, June/July). A Home Alone Explosion, Cass Business School, *Financial World*, 13–15.
- McGovern, M. (2019). Life Cycle Origins of Pre-Retirement Financial Status: Insights from Birth Cohort Data, Chapter 10.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Meen, G. (2005).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Barker Review of Housing Supply. *Housing Studies*, 20(6), 949–971.
- Melitz, J., & Edo, A. (2019, September). *The Primary Cause of European Inflation in 1500–1700: Precious Metals or Population? The English Evidenc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DP14023).
-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18). *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https://obr.uk/fsr/fiscal-sustainability-report-july-2018/>
- Papetti, A. (2019, March). *Demographics and the Natural Real Interest Rate: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Paths for the Euro Area*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2258).
- Philippon, T. (2019).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ön, M., & Stähler, N. (2019). When Old Meets Young? Germany's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Deutsche Bundesbank, No. 33/2019).
- Smithers, A. (2009). *Wall Street Revalued: Imperfect Markets and Inept Central Bankers*. Hoboken, NJ: Wiley.
- Smithers, A. (2013). *The Road to Recovery: How and Why Economic Policy Must Change*. Chichester, UK: Wiley.
- Smithers, A. (2019). *Productivity and the Bonus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 J. (2019). *Retirees Will Outlive Their Savings by a Decade*. World Economic Forum. Available a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6/retirees-will-out-live-their-savings-by-a-decade/>.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How We Can Save (for) Our Future*. Available at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how-we-can-save-for-our-future>.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Retirees Will Outlive Their Savings by a Decade*. Available a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6/retirees-will-out-live-their-savings-by-a-decade/>.

第6章

- Brand, C., Bielecki, M., & Penalver, A. (Eds.). (2018, December).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Estimates, Drivers, and Challenges to Monetary Policy*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No. 217).
- Caballero, R. J., Farhi, E., & Gourinchas, P.-O. (2017). The Safe Assets Shortage Conundru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3, Summer), 29–46.

- Davis, S. J., Haltiwanger, J. C., & Schuh, S. (1996).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French, E. B., Jones, J. B., McCauley, J., & Kelly, E. (2019, August). *End-of-life Medical Expenses*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DP13913).
- Gordon, R. J. (2012, August).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315).
- Hamilton, J. D., Harris, E. S., Hatzius, J., & West, K.D. (2015, August). *The Equilibrium Real Funds R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21476).
- Heise, M. (2019). *Inflation Targe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Monetar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Kalemli-Özcan, S., Laeven, L., & Moreno, D. (2019, February). *Debt Overhang, Rollover Risk,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Crisis*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2241).
- Laubach, T., & Williams, J. C. (2003, November). Measuring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4), 1063–1070.
- Marx, M., Mojon, B., & Velde, F. R. (2019, July 9). *Why Have Interest Rates Fallen Far Below the Return on Capita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794).
- Mokyr, J., Vickers, C., & Ziebarth, N. L. (2015).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is Time Differ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 Summer), 31–50.
- Rachel, L., & Smith, T. D. (2015, December). *Secular Drivers of the Global Real Interest Rate* (Bank of England Staff Working Paper No. 571).
- Rachel, L., & Summers, L. H. (2019, March 4). *On Falling Neutral Real Rates, Fiscal Policy, and the Risk of Secular Stagn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PEA Conference Drafts).
- Smithers, A. (2009). *Wall Street Revalued: Imperfect Markets and Inept Central Bankers*. Hoboken, NJ: Wiley.
- Smithers, A. (2013). *The Road to Recovery: How and Why Economic Policy Must Change*. Chichester, UK: Wiley.
- Smithers, A. (2019). *Productivity and the Bonus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7章

- Autor, D. H. (2019).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9, 1–32.
- Boehm, C., Flaaen, A., & Pandalai-Nayar, N.(2019, May). *Multinationals, Offshoring and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824).

- Bayoumi, T., & Barkema, J. (2019, June). *Stranded! How Rising Inequality Suppressed US Migration and Hurt Those "Left Behind"* (IMF Working Paper WP/19/122).
- Blinder, S. (2015). Imagined Immigrati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eanings of 'Immigrants' i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Debates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63, 80–100.
- Borella, M., De Nardi, M., & Yang, F. (2019, March). *The Lost On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 of Non-College-Educated Americans Born in the 1960s* (Opportun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9).
- Bratsberg, B., Moxnes, A., Raaun, O., & Ulltveit-Moe, K.-H. (2019, April). *Opening the Floodgates: Industry and Occupation Adjustments to Labor Immigrati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13670).
- Compertpay, R., Imren, A., & Litina, A. (2019, March).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in Aging Populations (CESifo Working Paper 7565).
- Desmet, K., Nagy, D. K., & Rossi-Hansberg, E. (2018).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3), 903–983.
- Duffy, R., & Frere-Smith, T. (2014).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Public Attitudes to Immigration*. London: IPSOS-MORI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 Durant, W., & Durant, A. (1968).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2018). *Changing Market Struc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 Gbohoui, W., Lam, W. R., & Lledo, V. (2019). The Great Divide: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IMF Working Paper, WP/19/88).
- George, A., Lalani, M., Mason, G., Rolfe, H., & Rosazza, C. (2012). *Skilled Immigration and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Skills in the UK Economy*, 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 Hainmueller, J., & Hiscox, M. J. (2007). Educated Preferences: Explaining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2), 399–442.
- Hainmueller, J., & Hiscox, M. J. (2010). 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61–84.
- High Pay Centre. (2019). *No Routine Riches: Reforms to Performance-Related Pay*. http://highpaycentre.org/files/No_Routine_Riches_FINAL.pdf.
- Immervoll, H., & Richardson, L. (2011, December). *Redistribution Policy and Inequality Reduction in OECD Countries: What Has Changed in Two Decad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6030).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October).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IMF: Washington, DC.
- Ipsos MORI. (2018).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Have Softened Since Referendum But Most Still Want to See It Reduced*. <https://www.ipsos.com/ipsos-mori/en-uk/attitudes-immigration-have-softened-referendum-most-still-want-see-it-reduced>.
- Kaufmann, E. (2017). Levels or Changes? Ethnic Context, Immigration and the UK Independence Party Vote. *Electoral Studies*, 48, 57–69.

- Krueger, A. B. (2018). Luncheon Address: Reflections on Dwindling Worker Bargaining Power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anging Market Struc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pp 267–282).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 Mayda, A. M. (2019, June 19). Discuss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by A. Börsch-Supan, D. N. Leite, & J. Rausch, European Central Bank Sintra Forum, Portugal.
- 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2018). *EEA Migration to the UK: Final Report*. London: MAC.
- Milanovic, B.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pon, T. (2019).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chel, L., & Summers, L. H. (2019, March 4). *On Falling Neutral Real Rates, Fiscal Policy, and the Risk of Secular Stagn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PEA Conference Drafts).
- Rodrik, D. (2018).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1), 12–33.
- Rolfe, H. (2019, May). Challenges for Immigration Policy in Post-Brexit Britain: Introduction.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48, R1–R4.
- Rolfe, H., Ahlstrom-Vij, K., Hudson-Sharp, N., & Runge, J. (2018). *Post-Brexit Immigration Policy: Reconciling Public Attitudes with Economic Evidence*. Leverhulme Trust, NIESR.
- Rolfe, H., Runge, J., & Hudson-Sharp, N. (2019, May). Immigration Policy from Post-War to Post-Brexit: How New Immigration Policy Can Reconcile Public Attitudes and Employer Preferences.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48, R5–R16.
- Scheidel, W. (2017).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 (2019).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London: Allen Lane.

第8章

- Engels, F. (2018).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London: Forgotten Books.
- Engels, F., & Marx, K. (201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Arcturus.
- Flemming, J. S. (1976). *Inf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bes, K. J. (2019, June). *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the Inflation Proces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791).
- Friedman, M. (1968, March).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17.
- Hooper, P., Mishkin, F. S., & Sufi, A. (2019, May). *Prospects for Inflation in a High Pressure Economy: Is the Phillips Curve Dead or is It Just Hibernatin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792).
- Lindé, J., & Trabandt, M. (2019, April 23). *Resolving the Missing Deflation Puzzl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DP13690).
- McLeay, M., & Tenreyro, S. (2018). *Optimal Infl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hillips Curve* (Discussion Papers 1815, Centre for Macroeconomics [CFM]).
- Mojon, B., & Ragot, X. (2019, March). *Can an Ageing Workforce Explain Low Inflatio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776).
- Phelps, E. S. (1968). Money-Wage Dynamics and Labor-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678–711.
- Phillips, A. W. (1958, November).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100), 283–299.
- Robertson, D. H. (1959, December). A Squeak from Aunt Sally. *The Banker*, CIX, p. 720.
- Stock, J. H., & Watson, M. W. (2019, June). *Slack and Cyclically Sensitive Infl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987).

第9章

- Ahmadjian, C. L., & Robinson, P. (2001, December). Safety in Numbers: Downsizing and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ermanent Employment in Japa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 622–654.
- Bank of Japan. (2019, July). *Japan's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for 2018*.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https://www.boj.or.jp/en/statistics/br/bop_06/bop2018a.pd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July). *Japan: Spillover Report for the 2011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and Selected Issu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untry Report No. 11/183).
-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g, J. S., & Piao, S. (2015, July). *Production Offshoring and Investment by Japanese Firm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15/183).
- Kiyota, K. (2015, September/October).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apan. *Japan SPOTLIGHT*, Japan Economic Foundation. https://www.jcf.or.jp/journal/pdf/203rd_Cover_04.pdf.
- Kuroda, H. (2014, August 23). *Deflati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QQE*. Remarks at the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hel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https://www.bis.org/review/r140825a.pdf>.
- METI. (2011).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Office, Trade Policy Bureau. <https://www.meti.go.jp/english/report/data/gWT2011fe.html>.
-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1997–2019). *Survey of Overseas Business Activity*. Published Annually. <https://www.meti.go.jp/english/statistics/tyo/kaigaizi/index.html>.
- Ogawa, K., Saito, M., & Tokutsu, I. (2012, July). *Japan Out of the Lost Decade: Divine Wind or Firms' Effor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12/171).
- Sakura, K., & Kondo, T. (2014). *Outward FDI and Domestic Job Cre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No. 14-E-3).

第10章

- Benzell, S. G., Kotlikoff, L. J., LaGarda, G., & Sachs, J. D. (2018). *Simulating U.S. Business Cash Flow Taxation in a 17-Region Global Model*. https://kotlikoff.net/wp-content/uploads/2019/03/Simulating-U.S.-Business-Cash-Flow-Taxation_0.pdf.
- Börsch-Supan, A. (2019, June 17–19). *Demographic Change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ECB Forum on Central Banking, Sintra, Portugal.
- Börsch-Supan, A., Härtl, K., & Ludwig, A. (2014). Aging in Europe: Refo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5), 224–229.
- Börsch-Supan, A. H., & Wilke, C. B. (2004). *Reforming the German Public Pension System* (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226).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Button, P. (2019, May). *Population Aging, Age Discrimination, and Age Discrimination Protections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850).
- Desmet, K., Nagy, D. K., & Rossi-Hansberg, E. (2018).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3), 903–983.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April). *How Can Sub-Saharan Africa Harnes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MF African Department.
- Kotlikoff, L. J. (2019). Ageing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apter 4.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The World Bank. *Human Capital Project*.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
- The World Bank. (2018, October 11). *Human Capital Index*. The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human-capital>.
- The World Bank. (2019). *Doing Business 2019: Training for Reform* (16th ed.). The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media/Annual-Reports/English/DB2019-report_web-version.pdf.

第11章

- Alfaro, L., & Kanczuk, F. (2019, October). *Undisclosed Debt Sustainabi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347).
- Altavilla, C., Boucinha, M., & Peydró, J.-L. (2018, October). Bank Profitability. *Economic Policy*, 96, 531–586; earlier (2017) in (ECB Working Paper No. 2015).
- Borio, C., Gambacorta, L., & Hofmann, B. (2017).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Profitabil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 48–63.
- Borio, C., Rungcharoenkikul, P., & Disyatat, P. (2019, October). *Monetary Policy Hysteresis and the Financial Cycl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817).
- Brunnermeier, M. K., & Koby, Y. (2018, December). *The Reversal Interest Rat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406).
- Cunliffe, J. (2019, May 7). *Financial Stability Post Brexit: Risks from Global Debt*. Bank of England Speech.
- Eggertsson, G. B., Juelsrud, R. E., Summers, L. H., & Wold, E. G. (2019, January). *Negative Nominal Interest Rates and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416).
- El-Erian, M. A. (2016). *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Penguin Random House).
- Ford, J. (2019, July 29). Warren is Right to Worry about Dangers of Private Equity Looting. *Financial Times*, p. 8.
- Goodhart, C. A. E., & Hudson, M. (2018, January 16). *Could/Should Jubilee Debt Cancellations be Reintroduced Today?* (CEPR Discussion Paper DP12605).
- Goodhart, C. A. E., & Kabiri, A. (2019, May 23).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Profitability in a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A Follow-Up and a Rejoinder*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DP 13752).
- Heer, B., Polito, V., & Wickens, M. R. (2018, June). *Population Aging, Social Security and Fiscal Limits*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121).
- Heider, F., Saidi, F., & Schepens, G. (2019, October). Life Below Zero: Bank Lending Under Negative Policy Rat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2(10), 3728–3761.
- Hudson, M. (2018). *...and Forgive Them Their Debts: Lending, Foreclosure and Redemption from Bronze Age Finance to the Jubilee Year*. Glashütte: ISLET-Verlag Dresden.
- Kalemli-Özcan, S., Laeven, L., & Moreno, D. (2019, February). *Debt Overhang, Rollover Risk,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Crisis*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2241).

- Mian, A., & Sufi, A. (2014). *House of Debt: How They (and You)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18). *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https://obr.uk/fsr/fiscal-sustainability-report-july-2018/>.
- Papetti, A. (2019, March). *Demographics and the Natural Real Interest Rate: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Paths for the Euro Area*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2258).
- Xu, T., Hu, K., & Das, U. S. (2019, January). *Bank Profitabilit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19/5).

第12章

- Auerbach, A., Devereux, M. P., Keen, M., & Vella, J. (2017, January). *Destination-Based Cash Flow Taxation* (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WP 17/01).
- Benetton, M., Bracke, P., Cocco, J. F., & Garbarino, N. (2019, April).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Shared Equity Mortgages* (Bank of England Staff Working Paper No. 790).
- Benford, J., Best, T., & Joy, M. (2016, September). *Sovereign GDP-Linked Bonds* (Bank of England, Financial Stability Paper No. 39).
- Devereux, M., & Vella, J. (2018). Gaming Destination Based Cash Flow Taxes. *Tax Law Review*, 71, 477–514.
- Goodhart, C. A. E., & Hudson, M. (2018, January 16). *Could/Should Jubilee Debt Cancellations Be Reintroduced Today?* (CEPR Discussion Paper DP12605).
- Goodhart, C. A. E., & Lastra, R. (2019, January 28). Equity Finance: Matching Liability to Power (CEPR Discussion Paper, DP 13494).
- Goodhart, C. A. E., & Lastra, R. M. (2020, March 11). *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Published Online. <https://academic.oup.com/jfr/advance-article-abstract/doi/10.1093/jfr/fjz010/5802863>.
- Huertas, T. (2019, May 22). *'Rebalance Bankers' Bonuses: Use Write-Down Bonds to Satisfy Both Supervisors and Shareholders*. SSR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336186>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336186>.
-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d.). (2011). *Tax by Design: The Mirrlees Re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2019, March 10). *Corporate Tax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MF Policy Paper No. 19/007).
- Mayer, C. (2018). *Prosperity: Better Business Makes the Greater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rrlees Review,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d.). (2011). *Tax by Design: The Mirrlees Re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edy, K. (2014, April). *Debt and In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s: A Case for Nominal GDP Targeti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pp. 301–373).
- Wolf, M. (2018, December 12). Rethink the Purpose of the Corporation. *Financial Times*.

第13章

- Bianchi, F., Kung, H., & Kind, T. (2019). *Threats to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High-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with Twitt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26308).
- Bloom, D. E. (Ed.). (2019).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Börsch-Supan, A. (2019).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Chapter 19.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Conesa, J. C., Kehoe, T. J., Nygaard, V. M., & Raveendranathan, G. (2019).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Ageing and Healthcar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7.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9).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9 to 2029*.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file=2019-03/54918-Outlook-Chapter1.pdf>.
- George, H. (2015). *Our Land and Land Policy and Other Work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Heer, B., Polito, V., & Wickens, M. R. (2018, June). *Population Aging, Social Security and Fiscal Limits* (CESifo Working Papers 7121/2018).
- Hobbes, T. (2014). *Leviathan*. London: Wordsworth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
- Korlikoff, L. J. (2019). Ageing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apter 4.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Korlikoff, L. J., Kubler, F., Polbin, A., Sachs, J. D., & Scheidegger, S. (2019, April). *Making Carbon Taxation a Generational Win W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760).
- Laitner, J., & Silverman, D. (2019). Population Ageing and Tax System Efficiency, Chapter 17. In D. E. Bloom (Ed.),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London: A VoxEU.org eBook, CEPR Press.
- Mill, J. S. (2016).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 Stuart Mill*. Scotts Valle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 OECD Secretariat. (2019, October). Secretariat Proposal for a “Unified Approach” Under Pillar On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OECD.
-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18). *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 <https://obr.uk/fsr/fiscal-sustainability-report-july-2018/>.
- Smith, A. (1982).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s I–III*.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The Economist (2019, April 13). Interference Day: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are Under Threat. That is bad news for the world.

第14章

- Hamilton, J. D., Harris, E. S., Hatzius, J., & West, K.D. (2015, August). *The Equilibrium Real Funds R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atur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21476).
- Papetti, A. (2019, March). *Demographics and the Natural Real Interest Rate: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Paths for the Euro Area*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 2258).

后记

- Bernard, A. B., Jensen, J. B., & Schott, P. K. (2006, January).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219–237.
- Pierce, J. R. & Schott, P. K. (2012, December).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655).
- Stansbury, A. & L.H. Summers, L.H. (2020, May). *The Declining Worker Power Hypothesi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cent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7193).

译后记

我们着手翻译此书，正是2020年下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全球宏观经济自2008年以来陷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困境。该书独树一帜，将其中两大谜题——低通胀和低利率，归结为人口这一长期、缓慢的结构性变量，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随着即将到来的全球人口大逆转，低通胀和低利率也将逆转，而且新冠疫情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困扰宏观经济研究者多年的谜题就这样破解了，谜底还这么简单，就是人口！初读本书，很是吃惊，就连作者也坦承他们的观点并不主流。毕竟，影响利率和通胀的因素众多，仅就通胀而言，译者之一曾专门撰文分析各种主流通胀决定论的不足，货币数量论、单位劳动成本、产出缺口等单一因素都难以决定通胀，更少见将通胀与抚养比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更少的劳动力抚养更多的人必然导致通胀。细细品味，其言或可商，但该书视角独特，逻辑自洽，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在译校的过程中反复再读，体会该书切中了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盲点，那就是过于关注周期性和短期因素而忽视结构性和长期变量，确是一本难得的上乘之作。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焦人口问题及其宏观影响。人口的变化和波动要远远小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其他驱动经济的长期变量。这或许是人口因素一直被忽视的原因。尚且不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范式在经济周期频率上压倒性的影响力。但本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说服力的论据，人口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慢变

量正在发生逆转，加速到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生育年龄的推迟，储蓄潜力的下降，老年护理需求的上升，都将推升名义利率和通胀。译者之一曾经主修人口与发展经济学，认为本书因其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全球化和结构化的视角，必将成为人口经济学的典范之作；就通胀或利率而言，不管是货币现象还是政治现象，归根结底仍是人的现象。

在本书译稿即将付梓之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的全球极低水平。本书所说的人口大逆转虽然是全球现象，但突出体现在中国。如果说人口红利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红利，最集中体现在世纪之交二十年的中国，那么即将（或许已经）到来的大逆转，中国仍将是焦点，七普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国刚刚宣布了渐进延迟退休和开放三胎等措施，但面临的挑战还很多，比如劳动力的迁徙、城乡之间人口抚养比的差异、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差别等，更包括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给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带来的双刃剑的影响等，这些都将影响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否顺畅有力。更重要的是，只有人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回到人既是增长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应有之义。作为中国读者，这本书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中国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来看待，又为我们在未来更加重视研究人口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帮助。

各章节翻译的分工如下：财政部廖岷负责第1章和第2章；南加州大学刘立中负责第3章和第7章；财政部国经中心聂宇程负责第4章和第14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建建负责第5章和第11章；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缪延亮和中央财经大学王帅负责第6章和第8章，中文版序言以及与作者的对话；上海银保监局汤颖男负责第9章和第10章；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周叶菁负责第12章和第13章。廖岷和缪延亮先后两次统校了全书，囿于水平和精

力，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疏忽和遗漏之处，责任均在我们。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的胡李鹏对译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财政部的栾楠也提供了文字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中信出版集团《比较》编辑室的吴素萍和孟凡玲，不仅督促我们完成译稿，还安排了和原作者的对话。我们将这一对话翻译成中文，作为导读，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廖岷 缪延亮

2021年6月于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大逆转 / (英) 查尔斯·古德哈特 , (英) 马诺吉·普拉丹著 ; 廖岷 , 缪延亮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1.7

书名原文: 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 Ageing Societies, Waning Inequality, and an Inflation Revival

ISBN 978-7-5217-3164-4

I. ①人... II. ①查... ②马... ③廖... ④缪... III. ①人口构成 - 影响 - 世界经济 - 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98643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Ageing Societies, Waning Inequality, and an Inflation Revival by Charles Goodhart and Manoj Pradhan, edition: 1

Copyright © Charles Goodhart and Manoj Pradhan, under exclusive license to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made liable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人口大逆转

著者: [英] 查尔斯·古德哈特 [英] 马诺吉·普拉丹

译者: 廖岷 缪延亮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21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 01-2021-09632019-378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217-3164-45217-168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诸神的黄昏

太平洋战争
三部曲
PACIFIC WAR
TRILOGY
III

1944 — 1945

Ian W. Toll

WA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944 — 1945

从莱特湾战役
到日本投降

TWILIGHT

OF THE GODS

[美] 伊恩·托尔——著

中信出版集团

谭星——译

诸神的黄昏

——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美]伊恩·托尔 著

谭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推荐赞誉

作者自述和致谢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尾声

参考文献

推荐赞誉

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贸易通道，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因此，海战不仅仅关涉到海上的战略战术，它从根本上关涉到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以及对自身国际定位的理解与把握。太平洋战争包含了多场非常重要的海洋对决，也是两种海洋观的命运对决，其中的启示极为深远。托尔此书因此非常值得一读。

——施展，外交学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始末，没有人比伊恩·托尔讲述得更出色。《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给“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精彩纷呈，令人百读不厌——不要错过这部无与伦比的军事史。

——亚历克斯·克肖（Alex Kershaw），二战史学家，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从伊恩·托尔的第一本书《六舰》开始，我就一直是他的粉丝，但“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末卷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高度。《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从头到尾吸引着你——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军事史巨著。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品曾入围普利策奖

托尔把控叙事的能力是专家级的，而且叙述过程中洞见迭出……这是一部全面而可靠的著作，如实展现了二战时期的海军，并未掩盖其缺点。

——马克·佩里（Mark Perry），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年的壮丽史诗……像前两卷《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那般扣人心弦……托尔不仅是优秀的战史讲述者，也是敏锐的文化观察家。

——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
著有《雷霆之海》（*Sea of Thunder*）和
《艾森豪威尔的虚张声势》（*Ike's Bluff*）等

托尔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包括使用尚未被人挖掘过的一手资料，以轻快的叙述将战略、军事行动和个人视角融合在一起，对战争尾声阶段双方的关键决定和行动进行了非常平衡的呈现。

——杰里·莱纳伯格（Jerry Lenaburg），
《纽约图书杂志》（*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伊恩·托尔以精湛的叙事，清晰而直观地讲述了美军沿岛屿组成的阶梯向日本进军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通过巧妙而深入的人物刻画，托尔还原了军政高层充满争论的生活：他们为下一步该怎样行动而争执，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反败为胜，或是痛失好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通俗海战史。

——理查德·斯诺（Richard Snow），历史学家，

著有《铁黎明》（*Iron Dawn*）和《无边的危险》（*A Measureless Peril*）等

托尔有高超的叙事本领，将海陆空战斗的经过和华盛顿与东京幕后的角力巧妙融合在一起。“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末卷以娴熟的文笔描写了跳岛战略执行过程中残酷而血腥的现实。学者和军迷期待已久了。

——克莱尔·巴雷特（*Claire Barrett*），
《军事史季刊》（*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副主编，二战
史研究者

托尔为人类一场史诗般的悲剧刻画的终幕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和“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前两卷对于其他太平洋战争史家来说是难以超越的。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才华横溢，书中丰富的故事让人既熟悉又感到新鲜。这部里程碑式的历史作品弥足珍贵，二战迷会爱不释手的。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星级评论

令人受益匪浅的历史作品。

——《柯克斯评论》（*Kirkus*）

作者自述和致谢

真的很不想回忆这件事。2007年，我开始撰写一部单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我前一本著作《六舰》的出版商为此和我签了协议，还预付了部分酬劳。两年半后，当距离交稿期限还有6个月时，我给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打了个电话。我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写了快800页了。还有一个坏消息，说的时候我连听筒都不敢放在耳朵旁，就是我才刚刚写到中途岛战役。这场44个月的战争，我才写了6个月，而且篇幅已经超过计划300页了。

就在这通电话里，斯塔林甚至都没有找我要那800页作品，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何不干脆把这部作品改成三部曲呢？于是协议改了，交稿时限延长了，预付款也增加了（可是没到三倍，唉）。第一卷《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于2011年出版，第二卷《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2015年出版。第一卷写的是战争的最初6个月，从日本突袭珍珠港到美军在中途岛毁灭性地反手一击。第二卷写的是战争中期的两年，从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主要是盟军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上的反攻。这一卷，也就是第三卷，从马里亚纳海战（又称菲律宾海战役）之后写起，讲的是战争最后一年的事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卷比此前两卷更长。我也没想这样。我原本预计第三卷会是三部曲中最容易写，或许也是最短

的。因为大部分研究成果已经“摆在那里”，而且要写的内容只有1年，而《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却覆盖了2年。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地预计说这最后一卷2018年就能写完。发现这一点已不可能做到后，我又在推特上赌咒说这一卷2019年无论如何都得写出来，“除非它先杀了我”。然后，当这一卷刚刚写完而未及印刷时，2020年就来了。万幸，推特可以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还活着，不过《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却已成了三部曲中最难写的一卷。原因很多。1944年末到1945年，战争在所有维度上都变得更宏大，我发现若不给予这卷书更多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篇幅，就对不起这些主题。那几年里我收集了诸多处于历史主轴外围的研究结果——例如，美国军队与媒体的关系，海军飞行员的训练，盟军用无线电和传单进行的宣传，以及疏散到乡下的日本学童的生活——我决定把它们全都放到这一卷里。（写前两卷时，我还能说“下一卷再写这些”，但写第三卷的时候就不行了。）结果，我写这三卷本太平洋战争史耗费的时间够打三次太平洋战争了。

在《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的作者自述中，我解释了一种发散的片段式讲述方式，这在传统的军事专著中是不常见的。这里我不想重复了。可以说，当时适用的话现在更适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里，与此前数年及其他战争相比，单纯的军事考量与政治、外交诉求在整体战略决策中的关系甚至更紧密了。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意识到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时间、规模和范围会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连带影响。更有甚者，在美国，1944年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策要在众目睽睽的总统大选过程中确定下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在宪政民主国

家里，选举周期是固定的，因此这句格言或许可以颠倒一下：“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本着这种精神，我选择了1944年7月的檀香山（火奴鲁鲁）战略会议作为本卷的开篇，在这篇幅较长的第一章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他在太平洋上的战区司令们为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制订了计划。这一段历史极其重要，无论对太平洋战争还是对战后的亚洲都是如此，但是历史和传记著作却常常会忽略它。我觉得它值得花上更多的篇幅，进行更为详尽的讲述，尤其是在最近刚刚发现重要新史料的情况下——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将军的日记。理查德森是夏威夷方面美国陆军总司令，在会议期间接待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第一手记录下了他和罗斯福之间的谈话内容。

向在各个方面帮助我进行研究的所有人致谢：感谢小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最近向我分享他关于硫黄岛和战后日本的收藏；感谢比尔·贝尔将其父亲威廉·贝尔关于第38特混舰队空中作战的日记给了我；感谢弗兰克·邓利维提供了其岳父关于在驱逐舰“约翰斯顿号”上服役经历的口述历史；感谢罗纳德·努涅斯向我提供了约翰·亨利·托尔斯将军的日记；感谢切特·莱和迈克尔·A.利里退役海军上校，他们分享了切斯特·尼米兹和好友沃克一家在瓦胡岛上的有趣细节（这些内容已在利里的《放松的尼米兹》中出版）；感谢罗伯特·C.理查德森四世退役空军上校提供了前文所述的其祖父的日记，理查德森将军曾希望后人在2015年之前不要公开这份日记；感谢罗纳德·拉塞尔，“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原编辑和站长，他审阅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就像他为前两卷所做的那样；几位日本朋友在不同方面协助了我，他们是下山进、村上久、渡边由布子、荒船清彦，以及佐藤由纪夫；感谢埃里克·西蒙诺夫，我18年的经纪人，尽管我拖延了很长时间，交稿期限也反复推迟，但他对我保持了充分的信任；我对

W.W.诺顿公司的整个团队致以谢意，包括诺玛·阿玛迪-奥比、瑞贝卡·霍梅斯基、比尔·拉辛，尤其是斯塔林·劳伦斯，他容忍了我总是离题的习惯，而且会在我离题太远时提醒我。

序章

不要和用桶装墨水的人争辩。

——美国警句，出处不详

自从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媒体的关系就开始每况愈下。在1933年那段蜜月期里，这位刚刚宣誓上任的总统凭借着一套友善而亲切的举动，成功获得了记者们的信任——他对记者们直呼其名，拿些琐碎小事插科打诨，给他们写生日贺卡，还会邀请他们的全家人来白宫做客。他每周两次的新闻发布会也充满了畅所欲言和宽松随意的氛围。记者们如果来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则会受到那个热情而不失庄重，穿着略有褶皱的整齐西装，坐在大办公桌后轮椅里的总统先生的热情欢迎。他常常会抽着一根烟，袖子上有时还会沾上一点烟灰。对于记者们的提问，他一直是有问必答，而且是脱口而出，不拘一格。和他在一起，气氛总是轻松而愉快。比如有时候罗斯福总统会指出某位记者貌似宿醉未醒，还问屋里的其他人怎么看；他还可能会向管安保的人详细询问某位记者是否接受过搜身检查。有时候总统还会以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差生的口吻对记者说：“不，我亲爱的孩子，你全错了。”^[1]听问题时，他滑稽地半张着嘴，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脸上则带着卓别林式的夸张，惊喜，困惑，继而警觉。然后他就紧盯着头顶天花板上的石膏总统纹章，深吸一口气，胸部挺起，再长长呼出，琢磨该怎么回答。他的搞笑样子令记者们忍俊不禁。

总统也不总是直面问题——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避而不谈。但他对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提问和不按规矩的往来交锋却也并不介意。白宫的速记员们记录了他998次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字，包括每次开场时的寒暄和玩笑。这些记录多达数千页，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档案馆里占据了超过11万立方厘米的空间。

然而到了1941年，也就是他第三任期的第一年，虽然那些热情和智慧的光芒仍会不时闪现，但是出入白宫的记者们却比数年前更强烈地觉得罗斯福反复无常、易怒，甚至有些难以捉摸，认为他现在成了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有一次他刚刚用他那著名的笑容活跃了屋里的气氛，下个瞬间便又回到了沉闷和攻讦的泥潭。罗斯福总统本身并不喜欢吼叫，甚至也不喜欢大声说话，但他即便是在开玩笑和打趣时也无不透露着怨妇式的情绪。如果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感到反感，则随时会恶语相向。根据美联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的说法，总统“时而如同第三大街的流浪画家那样粗鲁凶暴，时而又变得极富魅力、和善，讨人喜欢。这仅仅取决于问题，提出问题的人，以及罗斯福先生当天早晨起床时的心情”。^[2]

为了反驳独立撰稿人写的“报道”，他会拿出律师参加庭审时的劲头来吹毛求疵。罗斯福绝不会忍受那些诸如“谬误”或者“不准确”之类委婉的提法，而是直接指责那些独立撰稿人是在“胡扯”——如果这还不够到位的话，那就改成“显然胡扯”或者“绝对胡扯”。^[3]这“胡扯”（lie）一词直指撰稿人属于动机恶劣而绝对不是无心之失，这也正是总统想要的效果。为了打压报界向“评论性刊物”转型的趋势，他武断地声称报纸不应当承担新闻解读和批评的职责，即便是社论也不行。至于那些不隶属于报社的自由专栏作家，罗斯福总统则说他们是“社会上的毒瘤”。这些人总是追逐各种小道消息——罗斯福形容这都是“捕风捉影”——而且

把那些小道消息当成新闻四处乱发。当时读者最广泛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被罗斯福称为“老骗子”。[4]

在1939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提及罗斯福总统试图绕过国会的限制将武器运往欧洲时，他立即长篇大论回骂了开来：“美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读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是胡说，胡——说，胡说；这些人利用了美国人的无知、偏见和恐惧，他们这样做，根本不配称为美国人。”

当被问到他是否相信那些反对派的报刊是在蓄意误导读者时，罗斯福反问道：

“我该怎么说呢？是委婉地说还是直截了当？”

“直截了当。”一个记者答道。

“他们是故意胡扯。”[5]

他每天早上会阅读四五份报纸，通常是躺在床上读。罗斯福其实是个很虔诚的人，很少说粗话，但是这些早报常常会让他心生怒火，骂一句“见鬼”（damn），严重时候则是“活见鬼”（goddamn）。当他读报的时候，他的脸色会变得阴沉，下巴会僵直，眼中闪出愤怒的火花。他有时会把冒犯他的文章从报纸上撕下来，带到椭圆形办公室，再扔到新闻秘书史蒂夫·T.厄尔利的手里，然后抱怨道：“见鬼，这从头到尾都是在胡扯。”[6]他开始确信绝大部分美国报刊——他常常说这个比例是85%——都只是寡头政治斗争的喉舌。罗斯福曾说“保守派报社”奸诈、邪恶、无良。它们的老板和实际控制人是一群保守派富豪，他们个人对罗斯福充满憎恨，每天都会来指责罗斯福本人、他的政治盟友、参谋甚至是他的家人，给他添点堵。

在与罗斯福总统对阵的一众媒体大鳄中，有四个报界巨头最

为强大。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全国报业联盟经常专门发布社论抨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对此，媒体分析家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恶言恶语都来自“老大”本人，他从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圣西米恩的豪华别墅里直接连线他的编辑部，发出指示。

《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人“伯蒂”罗伯特·R·麦考密克会公开攻击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任何事，他的报纸——这是美国第二大城市里最大的日报，也是美国阅读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即便找不到借口，也会肆无忌惮地贬损政府。麦考密克的表兄约瑟夫·M·帕特森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创始人兼老板，这是美国第一份小报。凭借着大幅照片的排版风格，以及靠犯罪新闻、体育新闻、两性丑闻来吸引眼球的套路，《纽约每日新闻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突飞猛进，印数甚至超过了《纽约时报》。帕特森一度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起初曾是罗斯福新政的拥趸，但是到了1940年，他却站到了孤立主义运动的一边，他的报纸也转而激烈反对罗斯福总统。“锡西”埃莉诺·帕特森是约瑟夫·帕特森的妹妹，也是“伯蒂”麦考密克的表妹，她是个古怪而且粗俗的人，有厌世情绪。她从赫斯特手里买下了两份华盛顿的报纸，把它们合并成一份：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时代先驱报》打赢了美国首都的发行量之战，成了全美国最赚钱的报纸之一。这份报纸极度充满偏见，几乎每天都会攻击政府，甚至有时会在每天的四个版面上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政府，而署名“锡西·帕特森”的对罗斯福极尽辱骂的文章，则都会出现在头版上。报童们每天都会把这些报纸送到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常常会有一两个报童在白宫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读着这些报纸的头条标题大声叫卖。

这四个大鳄对于罗斯福来说都不陌生。麦考密克和约瑟夫·帕特森是他在格罗顿学校的同学；“锡西”帕特森在刚刚走进社

会，加入上流社交圈时曾和罗斯福十分友好。至于赫斯特，罗斯福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将他视为盟友，甚至说他是自己的“朋友”。罗斯福和这些人彼此间的厌恶已经很深，而且发自内心。由于这四个人中的三个都是亲戚，第四个人（赫斯特）也在长期的相处和业务往来中与其他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将赫斯特-麦考密克-帕特森的一系列报刊视为一个联盟。1940年，当罗斯福试图走进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全美国所有报刊中的四分之三都反对他这场竞选连任的豪赌，罗斯福与报界的关系也跌到了谷底。这场斗争似乎永无尽头，罗斯福还特地指责报界没能扮演好它们在美国民主中的重要角色。他说这些报社已经沦为了唯利是图的赚钱机器，它们发现追逐热点和流言蜚语比严谨、准确的报道更能赚钱，于是开始向舆论放毒。同年秋天，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总统决心“鼓励大众抵制报界”，以及“坚定认为报纸媒体不可信，唯利是图”。[7]

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后，一众记者、编辑、无线电播音员和专栏作家便坚定地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上。罗斯福打破了美国此前150年的规则，第三次竞选并且赢得了总统大选，入主白宫。现在，新闻人感受到了一种超乎以往的重任，他们一定要抵制这个强势的总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罗斯福早已是个毋庸置疑的伟大人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褒贬对立并且充满了争议。在媒体圈，即便在那些本身喜欢罗斯福或者是支持他政策的人眼里，罗斯福也理所当然是个无可救药的骗子。他常常显示出一种暗中掌控或绕过报界的能力。他通过无线电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此举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无线电广播此时仍然是种新的媒体，而且许多人担心它会成为政治煽动的工具。在

关于美国是否要卷入欧洲战事的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辩论中，罗斯福总统好几次指责批评他的人卖国。而批评者们则担心，一旦美国加入对抗希特勒的战争，总统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张。所有中年以上的美国人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记忆犹新。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权威”完全是不可触碰的，任何对总统或者其政策的批评，无论多么柔和或者善意，都会遭到起诉，连报纸都会被查封。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威尔逊的政府中供职，时任助理海军部长，因此也需要对那时候的权力滥用承担一部分责任。H.L.门肯在回忆1917—1918年那段特殊经历时警告他的同行，“要紧紧盯住那些操纵这个伟大国家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国家的”，这是媒体人的义务，战时尤甚于平时。报界的抵抗如果不够坚决，就会在“政客们自从共和制的襁褓时代便乐此不疲的强压战术之下”败下阵来。^[8]当1941年12月7日，20世纪美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在珍珠港的天空中突然炸响时，新闻界的态度便是这样的。

珍珠港遭袭两天后，罗斯福总统举办了他例行的周二记者会，这也是美国参战后的第一场记者会。记者们都被告知要提前来到白宫，因为新的战时安全措施会耗费很多时间。白宫周围到处都建起了新的警卫室和岗亭，每个入口都架起了钢制路障和10英尺^[9]高的沙包壁垒。屋顶上架起了机枪。戴着平碟式钢盔的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穿着便衣的特工们则拿着汤姆森冲锋枪。

这将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为容纳大批与会者，发布会的地点特地从椭圆形办公室改到了白宫东厅。总统的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细心地数出在大厅的警戒线后面居然挤着超过600名记者，“他们互相推挤、挪动，就像关在畜栏里的大群野马一般。我们每次只允许一个人通

过警戒线，验明正身，并要求他们在进入总统办公室时丢掉点燃的香烟”。[\[10\]](#)

在刚刚过去的48小时里，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报道夏威夷发生的事情。然而，除了少数通晓陆海两军的专业人士之外，大部分记者对军事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连陆海两军最高将领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从周日开始就在不停地发布例行新闻简报，但他有太多事情不能说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真相从珍珠港穿过谣言的海洋回流到美国本土：人们知道了有战列舰被击沉，许多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数千军人或死或伤。空气中充满了惊慌和恐惧，而第十四大街的媒体俱乐部则始终想方设法从流言中探寻真相。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第一步。美国陆军警告报界不准刊登关于部队调动的消息，海军则接管了国际电话电报局。然而，在开战之初的一片忙乱中，美国政府却还没有告诉报界应该何时、如何把大洋彼岸战场上的新闻告诉美国人民。

由于赖利的安检员要对来者证件做两次检查，发布会不得不推迟了一段时间。当记者和摄影师鱼贯而入时，罗斯福就坐在大厅尽头的办公桌后面，厄尔利站在他身旁。白宫的速记员记下了他二人之间的一个小对白：

“太挤了。”厄尔利说。

“他们大概会白来。”总统答道。[\[11\]](#)

发布会伊始，罗斯福总统宣读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动员的声明，发布了一些关于政府各个部门组织战时配给制，安排民用工业转产军需的消息。关于战况报告和新闻审查制度的内容则直到半个小时后才被提及。真正提到这些内容时的情况表明，罗斯福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还没怎么开始考虑这些事。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前都必须遵守两条显而易见的规则，”总统说道，“首先是准确，嗯，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发布出来的新闻绝不能资敌，不能让敌人如愿。”

显然，记者们并不愿意受审查规则的束缚。尽管珍珠港的悲剧凸显了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确实渴望着从漫天谣言中发掘出真相。一个记者问道，如果自己从非官方渠道得到了消息，该怎么办？总统告诉他，压在手裡，直到军事审查官检查过为止：“战争靠的是陆军和海军，而不是报纸。”

总统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珍珠港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他的解答也只是点到为止。有人要他证实在空袭当天早晨，有数千名水兵获准离开基地到檀香山休假，罗斯福总统立刻回击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这事的？他又怎么知道的？”^[12]流言这种东西，在平时已然很坏，到了战时，更是可能会给战争努力带来致命危害。

当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向全美国发表了开战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听众达到了破纪录的6 000万人。总统在讲话里重申并强调了几个小时前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过的事情。他说，这种时候出现一些谣言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却会给美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的人民向所有谣言说不。这些关于大灾难的小道消息会在战时漫天乱飞，必须把它们揪出来扔掉。”敌人将会散布谎言和假消息，以图迷惑和恐吓美国人民，勇敢面对这种宣传战是美国人民共同的责任。任何非官方来源的报道都不足为信。他还向新闻媒体提出了直接的要求：

致所有报纸和广播电台——所有能够触及美国人民眼与

耳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从现在起，在接下来这场战争中，你们为这个国家肩负着最神圣的使命。

如果你们觉得政府没有公布足够的真相，你们随时有权提出来。但是如果官方渠道没有给出所有的真相，你们无权打着爱国的名号去擅自揣测，发布未经证实的报道，让人民信以为真。[\[13\]](#)

战争爆发之初，当珍珠港的爆炸声似乎还在人们耳边回响时，新闻媒体的领袖们接受了新闻审查并报以积极态度。没有任何一个编辑、记者或者广播员愿意被指责危害了盟军，无论说其是有意还是无心。所有人都至少在道理上意识到，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绝不应该经由公开发行的报刊落入敌手。一本流行的商业杂志告诉读者：“在记者寻根究底的职业素养和不能向军人背后开枪的爱国道义之间，我们无可犹豫。出版界的自由，并不能允许我们把关于我们优势和弱点的秘密暴露给敌人。”[\[14\]](#)

要知道，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闻管制做得过了头，因此罗斯福的措施很谨慎。他曾表达过他本人对新闻管制的 unwilling。“美国人都喜欢新闻管制，就像他们不喜欢战争一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适度的新闻管制在战时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战时。”[\[15\]](#)

1942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这方面的基本政策。只有经过美国陆海两军认证的“战争通讯员”才能撰写关于海外战况的报道，他们的文章也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部门，得到批准后才能发表。而美国本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则要严格遵守自主审核制度，因为它们得不到政府的优先审查，也没有什么新机制能强制它们执行。它们被要求遵守“美国媒体战时执行守则”，其中

列出了一系列在战争期间不准发表的消息种类，包括部队调动、船只离港、军用品统计数据、天气状况、敏感军事设施或军火工厂的位置。不得提及来自情报渠道的消息，不得报道敌人防御措施的效果，也不得介绍新型武器或技术的开发。由于担心敌国间谍或者破坏分子会通过美国媒体相互联系，报纸被禁止刊登招聘类广告。出于同样的理由，商业广播电台也取消了即兴发挥型和热线型节目，以及“街拍式”访谈。听众们再也不能点歌，也不能广播诸如寻找宠物、俱乐部声明或会议通知之类的消息了。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新闻审查局，来负责相关工作。不久来到美联社担任执行编辑的资深新闻人拜伦·普莱斯被任命为局长。上任伊始，普莱斯就发誓绝不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用一些诸如“公共利益”或者“国民士气”之类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概念来限制新闻自由，否则就辞职。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这个法案在1942年初仍然有效，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总检察长保留了一定的执行权力，但是普莱斯的审查局不会直接惩罚或者起诉报刊，而是代之以聘请一批职业记者来充当“传教士”——这个词是普莱斯本人选的——周游全国，劝说编辑和播音员们遵守守则。普莱斯说，这套自主审查的模式“维护了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尊严，让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位编辑都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员”。[\[16\]](#)

珍珠港的惨剧到底有多惨，美国公众还不太清楚，但是各种报道和流言已经使人们确信，太平洋上的这座堡垒遭到了日本人毁灭性的一击。在珍珠港遭袭一周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向媒体发表了谈话，承认有多艘战列舰被摧毁，其余遭到重创；他还指出大约有3 000名水兵和其他军人遇难。相关调查正在国会和军队内部同时展开。诺克斯还说“陆海军部队未能保持戒

备”，这就意味着当地指挥官失职。[\[17\]](#)于是，夏威夷海陆两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和陆军上将沃尔特·C.肖特被解除了指挥权。他们将会被降职降级，被迫退休，并经受九轮无甚意义的质询的折磨，而这只是为了方便华盛顿方面推卸责任。

与此同时，从太平洋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混乱而令人不安。就在珍珠港遇袭几个小时后，日本人在长达3 000英里[\[18\]](#)的战线上向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美两国目标发动了空中闪电战。开战第三天，日本鱼雷机在马来亚外海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日军进攻部队则已经在吕宋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岛屿的多个滩头上了岸。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率领着他的部队与优势敌军进行着绝望而英勇的战斗——至少，那些从地球另一端传来的简略而且有些混乱的早期战报是让人这样觉得的。

虽然真相还要到多年后才会为人所知，但麦克阿瑟在战争第一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比金梅尔、肖特完全好不到哪里去。珍珠港遭袭的消息给了他9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可麦克阿瑟却依旧躲在他的指挥部里，拒绝和自己的航空兵指挥官联系，尽管后者多次试图联系他。结果，他手下的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的主力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而排列在机场上，日军对菲律宾周围的第一轮空袭就把它大部分摧毁在了地面上。华盛顿的头头脑脑对这场比前一次只晚了几个小时的“第二次珍珠港偷袭”沮丧不已，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对此却一无所知。12月7日的媒体报道只是说发现日军飞机出现在菲律宾空域。三天后，白宫宣布日军攻击了马尼拉北面的航空兵基地克拉克机场，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迄今仍无法报告战斗的详情。”[\[19\]](#)

从那以后，华盛顿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双重标准就一直困扰

着历史学者们。菲律宾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正式调查过，麦克阿瑟也从未为自己的错误和玩忽职守给出过解释，他的错误至少和夏威夷方面同样值得被追责，而且原本更加能够避免。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这种差异是美国国内对太平洋战争开局阶段一连串事件的报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要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那就要立即执行，否则就晚了——而当时并没有立即这样做。到了战争的第二个星期，美国民众的态度已彻底转变。现在他们渴望看到一个血战救赎的故事，来洗刷珍珠港的创伤和耻辱。而远在半個地球之外，麦克阿瑟那支被围攻的军队在既无援军也无补给的情况下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苦战，这恰恰满足了民众的渴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将领自然也就成了勇敢而高尚的象征，一个顶着主角光环的美式英雄。他的每日战报惊悚而花哨，牢牢攫住了美国人民的情绪。“他穿着时尚，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一位媒体评论员后来如此评价麦克阿瑟，“在62年的人生中，他一直像推炮弹的推杆那样身形笔挺，双眼清澈，面颊红润，只有一点秃顶。他面容平静，言语霸气，软顶帽的前沿给他优雅的外形平添了一抹浪漫。”^[20]

就这样，麦克阿瑟的人气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突然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他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超级明星，声誉鹊起，人望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肩。他的这枚火箭尖啸着从高空划出一条壮丽的弹道，飞过太平洋，直到十年后被哈里·杜鲁门打了下来。

菲律宾战役从一开始便毫无胜算，即便日本人不去偷袭珍珠港，结果或许也一样。日军向菲律宾群岛和其他盟军控制区发动的进攻十分熟练，而且占据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但是麦克阿瑟仍然愿意去打，也希望人们看到他在打仗，美国人则因此对他无比敬仰。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3月11日，麦克阿瑟的司令

部签发了142份媒体公报，其中109份只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麦克阿瑟。很少有某支部队被点名表扬或者嘉奖，这些公报里写的通常只是“麦克阿瑟的部队”，或者“麦克阿瑟的人”。[21]公报常常暗示他正亲赴前线率领部队，但实际上他只是待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

这位精通公关的将军清楚一句简短却足以上头条的言论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会拼尽全力。”战争爆发第五天，他如此告诉记者。[22]当有人提出应该把他马尼拉司令部屋顶的美国国旗撤下以免招来日本轰炸机时，他来了一句：“让国旗飘起来。”[23]这些“金句”都被写进了他的战报，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他太知道该怎样摆姿势照相了：身体立正，头略偏向一边，就像竖立在底座上的汉白玉雕像那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麦克阿瑟骄傲而坚定地站在那里，目视远方。新闻短片的制作者们纷纷把当年麦克阿瑟检阅部队、向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讲话，抑或是被法国将领亲吻双颊的纪录片片段翻出来再次播放。美国国会投票同意将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区西边的一条主干道更名为“麦克阿瑟大街”。红十字会组织了一场“麦克阿瑟周”活动以募集资金。多所大学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学位。纽约的一个舞蹈协会把新发明的舞步命名为“麦克阿瑟步法”。[24]黑脚族印第安人把麦克阿瑟“请”进了自己的部落，尊他为“Mo Kahki-Peta”，意即“圣鹰酋长”。纽约的几家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麦克阿瑟的“速成”传记——实际上都是极尽吹捧之能事的那种——这些书虽然都是粗制滥造的，但卖得都不错，包括《伟大的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平生精彩》，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自由而战》。

在1942年1月26日麦克阿瑟62周岁生日这天，国会山上的参

众两院议员扯开嗓门，集体给他送上了生日颂词，每个发言者都争先恐后地高调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25\]](#)第二天，《费城纪事》告诉读者们：“他是这场战争乃至整个战争史中最伟大的战将之一。这可是一段传子传孙的历史。”[\[26\]](#)1942年2月12日在波士顿的林肯诞辰纪念日演讲上，曾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提出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让他来指挥这场全球战争。“让麦克阿瑟回国来，”威尔基喊道，“让他登上最高宝座。不要让那些官僚和政客阻碍他……让他成为总统麾下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美国人民就可以让这位能人而非愚蠢无知的人来指导他们奋战了。”[\[27\]](#)

对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来说，整个国家都全神贯注地屏息盯着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个十分让人头痛的难题：事情该怎样收场？有可能去增援麦克阿瑟，或者哪怕只是给他提供一些补给吗？乔治·C.马歇尔上将要求他新上任的副参谋长，最近刚刚晋升准将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全面考察这个问题，给出个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在1935—1939年曾于菲律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他比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注意到马歇尔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对美国人民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忽视的：“很明显，他觉得任何蠢到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家伙都不配当上准将。”[\[28\]](#)

简而言之，菲律宾既无可挽救，也不能立即放弃，这就是难题所在。菲律宾的守军无法获救，因为盟军手里的船舶、海军力量和空中力量远远不足以打过太平洋，连一丁点这样的力量都使不出来。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是徒增这场败仗的规模而已：任何想要突破日军封锁，前往麦克阿瑟部队被困的巴丹半岛的船只，其结果都只能是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无论怎么算，巴丹半岛的军火和其他所需的补给品都不可能撑到盟军集结起足够规模

的部队并打回菲律宾的那个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告诉马歇尔，被围困的守军不应该被“冷血地”丢给敌人。即便军事逻辑决定现在需要止损，美国也毕竟是个大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必须努力通过潜艇、飞机和渗透人员把至少一部分补给送进巴丹半岛。即便这只是杯水车薪，至多也不过把不可避免的最终投降的命运推迟几个星期而已，但“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竭尽所能”。^[29]马歇尔同意了，他授权艾森豪威尔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些象征性的运输做起来。

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2月23日的日记里，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关于麦克阿瑟的极富预见性的评价：“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但我怀疑他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如此。巴丹半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地方：这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也让他成了公众眼里的英雄；这里具有所有的舞台元素，他则是这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然而一旦离开那里，民意就会把他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而在那时，他对聚光灯的热爱就会毁了他。”^[30]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并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时，艾森豪威尔失望地写道：“我忍不住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报界的干扰和‘民意’的裹挟，而不是出于军事逻辑。”艾森豪威尔的角色不在太平洋上——他另有舞台——但

是在1942年初，他就预见到了麦克阿瑟将会带给华盛顿领导层的所有麻烦。麦克阿瑟将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美国媒体上无与伦比的发言权来索要更多的部队、舰船和飞机。他将会拒绝把“欧洲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他将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他将会坚持由自己主导太平洋上的海上战争。他将会要求先解放全部菲律宾再向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艾森豪威尔预见到，在随后战争中的所有阶段，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将不得不去对付麦克阿瑟的个人影响力，因为“公众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超出他自己想象的大英雄”。[31]

欧内斯特·J·金，这个领导着美国海军的板着脸的老水手，决意不沾媒体的边。当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后任命他为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时，他是出席任何新闻发布会为条件才接受任命的。他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他的幕僚在拒绝采访请求时也会解释说金不希望做“有利或有助于敌人的事情”。[32]但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却正确地猜到金上将对媒体深深的敌意——他认为这些记者只会追逐流言蜚语，是些不请自来的卑鄙小人。根据一位记者的说法，金看起来对记者“如同对待鼠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33]

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金他们这一代海军将领都是在20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后这一

阶段开始海军生涯的。在那些年里，威廉·T.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谢利二人在媒体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在1898年7月3日的古巴圣地亚哥海战中各率领着一支海军舰队。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赢了这场海战并且贬低对方的贡献。两名将领及其拥趸想尽办法在媒体上争宠，并相互指责和辱骂。1901年9月，一个针对此事的调查庭成了媒体关注的头条，尤其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报纸，但问题是庭审给出了一个完全不着调的结论，结果便是火上浇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试图压灭关于此事的公开讨论，担心这会辱没美国海军对西班牙的胜利，但这件糗事还是在报纸上被持续议论了数年之久，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美国最早那批无声电影中就有这么一部《桑普森-谢利之争》（1901）。

对于那几年进入海军学院的学员们而言，这一糟糕的公众事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他们此时本应享受公众的欢呼，规划自己的未来，巩固这个军种在华盛顿的地位。然而，桑普森和谢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只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而把海军的家丑公之于众。那一代年轻的海军军官发誓决不让此事重演，其中包括金（1901届）、威廉·莱希（1897届）、威廉·哈尔西（1904届）、切斯特·尼米兹（1905届），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1906届）。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听说过桑普森-谢利这档子事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将领们却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以团队协作、冷静专业、谦虚谨慎为荣，对于报社记者，则是能躲则躲。

然而，严酷的战争很快就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轻视宣传带来的风险和困难。由于没有及时发布关于海上战事的确切消息，公众对此的了解便出现了真空——于是，各种流言和揣测便如同物

理定律一般不可避免地填满了这一真空。没人会质疑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当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之时，华盛顿有些有话语权的人便开始指责海军利用对战况信息的控制权来掩盖自己的惨败。更糟的是，共和党的首领们还指责海军成了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爪牙，利用公布新闻的权力来影响194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这当然是污蔑，但破坏性也毋庸置疑。金上将最终意识到，他必须对这些污蔑予以反驳，否则就会在政治与战事之间的非军事地带备受指责。

同样重大的压力，来自海军在战后国防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珍珠港一战之后，美国国会两党的领袖们都决意要优化军队组织架构的运作效率。美国的战争部[34]和海军部，从约翰·亚当斯时代起就一直彼此独立，平起平坐，现在，这两个部门将要被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防部，由一位文职内阁官员掌管。虽然具体措施还有待磋商，但将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整合入一套统一的指挥架构，这将是大势所趋。罗斯福总统成功说服国会将这一改组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但所有人都能看出，这次军种融合将必定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政治恶斗，而海军的独立指挥权和影响力都会受到重创。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他的次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又译福里斯特尔）都有媒体背景，他们警告金和海军将领们，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海军最好去向美国人民“讲自己的故事”。福莱斯特发现陆军已经通过私下渠道把自己的整合方案提交给了国会领袖们，“据我判断，从现在起，海军已经输了，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公众眼中，陆军的观点都将占据统治地位”。[35]1944年8月，福莱斯特告诉金：“现在，宣传已经和后勤或训练一样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36]

珍珠港事件之后数个星期的时间里，数百名在职记者向战争部和海军部申请成为战争通讯员，也就是今天“战地记者”的前身。根据军方的《通讯员战地基本守则》，这些前线报道员将要接受军队的领导，而且要“把所有用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声明、文字材料和照片提交审查”。^[37]他们虽然仍是平民，但也必须穿着卡其色军装，并佩戴表明其身份为“通讯员”“摄影师”“无线电解说员”的铜制肩章。到战争结束，总共有1 600名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军方的认证。

那些作为战争通讯员随船出海的记者都被告知要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在十个小时内离开本土。和陆海军军人们一样，他们也禁止泄露有关出海日期和目的地的消息，即便是对他们的编辑和爱人也不行。他们将要通过空运或海运与部队一同行动。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军官待遇，也就是可以在军官餐厅吃饭，享受军官的住宿和起居标准。作为民间人士，他们按说既不用敬军礼，也不该有别人向他们敬军礼——但是他们毕竟都穿着卡其色军装，因此经常会有军官或士兵向他们敬礼。这就难办了。严格说来，按照礼仪规范，他们不该回礼，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想因为未回礼而冒犯别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说法。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澳大利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威廉·J·邓恩说，他的大部分同僚的做法都是：不首先敬礼，但是会“仅仅出于礼貌”向别人回礼。然而，当与那些戴着“一排将星”的高级将领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手举到额前。礼仪规范？见鬼去吧。^[38]

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

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错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在有些海外司令部里，媒体部门采取的是一种“盲审”制度，尤以战争第一年为甚。审查官们拿着红色铅笔阅读每一篇报道，把任何他们觉得不合适的语句或段落删掉，然后直接把删改后的版本发回美国本土。作者本人则既不知道作品受到了怎样的编辑和修订，也没有进行解释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准重新撰写提交。有时候，报道会湮灭在审查官的“枪毙文件”里，而撰稿作者则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的报道是否通过审核，又被审查官的红铅笔改掉了多少。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作者肯定会暴怒，接下来的火星撞地球便是躲不掉的了。而那些新闻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出于保守机密的职责，自然是不会妥协。在新西兰司令部，五名战争通讯员向他们的媒体审查官列数不满事项，结果后者答复道：“我不怕你们，我更怕来五个日本鬼子。”^[39]另一位新闻官则油印了一封信件并分发出去，以回应这些抗议：

我的朋友：

当我听到你的忧愁苦恼时，我眼含泪水，喉咙哽咽。请允许我致以我最深切、最诚挚的慰问。但是，我不是牧师，也没有教堂。还请找你们船上的老大^[40]要东西擦干泪水吧。

祝平安，我的朋友。

审查长[41]

但是对于新闻官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不惧权威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全世界最能言善辩、赤口毒舌的人。《纽约客》通讯员A.J.李布林曾描述自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里遇到的那些新闻官。李布林留意到，参军之前他们原本都是些公司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是“芝加哥改写员”——但是战争让这些从来没进过训练营，也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军队里的少校和上校。他们只是些没用的“花边”，依附在合身、笔挺的军服上，带着刻意练习过的奉承和谄媚为军队说话。战前，没人拿他们当记者；现在，也没人拿他们当军官。凭借着在诡辩和敷衍方面的天赋，他们“蹚进了这一摊污臭的泥潭，如鱼得水”。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后不久，由于不必再担心失去媒体资格证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布林在自己的杂志上撰文，向新闻官开了炮。他宣称新闻审查只是出于“政治、个人，或者仅仅是任性的目的”，他还说，现在是时候来曝光“以军队公共关系为名所掩藏的数不清的蝇营狗苟之举了”。[42]

在夏威夷，也就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的地方，通讯员们很快郁闷地发现，这个冷漠的白头发得州佬决意不向他们提供任何有趣或值得一写的东西。新闻人们似乎都以为这个被派去给珍珠港报仇的人，看起来或者聊起来会像男孩子们的冒险小说里的炫酷游侠那样。但是据一位记者观察，尼米兹更像是“退休的银行家”。[43]根据《时代》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的说法，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公关人员的绝境，他根本不要发布大范围的讲话，或者提供精彩的受访内容”。[44]

尼米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42年1月29日，也就是他

接管珍珠港后一个月，还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逼着他举办的。战争通讯员们被带进了他位于海军码头潜艇基地内司令部里的办公室。他们看见尼米兹坐在一张普通的木质办公桌后，穿着卡其色常服，没有打领带。他没有站起来迎接访客。办公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只是挂着一个时钟、一份日历和一张太平洋地图。记者们坐在专为这场发布会而布置的折叠椅子上。尼米兹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介绍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已经建立起的指挥协同关系。不过这所有的信息，华盛顿方面此前都已经发布过了，所以不算新闻。之后他开始接受提问。是的，他预计能够守住并保护夏威夷群岛。不，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纽约时报》通讯员福斯特·希利请求他“就12月7日以来海军的作战情况，向国内的民众做一些介绍，好让民众放心”。他得到的答复是：“尼米兹将军说，关于舰队作战的任何声明都必须通过华盛顿发布，这是战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45\]](#)全场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同一个月，同样是在诺克斯部长的逼迫之下，尼米兹引进了一个全职公共关系专员。这个人就是沃尔多·德雷克，一个海军预备役中校，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的海运新闻记者。这种任命民间记者担任新闻官的做法是出于“河马内部好交流”[\[46\]](#)的考虑。他刚一上任，就向战争通讯员们表示，自己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办公室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因而赢得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他的上司还是一直把和媒体打交道视为需要去解决的麻烦，而不是和公众沟通的机会。德雷克的地盘从没有超出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范围，但是瓦胡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军事单位，包括美国陆军、陆军航空兵和第14海军军区的单位，这所有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审查人员和公共关系策略。[\[47\]](#)

通讯员们日复一日地敲开德雷克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给出的新闻都是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德雷克拖沓迟缓的审查流程，意味着记者们的报道发回本土时已经成了旧闻；还有就是获准随舰队出海的记者太少了。记者们要抱怨的事情太多了。当威克岛被日军占领时，审查官们去掉了报道中的“威克岛”一词，代之以“一个岛屿”。于是一位通讯员问：“海军里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攻占的是另一个岛屿？”[48]有一次，由于管理混乱，通讯员们获邀参加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的一次新闻简报会，问题是，尼米兹已经明令禁止潜艇部队发布新闻，于是德雷克只好临危受命，跑到会场上宣布简报会取消，而且他还收走了所有记者的记录本才允许他们离开。[49]还有一次，约瑟夫·海勒写的广受期待的新作，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本已经通过了陆军和海军的审核，但是海军的审查官篡改了其中一段。结果陆军发现海军改过的版本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吊销了作者的战争通讯员认证，但实际上这个可怜的作者在新书付印上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改成了什么样子。

随着珍珠港里通讯员的数量逐步超过了100人，大家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经久不息，德雷克的“开门政策”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变成了“有时候开门政策”，继而又成了“通常关门政策”。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鲍勃·凯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雷克，他说：“这里的宣传办公室应该交给那些军衔更合适、处事更老练、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管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得能看懂表上显示的时间。”[50]

尼米兹基本没什么时间来考虑公关问题，战争最初几个月尤其如此。他有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作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OA），他要担负起他这块巨大战场上所有军兵

种的指挥之责。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竞争是个老大难问题，尼米兹必须把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艺术全部发挥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绵延不绝的摩擦争斗。在这一方面，战争通讯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就是深挖矛盾，就像路灯旁的飞虫那样群集、环绕在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周围。对于瓦胡岛上的这种内部竞争，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他们挑动陆战队去抱怨海军，挑动陆军去鄙视陆战队，还挑动海军航空兵军官去和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吐槽。他们在军官俱乐部里守株待兔，等到军官们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旁敲侧击，来问出真实的情况。这种话题，审查官们当然一个字都不会让它们发出去，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就会经由口耳相传回到本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大厅里自由谈论这些事。美国本土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不必被人拿着红铅笔去审核。报社虽然会受到自主审查守则的限制，有些硬性的事实不能公布，但发表一些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许多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正是靠那些从前线通过非法渠道传回来的消息编写的，而提供消息的正是这些通讯员和他们毫无顾忌的议论。

到1942年春，在华盛顿和许多其他地方，珍珠港事件之后媒体和军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报纸在社论版上指责陆军和海军在信息管制方面做错了太多。许多天天搞新闻审查的军官资历太浅，无论年龄还是军衔都不够，还成天担心惹怒上级。一个25岁的年轻中尉，不会因为封杀了一条可能有些毛病的报道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这篇报道被他通过了，而偏偏又被某位上校或者将军看到还认为有害，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陆军和海军觉得自己掌控着新闻，其行事风格就好像在整个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它们，”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当实习记者的戴维·布林克利说，“就像历史上政府官员们常干

的那样，他们随意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对于胜利则是大吹大擂。”[51]

为了应对这日益升高的批评声浪，罗斯福总统创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来协调整个联邦政府战争相关消息的发布。1942年6月13日，政令生效，成立“战争消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缩写OWI），“承认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反轴心国侵略的人民有权获知真相”。[52]总统任命资深报界人士和无线电广播员埃尔默·戴维斯来负责这个办公室。战争消息办公室由四个已有的联邦政府部门合并而成，戴维斯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男人娶了死过四任丈夫的寡妇，还要把她前夫们留下的孩子抚养长大”。[53]戴维斯知道自己将会遭到战争部和海军部的抵制，于是请求政府特许战争消息办公室评估所有来自前线的军事行动报道，并且独立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发布。“但问题是，”布林克利写道，“其他部门，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不会去阅读罗斯福的声明，即便读了也会装不知道。事实正是如此。”[54]

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喜欢这个主意，不想去对付这个新的非军方宣传机构。当被问及战争消息办公室是否会指导战争部的新闻工作时，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反问了一个问题：“戴维斯先生是受过训练的军官吗？”[55]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自己也是个媒体人——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合伙人和股东——不过戴维斯后来说，虽然诺克斯总是很礼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被很礼貌地拒之门外”。[56]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每天的例行晨会上，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会呈上此前24小时里从前线传来的报告综述。戴维斯和他的同僚们就会将这些报告和官方公报做对比。如果他们有些消息受到了不恰当的封锁，他们就会要求军队部门把它们放出来。如戴维斯一位下属所说，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战争消息办公室会请求得到授权去“直接决定某一消息可以被写入公

报，除非军队能够拿出铁证证明这些消息事关安全，不得不删除”。[\[57\]](#)

戴维斯和金上将的沟通毫无进展。他很快得出结论，在公共关系领域，海军是各军种中的“问题儿童”。戴维斯有个评论在华盛顿流传甚广，他说金关于媒体政策的想法是，在战争结束前什么都不说，之后发布一份只有几个字的公报：“我们赢了。”金对戴维斯很热情，这可能是因为总统要他这么做，但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他还是能不配合尽量不配合。这一时期，金认为宣传和媒体工作顶多是第二等的问题，或者是第三等，他可以甩给下级去处理，自己则不闻不问。

就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成立的同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几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媒体泄密事件，这证明金对于媒体的看法是对的，他的态度由此也更坚定了。6月7日，就在中途岛战役结束次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海军得知了日本的海上进攻计划》。文中写道，海军在“战役开始几天前”就掌握了中途岛作战的关键细节。[\[58\]](#)这篇报道对美军获知日军计划的手段讳莫如深，但是读者稍加思索就会得出结论，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无线电密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可是整个战争中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现在这样一份美国大报把此事捅出来，很可能会惊动敌人，让他们采取反制措施。金暴跳如雷，下令彻查此事，最后很快查出捅篓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战争通讯员，名叫斯坦利·约翰斯顿，5月8日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航母沉没时，他就在舰上。后来他被护航驱逐舰救起，和一群“列克星敦号”上的军官一起搭乘运输船“巴奈特号”返回美国本土。航行途中，约翰斯顿看到了一份尼米兹上将于1942年5月31日签发的绝密电文，提到了即将开始的中途岛作战的细节。最终，“列克星敦号”的副舰长莫尔顿·塞利格曼中校被

认定为泄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59]

关于是否要以叛国和间谍罪的罪名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的问题被拖到了8月，原因是担心大动干戈反而会让日本人更容易注意到这条新闻。美国政府将联邦大陪审团召集到了芝加哥，但是海军不愿提供有关其绝密电报破译项目的详细证词，陪审团也拒绝宣布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结论，日本人没有注意到这条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战后的审讯也没有发现什么与此结论相悖的证据。[60]

随着海军的坏消息越来越多，金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华盛顿一位记者的说法，在国会山上，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军在公报中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他们隐瞒了一些严重的损失。看起来大家都认为金上将觉得公众无法接受这些损失”。[61]1942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美军军舰在战斗中被击沉，而公众往往要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知晓此事。当然每次都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隐瞒——要么是由于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些军舰已被击沉，要么是需要时间来通知伤亡人员亲属——但批评者们依旧怀疑海军在操控消息的传递，以保住颜面，以及保护金本人。

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刊登了关于这次惊人胜利的报道。报道夸大了日本的损失——实际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小型“婴儿航母”，即“祥凤号”——却对“列克星敦号”的毁灭只字未提，这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仅有的四艘航母之一。金曾亲自要求不允许让公众知道这艘航母战沉的消息，原因是它沉没时周围并未出现日本的飞机，因此敌人应当不知道此事。“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直到6月12日才发布出来，而此时美国已经在庆祝中途岛的胜利了。“不公开这一消息是出于海军的安全因素，”公报里如此写

道，这当然也是为了辩解，“这也是赢得中途岛胜利的一块基石。”^[62]

2个月后的8月8日夜间——美第1陆战师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次日——四艘盟军巡洋舰在萨沃岛海战中被击沉。金下令严格禁止公布关于此次惨败的消息。他的分析是明智的：战斗是在夜间发生的，而且日军舰队很快就撤回了拉包尔的基地，因此可以想见，敌人并不知道自己给美军带来了何种损失。一周后发布的一份海军公报重点介绍了美军在地面和空中的胜利，但是对于盟国海军的损失却未做更多说明，“因为这些消息对敌人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63]

但对于萨沃岛这样的大灾难，总会有一些信息通过流言蜚语零零散散地传回美国本土。到10月初——灾难发生2个月后——这在华盛顿官方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质疑者们认为金如此保密主要是为了自保。瓜岛作战是他的主意，他是强压着具体执行军官的反对发起这场行动的。根据《纽约时报》通讯员汉森·鲍德温的说法，金现在“如坐针毡，因为瓜岛作战是他一意孤行发动的。他就是那个拍板要干的人，虽然目的只是搞些小动作，但现在这些恶果、这些损失，以及海军所表现出的无能，美国人民都不会泰然处之，这对于金的名望和前景也没什么好处”。^[64]

埃尔默·戴维斯急切地要求金把萨沃岛的损失情况告诉公众，还有9月“黄蜂号”（又译“胡蜂号”）航母被潜艇击沉的事情也是一样。10月初，戴维斯来到金的办公室，与后者促膝长谈之后，他告诉妻子，这场会商“激烈却不失友善”。^[65]这位海军上将看起来意识到他的位置开始摇摇欲坠了。军舰沉没后短期内保持新闻封锁是说得通的，但是要压住消息足足两个月不让见报，就说过去了，尤其是在数以百计的幸存者已经回到国内的情况下。而随着权威报道的缺失，难免流言四起。有些人就说大半个

太平洋舰队已经在所罗门群岛丢掉了，还说日本人即将打过瓜岛。这里还有个政治原因——1942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开始——有人就怀疑金上将和海军之所以掩盖损失，是为了保护罗斯福在国会里的盟友。在如山的重压之下，金觉得是时候澄清萨沃岛惨败的真相了，于是10月12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公报：“所罗门群岛战役初期的一些情况，之前由于军事原因没有公布，现在可以报道了。”^[66]于是，那四艘战沉巡洋舰的悲惨故事便被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出来。

就在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惊喜突然到来。就在前一场海战发生的同一片水域，又发生了一次海上夜战，这一次——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美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海军又发布了另一份公报，原原本本地报道了这场战斗的结果。^[67]时间完全是巧合，但是新闻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愤怒地指责海军就像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再发布“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声明一样，又一次把坏消息（萨沃岛）压到后面与好消息（埃斯佩兰斯角）一并发出来。这时候恰好是瓜岛战役最危急的阶段，许多人怀疑海军和陆战队守不住这个岛屿，而战争新闻方面的处理不当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国会议员梅尔文·马斯最近刚刚到过南太平洋，他在议院里站起身来，宣称日本人正在赢得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并指责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现在，媒体开始怀疑和蔑视海军的公报了，他们猜测海军还有巨大的损失没有公布出来。

金虽然固执己见，但他来到华盛顿多年，其经验足以告诉他，无论是猜疑还是真相，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他有太多的敌人想把他赶走——陆军、海军、媒体、国会，无处不在——敌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举国上下团结应战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引火烧身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如果他真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那他就要走人了。现在到了战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金接

受了戴维斯的建议，把仍然没有公开的军舰沉没事件悉数公布出来。

10月26日，海军宣布“黄蜂号”航空母舰已于超过5个星期前在瓜岛以东遭到潜艇攻击而损失。[68]当天早些时候，海军又报告了后来被称为圣克鲁兹（又译圣克鲁斯）海战的航母会战的第一批结果，承认美军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以及“我方有一艘航母遭到重创”。[69]确实如此，这艘未被点名的航母是“大黄蜂号”。但是第二天，后续消息传来，“大黄蜂号”火灾严重，已经失控，不得不自沉。金犹豫了，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发布这一消息。日本人或许还不知道它已经沉没，这条消息可能会被日本人利用。埃尔默·戴维斯警告说，如果这个消息压到选举日之后再发，共和党人会起来闹事的。戴维斯坚决要求立即把消息发出来，他觉得这十分重要，于是直接把要求提到了诺克斯部长甚至是总统那里。但另一方面，尼米兹将军也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条消息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于是也写了一份语气坚定的提案，从夏威夷发了上去。

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主任威胁说若不公布消息就辞职，这就把金逼到了墙角，他判断自己已经别无选择。10月31日，就在中期选举的3天前，海军发布公报，承认“大黄蜂号”“后来沉没了”。[70]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提出抗议，称这次消息的公开“在关键时刻害了我们”。[71]

金有一个极信任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律师，“内利”科尼利厄斯·布尔，他常常称金上将为“船长”。布尔在职业生涯初期曾是一个报社记者，至今仍在华盛顿的媒体圈里有很多朋友。眼见争议四起，布尔开始担心金的脑袋不开窍，于是决定做点什么来帮帮他。10月一个周五的傍晚，他在华盛顿第十四大街媒体俱乐部拥挤的吧台旁找到了《纽约太阳报》的助理总编格伦·佩里。两

个人靠在吧台上，一边抿着汤姆·柯林斯鸡尾酒，一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准备挑选出十几个经验丰富、以“绝对诚实可靠”著称的大报记者。^[72]他们会邀请这些人与金进行一番非官方的私下交流，最好是在周末。接下来，这些新闻人将要遵守严格的基本原则，经过类似现代的“深度背景调研”——他们都需要同意，金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得见报，只是用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海军公报。他们不会引用将军的话，无论是署名引用还是匿名引用；也不会把金和自己交流过这件事告诉编辑部以外的任何人。布尔把这场会面的地点选在自己家里，这里可以令金感到舒适和放松。啤酒和小点心也是不会少的。记者们不会对将军说的话做任何记录。布尔和他的夫人将尽力创造一个放松和熟悉的氛围，让所有人（尤其是金）不要把这和官方发布会联想到一起。

布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令他惊喜的是，后者立刻就同意了。金知道陆军中和自己职务对等的马歇尔将军在战争部他的办公室里也做过这种非正式的战况介绍，后来也没有发生泄密的事。可以相信，知名的记者是可靠的，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原则（布尔、诺克斯、戴维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么对他说的）。由于会面地点是在布尔家里，金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偶遇，只是随便聊聊，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绕过海军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就不会受到诺克斯部长的监管。

11月1日星期天晚8点，金的黑色轿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公主街“内利”布尔的家门口。这座房子不大，最初还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建造的，房子正对着马路另一侧粉刷成白色的19世纪的旧监狱，这所监狱曾经因关押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而闻名。金离开了他的司机和陆战队卫兵，按响了门铃。此时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于是，一个“穿着标准海军蓝制服，步态悠闲的高个子”走了进来，把他的大衣和

军帽递给了布尔。格伦·佩里在写给编辑的一份备忘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安静地走进房间，我立刻注意到，他居然是独自一人！没有烦人的助手，也没有过度谨慎的公关专员来防止他掉进别人设的陷阱。他就是欧内斯特·J·金，美国海军上将，他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要把命运交到不太熟悉的人手里。然而他已经做足了准备，带着权威的、指示的姿态，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毫无做作。伟人们或许会享受号角齐鸣的礼遇，但他们并不需要靠此来获得身边人的敬重。

内利带着将军在屋里走了一圈，向他逐个介绍在座的通讯员。他和每个人都握了手，握得很快而且很紧，他会复述对方的名字，同时还满含热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但是不难想象，假如不是在这种合适的环境下，这对眼睛就会变得如同用战列舰装甲钢打造的那般冷酷。[73]

介绍完后，宾主落座——金坐在屋角的一把安乐椅上，记者们在他周围大致围成一个圈。啤酒装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洗手盆里，大家都是拿起瓶子直接喝。

金开始即兴发言。在最初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没有打断他。他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这场世界大战，从1941年时他所面对的将护航船队送过大西洋的问题说起，继而是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危机、中途岛大捷，以及当下瓜岛战事的艰难。

记者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宏观战略和复杂的后勤突然在他们面前清晰起来。金对于战争重大问题的专业总结本身

就是价值连城的知识培训——而当他转向具体问题，则又展现出了对细节，包括对技术数据惊人的了解。他喝了第二瓶啤酒，接着是第三瓶；他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点燃一支烟。在记者们看来，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述海军所犯的错误时也同样直言不讳，完全不像是为了自保而隐藏了什么的樣子。“他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常常还有即将会发生什么，”有人回忆道，“他说的坏消息和好消息一样详尽，许多时候还会一边介绍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一边介绍哪些策略、武器或者二者的结合取得了成功。从头到尾，他都是完全放松的，而且总是很耐心，欢迎大家插话提问，他的回答也直白而轻松。”[74]

许多问题都是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形势的，美国在那里的空战和海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美国能否守住这个岛屿？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战术撤退？

“我们会坚守。”金说道。他说所罗门群岛的战斗残酷而艰难，并承认美国海军遭到了惨重损失。但是在那里狠狠打一仗的理由也很充分。日本人也同样困难，而且他们无法轻易弥补所遭受的损失。当地地理条件也对盟军有利，因为日本在那附近没有航空兵基地。金解释了海军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公布损失的决定，并且提醒记者们，日军宣布的战果通常会夸张10倍以上。他提到“公牛”哈尔西最近刚被任命为南太平洋司令，还预告了即将于下个星期打响的大规模海战。[75]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承担失去舰队的风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

“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金答道。[76]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金离开之前和每一位记者握了手。有些记者会后留了下来继续讨论，其他人则匆忙离开，他们要把自己能够记住的所有讨论内容

写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讶，觉得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比之前深刻多了。有人回忆道：“金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也没有对那些头痛的难题视而不见，希望它们能自己消失。”^[77]对于海军延迟发布军舰战沉的消息引发的争议，记者们接受了金的解释，并觉得他和海军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

令金意外的是，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晚上的每时每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和自己说话，向自己讲述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这甚至也帮他自己厘清了一些思路。第二天早晨他一来到办公室，就给“内利”布尔打电话，问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78]

金的亚历山德里亚秘密媒体简报会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平均下来大约是每6个星期开一次。后来还有更多的通讯员获邀参加，数量最终接近30人。这些记者笑称自己是“阿灵顿游击队员”，他们还像正式的秘密行动一样给金安了个代号——“瘦子”。当诺克斯部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由衷地给予了赞许，虽然金将军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办了此事，对部长的权威似有侵犯。而且，金说出来的那些秘密，最终也从未在报纸上出现过。

金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了华盛顿媒体圈的一股善意。这笔资产看不见摸不着，但金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国会议员马斯曾经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称美军最高指挥层内部不和，同时推动立法把各军种合并入一个统一的指挥架构。金相信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形式已经足够顺畅，军种合并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于是金小心地约见了几个“阿灵顿游击队员”。不到24小时，全美各大报刊便充满了声讨马斯言论的文章和社论，对金却只字未提。不久后，在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领

袖的支持下，军种合并的事情被束之高阁，留待战后再议。

1941年，金刚刚到达华盛顿时，曾决心不和媒体发生任何瓜葛。而到了珍珠港事件即将满一周年之时，他已经能够如同华盛顿那些老练的幕后玩家那样暗中操控媒体了。猛一看，这似乎是个突然的逆转，但是若深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没人会误以为欧内斯特·J·金是个不善学习的人。

在麦克阿瑟将军设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新闻处的负责人是“皮克”勒格朗德·迪勒上校，他是个职业陆军军官，后来正是在此新闻处处长任上官至准将。迪勒是“巴丹帮”的元老，他们是麦克阿瑟最忠实的部下，战争爆发前就在菲律宾服役，1942年3月又和麦克阿瑟一起从科雷吉多尔出逃。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从来不缺人手：迪勒下辖的官兵数量最后超过了100人，里面不乏校级军官，其中许多人到战争结束时都晋升为上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从本土汹涌而来的记者们感到很头疼，迪勒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们持“越多越好”的态度，而且总是乐于签发更多的媒体许可证。在布里斯班，获得认证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广播员最终超过了400人。

迪勒和他的团队将通讯员们视为尊贵的客人。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提供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广播设施，在记者们即将奔赴前线时还会好好招待他们。他们会安排记者们直接面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那都是在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几乎每天一份的新闻公报都是由迪勒撰写初稿，再交给麦克阿瑟审核，常常还会被他重写。通讯员们很快发现，没有任何或明或暗的批评能够逃过迪勒的红铅笔，而另一方面，他

们的赞扬和吹捧越多，就越能得到独家消息或其他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

新闻界给迪勒和他团队的配合力度打了高分。和夏威夷的情况截然相反，新的报道提交给麦克阿瑟的新闻处之后，会在24小时内得到阅读、审核、批准，并传回美国国内，发表到报刊上时还是热乎的。这种新鲜出炉的新闻更容易登上头版头条，而来自尼米兹战区的那些相对过时的新闻就只好敬陪末座。就这样，1942年到1943年间，美国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仗都是麦克阿瑟打的。

麦克阿瑟比二战美军其他将帅更能理解视觉印象的重要性。他时刻关注自己的衣着和装饰，也就是反对者们口中他的“道具”——旧巴巴的菲律宾元帅软顶帽，整洁的飞行皮夹克，飞行太阳镜，还有他那看起来越来越大的玉米芯烟斗。他对自己头顶上的秃斑十分介意，如果不得不拍摄免冠照片，他就会找没人的地方花点时间，把头顶上的头发从一边梳到另一边，在双耳5厘米以上的地方留出完美的直发——今天人们常说的“遮秃发型”（combover）。这些照片和媒体文稿一样，也是迪勒的审查对象——麦克阿瑟登出来的大部分战时照片都是从下往上拍的，这样能让他看起来显得更高一些。

布里斯班的宣传机器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麦克阿瑟是在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作为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角色并不是亲自上战场打仗，而且他在“一战”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须再去证明什么。然而在前线拼杀的将士们从未在战场上见过麦克阿瑟，却听美国报纸上说他正在一线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这就难免令他们愤愤不平了。1942年10月，他飞往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盟军基地莫尔斯比港做了短暂的视察，布里斯班的战争通讯员们就报道说麦克阿瑟视察了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布纳附

近的战场。这样的报道都被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审查官审查通过了。有一张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罗克汉普顿观看部队演习的照片，发表到了媒体上就被误写成了“视察前线”。有一段记录麦克阿瑟坐在吉普车后排，在泥泞的林间小道上颠簸开进的新闻短片，解说员告诉观众，将军正乘车前往前线阵地。但实际上，在他整个视察期间，他和最近的日军部队之间始终隔着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79]

这样明目张胆的胡编乱造令第8集团军司令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十分愤怒，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新闻处是在滥用自己的战时新闻审查权来放纵麦克阿瑟个人的虚荣心。艾克尔伯格将军体验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同僚此前已经吃过的亏——如果一位下级军官想要和麦克阿瑟共事，那么他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艾克尔伯格在几份关于布纳战役的媒体报道上露了脸讲了话，于是便被召回布里斯班，被麦克阿瑟一顿臭骂：“你知不知道我明天就能把你降成上校，让你滚回家去？”[80]艾克尔伯格知道厉害了，他在战争余下的过程中对媒体一律拒之门外。有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公共关系官员说：“我宁愿你往我口袋里放一条毒蛇，也不希望你去宣传我。”[81]

从战争一开始，麦克阿瑟就一直坚持发布他自己的新闻公报，华盛顿要他低调一些，他也置若罔闻。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都不喜欢布里斯班发出的这些哗众取宠的声明，于是他们开始质疑麦克阿瑟所宣称的战果的准确性。对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宣传机器来说，真相常常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的战报写得天花乱坠，以便看起来显得更精彩和戏剧性，许多时候他们不仅舞文弄墨，甚至会随意捏造“事实”。有些时候，关于敌方损失的数据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不仅如此，许多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公报看起来并不怎么掩饰对海军或者尼米兹战区作战行动的贬损。最臭名

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当时麦克阿瑟对新几内亚以北海岸外的日本运兵船队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空袭，史称俾斯麦海海战。此战，乔治·C.肯尼中将第5航空队的轰炸机群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跳弹轰炸”的新的低空轰炸战术，击沉了12艘敌军舰船，包括8艘运输船和4艘护航驱逐舰。P-38战斗机群击落了大约20架在船队上空掩护的日军战斗机，赶走了其余20来架。这些运输船搭载了大约8 000名日军，其中至少3 000人被炸死或淹死。（准确数字从来都没有被统计出来过，有不少人趴在碎片上游到了附近的岸边，或者被小艇救起。）

这一杰出表现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次战术上的突破，此前他们一直为怎样命中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苦恼不已。但是，西南太平洋战区随后发布的公报却极尽夸大之能事：12艘运输船、3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被击沉，102架日军飞机“目视确认已被摧毁”。不仅如此，公报声称船队搭载了大约1.5万名日军，“全部被消灭”。[82]在同期发布给媒体的另一份声明中，麦克阿瑟似乎光从这一场战斗中就得出了一个实际上还遥遥无期的结论，说空中力量已经从根本上压倒了制海权，也就是说陆军航空队已经赢得了和海军之间持续已久的那场论战。他宣称，未来的制海权将由陆基航空兵而不是海上力量来决定：“盟军的海军部队完全可以打出自己的精彩，但是西太平洋上战争的胜负将由对空地联合部队的合理运用来决定。”[83]此话令海军将领们大吃一惊，于是他们找到马歇尔和史汀生，要他们把自己的人管紧点。

麦克阿瑟和肯尼的牛皮吹得太大了，根本架不住深究。当飞行员的作战报告和对海上救起的俘虏进行审讯的结果显示，他们宣称的击沉数比整个日军船队的规模还要大时，他们开始想办法澄清。但是，当马歇尔将军把订正后的战果评估发到布里斯班，要求西南太平洋战区发布一份修订公报时，麦克阿瑟爆发了。他

向后方发了一份长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有线电报，列出了他宣称击沉的22艘舰船中21艘的名称，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战果统计已经得到了缴获的日方文件和俘虏审讯记录的充分证实，并要求华盛顿方面修改统计数字，与自己先前发出的报告保持一致。他还说，他已准备好为自己公布的战果做辩护，“无论在官方内部还是通过公开的形式”。不仅如此，如果战争部执意要公开文件“质疑我作战报告的真实性的”，那就要告诉他这幕后的黑手是谁，“这样我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在环境允许时收拾这个应该负责的人”。[\[84\]](#)

其实麦克阿瑟在媒体公报上的这些瞎吹乱捧既无价值也没必要，因为在1943—1944年，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实打实的。他沿着新几内亚海岸推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向洛斯内格罗斯-马努斯岛发动了大胆的两栖突袭，在新几内亚北部沿岸长距离跃进至荷兰迪亚——所有这些行动的计划和执行都很完善。肯尼的轰炸机确实将一支重要的日军船队大部歼灭；他们真的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致命战术以击沉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这种打法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有充分的理由毫无顾虑地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南太平洋的反攻本来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这些公报带来的争议反而是在给这场胜利抹黑。

这些批评让麦克阿瑟在世人眼中成了一个沉醉在自我幻想中的自大狂，但是他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自有其目的。他是在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影响力下注。迪勒后来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努力在自己所处的层级上最大限度地为太平洋战区和我们的部队争取援助，因此他尝试把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这样人们就会出于同情而支持他”。[\[85\]](#)在麦克阿瑟眼里，他这是在与华盛顿的一众敌人坚持斗争。他最大的敌人是罗斯福。他很熟悉，但又十分瞧不起这个人。他不止一次对拥趸们说，总统在战争爆发之初

就“背叛”了自己，没有派部队到菲律宾去解救他。他对于把太平洋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战区，并把北边部分交给尼米兹指挥很不满。他觉得海军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狗腿子——这倒也不算全错——他对所有海军军官都不怎么信任，觉得他们都是间谍或者是搞破坏的。但是，麦克阿瑟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给陆军带来的麻烦比海军更甚。马歇尔、史汀生和华盛顿的其他陆军高层想尽了办法让西南太平洋战区守规矩。麦克阿瑟总是在抗命犯上的边缘反复试探，常常或明或暗地威胁说要让更多大众给自己的事情评理，而任何内部的矛盾捅到报纸和国会都可能会引发巨大反响。

麦克阿瑟发自内心地相信战争部辜负了他在菲律宾的军队。他愤怒地控诉那些身份不明的坏东西——“他们”——“他们”操控了军队，暗地里密谋削弱他。“他们”把“欧洲优先”作为盟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他痛恨这个政策，总是宣称这是个历史的谬误。“他们”拒绝向他提供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进攻和发动反击所需的部队。“他们”是一群坐办公室的官僚，“政治将军”，这些人妒忌他的公众声望，因此想尽办法打压他。“他们”把持着华盛顿，而他却在距离权力中心半个地球远的澳大利亚。自从1935年离开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华盛顿和美国本土；在罗斯福1941年7月任命他为远东美军总司令之前，他甚至已经从美国陆军退役，转而当上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长时间的两地分离，令他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必须用尽所需的手段来让华盛顿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获得他需要的部队、武器、军舰和飞机去打贏太平洋战争，并且是根据他自己的计划表去打贏。他必须在“他们”自己的游戏里打垮“他们”——他在华盛顿的敌手，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对手更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86]他想要统治整场战争，想要把尼米兹的部队纳入自己麾下；这既然做不到，他就

想要让自己的战区得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他想要让自己的战略主张压倒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乃至同盟国的主张，这意味着他应当首先尽快解放菲律宾群岛（尤其是北边的主岛吕宋岛）。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容许菲律宾被绕过，让位于那些能够更直接通往日本本土的路线。

在私下的谈话里，麦克阿瑟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积极的媒体关系策略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他们怕我，鲍勃，”他在1944年初这样对艾克尔伯格说道，“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报纸上和他们斗。”^[87]一位在他司令部工作的通讯员观察到，麦克阿瑟必须“每天早晨在他的公报里赢得这场战争，他要向公众证明，是罗斯福和邪恶的参谋长们扣住了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他的武器”。^[88]

在他1964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始终说自己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获得共和党1944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真实情况却是，他与一个所谓的“厨房内阁”积极合作，这是一群有实力的共和党人、商界领袖和媒体老板，他们都想要把罗斯福总统赶下台。这些人觉得，想要在一次战时选举中击败广受民众认可的现任总统，麦克阿瑟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的希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也和诸多亲朋好友及下属谈到了这件事，包括艾克尔伯格将军，他在1943年6月对夫人说：“我们首长谈起了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事——我看得出他想要得到提名，我想就是这样的。”^[89]麦克阿瑟可能参加竞选的第一个蛛丝马迹在当年4月露出了眉目，当时战争部长史汀生宣布，在职军官不允许一边穿着军装，一边参加国内竞选。共和党领袖，包括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和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将此解读为对麦克阿瑟的先发制人。这两人都跳出来指责史汀生干预政治，随后他们都收到了麦克阿瑟的感谢信，谢谢他们在危难时帮助自己。

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员范登堡是这个私下小团体的头儿，他警告麦克阿瑟，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想获得总统提名。他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1944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集会，届时共和党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和温德尔·威尔基将会僵持不下。到那个时候，这个小团体就会在万众欢呼之下提名麦克阿瑟成为总统候选人。这个策略是范登堡和其他一些精英人物一起商议出来的，包括报社老板赫斯特和麦考密克，退役陆军将领及西尔斯百货执行官罗伯特·E.伍德，国会议员卡尔·文森，《时代》《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及其夫人，女国会议员克莱尔·布斯·卢斯。麦克阿瑟在国内的支持者会定期在其高级幕僚回国时与他们见面。（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许多高级幕僚在搭乘军用飞机往来于澳大利亚和华盛顿之间处理政治事务时一点也不谨慎。）初选季开始的时候，麦克阿瑟写信联系了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信件的用词都是格外谨慎，以防万一落入外人之手。例如，他给范登堡的信是这么写的：“为了您全心全意的友谊，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唯愿终有一日能给予回报。我还有很多话，受限于环境不方便说。另外我想要您知道，我对您的经验和您睿智的伙伴们怀有绝对的信心。”^[90]

传记作家和历史学者们一直在为麦克阿瑟是否真的想要登上总统宝座而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他的目的只是想要向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压，让他来负责整个太平洋战争，并给他打赢这场战争所需的资源。他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内心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在聚光灯下自我膨胀。麦克阿瑟十分渴望打回菲律宾，拯救他那些被敌人囚禁并饱受折磨的队伍，并让星条旗在巴丹再次升起。若成为总统，他将会看到这一切成为现实，但同时也就不能亲手将其实现了。作为美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他一定知道自己这样做将会承担成为第二个麦克莱伦而毁掉职业生涯的

风险——麦克莱伦是南北战争时北方联邦军的将领，在1864年总统大选中挑战亚伯拉罕·林肯失败。或许麦克阿瑟更喜欢去响应万众的欢呼，这对他来说完全不需要靠什么竞选。而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罗斯福的前景也确实令他沉醉。这两人相识已久，他们曾是同僚、竞争对手，甚至是“朋友”，当然这只是面子上的，在华盛顿，点头之交有时也算朋友。在罗斯福刚刚当上美国总统时，麦克阿瑟是陆军参谋长。他对罗斯福在1934年缩减国防预算极为反对，甚至差点违抗这位新总统（连他自己都这么说）。和许多政治保守派一样，麦克阿瑟将罗斯福的新政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在美国国内的渗透。他私下里带着蔑视称罗斯福为“弗兰克表兄”，或者带着那个时代政治右翼普遍怀有的反犹情绪，不客气地以犹太名字“罗森菲尔德”来称呼他。^[91]根据艾克尔伯格的说法，麦克阿瑟好几次说过，“若不是因为憎恨罗斯福，甚至达到了仇视的程度”，他才不想去争那个共和党总统的提名。^[92]

1944年初，当共和党正式启动初选工作时，有媒体引用匿名来源的消息称，麦克阿瑟正准备返回美国国内，全职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范登堡在《科利尔》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我选择麦克阿瑟》，公开了此事。^[93]还有一份经迪勒审查批准后发布的报道，总结了据说是在布里斯班盛行的观点：“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还有此地的其他许多人——认为获得胜利的最短路径是让一位有经验的军人入主白宫，那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在摄像机前被问及关于此事的想法时，麦克阿瑟身边的所有人却又异口同声地避而不谈：“我们还是谈谈打仗吧。”^[94]独立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曾多次直接问麦克阿瑟是否有意于共和党总统提名，却从未得到正面回答：“每次他都装作没听见我说话。”^[95]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已经出现在了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两个州的共和党初选选票上，他从未要求这两个州把自己的

名字删掉。

但是有些反对偶像崇拜的记者提出了问题。一位正在与敌人血战的战区司令与国内的政治竞选眉来眼去，这样是否妥当？考虑到麦克阿瑟的公众形象是通过他自己的新闻审查官包装后由战时媒体折射出来的，让他和那些没有这一有利条件的候选人同台竞技，是否公平？美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麦克阿瑟在他自己这支军队的官兵中是多么不受待见。在竞选的聚光灯下，难免有人会强烈反对。1944年1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就是个例子。原先在亨利·卢斯手下供职的编辑约翰·麦卡登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然后回了国，因此绕开了迪勒的审查。在一篇毫不留情的人物概评里，他批评麦克阿瑟作为将领的表现被大大高估了，他醉心于高大的公众形象，但实际表现却无法与之相配，而且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肆无忌惮的新闻审查是对政治进程不可容忍的粗暴操控。麦卡登还重点指出了那些反对罗斯福的媒体对于塑造和维系“麦克阿瑟狂热”所起到的作用。他提出，麦克阿瑟无法胜任他自己所追求的角色，也就是太平洋战场总司令，因为“在一片由天空和海洋主导的战场上……他是个陆地上的将领”。[96]麦卡登写道，麦克阿瑟关于其并未参选总统的声明是不可信的，如果他真想消除外界的猜疑，就应当仿效谢尔曼将军在1884年的名言：“提名我，我不会接受；被选中了我也不会上任。”[97]

《美国信使》的文章令麦克阿瑟暴跳如雷，尤为甚者，这本期刊可是列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图书馆分发给海外军人的读物之中。在一封发给马歇尔的长电报中，他说这篇文章“行文可耻，可以说是诽谤”，还发牢骚说这是跟在日本人的煽动文章后面鹦鹉学舌。[98]但是他没有直接反驳，因为（按他告诉艾克尔伯格的说法）它包含了“一丝令他无法作答的事实”。遭此一击令他备感失望，“越过这道坎，是他必须去承受的”，[99]他说。麦克阿

瑟假若能够看到未来，想必会更加懊恼，因为从那以后，类似麦卡登这样的“恶毒攻击”将会在历史学家中变得十分普遍。

无论如何，这位黑马候选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最后冲刺的时刻摔了一跤。而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却在共和党选民和政治掮客中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实力。到3月下旬，事情已经很明朗，杜威将会战胜威尔基，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芝加哥将不会出现僵局，麦克阿瑟也就彻底失去了这张总统竞选的入场券。麦克阿瑟的参选之路最终因他写给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阿瑟·L·米勒的信件被擅自公开而以一团糟的状态收场。米勒急着要让麦克阿瑟接受本党派的邀请：“为了国民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们，你必须接受”，因为“除非能够制止这种‘新政’，否则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将会注定毁灭”。麦克阿瑟将军误以为国会议员都是很稳重的，于是在回信里直接写道，他“毫无保留地”肯定“您的评论充满智慧和政治家风度”。[100]谁知道米勒没有经过麦克阿瑟的同意，就在4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这封信立刻全文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刊上。如果说米勒相信媒体将会拿这封信来鼓吹麦克阿瑟参选，他就大错特错了。范登堡将这次曝光视为“巨大的乌龙”和“悲剧性的错误”。I.F.斯通在《国家》杂志上撰文，结论是这封信令麦克阿瑟展露出“军人不应有的形象——对自己的总司令不忠，是个浮夸而且无知的浑蛋”。[101]

麦克阿瑟在他1964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正是这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作为共和党提名人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突然对这件荒唐而且丢人的事情警觉起来，迅速而且坚定地制止了这一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自己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并将所有对米勒信件的此类解读斥为“用心险恶”。[102]大家都觉得他这声明过于可疑，于是他在1944年4月30日又发表了第二份声明，说道：“请不要把我的名字和总统提

名联系在一起，任何形式都不要。对此我既不曾觊觎，也不会接受。”^[103]

如此，麦克阿瑟关于总统政治的尝试便告一段落，至少在1944年这一届总统大选中是如此。这段丢人现眼的插曲将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小注脚。然而从更大的方面说，这一场闹剧却给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留下了一段抹不掉的印记。至关重要的全球战略居然受到了个人政治的拖累，并且在整个大选期间都将如此。杜威州长接受了所在党派的总统提名，他在1944年9月14日的演说中说道：“现在麦克阿瑟将军不会再从政治上威胁罗斯福先生了，他了不起的天才理应得到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瞩目……麦克阿瑟将军在补给不足、空中力量不足、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104]虽然此番发言语气平和，但杜威的评论却暗含了对总统的严厉指责，他暗暗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纵容政治因素来左右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分配。杜威并没有继续深挖此事，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参联会会来反驳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罗斯福从未原谅杜威，1944年的总统竞选将成为杜威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

关于太平洋战争大战略的基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麦克阿瑟是否应当获准收复整个菲律宾群岛，包括北方主岛吕宋岛？欧内斯特·金关于攻打台湾的方案能否获得通过？美军是否应当在中国大陆沿岸登陆？若如此，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将会大规模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更远一些看，对日本的最后一战将会是什么样子？日本能否在血腥惨烈的登陆之前接受投降条件？昭和天皇裕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会扮演何种角色？这都是些复杂而且无比重要的抉择，而且不可能无限期拖而不决。总统选举的时间安排是不可更改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选民们都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走进投票站。现在，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大选季对太平洋上

的重大战略问题做出决定了——人们必定会带上政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决策，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者，都将如此。

[1] FDR Press Conference #676, August 30, 1940, p.2.

[2] Smith, *Thank You, Mr. President*, p.22.

[3] For example, FDR Press Conference #389, August 9, 1937, pp.5, 17; and #523, February 3, 1939, p.8.

[4] White, *FDR and the Press*, p.31; FDR Press Conference #389, August 9, 1937, p.23; and #915, August 31, 1943, p.7.

[5] FDR Press Conference #523, February 3, 1939, pp.6—8.

[6] Tully, *F.D.R.: My Boss*, p.87.

[7] Arthur Krock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40, quoted in White, *FDR and the Press*, p.122.

[8] Rodgers, ed., *The Impossible H.L. Mencken*, pp.liv—lv.

[9] 1英尺≈30.5厘米。——编者注

[1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91.

[11] FDR Press Conference #790, December 9, 1941, pp.1—2.

[12] Ibid, pp.6—9.

[13] Fireside Chat No.19, “On the Declaration of War with Japan,” Radio Address from Washington, December 9, 1941, FDR Library.

[14] Whaley—Eaton *American Letter*, December 26, 1942, quoted in Parker, *A Priceless Advantage*, p.70.

[15] FDR, Statement to the Press, December 16, 1941, quoted in Price,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in War—T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 No.5, October 1942, p.841.

[16] Address by Byron Price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pril 16, 1942, reprinted in Summers, ed., *Wartime Censorship of Press and Radio*, p.30.

[17]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41.

[18]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19] “Washington News on Fighting Sca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1941.

[20] McCarte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21] Davis, *The U.S.Army and the Media in the 20th Century*, p.51.

[22] “We Shall Do Our Best, General MacArthur Stat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41.

[23] “Keep Flag Flying, MacArthur Ord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41.

[24] “MacArthur Glide Is New Dan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42.

[25] “MacArthur Works On Birthda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1942.

[26] *Philadelphia Record*, January 27, 1942, quoted in Borneman, *MacArthur at War*, p.125.

[27]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42, p.17.

[28]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18.

[29] *Ibid*, p.22.

[30]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February 23, 1942, in Ferrell, e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p.49.

[31]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February 23, 1942, *Ibid*, p.49.

[3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49.

[33] Perry, “*Dear Bart*,” p.79.

[34] 美国的战争部相当于陆军部。——译者注

[35] Forrestal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53.

[36] Forrestal recounted the quote in a letter to Carl Vinson dated August 30, 1944.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9.

[37] *Basic Field Manual, Regulations for Correspondents Accompanying U.S.Army Forces in the Field*, War Department, January 21, 1942, p.4.

[3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149.

[39] Driscoll, *Pacific Victory 1945*, p.226.

[40] 原文为Captain of the Head , 指厕所勤务兵。——编者注

[41] Ibid.

[42] Liebling, “The A.P.Surrender,” *New Yorker*, May 12, 1945.

[43] Ewing,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pp.1—2.

[4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4.

[45] “Girding of Pacific Speeded by Nimitz,”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42.

[4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362.

[47] Waldo Drake,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9.

[48]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234.

[49] Waldo Drake,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4.

[50]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278.

[51]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p.190—91.

[52] Davis and Price, *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 p.13.

[53] Ritchie,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p.62.

[54]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190.

[55] Current, *Secretary Stimson*, p.201.

[56] Burlingame, *Don't Let Them Scare You*, p.195.

[57] Healy and Catledge, *A Lifetime on Deadline*, p.109.

[58] “Navy Had Word of Jap Plan to Strike at Sea,” *Chicago Sunday Tribune*, June 7, 1942, p.1.

[59] COMINCH to CINCPAC, June 8, 1942, Message 205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1, p.559.根据菲奇将军司令部的通讯员弗洛伊德·比弗的说法，约翰斯

顿和塞利格曼是“好兄弟”，两人在船上一起散步，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本书作者于2014年1月17日对弗洛伊德·比弗的访问，以及约翰斯顿的著作《航母女王》都确证了这一情况。——作者注

[60] 罗奇福特在海波站的一个副手托马斯·戴尔注意到，日本人在中途岛战役的同一周采用了新的密码本，早于《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时间，因此不可能是其导致的。Thomas H.Dyer, oral history, pp.270—71.

[61] Glen Perry to Edmond Barnett, October 22, 1942; full text of letter in Perry, *Dear Bart*, p.70.

[62]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88, June 12, 1942.

[63]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07, August 17, 1942.

[64] Hanson Baldwin, oral history, p.359.

[65] Burlingame, *Don't Let Them Scare You*, p.201.

[66]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47, October 12, 1942.

[67]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49, October 13, 1942.

[68]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68, October 26, 1942.

[69]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69, October 26, 1942.

[70]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75, October 31, 1942.

[71] CINCPAC to COMINCH, November 1, 1942,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2, p.970.

[72] Perry, *Dear Bart*, p.84.

[73]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1, 1942, in Perry, *Dear Bart*, p.85.

[74] Phelps H.Adams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p.260—61.

[75] 瓜岛海战于1942年11月12日至15日进行，此战奠定了盟军在瓜岛战役中的胜局。——作者注

[76]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7, 1942, Perry, *Dear Bart*, p.91.

[77] Phelps H.Adams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61.

[78]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30, 1942, Perry, *Dear*

Bart, p.107.

[7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undated,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64—65.

[80]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65.

[81] Ibid.

[82] SWPA Communiqué No.326, March 4, 1943; SWPA Communiqué No.329, March 7, 1943;RG,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83] Press release, SWPA headquarters, April 14, 1943,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84] MacArthur to Chief of Staf, War Department, September 7, 1943, RG—4, Reel 593,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85] LeGrande Diller, oral history, September 26, 1982,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p.13.

[86] 麦克阿瑟使用代词“他们”来指代其在华盛顿的无名敌人，他的这种偏执倾向是威廉·曼彻斯特注意到的。 *American Caesar*, p.273.

[87]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anuary 29,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pp.90—91.

[88]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p.280—81.

[8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une 13, 1943,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71.

[90] Meijer, *Arthur Vandenberg*, p.218.

[91] This according to Faubion Bowers, an interpreter and loyal aide—de—camp, in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92] “Eichelberger Dictations,” November 12, 1953,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77.

[93] Arthur Vandenberg, “Why I Am for MacArthur,” *Collier’s Weekly*, February 12, 1944, p.14.

[94]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423.

[95] 克拉珀于1944年1月向前白宫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描述了这次谈

话。见McCrea, *Captain McCrea's War*, p.210。次月，克拉珀在报道登陆马绍尔群岛的“燧发枪”行动时，因其乘坐的海军轰炸机与另一架美国飞机相撞而遇难。

[96] John McCarte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97] Ibid.

[98] MacArthur to Marshall, cable in the clear, March 11,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9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anuary 28,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90.

[100]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435.

[101] Ibid., p.436.

[10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85.

[103] Press release, SWPA headquarters, Statement of Douglas MacArthur, April 30, 1944,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04] “Dewey Refuses to Say Directly That Roosevelt Withheld Pacific Supplies,” *Courier—Journal*(Louisville, KY), September 15, 1944, p.6.

第一章

1944年7月13日日落后，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驱车开到了华盛顿第十四大街的地下铁道岔线处，登上了一趟专车——“总统专列”。在车站和特勤局人员的帮助下，罗斯福进入了被称为“普尔曼1号”，也就是专列最后一节车厢里的一间豪华包房。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走进了同一节车厢的另一间豪华包房。白宫参谋长兼罗斯福的老友，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走进了第三间包房。列车向北穿过马里兰州的麦田，一行人在微微摇晃的卧铺上酣然入睡。

“普尔曼1号”的陈设精致而奢华，墙上是橡木壁板，地上铺着绿色长毛绒地毯，还有桃花心木的家具和又软又厚的椅子。然而，它还是一艘车轮上的战列舰。车厢的底盘装有12英寸厚的装甲钢板，足以抵御埋在铁路路基下的大型炸弹。树脂玻璃车窗厚达3英寸，足以挡住直接命中的.50口径[1]子弹。车体侧面装甲则能够承受中口径炮弹的打击。“普尔曼1号”重达142吨，几乎是普通车厢重量的2倍，但设计师并不希望它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其外观和普通的普尔曼式专车别无二致。

这趟旅程中，总统将乘坐专列经过芝加哥和圣迭戈，然后乘船前往夏威夷、阿拉斯加、皮吉特湾，最后再次乘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返回。全程将为期35天，是罗斯福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行程之一。其中的高潮部分将是总统对夏威夷瓦胡岛为期4天的视察，其间罗斯福将视察各军事设施，并和他在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将领——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尼米兹会面，商讨下一步

对日作战行动。

就在两天前，罗斯福毫不意外地发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声明，宣布自己将史无前例地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他对媒体说，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人民希望我继续作为总统领导这场战争，我就无权退缩，就像前线的战士无权丢弃阵地一样”。[2]总统的列车将在芝加哥短暂停留，那里正在举行民主党全国大会。同样是在芝加哥，共和党两周前刚刚举行过同样的大会，提名杜威州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由于选情，总统的这次旅行难免被其政治对手指为给竞选造势之举。

在和平时期，总统专列会搭乘最多四十名媒体记者随行。但这次则只有三位记者，分别代表三家重要通讯社获准同行——他们的报道只有在获得白宫授权之后才能发出，这通常要耽搁一个星期时间。战时安全需求使得这样的措施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媒体对于无法了解总统的行踪十分恼火，尤其是当他在数万人前出现而媒体却一无所知时。对于媒体的抱怨，罗斯福总统不为所动，甚至看起来还很乐意以此为借口让媒体离自己远远的。“坦率地说，”他对史蒂夫·厄尔利说，“我觉得新闻自由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之一。”[3]当白宫记者要求了解他的行程安排时，罗斯福通过厄尔利挖苦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偷看我洗澡还是跟我上厕所？”[4]

从1944年春开始，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有了个无法抗拒的理由来对付媒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华盛顿谣言满天飞，说 he 已无力继续执政了。他的面色变得灰白，眼睛显得凹陷和无神，声音也已沙哑而无力。他还开始严重地咳嗽，嘴唇和指甲出现了一抹不祥的蓝色。被问及感觉如何时，总统回答道：“太痛苦了”或者是“完了”。[5]1944年3月，海军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医生发现他的血压严重升高，并精确地诊断出总统患有充血性

心力衰竭。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治疗手段，病人再活过四年总统任期的概率并不太大。患有此病者确诊后存活时间的中位数不足两年。布鲁恩后来说，如果他的病人不是国家的战时总司令，他一定会坚持要求病人离任，立即入院治疗。但是有权向公众介绍总统健康状况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私人医生——海军军医处处长罗斯·T·麦金太尔中将，他告诉媒体，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比他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6]麦金太尔看似轻松的保证，实际上是一种掩饰，这种掩饰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总统去世之后。

布鲁恩后来承认，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将医生的道德规范让位于更高的国家利益了。罗斯福总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他在引领全球盟军协同作战方面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他是计划、商谈建立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人物。轴心国的宣传机构将强健的体魄塑造为力量的象征，并把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视为西方制度衰落的标志。他国内的政治对手们也四处散布流言，说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糟，并四处寻找能证明这些流言的证据。这样，布鲁恩医生的诊断书就成了国家机密，记者和摄影师也难以获准见到罗斯福总统。在总统专列上，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总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骂作“杀人凶手”“趁火打劫者”“食尸鬼”）不允许进入距离“普尔曼1号”三节车厢以内的地方。于是人们总是会看见这几位在俱乐部车厢的酒吧和牌桌旁消磨时间。

总统一家在哈得孙河河谷短暂停留，回到他们在海德公园的家里待了一天，之后在14日晚回到总统专列上。当晚，列车从纽约中央铁路驶过，第二天中午来到芝加哥55街的客车编组站暂歇，他们将在此停留两个小时，好让罗斯福面见民主党全国委员

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

大部分民主党成员都决意赶走现有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遵从了他们的意愿。关于哈里·S·杜鲁门参议员是怎样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这个结果很诡异，就连罗斯福最亲近的圈子都对此感到意外。与汉尼根短暂会面后，罗斯福总统签发了一封函件，同意让两名潜在竞选搭档中的任何一人与自己一同参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或者杜鲁门。这封函件中两人名字的顺序起初是道格拉斯在前，杜鲁门在后。但就在总统专列启程离开芝加哥前的最后一刻，汉尼根走出总统的私人包房，告诉总统的秘书格雷丝·塔利，把函件重新打印一遍，把两个人的名字顺序颠倒过来。就这样，罗斯福在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场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会面后，似乎是心血来潮地就正式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即便此时他的医生已经有理由担忧他能否活到下一个总统任期结束。

[7]

罗斯福在芝加哥这次历史性的停留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前，总统专列再一次启动，开往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继而沿着罗克城铁路向西进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火车缓缓穿过大平原和美国西南部的沙漠。火车开得很慢，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35英里，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统发觉这样的缓慢节奏会让旅行更加舒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发表他关于接受本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讲话，而具体的提名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在这种速度下，火车的电池续航力就成了问题，因此他们常常在沿途小站停车充电。罗斯福每晚睡得都很好，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这是至关重要的。旅行总是能让他难得地容光焕发。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边看着田野从窗外滑过，一边对照着窗外的小镇或者其他地标用膝盖上的地图查找当前的位置，这让他

的精神振奋了起来。他会讲述那些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的当地历史逸事，还如数家珍般回忆起自己在途经的每个选区的竞选往事，这给他的幕僚和随从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总统出行线路沿线，警察和当地驻军重兵布防，把守着所有的大小桥梁、岔路口和隧道。凡是高速公路和火车道近距离平行的地方，陆军的吉普和卡车都会陪同护送。不难想见，士兵们都会好奇地朝总统车厢的窗户张望，希望能看一眼他们的总司令、第一夫人，或者是他们那条名叫法拉的著名黑色小苏格兰犬。火车即将到达的消息都会提前口头传递到下一个站点。7月16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埃尔里诺火车站，有人看见埃莉诺·罗斯福用绳子牵着法拉在月台上来回溜达。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立刻有差不多500名好奇的人赶来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一个小时后火车启程离开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往这里赶来。[8]

除了第一夫人和莱希上将，与总统同行的还有一大群军事助理；一个医疗组，包括麦金太尔、布鲁恩和另两名医生；负责撰写演讲稿的萨姆·罗森曼；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绰号“老爹”的沃森陆军少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以及格雷丝·塔利。此外还有战时常见的大量特勤局人员，海军港务人员，铁路人员，以及通讯社派来的那“三个食尸鬼”。

在火车的前部，紧跟在火车头和行李车后面的，是一节由陆军通信部队掌管的没有窗户的通信车——一个挤满了电线、真空管、电子设备面板以及解码机的兔子窝。从这里，通信兵们通过短波无线电及无线电传打字机和白宫地图室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初级海军助理威廉·里格登上尉，在这次横穿大陆的旅行中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通信车和总统车厢之间的15节车厢里来回奔走，这段距离差不多有1/4英里。他要带着电文穿过一连串车

厢，包括上下铺的普尔曼式卧铺车、俱乐部车、餐车，以及更多的卧铺车厢，最后从守卫着总统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的武装便衣旁经过。[\[9\]](#)

7月19日凌晨2点，总统专列停靠上了圣迭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处火车站台。一行人将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停留三天，视察当地的各处军事设施。罗斯福夫妇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詹姆斯一家，他们就住在科罗纳多湾对面。罗斯福总统及随从前往圣迭戈以北4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港，视察了第5海军陆战师两个团级战斗队举行的两栖作战训练演习。这是一场高度拟真的实弹登陆演习，有很多重型装甲车辆和先进的登陆艇都参与其中。对于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幕僚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学习过程。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他们在欧申赛德见到的这种大规模两栖机动是在和平时期从未见过的。海军舰炮火力、空中支援和登陆部队的密切协作给莱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7月20日，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提名罗斯福第四次参选美国总统。此时，总统专列正停在海军陆战队的火车站台旁，罗斯福于是发表了接受提名的15分钟感言，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回了民主党大会会场上。之后，他又为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师重读了发言的高潮部分。距离9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埃莉诺·罗斯福和一行人挥手告别，搭乘一架军用飞机返回了华盛顿。总统、莱希和小狗法拉则乘车前往不远处的百老汇码头，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正停靠在那里。这艘军舰的舰员们事先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会搭乘此舰，但是当舰长住舱旁的走廊上搭建起轮椅专用的斜坡时，有些人就已经猜到这一点了。罗斯福住进了舰长住舱，莱希则住进了舰队司令住舱。

总统能理解老水手们不愿在星期五起航的迷信，军舰便一直

等到这一天午夜才解缆起锚。它沿着一条扫清了水雷的安全水道开向外海，5艘驱逐舰紧跟在黑暗中的巡洋舰身后。舰队随后转向243°航向（西南偏西），航速22节，消失在海平线上。

1944年3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力夺取帕劳，即密克罗尼西亚南部的一个日占岛群，任务完成时限是9月15日；然后是棉兰老，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大岛，完成时限为11月15日。但是对于接下来1945年初的主要作战行动，参联会尚未做出决定。一如既往，菲律宾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焦点，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华盛顿施压，以求支持他所倾向的南线进攻。他主张在向菲律宾以北区域发动任何两栖进攻之前，应当先集中所有可用的美军兵力（包括太平洋舰队）拿下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以及首都马尼拉。而金上将和参联会内部的大部分计划制订者都希望越过吕宋岛，直接将下一轮主要进攻指向台湾。3月12日参联会发给太平洋上两个战区司令部的电文将这一矛盾摊在了台面上。电文指示两个司令部准备可行性方案，目标是“占领台湾，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或者攻占吕宋，如果此行动先于进攻台湾的必要性得到证明的话，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11\]](#)

当“巴尔的摩号”搭载着美国总统开往夏威夷之时，美军进攻部队正在准备攻取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又译天宁岛）。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也就是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西方海域的一场海空大战中，日军损失了差不多300架飞机和3艘航母。同时，日本本土通往南方资源产区的海运线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日本帝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已然开始崩塌。虽然东京的统治高层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但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受的损失及其舰载航空兵的

毁灭却标志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现在，最后阶段的战役已经开始，最大的那个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如何迫使日本的领导层认输，并接受盟军给出的投降条件——无条件投降？美军知道，在眼下这个岔路口，两个选项——吕宋或者台湾——都是走得通的，而且一定能够打赢。显而易见，这是个高阶难题，需要战争计划制订者们综合考虑战略和技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华盛顿和太平洋战区里已经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多种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现在到了一策定乾坤的时候了。

早在1943年初，参联会的计划制订部门就开始讨论一份“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这份文件预期中国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既可以成为对日空中轰炸的基地，也可以提供大量兵员以消灭亚洲大陆上的日本陆军，如有必要，那就连日本本土的日本陆军也一起收拾了。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盟军将需要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而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了打开大陆之门的钥匙。这一以中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决战方案在华盛顿获得了有力支持，因为海军正是希望从中太平洋线路进攻，沿密克罗尼西亚前进，然后是马里亚纳群岛，继而前往台湾。

参联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计划制订机构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缩写JSSC），该机构由一群幕后人员组成，直接向各军种总司令汇报。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坦利·D·恩比克陆军中将，西点军校1899届毕业生。参联会的四大巨头对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里这位受人敬重的老兵始终青眼有加，他提出的建议完全不会受到军种竞争或者各机构之间的偏见影响。1943年11月，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而且明确的判断，即中太平洋的进攻比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战役更加重要，因为从这里打到日本的路径更短，因此“早日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全力从中

太平洋进攻，同时在南北两翼进行策应行动——使用所有能够在这些区域维持运转并有效使用的力量，包括海上力量、航空兵和地面部队”。^[12]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以及他关于将重心转向南线和菲律宾的要求，一直未能影响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所有新的研究结果都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幕后团队先前的结论——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作战并不必要，在太平洋上分散兵力可能会导致战争延长，而此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理应对敌人的内层防御圈展开更直接的进攻。根据委员会的判断，这个进攻的目的地就是台湾。

麦克阿瑟面临着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无法指望乔治·马歇尔来帮助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获得足够的关注，或者为他所主张的南太平洋—菲律宾进攻路线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前一年，他曾对自己的副手理查德·萨瑟兰将军赤裸裸地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萨瑟兰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要向马歇尔强调，他可以通过分配太平洋作战所需的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来控制局势。没有这些陆军的力量，海军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能把空中力量和地面补充力量投入这里，而不是把这些人派到海军的战区，他就能间接实现他想要的目标。”^[13]没人知道萨瑟兰是怎样向马歇尔灌输这一观点的，但是这位陆军参谋长生来就不喜欢“间接”地做事，韦氏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不直接，不坦率”。马歇尔对于太平洋上的军种竞争自然心中有数，但他从来不会把这种竞争视为陆海两军抑或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零和博弈，而且他一直乐于思考以更直接的方式攻至日本本土所能带来的益处。至于让海军“孤立无援”之说，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4年6月，眼见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论据是多么有力，马歇尔劝麦克阿瑟丢弃不合时宜的成见，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

太平洋全局。现在日军已经出现衰败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加快战役节奏的时机吗？越岛战术，也就是绕过敌军坚固防守的岛屿，已经成了麦克阿瑟南太平洋胜利进攻的招牌动作——那为什么不能也越过吕宋？如果盟军最终是要在中国大陆沿岸获得一个港口，那或许攻占台湾就宜早不宜迟。马歇尔甚至在考虑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参联会的计划制订者们已经在传阅这个方案了——对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岛直接发动登陆突袭。马歇尔告诉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个人情感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凌驾于我们的总体目标之上，那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我看来，‘越过’和‘抛弃’完全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才是最迅速、最彻底收复菲律宾的有效方式”。^[14]但是麦克阿瑟对此完全不买账，他声称必须收复吕宋，这既是出于战略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项重大义务要去履行”。^[15]

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的愿望是真诚的、可敬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了把这方面的历史说透彻，下面的这些事实也不能不提。1942年2月13日，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指挥地堡里，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签发了一道指令，要求从菲律宾联邦财政资金里向麦克阿瑟划拨50万美元，向萨瑟兰划拨7.5万美元，向麦克阿瑟参谋部的另外两名高级军官也划拨了数额稍低的钱款。这笔钱据说是为了感谢美国军队过去为菲律宾做出的贡献。付给麦克阿瑟的金额可以折合成今天的800万美元。由于菲律宾联邦财政的钱储存在纽约，名义上要部分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因此这笔费用需要获得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批准。马歇尔和史汀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既然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举措来制止这一交易。同样，根据现存的文件记录，罗斯福总统也知道此事。^[16]后来，奎松总统逃到美国后，在华盛

顿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想要“孝敬”他——具体金额不详——以感谢他此前在菲律宾的服务。艾森豪威尔谢绝了，他给出的解释很靠谱：“误读和误解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掉我在这场战争中为盟军所做的一切努力。”^[17]这位未来的欧洲战场总司令判定这种“献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长远来看也将会遭到民意的挞伐。这两个判断都是准确的。

1944年夏季，金上将私下里直截了当地对麦克阿瑟作为军事战略家是否称职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对于两栖作战方面的新进展知之甚少（或者不感兴趣），这些进展后来被证明足以让美军长距离跨越大洋，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岛屿。麦克阿瑟原先关于中太平洋灾难的预言早已破产，但他又做出了类似的预言，宣称台湾作战计划必定会失败。金在1942年曾经提倡南太平洋的反攻——实际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始于金发动的瓜岛战役，当时麦克阿瑟还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但是在金看来，南线进攻只适用于战争初期，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打过太平洋的中央海域。而此时，澳大利亚已经安全，盟军已经碾过了日军的俾斯麦海防线，现在是时候停止南线进攻了。麦克阿瑟作战行动的终点理应是棉兰老岛。金在一次例行的亚历山德里亚非正式媒体见面会上告诉记者们，夺回菲律宾“情感上很需要”但“实际上行不通”，这很可能会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推迟3到6个月。^[18]他还对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司令丹尼尔·E·巴比海军少将尖刻地说道：“看起来麦克阿瑟更在乎的是他重返菲律宾的承诺，而不是打赢这场战争。”^[19]

7月13日，金上将带着一大群随行幕僚，乘坐他专用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飞赴珍珠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开了两天会之后，金和尼米兹搭乘一架双垂尾的洛克希德“北极星”飞机，在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跳跃前行，短暂停留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

林和埃尼威托克（又译恩尼威托克）后，于7月17日飞抵塞班岛。在仅仅两个星期前还在激战的关岛阿斯里托机场，他们在停机坪上会见了一群高级将领，包括第5两栖军军长“疯子”霍兰·史密斯将军和第5舰队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当然还有媒体记者和摄影师。此时距离美军宣布占领该岛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小规模交火仍然在偏远区域接连不断，被困岛上顽固抵抗的日军还有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太平洋前线是什么样，他急着想上岛看看。史密斯担心日军狙击手的威胁，但金执意要来，于是史密斯只好派了三个连的海军陆战队来保护这两位四星将军。金和尼米兹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沿着岛屿西岸的主要道路，穿过已经化为瓦砾的加拉潘、坦纳帕格和嘉兰卡诺亚驱车前行。虽然负责掩埋尸体的卫生队已经两班倒连轴转，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腐烂尸体的恶臭，令人无处可躲。不过史密斯和他的部队已经来到塞班一个月了，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当天下午，金、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搭乘一艘汽艇前往停泊在海岸外大约1英里处的第5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三人在军舰的8英寸[20]主炮前合影之后，便前往舰队司令部餐厅提前吃晚饭。进了餐厅，斯普鲁恩斯坐在条桌的一端，金坐在他的右手边，尼米兹坐在左手边，还有十来名军官按军衔、年资的顺序在条桌旁依序而坐。就在甜点端上来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群苍蝇通过开着的舷窗蜂拥进了舱内。这些苍蝇都是从塞班岛数以千计的腐尸烂肉上生出来的，乘着海风飘到了海上。它们困扰舰员们一个星期了，但这天傍晚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苍蝇之多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这些家伙爬在桌子上、饭菜上，还有人们的脸上和手上。它们四处肆虐，有些甚至接近一英寸长。根据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卡尔”穆尔的说法，这些东西用手赶都赶

不走。如果它们落在你的鼻子上，你得把它们弹开或者用手拎走才行，“它们会爬在你的饭菜上，你的眼镜里面，飞进你的耳朵，无处不在，你会忍不住去想，它们都是吃惯了日本鬼子的尸体，现在想来到船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21]餐厅服务员赶紧关上了舷窗，但太晚了。毛手毛脚的军官们在挥手赶苍蝇时打碎了好几个玻璃杯，他们站起来和坐回去的时候，椅子在地面上刺耳地刮擦着，让接待四星上将来访时所应有的庄重体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金向斯普鲁恩斯询问“堤道”行动，也就是未来的进攻台湾战役的准备情况。这位第5舰队司令回答得倒也爽快：“我不喜欢台湾。”^[22]他提出可以攻取硫黄岛和冲绳岛来代替台湾，达到相同的目的。硫黄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和东京之间的飞行线路上，占领这里可以削弱日军航空兵的反击。冲绳岛比台湾小，因此战役规模更加可控。斯普鲁恩斯说，对于盟军的目的而言，冲绳岛的大小刚刚好——足够小，只要几个星期就能拿下；但又足够大，足以成为对日本本土作战的基地。它坐落在连接日本及其南方资源产区的航运线上，战略位置重要。冲绳还有许多可以登陆的地点，这样守军就无法集中其所有火力于一个滩头。这个岛屿既能够成为进军中国大陆海岸的垫脚石，也能成为进攻九州的跳板。

然而，冲绳距离九州仅有330英里，可以想见，两栖舰队将会遭到持续的大规模空袭。最近的盟军基地都远在1 000英里之外，因此航母特混舰队就必须在这片海域不间断停留数个星期，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鉴于这些挑战，金问斯普鲁恩斯：“你能做到吗？”斯普鲁恩斯回答说没问题，只要后勤部队能完善其海上弹药补给技术就行。这是当时所剩不多的能够拖慢第5舰队脚步而又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斯普鲁恩斯相信这个问

题一定能够解决，一如既往，他又判断对了。[23]

既然斯普鲁恩斯是负责台湾进攻战的舰队司令，那么他的观点自然非同小可。而且持相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反对“堤道”计划的人中包括了舰队、两栖部队和尼米兹司令部中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许多人怀疑台湾不值得如此努力去攻占，毕竟这场登陆战的规模堪与诺曼底登陆比肩。这些人告诉金，如果台湾真的非打不可，那他们就要首先获得吕宋岛的机场和马尼拉湾的海军基地，这样也就无法越过菲律宾了。在7月19日返回夏威夷的飞机上，哈尔西将军的参谋长“米克”罗伯特·卡尼向金抱怨，说打台湾就是“浪费时间”。[24]卡尼给出的替代方案是：“部队不如集结在吕宋，我们可以炸平台湾，然后绕过它。”[25]

金问：“你想把马尼拉变成伦敦吗？”

“不，将军，”卡尼答道，“我想的是把吕宋变成另一个英格兰。”[26]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7月20日的最后一场会议上，当舰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条一条地列举反对进攻台湾的理由时，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约翰·H.托尔斯将军着重提出，无论是关岛还是塞班岛，其港口设施都不足以支撑一支大到足以打下这个中国第一大岛的登陆部队。而陆军航空队打算在马里亚纳群岛部署至少12支B-29轰炸机大队，这就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了。托尔斯警告说，正在筹备的“堤道”行动，可能会“削弱VLR [B-29轰炸机] 计划”。[27]这样就可能会激怒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金仍然坚持“堤道”计划。但是他不打算利用自己的舰队总司令身份来压制同僚的不同意见。和他在许多历史著作中的形象相反，这位海军作战部长并不是个独裁者。他

坚持维护自由发表观点的氛围，对相反意见满怀善意。当尼米兹开始总结讨论内容时，金特地要求卡尼把所有反对打台湾的意见复述一遍，以便记录，确保这些意见都被写入会议纪要。很难想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如此欢迎来自下属的反对意见。[28]

金没有受邀在总统访问夏威夷时留下来。实际上他和马歇尔都特地被排除在外。据说这是因为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不受拘束地畅所欲言，而且他们早就对参联会的观点烂熟于心。但是金对于未能参加太平洋方面这次指挥层峰会十分不满。在他战后的回忆录中，他提到罗斯福此前刚刚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据此得出结论，现在他“想要让选民们看到，他才是总司令”。[29]

金不在，尼米兹便应该要为“堤道”行动辩护。但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尼米兹并不真的想打这一仗。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在司令部、舰队里的同僚们一样对这场行动充满疑虑。7月24日，尼米兹警告金，除非能首先消灭附近吕宋岛上的日本空中力量，否则派兵登陆这个中国第一大岛并不明智：“若不能有效削弱或压制石灰水〔吕宋的代号〕的敌人航空兵，则‘堤道’行动胜负难料。”[30]不仅如此，尼米兹还补充道，届时有可能会需要占领台湾全岛，而不仅仅是北部和南部的沿岸地区。若果真如此，他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要加码——更多部队，更多航空兵大队，更多运输船和更多的海军力量。而且，如果要扩大台湾之战的规模，美军就需要更大而且更近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这就又得回头先打吕宋。

金也没有坚持太平洋舰队司令一定要附和自己对台湾的态度。他知道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听太平洋舰队司令阐述自己的想法。“我尽量不给他施加太大压力，”金说，“因为我接受的训练是让人们独立思考。”但是金担心尼米兹说不过“那两个世界上最

精明最老练的辩手。尼米兹是个不错的人，但他在这方面完全不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手。当然，罗斯福先生则是‘前辈大师’”。

[31]

7月24日，距离计划中罗斯福总统到达珍珠港的日期还有两天，金一行登上了那架洛克希德水上飞机飞返本土。途中，他们从迎面开往瓦胡岛的“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舰队上空飞掠而过。

开往瓦胡岛途中，“巴尔的摩号”进入了战时航行状态，这就意味着要走之字形航线以规避敌方潜艇，并在黄昏后到黎明前进行灯火管制。此时天气凉爽，海波不兴，轻风拂面。海军的战斗机和巡逻机常常在军舰上方巡逻。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总统都待在自己的住舱里，要么睡觉，要么阅读，养精蓄锐以应对接下来那令人筋疲力尽的行程。莱希将军每天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大部分下午，他和莱希都会在指挥舰桥里坐一两个小时，享受阳光和海风。莱希的住舱里每晚都会放电影。一如往常，小狗法拉是所有人的好朋友，舰员们常常会给它喂一点狗粮，或者剪走一撮狗毛当作纪念品，直到舰长勒令他们住手为止。假如总统的爱犬在到达夏威夷时变得肥胖或者成了秃毛，那对于“巴尔的摩号”的名誉显然没什么好处。

比尔·莱希面容尊贵，黑眼睛炯炯有神，眉毛粗重，额头紧蹙，有点秃头。他的言谈举止谨慎、庄重而得体。虽然穿着军装，但他仍然时时透着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质。他在1939年退役之前，曾官至海军作战部长，海军的最高将领。后来罗斯福先后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和驻维希法国大使。1942年，罗斯福总统曾认真考虑过让莱希担任太平洋战场最高司令，统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虽未成为现实，但他还是以四星海军上将的军衔

被召回现役，担任总统的“军队总参谋长”，并位列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大员之一。

军衔和服役年限决定了莱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获五星上将军衔的陆海军将领，并影响了二战中所有主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决策。莱希还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老且最信赖的好友之一，亲信圈的一员，他的办公室位于白宫东边，只要不是睡觉时间，他大部分时候都和总统在一起。他作为总统日常伙伴的角色最近又扩大了，因为白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其职责相当于民事方面的莱希，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一样亲密）不幸罹患晚期胃癌，不得不退休。

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生效之前，参联会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没有提名流程，也不需要参议院同意。莱希的角色有时候会被称为参联会主席的“前身”，因为他并没有今天美国参联会主席所拥有的权力。看起来莱希仅仅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一致同意而被拉进参联会的。其他各位参谋长都说莱希是他们实际上的主席，这才确定了他的老大身份。当然这个决定是自发而且临时的。

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澄清了一直以来历史著作里关于莱希在二战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这位将军会被称为“白宫参谋长”或者“参联会主席”。这两个职位在今天都是存在的，但二者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那么，莱希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个幕僚？一个可靠的追随者？老练的传信者？罗斯福最好的朋友？或者实际上是全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答案似乎是，比尔·莱希这些都是。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挚友，尤其是在总统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但他同样深受各军种参谋长的敬重，他们尊他为战略家、前任海军作战部长，以及全球性的政治家。参联会做决定靠的是达成共识，而非

少数服从多数。因此，莱希最少也是这强大四人组里的成员。任何时候，只要参谋长们凑不出一致决议，这个官司就要打到总司令也就是总统那里，而莱希正是参联会和总统间的主要桥梁。

罗斯福和莱希之间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关门进行的，他们直接面对面交流，因此没有形成文字记录。这样，人们并不总能知道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互动的。这个难题由于莱希性格上的谦虚和内敛而愈加严重。他不愿抛头露面，也不在意自己能否名垂青史。在学术著作和传记里，他更倾向于躲在罗斯福总统的影子里。毫无疑问，他对此一定是会满意的。[32]

7月26日上午，瞭望哨看到军舰左前方50英里外出现了一条褐色细长条的陆地，那是莫洛凯岛。很快，一队由18架海军飞机组成的护航机群从西边飞来，在“巴尔的摩号”上方低空盘旋。此时天气晴朗，海面平静，海风一阵一阵地轻轻吹来。崎岖不平的戴蒙德角（又译钻石角）从前方海平线上升起，一步步向东逼近，渐渐带出了长弧状的怀基基白沙海滩和檀香山的风景。在这一幕景色中，瓦胡岛陡峭的青山显得巍峨而端庄。在珍珠港的入口水道外，“巴尔的摩号”停了下来，一艘拖轮带来了港口引水员和前来迎接的军民两界高官，包括尼米兹海军上将、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陆军中将（尼米兹战区的陆军部队司令），以及夏威夷总督英格拉姆·M.斯坦巴克。

当“巴尔的摩号”缓缓滑进拥挤的锚地，舰员们发现珍珠港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欢迎这位总司令了。数百架海军舰载机翼尖挨着翼尖排成密集队形，遮天蔽日地飞过。港内的战舰都穿上了盛装——从舰首到桅顶再向后到舰尾拉上了绳索，挂满了三角彩旗。舰员们都在栏杆旁就位——穿着白色军服，彼此相隔两三米立正，面向舷外，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没有人正式通知总统要来，但流言和猜测向来都是不胫而走的。既然秘密已经保不住

了，“巴尔的摩号”的主桅顶上便干脆升起了总统旗。

下午3点，一艘港务拖轮把“巴尔的摩号”推到了混凝土防波堤旁的泊位上，这个泊位就位于闻名遐迩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后方。码头上，一组大约24名陆海军将领在舷梯旁列队迎候。海军将领穿着白色军服，陆战队将领穿绿色，陆军将领穿卡其色。如此之多的将军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可是罕见的，甚至堪称前所未有。在将军们身后，栏杆和路障之外是人山人海，都是前来围观的军人和百姓，大约有2万人。

将领们登上了舷梯，没有什么迎接仪式。（这些礼仪都免了，因为这会浪费太多时间，耽误下午的行程。）访客在众人护卫下来到了舰桥甲板的走廊上，罗斯福和莱希在那里与尼米兹、理查德森做了短暂的交流。相互介绍、握手，然后寒暄几句。与此同时，在露天甲板上，海军摄影师和一个电影摄制组架好了长枪短炮，准备按计划在4点进行摄影。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没来。他的飞机一小时前就到达了附近的西卡姆机场。尼米兹的副司令托尔斯将军在赶往“巴尔的摩号”之前先迎接了他的飞机。但是麦克阿瑟拒绝和托尔斯一同直接前往海军码头，他选择前往理查德森将军在沙夫特堡的住所，这是他在会议期间的住处。这就有些失礼了。在“巴尔的摩号”的舰桥上，托尔斯小心翼翼地 向尼米兹和理查德森转达了麦克阿瑟的口信：“告诉总统，他在理查德森的寓所，等候关于何时应该向总统致敬的进一步指示。”^[33]这个口信被带给了莱希和总统。一群人等了大约20分钟，气氛开始尴尬起来。罗斯福转向理查德森将军问：“你能联系上他吗？”^[34]理查德森点了点头，接着离开军舰去找那个失踪了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根据麦克阿瑟的飞行员“土佬”惠尔顿·罗兹的说法，在从澳大利亚飞来的28小时的航程中，麦克阿瑟一直没怎么睡觉。他的专机，一架新型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运输机上装有一个舒服的大床，但麦克阿瑟都没用上它。他当时紧张而暴躁，但看不出疲劳的样子。他在机舱的过道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一次能走好几个小时。在新喀里多尼亚降落加油时，麦克阿瑟发现这还是他自开战以来第一次踏上自己战区以外的土地。话虽如此，但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他此前拒绝了所有赴努美阿或者珍珠港参加作战计划会议的邀请罢了。

当C-54飞机在墨色的夜空中飞行时，罗兹把飞机交给副驾驶，自己离开了驾驶舱，走进主机舱坐到将军旁边，将军于是开始了“一场麦克阿瑟式的独白，他也没指望我回答什么”。麦克阿瑟告诉飞行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召去会见总统，但是“接下来这次会议可能会出现任何结果，从他被解除指挥权，到把他的指挥权限制到仅仅防守新几内亚，再到给他大开绿灯，给他足够的人员装备去进攻菲律宾，都有可能”。想到罗斯福要拿他作为竞选的道具，麦克阿瑟发牢骚说他将不得不摆出“宣传姿态”，他还说他希望“既然他被命令跑这么大老远，说不定还会受辱，那他们的目的最好有足够的价值”。[35]

天亮前，飞机在坎顿岛第二次加油后再次起飞，接下来的目的地就是最后一站了——西卡姆机场。飞机在下午2时30分抵达瓦胡岛，此时“巴尔的摩号”正在准备进港。这整个高规格迎接的场景在他们下方一览无余。罗兹说他们“能看到空中满是刚刚起飞的飞机，正在机动、编队，准备让戴蒙德角外那艘驶来的巡洋舰上的总统检阅”。[36]

在西卡姆机场的柏油路面上，托尔斯将军迎接了麦克阿瑟的飞机，他提议二人立刻前往海军码头迎接总司令。麦克阿瑟拒绝

了，他说自己刚刚长途旅行，想要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军服。他告诉托尔斯：“我要到住所去了！待会儿总统想见我时候，他会派人来喊我的。”^[37]之后他快步登上了一旁等候的汽车，开往沙夫特堡。

迟到的麦克阿瑟带来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常见的一幕场景。长期给罗斯福当助理和讲稿主笔的萨姆·罗森曼回忆道，麦克阿瑟到达之前喇叭齐鸣，“之后，一辆护卫摩托车和我见过的最长的敞篷车来到码头，尖啸着开到了停车点。敞篷车前排是一位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司机，后排则是一个高个子——麦克阿瑟。没有助手或者随从。敞篷车在开阔地又开了一段，停在了舷梯旁”。^[38]

出席仪式的所有陆海军将领全都穿着整洁的军装，唯独麦克阿瑟，在这个夏威夷夏天下午的热浪中，在卡其色军服外还套着他那件著名的棕色飞行皮夹克。这次他没有衔他的玉米芯烟斗，但是常戴的飞行员太阳镜和那顶帽檐上带着“一堆鸡蛋”（实际上是金穗饰件）的破旧菲律宾元帅帽却并未缺席。“在一众人员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他每次都故意这么安排，”一位在附近军官俱乐部的阳台上观看这一仪式的海军军官如此说道，“他真的是那种漫画主角式的人物，但他同时也是个将军和人气旺盛的大英雄，所以没人管得了他。”^[39]

麦克阿瑟出现在了栏杆后的人山人海面前，顿时掌声雷动。他朝人群挥挥手，登上“巴尔的摩号”的舷梯，停留了片刻，好让人群能更好地看到他。之后他在水手长的号声中登上了军舰，向甲板上列队的军官回礼，继而去面见总统。

在舰桥甲板上，罗斯福握住麦克阿瑟的手，称他为“道格拉斯”。后来这位将军说这种亲热的动作让他很恼火。^[40]或许是离开华盛顿太久了，麦克阿瑟已经忘了总统通常对所有人都直呼其

名，包括他属下所有的军队首脑，同时希望别人称他为“总统先生”。不过就算麦克阿瑟真的感到被冒犯，他看起来也掩藏得不错：舰桥上当时挤满了人，但并没有谁感到气氛紧张。不仅如此，他还回称总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冒犯自然也不是软柿子，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们二人一直以“道格拉斯”和“富兰克林”互称。

眼见麦克阿瑟裹在厚实的皮夹克里，莱希将军问他：“道格拉斯，你来这里见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上合适的衣服呢？”

“唉，”麦克阿瑟回答道，“你是没去过我那里，那儿的天现在还很冷。”^[41]这话纯属瞎扯，他已经回了宿舍，说是要洗澡，换一身新衣服。不过这也没什么，莱希只是打个趣，麦克阿瑟也是。^[42]

现在，合影的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30分钟了，于是一行人下来前往“巴尔的摩号”的露天甲板，海军的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架好了设备。摄影人员早已习惯等罗斯福的轮椅摆放到位后再拍照或者启动摄影机，但是这一次，一小段16mm胶片记录下了罗斯福坐在轮椅里被推动的影像。（据信，这个小片段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这一场面的动态影像。）^[43]

麦克阿瑟坐在罗斯福的右边，尼米兹坐在他左边，莱希坐在尼米兹的左边。四个人摆好姿势，拍了一轮照片。之后莱希离开，总统和太平洋战场的两位战区司令单独合了影，拍摄了一段纪录片。在这段无声的电影片段里，罗斯福亲切地对麦克阿瑟的左耳低语，后者则面无表情地盯着摄影机镜头。有一个瞬间他看起来好像很难受，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罗斯福说的一句话看起来逗乐了麦克阿瑟，后者报之以热情一笑。这时候，一个像是条小猎犬的黑色影子从麦克阿瑟的右边溜达进了画面，从几个人的

椅子下穿过，最后从尼米兹的左边跑出了画面。[44]

轮到斯坦巴克总督和总统合影的时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接下来有一段影片拍到麦克阿瑟在画面一旁和理查德森将军说话。他拿出手帕，擦拭着脸和脖子上的汗水。他看起来热得难受，但就是不肯脱皮夹克。每个好演员都知道着装的重要性。

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收工后，军官们开始下船。罗斯福总统的轮椅则被推到了一个环绕着护栏的小木板平台上。整个平台被“巴尔的摩号”上的起重机从甲板上吊起，缓缓放到码头上。一名观看了全过程的海军军官猜想那个起重机操作员“肯定浑身冒汗”。[45]罗斯福被搀扶着坐进了一辆红色敞篷车的后座，一名陆战队卫兵和一众将军举手行礼。莱希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在大群警察的护送下开出基地，“穿过列队守卫的士兵和欢呼的人群”，开往檀香山市。[46]

总统一行人住在怀基基海滩一栋被高大椰子树环绕的乳白色别墅里。这座豪华宫殿原本属于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继承人克里斯·霍尔姆斯，二战期间被租给军方专用于接待贵宾和来访的将军们。别墅戒备森严。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守卫着别墅的大门和围墙，巡逻艇在海岸边往来巡游。接下来三天的日程漫长而耗时，因此医生坚持要求总统晚上早睡。在与助手们晚餐之后，罗斯福在微风吹拂沙滩的美妙声响中进入了梦乡，睡了九个小时。

麦克阿瑟和理查德森在后者的沙夫特堡寓所中共进晚餐，之后各自回到卧室。但是晚上11时45分，麦克阿瑟叫人给已经上床的理查德森带话，说自己还想接着聊。“我们坐在那里一直聊到凌晨4点，”理查德森在日记里写道，“大部分都是他在说，我则累得要死。”[47]

有必要停下来提一点，根据罗兹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同期的日记，看来麦克阿瑟在战争中最重要指挥层会议前夕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怎么睡。

谈到最近在总统竞选中的不幸遭遇时，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抱怨说“他这个已经无欲无求的人还如此屡受打压；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野心，只是想把事做好”。他还说到了自己的私事，他哀伤地聊到他的第一次婚姻——“注定要失败”——他说现在他只剩下了他的现任妻子，“一个南方姑娘”，还有他的“小男孩”，听上去很伤感。[48]

想来麦克阿瑟在星期二上午来到霍尔姆斯的别墅之前还是至少睡了几个小时的。他将陪同总统、莱希和尼米兹从那里出发，花上一整天来视察瓦胡岛各处。一行人登上了一辆大型黑色硬顶轿车——莱希坐在前排，尼米兹坐在后排中间，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坐在他两边——在11点差一刻时动身出发。他们向西进发，一路穿过埃瓦陆战队航空站，巴伯斯角周围的海军设施，以及卢阿卢阿莱的弹药库。他们经过了一处战俘营，日本俘虏们透过铁丝网好奇地看着他们。在补给站，他们驾车从堆成三四十英尺高的板条箱中间穿过。板条箱里装着弹药、补给品和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正等着被运到西太平洋新的前进基地去。瓦胡岛现在成了美国军事机器巨大力量和规模的大秀场。

总统对于岛上自他1934年上次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他后来告诉记者，“任何地方要如同瓦胡岛这般变化巨大”都是不太可能的。[49]十年前，即便是在珍珠港和檀香山市周围也满是空地和农田。而现在，新建成的军事基地和居住区已然连绵不断，仅以铁链相隔。

在绵延四分之一英里的摩托车和吉普车队的护卫下，载着总

统和三位将军的汽车穿过绿油油的甘蔗田和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开到了人烟稀少的怀厄奈海岸。即便是在瓦胡岛西部这最与世隔绝的乡间道路上，他们还是遇见了一队在路边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的哨兵。中午时分，车队沿着一处陡峭、曲折的柏油碎石路面开到了怀厄奈山高处的科勒科勒山口，珍珠港和东南方平原上散布的多个航空兵基地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在那里，乘坐红色帕卡德旅行车的理查德森将军迎了上来，此时，所有照相机和摄像机都关闭了镜头，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把罗斯福抱到了理查德森的车上。下午，他们将前往瓦胡岛最大的陆军基地——舒菲尔德兵营。

罗斯福对兵营的访问原本是要保密的，但消息早就不胫而走。通往舒菲尔德的道路已经被军人列队保护起来——但是就在这些军人身后，欢呼的老百姓已经围了三四层。看起来似乎整个瓦胡岛上的所有人不光知道总统在岛上，还不知怎么都知道了他车队的路线，然后就像观看花车巡游一样兴高采烈地围了上来——一家人带着野餐篮子和折叠椅，小宝宝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小学生们纷纷爬上榕树并坐在树枝上，免得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夏威夷是个融合了诸多亚洲民族和太平洋民族以及白种人的大熔炉，但此刻，他们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一眼那辆前挡泥板上飘着两面美国国旗的红色加长车，以及后座上那个穿着发皱的乳白色亚麻套装、戴着巴拿马帽子的人。

赖利说这次访问“是我见过的保密最差的一次”，就差没派一架战机到天上去写“欢迎富兰克林·D·罗斯福”了。^[50]他不喜欢这种敞篷旅行车，他知道车子每开三四十英尺，就会途经几千名围观者。罗斯福坐在几个穿军服的人中间，老远就能认出来。要知道，夏威夷最大的族群是日裔美国人，差不多有15万人。就算其中绝大多数都忠于美国——到1944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

——但只要冒出一个杀手从路边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就能把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参联会主席和美国总统一网打尽。于是，身材魁梧的赖利只好站在帕卡德车的脚踏板上，斜着身子准备随时保护罗斯福，眼睛也警惕地盯着人群——不过并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那些日裔美国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兴高采烈。

不管二人之间过去发生了什么，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看起来都很高兴彼此同行。和在国内声望、人气上唯一能与自己比肩的人一起待一天，两个人一定都很高兴。目击者的描述和当时的纪录片片段更印证了这一点。里格登写道，罗斯福“特别喜欢麦克阿瑟将军，七年后第一次重逢，他看起来真心高兴”。[51]麦金太尔医生常常听罗斯福带着“真挚的仰慕”谈论麦克阿瑟，说他是“个‘朋友’和‘军事天才’”。[52]麦克阿瑟这边则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聊了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事——聊当年简单愉快年岁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聊那些早已被时间埋没的事情”。[53]多年未见到总统，麦克阿瑟被他衰弱的样子吓了一跳。他预言说罗斯福总统活不过下一个总统任期，他说对了。但是看到总统像小孩一样在轮椅和汽车之间被抱来抱去，他“对罗斯福身上无可掩藏的精神力量仰慕不已，这种力量使得他在脸上印着身体的衰弱时，思维仍然保持着敏锐”。[54]

在无声的纪录片片段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彼此真心认可的。在舒菲尔德兵营的阅兵场上，两人坐在车后座上，看起来像是沉浸在彼此的对话中，他们脸贴着脸，咧着嘴笑，就像两个正在想办法恶作剧的小皮孩子。有时候总统不知道说了什么段子，两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或许（人们只能猜测）麦克阿瑟就是在那时问到了即将开始的大选，罗斯福装出一副正经脸，回答说那一刻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我仰头大笑，”麦克阿瑟后来告诉艾克尔伯格，“他看着我，自己也笑了，他说：‘如果对德战争在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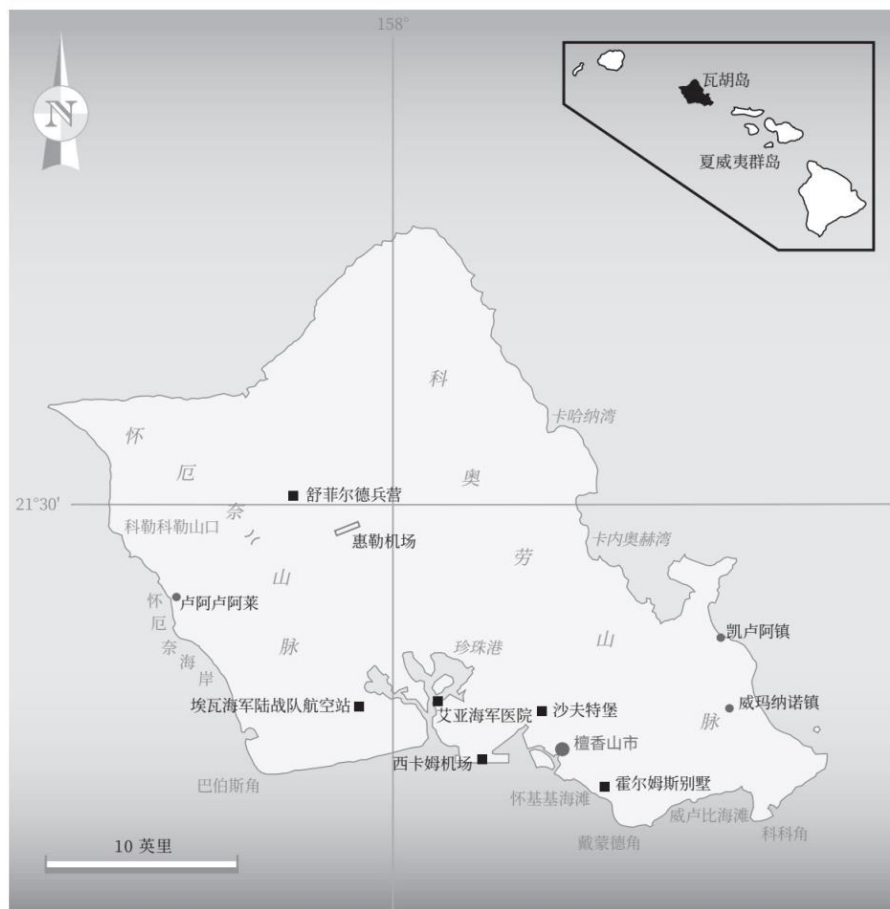
举前结束，我就选不上咯。””[55]

这一天，麦克阿瑟说罗斯福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中拥有压倒性的人气，这显然是对的。罗斯福则对麦克阿瑟说，如果事情不是现在这样，那么他（麦克阿瑟）将会是个好总统。反正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杜威，罗斯福给他这么个夸奖也是无关痛痒。

可以推想，两人的感觉其实都很复杂。或许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家，这仅仅是在镜头前演戏。但是他们可能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美国这个太平洋重要支撑点的中央，在成千上万欢呼的民众面前，在一群知道自己即将统治太平洋的将军中间创造历史。

中午12时35分，一行人从正门进入了舒菲尔德兵营，车队从一眼望不到头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旁开过，穿过惠勒机场的机库和旁边排列着飞机的滑行道，穿过战地医院，医院中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的日裔美军伤员从三楼向车队敬礼。道路两旁，士兵们列成一排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第7步兵师的1.4万名精壮军人在舒菲尔德的阅兵场上列好了队形。红色旅行车开上了一个专门为罗斯福此行搭建的木制平台，总统就坐在车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罗斯福戴不上麦克风，于是叫技术人员过来帮忙——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克风已经打开了，于是罗斯福这个稀里糊涂的请求便向数千排队形齐整的军人广播了出去。麦克阿瑟、尼米兹和莱希继续面无表情地和总统一起坐在车里。[56]

瓦胡岛, 1944年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这一天的公开行程到下午4时30分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不过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后来又被喊回怀基基海滩的霍尔姆斯别墅共进晚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公牛”哈尔西（他正准备在下个月接管舰队），以及威尔逊·布朗，他和哈尔西一样也是个老资格的航母特混舰队指挥官。六个人在别墅的大餐厅里吃晚饭，服务员是几个菲律宾人。餐后，哈尔西和布朗先

走了，其余四个人继续不设主题地讨论这场战争，又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午夜，人各散去。正式的会谈就在第二天上午（7月28日星期五），还在同一地点举行——这样，一夜之后，麦克阿瑟、尼米兹、莱希和总统又都回到了别墅的露天大厅，此番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陆海军摄影记者和纪录片摄制组。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已经提前在大厅的墙上挂出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大幅地图。议程开始后，先是15分钟的照片摆拍，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手持竹鞭指着地图，罗斯福和莱希则摆出观众的姿势。闪光灯噼啪作响，电影摄制组在四周来回移动，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摄影人员忙碌时，四个人就很耐心地在那里配合着摆出各种动作。这些都是公众形象，都是精心修饰过以合乎礼仪的。尼米兹执鞭时，指向了塞班，然后是关岛、东京、濑户内海南部。但是轮到麦克阿瑟时，他的竹鞭一动不动地放在吕宋岛上，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菲律宾。[\[57\]](#)

怀基基海滩这次历史性的辩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摄像师和摄影师完成工作离开房间后，所有参谋人员也都未获准留下。这样，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便只能仰仗那四个参与者第一手或是第二手的回忆来复原这次会议了。罗斯福在会议几个月后向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做了一次简述。莱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简要总结，并将其写在了发给参联会同僚的备忘录里。尼米兹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说明，但他的观点仍可从会前和会后发给金的有线电报里找到端倪。

麦克阿瑟是四个人中唯一给这次会议留下详尽第一手叙述的。他在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完整复现了当时的场景，当然，重头戏是他自己。这本书出版时，罗斯福已经去世十九年，莱希去世已五年，尼米兹还剩下两年的生命，此时也已老态龙钟。书中记载的对话似乎完全是靠记忆写下来的。关于讨论后得

出的战略结论，麦克阿瑟的讲述自然是可信的。但是具体内容则难免带有自私的成分，而且书中有些重要的细节和麦克阿瑟自己后来在私人谈话里的说法还相互矛盾。

举几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麦克阿瑟六个星期后告诉鲍勃·艾克尔伯格，几年后告诉雷德·布莱克，他被召到夏威夷时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就连总统要来也是到达后才知道的。他还进一步对布莱克说，乔治·马歇尔故意不让他知道这些消息，所以他才“掉进了这么个坑里”。[58]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阿瑟知道总统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会面上，他在从澳大利亚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还花了很多时间来与他的幕僚和飞行人员谈论此事。在他战后给一位军事部长讲的故事中，麦克阿瑟声称罗斯福起初邀请他到华盛顿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我要他越洋来到夏威夷。那是我离开工作岗位所能去的最远地方了”。[59]还有一个说法也只不过是胡扯：麦克阿瑟到会议日程全部排定之后，才知道总统要来。按他对布莱克的说法，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内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罗斯福的文官行政助手，包括萨姆·罗森曼和埃尔默·戴维斯也都参加了会议。但是“密苏里号”此时刚刚下水，还没有来到太平洋，而且这种正式的战略讨论也不会允许文官或幕僚人员参加。在提出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的问题时，麦克阿瑟诚心发誓，如果罗斯福“想要让一名海军人士来担任最高指挥官，我将心甘情愿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战争的胜利需要这样的决定”——虽然他是太平洋上最高衔级的将领，“我也将会乐于接受从属的位置，为了大局”。[60]然而他又私下里对理查德森将军说，他“绝对不会在海军手下做事”。[61]

不仅如此，麦克阿瑟回忆录里各个章节之间也常常自相矛盾。他书中称赞罗斯福“在组织讨论时完全是中立的”，但是在四个章节之后，他又引用总统的话说登陆吕宋“会招致我们承受不

起的惨重损失”。[62]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可以，说多了就没人信了。麦克阿瑟本就大话连篇，他关于1944年7月这次峰会的叙述也得有取有舍地看，尤其是那些找不到旁证的自吹自擂的说法。可是他的叙述总是被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传记和历史著作不加甄别地随意长篇引用。其原因不难想见。麦克阿瑟给我们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故事大大超脱于太平洋缜密而复杂的军事计划之上，而麦克阿瑟就是故事的主角，他面对着一众联合起来的反派——最后英雄靠着天才的灵性和人格的力量，打败了海军和白宫里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是麦克阿瑟的讲述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才是那个当之无愧的最老到的军事战略家；对尼米兹也不公平，据记载，他已经开始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吕宋岛的优先级高于台湾的意见；对莱希也一样，他的眼光越过了这所有的中间环节，直盯着那个终极问题：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地征服日本？

罗斯福后来对莫里森的简述向我们展示了麦克阿瑟的真实观点。27日晚餐后，罗斯福看着墙上地图中的菲律宾，指向其南部的岛屿棉兰老，问道：“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

麦克阿瑟答道：“莱特岛，总统，然后是吕宋！”[63]

莫里森在这里添加了一个谨慎的脚注，说总统把这一幕场景的发生地点搞错了，他说是在“巴尔的摩号”上，但实际上是在怀基基的别墅里。但是关于总统是否有可能记错这次对话准确内容的任何疑问，都在2015年烟消云散了，当时笔者拿到了理查德森将军的私人日记。当天晚上早些时候，被麦克阿瑟耳提面命了一番之后，理查德森记下了当天的日记：

晚餐后，总统指着棉兰老开启了一番会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现在，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这就成了引发一场讨论的导火索，麦克阿瑟随即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以及他认为应当采取的战略，那就是无论最终目的是攻打台湾、中国大陆还是日本本土，都得先拿下吕宋再说。[64]

麦克阿瑟进攻吕宋的方案已经打磨了两年半，它仍是基于后勤保障和空中支援的传统理念制定的。他坚持这种较为保守的“连续多次”两栖进攻，每一次新的进攻都要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掩护，登陆舰队也要从相对较近的港口出发。他坚持认为南方大洋洲附近海域岛屿密布的地理环境比北部海域更为有利，后者的岛屿之间动辄相距数千英里，只有通过航母特混舰队才能予以轰炸。和尼米兹的战区不同，麦克阿瑟战区里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和陆基航空兵能够相互支援，共同推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吕宋拥有大量可用于登陆的海滩，这样敌人就无法集中兵力应对第一轮登陆——他在1941年12月极其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当地地形也适合大规模机动作战，这样就有可能降低地面作战中的伤亡。麦克阿瑟可以通过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岛屿上的友方游击队来获得情报和其他支援，而台湾从19世纪末就被日军占领，美军无法预计当地百姓的态度。一旦夺取菲律宾的机场，美军航空兵就可以迅速赢得南海上空的制空权，进而在连接日本本土及其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区的海运线上展开巡猎。

在麦克阿瑟二十年后凭记忆重现的当年场景中，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地抛出了他掷地有声的意见，其他人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但是根据莱希不久之后日记里的记述，罗斯福才是主导会议的大师，他向两位战区司令提的问题十分合宜，而且很专

业地试探着两人的底线：“罗斯福完美地掌控着讨论，从一个议题转向另一个，并且缩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分歧，他的状态非常好。”^[65]总统向麦克阿瑟仔细询问了菲律宾的敌军兵力，好确定他对伤亡数据的预判。根据麦克阿瑟告诉理查德森的说法，罗斯福问道：“菲律宾群岛上有多少日本鬼子？”

“大约10万，”麦克阿瑟答道，“散布在整个群岛上。”

罗斯福说自己听说日军数量比这“多得多”。

“我是那儿的指挥官，”麦克阿瑟说，“我想请问你的信息从何而来？”

总统并未正面回答，而是提出了他的意见：“夺取吕宋的战斗会非常血腥。”^[66]

在这段对话中，罗斯福显然十分顾虑伤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吕宋作战。他可能只是在转述最近马歇尔将军向他汇报的情况，后者的战争部情报部门相信菲律宾群岛上有着17.6万名日军。^[67]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这一次总统的顾虑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即便是战争部也低估了日军的数量。在1944年7月时，菲律宾至少有25万日军，随着更多运兵船队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缅甸开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68]

罗斯福是否在来到夏威夷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想要越过吕宋？根据麦克阿瑟在会谈几个小时后复述给理查德森的情况，罗斯福只是顾虑这场战斗会“非常血腥”。但在20年后麦克阿瑟那本畅销而且广为引用的回忆录里，罗斯福说的话成了：“但是道格拉斯，夺取吕宋会招致我们承受不起的惨重损失。”（黑体为笔者所加）个中差异，值得细品。后者暗指罗斯福反对攻占吕宋，但这一点在任何历史记录中都找不到旁证。总统此前已经为预计会带来惨重伤亡的多次登陆或作战背过书，包括7个星期前的诺

曼底登陆。关于罗斯福提出这个国家无法“承受”重大部队伤亡的说法，有鉴于世界其余各地血流成河的战场现状，他似乎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仔细询问麦克阿瑟关于伤亡的预期仅仅是出于尽职，他也就台湾向尼米兹问了相同的问题。

无论如何，面对总统的询问，麦克阿瑟来了一番长篇大论，攻击尼米兹战区里那不必要而且不合理的重大伤亡。自从1943年11月中太平洋反攻的第一步，即塔拉瓦环礁登陆战里战死了1000人之后，尼米兹一直采用那种有争议的战术。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和媒体的盟友也在煽风点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报上经常表扬麦克阿瑟能够保持战场伤亡数量合理。在他的回忆录里，麦克阿瑟称自己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的伤亡不会太重，不会比过去更多。正面进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步兵武器十分致命，只有不怎么样的指挥官才会去正面突击。好的指挥官不会招来沉重损失。”^[69]根据理查德森的日记，麦克阿瑟预言说台湾战役至少会和吕宋之战一样血腥残酷，他还补充道“他战区里的所有战役伤亡都比较少——死的人比其他战区都要少”。^[70]

凭借着德裔得克萨斯人骨子里的冷静，尼米兹承受了这一切而未予反驳。但是其中暗含的批评必然也令他耿耿于怀，尤其是此刻他的部队正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遭受惨重伤亡，每一个小时都会有运载着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伤员的道格拉斯C-54“空中救护车”飞机降落在瓦胡岛上。在战后的一次分析中，尼米兹承认他中太平洋战区付出的人命代价比南太平洋更高，但他也提出人们“常会犯一个错误”，以为“即便盟军变招，日本人也会按兵不动”。赤道以北的战斗已经迫使敌军从南线分兵——如果他们不分兵，“西南太平洋部队就会在新几内亚地区遇到强大得多的抵抗”。^[71]若真想抬杠，尼米兹也可以指出麦克阿瑟长期以来

一直坚持要攻打自己战区里最坚固的日军据点拉包尔，直到参联会下令绕过这里才罢手。他还可以说仅仅比较两个战区的伤亡数字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伤亡代价与所打下的地盘潜在战略价值的对比——夺占赤道以北那些距离日本更近的岛屿，对最终的胜利更有决定性意义。

7月28日上午，尼米兹开始发言，提出了金关于绕过吕宋直取台湾的方案。毫无疑问这是个有吸引力的方案，但看起来他提出这个方案只是走个过场。在罗斯福的仔细询问之下，尼米兹并不掩盖他对于这个方案的保留态度。莱希和麦克阿瑟都注意到他其实并不完全赞同“堤道”计划。

尼米兹特地从两个方面认可了进攻吕宋的方案。首先，他表明自己现有的兵力能够支援吕宋作战，而若是攻打台湾，就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增援。其次，根据莱希日记里的记录：“他承认战局的发展可能会凸显出攻占马尼拉区域的必要性。”^[72]

这样，即便不考虑士气、政治和心理等因素，吕宋也是攻打台湾之前的良好落脚点。而麦克阿瑟则拿出了自己自从1942年3月逃离科雷吉多尔起就反复排练过的演讲，最终一锤定音：解救“1 700万忠诚的菲律宾基督徒”是美国的责任，这是血誓。“我认为从敌人手中解救这些自己人并非仅仅是个士气问题，现在机会来了，而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那么东方人将不会理解我们……我觉得第二次牺牲菲律宾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73]

麦克阿瑟提出，越过吕宋将会成为日本煽动宣传的话柄，他们总是说白种人不会为亚洲人流血。吕宋还关押着大约7 000名美国战俘和数千盟国平民。每过一个月，都会有数百人死在战俘营里，越过这个岛屿意味着要冷血地决定让许多人命丧残酷的拘

禁之下。对于越过吕宋可以使这个岛屿免于血战和毁灭的观点，麦克阿瑟不为所动：“我们曾经被刺刀指着赶出了吕宋，现在我们要用刺刀指着日本人把他们赶出去，夺回我们的尊严。”^[74]

麦克阿瑟在1942年3月逃离菲律宾后发出的声明——“我还要回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言论之一。但除此之外，罗斯福总统的承诺也同样掷地有声，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绝对不会让他忘掉这一点。1942年初，日军正横扫菲律宾，在如此危机之下，奎松总统一度考虑过要向日本人投降以换取和平。麦克阿瑟出于减轻菲律宾人民所遭受灾难的考虑，几乎就要同意这个做法。但罗斯福坚定地拒绝了。在写给奎松总统的一封信里，他恳求道：“无论现在的美国守军遭遇到了什么，我们都不会放弃努力，直到我们现在正在菲律宾以外组建的部队打回来，把最后一个侵略者从您的土地上赶出去为止。”^[75]这份誓言看起来也没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

金上将后来听说麦克阿瑟偏了题，没有专注讨论军事战略，便火冒三丈。他似乎觉得战略决策中民心士气或者外交政策这样更广的因素完全不是职业军人该考虑的事情。在战后的一些文字中，他抱怨说麦克阿瑟“在讨论时对太平洋上的军事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谈那些美国承诺要把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可怜的菲律宾人”。^[76]金这么说难免有袖手旁观之嫌。如果说有哪个军事将领有权参与这方面的决策，那就只有麦克阿瑟了。从1941年12月起，甚至是从美西战争时起，人们就可以说，美国在菲律宾的荣誉、声望和可信度已然岌岌可危。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当地人建立一个能够击退入侵者的有效的民选政府。美国曾承诺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这一承诺仍然有效。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来说，若能成功在菲律宾实现去殖民化，便能给全世界尤其是英

国人树立一个美式的标杆。在这样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重要战略决策能够与其远期的政治后果或外交政策后果脱离干系。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对轴心国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战后新秩序已然呼之欲出。

根据另一段常被提起、广为人知的野史，麦克阿瑟当时把罗斯福拉到一边，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越过菲律宾将会危及他本次竞选。这一风传的源头是一个叫考特尼·惠特尼的人，他是一名律师，战时和战后作为预备役军官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1956年，也就是夏威夷会议12年后，惠特尼出版了一本遍布虚构内容和伪造对白的满是马屁味的麦克阿瑟传记。在其中一章里，他让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决定绕过菲律宾，而将那里的数百万美国追随者和数千美国侨民、战俘继续置于痛苦和绝望中——我敢说美国人民会起来造反的，他们会在今年秋季的大选投票中表达出对你最大限度的愤怒。”^[77]这种啰唆的教训再怎么说是很失礼的。考虑到麦克阿瑟不久前刚刚卷入党派政治，这种话更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威胁。这件事显然没有旁证，惠特尼的野史最好还是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捕风捉影，仅此而已。

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妄称夏威夷会议上发生了一起内幕交易，说罗斯福为吕宋战役开了绿灯，以回报麦克阿瑟保证在选举前给罗斯福送几条有利头条新闻的承诺。支持这一“秘密交易”说法的人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证实。^[78]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麦克阿瑟对罗斯福唠叨了一大堆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了。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说法，罗斯福当时对他说：“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不对，再给我一片，我早上吃。我这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谁像麦克阿瑟这样对我说过话。”^[79]

28日午餐后，罗斯福、莱希和尼米兹一起把麦克阿瑟送到了西卡姆机场，他的C-54专机已经在那里加足燃油准备起飞了。看起来无论他们在送行的车里说了什么，麦克阿瑟最终都是觉得自己赢了。分别时，莱希对他说：“我会一直支持你，道格拉斯。”[\[80\]](#)

麦克阿瑟大步踏上飞机的舷梯时，飞行员“土佬”罗兹也跟他一起走了上去。他问上司会议开得成不成功。麦克阿瑟向周围看了一圈，确保没人旁听，随后低声答道：“是的，大获全胜。我们要开干了。”

“去打菲律宾？”罗兹问。

“是的，我这几天还不会宣布这事，但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9个小时后，当这架“空中霸王”在塔拉瓦机场降落加油时，罗兹把这段对话记在了他的日记中。他说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81\]](#)

麦克阿瑟回了澳大利亚，人们一般会觉得罗斯福应该回到怀基基别墅的床上或者“巴尔的摩号”的住舱里休息了。但实际上他在夏威夷又多待了一天半，他决心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看看这个瓦胡岛。作为一个患有致命心脏病的人，罗斯福似乎表现出了惊人的复原力。他此前一直是这样：深度休息一段时间（就像在从本土开来的“巴尔的摩号”上那样），之后爆发出惊人的活力。“在这一段极其繁忙的时期，”布鲁恩医生在他的医学记录中记载道，“总统在活动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劳或者任何形式的困难。”[\[82\]](#)纪录片片段也确证了这一印象。他看起来憔悴而瘦弱，眼袋很深，但是在迎接成群的将领、政要和军人时却仍然显

得兴高采烈、生气勃勃。周五下午，总统车队向东越过崎岖的科奥劳山脉，前往岛屿迎风一侧的卡哈纳湾海滩周围，视察一场在荒野中进行的丛林战训练。罗斯福还是坐在红色旅行车的后座上，帽子向后推过额头，举着望远镜观看持续了一个小时的实弹演习。穿着绿色军装的步兵们从铁丝网下方爬过，然后站立起来，肩并肩排成散兵线穿越一片空地，间或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开火。最后他们向一个用胶合板搭建的“日本村庄”演练了协同进攻。之后，车队沿海岸公路向南，在卡内奥赫湾的海军航空站短暂停留后，继续（根据白宫日志的记录）穿过“凯卢阿、位于威玛纳诺的两栖部队基地、科科角、位于威卢比的海岸警卫队基地，以及戴蒙德角”，回到怀基基。[\[83\]](#)

总统在夏威夷最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慰问那些刚刚从马里亚纳群岛战场撤回来的伤员了。车队开进檀香山城区，狭窄的街道旁挤满了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要靠国民警卫队才能拦住。总统的车开到陆军第147综合医院外的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医生和护士在医院大门前的台阶上站好了队。伤员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坐在轮椅上，一台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一个急不可耐的军人举起还打着石膏的手向总统敬礼。总统在病房里巡视了一个小时，之后乘车离开，前往檀香山海军航空站——今天的檀香山国际机场——之后前往西卡姆机场，在那里，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道格拉斯“空中救护车”刚刚落地，滑行到停机坪上。担架从飞机上被抬下来，伤员们被直接放置到了总统座车的旁边。这些刚刚从关岛撤下来的伤员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正面对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令他们惊喜万分。总统日志记载道：“与罗斯福不期而遇，这些孩子显得多么惊喜和兴奋。”[\[84\]](#)

太平洋战场的军人们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家里的老百姓”已经把他们忘了。与纳粹德国的战斗占据了各大报刊、无线

电和新闻影片——当1944年夏季，盟军部队正涌入法国，奔向巴黎时，就更是如此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看到罗斯福总统走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和军用设施，也看到他离开本土出现在国外各处，譬如摩洛哥、埃及和伊朗。在这一刻之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指望美国总统会出现在太平洋上。总统的到来告诉军人们，他们没有被忘记。这一点尤为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的夏威夷之行常常被认为是他为了选举连任而进行的宣传举措。

在海军造船厂，水兵们在道路两旁列队迎候，当车队开进视野时便一齐举手敬礼。列队的军人们接到命令，要两眼直视前方——但是当总统的座车开过的时候，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往前挪动，瞪大眼睛，想仔细看清楚。数千名造船厂工人在道路两旁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还从办公楼二层和三层的窗户外探出头来。车队穿过了几个巨大的工厂车间，之后在潜艇码头短暂停留，潜艇艇员们在那里一齐立正敬礼。车队接下来开到了正停在干船坞里的战列舰“马里兰号”旁，总统在那里听取了关于其正在进行的舰体维修情况的简报，五个星期前，这艘战列舰在塞班岛外海被一枚空投鱼雷击伤。[\[85\]](#)

这一天视察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坐落在珍珠港以东一座山顶上的艾亚海军医院。下午3点刚过，车队开到了这里，人们早已挤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上翘首以待。医院工作人员和大概50名还能走路或者是坐在轮椅上的伤员排好队形向总统敬礼，楼上的窗户外更是挤满了争先恐后想观看这一场面的医生、护士和伤员。一排拄着拐杖的人一齐举手敬礼。和此前三天一样，总统将要坐在敞篷旅行车的后座上直接发表讲话，通信组立刻上前架起了两个麦克风。他们告诉总统，这两个麦克风一个是连接广播系统，另一个是电影摄制组的。就像两天前在舒菲尔德兵营一样，罗斯福搞不清状况的问题又一次被扩音器广播了出去：“哪个是哪个？这

个还是那个？”众人不禁掩口偷笑，护士们看起来好像格外开心。坐在罗斯福身旁的尼米兹莞尔笑道：“我也从来都搞不定这些新玩意儿。”总统对听众说：“这事我做了两次，一次是在影片里，一次是在你们这些优秀的人面前。”

根据接下来三分钟散漫、没有草稿的讲话来看，罗斯福事先一点都没有去考虑该说什么。他用放松、闲聊的口气和人群交谈。他说自己很高兴见到他们，他还带来了家乡亲人的问候（“至少理论上如此”）。他说到了自己和麦金太尔医生两个人当年在规划和设计艾亚医院时扮演的角色，称赞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场伤员救治技术取得的长足进展，还向听众保证“整个国家都为他们而感到非常非常骄傲”。^[86]无论健康状况如何，总统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令人熟悉的优美音色还是那样完美无瑕。他热情地笑着，甩了甩头，推开了麦克风。人群爆发出了一阵真挚的掌声。

一如往常，迈克·赖利在把总统从车上抱下来放到轮椅上时，所有摄像机都是关闭的。当总统走进这座拥有5 000个床位的医院时，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是不允许跟进去的，但是有几位目击者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场景。大厅里都是在塞班岛和关岛的战斗中落下残疾的年轻人。许多人都被截了肢，或者装上了假肢，或者遭受了其他不可能完全复原的重伤。对他们来说，同样残疾的罗斯福代表了获得成功而充实的一生的可能性。麦金太尔医生回忆道，总统“坐在轮椅上穿过了每一间大厅，时不时在病床旁停下来和伤员交谈，或许是在表扬这些人，他的声音充满了热烈的情感，就好像这些受伤的陆海军士兵是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些灰暗、绝望的眼睛里燃起了新的光芒”。^[87]在一间大厅里，麦金太尔走在总统前面，和一名“看起来已经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了”的陆战队员交谈。

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写满了沮丧和惆怅。但是当他望向四周，看到是谁在向他靠过来时，这个年轻人张大了嘴，脸上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开心的笑容。

“嘿！”他叫道，“总统！”每个大厅里，每一长列病床旁都是这样的场面。这些落下残疾的人看到的并非只是美国总统，而是一个曾像他们一样被残疾打倒，继而又凭借意志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打败了身体上的残疾，走上人生巅峰的人。一股希望的热潮在医院里瞬间涌起，你我虽不在其中，却也感同身受。[88]

麦金太尔、莱希和罗森曼都说自己被艾亚医院里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总统肯定也是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罗斯福眼里有过泪水，”罗森曼回忆道，“那天他坐着轮椅被推出医院时，他和他们的心已然在一起。”[89]

一行人当晚就要登上“巴尔的摩号”离开珍珠港了，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在等着总统。那三个“食尸鬼”，大通讯社派来的三个记者，一直没有获邀参加任何视察行程——他们甚至不被允许靠近总统——于是他们向尼米兹的新闻官沃尔多·德雷克使劲抱怨，怒火越来越旺。最后，史蒂夫·厄尔利（从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同意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地点选在怀基基海滩霍尔姆斯别墅的精修草坪上，罗斯福坐在花园里一个柳条椅子上，记者们则在他周围围成半个圈。除了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外，参加发布会的还有常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大约24个战争通讯员。他们头上椰子树结的椰子都被摘掉了，免得掉下来砸到总统。

在纪录片里，罗斯福看起来很疲劳。他的肩膀耷拉着，说话时低着头。但他在迎接记者并和其中几个人握手时，脸上仍然洋

洋溢着友善的笑容。莱希和尼米兹分别站在长椅两端，其中后者两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两位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90]

总统开始即兴发言，说到了他对瓦胡岛军民的赞赏，说他们从1941年12月7日的大灾难里恢复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这次与麦克阿瑟、尼米兹的会面是“近期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时隔七年之后再次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他本人十分高兴。为了推动下一步重大战略决策，听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第一手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罗斯福说，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没有它，事情就会格外艰难”。[91]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但是总统没有向记者们透露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太平洋方面计划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吗？是的，他答道，不过仗打到现在，大家都能看出这一点，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新闻。

太平洋进攻有没有什么新的“重点或需要加速的事项”？

“都没有。”

麦克阿瑟将军会像他发誓的那样收复菲律宾吗？

“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

新闻发布会的后半场致力于宣示盟军的“无条件投降”原则。一名记者（身份不详）问：“我们要在这里敲定太平洋战场的目标吗？”[92]

自从罗斯福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出“无条件投降”这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以来——当时似乎很多人都觉得猝不及防——人们就在不停询问它的定义。虽然同盟国在会议上讨论过这个原则，但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直不

同意这一点，直到罗斯福当着各国记者的面直接把这个词说出来。总统的公开讲话把“无条件投降”原则变成了既成事实，丘吉尔别无选择，只好表态英国对此予以支持。罗斯福决意避免重演“一战”后的那种和平，当时德国人中间流行的“背后捅刀子”的传说促成了纳粹党的崛起。但是同盟国的许多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私下里都相信把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公布出去是个代价沉重的错误——轴心国会利用这一声明，将其作为盟国想要消灭和奴役本国人民的证据，强化其军民战斗到底的决心。有些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者认为，罗斯福的声明削弱了德国军队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势力，可能延长了欧洲的战事。

除了让纳粹和日本抓到国内宣传的把柄之外，“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还因为太不明确而带来了麻烦。定义这个抽象的概念容易，阐释如何将其付诸实施就难多了。尝试澄清这一点，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无论公开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样，都会被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利用并曲解（事实正是如此）。

关于这个词，罗斯福的灵感来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北军统帅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南军统帅罗伯特·E.李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那次会面^[93]时的一段野史。由于这个词在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十分重要，因此应该完整介绍罗斯福对于记者提问的回答。

“1865年，”他对记者们说，“李被赶进了里士满一角的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里。他的军队饿着肚子，接连两三天没睡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弹尽粮绝。”

因此他打着一面停战旗去找格兰特。为了让手下活下去，他询问格兰特投降的条件是什么。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说这样不行，他总得得到些东西。就举个例子，他手里的粮食只够部队再吃一顿的了。

格兰特说：“那这是很麻烦。”

李接着说：“我们骑兵的马不属于我们，它们属于我们的军官个人，他们还得骑马回家。”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只好说：“好吧，我投降。”之后把佩剑交给了格兰特。

格兰特说：“鲍勃，把它收回去。现在你打算无条件投降吗？”

李说：“是的。”

格兰特接着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俘虏了。你的人需要粮食吗？”

李说：“是的，我们现在只够吃一顿饭的了。”

格兰特又说：“现在，那些邦联军军官的马，你们要它们干什么用？”

李说：“我们需要它们去春耕。”

格兰特说：“告诉你的军官们，把马带回家春耕去吧。”

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并不是我发明的。我们都是人类——通常来说，都会替同类着想。这就是我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

从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讲述可谓错得离谱。

格兰特要求叛军“无条件投降”是在西部战线此前的两次战役中，不是在阿波马托克斯。而每一次（分别在道内森要塞和维克斯堡）格兰特提出如此要求后，都会和对方指挥官当面谈判，并接受对方有条件的投降。在阿波马托克斯，格兰特并没有坚持要李无条件投降，即便是做个样子都没有，他已准备把邦联军将领的条件写入投降协议中。

但是，对于罗斯福想借用格兰特和李的故事来表达的含义来说，历史事实错误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决意要让轴心国势力认识到自己将会被彻底打败，永不翻身。这一点绝不允许有任何疑虑和妥协，无论是在投降时还是长远来看，都是如此。因此必须坚持名义上的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个名义背后，似乎也有着关于缴枪不杀的承诺。或许甚至可以认为总统举的这个例子想要表达的是，只要德国和日本先同意无条件投降，那之后所有的合理诉求都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什么样的诉求才算是合理的？而且既然不接受讨价还价，那战败国怎样才能提前知道自己的待遇？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原则的难解之惑。人们不难察觉到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字面上看，这是说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战败者，而不用考虑后者的愿望和利益。但是根据罗斯福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恰恰与其相反。

在怀基基，一名记者的提问点破了这个难题：盟军会像格兰特将军那样供养被打败的轴心国军队吗？罗斯福回避了这个问题——从记录下来的文字上看，他的答复很草率。但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其答案也令同盟国领袖们挠头不已。每次想要阐明这个原则的尝试都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烦人的死循环即便在罗斯福去世后仍然不得解，它将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刻。

当晚，“巴尔的摩号”驶出了珍珠港，莱希整理了自己的想

法，写到了日记里。在他看来，麦克阿瑟将军“似乎关注的主要是收复菲律宾”，对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还没怎么考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表达了一个共识，“运用海空力量就能够迫使日本接受我们的投降条件，而无须登陆日本本土”。^[94]莱希相信，从长远来看，两大战区司令的这一共识——应当避免登陆日本——其重要程度远高于先打吕宋还是先打台湾的当前问题。

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还没有被纳入考虑。全盘知晓“曼哈顿计划”的盟军领导人数不多，罗斯福和莱希就是其中两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要到第二年才会获知此事。在1944年夏季时，人们连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都不知道，更不用谈能否赶上战争的最后阶段了。莱希将军曾经是海军炸药专家，他怀疑这个新玩意儿恐怕不管用。但无论如何，他十分确信战争能够（也必须要）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取得胜利，接下来盟军便可在停战后和平进占日本。

但是，如果太平洋战争要以不流血的投降告终，那就总要有个人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和盟国谈判。这个人会是谁？陆军将领出身的日本首相？还是据说是神圣化身的昭和天皇裕仁？胜利已然在望，“原班人马”在盟国控制的日本政府中将要扮演何种角色，这还是个争议颇大的未知数。裕仁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他是个被军方控制的傀儡、橡皮图章，还是真正握有实权？他能不能扮演好李，来和罗斯福扮演的格兰特演对手戏？答案将主要取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盟军领袖们所面临的战略决定和外交抉择。

罗斯福及其代表已多次要求约瑟夫·斯大林保证苏联将会在击败纳粹德国后加入对日作战。1944年中期时，这已成为美国政府和莫斯科之间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但是，是否真的需要苏联红军来对付日本呢？这显然取决于太平洋战争会比欧洲战事长多久。然而，即便抛开这个问题不谈，盟国还面临着另一个关键的

不确定问题。一旦日本政府真的投降了，大量被派到海外的日本陆军——在中国、朝鲜还有其他各处——是否也会放下武器？或者就像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继续打到最后一个人？许多盟军将领坦言，日本地面部队从来没人愿意投降，即便东京政府放弃抵抗也是一样——他们预言到时将不得不斩草除根，把日军所占土地上的每个日本人都剿灭才行。若确实如此，那美国人就迫切希望苏军能进攻中国东北，消灭百万关东军。同样，他们也希望蒋介石的军队能承担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战斗（以及相应的牺牲）。另一方面，如果裕仁天皇真的能同意命令他散布各处的军队投降，而且那些军队也遵守这个“现人神”的命令，太平洋战争可能就会赢得更快，死伤代价也会比悲观者预计的更低。若如此，或许就不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这意味着美国人不必为此去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如果美国寻求苏联的帮助，那么复杂的战后全球斗争（此时“冷战”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中的权力平衡也会随之改变。这些纷繁复杂的考量将会在下一年的关键决策中体现出来。

“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驱逐舰离开瓦胡岛后向北航行，开到足够远的安全距离后（也就是远到陆地上看不见为止）便转向353°航向（北略偏西），航速22节。罗斯福躲进了自己的住舱，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很少露面，睡觉很多，也不怎么工作。他们的目的地是阿留申群岛，总统将要去视察那一地区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兵基地。

此时在美国国内，选战从声势和激烈程度上说已经白热化，共和党和反对罗斯福的报纸抨击罗斯福此番行程，称他和他的狗都是在花纳税人的钱到太平洋上旅游度假。莱希将军在日记里称，夏威夷会议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他对此番阿拉斯加之行的

价值却心存疑虑。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对于有人批评总统仅仅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休闲而动用美国军舰十分敏感，尤其是在战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向任何朋友或罗斯福提过此事。

8月9日，当军舰开进浓雾弥漫的阿拉斯加内部水道时，罗斯福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声称“再次见到你令我格外高兴”。关于菲律宾问题，总统写道：“回去后我会推动这个计划，我确信这在总体上合乎逻辑，而且能够实现……总有一天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毫无疑问我希望这由你来完成。”^[95]

鉴于这封信的力度，以及第二个月又一封写给“亲爱的道格拉斯”的信，许多学者和传记作者断言总统认可了麦克阿瑟关于收复菲律宾的意愿。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关于送麦克阿瑟重返吕宋岛的最终决定要迟至9月底才敲定下来，此时距离檀香山会议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其间，吕宋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完全可能被绕过，至少是暂时绕过，而让位于全力攻打台湾。

8月1日，也就是离开珍珠港两天后，菲律宾总统奎松在纽约萨拉纳克湖的一所医院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巴尔的摩号”上。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两个人都对奎松和他的国民许下了诸多承诺。麦克阿瑟的许诺流传更广，但罗斯福的承诺也毫不含糊，同样必须兑现。两个人都知道，从长远来看，历史记录可能会更加关注罗斯福的许诺。在麦克阿瑟看来，绕过吕宋的决定是可耻的背叛，他将会想方设法在后代面前把这个责任甩到罗斯福身上。可以想见，作为历史学霸的罗斯福同样能够认识到这对他未来历史声望的潜在影响。在写信承诺“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时，罗斯福就知道他的秘书格雷丝·塔利会把这封信的复印件放到他的对外联系档案里，最终存入他在海德公园的总统档案馆并列

入“麦克阿瑟”类目之下，像霓虹灯广告那样招来一拨接一拨的未来历史学者。

那么，罗斯福到底向麦克阿瑟承诺了些什么？就像他此前写给奎松的信一样，总统的用词十分谨慎，应当仔细解读——既要看到他说了什么，也要看到他没说什么。“我会推动这个计划。”作为总司令，罗斯福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力去命令麦克阿瑟进攻吕宋，无论是作为进攻台湾的前奏还是干脆完全替代之，都不是问题，无须顾虑参联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但他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总有一天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但总统并没有说具体什么时间，即便是等到战争结束再办这么个仪式也不算失约。在怀基基，他对通讯员们说：“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96]这句话被禁止见报，但这为所有正在考虑的选项都打开了大门。他将“菲律宾”和其北方主岛吕宋笼统地并在一起，精明地含混过关。实际上，参联会已经（在1944年3月）授权夺取位于菲律宾群岛南端的大岛棉兰老，因此麦克阿瑟可以算是已经接到命令去收复菲律宾的主要部分。^[97]

没人准确知道罗斯福和莱希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对麦克阿瑟说了些什么，但是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告诉他C-54飞机的飞行员，自己得到了三个值得一提的口头承诺。他的部队将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新锐部队补充，达到齐装满员的状态；他的第5航空队将得到新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特混舰队将被用来支援他在菲律宾的两栖登陆（无论这场登陆战在何时何地打响）。^[98]从瓦胡岛飞往布里斯班的航程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样，当他来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看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有线电报，确定想要越过吕宋并“在可行的最早日期”登陆台湾时，人们便不难想象他的暴怒了。这份电报来

自参联会的作战计划部门，发送日期是7月27日，也就是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刚见面的那天。华盛顿的计划制订者们警告说“‘堤道’计划（进攻台湾的战役）将会需要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空中、地面和后勤部队”——他们还说这些兵力其后也不会归还给麦克阿瑟，而要被留给尼米兹用于“之后的作战”。麦克阿瑟应当制订计划以“最终完全夺回”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部分，但是——要命的是——“这些作战将不会得到太平洋舰队的直接支援”。[99]

这只是一份计划层面上的电文，也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参联会主要负责人的批准。但它却和麦克阿瑟从夏威夷带回来的结论直接冲突，他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耍了。他立刻直接给马歇尔将军写信，对参联会计划人员的设想表达“最强烈的反对”，并坚称从“国家政策的最高角度来看”收复整个菲律宾是至关重要的。他指责进攻台湾的方案“要冒险面对最危险的灾难”，还指出罗斯福总统已经说了菲律宾将会被收复。麦克阿瑟写道，更糟糕的事情是，越过菲律宾的方案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前景”——这需要对菲律宾进行彻底的海上封锁，这会导致饥荒，会有数百万无辜的菲律宾人和盟军战俘、侨民饿死，这样的结果“比我们的敌人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更凶残”。[100]

但是，如此恳切的言辞却未能给华盛顿的作战计划制订人员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接到指示，完全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政治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争论不在他们的权责范围之内。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没怎么关注参联会内部的作战计划部门，绝大部分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的传记对此更是只字未提，但是它却对太平洋上的战略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个课题比较沉闷，需要研究者沉下心来，在计划委员会备忘录和计划研究的迷宫中深入探索。许多相关材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密，此时有不少最广为流传的太

平洋战争历史著作已经面世。因此有一点格外需要强调：无论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说了些什么，参联会的计划制订系统都仍然在华盛顿按自己的逻辑运转，而且有影响力的声音（尤其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仍然认为太平洋上的作战应当集中在北方进攻路线上。令麦克阿瑟愤恨和沮丧的是，即便在夏威夷会议之后，这仍然是美军太平洋战略设想的主流。

假如罗斯福总统一意孤行，越过他的军队司令们插手指挥，那么这些参联会的内部机制便全都归于无效，这种事罗斯福此前已经干过不下十余次了。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使他可以命令陆海军将领攻打任何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总统顶着所有军种司令的一致反对，下达了执行“火炬”行动的命令，也就是1942年11月的登陆北非之战。不过，这种总统越级指挥的事情绝大部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1944年的情况和1942年已经大不相同。参联会辖下的内部计划和研究委员会在1942年时才刚刚建立，到1944年时则已人员齐备，军队中一些最好的战略专家也都被纳入其中。在战争后期，罗斯福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向战后的规划和策略方面，对于战略和作战行动方面的重要事项则关注得比较少。他放手把参联会交给莱希去代管，而莱希虽然支持麦克阿瑟的“吕宋优先”策略，却也没有去打断正在进行的“堤道”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在8月22日参联会的一次专题会议上，这位海军上将提出，和其他选项相比，攻打吕宋“付出的人命代价和耗费的资源会更少，花费的时间也不会更多”，但他并没有说要放弃台湾，也没有要求立即做出决定。

[101]这就很难被看成是对麦克阿瑟立场的坚定背书。如果此时莱希和罗斯福像往常一样心意相通，那么罗斯福似乎是选择了让参联会继续自己的计划而不加干扰。[102]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前线，那些将要去执行“堤道”行动的海

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官仍然对这次行动将信将疑。他们对台湾的研究越深，就越不喜欢这里。福里斯特·谢尔曼将军，一位47岁的老神童，是尼米兹的副参谋长——1949年，他将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作战部长——他对同僚们说，要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而“把吕宋及其机场、可用的补给物资和所有东西留在侧翼不动”是“荒唐”的。[\[103\]](#)谢尔曼说他想要写一份“烂到一眼便知，好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的作战计划草案，好把“堤道”计划搅黄。[\[104\]](#)太平洋舰队中的顶级两栖战专家，将要在这次作战中指挥两栖舰队的里奇蒙·特纳，也基于相似的原因而施加影响，以反对“堤道”计划。

部队的每一份“堤道”计划新草案都要投入更多兵力。参联会的计划人员预计美军部队将能够在台湾沿岸夺取并守住若干战略性的港口，但太平洋上各位指挥官的结论则是，他们可能需要打下并守住整个岛屿才行。台湾是个大岛，地形复杂，当地人可能会忠于日本，因此这一任务将会漫长而血腥。1944年8月18日，尼米兹估计这场战役将需要投入50.5万名陆军，15.4万名海军陆战队，以及6.1万名海军岸上人员。[\[105\]](#)这是个大数，很难看得出来，尤其是在此时欧洲战争已经很清楚将会拖到1945年的情况下。“堤道”行动的规模可与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比肩，但是后者的进攻部队只需跨越一条英吉利海峡，而进攻台湾的舰队和两栖部队却要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跨越一千英里洋面才能抵达目的地。艰巨的运输和后勤压力将难免和其他同样高优先级的事项争抢紧缺的资源，例如在塞班岛和关岛建设B-29轰炸机基地的计划。托尔斯将军指出，在机场建设计划方面“陆军航空队将与任何变化死磕到底”，他提醒金注意这个问题。[\[106\]](#)这样，到1944年8月下旬时，台湾战役计划在参联会内部又招来了另一个劲敌——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他预见到对日

本本土战略轰炸的主要出发阵地将会是马里亚纳群岛（而不是中国）。

或许更重要的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仍然坚决反对台湾作战计划，并决心用自己更倾向的硫黄岛—冲绳岛二级跳取而代之。1944年8月回到珍珠港后，斯普鲁恩斯便开始构建一套反对“堤道”计划的提案。和谢尔曼一样，他认为台湾的不利条件过于明显，这个计划应当被取消，因此他告诉手下人不必关注此事。

在9月上旬的一次计划讨论会上，陆军的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尔将军向尼米兹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人员报告他的“堤道”计划准备情况。斯普鲁恩斯显然认定巴克纳尔的发言是在浪费时间。他站了起来，获准打断讲话后走到尼米兹办公室后部，拉下一张西太平洋挂图开始发言。其他军官都把椅子转向斯普鲁恩斯，听这位海军将领阐述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的整体见解，无人理会的巴克纳尔则怒火中烧。海军陆战队的格雷夫斯·B·厄斯金少将称这是“我所听过的关于某场作战行动的态势的最专业的即兴评论之一”。^[107]斯普鲁恩斯推翻了“堤道”计划的基础构想，提出冲绳在所有方面都是更理想的进攻目标。冲绳无法在次年春季之前拿下——海军还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来组建所需的舰队、航空兵和后勤部队——他预计自己可以在1945年3月到4月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时间表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充分的时间去夺取菲律宾，包括吕宋。台湾则可以被安全地绕过。

斯普鲁恩斯是个内敛的人，一般不会用如此强硬的口气和尼米兹说话，尤其是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此番他完全甩掉了惯常的冷静做派，必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的信任超过他指挥系统内的任何其他人，而且既然是要由他来执行这次作战，那么他的意见自然非同小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堤道”计划仍然没有彻底取消。1944年9月9日，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同夺取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计划完成日期是12月20日。但是两位司令还被指示要继续制订接下来在吕宋和台湾两处登陆的计划，“关于是否要在占领台湾前先占领吕宋的最终决定将稍后做出”。[108]

在三天后布里斯班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告诉艾克尔伯格将军：“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赢到手的只是同意我们向前打到莱特。关于进攻路线要通过吕宋还是台湾，华盛顿还没有定下来。”[109]六个星期前从夏威夷回来时，麦克阿瑟已经让幕僚们相信他成功让总统决定收复整个菲律宾。显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总统打算把这个事情交到参联会手里。这个星期，麦克阿瑟收到了一封总统从魁北克同盟国圆桌会议上写来的信。罗斯福告诉他：“情况和我们离开夏威夷时并无变化，虽然还需要一些努力来避免你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我仍然控制着局面。”[110]这闪烁其词的表述再次引出了那个问题：如果罗斯福已经决定支持麦克阿瑟，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下令进攻吕宋呢？

与此同时，太平洋上新的战况令先前的计划构想迅速过时。9月中旬，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在空袭菲律宾时发现，敌人在这整个区域的航空兵力量出人意料地薄弱。9月12日，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宿务岛附近被击落。飞行员在海上迫降后游到岸上，当地人告诉他，宿务岛上只有大约1.5万名日军，莱特岛上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将军把这个情报通过无线电发给了尼米兹，建议美军尽快在莱特岛登陆。尼米兹把这个消息沿着指挥层级发给了正随同总统在魁北克开会的金，然后是参联会。到9月16日日终时，军事首脑们已经将莱特岛的登陆日期提前了足足两个月，改为1944年10月20日。

5天后，在一份发给参联会的长篇有线电报中，麦克阿瑟阐

述了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未来路线的总体观点。他提出可以从莱特岛直接跃进吕宋岛，12月20日出动四个两栖战师在林加延湾登陆。这次作战将需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力量的支援”，但是一旦登上吕宋，麦克阿瑟就将在2月底前收复马尼拉和马尼拉湾。“这将会使得我们在按照当前计划向更北方发动进攻时，享有[吕宋岛]基地和陆基航空兵支援带来的巨大优势。之后，[台湾]战役将不再必要，或可直接攻击[九州]，尤其是在先攻打[硫黄岛]的情况下。”[\[111\]](#)

麦克阿瑟的观点显然是不错的。他提出的作战安排可以依托太平洋上已有的兵力来实现，不需要从欧洲调兵增援。它可以保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部队持续与敌作战，同时避免了那场在两个战区里几乎没一个人喜欢的作战（“堤道”行动）。后来的事实将会显示，这一观点和战争的实际进程十分接近，只是漏掉了进攻冲绳的战役。甚至连麦克阿瑟计划的时间进度都很符合事实：最终他在1945年1月9日登陆林加延湾，3月初拿下了马尼拉。可以这么说，在1944年9月，麦克阿瑟和斯普鲁恩斯——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计划，也很少直接联系——不谋而合地拿出了打赢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蓝图。

金上将现在只能认输。他将于9月底在旧金山的美国舰队总司令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阶段性会议上与尼米兹会面。“堤道”计划在珍珠港的反对派们已经准备好要会见他们的总司令了。计划中的“堤道”行动的地面总指挥巴克纳尔将军签发了一封函件，声称分配给这场战役的可用部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他还补充说陆军可以用现有资源拿下冲绳。[\[112\]](#)福里斯特·谢尔曼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参联会批准麦克阿瑟关于进攻菲律宾的建议和斯普鲁恩斯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提议。花了三分钟浏览一通之后，斯普鲁恩斯把这份文件递回给谢尔曼，他说：“我一个字也不想

改。”^[113]

斯普鲁恩斯后来回忆道，在旧金山，金起初一直坚持他的“堤道”计划方案，“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他将会把这个方案 [吕宋岛—硫黄岛—冲绳岛方案] 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也是这么做的”。^[114]10月3日，参联会下达了新的指示，命令麦克阿瑟在1944年12月进攻吕宋岛，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1月进攻硫黄岛，一支大规模的海军—陆军—陆战队联合部队将在1945年3月进攻冲绳岛。这样，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年的主要作战次序就这么敲定了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金已经习惯于对太平洋上的事情顺其自然了。1942年4月时，他成功与马歇尔将军达成协议，实现双战区指挥，把整个太平洋北半部变成了海军的地盘。他坚决地抵制住了英国人想要把太平洋战争降格为单纯的防御作战以便集中力量击败德国的主张。他压制了负责实施战役的南太平洋司令的反对，强行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并赢得了最初的胜利。后来金又迎着麦克阿瑟的激烈反对，争取到参联会的批准，于1943年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初占领马绍尔群岛，在1944年中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他击碎了麦克阿瑟抢夺太平洋舰队指挥权并统治整个太平洋战场的野心。但是在讨论对台湾的进攻时，他最终遇到了对手。

[1].50口径，即口径为0.50英寸，合12.7毫米。——译者注

[2] Press and radio conference No.961, July 11, 1944, FDR Library.

[3] FDR to Stephen T.Early, October 24, 1944, in Stephen T.Early Papers, “Memoranda, FDR,1944,” Box 24, FDR Library.

[4] 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Life* magazine, August 19, 1946, p.49.

[5] William D.Hassett diary, March 6, 1944, in Hassett, *Of the Record with FDR*, p.239.

[6]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p.52.

[7] 副总统是在任总统一旦无法任职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在美国总统健康堪忧的情况下，副总统的人选就变得格外重要。——译者注

[8]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16, 1944, FDR Library.

[9]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p.19.

[10]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1, 1944, p.61,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11] “JCS to CINCPAC and CINCSOWESPAC,” March 12,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12]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p.503.

[13] MacArthur to Sutherland, March 8, 1943, RG—30, Reel 1007, Signal Corps No.Q4371,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4] Marshall to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June 24, 1944, Radio No.WAR—55718, George C.Marshall Papers, Pentagon Office Collection, Selected Materials, George C.Marshall Research Library, Lexington, Virginia.

[15] MacArthur to Marshall, Radio No.CX—13891, June 18, 1944, in Marshall,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ed.Bland and Stevens.

[16] 文件证据是由卡罗尔·M.佩蒂洛在1979年发现并发表的。见Petillo,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保罗·P.罗杰斯是麦克阿瑟的手下，他目睹了奎松、麦克阿瑟和萨瑟兰在科雷吉多尔岛的对话，并打出了该指令。Rogers, *The Good Years: MacArthur and Sutherland*, pp.165—66.

[17]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June 20, 1942, in *The Eisenhower Diaries*, p.63.

[18]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7, 1944, in Perry, *Dear Bart*, p.270.

[19]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183.

[20] 1英寸 = 2.54厘米。——编者注

[21]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63.

[22]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2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23] Spruance to Professor E.B.Potter, March 28, 1960, p.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Collection 707, Box 3, NHHC Archives.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435.

[25] Ibid.

[26] Ibid., p.438.

[27]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0,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2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440.

[29]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467.

[30] CINCPAC to COMINCH, July 24,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34.

[31] “Notes, 1950—1952,” pp.5—6, Ernest J.King Papers, LCMD.

[32] 例如，马克斯·黑斯廷斯在2008年出版的《惩罚》（*Retribution*）一书中花了半章的篇幅来介绍这次夏威夷会议，但对莱希的名字却只字未提。——作者注

[33]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34]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 Robert C.Richardson Jr.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5]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257.

[36] Ibid., p.258.

[37]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需要注意，惠尔顿·罗兹把托尔斯误当成了尼米兹，并在他的日记中错误地记录成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来接机。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258.

[38]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p.456—57.理查德森将军把他的车从“巴尔的摩号”开到沙夫特堡去接麦克阿瑟，所以两位将军可能是一起回来的。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7月26日，这辆敞篷车确实出现在海军基地，因为录像显示，罗斯福和莱希是在车里离开的。“FDR’s Tour of Inspection to the Pacific July—Aug, 1944,” 16mm film footage, MP71—8:63—6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39]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pp.97—99.

[40]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41] Leahy, *I Was There*, p.250.

[42] 据罗森曼回忆，是罗斯福先拿麦克阿瑟的夹克开玩笑，他说：“今天真是太热了。”西南太平洋司令答道：“唉，我刚从澳大利亚飞来。那地方还冷着呢。”（*Working with Roosevelt*, p.457）罗森曼的说法更加广为流传，但还是莱希更可信一些。他是麦克阿瑟的老友，开这种玩笑很正常。他还是麦克阿瑟的同僚和上级，提醒他注意着装也属合理。不爱吹牛的莱希说这话是自己说的，这样罗森曼的讲述就有可能是记错了；他听到了这一对话，但后来记错了话是谁说的了。——作者注

[43] “FDR’s Tour of Inspection to the Pacific July—Aug, 1944,” 16mm film footage, MP71—8:63—6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44] Ibid.

[45]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pp.97—99.

[46]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6, 1944,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47]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8] Ibid.

[49] FDR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5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191.

[51]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p.116.

[52]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99.

[53]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529.

[54]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61.

[55]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56]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 35mm film footage, FDR2757—28—2 and FDR2757—28—3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57] Ibid.

[58]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pp.501—2;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65.

[59]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60]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p.500;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72.

[61]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anuary 19, 1945,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97—98.

[6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9.

[64]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5] Leahy, *I Was There*, p.251.

[66]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7] Drea,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p.129.

[68] 麦克阿瑟的G-2部门（情报部门）总是低估菲律宾群岛的敌人兵力，而且低得离谱。这一差距在1945年1月进攻吕宋战役打响时尤为惊人。当时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长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说吕宋岛上有152 500名日军。沃尔特·克鲁格将军麾下第6集团军的G-2部门估计当地日军数量为234 500人。实际数量是27万。
——作者注

[6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98.

[70]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71] Nimitz et al., *The Great Sea War*, pp.370—73.

[72]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8, 1944,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7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97—98.

[74]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75]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p.92.

[76] 强调处为原文所加。“Notes, 1950—1952,” p.3, Ernest J.King Papers.

[77]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p.125.

[78] D.克莱顿·詹姆斯 (D.Clayton James) 是首先提出此说之人，他的多卷本传记 *The Years of MacArthur* 除了有这个问题外还是很出色的。后来沿用此说者极多。

[79]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200.

[80]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70.

[81]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61.

[82] Howard G.Bruenn, M.D., “Clinical Notes,” in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Appendix B, p.149.

[83]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9, 1944;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29, 1944;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2 and FDR 2757—28—3,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4] FDR daily log,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also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5]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86]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7]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1.

[88] *Ibid.*, p.13.

[89] Rosenman quoted in Dallek, *Franklin D.Roosevelt*, p.568.

[90]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91]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92] Ibid.

[93] 当时美国南方在此地向北方投降。——译者注

[94]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9, 1944,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95] Letter, FDR to MacArthur, August 9, 1944, FDR Library.

[96]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97] “JCS to CINCPAC and CINCSOWESPAC,” March 12,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98]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61.

[99] Joint Staf Planners, Washington, to Staf Planners of CINCPAC, CINCSWPA, July 2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36.

[100]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p.612.

[101] Leahy memorandum to JCS, “Discussion of Pacific Strategy,” September 5, 1944. Includes summary of past meetings. Inserted into William D.Leahy diary after entry for August 3, 1944,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102] 曾经直接接触过几位参联会巨头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对这次檀香山会议总结道：“实际上并未做出明确决定——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但是在主要战略方面达成了一致……既然参联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继续问那个问题：‘吕宋、台湾，还是哪里？’那么其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这一高层共识的特别影响。” Morison, *Leyte*, vol.12, pp.10–11.——作者注

[103]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73.

[104] Ibid.

[105] CINCPAC to COMINCH, August 18,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42.

[106]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0,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107] Graves B.Erskine, oral history, CCOH Marine Corps Project, p.379.

[108] Joint Chiefs of Staf to Nimitz, MacArthur, September 9,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0.

[10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110] Letter, FDR to MacArthur, September 15, 1944, FDR Library.

[111] 地理代号已改为相应的地名。MacArthur to Chief of Staf, War Department, September 21,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362—63.

[112]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September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113]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 interview in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21, Spruance Paper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114] Ibid.

第二章

1942年初，当美国举国忙于战争动员时，亚历山大·P·德·塞维爾斯基发表了一份题为《空中制胜》的宣言。塞维爾斯基宣称，战略轰炸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最大的贡献，这让美国人眼前一亮，他们对在欧洲重演血腥地面战忧惧不已。这本书自然也就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单之首，卖出去500万本。第二年，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把它拍成了一部动画纪实电影，创作了小飞象邓波和小鹿斑比的制作团队拿出了他们的天才，用手绘彩色动画展现出了燃烧而绝望的轴心国城市。

塞维爾斯基是个宗教般信仰航空并四处布道的人。他还是个顶尖的飞机制造商，一个已经向美国陆军航空队出售了数千架飞机的企业家，他希望能在战争胜利之前再卖出几万架飞机。他的书大大地讨了其客户的欢心，被奉为圣经。但是塞维爾斯基的公司和美国海军并无往来，作者的这样一番评述或许能解释他对航空母舰的态度：“舰载航空兵在敌方的陆基航空兵面前必然是无力的，它们的‘基地’本身就极其脆弱。对敌人的海岸发动进攻曾是海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海军已经不再胜任这样的任务了。”^[1]

到1944年，塞维爾斯基的这一部分观点已经被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航母打击力量，即第58特混舰队的实战表现推翻了。这样的一支舰队在大洋上从未出现过，1945年之后则再未出现过，未来的作战舰队也很难再达到这样的规模。这支强大的无敌舰队通常拥有12~16艘航空母舰，以及为航母提供屏护的大批战列

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其庞大的规模令其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方大洋的霸主。第58特混舰队可以在30分钟内放飞超过1 000架飞机，前去攻击200英里以外的敌人，之后在飞机返航时安全回收。这些飞机可以用炸弹、鱼雷、火箭弹、.50口径机枪的燃烧弹以及凝固汽油弹打击敌人。它们在跑道上炸开弹坑，把敌人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消灭在宿舍里，对停放着的飞机轰炸扫射，把机场上的机库和维修车间化为燃烧的废墟。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中将曾如此对一位同僚说：“所有岛上都有这么多鬼子飞机。我们要打过去，直面他们，和他们一较高下。我知道我们会遭到损失，但我们比他们更强……现在即便他们找到我们，我也无所谓。我们可以去到任何地方，没有人能阻挡我。如果我杀过去消灭了他们所有的飞机，那些见鬼的岛就帮不了他们了。”[2]

这一时期，美军标准的舰载战斗机是格鲁曼F6F“地狱猫”，这种飞机空重9 000磅[3]，由一台强有力的2 000马力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驱动。“地狱猫”的飞行性能和战斗力都优于它的主要对手，重量轻得多的三菱零式战斗机。“地狱猫”的爬升率在1.4万英尺以下高度和零式战斗机相当，在高空则具有优势；在平飞和俯冲时，其速度同样能远超对手。“发动机的强大动力令我惊喜，”一位曾经驾驶过前一代F4F野猫式战斗机的老飞行员说，“飞机看起来就像是从甲板上一跃而起，它的起飞滑跑距离比‘野猫’短得多。一旦升空，这只‘地狱猫’仿佛就想要不停地爬高爬高爬高。”[4]机上的6挺.50口径机枪能够有效撕开零战的机翼。而得益于装甲钢板和自封闭油箱的保护，这种粗壮的格鲁曼战斗机能够在空战中承受相当程度的打击。经常有机翼和机身被子弹和炮弹破片打得满是伤痕的“地狱猫”回到航母上安全降落。

在一个典型的“进攻日”里，起床号在凌晨3点吹响。一名号

兵吹出代表今日要起飞执行任务的号声，通过舰上各处的大喇叭传出去，帆缆士官们随即吼起来：“起床号！起床号！起床号！所有人！起床！”^[5]于是，全舰立刻会响起一片开闭舱盖、关舱门，以及数百双脚从钢质甲板上走过的声响。机库甲板上又闷又热，到处弥漫着航空汽油和舰用重油的气味，弹药组在那里把炸弹和鱼雷搬起来，挂到轰炸机的机腹下方。随后飞机会被推上升降机抬升到飞行甲板上。所有飞机的机轮前方都放置了木头轮挡。之后，飞机发动机启动，炸弹也装上了引信。快到起飞时间时，大喇叭里就会传出命令：“飞行员，上飞机！”

一声令下，飞行人员们立刻从自己中队的待命室里蜂拥爬上楼梯，一边穿戴飞行装具和降落伞，一边把风镜戴到额头上。戴着风帽的甲板人员领着飞行员们穿过密密麻麻排列在甲板上的机群，找到自己的飞机。飞行员们爬上机翼，跃进座舱，系上安全带。在破晓前的黑暗中，座舱是个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洞，只有仪表的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芒，飞行员只能摸索着把手脚放到操纵杆和踏板上。随着“发动飞机！”命令的下达，启动器点火，飞机发动机开始喘振着噼啪作响，之后轰鸣着转动了起来。与此同时，螺旋桨开始旋转，越转越快，随即在飞行员面前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圆盘；发动机则有节奏地低吼着，蓝色的废气被向下排到了甲板上。随着航母转向迎风航向，巨大的舰体剧烈倾斜。随后，桅杆上升起红白两色的“F”字旗，表示飞行任务开始。当航母完成转弯，自然风向和航母全速航行的航向重合之时，一股狂风就会从头到尾横扫飞行甲板。拿着发光棒的甲板人员要站稳扶牢，保护自己不致被吹到旋转的螺旋桨上。他们还要把每一架飞机向前推动到起飞位置上。

随着地勤人员挥动发光棒，飞行员一边踩住刹车一边向前推动节流阀，发动机的吼声变得狂暴而震颤。飞行员此时要检查磁

发电机、发动机汽缸里的混合气体状态，以及螺旋桨桨距；他要扫一眼发动机仪表，确定油温和油压正常；然后把发动机转速提到2 700转/分钟，并看着进排气管的压力。接着，蓝色的火舌会从发动机排气管喷出，在引擎罩上发出黯淡的闪光。飞行甲板军官若觉得发动机的声音没问题，就会放下发光棒，指向甲板。飞行员便会松开刹车踏板，一股向前的冲量便立刻把他重重按在座椅靠背上。航母舰岛的暗影从他的右边闪过。飞机的尾轮首先离开甲板，之后是主起落架，“地狱猫”就此跃入空中，开始爬高。飞行员随后会拉动液压杆收起起落架并向左压坡度转弯，一只眼还要盯住俯仰角指示器，免得栽进下方黛色的大海里。

空袭作战以数十架甚至数百架“地狱猫”的战斗机扫荡拉开序幕，它们将在SB2C“地狱潜鸟”（又译“地狱俯冲者”）俯冲轰炸机和TBM“复仇者”鱼雷机到达之前把空中的敌机消灭干净。战斗机升空后会去“捋队形”（group grope），即在飞行过程中集结成编队。目光锐利的飞行员们寻找着飞机排气管发出的微弱蓝光，那是前一架飞机唯一可循的踪迹。在黑暗中编队飞行需要飞行员们持续调整速度、航向和高度，并始终注意防止眩晕或者迷失方向，这样极易导致坠机。他们戴上氧气面罩爬升到2万或3万英尺的高度，很快座舱里就会变得如同冻肉冷库那样寒冷，于是飞行员只能拍击戴着手套的双手，在座位上晃动身子，好让自己暖和一点。到了曙光初露时，海平线和周围的飞机出现在眼前，飞行员们才会稍稍感到轻松一些。自从参加飞行训练的第一天起，飞行员们就被告知“要经常转转脑袋”，因此他们一直瞪大眼睛，在天空各处搜寻敌机的踪影——前方、上方、下方、左边、右边，然后回到前方，再来一次。

接近目标时，他们会压低机头，加速冲过高炮弹幕。如果空中有敌机，那它们通常会出现在更低的高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战绩最高的“地狱猫”飞行员之一戴维·麦克坎贝尔说过，他们几乎总是在自己下方看到日本对手，这样便可以发动俯冲攻击。“地狱猫”战斗机解散队形，“冲下去就能击中一两架敌机……我们发动攻击，再拉起，保持我们的高度优势和速度，然后再来一次。如此反复，一轮接一轮”。[6]

1944年，“地狱猫”是太平洋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但这种飞机用途多样，充当轰炸机也没问题。试验很快证明，F6F在挂载和投掷炸弹时几乎和专门制造的俯冲轰炸机同样有效——但和俯冲轰炸机不同的是，一旦投掉炸弹，“地狱猫”就可以在空对空的较量中打败任何对手。这种飞机有时会挂载6枚HVAR-高速航空火箭弹（high-velocity aerial rocket），昵称“圣摩西”（Holy Moses）——这种武器在攻击某些地面目标时被证明比炸弹更管用。每一枚HVAR都装有5英寸战斗部，威力堪与5英寸舰炮比肩。如此，“地狱猫”在一次齐射6枚火箭弹时，其打击力可达到驱逐舰一轮侧舷齐射的水平。有时候“地狱猫”还会使用另一种火箭——10英尺长的“小蒂姆”，威力与一枚12英寸舰炮的炮弹相当。到战争后期，随着飞行员们的使用经验愈加丰富，这些空对地武器也愈加有效。

随着战火燃烧到西太平洋，F6F越来越多地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日本地面工事。凝固汽油弹是一种简单的燃烧武器，它在汽油里增加了胶状化合物，变得黏稠。它会附着在落地时遇到的任何表面上——碉堡、高射炮、停放的飞机，或者是人的皮肤——然后剧烈燃烧直至燃油耗尽。一枚在混凝土堡垒顶上燃烧的凝固汽油弹足以把守军逼出来，赶到开阔地上，紧跟在投弹长机后方的“地狱猫”就可以用机枪把他们扫倒。

F6F的多用途特性使其成为航母特混舰队中最有价值的飞机，指挥官们也纷纷要求提高航母上“地狱猫”的搭载比例。如此

一来，轰炸机中队的规模就要相应缩小了。到战争结束时，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的典型载机方案为96架飞机，包括12架SB2C、12架TBM和72架“地狱猫”。

一个长期以来的战术思想是，航空母舰无法与岸基航空兵匹敌——塞维尔斯基的畅销书里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和众多过时的理论一样，这一点也被雷达、防空火力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同时进步推翻了。现在，航母特混舰队可以充满信心地击退哪怕是最猛烈的空袭，米彻尔这样的指挥官也越来越敢于在敌占岛屿附近巡游。根据一直给米彻尔当参谋长的阿利·伯克的说法，作战“逐步从‘打了就跑’的打法转变为‘留下来决一雌雄’。这种战术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敌人的航空兵彻底消灭”。^[7]如此，特混舰队便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敌人航空兵的反击，但是得到大幅改进的雷达系统能在100英里外发现来袭敌机，并准确读出其高度、速度和航向。IFF（敌我识别，“Identification, friend or foe”）技术此时也已能够在雷达屏幕上可靠地区分敌我。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被输送到每一艘航母上的CIC（战斗情报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在那里，一名战斗机引导官（FDO）及其助手将会通过无线电呼叫在上空巡逻的“地狱猫”，引导其前去截击来袭的敌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这些战斗情报中心和防空战斗机已经能够熟练组织起几乎完美无瑕的防空截击。舰员们常常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如果某一架敌机设法突破了“地狱猫”防空战斗机群的铜墙铁壁，来到特混舰队的中心区域，它就会落入高射炮火的狂风暴雨之中。护航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高射炮会火力全开，从威力强大的远程5英寸/38倍径高炮，到新型的40mm四联装博福斯高炮，再到作为最后防线，只需要一个人就能瞄准开火的20mm厄利孔高炮，全都会加入这场合唱。VT引信或者叫“近炸引信”的

装备大大提升了高炮炮弹的杀伤力，引信上装有一台微型多普勒雷达，用以探测目标位置，一旦接近到足够距离便引爆。在1942年的航母对决中，舰艇需要依赖高速剧烈机动以躲避空袭——所谓的“蛇舞”动作——但是在1944年，特混舰队已经变得更大，碰撞的危险也激增，于是新的战术条令便降低了对操舵的关注度，转而更倚重炮火。人们开始认为，还是让军舰保持航向，由炮手们用致命的防空炮火把军舰保护起来更好些。

第58特混舰队是以高速为目的建起来的。它尽可以穿上童话里的“七联靴”[8]，在敌人觉察到其动向之前向任意方向前进数千英里。大型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CV）和小型的“独立级”轻型航母（CVL）能够一连数天在大洋上破浪而行，航速始终不低于23节，一旦开战则可以提速至超过30节。1943年“约克城号”航母在试航时，其航速峰值达到了34.9节——这是个惊人的速度，在航母史上前无古人。为航母护航的有新型艾奥瓦级（又译衣阿华级）“快速战列舰”，这一型4.5万吨的巨大海怪可以毫无压力地跟上节奏。米彻尔的“骑兵队”里没有“弩马”，所有老旧缓慢的舰艇都被甩给了两栖舰队或后勤舰队。第58特混舰队的高速度令其具备了良好的机动性和作战范围，这在一望无际的蓝色太平洋上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个巨大的游动航空兵基地，可以在大洋上尽情驰骋，在赤道两侧来回往复，在高低纬度之间任意游走。水兵们可能前一两天还戴着羊绒帽子和皮手套，穿着厚重的风衣，接着就在赤道骄阳的无情炙烤下，穿着半身被汗水湿透的工装裤赤膊工作。这支庞大的舰队可以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敌方海域。它们可以躲在锋面之下，跟随热带风暴北上，也可以藏身于昼夜分界线的夜暗一侧，在敌人未察觉的情况下突然打出雷霆万钧的一击。它们可能留在那里和敌人打上一阵，也可能退回大洋深处，在一千英里以外再次突然出

现，对另一个敌方目标施以毁灭性打击。它们到底会怎么做？日本人只能靠猜。

舰队在航行时会组成轮形阵，三四艘航母布置在中央，护航舰艇从大到小由内而外依次组成同心圆阵形。在一个典型的阵形中，两艘重型航母和两艘轻型航母在编队中央组成菱形队形，战列舰在航母左右两侧近距离贴身护卫，巡洋舰则位于东南西北四角。最外层是驱逐舰，这些多用途的小“铁皮罐头”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例如充当雷达哨舰、传令兵、防空火力平台、飞行员捞救者和潜艇杀手。为了迷惑和干扰敌方潜艇，舰队会走“之”字形航线，精确根据事先规定的时间间隔突然急转。所有军舰同时转弯，它们白色的尾迹会在大海上留出一片整齐的曲线。只需要一分半钟的时间，它们就可以完成90°转弯，稳定朝新的航向航行。这种协调一致的机动若要做得好，就需要每艘船都具有过硬的操舰技术，即便是最小的驱逐舰和辅助船也不例外。操舰军官要不停地微调航向和航速以保持军舰的阵位，他要随时紧紧盯住前方、两侧和后方的军舰。

白天，这样的转弯可以通过肉眼来掌控——但是在暗夜或者是恶劣天气下，能见度降为零，这时候再要确定友邻舰艇的位置，就只能靠盯住雷达室里的圆形显示器了。显示器上会有一条半径线像钟表的分针那样沿着圆周反复扫动，扫过回波信号时会留下逐步消散的浅绿色“雪花”和暗绿色“光点”。军舰转弯时，雷达兵必须盯住这些邻近的光点，并不断向舰桥发出修正航向和航速的信息，严防这些光点挪动到显示屏的中央位置。这种时候，雷达室简直就成了一个高压锅。夜晚，舷窗和舱盖都得关紧，免得灯光漏出去暴露自身的位置，这里就成了汗流浹背、密不透风的闷罐。空气中弥漫着烟味，人们的军服全都被汗水湿透。尤其是在出击前的夜晚，特混舰队会在夜色中以30节的高速航行，此

时雷达显示器的操作员更是一刻也不敢把眼睛从显示器上挪开。许多人需要很努力才能保持冷静。驱逐舰“戴尔号”上的一名水兵回忆过一次在这样的夜色里与灾难擦肩而过的经历。当时另一艘驱逐舰出人意料地突然转弯，眼见高速碰撞几乎不可避免，“戴尔号”的操舰军官下令让两台发动机以1/3动力倒退，以避免那艘舰。舰上的螺旋桨猛烈击打着海水，舰体不住地震动和颤抖，仿佛所有的铆接处都要解体一样；它的舰尾冲进了自己的尾流，在海面上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拼命晃动。最后，那艘撞过来的友舰从它前方300英尺处开了过去，有惊无险。[9]

第58特混舰队规模太庞大了，而且随着新服役的舰艇陆续来到太平洋，它的规模还在不断膨胀，这支舰队已经无法组成单一的轮形阵执行任务了。于是这支舰队被拆分为若干个“特混大队”，大队本身就是一个小些的轮形阵舰队。每支特混大队集中编组，统一行动，在一名少将的指挥下半独立作战。这些大队可以脱离主队独自加油或者执行航空兵作战任务，也可以被米彻尔将军指派去攻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各特混大队中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能被抽调出来组成传统的水面作战舰队，派往舰队主力前方去和日军舰队打一场传统的水面炮战，或者轰击敌人的岸上工事。不过，更多的情况下，这些特混大队（3~5支不等）会以15~20英里的间距集中行动，以发挥最大的力量，同时又能够相互支援。

当这支庞大的“舰队集群”集中行动时，那就一眼望不到边了，即便是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也看不到尽头。若有人从环形队形中一艘航母的舰桥上往外看，他会发现自己周围目力所及之处，满眼都是大小不一、类型各异的灰色钢铁战舰，延伸至海平线之外。位于邻近特混大队队形中央的航空母舰那极富特色的舰

影已然在极远处，或许只有上层建筑还显露在海平线以上。侦察机会在200英里或250英里半径的区域里按楔形航线飞行，这样舰队就能“看到”各个方向海平面以外的情况。在晴朗的白天，方圆500英里范围内蓝色洋面上的任何东西都将无所遁形。夜晚，动力强劲的涡轮机会在各个方向上搅起数英里大海中的浮游生物，大海便会被绿莹莹的磷光点亮——有人说这些磷光的亮度足以让人看报纸。高射炮手一直驻守在炮位旁，他们把钢盔推到脑后，救生衣挂在脖子上，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搜索着敌机。海面上间或闪出一阵光，那是有军舰在向友舰发出灯光信号。

这支舰队可以在海上一连航行数周乃至数月，这令其原本已前所未有的机动能力如虎添翼。第58特混舰队的支援和补给任务由太平洋舰队后勤司令部承担，这支后勤部队的规模是先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就和当年的战争通讯员们一样，后世的历史学者也没能激起读者们对后勤的兴趣。但后勤实际上却是驱动这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到西太平洋深处的火车头，是盟军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正如海军专业人士在战时一直提醒战争通讯员，战后一直提醒历史学者的那样）后勤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基石。

到1944年春，太平洋上的战线已经推进到夏威夷以西很远距离之外，珍珠港已经太远，无法再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作战基地。舰队只能栖身于距离美国海军现有任何岸基设施都有数千英里的中太平洋上的偏僻环礁群。马绍尔群岛中的埃尼威托克、夸贾林和马朱罗，都是这种巨大的环形礁盘，其周围是低矮的珊瑚沙，也就是千万年来珊瑚们留下的遗骸。这些珊瑚沙围成了很浅但是巨大的潟湖，足以容纳数百艘舰船停泊。这些高出水面10~15英尺的细长岛礁成了天然的防波堤，保护舰队免受太平洋上持续涌浪的侵扰。但是其陆地面积太小，无法挡住狂风的侵袭，因此这些潟湖在风暴来临时也很难维持平静，停泊其中的军舰常

常被吹离锚地，搁浅到附近的浅滩上。

这些岛屿本身提供不了食物、淡水和其他原材料，岛上有的只有珊瑚礁，它们可以被砸碎，做成高标准的混凝土，用以建造机场、道路和码头。但岸上实际上并没有太多这种建设需求，因为“浮动的后勤队”足以满足一个前进舰队基地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支由油迹斑斑的运输船、油轮和辅助船组成的看似不起眼的舰队会在简陋的锚地下锚列队，为作战舰队提供所有必需的维修和补给勤务。除了最严重的战斗毁伤之外，所有的损伤都可以在移动浮船坞内完成维修。一支源源不断的航运大军将这些前哨基地和珍珠港乃至北美洲西海岸联结在了一起。这往来穿梭的“舰队尾巴”包括货轮、民用油轮、运兵船、舰队油轮、弹药船、医院船、布雷舰、扫雷舰、冷藏船、潜艇支援舰、水上飞机支援舰，以及护航航母或者说是“吉普”航母（CVE）。它们满载着燃油、弹药、补给物资、零备件、补充飞机，以及刚刚完成训练、准备接替老兵们上阵打仗的新兵。

第58特混舰队惊人的作战距离和机动性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这些锚地的战略位置，但或许更要归功于一套被称为“海上补给”的技术。舰队可以在海上加油、装载补给物资，最后还能补充弹药。1944年4月，“海上后勤大队”在太平洋美军最西边的埃尼威托克基地开张，这支大队拥有34艘2.5万吨舰队油轮，11艘护航航母，19艘驱逐舰，以及26艘护航驱逐舰。一支由12艘以上油轮组成的纵队在驱逐舰的护航下从埃尼威托克井然有序地开出，去与第58特混舰队会合。一名驱逐舰上的水兵回忆过一列油轮从海平线上开来，准备为舰队加油的场面，它们在舰队旁排成一行，如同“桥头排成一排的收费站”一般。

[10]空气中飘来一股重油的恶臭，下风一英里外都能闻到。1942年时，在恶劣海况下加油曾是航母作战的禁忌，这常常会导致严

重的延误——但是现在，经过了超过两年的实战经验和训练，舰员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需要加油的舰船会从油轮后方开来靠到其侧舷，以9节或10节的航速平行行驶，彼此保持30英尺的间距。之后，钩爪和电话线会被抛到对面船上，接着输油管被拖过去，绑扎在加油口的阀门上，之后油轮开动油泵，燃油便源源涌入。然而当涌浪袭来，两艘舰船都会剧烈摇摆，此时输油管就会被甩来甩去，随时可能被甩脱。“把油管从一艘船拖到另一艘船，就像是从树上拖下来一条大蛇，”一位目击者如此写道，“它翻滚、扭动、挣扎，玩命抵抗，即便被绑到了受油管上，也拼命想要挣脱。”^[11]两艘舰船上的舵手都在不停调整航向，以保证彼此精准地平行前进。两艘船的船头并肩向前，就如同漏斗一般，令汹涌的海水在其间归于平和。当受油舰的油槽装满之后，它就会解开输油管，逐步加速脱离，另一艘军舰则从后方靠上来。流程如此往复，直至舰队所有的舰艇都加满了油为止。

1943年秋到1944年春之间，随着新服役的快速航母和护航舰艇从美国本土不断来到太平洋，第58特混舰队的实力与日俱增。这支快速壮大的力量向世人证明，原来一支舰队也能具有如此空前的战术机动性，在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东征西讨，在长达5 000英里的战线上攻击各处日军目标。这一时期，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会为所有的主要两栖进攻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无论是尼米兹的战区还是麦克阿瑟的战区皆如此，有时它们还会一个星期里在赤道南北接连发动打击。1943年11月，一支特混大队被派往南线打击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其余部队则掩护对吉尔伯特群岛中塔拉瓦、马金两个环礁的登陆。之后，航母特混舰队重新集合，杀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央，发动了一连串猛烈空袭，直至1944年2月美军完成“燧发枪”登陆战役才告结束。当月晚些时候，第58特混舰队发动了截至当时最大胆的一次冒险——“冰

雷”作战，突袭日本设在本土之外最大的海军基地，特鲁克环礁。在两天的空袭中，美军舰载机摧毁了249架日军飞机（大部分是在地面上摧毁的），击沉船舶20万吨。北返途中，舰队顺道空袭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罗塔岛，之后再次南下，空袭了东距特鲁克1 200英里，西距菲律宾仅仅575英里的帕劳群岛。4月，第58特混舰队各部深入赤道以南，支援麦克阿瑟将军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荷兰迪亚的推进，空袭并摧毁了这一区域所有的日军机场。向北返航途中，舰队仿佛是突发奇想，再次向西拐了一道弯，花了两天时间，把特鲁克和帕劳群岛彻底炸成了废墟。

舰队的指挥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性格沉静，还有些腼腆。他中等身高，身形健硕，穿着合身的卡其色军装和油光铮亮的鞋子。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金色短发已经开始变白。他的皮肤由于长期阳光照射而显出了一副古铜色。他已经57岁了，但看起来却像是47岁。有人觉得他长得很像已故的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12\]](#)

战争爆发时，斯普鲁恩斯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少将，在哈尔西的航母特混舰队里指挥一支巡洋舰分队。但在1942年6月，两件意外令他的职业生涯扶摇直上。先是哈尔西被严重的皮炎放倒，他便临时接掌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为核心的第16特混舰队。在此任上，斯普鲁恩斯打赢了1942年6月4日至6日的中途岛海战，成为这场不朽胜利的主要功臣。紧接着，他又被尼米兹召回岸上，担任其参谋长，他将在这个实权职位上供职超过一年。1942年6月到1943年7月担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期间，他一直住在珍珠港马卡拉帕山尼米兹寓所二楼的一间简单的小卧室里。这令两位将领越走越近，无论是专业协作还是个人关系皆如此。当斯普鲁恩斯在司令部的任期结束时，尼米兹选择了他作为第5舰队司令，这是美国海军最庞大也最重要的海上作战部队。

（从更大范围看，这还是世界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支舰队。）尼米兹相信斯普鲁恩斯，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也是为什么尼米兹决定把这支出海作战的舰队交给他来指挥。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参谋军官评论道：“将军觉得现在可以把雷蒙德派出去了。他俩已经到了言谈举止都相像的地步了。”^[13]

斯普鲁恩斯虽然是米彻尔将军的上级，但是他常常放手把第5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权交给这位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不起眼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被编入米彻尔麾下以埃塞克斯级重型航母“列克星敦号”（CV-16）为核心的第58.3特混大队里，只是其环形护航舰队中的一员。有时候，当第58特混舰队一连数天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高速行进时，斯普鲁恩斯根本不操什么心，甚至什么事都不做，不下任何重要决定，甚至完全不和米彻尔联系，即便两艘旗舰相距仅仅1/4英里而已。

第5舰队参谋长“卡尔”查尔斯·穆尔后来对自己上司古怪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进行了坦率的描述。斯普鲁恩斯完全不是那种传统的战时舰队司令。他冷漠、内向而淡泊。他常说太平洋战争“很有趣”。作为一个健身狂，斯普鲁恩斯说自己要是每天不步行个5英里，就脑子想不清，晚上睡不着。在海上的平常日子里，斯普鲁恩斯每天都要围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舢板来回走上三四个小时，穿着印有夏威夷大花的浴袍，不穿衬衫，白袜子和平时常穿的黑皮鞋也不见踪影。

斯普鲁恩斯不怎么关注管理细节，把这些事交给下属去操心就好了。有时候穆尔想要找斯普鲁恩斯商讨一些事项，但斯普鲁恩斯又不想关注它，于是他就干脆不搭理。他会走出司令部舰桥到甲板上例行散步，抑或回到自己的舱室里闭门读书。“他从来不会激动或者兴奋，当我发脾气时，他也从来不以为意，”穆尔在1944年初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写道，“当他不做什么事的时候

候，他就假装没听见，回房睡觉或者出去走路，就是不答复你。”[14]

斯普鲁恩斯对待睡眠是毫不含糊。他每晚都想要睡八九个小时，常常早晨8点还没起床。即便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30节高速驶入敌方水域，舰员们都紧张得睡不着的时候，这位将军仍然睡得很香。有一天晚上，穆尔把他摇醒，告诉他雷达发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

“好吧，”斯普鲁恩斯躺在床上问道，“这事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没有。”穆尔答道。

“那为什么要把我喊醒？你知道我不喜欢半夜被人喊醒。”他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了。[15]

第5舰队的幕僚们都喜欢对别人讲他们司令官每天的饮食，他对这方面的关注可是事无巨细。斯普鲁恩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先洗个冷水澡。他在喝完早晨的咖啡之前一言不发，不过他对食堂里那些被称为海军“乔”的焦糖咖啡嗤之以鼻。他只喝用高等级夏威夷科纳咖啡豆煮出来的新鲜咖啡。这位将军不相信食堂的勤务人员能煮得好，于是干脆自己动手，用他自己的手摇咖啡研磨机磨咖啡豆，然后放在桌上的茶炉里煮。他早餐要喝三小杯咖啡，之后就不再喝了。他在饮食方面自律而有节制。“他[早餐]要吃几片烤面包，有的话还吃点葡萄干，”他的副官查尔斯·F.巴伯说，“午餐是一碗汤和一大盘沙拉。我常常在午餐前提醒访客，他们能吃到的东西只有这些。”[16]晚餐很用心，因为斯普鲁恩斯习惯于每晚在军舰上绕圈子散步。晚餐他会吃牛排和简单切片的洋葱，他觉得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

斯普鲁恩斯严格要求周围的人服装整洁，尤其是在他的个人

空间里。有一次穆尔把脚放在他指挥舱的椅子上，被他训了一顿。

“甲板很干净，”穆尔回应道，“就和这椅子一样干净。”

斯普鲁恩斯在坐下来之前特地用手擦了擦椅子，说：“我可不想让你脚上的脏东西弄到我的裤子上。”^[17]

在一些私下的交流中，斯普鲁恩斯批评他的老朋友比尔·哈尔西对新闻记者说话时太随意了。他相信哈尔西这样会让自己被媒体“利用”，于是决定不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1943年秋刚刚被任命为第5舰队司令时，他不允许任何战争通讯员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但他到任时，恰逢华盛顿方面开始提升海军的公共形象。海军部次长吉姆·福莱斯特尤其重视此事，他要求海军所有主要将领提高与媒体交流的质量、数量和及时性。珍珠港的记者们对这位神秘的四星上将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采访申请纷至沓来。“他拒绝和任何战争通讯员见面，”穆尔说，“直到我成功让他认识到这是他的职责。”^[18]

到了最后面见记者的时候，他的表现冷峻而一板一眼。他讲的都是些后勤方面的细枝末节，这个话题根本激不起记者们的兴趣。他的发言不带任何情绪，这样记者们便无从勾勒他的性格和指挥风格。问题是有些记者会发挥想象力来填补这些空白。1944年1月号的《科利尔》说斯普鲁恩斯是个努力拼命的工作狂：“斯普鲁恩斯将军只要不在步行，就在拼命——他自己拼命，要他的下级拼命，要他的军舰拼命，敌人也拼命。他是个工作的魔鬼。”^[19]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桥上，穆尔一次次重复这句话，来逗这位上将：工作的魔鬼！数年后，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穆尔重读《科利尔》的这篇报道时大笑了起来：“他是你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才不想工作。他讨厌写任何东西。他也不

拼命——你能看出来，他没有要我拼命，他想要我什么都不做，对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他没有让他的船去拼命。不过接敌的时候，他确实会逼着敌人拼命。这个家伙让你们觉得这里有个吃苦耐劳，热情满满，要所有人拼命的人，但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20\]](#)

1944年6月，当第5舰队奔赴马里亚纳群岛，准备发动登陆进攻时，斯普鲁恩斯古铜色的脸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机械人》。《时代》杂志称他是“冷峻而精于计算的机械人”，更像是个技术人员而非勇士。当这本杂志被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指挥舰桥上时，斯普鲁恩斯把它藏了起来。但这个家伙没能成功，穆尔又从别处搞到了一本，而且通过军舰上的广播系统把这一段文字大声读了出去。后来，穆尔给他的妻子（她和丈夫一样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老友）写信，用更严肃的语气指出，《时代》杂志简明扼要地点出了这位第5舰队司令的特点。“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会给出一个更好的对他的描述，但是我觉得公众和这个舰队里的几万人像《时代》形容的这样看待他也挺好。《时代》给他安的这些军事才能并非虚言，只不过他并非冷峻无情，而是腼腆害羞。”[\[21\]](#)

假如斯普鲁恩斯真的是为了逃避工作，就像他至少在战后的一封信件里随口自称的那样，那他真是把懒惰变成美德了。[\[22\]](#)他坚持向下授权，倾向于让下属尽可能发挥所长。他让自己的思维摆脱细节的困扰，聚焦于宏观的视角之上；他不愿为小事费神，因为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他每天5英里的甲板散步令他保持着良好的健康和精气神。锻炼身体有助于保持良好睡眠，即便是在敌方水域连续作战的重压之下也是如此。当舰队的其他人已经筋疲力尽，濒临崩溃时，斯普鲁恩斯仍能保持精神抖擞、睡眠充足。他在海上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如果我不

锻炼，感觉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会感到紧张，精神会压抑……我现在处于巅峰状态，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以做好我的工作，毕竟，这是个重要的工作。”[23]

随着新的海上补给能力大大延长了舰队远洋巡航的时间，这种哲学中的智慧不言而喻。军事和医疗方面的专家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指挥人员疲劳”带来的难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随时关注出海作战的指挥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944年夏季时有一名访客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他说第5舰队的参谋军官们“一眼看去累得像狗”。他们似乎早就该回到陆地上休个长假了。但是年龄比指挥部里任何其他人都大的斯普鲁恩斯，反而显得睡眠充足，健康而敏锐。[24]

在马里亚纳战役开始的时候，一位同僚提醒斯普鲁恩斯：“每个指挥官都必须是个赌徒。”若真如此，那斯普鲁恩斯就是个反例，他想要当个“专业型”的赌徒，因为他想让“我下注的所有赔率都要对我有利”。[25]他不相信那种不必要的冒险，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已进入后期，美军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且优势还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因此，他最想做的是保护塞班岛的滩头，以及外海上那些脆弱的两栖舰队。1944年6月18日夜間，当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向美军逼近时，米彻尔将军请求准许他率领第58特混舰队西进截击。由于担心日军向美军滩头发动决死攻击（虽然这个风险还很遥远），斯普鲁恩斯拒绝了这一请求。6月19日上午，日军航母舰队向第5舰队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空袭。在持续了几乎一整天的被称为“马里亚纳猎火鸡”的空战中，F6F“地狱猫”机群迎战了来袭日机并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将超过300架日本飞机打成了火球。但是此时第58特混舰队的位置过于偏东，无法向日军舰队发动反击。后来经过了长达24小时的追

击，米彻尔航母上的飞行员们最终还是在6月20日傍晚击沉了敌方两艘舰队油轮和一艘航空母舰，但日军的大部分舰队还是逃出生天，得以另候时机杀回再战。

在这场两天的“马里亚纳海战”之后，斯普鲁恩斯保守的战术指挥饱受争议。批评者指责他忘记或者忽略了航母作战的首要原则——先下手为强。而根据海军航空兵军官们的看法，这次战役中6月18日晚间能否西进加倍重要，因为这一水域的贸易风主要来自东边，航母在昼间常常需要转向东方航行以收放飞机，故而难以西进。斯普鲁恩斯精密算计之后做出的决定竟是把第58特混舰队拴在塞班岛近旁，让日军首先发动空中打击，同时把自己的航母部队布置在反击距离之外。在航母作战的历史上（当然，这个历史也不长），这样的决定还从来没见过。

在批评斯普鲁恩斯的人眼里，他的战术不仅错误，而且错得离谱，不可原谅。米彻尔的参谋长阿利·伯克后来回忆说，这个决定令他和他的战友们“心碎”。美国人原本已经抓住了彻底消灭日本海军全部进攻力量的机会，却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一争议在美国海军各个层级上给传统战列线军官（主要在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上服役，被称为“黑鞋族”）和新兴的专业航空兵军官队伍（被称为“棕鞋族”）之间带来了裂痕。“棕鞋族”声称像斯普鲁恩斯这样的“黑鞋族”没有资格去指挥快速航母特混舰队，因为他对于舰载航空兵带来的新能力缺乏天然的感觉。这一争议掺杂了兵种偏见，又被个人的野心所扭曲，变得格外尖锐。“棕鞋族”中越来越多的上校和少将坚持认为斯普鲁恩斯必须走人，他们想要去试探合理批评自己上级指挥官的界限，或者说是兵变的界限。次月，金和尼米兹造访了马里亚纳群岛，二人明确表态支持斯普鲁恩斯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从而平息了要赶他下台的议论。但这种争论还将在珍珠港和华盛顿不停歇地持续下去。

1944年8月发生了重要的指挥层调整。从1942年10月起就一直在南太平洋担任小战区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的哈尔西将军，被调到北边来接替斯普鲁恩斯。交接工作将在马里亚纳战役结束后开始。斯普鲁恩斯和他的幕僚团队将要满载荣誉离开战场，然后返回珍珠港去规划未来的作战行动。哈尔西将要指挥这支舰队直至1945年1月，之后再次由斯普鲁恩斯接掌指挥权。这一变更将每隔五六个月重复一次，直至战争结束。一位将领带着幕僚班子在海上指挥作战，另一位则在岸上规划下一轮登陆作战和航母进攻。多少有些迷惑性的是，哈尔西接手指挥时，第5舰队将改称为第3舰队，第58特混舰队也同步改称为第38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回来后，舰队就又会改回第5舰队和第58特混舰队。虽然编号来回变动，但实际上却还是同一支舰队。这个策略也是为了诱导日本人相信美军有两支独立的舰队在太平洋轮番作战。事实证明这一点成功了，至少初期是如此。日本的民用无线电广播有时会同时提到第5舰队和第3舰队，谈论它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26]

这种“两套班子”指挥模式的优点很明显。斯普鲁恩斯或许具有格外突出的耐受力，但也不能指望他和他的团队一刻不停地无限期待在海上。战线已经向西推进了如此之远，想让舰队每打赢一场战斗就回到珍珠港也是不现实的。随着美军突入日本的内层防御圈，让太平洋舰队保持与敌不间断作战便十分重要了。航空兵作战将会无休无止，一轮接着一轮。但舰队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直接参与制订新一轮的作战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舰队确实需要有一个班子在岸上司令部工作，另一个班子在海上作战。[27]

但也有人质疑这套舰队轮流指挥的体系是否明智。他们用了两个类比来形容这一安排，这两个类比在当时和战后的相关叙述

中都被广为使用。第一个类比是：“两个车夫，同一群马。”第二个则难免和橄榄球有关：“两个后卫，一个前锋。”在两个比喻中，马或者是前锋确实值得担心，因为没有机会休息。根据曾在1945年指挥一支航母特混大队的阿瑟·拉福德少将的说法：“马儿们有时会想，这辛苦一阵就能休息的车夫，是否真的能够理解这些船上一连数月天天在海上不换班的舰员的精神崩溃。”^[28]

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哈尔西的团队是否已经准备就绪？斯普鲁恩斯和他的团队有了一年难得的实战经验，已经达到了精熟状态。而哈尔西和他默契的幕僚班子则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岸上司令部里干了近两年。哈尔西自从1942年的晦暗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海指挥过。而就在这一段空白期里，技术和战术条令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和他的团队有太多东西要去学习，而海战这所学校却严酷而毫无宽容。

指挥南太平洋战区期间，哈尔西为自己赢得了富有感召力，行事高调，是个喜欢聚光灯的勇士的名声，他就是海军的乔治·S·巴顿。他在军人们和内部文件中的绰号“公牛”很快被报界广为传播。他对记者们充满热情，而且总是金句频出。他那段对日本人的血淋淋的狠话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不光是太平洋上的盟军官兵如此，美国国内的民众也是一样。和许多名角儿一样，他也有一句名言。“赢得战争的方式，”他说，“就是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杀死更多的日本鬼。”^[29]他发过这样一封电报：“让他们去死。”提到日本人对美国战俘的暴行时，他恶狠狠地宣布：“他们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他告诉媒体，他想要骑上裕仁天皇那匹著名的白马，穿上和天皇一样的服装，走上东京街头，亲口宣布：“你们已时日无多。”^[30]哈尔西先说后想的作风过去也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最有名的是他曾经草率地预言盟军将在1943年底彻底赢得太平洋战争，三个月后他又不得不撤回这个敏感的

预言，而他的撤回反而被日本官方新闻媒体抓住，大加利用。他后悔自己在报纸上“许多次把自己搞得跟猴子一样”[31]，发誓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32]但是斯普鲁恩斯私下里却忧心“对哈尔西的宣传报道已经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而且怀疑（不幸被他说中了）他这位将军僚友是否会在此压力之下“把自己变成光芒万丈的公众人物，而不再听从他那绝佳的军事判断力”。[33]

有一位战争通讯员在1944年中期结识了哈尔西核心幕僚圈子里的军官，他说这些人总是精神亢奋。“哈尔西一直不停地逗趣，哈尔西手下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总是很开心。”[34]这个调子是他们的老大定下来的。他是个粗俗、大嗓门、爱开玩笑的四星上将。人家拿他开玩笑，他开怀大笑；对于敌人他则唇枪舌剑，火力全开。他的幕僚班子以“米克”罗伯特·卡尼为首，他们自称为“阴谋诡计部”。他们对哈尔西高度忠诚，哈尔西对他们也是一样。自然，他们都想跟随自己的“比尔将军”去进行下一场远征，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第3舰队司令部里的岗位对于任何有雄心的军官来说都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而哈尔西也不想在这个时候遣散自己的左膀右臂。如上这些，毫无疑问促使他下定决心，1944年6月16日启程离开努美阿前往夏威夷时也带来了原来南太平洋司令部的一大群幕僚。当他们来到设在珍珠港海军造船厂里的第3舰队临时司令部时，其军官和士兵的数量超过了100人，还有更多的人将在8月指挥权交接之前陆续从南太平洋赶来。但是自从前一年埃塞克斯级快速航母加入以来，这些人中却没几个在舰队里服役过。哈尔西第3舰队司令部的规模几乎是斯普鲁恩斯团队的两倍，若不是尼米兹坚持要限制人数，这个数量还会更大。

在特混大队的层面上同样会进行人事变更。米彻尔在清除表现不佳的指挥官时毫不手软，自从1944年1月开始掌管第58特混

舰队以来，他已经赶走了三位特混大队指挥官。那些刚刚晋升上来的新一代航空兵将领都在盯着这些海军中最具声望的职位。于是，当他们想尽办法争夺这些职位的时候，雄心壮志、个人竞争，以及“棕鞋族”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便纷纷掺杂了进来。大部分新的特混大队指挥官都是1916—1919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资历比那些在舰队里指挥战列舰和巡洋舰的“黑鞋族”将领低得多。统领战列舰部队的“大下巴”威利斯·李中将1908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比斯普鲁恩斯只低了两届。他的年资比指挥各个特混大队的人高了10年，可他和手下战列舰舰长却不得不听命于这些人。这样的指挥结构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黑鞋族”指挥官已经接受了航空母舰快速崛起的事实，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他们也不再坚持那种按毕业年份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金上将决意要把太平洋方面最高层级的人事任命抓在自己手里。他的做法是人员轮替：把舰队的将领调回华盛顿负责行政管理和计划制订工作，并把总部的其他人派到舰队去。这一政策是明智而且公正的，但也意味着那些先前还在华盛顿当“飞行办公桌”的人突然就被甩到了重要的海上指挥岗位上，即便他们近期没有在舰队任职的经验。有鉴于技术和战术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向前演进，他们将会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和掌握。8月10日，第5舰队在一连两个月马不停蹄地支援马里亚纳群岛进攻作战之后，回到了埃尼威托克环礁，几位新任命的特混大队司令也飞抵此地，从其前任手中把指挥权接了过来。最近在金手下担任分管航空的副海军作战部长的“旋风”约翰·S.麦凯恩中将，接替“乔克”约瑟夫·克拉克担任第58.1特混大队司令。他的旗舰是“黄蜂号”。“泰德”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接替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指挥第58.3特混大队，他在“埃塞克斯号”上升起了将旗。杰拉尔德·博根继续指挥第58.2特混大队，他的旗舰是“邦克山号”；拉尔夫·戴维

森则坐镇“富兰克林号”，他是第58.4特混大队司令。他们都被告知舰队指挥权将在8月26日中午进行交接。斯普鲁恩斯将会带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返回珍珠港，“新泽西号”战列舰则会在9月第一周里带着哈尔西来到西太平洋。

米彻尔将军迟早也需要休息。舰队的随军医生已经从他身上发现了不少精神疲劳的迹象：米彻尔在6个月里瘦了15磅，由于他本来就和赛马骑手差不多瘦，这样的体重下降是他无法承受的。但是要替换米彻尔却会带来一个难题。在华盛顿和珍珠港，都有不少野心勃勃的“棕鞋族”将领对这个职位垂涎欲滴。但是具有米彻尔的军衔和年资的在役海军航空兵将领本来就没几个，这些人中指挥过新型航母出海作战的更是一个都没有。米彻尔倾向于从现有的特混大队指挥官中提拔一人来担当此职：他推荐了“泰德”谢尔曼。但是谢尔曼在开战时还只是个上校，将如此低年资的将领晋升至高级指挥岗位，将会引发妒忌和抵制。

金最终选择了约翰·麦凯恩来担任这一职务。麦凯恩是个年资很高的中将，他1906年就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在华盛顿，他是金最信任的副作战部长之一。瓜岛战役时，他曾是南太平洋航空兵司令，后来又担任海军部下属的航空局局长。与金和哈尔西一样，他也是航空兵的后来者——所有这三位将领都是在50岁以后担任上校时接受的飞行训练，目的仅仅是获得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而那些“真正的棕鞋族”从一开始就是飞行员，然后一路晋升，这些人并不把那些“新来的乔尼”真正视为自己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麦凯恩接替米彻尔担任第38特混舰队司令的消息感到迷惑和不安。

按计划，米彻尔还将在舰队里继续待到11月，在这期间麦凯恩将作为其下属的特混大队司令获得三个月的适应期。第38特混舰队下辖4个特混大队，麦凯恩指挥其中之一。他的前任指挥

官，“乔克”克拉克将留在“大黄蜂号”上，一旦有需要，他将从“大黄蜂号”上飞行一小段路来到“黄蜂号”，给新上司出谋划策。混杂英语中有个词叫“Makee-learner”（实习生），现在美国海军就用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在职训练的做法。麦凯恩无法继承米彻尔那经验丰富的幕僚班子，因此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任务：从零开始组建新团队。但是许多拥有关键实战知识的军官即将休假，或者被调往其他将领帐下，或者二者兼有。这令他的人员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要知道，麦凯恩的年资比米彻尔高4年，他对约翰·托尔斯说，自己觉得似乎是有人想要“割断他的喉咙”。^[35]在先前美国海军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高出来的4年年资都足以让所有这样的争议结果对麦凯恩有利。但是在这场宏大而残酷的战争的重压之下，诸多旧传统都已被抛诸一旁。现在需要的是务实的解决办法。尼米兹在礼貌地倾听了麦凯恩的讲述之后，告诉他，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好就行了。

舰队在埃尼威托克休整时，水兵和军官们就要上岸“解放”一阵了。于是两个小岛被指定成了休闲区，一个服务军官，另一个服务士兵。岛上发啤酒，每人两听，不过黑市上的酒类供应也很充足，军官休闲区那个小岛更是如此。8月中旬的一天，“大黄蜂号”上一队吃饱喝足的飞行人员站在码头上，等候一条汽艇来把他们送回母舰。然后这群人就打闹起来了。一个少尉被推进了潟湖里。他游回岸上，沿着码头冲了回来，想要“报仇”，结果又有几十个人掉进了水里。很快，凡是卡其色军装没有湿的人都成了靶子。即便是“大黄蜂号”的舰载机大队长“哈尔”哈罗德·L.比尔中校也被抓住双手双脚扔进了潟湖里。不过他一点都不介意。“不管怎么说，”他写道，“这就是找乐子，而且掉进水里能让喝了一下午的酒清醒过来。”^[36]

浑身滴着水回到码头后，比尔看到一个白头发的小个子被径直丢进了潟湖。比尔认出他是麦凯恩将军的时候，他已经被扔出去了。海军的礼仪规范在有些环境下可以不那么严格，但总的来说，喝醉的航空兵对一位三星中将动手，还把他扔进海里，这是不允许的。比尔大声喝止，但太晚了。他和其他几个人立刻跟着麦凯恩跳了下去：

我们抓住他并扶他站起来时，他气喘吁吁地说：“找我的帽子，孩子们，找我的帽子。”他这顶帽子是特殊款的野战软帽，镶有金色饰带和金穗纹章，几乎已被海上咸涩的空气变成绿色，这是他的幸运帽，在舰队飞行员中间很有名。我们找回了帽子，带将军回到了码头，并为我们的行为向他表达了最深刻的歉意……他是个小个子，弱不禁风的样子，看起来一阵狂风就能把他吹走。他身上还在滴着海水，挂着海藻和珊瑚沙，他咧嘴笑着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而我们还在不停向他道歉。他要了一根没被浸湿的香烟，点着，对我们说能回到他的“斗士们”身边真是太好了。他蓝色的眼睛在满是皱纹的脸上闪闪发光，鼻子和耳朵透着一股英雄气，他看起来整个就像是个魔法小精灵。

小艇开过来时，第一批小艇中有一艘是麦凯恩的摩托汽艇。这艘艇通体雪白，一尘不染，黄铜将星闪着光芒，蓝色三星旗在艇上飘扬，这场面真漂亮。将军和他的小伙子们聊得正欢，还不想散场。于是他要我们和他一起上船，他可以把我们带到自己船上。这艘干净的汽艇的艇员们一定很失望，将军带着十几个湿漉漉、脏兮兮的飞行员一起上了艇。之后我们在港内的大群战舰中转了一圈，把所有飞行员都送到了舰上。[37]

8月28日，已经完成改编的第38特混舰队从埃尼威托克出击。一如往常，舰队的离港是个漫长而复杂，需要事先编排妥当的过程：驱逐舰和巡洋舰在航母之前穿过出口处的深水水道离港，之后立即打开声呐搜索敌人潜艇。所有舰艇全部高速行驶——越快越好，离开日本潜艇出没的危险的出入口水域——并在不改变行进速度的情况下集结成巡航队形。米彻尔的舰队现已齐装满员，拥有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和8艘轻型航母，编成四支特混大队，搭载飞机总数超过1 000架。这次出击将会是快速航母特混舰队长达一年的历史上最持久、最富野心的一次。

打开太平洋的地图，可以看到一条长达3 000英里的岛群组成的弧线从日本本土，到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一路延伸到菲律宾群岛南部。现在美军已经拿下了马里亚纳群岛，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这条弧形岛链的整个南半部。第38特混舰队将为在加罗林和帕劳群岛诸岛登陆的“僵局”作战提供掩护。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到11月时，美军就将占领或压制北至马里亚纳，南至棉兰老的所有重要岛屿。在接下来的巡航中，美军航母部队将直逼菲律宾的大门，在11月15日麦克阿瑟计划登陆棉兰老的日期之前打击日军在这一区域的航空兵力量。照相侦察机已经在菲律宾群岛上识别出至少63座日军机场，根据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估测，这些机场上将有650架各型飞机。

在这道新月形岛链的上半段，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是一连串小岛组成的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日本人称其为“南部诸岛”。美国人俗称其为“诸岛”（Jimas）。[38]自从10个星期前美军登陆塞班岛以来，这里就成了战略焦点。其中硫黄岛作为敌人增援航空兵南下的落脚点尤为突出。从6月15日到8月5日，“乔克”克拉克麾下拥有埃塞克斯级航母“大黄蜂号”和“约克

城号”的第58.1特混大队向小笠原群岛一连发动了5轮大规模的航母打击。美军舰载机一次又一次杀回来，把机场、弹药库、高射炮、油库和地面设施碾为齑粉。它们在岛屿上空击落了接近100架日机，在地面上还摧毁了100架，向港口内的日本舰船发动了俯冲轰炸，对海岸外的渔船进行了扫射，还用鱼雷攻击了海上的日本船队。虽然舰队的普通官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一直在全力争取直接登陆硫黄岛，反复多次的航母空袭也提供了关于岛上日本守军情况的有效情报。

克拉克后来说他“一直将这些岛屿视为我的私有财产”，他的航空兵官兵也把这些岛昵称为“乔克岛”。一个月前回到埃尼威托克后，他们就搞了个假想的地产投资公司，还发了股票，所谓“乔克岛发展有限公司”，推广他们的业务，也就是购置并开发“小笠原群岛的专属地块”。认筹的“股东”还拿到了画得花花绿绿的股票持证，写明其所有者拥有“硫黄岛、父岛列岛、母岛列岛、婿岛列岛各处精选地块——距离东京市区仅500英里”。作为这家假想公司的“老板”，克拉克在每一张股票上亲笔签了名。一号股票被发给了米彻尔将军。这些股票很快就成了“有价证券”，在整个太平洋战区甚至远达华盛顿来回交易（有时候甚至得花真钱）。

现在，第38特混舰队再度出海，全舰队兵分两路。三支大队向南，空袭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的各处目标，一支大队（拉尔·戴维森指挥的第38.4大队）则北上再度前往小笠原群岛。在三天的空袭中，戴维森的飞行员们在群岛上空飞行了633个架次，战果是击落或在地上摧毁46架日机，并击沉6艘舰船。^[39]在发给哈尔西和米彻尔的战报中，戴维森写道：“乔克岛发展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机场和工业用地成交量大增后销售再创新高。”^[40]

戴维森的航母舰队在战斗中仅仅损失了5架飞机。其中一架被击落的TBM“复仇者”的飞行员是乔治·H.W.布什中尉，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位。他的飞机在父岛上空被高炮火力击中损毁。布什跳伞落海后被潜艇“长须鲸号”救起——但是他的2名机组成员，以及其他6名被击落飞机上的空勤人员被岛上日军抓获、拷打并处死。其中4名俘虏甚至被日本人办了个吃人仪式，吃掉了一部分。这一可怕的事件以及对战争罪犯的判决被收录在了詹姆斯·布拉德利2003年出版的《飞行小子》（*Flyboys*）一书中。

8月24日，哈尔西和他的幕僚班子搭乘“新泽西号”离开珍珠港。哈尔西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团队，接近200名官兵，达到了舰员人数的10%。这艘4.5万吨战列舰的上层建筑不得不施以大范围改造才能用作舰队的指挥中心。舰长舰桥下方的两层甲板被用作了“司令部区域”，包括一间装备了最先进通信设备和雷达设备的通信室，左右两侧配有走廊的专用司令部舰桥，司令部官兵的卧室，以及一间被扩建了一倍，用作会议中心的空荡荡的军官餐厅。^[41]舰上的这一区域比斯普鲁恩斯那艘小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同类区域大得多。新改建的军官餐厅和士兵食堂按海军的标准算得上是奢华了。情报官卡尔·索尔伯格上尉回忆道，餐厅里供应的伙食质量令这些低阶军官惊喜不已，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有新鲜的牛排和猪排，凉拌沙拉，不仅每晚都有冰激凌，每周日还有‘烘烤阿拉斯加’冰激凌蛋糕”。^[42]

来到第38特混舰队之前，哈尔西想要先前往马努斯岛会见麦克阿瑟手下的海军司令和航空兵司令。在从珍珠港出发的10天航程中，“新泽西号”和三艘护航的驱逐舰每天都要进行防空炮术训练，炮手们会向战列舰载水上飞机拖曳的靶标开火。“新泽西号”上的16英寸巨炮也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令第3舰队的通信官

们满意的是，巨炮射击时的强烈震动并不影响他们设备的正常工作，这可是原来那些旗舰普遍面临的难题。“米克”卡尼组织通信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高压演习，也就是所谓的“模拟战场问题”演练。^[43]此时，哈尔西及其旗舰和第38特混舰队相距数千英里之遥，米彻尔仍然负责航母部队的战术指挥——但是哈尔西还是频繁通过“新泽西号”塔状无线电天线向他发出指令。即便是在旗舰尚未加入舰队的时候，哈尔西就已经明显表现出他将会比前任更多地插手指挥。

对于如何打赢这场太平洋战争，哈尔西和他的“阴谋诡计部”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毫不犹豫地提出要对现有计划做大幅度修改。在接掌舰队之前的过渡期里，哈尔西提出“僵局”行动基本不必要。在他看来，远在赤道的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作为进攻目标应该是首先被绕过的，他提议将原本用于在这些岛屿登陆的部队移交给麦克阿瑟，用于加快对菲律宾的进攻。^[44]作为回应，尼米兹下令越过一个不能带来大幅跃进的主要目标（帕劳群岛中的巴伯尔达奥布岛）并同意考虑越过加罗林群岛的雅浦岛——但是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认定，对帕劳群岛西部〔佩里硫岛（又译佩莱利乌岛）和安加尔岛（又译昂奥尔岛）〕的进攻将要按计划进行。哈尔西的幕僚们还提出要对太平洋潜艇部队的运用方式做重要变更，将其优先攻击目标从日本商船和油轮改为日军军舰。这一招遭到了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查尔斯·A.洛克伍德将军的坚决反对。

在珍珠港，人们普遍觉得哈尔西和他的第3舰队在修改打赢太平洋战争的基本蓝图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8月中旬，尼米兹的副参谋长福里斯特·谢尔曼找到“米克”卡尼，两人一起向哈尔西发出了一份直言不讳的电报。第3舰队的任务是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我们很清

楚，我们自己不要去考虑战略计划问题，”卡尼回忆道，“这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职责，而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要接受金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导。这必定不是舰队战场指挥官的任务。我们必须十分十分明确，十分十分坚决地理解这一点。”[45]然而，即便是在海上，哈尔西还是一直沉湎于索尔伯格上尉所说的“他对指手画脚的爱好”，常常用无线电向尼米兹提出鲁莽的提议——大部分当然都被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拒绝了。[46]这一段时间里，尼米兹还多次委婉地批评他越权或者未能执行上级命令。[47]公正地说，从第5舰队向第3舰队的切换，起步并不稳。

9月8日，“新泽西号”在加罗林群岛以北加入第38特混舰队。哈尔西和几位高级幕僚搭乘高架缆索来到米彻尔的旗舰“列克星敦号”。根据第3舰队战时日志记载，“新泽西号”的舰员们“看到四星上将从海上滑过去都很兴奋”。[48]在“列克星敦号”上，他们开了很长时间的会，优化了空袭菲律宾的作战计划。

美军航母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空袭雅浦、帕劳和棉兰老岛，结果发现日军在这一地区的空中力量弱得令人意外。在许多目标上空，舰载机飞行员们遇到的抵抗十分轻微，甚至于无。他们在机场上炸开弹坑，摧毁建筑、物资堆栈和防御设施；他们对在港内能找到的任何敌人船舶和小艇肆意攻击。9月6日至8日，三支特混大队全军杀进帕劳群岛，一连发动三天空袭，飞行员们报告称“对佩里硫、安加尔、埃塞布斯和巴伯尔达奥布各岛上的地面设施、弹药和补给物资堆栈、无线电台、兵营、建筑和仓库造成了大量损毁”。[49]

9月9日，舰队西移攻击棉兰老岛，第38特混舰队预计将会遇到更激烈的反击，但是日军的抵抗依然微弱而零星。攻击机群仅遇到了数架防空战斗机，并很快将其全部击落。舰载机飞行员

们宣称在地面毁伤了大约60架日机。他们还对达沃湾和萨兰加尼湾中的船舶和小艇进行了轰炸和扫射，返航后宣称有大约40艘船只被击沉或击中起火。美军在这一系列空袭中只损失了12架飞机——8架被高炮击落，4架因事故损失。有一架F6F战斗机在低空飞越一艘内河驳船时损失。当时这架飞机用.50机枪的燃烧弹扫射，引爆了驳船上藏着的弹药，巨大的爆炸将飞机一同吞没。

航母上，在返航后与航空情报官进行的情况总结上，飞行员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足够有价值的目标。在空袭时和空袭后的航拍照片中，棉兰老岛上的许多机场看起来都被废弃了，地面设施不仅简陋，而且数量很少。第3舰队的战时日志将此归功于肯尼将军第5航空队的B-24轰炸机先前对这个岛屿的轰炸：“有迹象显示，第5航空队已经彻底摧毁了棉兰老的日军设施，对这一地区的航母空袭并不完全必要。”^[50]

现在，航母及其护航舰艇向东驶出了海平线，去和一队舰队油轮会合。各舰要通过过顶的输油管获取燃油，并且收取信件。哈尔西和米彻尔通过低频短距无线电进行了会商，他们一致认为再继续空袭棉兰老就是浪费时间。哈尔西司令部里的情报分析员大胆地推测日本航空兵可能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9月9日发表的一份战略评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日本舰队可能会向美国舰队发动自杀式的海上“万岁冲锋”。分析者推测，日本首脑甚至有可能主动寻求彻底毁灭其自己的舰队，他的逻辑是：“日方认为，比起在我们即将登陆其本土时被打败，还不如让舰队早点被打败，这样可以从旧帝国的废墟上救回更多东西。”^[51]这是个不同凡响的见解——日本海军高层中有些人已经认定战败不可避免，并开始尝试迫使东京政府尽早投降。这个设想固然不正确，但是敌人在菲律宾南部令人震惊的微弱抵抗实在过于奇怪而难以理解，这令哪怕是荒诞不经的设想也需要被认真考虑。

哈尔西叫停了对棉兰老的空袭，率领大部分舰队北上至菲律宾中部，在那里，他们将打击莱特、宿务、内格罗斯等岛上的日军目标。（戴维森的第38.4特混大队留在东边数百英里外的帕劳水域，为即将到来的佩里硫、安加尔岛两栖登陆提供空中支援。）第3舰队的航空情报分析员认真考虑了一个更大胆的招数——出动舰载机突袭马尼拉及日军在吕宋岛中部的巨大机场网络。哈尔西还想要摧毁马尼拉附近巨大的燃油储存库，他相信此举会给途经此地的日本军舰带去巨大的麻烦。[52]

彻夜高速北上之后，三支特混大队在9月12日拂晓时抵达莱特湾外海。此时海面平静，微风轻拂。晨光初露时，军舰甲板上的水兵们在西北方海平线上看到了萨马岛的青山。8块飞行甲板上放飞了超过3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它们向西飞去，在爬升过程中逐步结成巨大的多层次V字队形。飞越莱特岛上空时，机群仍在爬高，发动机巨大的声响惊醒了一名1942年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后一直困在此地的美军士兵。“我激动得浑身打战，我三年都没这么乐过，”他后来写道，“耶！我猜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菲律宾村民和游击队员向攻击机群拼命欢呼：“人们重新拉出美国国旗，一边挥舞一边喊道：‘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这是他们此刻的心声，也是他们此生最渴望的事情。”[53]

“大黄蜂号”舰载机大队长哈尔·比尔第一批飞临宿务机场上空，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从高处往下看，数十架日本飞机停放在滑行道和停机坪旁。地面扬起了烟尘，能看到有人在飞机之间跑来跑去。看来日本人正匆匆赶往他们的战斗机。F6F“地狱猫”从机场上空低飞而过，向停放着的和正在滑行未及起飞的敌机扫射过去。驾驶着一架SB2C“地狱潜鸟”轰炸机的比尔压低机头进入俯冲，瞄准了跑道尽头。此时两架日军零战正并排准备起飞。比尔把瞄准点对准了两架日机中间，投下了所有炸弹，包括

一枚1 000磅炸弹和两枚250磅炸弹：“炸弹就在那两架战斗机离开地面时落在了它们中间。长机歪到了右边，栽进树林炸成一团火球，另一架飞机则直接在跑道尽头爆炸。”[\[54\]](#)

“列克星敦号”上第16战斗机中队的一位新手F6F飞行员比尔·戴维斯那天上午在宿务岛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击落记录。他从一架零战上方俯冲而下，零战向左压坡度急转，他立刻将目标套进了瞄准镜，扣动了扳机。一个短点射足以将这架零战撕碎。“我发现有人在无线电里尖叫，”戴维斯回忆道，“我听了一阵，但它却停了。之后我意识到那是我在叫。我在向零式机开火时，就下意识地使出最大肺活量叫了起来。这尖叫来自我的脑海深处，来自我大脑里最原始的那部分。”[\[55\]](#)

在这天的第二次空袭中，戴维斯在宿务城附近一座岛屿上的燃油精炼厂上空低空飞行。他随意地朝着一片建筑群的中央开了火。他以为几发.50口径子弹没法给这片错综复杂的油管、高塔和管道带来多少伤害，结果爆炸把他的飞机掀了起来，他吓了一跳，本能地转弯拉起，盘旋着飞回高空。“我看到整个精炼厂都烧了起来。精炼厂变成巨大的火球时，爆炸也吞没了整个岛屿。”

回到“列克星敦号”后，戴维斯跟别人讲了他干的事情。一个同僚就拉下了脸。“那个精炼厂是德士古原油公司的，”他说，“我还指着这个厂能留到战后呢。我有德士古的股票。”[\[56\]](#)

对于参战的美军飞行员来说，9月12日的空袭就是“宿务烧烤节”，当天美军出动了1 200架次飞机，这是自从2个月前的“马里亚纳猎火鸡”以来最为一边倒的一场空中屠杀。

日军航空兵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奥宫正武已命令大约150架零式战斗机从吕宋出发飞往棉兰老，支援那里在前一个星期的空袭

中被炸得支离破碎的航空兵基地。这些飞机此刻正在南下途中经停宿务，当大群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东方海平线上时，它们大部分都停在地面上。空袭开始时，奥宫恰好坐在一架运输机上来到宿务岛上空。飞行员压坡度急转弯躲避杀过来的“地狱猫”，这就让奥宫得以自上而下从“鸟类视角”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俯冲轰炸机凌空而下，战斗机尖啸着在机场上空飞来飞去，曳光弹从机翼机枪里射出来，打进了停放着的零战里。仅仅几分钟，宿务岛上便已一片混乱。美军飞行员的攻击格外准确，从燃烧的零战里腾起的浓烟和烈焰让我想到了火葬场……是我们的火葬场。”[57]按奥宫的说法，他本想构建起战斗机的防线，以击退敌军对菲律宾的进攻，但这段时间里第3舰队的空袭沉重打击了这种努力。

即便是剔除掉飞行员上报战绩中的水分，第3舰队的航空情报官还是给出了在空中击落75架、地面摧毁123架敌机的空袭战果统计。还有至少5艘船只被击沉，另7艘被击伤。遭到扫射后起火或沉没的舢板和小艇更是不计其数，至少有四五十条。机场的地面建筑要么被夷平，要么遭到破坏。航母及其护航舰摆开了阵势，准备迎击来自菲律宾日军机场的空中反击，但是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的敌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全都很快掉头离去，不敢前来挑战舰队上空盘旋的“地狱猫”防空战斗机。9月14日，哈尔西向尼米兹报告：“敌人毫无主动性的态度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空中没有遇到抵抗，遇到的高炮也很弱……没有舰船可以去击沉……这一区域的大门已然敞开。”[58]

有一架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是“大黄蜂号”上的托马斯·C.蒂勒少尉，他的“地狱猫”在莱特湾上空被击中，遭到重创。蒂勒成功在水面上迫降，并爬上了他的充气救生筏。当地菲律宾人划着一条带两侧支架的小船把他带到了岸上。这些人对他很不错，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还找到了当地亲美军的游击队，后者设法

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海岸外的美军舰队。于是，“威奇塔号”巡洋舰上的一架水上飞机飞来接回了蒂勒，把他带回“大黄蜂号”，在那里，他向“乔克”克拉克将军做了报告。

莱特岛当地人向蒂勒讲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报。他们说莱特岛没有日军部队，除了一些荒地和长草的跑道外也没有航空兵基地。相邻的宿务岛上敌人守军只有大约1.5万人。美军的情报估算严重失准。如果能快速发起进攻的话，那么美军登陆莱特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将会极其微弱甚至没有。于是，克拉克把蒂勒带来的情报呈报给了哈尔西和米彻尔。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哈尔西一直劝说尼米兹取消中间的作战行动，以加快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进攻。现在他想到了一个更大胆的提议。或许一旦进攻部队准备就绪，麦克阿瑟就可以越过棉兰老，直接进攻莱特岛。卡尼和第3舰队的其他幕僚也都同意。但是哈尔西仍然在犹豫，他坐在“新泽西号”舰桥的一个角落里反复斟酌。尼米兹拒绝了他此前的大部分提议，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份提议，不仅不是我的职责，它还会推翻诸多成熟的计划，甚至还会惊动罗斯福先生和丘吉尔先生”。^[59]最后，他还是决定提上去。于是，一封急电被发给尼米兹，抄送给麦克阿瑟和金。哈尔西再次提出取消即将开始的雅浦岛和帕劳群岛登陆战的方案，因为这些岛屿“带给我们的歼敌机会无法值回时间的拖延和‘僵局’行动所耗费的精力”。用于这些行动的部队应当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立刻以轻微的代价，不需要任何过渡的行动”，夺取莱特岛。^[60]

收到此信，尼米兹暂停了对雅浦岛的登陆作战，他告诉金，如果麦克阿瑟也有此意的话，他愿意支持尽早在莱特岛登陆。但他同时也坚持主张美军部队必须拿下帕劳群岛南部诸岛。此时，开往佩里硫岛和安加尔岛的进攻舰队已经在航渡途中了，太平洋

舰队司令部决定让这些部队“按计划开进”。[61]在当天早些时候单独发给金的一份有线电报中，尼米兹写道，拥有这些岛屿“当然至关重要，而且也不可能像哈尔西130230号文件设想的那样快地重新拿出计划，把用于进攻和占领帕劳的部队用于他处”。[62]不过——尼米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拒绝了加快莱特岛作战的方案，“那就可以在10月中旬使用雅浦岛进攻部队拿下硫黄岛……我正在制订这一方向的计划，一旦需要随时可用。这个思路或许能实现，或许不能实现，但现在将其呈报出来，以便你充分了解各种可能性”。[63]

佩里硫之战格外血腥，但事后看来，这或许是不必要的。硫黄岛之战更为血腥，但如果能早些打，赶在日本人来得及向岛上派出援军并挖掘出地下防御工事网络之前进攻，或许就不会那样惨烈。如果尼米兹当时能同意像哈尔西提议的那样取消佩里硫的登陆战，并授权使用这批部队在10月向硫黄岛发动突袭，那么这两个决定会挽救数千美军的性命。

此时麦克阿瑟正搭乘着莫罗泰岛进攻舰队中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在海上航行。由于无线电静默要求，他无法立刻答复。但是能够加快进攻菲律宾的前景令他“欢欣鼓舞”，美军刚一拿下莫罗泰岛的滩头，他就立刻飞回他设在荷兰迪亚的司令部，拟好了同意哈尔西提议的回答：“我已经准备好立刻启动执行‘国王二号’[莱特岛]，任务日期是10月20日。”[6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刻正随同罗斯福一起，与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在魁北克开会。9月15日晚，麦克阿瑟的电文被送到了这里，当时他们正和英国同行一起吃饭。告假后，四位参谋长离开餐厅，来到旁边的会议室商议此事。没人反对。既然哈尔西、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全都同意，他们觉得那也就没什么好考虑的了。收到麦克阿瑟的有线电报90分钟后，一份新的命令便已在

发回太平洋的路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执行莱特岛作战，任务日期为10月20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应当安排必要的协作……要将你们的计划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6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领导层已经找到了办法来防止自己不知不觉中陷入现有计划和作战的惯性之中。从理念上，他们随时准备好并愿意抛弃原有计划，采纳新计划，以迅速行动，把环境的变动利用起来。要实现这样的理念，就需要从指挥体系的顶层不断向下施压，因为大型组织总是有一种抵抗甚至阻挠突然转向的倾向。横越太平洋的战争是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多军种两栖作战。作战计划的重大调整需要对地理上分布遥远的各个部队做出一系列较低层级的调动。事后看来，能够而且常常能在最后一刻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委实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在一夜之间就决定越过棉兰老，直接在1944年10月攻打莱特，便是所有这些调整中最富戏剧性，最具深远影响的一次。“阴谋诡计部”为自己赢得了庆贺的权利，这种庆贺记载于9月14日的战时日志中：“第3舰队的建议被采纳，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加快了3个月。”[66]这也在次年一月的国情咨文中为罗斯福赢得了一个可以拿出来吹牛的资本，他对国会如此说道：“仅仅24小时之内，我们就达成了一项涉及两个战区的陆军和海军部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加快了菲律宾的收复和最终的胜利——这个变化也拯救了那些原本会葬身于现已被遥遥甩在我方战线后方的岛屿上的生命。”[67]

但是尼米兹拒绝了哈尔西关于取消佩里硫岛登陆作战的急切请求。这是帕劳群岛南端一座常年烈日暴晒，满是红树林沼泽和石灰岩的荒芜岛屿。日军在此区域最重要的机场就建在这个岛上，不过机场上的大部分地面设施已经在美军登陆前的空中轰炸和舰炮炮击中被摧毁。对此，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解释是，用于

攻打佩里硫的进攻部队要么已经出海，要么几乎已经子弹上膛，这看起来更像是个有些牵强的借口。尼米兹不是那种会在关乎军人生死的决策上受到军种或战区间竞争影响的人，但若完整了解这段历史，下面的事实便不能不提。用于攻占佩里硫的主力部队是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打出威名的传奇性的第1陆战师。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曾为了这个师的归属而爆发过激烈争论。若按照哈尔西的提议，这个师就要被交给麦克阿瑟。若没有佩里硫作战，那么尼米兹的战区在1945年之前便不再有重大的两栖登陆作战了，这样，他就必须把他大批精锐的两栖舰队、登陆舰艇和作战部队交给麦克阿瑟用于菲律宾战役。

尼米兹将军其实比太平洋上的其他任何主要指挥官都更富有敏捷的思路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曾经多次进行大胆的越岛机动并取得了胜利——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冬季的“燧发枪”行动，当时他顶着海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官的反对强行要求越过马绍尔群岛最东边的几个环礁。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支持他坚持拿下佩里硫的决定。即便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这种尼米兹最铁杆的拥趸，也对此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尼米兹直到临终前都坚持认为佩里硫登陆战是必须打的——就像斯普鲁恩斯从来不肯承认1943年11月攻打塔拉瓦是不必要的一样。然而无论是佩里硫还是塔拉瓦，时间和经验都将证明，越过它们也不会给美军在更大范围内的进攻进度带来损失。

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似乎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公理——只要美军指挥官们围绕是否越过某个岛屿进行思虑和争论，最后又决定把它打下来，那么他们的决定在事后看来都是悲剧性的错误。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错误，无论对历史学者还是对他们自己，因为那些葬身沙滩上的人永远无法复活，而没有人愿意听说这些年轻人竟然是为了一个错误而死。

[1] De Seversky,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American Mercury, February 1942, Vol.54, pp.135—54.

[2] Mitscher to Captain Luis De Florez, quoted in Taylor,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pp.188—89.

[3] 1磅≈0.45千克。——编者注

[4] MacWhorter and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70.

[5] Commander James C.Shaw, USN, “Fast Carrier Operations, 1941—1945,” in the introduction to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7, Aleutians, Gilberts, and Marshalls, p.xxxii.

[6]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7] Arleigh Burke, oral history, p.5, RG—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 1946, Box 4, NARA.

[8] “七联靴”是格林童话中的靴子，可以让穿上它的人“跑一步顶七步”。——译者注

[9]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95.

[10] Hugh Melrose account, in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96.

[11] J.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13, 1945, in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21.

[12] 有两位战争通讯员指出斯普鲁恩斯很像罗杰斯。“Our Unsung Admiral,” by Frank D.Morris,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p.48; Fletcher Pratt“, Spruance: Picture of the Admiral,”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1946, p.144.

[1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185.

[14] Ibid., p.212.

[15] Ibid., p.258.

[16]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17]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269.

[18]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838.

[19] “Our Unsung Admiral,” by Frank D.Morris,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p.17.

[20]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839.

[21] Moore to his wife on July 1, 1944, quoted in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47.

[22] Spruance to E.M.Eller, July 22, 196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Folder 7.

[2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29.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2.

[25] Comments on E.B.Potter's book, Spruance Papers, NHHC Archives, Collection 707, Box 3, p.9.

[26] 比如，1944年9月的一次广播就提到了“哈尔西中将的第3舰队”“斯普鲁恩斯上将的第5舰队”“金凯德中将的第7舰队”。“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September 20,1944,” p.3, NARA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Digest: Japanese Radio Broadcasts, Box 22.

[27] Spruance to Potter, December 1, 1944, pp.2—3, Spruance Papers, NHHC Archives, Collection 707, Box 3.

[2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notes for chapters 1—4, p.453.

[29] Trumbull, “All Out with Halse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6, 1942, p.1.

[30]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3.

[31] 英语中的谚语，意指自取其辱。——译者注

[32] Halsey to Capt.Gene Markey, January 24, 1945, Halsey Papers, LCMD.

[33] “Interview with Admiral C.J.Moore,” by John T.Mason, November 28, 1966, p.4, Papers of Raymond Spruance, Series 188, Box 3, NHHC Archive.

[3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9.

[35]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238.

[36]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27.

[37] Ibid., pp.327—28.

[38] 小笠原群岛（婿岛列岛、父岛列岛、母岛列岛）和火山列岛（硫黄岛及

其邻岛)在地理上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但美军指挥官经常把它们都称为小笠原群岛,本书有时也遵循这个约定俗成的用法。

[39]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2,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30;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55, entry for September 3, 1944.

[40] CTG 38.4 to Com3rdFlt, CTF 38, September 3,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26.

[41]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24, 1944.

[42]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23.

[43]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31, 1944.

[44] Ibid., entries for June 18 & July 7, 1944;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30.

[45]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3.

[46]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p.22—23.

[47] Nimitz—Halsey letters, August—December 1944, in Halsey Papers/LCMD.

[48]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11, 1944.

[49] Ibid., September 8, 1944.

[50] Ibid., September 9, 1944.

[51] Ibid.

[52] COM3RDFLT to CTF 38, September 9,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1.

[53] St.John, *Leyte Calling*, p.168.

[54]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32.

[55]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226—27.

[56] Ibid., p.228.

[57]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242—43.

[58] COM3RDFLT to CINCPAC, September 1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229—30.

[59]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0.

[60] COM3RDFLT to CINCPAC, CINCSWPA, COMINCH, Message 130300, September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61]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etc., September 13,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3.

[62] CINCPAC to COMINCH, Sept 1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6.

[63] Ibid.

[64]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227; and MacArthur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September 15,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65]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Nimitz, MacArthur, Info Halsey, September 15,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7.

[66]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14, 1944.

[67] "Message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5, FDR Library.

第三章

“老种子”，也就是第1陆战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出的名——两年前，他们登上、守住了这个岛屿，并让这座岛名扬四海。此刻他们正驻扎在帕武武岛，位于瓜岛以西30英里处一个面积约50平方英里^[1]，散布着恶臭丛林的岛屿。自从最近参加新不列颠岛的格洛斯特角登陆战之后，他们就被送到这里休整和训练。

1944年9月时，这个师里大约有1/3是经历过瓜岛之战的老兵，他们对1943年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度过的天堂般日子念念不忘，想念那里舒适的气候和热情的女士们，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回去。其他人，包括瓜岛和格洛斯特角两战之间加入的人和刚刚从本土送来的新兵，听着老兵的故事，咒骂自己运气不好，因为他们没有被送到好地方，而来到了这个被上帝遗弃的荒岛。

这些“老种子”从第一天踏上帕武武岛的木制小码头时，就骂骂咧咧个不停。这里的生活环境近乎蛮荒。岛内的“主要道路”不过是一条泥泞小道，通向一处被整齐排列的高大椰子树环绕的空地，这是一个被废弃的英国椰子种植园的最后遗迹。这些人就被告知在此地扎营。在灌木丛下面搜寻了一圈，他们发现自己的帐篷、吊床、毯子都堆在地上，被雨淋湿，满是泥污。这里已经有两年半没人来收获果实了，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掉下来腐烂的椰子和棕榈叶。清理营地就是个见鬼的重体力活儿。堆积如山的垃圾散发着恶臭，而且随着垃圾被翻开，这股恶臭愈加浓烈。施工

的时候，腐烂的椰子会炸裂开来，臭水溅人一身。开挖地面时，人们才发现地面下有许多大老鼠的洞穴。为了把这些讨厌的小动物赶走，陆战队员们动用了火焰喷射器。带着火苗的老鼠顿时到处乱窜，空气中顷刻充满了老鼠皮毛烧焦的酸臭和腐败椰子的腥臭。

他们急着想开始训练，但在此之前，陆战队员们知道自己先要花上几个星期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做些建筑活儿。他们要挖出排水沟和厕所，建造穿过红树林沼泽的木板人行道，拿着大砍刀砍伐灌木，以拓宽旧道路。许多时候地面过于松软潮湿，无法承载卡车的重量，于是他们用手推车运来碾碎的珊瑚礁，铺到路基上。这里每天下午都会下一场短暂的热带暴雨，就像闹钟那样准时。既然岛上也没有洗澡设施，那陆战队员们便指望这样的暴雨来打肥皂洗个澡，洗去他们的疲劳了。不过他们得快，要在雨停之前把肥皂沫冲干净。

没有合适的食堂，他们就吃放在斯特诺加热罐里烧热的C型口粮。他们住在六人一间的金字塔形帐篷里，帐篷里放上用空弹药箱和汽油做成的简易火把照明。每天晚上，大批陆地蟹都会爬进帐篷和人们一起睡觉，陆战队员们很快便学会了每天早上穿靴子之前先把这些蓝黑色的小甲壳类动物晃出来。一个列兵回忆道，每隔几天“我们对这些脏家伙的忍受力就到了极限，我们会把它们从箱子底下、水兵袋和吊床里赶出来，用棍子、刺刀、铲子什么的把它们弄死。之后把它们铲到一起埋掉，不然湿热的空气中立刻就会充满让人受不了的臭味”。[\[2\]](#)

虽然时间紧张，地理条件不利，装备不足，他们还是在帕武武岛竭尽所能地进行训练。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做操，环岛跑步3英里。清理出一块步枪射程的射击场后，他们开始练习精确射击并提高野战武器的使用水平，包括勃朗宁自动步枪（BAR）、卡

宾枪、汤姆森冲锋枪、“巴祖卡”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以及新装备的60mm便携式迫击炮。岛屿很小，布满了浓密的低矮灌木，基本找不到运动空间，而连队级别的野战训练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岛上有1.5万名陆战队员，超过100个连；纵队行进的部队常常撞到一起，这时候一支纵队只好让到一边，让另一个纵队过去。起初，这个师基本没有登陆艇，更没有履带式登陆车（LVT）。于是他们紧急向周围岛屿求援，借用任何类型的登陆工具，包括陆军的轮式两栖卡车（DUKW）和普通的希金斯登陆艇（LCVP）。之后小规模的两栖训练便开始了。部队以连为单位，在帕武武岛的一处滩头进行实弹登陆演习。步枪班首先登陆，机枪手、火箭筒手和迫击炮班紧随其后。士官们吼叫着要士兵们赶紧上岸，到椰子林里找掩护：“离开这该死的海滩，越快越好，然后向内陆冲。鬼子会用手里的任何东西向海滩开火，所以你们往内陆跑得越快，就越能活下来。”[3]

8月28日，第1陆战师乘坐登陆艇来到帕武武旁的锚地，登上了靠泊在那里的运输船和坦克登陆舰。在向西穿越南太平洋的两个星期航程里，陆战队员们写信、打牌、阅读书刊，或者重新打包他们的武器，好打发时间。他们把步枪拆解开，涂上润滑油，重新组装起来；磨快他们的卡巴牌军刀；在“巴祖卡”和火焰喷射器上涂上迷彩。“我喜欢倚着栏杆，看着海豚在船的尾流里嬉戏，看着飞鱼在浪尖上滑翔，”第5陆战团3营K连的一位迫击炮手R.V.伯尔金回忆道，“我们全程都在走‘之’字形航线，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改变一次航向。”[4]战士们居住的下甲板格外闷热，下有散发着热气的船只引擎，上有赤道烈日的炙烤，但是海军的船员们还是一直在控制到甲板上透风的陆战队员的数量。

和往常一样，低阶官兵们要到出海踏上航程之后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听说佩里疏是目的地后，他们耸了耸肩。没人听说过

这个地方，不过也无所谓——他们打仗打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看起来差不多，分不清谁是谁的热带岛屿上作战，一个接着一个。每艘船都得到了一个泡沫塑料制作的岛屿的比例模型，军官们拿着教鞭向各排介绍了岛上的地形特征和地标。佩里硫平坦的南半部是机场，两条跑道和一条滑行道组成了一个“4”字形，旁边建有宽大的柏油停机坪。登陆滩头在其西南海岸，分为“白一”滩和“白二”滩，还有“橙一”“橙二”“橙三”滩。岛屿北部主要是覆盖着稀疏灌木的石灰岩山。第1陆战师将要在D日建立滩头阵地，D+1日拿下机场并将岛屿一分为二，在D+2和D+3日席卷北部山区。计划就是这样的。

第1陆战师的师长是威廉·H.拉佩图斯少将，瓜岛战役时他是副师长（师长是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率领一部分部队打下了“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北面的图拉吉岛。拉佩图斯确信佩里硫之战将会是一场血腥却短暂的战斗，就像之前在中太平洋上登陆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慕尔一样。他预计登陆前的大规模轰炸和炮击将会消灭众多日本守军，摧毁他们的工事，甚至迫使幸存者放弃抵抗。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敌人步兵将会发动自杀式的“万岁冲锋”，陆战队员们就可以用步枪和机枪火力将他们放倒。开往帕劳群岛的途中，拉佩图斯豪情万丈，他告诉下级，希望有人能把守岛日军指挥官的武士刀带来给他。

美国陆军第81步兵师（“野猫师”）也在开往佩里硫，他们将停留在海岸外的运输船上担任预备队。全盘指挥“僵局”行动的是第3两栖军军长罗伊·S.盖格少将，一个月前他刚从霍兰·史密斯手中接过这一职务。盖格将决定是否需要将增援部队送上佩里硫，如果不需要，这些部队就会被投向西南方数英里外较小一些的安加尔岛。拉佩图斯不希望陆军出现在佩里硫，也不觉得这有什么

必要。他告诉乘坐在他指挥舰上的战争通讯员：“这将是一次短期战斗，一次会有些艰难的‘快动作’，持续4天，最多5天。”[5]

9月14日，也就是D—1日晚上，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早早上床了。但大部分人都没怎么睡。在这种拥挤闷热的地方，睡个好觉从来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何况许多人还过度紧张，肾上腺素过度分泌，连眼睛都闭不上。凌晨3点，士官们穿过住舱，把陆战队员们从吊床上摇醒。大家起床开始D日的例行洗漱——刮胡子、洗脸，最重要的是蹲个厕所。官兵们排着长队洗脸或洗头，水壶里装满水，带上三天的野战口粮，穿上了战斗服——这是一款绿色的粗布制服，胸袋外缝有黑色的陆战队标识。船员们送来了传统的“死刑犯早餐”，牛排和鸡蛋，但是许多陆战队员没有食欲，一口也没吃。他们把私人物品塞进帆布水手袋子里，打成U形包袱，交了上去。机枪对海面进行了试射。一罐罐黑色和绿色的皮肤迷彩色被发了下来，人们把它们抹在自己的脸上和手上。

在破晓前的夜色中，他们来到了甲板上，听着舰炮射击时的轰鸣，看着北方海平线上闪起的火光。炮弹带着沉重的啸叫声从海面上掠过，飞向远方，但远方的闪光并不总能和这些声音节奏一致。随着船只开向岛屿，爆炸愈加明亮，声音越来越响，爆炸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名水兵还联想起了“落基山脉的夏日暴雨”。[6]随着东方曙光初露，晴朗的蓝天渐渐显现了出来，目力所及之处万里无云——但是佩里硫岛却已被浓烟烈火笼罩，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紫色轮廓，其中一端稍稍隆起。在浓密的烟雾中间和上方是几乎持续不断的橙色爆炸和带着黄色烟雾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起，每个人都能看见岛上被炸碎的椰子树和岛屿中部高地上象牙色的尖削山岭。“波特兰号”巡洋舰上一位炮术军官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那座石灰岩山岭，他觉得它如同一扇开了一条缝的钢门，每一次炮击，就像是门被砰的

一声关上。他让舰上的8英寸舰炮拿这座“钢门”练练手，向它打了几发炮弹，却无法摧毁目标。他说：“你就是把整个匹兹堡的钢铁全部砸上去，也打不掉它。”[7]

和其他两栖战部队先前多次经历过的一样，陆战队员们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即便距离战列舰和巡洋舰尚有半英里之遥，人们彼此说话都得大声吼，否则声音就会被巨炮雷鸣般的炮声所掩盖。第1陆战师此前进行过两次两栖登陆战——瓜岛和新不列颠岛——两次登陆时都没有遇到抵抗。这次会是第三次吗？他们已经听了足够多关于塔拉瓦、塞班和关岛登陆战的事情，知道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佩里硫岛上的敌人怎样才能在此凶猛的炮击下幸存。在登陆前的几个小时里，海军舰炮向岛上发射了1 400吨弹药。这幅毁天灭地的景象自然令战士们情绪激昂。有人说：“你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东西能活下来，所以我们开始感觉良好了。”[8]另一个人想知道“我们到那里时，岛还在不在”。[9]

在一艘运载着第1陆战团部队的坦克登陆舰上，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声：“现在所有陆战队员前往下船点！”[10]人们立刻背上背包，摸摸看武器是不是轻松地挎在正确的地方。他们排成一列走下楼梯，来到坦克甲板上，这是一处灯光刺眼的封闭空间，挤满了两栖车。两栖车的发动机启动后，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蓝色的废气立刻在舱内喷涌出来，令人窒息。陆战队员们爬上指定的两栖车，在座位上坐好。他们被废气熏得睁不开眼，但呼吸却是躲不掉的，有人开始恶心想吐。“豆大的汗珠从我们脸上流下，我们的夹克也都湿透了，紧贴在身上，”第1陆战团3营K连连长乔治·P·亨特上尉回忆道，“虽然大风扇在我们头上转，废气还是向我们涌来。我的手心开始发热出汗。”[11]亨特甚至怀疑他的人会不会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毒死。但是接下来，登陆舰蚌壳式的艏

门打开了，钢质跳板伸出去，放下来，第一排两栖车猛地前倾，开动了起来。它们开上跳板，开到海中，乘客们终于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坦克登陆舰排成一长排，艏门打开，跳板像长长的钢舌头一样伸入海中。挤满了人的两栖车随着波浪起伏，等候着向海滩进发的信号。海浪从车辆侧壁上方涌进来，把人们浇透。很快，数百辆两栖车开始在出发线后方绕圈子。没有风，空气中蓝色的废气越来越浓。海军的巡逻艇在登陆车艇中间忙碌穿梭，艇员们忙着设置浮标，通过大喇叭喊出指示。战列舰们则继续向岛屿开火，炮口下的海水被吹起一道道大浪。在一轮接一轮的齐射声中，车艇上的陆战队员们仍然要吼着说话才能听得见。早晨8时30分，按时间计划，第一轮出击的命令下达了。

两栖车的驾驶员加足油门，车身前冲，骑到了浪尖上，发动机喷出扇形水雾。其他车上的陆战队员们挥舞着拳头大声鼓励这些第一批离开出发线的战友，不过发动机和舰炮的轰鸣遮蔽了他们的声音。舰炮射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火箭弹从人们头上呼啸而过。重炮射击的声音如同击打着天堂之门，而火箭弹从头上掠过时那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开过。驾驶员换挡时，变速箱开始剧烈地震动，连车体都摇晃了起来。这些两栖车逐渐开到了7节的最高航速，开始全速前进。人们从车体前部看过去，小小的佩里硫岛完全被浓烟和烟尘所吞没——他们常会瞥见F6F“地狱猫”战斗机在海滩上空低空盘旋，喷射出橙色的曳光弹，或者舰载俯冲轰炸机从头顶上方直冲而下，把炸弹扔在看不见的目标上。

当两栖车靠近礁盘，人们发现日军开始反击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落在两栖车周围，掀起令人终生难忘的巨大水柱，这些水柱截住了上午的阳光，瞬间把它变成了七色彩虹。敌人看不见

这些两栖车，他们只能从烟幕后面盲射。被击中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这些炮火却证明敌人还活着，战斗力几乎完好无损。海滩此时仍然躲在浓烟烈火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爆发，”20岁的二等兵尤金·B·斯莱奇回忆道，“我们不是在开向岛屿，而是被卷入了一个燃烧的深渊。”^[12]

接近礁盘时，履带式登陆车队慢了下来。它们颠簸着，履带撞上珊瑚礁时车头会猛地扬起，车身摇晃着从珊瑚礁顶上缓缓碾过。车里的陆战队员们被抛了起来。他们没法继续坐着了，不然尾椎骨就会被椅子撞断，于是他们只好蹲下来，互相搀扶保持平衡：“我们抓牢，摇晃，嘴里咒骂着。”^[13]许多履带式登陆车上都装有75mm轻型榴弹炮，它们开始向海滩还击，当然也一样是盲射。进入礁盘后，这里海水很浅，显出一片绿色，水底的沙滩从车体舷外清晰可见。眼前的一片迷乱之中渐渐现出了被掀翻、炸碎的椰子树的影子。此时，银盘般的太阳高挂穹苍，无情炙烤着大地。

当第一批两栖车爬上橙滩海岸时，舰炮炮击给地面带来的震动开始向内陆推移。两栖车履带压上了沙滩，发动机开始加速，车辆向海滩开了一段后停下来。车辆的尾门“砰”的一声放下，士官们吼道：“我们走！”于是陆战队员们纷纷从车体后部涌出，然后掉头向海滩前方冲去。机枪和步枪火力不停地从看不见的树林深处射来，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从人们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重武器也在开火——他们也有直瞄火炮和野战炮。不少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在开阔的海滩上战死。其他人纷纷冲进椰子树林寻找最近的掩护——躲在树后，躲进弹坑，或者就地卧倒。高悬在这些人头顶上的是已被熏黑和炸得支离破碎的椰子树，他们眼睛和嘴里进了沙子，鼻子里满是硝烟的气味。这块地方已经被弹坑、倒下的椰子树干、四处散落的大块泥土搞得乱七八糟。

凌乱不堪的地形地貌不仅掩护了向前推进的陆战队员，也掩护了日军狙击手。

军官和士官们吼叫着要战士们前进，他们必须离开滩头，为后续批次的两栖车和登陆艇让出位置。于是他们剪开铁丝网障碍，在隐蔽处之间跳跃前进。许多人被敌人狙击手打倒。在椰子林的深处有日军的机枪阵地、木头射击掩体和长长的反坦克壕沟。面对这些，陆战队员们只能全力冲刺，发动正面突击，“就像一群印第安人那样吼叫”——美国版的“万岁冲锋”。[\[14\]](#)

佩里硫岛, 1944年9月—10月



亨特的连在白滩北端登陆，那里有一座岩石海角伸入海中大约200码^[15]。日军在海角南面的岩壁上建造了坚固的碉堡和巧妙隐蔽的暗堡。一门布置在无法通行的射击阵地上的47mm反坦克炮一连击毁了几辆还没有来得及抵达海滩的两栖车。K连的陆战队员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冰雹般的直射火力之下，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可找。他们只能拼命挖掘散兵坑，但这里的地面是坚硬的珊

瑚礁。从半晌午开始，天气就越来越热，现在已经让人受不了了，所有人都是汗流浹背。日军迫击炮渐渐找准了射程，陆战队的伤员数量便激增起来。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海滩上，看上去根本来不及运走。呼叫医疗兵的喊声此起彼伏。但担架手们自己也被日军的狙击火力放倒。亨特上尉记录道：“伤员们打着绷带、血肉模糊、残缺不全，恐怖极了，人们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伤痛，痛苦地呻吟和挣扎着。有人要么四肢伸开，要么身体扭曲，要么绝望地等候死亡。还有些人的肠子都流了出来，甚至被整个开膛剖腹。”

烟雾手榴弹令他们在致命火力之下稍得喘息。亨特的陆战队员们把几枚烟雾手榴弹投掷到岩壁下方，遮住了日本炮手的视线，令其只能隔着白烟盲目开火。随后他们派出一个班绕到后方封锁碉堡的后门。这时一名手持肩射火箭筒的陆战队员打出了幸运的一击：火箭弹贴着一门47mm反坦克炮的炮口钻进了碉堡的射击口。黑烟立刻从石壁上的射孔里涌了出来。岩壁里传来了日本人身上起火时的惨叫声，三名敌兵从后门冲了出来，守在这里的那个班立刻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到上午10点，美军三个步兵团已经在2 500码的一长串海滩上了岸。《生活》杂志的一名画家兼战争通讯员汤姆·利跟随第二批登陆部队登上了橙滩。此时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仍然和一个小时前第一轮登陆时一样密集。海滩和浅水里满是燃烧的或是动弹不得的两栖车，陆战队员们脸朝下卧倒在海滩上，“就像老鼠一样蜷缩着”。利躲进了一个弹坑，迫击炮弹在附近沙滩上爆炸时他就会把头低下来。回望大海方向，他看见陆战队员们踏浪前行，步枪举在头上，身边不断溅起白色的水花。他看见几个人被打死：“有一个人看起来被炸得粉身碎骨，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和一条腿飞到了空中，太可怕了。”^[16]

利没有把他的画板带到岛上，但是眼前这一幕定格在了他的脑海里，终生难以磨灭。后来他为《生活》杂志创作了几幅素描或油画，包括一幅题为《代价》的震撼人心的画作，画面描绘了一位遭受致命伤的陆战队员临死前在海滩上蹒跚前行的场景。他的左半边脸已经血肉模糊，“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发疯似的向前走时，一只胳膊仅存的碎肉如同棍子一般垂了下来。还算完好的另半边脸上露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绝望无助的忍受神情。他倒在我身后，在白色的沙滩上染出了一片红色”。^[17]发表这幅画作几个月后，抱怨声和退订单洪水般涌向《生活》杂志。有人指责利在画作中夸大事实，对此他愤怒地反驳说，他画的正是自己看到的真实场面，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在海滩旁的一片椰子林里，利看到了一个被指定为临时野战医院的大弹坑。医疗兵们每四人抬着一副担架不断来到这里，把担架在地上排成一排。血浆瓶被挂在炸断的树桩上。医疗兵们忙着给伤员注射吗啡，打止血带。一位牧师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圣经。“看得出，他被伤员们的痛苦和死亡深深地触动了，”利写道，“他看起来非常孤独，只有上帝与他同在，他俯下身来陪伴这些远离家乡、筋疲力尽的人。医疗兵们在死者灰暗的脸庞上盖上披风、衬衫、布块或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把他们抬到海滩上的一处防水棚下排成一排，等候掩埋。”^[18]

现在，美军在岛屿西南侧海岸上夺下了一块2英里长，平均纵深约500码的滩头阵地。排雷组挖出了那些没有爆炸的日本炮弹。人们带着成卷的电话线，随意铺设在海滩旁被炸弹翻开的地面和烧焦的灌木丛上。到处散布着战斗留下的痕迹，一堆堆被丢弃的背包、头盔、步枪、箱子、衣服和橡胶救生圈。日本人挖掘的一条长长的反坦克壕沟现在成了第1陆战师的指挥所。第5陆战团及其各营的指挥所也设在附近。D日一整天，这些区域都持续

遭到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一个营指挥所（5团3营）被炮弹直接命中，营长和几名参谋受伤。

师长仍然在努力勾勒岛上战事的准确图景。无线电员联系不上最前方的部队，无休止的炮击毁坏了野战电话系统，传令兵们不得不在暴露地形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或死或伤。拉佩图斯将军投入了他的预备队营，然后告诉幕僚们，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当战报传来，他的幕僚们统计出D日当天全师的伤亡是1 111人，至少209人战死。[\[19\]](#)

夜幕降临后，海岸外的军舰打出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和信号弹，保持对交战区域的不间断照明。在鬼魅般橙色和黄色光芒的照耀下，大地笼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宛如异境。黑影摇曳舞动，被炸倒的树木留下的歪歪扭扭的树桩戳在地面上。这一切令外海军舰上的一名水兵联想起了“月球表面”或者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战场上的无人地带”。[\[20\]](#)日本人一刻也没有消停，一会儿用火炮和迫击炮来一阵炮击，一会儿又派出渗透人员或小部队发动进攻，持续不断，直到天亮。K连坚守着滩头北翼的岩石海角，手指放在扳机上，仔细听着一切可能预兆着新一轮进攻的声响：“吼叫声、沙沙声、含糊不清的人语，抑或是脚踏在石头上的声音。”[\[21\]](#)一旦发现这样的响声，陆战队员们即便看不见也会投几枚手榴弹过去。佩里硫岛上的日军士兵们没有草率发动“万岁冲锋”涌上来，而是利用隐蔽处向前跃进。他们打得很精明，如果攻守角色对调，陆战队也会采取和他们差不多的进攻战术。“日本鬼子们在岩石中间时隐时现，”亨特回忆道，“我能看见他们扁平的棕色头盔。有时候我们很难把他们和自己人区分开来，他们行动太快了。”[\[22\]](#)看不见的狙击手从高大椰子树的顶上射击，打中了那些低着头，自以为已经脱离敌人火力射界的陆战队员。一整晚，敌人从三个方向不停地袭来，K连

的官兵们一刻也不得休息或喘息。“数不尽的爆炸、呼啸的子弹、在头顶上呼呼响或者砸在石头上的弹片、沙哑的吼叫声，以及尖声大叫的日本人，使战斗成了惨烈的混战。”[\[23\]](#)

16日破晓前一个小时，地面摸上去仍然在发热，温度大约为27摄氏度。机场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当太阳升起后，雾气很快消散，热浪滚滚而起，地面的景物都被扭曲。这天，阴凉处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但对于佩里硫岛上的绝大部分陆战队员来说，就连这种阴凉都是难以企及的奢侈。空气湿热而无风。汗水从人们脸上流下来，在迷彩涂料上留下一道道沟痕。灰色的珊瑚沙粘在汗水和油彩涂料上，令他们看上去仿佛戴了一层象牙色的面纱。

大部分陆战队员登陆时都会带上两壶饮用水。到第二天时，水壶基本都空了，就算没空也所剩无几。一个排在机场边缘的一个大坑底部找到了一汪浑浊得像牛奶一样的水，里面全是沙子，但人们太渴了，顾不得这么多，先喝再说。7点刚过，几辆卡车把装在5加仑[\[24\]](#)水桶里的水送到了前线，人们纷纷把手中的搪瓷杯伸进去舀水喝。这些水颜色有些发红，闻起来有一股燃油味，水面上还漂着蓝莹莹的油花。R.V.伯尔金回忆道：“人们喝一口就把它吐了出来，有些人把它喝了下去，几分钟后就会呕吐。有些人甚至一上午都忍着不喝水。”[\[25\]](#)他们后来才知道，储备的淡水是被装在55加仑油桶里运上运输船的，有些油桶没有清洗干净。

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穿越机场，到达佩里硫岛的东部海岸。当他们准备前进时，机场正北面一座陡峭的岩壁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有人将这座令人畏惧的石山称为“血鼻岭”。自从前一天登陆以来，日军就一直从这座山上向美军倾泻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有人说自己能“感觉到”高大山顶上那些看不见的敌兵的眼神，这令

他们感到无助。

10点刚过几分钟，出击信号来了。陆战队员们纷纷站起身，向机场中央冲去。他们就像训练时要求的那样分散开来，彼此保持8到10英尺间隔。他们全都低着头，跑得很快。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但他们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静止的目标更容易被打中。爆炸把大块的泥土掀起来抛向空中。冲刺时，弹片和炸飞起来的珊瑚碎块如雨点般落在人们身上。硝烟和灰尘钻进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里。伯尔金下士回忆道：“所有的东西都向我们打来——迫击炮、大炮、机枪和步枪。你能听见身边满是弹片和子弹的‘嗖嗖’声和‘啾啾’声。我们就像早餐桌上的虫子那样无遮无拦，我不停地喊：‘快跑！别停下！’”[\[26\]](#)

斯莱奇看到自己周围不断有人倒下。烟雾遮住了他的一部分视野，这令他深感庆幸。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在摇晃，耳边满是嗡嗡声。巨大的爆炸声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多：

我感觉自己飘浮在某个虚幻的风暴中央。日本人的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曳光弹从我腰部两侧飞过。这些致命的轻武器火力在爆炸的炮弹面前就显得不起眼了。爆炸和横飞的弹片撕裂了空气。成块的珊瑚礁被炸飞，砸在我的脸上和手上，钢铁弹片砸在坚硬的石头上，如同冰雹落在城市的街道上一一般。炮弹四处爆炸，就像巨大的鞭炮一样……我们冲得越远，情况越糟糕。巨大的声响和嗡嗡声就如同铁钳一般钳住了我的耳朵。我咬紧牙关，振作起来，做好了随时被打倒的准备。看起来我们没有人能冲过去。[\[27\]](#)

机场就是个被炸平了的垃圾堆放场，四处堆放着一百多架被

熏黑的日军飞机的残骸。所有建筑都被炸毁，但是成堆的废墟和混凝土墙的残垣断壁仍然掩护了敌人。无论计划是什么样的，陆战队员们在接近这些位置时都不得不停下来寻找掩护。一停下来，他们便体会到了炎热天气的可怕。他们的战斗服完全被汗水浸透，靴子里也满是汗水。有几个人还中了暑。他们的脸庞干枯而发红，如同身处严寒一样浑身颤抖着。斯莱奇躺下来，一只一只地抬起脚：“汗水实际上是从每一只鞋子里泼出来的。”[28]

5个小时的机场血战之后，第5陆战团的第一梯队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了东部海岸。他们背靠海滩，在红树林沼泽中构建了一个半圆形阵地，准备迎接接下来一整夜躲不掉的炮击、步兵进攻和渗透。

到9月16日，也就是D+1日下午，橙滩已然是一副海运物资堆放场的模样。滩头管理人员已经接管了这里，大批物资、装备、车辆通过浮桥源源不断来到岸上。[29]指示上岸物资堆放地点的指示牌也被钉在了地上。橙滩的不少地方挤满了板条箱和车辆，只有走路才进得去。战死的陆战队员们被排列在海滩上，眼下掩埋组只能摘下他们的“狗牌”（身份识别牌），把他们埋葬在长长的壕沟中。数百具日本人的尸体大部分都暴尸荒野。他们的口袋和其他财物都被搜了个遍，所有值钱或者有趣的纪念品都被拿走了。一位陆战队员回忆道：“裸露的肚子上流着红色的血。那些还在身上的胳膊和腿奇怪地扭曲着……他们的眼球干瘪，陷进了眼眶里。”[30]他们的皮肤开始变成褐色，苍蝇在身上飞来飞去。死者发出的恶臭很快变得比酷热更加可怕，陆战队员们急忙要来了推土机，好尽快掩埋死者。

拉佩图斯将军原本想在D日就上岸，但是他在训练事故中受了伤，脚上打着绷带，要拄拐杖才能走路。于是幕僚们劝他多等一天。D+1日，他来到岸上，接管了位于橙滩的师指挥所。他

的情绪很好。第5陆战团已经拿下了机场，这是佩里硫唯一真正的战略资产，而且他们在机场中部的防线也已连成一体。拉佩图斯确信最艰难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便电告盖格（他正坐镇外海的指挥舰上）自己不需要预备队了。于是盖格将军放出第81步兵师前往附近的安加尔岛登陆。拉佩图斯的建议和盖格的决定事后都将遭到严格的审查和批评。

战斗第三天，觉得胜利在望的拉佩图斯命令第1陆战团拿下机场北面的高地，也就是被他们称为“血鼻岭”的石灰岩山。在佩里硫的旧地图上，这里被标记为“乌穆尔布罗格山”。进攻路线只有一条狭窄的石质山谷，他们称之为“马蹄盆地”。从机场出发前往马蹄盆地需要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两旁满是混凝土炮楼和碉堡的废墟。陆战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推进，掩护自己的侧翼，进攻日军机枪手和狙击手藏身的碉堡残骸。这是一件缓慢而血腥的工作。高温和潮湿一刻也没放过这些人，他们常常要停下来等待运水车把5加仑的水罐送到前线来。障碍物和废墟被清理到一旁，好让坦克开上来。利看到了这个场景，他将这条路描述为“一条堆满了日本手推车、砸碎的弹药箱、生锈的铁丝和散落的装备的小道。各种伪装的陷阱令我们无法触碰其中的任何物件……日本鬼子的尸体就躺在他们被打死的地方，在两个碉堡里，我看到有些尸体只剩下了红色的碎肉，散落在被血染红的混凝土碎块和碎裂的原木中”。[31]

到这一天日终时，第1陆战团的前出巡逻队已经抵达了马蹄盆地的底部。他们并不喜欢这里的样子。布满岩石的谷底，每一寸地方都被能够相互支援的日军火力点或射击孔所覆盖。有些高居悬崖之上的火力点至少还看得见，但许多其他火力点则藏身于低矮的灌木丛之中。这样一座堡垒该怎样打？若要攀爬石壁前往某一个日军火力点，陆战队员们就会暴露于另一个火力点的致命

打击之下。马蹄盆地只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一整条嵌在极其精巧的碉堡体系中如迷宫般难走的小道。穿过马蹄盆地，是一个接一个尖削的山岭。这些崎岖的地形先前长满密林，从航空侦察照片上看似乎是一些平缓的圆形山包。然而轰炸和炮击却把这里险恶的地形地貌暴露了出来：被硝烟熏得斑驳不堪的山岭、丘陵、山尖、山谷、急流峡谷和陷坑。陆战队在打开地图制订作战计划时，给每一处地形都命了名。马蹄盆地被东边的“沃尔特岭”和西边的“五姐妹山”，以及北面的“五兄弟山”所俯瞰。与马蹄盆地平行的还有另一个山谷，被称为“野猫盆地”，山谷的尽头是一处被命名为“中国长城”的陡峭悬崖——翻过这个悬崖，是一处布满巨石的通道，称为死亡谷。整个战场只有大约1平方英里——但是对于在其中战斗的人们而言，这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仿佛有一个整个行星那么大，是一个无穷无尽、不可征服的喀斯特迷宫。

岛上的日本守军兵力达1.1万人，抽调自关东军的第十四师团。其指挥官是中川州男大佐，他是个满身勋章的“明星”指挥官，指挥这个师团的第二联队。当年早些时候马绍尔群岛突然陷落之后，这支部队便乘船从中国东北来到此地。东京方面并不指望佩里硫守军能够生还，也就没有制订撤离幸存者的计划。他们希望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在这座小岛上让敌人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然后战至最后一人。

5月上岛之后，这些日军便开始不知疲倦地升级和扩大佩里硫的地下防御工事。中川大佐是“蜂巢”防御战术的领军人物，这一战术的要旨是在地下挖掘碉堡和隧道。日军预见到敌人将会获得绝对海空优势，并把所有地表阵地化为废墟，这位大佐便把其大部分部队留在山峦深处的洞穴里作为预备队。他的意图是，让美国人送上门来，在岛屿内部的高地上一决高下。这一“纵深防

御”理念将使日军得以坚守更长时间，让进攻一方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佩里硫比太平洋战争中的任何其他战场都更适合上述战术。岛屿的中央是一片山岭，其下是千百万年地质变化形成的巨大“蜂巢”状洞穴群。象牙色的岩石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泥土，刚好够生长出足以遮蔽洞穴入口和射击孔的稀疏植被——但是石质地面却无法挖掘，这意味着进攻方将很难在地上挖出散兵坑隐蔽自己。得此天赐，日本人又继续扩大和改良。到1944年9月美军登陆前夕，中川的大部分守军都已栖身于连接着超过500个天然和人工洞穴的地下迷宫之中。有些洞穴入口处装有和斜坡齐平的钢门，藏在伪装网或植被之下难以发现。有些洞穴很小，人们需要四肢触地爬着才能进来，而最大的地下洞穴却足以一次容纳一千人。坑道体系内装有木质楼梯、电灯、电话线、仓库、通风井、隔层楼板、食堂和烹饪设备、医院、指挥所和嵌入式碉堡。淡水存储在水箱里，足以对付长期围攻。坑道网络长达数英里，中川可以把他的增援部队从山体的一处调动到另一处，即便距离超过半英里，也不会有一寸路途暴露在敌人火力面前。在岩石深处，气温凉爽舒适，守军因而得以免受外面火炉般的炙烤之苦。

守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中川拥有75mm火炮、81mm迫击炮、141mm重型迫击炮、.50口径机枪、高平两用炮、火箭发射器和藏在洞穴深处的各种充足弹药。许多时候，洞穴入口本身就是居高临下的射击阵地。重型火炮装在轨道上，可以通过地下通道在阵地间转移。弹药可以通过一台精巧的升降机和轨道车从弹药库里运出来。在大型洞穴的入口处，日军工兵在隧道侧壁炸开了很深的防炮洞，当洞口遭到敌人炮击时，部队便可隐蔽在此。日军还布置了隐蔽的通道和射击阵地，即便山洞被敌人攻下，日军依旧可以凭此威胁对手。

9月初，佩里硫开始遭到美军第3舰队舰载机和陆军航空队B-24轰炸机的反复猛烈轰炸。轰炸机夷平了地面上的几乎所有设施，包括机场的所有附属建筑。在9月6日美军的战斗机清场中，飞行员们发现“空中没有飞机，找不到舰船，高炮也很弱，地面上也看不到几架能用的飞机”。^[32]数十架日机被摧毁，其中许多毁于地面。航母舰载机用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反复攻击机场和滩头工事。9月12日，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出现在附近的海面上，开始向岛上倾泻高爆炸弹。炮击摧毁了登陆滩头尤其是机场周围大部分残余的建筑和碉堡。持续不断的打击逐渐烧毁或者清除掉了岛屿中央山区的灌木林，出乎预料的陡峭岩石地貌开始显现出来，珊瑚石锥和石柱组成了高大的峭壁，若非战时，这或许还会是美丽的风景。有一部分日军火炮开炮还击，但是并不多。

在设于一条山脊之下的指挥所里，中川大佐和北方另一座岛屿科洛岛上的日军指挥部还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的指挥所很舒服、好用，建造得也很好。这座大山洞里装有精心制作的木质楼层和楼梯，一个冷藏库，中川和其他高级军官还有用隔板隔出来的舒适的卧房。指挥所配有办公桌、会议桌、文件柜、地图墙和通信设施。在这深藏地下的巢穴里，军舰巨炮炮击带来的震动显得遥远而模糊。轰炸和炮击造成的伤亡微乎其微，他们的大部分兵力都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准备在自己选择的地方，也就是高地上，迎击敌人。

第1陆战团的4个营向马蹄盆地发动了第一轮进攻。地形将他们的进攻限制在了一处大约只有1 000码宽的地段上，路线两侧都是高大山岭，还处于高处敌人火力的覆盖之下。陆战队员们在这块布满岩石的走廊里行动时往往需要攀登和爬行。他们不断遭

到来自各个方向、不同类型和口径武器的攻击——步枪、机枪、手榴弹、火箭弹、迫击炮以及野战炮。他们的挖掘工具完全挖不动这里的岩石地面，因此无法挖坑隐蔽。看不见的敌人从各处射击，一旦陆战队员还击，他们就会退入地下通道网络，再换个地方继续打。迫击炮打来的弹雨会从地面上掀起大大小小的珊瑚礁碎块，令炮弹的破片杀伤效果大增。而美军的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则在巨石和石堆的阻拦下无法前进。

团长“大胸哥”刘易斯·伯维尔·普勒上校想要去占领高地，一次占领一个山头，即便付出沉重伤亡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守不住，那么即使拿下这些高地也没什么意义。9月20日，埃弗里特·P·波普上尉指挥的一个连（1营B连）攻占了马蹄谷边缘154高地的山顶，结果发现自己暴露在了更高处日军阵地压倒性的交叉火力之下。这支部队只能卧倒在地面上，撑到夜幕降临，但是天黑后，日军步兵又发动了一轮接一轮的凶猛反击。这个连不光要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来守卫阵地，甚至还要用上刺刀、匕首、石头，甚至是拳头。他们的人数锐减，伤员激增，弹药也不多了。拂晓时，他们还坚守在山顶上，但还能作战的只剩下了8个人。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上级也只能同意。但是这个连还要把伤员撤下去，这着实困难，他们后来用绳子把伤员从山头上吊放了下去，战死的人则只能丢弃在原地。他们的尸体还要在热带的高温下暴晒两个星期，之后才能被运到海滩附近的墓地中埋葬。波普连队的悲惨遭遇只是个开头，随着美军深入日军袋形阵地，这样的战斗还会更多。

那些在太平洋多个岛屿战场上打过仗的陆战队员，一致认为佩里硫是最艰苦的。无情的赤道烈日照射在草木不生、月球表面般的象牙色珊瑚岩上，温度常常超过43摄氏度。在前线待了3天后，官兵们都成了半人半鬼的模样：嘴唇干裂，头发蓬乱，珊瑚

沙粘在胡子拉碴的脸上。汗水流进原本已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睛里。无烟火药爆炸时的酸苦怪味刺激着他们的鼻子和喉咙。由于成天爬山，他们的手掌破了皮，伤痕累累。无处不在的臭味令人躲无可躲：腐烂的尸体，变质的口粮，还有粪便。没有埋葬的尸体上滋生出大群蓝绿色的大苍蝇，烦扰着活着的人。每天傍晚都会突然来一场大暴雨，有时候是在晚上。无休止的火炮和迫击炮轰击更是无处可躲，即便是没有被直接炸死炸伤的人，也会在反复的震动中耗尽体力和精力。有时候火炮的轰鸣声会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拂晓，想睡个囫囵觉都难——不过真正筋疲力尽的人即便是在155mm榴弹炮的炮口下也一样睡得着。斯莱奇排里的另一个人斯特林·梅斯说，这种炮声“就像是在你的双耳之间放了一条地铁隧道一样”。^[33]当炮声停下时，陆战队员们能听见夜色中传来日军伤兵和濒死者的哀号。他们呼喊妈妈——无论哪个国家的人，临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在岛屿南部的低海拔地区，后方梯队的工兵和后勤部队已经开始努力把佩里硫改造成为前进作战基地了。三个海军工程营（绰号“海蜂”）在D+3日上了岸。他们用浮箱搭建了一个精巧的1/4英里长的栈桥，使得车辆可以直接开出坦克登陆舰，越过礁盘开上橙滩。到D+4日，机场和宿营区便已挤满了卡车和推土机。很快，海滩旁的椰子林里便建起了帐篷营地。“海蜂”们接到命令，要把主跑道延长到6 500英尺并升级路面质量，以便起降B-24轰炸机。^[34]推土机把日本飞机的残骸推到跑道外，卡车运走建筑废墟，运来砸碎的珊瑚礁，用来制作混凝土。乌穆尔布罗格山上的日本火炮和迫击炮仍打得到机场北部，因此工兵们不得不在炮火下工作，有时候旧的弹坑还没有填好，炮弹又飞来在跑道上炸开了新的弹坑。爆炸和来来往往的重型机械掀起了漫天尘土，工兵们不得不戴上面罩，免得被呛住。“在北面，血鼻岭

的那一边，我能看见橙红色的火光，听见战斗的声响，就像连续不断的雷声一样，”“海蜂”上尉查尔斯·S.麦坎德利斯说，“那景象宛如地狱。”[35]

9月19日，一支海军陆战队的F4U“海盗”中队来到机场，开始支援地面作战，轰炸附近山脊上的日军阵地。它们会投掷500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投弹高度往往非常低。这或许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短的轰炸航程。这些“海盗”刚一起飞就立刻右转，低空飞越山上的敌人阵地，投完弹药后再次右转降落。轰炸过程通常持续不超过两分钟，飞行员甚至懒得收回起落架。

普通炸弹看起来对日军的地下阵地没什么作用，但凝固汽油弹就好得多，它至少可以烧掉残余的植被，把日军的火力点暴露出来。冻状汽油燃烧剂有时会从入口流进敌人洞穴，迫使日军后撤到他们地下坑道网络的更深处。

拉佩图斯将军没能搞清楚他的师所面对的全部敌情，他向盖格将军发出了不合时宜的乐观战报：美军现在牢牢控制了登陆海滩、东部海滩、东边的“龙虾钳”半岛，以及机场。第5陆战团各部正沿着岛屿西侧道路推进，遇到的抵抗轻微而零散。第7陆战团已经横扫岛屿南端，正在系统地猎杀留在这里的日军散兵。岛上日军余部绝大部分收缩进了日渐缩小的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拉佩图斯和他的师幕僚班子认为，再来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能拿下这里。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保持进攻动能，拉佩图斯要普勒上校“赶快”动起来打破僵局。普勒是个因好斗而出名的勇将，他根本不需要劝，直接把这些要求传达给了各个连长，还把他第1陆战团团部的一部分人手派到了前线。这个团向马蹄谷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步兵跟在坦克后面，还有炮兵弹幕射击支援，却一次接一次在惨重伤亡后被打退。在佩里硫之战的最初8天里，这个团伤亡了1 749人，进攻部队伤亡率达到56%，其中第1营伤

亡高达71%。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之后，战果却乏善可陈，几乎未能向敌人据守的恶劣地形区前进一步。

9月21日盖格将军首次登上佩里硫岛，眼前的情况让他警觉了起来。拉佩图斯和他的师指挥部人员显露出了疲劳和动摇的迹象，但他们却不打算承认自己需要新的战术。在马蹄盆地底部的第1陆战团指挥所，许多指挥官看起来在体力、情绪和精神上都已接近崩溃，脸上透着憔悴和惊恐。普勒上校不怎么说话，显得有些紧张。他和他的幕僚们除了请求继续增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之外，也找不出别的办法。盖格得出结论，第1陆战团的使命已经完成，这个团的损失过于沉重，应当撤离前线。他决定投入一部分预备队——陆军第81步兵师的一个团级战斗队。拉佩图斯立刻跳起来反对，但盖格主意已定，不容更改。他命令普勒的陆战队员们准备登船撤离，并要求那支陆军团登陆佩里硫。

9月21日，尤金·斯莱奇的K连（5团3营）沿西部道路行军时，遇到了从道路对侧走来的第1陆战团的纵队。斯莱奇立刻看出那个团已人数锐减。“第1陆战团原来的一个连看起来像是排，”他写道，“排看起来像班。”^[36]和斯莱奇同在一个队列里的斯特林·梅斯也有同感。这是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团，只要看一眼他们的脸，就足以知道佩里硫比自己部队此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可怕。那些从马蹄谷下来的弟兄也看着他们，“眼睛却盯着远方……他们看起来很可怕，汗水在破烂的军服上留下白色的盐渍，脸上胡子拉碴，被硝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浑身血迹，憔悴疲惫”。意识到自己的团可能会前往同一座山，梅斯忽然觉得，他们或许瞧见了“未来的自己”。^[37]

《生活》杂志的战地画家汤姆·利画了一幅肖像，描绘了前线血战后刚刚回到橙滩附近宿营地的一位陆战队员。“战争疲劳症”这个术语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军事医疗学的词典，而利笔

下的这个人恰好表现出了其症状。他看起来憔悴、疲惫而恐惧，瞳孔扩大，嘴巴张开，两眼无神。这是一幅令人伤心欲绝的悲惨肖像，堪比爱德华·蒙克绘于1893年的油画《呐喊》。利这幅画作名为《2 000码的凝视》，发表于1945年6月号的《生活》杂志，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或许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艺术作品之一。

佩里硫岛D日之后第8天，“僵局”行动愈加名副其实了。日军击退了向其山岭中的“口袋”发动的每一次协同进攻。而由于占据着高地，他们又能够以一阵阵的迫击炮和炮兵火力袭扰机场，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海军巡逻队还发现，敌人援军利用驳船和小艇不断在岛屿北岸上岛。于是，师长坚持要拿下佩里硫北部，这意味着要强行通过西部道路，顶着炮兵和狙击手的火力拿下这里。于是，一个陆军团和一个陆战团开始沿着道路试探进攻。在一处被称为“狙击手老巢”的地段，乌穆尔布罗格山的陡峭悬崖一直延伸到海边，将美军部队挤压到一处狭窄的通道中，其一侧是红树林沼泽，另一侧则是敌人占据的高地。敌人狙击手从右边的山坡上开火，左边则是沼泽，数十名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阵亡于此。道路上都布设了地雷，由绊索和其他设计精妙的机关触发。这些障碍不可避免地拖慢了一切进攻的速度，但是控制西部道路是绝对必要的，拉佩图斯对部队的催促一刻也没停过。有鉴于马蹄盆地的血腥僵持，他希望能找到一条从北方进入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的更有利途径。

9月23日，陆军第321团级战斗队从加莱科鲁村南边的出发阵地向山脊线发动了全面进攻。在外海战舰上舰炮火力的密切支援下，士兵们一开始取得了不错的进展。^[38]利用灌木丛的掩护，他们向内陆突破了大约1 200码的距离，清除了多个山洞和碉堡，消灭了大约30名日军，拿下的地盘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

期。这次突然进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这一部分日军防线上没有太多的兵力。然而，入夜后，日军还是发动了凶猛的反击，到9月24日日中时，攻过来的美军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口吞得太多了。他们的战线已经推进到了山区深处，从海滩过来，需要穿越布满碎石的崎岖道路的补给线变得长而不可靠。弹药、淡水和口粮必须由人力搬运，穿过半英里长上爬陡坡下穿险谷的路线才能送到部队手中。日军的反攻很凶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也丝毫未减。伤员要躺在担架上抬出去。在这样的地形上抬担架，可以想见伤员们遭受的痛苦，而且许多担架手也被敌人狙击手放倒。美军不敢把伤员留在身后交给敌人，否则他们一定会被虐杀。[39]

一如往常，入夜后日本人又来了，要么单枪匹马，要么三五成群。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任何一点声响都会显得很大。亨特上尉记述了在佩里疏岛上那些压力大到几乎要把人神经绷断的夜晚：“当一个人躺在洞穴里紧张地盯着眼前的黑暗，听着、闻着、等着、期待着，身边只有自己呼吸的声音，这样的寂静就会变得令人发疯，无生命的物体或许会慢慢站起来变成活物，静止的东西会动起来，微风摇动树叶的声音或许会变成有人在爬行的响动，战友可能会被当成敌人，敌人也会被当成友军。除非能有极其强韧的神经，否则那些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就足以令人疑神疑鬼。”[40]有人真的发疯了，开始大喊大叫。这些人立刻被从前线拉了出来，因为不能保持安静的人会危及他的队友。执行夜间渗透任务的日军穿着帆布做的分趾踏板鞋，不会发出声响，他们用匕首、军刀或刺刀无声无息地发起攻击。伯尔金下士说，有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兵溜进了一座山顶上的一处射击阵地，勒住了他班里一名陆战队员的脖子。这个人立刻惊醒过来，把手指插进了日本兵的眼窝，把他扔下了悬崖。“我听见那个鬼子坠落途中

一直在叫，从眼睛被插的那一秒直到他落到山下，”伯尔金写道，“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凄厉的叫声。”[41]

如同两个月前在塞班岛时一样，未埋葬的腐烂尸体上长出了黑压压的泛着金属光泽的蓝绿色大苍蝇。虽然这些东西更喜欢爬而不是飞，但空中仍然满是震耳的嗡嗡声。它们吃被丢弃的食物残渣，更恐怖的是，吃血和尸体；它们爬进人们的饭盒，飞到口粮罐里。它们懒而顽固，用手挥都挥不走，要用摇晃和拍打才能把它们从勺子和叉子上赶走。有了太平洋上其他屠杀场的经验，美国人已经预料到了这些飞虫的问题。于是农业部的专家乘飞机来到此地，在全岛展开灭蝇行动。海岸外运输船队的船舱里运载着数百桶“滴滴涕”农药，他们要把这些化学物质和柴油混合在一起，在全岛喷洒，尤其是要喷到尸体上。有超过300个消杀小组背着装有混合液的水罐，把它们喷洒在尸体、死水塘，以及“厨房、食堂和厕所”周围。[42]装在卡车上的喷雾器喷洒了海滩周围的大部分区域。消杀组甚至还找到了在山区战场上喷洒杀虫剂的方法。一架TBM“复仇者”装上了汽油驱动的天空喷雾器，还装了一台飞机加油泵，用来把杀虫剂从机腹油箱里泵出来。这套系统一分钟能喷洒大约100加仑。这样，杀虫剂就被喷洒到了整个乌穆尔布罗格山区，对敌人和己方阵地进行无差别消杀，覆盖所有的活人和死人。这些努力明显减少了苍蝇的数量——但是想要消灭干净还是做不到。[43]

到10月第一周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前线官兵的忍耐都接近了极限。这三个星期对他们来说就如同三个月，甚至三年那般漫长。斯莱奇回忆中的佩里硫就像是“一个恐怖的阴暗世界，随着战斗一拖再拖，伤亡与日俱增，想要离开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时间已没有意义，生命也没有意义。激烈的搏斗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野兽”。[44]麦坎德利斯上尉将佩里硫形容为但丁眼中的地

狱，许多在那里服役并战斗过的人也如此认为。但另一个更相似的场景是在J.R.R.托尔金的作品《指环王》中。就如同魔多的“黑暗之地”一样，这里的战场是一片邪恶，充满恶臭的废土——毫无生机，雾气缭绕，被高不可攀的尖削山岭所环绕。一支狡诈的半兽人军队深藏地下，他们能经由无处不在的地下坑道和洞穴网络在大山下面穿行。在对手看来，这些人和托尔金笔下的半兽人一样残忍，毫无人性。即便是这片邪恶地域的名字，乌穆尔布罗格，也像是来自中土世界的地图——就像托尔金小说中的中土之战一样，这场战争也必须要把敌人全部杀光才能赢得胜利。

登陆日当天，斯莱奇目睹过他连里一个老兵“战场劫掠”了一个死去的日本兵，掏走了他身上的值钱物品和纪念品，那时他还感到不齿。但是很快，他和第1陆战师的其他新兵就对更可怕的场面视若无睹。战场的大部分地方都无法在岩石地面上挖掘坟墓，因此尸体要在高温下停留数个星期，持续腐烂。它们膨胀、变黑，然后像烂果子那样裂开。斯莱奇的部队用大家都熟悉的尸体做路标，来标识防区周围的道路。“看着尸体一步步腐烂的过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从刚刚战死，到膨胀，到腐烂生蛆，到露出白骨——就像有一台生物的时钟在指示着一去不返的时间。”^[45]斯莱奇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向一具碎裂而且积满雨水的日本兵头骨里扔石头来打发时间，“就像小孩子向家后面某条道路的台阶上扔鹅卵石一样随意；他的举动毫无刻意的恶意”。^[46]

美军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把己方的尸体从战场拖回来，埋葬到海滩附近。但这并不总能立刻做到。于是虐待敌人的尸体便成了双方都无法否认的恶行。斯莱奇记得他们曾经发现一具陆战队员的遗骸，尸体早已四分五裂：头和手被砍下来，生殖器被割下来塞进了嘴里。“我的情绪立刻变得异常愤怒，对日本人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憎恨，”他写道，“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对他们抱有一丝怜悯或同情，无论何时何地。”^[47]那个时候日本牙医常常用黄金来填补缺牙，因此不少敌兵都镶有金牙。于是有些美国人就会从敌人尸体上“收获”这些值钱东西。斯莱奇就见到过一个陆战队员为了从一名日本伤兵嘴里拿金牙，用卡巴牌军刀把他的嘴活活割开：

由于日本人在不停地踢他的脚反抗，他的刀从牙齿上滑开，落进了受害者的嘴里。这个陆战队员一边咒骂着，一边把他的两颊割到了耳朵，用脚踩住他的下颌，又要去拔金牙。鲜血从那个兵的嘴里喷涌而出，他发出痛苦的叫声，拼命反抗。我喊道：“别这么折磨他了。”但没有人理我。另一个陆战队员冲了过去，把一颗子弹打进了敌兵的脑袋，终结了他的痛苦。而这个浑蛋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自顾自地拔他的值钱货。^[48]

虐待和摧残敌人尸体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在那种混乱的环境下，在无止境的暴行中间，人们很难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指责他们。那些想要阻止战友恶行的士兵也自有办法。例如，他可以向战场纪律部门举报，或者告诉对方这么做会被逮捕并受到惩罚，或者以防止腐尸烂肉臭味扩散为理由。他可以警告对方，从日本人尸体上拔牙可能会染上危险的细菌。最后，他还可以指出，这么做会令他自己永远被家里人视为怪物。斯莱奇排里的另一个陆战队员一度随身带着一只日本人的手。他把它包裹在蜡纸里，装在背包中，想要在离开岛屿时带回家。斯莱奇和其他几个人都不同意。他们告诉这个人，军官会把他送上法庭的。这只手会把全船熏臭，让人心里发毛。最后，这个人还是不情不愿地扔掉了他的这件纪念品。“战争毁了我的朋友，”斯莱奇评价

道，“他现在是个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即便举止礼貌，他也还是野蛮人。令我颤抖的是，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也会变成这样。”[\[49\]](#)

后知后觉的拉佩图斯终于意识到他期待的“激烈而短暂”的战斗落空了。这个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堡垒体系，与地形精妙结合，其设计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给进攻方制造伤亡。敌人庞大的洞穴与隧道体系经历了数年的苦心经营，还得到了坑道工兵和排雷工兵的支援。现在，美军需要耐心和新的战术。战斗的最后阶段将会是痛苦的消耗战。进攻的进展很慢，而且断断续续，地盘只能一码一码地去夺取。美军出动装甲车辆开到山脊线上，向日军阵地还击。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所有日军火炮和射击阵地的位置，并清除所有残余的植被。最终美军绘制出了整个战场的地图，包括最细微的地方，涵盖了每一处被探知的敌人火力点位置。一天的进展只能以五码或十码来计。或许陆战队应该把一门重炮拖到某一处新拿下的海角上，用钢缆索具将其固定住，之后这门新拉来的大炮就能对高山上那些麻烦的山洞入口或射击孔进行直射。155mm榴弹炮的威力足以一块一块地把山头啃掉——借助这些重武器的力量，他们开始逐步炸毁日军山洞的入口。

10月12日，师指挥部宣布战役的“突击阶段”结束。这份声明令仍在山区和敌人交战的部队嘘声一片。日本人还远远没有被打败，他们还保留着足够的战斗力，而美国人仍然在不停地死去。一名陆战队员说道：“师指挥部的某些人应该到这里来，告诉那些该死的鬼子，突击阶段结束了。”[\[50\]](#)但是必须承认，残余的日军已经躲进了他们越来越小的袋形阵地，对于防线之外也难以再构成威胁。佩里硫南部的平坦地带作为前进作战基地已经开始运转。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从这座机场起飞，前去支援对

菲律宾的进攻，货轮也开始定期向这个岛上运送补给物资。到10月第二周的时候，日军的“口袋”已经收缩到了一片400码×800码的区域内，未受伤的日军士兵只剩下1 000人多一点。有些人半开玩笑地提议，陆战队应该在这块地区周围架上带刺铁丝网，插上一块“战俘营”的牌子。美军飞机在战场周围投下了传单，日语专家也开始通过大喇叭向日军劝降。然而应者寥寥。中川的司令部一定在山洞某处有一台印刷机，因为他们也印制了自己的传单回应美军，写给“可怜的不要命的扬基娃们”。这份传单用半通不通的日式英语告诉美国人，他们之所以被送到佩里疏来，是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需要用太平洋上的一场胜利来奠定竞选连任的胜局。他们指责美国人的战争手段卑鄙，发誓日军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传单原文如下，连同错误拼写和不当用词一并奉上：

大骗子卢斯福（Rousevelt），他明显为了总统竞选，出于他的政治野心，像对待机器人一样不仅驱使着可怜的尼米特（Nimmit），还驱使着马卡瑟（Maccasir）。就像这里，真可怜。一定会牺牲掉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的劝降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向那些注定要在几天后被完全毁灭的人投降。告诉你们，对于你们毫无人性的进攻方式，你们的神会让日本军队向你们发动更多的报复性打击。再说一次，对于你们毫无人性，与军人精神相悖的进攻，你们将会得到一场极其严厉的打击。我们指的是残酷的打击。——日军

[51]

陆战队被逐步撤出了前线，代之以陆军第81步兵师（“野猫师”）。10月15日，当他们最终收到撤回帕武武的命令时，佩里疏只剩下最后一个第5陆战团还在岛上。他们乘坐卡车前往岛屿

北端，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新的宿营地。他们把旧的军服和作战靴埋入地下，领了新的，小小享受了一把淋浴、帐篷，还有舒适的匡西特板棚房食堂里的热饭热菜。几天后，他们排队走下海滩，登上登陆艇，前往等候在近旁的运输船。佩里硫之战让三个陆战团丧失了战斗力，他们不得不花上许多时间，吸纳大量的补充兵重建队伍。

几天后，盖格将岛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野猫师”师长保罗·J·米勒陆军少将。第1陆战师在战役中伤亡6 786人，其中超过1 300人战死。许多生还者都会长期生活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之下，虽然这个名词当时尚未出现。哈尔西将军发出了一封电报，向他们的努力和牺牲致敬：“谨以第3舰队全体向你们致敬。上铤高峰，下平山洞，消灭11 000名贼眉鼠眼的敌人，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干得极其漂亮。”^[52]

在太平洋的众多战场上——最严重的是在塞班——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同的战术理念带来了严重的摩擦。盖格和拉佩图斯想要在把岛屿移交给陆军之前消灭日军的抵抗，可是没做到，深感遗憾。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交给陆军之后，他们也是又进行了7个星期的艰苦战斗才把敌人从他们的山洞里挖出来。在乌穆尔布罗格恶劣地形上最后阶段的战斗中，“野猫师”展现了缓慢推进的围攻战术的好处。他们需要一条更宽、质量更高的道路通往马蹄盆地，以便把坦克、卡车、装甲推土机和重炮送到前线，于是便修了一条。他们让日军阵地不间断处于重炮炮击和空中轰炸之下，每天都要扔上去数吨的凝固汽油弹。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沙袋掩体以掩护步兵。这些沙袋在海滩装满沙子，然后用两栖车或其他装甲车辆送到前线。最后，陆军工兵甚至建设了一条空中滑道，其外观和功能都很像早期的滑雪场缆车，用于把沙袋从滩头直接运到山上。这些沙袋墙不断前推，越来越接近日军的射击阵

地，有时候士兵们甚至会用棍子把沙袋顶在自己前方向前爬。美军逐渐封闭了日军洞口和火力点。对此，日军报以一贯的高超技术、精明和坚定。即便“野猫师”占领了日军头上的山峰和山脊线，日军仍可能坚守着山体的内部。美军有时会听见自己下方的石头下面传来日本人的声音，或者闻到日本人做饭时的香气从看不到的通风口飘出来。被火炮轰塌的山洞口可能会从内部被炸开，随后一队日军士兵就会爬出来，从美军意料不到的方向发动进攻。由于夜间经常遭到小股部队袭击，于是陆军工兵便架起了泛光灯，保证战场如同白昼。沙袋堡垒向日军袋形阵地的中央不可阻挡地推进。美军还建了一条管道，柴油从海滩泵进去，直接倾泻到山洞口。“得益于一套接力泵和装在管道口上的喷嘴，我们达到了花园水龙带的喷射效果。白磷手榴弹则被用来引燃附着在喷洒区岩壁上和岩缝里的燃油。”[\[53\]](#)

1944年11月24日，中川大佐向科洛岛上的师团指挥所发出了最后的无线电报告。他烧掉了联队旗。此时他手头剩余的人数已不足百人；他们要组成小规模渗透组，发动最后一轮夜袭。中川似乎是搞了个仪式自杀了，但是没有任何亲见此事的人能活下来告诉人们真相。美军也没有注意到日军的最后攻击——实际上小股日军的袭击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而大几十个与主力失散的日军士兵还要在山洞里一直居住到战争结束之后。1947年3月，对日作战胜利足足18个月后，一群由一名中尉指挥的33名掉队日军还在这里被人发现并被劝降。

佩里硫之战在美国国内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只有一部分简短报道出现在了报纸的最后几版上。这几个星期里，从欧洲战场传来的消息更加轰动并令人振奋：盟军解放了巴黎，正横扫法国，向德国推进。在太平洋方面，人们对于麦克阿瑟向菲律宾的推进更感兴趣。而帕劳群岛，即便按照太平洋上的标准，也是个遥远

而且不知名的地方，人们搞不清这场战斗和其他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岛屿作战有什么区别。在这场全球战事中，佩里硫之战从规模上看也不算特别大。但这却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一种新的战役形态，它预示了太平洋上即将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发生在硫磺岛和冲绳岛上更著名的岛屿战役。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从伤亡比例来看，佩里硫是太平洋战争中代价最为惨痛的战役。在上岛参战的2.8万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官兵中，伤亡人数接近40%，包括大约1 800人战死，8 000人受伤。日军的1.1万名守军则基本全军覆没。就算是在一向对美军有利的杀伤人数对比方面——当然要考虑日本人不肯投降的因素——双方的伤亡比例也接近1：1。

中川利用他的地下坑道网络有效抵消了美军在舰炮火力和制空权方面的优势。他的部队基本避免了战术上徒劳无益的“万岁冲锋”，而是精心利用地形，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与敌交战。这些战术将在1945年日本近海各岛屿的战斗中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出现。

从此，美军士兵开始把自己的敌人视为毫无人性的恶毒的虐待狂，欲将其连根拔起、彻底消灭而后快。但同时，这种发自内心的憎恨中也夹杂着敬慕，敬慕他们的坚韧、精明、忍耐，以及在面对注定的失败和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毫不动摇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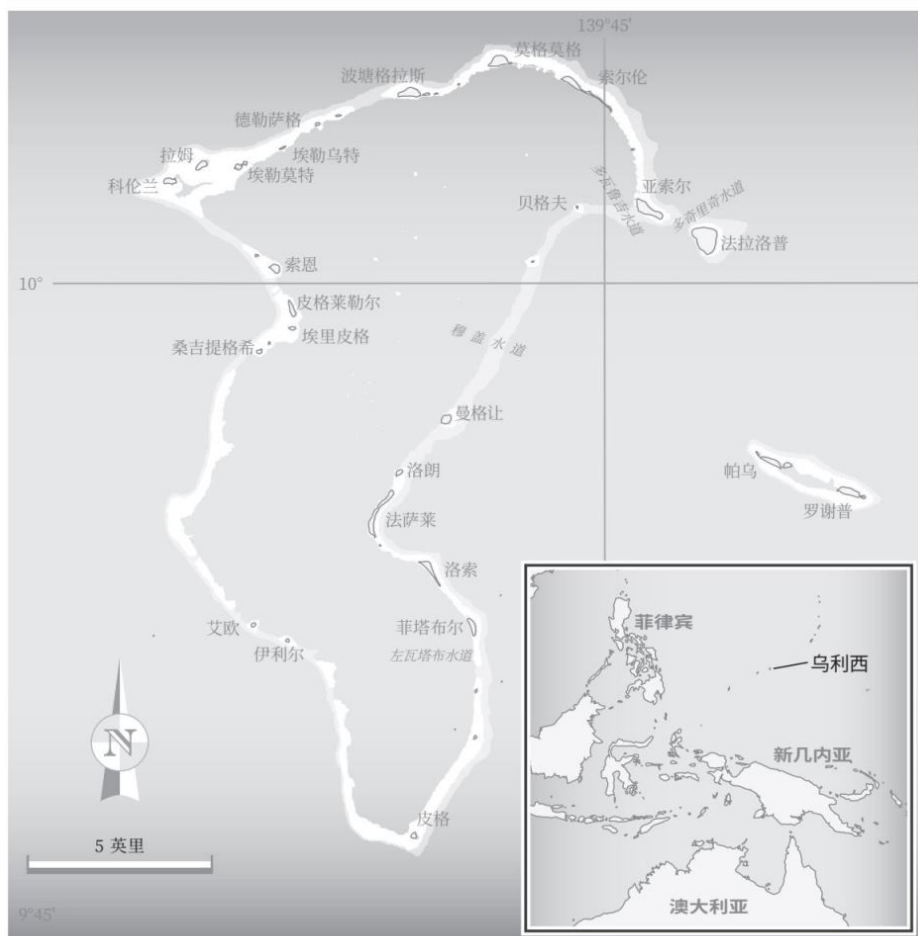
“僵局”行动的第三个目标（在佩里硫和安加尔岛之后）是佩里硫东北345英里之外的乌利西环礁。这座长满椰子树的长方形沙洲环礁几乎正好位于关岛和帕劳群岛的正中间，能够被用作新的舰队锚地。乌利西的潟湖面积达209平方英里，足以容纳整个第3舰队及其机动后勤支援舰队。一旦拿下乌利西，此前6个月里

一直扮演相似角色的埃尼威托克环礁就将降格为连接珍珠港和马里亚纳群岛的中转站。

日本人在几个月前就放弃了乌利西，因此美国人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这座大环礁。9月21日，扫雷艇扫清了潟湖的主要入口并设置了浮标，陆军“野猫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登上了一座大一些的外围岛礁。他们受到了羞怯的波利尼西亚原住民的欢迎，这些人知道这些陌生人是日本人的敌人后便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这支前进分队立刻在环礁上四散开来，他们乘坐橡皮艇在岛礁之间跃进。他们找到了一些日军丢弃的设备，但没见到敌军。根据第81师的报告，他们只找到“两个日本人，都是死的”。[\[54\]](#)到9月23日日落后，乌利西被宣布占领。

乌利西原住民的首领是一个成天醉醺醺的善良酋长，名叫“乌格王”。就和华盛顿的美国“大酋长”一样，乌格也因为脊髓灰质炎落下了残疾。于是他的下属用椰子树干和苇叶编织了一个宽大的轿子，抬着他走路。乌利西人散布在六七个小岛上简陋的原住民村落中，住在用劈开的椰子树干搭建的漂亮的棚屋里，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席子，高大而倾斜的屋顶上覆盖着露兜树叶。男人和男孩们系着缠腰布，女人和女孩们则穿着草裙，所有人都会在头发上戴花儿，身上涂油。400多年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最早发现了这些乌利西人，18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来到这里。从那时起，当地人中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化：来自传教士的教义和行为规范逐渐和他们自己的古代传说和宗教传统相融合。到1944年，他们仍然沿袭着祖先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潟湖中打鱼和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芋头。他们乘坐手工制作的有舷外托架的独木舟航行和打鱼——在浪花中划桨，或者升起用席子做成的三角帆，“如同一群海鸥在潟湖美丽的蓝色水面上掠过一样”快速航行。[\[55\]](#)

乌利西环礁



一名海军民事官劝说乌格王把他所有的臣民搬迁到环礁南部的一个岛上，作为回报，占领军将在战争期间为他们提供粮食、医疗服务和其他需要的物资。犹豫了一番后，乌格同意了。美军还建立了巡逻线，不允许自己人未经允许接近原住民居住区：“事实证明，这些步骤有效防止了我们的部队侵扰原住民。”^[56]

时间很紧。第3舰队在9月底就要来此停泊，根据新的在10月进行莱特岛作战的时间计划，他们没有时间返回埃尼威托克。于是，第51工程营的第一梯队刚一下船就开始分成两班，12小时一班连轴转，日夜不息。海滩管理组设置了上陆区和物资堆栈。栈桥也很快建好了，他们把浮箱装满沙子和珊瑚礁，然后沉入海底，锚定于此。短短三天里，工兵们卸载了超过3 000吨各种补给物资，包括淡水、口粮、燃油、医疗物资和弹药，还有大约300辆车辆，包括卡车、推土机和半履带车。他们用汽油机带动的锯子砍倒椰子树。树桩和树根被用炸药炸掉，垃圾则被运到了机场跑道和道路两旁清理出来的地方。卡车把砸碎的珊瑚礁运来倒进混凝土搅拌机。一队喷吐着废气的柴油推土机开始在法拉洛普岛原有的日军飞机跑道上施工，延长、拓宽，铺设路面。一套预制的钢质油罐组通过5条管道连接到了一个加油码头上，一块海滩突然变成了混凝土水上飞机坡道，椰子林中突然矗立起一座空中交通管制塔，机场外围也出现了用珊瑚礁做的滑行道、停机坪和停车场。一座名叫莫格莫格的岛被指定为舰队的休闲娱乐区，这里很快就会建起一系列棒球场、篮球场、烤肉炉、露天剧场和数个食堂。勤务和后勤船队将不得不自己从埃尼威托克开过来，航程超过1 500英里。这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航程，因为勤务船在海上的航速不会超过12节或14节，驳船和干船坞更是只能以6节的速度拖行。

10月1日拂晓前，两支航母特混大队鱼贯驶入潟湖，在北部锚地下锚：这是博根将军的第38.2大队（包括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和谢尔曼将军的第38.3大队。这大约是第38特混舰队的一半兵力，一支由60艘涂着蓝灰色迷彩、装有高大桅杆的钢铁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在它们的巨大体形面前，一旁的小岛都相形见绌。这天早晨，“海蜂”部队的麦坎德利斯上尉起床走到了海

滩上：“我走出椰子树林，向潟湖看过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满是战舰——大小不一，各种类型。航母、战列舰、巡洋舰、油轮、驱逐舰，10条或12条潜艇，等等，全都平静地停在锚地里。他们是在夜间溜进来的。我不知道它们怎样才能如此安静地开进来，之后我就意识到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乌利西了。这是个巨大的掩蔽场所，强大而庞大的美国特混舰队将会在此集结。”[\[57\]](#)

舰队计划在锚地里进行为期数天的休整和补充，但这没能实现。10月2日，就在舰队开进乌利西的第二天，即便是在潟湖的封闭水域里，海况也开始恶化，物资装载变得很难。气压骤降，舰队气象专家发出警告，台风将至。就和中太平洋的其他环礁一样，低矮的岛屿无法在风暴面前为舰队提供太多的保护。哈尔西将军只好不情不愿地率领舰队回到海上抵御风暴。10月3日，两支特混大队开始在滔天巨浪和速度高达50节的狂风下左摇右晃。10月4日早，他们通过穆盖水道重回环礁时，才发现风暴把65艘希金斯登陆艇和14艘机械化登陆艇（LCM）抛到了岸上，大部分都已无法修复。但是时间不等人，舰队必须重返大海，发动另一轮航母空袭，以支援即将开始的莱特岛登陆作战。第3舰队还有许多答应过的事情等着去做。[\[58\]](#)

10月6日下午，两支特混大队重新回到了海上，跟在台风后面面向北驶去。他们将在海上和第38特混舰队其余部分会合，之后开往日本和台湾岛之间的琉球群岛，空袭冲绳岛和邻近其他岛屿上的目标。这支舰队拥有17艘航母，军舰总计100余艘，水兵将近10万人，它将比自从1942年4月杜立德（又译杜立特）空袭以来的任何其他盟军舰艇（除了潜艇）都更接近日本本土。

这段1 300英里的航程艰难而充满混乱，狂风肆虐，巨浪埋舰。[\[59\]](#)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舱里，卡尼和参谋军官们将这场台

风命名为“零号特混舰队”。既然它在特混舰队前方北上，那么就可以压制日本航空兵的活动，并让敌人的远程巡逻机都停在家里，很有益处。10月7日，第38特混舰队的四个大队在塞班岛以西375英里处会合，开始了一天漫长而麻烦不断的海上加油。军舰在海上发狂般地纵摇和横摇，绿色的海水涌到甲板上，连许多老水兵都晕了船。第3舰队日志记载道：“舰队的操舰技术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9：15，加油结束，除了几艘大舰还没有完成加油定额之外，其余舰艇都加足了油。”[\[60\]](#)

10月9日午夜，舰队开到最高航速，向冲绳彻夜冲刺。一整夜，军舰咆哮着前进，但雷达屏幕上没有出现敌人巡逻机的踪影，日本人确实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来。卡尼评论道：“我们打了冲绳那帮小子一个彻底的措手不及，因为我知道在他们的观念里没人会在这种天气下出海。我们突然杀来，给他们全力一击。”[\[61\]](#)10月10日拂晓时，舰队抵达位于冲绳东北的预定起飞点，转向迎风航向，开始让飞机起飞。最初的扫荡战斗机群发现空中没几架敌机，地面上倒是停放着许多。在冲绳最大的读谷机场，攻击机群扫射了停放着的飞机，把大约12架敌机打成了火球。之后是四个轮次的轰炸机，更多的护航战斗机也挂载了炸弹和火箭弹，它们攻击了整个琉球群岛所有的机场、军营、弹药库、燃油库和防御设施。在这天的最后一轮空袭中，飞行员们只得对已经在此前的空袭中熊熊燃烧的目标再次下手了。大火吞没了冲绳县首府那霸市中心的古城，杀死了大约600名平民，把城区的4/5化为灰烬。大火毁灭了古代琉球王国遗留的许多艺术品、建筑和文化遗产。直至今日，冲绳的老年人仍然记得那场灾难发生的日期：10月10日。

这一天，米彻尔的航空兵部队总共向冲绳和其他邻近岛屿出击了1 396架次。美军损失了21架飞机，但大部分被击落的飞行

人员都被救生潜艇救回。[62]

第38特混舰队接着向南转向台湾。日军侦察机彻夜跟踪美军直至天亮。当遭遇执行防空巡逻任务的美军战斗机时，这些无处不在的日军巡逻机就会转弯逃走，常常是躲进云里。[63]但是很明显，它们随时追踪着第38特混舰队的位置，这样，在接下来的空袭台湾之战中达成突袭的可能性看起来不太大。驱逐舰的燃油已经不足——这是高速机动带来的必然后果——于是10月11日，舰队仍在南下途中，驱逐舰们就从包括“新泽西号”在内的战列舰的油槽里吸足了燃油。为了做出假动作迷惑台湾日军，哈尔西命令出动61架飞机对吕宋岛北部阿帕里机场上空进行战斗机扫荡。但是这一招数未能奏效——雷达屏幕显示，许多日本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进行扇形搜索飞行。飞行员们现在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来到台湾上空了，日本人已经严阵以待。哈尔西此时才意识到他不该先空袭冲绳，而应该把自己的第一场空袭指向台湾才对。

10月11日日落后，第38特混舰队再次加油，之后舰队转向北偏西航向，开始高速夜间冲刺。10月12日曙光初露时，台湾岛东部白雪覆盖的山顶已经出现在了西边。当太阳从东方海平线上探出头来时，第一批执行扫荡任务的战斗机群已经在空中了。出击的“地狱猫”超过200架，机群越过连绵的群山，来到目标所在地，岛屿西部平原的庞大机场网络上空。降低到云层之下，这些格鲁曼战斗机的飞行员发现大约有40架日军战斗机在2.5万英尺高度盘旋。此时即便是最没经验的“地狱猫”飞行员也完全不惧怕日本零式战斗机了，尤其是在这个高度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所有日军防空战斗机要么被击落，要么遁入云层。

当地日军航空兵指挥官，第二航空舰队司令福留繁将军在他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航空兵基地的司令部大楼上目睹了这场空战。

他先是伸长了脖子观察高空中的那些黑点，此时他无法区分美军和日军的飞机。当有飞机开始起火坠落时，他以为那都是“地狱猫”，于是认为他的飞行员们占得了上风。他拍着手兴高采烈地大喊：“干得好！干得好！大获全胜！”但片刻之后，他就发现所有坠落的飞机都是日军的，他的心一沉：“我们的战斗机去挑战严密的敌机编队，不过是以卵击石。”^[64]当海岸雷达捕捉到来袭的美军舰载机群时，福留繁集结了他所有可用的战斗机（总共约230架）。但到了这一天结束时，其中大约一半都被击落了。在随之而来的空袭中，岛上的主要航空兵基地都被严重损毁，许多飞机都被摧毁在了地面上。福留繁自己的司令部大楼也被炸成了废墟。在早晨最初的战斗机扫荡之后，他明智地命令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司令部全员躲进地下掩蔽所，因而无人伤亡。

统计了这一天的损失后，福留繁总结出自己在台湾可用的飞机已经不足150架了。但是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司令部还管辖着琉球群岛和九州岛上的航空兵基地，他在那些地方还有大约400架飞机，何况还能向东京求援。问题是，他应该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统统砸向台湾外海的美军舰队，还是保存力量来日再战更好些？1944年6月接任这一职务时，福留繁就发现自己的大部分飞行人员“仍处于训练阶段”。^[65]现在四个月过去了，情况也没多少改善，除了最精锐的飞行员之外，他对其他人都不抱指望。率领轰炸机和鱼雷机队的都是些老兵，但这些部队里大部分飞行人员都没有越洋飞行的经验，也从来没有在海上攻击过敌舰。为了保护自己，第3舰队拉起了“地狱猫”战斗机组成的防空屏障和高炮火网，他对于这些人突破这套防空体系的概率并不看好。

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大将此时恰好在台湾视察。离开时他告诉自己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一旦发现美军在西太平洋再次发动全力进攻，就命令航空兵投入战斗。当10月10日美军舰

载机空袭冲绳时，草鹿便命令所有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丰田觉得，“大决战”已经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定就在台湾他的临时前进指挥所里指挥这场战斗。这样福留繁就被架空了。

正如日军高层所见，他们这时候别无选择。美军航母对台湾的空袭可能预示着对这个岛屿的进攻即将到来，下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也可能发生在南方的菲律宾。无论如何，大战将至。由于后勤状况日益恶化，以及对敌方的意图缺乏了解，日军现在不得不快速行动起来，以确保自己能有机会倾力与敌一战，至于胜利，则是遥不可及的了。日本人失去主动权已久，现在他们只能再次被迫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转圈圈。东京时间10月12日上午9时45分，草鹿将军下达命令，启动“捷-1号”和“捷-2号”作战，也就是日本海军针对敌方进攻菲律宾或台湾岛而制定的预案。

有鉴于自己航空兵部队糟糕的训练水平，福留繁下令：“组织大量鱼雷机和轰炸机，在我方能出动的最强战斗机部队的护航下接近目标，以大编队发动同时攻击。”换言之，日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将不会像训练时那样编队飞行，也不打算按事先训练的方式进攻。它们只是径直飞向第3舰队，以庞大的机群一拥而上，期待单纯依靠数量压倒敌方的防御。福留繁后来解释道：“我们现在还能指望发动这类大机群进攻，就已经心满意足了。”^[66]

“米克”卡尼在“新泽西号”的雷达屏幕上紧盯着来袭的攻击机群。这是个巨大的回波信号，大约有75到100架飞机。防空巡逻战斗机被引导前往截击。当“地狱猫”飞行员们看到敌机编队时，“他们开始报告看到一大堆各种各样不同的飞机。换言之，这不是一支机型严整、组织合理的战术机群，而基本上是一群五花八门的空中乌合之众飞了过来，什么鬼东西都有”。^[67]卡尼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怀疑这种乱七八糟的空袭机群是不是意味着日本

的航空兵已经油尽灯枯。大部分来袭飞机被战斗机击落，还有许多毁于高炮，也有些敌机溜走了，逃回了台湾。但是天黑后，小群敌机又来了，它们几乎持续不断，贴着浪尖溜了过来。[68]第3舰队情报部门的索尔伯格上尉看见曳光弹的红色火光照亮了一架又一架敌机：“就在我们面前，它们一架接一架拖着火焰侧翻过去，在黑色的烟团和水柱中炸成巨大的火球。”[69]

第38特混舰队最终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只有一艘驱逐舰例外。“普利特切特号”被友军高炮火力击中，受到轻伤。在当晚向美军舰队发动进攻的大约100架日机中，只有25架安全返回台湾。飞行员乐观但错误地报告称本方击沉了2艘美舰，包括1艘航母，另外还击伤了2艘。[70]

但是美军在台湾的任务还没完成。10月13日清晨6时14分，东方露出鱼肚白，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向岛上的机场和其他设施放出了当天四支大规模战斗机扫荡——空袭机群中的第一支。在台湾东部的大部分区域，攻击机群遭遇了云底只有2 000英尺高的乌云遮盖着下方，浓雾笼罩着大地。轰炸机飞行员们被告知要轰炸一切可能被敌军利用的东西——跑道、机库、码头、军营、仓库、储油罐、船只——实际上他们还打击了岛上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铁路终点、电厂、一座水坝，甚至一座制糖厂。[71]“埃塞克斯号”第15战斗机中队的一名“地狱猫”飞行员肯特·李穿过云层后，发现一大群日本零式战斗机正等在那里呢。接着便是一场大混战，美日两军的飞机都在云层中穿进穿出。打跑空中的对手之后，这些“地狱猫”又接着扫射了地面目标。李回忆道：“我们的任务是摧毁机场上一切能动的东西——罐车、卡车、人员、飞机。我们就是这么干的。”[72]

“列克星敦号”第16战斗机中队的比尔·戴维斯从1.2万英尺高度冲下来，发现一架零式战斗机正高速向自己迎面冲来。戴维斯

知道自己应该转弯脱离，因为零战上20mm航炮的威力足以击落他的F6F“地狱猫”，但年轻人血气方刚，他驾机笔直地冲了过去，即便零战的炮口开始像舞厅频闪灯那样闪光也不退缩。“最终，”他写道，“一段仿佛无穷无尽的时间之后，我轻微拉起机头，所有六挺机枪火力全开。我立刻看到零战上掉下来一大块东西。他继续向前飞了片刻，随即从我的左翼下滑落并爆炸。”^[73]戴维斯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在返回“列克星敦号”时，F6F飞机上还嵌着许多日本飞机的碎片，包括“一块五平方英尺^[74]的零式机机翼插在[他的]机翼上”。^[75]

当天，美军出动了947架次飞机，45架飞机毁于战斗与事故，这个损失已经不可忽视了。很明显，日军连夜调来了增援航空兵，但是这些新来飞行员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美军飞行人员还发现了许多任务地图上没有标出，在前一天也被忽视了的机场。第38.3特混大队的飞行员们报告称在自己的任务区域里发现了15座机场，但任务简报告他们的是只有4座。^[76]

不出所料，就在日落前，当最后一批防空巡逻战斗机降落到航母甲板上时，空中反击到来了。日落时（傍晚6时26分），雷达显示低空敌机正从多个方向同时飞来。“地狱猫”机群赶在最后一抹日光消失在西边之前击落了几架来袭敌机，但是更多低空飞行的双引擎鱼雷机却在夜幕降临后纷至沓来。领队日机投下了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为后续飞机指示进攻航线。“敌人看起来相当坚定，只要找到我们，就一定会来，”第38.3特混大队战斗日志如此记载道，“我们的防区来了大约四五十架敌机，从海平面上的炮火判断，其他特混大队也没逃掉。”^[77]

在各艘旗舰上，航空兵参谋们很失望，他们觉得飞行员们显然是在台湾岛上留下了许多可以使用的机场。但实际上，这最后一批攻击机中的大部分都是直接从九州岛飞来的。这是些三菱

G4M“一式陆上攻击机”（盟军绰号“贝蒂”），它们已多次证明自己是有效的夜间鱼雷轰炸机。这些飞机来自日军精锐的陆海军混合航空兵部队，即所谓“T打击部队”。其长机飞行员中有不少都是日军中仅存的最富有经验、最技术纯熟的人。仍在台湾临时前进指挥所中指挥作战的丰田大将亲自命令T部队投入战斗，期望他们能给美军舰队以重创。

对于第38特混舰队的水兵们来说，这是战争中最惊险刺激的一夜。空袭一连数个小时毫不停歇。闪着绿色荧光的鱼雷航迹从特混大队轮形阵的中央穿过，与自己的目标仅仅是擦肩而过。高炮要直到敌机到达投雷位置时才能将它们击落。“列克星敦号”机库里的一名军官回忆了天刚黑时的场景：“地狱之门打开了。舰队的每一门高炮都在开火。从机库甲板打开的侧门望去，我看到到处都是日本飞机。”^[78]他听到大大小小的火炮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海面 and 天空被曳光弹和高炮炮弹的爆炸所照亮，敌机被撕碎，燃烧着坠入大海。

四架G4M攻击机突破到了第38.4特混大队的中央，攻击了“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其中两架飞机在投雷之前便燃烧坠落，但另外两架成功投下了鱼雷，“富兰克林号”的舰员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击中纯属奇迹。一枚鱼雷仅仅由于舰长命令动力机组全速倒退才从舰首外掠过，另一枚则从军舰底下穿过，在舰员们目力可及的距离上沉入海底。其中一架G4M低空掠过“富兰克林号”的飞行甲板，在试图逃离时被击落；另一架被高炮火力命中起火，那个飞行员瞄准了军舰的舰岛，想要自杀撞击。但他没能瞄准，只是撞中了飞行甲板旁的高炮走廊。燃烧的残骸从甲板上滑过，带着惯性落进了对侧的大海里。

当晚只有一艘美军军舰被击中。一架G4M在天黑后不久攻击了麦凯恩将军的第38.1特混大队，用鱼雷瞄准了“黄蜂号”航母。

鱼雷和目标擦身而过，但仍然继续前行，击中了重巡洋舰“堪培拉号”，引发了高及桅顶的火柱。爆炸在巡洋舰舰首处，装甲带下方炸开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巨大口子，4 500吨海水涌进了舰体，淹没了轮机舱和锅炉舱，炸死了23名舰员。工程师判断“堪培拉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靠自身动力开走了。

哈尔西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是应该命令“堪培拉号”舰员弃舰，将这艘残损的军舰自沉，还是把它拖出战区？他就算是选择了更保守的第一种选项也无可指摘。第3舰队赔得起一艘巡洋舰，而若要把它拖到安全海域则会把其他军舰暴露于危险之下。但是哈尔西很固执，他决定拯救它。他命令巡洋舰“威奇塔号”前去拖曳“堪培拉号”。很快这两艘舰都动了起来，但航速只有令人心焦的4节。开往乌利西的航程长达1 300英里，撤退的舰只将会在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处于来自三个方向超过100座机场的日军飞机的昼夜空袭之下。

为了压制必然紧随而至的日军空袭，哈尔西下令在10月14日早晨向台湾再发动一轮战斗机扫荡。第4特混大队则被派去空袭吕宋岛北部沿岸的日军机场，这不仅是自卫，也为麦克阿瑟加了一把火。坐镇珍珠港司令部的尼米兹从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调集陆基航空兵部队，投入对台湾、吕宋和琉球群岛的作战。陆军航空队也从中国大陆的机场起飞100架B-29轰炸机，空袭了台湾高雄的机场群。

一支由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组成的，被笑称为“第1残废分队”的舰队被派去护卫受损的“堪培拉号”撤离。一支以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和“卡伯特号”为核心的特混大队则被指派为其提供近距离空中掩护。10月14日一整个白天，日军飞机都对这支新建立的“残废分队”紧追不舍。为受损巡洋舰护航的舰艇则不停躲避日军的空投鱼雷，并迎战前来扫射的敌机。[79]

站在操舰角度看，拖曳被海水淹没的“堪培拉号”绝非易事。“威奇塔号”先用1.125英寸直径的铅淬火高强度拖曳钢缆拖上了前者，随后又缠绕上了马尼拉缆索、防撞设备和防摩擦设备，以免猛然拉扯导致钢缆断裂或从绞盘上被扯落。两艘舰都在风浪中危险地扭动，常常几近相撞，或者有舰员被绳索绊倒在甲板上受伤。到10月14日早上，受损的战舰已经把舰首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东南方），并踏上了航程。拖曳着部分进水的巡洋舰的救援大队成了敌人眼中的肥肉。暴雨区和低垂的云层成了日军飞机的帮凶，令其得以隐藏自身，躲避巡逻的“地狱猫”。敌机在雷达无法探测到的低空从多个方向同时杀来。领队机再一次投下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为后续跟进的飞机指示航线。和此前两天一样，日军航空兵再次遭到惨重损失，但是面对日机的数量优势，美军仍有被压垮的危险。围绕着蹒跚而行的“威奇塔号”和“堪培拉号”两舰，以四倍于其的航速环绕前进的护航舰船打出了密集的高射炮火，保护着两艘几乎无法动弹的巡洋舰。

[80]

10月14日傍晚时分，这天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晚6时45分，新型轻巡洋舰“休斯敦号”遭到日军鱼雷沉重一击，舰体中部中雷，轮机舱被海水淹没，全舰断电，军舰看起来几乎要断裂了。据一名舰员说，军舰的主甲板没入了水里，“浪头都有14英尺高”。[81]由于它向右严重倾斜，舰长下令弃舰，驱逐舰开始捞救落水的舰员。但是一个小时后，舰长又改变了主意，召集舰员返回舰上，呼叫拖曳。[82]

东边数百英里之外，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舰桥上，哈尔西正在甲板上踱步、抽烟，他在想自己的决定是否真的正确。这一天的空袭远比预计的更凶猛，而现在他已经有两艘巡洋舰被打残，被拖着走了。自从1942年所罗门群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还没

有遭受过如此重创。无线电情报（标识为“绝”，意即“绝密”）已经证实，日军的增援航空兵部队正涌入台湾。每隔15分钟左右，哈尔西就要检视一次地图桌上代表救援大队的钉子，确认这支舰队还在挪动。他后来写道，“休斯敦号”的受伤“令我担心这次救援的努力会让完好的舰艇步残舰后尘”。[83]

没人会因为哈尔西做出“自沉然后快走”的保守决定而责怪他——那样的决定意味着把两艘残舰送下海底，让未受损的舰艇离开这一海域。但是“阴谋诡计部”一直监听着东京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听到的内容令他们很恼火。日本人向国内外宣布，他们驻扎在台湾的航空兵部队已经歼灭美军舰队。新闻播音员显然信以为真，用狂喜的语调宣称，日军飞机已经击沉了8艘到11艘美军航空母舰。10月15日早上，这笔子虚乌有的账单上又加上了新的条目，东京广播电台骄傲地宣布，已有至少 17艘美军航母被送下海底。播音员还断言，美军已有36艘军舰被击沉，另有17艘“大破”。[84]广播中播放了返航日军飞行员接受采访时生动的“第一手讲述”。“军事专家”还做了绘声绘色的评论。他们宣称的夸张战果据说还有其他证据佐证——例如美军航母在这一区域空袭强度的减弱，许多逃生者坐在救生筏上的“事实”，尼米兹的司令部对这次战斗结果的缄口不语，以及中国基地出发的B-29在台湾上空的出现（这被解读为这一区域美军的绝望之举）。一名“专家”说道，在台湾外海的巨大胜利证明，“日本在这一区域仍握有不容置疑的优势……过去几天的战斗显示了一个事实，敌人越接近日本自身以及我们可怕的防御圈，其损失就会越大”。[85]东京广播电台报称马克·米彻尔中将的旗舰已被击沉，因此“美国特混舰队的司令官此时很可能已经与众多手下将士一起，在大海的坟墓里长眠”。[86]

哈尔西本人也被羞辱了一番。《每日新闻》的报道翻出了哈

尔西以往夸下的海口和要向日本人复仇的说法。一名头版评论员说道，他舰队的沉没是“上帝对人面兽心、妄想统治世界的扬基佬的惩罚”。[87]从无线电里听说东京上野动物园的管理员在猴子馆里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笼子，哈尔西都笑坏了。“鬼子们要从树上摔下来了，”他对幕僚们如此说道，“长着尾巴也没用。”[88]

返航的日本飞行员为什么会报出夸张到令人发笑的战果？T部队的飞行人员是在10月13日的夜色中发动的攻击，此时他们无法近距离观察战果。明显命中的鱼雷会以两倍乃至三倍的数量被报上去，这即便在白天也是个问题，夜间更是通病。十几名飞行员可能看到同一个“火柱”，并将其记为一次鱼雷命中。飞入高射炮火的旋涡之中，飞行员们会被五颜六色的曳光弹暂时致盲。而许多日军飞机被击落在美军特混舰队的舰艇之间，沉没之前漂在水面上燃烧，这些火光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军舰在燃烧。当地的航空兵指挥官则对这些报告不加甄别，直接上报，并一路报给了东京帝国大本营。福留繁战后写道：“渴望着见到火光的飞行人员很容易夸大他们的成绩。夜间攻击战果被夸大是屡见不鲜的。”[89]

这些广播中最令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感兴趣的是日本人提到的“肃清残敌”作战。东京广播电台报道称，日军舰队正在追击败退的美国舰队残部，意图在其到达安全海域前将其击沉：“日本航空兵，正在水面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攻击注定被消灭的敌特混舰队……敌残存舰艇现已注定全部葬身太平洋底。”[90]这些胡言乱语不过是宣传而已。但是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对自己播报的事情信心十足。不仅如此，来自珍珠港的新的绝密情报证实，一支水面舰队正准备通过丰后水道进入公海，追击并消灭第3舰队的一切残余。

这就让哈尔西的幕僚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机会利用敌人这

种被误导出来的乐观。关于被打残的“堪培拉号”，卡尼说道：“依我看，它就是个干苍蝇，是个不错的漂浮诱饵[91]。”[92]于是他和舰队作战参谋拉尔夫·威尔逊上校拿出了一套计划，交给了哈尔西。这些受损的军舰将被作为诱饵。如果运气好的话，美军航母或许能给追杀来的日本海军舰队设下圈套，赶在麦克阿瑟的部队登上莱特岛滩头之前就赢得一场大胜。哈尔西对此十分赞赏，于是一系列新的命令通过“新泽西号”高大的无线电桅杆发往舰队。第38.2和38.3特混大队将布置在受损军舰以东100英里处，这个距离足够远，不会被台湾和冲绳的日军侦察机找到，但也足够近，足以伏击闯进作战范围的日本舰队。第3舰队其余部分则退往安全距离外，开始接受油轮的加油。哈尔西把他的计划提交给了尼米兹，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随即命令这一区域所有可用的巡逻机搜索敌人舰队：“怀疑敌人水面舰队已离开本土水域，前来追击蓝军[美军]撤离台湾的残损军舰。扩大搜索范围……要覆盖敌人通过丰后水道前往大致位置的可能路线。”[93]哈尔西也让麦克阿瑟知道了他正准备迎击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主力，鉴于这种可能性，“所有对菲律宾的空袭都被撤回，等候进一步的消息”。[94]哈尔西要“威奇塔号”上的杜波斯将军发出一系列假的遇险信号。“第1残废分队”现在有了一个更拿得出手的绰号：“第1诱饵分队”。

即便没有一刻不停杀过来的一批批敌机，拯救两艘严重进水、瘫痪在海上的巡洋舰也是个不小的挑战。“第1诱饵分队”的官兵们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被牺牲掉的。看着树懒一般慢慢爬行的拖曳舰只，分队中的一名舰长说：“现在我知道鱼钩上的蚯蚓是什么感觉了。”[95]对于拖曳舰而言，要缓解重达1.6万吨的大家伙在巨浪上摇摆扭动带来的冲击，就需要舰员们精通“旧时代的结索技术”，包括使用结构复杂的挂钩和鹈鹕钩。[96]这项工作很

危险，有几个舰员都受了重伤。巡洋舰“波士顿号”最初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开始拖曳“休斯敦号”的，即便是站在“波士顿号”的舰尾，也看不见被拖着的“休斯敦号”。10月15日，远洋拖轮“波尼号”加入了这支大队，接手了拖曳“休斯敦号”的任务。令救援大队的舰员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天白天和夜晚居然都没有日军飞机前来骚扰。但是16日，他们的运气用完了，中午时分，一支由107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机群杀了过来。

“卡伯特号”和“考彭斯号”上的F6F防空巡逻机群击落了大约50架敌机，但仍然有一些敌机突破了防线。其中一架飞机瞄准“休斯敦号”的舰尾投下了一枚航空鱼雷。这枚鱼雷钻进了军舰的尾流，几乎在两个舵柱的正中间爆炸，把水上飞机库的舱门像瓶盖那样抛到了空中，20名水兵被掀飞到了海里。机库里的航空汽油罐被点燃了，舰尾燃起了大火。在空袭过程中及其之后，拖轮“波尼号”始终拖曳着“休斯敦号”，拖缆始终没有松劲。“休斯敦号”的舰长选择继续拯救军舰。这艘1.2万吨的军舰涌进了大约6 300吨海水，但仍然在向乌利西挣扎前进。大部分舰员都被转移走了，只留下大约100人在舰上。它的舰体已经深深没入水中，吃水深达32英尺，向右倾斜8°。^[97]军舰的横摇十分严重，舷侧梁端几乎触到了海面，甲板上涌上了青绿色的海水。

丰田大将起初已经命令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在志摩清英中将的指挥下从濑户内海出发，猎杀美军残舰。但最后，日本海军高层还是认清了真相。10月14日上午，日军侦察机搜索了台湾东部和南部的洋面，确认其周围仍有许多完好无损的美军舰艇。不仅如此，当天美军舰载机向吕宋发动的猛烈空袭也证明美军舰队大部一定并未受损。意识到可能有陷阱，丰田召回了志摩舰队，要他们前往冲绳以北的奄美大岛加油，10月18日再次出海，参加即将开始的防守菲律宾的“捷-1号”作战。

四天的“台湾空战”到此落下帷幕。根据福留繁的统计数据，他的台湾基地损失了329架飞机。其中179架前往攻击美军舰队未能返航，其余都是在地面上或者台湾上空被摧毁的。在岛上的主要航空兵基地高雄基地，只剩下一座建筑依然立在那里，只剩下一架飞机完好无损。此外，九州、冲绳和吕宋还有至少200架飞机被摧毁，这样日军在10月10日至17日累计损失的飞机超过了500架。自从6个星期前哈尔西的第3舰队出击以来，日军在这一区域已经损失了大约1 200架飞机。

在紧张的十日航行之后，“堪培拉号”“休斯敦号”及其救援大队最终于10月27日上午蹒跚开进了乌利西环礁。两艘巡洋舰都将回到美国本土全面修理，并在战争结束后重回海军。

台湾空战结束一天之后，麦克阿瑟登陆舰队的第一梯队来到了莱特岛外海。10月17日拂晓，苏禄灯塔（位于莱特湾入口处）上的瞭望哨用无线电发出了一份观察报告：一队扫雷舰正进入海峡。这份报告在大约一个小时后被送到丰田大将手中，他立即向所有部队发出了“捷-1号”作战警报。于是，分散在从日本本土到马来亚之间数千英里轴线上的日本舰队各部，都急忙开始准备出海。

“捷号”作战计划是在绝望之中制订出来的，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即便是最悲观的计划制订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竟会在美军登陆舰队到来之前损失如此之多的航空兵力。尽管如此，补充的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是开始从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涌入菲律宾。但是有鉴于他们的同僚刚刚遭到屠杀，这些人在面对美军舰载机飞行员的时候能有多少机会？虽然日本海军的将领们无论对下属还是对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一现实，但他们都知道，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海战已然迫在眉睫。他们将在没有有效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因此将会输掉——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真正的使命

并不是要取得完胜，而是要光荣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1] 1平方英里 $\approx$ 2.6平方千米。——编者注

[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32.

[3] *Ibid.*, pp.35—36.

[4]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20.

[5]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6] Mason, “We Will Stand By You,” p.216.

[7]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8] *Ibid.*

[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8.

[10] Hunt, *Coral Comes High*, p.36.

[11] *Ibid.*, p.37.

[1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56.

[13]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76.

[14] Hunt, *Coral Comes High*, p.71.

[15] 1码 $\approx$ 0.9米。——编者注

[16]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77.

[17] *Ibid.*, pp.177—78.

[18] *Ibid.*, p.182.

[19] Gayle, *Bloody Beaches*, p.13.

[20] Mason, “We Will Stand By You,” p.221.

[21] Hunt, *Coral Comes High*, p.137.

[22] *Ibid.*, p.124.

[23] *Ibid.*, p.103.

[24] 1美制加仑 $\approx$ 3.8升。——编者注

[25]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32.

[26] Ibid., p.133.

[27]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79.

[28] Ibid., p.80.

[29]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86.

[30]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64.

[31]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89.

[32] CTF 38 to COM3RDFLT Info CINCPAC, Sept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27.

[3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92.

[34]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5, 1944.

[35]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p.164, 166.

[36]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03.

[37]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103.

[38] War Diary, September 22,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79.

[39]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29,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40] Hunt, *Coral Comes High*, p.91.

[41]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52.

[42]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113,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43]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89.

[4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21.

[45] Ibid., p.143.

[46] Ibid., p.123.

[47] Ibid., p.148.

[48] Ibid., p.120.

[49] Ibid., pp.152—53.

[50] Ibid., p.150.

[51] “CTF 57 to CINCPAC Info CTG 57.14,”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CINCPAC Gray Book, Vol.5, p.2282.

[52]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53]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111,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54] Ibid., p.24.

[55] Wees, *King—Doctor of Ulithi*, p.36.

[56]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p.28—29,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57]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p.170—71.

[58]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2, 1944, CINCPAC Gray Book, October 5, 1944, Book 5, p.2093;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5, 1944.

[59]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7, 1944.

[60]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8, 1944.

[61]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92.

[62] COM3RDFLT to CINCPAC, etc., October 13,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39.

[63]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1, 1944.

[64]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46.

[6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IJN.

[66]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38.

[67]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98.

[68]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2, 1944.

[69]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58.

[70]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2, 194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13,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70.

[71]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3, 1944;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3, 1944.

[72] Kent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27.

[7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250.

[74] 1平方英尺 $\approx$ 929平方厘米。——编者注

[75] Ibid., p.252.

[76] War Diary, October 12,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97.

[77]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3, 1944.

[78]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257.

[79]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4, 1944.

[80]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4, 1944.

[81] William Ransom account in Kuehn et al., *Eyewitness Pacific Theater*, p.203.

[82] “Running Estimate,” October 14,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99.

[8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7.

[84]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5, 1944, p.2.

[85] Ibid., October 14, 1944, p.2.

[86]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4, 1944, cited in memo dated October 20, 1944, p.1.

[87]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7, 1944, p.2.

[8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6.

[89]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52.

[9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5, 1944, p.7, and October

16, 1944, p.2.

[91] 美国人的钓鱼方法：把干苍蝇丢在水面上漂着，好把鱼群引诱过来。
——译者注

[92] Carney, oral history, p.399.

[93] CINCPAC to COMFAIRWING, October 15,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0.

[94]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5, 1944.

[95] Captain *Inglis of the Birmingham*,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WII*, Vol.12, *Leyte*, p.103.

[96]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Vol.12, *Leyte*, p.96.

[97]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7, 1944.

第四章

1944年的整个夏季，东京炎热、尘土漫天，人们心怀不满。城市曾经最繁华的商业区此时已变得破败、灰暗，几乎被废弃。后来成为日本极受欢迎的小说家的竹山道雄回忆道：“熏风吹过城市，屋顶上蒙着尘土。即便是在涩谷周围，整排的商店都关了门，马路也挖开了，看不到什么人，只有各处的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龙。”^[1]

粮食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担忧。饥荒暂时还没有到来，但普通市民已经开始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足够的吃的了。人们可以从邻居们的脸上看出这一点：许多日本人正越来越消瘦。竹山还记得他学校的校长每过一个星期都要明显瘦一些，看上去几乎变了一个人。“他的下巴变窄了，脖子缩了回去，真可怜。他头发花白，眼睛深深陷入眼眶，皮肤上的皱纹越来越多，看起来总是像个旧的雕花面具。”^[2]人们很容易疲劳，也没有力气去应对每一天的劳作，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每天为了获取食物而需要付出的努力却开始压倒其他一切。有一份资料估计，每个日本家庭平均每天要花上5个小时来购买食物或者排队领取口粮。商店一整个星期都关着门，只有偶尔配给的口粮到货时才开门——东西卖完就又关门了。那些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的人常常空手而归。在战前的日本，乞丐本已基本绝迹，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即便是穿着光鲜的人也会向其他市民乞求给自己一点吃的。把食物端上家庭的餐桌，这需要消耗女人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而这些女人都会少吃东西，好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尽量多吃些，这就让她们更没有力

气去费劲在商店和口粮领取点前排队了。

城市里的居民们想要去乡下直接从农夫那里买粮食。但是通勤的火车在战时激增的运量重压之下已经喘不过气了，于是这趟旅途便成了痛苦的挣扎。火车站看上去就像是难民营。人们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挤上车，可能还要向车站人员行贿才能买到票。上了车，他们发现自己挤进了人堆。挤断肋骨已不足为奇，有几次甚至有婴儿被闷死的事情被广为报道。车厢破旧肮脏，椅套都被扯掉、撕开，头顶扶手上的拉环早已不知去向，窗户破了，地板也被弄坏了。早已超载的火车冲过车站，不敢停车，怕月台上等待许久的人拼命也要挤上车。

当一个城里人经受了这重重考验来到乡下，一幅田园风光便会出现在面前，山坡和种着水稻的梯田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安静的小村庄旁。这片宁静祥和的景象，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激烈战争完全联想不到一起。但是，这个人转眼就会发现乡民粗鲁而贪婪。他们会漫天要价，还要求买家对他们毕恭毕敬。之后他们只能回到火车站月台上，再一次像狗一样挤回城里。

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以白米作为主要粮食，但现在他们即便出高价也不一定买得到了。战时的口粮米掺入了碎挂面、麦粒、黄豆，或者甘薯，随着战争久拖不决，这些低等级替代品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3]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像是大米的混合物，人们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用油翻炒，做成一种备受鄙视的食品，称为“糠”。新鲜的肉和鱼已经从口粮配给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豆腐、蔬菜和沙丁鱼做的被称为“煮干”的很脆的小鱼干。为了给饭桌上添加些花样，人们会往锅里放入当天能从市场上找到的任何东西——茄子、鲜萝卜、萝卜干、豆芽、南瓜、竹笋，以及菊花叶子，哪怕数量很少，有一点也是好的。新鲜鸡蛋几乎绝了迹，于是人们只能用粉末状的“上海蛋”和水打在一起，

做成像是鸡蛋但不好吃的糊糊。火腿被换成了一种所谓的“鲸鱼火腿”，面包师批发不到面粉，便只能用豆泥制作一种像是面包的替代品。这样，日本流行的用白面包和火腿做成的午餐三明治，便成了既没有面包也不含火腿的冒牌货。

随着口粮供应质量和数量的下降，黑市对普通日本人的生计变得越发重要。到战争的最后一年，“黑先生”占日本全国零售量的份额可能达到了一半。1944年中期，黑市价格和官方定价的差异大幅度扩大，几乎所有类型食物的黑市价都达到官方定价的10倍以上。1944年3月，大米的黑市价是官方定价的14倍，到1944年11月则达到44倍。^[4]某些稀罕物的价格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人们甚至怀疑身边还有没有人吃得起。1944年7月下旬，东京西红柿的价格达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57钱（合0.57日元），桃子的价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5日元。^[5]火箭般飙升的物价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阶层矛盾。有钱或者有关系的日本人明显比他们的穷邻居吃得更好。一个人脸上和身上赘肉的多少足以衡量他所享有的特权，或者说是腐败。当时住在京都的74岁老人田村常次郎在日记中抱怨道：“那些富人可以拿着钱为所欲为，他们买光了下层人的货品和粮食，再拿回到黑市上去卖……这是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6]

在这个警察国家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民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也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公开抱怨。实际上，他们都表现出一副支持战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自从这个国家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来，大部分日本民众已经逐渐习惯了战争，视其为一种自然的长期状态。许多人并不觉得征服并奴役其他民族有什么奇怪或者不妥的，听到军队在海外战斗胜利的消息，他们还会热血沸腾。但是到1944年夏末，他们开始意识到太平洋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随着盟军向西越过太平

洋，任何看得懂地图的人都能看出日本的地盘在日益缩水。整个岛屿的日本守军一次又一次全部“玉碎”而亡。这和在战争中的中国不同。这是一场与想要占领日本并解除其武装的对手进行的全面战争，这个敌人有力量而且有意愿来做到这一点——想要避免彻底毁灭，唯一的希望是乞求征服者的怜悯。老百姓意识到真相之后，失败主义的情绪便蔓延开来。这种情绪的蔓延在1944年7月出现了一个拐点，当时塞班岛丢失，东条英机首相下台。

普通民众开始私下里或者在个人日记里尖锐地质疑官方报道的可信度。为了将真相与宣传区分开来，人们不可避免地陷于流言之中。警察部门花费了很大力气，想要压制流言的传播，但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是徒劳的，因为老百姓现在有无数种理由来担心自己的安全和国家的未来。人们还是不太敢公然蔑视政府，但是消极抵抗的迹象却越来越多。普通民众越来越多地抱怨官员的腐败和黑市的贪婪，他们在法定的民防和防空演习中对地方官员嗤之以鼻，敷衍了事。拖拉、旷工、偷懒和装病的情况在工作场所和强制的社区活动中已经屡见不鲜。根据日本工业杂志《钻石》的统计，日本军火工厂的每日缺勤率在1943年时为10%，1944年增加到了15%。^[7]违法行为、故意破坏和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许多日本人都发觉社会中不再有基本的礼貌，道德开始滑坡，诚实也越发罕见，对此人们予以谴责。人们参加半强制性的爱国集会、游行、送别出征新兵活动时的热情已不复当年。一名阵亡军人的母亲拒绝参拜为国战死者灵魂所在的靖国神社。她说：“那些失去宝贝孩子的人来到靖国神社，被逼着像乞丐那样蹲在白沙池里，还要不停地点头，我永远都不会去那种蠢地方。”^[8]

从7月起接替东条担任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私下里表达了对日本民众士气低落的担心。他的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应该放松新

闻审查，以求恢复政府日益降低的可信度。于是在一番锣鼓喧天之下，内阁情报委员会宣布要在报界和广播媒体中推行“言论自由”和“开启民智”政策。^[9]1944年10月13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解读说，这项新政策将会“开辟人民公开表达想法的通道……人们不再需要低声秘密地交流观点了”。坦诚而真实的战争报道将有助于提升日本人民的士气，让他们“感到幸福和快乐”。^[10]

就在第二天，传来了子虚乌有的台湾海域大捷的第一份报道。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一个媒体联络官手里拿着一瓶清酒冲进媒体室。“这是一枚鱼雷，”他叫着，用手里的瓶子比画着，像是一枚航空鱼雷高速冲进了一艘美国军舰的舰体，“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来啦！这就是神风！神风！”^[11]他说战报还在陆续发来，但是返航的日本飞行员的说法都是一致的——他们赢得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开战以来最大的胜利。他打开了瓶子，让记者和军官们举杯共饮。

第二天早上，《朝日新闻》头条报道了“史上罕见的巨大战果”。报纸上说美国人损失了50万吨军舰，2.6万名水兵战死。^[12]东京民居密集的大街小巷都回荡着NHK新闻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日本人估计的战果上涨了一整天，到下午3点，帝国大本营最终宣布，日本战机击沉了10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还击伤了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1艘型号不明的其他军舰。^[13]

就连没接受过教育的平民都看得出这些战果不正常，但是官方自己却似乎深信不疑，这些报道还引用了参战日本飞行员的证词作为佐证。据他们的说法，台湾之战将会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甚至比东乡大将在对马击败俄国舰队那次还要大，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歼灭性海战胜利。无线电通讯员被派出去

做街头采访，了解日本民众的观点。每过几个小时，就会有新的官方声明发出来，带来新的令人振奋的详细消息。报纸纷纷加印“号外”，民众则在各处报亭前排长队等待。小矶首相打着官腔说，这次伟大的胜利验证了此前已经公开讨论了超过一年的“诱敌深入”战略。德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代表阿道夫·希特勒发来了贺电。昭和天皇也宣布设立一个公共节日来庆祝这次“辉煌的胜利”，并说要为全国每个家庭发放一份特殊口粮“以示庆祝”。日本人现在可以重拾战争初期的那种兴奋情绪了——就像1942年春季的时光又回来了，那时候每个星期都会传来一两次令人激动的捷报。[\[14\]](#)

就在第一份台湾捷报发回后不到24个小时，军队高层就意识到这一战果被极度夸大了（这还是客气的说法）。真相要到战争结束后才会揭晓——只有两艘美军战舰被鱼雷击中，而且还没有沉没，但10月14日的空中侦察报告却足以证实第3舰队大部完好。福留繁说，他到这一天结束时就知道“对敌伤害轻微，我确信对菲律宾的大规模进攻很快就会到来”。[\[15\]](#)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评论道：“有些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夸大战果可能是必需的，但那些战斗指挥岗位上的人一定不能用夸大所取得的战绩来自欺欺人。”[\[16\]](#)10月18日，在帝国大本营，海军的计划制订者向陆军同僚公开承认，日本舰队不太可能在下一次与美国人的激烈海战中幸存（遑论取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打下去，好让联合舰队“死得光荣”。[\[17\]](#)

然而在面对日本公众时，覆水已然难收。政府和新闻媒体既然已经发布了胜利的报道，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咬死不改。裕仁天皇已经批准发布捷报，这位现人神签发的公报可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不仅如此，关于万民痛恨的美国舰队被消灭的假消息也满足了全国上下对随便什么好消息的发自内心的渴望。所有人

——军队领袖、记者、编辑，以及普罗大众——都迫切想要相信这些好消息是真的。到这个时候，这些新闻至少还能缓解一下日本人潜在后果严重的巨大心理压力，并缓和关于民众士气情况的担忧。站在战后的视角回头看，一名负责采访帝国大本营的记者总结道：“没有人故意说谎，这只是一种急性焦虑的表现，每个人都渴望着有好事发生。”^[18]

10月20日，小矶在日比谷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集会，这是一座建在东京市中心日比谷公园内的土红色十层大楼。会场上人山人海，参加集会的可能超过10万人，他们挤满了公园和附近的街道。大家挥舞着拳头，把帽子抛向空中以示庆祝。首相的讲话通过无线电进行了现场直播。他发表了对美国军队的长篇控诉，说美国战机轰炸和扫射日本平民，在战场上凌虐日军尸体；他指责美国抛弃了所有文明作战的伪装，“只是野兽般的凶手，不是人……神必然惩罚他们，给予他们毁灭性一击”。^[19]

小矶国昭的内阁成立刚刚三个月。小矶先前曾是朝鲜总督，秃头，有一副猫科动物似的威武面孔，正是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貌令他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称号。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率军打过仗，自然就没有战败的污点。由于已经离开东京两年，他也没有卷入政治阴谋和派系争斗，正是这些争斗导致了其前任东条英机在7月的下台。这些高层政治人物之所以选择小矶来担任首相，并非因为他是个格外值得期待的领导人，而仅仅是由于其他所有的候选人都有人反对而已。他的首相职位不过是来自一种脆弱的共同认可，他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小矶于1938年退出了现役，没有资格担任陆军大臣，因而基本被排除在军事战略的讨论之外。后来，小矶坚称自己在任的9个月时间里，别人甚至都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军事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20]

把东条赶走并不能纠正日本战时政府的根本性缺陷。日本明治宪法的形式和具体条款表面上看仍然有效，但是议会党派却已被架空，实权落入了一部分军阀和官僚的个人和部门手中。陆海两军的领导人互不信任，其战略也常常背道而驰。内阁和各类相关人士可以开会交流观点，却没有一个人拥有在整个政府内推行统一政策的权威。在东条时代，最高决策主体是所谓的“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小矶继任后，这个会议被解散，代之以一个被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Supreme War Direction Council，缩写为SWDC）的六人小组，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以及陆海两军各自的总参谋长。此后，以及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中，这个内阁决策委员会被称为“六巨头”——虽然具体人员会有变更，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出的。

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变必须经过这六个人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这还要以得到参议院、皇室成员以及天皇本人的支持为前提。一如既往，决议要经过一番拖沓冗长而痛苦的“根回”才能达成，所谓“根回”意即深挖根源，寻找共识。一旦各方意见形成死结，便什么事都做不了。遇到这种情况，陆军和海军常常就会沿着自己的路线行动，而为了面子，他们又都会做出一副已经在总体战略各方面进行过协调的样子。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曾经当过首相，此时已回到政府担任海军大臣兼小矶政府的副总理，他说这个委员会即使进行投票也无法打破僵局。“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他在战后对审讯者如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就某一问题取得一致，就不会团结行动。”^[21]如果达不成共识，那惯性就会压倒一切。无论原先的方向如何，日本都会继续走下去。

43岁的昭和天皇裕仁，他本人长期支持东条，反对其他人想要赶他下台的努力。东条的首相生涯临近完结时，天皇的弟弟高

松宫宣仁亲王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批评裕仁，说他正在让国家滑向失控。天皇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重大，这是宪法中白纸黑字写明了的，但即使是对那些明明知道他并不是神的人，裕仁也有着无形的巨大权威。他对这场战争及其带来的痛苦所要担负的责任也一直是后世学者和历史学家激烈争论的议题。1941年12月之前，裕仁反对让国家滑向战争，他希望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保持稳定。他还要求打压和严惩军队中那些头脑发热的“下克上”分子。但他的要求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不具有强制力，只有在内阁偶尔陷入僵局后寻求“圣裁”时例外。1944年7月最终同意让东条英机下台后，他便开始推动新政府做好准备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但他也没有提出要和盟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以寻求停战。他相信若想要得到外交谈判的成熟时机，日本就必须首先赢得一次对美国的压倒性胜利，这或许就会发生在即将到来的菲律宾战役中。在他战后的“独白”中，裕仁说自己曾希望把日本残余的所有军事力量全都投入守卫莱特岛的作战之中：“然后，等美国人栽了跟头，我们就能够寻找妥协的空间了。”^[22]

日本政府中没人敢讨论投降，就连要日本放弃1941年之前占领的海外领土的协议和解也不敢提。盟军至少得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同意坐到谈判桌旁。不过，日本的统治者们仍然知道在战争的最后交涉中外交手段必定会发挥作用，而且外相重光葵也在从几个方面同时推动这件事。日本开始通过驻欧洲中立国家的大使馆试探求和，包括瑞典、葡萄牙和瑞士。为了从中国脱身，重光葵的使节也已接触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提出只要蒋介石与盟国断绝关系，请求“善意中立”，就可以让日本军队撤出中国。这样的提议自然是没有下文，这一部分是由于日本政府选择的中间人根本不受蒋介石待见，同时也因为中国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太平洋上正一步步迈向失败。^[23]

通过外交手段“收场”的关键计划是让苏联政府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一从来都不特别现实的计划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就已讨论许久，现在重光希望借此获得想要的结果。他手下的驻莫斯科大使开始与克里姆林宫对话，他们提出的方案是由日本出面安排苏联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等欧洲东线战场重归和平，莫斯科再来斡旋调停太平洋战争。然而这套方案在1944年9月呈交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面前时，却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想法在苏德战争此前的任何其他时候提出来，都会收获好得多的效果——可现在却太晚了，盟军已经开始从东西两线向德国推进，这样的提议自然也只能无果而终。当日本人提出要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946年春季到期后续约时，莫洛托夫回答说此事不急，时间成熟后再议。重光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约瑟夫·斯大林已经向罗斯福透露他将会在击败德国后立即将部队调来进攻日本，或许他将会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就此做出承诺。日本的外交人员还一直徒劳地指望斯大林能帮助他们实现停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周苏联突然对日宣战。

实际上，日本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他们为外交停战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政府内外所有的领导人物都知道这一点。赶走东条只是外交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已，但若是在1944年秋季把国家方针突然转向求和，军队中那些强硬派会激烈反抗。宪兵一直监视着内阁首脑和其他领导人，防止他们暗中推动和平谈判。东条虽然已经失去了权力，但他仍能对国家安全机器继续施加影响，许多人怀疑这个被废黜的领导人还在准备政变。统治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国家会因此重回20世纪30年代那种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武装暴动和定点暗杀层出不穷的状况。而内战看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根据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

军的说法，日本政府拿子虚乌有的胜利出来大肆庆祝的习惯令其反受其害，因为日本公众在思想上从来就没有准备过去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哪怕只是提出早一点儿结束战争，人民都不会理解。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战局的真相，日本人民之间可能会爆发内战……依我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宿命就是把这场极不明智的战争打到底，直到末日。”^[24]

小矶的公开言论从一开始就在走他前任的老路。他的腔调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他的内阁自然也就没有想要探索停战选项的样子。这位新首相宣布，战争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新阶段，日本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以极度的狂热抵抗敌人。就在新政府上台的那一个星期，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将美国人称为“野兽”、“屠夫”和“魔鬼”的说法。美国《生活》杂志刊登过一幅照片，画面上是一个美国女子正在欣赏一个当作战场纪念品捡回来的日军头骨，这张照片也被日本媒体广为转载。据日媒报道，美国把监狱里的罪犯全都放了出来填充军队。“我们只能感到震惊和不齿，”NHK的广播评论员在1944年8月评论道，“美国人不会像普通的勇敢战士那样战斗，除非利用这些罪犯的野蛮。这证明他们只是一群野兽。”^[25]在1944年9月8日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小矶警告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敌人在我们国土上登陆的可能性。”^[26]他的内政大臣宣布了一份计划，要对全国的平民进行徒手格斗训练。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要加入国土防卫军：只要海上来的凶恶强盗把他们肮脏的靴子踏上日本的神圣海岸，他们就要用自制武器和竹枪进行抵抗。

随着美军拿下马里亚纳群岛，其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已近在眼前，于是日本政府下令采取新的民防措施。1944年8月16日，国土交通大臣宣布实施一系列举措以“应对空袭、舰炮炮击和其他形式的攻击所导致的交通中断”，其中包括“医疗急

救、应急物品发放、巡逻、人员撤离、预防瘟疫、供水、清除瓦砾，以及紧急恢复正常运转”。[27]成排的房屋和建筑被拆除，以在城区留出防火通道。学生们被召集去制作称为“气球炸弹”的堪称“奇幻”的武器，这种武器能上升到平流层，顺风飘行5 000英里，越过北太平洋，随机攻击美国本土。各种讲话、报纸文章和无线电广播中都满是宗教和神话的内容。小矶是个虔诚的神道教信徒，他刚刚上任就公开参拜了伊势神宫，喊出了一句新的民族口号：“众神之主必将重拾对国家的责任。”[28]这一意图不明的说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神示：当至高危机来临时，昭和天皇将会召集古代众神回来保卫国家。

美军的下一轮主要进攻无论落在菲律宾、台湾岛，还是琉球群岛，都会严重危及日本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和其他自然资源区的经济生命线。这将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崩溃，同时使其舰队无法行动，使得日本诸岛上的守军无法得到海上支援。日本政府两年多以来不停的欺骗宣传将会被戳破。与此同时，日本唯一真正的盟国显然正在输掉欧洲战争。任何一个对全球战事有基本了解的日本人都知道，自己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把很大的赌注下在了纳粹德国能够赢得战争之上。如果眼下的趋势维持下去，那么赌桌上成堆的筹码都会被一扫而空。

到当时为止，日本人打了很多败仗，但日本人虽已开始挨饿，却还不至于饥荒。到了1944年秋季，其粮食状况看起来已经到了大幅恶化的边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日本本土尚未遭到猛烈轰炸，但其国内稻米产量仍然下降了超过10%。粮食进口明显下滑，而且随着日本商船队在美军空中力量和潜艇的绞杀下日渐减少，这种下滑还将愈演愈烈。1944年7月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几乎每一类食物的产量都在下滑，“1944年的国民生活标准相较上一年将有较大缩水”。[29]恶劣的天气也是

一小部分原因，1944年的稻米收成受到了持续强降水的威胁。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在1945年时可能出现灾难性的锐减，这是由可以预见的船舶损失、能源危机，以及空中轰炸导致的道路和铁路运输崩溃共同造成的。

挨饿是一回事，饥荒是另一回事。日本领导人所担心的饥荒，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并危及其统治基础。日本民众之所以支持在海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国内可以有更高的生活标准。但是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生活却日益艰难，而且这种穷困还遥遥无期。在对美开战前，年轻的陆军军官们曾威胁要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以缓解日本民众遭受的贫困，这在1936年几乎酿成了政变。而现在，统治高层中有人指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也是由饿着的肚子和对外战争的灾难性失败导致的。于是，直到1945年8月投降，控制国内的紧张态势都一直是日本制定政策时的一项主要考虑因素——无论是民生、政治、外交，还是战略政策。

1944年9月，裕仁审阅并批准了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计划代号“捷”，取中文“胜利”之意。“捷号”计划分为四个方案，分别基于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的四种可能性。“捷-1号”计划到“捷-4号”计划分别应对美军向一条地理弧线上四个不同区域发动两栖进攻的可能性，从南到北依次是菲律宾，台湾和琉球，本州岛，以及北海道岛。然而从一开始，日本的计划制订者就认为下一场大规模作战最可能指向菲律宾，并且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制订“捷-1号”计划。他们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受到麦克阿瑟那著名的关于重返菲律宾的公开发誓的影响。[\[30\]](#)

“捷-1号”计划体现了日本海军一贯的诸多作战特点。其计划

十分复杂，将部队大范围分散，从多个方向接敌。这依赖于各分舰队之间精确的时间协同，因而很容易被打乱。日本先前的许多战役计划都包含了佯攻、诱饵，以及其他欺骗行动：与此相似，“捷-1号”唯一真正的成功希望也在于战场欺骗。栗田健男将军的“第一游击部队”拥有联合舰队的大部分水面作战力量，他们将从文莱启程北上。通过菲律宾群岛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时，其舰队的一部分将在西村祥治将军指挥下转向东南，主力仍将跟随栗田向北航行。这两支分舰队将分别通过两条不同的水道穿越菲律宾群岛，南边的苏里高海峡和北边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同时，小泽治三郎将军麾下拥有日本全部剩余航母的“第一机动部队”，将从濑户内海出发，从北边加入战场，以图将哈尔西第3舰队的主力诱离滩头。如果一切如愿，则栗田和西村两支纵队将会冲出海峡，以钳形机动攻击麦克阿瑟的登陆舰队。日军知道，这支舰队将搭载大约10万名敌军，并有数百艘满载着武器、装备以及支援登陆所需物资的货船。日军计划的关键在于让栗田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与已展开登陆行动的两栖舰队实现近距离战斗。

这是个庞大而恢宏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所有高级将领都知道的那样，“捷号”计划实际上是由燃油供应紧张和舰队补给困难所导致的机动性和作战半径的限制所决定的。燃油供应地远在南方的文莱和苏门答腊的油田区域——而船厂和维修设施则位于日本本土列岛，同样需要由本土提供的还有保持舰队战斗力所必需的各种补给物资、武器、弹药和后备人员。日本人已不可能再将足够数量的燃油运回本土以满足舰队的迫切需求，而且随着美军潜艇和飞机不断猎杀并击沉这个国家本已所剩无几的油轮，这种短缺还将雪上加霜。因此，舰队的大部分力量不得不停泊在遥远南方的锚地中，以靠近帝国的原油产地。但是小泽的航母部队却无法同行，他们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20日）中

几乎失去了全部的飞机和受过训练的舰载机飞行人员，需要接收新的补充飞行队并进行训练。由于日本此时飞行员训练和飞机工厂的糟糕状况，他需要让航母在日本海域停留一段时间，可能至少需要三四个月。

既然这些舰队之间不得不相隔数千英里，栗田便从小泽的指挥下脱离出来，受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直接指挥，后者不久前刚把自己的司令部从停泊在东京湾的一艘指挥舰上搬迁到横滨市庆应义塾大学日吉校区中的一座地堡里。小泽和栗田将会通过由日吉发出的长程无线电各自接受命令。这种将日军舰队主力分散布置的做法远远称不上理想，但考虑到糟糕的后勤状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如果日军能有机会向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发动全力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将主要依靠水面舰艇部队和陆基航空兵，因为没人会太指望小泽已经残废的航空母舰部队或者是已遭严重削弱的日本潜艇部队。“捷号”计划的主要难题在于，要将分散在各处的日军海空力量开到指定位置参战。为此，12艘舰队油轮被指派去为栗田舰队加油。这些加油船原本计划在10月进行海上补给训练，但是随后又被取消了。现在剩下的每一艘油轮都十分珍贵，对燃油状况的管理经不起什么差错了。现在就连栗田舰队在战斗结束后是否还有足够的燃油安全返航都保证不了。无论美军何时发动新一轮进攻，小泽对战役的贡献都将取决于其舰载航空兵的状况。没人指望日军航母部队能与其对手一较高下，小泽也知道自已将会再一次被痛打，而给对手的报复则会微乎其微。鉴于这一悲观前景，日军决定，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母机动部队将在此战中被用于诱敌，其任务是为栗田拉开一道通往登陆舰队的缺口。小泽也愿意担任这一卑微的任务。“诱饵，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去充当诱饵，”他说，“主要任务就是全部牺牲。用十分虚

弱的航空兵发动进攻，而目的就是要牺牲掉所有的飞机和军舰。”[\[31\]](#)

7月的政治风波之后，日本陆海两军的领导人都表示今后要密切配合。然而迟至10月的第三周，当麦克阿瑟的进攻舰队已经启程开往莱特时，两个军种依然是各拿各的剧本。陆军将领们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派遣部队前往增援莱特岛。有些人想要继续加强陆军在吕宋岛的力量，即便这意味着要把莱特岛拱手让给美国人。

10月18日，在东京的军官俱乐部里，四名将领（陆军省和海军省各一人，两军总参谋部各一人）聚在一起，想要敲定防守菲律宾的联合战略。评估了“捷-1号”计划之后，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将军在最后时刻提出了反对。佐藤承认日本民众正“哭求”舰队与敌决战，但他坚持最高司令官必须保持“冷静”，不应该草率迎合公众的想法。他说，如果联合舰队现在出战，就很可能遭到毁灭性失败。还不如把小泽的舰艇留在港里，这样它们至少还能发挥一些威慑作用，防止敌人靠近本土。不仅如此，佐藤还指出，舰队仅仅是开到战场就需要烧掉大量宝贵的燃油。此时，六艘油轮组成的船队已经准备好开向南方，船上运载着6万吨燃油。日本战时经济的运转也需要这些燃油。佐藤问自己的海军同行：“联合舰队现在出去打仗能得到什么？还不如那6万吨燃油来得重要。”[\[32\]](#)

一席话令屋里所有人，包括佐藤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他毫无遮掩地点破了日本的尴尬处境。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的荣耀，现在已经比不上六艘油轮及其运载的燃油了。连一位陆军的将领都看得出，舰队的衰微预示着失败。“这是我体验过的最伤心的感觉。”佐藤写道。

海军军令部的中泽佑少将哭了出来，他代表海军回答了佐藤的问题。他首先感谢了陆军将领的善意，但是“现在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希望能得到一处葬身之地”。由于燃油短缺以及敌人对制空权的掌握愈加牢固，“捷号”计划便成了让舰队“光荣地死去”的“最后机会”。中泽总结道：“这是海军最诚挚的愿望。”[33]

一阵哽咽之后，佐藤也泪流满面，他同意让这6万吨燃油作为送给海军的“临别礼物”。散会时，外面街道上响起了空袭警报，于是他在心中默祝“联合舰队能有一个英勇的终结”。[34]

这貌似动人的情景之下，隐藏着一个常常为西方莱特湾战役史所忽略的事实。“捷号”计划实质上是日本海军的“万岁冲锋”。它未言明的目的是保证日本舰队能在战争结束之前再最后好好打一仗。联合舰队参谋部的高田利种少将说：“国内已经有人开始问，海军在南洋败了一场又一场，比如马里亚纳和比亚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35]日本的水面舰艇部队自前一年所罗门群岛战役结束后就一直无所事事。军容严整的战列舰队从足足两年前的瓜岛海战以来就完全没打过仗。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甚至从没有在主炮射程内见过任何一艘敌舰。日本斥巨资在吴和长崎建造了这对大家伙，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舰，日本人对它们打赢战争的能力寄予了厚望。但它们在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港口度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出海作战需要大量燃油。于是两舰便双双成了舰队司令及其参谋部豪华的水上司令部。它们的无所事事、未曾一战已经在舰队各层次中引发了抱怨，这两艘舰也因此被戏称为“大和饭店”和“武藏饭店”。若让这两艘巨舰在锚地终此一生，其18英寸主炮连一次向敌舰开火的机会都没有，那将是不可容忍的耻辱。指挥这两艘战列舰的栗田将军在菲律宾战役打响前夕向他手下的军官们问道：“如果国家灭亡而舰队却保持完整，这难道不是耻辱吗？”[36]

在战后审讯中，日本海军领导人承认他们根本没真正指望能守住菲律宾，他们预期自己将遭到毁灭性损失，甚至全灭。但他们仍然选择无论如何都要打这一仗，因为他们认定保留舰队来日再战已经没有意义。无论美军能否拿下菲律宾以及何时拿下菲律宾，他们都必然会掐断连接日本及其原油产地的海运线。高田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舰队能留存下来，通往南洋的海运线也会被完全切断，这样舰队如果回到日本本土，就不会再有燃油补给；如果它留在南洋水域，就无法得到弹药和武器的补充”。别无选择之下，日本人决定“赌一把”，他们知道，“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整个舰队”。[37]栗田将军说，他已经准备好损失自己一半的军舰，以换取“毁伤你们在莱特湾中所有舰船的一半”。他还补充说，即便做到了这一点，也无法阻止麦克阿瑟登陆，而仅仅是“将登陆推迟两三天……因此这就是个有限的目标，将某一场登陆推迟两三天。对于后续的登陆我们便无能为力了”。[38]至于小泽，他已经成了空架子的航空母舰将被用作引诱哈尔西的诱饵，“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39]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台湾外海航空作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是在10月15日，当时哈尔西正向东回撤，受损的“堪培拉号”和“休斯敦号”也在缓慢撤退。这天，吕宋岛上的第二十六航空队司令有马正文少将摘掉了军衔徽章，爬进一架三菱G4M轰炸机的座舱，向敌人舰队发动了一次单程自杀撞击攻击。他的飞机攻击“富兰克林号”航母未成被毁，也可能是坠海，反正是没能返回基地。但是东京却报道说这位“军神”有马将军主动俯冲撞击了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并将其击沉。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称，这次事件预示了政府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自杀攻击。当太平洋空战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拉开时，日军飞机就会由自愿在爆炸

的火球中献身的人驾驶，变成致命的导弹。

“神风”一词此时还没有和自杀飞机扯上关系——它指的仍然是7个世纪前摧毁了蒙古来袭舰队的那次神话般的天降台风。不过，日本人所说的“必中武器”和“肉弹”战术的执行人已经被称为特攻部队。这种特攻作战将不仅有飞行员和飞机参加，同时还有其他专门制造的自杀武器，包括快艇、背着氧气瓶的水鬼、人操火箭，以及小型潜艇。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史学著作总是倾向于忽略这种有组织的自杀战术在日本乃至日军中引发的争议。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对此都是强烈反对的，认为此举误解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有些海军军官将这一想法和日本陆军中盛行的不理智的“死亡崇拜”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在海军中不应有一席之地。老航空兵们还记得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空战胜利，“神风”攻击在其眼中实质上无异于未战先败。其实日本飞行员一直都在俯冲撞击盟军舰船，或者撞落盟军轰炸机——但在1944年秋季之前，这些攻击都是偶然和随机的，常常只是在飞机受损无法返航时出现。著名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在第一次被部队指挥官命令执行自杀任务时震惊了。“我顿如五雷轰顶，”他回忆道，“他在说什么？我心中一团乱麻。脑中泛起厌恶感，令我感到寒冷、沮丧。”^[40]坂井说，一名飞行员必须做好战死的准备，但这并不包括“肆意挥霍人的生命”。^[41]

战后，日军领导人遭到了严厉指控。他们被指控出于不当目的而引诱数千年轻人进行飞行训练。控方提出，在1944年初，军方就开始秘密计划把大部分新飞行员训练成“神风”特攻队员，并把此事掩盖到受训者无法退出时才告诉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一直充满着各种禁忌（至今也是一样）。历史记录残缺不全——尤其是关于谁知道什么事以及何时知道的这种问题——但是

这并不妨碍有相当多的证据能被用来进行指控。在“神风”队员招募计划的初期，任何文字中都不允许提及自杀战术，命令只能口头下达。曾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少尉的神津直次当时自愿加入人操鱼雷计划，却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杀武器。他和同行的新兵仅仅被告知必须要“愿意执行危险的任务”以及“愿意使用一种特别武器”。战后回看，屋久总结道：“今天，我知道他们骗了我们！发自内心地知道。”[42]

在战后的审讯中，日本海军有些高级军官诡称“神风”战术最初是由一线作战部队提出并实施的。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猪口力平大佐称，这个想法是由驻菲律宾基地的航空部队自发提出的，“纯粹是那个基地自己的策略”。[43]面对“神风”作战计划是在麦克阿瑟登陆莱特岛之前由东京方面制订的证据，猪口仍然狡辩道：“这种东西只能是由基层发起，你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从来都没有下过执行‘神风’战术的命令……‘神风’的想法最初是为了应对当地的情况，并非大本营下发的全局政策。”[44]但记录显示，这些声明都是假的。无独有偶，丰田大将也告诉审讯自己的美国人，最初的“神风”空袭是“决定将第二[航空]舰队派往莱特湾带来的意外结果”。[45]他将这一主意归于菲律宾当地的航空兵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说：“如果地面部队正在采取这样的拼死打法，那我们也必须跟上，让所谓的特攻部队亮相。”[46]这也是错误的：在莱特湾战役之前很久，丰田的联合舰队参谋部就开始讨论和筹划自杀作战。小泽的供词也同样左右摇摆。起先他坚称“我第一次听说‘神风攻击’是在栗田舰队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时”。面对相反的证据，他又突然回忆起1944年6月时“这个方案就被提交给了丰田。丰田说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用这种战术太早了”。[47]

实际上，“神风”作战早在首次亮相太平洋战场之前一年多，

就已经在被研究、讨论和规划了。当时担任航母舰长的城英一郎大佐曾任裕仁天皇的海军顾问和驻华盛顿大使馆海军武官，他在1943年6月内部传阅的一份计划中就提出要建立一支“特攻部队”。[48]1944年3月，下台之前的东条英机批准了建立志愿自杀部队的初步计划。于是及川古志郎大将（1944年底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开始推动这一战术在整个海军航空兵中落实。[49]自从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之后，日本的报纸和新闻广播中便充满了“必胜武器”和“肉弹精神”的宣传。10月6日，就在第一支自杀飞行队于菲律宾成立的几个星期前，一名日本海军将领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海军航空兵很快就会开始采取“肉弹”战术，以“撞毁敌机或敌舰”。他期望这样的攻击能扭转战争态势：“这种战争方法，我确信，一定不会失败。相反，它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的——它只会越来越强大。”[50]

1944年秋，一系列特制的自杀武器已经开始量产。其中包括一款人操火箭“樱花”，这种武器由大型飞机投放，之后以接近声速的速度向敌舰冲击。一种被称为“回天”的单人自杀潜艇，由大型母艇放出，驾驶员随后驾驶它，如同一枚鱼雷一样冲入敌舰的舰体。一种被称为“震洋”的小型木质快艇，可以携载2吨重的战斗部，以50节的高速冲入敌人舰队中央。“伏龙”，背着氧气瓶的潜水员带着炸弹在水下设伏，并直接把炸弹安放到美军舰船底部。还有其他一些，包括从山顶起飞的滑翔机，还有不免让人联想到今日现实的爆炸背心。这些武器和载具，打起仗来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差。但是日军在这些计划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却戳破了他们关于“神风”时代是1944年10月时由基层官兵自发掀起的谎言。

日本和西方的有些学者声称，这种“神风”现象只是外在表现，其背后是日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包括武士道、神道

教、佛教禅宗，以及自杀雪耻的传统。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神风”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强加在懵懂无知、手足无措的人们身上的，是日本式的荒谬异端。其实这两派观点都能找到一些事实根据。神道教和佛教都主张自我只是虚幻，因此死亡并不可怕。神道教中的一众神明则围绕在天皇周围，据说每个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战死是一种自我净化，能够燃烧和洗刷前半生积累的尘埃和腐物，只留下战死者一尘不染的灵魂，与天皇的圣灵合为一体。禅宗和其他佛教流派的信徒都持有一种良善的教义，其基础是认为生与死实际上是同一的。所谓冥想就是要超脱自我。根据陆军军官兼知名作家杉本五郎的说法：“自我超脱与自我毁灭绝对不是互不相关的。恰恰相反，人们会认识到它们是一回事。”^[51]一位佛学学者将“神风”战术和禅宗的真谛联系到了一起：“特攻部队的精神源于抛开自我，让灵魂重生，这种精神来源于历史的传承。自古以来禅宗就将这种思想转变称为大彻大悟。”^[52]

自杀，一直都被视为武士荣耀和忠诚的理想象征。自杀可以洗雪脸面的丢失，这也是日本史诗“四十七浪人”故事的中心思想。在已经必败无疑的1944年后期，整个国家都将面临脸面无存的窘境。而这些进行自杀作战的“神风”飞行员，日本年轻人中的骄傲，则可以被视为老一套的用来为国家挽回部分颜面的祭品。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所说的“幽谷”时代拉开了序幕，一个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持极端民族主义态度的政府消灭了所有的不同意见，垄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在此黑暗的环境下，学术骗子们被鼓励捏造一些半神话的历史，以满足军国主义日程表中重要内政和外交事项的要求。在几个世纪的日本历史中，武士统治了国家及其人民。尤甚于中世纪欧洲或者其他封建

社会的是，精英武士阶层统治并且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日本人认为武士理想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样板，把日本变成由武士组成的优秀民族——好让国家获得国际霸权，就像武士们在普通日本人面前拥有无可挑战的权力一样。但武士道一直是一种精英化、阶级属性明显的信条，不一定适合全民普及。于是在变革过程中，它也进行了不明显却重大的变动。古代佩刀武士的武士道，强调的是对地方封建领主的狂热忠诚——不是对天皇，在明治朝之前，天皇不过是个模糊而无足轻重的偶像而已。武士道意味着坚忍、自律，以个人担当而自豪；它强调在长期训练和实战中精通搏击；它崇尚为履行使命而牺牲自己，丝毫不惧怕死亡；它还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粗茶淡饭，无欲则刚，不追求舒适、美味和奢华。武士们“视生如死”，这与佛教的观点相一致；武士们要将死亡视为一种宿命的常态，而不要依恋原本只是虚幻的生命。耻辱和蒙羞需要用自杀来弥补——当一个武士自杀时，他要用短刀切腹。

但传统的武士道并没有要求在取胜无望时也不能撤退或者投降，过去的武士只要在作战时尽职尽责，便不会因走投无路而投降名誉受损。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日本的武士们世代都在学习中国的这一军事经典：“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未败者，胜之转机也。”^[53]自杀战术在过去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自从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日本陆军的文化和条令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步兵操典被改写，其对“战斗精神”重要性的强调超过了诸如技术和机械力量等因素，上刺刀的大规模“万岁冲锋”也被视为近距离作战中的首选战术。“不可投降”的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付诸文字，并在1928年修订版的作战手册中升级为绝对禁止投降。日本陆军及其宣传机器原先并没有明确宣扬自杀战

术，但自从1932年在上海及周围爆发战争开始，关于“人体炸弹”和“肉弹”的报道就频频见诸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期，这又演变成了为战败而亡的人大唱赞歌，以“玉碎”来称颂他们。有一首叫《海行兮》的歌地位直逼日本国歌，歌词中没怎么提及胜败问题，反而对为国而死大加赞颂：

海行水渍尸，
山行草生尸。
吾为君亡，
死而无憾。[54]

在广播中和爱国集会上反复播放这首歌，会给日本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海行兮》及其所含的精神古已有之。但实际上其歌词只能上溯至18世纪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本身并不知名，而谱成歌曲则是1937年的事。大张旗鼓地宣扬战死——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结束——还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新现象，就像“决不投降”信条、大规模自杀攻击，以及帝国主义武士道中的优秀民族理念一样。这些思想和武士传统完全沾不上边。明治时代之前日本武士只和日本人打仗，没有机会产生民族沙文主义，也不会想要去征服外国。若有人对他说他和其他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他大概只会头晕。传统武士道赞美谦逊的态度以及了解并尊重敌人的美德，却不会宣扬愚蠢的好战，也不会指望上天来保佑胜利。但是古代武士信条中的这些元素并不能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军政府的目标，于是它们都从历史、教育和公众言论中被剔除了。

1944年，自杀飞机战术有一个简单实用的理由：日本新手

飞行员技术不好，无法使用传统的轰炸或投放鱼雷的办法来打击敌人舰队。派出去攻击近岸美军军舰的日本机群遭到了灾难性损失，敌人的舰载机却铺满了菲律宾的天空，无人能与争锋。日军仅仅在10月就损失了近1 000架飞机，而飞往菲律宾航空兵基地的补充飞行员都仅仅掌握最基础的技术。那些匆匆学完缩水了的训练课程，被派往前线部队的飞行学员都只有短短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记录。大部分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射击和导航训练。如果这些新飞行员无论如何都会死在座舱里，那么自杀战术或许是打退敌人的唯一现实希望。

负责为“神风”战术训练新飞行员的猪口大佐说，这其实是个精神问题——反复灌输去执行这种任务的意愿。从战术角度看，他说：“飞行员有基础技术就足够了，不需要特别的训练。”相较于俯冲轰炸、鱼雷攻击或者空中格斗，驾驶飞机向敌舰俯冲是个相对简单的机动样式，哪怕只有最基础飞行技术的飞行员也足以驾驭。因此，猪口说，使用“只经过短期训练和具有最少飞行经验”的飞行员是可能的”。[55]不仅如此，当修订后的“捷号”计划被分发给这一区域的各级指挥官时，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日本人还指望击退麦克阿瑟的登陆，他们的航空兵就必须至少消灭一部分美军舰队。他们面临着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打出战果的沉重压力。

“神风”特攻队于1944年10月20日成立，就在同一天（严格说来是同一个小时），麦克阿瑟将军跟在两栖进攻部队后面涉水上岸。推动“神风”成军这一重大进展的催化剂是大西泷治郎中将，他刚刚于10月19日从日本飞来接管第一航空舰队。大西面相凶恶——大饼脸，板寸头，体型如同运动员一般匀称而结实。他是个令人惧怕的人，同僚们都知道他会突然发脾气；作为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他常因为向同僚和其他人动粗而被训斥——尤

其是在酒后。他出生在神户附近兵库县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操着一口圆唇音很重的关西口音。和他后来的好友兼导师山本五十六一样，大西在军旅生涯的初期也投身于海军航空事业。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探索期之后，他就的一系列重要的航空兵岗位上任职，包括在岸上和海上。此人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成立和1941年12月在6 000英里战线上成功发动空中闪击战贡献良多。大西也反对对美开战的决定（和山本一样），但他还是参与制订了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并亲自指挥了曾在开战第一周屠灭驻菲律宾美国航空兵的驻台湾各航空队。

当1943年第一次见到自杀战术的提案时，大西坚决反对这一想法，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对这种“异端邪说”持反对态度。^[56]毫无疑问，大西个人对这一话题充满厌恶，就在两年半前，他的第一支航空兵队伍还赢得了诸多大捷，荣誉满身。但是他在1944年10月掌管第一航空舰队时，不得不直面他这支新部队的严峻现实。菲律宾的各个航空兵基地只有大约50架飞机还能飞。援军当然很快就会从中国战场和日本本土涌来，但敌人舰队却已经杀到了家门口。除了少数几个老手之外，他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传统的轰炸战术已无意义，大部分派去执行此类任务的飞机都回不来。

10月19日抵达马尼拉当晚，大西就乘坐一辆黑色帕卡德商务车前往吕宋岛上的主要航空兵综合基地——马巴拉卡特机场，也就是美国人所称的克拉克机场。由于美军战斗机有时候会扫射道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天黑后开两个小时的车过去。但另一方面，夜间开车同样危险，因为抗日游击队有时也会在路边发动袭击。即便是在美军尚未登陆菲律宾的此刻，日本人想必也已经有了自己正在失去这个群岛的觉悟。

抵达马巴拉卡特后，他在一条满是弹坑的跑道和一排破旧飞

机旁的一顶指挥帐篷里找到了当地第二〇一飞行队的参谋部，由于地勤人员的努力，这些飞机还勉强能上天。用的零部件都是从堆放在机场边缘的废弃飞机上拆下来的。那里的参谋军官和飞行队长都被召集到镇上的司令部楼里。根据在场一名飞行军官的回忆，大西的讲话简明扼要，语气平淡，直奔事实：“依我看，只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孱弱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那就是用挂载250千克炸弹的零式战斗机组成自杀攻击部队，每一架飞机都要撞中一艘航母。你们怎么看？”[57]

起先无人答话，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慌乱。但是也没人反对。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战术问题是，怎样让零式战斗机当好人力制导导弹。飞行员及其长官们都同意自杀机应该从1.8万英尺左右的高空接近敌人舰队。被美军雷达发现后，飞行员就要快速下降到二三百英尺的超低空，以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同时他们还要投放“窗户”——铝箔条——以欺骗敌方的雷达手。最后向目标冲刺时，飞行员将要压低机头，以45°角俯冲撞击。[58]

散会后，各飞行队聚集在一起再次讨论。不久，各飞行队长一个接一个跑回来说，他们的飞行员一致同意：就这么干。许多人都受到了刚刚战死的基地司令官有马将军的榜样的鼓舞，他在5天前牺牲了自己。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得知了整个日本海军都将冒着全灭的危险向莱特湾冲锋。大家都很坚决，甚至是狂热。一名飞行员伤感地评论道：“这个时候，这看起来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了。”[59]众人认为新部队的指挥官最好是一位科班毕业的人。参谋和指挥官们讨论了一番之后，决定让关行男大尉担任这一职务。接到通知后，关大尉毫不犹豫地答道：“务请让我来干！”[60]

新组建的自杀机航空队仅有26架零式战斗机，分成四个队。其中三队以马巴拉卡特为基地，第四个队驻南边的宿务岛。其中

一半飞机将用于护航和观察，其余则负责撞击敌舰。这样，第一支“神风”部队将只有13架飞机实际用于自杀撞击。司令部将这支部队用汉字命名为“神风”，日语发音“kamikaze”，这支部队便被称为“神风特攻队”，不过此时这个称呼还没有流传开来，那是以后的事。[\[61\]](#)

日军指挥高层对这13架自杀机寄予厚望。有人甚至觉得它们可能会全部撞中目标，或许会击沉多达13艘美军航空母舰，如此毁灭性一击将足以击退对菲律宾迫在眉睫的进攻。因此，日军期待这支小小的新“神风”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较量中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这第一次有组织地使用自杀机的战术还有另一面，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神风”计划也是一场同时针对日本作战部队和民众的公关和宣传行动的核心。10月21日，大西将军主持了一场伤感的送别仪式，他向即将启程的自杀机飞行员挥手告别，飞行员们立正，然后举杯饮下最后一杯壮行酒。他们齐唱《海行兮》，向将军敬礼，然后爬进座舱。第二天，这样的仪式又举行了一次。参加仪式的还有一组战争通讯员、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毫无疑问，新的“神风”战术将会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这一公关措施的目的和前一周虚报台湾大捷其实如出一辙。这些都是旨在激发各航空队本身自信心的宣传措施。这时的日本航空队已经开始绝望，因为怎么做都无法挑战美军的空中优势——如猪口所言：“没有什么比确信敌人具有优势更能摧毁士气的了。”[\[62\]](#)

这种宣传也面向国内阵线。眼见日本民众日益显露出对战争的疲倦，东京政府想要给大众的情绪打一剂强心针。年轻战士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场面或许能刺激人民努力工作，付出更多牺牲，掀起为了国家渡过危机而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战争的高潮。日

本的新闻媒体此时已经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不久前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后，有马将军被奉为“军神”，政府要求人民以他为榜样，为战争做出更大的努力。许多社论中还有一个未言明的论调，那就是老百姓要为他们作战部队付出的牺牲而感到羞愧，必须要工作更努力，吃得更少，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有马的同僚野村吉三郎将军则在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日本工人“在生产战线上以‘肉弹’精神进攻”。^[63]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神风”也是针对敌人的宣传战。这是日本的思维方式，或许能称之为日本太平洋战争“理论”的集大成者——这是一条逻辑线索，隐藏在他们1941年12月毫不理智地决定进攻美国背后，他们在如此决定时清楚美国的工业实力比日本强十倍。日本人所特有的“战斗精神”——常被称为“大和魂”——被用于解释为什么日本从未被征服，也从来没有输掉过战争。战后，日本陆军的河边虎四郎将军告诉前来审讯的美国人：“我想要解释一些很艰深的东西，你们或许无法理解。日本人直到最后都相信可以凭借精神力量和你们一决高下……我们相信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念能抵消你们的科技优势。”^[64]

这是一种宗教信条，根植于日本天皇的神性，以及（通过他根植于）日本的民族性之中。如果说美国人在1944年还要继续打下去，继续要求无条件投降，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种精神对日本人的支配性影响。但他们怎么可能理解？美国佬都是些混血杂种，他们无可救药地腐化堕落，追逐私利，没有任何真正的团结精神和统一目标。如果他们不能像日本那样决意打到最后，那么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工业基础以及技术天赋都将毫无意义。“神风”选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几周内诞生不是偶然的，此时罗斯福总统和杜威州长正针锋相对，美国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正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宇垣将军表达的观点十分典型，

他在10月21日的日记中如此评论刚刚出现的“神风”部队：

啊，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我们无惧百万敌军和千艘航母，因为我们全军共有此魂……如果一亿国民现在以此精神进行生产和自卫，则帝国可高枕无忧。据说美国人现在都为总统大选而疯狂，杜威还稍有领先。我敢说他们比不上我们，因为他们的战争目的和国家政策都是出于私欲。 [65]

在接下来的最后9个月战争中，主导日本战略意图就是：向美国人展示自己“大和魂”的全部威力和怒火。一个愿意把它的年轻人全都变成制导导弹的国家，也一定会全民战至最后一人——一个愿意如此死战到底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如果日本人把赌注叫得足够高，美国就会退缩。美国的领导人受选民掣肘，没有打到亡国灭种的勇气。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可能已经输掉了，军国主义政府的高官们在私下里、内心里已经越来越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打败仗和投降之间，失去海外占领地和看着国土被匪军践踏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人工制导导弹从来不是为了胜利而采用的，而只是为了避免彻底毁灭的恐怖。即便官方宣传不承认，为神圣的日本列岛进行的战斗也已开始，而“神风”正是它的第一道防线。

[1] Michio Takeyama essay in Minear, ed., *The Scars of War*, p.35.

[2] Ibid.

[3]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31.

[4] Ibid., p.94.

[5] Kiyoshi Kiyosawa diary, July 24, 1944,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2.

[6] Tsunejiro Tamura diary, January 16,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13.

[7]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96.

[8] 匿名女性的评论，记载于清泽冽1944年7月22日的日记中。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0.

[9] Taetora Ogat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Information, September 1944, quoted in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24.

[1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3, 1944,” p.3.

[11]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8.

[12] Kiyoshi Kiyosawa diary, October 20, 1944,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67.

[13]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6, 1944, p.1.

[14] Ibid., October 17, 1944, p.3, and October 18, 1944, p.1.

[15]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54.

[16]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1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74.

[17] 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18]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8.

[19]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20, 1944,” p.7.

[20]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76.

[2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22] Hirohito “Soliloquy,” translation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92.

[23]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78.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25]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25, 1944,” p.2.

[26] Premier Kuniaki Koiso, in speech to Diet, September 8, 1944;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27]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9, 1944,” p.5.

[28] *Chibu Nihon Shinbun*, July 26, 1944, quoted in Kiyoshi Kiyosawa diary, same date,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3.

[29] Report entitled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Empire’s Strength,” dated July 1944, quoted in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31.

[30] 例如，见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栗田健男（第47号）、野村吉三郎（第429号）和小泽治三郎（第227号）的审讯。栗田：“我们曾相信麦克阿瑟将军会从南方来到〔菲律宾〕。”野村：“你们的一位将军曾多次谈到他将夺回菲律宾……因此，我们认为你们一定会去那里。”小泽：“最初的‘捷号’计划非常全面，菲律宾是要防御的。”而且“美国的入侵可能发生在10月中旬的某个时候”。

[3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32] Verbatim [sic].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33] 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34] Ibid.

[3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attached successively to the Staf of the Third Fleet, the Combined Fleet, and the Naval General Staf.

[36] Ito and Pineau,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p.125—26.

[3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3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3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另外见松田千秋少将的审讯录, *Interrogation of Rear Admiral Chiaki Matsuda*, IJN, Nav No.69, USSBS No.345 : “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个行动计划终究不足以阻止你们前进；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

是最好的计划。我认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交战，相信我会在这次行动中死亡。”

[40] Sakai, with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21.

[41] Ibid., p.220.

[42] Naoji Kozu,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15.

[4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44] Ibid.

[4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5, USSBS No.378, Admiral Soemu Toyoda.

[46] Ibid.

[4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

[48]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25.

[49]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36.

[5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6, 1944,” p.2.

[51] Goro Sugimoto,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123.

[52] Dr.Reiho Masunaga in *Chugai Nippon*, May—June 1945,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139.

[53] *Thirty—Six Strategies* cited in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91.

[54]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61.

[5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56]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5.

[57]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

[5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59] Hastings, *Retribution*, pp.166—67.

[60]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11.

[61] 英语中的“神风”一词“kamikaze”最初可能是盟军翻译错了。但无论如何，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盟军始终笼罩于“kamikaze”的阴影之下，这个词后来也就被广为接受，包括日本。见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p.59–60, footnote。
——作者注

[62] Ibid., p.27.

[63] 1944年10月15日下午4时30分东京广播电台的讲话，见“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October 15, 1944, p.3。

[6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8, Lieutenant General Torashirō Kawabe, November 30, 1945.

[65]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1,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85.

第五章

莱特岛登陆的规模不如四个月前的诺曼底登陆，但舰队需要跨越的洋面却辽阔得多。从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北部的的主要登船港口荷兰迪亚到莱特湾的登陆滩头，距离足足有1 300英里。而且，登陆舰队拥有超过700艘舰船，荷兰迪亚容纳不了这么多——因此很大一部分部队是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中的马努斯岛出发的，那里还要再往东500英里。这支庞大舰队的各个部分将在航渡途中会合，此时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舰队中的数百艘登陆艇是从太平洋舰队借来的，这是另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从1943年起，两个战区就一直在共用这些专用舰艇及其人员。在进行了超过两年的两栖作战之后，美军已是轻车熟路。赤道南北大大小小差不多30次登陆战的磨炼已经让他们的两栖作战技艺炉火纯青。部队在最后一刻匆忙做好战斗准备，分发主要作战计划，并匆忙加油和补给，各个部门疯狂忙碌，以保障舰队按时出海——所有这一切，对于成千上万名参加过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战争的老兵来说，也都习以为常了。

一名驾机在上空巡逻的“甘比尔湾号”航母飞行员称此为“我见过的最庞大的大军。舰船一直延伸到海平线上”。[1]各个半自主行动的特混舰队组成轮形阵航行，航速不超过9节或10节，这样即使是最慢的舰船也能跟上——突击运输舰、普通运输船、登陆舰、巡逻艇、扫雷舰、弹药船、油轮，以及各种其他勤务船只，组成了巴洛克式的宏伟队形。运输船上运载了17.4万部队。每一型登陆舰艇都有一个以字母“L”[意即“登陆”(Landing)]

开头的缩写代号——LST（坦克登陆舰）、LSD（登陆艇母舰）、LCI（步兵登陆艇）、LCT（坦克登陆艇）等等，还有其他五六种。驱逐舰在队形中穿行，如同灵猫般优雅，又如同牧羊犬般机警。当日军在1942年占领菲律宾时，这些舰艇十中有九还没有造出来。实际上，其中许多都是刚刚来到太平洋，舰员也都刚刚完成训练，还没打过仗。

战后，有记者问第7舰队司令托马斯·金凯德中将是怎样协调这数百艘舰船行动的。“我基本上不是靠自己的手指头来指挥的，”他答道，“这是个组织问题，仅此而已。”^[2]宏大复杂的时间表是通过每一艘船需要在莱特湾出现的时间倒推确定的。最慢的船只要最先出发，有些早在10月4日就出海了，此时连行动计划都没有制订完成。随后，众多舰艇从其原先所在的相隔数百乃至数千英里的港口渐次启程。由于航行距离遥远，舰队要在航行途中加油，舰队油轮将在事先确定的时间和地点等着它们。

麦克阿瑟喜欢开玩笑说“我有三张‘老K’”——他的陆海空三大指挥官，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恰巧都是K。金凯德（Kinkaid）率领常被俗称为“麦克阿瑟海军”的第7舰队。陆军航空队乔治·C.肯尼（Kenney）中将从1942年7月起就一直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航空兵司令。参加莱特岛作战的主要地面部队，第6集团军，由陆军中将沃尔特·克鲁格（Krueger）指挥。登陆第一阶段的空中掩护支援由第3舰队负责。哈尔西（斯普鲁恩斯也是一样）虽然要优先执行联合作战任务，但他仍归属尼米兹的指挥系统。参联会没有尝试就统一指挥问题做出决定，而仅仅是要求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安排进行互相支援和协同作战”。^[3]

经历了西太平洋上一连串空前的不间断航母空袭之后，第3舰队及其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兵们太需要回港长时间休息了。所有的舰载机大队都明显出现了飞行员疲劳的情况，其代价便是愈

加频繁的飞行事故。航空医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可怕综合征带来的负面效果——飞行员们脸上出现了憔悴和沮丧的神情，他们神经脆弱，体重迅速下降。哈尔西在8月刚刚接管舰队，但许多官兵却已经在海上待了10个月，中间仅仅在中太平洋那些偏远的环礁上有过短暂休整。即便是哈尔西也累了，正如“米克”卡尼注意到的那样。舰队现在需要回到乌利西潟湖的锚地中，安静地停泊一长段时间，休息整补。然而，对菲律宾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第3舰队的快速航母还要在其中领衔主演。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头一次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斗机的掩护半径之外持续作战。在莱特岛上，美军想要拿下塔克洛班机场并抓紧升级改造，这样它就可以尽快接收肯尼的截击机。但在此之前，打退日本空中反击的活儿绝大部分还得交给哈尔西的航空兵来干。当10月21日哈尔西问麦克阿瑟第38特混舰队估计何时能够返回乌利西时，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坚决地答道：“这次行动的基本方案就是要仰赖第3舰队的全力支援，这是我第一次到我自己陆基空中掩护范围之外作战……我认为你掩护此次作战的任务十分关键，至为重要。”^[4]

关于接下来的作战，一个迫在眉睫的“肯定不确定”的问题是日军空中抵抗的规模和纵深。另一个问题是日本舰队是否会前来反击登陆。的确，哈尔西最近一段时间的横冲直撞揭示了日军航空兵力量的薄弱——但敌人在菲律宾有数百座机场和备降跑道，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这里可以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本土快速获得增援。莱特岛作战和此前太平洋上所有两栖登陆的不同之处在于，敌人能够依赖其纵深，并分散配置其增援航空兵。在悲观的情况下，美军将会发现自己陷入漫长而无休止的空中战役之中，需要反复迎战从南边、西边和北边杀来的一批又一批敌机。此时飞行员疲劳症已经十分严重，而这样的前景更是航母部队的

噩梦。哈尔西或许会后悔地想到，莱特进攻战役正是在他的大胆建议之下花了两个月推动的。他自己挖的坑，现在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填。

关于敌人舰队，密码破译情报和侦察报告已经准确判断出栗田和日军水面战舰停泊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水道，小泽和航母则位于濑户内海。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第3舰队和珍珠港，主流的观点是日本海军不会出来应战。但是持不同观点者仍然存在，而且大家都认为发生大规模舰队作战至少是有可能的。如果栗田要率领水面战舰前来挑战美军，那他们就必须从切开菲律宾中部岛屿屏障的两个海峡之一通过——莱特岛南部的苏里高海峡，或者是萨马岛北部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否则就要从棉兰老岛南部或者更远的吕宋岛北部海岸绕道。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但是为了赶上10月20日的任务期限，第3舰队和第7舰队的司令和计划制订人员并未就各自辖区内应对意外情况的具体计划沟通一致。

金凯德的第7舰队绝对不是赤手空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进攻，他们都能基本做到自保。岸轰和火力支援大队拥有6艘老式慢速战列舰——其中有些还在珍珠港被击伤过——以及数量充足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这支舰队被编为第77.2特混大队，由此前参加过多次两栖作战的老将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指挥。金凯德的舰队中还有16艘小型护航航母，其舰载机主要用于轰炸和扫射登陆滩头的地面目标，并在两栖舰队上空进行防空掩护。它们被编为第77.4特混大队，由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指挥。他这支小型慢速航母舰队及其护航驱逐舰被分为三个分队，其无线电呼号将会名垂青史：“塔菲1”、“塔菲2”，以及“塔菲3”。

第3舰队参谋长“米克”卡尼回忆说，哈尔西一直向他手下的所有人反复灌输一个原则：“如果能找到机会打一场大仗，那就让它变成现实，你们要始终把这作为首要目的……他的意图就是我们冲进去，和他们一决雌雄，只要找到敌人就干一仗，不管遇到的是谁。他本人对我们的指示，以及我们关于战斗的所有讨论的结果，都让这一点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5]

10月17日，舰队的先遣分队搭载着美国陆军游骑兵突击队登上了把守着海湾入口的三个小岛。游骑兵们迅速打垮了日本守军，随后架设起导航灯以协助两栖船队。扫雷舰费了不少力气，找到并扫除了大约200枚漂雷和混合雷，开辟了一条通往登陆海滩的宽阔通道。“水下爆破组”（UDT）的精锐蛙人们——他们是今天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前身——潜入水中寻找水下障碍物，却没找到。10月19日拂晓前，奥尔登多夫将军的火力支援舰队鱼贯进入海湾，大炮直指海滩，36小时的炮击就此拉开序幕。日军岸炮进行了还击，也打中美舰几炮。但它们在开火时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被美军舰队的优势炮火悉数打哑。

10月20日，无月之夜，运输船和两栖舰队如同幽灵船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进海湾，运动到各自的指定位置。奥尔登多夫将军的炮击编队仍在继续向海滩倾泻死亡和毁灭。早晨6点，当新一天的太阳跃出东方海平线时，炮火的数量和密度都令其宛如雷霆。

从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观看这幅场景，麦克阿瑟毫不讳言自己被震撼到了。炮火把海岸线翻了个底朝天，连莱特岛的海岸地貌都为之改变。巨大的炮弹带着货运列车般的巨大啸声直奔海岸而去，在天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红色弧线。火箭弹亮白色的烟尾久久不散，在天空中刻印出栅栏格子花纹。一团团浓烟从海滩以及远处的山上升起。一位目击者从海岸外的运输船上用

双筒望远镜观看了一艘驱逐舰用5英寸舰炮向一处高大海角上一座日本地堡瞄准齐射的场景。“地堡如同核桃壳子一般被砸开。当第二轮齐射命中时，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想要从里面爬出来。就这样了。曾经精心建造的堡垒现在不过是山坡上的一道白色疤痕而已。”[6]舰炮停止射击后仅仅几秒钟，舰载机便飞越海岸线，倾泻下炸弹、火箭弹和.50口径曳光弹，此种场面在这个上午无数次重演。在连续不断的猛轰之下，海岸已经从视野里消失了。这天上午几乎没有风，无法把潮湿空气中的一层层黄色和棕褐色浓烟吹散。即便是在奥尔登多夫战舰后方远处的运输船上，人们也不得不吼叫着说话才能被听见。他们的卡其色军服在胸膛上震颤，人们都能感受到五脏六腑深处受到的剧烈撼动。远处山上的爆炸发出一种极富穿透力和共振的声音：砰，砰，砰。南边和西边的整个地平线已经成了一条闪烁的光环。

上午10点，第一批登陆艇准时向海岸进发。炮击强度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天空、地面，以及船只的甲板，都如同琴弦一般震颤起来。海岸外的一名观察员在日志中记录：“你无法区分出一次一次的爆炸，那就是一片轰鸣。”[7]在车辆人员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的前方是一群安装了火箭发射器的登陆艇，它们不停地开火——火箭弹嗖嗖地尖啸着飞出去——这些致命的小火箭纷纷落在海滩和树林边缘。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军的时间拿捏和协同已经到了十分精熟的地步，进攻部队的官兵只要从登陆艇的船舷上面探出头来，就一定会看到一幅任何人都终生难忘的景象。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几秒钟后，毁灭性的弹幕便突然向内陆跃进半英里，就如同暴雨扫过北美洲的大平原一样，落在登陆海滩前方，使两栖部队得以安全上岸。

进攻部队跃出登陆艇，冲向海滩，随即要么在沙地上卧倒，要么躲进炮弹爆炸留下的弹坑中。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自己并未遭

到敌人火力的攻击。燃烧和破碎的椰子树林中还有几个孤零零的日军狙击手，各处残存的碉堡里也会响起一些零散的机枪射击声，但是日军的抵抗仍很轻微。岛上的大部分敌军似乎已被撤回西边的山区。美军第一梯队迅速向内陆推进，扩大地盘，并为后续批次的登陆艇腾出空间。不到一个小时，进攻部队就拿下了一块各位置纵深基本都达到1 000英尺的滩头阵地。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妨碍了他们的推进，那与其说是敌人的抵抗，还不如说是湿滑的地面。

数以万计的部队——总共有4个师——跟在他们后面上陆，海岸线很快就变成了不断膨胀的补给站。车辆在土路上行驶，板条箱成排堆放在一起，有人站在上面走来走去。在内陆更远处，步兵们在挖掘散兵坑和战壕。这里部队如此密集，散兵坑都直接连到了一起。许多人都把从登陆艇上带出来的救生衣当作枕头，把棕榈树叶放在散兵坑上方挡雨。第3两栖军的战地日志称：“部队大约向内陆推进了1 000码至1 400码。抵抗相当轻微。除了有些地方敌人挖掘了战壕并用迫击炮开火之外，大部分地段上部队都在持续推进。登陆海滩上伤亡轻微。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8]由于未遇到敌人有组织的抵抗，北部地段的部队继续向北进击，很快占领了岛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塔克洛班机场，这个机场位于岛屿东北沿岸的同名城镇附近。

在“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麦克阿瑟举着他的双筒望远镜，从漫长弧形海岸南端杜拉格村旁边的白滩，一路扫视到北边塔克洛班附近的红滩。在“纳什维尔号”和登陆滩头中间有太多的船只，他实际上很难看到海滩全貌。他时常放下望远镜，给他的玉米芯烟斗点火，和派驻他旗舰的战争通讯员亲切交谈。他兴致勃勃地给通讯员们讲起他第一次来到塔克洛班时的故事，那时候他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新来军官。

下午1点刚过几分钟，麦克阿瑟走下楼梯，来到他的登陆艇上。他身后跟着司令部里的几个主要人员，他的航空兵司令肯尼将军，以及几位他最喜欢的战争通讯员。登陆艇到另一艘运输船旁停下来，接上了塞尔吉奥·奥斯敏纳，他是曼努埃尔·奎松之后继任的菲律宾总统，还有卡洛斯·P·罗慕洛准将，他是驻美国众议院的菲律宾属地代表。登陆艇开向红滩途中，麦克阿瑟笔直地坐在靠近艇尾的座椅上。他拍着萨瑟兰的膝盖说道：“你能相信吗，迪克，我们回来了！”[9]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眼前的场景恍如梦境。这话他又向罗慕洛说了一遍。他握着两位菲律宾朋友的手：“好吧，我们来了！”罗慕洛记得他们都这么说了：“所有人都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用不同的语气，好像这是表达最深刻感情的最新方式一样。在我们听来这绝不啰唆。它听着就像是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者是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讲话一样。我们永远也听不够。”[10]

艇长操纵着登陆艇砰的一声轻轻靠上了岸，放下了跳板。他们距离海岸还有50码。两名通信部门的摄影师走下跳板涉水上岸，以便把这一场景拍摄下来。萨瑟兰扶着麦克阿瑟的胳膊，反复念叨着“我们来了！”——麦克阿瑟也回应道：“是的，你能相信吗，我们来了。”[11]这一行人耐心地等着摄影师架设好照相机。之后，麦克阿瑟戴着飞行员太阳镜和他镶有金穗纹饰的野战帽，走下齐膝深的水里，开始涉水上岸。奥斯敏纳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之后是同行的其他人。拍下这一场面的照片将会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

麦克阿瑟踩着浪花走到堆满补给物资的海滩上，无烟火药和棕榈树燃烧的气味填满了他的鼻子，他快步迈向陆地。受命保护他的一个连急忙快步上前，因为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一度似乎想要径直走到树林边缘去，而那里可能还有残余的日本狙击

手。随后他改变了主意，回头再次和奥斯敏纳握手。“总统先生，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奥斯敏纳此时已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12]消瘦憔悴的菲律宾老百姓纷纷围了过来，许多人挥舞着在日本占领的那些年里小心藏着的美国国旗。他们满脸喜悦地欢迎美国军人，高声喊着：“可爱的美国人！”

另一个通信小组正在准备一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并架设广播天线。麦克阿瑟和奥斯敏纳并肩坐在一根倒在地上的棕榈树干上。旁边的一棵树上并排飘动着美国和菲律宾联邦的旗帜。不久，通信队告诉他们，广播已经准备好了。

片刻之后，麦克阿瑟拿起了一支手持麦克风。当他说话时，天空飘起了细雨。这次广播在美国国内进行了现场直播，当时这还是个稀罕事；它也通过移动天线向全菲律宾进行直播，虽然看起来没几个菲律宾人能听到这最初的广播。

麦克阿瑟还是老样子，用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我”指代了他指挥下的部队。“菲律宾人民，”他宣布道，“我回来了！蒙全能的主的恩宠，我们的部队再次站在了菲律宾的土地上。”他还号召菲律宾人民起来反抗，打击敌人，而且“向我靠拢！”。^[13]

这番讲话惹得他手下不少官兵直翻白眼，在他们眼里这又是个麦克阿瑟式的牛皮。你是回来了，难道我们没回来吗？不过这次演讲对菲律宾人的振奋作用完全毋庸置疑。即便他们未能通过广播收听讲话，大部分人也很快就会通过传单或者口耳相传获悉此事。第二天，在塔克洛班市政府的台阶上，麦克阿瑟会给奥斯敏纳总统主持一场更正式的仪式——象征着将国家主权交还菲律宾。问题是他并没有就这份声明与掌握着菲律宾联邦主权的美国国务院和内政部澄清沟通。麦克阿瑟这是在擅自制定美国的亚洲外交政策——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10月20日晚，栗田麾下强大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纵队开进了婆罗洲北部的文莱湾。两艘油轮正在那里等着他们，所有军舰都要从它们身上喝个饱。第二天下午，来自全舰队各舰的摩托艇把舰长和高级军官送到了栗田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上。在那里，他们得知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刚刚发来最终的“捷号”作战命令，并听取了任务简报。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军官们被这一计划激怒了，有些人壮着胆子发出质问。如果情况真如上峰相信的那般绝望，那么总司令本人不该亲自前来率领大家参战吗？为什么丰田大将会躲在横滨安全的地下掩体里？如果这次出击是海军的“万岁冲锋”，那么进攻目标不该是美国的战列舰和航母，而不是莱特湾里的运输船吗？大家都受过严格的夜战训练，为什么还要在白天进攻？

栗田最后站了起来，简短回答了这些质疑。突袭运输船队最有希望重创敌人的进攻部队，他说。这可能是打一场全军尽出的舰队决战的最后机会，现在不打，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要么现在，要么就再也不会。不仅如此，他说，命令就是命令。于是，军官们起立，一齐高呼“万岁！”之后喝下一杯清酒，各自回舰。^[14]

10月22日早上8点，拥有31艘军舰的栗田舰队从文莱出发，向北开往巴拉望岛。研究了海图并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他决定让自己的舰队走中路，穿过巴拉望水道，然后是锡布延海和圣贝纳迪诺海峡。比栗田晚7个小时出发的是以西村为首的“C分遣队”舰队，他们将抄近路走南线，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苏禄海、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在北方远处，志摩将军的“第二游击部队”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启程南下，他接到的命令很模糊，只是要他跟随西村穿越苏里高海峡。早在10月20日下午，小泽的

光杆航母舰队就已经把船锚从濑户内海海底的淤泥里拉了起来，正在出海，准备前往丰后水道的集合点。到10月22日夜幕降临时，参加“捷号”计划的所有舰队全都动了起来。[15]

战斗打响前，美军有44艘潜艇在海上作战，其中许多被特地布置在能够截击和观察开往菲律宾东部水域的日本海军部队的位置上。有超过12艘潜艇奉命观察和警戒莱特湾周边海域。菲律宾中部的岛群组成了一道屏障，这里复杂的岛屿地形将任何想要穿越这道屏障的大吃水舰船都限制在了为数不多的航线上。美军潜艇就部署在各个航线的瓶颈上：巴拉巴克海峡、民都洛海峡、贝尔德岛海峡、巴拉望水道，以及吕宋岛西部海面。在研究了海图并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栗田和他的参谋们选择穿越巴拉望水道，这是巴拉望岛西北沿岸和“危险水域”之间一条可航行的走廊，后者是南海中一片缺乏海图的海域，那里满是浅滩、礁石和暗礁，四百年以来一直都是海船的坟墓。栗田和他的参谋们知道他们选择的路线可能会把自己带进美国潜艇的瞄准镜，但是由于接到死命令，以及受到紧张燃油状况的制约，他们也别无选择。

[16]

10月22日至23日午夜，两艘美军小鲨鱼级潜艇正守候在巴拉望岛西南端。“海鲫号”（Darter，艇长戴维·麦克林托克）和“鲛鱼号”（Dace，艇长布莱登·克拉格特）正浮在水面上，肩并肩，相距只有200英尺。凌晨1时16分，“海鲫号”的SJ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回波信号。信号位于东南方，距离大约17英里。起初雷达手觉得这一定是云团，但是很快又冒出来许多信号，在屏幕上共同运动。它们只可能是向北直奔巴拉望水道而来的重型战舰。于是麦克林托克拿着手持喇叭，隔着水面向“鲛鱼号”的舰桥喊话：“我们雷达发现目标。上！”[17]于是两艘潜艇四台引擎全开，以19节速度水上航行，想要在敌舰队前方抢占截击阵位。

莱特湾海战，1944年10月23日—26日



在夜幕的掩护下，两艘潜艇用无线电发出了日军舰队北上穿

越巴拉望水道的报告，并正确估计出舰队拥有至少三艘战列舰。

[18]远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蒂将军收到了“海鲫号”的第一份电报，他立刻将其转发给哈尔西和其他指挥官。在随后“海鲫号”发出的每一封敌情报告中，日军纵队的舰艇数量都在增加。在下潜之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麦克林托克报称：“至少11艘舰，航向航速不变。”[19]

“海鲫号”的航迹推算部门起初推测敌舰队的航速是22节，因此对自己占得攻击阵位的机会持悲观态度。但随着距离缩短，美军发现舰队的航速实际上不超过18节。而且它们将被挤进狭窄水道，其防御性的之字形航行也会受到限制。“我们现在抓住他们了！”“海鲫号”的日志中记载道。[20]当巴拉望岛绿树覆盖的山峰隐约出现在东方微露的晨光中时，两艘美国潜艇潜入了水下。

日本舰队中的大舰排成两路纵队齐头并进，几艘驱逐舰位于纵队两侧。左侧纵队由“爱宕号”领头。“海鲫号”运动到了能够攻击这一纵队的位置上，“鲛鱼号”则继续向东北方航行了几英里，准备伏击右侧纵队。两艘艇的艇员们都已各就各位。

在“海鲫号”的指挥塔里，麦克林托克中校眼睛紧贴着潜望镜，抓住两边的把手转动着方向。在镜头中，敌人军舰从雾气中显出形来，宛如教堂塔楼一般的灰色阴影以均匀间隔排成两列。“海鲫号”几乎就在左侧纵队的正前方。麦克林托克眼看着“爱宕号”向他开过来，直到它在瞄准镜里变得如此巨大，圆形的视场已经容不下它的全长。早晨6时32分，他在“不可能射失”的980码距离上射出了艇首鱼雷管中的6枚鱼雷，随后向左急转，向第二艘舰“高雄号”巡洋舰射出了艇尾的4枚鱼雷。

“爱宕号”的瞭望哨直到鱼雷快要命中时才发现其航迹。这艘旗舰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它的右舷爆发出4根燃烧着火焰的水

柱。数百名舰员可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当场丧命。它的舰首开始下沉，舰体向右严重倾斜。从“海鲫号”的潜望镜中，麦克林托克看见巨大的橘黄色火焰上方腾起滚滚黑烟，中雷巡洋舰的上层建筑完全藏进了一团团的烟雾背后。他还看见日本水兵在甲板上集合准备弃舰。

在“爱宕号”的舰桥上，栗田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旗舰完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告诉舰长：“该走了。”^[21]之后他脱掉鞋子，跳进海里，然后向最近的驱逐舰“岸波号”游过去。按栗田自己的说法，他是第一个离舰的。

大约一分钟后，“高雄号”的舰尾附近挨了两枚鱼雷。爆炸摧毁了两根传动轴，海水淹没了锅炉舱，使它瘫痪在水面上。舰员们急忙展开了损害管制，纵队其余各舰则接替了它的阵位并从它身旁开过。

整个日军舰队此时大幅度右转，以避免看不见的敌人潜艇。但是巴拉望岛海岸就在他们右侧不远处，没有多少空间可供他们规避机动。“爱宕号”被击沉后，指挥权暂时移交给了“大和号”上的宇垣缠将军。随后两个纵队开始加速，并坚决转回40°的主航线上。但这又把他们直接送到了“鲛鱼号”的瞄准镜前。克拉格特中校看着右侧纵队向自己驶来。“鲛鱼号”的鱼雷所剩不多，所以他不得不精心选择目标。他决定放过头两艘舰不予攻击，他的命令被载入了史册：“让它们过去——它们只是重巡洋舰。”^[22]但他把纵队的第三艘舰误当成了金刚级战列舰：实际上它还是一艘重巡洋舰，“摩耶号”。当敌舰在1 800码距离上完全暴露出侧舷时，他齐射出了6枚鱼雷。

几分钟后，“鲛鱼号”的艇员们听到四声确定无误是鱼雷命中的声音，几秒钟后又传来一次震动巨大而且恐怖的爆炸声，声呐

员甚至怀疑是不是“海底被炸开了”。之后他们听到一艘大舰解体的声音，铆钉一个接着一个崩落了下来。克拉格特称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23]他正确地判断出这是“摩耶号”的弹药库被引爆了。这艘军舰变成了一座冲天的水柱和火球，残骸碎片向各个方向飞出去，不断下落，持续了大半分钟。宇垣将军在“大和号”的舰桥上悲伤地看着这一幕，他看见“摩耶号”最后的位置上升起黄色的浓烟，“烟雾散尽后便已空无一物”。^[24]

其余大舰不敢停下脚步，继续匆匆向北。但护航的驱逐舰却在这一片海域四处投掷深水炸弹，把两艘潜艇压在水下数个小时。日本驱逐舰还捞救起了数百名“爱宕号”和“摩耶号”的幸存者。栗田将军奋力游过覆满原油的黏糊糊的海面，来到“岸波号”旁，人们把他拉上甲板，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还有一双白色运动鞋（他原来的鞋子已经扔掉了）。回望“爱宕号”最后所在的位置，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这艘舰——它在19分钟里沉入了海底。栗田向宇垣发出信号，表示自己想要来“大和号”，把它当作自己的新旗舰。但他和他的参谋部还要再等9个小时才能到达这艘战列舰上，因为此时所有幸存舰艇都必须迅速驶离巴拉望水道。

现在“爱宕号”和“摩耶号”完了，“高雄号”遭到重创但仍能低速航行，因此它奉命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返回新加坡。（它后来被判为无法修复，再未参战。）如此，莱特湾战役的这场开局之战让栗田31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失去了5艘舰。

“海鲫号”和“鲛鱼号”试图溜过去截击撤退中的“高雄号”，但是“海鲫号”却重重撞上了一处海图上未标明的暗礁，不得不放弃追杀。美国人想尽办法，想把它拖出来，却未能奏效。“鲛鱼号”只好接上“海鲫号”的所有艇员，返回弗里曼特尔，搁浅的潜艇则只能用炸药炸毁控制室和指挥塔后遗弃。时至今日，“海鲫

号”锈迹斑斑的残骸仍然静躺在巴拉望岛旁一块礁石上，既作为航标，也吸引着无数游客。

麦克林托克和克拉格特发出的无线电敌情报告或许比他们对栗田舰队的攻击更具有价值，因为这是第一条确凿无疑的消息，表明日本海军意图迎击进攻莱特岛的美军。另一方面，“爱宕号”的沉没导致55岁的栗田跳进了海里，不得不游泳逃生。他整个中路舰队的参谋部也是如此。随后他们要在驱逐舰局促的舰桥上待9个小时——其间军舰还要时时规避幽灵般时隐时现的潜艇踪迹，随时做好被鱼雷击中的准备——直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大和号”。《孙子兵法》有云：“佚而劳之。”战后接受美国审讯人员的询问时，骄傲的他不肯承认这段经历令他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但他私下里还是向同僚们坦白，身体上的疲劳、缺乏睡眠以及高度紧张，妨碍了他在后来战斗中的发挥。

哈尔西将军曾经觉得日军舰队大概不会来迎击对莱特岛的进攻，但到了10月23日日终时，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一天，侦察报告越来越多，绝密无线电监听情报也有线索显示敌人会做出“激烈反应”。“海鲫号”和“鲛鱼号”发现一支大规模水面舰队正开往米沙鄢航道，随后“犁头鲛号”潜艇拍发的报告显示，同一支舰队出现在了民都洛海峡入口附近。还没有人看到过日本航空母舰，但尼米兹的司令部发来警告，有迹象显示小泽将军的第一机动部队已经从濑户内海出发，可能从北方开过来。（这些估测情报的依据是无线电通信量分析，以及监听到的讨论让舰队油轮开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某处会合点的零散信息。）

夜晚，哈尔西三支航母特混大队中最北端的第38.3大队被低空飞行的日本夜间巡逻机盯上了，这些飞机可能来自吕宋岛上的

机场。各个战斗机中队度过了一个紧张而且不敢合眼的夜晚，他们要随时准备在暗夜中起飞迎击敌机夜袭。夜袭并未到来，但无处不在的夜间侦察机似乎预示着第二天上午会有大规模空袭，事实确实如此。

哈尔西原本希望能有一个短暂的喘息，这样他就能让航母特混大队轮流返回乌利西休息整补。他已经让第1特混大队（麦凯恩）回到东面800英里以外的乌利西环礁，还想要在第二天把第4特混大队（戴维森）也派回去。但现在没法儿再休息了。哈尔西命令麦凯恩停止休整，加油待命，并召集其他三支航母大队向吕宋岛南部和圣贝纳迪诺海峡靠拢，保持锅炉高强度运转，随时准备开出最高航速。24日曙光初露时，第38特混舰队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武装侦察”机群。两架飞机一组，一架“地狱猫”和一架“地狱潜鸟”，每一组负责10°扇区“切馅饼”，侦察距离300英里。爬升到高空后，它们排成一条巨大的弧线向各自方向散开，其侦察范围从西南到西北，覆盖米沙鄢海、锡布延海、民都洛海峡，以及菲律宾中部岛群的各处海域、海峡、海湾和峡湾。还有12架“地狱猫”被派出去担任“中继飞机”，在特混舰队以西100英里处高空盘旋，为搜索扇区最西端及其附近的飞机充当无线电中继。一旦遭到攻击，这些飞机还能迎击从西边来的敌人空袭，保护特混舰队。

上午，天高气爽，高空中有少量卷云，1 500英尺高处有一层薄薄的碎积云。从8 000英尺的高度，侦察员在各个方向上都能看到近100英里之外。在他们的下方，一幅壮美的热带风景画展现在眼前：蔚蓝的浅海，白沙浅滩，还有覆盖着丛林的高山岛屿，反复出现。宽阔的白色沙滩逐渐变成了浓密的椰子树林，树林从靠近岸边的浅绿色变成了陆地深处的深绿色，之后陡峭的山坡拔地而起，棕褐色山峰和黑色火山锥高至六七千英尺，火山锥

上还带着满是裂纹、时时冒烟的火山口。由于深度、海底质地和光照角度的不同，各处海水的颜色深浅不一，浅蓝色的波纹沿着海岸向远处延伸，散布着珊瑚礁的浅滩向海中伸出数英里。在岛屿之间的海峡里，海水逐渐变深，颜色也越来越暗。在早晨太阳的照耀下，整个大海一片波光粼粼。舰载机飞行员们可以熟练地将眼前的地标及海峡与座舱里的海图相互对照。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在菲律宾上空飞了不知道多少次，对这里的地形已然烂熟于胸——他们知道在这复杂岛群有限的几条可通行航道中该去哪里去寻找日本军舰。

早晨7时46分，“勇猛号”一架SB2C的飞行员在接近民都洛岛时发现机载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一簇回波信号。信号位于岛屿南方约10英里处。他向信号的位置转了过去，很快便看到了一串相互平行的航行尾迹，这是大舰队正在行动的第一个迹象。又过了一分钟，他就能目测出舰队的组成了：13艘驱逐舰，8艘巡洋舰，以及4艘战列舰。这份敌情报告于早晨8时10分送到了“新泽西号”上。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于是守在指挥舱的超高频无线电旁，等着进一步确认消息。消息很快便来了——“卡伯特号”的一名飞行员报告：“我看见了，是大舰。”两分钟后，“勇猛号”第18轰炸中队队长的声音出现在了频道里，响亮而且清晰：“4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航向东，位于民都洛岛南角外。”^[25]

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栗田的中路舰队，该舰队正绕过民都洛岛南角，准备进入塔布拉斯海峡。栗田的舰队比之前经过“海鲫号”和“鲛鱼号”把守的航道时要缩水了一些，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依然令人生畏。根据位置和航向判断，栗田应该是想要强行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北面杀进莱特湾。正当哈尔西准备下令向栗田发动空袭时，另一份敌情报告又送到了他手上，这次是来自

南方200英里外的“企业号”侦察机组，位置是在内格罗斯岛西南的苏禄海上：一支7艘水面战舰组成的纵队，包含2艘战列舰。这正是西村的南路舰队。根据其位置和东北航向很容易得出结论，该舰队正开往苏里高海峡。

发出敌情报告后，“企业号”的飞机请求友邻侦察机编队支援，准备向南路舰队发动进攻。这些飞机爬高到1.2万英尺，这是SB2C俯冲轰炸机转入俯冲的理想高度。两艘日军战列舰上的14英寸主炮扬起到最高射角，射出的对空弹炸出壮观的巨大火球。这一幕令美军飞行员惊叹不已，但这些炮弹炸点都太远，无一能伤及美机。“地狱猫”先俯冲下去，在2 000英尺高度射出5英寸航空火箭弹，然后改出俯冲扫射敌舰。“地狱潜鸟”跟在后方，以70°俯冲角凌空而下，投下500磅炸弹。有几枚炸弹近失“山城号”，在舷外近处爆炸，一枚近失弹导致战列舰右舷舰体轻微凹陷，成吨的海水从裂隙处涌进舰体内，令其向右倾斜。这艘旗舰高大的宝塔形上层建筑也遭到F6F的火箭弹和机枪射击，大约20名舰员战死。“扶桑号”战列舰被两枚炸弹命中。第一弹命中2号主炮塔附近，在下方两层甲板处爆炸；另一弹命中舰尾附近，击穿装甲甲板，在军官起居室中爆炸。一个航空燃油罐被引燃，烧起熊熊大火，吞没了停放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扶桑号”一度看起来像是没救了，但是舰员们还是控制住了损伤，令这艘军舰继续在编队中维持原有阵位。驱逐舰“时雨号”也被一枚500磅炸弹击中，不过炸弹在它前主炮塔上弹开，落进军舰一旁的海里才爆炸。

在这一轮短暂而激烈的空袭中，西村将军在“山城号”的舰桥上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一名舰员后来回忆道：“他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不安。他已经毫不畏惧，有了钢铁般的神经。这样一位指挥官令下属们心中镇定，充满勇气。”^[26]他的舰队已经流了第一

滴血，但是没有一艘舰被迫返航，所有军舰都留在纵队里，速度也没有下降。

判断出日军南路舰队规模较小，足以交给金凯德去对付之后，哈尔西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其中路舰队。他越过第38特混舰队司令米彻尔，直接通过低功率的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用他自己的声音下达了命令：“进攻，再说一次，进攻！祝好运！”^[27]这就是哈尔西吸引眼球的手段，他给这次战斗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他绕开了其内敛谦让的前任建立的一整套指挥系统，选了一句整个舰队都认得出来是他的话下达了命令：大家都记得，在两年前的圣克鲁兹海战中，他曾下达一条振奋人心的命令：“攻击，再说一次，攻击！”

就在此时——上午8时27分——第38特混舰队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批来袭飞机，它们是从吕宋岛各个机场方向飞来的。不出所料，美军航母现在一整个上午都要去对付敌人的空袭了。结果，只有博根将军的第2特混大队设法放飞了一支攻击机群：来自“勇猛号”和“卡伯特号”航母的45架俯冲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

攻击机群指挥官比尔·埃利斯率队飞了一条稍显绕路的航线，从宿务岛绕了一圈（美军认为岛上的日军航空基地可能得到了增援），然后向南转向塔布拉斯海峡。飞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美国人在晴空之下看到了他们的猎物。从空中，他们能看到整个舰队——锡布延海上空的能见度始终极佳——但每个飞行人员的目光都被两艘超级战列舰吸引住了，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列舰，它们正在同心圆阵形的中央高速前进，周围是小几号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附近没有日本飞机的影子，因此美军飞行员在上空花了些时

间稍事盘旋，精心准备他们的进攻。装有鱼雷的TBM“复仇者”将从目标舰首两侧进行“钳形”进攻，SB2C“地狱潜鸟”的俯冲轰炸将与其同时展开。战争初期，美军曾经费很大力气想让这些进攻彼此协调，到1944年，他们已经学会让进攻分秒不差了。

在日本军舰上，号手们吹响了战斗警报，人们匆匆奔向战位。日本人对没有空中掩护骂骂咧咧，但至少他们的军舰新加装了几十门高射炮。“大和号”和“武藏号”各自装有大约150门高射炮，两艘舰上的所有高炮每分钟共能射出1.2万发炮弹。小一些的战列舰上装有大约120门高炮，巡洋舰90门，驱逐舰30门到40门。在林加水道时，他们还特别强化训练，提高射击准确度和射击速度。日本人还为两艘超级战列舰的18.1英寸主炮专门设计了新型三式对空弹，这是一种蜂窝状的对空霰弹。当美军飞机降低高度开始进入攻击航线时，栗田向各舰发电：“敌机来袭，天佑诸君努力奋战。”[28]

比尔·埃利斯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战列舰巨大的主炮抬高至最大仰角。当SB2C和“地狱猫”转入俯冲时，这些巨型舰炮开火了。高射炮弹五颜六色，埃利斯回忆道：“弹道带着粉红色，白色曳光弹带着紫色，还有漫天的白磷弹，一发炮弹爆炸后会迸出大量银色的弹丸。”[29]“地狱潜鸟”背朝太阳从东方发起俯冲，以近乎垂直的角度俯冲而下，穿过高炮弹幕，随着日舰的规避动作一同转弯，将轰炸瞄准镜紧紧套在目标上，在大约2 000英尺的高度上投下1 000磅炸弹。“大和号”和“武藏号”都一度被近失弹掀起的水幕所遮蔽。“武藏号”的1号主炮塔被命中一弹，但这座装甲厚实的炮塔几乎未受损伤，只是掉了一块圆形的漆。近失弹似乎轻微震松了舰体钢板的连接处，导致突然进水，但是当水雾散尽后，大家才发现“武藏号”仍在继续前进，速度也没有下降。

“复仇者”机群开足马力，加速从1.5万英尺高空下降到海面
上方200英尺高度，改平时速度已经达到300节。“复仇者”就以
这样的高速，从两侧同时扑向“武藏号”。“我看到那该死的宝
塔，”鱼雷机分队指挥官说道，“但最令我难忘的是这艘舰的尺
寸。它这么长，你不可能射不中。”^[30]在900码距离上，TBM机
群投下鱼雷，随即转弯脱离。“武藏号”立即机动规避，两条鱼雷
航迹擦着它的舰首掠过，但第三枚鱼雷却正中其舰体右舷中部，
掀起了200英尺高的白色水柱。爆炸的剧烈震动把数百名舰员震
倒在地。军舰向右轻微倾斜，但通过对侧注水，它又很快恢复了
平衡。

当美机掉头东返后，“武藏号”报告自己仍能维持24节航速。
它和姊妹舰“大和号”在设计时就要求能够承受最多超过20枚鱼雷
的打击，一枚只是小意思。不过“复仇者”机群还命中重巡洋
舰“妙高号”一雷，这次打击就严重得多；它不得不退出队形，返
回文莱湾。

回到美国特混舰队这一边。在空中盘旋的防空巡逻“地狱
猫”从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对付日本飞机。日军从吕宋岛各个机
场接连放出了三批飞机，每一批都有五六十架，这些攻击都落在
第3舰队最北边的航母部队，谢尔曼将军的第3特混大队头上。在
整个上午一连串一边倒的空中格斗中，防御一方占据了压倒性优
势。但其他地方也都需要这些“地狱猫”——要护卫出击的攻击机
群飞往日本舰队，还要在敌人机场上空执行扫荡任务——而来袭
的敌人机群却无穷无尽，前仆后继，而且十分危险。哪怕只有一
架敌机溜过战斗机的拦截，它都有可能幸运地给某艘航母来上一
下子，而美军舰队距离任何己方港口都很遥远。“这一天，敌机
一大早就来了，很晚才走。”谢尔曼的战时日志如此写道。^[31]

“埃塞克斯号”第15航空大队队长戴维·麦克坎贝尔正在准备为一支出击的攻击机群护航时，他的中队被命紧急起飞。麦克坎贝尔从待命室里冲出来，爬上他的F6F“地狱猫”，这架飞机此时正挂在弹射器上加油。当油管被摘下来时，他的油箱刚刚加到一半，麦克坎贝尔就这样从甲板上弹射起飞了。他没有盘旋等候中队里其他人跟上来，而是直接机头向西开始爬升。另外7架F6F跟着他爬升到了1.4万英尺高度上，通过“行进间会合”逐步编成飞行队形。不久，他们就看到了自己的对手，一支由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群，总数大约有50架，在稍低的高度上迎头飞来。麦克坎贝尔用无线电喊出了“发现敌人”的呼号“TallyHo!”之后继续爬高，僚机飞行员罗伊·拉辛也跟着他一起爬升到1.8万英尺。他们准备向敌机发动俯冲攻击，但此时日机却转入了经典的防御机动：拉弗伯雷圈，各机首尾相接以环形航线飞行，每架飞机都可以掩护前方的友机。

麦克坎贝尔和拉辛耐心地等待着，在敌机的环形阵上方2000英尺处盘旋，“我们认为有些飞机容易飞出这个拉弗伯雷圈，那时我们就能动手了”。^[32]他们等了差不多一整个小时。两个人等着的时候甚至在座舱里抽起了烟。偶尔会有一架日本飞机不明智地离开队形或者想要爬高，“这样问题就简单了，找到一个空子，把它们打下来，然后把俯冲获得的速度重新转化为高度，再等下一个空子”。^[33]最后，当日军飞机转向西边脱离战场时，它们的环形队形解体了。“地狱猫”机群趁势掩杀过去，不断击落敌机。由于怕遗漏战果，麦克坎贝尔就拿铅笔在仪表盘上做记号：“我数到5就画个横线，就这样一直记下去。”^[34]当拉辛打完了子弹，麦克坎贝尔的燃油指针奔向0，他们便掉头返航了。麦克坎贝尔的仪表盘上被铅笔记了11笔。他刚刚降落在“埃塞克斯号”上时，发动机就熄火了，甲板人员不得不推着他的飞机停放

到拦阻网前方。

被问及这次出击怎么样时，麦克坎贝尔“几乎不好意思开口”。他确定自己击落了9架，最多可能是11架。根据他飞机上照相枪的记录，他的战绩被定为击落9架，从而创下了单次出击击落数量的纪录。那7名和他一同出击的“埃塞克斯号”“地狱猫”飞行员总共取得了击落24架的战绩。由于这次令人难忘的出击，麦克坎贝尔荣膺荣誉勋章。

但敌机还在不断飞来，一个上午没停过。马尼拉以北的机场网络（曾经属于美国）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航空兵基地的大量增援，简直成了航空兵的聚宝盆。日本人肯定不知道南边还有两支航母特混大队存在，因为这一天所有的攻击压力都落在了吕宋岛东边海岸外“泰德”谢尔曼将军的四艘航母身上——大型航母“埃塞克斯号”（他的旗舰）和“列克星敦号”，以及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和“兰利号”。谢尔曼担心日军可能最终会单纯凭借数量优势压垮他已经超负荷的防空战斗机群。

半晌午时，早晨原本晴朗的天气变成了短时大风和暴雨。海面上的低能见度成了捉摸不定的恶作剧者，对双方都是个不可控因素。在上午9点后不久那场混乱的空中搏斗之后，6架幸存的日军飞机屡次冲进低垂的云层，甩开美军防空战斗机。这些漏网之鱼逃不过雷达的监视，但F6F的飞行员们却无法向看不见的目标开火。入侵者就在附近，在特混舰队上方低空盘旋，其威胁无处不在。这是一场令人提心吊胆的飞行战争，运气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眷顾任意一方。舵手们操纵着舰艇开进每一片经过此地的暴雨区，这里可以像隐蔽飞机一样隐藏他们的军舰。只要一有敌机从云缝中出现，高射炮手们就会射出恐怖的密集炮火，落下的炮弹壳如同钢铁暴雨一般让大海沸腾起来。

上午9时49分，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的运气用尽了。它正转向迎风方向，准备回收飞机，这时一架D4Y“彗星”（盟军绰号“朱蒂”）俯冲轰炸机从头顶的云层中单枪匹马杀了下来，这架飞机已经进入高速俯冲状态，其航线已经完全对准了军舰中线。舰长威廉·H.布莱克立即下令向左急转，但来不及了。250千克炸弹如同导弹一般从1500英尺空中落下，正中军舰正中央。它击穿了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在二层甲板的面包房和相邻的洗衣间里爆炸，炸死了里面的人。[35]

布莱克一开始还满怀希望。“我并不太担心，”他说，“我想那是一枚小炸弹，我们很快就可以修复损伤。”[36]但是机库甲板后部的一处火灾点燃了从一架被毁的TBM“复仇者”机上漏出的汽油。救火队和损管队已经就位，舰长则操纵“普林斯顿号”转向，让风从左前方吹来，好把火焰控制在军舰后部。主消防水管很快失去了水压，救火队员无法在大火中保护这些水管。地狱般的烈火又吞没了机库甲板上的5架TBM“复仇者”，一架接着一架，它们的油箱被点燃了。上午10时10分，弹药库里的所有鱼雷被全部引爆。巨大的爆炸把前后两台升降机都炸出了升降机井，滚滚黑烟顿时从机库后部和飞行甲板上升腾起来。舰岛和飞行员待命室的通风扇里也开始喷出浓烟。不戴防毒面具和氧气瓶的人已经进不了机库了。数百名舰员挤上楼梯，爬到飞行甲板上，他们的脸和衣服都被烟熏得漆黑。他们纷纷赶到飞行甲板前端，接着来到左侧高炮走廊上，以躲避来自机库的高温、火焰和浓烟。

“普林斯顿号”开始侧面迎风，随波逐流，看上去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舰长下令，除了损管队以外所有人员撤离。它忠诚的护航舰——轻巡洋舰“伯明翰号”和驱逐舰“莫里森号”、“埃尔文号”——靠了上来，开始接运离舰人员。“伯明翰号”的消防龙头隔着军舰，以高抛物线把水和灭火泡沫喷向“普林斯顿号”的火灾

位置——“伯明翰号”的救火队也组织了几十名勇敢的志愿者登上“普林斯顿号”，加入拯救军舰的搏斗中。“埃尔文号”和“普林斯顿号”舰首对着舰首，开始直接从它的飞行甲板上接运人员。重伤员从一艘舰被抛掷到另一艘舰上等候着的双手中，这种抛掷需要视两舰甲板的起伏准确把握时机。其他人则顺着绳索滑到海中，再游到“莫里森号”和“埃尔文号”旁，通过吊绳网爬上去。然而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有几十人不幸溺亡。“莫里森号”的上层建筑还一度卡在了“普林斯顿号”侧舷伸出的烟囱中间，被困住无法脱身。“普林斯顿号”的一次油气爆炸把一辆飞机牵引车炸飞了出去——这辆车翻滚着撞到“莫里森号”的舰桥，之后落在这艘驱逐舰的艏楼甲板上。后来，舰长冷冷地表示他在海军生涯中从来没想到过竟会看到这种事。

布莱克仍然留在“普林斯顿号”的舰桥上，热得受不了时，他便来到旁边的露天走廊上。约翰·霍斯金斯和他在一起。霍斯金斯是作为布莱克的继任舰长来到舰上准备候任的。布莱克告诉霍斯金斯，自己有个严重的担忧。机库后部下方的弹药整备室里还有一车100磅航空炸弹，这个舱室此时正被烈火炙烤。炸弹会爆炸吗？此事无法确定，但是布莱克分析，如果炸弹会被烧炸，那它们在先前的爆炸中就已经炸过了。他仍然希望扑灭大火，拯救军舰。

正午到下午1点期间，情况看起来有所好转。火焰再次被逼退到军舰后部，几艘护航舰也在一直支援灭火。但是到了1点半，舰队开始时不时发现潜艇的声呐接触信号，空袭警报也响了起来，所有舰艇受命离开此地，机动规避。在此后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普林斯顿号”失去了护航舰的消防水龙支援。当友舰返回时，风速增加到了20节，大火已经重燃。“伯明翰号”靠泊到“普林斯顿号”的迎风一侧（左侧），用系泊缆绳把两舰固定到

一起。巡洋舰的消防水龙头再次开始扑救航母上的大火，“普林斯顿号”上躺着伤员的担架也被小心翼翼地运送过来。“伯明翰号”的甲板上此时挤满了人，有救火队员、操作水管的水兵、医护人员、高射炮手，以及指挥各项操作的军官。

这就是下午3时23分的情况。就在这时，“普林斯顿号”上整備完成的炸弹像布莱克担心的那样，爆炸了。根据战损报告记录，这场巨大的爆炸是由于“400枚100磅通用炸弹被大批同时引爆……炸掉了120号肋骨后部的整个舰尾及其上层建筑”。

[37]“普林斯顿号”的舰尾部分整个消失了。残骸和钢铁碎块，有些还很大，被炸飞到了高处又落了下来。尸体和残肢断臂像下雨般落到各个方向。“我看到了这次爆炸，还记得看见10具或者15具尸体飞到了空中。”驱逐舰“波特菲尔德号”上一名水兵约翰·希恩回忆道。有些碎块甚至飞过了驱逐舰“卡森·扬号”，落到了更远的海里。“我们想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幸存者，但找不到。我猜他们都被炸碎了。”[38]

后来在与《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一名记者谈及此事时，布莱克有些哽咽。“它既突然又恐怖，那爆炸，”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糟糕的声音，我没法向你描述。”[39]

碎片就像死神的镰刀一样横扫“伯明翰号”暴露的前甲板，其舰员死伤达229人。根据该舰战时日志记载：“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死者、垂死者和伤员铺满了甲板，许多人已经血肉模糊，令人恐惧。”一名幸存的军官回忆道：“鲜血顺着排水道流了出来。”许多舰员严重烧伤，看起来很难生还，甚至都不愿再活下去。有些人拒绝了医疗救治，要医护人员去救治其他存活概率更高的战友。一名士官对“伯明翰号”的副舰长说：“不要为我浪费吗啡了，指挥官，对我头上来一枪吧。”[40]

爆炸时，李·罗宾逊正在下甲板上，逃过一劫。之后整整两天，他不眠不休地救助受伤的战友。“说到这事我都忍不住想哭，”几十年后，他在一盘口述历史录音带中说，“这么多人一下就死了，鲜血都从甲板两边流了出去。我们不得不在甲板上撒上沙子，以免滑倒。”他和未受伤的战友们一连几天在舰上的洗衣房里为伤员洗出干净的绷带。罗宾逊回忆“伯明翰号”上的病房时说：“我们没人会独自去那儿。我们都是两人结伴，因为那里的景象太可怕了，到了那里我们就必然会看到。”[41]

炸弹库爆炸时，布莱克舰长和霍斯金斯正在“普林斯顿号”的飞行甲板上。布莱克在爆炸中只受了一些表皮伤，霍斯金斯的一条腿却被碎片击中，膝盖以下几乎全被炸飞了。他要布莱克去照顾其他伤员。当舰长几分钟后回来时，他发现霍斯金斯自己用刀切除了残余的碎肉，给自己截了肢，还自己做了包扎止血。布莱克意识到自己坚持拯救“普林斯顿号”的做法已经带来了可怕的代价，下令弃舰。下午4时40分，他最后一个滑下绳索离舰。

栗田被告知，他穿越菲律宾中部航道时可以期待空中掩护，但是他和他在长达三天的整场战役中总共只见过五六架日本飞机。他向菲律宾航空兵指挥官反复明语发电，却无人答复。福留将军在战后接受审讯时承认，他“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我认定，给栗田舰队最好的保护，是集中我所有的航空兵力进攻你们守在海峡外的特混舰队”。[42]

10月24日，中路舰队被美军舰载轰炸机和鱼雷机追打了一整个下午。舰员们一边用手头仅有的能对抗这种猛攻的武器——他们的高射炮——进行还击，一边在锡布延海中前进。他们知道随着与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攻击只会愈加猛烈。第38特混舰队

向栗田放出了259架次飞机，这些飞机来自至少7艘不同的航母：“勇猛号”、“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富兰克林号”、“企业号”、“圣贾辛托号”和“贝劳伍德号”。在这场“锡布延海海战”中，美军只损失了18架飞机，考虑到日舰射出的巨量高射炮火，这个损失实在不算大。

正午刚过，第二批攻击机就杀到了：来自“勇猛号”的大约100架挂着炸弹的F6F和挂载鱼雷的TBM。“复仇者”再次命中“武藏号”，将3枚（也可能是4枚）鱼雷打进它的左侧；与此同时，充当俯冲轰炸机的“地狱猫”也命中这艘舰两枚炸弹。一枚炸弹打哑了1号主炮塔，另一枚炸弹钻进它左边外侧轮机舱，摧毁了锅炉管道并迫使舰上一台锅炉熄火。失去了四个螺旋桨中的一个，再加上左舷防雷突出部被炸开一个口子，“武藏号”的航速已无法再超过22节。以这个速度行驶时，其左侧的舰首浪大得有些不自然，这是其水线下方的鱼雷损伤导致的。栗田把舰队其余各舰的速度也降了下来，好让受伤的超级战舰能够留在编队里，但是较慢的速度却令其在俯冲轰炸机尤其是鱼雷轰炸机面前更易遭到攻击。

第三轮空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来自“埃塞克斯号”和“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再次攻击了“武藏号”，将两枚炸弹扔在3号主炮塔附近，并又将4枚鱼雷射进其右舷。炸弹大量杀伤了舰上的高射炮手和其他暴露在外的人员，鱼雷则切断了一条关键的电缆，并导致轮机舱大范围进水。爆炸的冲击令这艘巨舰从头到尾猛烈摇晃起来：水兵们摔倒在地，倾泻而下的海水把死者和伤员沿着排水口冲到了海里。在下甲板上，医务室挤满了严重出血和烧伤的人，于是担架只能被放在相邻走廊的舱壁旁。问题是，炸弹的爆炸令舰体的这一部分充满了有毒气体，医务人员和伤员还必须紧急疏散。由于人员死伤，军舰关键部位进水，以及接连不断的

空袭，损管队竭尽全力却已力不从心。当舰上装有液压泵的舱室被海水淹没或者被炸弹毁伤后，军舰就变得越来越难保持平衡了。当“列克星敦号”和“埃塞克斯号”的飞机在下午1时50分消失在东方海平线上时，“武藏号”已经显著左倾，吃水也比空袭到来之前深了13英尺。它舰体内灌满了海水，无法再跟上中路舰队其余各舰，于是掉了队，只有一艘重巡洋舰“利根号”留下来护卫它。

下午2时55分，当最后一批攻击机接近中路舰队时，“企业号”和“富兰克林号”上的飞行人员看见“武藏号”拖着长长的油污，航速只剩下大约8节。攻击机在安全的高空兜着圈子，就连战列舰18英寸主炮蜂窝霰弹型的三式对空弹也够不着它们。鱼雷机飞行员耐心地等待着，计划着他们的攻击：他们将要全部瞄准军舰的左舷，也就是它倾斜的方向。

“武藏号”脱离了其余友舰（只有“利根号”伴随左右），灌满海水，蹒跚跛行，舰首下沉，这艘巨型战列舰已经成了人常说的“活靶子”。幸存的舰员们额头上扎着膏药旗，仍在拼命死战。他们在战死或者垂死战友的身旁继续操纵着残余的高射炮。18.1英寸主炮用三式弹在天空中打满了五颜六色的爆炸烟团。美军机组人员能感受到这些巨型武器爆炸时的冲击波。“即便距离很远，我也能感觉到它们每次射击时的炮口爆风。我发誓每次这些巨大的冲击波撞到我们时，我的机翼都简直要被折断。”^[43]第13鱼雷机中队的一名“复仇者”飞行员杰克·劳顿如此回忆道。这些高射炮弹都染上了各种鲜亮的颜色，以帮助日本炮手观察弹着点和纠正瞄准点。齐射弹幕的爆炸摇晃着他们的飞机，飞行员们却有了一种在天上花园中穿行的神奇感觉。“有些爆炸是蓝色的，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粉红色的，还有一些是黄色的。”劳顿说。第13鱼雷机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鲍勃·弗雷利则想起了“我

老家密歇根州阿德里安市莱纳维县广场七月四日庆典上的景象和声响”。[44]

鱼雷机飞行员开足马力，下滑到浪尖高度，节流阀一推到底，空速指针都指到了仪表盘上的红色危险区。面对高射炮时最好的自卫手段就是速度。劳顿感觉他的飞机“随着每一发炮弹的每一次冲击而摇晃和抖动。”红色的曳光弹向着他的风挡玻璃迎面扑来。他驾驶着他的格鲁曼飞机左躲右闪，以规避其航线上掀起的水柱，因为“撞上这些水柱无异于撞山”。[45]日舰的主副炮一齐向TBM机群航线上的海面开火，掀起200英尺高的彩色水柱。日军从太平洋战争之初便采用了这种打法——在低飞鱼雷机的航路上打出弹着水柱，以图将飞机击落或者至少迫使其偏离攻击航线。在600码距离上投雷后，劳顿一个急转弯，从“武藏号”的舰首前脱身而去。弗雷利也投下了鱼雷，但是“当进行规避机动以脱离这艘军舰的炮火时，一枚曳光弹打中了我的油管。燃油喷满了我的风挡”。弗雷利驾机在附近的岛屿旁迫降，和两名机组成员一起上了岸。他们被友方菲律宾人接了回去，几个星期后获救。[46]

“武藏号”行动愈加迟缓，最后瘫痪在了海面上，成了一个死靶子。TBM机群至少命中它7枚鱼雷，全部打在脆弱的左舷上。与此同时，SB2C和“地狱猫”机群协调一致的俯冲攻击也上场了，它们在军舰上投下了穿甲炸弹，从头炸到尾。一枚500磅炸弹击中了军舰的上层建筑，摧毁了舰桥，另一枚炸弹命中塔楼下方，燃起大火。这些打击杀死了舰上的许多高级军官。舰长猪口敏平少将右肩受伤，但仍能行走。他和副舰长一起在下层的指挥舰桥里建起了新的指挥所，但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来拯救军舰。它已经通体燃起大火，左倾愈加严重，海浪也已涌上了舰首。至少有一枚鱼雷（也可能有两枚）穿过先前的攻击在外层保

护船壳上留下的破洞，在内层船壳上爆炸，致使4号轮机舱被海水淹没。根据副舰长的说法：“上层接连不断的炸弹破坏令我们无暇顾及排水，因此已不可能阻止进水。”[\[47\]](#)

中路舰队其余各舰已经开到了“武藏号”前方30英里处，即将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西口。栗田又发出了几封紧急电报请求空中掩护，或者请求空袭第38特混舰队，但他没有收到任何正面答复。[\[48\]](#)经历前一天早晨巴拉望水道的惨剧之后，他和参谋们都很担心在海峡咽喉处可能会再次遭潜艇伏击，受到重创。他们从文莱出发时有15艘驱逐舰可用作护航，但现在只剩下11艘。舰队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中佐预言，中路舰队在天黑之前还要再击退三次大规模空袭，他警告栗田，不要在难以机动规避的狭窄水域被美军抓到。天黑后再强行穿越海峡将会更安全一些。他提出他们可以临时向西退避。他预计，这有意的耽搁可以为友军争取更多时间去空袭美军航母。这还可以成为一种假动作，令敌人误以为中路舰队正在撤退。

显然，“大和号”舰桥上的许多人都赞同大谷的分析。他们一边咒骂不知所终的日本航空兵，一边挖苦司令部的那些人。一名后来采访了多名军官的日本记者讲述了“栗田舰队每个人的愤怒与苦恼……在舰队里的这些人看来，他们的军舰就是送去给敌人训练打靶的”。[\[49\]](#)当天下午，联合舰队通过无线电发来了一份警报。敌人潜艇可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没，因此：“要警惕。”这份电文又引得舰桥上一片嘘声，这真是“无理而气人”。[\[50\]](#)中路舰队已经被潜艇击沉了两艘巡洋舰，而且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都在对付敌人潜望镜的观察。难道司令部的那帮蠢货以为他们会不警惕吗？

下午3时30分，栗田下令舰队转向180°。又过了30分钟，他才将此告知司令部。理由是“敌机数量众多，反复来袭”。栗田如

此告诉丰田，他会暂停推进，好让陆基航空兵有时间去重击美军航母。“如果我们继续现有航向，就会遭到难以计数的损失，却无望胜利完成任务。”^[51]他说他向西撤退只是“暂时的，稍后将重返战场”。^[52]

舰队西撤一小时后，他们回到了能目视看见被击伤的“武藏号”的地方。日军原本预计还要遭到几轮猛烈空袭，因此没有敌机来袭，让他们感到很惊喜。一架侦察机在舰队上空高处盘旋观察，舰队的西撤显然已被发现，但是下午4时20分之后便再没有敌机出现了。

下午5时15分，在没有收到丰田对他上一封电报的回电的情况下，栗田做出了决定。他的使命还在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另一边。“好吧，”他简洁地说，“我们回去。”^[53]他的命令显然令参谋部中的一部分人感到意外和错愕。但命令已下。“大和号”和编队中的护航舰进行了两次直角转弯，航向恢复向东。他们现在已经比计划中的时间落后了六七个小时，这意味着日军无法向莱特湾里两栖舰队发动协调一致的“钳形攻击”，除非西村的南路舰队同样延误。

拥堵的无线电通信导致了联合舰队总部回电的延误。（这个问题在美军一侧同样严重。）最终在晚上7时15分，栗田收到了丰田的消息。这是一条不容辩解的指令，带着半宗教的腔调，这条第372号作战命令的原文是：“天佑我军，全军突击。”^[54]这条命令还有一个言外之意，只有日本人才能读懂。这条命令是联合舰队参谋长高田利种起草，交给丰田大将签名发出的。高田后来告诉美国审讯人员，这条命令有一层所有日本军官都懂的含义，就是“撤退也不能控制或减轻损害，因此即便舰队全灭也要前进。我发出这条命令时就是这种感觉；因此我敢说，第二舰队没有因可能遭受的损失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55]

栗田接到的命令是毁灭他自己和他的舰队，同时争取给美军舰队一定打击作为回敬。日本海军力量能否幸存完全不应该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例如，他不应该去考虑他的驱逐舰会不会耗尽燃油而在美军的反击面前无法自保。他率领的是海军的“万岁冲锋”，目的是让帝国海军虽败犹荣。

这一声惊雷传到时，栗田已经掉头开往海峡超过一个小时了。根据伊藤正德的回忆，这份命令在“大和号”的舰桥上受到“一片嘲笑”。栗田的参谋们嘲笑那些高级将领的妄自尊大，他们远远躲在家里安全的地下掩体中，发出这种“无视敌人攻击”的命令。从这些讲述上看，当时舰桥上的普遍反应是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想造反。一名军官回忆道：“让我们去打仗。就是神也无法在岸上指挥海战。”另一个人将丰田的命令解释为：“我军必死，全军突击！”[56]

向东回航后，中路舰队从冒着烟、倾斜着且正在下沉的“武藏号”残骸南面几英里处经过。作为世界上装甲最厚重的两艘军舰之一，它能够承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它确实承受了——超过20枚炸弹命中上部，大约19枚或20枚鱼雷命中水线以下，其中15枚打在左舷。历史上从没有哪艘战舰遭受过这种打击还能幸存下来。在“大和号”的舰桥上，双筒望远镜把这幅场面拉到了宇垣将军的眼前——这艘7.2万吨的巨舰向左严重倾斜，塔楼式的上层建筑被炸弹炸毁、熏黑，一股黑烟升腾到数千英尺高的空中。它修长优雅的舰首被水淹没，前主炮前方的露天甲板都没入了水中，海水拍打着舰首的金色菊花纹章。此时已经夕阳西下，斜照过来的阳光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拖出长长的阴影，令这一幕景象更显悲凉。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武藏号”“凄惨的处境目不忍睹”。

[57]

“武藏号”的命运对“大和号”来说是个不祥之兆。这两艘姊妹

舰用同一套方案建造，都号称永不沉没。日本为了它们的设计和建造倾注了巨量的资金、人力、原材料，以及工程专业资源。海军省的一名军官曾做过评估，这两艘超级战列舰耗用的成本，足够日本海军制造2 000架最先进的战斗机，并训练出最顶尖的飞行员来驾驶它们。^[58]此外，这个项目还需要对用来建造两艘巨舰的长崎（“武藏号”）和吴港（“大和号”）的两座船坞进行大规模扩建。舰上的2 700名舰员也都是精英，他们从舰长到最基层的水兵，都是从日本海军各个军衔层级中表现最优异的人中精选出来的。它们是舰队中的孪生王者，其象征意义远比作为一种武器的实际价值更重要。这两艘舰都被用作联合舰队总司令的旗舰，宇垣缠就曾先后在两艘舰上给已故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做过参谋长。凭他的专业眼光，宇垣不用听完整的汇报就知道“武藏号”的右舷几乎所有能用来“放水”的舱室都已经放满水，这样也就没什么办法能纠正它的倾斜了。他仔细查看着垂死的“武藏号”，情况很明显——如果那艘舰会沉，那么他脚下的这艘也是一样。

宇垣通过灯光信号发出了命令：如果无望开到科隆湾，猪口将军应当努力开到附近的任意港口。如果还做不到，就应该让军舰在最近的岛屿冲滩搁浅。实际上宇垣并不真的指望“武藏号”能幸存。他在日记里写道，它已“为了‘大和号’牺牲了自己”。他还说自己预计“大和号”将来有一天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因此我最终下定决心，要毫无保留地和我的军舰共存亡，我决定让‘大和号’成为我的葬身之地。”^[59]

“武藏号”的左倾愈加严重，人们不得不扶住舱壁才站得住。在舰桥上，猪口告诉他的副舰长加藤宪吉大佐，他决意与舰共存亡。他给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将军写了一张便条，说自己寄如此厚望于大舰巨炮的威力是错误的，还承认了海军航空兵的优势地

位。他把便条交给加藤，并命令这位更年轻的军官去逃生。接下来便是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的一幕：天皇“御影”被从礼堂里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小艇上。那面20英尺长，10英尺宽的巨大的旭日旗，伴着一名号手吹出的日本国歌《君之代》被从旗杆上降下，收了起来。

与此同时，其他舰员还在疯狂地想要阻止军舰愈加严重的倾斜。所有能动的东西都被拖到了军舰右侧，甚至包括伤员和尸体。但他们的努力全部都是徒劳。晚上7点半，“武藏号”的倾斜角超过了 30° ，超过了它维持平衡的极限，巨舰轰然翻倒。当军舰倒扣过来时，有几十个人翻过右舷栏杆爬到了军舰长满藤壶的船底和龙骨上。还有些人掉进了第38特混舰队的鱼雷在这天早些时候炸开的大洞里。“武藏号”的舰首沉入了水下，舰尾则抬离了水面，海水如瀑布般从四个巨大的螺旋桨上流了下来。军舰下沉时水兵们纷纷逃了出来，他们攀爬在栏杆和甲板的物件上，有些人在主甲板倾斜到近乎垂直时掉了下去，还有些人跳过舰尾栏杆，掉在螺旋桨上，被弹到了一旁。当海水最终快要淹没舰尾时，一个巨大的旋涡将周围的碎片和水里的人都卷了进去。那些穿着救生衣的人还能再次浮出海面，但许多人刚刚喘过一口气就被这无法抗拒的吸力再次拖了进去，之后再次浮出来——如此往复，仿佛是死去战友的鬼魂抓住了他们的脚踝。游得离沉没的巨舰越远，生还的机会越大。有不少人最后活了下来，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但许多其他人却丢掉了性命，和他们心爱的“武藏号”一起堕入深渊，沉入锡布延海3 000英尺深的海底。

指挥舱占据了“新泽西号”上层建筑中的整整一层甲板，那里拥挤、繁忙，而且吵闹。空气中弥漫着烟味。空中飞行员们的无线电语音通话都会通过大喇叭直接传到屋里。来自诸多不同来源

的新的数据不断流入第3舰队这一拥挤的指挥中枢里。“阴谋诡计部”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一切。

情况时时都在变化而且极其复杂。两支独立的敌特混舰队正在菲律宾中部的岛屿屏障中穿行，其各自的目标显然是苏里高海峡和圣贝纳迪诺海峡。这种分进合击是日军的常用战术，哈尔西在1942年的几次海战中就见识过。不需要多强的分析能力就能看出，敌人意图强行穿越这两个海峡，向莱特湾里的两栖舰队发动钳形攻击。

这天下午对日军中路舰队的最后一轮大规模空袭结束后，飞行员们带回了过于乐观的报告。返航的飞行员们相信自己已经摧毁了两艘“大和级”战列舰，以及两艘小一些的“长门级”或者“金刚级”战列舰，他们还声称自己的鱼雷和炸弹消灭了两三艘重巡洋舰。不仅如此，侦察机还发现日军中路舰队残部正在向西航行。或许他们已经放弃作战，逃离以自保。无论如何，哈尔西都认为栗田幸存的军舰已遭彻底打击，“不再对金凯德构成严重威胁了”。[60]即便这支中路舰队设法通过了海峡，“它的战斗力也已遭到重创，无法决胜”。[61]

各方面的零散情报都显示，日军正倾尽全力，前来迎战美军对莱特岛的进攻。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他们的航空母舰呢？华盛顿和珍珠港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至少在10月中旬时小泽的航母部队还在日本海域。在过去的两天里，据破译的绝密无线电情报推测，小泽已经驶离日本，此时正在吕宋岛以北的菲律宾海某处。可以判断，他正从北面开过来，他的到达时机将与敌另两路特混舰队协调一致。哈尔西和关键幕僚们开始警惕起来，小泽很可能在舰队和吕宋岛机场群之间实施“穿梭轰炸”战术。因此他们决心要在日军航母加入战斗之前找到它们并展开空袭。

这天一大早，哈尔西就命令米彻尔向北放出加强兵力的空中搜索。但无线电频道上如此拥挤，这道指示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送到“列克星敦号”的指挥舰桥上。而此时，第38特混舰队正忙于应对来自吕宋岛的一轮轮空袭。因此，侦察机直到下午2时5分才起飞升空，两个小时后，仍未找到小泽。

当侦察机还在天上飞的时候，下午3时12分，哈尔西发布了一条内部命令，这条命令注定要在第二天的战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条命令的分类是“作战计划”，内容是此时在各航母大队中担任护航舰的6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将组成第34特混舰队，由战列舰队司令李中将指挥”。[62]这支舰队的目标将是“在远距离上与敌决战”。[63]这份电文的收件人是第3舰队司令的所有直接下级，并抄送给尼米兹和金。哈尔西打算把它作为“预备消息”，或者说是预警性命令，如果发生水面交战的概率增加，这道命令就将被执行。为了落实这一点，他后来又亲口通过舰船间无线电电话通知下属：“如果敌人[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击，我将命令第34特混舰队集合。”[64]

哈尔西后来坚称他的第一封电报不是发给他自己第3舰队以外的任何人的。但是既然美国海军所有指挥官都能监听到那份无线电报，而且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份密码，那么其他人看到这份电文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大家也常常这么干。第7舰队的通信组就把哈尔西的电文打印了出来，交给了“瓦萨奇号”上的金凯德将军。但哈尔西后来通过近距离无线电电话做的澄清却没有发给金凯德（也不可能发送给他），也没有发给尼米兹或者金。考虑到军事文件用语应有的准确性，“将组成”（will be formed）这种表述就十分模糊，尤其是在没有第二份消息做澄清的情况下。这个表述完全可以被解读为立刻行动，也就是说哈尔西在命令他的下级立刻组建新的特混舰队，准备参加计划中的战斗。他用表示

将来时态的“will”也可能仅仅是考虑到这些军舰分属于相距遥远的三个航母特混大队，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集结到李将军处。金凯德就是这么理解哈尔西的命令的，珍珠港和华盛顿也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下午4时40分，飞往北方的一架侦察机发来了消息。在吕宋岛东北海岸恩加诺角外190英里处发现一支大规模敌航母舰队：航速15节，航向210°。[\[65\]](#)那只可能是小泽，他要来了。考虑到时间已晚，美军此时的距离还不足以向小泽发动进攻。

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舱里，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研究海图，分析了形势。三支敌海军舰队正从三个不同方向朝莱特湾集中（或者是意图在此集中）。值得注意的是，或者说是哈尔西和他的团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支舰队都以“不慌不忙”的约15节航速开进，远低于其最佳巡航速度。第3舰队作战报告中对此写道：“这表明他们预先设定好了地点和时间。其动向意味着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协同计划正在实施。10月25日将是联合作战的最早日期。”[\[66\]](#)南路舰队正开往莱特南方的苏里高海峡，它相对较弱，可以安全地交给金凯德去对付。中路舰队遭到第38特混舰队航空大队一整天的凶猛打击，看起来正在撤退。而新发现的北路舰队是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敌特混舰队。它是生力军，毫发无损，攻击力完整。小泽可能意图对美军舰队做穿梭轰炸，就是说他的轰炸机将在拂晓时空袭第38特混舰队，之后飞往吕宋加油装弹，继而再次发动空袭，随后返回航母。

在空战中获胜，这对哈尔西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美军舰载航空兵已经拥有了相当显著的优势——但他想要的是全歼北路舰队，先用多轮空袭将它打残，再用他的水面战舰结果它。为确保全灭敌人，他需要先缩短距离。和哈尔西最亲密的“努美阿帮”的几名军官建议全舰队北上，[\[67\]](#)这些人从瓜达

尔卡纳尔岛战役开始就一直在哈尔西手下干。于是哈尔西把他的手指放在海图上，指着报告中小泽舰队的位置，对卡尼说：“我们要去这里。米克，让他们向北。”^[68]

10月24日晚8时22分，“新泽西号”通过无线电命博根和戴维森加大马力，以25节航速跟随谢尔曼的第3大队一同北上。被大火吞没，被舰员放弃的“普林斯顿号”被命令击沉，其护航舰队中的一艘舰将齐射鱼雷执行这一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三支航母大队的所有舰艇都要北上，包括那些原本将要转入第34特混舰队，留下来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的快速战列舰和其他水面战舰。整个舰队，总共65艘舰艇，将要加入这场向北的冲刺。至于栗田那支被大大削弱的中路舰队，如果它真的重新集合起来穿过海峡，那就交给金凯德第7舰队的大炮和护航航母去对付吧。

哈尔西告诉金凯德，他正“带着三支大队向北航行，在拂晓时攻击敌航母舰队”。^[69]这份电文有太多东西没说清楚，而致命的误解恰好出现在它没有说明的地方。哈尔西完全没有提到第34特混舰队的事。他也没有告诉他的战友，第四支航母特混大队此前已被派往东边，距离太远，无法提供直接支援。金凯德没有想到一个致命的事实：第3舰队没有任何一部分被留下来守卫（哪怕只是监视）圣贝纳迪诺海峡。

下达了命令之后，哈尔西回到他的舱室，躺到了床上。他累坏了，过去的48小时里他都没睡。他需要合一会儿眼，现在恰好有空。

此时，在哈尔西的情报部门和整个第3舰队的各个指挥舰桥上，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哈尔西的舰队相当强大，他一艘舰也不留下来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决定看起来很奇怪，甚至令人费解。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当哈尔西选择的作战计划开始付诸行动时，新的侦察报告动摇了“栗田舰队已撤退”的前提。博根将军第2特混大队中的轻型航母“独立号”配有一支夜航中队。他们向圣贝纳迪诺海峡的西口派出了几架夜间侦察机。他们发回的有些报告显得混乱而彼此矛盾，但是汇总在一起则指向一个结论：日军中路舰队正在高速东进。6时35分，敌舰纵队被发现位于先前位置以北约6英里处，航向似乎为东北方。“独立号”的另一架飞机报称敌舰队位于布里亚斯岛附近，比前一次被发现的位置向东北移动了25英里。之后又收到一份报告，日舰位于布里亚斯岛和马斯巴特群岛之间，这意味着栗田已经转向东，以24节速度全速前进。如果栗田以这个速度航行，他舰队的状况一定比先前预计的更好。最后，消息传来，标示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亮了。

博根将军打开了无线电步话机直接找到“独立号”舰长，后者告诉他，日军舰队正在向东北方高速航行。他们很快就会到达圣贝纳迪诺海峡西侧入口，那里的导航灯已经亮了起来。博根随后直接联系上了“新泽西号”，和他通话的是指挥舱里一位不知名的军官。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出来后，博根提议让第34特混舰队和1支航母大队（他自己的）留下来负责守卫海峡。然而那个人用“相当不耐烦的语气”打断了他，说：“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70]

博根说，后来“我觉得哈尔西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71]他对于李的战列舰没能和栗田的战列舰碰上面感到遗憾，他相信这场战斗美军将会手到擒来。“这将意味着日本海军力量就在那里终结，彻底终结，”博根总结道，“这真是太郁闷了。”^[72]

李将军也是这么想的。他试图联系“新泽西号”，先是用灯光信号，接着又用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系统。他询问第3舰队司令是否留意到最新的侦察报告，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收到。”^[73]和

博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能做的到此为止了。

第4大队司令拉尔夫·戴维森对他的参谋长詹姆斯·拉塞尔说：“吉姆，我们正在给莱特湾里的那些运输船玩一个要命的阴谋诡计。”拉塞尔同意他的说法，问戴维森是否要联系米彻尔将军，提出不同的作战路线。戴维森拒绝了，他说：“他的信息肯定比我们多。”^[74]

在“列克星敦号”上，第38特混舰队的幕僚们询问哈尔西是否已经直接接手航母的战术指挥，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自从8月以来，米彻尔将军已越来越适应这种冷板凳了。他明显很累了，精神和体力皆然，自从1944年开年以来他就一直在海上作战；此时，哈尔西那一伙人无论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了。米彻尔此时已经上床了，他的参谋长阿利·伯克把脑袋伸进了将军的住舱里。他想要用无线电联系“新泽西号”，警告他们北路舰队只是个诱饵。“我想你是对的，”米彻尔答道，“但我并不确定。我想我们不该打扰哈尔西将军。他够忙的了。他脑子里面事情太多了。”^[75]

不久后，伯克又拉着第38特混舰队作战参谋吉姆·弗拉特利一起回来了。他们摇醒了米彻尔，告诉他新的发现，也就是圣贝纳迪诺海峡中的导航灯亮起的消息。米彻尔问道：“哈尔西收到那报告了吗？”弗拉特利承认他收到了。米彻尔说，这样的话就犯不着去揣测舰队老大的意思了：“如果他需要我的建议，他会来问的。”

第3舰队情报部门的几位军官相信北面的航母舰队是个诱饵，并且担心哈尔西会一口吞下它。北上的决定在做出之前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舰队情报官迈克·奇克“愤怒地”和道格·莫尔顿争辩了起来，后者是舰队的航空作战参谋，是哈尔西核心圈子

里的老人。奇克少见地扯开了嗓门，说他知道栗田正在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但莫尔顿不为所动。

奇克败下阵来，不过他的两名下级劝他把他的方案沿指挥链提交给“米克”卡尼。卡尼说如果奇克想要喊醒哈尔西，去提交他的方案，他（卡尼自己）不会阻拦。但是，卡尼说，他怀疑哈尔西不会被奇克的分析说动，他还补充说，哈尔西“在过去48小时里都没怎么睡了”。^[76]奇克自然不会去喊醒将军，事情就这样了。

哈尔西和他的核心圈子已经决定不再重蹈斯普鲁恩斯在当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中的覆辙，他们相信斯普鲁恩斯当时犯了错误，拒绝让第38特混舰队（当时叫第58特混舰队）向西追击小泽。换言之，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日本航母赶尽杀绝，彻底消灭，他们愿意押上大赌注来实现那个目标。根据“米克”卡尼在战争结束20年后接受采访时的说法：

哈尔西和莫尔顿尤其强烈地拥护一个观点，而且早先就已表达过这个观点：如果日军舰队失去了他们的战术航空力量，那么无论他们未来如何计划，这支舰队都永远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确信他们已无法再为其补充力量了。

如此讨论之后，当晚我们在哈尔西的旗舰上下定了决心，首要目标将是敌航母航空兵。实际上——好吧，我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执念。^[77]

摧毁日军航母是哈尔西的“执念”。这个判断来自与他长期共事而且忠诚于他的参谋长，“阴谋诡计部”的大管家，后来爬到海军顶层（海军作战部长，1953—1954）的人。卡尼的坦白无论对哈尔西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当年犯错的铁证，但这也有助于我们

理解当晚第3舰队的战术决策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哈尔西和他的团队看起来已经感受到了长期身心俱疲的影响。指挥舱里的许多人刚从最近一轮流感中康复。在此前六个星期几乎毫无停顿的航母作战中，他们根本都没有休息过。

但疲劳和感冒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自从哈尔西在8月从斯普鲁恩斯手里接过舰队指挥权以来，他们的基本操作流程出现了一系列混乱、草率和冲动的行为。第3舰队司令部比第5舰队司令部大得多，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效率也低得多。新的各个部门并不能如斯普鲁恩斯的司令部那样拿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他们更喜欢靠频繁向舰队发通知来打仗。但通信常常延误，消息模棱两可，或者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航母特混大队指挥官常常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位新舰队司令毛手毛脚的习惯就连珍珠港也很头疼。尼米兹常常训斥哈尔西越权，或者未能准时、明确地发出报告。在10月上旬发生一次这样的错误时，哈尔西乞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原谅：“我为我的糊涂深感抱歉。我向你保证我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执行很差。”^[78]

哈尔西习惯于依赖那些从南太平洋司令部就一直跟着他的军官，这些人他都很熟，即便他们都没有最近的航母作战经验。根据航母将领、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拉福德将军的说法，哈尔西“要么被关于航母航空作战的馊主意所拖累，要么固执己见，后者可能更糟”。^[79]舰队中常常有与此相似的观点，即便在哈尔西海军生涯中最具争议的阶段到来之前也是如此。米彻尔的幕僚克拉克·雷诺兹评价哈尔西并没有如同斯普鲁恩斯那样“获得专业方面的诚挚尊敬”，尽管他作为一名领袖获得了“真心爱戴”。^[80]罗兰·斯穆特说他就是个“彻底、十足的笨蛋……但如果他说‘我们一起下地狱去吧’，你还是会跟他一起去”。^[81]

在南方300英里以外的莱特湾中，第7舰队正在准备迎战和打退即将穿越苏里高海峡杀过来的西村的南路舰队。金凯德向炮击和火力支援大队司令奥尔登多夫将军发电：“敌人今夜可到达莱特湾。做好夜战的万全之备。”^[82]

奥尔登多夫的舰队包含了美国海军的大部分老式战列舰以及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包括5艘曾在日军袭击珍珠港时被击伤的战列舰。这5艘幸存老舰中的2艘，“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曾经挨过日本的航空鱼雷，沉入了港口的海底。经过拼命抢救，它们浮起来并完成了修复。在珍珠港的船坞里，它们从头到脚都进行了重建，装备了最新型的火炮、火力控制和雷达系统。就连舰员都是新的：尤其是“西弗吉尼亚号”，全靠训练有素的新兵操纵，其大部分人在6月上舰之前都没有出过海。根据这艘舰的作战报告：“只有12名水兵此前有过出海经验。两名炮塔军官此前从未出过海，三号炮塔军官来自潜艇部队，四号来自小艇部队。然而，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这些人通过了严格的试航期，以一个战斗整体的面貌加入了舰队。”^[83]

奥尔登多夫将这些复活的战列舰在苏里高海峡北口处排成一路纵队。在其侧翼，南方2英里处，巡洋舰分队将沿对角线航行，这样就在敌舰的预期行进路线上构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重炮阵。这是直接而且传统的战术安排，用的是传承了几个世纪的“战列线”海战理念。奥尔登多夫把他的驱逐舰布置在南方更远处的海峡内，命令它们紧靠海岸；它们将隐蔽在帕纳翁岛和迪纳加特岛沿岸高山和峭壁构成的雷达阴影区中。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向冲进海峡的日军南路舰队发起鱼雷攻击。

奥尔登多夫还用上了第7舰队的全部45艘PT鱼雷艇。他将这

些小艇部署在海峡南部和入口西侧。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早期警戒哨。用无线电发出敌情报告后，它们就将自由行动，争取进行鱼雷攻击。[84]

奥尔登多夫舰队的“钢铁总重”比西村多几倍，看起来完胜对手绰绰有余。日军南路舰队在苏里高海峡中将遭遇一场漫长、致命的夜间鱼雷痛击。如果能闯到海峡尽头，日军战舰还将面对6艘战列舰和8艘巡洋舰的密集舰炮火力。奥尔登多夫的大舰将沿东西轴线列阵，而西村的纵队必须向北接敌。这意味着盟军舰队将有机会抢占日本舰队的“T字横头”位——这样，它们就能用全部侧舷火力轰击敌舰，而敌舰只能用前部炮塔还击。这是一种古老而备受尊崇的战术理念，可以追溯到大炮第一次装到战舰上时。这样，作战的布局令奥尔登多夫原本已是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更加如虎添翼。

美军知道自己手中的牌比对手大，对胜利胸有成竹。但是美军对来袭日军舰队的组成仍有些不确定，奥尔登多夫战舰装载的炮弹种类也让人略有担心。空中侦察报告对日军纵队中战列舰的数量并未达成一致：有些报告说有两艘，但至少有一名飞行员说他看到了四艘。即便是四艘，美军也还是握有优势，只不过没那么大而已。登陆莱特岛之前，火力支援大队装载的大部分炮弹都是适合岸轰的高爆弹，因此他们储备的穿甲弹数量相对有限。只要战斗别拖得太久，这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奥尔登多夫并不想试运气。为了节约穿甲弹，他要求各战列舰在敌人进入1.7万英尺到2万英尺之间的中等距离前不要开火，“在这样的距离上，他们的命中率和打击威力都会很高”。[85]

在做最后的准备时，金凯德将军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一次微妙的协商。通常情况下奥尔登多夫的战斗群里包括了巡洋舰“纳什维尔号”。但是“纳什维尔号”从荷兰迪亚启程时就一直搭载着麦

克阿瑟将军，此时仍然是他的指挥舰。自从登陆以来，他每天都要上岸一回，但晚上都要回到舰上。现在，岸上的情况已经好到足够让麦克阿瑟把他的司令部迁移到莱特岛上了；实际上他原本已经计划第二天就来落实此事。金凯德希望把“纳什维尔号”派到苏里高去，舰上的官兵当然也热切地想要参战。但麦克阿瑟还在舰上，他也想去参加这场大冒险。他对金凯德说：“无论怎么说我都应该出席这样一场关键战斗。不仅如此，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大规模海战，我很想看一次。”^[86]可是金凯德实在找不到理由让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冒险参加海战。他向麦克阿瑟提供了另一艘不参战的军舰作为指挥舰，之后又请他到自己的指挥舰“瓦萨奇号”上来。在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两份邀请之后，金凯德干脆把“纳什维尔号”从作战序列中抽了出来，扔到塔克洛班锚地了事。

日落前，奥尔登多夫的军舰到达了阵位。战列舰和巡洋舰弹出了水上飞机，要它们去莱特岛的机场降落，以清空其炮塔的射界。战列舰在下午6时30分编成纵队。一个小时后，舰队做好了战斗准备，进入“一级戒备状态”。^[87]

在莱特湾，所有的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心跳都朝向了南方，朝向即将打响的苏里高海峡之战。第7舰队中无人发觉哈尔西已经把他庞大的舰队悉数带到了北方，而让圣贝纳迪诺海峡大门洞开，就连一艘负责警戒的驱逐哨舰都没有。准备在南边伏击西村之时，金凯德也即将遭到来自北面的突袭，直到天亮几分钟后栗田的巨炮开火，他才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

^[1] Edward J.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and notes, p.5.

^[2] Thomas C.Kinkaid, oral history, p.301.

[3]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acArthur, Nimitz,” October 3, 1944, #2255,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78.

[4] “MacArthur to COM3RDFLT,” October 21, 1944, #2240,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89.

[5] Carney, oral history, pp.396—97.

[6]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20.

[7] Log of Captain Ray Tarbuck, U.S.Navy, entry for October 19, 1944, 0958, quoted in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245.

[8] Entry for 1400; Third Amphibious Force War Diary, October 20, 1944, p.6,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177.

[9] Dickinson, “MacArthur Fulfills Pledge to Return,” in Stenbuck, ed., *Typewriter Battalion. Dramatic Frontline Dispatches from World War II*, p.239.

[10] Romulo, *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 p.90.

[11] Ibid., p.91.

[12] Ibid., p.92.

[13] Boquet,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p.100.

[1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15] 日本参战序列中各部队的名称比较混乱。栗田的原第二舰队现在被命名为第一游击部队，又进一步分为A分遣队（栗田）和C分遣队（西村），但有一些日方资料也分别称其为第一和第二佯攻部队。小泽的航母舰队原本是第一机动部队，现在日本人称其为“本队”。志摩的舰队被命名为第二游击部队，但其原先被称为第五舰队，有些资料就采用了他们先前的称呼。本书根据大部分西方史料的习惯，将分别称之为南路舰队（西村），中路舰队（栗田），和北路舰队（小泽），有些时候会仅以指挥官的名字指代。志摩的10艘舰将简称为“志摩舰队”。——作者注

[16]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ao Kurita.

[17] USS *Darter* (SS—227) War Patrol Report No.4, November 5, 194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18] “Running Estimate” entry dated October 22,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06.

[19]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77.

[20] USS *Darter* (SS—227) War Patrol Report No.4, November 5, 194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1] Thomas, *Sea of Thunder*, p.190.

[22] USS *Dace* (SS—247) War Patrol Report No.5,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p.3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3] USS *Dace* (SS—247) War Patrol Report No.5,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p.37,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3,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87.

[25]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99.

[26]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68.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11.

[28]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159.

[29] Astor, *Wings of Gold*, p.361.

[30]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05.

[31] TG 38.3 War Diary, October 24, 1944.

[32]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33] Woodward,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p.52.

[34]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35] War Damage Report No.62, U.S.S.*Princeton* (CVL—23), Loss in Action Of Luzon, 24 October 1944,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

[36] Peggy Hull Deuell, “Death of Carriers Describ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One, p.549.

[37] War Damage Report No.62, U.S.S.*Princeton* (CVL—23), Loss in Action

Of Luzon, 24 October 1944,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

[38] John Sheehan, oral history, in Petty, ed.,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08.

[39] Peggy Hull Deuell, "Death of Carriers Describ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550.

[40] Excerpts from Birmingham war diary,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181.

[41] Lee Robinson, oral history, in Petty, ed.,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239.

[4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IJN.

[43] Jack Lawton, oral history, in Springer, *Inferno*, p.134.

[44] Robert Freligh, email to author, February 11, 2018.

[45] Jack Lawton, oral history, in Springer, *Inferno*, p.134.

[46] Robert Freligh, email to author, February 11, 2018.

[4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83, USSBS No.407, Captain Kenkichi Kato, IJN (Executive Officer, Musashi, when sunk at Leyte Gulf).

[4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49]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6. 宇垣赞成向西转向，并在日记中写道：“我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在傍晚前折回一次，以欺骗敌人，这会对明天的战斗更有利。”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0.

[50]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8.

[51] Ibid.

[5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53]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23.

[54] Haruo Tohmatsu, email to H.P.Willmott, December 3, 2003, quoted in Willmott,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p.132.

[5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attached successively to the Staf of the Third Fleet, the Combined Fleet, and the Naval General Staf.

[56]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11.

[57]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0.

[5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06.

[59]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1.

[60] Com 3rd Fleet to CINCPAC, 26 October 1944 (251317);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4, “CINCPOA Dispatches, October 1944.”

[61]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62] “大下巴”威利斯·李是老资格的战列舰分队司令，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好几年了。李曾经指挥美军舰队进行瓜岛海战第二阶段（1942年11月14日至15日）的战斗，这是太平洋战争截至此时唯一的一次战列舰舰炮对决。——作者注

[63] “COM3RDFLEET to ALL TFC’S 3RD FLEET, ALL TGC’S OF TF 38 Info COMINCH, CINCPAC,” Oct 24, 1944, 0612;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2.

[64]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14.

[65]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66]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67] 当时的目击证人索尔伯格指出的在场者有道格·莫尔顿、哈罗德·史塔生和“罗洛”威尔逊，见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17.

[68]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26.

[69] COM3RDFLT to CTF 77, etc.(24112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3.

[70] 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09.

[71] Ibid.

[72] Ibid., p.113.

[73] 根据李将军一位参谋在1950年3月6日写给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信, 见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195n34。

[74] Cutler,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p.208.

[75] Prados, *Storm Over Leyte*, p.224.

[76]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31.

[77]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07.

[78]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6, 1944, LCMD, Halsey Papers, Box 15.

[79]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40.

[80]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258.

[81] Roland Smoot, oral history, quoted in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347.

[82] Commander Task Force 77 to COMINCH, "Preliminary Action Report of Engagements in Leyte Gulf and Off Samar Island on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02335, November 18, 1944, FDR Library,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86, enclosure: Dispatches, p.19.

[83]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Comments by Captain Herbert V.Wiley.

[84] Commander Task Force 77 to COMINCH, "Preliminary Action Report of Engagements in Leyte Gulf and Off Samar Island on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02335, November 18, 1944, FDR Library,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86, p.7.

[85] Woodward,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p.89.

[86]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84.

[87]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第六章

10月24日一整个下午，西村的南路舰队都在棉兰老海中坚定地向前行进，航向直指苏里高海峡。在上午与第3舰队侦察机部队短暂而激烈地交战后，舰队已经恢复完好。“山城号”的损伤已被修补好，右倾也被纠正了。

由于空中侦察报告在苏里高海峡入口处出现许多美军PT鱼雷艇，西村决定在把他的两艘战列舰带入苏里高海峡之前先派巡洋舰“最上号”和4艘驱逐舰前出对这一海域进行侦察。晚6时30分，“最上号”侦察队离开战列舰，前进到棉兰老海北部海域进行侦察。侦察队离开后不久，西村收到了丰田的电报，收件人是所有日军指挥官，但实际上是发给栗田看的：“天佑我军，全军突击。”

这一奇怪的电报一定令西村大惑不解，因为他还不知道栗田已经掉头西撤。三个小时后，他才从栗田那里直接获悉，中路舰队延误了，无法在次日上午11点前抵达莱特湾。这个坏消息令西村更加坚毅，他继续以原速度航行，决意按原来的时间计划发动进攻。他一定早就知道自己突破到莱特湾的希望从来都不大，但现在他已能够确定自己将会闯进整个美军舰队的集火攻击之下，而计划中钳形攻击的北半边将不会再帮他吸引敌人了。他按原速度前进的决定也致使志摩将军的“第二游击部队”，这支仅有两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的后娘养的小舰队无法跟上西村舰队。落在西村后方45英里处的志摩只是蒙着头向前开，他和西村事先没有做任何协同作战的计划。

由于能活下来向我们讲述苏里高海峡那一夜发生了什么的日本高级军官太少了，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依赖推理和猜测。没有人知道当他的旗舰“山城号”闯进一场前途未卜的战斗时，西村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会怀疑自己是否把这支7艘舰的纵队带进了伏击圈。他或许还觉得日军凭借着优秀的夜间水面作战技术而仍然保有一些优势，他们在战前为此进行了巨量的训练，而且在所罗门群岛的几次夜战中展示出了这一点。夜幕掩护下的水面炮战也会消除空袭的威胁。

但是所有这些战术考虑都忽略了西村任务中更加关键的一点：他的舰队无人指望生还。西村知道他率领的是一次海上“万岁冲锋”，他显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南路舰队是一个诱饵，意在将部分美军舰队吸引到南边，以增加栗田在北边的胜算。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他的小舰队实际上是献给战神的祭品。西村的真实任务是去光荣地毁灭，让大炮轰鸣到最后一刻，纵使战败，也要保住日本海军的荣耀。

这样的安排当然不会白纸黑字写出来，在“捷号”计划或者丰田的后续命令中也不会言明。在战后关于这次战役的叙述中，伊藤正德坚称西方的批评者没能理解这些“[西村的]任务背后的特殊环境”。但是幸存军官和舰员们的陈述却证明他们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心知肚明。驱逐舰“满潮号”的舰长田中知生说：“本舰队的全体军官都知道自己执行的是自杀任务，无人期望生还。”^[1]战列舰“扶桑号”的一名作战参谋告诉他手下的水兵，他们将顶着美军舰队的优势炮火冲进塔克洛班锚地，军舰将会冲滩搁浅，这样即便遭到足以导致沉没的战损，也能继续用主炮射击。“我们将要进行一场水上特攻。”他如此告诉手下。^[2]他所谓的“特攻”指的就是单程自杀式攻击。据另一名目击者说，在一次战前布置中，西村将军“强调不仅要做好战斗准备，也要做好精

神准备。西村已经准备好赴死。他的态度感染了全体官兵，令他们心甘情愿地随他踏上这场赴死之途”。[3]

美军的PT鱼雷艇正守候在西村的前进路线旁。39艘艇分成三个艇群，环绕在保和海和苏里高海峡南口周围的岛屿旁。它们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艇上的帕卡德发动机空转着，排出的废气随微风飘散，海浪轻轻拍打在它们的木质艇壳上。这个夜晚闷热而晴朗。西边的夜空中低垂着一弯月牙，淡黄色的月光洒在碧波粼粼的海面上。

前卫鱼雷艇分队布置在海峡南口60英里外，紧靠着保和岛和甘米银岛。晚10时36分，PT-131号艇在雷达屏幕上发现两个大型回波信号正以20节速度从西边驶来。彼得·加德少尉拿起夜间专用望远镜扫视海平线，很快看到了敌人：双路纵队，4艘驱逐舰打头阵，其后是2艘带有独具特色的宝塔形塔楼的战列舰，最后是“最上号”巡洋舰。

当加德用无线电发出敌情报告时，日军也发现了PT鱼雷艇群，并向这个方向打出了照明弹。照明弹在头顶上点亮，整个战场顿时洒满了强烈的红光。加德的三艘鱼雷艇立刻开足了马力。它们的引擎轰鸣着，艇体跃出了水面，艇尾拖出长长的白色尾迹。“时雨号”驱逐舰的探照灯罩住了它们，舰上的5英寸炮随即开火。以超过30节的速度接近目标时，这些木质小艇的周围掀起了白色的水柱。“我们被探照灯逮住了，”PT-152号艇上的一名艇员说，“我只知道这艇在飞奔，那声音大得难以想象。”[4]

PT-152号艇的40mm炮组向“时雨号”开火，想要打灭它的探照灯，但未能成功。“时雨号”和日舰纵队中的其他几艘军舰向进攻方迎面转来，减少被弹面并准备躲避鱼雷。鱼雷艇射出鱼雷之后便转弯脱离。所有鱼雷都没有命中——可能还差得很远，因为

日军瞭望哨没有看到鱼雷航迹。

在之字形航行、施放烟幕高速脱离时，PT-152号艇的艇尾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艇上的37mm火炮被击毁，炮手当场阵亡，艇后部舱室内燃起大火。PT-130号艇也被击中了，击中它的可能是“山城号”一门副炮射出的6英寸炮弹，但是这枚穿甲弹把艇上的桃花心木艇壳打了个对穿，没有爆炸。在这危急时刻，受损的PT-152号艇眼看就要被“时雨号”追上干掉，但是日军驱逐舰却返回了己方纵队，放弃了追击。日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这时候坏运气来了，加德分队的全部三艘艇都发现自己的无线电坏了。于是PT-130号和PT-131号两艇转向东南方，奔向甘米银岛，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个分队。加德跑到PT-127号艇上，用无线电向海峡另一头的奥尔登多夫将军发出了他的敌情报告和作战报告。现在奥尔登多夫知道西村就在他西南方约90英里处的保和岛以南，接下来的这一整晚他都会不停收到新的对手位置信息。盟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继续以5节航速在海峡中巡航，火炮指向南方，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路过利马萨瓦岛时，日军舰队重新编成双纵队，驱逐舰在两翼护卫。德怀特·H.欧文上尉指挥的第12鱼雷艇中队的3艘艇在近距离上看到了它们，先是在雷达屏幕上，继而是目视。当西村来到帕纳翁岛南端附近时，欧文的鱼雷艇冲出岸边的阴影区，发动了进攻。151号和146号两艇顶着周围不断升起的水柱，冲向探照灯，在1800码距离上射出了鱼雷。鱼雷都不知射到哪儿去了。这两艘艇随即转弯，以之字形航线逃生。在混战中，战列舰“扶桑号”将巡洋舰“最上号”误认为是敌舰并短暂向其开火，但没有造成严重损伤。

日军舰队在帕纳翁岛旁转弯，向北驶入苏里高海峡时，突然陷入了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攻击之中。罗伯特·利森少校指挥的3艘鱼雷艇（PT-134、PT-132和PT-137号艇）向日军纵队中央冲过去，被罩在了一艘战列舰令人目眩的探照灯光中，可能射自“山城号”。它们冲到1 500码的距离上，放出了7枚鱼雷，之后急转弯脱离。它们在“山城号”巨炮和暴风雨般机炮火力的追杀下拼命沿之字形航线逃命。“它的40毫米火炮和14英寸主炮把夜晚照得如同白昼，”一名鱼雷艇员说，他觉得能从这次战斗中生还纯属侥幸，“5英寸炮火也很猛。驱逐舰一定也开火了，到处都是曳光弹、浓烟、爆炸和火焰。”[5]

当日军炮火追击利森那三艘撤退的鱼雷艇时，另三艘艇从东南方的阴影中杀了出来。PT-523、PT-524和PT-526号艇发现它们目标的轮廓正好被其自己的炮口焰和照明弹映了出来。它们发射了鱼雷，随后迅速逃向苏米伦岛背后寻找掩护。没人知道日军是否看见了这三艘从右舷来的刺客，因为几乎就在同时，PT-490、PT-491和PT-493号三艇从北边冲出来，展开了几乎是正对头的攻击。这支分队从藏身的暴雨区冲出来，发现自己距离最近的敌人驱逐舰只有700码。敌舰正忙于和另一边的鱼雷艇作战，无暇他顾。于是这三艘艇进行了当晚最大胆的鱼雷攻击，在被敌人的探照灯照亮之前，它们接近到了400码的距离上，射出鱼雷，掉头脱离，白色的水柱就在它们身后炸开。在沿之字形航线向北脱离时，所有三艘艇都被敌人火力击中。PT-493号艇遭到了当晚所有鱼雷艇中最严重的打击：一枚5英寸炮弹命中艇尾，第二弹击中水线下方的艇体，第三弹击中海图室后方，当场炸死2人，炸伤7人。由于无人掌舵，PT-493号艇开始毫无规律地乱跑，甚至差点掉头回到敌人附近，后来一名幸存者抓住了舵轮，才让它直线脱离战场。它逃进了一片路过的暴雨区，但此时

这艘艇已经被炸得稀烂，行将沉没，大部分艇员受了伤，动弹不得。幸存者把它开到帕纳翁岛旁，把伤员抬上岸，等着第二天上午自己人前来搭救。

到目前为止，鱼雷艇的攻击对日军来说只是骚扰。它们射出了超过24枚鱼雷，却无一命中。后来人们认为鱼雷艇部队的官兵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鱼雷战术训练。毫无疑问，他们在敌人炮火的攻击下常常是胡乱发射，或者慑于自身毁灭的危险而不敢冲到近距离。他们的有些武器还可能失灵了，有些鱼雷或许实际上命中了目标却没有爆炸。尽管如此，这些鱼雷艇还是完成了它们的首要任务，即在敌人接近时提供早期预警。当日舰迎击这一连串蜂拥而来的“魔鬼艇”时，炮火和照明弹照亮了夜空，在很远之外就能看到。据“西弗吉尼亚号”的日志记载：凌晨2时6分，“看见东南方远处出现照明弹”。2分钟后：“180°正方向观察到炮火。”^[6]在这一路移动的烟火表演中，西村揭开了自己的隐身衣。

但他并没有停下，甚至没有放慢脚步。进入海峡中央后，西村各舰朝着0°正北航向，向等候着的美军舰队疾驰而去。晚11时，月亮落入了海面，夜色伸手不见五指。大海依然平静，只是有时会有一阵暴雨从这片海域扫过，降低了能见度。日军的瞭望哨只能勉强识别出左边帕纳翁岛和右边迪纳加特岛的轮廓，而完全看不到它们高大、密布森林的山脊线，只是在远处偶尔亮起闪电时才会例外。在北方，熟悉的大熊星座和北斗星低垂在天幕之下。

杰西·科沃德上校的第54驱逐舰中队正从北面快速驶来。科沃德把他的驱逐舰分成两个分队平行前进，意图从两翼包抄日军纵队。双方以高达40节的相对速度彼此接近——科沃德的驱逐舰以20节速度南下，西村则以相同速度向北冲刺——两军在相距5英里时同时目视发现了对方。科沃德的东侧纵队与日军几乎是迎

头对进，出现在日军先导舰右前方仅仅10°处。美军接近时施放烟幕，以进一步降低能见度——但眼睛如猫头鹰般锐利的日军瞭望哨仍然能够在迪纳加特岛平坦的轮廓前方辨认出形状独特的驱逐舰烟囱在移动。

日军在远距离上开了火，但他们的第一轮射击毫无准头，弹着水柱距离目标近了2 000码。^[7]由于紧贴着苏里高海峡的海岸线航行，科沃德的舰队藏身于多山岛屿下的“雷达阴影区”。据“时雨号”驱逐舰舰长西野繁中佐说，这一战术达到了目的。备感挫败的日军炮手紧盯着雷达屏幕，“无法区分陆地和敌舰。屏幕上只是一大片回波信号。我们不顾一切地射击，但我觉得那十分无效”。^[8]

美舰没有还击，以免自己的炮口焰成为敌人的瞄准点。科沃德要求他的中队仅使用鱼雷攻击。凌晨3点，他东侧分队的三艘驱逐舰射出了27枚鱼雷，随后在各种口径舰炮的追杀下向左急转脱离。日舰的瞭望哨看到了来袭的鱼雷尾迹和掀起的绿色磷光，日军纵队随即转弯规避。“扶桑号”的14英寸火炮向正在逃离的驱逐舰开火，还对“麦克格万号”取得了跨射，却未能命中。然而几乎同一时刻，“扶桑号”的右舷中部挨了两枚，也可能是三枚鱼雷。它的锅炉舱被海水淹没，舰体向右严重倾斜，并突然丧失了电力。它掉了队。跟在它后方的巡洋舰“最上号”不得不紧急转弯，以免碰撞。

科沃德的另一半驱逐舰——由“蒙森号”和“麦克德莫特号”组成的西侧分队——在接近到八九千码时扇面射出了20枚鱼雷。西村舰队正在转回正北方的基本航向时，这批鱼雷抵达了目标。结果是灾难性的。三分钟内，日军纵队4艘驱逐舰中的3艘被击中。“山云号”中部被两枚鱼雷同时命中。爆炸还引爆了军舰自己鱼雷管里的两枚鱼雷。几个战斗部的爆炸把它炸成了两半，它短

短两分钟内就沉没了。西野中佐回忆说，它沉没时还带着滋滋声，“就像一块巨大的红热铁块插进水里”。[9]“满潮号”被一枚命中左侧轮机舱的鱼雷打残，瘫在水面上开始下沉，硬是靠着幸存舰员们的英勇奋战才浮在水面上。第三艘“朝云号”前部中雷，整个舰首被撕掉，但舰员们还是设法堵住了破口。[10]这艘舰只好掉头向南蹒跚而去。

遭到重创的“扶桑号”不能动了。它已是自身难保，“从水线到桅顶，全都被火焰包围”。[11]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它无力地随波逐流。舰长下令弃舰，于是舰员们开始跳进苏里高海峡温暖的海水里。大约凌晨4点，它终于向右舷翻倒，巨大的上层建筑在海面上砸出了巨大的水花。它的舰首沉入了海面，舰尾从海面上竖起150英尺高，螺旋桨还在旋转，它就这样沉了下去。泄漏出来的燃油在海面上扩散开来，把火焰带到了数百英尺外，吞没了许多正拼命游泳逃生的人。没人知道多少人从沉船上逃了出来，但很少有人海上漂流的几个小时中幸存下来。最终只有10名“扶桑号”成员在战役结束后回到日本。

现在，日军各舰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有些人觉得纵队已被鱼雷艇包围。西野中佐一直以为被击中的是旗舰“山城号”而不是“扶桑号”。实际上“山城号”仍在继续以25节航速北上，但西村将军和他的幕僚们并不知道“扶桑号”和三艘驱逐舰已经中雷，整个纵队总吨位中的一半已经沉没或者丧失了战斗力。和旗舰待在一起的只剩下“最上号”。唯一幸存而且还能航行的驱逐舰“时雨号”加快了速度以逃出鱼雷攻击区，但随后它就和舰队其余各舰失去了联系。西野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任何一艘友舰，于是他转向南“去看看‘山城号’怎么样了，可能的话去接收命令，然后转回来继续北上”。[12]

此时，在海峡北端，奥尔登多夫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雷达捕

捉到了接近的日舰。他们能零零星星监听到一些日军低功率无线电通话。瞭望哨能看到远处的照明弹和炮火，听见远方爆炸的隆隆声。奥尔登多夫将军看见一艘敌舰的探照灯光束扫过海平线，他形容这像是“黑夜中挥舞着的一支盲人的拐杖，尽管我们看不见它指向哪里”。[13]“山云号”爆炸时，火光在海峡顶端都能清楚地看见——几秒钟后，雷达屏幕上的那个“亮点”也消失了。

炮手们已经锁定了目标，做好了射击准备，但遵照奥尔登多夫先前的指示，他们没有开火。要先让最北边的驱逐舰群——第56驱逐舰中队——向敌人发动攻击。凌晨3时34分，奥尔登多夫命令驱逐舰前出攻击，“拿下那些大家伙”。[14]

率领这最后一轮驱逐舰进攻的是坐镇“纽康姆号”的罗兰·斯穆特上校。他的第56驱逐舰中队各舰被分成3个分队，每队3艘弗莱彻级，排成纵队——分别攻击西村的左翼、右翼和正前方。它们沿着海峡以25节航速直扑而来。由于意识到奥尔登多夫的重炮即将开火，最好在重炮打响时让他的驱逐舰躲开火线，因此中路纵队指挥官电令各舰：“要快。在鱼雷旁守着。”[15]当距离接近到6 000码时，各纵队都转向用侧舷对敌，射出了鱼雷——每艘舰5枚，共计45枚。之后它们继续以最高速度开向海峡边缘，并用烟囱施放大量烟幕，脱离射击区域。

当斯穆特的最后一枚鱼雷从发射管钻入海中时，北方海平线上的大炮响了。右翼巡洋舰上的6英寸和8英寸炮率先开火，战列舰的14英寸和16英寸主炮齐射紧随其后。红色的曳光弹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缓慢地在天上飞过。这些巨大的炮弹在飞向目标的12英里航程中似乎是慢悠悠地挂在空中。斯穆特上校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夜空中曳光弹的弧线宛如亮着灯光的列车从山头上一列列开过”。[16]

凌晨3时53分，“西弗吉尼亚号”的首轮齐射落地。枪炮官打开送话器喊道：“首轮达阵”。赫伯特·V·威利上校用望远镜观察目标，看见目标在第二轮齐射落地时爆炸开来。^[17]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目标正是西村的旗舰“山城号”，这艘日军战列舰很快遭到了至少12艘美军巡洋舰和战列舰的集中射击。“丹佛号”的战报写道：“几乎从3时50分开始射击时起，敌舰在我舰瞭望哨眼里便成了一团团爆炸的火球。”^[18]

“山城号”坚定地向这场风暴迎面而去。在随后的7分钟里，整个盟军舰队所有的舰炮都向这一艘舰集中射击。水柱在它左右近旁垂直升起。厚重的装甲甲板遭到了雨点般穿甲弹的洗礼。伤员被送到军官餐厅里，安放在桌子上，然而一枚直接命中的炮弹炸毁了这个舱室，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医护人员。即便在内部通信全部中断，炮塔炮手和舰桥失去联系之后，他们仍然在用主炮和副炮喷射弹雨，在美军驱逐舰和右翼巡洋舰周围掀起水柱。^[19]由于没有火控雷达，“山城号”的射击精度远逊于对手，但还是有几发炮弹落在盟军巡洋舰近旁，令他们心惊肉跳。一轮齐射落在澳大利亚巡洋舰“什罗普郡号”远处，第二轮近了一些，第三轮就从头上飞过，在远侧溅起巨大水花。“凤凰城号”和奥尔登多夫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周围也炸开了水柱。于是将军命令巡洋舰纵队加速进行机动规避。

在“山城号”后方1/4英里处的“最上号”上，一名舰员回忆道，炮弹来袭时的尖啸声“可怕而令人恐惧，它们从左边飞到右边”。当第一轮齐射跨射此舰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一堵高大的白色水墙”。^[20]6英寸和8英寸的炮弹落在舰体上方，击毁了一座炮塔，并让海水淹没了轮机舱。舰长下令右转以让侧舷对敌。“最上号”向着海峡前方炮口闪光的大致位置射出了4枚鱼雷。但这些鱼雷都被设为高速模式，因而降低了射程。

转弯时，“最上号”的主炮指向了3艘撤退中的美军驱逐舰，“达利号”、“哈金斯号”和“巴奇号”。于是它打出了一轮侧舷齐射。“达利号”舰长惊恐地看到红色曳光弹直奔他的军舰而来：齐射几乎就要打中目标了。“它绝对是冲我而来，感觉就像是站在棒球场中央等着用手套接住飞来的球一样，”这位舰长后来评论道，“万幸，这轮齐射从头上飞了过去，落在二三百码外。”^[21]

“山城号”的右舷又挨了2枚鱼雷，可能来自驱逐舰“纽康姆号”和“拜尼恩号”。这使得它的中雷总数达到4枚。军舰开始向左倾斜，航速锐减到6节。全舰燃起大火，宝塔形的桅楼如同一支火炬。但是仰仗上层建筑高处舰桥装甲的保护，西村和他的参谋们还活着。他告诉参谋长：“向本队司令发报。我们继续向莱特前进，直至玉碎。”^[22]

“最上号”的右转弯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它转向南方，远离敌人的炮火而去。在舰桥上，军官们爆发了争论。有人想要继续向南沿海峡脱离，认输；其他人则决心死战到底。舰长最后被强硬派说服，下令让军舰返回战场。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始转弯，“波特兰号”巡洋舰射出的两枚8英寸炮弹便直接命中“最上号”舰桥，终结了这场争论。由于无人操舵，无人下令，军舰一度原向航行。最后幸存的舰员爬上了舷梯，发现舰桥里已经满是尸体。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舰上的炮术长接管了全舰。“最上号”还在不断被炮弹击中，已经无法再战了。新舰长决定向南航行，以求保住军舰。

与“山城号”失去联系已久的“时雨号”也遭到了6英寸和8英寸炮弹的跨射。接连不断的近失弹令这艘轻型军舰剧烈摇晃起来；西野中佐说近处的爆炸甚至会把舰体抛出水面一米有余。“我遭到了可怕的炮击，”他说，“近失弹这么多，连罗盘都被震坏了。

近失弹的冲击让军舰不停摇晃，无线电也坏了。”[23]失去了无线电联络，西野无从知晓自己应该前进还是撤退。他转向东，希望来到“山城号”的灯光信号距离内，却完全找不到它和“最上号”的影子，甚至都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浮在水面上。关于“最上号”，“时雨号”的军官们意见各不相同。有些人相信“时雨号”是南路舰队最后的幸存者。炮术长还问他们的使命是否就是“仅仅像狗一样死去”。凌晨3时15分，西野判定“山城号”和“最上号”可能已经完蛋了，因此“在没有收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决定向南撤退”。[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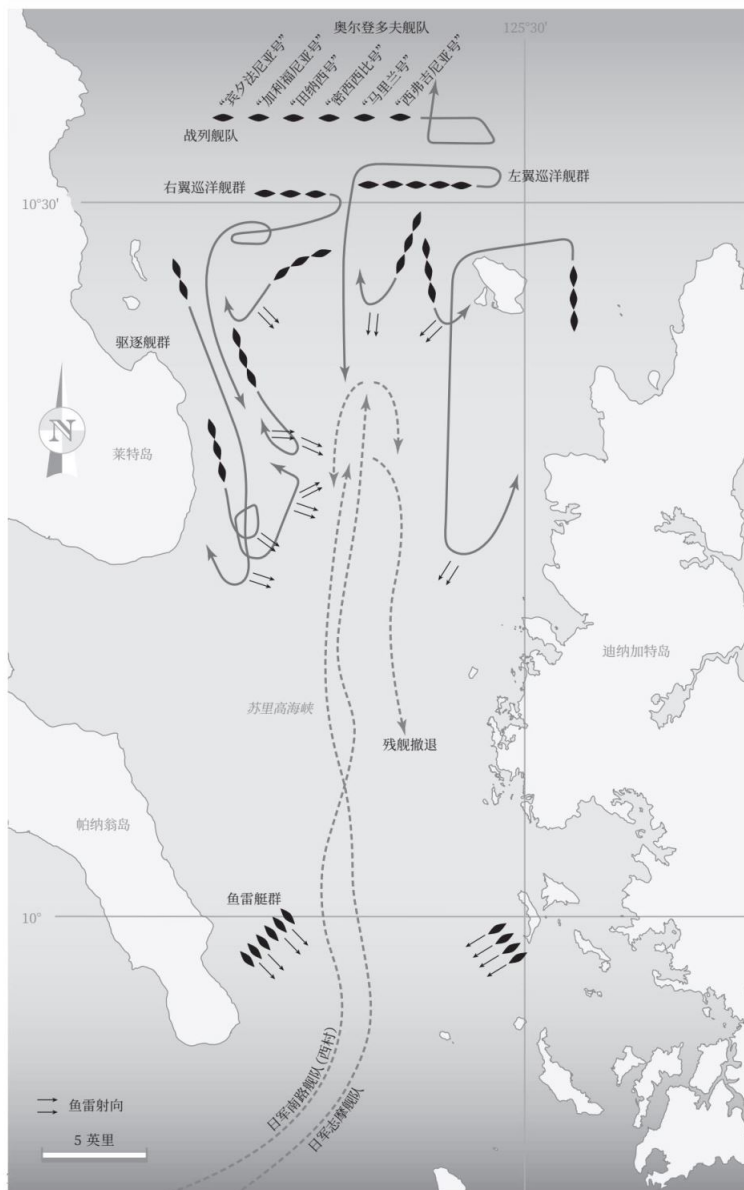
一艘美军驱逐舰“格兰特号”没能离开射击区，于是发现自己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猛烈射击。“山城号”从大约3英里外把炮弹砸在它周围。但是最严重的炮击来自友军，也就是右翼的巡洋舰纵队。“格兰特号”被命中了大约20枚炮弹，大部分可能来自巡洋舰“丹佛号”。舰上有34人战死，94人负伤。右翼巡洋舰部队指挥官拉塞尔·S·伯基将军打开无线电，警告说有一艘友军驱逐舰正瘫痪在水上，并遭到友军攻击。凌晨4时9分，奥尔登多夫向全舰队发出警告：“‘格兰特号’中弹，瘫痪在水上。所有军舰都要格外小心。”[25]

美军舰队遵从指示，炮声停了下来，海峡顿时陷入了诡异的宁静。随着美军战列舰向北转向以躲避“最上号”的鱼雷，停火又延长了片刻。

尽管西村勇敢地要求继续向敌人冲锋，但是遭受重创、燃起大火的“山城号”还是在盟军停火后不久转向了南边。可能西村是想去和志摩会合，或许想要安全撤离：没人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他和舰桥上的其他军官都没能活下来告诉我们答案。不知什么原因，技术人员设法把“山城号”的航速恢复到12节，但这也不过是加大了舰体破口处的进水而已。凌晨4时19分，它开始向左翻

覆，西村的参谋长下令弃舰。之后它便翻倒在了海面上，巨大的
宝塔形建筑落在了水上。它舰尾向下，迅速下沉，卷走了几乎所有
舰员，仅有少数人幸存。

苏里高海峡夜战, 1944年10月25日



此时，在南面，能见度下降了。暴雨区扫过棉兰老海和海峡

南段。志摩的小舰队在恶劣天气下以25节速度冲刺，结果差点撞上帕纳翁岛。当这座岛高大的山脊线突然从雾中出现时，舰队才在最后一刻紧急转向躲了过去。[\[26\]](#)当志摩舰队紧急转弯时，PT-137号鱼雷艇向驱逐舰“大潮号”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从目标舰底穿过，继续向前，击中了3 000码外吃水更深的巡洋舰“阿武隈号”。这是整场战役中美军鱼雷艇唯一命中目标的一雷。遭到重创的“阿武隈号”掉了队，以10节速度蹒跚前进。

进入苏里高海峡后，志摩舰队在黑夜中以28节航速北进，瞭望哨远远看见了正在下沉的“扶桑号”。浓烟和雨雾带来了糟糕的能见度，志摩舰队的人误以为自己见到了两艘燃烧的战列舰，而不是一艘。这可能是由于“扶桑号”的舰首被从舰体上撕下，还浮在水上，也可能是因为瞭望哨将大片起火的燃油当成了第二艘舰。无论如何，这些新来者没有停顿，继续在苏里高海峡中高速前进。

凌晨4时22分，志摩的纵队右转，开始发射鱼雷。鱼雷以49节的高速冲了出去。正当旗舰“那智号”的鱼雷射出之时，舰上的瞭望哨看见了“最上号”。在他们看来，这艘舰似乎是静止在水上燃烧，但距离接近后，舰桥上的军官意识到这艘舰正在与本舰快速相向而行。“那智号”舰长下令以最大马力倒退，但太晚了，“那智号”一头撞上了“最上号”。后者的操舵室被海水淹没，航速减半。“那智号”也受了重伤，最高航速只剩下了19节。“那智号”随即转向南，舰员开始检查损伤。

这时，在“那智号”的舰桥上，第五舰队鱼雷长森孝吉与志摩商量了起来。考虑到军舰受损，西村舰队几近全灭，以及海上越来越差的能见度，森提出再前进就是自杀。敌人已在前面为他们设下了陷阱。“将军，”他说，“前面敌人肯定正拿着大炮等着我们。”[\[27\]](#)志摩对此深表同意，他决定今晚就到此为止。他向丰田

发电：“本部队已结束进攻，正退出战场，以备再战。”[28]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称志摩的决定是“整场战役中所有日军指挥官做出的最明智的举动”。[29]

凌晨5点，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两支日军舰队的残部正沿苏里高海峡蹒跚而行。奥尔登多夫将军把战列舰留在原位，亲率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包括他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南下追击并“扫荡敌残舰”。

由于担心不慎遭到鱼雷攻击，奥尔登多夫小心翼翼地保持着15节航速。此时的海上满是暴雨、雾气，还有燃烧的舰船和燃油升腾起的不散的浓烟，能见度仍然很差。海面上漂浮着泄漏出来的重油，到处都是漂浮着的残骸和尸体。他们在一片狼藉中看见数百名日本水兵，要么泡在水里，要么趴在残骸上。一如往常，几乎所有人都拒绝救援，甚至在美舰开来时要跳海自杀。追击舰队路过漂浮着的残骸，它们是四艘正在下沉的不同的日军舰只，但这些军舰已经“由于周围浓密的油烟和火焰而无法辨识”。

[30]“扶桑号”的一部分还漂在水上，可能是舰首，路过的“路易斯维尔号”向这块残骸打了几轮齐射，将其击沉。

起先，受损的“那智号”、“最上号”和“时雨号”还能维持足够的速度让奥尔登多夫追不上。但是到了卡尼瀚岛附近，一群讨厌的PT鱼雷艇拖慢了它们的速度。仍然带着火而且几乎无法转向的“最上号”和这些小家伙打了起来。它的8英寸炮弹落在鱼雷艇周围，将它们赶走，甚至还直接命中PT-194号艇一弹，炸毁了艇上的三台发动机，炸死一名40mm炮手。奥尔登多夫的巡洋舰在清晨5时29分看见了远处的“最上号”，并在远距离上开火，命中大约10弹。“哥伦比亚号”舰长用望远镜观察目标，报告说它“完全烧起来了，比珍珠港时候的‘亚利桑那号’烧得还厉害”。

[31]志摩将军硬下心来决定继续前进，把“最上号”丢在后面以吸

引追兵。“那智号”、“时雨号”和第二游击部队的其余各舰则溜走了，绕过帕纳翁岛转弯逃离。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身陷绝境，“最上号”还是不肯认命。舰上勇猛的工程人员居然让它恢复了12节航速，它也逃进了棉兰老海。

留在苏里高海峡中的最后一艘日舰是遭到重创的驱逐舰“朝云号”，它先前被科沃德的鱼雷炸掉了舰首。它瘫在水面上，前甲板已经沉入水下。舰上仅剩的一座能用的炮塔还在勇敢地向涌过来想要用鱼雷击沉它的鱼雷艇还击。早晨7点之前，舰长便已下令弃舰，舰员正在爬上救生艇，这时追杀而来的美舰进入了射程。7时4分，“朝云号”遭到了炮击，起先是一艘驱逐舰，几分钟后便是一大群巡洋舰和驱逐舰：总共有10艘美舰参加了对这艘垂死驱逐舰的最后行刑。它的水线被炸开，火焰从每一处舱口冒了出来。“朝云号”翻倒下来，舰首朝下沉入海里。舰桥上还有人向丰田和栗田二位将军发出了诀别电：“我舰遭袭沉没。”^[32]

有人说它唯一可用的炮塔即便在军舰沉没时还在开火。“拜尼恩号”的枪炮官詹姆斯·L·霍洛威三世看到了这个勇敢小斗士的落幕场景：“当我们接近到大约2 000码时，这艘日军驱逐舰已经沉到了波浪起伏的灰色海面之下，舰首朝下，我们从它近旁驶过时，它的螺旋桨还在缓慢地转动。”^[33]逃脱的日军各舰还将遭到美军舰载机的追杀，那艘有九条命的“最上号”最终也在当天傍晚没能扛过空袭的打击。西村南路舰队中唯一幸存的“时雨号”将在10月27日抵达文莱。美军的空中追杀和清剿作战还会再持续一天，最终把志摩一路追进了马尼拉湾。11月5日，他的旗舰“那智号”就在此地被空袭击沉。

但奥尔登多夫的这部分战斗结束了。10月24日早晨7时25

分，他收到了第一封命令他北上的急电，这样的急电随后还有多次。位于莱特湾以北的第7舰队护航航母，遭到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强大日军水面舰队的攻击。

圣贝纳迪诺海峡是一条狭窄而危险的航道，栗田的中路舰队不得不排成单纵队队形穿过这里。由于担心再像在巴拉望水道时那样遭到灾难性的潜艇攻击，这支长达13英里的纵队不得不冒死以20节的速度匆匆开过。这里的水流速度高达8节，搁浅的危险很大。但是这天晚上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而且正如哈尔西的夜间侦察机早先注意到的那样，海峡中的浮标和灯塔都已点亮。午夜过后半小时，舰队完好无损地驶入了菲律宾海。他们比预定的时间落后了6个小时，而且对西村的命运仍一无所知。

栗田和他的军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一直觉得自己会被雷达、夜间侦察机和海峡沿岸的菲律宾瞭望员一路追踪，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敌人潜艇来打扰他们。他们预计自己会遭遇封锁海峡出口的美军战列舰队的密集炮火——正是这样的T字横头伏击刚刚在南方300英里外痛揍了西村。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后来说，如此将会令中路舰队“步履维艰”，如此前景也令“大和号”舰桥上的人们对此“严重关切”。^[34]但是现在，他们安全穿越了海峡，没有任何人挡在他们面前。

在两个小时里，栗田舰队一路向东奔向开阔海面。原来的单路纵队转换成夜间搜索阵形，六路纵队如耙犁一般覆盖了宽近20英里的洋面。日本人并不知道哈尔西去哪儿了，他们仅仅是根据前一天下午美军舰载机飞走的方向猜测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凌晨3点，“大和号”用灯光信号发出指令：航向转为东南，开往莱特湾。在接下来的三小时里，舰队向南一路冲刺，把萨马岛的群山

远远留在自己的右手边。[35]

5时30分，“大和号”收到了志摩将军的报告，“山城号”和“扶桑号”完了，“最上号”起火，所有幸存日军部队正在撤离苏里高海峡。这个坏消息并不太出人意料，却确凿无疑地告诉他们，期待中的钳形攻击泡汤了。即便中路舰队成功前进到莱特湾，它也只能孤军奋战。早晨6时14分，美丽的热带日出送来了新的一天。此时东北风轻拂，海面平静，但是灰色的散碎积云悬在空中，阴沉的暴雨从低空扫过海面。

此时挡在栗田和他目标海域之间的是美第7舰队各护航航母战斗群。这支舰队拥有16艘小型航母和22艘为其护航的驱逐舰和驱护舰。它们被统一编为第77.4特混大队，由托马斯·L.斯普拉格少将指挥。这支大队又进一步分为三支特混编队，“塔菲1”、“塔菲2”和“塔菲3”。其中最北方的编队，“塔菲3”，由绰号“拐子”的克利夫顿·A.F.斯普拉格少将率领。

两位斯普拉格并非亲属。这对海军学院的同学（都是1917届）有着相同的少见姓氏，又一同在第7舰队的同一支小分队里当少将，这真是个罕见的巧合。

护航航母，“CVE”，是一种小型的辅助舰艇，有时也被戏称为“吉普航母”或者“婴儿平顶”。和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相比，它们的长度只有其一半，吨位只有三分之一。它们长500英尺，排水量约1万吨，只能搭载25 ~ 30架飞机。从海军的观点来看，它们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快速而且廉价地建造下水。它们能够执行的任务有限：为商船队和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支援两栖登陆，以及运送补充飞机越过太平洋。它们太慢：大部分舰只的航速不超过18节，无法伴随第38特混舰队那些大型战斗航母。人们认为这种舰过于脆弱，无法承受航空兵和潜艇的集中攻击，因为它

们钢板太薄，极易被炸弹或鱼雷击穿。舰员们戏称“CVE”三个字母指代的是“易燃、易受攻击、可牺牲”（combustible, vulnerable, and expendable），这三条还真的一点都没错。

最初的护航航母就是直接在货船或者油轮的船体上放一块飞行甲板而已，但后来的就是亨利·凯泽在他的华盛顿州温哥华船厂专门建造的了。凯泽建造的各舰（总共104艘护航航母中的55艘）被蔑称为“凯泽的棺材”。第77.4特混大队的16艘护航航母中，13艘都是凯泽造的。

到目前为止，对“塔菲”各编队而言，莱特岛作战波澜不兴。各舰在萨马岛和莱特岛外的阵位已经待了近一个星期。航空大队一直不停地在运输船队上空巡逻，在菲律宾中部进行空中侦察，并攻击海滩上的地面目标。但舰员们却根本见不到敌机。周围有一些潜艇威胁，但没有日本军舰的影子。驱逐舰忠实地执行着护航的任务，在舰队周围猎杀来袭的潜艇，救援被击落的飞行员。“塔菲”编队完全没有打算参加在南边、东边，可能还有北边爆发的海战。因此，这天早上7点前不久，当栗田那些巨型战列舰和巡洋舰宝塔式的桅楼从西北方海平线上探出头来时，他们大惊失色。

敌舰来袭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半个小时前，当时“塔菲3”编队的反潜巡逻机刚刚从飞行甲板上弹射起飞。这时一个短距离低功率无线电频道中传来了日本人的声音。不过大家都认为最近的敌舰还在超过150英里之外，这个电波可能来自附近的菲律宾岛屿。还有一条无法确证的SG雷达回波似乎显示有些东西正从北边过来，但是这些回波信号还不像是一支舰队。它可能是哈尔西舰队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团云。早晨6时46分，“塔菲3”的瞭望哨看见西北方海平线上远远地出现了一些高炮烟团。这就很奇怪了，“拐子”斯普拉格正准备要他的巡逻机飞行员前去侦察，一

名飞行员就在无线电里喊道：“敌水面舰队……距你们特混大队西北20英里，以20节航速接近。”

由于觉得这可能是“某些毛躁的年轻飞行员”把第3舰队的一部分舰艇错当成了敌人，斯普拉格将军火了。他抬高了嗓门吼道：“空情室，让他去复核他的消息。”

一分钟后，答复来了。“确认是敌舰队，”飞行员说道，“军舰都有宝塔式桅楼。”[\[36\]](#)

斯普拉格和他的军官们难以置信地扫视着西北方海平线。越来越多的高炮烟团让天空一片斑驳。日舰桅顶的暗影出现在了海平线上。最近的敌人已经到了17英里之外，正在快速冲过来。

在近旁“塔菲2”编队护航队中的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上，早餐被令人汗毛倒竖的紧急集合令打断。“我们奔向战位，”水兵小迈克尔·巴克回忆道，“我跑到舰桥向外看，见到海平线上冒出来一些像是牙签的东西，就在海平线上——那是许许多多敌舰。”[\[37\]](#)

虽然情势骤变令人手足无措，但斯普拉格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他用无线电播发了敌情报告，并呼叫邻近“塔菲”编队的空中支援。他命令他的航母转向东迎风航行，加到最大速度。飞行甲板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即便没有挂装反舰弹药也要飞。驱逐舰被要求在撤退的护航航母后方做之字形航行，用烟囱施放烟幕，越多越好，还用上了通常只用于飞机的化学造雾剂。

日本人几乎和美国人一样大吃一惊。他们的瞭望哨只比“塔菲3”编队中的同行早几分钟发现对方，发现距离都是地球曲率所允许的极限。即便是在美军施放烟幕之前，能见度也不是十分理想。天空中阴云密布，海上有雾。那些陌生舰船的船体都还藏在东南方海平面以下，起初并不太像是航空母舰。“大和号”舰桥上

甚至有些人说那肯定是日本船。他们遇到的是小泽将军的北路舰队吗？很快，第二支护航航母战斗群“塔菲2”的桅杆从南方大海边缘探了出来。随着距离的接近，瞭望哨看见有飞机在起飞，护航航母方方正正的轮廓也露出了海平线。它们是航母，而且不是小泽的。但那是何种航母？日本人并不知道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部署了一大批小型辅助航母。“大和号”舰桥上的军官们认定自己一定是撞上了第38特混舰队的某一部分。

无论如何，胜利似乎已经在握。“这真是奇迹，”栗田的参谋长小柳富次说，“想想一支水面舰队竟能抓住一支敌人航母部队！天赐良机，不可放过。”^[38]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赶在美军放飞飞机攻击追击者之前打击并摧毁其飞行甲板。这一战场态势需要他们展开全力追击——可能的话还要机动到上风区，这样敌人逃跑时便无法再收放飞机。栗田下令“全军追击”，意即每一艘日舰都要开出最大速度追击敌人，而无须顾虑舰队巡航队形。早晨6时59分，他下令：“准备水面战。”^[39]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和传统，其他各舰都要等旗舰打响第一炮。于是“大和号”的6英寸副炮率先“发言”，它的两座18英寸前主炮塔紧随其后开了火。

交战距离遥远，“大和号”巨大主炮长长的炮管伸向前方，抬高到23°仰角。在六大团烟火的推动下，六枚穿甲弹冲出炮口，奔向远方的目标。每一枚炮弹都重达3 200磅。飞行25秒之后，也就是距离撞击还有一半时间时，炮弹到达海面以上2万英尺高处的弹道顶点。之后它们开始以每秒约1 500英尺的终极速度向下俯冲——比炮口初速慢了许多，但仍然远远快于声速。因此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弹群来袭时并没有尖啸声。直到“白平原号”航母右舷外突然炸开六根白色水柱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要挨打了。这些水柱每一根都有20层楼高，它们不会轰然落下，而是向下风区慢慢消散成一团水雾，直到炮弹落海半分钟后，六团怪

兽般巨大的水汽仍然飘浮在巨弹落水处。

“塔菲3”编队中没有一艘舰装有5英寸以上口径的武器，因此在这个距离上美军无法反击：他们只能逃命。但他们也跑不了太快，即便把所有锅炉都烧到顶也不行。战斗群中有些护航航母只能开到17节。斯普拉格后来承认：“我想我们撑不过15分钟。”^[40]

首轮齐射后不到一分钟，“大和号”的第二轮齐射便接踵而至，对“白平原号”形成了近距离跨射。巨大的水墙一度吞没了这艘“婴儿平顶”。它继续前进，看似完好无损，但“大和号”近失弹那毁灭性的冲击波还是重重震伤了这艘轻型军舰。它的铆钉被震松，焊缝被扯开，电力中断，舰内灯光熄灭，无线电收发机都坏了，雷达屏幕也灭了，舰桥上有一张桌子震断了一条腿，倒了下来。

当溅落的海水暴雨般落在“白平原号”的飞行甲板上时，“大和号”的第三轮齐射又到了。用舰长丹尼斯·J·沙利文的话说，这次六枚炮弹落点“近得用显微镜才能分出来”。他还说：“军舰被剧烈地摇晃和扭曲，有些地方的人都被震倒在地，许多零备件也从平时存放的水平架子上落到甲板上。”^[41]一枚炮弹钻进水中，在舰体下方龙骨左边爆炸。根据战后报告，“军舰被扭曲和抬起，第101和146号肋骨左右两侧出现挤压和撕裂伤痕”。^[42]爆炸的冲击波撕裂了水线下的舰体钢板，炸断了舵杆，致使甲板和舱壁扭曲，燃油和航空汽油在全舰各处渗漏出来。在飞行甲板上，一架正准备起飞的野猫式战斗机被震得跳了起来，越过轮挡向前滑去，螺旋桨在前面一架飞机的机翼上狠狠咬了一口。舰上四台锅炉中的两台蒸汽压力突然下降。如果这枚炮弹在水下的炸点再后移几英尺，它就可能会使海水淹没军舰的轮机舱，让“白平原号”瘫在海面上，任由快速接近的敌人处置。

“大和号”打出的一式穿甲弹正是专门设计要在敌舰近处入水冲到目标下方爆炸的。这一枚炮弹正是达到了其设计目的，入水后保持直线弹道，0.4秒后爆炸。虽然它没有直接撞击敌舰，但它的爆炸波却可以冲击炸点上方舰体的薄弱部位。从这个角度看，一式弹的效果类似于水雷或者美军使用的磁性引信鱼雷，它们的设计都是要让战斗部在敌舰正下方爆炸。罗伯特·伦德格伦在他关于萨马岛海战的精心之作《全世界都想知道》（2014年）中提出，“大和号”的第三轮齐射应当被视为命中“白平原号”。[43]若这一观点能得到公认，“大和号”就会拿下舰炮射击命中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34 587码，接近20英里。

“甘比尔湾号”的舰载机中队长爱德华·J.赫克斯塔布尔正和手下飞行员一起在军官餐厅吃早饭，这时大喇叭里传来紧急集合的厉声警报。他立刻冲向飞行甲板，也没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座机，一架TBM“复仇者”，此时还没有装上炸弹或者鱼雷，但航空副舰长看起来急着要他无论如何都先起飞。跳进座舱时，赫克斯塔布尔很疑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驾驶这架无武装的飞机起飞。突然，“我左耳旁传来一声像是步枪射击的声音。我看过去，看到一轮重炮齐射溅落在‘白平原号’旁。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敌人已经这么近了。我要挂上弹射器！”。[44]

赫克斯塔布尔跟在其他几架“复仇者”后面弹射爬升，他们钻进了1 200英尺高处一片灰色的云层里。斯普拉格将军在无线电里发出了指令：“立即进攻。”此时，空中的能见度很低，赫克斯塔布尔只能隔着低垂的云雾努力辨认敌人舰队。他看见4艘日本巡洋舰正接近“塔菲3”的左后方，于是决定发动扫射，希望能拖慢其追击。他沿着日舰的航行轴线低空飞行，轮流从每艘舰上空飞过。高炮炮弹的爆炸震动着他的飞机，但他的手指始终压住扳机，将.50口径的曳光弹猛射向敌舰甲板。之后他压坡度转弯，

再次低空通场，这一回他打开了格鲁曼飞机狭长的炸弹舱门。他的弹舱里没有鱼雷，但日本人也能看见他打开了舱门，或许模拟一次鱼雷攻击能唬住日本人，让他们做规避机动，好为正在逃命的本方航母争取时间。[45]

其他几十名飞行员也是这么想的。来自多个中队的飞机在日本舰队上空盘旋，从云层中冲出来对栗田舰队进行扫射、轰炸和鱼雷攻击，或者用没有武器的“假通场”来假装进行扫射、轰炸和鱼雷攻击。从“圣洛号”“方肖湾号”“基昆湾号”航母上起飞的防空和反潜巡逻机在战斗初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命中了日军战列舰“金刚号”，重巡洋舰“羽黑号”、“鸟海号”和“筑摩号”的上部，还有一些近失弹也击伤了敌舰。防空火力很猛，许多美军飞机被高炮击伤，但被击落的飞机却没几架。一名日本舰长抱怨说他的炮手们就算是“弹幕盲射”也不会比这差到哪里去。[46]7时27分，重巡洋舰“铃谷号”遭到了一群TBM的同时轰炸：一枚炸弹落在左后方近旁，冲击波炸弯了左侧外部螺旋桨轴，令其无法使用。“铃谷号”的最高航速降低到20节，它掉了队，放弃了追击。

少数几架飞机在清晨的行动中早早落回“塔菲3”的航母，当时这些航母正迎着东风航行。但是早晨7时15分，斯普拉格转向南以寻求路过暴雨区的掩护。这就使得“塔菲3”各舰的飞行甲板无法再起降飞机了。南方的“塔菲1”和“塔菲2”编队的友军航母承担了一部分飞机的起降补给，空中还有些飞机飞往附近莱特岛上的塔克洛班机场加油装弹。越来越多的美军飞机聚集在日本舰队周围，它们常常没有合适的武器，但还是想尽办法逼迫敌人转向远离正在逃生的航空母舰。

多雨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了能见度。阳光有时会穿过云层照在战场上，但更多的时候，低垂的云层、暴雨，以及在“吉普航母”后方之字形航行的驱逐舰烟囱里施放的大量黑烟和暗黄色化

学烟雾都会遮蔽远方的海平线。大海阴沉，泛着铁灰色，轻浪起伏，带着白色的浪尖。日军瞭望哨总是高估敌舰的尺寸，把驱逐舰误当成巡洋舰，把护航航母当成埃塞克斯级航母。这是一场致命的猫鼠游戏，猎物在烟幕和雨雾之间时隐时现。射击窗口稍纵即逝，日军炮手很难看见他们的弹着点，因此也无法为后续的齐射进行矫正。

在航母后方拉烟的美军驱逐舰遭到了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猛烈射击。染了颜色的水柱把周围打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万花筒：黄色、红色、蓝色、粉色和绿色。一名水兵叫道：“他们用彩色的炮弹打我们！”^[47]在半英里宽度上施放烟幕的驱逐舰“约翰斯顿号”发现自己落在了危险的后卫位置上。它比其他任何美舰都更接近敌人，因此受到了敌人炮手的特别关注。它多次被14英寸和8英寸火炮的齐射跨射。“红色、绿色、紫色和黄色，若是在其他场合可能会很美丽，”“约翰斯顿号”枪炮官鲍勃·哈根说，“但此刻我才不喜欢这些彩色图案。”^[48]当右侧一支日军巡洋舰编队追击到1.8万码外时，“约翰斯顿号”的5英寸主炮开始还击。

早晨7时16分，斯普拉格命令驱逐舰和驱护舰掉头向敌人发动鱼雷攻击，以求打断他们的追击。“约翰斯顿号”舰长欧内斯特·E.埃文斯中校还没接到命令时就已经在准备这样的攻击了。“准备鱼雷攻击，”他下令，“左满舵。”于是，这艘2 700吨的弗莱彻级驱逐舰转过身来，单枪匹马向追杀而来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发动了正面冲锋。

埃文斯在俄克拉何马州的波尼市出生和长大，具有3/4美国原住民血统。他的母亲是纯血统的切罗基族人，父亲则有一半的克里克族血统。他先是在1926年18岁时作为列兵加入美国海军，次年又获命赴海军学院学习深造，1931年毕业。他14年海

军军官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驱逐舰上度过的。埃文斯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准备向海军高层爬的军官，他被认为是稳妥而可靠的执行者。和“塔菲3”编队的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一天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大炮射程内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舰队进行一场生死搏杀。但是他就站在这里，“约翰斯顿号”也是。“我现在能看见他，”哈根回忆道，“个子不高，胸肌厚实，他站在舰桥上，双手叉在腰后，用他浑厚的声音发出一连串命令。”[\[49\]](#)

这艘小小的双烟囱舰剧烈倾斜着向敌人急转，随即如同猎犬一般扑了上去。它开出了最高速度，超过30节。随着彩色的水柱在它近旁升起，埃文斯下令调整航向以“追逐弹着点”——就是要朝每一次弹群入水的位置开，以规避敌方炮手的校准。5英寸火炮也进行了还击，打出超过200枚炮弹，随着距离接近，炮弹开始不断命中。7时20分，当“约翰斯顿号”距离领头的日军巡洋舰“熊野号”9 000码时，它齐射出了10枚鱼雷。这些鱼雷发射角彼此相差1°，都被设为低速模式以增加射程。它们呈扇形展开，向敌人扑去，全都“猛烈、笔直，而且运作正常”。随后埃文斯下令向右急转，军舰随即向左大角度倾斜，躲进自己施放的烟幕掩护之中。由于烟幕的阻挡，舰员们无法看到战果；很久以后，舰上的幸存者们才知道他们射出的一枚鱼雷正面击中了“熊野号”，在舰首炸开了一个大口子，迫使它退出队列。“熊野号”不得不蹒跚北撤，舔舐伤口，退出了这场战斗。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约翰斯顿号”向东退却，安全躲进了自己施放的烟幕中。然而7时25分，它短暂地从烟幕中现出了身影，“大和号”的炮手们立即用这艘超级战列舰的主炮和副炮打出了齐射。此时的射程是20 313码，比早先那次“近得用显微镜才能分出来”的“白平原号”近失弹发射时近得多。这一回，“大和

号”的炮手们没有射失了：3枚18英寸炮弹命中了“约翰斯顿号”主甲板中部左侧。“就像一只小狗被大卡车碾过一样。”鲍勃·哈根回忆道。^[50]巨大的爆炸把这艘小小的军舰推得向右直晃，炮弹穿入了下甲板，摧毁了左侧轮机舱。锅炉舱里的一台锅炉炸裂，舱室里顿时充满了滚烫的蒸汽，有几个人甚至被活活烫死。

几秒钟后，“大和号”6英寸副炮的一轮齐射命中了“约翰斯顿号”的前部烟囱和舰桥左侧，舰桥里的高级军官们都被抛了起来，撞到舱壁上。哈根的头盔、通话器和望远镜都被从头上和脖子上甩了下来。他坐的小凳子被震碎了，让他摔在了甲板上，伤了膝盖。不过这位枪炮官还算是幸运的：两名站得比较近的人被当场炸死，另两人被弹片打死。埃文斯中校摔倒在哈根旁边几英尺的甲板上，光着上身——他的卡其色衬衫被爆炸的冲击波从身上扯掉了。舰长的头发被烧焦，脸被熏黑，流着血，左手被炸掉了两根手指。他带着伤站了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继续下达命令。他自己用一块手帕包扎住被炸断的手指根部。医生来时，埃文斯拒绝了救助，他说：“现在别打扰我。”^[51]

打到这个时候，“约翰斯顿号”和“塔菲3”其余各舰已身处险境。恰在此时，一片暴雨云及时从东边飘来，很快便将军舰笼罩起来。“拐子”斯普拉格将军直接冲了进去，于是在从左后方快速接近的一队日军巡洋舰眼中，他的6艘“婴儿平顶”便仿佛消失了一般。这令处在敌人惊人准确的舰炮火力下的美军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暴雨区中的能见度降到了几百英尺，但日军仍在继续开火，美军水兵们依然能看到熟悉的、弹着点密集的彩色水柱在自己队形中间炸开。“约翰斯顿号”也在向看不见的敌人还击，他们依靠的仅仅是经过改进的火控雷达——虽然炮手们无法目视确认是否击中目标，但确实有几艘日军巡洋舰在这时被5英寸炮弹击中。

斯普拉格并不觉得自己的胜算有多大。暴雨很快就会飘走，把他的军舰再度暴露出来。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最高速度稳超25节，而他的护航航母只能达到17节。在敌人看不见自己的时间里，斯普拉格把航向转向了西南方。他希望把追击者引向南方，带到莱特湾里奥尔登多夫舰队的那些巨炮面前。他还分析，如果能引诱敌人舰队远离圣贝纳迪诺海峡，那么敌人就将难以逃脱盟军其他海空力量的反击。至于“塔菲3”编队自己，“这场战斗看起来只可能有一种结局——完全毁灭”。[52]

哈尔西65艘舰组成的大舰队一整晚都在向北冲刺，想要在拂晓时伏击小泽。战术指令被发给米彻尔，他令三支航母大队的航向和航速保持些许差异，这样他们就能在晨光初露时抵达最佳起飞位置。所有航母都接到命令，要给它们的攻击机群装好弹加满油，在甲板上排列好，届时无论能不能找到敌人的准确位置，它们都将紧随第一批防空巡逻的F6F战斗机之后起飞。第34特混舰队被集合起来，由“大下巴”李指挥，在三支航母大队前方约10英里处占据前卫阵位。当东方露出第一道微光时，飞机开始从甲板上呼啸而起，升上天空。得到大力增援的搜索机队离开舰队，向从北到东各个方向飞去。由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护航“地狱猫”组成的攻击机群奉命在美军舰队以北约50英里处盘旋，等待找到敌人的确切位置。

在南方300英里外的“瓦萨奇号”上，金凯德将军和他的军官们正在庆祝奥尔登多夫在苏里高海峡中的完胜，并讨论着怎样勇猛地追歼退却的日军南路舰队残部。一名作战参谋提醒金凯德，他们还一直没有收到关于哈尔西是否留下重型舰艇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明确消息。还是谨慎些，去求证一下比较好。于是凌晨4时12分，金凯德直接询问哈尔西：“询问。第34特混舰队是否

在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53]

由于这一整个区域交战的规模极大，美国海军的无线电通信网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金凯德的电报直到6时48分才送到“新泽西号”上，距离发出已经超过了两个半小时。这令哈尔西困惑不已，他称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金凯德收到并误解了我前一天发给我的舰队的预备电文”。[54]他给出了否定的答复，表示第34特混舰队正和第3舰队的航母一起远在恩加诺角猎杀日本航母舰队。

侦察机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小泽舰队。“埃塞克斯号”战斗空中巡逻队中的一个战斗机小队被临时派往东北方执行侦察任务，就在哈尔西接到金凯德电报后几分钟，这支小队找到了敌人的航空母舰。此时它们正位于第38特混舰队15°方位，距离130英里。小泽正向北航行，显然是在逃跑。但这次和4个月前“马里亚纳猎火鸡”时不同了：现在美军手中全是大牌。距离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能见度良好，清风从美舰右前方45°吹来，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一边收放飞机，一边缩短和敌人的距离。第一批攻击机已经升空，正在美军舰队北方盘旋，它们只要飞一小段距离就能到达目标。[55]

日军仅仅起飞了少得可怜的一小群战斗机保护舰队，迎战一批批飞来的敌机，它们很快被屠戮殆尽。在这天的其余时间里，天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小泽的战斗机。美军攻击机群可以安全待在日军高炮够不着的高处，像秃鹰一样在敌人舰队上空盘旋，有条不紊。指定的攻击协调人留在高空，组织和指挥进攻，并确保他们不会一窝蜂涌向最大的那艘敌舰。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美军航母总共向小泽的舰队放出了527架次飞机。

埃德温·约翰·威尔上尉是“富兰克林号”航母上的一名寇蒂斯

SB2C轰炸机飞行员。他在1.4万英尺高度压下机头，向轻型航母“瑞凤号”发起了俯冲。他穿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射炮火，紧紧握住操纵杆，把日舰飞行甲板上的红丸标志保持在轰炸瞄准具中央。高度表的指针飞速旋转着，他在比标准投弹高度略低一些的目标上空600英尺处投下了炸弹。当他拉起俯冲时，他的后座机枪手在机内通话器中大叫着确认本机直接命中。此时，寇蒂斯飞机已经降到了海面上空100英尺低空。威尔驾驶着他的飞机左右闪躲着周围爆炸的高炮炮弹，直接从一艘重型军舰的侧旁飞过，看到了“它宝塔式的桅楼和令人心惊胆战的各种火力”。[56]

小泽舰队喷吐着美军飞行员所见过的最密集的高射炮火。比尔·戴维斯是“列克星敦号”上一名“地狱猫”飞行员，他俯冲突破了一阵密集得让他看不到下方海面的高炮弹雨。“在1万英尺高的地方是40mm和5英寸炮弹爆炸的黑色烟团……第二轮致命的烟云则是4 000英尺高的地方20mm炮弹的爆炸。”[57]戴维斯知道速度是自己的盟友，于是将节流阀一推到底。拉起俯冲时，他估计自己的速度超过了每小时500英里，比格鲁曼飞机的推荐最大速度快得多。他已经紧贴着海面，一艘日本重巡洋舰正拦在他的面前。它在飞机风挡里迅速变大，他已来不及转弯规避了。于是戴维斯拉起机头，向右狠压坡度急转，从上层建筑和前炮塔之间穿了过去。“我距离舰桥的窗户恐怕只有3英尺，都能看到指挥这艘舰的日本官兵，”他说，“有一位将军穿着白色制服，带着佩剑。其他官兵也都穿白色军服。我此刻时速有530英里，只是瞥见一眼，但这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58]

哈尔西的第一轮攻击命中了“千岁号”、“千代田号”、“瑞凤号”和小泽的旗舰“瑞鹤号”，“瑞鹤号”是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6艘航母中唯一幸存至今的，美军特别下定决心要把它送下海底。它在第一轮空袭中遭到重创，小泽不得不把自己的将旗转移到“大

淀号”巡洋舰上。[59]“千岁号”遭到3枚鱼雷和多枚1 000磅炸弹重击，大火失去控制，瘫痪在水上，于上午9时37分沉没。[60]

哈尔西直到上午8时22分才获悉萨马岛外的情况，此时他收到了金凯德的第一次紧急求救：“CTU77.4.3指挥官[‘拐子’斯普拉格]报告，敌战列舰和巡洋舰在其所部后方15英里处，正在向他开火。”[61]

哈尔西后来写道，这个消息“没有让自己警觉起来”，他觉得护航航母足以长时间压制敌人，让奥尔登多夫的重型战舰前来参战。[62]但此语毫无疑问有一股嘴硬的味道。情报官卡尔·索尔伯格记录说哈尔西脸色“苍白”，看起来“相当不耐烦”。[63]不论他觉得“塔菲3”编队胜算几何，哈尔西都必定意识到栗田的突然出现对他早前的决定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这至少意味着他夸大了前一天他的飞机在锡布延海中的战绩。

特湾现在急需快速战列舰。”[64]哈尔西说他对这一要求感到“惊讶”。按他对作战命令的解读，保护金凯德的舰队不是他的任务，是金凯德自己的任务。然而他还是电告麦凯恩将军，“尽可能发动空袭”。[65]此时他的第1特混大队还在菲律宾以东海面上加油。

“拐子”斯普拉格此时也直接加入了对话，他向金凯德发出的几封急电，都将“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列为抄送对象。[66]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违规，哈尔西和尼米兹并不属于斯普拉格所在的指挥链。但是情况紧急，无人提出异议。

半个小时后的9点，金凯德的又一封电报送到了“新泽西号”。第7舰队的老大这次还是重复先前的话，只是语气更加激动：“我情况危殆。快速航母和空袭支援或能阻止敌人摧毁护航航母部队并进入莱特湾。”[67]但哈尔西相信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他再次给麦凯恩发电，这次是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去截击栗田。之后他告诉金凯德，麦凯恩已经在路上了。[68]

22分钟后，金凯德来电，报称敌舰队“显然在夜间穿越了圣贝纳迪诺海峡。请求立刻空袭。并请求重型战舰支援。我的老战列舰弹药不足”。[69]

最后一句话是个新因素，哈尔西说，“如此惊人，我很难接受”。他想知道金凯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之后他看了时间戳，意识到自己接收金凯德电文的顺序错了。这最后一份电报是金凯德第三个发出，却是第六个被收到的。这还是几乎两个小时前的早晨7时25分发出的。在这两个小时里，“新泽西号”距离萨马岛外的战场又远了40英里。超负荷的无线电网络给两支舰队之间的通信带来了灾难。一名密码军官后来解释道，所有电报的发

送都遵循以瓦胡岛为中心的“F广播时间表”[70]，并且不允许发送大量文字，以免“由于其相当缓慢的字词发送速度而给时间表带来恐怖的负担，因为舰队中的所有军舰都希望收到大部分电报或至少能够收到电报”。[71]许多发送方不愿受限于这一落后的无线电通信模式，转而发送普通电报并打上“高优先级”标签。这个习惯很快蔓延开来，于是不可避免地拖慢了真正紧急电报的传送速度。

哈尔西答复道：“我正与敌航母部队交战。拥有5艘航母和4艘巡洋舰的38.1特混大队已得令立即前来支援你。”[72]他还附上自己的经纬度，以表明催他返航是没有意义的。第3舰队正远在北京400英里以外，即便哈尔西想要救援第7舰队，他也太远了。

金凯德起初的几封电报是“透明”发送的——意即用明语，不加密。这就令它们几乎是坐等着敌人来截获，但也会使它们能够更快通过译码室送到接收人手中。尽管如此，这一次无线电的传送还是耽搁了，不过金凯德告诉一名战友，他用明语发报还有一个原因——“让电文更具有刺激性，这显然做到了”。[73]

在“新泽西号”舰桥上至少一名下属的眼里，哈尔西那著名的蛮干心态似乎变弱了。这位将军孤独地坐在皮革窗沿上，压抑而安静。旁人能听到他的自言自语：“到嘴的鸭子，我不想让它飞了。”[74]

整个太平洋，乃至美国本土所有的军队司令部都实时监听着金凯德和哈尔西的对话。金和尼米兹两位将军被其中的几封电报列为“抄送人”。即便没有，他们通常也能收到所有的电文，因为他们的通信处监听着整个无线网络。低阶参谋们把每一次更新的经纬度位置都标注在桌面的海图上，好让将军们能直观地看到

各支舰队的位置。因此，在珍珠港和华盛顿，哈尔西仅有的两名直接上级都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并随时评价他的一举一动。两个人都很不满意。

先前和后来都是航母特混大队司令的“乔克”克拉克此时正在华盛顿宪法街的海军部里。走进金上将的办公室，他发现这位海军作战部长正在大发雷霆。金“像老虎一样”在地板上踱步，咒骂哈尔西把圣贝纳迪诺海峡丢下不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克拉克回忆道，“我见他发过很多次脾气，也见过他发大脾气，但这回却是能写进故事书里的。他走过来走过去，极尽恶语骂着哈尔西，连空气都凝固了。”[75]

同时，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步。据他的参谋长助理伯纳德·奥斯汀说，这很稀奇，因为“尼米兹将军不是那种喜欢踱步的人。他会冷静地面对许多问题，对于头脑里正在据实应对的困难不动声色。但是这一次，他也走过来走过去。因此我意识到这意味着这位五星上将正处于最严重的忧虑之中”。[76]

尼米兹后来说，这段时间里他大多待在马卡拉帕山上居所后面的马蹄铁赛场[77]里。“我如坐针毡，却不能表现出来。于是我回到宿舍去拿马蹄铁，告诉我的幕僚，‘如果有消息，就送到那里给我’。这场日本舰队彻底覆灭之战中的大部分电报，我都是在马蹄铁赛场里收到的。”[78]这毫无疑问是可信的，但根据几位尼米兹幕僚的说法，在哈尔西北上恩加诺角的关键的几个小时里，尼米兹都待在司令部里。他不停地按铃把奥斯汀叫到办公室，每次都问他有没有电报能够显示哈尔西是否留下重型战舰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奥斯汀梳理了所有电文，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建议尼米兹将军干脆向哈尔西求证海峡是否有人防守。但尼米兹没有这么做，他说“他不想发出任何可能直接或间

接影响战场负责人对其部队战术运用的电文”。[79]

这段时间里，尼米兹办公室的里里外外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幕僚，包括福里斯特·谢尔曼和杜鲁门·赫丁。当金凯德报告说“塔菲3”编队遭到攻击时，他们再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尼米兹是否应该询问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

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开战三年来，尼米兹从来没有通过索要信息或者催促舰队司令采取行动而插手过某一场战役。他常常很想去这么做，或者被幕僚们怂恿这么做——包括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1942年下半年瓜岛周围的几次海战，最近一次是在当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但尼米兹每次都忍住没有干扰他的舰队司令，他选择相信他们的战术判断。

珍珠港方面没有收到哈尔西发给金凯德的关于战列舰已随同第3舰队北上的电报。因此这个问题被谢尔曼、赫丁和奥斯汀第三次提给总司令。何不干脆向哈尔西询问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最后尼米兹终于同意了。

这份简短的电文由谢尔曼或者奥斯汀编写——说法不一——经由尼米兹批准发出：“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80]金和金凯德也作为“告知”收件人一并发送。

这份电文嗖的一声通过气压输送管送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地下室里的编码室，密码无线电通信史上最著名的乌龙事件便拉开了序幕。给外发电文加密时的标准做法是在正文的首尾添加几个无意义的词句。这些废话被称为“填凑部分”（padding），目的是迷惑敌人的密码破译人员。“填凑部分”和正文之间会插进两个无意义的字母，接收方的通信官要先把这些废话去掉再交给接收人。由于认为短电文更易于破解，因此人们也常重复正文中的一部分文字，仅仅是为了让电文更长些。于是，此番发出的电文

便成了这样：

火鸡跃入水中GG发件人CINCPAC [尼米兹] 主送第3舰队司令 [哈尔西] 告知COMINCH [金] 第7舰队司令 [金凯德] X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RR全世界都想知道。[81]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新泽西号”高大的无线电塔收到了电文的一笔一画。在下方的解码室里，一名电报打字员在一小截纸带上打了解码后的电文。一般情况下通信人员会把正文抄下来，作为正式电文。但是当电报很急时，就像这次一样，他们也会直接把填凑部分撕下来，把解码后的纸带原样送到指挥室。通信官查尔斯·福克斯上尉看出来前一段填凑部分是废话，便撕掉了它，但最后几个字却让他犯了难。虽然它们与前文之间隔了两个看似无意义的字母，但谁也不敢保证这“RR”不会是某一段电文错乱的遗留。在情况难以判定或模棱两可时，若无法确定一段语词到底是填凑部分还是电报正文，那么标准的做法就是把它留在纸带上，交给接收人自己去判断。[82]

福克斯把解码纸带交给一名下级，后者把它放进文件盒，塞进气压输送管，它又一次嗖的一声被送到了三层甲板上的指挥室里。一名通信官把它从管道里取出来，看这是尼米兹发的，便直接交给了哈尔西，他扫了一眼，读出了一股挖苦的味道：“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全世界都想知道？”

哈尔西爆发了。好几个人都说他脸色涨成了紫红色，把帽子摔在甲板上，把电文揉成一团，扔在地下还踩了一脚。还有人说他眼中噙满了泪水，哀伤地抱怨着，快要哭出了声。“我震惊了，如同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他后来写道。[83]他咆哮道：“切

斯特怎么能给我发出这种浑蛋电报？”[84]

这位四星上将在第3舰队司令部众目睽睽之下崩溃的场面令“米克”卡尼警觉了起来，他迅速来到哈尔西面前：“别这样！你在搞什么鬼东西？振作起来！”[85]

哈尔西冲出了舰桥，回到他的卧室里，卡尼也紧跟其后钻了进去。两人关了门，在里面单独交流了近一个小时。在这一段时间里，第3舰队仍在继续高速北上，向着小泽已遭重创的舰队开去，却离萨马岛外急如星火的战场越来越远。

据查尔斯·福克斯说，这份电报被反复解译了好几次，那句似是而非的“全世界都想知道”很快被纠正了。[86]考虑到这句话的重要性，这个乌龙和纠正的结果要立刻让哈尔西知道。于是在他最初的震惊后不久，哈尔西就知道自己误解了电文的那最后一句——此时他不是还和卡尼待在舱内，就是刚刚回到指挥室。哈尔西和卡尼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那一个小时的促膝长谈谈了什么，但是作为老海军，他们应当能够理解“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这句只是个编码习惯，并非想要在电报中表达什么强硬口气。哈尔西很熟悉尼米兹，知道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不会恶语伤人，这次当然也不会。“我被这封看起来很无礼的电文激怒了，”他后来如此告诉一位历史学家，“当怒气平息下来之后，我便开始思考，我意识到是哪里搞错了。我还意识到尼米兹将军不可能给我发这样一封电报。”[87]因此可以想见，最初的误解没有持续太久。[88]

还有一点因常被忽视而值得重点说明。即便不考虑那条不恰当的填凑部分，无论这条电文如何平淡无奇，尼米兹的询问也会令哈尔西老脸丢尽，颜面扫地。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此前从未在战役过程中插过手。即便把“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理解为

一个简单的询问而不是一种催促，这也暗含着责备哈尔西没能清晰无误地上报自己动向的意味。如果尼米兹都没能理解哈尔西先前的电报，那么又怎么能指望金凯德做得到呢？实际上，尼米兹肯定是在责怪哈尔西放任日军溜进来袭击了第7舰队。把这封电报同时发给了金和金凯德，更是加重了这种指责的分量。

在这种环境下，尼米兹的电报根本就不是询问。那是命令，只是礼貌地用询问的语气说了出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再怀疑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他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它和第3舰队其余兵力一同北上了。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本身就是第34特混舰队的一员。换言之，哈尔西在哪里，第34特混舰队就在哪里——这位将军在发给金凯德的几封电报中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比如“我正带三支大队向北行进”，还有“我正与敌航母部队交战”。哈尔西不会把他的战列舰丢在没有空中掩护的地方，但他也说得很明白，所有三支航母大队都北上了，因此，战列舰肯定也跟着去了。更直接地说，大家都知道栗田已经溜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深入了足以炮击第7舰队的地方。既然第34特混舰队没有留在那里拦截栗田，那也就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它肯定是到北边去了。战争结束许多年后，尼米兹告诉自己的传记作家：“我很清楚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89]

上午11点前，哈尔西和卡尼带着坚毅的表情回到了指挥室。卡尼开始起草命令。第34特混舰队将要掉转航向，以最高速度南下救援第7舰队。一支航母大队，博根的第2大队，将一同南下，其余两支航母大队将留下来消灭日军北路舰队。当这些巨舰开始转向时，他们距离最近的小泽舰队残舰只有42海里，几乎就要在海平线上看到它们了。这真是太扫兴了。哈尔西后来写道：“我向我自从军校学员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机会挥手道别。”^[90]但尼米兹要求他必须如此。他告诉金凯德：“我正带领第38.2特混大

队和6艘快速战列舰开往莱特湾。”[\[91\]](#)但他也补充道，自己预计无法在次日上午8点前到达。

“尾追难追”，这是老海军们的格言——这天上午在萨马岛外的追击战正是如此。栗田中路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比“塔菲3”编队的那些护航航母大约快10节，但斯普拉格灵活地指挥舰队机动，改变航向，将追击者置于尾后，并完美利用了烟幕和多雨的天气。他让他的6艘“婴儿平顶”在暴雨中躲了20分钟，其间他转向南，继而转向西南。日军根本无法像斯普拉格最害怕的那样抄他的近道截杀他，只能跟在他后面转弯，追击距离拉长了许多。栗田松散的梯队队形也不断被空袭阻碍，这些飞机有些来自“塔菲3”编队自己，有些则来自南方相邻的其他“塔菲”编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塔菲3”编队中护航的小“铁皮罐头”们——几艘驱逐舰和驱护舰——打了一场激烈而拼命的后卫作战，迫使日舰反复躲避鱼雷，为航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早晨7时50分，“霍埃尔号”、“赫尔曼号”和“雷蒙德号”以最大航速向右急转，向敌人冲锋。驱逐舰开到了30节航速，螺旋桨拍击着海水，舰尾下沉，舰首上扬，直冲敌人的核心力量战列舰而去。遭到重创的“约翰斯顿号”靠着应急操舵，也努力跟在进攻的驱逐舰后面，用它的5英寸主炮向最近的日本巡洋舰开火。日军也开到了近30节航速，因此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当打头阵的驱逐舰“霍埃尔号”与敌人距离接近到1.8万码以内时，舰上的鱼雷兵们做好了发射的准备。他们把鱼雷调到中等速度。一半鱼雷管对准了迎面开来的战列舰，另一半则瞄准了右舷的巡洋舰。“霍埃尔号”在9 000码距离上射出了鱼雷，随后向右急转脱离。[\[92\]](#)

日军让这些勇敢的小驱逐舰付出了代价。当“霍埃尔号”的侧舷暴露在敌人面前时，一阵弹雨砸进了它的左侧，炸毁了舰桥。舵手和几名军官被当场炸死，所有的语音无线电通信也都中断了。它的后部锅炉舱和后轮机被直接命中，左侧发动机被炸毁。一枚命中舰尾的炮弹导致船舵卡住，使得“霍埃尔号”只能原地转圈。舰员们迅速转为应急人工操舵，才保持住了航向，脱离敌人。[93]

与此同时，“霍埃尔号”的鱼雷呈扇面向北扑去。7时54分，“大和号”上的瞭望哨指着左前方袭来的鱼雷航迹大叫了起来，这艘巨大的战列舰随即向左急转以躲避危险。但这么一来，它便转向了北方，离自己的敌人越来越远。4枚鱼雷航迹在它右舷，航向大致平行，左舷还有2枚。“大和号”的航速是26节，和鱼雷差不多，于是它被鱼雷夹在了这一航向上，直到它们耗尽燃料沉入海底。宇垣将军记录道，“大和号”被迫向北航行了大约10分钟，“但我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小时。等到航迹消失后，我们才最终得以向右转弯，然后开足马力继续追击”。[94]

“霍埃尔号”的鱼雷管里还有几枚待发的鱼雷，但是鱼雷兵们却在弹雨中死伤惨重。于是一名前部鱼雷管的军官跑到后面，接管起那里的鱼雷管，用目视瞄准，向从左后方6 000码外靠过来的日军重巡洋舰纵队射出了5枚鱼雷。“打完10枚鱼雷，我们认定，现在是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一名“霍埃尔号”的幸存舰员说。[95]但是由于一台发动机被毁，它的航速下降到了17节。现在，敌人战列舰从右后方驶来，巡洋舰则从左后方步步紧逼，“霍埃尔号”已经无可选择。它左右摇摆着“追逐弹着点”，但是猛烈的炮火先是落在它的左右两侧前方，接着便砸在两旁。“霍埃尔号”很快便浑身中弹，千疮百孔。鱼雷舱、信号舰桥、救护所和两门20mm高射炮都被炸掉了。其左舷水线上下多

处中弹，致使下部舱室很快被水淹没，舰体严重左倾，大火失去了控制。舰桥上传来弃舰的命令，传令兵们被派往舰体下部各处，把弃舰令传达给战位上的水兵们。人们于是咳嗽着爬上了梯子，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他们从尸体和濒死的战友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然后跳进海里。即便舰尾已经没入水中，“霍埃尔号”的前部炮塔仍在勇敢地开火射击，于是一名传令兵被派过去告诉炮手们停止射击，到安全的地方去。[\[96\]](#)8时55分，“霍埃尔号”翻倒在水面上，舰尾朝下。它的舰首高高抬起，之后带着300名舰员中的253人渐渐沉入大海。

萨马岛海战, 1944年10月25日



幸存者们在水中挣扎着，攀附到浮筒救生网上，并尽其所能地照顾好伤员。日军舰队从手枪射程距离上经过，却无人向水中的人射击。美军水兵们抬起头，和经过的军舰上从栏杆后静静看着自己的日军水兵四目相对。四艘战列舰从旁边经过，还有八艘巡洋舰。巨舰一艘接着一艘，全都悬挂着红白相间的旭日军旗。宇垣将军从“大和号”的舰桥上看着下方的“霍埃尔号”逃生者们，

他想知道：“他们对我们追击舰队的雄姿有何感想？”[97]美军水兵们确实被巨大的“大和号”和它高耸的灰色宝塔形桅楼震撼到了。有个人叫道：“我的上帝，看那个！”当一架美军战斗机穿出云层，扫射经过的舰队时，他们更是惊呆了。“我们离军舰特别近，都能听到.50口径子弹打在坚硬的木甲板上，”“霍埃尔号”幸存者格伦·帕金说，“日本人用差不多所有的轻武器还击。那架F6F冲下来，进行了扫射又回到云中，前后不超过30秒。我的上帝，这太好看了——还是在前排佳座。”[98]

此时，“塔菲3”编队的航空母舰已经开出了暴雨区，向西南偏南方向逃离。斯普拉格的旗舰“方肖湾号”行驶在队形最前方，“白平原号”和“加里宁湾号”跟在后面，“圣洛号”在右，“基昆湾号”和“甘比尔湾号”居左。

4艘日军巡洋舰——“筑摩号”、“鸟海号”、“羽黑号”和“利根号”——正稳步接近“塔菲3”的左后方。这些强大军舰的最高航速超过了30节。随着这场追击战进入第二个小时，它们已经将距离缩短到了1.4万码，各航母常常被6英寸和8英寸炮弹跨射。这些脆弱的小舰在近距离爆炸的冲击下剧烈摇动——舰员们摔倒在地，电气系统短路，舰体钢板间撕开裂缝。“方肖湾号”被直接命中4弹，或许是它的轻型结构救了它，因为至少有两枚穿甲弹在多层甲板和多个舱壁上打了个对穿，在舰外爆炸。

驱逐舰依旧在队尾以之字形航行，全力施放烟幕。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上的小迈克尔·巴克回忆道：“我们一直不停地右满舵，左满舵，右满舵，左满舵，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周围。”[99]随着追兵的步步紧逼，华丽的彩色水柱愈加靠近“弗兰克斯号”。在一次落点很近的炮击中，巴克甚至爬到了会议桌底下，卧倒抱头。他想知道敌人怎么会溜到离美军舰队这么近的地方却没有被巡逻飞机发现：“我不敢相信会在这么近的距离上看到这些军

舰。我都能看见其中一艘舰上的旗帜，它太近了。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距离我们这么近，我们的将军们却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在看其他地方，他们却从后面过来了。”^[100]

斯普拉格一次又一次被高速杀来的追兵逼着转弯，渐渐将航向转向西南，最终几乎转向正西，直朝着萨马岛绿色的群山奔去。漫长的航程打乱了美舰的队形，让这六艘航母大致形成一路纵队。其中“加里宁湾号”和“甘比尔湾号”被姊妹舰们甩在最后，格外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的炮口前。它们同时也在用5英寸“豌豆枪”向最近的日本巡洋舰还击，这些巡洋舰已经来到了它们左舷外。“加里宁湾号”被命中超过12次，以及数量或许两倍于此的毁灭性近失弹；它的舰长觉得此舰没有被追上摧毁简直是个奇迹。

落在最后的“甘比尔湾号”情况最为严重。在大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艘航母依靠“追逐弹着点”战术，未被直接命中。但在8时20分，它左舷中部水线处遭到重重一击。成吨的海水涌进舰体，淹没了左前部的轮机舱。失去一台引擎之后，它的航速跌到了11节。此时日军已经撵上了它的脚后跟，它逃不掉了。舰长沃尔特·V.R.菲韦格上校告诉斯普拉格将军自己的军舰要掉队了。日军巡洋舰很快追了上来，开始在近距离向它倾泻弹雨。与此同时，战列舰“大和号”和“金刚号”也从尾后测准了距离，用大口径主炮向不幸的“甘比尔湾号”展开雨点般的齐射。

刚刚领教过“大和号”18英寸巨炮怒火的“约翰斯顿号”，此时仍在低速前进。它的舵机被毁，无法修复，因此只能靠4名强壮的水兵人工操舵（就和古代一样），这些人每10分钟就要轮一班。埃文斯起先用电话下达转向命令，但他很快就不得不离开已被摧毁的舰桥，跑到舰尾，直接吼叫着向下面的舵手发令。舰上的火控系统已经失灵，因此各炮只能“各自为战”，但“约翰斯顿

号”仍在竭尽所能地坚持战斗。

8时10分，它从浓密的烟幕中开出来，发现姊妹舰“赫尔曼号”正处于将与自己相撞的航线上高速行驶，距离只有200码。两边的舰长都下达了“全引擎倒退”的命令，虽然“约翰斯顿号”只有一台引擎可用。站在“约翰斯顿号”舰部深水炸弹导轨旁的鲍勃·迪尔被晃倒在地：“我们的舰尾深深沉入水中，海水都漫上了后甲板。”^[101]“赫尔曼号”的两台引擎开足马力倒退，完全停了下来，随后以15节速度反向脱离。这样，这两艘姊妹舰才算是以仅仅10英尺的距离擦肩而过。两边的舰员同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埃文斯用他仅有的一台可用引擎前进，避开“赫尔曼号”，继续战斗。^[102]

8时20分，“金刚号”从“约翰斯顿号”左边的烟幕里现出身来，距离7 000码。美军向日军巨舰打出了大约40枚5英寸炮弹，并观察到几枚炮弹击中了宝塔形的上层建筑。“这根本起不了什么决定性作用，就像是用纸卷打钢盔一样。”哈根承认道。当“金刚号”的14英寸炮转向“约翰斯顿号”并开始还击时，美舰再次躲进了自己施放的烟幕中寻求掩护。10分钟后，烟幕消散，“甘比尔湾号”出现在了前方几英里外。它瘫痪在水面上，正在遭受一艘日本巡洋舰的猛烈射击，可能是“筑摩号”。哈根回忆道：“埃文斯中校向我下达了我听到过的最英勇的命令。‘向那艘巡洋舰开火，哈根，’他说，‘把它的火力从“甘比尔湾号”引到我们这边来。’”^[103]

“约翰斯顿号”现在和巡洋舰“矢矧号”交上了火，并被命中了几枚6英寸炮弹，受损。敌方一支5艘驱逐舰组成的纵队从另一边接近过来，显然是要开往已被打残的“甘比尔湾号”。此时，“约翰斯顿号”是附近仅有的一艘美军驱逐舰，因此它向所有敌舰轮流开火，将火炮逐一指向进入射程的日舰。此时的“约翰斯顿

号”一侧遭5英寸炮弹轰击，另一侧遭8英寸炮弹重击。它的前部炮塔哑火了，舰体处处带火，40mm炮弹整备器被火焰吞没，高射炮弹被灼烧至爆炸。轮机舱里充满浓烟，把舰员们赶到主甲板上，那里已经被鲜血染红，到处躺着战友的尸体。

南边2英里处，“甘比尔湾号”已经成了一艘废船，它瘫痪在水上，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倾覆。它机库甲板上一架“复仇者”爆炸了，火焰引燃了泄漏出来的航空汽油。黑烟立即从下甲板升腾起来，迫使人们爬上梯子来到飞行甲板上。一次爆炸把升降机从机井里炸飞了出来。暴风雨般的炮弹撕扯着军舰，把它开膛破肚，炸死了几十名舰员。许多炮弹从左侧打进右侧出来，把军舰打个对穿，因此有些日舰换上了装有瞬发引信的高炸弹，它们会在命中舰体的瞬间爆炸。上午8时45分，舰长下令将所有密码本和其他保密材料扔进海里，之后要求舰员离舰。9点后不久，“甘比尔湾号”侧翻，很快沉没。它成了唯一一艘被舰炮摧毁的美军航空母舰。

随后，日军驱逐舰向“约翰斯顿号”靠过来，向这具燃烧的残骸倾泻弹雨。但残骸上唯一一门依然能用的炮塔仍不屈不挠地还击。上午9时45分，在三个小时残酷的战斗之后，埃文斯中校传令弃舰。当幸存者跳入海中或者攀爬到救生筏上时，敌驱逐舰开到了近距离，向“约翰斯顿号”射击，直到它消失在波涛之中。

奥野匡是日本驱逐舰上一名25岁的水兵，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水面上的人浮浮沉沉，半裸的舰员们拥挤着爬上救生艇，划着桨逃离。我们近到能够看见他们没刮干净的胡子和胳膊上的文身。我们的一名机炮手冲动地扣动了扳机。他一定是被对敌人的仇恨冲昏了头。但来自舰桥的一个响亮声音制止了他：‘不要向逃生人员射击！停止射击，停！’”^[104]美军幸存者们

证实日军确实停了火，还有一个人看见一名日军舰长向沉没的“约翰斯顿号”举手敬礼。

打到这个时候，栗田舰队的队形已经几乎完全散了架。战场上满是低云、暴雨和施放的烟幕，能见度仍然很差。日舰之间彼此无法目视联系，而由于技术故障和关键人员伤亡，日军指挥官想要保持无线电联系也很难。日军各舰航速不同，为追击不同目标而开往不同的方向，躲避鱼雷，迎击空袭，这一切使得日军舰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失去了统一的目标。他们对“塔菲3”编队剩余的5艘护航航母已不再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尾随追击你们的军舰，而它们都在之字形航行，很难缩短距离，”栗田后来说，“而且，由于你们驱逐舰的鱼雷攻击，各主要舰艇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105]日军瞭望哨很难识别出正在追击的敌舰类型，他们觉得那是些30节航速的埃塞克斯级航母，这样即便追一整天，他们还是会在舰炮的射程之外。小柳参谋长判断“追击战将会成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我们将无法打出决定性一击。而以最高速度航行，我们的燃料消耗速度将值得警惕”。^[106]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栗田将军向麾下各舰发出信号，停止追击，随同自己转向北。

“拐子”斯普拉格对“方肖湾号”没有被追上干掉感到意外，他开始期待他的舰队能有一部分逃出生天。8时15分，在敌人的追杀下逃了一个小时后，他向军需官说：“上帝，我想我们或许还有机会。”之后当“甘比尔湾号”被追上并被舰炮击沉后，这个前景又暗淡了下来。当日军的大炮最终沉寂下来，敌人转而向北航行时，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方肖湾号”上一名信号兵故作慌张地喊道：“见鬼，小子们，他们跑了！”^[107]

大西将军知道，直到这天上午，他新的神风自杀部队还一事无成。从10月21日起，一连三天，关行男大尉每天都率队从吕宋岛的马巴拉卡特机场起飞，但这些战机每一回都找不到合适的舰队目标，然后丢人现眼地飞回基地。24日，机场上空浓云密布，飞机甚至都没有起飞。驾驶“神风”侦察机的飞行员技术熟练，可以让他们在云层中飞行，但是大部分被指派的自杀飞行员都只有最基本的飞行技术，大西不希望他们因事故而白白损失或者不知去向。最好还是等到天气晴好，这样他们至少还会有一次撞击的机会。

自从战争爆发之初起，一个一个的日本飞行员就一直在自发地把自己的飞机变成人操导弹。进攻之初，莱特湾里的盟军舰队就遭到过几次这种“非官方”的自杀攻击。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0月21日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澳大利亚号”遭受的撞击，当时，一架单枪匹马的爱知D3A1轰炸机从军舰右前方掠海高度飞来，然后突然压坡度撞向军舰的上层建筑，机枪也在近距离上猛烈扫射。飞机撞上了“澳大利亚号”主桅杆瞭望台下方的位置，炸成一团橘黄色的火球。燃烧的航空汽油涌入上层建筑内部，破片横扫舰桥，舰上一众高级军官非死即伤。舰长腹部被击中，迅速被送往急救所，在那里痛苦地死去。大火最终得到了控制，“澳大利亚号”也仅仅受了轻伤，但是这次攻击却让盟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假如日军有组织地大规模运用空中自杀战术，他们将会遇到些什么。

第一次成规模的自杀攻击落在三支护航航母编队中最南边的托马斯·斯普拉格的“塔菲1”编队身上，此时正是萨马岛追击战最激烈的阶段。当时“塔菲1”的航空母舰正转向迎风航向放飞飞机——飞机将飞向北面去攻击栗田舰队——这时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从云层中出现，向“桑提号”和“苏万尼号”俯冲下来。一架飞机

撞中了“桑提号”飞行甲板的后升降机前部，炸弹穿入机库甲板爆炸。舰员们控制住了大火，但是不幸的“桑提号”此时却又被日本潜艇伊-56射出的一枚鱼雷击中。在一片混乱之下，“桑提号”的军官们都以为军舰是被舰上损管队丢弃到海里的一枚深水炸弹炸伤的，直到一个月后军舰被送进干船坞修理，美国人才意识到它是被一枚日本鱼雷击中的。同时，它的几艘姊妹舰近旁也有近失弹落下，这可能是自杀飞行员未能命中，栽进了附近的海里。“苏万尼号”在24分钟的时间里被两架“神风”机撞中，其中第二架飞机把机库炸成一片废墟，令“苏万尼号”在这天的一整个下午都无法再收放飞机。

三个小时后，当栗田中路舰队放弃追击向北转向后不久，又一轮“神风”到来了。似乎是“拐子”斯普拉格的编队这一早上经受的磨难还不够，这一次致命打击直接落在了“塔菲3”编队身上。舰员们此时刚刚解除高级战备状态，正在庆幸自己意料之外的死里逃生，雷达屏幕忽然显示许多敌机正从北面飞来。上午10时40分，6架日机出现在舰尾，天空顿时被高炮炮弹填满。两架飞机撞击了“加里宁湾号”，炸成了一团烈焰：爆炸和火焰造成5名舰员死亡，50人受伤。另一架飞机瞄准了“方肖湾号”，却被高炮火力击毁，坠落在军舰侧旁。“白平原号”的炮手同样在极近距离上摧毁了一架敌机，但是敌机炸弹却在很近距离上爆炸，许多人被落在飞行甲板上的破片击伤。一架零战擦着“基昆湾号”的舰桥飞过，撞在它的左前方高炮走廊上，瞬间燃起大火，但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大部分被命中的航母，其损管队都努力控制住了火势，军舰至少能够依靠自身动力脱离战场，只有一艘例外。它就是上午10时53分被撞中的“圣洛号”。一架零式战斗机急转弯躲过“白平原号”射出的高炮火墙，飞到了“圣洛号”舰首上方，随即在飞行甲

板上方直接压机头，撞中了军舰正中央。机上的250千克炸弹在机库中爆炸，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吞没了弹药库中存放整备妥当的炸弹和鱼雷。接着，这艘轻量化结构的军舰被一连串爆炸撕扯得七零八落，开始向左倾斜。虽然“圣洛号”的两台引擎还能正常工作，但舰长还是关闭了引擎，下令弃舰，舰员随即开始从侧面跳入水中。随后，向左严重倾斜的军舰突然正过来，然后开始向右翻滚。上午11时25分，它翻倒在海面上，沉入海中。刚刚和栗田那些战列舰、巡洋舰英勇战斗过的护航舰艇赶紧靠了过来，救援幸存者。大部分舰员，800人中的754人，被救了上来。

这次进攻由关行男大尉率领，他是被大西将军亲自任命，率领吕宋岛马巴拉卡特基地第一支“神风”自杀机部队的。观察机队由西泽广义飞曹长率领，他是日本海軍中最负盛名的零战王牌之一。西泽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战报：关大尉的四架自杀机命中了目标，击沉一艘航母和一艘轻巡洋舰，击伤了另一艘航母。这个消息立刻通过无线电发给东京，随即写入公报发布了出去。

日本的公报第一次没有夸大战果。战场上没有巡洋舰，但是关行男的飞机命中了三艘航母，而不是两艘，一艘被摧毁，另两艘也遭到重创，不得不撤回后方基地进行大修。

这一小群新手自杀机飞行员的攻击，成了刚刚落幕的大海战的尾声，也是一个凶兆，预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双方都对此战的教训牢记于心：如果日军飞行员愿意用性命来确保命中盟军军舰，他们就能要盟军的命。

哈尔西所部各舰彻夜向南疾进，但还是来得太晚，未能抓住撤退的栗田。这位将军和他的幕僚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敌人舰队冲进莱特湾的消息，金凯德发来的电报还一度自相矛盾。一连串

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无线电战报飞到了“新泽西号”的指挥舱。“汤米”斯普拉格先是说“情况好些了”，但是45分钟后他又说“敌水面舰队继续攻击护航航母”。[108]当最终确定栗田已经放弃进攻时，哈尔西决定以最高速度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入口，以期在这个必经之道截住他。他重新编组了部队，让速度最快的战舰超前行动。追击部队包括他自己的旗舰“新泽西号”和姊妹舰“艾奥瓦号”（又译“衣阿华号”），以及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他们开到30节航速，将航向指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他们在凌晨1点后不久抵达目的地，但是栗田却抢先一步来到这里，并在两个小时前安全抵达海峡另一端。落入美军舰炮射程的只有一艘掉队的日舰，就是身负重伤的驱逐舰“野分号”。这艘残舰太小，根本不值得动用“新泽西号”的16英寸巨炮，于是哈尔西派出一艘驱逐舰赶过去结果了它。这是整场战役中第3舰队司令部唯一目睹的战斗。强大的“新泽西号”向北追击了300英里，继而掉头，又向南追击300英里。属于它的战役便这么结束了，它的大炮依然是冷的。“老鼠在猫赶来之前就躲回了洞里，”卡尼悔恨地总结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它溜过去时赶紧抓住它的尾巴。”[109]

此时，在恩加诺角外，第3舰队留下来的两支航母特混大队（38.3和38.4大队）仍在不停地向撤退的小泽舰队残部放出攻击机群。4艘日军航母被他们送下海底，包括“瑞鹤号”，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日军航母中的第6艘，也是最后一艘。本着友好竞争的精神，美军各航空兵单位都给予这艘舰格外关注，都想要拿到对它“致命一击”的荣誉。弗雷德里克·C·谢尔曼将军回忆称，从他第38.3特混大队飞行甲板上起飞的第三攻击波“最后终结了‘瑞鹤号’，直接命中9枚1 000磅和2 000磅炸弹”。在此之前，它已经被命中了估计有7枚航空鱼雷。这具燃烧的躯壳严重左倾，然

后在下午2时14分翻倒，舰首朝下沉入海面。在远处观察的目标协调员称这是“十分壮观的场面”。[110]

当天下午，劳伦斯·T·杜博斯少将率领的一支巡洋舰——驱逐舰分队被派出去用舰炮击沉敌人残舰。杜博斯的军舰追上了“千代田号”，用舰炮一直打到它沉没为止。上空盘旋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把战报转发回特混舰队：“17时1分击沉轻型航母一艘——4艘全部击沉，无一逃脱。”[111]三个小时后，这支舰队又击沉了驱逐舰“初月号”。然而夜幕降临后，杜博斯却被召了回去，两支航母大队转向南，次日他们将继续跟随哈尔西行动。

现在，所有残存的日军舰艇都飞速撤退了。舰载机一路追杀撤退的敌军，追到棉兰老海、苏禄海和锡布延海。“塔菲”编队的护航航母也放出飞机追击西村和志摩两支舰队最后的败逃战舰，最终在25日下午结果了“最上号”。丧失部分动力的“阿武隈号”巡洋舰已经无法有效机动，被美国陆军B-24“解放者”轰炸机群投下的密集的500磅炸弹弹雨命中，最终在内格罗斯岛附近沉没。10月26日一整天，栗田舰队在撤退途中遭到了美军飞机的反复攻击，许多舰艇都再次遭到打击，包括“长门号”、“榛名号”、“熊野号”和“大和号”。其巡洋舰“能代号”于上午11时37分在塔布拉斯海峡沉没。西村的南路舰队中，仅有“时雨号”一艘舰幸存，它孤零零地回到文莱湾，其舰长也成了这支舰队唯一生还的指挥官。小泽舰队中的巡洋舰“多摩号”撤退时在吕宋岛东北方被美军潜艇“仿石鲈号”击沉。志摩将军丢下了受伤的友舰，才算是乘坐“那智号”逃出了苏里高海峡——但它后来还是在马尼拉湾遭到第38特混舰队舰载机的攻击并被击沉。舰载机扫射了水面上的幸存者，807名舰员丧生。

若按照历史学家设定的标志战役结束的时间界限，有些这种后续的扫荡作战已经不再属于莱特湾海战了。然而即便有此限

制，这场大规模的较量也已经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了。参战军舰近300艘，总吨位约300万吨。参战舰队载有20万人，比得上一个中等城市了。双方总共损失了34艘舰船，超过500架飞机，超过1.6万人伤亡。这场战役还囊括了每一种能想到的海战形式，每一类型军舰——航母空袭，水面战舰之间的舰炮和鱼雷对决，潜艇攻击，鱼雷艇蜂群式攻击，以及自杀式空袭。战役中，苏里高海峡打出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战列线对战”，萨马岛外海的“铁皮罐头”们打出了大卫对抗巨人歌利亚式的以少胜多之战，再就是“神风”之战正式开场。这场持续了四天的“战役”实际上是由广泛分散在10万平方英里洋面上的多次相对独立的战斗组成的。其中四场战斗的规模大到可单独成为一场大战，它们分别是：锡布延海海战，苏里高海峡海战，恩加诺角海战，以及萨马岛海战。实际上莱特湾内并没有发生海战（空袭除外），因此这整场会战的名称并不恰当。美国海军起初称其为“第二次菲律宾海海战”，早期有些历史学者也用了这个称谓。但是麦克阿瑟更喜欢称其为“莱特湾海战”，因为这强调了他的滩头阵地是敌人分进合击的汇聚点，于是这个名称便流传了下来。（其实“菲律宾海战”的名称比上述两个称谓都要合适，但这个问题早就尘埃落定了，不必再纠结。）

这场战役宣告了太平洋海战的终结。鉴于旧日本海军在战役之前已经十分虚弱，他们在莱特湾的损失可谓是毁灭性的：4艘航母，3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日军飞机的损失在战役前数周里原本就十分惨重了，但日军又努力丢掉了差不多500架。清点损失的官兵人数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数字最终超过了1.2万人。日本舰队的残部挣扎着逃走了，但他们再也不会大规模出击了。交战双方都已预见到，随着美军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日军的南北海运线将不再畅通，这意味着日军幸

存的重型战舰将由于燃油耗尽而动弹不得。小泽将军说，舰队的幸存者“完全成了摆设……水面舰艇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一些特殊舰艇除外”。^[112]日本舰载航空队的少许残余力量都被部署到了陆地机场，剩下的飞行员和飞机大部分都被用作了“神风特攻队”。

盟军方面也有损失。美军损失了1艘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2艘护航航母（“甘比尔湾号”和“圣洛号”），2艘驱逐舰和1艘驱护舰。其他许多军舰也受损严重，不得不送回马努斯、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大修。美军有1 500人战死或失踪，两倍于此的人受伤。相对于这场胜利的规模，这些损失倒不算过分，却也让胜利者备感苦涩。第3舰队和第7舰队之间的往来电报中也可以听出一种指责的意味。萨马岛外那场战斗近乎溃败，后来的海空救援行动又乱成一团，导致这次行动中“塔菲3”编队的超过1 000名幸存者从日军舰队离开起在海里泡了几乎两天。由于误报位置，最初的救援行动覆盖区域过于偏南。迟至10月26日，一队步兵登陆艇才捞起700名“甘比尔湾号”的幸存者，之后又在次日上午找到了“约翰斯顿号”、“罗伯茨号”和“霍埃尔号”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他们的许多战友此时已经死于溺水、太阳暴晒或者鲨鱼之口。“约翰斯顿号”舰长埃文斯中校也在这由于救援长时间延误而阵亡的人员之中，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

胜利一方在获胜之初也是一副沮丧、痛苦和筋疲力尽的模样。赶到圣贝纳迪诺海峡却发现栗田已经逃走之后，哈尔西用无线电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海军已经被第3和第7舰队打败、赶走和粉碎了。”^[113]这虽是事实不假，却也不过是为了安抚疮疤而故意逞强罢了。10月26日午夜刚过，这位第3舰队司令就起草了一封长达480词的言辞激烈的电报为自己辩护，阐述了他率领整个舰队北上的决定并进行了

辩解，这天上午，他把电报发给了金、尼米兹、麦克阿瑟和金凯德。他的慷慨陈词中有一些语句只能解释为极度精神疲劳和情绪过载的产物。“死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直到敌人水面舰队和航母发动协同攻击是幼稚的。”哈尔西写道。栗田的中路舰队已于10月24日在锡布延海被他的航母舰载机空袭“打残”，而且“损伤严重，因此它不再对金凯德构成严重威胁”。至于退出恩加诺角的战斗，哈尔西抱怨道，自己失去了全歼敌人北路航母舰队的“黄金机会”。[114]

这是哈尔西第一次对他在莱特湾的决定做事后解释。后来他将坚定不移地一直解释下去，直到1959年去世为止。对于在三天恶战之后匆匆写就的电文中的一些不当用词确实不应过于苛责。但是“幼稚”（childish）一词看起来尤为不妥，哈尔西的同僚们对此也议论纷纷。用战列舰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绝对不是“死守”，更不是“幼稚”，反而是主动和果断的表现。至于栗田舰队已在锡布延海被打残，无法威胁金凯德的想法，则已经被那天上午萨马岛外的战斗击得粉碎。失去“黄金机会”之说立场也不正确，它违背了美国海军“团队先于个人”的理念，也意味着哈尔西有一种麦克阿瑟式的沽名钓誉。

作为历史上最近、最大，也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场海战，莱特湾海战的研究已经成了体系。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者自然各持看法，但创造性的新贡献却也年复一年层出不穷，围绕各项争议的激烈辩论更是从未停止过。哈尔西和栗田的两项争议性决定尤其如此——前者在10月24日夜带领他的整个舰队北上，后者则在10月25日上午放弃了进攻。关于这次战役的第一部重要史书的作者C.范·伍德沃德判断，“莱特湾这两次重大失误理应归因于一个美国急性子和日本的哈姆雷特”。[115]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看，栗田掉头撤退的决定冥冥中弥补了哈尔西未能掩护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错误。就像代数方程中常见的那样，负负得正。

在上午9时25分放弃追击护航航母之后，栗田召集下属各舰重新编成轮形阵。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时能见度仍然很低，无线电通信也时断时续，无休无止的空袭还不断落在中路舰队头上。舰队重新整队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在这期间，新的敌情报告和截获的无线电通信如潮水般涌来，加剧了这一片混乱。不停有报告说北方有另一支美军特混舰队，这令日本人觉得自己被包围了，但其实那个方向上并没有敌军出现。11时20分，栗田将航向转向西南，一度想要冲进莱特湾。半个小时后，瞭望哨报告说南面观察到一艘“宾夕法尼亚级”战列舰的桅杆和另外4艘只露出上层建筑的军舰，估计距离约39千米。这不可能是奥尔登多夫，他此时还在莱特湾南部，附近也没有其他任何战列舰——显然，这又是一次“幽灵船”事件。（栗田从“大和号”派出了一架水上飞机前去侦察，但显然被击落了。）下午1时13分，栗田再次改变主意，掉头向北，这一次他想要沿萨马岛海岸前进，希望找到另一支美军航母大队，他们是根据截获的金凯德的明语通信判断出那支舰队的存在的。于是中路舰队向北航行了几个小时，途中迎击了几轮美军空袭。栗田预计自己将在两个小时内接触敌特混舰队，但是桅顶的瞭望哨看遍了四周的海平线，都没有见到敌舰的影子。至此，他对燃料存量的担忧愈加深重。他的燃料很快就将不足以回到科隆湾，甚至不足以机动规避美军空袭。如果还想撤就要趁现在，否则就永远别想了。晚6时30分，天色渐暗，他决定结束战斗，开往圣贝纳迪诺海峡。

栗田接到的命令很直接，没有任何不清楚之处：他要冲进莱特湾，攻击美军运输船队和滩头阵地。他被明确告知，即便冒着全灭的危险也要前进。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不这么做？这位将

军及其部下给出的各种解释和辩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混乱和自相矛盾。他说他觉得对自己舰队的空袭愈加猛烈而有效，而且“在莱特湾的狭窄水域里我无法利用军舰所具有的机动性优势，而在能够发挥机动性优势的开阔水域，我在同样的攻击之下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16]他的通信组截获了美军呼叫空中支援的通话，因此他预计空袭将会更多更猛烈。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得到返航所需的足够燃油：“因此，燃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考虑，是基础性的考虑。”[117]栗田还补充说自己相信大部分美军两栖舰队可能已经离开海湾，“因此我考虑进入莱特湾也就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118]“大和号”还收到了一条奇怪的报告，称苏禄灯塔以北113英里处有一支美军特混舰队。栗田认为这是第3舰队的另一支航母大队，因此觉得最好是向这个目标前进，赶在对手向自己发动空袭之前将其置于自己的炮口之下。

西方关于此次战役的历史研究大多依赖战后对栗田及其高级参谋军官的审讯。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会同美国海军一起，审遍日军最高级将领，向他们仔细询问在莱特湾和其他战役中所做的历次主要决定。其结果对历史学者而言是无价之宝。然而，不难想见，并非所有的日本将领在面对审讯时都一样痛快。只要提到敏感或者可能对其不利的话题，闪躲、误导和直接说谎就是可以预期的了。这些高傲的人自然不乐意在征服者面前自曝家丑。1945年11月，在与栗田进行了长期的审问之后，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官形容这位将军“有某种程度的戒心，只用最简短的语句作答……有时候他回忆中关于诸如时间、航行位置之类的细节看起来并不准确”。[119]

被要求解释他10月25日北上的决定时，他变得稍稍积极了一些。他给出了几项原因，但有些却相互矛盾。当被问及他向北转向是否为了躲避毁灭性空袭时，他答道：“这不是毁灭的问

题，那并不重要。问题是在海湾里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在舰载机和岸基飞机的猛烈空袭之下，我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我自己做出决定，觉得最好北上和小泽将军会合。”但是和小泽会合从来都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主意，栗田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话：“我主要的目的并非和小泽将军会合，而是北上找到敌人。如果我到了这里〔指海图上大约北纬13°20′位置〕还没有找到敌人，那我还会继续北上搜索敌人，并在夜晚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回去。”栗田的意思似乎是说，他想要随时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撤退之门保持在触手可及之处，但只有在最终未能找到敌人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撤退。但他还补充了一条解释，表明他一直想要在当晚撤离，因为“我若不在夜间进入海峡，第二天对我而言便是绝望的，那时我将会处于陆基飞机和〔哈尔西的〕舰队的攻击之下”。[\[120\]](#)

如果将中路舰队参谋长（小柳富次）和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的审讯报告，以及宇垣将军的日记放在一起考察，就能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解释这次向北转向的决定。小柳一个人就逐个列出了多达6条原因。（第一，他们追不上“塔菲3”的航母；第二，他们落后原定与西村协同进攻的时间计划太多；第三，他们根据金凯德的明语通信判断自己将遭到猛烈空袭；第四，他们不想在局促水域内遭到猛烈空袭；第五，他们想和北面的哈尔西舰队来一场决战；第六，他们燃油不足了。）

[\[121\]](#)这是一幅碎片拼凑而成的场景，人们在巨大压力和多个相互影响因素的驱使下做出了决定。小柳和大谷都证实，北上的决定得到了参谋部的一致支持。宇垣则在日记中评论道：“在同一个舰桥上，我为他们缺乏战斗精神和策略而恼怒。”但是宇垣也相信北方的美军幽灵航母舰队是确实存在的，他甚至记录称自己看到了20°方位上“海平线之外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其实那个位置

上并没有这样的航母舰队，因此宇垣记录的这个“幽灵舰队”只不过增加了这天上午“大和号”指挥舰桥上的混乱和迷惑感而已。

[122]

完整的真相或许永远都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很清楚：栗田太累了。自从三天前离开文莱起，他就完全没有睡过觉。他的旗舰“爱宕号”在巴拉望水道从下方被击沉，迫使这位55岁的中将跳海并游泳逃生。他的军舰遭到了一支舰队在海上所遭受过的有史以来最为持久的空袭，却完全没有本方空中掩护。面对美国人、记者和其他外人，栗田不愿承认疲劳在他停止进攻和撤退的决定中起过作用。但是在和同僚的私下谈话中，他就坦白多了。他告诉老资格的驱逐舰长原为一：“我犯这个错误，纯粹是因为身体疲劳。”[123]他的参谋们一定也很疲劳，因为他们和长官一起历尽磨难，而且没有反对这个决定。

栗田已经把一场压倒性胜利抓在了自己手中，却又让它从指缝中溜走。这一可怕的指挥失误根本不是事后列出的那些理由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的。有些人直接指责栗田胆怯，其他许多人虽未明说，却也是这个意思。起码可以确定，他确实已无心再战。“捷号”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舰队的反对。在文莱的指挥官会议上，反对声便已四起。攻击莱特湾内运输船和运兵船的计划冒犯了许多日军军官的敏感神经，他们长期以来的训练令其相信，军舰就是用来对付军舰的。其他一些人则责怪丰田将军只会下达命令，却没来亲自领军作战。当他们顶着无休止的空袭穿过锡布延海，上级承诺给他们的空中掩护却不见踪影时，“大和号”舰桥上的军官们便以近乎叛变的口吻咒骂着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愚蠢和呆板。栗田从战场上掉头撤退不是一次，而是两次，24日那次是暂时撤退，25日则是彻底撤退——在第一次撤退时，他的有些参谋军官便希望干脆就此退出战斗。而且，常常被人忽略

的一点是，其他几位日军司令长官也曾不合时宜地撤退。小泽在10月24日下午一度向北返航，当时他的北路舰队刚刚被哈尔西的侦察机发现，后来还是应联合舰队司令部从日吉的地堡内发来的电报要求才继续南下的。志摩将军的舰队在草草齐射了一轮鱼雷之后，也在10月25日早晨匆匆逃出苏里高海峡。他电告丰田，他的撤退只是暂时的，但是美军飞机却一路追击他到马尼拉湾。颇具武士精神的西村祥治比其他几位舰队司令更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海上“万岁冲锋”任务。但即便如此，他南路舰队的每一艘舰在意识到战斗已经输掉之后也都掉转了航向，至少是试图掉转航向。连西村自己的旗舰“山城号”也在试图独闯盟军舰队火力网失败之后，在最后一刻掉转了船头。

实际上，日军舰队里的官兵们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捷号”计划，因为它不具有切实的成功希望。他们明白，编写这份计划的参谋军官们根本没有真的指望他们能打赢，而只是想最后光荣地打一仗，保住日本海军的荣光。他们被要求奉上仍然强大的联合舰队作为祭品。但是日本海军在此方面和日本陆军是不一样的：它的文化、训练和传统中，都没有这种没有头脑的万岁冲锋的先例。海军航空兵虽然最终还是采纳了“神风”战术，却也是遭到各级官兵的反对而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才采取。这种战术会牺牲一些飞机和缺乏常规战术所需飞行技能和作战技能的新手飞行员。但是天皇的军舰都是些大件资产，最先进的武器，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国家象征，耗费巨额资金才建造起来并使用了几十年。人们从来没想过仅仅是为了虚无的荣誉就要把它们牺牲掉。

纵观日本海军的整个历史，他们总是想要打赢的。胜利才是首要目标，“光荣的死”只是一种附带的道德观而已。如果一艘军舰的宿命是在战场上沉没，那么人们希望它奋战到最后一刻。如果一个士兵的宿命是在战场上战死，那么人们希望他能心甘情愿

地赴死，他的灵魂将在靖国神社永久安息。但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目标是胜利。然而此时，1944年10月，这个以胜利为名的“捷号”计划却颠倒了二者的优先顺序，堪称讽刺。东京的将军们已经预见到，一旦美军控制了菲律宾，舰队的燃油供应问题将会成为不治之症。一旦如此，舰队就会动弹不得，静坐在锚地里等待战争结束，或者在敌人雨点般的炸弹袭击中沉入港内。“捷号”计划的首要目的在于避免这种耻辱的结局，确保日本海军死得轰轰烈烈而不是悄无声息。如果还有可能打赢，那就更好了，不过无论双方实力多么悬殊，这场仗都必须打。

还有一点常常被研究莱特湾海战的西方史学者所忽视，这一部分是由于东京方面的作战命令和后续电报中的“言外之意”会在翻译成英语时丢掉，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日本军官在战后接受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对此话题讳莫如深。但是真相仍然藏身于当时的一些资料和战后的当事人讲述中，吸引着历史学者们。栗田在文莱召集他的下属指挥官开会时说道：“你们全体必须记住，世上会有奇迹发生。”^[124]小柳在战后撰文指出，舰队要被迫航行几乎1 000英里才能到达战场，其间要穿越敌人潜艇出没的水域，以及被敌人飞机统治的天空。“这完全是一套绝望、鲁莽而且前所未见的计划，无视战争的基本规则，”他总结道，“我无法不把它理解为给栗田舰队的自杀命令。”^[125]

要解释栗田的含糊其词和撤退，与其说他是懦夫，不如说他的士气已经荡然无存。他和他的同僚军官比一般平民百姓更清楚，战争已经输掉了，高层只是想用成堆的谎言来掩盖这一事实而已。官兵们固然不能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此事，但沉重的失败情绪已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当这滑稽的“捷号”计划名称本身就暗示了整个国家的失败情绪时，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哈尔西至死不承认他在1944年10月24日夜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是错误的。无论对任何人，他都说他唯一的错误是在小泽的航母舰队几乎就要进入他大炮射程之内时掉头离去。卡尼和第3舰队司令部都站在他这边，但是显然所有航母大队和特混舰队司令都确信他们的指挥官错了，他们的议论很快传到了关岛、乌利西、马努斯、珍珠港，以及华盛顿。不仅如此，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即使是在“阴谋诡计部”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即将接掌一支特混大队的阿瑟·拉福德少将，刚刚来到太平洋前线就于11月17日前往“新泽西号”报到。他想找他的老朋友，海军学院同学“米克”卡尼聊聊最近的战事。“令我惊讶的是，”拉福德说，“一向多话的米克变得躲躲闪闪，哈尔西将军和他司令部里的其他几个人也是这样。这给我留下了明确的印象：他们不想谈论10月的那些日子。我明显感到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于其原因却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126]

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常常只是由于运气不好，哈尔西错过了此前太平洋战争中所有的航母对决。1942年5月，他的“企业号”特混舰队由于被派往北面掩护杜立德对东京的空袭而未能赶上珊瑚海海战。次月他又患上皮肤病，被尼米兹勒令住院，因此错过了中途岛海战。（他信任的替补队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接过哈尔西的指挥棒，赢得了这场不朽的胜利。）1942年8月瓜岛登陆时，哈尔西还没有来到南太平洋，因而也就错过了当月晚些时候东所罗门海战中的航母会战。1942年10月的圣克鲁兹群岛海战发生时，他在新喀里多尼亚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地司令部里。随后就是20个月的平静期，日军航母一直没有出现。当它们最终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中再次出战时，指挥第5舰队迎战的又是斯普鲁恩斯。

在南太平洋时，哈尔西被人戏称为“大笔刷子”（rough

brush)——这个词本意指的是画家用画笔大笔猛扫，而非精雕细刻。他对精妙的战术安排不感兴趣，只是把部队集中起来砸向敌人，剩下的就交给运气了。他更著名的绰号“公牛”也是这个意思。自从1944年8月接掌第3舰队以来，他的夙愿就是摧毁敌人的航母特混舰队——并非只是迎战，或者击败，而是全歼它们，消灭干净，把所有残余的日军航母，连同所有的飞机和护航舰一起烧掉，打沉。他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尊奉霍拉肖·纳尔逊传统的混战派海军将领，纳尔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英格兰的敌人身上赢得了数次这种歼灭性胜利。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引用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的训示：“如果一个舰长率舰靠上敌舰，那他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哈尔西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海战理念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最好的防御是猛烈的进攻。”[127]

他的朋友斯普鲁恩斯在四个月前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放跑了大部分日军舰队。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在6月18日夜间想要西进迎敌，以便在次日早晨到达攻击机群起飞位置。但斯普鲁恩斯由于担心敌人会向塞班岛滩头发动决死突击而拒绝了。这一保守的决定遭到了海军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棕鞋族”（航空兵军官）的抨击，他们指责“黑鞋族”（非航空兵军官）斯普鲁恩斯根本不懂现代舰载航空兵的能力。这时候，哈尔西正在珍珠港准备接掌舰队。他和他的幕僚天天被航空兵们唠叨，他们求哈尔西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在第5舰队中职务和“米克”卡尼相同的“卡尔”穆尔相信哈尔西“正是那最初几天里围坐在一起指责斯普鲁恩斯的一群人中的一员。我想他的脑海里会冒出一个想法，他绝对不愿把他自己放到那样的位置上……现在我没有证据，我想卡尼会否认。而且哈尔西事后当然也会想方设法否认。但事实就是如此”。[128]

和往常一样，尼米兹放手让他的前线指挥官根据战场环境自

由运用其部队。他的作战计划要求哈尔西“掩护和支援莱特湾——苏里高作战”。但同时作战计划又特别提出：“如果消灭大股敌军舰队的机会出现或者可以争取，则歼敌就是首要任务。”^[129]如此，这两句话之间就出现了关键的模棱两可之意。日军的战场策略中常常出现欺骗、佯攻和引诱。在此前的几场海战中，包括马里亚纳海战之前的全部四场航母对决，日军都是兵分多路，分进合击。如果多支“大股敌军舰队”从不同方向开过来，正如莱特湾出现的这样，该怎么办？此时应该冲出去追击敌人，消灭敌舰队一部，还是严守对第7舰队和滩头阵地的“掩护和支援”？这只能由哈尔西来判断。

“消灭大股敌军舰队”这句话也是老生常谈了：自从1943年11月攻打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以来，历次两栖作战的战斗命令中都有类似的指示。毕竟，命令就是命令，而且将摧毁敌舰队视为“首要任务”的要求似乎也为哈尔西的进攻心态提供了理由。面临着堪比四个月前马里亚纳海战的两难处境，哈尔西的本能就是将命令中的优先顺序对调。斯普鲁恩斯拒绝冒险让滩头遭到敌人决死突击，即便这意味着放跑敌人航母。哈尔西则拒绝放跑敌人航母，而宁愿冒险让滩头遭到敌人决死突击。

当小泽的北路舰队出现在恩加诺角外海时，哈尔西面临着一场赌注巨大的赌博。总的来说，他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留在原地，可以兵分两路，也可以带全军北上歼敌。他放弃了第一个选项，没有把他的全部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没问题：他想要在敌人航母和吕宋岛机场建立联系并对自己“穿梭轰炸”之前击沉它们。但是他拒绝第二个选项（留下第34特混舰队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选择第三个选项（带着所有舰艇北上，让海峡门户洞开）的理由却显然无法说服任何人，只有区区几个参与决策的死忠派除外。第3舰队战报给出的理由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

服。其中称，率领整个舰队北上“保持了蓝军〔指美军〕攻击舰队的完整性，最能够出其不意并消灭敌航母舰队”。[\[130\]](#)说这个决定保持了“舰队的完整性”固然没错，这使得舰队一直都集中在一起，成为一个不拆分的整体，但这只是对这个决定的复述，而没有进行解释或论证。这只是文字游戏掩饰的车轱辘话而已。舰队集中使用原本是马汉理论的正统，在哈尔西这一代将领的军校时代是至高无上的。但到了1944年，无线电、雷达以及航空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集中舰队的旧规则已经像帆船那样过时了。

没有任何硬性要求迫使哈尔西集中他全部65艘舰去对付北面只有19艘军舰的日本航母舰队，但是守卫海峡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他完全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他的实力足以同时对付栗田和小泽还绰绰有余。他的战报将北路舰队称为“强大的新威胁”，值得第3舰队全力应对。它刚刚加入战场，尚未遭到打击，而中路舰队却已经在空袭中遭受了惨重损失。但是，日军航母部队已经由于失去了最顶尖的飞行员而大为削弱，这一因素即便在莱特湾海战之前就已经在美军航空兵和情报圈里广为人知。“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军的舰载航空兵已经很少，”杜鲁门·赫丁说，他之前是第58特混舰队参谋长，此时在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供职，“实际上已经不值一提……我们任何一支航母特混大队都能制服他们。”[\[131\]](#)赫丁的判断得到了当时和战后诸多其他权威人士的证实。

关于中路舰队，哈尔西认为它“已经遭到重创，不再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由于鱼雷打击、炸弹打击、上层建筑损毁、火灾和人员伤亡，其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132\]](#)但是这个结论仅仅是基于当天第38特混舰队参加锡布延海空袭并返航的飞行员们的报告。三年的战争早已表明，这种声明基本上都是夸大的，常

常夸大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各特混大队司令都对哈尔西居然敢对这种报告的准确性下那么大的赌注感到惊奇，尤其是在巡逻机后来确认中路舰队已再次开往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且海峡中的导航灯都已点亮的情况下。关于这一点，哈尔西亲自执笔为自己辩护，或者也可能用的是文书的打字机。他觉得率领他的整个庞大舰队北上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宁愿冒险让栗田的战列舰找到莱特湾中的运输船：

日本鬼子的顽固人所共知，第3舰队司令也已意识到敌中路舰队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进攻莱特湾内船队的可能性，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但第3舰队司令确信中路舰队已经遭到重创，不再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最后，计算显示，第3舰队能够及时赶回来，扭转敌中路舰队所可能获得的任何优势。……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第3舰队司令也一直密切关注那里的情况，直到他收到敌中路舰队在第7舰队护航航母编队的英勇奋战下放弃进攻的消息为止。

[133]

毫不意外地，麦克阿瑟将军看待此事的观点截然不同。没人知道他是否看过第3舰队战报中的字句，但他对这一场景的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海军掩护部队放过任何一支强大的日军舰队闯进莱特湾，整个菲律宾进攻作战都将被置于岌岌可危之境……这将是灾难性的一幕……如果敌人进入了莱特湾，他们强大的舰炮将会消灭海域中任何一艘鸡蛋壳般脆弱的运输船，摧毁滩头上那些急需的补给物资。海滩上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将会被包围，并被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敌人火力压在地上，陷

入绝境。这样，其结果将不仅仅是补充援军的时间表被彻底推翻，就连进攻能否获胜都难以预期。……现在我别无可为，只能巩固阵地，坚守防线，静待即将到来的海战的结局。[134]

如果栗田再坚决一些，这样一场灾难或许就会完完全全成为现实。但其长远后果却未必如麦克阿瑟预言的这般严重——鉴于日军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的实力，怎么看美军的进攻都是很难失败的。但若真的如此，恶劣影响还是会一路传回华盛顿。太平洋上的每一个记者都会盯着这件事，麦克阿瑟的审查机构也会让他们把话都说出来。即便有新闻审查，这些事实还是会迅速扩散到全国的报社里，各种报道也会在总统竞选最为胶着的最后两个星期里爆发出来——在这场竞选中，挑战者已经开始批评当权者将太平洋战场一分为二的做法。在国会山，关于太平洋上指挥不统一的负面声音已经层出不穷，立法者们也将会为此安排听证。哈尔西和海军将理所应当为这场灾难担责。麦克阿瑟一直想要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而其运输船队差点遭到屠杀必然会成为头号论据。参联会也将不得不在公众的强烈关注之下重新审视这一永远也吵不完的话题。

哈尔西将自己与金凯德之间的误会归结于不恰当的指挥架构，当时只是私下说，战后便是公开说。战役之后一个星期，他给尼米兹写了一封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切斯特”的私信，信中说：“我们不能用一支海军的观点来评判两位彼此独立的战场舰队指挥官。在海战中协调永远替代不了指挥，让第7舰队与太平洋舰队联合作战却又相互分离，独立行动，这就一定会导致混乱，甚至是灾难。”[135]

尼米兹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至少没人见过他的答复。但人

们可以想见他是什么看法。哈尔西在10月24日所犯的各种错误都无法直接归咎于指挥架构问题。哈尔西在18个月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任期里常常和麦克阿瑟斗来斗去，他肯定知道太平洋战场统一指挥所面临的障碍。情况和1942年4月金和马歇尔议定“双战区”指挥系统的时候如出一辙。如果将麦克阿瑟置于任何一位海军将领的麾下，他就会辞职，反之，海军将领们也不愿从属于麦克阿瑟，觉得他不够格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这一双重指挥体系或许并不理想，也会浪费资源，但它却平稳运行了两年半，而且看上去仍然可以为陆海军之间的僵局提供一个“最不坏”的解决方式。哈尔西是四星上将，高级指挥官，这意味着他背负着关照海军军种利益，能够长袖善舞，妥善处理与其他军种和战区的竞争关系，并且不犯政治错误的期望。然而当哈尔西在莱特湾所犯的高层错误曝光时——他几乎毁掉了将太平洋舰队交给美国海军来掌管的社会共识，而太平洋舰队正是海军自己皇冠上的钻石。

当然，这样的危机最终并未出现，栗田的撤退使这场灾难得以避免。第7舰队中自然有一些对哈尔西不满的声音，就连第3舰队中也有——但这些牢骚很快就被对盟军这次历史性胜利的大张旗鼓的庆贺淹没了。10月26日，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份胜利公报。福莱斯特部长决意让海军也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占得一席之地，于是他公开了哈尔西这天早些时候的电报，就是宣称日军舰队已经被“第3和第7舰队打败、赶走和粉碎了”的那一封。^[136]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大声宣读了哈尔西的电报，于是这份电报第二天便出现在了数百份美国报纸上。在美国人民眼中，哈尔西的形象比以往更加高大了。

没人想在这种时候搞出一点负面舆论来破坏这一片大好的氛围。金凯德删除了他战报中所有直接批评哈尔西的内容。当尼米兹的一位下属起草了一份对哈尔西的决定持批评态度的报告时，

尼米兹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淡化此事”。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当周的一次会议上，几位军官贬损了哈尔西的表现，麦克阿瑟打断了他们：“够了。别烦公牛了。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得力的海上战将。”^[137]

许多人觉得哈尔西之所以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是因为他的声望和人气对海军很有价值。尼米兹和金的通信，及其后来的访谈和著作中都找不到关于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迄今所知，福莱斯特部长、莱希上将和参联会的任何其他人都没说过这种话。然而，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莱特湾海战及其后一段时间恰逢福莱斯特大力改善海军的公共关系之时。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哈尔西猛打猛冲的个性和他“杀死更多的日本鬼”的口号在各种媒体文章和新闻短片中广为流传。在1945年2月华盛顿的一次媒体会上，哈尔西夸口说第3舰队从“野蛮猿人”手里夺取了对海洋的控制。他还说：“我们打下他们的飞机，把他们烧死，淹死。烧死他们和淹死他们一样痛快。”^[138]

哈尔西在他的同僚和上级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口碑，这些人对1942年时的灾难和急迫态势至今记忆犹新。在那个时候，哈尔西的无所畏惧和振奋人心的领导力看似鲁莽，却赢得了成功。他为自己赢得了犯错的权利。解除他的指挥权只会引起人们对莱特湾几近灾难的关注，海军并不希望如此。而且，谁能取代他呢？具有必需的年资并且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四星上将除了他也没别人了。米彻尔固然可以提拔上来，但他此时急需长时间休息，而且接替他的人（约翰·麦凯恩）还没有完全上手。金和尼米兹显然讨论过解除哈尔西职务的可能性，至少是一度讨论过，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两套班子轮换的指挥体系，也就是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每隔几个月轮流上岗的做法，将会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而且，最终得到第五颗将星的还是哈尔西（而不是斯

普鲁恩斯)。

关于莱特湾海战指挥的争议到了战后烽烟再起，再次成了一个漫长而且扯不清的话题。哈尔西永远没法让自己承认日本人是故意把他引诱到北边，而小泽北路舰队的航空母舰不过是个诱饵而已。在美国人找到“捷号”计划的原文并翻译出来，甚至小泽、栗田、丰田和其他人在战后向美军审讯人员供述了全部真相之后，哈尔西依旧自顾自地抵赖。小泽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日军航母的角色是被严格限制的：“诱饵，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的主要考虑就是引诱你们的舰队向北，我们已准备好遭到全歼。”^[139]在取得这一重要发现超过6年后，哈尔西仍然表示自己不明白小泽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没能好好打一仗。在一篇刊登在《海军学院学报》的文章中，他写道：“这次战斗中的一件怪事是，空战一直没能打起来。我们的攻击机看到敌人航母的甲板上只有区区几架飞机，空中也只有15架。”^[140]

在他辉煌海军生涯的后期，适当的谦逊会对哈尔西大有益处。他是个海军五星上将，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海军五星上将之一，这个职位令他直到临终前都得以享受现役待遇，发全薪，拥有专用办公室，享受住宅津贴，配有专车和司机。他还靠着出售回忆录和巡回演讲而发了财。在公司董事会的职务又让他挣了一大笔钱。20世纪50年代，“公牛”哈尔西俨然成了一个拥趸无数的大明星，常常在电视上露脸。他原本应当对历史学者们的结论泰然处之。即便承认在莱特湾所犯的错误，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实际上，这甚至可能会令他的传奇更加高尚而不是受损。他大可把他曾私下承认过的事情公开说出来——他觉得更应该让斯普鲁恩斯来指挥莱特湾海战，他自己则去指挥马里亚纳海战。^[141]然而，直到1959年离世，这位骄傲的老五星上将仍然

在徒劳地对抗历史学界的定论。

战争期间，他一直拿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当朋友。然而，1950年，莫里森在一次向海军军官的讲话中，称哈尔西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决定是个“大错”。哈尔西通过小道消息听说了此事，怒气冲冲地给莫里森写信对质。于是这位历史学者同意以后再也不用“大错”这个词了，但观点仍然不变。他告诉哈尔西，在此后的演讲中，他会把这个词换成“误判”。由于对这个答复不满意，这位将军便将莫里森称为“高水平的马后炮”。[142]

之后一切便平静了下来，直到1958年，当时莫里森的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系列著作的第12卷《莱特湾》出版面世。书中，莫里森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论，称哈尔西落入了日本人引诱他北上的陷阱，他正是萨马岛海战几近惨败的主要责任人。愤怒的老将军想要召集他的第3舰队旧部发起反击。“我的想法是狠狠收拾这个狗娘养的，找他的麻烦，”他在写给“阴谋诡计部”一名下属的信中写道，“我想要你们和我一起。”[143]有人答应了哈尔西，但是“米克”卡尼（他后来晋升到了海军的最高职务，海军作战部长）却给这个计划泼了一盆冷水。卡尼警告道，莫里森的声望是无法撼动的，“你们的攻击无论多么公正，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你们更可能反受其害”。[144]他建议哈尔西不如发表一份反驳海军历史处的声明完事。

这位老将军显然采纳了自己前参谋长的建议。但是几个月后，他的黑名单上又多出了一个顶级历史学者。海军学院教授E.B.波特请求哈尔西阅读他即将面世的新书的书稿。哈尔西不喜欢书中关于莱特湾海战的讲述，于是恼怒甚至充满威胁地答复道：“我不打算让严重歪曲我的想法的表述写进一本准备用来教育学员的书，我不想找你麻烦。”[145]

在哈尔西最后的年月里，“公牛”这个绰号已广为流传。哈尔西并不太喜欢这个绰号，即便这是1942年时被爱戴他的媒体安在他头上的。但他在努美阿司令部和第3舰队司令部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不喜欢。麦克阿瑟肯定也不知道，因为他凡提到哈尔西必用这个绰号，甚至当面这么称呼他。哈尔西将军也听之任之，可能是由于麦克阿瑟的称呼中满怀尊敬和爱戴。然而现在，晚年的哈尔西却拒绝回应这个“虚假而夸大其词”的绰号。^[146]他告诉一个朋友：“只有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才会称我为‘公牛’。”^[147]

哈尔西拒绝这个绰号并不令人意外。这个绰号显然有两面含义，而且这一点愈加明显。人们尊重公牛是因为其体量、力量和勇猛，而不是因为它的战术敏锐性。公牛顽固、不讲理、莽撞。它行动时不顾及周围，狂怒而猛烈，“就像等待进入斗牛场的公牛”。其他猛兽在狭小的空间里都会施展不开，但它不同，它是全世界所有瓷器店主最害怕的动物。所有哺乳动物都会在地上排便，唯独公牛粪便（bullshit）在美国俚语里有一席之地，意指“废话、说谎或者自吹自擂”。

公牛冲向斗牛士的斗篷，却没有看到他手中的长剑。公牛看见一片红色，便挺起牛角冲了上去，自信能够轻松干掉这个不起眼的对手。但最终，往往是公牛血淋淋的尸体被拖出斗牛场，斗牛士则在万众欢呼之下昂首离开。

^[1] Tomoo Tanaka quoted in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47.

^[2] Yasuo Kato quoted in Ibid., p.47.

^[3] Shigeru Nishino quoted in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16.

^[4] Bob Clarkin quoted in Sears, “Wooden Boats at War: Surigao Strait,” World War II Magazine, Vol.28, Issue No.5, February 2014.

[5] “Lone PT Attacked Japanese Flee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44.

[6]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7] Bates,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2.

[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9]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58.

[10] Bates,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8.

[11] *Ibid.*, p.395.

[1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13]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85.

[14] *Ibid.*, p.186.

[15] *Ibid.*, p.188.

[16] Smoot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Leyte*, p.228.

[17]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Comments by Captain Herbert V.Wiley.

[18]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enver*,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0].

[19] James L.Holloway 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24, No.5, October 2010.

[20]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94.

[21]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aly*,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4].

[22]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12.

[2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November 18, 1945.

[24] Ibid.

[25]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26] Bates,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October 1944*,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9.

[27] Prados, *Storm Over Leyte*, p.25.

[28]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27.

[2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40.

[30]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enver*,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0].

[31]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39.

[32]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38.

[33] James L.Holloway 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24, No.5, October 2010.

[3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41, USSBS No.170, Commander Tonosuke Otani, IJN, Operations Officer on the Staf of C—in—C Second Fleet.

[35]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9.

[36]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p.40.

[37]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p.154—55.

[38]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7.

[39] Yamato action report,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21.

[40]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p.40.

[41] *White Plains* (CVE—66) action report,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29.

[42] *Ibid.*, p.31.

[43] *Ibid.*, p.35.

[44] 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p.7.

[45] *Ibid.*, p.9.

[46] Captain Sugiura of the *Haguro*,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57.

[4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53.

[48] Robert C.Hagen,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and Got It,”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accessed August 14, 2018, http://www.bosamar.com/pages/hagen_story.

[49] *Ibid.*

[50] 哈根认为他的军舰是被“金刚级”战列舰14英寸炮的齐射击中的。大部分著作都支持这一观点，将这一组命中算给了“金刚号”。但是罗伯特·伦德格伦根据自己对日军战报的分析，以及“大和号”日志中关于其在7时25分给予一艘巡洋舰致命一击的记录，令人信服地提出，是“大和号”打出了这一轮齐射。（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p.69–74.）1944年时，美军尚不知道“大和号”装有18英寸炮，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种武器存在。如果哈根知道，他或许会觉得碾过这只小狗的不是大卡车，而是火车。——作者注

[51] *Ibid.*

[52]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p.40.

[53] CTF 77 to COM3RDFLT, October 2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54]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55]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entry.

[56] Weil quoted in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48.

[57]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275—76.

[58] *Ibid.*, p.276.

[5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36, USSBS No.150, Captain Toshikazu Ohmae, IJN.

[60]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entry.

[61] CTF 77 to COM3RDFLT, CTF 3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62]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63]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52.

[64] CTF 77 to COM3RDFLT, CTF 3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65] COM3RDFLT to CTG 38.1, in *Ibid.*

[6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246—47.

[67] CTF 77 to COM3rdFLT, in *Ibid.*, p.2247.

[68] COM3rdFLT to CTG 38.1 info ALL TFC’S AND TGC’S 3rd Fleet, CTF 77, Com7thFl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7.

[69] CTF 77 to COM3RDFL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70] F广播时间表（Fox Broadcast schedule），一种接收方无须反馈的无线电发送模式。——译者注

[71]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p.2—3.

[72] COM3RDFLT to CTF 77,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73] James Fife,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2, No.452, p.400.根据哈尔西1952年5月发表在《海军学院学报》上的文章，金凯德在10点用明语发出无线电：“李在哪里。派李过来。”这一绝望的恳求被频繁引用，但在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灰皮书中没有出现这条信息，而且由于哈尔西的文章对其他电文也

有措辞上的变动，因此这条电文应该不是一字不差的还原。

[74] Lieutenant John Marshall quoted in Wukovits, *Admiral "Bull" Halsey*, p.196.

[75] Joseph J.Clark, oral history, p.501.

[76] 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4.

[77] 掷马蹄铁比赛是西方军队中流行的一种游戏，比赛双方把特制的马蹄铁投掷到指定距离外的桩子上，与套圈类似，马蹄铁套住桩子更多的一方为胜。

——译者注

[78] Chester W.Nimitz, "Some Thoughts to Live By."

[79] 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3.

[80]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COMINCH, CTF 77,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奥斯汀称电文是他口述给一名文书军士的，赫丁则表示他看到谢尔曼亲笔写下此电文。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4;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p.97—98.

[81] Potter and Nimitz, eds., *The Great Sea War*, pp.389—90n.

[82]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3.福克斯的上级军官伦纳德·道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确认了细节。Leonard J.Dow, RADM, U.S.Navy (ret.) to E.B.Potter, January 6, 1959."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8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20.

[84] Drury and Clavin, *Halsey's Typhoon*, p.49.

[85] Thomas, *Sea of Thunder*, p.300.

[86]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4.

[87] Halsey to E.B.Potter, December 12,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Halsey Papers.

[88] 在哈尔西的回忆录中，他声称自己“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知道真相”。他指的可能是他直到12月下旬尼米兹访问舰队时，才得到对方关于自己无意冒犯的亲口保证。Halsey and Bryant,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20.——作者注

[89] Potter, *Nimitz*, p.593.（尼米兹对作者所说的话引自其第20章的出处注

释。)

[90] Potter, *Bull Halsey*, p.304.

[91] COM3RDFLT to CTF 77 Info COM7THFL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92]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93] Commanding officer, U.S.S.*Hoel*, “Combined Action Report and Report of Loss of U.S.S.Hoel(DD 533) on 25 October, 1944.”

[9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3.

[95]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96] Ibid.

[97]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5.

[98] Report by Glenn H.Parki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253.html>.

[99]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155.

[100] Ibid., p.156.

[101] Robert M.Deal, personal account, USS *Johnston* Veterans Association pamphlet, p.70.

[102] “Action Report—surface engagement of Samar, P.I., 25 October 1944,” USS *Johnston*, DD557/A16—3, Serial 04, November 14, 1944, submitted by “Senior Surviving Officer.”

[103] Robert C.Hagen,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and Got It.”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104] Tadashi Okuno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published in Gibney, ed., *Senso*, pp.136—37.

[10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06]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8.

[107]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p.40.

[108] CTF 77 to COM3RDFLT, etc., 250146 and 250231,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10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09.

[110]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111] Ibid.

[11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113]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October 25, 1944 (25122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114] COM3RDFLT to CINCPAC, 26 October 1944 (251317).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4, “CINCPOA Dispatches, October 1944.”

[115] C.Vann Woodward quoted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32.

[116]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17] Ibid.

[118] Ibid.

[119] Interrogator’s notes in Ibid.

[120]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2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35, USSBS No.149, Rear Admiral Tomiji Koyanagi, IJN.

[122] Ibid; Nav No.41, USSBS No.170, Commander Tonosuke Otani, IJN;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p.496—97.

[123]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56.

[124]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0.

[125]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77.

[126] 拉福德后来在1953—195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0.

[1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8.

[128]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32.

[12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58.

[130]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5;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131]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1.

[132]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p.4—5,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133] Ibid.

[134]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227—28.

[135] Halsey to Nimitz, November 4, 1944, LCMD, Halsey Papers, Box 15.

[136]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October 25, 1944 (25122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137] Merrill, *A Sailor's Admiral*, p.169.

[138] “Admiral Halsey Reports,” British Pathé newsreel archive, URN: 74239, Film ID: 2121.

[13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

[140]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141] “Statement to the author, April 9, 1953,” in Taylor,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p.265.

[142] Letters between Halsey and Morison, and Halsey and Ralph E.Wilson, January—February 1951, in Halsey Papers, “Correspondence Files.”

[143] Halsey to officers, November 14,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144] Carney to Halsey, November 14,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145] Halsey to Prof.E.B.Potter, July 27, 1959,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Halsey’s comments,”Halsey Papers.

[146] Halsey and Bryant, *Admiral Halsey’s Story*, Author’s Foreword, p.1.

[147] Halsey to Charlie Belknap, March 24, 1949, Halsey Papers, Box 7.

第七章

在战后美国海军学会发表的一篇获奖论文中，J.C.小威利上校提出，日本是被一系列“推进式”和“累积式”相结合的联合战略击败的。其中的“推进式”指的是一路西进的两栖进攻，这一连串战斗和登陆作战让盟军部队一步步逼近了日本。它体现在地图上那些代表陆海军部队进占地盘的小箭头上。这更适合传统的以时间为顺序的讲述方法。这样即便是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或教育的门外汉也能凭本能理解这一点。对于那些一直在报纸上关注战争进展或者读过第一阶段战争历史的人而言，这一系列战役组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完整历史。

根据威利的说法，累积式作战策略截然不同，它并不包括攻占地盘和大规模激战，而是一种“积累不易察觉的微小战果，积小胜为大胜，直到未知的某一时刻，这大量精心策划的战斗将改变战局”。^[1]其基本逻辑是，“千刀杀一人”。在太平洋上，正是这种累积式作战逐步蚕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其中一个例子是宣传战，或曰“心理战”，其针对的是遭到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日本民众，日军官兵，最终就连东京的高层决策圈也会受到影响。另一项累积式作战是战略轰炸。从1944年11月开始，美军对日本的核心工业区展开了持续的空中轰炸，以图重创其主要的战争工业。最终，这种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城市。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军还运用其空中和海上力量（尤其是潜艇）打击了日本与海外占领区之间的航运线，这样的作战行动逐步卡住了日军战争潜力的咽喉。到1945年，除了麦

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路进攻大军“推进式”占领了许多地盘之外，日本的经济也已财竭力尽，濒于崩溃。

和其他工业国家相比，日本无法实现原材料自给，和二战其他主要参战国相比更是如此。日本本土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原油、铁矿石、铝土矿和其他重要矿藏的储量几近于零，只有少量木材和低等级煤炭。自从明治时代开始寻求成为亚洲的领头羊之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旨便是确保能够稳定可靠地获取这些必不可少的资源。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贸易足以满足需要，保护和维系此类贸易的需求便主导了日本的外交。然而到了30年代，日本进入了所谓“幽谷”时期，军国主义者把持了国家，他们决意夺占海外原材料产地并实施殖民统治，以向自己的工业经济和战争机器输入这些必需的物资。

1931年日本侵占了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其钢铁厂由此得到了稳定的铁矿石和无烟煤供应。但日本的原油、橡胶、铝土矿、铜、锌，以及其他钢铁和有色金属的进口却仍然要完全依赖东南亚的美国和欧洲殖民地，别无可选。日本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国——美国、英国和荷兰——一致反对纳粹德国，即便如此，东京还是在1940年9月和柏林、罗马方面共同组成了轴心国，这一鲁莽的决定直接引发了对日本的贸易制裁。1940年之前，美国供应了日本74%的废旧金属进口，93%的铜进口，最关键的是还供应了大约80%的原油进口。1940年，罗斯福政府开始针对上述物资和其他一些物资实施对日禁运，而且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和严格程度还在不断增加。到1941年8月时，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原油阀门被彻底关闭了。日本没有其他的石油来源，不得不开始消耗原本就十分有限而且还越来越少的国内储备。当东条内阁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不归路时，石油危机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加严重。

开战之初，日本人将解决资源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向南方的盟国殖民地发动闪电进攻上。到1942年4月，也就是袭击珍珠港之后仅仅4个月，侵略者已经开始利用马来亚、东印度、菲律宾和其他各地的丰富资源了。最重要的是，日本占领了曾经分别是荷兰、英国殖民地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这里拥有当地产量最大的油田和石油精炼厂。

但是还有一个毋庸置疑的难题：抢来的油田距离日本本土还很远。这些维系日本经济的血液需要流过一条长达3 000英里的漫长而脆弱的海上大动脉。一旦这条动脉受损，日本的战争机器就会迅速失血，如此，战败就将不可避免。东京对这一威胁心知肚明，即便在这个国家鲁莽地踏进无法打赢的战争之前就知道，但是它的统治集团却自我麻醉式地相信自己能守住海运线足够长的时间，直至获得胜利。可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并不充裕。日本的商船队已经拼了老命，使用率几近于100%。1938年末时，日本商船队中只有0.3%的船只处于空闲状态，作为对比，同期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是3%和10%。^[2]需要船运的地方很多，除了进口原材料，向海外的部队、舰队和基地输送补给也需要船运。不仅如此，日本国土中可耕地只占3%，需要进口粮食以避免饥荒。即便是对于日本国内的运输系统而言，船运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国家的铁路系统总的来说承载能力不强，无法重载，其大部分工业贸易都是经由近岸船只在港口之间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后期大力造船之后，日本商船队（主要由吨位500吨以上的钢质船舶组成）的总吨位增长到了大约600万吨。其中约410万吨被陆海两军征用，只有190万吨作为民用和工业用途。^[3]内阁计划委员会坚持认为，要维持日本经济正常运转，至少要有300万吨船舶作为民用，但陆海两军却拒绝让出

所需的船只。日本政府预计战争第一年的船只损失将在80万到110万吨之间，随后两年的每年损失将降至70万～80万吨。战时新建船只预期能够弥补这些损失，至少是部分弥补。实际上日本战时的造船成果十分惊人，每年新下水的货船从1941年的23.8万吨增长到1944年的160万吨。但是被击沉的数量却远远高于预期，战争期间日本每年的船舶吨位净减都十分严重。[\[4\]](#)

日本陆军和海军毫不重视彼此间的协作，和民间船运的协作就更是无从谈起。军用运输船运载着部队、武器和补给物资前往海外基地，之后装一些压舱物（等于是空船）就回来了。实际上若能把这些船只派到附近的港口，装上一些物资再返程，船运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这样的控制权来要求相互竞争的陆海两军如此配合。

如果说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容易受到航空兵和潜艇的攻击，那么它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略空袭面前则是毫无防备。日本的工业基地都是新兴的，仅仅用了三四十年就从零起步建设了起来。官方和资本联手协作，创立了一套以军工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其中最优先发展的是钢铁、造船、汽车、飞机、坦克和机床制造业。其成果十分惊人，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就在袭击珍珠港一年之前的1940年，日本重工业产值在12年时间里增长了5倍。日本经济总量的17%都被用于军工生产，作为对比，美国经济中的军工占比只有2.6%。[\[5\]](#)1941年之后，军工生产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迅速增长，到1944年时已接近50%。到了这一阶段，日本的民众已经多多少少陷入了贫困，其经济中剩余的非军工份额只剩下了农业和食品生产。如此，其战争工业便不再有增长空间，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剩余空间都已被挤占干净。战争期间，日本工厂的开工率近乎100%，只有其生产线由于必需原材料短缺而不得不停下来时例外。况且，

工业依赖于大量技艺精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补充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大型工厂中，它们的物资供应相对落后。例如，维持整个日本经济所需的大部分钢铁生产都集中在6所主要钢铁厂中，盟军对它们的位置一清二楚。这样，只要对钢铁厂本身或者为其服务的运输设施进行少数几次有效的轰炸，日本的钢铁供应就会被切断。由于没有后备产能可供应急，这种轰炸的影响将很快蔓延至整个日本经济中。

因此，显而易见，从海上和空中对日本的商船和战争工业进行打击将会对日本的战争能力造成釜底抽薪的影响，甚至予以致命打击。但是在这样一场宏大而且复杂的战争中，盟军怎样才能平衡彼此矛盾的各项任务之间的优先级？太平洋战争各个阶段的任务实际上都受到“推进式”和“累积式”之争（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的影响。地面战场和海上战场的盟军指挥官都会本能地优先考虑眼前的战术问题，而对针对敌人经济的长远“累积式”作战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都将“丸”——日本的商船与货轮——视为次要目标，或者只是“安慰奖”。战区指挥官们倾向于将航空兵投入眼前的焦点战场，对于向远在天边的敌人本土进行的没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轰炸，他们同样怀疑其价值。潜艇的角色和任务则很杂乱，常常缺乏明确的战略依据：直到1943年后期，它们才得以专心投入消灭日本商船的作战。

1944年8月，当哈尔西将军接掌第3舰队时，他和他的“阴谋诡计部”就提出要对太平洋舰队潜艇的运用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他们将此称为“动物园计划”。“米克”卡尼和“罗洛”威尔逊制定了具体细节。他们将菲律宾、台湾岛、琉球群岛周边海域划分为24个区域，各用一种动物名称命名（所以叫“动物园”）。潜艇狼群将被部署在每个区域里的航线上，奉命在一场大规模海战之后拦截并击沉日军军舰。卡尼后来解释道：无论预计中的海战的

结果如何，日军舰队在战斗之后总要“退出战场加油并返回基地，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闯进我方潜艇在其撤退路线上布下的天罗地网”。[6]

在1944年9月28日写给尼米兹的一封信里——此时距离莱特湾海战打响不足一个月——哈尔西提出了“动物园”方案。他首先承认了击沉敌人商船的价值，同时却提出，“当敌人舰队出击时，太平洋上的所有武器都要拿来对付他们”。[7]哈尔西提出要把潜艇部队交由自己直接指挥，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海上大秀之前如此安排，这样他们将能够更好地与第3舰队协同作战。

在对此提案“深思熟虑”之后，尼米兹拒绝了。在10月8日发出的一封写给“亲爱的比尔”的信中，他委婉地反驳了他的这位好友。只要机会出现，潜艇就应当攻击敌人军舰，他说，但它们的首要任务将始终是破坏商船。尼米兹和他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查尔斯·A·洛克伍德中将将继续对这些潜艇进行直接战术指挥。他要哈尔西“接受我的决定，因为这是对所有相关因素充分考虑之后的结果，其所依据的情报比你能获得的更加丰富，而且其背后是我更为广泛的职责”。[8]

然而讽刺的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尼米兹在一项关于新型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相似争议中却站到了另一边。这些轰炸机正在被大批部署至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上，下个月就要开始对日本进行轰炸了。这种巨型波音飞机的重量和航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能够携带1万磅有效载荷，作战半径远达1 600英里。以阿诺德将军为首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众将领决意要将所有“超级堡垒”轰炸机全部用于对日本战略轰炸作战。但是两位战区指挥官却对这些新型轰炸机的用途另有想法，关于如何将这大家伙用于战术目的的想法也层出不穷。尼米兹的司令部对它们远程侦察、搜索救援，以及在濑户内海布雷的能力很感兴趣。麦克

阿瑟则希望把所有的B-29都派到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他警告乔治·马歇尔，“将这些未经实战检验的飞机一开始就部署到马里亚纳群岛，会使得它们在第一次参战时就处于最困难的条件下”。[9]

但是“福将”阿诺德没有搭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他成功说服参联会的其他成员创建了一个新的独立航空兵部队，第20航空队，专司对日本本土列岛进行战略轰炸。和其他任何航空兵部队不同，第20航空队将由参联会从华盛顿直接指挥。作战命令将由阿诺德作为各位参谋长的“代表”下达至部队。航空队将下辖两个轰炸机司令部，第20和第21轰炸机司令部，其基地分别设在中印战区和马里亚纳群岛。虽然第21轰炸机司令部设在尼米兹的战区内，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它却完全没有指挥权，只有紧急情况下除外。阿诺德将军坚持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指挥架构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确保“超级堡垒”轰炸机专注于执行其首要任务，打击日本的工业目标。

尼米兹获悉此事后很不高兴。绰号“负鼠”的海伍德·S·汉塞尔准将是马里亚纳群岛第一支B-29部队的指挥官，他在1944年10月5日拜访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这种安排十分反对……这是对指挥体系的一种破坏。”但是既然参联会已经如此决定了，他也无可奈何，他保证会尽最大努力支援汉塞尔：“我将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你所有的帮助和协同。衷心祝你成功。”[10]

没有记录能显示尼米兹是否注意到他拒绝哈尔西的“动物园计划”和这件事其实是一回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三天后拒绝了这一计划。尼米兹没有把潜艇部队交给哈尔西，以确保他们能执行切断日本海运线的“累积式”任务。参联会也没有把B-29部队交给尼米兹，以确保他们能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累积式”任务。

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之外，潜艇部队一直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媒体对他们的报道非常少，战争初期尤为如此。潜艇部队“沉默军种”的称号不是白来的：潜艇战士们天生嘴严，即便是在海军其他部门的战友们面前也是如此。他们在珍珠港的基地看起来很神秘，甚至有些诡异。流线型的低矮潜艇通体漆黑，隐藏在东部海湾中手指般细长的堤道之后，从外面只能看见一丛丛伸出来的指挥塔外壳。在堤道背后的海军造船厂里，坐落着一座平凡无奇的三层混凝土办公楼。只有一块低调的门牌说明了这里的身份：“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部”（ComSubPac）。

1943年2月7日小鲨鱼级潜艇“刺鲅号”返回珍珠港，这可以算是少有的几次例外之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有些人决定要让潜艇部队在公众面前露露脸了。“刺鲅号”在护航舰艇的护卫下驶入了港口水道，潜望镜筒上刷头朝上绑着一支扫帚和一条长长的飘带，飘带上写着“打死挂太阳旗的浑蛋”。数百人拥挤在码头旁，其中有战争通讯员、摄影师、新闻电影摄制组。当“刺鲅号”靠上泊位时，军乐队奏起了音乐。随即一个人都戴着金穗徽章的高级军官代表团通过跳板登上了潜艇，后面跟着一组已经获准拍照和采访艇员的记者。那些习惯于保密的“刺鲅号”水兵见到这一幕，一个个目瞪口呆。有人在日记里兴高采烈地写道：“我在后发动机舱里拍了一张照片。那是要登上《时代》杂志的。”^[11]

这次突如其来的公共宣传是由于“刺鲅号”刚刚结束并引起了轰动的第三次战斗巡逻，这艘潜艇在此次巡逻中击沉了5艘船，总吨位达3.2万吨。（前文提到的扫帚象征着“扫清敌人”。）在古怪而富有进攻精神的艇长“大舌头”达德利·W.莫顿的指挥下，“刺鲅号”证明了潜艇可以承担先前被认为不可承受的风险，

昼间可以长时间停留在水面上，夜间可以在水面上发动攻击而毫发无损，即便在面对日本护航舰艇时也是如此。莫顿和他信赖的副艇长理查德·奥凯恩一起，探索出了一套新的接近并攻击目标的流程。奥凯恩被指定为“副接敌官”，在整个鱼雷攻击过程中负责所有的潜望镜观察事务，这样莫顿就被解放出来，得以思考其他所有地方来的信息并做出决策。“刺鲛号”此番战斗巡逻中最光彩照人的一击是在新几内亚的韦瓦克港，它在那里以一次前所未见的鱼雷攻击“一剑封喉”，打跑了一艘冲过来的日本驱逐舰。当被问及在紧张战斗中有何感受时，莫顿答道：“你说我为什么要派奥凯恩看着它〔敌人驱逐舰〕呢？他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12]

莫顿是个高大壮硕，天不怕地不怕，有些狂妄的肯塔基州人，口音也是那里的口音，他会穿着一件不怎么雅观的红色浴袍在艇上走来走去，时常心血来潮，和措手不及的艇员们来一场摔跤。他常常会在巡逻报告中写一些和潜艇工作基本没关系的小提议。他对敌人的态度可谓残暴无情。莫顿似乎是将击沉所有还浮着的日本舰船视为他自己的使命，屠杀日本水手时也没什么负罪感。他属于在和平年代的海军中完全混不下去的那类人——但是在战时的压力之下，他海盗式的作风和敢于冒险的战术使他成了明星。

“刺鲛号”的第三次巡逻只有24天，是有记录可查的最短的潜艇战斗巡逻之一（不过原因很简单，它打完了鱼雷，只能返航）。潜艇战斗巡逻的间隔通常为两个星期，其间所有艇员——军官和水兵都一样——都会在夏威夷皇家大酒店和怀基基海滩的女王酒店享受一段奢华的休息与娱乐。不过既然这次“刺鲛号”那么快就回来了，洛克伍德将军决定让他们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

潜艇则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大修。它被送进干船坞，船底的

寄生生物被刮除，重新油漆了一遍；艇体内部被彻底打扫干净，装满补给物资，填入新的鱼雷。它的4英寸甲板炮被挪到了前部甲板上，后部甲板加装了第三门20mm机炮。所有美军潜艇都进行了改装，加强了甲板炮的火力，因为经验已经证明“上浮击沉”战术战果颇丰。

2月17日，艇员们再度上艇，一个代表团也来到码头送行，“刺鲅号”已经做好了再度出海的准备。它的引擎开始空转，水兵们解开缆索，把它抛掷到码头上。潜艇以半节航速缓缓驶入水道，发动机排出的蓝色废气环绕在艇体周围。在一名引水员的协助下，它驶出了拥挤的港区，在中午前不久穿过了珍珠港狭长的入口水道。

“刺鲅号”的第四次巡逻将进入美国潜艇从未到过的水域——东海和黄海，距离中国和朝鲜海岸很近。莫顿主动申请这个任务，洛克伍德便给了他。莫顿对这片水域很熟悉，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时曾到过那里。这里有全世界最繁忙的一些航线，包括青岛、大连、黄河入海口和下关海峡（濑户内海的西部入口，两侧分别是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航线。莫顿告诉奥凯恩和艇员们，“刺鲅号”这次将要去往一片“处女地”，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巡逻中“杀个痛快”。[\[13\]](#)

潜艇日复一日地在阴冷的灰色海面上颠簸穿行。除了每日例行的下潜训练之外，它一直在海面上航行，从没有遇到过一艘巡逻艇或者一架巡逻机。“刺鲅号”在中途岛短暂停留加油，在那里，它运上了一箱子改进版莫洛托夫燃烧弹，这是守岛陆战队送的礼物。（他们认为一旦和敌人的舢板或者其他小艇近距离遭遇，这些武器就会派上用场。）进入三月第一个星期之后，它把航速降到了单引擎驱动的水平以节约燃油。

3月10日上午，高位观察的潜望镜看到了九州岛南方屋久岛上崎岖的绿色山峦。“南西诸岛”中的许多其他岛屿也纷纷映入眼帘，其中有些岛上的火山或其他地标清楚地标明了自己的身份。11日夜，“刺鲛号”驶过了穿越“南西诸岛”的主要水道吐噶喇海峡。第二天破晓前，它做好战斗准备，进入了东海，也就是指定的巡逻海域。

在随后的几天里，“刺鲛号”白天潜在水下，沿着台湾岛和九州岛之间的航运线猎杀高价值目标。这一海域满是“小鱼”——小渔船、中式帆船以及500吨以下的拖网渔船，这些船常常在夜间亮着灯，以表明自己不是军用船只。艇长和副艇长轮流值守潜望镜，并时不时为某个目标是否值得用一枚鱼雷而争论一番。3月13日，他们向一艘大型拖网渔船射出了艇上24枚鱼雷中的第一枚。但是鱼雷却从目标尾部驶过，未能命中。莫顿可不想再浪费一枚鱼雷，他预计在北方会有更大的猎物等着自己，想把弹药留到那里。在接下来的4天里，“刺鲛号”从数百只舢板近旁经过，艇员们于是将这片海域戏称为“舢板窝”。3月17日，巡逻报告中写道，“刺鲛号”“很难躲开所有的中式帆船和拖网渔船而不被看到”。^[14]

它继续向北，来到了交通繁忙的黄海水域——这是太平洋岸边的浅水海区，三面分别被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环绕。持续的北风将来自北极圈的寒流带到了这里，夜间在指挥塔上执勤瞭望的人都要裹上厚厚的羊毛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他们能在月光下看到自己呼出的雾气，要不停地跺脚拍手取暖，他们的皮肤和脸被吹得泛红、皴裂，执勤不了多长时间就需要由其他艇员接替。

莫顿战前就在这片水域执行过任务，研究过海图和情报。他预计可以在青岛、大连和长崎、下关之间的航线上找到大量的目标，他的判断是对的。从3月19日到25日，在5天的愉快猎杀

中，“刺鲛号”击沉了5艘2 000吨以上的货船。新型的铝末混合炸药战斗部具有可怕的能量：他们看到有几个目标被命中时爆炸解体。碎片被炸飞到空中数百英尺高，残余的船体常常不到两分钟便会沉没。他们常常能看见幸存者趴在残骸上。由于水温只有零上几度，这些幸存者很难活下来。但是莫顿已经决心不留下任何目击者去“告发我们”。[15]3月21日，在山东半岛外击沉货轮“日通丸”之后，莫顿下令：浮上水面，甲板炮就位。他指挥潜艇撞翻了一只救生艇，把艇上的幸存者掀翻到了海里，随后一门20mm炮迅速打死了水里的人。“刺鲛号”的一名水兵在日记中写道：“‘日通丸’连同它所有的货物和船员就此沉底了，其他鬼子海军不久后也将统统如此。”[16]

“刺鲛号”在黄海打出的所有鱼雷中有约1/3没能正常生效。这是太平洋战争头两年中的常见问题——美国鱼雷要么偏离航线，要么从目标下方穿过，要么命中敌人船体但不爆炸，或者提前爆炸，或者沉入水中，甚至转一圈回来冲向母艇。3月25日拂晓，部分由于莫顿对鱼雷失灵感到失望，“刺鲛号”浮上水面，用艇上的4英寸甲板炮干掉了一艘小型货轮。莫顿很喜欢如此使用他的甲板炮，它们当然比鱼雷可靠得多：但大家都觉得这种武器对于1 500吨的潜艇来说有点太大了，而且它的炮口爆风也会给潜艇的上层结构带来重创。一名水兵记得看见过一块甲板在火炮射击时被震了下来。但无论如何，这门炮还是把那艘2 500吨的货轮彻底打成了碎片，直到它沉入海面。“刺鲛号”的有些艇员还跑去嘲笑那些趴在船只残骸上的幸存的日本水手，朝他们喊“*So Solly !*”。[17][18]

“刺鲛号”的巡逻报告描述了这场战斗：“从来没人见过一艘潜艇于曙光初露时，在平静的海面上和清爽的天气中，用3门20mm炮和1门4英寸炮打一场水面战，从没见过……真的很精

彩。”^[19]

此时东方已经天光放亮，“刺鲎号”继续航行，又摧毁了一艘货轮和几艘小一些的船只。随后“刺鲎号”加速退向南边并潜入水下，跟踪了一艘7 000吨的海军辅助船，向它射出了3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命中了船首附近，重创目标但没有当场击沉。^[20]莫顿也没有将它计入击沉记录，但战后调查显示，这艘船确实在向北逃走后沉没了。

“刺鲎号”的横冲直撞给东京敲响了警钟。日本大本营认定是有美军的潜艇狼群正在黄海活动。于是巡逻艇纷纷开往最近有船只被击沉的位置，侦察机也开始在上空往来巡逻。莫顿虽然强硬，却不是不要命的牛仔。奥凯恩就发出了理性的声音，说这次巡逻本身就很危险，要谨慎行事。黄海实际上是覆盖着海水的大陆架，太浅，无法进行深潜规避机动，而深潜规避机动正是潜艇对抗深水炸弹攻击的最佳自卫手段。莫顿将这一海域称为“小水潭”，他的巡逻报告写道：“我们不得不小心控制下潜角度，防止扎进海底。”^[21]随处可见的舢板和中式帆船中，有些可能是军用巡逻船，能看见有些船上装有大型的雷达阵列和无线电天线，普通渔船上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上浮攻击的战术在有条件实施时十分有效，而且迄今一直都很有效——但是任何一艘看似无害的拖网渔船，说不定都装有一门藏在油布下的甲板炮，而只消一枚中口径炮弹直接命中，可能就足以摧毁一艘潜艇。

一枚故障或者哑火的鱼雷射出去后常常只会暴露潜艇的位置。3月25日早些时候，“刺鲎号”击沉了几艘敌船，到了下午，一艘日本驱逐舰直冲着它开了过来。此时双方舰首朝向的角度对“刺鲎号”比较有利，它完全可以机动到有利位置上向对手发动一次理想的鱼雷攻击。它左舷还剩有两枚鱼雷。两个月前在韦瓦克，它曾经以一次大胆的“一剑封喉”鱼雷攻击打中了敌人一艘驱

驱逐舰。这一回，莫顿和奥凯恩一致同意安全第一。“刺鲛号”快速下潜至150英尺深度以规避深水炸弹。驱逐舰很快开到了深弹射程之外，显然没有发现这里还有艘潜艇。据巡逻报告记载，“刺鲛号”“没敢用仅有的两枚鱼雷挑战这个家伙，根据最近的经验，这些鱼雷可能会提前爆炸。我们不得不躲进壳里溜走，这很有辱尊严”。[22]

次日，进一步往南行驶的“刺鲛号”向一艘装载着煤炭，可能正开往九州炼钢厂的4 000吨的货轮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击中了船体中部，货轮在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中爆炸了，掀起的煤灰变成了一朵蘑菇云，令空气几分钟内都无法呼吸。“刺鲛号”继续向南航行，溜到通往南方区域的主航线上，3月28日，它向一艘货轮放出了最后一枚鱼雷。那艘货轮两分钟内就沉没了。

所有鱼雷打光后，莫顿命令“刺鲛号”浮出水面。它再度杀回“舢板窝”，用甲板炮在小船面前耀武扬威。3月27日上午，“刺鲛号”击沉了一艘装有大型雷达天线的拖网渔船，莫顿怀疑那是一艘日军巡逻艇。果不其然，当敌船开始下沉时，船上的三门甲板炮露了出来。潜艇上的20mm机炮已炮管过热，水兵们不得不把成桶的海水泼上去降温。一名艇员发现炮身已经滚烫到水一浇到炮管上就会蒸发掉。一支潜水员组成的“突击队”登上正在下沉的敌船残骸寻找敌人文件，却空手而归。最后，他们用几枚中途岛上海军陆战队送的莫洛托夫燃烧弹结果了这条船。

当晚，“刺鲛号”退往吐噶喇海峡，艇员们在收听东京广播电台时听见有发言人宣称没有美国潜艇胆敢接近日本水域，都乐了。

“刺鲛号”的第四次战斗巡逻再次大获全胜。在黄海上的19天里，这艘常常在水面航行的潜艇击沉了9艘轮船、1艘拖网渔船和

2条捕鱼舢板。它深入了日本人先前认为安全的水域，充分利用了突袭的优势。莫顿称自己击沉了8艘轮船，上级就给他记录了8艘战绩，直到战后统计时，他的战绩才增加到9艘，这就令此次出击成了单次击沉敌船数量最多的一次潜艇战斗巡逻。在黄海上的这次大打出手令莫顿坐稳了太平洋潜艇部队MVP（最有价值选手）的位置。

尽管“刺鲛号”拿到了一张可怕的成绩单，但艇上至少有6枚鱼雷失灵，占艇上鱼雷总数的1/4。3月24日，它由于鱼雷故障放跑了一艘大型油轮，这尤其令人恼火。莫顿向这个高价值目标射出了4枚鱼雷，却居然无一奏效。两枚提前爆炸，第三枚被那两次不合时宜的爆炸炸得偏离了航向，第四枚则开始“海豚跳”——时而深潜，时而浮出水面，像一道正弦波——然后偏离航线狂奔而去。莫顿就这个问题向洛克伍德将军大发牢骚，洛克伍德对他的话毫不怀疑。到1943年夏季，他确信Mk14蒸汽鱼雷是不合格的武器，并为了这个问题在华盛顿找了不少麻烦。6月24日，他获得尼米兹的许可，拆下了所有鱼雷上的磁性起爆器，等候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同一周，洛克伍德告诉金上将，鱼雷故障可能致使他的太平洋潜艇部队在头18个月战争中的战果下降了至少50%。

海军军械局对此的反应慢到令人愤慨，也令问题雪上加霜，正是军械局设计和制造了Mk14鱼雷。这种武器在战前根本就没有好好测试过，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经费不足的原因。设在罗得岛州纽波特的海军鱼雷站里，某些有分量的军官和工程师看起来是把所有关于这种武器的抱怨视作针对自己个人的了，他们坚持认为所有的故障都要归因于操作不当，以及珍珠港和潜艇自身对鱼雷维护不佳。面对如此答复，潜艇官兵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巡逻时更加“宝贝”这些武器，只在最佳状况下发射。许多潜艇

甚至开始关闭鱼雷管保护盖，直到发射前片刻才打开保护盖把鱼雷装进去，这样鱼雷就不会过早暴露在含盐的海水中。

但是故障依旧。故障的原因很多，而且一个原因可能会掩盖其他原因，这就令它们更难以被找到和纠正。许多故障都和“磁性”起爆器相关，这一装置的作用是通过探测目标船的磁场来引爆鱼雷战斗部。这项技术在当时十分先进，是战前美国最高机密武器计划的产物之一。其设计目的是应对当时在大部分重型战舰上常见的舰体“突出部”。（“突出部”是在舰体水线上下凸出来的双层船壳，当传统鱼雷在其表面爆炸时，它就可以保护内层船壳。）它的思路是让鱼雷冲到舰船下方，直接在龙骨下爆炸。这样爆炸的力量就会直接向上打击敌船无防护的底部，对目标的损害将会严重得多。但是这种磁性引信在战斗中常常失效，这就导致哑弹或者提前爆炸的比例很高。最终人们发现，设计人员忽略了世界不同区域磁场的变化，这一技术还需要根据经纬度进行微调才能使用。

人们还发现，Mk14鱼雷的实际航行深度会比设置深度深10英尺或11英尺。这个问题不难纠正，却直到1942年6月才最终被发现，此时已经开战6个月，超过800枚这样的鱼雷在战斗中被发射了出去。不仅如此，尽管抱怨不断，但这个问题却不是由军械局发现的——是洛克伍德本人亲自发现的，当时他是西澳大利亚潜艇部队司令，他在乔治王湾里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结果显示，这种武器航行时平均比设置深度深11英尺。起初军械局坚称洛克伍德的测试未经授权，结果不准确。直到两个月后，金上将在军械局的“屁股下烧了一把火”，他们才（根据在纽波特进行的测试）承认Mk14鱼雷确实航行偏深，其机械装置在战前测试不足。

然而，第三个问题却被其他缺陷遮蔽了超过一年。Mk14鱼

雷的触发引信，也就是磁性引信的传统版本，其撞针过于脆弱，常常在撞击时破碎，无法引爆战斗部。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洛克伍德命令拆除大部分潜艇上鱼雷的磁性引信才被发现。当时很快就有报告称鱼雷以理想的90°角直接撞上目标船的船体，结果却弹开了，没有爆炸。最惨痛的一次是在1943年7月24日，当时丹·达斯皮特艇长指挥的潜艇“黑鲈鱼号”在帕劳群岛西部攻击了一艘日本货轮。“黑鲈鱼号”在近距离几近完美的条件下连续发射了11枚鱼雷。达斯皮特通过潜望镜观察战果，谁知这些鱼雷竟然一枚接一枚地命中敌船，随后沉没不见。其中一枚鱼雷从船体上弹开，像鱼儿咬了钩一般跃出海面，接着又像鱼儿脱了钩一样掉进水里消失了。此时艇上只剩下了一枚鱼雷，达斯皮特放弃了击沉目标的努力，他要把这最后一枚鱼雷带回珍珠港仔细检查。

洛克伍德一年前在澳大利亚做测试时就干了军械局的活儿，现在他故技重演，在珍珠港做了一系列测试。触发引信故障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把撞针换成更坚固的铝合金材质就行了。“此事最终打垮了鱼雷官僚们，”当时在潜艇部队担任军官的爱德华·比奇说，“他们现在终于愿意承认，在实验室里多消耗几枚鱼雷，比在更重要的实战中浪费掉它们要好得多。”^[23]

1943年9月，太平洋潜艇部队被告知Mk14鱼雷最终“修好了”，累计统计数字也显示，在随后几个月里鱼雷的实战表现越来越好。然而，关于鱼雷失灵的报告却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消失过。最恐怖的失灵现象是“环航”，一旦鱼雷的舵面被卡住，它就会全副武装掉过头来向发射自己的潜艇扑过去。有几艘美军潜艇就体验了这种可怕的故障，靠深潜或者在水面上剧烈机动才擦着边躲过一劫。明确知道的就有两艘潜艇这样被自己的鱼雷摧毁，这是因为艇员中有人幸存下来说出了真相。可以想见，还有其他

潜艇也同样由此被击沉，只是无人幸存而已，对此，后人只能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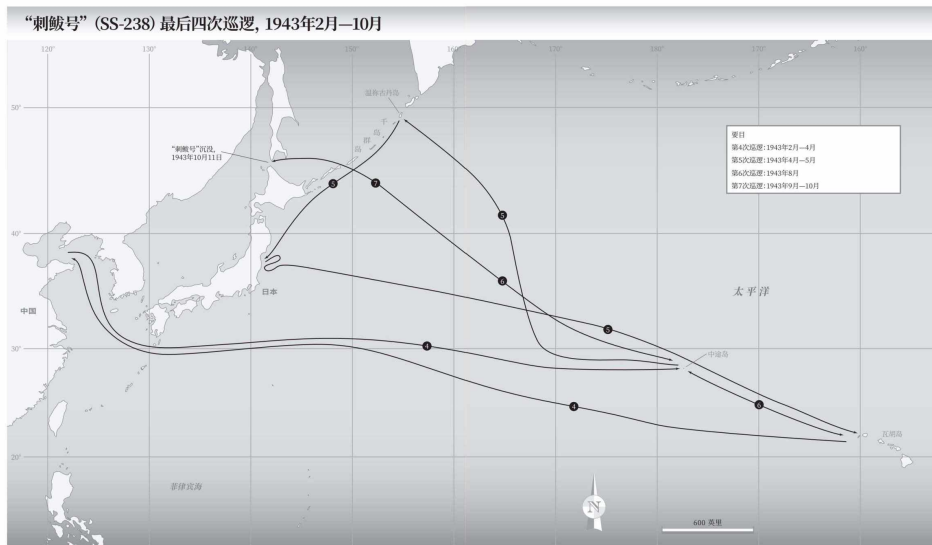
西屋公司的下一代Mk18电动鱼雷恰好在此时的1943年秋季进入部队，这种鱼雷不会拖出易被发现的气泡或废气尾流。这一新型武器也被送到纽波特的海军鱼雷站进行试验和测试——然而一名潜艇部队军官却发现，“纽波特这伙人”不肯配合。设计并制造了Mk14鱼雷的纽波特鱼雷站的工程师们将西屋公司的这一新产品视作来抢饭碗的，十分仇视。戈特岛（纽波特港口中的一个小岛，是鱼雷站的所在地）被“非我发明综合征”^[24]控制了。在纽波特监督这些试验的“黑鲛号”潜艇军官们对自己得到的对待备感失望。“说他们蓄意破坏可能太重了，”“黑鲛号”副艇长伊莱·赖克如是说，“但他们确实一点忙都不肯帮。”^[25]赖克在珍珠港告诉洛克伍德的副手：“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战争意识。”^[26]

1943年5月21日，“刺鲛号”结束了第五次战斗巡逻后返回，此番它去到了高纬度上冰天雪地的日本千岛群岛。它击沉了3艘敌船，考虑到这次任务的实际情况，这个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莫顿告诉洛克伍德，如果鱼雷都能正常工作的话，自己原本可以击沉6艘。“刺鲛号”此时已经急需大修，于是它奉命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雷岛，也就是这艘艇18个月前诞生的地方。迪克·奥凯恩晋升了，现在他要去指挥自己的潜艇，一艘白鱼级潜艇，名为“刺尾鱼号”。这艘潜艇此时尚未建成，它也是在马雷岛建造的，只要从“刺鲛号”的泊位沿着河边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刺尾鱼号”将于1943年8月下水，奥凯恩和骨干艇员们将监督它最后阶段的建造和舾装。与此同时，“刺鲛号”基本相当于重建了，当它在1943年7月启程开往珍珠港时，其外观已经完全变了样。莫顿带领着几位新的军官和大部分都是新人的艇员登上了“刺鲛

号”。当它在7月21日驶入纳帕河时，艇长和自己的好友、老搭档副艇长挥手道别。这是二人的最后一面。

莫顿这一次想要带领“刺鲛号”前往日本海，这片海域位于日本和亚洲大陆日占区之间，几乎完全被陆地包围。洛克伍德答应了自己这位明星艇长的请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太平洋水下战争的“最后一程”；这是唯一一处美军潜艇尚未渗入的重要海域。这里满是往来于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船只。但由于地形封闭，日本人此前还没有在这里采取什么特别的反潜措施。如果说黄海是美国潜艇的“处女地”，那么日本海简直就是日本不容侵犯的圣地。

出入日本海只有三条通道：位于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的津轻海峡，以及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的拉彼鲁兹海峡（又称为宗谷海峡）。这三处水道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咽喉要地。所有水道都布设了水雷，有岸炮把守，并且有反潜巡逻艇和巡逻机密集巡逻。闯入这里很危险，逃出更难——一旦日本人发现日本海中有敌人潜艇，他们在几个出口处的反潜措施就会加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后，洛克伍德和莫顿一致认为拉彼鲁兹海峡是进出日本海的最好选择。



1943年8月14日,“刺鲛号”开进了拉彼鲁兹海峡。它趁着夜色以大约18节航速从水面开了进去。日本雷达发现了它,一座灯塔向它打出了身份识别信号,但它无法应答,因为不知道口令。但是还没等日本人做出反应,它就溜了过去,如同鬼影一般消失在了日本海上。

和预期的一样,这片海域中满是高价值船只,莫顿兴奋地准备再一次大展拳脚。但是它的鱼雷坑了它。在8月15日到22日之间的一个星期里,“刺鲛号”找到并攻击了12艘货轮,却经常碰到哑弹、航线过深、提前爆炸以及偏航失踪的问题。莫顿于是决定尽快返回珍珠港,要求上级重视此问题。在这次半途而废的短暂巡逻的报告中,莫顿引用了历史上一句著名的海军口号,这是由美国内战时的海军将领戴维·法拉格特喊出来的:“该死的鱼雷!”放在此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8月28日,得到洛克伍德返回基地的许可之后,“刺鲛号”浮上水面,向一艘日本舢板的前方开火令其停航。但日本船没有

停，于是“刺鲛号”用甲板炮把它打成了碎片。6名日本渔民投降，被带上艇当了俘虏。这些人都得到了干净的干衣服和一杯白兰地，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们被关押在后部鱼雷舱里，睡在甲板上的垫子上。“刺鲛号”艇员和这些俘虏的关系还不错，甚至可以说很友好。俘虏们给艇员们展示了自己的厨艺，还自告奋勇承担了日常清扫工作。[27]

回到珍珠港，“刺鲛号”迅速进行了物资补充。莫顿想要立刻重返日本海，洛克伍德同意了。另一艘潜艇“锯鳐号”将与它同行。“刺鲛号”此次装上了新型Mk18鱼雷。9月10日，两艘潜艇开向了大海。

当天早晨，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的一次有记录的新闻简报会上，莫顿花了不少时间，大方地接受了采访。在通讯稿中，他乐观而无拘无束的性格跃然纸上。上午11时50分，他结束了采访，解释说自己的艇下午1点就要出发了。莫顿向记者们保证，下一次战斗巡逻结束后，自己将会再次坐下来接受采访——“等他回来后，”记者在通讯稿末尾写道，“我们就会听到更多关于‘刺鲛号’的冒险故事了。”[28]

然而，马什·莫顿再也没有回到珍珠港，“刺鲛号”后来的故事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它的第七次战斗出航成了最后一次，如潜艇兵们所言，它将要“永远巡航”。

借助日方资料和专业人员的估测，我们可以重现“刺鲛号”最后一次战斗巡逻的部分情况。当天下午，它和“锯鳐号”结伴离开了珍珠港。两天后，它开进中途岛加满燃油，随后继续航行7天，回到了拉彼鲁兹海峡。“刺鲛号”再一次趁夜（可能还是在水面上）通过了这里，“锯鳐号”两天后也随之进入。莫顿说过，他想要前往日本海南部海盆猎杀船只，也就是在下关海峡的西部入

口，濑户内海的西大门附近。10月5日，东京的日本同盟通讯社报道，一艘“汽船”当天被美国潜艇击沉，544人遇难。而这一水域里只有一艘美军潜艇，那就是“刺鲛号”。同盟社没有说明这艘船是军用还是民用，也没有说清死掉的这些人是军人还是平民。战后发现的记录显示，被击沉的是8 000吨级的客轮“昆仑丸”，它已被日本陆军征用为运兵船。它的沉没促使日本人取消了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夜间航渡。

战后的分析显示，“刺鲛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摧毁了另3艘1 000吨以上的敌船。它们被击沉的地点在当天只有“刺鲛号”能够到达。

“锯鳐号”在10月9日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离开了日本海，比“刺鲛号”的预定返回日期早了两天。它的艇长发现日军的反潜措施大大加强了；“锯鳐号”遭到了多艘巡逻艇和一架飞机的追杀。它下潜到200英尺深度，一连潜伏了数个小时，仅仅依靠回声测距来控制深度。日军投下了几枚炸弹和深水炸弹，但距离潜艇都很远。它在下潜状态下穿过了海峡，次日上午安全脱险。

两天后的夜里，“刺鲛号”遭到了北海道岛北端岸炮的射击，可能为一枚近失弹所伤。它快速下潜，但还是没来得及躲过一架在附近盘旋的大凑航空队的水上飞机，这架飞机向“刺鲛号”所在位置投下了3枚深水炸弹。巡逻艇（可能就是追杀“锯鳐号”的同一批）随即涌进海峡，四处投掷深水炸弹。日军舰艇未能用声呐锁定“刺鲛号”的位置，但它们还是在这一区域停留了4个小时。拉彼鲁兹海峡中的这一片水域深度很浅，无法深潜。随后，一片长达3英里的巨大油污证明“刺鲛号”最终沉入了水面下213英尺的海底。2008年，人们才找到并辨认出了“刺鲛号”的残骸。

美国人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对“刺鲛号”被摧毁时的情况一无

所知。它可能是在拉彼鲁兹海峡中被深水炸弹炸毁的，但也可能是毁于事故、水雷，或者一枚出故障的鱼雷。1943年11月9日，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宣布这艘艇“超期未归，判定为损失”。这个消息在美军潜艇部队中引发了一阵哀伤。莫顿是潜艇部队中最受人崇拜的艇长，他的战友们一直想要仿效他勇猛的打法。他们这时候会不会把“刺鲛号”的损失视为一种警示，认为他实际上是太鲁莽了？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却不能忽略。而且，大家都知道潜艇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任何一艘艇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损失掉，无论它采用了何种战术。从此，洛克伍德叫停了所有向日本海渗透的行动，这个方向上的进攻作战直到战争末期才恢复。

随着统计数据经过战后的分析而不断增长和修订，莫顿和“刺鲛号”已然接近了美军潜艇部队排行榜的顶端。他战时的战绩是击沉敌船17艘，战后这一数字增长到20艘，更新的评估认为可能高达24艘。虽然在战争中半道而亡，而且饱受鱼雷故障的困扰（这一故障在他死后大大减轻），莫顿仍然能够位居击沉敌船数量排行榜的次席，以及单次战斗巡逻战绩排行榜的次席。或许莫顿的领导能力还带来一项更大的贡献，他原先的副艇长迪克·奥凯恩正是那个后来在两个排行榜上都超越了莫顿的人。

1943年秋，美国人的潜艇运用思路发生了转变。此前，洛克伍德和澳大利亚的潜艇部队将领们让许多舰队潜艇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周围海域巡逻，这些都是日本海军最大的海外舰队锚地。它们能对敌人大规模的海军行动提供宝贵的目视侦察和预警，还能在敌舰进出环礁时抓住机会发动攻击。潜艇部队同样还被部署在所罗门群岛和南太平洋以支援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在这一地区的进攻作战。此外和往常一样，潜艇们还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特殊任务，比如侦察、捞救坠海飞行员，以及向菲律宾偷运代

理人和情报。而在1943年10月到12月间，更多的潜艇开始被派去攻击西太平洋上的日本海运线，包括“刺鲛号”探索出来的海域：东海和黄海。到这个时候，美军潜艇每个月都能击沉超过10万吨日本船舶。

拉尔夫·克里斯蒂将军的西澳大利亚司令部驻地在弗里曼特尔，他们投入了全部力量来寻找和击沉往来于婆罗洲和特鲁克之间的日本油轮。这条航线上的许多油轮都有双层船壳，很难被击沉，但它们又比军舰缓慢，更易于被击中。好在新铝末混合炸药战斗部具有巨大的能量，而油轮也常常满载着相对容易挥发的未经提炼的原油，这就使它们很容易遭受毁灭性的二次爆炸和大火。在194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从弗里曼特尔出发的美军潜艇将12艘油轮送下海底，这足以打断日本的补给线，并令东京开始严重担忧他们的舰队会由于缺油而无法行动。

1944年，美军潜艇的吨位战战绩达到了巅峰。它们击沉商船（不含军舰）的吨位翻了一倍还不止，从1943年的120万吨增加到1944年的250万吨。^[29]随着新型白鱼级潜艇服役，太平洋潜艇部队的规模从1943年2月的47艘增长到1944年6月时的超过100艘。于是，洛克伍德和他的团队开始试验狼群战术，将3到6艘艇交由一名指挥官指挥。这些潜艇装备了更好的声呐、雷达、光学和通信系统，配有更强大的甲板炮，鱼雷也最终达到了设计性能。Mk14鱼雷被新型Mk18鱼雷取代，这种鱼雷在纠正了一些缺陷后成了致命的武器。更年轻、更勇猛的新一代艇长学着马什·莫顿的样子，战斗巡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水上航行。他们被派到更远的地方，前往亚洲大陆和日本沿海，在敌人最繁忙的航运线上大开杀戒。夜晚，他们会使用大为改进的SJ雷达，锁定猎物的位置、航速和航向，之后发动四台引擎，以常常接近20节的最大速度冲向攻击位置。珍珠港的密码破译部门破译了日本的航

运密码，这样就能准确预判日本商船队的位置和航线。这一宝贵的绝密数据被用于选择巡逻位置，也常常通过远程无线电发送给已经出海的潜艇。

1944年1月，迪克·奥凯恩和他的新型白鱼级潜艇“刺尾鱼号”完成了从马雷岛到珍珠港的处女航。在奥凯恩的指挥下，这艘致命的“刺尾鱼号”在9个月的战斗生涯中登上了美军潜艇部队击沉总吨位排行榜的榜首，甚至超越了莫顿在“刺鲀号”上创造的纪录。根据陆海军联合评估委员会（JANAC）战后得出的结论，它摧毁了24艘敌船。而它的艇长和艇员则坚持认为实际总击沉数更高，可能多达33艘。无论如何，“刺尾鱼号”在“沉默军种”二战单艇击沉总吨位排行榜上位列前三是毫无疑问的。

奥凯恩本人看起来也想要为马什·莫顿之死和随同“刺鲀号”一同葬身拉彼鲁兹海峡的80条人命复仇。他作为“刺鲀号”副艇长进行的三次战斗巡逻已经让他成了这种事情的行家里手。和莫顿一样，奥凯恩也是夜间水面攻击的拥护者。他认为紧急下潜只是最后的手段，仅限于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夜间在水面上作战可以为自己赋予更高的能见度，不仅能用SJ雷达，还能派遣视力发达的年轻水兵带着高倍率望远镜爬到潜望镜筒的顶上去。每次作战前，奥凯恩都会先把成功的概率算清楚，如果他觉得没问题，就会发动大胆、勇猛的进攻。“刺尾鱼号”一次又一次甩开日本驱逐舰，潜入敌人运输船队队形内，常常能用一轮齐射击沉多艘敌船。

“刺尾鱼号”的第一次战斗巡逻是在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水域，它在暴雨中花了两天时间追踪一支大型船队，击沉了三艘大船。两天后的夜里，它的雷达捕捉到了另一支向北航行的船队，在两天的猫和老鼠游戏中，“刺尾鱼号”又击沉了两个高价值目标，包括一艘大型海军油轮“越前丸”。在此次亮眼的战

斗巡逻之后，“刺尾鱼号”在第5舰队航母首次空袭特鲁克（1944年2月17—18日的“冰雹”作战）时担任了救生潜艇，它在这次行动中救回了7名空勤人员，比参与此次行动的其他任何潜艇都要多，出了名。它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巡逻是在东海——奥凯恩对这片水域很熟悉，他一年前就随“刺鲀号”在这里巡逻过——“刺尾鱼号”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单艇狼群。1944年6月24日夜，在距离长崎不远的地方，它伏击了一支由6艘大型货轮组成，有军舰护航的纵队，呈扇面齐射了6枚鱼雷。奥凯恩相信并宣称有两枚鱼雷找到了准头，击沉了两艘船。然而根据战后统计，这轮齐射击沉了4艘大型货轮，总吨位达1.6万吨。6雷齐射击沉4艘船，这就是二战中最致命的一次潜艇齐射了。1944年8月，“刺尾鱼号”再续辉煌，在日本本土主岛本州岛以南大胆地闯进船只最为密集的沿岸海域横冲直撞，又摧毁了至少两艘大型商船，总吨位11 500吨。

这一年，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潜艇和艇长名留青史。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斯莱德·卡特尔，美国海军学院1935届的前橄榄球明星，他是个马什·莫顿式的敢冒险的大胆艇长。他进行了4次战绩彪炳的巡逻，其高峰是1944年6月在吕宋海峡的一番战斗，卡特尔的潜艇“海马号”击沉了总吨位达7.2万吨的19艘敌船。到战争结束时，他和马什·莫顿并列击沉数排行榜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奥凯恩）。萨姆·迪利作为“鲐鱼号”艇长进行了6次战斗巡逻，击沉了16艘日本船只，总吨位54 002吨。“鲐鱼号”对战争最著名的贡献发生在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前不久。它在苏禄海南部的塔威塔威锚地里追踪日本舰队主力，在3天时间里击沉了3艘驱逐舰。鲁本·威泰克是“松鲷号”艇长，小切斯特·尼米兹是他的三副；在菲律宾周围和南海的4次巡逻中，“松鲷号”击沉了总吨位60 846吨的15艘船。吉恩·弗拉基，“石首鱼号”艇长，在吕

宋海峡和东海取得了少见的7次战斗巡逻记录，击沉了总吨位96628吨的17艘船。“石首鱼号”在1945年7月有一次耀眼的表现，它运送一组突击队员在当时还是日占区的库页岛上登陆，炸毁了一列火车。这是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次此类作战，也是盟军在日本本土岛屿上的唯一一次地面作战。

但是太平洋上的吨位战依赖的并不仅仅是美国潜艇部队的这些尖子选手。在这场“千刀杀一人”的战事中，每一小刀都有价值。大部分艇长和潜艇都在战绩榜的下方，但即便是那些名字大多已被遗忘的中等水平选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日本来说，残余的那些宝贵油轮到底是被“刺鲛号”、“刺尾鱼号”或“海马号”这样的超级明星击沉，还是被默默无闻的诸如（此处随机选几个）“鳕鱼号”、“王鱼号”或“巴伯罗鱼号”这样的普通潜艇送下海底，并没有什么区别。1944年，处于战斗巡逻状态的美军潜艇数量翻了一番，从1943年6月时的平均24艘增加到1944年6月时的48艘。^[30]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里，有人说人们可以踩着美国潜艇的潜望镜从日本走到新加坡。最终发挥作用的，是他们所有努力所取得的总成果。

1944年后期，美军潜艇每个月都能击沉超过25万吨日本商船。击沉吨位的高峰出现在1944年10月，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麦克阿瑟的重返菲律宾之战和莱特湾大海战。这个月，海面下的掠食者们摧毁了328 843吨日本商船，其中包括103 903吨油轮。^[31]此后，每月的击沉总吨位开始下降，但这仅仅是因为目标开始相对变少了。在最繁忙航运线上巡逻的美军潜艇发现海面上满是之前被击沉的船只留下的油污、碎片和残骸。许多艇长开始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击沉中式帆船和装有甲板炮的拖网渔船。

“刺尾鱼号”的最后一次巡逻始于1944年9月的最后一周，这次它来到了台湾海峡。这次巡逻恰逢哈尔西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

空袭此地，以及莱特湾海战的开局。在两天的时间里，奥凯恩艇长追踪了向南航行的志摩舰队（它后来参加了苏里高海峡之战）。遭到志摩一艘巡洋舰上8英寸炮的轰击后，“刺尾鱼号”紧急下潜以保护自己。奥凯恩的目视侦察报告发到了珍珠港，随后又转发给了哈尔西和金凯德。10月23日，“刺尾鱼号”截击了一支向北航行的船队，船队有三艘油轮，两翼有两艘货轮，有驱逐舰严密护航。避开驱逐舰之后，奥凯恩指挥潜艇机动到了船队中间，准备发动近距离夜间鱼雷攻击，他只用了一轮近距离鱼雷齐射就击沉了全部三艘油轮。大爆炸一度照亮了“刺尾鱼号”，其余的货轮便直接转向潜艇，似乎想要撞击它。奥凯恩下令“紧急全速前进”，潜艇猛地向前一冲，横在了从两侧靠过来的两艘船的前方。两艘日本船却发现由于同时朝一个位置驶去，快要撞上了；它们真的撞上了，片刻之后，两艘船双双被“刺尾鱼号”尾部发射管的鱼雷齐射击中了。两次大爆炸炸毁了它们。“刺尾鱼号”甚至都用不着下潜。它在短短10分钟时间里摧毁了5个高价值目标，这是战争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击。

奥凯恩此时还有12枚鱼雷，他还想把它们用起来。10月24日，当莱特湾海战在南方激烈进行的时候，“刺尾鱼号”的SJ雷达再次捕获了一支北上的船队。这是个大船队，可能有多达10艘船，还有护航舰。接下来便又是一场屠杀：奥凯恩指挥“刺尾鱼号”接近过去，六雷齐射。两枚鱼雷命中了两个不同的目标，敌船迅速双双沉没。接着艇尾鱼雷管又射出四枚鱼雷，命中了一艘油轮，油轮带着伤逃走了。此时一艘驱逐舰突然出现在“刺尾鱼号”左侧，奥凯恩赶紧下潜脱离了战场，在深水处静默。随后，他又指挥潜艇浮上水面，追踪受损的敌船。“刺尾鱼号”现在还有两枚鱼雷来做这件事。奥凯恩站在舰桥上，命令两个舰首鱼雷管装填鱼雷，潜艇向几乎动弹不得，还在燃烧的油轮驶去。第一枚

鱼雷工作正常，径直命中目标船首附近，又一道火柱冲天而起。这可能足以结果它了，但是“刺尾鱼号”还剩一枚鱼雷，奥凯恩决定靠上去，打出这一雷，给出致命一击。

这确实是致命一击，却不是美国人想的那个样子。这最后一枚鱼雷刚刚射出去，就开始一阵一阵地海豚跳，向左转弯。它长长的尾迹泛着泡沫，闪着磷光，转了一个大圈直奔“刺尾鱼号”而来。奥凯恩见状向下方舱盖里大吼道：“紧急全速前进”，以及“右满舵”，但来不及了。鱼雷的舵卡住了，抑或是舵机失灵；不管原因如何，它此时正直冲“刺尾鱼号”正中间而来，目标点就在奥凯恩和其他8个人所在的舰桥正下方。随着潜艇引擎突然加大马力，它向前猛冲，开始以鱼尾机动摆脱直扑而来的鱼雷航迹，但是鱼雷还是命中并爆炸开来，撕开了后部鱼雷舱附近的艇体。后部舱室立刻被海水淹没，艇尾下沉，艇首抬出了水面。奥凯恩向指挥塔内吼叫着要他们关闭舱门，但是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海水淹没了舰桥和舱盖，奥凯恩和其他几个人被甩进了海里，“刺尾鱼号”无助地翻滚起来，艇尾向下，艇首直指天空。此时对留在艇上的那80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刺尾鱼号”能多在海面上坚持一段时间，好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不过倘若是这种情况，他们可以预料到，自己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就只能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度过了。

游在海面上的几个人——包括奥凯恩和另外9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刚刚从指挥塔舱盖里逃出来——眼睁睁看着潜艇滑入海面下。它一直下沉到约180英尺处才停下来。前部鱼雷舱里有大约30个人还活着，他们设法锁住了舱盖。这些人烧掉了所有的保密文件，却让空气中满是烟雾，令他们的处境更加绝望。总共有13个人分成4组，设法通过前部逃生窗口逃出潜艇，借助被称为“莫姆森肺”的简易呼吸装置浮到海面上。其中8个人在上浮过程中或

是浮出水面后死去，可能是由于减压病（所谓“潜水员病”）。他们在海面上漂浮了一整夜后，一艘日本驱逐舰捞起了10名“刺尾鱼号”艇员，包括奥凯恩。[\[32\]](#)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们就是战俘了，在本州岛的几个战俘营里调来调去。只有4个人活到了战争结束。奥凯恩活了下来，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1932年，空中力量的先驱、退役陆军航空兵军官比利·米切尔就呼吁开发一型航程5 000英里，载弹量10 000磅，实用升限35 000英尺的重型轰炸机。在那个时候，这个主意看起来过于超前和异想天开了，就像儒勒·凡尔纳或者H.G.威尔斯小说里幻想的机器那样。但是航空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到1940年，在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之时，航空工程师们相信，制造一种超重型、超远程、气密增压的轰炸机已经是可行的了。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成功说服国会从纳税人的口袋里再多掏一些钱出来，资助这种波音公司设计的航程和载荷都是B-17“飞行堡垒”两倍的新型轰炸机。30亿美元（1940年币值）砸下去之后，B-29“超级堡垒”诞生了。

该计划的支持者对当时的政治风向很敏锐，因此没有将这种飞机宣传为战略轰炸武器。这种超重型或说超远程轰炸机（英语缩写为“VHB”或者“VLR”，两个缩写常常混用）是战前孤立主义者重视的“半球防御”战略的基石。B-29具有可怕的航程，能够监视大西洋航线，发现任何接近的敌人船队（预想是德国人的）。这种飞机将在大洋中央赢得无可挑战的空中霸权，在敌人进攻部队在北美或南美大陆获得第一个立足点之前予以拦截并将其击退。如果纳粹真的在南美洲夺取了一块滩头阵地，B-29就可以从佛罗里达州或加勒比海的基地出发打击敌人。这样，这种巨型飞机就会成为“美洲堡垒”的看门狗和警犬。据说如此。

1941年，当全球大战的阴影铺满世界时，美国战争部要求波音公司加快研发进度，在测试和优化工作全部完成前就将这种新型轰炸机投产。1941年5月，波音接到了首批250架飞机订单，此时距离珍珠港之战还有6个多月。一年后，波音已经得到了交付1 644架飞机的订单，而此时这种飞机甚至一架都没有上过天。^[33]波音为B-29的制造投入了两座大型工厂，华盛顿州的兰顿工厂和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工厂。其他多家顶尖的航空工业公司也加入为其提供零部件或者发动机的行列，包括贝尔、费舍尔、马丁和莱特公司。当这型飞机还只有几架验证机的时候，陆军航空队就为了它们未来的交付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型指挥部和行政组织。招募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在B-17和B-26飞机上训练，其中大部分人在小轰炸机上完成训练之前都没有飞过（甚至没见过）“超级堡垒”。1943年2月，一架B-29早期原型机在试飞中坠毁，夷平了西雅图市郊的一座肉类加工厂，整个项目中最优秀的试飞机组和工程师连同地面上的21名平民死于非命。但是项目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当第一架B-29在1943年7月交付时，飞机还有许多小毛病，即便此时全国各地的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马力生产，飞机的设计还是接受了数千项改动。

它比此前所有批量生产过的飞机都大得多。飞机全长99英尺，翼展140英尺。空机重量7.45万磅，但是战斗载荷时的起飞重量通常至少有12万磅，超过14万磅则是家常便饭。将这架“超级堡垒”抬离地面所需的巨大推力来自四台2 200马力的莱特R-3350星型发动机。

第一次见到这架新飞机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目瞪口呆。那修长的机身，庞大的有机玻璃花房式机头，巨大的机翼和襟翼，以及耸立着的三层楼高的机尾，都让他们赞叹不已。靠着前三点式起落架，飞机骄傲地站立在柏油停机坪上。用平头铆钉连

接起来的铝合金机身如同抛光过的白银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部分新手都是在B-17上训练的，大家觉得那已经是很大很重的轰炸机了。而“超级堡垒”在所有方面都要大得多，重量更达到了B-17的两倍。飞行人员们知道自己的性命有赖于那四台强大的十八缸引擎，还有桨叶尖端距离远达16英尺，如同独木舟一般大小的螺旋桨。

爬进机舱后，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这架新飞机了。两个宽敞的机舱通过炸弹舱上方的一条爬行管道连接到一起，这让全部11名机组人员都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舱室可以加热，还是气密加压的。即便是在外部温度只有零下70摄氏度的3万英尺高空，他们仍然可以舒舒服服地穿着衬衫坐在座位上。巡航时，他们不用戴氧气面罩，还能自由地抽烟。腰部和尾部机枪手坐在气泡形有机玻璃窗内，视野良好，他们坐在这里就可以通过电动遥控系统同时控制多个.50口径机枪塔。发动机的噪声被挡在外面，这很令大家满意，机枪也不会像无气密的B-17上那样就在耳朵旁边炸响。置于圆锥形有机玻璃机头前部的驾驶舱，在各个方向上的视野都很好，尤其是上方和下方。正副飞行员会有一种几乎飘浮在长长机身前方空中的奇怪感觉，有人说驾驶“超级堡垒”就像是“坐在门前走廊上带着房子飞起来”。[\[34\]](#)

为了克服重力把70吨重的飞机送上天空，重压之下的莱特R-3350引擎很容易过热、漏油、汽缸盖飞脱、阀门落入汽缸，以及把熔化的碎片甩到高度易燃的镁合金曲轴箱里。在数百架B-29已经走下组装线之后，原先的空气冷却装置却还要重新制造。燃烧的发动机会拖出一道烟火，就像流星穿过大气层一样——但这个流星却是连接在飞机机翼上的，随时可能引燃机翼自身的铝质蒙皮和大梁。因此，一台状况不佳的发动机最好在起火之前迅速关掉。这是通过让螺旋桨“顺桨”实现的。一套从座舱里

控制的液压系统可以旋转四片桨叶的迎风角，也就是“回桨”，直至它们停下来并反转，让发动机停转为止。如果机组反应迟缓，或者回桨失灵，螺旋桨就会开始“风车转”，这就会带来巨大的阻力：几分钟内它们就会把桨轴烧断，从引擎上飞出去，有时会重重撞在机翼上。

如果一台故障引擎能恰当关闭，那么其余三台还足以把B-29带回家，即使距离远也没问题。但是这样一来，那三台正常工作的引擎就会比原先消耗更多的燃油，这样，把原本用于故障引擎的燃油从油箱和油路里重新分配给其他引擎就至关重要了。这可能需要对所有燃油储备进行复杂的重新调配。这种操作的容错空间很小，任何一点差错都会带来灾难。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B-17飞行员，在试飞B-29之前也需要接受几个星期的课堂教学。每一阶段的学习都要认真关注一长串知识点。起飞滑跑距离很长，超过一英里，然后引擎就会吼叫着使足力气，把这台巨大的机器抬离地面。然而一旦升空，B-29就会灵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我飞过的最大、最重、最强有力的飞机，”一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如此回忆他第一次驾驶B-29飞行时的情况，“然而它的反应非常棒，控制手感柔和而精确。”^[35]它还很快，其地面速度^[36]很容易就能超过每小时300英里。它的速度、航行高度和位置合理的.50机枪塔令这款飞机的绰号名副其实：“超级堡垒”将会是个砸不烂的硬核桃，对敌人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说都是如此。

部队急需B-29投入现役，这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见的措施。战争部在飞机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情况下就签发了超过1000架的采购订单，打算等它们上天后再进行必要的改进。设计—测试—制造全流程的速度被加快到和平时期的差不多两倍。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浪费很大，却是唯一能让B-29在1944年春季

参战的方法，坚持这样做的除了罗斯福总统之外还有许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B-29的服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全国动员方式的缩影。在所有方面，领导者都会把效率、节约、安全，甚至是谨慎置之脑后，而一切以速度为先。

第一批B-29在踏上飞往亚洲的漫长航程之前，都要由机组驾驶，飞往威奇塔市波音工厂旁边的一座机场，在这里进行数百项改进。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将这次行动称为“堪萨斯之战”，或曰“堪萨斯闪电战”。其实美国各地的多处航空兵基地也都建起了改装中心，或所谓“改装厂”。新手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把他们新拿到手的B-29飞到这些中心进行改装。这样的飞行自身也成了训练课程的一部分，在进行越洋部署之前为新手们提供一些积累飞行时长的机会。然而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甚至在许多飞机已经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军方还下令进行数百项新的改进。这种情况下，改装和维修“套件”就会连同必需的零部件和工程师一起空运到远在埃及或者印度的国外机场上去。螺旋桨回桨系统、火控系统、电子系统，最重要的是麻烦不断的莱特发动机，都进行了改装。美军在开罗和卡拉奇建立了两个最大的海外B-29改装中心。即便是在中国和后来的马里亚纳群岛基地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作战之后，那些地面机械设备还常常被用来纠正“超级堡垒”的原始设计缺陷，而非仅仅用于例行维护。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领柯蒂斯·E.李梅发现他的飞行人员不得不在飞实战任务时做一些测试项目。这项工作困难而且危险，因为B-29“有的bug [毛病] 和史密森尼学会昆虫馆里的bug [虫子] 一样多。无论他们揪出这些bug的速度多快，都会有新的bug从引擎罩底下爬出来”。^[37]

当同盟国首脑在埃及开罗开会时（1943年11月的“六分仪”会议），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保证，将会有数百架B-29进驻中国，并向日本本土列岛发动持续轰炸。蒋介石之前总在抱怨盟

军对中国的支援不够，并威胁要和日本议和（但并未明言）。罗斯福常常告诉他的军队领导人，从中国机场出发轰炸日本将会激发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而无论是B-17还是B-24，其航程都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因此从一开始，将B-29部署到中缅印战区的做法就是一场政治赌博，意在安抚中国国民党政府，令其继续打下去。此次行动被赋予代号“马特洪山”（matterhorn）。

然而，“马特洪山”行动从一开始就饱受后勤困难的拖累。这些发动机不太好使的新B-29飞机都是由新训练出来的飞行人员驾驶飞往战区的。他们的环球之旅从佛罗里达州的莫里森机场开始，经由加勒比海、巴西、阿森松岛（位于大西洋中部）、利比亚、开罗、巴格达、卡拉奇，以及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通过一连串加油站接力飞行。一路上，莱特引擎常常过热，导致坠机或者迫降。当几十架飞机飞抵开罗和卡拉奇时，人们发现当地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3摄氏度，致使发动机在起飞时就会出故障，于是，美国人不得不从本土派出工程师飞过去重做莱特引擎的风冷机构。

1944年4月，B-29机群开始抵达位于克勒格布尔的固定后方基地。它们将从这里出发，前往四川成都的前进机场。途中要经过极其艰险的“驼峰航线”，飞越世界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超级堡垒”要从常人难以踏足的锯齿状山峰和陡峭峡谷上空飞过，剧烈的乱流和突然出现的下沉气流会让飞机剧烈颠簸，此外还时常会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狂风，能见度也会降至零。机组人员偶尔能透过晴朗的空域看见航线以北仅仅150英里处的珠穆朗玛峰顶。

这段1 200英里航程的终点是成都以南四座新建造的机场之一，此时其修建工作尚未完成。超过25万名中国农民被召集起来，几乎完全靠人拉肩扛建起了这些长度将近2.5千米的跑道。

新闻影片拍下了这大群的劳工，许多人光着脚，戴着圆锥形的毡帽，用篮子和独轮车搬运沙土和碎石。八九岁的男孩子们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碎石。工人们挑着麻袋，把石头从附近的河边挑到基地。这些石头被密集放置在跑道的地基下，之后在上方铺上碎石和泥土，再用50人才拖得动的巨大石碾压实。当一架飞来的B-29进入降落航线时，工地上就会响起响亮的号声，工人们纷纷涌到跑道旁边。飞机落地后，人群又会散去，继续干活。

最初的“马特洪山”计划考虑在成都部署两支B-29作战联队（各15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飞机毛病不断，以及经由印度进行补给成本过于高昂，美军不得不把规模缩小为一支轰炸联队。第20轰炸机司令部原本要自己解决后勤问题，也就是要自己把所需的零部件、补给物资、炸弹和航空燃油从印度运来。为此，这个司令部得到了一队C-109运油机和C-87运输机。此外，“超级堡垒”自己有时也会客串当运输机，这时候机上的机枪和其他装备就会被拆下来，炸弹舱里装上油罐。但仅仅是需要运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燃油和物资的重量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马特洪山”行动期间每飞一架次轰炸任务，就需要运输机到印度往来飞行12架次。每8桶从克勒格布尔运往成都的航空燃油中，就有7桶会在往来运输的飞行中消耗掉。情况很快便显而易见：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不可能自行解决燃油和补给的需求，现有的空运司令部需要来补足缺额。但这意味着要挤占中国军队、美国驻华地面部队和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本已捉襟见肘的燃料和其他物资。

1944年6月5日，B-29首次在战场亮相，当时98架飞机从克勒格布尔起飞，轰炸了1 000英里外日占曼谷的铁路终点站。此次空袭向目标投下了368吨炸弹，这一结果令人振奋。10天后，“超级堡垒”首次造访日本本土。当参加“征粮者”行动的美军

两栖部队冲上塞班岛滩头时，50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本九州岛八幡市的钢铁厂。这是1942年4月杜立德空袭之后日本本土首次遭遇轰炸，因而登上了美国、中国、日本的头版头条。马歇尔将军发布了一份战报，宣布这次行动开启了对日本本土的“新的进攻形式”。蒋介石当局兴高采烈。而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在公开宣传中隐瞒了八幡遭到轰炸的事实，谎称日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了几十架轰炸机。然而和前一次一样，敌人作战飞机在日本本土上空的出现在公众中引发了恐慌。至于这次空袭只造成了轻微破坏，反而不重要了。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马特洪山”项目的B-29轰炸了整个亚洲战场各处的敌人目标：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炼焦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华北的炼钢厂和港口设施，上海的码头和仓库，台湾的航空兵基地，香港的船运，以及缅甸的铁路和仓库。最后，第20轰炸机司令部向九州的工业目标又发动了8次空袭。然而，每次出击之前都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补充燃油、炸弹和其他物资。轰炸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战斗损失则很惨重。从成都起飞的B-29将能够飞到1 500英里外的九州，却够不着东京和本州岛上的其他高价值目标。若要全面展开对日战略轰炸，他们就需要在中国东部建立新的机场。但是中国沿海的港口已尽数落入敌手，这意味着从印度出发的货运航线要向东延伸得更远。不仅如此，没人敢指望中国东部的机场能顶住日本陆军的进攻，后者此时正在执行“一号”作战，在大陆上快速推进，占领区迅速扩张。实际上，“一号”作战已经威胁到了成都和昆明周围的盟军航空兵基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醋性子乔”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认为，需要50个受过训练的中国步兵师才能保证这些机场的安全。但是没人相信（包括史迪威自己）蒋介石能拿出如此多的部队。

出于这种种原因，“马特洪山”作战从未实现自己的承诺。从

一开始，罗斯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团结，并为对日决战保留发掘中国巨大人力的可能性。到1944年中期，事情开始明朗化，后勤和安全已经成了“马特洪山”计划无法克服的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一项更好的选择浮现了出来：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在当年6月至8月夺取了这里。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的地形适合建造大型的B-29飞行基地，对敌人的地面进攻免疫，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可以通过海运而非空运进行补给。这里已经将东京纳入了1 500英里的作战半径之内。1944年7月，参联会敲定，驻马里亚纳群岛的新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将获得新“超级堡垒”分配和物资供应的优先权，当年11月之后，再没有新的B-29飞到印度或者中国。1945年1月，“马特洪山”计划终结。

回头看这场在中国走的弯路时，李梅总结道：“这没起作用。没人能让它起作用。它的后勤基础完全不行……这种作战方式只是个幻想，就像是来自《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国那样。”^[38]

然而，马里亚纳群岛面临的困难同样令人生畏。燃油和补给物资当然可以从海路运来，但这条海上生命线格外漫长——从旧金山湾开过来要航行5 800英里——B-29机队还不得不和其他数百支盟军部队争夺有限的船运和其他资源。满载的轰炸机将要从那些尚未开工建设的基地起飞，而在那些岛上，敌人的残余部队仍然在山区坚持战斗。从塞班、提尼安抑或（尤其是）关岛出发，日本的目标基本都在B-29极限作战半径的边缘。经验相对不足的机组将要飞越超过3 000英里没有任何指示物的洋面，一部分还要在夜间飞行，往来全程会持续15小时甚至更久。世界上没有一种战斗机拥有足以执行这种任务的航程，盟军在更接近日本的地方也没有别的机场可用：因此，B-29的所有任务都是没有护航的。尽管被称为“超级堡垒”，这种飞机的结构其实相当轻（这

是出于节约重量的目的），而且在空中时被弹面非常大。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有些计划制订者已经提出警告，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的损失可能高到无法承受。

阿诺德点名要求“负鼠”汉塞尔担任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首任司令。汉塞尔原先是阿诺德在华盛顿的作战计划部门的一个处长，表现出色，最近又当过第20航空队参谋长。（当汉塞尔夫人被问及其夫君“负鼠”的绰号来由时，她说因为他长得像。从照片上看，她说得还蛮有道理。）和大部分美国陆军航空队一线指挥官一样，汉塞尔不算太老（41岁），本人也是个飞行老手。他坐在座舱左边的机长座位上，亲自驾驶第一架B-29飞到了塞班。他的飞机被称为“约尔廷的约西号”，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附近）的马瑟机场出发，经由檀香山、夸贾林三级跳，于1944年10月12日在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降落。成群的地勤人员拥挤在跑道旁，他们大部分人从未亲眼见过“超级堡垒”。一名目击者回忆道，当“约尔廷的约西号”飞过来时，“欢声雷动，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飞过去……所有人都兴奋地手舞足蹈”。^[39]

然而，汉塞尔发现塞班岛上的情况令人失望。计划要求岛上建设两条8 500英尺长的平行跑道，以及80个硬化停机坪（沿滑行道铺设的停机区）。但他发现那里只有一条7 000英尺长的跑道，而且只有一部分铺设了硬化道面，另一条平行的跑道才刚刚把地面清理出来，铺好路基，道面铺设还完全没有开始。硬化停机坪只建成40个，当第73轰炸联队的B-29机群在当月早些时候飞来时，它们只能两架飞机挤在一个停机坪上。航空燃油还只能存储在停放在附近停车场的油罐挂车里。按计划，这个基地将在当年年底前接收180架飞机和1.2万人，但是这里还没有军营，没有办公楼，也没有仓库。当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先头梯队到达

时，他们不得不住进机场周围的帐篷群里。即便是汉塞尔将军也是住在一处可以俯瞰东方海面的悬崖上的帆布帐篷里。食堂是用匡西特板棚房搭建的，即便是将军们也得“排队打饭”。“我没有车间，也没有设施，只有帐篷，”汉塞尔后来回忆道，“我有一个炸弹堆栈，一座停车场，燃油也有储备，但是其余一切都是我见过的最难受的一团乱麻。”^[40]

这一延误并非由于不努力。伊斯利机场上的推土机从6月24日起就开始轰鸣，此时岛上仍在激战，日军防线就在北方1英里之外。航空工程营已经是24小时轮班施工，在夜间用泛光灯照明，有时还会招来炮轰和狙击手的射击。瓢泼大雨会把尚未铺设硬化道面的跑道和停机坪化成一汪泥潭。岛上有着用不完的珊瑚礁，碾成粉末后可以做成高品质的混凝土，用来制造沥青。但是珊瑚矿区和机场之间的道路都很狭窄，许多地方都没有铺设路面；道路常常发生交通堵塞，或者被热带暴雨淹掉。铺设跑道和勤务区需要数千吨珊瑚粉末——但是首先要对道路进行拓宽、升级和路面铺设，这同样需要数千吨珊瑚粉末。

面对必需装备和零部件的严重短缺，汉塞尔向国内大声疾呼，要求提供后勤支持。当一艘运载着关键货物的船开进拥挤混乱的关岛港时，海军港务管理员说：“我只给你24小时，让这艘见鬼的船离开这里。”^[41]于是在匆忙的卸货过程中，这些货物都被堆放在丛林边缘的一块空地上，暴露在暴雨、湿热天气，以及自己人的偷扒摸抢之下。大部分都丢失或者损坏到无法使用的地步了。面对可能导致轰炸任务延误的物资短缺，一路通往后方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货运线路被开辟了出来。于是，B-29再一次担负起了把自己所需物资运往战区的任务。这又是一条“驼峰”航线，只不过这个“驼峰”是跨越了94个经度的地球表面的弧线。

汉塞尔到达后的几个星期里，平均每天都有3到5架“超级堡

垒”飞到塞班岛。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由新训练出来的机组人员自己从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训练和改装中心飞来的。他们沿用了汉塞尔和他的“约尔廷的约西号”的航线：先飞越群山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马瑟机场；继而跨越东太平洋飞到檀香山的约翰·罗杰斯机场，这里原本是座民用机场；之后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到达中太平洋的夸贾林环礁，这时他们的日历要向前翻一天；最后飞行1 500英里抵达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绝大部分年轻飞行人员都不熟悉这样的远程越洋飞行。这是对他们海上导航技术的一次实战检验，其自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训练课程。在云上飞行时，领航员需要透过浓云的缝隙观察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他有时候可能会看见一块珊瑚礁或者沙质浅滩，此时他就会努力把这些地标和桌子上的海图做对比。夜晚，领航员要用六分仪观察星星，以此来确定飞机的位置，就像古代的航海家那样。大部分时候他要依靠航位推测法，小心翼翼地随时记录飞机的空速和罗盘方向，再加上风速校正，直到他能够收到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或者无线导航塔的信号为止。

一个典型的B-29机组由11人组成，年龄从19岁到30岁不等。在许多飞机上，机长兼最年长的机组成员是一位25岁的中尉，他应该是在约18个月前在一架单引擎教练机上学会飞行的。即便他们很年轻，身体处于最佳状况，也无法逃脱高空长途飞行带来的疲劳。在15小时的飞行之后，一名飞行员在家信中写道：“我的腿和后背都僵住了，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我们拂晓时就起飞了，天黑几个小时后才落地。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轰炸目标花不了多少时间，飞往目标和返回基地的航程才是考验，让人受不了。”^[42]

随着新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涌入塞班岛，汉塞尔决定，需要进行更多的编队飞行、集结、通信、导航和精确轰炸方面的教学和

训练。他觉得没有什么训练能比向相对较弱的敌人阵地进行实战更好了。10月27日，汉塞尔亲自率队向曾经令人生畏的特鲁克环礁进行了战术轰炸，目标是杜布隆岛上的日本潜艇锚地。（美国陆军航空队禁止将军们飞战斗任务，这是汉塞尔最后一次被允许率队出击，这令他十分失望。）后来他们又对特鲁克进行了三次训练作战，对硫磺岛进行了两次。空袭中投下了数百吨炸弹。对于地面上挨炸的人来说，若他们知道这仅仅是训练，恐怕难免觉得惊讶和沮丧。

10月30日，一架专门改装执行远程照相侦察任务的“超级堡垒”，型号为F-13，抵达了塞班。好运来了挡不住，就在第二天拂晓，东京及其周边区域出现了难得的晴好天气。拉尔夫·D·斯蒂克利上尉提出要立即飞一趟照相侦察，希望把这次少见的有利天气利用起来，汉塞尔同意了。这架名为“东京玫瑰号”（真是讽刺）的孤零零的F-13，在日本首都上空3.2万英尺高处飞过，机上4台照相机不停地拍照。斯蒂克利在东京、东京湾、横滨上空缓缓地沿“8”字航线飞行，随后向西飞过富士山，前往东海地区以及名古屋地区的核心工业区。这是自从两年半之前杜立德空袭之后第一架突破到东京空域的盟军飞机。日本陆军的战斗机群起拦截，但是令防空司令部无地自容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追上这架飞得又高又快的入侵者。在3万英尺以上的高度，日军的中岛Ki-44战斗机（盟军绰号“东条”）再要爬高就会导致地面速度骤降，于是“东京玫瑰号”安然无恙，全身而退。高炮部队进行了一场炫目的烟火秀，但炮弹的炸点既不够高，也没有准头。

在不多见的晴朗天气中飞行了14小时之后，F-13带着数千张摄有东京和名古屋地区主要工业设施和航空工厂的航拍底片降落在塞班岛上。一个设在匡西特板棚房里的照片冲印组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几天，冲印出了7 000张高清晰度照片。这些照片成了后

来任务计划的基础。斯蒂克利的探路之旅对整个战略轰炸事业的价值难以估量。[43]

当时，选择目标依靠的都是近期德国上空空战的经验。计划人员相信，对日轰炸战役的第一步应当是赢得日本上空的制空权。这意味着要从根源上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轰炸其航空工业，包括日本主要的发动机工厂和飞机组装中心。在战前的许多年里，盟国的驻日武官和情报分析人员一点点地积累起关于这一机密产业的数据。日本的航空工业由少数几个大企业统治：三菱、中岛、川西、爱知，以及立川。它们的大部分大工厂都位于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户周围。例如，盟军知道东京郊区的武藏野就有一家重要的中岛工厂。名古屋的三菱联合体据说是世界第二大的飞机制造厂。其他许多此类工厂的大致位置，盟军也都知道。“东京玫瑰号”拍摄的照片恰好填补了空白，使得分析人员能够确定高优先级目标的位置和大小。

1944年11月时的战术条令倾向于大规模高空精确轰炸。任务要在白天执行，最好是晴朗天气，这样投弹手们就能通过轰炸瞄准具瞄准目标。雷达瞄准只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应急之举，仅用于浓云密布时。低空夜间轰炸还不是个可用选项。汉塞尔想要在首次轰炸日本时出动至少100架“超级堡垒”。在出现足以目视轰炸的晴朗天气前，他不愿把这些飞机派出去。在有利天气下发动大规模空袭将充分利用突袭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也决定要在11月底前发动对东京的首次空袭，因此时间并不宽裕。11月18日，塞班岛的B-29飞机、弹药和飞行人员数量都足够执行这样的任务了，但是当天日本上空天气阴沉，这样的天气持续了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机组人员都要参加任务前的简报会，结果每次都被告知按兵不动。这对人的神经真是挑战。“我们来聊聊制造紧张的人，”一名年轻的机组人员在日记中写道，“你可以强装镇定，

但任何人如果说自己不害怕，那他说的一定不是事实！”[\[44\]](#)

11月24日感恩节这天，云开了。飞行人员在凌晨三点就起床了。当东方破晓之时，排成长龙的“超级堡垒”机群已经在滑行道上给发动机预热了。出于公众宣传的目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带来了代表美国各主要报刊和无线电台的24名战争通讯员。当第73轰炸联队指挥官兼本次任务的领队“罗西”埃米特·奥唐纳尔准将爬进他的座舱时，电影摄制组启动了摄影机，闪光灯也闪烁了起来。奥唐纳尔的飞机“无畏多蒂号”率先起飞，在他身后，其他110架“超级堡垒”以30秒间隔依次升空。它们向东爬升，在女巫湾上空向左转，踏上北上的漫长航程。每架飞机都装载到了极限起飞重量，14万磅。（莱特公司的工程师建议将起飞重量限制在12万磅，他们的要求过严了。）飞行人员在忙于爬升至高空并在行进中集合队形之时，还要小心盯着他们的发动机。起火和其他机械故障迫使17架飞机折返。其余94架飞机则直奔主要目标，位于东京西部吉祥寺的中岛飞机公司武藏野工厂。

日本人知道“超级堡垒”在塞班岛的集结。他们早就预见到了此次空袭，并采取各种措施，做好了准备。自从6月以来，从中国基地出发的B-29已经8次空袭九州，他们对这种大型轰炸机及其性能并不陌生。在几个星期前拦截“东京玫瑰号”失败之后，日本战斗机进行了改进，提高了爬升速度和实用升限。日本人给飞机装上了更宽的螺旋桨叶，发动机也做了调整，以便在稀薄空气中提供更大的推力。最激进的措施——也最有日本风格——是建立了空对空撞击部队。这支部队的战斗机拆除了所有的机枪、弹药和装甲板。这令它们在更高的高度也能表现良好，但显然就无法向敌人射击了。这些飞行员，也可以视为神风队员，都练习了高空撞击机动，目标是“超级堡垒”脆弱的尾部。

日本的海岸雷达站发现来袭的机群之后，日军125架战斗机

起飞迎战。其中有10架日本陆军第四十七“震天”航空队的中岛Ki-44“钟馗”机，它们全部用于对敌轰炸机进行撞击。

抓住高空飞行的“超级堡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事。来袭机群在2.7万英尺到3.2万英尺高度之间进入日本空域，大部分防空战斗机都要花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爬升到这一高度。这天的急流很剧烈，每小时150英里的顺风使得B-29的地面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00英里。气流打乱了轰炸机的队形，让精确轰炸成了空中楼阁。薄薄的云毯令中岛工厂变得模糊不清。只有24架飞机向武藏野投下了炸弹，而且几乎全部落在中岛工厂的围栏之外。64架飞机攻击了预定的第二目标，东京港。[\[45\]](#)

第四十七“震天”航空队的三田义雄三飞曹用一次壮观的撞击获得了当天唯一一个击落战绩。他从后上方接近一支B-29编队，这位勇敢的武士做了一个剧烈的俯冲滚转，驾驶他的中岛飞机撞上了萨姆·瓦格纳中尉驾驶的A-26号飞机尾部。三田的飞机炸成了一团火球，拖着长长的浓烟坠向地面。A-26号机还在飞，但是撞击撕掉了它的垂直安定面和左侧升降舵。瓦格纳试图转向返航，但是飞机却撑不住了。它在距离东京湾约20英里处坠毁，机组无人生还。

对于其他的“超级堡垒”而言，向塞班岛的返航也是一种漫长的煎熬。低垂的云层覆盖了日本南方海域，遮住了各处地标，当夜幕降临时，返航机群还在伊斯利机场以北几个小时航程处。此时跑道只有一些火堆能用以标记，一旦有事故堵塞了跑道，许多B-29可能就要迫降了。好在91架飞机安全着陆，给任务画下了一个成功的句号。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后来复盘此次战斗时，汉塞尔承认11月24日的东京之战过于冒险，几近鲁莽。轰炸没有取得多少成果，武藏野损伤轻微，

东京港区甚至没有被直接击中。他觉得幸运的是只损失了3架飞机。（两架坠入本州岛以南洋面，救生潜艇搜索了此地，但一无所获。）汉塞尔害怕失败，他后来写道：“但是我十分担心这种作战状况会损害和危及我正在推进的对日本列岛的独立作战。”^[46]换言之，汉塞尔背负着压力，他要展示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轰炸东京的可行性——这样才能让质疑者闭嘴，并且巩固第20航空队的独立性。人们认为，只要这些“超级堡垒”能够兑现轰炸日本工业核心区的承诺，“福将”阿诺德就能顶住将这些飞机用于其他目的的压力。

本州岛南部海域，有12艘执行救生任务的美军潜艇。其中之一是“射水鱼号”，这是一艘白鱼级潜艇，艇长是约瑟夫·E·恩莱特少校。它巡逻的这片水域被官兵们私下称为“猎场”（Hit Parade），其他潜艇（包括“刺尾鱼号”）已在这里找到过大量进出东京湾的日本船只。11月24日晚间一架B-29在这里的海面上迫降后，“射水鱼号”赶来搜索了三天，却没有找到任何飞机、救生筏或者残骸，恩莱特最后发电向珍珠港报告，“这里的海况不适合水上迫降，轰炸机可能已经坠毁并迅速沉没了”。^[47]

11月27日，太平洋潜艇司令部来电，48小时内不会再有B-29飞临日本上空。这意味着“射水鱼号”和其他救生潜艇可以松绑，继续去猎杀敌船了。恩莱特指挥他的潜艇来到本州岛近岸，白天潜航，时常把潜望镜升到高位进行观察。富士山巨大的火山口常常从潜望镜圆形视野中的十字瞄准线下飘过，但是恩莱特却没见到任何有价值的船只，只有一些拖网渔船和其他小艇，他觉得这些小船“太小，不值得用鱼雷”。^[48]

恩莱特在南达科他州迈诺特市出生、长大，美国海军学院

1933届毕业生。战争早些时候他曾任“鲛鱼号”潜艇艇长，但在1943年秋季那次49天的令人失望的巡逻之后，恩莱特认定自己不是指挥潜艇的料，请求洛克伍德放过他。[49]

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一直在中途岛潜艇基地做一些岸上工作。到了1944年8月，他又急着想要出去试试身手了，于是洛克伍德给了恩莱特一件最难得的礼物：第二次担任潜艇艇长的机会。因此，他比太平洋上其他普通的潜艇艇长更渴望获得战绩。然而出巡至今，他仍然两手空空。“射水鱼号”上的那24枚Mk18电动鱼雷都还躺在原处，一枚未射。

11月27日晚8时48分，“射水鱼号”的SJ雷达发现24 700码外有一个目标，真方位28°。[50]于是一名瞭望哨爬上潜望镜平台，举起望远镜观察北方海平面。当时的环境很适合目视搜索：天气晴朗，轻风徐徐，几近满月。恩莱特起先觉得这个目标是个岛屿，但是雷达扫描结果很快显示，它正在向自己靠近，瞭望哨随即报告：“海平面上有一个暗影，位于右前方2点[51]。”[52]

恩莱特很快认出了望远镜中海平线上的那个暗淡的“目标点”。对比目视测距和雷达测距的结果，他判断出这是个家伙，可能是油轮，这可是最高优先级的目标。

“射水鱼号”继续停留在水面上向西航行，想要绕到目标背向月光的方向。首次发现目标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瞭望哨向下面大吼说，目标的矩形轮廓从远距离上看很像是一艘航空母舰。恩莱特起先将信将疑，但是观察了一会儿后，他信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目标的外形愈加明显，航母巨大的舰岛和烟囱从平坦的船体上部伸出来。目标的基准航向是210°，航速20节。[53]

这艘神秘的航空母舰是“信浓号”，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

在“大和级”战列舰原三号舰的舰体上改建出来的大家伙。这艘舰建于东京湾里横须贺海军基地的船厂，10月8日下水，8天前刚刚服役。自从当年6月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丢掉了三艘航母之后，这艘舰上的舰员和3 000名船厂工人便开始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七天，加班加点。日军的航母突击舰队曾经令人望而生畏，而这艘新造的巨舰则承载着日本复苏这支舰队的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

“信浓号”的目的地是吴港，它要在那里完成舾装并搭载舰载机。舰长阿部俊雄大佐一直对军舰出海前的准备情况忧心忡忡。在完全不合情理的时限要求之下，许多工作都被简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设施都还没有完工或者未经检验，包括水密门、抽水泵、消防水管以及通风管道。阿部此前就警告过上级，这艘舰和舰员们都还没有做好出海的准备，即便只是沿着海岸航行一夜也不行。但是上级指挥部却无动于衷，这一周的B-29空袭过后就更是如此了。他们不得不假定这艘大型航母已经被敌人发现并拍了照，而高空飞行的敌人轰炸机随时可能回来轰炸船厂。因此，东京的将领们驳回了阿部关于推迟出海的请求，要求“信浓号”必须不迟于11月28日出海。

就和准姊妹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一样，这艘舰在施工期间也受到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在横须贺的海滨地带，日本人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来保护这项工程不被人看见。6号码头周围竖起了高耸的波纹板围栏，“信浓号”就在其中建造。数千名船厂工人被拘禁在基地内，施工期间从不允许外出。任何工人甚至只要提到这艘舰的名字，就会遭到宪兵逮捕、关押、审讯和拷打。

它真的很大：长872英尺，舷宽119英尺，满载排水量71 890吨。就和那两艘超级战列舰一样，“信浓号”装有四台巨大的蒸汽轮机，可以向螺旋桨输出15万马力，使其最高航速达到27

节。它的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都设有装甲，设计能够抵御1 000磅炸弹的攻击。舰岛位于右舷中部，尺寸相当于一栋办公楼。舰岛内整合了巨大的烟囱，烟囱向舷外大角度倾斜，让这艘舰的造型显得有些奇特。“信浓号”装有数百门高射炮，比任何其他航母都要多。“当我站在铺设完成的飞行甲板尾部，站在舰首的人看上去只有小豆那么大，”横须贺的一名船厂工人大岛盛业回忆道，“我记得自己兴奋地大喊大叫。‘信浓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54]如果这里的“大”指的是吨位，那么大岛所言完全正确——在美国第一艘福莱斯特级航母于10年后的1954年下水之前，世界上没有比“信浓号”更大的航母了。

根据命令，“信浓号”在11月28日日落后不久在三艘驱逐舰的伴随下离开了东京湾。舰上有2 475人，包括由2 175名官兵组成的舰员组，以及大约300名船厂工人。舰上没有飞机，机库里装着50枚“樱花”自杀弹，这种武器设计用来由飞机投射。还有6艘“震洋”自杀快艇。这些自杀艇将要送到吴港沿岸，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送到冲绳。

和上级商议后，阿部大佐设计了一条绕路远离海岸的航线。这会稍稍简化一些导航工作，也是为了避开已知有美国潜艇出没的海域。航程的第一阶段，航母和驱逐舰将会向正南方开往远海。次日凌晨破晓前它们将要转向西边，向濑户内海高速冲刺。最后阶段会是在白天，舰队得不到任何空中掩护，不过阿部什么都做不了，东京方面根本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相信自己选择的是在当时环境下最安全的路线。“信浓号”和护航舰在洒满月光的平静海面上破浪而行，航速20节，走之字形航线以规避敌人潜艇。

美国海军的识别手册上，没有任何一艘船的轮廓能匹配得上眼前的“信浓号”。恩莱特和他的军官们认为这艘陌生的敌舰肯定是“飞鹰级”或者“大凤级”航母。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猎物的吨位竟然会是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的两倍。盟军阵营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关于这艘舰存在的蛛丝马迹。

三艘护航驱逐舰出现在了雷达屏幕上。距离缩短后，“射水鱼号”潜望镜平台上的人已经隐约能够见到它们了。恩莱特觉得在目标的背后可能还有第四艘护航舰，当然实际上并没有。

想要在水面上接近有四艘驱逐舰（哪怕只是三艘）护航的敌人航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这样明亮的月光下。恩莱特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他相信这种尝试“实际上就是自杀”。^[55]但是下潜会让“射水鱼号”的速度下降大半，无法机动到攻击位置。情况并不理想。恩莱特选择转向南，在“信浓号”前方大约9英里处与其几乎平行航行，并加速到19节。他需要一些运气。敌舰航速20节，比“射水鱼号”略快一点。一旦距离接近到三四英里，潜艇就必须下潜，否则就要冒被发现的风险。射击窗口转瞬即逝，而且如果“信浓号”及其护航舰没有在之字形航行时转向“射水鱼号”，这个射击窗口甚至根本不会到来。

恩莱特用无线电拍发了敌情报告。或许还有别的潜艇可以被引导到能截击这艘未知航母的位置上，抑或是哈尔西的第3舰队能来对付它。他没有放弃“射水鱼号”自身的机会，但对此并不乐观：“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保持最大水面航速，与敌人平行航行，并祈祷那艘航母转向我们。”^[56]

“信浓号”上，雷达探测器捕捉到了“射水鱼号”水面搜索雷达的电波。其频率和脉冲速率显示那是美国人，但是“信浓号”上的雷达技师无法确定其方位。“射水鱼号”发出敌情报告的无线电信

号也被“信浓号”监听到了——但是，方位还是不知道。阿部大佐意识到附近至少有一艘敌人潜艇，却不知道其位置。当周的一份敌情报告称，一队美国潜艇在5天前一同离开了关岛，数量可能多达7艘。将种种信息汇集在一起，阿部认定美军的潜艇狼群正在跟踪自己的座舰。他将此信息传达给了他的瞭望哨们——航母的飞行甲板和上层建筑周围共布置了25名瞭望哨——要他们搜索水面上的潜艇踪迹。

晚上10时45分，一名眼尖的瞭望哨报称“舰首右侧发现不明物体”。想靠目视发现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用“信浓号”上最先进的光学设备也不行。5英里之外涂成黑色的低矮潜艇，即便是在白天也很难被看到。地球的曲率遮住了大部分艇体，只有舰桥顶部会露出海平面。不仅如此，它还在“信浓号”的几乎正前方平行航行，这就使它的轮廓更小了。几十双日本人的眼睛都看向了西南方远处海平面上那个暗影，“信浓号”的航海官认为那可能只是一艘“小船”。

日军驱逐舰“矶风号”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离开了编队。它以超过30节的航速向“射水鱼号”奔来，身后留下泛着泡沫和荧光的长长尾迹。

在“射水鱼号”舰桥上，恩莱特看着从自己艇尾方向冲来的敌人驱逐舰。他正确地判断出那是一艘“阳炎级”驱逐舰——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驱逐舰之一，最高航速可超过35节。他命令瞭望哨从平台上下来，全员离开舰桥。他看了看表，此时是晚上10时50分。他举起望远镜朝向冲过来的驱逐舰，注意到它“愈加接近‘射水鱼号’，越来越大。好家伙，速度真够快的！”。^[57]恩莱特正要钻进舱门下令紧急下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矶风号”掉头走了，回到了“信浓号”右侧原先的阵位上。于是“射水鱼号”继续保持原有航向，并留在水面上。

是阿部要“矶风号”回到阵位上的。他仍然认为“信浓号”正在被敌人的潜艇狼群跟踪，他担心南方那个身份不明的目标就是故意要诱出他的一艘护航舰。“它是个诱饵，我敢肯定。”他如此告诉舰桥上的其他军官。他下令向东转向，远离了“射水鱼号”。

[58]舰队航速超过20节，阿部知道自己甩开那个鬼影毫无问题。

恩莱特觉得自己已经把机会丢掉了，但他仍然让“射水鱼号”以最大速度破浪而行，航向与“信浓号”编队的基准航向大致平行。日舰的航速比“射水鱼号”至少快1节，这样除非它们转回西边，否则“射水鱼号”难有机会进入攻击位置。恩莱特舰长用手抚摸着胸前的玫瑰经念珠，默默祈祷敌人会如此转弯。

晚11时40分，祈祷生效了。“看起来大之字形转弯转到我们这个方向了。”潜艇日志记录道。[59]“信浓号”向右急转，航向转向西边，从“射水鱼号”艇尾越过。如果它接下来的左转时机凑巧，那么这艘巨型航母就可能直接撞进潜艇的射击范围。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各方都保持航线不变。“信浓号”和它的三艘护航舰渐渐越过了“射水鱼号”的艇尾，从潜艇左后方来到了它的右后方。这是一场奇怪的捕猎，猎手位于猎物前方数英里处。“射水鱼号”径直向南方数英里外的某个位置驶去——如果恩莱特没猜错，“信浓号”和“射水鱼号”的航迹会在那里交会。

在潜艇的舰桥上，瞭望哨手中的夜间望远镜紧盯着远方的庞然大物，它高大的舰岛和倾斜的烟囱从艇尾的海平面上高高耸起。“射水鱼号”在月光粼粼的海面上向南疾驰，艇首剧烈起伏着，四台发动机开足了马力，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它修长的艇体。带着泡沫的海水从艇首两侧飞溅而出，溅到了瞭望哨的脸上。恩莱特现在还需要一些运气的眷顾，他一直在抚摸他的玫瑰经念珠。

凌晨2时56分，他的祈祷又灵验了。“信浓号”及其护航舰又转弯了，这次是向左，稳稳地开向东南方向，径直冲“射水鱼号”的驾驶室而来。这艘世界上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正把自己像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物一般送到“射水鱼号”面前。日志记录道：“距离迅速缩短，我们就在其前方。”^[60]

“信浓号”左转8分钟后，双方距离缩短到1.2万码，恩莱特命令“射水鱼号”下潜。瞭望哨首先跳进指挥塔，艇长紧随其后，下潜警报响彻全艇（“啊呜——嘎”的声音）；一名水兵猛拉拉绳，关上了舱盖，手轮转6圈锁紧。“射水鱼号”下潜到60英尺深度。恩莱特升起了夜间专用的2号潜望镜，指向了目标。他把十字瞄准线压在了“信浓号”上，低声自言自语道：“来啊，亲爱的，别跑。”^[61]

潜艇向西潜行，悄悄机动到一处理想的射击位置上：航母正侧面1 000码至2 000码之间，此时“信浓号”将以最大的被弹面暴露在“射水鱼号”的鱼雷面前。恩莱特几次升起夜间潜望镜快速查看，确定目标的航向和速度。目标跟踪组则把他的估算结果输入鱼雷数据解算仪（TDC）中，据此设定可能的攻击偏角。被动听音定向仪证实了艇长从潜望镜中观察的结果。他告诉前部鱼雷组，准备六雷齐射。鱼雷航行深度被设为10英尺，为可能的潜航过深风险留下余量。

恩莱特再次升起夜间潜望镜，紧紧抓住潜望镜把手。“信浓号”在圆形镜头中越来越大，它被月光照亮的上层建筑和特有的倾斜烟囱清楚地展现在恩莱特面前。它确实和识别手册中的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或许这是艘被彻底重建了的老航母？他抓起铅笔在一张草稿纸上画出了敌舰的草图。随后恩莱特看见舰桥上闪过一道光，这显然来自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他转动夜间潜望镜，直到找到那艘驱逐舰，并紧张地发现它正直接朝着“射水鱼

号”高速驶来。

恩莱特现在面临着海军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如果“射水鱼号”被发现了，他就需要紧急下潜并躲避深水炸弹攻击。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会脱离攻击位置，直到“信浓号”安全脱离射程为止。但看起来潜望镜不太可能被发现。于是恩莱特问他的声呐员：那艘驱逐舰在用声呐测距吗？没有，他答道——没有砰砰声。然而由于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恩莱特想要确认这个答案。“斯坎伦，”他喊道，“看着我，告诉我那艘驱逐舰有没有砰砰声。”^[62]斯坎伦检查了所有可能的频率，之后转向恩莱特，重复了他的答案：没有。

艇长指挥潜艇又下潜了几英尺，艇底深度达到62英尺。如果驱逐舰从头顶直接开过（这看起来很有可能），那么它的舰底就会从“射水鱼号”顶部潜望镜支架上方10英尺处开过。恩莱特现在不敢再升潜望镜了，他和几个紧张到冒汗的指挥塔人员只能静听着敌舰开过来。被动听音定向仪证实它正直冲潜艇而来。军舰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之后就是螺旋桨的呼呼声。这些有节奏的声音越来越大。“它就像火车头一样从头上经过，”恩莱特写道，“整个潜艇被震得摇晃不已。”^[63]然后它就开过去了，声音开始变小。日军没有投下深水炸弹，显然，他们对潜伏在自己舰底下方的潜艇一无所知。

恩莱特再次升起了夜间潜望镜，将十字线瞄准了月光下“信浓号”灰色的巨大舰岛。“瞄准！偏角，”他喊道，“预备……一号鱼雷发射！”^[64]

艇首传来一阵低沉的咝咝声，当第一枚鱼雷从发射管中射出时，潜艇在反推力的作用下向后退去。在潜望镜里，恩莱特看见鱼雷的航迹直奔目标而去，“快速，直航，一切正常。”8秒钟

后：“二号鱼雷发射。”于是又一股压缩空气喷射了出去，“射水鱼号”“如同被鲸鱼撞上了一样猛地一震”。[65]之后，第三枚和第四枚鱼雷又以8秒间隔射了出去。航迹跟踪组立刻启动了工作，“射水鱼号”则在第五和第六枚鱼雷冲出发射管时再次震动起来。

6枚鱼雷以150°扇面射出，这意味着4枚瞄准点指向“信浓号”，1枚瞄准舰首前方，1枚瞄准舰尾后方。这是战斗条令对攻击大型高价值目标的要求——目的是留出一些余量，即便TDC数据解算错误时也能确保至少有一枚鱼雷命中。但这一次“射水鱼号”几乎不可能射失。它就在长达872英尺的航母的正侧方，距离对于鱼雷攻击而言很近：1 400码。就像是对谷仓的宽阔侧墙射击一样。

鱼雷向目标冲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指挥塔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恩莱特将潜望镜的圆形视场始终对准“信浓号”。当第一枚鱼雷的倒计时到0时，他担心自己一定是射偏了，或者那是一枚哑弹。但随后，“我通过镜片看到目标舰尾附近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之后水中传来了第一枚鱼雷命中的声响。然后‘射水鱼号’便感受到了680磅铝末混合炸药爆炸的冲击波”。[66]恩莱特欢呼起来，他用潜望镜继续观察了8秒，看到了第二个火球，位于第一个火球前方50码处。

恩莱特旋转潜望镜，看见一艘驱逐舰正向“射水鱼号”转来。他拍了拍潜望镜轴上的把手，下令降下潜望镜，压载水舱进水，规避深水炸弹。随着海水涌进压载水舱，艇首加重，甲板向前倾斜，潜艇在重力作用下潜向更深处。随着潜艇前部重量越来越大，水翼面开始发挥作用，使潜艇以更陡峭的角度下潜。“射水鱼号”一路下潜到400英尺以下才停下来。

深水炸弹如约而至：刺耳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但距离并不十分近。恩莱特估计最近的爆炸都在300码之外。日本人看起来是在胡乱投弹。15分钟散乱随机的“撒胡椒面”之后，他们放弃了反击。潜艇的声呐监听着驱逐舰向西南方向离开。

在随后的一连三个小时里，“射水鱼号”都在水下深处潜行，缓慢而无声。通过航位推算法回到他觉得目标沉没的位置后，恩莱特指挥潜艇回到潜望镜深度。此时已是早晨6时10分。他升起潜望镜，扫视四周的海平线，却发现大海上空无一物。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面轻风徐徐。“射水鱼号”再次潜入水下，停留了一整天，直到下午5时22分才再次浮出水面，向珍珠港发回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它用鱼雷击中了一艘敌人航空母舰。[\[67\]](#)

自从前一晚11点起，阿部大佐就确信“信浓号”遭到了敌人潜艇狼群的跟踪。藏身水下的捕食者可能四处皆是，可能出现在任何方向，或者是所有方向。他认定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保持比较快的速度，并且以不规则的之字形航行。就在“射水鱼号”的鱼雷撞上他座舰的右舷之时，他正准备下令再次向右转弯。

第一击落在舰尾前方，水线以下大约10英尺处，激起了一道橘红色的火柱。接着，三次命中接踵而至，又是三支火柱冲天而起，每一次的位置都在上一次的前方。爆炸导致三层甲板的舱室被淹，包括3间锅炉舱，几十名在铺位上睡觉的水兵死于非命。燃油管路起火，一个油槽也裂开了。损管组赶紧抓起水龙头灭火，但是仍无法阻止火焰蔓延到邻近区域。数百个担架被抬到了救护所，医务人员很快就忙不过来了。命中后仅仅几分钟，“信浓号”就向右倾斜了10°。

和它的准姊妹舰“大和号”“武藏号”一样，这艘超级航母建造

时也要求能够承受鱼雷的打击。一个月前，在锡布延海，“武藏号”承受了几乎20枚鱼雷才告沉没。阿部对“信浓号”如此快地向右倾斜有些吃惊，但他觉得这种倾斜可以通过对侧注水来纠正，而且他自信只要不再遭到打击，就能让军舰继续浮在海面上。由于担心想象中的潜艇狼群，这位舰长与轮机舱通了电话，告诉技术人员，他需要每一节可达到的航速来离开潜艇出没的区域。于是“信浓号”和驱逐舰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前，航速不减。

在舰体下部中雷区域周围的过道里，水密门、管道和通风口发出可怕的尖锐嘶鸣。这是压缩的空气从防水密封处挤出时发出的声音，而将空气挤出的，正是从舰体四处破口处无可阻挡地涌入的成吨海水。“我们干活的时候能听到金属板在至少100吨的压力之下嘎吱作响，”一名舰员回忆道，“铆钉开始晃动，看起来随时可能从洞里迸出来。”^[68]海水从水密门密封垫的破口处喷射而出。管道和通风管也炸裂开了。“信浓号”强大的机组驱动着巨舰以超过20节的航速前进，却间接地把数千吨太平洋的海水吸入了右侧舰体。即便在左侧突出部充入3000吨海水之后，“信浓号”的右倾仍在不断加剧。当倾斜达到15°时，水兵们已经不得不扶着右舷的舱壁才能站立了。

阿部大佐仍然在扩音器里安抚人心。他告诉舰员们军舰没有翻覆的危险，但同时也要求水泵组竭尽全力纠正倾斜。

“信浓号”的航速逐步跌落到了10节。进水和大火无可阻遏地蔓延开来，水泵站即将失守。数百名奉命坚守岗位的官兵被困在卡死的舱门和变形的舱壁之后，一旦海水涌入他们的舱室，他们必死无疑。阿部大佐到这时才意识到“信浓号”要拼死求生了，他向横滨发出了求救信号，随即指挥遭受重创的军舰掉头向北，想要在最近的岛屿上搁浅。

东方海平线上升起了第一缕曙光，月亮也已西斜。受伤的航母向北蹒跚而去，三艘驱逐舰紧紧护卫在它身旁。它巨大的上层建筑和烟囱如同醉汉一般向右歪斜着，滚滚浓烟紧随其后，随风飘去。早晨7点，它的轮机由于蒸汽不足而停机。“信浓号”瘫痪在了海面上，在海浪的冲击下，舰体每横摇一次，右倾都会加重一点。阿部命令两艘驱逐舰“浜风号”和“矶风号”前来拖曳这艘6.5万吨的航母，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番努力以钢缆断裂告终。

阿部迟迟不肯下达弃舰令，数百名舰员为此付出了性命。从舰底淹没区域逃出来的人涌上了机库甲板和飞行甲板。纪律即将崩溃，至少在舰上部分区域是如此。水兵们慌成一团，没有命令就跳进了海里。9时30分，“信浓号”缓慢而无可阻挡地向右翻倒。海水涌入了飞行甲板上的主升降机井，把水兵们冲倒在地，抛进了机库。当烟囱没入水中，海面上的几十人都被吞进了它黑洞洞的大口。当阿部最后下令弃舰时，许多舰员已经跳进了海里，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为时已晚。在这艘翻倒的大海兽周围半英里范围内，到处都是攀爬在残骸上等待护航驱逐舰救援的逃生者。

阿部大佐已无意苟活，一众军官僚友也决意与他同死。他们沿着严重倾斜的飞行甲板爬到舰首，他们知道这里将会是军舰最后沉入大海的地方。当舰尾没入水中，军舰又开始回转，恢复了左右两侧的平衡。它的舰首完全抬离海面，高高扬起，飞行甲板已近乎垂直。当海水从舰尾涌入时，“信浓号”这个姿势保持了一段时间，似乎纹丝不动。而舰体内部却传来了爆炸声，空气挤出时的咝咝声，以及重型设备和大块残骸松动后沿着舰体轴线坠落时的碰撞声。它缓缓沉入水中，直到海水最后吞没了它金色的十六瓣菊花纹章。阿部和其他1 400名舰员一同沉入了深渊。

“信浓号”的处女航到此落下了帷幕。

12月15日，“射水鱼号”回到了关岛，乔·恩莱特却遭遇了对他击沉战果的一片质疑之声。海军情报部门完全不知道这艘舰的存在，他对目标上层建筑和倾斜烟囱的描述和日军舰队中已知的任何一艘航母都对不上号。11月28日，太平洋监听站截获了一条日本电报并很快破译了出来：“信浓沉没。”美军没有这一名称的日舰的记录，但“信浓”是本州岛东北方一条主要河流的名称。根据日本海军固定的舰艇命名传统，这个名称意味着目标可能是一艘巡洋舰。基于此，洛克伍德倾向于认定“射水鱼号”击沉的是一艘级别不明的重巡洋舰，可能是彻底重建的老舰。

但是恩莱特确定自己击沉了一艘航母，并且拿出了那张他在通过潜望镜观察“信浓号”时画的铅笔草图来佐证观点。珍珠港的分析人员不得不表示同意：这张详细的草图画确实是一艘航母。与此同时，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有人指出，“信浓”也是日本长野地区一个古国名，这意味着它也可能是一艘航母的名称。这样，洛克伍德便认定“射水鱼号”击沉的是一艘2.8万吨的“飞鹰级”航母。^[69]

直到战后，整个真相才浮出水面。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证明，“射水鱼号”击沉了一艘6.5万吨的航空母舰，这令它成了单次巡逻击沉吨位最高的潜艇。为人谦逊的恩莱特总是强调他只是运气好，瞎猫碰到死耗子，让之字形航行的“信浓号”撞进了自己的射击窗口。这固然是没错的，命运把胜利交给了“射水鱼号”。但是恩莱特也确实把手中的牌打得完美无瑕，为此，他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1] Wylie, “Reflections 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pp.32—33.

[3]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p.2.

[4] USSB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p.11;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p.176, Table C—G9.

[5] USSB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p.13.

[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6.

[7] Halsey to Nimitz, September 28, 1944, Halsey Papers.

[8] Nimitz to Halsey, October 8, 1944, Halsey Papers.

[9] MacArthur radiogram to Marshall, February 2, 1944, p.1; RG—4, Records of Headquarters, U.S.Army Forces Pacific (USAFAPAC), 1942—1947,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0]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p.173.

[11] John W.Clary, “Wartime Diary,” accessed January 3, 2018, http://www.warfish.com/gaz_clary.html.

[12] Beach, *Submarine!*, p.59.

[13]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14] “U.S.S. *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17, 1943, *U.S.S. 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69.

[15]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16] John W.Clary MoMM1c, “Wartime Diary.”

[17] 日本人发音不准，“Sorry”（对不起）都会被读成“Solly”。——译者注

[18] “U.S.S. *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25, 1943, *U.S.S. 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75.

[19] Ibid.

[20]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21]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 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and *Wahoo* patrol report, March 22, 1943.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22] “U.S.S. *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25, 1943, *U.S.S. 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76.

[23] Beach, “Culpable Negligence,” in Sears,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80 in *American Heritage*), p.74.

[24] “非我发明综合征”（“not invented here” syndrome），指的是一个组织对非自身原创的外来事物持抵制态度的现象。——译者注

[25] Blair, *Silent Victory*, p.402.

[26] Ibid., p.403.

[27] “U.S.S. *Wahoo*, Report of War Patrol Number Six,” Item (O): “Health and Habitability,” *U.S.S. 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138.

[28]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 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29]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p.114.

[30] CINCPAC to COMINCH, 7 November 1944, “Operations in Pacific Ocean Areas, June 1944: Part VI, Pacific Fleet Submarines,” p.18, Map Room Files, USN Action Reports, Box 183, FDR Library.

[31]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p.114.

[32]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33] Tillman, *Whirlwind*, p.34.

[34] Phillips Jr., *Rain of Fire*, p.17.

[35] Sweeney, *War's End*, p.56.

[36] 地面速度：航空术语，指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与其相对的是“空速”，即飞机相对于气流的速度。——译者注

[37]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21.

[38] Ibid., p.322.

[39] Craven and Cate, 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5, p.546.

[40] Hansell quoted in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96.

[41]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A Memoir*, p.175.

[42] Letter written by Charles L.Phillips Jr., quoted in Phillips Jr., *Rain of Fire*, p.32.

[43] November 4, 1944 entry,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25.

[44] Marshall Chester diary, November 18—26, 1944,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28.

[45]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1 labeled “Gen.Spaatz,” entry dated November 23,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49.

[46] Hansell quoted in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01.

[47] Submarine Division 102, “First Endorsement to CO *Archerfish* Conf.Ltr.SS311/16—3, Serial 013—44 dated December 15, 1944,” p.1, Item 3, appended to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December 15, 1944.NARA, RG 38: U.S.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1941—1945.

[48]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6, 1944, p.7.

[49] 人们会记得，就在5个星期前，“鲛鱼号”在另一名艇长的指挥下，在巴拉望水道伏击了栗田将军的中路舰队，打响了莱特湾海战第一枪。——作者注

[50] “真方位”是航海术语，指以地球北极点方向为0°，顺时针计算方位。与此相对的是“磁方位”，以北磁极为0°。——译者注

[51] 这里的“点”是航海术语，将360°圆周进行32等分，1“点”相当于方位11.25°。——译者注

[52] Enright and Ryan, *Sea Assault*, p.46.

[53]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8, 1944, p.8.

[54] Oshima Morinar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49.

[55] Enright, *Sea Assault*, p.95.

[56] Ibid.

[57] Ibid., p.103.

[58] Ibid., p.114.

[59]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8, 1944, p.9.

[60]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9, 1944, p.9.

[61] Enright, *Sea Assault*, p.178.

[62] Ibid., p.183.

[63] Ibid., p.184.

[64] Ibid., p.185.

[65] Ibid.

[66] Ibid., pp.186—87.

[67]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9, 1944, p.10.

[68] Enright, *Sea Assault*, p.201.

[69] Ibid., pp.245—46.

第八章

莱特岛周围的海面上满是大海战之后美日两军沉舰留下的碎块和残骸。苏里高海峡沿岸的沙滩上满是油污。尸体随着潮汐被冲到岸边——大部分是日本人。美军第7舰队一名军官发现这个区域弥漫着“腐尸烂肉的臭味”。[1]根据萨马岛上一名和当地抗日游击队协同行动的美军情报官的说法，在栗田舰队和“塔菲”编队海战之后的几天里，海滩上可以找到许多“财宝”。一箱箱口粮漂到了岸上，里面有饼干、奶酪、果酱、脱水土豆、午餐肉、香烟，还有咖啡。衣服和床垫都被当地菲律宾人拿走了。还有一本被水浸透的简装版《乱世佳人》小说被摊在太阳下面晒干。一桶桶汽油被拿走藏了起来。[2]有一具无头尸体被冲上海滩，可能是日本人：当地人把他架在一堆木头上火化了。

莱特湾的封闭水域里挤满了金凯德运输船队和两栖舰队的约650艘船，它们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把物资卸载到登陆滩头的工作需要许多个星期。海面变得污浊不堪，它变成了这座超过10万人的水上城市的露天污水沟。“海湾里的水发绿，满是许许多多船上的屎和尿。”一名水兵在家信中如此写道。[3]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日军空袭，舰队施放了灰色、棕色、黄色的化学烟雾。登陆艇尾部的架子上放上了发烟罐，运输船的上风位置布放了发烟浮标，装在大型舰船上的贝斯莱尔油雾发生器能够一次施放出可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面积烟雾。[4]每到薄暮或破晓的空袭高危时间，整个海湾都会笼罩上一层薄纱。

莱特岛的东部海岸很适合两栖部队的后勤补给。长长的白色

沙滩向大海延伸不远，就突然变成适宜航行的深水区，入口水道处也没有珊瑚礁阻碍。大型船只、坦克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能够面朝海滩，通过跳板或浮桥栈道直接卸载物资。登陆舰艇上的吉普车、卡车和坦克可以直接开到岸上。塔克洛班附近海岸航拍的照片中能够看到几十艘这种大型两栖舰艇，船头挤在海滩上，跳板如同舌头一样从打开的蚌壳式艏门中伸出来。锚泊在海岸外的运输船和海滩之间的水面上，数百条小艇拖着白色的尾流来来往往。在A日之后的2个月时间里，金凯德的两栖舰队平均每天都会向那些海滩卸载1.1万吨的武器、弹药、补给、车辆，以及各种物资。[5]

但是拼了老命的卸载却也让登陆区域的物资堆成了一团乱麻。在1944年10月时，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和以往一样，两栖舰队指挥官责怪登陆海滩人手不足，而地面部队指挥官则说他们的部队都在岸上打仗（这也不无道理）。海滩旁边的平坦野地很快就成了拥挤的物资堆栈，覆盖了许多平方英里的地面。物资大致堆放成格子状，成堆的板条箱、油桶和停放的车辆之间是土质道路。大批的军用物资就这么暴露在敌人的空袭面前，许多物资在战役第一周就被毁掉了。例如，10月25日傍晚，一架日军轰炸机就击中了一个含有4 500个汽油桶的堆栈，大火直到24小时后还在烧。但是更严重的毁坏来自没完没了、瓢泼而下的季风雨，雨水把大大小小的道路变成了泥潭，向涨水的棕色河流拉出一道道冲沟。艾克尔伯格将军形容塔克洛班以南的沿岸区域是“沼泽和泥坑，别无其他”。[6]

美国陆军航空队第308轰炸联队的一支地面分队正在塔克洛班机场上施工，他们快马加鞭，想要尽快把这里建成一座大型航空兵基地。但是环境对他们很不利。地面松软而湿滑，美军的推土和平整能力远不足以对付这一大片泥潭。卡车沿跑道全线倾倒

土方和碎石，但是附近找不到珊瑚矿，因此也就没有制造混凝土和沥青所需的合适材料。舰载机常常在这里紧急降落，迫使建筑队伍离开跑道。勇敢的人们会举着旗帜和火把站在跑道旁，标出飞机要规避的重要位置。坠机几乎是家常便饭。这时候推土机就会把残骸推到机场旁边。大雨和敌人的空袭常常会打断施工，就和在莱特岛的其他地方一样。马斯顿钢板被送到岸上，铺设在跑道表面，但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钢板下方的松软泥土常常会让紧密排列的钢板滑动开。位于南方的杜拉格、巴育、布里和圣巴勃罗的机场也受到相似问题的困扰。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直到1944年12月才开始大规模使用莱特基地，而此时菲律宾的战事已经转移到了民都洛和吕宋。

莱特岛之战的最初几天，美军占领的地盘比预期的更大，遭受的伤亡比担心的更少。美国第6集团军由出生在德国的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他们在岛屿的东部沿岸平原上部署了4个齐装满员的师。大海战之后，他们的海上后勤线也已安全。土路从低处一路攀升到高耸崎岖的细长山脊地带，山脊线大致沿南北方向延伸，覆盖着浓密森林的山峦向上隆起，顶峰高达4 000英尺。尽管天气阴晴不定，日军也在俯瞰各处的高地上占据了坚固的阵地，但坦克和重型装备可以开上这样的道路。在岛屿北端附近，东部的莱特谷和西边的奥尔莫克谷经由2号高速公路连接到一起，这是一条陡峭而曲折的道路。它沿着岛屿西海岸向南延伸到奥尔莫克港和更南边的拜拜镇，又在这里转向内陆，从高山上越过岛屿中部，最终止于东部海岸的阿布约港。

第6集团军起先向内陆稳步推进，日军则边打边撤。前进巡逻队越过岛屿中央的山腰地带，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抵抗就拿下了拜拜镇。富兰克林·C·赛伯特少将指挥的第10军肃清了莱特谷北部，开始沿着圣华尼科海峡海岸向北推进。24日，第8骑兵团

的部队乘坐登陆艇越过海峡，在萨马岛上的拉巴斯登陆，从这里他们可以防止日军乘坐小艇向海峡发动袭击。牢固控制了水道之后，美军现在可以通过沿岸海路运输部队和物资了。

11月7日，美军第24师的部队在岛屿北部沿岸卡里加拉湾西侧突击上陆。从卡里加拉南下的道路陡峭、曲折，而且常常遭到暴雨侵袭。向南边的高地推进时，美军遇到了日军设在一座森林密布的马蹄形山上的坚固防线，于是这里成了美军口中的“断颈岭”。精锐的日军第一师团在这里构筑了用原木铺设的战壕和火力点网络，并藏身其中。这里的战斗愈加艰难而激烈，美军在此地驻足不前了近两个星期。

直到麦克阿瑟登陆前夕，日本陆军的指挥官们还在为迎击美军进攻的战略争论不休。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伯爵元帅统管着整个南太平洋和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6个月前的1944年4月，他把他的司令部从新加坡搬迁到了马尼拉。他点名要山下奉文中将来负责菲律宾的防守，山下奉文由于在1942年初率军打下了马来亚和新加坡而声名鹊起。10月初，山下来到马尼拉，此时距离美军登陆莱特岛只有两个星期了，他却发现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日军并没有确定的应对之策。菲律宾的日军指挥官预计美军会在10月1日左右登陆，但地点却不知道。南方的棉兰老岛显然是个可能的登陆地点，莱特岛也是——但是美军大胆直接进攻吕宋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他们面临着和1941年12月时的麦克阿瑟相同的困境——庞大的岛群为拥有海空优势的进攻方提供了数百个可能的进攻入口。

关于应对战略，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使马尼拉的日军司令部四分五裂。有些人认为空中优势才是唯一有效的防御，他们想要

把陆军的所有人力和资源用来建造和升级机场。1944年8月底之前，日本陆军确实将其大部分力量都用来建造和升级这一区域的机场，尤其是吕宋区域。大范围的分散部署是这一战略的基石，即把飞机分散布置到众多位于偏远和森林地带的小型土质机场网络里。但是另一派指挥官想要倾其全力，在最可能遭到登陆的海滩修筑固定工事，或者在地形有利于防守的高地上建造坚固支撑点。这又是两派观点之争，一名高级军官将其总结为“滩头歼敌”和“诱敌深入”之争。^[7]

然而在1944年10月中旬，更加急迫的问题是，日本陆军是否应当将主力保留在北方的主岛吕宋岛？是否应该尝试运送大部队的去迎击进攻莱特的敌人？当10月18日美军战舰首次炮击莱特岛滩头，特种部队占领莱特湾入口处的小岛时，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山下将军想要在莱特岛打一场规模有限的迟滞作战。他反对从吕宋抽调大量部队，觉得其中许多部队会在海上损失掉。美军航空兵和潜艇对运兵船的攻击已经令南太平洋日军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其他一些人则相信了日本海军关于10月12日至15日在台湾外海重创美国第3舰队的说法。接下来海军又报称在莱特湾海战中再获大捷，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寺内元帅坚持要增援莱特，他要求山下必须执行命令。山下对这一他认为是灾难性的决策大为光火，但还是命令从棉兰老、吕宋和米沙鄢群岛的其他岛上大规模抽调部队，通过奥尔莫克湾的“后门”运往莱特岛。

^[8]

美军在莱特岛登陆时，岛上大约有4.3万名日军，是美军情报部门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左右。在战役期间，日军还想方设法向岛上送来了3.4万名援军。他们从马尼拉派出了9支大规模的增援船队，还有数不清的小部队从棉兰老和米沙鄢群岛乘坐小艇或驳船上岛。大约1万名日军在前往莱特岛途中由于运输船遇袭而损

失。许多到达莱特岛的人也因此失去了装备和重武器，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上岸后能发挥的作用。然而，一流实力的第一师团在战役第一周来到岛上，还是大大提振了日军的信心和士气。“我们曾满怀希望地讨论在11月16日进入塔克洛班。”师团参谋长友近（Tomochika）将军如此说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活捉麦克阿瑟的事情，美国人若想把他赎回去，就要“美国军队全部投降”。[9]

日军早期的计划打算将第一师团部署在卡里加拉周围，第二十六师团放在南方几英里外的伽罗。补给线将以奥尔莫克为起点，通过海运沿海岸延伸。然而11月1日，位于奥尔莫克的莱特岛日军司令部获悉，美军部队已经穿越其登陆滩头前方那片难以通行的区域，越过卡里加拉一线。美军从岛屿东部海岸最初登陆地点发起的地面装甲突击令日本人大惊失色。许多大队规模的部队被消灭殆尽，守岛司令部发现自己甚至连和一线部队保持联系都很困难。于是日本陆军被迫退往卡里加拉西南边的山区，那里的地形更有利于防守。但是这一机动却导致他们失去了与海岸的联系，从而难以维系由奥尔莫克延伸过来的陆上补给线，致使后勤问题恶化。

莱特湾大海战之后，大获全胜的美国海军第3舰队也已筋疲力尽。自从10月上旬以来，飞行员们几乎整天都在飞作战任务。舰载机大队指挥官警告称严重的战斗疲劳综合征正在官兵中蔓延。“黄蜂号”上的一名航空医官判断，这艘航母上的131名空勤人员中，只有30人还适合继续每天飞任务。[10]各舰上的大部分舰员也都有两三个月没体会过脚踩在土地上的感觉了。哈尔西想要把他的舰队拉回乌利西环礁，在接下来的“热足”行动之前短暂休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对日本本土发动航母空袭，暂定在11

月的第三周进行。哈尔西在向所有指挥官发出那份夸口说日本海军已经被“打败、赶走和粉碎”的电报之后4分钟，他就向金凯德发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前所未见的连续16天战斗之后，快速航母部队需要补给，舰载机大队也已很疲劳。”[\[11\]](#)

但是金凯德，或许还包括麦克阿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建议，他们希望第38特混舰队一直待在战区，直到陆军第5航空队做好准备接管莱特岛滩头的空防为止。金凯德报告了他的护航航母部队在萨马岛海战中所遭受打击的详情。它们的状况已经无法保持对运输船队和滩头的空中掩护：“护航航母部队在飞机防空巡逻方面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它们可能很快就无法再作战了。”陆军飞机也还无法承担空中掩护之责，因为塔克洛班和杜拉格机场以其现状还无法接收它们。此时此刻，哈尔西至少还要留下一支航母大队“支援和掩护莱特湾区域，或许还要保护护航航母部队”。[\[12\]](#)

有些事大家都明白，金凯德无须点破：哈尔西必须弥补自己最近所犯的错误。既然让“塔菲”编队遭到栗田突袭的责任得由第3舰队的老大来承担，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来补足空中力量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天里，哈尔西再次急切请求离开战场休整，但金凯德坚持要求继续提供空中掩护。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空勤人员：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也感受到了长时间海上作战带来的压力。后来他承认：“我累了，身心俱疲。我们都一样。”[\[13\]](#)

后来在10月26日，哈尔西直接向麦克阿瑟提出了请求：“打了17天之后，快速航母部队实际上已经用完了炸弹、鱼雷和补给，飞行员们都很疲劳。我无法再提供任何大范围的直接空中支援了。你的岸基航空兵何时才能接管目标上空的空防？哈尔西。”[\[14\]](#)

尼米兹在他珍珠港的司令部里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局势的进展。他知道第3舰队已经绷到了极限，但海军已经答应过要为支援莱特岛作战提供航母空中掩护。萨马岛外海几近灾难的战斗则进一步加大了他投下的赌注。关于跨军种和跨战区协作的问题，如果太平洋方面自己解决不了，那就只能踢给参联会。更糟糕的是，美国国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士和媒体已经将矛头对准了太平洋上的双战区指挥体系。杜威州长已经在参选总统时提出了此事，而大选就在两个星期之后。如果太平洋方面出现重大纰漏，麦克阿瑟那些强有力的后台就会坚持要求把整个战役交由他来全权指挥。

海军高层一向远离政治，正如他们的职业准则所要求的那样。但是尼米兹、金和莱希都在华盛顿工作多年，对这个城市的套路了然于心。太平洋的统一指挥问题是政治斗争的焦点。这个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他们必须把现有的双战区指挥模式用好。

尼米兹截收到哈尔西向麦克阿瑟发出的再三请求（文件号261235）之后，迅速着手干预。哈尔西将补给不足作为自己返回乌利西的一项重要理由，尼米兹不相信。他向他的这位舰队司令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质疑，电报也同时抄送给了金和太平洋舰队后勤司令威廉·L·卡尔霍恩中将：“我不理解你261235号文件中关于补给的說法。請報告你艦隊中各類作戰艦艇上干货补给的大致可维持天数，并列岀因数量不足而影响作战行动的关键物资类型。”^[15]关于为莱特湾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以其不容置疑的命令要求哈尔西留在战位上，这份电报也抄送给了金凯德和麦克阿瑟：“我的8—44号作战计划仍然有效。掩护和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直到我发出新的指示为止。”^[16]

哈尔西只好闭嘴，安排他的各个航母特混大队轮流返回乌利西环礁“轮休”。第38.1（麦凯恩）和38.3（谢尔曼）这两支大队

退回乌利西休息和补充，其余两支大队——38.2（博根）和38.4（戴维森）大队——则留在萨马岛外海为莱特湾提供空中掩护。然而10月30日，刚刚在乌利西锚地停泊了两天的谢尔曼特混大队又被哈尔西紧急召了回去。日本人发动了凶猛到出人意料的空袭。吕宋的机场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本土的飞机增援。不仅如此，大规模的自杀性空袭也带来了持久且令人胆寒的新威胁。“神风”的时代到来了。

博根的旗舰“勇猛号”在10月29日被击中。下午，一支美军空袭机群轰炸和扫射了马尼拉北面的日军机场。几架“神风”机显然尾随着返航的美军飞机找到了航母。其中一架飞机从浓云中俯冲而下，撞中了“勇猛号”右舷的40mm炮组。航母的战斗力的严重受损，但是这一击还是炸死6人，击伤10人。

第二天下午，戴维森的大队遭到了一大群“神风”机的攻击，这次美国人付出了高得多的代价。戴维森将军的参谋长吉姆·拉塞尔在“富兰克林号”的指挥舰桥上目睹了这次攻击。5架敌机躲过了战斗空中巡逻队的截杀，向特混大队的核心区发起了俯冲：“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他们正从很远的地方歪歪斜斜地发动自杀式俯冲。”^[17]每一艘军舰上的每一门高射炮都开了火。“企业号”的炮手们打断了一架来袭敌机的机翼，令其坠入距离军舰仅有30英尺的海面上。“圣贾辛托号”的炮手也打掉了一架，拯救了他们的母舰。“贝劳伍德号”的炮手击落了一架“神风”机，却未能击落第二架——那架飞机撞中军舰后部，穿过飞行甲板，在机库里引发了毁灭性的火灾。第五架飞机命中了“富兰克林号”，正中飞行甲板中央。飞机在3号升降机前方砸了一个40英尺宽的洞，在升降机井中爆炸。舰员们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才控制住火势。

人员损失很惨重：“贝劳伍德号”上92人战死，“富兰克林

号”上54人死亡。“贝劳伍德号”上有12架飞机被焚毁或者损伤至无法修复的地步，“富兰克林号”上则有33架这样的飞机。它们被抛弃了。

根据拉塞尔的说法，“富兰克林号”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居然被完整找到了。“你知道，”他说，“虽然爆炸了，但那家伙的尸体还能认出来。他的丝绸飞行服把他包裹起来，至少你还能看得出那是个人。当然，他已经不成人样了。”^[18]

日本的国营新闻媒体报道称，莱特湾中又迎来了一次辉煌胜利。据报道，日本帝国海军埋头苦干，“一遍又一遍地加强训练”。它耐心地等候美国人越过辽阔的太平洋，到那时他们将会遭遇补给线过长之不利局面。最终，美国舰队冒失地闯进了台湾岛和菲律宾强大的日本航空兵基地的飞行范围，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接连遭到两次大败。NHK广播电台的一名评论员向听众保证，战争结束已为时不远：

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了：美国人已经输掉了战争。日本军队已经在莱特岛及其周围占有了彻底的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而强大的日本增援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所有日本人在未来作战中所要做的就是向敌人展示出他们的不屈精神，敌人便会心惊胆寒，不战而败。当然，这些西方人不会理解这种强大的东方力量。^[19]

报道特别宣传了10月25日下午萨马岛外的“神风”攻击。日本人此前曾或明或暗地听说过所谓“特攻部队”和“肉弹”——但是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神风”是日本报纸和广播中最重要的报道对象。有人估计，关于自杀飞行员的报道占据了这一时期东京所有报纸大约一半的版面。虽然涉及陆海两军矛盾的说法都禁止

刊登，但所有明白弦外之音的人都能看出来，两个军种在竞相宣传自己的“特攻”。[20]海军是先行者，还在10月15日牺牲了有马将军——陆军仅仅5天之后就赶上了趟，大张旗鼓地在茨城县的鉾田飞行训练基地创建了“伴田部队”。帝国大本营指示这些新的自杀部队去“破坏敌登陆部队在海上的增援和补给（包括摧毁锚地附近的运输船），以及摧毁敌人航母打击特混舰队（包括支援登陆作战的海军舰艇）”。[21]

“神风”在战术和宣传两个方面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军国主义政府对于民众日渐消沉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国内战争报道可信度越来越多的质疑感到警觉。必须想办法重树人们对最终胜利的信念。这些自杀航空兵和其他新玩意儿——诸如“樱花”“回天”，以及越洋气球炸弹——实际上和同一时期纳粹宣传的“神奇武器”如出一辙。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宣传手段，旨在重振轴心国政府愈加低落的可信度，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在日本，当权者常常能用耻辱感撬动社会思想，“神风”更是被塑造成了普通民众的榜样。在10月下旬报道对第38特混舰队的自杀攻击时，《每日新闻》的编辑写道：“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学习这些年轻人的高贵精神。”[22]小矶首相则要求军工领域的工人们“学习特攻队勇士的榜样，在生产领域展示出尤胜于此的必胜精神”。[23]

“神风”部队在陆海两军中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正规化。整支整支的航空队被改编为特攻部队，还得到了或文艺或神秘的夸张命名。数以百计的飞机和飞行人员在1944年11月被派往菲律宾去执行特攻任务，即便大量自杀机如此在战斗中损失掉，“神风”部队依旧在迅速扩大。200架陆军飞机飞往莱特岛西边的内格罗斯岛，加入那里富永恭次中将军的第四航空军。在日本的训练基地，整个班级的飞行学员——有些人刚刚掌握最基础的飞行技术——被纳入新组建的“神风”部队。许多人奉命直接飞往菲律宾，

他们几周甚至是几天后就要发动进攻。那些刚刚招进来，还没有开始初级飞行训练的学员被告知，他们将从一开始就作为“神风”队员进行训练。这样日军就建立了一套训练体系，确保到1945年春季时将会有大量自杀飞行员可用。

福留中将起先反对大西关于让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的两支航空舰队大规模使用自杀战术的提议，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仍然在执行常规任务。然而，10月25日关行男大尉那次出击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这令福留印象深刻，而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传统的空中战术已经失效。次日，10月26日，两支航空舰队合并，福留繁任总司令，大西泷治郎担任他的参谋长。从那一天起，福留说：“‘神风’或曰特攻飞机将成为我这支航空部队的核心。”^[24]和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他本人并不愿意让这些年轻人去送死，尤其是在东京方面传来昭和天皇对关大尉进攻一事的反应之后。裕仁问海军军令部总长：“必须要如此极端吗？当然他们做得非常好。”^[25]大西将军将这位现人神的询问解读为批评，并深受困扰。但是他和福留都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行办法了。

下级官兵中也有一些违抗的人。老资格的飞行队长藤田怡与藏少佐被要求选出12名飞行员来执行自杀任务。“我不干，”他告诉上级，“你要想去干，我没意见，你自己去挑飞行员。”之后他就回到宿舍躺在了床上。藤田战后说：“仗打到这个时候，我确信高层是疯了。最后这个战斗机队还是执行这个任务了，再也没听说过有关他们的消息。”^[26]有些飞行员被吓坏了，却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对。一名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大学生回忆说，听说他的训练班级被指定执行“神风”作战时，心里“翻江倒海”。但他不敢说，即便对同学也不敢。“我们无法分享彼此的疑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大学。如果我表达了担心，我的大学就会蒙羞。我

只能把它藏在心里。”[27]

然而根据一些逸事提供的证据，日本大部分飞行人员不仅愿意，甚至急于作为“神风”队员献出生命。招募志愿人员时，应募者一致同意是很常见的。一名飞行队长回忆说，他的人围绕着他，拉着他的胳膊，哭喊着说：“让我去！请让我去！我！”他还厉声对这些人说：“每个人都想去，你不能这么自私！”[28]根据航空兵指挥官猪口力平的说法，那些被指定执行后续“神风”任务的飞行员在每一次任务之前都热情满满地想要参加。“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去？”他们问道，或者是：“我还要等多久？”[29]

“神风”队员已然成了一个特殊人群。他们被视为“脱离凡俗的神祇”，受到那些军衔、经验和技能都远高于他们的同僚的善待和尊敬。在等候执行特攻任务的时候，他们有独立的宿舍可以住，通常都是基地里最好、最干净的房间，伙食也是按照高级军官的标准供应。常规航空兵人员和其他部队的战友会送他们昂贵的礼物。本土的民间团体，包括初中生，会带着仰慕之情给他们写信，还会附上礼包一起寄来。战争通讯员和摄影师四处寻找他们，进行采访和拍照。到处都有盛宴款待，少见的珍馐美味被端放在他们面前，还有艺伎在一旁载歌载舞，以娱其心。军衔高低在他们面前不值一提。猪口中佐有一次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岛机场与“神风”飞行员进行了交流。一个飞行员指出，在日本神道教的英灵殿，也就是靖国神社里，战死者灵魂的座次应当按照来到此地的时间来排序，而不是按照军衔。

“那样我就会排在你前面，中佐，”他说，“因为你在亲自上阵之前还要派出去许多飞行员。”

“话说，”另一个人说道，“他到靖国神社报到时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让他当司务长管伙食！”

这番答复引来一阵哄笑。

猪口接了茬儿，他哀求下属们：“你们就不能给我个好点的差使吗？”

“好吧，”有人答道，“可以当勤杂官。”笑声更大了。[30]

新的“神风”飞行员在抵达菲律宾时只接受了7天的入门培训，包括课堂教学和基础飞行练习。典型的出击队形通常是一个小编队，由4架到6架飞机组成，其中有一两架是护航——观测机。（护航机由技术更好且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他们不会发动攻击。其任务是把“神风”机带到目标上空，观察战果，并且安全返回基地。）他们会采取两种接敌和攻击方式：一是高空，一是低空。前者，飞机在2.5万英尺或者更高的高度上接近敌舰队。接近到相距40英里时，飞机会投下大量的“窗户”——铝箔条——以干扰美军的雷达系统。当无处不在的F6F“地狱猫”蜂拥而至，护航机就会以花哨的防御机动把它们诱开，“神风”机则俯冲加速并寻找云层掩护，争取接近到能向美军舰队发动攻击的距离。低空接敌时，飞机在二三十英尺的掠海高度飞行。由于地球曲率和海面杂波干扰的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通常在大约10英里外就无法探知这些低空来袭的敌机。接近到距离敌舰队五六英里时，低空飞行的“神风”机会突然拉起，爬高到约2 000英尺。如果那里有云，它们就会躲进其中，寻找目标。[31]

最后的攻击阶段——高空和低空模式都一样——“神风”队员们被要求像俯冲轰炸机那样大角度冲向目标。他们要瞄准目标的上层甲板。进攻时俯冲角越大，他们的穿透力就越大。攻击航空母舰时，他们会瞄准飞行甲板上的一台升降机井。日本人相信这样撞进机库的机会最大，引发二次火灾和爆炸的概率也最高。

（至少炸掉一台升降机可以阻断航母的飞机起落。）“神风”队员们还被告知，如果无法向飞行甲板发动大角度撞击，就要瞄准航母的岛形上层建筑，以期打死其高级军官，摧毁航母的神经中枢。[\[32\]](#)

11月的第一天，一批接一批的自杀飞机落在了莱特湾中金凯德将军第7舰队的头上。进攻从上午早些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许多军舰靠着剧烈的机动才侥幸未被直接击中。高射炮摧毁了可能有20架敌机。有一架攻击机斜向撞上了驱逐舰“阿曼号”的主烟囱。大约下午1时30分，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小队来袭的敌机，它们正从高空高速俯冲，而空中却没有美军战斗机能去拦截。当一架爱知俯冲轰炸机破云而出时，驱逐舰“阿布纳·里德号”开始剧烈机动，舰上的40mm和20mm高射炮猛烈开火，人们看见来袭敌机的左翼被打了下来，但敌机残骸仍然靠惯性撞上了驱逐舰的右舷中部。

“阿布纳·里德号”的前部舰体燃起了大火，深水炸弹架和鱼雷发射管也面临被大火吞没的危险。水兵们匆忙赶在深水炸弹和鱼雷被烧炸之前把它们丢进海里或者发射出去。在被击中的驱逐舰近旁航行的驱逐舰“克拉克斯顿号”上，一名目击者惊异地看到一个不知名的鱼雷兵径直冲进火里操作鱼雷管。“电力显然已经被切断了，于是，他整个人都在火中，人工把鱼雷发射管转向右舷，用一把锤子人工射出了全部五枚鱼雷。”[\[33\]](#)这一壮举使得军舰免遭自身鱼雷之害，但是大火很快蔓延到弹药库和临时弹药架，引发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大爆炸。当“阿布纳·里德号”的舰员开始弃舰，“克拉克斯顿号”靠了上去以捞救幸存者。然而就在此刻，另一架“神风”自杀机以近乎垂直的航线冲了下来。它差一点就击中了“克拉克斯顿号”，但是机上的炸弹却在军舰侧旁的海面爆炸，炸死5人，导致军舰下部舰体进水。尽管如此，“克拉克斯

顿号”还是救起了187名“阿布纳·里德号”的幸存者。

一整个下午，一批接一批的“神风”机不断来到莱特湾，它们俯冲下来，往往落在让人心惊胆战的近处。当天傍晚，第三艘驱逐舰“安德森号”被直接命中。金凯德不得不让6艘军舰返回马努斯的干船坞去维修。

这天，莱特岛的登陆滩头仿佛成了众矢之的。美国陆军第5航空队一架巡逻机报称一支强大的日本特混舰队出现在棉兰老海，向东航行。这可能意味着第二次莱特湾海战，只是这一回盟军在此区域中的海军力量弱了很多。哈尔西对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十分怀疑，却也不敢怠慢，派出一支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前去守卫苏里高海峡。^[34]（但第二天上午，事情就清楚了，这份侦察报告有误。）与此同时，日军空袭无休止地落在登陆海滩上。来袭敌机从低空飞来，借助周围的高山隐蔽自己的行踪。它们轰炸扫射了补给物资堆栈，已经上岸的坦克登陆舰，塔克洛班的机场，以及设在沿岸一群帐篷和棚屋里的尚未建成的各种指挥所。陆军第5航空队第308攻击联队的P-38“闪电”战斗机从10月27日起进驻塔克洛班参战，但是由于“机场环境恶劣”，其数量还不多。^[35]美国陆军航空队还有许多战斗机在地面上被毁，有一次空袭一下子就击毁了27架飞机。在11月的第一周里，日军向莱特岛滩头发动的常规空袭（非“神风”）摧毁了2 000吨汽油和1 700吨弹药。^[36]

金凯德实在没办法了。11月1日当天晚上，他向麦克阿瑟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说莱特湾的情况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敌人航空兵力的复苏令人警觉。他们对滩头的空袭显然未受阻碍，这可能会卡住陆军的后勤生命线，而且“神风”自杀机向海岸外舰队的攻击也是个愈加可怕的噩梦。他警告说，由于迟迟未能在塔克洛班和杜拉格进驻强大的陆军航空队兵力，整个战役可能面临失败。

与此同时，第7舰队的司令再次提出了为莱特湾上空提供更多舰载机支援的请求。哈尔西则答复说，他更愿意从源头上打击敌人的空中威胁，他要轰炸吕宋岛上的日本机场群。11月5日和6日，第38特混舰队的飞机重创了马尼拉北面的敌人各大航空兵基地，同时攻击了马尼拉湾里的舰船，被它们击沉的舰船之中包括“那智号”重巡洋舰，从苏里高海峡夜战中幸存的志摩将军的旗舰。然而，5日这一天，有几支“神风”机和护航机组成的的小编队尾随返航的美军飞机找到了萨马岛以东的特混舰队。遭遇巡逻的美军战斗机时，日军飞机会迅速脱离战斗，之后寻找云层掩护，潜入特混舰队外围。下午1时39分，七八架敌机突破到了第38.3特混大队中央。其中大部分在向位于轮形阵中央的航母俯冲时被近距离高炮火力击落。一架飞机坠落在“提康德罗加号”右舷30英尺外，在海面上炸成一团火球。另一架飞机坚定地穿过高炮火墙，撞上了“列克星敦号”的信号舰桥。大火立刻在岛形上层建筑内蔓延开来，吞没了舰桥，摧毁了大部分通信设备和雷达设备。航母的飞机起落未受影响，但伤亡却十分惨重——42死126伤。伤者中包括了舰上很大一部分火炮部门和通信组人员，许多人都受到了严重的烧伤。“列克星敦号”只好返回乌利西维修，要在那里停泊17天。6日，它为战死者举行了海葬，葬礼期间，舰上的军旗（连同第38.3大队的军旗一起）降了半旗。[38]

“神风”在美国舰队的官兵中间引起了恐惧、害怕、仇恨以及（相当多的）关注。他们似乎确信了原本犹豫不定的一个想法，即日本人和自己不是一个“物种”——他们极端狂热，热衷于赴死，毫无人性。人们对怪异的、非人性的“他者”的这种印象激起了许多不着调的流言——他们穿着白绿相间的教袍，或者戴着黑色头巾，或者被镣铐锁在座舱里。有人称他们为“绿黄蜂”。他们

引发了一种新的恐怖。一名驱逐舰水兵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一个邪恶的野兽驾驶着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直冲我而来，机翼上6挺机枪火力全开。看起来他就是冲我而来的。”^[39]《时代》杂志的通讯员鲍勃·谢罗德注意到太平洋上的美国水兵们谈论的几乎全部都是“神风”，再无其他。“没什么比看着一个人连人带飞机撞向敌人更令人敬畏的了，”施罗德写道，“没人想得到日本人能把中世纪式的宗教狂热和飞机这样的现代化机器结合到一起。”^[40]

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则有些“冷血”。此时人在美国本土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立刻就意识到，自杀攻击是日本对日益衰弱的航空兵力量的“十分理想而且经济”的运用方式，在战争结束前盟军将会始终面临其威胁。^[41]吉米·萨奇是个传奇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时任第38特混舰队作战参谋，他认为“神风”是一种“远远领先于时代”的武器。一名决意自杀俯冲的飞行员能够在最后一分钟调整航线以命中目标，就像是人工制导导弹一样。“神风”飞行员对航空母舰尤为致命，因为他可以瞄准航母暴露的舰桥撞上去，或者想办法穿进机库，在那里，爆炸和火焰可以引燃燃油、爆炸物，以及其他可燃物。“那实际上就是一枚制导导弹，而此时我们还完全没有制导导弹这种东西，”萨奇说，“它由人脑、人眼和人手制导，因此比制导导弹更好，他可以观察情况，理解信息，改变航线，规避打击，命中目标。”^[42]

在整个第38特混舰队中，渴望得到更多战斗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样的主张已经酝酿了数月，现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本海军大部分已经被击沉，美军舰队对传统舰载轰炸机的需求不再那么大了。“棕鞋族”们想要对标准舰载机大队的编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增加“地狱猫”和F4U“海盗”。“在这种战争中，”盖里·博根在一份直接发给尼米兹和金的言辞激烈的电报中

说，“[SB2C‘地狱潜鸟’]使飞机运作复杂化，而且占用了本可用于无价的舰载战斗机的宝贵空间。”他还补充说，训练体系也不是问题，因为现有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还有那些在训的，可以直接转换到战斗机上。博根说他知道飞机的数量足够，可以立刻调到西太平洋来：“我们先前做的准备工作是为了打击敌人的力量来源，现在是时候出手了。”^[43]

这份电报公然违背了通信规则，而且其语气近乎叛乱。博根当然知道，一位特混大队指挥官不应该直接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电，遑论海军作战部长。尼米兹批评博根“不恰当地越级向上发电”，要求他把他的观点重新提交给哈尔西。^[44]但是这唇枪舌剑的往来电文却也凸显了舰队对这一需求的紧迫感。实际上航母部队的指挥官们几个月来都在要求得到更多的战斗机，而“神风”威胁的突如其来仅仅是加剧了这种短缺。

海军高层已经在竭尽所能地将更多的“地狱猫”及其飞行员送往太平洋，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会打乱未来的计划。如果他们在1944年后期加速将新组建的F6F中队部署到太平洋，那就会面临1945年时战斗机不足的风险，而那时舰队需要保持齐装满员，以执行进攻硫黄岛、冲绳岛乃至日本本土的计划。“棕鞋族”们则认为轰炸机飞行员可以直接坐进战斗机的座舱。他们或许不能一夜之间变成战斗机王牌——但是在太平洋当前的情况下，即便是水平一般的F6F飞行员也比SB2C飞行员更有价值。博根坚持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只要两个小时的适应飞行就够了。

不仅如此，F6F“地狱猫”本身就是不错的轰炸机，即便它原本并非为此而设计。它的动力足以挂载一枚1 000磅炸弹，而且能在大角度俯冲时保持稳定。装备火箭弹时，它就常常如此行事，攻击地面目标的精确度比俯冲轰炸更高。“这就是那种难得一见的事情，你可以白得好处而无须代价，”萨奇说，“你投下炸

弹，然后就得到了一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45]萨奇还想让航母也带上陆战队飞行员和他们的F4U“海盗”，他们最近刚刚开始从护航航母上起飞支援两栖作战。如果他们在小型的“吉普航母”上都能学会降落，那么在飞行甲板大得多的埃塞克斯级航母上降落也不会有问题。

尼米兹和金逐步接受了这些来自一线航空兵的坚决要求。他们此前已经把标准舰载机大队的编制从18架鱼雷机、36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改成了18架鱼雷机、24架轰炸机，“战斗机能装多少装多少”。[46]11月29日，金再度批准了新的埃塞克斯级航母舰载机编成：73架“地狱猫”，15架“地狱潜鸟”和15架“复仇者”。然而，落实这些变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舰载战斗机的需求量很大，但供应却很紧张。[47]尼米兹告诉哈尔西，他想要在关岛保留一批后备F6F飞机，但是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被哈尔西恳切的答复说服了：“急切地请你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很紧张，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了……自杀攻击若不加以应对，那么对我们的航母和你未来的作战都是个严重威胁。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斗机来对付它，而现在要么少派一些战斗机到目标上空去，要么补充战斗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48]第二天尼米兹就改变了决定，把现有的整个后备战斗机群全部立刻交给第38特混舰队。但他仍然对1945年初可能出现的舰载战斗机短缺忧心忡忡。

在舰队里，航空兵参谋们发明了创造性的新战术来对付“神风”的威胁。第38特混舰队的4支特混大队被整编为3支，这样每支大队都能确保力量充足。队形中央的航母越多，上空的防空战斗机就越多；这还意味着更强大的护航舰队以及更集中的高炮火力。美军设计了一套被称为“驼鹿陷阱”的防御措施来对付日军出动“神风”编队尾随返航美军飞机攻击航母的战术。两艘驱逐舰

（“看门狗”）被布置在距离航母特混舰队约60英里处，位于舰队和空袭目标之间的直线航线上。美军空袭机群返航时先飞往这些“看门狗”，在其上空环绕360°之后再返回航母。防空战斗机（“汤姆猫”）在驱逐哨舰上空巡逻，在返航机群兜圈子时靠上去检查，一旦发现日机便将其击落。这一过程被称为“灭虱”。[49] 美军飞行员被告知不要进入驱逐哨舰之间的区域，这样的区域被称为“开放狩猎区”。任何出现在这一区域的雷达信号都会被认为是敌人，并立即加以攻击。驱逐哨舰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神风”机进行早期雷达预警，低空的战斗空中巡逻队（所谓“杰克”）则会被引导前往截击。“我们告诉飞行员们，如果他们返航时没有在哨舰上空‘灭虱’，就很可能挨打，”萨奇说，“保证那片区域没有敌人就行了。如果有敌机攻过来，就像它们常干的那样，我们提前很久就能发现。这招就是这么奏效的。”[50]

除了这些防御战术，他们还发明了一套进攻战术，被称为“大蓝毯”的空袭体系。在空袭日，航母部队会派出大编队的F6F“地狱猫”在吕宋岛的敌人机场群上空巡逻，轮流值班，全天不断，这样就能直接在敌人各个基地上空保持压制。任何试图起飞或降落的敌机都会被击落。萨奇安排了三个班次的飞机来轮流执勤，各班次的起飞和降落时间都经过精心安排，以保障“大蓝毯”不出漏洞，“我们取得了相当惊人的飞机摧毁战绩，有些在空中，但大部分是在地面上”。[51]

新战术起初似乎取得了成功。11月19日，美军向吕宋岛发动的一轮空袭几乎未遇抵抗。当最后一批攻击机群返回特混舰队时，美机在距离特混舰队大约70英里处的哨舰外围拦截并击落了大约20架敌机，对手无一突破防御圈。

退往东方加油5天之后，第2和第3两支特混大队再次在破晓前高速冲向吕宋岛，在日出后不久放出了攻击机群。午后几分

钟，第2特混大队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敌机的身影。此时6 000英尺的空中有一层碎云，这为来袭敌机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中午12时52分，一群零式战斗机从云底冲出，向“勇猛号”、“卡伯特号”和“汉考克号”俯冲过来。其中一架飞机撞上了倒霉的“勇猛号”的左舷高炮平台，炸死10名舰员，炸伤6人。“勇猛号”损伤严重，但还扛得住，航速不减，继续前进。然而6分钟后，另一架零战从舰尾方向冲来，机枪喷吐着火舌，撞上了飞行甲板左侧。飞机残骸一路滑到了舰首，而炸弹却击穿了飞行甲板，在机库里爆炸。哈尔西将军在近旁的“新泽西号”上目睹了这次攻击，他写道：“[‘勇猛号’]在地狱里走了一遭。被击中后没过多久，它就被火焰包围；汽油燃烧的火焰从它的侧旁喷出；爆炸震撼着舰体；滚滚黑烟升腾到数千英尺高处，吞没了舰首的一切。”^[52]“勇猛号”上有69人战死，17架飞机被毁。这艘骄傲却不幸的军舰再一次被迫退出战场，返回珍珠港维修。

第2特混大队遭到这场可怕的攻击时，第3特混大队的雷达屏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敌机，它们从东南方55英里外飞来。许多敌机遭到了战斗空中巡逻队的拦截，但还是有一些飞机逃进了云层。这些来袭者在特混大队周围和美军战斗机玩了大约20分钟的猫鼠游戏，随后开始高速下滑，向目标冲去。谢尔曼将军的旗舰“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座40mm高炮向一架飞过来的D4Y“彗星”（盟军绰号“朱蒂”）轰炸机开火，命中了其左翼翼根。军舰的战时日志记载道：“这虽然没能阻止他，但至少令其向左偏航，因而未能击中排满了加好油、装好弹的飞机的飞行甲板后部。他撞在2号升降机前方飞行甲板中部距离左侧边缘15英尺处，炸成一团浓烟烈焰，看上去十分糟糕，实际情况却要好一些。”^[53]爆炸在飞行甲板上撕开了一个直径大约16英尺的口子，引发了大火，吞没了将军的住舱（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但是它造成的实际损伤

和伤亡比“勇猛号”轻微不少。“埃塞克斯号”没有停顿，继续奋战，甚至还接收了11架无家可归的“勇猛号”的战斗机。

第二天，哈尔西向尼米兹拍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说菲律宾的空战局势已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设法将他们的飞机大范围疏散到吕宋岛上的众多小型土质机场上，并且用植物枝叶和伪装网进行了妥善的伪装。单架飞机常常会隐蔽在距离跑道数英里之处，再利用暗夜的掩护或推或拉到跑道上。增援的飞机和飞行员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和台湾岛飞来。第3舰队摧毁了数百架敌机，但仍在挨打。许多航母遭到重创，包括“卡伯特号”、“勇猛号”、“列克星敦号”、“富兰克林号”，以及“贝劳伍德号”。还有许多军舰也遭到攻击，只是损失没那么重，但威胁却无处不在。莱特岛陆地机场建设的拖延，加之致命的自杀战术的出现，难免导致进攻民都洛和吕宋的计划被推迟。

与此同时，第7舰队也在莱特湾里遭到了打击。11月27日中午前后，T.D.鲁多克少将率领的一支由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正试图从一艘1.4万吨的油轮上加油。上午10时50分，雷达显示大约30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从北面和东面飞来。它们的高度各不相同，有些刚好在碎云云底之上，还有一些是掠海飞行。舰队上空有几架陆军的P-38战斗机在巡逻，但它们不足以拦截所有的来袭敌机。靠在油轮旁的“西弗吉尼亚号”立刻松脱了加油管并脱离开来。5英寸高射炮低沉的轰鸣声开始接连响起，天空中顿时布满了棕黑色的烟团。

11时25分，三架“神风”自杀机冲向了轮形阵中央的战列舰。一架敌机落在“西弗吉尼亚号”近旁。两架同时冲向“科罗拉多号”，其中一架命中了该舰左舷的5英寸副炮组。19名舰员战死，72人受伤，但战列舰损伤轻微。另一架飞机瞄准了巡洋舰“圣路易斯号”，并冲进了其舰尾的机库。飞机油箱里的汽油引

发了大火，军舰拖出了大股浓烟，这似乎在随后的战斗中引来了更多的“神风”自杀机。四架自杀机在冲向“圣路易斯号”时被击落，另一架撞上了其左舷水线上方。

根据巡洋舰“蒙彼利埃号”一位海军上士詹姆斯·J.费伊的日记，敌机似乎是从所有方向同时扑了过来。上午11时25分，战斗达到了高潮，“鬼子飞机落在我们四周，空中满是鬼子的机枪子弹。鬼子的飞机和炸弹在我们四周遍地开花。我们的有些军舰被自杀机、炸弹和机枪火力击中了”。^[54]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里，40mm和20mm高射炮一直在开火，中间几乎没有停过。落下的高射炮弹和抛出的弹壳如同瓢泼而下的暴雨一般把海面打得水花四溅。“蒙彼利埃号”从头到尾都落下了被击毁的日本飞机的碎片，费伊的许多战友都因此受了伤。三架“神风”机在近距离上被打掉，其中一架飞机的残骸从海面上弹起来，撞上了军舰左舷的一座40mm高炮。几名舰员因四散的碎片和燃烧的汽油受了伤。费伊看到有一位炮长一直在向耳麦大吼大叫，却没有留意到耳麦的线路已经被弹片切断。“看起来就像是下了一场飞机碎片雨。它们落在军舰各处。不少人被鬼子飞机的大块残骸砸到。”^[55]

这一切又在转瞬间平静了下来。下午2时10分，最后的敌机或逃走，或被击落。特混舰队周围的海面上漂满了飞机的残骸和燃烧着的汽油。“蒙彼利埃号”上无人死亡，但有11人受伤，其中有几人伤势严重。军舰上到处散落着日本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血淋淋的尸体碎块。军舰的救生艇已经被击碎，救生艇吊索垂了下来，钢质吊柱也被炸弯。甲板上，空弹壳仍然滚烫，无法触碰。费伊战位周围的甲板上满是“血、肠子、脑子、舌头、头皮、心脏、胳膊之类的东西，都是鬼子飞行员的”。在水龙头被弄上来清洗甲板之前，一群人开始从这一堆恐怖的血肉中寻找纪念品。

一个陆战队员从敌人飞行员尸体的手指上摘下了一枚戒指，一个水兵捡走了一块头皮。“我们炮座上的一个人拿来了一根鬼子的肋骨，把它洗干净，”费伊写道，“他说他姐妹想要一块鬼子尸体。一个得克萨斯州来的家伙拿了一块膝盖骨，他想要把它保存在从急救所搞来的酒精里。”[56]

第二天战事稍得喘息，但是29日又是漫长的一天。空袭断断续续，电喇叭响个不停，把水兵们召回战位。太阳刚刚下山，雷达屏幕上就出现了许多“亮点”。一架“神风”机如离弦之箭般从云底穿出，冲向“丹佛号”，却被暴风雨般的高炮火力所阻。于是它大坡度转弯脱离，爬升回到云层中。其他几架飞机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一边躲避高炮射击一边寻找目标。有一架飞机做出了一连串杂技般的飞行动作，简直就是在嘲弄美国人，之后它以最大马力转入了俯冲，直扑战列舰“马里兰号”。这艘战列舰已经来不及改变航向了，炮手们也未能把这架快如火箭的飞机揍下来。它撞中了“马里兰号”艏楼，落在两座16英寸前主炮塔正中间。“你再也不会看见这样的危险动作了，”在近旁的“蒙彼利埃号”上看到了这次进攻的费伊写道，“这种事一辈子只能有一次。对于这些自杀飞行员来说，这绝对是高光时刻，他们就是来赴死的。”[57]

这架“神风”机俯冲时的速度可能超过了每小时500英里，这个速度令其具有了可怕的穿透力。它的炸弹击穿了“马里兰号”两层厚重的装甲甲板，爆炸覆盖了从26号到52号肋骨之间三层甲板上的大面积区域。被击中区域满是浓烟，逼退了损管队。31人被炸死，30人受伤。原有的救护所被火焰包围，于是美军在低阶军官和士官食堂里建立了临时救护所。他们隔开一部分舱室，确认战死的人就会被抬到那里的床铺上，他们将在稍后进行海葬。根据“马里兰号”巡航日志记载，舰员们的士气跌落到了谷底：“可怕的高温，连续不断的空袭，紧张的生活和最近的灾难

性打击令许多人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舰员们得知“马里兰号”要返回珍珠港进行大范围修理时都“高兴坏了”。[58]

11月底，对陆海空三方面的战斗情况进行了评估之后，金凯德将军得出结论，计划中对民都洛（12月5日）和吕宋（12月20日）的进攻已不可能实现。11月30日，金凯德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长篇备忘录，要求“取消”对民都洛和吕宋的进攻。（注意，他说的不是“推迟”。）他写道，在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夺取制空权之前尝试在这些岛屿登陆，“将会导致战争史上罕见的灾难”。[59]

金凯德要他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官阿瑟·麦科勒姆少校作为特使去找麦克阿瑟。他要麦科勒姆向麦克阿瑟转达，考虑到当前菲律宾美国海空力量的状况，战役必须无限期推迟。人们觉得麦科勒姆和麦克阿瑟的私交不错，他们的昵称都是“麦克”，两人还为此开过玩笑。

麦科勒姆可能是联想到了古代给亚美尼亚国王报告坏消息的信使的下场，他答复道：“好吧，将军，我觉得你要我干的事情真是要人命。我是指你派我去那里。”[60]

金凯德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可以去往那里，或许能和他面对面交流而不会被带偏到陆海军关系或其他大问题上的。见鬼，你就过去，见到将军，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麦科勒姆觉得这个任务是“使在下级身上的卑鄙手段”，但他还是上了岸，来到了塔克洛班附近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莱特岛登陆后的几个星期里，狂暴的季风雨横扫了岛屿东部的沿岸平原。自从A日以来，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25英寸。每小

时70英里的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把帐篷和棚屋吹到了九霄云外。工兵们挖掘了很深的排水沟，以控制无边的洪水，并在泥泞的步道上铺设了木板。计划要求建设有9 000张床位的临时野战医院，但是由于恶劣的道路状况，医院的建设工作被耽搁了。

（缺口由停泊在塔克洛班海岸旁的第7舰队医疗船弥补。）整个区域都喷洒了DDT（滴滴涕）农药，但是这片潮湿肥沃的土地还是滋生了无数蚊虫——“每天晚上，”艾克尔伯格将军记录道，“我们都要在成团的蚊虫中爬上床。”^[61]

日军的空袭常常指向设施相对完备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建筑群。11月3日，麦克阿瑟正在司令部办公室里，一架日军飞机低空飞来扫射了这栋楼。一枚.50口径子弹在他脑袋后面的墙上打了一个洞。其他人涌进房间时，看见麦克阿瑟正咧着嘴向他们笑，指着子弹洞说：“我还没死！”此事登上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份战报，第二天就成了美国本土的头条新闻。^[62]

麦科勒姆到达此地转达金凯德的消息时，麦克阿瑟的反应不出所料。“你听我说，麦克，”他说道，“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该死的海军将军们保证过他们会一直支援我，现在你来告诉我这个。”他还骂海军将领们是在“耍赖”。

“将军，”麦科勒姆答道，“事情不是这样。我是说，老天，是肯尼将军在对你耍赖。他应该要把这周围那些该死的机场建起来的。”

对此麦克阿瑟答道：“是的，我知道是这样。”

麦克阿瑟把迪克·萨瑟兰召到了办公室。“麦科勒姆来这里告诉我，那些天杀的海军将领不再支援我们了。”据麦科勒姆的观察，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参谋长随时准备着给麦克阿瑟的盛怒火

上浇油。对话仍在继续，麦克阿瑟低沉有力地说不同意。麦科勒姆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再三阐述实际情况的艰难。莱特的地面作战比预期的更加漫长，日军仍在通过西部海岸登陆援军，“神风”也成了第6集团军海上补给线的浩劫。哈尔西将军同样有这些忧虑，他也亲口这么说过。

最后麦克阿瑟让步了。“随你怎么告诉[金凯德]，我不在乎，但是你回去，跟他说我同意了，”他说，“我不喜欢这样，但我也理解，就这样吧。”[63]

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深入莱特岛上难以通行的“科迪勒拉山”[64]，也就是多山的内地，其后勤愈加困难。通向内陆的道路常常被冲毁，或者要从密林中穿过。战斗在美军称之为“断颈岭”的高地处止步不前。这道山岭上的堑壕阵地由日本第一师团精选出来的精锐部队防守，他们不久前还是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刚刚乘船来此。一连几天，战线一步也未能推进。部队在陡峭的山路上负重前行，有时候靴子都会脱落在烂泥里。在水稻田里，水常常漫到人的腰部。11月5日，另一支美军部队拿下了利蒙镇，越过这里便是一条直通奥尔莫克湾的山谷，但是这个方向上的后续进展却为糟糕的后勤状况所阻滞。

由于急着打破血腥的僵局，以及担心日军援军通过岛屿西海岸继续上岛，克鲁格将军劝说麦克阿瑟同意放出他的预备队。他现在在岛上有超过12万部队，想要在奥尔莫克谷地中发动一场大规模钳形攻势，打垮日军。最终，断颈岭的日军阵地被美军双叉包围所突破：美军一个营穿越丛林，绕到1525高地东边，另一个营乘坐18辆履带式登陆车，走海路在2号高速公路向南转弯的地方附近登陆。这一机动令当地日军陷入了无法立足的困境：深陷丛林深处，通往西海岸的补给线被切断。

美军后来才意识到，敌人已经决心不惜代价也要向岛上增援。麦克阿瑟和他的指挥官们起初将莱特之战视为一场过渡性战役，只是通向吕宋岛的垫脚石。他们原本以为开进奥尔莫克港的一队队运输船是为了撤走日军部队，而不是运入新锐部队。但是，马尼拉的日军司令部已经决心要打赢莱特之战，直到1944年12月的第一周都不停地向岛上投入增援部队。“到11月底，”麦克阿瑟写道，“尽管航运途中和战斗损失都很大，莱特岛上的敌人还是比10月底多了成千上万人。”[\[65\]](#)

日军通向奥尔莫克湾的海上补给引发了卡莫特斯海上一连串激烈的海空战斗。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瓜岛战役的重演，交战双方都想要孤立岛上的敌军，并控制岛屿周围的海运线。11月3日至9日，有几支大规模的运兵船队和货轮船队在驱逐舰的护航下从马尼拉湾出发，在菲律宾岛群之间的海域航行了600英里，在奥尔莫克湾卸下了超过整整两个师团的兵力。美军航母舰载机赶来向这些船队发动了攻击，击沉了超过12艘日本船只，从莫罗泰岛机场起飞的第5航空队的B-24和B-25轰炸机在11月8日也击沉了两艘大型运兵船。但日本人的运输仍然在继续。由于马尼拉湾已经遭到持续空袭，日本人判定已经没有必要把这些船留待日后使用了。如果不立刻把它们派出去，它们基本上也会在锚地被击沉。

11月11日，一支大规模增援船队在奥尔莫克湾靠岸，卸下了第二十六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当这个师团的重武器和补给物资仍在卸载之时，一批美军舰载机扑了过来，击沉了4艘大型运输船和4艘驱逐舰。第38.3特混大队的日志记录道：“当第38特混舰队开始系统地消灭这支船队时，日本鬼子就倒霉了。”[\[66\]](#)根据日方资料，这个师团上陆时的伤亡很小，但是只带了步枪和10个基数的弹药。[\[67\]](#)

12月的第一周，第7舰队的驱逐舰部队开出苏里高海峡，再向北穿过卡尼高海峡，扫荡莱特岛西海岸。这一轮海上攻击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美舰在卡尼高海峡里布设了大量水雷，在空中巡逻不断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扫除这些水雷。12月2日傍晚时，一支3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编队在约翰·C.扎姆中校的率领下离开莱特湾，高速绕过莱特岛南部，在午夜前不久抵达奥尔莫克湾。此时一支日本船队正在向码头卸载部队和物资。扎姆那三艘“铁皮罐头”的出现完全出乎日军意料，它们向日本船只和码头区域倾泻出5英寸弹雨，射出了鱼雷。美军一名驱逐舰水兵回忆道：“战斗刚一爆发，夜空就被一出大型烟火秀照亮。这场烟火秀来自射往各个方向的红色和绿色照明弹，熊熊燃烧并炸成五颜六色的火球的船只和岸上建筑，还有许多火炮向我们射击时的闪光。这简直是地狱！”[68]驱逐舰摧毁了两艘敌船，把岸上物资堆栈中宝贵的军用物资变成了一堆垃圾。0时22分，驱逐舰“库珀号”被一枚鱼雷命中，炸成了两半；它迅速沉没，191人死亡。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其余两艘驱逐舰迅速离开了战场，未能停留下来捞救幸存者。3架执行“黑猫”任务[69]的PBY水上飞机降落在奥尔莫克湾，捞起了几十名“库珀号”的幸存者。其中一架飞机设法塞进了多达56名幸存者后才飞起来，此外还有机上的9名乘员——这是PBY飞机再未超越或追上的纪录。

[70]

莱特岛之战, 1944年10月—12月



最终肃清了断颈岭—基莱岭区域之后，第10军开始沿着奥尔莫克走廊无可阻挡地推进。第32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并肩打垮了精心布设的日军防线。精锐的日军第一师团残部进行了拼死而卓越的战斗，但他们却无法抵挡美军强大而猛烈的持续地面进攻。在步兵和坦克发动进攻前，是持续、猛烈而精准的迫击炮和火炮炮击。美军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攻击日军的火力点和堡

垒。美军以第11空降师为先锋，在第32步兵师部分部队的支援下向西推进，越过了岛屿中部的艰难地形。与此同时，铁钳的南半边从拜拜镇出发北上。这一路打击令日军措手不及。日军侦察部队曾向铃木将军保证，从东部海岸杜拉格通向这一地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已无法通行。日军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地区的敌军竟能如此轻易地从海上获得补给。

在奥尔莫克附近的日军司令部里，基本的指挥和控制正在瓦解。和一线部队的联系先是时断时续，然后彻底断了。当日军各部队只能勉强维持防御阵地时，却还有一道道命令发来要求进攻。12月6日，第一师团的一名参谋军官报告说这个师团已经“濒临崩溃”。^[71]一条日本的无线电广播令指挥部的参谋格外恼火，这条广播预告说莱特岛上即将取得辉煌胜利。马尼拉和东京的报社需要窜改前线的电文才能让新闻获得发布许可。“敌人此时已转入防御，”一份这样的战报宣称，“我们的援军正和主力部队协同向卡里加拉西部推进。他们和美第24师进行了战斗。11月7日，我军一部运用合围战术迅速冲过困难地形，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给予其重击。在我军重压之下，敌人只能溃逃。”^[72]

12月6日薄暮时分，在莱特湾的主要登陆滩头附近，圣巴勃罗机场周围的美军作战部队和工兵惊异地看见一队运输机以中等高度从他们头上飞过，白色的降落伞开始像花儿一样在飞机后方绽放开来。顿时警报声大作，高射炮、地炮、机枪和轻武器火力纷纷射向天空。这是一次胆大包天的伞兵进攻，参加作战的是驻扎在吕宋岛的空中突击旅的约400名“高千穗”部队伞兵。日军从空中用步枪还击，接近地面时就投掷手榴弹。当敌人伞兵落地时，有几名“海蜂”部队的工兵正在洗澡，他们“吓了一跳，光着屁股就去拿枪”。^[73]激烈的交火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个班的袭击者在停放着的飞机和燃油堆栈上安放了炸药，随后整个战场都被

火光照亮。战斗持续了三天。第11空降师在“海蜂”和各种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在12月9日夺回了机场。这场进攻给美军带来了不少损失，但还是失败了。

莱特岛的战斗终于进入了尾声。然而胜利还要等到岛上日军的增援和补给被彻底切断后才会到来。这就需要关闭敌人通往莱特岛的“后门”，奥尔莫克港。12月7日，第77步兵师在安德鲁·D.布鲁斯少将的指挥下，在奥尔莫克以南4英里处的德斯波西托突击上陆。这次两栖突袭具有此前所有登陆战的基本要素，比如在塞班岛、关岛或者莱特岛东岸的登陆，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登陆战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布鲁斯师的两个团安全上岸，并在日军发动反击之前挖掘好了防御阵地。

日军航空兵来得太晚，没能阻碍美军的登陆，但他们对阿瑟·D.斯特鲁布尔将军的两栖舰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神风”机撞中了驱逐舰“马汉号”和高速运输舰“沃德号”。两艘舰都遭到了严重损伤，不得不抛弃并击沉。在通过卡尼高海峡和苏里高海峡退往莱特湾的漫长航程中，这支船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空袭。运输船“利德尔号”的舰桥遭到重击，船上大部分高级军官战死，但该船仍然设法依靠自身动力继续航行。[\[74\]](#)

新登陆的部队承受着严重的伤亡，向北进攻，于12月10日一路杀进了奥尔莫克。第7师则从拜拜镇出发，打垮了日军零散但顽强的抵抗，向北推进。当美国人拿下奥尔莫克湾和港口设施后，日军从马尼拉发出的最后一支大型运输船队不得不转而沿海岸向北，前往30英里外的圣伊西德罗。美军空袭击沉了5艘大型运输船。大约有两个大队的日军登上了海岸，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提前到达那里的美军部队包围并打垮。

12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莱特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

束。虽然崎岖的高地上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菲律宾之战的主战场已经推进到了西边：同日，美军在民都洛岛登陆。“敌人作战很英勇，”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写道，“但是他们无法抵挡我们的三路进攻。他们的部队被分割成孤立的小块，要么在小包围圈中困兽犹斗，要么被打散在山区中。”^[75]

哈尔西和他的航母指挥官们一直要求在乌利西至少停留10天，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3R”——休息（Rest）、维修（Repair）和补充（Replenishment）。12月1日，第38特混舰队的三支大队在乌利西潟湖底部的沙地上下了锚。^[76]此时勤务和后勤舰队已经从埃尼威托克完全搬迁至此，因此锚地比往常更加拥挤。在舰队和亚索尔、法拉洛普、波塘格拉斯、索尔伦以及莫格莫格这些小岛之间的水面上，各种小艇和驳船来来往往。通过望远镜，人们偶尔可以瞥见只穿着缠腰带的原住民渔民，坐在手工制作的带舷外支架的独木舟上，从蔚蓝色的潟湖上滑过。

这一周，一位航空摄影师拍下了一张“杀人犯大街”的照片——第38特混舰队的一长列航母停泊在锚地中。每艘舰都披着蓝灰相间的“炫目迷彩”。它们的周围是大群巡洋舰、战列舰和驱逐舰——在北方远处，还有数不清的后勤舰队的勤务船只。这是一支前所未见的庞大舰队，其规模之大，就连珍珠港都从未同时停泊过如此多的军舰。

美国人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对舰队的位置进行保密。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利西”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在媒体上的。舰队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所有要发出的电报都会空运到东北方400英里外的关岛，再从那里发出。但日本人不傻，他们知道美军舰队已经把乌利西当作了新的母港。11月20日，几条“回

天”——单人自杀潜艇——在环礁以北由一艘大型母艇放出。至少有两条这种难以发现的小艇通过次要入口水道潜入潟湖。11月20日拂晓时，一条“回天”撞上了油轮“密西西纳瓦号”。这艘装载着数万吨航空汽油、柴油、重油的油轮顿时炸成了一团烈焰。拖船赶来用消防水管向燃烧的残骸喷水灭火，但无济于事。上午10点，它带着60名船员一起翻沉海底。^[77]美军驱逐舰在锚地各处投下了深水炸弹，至少有一条“回天”被击沉。

从这天起直至战争结束，美军在乌利西从未感到过安全。谢尔曼将军回忆道：“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这里根本谈不上休息，我们觉得还是待在大海上更安全些。”^[78]

即便如此，舰队在乌利西的休整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舰队的每艘舰上每晚都会播放一部新电影。一艘驱逐舰被指定为“电影交换舰”，舰上装着数百部电影，数千卷胶片，根据事先公布的电影排期表在舰队中巡回收发影片。^[79]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轻歌舞剧从一艘舰演到另一艘舰，同一个剧目艺人们常常每天要演上四五遍。哈尔西将军特别喜欢艾迪·皮博迪，喜欢他表演的《班卓琴之王》和《都是海军兄弟》。在潟湖北端风景如画的莫格莫格岛上，“海蜂”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起了一处舰队休闲区。步道从码头延伸到陆地，通向一片野餐区、网球场、排球场、拳击台、棒球场、带天棚的舞台、烧烤炉，以及啤酒花园。对于数以千计疲于战斗和航海的军人来说，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有机会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水兵们每人可以领到两听啤酒，但是总有人会千方百计骗来更多。军官们则可以到莫格莫格的军官俱乐部里享用成箱的烈性酒，俱乐部设在岛上僻静角落里一处原住民建造的独木舟棚子中。有人回忆道：“这就是杀猪宴。”^[80]据第3舰队战争日志记载，在194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

里，莫格莫格“每天都要挤进去1万到1.5万名水兵和500到1 000名军官”。[81]每天傍晚，当壮丽的热带晚霞照亮西边的天空时，满载官兵的小艇都会离开码头，缓缓开回舰队锚地。

12月11日，舰队穿过穆盖水道，再度大规模出击，他们将要再次空袭吕宋岛，支援麦克阿瑟对民都洛的进攻。哈尔西回忆，从14日开始，“我们倾全力连续空袭了三天”。[82]“大蓝毯”再次铺到了吕宋岛上空，大队的F6F机群牢牢监控着超过90座已知或疑似的敌人机场。飞行员返回后宣称在空中击落敌机62架，另在地面摧毁208架。“驼鹿陷阱”和其他一些防御措施似乎也起了作用，因为没有敌机接近到距离特混舰队20英里以内的地方。12月14日这天首批出击的机群遇到了迎头飞来的11架日军飞机，并“在吕宋岛东部海岸附近将其全部击落”。[83]

在金凯德的坚持下推迟了10天的民都洛岛登陆，需要深入吕宋岛机场日军航空兵能够轻易抵达的水域。美军认为民都洛的日军地面部队不会给自己的登陆部队带来太大麻烦，但是航渡过程却十分危险，两栖运输船队必须立即撤出。登陆船队由斯特鲁布尔少将指挥，他的船队一个星期前刚刚在奥尔莫克湾作战中挨过打。12月13日下午2时57分，在内格罗斯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海峡里，斯特鲁布尔的旗舰“纳什维尔号”遭到了“神风”机的重击。将军没受伤，但是“纳什维尔号”却不得不返航。于是斯特鲁布尔把他的将旗转移到了驱逐舰“达谢尔号”上。12月15日，美军地面部队在民都洛岛登陆，很快打垮了岛上的少量日本守军。

美军拿下民都洛岛上的两个小型机场后，整个菲律宾战役局势骤变，因为这使得邻近的马尼拉及其周边区域进入了肯尼将军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占领民都洛使得莱特岛成了战略后方。18日，山下将军通过无线电联系铃木将军，建议不要再向莱特岛增派部队和补给物资。山下担心，这座

岛上的战斗会消耗掉菲律宾日军的大部分力量，从而危及即将到来的吕宋岛之战。12月的最后一周，美军认真统计了岛上日军尸体的数量，认为有60 809名日军死在莱特，只有434人被俘。[\[84\]](#)美国第6集团军的损失为只有2 888人阵亡，9 858人受伤。

随后，第38特混舰队退往东面，与后勤船队会合加油，加完油再回来向吕宋进行第二轮空袭。12月17日早晨，吕宋以东大约500英里处，舰队见到了他们信赖的海上后勤支援大队，随即开始早已驾轻就熟的加油操作。和平时一样，驱逐舰的燃油存量尤其低，许多驱逐舰靠到战列舰和航母身旁，从它们巨大的油槽中汲取燃油。但是海浪越来越大，风速从20节增加到了30节，小型舰艇的纵摇和横摇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对于这些重量很轻的“铁皮罐头”而言，燃油也扮演着压舱物的角色，因此那些燃油量最低的驱逐舰自然就会不稳定。这一问题还由于桅顶和上层建筑上方加装了新型雷达和通信设备而雪上加霜，它们进一步提高了军舰的重心位置。一名军官回忆道，通过大舰加油时，那些没有压舱物的驱逐舰“像野马一样跳跃挣扎”。[\[85\]](#)它们在恶劣海况下时常与邻近的大个子友舰撞在一起，冲击力会损坏驱逐舰的上层建筑，把一些装备从固定位置上扯下来。油管会断裂，把棕色的重油如同瀑布一般喷洒到驱逐舰甲板上和两舰之间的海里。在17日那个狂风暴雨肆虐的上午，哈尔西将军从他的指挥舰桥上看着驱逐舰“斯潘思号”尝试通过他的旗舰“新泽西号”加油。刚刚加上6 000加仑燃油，油管就断了，“斯潘思号”被迫转向离开。[\[86\]](#)

此时，气压计指针一降再降，风向已经转为南风，海浪越来越大。一缕缕卷积云从高空快速飘过，太阳也蒙上了一道光晕，这是不祥之兆。舰队的气象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热带扰动”正在东南方500英里外形成，正以12节至15节的速度北上——但他们还不打算将其视为热带风暴，台风就更谈不上了。不管怎样，他们

都相当自信地认为它将会遇上一道冷锋面，之后转向东北方。但是许多老资格的水手却不敢如此确信。此时毕竟是台风季，而且舰队正位于被称为“台风区”的核心区域附近。美国海军此时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远程气象侦察飞行，因此只能依靠来自各种飞机、舰船和潜艇的零散气象报告。这种情况下，要判断一个“扰动”是否会发展成完整规模的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那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对风暴运动路线的预测也是如此。在舰队各舰的舰桥上，军官们都盯着海图和仪表。有些人在翻鲍迪奇所著的老书《美国实践航海学》。下午，风速和海况都在继续恶化。此时作为观察员待在“提康德罗加号”上的拉福德将军判断：“我们正向它开去。”航母舰长表示同意，并下令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87]整个舰队中其他许多人，包括所有特混大队司令和许多高年资的舰长，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转向南边。但这样会使第38特混舰队无法按计划在两天后到达向吕宋放飞攻击机群的位置，而且哈尔西已经决心要坚守对麦克阿瑟的承诺。考虑到他的气象学家预测这场风暴（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将会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将军便让舰队保持西北航向。“哈尔西认为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坚守那个承诺，而不是在情况真的完全发展成有威胁的台风之前就撤退，”“米克”卡尼后来解释道，“我们就这么做了。”这位参谋长强调，上司最后一锤定音：“这是他的决定，没有人想要反对。”^[88]

大海起伏而阴郁。天空中的颜色十分古怪，疾走的暗紫色飞云下方是一片暗铜色光芒。狂风吹得海面上浪花飞腾。舰队日志记载，下午2时37分，“海况愈加恶劣，风速此时已经达到40节，风向20°”。哈尔西推迟了加油计划，加油会合时间改为次日早晨6点，地点在西北方200英里处。许多舰艇发现自己已经无

法保持阵位了，哈尔西也批准了麦凯恩将军关于把特混舰队航速从17节降低到15节，并停止之字形机动的请求。[89]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进一步恶化。天气预报员修改了之前的预报。原先的“热带扰动”已经成了气旋性风暴，正在发展为台风，其移动方向也开始偏西。来自一艘飞机支援舰的报告称，风暴距离舰队只有200英里了。按卡尼的说法，这场风暴似乎是在追着他们跑，就像是“有了自己的智慧一样”。[90]哈尔西于是命令航向转向南，并更改了次日早晨的加油地点。即便到了这时，他仍然希望能在拂晓时加油，并按照之前的承诺，带领航母在19日抵达发动空袭的位置。

拂晓时风速暴增到了50节，气压计指针像石头一般向下坠。甲板上的水兵们要抓紧把手，低下头，才能顶住那一片片飞溅而起的海水。在海平线远处，海水变得灰暗而沸腾。从大型军舰上层建筑的高处看下来，能看见一排排高大到令人害怕的浪头从北方排山倒海一般袭来。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狂暴的海况之下，哈尔西仍然电告舰队转向北，航向60°，航速10节，开始加油。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加油已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舰队再度转向南。

日出后一小时，天光已经放亮，却看不到太阳。能见度很差，海浪如同大山一般，狂风愈加猛烈——风速达到了60节，之后又达到70节。第38特混舰队北翼“黄蜂号”航母的PPI雷达显示屏上显示，乱云密布的圆形台风眼从北方仅仅35英里外经过。[91]哈尔西和他的指挥班子再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了：舰队已经进入了台风的“危险半圆”[92]，而且除了在风浪之间疾驰，期待运气眷顾之外，别无可为。早晨8时18分，哈尔西电告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他要取消次日向吕宋的空袭了。[93]

风暴愈加强大而残暴。海浪越来越大，波峰之间的距离也变

得更长。在每一轮浪涛的峰顶处，狂风呼啸，暴雨和飞溅的海浪如同猎枪打出的铁砂那样猛烈地砸在人们身上。在波谷之中，刺耳的呼啸声和风浪没那么难以承受，但是白色的海水却涌上甲板，从排水孔里倾泻而下。哈尔西和麦凯恩的命令都是发出不久便撤回，所有舰长都很快意识到，他们已经指望不上任何人了，必须自己想尽办法来拯救自己的军舰。上午11时49分，哈尔西通过短波电台指示麦凯恩“走最容易通行的路线，让风从左后方吹来”。[94]但是那些小号的军舰，尤其是驱逐舰，此时只能挣扎自救，航向早就顾不上了。

海上能见度持续下降，直到大部分舰船都完全看不见相邻的友舰，除了狂风巨浪，碰撞的危险也骤然凸显。有时候另一艘军舰会突然从浪涛中出现，之后又转向消失。风速愈加狂暴，最终超过了100节。气压计读数跌破了27英寸。哈尔西告诉尼米兹，他的舰队正挣扎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飞云疾走，暴雨如注，风速70节，风向西北偏西……台风愈加猛烈”。[95]

那些燃油不足而缺乏压舱物的驱逐舰尤为艰难。它们无论怎样控制引擎和操舵都无法保持航向，只能在巨浪和波谷之间随波逐流。中午前后，风暴达到了高峰，风速达到120节，海浪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的高差达到差不多80英尺。[96]据“杜威号”舰长的说法，雨雾之密集，使得舰桥上的人甚至看不到舰首。如果有人暴露其中，“那感觉就像是数千枚钢针刺向脸和手”，而且这些“钢针”“就如同沙尘暴一般把许多处金属表面上的油漆都刮掉了”。这些小舰一次又一次几乎被打翻。在操舵室里，人们紧紧抓着把手，双脚悬空，直至军舰自己回正，脚才落到甲板上。一名水兵惊恐地发现自己站立在一根平时应当是垂直的立柱上。他松开手掌，对战友们叫道：“看，能松手了！”在一次角度格外大的横倾中，倾角指示仪的指针指到了顶（最大刻度是73°），“杜

威号”舰桥的右侧甚至浸入了水中，舀起青绿色的海水。“我们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船能从这样的横摇中复原，”舰长说，“但这艘船做到了！”[97]

大型军舰对风暴的承受力要更好一些，但即便是艾奥瓦级战列舰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这种滔天巨浪中也很难高枕无忧。“米克”卡尼一度担心“新泽西号”难以幸存。“当军舰侧倾过去时，可怕的倾斜角实在是难以形容，那就快要达到它稳定倾角的极限了。军舰会横摇到一个角度，然后维持在那里，直到开始回正。”[98]即便是在“新泽西号”指挥舰桥这样的高处，卡尼也要抬起头才能看见迎面而来的浪尖。在2.7万吨的埃塞克斯级航母“提康德罗加号”上，阿瑟·拉福德在指挥舰桥的走廊上恐惧地看着袭来的风暴。当巨浪涌来，“提康德罗加号”向右倾斜时，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伸出手就能触碰到海水的错觉。“提康德罗加号”的姊妹舰“汉考克号”，其水线上方近60英尺处的飞行甲板上居然积了成吨的青绿色海水。[99]

独立级轻型航母的舷宽比大型航母窄得多，在台风中的横摇更加剧烈。在“蒙特雷号”上，停放在飞行甲板上的4架F6F“地狱猫”松脱开来，滑进了海里，它们还带走了左舷的救生网和降落信号官平台。随着风力加大，舰长命令所有人员离开飞行甲板寻找掩蔽。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下方的机库甲板上，那里的飞机被甩来甩去，固定飞机的缆绳几乎就要绷断了。地勤人员赶紧跑过去加固，并再多捆绑一道缆绳，但是当横倾角超过34°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也快要站不住了。上午9点之后不久，一架“地狱猫”战斗机突然挣脱了绳索，变成了5吨重可燃烧的攻城槌。它立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东撞西碰，撞毁了通风管道、电路缆线、水泵，以及其他飞机。虽然这架飞机已经放空了燃油，但其油箱和引擎管路内残留的燃油还是烧了起来。很快，一场爆炸就撕开了

机库侧壁。又有几架飞机松脱开来，让这一团混乱成倍恶化。燃烧的黑烟通过破裂的通风管道涌入下层甲板的密闭空间，轮机舱里的舰员们不得不撤离，直到带上便携式呼吸设备才得以返回。

“蒙特雷号”的姊妹舰“考彭斯号”和“圣贾辛托号”上的情况也差不多。飞机挣脱固定缆绳，或者把甲板上的固定栓扯出来，之后撞上旁边的飞机，把它们也撞到松脱，接着又在机库里左冲右撞，留下一堆堆残骸。根据“圣贾辛托号”风暴之后的报告，“备用引擎、螺旋桨、牵引车和其他重型设备都成堆地在左舷和右舷之间来回猛撞，使那些无保护、不结实的进气口和通风管严重受损。维修组和支援人员英勇地尝试逐一固定那些失控的破坏性重物，最终他们在16时获得了成功，但在此之前还是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电气起火和燃油起火”。[\[100\]](#)

当“蒙特雷号”舰员撤离轮机舱后，舰长被迫关闭轮机。于是航母瘫痪在水面上，任由如山巨浪肆虐。所有可能燃烧的东西都被扔掉了，包括弹药整备库里的弹药。人们赶忙把消防水管拉进机库，把水龙喷向起火点，片刻延迟之后，喷淋系统最后也恢复运转。军舰最终获救，但2/3的机库被彻底烧毁。在“圣贾辛托号”上，火灾不久就被扑灭，但是大量松脱的残骸导致无法派人步行进入机库。舰长在报告中写道：

对于没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来说，各种巨大的声响让机库变得异常可怖，有飞机碰撞和撕裂的声音，通风管道薄弱的金属板落地和撕开的声音，重物在左右两侧来回滑动的声音，甲板上海水涌动的声音，还有大团蒸汽从封闭机库空间里破裂的排气管道喷出的声音。然而，尽管环境令人恐惧，机库甲板上的人们还是排成长队，从上面摇摇晃晃地来到甲板上，来到来回滑动的成堆碎片中间，冒着几乎必定非死即

残的危险，成功固定住了它们，将损坏控制到最低。[101]

当风暴到达高潮时，狂风尖啸着裹起暴雨和海水，世界一片天昏地暗。能见度只剩下三四十英尺。军舰顶部的人已然分不清天空和大海，甚至分不清上和下，只有脚下甲板的剧烈摇晃让他们还能感觉到自己身处无边的大海之上。船长出身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曾经描述过19世纪时在同一海域遭遇到的台风的磨难：“它猛地一歪，让人感到一种恐怖的无望感；它像是一头扎入虚空那般往前栽倒，却仿佛每次都撞在墙上……在某些时刻，迎面而来的强烈气流，如同汇聚于某一点的实体力量，要把它吸入隧道，将它整个掀离水面。有那么一瞬，它船首朝天，从头到尾震动起来。之后它又会翻滚下来，就像掉回沸腾的大锅里一样。”[102]

当法拉格特级驱逐舰的横摇超过45°时，其发动机就会无法吸到润滑油并停机。[103]失去航速，舵面也会失效，当陷入巨浪之间的谷底时，它们动弹不得，就像是被打败的摔跤手。无线电桅杆、雷达天线、探照灯、救生艇、吊艇柱，以及深弹投放架都被风浪卷走。弹药库厚重的钢质顶盖也被扯了下来。“赫尔号”舰长詹姆斯·A·马克斯少校甚至担心自己军舰的烟囱会被从甲板上连根拔起。当100节的狂风扫过军舰时，“操舵室甲板上的一名尉官被从左侧完全吹飞了起来，撞到舱室的右上方”。[104]最终，经历了“令人屏住呼吸的无穷时间”之后，军舰自行回正了过来。在“杜威号”上，固定烟囱的缆绳和固定栓被拉松，烟囱真的倒了下来，耷拉在军舰右半边。然而这却降低了军舰的重心，减少了迎风面积，因此尽管看上去是场灾难，但这可能反而挽救了“杜威号”。它的舰长说：“变化几乎立刻就能感觉到，军舰的航行状况改善了。”[105]

在“阿勒万号”上，轮机舱的风扇坏了，舱室里的温度立刻飙升到80摄氏度，迫使所有人员撤离那里。舱底也开始积水，水深达甲板以上数英尺。大约上午11点前后，“阿勒万号”瘫痪了，侧舷几乎没入水面。失去引擎，它无法摆脱困境——然而，舰长设法用舰体做帆，调整舰尾朝向，令舰尾迎风以缓解舰体承受的压力。这使得军舰的侧倾角恢复到“只有”60°，它就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坚持漂浮在水面上，直至台风离去。[106]

“赫尔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正午之前不久，它被拍翻，向右倾倒，横倾角达到了大约80°，并无力复原。海水淹没了操舵室，涌进了烟囱。这样的冲击是不可能回正的。马克斯少校爬出舰桥左侧，游了出来。穿着木棉救生衣，他回过身，最后看了一眼正在被海水吞没的“赫尔号”。“不久后，我感受到了锅炉在水下爆炸的震动……在那之后，我便竭尽全力，以求在砸向我们的如山巨浪中活下来。”[107]相似的命运还落在了驱逐舰“斯潘思号”和“莫纳汉号”身上。

当晚风浪平复之后，哈尔西指示麦凯恩组织一支搜救队，沿舰队途经路线北上。正在舔伤口的第38特混舰队其余兵力，则要转向西北，争取再次向吕宋发动空袭。但是天气依旧恶劣，巨浪仍旧从北面涌来。12月21日中午，哈尔西取消了空袭，命令全舰队撤回乌利西。[108]

搜救队努力工作了72个小时。各舰散开成宽大的搜索线，驱逐舰在侧翼护卫，夜间会打开探照灯搜索前方海面。舰队日志记载：“搜索期间，数不清的空救生筏、软木救生衣以及漂浮的残骸出现在眼前，我们会检查那些地方是否有人。”[109]他们听到了许多口哨声。救生筏也被抛进军舰的尾流里。12月21日，驱护舰“塔伯勒号”（其自身也在风暴中遭到重创）发现了一个坐着10名“斯潘思号”幸存者的救生筏。“塔伯勒号”的舰长指挥军舰机

动到救生筏的上风方向，让风把军舰缓缓推向那些逃生者，这样军舰的舰体还能游泳的人遮挡一些风浪。军舰的背风面放下了两个大型吊货网，系着长长绳索的救生圈被抛给了水里的人。“塔伯勒号”自身的几名舰员也系上救生绳，穿上木棉救生衣跳入水中，游过去救援，把幸存者拖到吊货网中。^[110]“塔伯勒号”就这样捞回来总共55名“斯潘思号”和“赫尔号”的幸存者。

这场台风要了790个美国人的性命。三艘驱逐舰彻底损失，另有多艘遭到重创。风暴之后的搜索救回了93名逃生人员。死亡率最高的是“莫纳汉号”的舰员，只有6人幸存。146架舰载机被毁或者被吹下海，其中大部分都是轻型航母的舰载机。“蒙特雷号”、“考彭斯号”和“圣贾辛托号”遭到重创，需要大修。^[111]

圣诞节前一天上午，“新泽西号”驶入了乌利西，小心翼翼开到它指定的泊位上。一长串重型舰艇也通过穆盖水道开了进来，包括几十艘航空母舰，直到“杀人犯大街”再次填满了北侧锚地。

尼米兹将军此时已经飞到乌利西，按原定计划来此和哈尔西以及第3舰队司令部开会。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最近刚刚晋升为新设军衔五星上将，或曰“舰队上将”，他在下午1时50分登上了“新泽西号”。美国海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艘军舰的主桅杆上升起了五星将旗。简单寒暄之后，将军们在指挥部会堂落座，复盘最近的作战，并制订后续的作战计划。

在旗舰上，哈尔西的餐厅里举行了平安夜晚餐。尼米兹一行人从珍珠港带来了一棵装有饰品的圣诞树。舰队战争日志记载，此举“为这个场合带来了圣诞气氛”。^[112]不过哈尔西后来承认，这个节日没法让他感到享受，因为这已经是“一连第四个远离家乡的圣诞节了，四个只有海水和沙滩，没有雪和冬青树的圣诞节”。^[113]虽然哈尔西当时和后来都不肯承认，但他肯定知道自

己要承担舰队刚刚遭受沉重打击的重大责任。他的下属们后来比对了各自的记录和意见，许多人都认为哈尔西错在没能在12月17日下午还来得及躲开风暴。航母派的“棕鞋族”向来在批评时直言不讳。盖里·博根将军“觉得这简直纯属顽固和愚蠢”。^[114]以待命状态待在“大黄蜂号”上的“乔克”克拉克持相似观点，阿瑟·拉福德也一样。谢尔曼做证说，12月17日海面 and 天空的样子已是台风即将到来的确证。

哈尔西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他决心要信守给麦克阿瑟的承诺。这个动机固然可敬，但结果却并非空袭吕宋，而是舰队惨遭台风肆虐。两个月内第二次出娄子，尼米兹不得不怀疑哈尔西究竟能否胜任他所担任的极其重要的职务。根据尼米兹的高级幕僚杜鲁门·赫丁的说法（他曾在第58特混舰队中任米彻尔的参谋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很难理解把特混舰队径直带进台风危险半圆区的做法……他对此深感焦虑和担忧，因为这反映了你的航海能力。而做一个好水手是军官们常常引以为荣的事情”。^[115]赫丁还从小道消息听说，金上将也暴怒了，他“为了此事简直要把海军部给拆了”。^[116]

圣诞节这一天，尼米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新泽西号”上度过，开了数不清的会议。当天下午，他和哈尔西一同会见了媒体，并拒绝回答任何关于此次台风的问题。但是尼米兹下令组建一个调查庭来彻查损失三艘驱逐舰的事情。哈尔西在12月28日接受了听证。^[117]

调查庭的正式报告在1945年1月发布，哈尔西未能避开风暴，要承担“主要责任”，报告责备他“在战争行动的压力之下判断失误”。虽然调查庭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惩罚措施，但其判决足够严厉，足以解除哈尔西的指挥职务。斯普鲁恩斯原本就要于当月早些时候返回担任第5舰队司令，提前几个星期将他召回并非

难事。但是私下交流之后，尼米兹和金决定不这么做。杜鲁门·赫丁和许多其他人都认为，是哈尔西在媒体和公众中的人气保住了他的指挥岗位，“因为哈尔西是个国家英雄，战争期间你不能这么做”。^[118]

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还走出了不同凡响的一步，撰写了一篇长而详尽的题为《台风受损的教训》的备忘录，并就此向整个舰队发表了讲话。尼米兹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无线电发明之前，海军舰队在遭遇风暴时是无法保持队形完整和统一指挥的。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舰长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他的船，而不管舰队指挥官意愿如何。到1944年，情况已有所不同，一个舰队指挥官即便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也能够继续发布命令，而且他们确实会这么做。这在漫长的人类航海史上还是个相对新出现的情况，在此情况下，“高级指挥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替麾下最小的舰艇和最没有经验的舰长着想”。他绝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或者以为小舰船能够“像他自己的大舰那样承受风浪”。本着同样的精神，每一位舰长都有责任尽职挽救他自己的军舰，当面临“致命危险”时，他必须自行决定是否离开队形。不仅如此，采取此类措施时一定不能犹豫，因为“对于一个水手而言，没什么比因为担心事后发现不必要而犹豫不决更危险的了。几千年来，人们依靠的都是与此相反的逻辑平安航海的”。^[119]

^[1] Evans, *Wartime Sea Stories*, p.94.

^[2] St.John, *Leyte Calling*, p.195.

^[3]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December 4, 1944,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156.

^[4] Commander Third Amphibious Force, CTF 79, “Report of Leyte

Operation,” November 13, 1944, enclosure (E).5.1944, p.4.

[5] Commander Third Amphibious Force, CTF 79, “Report of Leyte Operation,” November 13, 1944, p.4.

[6]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0.

[7]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6.

[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9]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13.

[10] Third Fleet War Diary, October 28, 1944.

[11] COM3RDFLT to CTF 77, Info etc.(25123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12] CTF 77 to COM3RDFLT, Info etc.(26031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8.

[1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4.

[14] COM3RDFLT to CINCSOWESPAC, Info etc.(26123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5.

[15]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COMINCH, COMSERVPAC (261812), CINC 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5.

[16] Ibid.

[17] James S.Russell, oral history, p.44.

[18] Ibid.

[19] Radio Tokyo broadcast, October 26,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7.

[20] 清泽冽1944年11月14日的日记：“陆海军竞相宣布成立特攻部队。”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81.

[21] Imperial Japanese Navy Directive No.482, 29 October 1944.NARA, RG 38: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Box 42.

[22] *Mainichi Shinbun*, November 1, 1944, quoted in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p.97.

[23] Koiso quoted i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p.300.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25]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58.

[26] Lieutenant Commander Iyozo Fuj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3.

[27] Naoji Kozu,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15.

[28]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p.296.

[29]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1.

[30] *Ibid.*, p.72.

[3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3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3.

[33] Report of Captain Charlie Nelson, USNR, accessed February 16, 2018, <http://destroyerhistory.org/fletcherclass>.

[34]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 1944, p.1.

[35] Third Fleet War Diary, October 27, 1944, p.44.

[36] Krueg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p.350.

[37] CTF 77 to CINCSWPA, November 1, 1944, RS—4,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 1944, p.2.

[38]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5, p.8;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944, p.5.

[39]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November 24, 1944,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139.

[40]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90.

[41]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44.

[42] John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65.

[43] COM2NDCARTASKFORPAC to COMINCH, etc., October 23, 1944, in CINC 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1.

[44] Ibid.

[45]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45.

[4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23.

[47] Nimitz to Halsey, October 22, 1944, Halsey Papers, Box 15;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29, 1944, p.27.

[48]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November 28,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92.

[49]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7.

[50] John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66.

[51] Ibid., p.268.

[52]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2.

[53]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25, 1944, pp.31—32.

[54] James J.Fahey diary, November 27,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229.

[55] Ibid.

[56] Ibid., p.230.

[57] Ibid., p.234.

[58] U.S.S.*Maryland* Cruise Book, U.S.Navy Library, Washington Navy Yard, Washington, DC, pp.31—32.

[59] Memorandum to MacArthur, "Our Present Situation—Leyte Gulf, Mindoro, Lingayen Gulf," November 30, 1944, RS—4,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60] Arthur H.McCollum, oral history, Vol.1, pp.527—29.

[61]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0.

[62] Press Release, 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November 3, 1944.

[63] Arthur H. McCollum, oral history, Vol.1, pp.527—29.

[64] 科迪勒拉山是美洲西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译者注

[6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32.

[66]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11, 1944, p.16.

[67]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20.

[68] Eugene George Anderson, “Nightmare in Ormoc Bay,” *Sea Combat* magazine, accessed October 14, 2018, <http://www.dd-692.com/nightmare.htm>.

[69] “黑猫”专指由PBY水上飞机执行的夜间巡逻与攻击任务。——译者注

[7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40.

[71]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25.

[72] *Ibid.*, p.21.

[73] Huie, *From Omaha to Okinawa*, p.211.

[74] CTF 77 to CINCSWPA, Dec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98.

[7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33.

[7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 1944, p.2.

[77] Naval Debriefing, December 12, 1944: Captain Philip G. Beck, U.S. Naval Reserve, USS *Mississinewa*,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2, p.2;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20, p.27.

[7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72.

[79]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4, 1944, p.14.

[80] Steven Jurika Jr.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51.

[81]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1, 1944, p.9.

[82]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6.

[83]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4—16, 194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9.

[8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39.

[85] J.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24, 1945, in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39.

[8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7, 1944, p.17.

[87]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2.

[8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8.

[89]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7, 1944, p.23.

[9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7.

[91]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13.

[92] 危险半圆是指台风中風浪更大，危险程度更高的半圆区；其对侧半圆風浪稍小，称为“可航半圆”。——译者注

[93]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8, 1944, p.27.

[94] Ibid., p.30.

[95] Ibid., p.31;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13.

[9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8, 1944, p.31.

[97]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5.

[9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8.

[99]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4.

[10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82.

[101] Ibid.

[102] Joseph Conrad, "Typhoon,"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7,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142/>.

[103]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p.226—27.

[10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105] Ibid., p.75.

[106]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6.

[107]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108]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0, 1944, p.37.

[109]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9, 1944, p.36.

[11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85.

[111] COM3RDFLT to CINCPAC, December 19,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62;Ibid., p.13.

[112]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4, 1944, p.41.

[11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41.

[114] 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26.

[115]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3.

[116] Ibid., p.105.

[117]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8, 1944, p.42.

[118]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4.

[119] Nimitz, “Pacific Fleet Confidential Letter 14CL—45,” February 13, 1945, “Damage in Typhoon, Lessons of,” CINCPAC File A2—11 L11—1.

第九章

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已经胜利在望，他们的思虑也开始转向战后世界和军人复员的压力。许多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忧海外作战的人和“家里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在老兵们中间，痛苦感和被排斥感十分普遍。他们的抱怨很复杂，有时候自相矛盾，也不太清晰——但是总的来说，老兵们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人抛弃了。他们的怒火常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出来，把周围人吓一跳。任何关于罢工的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一名水兵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就抱怨说“我极其讨厌工会里的魔鬼和高薪工人”。^[1]关于贪腐、暴利、囤积居奇和黑市欺诈的流言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对华盛顿那些政客歇斯底里的吵闹怒目而视，这些人整天争来斗去的都是些军人们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散兵坑里的大头兵们有时甚至觉得，如果能让美国的城市被敌人轰炸一顿就最好了，这样或许能给后方百姓一些震动，让他们认清战争的现实。^[2]

军人们清楚国内的经济在迅速繁荣——那里有许多钱可以挣，许多地方可以花钱，许多单身女人，以及（对男人而言）十分有利的性别比例。他们不能忍受民众关于诸如配给制、高房租、新闻管制、拼车、排长队、过于拥挤的火车，或者是肉价之类“鸡毛蒜皮”的抱怨。他们认为战争将会把国家吃干抹净，和平之后就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中去，许多专业经济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的。等他们回到美国国内冷冰冰的资本主义怀抱中时，所有那些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挣大钱”机会早就消失了。他们

抱着如此悲观的看法，而且笃信不疑。

大部分人以为，已经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生活了三年的老百姓都会知道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报纸读得比较多的平民可能确实比普通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军人更了解全球军事战略的复杂性。他或许能说出在国外各战区作战的盟军部队取得的详细进展和统计数字，但是一个从没打过仗的老百姓绝对不会真正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肤浅的言谈又只会激怒这些老兵。“说，说，说，他们只会说，”一名美国大兵如此评论他在国内碰到的多话的老百姓，“他们关于战争的说法不是很愚蠢，就是无关紧要。”[3]一个母亲来到老兵医院探望受伤的儿子并开始讨论战争时，儿子没好气地问道：“你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吧？”[4]军人们在听到广播员用第一人称“我们”来指代在海外作战的美军部队时，都会报之以不屑。他们对所谓“后方战线”的说法嗤之以鼻，那说的就好像靠回收废旧金属和“胜利菜园”[5]就能把和平的国家变成战场一样！工厂墙上的海报告诉工人们要把自己当成“生产战线上的士兵”。士兵？笑话！就是那种8小时轮班，还有丰厚薪水的士兵吗！在这些所谓的“后方战线”上，军人们都能看到爱国宣传画和俗不可耐的战争债券推销广告。每次看到美国国旗被用于商业宣传，他们都会无奈地摇摇头。当给军人们放映战争电影，星条旗搭配着激昂的管弦乐缓缓展开时，他们有时甚至会嘀咕着嘲讽道：“哈哈，摇旗子了！”[6]他们嘲讽的不是国旗本身，他们还是很尊敬国旗的，他们嘲讽的是好莱坞和麦迪逊大街的那些恶心套路。1944年下半年，一名陆战队军官如此评价他的部队：“他们已经忘记了打一场光荣的战争带给人的巨大幻觉，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或许曾经被阅兵场面、万众欢呼和金色绶带所鼓舞，但现在他们知道打仗其实是个脏活儿，曾经存在于他们想象

中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7\]](#)

但是对于曾在大萧条的年份里痛苦挣扎的民众而言，新的繁荣确实令人兴奋。1944年，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1.2%——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也可能后无来者。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到1944年实际增长了约60%。[\[8\]](#)这份收益也广泛分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社会底层的收入规模增幅是最高的。战争带来的繁荣完成了罗斯福新政想要做的事情——增加美国最穷人群的财富，包括黑人、拉丁裔，以及贫困的农村白人。1944年，美国有1 900万各个种族的女性离家工作，其中大约200万人在军需工厂工作。工资暴涨的时候，遇上了口粮配给以及汽车和大型家电等一部分贵重商品的禁售。其结果便是前所未有的储蓄额和几乎增至5倍的家庭财富。存在银行或者投资战争债券的个人存款总额从1940年的85亿美元增长到1944年的398亿美元。[\[9\]](#)

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卓有成效的价格和薪资管控措施有效控制了战时通货膨胀，因此即便政府鼓励战时节约，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还是提高了。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这天，梅西百货公司迎来了公司历史上单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某些奢侈品和消费品的短缺并没有影响顾客的购物热情。“人们想要花钱，”一名店长说，“他们不是买衣服，就是买家具，或者买其他一些东西。”[\[10\]](#)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看来：“人类战争史上，牺牲被人挂在嘴边的次数从未如此之多，实际付出的牺牲却从未如此之少。”[\[11\]](#)

批评家则说，这些“后方战线”的美国人虽然富裕了，却变得更加吝啬、冷漠、缺乏体谅。大约400万个家庭，共900万人，收拾起行李在国内跨区域迁徙，以追逐战争带来的工作机会。火车和城际大巴被坐在过道里行李箱上的旅客挤得满满当当。“黄

牛”们在车站游荡，出售高价车票。到处都能看见年轻的军人妻子，怀抱婴儿，拉着小孩，倔强地跟随着她们的丈夫走过一站又一站。许多人迁居到了西海岸，好寻找一处更靠近太平洋战场的住处。太平洋舰船上的水兵们随时可能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被送到圣迭戈或者旧金山，然后放三天假。如果他们想和家人团聚，那他的家庭最好就住在附近。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有数百万新来的移民——这个淘金州的人口在战争期间增长了超过1/3——房子始终不够住。旧金山的一名市政官员报告说：“许多家庭睡在车库里，他们把床垫铺在水泥地上，一张床上能睡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人。”^[12]

玛乔丽·卡特赖特的丈夫是一名水兵，二人在男人随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出海前一个星期结了婚。她陪丈夫一起来到了他所在军舰的母港旧金山，承诺要在这里等他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我孤身一人，住在一个不熟悉，也不认识什么人的城市，就像一个婴儿一般。我感到孤单无助。”她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一个有家具的房间，在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穿孔机操作员的工作。“那时候我学会了针织，我花了许多时间给我的丈夫织袜子，收听广播里的战争新闻，”她多年后回忆道，“战争期间我一个人住了4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最孤独的几年。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许多后来再也做不到的事情。许多夜晚，我都独守空房，孤独而泣。”^[13]

在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里，1941—1945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会引发住宅建设的爆发。但是为了引导人力和资源进入军工行业，联邦政府刻意压制了住宅建设。1941年，美国住宅建设投资为62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43年暴跌至20亿美元，到1944年也仅仅恢复至22亿美元。^[14]战时新建造的房屋根本不够

应付那些找不到地方住的新来者，于是房东们便狮子大开口。位于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福特公司威楼峦工厂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但工厂周围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住房。于是工人大军要么每天乘坐公交车往返底特律，要么住在公路两旁脏兮兮的拖车营地里。密歇根州的荒地于是搭建起了一片片柏油纸棚子组成的棚户区。在现有的住宅里，屋主靠着出租空房间大发横财。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住房变成了拥挤的宿舍，床铺都是按小时出租的。两三个人轮流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所谓“睡热铺”——他们的睡觉时间和在工厂里的排班是对应的。

数以千计的工人要在午夜从工厂下班，这令休闲和娱乐行业发现通宵营业还是蛮有利可图的。于是酒吧开始彻夜开门，甚至在凌晨两三点也挤满了人。夜店外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三流艺人担纲的“中班”节目会在午夜到拂晓时段上演。人们甚至凌晨3点都能找到地方打保龄球。电影院每天24小时一部接一部地放电影，而且场场爆满。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会买一张午夜场的电影票，然后在座位上睡一觉。父母会把孩子安顿在电影院，去工厂上班，再回来接走。记者马克斯·勒纳描述了战时纽约的通宵电影院：“这里狭长、拥挤、臭气熏天，有个壮汉在里面巡逻，确保没人在里面杀人、放火、捣乱和强暴。不在这种通宵影院看一次电影，你都不算真正看过电影。”^[15]

大规模的移民把美国各个不同的族群、阶层和种族统统塞进拥挤的城市，他们突然发现彼此要开始朝夕相处了。军工行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了整合。战争还加快了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方和中西部工业区大规模迁徙的进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黑人收拾行李离开家园。高薪工作的承诺也吸引了数十万白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去学着过不熟悉的新生活。

在1943年炎热的夏季，种族暴力如同流行病般席卷了多个

美国城市。其中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骚乱发生在底特律，那里的人口从1940年到1943年膨胀了几乎一倍。此事最初的爆发点是1942年2月在一处波兰裔美国人社区旁边建设了公共住房项目“旅行者之家”。支持和反对这个项目的两支游行队伍爆发了冲突，国民警卫队随即赶来，保护黑人居民入住新开放的住房。这起冲突最终平息了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当底特律河上的贝尔岛公园发生种族械斗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傍晚时，数千名居民要通过这座公园所在的岛屿上的桥梁回家，于是，原先几十个人的群殴演变成了黑人对白人的大混战。流言和挑衅言论迅速在城市里口耳相传，蔓延开来。数千名年轻的黑人和白人来到底特律城区，四处找麻烦。斗殴、破坏、放火和劫掠很快扩散，持续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白人暴徒只要警察没看见就随意挑衅、殴打乃至杀害黑人。一名报社摄影师拍下了一个暴徒把一个黑人从有轨电车里拖出来当街殴打的画面。许多白人也不明不白地落到黑人暴乱者手中，遭到相似待遇。底特律警察局逮捕了几个白人，枪杀了几十个黑人。据报道，警察在黑人社区宣布了非正式宵禁，并处决了许多宵禁时间还在户外的年轻黑人。

三天的暴乱之后，联邦军队来到城市，恢复了秩序，但这座城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事后，一个16岁的白人男孩还拿自己干过的事情出来炫耀：“车里有我们200个人。我们杀了他们8个人。我看见刀子刺穿他们的喉咙，子弹打穿他们的脑袋。我们把装有黑人的车子掀翻。你真该看到这个场景。这真有意思。”^[16]

同月，洛杉矶查韦斯谷（今天道奇体育场附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也爆发了暴乱。这场骚乱始于附近海军预备役训练中心的水兵和当地那些穿着“灯笼裤”、戴着宽边帽的拉丁裔年轻人之间逐渐升级的矛盾。这些“穿灯笼裤的”对数以千计涌入他

们“西语地区”的军人十分憎恶。街头冲突很常见。1942年，洛杉矶的报纸，尤其是赫斯特的两份当地日报开始攻击这些“穿灯笼裤的”，用很刺耳的词语说他们打架斗殴、偷窃、强奸，好逸恶劳，逃避兵役，而且抽大麻。1943年6月4日——中途岛战役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一则流言在当地的陆海军基地里流传开来。说是一伙“穿灯笼裤的”打了一名水兵，然后逃进了当地一所电影院。于是手持棒球棍的水兵们一车一车地涌进查韦斯谷，他们冲进电影院，强迫放映员打开灯，然后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只要见到有人穿灯笼裤就拖到大街上。一顿老拳自然少不了，裤子还给扒掉。洛杉矶警察局和海军岸上巡逻队袖手旁观，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加以干预。暴乱第二天，又有一群水兵和陆战队员从圣迭戈过来，他们的攻击目标扩大到了所有拉丁裔年轻男子，而不论他有没有穿灯笼裤。骚乱蔓延到了洛杉矶城区和东部。赫斯特的报纸谴责了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的暴力行径。“许多人被打伤，许多是无辜的人，许多是这种墨西哥小孩，”18岁的暴动目击者唐·麦克法登说，“我看到一群军人拦下一辆有轨电车，他们看见里面有个穿灯笼裤的，就上去了。他逃不掉，结果被打到昏迷不醒。还有个坐有轨电车的人也挨了打，仅仅因为他凑巧是个墨西哥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17]一名不赞成此举的军人说：“我看不出我们这些士兵和那些殴打势单力孤的非雅利安人的纳粹冲锋队有什么区别。”^[18]

在美国南方，当联邦的反种族隔离法令和当地的吉姆·克劳法发生冲突时，暴乱便在多个城市里爆发——最可耻的是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和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市，当莫比尔当地的一家船厂提拔了12名黑人工人，博蒙特的一处非裔美国人居住区被火烧光，两地便爆发了野蛮的暴力事件。在佐治亚州的斯图尔特营，白人军警和黑人军警之间居然打起了枪战，1人被打死，4人

受伤。在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阿瑟港，种族冲突逐步升级成暴乱。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也席卷了美国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包括费城、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巴尔的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1943年8月，在纽约的哈莱姆，一名警官打死了一位黑人士兵，暴乱便开始了。

1944年总统大选的要紧时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的处境很不妙。他面临的挑战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令人生畏。他既要保持共和党基本选民的团结，又要从已经帮助罗斯福连赢三届的新政支持者中撬出一块墙角来。此时共和党内部正由于内外政策观点不一而出现裂痕。许多共和党人仍然坚持他们彻底推翻新政的决心——但是新政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保护和金融改革法案，却是大众不愿意撤销的。共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例如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之流，仍在坚持他们和战前时代如出一辙的孤立主义思路，希望美国不要参与战后条约和多边组织。但是这种孤立主义早已在1941年12月7日名誉扫地，绝大部分美国人现在更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以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对罗斯福的憎恨是将共和党人团结起来的黏合剂，但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传达出了“我也一样”的信息，承诺保持大部分新政改革措施，同时保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伤亡代价打赢战争。杜威想要攻击执政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忽略了敌人来袭的迹象，但是此举将会暴露美军在战前就已破译日本外交电码的秘密。马歇尔将军劝他收手，警告说如果走漏消息让日本人停用旧密码，美国就无法获得这些情报了。杜威也听说了关于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这很准确），并且考虑在竞选中利用此事，但最终还是觉得这种攻击可能反而会激起大众对现任总统的同情，从而对自己不利。他后来只是模糊地提到罗斯福政府中那个“疲惫的老年人”，这方面若更过火一些，可能反而会降低他自己的胜

算。

选战最耀眼（也可以说是最丢脸）的一幕是9月23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酒店发表的演说。这次活动由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赞助。罗斯福坐在舞厅内侧的一个长条形讲台上，两边是大约20名兄弟会的头面人物，包括（紧挨着坐在他左边的）爱尔兰出生的兄弟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总统面前放着许多无线麦克风，演讲向全世界听众进行了无线电直播。这次演讲后来被称为“法拉讲话”，这是一次铁杆支持者大聚会，也是罗斯福漫长政治生涯中最愤怒、最刻薄，也最毫不避讳的一场谩骂。提到杜威试图把他自己的政党和该党长期以来反对公共劳工法案的历史撇清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在马戏团里见过很多精彩的表演，但从来没人见过大象能翻跟头还不会摔得四脚朝天的。”（此时，托宾笑得几乎要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总统还反驳了反对者关于他未能让国家做好战争准备的指责——回顾1941年之前共和党反对军事开支的种种行径，他说：“我怀疑连戈培尔都不会这么阻挠我们。”杜威和其他共和党领袖最近发表演说，指责罗斯福的政策扩大和加深了大萧条。总统故意瞪大了眼睛，装出一副对这一路攻击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一句有些伤感的老话要送给他们——‘绝对不要对一屋子吊死鬼说绳子’，”他慢条斯理地说，“同样道理，假如我是共和党领袖，我在对许多听众讲话时，在整个词典里最不愿意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萧条’。”

当晚，大家在斯塔特勒酒店的舞厅里开怀畅饮。兄弟会成员们一次又一次跳着脚并挥舞着拳头疯狂欢呼。有人用汤勺敲击银盘子，还有一个人每次当罗斯福指责对手时，就要摔碎一个酒杯来配合气氛。一个应邀参会的战争消息办公室记者甚至担心这伙人会趁着酒劲出去闹事。

总统的最后一轮抨击，也是令听众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涉

及一则关于他当年夏天乘军舰前往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时的谣言——总统的宠物狗“法拉”被意外丢在了阿留申群岛上，于是海军从西雅图派出一艘驱逐舰专门去把狗接了回来。这个传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大的总统随行团队怎么可能忘了一条狗？他们怎么可能回到西雅图才发现狗不见了？为什么派驱逐舰而不派飞机？但是反对罗斯福的媒体依然在一遍遍重复这个故事，而且谣言还越传越离谱，驱逐舰升级成了巡洋舰，后来又是战列舰，还说这场子虚乌有的救援行动花费了2 0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莱希上将不得不站出来否认了这则传言，才把它赶出了报纸头版。但是罗斯福知道，自己的对头们玩过火了，他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罗斯福板起了脸，停了下来，让听众们放声大笑完了之后，向那些土包子打出了沉重一击。“这些共和党领袖并不满足于攻击我，或者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他对兄弟会如此说，“不，他们不满足于此，现在他们还攻击我的小狗，法拉。”

好吧，当然，我不在乎攻击，我的家人也不在乎，但法拉在乎啊。你们知道，法拉是条苏格兰犬，作为苏格兰来客，它一听说国会内外的共和党小说家们编了个故事，说我把它丢在了阿留申群岛，还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它找回来——花了纳税人200万，300万，或者800万，还有2 000万美元——它的苏格兰灵魂就愤怒了。它再也不是原先的那条狗了。我早就习惯听到对我本人的恶毒诽谤了——就像那个老掉牙的无稽之谈，说我宣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想我有权利去在乎，去抗议对我的狗的诽谤。

这个国家很爱狗，这样的攻击自然能致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人后来总结说，这场竞赛的双方就是“罗斯福的狗和杜

威的山羊”。[19]

晚宴在晚上10时30分散场，两位倒霉的年轻海军上尉恰好路过舞厅外的门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醉醺醺而且气势汹汹的兄弟会成员围住了，这些人想要知道这两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站在罗斯福这边还是杜威那边的。23岁的伦道夫·小迪金斯上尉是个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他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20]于是就打起来了。据迪金斯说，兄弟会想要知道海外的军人们如何看待工会，并且指责这两个军官“不忠于军队，不忠于我们的统帅”。[21]双方一顿混战。根据有些报道的说法，迪金斯一拳头把兄弟会的帮主丹尼尔·J.托宾打翻在地，随后被两名暴徒从背后抱住，第三个暴徒猛揍他的脸，“眼睛被打肿得很厉害，伤口缝了好几针”。[22]酒店的行李员赶来拉开了双方。酒店经理则喊来了海军岸上巡逻队，他们最终平息了纷争。据说迪金斯被拉走时，有个兄弟会成员告诉他，被他打翻的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好友，以后有他受的。

这场“斯塔特勒之战”被反罗斯福的媒体抓住大做文章。兄弟会指责这些报道纯属诽谤，意在抹黑劳工组织，他们还向华盛顿寄去了一百多封请愿信，说是那两个军官先动的手。

“法拉讲话”之后，选战双方的辩论变得愈加恶毒。杜威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州长约翰·W.布里克，指责工会和大城市的政府机器被“缺乏信仰的共产主义力量”所影响。杜威则说罗斯福“对白劳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白劳德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23]但是此时的民意已经倾向于现任总统，这样的攻击便不免有些垂死挣扎的味道。盟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大步推进，轴心国一败涂地，罗斯福也通过显得很辛劳的竞选巡游路线消除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11月7日，罗斯福赢得了53.4%的普选票，在选举人票中更是以432：99大获全胜。

和平已经在望，“松一口气”的感觉也逐渐占据了美国民众的思想。军事工业的规模开始缩小。诸如罐头食品和肉类这类物资的配给制也逐渐放松。战争部和海军部发了数百份准备取消采购的通知。数百亿原本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资金被保留了下来，准备归还给财政部。1944年6月，军需工业雇用的工人总数已经在6个月时间里减少了大约100万人。报纸上满是复杂采购合同期限放宽的新闻，法律纠纷随之而来，涉及的都是合同取消费用，用于工厂改建的低息融资，加快折旧以降低税负，以及投资意向之类的细节问题。吉普车和其他剩余军用物资被卖到了民用市场上。电冰箱和其他大型家用电器的销售广告也从1941年以来首次再度出现。美国铸币厂恢复出产铜币了。灯火管制先是在一些主要城市被放宽，随后便全部取消了。新征募的军人回了家。人们又开始穿起正装参加百老汇的剧目首映和其他此类活动了。赛马场恢复营业，下注窗口收到了多得前所未见的钱。罢工又开始危及关键产业了，因为工会领袖们觉得这样的停工不再会妨害战争。

在美国经济从顶到底的各个阶层，大部分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将会让大家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中。这种现象甚至还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萧条精神病”。在战争的高峰期，整个美国经济雇用了5 500万名平民工人，此外还有1 200万人穿上了军装。而战后，武装部队的复员和军工合同的取消将会同时到来。两相叠加，其冲击将会导致失去多达2 000万个就业岗位。陆海两军的巨量富余人员要由现有经济体系吸收掉，但又不能影响现有的市场供需。许多经济学家都警告说战后的失业危机将不可避免。新政的支持者们要求恢复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就业计划。工商业领袖则希望联邦政府能够补贴向民用工业“转产”所需的成本。

结束战争的时机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变量。德国预期将在1945年初崩溃，而陆海军的将领们却坦言对于降伏日本还需要多久心中无数。根据一个经济学家团体的说法，如果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举白旗投降，“美国就会发现自己基本没有为对付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做好准备”。[24]一名战争通讯员写道，太平洋战争如果突然提前结束，那将会是“一场和平的珍珠港事件”。[25]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不考虑人命的损失——可以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太平洋战争能在纳粹德国败亡后再拖延几个月。甚至在普通民众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观点。曾在肯塔基州一所军需工厂里工作的佩姬·特里回忆说，自己听到一名工友说她希望战争“等到她攒够买电冰箱的钱再结束。一个老人于是用一把伞打了她的头，说：‘你竟敢这么说！’”。[26]

1944年11月，就在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之后，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警告说后方战线上的美国民众放松得太早了。农业的歉收使得恢复口粮配给的呼声再起。有人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国民服役法案”，旨在授权联邦政府征召平民劳工和对军事工业锁定劳动力，不过未能获得国会批准。被称为“突出部战役”的德军反击戳破了美国人关于欧洲战事提前结束的幻想。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罗斯福写信，警告不要指望“西线敌军全面投降”。[27]这封信很快被发布给了媒体。1945年1月，马歇尔和金给总统写了一封联名信，警告说陆海两军都面临着人员短缺，请求再征召90万人以替换那些“伤亡和患上战争疲劳症的人”。[28]史汀生对于官兵们逐渐低落的士气愈加警觉。如果战争拖延的时间超过预期，军人们会不会纷纷要求回家？于是他劝说总统在后方战线上再兴节俭之风，哪怕这些措施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也可以。

1945年1月3日，联邦政府下令关闭所有赛马场和赛狗场。官方的理由是减轻道路和大规模交通系统的负担。但是如一些政

府官员在无正式记载的场合所说，这项政策真正的目的是防止那些在战争中挣到了钱的老百姓把这些钱挥霍在赌博中。次月，酒吧和夜店又被要求午夜停业。这次，表面理由是节约电力和燃油，但此举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感觉民众缺乏‘战争紧迫感’而采取的措施”。[29]

到1945年初，海外的军人和国内的民众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真心厌倦了战争，渴望回到正常的和平生活中。报纸专栏作家罗伯特·M·约德尔盼着有一天，“尽可以要那几千个鼓舞士气的志愿者和职责解说人别来烦我们。你可以把胜利菜园挖掉，把芜菁扔在街区监督员的脸上”。[30]与此相似，第1陆战师的一名下士也只想要“回到老家的妻子那里，重操我开邮车的旧业，没有人打扰”。[31]对于数百万思乡的军人来说，那种简单、平凡、平淡的生活就是天堂了，只要没人给他们下命令或者想要杀掉他们就行。当他们梦回家乡的时候，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福祉都变得令人魂牵梦萦——私人生活，休息，街角小店的一杯咖啡，公园里散步，和姑娘们在一起，推孩子荡秋千，安全感，软床垫，还有睡个好觉。但是无论对那些“后方的家伙”怎样羡慕和嫉妒，这些军人都已学会比一般民众更加爱国并做出奉献。他们会幻想自己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要迎娶的妻子，将要居住的房子，将要抚养的孩子。“我曾经认识过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说他期望的就是60分的生活，”士兵埃利奥特·约翰逊说，“可以期望回到自己的漂亮女孩旁边，梦想得到孩子和工作。这绝对足够让人撑下去了。”[32]玛乔丽·卡特赖特也是同样的想法，她空闲的时间都在做有关战后生活的白日梦：她的丈夫将会从太平洋上回来，离开海军。他们会盖一座两层砖头小楼，有大大门厅，宽宽的楼梯，能装下五个孩子的卧室：“我就喜欢那样的房子，那个计划在我的脑子里重复了一年又一年。”[33]

1944年年初，美国海军有27 500架飞机在役，比1940年时多了10倍。随着格鲁曼、道格拉斯、马丁和寇蒂斯公司的飞机生产线在当年3月到6月间达到产能峰值，海军的新飞机库存急速膨胀，几乎就要严重过剩，管理不过来了。1944财年中，海军得到了2.4万架新作战飞机，比之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34]这是个高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参战国若遇到这种事怕是高兴还来不及。但是美国海军将领们却真真切切地面临着这个不大不小的抉择：产量越来越多，库存却过度臃肿，怎么办？2月，金上将签发了一份命令，将海军在役飞机的上限设定为3.8万架，并且固执地拒绝放宽。^[35]于是生产线的产量从1944年夏季开始锐减——但不允许彻底停产。为了保留这一关键战略性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经验，人们认为必须让它们保持低速运转。时任分管航空的副海军作战部长的麦凯恩将军提出了一份计划，要求只把最新型的飞机送到一线作战，老一些的飞机则送回美国本土用于训练和其他目的。1944年9月，美国海军采纳了一项更激进的计划——将数千架老旧的飞机直接扔掉，包括那些已经部署到太平洋的飞机，好为新飞机腾地方。各级指挥官都收到了指示：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把旧飞机处理掉。

作为1944年和1945年美国工业实力达到何种程度的一种体现，接下来的大规模飞机弃用比上千页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如果一架飞机需要小修，它就会被拖出停机坪丢掉，闪闪发光的新飞机会飞来接替它的位置。数百架飞机飞到太平洋偏远海岛的机场，停放在空地上，然后就不要了。许多这样的飞机“坟场”后来都成了美军轰炸机投弹训练的靶场。拆解的飞机用推土机推成堆，再把坦克开上去压扁。轻微损伤的舰载机被推出飞行甲板，扔进海里，新的补充飞机会从护航航母上飞来。此时正是战争的

高潮，美军这边大规模丢弃完好可用的作战飞机时，日本人却苦于飞机产量远远达不到目标，他们要费尽力气才能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转。

大规模的飞行员训练就完全是另一种挑战了，海军从来不算引入民营企业参与此事。托尔斯将军和他的棕鞋族同僚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并为建立训练司令部打下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飞行员数量就可以迅速增加。事实正是如此：1941年，美国海军向3 112名新飞行员授予了“金翼”徽章，1942年是10 869人，1943年是20 842人，1944年是21 067人。这种现象级的增长并不是靠降低训练标准换来的。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44年的新手飞行员来到一线中队时，平均飞行时长达到了600小时，其中200小时是在他们被指派驾驶的在役机型上飞的，部队里的老兵们还让他们获得了比前一代飞行员更高的技巧和战备水平。这一成就是通过扩建美国海军设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主要训练综合体，以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12座海军航空站实现的。这些新建航空站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墨西哥湾旁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南部的灌木林平原上，其规模堪比彭萨科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林登·B.约翰逊在幕后推动政府向他的主要竞选赞助商，休斯敦的布朗&鲁特建筑公司授予了一份最初金额为2 400万美元的成本加固定费用的建筑合同来建设这一基地。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建设费用最终膨胀到1亿美元。^[36]这一大规模项目也间接令约翰逊的政治生涯平步青云，使他来到了更高的官僚层级上。

最初，美国海军的大部分飞行学员都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生。但是随着欧洲战云密布，新的人员招募通道被打开了。1939年的海军飞行预备法案要求训练6 000名新飞行员，1940年的补充法案将目标提高到为海军和陆战队训练1.5万名各种机型

的飞行员。征募者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带着训练手册在课堂和四方院子里设立了招募点。海军起初想要工科学生，不过后来即使是文学专业的也没问题，只要这个人健康状况良好，视力不低于1.0，未婚无子女，身高在5英尺4英寸到6英尺2英寸之间，读完至少4个学期的课程就行。（后来海军也开始接受条件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视力检测和健康检查就地进行。那些入围的新手将会接受数学相关的智力测试和精神科医生的仔细询问。如果通过，他们就会拿到一封介绍信，前往被称为“E基地”的小型农用机场，坐进单引擎单翼小飞机，进行为期30天的基础训练。

“E”的意思是淘汰（Elimination），而这正是关键。这些帆布蒙皮的小飞机被一位学员形容为“装着小发动机的风筝”。坐在它的驾驶舱里，学员们要么表现出自己的飞行天赋，要么被淘汰。塞缪尔·海因斯在得克萨斯州的登顿进行了淘汰训练，那是一座和周围农田几乎融为一体的草地机场，机场上有一个小机库，一所邮局，一根带有风向袋的杆子，周围围着栅栏。羊群常常出现在跑道上，机场本身也兼做牧场。当小飞机滑出机库进入机场时，飞行员还要操作飞机转一转，把羊群从跑道上赶走才行。

大部分飞行员很快就能掌控飞机，能够自信地把飞机飞得很好。其他人则被刷掉了，教官判断这些人无法值回山姆大叔为训练他们而花费的钱。

通过E基地训练的人将进入预备飞行学校，在那里他们将进行为期数月的基础训练和课堂学习。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根据计划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大学和学院里——最大的学校位于北卡罗来纳、艾奥瓦、佐治亚州的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里。但是没人会把这些预备飞行学员视为普通大学生。他们都要

穿上军装，剃成板寸头。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水兵二等兵，身处海军军衔体系的最底层。被淘汰的人会被送往舰队成为普通的白帽子水兵，用拖把擦军舰。海军集体宿舍被改造成学员们的兵营，他们睡在上下铺上，私人物品存放在脚旁的柜子里。训练营里的纪律很严格，士官长每天早晨6点会把他们从床上喊起来，做早操，进行队列训练和长跑。无论他们去哪里——食堂、教室、训练场、游泳池——都要排好队。第一天来到游泳池时，所有人都被要求爬到跳水台顶上再跳下去。一名学员解释说自己完全不会游泳，军官答道：“我没问你会不会游泳，我要你跳下去，你会不会游，我们看得出来。”^[37]

晚上，士官们会要他们去打扫兵营，直至所有地方都一尘不染。他们要刷洗“甲板”（就是地板），直到像新拿出来的餐盘一样干净。罗伯特·史密斯回忆自己在打扫厕所时，盯着他的士官长吼道：“把你的胳膊伸下去擦茅坑底下——把这里擦干净之后，回去把擦过的再擦一遍！”^[38]

他们大约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课堂里，在那里他们要修完航空工程学、数学、物理学、通信、导航以及气象学课程。大部分课程都少不了死记硬背，而且还要常常考试以检查他们的掌握程度。他们要学会使用旗语和莫尔斯电码通信，要能达到每分钟接收13个词的水平。借助照片、剪影轮廓，以及玩具一般的小飞机模型，他们要学会辨认全球各参战国所有的飞机型号。他们还要学习航空发动机的基本原理，了解空气是怎样流过一架飞机的控制翼面的。据哈尔·比尔估计，预备飞行学校把相当于大学里一整年的课程压缩到了4个月，他称此为“残酷的磨炼”。^[39]许多有志成为海军飞行员的年轻人都在这些课堂里翻了船，未及参加初级飞行训练就被淘汰出局。

彭萨科拉位于佛罗里达半岛最西端顶部，是一座优雅的古典

西班牙风格的小城，满载着一批批新飞行学员的大巴穿过宽阔的石头大门驶入基地。它们从一座座优美办公小楼之间的大道上开过，道路两旁整整齐齐排列着覆盖着苔藓的橡树。在基地西侧平坦的荒地上是超过12座大大小小的机场，机场两边排满了漂亮的红砖机库。整个白天，空中都满是低空飞行的飞机，晚上也常常如此。死人的事故并不少见，机库的墙壁旁堆放着空的松木棺材。在战争高峰时期，彭萨科拉平均每天都有一次坠机事故。飞机会在起飞时掉高度，坠毁在跑道尽头，还会空中相撞。学员们可能死于过度小心导致的失速坠机，也可能死于飞得过于大胆——例如在树梢高度飞行，结果撞上电线。人们找到飞行员尸体的时候，医疗官会在他飞行服的袖子和袖口上系好绳子，解释是这样的：“这是为了防止他从飞行服里滑出来……遗体像凝胶那样柔若无骨，会滑出来的。”[\[40\]](#)

美国海军的初级教练机是波音-斯蒂尔曼N2S，一种使用开放式座舱，用明黄色帆布做蒙皮的双翼飞机。这种飞机的绰号更有名：“黄祸”。机上一前一后设有两个座舱。教官坐在前座，通过一套被称为“通话软管”的单工通话线路向后座的学员说话。在空中，教官会演示各种基本机动动作——失速、改出、滚转、滑翔、爬升和俯冲。之后他会让学员控制飞机，自己则通过通话软管向他吼叫。马特·波尔茨记得他第一次接管操纵杆时教官对他吼道：“你爬升太慢了。机头低一点。别水平转弯。你想让我们陷入螺旋吗？你的控制太匆忙了。你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41\]](#)机上设备根本不允许学员回答教官的话，他根本没法提问题或者做解释。

斯蒂尔曼教练机是一台容许犯错的机器，很容易飞，却也足够灵活，能够做出飞行员在驾驶战斗机时需要做的各种基本机动，包括翻筋斗、爬升半滚倒转、桶滚、殷麦曼滚转、破S，还

有“落叶飘”。学员们要绕着地面上的两座输电塔，保持在仅仅500英尺高度飞8字形航线，练习精确转弯。这能教会飞行员怎样压大坡度而又不掉高度，这对任何飞行员来说都是一项关键性技术。他们还要学习怎样在强侧风中降落。如此种种，一轮接一轮地飞行。在飞了10次到20次之后，学员们就会获准第一次放单飞。这是人人都永生难忘的一个里程碑。

拉塞尔·贝克是个18岁的巴尔的摩人（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别人告诉他开飞机就像开汽车。贝克从来没开过汽车，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担心教官会因此小看他，甚至可能会把他淘汰掉。后来，他摇摇晃晃地飞了一次斯蒂尔曼飞机，教官对他说要轻轻控制操纵杆。“贝克，”他说，“这就像是抚摸姑娘的胸部那样。你得温柔。”贝克也不敢承认他从来没有摸过女性的胸部。[42]

几个星期过去后，飞行学员的队伍明显缩水了。有些人觉得飞行不适合自己的，于是请求换到其他军官训练课程中去。还有一些人死于坠机。许多人被教官淘汰了。被淘汰者会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常常连和同学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候说再见是一件尴尬的事，有人回忆道：“这对我们来说都很尴尬。”[43]

通过初级飞行训练的人会进入中级训练，他们会改为驾驶更先进的教练机。北美SNJ“得州佬”和伏尔梯SNV“振荡器”都是下单翼封闭式座舱飞机，外形和性能与现役飞机相差无几。和“黄祸”相比，它们对飞行员的要求更高，也更具危险性。“高速时候会发生各种事情，”比尔·戴维斯说，“而且所有事情发生得更快，容错空间更小。”[44]在这些中级教练机上，学员们会学习基础的轰炸战术、狗斗和射击。他们会向另一架飞机拖曳的条状靶标射击。他们会在一种叫作空战模拟器的设备上适应空中格斗，塞缪尔·海因斯形容这种设备就像“游乐场里的摇摇车”。该设备是一个

面向一块电影银幕的模拟座舱，银幕上会放映攻击敌机的电影片段。学员晃动操纵杆，银幕上的飞机就会动。只要学员在有一架飞机进入十字线时扣动扳机，旁边铃声就会响起表示“击中”。对于海因斯来说，这使得“把人从天上打下来这种事看起来成了一场拼技巧的无害游戏，就像你在弹子房里消磨时间时玩的那样，还能赢一个丘比娃娃”。[45]

学员们会在地面上一台被称为“林克模拟器”的早期飞行模拟设备上首次接触仪表飞行。他们会爬进那个“铁处女”[46]，一个设计用来模拟飞机座舱的压抑幽闭的封闭舱室。学员们头上的盖子会关上。他面前有一套模拟控制系统和一套模拟飞机仪表的显示器。教官会通过通话软管告诉他按指定的航线和高度飞行，而学员表现如何，则要通过一台能打印出一页页数据的原始计算机来评判。自然，那些在此前的训练飞行中表现出色的飞行员有时会在静止不动的林克模拟器上晕头转向，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实际飞行时的“感觉”。但是精通单凭仪表飞行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海军飞行员迟早都会在夜间或者能见度为零的天气下飞行。他们要学会相信仪表——空速、高度、罗盘、高度指示器，以及水平仪。他们还要学会如何“波束飞行”——就是根据导航雷达信号飞往指定方向。之后，他们会进行“蒙眼飞行”来检验技术：教练机的座舱周围会蒙上帆布，这样飞行员就看不见外面，不得不单独依靠仪表来驾驶飞机。许多人都感到这种训练太恐怖了。史密斯说他第一次飞这种练习时就像是“试着在杆顶上放一个沙滩球”。[47]

在近一年的努力学习之后，学员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翼徽章。他们在彭萨科拉基地的一个四方院子里列队，一名将军过来，亲自把徽章别在每个人笔挺的白衬衫上。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少尉军衔加入了现役。现在他们完全可以自称为海军航空

兵了。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并不是他们训练的终点。1944年，新拿到金翼徽章的飞行员们在被分配到前线部队之前，还要在高级航母训练大队（ACTG）再飞三四百个小时。其中许多人被派到位于迈阿密西北部的奥帕洛卡机场，“热带骄阳下一片满是沙地、灌木丛和响尾蛇的地方”。[48]他们在这里飞的都是现役机型——“地狱猫”“地狱潜鸟”“海盗”——和他们将来上战场时要驾驶的机型别无二致。这也是他们头一次和新近从舰队回来的老飞行员们一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编队飞行、射击、轰炸、夜间飞行，以及海上导航。飞行员们会向位于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中心深处的三合板靶标投掷烟幕弹来练习俯冲轰炸技术。这些人还被告知，不到紧急情况下不要使用无线电——“别出声儿！”——他们还要学习掌握详尽的手势信号，这样就可以在座舱之间通过目视通信。

大部分高级航母训练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是参加过太平洋航母对决的老手。他们很清楚这些新兵蛋子来到舰队后将会面临的磨难和挑战。汉密尔顿·麦克沃特是个著名的“地狱猫”王牌，他回到美国，在已经编制完成、正在全员训练的第12舰载机大队中指挥战斗机中队。“我们飞啊飞啊飞啊，”他如此说，“如果我的学员没有掌握要领，我们就会接着飞。掌握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飞——在返回机场的途中还常常会练习编队战术、空对空和空对地射击，有时会有仪表飞行和夜间飞行，当然，还少不了狗斗和咬尾追逐的练习。”[49]

第12舰载机大队在俄勒冈州沿岸的阿斯托里亚海军航空站驻扎了几个星期。大部分早晨，飞机起飞时都是在“零零”环境之下：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浓雾。他们在白茫茫的雾气中爬升，紧盯着前方飞机排气口发出的淡蓝色火焰。到了4 000英尺高处，天空豁然开朗，头上是万里晴空，下方则是一片雪白如羊毛一般

的云毯。这种飞行之艰难，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急白头发，而且真的有人头发变白了。但是正如麦克沃特不厌其烦地向年轻人灌输的那样，这种飞行是他们将会在太平洋战区实际遇到的。早上，航母特混舰队时常会被不透光的浓雾包围，飞行员可能一连几天都不得不依靠仪表和导航台飞行，因为风挡玻璃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下午飞行时，他可能不得不在薄暮中降落，眼睛四处寻找昏暗的飞行甲板，油量指针则已经几乎回到零。他还可能需要在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时飞行，可能需要驾驶着被击伤的飞机寻找返航的路，甚至本人也可能受了伤，鲜血直流。而这里的训练将会让飞行员们获得面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挑战时所需要的技术和本能。

年轻的飞行员们常常违规，不过有时却会得到队长的默许。“贴头皮”——紧贴地面飞行——是被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区域。但许多飞行员根本无视这条禁令，尤其是在战时。从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起飞的海军飞机常常超低空飞到邻近的国王牧场上空驱赶牛群，地面上的牛仔们只能向他们挥舞拳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贴头皮”的飞行员们会从10英尺到15英尺高的超低空沿着海岸或者高速公路的中心线飞行，有时甚至会把骑摩托车的人挤到路边。这些新手飞行员很快学会了那些老家伙的业余生活方式——后半夜在当地的酒吧和夜店里喝得酩酊大醉。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詹姆斯·W. 韦尔农的高级训练是在位于新泽西州海岸最南端附近的怀尔德伍德海军航空站进行的。那段时期他不是在空中飞行，就是在附近的海岸小镇里鬼混，镇上满是“夸张的醉酒狂欢，弥漫着烟味的俱乐部，胡聊乱扯，群魔乱舞，对姑娘们的骚扰，脏兮兮的旅馆房间，下半夜空荡荡的街道，宿醉，以及对染上性病的担忧……一定是有一些激素的刺激和从众的心理让我们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如此丢人现眼”。[\[50\]](#)他

和他的飞行员战友通常在每天6点的起床号之前只睡三四个小时，只有从座舱面罩中呼吸纯氧才能缓解那一阵阵的头痛。

性病对高级飞行训练中队的影响尤其大。医疗管理部门发布影片规劝军人们注意性行为的安全性。比尔·戴维斯尤其喜欢一部名叫“病菌横飞，管住自己”的影片。在这部片子里，医生告诉一名水兵他患上了性病。“我肯定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得上的。”水兵说。“在那地方约会真是见了鬼。”医生答道。[\[51\]](#)

1945年初，当胜利已经在望之时，训练中队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都迫不及待想要参战。他们担心和平可能突然到来，剥夺他们参加空中战斗的机会。老兵们则对他们说，连续三四个星期每天不间断的飞行战斗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如此积极了；飞行疲劳综合征是真实而且普遍存在的。飞行是一份活儿，得出力。飞机座舱不是什么好地方，要么太热，要么太冷。一个人被迫在那里坐几个小时，会越发感到局促和不适。飞行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精神压力就成了大问题。时常在死亡边缘游走，也侵蚀着飞行员们的神经。但即便如此，那些最为厌倦的飞行员还是偶尔会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想要飞行。塞缪尔·海因斯在一次薄暮飞行训练时体会到了这样的感觉，当时他下方的地面已经被夜色笼罩：“这架飞机仿佛吸收并保留了阳光和晚霞。我的周围一片光明，但是脚下的大地似乎已经死去，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我心中立刻充满了一种生存感。我永远不会死，我要永远飞下去。”[\[52\]](#)

1945年元旦这天，第3舰队再次出海，他们离开了乌利西环礁向北开去。这次的任务还是老一套——向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岛群发动新一轮舰载机空袭，这次是要支援麦克阿瑟计划中1月9

日在吕宋岛的登陆。他们的目标是切断从日本到战区的空中增援通道，孤立林加延湾的登陆滩头。同时照相侦察机还会在冲绳岛拍摄数千张高角度或者斜侧角度的照片，用来为即将在3个月内打响的冲绳登陆战制订计划。

1月3日和4日两天，恶劣天气使得台湾岛上空能见度很差，因此麦凯恩将军取消了对台湾大约一半的空袭。返回的飞行员们将其描述为自己所飞过的最恶劣的天气。“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名航空情报官威廉·A·贝尔上尉称“险恶的乌云从700英尺堆积到1万英尺高空，到处都是暴雨，海面是一片青灰色，狂风怒号”。[53] 作战损失很惨重，第38特混舰队仅仅1月7日一天就损失了28架飞机。但是飞行员们仍在坚持作战，对台湾、吕宋和澎湖列岛的机场进行扫射和轰炸。[54]

在南方的林加延湾，麦克阿瑟的炮击和扫雷舰队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神风攻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也一遍又一遍要求哈尔西压制这些威胁。航空照片揭示了这些致命攻击的来源：日军不遗余力地隐蔽他们的飞机，把它们藏在枝叶和灌木丛下面，停放在机场数英里之外。1月7日、8日、9日对于航母部队来说漫长而忙碌，飞行员们每天最多要飞四趟，大胆地以树梢高度在吕宋岛中部和北部进行搜索和扫射。

自从在8月掌管第3舰队以来，哈尔西一直希望向菲律宾西边的南海发动一场航母空袭。他期望能够在中國大陸南部海岸和中南半岛沿岸的诸多港口中寻获大批高价值目标。自从1941年12月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马来亚外海被日军空袭击沉后，还没有哪艘盟军军舰敢于闯进这片海域，潜艇除外。1944年10月和11月，哈尔西两次请求允许自己进入南海，但是尼米兹和金认为这太危险了。（哈尔西说：“我的上级恐怕是在怀疑我对于那里有丰富目标的判断。”[55]他说对了。）现在哈尔

西再次提出请求。他特别想要摧毁日军那两艘老式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据信这两艘舰正停泊在中南半岛的金兰湾里。尼米兹终于同意了。

几天后的1月9日，就在麦克阿瑟的部队登陆吕宋岛当天，第38特混舰队穿过了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这条航线令这支庞大舰队来到了距离日军在台湾南部的主要航空兵基地富山机场只有80英里的近处。与此同时，一支由30艘舰队油轮，以及护航航母、驱逐舰和弹药船组成的后勤船队穿过了巴林塘海峡，这是吕宋岛和台湾岛之间的岛链中仅有的另一条可通行的水道。两支舰队都未被敌人察觉。当1月10日的太阳从海平线上升起时，美国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已经出现在了南海的中央，这是一片四周全部被敌人海军和航空兵基地包围的水域。哈尔西后来写道，舰队的处境“极度艰险”，因为日军飞机可以从任意方向前来进攻，或者几个方向同时进攻。第38特混舰队的实力足以自保，但哈尔西不得不为脆弱的后勤船队的安全操心。但另一方面，从这个位置上，美军航母部队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动强有力的空袭，打击那些在最近三年来始终无法触及的目标。

加满油之后，舰队开始向中南半岛沿岸彻夜疾驰。哈尔西向航空兵们发出了一条电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让他们去死。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哈尔西。”^[56]第二天一早，超过1 000架舰载机向金兰湾和西贡之间的目标投下了炸弹。他们把机场碾为齑粉，摧毁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炸断桥梁，把货运列车打翻在地，轰炸了码头、仓库和油库，并把停泊在锚地里的敌人舰船送下海底。一支编有11艘货船的无护航船队在越南头顿（圣雅克角）海岸附近的开阔水域被逮个正着，全数击沉。日军未能起飞战斗机拦截美军机群，高炮火力也弱到可以忽略，这一区域的日军显然完全措手不及。航拍照片展示了沿岸地带一片毁灭的图景

——贝尔上尉在日记中写道：“目力所及之处全是火焰和冒烟的船只。被击沉船只的桅杆和上层建筑矗立在平静的海面上。还有一些船只侧躺在海面上一动不动。”^[57]“伊势号”和“日向号”已经在两个星期前离开此地到新加坡去了，但是这一天的战果已经足够好，哈尔西对此并不太介意。当地的自由法国人员后来报告说，空袭击沉了41艘船，总吨位12.7万吨，击伤了28艘船，7万吨，而且把整个海岸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58]

此时正值东北季风的高峰期，天气急转直下。天空浓云密布，大海也变得恶浪滔天，北风呼啸而来。自从三个星期前的台风事件之后，哈尔西和他的团队对此小心了起来。特混舰队在撤离中南半岛时，航速下降到了16节，以防止再遭台风损伤。驱逐舰的燃油已经不足，必须在接下来空袭中国沿海日军之前加满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油却十分危险。在舰队油轮侧旁，驱逐舰就像跷跷板一般忽上忽下。它们的舰首高高扬起，前部三四十英尺长的舰底伸出海面——之后又重重地跌入波谷。螺旋桨都露了出来，掀起成片的水花。青绿色的海水涌上它们的甲板，又从排水口里倾泻而出。浑身湿透的舰员们就像骑牛大赛选手那样摇来晃去。眼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拉福德将军庆幸自己是在一艘27 500吨的舰队航母上。贝尔上尉从“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看去，发现那些小舰横摇幅度很大，“它们的桅杆看起来就像狂风中的小树，几乎就要插进狂暴的海水里”。^[59]

加油持续了1月13日一整天，一直到14日上午才结束，6艘舰队油轮被吸得干干净净，整个第38特混舰队各舰的燃油量也至少加到了60%。

第二天，舰队向香港、广州、海南、厦门，以及再次向台湾发动了空袭。在香港上空，他们遭遇了最为猛烈的高射炮火，各种颜色的高炮烟团在3 000英尺到1.5万英尺之间组成三层绵密的

弹幕，就连许多老飞行员也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有一个飞行员形容这里的高炮“密集到难以置信”。[60]但是对于攻击一方而言，这又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他们摧毁了数万吨船舶，向广州、九龙和昂船洲的沿岸设施、干船坞、码头、燃油精炼厂投下了炸弹。返航的飞行员声称他们在台湾摧毁或打翻了10列火车。但是这一天的飞机损失也很严重——30架毁于战斗，31架毁于事故。有几架昏了头的“地狱猫”错误地轰炸和扫射了澳门的地面目标，这里当时还是中立国葡萄牙统治的。葡萄牙政府向华盛顿提出了愤怒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则拿出了一份正式的道歉，这事也就了结了。[61]

1月18日，天气仿佛铁了心要把特混舰队在南海里掀个底朝天。一片低压区正穿过吕宋海峡而来，海况等级开始升高。哈尔西并不想让第3舰队在这种环境下穿越这处狭窄局促的水域。他觉得可以通过菲律宾群岛内部的水道——民都洛海峡、苏禄海、棉兰老海和苏里高海峡——退往东边。这意味着他们要高速穿越狭窄水道，两个月前莱特湾海战时西村的南路舰队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各个特混大队都必须采用特殊而且不熟悉的航行队形，触礁搁浅的危险也很大。这一行动很可能被日军发现，虽然这一区域的日军航空兵已经大为削弱，但“神风”的威胁依然不可忽略。当哈尔西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尼米兹时，总司令立刻否决了它，他指示舰队继续留在南海，等天气好了再走。[62]1月20日，舰队开出了巴林塘海峡。哈尔西的这次南海大冒险历时11天，舰队总航程达到3 800英里。

麦克阿瑟的部队顺利登上了吕宋岛，并向南面的马尼拉推进。但是日军对林加延湾内美军两栖舰队的空袭却无休无止，和往常一样，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想要第3舰队为他提供更多的直接空中支援。1月21日又是漫长的一天，美军向已经熟悉了台

湾和琉球群岛的目标再度发动空袭，但是日军航空兵向舰队发动了一轮接一轮的猛烈反击。日军飞机藏身在密布的浓云之中，显然是尾随上午空袭后返航的美军飞机而来，一旦遇到巡逻的“地狱猫”机群便躲入云中。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大批敌机从云底冲了出来。一架飞机命中“兰利号”航母一枚小型炸弹，一架自杀机命中了驱逐舰“马多克斯号”，炸死4名舰员。“汉考克号”航母受了重伤，它自己的一架飞机在挂弹降落时炸弹被引爆，炸死了48名水兵。两架“神风”自杀机沉重打击了埃塞克斯级航母“提康德罗加号”（CV-14）。它的信号舰桥被摧毁，飞行甲板无法使用，机库也被大火吞没。^[63]140名舰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不少高级军官。大火烧毁了36架飞机，超过其总载机量的三分之一。贝尔上尉从邻近的“埃塞克斯号”上看着这座漂浮的地狱，他在日记中写道：“‘神风’是太平洋上最重大的事件，但国内却没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少数几架飞机和一小群疯狂的小人物，鬼子就能把我们所有能拿来参战的水面舰艇全部重创或击沉……‘神风’让日本人找到了战争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这肯定是最令人胆寒，令人畏惧的。”^[64]

第3舰队的任务完成了，至少这一轮任务完成了。它已经在海上接连航行了28天，航程超过1.2万英里。它的舰载机摧毁了30万吨日本船舶。1月25日，特混舰队回到了乌利西的“大谷仓”里。此时的潟湖锚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第3舰队和第7舰队主力都来到了此地。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也在这里，按计划，他将在第二天接管第3舰队。当晚，斯普鲁恩斯带领一众随行高级幕僚造访了“新泽西号”，拜会了哈尔西。这两位四星上将在哈尔西的指挥舱里单独待了超过一个小时。他们聊的内容则无人知晓。

1月26日午夜，指挥权由哈尔西移交给斯普鲁恩斯。第3舰

队变更为第5舰队，第38特混舰队也再次改编为第58特混舰队。米彻尔将军接替麦凯恩，重回第58特混舰队司令岗位。哈尔西则飞回珍珠港，接着又回到美国本土。他早就该休长假了。

[1]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September 16, 1944,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74.

[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66.

[3] Willard Waller, “Why Veterans Are Bitter,” *American Mercury*, August 1945, p.147.3

[4] Ibid.

[5] “胜利菜园”是指战时英美两国发动市民在自家院子里种植蔬菜以弥补食物不足的举措。——译者注

[6] 此事为沃尔特R.埃文斯日后所述。他还描述了“维斯塔尔号”修理船上的船友对“好莱坞式造作”的态度。Evans, *Wartime Sea Stories*, p.38.

[7] Hunt, *Coral Comes High*, p.21.

[8] 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F, “National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F 1—5.以时价来算，1940年是997亿美元，1944年增至2 101亿美元；以1958年的价格来算，1940年是2 272亿美元，1944年增至3 613亿美元。

[9] 后一个数字按1940年的标准来算为316.6亿美元。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F 540—551, “National Saving, by Major Saver Groups, in Current Prices, 1897 to 1945.”

[10] Blum, *V Was For Victory*, p.98.

[1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323.

[12] Winkler, *Home Front U.S.A.*, p.45.

[13] Marjorie Cartwrigh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p.190—91.

[14] 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N1—29, “Value of New Private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Put in Place:

1915 to 1970.”

[15] Lerner, *Public Journal*, pp.28—29.

[16] Baime,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p.247.

[17] Don McFadden,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48.

[18] Perret,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p.315.

[19] Reid, *The Brazen Age*, p.8.

[20] “Navy Officer Says Teamsters Hit Hi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44, p.15.

[21] Ibid.

[22] “Dickins v.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Etc., 171 F.2d 21 (D.C.Cir.1948),” October 18, 1948,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23] Blum, *V Was For Victory*, p.297.

[24] The “Mead Report” quoted in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300.

[25] Perret,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p.399.

[26] Peggy Terry,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12.

[27] Eisenhower to FDR, March 31, 1945, FDR Library.

[28] King/Marshall letter to FDR, January 1945, excerpted in “Letters on the Pressing Manpower Probl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45.

[29] “Curfew Used to Teach ‘War Awareness’ Less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p.67.

[30] Yoder, *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 p.115.

[31] Hunt, *Coral Comes High*, p.21.

[32] Elliot Johnson account,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198.

[33] Marjorie Cartwright account,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p.190—91.

[34] U.S.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44, Secretary of the Navy James Forrest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15, Hopkins

Papers, Group 24, FDR Library.

[35]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324.

[36] Delaney, “Corpus Christi: University of the Air,” *Naval History* 27, no.3, June 2013, p.37.

[37]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42.

[38] Smyth, *Sea Stories*, p.39.

[3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6.

[40]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72.

[41] Portz, “Aviation Training and Expansion,” *Naval Aviation News*, July—August 1990, p.24.

[42] Baker, *Growing Up*, p.216.

[4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61.

[44] *Ibid.*, p.67.

[45]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69.

[46] 铁处女，传说中欧洲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受刑者会被关进一个类似棺材的铁柜子。——译者注

[47] Smyth, *Sea Stories*, p.48.

[4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9.

[49] MacWhorter and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134.

[50] Vernon, *Hostile Sky*, p.99.

[51]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44.

[52]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60.

[53] Lieutenant William A.Bell, “Under the Nips’ Nose,” pp.12—13.

[54]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7, 1945, p.8.

[55]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95.

[56]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11, 1945, p.11.

[57] William A.Bell Diary, January 12, 1945, p.7.

[5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98.

[59] Lieutenant William A.Bell, "Under the Nips' Nose," p.24.

[60] *Ibid.*, p.23.

[61]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79;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96.

[62]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19, 1945, p.18.

[63] *Ibid.*, p.21.

[64] William A.Bell Diary, January 21, 1945, pp.17—18.

第十章

林加延湾，吕宋岛西北海岸的一处马蹄形缺口，在1941年12月时为攻打过来的日军提供了主要入口。三年零三个星期后，历史再度重演，但规模却要大得多。太平洋上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由超过800艘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进攻舰队，从1945年1月6日开始抵达林加延湾。这支舰队的任务是运送美国第6集团军在林加延湾南部海滩登陆。“塞拉日”，也就是指定的登陆日，定为1月9日。

每当有新的船只进入海湾，它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锚地，沿着浮标标示出的水道，开到指定的“泊位”上。海岸线周围地形起伏多山。在东侧，丛林密布的暗绿色山岭逐步升高，直到在卡加延周围变成崎岖的绿色山峰。军舰和运输船上的舰员们都很紧张，这很容易理解：舰队太过庞大，峡湾太过狭小，无法进行高速规避机动。大部分舰船在整个战役期间都不得不锚泊在那里，过于密集又静止不动。来袭的日军飞机可以躲进多山的海岸地貌留下的雷达盲区里隐蔽接近。雷达员们紧紧盯着显示屏，脸都快要贴了上去，高射炮手们警惕地扫视着各处，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舰载机则在上空盘旋。发烟器产生的化学烟雾飘浮在海湾上空，仿佛连风都吹不走。

这次，美军在战争中头一回遇到了可怕的“震洋”自杀快艇。这些木质小艇从林加延湾西侧沿岸开出来，向舰队高速冲去。1月6日夜间，几艘美军船只和登陆艇遭到了重创，从那以后，美军20mm机关炮的炮手们都会时刻握住扳机，向所有能辨认得出

的东西开火。从傍晚到清晨，海岸线都会被照明弹和探照灯照亮。日军甚至派出人员游泳进行自杀攻击，他们躲在漂浮的残骸后面接近目标，想要把爆炸物安放在美军舰船的船体上。还有一些人则伪装成菲律宾渔民，坐在当地人的独木舟上，满载着炸药接近舰队。有一艘运输船的侧舷就被这样的攻击炸开了一个大洞，炸死了几名船员。

在从莱特湾出发开往林加延湾的一个星期的航程中，盟军进攻舰队遭到了空前猛烈的神风攻击。当杰西·奥尔登多夫中将的火力支援大队鱼贯穿过班乃岛以西的狭窄近岸水道时，凶猛的攻击落到了他们头上，对美军的考验就此开始了。1月4日下午5时12分，一架单枪匹马的横须贺厂P1Y“银河”轰炸机（盟军绰号“弗兰斯”）突然穿出云底，撞进了护航航母“欧曼尼湾号”的甲板。它的进攻如此突然，美军毫无防备，甚至连高射炮手都来不及开火。两枚炸弹击穿了这艘“吉普航母”脆弱的钢质飞行甲板，在机库里爆炸开来。大火立刻失去了控制，吞没了炸弹和鱼雷库，引发了殉爆。这艘小航母被炸成了碎片，93名舰员阵亡。幸存者跳进了海里，被护航的驱逐舰救起。燃烧的残骸则被丢弃在民都洛海峡中。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日军在菲律宾的航空兵已是强弩之末。指挥部设在马巴拉卡特的第二〇一航空队只剩下大约40架还能飞的飞机。在整个菲律宾，剩余的日本飞机可能也不超过200架。在12月的最后一周，日本帝国大本营做出决定，不再向菲律宾增援空中力量。菲律宾群岛北边的飞行航线再也用不着了。自从莱特湾海战以来，每10架从台湾岛或者日本飞往菲律宾的日军飞机中，就有大约3架或毁于事故，或被第3舰队的舰载机击落。^[1]现在，根据东京的命令，所有剩余的飞机都要起飞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航空兵基地内的剩余人员将要退往山区和日本陆军

部队会合。二〇一航空队的高级军官们将要利用暗夜的掩护乘飞机撤回台湾。其中最后一条命令是秘密传达的，以免打击留守人员的士气。

吕宋岛上的日军机场几乎每天都有美军轰炸机和扫射地面的战斗机前来光顾。日军飞机除非停放在远离机场处并用伪装网和灌木枝叶妥善隐蔽，否则都会被很快摧毁。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自杀机飞行员被告知，他们的飞机一旦拖出隐蔽处并推到起飞位置，就要迅速起飞，并赶在美军战斗机前来截击之前爬升到高空。只有技术较好而且运气上佳的人才能抵达敌人舰队，能撞中敌舰的更是少之又少。但是日军从来都不缺自愿飞自杀任务的人。在飞行员比能飞的飞机还多的克拉克机场，年轻人们围着他们的航空队长，请求让自己起飞作战。1月5日晚，基地里只剩下13架第二天还能出击的飞机，于是13名飞行员被选中执行任务。失望的落选飞行员便在地面上四处寻找坏飞机，然后“恳求机械师把这些破飞机上状态最好的部件拼凑成随便什么能飞的东西”。^[2]经过地面人员一整夜的努力，又有5架飞机被修复到能够飞行的程度。

破晓时，机场旁举行了简单的送行仪式。飞行员从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上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在战友们向自己敬礼告别后爬进座舱，最后一次起飞升空。

临近中午时，当奥尔登多夫麾下拥有164艘舰艇的对岸炮击大队在林加延湾外占领阵位时，“神风”机群从东边蜂拥而出。奥尔登多夫的旗舰，珍珠港的幸存者“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被撞中右舷主桅杆附近位置，炸死了32人，炸伤数十人。一枚高速落下的炸弹击中了乔治·韦勒少将的旗舰“新墨西哥号”战列舰的舰桥左侧，炸出了巨大的火球。30人被炸死，其中包括舰长罗伯特·W·弗莱明上校，以及两位贵宾——英国陆军的赫伯特·拉姆斯登中

将，以及《时代》杂志通讯员威廉·亨利·奇克林。太平洋上军衔最高的英军将领，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此时也作为观察员搭乘在“新墨西哥号”上，好在他侥幸生还。下午稍晚时候，一架“神风”自杀机独自突破了暴风雨般的防空火网，撞击了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机上的两枚炸弹爆炸开来，在2号炮塔和操舵室周围引发了严重火灾。第4巡洋舰分队指挥官西奥多·E.钱德勒将军被严重烧伤，次日离世。舰员们发现了那架“神风”机飞行员一丝不挂的无头尸体，直接把他从侧舷扔到了海里。

在林加延湾首轮两栖登陆之前的5天里，“神风”自杀机命中或近失损伤了30艘盟军舰船。3艘被摧毁，14艘遭到重创，13艘轻伤。突击运输舰“多恩号”上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眼看着军舰带着垮塌的上层建筑和“被熏黑和撕碎的曾经是炮塔的东西”从眼前经过的“奇特景象”。[3]搭乘在巡洋舰“博伊斯号”上的麦克阿瑟将军亲眼看到了几次可能轻松把他干掉的攻击。他不要命地拒绝了所有请他到下方寻找掩护的提议，站在后甲板的水上飞机滑道上一边观看战斗，一边若无其事地抽他的烟斗。在回忆录中，他描述了这“猛烈的防空弹幕，每艘舰都打出了震耳欲聋的高炮齐射”。[4]

1月7日，应金凯德和麦克阿瑟的紧急要求，哈尔西在吕宋岛上空再度铺上了“大蓝毯”。舰载机飞行员返回母舰时宣称他们在地面上至少摧毁了75架日军飞机。令人宽慰的是，第二天，“神风”机的威胁真的大大缓解了。

吕宋登陆战役中的美军指挥体系和莱特岛战役时基本相同。克鲁格将军继续指挥第6集团军，下辖两个各编有两个师的军——伊尼斯·P.斯威夫特少将的第1军（下辖第6师和第43师），以及奥斯卡·W.格里斯伍德中将的第14军（下辖第37师和第40师）。第5个师，第25师，则待在海岸外的船上担任“海上预备

队”。金凯德将军的第7舰队将封锁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并保护漫长的海上后勤线。肯尼将军继续指挥第5航空队和第13航空队。一旦地面部队拿下克拉克机场和吕宋岛上的其他机场，他的陆军航空队战斗机和轰炸机就会飞来此地驻扎。第8集团军仍由艾克尔伯格将军指挥，他们将采取欺敌措施，争取让日军误以为盟军的主要登陆行动将在吕宋岛南部。“S日”当天，克鲁格的四个主攻师将在林加延湾湾底20英里宽的滩头正面登陆，之后向内陆推进，夺占吕宋岛中部平原。左翼的第1军将把日军主力围困在卡加延山区，同时第14军将南下直取马尼拉。之后，第8集团军将出动一支部队在岛屿南部海岸登陆。第6和第8两个集团军将以钳形运动合围马尼拉和马尼拉湾。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日军地面部队主力就将被孤立在岛屿多山的北部，与菲律宾首都及南部的其他日本陆军部队断绝联系。

登陆前夜，炮击舰队上演了一出华丽的烟火秀，用密集的舰炮弹雨洗扫滩头。驱逐舰“霍沃思号”上的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那些以长长的高弧度弹道飞向岸边的炮弹：“你知道吗？你看过去的时候，它们仿佛飞得很慢。它们就像缓缓坠落的星星那样飘过天空。我们射击的目标在7英里外，中间是一层层浓密的烟云。我站在舰桥侧面，眼看着那些红色的火球消失在云层中，接着再次出现。目标太远了，炮弹落地时我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点红色闪光。”^[5]炮火被引向整个林加延湾海岸线上所有疑似是日军沿岸阵地的地方，尤其是马蹄形海湾湾底处预定的登陆滩头上，也就是林加延、达古潘、马比老以及圣法比安几个小镇周围。敌人的岸炮火力几乎没有还击，南部登陆滩头附近的日军更是一弹未发。拂晓时，在林加延镇里，美军发现一群菲律宾老百姓打着美国国旗聚集成群。用望远镜看到这一情景后，奥尔登多夫立即命令舰炮火力远离这一区域。

当突击部队爬下吊绳网，来到登陆艇中时，天气平和，微风徐徐，空中有碎云，海湾的封闭水域内波浪不兴。南十字座就高挂在登陆滩头上方，但那里却被低垂的雾霭所笼罩。登陆艇在运输船集结区里兜圈子，或者引擎空转，它们在等候发起登陆的信号。有几艘“震洋”快艇从西侧海岸拼命冲出来，但要么被摧毁，要么被驱离，无一能够扑向目标。

上午9时30分，第一批登陆部队出发。超过1 000艘登陆艇向海滩开去，它们长长的尾流在海上画出一条条平行的白色线条。到9时40分就有近2万部队上了岸，到中午时，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8万人。他们沿着海湾南端林加延、达古潘、马比老三个镇子旁一条12英里宽的滩头登上了海岸。海滩宽阔而且连成一片，大到足以容纳整整两个军（共有四个步兵师）以及巨量的重型装备、车辆、武器，还有按计划将在几个小时内到达的补给物资。登陆几乎未遇到抵抗，菲律宾当地人兴高采烈地和士兵们握手、亲吻。日军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海湾东部沿岸，也就是三年前本间雅晴将军部队登陆的地方。在美军战线右翼，第40师完全没有遇到敌人：没有炮兵，没有迫击炮，没有轻武器火力，也见不到日本人。前出巡逻队找到了几个碉堡和暗堡，并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但是见不到一个敌兵。这个师向内陆进发，在林加延夺取了一条可用的飞机跑道。

在东翼，第6师在曼加尔丹附近的“蓝一”“蓝二”滩登陆，第43师在圣法比安附近的“白一”“白二”“白三”滩登陆。他们遭到了圣法比安背后高处日军远程炮兵和迫击炮火力的零星射击。这种火力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骚扰，它们既不够猛烈，也不够准确，无法造成重大伤亡，但还是迫使美军把物资卸载的地点向海岸西边迁移了一些。伤亡只有寥寥数人，其中有一个士兵还是被发狂的水牛踩死的。[6]

麦克阿瑟将军在中午时上了岸，身后跟着一群幕僚、战争通讯员和摄影师。他乘坐的驳船开向滩头中央，工兵们已经在那里用一对下锚固定的浮舟搭建了一座通向沙滩的临时码头。舵手原本想操船靠到码头上，但是麦克阿瑟却示意他离开码头。他转而从一处水深及膝的地方下船，涉水上了岸。这种仪式简直成了他的招牌动作。和在莱特岛和民都洛岛时一样，这一次他的举动又被摄影师拍摄了下来。麦克阿瑟还是戴着他为人们所熟悉的元帅帽和飞行员墨镜，挺直身躯，迈着坚定的步伐，即便有一架零式战斗机出现在头顶低空。他满意地看着那架敌机被高射炮火组成的“火墙”摧毁。[7]

在滩头东北面第1军的防区里，第43师的前出巡逻队遭到了来自达莫提斯和圣费尔南多两个镇子上方山区和山岭上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斯威夫特将军的第1军司令部立刻命令这个师向内陆推进，夺占这些草甸高地。一个团受命肃清正东方的470高地，另一个团则要夺取马比老镇上方的山脊线。其余各部则沿着海岸道路交替掩护推进。一整个下午，日军野战炮和迫击炮都在不停地给美军带来伤亡，但是地面上步兵的抵抗却十分零散。到1月9日日落时，美军的滩头阵地已经沿着海岸向圣贾辛托和宾岱镇扩展了4英里。

登陆第二天和第三天，第43师沿着圣法比安和达莫提斯东面的谷底道路以及通向北方罗萨里奥和卡巴鲁安山的山脊线发动了试探性进攻。在这一区域，进攻方在通向山区的道路各处都遭到了日军愈加猛烈的抵抗。情报已经显示，岛上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将军在卡加延山高处的旅游胜地，距海岸约20英里的碧瑶建立了指挥部。山区的道路均处于坚固的堑壕阵地，巧妙伪装的火力点和岩洞，以及雷区的防御之下。美军用重炮、舰炮和空袭还击日军，却无法把日军赶出去，除非他们向那些危险的高地

发动协同进攻。美军不会这么做。麦克阿瑟的首要目标马尼拉位于另一个方向上。根据这位上司的剧本，主攻方向是南方，指向吕宋中部平原的中央，以及菲律宾首都。因此，克鲁格将军只会增强左翼的防守，并希望日军不会从东北面的山区发动装甲反击。

到登陆第三天结束时，第6集团军的滩头阵地已经有20英里宽，纵深5英里至7英里，占据了海湾的整个南岸。人数相当于15个陆军师的美军上了岛，沿30英里长的防线布阵。林加延湾原本平静的海滩已经被改造成了从海到岸的中转站，物资吞吐能力不逊于一座大型港口。坦克登陆舰直接开上海滩，打开蚌壳式舰首舱门，以工业化的速度卸载大件货物。满载的卡车、牵引车和吉普车沿着浮桥栈道直接开上岸。滩头成了一座满是成堆的板条箱、油桶、停放的车辆、帐篷区以及围着沙袋的高炮阵地的迷宫。暴脾气的海军滩头管理员拿着大喇叭吼叫个没完。在拿下马尼拉湾并使其向盟军船只开放之前，林加延是美军唯一可以掌控的海港。

林加延湾曾经蔚蓝色的天然海水已经被800艘舰船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垃圾所污染。海面 and 海岸上满是垃圾和废物。停泊着的运输船之间漂浮着腐烂的尸体，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人。每隔一段时间，专用垃圾清理驳船就会把这些废物和敌人的尸体捞起来，堆到海滩上一把火烧掉。

第14军防区的内陆深处是一片草木繁盛的湿地，其间溪流纵横交错，还点缀着老百姓的鱼塘。这种潮湿地形给后勤和工程建设都带来了困难。在林加延镇周围，巨大的沙丘令轮式车辆无法通行，于是推土机被派过来清理出一条通路。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桥梁都被毁掉了——被敌人毁掉，被友方的菲律宾游击队毁掉，以及被美军的轰炸和炮击毁掉。于是一队队士兵只能把步枪举过

头顶涉水过河。两栖卡车被拿来当作货船，在那些水深无法涉渡的河流中穿梭。工兵们在水深较大的渡口用原木造桥，只要结构合理，它们就能承受数以千计的人员、卡车和坦克的重量。达莫提斯—罗萨里奥之间20英里长的铁路线被扒掉，路基则改造成了供重型装备通行的高速公路。D+3日，前出巡逻队抵达阿格诺河，这是美国陆军前进路线上的第一道天堑。工兵们迅速在河上架起了两座承重35吨的组合式钢结构桥。

通向马尼拉的路线要从吕宋岛中部平原正中央穿过，这是一片平坦、肥沃的地区，满是稻田、牧场和甘蔗田，以及密布的河道和灌溉渠。这片平原两侧都是山脉，南北长约120英里，宽30英里至50英里，是菲律宾最富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平原上点缀着大种植园，有集市的小村庄，村庄里的石头教堂俯瞰着西班牙风格的露天广场。这里拥有整个菲律宾最好的道路网，包括一条双车道的碎石柏油高级公路，公路每隔一英里左右就会与东西向的砾石道路交叉，还有两条铁路干线。这完全是一片祥和的田园风光，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交织在一起：白茅草地和低洼的稻田，蜿蜒的河床，两侧是一片片榴槿和山竹树丛，高出来的河堤上搭建有覆盖着暗褐色聂帕榈树叶的小棚子；黑色的水牛在草地上徜徉，有些水牛的背上还栖息着白鹭；盖着铁皮波纹板房顶的竹子搭建的小屋旁，挂着木槿花和叶子花做的花环。

起初，日军在乡村平原地带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炮兵和配备轻武器的小部队向美军侦察小分队开火，随即向南方或东方撤退，躲进山区。这些临时射击阵地设在灌溉沟渠内或者种植园建筑群里，用沙袋做了强化。双方的交火短暂而且断断续续，他们仅仅是拖慢了美军进攻的节奏而已。克鲁格将军急于让第6集团军只以一条较宽的阵线保持推进，他开始对格里斯伍德第14军向首都猛打猛冲的步伐担忧起来。这意味着斯威夫特的第1军必

须要跟上格里斯伍德的推进速度——但这很难，因为第14军的路线上并没有多少日军反抗，而斯威夫特还担负着把日军重兵集团困在东北部山区，守卫集团军左翼的任务。第14军的第37师沿着林加延—巴延邦道路疾进，根本没遇到敌人，只有一群群欢呼雀跃的菲律宾百姓。该军的第40师则沿着西侧约10英里外平行的13号高速公路向南高歌猛进。而第1军的推进则遭到达莫提斯—罗萨里奥公路沿线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这里，第43师的工兵们还要在敌人密集的炮击下费力清理道路和建造桥梁——在卡巴鲁安山区，第6师遭遇了从一处高大海角上坚固支撑点里的日军射来的猛烈火力。眼见日军向他过度拉长的战线发动反攻的风险越来越大，克鲁格投入了他的预备队，第25师（欠一个团），来增援第43师。

麦克阿瑟在林加延湾的达古潘设立了他最初的指挥所，但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前线附近。他坐着吉普车从长长的行军队列旁开过，士兵们看见这个戴着元帅帽和飞行员墨镜的熟悉身影时，一下子都还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美军并未就固定的进攻时间表达成一致，但麦克阿瑟急于拿下马尼拉，越早越好，这部分是由于他担心被日军关押在城内集中营里的美军战俘和当地人身处险境。他怀疑克鲁格对日军反击的威胁担忧过度了。1月12日，在仍然停泊于林加延湾内的“博伊斯号”巡洋舰上举行的高级指挥官会议上，麦克阿瑟要求他的第6集团军司令加快向马尼拉推进的速度。如果第14军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它就该推进得再快些。他向克鲁格咆哮道：“你的伤亡在哪儿？他们在哪儿？”^[8] 麦克阿瑟还坚持要求尽快占领日本人称为马巴拉卡特的大型航空兵基地——美国人仍然称其为克拉克机场——这样第5航空队就能开始在吕宋岛上起降重型轰炸机了。但是克鲁格仍然担心日军会从东北山区发动装甲反击，他坚持说“我认为向马尼拉草率推

进会 [让第14军] 遭遇敌人的反攻，而且一定会使补给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毕竟所有的桥都被毁掉了”。[9]

日军山下将军的处境也很不妙。美军潜艇和飞机的封锁线有效切断了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联系，因此他无法再指望更多的补给或者增援了。他已经预料到麦克阿瑟会在林加延湾登陆，只是没料到登陆来得如此之快。山下曾经不情不愿地被迫把他最好的部队海运到莱特岛上去送死。但他此时麾下的部队数量仍然可观——吕宋岛上有大约27万名日军部队和其他军事人员——不过他的部队却分散得很广，而且处于陆军和海军的双头交叉指挥之下，难以集中力量。吕宋岛上的大部分日军地面部队都被用来防守三处相距遥远的山区，无法机动。由于缺乏车辆、铁路车皮和燃料，日军的交通线很难发挥作用——菲律宾游击队对道路、车辆和铁路的破袭行动更令日军雪上加霜。大部分日军部队陷入半孤立状态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小部队在乡间游荡，在丛林里渔猎，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山下不得不采取静态防御策略。他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延缓美军向日本本土碾轧的势头。而无论他怎么做，吕宋岛迟早都要落入敌手，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最大的一支日军兵团，“尚武集团”，拥有15.2万人，部署在林加延湾东北面的卡加延山区。山下将军从海拔5 000英尺的度假胜地碧瑶的指挥部里直接指挥这个兵团。第二个兵团占据了马尼拉北面的克拉克机场，并以部分兵力防守巴丹与科雷吉多尔。第三支兵团，兵力约8万人，在马尼拉东边的山区掘壕固守。还有一些小股部队散布在外围区域。山下拒绝了在阿格诺河以西的

平原上反击麦克阿瑟部队的提议，他认为进攻部队会被美军的优势炮兵和空中力量粉碎。相反，他用部队封锁了所有可能通往卡加延山区的道路。其他地方的指挥官则被告知在高地上建立防御阵地，以期“牵制吕宋岛美军部队主力，摧毁其作战力量，同时做好长期自给自足、独立抗战的准备”。

这样，通往马尼拉的道路就敞开了，而且山下也没打算防守这座城市及马尼拉湾。他指示部队将储存在马尼拉沿海区域的6.5万到7万吨补给物资搬运到山区的隐蔽所去，这样就可以用这些物资来保障那里的日军部队。待搬运工作完成后，剩余的守军就要撤离马尼拉，退往城市东边更易于防守的高地上。日军的计划就是如此。

战役第二周，当美军第1军向南面和东面推进时，地形始终对防守一方有利。日军将火炮布置在山岭侧面的洞穴里，阵位都经过了精心选择，令攻过来的敌军深陷多方交叉火力之下。在城镇和路口，日军挖掘浅坑并构筑沙袋掩体，以保护他们的机枪和反坦克炮。在有些地方，他们会把中型坦克的车体半埋起来，露出炮塔，成为固定火炮火力点。日军打起仗来还是一如既往地顽强，美军只有经过恶战才能拿下这些阵地。美军第25师在圣曼努埃尔村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日军第七战车联队在那里发动了一连串装甲反击。美军血战了两个星期才最终拿下了这里，肃清了残余敌军。

麦克阿瑟把他的指挥所搬迁到了马尼拉以北约75英里处打拉市附近圣米格尔的一座制糖厂里。从这个靠近前线的指挥所里，他继续不断给他的前线指挥官施压，要他们加快战役节奏。1月17日，他命令克鲁格进攻克拉克机场，克鲁格把命令转达给了格里斯伍德将军，他的第14军有充足的兵力用来在1月23日到达并跨过班班河。但是就在第二天，格里斯伍德的部队在斯托尔滕贝

格堡以北撞上了日军的坚固防线，在这里，高大巍峨的阿拉亚特山（一座死火山）俯瞰着东面的平原。大西泷治郎将军曾经亲自监督手下在克拉克机场周围建立一系列同心圆防线。他的部队在这里挖掘了战壕和反坦克壕沟，从飞机残骸里把机枪拆下来，重新布置在火力点中；这些人还构筑了多个坚固支撑点来控制延伸向西边山脚下的3号高速公路。^[10]1月27日，美第37师发动步坦协同攻击，砸穿了日军防线，占领了航空兵基地，同时第40师则在斯托尔滕贝格堡北面和西面的艰难地形中拿下了日军的碉堡和坑道阵地。撤走的日军丢下了大量补给物资和武器弹药。在1月29日签发的一份公报中，麦克阿瑟列举了他的战利品，包括“200台全新的飞机引擎，许多无线电收发设备，大量各种装备，足够几个月使用的弹药、粮食和装备，以及超过4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11]

菲律宾游击队提醒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人员，在马尼拉以北约60英里处的甲万那端有一个战俘营。那里的铁丝网里关押着数百名美军战俘。从航拍照片上看，这里的守卫力量很薄弱。于是麦克阿瑟下令采取救援行动。这一任务被指派给了陆军第6游骑兵营。一支来自阿拉莫的侦察队被派去执行这次长达14英里的长途奔袭任务，他们带着轻武器——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榴弹——奉命在丛林中隐蔽前进。战俘营的守卫已经跑掉了，俘虏们实际上无人看管，但是营地附近另外驻扎有数百名日军。1月30日晚8时，侦察兵们向日军营地发动突袭，很快击毙了超过200名敌人，自身只有两名游骑兵战死，一人受伤。

甲万那端战俘营里的许多俘虏们都觉得自己要被日本人杀掉了，此刻，突如其来的解放令他们震惊，甚至都忘记了欢呼。现在他们要在开阔地上步行近10英里撤退，许多病弱难行的俘虏被放进了水牛拖着的牛车。1月31日，游骑兵们和512名被解救的

战俘回到了美军防线。脱离险境的俘虏们被安置在设于一所菲律宾学校里的第1骑兵师野战医院加以照顾。当医生、护士和战争通讯员们想要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许多人都显得有些胆怯、害羞和惊恐。他们在这里尽情吃喝，体重恢复得很快，但是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康复却都需要时间。

在南面，艾克尔伯格将军第8集团军的部队也加入了战斗。1月29日，一支被编为第11军的两栖部队在苏比克湾北部三描礼士海滩登陆。登陆没有遇到抵抗，无论在海滩还是向内陆推进初期皆如此。到了7号高速公路的之字形拐弯处，日军终于拦下了这一路新杀过来的美军。血战几天之后，敌人被剿灭，道路也恢复了通行。第11军通过这个路口涌了进来，夺取了马尼拉湾北部区域，确保了前往巴丹半岛的道路畅通无阻。与此同时，在马尼拉南部，第11空降师的两个团出人意料地在纳苏格布着陆，赶在日军炸桥之前夺取了一座战略意义重大的桥梁。第三个团，第511伞兵团，在塔阿尔湖北岸的大雅台山伞降。就这样，第11空降师夺取了马尼拉湾南部，开始穿过首都南郊向北推进。这支部队起初只遇到了日军象征性的抵抗，直至2月3日攻抵伊姆斯镇。在这里，一支数量不多但意志坚定的日军依托一座石质建筑打了一整天，直到最终一名美军中士爬上屋顶，将汽油倒入房中，再用一枚白磷手榴弹将其引燃。大部分日军都死了，那些试图逃离建筑的人刚一出来就被击毙了。

在北边，麦克阿瑟仍在反复催促克鲁格要快，快，快。他长长的吉普车队常出现在主战线前方，载着他前往前卫阵地面见师、团指挥官。1月30日在圣费尔南多和卡伦匹特之间的道路上造访了第37师之后，麦克阿瑟发电向他的第6集团军司令抱怨说部队“显然缺乏动力和主动精神”。[\[12\]](#)他预计尽早进攻马尼拉将会令城内日军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日本人

将会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就像他，麦克阿瑟，在1941年12月做的那样。他担心被日军关押在圣托马斯大学、比利彼得监狱和洛斯巴诺斯的数千名盟国俘虏以及侨民的命运。12月时，在狭长的巴拉望岛上的一个战俘营里，日本人逼迫150名快要饿死的俘虏跳下壕沟，然后活埋了他们。不难想见，麦克阿瑟急切地想要阻止此类惨剧再次发生。这并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他本人就知道马尼拉城内外关押着许多盟国军民。在打拉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迪克·萨瑟兰将军让战争通讯员们都清楚他和他首长在此事上的立场。根据一份未记录入册的史料，萨瑟兰痛斥克鲁格过于小心，他还说：“如果让我来指挥第6集团军，我们现在已经在马尼拉了。”^[13]

克拉克机场和斯托尔滕贝格堡落入美军手中后，美第14军开始集中兵力向菲律宾首都推进。担任预备队的维恩·D·马奇少将指挥下的第1骑兵师在林加延湾登陆，向南来到一线参战，成为第14军两路南下突击兵团之一。1月30日上午，麦克阿瑟将军造访了马奇将军设在金巴的指挥所，说他期待第1骑兵师能够快速推进：“到马尼拉去，绕过鬼子，把他们打跑，但你要去马尼拉。”在大量吉普车、卡车、坦克甚至是拖车的保障下，整个师沿着5号高速公路疾驰而下。竞争激发了他们的斗志。马奇一心想要赶在鲍勃·贝特勒少将的第37步兵师前面，后者正沿着西侧的3号高速公路向同一座城市赶来。

零星日军部队仍在沿途伏击美军，还有一些美军士兵被敌人狙击手打倒。推进纵队常常停下来卧倒，坐在暴露的吉普车里的人会下车在路旁的灌木丛里寻找掩护，坦克—步兵合成分队则被派往前方去消灭敌人或将其击退。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拖慢了行军纵队的速度。许多桥梁被炸毁了，即便偶尔还能见到一座桥，美军也不得不派出排爆专家仔细检查，确认没有布设爆炸物。当小

股日军向路过的美军车队射击时，美军会以猛烈的火力打回去——步枪、机枪和轻型火炮，常常直接在车上开火。《生活》杂志通讯员卡尔·迈登斯在报道中写道：“我们车队里每个人都用手中的所有武器向敌人火力全开，把他们消灭掉。我们一边向道路两侧开火，一边继续推进。”^[14]在许多地方，进攻纵队会驶离高速公路主路，在土路上前进，或者在牧场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侦察兵们会为重型车辆寻找能够涉渡的“渡口”，长长的吉普车、卡车和拖车车队会从这里穿过，混浊的河水会没过它们的车轴，有时甚至会漫到引擎盖上。渡过安加特河时，水太深，大部分轮式车辆无法通过。美军采取“列车”方式解决了问题：用能够渡河的坦克充当“火车头”，后面拖着一长串卡车和吉普车从河里开过去。不过这些车辆过河后得停放一个小时，在太阳下晒干发动机。

[illegible]

穿过村庄时，美军受到了大群菲律宾本地人热烈的欢迎。光着脚丫子的小孩子们跟在吉普车和卡车的旁边跑，兴高采烈地挥着双手。大人们则把帽子举过头顶，高兴地挥舞着。房屋和公共建筑顶上都升起了美国国旗。菲律宾游击队则打着美国和菲律宾的旗帜列队受阅。比尔·邓恩回忆道，在小城巴利瓦格，第1骑兵师遇到了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他们挤满了街道，呼喊，歌

唱，在我们的纵队旁跳舞，对仍然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直到道路上水泄不通为止。在城中心，我们的吉普车被彻底围住了，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刚停，女人和小孩们就向我们抛来鲜花，还挤过来和我们握手。队伍里每一辆车都是如此”。[15]民众向美军送来了水果、鱼、鸡蛋和烤山药。两位菲律宾年轻人爬上了教堂的尖顶，用石头敲响了那里的大钟。马奇将军的“飞行纵队”完全动弹不得了，直到当地警察和部队设法让民众离开了街道，美军才得以继续前进。

考虑到城内近100万人口的卫生和饮水问题，美军指挥官采取措施，控制了马尼拉的供水系统。第14军受命夺取城市北郊那些重要的水库、水坝和高架水渠——诺瓦里切斯水坝、马里基纳水坝、巴拉拉的滤水设备，以及圣胡安水库。美军指挥官同样打算夺取主要的电力设施，包括帕西格河中普罗维瑟岛上的蒸汽发电厂。

2月3日，第1骑兵师抵达了图拉汗河北岸的诺瓦里切斯。一个先头中队赶在日军爆破之前抵达了河上的主要桥梁并跨了过去。在激烈的交火中，一名海军上尉兼排爆专家冲到桥下切断了导火索。这一英勇举动挽救了桥梁，为美军赢得了至少一天的时间。渡过河流之后，这个师遇到的抵抗便十分轻微了。当天下午稍晚时候，骑兵们在与3号高速公路交会的路口与第37师会师。2月4日，两个师并肩扑向马尼拉市界。

美军三个营开过去包围了圣托马斯大学，这座被围墙围起来的校园现在已经成了关押着大约4 000名西方平民的集中营，被称为“巴丹天使”而广为人知的美国陆军的护士们也在其中。一辆谢尔曼坦克撞开了校园大门，一个步兵营随即冲了进去。日军林俊雄中佐手下的守卫们并不打算和美军死战。打了几枪之后，林中佐发出信号，表示愿意释放大部分在押人员。于是超过3 000

名面容憔悴却兴高采烈的西方平民开始从学校大门走出来。但林还是命令剩余221名俘虏集中到校园中央的一座大楼里，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人质，来交换自己人的生存。由于担心日军屠杀囚犯，美军指挥官同意停火并进行谈判。林同意释放囚犯，作为交换，美军要保证他的人安全到达日军防线。于是太平洋战争中仅见的一幕出现了：林带着他的看守们直接在数千名虎视眈眈的美军注视之下走出大楼，从大学正门逃离。那些刚刚解放的平民俘虏向这些列队行进的日本人恶语相加。“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一边大声挖苦他们，一边跟着他们穿过营房——女人们的声音尤其刺耳——直到日本人走出校园，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为止。”^[16]但是协议还是得到了遵守。双方都没有开枪，林的人获准向南走去，他们将去那里和日本地面部队主力会合。离开时，所有日军官兵都向美军敬礼或鞠躬。^[17]

当天下午稍晚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来到了圣托马斯。大群心怀感激、泪流满面的人立刻围住了他。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他向认识的人打了招呼。有些小孩子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三年，已经不记得战前的生活了。“有一个人抱住我，头靠在我的胸前失声大哭，”麦克阿瑟回忆道，“这是个终生难忘的美妙时刻——不是作为杀人者，而是作为救人者。”^[18]俘虏们讲述的事情坚定了麦克阿瑟加快解放各集中营的决心。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分配给俘虏们的食物锐减，许多人已经濒临饿死。CBS无线电台的通讯员比尔·邓恩说，如果解救者30天后再到，“其结果可能就会是彻底的悲剧”。^[19]

当美军部队向马尼拉北部的建筑密集区推进时，城市上空腾起了滚滚浓烟。撤退的日军在城市北部的商贸区点燃了上百处大火。由于缺乏理想的引火工具，他们的点火方式就如同二流的纵火犯一般，用的是火药、火柴以及装在5加仑油桶里的汽油。整

个城区被火焰吞没。城市西边海湾旁是住满居民的敦洛区，那里密集的灰泥房屋是木质结构，如同火毯一般一点就着。第14军在报告中写道：“烟尘浓密，燃烧的建筑向外散发着高温热浪，我们一步也前进不得。”^[20]悲惨的难民们沿着主要道路向北走来，从相向而行的美军士兵身旁经过：年轻的妈妈怀抱着婴儿；整个家庭拖家带口，把财产堆放在马车上；小孩子沿路向美军士兵索要吃的和香烟。还有趁火打劫的人忙于从燃尽的废墟和被主人抛弃的房子里劫掠一切有点价值的东西。

格里斯伍德将军派出第5骑兵团第2中队前去夺取奎松桥，这是帕西格河上的最后一座桥梁，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然而在奎松大街和阿兹卡拉伽路的岔路口，古老的比利彼得监狱和远东大学的高大楼宇之间，美军陷入了猛烈的机枪和反坦克炮火力之下。突击中队被来自多个方向的致命交叉火力压制，这些火力来自大学建筑高层的窗户、街道南面的一处沙袋掩体，以及一处临时的街垒，这个街垒由四辆拴在一起的废弃卡车组成，由钉入路面的钢质栅栏保护。美军迅速撤了回去，准备带上援军再来。与此同时，第1骑兵团的其他部队沿着帕西格河北岸肃清了东面的街道和街区，占领了马拉干鄢宫。

在敦洛区，前进的巡逻队看到了一幅平民遭屠杀的悲惨景象。医疗队的霍伯特·D·梅森发现一家香烟厂的地板上横卧着49具尸体，其中有许多是女性，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孩子。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许多人都是被刺刀或者武士刀杀死的。^[21]在相邻的戴帕克贮木场，美军士兵找到了115具遇害平民的遗体。小孩甚至是婴儿都被砍了头。在一份提交给战争罪法官的呈堂证供中，戴维·V·宾克利少校描述了他看到的一个场面，似乎是一个妈妈试图保护她的两个孩子：“一位妇女面朝下，双臂各抱住一个孩子。她被军刀类型的武器砍杀。一个孩子被劈掉了一部分脑

袋。”^[22]

当美军部队接近马尼拉时，那些伪装成普通马尼拉市民而在城区自由出没的菲律宾游击队员揭竿而起。他们伏击日军部队，破坏装备，炸毁卡车和铁路车厢，切断电话线，并把宝贵的情报递送给打过来的美军，包括日军碉堡、军械库和雷区的位置。游击队开始大胆地直接从马尼拉向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电告情报，甚至常常用英文明语。日本人能截获这些无线电通信，却很少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在中国、马来亚和其他占领区，日军奉行“三光政策”，会将怀疑支持游击队或敌军的整个村庄屠杀殆尽。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菲律宾日军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对无辜民众的暴虐和残忍。现在，面对即将战败的耻辱，眼看着普通菲律宾人逐渐显露出兴奋的情绪，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兽行便随之而起。

在马尼拉北部的袋形区域里，零星而断断续续的交火仍在持续，机枪射击的嗒嗒声随处可闻。但是到了2月6日，事情就明朗了。日军只是在进行迟滞作战，以掩护他们渡河南撤。美军的步坦协同分队费了很大力气，逐个街区甚至逐屋肃清残敌。当天下午，美军再攻奎松桥，这次他们得到了坦克和重炮的支援。但是日军边打边撤退，过桥后将其引爆。这导致第1骑兵师停住了脚步。现在帕西格河上已经没有桥了，他们无法让卡车和坦克直接过河。推进不得不暂停，等候新的计划制订出来。

与此同时，比利彼得监狱里的一千名盟军战俘被救了出来，其中许多人都是1942年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被俘的军人。俘虏们走出这群建筑时，麦克阿瑟来了。“这群备受折磨的人骨瘦如柴，当我从他们的队伍旁缓缓走过时，周围的每个人开口都有气无力，声若游丝。他们说，‘你回来了’，‘你做到了’，或者是‘上帝保佑你’。我无言以对。‘我来得有些迟了，但我还是来了。’”^[23]

在南面，第11空降师夺取了尼科尔斯机场，正在向马尼拉南区挺进。马尼拉已经被来自南北两面的优势兵力包围，两个方向的进攻者都已经攻入了市界，仅仅遭遇了零星抵抗。第14军已经冲进了马尼拉，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赶在盟军战俘和被囚平民为日军所害之前救出他们，同时夺取城市的供水系统。该军的两个师以相当不错的速度和效率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突然拿下了帕西格河以北的整个城区之后，格里斯伍德将军一时判断不清河对岸还有多少敌军，或者他们是否想要决一死战。在此情况未明之时，麦克阿瑟将军决定宣布胜利。仍然远在马尼拉以北的圣米格尔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签发了一份声明，暗示马尼拉之战已进入收尾阶段：“我军正迅速肃清马尼拉之敌。我们的各路大军……已经进入城内并包围了日本守军。他们即将彻底毁灭。”^[24]第二天，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收复马尼拉的捷报。麦克阿瑟的幕僚们已经开始计划在市中心举行胜利阅兵了。然而实际上，未来还将有一个月的苦战等着他们。

这一草率的声明令下属前线指挥官恼火不已。这已经不是麦克阿瑟的宣传工作第一次抢跑了。格里斯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麦克阿瑟是个“媒体疯子”。艾克尔伯格稍微委婉一些，说这份声明“不妥”。这些人还面临着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巷战，他们不喜欢被告知自己仅仅是在“肃清残敌”。^[25]

马尼拉是一座对比感强烈的城市，融合了古老和现代，富裕与贫穷，壮美和破败，亚洲和欧洲。许多人认为这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这是一座大学城，拥有超过12座世俗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城内多座现代化医院提供了当时亚洲最好的医疗服务。日军

入侵之前，这里曾是银行业中心和贸易中心，各大顶级跨国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主要办事处。这里有宽阔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公园，顶级的酒店，宏伟的公共建筑，宽敞的露天广场，还有许多尖顶的哥特式教堂。马尼拉带着西班牙式的风格，拥有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式的优雅和壮美。

第14军占领了帕西格河北岸那些高大的写字楼和居民楼，随即在高层和屋顶上建立了观察所。格里斯伍德的指挥所设在一座被部分焚毁的酒店8楼，向南一览无余。天际线上，浓烟不散，遮天蔽日。城市在燃烧，南面和北面都一样。大火在蔓延，炙烤着死去士兵和平民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人肉被烤焦的气味。夜晚，各色教堂的穹顶和尖顶被一丛丛火焰罩上了一层鬼魅般的古铜色亮光。日军的防御阵地把首都的几座主要政府建筑围在其中，包括立法会、财政部、农业部、市政厅、邮政总局、马尼拉警察局，以及城市供水区建筑。这些巨大的新古典派建筑用钢筋、砖石和混凝土建造，设计要求能够抵御大地震。日本人把它们改造成了堡垒，门窗都用沙袋堵上，火炮和迫击炮就架设在屋顶。

通过望远镜观察了这些防御设施后，格里斯伍德将军得出结论，他的部队面临着漫长而残酷的战斗。和往常一样，日本人会血战到底，挽救城市难如登天。如果麦克阿瑟还想要不流血拿下城市，那纯属痴心妄想。“他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事实，随着他们系统地破坏这座城市，每晚天空都被烧成红色，”格里斯伍德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也不知道敌人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和炮兵火力正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依我看，鬼子会死守帕西格河以南的部分马尼拉城区，直到全部战死。”^[26]

帕西格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河流，而是连接内湖和马尼拉湾的一处平静河口。它的河床很深很宽，是城市中央的一个“裂

口”，“河面”常常位于城市地面20英尺以下。先前有6座桥横跨帕西格河，但全被日本人毁掉了。第14军将不得不乘舟渡河。这是又一场两栖登陆，只不过是在亚洲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

山下将军已经从北方山区遥远的指挥部里发出命令，要求日军在将成堆的补给物资和弹药全部摧毁或搬走后撤出马尼拉。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无线电通信不畅、时间紧张、多头指挥、军种竞争等等，这些指示并未得到执行。当地的交通状况严重恶化，导致能够搬到山区的物资少之又少。日军马尼拉守备司令岩渊三次海军少将于是提前启动了预案，摧毁所有可能资敌的设施，包括码头、仓库、工厂、储油罐和发电站。城市的港区凿沉了不少废船，以免美国船只靠泊。甲米地海军基地所有的建筑和设施都被烧毁或炸掉。2月3日的一份命令特别指出，破坏时要小心，如果可能的话要尽量保密，“这样这些举动就不会惊扰民众，或者被敌人用作反宣传的口实”。^[27]此后，日军的各种报道都将爆炸和大火归咎于美军的飞机和炮火，抑或是菲律宾游击队。

司令部设在马尼拉东面山区蒙塔尔万的横山静雄中将是山下的下属。但是他要求自己的手下坚守马尼拉：“他们必须拿起武器，为从瓜达尔卡纳尔以来战死的无数战友报仇，而且必须拦住万恶的敌人向北推进的计划……我们必须相信神力，直至最后一刻。”^[28]山下可能都不知道横山会下达与自己的意图完全相悖的命令，还有迹象显示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菲律宾首都还留有日军。但是当菲律宾伪总统何塞·P·劳雷尔请求山下像1941年麦克阿瑟那样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时，山下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会有损于日本军队的“武德”。^[29]

至于海军的岩渊将军，他看起来压根就没想过要离开马尼拉，而无论命令如何。他曾是“雾岛号”战列舰舰长，两年多前这

艘战列舰在瓜岛海战中被击沉时正是在他的指挥下。他有些僚友觉得他在那场战斗后活下来是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这或许就能解释这位海军将领为什么会决意率部死守，直至被敌人淹没了。若能在马尼拉之战中“玉碎”，便可洗雪他的耻辱，或者向美国人索回代价，或者二者兼有。他手下的马尼拉海军守备队拥有四个大队的海军基地部队，四个暂编步兵大队，以及一批杂七杂八的陆海军部队，总共有大约1.6万作战人员。岩渊似乎是以还有设施需要摧毁为理由逗留在马尼拉市内，等到美国人来了，那就想撤退都撤不掉了。逗留期间，他监督了帕西格河南岸老城区中心坚固支撑点的建设。街道上布设了路障和钢质拒马，废墟下方的路面上埋设了地雷和诡雷。河南岸用砖石构建的古城令人畏惧，这里又被称为“王城”，日军在此密密麻麻地建造了地道、碉堡和炮兵阵地。日军将会逐个街区、逐个建筑甚至逐个房间地死守此地；不会有撤离，不会有投降，也不打算生还。

第一支渡过帕西格河的美军巡逻队遭遇了日军从古城巨大石墙背后打来的密集的迫击炮和轻武器火力。因此格里斯伍德决定让他的第14军进行侧翼机动，在更靠东的地方渡河。2月7日拂晓，第148步兵团的两个营在马拉干鄢宫和圣米格尔啤酒公司之间的地段渡过帕西格河。他们发动正面进攻，占领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南岸护坡。击退了日军的凶猛反击之后，美军在河南岸站稳了脚跟。随着更多部队渡河，他们开始迅速扩大地盘。第1骑兵师的部队紧随其后。他们计划向南进攻，打到原本安静祥和的潘达肯和帕科居民区，然后向西攻打“王城”。

与此同时，第129步兵团一部进攻了帕西格河中间的普罗维瑟岛，这里是马尼拉最大发电厂的所在地。一支日本守军已经将厂区改造成了堡垒。接下来便是3天血战，双方在电厂昏暗的内部展开了逐屋争夺。285名美军在战斗中伤亡，其中包括35人战

死，10人失踪。电厂的汽轮机在战斗中被彻底毁坏，这样马尼拉的大部分城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都不会有电了。

2月8日，潘达肯和帕科燃烧的街道上爆发了激战。这一区域里的日军边打边退，撤入了帕科火车站，一座建于1915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宏伟建筑。^[30]美军第148步兵团封闭了火车站周围的包围圈。三个日军精锐中队则在车站精心构筑了防御工事。机枪阵地、反坦克炮和重型迫击炮都得到了沙袋掩体的保护。碉堡控制了所有街道入口的杀伤区。美军野战炮一寸一寸地摧毁着这座壮美的老建筑，而日军也在不断恢复实力，他们的增援部队会步行溜过美军防线进入车站。美军B连的一个排在火车站以北约100码处被压制在宽阔的大街上。两名列兵，“奇科”克莱托·罗德里格斯和小约翰·N.里斯，迎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冲了上去，在距离车站约60码的一处房屋里找到了隐蔽处，随即二人交替掩护，推进到距离最近的碉堡30码之内。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战斗中，二人打得很好，杀死了大约35名日军，打伤了更多。眼见弹药不足，他们便边打边撤，回到了美军防线。里斯不幸被日军机枪点射击中身亡。当天深夜，他们的营向火车站发动总攻，消灭了周围所有残余敌军。美军认可了两名士兵的杰出表现，罗德里格斯和里斯双双荣膺国会荣誉勋章。

当美军部队转向西边，朝“王城”推进时，他们遭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几场巷战。他们途中遇到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处半垮塌的废墟，都需要进行搜索和肃清残敌。他们碰到了各种难啃的防御设施，包括用钉入路面的钢筋加强的路障，翻倒的卡车和汽车，成堆装满碎砖石的油桶，一圈圈带刺铁丝网，以及反坦克、反步兵地雷。混凝土碉堡把守着通向这些障碍物的通道。日军还在楼宇的屋顶和高层布设了狙击手。美军步兵们以各种小分队战术向前推进，摧毁这些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

美军探出了每一枚地雷的位置并标绘在地图上，之后用谢尔曼坦克或者半履带车拖着铁链把它们扫出来。轻型迫击炮发射烟幕弹遮蔽敌人的视野。当步兵班冲上去，在近距离内用手榴弹、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攻击碉堡时，机枪会为他们提供火力压制。当一支小队进入一栋房屋或楼宇时，他们会首先冲上屋顶和顶层，再沿着楼梯向下仔细搜索每一间房间。如果房间里可能有敌人，他们就会先投掷手榴弹开路，或者向屋内喷火，把敌人活活烧死。若要进入房屋，他们会在墙壁上炸开洞而不是走门。如果敌人的抵抗过于激烈，他们就会撤出来，然后用火炮和爆破器材将整个建筑炸垮。

战至2月12日，日军最后6个主力大队（4个海军大队，2个陆军大队）被挤压进了一处大约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这片区域北临帕西格河，一边从卢纳、帕科市场和帕科河向东，另一边从波洛俱乐部延伸向南面的海湾。此时，位于麦金利堡和尼科尔斯机场之间的日军防线在美第8集团军的持续重压之下业已崩溃，当地残余的日军被分割在孤立的包围圈内。“我们奔赴马尼拉的途中满是毁灭和混乱，”第11空降师的爱德华·弗拉纳根写道，“在通往马尼拉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两旁，房屋和商店都被美日双方的炮火击碎。铁皮屋顶的房子就像是被巨大的开罐器划过一般，而那些原本奢华的豪宅也只剩下焦黑的烟囱和一堆废墟。”^[31]

然而，马尼拉战役中最艰难的战斗还没有到来。敌人的防御圈中还有几座马尼拉市的主要政府建筑，其钢筋混凝土外墙只有用最重型的花炮才能轰开，所有的门窗阳台都被用沙袋封上，火力点封锁住了所有的道路。这些建筑周围是宽阔的广场、公园和街道——这意味着进攻的美军步兵不得不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冲过开阔地才能接近建筑。每一座建筑周围都守着一圈隐蔽良好、

可以相互支援的暗堡。建筑物内部的走廊、楼梯和房间都被堵上了沙袋和各种家具，只在顶上留出几英尺的空间，以便向攻过来的对手投掷手榴弹。这些坚固支撑点共同组成了西班牙古城的日军防线的外围阵地。

为了保全城市，包括其建筑和居民，麦克阿瑟严格禁止空袭马尼拉。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限制使用重炮；在战役初期，美军重炮仅限于执行反炮兵任务和“向已知的敌人坚固据点进行目视射击”。^[32]但是敌人令人生畏的防御令美军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别无选择。随着伤亡率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回到早已烂熟的老路上，一发现敌人火力，就把整栋楼轰平。当步兵在市中心迎着日军坚固的防御推进时，持续的重炮轰击夷平了整片整片的街区。难民从受到攻击的区域涌出，穿过美军防线，拼命想要去往安全地带。

有些大型建筑可以孤立和绕过，但另一些大楼则必须彻底摧毁，才能让美军部队安全通过。它们遭到了105mm和155mm榴弹炮的炮击，直至被一点点夷为平地。第148步兵团的团长告诉记者：“我看不到保住马尼拉那些著名建筑的希望。这是一场全面的炮战，你知道这对城市意味着什么。”^[33]坦克开到极近的距离上，用火炮进一步摧残这座城市。迫击炮弹如雨点般砸向建筑的外墙和下方的拱廊商业街。最终，这些高大建筑物的结构完全被毁，屋顶坍塌。步兵班随后通过墙上的洞进入楼内（不能走门，那里会有步枪、机枪和诡雷守卫），杀死所有残余的敌军士兵。

帕西格河北岸的花旗银行大楼被用作炮兵观察所。军官们拿着望远镜在这里观察他们炮弹的落点，并且与地面和空中观察机上的观察员对话。他们把城市地图摆放在桌子上，把坐标发送给炮手们。在6楼的一间套房里，记者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吃

着小点心，喝着冰啤酒。看着老城区中心毁灭的场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断摇头。马尼拉的主要地标在大毁灭中一栋接一栋地坍塌。日本人将菲律宾本地人驱赶到战略性建筑的墙外，可能是希望拿他们当作人质。但美军的炮火并没有回避他们。被称为“长汤姆”的155mm重炮，能够把95磅重的炮弹发射到最远9英里外。通讯员约翰·多斯·帕索斯被这种武器射击时的巨大冲击波震撼了，即便是在数百码外：“每次‘长汤姆’射击时，那感觉就像是头上挨了一记棒球棍。”^[34]无线电播音员比尔·邓恩认定自己的耳膜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他写道，从那一天之后，他就“越来越听不见了”。^[35]

2月16日，在哈里森公园和拉萨尔大学附近的黎刹纪念棒球场爆发了激战。美军火炮在右外场附近的外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谢尔曼坦克随即开进了已经杂草丛生的外场，第5和第12骑兵团的步兵们猫着腰，紧随着坦克向前推进。三四个装备精良的日军中队在本垒和一垒线后方构筑了支撑点、堑壕和交通壕。所有的门窗都堵上了沙袋，墙上也开出了射击孔。攻方部队跟随坦克攻进了内场，用迫击炮和“巴祖卡”火箭筒射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至所有的日军都被击毙为止。

日军接到命令，要阻止难民涌向美军防线。于是日本兵们彻底摧毁了所有可能载人渡过帕西格河或进入海湾的大小船艇。古城的全部四座拱门都设置了岗哨。当马尼拉之战进入尾声，日本兵们开始抓捕全城的平民。首当其冲的是成年男子和十一二岁以上的男孩。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和侨民被当作人质来对付美军空袭。这一野蛮举动倒也达到了效果，因为麦克阿瑟始终拒绝用飞机轰炸马尼拉。然而最后，长时间的大规模炮击却也干了那些原本要由轰炸机来干的事情。没人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马尼拉之战中，但这个数字一定是巨大的——可能超过10万人。有些人

葬身于他们的居所、藏身地，以及监狱的废墟之下，但更多的人则在一场恶劣程度在20世纪位居前列的兽行中被日本兵杀害——同样，数字已无法统计。

大规模屠杀的命令被手写下来发给了日军部队。随着美军越过帕西格河，日军对“游击队”的抓捕和处决愈加随心所欲。战场上缴获的文件证明了这场大规模的“处理”。一名日军士兵的日记被翻译了出来，并呈送到战后的审判庭上，其中记载了如下文字：

1945年2月7日：今晚处理掉了150名游击队员，我本人刺死了10人。

2月8日：看守1 184名今天新抓来的游击队员。

2月9日：今晚烧死了1 000名游击队员。

2月10日：看守大约1 660名游击队员。

2月13日：敌人坦克出现在万岁桥 [琼斯桥] 附近。我们的攻击准备业已完成。我现在负责守卫游击队集中营。我执勤时有10个游击队员想要逃跑，结果被全部刺死。16：00，所有游击队员都被烧死。[36]

2月13日，岩渊将军指示他的部队杀死日军防线内的所有平民：“连女人和儿童都已经成了游击队员……除了日本军人、日本平民和特别建设队外，战场上的所有人都要杀掉。”[37]两天后，一支马尼拉海军守备队下达了更详细的指示，他们还关注了节约人力和弹药的问题。日军应该把待杀掉的平民集中驱赶到房屋或大楼里，随后将它们烧掉或者炸掉。这会使处理尸体的“麻烦事”不那么棘手。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应该被扔进河里”。

2月11日到15日，腥风血雨愈加凶暴。大规模的屠杀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劫掠、纵火、强暴、酷刑和肢解，在教堂、大学、旅馆和医院里，暴行无处不在。城中的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精英们境遇格外悲惨，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各国侨民也是一样。有些家庭被杀尽。屠杀队向所有曾经穿过警服或军服的人，以及曾向西方囚徒或战俘表示过同情的人痛下杀手。

马尼拉许多最著名的宗教、医疗和教育设施成了战争罪行的发生地。教士、修女和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被杀死在他们的教堂里、圣坛上。数百平民被驱赶到圣托马斯街和卢纳将军街交叉口的教堂里，成群醉醺醺的日本兵在走廊和教堂的长椅间横冲直撞，用刺刀刺杀无辜平民，把年轻女人和女孩从哭天抢地的家人旁强拉出来，拖到附近的小教堂里施暴。根据弗朗西斯·J. 科斯格雷夫神父的证词，在拉萨尔学院的一处讲堂里，20个日本兵冲进来，“开始用刺刀捅刺我们所有人，男人、女人、儿童都一样”。死者和伤者在台阶下方堆成一堆，其中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幼儿。一位妇女的乳房还被割掉了。日本人离开了一个小时，能听见他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喝酒。后来他们回来了，“向悲惨的受害者狂笑，极尽侮辱”。科斯格雷夫被捅了两刀，血流不止，但还是爬到濒死者身旁，做临终祷告。他还特别肯定地指出，有些受害者“还在祈祷上帝原谅那些害死自己的人”。[39]

沃尔特·方克尔是菲律宾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们夫妇和另外6个人被关进一所房间，里面又被灌入汽油时，他吻别了妻子。妻子被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我由衷庆幸深爱的妻子没有遭受烈火灼烧之苦”。[40]日本人离开后，方克尔博士和屋里的另一个人设法逃了出来。在圣保罗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卡耶塔诺·巴拉奥纳试图在一伙日本兵开始捅刺里面的所有人时保护家人。

一个日本兵把一个男婴从母亲怀里抢过来抛向空中。“另一个日本人拿着上好的刺刀过来，刺中了婴儿腹部的正中央。”巴拉奥纳说。他惊恐地看见那个婴儿没有立刻死去：“我能看见那个婴儿的手臂还在摆动。”^[41]

在菲律宾总医院，大约7 000名平民被赶入病房和走廊充当人质。晚上，喝醉了的日本兵挤进人群，用手电筒照亮人脸，并把年轻的女人和女孩拖出来强暴。甚至直到医院遭到了美军火炮和坦克的攻击，墙壁开始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身旁坍塌时，暴行仍未停止。在圣保罗学院，日军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女性在刺刀的逼迫下穿过街道，来到杜威大街的湾景酒店。她们瑟瑟发抖，抽泣着，相互搀扶着，被迫走上楼梯，来到三楼。她们每15人至20人被赶进一间客房，坐在地上，一待就是几天，没有食物和水。日本海军的人一次次闯进房间，检视每个女子，被选中的人就被拖到酒店其他地方强暴。于是女人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貌不惊人，或者遮蔽自己的脸。“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名受害者回忆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哭，想要躲进床垫和帘子下面。”^[42]

马尼拉的德国人作为轴心国的公民，在三年的占领期间并未受到打扰。当美军逼近时，许多人都在埃尔米塔区的德国俱乐部避难。但是如果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籍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日军侵害，那他们就错了。2月10日，一个分队的日本兵冲进俱乐部。里面的人义正词严地说自己是盟友。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还站出来请求放过，或许她觉得孩子可以消解入侵者的兽欲。但是一个日军用刺刀捅穿了婴儿，刺进妈妈的身体。其他人则开始把年轻女人从家人身旁拉出来，撕扯她们的衣服，把她们拖走。俱乐部随后被放了火，人群恐慌地涌向大门，却发现大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住了。

在伊萨克·佩拉尔街的红十字总会，大门向所有国籍的难民敞开，并承诺提供庇护和医疗。楼里的每一处走廊、房间和楼梯，地上都坐满了难民。2月10日，一队日本人来了，要求看被收容者名单，对红十字会依照国际法提供庇护的解释毫不理睬。当天早些时候，大群日本兵涌了过来，从前门和后门同时进入楼内，用子弹、匕首、军刀和刺刀肆意杀人。一名站出来要和指挥官对话的注册护士被当场杀死。一个妈妈想要挽救她被刺刀刺穿腹部的幼小女儿。“我努力想要把她的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43]婴儿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日本军队逐渐升级的恶行中可以看出一种熟悉的模式。起先，在美军进城前，他们也很残暴，但还算是纪律。小队日军会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到一户人家或者营业场所，要求了解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和年龄，并把这些信息记录在小本子上。一两天后他们可能会回来，解释说他们在奉命搜查游击队和禁运品。士兵们可能会把在橱柜或抽屉里找到的值钱东西装进口袋，但不会伤害屋里的人。第三次他们可能就要抄家了，还会厚颜无耻地公然劫掠。搜查过程中女人会遭到猥亵，男人和大一点的男孩可能会被绑走。第四次来就是强奸了。当美军进了城，远处的炮声已隆隆可闻时，日本人变得愈加满怀仇恨和恣意妄为。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轮奸也更加常见。到了战役尾声，当美军接近日军防线，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时，暴行便更加疯狂和骇人听闻。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强奸和杀害女性，还一定会残害她们，割下她们的乳房，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然后点火烧死。幸存者还报告有人奸尸。有时这些杀人者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恶，可能会把罪行所在的房屋或大楼烧掉。到最后阶段，美军已经很近了，这些日本人反而更愿意展示他们的恶行——例如把平民们遍体鳞伤的无头尸体挂在路灯柱上。

马尼拉大屠杀揭示了日本军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变态的部分。这是“决不投降”原则显而易见的阴暗面，揭示了日本人在所谓“玉碎”光环下极其邪恶的内核。岩渊部队的官兵们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们还被直接命令要处死防线内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下达命令的军官们的权威是神圣不容置疑的。许多人还被告知要用刺刀，或者把受害者活活烧死，以节约弹药。在这样的噩梦之下，备受恐惧和憎恨煎熬的日本兵变得狂暴，放纵自己犯下了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野蛮罪行。

横山将军从他设在蒙塔尔万的振武集团司令部里要求岩渊将军趁还来得及赶紧突围。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岩渊6个大队的残部已经遭到了四面包围，不得不在雨点般的大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之下躲进他们的碉堡、楼宇和隧道内。美军第37步兵师从北面逼来，第1骑兵师从东面打来，南面则是第11空降师。几乎所有残余的日军火炮都哑了火，要么是因为火炮本身被摧毁或缴获，要么是因为弹药耗尽。在2月15日的一次无线电通信中，岩渊将军向横山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司令部不能动……很明显，我们一旦移动，就会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掘壕固守，就能再坚持一个星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坚守所有的阵地，用一切手段重创敌人。固定阵地是我们强大的优势，如果我们动了，就会弱化。因此，我们将尽可能持久地坚守，然后用所有力量发动决死冲锋。给您添麻烦了，感激不尽。[44]

随后岩渊向碧瑶的司令部发电：

由于预计通信可能中断，我特此向您发电。我对属下部

队的众多伤亡和由于我的无能而未能尽职深感羞愧。战士们都已在战斗中竭尽所能。我们很高兴，感谢有机会在圣战中为国尽忠。现在，残存的部队仍将勇敢地与敌战斗。“天皇陛下万岁！”我们已决心战至最后一人。[45]

仍有大约2 000名日军在古城高大围墙后的预设阵地中设防。这座西班牙人建于16世纪后期的高大石头筑垒周长大约2.5英里，高25英尺，厚度从10英尺到20英尺不等。这里的城墙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墙很相似，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常见的那种——但在太平洋的岛群中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城墙原本有护城河环绕，但护城河早已干涸，而且被改造成了城市公园和9洞高尔夫球场。四座拱门全都构筑了坚固的沙袋掩体，日军在这里架设了机枪和反坦克炮。日本人在这些古老的砖石构造上挖出了火炮掩体和隧道，并与其他防御设施连接到了一起。

在这些围墙内是数千名快要饿死的平民人质，许多人都被塞进了河床下的古代地牢，另一些人则被当着攻城美军的面吊在了外墙上。美军有大喇叭广播劝降，观察机还投下了传单，但无人响应。2月23日上午，第14军做好了进攻“王城”的准备，显然，美军将不得不正面强攻这座堡垒，并与守军血战到底。

格里斯伍德再次请求空袭，再次被驳回。看起来麦克阿瑟仍然指望日本人会良心发现，保留下他挚爱的老城区。然而，美军再次拖来大量重炮，干了原本应该轰炸机干的事情。2月23日早晨7点半，超过100门105mm和155mm榴弹炮打出了太平洋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密集弹幕。有些火炮被布置在约300码距离的近处，以低伸弹道射击。在一小时内，美军火炮和坦克打出了总共7 896枚高爆炸弹。[46]整个“王城”被遮蔽在了一片浓烟烈火和尘土之中，就像是皮纳图博火山在马尼拉市中心爆发了一样。《纽约

时报》通讯员乔治·琼斯描述了“巨大的黑色烟柱，如雨点般落下的碎片和弹片。空中满是烟尘，古城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透过浓重烟幕唯一可见的只有炮弹爆炸时的闪光”。[47]

在圣地亚哥城堡的地下室里，日军奉命屠杀了所有仍留在地牢里的囚犯。许多人被用匕首、军刀、刺刀和子弹杀害。大一些的监牢里满是几天没吃没喝的囚犯，日本兵把汽油通过牢笼灌了进去，然后点燃。据后来找到的一名日本海军大尉的日记记载，岩渊将军要求他最后残存的部队在战斗结束前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如果我们子弹用尽，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军刀劈倒敌人；如果军刀折断了，就用牙咬断他们的喉咙，杀死他们。”[48]

上午8点半，炮击结束，烟尘散去，大片老城区已经化为堆积如山的废墟。第145和129步兵团的部队联手发动进攻，士兵们爬上废墟，向对面的街道开火，然后冲了过去。装甲推土机开了进来，为谢尔曼坦克清理出一条通道。大约100艘冲锋舟冲下帕西格河的泥滩，渡河来到对岸。炮兵火力在河流和城墙之间的砖石护坡上炸出一级级“台阶”，让部队得以爬上护堤。美军以排为单位，向前投掷烟雾手榴弹以遮蔽敌人视线，然后以纵队从城墙的缺口处冲了进去。[49]

当进攻部队来到堡垒中央迷宫般的狭窄街巷中时，机枪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像爆豆般响了起来。士兵们再次祭出了曾在东边城区施展过的巷战战术。他们控制着节奏，关注点在于减少自己的伤亡，而不是迅速获胜。

农业部大楼野战司令部里的岩渊和他的主要幕僚，据信在2月26日拂晓前自杀身亡。

有些敌军仍然据守在圣地亚哥城堡下方的地下室和地道里。

于是美军用大量炸药封住了这些地下通道的入口，接着向地道内灌入汽油，扔进去白磷手榴弹，将其内部化为窑炉。

直到最后，麦克阿瑟看来都不愿相信发生在马尼拉的惨剧。2月7日至19日，他待在打拉的司令部里，只来首都短暂地看了看。即便在目睹了北部城区的灾难，并面对着河南岸已无可置疑的烈焰和毁灭之后，他仍然在向同僚传达乐观的态度。他不允许他的媒体部门在几乎每天一次的公报中描述这场战斗和屠杀的全貌，这或许是由于他先前过早宣布的胜利令他陷入尴尬之中。在逼迫他的前线指挥官加速占领城市的时候，麦克阿瑟却忽略了日军已在老城区坚固设防的迹象。

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最终在2月23日进入已成废墟的首都时，他的装甲车队来到了他战前在马尼拉饭店的住处。这座曾经壮美的地标建筑已经被大火吞噬，大片外墙已经坍塌，露出了残缺不全的高层客房。在冲锋枪手的伴随下，麦克阿瑟走上满是废墟的楼梯，来到了自己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他发现这里被火烧过，堆满垃圾。门厅里还躺着一个日军大佐的尸体。他的财产无一幸存。他那规模庞大的军事史藏书全部丢光了。日本前天皇送给他父亲的一对古董花瓶也碎了一地。“这真不是个愉快的时刻，”麦克阿瑟回忆道，“我深爱的家毁了，这令我痛苦万分。”^[50]

四天后，正式的庆典在马拉干鄢宫举行。一众穿着卡其色军服的美国陆军军官，还有菲律宾立法委员和战争通讯员，来到了宏伟的会客大厅，那里有精美的木雕，波斯挂毯，以及水晶吊灯。菲律宾联邦政府在这里正式恢复了战前的全部权力。站在一排麦克风后面的麦克阿瑟将军历数了三年来为了收复菲律宾而遭受的“痛苦、挣扎和牺牲”。他愤怒地指责日本人没有像他在1941年时那样退出马尼拉，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敌人不会这

么做，大部分我想保留的东西都被他们的困兽犹斗不必要地毁掉了——但是在这些灰烬中，他们未来的可耻命运也确定无疑了。”[\[51\]](#)又演讲了差不多一分钟后，将军最终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了。还没说到事先准备好的总结，麦克阿瑟就把讲坛让给了奥斯敏纳总统。在新闻纪录片中，人们看见他站在总统身后，用手帕擦拭着脸上的泪水。[\[52\]](#)

再也没人提胜利阅兵的事儿了，因为大半个马尼拉都完了。站在帕西格河南岸的城西区举目四望，损毁建筑的外墙和堆积如小山一般的焦黑废墟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上。原先在大道旁整齐排列的大树如今只剩下了乌黑、扭曲的树桩。大部分地标性建筑都消失了，路标牌也不复存在，就算是土生土长的马尼拉人在这座原本熟悉的城市的废墟中也会迷路。废墟中满是未及掩埋的尸体——已经在太阳的暴晒下发黑、膨胀，五官已无从辨认，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无穷的远方，嘴巴张开，显出几分狰狞。在大屠杀之处，平民的尸体堆成小山——男人、女人、儿童，都未能逃过，肿胀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死于枪击、刀刺或砍头。空气中充满了腐尸烂肉的臭味，只有到上风方向的城市边界之外才躲得掉。

难民们住在废墟之中和临时搭建的贫民窟里。人们用从废墟中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搭成简陋的棚屋——木板、管子、砖块、毯子，以及马口铁波纹板。盗贼们在烧毁的楼宇和被主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游荡。美国陆军的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则向人们分发蒸馏水、食物、衣服、毯子和其他物资。受伤的平民在草草搭建的野战医院里接受救治。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岌岌可危：城市的供水地虽然已经拿下，但交战城区里的主要供水和排水管道却已被摧毁。在接下来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城区是肯定不会有自来水了，路边阴沟也成了露天的臭水沟。卖淫团伙甚至在

日军最后几个防御阵地被消灭之前就出来做生意了。街上的流浪儿和美国兵打招呼，替他们的大姐姐报出“肉价”。但是即便在这肮脏的废土上，在满目的疮痍和绝望之中，许多菲律宾人还是在街道上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他们口中高喊着：“Mabuhay！”（“活下去！”）[53]

马尼拉湾也成了屠场，满是漂浮的尸体和沉没船只留下的大片油污。这里至少有50艘各种类型、大小的沉船，包括半沉在泥滩上的惨遭开膛破肚的货轮，还有几艘日军大型战舰宝塔形的桅顶从海面上伸出。这里的码头已经被轰炸了6个月，来袭者既有哈尔西第3舰队的舰载机，也有从南方基地起飞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在马尼拉南面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了。日本人特地拆毁或者烧掉了所有空袭后还没有被毁的东西。他们有意在码头上凿沉了几艘货轮，以令这些码头无法使用。根据美国海军救援部队的记录，在一处重要的泊位上，三条被凿沉的小型船只叠放在一起，这样这些堆起来的钢铁残骸就只能分多次拖走，更加耗时。清理港口和恢复海港营运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但必须迅速完成，因为马尼拉将成为进攻冲绳岛和九州岛的主要前进基地之一。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失去马尼拉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在历史厚重的老城区中心，重建已经全无可能——他们只能把废墟清理掉，然后从平地上重新建设一座新城市。这个国家的许多文化遗产已经不复存在：建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几个世纪的历史。即便只是政府官方文件的缺失也是个影响深远的大问题，因为这会动摇这个国家战后重建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马尼拉，这座美丽而重要的城市，曾是这个正在崭露头角的亚洲国家最为重要的财富。它曾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失去马尼拉，对于菲律宾人民恢复经济和成

功独立的期望是个沉重的打击。

卡洛斯·P·罗慕洛将军是美国众议院的列席代表，代表菲律宾。1942年4月日本人悬赏要他的人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妻子和四个孩子。现在，他回到了位于埃尔米塔区的故居，发现这里已经成了灰烬，无人居住。他在房屋地基的边缘看到了一具严重腐败的被刺刀刺死的尸体。他认出这是他的隔壁邻居。在被毁的街区走了一圈，罗慕洛遇到了不少熟人。他很高兴这些人都还活着，但是没人知道他家人的去向，只知道他们都逃离了首都。罗慕洛查看了横卧在街道上的尸体，惊恐地发现自己能够辨认出其中的许多人：“这些都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看见他们饱受折磨的尸体就堆在马尼拉的街道上，他们的头发被剃光，手被反绑在背后，刺刀一次又一次刺穿他们的身体。这个无声无息盯着我的女孩，她年轻的胸膛被刺刀刺成了筛子，她是我儿子的学校同学。”^[54]（一个星期后，罗慕洛终于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团圆了，他们都活了下来，毫发无损。）

甚至当城中还在激战之时，一群群律师、摄影师、速记员、翻译和医生就开始收集战争罪行记录和目击证据，进行这项痛苦的工作。他们采访目击者，记录下宣过誓的证词，审讯俘虏，检查幸存者，摄影师拍摄了屠杀现场的照片，缴获的日本文件也交给盟军的笔译和口译组翻译出来。有时候作恶者会试图用火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在太多地方实施了太多暴行，盟军的证据都收集不过来。盟军找到的文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暴行。于是收集文件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证明“马尼拉大屠杀及其恐怖行为并非那些被逼到墙角的狂暴守军的个人行为，而是日军高层制订的有为之的冷血计划”。^[55]（此说最终未能完全证实，但山下仍然被绞死了。）

若非如此——假如日本人没有施暴，将平民安全释放——那

么他们在马尼拉的决死战斗可能还会受到敌人的些许尊敬。毕竟美国人自己也有不愿投降的传统和意识——面对墨西哥人死战到底的阿拉莫守军，“绝不弃船”的詹姆斯·劳伦斯，以及（刚刚发生的）阿登战役中被围困在巴斯托涅的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他对德军的劝降只回复了一个字：“滚！”但是这种故意的强奸、折磨，以及对无辜人员的屠杀却让他们战斗全无荣誉可言。即便是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全世界也没人会赞同日本人在马尼拉的所作所为，只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硬派除外。

日本明治天皇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是日本官方对军人道德提出的要求。这是日本帝国的两大支柱性文件之一（另一份文件是1890年的《教育敕谕》）。说这两份明治时代的文件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仍然被奉若圣典是不为过的，而且《军人敕谕》也是日本军人所有权威的唯一基础。所有穿军服的人都必须对此倒背如流。其中常常被西方史料引用的最著名的语句是：“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面的文字，见于《军人敕谕》第三章：

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是皆非谓武勇。为军人者。当善明义理。锻炼胆力。曲尽思虑以谋事。小敌不侮。大敌不惧。但求尽己之武职。此则所谓大勇者也。故尚武勇者。待人接物。常能温和。博得人类之敬爱。好勇无谋。动辄肆威。势必至招人之忌。而使人畏之如豺狼也。……以上为军人不可须臾忽者也。[56]

在随后的四十年里，日本陆海军确实没有片刻忽视此敕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纪律性和骑士精

神达到了西方军队的水准，甚至常常超过西方人。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日本在对待俄国战俘方面可谓典范——国际红十字会的观察员证实了这一事实。然而从那之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文化急转直下，滑向了野蛮和暴虐，其原因至今仍为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队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谴责，二战结束前，这种趋势仍在持续恶化。

于是，明治天皇的警告一语成谶。马尼拉的岩渊部队就像丢掉一大堆鸿毛一样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就此也放下了重于泰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敕谕》里说的真“武勇”，不辨是非，放纵自己如同野兽般向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施暴。最后，正如裕仁天皇的祖父预言的那样，世人痛恨之，视其如豺狼。正如一名幸存的马尼拉暴行亲历者事后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疯狗一样。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禽兽。”^[57]

过了马尼拉湾向西，巴丹半岛的绿色群山赫然耸立，此外还有科雷吉多尔岛低矮的灰色轮廓。美第11军受命收复这些太平洋美军心中的圣地。2月15日，他们踏上了通往巴丹半岛的征途。两支强大的纵队沿着半岛两岸向南进攻，很快打垮了这里的少量日军。一个星期内，他们就拿下了巴丹。在坚固设防的科雷吉多尔岛，一支6 000人的日本守军顶着如雨点般落下的舰炮炮弹和航空炸弹坚守此地。美军第503空降步兵团降落在岛屿西部高地被称作“顶层”的山峰上，与从岛屿东岸马林塔隧道口附近登陆的两栖部队会合。守军则以典型的方式拼死战斗，打到最后一人，他们在退往“大石头”内部深处时炸毁了隧道。2月28日，美军宣布占领这座岛屿，但是仍有数百名死不投降或者掉队的日军有待猎杀。

3月2日，麦克阿瑟召集了一众曾在1942年3月和他一起离开科雷吉多尔的军官。出于传统，他们乘坐一队崭新的海军PT鱼雷艇渡过马尼拉湾。在记者和纪录片摄制组的陪同下，他们攀爬岩石，在“顶层”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第503空降步兵团的琼斯上校向麦克阿瑟敬礼：“长官，我把科雷吉多尔堡垒交给你了。”

吕宋是一个多山的大岛，想要完全征服这里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首都以北150英里外碧瑶山区的司令部里，山下将军告诉日本媒体记者们，吕宋之战仍然“仅仅处于战斗最初阶段”。他说美国人已经伤亡了7万人。（到此时美军实际伤亡人数约为2.2万。）麦克阿瑟还没能抓住他岛上部队的主力。“我们的战略仍然是引诱美军登陆部队进入吕宋中部平原和马尼拉地区，之后从多处侧翼血洗他们，”山下如此告诉日本记者，“因此，吕宋之战正完全按我们的计划进行。”^[58]

这是标准的宣传口径，但毫无疑问，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宾其他地方的日军主力仍然规模庞大。山下奉文没有重犯1941—1942年麦克阿瑟的战略错误，当时防守一方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带展开作战，又没有及时做好城市围困战的准备。在那次战役中，美菲联军在日军登陆林加延湾后不到四个月就被迫在巴丹投降。三年后，双方攻守易位，山下的“尚武集团”主力在吕宋岛的北部山区坚守了超过8个月，直至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

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向北面和东面同时发动了三路进攻——第1军进攻卡加延山谷和山下在碧瑶的藏身之所，第11军进攻马尼拉东面的马德雷山脉，第14军进攻岛屿东南诸省。日本守军残余各阵地遭受的压力一刻也没有缓解。美军充分利用了他们在空中力量、炮兵、坦克、机动性、野战工兵和后勤方面的优势。菲律宾游击队也提供了关于日军位置、数量、装备，甚至是作战计

划方面的宝贵情报。山下逐渐与他在岛屿其他地方的下属失去了联系。战至5月23日，美第25师突破了巴勒特山口的战略瓶颈，涌入卡加延山谷。

在这几个月里，麦克阿瑟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就下令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两栖登陆，以收复南面的各个岛屿。2月28日，第8集团军一部在巴拉望岛登陆，迅速将日军赶入无法通行的山区。随后于4月17日在棉兰老登陆，之后又在班乃、宿务、内格罗斯和南方其他小岛进行了小规模登陆。美军伤亡轻微，日军基本都撤退到了山区，然后在一无补给二无支援的情况下等死。幸存的日军部队四散在乡间，三五成群，像林木工人那样四处游荡，一点点地因饥饿或热带疾病而毙命。当地游击队猎杀掉队的日军，常常会把他们折磨致死，并摧残他们的尸体。这些日军的纪律也崩溃了。士兵们转而杀死军官，然后为争夺食物而搏斗，甚至为此杀人并吃人的尸体。西原孝磨回忆说，自己一名即将死于疾病的战友，请他吃掉自己臀部的肌肉以多活几天。快要饿死的西原说自己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但我的眼睛却控制不住地盯着他屁股上的肉”。[\[59\]](#)

一个名叫小岛清文的年轻海军军官一直努力让他由于饥饿而不断缩水的小分队在吕宋山区中不要走散。他和他的手下开始像害怕菲律宾人和美国人那样害怕日本战友。“瘦弱的掉队者成了强壮者的猎物。这太可怕了。我们被包围了，只能穿着破衣烂衫在丛林里兜圈子寻找吃的。与敌人作战成了我们最次要的事情。”[\[60\]](#) 小岛最后提出了向美国人投降的异端想法。起先这个主意被他的人大声喝止，但他们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弱，到最后，幸存者终于接受了这种曾经不可想象的耻辱。8个人设法躲过了凶猛的菲律宾游击队，长途跋涉来到了美军防线，在那里他们成了俘虏，有烟抽，还有罐头口粮可以吃。

见到俘虏自己的人，小岛为他们的种族和血统之多感到震惊：“他们的头发有金色、银色、黑色、棕色和红色。眼睛有蓝色、绿色、棕色、黑色。皮肤则是白色、黑色还有各种其他颜色。我震惊了。我意识到我们是在和全世界的人们作战。同时我还想到，美国是个多么有趣的国家啊，那么多不同人种，却穿着同一套制服来打仗。”^[61]

6月28日，麦克阿瑟宣布“吕宋战役的主要阶段”结束，他说美军已经占领了所有的平原、城镇，以及岛上的所有战略隘口：“拥有40 420平方英里面积、800万人口的吕宋全岛，现在解放了。”^[62]吕宋之战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陆军第一场以军级兵力作战，并能在辽阔地域中机动的战役。换言之，吕宋战役比太平洋战争的任何其他战役都更像欧洲的战争。这是太平洋上最大规模的地面战役，只有冲绳战役可与之相提并论。从某些角度来看，麦克阿瑟关于优先攻打吕宋的主张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他提出这里的地形易攻难守，以及当地游击队作为侦察兵、间谍、破坏者和游击战士具有重大价值。这都是正确的。

最终，日军丢掉了他们在吕宋的大部分部队，只剩下象征性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20万日军葬身吕宋，只有9 000人在1945年东京彻底投降前被俘。战争结束后，只有大约4万名曾在岛上打过仗的日军能返回故土。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日本陆军在菲律宾总共死了368 700人。^[63]美军歼灭了9个日本陆军精锐师团，并将另外6个打到无力再战。这场战役直接或间接令日军损失了超过3 000架飞机，并迫使日本人将“神风”自杀战术作为了此后直到战争结束的主要航空兵战术。美军的战斗伤亡大约为4.7万人，其中10 380人战死——但若是加上非战斗伤亡，尤其是疾病所致的伤亡，这个数字就会增加到90 400人。

[1] 猪口力平估计损失率为30% , 见Rikihei Inoguchi, *The Divine Wind*, p.87.

[2] *Ibid.*, p.88.

[3]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53.

[4]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0.

[5]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January 15, 1945,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204.

[6]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55.

[7]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1.

[8] Herman, *Douglas MacArthur: American Warrior*, p.570.

[9] Krueg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p.228.

[10]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p.30—31.

[11] GHQ, SWPA, *Communique No.1027*, January 29, 1945, quoted in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p.270.

[12] Smith, *United States Army in WWII,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19.

[13]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279.

[14] Carl Mydans,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Two*, p.607.

[15]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293.

[16] Robin Prising quoted in Scott, *Rampage*, p.188.

[17] Carl Mydans,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Two*, p.616.

[18]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7.

[19] Bill Dunn’s CBS Radio Broadcast, February 4, 1945, quoted in Scott, *Rampage*, p.170.

[20] Scott, *Rampage*, p.198.

[21] Sworn Affidavit of Hobert D. Mason of the 112th Medical Battalion,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2] Sworn affidavit, Major David V.Binkley, U.S.Army,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8.

[24] Borneman, *MacArthur At War*, p.467.

[25]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6.

[26] Scott, *Rampage*, p.205.

[27]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Battle of Manila, First Phase,” p.12.

[28] “Directions Concerning Combat by Shimbu Group Headquarters,” in “Documents and Orders Captured in the Field,” accessed October 11, 2018, <http://battleofmanila.org>.

[29]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p.1,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0]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15.

[31] Scott, *Rampage*, p.248.

[32] H.O.Eaton Jr., “Assault Tactics Employ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33] Scott, *Rampage*, p.317.

[34] *Ibid.*, p.350.

[35]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13.

[36] Captured diary, unknown soldier of Ninth Shipping Engineer Regiment, Japanese Army,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7] Ibid., p.4.

[38] Ibid., p.3.

[39] Sworn affidavits of Father Francis J.Cosgrave and Major David V.Binkley, U.S.Army Forces,“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in Ibid.

[40] Sworn affidavit, Dr.Walter K.Funkel,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1] Scott, *Rampage*, p.25.

[42] Ibid., p.263.

[43] Ibid., p.309.

[44] Admiral Sanji Iwabuchi to Shimbu Group headquarters,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p.18—19.

[45] Admiral Sanji Iwabuchi to C—in—C, Southwest Area Fleet at Baguio, Japanese Monograph 114,“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 —August 1945, p.18.

[46] McEnery, *The XIV Corps Battle for Manila, February 1945*, p.98.

[47] “Intramuros a City of Utter Horror,” George E.Jon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p.25.

[48] Quoted in Friend, *The Blue—Eyed Enemy*, p.205.

[49] H.O.Eaton Jr., “Assault Tactics Employ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50]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7.

[51] Ibid., p.252.

[52] Ibid., pp.251—52, and newsreel footage, “Ceremony at Malacañang Palace,” February 27, 1945,accessed July 20, 2018, http://www.criticalpast.com/video/65675037789_Sergio—Osmena_General—MacArthur_Commonwealth—Government_legislature.

[5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50.

[54] Romulo, *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 p.223.

[55]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p.1,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6] "Imperial Rescript to Soldiers and Sailors (1882)," p.227, in Allinson,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57] Scott, *Rampage*, p.265.

[58]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March 9, 1945, p.2.

[59] Takamaro Nishihar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157.

[60] Kiyofumi Kojim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76.

[61] *Ibid.*, p.378.

[6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63] Reported in 1964 by the Jap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cited b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73.

第十一章

1944年6月，就在美军突击登陆塞班岛的两天前，硫黄岛日军迎来了一位新的司令官。栗林忠道中将身材壮实，中等个头，53岁，留着两撇仁丹胡子。他是日本陆军的明星军官之一，无论是作为前线指挥还是作战参谋，他的表现都很杰出。1928—1929年在华盛顿任大使馆武官时，操一口流利英语的他游历了美国大部分区域。在1938—1939年日本与苏联之间秘而不宣的战争中，他在中国东北的诺门坎指挥一个骑兵联队。1941年之后，他又在广州担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的参谋长。前不久，他被调往东京指挥皇宫近卫军，这是个富于声望的岗位，他也由此得以直接面见天皇。此番他的新任务是指挥第一〇九师团和小笠原兵团，包括小笠原群岛上的全部守军。启程离开东京之前，东条英机首相曾指示栗林“要像阿图岛那样”。[\[1\]](#)这相当于自杀性命令：栗林必须死守岛屿，战至最后一人。

硫黄岛是一个8平方英里的荒岛，覆盖着含硫火山灰，灰蒙蒙的荆棘，以及岩石峭壁。它是火山列岛一众荒芜小岛中最大的一个，火山列岛则是小笠原群岛的组成部分。这座状似猪排的岛屿几乎就在塞班岛和东京之间的航线上，南距塞班岛625海里，北距东京660海里。其大部分海岸线都是陡峭的滩涂——但是覆盖海滩的不是沙子，而是火山岩屑，无法承受重型车辆。俯瞰全岛的折钵山高550英尺，位于岛屿南端。折钵山北面的平地上有2座可用的飞机场，元山1号和2号机场。第3座机场，即3号机场，正在施工之中。再向北，岛屿宽度变大，地形也变为越来越

高的石质阶地，沟壑纵横，一直延伸至一处海拔350英尺的半球形岩石山峰，那里被称为元山高地。整个岛屿的地下满是硫黄，蒸气从地表裂隙处喷出，把地热和地下气体带出地面。这是一处昏黑、蛮荒、乌烟瘴气之所，却是当地唯一一座地形适合修建足以容纳B-29这类重型轰炸机的机场的岛屿。这使得硫黄岛顿时价值倍增，栗林决定把他的指挥部建在这里，而不是北面168英里外人口更多也更加舒适的父岛。

刚一抵达，栗林将军就拿起一根木头拐杖，背着水壶，开始步行环游全岛。在1号机场南端旁边的海滩内陆一侧，他卧倒在地，用他的木拐杖瞄准，仿佛拿着的是一支步枪。他要他的副官堀江义孝少佐从不同方向朝他走过来。栗林随后就在小本子上画下了他的瞄准线。到达后仅仅两个小时，他就准确知道了该如何布置他的部队和构筑防御设施。由于预见到美军将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这位将军完全没有指望将敌人的两栖部队歼灭于水际滩头。他将会把部队和火炮集中在内陆的岩石高地中。他的人马将深藏于山洞、坑道和地下堡垒之中，通过数不清的射击孔、碉堡和在山岩中凿出的工事向敌人开火。折钵山将被改造成一座堡垒，一支独立的作战支队将防守此地。他的部队主力将部署在北面两条横贯全岛的坚固筑垒防线上——一条位于1号和2号机场之间，第二条紧挨着2号机场北侧。元山高地顶部将是“蜂巢阵地”——硫黄岛的超级堡垒。

当年夏季，美军攻击这个岛屿的频率和力度都在增加。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在7个星期里5次空袭此地。B-24轰炸机进驻塞班岛之后，开始对硫黄岛例行“送牛奶”，到1944年末，这种例行轰炸最终发展为每天一趟。试图从本土向硫黄岛运输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的货轮和运兵船遭到了美国潜艇的截杀。7月，一支美军巡洋舰——驱逐舰混合编队出现在岛旁，8英寸和5英寸的

舰炮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岛上。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帐篷被撕碎，司令部大楼和兵营被炸平。“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反击，”一名飞机在地面被毁的零战飞行员回忆道，“人们尖叫，咒骂，吼叫，他们挥舞着拳头发誓要报仇，他们许多人倒在了地面上，他们的威胁溶解在泛着泡沫的鲜血里，从喉咙的破口里喷涌而出。”[2]

栗林是岛上的最高指挥官不假，但是陆海两军各自住在不同的营地里，军种间的政治问题也还是一如既往地难缠。海军指挥官厚着脸皮，不停地向栗林索要更多的食物、水和其他物资。随着援军不断抵达，守军规模日益膨胀，物资短缺也愈加严重。栗林在1944年6月到达时，岛上有6 000名军人；9个月后盟军登陆时，守军的数量已接近最初的4倍。最严重的问题是水。挖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含盐含硫：士兵们称其为“妖水”或者“死水”。[3]可以用蓄水池来收集雨水，但这远远满足不了两万人的需要。口渴的人们会直接从地上的水坑里喝水，结果导致伤寒和痢疾的大暴发。饮水被严格地定量供应。淡水被装在瓶子里，从父岛用木质驳船运来，空瓶子还得运回去重新装水。栗林给他的下属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用一杯水就刮了胡子、洗了脸、刷了牙。[4]

岛上的海军军官在其东京的上级的支持下，主张进行“水际滩头防御”战略。他们想要在1号机场周围建立由250个到300个碉堡组成的防线，希望在滩头击退美军登陆部队。海军将会把所需的建材和武器从日本用船运来，包括水泥、钢筋、炸药、机枪和弹药。水际防御方案和栗林更倾向的纵深防御战略背道而驰，但是栗林太需要这些建材和武器了，因此他没有立刻向他的海军战友下达硬性要求。在10月的一次指挥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日本守军只有地面部队。他们将要与敌人陆海空

联合部队对阵。以滩头为基础的战略将会令防御部队暴露在美军压倒性的海军舰炮和航空炸弹火力之下，很快就会被消灭。^[5]但是海军一方仍不为所动。海军为岛上提供建筑物资是以守卫机场为条件的。如果不防守机场，海军就不会从日本运送物资过来。

堀江少佐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海军运上岛的物资，一半拿去建造海军想要的滩头碉堡，其余则分配给栗林的高地筑垒。考虑到有一半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栗林将军同意了。

栗林带来了一队军事工程师和地雷工兵来监督他的挖掘工作。硫黄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凝灰岩”，一种由火山灰积压而成的多孔透水的岩石，很容易用铲子和铁锹挖掘。挖掘施工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轮班倒。他们每天可以掘进3英尺，如果有炸药的话，进度还能快一倍。挖出来的灰土和碎块会装在帆布袋里运上地面。这完全是个苦活儿。施工人员越往岛屿深处挖，就越强烈地受到地热和硫黄蒸气的折磨。他们光着膀子，只穿着缠腰带，踩着胶底分趾拖鞋，每次下去挖掘都坚持不了10分钟就要回到地面呼吸新鲜空气，休息一会儿。“我们的手上满是水疱，肩膀僵硬，在地热中气喘吁吁，”一名陆军二等兵回忆道，“我们的喉咙渴得发疼，但是却没有水可以喝。”^[6]

到1944年秋，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一套复杂的隧道、台阶和碉堡体系已经在岩石内部初见雏形。那些天然的大山洞可以一次性容纳多达500人。日军在里面接了电灯和通风系统，以改善居住的舒适性。裸露的岩壁被刷上了石灰。各个指挥所之间通过无线电或地下电话线相互联系。最终，大约1 500座地下掩体经由16英里长的走道连接到了一起，出入口广泛分布在上方的开阔地上。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城里，人们可以找到医院、宿舍、食堂，以及满是最先进技术的通信中心。岛上海军的主要指

挥部，被称为南部诸岛地堡，位于地面以下90英尺处。在地面上，海军的劳工队沿着机场周围建造了数百座半球形混凝土碉堡。碉堡周围堆上了沙子，这既是为了隐蔽，也是为了减缓舰炮炮击的冲击力。众多狭小射击阵地的射界在登陆滩头上相互交叉重叠。反坦克壕沟和步兵堑壕纵横交错。海军工兵们还从飞机残骸上拆下零部件来升级跑道沿途的筑垒设施。机翼、炸弹舱、机身尾段都被用作建筑材料。残损的机身被半埋入地下，然后覆盖上石头和沙袋，用作临时碉堡。一名军官在检视了这些工程后伸出了大拇指：“干得漂亮。这些飞机为国家效力了两次。”^[7]

为减少吃饭的嘴，栗林将军命令将硫黄岛上的所有平民撤回日本。从7月3日到14日，一千名住在岛上的老百姓回到了日本本土。所有16岁到40岁没有家属要供养的男子都被征召入伍。当栗林发现他的高级军官们一直在司令部转悠，想要找行政管理的工作做时，他命令他们“离总部越远越好，投入前线指挥中去”。有些人不喜欢这种无休止的体力活，在背后抱怨将军：“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挖洞的。”^[8]栗林忠道素来手下无情，他立刻清除了这些反对派和牢骚满腹的家伙。他撤了多名高级军官的职务，包括他自己的参谋长，一名旅团长，以及两名大队长，然后把年轻军官提拔起来担任他们的职务，或者从本土要人前来接替。

有些人说栗林是个暴君，但他却又对下级的切身福利表现出了真诚的关心。每当有本土来的访客带来食物或蔬菜做礼物，他都会下令把它们分给手下。他还是个重家庭的人，很宠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栗林会给他们单独写信，常常会关心他们国内生活的细枝末节，并提醒孩子们要分担家务。他预见到了日本遭到轰炸可能带来的灾难，并提出警告。1944年9月12日，他在写给妻子吉井的信中说：“每当我想到东京遭到轰炸后的样子——我

仿佛看到一片被烧尽的沙漠，遍地尸体——我就会拼命去阻止他们来空袭东京。”两个月后，当“超级堡垒”机群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起飞作战时，栗林和他的官兵们能够看见这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从自己头顶高处飞过，前往日本。但是守军却完全无法阻挡它们，因为它们在高炮的射程之外。“在这场战争中，像我这样在前线等死的人是无所谓了，”他在12月8日给吉井的信中写道，“但每念及即便是你、国内的女人和孩子们都满怀危在旦夕之感，便难以忍受。无论如何，躲到乡下去，活下来。”[9]

1945年1月，栗林和他的军官们认为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只剩下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可能还没有这么久。按计划，他们还要在机场地下深处挖一条长隧道连接元山高地和折钵山，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挖它了。硫黄岛与日本之间的海运线已经不再安全了，甚至就连操持小舟在硫黄岛和父岛之间往来也十分危险。栗林宣布收回先前和海军达成的妥协，下令停止机场周围碉堡的施工，集中所有人力物力，优先完成元山高地的筑垒工事。他要求花更大力气来伪装地下碉堡和火炮射击阵地的入口，并且提升了训练标准，重点练习狙击技术、夜间渗透攻击，以及反坦克战术。[10]

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栗林要求获得更多的武器、弹药和补给物资，提出要把这些物资空运到岛上来。他还想要征用小船甚至是渔船来把淡水和补给品从父岛运来。但是到了2月，随着岛上守军超过2.2万人，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急转直下。地下碉堡闷热、拥挤、肮脏。虽然增加了一些通风扇，但是地下的温度常常超过60摄氏度，硫黄蒸气也令呼吸极度困难。岛上没有足够的厕所，那些腹泻难忍之人只能就地解决。而隧道入口处的露天便池里则滋生出成片的大苍蝇。为了在美军无休止的空袭下保护补给物资，守军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搬到隧道和碉堡里去。于是地下

的过道里堆放起了一排排装满淡水、燃油、煤油和柴油的55加仑圆桶。人们在这些圆桶上铺上薄褥子或者毯子，然后睡在上面。无处不在的苍蝇、蚂蚁、虱子和蟑螂让人们伤透了脑筋。密不透风的地下洞穴里满是汗臭。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进入防空洞，就像是在船舱里一样。有人烧火做饭，令这里变得闷热，温度很高，人在这里待久了就难免头疼。”^[11]

就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日本守军的隐蔽工作令关岛和珍珠港的美军情报分析人员大吃一惊。硫黄岛已经被轰炸、扫射、炮击了8个月；它被海岸外的军舰炮击过，被附近马里亚纳群岛的B-24和B-29轰炸过，航母特混舰队更是造访此地12次。岛屿柔软的火山灰上被炸出了一个叠着一个的弹坑。光是B-24轰炸机，就已一连轰炸了此地70天，投下数千吨炸弹。但在此期间，硫黄岛的地下堡垒和炮兵掩体反而变得愈加坚固和密集。轰炸和炮击对岛上的防御几乎没起到什么影响，也没有拖慢守军施工的进度。美军飞机和潜艇对硫黄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拍摄了照片，制作了数千张从各个角度看的高清照片。照片显示，日军已经离开了他们暴露的兵营和宿营区，搬到了地下。每日的飞机侦察证实，岛上显然已经没有了任何建筑和帐篷，从空中也很难见到部队的踪迹。第26陆战团的托马斯·菲尔兹上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不在硫黄岛上了，他们在硫黄岛下。”^[12]

到了美军进攻前夕，硫黄岛已经做好了迎敌准备。折钵山和元山高地被改造成了天然堡垒。岩石中架设了各种武器，从安放在下沉式阵地中的大型海岸炮，到迫击炮、轻型火炮、反坦克炮和机枪。迫击炮管和火箭发射器被隐藏在可以快速开关的钢质或混凝土盖子下面。守军中枪法最好的人都得到了狙击步枪，他们被布置在视野最开阔，能够俯瞰海滩和机场的洞口处。碉堡的入口处都放上了成箱的手榴弹。从海滩通往梯形地带和机场的小道

都埋设了反步兵地雷，大路和开阔地上则布设了足以摧毁或阻止坦克、推土机和卡车的重型反车辆地雷。岛上储存的粮食足够守军吃两个月。虽然栗林将军遭到了同僚们的激烈反对，但他最终还是把他的意愿灌输给了守军，所有的下属指挥官都被洗了脑，将按他的计划行事。他们不会在开阔地上发动大规模反击。万岁冲锋被严格禁止。日军将会用炮兵和迫击炮火力覆盖滩头上处于最脆弱时刻的进攻部队，但他们不会拼尽全力守卫机场。

栗林将军并不指望他的人能打赢硫黄岛之战。他们的目的是打一场迟滞作战，战至最后一人，给美军造成最大的伤亡。在敌人进攻的几天前，栗林在他位于西北岸岩滩附近的地下指挥所里写下了6条“敢斗之誓”。这些誓词被油印出来，发给岛上的每一支部队，每一名士兵都要熟记和背诵。它们被张贴在碉堡的墙壁上，贴在大炮的炮管上，整洁地抄写在小本子上，以及写在纸上叠放在士兵的口袋里：

- 1.我等将全力死守本岛。
- 2.我等将身负炸药飞身上前，粉碎敌战车。
- 3.我等将冲入敌阵，杀尽敌人。
- 4.我等须每发必中，每击必歼敌。
- 5.我等若不毙敌十人，死不瞑目。
- 6.我等纵使只剩最后一人，也须游击扰敌。 [13]

1945年2月16日，当美军登陆舰队云集海岸外时，无线电兵秋草鹤次正待在下方机场旁的瞭望地堡里。通过3英尺宽的射击口向外看去，他看见排成同心圆队形的军舰包围了岛屿，延伸到海平线外：“那就像是海上升起了一群山峰。” [14]当远处的战列

舰开火时，他先是看到闪光，之后才听见轰鸣声。一股热风从射击口扑到他的脸上，火药味随即飘进鼻孔。第一批炮弹落地时掀起了大块的土石。大地在颤抖，碉堡的墙壁如同纸糊的一般摇来晃去。第1工兵混成旅团的高桥俊治军曹被吓呆了：“岛上如同发生了大地震，火光冲天。黑烟笼罩了岛屿，弹片带着尖啸声四处横飞。树干直径有一米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那声音震耳欲聋，就像两百个霹雳同时炸响。即便是在30米深的地下，我的身体也被抛离了地面。这真是人间地狱。”[\[15\]](#)

当第58特混舰队于1945年2月10日离开乌利西时，大约一半的飞行员都是刚刚被分配到舰队的新手。许多打完了整个菲律宾战役的老飞行员都因急需休息而轮休去了。新人们训练水平很高，飞行日志上平均有600个小时的“握杆时间”，但是他们的技术还没有经过空战的检验。

当舰队在轻浪微风中向北航行时，流言开始四起。所有人都猜得到自己这是要去打另一场大规模登陆，他们都见过锚泊在乌利西潟湖里的大批运兵船和两栖舰艇，因而确定无疑。2月15日，所有舰上都宣布了爆炸性的消息：第58特混舰队正开往东京，他们将要空袭那里的航空兵基地和飞机制造厂，随后转向南面支援对硫黄岛的两栖登陆。自从近3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还没有哪一支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尝试过攻击日本本土。攻击敌人的首都将会捅马蜂窝：很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日本战斗机前来迎击，高炮火力也会很猛。一名年轻的“地狱猫”飞行员先是鼓掌，接着停下来问他的队友：“我的上帝，我怎么会拍手？”[\[16\]](#)

当舰队向北进入高纬度海域，天气开始变得潮湿、寒冷，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洗刷着甲板，落在舰桥和操舵室的有机玻璃窗户上。军舰时高时低，左摇右晃，在冬季的灰色海面上穿行。斯普鲁恩斯将军称之为“我能想到的最该死、最烂的天气”。[\[17\]](#)所

有在甲板上执勤的水兵都领到了厚重的羊毛大衣、帽子和手套。但是恶劣的天气也有一个好处：特混舰队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日本近岸水域。敌人的巡逻机停在了地面上，即使起飞也无法透过浓云看到开过来的舰队。雷达操作员的眼睛紧盯着显示屏，但是没有敌机接近。美军的无线电室一直在不断监听NHK广播电台和东京广播电台，它们也一直在按节目单正常播放。

空袭前夕，米彻尔将军向所有舰载机大队发出了一份备忘录：“第58特混舰队的大部分战斗机飞行员都将第一次在东京上空参加空战。如果飞行员能够记住这些要领并保持冷静，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要过于激动。要记住你的飞机在所有方面都比日本人的优秀。比起你对他的害怕，他可能更害怕你。”米彻尔强调了保持编队队形的重要性，他们要克服脱离编队追击个别日军飞机的本能反应。在低空尤其如此，那里的容错空间更小，零战也可以发挥它们在小半径急转弯方面的优势。“发现第一架敌机时，要克服你的第一反应，不可冲动行事，”米彻尔写道，“如果你是僚机，那就跟紧你的长机，绝对不要离开它。”^[18]

夜里，飞行员们在待命室集合。他们舒服地坐在皮质扶手椅上，听取他们中队长和航空情报官的任务简报。目标选择人员在东京城内和周边找到了24座机场和飞机工厂，并向各个中队分配了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在优先级最高的目标中有两座重要的飞机工厂：位于东京以西的多摩的一座立川飞机发动机工厂，以及东京南面的东京湾旁边大田的一座中岛飞机总装厂，第20航空队的B-29机群在过去10个星期里一直试图摧毁它们，但未能成功。

奔赴日本海岸线途中的最后一夜，天气依然糟糕透顶。舰队航速从25节下降到20节，但这仍然是一趟艰难的旅程。舰艇摇摆得很厉害，伸缩接头在应力作用下嘎吱作响。在“伦道夫号”航

母上，第12战斗机中队的年轻少尉们躺在床铺上彻夜难眠。他们盯着天花板，努力想要在大战之前尽量睡一会儿。一根铁链拍打在“伦道夫号”的舰体上，发出可怕的声音。有人后来回忆道：“我最后肯定是睡着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被惊雷般的‘全体人员，各就各位’的命令惊醒。我们训练了两年，就为了这一天。”^[19]

2月16日拂晓，特混舰队位于本州岛海岸外60英里，东京西南大约125英里处。冰冷的北风以30节速度刮来。大雨冲刷着航母的飞行甲板。在刺骨的寒冷中，雨水夹杂着雪花。能见度降到了零。^[20]地勤人员裹着羊毛外套和围巾，举着红色和绿色的手电筒，带着飞行员穿过排列在甲板上的机群。当F字旗升起时，点火管开始打火，发动机转了起来；它们喘振着，回火，然后发出了熟悉的轰鸣声。一名军官从“约克城号”舰桥侧旁的走廊上目睹了这一幕，感觉这简直如同“最底层地狱的全景——黑暗，寒冷，喧闹。发动机的轰鸣震撼着军舰。淡蓝色的火光从排气管喷出来，倒映在湿滑的甲板上，直到螺旋桨把甲板上的水坑吹干为止”。^[21]

第58特混舰队的17艘航母上起飞了1 100架舰载机。它们在暗灰色的夜幕中向北爬升，每个飞行员都很努力地紧盯着前方飞机排气管处的淡蓝色火光。第12战斗机中队的麦克沃特上尉回忆道：“我在冰冷的风中关上了座舱盖，当雨雪落在我的飞机上沙沙作响时，我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就在下方几百英尺处，泛着白色浪尖的怒涛显出一片铁灰色——真冷啊。”^[22]在1.4万英尺高度，“伦道夫号”的47架“地狱猫”突然冲出了云层，来到了晴空下。他们下方是一片羊毛般的灰色云毯，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天际线处。他们看不见日本的其他地面，只能看见左侧约70英里外富士山那覆盖着白雪的圆形火山口。这成了一处有价值的导航参

照物。

当他们接近日本海岸线时，云层出现了裂隙。通过云缝，他们第一次看见了敌人的国土——白雪皑皑的山峦，稻田，以及一片片黑色的屋顶房瓦。麦克沃特发现左上方有一架日军零战。他将起飞前关于保持队形的告诫抛之脑后，向左急压坡度追了上去。敌机显然不急于交战，它转弯向云层俯冲。但是零式战斗机的结构轻，俯冲速度无法与“地狱猫”比肩，麦克沃特迅速追上了猎物。他打出一串长点射，打进了那架零战的发动机和机翼。令它拖着烟火消失在了云层中。

东京南部天气太差，无法飞行，于是大部分进攻中队都转向了备选目标。战机从云缝中俯冲而下，轰炸了城市北面和东面的机场。“地狱猫”机群用5英寸高速空地火箭弹向机库、机械车间和停放着的飞机进行了齐射。之后它们压坡度绕回来，再次进行低空扫射。数百架日军飞机已经升空，但许多飞机并不怎么想来参战，只是在云层间飞入飞出，躲避追杀。显然，它们起飞只是为了避免被摧毁在地面上。

在海岸外，能见度依然很差，返航的飞行员不得不借助各自母舰的YE/ZB无线导航台回到舰队。在浓密的云层中下降时，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座舱里的仪表板，许多年轻的新手都在暗暗感激自己在林克模拟器和在教练机上“蒙布飞行”所花出去的大量时间。第58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原本预计会遭到惨重的损失，但是2月16日这天只有36架飞机未归。有些返航的飞机遭到了重创。有一架格鲁曼“地狱猫”左翼被打掉了10英尺长的一段，但还是设法完美地降落了下来。在“伦道夫号”上，水兵们挤到一架重伤的“地狱猫”旁，对它遭到的打击惊叹不已。他们在一侧机翼上数出了54个弹孔，而且“机身看上去就像是被当成了靶子，鬼子的靶子”。[\[23\]](#)

2月17日曙光初露时，天气比前一天只是略有改善，大雨时断时续，云底高300英尺到700英尺不等。斯普鲁恩斯批准进行早间战斗机扫荡，但是他也告诉米彻尔，他预计战况可能依旧不利，“如果当天的初始作战效果不佳，我们就撤回去支援硫黄岛的登陆”。[24]

东京上空的天气比前一天要好，日军的防空部队也做好了准备。排成大型多层“V字形”编队的第12航空大队被大约12架日本战斗机盯上了。大队长查理·克罗姆林中校要求他的战斗机保持队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护送“地狱潜鸟”和“复仇者”前往其首要目标，多摩的立川工厂。俯冲轰炸机命中了该厂区50枚500磅炸弹，“地狱猫”则又奉上42枚航空火箭弹。工厂核心区的各个设施都化为了翻滚的烈焰。SB2C飞行员约翰·莫里斯少尉改出俯冲后从树梢高度脱离，这看起来比爬升到高射炮火更密集的高度更安全些。他低空飞越东京湾，“时左时右，忽高忽低。我们扫射了任何恰好出现在我们航线上的船只，但是不会离开航线去寻找目标”。[25]他随后安全返回了“伦道夫号”。

在东京东北方的鸿池机场，12架三菱G4M轰炸机翼尖挨着翼尖排列在起飞线上。鸿池机场是一座“樱花”（人操自杀弹）训练中心，这些轰炸机都是挂载和投放这些小型火箭动力自杀机的母机。这些G4M都加满了油，它们原本计划在当天上午进行训练飞行。一个中队的“海盗”来此进行了低空扫射，用.50口径燃烧弹覆盖了停放着的飞机。所有12架三菱轰炸机都被摧毁在了地面上。一名日本飞行学员回忆道：“火焰吞没了一切。所有东西都是先发出蓝灰色火光，一秒钟后又变成橙黄色。如果场面不是这么可怕，我可能会说那很美丽。”[26]

上午11点，斯普鲁恩斯终止了行动。他要米彻尔回收所有飞机，撤回去支援硫黄岛登陆。当天下午4点，特混舰队已高速南

下。

虽然天气带来了麻烦，但空袭东京仍然是一场大胜。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们击落了大约100架日军飞机，在地面另外摧毁了150架。多座重要的机场设施和航空站点化为冒烟的废墟。舰载轰炸机让立川工厂停了产，摧毁了大田中岛飞机总装厂大约60%的建筑。第58特混舰队在战斗中损失了60架舰载机，事故损失28架，但是航母和护航舰艇毫发无损。这场空袭被正在与美国陆军航空队激辩的海军当作了首要证据。海军提出，俯冲轰炸、低空扫射和火箭弹攻击能够比“超级堡垒”的高空精确轰炸更可靠地命中地面目标。立川和中岛工厂的下场看来是证实了他们的主张。米彻尔称这场两天的空袭为“航母航空兵在战争中最大的胜利”^[27]时，想的可能就是这场军种之争。此后，第58（第38）特混舰队将会一次又一次杀回来，轰炸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其频率和猛烈程度将越来越高，直至战争结束。

参加2月16日至17日空袭的战斗机飞行员中，有超过一半此前都没有空战经验。但他们的表现却很像是老手。米彻尔的战报总结道：“对于海军飞行训练机构及其训练方式，怎样称赞都不为过。”^[28]

就在舰载机空袭东京的当天，炮击舰队抵达了硫黄岛外海，用排山倒海般的高爆弹淹没了这座岛屿。从舰队上只能看见折钵山的峰顶，岛屿的其他部分都被浓烟烈火所包围，一无可见。炮弹划过抛物线弹道飞向岛屿，弹道根据火炮的口径和军舰距离海岸的距离有高有低。而接连不断的爆炸汇集成了一整片难以区分出炸点的轰响。扶在军舰栏杆上观看的人们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震撼了。阵阵热风把他们的衬衫吹得从胸前飘了起来。一队

B-24滑翔着飞了过来，泛着金属光泽的亮点拉出斜线，从它们打开的炸弹舱里落下来。一连串爆炸随即在岛屿中央延伸开来，翻腾的烟尘中闪出橙黄色的火光。[29]曾经目睹过塔拉瓦、夸贾林和塞班岛登陆战的战争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称这“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同类场面还要吓人”。[30]

第53特混舰队那些搭载着第4和第5陆战师的运兵船于D日午夜后抵达。扫雷艇已经清理出通向滩头的航道，水下爆破组的蛙人们也绘制了海底的地形图，并炸掉了那里所有用来阻止登陆艇靠岸的障碍物。和其他此类作战一样，突击部队能够坐在前排观赏登陆前轰炸和炮击的高潮一幕。对于第5陆战师的罗纳德·D.托马斯中尉来说，“看起来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存活。俯冲轰炸机铺满了天空，当它们俯冲时，地面宛如掀起一阵沙暴”。[31]

登陆舰队搭载着11.1万部队，包括7.5万登陆部队（几乎全都是海军陆战队）和另外3.6万名陆军守备部队。运输船和登陆舰还运载了9.8万吨补给物资。许多小型登陆载具，例如履带式登陆车和轮式两栖卡车，在珍珠港就提前装满了口粮、弹药、燃油和其他物资。之前借给麦克阿瑟用于吕宋岛登陆战的第7舰队水面战舰，现在又不得不匆匆北上，以及时赶上硫黄岛之战。举个例子，“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林加延湾一连待了35天后，刚刚在2月16日回到乌利西环礁，随后在24小时内完成了加油装弹。这艘可敬的老战列舰在珍珠港之战后起死回生，披挂上阵，一连50个小时以最大速度冲刺了900英里，在D日（2月19日）上午10点半抵达岛旁，此时登陆战已经开始了一个半小时。在随后的连续11天里，它为部队提供了炮兵压制射击和应召火力支援，直到所有16英寸炮弹打光为止。

舰炮轰击看似吓人，但实际上却远远没有达到海军陆战队想要的标准。在分配作战任务时，哈里·施密特少将申请在登陆前

进行至少连续10天的炮击。他的主张得到了特纳将军司令部的海军舰炮火力协调官唐纳德·M. 韦勒中校的支持，此人曾系统研究过塔拉瓦、塞班、佩里硫战役中舰炮火力的效果。韦勒提出，瞄准精度和威力固然重要，但是对岸轰击的持续时间也是个同等关键的因素。没有什么比向岸上防御阵地进行日复一日、一刻不停的重炮轰击效果更好了。但是由于后勤上不可行，施密特的请求还是被特纳拒绝了；美国海军从未尝试过如此长时间的炮击。经过几轮争辩和讨价还价，斯普鲁恩斯将军裁定，D日之前将对岛屿进行三天炮击。对于这一决定，他的解释是，炮击时间过长会令固定阵位上的舰队遭受潜艇和飞机反击的危险，同时海上弹药补给也有困难。绰号“疯子”的霍兰·史密斯中将是太平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后来在战后回忆录中感叹道：“我们不得不像马贩子一样讨价还价，在无可替代的人命和能够补充的弹药之间左右权衡。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32]

美军的指挥系统和先前在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作战时几无二致。斯普鲁恩斯仍然是海上的总司令，负责整个第5舰队，米彻尔则是第58特混舰队司令。特纳将军指挥两栖远征舰队，他从16个月前的塔拉瓦战役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和以往一样，他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向陆战队的地面指挥官下达命令。史密斯指挥远征军，包括第3、第4和第5海军陆战师，以及将在拿下岛屿后上陆的陆军守备队。但是史密斯没有像此前战役中那样直接指挥第5两栖军，这个任务交给了施密特将军。这一安排相当于在原本经过检验而且行之有效的指挥体系中生生插入一个新的层级，许多前线基层指挥官对此都颇有疑虑。实际上即便施密特干的是和史密斯在此前战斗中一样的工作，史密斯也仍然是施密特和特纳之间的润滑剂。史密斯62岁了，即将强制退出一线，硫黄岛将是他的最后一战。作为唯一有实打实的

成绩表明能够和暴躁的“凯利”特纳有效协作的陆战队高级将领，他的任务是待在特纳的指挥舰“埃尔多拉多号”上，代表陆战队的主张，争取陆战队的利益，而施密特则要上岸负责地面战斗。

特纳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他是美军中最顶尖的两栖战专家——因此也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了——但他并不总是能和其他人愉快地合作。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特纳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即便在海上执勤时也是如此，这是违规的。“特纳将军很难不喝酒，”斯普鲁恩斯的总司令秘书查尔斯·F·巴伯说，“但他有个神奇的能力：晚上睡得香，早上精神好……斯普鲁恩斯站在他这边，很重视他。”[33]

第4和第5陆战师将在岛屿东南海岸登陆。第4陆战师登陆后将直接向内陆推进，夺占两座机场中较大的元山1号机场，之后转向北，攻打2号机场。第5陆战师将打过相对狭窄而平坦的岛屿“颈部”，之后转向南，孤立并攻占折钵山。一旦火山落入美军之手，第5陆战师就将沿岛屿西岸北上，与第4陆战师共同组成一条横穿全岛的连贯阵线。第3陆战师将留在海岸外的运输船上担任海上预备队，但是施密特和史密斯预计这个师到战斗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可能获令上陆，插入战线的中央。之后三个陆战师就会组成一条战线向北平推，打垮日军在元山高地的防御。

没人指望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漫步。美军已经做好了在硫黄岛流血的准备。在D日前一个星期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特纳将军告诉通讯员们：“硫黄岛和当今世界其他那些坚固堡垒一样防守严密。”[34] 另一名将领觉得即便是攻打直布罗陀也会比这容易一些。史密斯将军预计他的进攻部队将会至少有1.5万人伤亡。舰队也已经把4艘坦克登陆舰改造为浮动的医疗中转中心，伤员会先送到这里进行评估和救治，之后再送往医院船“撒玛利亚号”或“慰藉号”。医院船会把伤员送回到塞班岛和关岛，那里新

建的陆军和海军医院有5 000张床位。一旦硫黄岛机场可用，道格拉斯“空中霸王”“空中救护车”就会飞来把最危重的伤员运往马里亚纳群岛，甚至直接送到瓦胡岛。

在运输船上，第一批陆战队员沿着吊绳网爬到了希金斯登陆艇和履带式登陆车中。平底登陆艇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每个人都要算准下脚时间，在登陆艇位于最高位置时下去。许多陆战队员来了个“粗暴下船”，一脚踏空，摔倒在艇底。[\[35\]](#)爬起来之后，他们在长凳上坐下来，大家挤得很紧，为其他爬下吊绳网的人留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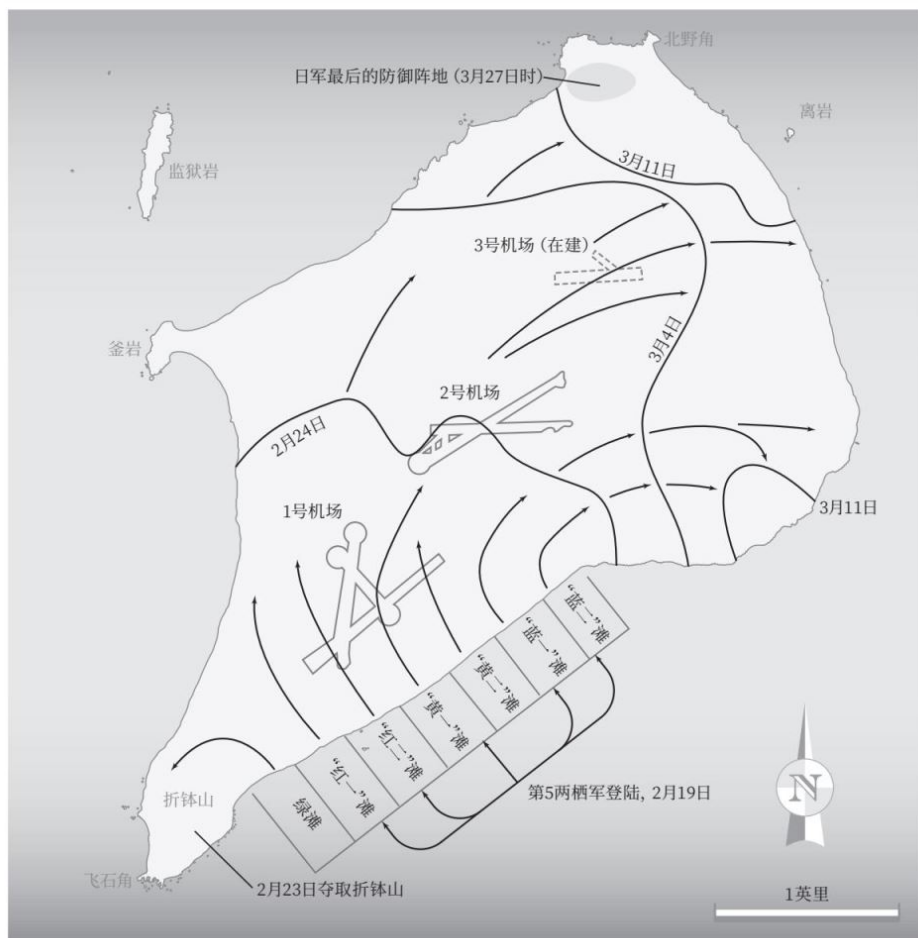
状况好得不能再好了。轻风从西北方吹来，海面自从三天前特混舰队先头分队抵达以来一直都很平静。舰炮炮击达到了高潮，战列舰的16英寸炮弹从头上飞过，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从隧道中穿过一般。日军至少有几门岸炮还击了过来，因为当第一批登陆艇在卸载线后方编波时，运输船队形中时不时会腾起几支白色水柱。上午8时40分，随着一声号响，操艇手们加足马力，向海滩长距离冲刺。登陆艇随着海浪时起时伏，因此在那些扶着运输船栏杆的人看来，这些登陆艇时而完全消失在海面下，时而又冒出来。这一趟航程不好走。人们拼命不让自己晕船，他们的尾椎骨重重撞在木质长凳上，粗布军服湿透了，眼睛也被飞溅进来的寒冷海水刺得生疼。路过正在开炮的军舰时，他们能感觉到巨型舰炮发出的冲击波。当托马斯中尉的登陆艇经过“田纳西号”战列舰时，他发现每次舰炮开火时，炮口下方的海面都会被吹出一个凹坑，之后又会流平。[\[36\]](#)

当登陆艇接近硫黄岛时，暗褐色的陡峭海滩出现在了前方。在海滩的最高处能看到一排日军飞机的残骸，那就是1号机场的最南端。进击的登陆艇队形中突然冒出许多白色水柱，这是日军迫击炮开火的结果。陆战队员们听见了日军机枪的嗒嗒声，以及

大口径火炮发出的更低沉的声音。有两队F4U“海盗”战斗机在海滩上方低空飞行，扫射阶梯状海滩上的碉堡。这些飞机来自从“埃塞克斯号”航母上起飞的海军陆战队第124和213战斗机中队——许多大头兵还是第一次看见陆战队的飞机。他们从南北两个方向相向接近，在相撞前的最后一刻分别向东边和西边转弯脱离——这是种炫目的特技动作。一名陆战队对空协调员回忆道，这种动作“精彩有余，但效果欠佳”。[37]一架“海盗”被高炮直接命中，炸成一团火球，坠毁在海里。

靠近海滩时，舵手们努力不让小小的平底登陆艇横转过来。6英尺高的海浪把登陆艇抛起来，又狠狠摔下，撞在船底的沙滩上。登陆跳板砰的一声放下来，陆战队员们向陡峭的滩头跋涉而去。他们走得很艰难。他们脚下的“沙滩”实际上是柔软的火山岩屑，一脚踩上去，岩屑会漫到脚背。在坡度较大的地段，他们发现自己甚至会跌跌撞撞地向下滑。第4陆战师的一名步枪手说这就像是“跑在松垮的咖啡渣上面”。[38]

硫黄岛之战, 1945年2月—3月



起初，登陆滩头的情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滩头上的部队指挥官发回了令人振奋的无线电报告：“只有轻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海滩抵抗轻微……只有零星的迫击炮火力。”^[39] 海滩上竖起彩色信号弹，表示登陆已成功，第二批和第三批登陆艇也紧随第一批之后开了上去。在登陆滩头南端的绿滩和红滩，突击部队推平了敌人的明碉暗堡，向内陆推进了300码，损失轻微。有人

推测可能是舰炮炮击和空中支援起了作用，霍兰·史密斯猜测日本人“被我们舰炮火力的巨大爆炸震晕了”。^[40]在硫黄岛之战的最初90分钟里，陆战队已有8个营上岸，包括两个坦克营和来自两个炮兵营的部分兵力。

当天上午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北翼的陡峭崎岖地段，位于“蓝二”滩上，陆战队员们称这片区域为“采石场”。这里的山谷和岩石地面看上去足以经受1 000磅炸弹和大口径舰炮的直接命中。这一地段被大量钢筋混凝土进行了加固，所有可能的通道都被机枪火力封锁。从登陆的那一刻起，第25陆战团3营就陷入了绵密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之下。他们越过第一层台地时遭遇了来自内陆和南侧日军碉堡的交叉火力。营长贾斯蒂斯·M.钱伯斯中校觉得，日本人仿佛在从所有方向朝他们开火：“你拿起一支烟，飞过的子弹就能把它点着。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41]“采石场”是美军转换整条战线推进方向的枢轴，因此第25陆战团的任务十分关键，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承受伤亡，坚持战斗。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上午11点，日军的迫击炮和炮兵火力突然变得密集了。他们的火炮已经提前瞄准了登陆海滩，弹着点位于海浪线和最高一层台地之间，美军部队正集中暴露在这片区域中。海军特混舰队和支援飞机竭尽所能，想要打哑这些火力，但是折钵山和元山高地上的日军火炮阵地隐蔽得很好，即便飞到其正上方也无法发现。谢尔曼坦克从第三批和第四批登陆的机械化登陆舰里挣扎着爬上海滩，却成了日本炮兵口中的肥肉。跟在钱伯斯第3营后方登陆蓝滩的陆战队员们刚一下登陆艇就被机枪扫倒。密集的迫击炮火也落在折钵山以北的红滩上，当天上午这里的进攻原本还比较顺利。陆战队员们卧倒在柔软的火山岩屑上，用他们的铲子、头盔甚至是徒手挖掘掩体，但是岩屑缺乏黏合力，他们的散兵坑纷纷

向内塌陷下来。“见鬼！”有人叫道，“这就像是在一桶面粉里挖坑。”^[42]

到中午时分，登陆滩头已经如同垃圾场一般。站在海岸外约两英里的“埃尔多拉多号”上用望远镜望去，霍兰·史密斯将军形容那里的场景就像是“被狂风摧残过的一排板棚房”。^[43]坦克和两栖车要么爬不上海滩的陡坡，要么陷在浅水区；要么被炮弹直接命中，要么压上了地雷；要么落入了反坦克陷阱，要么甩脱了履带。还有些被困在其他被毁、受困和燃烧的车辆中间无处可去。拥挤的海滩上到处散落着尸体和残骸，坦克只能直接从战死的陆战队员身上碾过去。成堆的残骸给后续开来的登陆艇带来了危险。操艇手们在燃烧的残骸之间寻找没有障碍的沙滩，有不少登陆艇在海浪中横转过来。浮桥无法锚定，变得很不稳定，随着冲上沙滩的海浪来回摇晃，要么撞到艇上，要么从背后撞上涉水上岸的陆战队员。然而，滩头的陆战队急需更多的人手、坦克、火炮、弹药和补给，特纳将军也别无选择，只能不停地派遣更多登陆艇尝试靠岸。

美军整排整排的部队被困在黛色的火山岩屑上动弹不得。迫击炮弹的啸叫和爆炸震耳欲聋，人们不得不吼叫着说话才能让别人听见。那些站起身来转移位置的人都要冒着被来自顶层台地的步机枪火力打倒的危险。但是留在草草挖掘的散兵坑里的人也可能被无休无止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日本人使用了一种巨大的320mm“栓式迫击炮”，可以将675磅重的炮弹打到1 440码外。陆战队员们称它为“飞行垃圾桶”或者“呼啸的基督”。他们抬起头就能够看到这个黑色的丑家伙以高抛弹道落下来。有一名军官回忆道：“我会在眼前竖起一根手指，如果它向左或向右移动，我就知道它不会落在我旁边。但如果我的手指能遮住它超过半秒钟，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44]

医疗兵们在暴露的地段上跑来跑去，救助伤员，但是对于那些被迫击炮弹片重伤的人来说，医疗兵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他们的肌肉被扯开撕碎，肢体被打断，面部血肉模糊，伤口里满是无处不在的火山岩屑。医疗兵们拿着吗啡针，给伤员们打止血带，包扎伤口，静脉注射止血针，并把伤员们拖到有掩护的地方。但是他们蹲在伤员旁边时，自己也常常被炮弹或狙击手打中。在红滩上，一名身负重伤的陆战队员跌跌撞撞地试图穿过冰雹般的炮弹和机枪弹雨，返回海滩，他双目失明，双手都被炸飞了。一位医疗兵立刻跳起来冲过开阔地，拉着这位伤员前往急救所。在硫黄岛上，许多医疗兵都为这种无私的行动付出了代价。在第4陆战师中，医疗兵的伤亡率高达38%。

海岸外，大小舰船跟随泛着白色浪尖的波涛起伏摇摆，高级指挥官们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问题。情况很不妙。后来的登陆批次比早先的批次遭受了更严重的伤亡。海滩上有许多伤员在等着被撤回舰队。海岸外的战舰和天上盘旋的舰载机已经竭尽全力，想要找到并摧毁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但奈何敌人藏身于深沟高垒之中。只有直接命中才能打哑它们，有时候甚至连直接命中都不管用。舰载机向看得见的敌人阵地投下凝固汽油弹，希望能够消灭日本炮手或者把他们逼入地下，但是迫击炮弹雨仍在不断落下，每一次爆炸都会把沙尘、碎片和尸体掀飞到半空中。赶在天黑前将更多的部队和坦克送上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人都担心日军的大规模夜袭。因此海滩上的陆战队员们必须尽快向内陆推进，为后续登陆批次腾出空间，即便这意味着惨重的伤亡。

夜幕降临时，已有4万名美军上了岸。他们控制了岛上10%的地盘，从元山1号机场东北角到南面第5陆战师将折钵山以北的地峡切断之处。日本人依旧控制着南北两面的高地，从高处的观察点俯瞰着美军。一整夜，战场都被海岸外战舰打出的照明弹照

得雪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每晚都会如此。战役期间，美军每晚都会消耗平均1 000枚照明弹。陆战队认为正是这种鬼魅般的灼目光芒阻止了日军小股部队的渗透。一名驱逐舰水兵在家信中描述了这一诡异景象：“看照明弹从白云中落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们会在云中点亮，令云彩发出白雪般的光芒，然后缓缓穿过一层层云，最后穿出云底，照亮整个岛屿。”^[45]

第一夜，无人合眼，瞭望哨瞪大了眼睛寻找着任何可能是敌人的迹象。晚上有些凉，甚至是冷——这提醒人们此时是冬季，而且他们已经身处远离热带的北方。但是没有夜袭发生。到拂晓时，美军指挥官开始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精明狡诈的步兵战术家。他们不会在开阔地上发动大规模反击，这样的反击在美军的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援面前难成威胁。守军将始终藏身地下，看不见也打不着，他们将令进攻一方为每一寸土地付出代价。

在南面，第28陆战团抬头就能看到“热岩”——这是他们给折钵山起的名字——这座火山四面陡峭，表面铺满棕色的火山灰，没有植被，山上的硫黄蒸气出口喷吐着恶臭。这个团的团长是哈里·B·利弗西奇上校，他接到的命令是孤立这座小火山，炸塌那里的洞穴和碉堡，扫清守军，并占领山顶。山脚周围的平地上环绕着70座覆盖着沙土的混凝土碉堡，这些阵地由厚地兼彦大佐指挥的硫黄岛南部防区部队把守。在开始攀登折钵山之前，美军必须将这些山脚下的堡垒拔除。它们不可能以迂回战术来进攻，只能靠步兵正面强攻才能拿下。

D+1日早晨，在寒冷的细雨之下，野战炮、舰炮以及舰载轰炸机向折钵山发起了规模巨大的联合轰击，这座火山甚至一度全部为烈火和烟尘所遮蔽。上午8点半，预定的“进攻发起时

刻”，炮击和轰炸突然停止。陆战队员们猫着腰向前扑去，在岩石、弹坑、岩石之间跃进。2营在左，3营在右，一齐冲向日军的机枪和47mm反坦克炮，许多人中弹倒下。这一天，2营伤亡最为惨重。他们进攻路线的最后200码是在平坦的火山灰上，几乎完全没有隐蔽。他们投出烟雾手榴弹遮住敌人的视线，随后便直接冲向敌人的射击阵地。E连的列兵唐纳德·J.鲁尔用身体压住日军的手榴弹，用生命掩护了排里的其他战友。为了表彰这种极致的牺牲精神，他被追授荣誉勋章。

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彭德尔顿军营，陆战队员们学习并演练了整套作战体系。他们耐心、一丝不苟地进行操练，专心地打磨每一处细节：重型舰炮开火，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坦克和75mm半履带自行火炮推进到近距离射程内，投掷烟雾手榴弹遮蔽日本人的视线，向射击口投入白磷手榴弹和炸药，用火焰喷射器向后门喷射，用刺刀、匕首甚至是拳头近身肉搏。若地形使得坦克无法向日军防御设施推进，他们就会把37mm炮推到前方阵位，从那里用它们一点点地砸开混凝土建筑——打死、震晕，或者用其他方式压制守军，这样步兵班就能够冲上去完成任务。日军的碉堡一个接一个变成坟墓。装甲推土机会开上来，将成堆的泥土堆上去，这样日本人便无法再次进入其中。

战役第三天，天气阴沉，狂风大作，间或来一阵大雨。虽然恶劣的地形阻止了坦克的前进，但3营还是在战线中央发动了进攻。在左翼，2营则在努力肃清后方区域，日军的狙击手和零星步兵仍在那里时有出现。战至当日日落时，第28陆战团已经包围了折钵山并打哑了山脚周围绝大部分敌人火力点。该团主任参谋罗伯特·H.威廉斯中校说，第28团跨过了折钵山山脚下的敌人防线后，敌人很快便偃旗息鼓。他告诉第5陆战师师长凯勒·E.洛基少将：“我们估计在那里打死了大概800个鬼子，但是我们花了很

大力气才找到100具尸体。我们确定炸毁了50个山洞。”[46]

美军控制了山脚，日军厚地大佐现在要尝试突围了。他命令残余的有组织的部队争取冲到北方防线。几乎所有的日军都在来到开阔地时被打倒，但还是有大约25人穿过美军防线，来到日军主力部队所在的元山高地。栗林对于折钵山部队没能坚守更长时间深感失望。他问参谋们：“我能想到一号机场会落入敌手。但是折钵山怎么能只守了3天就陷落了呢？”[47]

第四天，海军陆战队拿下了山头。和前一天一样，这天上午天气阴沉，下着小雨——战斗的开局也和前一天一样，大规模的海空火力猛烈击打着折钵山，直到整座山头被烟火淹没为止。两支侦察巡逻队沿着陡峭而危险的东坡在弹坑之间摸索前进。一支40人的巡逻队紧随其后，在10点过后几分钟到达了山顶。他们只遇到了零星抵抗。有少量日本人从隧道和洞穴里冒出来，还有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了过来，他们很快都被干掉了。陆战队员们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封闭了所有能找到的洞口。许多日本人自杀了，要么把手榴弹贴在胸口引爆，要么把步枪的枪口插进嘴里，用脚趾扣动扳机。折钵山山体内部的有些坑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因为那里堆满了日军的尸骸。

站在山顶向北望去，机场、登陆滩头、海岸外的特混舰队一览无余。他们的陆战队战友们正在两座机场之间的平坦地形上与敌人激战。在战役的最初四天，日本人占据着这座具有战术价值的观察点。现在双方角色互换了，美国人得到了折钵山，插旗为证。2营E连从瓦砾中抽出一段10英尺长的铅管用作旗杆——它本来一头连着蓄水池，一头连着山顶下方的一座碉堡。上午10时20分，他们升起了营旗。北面战场以及海岸外舰船上的瞭望员顿时一片欢腾。罗纳德·托马斯中尉回忆道：“每个人都欢呼起来，我想有些人还哭了。”[48]第5师副师长利奥·赫姆利准将称其

为“我一生难忘的最伟大的场面之一……整个岛上，目力所及之处一片欢声雷动”。[49]

海军部长吉姆·福莱斯特也是搭乘特纳将军的旗舰“埃尔多拉多号”的观战团成员之一。福莱斯特中等身高，身材瘦削，翘鼻子，宽嘴巴，沙褐色的头发向后梳起，在头顶上分到两边。他是个热情的人，充满进取心，以前当过华尔街债券销售员，现在是最深得罗斯福总统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内阁顾问之一。部长选择在D+4日这天上午来到岸上，简短视察红滩。他戴着钢盔，穿着没有标识的普通绿色军服，在霍兰·史密斯将军和一个陆战排的伴随下来到前线。当那面小国旗插上南部山峰的顶部时，他们一行人刚刚从一艘希金斯登陆艇上下来。福莱斯特对史密斯说道：“霍兰，折钵山上升起的这面旗帜意味着海军陆战队还能存续500年。”[50]

这位海军部长一直在推动尼米兹战区的宣传公关工作。他会直接插手新闻审核流程，并且要求将军们保证连夜向国内的新闻编辑部发送新闻稿复印件和照片。在这一趟太平洋之旅中，福莱斯特常常提醒海军和陆战队的将军们，不久之后就会爆发关于军种合并和重组的惨烈政治斗争，海军陆战队在战后能否存在还未可知。如此，福莱斯特这关于“500年”的说法便有了适时的意味和弦外之音：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将会有助于海军陆战队在战后的国防体系中争取独立权。

史密斯将军在战后回忆录中描述，福莱斯特行走于登陆艇、坦克和两栖车的残骸之间，在敌人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呼啸着投下来的时候，和极为惊讶的陆战队员们握手。史密斯写道，在他们所站立之处的100码之内有20个人或死或伤——“但是部长看上去对危险完全不屑一顾”。[51]或许福莱斯特之所以能若无其事，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和将军的描述并不一样。在当天的日记中，福

莱斯特只是这样写的：“海滩当天上午吃了几枚炮弹，但并不严重，虽然我们到达的一个小时前，一阵炮弹造成了一些伤亡。”^[52]

三个小时后，更著名的第二次升旗行动到来了。第28陆战团的一支后续巡逻队把一面更大的国旗带到了折钵山山顶。随队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就在现场，拍下了这一幕。当6名陆战队员抬起旗杆，国旗在风中飘扬之时，罗森塔尔连取景窗都没有看就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他把未冲洗的胶卷送到了关岛，一名美联社的图片编辑把它冲印出来，送回美国。这张匆忙拍摄的照片意外成了经典之作，也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具象征性的画面，没有之一。这张照片通过电话铜缆传送到全美各地的新闻编辑部，同时登上了数百份报纸的头版和杂志封面。罗森塔尔也因此荣获普利策奖。这次升旗行动成了美国推销战争债券的主题展示，照片上6人中幸存下来的3个人也被召回美国，进行公关宣传。这一幕还被做成铜像，安放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馆前。

第28陆战团报告，在折钵山的战斗中有510人伤亡，若再加上D日的损失，这个团在5天里总共伤亡了895人。更糟的是，除了这个团，同期那些在北侧作战的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美国国内，许多人都觉得罗森塔尔照片中的升旗场面肯定意味着一场胜利战役的辉煌高潮。实际上，拿下折钵山只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大战的第一阶段。元山高地的战斗最终要让美军付出比折钵山多20倍的人命。D+6日（2月25日），第28陆战团被调入第5两栖军的预备队，开始向北移动，以加入正在岛屿中央血战的兄弟部队。

施密特将军把他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拿下的折钵山北侧。距离前线仅仅半英里的这一整片地区已经渐渐变成了后勤基地的模样。过去几天的恶劣天气变成了风平浪静，美军得以开始卸货。即使敌人的炮弹和迫击炮弹依旧不断飞过来，但后方梯队还是在这里建起了补给堆栈、集装箱区、后备发动机库、燃油堆栈、指挥帐篷，以及野战医院。推土机升级了岛上的路网，清理分队也把主干道上的残骸拖走。第31海军工程营的“海蜂”们在元山1号机场上忙活，他们清除了跑道和停机坪上的地雷，还把混凝土搅拌机和重型建筑装备拉上了岸。施密特告诉一位记者，再激战5天就可以消灭硫黄岛上顽抗的敌人：“我上周说过这需要10天，我还没有改变主意。”^[53]

主要战线现在推进到了元山2号机场，这里的海拔比1号机场略高些。跑道和滑行道上堆满了飞机残骸，日军步兵将它们用作了现成的临时碉堡。陆战队呼叫舰炮、地面重炮以及航空兵来轰炸这些阵地，随后越过开阔地，发动步坦协同进攻。元山高地的黛色穹隆形石山在北方巍然耸立。要拿下这里，就要攀上一系列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的阶梯状火山岩台地。霍兰·史密斯形容这里是“大纵深的筑垒地带，从岛屿的一侧海岸延伸到另一侧海岸，有许多可以相互支援的碉堡，其中不少几乎埋在地下”。^[54]这里的地形没有太多侧翼攻击的空间，因此陆战队员们别无选择，只能正面强攻。约瑟夫·L.斯图尔特中校称之为“乏味的挤压战”。^[55]另一名军官用了一个人人都想得到的橄榄球比喻：“你冲不到底线，胜负全看抢断。”^[56]

施密特招来了他手头所有的海上预备队：格雷夫斯·B.厄斯金少将指挥的第3陆战师（欠1个团）。这支老部队被插进战线中央，第5师在左，第4师在右——他们领受了最艰难的任务：向北直接推进，穿过元山村的废墟和未完工的3号机场，冲到元山高

地中央的台地上。施密特命令第5两栖军50%的炮兵火力集中到这一区域，其余50%均分给第4师和第5师的侧翼。D+5日，也就是折钵山插旗的次日，三个师并肩前行，再度开始向北进攻。

美军对守军拥有3：1的兵力优势，10：1的炮兵火力优势（包括舰炮），并且完全控制了天空。但是栗林天才的地下防御设施有效抵消了这些优势。美军坦克常常跟不上来，至少在进攻初期如此，因为所有通往台地高层的道路都密集布设了地雷，并挖上了坦克陷阱。步兵们沿着道路用轻武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向前进攻。在战线中央，第3师在向整个太平洋上最坚固的筑垒地域进攻时伤亡惨重。

对于前线的大头兵而言，战场上横飞的弹雨是躲不开的。机枪的嗒嗒声和火炮及迫击炮的轰鸣从来没消停过。他们低着头，知道高地上的日军狙击手一直在通过枪上的瞄准镜观察。日军甚至会用更大型的武器来进行狙击，尤其是他们的47mm反坦克炮，其射击精度足以击中数百码外的一个人。有这么多重武器在开火，士兵们对于步枪的射击也就听天由命了，即便子弹从他们近旁飞过也无动于衷。第24陆战团I连的威廉·凯查姆上尉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都被击中了，但是包扎了伤口之后，他仍然和他的连队一起留在前线。他嘲笑道：“他们打了我12枪，只有两枪擦破我点皮。”^[57]

大兵们渐渐像痛恨敌人一样痛恨这座岛屿。硫黄岛令人“毛骨悚然”，第4陆战师的泰德·艾伦比回忆道：“那简直就像是月球的一部分掉到了地球上。”^[58]陆战队员们要在地面挖坑，躲避无穷无尽的敌人炮火，结果却释放出了难闻的硫黄蒸气。硫黄味和腐尸烂肉烧焦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恶臭弥漫全岛，无处可逃。他们想要睡觉时，又会有地蟹从坑底的岩屑里钻出来，在他们身上爬。风和爆炸会扬起细小的火山灰，钻进人们的眼睛、耳朵、鼻

子和嘴里。地面摸上去发热，挖得越深就越热。埃尔顿·施罗德把他的罐装口粮埋进他散兵坑底部的地面下。半个小时后再挖出来，“就有热腾腾的C型口粮可以吃了。这是我在这座破岛上唯一能找到的好处”。[59]

大约8万部队挤在不足8平方英里的小岛上，硫黄岛堪称历史上人员密度最大的战场之一。再加上双方的火力强度，这就成了可怕的屠场。前线固然最惨烈，但是硫黄岛的后方地域也不是真正的后方。每一名战士都能够指引重炮和迫击炮向岛上的任何位置开火，因此，岛上的所有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前线。滚雷般的弹幕犁扫着滩头、散兵坑和指挥所。偶有减弱，也极其短暂。陆战队员们不情愿地承认，敌人有着要命的技术。“日本人是优秀的炮兵，”斯图尔特上校说，“他们每次开火都会有人被击中。”这里没有安全地域，没有后方地域，而且——对于美国人而言——还没有什么天然掩体。施密特将军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位于折钵山北边不远处，是一片被沙袋包围着的帐篷群。据施密特的作战参谋爱德华·克雷格上校的说法，指挥帐篷在整场战役中都会时不时遭到重炮轰击。沙袋掩体越垒越高，但炮击的震动仍然很恐怖。克雷格回忆道，当炮击到来时，“我们就在小小的指挥帐篷里摆出三人纵深防守的姿势，趴在地上，一直保持到炮击结束”。[60]在北面半英里外的第4陆战师指挥所，巨大的320mm栓式迫击炮弹四处落地，天空变成了怪异的红色，细小的尘土弥散在空气中。陆战队的榴弹炮和海岸外的战舰展开了反炮兵压制，但对日军似乎毫无影响，他们重武器轰击的强度一点也没有减弱。

第5两栖军司令部与各个师部和前线之间通过无线电或传令兵保持联系。来自团级和连级指挥官的意见也对施密特将军及其指挥部的战术决策发挥了作用。军部和师部的许多军官和士官都

被派到前线去接替那些伤亡人员，承担起了战斗任务。伤员们被救护吉普车或者是人力担架送往南边，卡车、坦克和推土机则向北开去。岛上布满了地雷，威胁无处不在。陆战队员们都学会了在道路上踩着车辆留下的车轮印行走。大型的反坦克雷埋得很深，因此扫雷组并不总能找到它们。但是一旦有坦克或其他重型车辆压上去，它们就会爆炸。施罗德就亲眼看到一辆在2号机场南边扩展道路的卡特彼勒DS重型推土机遭遇了这种事。“发生了可怕的大爆炸，那辆DS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赶紧寻找掩护。那辆推土机的零件像雨点一样落得到处都是。有些零件至少重1000磅。司机落在离我大约10码处，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61]

在战役最初5天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平均每天伤亡超过1200人。海滩和机场周围的平坦地带布满了尸体。直接命中的炮弹会留下弹坑，有些弹坑里散落着10到12名陆战队员的尸块。鲍勃·谢罗德写道，在红滩上方的一层层台地上，“我在太平洋战争中还没见过这样残缺不全的尸体。许多人被拦腰截断，胳膊和腿飞到了50英尺外。一处沙滩上，在离我最近的尸堆远处，我看见一条肠子拖了15英尺长”。[62]军官和士官的伤亡率更高。枪炮军士约翰·巴斯隆曾在瓜岛战役中因表现英勇而荣获荣誉勋章，是蜚声全美的陆战队员，他也在D日当天率队冲往元山1号机场时战死。

装甲推土机挖出了长长的壕沟，用作坟墓。“我们用推土铲一次埋葬50人，”随军牧师盖奇·霍塔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天主教徒，还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的都是通用的祷告词：‘我们把你交还给大地，由全能的主庇佑。’”[63]

军舰在海岸外巡游，驱逐舰和炮艇紧靠着海岸，巡洋舰和战列舰则远一些。前线的陆战队协调官可以通过直达军舰枪炮长的

开放式无线网络呼叫精准的舰炮火力轰击任何目标。问题是舰炮常常单独依靠雷达引导来射击，炮手们只要把坐标参数输入火控系统就行了。在硫黄岛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的环境下，舰炮射击的效果并不总是很好。尽管如此，根据特纳将军的战报，这次战役中舰炮应召射击任务的次数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口径从16英寸到5英寸的高爆弹像雨点般落在元山台地的各处目标上。小型炮艇——用登陆艇装上火箭炮、轻型迫击炮和20mm火炮改造而来——在岛屿西北部海岸巡逻，以火力袭扰敌人阵地。它们还会阻止敌人沿海岸移动，并拦截试图从北面的父岛或其他岛屿前来登陆的小艇。

在驱逐舰“霍沃思号”上，岸上一名陆战队军官的声音从舰上的大喇叭中广播出来，这样舰上的所有人都可以按要求行动。但由于岛屿常常被浓烟和尘土遮蔽，舰员们难得看到他们的5英寸火炮齐射命中目标。当喇叭里的声音确认“霍沃思号”打中了指定目标时，文书军士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就会感到骄傲：“看，那些杂种在跑！”然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的射击非常棒。效果特别好”。雷恩斯举起望远镜，试图了解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烟尘散尽后，他看见一辆谢尔曼坦克迎着重机枪火力向前推进，一个步兵班则猫着腰跟在后面。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雷恩斯说他得知“霍沃思号”的火炮命中敌人后十分兴奋。“我能为消灭他们一些人做出贡献，我很开心，虽然我觉得你和我都为此做出了牺牲。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能打死他们让我格外开心。我只希望离得足够近，能看到我们的炮弹落地时他们的尸体和尸体碎块飞上天。”但另一方面，雷恩斯也承认，他更愿意在相对安全的“霍沃思号”上观看战斗：“你总不能用绞盘把我拉到岸上去。”^[64]

日军航空兵对硫黄岛登陆的反应相当弱，这既是由于恶劣的

天气，也是由于第58特混舰队对东京机场的空袭压制。很少有日本作战飞机出现在岛屿上空，即使有，大部分也会被在上空巡逻的美军舰载战斗机迅速击落。这段时间只出现过一次成规模的“神风”攻击。2月21日（D+2日）黄昏，大约50架双引擎三菱G4M轰炸机在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攻击了硫黄岛外海的舰队。“萨拉托加号”航母被3架飞机撞中，舰上123人战死，192人受伤，不得不回珍珠港去修理。护航航母“俾斯麦海号”被一架自杀机撞中尾部，在机库里引发了致命的二次爆炸。舰上的大火失去了控制，它侧翻在海面上，带着218名官兵沉入海底。另一艘护航航母“隆加角号”打掉了4架“神风”飞机，只受到轻伤。还有一艘货船和一艘坦克登陆舰被击中，遭到重创。

岛上的美军地面部队从来不缺近距离空中支援。有三个军种的飞机来为他们进行轰炸、侦察和扫射——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陆军航空队。有时候，硫黄岛上空飞机的密度如此之大，简直快要撞上了。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队又一队格鲁曼、沃特和寇蒂斯轰炸机映着阳光飞过来。俯冲轰炸机以70°俯冲角冲下来，向敌人战线后方看不见的目标投下炸弹，掀起冲天火光和滚滚烟尘。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用.50口径机枪的曳光弹扫过日军的火炮掩体，或者在2 000英尺高度上发射5英寸火箭弹。飞行牛仔们的表演很精彩，陆战队员们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扫射、轰炸和火箭攻击的效果都不理想，原因和影响舰炮射击效果的一样。大部分弹药打在岛上坚固的山洞和下沉式火炮阵地上毫无效果，飞行员们还要小心翼翼地防止误伤本方部队——双方战线如此之近，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舰载机还是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为炮兵做空中校射，阻止日军在开阔地上运动。但是硫黄岛的战场环境对地面部队和航空兵之间的配合程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而美军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积累更多经验才能满足这种要

求。

陆战队的对空协调官韦尔农·E·梅基上校在2月24日上岸，他在折钵山北侧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建立了他的通信帐篷。他最终成了硫黄岛上的实际空中指挥官。梅基尝试了一种新的对空协调系统，前线的对空联络官可以叫来飞机空袭仅仅300码外的日军阵地。陆战队的战场观察员搭乘在TBM“复仇者”飞机的后座上，他可以通过开放的无线电频道和地面上的炮兵营联系。日军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弱，但有时会突然在意料之外的时间和地点打出来。在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中，防空火力击落美机26架，重创9架。

3月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5战斗机大队——包括一队P-51“野马”和P-61“黑寡妇”——入驻1号机场。这些陆军飞行员没有接受过对地近距离支援的训练，但他们都是高水平的飞行员，而且对飞行都有着“野心勃勃”的态度，他们乐意尝试梅基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事。P-51战斗机的动力足以挂载和投掷1 000磅炸弹，这对硫黄岛北部岩石高地上那些砂岩浮石的打击效果比500磅炸弹大得多。这些“野马”以45°下滑角接近目标，与战线平行飞行，以降低误伤陆战队的风险。装有延时引信的半吨重的炸弹被投进岩石的裂隙或干脆砸进石头中，爆炸的威力大大增加。梅基说，有几次战例令人印象深刻，P-51投下的炸弹“把整个峭壁的侧面炸进了海里，把敌人的山洞、隧道全都暴露在了舰队的直射火力面前”。^[65]

和营团级指挥官交流时，梅基强调1 000磅炸弹会给他们的部队带来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弹着点大幅偏向美军战线一侧时。根据经验，他提出投弹安全距离的码数要和炸弹重量的磅数相同，也就是说，1 000磅炸弹应当用于攻击距离本方陆战队不低于1 000码的目标：“一枚落在你们前方两三百码的1 000磅炸

弹可不是玩具。”但是正在岛屿东北岸的岩洞筑垒地域艰苦血战的第4陆战师，则想要让“野马”去攻击直面其战线的敌人阵地。一名营长告诉梅基：“好吧，你就算打到我们，也不会比我们现在挨的打更重。”通过直达飞机座舱的无线电，陆战队员们可以在炸弹投下前一刻寻找掩护。“所以我过去以后就按他们说的进行了空袭，”梅基说，“我们震得很多人牙根发疼，包括我自己。但除了鬼子外，我们没有伤到任何人。”[66]

施密特将军关于十日取胜的预言过于乐观了。3月4日星期天——开战整整两个星期——主要战斗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陆战队拿下了硫黄岛2/3的部分，包括全部3座机场，并打垮了栗林在元山高地外围的防线。第5两栖军已有1.3万人伤亡，包括3000人战死。打得最惨的部队失去了指挥官、军官和士官，之后接替他们的人也伤亡殆尽。在战线东部的关键战场，第4陆战师最终越过了被他们称为“斗兽场”的峭壁包围的海湾。西面的第5陆战师向尼基岭和362B高地推进，遇到了沿岸岩石峭壁上日军的顽强抵抗。在中央地段，第3陆战师向沟壑纵横的高地展开了惨烈的进攻，在令人焦心的9天里只推进了3000码。“元山蜂巢”那阴暗、可怕的轮廓就在他们前方。这一交战地域面积只有约1平方英里，却有着一千个各式各样的山洞或隧道入口，其下则是极其复杂的地下迷宫。

在南面机场周围的平坦地带，后方梯队正把这里逐步建成一座先进的作战基地。滩头的物资卸载已经十分顺利，除了偶尔遭到一阵远程迫击炮或火炮的炮击外，不再有其他任何阻碍。折钵山布满弹坑的山坡上建起了墓地，一排排白色的十字架越来越长。第133海军工程营的“海蜂”们建起了6套海水蒸馏系统。这些高能耗的机器能把海水变成可饮用的净化水，再装进5加仑的

水桶送到前线。到3月6日，这些蒸馏器已经足以每天为岛上的每位陆战队员供应3壶饮用水了。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洞穴和碉堡里，淡水的存储量却在快速下降，人们已经开始难以忍受干渴的煎熬。

3月4日，“超级堡垒”轰炸机“蒂娜力量号”（隶属于第9轰炸机大队第1中队）在元山1号机场（美军已将其命名为南机场）紧急降落。这架轰炸机在轰炸日本的任务中受了重伤，若没有硫黄岛上的这条跑道，它就只能在海里迫降了。当它停止滑行并关闭了4台引擎时，大约200名陆战队员和“海蜂”们立刻围了上去。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架巨大银色轰炸机的到来是这场战役中一个令人难忘的里程碑，对岛上美军的士气也是个不失时机的鼓舞。它展现了这场岛屿血战的更宏大的目标——在能够轻易轰炸东京的距离上夺取一个航空兵基地。一个月后，第7战斗机司令部的P-51“野马”开始加入向北飞去的B-29编队，为它们的轰炸任务提供战斗机护航。3月16日，一个中队的海军B-24（海军称之为PB4Y）巡逻轰炸机也将开始从硫黄岛起飞作战。当北面一英里半之外还在激战之时，南机场已经开始显出一副忙碌的大型航空基地的样子了。

在第5两栖军司令部召开了一场指挥会议后，施密特命令全部三个师在大规模炮击之后全线恢复进攻。3月5日，最筋疲力尽，损失最为惨重的部队被撤回后方集结地域短暂休整，并将补充兵补入那些死伤严重的营。3月6日拂晓前，当炮火准备打响时，这些部队回到了前线。这是整场战役中最猛烈的炮击，所有能用的榴弹炮在海岸外巨舰重炮的支援下进行了长时间的猛轰。根据各炮兵营的报告，这一天的弹药消耗为2 500枚155mm“长汤姆”炮弹，外加2万枚75mm和105mm炮弹。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以及各色炮艇还发射了22 500枚舰炮炮弹。

目标坐标被设在美军战线前方至少200码处，但还是有很多炮弹危险地落在陆战队员们近旁，有些偏离弹甚至直接落在他们的防线上。飞机也参与了进来，在精准的时间点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一如往常，不熟悉的人会怀疑没有人或者活物能够在这凶猛的打击中幸存下来；同样一如往常的是，他们错了。

炮击停止后，突击梯队向敌人的防线扑了上去。在地形允许的地方，谢尔曼坦克会行驶在步兵前方。日军立刻打来了致命的步机枪弹雨；他们的抵抗看上去和先前一样顽强。凶猛的弹雨从碉堡和山洞的入口处喷射出来，以侧射火力覆盖了正在推进的陆战队员。白磷弹落在他们周围，迫使他们卧倒在地并挖掘掩体。先前没有被发现的日军新火力点也从不同角度开火。由于这一地区沟壑纵横，坦克在许多地方无法推进，步兵不得不独自上前。步坦协同进攻的冲击力很快便消解于无形，但是陆战队员们没有退缩，激烈的战斗又持续打了一整天。为了打破僵局，前线部队的指挥官呼叫炮火轰击距离己方阵地仅仅100码的敌人阵地。不少洞穴被炸塌，有些碉堡被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拿下，几十名日军被打死。但是守军极少暴露在开阔地上进攻。他们就如栗林将军教导的那样，紧紧依托自己的防御工事和堡垒，通过地下通道网络四处机动。

战至3月6日日终时，陆战队在沿岸的起伏地带上推进了大约250码，但在大部分地段，其进展不超过50码。在地形最恶劣的战线上，陆战队员们可能只前进了30码——但毕竟总算是有了些进展。突破深度的差异令双方都暴露出了侧翼，形成了突出部，这样美军就有机会向原先无法触达的日军火力点发动侧翼进攻，甚至是从上向下进攻。装甲推土机在难行地段上清理出通路，这样坦克和装有75mm炮的半履带车就能伴随步兵前进了。但是要挖掘出新的供坦克通行的道路并扫清地雷，则尚需时间和耐心，

而且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第4陆战师师长克利夫顿·B.凯茨将军估计高级军官们已经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感受。“好吧，我们会一直揍他们，”他告诉鲍勃·谢罗德，“他们不可能永远撑下去。我们会不停地压迫他们，直到把他们压垮。不要放弃。”^[67]

3月7日，施密特将军要各个炮兵营节约炮弹，在前一天早上的烟火秀之后，弹药的存量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他命令第5陆战师转向内陆进攻，夺占能够俯瞰海边和北野角周围那一圈可怕防御设施的高地。但是正当第27陆战团准备冲出去的时候，一顿毁灭性的迫击炮弹雨从天而降。2营E连被迫击炮弹直接覆盖，35人或死或伤。这一区域的进攻从一开始就陷于停滞，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在东边的第4师战区，战线后方还有大量的后卫肃清任务要执行，在“斗兽场”和“土耳其门把手”地区，新的日军士兵仿佛黑魔法一般变了出来。这个师的状况糟透了。由于大量军官和士官阵亡，指挥能力大幅跌落。士兵们已经出现了战争疲劳综合征的症状。这个师的连排一级已经出现了补充兵难以协同作战的问题。一份报告指出，“疲劳和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的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地体现在了部队的战斗方式上”，报告估计第4师的作战效率已经只剩下D日时的40%。

在“斗兽场”北面，崎岖的岩石山岭和密布低矮灌木的山谷相互交错。第25陆战团继续向内陆进逼，逐步将千田贞季少将指挥的第二混成旅团包围进了一个不断缩小的封闭口袋阵里。眼见日军可能发动突围，甚至是大规模的万岁冲锋，陆战队拉起了成卷的带刺铁丝网，在其间布设了数以百计的反步兵地雷。他们架起各种类型和各种口径的武器，封锁日军进攻的必经之地，他们的轻型榴弹炮和轻型迫击炮也都瞄准了防线前方的无人地带。

在第3陆战师的战区，向362C高地的推进依然缓慢，这是一

处具有特殊战术价值的海角，是高地顶部防御链条的关键一环。唯一一条通往此地的道路需要经过硫黄岛上最为起伏崎岖的地形，日军也已筑好了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这里的景致并不美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硫黄味。脚下的地面很热——热到躺上去都会感到难受，再挖个散兵坑就更难受了。然而推进到这一屠杀场的士兵们又不得不挖掘散兵坑，来躲避敌人的机枪、掷弹筒以及反坦克炮。由于没法指望把碾压性的装甲力量开到这崎岖难行的地形上来，这个师不得不拿出老办法，步兵正面强攻。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还从来没打过夜间进攻。他们的条令里没有这条，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厄斯金将军最近一段时间来一直认为一个营规模的夜间渗透进攻能够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厄斯金向施密特将军提出了申请，并获准在3月8日破晓前发动这样的进攻。第一步，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组悄无声息地快速渗透至日军防线后方约500码处。得益于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他们在守敌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炸掉了许多碉堡和洞口。许多日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打死，有些还死于刺刀之下。破晓时，陆战队员们向这一区域打出了烟幕弹，遮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第9陆战团3营承担了拿下362C高地的任务，他们起初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烟幕不仅迷惑了敌人，也迷惑了美军自己。到早晨6点左右，K连的军官们郁闷地发现他们占领的是331高地，不是362C高地，后者还在北面250码远处。这距离不算近，需要越过一处暴露在日军步机枪火力之下的山头。于是，激烈的战斗打了一整天，两个陆战连在此地伤亡惨重。然而，负责率领此次进攻的贝姆上校决定向预定的正确目标继续推进。这是一场血战，打了一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到日落时，这个营最终还是在362C高地顶峰周围建立了防线。

同日，一样是在破晓前，千田将军被围困的部队展开了突围

行动。他们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万岁冲锋，而是在猛烈的迫击炮、火箭炮和火炮射击之后，明智地沿着整条战线发动了一连串小部队渗透进攻。这些人利用暗夜的掩护，巧妙利用复杂地形悄悄摸了上来。但是第4师的陆战队员们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他们的轻型榴弹炮向日军进攻部队倾泻弹雨，许多来袭者踏响了地雷或者在试图剪断铁丝网障碍时被击毙。大约12名日军渗透到第23陆战团2营的指挥所，但很快都被消灭。第二天早晨，战场上倒卧着650具日军尸体。大曲觉中尉是战役中日军仅有的几名幸存者之一，据他的说法，“土耳其门把手”和“斗兽场”周围地区成了堆尸场：“我见到没有四肢的尸体，数不清的腿、胳膊、手，还有内脏散落在岩石上。”[\[68\]](#)

这是地上人和地底人之间的对决，一支住在地面上的军队和穴居人军队的对决。硫黄岛上有许多日军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没有见过太阳。他们听到坦克在头顶上轰鸣，甚至在烈火灼身之前还能听到火焰喷射时的气流声。一名日军指挥官报告说，美军“毁灭了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像杀灭害虫一般打仗”。[\[69\]](#)当美军陆战队占领了他们地堡的上方，日军有时会引爆炸药，把自己和敌人一同送上西天。这令人心惊胆战地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地道式”进攻，或者是美国内战中对彼得斯堡的围攻。埃尔顿·施罗德就亲眼看到仁志村北边的小山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看见许多尸体就像破布娃娃一样被抛到空中。”[\[70\]](#)在这次大爆炸中，有43名陆战队员非死即伤。

在硫黄岛之战的头21天里，医护人员平均每天要处理1 000名伤亡人员。到D+33日，已有总共17 677名伤员被撤到海岸外的医院船或者马里亚纳群岛的医院里。[\[71\]](#)所有人都有理由为医护人员的杰出努力而骄傲，无论是战场上的医护兵，还是在前线

急救所、野战医院、海岸外的医院船以及塞班岛和关岛上的医院里工作的人。医护兵和担架手在战场上有求必应，不知疲倦，在敌人的枪口前跑来跑去。医疗兵们顶着被近旁爆炸的炮弹和从头顶飞过的子弹击中的风险，蹲在受伤的陆战队员身旁，打开身上的“三单元”急救包，拿出皮下注射器，用吗啡针缓解伤员的痛苦和减轻炮弹震荡症；把磺胺粉直接撒在伤口上消毒；用止血钳、缝合线、绷带和止血带为伤员止血。如果伤员失血过多，他就会接受静脉血浆注射——这是能降低失血性休克致死率的救命药。血浆瓶被举在手里，或者挂在倒插在地里的步枪枪托上。伤员如果幸运的话，就会有四名担架手迅速赶来，把他送回营里的急救所，一名医疗兵会在那里检查他的伤口并重新包扎。在附近火炮射击的轰鸣声中，他可能会被打一针青霉素以避免感染。一名穿着普通军装和戴着钢盔的牧师会过来，为他们带来安慰、圣水、祈祷，或者是临终祷告。

担架会被放在救护吉普车的后座上，或者是半履带车和两栖车上，送到岛上的某处野战医院里。道路颠簸，伤员们会很痛苦，血浆瓶则挂在架子上摇来晃去。硫黄岛上的野战医院都位于战线后方不远处的主要道路旁，大部分设在南机场近旁的低洼地或护坡上——那是一片低矮而不显眼的环绕着沙袋的暗绿色帐篷。伤员们被抬进厚重的双层遮光布帘，来到被用作接收病房的长条形帐篷里，他们的担架被安放在可折叠的胶合板手术台上。医生和医护兵会在每个担架夹着的牌子上做标记。原先简单的血浆瓶会被换成一整套静脉输血设备。血衣会被剪开，伤口会被清理，即将进行手术的伤员会被擦洗干净，刮去汗毛。这里十分闷热，尤其是在夜晚，帐篷必须封闭严实，以免漏出灯光。空气无法流通，血和杀菌剂的气味还有烟味都无处不在。即便如此，按照20世纪中叶的医疗标准，这些野战医院的设备可谓极其精良

——可能是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为先进的军用野战医院。医院里挤满了手术台、X光机、氧气面罩和氧气罐、用于存放血清的冰箱、发电机、制冰机，以及一堆堆由美国民众捐献，装在冰袋里送到岛上来的血液。比较危重的伤员会直接送进手术室，在那里，各个专业的外科医生会立刻行动起来。医生们都认为最严重的伤是“腹腔伤”——指人的胃、肠或者其他关键脏器被子弹击穿。受损器官要取出来切除损毁部分，再放回伤员的腹腔。这种伤员需要进行复杂的长时间外科手术，耗时常常多达四五个小时，后面还要进行大范围的术后护理。即便如此，仍有大约一半的伤员会在手术后死去，死因常常是脓毒或感染。这时候，人们就会在死者脸上盖上一块布，把他抬到外面的地面上，准备送往墓地。

超过9 000名受伤的陆战队员被从海路撤出硫黄岛。他们的担架会放在经过特殊改造的希金斯登陆艇或者履带式登陆车里，然后送往被改造成海上伤员分类中心的四艘坦克登陆舰之一。每艘艇上都会有一名医护兵负责在转运途中照顾伤员。这趟航程往往很艰难，船艇会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海水还会从侧舷飞溅入艇内。挂着的血浆瓶会在架子上摇来晃去，有些伤员还会晕船，这就令其状况雪上加霜。那些在转运途中死去的人会被送回海滩，埋葬在墓地中。

更危重的伤员会被送到离海岸更远的运输船，或者是专用医院船“撒玛利亚号”和“慰藉号”上，这些船会把伤员送回关岛和塞班岛。它们的侧舷绘有巨大的红十字，船体四周画有一条绿色色带——和战时的其他船只显然不同的是，它们在夜晚从来都是灯火通明。担架被放在挂着吊钩的平板上送上船，然后迅速抬到被用作接收病房的一间宽敞大厅里。护理病房会产生巨量的医疗垃圾——沾血的绷带和毛巾，空的血浆瓶，被撕成布条的衣服，用

过的石膏模具和夹板——清扫人员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把所有需要扔掉的东西收起来扔掉。水兵们用拖把擦洗染上血的甲板，时不时停下来把被染红的水拧到桶里。

无论如何，大部分受伤的陆战队员仍然勇敢而乐观。一名被炸掉一条腿的军人对“慰藉号”上的一位医生说道：“大夫，我想只要有足够的血浆，我就没事了。”医生答道：“孩子，我们的血浆够所有人用。”^[72]许多人觉得自己伤得不重，他们会要求医生和护士去照料其他那些受伤更重的人。有些人会为自己先前因伤痛而叫喊道歉，因为打扰了这里的安静。还有些人会开玩笑。有个失去了右臂的人说道：“好吧，不管怎样，反正我现在是不用去写信了。”^[73]那些面色惨白、人事不省的陆战队员输血后就会苏醒过来。他们的脸色恢复红润，人也恢复了意识。有些伤员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尽了职，而且从战争中活下来了。

从3月4日起，“空中霸王”救护飞机开始飞来，每天从硫黄岛南机场接走大约200名伤员。到3月21日，也就是D+30日，总共有2 393名待救治伤员被空运离开岛屿。^[74]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1/4个世纪里，战地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前一场战争中，每100名被送到美国野战医院的伤员中会有8人死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降到了4%以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医学界权威将此归功于更好的战场急救，快速撤退伤员（包括空运），以及经过血型匹配的全血的广泛使用。^[75]但是，尽管医护人员在硫黄岛战役中表现出色，从岛上撤出来的伤员死亡率仍然接近8%。换言之，硫黄岛的伤员死亡率比二战所有其他战场高一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步兵部队大致相当。

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硫黄岛之战的残酷性。无休止的迫击炮炮击会将人体真正意义上地炸成两半，造成了高比例的极度危重伤员。他们的伤口常常会沾上岛上细小的火山灰，很难清洗。一艘运输船上的医生说：“诺曼底登陆时我就在这艘船上，那时只有5%的伤员需要动大手术；在这里，我发誓我确信这个比例是90%。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伤。”^[76]和太平洋上其他的岛屿战役不同，这场屠杀几乎毫不停顿地持续到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参加这场最艰难战斗的部队因而遭到了可怕的伤亡。军官和士官的伤亡比例如此之高，以至于一整个连队常常不得不交给年轻的中尉来指挥，大头兵则成了排长。第26陆战团2营的军官伤亡率达到108%。他们在战斗中从后备部队里抽调了14名军官送到前线，去接替那些死伤的人，而在这14名补充军官中，又有10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伤亡。^[77]第28陆战团1营B连先后失去了8名连长。第24陆战团3营I连在D日登陆时有133名步枪手，当他们在35天后离开该岛时，这些人中只剩下9个人没受伤。

在战役的收尾阶段，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明显削弱。3月11日，美军防线最后一次遭到猛烈炮击。但是对于向岛屿北岸推进的前锋部队而言，战斗却一如既往地痛苦和代价惨重。这里的地形很恶劣，巨石滩、岩体和深谷交错，大部分地方坦克无法通行。硫黄蒸气笼罩着凶险破碎的地面。带着火焰喷射器的步兵班逐个敲掉敌人的碉堡，他们冲到极近的距离，将火焰喷入碉堡内部，再用炸药解决战斗。岛屿的北岸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目标，3月9日，美军终于实现了突破，当时第21陆战团一支6人前进巡逻队从北岸的峭壁爬下，来到海边。他们装满了一壶海水，把它呈给了厄斯金将军，上面写着：“供查看，不可饮用。”^[78]

到3月9日日落时，厄斯金的部队已经控制了硫黄岛东北角一段800码长的连续海岸线。这样就把残余的日军部队分割进了两个口袋，分别位于岛屿的东北和西北海岸。东边的突出部由第4师包围，千田将军的反击惨败之后，第4师巩固了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西北边北野角的崎岖海岸地带，美军的前景则艰难得多，栗林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此地深处的地下堡垒中。这个坚固据点防守严密，有利地形使其无法被直接攻击。对此地的舰炮炮击和空袭已经持续了数天，但是看起来没什么效果。栗林预计北野角及其南面的岩石峭壁和山谷将会是硫黄岛日军最后的有组织抵抗之地，他也是这么安排的。这里的洞口和射击阵地都布置在陡峭的岩壁高处，控制着200英尺宽的岩石山谷。其中或许还有3 000名日军存活，而且战斗状况良好。

坚守在山洞和碉堡里的守军基本不会因无休止的猛烈炮击和空中轰炸而伤亡。但是巨大的轰鸣和爆炸的冲击却不断敲打着他们的神经，许多人已经陷入紧张性木僵状态。他们的地下城也愈加恶臭和难以忍受。他们没法掩埋尸体，只好把死者放在地面上，陪在自己周围。那种恶臭无法言表，里面烤箱般的高温和通风不畅更令情况雪上加霜。更何况他们的饮用水也处于短缺状态，到了战役第四周最后一个储水箱耗尽时，这已经成了致命问题。人们无休止地谈起水，谈起日本老家的山泉和小溪。山洞地面上的任何一点水渍都会立刻被干渴的士兵们吮吸一尽。他们还会舔舐侧壁上的水汽，有人甚至开始喝自己的尿液。第二十独立炮兵大队的一名士兵说：“我想我永远也忘不掉夜晚隧道地面上积聚的雨水有多么甜，我们紧紧趴在地上，只为了喝上一口。”^[79]

栗林将军的防弹指挥所设在北野角离岸约300码，地下约75英尺深处。指挥地堡很宽敞，天花板高9英尺，很大，足以容纳

一张会议桌，一些办公桌，以及通信设备。穿过一条不长的狭窄隧道，就是他的私人卧室，一间不大的石洞，有一个吊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整个地下网络处处装有电灯。这座地下城布满了隧道迷宫，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向地面上的世界，还有许多隧道通往有人驻守的碉堡，那些碉堡里架设有有机枪和其他轻武器。在正上方的岩石里，嵌着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碉堡，长150英尺，宽70英尺，屋顶厚达10英尺。

当美军炸掉一个个山洞和隧道时，这些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发回了诀别电。许多基层部队宣称要对敌人发动最后的万岁冲锋，但是栗林坚决要求他们守在阵地里，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他说，“每个人都想要死个痛快”，但岛上每个日本军人的职责是尽量活得久一些，“重创敌人”。[\[80\]](#)

美军架起了大喇叭，开始用日语劝降，包括直接针对栗林忠道本人的劝降。但日军不为所动，只以子弹回应。厄斯金将军第3师的幕僚们放了两名日军战俘回到其防线，给第一四五步兵联队指挥官带去了一封信。这两个信使最终回到了美军防线，报告说栗林将军还活着，但无意投降。

3月16日，在发往东京的诀别电中，栗林写道：“鄙人所部的卓绝战斗惊天地泣鬼神。”他的部队“面对物质优势超乎想象之敌的陆海空进攻时装备不足，近乎赤手空拳”。[\[81\]](#)这样的说法犯了日本的大忌，这封电报在东京报纸上登出来时面目全非。“装备不足，近乎赤手空拳”这样的字句被改掉了。最后一句被改成了栗林发誓展开最后的进攻，“并与全体官兵衷心祝愿天皇陛下万寿无疆”。[\[82\]](#)

硫黄岛和东京的无线电联系开始变得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堀江少佐在他父岛的岗位上，试图将一份电报转发给栗林，告知

他已经被晋升为陆军大将，但无人知道他是否收到了这封电报。3月21日的一份电文告诉堀江，残余部队已经5天没吃没喝了。3月23日，父岛收到了来自硫黄岛的最后消息，内容很简单：“致父岛的全体官兵，永别了。”[\[83\]](#)

3月26日拂晓前，大约300名日军从山洞里出来，沿着岛屿西岸蹑手蹑脚地摸向折钵山。他们的出现让在南机场附近平和湾露营的美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兵人员猝不及防。在近三个小时的交战后，日军全部被击毙。而美军由于对这场拂晓前的突袭毫无防备，也有170人伤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对此写道：“这次攻击不是万岁冲锋，而像是一场经过精心筹划，旨在造成最大限度混乱和破坏的行动。”[\[84\]](#)

没人见到栗林是怎么死的，他的尸体也始终未能找到。有些日方资料认为这位将军率领了最后的进攻并战死，另一些资料则认为他在离开地堡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美军搜遍了平和湾的日军尸体，但是所有人的军衔都被摘掉了，也没有人携带任何文件。

陆战队从1945年3月14日便开始撤离此地。他们分成梯队离开岛屿，最先离开的是第4师，随后是第5师和第3师。留守硫黄岛的任务交给了陆军的第147步兵团，他们在3月20日来到这里。3月26日，陆军接管了这座岛屿，当时差不多刚好是突袭平和湾的日军被消灭的时候。

可以确定，没有一个美国兵不愿意离开硫黄岛。一名“海蜂”发誓说他绝不会从岛上拿走任何纪念品：“我只想忘掉这里带给我的一切记忆。”[\[85\]](#)当然，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个岛屿是无法忘记的。

胜利一方为了这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岛上的陆战队和

海军遭受了24 053人的伤亡，也就是说每3名上岛人员中就有1人非死即伤，其中有6 140人死亡。而日军方面，除了数百人被俘之外，其余守军无一生还，大约有2.2万人。若将双方的死伤人员累计对比，则栗林的部队给敌人造成了比自身更多的伤亡。考虑到进攻方在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就不能不说是个惨重的失败了。他的地下军团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组织性、纪律性，让美军陆战队为每一寸土地付出代价。然而，在塔拉瓦、罗伊-那慕尔、塞班和佩里硫的血战之后，即便日本人还心存某些侥幸，他们也深知敌人能够拿下他们想要的任何太平洋岛屿，无论其防御如何坚固，抵抗多么顽强。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陆战队员们也坚信自己一定能赢，从不怀疑。罗伯特·E.盖勒中校回忆道，在瓜达尔卡纳尔，他们常常会问：“我们能不能守住？”但是在硫黄岛，“问题就简单了：‘我们何时能拿下？’”。

[86]

在战争的余下5个月里，美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在硫黄岛紧急降落2 251架次。占领了这个几乎就在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航线上的落脚点，美军就能有效增加“超级堡垒”轰炸机的作战距离和有效载荷。它还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4月，以硫黄岛为基地的P-51中队将开始为轰炸日本的B-29机群提供战斗机护航。大约两万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勤人员在岛上至少紧急降落过一次，若没有这座岛，其中很多人可能就消失在大海上了。一名B-29飞行员说出了所有航空同僚的心声：“无论何时，只要我落在这座岛上，我就会感谢上帝赐予我那些为了这座岛而战斗的人。”[87]

硫黄岛的惨重伤亡触动了美国公众的神经，掀起了一阵指责和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早先曾在塔拉瓦和塞班血战中指挥远征军

的霍兰·史密斯，当时就被斥为“屠夫”，“冷血的杀人凶手”，还有“肆意挥霍人命”。[88]现在，更多这样的恶言恶语再度砸向他和整个海军陆战队。信件如雪片般飞向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则又提出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岛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吗？能不能用更少的伤亡拿下它呢？

当时正在指挥吕宋战役的麦克阿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2月26日，陆战队登陆硫黄岛一周之后，麦克阿瑟的部队完全收复了科雷吉多尔岛。约6 000名日本守军几乎被全歼，美军的代价只有675人伤亡。西南太平洋战区在一份公报中骄傲地写道：“这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岛屿堡垒，由装备精良、头脑狂热的敌人防守得密不透风……我们通过突袭，巧妙的战略战术，战斗技能，以及与海空支援力量的完美协同，在短短12天里就将其拿了下来。”[89]大家都看得出他在暗指什么。麦克阿瑟其实是想说，只要有更好的指挥，就能以更少的伤亡打赢硫黄岛战役。这些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格外刺耳，因为太平洋美军的两支进攻矛头很快就要合兵一处。而麦克阿瑟正在觊觎太平洋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他在美国的后台很快就会推动此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他位于加州海岸中部圣西米恩的山顶别墅里拿起电话，向《旧金山观察家报》的主编口述了一份关于硫黄岛的社论。2月27日，这份社论就出现在了《观察家报》的头版：“美军进攻部队为这个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可能过于沉重了……直白地说，我们的整个太平洋作战需要的只是一位战略家。”赫斯特随即点出了麦克阿瑟，因为“他拯救了他手下人的性命”。[90]

当天下午，大约100名休假的海军陆战队员鱼贯走进第三大街和市场街交会处赫斯特大厦的《观察家报》新闻编辑部。一名吓坏了的工作人员报了警，但是几分钟后他又打电话撤销了报警，说不需要派警察了。这些陆战队员很冷静，遵纪守法。他们

没有威胁工作人员或者破坏工作场所，他们只是想要见到这位编辑，向他解释说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海军陆战队最终还是在民心的审判庭上打赢了官司。曾在哈得孙河河谷当过独家报道记者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已经强令海军和陆战队采取更友善的媒体政策。到1945年2月，他的努力已经结出了硕果。数十名战争通讯员从硫黄岛发回了报道，他们的文章在48小时之内就能传回本土。大批的头版报道保证了公众对这场战役的高关注度，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敌人地下堡垒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战术难题。“福将”阿诺德和一众其他陆军航空队将领公开强调了夺取硫黄岛对于支援B-29轰炸作战的绝对必要性。乔·罗森塔尔那张折钵山升旗的振奋人心的照片，其作用也堪比百万行新闻报道。

麦克阿瑟的含沙射影总的来说是不公平的。攻取硫黄岛之战并没有什么战术选择的余地，而且栗林忠道的战斗准备十分卓越。麦克阿瑟纵有毋庸置疑的战场指挥天赋，却也从未遇到过硫黄岛这样的挑战，何况他也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曾经在菲律宾给麦克阿瑟当过手下，后来又指挥了战争中最大规模地面作战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1952年以当选总统的身份简短造访硫黄岛。当他走下飞机，举目四望，他对当年海军陆战队能在这座岛上登陆超过6万人感到震惊。把这座荒芜的小岛和“拥有大片开阔地的诺曼底”做了对比之后，艾森豪威尔说他很难想象在如此局促的地方会有如此规模的战役：“这令他很难理解。”^[91]

[1]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8.

[2]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35.

[3]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6.

[4]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p.78.

[5]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p.63.

[6] Private Shuji Ishii quoted in Kakehashi,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6.

[7]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30.

[8]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8.

[9] Letters quoted in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93.

[10]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Box 6, p.78.

[11] Japanese soldier’s diary, entry dated February 18, 1945, in Dixon, Brawley,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40.

[12] Fields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31.

[13]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39.

[14] Tsuruji Akikuisa quoted in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11.

[15] Toshiharu Takahashi quoted in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p.101—2.

[16]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30.

[17]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56.

[18] “Air Combat Notes for Pilots,” Enclosure (C)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Operations of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pp.2—3.

[19] Roy W. Bruce quoted in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35.

[20] “Areological Summary for Action Report,” Enclosure (G)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21] J. 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16,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

[22] McWhorter, *The First Hellcat Ace*, p.152.

[23]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52.

[24] Fifth Fleet War Diary, February 17, 1945, p.2.

[25] Ensign John Morris quoted in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51.

[26]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180.

[27] "Air Combat Notes for Pilots," Enclosure (C)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p.3.

[28]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March 13, 1945, p.25.

[29] William W. Buchanan, oral history, pp.78—79.

[30]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69.

[31] Lieutenant Ronald D. 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6, U.S. Marine Corps Archive, Quantico, Virginia.

[32]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14.

[33] Charles F. 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 Cherpak, March 1, 1996, p.18,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3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54.

[35] Elton N. 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5, U.S. Marine Corps Archive, Quantico, Virginia.

[36] Lieutenant Ronald D. 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6, U.S. Marine Corps Archive.

[37] Vernon E. Megee, oral history, p.34.

[38] Corporal Edward Hartman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12.

[3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70.

[40]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24.

[41] Lieutenant Colonel Justice M. Chambers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14.

[4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76.

[43]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25.

[44]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22.

[45]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February 22, 1945,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238.

[46]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2.

[47]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48] Lieutenant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8, U.S.Marine Corps Archive.

[49] Leo D.Hermle, oral history, p.86.

[50]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27.

[51] *Ibid.*, p.228.

[52] Forrestal diary, February 23, 1945, in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30.

[53]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2.

[5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0.

[55] Joseph L.Stewart, oral history, pp.39—40.

[56] John Lardner, "D—Day, Iwo Jima," *New Yorker*, March 17, 1945, p.48.

[5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6.

[58] Ted Allenby,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81.

[59]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60] Edward A.Craig, oral history, p.142.

[61]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9, U.S.Marine Corps Archive.

[6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2.

[63] Bradley, *Flags of Our Fathers*, p.268.

[64]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February 22, 1945,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p.239—40.

[65] Vernon E.Megee, oral history, p.37.

[66] Ibid., p.46.

[6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5.

[68]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31.

[69]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56.

[70]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71]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med P—SOS1,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p.95.

[7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7.

[73] Ibid., p.219.

[74]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p.101.

[75] Grifin, *Out of Carnage*, p.13.

[76]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8.

[77] Ibid., p.213.

[7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8.

[79]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65.

[80]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Box 6, p.93.

[81]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xviii.

[82] Ibid., p.xx.

[83]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Box 6, p.99.

[84] Bartley, *Iwo Jima: Amphibious Epic*, p.192.

[85] Miller, *Its' Tomorrow Out Here*, p.180.

[86] Galer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49.

[87] Alexander, *Closing In*, p.49.

[8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5.

[8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5.

[90] Quoted in *San Bernardino Sun*, Vol.51, February 28, 1945, p.1.

[91] William W.Buchanan, oral history, p.79.

第十二章

在关岛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指挥所——这是位于岛屿北部悬崖上的一组简陋的匡西特板棚房——“负鼠”汉塞尔和他的团队沮丧到了极点。他们作战的所有方面都感受到了部队初创阶段的问题，并愈加痛苦，包括维护、训练、补给、住房，以及机场建设。即便新的B-29飞机和机组人员还在不断飞来马里亚纳群岛，汉塞尔的部队仍然难以向日本派出更大规模的轰炸机群。“折返率”越来越高——这个词指的是由于引擎故障或其他技术问题而被迫返航的飞机比例——高达21%。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就是第一次，那是在1944年11月24日，当时111架B-29起飞，94架飞抵日本空域。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再未达到过。

在美军攻占硫黄岛之前，从那里起飞的日军战斗机时常会从低空飞过来对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展开轰炸和扫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11月27日，当时15架零式战斗机从硫黄岛起飞，躲在塞班岛雷达的探测盲区之下，以掠海高度南下，之后毫无预警地突然飞临伊斯利机场上空。这些零式机实现了彻底的突袭，扫射了停机坪上的B-29，摧毁3架，另击伤8架。汉塞尔将军目睹了这场大胆的袭击，还差点命丧其中。当时他正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一架零战从他们头上轰鸣而过，向他的车扫射。汉塞尔和他的司机立刻拐到一旁，躲进了灌木丛里。那个日军飞行员耗尽弹药后，放下起落架降落在了伊斯利机场的主跑道上。令汉塞尔大吃一惊的是，那个飞行员居然跳出座舱，拿着手枪和美军士兵来了一场枪战，结果自然是很快被击毙。

这样的攻击后来还发生过几次，“超级堡垒”损毁数量也在攀升，直到“福将”阿诺德将军要求提升岛屿的防空能力：“我们B-29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肯定会招来疯狂的拼死反击。”^[1]于是美军安排了新的战斗机巡逻计划，B-24轰炸机也反复轰炸了硫黄岛的机场。在塞班岛北角建起了探照灯和微波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岛屿北面还布置了几艘驱逐舰用作雷达哨舰。这些措施起到了作用，但是直到1945年2月海军陆战队进攻硫黄岛，这个威胁才彻底解决。

要在距离美国本土近6 000英里的几个岛屿上，为1 000架“超级堡垒”轰炸机建设机场和地面支援设施，这可是个重活儿。每一支轰炸联队都需要两条平行的跑道，各长8 500英尺，宽200英尺，还要有相邻配套的停机坪、滑行道和维护区。这意味着要对大面积的地面进行改良和铺设路面，而推土机和蒸汽挖掘机还必须等到岛上一些基础设施建成后才能上岛动工。机场的建设并非唯一优先的项目，马里亚纳群岛同时还要为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作战迅速集结海军和地面部队。关岛和塞班岛还需要电力、供水系统、卫生设施、住房和现代化的海港。在使机场工地和港口及珊瑚岩矿场相连的高级道路建成之前，机场建设工程很难取得突破。在马里亚纳群岛第一个可起降B-29的伊斯利机场，所有的武器整備、加油、飞机维护都是在拥挤的停机坪上，在热带的酷热和暴雨之下露天进行的。工具和零备件都放在户外的补给堆栈里，装进板条箱堆在地面上，上面盖着防雨布。一队C-54运输机每周两次把零备件从加利福尼亚州运过来。技师们在泛光灯下或者把小手电筒咬在嘴里，昼夜轮班工作。他们还在不断熟悉这种巨型波音飞机的诸多复杂系统，尤其是它那难伺候的2 200马力莱特“双旋风”发动机。他们常常要在一架“超级堡垒”即将出发进行15小时的轰炸飞行之前，连夜拆装发动机。

起初，每支新到达马利亚纳的B-29轰炸联队都不得不从同一条跑道起飞作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里可以起飞的B-29数量十分有限，当后续飞机还在地面上时，先头飞机就只能在天上空耗燃油。完成任务返回时，飞机的油箱已经快要干了，此时机组人员又面临着另一个危险的瓶颈。机场上空可能会有二十多架B-29在盘旋，等候降落。这种状况需要飞机携带大量备用燃料，也意味着飞机的载弹量更少，这样投在日本的炸弹总量就会下降。“福将”阿诺德和他的幕僚们仔细查看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这让他们很不满意。汉塞尔和他的部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山姆大叔在B-29项目上的巨额投资是要追求回报的。

从11月首次空袭到1944年底，第21轰炸机司令部总共向日本本土发动了10次空袭。他们轰炸了东京、横滨、滨松、沼津以及名古屋的飞机工厂和城市设施。并不是每次轰炸都能收到良好效果。从3万英尺高空扔下去的炸弹常常无法击中所瞄准的飞机工厂，而是落进附近的居民区。11月29日的空袭就在东京的神田区和日本桥区引发了灾难性的大火，烧死大约100名平民，烧毁房屋约2 500座。1944年12月7日，东京西南高度工业化的东海区遭到了里氏8.1级大地震和海啸的袭击。这场自然灾害致使1 223人死亡，摧毁了几乎3万间房屋。三菱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名古屋港口东面一座大型飞机组装中心遭到重创。正当三菱公司竭力想要恢复并启动生产线时，大规模的B-29空袭又在12月13日、18日和22日三度光临此地。这几天天气晴朗，轰炸比往日更加精准。厂区内有一座组装车间和七座附属建筑被摧毁。这次打击令三菱和日本政府决心关闭了此处的生产线，转而试图将组装工作分散到多个地下厂区和城市外围厂区。与此同时，美军还在名古屋投下了传单，以打击日本人的战意。传单上问：“地震之后，接下来想要我们给你们什么？”[2]

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斥巨资开发能在高空进行精确轰炸的技术——最有名的是广为人知的“诺顿”轰炸瞄准具，其支持者称其能帮助美国打赢战争。“超级堡垒”也被认为是能够在敌国领土3万英尺上空把炸弹“投到一个腌菜桶里”的武器。在欧洲，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开始进行夜间区域轰炸和燃烧弹攻击，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信徒们还坚守着他们关于精确轰炸的信念，而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在高空轰炸德国工业目标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当第20航空队在参联会的支持下建立之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使用精确轰炸技术去摧毁“日本的战争机器”，首要的目标便是其航空工业。

但是晴朗天气在日本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冬季的几个月中，本州岛海岸常常笼罩在阴云之下。即便是太平洋上最好的天气预报员也无法报出目标上空何时会是晴天。负责侦察的B-29可以先飞出去侦察气象，但是就在轰炸机编队从马里亚纳群岛飞到日本的七八个小时时间里，天气就可能天翻地覆。向北飞行的B-29编队可能还没有飞过海岸线，其队形就会被狂风吹散。在日本上空，飞行员们还会遇到“喷流”，这是轰炸德国时从未出现过的因素。在早期的轰炸任务中，B-29都是在高空飞行，那里的风速通常会超过每小时100英里，有时还会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超级堡垒”轰炸机顺风飞行，这样它们的地面速度就会达到每小时500英里。投弹手不得不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纠正如此狂风带来的弹道偏差。

在德国上空，B-17轰炸机群通常都有战斗机保护。但是在1945年4月美军P-51战斗机能够从硫黄岛起飞加入空袭之前，轰炸日本的B-29都是没有护航的。这样一来，执行昼间轰炸任务就需要飞机携带大量的汽油和武器——爬升到高空和编队飞行都需要消耗汽油，迎战日军战斗机则需要更多的武器。燃油、机枪和

弹药很重，这就需要在其他方面减轻重量，予以补偿。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开始参战的头三个月里，每架飞机平均载弹3吨——“超级堡垒”的拥趸们多年来可是一直宣称它能装载10吨炸弹，而实际载弹量连这个数字的1/3都达不到。有人已经在讨论夜间雷达轰炸的事情了，这一技术将能够带来更高的投弹精度和更高的载弹量，但是雷达轰炸的发展却很慢。一部分原因是最新型雷达轰炸瞄准具APQ-7迟迟未得到广泛采用——直到1944年底，第21轰炸机司令部只有第315这一支联队得到了这款装备。

日军战斗机给无护航的B-29带来的麻烦远比美国陆军航空队计划人员预期的更多。B-29的任务模式是固定的——轰炸机在白天一次次以同样的高度（3万英尺）飞到同一片区域（东京和名古屋）上空。日本陆海军的战斗机指挥部很快就发现了这一规律，并且调整了战术，以应对空袭。他们的海岸雷达一旦发现来袭机群，战斗机就会在高空集结。日军常常能组织超过200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来袭的50架至75架无护航的B-29。日本关东地区的防空主要由横须贺附近的厚木基地集中负责。四国岛上的松山基地还成立了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这支航空队由曾经策划了珍珠港袭击的著名海军航空兵指挥官源田实筹建。日本南部的防空由宇垣缠海军中将负责组织，他是重新组建的第五航空舰队的指挥官，这是日本此时最大的海军航空兵机队，司令部设在南九州的鹿屋航空兵基地。日本海军剩余的所有最好的战斗机和最老练的飞行员都集中在这些基地。[3]

日军负责本土防空的航空队是一锅大杂烩，各种机型都有，既有许多老式的零战，也有不少高空性能优越得多的新设计。三菱A7M“烈风”是零战的后继者，其爬升率可与“地狱猫”和“野马”比肩，其实用升限达到4万英尺。这型飞机的盟军绰号是“山姆”。川西N1K2—J“紫电改”由早先一型水上战斗机发展而来，

它速度快，马力大，机动性好，而且结构坚固，火力几乎达到零战标准型的两倍。美军在菲律宾和台湾岛上空见识过不少“紫电改”，并赋予其识别代号“乔治”，但是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型新战机的性能。J2M“雷电”是一型动力强劲三菱截击机，其设计目标正是拿下美军重型轰炸机。它的海平面最大速度超过每小时400英里，机上装有4门20mm航炮，足以击落B-29。盟军称其为“杰克”。“山姆”、“乔治”和“杰克”都是强有力的机型，需要技术娴熟的飞行员来驾驭，而这样的飞行员在日军航空兵中已所剩无几。赤松贞明中尉就是日军最后的几位空战王牌之一，他常年醉醺醺的，在厚木附近的一家妓院里长住。“他常常开着一辆破汽车赶往航空基地，”他的一名战友后来回忆道，“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还拿着酒瓶往嘴里灌，他开起车来就像个鬼。警报声还没停下来，他就从车上跳下来，跳进他已经被机械师发动起来的战斗机。舱盖刚刚关上，他就飞起来了。”^[4]赤松在中国和日本上空总共有8 000个小时的飞行纪录，最终击落战绩为27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从战争中活了下来，活到1980年，终年70岁。

对于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B-29机群来说，1945年1月是整个战争中最要人命的一个月。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用“刺激”来形容日军战斗机的拦截作战。敌机向他们发动迎面攻击，侧面掠袭，炮口喷吐着火舌，对“超级堡垒”的.50口径机枪塔似乎不屑一顾。日军飞行员如果无法用枪炮击落一架B-29，有时他们就会转而采取自杀性的撞击。约翰·哈尔迪在一架B-29的机身侧面气泡形窗口处操作一挺.50机枪，他击落过几架试图攻击他B-29的日军战斗机。他目睹了自己中队的许多友机被击落。“那时我们和另一架飞机并排飞行，那架飞机被击中了，开始下坠。我看到了它最顶上大型气泡窗口里‘理发椅子’上的炮手，他就在我们的旁边，

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我们挥手告别。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根本够不着他。这当然会让你大受震动。”[5]

“超级堡垒”只要主要控制翼面没有被打掉，至少还有两台引擎能工作，就有机会返回基地。但是当一架受伤的“超级堡垒”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时，太平洋的巨大空间便开始施展它的淫威。在硫黄岛落入美军手里之前，日本海岸外1 400英里的范围内没有安全的跑道可供“超级堡垒”降落。缺乏经验的机组人员会在浓云上、黑暗中发生导航错误，因而不得不耗费更多燃油才能返回正确航线。几乎每次任务中都会有B-29坠海，或者是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们正准备控制飞机在水上迫降，但是能够被救回来的逃生机组比例很低。在巨大的蓝色海洋上搜索一个小小的橡胶救生筏，这无异于海底捞针，尤其是在天气不完全晴好的时候。执行海空搜救任务的海军水上飞机航程和续航时间都不足，无法全面搜索距离基地如此遥远的水域。日本南边有救生潜艇，但除非飞机能在晴朗天气下迫降至指定坐标位置，否则潜艇找到被击落机组的机会也很渺茫。受伤的“超级堡垒”纵使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回到马里亚纳群岛，它也可能坠毁在跑道上，摔成几块，燃起大火。

1945年1月，平均每次轰炸日本的任务都会有四五架B-29无法返航，平均损失率为5.7%。被打得最惨的中队遭到了堪称灾难性的损失。第873轰炸中队的17架B-29损失了10架，被击落的99名机组人员中有80人死亡。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规定飞行人员要执行35次作战任务。但官兵们自己会算这笔账。如果每次任务的损失率高达5%，那么他们平均可以活过不超过20次任务。更糟糕的是，B-29的训练体系尚不足以训练出数量足以保障例行人员轮换的新机组，这就意味着他们飞行35次可能还不够。如果损失率无法下降，那么所有B-29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就可以认为

自己会一直飞到死了。“我们都在撞大运，”恰尔迪说，“有一定数量的飞机肯定是要损失掉的。我们只能赌我们的飞机不在其中。”^[6]

士气愈加消沉。B-29的机组人员们为无法实现自己背负的巨大期望而忧心忡忡。轰炸准确率始终令人失望，这部分是因为日本冬季糟糕透顶的天气。他们的损失很惨重，而且看起来情况还会恶化。汉塞尔告诉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飞行人员们压力太大了，航空部队指挥官和医生都报告出现了飞行疲劳症的症状。一名B-29飞行员对战争通讯员说：“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但代价也很高昂。我们失去了很多好伙伴，尤其是像大队长和中队长这样的关键人员。”^[7]

在执行任务的间隙，飞行人员们几乎无所事事。许多人就这么躺在帆布折叠床上睡觉，或是盯着他们匡西特板棚房天花板上的弧形钢架。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睡饱了觉，他们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即便对于这些身体条件处于巅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往返日本的战斗飞行中所消耗的精力也需要四五天才能补上。在任务前的夜晚，许多人完全睡不着。他们躺在那里，忧心地想自己第二天能不能活下来。

到1945年1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者和分析人员对于继续对日昼间精确轰炸的疑虑与日俱增。在对日本航空制造业目标发动了超过10次轰炸之后，只有名古屋的三菱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其中还有12月地震的部分功劳。对中岛、立川和川西生产中心的轰炸收效甚微。位于东京武藏野的一座中岛发动机工厂已经被汉塞尔的B-29机群造访了5次，但仍大部完好。“福将”阿诺德和他的司令部计划人员想要在轰炸机挂载的标准高爆“铁炸弹”中混入一些燃烧弹。有些人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战术变革，想要向日本城市发动全面的火攻——把整个城市烧成灰

烬，而不再区分具体目标。这样的任务能在夜间进行，日军战斗机的威胁也会随之减弱。

汉塞尔反对转为火攻，他坚持认为精确轰炸战术仍然可以在实战中改良：“我确信这一点。”^[8]他觉得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些耐心。磨炼技术、建造机场和支援设施，以及从美国本土搞来更多的B-29和飞行人员，这些都需要时间。

在中缅印战场，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业已解散，不再发起行动。此前位于中国和印度的所有B-29轰炸机都要被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总指挥也接到命令，要把司令部搬迁到关岛。寇蒂斯·李梅少将先前在欧洲战区时是汉塞尔的下属，但随后晋升了上来，此时已经是汉塞尔的上级了。阿诺德决定让李梅直接负责指挥第21轰炸机司令部，汉塞尔则要担任李梅的副指挥。汉塞尔本是阿诺德的红人之一，这位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做出这一决定也属忍痛，并强调自己并未失去对汉塞尔的信心。只是由于战术调整已是大势所趋，而汉塞尔显然不愿转向大规模火攻战术，因此不得不撤销他的职务。

失望的汉塞尔只好收起他的骄傲，表示说自己对李梅充满信心，但他也婉拒了留下来担任二把手的任命，觉得李梅“并不需要一个副手来掣肘……我自己也不乐意当个傀儡”。^[9]随后汉塞尔飞回美国，接管了B-29的训练工作。李梅首先飞到印度的克勒格布尔交出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随后在1月18日回到关岛承担起新组建的第20航空队的指挥之责。

日本老百姓对这些B-29十分好奇、着迷，甚至是仰慕。无论何时，只要这些遥远的银色十字形飞机出现在头顶上，他们就会涌到街上，伸长了脖子盯着天空。“刚刚开始轰炸的时候，我们

都有一种惊喜和好奇的感觉，”东京一名记者写道，“甚至有一点冒险感，还有一点得意，因为虽然只是平民，但我们一样可以分担战争的危险。”^[10]警察和民防长官向围观人群大呼小叫，但是许多人还是过于激动，不愿退回防空洞。他们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或许有些讽刺的是，老百姓都在讨论这些“可敬的访客”，甚至把“超级堡垒”称为“B桑”（“B先生”）。东京有个人用望远镜观察了一支“壮观的”B-29编队，然后向邻居的孩子们讲述它们的设计细节和作战细节，让孩子们赞叹不已。^[11]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竹山道雄这样描述在1月的一天傍晚飞临首都上空的一支“超级堡垒”编队：“它们通体闪着紫色的光芒，从云中飘然而出，排成常见的队形，太漂亮了。在冬天，它们的后面拖着尾迹，如同水母拖着透明的白色触须。”^[12]

这些空袭给日本政府的宣传部门带来了大难题。千百万人目睹轰炸机的到来，瞒是瞒不住了。新闻报道便只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间左右挣扎——既要蔑视空袭，说它们徒劳无功，又要激发民众的怒气。于是报纸一方面对轰炸机带来的损伤轻描淡写，一方面又夸大了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数量。“B-29的送葬之路”，1945年1月1日《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如此写道。报道说自从五个星期前美军开始空袭关东地区以来，已有550架这种大型轰炸机化为火焰坠落了下来。^[13]（截至此时的实际击落数还不到50。）空袭带来的损失常常被形容为“轻微”，但是却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新闻中还常常确认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

其他一些报道则旨在刺激民众，激起他们复仇的欲望，并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战争而劳动。《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炸弹落在东京正中央才能惊醒日本人。”^[14]还有报道说美军轰炸机瞄准的是医院和学校。1945年1月14日，B-29扔下

的一枚高爆弹落在伊势丰受神宫附近，这是日本神道教最受崇敬的神殿之一。神宫并非轰炸目标，也没有受损，但是《朝日新闻》还是暴怒地指责“敌人残暴的野蛮行径”和“真正的恶魔本性”。一篇新闻头条叫嚣道：“诅咒你们！从现在起，等着瞧！”^[15]

自从差不多三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东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新闻报道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有何差别。从火车和公交车的窗户向外看，他们能看见倒塌的住宅和建筑，以及燃烧的废墟。其间满是各种瓷器、衣服和榻榻米的垫子。人们仔细检查废墟，挖出他们的床铺、鞋子和锅碗瓢盆。难民们把他们仅剩的所有家当挑在肩上，或者向邻居兜售：火盆、书、篮子、褥子，还有蓝白相间的瓷罐。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政府法令而无家可归，拆迁队为了留出城市防火通道而拆掉了整个街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那些被从家里赶出来的家庭三五成群站在路边，悲伤地看着苦力们把他们的家拆成碎片。”^[16]

1945年1月27日，72架B-29由于浓云未能找到主要目标，于是将炸弹投在了东京市中心，炸弹落在了银座区周六逛街购物的人群中，几百人被炸死。在那些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市民中间，政府所谓的“战斗精神”引发了一阵冷嘲热讽。一个叫清泽冽的人在日记中评论道：“日本人的精神催生的想法是，在看见B-29时，他们可以用竹枪或者柔道去对付。”^[17]

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其结果令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空袭是摧毁日本民众士气的“最重要原因”。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影响力——无论是海外的军事失利，还是本土的口粮标准降低——敌机在日本天空的出现，让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取胜，并且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对日本城市的战略轰炸“造

成了严重的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为日本在盟军登陆之前便投降做出了贡献”。[18]不仅如此，面临空袭时，日本人会更多责怪他们的领导人，而非敌人。“这个时候，日本的地理隔绝以及数百年来文化隔绝成为不利因素了，”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作者写道，“闭关锁国给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带来的狭隘性，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遭到攻击，其本土坚不可摧。而B-29则粗暴地把他们从安全的幻梦中唤醒了。”[19]

毁灭性的大火自古以来都是日本城市的心腹之患。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的火灾，这场灾难在东京和横滨摧毁了70万栋建筑，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破坏力接近那场地震的灾难还发生过几次。和日本的其他所有大城市一样，东京也极度易燃。商务楼和工厂周围密布着居民区。那些房屋都是用木头、纸板和薄石灰墙建成，屋顶上覆盖着草席。许多房屋还在用煤油灯和纸灯笼照明，人们在炭火盆上做饭。燃气通过埋藏深度浅且易受损伤的管道送到千家万户，供电也是通过低垂的电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的消防队就显得人手不足，装备低劣了，他们还是在僵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出任务的。战争爆发后，最强壮和最年轻的消防员被抽走，消防队更是雪上加霜。1945年时，大部分仍然在岗的消防员都是老年人，他们的状态早已不在巅峰，其数量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突发灾情。

当B-29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上空时，当局便开始加倍关注民防了。市民们被要求发誓“遵守命令，抛开私念，防空时相互扶助”。[20]所有人都会被要求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遇到火星乱飞或碎物落下时，要用衣服裹住头脸以防受伤。每个家庭都必须准备一个装满沙子的铁桶，一架梯子，两把铲子，几桶水，拖把，还有湿毯子。社区会组织大家挖掘隐蔽壕沟，在后院里挖防空洞。检

查和演习随时都会突然到来，哪怕是午夜。上野动物园的管理方要求把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猛兽尽量无痛地杀死，以免它们在空袭摧毁笼子后跑到东京街上伤人。学生们会在操场上进行防空演习。小孩子们则跟着老师唱歌和打拍子来学习防空流程：

空袭，空袭，空袭来啦！红的，红的，燃烧弹来啦！

快跑，快跑，拿毯子和沙子！

空袭，空袭，空袭来啦！黑的，黑的，炸弹来啦！

捂住耳朵！闭上眼睛！[\[21\]](#)

这样的演习和检查日益频繁而扰民，民众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这时候许多人饭都吃不饱，如此例行民防措施只会徒耗人们的体力。一位筋疲力尽的女性说道：“拎着水桶往山上跑，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愚蠢打仗方式。”[\[22\]](#)每隔三四个晚上，空袭警报就会把他们从床垫上拖出来，扔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这些防空洞都是老百姓用铁锹和铲子自己挖的，狭窄而且简陋，常常没有灯，也没有地方坐。只要下雨，必定被淹。虚警过于稀松平常，于是当警报和木头梆子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用枕头盖住头，随它去。当空袭的威胁日益严重时，麻木和抵触反而愈加常见。

1943年末，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让非战斗人员和非关键岗位工人撤离城市。大规模的人员疏散可以部分化解空袭的危险，这同时也是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一种手段，并且能够减轻从农村收集粮食的负担。这一行动起初只是公共服务部门发布消息，鼓励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身体虚弱的人——任何无法为战争直接做出贡献的人都可归入此类——搬到乡下的亲戚家住。根

据日本内阁1943年12月一份官方声明的说法，“撤离的市民并非仅是从城市撤退和疏散”，而是“会为我们的战斗力做出有益的贡献”。[23]那些在军工厂或者其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则不允许离开，除非工厂整体搬迁，这种时候工人就将被迫和雇主、同事一同迁移。一列列特别“疏散列车”从东京开出来，里面满载着面色阴郁的市民，他们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带在身旁，其余所有家当则丢在了原地。

从1943年初，儿童就开始根据自愿原则撤离城市，但是到1943年12月时，日本教育省还是开始向城市的学校和父母施压，要求他们把所有小学生送到乡下去。1944年6月30日，美军已经登上塞班岛，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已经从全国最大的12座城市强制疏散了35万名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乡村的小旅馆里，会议厅里，庙里，以及被废弃的旅游景区里。[24]11月，B-29的空袭开始了，这时整所整所的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乘上喷绘着旭日旗的火车离开城市，孩子们的父母则在月台上挥手道别。到达目的地之后，孩子们会住进拥挤的宿舍，每天24小时在集体生活和工作安排中度过。分配给他们的口粮常常不够吃，孩子们也越来越消瘦，营养不良。一位随同他的学生们一起从东京来到长野的老师回忆道：“孩子们打开午饭饭盒的盖子，看见里面只装了一半时唉声叹气，真可怜。”[25]为补充饭食的不足，他们被派出去采集食物，其中许多都只是勉强能入口而已：蕨类植物的种子和根茎，没长熟的蒲公英，竹笋、蜂斗菜、柿子、卷耳、蒿草，还有水芹。他们会捕捉青蛙和蛇，把它们剥皮烤熟，还会在当地的小溪里捕捞淡水虾、鲤鱼和泥鳅。他们还吃蚂蚱、麻雀、蜗牛和油炒甲虫。根据日本厚生省报告，到战争结束时，这些疏散出来的儿童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只有1 000卡路里，远低于最低饮食需求。[26]

孩子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严格规定好的，包括课堂学习和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学生们穿着军服，跟在老师后面列队行进。那些低“军衔”的孩子要向高级别的孩子敬礼，而所有人都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态度、个人担当以及是否听话而晋升或者降级。他们要参加为出征军人和“神风”队员举行的欢送仪式，给海外军人写信和寄送“慰问包”，以及迎接运送回国的战死军人骨灰。

随着战争的进行，疏散走的孩子们花在课堂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为战争服务的时间则越来越多。1944年9月，小矶国昭首相宣布了全民动员令：“值此危难之秋，我们的国家不允许有一个闲人或者旁观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军人。”^[27]日本政府发布的一份法令规定，在工厂工作“可视同于教育”，到了1945年，那些饱受人手不足困扰的工厂厂长便要求童工们延长工作时间。最小只有8岁的小孩子都被送进军工厂做工。还有一些小孩则作为农业劳动力，被派去帮忙收割庄稼。在森林里，大批小孩出去采集松果，想要提炼松油以转化出航空燃油，但这是不可能的。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340万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许多人每天的正常上课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28]“学校里没多少课了，”当时被疏散到茨城县的6年级小学生佐藤秀夫后来回忆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操场的角落挖掘一条反坦克壕。”这是一项重活儿，尤其是对于那些力气小，拖不动多少土的小孩子而言。“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才挖出了一个深度够让老师跳进去的散兵坑，坑的深度刚刚超过头顶。我们被分成组来做这项工作，每个组都负责完成自己的任务。”^[29]

在与世隔绝的乡下，孩子们只能知道那些教育省想要让他们知道的事情。教师们则受到监控，不能有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1944年底，日本又发布了一份新的“国防总动员令”，旨在确保“致力于教育使命的人拥有坚定的胜利信念，并努力激发战斗

精神”。[30]疏散出去的孩子们被要求每天记日记，这既是为了练习写作，也是为了记录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日记要交给老师，而老师的打分依据不仅包括一般的语法、措辞、字迹以及文风，还包括其情感表达是否诚挚、热情。中根美穗子当时还是个9岁的小女孩，1945年，她所在的小学整体从东京搬迁到了富山县。她常常会表达出全心全意热爱学习，提升自己，并让老师喜欢自己的心情。在日记里，她保证自己会是个“好孩子”，或者是“更好的孩子”，并且要竭尽全力“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美穗子热情满满，无论是捡柴火，进行行军训练，采集蒿草，送别新兵，唱军歌，还是迎接战死者的魂灵，都是如此：“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真心感激他们。”她还记录了自己对敌人的可以想见的仇恨：“痛恨，痛恨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多可恨啊！我就是这么想的。”美穗子从未抱怨过她少得可怜的口粮，即便是里面长了象鼻虫也没有抱怨，而且日记里常常写她的午饭和晚饭“真好吃”。当她被提升为班长时，她十分在乎这一神圣使命：“这样，我就更想当好孩子了，想拿出班长应有的样子。”[31]

由于与生俱来的天真、轻信、适应性，孩子们反而会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已经幡然醒悟时仍然保持着对战争的热情。他们并不期望吃得好，因为他们根本记不起那些没有饥饿的时光。他们不介意在军工厂当童工，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很了不起，而且还能免于沉闷的课堂学习。为战争制造武器令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收集松果送去炼制航空燃油令他们觉得头上飞过的日军战机之所以能升空，自己也是出了力的。而那些在气球炸弹工厂做工的孩子则听说了关于自己的制品飞过半半个地球去惩罚邪恶美帝的神奇故事。他们很喜欢这种壮观的战争，喜欢唱歌和列队行军，喜欢被拉去踩踏和撕碎美英两国的旗帜，喜欢每月一次朗读

《教育敕谕》，喜欢每天早上做集体早操，他们裸露着上身（女孩也一样），唱着：“消灭美英！一二三四！消灭美英！一二三四！”^[32]他们是最后一批仍然相信电台里播放的大捷消息的人。

“我是在战时出生的，”半个世纪后，佐藤秀夫在一份口述历史录音中解释道，“男孩子们喜欢打仗。战争是他们游戏的主题……这简直就成了一种运动。这和小皮孩子们玩的游戏没什么区别，只是规模大一些。”当他的班级被疏散到茨城县的时候他只有11岁。他们被送到一座常常遭到美军舰载机空袭的机场上工作。每次当“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来袭时，秀夫和他的同学们都在操练，他们会笔直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以证明自己的勇敢，直到坚持不下去为止：

如果你看着它飞来，就能在最后一刻滚到一旁躲开。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装着炮，它们速度很快，直冲你飞来，但这也需要时间。如果它们瞄准的是你，你会知道的。你能看见火球飞来，之后才能听见声音。你会学会根据经验判断火球飞来的角度。入射角 45° 的火球最危险。那时候你会本能地闭眼。他们常常把这称为扫射，但那不是机枪，那是机关炮，20毫米的，它们的每一枚炮弹都会爆炸。那可不像电影里，你只能看见一小团一小团的烟。在稻田里，泥土都被打得飞起来了，那火球会把水稻连根拔起，还会爆炸，“轰轰轰！轰轰！”。

一旦知道它们没有打中你，你就会站起来开始跑。它们飞得很低，飞行员有时候会打开座舱盖，把头伸出来——美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看着我们。我甚至会向他们挥手。这种事我经历了不下十次。^[33]

根据小矶首相“武装一亿人”的国家政策，疏散出去的孩子都要训练徒手格斗，好让他们也能在即将到来的本土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个被疏散到富山县的9岁女孩中根美穗子用她一贯的热情描述了这种“精神训练”：“那十分十分有趣。”她的班级用长枪、木剑和模拟手榴弹进行训练。这些操练和他们的正常文体活动穿插进行，比如闪避球，背人跑，唱军歌，以及捉迷藏。训练时孩子们只穿着内衣，头上扎着画有旭日徽的绑扎带。在“投手榴弹课”里，他们会投掷小球去砸大球，老师说大球代表着敌人的脑袋。之后又是木剑训练：“我们向左砍，向右砍。”当美穗子练习用竹枪突刺时，老师会吼叫：“扎他们！扎他们！”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太有趣了。我很累，但我知道了即使是我一个人也能消灭很多敌人。”^[34]

收复8个月之后，关岛已经成了20万美军官兵，2.4万原住民，以及不知道多少（可能有数千人）藏身灌木丛的日军散兵游勇的家。1945年2月和3月，在建的主要工程项目清单已经在关岛指挥官的战争日志中用小字号密密麻麻记了6页。^[35]第5海军工程旅的“海蜂”们一直在拓宽和延长道路，安装足以支撑一座美国大城市的供电、供水和卫生设施。阿普拉港新建成了多条浮箱栈桥，防波堤，以及一条3 900英尺长的堤道，每月的吞吐量已经达到了265艘货船——是战前吞吐量的10倍。新建成的四车道柏油高速公路从苏迈延伸至阿加尼亚，现在是岛上道路网的核心。1.6万原住民（大部分是查莫罗人）住在岛屿西海岸的三个难民营里。民政部门想要尽快让他们回到自己原先的农田和村庄里，但是在此之前还有许多重建工作要做，而且流窜的日本散兵对外围区域的安全仍然构成威胁。

关岛被称为“太平洋超市”，这个绰号名副其实。战争通讯员

厄尼·派尔如此描述他在奥罗特半岛看到的半圆形屋顶的巨大仓库：“你在这里可以找到K型口粮、木材和炸弹，它们的数量足够养活一座城市，建造一座城市，或者炸掉一座城市。”[36]

关岛上的大部分美军官兵都很闲，只是等着参加接下来的战役，美军费了不少心思来让这些人有事可干。例如在1945年3月，64支军人棒球队打了256场比赛，50支篮球队打了220场比赛。他们顺利地建立起了球队联盟，有专业的裁判，各种颜色的球衣，巨大的木质比分牌，以及为观众准备的露天看台。每晚都会有400处大银幕在放映电影，一个晚上的观众人数估计能有8万人。还有一份《岛屿司令部每日新闻报》会分发给超过10万人。军队广播服务处（AFRS）一个呼号为WXLI的电台每天播音九个半小时。两名前中量级拳王格奥尔基·艾布拉姆斯和弗雷德·阿波斯托利来到关岛举行了一系列拳击表演赛，吸引了大约3万名观众。美国劳军联合组织在任何时候都有十多个乐团在岛上巡演，其中火爆剧目《疯女孩》在3月12日到30日之间每天都要上演两场。有四片海滩被专门开辟成了海滨浴场，还布置了更衣帐篷和救生员，平均每天有4 000名泳客前来光顾。棒球大联盟的球星从美国本土飞来，在4万名军人面前打了4场表演赛。根据红十字会前线总会的记录，“我们制订了计划，要为岛上的女军人建设和运营一座8床位的美容院，还要建设四五座保龄球场以满足军人们的需要”。[37]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1月，尼米兹将军批准了扩建关岛B-29轰炸机基地的计划。工程在关岛北部崎岖的高地上的两座大型机场展开，它们分别是北部机场和西北机场，各有两条跑道和满足两支轰炸联队所需的地面设施。到2月第一周，北部机场的一条跑道投入使用，第314轰炸联队的180架“超级堡垒”进驻这里。第二条跑道的地面已经清理干净并完成了部分地面平整工

作，但是路面只铺设了50%。西北机场还未投入使用，但是推土机、蒸汽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以及压路机已经来到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起来。

战争通讯员约翰·多斯·帕索斯在这个月来到关岛，走访了一处运动场大小的珊瑚矿场。在那里，蒸汽挖掘机不停地把碾碎的珊瑚礁倒进翻斗卡车里。工人们都戴着面具，以阻挡机械设备扬起的白色粉尘。有个人告诉多斯·帕索斯：“他们以前装满一辆卡车需要40秒，现在只要20秒。”^[38]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队伍通过一条崎岖的道路开到苏迈—阿加尼亚高速公路上，向北开4英里，之后再开过一段盘山公路，来到西北机场那些“泥泞的台地”上。多斯·帕索斯和司机来到这里时天刚黑，但是他们发现工程仍在全速推进。卡车直接把满载的碎石块倾倒在跑道的地基上，推土机立刻过来把它们推平。“铲土机、平路机、压路机，还有各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机器，有序地跟在它们后面。工人们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肌肤沾满了白色的尘土，在泛光灯的照耀之下显得一片雪白。”^[39]

尼米兹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李梅将军的第20航空队之间经常为了物资和人力的分配而唇枪舌剑。由于李梅不归尼米兹管，他们的官司常常要打到参联会去。李梅的观点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就是用B-29轰炸机空袭日本，因此所有的建设和开发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海军则反驳说马里亚纳群岛也是1945年即将进行的大规模两栖进攻的前进基地。所有资源都供不应求，各方费了老大力气讨价还价，结果谁都不满意。春季，热带暴雨从天而降——仅3月就有16个雨天，岛上降水量达到6.5英寸，给机场工地上的建筑人员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40]当岛屿司令部将两个航空工程营从西北机场建筑工地调往其他“优先级更高”的项目时，立刻有人向华盛顿提出了抗议。

李梅对他在关岛南部和沿岸看到的那些奢侈的休闲设施和娱乐设施大为光火。“他们为岛屿指挥官修建了网球场，还修建了舰队休闲中心，陆战队疗养中心，岛屿间勤务船只的码头，建了世界上所有无关紧要的该死玩意儿，唯独忽略了他们拿下这些岛的最初目的。”他还挖苦说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得到合适的指挥部之前，岛上可能还需要一个“旱冰场”。[41]

到达后不久，李梅获邀前往尼米兹在方特高地上的住处共进晚餐，这是一处能够俯瞰阿普拉港的小山。这栋漂亮的白色小楼里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带落地窗的门厅，还有一间适合将领聚会和接待贵宾的餐厅。[42]这地方景致不错，周围种满了花和当地的灌木，还修建了一个掷马蹄铁赛场，专供尼米兹休闲使用。参加晚宴的还有关岛上陆军、海军、陆战队的许多其他高级军官。“我走了进去，看到树枝形吊灯亮着，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餐桌上铺着白色台布，银餐具闪闪发光，凡此种种，”李梅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都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大家举杯共饮。”[43]桌上摆着高杯鸡尾酒和点心，“就像在华盛顿大使馆里的待遇那样”。晚餐很丰盛，有例汤、鱼、烤牛肉、甜点，饭后还有咖啡、白兰地和雪茄。[44]

李梅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他回请海军将领们到他的营地来吃饭，大家在匡西特板棚房食堂里站成一排吃罐头口粮。此举解决了问题：“最后他们搞来了我们需要的设施。”[45]

感受到来自参联会的沉重压力之后，尼米兹采取措施，加快了B-29基地的建设进度。他应“福将”阿诺德的请求，将新的航空工程营运上了岛，即便他们的重装备暂时还落在后面。[46]这样“海蜂”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装备交给航空兵，其他项目的优先级也需要相应调整。船运能力是关键瓶颈，包括装货码头的停泊时间这类看似平凡的因素都是问题。3月28日，太平洋舰

队司令部下令“严格限制”出于其他目的而开进马利亚纳群岛的船运，以为第20航空队所需的物资留出运力。货物的分配规则也由此转变为“最大限度保障‘超级堡垒’所需要的弹药和其他物资”。

[47]这一命令引起了各个地方海军和陆战队的反对。在华盛顿，金的副作战部长理查德·S·爱德华兹将军觉得阿诺德将军“想要从华盛顿操控 [第20航空队的] 所有事情，直到把他在前线的人搞得一团乱，然后再指望战区指挥官冲出来拯救局面”。[48]

美军发现整体地形比较平坦的提尼安岛能够容纳多达8条B-29跑道，而不是攻占该岛之前计划中的4条，这多少补偿了一些建设进度缓慢带来的沮丧。于是6个海军工程旅甩开膀子，把长长的珊瑚岭挖掉了差不多一半，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平整地面，同时也是为了开采其中的岩石。提尼安岛的北部机场建成了4条可用的跑道，于是这个基地比马利亚纳群岛的其他任何基地都更早完工并交付使用。1945年1月，美军决定同时进行提尼安岛西部机场的开发工作，这将使得美军在马利亚纳群岛占领的三个岛屿中最小的提尼安岛能够容纳足足两支轰炸联队。1945年3月22日，西部机场的第一条跑道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勘测人员发现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也能够继续扩建，令其两条8 500英尺长的平行跑道能够容纳第73轰炸联队的4支大队。

3月初，李梅将军坐稳了他的指挥职位，但他一点也不开心，他对此毫不掩饰。高空精确轰炸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选定的11座最高空袭优先级的日本飞机工厂中，没有一座被摧毁（虽然有几座厂的产量显著下降）。美军向位于武藏野的中岛发动机工厂发动了8次空袭，但是最新的侦察照片却显示这座工业综合体仅仅遭受了4%的损伤。由于技术问题，包括发动机故障和导航问题，第20航空队一直没能向日本上空派出足够数量的飞机。此时马利亚纳群岛上已经有了350架

B-29，但是平均每次出击能飞到日本上空的飞机只有130架。

[49]

令李梅恼火的是，美国的报纸一直给人以B-29正在对日本施加巨大打击的印象。这并不一定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新闻官的责任，他们的新闻公报都很符合事实。美国的报界看起来是想迎合读者，展示他们渴望看到的内容——“超级堡垒”正在让“天火”从日本的一头烧到另一头。1945年3月6日，李梅将军对他的公共关系主任圣克莱尔·麦凯尔韦少校说：“我们这帮人现在人气太旺了，但该死的轰炸战果却跟不上。”[50]

自从1月上任以来，李梅就考虑要彻底改变战术：高投弹密度的夜间低空火攻。这种战术要在夜间派B-29飞往目标上空，在5 000英尺至7 000英尺的高度上投弹轰炸，这个高度远低于它们2.5万英尺至3万英尺的典型作战高度，如此投弹就可以免受高空喷流的影响，发动机也无须承受长时间爬升带来的沉重负荷。由此节约下来的燃油量将用来携带更多的炸弹——载弹量将达到6吨至8吨，而此前平均只有三四吨。轰炸方式是将集束凝固汽油燃烧弹投放在大面积区域里，这样轰炸精度也就无关紧要了。此外，日军防空战斗机在夜间也没那么危险。鉴于B-29在空中将不会遇到太多抵抗，机上所有的.50口径机枪和弹药都可以移除。这样可以节约重量，而且“至少我们的人不会打到自己人”。[51] 李梅分析，由于这一战术出人意料，美军应当可以全身而退。

李梅是个天生的自我驱动者，他后来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低空火攻是他的主意。但实际上，华盛顿美国陆军航空队总部的计划人员此前已经表现出了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的浓厚兴趣，并且思考过出动“超级堡垒”进行夜间低空轰炸的潜在优势。作为参联会成员的阿诺德将军已经下令，要对日本的多个中心城市发动一系列“全力尽出”的B-29空袭。（“全力尽出”空袭指的是把每

一架维护人员认为可以飞行的飞机全都派出去。)自从B-29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作战以来，这里第一次存储了足够执行五六次“全力尽出”空袭的燃烧弹。第73轰炸联队已经接受了大量的夜间作战训练，包括夜间使用雷达进行轰炸。美军在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建立了一座模拟的“日本村镇”，使用了日本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进行轰炸试验时，美军混合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镁燃烧弹，结果迅速将模拟村镇烧成白地。大家知道日本的城市比德国城市更易于被火攻摧毁，因为日本城市的人口密度更高，而且密集建造的木质房屋也更容易起火。

火攻的主力是M69型凝固汽油子炸弹，它们被裹在装有弹翼的500磅E46圆柱形集束炸弹中。几乎所有这种炸弹都是在位于新泽西州松林荒地里的秘密工厂制造的，工厂地点在大西洋城靠内陆15英里处。每一枚M69子弹药或者“小炸弹”实际上是把一个装满胶冻状汽油的棉布袋子装入一个铅管内。每一枚E46燃烧弹都集中了38枚M69，通过一个由定时引信炸开的束带捆绑到一起。集束炸弹将设定在距离地面2 000英尺处炸开，每一枚子炸弹后面都拖着3英尺长的棉布飘带，确保它们散落在直径约1 000英尺的区域内。一旦触地，第二个引信就会引爆，此时一块发射药就会把一团团起火的凝固汽油溅射到半径约100英尺的区域里。这些半液体汽油滴无论沾到哪里——墙壁、屋顶、人体皮肤——都会附着在那里，以超过500摄氏度的高温燃烧8分钟到10分钟，足以引燃所有日本城市中心那些挤成一团的，由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建筑区。

在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爆发之初，美国的领袖们坚决反对从空中对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1939年9月，当欧洲陷入战火时，罗斯福总统曾呼吁所有交战国不要“从空中轰炸人口密集区域或者未设防的城市”。[\[52\]](#)即便是陆军航空队的将领们，也坚持

反对对城市的“无差别轰炸”。1940年，“福将”阿诺德发誓：“航空队的战略是对军事目标进行高空精确轰炸。对城市使用燃烧弹与我国仅攻击军事目标的政策是相悖的。”^[53]现在，持续了5年的全球性灾难和轴心国的暴行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日本和德国首先向无辜民众发动了空中攻击——日本轰炸了上海、南京、重庆和其他中国城市，德国则轰炸了鹿特丹、伦敦、考文垂和许多其他英国城市。1940年德国空军的“闪电战”促使英国寻求报复，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当年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恐怖轰炸的高峰是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夜間对德累斯顿市的燃烧弹空袭，此战中估计有3.5万德国平民被烧死。由于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军事价值，此战在美国报界甚至是英国众议院都引发了一阵批评之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道：“盟国航空兵指挥官终于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的大型人口中心进行有意识的恐怖轰炸，作为一种加快希特勒灭亡的残酷冒险。”^[54]但是史汀生部长否认了美联社的报道，他判定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是有军事必要性的。他说：“我们的政策从来都不是向城市居民进行恐怖轰炸……我们的努力仍然局限于攻击敌人的军事目标。”^[55]

即便是到了现在，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的尾声阶段，美国的领袖们仍然不愿承认自己放弃了反对恐怖轰炸的政策。因此，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必须要找到一个说得通的军事上的借口。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目标选择人员解释说，日本的许多工业生产是在居民区里进行的，那些小型“供应商”或者“屋檐下”工场组成的家庭手工业会为大厂提供零部件。它们据说是大规模火攻轰炸的真正目标。然而就在首次大规模火攻东京之前仅仅三个星期的火烧德累斯顿之战后，盟军受到的道德谴责依旧严重。既然这在德国会招来如此的反对，那么在日本也是一样。后来，李

梅承认是日本的战争罪行为这样的轰炸提供了一些正义性，至少对他的心理上是个安慰：“我并不希望如此，但我也不会特别顾虑火攻造成的民众伤亡。我不会让这一点影响我的任何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如何对待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地方俘虏的美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56]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在全世界面前曝光之后仅仅两个星期，火攻轰炸就拉开了序幕，这并非巧合。

新战术也很危险。在德国上空5 000英尺处进行轰炸将会招来毁灭性的战斗机攻击和密集的高射炮火——如李梅所说，“像这样的低空编队将会被德国空军打到骨折”。[57]但是他愿意赌一把，赌日军夜间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和数量都不足以在暗夜中击落B-29，其高射炮也将会凌乱而无效，尤其是在突袭的影响下。一般认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雷达指挥的高炮原始而且不准确。但这只是个未经验证的设想；还没有B-29在日本上空8 000英尺以下的高度执行过任务，仅有的在这个高度的轰炸还是当初对九州岛八幡市钢铁厂的轰炸。防卫东京、名古屋、大阪的高炮数量更多，而且可能更先进。美军还知道，日本人已经训练了至少两支夜间战斗机中队。如果李梅赌错了，那么代价将会是飞机和机组人员的灾难性损失。

根据新闻官麦凯尔韦少校的说法，有多个轰炸联队的高炮专家都警告李梅他是在走向灾难。他们告诉李梅，东京的高射炮部队能够像在射击游戏里打胶合板鸭子那样把低飞的轰炸机打下来。即便是地面上的日军机枪也有可能打中飞机。有个人还预言说每10架“超级堡垒”中会丢掉7架。“如果你是对的，”李梅答道，“那若我们低空飞进去，就剩不下多少飞机了。”[58]李梅是历史上最杀人如麻的杀手之一，但他“发自内心地不情愿”把他的飞行人员送上绝路。他更想要亲自率领此次任务，但是华盛顿已

经禁止他这个级别的军官飞越敌占区。在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损失机组人员已经够糟的了，如果由于地面指挥人员的错误战术决定而损失他们，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你才真正理解这一点。”[59]如果任务失败，李梅很可能被解除指挥权，还会被降回他的永久军衔，他或许就要以一个小小的上校军衔结束他的陆军航空队生涯了。

然而，关键在于，李梅赢得了他的联队长们的支持，他们是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三个轰炸联队中驾驶领队长机的准将——“罗西”埃米特·奥唐纳尔、托马斯·S.鲍尔，以及约翰·H.戴维斯。这三位准将立刻看出了这一任务方案的优越性。狂暴的喷流会远高于他们，5 000英尺高度上的风速不过25节到30节，因此投弹飘移的问题便不复存在。能力最强的老手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包括联队长）将驾驶领队的“探路者”飞机，他们将会用投下的燃烧弹在地面画出一个燃烧的“X”形以标示目标。最初的燃烧区就会成为瞄准点。对于后面的飞机而言，导航就是小菜一碟了。日本海岸线两侧的陆地和海洋在机载雷达屏幕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因此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机组也能毫无问题地找到东京湾，而无须考虑能见度如何。之后，他们只要“朝着我们给出的方向，行驶一段时间，把燃烧弹投下去就行了”。[60]

在B-29的轰炸作战中，这还是第一次无须考虑天气因素。如李梅所说：“我们可以说忘了天气吧。我们已经证明，即便是最菜的雷达操作员也能让我们根据陆海分割线飞到东京。如果我们派一些老手在前面飞，他们就会找到目标，然后点火。若真的能让大火烧起来，后来的人就能看见火光，并向那里投弹。”[61]

被选中的轰炸目标是东京的下町区，这里位于隅田川流域，是东京地势低洼的地区，以房屋密集的工人居住区为主。在选择目标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人员参考了特勤局——中央

情报局的前身——绘制的地图，图中给东京的35个区都绘制了易燃等级。特勤局的评判标准是建筑的密度和材质，他们甚至还收集了战前日本保险公司为火灾险进行的风险评估。之所以选择下町区作为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因为这里比日本首都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加易燃。[62]

出击前一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们在群岛各地机场上拥挤的匡西特板棚房里听取了任务简报。出于保密原因，事先没人知道会采用这个新战术。当作战参谋介绍了详情后，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一名上校告诉他的飞行员们：“我们把教科书扔了吧。这次我们不飞编队了。”[63]他们要挂载多得多的炸弹，却要把.50机枪和机枪手都留在地上。根据塞班岛上第498轰炸大队一名飞行员的回忆，他们听说要在夜间空袭东京的消息后，人群中“一片死寂”。但是当简报官告诉他们要在5 000英尺到7 0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东京市中心时，“机组人群中响起一片嘘声”。[64]和以往的任务相比，此番他们距离地面要近5英里。

根据联队长的指示，作战参谋们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采用如此的新战术，以及为什么新战术预计能够成功。突然性所带来的战术优势有利于美国人，这将令他们得以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而损失不会过重。然而并非所有飞行人员都听得进去这些话。晚上回到宿舍后，有人预言说所有出击的飞机中会损失至少三分之一。带着这种其实算是乐观的想法，他们钻进被窝，想要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再说。

第二天下午，在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的机组人员乘坐罩着帆布车篷的卡车来到停机坪上的飞机旁。这些人登上飞机，开始仔细检查各项设备和功能。机械师转动着巨大的螺旋桨叶，

冲洗掉漏出的润滑油。第一架飞机的预定起飞时间到来的30分钟前，莱特“双旋风”发动机开始点火。它们喘振、启动、发出轰响，然后如雷鸣般回火，喷出大团的废气。之后，飞机的舱门、舱盖和炸弹舱猛地关上，领队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滑行道。螺旋桨卷起的尘土飞进了地面人员和跑道两旁众多围观者的眼中，口中，鼻中。这么多大型发动机同时发出轰鸣，令天空和大地都开始颤抖。一名围观者联想起了“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车赛”。[65]陆军与陆战队士兵们围坐在跑道旁的石头上，就像是在看一场户外音乐会。

傍晚6时15分，夕阳已经低垂，指挥塔上方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领队的“超级堡垒”开始起飞滑跑。飞行员把4个节流阀推到了最前方，松开了踩住刹车的脚。他调整了方向舵踏板，以保持飞机沿着跑道中心线加速。之后他紧紧握住操纵杆，收住襟翼，好让飞机加速更快。一段时间之后，飞机的速度已经快到无法停下了，此时它要么起飞升空，要么坠毁，不可回头。当时速达到160英里时，前轮会抬起，后轮也会渐渐离开沥青跑道。此时副驾驶会拨动起落架开关，支柱和机轮就会向上完全收入起落架舱。第一架飞机刚刚升空，第二架飞机就开始了滑跑。如此往复了超过一个小时。

飞出海岸线之后，飞行员会轻微压低机头以加速，之后缓缓放出襟翼。这种重型飞机贴着海面掠过，螺旋桨在海上吹出4条清晰可见的白色尾流。接下来飞机就开始爬升了，但很缓慢。参加3月9日这次出击的大部分B-29都达到了起飞重量的极限，14万磅——相当于70吨[66]。

首批起飞的是驻关岛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第19大队和20大队的飞机。40分钟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领队机也开始起飞滑跑。从关岛第一架飞机到塞班岛的最后一架飞机，整个起飞过

程耗时足足2小时45分钟。最后，当天色刚刚黑透之时，334架“超级堡垒”已然升空，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程。[67]

既然不用编队飞行，那也就无所谓集结了。每个飞行员只要向北爬升到指定高度，再按预定方向飞就行了。在飞往日本的7个小时航程中，他们遭遇了一些浓云和乱流，但是这些都远不足以带来危险。在海洋上空5 000英尺至7 000英尺高度飞行时，飞机的发动机保持在低功率状态就可以了。机组人员们小心翼翼地透过舷窗和气泡形观察窗在暗夜中搜索是否有飞机过于接近的迹象。有一名飞行员回忆说，他在透过花房式的机头驾驶舱全方位扫视天空时总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四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担心着另一架B-29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相撞的概率看起来非常高。真可怕。”[68]

在打头阵的“探路者”飞机上，雷达手趴在他们的APQ-13雷达显示屏上，紧盯着越来越近的本州岛南部海岸线。即便是在一片漆黑中，海岸线也会很清楚地显示在绿色的雷达屏幕上：房总半岛，野岛崎，以及东京湾海岸线凹进去形成的巨大缺口。当“探路者”飞临陆地上空时，他们转向正北，飞过东京湾中央，隅田川入海口，以及码头。天空中云比预期的少，目标上空云量只有约10%~30%，因此领队机的投弹手毫无困难地找到了他们的瞄准点。

接下来的轰炸航线要求他们把节流阀一推到底，同时小角度俯冲以提高速度，这样才能干扰高射炮手的瞄准和追击而来的战斗机的攻击机动路线。飞机的发动机提高扭矩，速度飙升到300节。炸弹舱门随即打开。雷达手紧盯着屏幕，通过耳机和投弹手不断交流。午夜后一刻钟，首批M47炸弹全部投了下去。它们在距离地面100英尺时炸开，迸发出燃烧的白色镁条。火焰组成了一个巨大而耀眼的X形，标示出了大约10平方英里的目标区。一

名领队长机用无线电向关岛报告：“目视轰炸目标。大火可见。高炮弱，未见敌战斗机。”[69]

当后续飞机来到野岛崎上空时，东京大火的粉红色火光已经出现在了北方的地平线上。当“丁字尺12号”轰炸机飞过隅田川入海口时，小查尔斯·L·菲利普斯上尉看见一片飞舞着的火烧云，映照下方鬼魅般的橙红色火光。在一片火毯中，能看到一条条暗线纵横交错，那是城市的街道。菲利普斯和他的机组能够闻到烟味，甚至是人肉被烧焦的甜丝丝的怪味。“我们这些坐在前乘员舱里的人真的能看到门框窗框的碎片被气流吹上天。”[70]

当“丁字尺12号”飞入火烧云时，飞机突然被甩向上方。在强劲的上升热气流的推动下，飞机在4分钟内升高了超过6 000英尺。菲利普斯把全部4台发动机的节流阀都收到空转，但“丁字尺12号”仍然在上升，“像风暴中的一片树叶”。[71]菲利普斯称这是“我在超过7 000小时的飞行经历中见识过的最狂暴的飞行，最可怕的乱流。机翼似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B-29上被扯掉了”。[72]

被卷入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升气流的飞机，除了顺势爬高之外再无其他选择。有一位飞行员想要下降，让飞机保持在指定的高度上，但这却意味着要在上升气流中陡降，相对空速会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推荐最大“标定速度”。有不少B-29被掀翻，底朝天，机组人员靠着安全带才没有撞到脑袋，脚下的仪器设备也松动了。如果被掀翻的飞机处于上升气流中，他们就应当飞一个倒筋斗然后改出俯冲。有一位飞行员报告说他的空速超过了每小时450英里——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这一速度会要了B-29的命——他们坠落到东京湾上空仅仅200英尺的高度才恢复了对飞机的控制。[73]

“丁字尺12号”轰炸机投下了全部M69集束燃烧弹。飞机瞬间

减轻了6吨重量，被气流向上抛的速度更快了，高度表指针像疯了一样转起圈来。菲利普斯和他的副驾驶没有系肩带。上升到1.4万英尺高度时，上升气流突然消失，飞机又猛地转入了俯冲。两名飞行员都从座椅上飘了起来，就像零重力空间中的宇航员那样。“我们都紧紧抓住，保命要紧，”菲利普斯写道，“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秒钟。之后我们落回座位上，重新控制住了飞机。进行了一次大坡度左转之后，我们转向了太平洋方向，返程的方向。”^[74]

早在第一批飞机抵达前大约一个小时，日本的海岸雷达站就第一次侦测到了来袭的空袭机群，空袭警报随之响起。民防人员立刻走街串巷，用木头梆子通知市民们各就各位。起初，许多人不愿离开他们的床和家，觉得这只不过又是一次虚警罢了。但是当第一批“探路者”B-29来到城市上空，以比往日低得多的高度飞过，它们引擎的轰鸣声把人们吸引到了街道上。抬起头，他们看见了这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机腹倒映着下方橙色、粉红色和紫色的火光。它们的高度只有此前空袭的1/5到1/4。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这些飞机似乎触手可及，它们看起来真大。”^[75]探照灯很快照了上来，高炮炮弹爆炸的火光也出现在了飞机上方。有人看见了M69燃烧弹，它们翻滚摇摆着坠落下来，长长的棉布飘带在后面飞舞。

当晚，东京刮起了干燥的大风，因此最初的火灾很快蔓延开来。根据东京消防总局的记录，“探路者”投下首批炸弹30分钟后，火势“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完全无能为力”。^[76]消防队立刻投入了战斗，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却只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新到达的“超级堡垒”还在继续雨点般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包围了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密集居

民区，从西北方的浅草区到东北方的本所区，从东南面的深川区到西南边的日本桥区——大火如同风暴一般横扫而来，从一座房屋烧到另一座房屋，从一面墙、一处屋顶烧到另一面墙、另一处屋顶，越过狭窄的鹅卵石巷，吞噬了沿途所有可燃的油料，之后变得愈加猛烈。这里的作坊和小型工厂里堆满了可燃的黄油、润滑油和汽油，它们很快就像挨了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一堵堵火墙沿着屋顶和街道肆虐开来，把人们烧死在街道上，或者吞没他们的房屋，甚至不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日本内务省出版的一本防空手册提出，“对付燃烧弹攻击时，第一分钟是最关键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本手册却要市民们留下来救火，而不是赶紧逃离。他们要“向你附近的可燃物泼水，以防止火灾发生后蔓延过来”。^[77]但在如此规模的灾难面前，这样的措施完全无济于事。他们唯一的存活希望就是逃离，而且在选择逃跑方向时运气足够好。

幸存者们后来说，他们陷入了一片突如其来，持续不断的混响之中，噪声如此之大，他们不得不大声吼叫才能让别人听到。大火伴随着爆裂、呼啸、咝咝声，以及巨大的咆哮声。火星、未燃尽的木块以及着火的各种东西被旋风卷起，落在人们的头上和背上。周围的温度飙升，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如同一个巨大烤箱的门在面前打开。大火辐射出的红外光波烤干了所有能照到的地方，引燃了火焰尚未触达的可燃物。他们脚下的沥青路面变得黏稠、起泡，直至完全熔化。这时候人的本能都是盲目地向远离高温的地方跑，但活下来的往往是做出理智选择的人——跑向最宽阔的街道，或者游泳池、河流，抑或是某个公园。长峰武当时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父亲意识到狂风是从西边吹来的，并由此知道了火将会从那个方向扑向他们。于是他带领一家人来到了隅田公园，算

定了大火会绕开这里。就这样，他们活下来了。其他人涌进了学校，这里通常也是灾难庇护所——但这一选择却要了许多市民的命。

船户和代当时是个小学六年级学生，靠她父亲在浅草开设的玩具店生活。空袭到来时她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跑到了大街上。他们顺风跑到了砂町，但是大火仿佛同时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她父亲领着一家人跑向当地一座公园，却发现他们的道路被大群从另一边涌过狭窄人行桥的人堵得死死的。被迫折返后，他们只能盲目地瞎跑，在这样的大灾难之下，他们一家人不可避免地失散了。“风和火都变得很大”，船户说道：

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碎块朝我们砸下来。太可怕了。火星四处乱飞。电线闪着火苗落了下来。妈妈背着小弟弟，被风吹得站立不稳，摔倒在路旁。爸爸跟着跳了过去。“你没事吧？”他叫道。这时候义明喊道：“爸爸！”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救爸爸还是想和他在一起，但他们立刻就消失在了火焰和黑烟之中。[78]

大久保美智子当时只有12岁，她还带着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后者一定是在逃离火灾时与家人走散了。美智子拉着小女孩的手说：“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于是她们手拉着手跑了起来。她抬起头，看见一枚燃烧弹正落向她们，“火焰喷射而出，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女孩的手从她手中滑脱了。她回过身去，看见了几个被火焰吞没的人：“小女孩棉头巾的一块残片飘到了空中。”几十年后，美智子在回忆此事时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她柔软的小手握在我手中的感觉，就像一片枫叶。”[79]

数千人涌向运河或者隅田川。在狭窄的老桥上，无数人同时

从两端涌来，想要去往对岸，结果谁都动弹不得，被困在迅速蔓延的大火前。火墙吞没了他们，耗尽了空气中的所有氧气，把这些人全部送下了地狱。他们拼命想要呼吸，但空气已经变得滚烫，于是他们开始窒息、咯血，然后陷入痉挛。许多人跳下了桥，在水里寻得了片刻解脱，但是其他跳桥的人很快就会砸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挤下水里淹死。幸存者回忆说，水里挤满了晃动的人头。“这是一幅地狱般的狂暴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消防队员加世勇回忆道，“人们都跳进运河，想要逃离地狱。”^[80]在小而浅的运河里，河水被全部蒸发，死者堆积如山。

浅草观音寺是日本最大、最著名的寺庙之一，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火灾中，即便周遭的建筑都被烧成平地，这里依旧安然无恙。此时，数千人涌进了寺庙及其宽敞的大殿，希望寻得庇护。成群的人涌了进来，直到把这里堵得严严实实。更多的人还在不断到来，想要挤进门廊，但里面的人则想方设法把他们挡在外面。当大火逼近庙宇时，火星和余烬开始落在巨大木门外恐慌的人群身上。从B-29上扔下来的凝固汽油燃烧弹不断从庙宇上方飞过，有些直接落在了寺庙的屋顶瓦片上。于是这座宏伟的木制建筑也烧了起来。火势迅速蔓延。燃烧的大梁从房顶掉落到被困庙中的人们的头上。想要挤进寺庙的大群人和想要冲出去的恐慌的人群迎头撞在了一起。当空气愈加灼热之时，许多人死于拥挤和踩踏，和寺庙一起被烧成灰烬。

隅田电话交换中心是东京的六大电话交换台之一，这里的规定要求操作人员坚守岗位灭火。操作交换机的都是些年轻女孩子，大部分还是青春期的少女。她们都受过训练，用潮湿的拖把和装在桶里的沙子和水灭火，保护设备。当B-29机群从头顶吼叫着飞过，大火吞没了周围的居民区时，操作员们仍在坚守岗位。女孩子们拿着水桶，从浴室甚至是厨房的烧水壶里接水。此时，

交换中心的周围竖起了一排粗壮的电话线杆作为支撑，防止大楼在被炸弹击中时倒塌。但是大火烧着了这些木杆，并蔓延到了墙上。由于没有接到撤离命令，工作人员觉得自己必须留在原地全力灭火。“当所有东西都着了火时，还是没有接到撤出办公室的命令，”维护工小林弘泰后来回忆道，“没有命令要你走，你就必须在岗位上坚守到死！事情就是这样。”^[81]夜班主管最后还是发出了撤离大楼的命令，但是对于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已经太晚了。只有4名交换机操作员幸免于难，31人葬身火海。大部分死者都只有15岁到18岁。小林是仅有的几位逃出电话交换中心的员工之一。后来，他的老板要他解释为什么逃跑。“但是当它们来查看的时候，发现就连公共电话的硬币盒子都完全熔化了。他们就明白了。”^[82]

在火灾区域的中央，也有一些人仅凭运气活了下来。他们找到了一条能迅速逃走的路线，而且逃向了迎风方向。他们都找到了一片开阔区域，那里只要有一条沟渠或者一栋混凝土建筑，或者是高耸铁路路基下的一条安全过道，就足以保护他们免受高温和烈火之害。他们趴在地上，那里的氧气仍然足够呼吸，而且这也能让他们在高温的烘烤下撑到火焰熄灭。六年级的船户和代在一所学校后面的沟渠里找到了藏身之所。他的妹妹一直在哭：“好热，好热！”^[83]但她们聪明地一直趴在地上，就这么活了下来。有个小男孩躺在一条宽阔马路旁的阴沟里活了下来，路边就是大火。数百人逃进了两国火车站宽阔的铁路调度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开阔地，周围都是些无法燃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筱田友子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在匆忙跑过押上站时，别人要她待在那里别动。“那里又闷又热，我把脸紧紧贴在地上。地面附近的空气还算凉爽干净。”^[84]友子和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过了一夜。拂晓前后，她站了起来，陌生人却倒在了地下。“我晃了

晃他，但他却死了。他们说，他死于大火带来的浓烟和高温。”[85] 土仓秀三是个工厂工人，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爬到了双叶学校的屋顶上。当火焰逼近时，余烬和燃烧的残骸落在他们的头上，孩子们哭闹着要回家。土仓则打开了屋顶的储水箱，舀出水浇在孩子身上，还浇灭了自己衣服上的火。然后他把两个小孩轮流泡到水里。“在接下来的90分钟左右时间里，我们一直如此反复。空气太热了，当我把孩子浸到水里又捞回到屋顶上时，他们衣服上的水几乎立刻就蒸发干了。”土仓和他的孩子幸存了下来，没受什么伤。[86]

如此猛烈而范围广阔的大火，燃尽的速度也比较快。到3月10日拂晓，大部分火焰都已熄灭。火灾区域满是浓烟，呛得幸存者们睁不开眼。人们可怜兮兮地拖着脚步，在街道上穿行。他们的皮肤被烧伤起泡，满面污垢，衣服被烧得褴褛不堪，眼睛红肿。有些人蹲在地上却不肯坐下，因为地面仍然有些烫人。城市成了一片闷燃的废土——堆满了灰烬和废墟，其间散布着一些被熏黑、损毁的混凝土墙壁、砖石烟囱，以及钢质护栏。这令那些中老年人回忆起了1923年的灾难。幸存者们走向他们的家，或者说家曾经所在的地皮，但是有些居民区被彻底夷平，地标都已不知去向，他们也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们看到了城市远方的景观，那些前一天还根本看不见的遥远建筑。

当局随即开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清点、收拢和掩埋死者的工作。尸体被像积木那样摞起来。它们被烧得如同焦炭一般，大小只有生前的四分之三，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男人和女人的尸体无法区分，那些小号的尸体都是些孩子，死在父母的身旁。它们要么被就地焚烧，要么装上卡车集中掩埋，要么送到城市郊区集中火化。穿过屠场回家的路上，筱田友子看到地上有一双黑色的劳保手套。但是驻足仔细一看，她才发现那是人的手。她从一辆

消防车旁走过，原本红色的车身此时已被熏黑；同样被熏黑的救火队员全都被烧死在车里。小川寿美回忆，隅田公园已经成了坟场，“一排排都是坟堆。人们挖出大坑，把煤油倒在尸体上进行火化”。[87]清冈美智子当时21岁，住在浅草，她当时靠在一堆仍在闷燃的尸堆上取暖。她说：“我能看见一只手臂，还有很多人的鼻孔。但那时候我已经麻木了。那气味仿佛永远沾在我身上，挥之不去。”[88]

当局打开了各处被用作庇护所的学校和其他建筑的门，结果只找到了成百上千的死者。在双叶学校旁的一个游泳池里，人们跳进水里以躲避高温和烈火。“那情景太可怕了，”一名目击者回忆道，“我们估计有超过1 000人挤进了水池。我们刚刚到那里时，水池里完全挤满了人。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只有大人和小孩的遗体。”[89]

根据东京警视厅的统计，这次空袭造成8.8万人死亡，4.1万人受伤，几乎100万人无家可归。大约26.7万栋房屋被彻底烧毁。16平方英里的城区化为灰烬。[90]根据日本政府后来修正的数据，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还有些资料则估计人数高达12.5万。实际数据已无人知晓，这部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一城区的大部分官方户籍记录，部分由于军警人员不愿去清点遗体的准确数量。战后，一名东京官员告诉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人员：“那情景太可怕，我已无法描述。空袭后我应该去做调查，但我没去，因为我不想看到那可怕的场景。”[91]3月9日和10日火攻东京之战杀死的人数似乎超过了落在广岛或者长崎的原子弹，至少当场死亡的人数是如此。如果死亡人数的最高估算值属实，那么空袭东京当场杀死的人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加起来还要多。这是战争中最具灾难性的空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皆如此。此战的死亡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要多。

日本媒体隐瞒了灾难的规模。头版新闻都在强调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安然无恙。头条则指责美国进行“盲目轰炸”或者“屠杀式轰炸”。社论说面对着敌人愈演愈烈的暴行，相信日本人民的斗志将会被激起。《朝日新闻》向读者保证：“我们为本土决战进行的军力积累不会被敌人这样的攻击所打断。相反，这将会激发我们的斗志，以及消灭敌人的决心。”^[92]

在关岛的指挥所棚子里，李梅在地板上踱着步，等候着前线的消息。大部分幕僚都睡了，但李梅却没睡。他一边抽雪茄，一边喝可口可乐。他告诉麦凯尔韦少校他睡不着：“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93]

关岛时间凌晨2点前不久，第一份“炸弹已投下”的电报发了回来。消息令人鼓舞，飞机损失看起来要比预期的少。七个小时后，第一架返航的B-29落地，飞行人员报出了他们的结论：“东京就像松树林那样着了火。”^[94]任务领队鲍尔将军返航时带回了正在蔓延的大火的照片。一艘位于本州岛南部海岸足足150英里外的美军潜艇报告说海平线上升起了浓烟。三架B-29照相侦察机在3月10日中午飞到东京上空，在晴空下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当天深夜，空袭后的照片被送到了关岛的作战控制室，摊放在电灯下方的桌子上。照片显示，沿着隅田川两岸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损毁区域，覆盖大约16平方英里的城区。李梅叼着雪茄，脸上“毫无表情”，趴在桌子上，指着照片中的损毁区。“这里全毁了。”他说。他的手指顺着灰白色的带状地带滑动着：“这里毁了——这里——这里——这里。”^[95]在起飞的334架“超级堡垒”中，只有14架未能返回。损失率4.2%，低于此前任务的累计平均值。鉴于李梅和他的飞行人员担心损失会骤增，320架飞机安全返回的结果也算是一个惊喜了，这证明了李梅关于日方将会

措手不及的理论是正确的。（战后，美国人才知道日本战斗机在狂暴的上升热气流中无法控制；它们甚至无法接近B-29，更不用说攻击了。）机组人员士气高涨，尤其是在他们看到航空照片显示敌国首都的1/5化为灰烬之后。这些照片被放大，标上箭头和注释，钉在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办公室和任务简报室里的公告栏上。

李梅急于赶在日本人拿出对策之前立刻再来一次闪电攻击。他想要他的飞机在返航当天，也就是3月10日夜晩前去空袭名古屋，但这是不可能的。奔赴名古屋的第一批飞机在3月11日下午升空，此时距离空袭东京的最后一批B-29返航刚刚过去30个小时。空袭名古屋又是一次“全力尽出”的任务：313架B-29起飞，286架抵达目标。战术和两晚之前在东京时如出一辙。攻击者投下了1 790吨燃烧弹，略少于东京的投弹量。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风速较低，建筑密度较低，消防队的反应也更有效——名古屋没有遭受东京那样的大灾难。数以百计的起火点未能汇聚成一整片大火场，它们烧毁了“仅仅”2平方英里的城区。但是，只要别按前一次东京的标准，名古屋的大火也堪称毁灭性灾难。城市多处最重要的工业目标受损或完全被毁。

48小时内连飞了两次15小时的任务，查尔斯·菲利普斯自打受训飞行以来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疲惫过。“两个晚上之前我们就见识过了这种大火，”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因此看到像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陷入火海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次和上回一样令人敬畏。和上次一样，我们低下头，数着被我们抹平的一个个街区。城市成了地狱。浓烟翻滚而来，我们坐在飞机里都能闻到名古屋燃烧的气味。”^[96]

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3月13日的火攻目标。204架“超级堡垒”飞到城市上空，从低空投下2 240吨燃烧弹。浓云

遮盖了城市，但这并不影响雷达轰炸的精确度，此番轰炸比先前“更加密集，更加集中”。[97]大阪城区9平方英里的区域被烧成白地。被摧毁的重要目标中包括了大阪兵工厂，日本陆军1/5的火炮炮弹便产自这里。大阪上空的上升热气流比四个晚上之前的东京更加凶猛。有一位飞行员形容说：“巨大的蘑菇状浓密黑烟几秒钟内就升腾到5 000英尺的空中。”第313联队有一架B-29名为“颠倒号”，这个名称真是名副其实，它被风暴掀了个底朝天，机组人员都被倒挂在肩带上。[98]它向下俯冲了1万英尺——几乎栽到了地面上——飞行员才重新控制住了飞机并返航，最终安全回到基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只损失了2架B-29，另有13架受损。

3月16日夜，307架B-29轰炸了神户，一座大型港口和工业中心，日本第六大城市。2 300吨燃烧弹烧掉了3平方英里的城市。日军战斗机的反击比此前几次空袭都更猛烈，但这些截击机也无力发动有效攻击，只有3架B-29未归。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闪电”空袭，是19日夜再袭名古屋。290架“超级堡垒”向这座城市扔下了2 000吨炸弹。机群向更小的一片区域更密集地投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马里亚纳群岛弹药库里剩余的几乎所有燃烧弹全都装到了飞机上。空袭又摧毁了名古屋3平方英里的城区，击伤或摧毁了诸如名古屋兵工厂、货运码头、爱知飞机发动机工厂之类的多处高优先级目标。

1945年3月的“闪电”火攻空袭到此便暂时告一段落。参加战斗的所有人——机组人员、后方参谋和地勤人员——都累坏了。必须要暂停一阵子了，否则技术事故就会成为大问题。不仅如此，马里亚纳群岛储存的所有燃烧弹在五次空袭中用得一千二净，补充弹药还要从海路运来。这段时间里，B-29机队不得不回到拿通用的“铁炸弹”进行传统轰炸的老路上。4月中旬之前是不

可能恢复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了。在这一间隙里，B-29机群还被强行要求去支援“冰山”行动，即冲绳登陆战。

在10天时间里发动的5次“全力尽出”燃烧弹轰炸中，B-29机群总共出击1 595架次，向日本投下了近1万吨炸弹。空袭在4座日本大城市中烧毁了32平方英里的城区。首次用燃烧弹夜袭东京时，美军出动了334架飞机，这几乎是此前空袭飞机数量的2倍。几乎在一夜之间，第20航空队的攻击能力就从50架飞机的级别骤增至300架。机群来回一趟要3 000英里，还要在仅仅1英里的高度飞越日本防空最严密的空域，而美军的累计飞机损失率只有1.3%，空勤人员损失率0.9%。在5月至6月间，火攻日本的作战还将以更大的规模重启，损失率还将持续下降。

燃烧弹空袭的大获成功，维护并巩固了第20航空队在参联会直接掌控下的独立地位。B-29未来将会执行一些战术任务——最主要的是轰炸九州岛的机场以支援即将到来的冲绳战役——但是李梅现在有了充分的信心，坚持自己应当获准去继续完成抹平日本城市的使命。他计划把他的空勤人员和飞机压榨到极限。他告诉华盛顿的上级，自己的部队到1945年8月时将能够每月出击超过6 000架次。数年后，他觉得如果当时海军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援，保证他的B-29能够以最大力度不间断地空袭日本，这个国家可能等不到1945年8月就会投降：“我想这或许是有可能的。”^[99]

18个月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鼓励人们从东京和其他城市疏散。现在这一行动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了。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除了离开城市，他们别无选择，其他许多人出于对灾难再临的担心，也加入了撤离的人流。从1945年1月到8月，东京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一半。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全国离开城市（如果还能称其为城市的话）的逃难市民可能超过1 000万人。在城市的工厂

中，经理们千方百计阻止工人旷工。东京消防总队给出了确信无疑的意见：首都在这样的空袭面前毫无防御能力。日本人关于必须坚守岗位并救火的原则被抛弃了，无论市民还是当局皆如此。他们现在意识到，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逃，空袭警报一响就赶紧逃。

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支武装车队载着裕仁天皇开过了皇宫的护城河，天皇视察了被烧毁的“下城区”的废墟。新闻报道中也不得不很直白地承认，空袭造成的损失“不轻微”或者“相当大”。^[100]但是日本政府到处都有眼线，大部分日本市民都清楚要闭嘴。“看起来还不算太坏”，在左邻右舍和陌生人之间，只有这样说才安全。^[101]

[1] Arnold signed Marshall COMGENA AFPOA to Richardson for Harmon Info CINCPAC, Dec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44.

[2] “Those Who Witnessed Series—How Civilians Viewed the War,” NHK television documentary, accessed January 4,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JH2UzYrLw>;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en, *Zero!*, p.257.

[3] “War History of the 5th Air Fleet,” February 10, 1945, to August 19, 1945, Library of Congress, Japanese Monograph Series, No.86.

[4]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64.

[5] John Giardi,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p.201—2.

[6] *Ibid.*, p.201.

[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52.

[8]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p.217.

[9] *Ibid.*, p.215.

[10] Matsuo Kato quoted in *Time—Life Books, Japan at War*, p.157.

[11]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00.

[12] Michio Takeyama essay in Minear, ed., *The Scars of War*, p.62.

[13] Kiyoshi Kiyosawa diary, January 2, 1945,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0.

[14] “Let There Be a People of 100 Million Heroes,” *Mainichi Shinbun*, January 2, 1945, quoted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0.

[15] *Asahi Shinbun* headlines on January 15 & 16, 1945, quoted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7.

[1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43.

[17] Kiyoshi Kiyosawa diary, March 29, 1945,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39.

[18]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

[19] *Ibid.*, p.26.

[20]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58.

[21] Quo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37.

[22] Quoted in *Time—Life Books, Japan at War*, p.44.

[23] Statement, Cabinet Board of Information, December 22, 1943, quoted in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73n1.

[24]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62;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6, 1944, p.2.

[25]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65.

[26]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22.

[27] Koiso address to Japanese National Diet, quoted in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September 8, 1944, p.4.

[28]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3.

[29] Hideo S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36.

[3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4, 1944 memo cited in broadcast of October 11, 1944, p.3.

[31] Mihoko Nakane, diary entries, April—June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p.268—305.

[32] Naokata Sasak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68.

[33] Hideo S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37.

[34] Mihoko Nakane diary, June 17,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289.

[35]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summary, pp.5—9,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36] Pyle, *Last Chapter*, p.19.

[37] Welfare Office Monthly Report, pp.2—6, in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38] Dos Passos, *Tour of Duty*, p.73.

[39] Ibid.

[40]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p.4,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41]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p.340—42

[42] Truman J. Hedding, oral history, p.108; Lamar, “I Saw Stars,” p.12.

[43]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10.

[44]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42.

[45] Ibid., pp.341—42.

[46] Message 221837, Arnold (signed Marshall) to Richardson, Harmon, and Nimitz, December 22,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71.

[47] CINCPAC PEARL to COMGENPOA, COMGENAAFP, DEPCOM 20THAF, etc., March 28,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08.

[48] Edwards to King, November 14, 1944;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1, labeled “General Spaatz.”

[49] Straubel, *Air Force Diary*, p.450.

[50]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77.

[51]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49.

[52] Selden, "A Forgotten Holocaust," *Asia—Pacific Journal*, Vol.5, Issue 5, May 2, 2007.

[53] Ralph, "Improvised Destruction," *War in History*, Vol.13, No.4, October 2006, p.498.

[54] Tanaka, *Tanaka, and Young,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p.81.

[55] Park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hort History*, p.170.

[56]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25.

[57] *Ibid.*, p.122.

[58]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85.

[59]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12.

[60] *Ibid.*, pp.351—52.

[61] *Ibid.*, p.349.

[62] Fedman and Karacas, "A Cartographic Fade to Black,"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 , Issue 3, July 2012, pp.306—28.

[63]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75.

[64] Phillips, *Rain of Fire*, p.37.

[65] Pyle, *Last Chapter*, p.29.

[66] 这里的“吨”指的应该是美国人常用的“美吨”或称为“短吨”，一吨相当于907千克。——译者注

[67]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22.

[68]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8.

[69]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2.

[70]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1.

[71] *Ibid.*, p.42.

[72] *Ibid.*, p.37.

[73]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20.

[74]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4.

[75]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76]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11.

[77]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196—97.

[78] Kazuyo Fun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46.

[79] Michiko Okubo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p.207—8.

[80] Isamu Kase quoted in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81] Hiroyasu Kobayash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51.

[82] Ibid., p.352.

[83] Kazuyo Fun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47.

[84] Tomoko Shinod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5.

[85] Ibid.

[86]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41.

[87] Sumi Ogaw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4.

[88]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89]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43.

[90]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95.

[91]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37.

[92] *Asahi Shinbun* quo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40—42.

[93]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0.

[94]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78.

- [95]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4.
- [96]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5.
- [97]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54.
- [98]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54.
- [99]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68.
- [100]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23.
- [101] Naruo Shira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6.

第十三章

在硫黄岛的任务完成后，第58特混舰队回到乌利西锚地短暂休息、维修和补给。庞大的舰队把潟湖北部锚地停得满满当当。夜晚，尽管战时要灯火管制，但据目击者说，停泊的军舰上仍然能看到许多灯火。在巨大潟湖周围的岛屿上，露天剧场每晚都要放映电影。随着战线北移，所有人都打心底里厌倦了灯火管制，灯火管制也日益名存实亡。

3月11日，日落后大概1个小时，“乔克”克拉克将军站在他旗舰“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听到头上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抬起头，他看见了一架绿色的双引擎轰炸机，机翼上绘着红丸机徽。它迅速向停泊在1/4英里外的另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伦道夫号”俯冲过去。这架自杀机撞中了“伦道夫号”右后方飞行甲板下部，在飞行甲板上炸开了一个直径40英尺的大洞，并在机械车间和机库后部引发了大火。27名舰员被炸死，14架飞机被毁。半个小时后，第二架日军飞机撞上了附近的索尔伦岛并爆炸，炸伤了14人，一些地面设施受损。那个日本飞行员可能是把灯火通明的岛屿误当成停泊的军舰了。^[1]

这两架攻击机是从超过1 600英里外的日本九州岛一路飞来的，日本第五航空舰队将此次自杀攻击任务命名为“丹号”作战。当天上午，24架横须贺厂P1Y“银河”轰炸机（盟军绰号“弗朗西斯”）从鹿屋海军航空基地的主跑道上起飞。其中10架飞机由于引擎故障被迫折返或者在其他岛屿上迫降。还有几架飞机在远航途中失踪。下午6时52分，在飞了9个小时之后，领队飞行员电

告鹿屋基地，报称幸存飞机达成对乌利西环礁的彻底突袭。第五航空舰队的参谋们对这一报告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评估，认为美军肯定有11艘航母被击中。[\[2\]](#)实际上，被击中的只有1艘“伦道夫号”。

这次超远程进攻彰显了“神风”自杀战术所特有的优势：无须留返航燃油，作战半径有效提高了一倍。克拉克将军称此次攻击“胆大包天，很日本”。[\[3\]](#)

三天后，第58特混舰队再次出海。大规模的舰队出航花费了大半天时间，5支半独立的航母特混大队每次一支，鱼贯穿越穆盖水道。他们穿过一片热带锋面向北航行，在恶劣海况和浓云的掩护之下颠簸前进。这些特混大队的指挥官是海军航空兵将领“乔克”克拉克、拉尔夫·戴维森、“泰德”谢尔曼，以及阿瑟·拉福德；小一些的第五支大队（58.5大队）专司夜间作战，由马特·加德纳少将指挥。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搭乘在谢尔曼第58.3特混大队中的“邦克山号”航母上。他们的任务是打击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南部的日军航空兵基地，以图削弱日军航空兵对两个星期后打响的“冰山”行动，也就是登陆冲绳之战的反击。

3月17日至18日夜間，美军接近九州岛南岸时，日军侦察机在特混舰队周围投下了照明弹。“企业号”的夜间战斗机击落了两架侦察机，但是雷达却显示，美军舰队外围还有更多侦察机出没。此番，美军便不再有突袭的战术优势了。[\[4\]](#)

日军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宇垣缠将军，坐镇鹿屋基地的司令部，掌控着各方面的目视报告和雷达侦察报告。远程侦察机确认美军舰队主力在3月15日离开了乌利西。3月17日日落后，夜间巡逻机接触了美军舰队的先头部队。宇垣心知肚明：猛烈的空

袭3月18日早晨就会落在他的机场上。

两个星期前，东京帝国大本营的陆海两军分部定下了保守使用本土航空兵力的政策。最好和最有经验的飞行队都要留到登陆舰队接近日本海岸之时再出击。仅仅“航母空袭”到来时是不会动用他们的。即便美军舰载机出现在本土上空，日军飞行员和飞机也应当尽最大可能避免接战，“应避免主动作战，以保存实力”。[\[5\]](#)换言之，日军航空兵将会保存自己，来日再战，即便任由其机场遭到肆意空袭也在所不惜：“原则上，不要为战略要点的防空投入反战斗机作战，除非条件格外有利或者迫不得已。”[\[6\]](#)

但是宇垣从来不接受这种任人宰割、安于自守的策略。他预计美军战斗机的扫荡会严密压制日本南部的航空兵基地，令其无法飞往外海侦察，也就无从知晓登陆进攻是否会到来。当第58特混舰队向九州岛东面的起飞点航行时，宇垣担心美军的航母空袭“会没完没了，我们即便想要保存实力也保不住。我没法坐等着看〔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因此，宇垣利用他个人的权威做出了决定，第五航空舰队“全力以赴”发动反击。[\[7\]](#)

3月18日拂晓前，在九州岛南端以外90英里处，美军航母放飞了130架“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这第一批战斗机扫荡部队在空中未遇到对手，飞行员在地面上也没见到什么飞机，于是只好扫射一些地面设施了事。大约40分钟后，轰炸机群来了，里面有60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由40架战斗机护航。当天下午，第二轮空袭深入内陆，攻击了九州北部的机场。飞行员们返航时宣布在空中击落102架敌机，在地面毁伤275架敌机。[\[8\]](#)

海岸外的美军特混舰队发现自己身处低垂的浓云之下，云底就悬在飞行甲板上方仅仅500英尺处。这在战术上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日军飞机可以借此躲避巡逻战斗机，在高射炮来得及做

出反应之前突然穿出云层冲下来。“企业号”的前部升降机吃了一枚重磅炸弹，“勇猛号”也受了轻伤，一架G4M轰炸机落在其近旁的水面上。下午3点刚过几分钟，“约克城号”航母（第58.4大队拉福德将军的旗舰）的通信舰桥右侧也被击中。所有三艘航母都控制住了损伤，但是面对如此决心坚定而且技术娴熟到出人意料的常规轰炸（非“神风”攻击），舰员们心里直发毛，这看起来意味着日本人为战争的高潮而保留了一些最优秀且最有经验的飞行员。

第二天上午，这一想法就得到了证实。当时一支大规模攻击机群起飞扑向停泊在濑户内海的吴港和广岛港的日军军舰。攻击机群此番打得十分艰难。在四国岛北岸的松山机场上空，两个中队的“地狱猫”战斗机从后方和上方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伏击，来者是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他们驾驶的都是高速而动力强劲的川西N1K2—J“紫电改”战斗机。1945年3月19日在松山上空的格斗中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数量不明，但日军宣布自己击落了超过12架美机。余下的美军飞机还将在吴港上空遭到进一步的沉重打击，那里的高射炮火十分猛烈。SB2C和F6F投下炸弹，命中了多艘日军军舰，但无一击沉。这天，美军损失了60架飞机。

与此同时，一支日军攻击机群也迎头飞向美军特混舰队，在四国岛南岸外不远处找到了目标。2 000英尺高度上的断云再次令敌攻击机得以甩脱美军战斗空中巡逻机，米彻尔形容这一情况“对敌人堪称完美……雷达再次无法应对”。[9]大批熟练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俯冲到戴维森将军第58.2特混大队中央的大型航母上空。早晨7时10分，“黄蜂号”遭到沉重一击，炸弹穿透3层甲板之后爆炸，炸死了差不多100名舰员。几分钟后，一架横须贺D4Y“彗星”俯冲轰炸机在“富兰克林号”正上方大约1 000码处穿出云底，赶在美军炮手来得及反应之前投下了两枚250千克炸

弹。致命的落弹穿透了“富兰克林号”的飞行甲板，穿入了舰体深处。结果是灾难性的。“大本”^[10]遭受了太平洋战争中所有其他未沉航母都没有遇到过的严重爆炸和火灾。数百人被当场炸死，有些人甚至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航母遭袭就命丧黄泉。

攻击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舰桥上的舰长莱斯利·格雷斯上校都没有见到那架敌机和它投下的炸弹。“富兰克林号”当时正在放飞飞机。停机位上的炸弹和已经装填好的机枪弹被爆炸引燃，并发生了连续爆炸。有几架F6F“地狱猫”挂装了“小蒂姆”火箭弹，它们也被点着，从损毁的飞机上发射了出去。根据副舰长乔·泰勒中校的说法：“火箭弹呼啸着，有些射向右舷，有的射向左舷，还有些沿着飞行甲板飞去。这些武器从近旁呼啸而过，是一个人有幸得见的最恐怖的场景。有些火箭弹直飞了出去，有些则跌跌撞撞从一端飞到另一端。每次有一枚火箭射出，前方的救火队员就会本能地卧倒在地。”^[11]救火队员们不得不寻找掩护，这就妨碍了他们灭火的努力。

在特混舰队的其他舰上，旁观者们举起望远镜看向了爆炸的航母。旗舰在至少15英里外的拉福德将军，注意到了蘑菇云和他所见过的单艘军舰升起的最大的烟团。“我们无法相信遭受如此劫难的船上还有人能活下来，”他说，“我心里已经在对我的同学戴维森将军和我那身为‘富兰克林号’舰长的朋友莱斯利·格雷斯上校告别了。”^[12]在12英里外的“约克城号”上，舰桥上的一名军官数出了9次巨大爆炸。一名战友说：“就这样了，兄弟！我们可以和‘大本’说再见了。”^[13]

但是格雷斯舰长选择拯救自己的军舰。巡洋舰“圣菲号”靠到侧舷，接走了许多幸存的舰员，包括戴维森将军和他的幕僚班子。（他把将旗迁移到了“汉考克号”上。）救火队奋战了四个小时，直到上午11点，火势才被控制到能让巡洋舰“匹兹堡号”开过

来拖曳“富兰克林号”的程度。很快，这艘被打得不像样的航母就开始以3节航速向南航行了。^[14]次日凌晨3点，在昼夜不休的拯救之下，“大本”恢复了动力，能够用它自身的蒸汽开出20节航速了。斯普鲁恩斯让这艘舰返回乌利西，继而去往珍珠港，再进行1.2万英里的远航开回纽约，用的都是它自身的动力。

在它沿途的每个港口，人们都向它行注目礼。“富兰克林号”已经成了废墟，到处都被熏黑、破烂不堪，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它飞行甲板上有一些无法辨认形状的焦黑的钢块，那是它舰载机的最后痕迹。（火焰如此猛烈，飞机的残骸都熔化进了舰体，甩都甩不掉。）“富兰克林号”的伤亡清单中有807人死亡，超过487人负伤，几乎是其舰员总数的一半。正如切斯特·尼米兹后来总结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在整个历史上，没有其他哪艘受到如此重创的船还能浮在水面上。”^[15]

在日本南部外海的两天空袭中，第58特混舰队攻击了日本的机场、港口和战舰，在空中和地面摧毁了大约400架敌机，但是自身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6艘航母被击中受伤，其中3艘（“企业号”、“黄蜂号”和“富兰克林号”）需要回到后方基地进行大修。3月20日，米彻尔决定撤出这一区域，不再进行第三天的空袭。受损军舰在强大护航兵力掩护下被送回乌利西，其余军舰则在冲绳岛东南150英里海面上与勤务中队会合，加油装弹。第58特混舰队是无法休息的。即将于4月1日开始的“冰山”作战，即登陆冲绳之战，还需要舰载机大队的支援。^[16]

太平洋上每一场登陆战的规模都比前一场更大，这已经成了一个铁律。冲绳之战是战争中最后一次两栖作战，因此，它的规模也超过了先前任何一次登陆。地面部队拥有来自陆军和海军陆

战队的18.3万战斗部队，此外还有12万勤务部队和工兵部队。运输和后勤舰队拥有超过1 200艘船。这还不包括第58特混舰队和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大约200艘军舰，它们将为作战提供空中掩护。冲绳岛距离旧金山6 100英里，距离硫黄岛850英里，距离马尼拉920英里，距离关岛和乌利西均为约1 400英里——但距离日本本土只有330英里。盟军部队将在一条长到前所未有的补给线末端，在处于敌人不间断空袭之下的水域中，一连作战几乎三个月。“赖着不走的舰队”（水兵们这样称呼舰队）每个月都要烧掉600万桶燃油。所有这些都要经由商用油轮和舰队油轮送到战区。

出于保密原因，只有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才知道到底有多少船只参加作战。中下层官兵只能靠猜，他们试着数清海平面上的船只，但这就像在晴朗的夜空数星星一样根本不可能。

从1945年3月23日，也就是登陆的一个星期之前起，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就开始时常出现在冲绳上空。它们在这里进行轰炸和扫射，照相侦察，以及战斗空中巡逻。透过浓云的缝隙，“约克城号”一架TBM“复仇者”飞机的机组人员看见了“一座迷人的小岛，有起伏的山峦，绵密的森林，沿着山坡向下，则是如方格被子一般褐色和绿色交织的农田地块”。^[17]这座岛屿的经济主要局限于渔业和农业，主要的作物包括甘蔗、稻米、甘薯、甜菜、大麦和卷心菜。岛屿的中央平原和相当一部分山坡上满是甘蔗田、梯田和水稻田。只有山顶还保留着浓密的森林，长满了榲树和常绿的松树。岛上的道路都是些土路，宽度足够马车通行。不起眼的小村庄散布四处，覆盖着茅草屋顶的石头房子紧紧挨在一起。朝西的山坡上点缀着形如七弦琴或者锁眼的石头墓碑，其中许多显然被纳入了日军的筑垒体系。

冲绳岛长约60英里，宽3英里到15英里不等，面积约480平

方英里。岛屿北半部地形崎岖，森林密布，人口稀疏。战前大约80%的人口住在岛南1/3的面积上，那霸和首里两座城市都位于这一区域。第58特混舰队的飞机攻击了读谷、嘉手纳、浦添、那霸的岛上主要机场，所有的跑道都被炸得坑坑洼洼，日军看起来已经放弃了对这里的防御和修复。机场上几乎见不到日军飞机，除了残骸。1944年10月，第3舰队的航母空袭毁灭了那霸市，城区大部分被烧毁，居民也流落各地。在岛屿最南端地区，地形崎岖，遍布着断崖、高山、深谷、峭壁和天然岩洞。在南侧海岸，陡峭的悬崖紧挨着岩石海滩。岛上仅有一条铺平的公路，就是连接那霸和首里的双车道高速路。

美军航母的飞行人员来此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冲绳是个人口大岛，他们知道这一点，1940年时岛上人口80万人——但是现在，当 they 从飞机向下看时，却几乎见不到人。尼米兹的情报分析人员估计岛上日军为6.5万人。实际数字接近10万——但是从空中难以确定碉堡和火炮阵地的位置。^[18]然而在岛屿南部首里周围的群山上空反复盘旋之后，目光锐利的飞行员们还是逐步辨别出了一条由严密伪装的堡垒组成的横跨东西海岸的绵亘防线。3月25日，米彻尔电告里奇蒙·特纳中将：“从照片上看，整座冲绳岛似乎布满了洞穴、隧道和火炮阵地，尤其是道路沿线。能看到坦克和装甲车辆出入山洞。这里会很难打。”^[19]

虽然说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但是岛民们在文化、血统、语言上和日本人都不同。总体来说，冲绳人比他们的北方邻居个子更矮，脸也更圆一些。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岛屿一直是琉球王国的国王所在地，其统治区域覆盖整个琉球群岛。年轻的冲绳人会在学校里学习日语，而且说得很流利，但是老人和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居民还是只会说冲绳话。日本兵们总是把当地人视为下等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要求数十万冲绳人撤往台湾岛

和日本本土，数万日军则在这几年里陆续来到岛上，因此1945年时冲绳的总人口为45万至50万人，其中10万人是日本军队或者受日军指挥的当地民兵。

所谓“南西诸岛”从琉球绵延至台湾，长达800英里。作为其中最大、最重要的岛屿，冲绳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上。这里距离台湾岛、中国大陆和九州岛的距离都差不多，飞机从此地出发，可以轻易覆盖这些地方。若落入盟军手中，这座岛屿就可以成为进攻日本的后勤中转站，同时岛上还有大量土地适合建设大型机场和港口。这里的机场能够让盟军航空兵控制东海上空。岛屿本身也将会被用作重要的作战基地和进攻九州的跳板。

美军部队由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统一指挥，他一直主张进攻冲绳，并说服了尼米兹和金。特纳将军指挥运输船队和联合远征军。他麾下的舰队被统称为第51特混舰队，包括旧式战列舰，护航航母，执行护卫任务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数百艘突击运输舰，数千艘登陆舰艇，扫雷舰，医院船，和数不清的其他辅助舰船。作为美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两栖战专家，他自从1942年瓜岛战役以来率领了一次又一次的两栖战，“恐怖特纳”是少不了的。但是这位将军已经身心俱疲，脾气也比之前更大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特纳每晚都要喝得酩酊大醉，这可是明文禁止的。斯普鲁恩斯、尼米兹和金都知道他泡酒坛子的事，但是大家都认为他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干得更好，也就随他去了。

登陆部队被编组为第10集团军。由美国陆军的小西蒙·B.巴克纳尔中将整体指挥。这支部队的主力是陆军第24军，包括三个步兵师（第7师、第77师和第96师），由约翰·R.霍奇少将指挥；以及第3两栖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6师，由罗伊·S.盖格少将指挥。另外还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一个师被留作海上预备队。英国太平洋舰队被编为第57特混舰队，负责掩护冲绳和台湾

之间的南方海域。这支舰队编有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以及15艘护航舰艇，规模和实力相当于美军一支航母特混大队。其指挥官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直接向斯普鲁恩斯将军汇报。由于英军舰队的海上加油和补给能力未臻成熟，它还需要严重依赖美军的后勤支援。

冲绳岛周围的海域水深通常不超过100英寻[20]，很容易布雷。岛屿附近水域被布设了超过1 000枚锚雷或漂雷，正是这一威胁导致了1945年3月26日驱逐舰“哈利根号”在那霸以西水域的突然沉没。到“L日”[也就是计划登陆日期4月1日，称之为“Love Day”（“爱日”），缩写“L日”]之前，美军扫雷舰已经清扫了冲绳周围的25万平方英里海域，包括岛屿近处浅水区的6个主要雷场。由于需要近岸作业，这些扫雷舰理论上很容易受到岸炮的攻击——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日军没有向它们开火，这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其海岸炮的位置。扫雷舰完成任务后，会布设无线电浮标，以标示出安全通道。

3月26日，也就是L-5日，第77步兵师的3个营在冲绳岛南部西侧15英里外的庆良间列岛登陆。由500名左右日军组成的小规模守备部队很快被打垮。这个小岛群的多山岛屿并没有适合修建机场的地方，但是其最大的岛屿（渡嘉敷岛）和西边5个小岛之间形成了一块南北延伸的半封闭内部水域。这处“庆良间锚地”足以容纳大约75艘吃水二三十英寻的大型船只，它将被用作舰队的前进锚地。其狭窄的入口处将布置防御，以免敌人潜艇进入。主要锚地西侧是一片适合用作水上飞机基地的区域，在这里，只要不是最恶劣的海况，长长的卷浪都不会妨碍水上飞机的起飞和降落。3月27日，几十艘辅助船和修理船开始在此锚地下锚。在这处距离冲绳登陆滩头只有数英里的防风浪水域里，一支浮动的后勤舰队将能在漫长的战役期间为前线部队提供燃料和弹药补给。

一支救援和维修大队将在这一距离冲绳不到一小时航程的前进阵位上为舰队提供应急舰船维修。庆良间登陆战还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美军在这里缴获了350艘还没有来得及扑向美军舰队的“震洋”胶合板自杀快艇。

3月31日，另一支部队在冲绳以西仅仅8英里处的神山岛登陆。这令美军的155mm火炮可以直接攻击冲绳岛的目标。

在登陆前的这整整一周时间里，日军从南九州和台湾的航空兵基地向美军舰队发动了接连不断的空袭。盟军的情报人员和航空分析人员试图判断出日军残余空中威胁的规模和恢复能力。他们的意见极不一致，对日本本土作战飞机数量的估算差异很大，少至约2 000架，多则约5 000架。从九州到冲绳的单程飞行距离不足400英里，空中威胁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盟军阵营中无人敢说知道日军到底有多少老手飞行员还活着而且能升空，但3月18日至19日的空战已经证明至少还有一批这样的人存在。当第58特混舰队在3月19日退出那场战斗时，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首次成规模地使用被称为“樱花”的人操自杀弹向敌人发动进攻。19架G4M轰炸机从鹿屋基地起飞，每架飞机都挂载了一枚火箭推进的“樱花”弹，自杀弹座舱里坐着一名飞行员。轰炸机要把它们带到距离美军舰队40英里之内的地方，“樱花”将从机身下投下，向美舰发起撞击。但是美军舰队的雷达捕捉到了这支日军机群，“地狱猫”战斗机赶来截击，它们在日军还没来得及发射“樱花”的时候，就在舰队的60英里外将G4M轰炸机全数击落。每一枚“樱花”重量超过2吨，这一沉重负担令轰炸机变得缓慢而笨拙，因此很容易击落。日军此前还从未认真考虑过“樱花”的这一“阿喀琉斯之踵”——笨重、超载的母机很容易在抵达发射距离之前被拦截击落。

3月26日午夜刚过，驱逐舰“金伯利号”遭到了两架爱知D3A

俯冲轰炸机的撞击。舰上的高炮击落了一架飞机，但另一架撞中了它的尾炮塔基座，炸死炸伤超过50名舰员。这艘舰在庆良间锚地简单修补之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维修。第二天，“神风”自杀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一整天的空袭，命中了美军战列舰“内华达号”和“田纳西号”，轻巡洋舰“比洛克西号”，还有其他几艘驱逐舰、运输船、扫雷舰和布雷舰。3月31日，登陆前一天，斯普鲁恩斯将军长期以来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遭到一架中岛Ki-43（盟军绰号“奥斯卡”）战斗机的攻击。俯冲而来的日机在撞上军舰左后方之前一瞬间投下了炸弹，炸弹击穿了冷凝器舱和食堂，在军舰的油槽旁爆炸。该舰在庆良间简单修补后奉命回国维修。斯普鲁恩斯把将旗转移到了战列舰“新墨西哥号”上，这艘舰对“神风”攻击也不陌生。根据他的副官查尔斯·巴伯上尉的说法，斯普鲁恩斯展现出了标志性的超然态度：“他只是对于在登陆之前失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及自己无法在这艘舰上观察战斗而十分失望，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21]

L日前的72小时里，海军炮击大队将高爆炸弹倾泻在岛屿西岸的渡知具海湾沿岸的登陆滩头上，位于那霸以北11英里处。和以往的两栖登陆一样，火力支援任务中出力最大的还是那些“德高望重”的“OBB”——“老式战列舰”——其中有不少在珍珠港之战中失去了战斗力，后来又被捞起重建。这些老舰太慢，无法和航母特混舰队协同作战，但它们打出的重拳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些老舰由莫顿·L·德约少将指挥，他的火力支援大队还有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117艘加装了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的步兵登陆艇（LCI）。在登陆前的最后24小时里，德约的舰队向冲绳岛上的各个目标发射了3 800吨舰炮炮弹。炮击日夜不停，全面彻底，无休无止，有时并没有瞄准任何特定目标，而只是随机选择

一块区域进行炮轰。一个驱逐舰水兵想知道为什么要整夜进行这种凌乱的炮击，别人告诉他：“这是要让日本人睡不着。”^[22]那些在岸上承受如此巨量弹幕的人，称其为“钢铁台风”。

事后看来，大部分炮击都浪费了。冲绳南部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炮火夷平。登陆海滩内陆的机场即便已经被日军放弃，而且早已无法使用，也还是被炸成了月球表面——新弹坑落在旧弹坑上，一层叠着一层。

突击部队被告知要做好在登陆海滩上遭到凶猛反击的准备。根据第10集团军的作战预案，日军在登陆区布置了一个坚固设防的联队，而且敌援军很快就会抵达。美军第一批登陆编队将会遭到猛烈的火炮、机枪和迫击炮打击。在海滩的高潮位线上方矗立着一座6英尺高的防波堤，进攻部队不得不用木梯子爬上去。通过这道障碍之后，他们就要向着拥有“猛烈机枪火力”的碉堡和有掩护的堑壕冲锋了。^[23]冲绳岛的“爱日”，恰好又是复活节和愚人节，美军预计这将会是个伤心的日子。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被告知要做好在海滩上伤亡80%到85%的准备。^[24]

一支独立的火力大队和进攻师（第2陆战师）奉命绕到岛屿东南海岸，这是一次伪装“大游行”——他们将进行模拟登陆，以引诱日军将援军派往岛屿此处。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最逼真的此类佯动，也只有在太平洋战区运输船和登陆舰艇空前充裕的此时才做得到。日军指挥官显然中了计，他们后来报告称自己在那一片海岸击退了一支大规模登陆部队。

4月1日拂晓前，登陆兵们从床铺上起来，开始了他们熟悉的D日流程——收拾背包、卡宾枪、弹药、饭盒和其他装具，给枪支抹油，磨刺刀，排队排到船头，以及狼吞虎咽地吃下他们传统的“死刑犯早餐”提供的牛排煎蛋。每一支部队都混合着新兵蛋子

和百战老兵，这一点陆军和陆战队都一样。几乎所有士官都打过至少一场两栖登陆战，许多人更是打过两次或者更多。他们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并把他们的知识经验分享给了新兵们。巨舰大炮开始向海滩后方的区域猛轰，包括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即便是老兵们也被如此宏大的炮击惊到了。尽管见识过先前的作战，他们还是怀疑是否有活物能从如此凶猛的火力之下幸存。他们看着四周绵延至海平线以外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船只，感到不可思议。一名陆战队员说道：“我们舰队的巨大规模令我信心十足。”^[25]

这一天风和日丽，天上有一些云彩，轻微东北风，海面平静。气温约24摄氏度。那些在热带高温和南太平洋雨季里打过仗的军人很欢迎这种凉爽的天气。乘坐运兵船从乌利西开来的途中，天文爱好者们能看到南十字星座一晚接一晚地沉向南方海平面，直到最终消失。（南十字星座被绘在了第1陆战师的肩章上。）登陆部队领到了羊毛衬里的拉链野战夹克，这种战斗服在所罗门群岛和帕劳群岛根本用不上。

当岛屿的东方露出第一道曙光时，突击部队沿着吊绳网来到了下方等候着的希金斯登陆艇上，每个人都紧挨着相邻战友在条凳上落座。艇员们操纵着满载的登陆艇来到海上进攻发起线附近水域，引擎空转，排出的废气在海上飘荡。登陆艇紧紧趴在海面上，海浪扑打着侧舷上缘，时不时还灌入艇内。舰载机在上空盘旋。战役的巨大规模和芭蕾舞般的复杂性令登陆部队官兵惊叹不已。

上午8时30分，指挥艇上升起信号旗，第一批登陆艇的舵手打开了油门。登陆艇们越过战列舰和巡洋舰，彼此间保持着100英尺的横向间隔，沿着前方登陆艇的尾流稳步开进了笔直、狭窄的航道。打头阵的是炮艇，它们一边前进一边用火箭弹和3英寸舰首炮开火。紧随其后的是引导艇，艇上飘着彩旗，以标示不同

的登陆滩头。它们长长的白色尾流彼此完全平行，就像梳子的梳齿一般。一名观察员发现第一批登陆部队“带着一股中世纪战争的色彩和宏伟感，看不到边的部队打着旗帜向前推进。在早晨宁谧的阳光下，这真是一幕令人难忘的景象”。[26]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站在“田纳西号”的甲板上看着这一幕，他形容40mm曳光弹“就像一团团白色火球，看起来似乎就要落在登陆艇中间了，但它们低伸的弹道还是令其飞到了海滩上”。[27]

沿着7.5英里宽的海滩，美军划分了16个不同的突击登陆区。两栖舰队和滩头之间有一些大型珊瑚暗礁，但是登陆时间赶上了高潮位，暗礁影响大为削弱，而且水下爆破组已经在珊瑚礁中间清理出了可通行的航道。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后，突击部队便立起了大幅彩旗以标志各个登陆区。陆战队的登陆区在比沙河口以北，陆军则在河口以南。

“冰山”行动: 冲绳之战, 1945年4月—6月



即便在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前，艇员和突击部队官兵就发现他

们遭到的敌人火力攻击很微弱。时不时会有一股白色水柱溅起，表明有一发迫击炮或者是火炮的炮弹落下来——但是和先前的两栖登陆相比，这些炮弹数量更少，落点也更稀疏。只有一挺日军机枪嗒嗒作响，它很快就被海岸外军舰上的重炮打掉了。还有一股迫击炮火力，美军发现其射击阵地位于比沙河口附近，于是很快也将其打哑。第一批登陆艇上都携带了木梯子，准备用来攀爬将会在海滩尽头遇到的防波堤。但是登陆艇靠岸后，陆军和陆战队士兵们却发现防波堤远比之前说的要低矮——大部分地方不超过3英尺——而且舰炮轰击已经将其大部分夷平。突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敌人的轻武器和远程炮兵火力，但是并没有遭遇反击。渡知具湾一片平静。登陆基本未遇抵抗。

当第二批部队登陆时，官兵们干脆挺着腰板大步走上海滩，都懒得猫腰。在河口北侧的黄滩，第1陆战师的各个进攻营向内陆推进时都端着上了膛的枪，却完全没有遇到敌人火力。他们在船上听任务简报时得知这里会有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但实际上却连一点影子都没见到。第一批部队登陆一个小时后，已有1.6万名美军登上了冲绳岛并向前推进，只遇到微弱而零星的抵抗。这些区域大部分都被放弃。日军甚至在读谷和嘉手纳两个关键的机场都一仗没有打就放弃了，到中午时，两个机场双双落入美军手中。

登陆部队都为他们意料之外的死刑缓期感激不尽。登陆一小时后，第7步兵师的一名士兵评论道：“我已经活得比我预想的要长了。”^[28]第1陆战师的尤金·斯莱奇称这是“战争中最大的惊喜”。^[29]随同第6陆战师登陆的《纽约客》战争通讯员约翰·拉德纳形容这次登陆就像是“抓捕持枪歹徒的警察勇猛地冲进一间房屋，却突然发现那里只不过是闹鬼而已”。^[30]登陆一个小时后，突击部队已经开始轻手轻脚地从登陆艇上下来，跳过海浪以免海

水灌进靴子了，他们在海滩上游逛，就像是周末远足一样。团级和师级指挥梯队比计划中的时间提前上岸，在海滩建起了临时指挥所。推土机已经开始推平海滩最上面的沙堆，以清理出通向内陆机场和补给堆栈的道路。在急救所，医护兵们蹲在地上谈天说地，他们根本无事可做。美军在沿岸的渔民棚子里找到了几个冲绳本地人。他们向美军深鞠躬，并把冲绳本地人的文身露出来，解释说：“不是日本。”他们不是日本人，也希望美国人知道这一点。

到“爱日”日落时，登陆部队已经占据了长度超过8英里的滩头，向内陆推进的最远距离达到3英里，并且拿下了2座机场。5万美军已经上岸。伤亡之少令人欣慰——28人死亡，104人受伤，27人失踪。[\[31\]](#)

在渡知具南面12英里外的绿色山顶上，日军牛岛满中将和一群参谋正看着美军部队上岸。这些人抽着烟，说着话，轮流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场两栖登陆的全景。见到密集的舰炮炮弹落在海滩上方基本被弃守的区域里，他们露出了一丝笑意，因为这浪费了敌人如此之多的弹药。但仅仅是登陆部队的数量和战役规模便足以令人敬畏和警觉了。有人觉得这“就像是大海本身吼叫着扑了上来”。[\[32\]](#)

在硫黄岛和佩里硫，日军选择了纵深防御策略，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滩头后方高耸的岩石山区，并藏身于地下深处，以躲避美军的优势空中力量和海岸外的舰炮火力。守军计划放任敌人登陆，并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地区耐心等候美国人自投罗网。然而和硫黄岛、佩里硫不同的是，冲绳岛的日军要等敌人推进到内陆深处预设的主要陆地交战区后才让他们自己的重炮投入战斗。日军

会保存弹药，把火炮隐蔽在山洞口或者伪装网下，他们打算先节约弹药，直到能够最有效发挥威力时再开火。

牛岛的战役计划充满了争议。围绕这一计划，参谋军官和部队指挥官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和台湾、东京的更高指挥层级的意愿也进行了抗争，直到不久前的1944年底，该计划才付诸实施。早先的作战计划强调空中防御，依靠坚固而物资充足的机场和从邻近的九州岛不断飞来的飞机进行防御。在1944年的头10个月里，冲绳岛的军事建设项目一直聚焦于扩建和升级岛上的机场。冲绳和邻近的小岛上一度有18个不同的机场在同时开工。帝国大本营甚至将冲绳视为60英里长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日军高层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概念中的明显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套岛屿机场网络怎样才能美军无穷无尽的陆海空三路毁灭性力量面前保住自己？他们在攻占自己看中的岛屿时还从来没有失手过，而且其实力还在越来越壮大、强悍，每过一个月都会变得更加技术精熟。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将会掌握机场上空的制空权。而低平的地形不可能顶住优势地面部队的进攻，尤其是在他们还能得到海岸外压倒性的舰炮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投入大量人力和物资来升级机场，只会提高它们对盟军的价值，机场将不可避免地落入盟军手中并被掉过头来对付日本。牛岛将军的一名计划人员总结道：“我们的地面部队汗流浹背、累死累活地建设机场，就像是要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敌人一样。”^[33]

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统一纳入第三十二军麾下，由牛岛指挥，其复杂的指挥地堡设在首里要塞的地下，该要塞是那霸东坡上一座古代的石头城堡。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二十四、第六十二步兵师团，第四十四独立混成旅团，第二十七战车联队，第五炮兵司令部。第三十二军司令部还直辖诸多独立的精锐炮兵、迫击炮、高炮和反坦克炮专业部队。在那霸以南的小禄半岛还驻有

约9 000名海军基地部队；他们原本和第三十二军彼此独立，但按照事先达成的共识，从4月1日美军登陆起，他们便转由牛岛统一指挥。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部队和人员，岛上日军正规部队的总兵力达到了大约7.6万人。此外还有一些冲绳本地民兵和应征入伍人员，其中有些人接受了作战训练，其他人则只是劳动力，他们使得岛上穿军服的人总数达到约10万人。

1944年末，随着盟军的实力增长，冲绳遭到进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开始谋求将作战计划推倒重来。高级作战参谋八原博通大佐认为，第三十二军的实力无法让其守住海滩、平原，以及东京方面想要的各个机场。他更想在易于防守的冲绳岛南部山区打一场消耗战。参谋长长勇少将支持八原的观点，他把提案提交给了牛岛。牛岛力排众议批准了这一方案。1944年11月26日，即便没有经过帝国大本营的批准，修订后的作战计划还是被发了下去。此举近乎抗命，但是此时冲绳岛守军的各级官兵早已有了犯上之意。无论是在一线士兵中还是在牛岛指挥地堡的高级参谋军官中，人们都能听到对东京上峰的怒斥，说他们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只知道害怕美军飞机和潜艇，根本不敢亲自到冲绳岛上来察看情况。有个军官讽刺道，他们或许没有理由来，因为那霸的红灯区已经被美军舰载机空袭烧毁了。[34]

于是大部分可用的劳动力和物资都被投向了冲绳南部。那里，在那霸东面的崎岖乡间，日军设计了一套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和挖掘计划，构筑一套包括相互连接的隧道、碉堡、暗堡、战壕、坦克陷阱、炮兵阵地以及狙击手阵地的庞大体系。工事组成一条绵亘防线，横贯全岛，从一边海岸延伸至另一边，穿过高山、深谷、悬崖等令人生畏的地貌。这一地区布满了天然石灰岩洞穴，日军扩大了洞穴，并用隧道将其连接到一起，这样几乎整

个第三十二军都能够带着武器、弹药、补给和淡水箱躲进地下城中，躲过轰炸、扫射，以及哪怕是海岸外美军战列舰上最大口径舰炮的炮击。这一天然堡垒的核心是首里，古代琉球国王的王宫所在地，这里的古代石头城堡和城墙矗立在岩石峭壁之上，俯瞰着被炸毁城镇的废墟。牛岛将军地下指挥所的入口位于城堡附近一座山岭的反斜面上。首里周围的三个方向上布置了同心圆状的坚固防御工事，工事位于高地上，射界覆盖所有可能接近的道路，彼此之间通过有掩蔽的交通壕和隧道相连。这里是太平洋上的凡尔登。

每一支日军部队都要负责挖掘和构筑自己的防线。前线的士兵们清楚这是自己能否从密集的海空火力下生还的关键，都拼尽全力投入这一累人的劳作中。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的口号是“深沟高垒必胜”。^[35]和硫黄岛上一样，日军缺乏机械化挖掘设备和炸药，因此部队不得不用锹和铲来干活儿。他们还缺乏水泥或者制作水泥的装备，因此隧道不得不用原松木加固。大部分原木都是在冲绳北部的森林里砍伐的，通过本地人的小船沿着海岸运到南边。第五炮兵司令部的重炮被集中部署在防线中央附近，这样火炮可以向任何激战之处射击。火炮射击阵地都得到了良好的伪装，而且轮式的大炮可以退入山洞，通过隧道移动到别的射击阵地上，以减少其暴露在反制火力下的时间。冲绳岛上的炮兵是日本陆军中最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炮兵。

冲绳岛为数众多的平民是个令人挠头的因素。战争期间，冲绳县政府先是鼓励，后来又强迫冲绳人大规模向台湾岛和日本本土疏散。但这些举措在冲绳人中并不受欢迎，甚至遭到抵制，尤其是在1944年8月装载着数百名撤离人员的船只在开往九州途中被击沉之后。1945年3月，日军下令将大部分尚存的冲绳民众撤往岛屿北部，但这一举措也受到抵制。于是，长勇将军在《冲绳

新报》上发文，警告说所有民众都必须加入民兵，服从军队的命令。一旦遭到进攻，每个民众在自己战死前都要努力消灭10个敌军。他还说所有妇女和儿童都要“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免成为作战的障碍”，因为“不能为了保护民众生命而输掉战斗”。[36]数百名还在读初中和高中的男生和女生被动员起来加入学生军，担任通信员、厨师、劳工或者护士。针对当地人的总动员令在1945年元旦下达。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冲绳男性居民都被直接征入当地“自卫军”。大部分人从此再未见过家人。

在战役打响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日本军队和政府还在努力将不参战的居民迁移到冲绳北部。但是许多民众被当局关于任何落入美军手中的人都会被虐杀的宣传吓住了。当3月的最后一周美军舰队出现在冲绳外海时，大约30万民众仍然留在岛屿南半边，许多人拼命想要躲在日军防线背后。这里的粮食根本不够他们吃，因此即便在战火燃烧到这里之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也已迫在眉睫。

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日本陆海两军的高参们终于拍板确定了在琉球群岛和东海运用航空兵的策略。海军飞机将攻击敌人军舰，陆军飞机则要去打运输船队。两个军种都会同时发动常规轰炸和“神风”攻击，但是“重点将放在组建和运用特攻力量上”。

[37]飞行学员们将迅速完成训练计划，直接派往一线攻击机部队，在那里，他们将被要求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当地地面部队在冲绳陷入漫长的消耗战时，盟军舰队在不得不在这一海域停留数个星期，这时就可以向其反复发动空袭。日本最后的希望是，削弱敌人“在舰船、飞机和人力上的优势，阻挠他们建立前进基地，打击敌人的士气，由此大大拖延对日本最后攻击”。[38]

这大部分任务都要由司令部设在南九州鹿屋航空兵基地的第五航空舰队来完成。这支“舰队”其实是各种不同类型海军航空兵

部队的集合体，包括多个机型，散布在九州岛和四国岛的20余个航空兵基地上。第五航空舰队拥有大约600架飞机，其中大约400架属于“神风”特攻队。在B-29和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持续威胁之下，鹿屋和其他航空兵基地的人员都在费力将修理车间、弹药库和燃油储备搬入地下掩体和隧道。跑道周围的场地上都在进行各种挖掘作业。和在冲绳一样，大部分挖掘工作都要靠铲子和铁锹，就连飞行员也要来帮忙。小型机场被伪装成简单的乡间土路。废弃的兵营和机库则留在那里，用作诱饵来吸引美军轰炸机。至于第五航空舰队的飞机，“重点在于对飞机进行彻底的疏散、保护和伪装，以及建造假飞机和护坡掩体”。[39]

在私人日记里，宇垣常常透露出对其航空兵部队糟糕状况的失望。他缺少飞行员、飞机和燃油，甚至连在日本南部水域保持充分的每日空中巡逻都不够。坠机和其他事故损失多得令人痛心，他不得不出于天气和其他原因取消了许多训练任务。他的第五航空舰队在航空燃油分配上具有优先权，但是日本此时已经运不进来多少油了，捉襟见肘的燃油分配已经开始影响作战。2月27日，有人向宇垣介绍了从松树根中提炼生物燃料的方法：日本的学生们已经被派到全国的森林里去大量收集松果、松根和针叶。这一做法很有创意，但没什么用，提炼一小时飞行所需的燃油需要耗费超过1 000个工时。设在跑道旁边一座兵营里的鹿屋基地司令部被认为过于容易遭到空袭，因此2月28日，宇垣和他的司令部搬入了一处地下碉堡。甚至有人讨论要把飞机送到朝鲜和中国东北，以免它们在地面上被摧毁。第五航空舰队3月17日的日志反映了参谋们对前景的极度悲观：“在攻击敌特混舰队时，我方航空部队精选出来的这些力量立刻就会损失掉。”[40]

南九州春来早，在基地周围树林和野地里短暂漫步令宇垣恢复了精神。在平静的下午，他会拿上霰弹枪，独自去爬山，捕猎

当地特有的绿雉鸡。一次外出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大自然在数日里展现出的伟力足以耻笑不起眼的小小人世，而我们还正在为战争和敌特混舰队之类的琐事而庸人自扰。”^[41]

3月18日至19日的战斗中，日军常规俯冲轰炸飞行队的表现出人意料地好。然而和往常一样，他们严重夸大了对战果的评估。3月21日，在鹿屋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之后，日军宣布美军损失了5艘航母、2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42]这份报告被放在报纸头条上，以一贯的欣喜若狂的口吻大吹大擂。而挂载“樱花”人操自杀弹的G4M轰炸机编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则被封锁。第五航空舰队的分析人员得出结论，除非日军能够首先暂时在目标上方夺取空中优势，否则这样的攻击将不可能再次上演。考虑到日军航空兵的状况，唯一可能取得成功的方法是单纯依靠数量压垮美军的防空体系，这意味着要一次起飞数百架飞机，期望至少有几架能够突破战斗机和高炮的防线并命中目标。

3月25日，当美军进攻部队开始在冲绳外海集结之时，位于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了启动“天号”作战的指令。这一计划要求出动所有力量向美军舰队发动大规模自杀攻击和轰炸。然而在不久前美军航母空袭日本时，日军损失惨重，需要时间来调集部队。于是新的“神风”飞行队和飞机飞往鹿屋和其他机场，准备发动第一轮全力出击的“菊水”攻击。在调集航空兵和海军部队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日军选定4月6日开战。这一天，冲绳的日本陆军将向美军防线发动反击，日本海军最后残余的水面战舰（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也将从濑户内海出击，发动海上万岁冲锋。数百名“自杀军神”将从九州各个机场起飞，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消灭冲绳外海的敌舰”。^[43]在日记里，宇垣将军承认自己为派出如此多的飞行员去送死感到痛苦和内疚，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追随那些年轻男孩而去。我乐见我极易落泪的脆弱心灵已来到

这个阶段”。[44]

第58特混舰队一直在冲绳岛东南近海巡游，为岸上的地面部队和岛屿另一侧的两栖舰队昼夜提供空中掩护。事情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航空兵和舰员都一样。狂风和巨浪对飞行作业的影响很大。4月4日上午，天气阴沉，海上起了浓雾，“约克城号”的一名军官记录道，航母“一整晚就像烈马那样颠簸摇动。我这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不得不用一只手扶着洗脸池；当我在走出舱室的时候，一半的路程是爬过去的，另一半则是冲过去的”。[45]前一晚，由于能见度太差，战列舰“新泽西号”撞上了屏护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两舰的大小和体量实在悬殊，战列舰只受了一些轻微的擦伤，而“弗兰克斯号”的整个左舷一侧都被开膛破肚，舰长也受了重伤。[46]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空袭少之又少，斯普鲁恩斯将此归功于两周前对九州的空袭。各航母大队一连执行了3天的飞行作战，第4天，他们退往东南方一定距离之外，和油轮及补给船会合去了。

4月6日，天气微凉，风大，海上波浪起伏。阿瑟·拉福德的第58.2特混大队正在加油和补给，因此谢尔曼的第58.3大队和克拉克的第58.1大队是前线仅有的两支特混大队。破晓的一个小时后，冲绳以北美军驱逐舰上的雷达发现有敌机从北面飞来。日军攻击机群的先导机撒下巨量“窗户”——铝箔条——以干扰美军的雷达系统，但是此番空袭规模太大，根本藏无可藏。米彻尔向所有航母下令，把全部轰炸机留在机库里，把飞行甲板腾出来供战斗机使用。更多“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升空，以增援战斗空中巡逻队，其余飞机则被导向指定方向进行截击。引导战斗机的无线电频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美军战斗机杀入日军机群，在这一整天大战的首轮交锋中便将至少60架飞机变成了火焰。但是此

番“菊水一号”攻击规模太大——大约700架飞机，其中超过一半是“神风”机——还是有超过200架日机突破了战斗机的拦截，向美军舰队扑去。

这一整天从早到晚，它们一批批地冲过来，最凶猛的空袭在下午到来。“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一艘运输船上的一名基层军官回忆道，“它们或单枪匹马，或两两成对，或三五成群，下滑、俯冲、垂直冲下，有些还栽进了水里……看上去它们一刻也没停下来过。”^[47]克拉克将军称敌人一拥而上的攻击“实在太强大了”。^[48]天空布满了高射炮弹爆炸的烟团，曳光弹从薄暮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一道道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许多舰船上，战斗机引导官和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通话被通过船上的大喇叭广播了出来，这让船员们有一种正在收听田径比赛现场直播的奇妙感觉。《时代》和《生活》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在特纳将军的指挥船“埃尔多拉多号”上亲眼见到一架日军飞机冲向渡知具滩头外海的一艘坦克登陆舰。“可怕的‘嗒嗒嗒’的弹雨从两英里内的每一艘舰船上喷向那架飞机，”他写道，“那个鬼子在距离目标300英尺时着了火，翻滚起来，落进了浅水中。”^[49]

到这一天结束时，26艘美军舰船被“神风”机击中。6艘沉没，包括2艘胜利轮，1艘扫雷舰，1艘坦克登陆舰，以及2艘驱逐舰“布什号”和“科尔霍恩号”。其他船只也遭到重创，伤亡惨重，有些还被编队内友邻的高射炮火误击。但关键是，这些驱逐哨舰和其他外围屏护舰艇的牺牲掩护了位于第58特混舰队队形中央的航空母舰。有几艘航母遭到了令人神经崩溃的撞击近失，但没有一艘被直接击中受损。舰载机大队与驱逐哨舰上的战斗机引导官密切配合，在这一天中击落了超过200架飞机。“埃塞克斯号”舰载机大队击落了65架飞机，几乎打破了单艘航母的单日击落纪录。^[50]

这天一大早，一艘在丰后水道（九州岛和四国岛之间的海峡）外巡逻的美军潜艇发现一队日军战舰正在出海。这是“大和号”战列舰带着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队，它们是日本舰队最后一点还能出海的残余力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大和号”舰队一直处于美军不间断的空中监视之下，B-29和美军舰载机对吴港南部锚地的舰船进行侦察和拍照，并跟踪它们进入濑户内海，因此它们突然出现在海上并不令人意外。4月7日破晓前，美军从庆良间列岛起飞数架PBM水上飞机，北上前去跟踪敌舰队。上午8时23分，来自“埃塞克斯号”航母的搜索机发现“大和号”舰队出现在北纬30°44′，东经129°10′，航速12节，航向300°。舰队已经绕过了九州岛南端，正向西偏西北方向航行，似乎是要开往朝鲜。[51]

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和特纳都判断出日军这是想要躲避侦察和拦截。“大和号”和它的护航舰队想要绕道东海，再返回来从西边摸向美军舰队。斯普鲁恩斯立刻组织起一支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在德约将军指挥下前去拦截。但是米彻尔和第58特混舰队的航空兵们想要用舰载机来解决“大和号”，而且他们的飞机能更快抵达那里。他们距离目标238英里，飞过去不超过90分钟。此时谢尔曼的第58.3大队已经赶回来与另两支大队会合，因此美军的空中打击力量绰绰有余。从上午10时18分开始，三支航母特混大队放飞了由386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包括180架战斗机、75架俯冲轰炸机和131架鱼雷机。“乔克”克拉克告诉他的“复仇者”飞行员们，他期望他们能击沉这艘据说是“不沉”的“大和号”，因为他们的鱼雷能够砸开这艘强大战列舰的舰体，“让海水灌进去”。[52]

“大和号”及其9艘护航舰上的官兵们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他

们的任务就是一次海上“万岁冲锋”，一次没有明确战术目标的无意义的自杀冲击。由于没有空中掩护，他们将只能靠自己的高射炮去对付一批接一批的美军飞机。和早前的“捷号”计划，也就是日军为莱特湾海战制订的计划一样，舰队被要求去自我毁灭以维护荣誉。但和前一次海战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突袭美军舰队的希望。有一名高级军官评论道，这“甚至不是一次‘神风’攻击，‘神风’攻击至少还有机会干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53]

和“捷号”计划一样，这次作战也是由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大将从他在日吉的指挥地堡里发出的命令。和前次一样，丰田此番选择不亲自率军出击，此举令“大和号”舰桥上的悲观论者们几乎就要起来造反了。丰田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中将飞往吴港去兜售这次计划。接替栗田健男担任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伊藤整一中将坚决反对这次自杀性任务，而且他毫不犹豫地表了态。这种单程出击是对军舰、燃油、弹药，以及本土防御所急需的受过训练人员的无意义的牺牲。巡洋舰“矢矧号”舰长原为一称其“荒谬透顶……如以卵击石”。[54]草鹿则反驳说这次计划是一次“诱饵作战”，其真实目的是在从九州各机场出发的数百架“神风”机攻击敌舰队时分散美军航空母舰的注意力。但草鹿也承认，大本营急于避免“大和号”在港口里迎来终战的耻辱。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事情很明显了，无论草鹿的语气如何委婉，这次自杀任务都不是请求，而是命令。

出海前一晚，“大和号”全体舰员都领到了大量清酒，各个分队自行组织，开怀畅饮。副舰长通过舰上的大喇叭喊道：“神风‘大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神风！”[55]在第一礼堂里，有贺幸作大佐站在一群大尉和少尉中间，举起一大瓶清酒直接灌进嘴里。在“狂歌劲舞”的人群中，空酒瓶在脚下的甲板上乱滚，无数只手放肆地伸过来拍舰长的光头，有的人甚至还用力揍一下。副

舰长则干脆脱光了上衣和其他军官比赛相扑。[56]

第二天，当舰员们还在对付宿醉后的头痛，给家人写诀别信时，“大和号”将德山油库里的重油搜刮一尽。食堂里所有剩余的香烟和其他好东西都被免费分发给舰员们。下午6点，“大和号”全员在前甲板上集合。战列舰上升起了第二舰队的将旗。当夜幕降临时，巡洋舰“矢矧号”引领整个编队驶入了丰后水道。各舰排成纵队沿着九州岛海岸以12节航速南下。在愈加浓重的暮色中，舰员们看到岸边的樱花已经开始绽放。军官们小口吮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烈酒。高射炮手则只能在战位上就着绿茶吃饭团了。甲板上，水兵们在磨快刺刀，收集步兵武器，准备发给舰员们，一旦他们成功让军舰在冲绳岛上冲滩搁浅，并加入岛上的地面部队，这些东西就有用了。

深夜，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随后，当舰队绕过九州岛南端后不久，东方迎来了拂晓的第一束阳光。鹿儿岛的绿色群山逐渐消失在了军舰尾流的远方。此时人们还能看见有些日军战斗机在上空巡逻，但是它们很快就返回九州岛的基地了。“大和号”舰桥上的一名雷达官吉田满少尉郁闷地写道：“看不到一架护航飞机了，此后也一架都看不到了。我们被抛弃了。”[57]

“大和号”的无线电监听员截获了一些无线电通信，有些就是英语明文，报告了日军舰队的位置和航向。和预期的一样，他们被丰后水道外的敌潜艇盯上了。PBM水上飞机在“大和号”上空高处兜着圈子，跟踪其去向。它们小心翼翼地飞在日军高射炮的射程之外。军舰的某座主炮塔偶尔也会打一轮齐射，空中会出现高炮爆炸的烟团，但那常常出现在美军飞机的下方和后面。

午后12时20分，第一批来袭的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了“大和号”的雷达屏幕上。战列舰上的领航员吼道：“前方出现超过100

架敌机！”[58]警报立刻通过灯光信号发给了舰队中的其他各舰。10分钟后，瞭望哨看见了第一群黑点，它们位于高空，在“大和号”巨大的460mm主炮防空弹的射程之外。

美军控制着时间，他们在日军舰队上空逆时针绕圈子，等待后续中队跟上来，就如同一群在腐尸上空盘旋的秃鹫。高空中的能见度并不好。透过3 000英尺到5 000英尺高度上的碎云向下看，哈里·D.琼斯少尉——他是“大黄蜂号”第17鱼雷中队的一名“复仇者”飞行员——完全看不到敌人舰队。后来，他通过一处云缝看见了“大和号”。琼斯觉得这艘超级战列舰看起来就像是“帝国大厦在破浪而行。它真大”。[59]

美机燃油足够，而且没有敌机前来打扰，因此攻击机群的指挥官得以有条不紊地安排进攻。“地狱猫”和“海盗”将向“大和号”俯冲，投掷小号的炸弹，随后扫射甲板；SB2C寇蒂斯俯冲轰炸机将紧随其后，投掷1 000磅炸弹；“复仇者”机群则要算准时间，与俯冲轰炸机同时进攻，发动鱼雷攻击。大部分鱼雷都要瞄准巨大战列舰的左舷，希望令其朝这个方向翻覆。

当第一轮攻击陆续展开时，“大和号”的高炮开火了，打出五颜六色的爆炸烟团。炮火很猛烈，但不够精准，美军飞机继续俯冲而下。“约克城号”一名“地狱猫”飞行员想道：“老天，他们根本穿不过那些弹幕！这是谋杀！”[60]但是攻击机群还是保持着速度，飞过了爆炸烟团。率领“邦克山号”鱼雷中队的钱德勒·W.斯文森少校最担心撞上其他友机的危险：“我们的飞机要从各个方向在目标上空交会。这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必须避免撞上我们自己的飞机。飞机太多了，机动空间又那么少。我们没有相撞，这真令人惊讶。”[61]

日舰以27节航速破浪而行。“大和号”剧烈机动着，“地狱潜

鸟”投下的炸弹落在近旁，军舰周围顿时掀起一片“水柱森林”。高塔般的白色水柱把海水如瀑布般猛烈地泼在甲板上，把人们冲倒在地，甚至把设备从缆索上扯下来。四枚重磅炸弹接连命中，打哑了高射炮，把残骸和尸体掀飞到空中。战斗机俯冲下来，用.50口径机枪火力扫射军舰的上层建筑，击中了舰桥，打死数人。“大和号”舰尾燃起大火，后方拖出了一股黑烟。吉田看到“鱼雷的银色航迹”从多个方向朝本舰汇聚而来。^[62]有贺大佐灵活地指挥他的军舰，迎着鱼雷航迹转去，躲过了多枚鱼雷，但“大和号”无法躲开所有鱼雷。三枚鱼雷接连命中其左舷中部，随后第四枚又击中了后部。每一次命中，巨舰都会颤抖一次，然后开始向左倾斜。

在“大和号”的左边，驱逐舰“浜风号”被多枚炸弹击中，掉了队。它从舰尾开始下沉，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在了水面上，“只留下一圈翻卷的白色泡沫”。^[63]巡洋舰“矢矧号”消失在了一片水幕之中，战斗机低飞扫射了这艘舰，舰长原为一回忆道：“它们把子弹和螺旋桨气流打在我们身上，随后从桅顶高度脱离。”眼见TBM机群穿过猛烈的高炮弹雨扑过来，他想：“敌人的飞行员一定很勇敢。”^[64]一枚鱼雷击中了该舰的右舷轮机舱，炸死了轮机班，炸掉了它的螺旋桨。舰体上还挨了六七枚炸弹。8 000吨的“矢矧号”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打击。它变成了一具燃烧、倾斜的残骸，无法再机动躲避后续的攻击波。驱逐舰“矶风号”从后方靠近，显然是要接走受创的“矢矧号”的幸存者，但是它也吃了一两枚炸弹，燃起大火，动弹不得。“凉月号”也被击中，受了重伤，但还是幸存了下来，挣扎着回到长崎近旁的海军基地佐世保港。

通过对侧注水，“大和号”的左倾被纠正了，但是大火依然在舰体后部蔓延。救火队和损管队在攻击中死伤惨重，因此火势已经无法控制，当第二批美军飞机来到舰队上空时，火情仍在继续

恶化。在舰桥上，当担架队员把遍布弹孔的尸体抬起来运走时，伊藤中将就安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由于大火、伤亡和战损，舰桥对多个部门和战位的指挥和控制已经开始被切断。

在首轮空袭大约40分钟后的第二次攻击波中，“大和号”的左舷又被命中了五六枚鱼雷，右舷至少中了一枚鱼雷。还有一枚鱼雷在舰尾爆炸，摧毁了它的舵柱，令其失去操舵能力。SB2C俯冲轰炸机把重磅穿甲炸弹如雨点般投在巨舰的上甲板上，低空飞行的“地狱猫”和“海盗”则如蜂群般飞来，扫射它残存的高射炮组。吉田记得当时“不停地爆炸，闪光刺目，声如雷鸣，巨大的冲击波十分猛烈”。^[65]驱逐舰“朝霜号”和“霞号”遭到重创，即使不沉也得被自己人凿沉。瘫痪的“矢矧号”又吃了四枚鱼雷和七八枚炸弹。原为一舰长前后看去，判定他这艘舰快要不行了。鱼雷在舰体上爆炸时掀起高大的白色水柱。炸弹把碎片和尸体炸飞到空中。钢质甲板上的铆钉开始进射，舰桥也在他脚下晃动。“我们濒死的军舰随爆炸而震动，”原为一写道，“爆炸最终停了下来，但是倾斜还在加剧，海浪冲刷着甲板上的鲜血，残缺的尸体滚进了海里。”^[66]

“大和号”低伏在水面上，它的下部舰体被海水淹没，左倾增加到了18°。上层建筑已经成了废墟——被炸垮、熏黑，还在燃烧。有些舰员开始恐慌。舰长来到大喇叭旁下令：“所有人起来修补军舰！”但是损管队已经伤亡惨重，舰桥上也很难和舰底下层岗位保持联系了。大火和进水使得舰员无法修补左舷受损的舱室。而水泵和阀门的损坏又使舰员们无法向“大和号”右侧的放水舱室进行对称注水。副舰长告诉舰长：“无望纠正倾斜！”^[67]

意识到军舰倾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有贺舰长犹豫再三，冷血地做出了放水淹没右舷轮机舱和锅炉舱的决定。警报声立刻响起，右舷下层的电话也疯狂响起，通知舰员撤离，但是时间并不

够这些人离开。所谓“黑帮”，也就是数百名负责维护军舰轮机的官兵被困在舱室里，淹死在战位上。吉田少尉说：“这对于一连数天在酷热高温和震耳欲聋的噪声下辛苦工作的他们而言，是个不近人情的结局。”^[68]

当“约克城号”的舰载机大队在下午1时45分抵达时，“大和号”的倾斜已经肉眼可见，速度也降到了10节以下。舰上的防空炮火已被先前的攻击打残，只有少量武器还能打响，而且也不可能再从弹药库里把弹药送上来了。美军此番仍然有充足的时间来计划和组织进攻，因此“复仇者”的鱼雷攻击都算好了时间，和“地狱潜鸟”以及“地狱猫”的俯冲轰炸和扫射同时进行。舰桥上的日本军官看着这一切，绝望地仰慕着他们对手的熟练和勇敢。当多枚鱼雷再次撕开战列舰破损的舰体，有贺舰长大吼道：“大家稳住！大家稳住！”^[69]但是舰上的广播系统已经失灵，因此只有周围的人还能听见他的话。“大和号”的倾斜增加到了35°，接着又到45°，右舷舳部露出了水面，把无装甲保护的薄弱舰底交给了最后一批挂着鱼雷的“复仇者”。

“大和号”的最后出击, 1945年4月6日—7日



军舰已经动力全失，舰长开始准备下令弃舰了。由于失去了内部通信系统，下甲板上的许多人可能从未收到撤离战位的命令。伊藤将军向幸存的参谋军官们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住舱里。此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在后方一英里外，俯冲轰炸机向着动弹不得的“矢矧号”冲了下来。原为一咬着牙咕哝道：“好吧，你们这些美国鬼子，你们

赢了！”[\[70\]](#)下午2时6分，他大声向舰员们下令弃舰。他跳进海里时，F6F“地狱猫”机群吼叫着从头顶飞过。原为一被沉船的旋涡卷了进去，但是他的救生马甲又把他拉回到了水面上，之后他和另外几个满身油污的幸存者一起紧贴在残骸上。

“大和号”仍在侧倾，甲板侧舷几乎触到了水面。此时正值中午，但浓烟遮天蔽日，宛若黄昏。吉田少尉牢牢抓住舰桥上的结构，他后来记录了这可怖的场景留给他的印象：“地平线似乎出现在了一个疯狂的高角度上。当受损军舰的倾斜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80°时，黑色的海浪拍过来，打在了我们身上。”向后看，他看到了30英尺长的巨大“旭日”战旗没入海里。一名年轻水兵紧紧抓住旗杆底部，显然是想与舰同沉。舰体深处传来了机器设备滑落时的隆隆声、震动和撞击声。在舰桥上，有贺大佐把自己绑在罗盘箱上。领航员和他的助手也把自己绑在一起，“当军舰翻覆时，他们只是瞪着涌来的海浪”。[\[71\]](#)伊藤将军的参谋长吼叫着要那些年轻军官逃生，有些年轻人离舰时有些犹豫，他就过去揍他们，把他们抛进海里。当海浪冲到舰桥甲板上时，许多人没抓住，也落到了水里。

吉田在黏稠的原油中游泳挣扎。当巨舰开始下沉时，周围的海面上形成了巨大的旋涡，吉田也被吸了进去。在水面以下，他看到了一道闪光以及“巨大的火柱冲向昏暗的天空”。[\[72\]](#)“大和号”的主炮弹药库被引爆了。吉田被抛出了水面，之后又被拖了下去，然后再次浮上来，发现自己周围满是残骸碎片和与自己一样游在水上的人。

“大和号”升起的烟云直径超过1 000英尺，迅速升腾到2万英尺的高空。连在125英里外的鹿儿岛上都能看见这场爆炸。当烟云升起时，“大和号”已然不复存在。舰上只有23名军官和246名士兵幸存；巨舰带着近3 000条人命一同沉入深渊。剩余的三艘

未受损的日军驱逐舰来到幸存者中间，把他们捞了上来。

超过4 000名日军水兵在这场基本只是象征性的战斗中丧命。美军赢得了胜利，代价只有区区10架飞机和12名飞行员。

放出攻击机群后，第58特混舰队遭到了大约100架“神风”自杀机的攻击。大部分自杀机都被击落，但是有一架飞机撞中了战列舰“马里兰号”——这是“战斗玛丽”在战争中第二次遭此劫难——另一架日机从低云中穿出，撞中了“汉考克号”航母的飞行甲板。火灾在45分钟之内就被控制住了，“汉考克号”也因而得以在本舰舰载机返航时予以接收。但是这次攻击造成了舰员64人死亡，71人受伤。大部分伤亡人员都被困在下甲板，被烧死、炸飞，或者被致命的浓烟熏死。

根据巴克纳尔将军下达的进攻计划，第3两栖军的海军陆战队将要横穿冲绳岛，将岛屿一分为二并控制东部海岸，之后向北转，占领并肃清岛屿中部和北部。他们还将发动两栖进攻，占领本部半岛外的小岛伊江岛。无论有什么样的敌人守得多山、密林的冲绳岛北端，他们都将被封锁并孤立起来。与此同时，陆军第24军各师将向南面令人生畏的山峦进军，攻占冲绳县首府那霸及其港口，打垮首里山周围的敌人坚固防线。整场战役预计耗时45天到60天。

由于没有日军设防，陆战队在战役的最初几天取得了出人意外的迅速进展。在L+1日（即登陆次日）下午，前进巡逻队越过岛屿，抵达了冲绳东海岸。此举将岛屿一分为二，将冲绳北部的日军部队与南部主力隔绝开来。“老种子”第1陆战师，以及截至当时人数最多且最新的陆战师即第6陆战师的3个团，分别沿着东

西两岸的道路向东北方被称为“石川颈”的狭窄地峡推进。沿途遇到的抵抗可以忽略，差不多根本没有抵抗。此次行动的高潮十分辉煌，场面壮美。根据第5陆战团的斯特林·梅斯的回忆：“碧蓝的大海波涛起伏，纯净的沙滩像水晶那样洁白，被主人抛弃的冲绳骏马在水边尽情地奔跑。”^[73]越过沙丘望向内陆，他们看到了一片平静的麦田、甘蔗园、牧场，以及狭窄土路和汨汨作响的小溪之间的一片片水稻田。起伏的山坡被改造成了可以耕种的梯田，其间点缀着古代的墓碑。春天的野花正在盛开，山顶覆盖着浓密的松树林，散发着甜美的芬芳。每走半英里左右，陆战队员们就会穿过一座由几栋小房子组成的小村庄，那里，屋顶覆盖着茅草的石头小屋紧紧挨在一起。二等兵尤金·斯莱奇写道，冲绳“美如一幅田园风景画”。^[74]

冲绳的大部分平民要么随日军迁移到了岛屿南边，要么被撤回日本。美军在道路上或村镇中会不时遇到一群老百姓。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些老头子；在登陆部队占领的区域里几乎见不到几个年轻男性冲绳人。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是穷苦的农民或雇农，穿着粗麻布裤子和普通的棉布袍子；许多人都光着脚，身上脏兮兮的，所有人看起来都营养不良。年长的人都很害怕。他们九十度深鞠躬，畏畏缩缩，好像一副马上要挨打的样子。倒是那些小孩子，面对美国兵们热情的笑容，很快就不怕了。他们瞪大了双眼，伸着手，跑过来接受征服者给予的救助——糖果、口香糖和C型口粮。“孩子们几乎全都很机灵，面露喜色，”斯莱奇写道，“他们长着圆脸，黑眼睛。小男孩们通常剃成板寸头，小女孩则把黑得发亮的头发剪成那个时代日本小孩常见的齐耳短发。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小孩。”^[75]眼见小孩子们以惊人的轻松和美国兵们混熟了，大人们也放下了他们的担忧。和日军宣传人员说的恰恰相反，这些入侵者并非食人兽或者魔鬼。冲绳

老百姓居然没有遭到强暴、折磨、摧残和杀害。实际上美国人反而为这些平民送来了粮食，而且打算等到安全时候尽快把他们送回家里和村里。“爱日”48小时后，岛上的难民已经开始对排成纵队路过的美军吉普车和坦克招手或者敬礼，大兵们也能伸手去摸路过小孩的头了。

对于陆战队员们来说，冲绳战役的第一个月只是一段平静的插曲。他们能听见南方远处的隆隆炮声，但眼下那都是陆军的事情。有些新来的“补充”陆战队员会责怪老兵，说他们讲的太平洋岛屿作战如何如何恐怖的事情肯定都是在虚张声势。每晚扎营的时候，他们都会像训练时那样挖掘散兵坑，并设置防御阵地。迫击炮手们把武器架设在他们觉得夜间渗透攻击的日军最可能经过的地方。冲绳岛上的土壤都是些松软的黏土，他们的铁锹和折叠铲挖起来很容易。相较于佩里琉岛上的珊瑚岩地面，这里轻松的挖掘工作让他们感到幸运。夜晚很凉，大兵们都对自己的羊毛衬里野战夹克很满意。

炮排和迫击炮排使用当地的骡马来驮运他们的武器和弹药。还有人看见陆战队员不用马鞍就直接骑在这些骡马上。有些人会脱掉军服在小溪里洗澡。根据与第6陆战师同行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记录，有“几十个脏兮兮，胡子也不刮的陆战队员”在一栋被摧毁房屋的废墟里找到了几件粉红色和蓝色的日本和服，于是他们洗军服的时候就会穿上这些和服。^[76]还有个人把捡来的小白山羊当成了宠物。一名18岁的陆战队员告诉鲍勃·谢罗德，他希望能尽快遇到敌军，因为“我扛弹药扛烦了”。^[77]

与此同时，在南边，陆军已经陷入激战。从渡知具滩头向南试探性进攻时，约翰·霍奇将军的第24军在那霸以北的多山地区遇到了坚固设防的日军阵地。第96步兵师在一处被称为嘉数高地的地形上被日军的火炮、迫击炮和步兵的顽强反击所阻。4月4日

至8日的四天恶战之后，第24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1 500人。美军被迫挖掘战壕，战况面临演变为久拖不决的血腥僵局的危险。首里防线巨大的天然堡垒就在面前，但是那里无法迂回，甚至无法接近，只有冲过一段被完成预瞄的火炮和迫击炮覆盖的暴露地形才能到达。这使得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打过仗的人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似曾相识感。日本人选择的战场对他们很有利，而且防御计划也很高明。他们不再发动损失巨大而效果不佳的万岁冲锋。和此前的战斗相比，他们的步兵进攻与火炮、迫击炮炮击的协同要完善得多。他们巧妙利用了反斜面上的阵地和防御工事，使其火炮免遭美军炮兵和坦克的攻击。他们的炮手在使用弹药时远比供应更充足的美军吝啬，但是他们打出的每一枚炮弹都能起到作用。

第三十二军的作战参谋八原大佐早就预想要打一场消耗战，让美国人流尽鲜血，并为本土的战友们争取时间强化防御。但是牛岛将军的上级却不断逼迫他全力发动反击，以夺回读谷和嘉手纳两座机场。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和台湾的第十方面军不停地发来电报，催促他将登陆敌军赶回海滩。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将军也给第三十二军的同行长勇将军发电，要求把两座机场从美军手里抢回来。^[78]4月2日，当梅津美治郎将军向天皇报告时，裕仁对失去冲绳可能带来的公众反响表达了担忧，他问：“陆军为什么不反击？”^[79]

由于担心牛岛将军声望受损，长勇将军坚持认为第三十二军必须发动一场反击。八原称这一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警告说，日军部队只要一离开防御工事就会立刻被消灭。但是来自东京和台湾方面的压力是无法忽略的，指挥地堡里主张发动一场进攻的氛围也很浓烈。听取长勇和八原针锋相对的见解后，牛岛批准了在4月12日夜间发动突袭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第62师团和

第24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一个旅团，他们将在天黑后冲出防线，突破嘉数高地下方的美军防御阵地。

4月12日午夜，反攻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包括拼死的白刃格斗，日军撤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两晚，日军再度打回来。美军确实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却顶住了进攻，把日本人打了回去。这些战斗看起来支持了八原大佐的观点——无论夜间渗透攻击有多少好处，只要日军部队离开他们的洞穴和堑壕，美军在炮兵和火力上的优势就会给他们带来不可承受的损失。4月13日上午，牛岛将军取消了行动，但是进攻的冲动是深入日本军队骨髓的，在这场战役中，长勇和八原的争论将在后来复燃。

在4月6日的“神风”大空袭后，美军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的飞机储备已经耗尽，他们已无力再发动一次如此规模的攻击，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但是这一结论过于乐观了。日军正准备向盟军舰队砸过去数千架飞机。4月6日只是十次“菊水特攻”的第一次——在这些大规模空袭的间隙，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几乎每天都要发动小规模攻击。参加空袭的日军飞机既包括杂七杂八、多年未见的过时机型，也有很多最新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常规的俯冲轰炸和鱼雷攻击，与“神风”攻击甚至是火箭驱动的“樱花”人操自杀弹联合出手。冲绳战役期间，来袭日军飞机最终总共超过了3 700架次，击中了超过200艘盟军舰船，超过4 900名海军官兵死于非命。

日军航空兵指挥官们相信4月6日的空袭给盟军舰队带来了沉重打击。宇垣将军在日记中记载，一架侦察机数出了150根烟柱，“因此冲绳周边海域已变成屠宰场”。通过监听美军战斗机引导通信，日军对于能令敌军飞行人员“手忙脚乱”感到满意。4月6

日，宇垣的结论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摧毁了4艘航母”。[80]经过了充分评估，包括听取了冲绳岛上第三十二军的观察报告之后，帝国大本营最终估算有35艘美舰被击中，其中22艘被击沉。[81]这一夸张的战果统计令日军高层相信，大规模的自杀攻击具有打垮打散敌人舰队的潜力，甚至有可能迫使美军放弃冲绳。4月9日，丰田将军下令从全日本的航空兵基地抽调航空兵部队增援九州各机场，准备进行“菊水二号”作战。

对于在冲绳岛东北方60平方英里防御区内作战的第58特混舰队来说，每日的例行工作已经令人筋疲力尽了。舰队在海上已经待了近一个月而未得喘息，还要不停地击退令人汗毛倒竖的空袭和“神风”攻击。舰队中超过1/3的航空母舰都在这些攻击中受创，还常常伴随着惨重的人员伤亡。噩梦般的战斗昼夜难分。各级官兵的精神压力已经成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军必须让军舰轮流退出战场，返回关岛、乌利西，或者莱特湾——部分是为了维修、保养和补给，但也是为了让舰员们能有短暂的休息。舰队的医师发出警告，飞行员疲劳症的症状已经很普遍。第58.1特混大队指挥官“乔克”克拉克的幕僚们出于对他精神健康的考虑，在夜间不再用电报来打扰他的休息，而是等到他早晨沐浴完，匆匆吃完早饭后再统一告诉他。[82]陆战队的战斗机早在4月8日就进驻了读谷机场，但是出于种种原因，陆基航空兵部队还要等到战役很靠后的阶段才能承担起保护岛屿和舰队的重要职责。“赖着不走的舰队”不得不继续待在这里，变得名副其实。

随着战役的进行，美国人也在每日空战这所无情的学校里学到了重要的教训。日军不停地尝试新战术，防御一方也不得不相应调整。当敌人侦察机从非常高的空中飞来时，美军就会在3.5万英尺高空采取“高空战斗空中巡逻”。“地狱猫”和“海盗”的飞行员在这种极高的高空中盘旋时，座舱冷得像冰窖，呼吸也要依靠

机上的氧气瓶和呼吸面罩。此时保持阵位需要相当优秀的飞行技巧，在那个高度上西风的风速常常超过150节。在冲绳，雷达简直如同上天的礼物——比此前的战役更重要——但是当时的雷达系统尚无法确保对来袭敌机的高度做出准确估算，而且随着距离缩短，它们也常常会丢失目标。

作为应对，美军在岛屿和舰队巡逻区外围的16个“站点”布置了雷达哨驱逐舰。最繁忙的哨站上会有两艘驱逐舰进行巡逻，另外还有两艘到四艘两栖炮艇负责提供防空火力支援。它们会对敌人的飞机和潜艇保持不间断的雷达搜索、声呐搜索和目视搜索。白天，哨上空会有强大的防空巡逻战斗机队盘旋。驱逐舰本身就配备了战斗机引导官，来引导空中盘旋的战斗机作战。战斗机引导官和防空巡逻战斗机队之间满是术语和代号的对话要通过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Inter-Fighter Director，IFD）进行，舰队所有舰艇上的大喇叭也都会对此现场直播。这令军舰上的官兵得以在看到空中的来袭敌机之前就跟踪它们的动向。“战斗机引导网络一度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和消遣，”冲绳外海一艘战列舰上的一名高炮指挥官说，“它让我们根据来袭敌机的动向做好自卫准备，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很吸引人。”^[83]

没有任何一位海军将领愿意公开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哨舰并不仅仅是一种提供早期预警的雷达“绊索”。它们还是诱饵，意在吸引走一部分来袭敌机。驱逐舰和炮艇（支援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比南面那些大型战舰以及滩头附近满载的运兵船和运输舰价值更低。它们损失得起，舰员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在漫长的战役中，这些哨舰始终在“神风”的狂啸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哨上空防空巡逻时断时续，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或者是日落之后。和舰载战斗机不同，自杀机飞行员根本不用担心在暗夜返回基地的问题。因此，这些小小的哨舰常常只有舵手和高射炮能保

护自己。而且即便头上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巡逻战斗机队来拦截日军的空袭，舰上的雷达也很难分清敌我。“神风”机任何时候都可能从空中肉搏战中摆脱出来，突然冲向下方的军舰。当一艘哨舰被超过一架俯冲下来的飞机同时瞄上时，火控官就必须分散火力，其射击准确度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渐渐地，驱逐哨舰的舰长们凭经验学会了以更有效的机动来对付空袭。他们做任何动作时都要开到最大航速，以提高军舰的敏捷性。他们变换航向，用侧舷面对俯冲下来的敌机，这样就可以用最猛烈的高炮火力向目标开火。哨舰一旦被命中——或者哪怕只是遭受一次有损伤的近失——就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航速和机动性。舰上有一门或多门高炮可能会被打哑——武器本身失去战斗力或者炮手伤亡——这会令其在后续的“神风”机面前更加脆弱。这一问题在4月16日1号雷达哨站“拉菲号”驱逐舰的遭遇中得到了灾难性的体现，当时这艘2 200吨的驱逐舰在80分钟里遭到了22架日军飞机的进攻。“拉菲号”被4枚炸弹和6架自杀机击中，舰上32人战死，71人受伤，几乎占舰员的1/3。

在4月6日到6月22日，日军发动了10次“菊水特攻”，其攻击机单纯依靠庞大的数量令盟军防空力量不堪重荷。敌机有时会在距离目标五六英里的高炮有效射程外盘旋，然后同时从多个方向扑过来，迫使一个个高射炮组在攻击机蜂拥而至时失去统一指挥，零散射击。在整个冲绳战役中，有15艘雷达哨舰被击沉，50艘受创，几乎每三艘在哨站执勤过的军舰中就有一艘被击中。单单雷达哨舰（不包含舰队其余部分）的人员伤亡就达到1 348人死，1 586人伤。[84]

特纳将军给尼米兹将军送去了28张被“神风”重创的哨舰的照片。这一张张照片上都是横遭暴虐的驱逐舰和炮艇，它们的甲板上被撕开大洞，上层建筑垮塌、烧黑，炮塔歪到一边，熔化的钢

铁低垂到海面上。在说明信中，特纳写道：“这些会让你理解小伙子们在经历些什么。他们能把船开回来就是个奇迹；但他们仍然很积极，想方设法让他们的船留在这里而不是被送回后方。士气看起来很高，即便是在那些知道自己是在为我们整个舰队挡刀的雷达哨舰上也是如此，他们愿意按此方针打下去。”[85]

米彻尔一次又一次派遣各航母特混大队北上空袭九州日军机场。他们轰炸跑道，击落防空战斗机，并扫射任何能找到的停放着的飞机。但是美军一直未能从源头上掐灭日军的空中威胁；他们无法做到像在吕宋岛时那样直接把“大蓝毯”铺到九州岛上空。九州太大，机场太多，太过分散，防空力量也远比吕宋更加令人生畏。而且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还能把飞机分散部署到附近的四国岛和本州岛南部。在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利用自己的临时指挥权叫来了第20航空队的支援，于是在1945年4月至5月间，数百架B-29在17个不同的日子里飞来向九州和四国岛的机场投下了高爆“铁炸弹”。但是这些空袭从来没能让第五航空舰队消停下来，鹿屋及其周边许多机场仍然是“神风”的老巢。日军飞机被分散停放，藏在伪装网下或灌木丛中，并在黎明前夜色的掩护下推到起飞位置。那些拿着简单工具和设备的劳工队伍很快就能填平跑道上的弹坑，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些手推车、篮子、铲子和手推式压路辊。美军舰载机和“超级堡垒”会投下延时起爆炸弹，其引信设为美军飞机离开几个小时后爆炸——但是无论这些炸弹炸死多少工人，日本从来都不会缺乏劳动力来弥补这些损失。

这些行动从来都不受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将领们欢迎，他们反对让B-29从其正在进行的对日本城市和航空工厂的战略轰炸任务中分身。但是当李梅将军向尼米兹抱怨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坚定地告诉他，当下的轰炸必须继续。官司沿着美军指挥层级

一路打到了参联会，但参联会也支持尼米兹，李梅便再无话可说。“超级堡垒”对九州和四国机场的空袭从4月8日一直持续到5月11日，出击了超过1 600架次，才从这一勉为其难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在回忆录中，李梅声称这次任务是可耻的，而且并不值得：“B-29不是一种战术轰炸机，也没打算起到这个作用。无论我们怎样收拾这些小机场，也不可能把‘神风’的威胁降到零。或多或少，它总会存在。”[86]

在冲绳岛西边，拥挤的那霸沿岸水域和渡知具滩头，海面上漂满了残骸和垃圾。运输船和两栖舰队的船员们警惕地搜索着自杀快艇、“侏儒”潜艇，甚至是背着炸药背带的蛙人。在4月9日破晓前驱逐舰“查尔斯·J·巴杰尔号”被快艇投放的水雷炸中之后，每艘舰船上都布置了手持手电筒和汤姆森冲锋枪的哨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们会向所有漂到射程内的残骸开火。舰队通过应召舰炮火力，以及在首里和那霸以北战场上彻夜发射照明弹来支援第10集团军。每天晚上，从薄暮到清晨，美日两军防线之间的“无人区”都被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岸上部队很感激这样的支援，认为此举降低了敌人夜间渗透进攻的威胁。

只要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的通话中报告有敌机接近警戒线，军舰上就会响起警报，一名号手会通过大喇叭广播系统吹号，然后所有舰员各就各位。舰长会宣布进入“Z状态”，意即要求把所有水密门和舱盖锁上。德约将军第54特混舰队的炮击军舰则会组成防空轮形阵，就像过去美国西部的大篷车防御阵一样。化学烟雾发生器开始喷吐浓密的蓝灰色烟幕，烟幕随海风逐渐扩大，但看起来一直紧贴在海面上。炮手和火控官们扫视着天空，听着无线电里战斗机引导官和战斗机飞行员们之间的通话。每艘舰“射击线”上的炮手们操纵着从5英寸到20毫米不等的高炮，炮管指向天空，眼睛也紧紧盯着那里。

这一时期最致命、使用最广泛的高射炮是中等射程的40mm博福斯炮，这种炮发射2磅重的炮弹，炮口初速每秒2 890英尺，单管炮理论射速每分钟160发，其弹道低伸，有效射程可接近2英里。博福斯高炮可以在超过1英里外击中一架大角度俯冲而来的“神风”机，其40mm炮弹将会把敌机撕碎——扯断机翼，撕开机身，打碎风挡和座舱，把螺旋桨打飞。飞机上最重、最坚固的部分，发动机和机身，即便飞机其他部分都被打掉，也还是会继续前冲一段距离才坠入海里。“爱达荷号”上的一名高炮指挥官罗伯特·华莱士上尉如此评论博福斯高炮：“即便只有一门四联装40炮的炮手知道该怎么做，就没有‘神风’机能冲过来。”^[87]

大型5英寸 / 38倍径炮的真实潜力要到VT（可变定时）引信装备部队后才被展露出来，这种引信又被称为“感应引信”或“近炸引信”，它相当于在炮弹上安装一台小型短距离多普勒雷达。这套技术令人赞叹地解决了在接近敌机这种快速移动的小型目标时引爆炮弹的难题，不会再让炮弹在其下方或后方爆炸。^[88]对于旁观者而言，5英寸VT引信炮弹的成功使用会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画面。如果目标是一架轰炸机，那么炮弹常常会引爆飞机挂载的炸弹。这时敌机不会燃起大火坠入海面，而是直接凌空爆炸，除了一团黑烟外什么都不剩。

4月12日，天高气爽，能见度几乎无限，宇垣将军下令发动“菊水二号”作战，参战部队包括185架“神风”自杀机以及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上午11点后不久，行动开始，129架飞机从九州南部机场起飞。2个小时后，位于1号雷达哨站（代号“棺材角”）的2艘驱逐舰和4艘步兵支援登陆艇（炮艇）上的雷达显示屏亮了，30架爱知俯冲轰炸机向驱逐舰“普尔蒂号”和“卡辛·杨号”扑下来。两艘驱逐舰立刻拉起了一道防空火墙，大约12架飞机应声起火，坠入附近的海中。在随后的混战中，两艘驱逐

舰和一艘炮艇被击中，遭到重创。“普尔蒂号”舰长在战斗报告中写道：“对于被派往雷达哨站执勤的驱逐舰水兵而言，即便有持久而光辉的职业前景也不会太令人期待。这个岗位极其危险，非常令人劳累，让人很不痛快。”[89]

下午稍晚时候，在冲绳岛西方被称为“神风峡谷”的水域，德约将军的第54特混舰队遭到了一群飞机的突击。下午1时26分，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中传来呼叫：“Exbrook ! Exbrook ! [全体舰艇注意！] 指挥官说：‘闪光灯红，指挥灯绿。[向视野里一切逼近的飞机开火。]’”[90]三架鱼雷机从浪尖高度快速飞近，越过护航舰艇，直奔队形中央的战列舰而来。一架敌机被40mm炮弹击中，撞上了驱逐舰“杰拉斯号”左侧，炸成一团火球，驱逐舰上29人丧命。战列舰“田纳西号”则遭到5架飞机的攻击，它们穿过“杰拉斯号”的浓烟低空飞来，一架接一架被“田纳西号”和“爱达荷号”40mm和20mm炮的交叉火力击中，坠入海中。几分钟后，又一架日机冲下来，向“田纳西号”发动了时间计算精准的下滑攻击，结果却在军舰正上方被击落。左前方出现的一架爱知俯冲轰炸机径直冲向军舰的上层建筑。它撞中了一座40mm四联高炮，炸死了所有炮手，燃烧的汽油流遍了甲板。飞机挂载的250磅炸弹穿透了甲板，在尉官住宿区爆炸。“田纳西号”战列舰上有23人战死，106人受伤，其中几十人严重烧伤。

两架中岛九七式舰攻鱼雷机现在开始向“爱达荷号”的左后方发动进攻。一枚5英寸VT引信炮弹引爆了第一架中岛鱼雷机携带的炸弹，飞机被炸得渣都不剩，甚至没见到有成块的残骸或碎片落入海里。第二架九七式舰攻还在继续飞来，并一度躲进了被摧毁同伴留下的烟团中。最终，一门20mm炮在极近的距离上阻止了这架飞机，可能距离“爱达荷号”左后方只有20英尺。机上炸弹被引爆，把残骸和弹片抛向甲板，导致舰上的8个防雷突出部隔

舱进水，12人受伤。华莱士上尉站在“爱达荷号”上层建筑前部的岗位上，觉得那架飞机一定命中了军舰。他发现，“一枚离你如此近的炸弹爆炸时并不会像电影上那样发出隆隆声，而是发出一种爆裂声，就像闪电”。[91]

战斗接二连三，一直持续到傍晚。这天第58特混舰队没有一艘舰被击中或者受到近失弹损伤[92]，其战斗机飞行员称击落的战绩为151架。[93]

在舰队遭到这场前所未有的空袭之后，第二天上午，一条灾难性的消息从华盛顿的福莱斯特海军部长处发出，通过“ALNAV”电报——发往全体海军的电报——发到了每一艘舰船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去世了。他在佐治亚州温泉镇死于脑出血。战列舰“田纳西号”还在舔舐前一天被“神风”自杀机命中留下的伤口时，舰上的大喇叭响了：“注意！全体舰员注意！罗斯福总统去世了。重复，我们的最高统帅，罗斯福总统，去世了。”[94]

这条消息引发了一片震惊、悲伤，以及对未来战争走向的忧虑。年轻人从记事起，罗斯福就一直是美国总统。渡知县外海一艘突击运输舰上的一名水兵回忆道：“我们没人说话，甚至没人抬头互相看彼此。我们散去了，似乎是本能地找地方一个人待着。许多人都在祈祷，许多人掩面而泣。”[95]《纽约客》通讯员约翰·拉德纳正在冲绳岛上一个陆战队的团级指挥所里，这时电话里传来了这个消息。拉德纳看到许多陆战队员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还有些人震惊到一言不发，做起事来如同在梦游……我从未见过哪条消息能有这样的效果”。[96]

约翰·A.罗斯福是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第六个孩子，也是他们

最小的孩子，他是“大黄蜂号”上的一名后勤军官。“乔克”克拉克将军来到罗斯福上尉的住舱，把消息告诉了他。克拉克说可以送罗斯福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但是上尉谢绝了，他说：“我该待的地方在这儿。”^[97]

根据福莱斯特部长的命令，4月15日星期天，所有军舰都要举行特别纪念仪式。按照典型的流程，全体舰员默哀五分钟，然后排枪齐射三响，为老总统送别。

哈里·杜鲁门从1933年起就一直是罗斯福的第三副总统。许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CBS广播电台驻马尼拉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通讯员威廉·邓恩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记不住现任副总统的名字。听到罗斯福的死讯，“我似乎被打上了标签，成了连这个国家的掌舵人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家播音员！”。^[98]尤金·斯莱奇记录说，他和陆战队的战友对杜鲁门“感到好奇，有一点担忧”：“我们当然不希望白宫里的什么人来把战争不必要地延长哪怕只有一天。”^[99]

与此相反，日军第三十二军指挥地堡里的气氛却是一片欢腾。据八原大佐回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确信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100]有些人牵强附会地说，肯定是4月12日冲绳的地面进攻和大规模“菊水特攻”促使罗斯福中风而死。一份散发给岛上美军部队的日本传单宣称，每10艘美军航空母舰中有7艘或沉或伤，舰队伤亡15万人。“不仅是前任总统，任何人听说这一毁灭性的重创后都会因过度忧虑而死。吓死你们前领袖的可怕损失将会让你们成为这个岛上的孤儿。日本的特攻部队将会击沉你们所有的舰船，连最后一艘驱逐舰都不放过。你们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目睹这一切成为现实。”^[101]

当天，罗斯福的死讯传遍了全世界，东京也宣布了重大的政

治变动。小矶首相及其大部分内阁成员被罢免。77岁的退役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被任命为新任首相。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巨头”也被换掉了五个，唯一留下来的是主和派领袖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宇垣将军在日记中或许语带讽刺地写道，最近的大规模“神风”攻击和冲绳岛上的地面进攻“就这么推翻了内阁，坑死了罗斯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反应”。[102]

[1]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13; USS *Randolph*, CV—15, “Action Report, Attack by Enemy Plane at Ulithi, 11—12 March 1945,” CV—15 A6—3 Serial: 004; Fifth Fleet War Diary, March 11, 1945, p.10; CO *Randolph* to Com5thFlt, March 14,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793.

[2]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1, 1945, p.18.

[3]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p.213—14.

[4]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5] Combined Fleet Telegram Order No.564—B, reproduced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553.

[6]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dated March 1, 1945, p.157,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7]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8, 1945, p.23; Ugaki, *Fading Victory*, p.527.

[8]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9] Ibid.

[10] “富兰克林号”全称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号”，昵称“大本”。——译者注

[11] Commander Joe Taylor, Executive Officer, “Narrative of Action 19

March 1945,” Enclosure C,USS *Franklin* (CV—13) Action Report, Serial 00212, 11 April 1945, FDR Library Map Room,Box 191.

[12] Radford and Jurika,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46.

[13] J.Bryan III diary, March 19,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78.

[14]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March 19, 1945, p.18.

[15] Potter and Nimitz, *The Great Sea War*, p.449.

[16] COM5THFLT to CINCPAC, March 2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797.

[17] J.Bryan III diary, April 2,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5.

[18] Dyer,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1078.

[19] CTF 58 to CTF 51, March 25,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01.

[20] 1英寻≈1.8米。——编者注

[21] Charles F.Barber, oral history, p.6,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22]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U.S.Naval Institute, 1988, p.192.

[2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23.

[2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79.

[25] Ibid., p.185.

[26] Dyer,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1094.

[2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149.

[28]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Ryukyus: The U.S.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p.11.

[29]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87.

[30]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31] CTF 51 [Turner] to COM5THFLT [Spruance], April 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green pages, pp.2810—11.

[32]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xi.

[33] Ibid., p.8.

[34] Ibid., p.46.

[35]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12.

[36] *Okinawa Shinpo*, January 27, 1945, quo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3.

[37]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March 1, 1945, p.143.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38] “Outline of Army and Navy Operations,” January 19, 1945,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39]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dated March 1, 1945, p.157,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40]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7, 1945, p.22.

[41] Matome Ugaki diary, March 2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p.559—60.

[42]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22, 1945, p.28.

[43] Ibid., entry dated April 4, 1945, p.42.

[44] Matome Ugaki diary, March 1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50.

[45] J.Bryan III diary, April 4,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10.

[46]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p.193—94.

[47] Walker, *Ninety Day Wonder*, pp.109—10.

[48]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24.

[4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92.

[50]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51] CTF 58 to ATFC5THFLT Info CINCPAC, April 7,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23.

[5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3.

[53] Admiral Keizo Komura, commander of the fleet's destroyer squadron, quoted in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61.

[5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62.

[55] Yoshida and Minear,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p.8.

[56] Ibid., p.24.

[57]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82.

[58]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4.

[59] Astor, *Wings of Gold*, p.402.

[60] J.Bryan III diary, April 7,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18.

[61] Astor, *Wings of Gold*, p.405.

[62]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5.

[63] Ibid.

[6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78.

[65]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6.

[66]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80.

[67]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92.

[68] Ibid., p.488.

[69] Ibid., p.492.

[70]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82.

[71]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94.

[72] Yoshida and Minear,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p.118.

[7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35.

[7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97.

[75] Ibid., pp.192—93.

[76] Pyle, *Last Chapter*, p.89.

[7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85.

[78] Reported in Admiral Ugaki's diary on April 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71.

[79]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1.

[80] Matome Ugaki diary, Friday, April 6,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p.572—73.

[81]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April 6, 1945, pp.45—46.

[82]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27.

[83]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36.

[84] Appendix 1, "Ships Damaged or Sunk on Radar Picket Duty,"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p.351—53.

[85]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p.35—36.

[86]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72.

[87]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9.

[88] Rowland and Boyd, *U.S.Navy Bureau of Ordnance in World War II*, Bureau of Ordnanc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Washington, DC, 1953, pp.270—74.

[89] USS *Purdy* Serial 024 Action Report 20 April 1945, p.28,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34.

[90]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38.

[91] Ibid., p.40.

[92] 前文中提到的被击中的老式战列舰属于炮击大队，不属于第58特混舰队。——译者注

[93]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p.12.

[94]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231.

[95] Ibid.

[96]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97]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5.

[9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19.

[99]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01.

[100]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45.

[101]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51.

[102] Matome Ugaki diary, Friday, April 13,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84.

第十四章

巴克纳尔将军决心要打破那霸—首里—与那原防线前的僵局，便批准了恢复地面进攻的计划。三个陆军师——由西到东依次是第7师、第96师、第27师——将并肩全线推进，目标是夺占嘉数高地、西原高地和知念半岛。4月19日破晓，美军的炮兵和舰炮进行了战役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第10集团军的炮兵在40分钟时间里向日军防线射出了1.9万枚炮弹，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也向指定目标倾泻了大量高爆炸弹。陆战队和海军的舰载机也用炸弹和火箭弹加入了这场大合唱。这一幕场景对所有旁观者都充满了吸引力，但是炮击大部分只是听个响。日军部队安全地躲在他们的山洞和碉堡内，得到了天然石灰岩的有力保护，一旦炮击停止，他们就会立刻重回地面。第24军炮兵司令约瑟夫·希茨准将判断，每100枚落到他们防线上的炮弹，炸死的日军不会超过1个。^[1]

美第27师出动30辆谢尔曼坦克在步兵掩护下向嘉数高地发动进攻。当坦克来到山坡的陡峭处时，日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突然开火，美军顿时陷入致命的火力之下。有几辆坦克被日军47mm反坦克炮命中瘫痪。当炮击停止，数百名日军步兵号叫着从山上冲下来。他们逐退美军步兵，再用手榴弹和22磅炸药包攻击坦克。22辆谢尔曼坦克被摧毁，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坦克单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在西边，第7步兵师被事先瞄准了山脚下的日军火炮和迫击炮压制在了开阔地上。第96师向位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区中央的知念—西原山脊发动进攻。他们的两个先头排

抵达了山脊，却被更高处日军射来的炮火压制在地，动弹不得，只能在惨重伤亡后撤退。在4月19日的进攻中，美军未能拿下区域中任何一处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山头，几乎被赶回了进攻发起线，反而付出了720人伤亡或失踪的代价。

如此，巴克纳尔和他的手下人开始意识到，前方有一场漫长、艰苦而血腥的战斗在等着他们。敌人的筑垒防线设防严密，而且横跨岛屿两侧海岸。地形决定了这里没有可供包抄或机动的空间，而且许多地段过于陡峭崎岖，坦克无法通行。根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记载，这里的地形“完全没有机动空间；那里满是方块形的小山头，深洞，圆形黏土山，平缓的绿色山谷，崎岖的光秃秃的珊瑚岭，遍布四处的小土墩，以及从大山中延伸下来的狭窄的深谷和陡峭的手指形山岭”。[2]对于美军来说，制空权和优势火力是有价值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陆军面临的困境和陆战队在硫黄岛上时相似，只是规模大了许多。美军将不得不依靠蛮力，沿着某些在整个太平洋上都属最为艰难的地形仰攻。

4月19日的进攻失败后，双方在整条战线上又进行了5天的激烈地面战。经历了痛苦体验的美军步兵也在逐步学习着如何进攻令人生畏的日军工事。他们绘制了精确到每一块巨石、每一个洞穴、每一座碉堡的战场地图，找到日军火力点之间的盲区或曰“死角”。随后步兵会紧密跟随炮击弹幕运动，前进巡逻队会设法趁日军躲避炮火时渗透到这些盲区中。如果步兵班能够包抄地堡或山洞入口，或者爬到它们顶上，日本守军便无法看见他们。他们一离开安全位置就会被消灭掉。这是一项缓慢、血腥、危险的工作，需要使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炸药包、轻武器、刺刀，甚至是匕首和拳头。巴克纳尔将军将这些战术称为“喷灯和手钻”打法，日军则称其为“骑兵冲锋”或“骑马”攻击法。

在冲绳岛上，舰炮和空中火力支援价值重大，但它们从来无

法替代步兵部队的勇敢、主动性和坚毅。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由陆军和陆战队士兵们把敌人从地下挖出来消灭掉，别无他法。他们鲜有侧翼机动的机会。在首里高地周围的局促地形上，人员密集的战线上被塞进去一个又一个的营——平均每600码前线就有1000人——打败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正面突击。他们或许能短暂攻占山顶表面阵地，但很快就会被来自南面远处的敌人猛烈炮击或者优势兵力的日军步兵反击打回去。这样的事情在硫黄岛上一再发生：双方反复进行攻击和反击，高地常常多次易手，有时会多达十几次。战场上美日两军的死者紧挨着躺在一起。曾经枝繁叶茂的地方，所有枝叶都被炸掉或者烧光，两军防线之间的地带成了弹痕累累、草木不生的荒原。重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不停地落下，震撼着堑壕和散兵坑的侧壁。夜晚，日军的渗透攻击成了噩梦。士兵们精神崩溃后成为“精神病例”并被迫撤出前线的情况比先前任何一处太平洋战场都要多。战争通讯员约翰·拉德纳见到一个士兵被两名医护兵搀扶着离开前线。他没有受伤，但是瞪大了眼睛，不停地叫道：“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3]

在冲绳西北角海岸伸出的本部半岛上，第6陆战师逐步打击并消灭了两个大队的日军。在半岛中央林木茂密而又地形崎岖的高地上，艰苦的战斗在所难免，即便在陆战队控制了半岛之后，他们也还要花很长时间来肃清残敌。第77步兵师的三个团在伊江岛上登陆，这是本部半岛西端海外的一座小岛。空中侦察未能判断出岛上日军的实力，于是陆军部队在一处他们称之为“血岭”的地形上陷入了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他们还要耗费5天时间才能消灭伊江岛上的抵抗。美军有258人战死，879人受伤，而所有4700名日本守军则几乎被全部击毙。

伊江岛上的恶战还要了厄尼·派尔的性命，他是一位广受喜

爱的著名战争通讯员，大兵们说他是“士兵之友”。[4]先前在非洲、意大利、北欧和太平洋的战斗中，派尔常常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战场上的士兵们共同行军，共同生活。伊江岛之战原本是在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地任务，他甚至已经在一架返回美国的C-54运输机上拿到了一个座位。4月18日，派尔和一名营长一起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前往前线。当车子在一处十字路口减速时，一挺日军机枪开火了。这挺机枪隐蔽在路边几英尺外的一片浓密灌木丛中。司机和乘客立刻跳下车，躲进道路对侧的一条沟渠中。机枪第一次射击时没有人中弹，但是派尔犯了个错误，他把头伸出来想要查看情况。结果一颗子弹紧挨着钢盔下缘击中了他的左侧太阳穴，派尔当场死亡。后来，士兵们在此地竖起了一块木牌子：“在这里，第77步兵师失去了一位兄弟，厄尼·派尔，1945年4月18日。”[5]

4月30日，巴克纳尔将军命令海军陆战队加入首里防线中段和西段的战斗。5月1日，陆战队开始南下，他们坐在卡车上经过大片的帐篷城市，补给堆栈，以及筑路工地，那里的推土机和运土设备正在重塑地貌。在道路另一边向北行进的是第27步兵师的血战老兵们，第1陆战师此番正是要去接管他们的防线。“悲伤的神色揭示了他们的经历，”尤金·斯莱奇写道，“他们筋疲力尽，灰头土脸，形容可怖，眼神空洞，神情紧张。自从佩里硫以来我再未见过这种面容。”一名路过的陆军士兵告诉斯莱奇要做什么样的期待：“那里是地狱，陆战队。”[6]

随着距离前线越来越近，炮声越来越响，高低起伏的田园风光也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灰暗废土。在山岭的高处，炮弹炸碎、崩飞了外面的土石，露出了里面象牙色的珊瑚岩。威廉·曼彻斯特下士站在一处山顶向前看，觉得这幕场景看起来“很丑陋，但也有些似曾相识，我后来意识到，那很像是1914—1918年战争的

照片。我想，凡尔登和帕斯尚尔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两支大军，面对面蹲在泥泞和烟尘之中纠缠在一起，痛苦到令人难以想象。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迂回，东边是太平洋，西边就是东海”。[7]

在首里要塞深处的日军第三十二军指挥地堡里，美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炸弹只不过是一种烦扰而已。爆炸声已经衰减大半，就像是在很远处一样，不会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地堡仍然在颤抖和摇晃，烟气有时也会从通风管飘进来，让所有人匆忙拿起防毒面具。4月29日，长勇将军召集参谋部和各师团长开会。长勇想要再发动一次反击，但规模要比4月12日半途而废的那次大上许多倍。和此前一样，八原大佐持另一派观点；他想要继续采取已经令美军失血三个星期的防御消耗战术。八原注意到敌人向首里的推进已经被控制在了每天前进100米的节奏上。让日军部队离开安全的工事，暴露在敌人炮兵、舰炮和航空兵强大的联合火力之下，是“鲁莽的，而且注定会失败”。[8]但是长勇夺回主动权的愿望却得到了各个师团长和前线指挥官的共鸣，他们认为八原的防御战术必然导致最终的失败。

听取了所有下属的意见后，牛岛将军决定发动进攻。进攻时间计划在5月4日。最终下达的命令中要求各部“展示团结的力量。每个军人必须消灭至少一个美国鬼子”。[9]

进攻战以整个战役中日军最猛烈的迫击炮和重炮射击开场，在最初三个小时内就消耗了1.3万发炮弹。突击小分队溜出洞穴，试图渗透到美军防线后方。日军第二十七战车联队也派出了他们的轻型和中型坦克，想要对美军第24军战线中央第7师和第77师的接合部附近发动进攻。日军两栖进攻部队也在那霸和与那原南面的海滩登船。起初，攻击进展令人振奋。第三十二联队夺

占了前田村以东的一处高地，第二十二联队推进到翁长村以北的一处山岭，将两支美军机枪组赶出了阵地。美军第184团的三个连被包抄、孤立在他们称之为“烟囱悬崖”和“轮盘赌台”的两处岩石山顶上。然而到了中午，日军的冲击动能逐渐耗尽。美军的反炮兵火力和空袭摧毁了超过50门日军火炮，其余大部分火炮被拖回山洞隐蔽起来。有些日军坦克迷了路，被迫折返；其余则被美军火炮或飞机打瘫、摧毁。东西两侧的两栖反登陆均告失败，大部分登陆艇被摧毁，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上岸，日军损失了500到800名官兵和几乎全部登陆艇。

到5月5日日终时，牛岛承认进攻失败，并令所有进攻部队“回归原位”。此战，日军损失了至少6 000名官兵，第二十七战车联队只剩下6辆中型坦克。日军炮兵大队也损失了众多火炮，消耗了大量库存弹药。在首里要塞，牛岛遇到八原大佐时声泪俱下，说他是的，并保证在冲绳岛的后续战役中坚持防御消耗战术。然而，如八原大佐所说：“5月4日惨败留下的深刻创伤，哪怕用神药也无法医治。”^[10]日军从上到下顿时弥漫起了一股绝望感。

5月4日，美军的两个师伤亡335人，5月5日又伤亡了379人。但是战线两侧的力量平衡却被打破了，美军立刻行动了起来，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巴克纳尔将军告诉他的军长和师长们，他希望再花两个星期时间突破至首里。第1陆战团进攻了60高地，这是日军防线最西端的一处主要地块。5月6日至9日，双方展开了激战，山头易手两次，陆战队员们才最终巩固了对这个山头的占领。在他们的左边，第5陆战团以坦克和步兵协同杀入阿波茶镇（Awacha）以南的复杂地形。陆军第7师第184步兵团向我谢高地和圆锥形山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并在5月7日至8日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迅速进展。在美军防线中部，第77师沿着5号

公路推进，打垮了沿途日军在每个山头 and 山脊上的疯狂抵抗。到5月11日，美第10集团军已经控制了前田、高知、阿波茶一线，后方通往渡知具的补给线也已安全。然而首里要塞那令人生畏的高大堡垒仍然矗立在南方，想要拿下它，还需要更多艰苦的战斗。

4月14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宣布，对冲绳外海盟军舰队的空袭已经击沉击伤敌舰326艘。其中“完全确定”击沉的包括6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34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根据官方战报，真实的数字应该还会更高——但是出于小心谨慎的考虑，以防忙中出错，未确认的战果暂未发布，以待“进一步确认”。^[11]一周后，东京广播电台报道说，敌人带到冲绳来的1 400艘船已经损失了一半，其中400艘被击沉，人员伤亡不少于80万人！报道中称，这一可怕的损失已经令美军“堕入混乱与痛苦的深渊”。^[12]

这些报道令东京先前吹过的那些牛皮相形见绌。宇垣的副司令横井俊之将军后来解释道，九州航空兵指挥官受到来自下级的压力，这些下级想让指挥官们确认这些明显夸张的战果。当横井对一份这样的报告提出怀疑时，一名“神风”特攻队指挥官对他说：“若如此低估我们取得的战果，那我就没有理由要我的人去死。如果司令部不充分认可这些战绩，我就将切腹以示反对以及谢罪。”^[13]

尽管如此，东京的指挥层看起来真的相信“神风”战术或许能打赢冲绳之战。日本海军军令部估计美军舰队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现在的胜率是五五开”。^[14]帝国大本营下令继续发动“菊水特攻”，以期将对手一击出局。时间是关键，自杀机部队必须

赶在美军两栖舰队卸下大部分货物并退往乌利西或莱特岛之前发动进攻。补充飞机和飞行员将从本州岛源源不断南下，来到第五航空舰队位于九州的前进基地。[15]

在鹿屋基地，神风队员们住在基地中最好的兵营里。他们的宿舍就在汨汨流过的小溪旁，小溪上游是青翠的竹林和长满野花的草地。在随时可能赴死的阴影中生活，他们会在这片田园美景中漫步。他们会写信，写诗。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礼物，包括清酒、烈酒，和在饥馑之中艰难节约出来的食物。村民们会送来鸡蛋、鸡、猪，甚至是牛，将其宰杀，供神风队员们在最后的日子享用。当地勤皇队的年轻女孩子们负责为他们洗衣、做饭、整理家务。这些“勤皇少女”成了这些神风队员的情感寄托——看起来是很纯洁的那种——她们将队员们称为“哥哥”，自己则是“妹妹”。出击前，女孩子们会彻夜工作，给自杀机装饰上樱花，在座舱里放上布娃娃或者折纸人偶。她们会参加起飞线上的送行仪式，流着泪向出发的飞机挥舞樱树枝或太阳旗。她们会收集飞行员们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附在感谢信里寄到他们家里。

“神风”特攻队在初期从来不缺志愿者。但是到了1945年春，航空兵指挥官发现新来自杀机飞行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许多人都是在无法拒绝的环境下被“要求”志愿参加的。根据一名海军参谋军官的说法：“鼓励‘志愿参加’变成了一种压力，而不完全自愿，可以想见，环境上的这种变化会导致所涉人员态度的变化。”他还补充说，许多新来者“显然是被环境所扰[而做出的决定]”。[16]在水户市的陆军训练基地里，有一整个班的飞行学员被指挥官要求志愿执行自杀任务。“我都不记得要我向前迈一步，”一名学员后来说，“就像是一股狂风从队列后方呼啸而来，把每个人都向前吹了一步，那简直是完全整齐的一步走。”[17]

1945年时的神风队员中大约有一半是从各个年级的大学生

中拉来的。许多人都具有开放式的思维，接受过国外思想的影响，包括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这令他们在军队训练营中很不招军官和士官们待见。许多年轻学员被单独拎出来特别对待，包括毒打——这令他们对军官，以及对把控着国家命运的独裁政府充满鄙视和憎恨。从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中看，这些未来的神风队员中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十分仰慕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其他一些人则持有激进主义、乌托邦、和平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

例如，林忠男（音）就是从京都大学被拉出来的。在他的文字中，林从不认可战争目标和帝国主义政府；他甚至认为日本的失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当的。但他仍然决意为国而死：“时局固然危殆。但于我，日本毁灭理所应当……历史的必然让我们的人民遭此危难。为了保卫这片我们所热爱的土地上的人民，我们挺身而出。”[\[18\]](#)林忠男死于战争结束前3个星期，时年24岁。

佐佐木八郎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他相信受资本主义荼毒的日本毫无指望，而即将到来的战败将会为革命带来机会。这位博学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在1945年4月14日冲绳外海的一次自杀任务中战死，时年22岁。他身后留下了一套规模庞大的个人藏书，涵盖历史、科学、哲学、经济，还有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19\]](#)

林一藏来自九州岛的福冈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最后一次出击时还带着一本《圣经》、一本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和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会把您的照片放在胸前，”他在从鹿屋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一定会击沉一艘敌舰。当您从广播中听到我们胜利击沉他们军舰时，请记住有一艘敌舰是我撞的。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妈妈在看着我，为我祈祷。”[\[20\]](#)

林少尉，22岁，死于1945年4月12日的“菊水二号”作战中。

有些人并不想去送死。随着战争的进行，或明或暗的反抗也越来越多。横井将军回忆说，队员们的态度“从待宰羔羊的绝望到公开挑战他们的上级军官，各种都有”。^[21]在最后出击前一晚，神风队会组织狂欢酒宴，大家纵情畅饮清酒，还会打砸家具。一名目击者讲述了这样的一幕场景：“那地方变成了骚乱。有些人用军刀打破悬挂着的电灯泡。有些人搬起椅子砸破窗户，撕白色的桌布。空中回荡着军歌和咒骂的声音。有些人发狂怒吼，另一些人则大声哭泣。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晚。”^[22]起飞后，有些桀骜不驯的飞行员会低空飞过他们上级军官的宿舍，像是要撞击或者扫射他们的样子。但只要他们接下来执行了使命，那这些违抗都是可以原谅的。

到冲绳战役后期，“神风”机越来越多地掉头返回基地降落。飞行员们会报告说遭遇发动机故障，或者说是无法找到敌舰。其他一些人则在九州和冲绳之间某个小岛附近海面迫降，希望能逃到岸上撑到战争结束。有些飞行员会在计划出发前一晚溜过起飞线破坏飞机。他们可能只是打开油箱盖子，假装燃油不足，然后以此为借口返航。有一名飞行员（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一连9次返回基地后，被行刑队枪决。另一次，一名“神风”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在鹿儿岛他家附近的一处铁路路基上，似乎是想死得离家近一点。

九州南部已到了鲜花盛开的时节。每天下午宇垣将军都会花几个小时到他鹿屋司令部周围的山上和乡间打野鸡。4月13日，他发现麦苗已经“很高了”，大树也“绿得生机勃勃”。^[23]樱花已至全盛花期，当地老百姓也在空地上种下了土豆和蔬菜，将军很高兴看到这些新种下的庄稼茁壮成长。他看到麦苗已经“完全长起来了，麦穗全都如同枪尖一样指向天空，就像是要号召整个国

家拿起武器”。[24]4月21日，春季捕猎季节结束，宇垣收起了他的捕猎执照和猎枪。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并不指望能活到秋季捕猎季到来之时。[25]

九州的各个机场几乎每天都会遭到B-29机群和美军舰载机的空袭。“地狱猫”和“海盗”从机场上低空飞过，扫射停放着的飞机和地面人员。“超级堡垒”则从高空投下成群的1000磅高爆炸弹，落在跑道中央。有些炸弹会立刻爆炸，其他一些——装有延时引信——则会钻到沥青下面蛰伏起来。鹿屋机场的主跑道插满了标示尚未起爆的延时炸弹位置的小红旗。宇垣将军觉得它们“相当麻烦……它们无法被当作哑弹立刻处理掉，有些炸弹的延时引信设置会长达72小时”。[26]

在鹿儿岛湾的知览机场，勤皇少女们被派去修复跑道。她们把泥土和石子铲进弹坑，直到手掌磨出血泡，腰也伸不直。5月初的一天，空袭警报声打断了她们的工作，于是她们跑进了跑道旁边的堑壕里。一队F6F“地狱猫”从低空飞过机场，扫射停放的飞机和地面设施。“这些美国人飞得这么低，你可以看见他们粉红色的脸和蓝眼睛，以及方形白边的老大的护目镜，”鸟滨玲子说，“我们不愿承认，但我们确实佩服他们的自信，竟敢飞得这么低。我到现在都不确定他们到底是十分勇敢，还是只不过看不起我们，觉得没什么好怕的。”[27]

在“神风”进攻日的早晨，地面人员、当地司令部参谋以及勤皇少女们都会参加在起飞线上举行的哀伤的送行仪式。飞行员们戴着白色围巾和旭日头带，被称赞是“神鹰一去不复返”。有些人为了这一刻已经把体毛全部刮掉。他们和部队指挥官最后一次共举酒杯一饮而尽，之后爬进已经被女孩子们打扫一净并装饰一新的座舱，启动发动机，滑行到跑道上。他们一架接一架地起飞，随后转向南面飞行两个小时，扑向冲绳外海的敌舰队。他们从九

州南部的稻田、麦地和小山上低空飞过。“我们会跑出来，挥舞旗子或者只是挥手，”一名当地女人回忆道，“有一架飞机，可能是领队的，会低飞摇晃机翼向我们致意。我们大哭不止。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我们拼命挥手，直到他们消失，然后会为他们祈祷。”[28]

对于冲绳岛外海战舰上的盟军水兵们而言，白天黑夜都是在令人神经麻木的敌机来袭和虚假警报之间无限循环。只要“神风”来袭，刺耳的鸣笛警报就会响起，把所有人召唤到战位上。烟雾发生器会放出不透光的化学烟雾，5英寸高炮开始接连发出低沉的射击声（砰！砰！砰！），黑色的高炮烟团立刻布满了天空。当高炮以低射角开火时，炮弹对邻近的友舰也会造成不小的威胁。在整个冲绳战役期间，友舰高炮的误伤造成了多达几百人的伤亡。高射炮群没完没了的轰鸣令水兵们身心俱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无论那些5英寸、40毫米、20毫米高炮的炮手打出多少炮弹，庆良间列岛的军火船上总是会有足够的炮弹等着他们去打——因此他们尽可以不停地开火，完全不用考虑节约。在渡知具滩头旁，高射炮火的密度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名目击者记得自己看到一艘战列舰夜间遭到空袭，舰上高炮射出炽烈的曳光弹，汇成一条连续不断的火的溪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炮弹和曳光弹从一个地方射出来……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锥形，这个锥形还会四处移动。然后你就能看到一架飞机在锥形顶角处起火，掉下来，而锥形还在继续移动。这真壮观。”[29]

被炸毁、烧焦、打成残废的舰船挤满了庆良间列岛的维修锚地，美国人将这里戏称为“破船湾”。“凯利”特纳早先关于夺占这片岛群的决定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如果舰队没能在距离冲绳如此之近的地方拿下这样一片受岛群保护的水域，许多受损船只将不

得不自沉。但有了这个基地，修理船和浮船坞就足以处理一些小规模的维修，损伤更严重的舰船也可以在这里先行修补，再用自身动力开往乌利西甚至是珍珠港。从4月6日到6月22日，超过200艘盟军舰艇和支援船只被“神风”自杀机或常规轰炸机命中，或者被近失弹击伤——但只有36艘被击沉或自沉。

战斗的久拖不决令海军水兵们难堪重荷，但第5舰队的总司令仍然和往日一样坚韧而镇定。早在登陆部队踏上冲绳之前的3月31日，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就由于一架“神风”机的撞击而被赶出了他的第一艘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他的第二艘旗舰，老式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在4月至5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和空袭搏斗。尽管如此，这位身材颀长，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的四星上将却依旧军容严整。和往常一样，他每天都要在军舰艏楼上步行数个小时锻炼身体，即便“新墨西哥号”上的火炮彻夜轰鸣，他也一样睡得很香。第5舰队的航海医生戴维·威尔卡茨回忆过1945年4月底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站在后甲板上，看到一群日军飞机从西北方扑来。有一架“神风”机单枪匹马向“新墨西哥号”发动大角度撞击。其他军官立刻躲进屋里寻找掩护，只有斯普鲁恩斯继续待在栏杆旁用望远镜看着冲过来的飞机，连腰都没弯一下。40mm高炮最终摧毁了那架自杀机，它“炸成几块掉进了海里，距离‘新墨西哥号’真的只有几英尺远”。

威尔卡茨医生壮着胆子过去批评总司令不该如此不必要地暴露自己。斯普鲁恩斯答道：“如果你是个好的长老会信徒，你就会知道，除非该轮到你死，否则不会有危险。”^[30]

一如往日，外围雷达哨站上的驱逐舰和炮艇在战斗中的遭遇最为惨烈。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连续执勤三四天后，舰员们就会显示出极度疲劳的迹象。他们昼夜待在战位上，吃厨房做好送

上来的三明治、煮熟的鸡蛋，喝咖啡。“压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步兵支援登陆艇的艇长回忆道，“我们身上又破又脏，散发着臭味，眼睛血红。舰上一团乱，到处都是空弹壳。我的脸上被燃烧的火药颗粒烧出了麻子，因为有一门厄利孔高炮就在距离我战位只有3码的地方开火。我们祈祷能有坏天气，这大概是唯一能放慢来袭日军飞机的事情了。”^[31]另一艘炮艇上的一名水手写道，所有舰员都到了“崩溃边缘”。大家的精神都十分脆弱，舰上的战友们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脸红脖子粗。当有人把一个扳子丢在甲板上时，“我就像是被高压电打到了那样跳了起来”。^[32]

1945年5月3日，10号雷达哨站打了一场这种典型的死战。此时正值夕阳西下，完成战斗空中巡逻的“地狱猫”和“海盗”刚刚返回母舰。驱逐舰“阿伦·沃德号”和“利特尔号”和伴随的4艘炮艇遭到了大约50架日军飞机的进攻。“阿伦·沃德号”被7架“神风”自杀机撞中，严重进水，几乎沉没，军舰的下甲板也被大火吞没。45名舰员战死，49人受伤。^[33]经过漫长而英勇的救火和救援，这艘遭到重创的驱逐舰被拖到了庆良间列岛。与此同时，“利特尔号”遭到了至少18架自杀机的攻击，并被4架飞机撞中，其中1架飞机几乎垂直地撞在军舰的后部鱼雷发射管处。巨大的冲击力打断了“利特尔号”的龙骨，两分钟内它的主甲板就淹了水。一名爬到甲板上的舰员被眼前地狱般的场景震撼了：“军官们无声地在甲板上快速走动，把灰色的毯子盖在仍然带着体温、正在流血的尸体上……从许多意义上看，死者都是我们中间最幸运的人。他们既不用弃舰，也不用回忆。”^[34]被第一架“神风”命中仅仅12分钟后，“利特尔号”就消失了。30名舰员死亡，79人受伤。

第58特混舰队在冲绳以东占据了阵位，并在大约6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持续巡航。米彻尔将军原本期望至迟到4月底时能够

从为两栖舰队和岛屿提供空中掩护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如果能早些更好——但是陆军和陆战队的航空兵部队要到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时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这种延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冲绳岛上机场的建设由于地面松软湿滑而落后于计划中的进度，这一情况由于5月春季降雨的到来而雪上加霜。和在莱特岛时一样，岛上缺乏足够的珊瑚岩来铺设机场。日本人建造的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粗糙而泥泞，在夜间，还要靠在跑道两旁挖掘的火坑里点燃汽油和煤油来标示出跑道。飞行员和地面人员就住在帐篷里，从天而降的高炮弹片可以轻易把它们撕碎。

5月24日晚，日军向读谷机场发动了一场大胆的突击队奇袭。5架日军轰炸机突然从低空飞来，放下起落架，想要在机场降落。其中4架在着陆前就被击落了，剩下那架成功降落并滑行到停机坪旁停了下来。12名日军突击队员从机舱里涌出，四散到停放的美军飞机中，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进行破坏。9架美军飞机被炸毁，另有20多架受伤。守卫机场的陆战队员开始疯狂射击，甚至相互对射，许多人被友军火力误击而死伤。日军还炸毁了一处油库，烧掉了7万加仑航空燃油。交火持续了一整夜，直至黎明后最后一名日军突击队员被击毙为止。基地中的一名陆战队航空兵军官罗纳德·D.萨尔蒙上校说这一幕“相当可怕……我在所有战争中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晚”。^[35]

虽然第58特混舰队多次派遣单个特混大队分兵北上去空袭九州，但其主力却始终被牢牢钉在冲绳滩头，机动性受到巨大限制。他们每天的行动是可以预见的，而可预见就意味着危险。米彻尔抱怨说他的特混舰队已经成了“日本航空兵的高速死靶子”。^[36]大部分晚上，小群敌人巡逻机都会飞来跟踪美军舰队，投下照明弹，有时还会直接投射炸弹或鱼雷。美军会用雷达跟踪这些来袭者，并引导夜间战斗机前往截击。白天会有大规模的空袭，

时间常常是在中午前后。大部分日机都会被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斗机拦截并常常在距离特混大队中央至少30英里处被击落，但是少量飞机突破外围防线向航母发动俯冲也不是稀罕事。这对军舰舰员们而言就是最令人紧张的时刻了。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没人能预料到何时会有一架飞机逃过暴风雨般的高射炮火撞向军舰。下甲板上的人们对此类空袭尤为紧张——原因很简单，下甲板的人员伤亡率要高得多，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大火围困或被浓烟熏死。

这一沉闷的循环看似永无止境。人们有时也会来点幽默减减压。在一连数天可怕的防空作战之后，“乔克”克拉克将军向他的特混大队发电：“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8段。”于是在整个大队的所有舰上，人们打开《圣经》，大声读了出来：“耶稣基督[37]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38]

人们变得越发易怒和暴躁。舰队里有个公开的秘密，许多水兵会从机库甲板的弹药库里偷高酒精度的“鱼雷汁”来喝。所有舰员都被要求在脸上和手臂上涂抹一种油腻的白亮亮的防晒霜，但是许多人讨厌这种感觉和防晒霜的气味。补充中队的年轻飞行员们现在体会到了什么是飞行员疲劳症，航空医生则警告说必须尽快替换这些人，否则操作事故就会激增。大喇叭里传出的命令和发言要求所有人保持警惕，这样才能活下来。在一艘航母上，有人在一个战斗机中队待命室的黑板上潦草地写了一行字：“保持警惕——别忘了军舰上那些瑟瑟发抖的可怜战友！”[39]另一艘航母上，一份当日计划中写道：“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作战疲劳而艰难，但不要因此而丢掉我们的判断力。”所有舰员都被要求“谨防不当之词脱口而出，这不仅会贬低你，还会让你失去战友之谊……臭脾气就和臭垃圾一样，应该被砸碎丢进海里”。[40]

1945年5月11日上午，米彻尔将军的旗舰“邦克山号”成了一

场可怕程度极为罕见的“神风”攻击的牺牲品。两架三菱零式战斗机利用特混舰队上空的低云，在炮手们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穿出浓密的云层。第一架飞机以小角度俯冲，扑向航母右后方，撞在了3号升降机后部的飞行甲板上，栽进一个中队34架加满了油的“地狱猫”中间。在撞击前一瞬间，飞机投下了挂载的550磅炸弹，炸弹撕开三层甲板，穿出舰体，在右舷旁爆炸。第二架飞机以近乎垂直的俯冲撞下来，速度可能超过500节，击穿了舰岛底部的飞行甲板。在这些灾难性打击之下，“邦克山号”自己的弹药和燃油被点着了，巨大的二次爆炸引发了最为惨烈的破坏。数百名舰员没有任何逃生机会，当场丧命——炸死、烧死或者窒息而死。还有数百人被逼出飞行甲板，退到舷外通道和高炮走廊上等候救援，或者干脆自发跳进海里。军舰燃起大火，一股浓烟升腾到1 000英尺高处。搭乘在邻近的“企业号”上的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描述了这艘燃烧的航母：

军舰的整个后部都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烈火中。它看起来更像是新闻短片里燃烧的油井，只是更凶猛——因为这火烧的是高度提炼后的汽油和未发射的弹药。大股翻滚的黑烟从舰尾升起，猛烈地喷吐着橙红色的火舌。耀眼的白色亮光不停地从中闪现，那是燃烧的飞机或炮位上整備完成的弹药被引爆了。每过几分钟，整团的浓烟就会被大片的火焰遮蔽，那是又有一架飞机的油箱爆炸了，或者是又一摊从下方机库甲板破损的燃油管线里漏出的汽油触碰了火舌。

在超过一小时的时间里，烈火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当数十万加仑的水和化学灭火剂喷射上去之后，它们或许略微平缓了一点，但随着受伤的舰体内发生更多的爆炸，它们反而更加贪婪地向舰体前部蔓延而去。[\[41\]](#)

死者中有第58特混舰队司令部的3名军官和10名水兵。^[42]米彻尔将军本人也失去了许多舰载机大队和舰员中的好友。当天下午3点，他和60名幸存的幕僚一起离开了仍在燃烧的“邦克山号”，转移到“企业号”上。当米彻尔来到舰上时，亚当斯写道：“他看起来又累又老，简直要发疯了。他轮廓鲜明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就像是河川侵蚀过的尘暴旱区一样——但他的双眼却闪耀着复仇的火焰。”^[43]

经历了8个小时的灭火和抢修之后，“邦克山号”变成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就和它的姊妹舰“富兰克林号”六个星期前一样。舰上有389人死亡，264人受伤。死者和伤者的比例高得反常，这只能归因于当时的情况——当敌机撞击时，这些人都在下甲板上，他们还没来得及爬上梯子就死于浓烟。挖开这艘航母的第84战斗机中队的待命室时，救援队在入口处发现22名飞行员的尸体堆在了一起。舱室里充满了浓烟时，他们都想从这里逃出去。

但是“邦克山号”的轮机舱和发电机却大部完好，因此它还能以近20节的速度退往乌利西环礁。5月12日，“邦克山号”为超过300名舰员举行了海葬。这艘破破烂烂的航母在乌利西做了简单修补，随后靠自身的动力横跨太平洋。三个月后战争结束时，它正在皮吉特湾的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进行维修。

三天后，米彻尔的新旗舰“企业号”又被一架“神风”自杀机撞中，这位将军不得不再次更换旗舰，这次是“伦道夫号”——它也不是“神风”攻击的生客了。米彻尔对他的作战参谋詹姆斯·弗拉特利说：“吉米，告诉我的特混大队指挥官们，如果鬼子再这么搞下去，我头上马上就要长头发了。”^[44]

“邦克山号”的悲剧发生一天后，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新

墨西哥号”也中了招。当时这艘战列舰刚刚在庆良间列岛补充完弹药，正在返回渡知具湾。这天天气凉爽，风平浪静。下午5点，两架低飞的日军飞机从舰尾“太阳方向”飞了过来。一枚5英寸炮弹直接命中了日军长机，它在“新墨西哥号”左后方大约1/4英里处坠入海面。第二架飞机在高射炮火中穿行，绕了一圈，撞上了军舰右侧前桅后部。机上的炸弹在高炮甲板上爆炸，飞机的残骸则冲进了烟道，在烟囱的薄壁上撕开了一个30英尺的口子。爆炸使得舰上的航空汽油罐开裂，大火立刻吞没了上层建筑。已经装填完毕的40mm和20mm高炮的炮弹从炮位护栏处掉落，滚进了烟囱并开始爆炸。但是损管队在不到60秒的时间里就打开了水龙头，很快就控制住了火势。所有火焰都在一小时内被扑灭。

起初人们找不到斯普鲁恩斯将军了，他的幕僚们担心他不会死了。参谋长阿瑟·C.戴维斯少将和副官查尔斯·F.巴伯一起冲出食堂甲板，匆匆赶到指挥舰桥上。但斯普鲁恩斯没在那里。最后他们在二层甲板上找到了他，当时他正拿着消防水管和其他舰员一起救火呢。他毫发无伤，而且跟没事人一样。巴伯上尉回忆道：“斯普鲁恩斯将军，就像他常常做的那样，总是会从容不迫地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完。”^[45]被命中一小时后，“新墨西哥号”的损伤便已被控制住，他告诉幕僚们，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一次更换旗舰：“我相信我们可以留在战位上，完成修复，然后继续。”^[46]

“新墨西哥号”遭受了177人的伤亡，其中55人战死。炸弹在烟囱上炸开了一个“大得可怕的洞”，但是军舰航行未受影响。^[47]第二天上午，斯普鲁恩斯给他的前参谋长“卡尔”穆尔写信道：“高炮开火时我正准备到舰桥去，于是我就走向二层甲板的掩蔽处，没走多远我们就被击中了，从我所在的地方通往舰桥的两条路刚巧都被飞机和炸弹打到了，所以我没有走过去实属万

幸。”和平时一样，这位第5舰队司令的评论中毫无感情色彩：“自杀飞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我们绝不能低估。我不相信那些没在它们作战范围内待过的人能体会到它对舰攻击的潜力。”^[48]

1945年5月8日传来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冲绳外海的战舰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猛烈最持久的舰炮炮击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然而战壕里的大头兵们对于欧洲胜利日只不过是耸耸肩，苦笑一下而已。这一事件和他们眼下的艰难处境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欧洲胜利日意味着可以把部队和飞机从欧洲调过来，那倒是不错的事。但若是说这应该庆祝，那他们就只能报以怒目了。如一名在冲绳苦战的陆战队员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消息“没有改变我们战线的位置，泥土的质地，天空的颜色，也没有改变我们每个人斗篷里装的弹药数量”。另一个人也说：“纳粹德国和在月亮上也没什么区别。”^[49]

3天后的5月11日，第10集团军以两个不同军种的军再次发动协同进攻——西边是第3两栖军，包括第1陆战师和第6陆战师；东边是第24军，包括第77步兵师和第96步兵师，还有第7师留作预备队。在左右两翼的远端，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将会沿着海岸向南推进，同时对首里要塞周围的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强大压力。此举演变成了冲绳岛乃至太平洋所有岛屿上最为激烈和拼命的地面作战。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向着那些貌不惊人的山头和高地上的日军坚固防御阵地攻了上去，这些山原本没有名字，美军在绘制地图时临时给它们取了名：巧克力山、平顶山、墓碑高地、圆锥形山、瓦纳高地、瓦纳谷地、甜面包山。六个星期前，它们还是些绿植覆盖的平静优美的地方，有起伏的山峦和密布的梯田，还能看见美丽的蓝色大海。但是现在，这里已是一

片荒原，没有植被，到处都是浑身烂泥的尸体。

对阵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进攻，在山坡上仰攻下冲，在坦克陷阱和雷区中血战，在机枪火舌前冲锋，山头几度易手，直到日美两军的尸体堆满地面，交相枕藉。每一轮新的进攻都以划破天际的火炮与迫击炮弹幕射击开场，此时谢尔曼坦克引擎空转，舱盖打开，驾驶员等候着前进的信号。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手们都受领了“射击任务”，包括标有目标坐标和射程的卡片，还有关于应该射击多少炮弹、何种炮弹以及射击多久的指示。步兵们则领取弹药，把水壶装满水，把用不上的装备丢下来，然后跳进散兵坑和堑壕，低下头，等着军官或士官发出前进的号令。炮击逐渐达到了高潮，海岸外的舰炮也以其巨大的火力和野战炮兵一同唱响了大合唱，这时，除了分不出炸点的连续轰鸣，人们什么都听不见。最后，迫击炮射出白磷弹，在敌人的视线前拉起一道烟幕。随着信号发出，坦克发动机轰的一声咬上离合器，履带开始在泥土中前行，步兵们则站起来猫着腰向前走，前后左右各保持5步间距。他们的目的地是日军火力点之间的盲区，在那里，他们可以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碉堡和山洞口。隔着烟幕，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嗒嗒嗒”“砰、砰”地响着，子弹从士兵们耳边嗖嗖地飞过。还有迫击炮弹落在他们中间。士兵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赌平均概率，或生或死，听天由命。当烟幕浓厚时，日军的“南部式”轻机枪会快速进行两三点射以节约子弹，“嗒嗒……嗒嗒嗒……嗒嗒”。但是一旦烟幕散去，日军机枪手能够看见目标，他们就会紧紧扣住扳机，扫射整个射界。如果左右两边有人倒下，他的战友会继续前进。“你会看到这一幕，但是你要继续前进，”一名陆战队员回忆道，“你不会停下来，因为他已经死了。”[\[50\]](#)

侧翼包抄的机会几乎没有，地面进攻只能迎头打上去。每一

次向前推进都会招来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从看似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射来的猛烈火力。在5月15日对瓦纳谷地发动的一场进攻中，日军47mm反坦克炮当场摧毁了数辆谢尔曼坦克，其余坦克只能折返。在这样的防御面前，既然连坦克都无法取得进展，那还能指望步兵们有什么斩获呢？有时候，他们甚至对取得半点进展都不抱希望。机枪射击的嗒嗒声和步枪的砰砰声从来没有减弱过，此外还有火炮和迫击炮低沉的轰鸣，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如此大量的钢铁在空中横飞，任何形式的进攻看上去都只能是自杀。但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却很直接，压力也很大：他们必须摧垮日本守军的防御，而且必须要快。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硬冲敌人防线。经过代价惨重的反复试错，他们渐渐摸索出了新战术。战术创新常常是由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官们发明的，这些人突然意识到了怎样才能拿下一处敌人阵地，并且就地动手。日军对反斜面阵地的运用精明而有效，美军却可以用精确而准时的迫击炮火来对付。美军的迫击炮手们一点一点地、断断续续地找到了窍门。迫击炮弹能够越过山顶，直接落在堑壕和洞口中。如果能掐准炮击和地面佯攻之间的时间，那么迫击炮弹就能卡在日军士兵从地下掩体内钻出来准备迎击美军时命中目标。许多日军被打死，其余人则会撤退，这样美军步兵班就有机会施展“喷灯和手钻”打法了，而其余敌人此时仍在地下，对外面一无所知，从而陷入被动。

从5月21日起，一连10天的大暴雨将战场化为了无边无际的泥潭。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躲在雨衣下，浑身湿透，十分痛苦。散兵坑进了水，他们不得不用头盔把水舀出来。人们不得不试着把弹药箱摆放在被水灌满的战壕底部充当木地板。他们手上和指头上的皮肤起皱而发白。他们的脚从来都干不了，还长了疮，一碰就淌水——当他们把靴子脱掉时，会发现湿袜子上沾了

许多一小团一小团的死肉。他们读家信时都得抓紧时间，不然墨水就会被雨水化开冲掉。他们打开口粮罐头时，可以接满雨水，把吃的变成汤，不过是冷的。吉普车和卡车的车轴陷入泥泞，动弹不得，就连坦克和履带车都无法前进。弹药、补给物资和5加仑水桶不得不由人顶着瓢泼大雨，蹚过齐膝深的泥潭，穿过日军炮火覆盖的地段送到前线来。

在从不停歇的暴雨中，能见度有时会降到只有10英尺。美军偶尔会瞥见他们的敌人——壮实的小个子士兵，穿着褐色军服，戴着宽边钢盔，在满是弹坑的地段迅速而高效地移动。无人区通宵都被美军用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照得雪亮。美军时时刻刻都在提防日军步兵的夜袭，无论是小股部队的隐蔽渗透还是连级规模日军高呼着“日本万岁！”的刺刀冲锋。美军知道日军会穿戴着缴获的美军钢盔和军服，大摇大摆地走进美军防线，然后突然开火。在冲绳，敌人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扑过来。他们会来自日军防线——这自然无须多言——还会经由地下隧道或被越过的阵地从侧翼或者后方出现。只要空中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美国大兵们就会警惕地抬头望去，因为他们都被告知要留意观察敌人的伞兵。

战场上尸横遍野，腐尸烂肉散发出的令人反胃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躲无可躲。除非让丧葬组暴露在敌人的致命火力之下，否则就不可能把尸体拖走。如果把尸体就地掩埋，那么迫击炮和火炮炮弹爆炸的巨大冲击会将其从地下翻出来，炸成肉块撒到战场上。而这些暴尸荒野的尸体又会被反复炸得粉身碎骨，除了红色的血迹留在泥土中，其余什么都不剩。这里的卫生问题比太平洋其他任何战场都更严重。威廉·曼彻斯特就发现：“如果你把超过25万人在一条战线上放三个星期，却没有处理排泄物的设施，那你就要遇到大麻烦了。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巨大的粪池中作战

和睡觉。”[51]粪便中长满了又大又肥的白色蛆虫。如果有人摔倒再站起来，他就会看到蛆爬满了他的裤子和子弹带，或者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有个陆战队员会用一柄匕首的刀背把它们刮下来。对于尤金·斯莱奇而言，这些蛆几乎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被迫在战争的腐尸中翻来滚去，这几乎超过了我们所能忍受的极限。”[52]七个月前在佩里硫，他原本认定自己和陆战队的战友们遇到的已经是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战场环境了。但是现在：“我度日如年，有时甚至想还是死了更好些。我们处在战争终极恐怖的深渊底下。在佩里硫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周围的战斗中，我曾因为人命如草芥而感到沮丧。但是在首里要塞前的泥泞和暴雨之中，我们甚至已身处蛆虫和腐尸的包围之中。人们挣扎、战斗、流血，环境则如此恶劣，我觉得我们是被扔进了地狱的粪坑中。”[53]

在战线西端，第6陆战师在他们称之为“甜面包山”，日本人称为“安里五十二高地”的地形上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是一座由珊瑚岩和火山灰构成的山岭，大约300码长，100英尺高，其两侧另有两座山头拱卫，分别是半月山和马蹄山，三座山头呈箭头形。这里陡峭的悬崖被挖空，里面布满了隧道和射击孔。这里的地形使得日军总是能够对所有接近路线形成多重交叉火力覆盖。双方都明白此处是整个防线的关键环节：如果美军突破此地，前方便是开阔大道，可以包抄与合围首里要塞。日军指挥官们从他们在首里的观察所可以直接看到这里的战斗，每次美军发动新一轮进攻，他们就会向这里投入大量援军。美军用火炮、火箭弹、凝固汽油弹、烟幕弹和舰炮弹幕对甜面包山狂轰滥炸。一连10天，第6陆战师不停地派出坦克和步兵，向这个防御体系发动进攻。陆战队员们一次又一次短暂攻上甜面包山顶，但结果却都被日军猛烈的炮击和步兵冲锋打回来。最终，在5月26日，美军

占领此地后击退了日军的多次猛烈反击，守住了这里。

八原大佐相信，如果日本炮兵能拥有更多的弹药储备，他们或许就能无限期挡住美军陆战队的进攻。事实上，这些守军“十分坚定，他们的战斗如此勇猛，以至于安里五十二之战比预期中持久得多。即便在安里五十二落入敌手之后，我们的部队仍然在令人难以置信地坚持战斗”。[54]

当日军防线的东西两端向后弯曲时，战场上的僵局也开始逐渐被打破，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开始沿海岸推进。这次双路合围有可能会孤立日军防线中央的主要防御支撑点。在甜面包山拿下日军侧翼后，陆战队员们打通了越过安里川的南部海岸公路，进入了被孤立的那霸城。从这里，陆战队通往国场山区的门户已经洞开，接下来便可直通首里防御体系。在东边，第96师攻占了海拔比与那原周围海岸平原高出476英尺的圆锥形山东侧，这样，日军俯瞰中城湾的阵地也就守不住了。于是日军开始战术撤退，他们后退了大约半英里，进入紧靠着首里北侧的一条新防线。

牛岛将军现在相信他的部队无法再坚守已经守了一个月的横跨岛屿的防线了。防线的东西两翼已经在敌人连续不断的猛攻之下塌陷。整个日军防线被向后击退了大约半英里，牛岛也没有步兵预备队可以来填补损失了。他的部队仍然防守着首里周围的同心圆形堡垒防线，但是美军已经准备好从两个方向发动压倒性的夹击。正如八原大佐后来所写：“整体上，战况看似稳定，但实际上，从5月28日之后就已经如同晚期肺结核病人一般。或许看起来一切正常，但胸腔却已经空了。”[55]

在5月下旬的暴雨中，日军第三十二军的指挥地堡变得格外恶臭而难以忍受。地堡内进水严重，“扫帚乱漂”，所有人都要动

起手来把床和家具垫高。[56]美军火炮看起来已经锁定了他们的洞口，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炮弹落在洞口周围，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离开地堡都是件危险的事。在最近一次发给东京的无线电报中，牛岛将军告诉大本营，他的阵地即将被攻破。他还请求向海岸外的美军舰队再发动一轮“神风”进攻，以求让美军地面部队觉得他们的弹药和补给可能会耗尽。大本营要牛岛继续坚守防线，守得越久越好，并且拖延战斗，为本土争取准备防御的时间。

此前提出过正确主张的八原大佐又拿出了向冲绳岛南端喜屋武半岛撤退的战术方案，那里美军坦克无法通行的巨石堆中已经备妥了地下阵地。南撤无法改变冲绳之战的结局——第三十二军将要被消灭，所有日军指挥官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或许能拖延战斗，并让美军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这一想法遭到了几位师团长和旅团长的反对。第六十二师团参谋长提出，数千人已在防守首里时死去，他们的战友想要死在同一个地方。坑道里还有数千名伤员，他们也只能被丢下。冲绳地方官员则担心首里地区民众的命运，许多人将会试图跟随军队南下，他们将会陷入双方的交叉火网或者落入敌手。

听取了各方不同的主张后，牛岛决定南撤。“我们还保有一部分战斗力，”他说，“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岛民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我们将要在最南边的山区战斗，打到最后一寸土地，最后一人。”[57]

日军指挥官使出了各种瞒天过海之术来隐蔽他们的撤退企图。一部分被选定的前线部队要向美军防线发动“表演性”进攻，同时军队主力则要趁夜离开阵地南下，乘车或步行。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在5月24日至25日夜间撤退，其后卫部队同时向美军第77步兵师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第二十四师团在三天后的夜晚撤退，第四十四独立混成旅团在5月31日撤退。每一名撤退的士兵

都带上了尽可能多的弹药和补给，每人约130磅。大部分伤员都被丢在了后面，许多人喝下掺了氰化钾的牛奶而死。

5月27日，第三十二军的最高指挥人员分批走出首里地堡，离开了他们的指挥山洞。牛岛将军一个人摸黑走下了石头台阶。他的参谋军官们想要跟上他，结果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沿途到处都是日军士兵和冲绳平民的尸体，其中许多已经在野外腐烂多时。军官们爬上一辆卡车的后厢，沿着黑暗的道路开去。卡车没有开车灯，从撤退的日军士兵和大群难民组成的长长纵队旁驶过。

直到日军部队主力逃到喜屋武半岛的新防御阵地后，美军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恶劣的天气帮助了日军，雨、雾和低垂的云层即便是在白天也会遮蔽他们的行踪。透过云缝，美军飞行员偶尔能瞥见大群日本人向南走去，但他们觉得这些全都是平民。对于那些在仿佛坚不可摧的首里要塞前苦战的美军指挥官而言，日军主动放弃这一价值重大的堡垒是难以置信的。即便是美方军、师级指挥部的情报部门也判断日军计划在这些高地上死战到底。

美军的铁钳现在终于在业已被削弱的首里防御阵地上合拢了。战斗漫长而痛苦，即便面对的只是留下来掩护第三十二军撤退的已经消耗殆尽的日军后卫部队，也是如此。倾盆大雨令能见度降到了10英尺。车辆无法爬上被冲毁的道路，因而无法开上山顶，这样补给就十分困难。于是美军飞机从低空飞来，向被火焰和浓烟标记出来的地区空投补给和弹药。最终，5月29日，第1陆战师的先头部队开进了首里要塞——或者说是要塞那古代石头城墙的废墟——第77师一部则拿下了旁边的首里城。留作牺牲品的日军后卫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战至最后一人。

5月27日午夜，哈尔西将军回来接替斯普鲁恩斯掌管了舰队。第二天，麦凯恩接替米彻尔指挥快速航母突击舰队。第5舰队改编为第3舰队，第58特混舰队也再次变成第38特混舰队。此时“新泽西号”正在改装，因此哈尔西和他的“阴谋诡计部”此次登上了其姊妹舰，战列舰“密苏里号”。

指挥交接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其从未被公开过的原因，乃是尼米兹和金希望他们的“首发阵容”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和特纳能在接下来11月的“奥林匹克”九州岛登陆战中担任指挥。为了保持5个月一次的轮换频率，就有必要让哈尔西和麦凯恩提前回来。[58]

此时，第38特混舰队仍要继续掩护冲绳外海的两栖舰队，其飞机也要在岛上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陆地上正在激战，“神风”攻击的规模已经缩小，频率也降低了，但威胁仍不容忽视。经历了两个多月以来一天没停过的激烈战斗后，各个航母大队已是师老兵疲。其中一个大队，“泰德”谢尔曼将军的第38.3大队被派回莱特湾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补充。阿瑟·拉福德的第38.4特混大队被派往北面，向九州的机场再次发动战斗机扫荡。“乔克”克拉克的第38.1大队（哈尔西的新旗舰就在这个大队的内层防卫圈中作战）则要空袭近处的冲绳岛，并为岛上提供战斗空中巡逻。

6月1日，舰队南方的帕劳群岛附近海域显露出了台风正在生成的第一丝迹象。关岛的气象中心收集并汇总了来自舰船、潜艇和远程巡逻机的气象报告，跟踪着正在北上的“热带扰动”。这些报告很零散，常常互相矛盾，其汇总后的图景也很混乱。但是6月4日，中途岛战役3周年之际，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报告：一场大号台风正径直扑向冲绳岛以东第3舰队的所在地。

和往常一样，风暴的行进路线无法准确预测，但没人会忘记前一年12月的那场灾难。于是飞机被召回航母，降到机库甲板，用双股和三股钢缆固定起来。驱逐舰则匆匆加满了油。和幕僚及气象人员商议了之后，哈尔西选择令他的两支特混大队转向110°的东南偏东航向，预计这样可以令舰队远离风暴，同时和冲绳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太远。但是随后的报告则说风暴的路线更加偏北，移动速度也比先前预想的更快。此时，气压计读数开始下降，天象也变得复杂。哈尔西命令舰队航向转向西北。他的想法是横越风暴前方，从其预计路线外围风力较弱的西半边通过。但是台风仿佛自己有了心眼，故意奔着第3舰队而来。那些6个月前就在舰队里的人觉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祥之兆。

克拉克的第38.1大队最惨。6月5日一早，他旗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显示屏探测到了一个紧密的圆形“台风眼”正直奔自己而来，这是大威力台风的特有标志。^[59]在巨浪中，“大黄蜂号”摇晃得如同驱逐舰一般，小些的舰艇则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凌晨4时20分，克拉克通过短距离步话机联系麦凯恩，请求允许向南转，这样他的舰船就能赶在台风到来之前逃走。麦凯恩把请示转给了哈尔西，因而延迟了20分钟答复。在这段时间里，克拉克命令所有舰船尽最大努力转舵迎向海浪。凌晨4时40分，当“大黄蜂号”的指挥舰桥收到麦凯恩的确认答复时，已经来不及了。克拉克的舰队已经被牢牢卷入了呼啸的狂风之中。

当东方海平线上露出第一道紫色光芒时，一座“水山”撞上了“大黄蜂号”的舰首。“老天！”副舰长罗伊·L.约翰逊说，“那一定有十座房子那么高，当全部的冲击力落在飞行甲板上时，所有东西都被带走了。飞行甲板的边缘塌了，所有天线都不见了，全部的侧舷走廊和有些飞机掉进了海里。我们处境艰难。”^[60]

风情逐渐缓解之后，事情就很清楚了：整个特混大队都遭到

了重击。没有舰船沉没，但是几乎每艘舰船都报告遭到重创，包括第38.1大队的全部4艘航母。“大黄蜂号”和“本宁顿号”的飞行甲板前部拐角折了下来，就像是书页上为了标记而折的角那样。重巡洋舰“匹兹堡号”大约100英尺的舰首从舰上被整个撕下。“匹兹堡号”的姊妹舰“巴尔的摩号”——正是这艘舰前一年把罗斯福送到了夏威夷——也遭到重击，但它仍然留在舰队里，后来在干船坞中进行了维修。飞机方面，总共有233架飞机掉出舷外，36架损坏到无法维修而被抛弃，另有23架受损严重。6人被卷入大海，另有4人受重伤。

台风过后，哈尔西下令再次空袭九州。“大黄蜂号”已经不像能放出飞机的样子了，但是克拉克决心试试。一架F4U“海盗”战斗机试图在缩短了飞行甲板上滑跑起飞，结果一头栽进海里，带着飞行员沉了下去。这是因为折起来的飞行甲板导致了过大的紊流。舰员们点着喷灯，想要把飞行甲板的损坏部分尽可能切割掉，但是忙了一天一夜，施工队只切除了一小部分损坏的钢质结构。在克拉克的怂恿下——虽然他不是舰长——“大黄蜂号”设法从舰尾放出飞机。埃塞克斯级航母从来没试过这种引人注目的杂耍般的把戏。舰上的轮机开始倒转，军舰开始迎风“倒退”。工程人员为此把轮机开到了超负荷状态。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大黄蜂号”成功用这种方法坚持收放飞机，从舰尾放出飞机，从受损的舰首回收飞机。

6月10日，肯尼将军的陆军第5航空队做好了完全承担起冲绳防空工作的准备，第3舰队终于可以被解脱出来，撤回莱特湾去进行急需的维修、补给和休整了。舰队已经筋疲力尽，而台风带来的创伤又令其雪上加霜。旗舰“约克城号”在圣彼得罗湾下锚后，拉福德将军一头栽到床铺上，一连睡了几乎24个小时。^[61]谢尔曼将军的第38.3特混大队已经在海上停留了79天，其中52

天都在作战——这创造了美国海军的新纪录。[62]

6个月内两次误入台风，哈尔西知道他的指挥权已经悬于一线。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他告诉尼米兹，天气预报烂透了。他们把关于风暴位置和路线的报告全都标绘在了地图上：“早先对风暴位置的估算覆盖了3.4万平方英里。而且预报还严重延迟。”[63]美国海军为此在“新墨西哥号”的军官餐厅里组织了一个调查庭。主席是约翰·胡佛将军，前一年12月那次台风后判定责任在哈尔西的调查庭主席也是这位目光锐利的老水手。特混大队指挥官克拉克和拉福德在做证时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未来的参联会主席拉福德认为：“此番哈尔西将军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疏忽不可原谅。”他提出，哈尔西和麦凯恩两人在国内待了很久，刚刚回到舰队，他们过于骄傲，没有听取更有经验的下级的建议。拉福德知道天气预报不靠谱，但他认为即便只是靠基本的航海技术也应当让两位将军做出更好的选择：“我很难理解[哈尔西]为什么硬要让所有三支特混大队待在一起，独立行动的大队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别管我们，我的大队就能逃出风暴。”[64]

调查庭建议“认真考虑”解除哈尔西和麦凯恩两位将军的指挥权，把他们打发到其他岗位上。最终裁决则交给了上级。金似乎确实认真考虑了解除两位将军指挥权的事，而且福莱斯特部长也说会支持他的决定。不过最后，他们决定留下哈尔西，但把麦凯恩召回华盛顿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副局长。（后来还没等调离麦凯恩，战争就结束了，这位将军在到任新岗位之前就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这一次，很可能是哈尔西的国民英雄身份拯救了他的指挥权。在1945年的整个夏季，他的照片和他喋喋不休的演讲都是美国媒体上的重头戏。在调查庭提交结论的当周，哈尔西奸笑的

面孔就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头像上方是他的标志性口号：“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杀死更多的日本鬼。”^[65]

当美第10集团军在岛上追击日军时，持续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拖了他们的后腿。即便是坦克和履带车辆也会陷入褐色的泥潭中，许多车辆都不得被抛弃。补给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部分依靠将补给物资直接送到美军控制的海滩，部分依靠空投。塞缪尔·海因斯飞了几十次空中补给，在他的翼下“是一个曾经和平的古代世界的废墟——小块的田地和石头老城墙，古树的虬枝下遍布小道，原来是房子的地方只剩下一堆石头，所有一切就在我的机翼下方，所有一切都清晰可见，即便在雨中也是如此”。^[66]

南下的道路成了露天停尸房，到处可见死去的日本人和冲绳人。美军步兵要下手清理，把尸体拖到路边，好为卡车和坦克清出一条通路来。第6陆战师的托马斯·麦金尼回忆了他看到的情景，那些尸体显然是努力想要跟随撤退的军队向南爬的日军伤兵：“我们发现，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多少，数百人吧，伸着胳膊和腿，躺在那里，很明显他们曾经努力爬行。他们的残肢仍然打着绷带，却沾满了泥土和其他东西。他们就这么爬，很努力，他们决心要向前，却死在了路上。”^[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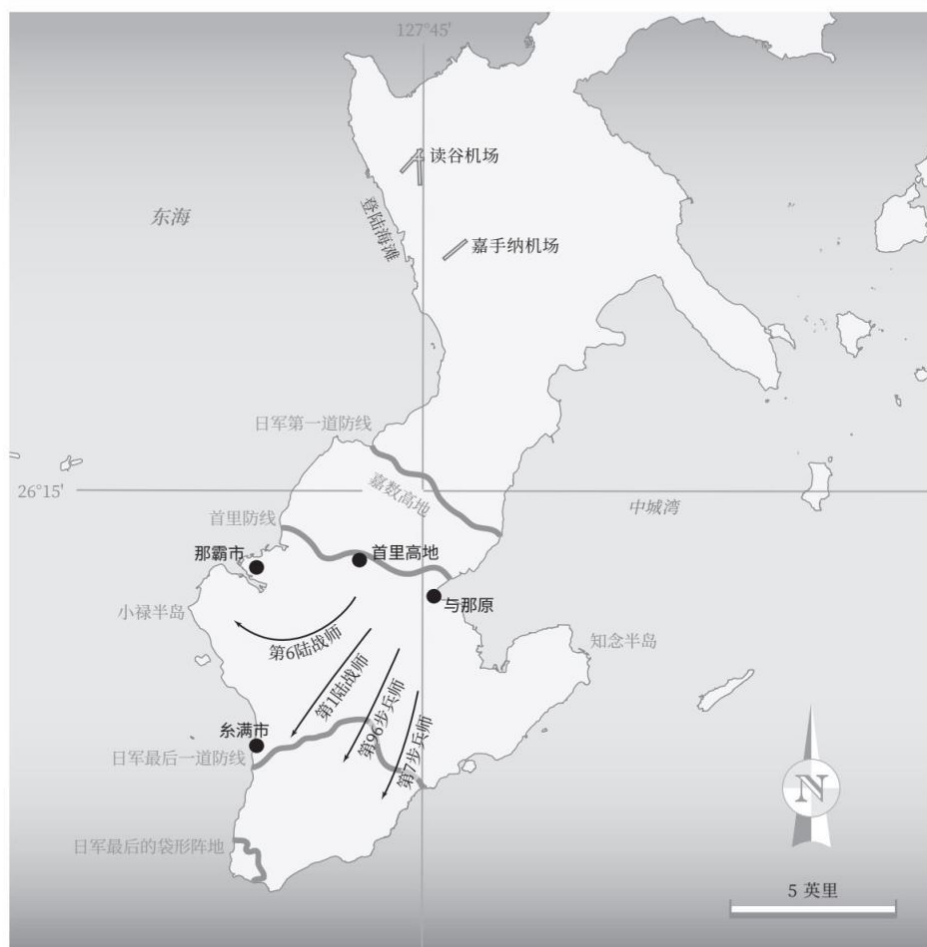
日军第三十二军将会在横跨喜屋武半岛的防线上建立最后的立足点，这是冲绳岛最南端，是由崎岖台地和珊瑚岩峭壁组成的伸向大海的一条“舌头”。日军的主要防线穿过与座岳和八重濑岳两座山岭。冲绳战场的这最后一角占地约11平方英里。

日军从首里的撤退非常顺畅。美军发现日军动向时，已经来不及利用撤退的纵队暴露在外的机会来消灭他们了。尽管如此，第三十二军还是遭到了严重削弱，其向喜屋武的撤退顶多将最终

的失败推迟两三个星期而已。6月4日，在汇总了来自各个师团和联队指挥官的报告之后，总部参谋们得出结论，全军残余的兵力大约为3万人，而两个星期前是4万人。日军在首里防线的后卫作战中失去了一些最精锐的老部队。残余规模最大的有组织部队是还有1.2万名官兵的第二十四师团。但是由于重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物资的损失，其战斗效能已经大幅下降。

6月6日，四个美军师（两个陆军师，两个陆战师）沿着八重濑岳和与座岳悬崖向日军主要支撑点发动了试探性进攻。野战炮炸掉那些伸出地面的珊瑚岩，为第713装甲喷火营的喷火坦克清理通道，后者则将火焰喷进周围天然石灰岩洞的洞口。美军在地形稍好的防线东段取得了快速进展，在6月11日夜夺取了被称为“95高地”的一处地块。日军只做了零星抵抗，而且大部分没有组织，但是仍将会有许多美军在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丢掉性命。随着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封闭了敌人日渐缩小的袋形阵地外的包围圈，班规模的小股日军发动了夜间渗透攻击和万岁冲锋。山上的狙击手也要了许多人的命，而当美军在山间快速推进时，友军迫击炮和火炮造成的伤亡也与日俱增。最惨的是“老种子”第1陆战师，他们在6月11日到6月18日一周时间内伤亡了1 150人。

冲绳南部：最后阶段作战，1945年4月—6月



美军在冲绳岛比在太平洋任何其他战场上都更努力地劝说敌人放下武器。劝降对象既包括日本军人，也包括冲绳平民。飞机在日军防线上投下了数十万份传单，其中仅6月12日一天就投下3万份。第10集团军的心理战部门出版了一份日语日报。吉普车、卡车和巡逻艇上都架设了大喇叭，由日裔“美二代”们拿着劝降信朗读播放。电池供电的袖珍收音机还被挂在降落伞上投了下

去，这样日军在山洞里也可以听到美军的广播。和早前相比，这些传单和劝降信写得更好，更聪明，而且更贴合日本人特有的风俗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几个中心思想上：军事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日本军政府腐败无能，日本人必须团结起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使之免于彻底的毁灭。[68]“投降”一词被格外小心地予以回避，改为邀请日本军人“起来反抗，加入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这是走出绝望困境的最好方法”。他们告诉日军士兵，他打得很勇敢，但是现在他已经“竭尽所能，战争结束后还需要他”。[69]

这样的劝降比此前太平洋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在战役最后阶段的喜屋武半岛战斗中，数千名日军士兵双手举过头顶走出了山洞。最令人惊讶的是，整个编制单位的日军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有序指挥下举起了双手——这在传统日本观点看来匪夷所思。这样就形成了滚雪球之势——走进美军防线的日本人越多，想要效仿他们的人也就越多。许多勇敢的日裔“美二代”自愿独自走下洞穴，和敌人士兵面对面说话——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都被关在美国本土的营地里。有些被俘日军甚至愿意返回山洞和地堡帮助劝说自己的前战友投降，他们知道这些人藏在哪里。冲绳战役中总共有约1.1万名日军成为俘虏，包括超过7 000名日本正规军士兵。为了容纳这源源不断的人流，美军的战俘营也越修越大。一名美军中尉惊叹道：“你需要一辆吉普车才能从战俘营的一侧来到另一侧”。[70]

数万名冲绳平民因害怕据说如同魔鬼一般的敌人而跟随日本军队南撤。岛屿南部交战区域附近可能有多达10万平民——平均算来，战场上每有1名日本兵，就会有超过3名平民。太平洋战争中还从来没有哪个主要战场上有如此之多的老百姓，或许只有马尼拉除外。日军常常把老百姓赶出山洞，赶到开阔地上，暴露在

轰炸之下。日军抢走他们的食物，逼迫当妈妈的冲绳人带着哭闹的婴儿离开洞穴，要么就让她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否则他们就会直接下手杀害婴儿。数不清的成人和孩子死在地炮和舰炮的炮击以及空中轰炸之下，或者死在机枪、火焰喷射器和其他步兵武器的交叉火力之中。日军已经下令，只要逮到没有说日语的平民，就要将其当作间谍处死。许多当地老人不会说日语，因此而遭受戕害。一名冲绳人说日本军队把老百姓当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炮灰，“就像象棋里的小卒子”。[71]

美军部队向南前进时，遇到了道路另一边迎面而来的难民长龙——悲惨的人潮，他们绝望、饥饿、肮脏，女人背着孩子，打成捆的衣服或其他财产挑在肩上。不少人嚼着甜菜根。有些人受了伤，手脚并用向前爬。当时16岁的冲绳学生宫城喜久子回忆了那一幕惨剧：“数万人像蚂蚁那样向前爬。他们都是老百姓。老爷爷，老奶奶，背着孩子的妈妈，浑身泥土，迈着碎步向前跑。孩子若是受了伤，就会被丢在路边，扔掉不要了。那些小孩认出我们是学生，就会喊着‘Nei, nei !’——那是冲绳话‘姐姐’的意思，想要我们抱起他们。太可怜了。我至今都时常想起他们的哭声。”[72]

许多冲绳老百姓在接近美军防御阵地时被打死。美军哨兵们都接到命令要向他们开枪，尤其是在夜间，这种时候人很难分清来者是军人还是平民。火光和照明弹照亮了朝北走向美军防线的人群。有些时候日本军队甚至会驱赶着冲绳老百姓在自己前面走，拿他们当肉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杀戮，美军向全岛各处投放了传单，传单上用图画和简单的日语、冲绳语写道：“远离飞机！远离道路！不要靠近弹药库！远离军队阵地！哪怕你只是偶然忽略了上述某个警告，下场都可能会很惨。”[73]第6陆战师的诺里斯·布彻尔回忆说，许多日军士兵穿成平民的样子，甚至化

装成女人，混在成群的平民中溜过防线。“很不幸，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打死他们。许多可怜的冲绳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他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也很难受，但我们也要保自己的命。”[74]第7步兵师的二等兵约翰·加西亚在夜间看到一个黑影穿过一片田地走来，于是开了枪。天亮后，他走过去，发现“那里躺着一个女人，背上绑着婴儿。子弹打穿了她，从婴儿背后穿了出来。这至今仍然困扰着我，阴魂不散。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杀人犯。你在黑暗中只能看见一个人影弯着腰。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个士兵还是老百姓”。[75]但是第6陆战师的查尔斯·米勒却说他的许多陆战队战友会多少有些随意地射杀冲绳老百姓。“这些人会说：‘来了个斜眼睛的，砰砰……又来了个斜眼睛的猪，砰砰！’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76]

而与此同时，许多美军士兵也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救援平民。路易斯·托马斯中尉是美国海军医疗队的一名军官，他驻扎在冲绳北部的名户镇附近。他的医院有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防守。道路上拉起了警戒线。一天夜里，火光中有一大群平民沿着道路走过来。这时一名陆战队哨兵在步话机中呼叫：“不要开火。那是平民。”随后他爬出沙包掩体，跑进了黑暗中。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护卫着一群老人、女人和儿童。“我想不会有人记录了他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有权利授予他金质奖章的话，我们会这么做的，”托马斯中尉回忆道，“那时候，我们都鼓起了掌，欢呼起来，我们对他说他是个伟大的陆战队员。”[77]

日军第三十二军最后的指挥洞穴里挤满了士兵和难民，即便是牛岛将军自己也没有私人空间了。参谋军官们不得不在仅余的少量床铺上轮流睡觉，要么就在脏兮兮的过道上席地而眠。石灰岩洞穴内部又臭又潮，水滴从钟乳石上一滴滴地落到地上。各个山洞中有数百名和部队失散的掉队士兵。许多人神经紧张，两眼

空洞，漫无目的地在山洞中晃动，自言自语。美军飞机在其头顶的山岭上投下凝固汽油弹，上层洞穴中的人纷纷死于烟熏火烧。海岸外的巡逻艇不停地向洞口开炮，直到它们开始一点点地崩塌。一名日本兵回忆道：“当大型炸弹和炮弹在摩文仁悬崖上爆炸时，我们的整个山洞就如同地震那样晃动了起来。”^[78]

牛岛将军的最后几天是一个人在一张小写字桌旁度过的，他读书，借着烛光写嘉奖信，有时还会拿起纸扇给自己扇风。隔壁山洞里的长勇将军则一边拿着大烟斗吸烟，一边读书。6月18日星期一，牛岛将军向他的所有指挥官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他感谢他“挚爱的军人们”尽了职。从此往后，所有人都要听从本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长勇将军在电文后还加了一句附言：“勿受被俘之辱，汝等可永生。”^[79]残余的散兵游勇被告知要争取渗透出美军防线，到岛屿北部去，那里的山区还有日军小股部队在进行游击战。

日军指挥官能听到海岸外巡逻艇上大喇叭播放的要冲绳老百姓投降的劝降广播。有些死硬的军官对此不屑一顾，说“美国人成天胡说八道”。^[80]但是能看到许多平民甚至是军人向海岸外的巡逻艇游过去。6月18日，日军司令部收到了巴克纳尔将军直接写给牛岛将军的劝降信：“阁下麾下的部队打得很英勇，很好，你们的步兵战术已经获得了你们对手的尊敬……比如我，您是一名长期钻研和实践步兵作战的将军……因此我相信，您和我一样明白，岛上所有抵抗的日军不出几天就要毁灭了。”^[81]这封信引来了一阵大笑，牛岛讥讽道：“敌人让我当上步兵作战专家了。”^[82]

三天后，牛岛向东京发出了诀别电。之后他邀请所有的参谋参加最后的宴会。剩下的所有清酒和烈酒都开了瓶，大家共饮告别酒。之后，牛岛和长勇离开山洞，坐在一处俯瞰东海的悬崖顶

上。牛岛穿着全套的军服，长勇将军则穿着白色和服。6月22日凌晨4时10分，他们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腹部，下属军官们立刻举起武士刀砍掉了他们的脑袋。

根据大田昌秀的回忆，美军后来找到了牛岛将军的坟墓。大田看到墓碑上插着一把美式军刀，还用英文涂满了脏话。[83]

南部沿岸的山洞里还留有大约1.5万名日军，要把他们彻底扫除还需要不少时间。小股日军还将一直打到7月，但是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冲绳岛上也不再有了“前线”。所有山洞都用火焰喷射器全面扫荡了一遍，再用炸药炸塌；数千名日军和平民被埋葬其中。在有组织的抵抗结束后的最后八天战斗中，估计有8 975名日军士兵被打死，数千名日本人投降。其余许多人自杀身亡。

16岁的冲绳学生宫城喜久子在一个山洞里躲藏了超过两个星期。6月17日，山洞被炸了，可能是美军手榴弹炸的。喜久子没有受伤，但她的许多同学都受伤而死：

我闻到了血腥味。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被击中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什么都要靠闻。我在下面听到我同学的声音：“我一条腿没了！”“我的手没了！”在老师的要求下，我来到了一片血海之中。护士、士兵、学生，要么当场死掉，要么身受重伤，其中有一人我的朋友胜子，她的大腿根受了伤。我蒙了。洞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旁边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正拼命想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行了，”她小声说，“所以请先照顾其他人吧。”随后她就停止了呼吸。[84]

喜久子和其他几位没有受伤的女孩子设法逃出了山洞。她们爬下悬崖，来到一处布满礁石的海滩上。她们已经严重脱水，头

发爬满了虱子，指甲磨秃了，身上长满跳蚤，浑身都是泥土。这些人浑身发痒，而且几乎就快饿死了。她和其他女孩子相互保证：“如果我不能动了，或者你不能动，我就给你氰化物。”她们每人都留着一枚手榴弹，“就像留着护身符一样”。[85]

在海滩上，他们遇到了好几万人，这一大群人当中既有日本士兵，也有冲绳老百姓。美军巡逻艇就在海岸外，日裔美军广播员用大喇叭高声劝降：“那些会游泳的，游过来！我们会救你们的。不会游泳的，走到港川去！白天走，晚上不要动。我们有吃的，我们会帮助你们！”

但是女孩子们不信这些声音。“自打我们还是小孩子起，我们就只被教育着要恨他们，”喜久子说，“他们会扒光女孩子的衣服，为所欲为，再用坦克压过去。我们真的信了……我们没有搭理那声音，而是继续游荡。我们只是太害怕被扒光了。女孩子最怕的就是这个，不是吗？”[86]她震惊地看到一个日本兵举起双手涉水走下海里，另一个日本兵举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四天后，她被俘虏了。她失去了意识，醒来时在恍惚中看到一个美国兵用枪戳她，示意她站起来。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杀死或者被侵犯，但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其他老百姓都得到了美军医疗人员的照顾。他们的伤口都打上了绷带，还注射了生理盐水。“在那一刻之前，我印象中的美国人都是魔鬼和恶魔。我愣住了。我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87]

回到渡知具湾周围的集结区和休息营地时，这些打得筋疲力尽的美国大兵都认不出那里了。挖土队、施工队和建设队已经令此地面目一新。这座640平方英里的岛屿将被用作历史上最大规模两栖作战的前进基地，该行动便是即将对九州岛发动的登陆战

（“奥林匹克”行动），战役计划发起日是1945年11月1日。第8航空队的B-24、B-17轰炸机和陆军战斗机已经从遥远的欧洲来到此地。在登陆滩头附近的读谷机场，一条7 000英尺长的跑道已经在6月17日投入使用。筑路单位将修建1 400英里新铺设的道路，包括两条纵贯岛屿南北的四车道高速公路，还有其他几条横跨全岛的公路。为了替代被摧毁的桥梁，满足过河之需，工兵们使用了英国人发明的“贝利桥”，也就是活动便桥——一种可折叠的预制钢桁架桥。各个主要机场和补给中心周围的道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卡车、吉普车、拖车和马车。美军不得不派一部分士兵来指挥交通。在嘉手纳机场附近，交通如此拥堵，以至于美军还在其中一个主要十字路口处建设了环岛。数十辆推土机铲平了整座山头，填平了沟壑与河床。冲绳的港口新建了不少栈桥、码头，还用清淤驳船进行了扩建。到6月时，这里单月卸载的货物量已经超过了和平时期纽约港的水平。一份海军基建项目的官方史料给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统计数字：“到1945年底，冲绳的海军设施占地2万英亩[88]，其中建有4 180英尺长的码头，71.2万平方英尺的室内通用存储空间，1 177.8万平方英尺露天存放区，19.3万立方英尺冷库，还有可以存储882万加仑航空汽油、3万桶柴油、5万桶原油以及1.3万平方英尺弹药的堆栈。飞机修理车间占地32.41万平方英尺，普通修理车间占地9.1万平方英尺。医院面积达到33.8万平方英尺，住房面积475.5万平方英尺。”[89]一位“海蜂”工兵说得更加直白：“我们在冲绳的工程量相当于从原始森林上建起一整个罗得岛。”[90]

离前线越远，人们越能感受到军种之间深深的矛盾——从无伤大雅的互相取笑，到带着恶意的指责，到对骂，再到群殴。无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会教冲绳小孩跑到陆军营地外喊：“麦克阿瑟将军吃屎！”（他们骗小孩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给我一根

烟”。) [91] 唯独“海蜂”部队得到了所有其他姊妹军种的喜爱和尊敬。约翰·沃林格中士和另一名陆战队员有一次到一个“海蜂”营地去看能不能蹭一块肥皂。到了那里后，他们意外找到了一个专业的鞋匠。沃林格把自己的靴子给那人看了看，靴子的鞋跟处有一枚钉子露出来了。“他看了下鞋跟，说‘把另一只也给我’。于是他把两个鞋跟都拆下来，换上了新的。他后来问我们吃过了没，我们说反正回到炮位上的时候饿不死，他说：‘跟我来。’他把我们带到了军士长食堂，请我们吃了一顿难以置信的炸牡蛎，这是有些‘海蜂’主动从礁石上搞来的。” [92]

无论从哪方面看，冲绳战役都是太平洋上最可怕的一战，没有之一。美军的伤亡（包括海、陆、空）是太平洋上所有两栖战中最高的一战——48 881人伤亡，其中12 520人死亡或失踪，36 361人负伤。第10集团军有7 613人战死，约3.1万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巴克纳尔将军，他在6月18日被敌人的火炮袭击打死，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死于敌人火力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此外还有2.6万名军人被列为“非战斗伤亡”，其中不仅包括那些患病者，还包括由于“战斗神经症”或“疲劳症”而退出前线的人。 [93] 正如一名美军分析人员发现的那样：“冲绳战役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它充分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动化武器，如坦克、飞机、无线电和卡车，但此战仍然表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所特有的僵持特征和无数死伤。” [94] 美军坦克确实抵消了山洞给日军防御带来的一些优势，但是它们在首里防线上最坚固的堡垒前也一筹莫展，美军所能依靠的只有勇敢、主动、不屈不挠的步兵部队，他们甘愿迎着猛烈炮火冲锋，在肉搏距离上和敌人决一死战。

美国海军遭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沉重的打击：368艘舰船受创，36艘沉没，包括15艘两栖舰船和12艘驱逐舰。海军有4 907

名官兵战死，大部分死于“神风”攻击。海军在冲绳战役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陆军和陆战队——当然地面战的总死亡人数还是超过海军的。

日军地面部队与美军的数量比为1：2，在炮兵、舰炮和空中力量方面更是远远逊于对手。但是牛岛将军的部队还是坚守了近12个星期，给敌人造成了严重伤亡。虽然承受着来自东京和台湾方面关于发动愚蠢反击的持续压力，但日军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原先坚决的寸土不让的防御计划。最后，他们如愿全军覆没，接近9万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战死，1.1万人被俘。

被卷入战争血肉磨坊的冲绳人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死在交叉火力之中，死在炸弹和炮弹之下，无论是意外中弹还是被蓄意杀死；还有许多人病饿而死。和近一年前塞班岛上的情况一样，日本宣传部门警告说任何落入美军之手的老百姓都会比死还惨——同样和塞班岛一样，许多被吓住的平民选择结束自己和所爱之人的生命。由于许多人葬身洞穴之中，无法找到尸体，因此民众的死亡人数只能估算。根据冲绳县政府的数据，9.4万冲绳平民死于战火，其中59 939人死于1945年6月日本军队撤离首里之后。[\[95\]](#)

对于胜利一方来说，占领冲绳带来了巨大的战略优势。这座岛屿距离九州南部的预定登陆海滩不足400英里，为即将到来的登陆日本之战提供了一个集结区和跳板。它还为美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提供了很容易就能飞临日本的基地，并为舰队和两栖部队提供了能够遮风挡雨的锚地。斯普鲁恩斯将军在一年前提出应当占领冲绳时就已经预见到了所有这些优势。对于日本人而言，失去冲绳只是确证了其领导人早已知道的事实——战争已经输了，他们的敌人有能力也有意愿进攻并征服日本本土。

-
- [1]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94.
- [2]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87.
- [3]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 [4] Leckie, Okinawa, p.125.
- [5]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63.
- [6]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05.
- [7]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360.
- [8]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83.
- [9] Appleman et al.,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286.
- [10]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42.
- [11] "Tokyo, Domei, in English, to China and South Seas,"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pril 14,1945, p.1.
- [12] "Tokyo, Domei, in English, to America,"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pril 20, 1945, p.2.
- [13] Toshiyuki Yokoi, "Kamikazes in the Okinawa Campaig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69.
- [14]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9,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78.
- [15]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5, p.59.
- [16]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141.
- [17] Iwao Fukagawa quoted in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214.
- [18] Ohnuki—Tierney, *Kamikaze Diaries*, p.88.
- [19] Ibid., p.69.
- [20] Ibid., p.175.
- [21] Toshiyuki Yokoi, "Kamikazes in the Okinawa Campaig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68.
- [22] Letter from Takeo Kasuga to Shozo Umezawa, June 21, 1945, quoted

in Ohnuki—Tierney, *Kamikaze Diaries*, p.10.

[23]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13,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84.

[24] Ibid., p.595.

[25]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2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94.

[26]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29,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600.

[27] Reiko Torihama quoted in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287.

[28] Shigeko Arak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20.

[29] Chief Ship's Clerk (W—2) C.S.King, oral history,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82.

[30] Dr.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p.6, Manuscript Item 297,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31] H.D.Chickering, commanding officer of LCS(L) 51,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346.

[32] Charles Thomas, crewman on the LCS(L) 35,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0.

[33] "CO USS Aaron Ward comments," in Secre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4: "Battle Experience: Radar Pickets and Methods of Combating Suicide Attacks Of Okinawa, March—May 1945," July 20, 1945, p.81—41.

[34] Fenoglio, Y3C, "This I Remember," accessed April 21, 2019, <https://dd803.org/crew/stories—from—the—crew/melvin—fenoglio—account>.

[35]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110; John C.Munn, oral history, p.81.

[3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9.

[37] 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在口语中的另一层含义是表示愤怒、烦恼或惊讶 , 可理解为“我的天哪 ! ”。——编者注

[38] Ibid., p.417.

[39] Pyle, *Last Chapter*, p.83.

[40] J.Bryan III diary, April 11,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21.

[41] Phelps Adams, "Attack on Carrier Bunker Hill, " *New York Sun*, June 28, 1945, article reprint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2, p.757.

[42]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p.14.

[43] Phelps Adams, “Attack on Carrier *Bunker Hill*, ”*New York Sun*, June 28, 1945; article reprint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2, p.759.

[44] Marc Mitscher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7.

[45]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p.2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46] Dr.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p.8, Manuscript Item 29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47] “大得可怕的洞”是威尔卡茨医生的描述。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p.8, Manuscript Item 29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48] Letter, Raymond Spruance to Charles J.Moore, May 13, 1945, NHHC Archives,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4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93;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23.

[50] Bill Pierce quoted in James Holland, “The Battle for Okinawa: One Marine’s Story,” *BBC History Magazine* and *BBC World Histories Magazine*, accessed May 2, 2019, <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second—world—war/the—battle—foR-okinawA-one—marines—story/>.

[51] William Manchester,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All,”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87.

[5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78.

[53] *Ibid.*, p.253.

[54]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59.

[55] *Ibid.*, p.67.

[56] *Ibid.*, p.83.

[57] Ushijima quo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2.

[58] 尼米兹说：“我认为，在‘奥林匹克’行动中，如果把需要精心计划的两栖

作战阶段交给斯普鲁恩斯，而让哈尔西来负责进攻性的掩护行动，这对国家是最有利的。.....这样一来，两人都将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工作。” CINCPAC to COMINCH, Message 0226, April 5, 1945,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8.金的回复是：“我同意你的观点，登陆指挥应该交给第5舰队的斯普鲁恩斯与特纳这对搭档。” Message 1921, April 9, 1945,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9.

[59]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ne 4, 1945, p.7.

[60] Roy L.Johnson account,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p.245—46.

[61]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0.

[6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308.

[63]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ne 4, 1945, p.7.

[64]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0.

[65] *Time* magazine, July 23, 1945.

[6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36.

[67] Thomas McKinney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86.

[68] “Japanese Radio Plan,” pp.1—2, “Weekl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pril 28, 1945.”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ary to Commander Chief, U.S.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nner Fellers Papers.

[69] Appendix, “Inducement to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Combined Chiefs of Staf, Anglo—American Outline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 Reference A, CCS—539 Series, p.1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nner Fellers Papers.

[70] Frank B.Gibney’s commentary in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99.

[71] Masahide Ota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61.

[72] Kikuko Miyag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57—58.

[73] The leaflet is reproduced in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illustrations insert after p.70.

[74] Norris Buchter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67.

[75] John Garcia,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23.

[76] Charles Miller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73.

[77] Lewis Thomas accoun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p.241—42.

[78]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35.

[79] Ibid., p.137.

[80] Ibid., p.136.

[81] Quoted in Appleman, et al.,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463.

[82]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36.

[83] Masahide Ot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69.

[84] Kikuko Miyag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58.

[85] Ibid., p.360.

[86] Ibid.

[87] Ibid., p.362.

[88] 1英亩 $\approx$ 4 047平方米。——编者注

[89]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p.410,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90] Huie, *From Omaha to Okinawa*, p.214.

[91]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09.

[92]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9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282.

[94]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122.

[95]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2.

第十五章

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白宫的记者室里总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了人民。哈里·S·杜鲁门就是人民。”这位显得多余的中西部人虽然可以站立，但他看起来却比坐在轮椅上的前任还要矮小。他在担任自己的新角色时显得有些尴尬而不自然。当一群人“向老大打招呼”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回应什么样的礼仪，也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敬礼？立正手放两边？和打招呼的人握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三种动作都用上了。一名记者被指派去写一份关于新总统的“有特色的报道”，结果他告诉自己的编辑：“这个人的特色就是完全没有特色。他就是个凡人百姓。你可以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碰见他，在杂货店冷饮柜台遇到他坐在你旁边。像他这样的人得有几百万。”^[1]

杜鲁门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早晨很早就来到了白宫，等着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向他做个晨报。但肯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事，也找不着他们。新总统等了超过一个小时，“都有些不耐烦了”，一个手忙脚乱的秘书这才把白宫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和白宫高级军事顾问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带了进来。这二位收拾起简报文稿匆匆赶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新总统坐在罗斯福留下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桌上仍然摆放着前总统留下的小东西。

立正站好的两位海军将领，开始赶在参联会开会前介绍最近的事项。杜鲁门打断了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坐下来！你们

这样让我很紧张！到有光的地方来，我才能看清楚你们。”于是莱希和布朗拉过椅子坐了下来。杜鲁门看着他们的脸，布朗回忆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在观察他。”[2]

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和随后11点规模更大的参联会会面中，大家很痛苦地发现杜鲁门跟不上趟。他并不清楚战争的进度，无论是欧洲还是太平洋都一样，而且对最近开始和苏联进行的地缘战略博弈也是一无所知。这位新总统很敬业，他读最高机密的报告和备忘录会一直读到眼皮打架。他在日记里称自己在“大白监牢”（他给白宫起的绰号）里度过了漫长的“忙碌的日子”。[3]他常常会对自己不够了解现状讳莫如深，即便在和贴身顾问、军队参谋长私下开会时也是如此。有人注意到杜鲁门不愿意问问题，担心这会暴露他的无知，即便在他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时也是如此。当有人提出行动路线时，杜鲁门常常答复说他已经在考虑这么干了，似乎是不愿让人觉得他只是在照别人说的做。

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逐渐适应了总司令的岗位，而且最终表现得并非仅仅是称职而已。但是在1945年的春夏之际，他的痛苦却与日俱增——而他在这最初几个星期里必须面对的那些决策，恰恰是他整个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

在日记中，比尔·莱希表达了他对于“[杜鲁门]必须承担的战争与和平之重担”的担忧。据莱希儿子回忆，这位海军上将私下里觉得新上司是个“二等选手”。他一直习惯于把想法告诉罗斯福，知道这位总统才是“队长”，而且罗斯福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同意或拒绝他的提议。但是杜鲁门还不具备面对他的顾问时所需要的自信心和独立性。莱希对其他顾问说，杜鲁门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的，这意味着所有向总统提建议的人都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必须绝对确保自己的提议是正确的。[4]

在他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录中，莱希丝毫不觉得自己对新总统相对无知的状况应该负一定责任或是应该为此受到批评。这样一位睿智而且判断力卓越的华盛顿政治家居然如此缺乏自省，颇为令人吃惊。且不论他知不知道罗斯福总统的身体每况愈下，莱希在前总统在世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伴随在他左右，他当然足够清楚杜鲁门随时都有可能坐上总司令之位。莱希是白宫参谋长，参联会主席，他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副总统也能准确了解战况吗？这事他不干，谁来干？在组织良好的政府中，这都是基本的流程，出现这样的重大缺陷，他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莱希对杜鲁门说，自己和罗斯福私交很好，他的死去令自己很“悲伤”。他想要离开海军，也不再担任白宫参谋长之职。但是即便不考虑别的，单纯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杜鲁门也需要他，于是杜鲁门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把战争事务的方方面面扛起来”。在杜鲁门保证将会沿用罗斯福留下的决策流程之后，莱希同意在岗位上至少再多干几个月。[\[5\]](#)结果他这一干就是4年，一直到杜鲁门第一个任期结束。

即便此时已到战争末期，太平洋方面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对日本的陆地进攻是否必要？抑或是用严密的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逼降日本？盟军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沿岸登陆？他们是否仍然需要苏联参战或者想要苏联参战？日本决策层中的“议和派”实力到底如何？有没有办法强化他们？前总统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是否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裕仁天皇是否具备足以结束战争的权力和影响力？——若他具备，盟军是否可以表示允许他保留皇位？这些问题都极其复杂，没有明确的结论。军事计划的制订工作通常都要考虑更高层的国际政策问题。打败日本仅仅是最临近的问题。之后还要在战后的亚洲建立新秩序，这就绕不开苏联对领土的渴求，中国国内革命，和英、法、

荷前殖民地地位等问题。

在5月1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会议中，吉姆·福莱斯特对两位同僚说，现在是时候“对我们在远东的政治目标进行彻底的研究了”。鉴于斯大林不久前在东欧政治独立问题上的看法，他们对苏联在远东的渴望有所警觉也就不难理解了。福莱斯特问：“我们是否想要制衡其影响？制衡点应该在中国还是日本？”如果选择后者，那么美国必须拿出一份计划来重建日本的经济能力和区域地位。在随后的会议中，美国内阁探讨了关于朝鲜、中南半岛（越南）以及中国东北和香港的未来地位的问题。福莱斯特的日记里关于这些讨论的章节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还是第一次直面这些问题。在5月29日的另一次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会议上，三位部长还讨论了杜鲁门总统是否应该发表一次讲话，澄清“无条件投降”的含义，或许还要处理战后日本皇室地位的问题。结果三方一致同意搁置这些问题，因为“此时不适合 [总统] 做此声明”。^[6]

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都认同一点：登陆日本是不必要的，应当避免。他们强调，海空封锁的效果日积月累，一定能够实质上切断日本所有残余的海上运输。一旦失去这最后一点石油、原材料和粮食进口，日本经济就会停转，人民就会挨饿。与此同时，空中轰炸的毁灭性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数百架新服役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正从美国飞往战区，第8航空队的数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正从欧洲移师此地，第3舰队也正准备冲进敌人水域，展开6周的猛烈打击，这将会是对日本城市、港口和公路铁路网发动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载机空袭。

当这些沉重的打击见效时，有人就提出应当出兵登陆亚洲大陆。驻华美国陆军司令阿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写道：“在沿岸建立一个滩头阵地自然会鼓舞中国人，使他们加倍努力和我们一起取得

陆上的联系，由此打通交通线。”[7]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支持夺取上海东南方的舟山群岛，以及长江入海口南侧附近的宁波半岛。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桥头堡，打通一条通向中国重庆政府的交通线，如果时间充裕（尼米兹一名顶级计划人员语），就将“建设更多的机场，把日本炸服”。[8]这一“长汤姆”作战提案一度得到了参联会的支持，并将发动日期暂定为1945年8月。

麦克阿瑟则主张尽早直接进攻日本。他说在中国沿海蜻蜓点水地打几仗只是浪费时间、生命和物资。他还说，单靠封锁和轰炸无法击败日本——他举了日本的盟友德国的例子，德国人在自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后都不肯投降。“日本最强大的军事部门是他们的陆军，只有击败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这一点只有使用大规模地面部队才能做到……和德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击败日本陆军。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战略必须要创造路径和手段，以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让敌我双方的地面部队决一雌雄。”[9]麦克阿瑟从他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告诉马歇尔，他用太平洋上现有的部队能够拿下九州。如果必须进攻本州岛并攻占东京，他就需要来自欧洲和美国本土的援军。[10]

“没落”行动，正如其代号所示，旨在于最终击败德国之后的18个月内征服日本并实现和平。华盛顿的参联会计划部门曾拿出过一个早期版本，在1945年2月马耳他的阿尔戈会议上呈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没落”计划包含两个阶段：一是1945年后期在南九州的登陆战（代号“奥林匹克”），其后是1946年春季向本州岛的进攻（代号“冠冕”）。这两场两栖进攻，尤其是“冠冕”作战，都会令前一年的诺曼底登陆相形见绌。“没落”行动将需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个战区所有部队、所有军兵种联合作战，同时还需要英国和其他盟国军队的支援。向九州发动的进攻将由克鲁

格将军久经沙场的第6集团军负责，他们是打过菲律宾战役的老手。他的部队将辖有两支陆军加强军，以及由三个陆战师组成的第三个军；他们将同时在九州岛东部海岸的宫崎、南部的有明湾，以及西海岸的串木野登陆。决定性的第二阶段“冠冕”作战将指向人口密集而且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关东平原。艾克尔伯格将军的第8集团军将担任此次进攻的前锋，其部队将在相模湾北端的滩头登陆。将有不少于25个师参加“冠冕”进攻，此外还会根据需要更多增援部队投入作战。假如向东京发动的压倒性钳形攻势没能让日本投降，盟军就将占领其首都——然后以此为中心向所有方向展开进攻，一个府一个县地扫清有组织的抵抗，直到整个国家认输并臣服为止。

按照1945年3月下旬参联会敲定的第一版时间计划，“奥林匹克”登陆战将在1945年12月1日打响，“冠冕”登陆将在1946年3月1日发动。根据尼米兹的建议，考虑到冬季风暴给舰队带来的危险，“奥林匹克”行动的计划发动日期将提前到1945年11月1日。^[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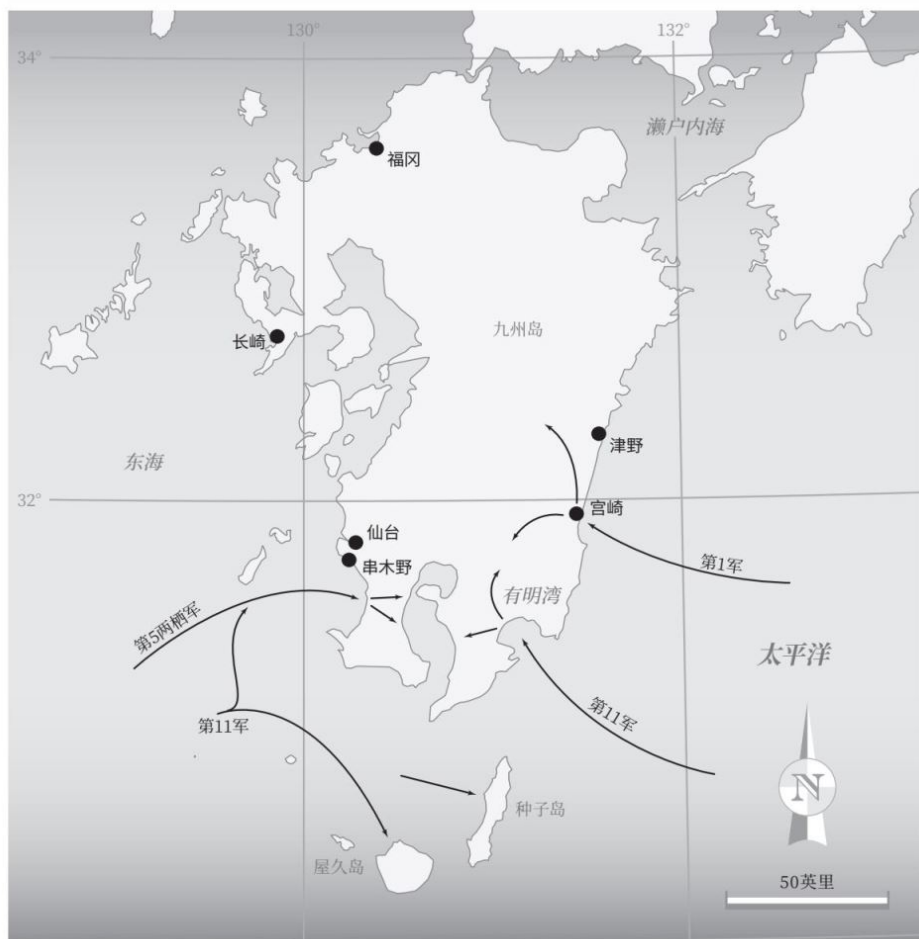
此时，参联会还有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没能解决，那就是统一指挥问题。和所有的两栖作战一样，“没落”行动同样需要空中、地面、海上三方面力量持续而复杂的协作。但在1945年春季，太平洋上各军种之间的内讧和争斗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两位战区总司令之间的个人沟通在热天里也令人脊背发凉。4月，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在马尼拉和关岛的司令部，结果两人都婉拒了。^[12]尼米兹战区的最高陆军指挥官理查德森将军请求前往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开会。但尼米兹未予批准，理由是他想要先解决好眼下的谈判。^[13]一个星期后，尼米兹屈尊飞往马尼拉，听人介绍了麦克阿瑟关于“没落”行动的计划草案。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提出要接管冲绳岛和琉球群岛

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所有陆基航空兵。尼米兹不干了。他随即飞回关岛，要他的幕僚们拿出一份海军自己的“没落”行动两栖作战阶段的计划，只在必要时向麦克阿瑟“征求意见”。[14]

尼米兹在他关岛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挂了一张麦克阿瑟的大幅相片。访客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为了表示敬意。但当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问他为什么要挂这张照片时，尼米兹笑着答道：“莱顿，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变成浑蛋。”[15]

4月13日，人称“麦克阿瑟右手”的萨瑟兰将军来到关岛，提出对太平洋战场指挥结构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方案。他说，跨军种的战区指挥官制度已经显示出是一种不适用的“陈规陋习”。麦克阿瑟想要指挥整个太平洋上所有的陆军部队，包括尼米兹控制的那些岛屿上的守军。而尼米兹可以接管第7舰队，这支舰队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归属麦克阿瑟管辖。每个军种都要承担自己下辖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职责，而无论部队位于何处。萨瑟兰还补充说，冲绳战役之后，“就不能再有陆军部队放在海军将领辖下了”。[16]

计划中的九州登陆战役“奥林匹克”，计划发起日期：1945年11月1日



麦克阿瑟的提案意味着陆海两军的“友好分手”，但这需要进行复杂的行政改组，会在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战役的筹备阶段消耗参谋人员的大量精力。此事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才能定夺。正如莱希后来说的那样，“太平洋战场的指挥问题是那种就算做出一连串‘协议’也安稳不下来的事情”。[\[17\]](#)参联会判断这是避免陆海两军公开决裂的唯一途径，于是下达了必要的指示。麦克阿瑟

领到了新头衔“太平洋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缩写为“COMAFAPAC”。在一份发给麦克阿瑟的“严禁外传”的电报中，乔治·马歇尔将军提到，关于陆海两军的分歧“国内出现了大量最为不利的谣言和非议”，他要求新任COMAFAPAC“做最大努力压制下级中的这种致命议论，我在这里也会下重手做同样的事”。

[18]

然而未等这个问题解决，“没落”行动的指挥关系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口角。尼米兹想要保持他的部队自从1943年11月“电流”作战以来一直沿用的指挥模式：进攻部队在海军指挥下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在建立岸上指挥所之后再接管指挥权。[19] 麦克阿瑟不仅对此一口回绝，甚至拒绝讨论，坚持要把此事提交参联会裁决。海军还提议，在开赴登陆滩头的过程中和登陆的最初阶段，由海军负责“陆海军所有宣传事务”，麦克阿瑟对这一提议格外愤怒。[20]

在华盛顿，此事似乎陷入了僵局。马歇尔直白地告诉金，他俩对于“没落”行动的指挥结构“观点显然完全不同”，他坚称参联会应该立刻选择“一位对此次战役承担首要责任的指挥官”。[21] 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自明。如果下一次参联会会议上无法就此达成一致，那就必须提交美国总统裁决。随着太平洋上的两路进攻大军逐渐向日本会合，再保持两个战区指挥官平起平坐就越来越难了。麦克阿瑟的资历比尼米兹老，他的公众人气和声望也无可媲美。罗斯福当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人，而现在的杜鲁门则是个陆军老兵。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弱点之后，金退让了。于是参联会下达命令，指定麦克阿瑟承担“没落”行动的“主要责任”，但为了保全海军颜面，尼米兹或者其指定的舰队指挥官将在战役的两栖登陆阶段拥有较大的自主行动权，甚至是独立行动权。[22] 原计划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的“长汤姆”方案被取消。

1945年4月接掌日本首相大权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男爵是个77岁的老头子，耳朵听不清，还常常在开会时打瞌睡。他早就从海军退役了，此前干了近10年的侍从长，和裕仁天皇的私交很好。在1936年被挫败的“二二六”政变中，他被子弹击中，差点死掉。铃木和天皇二人私下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新政府必须找到办法结束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接受盟国苛刻的条件。他们同意，一旦时机成熟，天皇就将发布“诏书”以结束战争。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对军队造反、刺杀甚至内战的风险心知肚明。如果政府被推翻，那么和盟国和谈的机会就将丧失，日本也将万劫不复。从某种意义上说，议和派关于结束战争的密谋必须保密足够久才能成功。铃木在上一次刺杀事件中险些丧命，因此对这一点更有切肤之痛。正如理查德·B·弗兰克在他研究太平洋战争结束过程的著作《没落》一书中所写：“掌控日本命运的这一小群人对于来自内部的致命威胁的意识，是理解其动机的钥匙。”^[23]

重组后的日本内阁代表了整合各派势力的一次尝试，而这各派势力在围绕战争与议和的根本方针上却正陷于僵局之中。暗地里推进议和的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坐海军大臣之位。陆军大将阿南惟几则是作为陆军大臣入场，他的入场是为了安抚东条英机和其他陆军中占主导地位的“统制派”强硬分子。前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此时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在此任上他将会和阿南惟几及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一起组成主张“坚持战斗”的强硬派核心圈子。前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他先得到了许诺，可以自由推进让日本在一年内退出战争的计划，之后他才接受了这一任命。

日本政府的主要决策部门仍然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巨头”，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所有这些人。但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刚刚进行了一项新的重要改革：参会人仅限于上述六人，不允许顾问人员和较低级别的军官在场。“六巨头”将举行密室会议，再加上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和天皇本人，总共八人参会。正是这八个人将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几个星期里通过激烈争议而达成共识——可能还有另外10人到15人也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

达成共识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在此之前，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为了形容这一集体决策的痛苦过程，日本人用了一个古代园丁的术语——“根回”。意思是把一棵成年大树的所有树根全部从土里挖出来，以移植到其他地方。每一条树根都要从地面下挖出来。这是一项极易出错、必须小心处理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一旦出错，树说不定就死了。“根回”这个词解释了为什么像米内光政海军大将这样令人敬畏的政治家、前首相，从1944年加入政府以来一直领导着秘密议和派，却无法向自己的同僚直白地表达主张。即便在纳粹德国战败，日本显然也注定失败的情况下，米内发现，“对于我而言，我想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还是很难向任何人提起结束战争的话题”。即便是对铃木，他也只能“抽象”地说：“我想我们这样是持续不了多久的。”^[24]

正是这样的制度缺陷导致日本在1941年做出了发动战争的不理智决定，如今又使其无法做出结束战争的理智决定。东京并没有真正的责任中心，权力被拆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军事部门和政治机构中。陆军和海军的领导人实际上只是橡皮图章，他们完全可以被军衔更低的年轻军官操控、罢黜、替换，甚至刺杀。从战争突然转向议和，需要得到广大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的服从，包括两大军种的中层军官们。而根深蒂固的意见分歧和长期

以来的叛乱威胁，解释了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所称的“从政府最高层承认失败到最终投降之间长得反常的时间”。[25]

根据米内的建议，铃木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秘书长准备一份关于日本整体经济和战略处境的调研报告。这份名为《国家资源调研，1945年6月1日—10日》的机密报告在6月6日提交。其结论一反常态地直白扼要——不仅仅战败不可避免，而且国家经济正走向崩溃，日本领导人也正在失去人民的信任。统计数据展示了船运的损失，生产的下滑，原油储备耗尽，铁路运输中断，粮食供应日益恶化。由于冲绳即将失守，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海上航线将遭到严重威胁，整个工业体系都将陷入停顿。消费品短缺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粮食状况将在1945年底到达危急状态，“国家部分偏远地区将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关于军事状况，所有剩余的作战飞机都将被用作“神风”自杀机，但是关键的航空汽油短缺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而且，即便自杀飞机和自杀潜艇能设法击沉美军进攻舰队的1/4，“也很难通过海上歼敌来挫败美军的进攻计划”。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军舰队和航空兵的压倒性力量，而且还警告说“派往西欧战场的约60个师中，一半左右会被调过来对付日本”。[26]

“六巨头”中三名强硬派之一的丰田海军大将后来告诉美军审讯人员，这些统计数字证明日本的战争潜力正在持续锐减。然而，他说，屋子里没人有勇气提出日本要根据盟国的条款接受失败。“在那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成员都很难提出我们应当求和，”丰田如是说，“因此决议就成了必须做些什么让战争持续下去。”[27]既然有那么多根须要一根接一根地从地下挖出来，那自然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被夹在寻求和平与坚持战争两股力量之间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选择了两边一起发力。会议一致同意采取首鼠两端的“基本政策”。陆海两军将动员力量，准备全

力以赴进行本土防御作战。外务省则将请求苏联出面作为中介，组织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和平谈判。6月8日，裕仁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他在内阁达成一致后通常都会批准其决议。

“决号”作战，也就是日军击退盟军本土登陆的作战计划，在铃木政府上台的当周面世。其要义在于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国家剩余的所有军事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进攻。“决号”计划要求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组建，主要是新建陆军师团和动员预备役陆军师团；将部队部署到最有可能成为登陆地点的区域；在预计的登陆海滩后方建造海岸防御设施；以及向盟军舰队发动规模空前的“神风”突击。这份计划正确地预料到进攻将在1945年阳历年底前到来。日本人也准确判断出第一轮登陆将落在南九州，1946年春季还将有更大规模的进攻落在关东平原和大东京地区。

在不久前的1945年1月，日本国内只有11个完整的陆军师团。4月至5月美军部队拿下冲绳大部之时，日本陆军开始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调回部队，并在本土新建师团和召集预备役师团。到1945年7月，通过两个阶段的动员，日本本土已经部署了30个一线战斗师团，24个海岸防御师团，23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战车旅团，3个步兵旅团。^[28]与此同时，日军部队被集结到预计将会承受盟军下一轮突击的九州岛上。到7月底，岛上已经有15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独立战车旅团，和2支海岸防御部队，总兵力超过80万人。由于军火短缺和生产下滑，这些部队并非全都拥有合适的武器和装备。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能抵御轰炸和炮击的山洞和地堡内存储弹药，日军还是估计一旦战役持续超过数周，九州许多日军一线部队的弹药就会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东京方面还付出很大努力来组建、武装和训练民兵。所有15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和17岁至40岁之间的女性都被

编入了这些地方战斗团体，其官方统计人数最高达到2 500万人。许多人手中的武器只有长矛或是能用作武器的家用品。每个民兵都被要求在战死之前消灭至少一个入侵的强盗。这样的备战有一个新的全国口号：“一亿玉碎。”^[29]

1945年6月上旬之后，日军航空兵就基本放弃了对美军空袭的抵抗，转而把他们残余的飞机保存起来，用于最后的决战。7月，日本本土列岛各处存储了大约9 000架飞机，显然这所有的飞机都是要拿去当作“神风”机撞向美军进攻舰队的，包括教练机在内。日本的航空工业被要求在9月底前再拿出2 500架飞机来用于此目的。飞行员的训练被简化到了最低程度，许多未来的“神风”飞行员除了起飞和做些基础的空中机动之外什么都不会。鉴于航空汽油储备耗尽，大部分人都将待在地上，坐等着最后一次起飞出击的到来。

美军对日军机场的轰炸和战斗机扫射一直没停，大量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但是美军也没别的办法来对付“神风”的威胁了。有不少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敌机”实际上只是胶合板做的假目标，真飞机都被分散藏了起来。美军的炸弹可以把跑道炸得坑坑洼洼，但是“神风”自杀机只要能起飞就行——它们完全没打算返航和降落——因此它们只要有一些最简陋的土质跑道就够用了，这些跑道修复起来又快又便宜。在攻击九州岛外的进攻舰队时，“神风”特攻队将拥有两项在冲绳战役中不具备的战术优势。首先，飞行距离很短；其次，攻击机可以从整个岛屿各个不同的机场起飞，这意味着它们将能够从不同方向同时飞向进攻舰队。此外，日本海军还将投入大量资源制造自杀潜艇和自杀快艇，以及能够从山顶起飞的自杀滑翔机。计划目标是摧毁美军进攻舰队的1/4。即便未能达到这一预期（这几乎是肯定的），“神风”攻击也确实有望在九州外海让盟军比在冲绳外海时失血更多。

虽然日军已经开始向九州投入大量增援部队，但他们不能认为盟军第一轮进攻一定不会落在本州岛的东京附近，以及本州岛北部或四国岛这种更远的地方。“决号”作战也制定了应急预案，以调动部队去迎战可能从任何地方上岸的登陆部队。一旦需要，日军就会通过沿岸的海路和铁路运输部队，但是考虑到日本的运输系统正持续受到打击，再加上迫在眉睫的燃料危机带来的大量困难，地面部队的机动将会受到很大限制。如果必要，增援部队将步行越野行军，就像武士时代那样。按照日本大本营的估算，一旦美军越过九州岛直接在关东平原登陆，日军将要花费65天才能将援军从九州岛调集到名古屋，之后再花10天送他们上战场。如果这些援军要耗费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参加战斗，那他们能否及时赶到并救援首都也就很值得怀疑了。[30]

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央的司令部与外围区域可能会完全失去联络。由于预见到基本的指挥控制体系被摧毁的情况，日本陆军被重新编组为半自主的区域指挥架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军分别负责日本的北部、中部和南部。文职政府体系也去中央化，县级政府获得了更高的地方自主权，这样他们就能对付食物短缺和交通中断带来的地方性危机了。日本此时正滑向灾难——B-29的空袭日益猛烈，海上交通线基本瘫痪（即便是濑户内海和日本海也受到严重影响），供电网络濒临崩溃，燃油储备耗尽，饥荒已近在眼前——鉴于此，谁也不知道日本是否还能打一场集中指挥的本土防御战。

铃木政府的第二条“路线”，争取和谈，由东乡和外务省负责协调。他们犹疑不定地通过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和私人关系，以及通过天主教会做出了和平的试探。盟国的情报机构跟踪并报告了这些行踪诡秘的探子的举动，并正确地判断出他们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充分而确定的支持。[31]他们还计划在中国停战，请求蒋

介石的国民政府充当中介，和盟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和谈，结果自然也是无疾而终。

莫斯科一直是东京方面外交工作的焦点。日本愿意放弃在40年前日俄战争中赢得的大部分（或许是所有）土地和商业特权。作为交换，它希望能从西伯利亚获得原油和其他急需的原材料，并保持自己作为东亚一个独立“缓冲国家”的地位，以平衡苏联和英美势力之间的利益。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包括其中的强硬派）的支持下，日本政府正式提请克里姆林宫协助安排停战，并与盟国议和。这些请求同时通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和苏联驻东京大使提交了出去。日本人请求苏联人允许一个外交特使前往莫斯科——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他从1941年起就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苏联人听到了日本人的哀求，他们没有给出令人振奋的答复，但也没有立刻回绝。斯大林的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似乎是抽不出身来解决此事。他根本见不着人，会面被推迟，改期，然后再推迟。莫洛托夫请日本大使佐藤尚武拿出一份更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来。他告诉佐藤，待他和斯大林从德国波茨坦的同盟国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上回来后，苏联就会答复日本的请求。日本人不知道，也没想到苏联人已经确定要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斯大林已经确定，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的日期是德国战败后三个月。苏联领导人拖着日本人没完没了的外交往来又不给结论，目的就是争取时间，把部队从欧洲调过来。6月至7月间，苏联的部队、坦克、大炮被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运往东方，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这一富有斯大林特色的举动的要点在于，他的国家要加入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以求以轻微代价获取胜利。

在6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裕仁给出了他站在议和

派一边的最明确的信号，他说：“我要的是结束战争的可行计划，不要受现有政策拖累，你们抓紧研究，落地执行。”^[32]他想要知道近卫公爵赴莫斯科的时间。近卫后来告诉美国审讯人员，他得到了“天皇暗地里的直接指示，要不惜代价取得和平，即使条件严苛”。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秘书长的回忆，铃木和东乡都同意，如果克里姆林宫拒绝协调议和，他们就会直接向美国求和。^[33]

然而，除了向苏联发出态度含糊的求援外，东京各派势力尚未达成任何共识。军部不想再忍受任何和谈的路线。日本政府的公开政策是死战到底，其外交活动则是严格保密的。铃木首相的公开言论仍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和充满斗志。关于投降的想法都是过街老鼠，即便议和派人士都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日本统治层中有些人私下里已经意识到日本将被迫放弃其所有海外占领区，但其他人还希望能保住这个国家几十年前就吞下的土地，包括朝鲜和台湾岛。军方高层愿意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回军队，甚至急于这样做——但他们想要在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撤离部队，而不是在缴械投降后被遣送回来。至于不打一仗就让盟国占领军登上日本国土的想法，任何日本领导人都觉得这种耻辱的方案只会招来刺客的眉心一枪。即便到了这个时候，1945年夏季，日本的统治者们都还没能充分意识到他们已不可能把时钟拨回到1941年，或者是1937年、1931年，甚至是1905年。他们想要停战，但还没准备好面对彻底失败的残酷现实。

对于在西太平洋巡弋的美军潜艇来说，1945年春季是个淡季。随便什么类型的日本船只都已所剩无几。“想要闯回本土的满载物资的肥肉船队不见了，”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查尔斯·洛克伍德中将写道，“那些堆满了军火，敌军都挤到栏杆上的从

敌人本土南下的巨型运输船也消失了。”[34]击沉战绩大跳水。4月，19艘潜艇使出浑身解数也仅仅击沉了总吨位66 352吨的18艘敌人货轮，以及13 651吨的10艘军舰。到了5月，战绩又下跌到30 194吨的15艘商船和4 484吨的5艘军舰。[35]仅存的少量目标大多出现在法伊夫将军的苏比克湾司令部的辖区内——包括爪哇海、暹罗湾和中南半岛近岸。美军潜艇开始越来越多地猎杀这些水域中无处不在的破旧的小型拖网渔船、帆船和舢板。其中大部分装载的是大米、谷物、水产、咖啡、糖和盐等不受管制的物资，船员也常常是中国人、泰国人，或马来亚本地人。但他们是在前往日占区的港口进行沿岸贸易，这就足够宣判其死刑了。在1945年7月马来亚东部沿岸的一次巡逻中，潜艇“鲑鱼号”用甲板炮击沉了63艘小艇。大部分时候，艇长威廉·哈泽德会在开火前向船员发出警告，允许他们离开船只，坐上救生筏和救生艇，但也不是每次都如此。

眼见单靠破交巡航已难有斩获，潜艇部队便开始投入密切配合盟军其他部队的新任务中。在硫黄岛和冲绳岛战役期间，潜艇部队成了多面手——在日本沿岸侦察，击沉敌人哨艇，对“神风”攻击进行早期预警。他们侦察敌人雷场并在海图上标绘出来，同时自己也在敌人航运的必经之路上布雷。[36]潜艇的技术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到1945年春季，美军潜艇装备了新的声呐和雷达系统，这令它们成为更加致命的猎手，新型无线电收发设备使得它们即便在下潜状态时也能收发信息。洛克伍德和李梅两人的办公室在关岛上相邻，他二人为了提高被击落“超级堡垒”机组人员的救援成功率而进行了协作。到1945年2月，每次B-29出击时，其航线沿途都会直接部署至少4艘潜艇。这些艇员自称为“救援联盟”。虽然救援流程的改进速度从来无法令洛克伍德和李梅满意，但总归是在不断改进。到6月，“救援联盟”的

潜艇艇员们已经能够用无线电和在上空巡逻的“小飞象”——海军的搜索救援飞机——直接配合了。[37]

日本最后一条还算畅通的海运线位于日本海上，是日本本土和朝鲜、中国东北这些关键占领区之间的“后门”。自从1943年9月莫顿的“刺鲛号”在此地被摧毁之后，一直还没有美军潜艇试图进入这片四周大部封闭的边缘海。在此期间，日军升级并强化了其三个主要出入航道的反潜防御。海域北部狭窄的拉彼鲁兹海峡和津轻海峡有飞机和小型舰艇进行密集巡逻，还有岸炮把守。九州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宽40英里，但是有一股强大的暖流常年穿过海峡向北流动，这是全世界雷场最为密集的水道之一。洛克伍德对新的调频声呐系统很感兴趣，这种技术有可能帮助潜艇穿过对马海峡的雷障，到1945年，它已经足够成熟，看起来值得拿出来冒冒险了。在夏威夷外海的模拟雷场进行了几轮测试之后，洛克伍德把这个想法兜售给了金和尼米兹。这次行动被称为“吵闹”计划。

1945年6月4日，一支9艘潜艇组成的“狼群”溜进了对马海峡。它们编成三组，每组三艘艇，以略有不同的航线穿过四层雷障。各艇保持在150英尺以下的深度，声呐设备向上“观察”漂雷的位置。当各艇闪躲着调频声呐显示屏上那些鬼影般的暗淡图案，在钢质雷索的森林中穿行时，每一秒钟都如同一分钟那么长，一分钟则如同一个小时。“飞鱼号”在水下潜航了16小时，几乎达到了蓄电池电量的极限，艇员们则在氧气不足的局促艇体内喘着粗气，汗流浹背。[38]一根雷索从“黑鲔鱼号”侧旁擦过，发出的声响所有艇员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会把水雷拉下来，将潜艇炸成碎片吗？一名水兵在日记中记录道，“黑鲔鱼号”上的艇员紧张到了“一枚硬币掉在甲板上，都会让所有人吓得跳到天花板上”。[39]

所有9艘潜艇全都安全进入“裕仁的私人澡盆”中，开始了三个星期的大肆猎杀，总共击沉了54 784吨的28艘船只。^[40]此时日本的战时经济已濒临崩溃，承担不起这些船只损失。6月19日，“北梭鱼号”在富山湾被日军护卫舰“冲绳号”和一队小型巡逻艇击沉。其余8艘艇则安然无恙，冲刺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离开这片封闭海域。两年前，“刺鲛号”正是在这北方的海峡里迎来了末日。它们的战术是所有潜艇集中在一起水面航行，用甲板炮击退任何前来拦截的日本驱逐舰或巡逻机。但是6月24日，一场适时降临的浓雾遮蔽了它们的高速水面冲刺，令其没有遇到任何敌人。随后它们直接开返珍珠港，7月4日抵达。大家为“北梭鱼号”及其艇员默哀，但是28艘的击沉战果还是可以接受的。洛克伍德还想再来几次，不过“吵闹”计划的战绩已是太平洋潜艇部队在战争期间的巅峰了。

为了支援进攻冲绳之战而在九州上空飞了数以百计的战术任务之后，李梅的B-29机群又恢复了对日本城市和工业的战略轰炸。规模愈加庞大的“超级堡垒”空中舰队又杀了回来，向大东京和名古屋地区的飞机工厂，以及大阪、川崎、神户和横滨残余的工业区再次发动空袭。面对着原材料的短缺和毁灭性的空袭，日本人基本放弃了补充飞机损失的指望。对城市中心区的无差别火攻再度到来，而且愈演愈烈。4月13日，东京西北部遭到327架携带混装燃烧弹和500磅通用炸弹的“超级堡垒”的攻击。这次市民们知道了应该逃离而不是留在原地救火，因此伤亡人数比3月9日至10日大空袭那次要少，但是轰炸对城区的打击却别无二致：11平方英里的城市被烧成白地。两天后，又一场大规模空袭攻击了东京南面的川崎市，摧毁了大部分市区。此时东京已经大部分被烧毁，但是“超级堡垒”还将数次攻击日本的首都。5月24日，500架轰炸机在白天轰炸了东京南部和中部的城区。两天后的夜

里，5月24日轰炸的余火尚未燃尽，又一次大规模空袭便再度向东京皇宫外围银座和日比谷的高级商业区和居住区投下了3 252吨M-77炸弹。

经过7次大规模燃烧弹的轰炸之后，东京已经没什么可炸的了。这座大城市的一半面积，大约57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了灰烬。城市人口锐减了大约50%，无家可归的难民还将继续离开城市，直至战争结束。

3月底，第313轰炸联队开始向日本港口和内河航道空中布雷，这场战役被名副其实地称为“饥饿”作战。李梅起初十分反对执行这一新任务，觉得这又要耽搁他主要的战略轰炸计划——然而空中布雷最终被证明是B-29最富成果的运用方式。在最初一个星期的行动中，轰炸机向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下关海峡投放了数百枚水雷。雨点般的水雷突然落在这一航运要道上，让日本人大吃一惊，他们根本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美军投下了多种水雷——音响水雷、磁性水雷、压发水雷——并使其下沉到不同的深度。日本的扫雷舰艇不堪重负，它们缺乏足够的设备和技能，只能找到其中一小部分水雷。有些水雷还安装了巧妙的智能起爆装置，包括延时器和计数器，等到指定数量的船只通过之后才会起爆。压发水雷的战斗部由经过船只引起的流动水压引爆，扫雷器完全无法探知，日本人称其“不可扫除”。[\[41\]](#)

4月至5月间，第313联队的“超级堡垒”在濑户内海的所有主要水道，吴港—广岛锚地，佐世保军港，东京、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的港口，丰后水道，以及日本西部的各个主要港口都布了雷。日军扫雷舰艇在下关海峡的扫雷工作初见成效时，一批批的B-29又飞来向这里雨点般投下数千枚新的水雷。这一攻势有效封锁了濑户内海西侧这一关键通道。在愈加深重的绝望之下，日本商船的船长们试图强行冲过雷场，并祈祷自己好运。结果许多船

只就这么消失在了巨大的白色水柱中。

“饥饿”行动最终向日本海域布设了超过1.2万枚水雷。虽然这一行动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太平洋战争的最后5个月，但它总共击沉或打残了125万吨船舶，占整个战争中日本船只损失的9.3%。布雷任务通常在夜间进行，飞行区域也没有强大的高射炮部队保护。因此在1 529架次布雷飞行中，只有15架B-29未归，损失率低于1%。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人员总结认为，这一致命的行动应当更早启动，权重也应该更大：“在针对敌人航运的所有作战形式中，布雷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是最经济的。”^[42]

随着增援飞机从中国和美国不断飞来，第20航空队也在快速壮大。到7月，它已拥有5支联队，超过1 000架B-29，总人数8.3万人（包括飞行机组、管理人员和地勤保障部队）。第58轰炸联队在第20轰炸机司令部解散后从中国和印度飞来，在提尼安岛西部机场重新开张。新成立的第315轰炸联队从新建成的关岛西北机场起飞作战。由于装备了新型AN/APQ-7“鹰”雷达系统，第315联队的“超级堡垒”针对日本最大的石油精炼厂、储油设施和输油管道进行了一系列精确打击。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机组人员单单依靠雷达就能够以致命的精度击中目标，即便在密不透光的云层上也可以。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六个星期里，“全力尽出”的对日空袭每周都要进行两三次，每次出动的都是由六七百架“超级堡垒”组成的巨大轰炸机群。飞行员查尔斯·菲利普斯如此记述战争末期的这些轰炸任务：“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城市并把它夷为平地，无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无论是目视投弹还是用雷达。”^[43]

地面的保障和维护体系也大幅改善。曾经麻烦不断的莱特R-3350发动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从250小时增加

到750小时。折返率降到10%以下。P-51“野马”战斗机也从新占领的硫黄岛基地起飞，加入向北驶去的B-29机群中。它们能轻易屠灭爬上来迎击来袭机群的日军战斗机，双方的累计空战交换比达到了约8：1。自从6月中旬之后，美军机组人员就很难再看到日军截击机了。B-29每次任务的损失率降到了1%以下。到战争结束时，李梅骄傲地宣称，从统计数字上看，在日本上空飞一趟轰炸任务比在国内飞一趟训练还要安全。

7月1日，第3舰队再次出海，保持无线电静默，向北开往日本。这支舰队拥有105艘舰艇，包括17艘航母和8艘战列舰，编成三支特混大队。这支舰队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支海上打击力量都要强大。它的任务是攻击日本本土列岛，向本州岛和北海道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打击当地的城市、工厂、码头，以及航运和运输设施。它还将攻击日本北方那些远在B-29作战范围外的“处女地”。此番它力争彻底消灭东京湾和濑户内海各处锚地里的日本舰队残余。哈尔西将军和他的舰队将要在海上停留数周，依靠在预定时间和坐标前来会合的后勤船只和油轮来加油装弹，然后一次次杀回来，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火力空袭日本本土列岛。

7月10日拂晓前，舰队开到了东京东南方170英里外的起飞点。第一轮战斗机扫荡令日军完全措手不及。在大东京地区上空这漫长而激烈的一整天空行动中，美军舰载机向工业设施、码头、桥梁、电站和机场投下了454吨炸弹，射出了1 648枚火箭弹。没有日军战斗机起飞迎击，倒是高射炮火击落了10架美军飞机，另有5架飞机毁于事故。[\[44\]](#)

退回到浩渺的太平洋上之后，舰队向北疾驰，接着原路返回，突然出现在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南部，这里还从来没有吃到

过敌人的炸弹。舰载机横扫了这一区域的诸多港口，向锚泊的船只投下了炸弹、射出了火箭，返回的飞行员们宣称摧毁24艘船只，击伤无数。他们还摧毁了翼尖挨着翼尖停放在日本北端机场上的飞机，击毁了许多弹药库、大楼、无线电台、工厂和仓库。还有一部分飞机攻击了铁路设施，破坏了编组站，炸毁桥梁，将火车头和车厢碾为齑粉。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由一套跨越海峡的火车轮渡体系相连。舰载机飞行员们击沉了4艘火车渡轮，还有几艘中弹后被迫搁浅。光这一天的作战就使得从北海道运往本州岛的煤炭量下降了50%。[\[45\]](#)这天的天气不适合飞行，多雨，多云，能见度差，许多空袭都被取消；但是第38特混舰队还是设法在日落之前完成了871架次出击。[\[46\]](#)据拉福德将军的说法：“实际上没有遇到空中抵抗。”[\[47\]](#)

7月15日迎来了战争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舰队第一次炮击敌国本土。拂晓时，一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开到一座大型炼钢厂所在的釜石市近海，向炼钢厂开火。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打出的16英寸炮弹将铸造厂和高炉化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天，另一支水面舰队炮击了北海道室兰市的日本钢铁公司和轮西冶铁厂。“密苏里号”战列舰也加入了炮击室兰的战斗编队，这令哈尔西得以坐到“前排佳座”来观赏这场“壮观的大戏”。[\[48\]](#)大火还蔓延到邻近的钏路市，烧毁了大约20个街区。根据“米克”卡尼的说法，他们完全没见到敌人的飞机，岸炮零星的还击也软弱无力。对此，他的结论是，日本肯定快要完蛋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列舰开到沿岸任何能炮击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无力做出有效的抵抗。因此很明显，我们打或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49\]](#)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日军的海岸侦察已近似于无。美军潜艇和舰载机击沉了他们的大部分海岸哨戒舰艇。他们的巡逻

机和飞行员也所剩无几。“他们一派出飞机来侦察舰队，我们就把他打下来，”“贝劳伍德号”第31战斗机中队的“地狱猫”飞行员阿瑟·R·霍金斯回忆道，“第二天他们又会再来。他们把他派出来，如果他回不去，他们就知道舰队在这里。”^[50]美军发现自己即便在日本海岸外目力可及之处行动都不会受到打击，便不再费力隐蔽行踪了。“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霍金斯说，“天上根本没有敌机。我们就改为轰炸，飞过去后投下炸弹，然后在周围盘旋，扫射地面上的人。”^[51]

7月16日，第38特混舰队退向东边，和加油船及后勤大队会合。这支庞大的舰队靠在舰队油轮侧旁，“喝”下了379 157桶燃油。同时还有6 369吨弹药和1 635吨补给物资从仓储船送进了舰队的弹药库和贮藏室。整个补给过程只用了大约18个小时。拉福德将军称此为“公海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后勤壮举”。^[52]此言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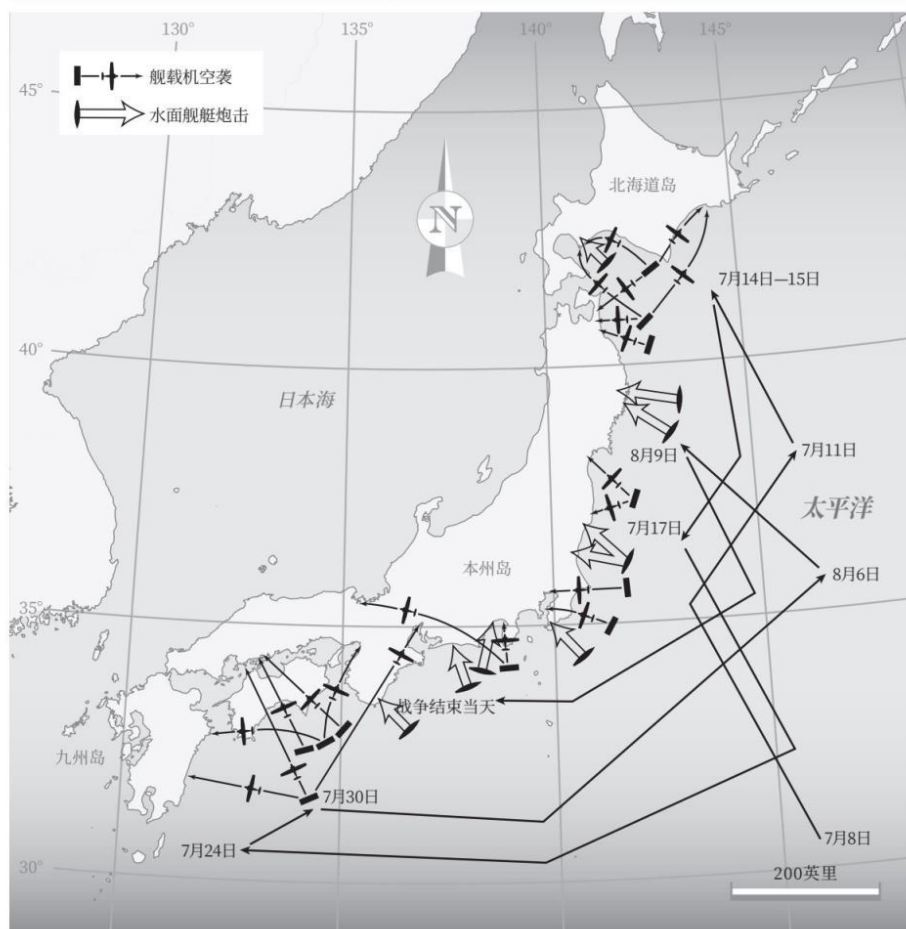
7月17日，第38特混舰队杀回本州岛，舰载机突袭了东京湾和横须贺军港。它们蜂拥扑向锚泊在海湾内的战列舰“长门号”。在战争爆发和珍珠港遇袭之时，这艘战列舰曾是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旗舰，但此时它已沦为一具焦黑、冒烟、倾斜的残骸。其他美军飞机轰炸扫射了整个区域里的各个机场，将未来的“神风”机摧毁在地面上。战列舰和巡洋舰开到海岸近旁，炮击了水户—日立地区。英国海军中将伯纳德·罗林斯麾下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加入之后，美英两军的庞大舰队集体向濑户内海东半部的各个主要港口发动了协同进攻。他们还锚泊在吴港外的日本舰队残余舰艇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日本海军此时已经瘫痪，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但是盟军航空兵们决心算清这笔拖了44个月的旧账。舰队每一间待命室的小黑板上都用粉笔写着“牢记珍珠港”。“随你怎么说，”“米克”卡尼

说，“这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心声，珍珠港之耻永远不会消弭，除非他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非他们被彻底消灭。”[53]在7月26日的决定性打击中，舰载机摧毁了锚地中的24艘日军军舰，有效清除了日本海军的最后残余。“到当天傍晚日落时，”哈尔西写道，“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54]

在这些最后的行动中，哈尔西常常向那些被派到第3舰队中的战争通讯员提到他的老生常谈，威胁说日本人想要和平就要接受复仇。被问及日本投降的条件时，他说裕仁要“为冒充神灵付出代价”。[55]他发誓要拿到天皇的那匹白马作为战利品。在接受《科利尔》杂志采访时，哈尔西说日本“不适合留在文明世界中”，他还提出要为每一个死于战俘营的美国战俘处死一个日本军官。[56]7月23日，他的金句“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和他的面孔一起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57]禁止轰炸东京皇宫的禁令让哈尔西很愤怒。据卡尼说，这位第3舰队司令根本不想理会关于裕仁在战后可能对盟国有用这种“娘娘腔的主意”：“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抓到他，抓到这个头号鬼子，把他干掉。”[58]

第3舰队对日攻击作战, 1945年7月—8月



哈尔西的好斗言论令美国媒体很受用，但是却与盟军的主要宣传思路相悖并对其构成了威胁。哈尔西回到太平洋一周后，战争消息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提出警告：

日本人的士气正不断下滑，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就会达到足以使战争结束的程度。其中首要的可控因素

是他们承受的军事压力，但是有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盟军想要：

- a. 屠杀、折磨或奴役日本人民；
- b. 摧毁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天皇和相关的价值观。

[59]

一整个夏天，哈尔西自己的舰载机也向日本投下了千百万份传单。这些文字想要让日本人看到，不远的前方就是战争结束后那和平、繁荣的未来。“美国不想伤害你和你的家人，”一张这样的传单写道，“美国不想要你们的国家。美国想要的只是终结侵略和世界和平。”[60]

在国务院、军队和战争消息办公室的协同努力之下，美国人最终研究出了一整套对日“心理战”策略。战争消息办公室在关岛设立了传单制作部门，拥有数百名工人，配备印刷机，规模相当于一份大报。新鲜出炉的传单被装进500磅炸弹的弹壳里，它们会在地面上空4 000英尺处弹开。这样，一枚传单“炸弹”就能覆盖整个城市。根据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估算，战争的最后三个月里，美军在日本投放了6 300万份传单。[61]

所有传单围绕的都是几条中心思想：日本的军事失败不可避免，军国主义政府邪恶、虚伪、自私，和平将会令日本人民过得更好。盟军所有宣传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完全不要提到天皇，所有的指责都指向“军阀”。日本的主要盟友纳粹德国已经彻底失败。现在日本已是孤军奋战，将要承受盟国的全部军事压力。这样的一份传单便很有代表性：“日本正面临着危局，盟国的所有力量都将用来对付它，它不觉得孤单吗？”[62]这些传单常常会饰以日本人喜欢的图案，比如富士山或者盛开的樱花。早期

传单上印的语句过于僵硬而官方——“曲高和寡，难有实效”，一名分析人员如此评价。^[63]但是在日裔“美二代”和其他语言专家也来参与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其文字就变得愈加流畅而易懂了。有些时候日本战俘也会协助起草或编辑文字。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所有宣传文稿都在重复三个核心思想——“我们来了，我们要赢了，而且从长远看我们赢了对所有人都会更好”。^[64]

除了传单，美军还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建起了10万瓦特功率的短波无线电发射机，后来又用设在塞班岛北部海岸的5万瓦特无干扰信道无线电塔进行信号放大。战争消息办公室的广播都是反复播出，常常是在重复传单上的信息。战后研究显示，听到这些广播的日本人极少。最有效的广播宣传都是直接针对日本领导层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6月至7月间的“扎卡利亚斯广播”。

埃利斯·扎卡利亚斯是美国海军一名情报官，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和太平洋舰队情报负责人埃德温·莱顿，以及中途岛大捷前在珍珠港领导密码破译团队的约瑟夫·罗奇福特是好友兼同僚。扎卡利亚斯相信东京的统治集团或许很难直接提出停战。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改广播内容的方案，盟军或可至少先澄清“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含义。在一连数个星期的讨论之后，一批广播稿获得了国务院、战争消息办公室和参联会的批准。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当天，扎卡利亚斯进行了第一次无线电播音。此后他每周广播一次，直到8月第一周最后一次播出，总共播放了14次。每次广播时扎卡利亚斯都会反复强调“无条件投降”指的只是“终结对抗的形式”，并不意味着要征服或奴役日本。他还引用了同盟国的其他声明，例如《大西洋宪章》和《开罗宣言》，这些文件都保证要施行普世人

权和民族自决原则。扎卡利亚斯说，日本已经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这个国家面临着二选一的选择：“一边是日本的彻底毁灭，之后是被支配的和平。另一边则是在《大西洋宪章》规定的权益之下无条件投降。”[65]

扎卡利亚斯的第四次广播获得了日本政府官方发言人井上勇博士的直接回应。回应来自东京的短波无线电广播。其答复文字生硬、晦涩、含糊不清，但语气谦逊，而且没有拒绝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日本将准备商讨和平条款，”井上说，“假若能对无条件投降原则进行些许调整的话。”[66]

物理学家们早在40年前就知道原子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试验显示金属铀的一种罕见同位素铀-235具有高度“易裂变”的特性，也就是说这种物质的中子能够穿透原子核的正电荷屏障，这一过程将释放出“自由”能量。核裂变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廉价、无限的电能来源。但是这项重大发现也带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前景——在某种自然界不具备的条件下，一定质量的纯铀-235能够在人为控制下触发链式反应，瞬间爆发出大量能量，爆炸当量可以达到2万吨TNT（梯恩梯）。非专业人员想方设法去理解这些物理学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大部分人出于本能对此表示怀疑。但是这一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共识。他们警告说，原子能“超级炸弹”的理论基础是没问题的，造出这种武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都可以克服，如果给予充足的资金、专家和工业规模的工程能力，那么或许几年就能造出来。

对于人类而言，自然是别去触碰这种可怕的力量更为安全，但是没人敢指望阿道夫·希特勒也认同这一点。各国认为德国具

有制造出原子弹所需的科技能力，而且盟军情报部门警告说，纳粹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以获取所需的材料了。在进犯过程中，德国人控制了挪威的一座“重水”工厂，并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属刚果开掘铀矿。如果让希特勒获得了核武器，那么盟国是没有任何有效对抗手段的；即便纳粹独裁者的军队在常规军事方面被打得一败涂地，他也可以凭借核武器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全世界。唯一的防卫措施就是拥有同样的可怕武器，获得可靠的对等反击能力。

1941年美国参战时，英国在这一被其称为“合金管”的领域内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丘吉尔和罗斯福二人同意联合两国的力量，在美国本土开展此项工作。1942年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命令，启动工业化制造原子弹的整个系统。曾监督五角大楼建设工程的陆军工程师莱斯利·R·格罗夫斯上校被指派负责这一机密项目。这一项目被赋予了AAA级的第一优先级，这令格罗夫斯有权要求得到资金、资源和人员，而无须向任何人说明其用途。如果需要写这个项目的名称——比如填表什么的——格罗夫斯要他的职员们写上“曼哈顿工程区”，这是个把戏，因为这个项目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设在曼哈顿所在的纽约。

为了给这个“曼哈顿工程”提供资金，史汀生和马歇尔起先用的都是各种传统武器研发项目的名义。但是到了需要在田纳西和华盛顿州建立庞大而昂贵的同位素分离工厂的时候，战争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意识到他们要获得国会的同意。于是二人来到国会山，拜会了参众两院的领袖。史汀生模糊不清地讲了几句他自己也不怎么懂的深奥科学原理——不过他说国会议员们也是一样不明白，所以谈细节有何意义呢？战争部需要6亿美元，现在就要，而且不久后还要更多。出于保密，拨款的详细用途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告诉国会的各位议员。根据马歇尔的回忆，史汀生对

这些立法委员说，他们要“相信我们的话，给我们这笔额外的钱是至关重要的，同等至关重要，关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字都不能说”。^[67]简言之，他们想为一个详情一片空白的项目讨到一张金额任意填写的签名支票，而且要到了。曼哈顿项目的总成本最终达到了20亿美元。

伯克利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主持着这个项目的研究中心，这座中心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一处戒备森严的偏远建筑群中，聚集了大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被夹在岩石峡谷之间，西靠赫梅斯山脉，东边远处是桑格雷-德里。通往这里的道路没有铺设路面，在春天雨季会很泥泞，有大量吉普车和军用卡车通行其上。研发工作是在技术区进行的，这是一片被围栏包围的办公楼和实验楼建筑群，大约有4个城市街区那么大面积。其外围是居住区，一片由预制构件盖起来的千篇一律的住房、洗衣房、食堂、学校和电影院。洛斯阿拉莫斯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不断扩大，高峰时人口达到5 800人——这个小山村里满是倔强而积极的天才，其中有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包括各个领域的一些顶尖人物。虽然戒备森严——铁丝网、瞭望塔、检查站、拴着皮带的警犬、步枪上了刺刀的士兵——但洛斯阿拉莫斯却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区，孕妇们推着婴儿车在人行道上漫步，一群群小孩在白色的护墙板旁晃动。这里的许多居民都来自欧洲，为了逃避第三帝国的虎狼之师而来到此地，因此他们出现在这里对纳粹来说有一层报应的意味。

开发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将铀的两种主要同位素分开，获得高纯度的“临界质量”铀-235同位素，这种同位素更轻，也更为稀有。从一开始就没人能准确说出临界质量是多少。估计的范围低至1磅左右，高至200磅上下。如果最终的数字落在这一估

算范围的低端，那么原子弹或许就是可行的；而如果落在高端，那它所需的工业工程资源可能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的了，至少在预估的战争持续时间内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曼哈顿工程是在对失败的可能性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铀-235这种物质从来不会以纯净物的形态出现，除非是在亚微观的数量级上。有几种可能的浓缩手段：前三个选项是汽化、化学反应和热辐射。第四种可能方式的发现则是一项重大突破，这种方式是将铀-238转化为钚，这是一种全新而且极易裂变的元素，可以更容易地从其余铀中分离出来。然而无论用哪种方法，想达到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浓度都绝非易事，没有捷径可走。上述所有浓缩方法都需要巨量的工业工程资源。

拿到美国纳税人给的金额无限的支票之后，项目总监决定同时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于是，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建起了一座占地5.6万英亩的巨大的铀浓缩工厂。选址于此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偏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耗能巨大的“铀同位素分离器”能够从附近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获取电能。钚项目建在华盛顿州里奇兰附近的汉福德机器制造厂里。这里位于哥伦比亚河西北方一处偏僻的灌木区，可以从河里获得充足的水以冷却反应器。这里的建筑规模即使按照曼哈顿工程的标准来看也很庞大，汉福德厂区内建起了超过1 200座建筑。在建筑阶段，这一秘密营地里有超过6万人，使得里奇兰成了美国人口第四大市。[68]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把两块裂变物质几乎瞬间融到一起，达到足以启动可持续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两块物质必须以极高速度融为一体，否则未等它们充分融合，链式反应就会开始，这样爆炸威力就会小得多，甚至没有威力。装有裂变物质的起爆机构必须装在小到能够由飞机装载和投掷的金属箱体里。最初的方案是用常规炸药以“双枪”的形式把分

成两半的亚临界物质打到一起。但是1944年7月，科学家们发现钚很容易自发启动裂变，这样简单的枪式起爆机构只会引发微弱的“滋滋”声而非威力全开的核爆。解决方案是使用一套复杂的透镜系统制造一圈向心对称聚爆冲击波。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延误，有些被派到此处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对解决这一问题绝望了。得益于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理论贡献和俄罗斯出生的化学家格奥尔基·奇斯佳科夫斯基的工程实践，经过反复尝试，一套实用的聚爆式引爆装置最终在1945年春准备就绪。

到此时，足够质量的武器级裂变物质铀和钚最终在橡树岭和汉福德造了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确信到当年年中时能够拿出三枚炸弹来——一枚铀弹和两枚钚弹。由于聚爆装置存在失败风险，他们计划在1945年7月对第一枚钚弹进行试验。（由于对铀弹上简单的枪式起爆装置能够按设计启动充满信心，他们觉得它已不再需要更多试验。）因此，在命运的安排下，最初的原子弹将在德国战败之后和日本战败之前诞生。

在继任总统之前，杜鲁门就听说过曼哈顿工程这回事。1943年，他还是代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被称为“杜鲁门委员会”）来调查军事工业中的浪费和腐败问题，他们曾要求提供关于田纳西和华盛顿那些在建神秘工厂的信息。史汀生部长拒绝了他，只说这是一项最高机密的武器项目，涉及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杜鲁门也就识大体地同意不再深问。当副总统的时候也没人对他说起这事，这遵循了该项目中严格执行的“非必要不告知”的限制原则。1945年4月，他第一天当上总统就听取了史汀生的口头报告，得知了这个秘密行动正在制造“一种具有几乎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新型炸弹”。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杜鲁门从詹姆斯·F.贝尔纳斯那里了解到了更多情况，这位贝尔纳斯原来是负责战争动员的专员，不久后将被任命为国务

卿。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于这种威力或许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炸弹的设计草图感到“大惑不解”。^[69]4月25日，他听取了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此后他被晋升为少将）关于此事的正式详细报告，他们还对总统提出的许多相关问题逐一作答。

原子武器和原子能及其在战时、战后的运用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获得相关的建议，杜鲁门组织了一个由政府、工业界和科学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临时拼凑的团队有个名副其实的名称，叫“临时委员会”。当然未来会组建更正规的机构来负责此事，但在眼下，保密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在已经了解此事的人员中选出一个小组来。史汀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斯也是成员之一；其他人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卡尔·康普顿、拉尔夫·巴德（福莱斯特的副海军部长），以及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委员会下辖的科学顾问团是其子机构，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恩里科·费米都为其成员。

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场白中，史汀生要求委员们从大局上思考摆在面前的问题：“这一领域到目前的进展都是战争的需要带动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一项目的应用范围将会远远超过当前这场战争，这是很重要的。”^[70]1945年5月31日和6月1日，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会，并一致同意应当使用这种新型炸弹来对付日本，“越快越好”。^[71]正式提交给总统的建议稿还要再等几天，但是会议纪要体现了大家的共同观点：“我们不能向日本人发出任何预警，我们不应打击人口密集区，但是我们应当争取给尽可能多的居民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科南特博士提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座重要的军工厂，其中有大量的工人，周围满是工人住房。”^[72]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目标选择工作被交给了“目标选择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格罗夫斯将军和曼哈顿工程的若干科学家。

1945年5月至8月间美国领导人的重大政治决策之纠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单纯的军事战略与更高层次上的外交政策问题融合到了一起；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考虑的事情都转向了战后新秩序。美国总统的幕僚们整天整天地就雅尔塔协定与斯大林斗法，探讨德国的占领和重建问题，法国的夏尔·戴高乐的政治主张，再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他们刚刚开始考虑亚洲的前途问题，包括前日占区的地位，英国殖民地的命运，中国革命，盟军占领之下日本的未来，以及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东京命令日本海外占领军放下武器，他们是否会照做？会不会即便在日本本土屈服之后，盟军也还是要打上一仗来消灭他们？主要决策都面临着时间和局势的压力。这些事务都由一小群文官和军官来操持，其人数不为人知。他们都已在沉重工作的负担下挣扎多年。有时候，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总统的人长期觉得身心俱疲，压力巨大。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都是“在外面”制定的，也就是在德国波茨坦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他们这位初任总统的总司令还没有为自己的新岗位做好准备，工作经历也不够长，达不到其前任那样的专业性、自信心和手腕。

在考虑是否允许裕仁保留皇位的问题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分成了两派。曾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驻东京大使，现在担任副国务卿的约瑟夫·C·格鲁支持美国的主流民意，就是要让日本天皇作为战犯受审。他的公开言论满是鹰派的调子，他对广播听众说，和日本商谈投降条款等同于“给杀人犯宽限时间，用人命去商谈背叛”。^[73]格鲁厌倦了可能将盟国拖入漫长谈判的外交往来。但是私下里，他也认为裕仁必须在战争最后阶段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只有他拥有要求所有本土和海外日军放下武器的权力。格鲁告诉一名记者朋友，昭和天皇发布的敕谕“是可以利用的，这或许可以挽救数万名我方战士的生命”。^[74]

在发布《波茨坦公告》之前的讨论中，大部分美国领导层人士（包括杜鲁门）都倾向于告诉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不会危及其皇室。在6月的参联会和内阁会议上，大家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把天皇留作伙伴或傀儡是符合美国和盟国利益的。但是这样一份声明却总是在具体用词方面引发争执。所有人都不愿为破坏他们前总司令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承担责任。为了避免突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在美国和盟国的公开声明中删除了所有提及天皇及其皇室的部分。这一状况直到1945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才有所改变，此时广岛和长崎已经落下了原子弹，而日本尚未最终投降。美国直到这时才明确保证不会去触碰裕仁。最后，正如格鲁沮丧地说的那样，美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然后投下了原子弹并接受了有条件投降”。[75]

6月1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开会时，史汀生、福莱斯特两位部长和参联会的四巨头陈述了他们的总体对日战略。对日本本土列岛的封锁已经开始，而且还会加强，因此大家可以指望日本在登陆九州之前投降，或至少在次年春天登陆本州岛之前投降。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围绕11月1日登陆战进行的计划制订和后勤筹备工作都必须立刻着手准备。马歇尔提出，“奥林匹克”作战“对于绞杀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收紧海空封锁，同时为在关东平原展开的决定性的“冠冕”登陆战提供一个后勤支点。金上将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也认同当前继续全方位推进“奥林匹克”和“冠冕”作战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他相信“依靠海空力量就足以打败日本，登陆是不必要的”。[76]莱希也提出登陆日本既不必要也不可取，但是他并不反对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订计划。最后，杜鲁门批准了“没落”计划，并签署命令，从欧洲和美国本土调集所需的部队。

那年夏天最纠结的问题之一是，是否还想要苏联参与远东战

事。罗斯福总统当年花了很大力气才让斯大林承诺加入对日作战；在1943年至1944年间，这或许是与莫斯科的外交中优先级最高的事项。但是到了1945年6月，东西两方阵营将在未来几十年里长期全球对峙的前景已经明朗，美国阵营中的许多人开始质疑是否需要甚至是否想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参战固然更容易迫使日本投降，但这也会让红军占领很多战略性区域，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在东亚出现一大块苏联的地盘可能会大大增强苏联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力。麦克阿瑟后来宣称，他在获悉苏联已与美国达成对日作战协议之后“感到震惊”：“依我看来，我们不需要让苏联在1945年加入战争。”^[77]金和艾森豪威尔也各自建议总统不要允许或邀请苏联参战。^[78]新任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早先倾向于请求苏联参战，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鉴于苏联人在东欧的表现，贝尔纳斯不相信他们；他认为现在也不需要苏联人了，因为觉得原子弹足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79]贝尔纳斯的助手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最终击败日本要尽快，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就会投降，这样苏联就无法深度介入这场屠杀和获得对东亚指手画脚的地位。”^[80]

杜鲁门对于波茨坦之行并不满意，他不太想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参联会和内阁一致认为总统必须到场。于是杜鲁门乘坐火车从华盛顿来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在那里登上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进行八天的跨越大西洋之旅。在火车上，他给妻子写信说“这一趟旅行让我蓝到发紫^[81]”。^[82]他的随行人员以莱希上将和贝尔纳斯国务卿为首，还有一大群军队助手和政府助手。（贝尔纳斯设法把他的竞争对手亨利·史汀生赶下了船，史汀生后来乘飞机前往欧洲，在波茨坦和大部队会合。）7月15日，“奥古斯塔号”抵达安特卫普。杜鲁门一行人乘坐一支40辆车组成的车队前往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机场，之后飞过疮痍满目的

德国废墟，前往柏林南边的波茨坦，一座普鲁士时代的古城。

波茨坦会议主要讨论在当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中悬而未决的欧洲问题，包括德国—波兰—苏联的边界问题，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分区占领问题，以及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是否占有主权的问题。而关于对日本的最后打击，以及主导战后亚洲局势的相关安排，只在主要议程之间见缝插针地讨论，大部分是巨头们的非正式会商。丘吉尔也来到了波茨坦，但是在会议的第二个星期，他却被换成了新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后者的工党在1939年以来英国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

波茨坦是在苏联占领区内，会议自然就是斯大林做东。正式会谈在塞西林霍夫宫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这里曾是王公的住所。与会各方的达官贵人们住在附近巴贝斯伯格镇的一些豪宅里，而这些豪宅的主人则被枪逼着赶了出去。杜鲁门一行人住进了国王大街上一座被粉刷成白色的三层小楼里，美国人称这里为“小白宫”。小楼里到处都安装了窃听器，服务人员中也有几个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

斯大林比其他人晚来一天。7月17日中午，他提前来到“小白宫”会见了杜鲁门。两位领袖热情地握住双手，相互咧嘴大笑。斯大林介绍了他的政府正在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他们打算为即将开始的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军的进攻商定条款。杜鲁门对此不置可否，这一姿态或许令斯大林感到失望；这位苏联领导人原本期望美国总统能向苏联发出参加远东战事的正式请求，给他一个撕毁与日本之间中立条约的借口。但是杜鲁门和他的政府并没有打算满足斯大林的愿望，因为此时已经很明显，他们对苏联介入战争的后果感到担忧。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美国态度的新变化，并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一张便条上提到了此事：“已经相当明显，美国目前并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

战。”^[83]

美国人为“三位一体”行动，也就是第一次核试验选择的地点是洛斯阿拉莫斯以南200英里外，新墨西哥州沙漠深处的一片荒原。核弹将被放置在一座100英尺高的铁塔顶上引爆，其坐标位置被命名为“零区”。铁塔的6英里外建有一座用粗大原木垒砌而成并覆盖着厚土的指挥地堡，试验人员的营地则在10英里外。试验被安排在1945年7月16日拂晓进行。

当时针指向“零点”，沙漠中黑暗而寒冷。铁塔近旁探照灯的光束撕开了低垂的云层。在营地南边一座沙坡上的观察所里，科学家、记者和访客们喝着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咖啡，不停地跺脚取暖。他们互相传递着两个双筒望远镜，轮流观察远处被照得雪亮的铁塔。一名陆军中士走进来，借着手电筒的光宣读了要求：当两分钟倒计时开始时，观察人员要卧倒在地面上，脸不要朝向铁塔。爆炸之后，他们可以转过头来看铁塔上方的云层，但是不要直接凝视火球，以防伤害眼睛。对于那些不要命也要看爆炸的人，上面发了黑玻璃，要求这些人把黑玻璃挡在面前观看。他们都要穿上长衣长裤以保护皮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一瓶瓶防晒霜被发了下去，人们把它抹在自己暴露的脸上和手上。他们要保持卧倒姿势，直到冲击波过去：“像这样低伏在地面上可以降低爆炸带来的危险，飞石、玻璃和其他东西可以从爆炸点直接飞到你们这里。”^[84]所有汽车的窗户都要打开。

到了能安全站起来的时候，会有警报提示。那时所有无须留在这里执行任务的人都要立刻返回营地，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大巴。这一区域将要疏散人员，直至完成辐射测量。

在曼哈顿工程初期，物理学家们曾仔细考虑爆炸规模可能会

远超他们计算结果的危险。有人担心巨大的爆炸可能会引燃地球大气中的氮气，甚至可能会毁灭这个星球。当然后来的计算似乎推翻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晚在沙坡上观察所里的恩里科·费米还是玩了一手黑色幽默。他提议下注赌这枚核弹引燃大气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真的引燃大气，被毁灭的是新墨西哥州还是整个世界。他的同事很可能答道，无论结果如何，赢的钱谁都拿不走。

在指挥地堡里，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带领着一个大约20人组成的技术组和通信组。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挤满了电子设备和无线电台。他们对当晚的天气忧心忡忡。云层中时而会出现一道闪电，天气预报称南方有阵雨。一个气象小组和正在头上盘旋的装有特殊设备的B-29气象侦察机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如果风力过大而且风向不对，那么致命的辐射尘就有向东飘浮300英里落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风险。但是在破晓前一小时，他们确定气象条件没问题。

在距离试爆还有20分钟时，“零区”升起了第一枚红色警告信号弹，之后还有数枚这样的信号弹将要升空。此时留在铁塔周围的所有人都乘上吉普车离开此地，开往地堡。无线电中有一个僵硬的声音在报时。在地堡里，人们趴在各自的仪表板上。气氛十分紧张，时间仿佛凝滞了。科南特博士说他“从来没想过一秒钟会这么长”。^[85]奥本海默没有说话，甚至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他透过地堡那暗到几乎不透光的蓝色窗户凝视着外面，手扶着一根木桩，以支撑自己的身体。还差10秒试爆时，一枚绿色信号弹升起，随后穿过“零区”上空的云层缓缓落下。这最后的10秒钟如同永远那么长。无论他们怎么看待作为武器的这枚炸弹，这些科学家都已把数年光阴投入它的制造中，为此赌上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声誉；他们还说服了山姆大叔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拿来为此付账。有个见到这一幕的人评论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宗教信

仰或是有无信仰，“都可以肯定地说，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在祈祷，比以往任何一次祈祷都更努力”。[86]

凌晨5时30分，秒针指到了0，大喇叭里传来声音：“开始。”起初是一个刺眼的白色光点，几乎转瞬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直径半英里的小太阳，如同照相机的闪光灯那样明亮，连黎明前的黑暗都被巨大的光芒驱赶得无影无踪。转眼间，地平线以内的整个沙漠都被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大部分光芒被吸回到爆炸的旋涡之中，至少在观察者眼中是如此的。随后，巨大的火球升入天空，仿佛液化了一般，变成了翻滚的霓虹，金色、绿色、橙色、蓝色、灰色和紫色，幻化成了迷人的万花筒。火球垂直延伸，变成了一根烟火交错的巨柱，穿透云层，升腾到1万英尺、2万英尺、3万英尺高空。烟柱顶上出现了一片蘑菇云，其高度后来估算达到了4.1万英尺，而蘑菇云的根部仍然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尘，如同镁光般明亮，但是更加多彩。方圆40英里内的新墨西哥荒原被笼罩在蓝紫色的光芒之下，所有山丘、沙坡和沟壑都被照得纤毫毕现。

在地堡、观察所和营地，人们都站了起来，像小孩子那样互相拥抱，拍打后背，握手，大声欢呼，大笑着手舞足蹈。奥本海默脸上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聚爆式钚弹起爆装置的设计者奇斯佳科夫斯基博士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设计行之有效，他高兴地一把搂住奥本海默，发出了胜利的吼叫。有人对格罗夫斯将军说：“结束了。”格罗夫斯答道：“是的，等我们把两枚炸弹扔到日本之后。”[87]

在沙坡上，绝大部分观看者在等候冲击波抵达时都将要他们卧倒的告诫抛诸脑后。爆炸45秒后，眼前幻境般的世界仍然保持着寂静——他们能感到热量扑面而来，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最后，声音还是来了，那是一种连续、可怖、粗重的轰鸣，伴随着

一阵狂暴的热风，脚下的大地也在颤抖。大地的回声融合成了一阵阵逐渐变响继而衰弱的声波，持续了很久才告消失。有人觉得和他们亲眼看到的壮观视觉效果相比，这冲击波并不算强，甚至有点虎头蛇尾。这固然没错，但其原因仅仅是他们距离“零区”太远了而已。

发出最初的胜利欢呼之后，观看者们很快平静下来，开始思考。欧内斯特·O·劳伦斯记得自己“带着敬畏招呼所有人安静下来”。[88]对于奇斯佳科夫斯基来说，核爆炸是“最接近人们所能想象的审判日的事情。我确信，在世界终结之时——地球存在的最后一毫秒——最后一个人将会看到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一幕”。[89]当他们乘车离开试验场时，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探出了头。菲利普·莫里森发现太阳照在脸上的热感和此前爆炸时如出一辙。他说，这天早上“我们有两次日出”。[90]

远在北边的圣菲市，西边的银城市，还有南边的埃尔帕索市，都能看见核爆的闪光。在“零区”北面175英里外的阿尔伯克基，早起的市民们停下了脚步，想要知道南方地平线上的那道闪光到底是什么。根据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就连城中一名失明女童都喊了出来：“那是什么？”[91]为了平息这些难以回答的询问，格罗夫斯安排附近阿拉莫戈多航空兵基地的指挥官发布一份声明，称基地的一座弹药库发生了爆炸。[92]

核试验次日，几个勇者回到“三位一体”基地去观察爆炸的影响。他们携带的用来测量放射性的便携式盖革计数器狂叫不止，他们干脆将其关掉。为限制在辐射中暴露的时间，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钟原则”：每个人只能进入基地一次，只能停留十分钟。在距离“零区”一英里处，沙漠中的灌木被烧焦并倒向远离爆点一侧；离得更近的植物则被完全烧掉。原先铁塔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直径1 200英尺的浅坑，坑底有一堆碎屑。地面变得平整而

光滑，其中能看到一些发绿的线条：沙子都被变成了玻璃。

弹坑中央的地面上有一片淡淡的锈红色。观察人员判断这是汽化后的氧化亚铁凝华后和沙子中的硅熔合在一起所致——换言之，这是原先承载“三位一体”炸弹的那座10层高铁塔的最后遗迹。

当天早些时候，核试验成功的第一份报告在当地时间晚7点半被送抵波茨坦。战争部一名助理向史汀生发去电报：“今早进行了试验。尚未得出结论，但结果看起来很理想，已经超出了预期。”^[93]史汀生随后走到“小白宫”，把消息告诉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二人闻讯大喜。含义模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后，又有几份电报接踵而至，也都写得模棱两可。7月21日，出自格罗夫斯之手的长篇详细报告经由信使送达。爆炸威力相当于1.5万吨至2万吨TNT炸药，位于此前预计的威力范围的上限处。格罗夫斯曾经夸口说五角大楼（他的前一个作品）对空袭免疫，现在他收回了自己的话。

史汀生把报告全文读给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这位战争部长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极度兴奋，只要见到我，就一遍一遍地和我谈这事”。^[94]丘吉尔也发现第二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时，杜鲁门表现出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兴奋，“以最坚定而果断的方式与苏联人对峙，向苏联人提出了一些他们绝对做不到的要求，还说美国完全反对他们”。^[95]

和顾问们讨论之后，杜鲁门决定让斯大林知道“三位一体”试验的事情，虽然只能用最笼统的方式。7月24日晚上，他找到这位苏联领袖，（通过翻译）对他说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斯大林看上去不为所动，只是平静地说

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搞不清对方是否领会了他所说事情的重要性。他并不知道，也没想过苏联间谍早已成功渗透进了曼哈顿工程，苏联人早已对原子弹一事了如指掌。

美国的情报破译人员早已破译了日本政府与驻各国首都外交官之间的通信密码。这种通信内容的代号为“魔术”（MAGIC），对它们的总结和分析被写成绝密的报告，发给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官。因此，美国领导人完全知道东京想要说服苏联政府充当中介来找盟国和谈。日本外交大臣东乡茂德和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之间急切的电报往来都在美国人面前现场直播，而且很值得一读。东乡发给佐藤的“极度紧急”电报的内容显示了他的绝望感。7月11日，他要求大使“十万火急”地拜访克里姆林宫。次日，东乡又要佐藤向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转达，“天皇陛下”本人希望“尽快恢复和平”。^[96]在这些截获内容的批注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写道，这是第一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裕仁在推动这些发往莫斯科的外交请求。

佐藤在外交部门服务年限较长，比东乡资历更深，而且他自己原来也当过外交大臣（1937年）。因此他不会完全服从现任外交大臣，而是毫不犹豫地直白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些最后时刻绝望之举的重要意见。佐藤告诉东乡，要他去提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请求是从来不可能说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人“极其实际”，任何缺乏明确可实施路径或者盟军确实可接受条款的提案都不可能说动他们。“如果大日本帝国真的有必要结束战争，”7月12日他如此对外交大臣说，“我们必须首先统一思想来做这件事。”^[97]日方从未明文表示过要这样做，东乡只能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达成的三心二意的共识来做事。任何包含了具体和平条款的提案都会令决策团队分裂，并导致铃木政府倒台。

在他后来发给东京的电报中，佐藤劝政府认识到战争已经输

了，这意味着日本“别无选择，只剩下无条件投降或以近似于此的形式投降”。他判断，唯一可以和盟军谈的条件就是“保留我们的国体”，也就是说保证让裕仁留在皇位上。^[98]但东乡却只是反复重申此前的指示，即请求克里姆林宫协助安排议和。他写道，此时确实急需和平，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国内很难立刻确定可实施的和平条款”。^[99]佐藤能够读懂其中的言外之意：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望化解，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憎恨任何类似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东乡的双手是被束缚住的，佐藤也一样。

当波茨坦会议进行到第二周时，美国人面临着如何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急迫决策。“没落”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计划进攻日期是11月1日。情报显示，九州岛上的日军兵力正在增长。美国人开始讨厌让苏联人加入战争，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让这位红色盟友置身事外，而且苏联红军最迟到8月中旬就能做好进攻中国东北的准备。根据格罗夫斯将军的报告，两枚原子弹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做好向日本投掷的准备。还有些人从道德角度反对在不明确加以警告的情况下便使用这种武器，反对用城市来取代军事目标作为轰炸对象。曼哈顿工程的各部门科学家都提交了请愿书。海军部次长兼临时委员会成员拉尔夫·巴德倾向于提前进行警告。他给史汀生写信道：“这一考虑主要是出于美国作为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以及我们人民的公平竞争精神。”^[100]

然而，临时委员会及其下级委员会，以及政府内阁的主流想法始终是应当将原子弹用于对付日本。他们考虑过进行一次力量展示或者警告，但最终否决了这个提议，主要是由于这看起来不可能让日本投降。科学顾问团（奥本海默、科南特、劳伦斯和费米）承认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无法拿出任何足以结束战争的技术展示；除了直接用

于军事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可接受的选项。”[101]

目标选择委员会已经拿出了列有四座城市的最终目标列表：广岛、长崎、小仓，以及新潟。之所以选择这四座城市，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常规轰炸夷平，这样就能最充分、最清晰地展现原子弹的威力。早先的列表上列入了京都，但是史汀生把它划掉了。原因是这座日本古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迹都是独一无二的，史汀生担心摧毁这里会引起后世日本人的仇恨。（这位战争部长不得不两次把京都从名单上划掉：很明显，格罗夫斯真的很想轰炸这座城市。）广岛和小仓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仓库、兵工厂所在地；长崎和新潟则仅仅是作为重要的航运和工业中心而入选。在发给第20航空队的命令中，这四座城市被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让它们远离李梅的火攻，留下来，别碰，保持完整，这样就能让原子弹把它们一击摧毁。虽然此时雷达瞄准已经足够可靠，但原子弹还是会在晴朗天气下投掷，这样就能从空中看到核爆炸并进行拍照：“由于四座城市相距甚远……即便天气各不相同，这四个目标也很可能至少有一个天气晴朗。”[102]

同盟国原则上同意要向日本发出最后的警告。在纳粹德国的废墟中，从波茨坦，签发这份公告，将会赋予这份最后通牒以象征意义——让日本人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盟友了，他们自己很快也将是相同的命运。但是公告的具体文字还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争论才能敲定。在此前的几份文件，包括《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以及（一个月前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同盟国已经将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和盘托出。现在问题来了：是否应该重申并进一步阐明它们？盟国应当将占领日本的意图表达达到何种程度？美国阵营中的几位领军人物，包括史汀生和格鲁，倾向于承诺将现有的天皇帝制作为日本新宪法的基础。他们分析认为，这样的承诺或许能加强东京议和

派的力量，甚至可能让天皇直接做出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说，盟国需要裕仁来强制要求日军投降并作为听话的代理人。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反对任何可能偏离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承诺，他还认为这有可能被日本人视作盟国对其无能为力信号。

7月17日，当“三方声明”的文稿在盟国政府之间审阅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华盛顿发出电报，提交了一份建议稿。原有文稿中写道，日本人民将会自行选择政府，这就“可能包括以现有皇室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如果这样一个新政府能让全世界完全相信其永不发动侵略的话”。而按照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即参联会的“智囊”的建议，参谋长们推荐完全删除这一句。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关于“现有皇室”的内容可能会被误解为想要裕仁让位于他的儿子；其次，这一提案表明盟国有意维持日本的“天皇崇拜”体系，因而会打击“日本的进步势力”。^[103]这两条分析都不怎么有说服力。第一个反对意见只要澄清用词即可解决，无须全部删除；第二个意见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日本的进步势力”无力影响其投降决策。尽管如此，关于删除此句的提议还是得到了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的顾问们的认可，而且显然没有什么争议。莱希和马歇尔看起来都是毫无疑问地支持删除，虽然二人此前都倾向于明确天皇的战后地位。

7月24日，史汀生最后一次想要把保留日本政体的条款重新写进去。据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写的日记，史汀生见到了杜鲁门，“告诉他，我认为向日本人承诺保留其帝制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把这一点写入正式警告很有必要，或许这正是能让他们接受公告的因素”。^[104]杜鲁门以实际操作方面的理由拒绝了他，解释说公告文稿已经发给蒋介石签字了。史汀生也就作罢了，不过他还是建议杜鲁门做好准备，在开始和日本政府进行直

接会谈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他们做出口头保证。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在起草和下发执行核攻击任务的命令。驻提尼安岛的一支特殊的B-29航空大队已经接受专门训练以投放原子弹，他们已经做好了执行任务的准备。超级武器的各个部件已经通过空运和海运送到了马里亚纳群岛。最近刚刚被任命为太平洋美国陆军航空队战略航空兵总司令的卡尔·斯帕茨将军此时正在华盛顿。7月25日，他来到战争部报到，和马歇尔离开时代代理陆军参谋长职责的托马斯·H.汉迪将军进行了商议。斯帕茨接到了关于投掷两枚原子弹的口头命令，但他告诉汉迪，他需要得到写有命令的“一张纸”。于是汉迪起草并签发了一道命令，指示第20航空队“在1945年8月3日之后，一旦天气允许进行目视轰炸，就要向以下目标之一投掷第一枚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而且“一旦完成整備”，就要向同一份列表中的城市投掷另一枚炸弹。^[105]最后一句命令还补充道，这一指示是在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的“指导和批准下”发出的。这是唯一一份要求用核武器攻击日本的书面命令。

同一天（7月25日）在波茨坦的“小白宫”，杜鲁门独自面见了他的战争部长——如果总统的日记可信的话，那么他对史汀生的口头指示和华盛顿刚刚发出的命令并不一致：

我告诉战争部长史汀生先生，使用的时候要以军事单位或陆海军队作为目标，而不要打击妇女和儿童。虽然日本人野蛮、狂暴、残忍而且疯狂，但我们是为全世界争取福利的领导者，不能把这种可怕的炸弹扔在日本的旧都或新都上
[指京都和东京]。

他和我观点一致。打击将会选择纯军事目标，而且我们会发出警告声明，要求日本鬼子投降保命。我确信他们不会

投降，但我们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106]

但是汉迪在史汀生授权下写出的命令，却白纸黑字写着他已经得到了来自波茨坦的指示。此命令基于临时委员会及其下属子机构的建议，并得到了内阁和总统的批准。一旦炸弹准备就绪而且天气条件允许，就要把它们投向目标委员会选出的四座日本城市。这份命令中没有提到提前警告，军事目标，或者是要避开妇女儿童这些事。选择这些城市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军事属性，轰炸时的瞄准点也没有特别选定那里的军事目标。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符合目标委员会指定的三个条件——这些城市“城区面积较大，直径超过3英里”，“能够被一场爆炸有效打击”，以及“8月之前不大可能挨炸”。[107]

这样，杜鲁门7月25日的日记中就存有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或许他突然感到恐慌，于是小心翼翼地想要化解。他或许感觉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会探究他背后的想法，于是想要把自己包装成完全良善之人。若如此，这天的日记就只是惺惺作态，只能让人感觉这篇日记没有反映杜鲁门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著名的座右铭——“责任在我”——就摆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办公桌上的显眼位置。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第七大城市的中心炸响之后，这位“不推卸责任”的总司令将会把广岛称为“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如果能说圣迭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的话，那这么说倒也没错。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杜鲁门承担了决定使用原子弹的责任——然而即便到了十年之后他已退休的此时，他也没有承认有意选择了城市作为目标。关于1945年7月25日汉迪将军签发的指示，杜鲁门写道：“这一命令发出后，首次向一个军事目标使用原子弹的车轮便启动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还告诉史汀生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除非我对他说日本接受了我们的最

后通牒。”[\[108\]](#)

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政府向全世界媒体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日本武装部队立刻无条件投降，并警告说如果拒绝投降，日本本土将会“全部残毁”：“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109\]](#)日本不可再踏上对外扩张之路。军国主义的影响要彻底且永久地拔除。战犯将被送上国际法庭受审。日本需放弃所有海外占领区，日本的主权将永久局限于本土列岛。其海外军队需放下武器，并允许和平回国。盟军将会占领“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的地方，直至确保“穷兵黩武主义”被赶出政府并解除日本的武装为止。允许日本恢复其工业，其经济也将被国际贸易所接纳。和日本政府散布的宣传相反，公告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而且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

7月27日拂晓后不久，东京方面就通过旧金山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收到了这份公告。当这份“三方声明”被译成日语并在各省、厅中传阅时，日本的领导人死盯着一个事实：签署这份公告的有美、英、中三国领袖，唯独没有斯大林。他们便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丝机会上。他们知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在波茨坦，和英美两国正密切接触，但是苏联却没有出现在这份最后通牒之上。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愿意插进来行调停之事？

东乡外相立刻行动起来，防止公告被草率回绝。他直接面见天皇，说这份声明“留下了进一步探究落地条款的空间”，以及“我们计划通过苏联了解这些落地条款”。[\[110\]](#)在当天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紧急会商中，东乡对同僚们说，这份公告可以被解读为对先前要求的软化，或许预示着一种保留颜面的“有条件”投降。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日本皇室，但其所言“依据日本人民

自由表示之意志”却给予了保留天皇的希望。他还警告说，立刻回绝这份公告或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东乡提出，在他的外交部门试探出苏联人的态度之前，不要对此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后续的讨论勉强达成了共识。在等待苏联人回应日本先前的请求期间，日本政府将不对《波茨坦公告》做出表态。报纸也都得到指示，不要张扬此事。

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下午4点，年迈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进行了无线电广播。想要说清楚“六巨头”两派商议出的临时政策绝非易事。铃木无法说出和莫斯科方面交涉的事情，因为这是保密的；他也不能表达出这份公告提供和谈机会的意思，因为强硬派会起来造反的。在一种看起来很随意的表达中，他告诉媒体，政府想要“默杀”《波茨坦公告》。这个词同时也可以被翻译为“忽略”、“拒绝”或者是“视而不见”。这一次，“默杀”一词的实际含义或许是在接受和拒绝最后通牒之间走钢丝——换言之，“无可奉告”。

若铃木的意图确实如此，那他就太不成功了。这个词在日语中本就含义模糊，何况还要翻译成英文？在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予以反对的情况下，日本媒体就报道说首相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公告。29日，《读卖新闻》的头版大标题是“荒谬的日本投降条件”。^[111]此时，铃木已经来不及收回他的话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随后的讨论中，三名强硬派一直认为政府对《波茨坦公告》持摇摆态度是不可接受的。议和派的东乡和米内则主张无须再多说，但首相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澄清说明。在次日上午的媒体会上，铃木说：“我想这次的联合声明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重大价值。我们只能忽略它。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把战争打到底。”^[112]

起初美国的翻译人员还在为“默杀”一词大惑不解，争论它可

能暗含的意思或者重点。但是这第二份声明给出的信号就清晰得多。杜鲁门本人对此的解读一针见血：“他们要我们去死，就是这个意思。”^[113]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注意到铃木小心翼翼地避免立刻回绝最后通牒。他们理解他这话是说给军队中那些潜在的叛乱者听的，而不是回应发出最后通牒的各国政府。在随后的几天里，无线电监听人员截获的日本军方电文和外交电文显示，东京有些人已经准备要依照《波茨坦公告》投降了。但这些情报碎片仅仅是确证了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日本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死扣，死硬的“顽抗到底”派仍然足够强势，足以打断任何议和之举。

一份来自“小白宫”的绝密电报指示格罗夫斯将军在1945年8月2日之后发动第一次核轰炸，这天是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天。杜鲁门希望第一枚核武器扔出去时自己不在岗位上，而是在海上。^[114]就在这一周，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地面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欧洲的任何地方——实际上，超过了整个战争史上的其他地方。在日本那些大城市的中央，若有人举目四望，那么他的视野中除了灰烬和堆积如山的废墟，以及少量被熏黑的烟囱和矗立在各处的钢架之外将再无他物。战争中最大一次空袭出现在1945年8月1日，当时853架B-29向整个日本西部的各个城市和航道投下了6 486吨燃烧弹、精确投掷的炸弹和空投水雷。这一天，日本民众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10万人。

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这种常规轰炸的规模和力度将会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高度。美英两军各种类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从欧洲调来；与此同时，新的飞机也正从美国的飞机工厂源源涌出，刚刚完成训练的机组人员正驾驶着它们来到附近冲绳岛新建成的机场上。在1945年5月至8月轰炸作战的高峰

时，平均每月都有34 402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被投到日本。
[115]根据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福将”阿诺德的说法，到1945年9月，单月投下的炸弹总数将达到10万吨，随后还将逐月持续增加。到1946年初，如果日本还在战斗，那么美国陆军航空队就将有80支作战大队参加对日进攻，轰炸机总数将达到4 000架。1946年1月，他们将向日本投下17万吨炸弹，一个月的投弹量就将超过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实际投向这个国家的炸弹总数。到计划在关东平原发动“冠冕”登陆作战的1946年3月，单月投弹量将超过20万吨。[116]毁灭之雨将会从天而降，使这个国家的国内交通设施彻底崩溃，经济不再运转，并导致大规模的城市饥荒。“再有6个月，日本就将被打回黑暗时代，”寇蒂斯·李梅如是说，“无论如何都会是这样。”[117]

在战争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第20航空队开始发动一种新的毁灭性的心理战。“超级堡垒”机群开始“在开火前打招呼”——向即将轰炸的城市投下传单，警告市民撤离，一两天后再回来将其炸毁。例如，7月27日，日本收到《波茨坦公告》的当天，美军向11座日本城市投下了6万张警告传单。其中6座城市在第二天挨了炸。8月1日，美军故技重演；8月4日，第三次。每次警告的效果都很好。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想要阻止这种警告，但消息还是会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恐慌就会在落下载单的城市里蔓延开来。整个城市的人都想要逃往乡村，于是难民们挤满了道路和火车。军工厂由于没有工人而瘫痪。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总结认为，“开火前警告”传单是“最令人赞叹的心理战行动之一”。[118]它们彰显了日本军队及其航空兵的无力，让千千万万普通日本人确信失败已不可避免。战略轰炸调查组认为，大约一半的日本人要么见到过传单，要么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传单中的消息。

与此同时，这些警告被许多日本人当作体谅和同情的表示。长冈市的一名妇女说是传单救了她的命。她说，她自己的政府从来不肯把关于这座城市已被列入目标的致命信息发布出来，但是“我相信美国人是诚实的好人，让我们提前知道即将到来的空袭”。她逃离了这里。三天后，长冈市遭到了火攻。秋田的一名工厂工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不是强盗，”他指着头上那些驾驶着银色巨型轰炸机的人说，“他们提醒我们了，要我们撤离。”^[119]

[1] Smith, *Thank You, Mr. President*, p.218.

[2] Brown, “Aide to Four President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1955, Vol.6, Issue 2.

[3] Truman diary, June 1, 1945.

[4] William D. Leahy diary, April 12, 1945, William D. Leahy Papers, LCMD;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283.

[5] Leahy, *I Was There*, p.347.

[6] Forrestal diary, entries dated May 1, 12, & 29,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52—66.

[7] Wedemeyer to Marshall, May 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20.

[8] Truman J. Hedding, oral history, p.109.

[9] Statement Released to the Press, SWPA Headquarters, February 16, 1944; RG—4, Reel 612,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0] MacArthur to Marshall, April 21, 1945, #192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12.

[11] CINCPAC to COMINCH, #0230, April 5,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3.

[12] Messages between Nimitz and MacArthur, April 7—8,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p.3077—78.

[13]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April 10, 1945,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4] Nimitz to King, May 17,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29.

[1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484.

[16] Nimitz to King, April 13, #234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03.

[17] Leahy, *I Was There*, p.370.

[18] Marshall to MacArthur, April 4, 1945, War Department #63196; RG—30, Reel 1007, radio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9] Nimitz to MacArthur, May 26, 1945, #0552,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33.

[20] MacArthur to Nimitz, May 25, 1945, #1102,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p.3141—42.

[21] Marshall to King, memorandum dated May 22, 1945,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0.

[2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23] Frank, *Downfall*, p.98.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25]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5.

[26] *Ibid.*, p.20.

[2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5, USSBS No.378, Admiral Soemu Toyoda.

[28]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Vol.1, p.402.

[29]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p.82.

[30]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Vol.1, p.403.

[31] 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时正作为OSS（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代表外派到瑞士伯尔尼，并间接接触了日本政府的代表。其中令人感兴趣的细

节在1993年解密。参见“OS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Jul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参联会主席莱希亲自过问此事时，杜勒斯表示对这类接触毫不知情。Leahy, *I Was There*, p.384。——作者注

[32]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64.

[33]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13.

[34] Lockwood and Adamson, *Hellcats of the Sea*, p.40.

[35] Joint ArmyN At Citty—avyssessmenommee (JANAC) scores cited in Lockwood, *Sink 'Em All*, pp.274—75, 285—86.

[36] James Fife,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52, Vol.2, p.415.

[37] Lockwood, *Sink 'Em All*, pp.249—50.

[38]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103.

[39] Smith, “Payback: Nine American Subs Avenge a Legend’s Death,” *World War II Magazine*, 10/24/2016, accessed August 22, 2018, <http://www.historynet.com/uss—wahoo—vengeance.html>.

[40] Blair, *Silent Victory*, p.863.

[41] Ostrander, “Chaos at Shimonosek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2, June 1947, p.652.

[42] USSBS, *The Offensive Mine Laying Campaign Against Japan*, p.2.

[43] Phillips, *Rain of Fire*, p.99.

[44]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ly 10, 1945.

[45]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312.

[46]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ly 14, 1945.

[47]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2.

[4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57.

[4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42.

[50] Arthur R.Hawkins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73.

[51] Ibid.

[52]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2.

[53]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65.

[5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312.

[55] “Halsey Ridicules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45.

[56] Wukovits, *Admiral “Bull” Halsey*, p.232.

[57] *Time* magazine, Vol.46, No.4, July 23, 1945.

[5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43—44.

[59]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ureau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 Special Report No.5, “Current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Tensions in Japan,” June 1, 1945, p.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ox 3, “Reports on Japan, 1945.”

[60] Leaflet 36J6, Leaflet File No.2, Box 2, 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Archives.

[61] Williams, “Paths to Peace: The Information War in the Pacific, 1945,” p.4,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IA, accessed November 4,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

[62] Leaflet entitled “What Can Be Done Against Overwhelming Odds?,” Leaflet File No.2, Box 2, 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Archives.

[63] “The Reaction of Japanese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p.6, Annex 26, Report of SWPA Headquarters,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Leaflets,” RG—4, MacArthur Archives.

[64] Davis and Price, *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 p.20.

[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2, 740.00119 PW/7—2245: Telegram No.1243,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2, 1945.

[66] Zacharias, *Secret Missions*, p.358.

[67] Interview with George C.Marshall, by Forrest C.Pogue Jr., February 11, 1957,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Collections.

[68] Smyth,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p.146.

[69] Truman, *Year of Decisions*, pp.10—11.

[70] “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Thursday, 31 Ma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 2018,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bomb.

[71]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51.

[72] “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Thursday, 31 Ma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 2018,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bomb.

[73] “Address Before the Cleveland Public Affairs Council,” February 5, 1943, in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398.

[74] Joseph C.Grew to Randall Gould, e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April 14, 1945, in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420.

[75]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424.

[76]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598.

[77]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78]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598; Forrestal diary, entry dated July 28, 1945, and additional references to a 1947 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 undated,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78.

[79]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210.

[80] Walter Brown diary quoted in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58.

[81] 英文中“蓝”意指“郁闷”，“蓝到发紫”相当于“郁闷得想哭”。——译者注

[82]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30.

[83] Churchill to Eden, July 23, 1945, meeting “minute,” in Alperovitz and Tree,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p.271.

[84] Trinity Test observer instructions quoted in Laurence, *Dawn Over Zero*, p.7.

[85]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p.13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2.

[86] Brigadier General Thomas F.Farrell quoted in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Stimson), 18 July 1945, p.13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87]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

[88]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Encl.4, "Thoughts by E.O.Lawrence," p.13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89] Kistiakowsky quoted in Laurence, *Dawn Over Zero*, p.10.

[90]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

[91] H.D.Smyth,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Appendix 6: War Department Release on New Mexico Test, July 16, 1945, p.250.

[92]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Encl.3, p.136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93] No.1303, Acting Chairman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Harrison)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6 July 194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94] Stimson diary, July 21,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18, www.doug—long.com/stimson8.htm.

[95] Stimson diary, July 22,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22—23.

[96] MAGIC Diplomatic Summaries Nos.1204 & 1205, July 12—13,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78—79.

[97] MAGIC Diplomatic Summary No.1206, July 14,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82.

[98] MAGIC Diplomatic Summaries Nos.1208 & 1212, July 16—20,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82—84.

[99] MAGIC Diplomatic Intercept No.1225, August 2,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87.

[100] Ralph Bard, “Memorandum on the Use of S—1 Bomb,” June 17,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09.

[101] The Scientific Panel, Interim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on the Immediat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June 1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01.

[102] Memorandum for General Arnold, July 24, 1945, Document B18,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8.

[103] Joint Chiefs of Staf,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uly 17, 1945, Document B17,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7.

[104] Henry L.Stimson diary, July 24, 1945, Stof et al., eds., *The Manhattan Project*, p.214.

[105] U.S.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TS Manhattan Project File '42 to '46, Folder 5B, “Directives,Memos, Etc.to and from C/S, S/W, etc.”

[106] Truman diary, June 25, 1945.

[107] Memorandum from Major J.A.Derry and Dr.N.F.Ramsey to General L.R.Groves, May 10—11,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atomicheritage.org/key—documents/target—committee—recommendations>.

[108] Truman, *Year of Decision*, p.421.

[109] Document A45,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July 2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26.

[110]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66.

[111] *Yomiuri Shinbun* headline quoted in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67.

[112] Suzuki quoted in *Yomiuri Shinbun* account,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p.167—68.

[113] Ferrell, *Harry S. Truman*, p.215.

[114] Sourced to assistant naval aide George Elsey: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298.

[115]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p.159—60.

[116] Arnold to Marshall,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ne 17, 1945, RG—30, Reel 1007,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17] LeMay quoted in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57.

[118]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32.

[119] Ibid.

第十六章

塞班岛南面的提尼安岛原本是一座宁静的热带岛屿，现在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兵基地。其39平方英里面积中近一半都被铺上路面成为机场，以容纳B-29轰炸机和各型战斗机。岛上的北部机场和西部机场建有8条专供“超级堡垒”使用的巨大跑道，每条都有几乎2英里长，宽度相当于10车道高速公路。这些跑道通过11英里长的滑行道与起飞前等候区、停机坪以及燃油堆栈连接到一起。长长的珊瑚岭大部分被铲平以提供巨量路面铺设和沥青制作所需的珊瑚岩。目击者回忆称，从空中往下看，提尼安岛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甲板停满了轰炸机”。^[1]还有一些人联想到了曼哈顿，两座岛屿面积相当，同样都铺满了路面。和曼哈顿一样，提尼安岛的道路也呈网格状。岛上两条主要南北向道路分别被称为“百老汇”和“第八大街”；东西向的交叉道路有“华尔街”、“42街”和“110街”。岛屿中央一块未开发的牲畜保护区被称为“中央公园”。

在第八大街和125街的交叉口，靠近被单独划出来的北部机场北端部分，有一座岗亭，这里就是第509混合大队的大门，这是一支神秘而隐秘的B-29部队，它的一切都由两层铁丝网和巡逻的武装哨兵严密把守。第509大队是能够独立运作的，意味着有自己的地勤、后勤、通信、安保和行政管理机构。它和自己名义上隶属的第313轰炸联队完全不打任何交道。大红色和黑色的指示牌警告称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营区。即便是第313联队的指挥官詹姆斯·戴维斯准将也不知道这些表面上属于自己辖下的

神秘的“超级堡垒”是干什么的。戴维斯想要来大队地盘看看，结果被枪指着赶了回去。

第509混合大队唯一的任务就是投掷原子弹。大队长是小保罗·W.蒂贝茨，一位29岁的中校。蒂贝茨被赋予了实际上是无限量的资源来完成他的任务。他有权要求得到物资、装备或者他看中的任何人，他组建队伍时从其他航空大队调走了整个的B-29中队而无须给出任何解释。1944年12月，第509大队在美国犹他州的文多弗陆军机场开张——这座基地阴冷、干旱，位于犹他州盐场和内华达州边境之间。所有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都被告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其所做之事，不可走漏半点风声。任何问太多问题的人，哪怕是核心团队成员，也要被送走。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循“非必要不告知”原则，但是飞行员和投弹手被告知，他们必须进行训练，以投掷一枚9 000磅重的“特殊炸弹”，出于保密，他们称其为“小玩意儿”。[2]

投掷新型炸弹时，飞机按要求得在爆炸时飞离炸点至少8英里。它将会有40秒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机动。这需要进行155°大坡度急转弯，同时飞行员还要大角度俯冲以加速。对日本战斗机的防空战术进行分析后，蒂贝茨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拆除飞机上的大部分武器，依靠速度和高度来躲避拦截。第509混合大队还必须监督对B-29飞机进行的大改造，因为新型炸弹无法装入这型飞机的标准弹舱。在文多弗，这支大队使用“南瓜炸弹”进行训练——它的尺寸、重量和弹道特性都模拟了分别被称为“小男孩”和“胖子”的铀弹和钚弹。训练飞行时，B-29会瞄准画在地面上的300英尺直径的圆圈投下哑弹，随后进行规避机动。

“三位一体”核试验刚刚完成，两枚原子弹的主要部件就被运到提尼安岛。装着“小男孩”炸弹中枪式起爆机构和一半铀——235核心部件的板条箱被空运到旧金山，装上巡洋舰“印第安纳波

利斯号”。这艘军舰平安无事地在7月26日抵达提尼安岛的一处码头。板条箱随即被送到第509大队营区的一座组装厂，厂里的操作人员都是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和技师。铀弹的其余部分被分装在两个箱子里，搭乘一架C-54运输机飞过了太平洋。8月1日，原子弹的所有部件都来到了提尼安岛，准备组装。

卸下神秘货物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启程前往莱特湾。但它此行却在7月30日戛然而止。当天，这艘巡洋舰被日本潜艇伊-58发射的两枚鱼雷命中，在12分钟内沉没。它的求救信号无人收到，而且直到三天后才有人发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不见了。等到救援船只到达沉船现场，第四天已经过去了。军舰沉没时，舰上的1 200名舰员中有约900人弃舰逃离，但是放下来的救生艇却没几艘，于是人们只能在海中游泳或攀爬在残骸上。在这四天的煎熬中，大约600人死于暴晒、脱水、盐水中毒、溺水或者鲨鱼之口，只有317人获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这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前第5舰队旗舰，是美军在二战中损失的最后一艘主要作战舰艇。

虽然自从1944年那些初探的日子以来，B-29空袭作战已经愈加安全了，但起飞时坠机的情况还是会时常出现。飞机在起飞时满载燃油，比整个航程中的任何其他时刻都更重。第20航空队各个机场的跑道尽头都有不少烧尽的坠毁B-29的空壳。8月4日，就在轰炸广岛任务的两天前，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的各个机场上总共有4架B-29在起飞时坠毁。这种事故表明，在载机安全升空之前绝对不能提前整備原子弹。这意味着原子弹组装小组要随同机组人员升空。

蒂贝茨将亲自驾驶投掷铀弹的B-29。45—MO号B-29飞机有个更知名的名称：“伊诺拉·盖伊号”——蒂贝茨用自己母亲伊诺拉·盖伊·蒂贝茨的名字给这架飞机命了名。第509大队另两架“超级

堡垒”将作为观测机伴随“伊诺拉·盖伊号”同行，并将投下各种测量设备。还有三架同型机将在前方飞行，侦察目标上空的气象条件。

8月6日子夜时分，一间严密把守的匡西特板棚房里进行了任务简报，牧师还做了祈祷。“伊诺拉·盖伊号”和其他飞机的机组人员随后乘上覆盖着帆布、架着条凳的卡车开往机场。经过沿途诸多检查点后，机组人员来到了停机坪，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一幕。“伊诺拉·盖伊号”被数百人围得水泄不通——有贵宾、地勤人员、士兵，还有一个庞大的媒体代表团。巨大的飞机被拍摄电影用的弧光灯照得雪亮。一处小平台上架设起了摄影机，闪光灯闪个不停。观者不由得联想起百老汇的公演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首映式。

蒂贝茨和机组人员在他们的飞机前拍了一张正式的合影。凌晨2时20分，蒂贝茨说：“好了，我们开始干活吧。”机组爬上了飞机，再次向围观人群挥挥手，接着关上了舱盖。启动引擎之前，蒂贝茨透过座舱左侧座位旁的舷窗向摄影机咧嘴一笑，最后一次挥手致意。舷窗下是用黑体字蜡印的他母亲的名字：伊诺拉·盖伊。

当巨大的引擎点着了火，人们纷纷向后退去。长长的螺旋桨开始旋转，引擎轰鸣起来。飞机滑行到A跑道和B跑道的边缘。“伊诺拉·盖伊号”关闭着航行灯，在2时45分开始起飞滑跑。由于带着5吨重的原子弹并满载燃油，这架轰炸机需要跑完几乎整条跑道才能离地升空。仪器载机“大艺术家号”在两分钟后从B跑道起飞，再过两分钟后升空的则是第二架观测机“必要之恶号”。三架飞机随后转向北，开始爬升。

“伊诺拉·盖伊号”安全升空后，总军械师“迪克”威廉·S·帕森斯

海军上校爬回炸弹舱，着手进行整備“小男孩”的复杂操作。这枚武器长10英尺，直径2.5英尺，重9 800磅。帕森斯把炸药插进枪式起爆设备中。几个小时后他还要回来接通起爆线路。

凌晨5时45分，机组看到了硫黄岛，折钵山在朝阳下清晰可见。“大艺术家号”加入了编队，距离“伊诺拉·盖伊号”的右翼仅仅30英尺；“必要之恶号”则来到领队机的左侧。从硫黄岛向北飞了两个小时后，三架飞机开始缓慢爬升至9 000英尺高度。几名无事可做的组员在路上睡了几个小时。

三架气象侦察机“同花顺号”、“加比特III号”和“满堂红号”已经提前起飞，在轰炸机前方飞行，侦察广岛和备选目标小仓及长崎上空的天气。“伊诺拉·盖伊号”的无线电员收到了在广岛上空盘旋的“同花顺号”发来的加密电报：“全空域云量少于3/10。建议：轰炸首选目标。”于是机组人员穿上他们的高炮夹克，背上了降落伞。蒂贝茨给座舱增压，“伊诺拉·盖伊号”继续缓缓爬高，最终在32 700英尺高空转为平飞。飞机在上午8时50分飞过四国岛南部海岸。空中没有日本战斗机，也见不到高射炮火。

帕森斯上校和他的助手回到炸弹舱，完成他们的炸弹整備检查工作。他们取下了保险，把尾管拧进去，接通起爆电路，并在这些机构外安上装甲护板。“小男孩”现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拆下脚手架并收好，离开了炸弹舱。他们不会再过来了。

蒂贝茨和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透过“伊诺拉·盖伊号”的花房式机头看着下方熟悉的海岸线轮廓和濑户内海的岛屿。这是个天清气朗的早晨，空中只有零星的碎云。他们直接从龙虾形状的江田岛上空飞过，这里是日本海军兵学校所在地。吴港的港口和城市从他们右侧下方滑过。在前方，广岛人口稠密的扇形三角洲出现在了视野中。这是一座宽阔且平坦的城市，位于

太田川分叉的潮汐河口上，一侧临濑户内海，其余三面被青翠的山岭所包围。蒂贝茨以磁罗经航向272°进入了最后的投弹航线。透过一道云缝，他和副驾驶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瞄准点——中岛北侧横跨太田川的巨大T形相生桥。此时，“伊诺拉·盖伊号”和僚机正在31 600英尺的高空，距离下方的城市几乎有6英里远。（广岛当地时间）上午8时5分，领航员喊道：“10分钟后投弹。”

8时14分，距离投弹还有1分钟时，蒂贝茨下令：“戴墨镜。”于是所有机组人员都戴上了焊有深色偏光镜片的保护风镜。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检查了诺顿轰炸瞄准具，确认瞄准点“入境”，这意味着飞机正直直飞向目标。此时，两架观测机也收到了无线电预警信号。8时15分，“伊诺拉·盖伊号”打开弹舱门，挂着“小男孩”的挂钩缩回槽内。费雷比告诉蒂贝茨，“投弹完毕”——其实飞行员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一下子轻了5吨，突然升了上去。蒂贝茨随即向右压坡度转弯。

“伊诺拉·盖伊号”右翼“大艺术家号”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威尼看到这枚10英尺长的圆柱体从投弹机上落了下去。他想：“木已成舟了。那上面也没有绳子或钢缆。无论它起不起效，我们都拉不回来了。”^[3]“小男孩”轻轻摇晃或者说“海豚跳”了一下，随后就像一枚导弹那样沿着航向稳步飞去。它的弹道相对陡峭，很快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它将要下落43秒，到达相生桥上空1 800英尺处的起爆点。

“大艺术家号”投下了仪器盒子，它们可以收集测量数据并通过无线电传回飞机。随后斯威尼向左大坡度急转，他的B-29随之进入了155°俯冲转弯，他和第509大队的其他飞行员已经为这个动作训练了9个月。“伊诺拉·盖伊号”向右进行了相似的转弯。文多弗基地的试验已经表明“超级堡垒”能够承受这样的转弯而不会

有结构损坏的风险。[4]

转弯时，蒂贝茨和斯威尼二人都小心翼翼地盯着他们的仪表。戴着焊有偏光镜的风镜看仪表盘实在不容易，他二人都快要
把额头贴上去了。“大艺术家号”正在飞离爆心的途中，机舱内突然充满了炫目的银蓝色光芒，斯威尼发现他前方的天空变成了一片耀眼的亮白色。他本能地闭上眼，但仍能感到满眼光亮。同时，他发觉自己嘴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像是铅。（这是伽马射线产生的臭氧。）在此时距离爆心15英里的“必要之恶号”上，一名机组人员发现机舱里明亮至极，戴着墨镜也能看清他袖珍《圣经》里的小字。

这时候蒂贝茨也注意到了闪光和口中的金属味。“我看到了光亮，”他后来说，“我还尝到了它。是的，我能尝到。那味道就像铅。这种感觉就落在我的牙齿上。你们看，这就是辐射。因此我尝到铅味时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它爆炸了。”[5]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从座椅上回头向后看。他立刻一边拍着蒂贝茨的肩膀一边大叫：“快看那儿！快看那儿！快看那儿！”路易斯后来在任务日志中写道：“我的天，我们干了什么？”[6]

大约一分钟后，第一次冲击扫过了“伊诺拉·盖伊号”。飞机的铝蒙皮开始出现明显而猛烈的扭曲，就像是外面有人挥舞着巨大的铁锤敲打机身一样。飞机被猛地一推，颤抖起来，好在还没有散架。蒂贝茨估计这一击的力量相当于2.5G。第一次冲击过后，第二次冲击接踵而至，这次的力量就小得多了——这是第一次冲击碰到地面之后向上反弹而形成的回波。

这些飞行人员没见过“三位一体”核试验，因此当飞机向爆心转弯拍照时，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场景毫无准备。“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中士觉得这看起来就像是“太阳从

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地上”。[7]这一幕令人敬畏而恐惧，一个火球带着无数紫色和琥珀色阴影冉冉升起，四周是大团翻腾的烟尘和燃烧的气体。巨大烟柱的顶端形成了一朵灰色的蘑菇云。烟柱已经升到比飞机更高处，因此飞行人员要抬起头才能看到蘑菇云。除了水面上几条长码头的外端之外，从空中看不到广岛市的任何部分。城市北面和西面的绿色山岭在灾难面前岿然不动，但浓密的烟尘之毯沿着蜿蜒的河谷向内陆铺开。“在下方你只能看见翻滚的黑色烟团，”蒂贝茨说，“我没去想底下的地面上发生了什么——你不能想这个。不是我下令要扔这枚炸弹的，我只是在执行任务。”[8]

“伊诺拉·盖伊号”和“大艺术家号”环绕广岛三圈，以螺旋形航线逐步降低高度，机组人员们则一直盯着下方难以言表的灾难，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仪器载机上的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数百张照片，摄影技师报告说照片拍得非常好。帕森斯上校则向提尼安岛发回加密电报，报告称核爆成功，B-29正在返回基地。

乔·斯提伯里克是“伊诺拉·盖伊号”上的一名机组成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漫长的返程中，机上所有人都几乎一言不发。“我被惊呆了，”他说，“我猜是因为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难以言表吧。我们都处于震惊之中。我们所有人想得最多的大概是这东西会结束战争，我们努力让自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9]

一整个夏天，广岛城中都是流言四起。据说美国人给这座城市准备了某种可怕的命运。否则为什么这一区域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摧毁了，包括吴港、岩国以及德山，唯独广岛完好无损？8月5日至6日的夜间，城中两次响起防空警报，有人乖乖爬起来躲

进防空洞，但其他许多人则在警报声中继续睡觉。

这天一早，海岸雷达网侦测到了“伊诺拉·盖伊号”前方的气象侦察机B-29。于是日本人拉响了防空警报，把城中居民召到了掩体内。早上8点，警报解除。空袭志愿队人员，包括许多学龄儿童，都解除了任务。

夏天还没有过去，这是一个晴朗、炎热的早晨，空中只有一朵云彩。道路上挤满了早高峰的人群，有人步行，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乘坐黄包车、马车、汽车，还有有轨电车。当“伊诺拉·盖伊号”和两架观测机从南面嗡嗡飞来时，从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目击者看到高空中展开了若干降落伞，那是“大艺术家号”投下的仪器盒子。

上午8时16分，“小男孩”在距离地面1 870英尺的高度，与瞄准点水平距离仅550英尺处爆炸了。爆炸造成的核链式反应，使核爆区中央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引燃了周围直径近1千米的空气。火球吞没了市中心，地面上约两万人当场蒸发。高温和电离辐射令距离火球表面1千米之内的所有人当场死亡，要么死于灼烧，要么五脏六腑被震碎。更远处，以爆心为圆心，呈同心圆状扩散的伽马射线、中子辐射、光灼伤、冲击波和火焰风暴将人们卷入其中。最初的冲击波从爆心处以超声速向外冲出，速度达到每小时约984英里。有轨电车从轨道上被吹下来，像玩具一样翻倒在一旁。人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扯掉了。2.3千米之内几乎所有的木质建筑都被夷平，半径3.2千米处的此类建筑则被摧毁一半。后来，调查人员发现爆心内圈半径里留下许多人的影子。他们都化为了气体，但其身体在路面或附近的墙上留下了淡淡的轮廓。

和头上B-29中的机组人员一样，地面上幸存的目击者也记得

爆炸时的闪光和口中的臭氧味道。蜂谷道彦医生当时正待在家里，他的起居室突然充满了刺眼的白光。就在他的房子倒塌前一瞬，这位医生还在好奇是不是有人在他窗户外面点燃了镁光灯。松重美人当时是《广岛日报》的摄影师，他记得出现了一道“明亮的闪光，满眼雪白，就像我们原来拍照时使用的镁光灯那样”。[10]约翰尼斯·西梅斯是德国耶稣会神父，也是东京基督教大学的现代哲学教授，他从首都被疏散出来，来到广岛郊区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当时他正坐在他简陋的卧室里，距离爆心约1英里，突然，屋里充满了“炫目的光芒，就像是摄影时候使用的镁光灯，我还感到了一股热浪”。[11]

片刻之后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巨响，天花板和墙壁突然塌了下来，堕入深渊之感包围了每一个人。蜂谷医生的屋子里充满了烟尘。他只能看到一根木柱歪倒在旁，之后又看见屋顶塌陷了下来。他原来穿着内衣，但是闪光之后，他转眼就变得一丝不挂，虽然他都没有注意到衣服被撕掉。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这位医生起初以为是一枚常规炸弹直接落在了他的房子上。他向妻子大叫道：“这是个500吨炸弹！”[12]

那些身处户外的人被掀飞到了空中。山冈美智子是个15岁的女孩子，当时正在前往她工作的电话局途中。原子弹爆炸时，她正抬头观看空中的飞机。“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她几年后回忆道，“这很难形容。我直接昏过去了。我记得我的身体飞到了空中。可能是冲击波导致的吧，但我不知道自己飞出去多远。”[13]碎玻璃和木头碎块扎进了她的肉里。田冈英子是一位21岁的母亲，正抱着她的男婴坐在一辆开往市中心的有轨电车上，车里突然充满了“奇怪的气味和声音”。她低下头，看见一块碎玻璃划破了她孩子的脑袋，孩子流了许多血，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起来也不疼。他还带着一脸血向妈妈笑。[14]中村初代

也是个年轻的母亲，她疯狂地想要把她的孩子们从家里的废墟中挖出来。她5岁的女儿痛得大叫。“现在没时间管疼不疼了。”她一边答道，一边把女儿拉了出来。她身上有几处划伤和青肿，不过没受其他伤。[15]北山双叶是一位33岁的妇女，在防火障拆除队工作，她被埋在了一座她正在拆除的房屋的废墟下。从废墟中挣脱之后，她发现自己正在流血。她的头发上落了一些还在燃烧的木块，碎玻璃扎进肉里。她找到一条毛巾，于是拿过来擦去脸上的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我发现我脸上的皮肤也被毛巾擦了下来。哦！我的手和胳膊上的皮肤也脱落了。我右手从胳膊肘到指尖的整块皮肤都脱落了，奇怪地挂在那里。我左手的皮肤也落了下来，五根手指，就像手套一样。”[16]

浓烟和尘埃笼罩在城市上空，遮天蔽日，白昼如夜。中村的女儿在和妈妈逃离家的废墟时一直问个不停：“天怎么黑了？我们家怎么塌了？发生了什么？”[17]大批难民——悲惨而痛苦的人组成的人潮——在大火前四散奔逃，远离爆心，或者涌向河堤。他们一瘸一拐，张着胳膊；许多人的大部分皮肤都已剥落，要张着胳膊才能避免和身体摩擦时的剧痛。许多人都是赤身裸体，而且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还光着脚，他们的鞋子陷入了燃烧的沥青路面，被扯掉了。他们的脸都可怕地烧黑、肿胀，头发被烧焦并蜷曲起来。那些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呼喊着想路过的人，请求帮忙给点水喝。到处都能听见哀伤的呻吟：“水，水，水！”[18]

醒过来后，山冈意识到她被严重烧伤了。“我的衣服都烧掉了，皮肤也是。我的衣服成了破布。我的头发原本都扎了辫子，但现在就像是狮子鬃毛一样。有些人还有一口气，努力想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有人腿被拧断了；有人没有头；还有人的脸被烧黑、肿胀，都不成人形了。”[19]松重美人带着他的照相机来到了

街上，想为他的报社拍几张照片，但刚一出门，他就发现自己面对这一幕幕可怕的景象实在无法按下快门。“人们的尸体都肿胀了起来，”他说，“他们的皮肤被烧掉，一条条挂了下来。他们的脸都被熏黑。我把手放在了照相机上，但是地狱般的鬼魅之景让我无法按下快门。”^[20]

大火蔓延开来，越烧越旺，汇聚成了快速移动的火焰风暴。风暴快速横扫被摧毁的城区，烧光地上的残骸，吞没了奔逃的人群。从这个角度上说，广岛核爆的后效和早先对东京等其他城市的火攻十分相似。许多原本可能生还的人由于吸入过多的尘土和浓烟而死。火焰激发了如同龙卷风一般的强大风暴，把一块块屋顶、房门、榻榻米和各种其他碎块卷走。人肉烧焦的恶臭弥漫全城。根据松重的记录，“人体脂肪被灼烧时会起泡而且噼啪作响。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烤人肉”。^[21]

本能驱使着人们奔向桥和河岸，要么清洗伤口，要么找水喝。他们跑下河堤上的石头台阶，来到狭窄、泥泞的河岸上，却看到了庞大到难以置信的难民人潮。就和那些遭到火攻的城市一样，河流成了乱葬岗。受伤严重的北山双叶径直来到附近的鹤见桥上，但是她低头向水里看了一眼就被吓了回来。“数以百计的人在河里挣扎。我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面孔浮肿而苍白，头发乱作一团，都举着手痛苦地呻吟着，跳进水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想要跳下去，因为浑身灼痛。但是我不会游泳，只好忍住了。”^[22]这一决定或许救了她的命。许多人从桥上跳下去，砸在其他人的头上，或者从河岸旁推开漂浮的尸体，涉水来到河中。广岛是一片冲积平原，河流都是潮汐河口：这里的水都是咸水，不可饮用。那些喝了水的人都会吐出来，呕吐物里还掺杂着血。

爆炸两个小时后，黑雨从天而降：雨滴反常地又大又重，大

小如同玻璃弹子一般，颜色乌黑，质地黏稠。这是由于水滴在凝结时吸收了升腾的灰土和尘埃。这些黑色的雨滴很大，落在难民身上时会砸得人生疼，还会在人皮肤上留下洗不掉的黑色斑点。黑雨很冷，有些被雨淋到的人开始颤抖。幸存者将来会知道，这些不祥的雨滴都含有放射性。

住在城中的人能看见闪光，却并未注意到爆炸声。而住在远处郊区的人则先是看见了闪光，随后又听见了轰隆的爆炸声。广岛的日本人将闪光读作“pika”，将巨大的响声读作“don”。这样核爆炸就被他们称为“pikadon”，意即闪爆。[\[23\]](#)

在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里，神父们竭尽所能地救助那些沿着河谷从城市中走出来的伤员。他们的教堂和图书馆被用作了临时救护所，但是这些救护所很快就挤满了伤员，再也容不下更多人了。于是神父们把榻榻米搬出来放在草地上继续救人。有一个神父在担任神职人员之前学过医科，于是他便指导其他人进行基础的急救。但是修道院里的绷带和药品很快用完了。于是他们尽可能地清洗伤口，然后抹上食用油，充作油膏。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神父们获悉有两位耶稣会教士在城里的教会办公室受了重伤。二人正临时在元安川中的浅野公园避难（这里距离广岛古城遗址和第二总军司令部都很近）。于是西梅斯神父和其他几位同僚拿起两副担架就进城去了。在迎面而来的难民人潮中逆流而行十分困难。接近市中心时，灾难愈加触目惊心。“原来城市所在的地方，”西梅斯后来说，“现在成了一片巨大的烧尽的废墟。”受伤的人们向他们呼喊。神父们尽了全力，带上了一个受伤的孤儿同行，但他们无法帮助所有人，因而不得不对无数哀求充耳不闻。浅野公园内的场面十分恐怖。数万市民席地而居，火焰风暴将大树连根拔起，横挡在道路上，因此只能从似乎数不尽的惨不忍睹的成人和孩子中间穿过才能走进公园。

救援队最后找到了他们的神父同僚，把他们放到担架上。第二天上午他们才回到长野。这一来一回用了12个小时。

浅野公园旁的红十字会医院已经部分坍塌而且被火焰包围，但是幸存的医生和护士仍然在努力工作，他们的医疗大厅里住进了大约1万名伤情严重的烧伤者或其他伤员。医生们对那些最严重的烧伤者已经无能为力，哪怕只是想脱下他们的衣服，皮肤也会跟着被撕下来。辐射伤害的迹象在8月6日就已显现；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这还将愈加明显。受害者的皮肤、牙龈、眼睛都在流血；他们咯血或者便血，头发一丛丛地脱落下来。医院里的许多伤员除了给伤口涂上一点碘酒之外再未得到更多救治。有个人在医院里当面问一位医生，为什么医疗人员对浅野公园里那巨大的人群不闻不问。医生答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施救，尽可能挽救性命。那些重伤者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会死，我们不能被他们拖累。”[24]

广岛的幸存者们已然分不清白天与黑夜。8月6日几乎一整天，城市的天空都是黑的，直到傍晚才放亮。大部分时钟和手表都被毁了。蜂谷医生还记得他无从知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我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一瞬，或许会持续到时间尽头。”他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无所知，因此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美国人用某种办法在整个城市里喷洒了看不见的油雾，然后将它点燃了？7日早晨，天终于晴了，广岛市民们第一次看见这片丑陋的废墟，而这正是他们的城市原先矗立的地方。到处都有一些钢筋混凝土残墙或者钢架结构还立在地面上。东面和北面的青山，以及南面的濑户内海，仿佛比以往更近，也更清晰了。城市被夷平，视野便开阔了：“房屋都消失后，广岛显得那么小。”[25]

幸存者中没有几个人表达出愤怒之意。消极的认命感主宰了

人们的情绪。许多人耸耸肩，说道：“Shikata Ga Nai [仕方がない]。”[26]这句话在战时的日本很常见：“没办法。”灾难已然发生，而且无法阻止。有人活下来了，有人死了，战争还要打下去，直到那些掌权者喊停为止。

杜鲁门是在乘坐“奥古斯塔号”横越大西洋时收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坐在水兵食堂条桌旁的条凳上，和舰员们肩挨着肩，端着不锈钢托盘吃午饭。一名军事顾问找到他，递给他一份从华盛顿发来的高优先级电报。电报告诉他，第一枚特殊炸弹已经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投掷到了广岛，效果看起来比新墨西哥州的试验更好。杜鲁门笑了，他和顾问握了握手，说道：“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27]十分钟后，第二份报告送来了，这次直接来自史汀生部长，报告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杜鲁门站了起来，向食堂里的人群大声读出了消息。水兵们围成一圈，鼓掌欢呼起来。总统随后又来到军官餐厅，向舰上的军官们再次宣读了战果，他们也一样鼓起掌来。里格登上尉说人们欢呼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有望更快结束”。[28]

按照事先的安排，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美国已经将世界第一枚原子弹投在了“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广岛。[29]杜鲁门简短会见了随行的媒体通讯员，但是除了正式声明中的内容外，他也没法告诉对方更多东西了。他随后向电影摄制组宣读了声明的一部分内容。纪录片是在“奥古斯塔号”的“指挥台”上总统的套房里录制的。总统穿着浅褐色的夏季制服，打着红色领带，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面对摄影机，后面的圆形舷窗清晰可见。“那是一枚原子弹，”他说，“它利用的是宇宙间最基本的能量。这股力量是太阳的能量之源，它被用在了给远东带来战争的人身上。”他解释说，美国在英国的协助下，集合了这个项目所需的

最顶尖的科学家，建设了巨大的工业设施，花费超过20亿美元。他说，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详情将由战争部发布。至于日本人，《波茨坦公告》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来避免这一可怕的命运，但是东京的领导人粗暴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因此，“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款，他们就等着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毁灭之雨从天而降吧”。[30]

在东京，广岛灾难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了过来。上午8点半，爆炸约15分钟后，吴港海军造船厂报告说相邻城市遭到了“一枚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的打击。[31]一个半小时后，广岛80英里外的一处航空兵基地报告称，“一枚巨大的特殊类型强力炸弹，看起来像是镁弹”，在爆炸时发出炫目的闪光，冲击波夷平了2英里半径内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帝国大本营没有收到来自广岛第二总军司令部的任何消息；那里的所有无线电和有线通信线路都断了。上午11时20分，广岛城外8英里处的一个无线电通讯员设法通过电话向东京的同盟社转发了一份口述报告。他说广岛已经被仅仅一两架B-29投下的一枚或数枚炸弹完全摧毁。[32]

日本军队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起初对美国能否造出这样一种武器表示了怀疑。丰田海军大将对日本自己失败的核计划有完整的了解，他判断即便敌人凑够了制造一枚炸弹所需的材料，他们可能也仅仅造出了一枚而已。即便不止一枚，也顶多只有两三枚，因此它们不足以从空中摧毁整个国家。（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对的。）民防当局行动起来，压制造成恐慌的流言，并谎称所有躲在地下防弹掩体内的广岛人都毫发无损。[33]

第二天天亮前，东京的新闻审查人员撤下了杜鲁门总统关于

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声明，议和派也行动起来，推进投降事宜。外交大臣东乡这天上午来到皇宫面见天皇。裕仁宣布，战争必须要结束，他要东乡把他渴望立刻停战的意愿转达给首相。当天下午和天皇会商后，木户侯爵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关切，问了许多问题。但是在当天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强硬派还在拖延时间，说是在调查清楚广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阿南惟几说，军队的技术顾问对于原子弹是否存在将信将疑，但他们还是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前往广岛了解情况。在新组建的“原子弹应对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技术委员会代表们说，他们怀疑美国人能否造出这样一枚炸弹，认为即便他们造出来了，也无法把这种不稳定的装置运过太平洋。他们认为攻击广岛的是一种“带有特殊装置的新型炸弹，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媒体只被允许说广岛遭到了一种新型武器的攻击，在8日之前，日本的报纸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原子弹的事情。

8月7日上午，由7名军官和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飞到了广岛。调查组中包括了日本的顶尖核科学家仁科芳雄，正是他领导了这个国家半途而废的原子弹计划。在被摧毁的城市上空盘旋时，仁科说他一看便知“除了原子弹，没有别的武器能造成如此破坏”。^[34]他的盖革计数器确证了这一点。当飞机在机场停下来时，他们见到的一名官员本人就是原子弹威力的生动例子。这个人受到了闪光灼伤，但是他当时正侧脸对着爆心，因此他的半边脸被完全烧伤，另半边则完好无损。他告诉调查人员：“所有暴露的东西都被烧了，但是只要有掩蔽，哪怕只是轻微的掩蔽，也可以免于烧伤。因此不能说没有对付的办法。”^[35]第二天，调查组向帝国大本营提交了报告，结论是，攻击广岛的毫无疑问是一枚原子弹。^[36]

在东京，8月8日，铃木首相召集“六巨头”再次举行最高战争

指导会议，却被告知有些人因忙于其他工作而无法参加。这样，首枚原子弹爆炸后的整整48小时就这么被浪费了，日本的政策连做出调整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决策委员会凑不足人数。但日本政府还是再次向莫斯科发出了急切的恳求。他们仍然没能发现苏联正在为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做准备。东乡给佐藤大使发电报，询问苏联人是否有做出答复的迹象。几个小时后，佐藤回电，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终于同意在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5点接待他。

根据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整个首都此时都处于翘首以盼的状态中，期待着苏联那边能传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或许能让日本通过外交途径退出战争，从而得救。[37]

佐藤应约准点来到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办公室。这位日本大使刚刚开始他的礼节性问候，莫洛托夫就打断了他，请他坐下，说自己有一份正式声明想要宣读。莫洛托夫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宣读苏联的对日宣战公告，时不时停顿一会儿，以便翻译。他说他的政府是在应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政府之请求而行事，这些国家邀请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此举是为了“令和平更快到来，使人民免于承受进一步的牺牲和痛苦，并让日本人有机会避免像德国那样由于拒绝无条件投降而遭受危险和毁灭”。[38]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从第二天，即1945年8月9日起，视为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没有就取消苏日中立条约一事给出任何解释或者理由，这一条约原定于次年到期。

出于礼节，佐藤感谢了莫洛托夫为缔造和平而倾注的努力。这位大使拿到了文件的一份复印件，并被请出了大门。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即将到来的战争行动开始时间应当以哪个时区为准。佐藤或许觉得莫洛托夫指的是莫斯科时间8月9日——第二天

早晨。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是苏联人精心算计过的。莫斯科的5点是外贝加尔时区的11点。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边界上，此时已是午夜，一个小时后就是1945年8月9日了。到那一小时，到那一分钟，苏联战机就会起飞，苏联坦克就会开始滚滚向前。

过去的几个月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苏联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最具压倒性的地面进攻。部队集结地域就在边境线后方，高级前线指挥官也隐姓埋名，穿着低级军官的军服来到战区。随着13.6万节铁路车皮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来回往复，大批部队、坦克、野战炮和其他军用物资被运到了远东。自从三个月前德国投降以来，这一战区苏联红军的实力已经增长了超过一倍，达到大约89个师。[\[39\]](#)日本情报部门却未能察觉到这大规模战役准备和部队调动的任何迹象。

苏联人的计划是，在长达2 600英里的战线上，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同时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三路进攻。为此，苏军新成立了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由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他将依靠一套完整的指挥班子指挥整场战役。西路进攻由外贝加尔方面军负责，R.Y.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麾下的红军部队将穿越艰难险阻的戈壁沙漠和阿尔泰山区，迅速突破至中国东北腹地的沈阳。东路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将在K.A.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下越过小兴安岭，攻占长春，随后杀入朝鲜北部。远东第二方面军将从北面向中国东北进攻，支援两翼的进攻部队。参加此次作战的红军总兵力约150万人，超过该地区日军兵力一倍有余——而且苏军都是机械化部队。红军在欧洲东线血战多年并赢得胜利，此时其实力和作战效能都处于巅峰状态——各个层级老兵众多，装备精良，而且指挥能力卓越。正如一名美国军事分析人员所写的那样：“苏军的作战计划和战争中其他时候一样别出心裁。出色地执行这些计划令其在两个星期内便赢得

了胜利。”[\[40\]](#)

虽然苏军的作战计划被称为“中国东北战略进攻战役”，但它也包含了占领朝鲜、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辅助作战计划。进攻千岛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直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才开始，红军部队还将迅速占领岛链的其余部分，其进攻作战将持续至1945年9月2日苏联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还指示红军拿出攻占北海道岛的备用计划。假如日本再晚投降哪怕只是几个星期，其本土最北端的岛屿就要在“铁幕”另一边待上45年了。

当东京方面获悉莫斯科宣战时，苏联红军已经杀进了中国东北。8月9日拂晓时，日本的陆军省和帝国大本营中已经挤满了睡眠惺忪的军官。许多人已经预料到苏联会来进攻，但是没几个人能想到苏联会在击败德国后这么快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一个月前发布的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还估计说苏联人最早要到1946年2月才能在东亚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据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回忆，这次突然袭击“真的到来时，给大家沉重一击”。[\[41\]](#)在帝国大本营，高级将领们讨论了苏联如果同意恢复中立并协助外交停战的话，可能会开出怎样的价码，并且商量从亚洲大陆撤回所有日军部队。许多人主张，如果苏联真的开价的话，日本应该接受——这显示出日本高层其实知道自己在这一区域的力量是多么虚弱。

收到来自中国东北的战报之后，事情便很快清楚了，红军以庞大的装甲机械化纵队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动了进攻。这支碾碎过德国国防军的军队现在把自己全部的怒火砸向了业已消耗殆尽的关东军。日本士兵带着一贯的坚韧和勇敢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无法与对手相提并论：兵力、坦克、空中力量、后勤，以及机动性。数十万日本士兵被苏军俘虏，许多人直到战争

结束后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多年，充当劳力。

铃木首相召来了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问道：“关东军能击退苏军吗？”

池田答道：“关东军毫无希望。”这支曾经精锐的兵团已经把它最好的部队、装备和军火调去增援台湾岛、日本本土和太平洋其他战场。现在它只是曾经那支关东军的“一具空壳”。

听罢，铃木长叹一口气。“关东军那么弱了吗？”他问道，“那就没戏了。”

“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池田说。

铃木对此答道：“完全正确。”[\[42\]](#)

斯大林在1945年8月进攻日本的举动是一连串翻云覆雨的新回合，这些事件始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中立条约。这一密约终结于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突然入侵。莫斯科以类似的方式，在1945年6月至8月间一直在和东京玩外交哑剧，为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打掩护。苏联直到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前整一个小时才把宣战书发给日本，这可以看成是1941年日本背信弃义偷袭珍珠港的间接报应了，偷袭珍珠港也是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筹划和准备的。

在东京看来，苏联进攻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危局还只是问题的一半，而且还不一定是更重要的那一半。议和派可是把外交停战的所有鸡蛋都装在了这一个篮子里。莫斯科的突然宣战浇灭了他们最后一点通过和平谈判保留一部分日本主权的希望。现在，日本投降的时机将会直接影响到苏联在战后对日占领中的地位。池田纯久在和铃木首相谈话时表达过他的观点：“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他的意思是，日本此时面

对着如此困境：自己越晚认识到投降的必要性，苏联要求参与统治日本的危险就越大。比起向西方势力投降，日本政府中的许多人更担心苏联影响力的增长。

外交大臣东乡召集了外务省的高级幕僚，说自己将要提议立刻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还要附上单方面声明，和平“不对皇室地位造成任何影响”。[43]和铃木及米内会面后，东乡此举提前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米内对海军部的一位同僚说，对广岛的轰炸和苏联参战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它们创造了一场或可用来打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僵局的危机，也为军方提供了一个接受战败而保全颜面的台阶。[44]

当苏军的进攻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在提尼安岛第509混合大队营区起飞线旁的一个煤渣砖仓库里，第二枚原子弹正在进行作战准备。“胖子”是一枚大个头的炸弹，名副其实。弹体中部短而肥，外形就像个鸡蛋——或者如任务指挥官查尔斯·斯威尼所说，像个超大号的挂壁球。这枚炸弹重量超过5吨，外壳漆成明黄色，弹头上漆有两行缩写字母：“FM1”和“JANCFU”。意思分别是“Fat Man 1”（胖子1号）和“Joint Army-Navy-Civilian Foul-up”（陆海军民联合惹祸）。

技师和科学家们在操作11磅重的钚核心时小心翼翼。这东西看似普通，摸起来却热乎乎的，如同活物一般。在仓库里，一块块的钚被放进指定的匣子里。聚爆装置中装有5 300磅重的B炸药，也就是“巴拉托炸药”——这令“胖子”即便不考虑核装药，也是上过飞机的最大的炸弹之一。安装弹上的透镜系统是个精细活儿，专家们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核弹装置组装完成后，钢板用螺栓锁上，外面的插孔插上了绿色安全栓。

8月8日下午，“胖子”被放在手推车上，由三个人推出了没有窗户但装有空调的绿色煤渣砖仓库。他们用螺栓把尾翼固定到炸弹尾部，然后把它推到一处特制的混凝土装弹槽中。投弹机“博克之车号”就停放在装弹槽上方，炸弹舱门打开。人们极其小心地把炸弹抬升到飞机内部装好。空间刚刚好。

起初蒂贝茨打算继续率领这第二次核轰炸任务编队，并亲自驾驶投弹机，就像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一样。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后来决定不去了，把任务交给了斯威尼。有些人对他的这一决定感到吃惊。斯威尼来自马萨诸塞州北昆西市，是一名25岁的陆军少校，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极具天赋的飞行员，可能是第509混合大队中仅次于蒂贝茨本人的第二优秀的飞行员。（加入第509大队之前，斯威尼曾被指派教寇蒂斯·李梅将军驾驶B-29。）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驾驶的是担任仪器载机的“大艺术家号”。然而斯威尼没有在德国上空飞过，实战飞行经验也有限。

这次任务的首要目标是小仓，这是位于九州岛最北端的一座古城和工业城市，面对着下关海峡。第二目标是长崎，九州岛西海岸的一座大型港口和造船中心。

这三架飞机的大部分机组人员都飞过广岛那次任务。有些人后来说，他们对于还要投第二枚原子弹感到吃惊。他们都希望一枚原子弹就足以结束战争。“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员阿贝·斯皮策记录了他的失望之感：“没必要再执行更多任务，投放更多炸弹，造成更多恐惧和更多死亡了。上帝啊，连傻子都会这么认为。”^[45]

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是完美无瑕的。与之相比，长崎这一趟出击从一开始就饱受各种混乱和错误

困扰，几乎导致任务失败。那句厚脸皮的JANCFU（陆海军民联合惹祸）实在是预言得太准了。炸弹本身的技术问题，投弹机的供油系统故障，会合失败，糟糕的天气，混乱不堪的无线电通信，几乎撞机，还有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上空同样恶劣的能见度。斯威尼不佳的决断能力以及本次任务主武器官不清不白的指挥关系令这些问题雪上加霜。在“博克之车号”长达19小时的远航中，不少机组成员多次觉得自己要完蛋了，觉得他们的飞机要在海上坠毁或迫降了——提尼安岛上的指挥官们则搞不清投弹机是不是已经连同其珍贵的载运物彻底消失了。最后“博克之车号”还是靠在冲绳紧急迫降才幸免于难，那时候它的发动机已经开始冒烟，飞机还差点撞毁了一排停放着的B-24。其中许多事情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世。在真相公布后，参战人员之间随即在媒体上进行了尖刻的相互指责，包括蒂贝茨和斯威尼。

斯威尼平时驾驶的飞机是“大艺术家号”，广岛任务中他就是驾驶这架飞机担任仪器载机的。他原本要从这架飞机上投掷“胖子”，“博克之车号”担任仪器载机。但是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把仪器仪表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给地勤人员带来很大负担。因此，他们最终决定让斯威尼和他的机组直接驾驶“博克之车号”担任投弹机，弗雷德里克·C·博克和他的机组则改飞“大艺术家号”。《纽约时报》杂志通讯员威廉·劳伦斯被指派乘坐仪器载机参加此次行动，却没人告诉他这一调整，于是他在后来广为阅读的报道中称是“大艺术家号”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一错误在战后还被许多历史著作延续下来。

麻烦在“博克之车号”起飞离地之前就开始了。8月9日凌晨2时15分，当机组进行起飞前逐项例行检查时，一名航空工程师发现一个油泵不工作了。这需要更换一个新的螺线管，大概要耗费几个小时，任务也不得不推迟。按照蒂贝茨的意见，预备燃油主

要是用作压舱物，用来平衡炸弹的重量。他觉得这个油泵并非必不可少。根据斯威尼的说法，蒂贝茨要他自己做决定，于是他说他们要出发了。[\[46\]](#)坏掉的油泵意味着这次任务可用的燃油更少，因此要相应有所调整。

凌晨3时40分，“博克之车号”滑行到起飞线上，此时北方的天气并不好。午夜刚过，暴雨区就开始扫过那里，北方海平线上时不时还能看到闪电的光芒。航线沿途尽是暴雨天气。“博克之车号”此时重量为77吨，比波音公司建议的最大起飞重量高出30%。当四台引擎的转速都压到2 600 rpm（每分钟转数）时，斯威尼放下襟翼，向前推动节流阀，松开了刹车。超重的飞机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起飞滑跑，要把跑道的几乎每一寸沥青路面都用上，这架带着强大炸弹的超重飞机直到距离海岸的岩石峭壁仅仅200英尺时才离地升空。斯威尼保持飞机平飞，以增加速度和升力，之后才开始缓慢、长时间地向高空爬升。

他们在1.7万英尺高度向北飞行时，天上看不到几颗星星，机舱外的气温是零下30摄氏度。在飞往九州南面的集合点的漫长航程中，飞机颠簸得令人想要呕吐。在“大艺术家号”上，劳伦斯看到旋转的螺旋桨周围形成一片不可思议的蓝色等离子火光，“就好像我们坐在蓝色火光的战车上，乘着旋风在空中前行”。当他开口询问此事时，博克上校解释说这叫“圣爱尔摩火”[\[47\]](#)。5点刚过几分钟，飞机右舷海平线上一道紫色的光芒宣告了黎明的到来。爬升到3万英尺的集合高度时，飞机下方布满了棉花团一般的云层。“在那个高度上，下面的大海和上面的天空仿佛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劳伦斯写道，“我就在这片苍穹之中，坐在巨大的白色云山之巅。”[\[48\]](#)在“博克之车号”上，“胖子”并不需要像前一次的“小男孩”那样进行精细的安装操作。钚弹的聚爆透镜系统过于复杂，必须在炸弹挂装到飞机

上之前装配好。因此，海军的弗雷德里克·L·阿什沃思上校，本次任务的主武器官，只要爬进“博克之车号”的弹舱，把绿色安全栓摘掉，把红色的起爆插头插进去就行。这样，武器就做好战斗准备了。为了保险，弹上装有不少于8个引信，能通过无线电、雷达、高度、触地等各种方式引爆。然而，虽然在提尼安岛进行了那么多仔细的准备，错漏还是出现了。7点左右，阿什沃思和他的助手发现一个本应关闭的红灯在闪烁，而且还越闪越快。他们一时间陷入了恐慌，觉得这炸弹可能马上就要在飞机上爆炸了，这对“博克之车号”和机组人员来说可不是好事。在肾上腺素的驱动下，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打开炸弹的设计蓝图研究其电路。随后他们拆开炸弹外壳，检查各项开关。怪事出现了：虽然地面技师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两个开关位置错了。于是他们重设了开关，警告灯便熄灭了。两个人重新装上外壳，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直到几十年后才说出来。[49]

早上7时45分，“博克之车号”抵达了屋久岛上空的集合点。此时的飞行高度是3万英尺，他们已经在空中飞了5个小时。几分钟内，“大艺术家号”就来到了投弹机的右翼位置。但是照相飞机“大丑闻号”却不见踪影。20分钟过去了，两架飞机在盘旋时消耗了不少燃油。在那个高度的稀薄空气中，燃油消耗率很高，每小时要烧掉500加仑。低下头，他们从云缝中瞥见了屋久岛——这是一座圆形的岛屿，苍翠而起伏，有陡峭的高山和深谷。这时，斯威尼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继续等。又过了25分钟，失踪的飞机还是杳无音信。后来人们才知道“大丑闻号”是飞错到3.9万英尺的高度上了。

最终，在空耗了45分钟的燃油之后，斯威尼决定往北转向，飞往此次任务的首选目标——小仓。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出了海平线。“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从南到北飞过了整个九州

岛，飞过了日本几座最大的“神风”基地。两架飞机保持着无线电静默，但是那架行踪不明的照相飞机的飞行员却呼叫了提尼安岛。根据各方面的说法，他问：“斯威尼放弃了吗？”还有：“‘博克之车号’坠毁了吗？”这些询问本就容易引起误解，提尼安岛收到的无线电信号偏偏又残缺不全，于是这就成了“‘博克之车号’坠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提尼安岛上的指挥官觉得飞机和炸弹可能已经葬送在海上了。

当两架“超级堡垒”飞临小仓时，这座城市却被笼罩在云雾之中。透过树脂玻璃机头向下看，机组能找到某些地标——但是指定的瞄准点小仓兵工厂却看不见。附近的八幡市燃烧着大火，那里前一天刚刚被常规轰炸过，褐色的浓烟飘到了小仓上空。此外，当地炼钢厂的焦炉也工作起来，施放出了不少烟雾——这也是一种防空措施，目的是降低空中的能见度。^[50]“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抵达后不久，城市的高炮向它们开了火。起初高射炮弹的爆炸高度偏低，但当两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度盘旋时，高炮的炸点也在逐步升高。第509混合大队接到的命令是目视轰炸，也就是说投弹手要先用他的诺顿轰炸瞄准具确认瞄准点，然后再投下炸弹。斯威尼一连三次调整机头，三次进入投弹航线。但每次投弹手都说他看不见瞄准点。而高射炮的弹幕却逐渐升高，越来越近。

斯威尼和博克爬高到3.1万英尺，继而是3.2万英尺。无线电员在当地战斗机司令部使用的频率上监听到了日语说话，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遇到不愿碰上的家伙。机组人员紧张地看着燃油指针——他们知道可用的燃油比指针显示的更少。两架飞机的机舱里气氛紧张了起来。据机组人员们后来的叙述，许多人觉得这次任务可能会失败，或许两架飞机都要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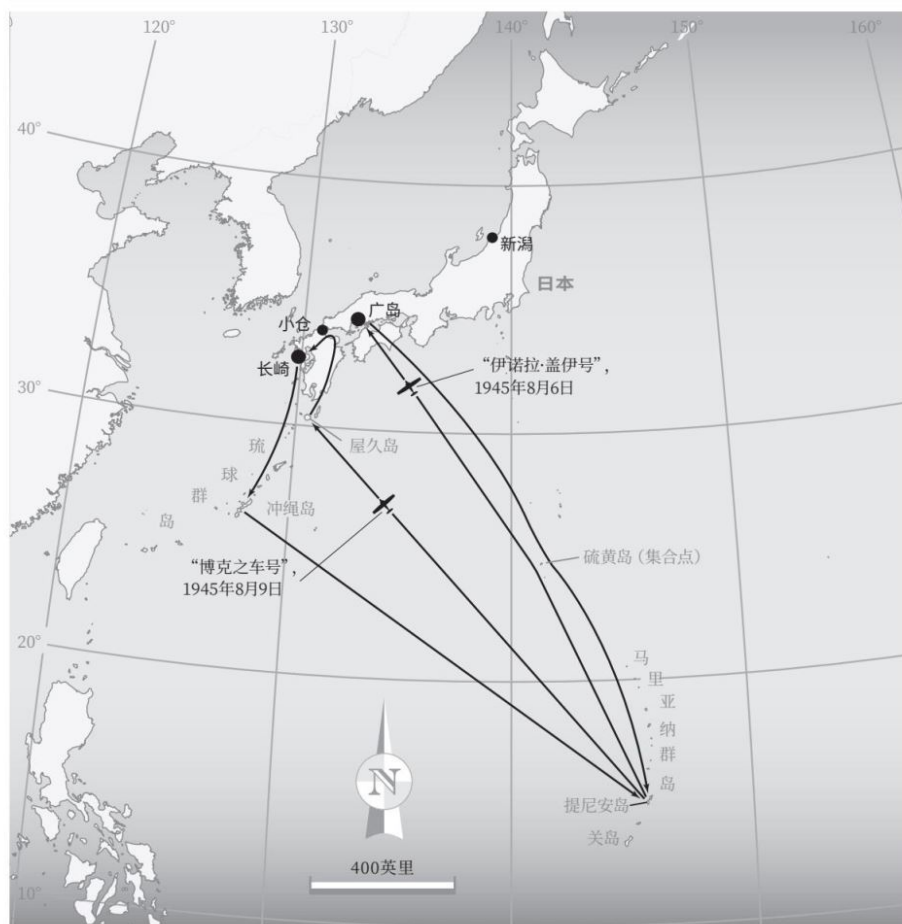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似乎没人为这种情况做过明确的预案。

虽然日本上空能见度不良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他们无权进行雷达轰炸。考虑到原子弹轰炸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准确度，这种过分的要求实在有些说不通。

在小仓上空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后，斯威尼决定转向第二目标。他压坡度转向南，要求领航员给出长崎的方向。据阿什沃思的说法，“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在转弯时差点就撞上了。接着，斯威尼的胳膊肘又不小心碰到了座舱里的一个按钮，把通话器从机内通话切换到了命令发送上。这样，一道原本应该发给本机组的例行询问便向外发送了出去，无线电静默也就被打破了。失踪的那架照相飞机“小丑闻号”的飞行员收到了这份无线电，他立刻回复道：“查克？是你吗，查克？你到底在哪儿？”^[51]斯威尼没有答复，他知道日本人肯定也在监听这一泄露出去的通话。他还知道“博克之车号”的燃油根本不够去和失踪的飞机会合。

飞往长崎的100英里航程只用了20分钟。上午11时50分，“博克之车号”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比计划的投弹时间晚了超过两个小时。飞机已经在空中飞了超过8个小时，剩余的燃油快要不够返航了。低头看下去，斯威尼和他的副驾驶失望地看到长崎也是阴云笼罩，“6 000英尺到8 000英尺高度上的云量达到80%~90%”。^[52]飞机的燃油只够飞一次投弹航线了，但投弹手还是看不见瞄准点，也就是三菱炼钢厂和兵工厂。无奈之中，斯威尼说他要临机决断，下令进行雷达投弹。否则就要把炸弹扔到海里去了。但是当“博克之车号”进入投弹航线时，投弹手突然大叫说他目视锁定目标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45秒后，“胖子”从“博克之车号”的弹舱里直落而下，斯威尼随即向右大坡度转弯脱离。“大艺术家号”紧随其后。

投放原子弹任务, 1945年8月



就和三天前在广岛时一样，一阵炫目的银色光芒再次充满了两架飞机的内部，天空都变成了白色。两道冲击波接连撞在飞机上，比在广岛时更加猛烈，令飞机嘎吱作响地摇晃起来。有一名机组人员说，他觉得“博克之车号”就快被撕碎了。

向下望去，他们看见一个紫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光球破云而出，就像一个气泡在水面上炸开。从“大艺术家号”的一个窗口向

外看的威廉·劳伦斯被震蒙了。光球变成了一根扶摇直上的棕灰色烟柱，“我们眼看着它直冲云霄，就像是一颗流星从大地上升起而不是从外太空落下，它在穿过白云升上天空时变得更加活跃。它不再是一阵烟，或者尘埃，甚至不是火云，它是一个活物，一个新物种，就在我们眼前不可思议地诞生了”。[\[53\]](#)当烟柱升到比两架飞机更高处时，其顶端变成了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下面，长崎市已经消失在了一片密不透光的烟雾、尘土和火焰之中。从脚下的有机玻璃板俯望过去，斯威尼说：“我们只能看见一团浓厚、污浊的褐色烟毯，间或能看见一片火光。”[\[54\]](#)

两架飞机在炸点周围盘旋，一张接一张地拍下照片。当蘑菇云的顶盖向外展开时，“博克之车号”似乎离得太近，马上就要被烟云吞没了。一名机组人员叫道：“蘑菇云朝我们来了！”[\[55\]](#)于是斯威尼第二次向右急转，远离了核爆。在令人屏住呼吸的几分钟里，机组人员们惊恐地看着直扑自己的蘑菇云。“博克之车号”脱离了危险，但是这次机动却进一步耗费了本已浪费不起的燃油。

“胖子”在浦上河谷上空大约1 800英尺处炸响，下方是长崎市北部一片挤满了传统日式木质住宅的密集居民区，建有一座天主教堂、小学和大学，还有两座三菱工厂。炸点位于预定的瞄准点西北方3/4英里处，但还是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里刚好是南面的三菱炼钢军工厂，以及北面的三菱——浦上弹药厂的正中间，爆炸把两座工厂全部夷为平地。

由于当地的新闻媒体还没有报道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事情，许多居民还想不到一两架B-29竟能够摧毁一座城市。当两架飞机从北方高空比翼飞来时，不少人根本没拿空袭警报当回事，都还站

在原地看着从头上飞过的轰炸机。和在广岛时一样，爆炸时出现了一个照亮天宇的炫目光球，所有距离爆心大约半英里之内的户外的人都当场蒸发。长崎原样重现了三天前广岛的恐怖场面。当时躲藏起来逃过一劫的人随后发现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地狱景象，太阳消失不见，大火四处蔓延，整个地面已是面目全非。一如广岛，烟尘遮天蔽日，全城满是可怕的红色光芒。“零区”周边区域大部分都是日本传统的小型木质建筑，它们几乎被完全夷平、蒸发或烧毁。在无边无际的残垣断壁之中，到处都是扭曲、熏黑的波纹板和钢架。那些位于爆心下方的房屋被直接压进了地下，瓦片和泥土、废墟熔在了一起。在距离“零区”半英里的长崎医学院，校园里所有的木质建筑都被炸平，里面的所有人都死于非命。而在混凝土建筑里，墙壁则提供了不错的保护，每10个人中有6个人能活下来，虽然其中许多人还是受了重伤。一名从防空洞走回学校的少女向同行的同学喊道：“我们进防空洞时那里不是有房子吗？”[\[56\]](#)

伤员躺满了道路，被困在废墟中，有些人蹒跚跛行，有些人在地上爬行，有些人甚至几乎一丝不挂——冲击波扯掉了他们的衣服——许多人无法动弹，乞求周围人给点水。有些人被烧伤到脸部完全无法辨认，带血的毛发和皮肤从身上一条条地垂下来；有人的伤口过深，连骨头都从绽开的皮肉里露了出来；他们张开双臂，以避免烧伤和刮伤的皮肤相互触碰引发剧痛。“零区”南面道路上奔逃的难民令一位目击者联想起了“蚂蚁大军”。[\[57\]](#)和广岛那次一样，幸存者们本能地逃向河流——这次是浦上河。数以千计的人挤到河边，跳进水里，想要缓解伤痛或者喝水。很快，河流就变成了漂浮的尸堆，退潮时大量尸体都被冲到了港口和海里。

核爆后大约一小时，与广岛相同的可怕雨水落了下来——黏

稠、发黑的奇怪雨滴砸下来，它们又大又重，落在淋雨的人身上，把人砸得生疼。黑雨令许多幸存者相信审判日已经降临。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地狱。

“胖子”的落点距离日本最大、最著名的基督教堂浦上天主堂只有半英里。这座宏伟的石头建筑几乎被完全夷平，只剩下几堵残墙和两座钟楼之一还矗立在废墟中。周围的居住区被一扫而空。自从四个世纪前第一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日本起，长崎周围的海岸区域就一直是日本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从1700年左右开始，浦上河谷就是这个规模不大但百折不挠的宗教社群的中心，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中生存下来，往往通过暗中信教的形式躲过劫难。估计大约有1万名日本基督徒死于核爆，或不久后伤重而死。有些日本人注意到长崎的諏访神社未受核爆损伤，和基督教会的毁灭形成天壤之别，认为这是天佑所致。他们觉得古神道教的神祇比外来的神更厉害。

和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的广岛不同，长崎城区被山岭所分隔。起伏的地形遮蔽了外围城区，使其免遭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浦上河谷西边一座陡峭的山岭吸收了大部分冲击波和辐射，让长崎其余城区大部分免受其害。山岭面向“零区”的一面化为焦土，大部分建筑和植被都被烧毁了，令其看上去如同“初秋早至”（一名目击者语）。[58]但在山岭的另一面，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另一个世界，草木依旧青翠，大部分建筑看上去完好无损。

勘测人员收集了两处核爆地点的数据之后，很快就知道长崎的这枚炸弹威力更大。“胖子”的爆炸当量比“小男孩”大30%，浦上河谷的碗状地形进一步加剧了爆炸的威力。第二枚原子弹对于与爆心距离相同的相似建筑造成了严重得多的破坏。[59]

和广岛一样，准确的伤亡数字很难算清楚。据信有4万至7.5

万长崎居民在8月9日或其后不久死去，另有7万人在1945年底前死亡。

两架燃油不足的B-29已没希望飞回提尼安岛了。最近的己方机场位于冲绳，飞行距离460英里。斯威尼相信他的燃油已不够飞到那里，但他将要努力用尽最后的每一加仑燃油，飞出尽可能远的距离。此时“博克之车号”的高度是3万英尺，他有足够的高度可以拿来交换。斯威尼将引擎转速从平常的2 000 rpm巡航转速降到1 800 rpm，随后又降到1 600 rpm，这已经低于发动机的设计指标了。如此低的转速会让引擎承受大量的应力，可能造成损坏。但是如果“博克之车号”在抵达冲绳前就耗尽燃油，那发动机完好也就没有意义了。考虑到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海上迫降，阿什沃思上校要机组全都穿上救生衣。

在冲绳北面60英里处，油量指针已经逼近0，无线电员开始尝试呼叫读谷机场的指挥塔台。但是无人回应。他试了所有可能的频道，仍然无回应。斯威尼于是发出了“求救”呼叫。他进一步降低了发动机功率，飞机实际上已经是在滑翔了。当机场出现在前方时，斯威尼能看到有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在盘旋降落。空中有很多飞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塔台对他毫无回应。“博克之车号”没有燃油去飞复杂的降落航线了。斯威尼想要直接对准跑道一端来一次没有退路的滑翔降落。但是机场知道他要来吗？“联系上随便哪个该死的冲绳塔台！”斯威尼向无线电员吼道。他自己则继续发出呼救信号。随后他告诉机组，从头上的舱盖向外发射信号弹。一个机组人员问他应该发射哪个颜色的信号弹。“把我们机上所有该死的信号弹全都打出去！”[60]

于是副驾驶打开舱盖，射出了8枚信号弹。每一枚信号弹本

身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告诉塔台“博克之车号”起火、燃油耗尽、机上有伤员等。但这一回，所有信号弹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机场的注意，在这方面他们成功了。当“博克之车号”最后飞临跑道时，所有其他飞机都让了路。右侧外发动机喘振着，噼啪作响，停了下来。斯威尼说：“我此时就像脱轨的列车车厢一样直冲了出去。”^[61]他保持着空速不降，瞄准了跑道正中央。“博克之车号”重重地落在跑道上，向上弹了25英尺，接着跌回地面。左侧外发动机也熄火了。他的空速过快，达到每小时约140英里。飞机开始向左偏航，飞向一处停满了B-24轰炸机的停机坪。斯威尼随即开始反转螺旋桨——这种功能只有第509混合大队的飞机具备——以进行紧急刹车。“博克之车号”重新对准了跑道中心线，最终停了下来。当飞机开到滑行道上时，第三台发动机也停转了。斯威尼关闭了第四台发动机，踩住了刹车。他瘫在座位上，筋疲力尽。剩下的滑行就交给拖车了。此时“博克之车号”的油箱里只剩下7加仑燃油了。

第8航空队指挥官詹姆斯·杜立德将军目睹了这次狂暴的降落。他一度确信这架飞机要坠毁了。后来斯威尼向指挥官报告，解释了他此次任务的内容。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正是轰炸日本的首尾。1942年4月第一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是杜立德率领的，斯威尼则刚刚扔下能够标志战争结束的那枚炸弹。

在食堂里饱餐一顿之后，“博克之车号”的机组重新登上已经加满燃油的飞机。他们还要再飞行5个小时，返回提尼安岛。晚上10点半，飞机降落在了提尼安岛北部机场的A跑道上。这次任务持续了19个小时。机场上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媒体，也没有任何庆祝。斯威尼被蒂贝茨和李梅抓去盘问了一番，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决定糟糕透顶，几乎毁掉了任务。他们也围绕是否应该把他

送上调查庭而进行了争论。但最后，他们决定不管了。至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长崎的轰炸成功了，他们也乐得保持这个状况。那些让“博克之车号”几乎毁灭的可怕细节直到几十年后才公布出来。

东京方面，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当天上午的一次长会中，“六巨头”发现自己分成了早已习以为常的3：3两派，相持不下。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三个强硬派也认为战争必须要结束了，他们“原则上”同意外交大臣东乡关于向盟国求和的提案。但他们还是坚持要附带几个条件。阿南将军发誓说，他和陆军决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他指出，日本可能会进入无政府状态，甚至有内战的危险，这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威胁。和往常一样，他得到了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的支持。

上午11点半，他们还在讨论之时，收到了长崎被另一枚原子弹攻击的消息。但是这一坏消息并未解决会议的僵局。

三个小时纠缠不清的争论之后，两派在以“单条件”还是“四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所有六个人都同意盟国必须保证保留天皇和皇室。议和派的东乡、铃木和米内主张这应该是唯一的条件，他们警告说，任何更多要求都无异于拒绝《波茨坦公告》，战争就会持续下去，直至日本毁灭。但是强硬派还坚持提出另外三项条件。首先，日本领土上不能有外国占领军；其次，海外的日军部队应当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撤回本土并复员；最后，战犯要由日本自己来审理。

在当天下午的内阁全员紧急会议上，米内大将直言不讳道，日本已绝无可能击退盟军向日本本土的进攻。阿南则反驳说，陆军有信心在盟军突击登陆时给予其重大杀伤，这样一击应当至少

能带来更有利的和平条件。阿南还补充道：“我们将以‘一亿玉碎’摆脱绝境。”^[62]几位文官大臣指出了陆海交通、燃油储备、经济和农业方面的糟糕状况，强调已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掌管司法的内务大臣警告说，如果让公众知道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社会秩序可能会崩溃。到当晚8点，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外的所有大臣都申明了自己的意见。6人支持东乡的“单条件”回应，4人举手支持强硬派的“四条件”回应，其余的人要么持中间立场，要么保证支持首相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这种僵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日本人已经在按照习惯使用“根回”的方法（刨根问底，寻找共识）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最重要的讨论都发生在各位大臣之间的一对一商谈，以及皇宫中。铃木首相和木户侯爵均多次单独入宫觐见裕仁，让他随时了解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讨论进展。几位“重臣”（这类人都是“高级政治家”，包括所有日本前首相）前来面见木户。和木户关系很好的前外相重光葵从乡下老家被召回来，准备接替东乡的位置。整个下午，几位皇室成员也积极活动了起来。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起初支持“四条件”回应方案，但他逐渐被议和派的分析所说服，到这一天结束时，他已坚定地站在“单条件”回应这一边了。^[63]

第二梯队的文官们和内阁中的议和派一起在幕后运作，策划将投降的决定交由“圣裁”。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请“六巨头”在一份同意进宫举行正式御前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迫水似乎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的强硬派相信，他们只要把观点呈给裕仁就可以达到目的。假如他们担心圣意会直接打破僵局，他们就会拒绝签字，这会议也就开不起来了。

午夜前不久，这场历史性的深夜会议在皇宫地下室一处拥挤闷热的防空洞里举行。所有与会人员都穿着正装，或者穿军服并

戴白手套，坐在电灯下的木椅上。天皇穿着军服，面向他们而坐。他的背后是一面镀金屏风。迫水大声朗读了《波茨坦公告》。两套备选的回答文稿——议和派的“单条件”接受文稿和强硬派的“四条件”接受文稿——被分发给了所有参会人员。

东乡首先发言。他话说得很重，重申了从这天一早就一直坚持的主张。他说，除了以保留天皇地位为仅有的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再无其他现实道路。再增加一连串条件无异于直接拒绝盟国的条款。那样的话谈判还没有开始就会结束，日本就只能在彻底毁灭或者（更加颜面无存的）接受完全无条件投降这两种灾难之间选择了。阿南则愤怒地咆哮道，日本陆军还没有被击败，在本土作战中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战术优势。应当允许陆军去击退入侵者；打完了这一仗，政府就有资本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条件。米内轻声细语地支持了东乡的观点。两个军种的参谋长梅津和丰田则说他们赞同阿南，虽然看上去两人都没有阿南那样的信心。木户侯爵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都站在“单条件”接受公告这一边。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屋里所有人都发了言。铃木没有表态，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自己成为调停人，而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凌晨两点，年事已高的首相站起身来，面向他的同僚。“诸君，”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几个小时而没有达成决议，而且也看不到形成共识的希望。诸君都很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连一分钟都浪费不起。”接着他转向天皇。“因此，我提议，乞陛下圣断，将圣谕作为本次会议的决议。”^[64]

此举既不合宪法，也无先例可循，强硬派对此震惊不已。裕仁极少亲自出手打破其内阁的僵局。他上一次如此违规用权是在1936年2月陆军军官叛乱期间。这个时候阿南一伙人本可以流程

不合规为由提出反对，在天皇发声之前强制休会。但是此举会在现人神的天皇面前有忤逆之嫌。这还会致使政府垮台，从而加剧眼前的国家危机。可能此刻他们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可能正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强硬派实际上也希望天皇裁决投降，因为他们也知道再无其他可行的选项了，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天皇的明确圣裁才能让他们那些难以掌控的下级守规矩。

整理了一下情绪之后，裕仁低声开口了。“我同意外交大臣提出的第一种方案。”他说。他对于陆海军如此众多忠勇将士的牺牲和日本人民在空中轰炸之下遭受的苦难深感痛心。但是若不接受盟国条款，则唯有国家毁灭一途，还将让整个亚洲和世界遭受更多苦难。对于陆军提出的本土决战，天皇则直接说他对他的军队指挥官已丧失信心，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和实际表现之间总是有天壤之别”。[65]裕仁说，到了这个时候，要“忍所难忍”——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明治天皇的裁决中也有此语，当时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修改第一次中日战争[66]后的和平协定。他祖父此语恰合此刻日本的痛苦境地。日本不得不再一次为了国家生存而忍受颜面扫地之耻。

随后铃木说：“圣裁已下，这就是本次会议的结论。”[67]裕仁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无人反对。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人都在“单条件”文书上签了字，包括阿南、梅津和丰田。随后铃木召集全体内阁举行另一场紧急会议，大臣们一致正式批准了这一决议。东乡的外务省开始起草正式的乞降照会，并准备经由欧洲中立国首都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转交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东京时间早上7点，这份文件被发了出去。照会中写道，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68]

一整晚没睡的阿南惟几将军回到了位于市谷的具有装饰派艺

术风格的陆军部大厦。他命令各处室主任和幕僚上午9点前来听取指示。会上，他以低沉、严肃的声音公布了天皇的决定。讨价还价的文件已经发给了盟国，他说，根据对方的反馈，陆军要么打下去，要么以保存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震惊的消息引来了一片怒斥。一名年轻军官跳着脚问：“陆军大臣真的想过要投降吗？”阿南用他的短柄手杖敲着桌子答道，在这样的危机下，陆军必须保持团结和守纪，“事实就是和平之事已决，我无话可说。但你们这帮家伙要是心存不满，想要推翻此决定，那就踩着我的尸体过去”。[69]最后这句话阿南绝不只是口头说说，屋里的每个人都看懂了这一点。

收到《波茨坦公告》之时，裕仁就盘算着他必须牺牲掉陆军和海军以保住其国体的核心（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在未来的战后世界中，这一国体将被剥夺其传统的军队“外壳”。留下来的将是一个更纯粹的以神道教国家和天皇万世一系为基础的宗教政权模式。在战后的叙述中，天皇解释说 he 曾经担心伊势和热田两座神宫的安全。如果有进攻部队在伊势湾登陆并占领了这两处圣地，敌人就将控制天皇的神权之柄——存放在神宫内的三件神器——若如此，“就很难继续保留国家政体”。[70]或许正是这一宗教信仰令裕仁和其他皇族要人警醒起来。如果只有牺牲军队才能保护自古以来的神道教传统，那也只能如此了。按照天皇的“圣裁”，陆军和海军不仅将被解除武装，遣散回家，还将被连根拔除。其领导人将被押上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可能将被关押或绞死。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令陆军领导人愤怒的是，天皇直白地说他不再相信他们的承诺了。梅津将军绝望地对河边虎四郎将军说：“很久以前，天皇就对军队的作战结果彻底失望了。他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信任。”[71]河边在一篇很长的日记中表示，这一

奇耻大辱令他深感痛心，他却也承认天皇的批评是“真实写照”。日本陆军确实毫无希望击退即将到来的对本土的进攻，而陆军的将军们却拒绝面对日本的绝望处境。河边写道：“我被这样的感觉所包围：‘我不愿意投降，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哪怕是面对死亡。’我正是带着这种感觉指导了这场战争中最后的作战。”^[72]

备感内疚的河边虎四郎保证，将尽其所能说服日本陆军上上下下接受天皇的决定。但谁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守住纪律。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五天里，东京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爆炸的边缘。陆军甚至海军的中级军官们跳起来想要阻挠和谈，为他们的全军造反和叛乱创造基础。鹰鸽两派争相通过国内甚至是国际新闻媒体发布观点。外务省官方安排同盟社的无线电台播发一次国际广播声明（英语），题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73]暴怒的陆军军官们随后就想要夺占同盟社的短波广播设备。8月10日晚，陆军省以阿南的名义发出了鼓舞士气的布告，号召部队“毅然决然将扩持神州之圣战战斗到底。纵食草啖泥，潜伏野处，断然作战，深信死中有生”。^[74]私下里，阿南告诉海外各地的陆军司令部，和平谈判已在进行，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部队必须“即便可能全军覆没”也要坚持战斗。^[75]

密谋者们开列了一份名单。凡是公认支持议和派的内阁官员都要抓捕或刺杀。投降实在是个刀头舔血的事情。有人讨论要占领皇宫，宣布戒严，甚至可能会对天皇进行“保护性监管”。外交大臣东乡的官邸大门前被人扔了一枚炸弹。但议和派显然知道结束战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迫水久常准备了一份天皇诏书的文稿，呈给天皇盖印，木户则在安排一场史无前例的广播，由天皇宣布终战。然而，直到8月11日日终时，盟国政府方面还是杳无音信。如果这唯一的条件被盟国拒绝，那么日本就要打到自己彻

底毁灭为止。对于神经紧绷的那几天，外交官加濑俊一后来写道：“连秒针的嘀嗒声都像是在讲述这个行将毁灭的帝国悬而未定的命运。”[\[76\]](#)

日本的照会通过多条途径被送到了华盛顿。首先，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截获并破译了东京和伯尔尼之间的电报，然后沿着指挥体系送交了上去。日本外务省在同盟社安排发送的短波无线电消息在8月10日凌晨被传递到华盛顿。（这一消息成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头版头条，抵消了阿南发给陆军的好战声明传达出的恶劣印象。）当天下午稍晚时候，美国国务院通过驻瑞士大使馆收到了正式的消息。

这个时候，史汀生部长正在驱车前往机场，他马上要登上飞机，飞往纽约郊外的阿迪朗达克湖区，去享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夏日休假。当消息传来，汽车赶紧掉头把他送回了战争部。史汀生回忆道，当他读到日本请求保证天皇地位的词句时，“很奇怪，这正是我担心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一点”。[\[77\]](#)他在日记里写道，美国国内要求惩罚天皇的政治呼声此时已经危及不流血战胜日本的希望了。居明显多数的美国人想要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根据盖洛普在1945年5月进行的一项调研，33%的美国人想要处死天皇，11%的人说应该把他关起来，还有9%的人说应该把他流放出境。史汀生说，这样的观点在更高层级的政府圈子里也有市场，“这些人对日本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日本天皇》”。[\[78\]](#)

杜鲁门把他的各军种总司令、国务卿、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召集到了白宫。9点，所有人都赶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各方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三个星期前在波茨坦争论时的翻版。国务卿贝尔纳

斯担心接受这份声明意味着放弃“无条件投降”的最终目标：“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比在波茨坦时做更多让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参战。”他向杜鲁门警告了此事的政治后果。他说，接受日本的条件将意味着“把总统架在火上烤”。[79]

莱希和史汀生一看到日本的条件就准备要接受了。莱希说，保留天皇只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付出的一个小代价。“我不是同情小裕仁，但是我确信有必要利用他来保证日本真正投降。”[80]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说时间对盟国不利，因为苏联在亚洲的地盘每一小时都在扩大。史汀生说，红军的进攻决定了美国人在这最后一轮博弈中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赶在苏联人有资格提出关于占领和托管日本本土的任何实质性声索之前，确保日本本土在我们手里，是十分重要的”。[81]苏联人在中国北部边境占领的地盘越大，他们对后续亚洲事务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苏联人对朝鲜的关注也愈加令人担忧，甚至有人开始谈论要派遣一支美军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苏联已经公开要求在对日占领中分一杯羹，可能会采用多国分区占领的方式，就像在德国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洲的未来就取决于东京和华盛顿化解僵局的最快速度。

吉姆·福莱斯特突然想到的办法解决了问题。盟国完全不必明确接受或拒绝日本的条件，他说，盟国可以直接给个“确认声明”，展示他们视天皇为从属地位的姿态即可。这样一份声明可以对日本的条件不作答，但含蓄地向日本人保证把裕仁留在皇位上。[82]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贝尔纳斯的答复文件里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至于未来日本政府的组织形式，它

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组建。[83]“最高统帅”一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强调执行对日占领的将是一名军官，而非同盟国的联合组织。就在当天，杜鲁门总统确认了那个所有人都期盼了数月的决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担任日本占领军的盟军最高指挥官（SCAP）。

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建议在和谈期间暂停轰炸。史汀生说美国民众对原子弹的“忧虑和误解与日俱增”。杜鲁门同意下令暂停原子弹轰炸——反正第三枚核武器也要等到这个月下旬才能准备好——但是他决定让常规轰炸作战“以现有的频度”继续实施，直到日本最终投降。[84]

由于东京鸽派安排的短波无线电广播，全世界现在都知道日本已经求和了。当内阁和各军种司令簇拥在总统周围时，白宫大门外挤满了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传来了一片欢呼声和汽车喇叭声。广播新闻中都在报道全美各个城市举行的群众庆祝活动。在整个太平洋上，军人们拿起武器朝天开枪。盟军军舰拉响了汽笛，打出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和高射炮弹。在冲绳岛旁的渡知具锚地，庆贺时打到天上的高射炮弹太多了，甚至有几名水兵因此丧命。[85]陆战队飞行员萨姆·海因斯还记得那是个“歇斯底里、令人惊恐的夜晚，战争的情绪被荡涤一空”。[86]岸上的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纷纷躲进了散兵坑或者战壕。当地海军基地指挥官向舰队发出指令：“收到此电文后，所有出于庆贺目的发射对空武器的行为应予停止。”[87]

第3舰队此时正位于日本北部外海，攻击这整个区域的各处目标。在“约克城号”上，舰长通过大喇叭宣读了这一消息，“黑暗的飞行甲板上传来一阵欢呼，那里满是正在排布飞机的舰员”。[88]在“密苏里号”上，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正在观看花样游泳明星埃斯特·威廉姆斯主演的彩色音乐剧。一名通信官从后面

走过来，在卡尼和哈尔西的耳边轻声说出了这一消息。哈尔西挥手要他退下，说：“我们先看电影。”^[89]由于没有收到停止攻击作战的命令，这支强大的舰队继续向南开往东京，8月12日他们将按计划在那里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

贝尔纳斯的答复通过设在旧金山的一个商业广播电台播放给了东京。8月12日拂晓前，东京收到了消息。东乡一大早就赶到他在外务省的办公室，和副手们仔细商议了此事。他们都认为这份答复并不理想，但也不是最差的。天皇将成为占领军的下级伙伴。经过对其中语句颇有些费力的解读，这份文件可以被理解为不会对裕仁及其家族进行逮捕、罢免或其他伤害之举的保证。翻译们还淡化了贝尔纳斯文件中的刺激性语句，将原文中的“须听从”软化成了日语中的“在其制约之下”。

在东京的各处权力中心——帝国大本营、各省及皇宫——日本领导人仔细研读了这份答复并围绕其含义和好处进行了争论。8月12日是漫长而混乱的一天。有些原本坚定站在议和派阵营的人开始心生疑虑和动摇。被重新起用的前首相平沼骐一郎认为，接受美国的条款将会导致国体丧失。他不喜欢日本政府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决定这一规定，他认为这是在诱导进行“旨在颠覆君主制政府的破坏性活动”。^[90]简言之，在12日上午，东乡在“六巨头”中仅有的可靠盟友，铃木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都被这些反对意见动摇了。在当天上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随后的内阁全体会议中，熟悉的僵局再次出现。有些大臣想要让美国人“阐明”关于天皇的条款。东乡则反对说任何这样的回应都有导致和谈崩溃的危险，这样日本就完了。他还暗示，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向华盛顿再发一份拖延时间的说明。

从8月10日首次求和到8月15日最终投降这段时间里，日本报纸的调门一直摇摆不定。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一事已经用英语播发给了海外听众，但是NHK电台的国内广播上却还没有出现同样的报道。而阿南惟几在求和后仅仅一个小时就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战斗到底的布告，却成了8月10日至11日日本报纸和广播报道的主角。

市谷的陆军省成了一座火山。少壮派的军官们已经在公开谈论政变，酝酿造反了。叛乱者们制订了计划，要控制皇宫近卫军，封锁皇宫大院，还要逮捕或刺杀内阁中的鸽派，实行军管，占领外务省，并控制广播电台。与此同时，海外的陆军指挥官也源源不断发来电报，不让投降。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将军说他难以想象他这支没打过败仗的军队竟要向手下败将中国军队投降。^[91]陆军中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还试图发表一份高级将领们联合签名的声明，要求在所有战线上加强战斗。内阁情报委员会出于对这些阴谋的警惕，拦下了这些文件，没让它们发到媒体上。

陆军大臣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把叛乱计划抛给了阿南、梅津和河边，以及其他陆军高级将领。这些领导人听完后支吾搪塞，不置可否。这种暧昧的回应令叛乱头子们对于将来得到高层的支持产生了期待，并继续行动下去。阿南紧抓着最后一根稻草，询问外相是否还有希望重新让苏联政府作为中介帮日本和盟国接触。（此时红军发动进攻已经有3天，攻入了中国东北纵深地带。）河边将军对这些密谋者毫无好感，认为“这个时间点上瞎胡闹，坏处比好处多得多”。^[92]他明显还在因为知道天皇对陆军失去信任而感到茫然。

铃木首相对一位下属说，由于苏联红军的快速挺进，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错过了今天，那么苏联人拿下的就

不只是中国东北、朝鲜、库页岛南部，他们还会拿下北海道。这会摧毁日本的基础。我们只要接触上美国，就必须停止战争。”[93]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大将出人意料地向天皇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警告说，接受贝尔纳斯声明中提出的投降条款，“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这么说很不妥，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的帝国将沦为附庸，这是我们不可接受的”。[94]

以这种方式直接向天皇进言是一种严重僭越的行为，放在平时，他们的官场生涯就完了。但是早先裕仁为了把他的意愿施加给政府，已经连更重要的礼节都丢掉了。暴怒的米内把丰田拖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两位参谋长到底是真的决心阻止投降，抑或仅仅是“做做样子”，就像长谷川毅提出的那样，只是为了“安抚激进派军官的不满”。[95]梅津和丰田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随后将会和政府达成完全一致之意见，再来请求圣裁”。[96]这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将会遵守天皇的最后指示，无论内容如何。

而天皇心意已决。他在8月9日就拿定了主意，现在只想让太平洋战争的这最后一出戏尽快落幕。在皇宫里的一连串私下会面中，他告诉木户、铃木、东乡、重臣、皇子以及统治层的其他人，他认为贝尔纳斯的条款是可接受的，他不想再进一步谈判了。

但是内阁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另一个“圣裁”必不可少。统治层都知晓了天皇的意见之后，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便极大了。政府任何时候都可能垮台，一旦如此，投降便不可能了。如果阿南辞职（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么陆军就可以拒绝提名新的

陆军大臣，这样也就无法再组建内阁。而在天皇下达停战诏书之前，全体内阁大臣的联名复签是必不可少的。而哪怕只有一名大臣拒绝在文件上签字，政府接下来都要集体辞职。换言之，仅有天皇一个人决定投降是不够的，还必须是整个政府，包括陆军，全都站在天皇这一边才行。而直到8月13日夜幕降临时，这一点似乎还遥不可及。

除了议和派与天皇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再无其他能够挽救投降可能性的办法了。日本人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贝尔纳斯正式的声明。（他们是从新闻广播里听到消息的，但是正式方案还要等到8月14日上午才能经由瑞士公使馆送到外务省。）但是两名参谋长却拒绝签字授权首相召开御前会议。这就形成了一个流程上的障碍。最后，在14日上午，铃木说服天皇以自己的权力直接召集开会，从而解决了问题。

通过这些方式，内阁全体会议最终于上午10时在皇宫召开，他们又挤进了狭窄的地下防空洞。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到10时50分，天皇才走进屋里就座。他穿着军服，戴着白手套。铃木首相站起身，概述了支持和反对贝尔纳斯声明的各方主张，并告诉天皇，虽然经过长时间努力，但内阁未能取得共识。铃木随后请三名强硬派总结他们的观点。梅津、阿南和丰田各自做了简单说明。他们想要让美国人就天皇地位问题给出更为明确的保证，如果被拒绝，就打到底。接下来，铃木直接请求天皇来决定。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裕仁第二次决定性地介入了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崩溃的决策体系。和三天前相比，他这天上午的表态更加坚定、直接、一针见血。天皇直接回应了三名强硬派。“在我看来，没有其他观点支撑你们的立场，”他说，“我来解释下我的观点。我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意见还是那天晚上和你们说的。

美国人的答复在我看来可以接受。”^[97]贝尔纳斯的声明为延续他的帝制做出了足够的保证。这时候几位大臣已经哭出来了。裕仁指示各位军队领导人要竭尽全力维持官兵的纪律，然后要内阁起草停战诏书，还说他愿意亲自在广播中宣读。天皇讲完，铃木起身，为内阁未能达成共识而致歉。

没有人公开反对。内阁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决定上签了字——包括阿南、梅津和丰田——内阁书记处便开始起草诏书。这天的一整个下午都在字斟句酌，围绕诏书的用词形成共识。外务省以东乡的名义向瑞士和瑞典拍发了一份说明，希望能转发给盟国政府。日本愿意以贝尔纳斯的声明为基础接受《波茨坦公告》。

这一整天，军队中的叛乱分子都在市谷的陆军省门廊大厅和地下室里准备起事。即便在天皇做出了决定之后，他们还在继续策划军事暴动。没人采取措施抓捕他们，密谋者们便公开游说甚至是威胁军队的将领们。最近刚刚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次长的大西泷治郎中将是潜在叛乱者中军衔最高的一个。他试图说服同僚，投降是不可想象的，但徒劳无功。他陈述主张的时候总是声泪俱下，他说唯一保持荣誉的办法就是大规模使用自杀战术。他找了米内，结果被骂了回来；找梅津，梅津没给他任何希望；又去找阿南，阿南个人对大西表示了同情，但拒绝加入。大西直接游说了军队和政府中的所有领导人物，甚至还有皇室的几位皇子。

天皇做出最终决定一个小时后，叛乱军官们试图伪造一份从帝国大本营发往海外各部队的命令，号召大家向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发动新一轮进攻。忠于梅津大将的人设法赶在假消息通过商用广播电台发出去之前将其拦截了下来。这真是万幸，如果发出去了，盟国很可能产生误解。

梅津心硬如铁，动用权威来强化纪律。他喊出了一句口号来说服军队放下武器：“尊皇不败。”^[98]但阿南却似乎动摇了。他和陆军上上下下都在交流，给一些人留下了他可能想要加入密谋的印象。如果叛乱想要有机会成功，那就必须得到首都主要地方部队司令部“东部军”的支持。但是除非陆军省直接命令他们这么做，否则东部军不可能支持正在筹划中的叛乱。这样的命令必须是书面命令，而且要由阿南本人签名。但是阿南并不愿意在一封和天皇的明确旨意相违背的文件上签字，何况他已经在其他一些同意投降的文件上签了字。

日本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晚发生的叛乱行为称为“独走事件”。陆军省军官、叛乱头子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率领一个大队的叛军闯进了皇宫。畑中和椎崎厚颜无耻地欺骗第二皇宫近卫联队的指挥官，说最高指挥官已经下令封锁皇宫对外的一切联系。守军相信更大范围的叛乱已经开始，于是同意遵从他们的要求，等候东部军到来。但是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发觉情况不对劲，拒绝加入密谋，结果被冷血地当场打死。叛军以森赳将军之名伪造了一份命令，还盖上了其办公室的印章。这份命令指示近卫部队占领皇宫，切断宫内与护城河外的一切联系，并且“保护”天皇免遭可能的威胁。

在皇宫内，皇室速记员写下了停战诏书的最后一笔，盖上了天皇的印玺，这样就成了正式文件。午夜前不久，裕仁走进了皇宫下方的一个隔音地堡，NHK的一组技术人员已经在那里架设好了录音设备。天皇对着麦克风宣读了停战诏书。这段录音长4分45秒，同日向海外播发的英文译本也仅有652个词。这样只录一遍就够了。技术人员把录音存入两张黑胶唱片，这些唱片现场就制作出来，放进了皇宫地下的保险柜。

在皇宫近卫部队的支持下，叛乱头子占领了皇宫，切断了电

话线。听说东部军正在赶来之后，近卫军关上宫门，切断了进出皇宫院墙的所有行车道和步行道。叛军搜查了皇宫的地下迷宫，挺着刺刀逮捕并审讯了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想要找掌玺大臣木户侯爵，但没找到。他们也没能找到留声机唱片。由于防空需要灯火管制，所有灯光全都熄灭，搜查者只能靠手电筒。搜查组并不了解地下迷宫中通道和地下室的布局，也很难看懂标记各个房间位置的古文字。

与此同时，其他同谋者也在东京和横滨四处出击。年老的铃木首相9年前就从一场刺杀中侥幸生还，这次他在刺客到来前的片刻得到告警，从后门溜了出去，躲进了隔壁房屋。感到挫败的闯入者用机枪扫射了他的办公室，并把它付之一炬。叛军来到阿南的官邸，想要说服这位陆军大臣加入他们的叛乱。阿南拒绝了，但叛军用不着把他杀掉，他本来就准备按老规矩剖腹自杀。平沼骐一郎男爵的家也被闯入，就和铃木一样，他也在叛军到来前不久逃走了。其他人占领了重要的无线电台，想要赶在天皇的投降录音向全国播发之前截住它。

当黎明到来时，畑中和椎崎意识到他们其实无路可走。没有一名陆海军将领前来支持这场叛乱。就连最热烈支持战斗到底的大西将军，也放弃了这条路线，准备用武士的方式结束生命。东部军司令田中静一将军决定平息这场叛乱。一整个装备精良的师团包围了皇宫大院，堵住了护城河上的桥梁。筋疲力尽的叛乱者在人数和能力上都比不了对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赌博失败了。早上8点，叛军投降。畑中请求允许他通过无线电进行10分钟的广播，但被拒绝了。他和椎崎没有被逮捕，或许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会自我了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二人绕着东京散发了一些解释他们所行之事及其原因的传单。就在天皇的广播即将播发之际，二人举枪自杀。

没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叛乱只能夭折。阿南和梅津只要有一个人支持，他们或许就能说服田中加入。如果这三人全都支持叛乱，他们恐怕就不会失败了。但是日军指挥体系最高层的军官们选择了遵从皇命，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下级部队中维持纪律。无论即将面临怎样的审判和艰难的战败，他们认为保持国家的完整性还是必不可少的。

军国主义狂人们想把整个国家拖入让所有人都死光的最后决战中——全民玉碎——就像许多日军士兵在数不清的太平洋岛屿上那样。但是日本人民并不想打这一仗。文官大臣、皇室、皇宫、重臣以及天皇本人也不想。最后，即便是军队最高领导层也不想。在随后的几天里，从宣布投降占领军到达之间，东京和全国各地的军队基地里时不时有叛乱发生，常常是一群中级军官占领公共设施，或者散发传单说天皇的广播是伪造的。但是没有任何高级军官或文官加入推翻天皇“圣裁”的尝试中。

当天晚上7点，一名NHK播音员提醒所有日本人，次日中午要守在收音机旁：“明天，8月15日中午，将有重要广播。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广播，一亿听众必须认真严肃收听，不得有误。”^[99]后来的公告还说这次广播将会有“天皇陛下的玉音”。^[100]为确保所有人能听到，那些通常会断电的社区也都被供上了电。为迎接这次重要广播，从14日晚10点起，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播了，直到放完天皇的录音后才恢复。

当叛军还在垂死挣扎时，那两张黑胶唱片之一被送到了NHK，日本的国立广播公司。在预定的广播时间之前一个小时，唱片被送到了广播工程师手中。东部军的部队控制了NHK总部周围的街道。密谋叛乱者和当局都知道，一旦天皇的声音通过电波

发出去，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任何叛乱都不再可能成功。

8月15日上午，整个日本的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接下来的广播会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听说外国皇室常常会在广播中讲话，但这种事在日本还没见过。很少有日本人听说过“裕仁”这个名字，他们只知道君主是“天皇”。他们连想象这位现人神的“玉音”怕是都办不到。关于银行将不再接受取款的流言四处传播，于是有些地区出现了小规模挤兑。有人怀疑战争结束在即，但其他许多人觉得广播的目的可能是对苏联宣战。或许天皇想要勉励臣民战斗到底吧。天刚亮，空袭警报就几乎一刻不停地响了起来，一批接一批的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哈尔西的第3舰队发动了战争中规模堪称空前的空袭。“和往常一样，我们无从知晓真相，”竹山道雄回忆道，“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看见、听见的狭小半径内的事情。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流言蜚语来揣测和总结。尽管如此，我们从报纸上能看出，肯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101\]](#)

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一个村子可能只有一台收音机，因此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到户外某处——一条街上，小公园里，学校操场。在城市里，社区组织把收音机接到大喇叭上。亲朋好友纷纷聚集在家中。许多工人都下工回了家，好和家人一起收听广播。在工厂、写字楼、学校、兵营里，日本人纷纷聚集在收音机旁，恭恭敬敬的，神情严肃，低着头，帽子拿在手中。还有些人怯生生地跪在地上说：“让我们也听听吧。”NHK的广播寂静无声，只是偶尔会有一个庄重的声音响起来，确认特别广播将在中午开始。

中午11时59分，空袭警报喧响了一阵，止住了。听众们屏住了呼吸，街上鸦雀无声。许多地方都只能听见夏蝉的高歌，人们纷纷伸长了脖子，侧耳倾听。在东京的NHK演播室里，一名技

师把唱针放到了唱片上，随后站到一旁，低下头。

电波中响起了声音。声音不大，有些尖锐而颤抖。许多人都觉得在滋滋的静电声中很难听清。“兹告尔等臣民”，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102\]](#)

他说的是古语，古代日本宫廷使用的一种晦涩语言。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都觉得演讲很难听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更是一头雾水。一名年轻的海军大尉，未来索尼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觉得演讲的语言很难理解。但他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是天皇，“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每一字的含义，但天皇说的大意我们明白了。我们之前非常紧张，现在松了一口气”。

[\[103\]](#)对于海军航空兵军官前田武而言，“仿佛连蝉都停止了鸣叫”。[\[104\]](#)天皇继续讲道：

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105\]](#)

有人讽刺称，“而战局并未好转”一语实在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此前一版文稿更准确，说的是“战局每况愈下”。[\[106\]](#)陆军省坚持用词不能这么重。8月14日下午，内阁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

这一点。即便是在战败前的挣扎中，陆军还是一心想着给自己保存一点颜面。[107]在盟国，当这次讲话的译稿见报时，许多人都被这让人觉得倨傲甚至挑衅的语气激怒了。裕仁居然说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纯粹且正义的，是“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在天皇的这篇讲话中，他投降的决定变成了一种克制而无私的高尚姿态。

讲话结束，许多日本人目瞪口呆，潸然泪下。他们向邻居深鞠躬，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有些人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那些对古日文了解比较多的人会把演讲翻译给邻居们听。在私下的议论、交谈和日记里，许多日本人都表达了对天皇感受的深切担忧。他们觉得天皇如此悲痛和焦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许多人都被清楚可见的“陛下的感情”感动了。[108]海军维护官宫下八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工作也无法集中精神。他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天。还有人爆发出愤怒之情。有个人说他和邻居感受到了“战败之耻”——更有甚者，他们还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当亡国奴之耻”。[109]有个被疏散到乡下的小学五年级孩童犯了个错，他告诉同学们：“战争现在结束了，我们能回家了。”其他几个男孩子冲上去揍了他一顿，吼道：“你个叛徒！我们发誓在这里拼尽全力，直至胜利那一天！”[110]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对于自己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而愤怒不已。如果结束战争如此容易，如果天皇拥有权力直接将战争叫停，那他为何不早点这样做？“皇帝老儿，”有个人说，“就为了这个，我的儿子们都白死了，死得像狗一样。”[111]

广岛的蜂谷道彦医生一连忙碌了9天来照顾核爆的伤者。听了天皇的广播后，他诊疗大厅里的许多伤员都很愤怒。他们吼道：“我们怎么能输掉战争！……现在只有懦夫才会放弃！……

我宁死不降！……我们受这么多罪都是图的什么？……逝者死不瞑目！”蜂谷医生发现许多在核爆后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人现在都想要继续打下去，就好像他们都忘了身上的严重烧伤和丧失至亲之痛，除非整个国家投入最后的决战。“‘投降’这个词带来的震动，比我们城市被炸带来的冲击还要严重，”这位医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得越多，就越发难受和痛苦。”^[112]

但是天皇已经表达了他的意愿，而且不会有人反对他。民众的大部分怒火都转向了政府和军队领袖。有人批评那些劝说天皇投降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则责骂同一群领导人鲁莽地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性的战争。许多人都很害怕，觉得会被胜利的盟国奴役。他们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们输了。”这是个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瞪大了眼睛互相询问：“现在我们输了，接下来会怎样？”^[113]没人知道答案，但是最坏的结果并不难想象，对于那些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马来亚、菲律宾和其他各处所作所为的人来说尤为如此。但还是有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空袭总算是不会再来了。他们也不用拿着菜刀和竹枪去迎战前来登陆的野蛮军团了。或许政府会重新开放浴室，他们就能去把身上的泥垢洗干净。在8月15日晚，尽管只是和平后的第一夜，防空管制就取消了，天黑后可以开电灯了。人们也终于能把窗户上的遮光罩取下来了。住在东京的文员吉泽久子想知道邻居们怎样看待这个重大的消息，她的结论是，“他们脸上明白无误的笑意回答了一切”。^[114]

在军事基地里，纪律已经完全崩溃了。士兵们拒绝听从命令。年轻的狂热分子赌咒说：“我们要取下天皇身边乱臣贼子的项上人头！”^[115]那些派驻海外的人急切地想要回家，去保护他们的家人免遭占领军侵害；他们计划着一回到日本本土就逃离军队。那些肉体上饱受军官们虐待的小兵开始找机会报仇。一个曾

经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士兵回忆道：“我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欢呼起来。一个军官来揍我，我揍了回去。”^[116]栃木县一所军队医院里的一位护士看到好几个军官在被自己人痛揍时呼喊道：“原谅我，原谅我！”^[117]

冷静下来之后，日本军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有义务去自杀。许多人不喜欢“其他那么多人献出生命之后我却战败回家”的想法。他们不敢指望受到乡邻甚至是家人的热情欢迎，因为他们将会“背负战败之耻”。^[118]驻扎在筑前航空兵基地的“神风”飞行员土田翔治，还指望着在天皇广播的当天飞他的最后任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受到失败的命运带来的幻灭。当地人看我们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些什么，实际上那是因为我们背上了失败的耻辱。”^[119]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里，军官们分成了几派，有人认为应该遵从命令投降，有人要上山打游击，还有人认为应该自杀。许多人想要打下去，或者自裁，但是一名年轻的中尉说：“死是很容易的事情。想想如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活下去，那才是折磨和痛苦……在黑暗时代活下去并把我们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绝非易事。但如果没人这么做，日本人民真正觉醒的时代就不会到来。”^[120]有些原本已经对活过战争不抱希望的人现在兴高采烈地意识到他们已然获得重生。天皇的演讲明确解除了他们对国家战败的责任，并且召集他们去努力工作，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拒绝投降是对圣意的不敬，也是对天皇权威的冒犯。诏书里已经对此有了明确要求，这和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也是符合的：“英雄豪杰，每因重私情之信义，而遭杀身之祸，以致遗臭万年者，亦复不少。可不戒哉？”^[121]

最后，日军从上到下绝大部分官兵都选择了活下去，例外之人少得令人吃惊。“我想过要自杀，却下不去手，”南九州的一名士兵后来承认，“我发过誓要‘打击美国鬼子，七生报国’。但我还

是选择了继续活下去。”[\[122\]](#)

阿南将军便是那少数例外之一。他没有收听裕仁的广播；8月15日凌晨，他用武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彻底摆脱了羞辱。他一晚没睡，和来访友人一起喝清酒，拒绝为正在皇宫中推进的叛乱分子提供任何支持。拂晓，这位浑身汗透的陆军大将遵循日本传统提笔写下了“绝命诗”，只有寥寥数笔：

皇恩无极，吾欲何言。[\[123\]](#)

之后，他手持一把短刀刺进自己的腹部，一直刺到刀柄处，刺穿了五脏六腑，左右搅动。刀刃割破了降主动脉，导致腹腔内大出血。他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按照日本传统观点，这是可敬的。

第二天夜里，大西将军重演了这血腥的仪式，用刀刺进自己的肚子，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自杀时许多军官过来看他，但他拒绝让他们帮助自己解脱痛苦。足足过了15个小时，他才失血而死。这位最好战的强硬派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要那些前来看望他的年轻军官必须遵从皇命，按天皇的指示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在镇压8月14日至15日的叛乱时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田中静一将军，在8月24日，也就是美国占领军第一支先遣队踏上日本国土的前一天举枪自尽。阿南的前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在9月12日举枪自杀，他的夫人惠子也在一天后随夫而去。

人称“小墨索里尼”的东条英机，也就是把日本拖入灾难性战争的那个人，在1945年9月11日自杀未遂。当前来抓捕这个战犯的美军敲他的前门时，东条从二楼窗户看到了他们。意识到自己

无路可逃之后，他回到书房，向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他的伤势很重，但并不致命。前来抓他的美军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外科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由于他失血过多，还进行了输血。这次失败的自杀被东条的国人认为是他可恨的政治生涯中最可耻的一幕。他被救了回来，最后被判犯有战争罪，在1948年被绞死。

在九州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里，宇垣缠将军起初拒绝相信天皇已经决定投降的“可恶消息”。但接到从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挥地堡打来的电话后，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在日记里写道，东京的领导人们“不过是一群自私的弱者，他们不会认真替这个国家的未来考虑，而只知寻求眼下的好处”。^[124]8月15日早晨，他奉命暂缓对敌舰队的攻击。中午，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全体人员立正收听天皇的广播。宇垣没法把所有词句都听懂，但足以知道战争结束了。“我从未如此惶恐。作为一名备受天皇信赖的军官，我竟然有这么痛苦的一天。我从未自觉如此羞耻。唉！”^[125]

自从来到九州担任指挥官以来，宇垣已经派数千名年轻的“神风”飞行员前去送死。现在他决心要追随他们而去了。他把个人日记——足足15本字迹工整的皮革本子——交托给了他的1912届海军兵学校校友会妥善保管。

宇垣缠的日记《战藻录》至今仍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最重要的文献记录之一。它的时间跨度覆盖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从袭击珍珠港之前几个星期写起，然后是珊瑚海、中途岛、瓜岛一系列血战，直到1943年4月山本在飞机上被击落身亡，这段时间里宇垣一直是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参谋长。1944年，宇垣指挥日本海军最重要的战列舰战队，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

参加了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1945年，他又担任第五航空舰队司令，指挥了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神风”攻击。在这全部过程中，宇垣把他的个人想法写进了日记里。

宇垣决意要赶在正式的停战命令从东京发下来之前驾机出击，于是立刻行动了起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已决意，纵使魂归天国也要为国效力。”战败后，日本将面临长期的苦难，他期待所有日本人能够“比以往更加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全力以赴地复兴这个国家，最终报此败之仇”。[\[126\]](#)

下午4点，和司令部的参谋们饮下最后一杯壮行酒之后，宇垣将军驱车来到不远处的大分机场。那里，11架D4Y“彗星”俯冲轰炸机已经排列在了起飞线上，22名机组人员已列队站好。所有人头上都系着旭日绑扎带。命令是五机出击，但所有飞行人员都想要参加任务。

宇垣问：“你们都跟我走吗？”

他们举起右手齐声喊道：“是，长官！”

宇垣摘掉了自己的军衔。他穿着绿色军服，戴着白手套，佩带着山本五十六送给他的短刀。在登上飞机之前，宇垣正对着照相机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看起来平静而坚决，脸上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他爬上了领队机的机翼，坐进后座。原本应当坐在这一位置的无线电员兼领航员求他让自己也坐进去。宇垣同意了，于是这个年轻人挤进了将军膝盖前的空间里。

11架飞机滑行到起飞线，人们看见宇垣戴着白手套的手从座舱里向外挥动。飞机起飞后向南飞去，其中三架飞机后来返航降落，机组成员报称“引擎故障”。

晚7时24分，宇垣的飞机向基地发出无线电呼叫。攻击机群即将撞击冲绳海岸外“傲慢的美军舰队”。此后便杳无音信。[127]

据美国海军的报告，一小群敌机试图向冲绳岸外伊江岛旁锚泊着的运输船发动俯冲攻击。它们全部被高射炮火击落，没有美军舰船被击中受损。次日上午，一艘坦克登陆舰（LST-926）的舰员们在岛旁的浅水里发现了日本飞机的残骸。他们把残骸里的尸体拖出来，掩埋在岸上。

在九州的第五航空舰队军营，宇垣的个人物品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是要送到他家人手中的。人们发现了一张手写便条，似乎是这天早些时候写的：“大梦已了，吾将升天。”[128]

[1] Phillip Morrison quoted in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p.681.

[2]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49.

[3] Sweeney, *War's End*, Foreword, p.i.

[4] Groves, *Now It Can Be Told*, p.318.

[5] Julian Ryall, “Hiroshima Bomber Tasted Lead After Nuclear Blast, Rediscovered Enola Gay Recordings Reveal,” *The Telegraph* (UK), August 6, 2018.

[6]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4; Interview with crew of Enola Gay, October 1962, Unknown Collections: 509th Composite Group, <https://www.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oral—histories/atomic-bombers>.

[7] Merle and Spitzer, *We Dropped the A—Bomb*, Introduction, p.1.

[8] Kelly, 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330.

[9] Stiborik quoted in Patricia Benoit, “From Czechoslovakia to Life in Central Texas,” *Temple Daily Telegram*, August 23, 2015.

[10] Yoshido Matsushige,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91.

[11] “Chapter 25—Eyewitness Account,”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by Father John A.Siemes,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http://avalon.law.yale.edu>.

[12]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2.

[13] Michiko Yamaok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85.

[14] Eiko Taoka, “Testimony of Hatchobori Streetcar Survivors,” The Atomic Archive,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Hibakusha/Hatchobori.shtml>.

[15] Hersey, *Hiroshima*, p.19.

[16] Futaba Kitayama quoted in Robert Guillain,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 August 1980.

[17] Hersey, *Hiroshima*, p.19.

[18] Ibid., p.31.

[19] Michiko Yamaok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85.

[20] Yoshido Matsushige,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92.

[21] Ibid., p.393.

[22] Futaba Kitayama quoted in Robert Guillain,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 August 1980.

[23] Frank, *Downfall*, p.265.

[24] Hersey, *Hiroshima*, p.50.

[25]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8.

[26] Hersey, *Hiroshima*, p.89.

[27] Lieutenant William M.Rigdon, USN, “Log: President’s Trip to the Berlin Conference,” August 6,1945, p.50, Leahy, *I Was There*, pp.432—33.

[28] Ibid.

[29] Truman's Statement on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30.

[30] Ibid.

[31]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84.

[32]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The Day Man Lost*, p.270.

[33] Frank, *Downfall*, p.269.

[34]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6.

[35] Frank, *Downfall*, p.270.

[36]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The Day Man Lost*, p.293.

[37] USSBS Interrogation No.609, Hisatsune Sakomizu, December 11, 1945, Kort,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61.

[38] "Soviet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 August 8, 1945,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http://avalon.law.yale.edu/wwii/s4.asp>.

[39] Lieutenant Colonel David M.Glantz,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pp.1—2, Leavenworth Paper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S.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February 1983.

[40] Glantz, *August Storm*, p.xiv.

[41] Document G9,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2608:Lieutenant General Torashirō Kawabe, November 21,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82.

[42] Document G7,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4479: Statement of Sumihisa Ikeda, December 23,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79.

[4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97.

[44]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01.

[45] Merle and Spitzer, *We Dropped the A—Bomb*, p.123.

[46] Sweeney, *War's End*, p.204; Paul Tibbets, oral history, accessed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oral—histories/>

general—paul—tibbets.

[47] “圣爱尔摩火”（St.Elmo’s fire），指尖锐物体在强电荷大气中运动时产生的发光现象。——译者注

[48] William L.Laurence,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49] 根据埃伦·布拉德伯里的说法，“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记载在任何官方史料中，但阿什沃思向我发誓真的发生过这些事”，见Bradbury and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4, 2015.

[50] Alex Wellerstein, “Nagasaki: The Last Bomb,” *New Yorker*, August 7, 2015.

[51] Sweeney, *War’s End*, p.215.

[52] Ibid., p.216.

[53] William L.Laurence,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54] Sweeney, *War’s End*, p.219.

[55] Bradbury and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56] William L.Leary and Michie Hattori Bernstein, “Eyewitness to the Nagasaki Atomic Bomb,” *World War II* magazine, July/August 2005, <http://www.historynet.com/michie—hattori—eyewitness—to—the—nagasaKi-atomic-bomB-blast.htm>.

[57] Shizuko Nagae eyewitness account, as told to her daughter, Masako Waba, “A Survivor’s Harrowing Account of Nagasaki Bombing,” *CBC News*, May 26, 2016, <https://www.cbc.ca/news/world/nagasaki—atomic-bomB-survivor-transcriPT-1.3601606>.

[58]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p.11, Report by the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June 29, 1946,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MED/med_chp9.shtml.

[59]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p.11.

[60] Sweeney, *War’s End*, p.225.

[61] Ibid.

[62]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53.

[63] Document D14, diary entries of Marquis Koichi Kido,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7.

[64] 此处为加濑俊一的转述。在迫水久常向战略轰炸调查组提供的说法中，铃木的措辞略有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34;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8.

[65] Document E1, Emperor Hirohito's Surrender Decision,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23.

[66]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译者注

[67]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9.

[68] Document 41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wiss Chargé (Grässli), Washington, August 11, 1945," in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6, p.627.

[69] Document G11,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0025A,Lieutenant Colonel Masahiko Takeshita, June 11,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8—84.

[70] Emperor's "Monologue," quoted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125.

[71]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01.

[72] Torashirō Kawabe diary,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13.

[7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17.

[74] Document D9, Army Minister Korechika Anami Broadcast: "Instruction to the Troops,"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0.

[75] Document D10, Army General Staf Telegram, August 11,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1.

[7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40.

[77] Stimson diary, August 10, 1945, quoted in Alperovitz and Tree,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p.489.

[78] Stimson diary, August 10, 1945, quoted in Janssens, *‘What Future for Japan?’: U.S. 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Postwar Era, 1942—1945*, p.318.

[79]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0.

[80] Leahy, *I Was There*, p.434.

[81]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0.

[82] Forrestal diary, August 10,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83.

[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6, pp.631—32.

[84] Forrestal diary, August 10,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83—84.

[85] James J.Fahey diary, August 10, 1945,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375.

[8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4.

[87]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54.

[8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4.

[8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447.

[90]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p.243—44.

[91] Documents C—17, C—18, C—19, Magic Diplomatic Intercept Numbers 1236—1238, August 13—15,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89—90.

[92]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8.

[93] *Ibid.*, p.237.

[94] Document D12, Toyoda and Umezu Report to the Emperor, August 12,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02—3.

[95]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9.

[96] Document D12, Toyoda and Umezu Report to the Emperor, August 12,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02—3.

[97]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9.

[98] Wray et al., *Bridging the Atomic Divide*, p.159.

[99]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4, 1945, pp.2—3.

[100]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5.

[101] Takeyama and Minear, eds., *The Scars of War*, p.50.

[102]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Released in Digital Form,”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 2015 (内附1945年8月15日刊于此报的天皇停战诏书的英译文)。

[103] Morita, Reingold, and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p.34.

[104]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126.

[105]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10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56.

[107] 日本停战诏书中文译本全文如下，供读者参考：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译者注

[108]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7.

[109] Ibid., p.179.

[110] Iwamoto Akir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58.

[111]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35.

[112] Dr.Michihiko Hachiya diary, August 15, 1945, in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83.

[113]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9.

[114] Hisako Yoskizawa diary, August 15,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217.

[115] Sadao Mogam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56.

[116] Haruyoshi Kagaw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50.

[117] Michi Fukud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42.

[118]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87.

[119] Ibid., p.186.

[120] Ibid., p.184.

[121]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122] Hideo Yamaguch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73.

[123]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5, 1945, p.16.

[124] Matome Ugaki diary, August 1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659.

[125] Ibid., p.664.

[126] Ibid.

[127] Ugaki, *Fading Victory*, p.666.

[128] Ibid.

尾声

于我而言，将生活建立在混乱、痛苦和死亡之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得蛮荒；我听见雷鸣隆隆而来，总有一天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千百万人沉陷于痛苦之中。但是，当我仰望天空，我却能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眼下的暴行终将结束，和平和宁静将重回人间。

——安妮·弗兰克，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

8月14日晚，白宫媒体团被请进了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身后站着他的内阁部长、军种司令以及助理们。他们脸上的笑容说明了一切。总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记者们听罢立刻赶回编辑部，片刻之后，新闻就发了出去。很快，白宫大门外就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莱希上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城市中闹哄哄地庆祝了起来，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大群欢呼的人在街上游逛，连交通都堵住了。收音机里满是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各个城市进行庆祝的新闻，所有城市都在庆祝战争的结束，街上人潮汹涌，吵闹而拥挤。”莱希并不喜欢这样。他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出冷静、深思熟虑、持重的反应。“但是老百姓觉得闹腾一点很好，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必须有自己的庆祝方式。”^[1]

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庆祝方式，在整个美国的各个城市，庆祝持续了这一整个夏夜，直至天明。大群人冲到公共广场上，兴高

采烈地挥舞着双手，到处找人拍照，无论军人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所有人都抛开所有拘束，纵情痛饮。在城市的商务区，空中飘满了从高层窗户抛下的纸屑——权当彩色纸带——和从厕所拿出来滚落成飘带的卷筒纸。警察也不管了，随他们闹吧，只要别玩过头，不伤人和不毁坏财物就行。酒瓶在陌生人手中传来传去。汽车被人群堵得死死的，只能一寸一寸往前挤，人们爬到车顶和引擎盖上，把这些路过的车辆即兴变成了游行花车。在纽约，6万人涌向时代广场，百老汇和第七大街之间那些高楼的电子显示牌上都打出了字样：“鬼子投降了！”人群中，一名水兵拥吻了一名护士，这一幕被《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拍下，成了这场胜利大游行的象征。哈尔·比尔，一名在太平洋上飞了三年俯冲轰炸机的海军上尉，发现自己被大群兴奋的纽约人包围，因为他穿着军服，所以人们“拍他、拉他、吻他，向他欢呼”。一名妇人递给他一瓶啤酒，在他耳边叫道：“战争结束了，我儿子还活着！”比尔和同行的一位军官干脆在曼哈顿混了一整晚，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反正没人找他们要酒钱。

[2]

一名洛杉矶市民还记得：“大家的庆祝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在街上跳舞，所有店铺都休了业，所有人都去庆贺了。有些街道被完全堵死了。汽车就算没有完全停下来，速度也和蜗牛差不多。”[3]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位妇女回忆道：“我们居住的酒店算是瘫痪了。没有客房服务员，没有电话接听员。所有人都在外面街上乱跑。一片混乱，彻底乱套。许多人一边喝酒一边东游西逛。”[4]从外地来到圣迭戈的帕特丽夏·利沃莫尔在逛街时遇上了庆祝的人群：“圣迭戈市区霍顿广场上的每个女孩都被亲了，被推进广场喷泉里。我被推进去差不多有十次。”利沃莫尔和她的朋友们住在匹克威克酒店里。当地酒馆的库存都卖光了，酒店

的侍应生就把手里的几瓶酒拿出来高价售卖。她们用安全套装满水，从她们位于酒店高层的房间窗户里向下方的人群扔去。“我们只能用这个，”她解释说，“我们找不到气球。”[5]

夏威夷的战时岁月大部分都是在戒严中度过的，此刻，没人再去理会灯火管制要求了，檀香山的酒吧也开始彻夜营业。大群“白帽子”在酒店街上庆祝。人群开始将海滩上的一卷卷带刺铁丝网拖走。有人爬上阿罗哈塔，开始往下扯伪装网。宪兵、海岸巡逻队、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员们则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加入狂欢。

在旧金山市区，对日胜利日的庆祝则演变成了悲剧。天黑后，酩酊大醉的市民与军人在市场街同警察打了起来。暴徒们砸碎了面向街道的窗户，掀翻汽车，围殴无辜的过路市民。30辆电车被砸瘫或砸毁。根据旧金山市政史料记载，“从第六大街到第三大街，都有窗户被砸碎。警察和海岸巡逻队无力阻止也未予阻止。打碎玻璃的声音响亮而持续不断，就像爆竹爆炸一样。没有玻璃爆裂声的时间不超过连续5分钟”。[6]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警察在抛来的砖块和酒瓶面前撤退了。两个小时后，得到宪兵和海岸巡逻队增援的警察卷土重来，他们排成一排，挥舞着警棍沿市场街前进。大部分暴徒从街道两侧四散逃走。留在原地的人被一顿暴打，逮捕，扔进警车。此次骚乱导致11人死亡，大约1000人受伤。[7]当地报纸称此事为“胜利骚乱”，这是旧金山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事件。但是此事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国家级媒体的头版上，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日本南部的海面上，第3舰队在8月15日早晨6时14分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停火命令——他们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因此从日期上比美国本土早了一天。这天上午破晓前，第38特混舰队已经放出数百架战机前往空袭东京——第一批飞机已经飞临日

本首都上空，投下炸弹，打出火箭弹。美军飞行人员发现日军战斗机的抵抗出人意料地猛烈，他们称其为“自从冲绳战役以来最顽强的空中抵抗”。[8]7架美军飞机在对日胜利日这天上午的空战中被击落，另有2架毁于事故。其余飞机则平安返航。11点，机群全部降落到了母舰上。

正午时分，“密苏里号”汽笛和警报齐鸣一分钟。主桅上升起了战旗和四星上将将旗。哈尔西下令向全军发出信号：“干得漂亮！”他要求各航母把攻击机收回机库，好把飞行甲板腾出来供防空战斗机使用。战斗空中巡逻队得到了加强。哈尔西并不确信这和平是可靠的——即便日本政府真心想要投降，也会有一万种原因让抗命的飞行员前来发动“神风”攻击。在引起全舰队会心大笑的指示中，他命令“地狱猫”和“海盗”飞行员“找到并干掉所有的敌侦察机——别太狠毒，要友好点”。[9]

哈尔西的警觉理所应当。仅仅20分钟后，雷达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来袭敌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战斗空中巡逻队和驱逐哨舰击落了8架日军战机。最后，在对日胜利日下午2时45分，第3舰队的战争落下了帷幕：此后，舰队的火炮再未怒吼过。

已经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将军一点时间都没有耽搁就开始施展自己的权力。他在马尼拉的指挥部开始从多个频道直接向东京广播，就通信联络、解除武装、释放盟军战俘、正式投降安排，以及接下来占领军到达等事宜做出了指示。他还要日本安排一名得到天皇授权的“称职代表”飞来马尼拉协商上述事宜。

没人敢说日本陆海军的官兵们一定会遵从天皇的投降诏令。因此，第一支占领军部队可能要依靠武力才能进入日本——即便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可能会发现某些关键设施被毁坏或者变成杀人陷阱。部队必须为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准备，但他们同时也要尽

快涌入那个被击败的国家，及时达到必需的部队规模。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运输将由所有军种合力完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陆军航空兵，来自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个战区。占领日本所需的地面部队此时还散布在冲绳、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他们正在那些地方准备登陆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仍然位于日本外海的第3舰队被指派开进并占领东京湾，包括横须贺军港。由于时间紧张，横须贺登陆部队只能由已经随同舰队出海的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由于不知道岸上设施的情况，他们必须带上电工、木工、管子工、警察、医生、翻译，还有——如“米克”卡尼所说——“文明社区每日生活所需的所有基础用品，这是军事当局要求的”。[\[10\]](#)

第11空降师将从8月26日起经由大规模空运飞抵东京西南边的厚木航空兵基地。陆军空运司令部计划每天向厚木飞300架C-54运输机，这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运——但这些大型四引擎飞机将要在—座已经被猛烈轰炸了几个月的基地降落，大部分地面设施都已化为废墟。因此后勤面临着严峻挑战。伞兵们将要飞去的那个机场，从对日胜利日起成了军事叛乱的温床。裕仁的广播刚刚结束，厚木基地的日本飞行人员便发誓要爬上飞机，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试图恢复纪律的军官都挨了揍。“航空基地自身就是骚乱来源，”坂井三郎回忆道，“许多飞行员喝得大醉，狂吼怒骂。”[\[11\]](#)与此同时，在首都，叛军占领了市中心附近的上野山和爱宕山，要求其余部队也加入他们的叛乱。[\[12\]](#)皇宫外的广场上发生了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自杀。米内大将十分担心军纪崩溃，害怕日本陷入混乱。他最后通过说服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亲访厚木基地，平息了那里的叛乱。米内组织附近横须贺的海军基地部队前往占领厚木基地，还拆掉了那里飞机的螺旋桨。米内后来说：“在我漫长的海军大臣生涯中，我可能从未像

那个月14日到23日前后这段时间里那样担忧过。”[13]

然而，在同一个星期，事态也在变得明朗：日本政府，包括军队高层，是诚心要投降的。东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往来电报简洁、明快、谦恭。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听从麦克阿瑟的指示，他们常常请求美方明确具体要求，这就证明他们将会全力以赴配合工作。8月17日，在那次更为著名的投降广播之后，裕仁又签发了第二份诏书，直接命令武装部队“克体朕意”以及“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14]就在当天，东久迩稔彦亲王被任命为临时首相，他宣布“在任何方面违背天皇陛下旨意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15]皇室成员们纷纷作为裕仁的个人代表被派往亚洲各地的基地和司令部，确保所有海外日军放下武器。当东京请求为运送这些特使的飞机提供保护时，麦克阿瑟很快应允。[16]

遵从麦克阿瑟的指示，8月19日，一支日本议和代表团飞到了马尼拉。为首的是河边将军，梅津美治郎在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次长。双方在马尼拉市政厅举行了正式非军事会议。美国方面就解除战机和战舰的武装，弹药和武器的安全保管，盟军战俘的释放，导航灯塔和浮标的设立，以及雷场清除等事项给出了详细指示。[17]日本方面请求允许他们自己来集合部队并解除其武装，尤其是在东京地区。他们说，情况存在不稳定因素——但是只要给予一些时间，他们就能制服那些不听话的狂热分子。美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但也愿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同意将登陆横须贺与在厚木空降的时间推迟48小时。一名与会的日本人说，他对胜利方的姿态印象深刻，发现这些人虽然严厉，却也公平，“既不傲慢，也无轻蔑”。[18]

8月27日，第3舰队大部在相模湾下锚，这是本州岛沿岸东京湾西南面一处三面被陆地环抱的浅水海湾。入湾舰队中有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但没有航空母舰，它们都被留在外海，

在那里它们既能提供空中掩护，遭受反击的威胁也小一些。“密苏里号”靠泊在三浦半岛旁，位于海滨的历史名城镰仓附近。西边40英里以外，富士山隐约可见。日落时，从舰队的高处看去，太阳正对着富士山的背后，落日就如同坠入了那巨大的圆锥形火山口里。哈尔西将军和“阴谋诡计部”的其他成员纷纷涌上“密苏里号”的指挥舰桥走廊，观看这令人惊叹的壮丽美景，还让舰上的摄影师来把它拍摄下来。[\[19\]](#)近旁的战列舰“爱达荷号”上的一名军官说，太阳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富士山“放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红色光芒，就像日本海军军旗那样。我们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20\]](#)

第二天拂晓，一队扫雷艇开始在东京湾入口处执行危险的扫雷任务。在港口的日本引水员的协助下，他们在海图上绘制出了安全航道，并用浮标标了出来。他们在海湾西南一角清理出了一块锚地，包括横须贺与横滨的沿海区域以及通往东京的河流的入海口处。“密苏里号”停泊在距离横须贺海岸约4英里，水深10英寻处，伴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就停泊在它周围。附近还有另外三艘战列舰，包括现在已经是尼米兹将军旗舰的“南达科他号”，他前一天刚从关岛飞来。

从这里，美国人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处尽是日本的地盘。这种感觉令人兴奋，却也令人紧张。有人觉得投降是个陷阱，觉得日本人想要背信弃义，发动进攻。因此舰队保持着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舰员各就各位，舰炮指向海岸。

对于各个舰载机大队而言，和平初至的那几天和战时一样忙碌。8月16日到9月2日期间，第3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们总共起飞了7 726架次，比战时任何相同长度的时间段飞得都要多。[\[21\]](#)舰载机向盟军战俘营投下了传单，要俘虏们留在营地内，等候盟军人员前来。“快要结束了，”一张这种传单上写道，“不要灰

心。我们惦记着你们呢。我们正在实施能最快接到你们的方案。”[22]装着食物、衣物、药物和香烟的救援包挂在降落伞上扔了下来。在东京湾，有些战俘已经跑到海边，向美国巡逻舰艇喊叫，打信号。尼米兹于是授权展开救援。小艇开进河口，沿河而上，搭载了东京附近战俘营里的俘虏。位于横滨外海一处人工岛上的臭名昭著的大森8号战俘营在8月29日被完全解放。到这一天结束时，超过700名盟军俘虏已被接回锚泊在海湾里的医院船“仁爱号”。这些饿得半死的人吃饭时狼吞虎咽，体重也飞速增长，常常每天能增重四五磅。

8月30日，第4陆战团战斗群在横须贺上岸。他们保持着全副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却没有遇到任何敌人，也没见到日本人耍花招的迹象。在一间仓库里，他们发现了一句刷在墙上的英文标语：“三敬美国海军和陆军！”[23]这个基地基本上已经被废弃，留守的几个日本兵只想着不要招惹麻烦。到夜幕降临时，已有1万陆战队和海军人员安全上岸。日军基地指挥官户冢道太郎海军中将对他们彬彬有礼，百依百顺。[24]户冢中将以深鞠躬向“米克”卡尼投降，卡尼被看到的景象弄蒙了，甚至有些警觉：“街上的小孩子都向我们比V字手势。你怎么看？”他发现日本人的友好态度“比阴郁或抵抗还令人恐慌……这真诡异”。[25]

在横须贺，轰炸留下的毁坏痕迹随处可见，许多设施已是污水横流。一名陆战队军官回忆道：“他们显然已经放弃了；兵营的地面已有几个月未打扫，地上的灰土有半英寸到一英寸厚。设施的状况糟透了。我们每天都得清理粪池，用木车和超大号的桶运走粪便，那些桶还是漏的。街上、兵营、食堂里满是大群大群的苍蝇，我们花了几个月才修好排污系统，把这个地方清理干净。人员的健康状况令我忧心忡忡。”[26]当天下午稍晚时候，哈尔西将军来到岸上，发现军官俱乐部里“体形和胆子都大得出奇

的老鼠到处乱跑”。[27]横须贺兵营里的床铺对美国人来说太短了，于是舰队赶紧送来了折叠床和吊床。“海蜂”们立刻投入了工作，修建厨房和食堂，修复电网和电话网，重新铺设道路，在机场跑道上抹了一层层沥青。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还将建造起礼拜堂、冷库、棒球场、体育馆、自来水厂以及热水浴室。

8月28日，第11空降师的先头部队乘坐首批C-54运输机在厚木基地降落，空运行动拉开序幕。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日方人员又是敬礼又是握手，还有人护送他们来到原先神风队员居住的兵营，这里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食堂里还有热饭供应。到8月30日，已有超过300架C-54“空中霸王”运输机在冲绳和厚木之间往来穿梭，每一趟的航程是980英里。它们以每小时20架的频率在厚木降落，每3分钟1架。第3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为它们提供全程战斗机护航。

盟军部队进入东京地区, 1945年8月



8月30日，麦克阿瑟来了。这天天高气爽，整个本州岛南部沿岸能见度良好。在乘坐他的C-54“巴丹号”专机从冲绳飞来的5个小时航程中，麦克阿瑟一会儿在走道里踱步，一会儿到驾驶舱里看看。当富士山出现在座舱风挡玻璃前方100余英里之外时，他便坐在右侧飞行员席不动了，直至航程结束。“巴丹号”从三浦半岛中部飞过，飞得很低，透过舷窗可以看到镰仓的巨大铜佛

像。之后飞机在东京湾绕了个大圈，锚泊中的第3舰队清晰可见。飞机下降了高度，飞过青翠的旱田和水田。跨过机场围墙时，麦克阿瑟和他的飞行员能够看见被炸毁的机库和地面设施的废墟，还有被拆掉了螺旋桨的日本飞机。“巴丹号”在下午2点准时落地，跟随引导吉普滑行到一处停机区，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军官、士兵和战争通讯员。

下飞机前，麦克阿瑟要机上的所有军官把佩枪卸下来丢在飞机上。这些武器没用，他说，因为“方圆十英里之内有15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师团。如果他们真想干些什么事，我们的这些玩具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28\]](#)在他担任日本占领军司令的6年里，麦克阿瑟始终没有带过佩枪。麦克阿瑟的航空兵司令肯尼将军说，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姿态是心理上的神来之笔，因为“看见我们赤手空拳走在他们的国土上，看见我们对这7 000万人口的战败国中存在的危险全然无惧，鬼子们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确凿无疑地输了”。[\[29\]](#)

日本人凑到了大约50辆不同牌子、颜色、年份的小汽车和大巴，其中许多被改装成烧木炭驱动。这支五花八门的车队将把麦克阿瑟和他的团队送到横滨市区的新大酒店，为他们开路的是一辆启动时回火声响亮的破旧红色消防车。CBS的通讯员比尔·邓恩觉得似乎“这些破破烂烂、嘎吱作响，靠烧木炭驱动的汽车中，没有哪辆”像是能开完这18英里的样子。[\[30\]](#)麦克阿瑟爬进那辆林肯牌大轿车的后座，车队开上了满是弹坑的道路，穿过精心照料的水田和一排排小木屋。数千名端着枪的日军在道路两旁列队立定，每两米站一人，组成“举枪致敬”的队形，面朝路外，背对道路。美国人了解到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仪式。有些农夫会好奇地抬起头来看着路过的汽车，有些人甚至会挥挥手，但大部分人还是继续埋头干活。

来到横滨市郊，美国人从地面上看到了他们空中轰炸的效果。成片的瓦砾中夹杂着一堆堆废墟，只剩下石头砌成的烟囱和混凝土办公楼的残垣断壁还矗立其中。他们看见贫苦的老百姓在废墟中寻找能吃的东西。许多人都住在木头、管子和波纹板临时搭建的棚子和窝棚里。横滨市区状况好一些，但也成了一座鬼城。“店铺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遮光罩摘掉了，许多人行道也废弃了，”考特尼·惠特尼回忆道，“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我们被送到了新大酒店，我们要在那里待到麦克阿瑟正式进驻东京为止。”^[31]

麦克阿瑟的车开到了酒店大门前，酒店经理和工作人员已经在大堂前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了。他们看起来都因为能接待这些人而由衷地开心，就像这是什么莫大的荣耀一样。经理向他们深鞠躬，伸出手引路，并护送着麦克阿瑟进入电梯，来到他的房间。这是酒店最好的房间，里面的家具陈设有些老旧，但房间很干净。一个小时后，将军回到餐厅，享受了一顿牛排晚餐。他的助手担心饭里被下毒，但麦克阿瑟沉着地答道，“没人能永生”，接着就把肉塞进嘴里。^[32]酒店经理后来感谢麦克阿瑟的信任，还说这是他和工作人员的“无上光荣”。^[33]

餐厅里挤满了盟军军官和战争通讯员，他们正从厚木陆续赶来。尽管如此，厨房总有办法拿出足够多的食物给他们吃。最后牛排吃完了，菜单上只剩下了油煎鱼。为了展示幕僚军官们的善意，麦克阿瑟要求他们吃鱼，即使不合胃口也要吃，因为“这无疑是他们唯一能拿出来给我们的食物了”。^[34]

后来，麦克阿瑟在酒店大堂重新见到了乔纳森·M·温赖特将军，他在1942年3月被留在科雷吉多尔岛担任指挥官，并于当年5月率领岛上守军向日本人投降。温赖特被关在中国东北的一座战俘营里，和包括1942年2月率领新加坡守军投降的英国将军

A.E.珀西瓦尔在内的其他高级军官关在一起。两位将军全都饿得皮包骨头，他们的样子大大激怒了盟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温赖特都担心他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投降会令他蒙羞——确实，有一段时间麦克阿瑟曾向他的下属抱怨温赖特没能打到底。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麦克阿瑟拥抱了他的老下级，说：“怎么会？吉姆，你的老部队还是你的，就等着你来要了。”[35]

8月31日和9月1日，下起了瓢泼大雨。麦克阿瑟和他的幕僚班子搬到了设在海关大楼内的临时指挥部，那是距离酒店三个街区，靠近横滨海边的一座大型石头建筑。飞往厚木的空运一刻也没停，占领军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这个国家。到9月2日，美军哨兵们已经在酒店周围的路口和海滨搭建起了检查站和岗亭。第11空降师的部队向东京市郊挺进，但是在多摩川南岸止住了脚步，他们能看见日军部队就驻扎在河对岸。日本当局请求麦克阿瑟将美国人进入首都的时间推迟一个星期，好让他们有时间解除当地部队的武装，麦克阿瑟同意了。[36]

与此同时，军队的高官和记者们还在不断飞往厚木。由于缺乏车辆，他们不得不拼车，这种时候，军衔的高低尊卑就发挥作用了，高级军官可以直接坐进等候着的小汽车。在从厚木到横滨酒店的18英里道路旁，几十辆坏掉的小汽车和烧木炭的大巴丢在沿途。等得久了，有时会有公交车前来接运滞留的乘客，而美国陆海军的将军们即便坐在这些拥挤车辆过道里的行李箱上也要尽力保持体面。乘坐这样一辆公交车时，有人看见苏联将军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藏在衬衣袖子里和行李箱里的配发给他的伏特加。[37]

8月31日飞到厚木的罗伯特·C.理查德森将军说：“道路很糟，全部坑坑洼洼而且很窄。道路穿过种满庄稼的绿色乡野和几座村庄，一切都极其简陋而贫困。这些糟糕道路两侧的人都脏兮

兮的——无论男女。”[38]他发现横滨是“一座死城——没有生命，没有商店，也没有动静——只是偶尔会有手推车或电车开过”。[39]

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将在第3舰队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这艘舰是由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命名的，用的是他老家的州名。这艘4.5万吨战列舰上的舰员们用水磨石把甲板打磨得连灰色防火漆下方的柚木都露了出来，所有铜件都被擦得像镜子那样亮，所有沾着油渍和生锈的地方都重新刷了漆。仪式的计划制订严格遵循海军礼仪和外交礼仪，精确到了分钟。仪式将在右侧上甲板上举行，这里位于一座16英寸前主炮塔高大的钢质炮座旁的一小块三角形露台上。所有出席者都被指定了站立位置，并标记在了甲板上。访客和战争通讯员上舰后，护送的水兵们会引导他们来到指定的位置上。[40]

9月2日这天，天气反常地寒冷，空中阴云密布。早上7点过后不久，盟国的高级将领和签字代表便开始陆续上舰。驱逐舰靠上“密苏里号”的左舷，访客随即通过舷梯来到战列舰上。舰上的乐队演奏了几个盟国的国歌。当尼米兹上将上舰后，军舰的桅顶降下了哈尔西的四星将旗，升起了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温赖特将军从未见过这种艾奥瓦级战列舰，张着嘴愣愣地看着那高大的上层建筑。“我真是无法相信会有那么大的东西，装那么多大炮，”他后来写道，“上面的火炮就像是一只巨大刺猬伸出的刺。”[41]

麦克阿瑟一行人乘坐驱逐舰“布坎南号”来到了“密苏里号”上。这位盟军最高指挥官沿着右前方的舷梯上舰，在那里得到了尼米兹和哈尔西的迎接。他登上“密苏里号”后，桅顶升起了第二面三角形的五星将旗，高度和尼米兹的将旗相同。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海军礼仪规定，一艘军舰任何时候都只能升起一

面将旗——以舰上的最高将领为准。但这本来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天，而且没人想要去冒犯麦克阿瑟那些幕僚敏感的内心。

尼米兹和哈尔西陪同麦克阿瑟来到哈尔西的住舱，三人在那里私聊了片刻。“米克”卡尼发现麦克阿瑟对哈尔西很熟悉，很友善，称他为“公牛”，对尼米兹则有些冷淡，显得更正式。^[42]麦克阿瑟躲进哈尔西的私人卫生间待了一会。“土佬”罗兹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见他在里面干呕，问他要不要我去请个医生来。他说他一会儿就好了。”^[43]几分钟后，他走到了能够俯瞰上甲板的阳台上。摄影记者们看见了他，向他打招呼，要他向自己这边看。麦克阿瑟摆了个姿势说：“好的，孩子们，拍这里。”^[44]

报道这场仪式的媒体人员数量极多，共有来自全世界的225名通讯员和75名摄影师参加，其中还包括了日本同盟社的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军舰右舷栏杆外临时搭建了一个媒体平台，那里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为了抢到更好的位置，不守规矩的新闻人员争先恐后地往前挤，甚至相互推搡起来。一名苏联报社的记者想要直接站到即将代表苏联签字的杰列维扬科将军身后。人家要他离开，他不干，说是有来自莫斯科的特别指示。于是斯图尔特·S·莫里上校找来两个强壮的水兵，抓着他的两只胳膊，把他往上拖了两层甲板，来到他的指定位置上。一些美国军官和外国高官被这一幕小插曲逗笑了，包括杰列维扬科将军，他哈哈大笑道：“好，好，好。”^[45]

出席者各就各位后，一名通讯员注意到，在这块小小的露天甲板上站着的美国陆海军上将和中将比二战之前就任的所有上将和中将都要多。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的众多顶级人物都来了，包括特纳、麦凯恩、洛克伍德、拉福德、博根、托尔斯、两个谢尔曼、两个斯普拉格——但是没有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尼米兹要他们远离此地，防止此时有自杀机杀出来，把太平洋舰队的高

级将领一锅端干净。代表海军陆战队的是盖格中将与两名准将。代表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是背靠巨大16英寸炮塔列队站立的卡其色方阵，站在前排的有克鲁格、艾克尔伯格、肯尼、斯帕茨、史迪威和理查德森一众陆军将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和消瘦憔悴的前战俘温赖特、珀西瓦尔站在一起，他们将在麦克阿瑟签字时直接站在他身后。胖墩墩的C.E.L.赫尔弗里赫将军身着白衣，代表荷兰签字；穿橄榄绿军服配黑色肩带的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签字；留着板刷胡子，头戴直筒高帽的雅克·勒克莱尔将军代表法国签字；代表英国签字的则是英国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他穿着像是小学生夏季校服的军常服，白色短衣短裤，白鞋子，白袜子提至膝盖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也出席了仪式。

在甲板中央摆放着一张从“密苏里号”水兵食堂里搬出来的桌子，铺着一块普通的绿呢桌布。桌上放着两份投降文件，以及几支黑色钢笔。

日本代表团由11名军政官员组成，为首的是代表帝国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以及在投降第二天才回到外务省（接替东乡）的外交大臣重光葵。他们的名字在日本国内是保密的，以防有人来刺杀他们。来到横滨码头后，他们穿过几道美军检查站，随后登上美军驱逐舰“兰斯多恩号”。在开往美军舰队中央的漫长航程中，舰员们和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接着日本代表团转乘一艘摩托快艇前往“密苏里号”。靠近巨舰，他们抬起头，看见一排排美国水兵在栏杆旁列队，一言不发地低眼看着他们。在一排端着枪的陆战队员的凝视下，日本人一个接一个登上了战列舰右舷的舷梯。梅津大将和其他日本军官向对方敬礼，但美国人没有回礼。外相重光葵许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炸弹袭击中丢掉了一条腿，他走路时要靠木头假肢，拄着拐杖。攀爬摇晃的舷梯对他

来说漫长而缓慢，但是这个蹒跚的老者并没有获得舰员的同情。一名美军说他能听到“他在‘密苏里号’侧旁挣扎着向上爬的时候假肢触碰在每一级舷梯台阶上的声音”，还有一位战争通讯员留意到美国人“幸灾乐祸地”看着重光葵艰难向上爬。[\[46\]](#)

在露天甲板上，11名日本代表自行排成三列，立正等候。重光葵拄着拐杖站在代表团前方，他穿着传统的外交正装——黑色长礼服，条纹西裤，戴着白手套，头戴丝质高筒帽。梅津大将站在他左边，穿着一身橄榄绿军服，胸前挂着金穗和一排绶带。两人都低垂着双眼。重光的一名助理加濑俊一抬起头，看见每一处甲板、炮塔和栏杆旁的每一寸都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水兵们甚至爬到了“密苏里号”桅杆的平台和缆绳上。加濑在战列舰的烟囱上看到了一排排小小的旭日旗，每一面旗子都代表一架被这艘舰的高射炮摧毁的日军飞机。在舰长舱室侧壁上的显眼位置挂着一面玻璃镜框，里面是一面31星美国国旗，92年前，马修·佩里准将的“黑船”锚泊在这同一片水域时，飘扬着的就是这样的旗帜。

照相机快门咔嚓响个不停，但无人说话。日本人站在那里等待了仅仅四分钟，但这点时间却如同永远那么久。“千万只眼睛像千万支带火的利箭以疾风骤雨之势射向我们，”加濑写道，“我感到它们的锋芒深深刺入体内，引起一阵肉体的剧痛。我从未意识到灼灼目光竟能带来这般痛楚。”[\[47\]](#)

时间很快到了9点，“密苏里号”的枪炮官双手拢在嘴边喊道：“全体立正！”麦克阿瑟走到甲板上，身后跟着尼米兹和哈尔西。三人快步走到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后面。他们都穿着卡其色军常服，没有打领带。一名战争通讯员发现麦克阿瑟的制服居然有些破旧：“裤脚磨破了，扣子扣到喉咙口的衬衫明显是旧的。他的胸前满是绶带和勋章，还有绣着五颗银星的领章，这都显示出这套军服的主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大头兵。”[\[48\]](#)这一身朴素的旧

卡其色衬衫在身后一排穿着各种颜色整洁军服的盟国代表前十分显眼。

麦克阿瑟走到一排麦克风前。短暂停顿之后，他用缓慢而洪亮的语调开始讲话：

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们，我们今日齐聚于此，缔结一项令和平得以恢复的庄严协定。不同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世界战场上决出了胜负，所以我们无须再来讨论和争辩。我们在此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广大的人民，所以我们并非怀着猜疑、恶意以及仇恨的精神前来相见，而是要求我们胜败双方都更有尊严，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的，使我们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履行在此正式承担的职责。

[49]

这位最高指挥官的词句很清晰，但他显然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他在读他自己准备的手稿时，双手都在激动地颤抖。

[50]麦克阿瑟随后指着桌上的文件说道：“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帝国军部的代表现在可以来签字了。”

一片沉寂中，重光拖着跛脚走上来，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加濑就站在他身旁。这位外相摘下帽子和手套放在桌上。随后发生了一个短暂的意外，他看完两份投降协议，却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签字。重光的英语很流利，似乎没有理由出现这样的耽搁。哈尔西怀疑他是在拖时间，他甚至有一股冲动，想要上去打日本外相一记耳光，朝他吼道：“签，见鬼！签！”但他忍住了。[51]最后麦克阿瑟转向萨瑟兰，甩出一句：“萨瑟兰，告诉他在哪儿签。”[52]

萨瑟兰指向日本外相名字上方的横线。重光看了一眼加濑，

后者看了看表，说现在是9时4分。于是日本外相挥了几笔，用汉字签下了他的名字，署上了时间。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重光站起身，回到位置上，接着梅津大将快步上前，眼光躲避着麦克阿瑟和其他所有盟军将领。他没有坐下来。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笔，趴在桌子上签了字，随后迅速走回位置立正，双眼依旧低垂。有目击者看到站在梅津身后的一名日本军官眼里流出了泪水。

麦克阿瑟示意温赖特和珀西瓦尔上前，然后自己在桌旁就座。他从口袋里掏出6支钢笔，放在桌子上。他写下了几个字母，随即放下笔，转向温赖特，把笔送给了他，接着又拿起另一支笔签了几个字母，随后把笔送给了珀西瓦尔。他用剩下四支笔签完了名字，这些笔后来会被他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国内的不同友人。一名记者发现，麦克阿瑟在签名的时候，手都激动得发抖。

[53]

接着，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签字。他看起来也一样紧张和激动，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我激动得发抖，抖得厉害，几乎写不出我的名字。”[54]

盟国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签下了名字：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以及新西兰。

最后，麦克阿瑟回到麦克风旁说道：“现在，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祷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当麦克阿瑟和其他盟军高级将领回到哈尔西的舱室享用咖啡和桂皮卷时，重光外相和加濑俊一走上前去查看投降文件的日文版。他们发现一位签字代表，加拿大的L.穆尔·科斯格雷夫签错了行，后面三位盟国代表也都跟着科斯格雷夫向下签错了一行，这

样他们的签名和印在签字栏上的名字就对不上了。重光和加濑查看文件时，萨瑟兰将军和其他几位美军军官围了过去。最后，萨瑟兰坐下来，拿起一支笔，把印上去的盟国代表名字划掉，在签错位置的名字下方重新写上正确的名字。萨瑟兰后来说，这么一改，这份文件就有瑕疵了，但是他觉得“终归没几个人会看到它，因为它很可能被埋藏在最机密的档案柜子里的最深处”。[\[55\]](#)

当日本人走下舷梯，来到等候在那里的摩托艇上时，南方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当嗡嗡声逐渐变成雷鸣般的轰响时，他们抬起头。100架B-29排成相等间距的队形，在云底之下，从他们头上低空隆隆飞过。接着又飞来一支450架舰载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那是来自第38特混舰队的“地狱猫”和“海盗”。舰载机从东边飞来，航线与B-29机群垂直相交，然后继续飞过横滨和东京。舰载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到400英尺，几乎就在桅顶高度，比“超级堡垒”飞得更低。

空中分列式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太响了，“密苏里号”甲板上的人不得不提高音量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米克”卡尼称其为“一场精彩的表演，太过瘾了”，还说那大规模的空中分列式“肯定会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止步不前”。[\[56\]](#)

盟军涌入了这个被打败的国家，指定了14个主要占领区，覆盖了从南方的九州岛到北方的北海道岛，包括所有城市和工业区，所有陆海军基地，所有重要的战略性水道和沿岸港口。在大部分占领区，都会由前锋先行空运抵达，占领一处能够稳定起降货运飞机的机场，再和附近的港口建立联系，这样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就能从海路过来。“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三天后，第1

骑兵师和第11军的重装甲前进巡逻队开进了东京，占领了主要道路和桥梁，准备迎接9月8日占领军主力的到来。到1945年9月底，美国第8集团军已有总共232 379人进入日本中部和北部，包括整个大东京地区和关东平原，同时美国第6集团军也开始向本州岛南部余下的大阪—京都—神户地区和四国岛进行空运。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在大阪湾入口处的和歌山上岸，两天后在京都正式投入运作。第2陆战师和第5陆战师分别在九州岛的佐世保和长崎登陆，随后在地面上推进，占领了日本南部这座大岛上所有的港口和城市。在对日占领的高峰期，进驻日本的盟军部队将超过70万人。[57]

在许多偏远地区，占领军只有一点象征性的兵力，假使日军中那些不听话的极端分子决定一战，这些占领军很快就会被消灭。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提交的一份报告称，对日占领“虽然有备而来，但仍是一场军事大赌博”。[58]美国人赌天皇的意志和权威能够在精神上降住日本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这场豪赌收获了奇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甚至没人向盟国占领军开过一枪。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之突然、之彻底，令人猝不及防。就在三四个星期前，日本人还在准备用竹枪和菜刀迎战入侵者。现在他们却如同对待贵宾般对新来者报以鞠躬和笑脸。

美国陆军中士理查德·伦纳德于9月11日在和歌山上岸。他的排是乘坐希金斯登陆艇突击上陆的。涉水上岸时，他们的枪都上了膛，但是手无寸铁的日本老百姓却带着热情的笑容欢迎了他们，小贩还向他们兜售小饰物和纪念品。来自巡洋舰“蒙彼利埃号”的水兵詹姆斯·费伊第二天在神户附近上岸，他和同一艘舰上的几名战友步行探索了这片区域。日本人好奇地看着他们，但是并无惧怕或敌对之意。一排挖甘薯的妇女被这些美国水兵奇怪的

身高逗乐了——在她们眼里美国人太高了。“我们和她们一起笑了起来，”费伊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很愉快。他们很友好。”[59]

占领军和日本人都接到警告，互相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两边似乎都没几个人搭理这条禁令。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子邀请费伊和另一名水兵到自己家里做客，见见他的家人。费伊如此描述这一次拜访：“他们的家很漂亮。我看得出他们都是好人。一间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漂亮的大桌子和一台收音机。他们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的画像。对他们而言，他就是神。离开时我们握了手，挥手道别。”作为经历了许多次海上恶战和“神风”攻击的老兵，费伊惊讶地发现这些普通日本人都那么诚实而勤奋，“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别无二致”。[60] 伦纳德中士对此表示赞同。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说“普通日本人也和你我一样不会去想‘统治世界’那样的事情。他只是普通的木偶，参加战争只是因为别人要他这么做，而且别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61] 战争中，伦纳德恨透了日本人，恨他们所有人，但是现在，他发现这种感觉已如同半梦半醒时的梦境一般渐渐消散：

我本来是个生性多疑之人，但是我应该去恨谁？我在火车启动前卖给一个男孩一包烟，他为了把烟钱交给我，追着我的火车窗户跑了50码，我能恨他吗？有个老者请我们到他家里共进晚餐，还把传家宝送给我们做纪念品，我能恨他吗？在大街上跑过来抱住我的孩子们，我能恨他们吗？难道恨那个有一天晚上绕了几英里远路送我回家的日本卡车司机？或者是那个跑过来把她唯一的布娃娃送给我做礼物的（大约4岁的）小女孩？我的答案是，我做不到。[62]

日本人也是一样，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天性良善而礼貌后，他们也长舒了一口气。那些要接收占领军第一批先头部队的社区原本都很害怕。老百姓仍然受到战时宣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海外的日本军队都干了些什么——觉得自己将会遭到虐待、劫掠、屠杀和强暴。[63]许多妇女和女孩子都逃到了遥远的山村。另一些女性则躲在屋里，藏起来，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往脸上抹煤灰，把自己扮丑。有人甚至身携利刃，随时准备割脉自杀。当美军士兵第一次出现在东京以北的宫城县时，一群被疏散的小学生躲在自己的宿舍里，从窗户纸上的洞里向外看。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不会是人类。“我们觉得，‘他们肯定长着角！’”有人回忆道，“我们都想象着会看到头上长着角的凶恶魔鬼。当然，我们失望了。他们根本没长角。”[64]有些小男孩跑了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拿着巧克力棒回来了。

日本人注意到了美国人的小善举。在电车里，美国人常常会把座位让给孕妇和老人，这种习惯在日本还不太常见。他们发现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更加随和，军官和士官们不会殴打下级。美国大兵们天生喜欢小孩子，孩子们很快发现向这些新来者要东西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说：“Gibu me candy”（给我糖），或者“Gibu me chocolate”（给我巧克力）[65]。[66]一名日本妇女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一名调查员：“下雨时，美国的汽车会尽力避免把泥水溅到路人身上，我很感激。”[67]一个在东京的狭窄街道上拉车的人被一辆迎面开来的美军卡车堵住了。“他们把卡车停了下来，把我的小车抬到了卡车另一边，”这个人讲述道，“他们笑着和我说再见，然后走了。我泪流满面。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不是吗？说来可笑，当我再次拉起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68]

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将会被要求供养占领军。在日军侵占的外国土地上，向被占区的老百姓征粮是标准做法。但是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加之预计占领军会来大吃特吃，大规模的饥荒看起来就要不可避免了。投降后，农业省和经济委员会的官员们发出警告，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将远远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冬天的最低需要。但是8月18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宣布，占领军将自行解决给养问题。^[69]实际上，占领军还会常常拿出粮食来给当地百姓解危救难，其中许多都是出于善心的非官方行为或专门的慈善行为。在横须贺军港，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人就给当地百姓送来了“20卡车的面粉、燕麦片、罐头食品和大米”，第二天，又有11辆装着“医疗物资、毯子、茶叶和其他东西”的卡车开了过来。^[70]在东京南边的一座陆军兵营，铁丝网围栏上出现了几张饥饿的小脸。老规矩，士兵们把吃的拿给了这些小孩。消息不胫而走，更多的人跑了过来，到最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妇女和儿童在兵营大门口排成长队，士兵们则把罐装C型口粮装在粗麻袋里送出来，他们的指挥官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在东京的一个社区，美国人向市民分发固体酒精，但是这种便携式烹煮罐的功能和用途却遭遇了语言障碍。拿到东西的人打开罐子，把这些燃料倒进嘴里，一阵恶心之后吐出来，说美国人想要毒死他们。这一说法很快不攻自破，有个认识一点英语的街坊发现罐子上原本就写着“poison”（有毒）。最后，一个日裔美籍妇女化解了误会。“他们看着我把火柴伸向罐子时都一脸敬畏！”她说，“这里燃料很紧缺，当人们知道怎么用固体酒精的时候，他们都很感激能得到它。”^[71]

占领军也不总是彬彬有礼，遵纪守法。深仇宿怨很难消退干净。占领军中的很多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都是参加过太平洋上残酷岛屿作战的老兵。有些人觉得以前的敌人表现出的善意十分古怪

而且令人不安，因而拒绝信任。获救战俘的悲惨状况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占领军军人在日本也犯下了不少罪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杀人。但是这些罪行却很难统计，因为占领当局不允许报纸报道这些事情，也未保留其内部军法审判的详情。（对日占领的史料对此很少予以关注，美国档案中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为了减少性犯罪，日本政府甚至建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下层社会女性到横须贺和其他基地附近的妓院里充当妓女。美国当局也认可了这种设施，甚至还允许军医去为这些女性检查身体（他们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也做过这种工作）。[72]

看到日本女人和占领军官兵出双入对，许多日本人都极为愤慨。他们把这些涂着亮红色口红，穿着尼龙丝袜和高跟鞋，常常和美国军人一同坐在吉普和卡车上的日本女孩称为“青楼女子”。在被占领之初那艰难困苦的几年里，她们吃得、过得显然比其他日本人都要好。

据艾克尔伯格将军说，他的第8集团军部队只遭到过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位于横滨和东京之间的山田，一群联防队员不让未执勤的美军进入。两个美军还被绑起来揍了一顿。艾克尔伯格下令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装甲车辆组成战斗队形，在山田的街上巡逻了几个小时”。肇事者也被抓起来扔进了监牢。[73]

但是这种事无论在占领军还是日本人眼里都被视为偶然而非常态。总的来说，日本人欣然接受了战败，而且尽可能从中获益。日本政府原有各部门都还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监督之下继续运转。日本军队也接受了占领军的管理，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和怨恨。军官们心甘情愿地配合让自己的部队复员的工作，并销毁残余的飞机、弹药和枪炮。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日本海军的原为一大佐回忆说，当他在9月23日把九州岛的一处

自杀快艇基地移交给一名美国海军上校时，“这名美国上校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征服者，这令我感到吃惊”。[74]例外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同一天在近旁的长崎港，一艘日本海防舰的舰长“以粗暴和挑衅的态度”对待一支美国海军代表团。这件事被报上去之后，这名闹事者被逮捕，赶出了日本海军，这表明当局已经决意要加强双方的配合。[75]对日占领的初始阶段，一切都如此顺利，于是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之后不到一个月，麦克阿瑟将军便宣布盟国军队在日本的数量将于1946年7月下降至20万人。[76]

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敌人良善而且值得尊敬之后，日本人在感到惊讶和轻松的同时，另一种感觉也油然而生。普通日本人突然开始意识到他们被自己的领导人骗得有多么彻底。战时的宣传言犹在耳——他们很难忘掉——但现在看来，那简直是愚不可及。

《波茨坦公告》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这个国家必须彻底清除“穷兵黩武主义”。[77]无论他们的战后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日本人民都会自己来满足这一条件。战时的那些军政府领导人遭到了广泛的鄙视。这种态度甚至在投降之前便已扩散开来，只不过畏于镇压而从未公开表达出来而已。现在，它们都浮出了水面——那是对战争以及把日本拖入战争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而源于本能的深刻憎恨。“我恨军人，”畑中繁雄说，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另一个人种。军人们会在特殊场合穿上礼服，但脑子里充满幼稚的想法，思维简单。”[78]随着日军士兵从海外回来，许多普通老百姓第一次知道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争罪行。一个年轻女孩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冷漠地谈论着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笑嘻嘻地聊他们强奸过的女人的数量。她为自己原先支持战争的想法感到恐

慌：“现在我受不了这样想了。”[79]正如寺崎英成的妻子格温观察的那样，“现在，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日本人不仅意识到了军国主义者是多么疯狂，也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无知才会信任这伙人。幻灭感令他们痛彻骨髓”。[80]

回顾这场刚刚输掉的战争，日本领导人也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哀叹。被人问及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时，米内大将答道：“坦白地说，我觉得开战便是转折点。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毫无胜算……我至今仍然认为，鉴于当时的局势，我国的战争实力，那样的计划并不合适。”[81]1945年秋季，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许多日本领导人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1941年12月，他们进攻美国 and 盟国的致命决定是基于一系列错误的假设而做出的。他们以为战争可以速胜，从而避免让美国的经济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持久消耗战。他们还以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英国和苏联将在德国的铁蹄下臣服；以为连接日本和马来群岛石油产地的海运线能够免遭潜艇攻击和空袭；以为美国海军舰队主力将会闯入西太平洋，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中被歼灭，让日本海军重现在1905年对马海战中取得的大捷。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有神圣天皇的指引，有千古诸神的庇佑，肩负着统治亚洲的神圣使命。由于对美国文化和民主的浅薄思维定式，日本人错估了对手的血性和勇气。他们觉得美国人不愿意在地球另一端打一场持久、血腥的战争。觉得自己的敌人被优越的生活变得软弱而颓废，毫无希望地沉迷于灯红酒绿。美国是个大杂烩，移民国家，缺乏凝聚力，没有高尚的追求，被种族、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内斗拖累得虚弱无比。美国女人都有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会施加政治影响，抵制把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派到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去打仗。美

国经济体量大，实力虽强，但若无法进行战争动员，那也没有意义，而且寡头资本家也不会愿意去改造他们原本利润丰厚的产业。袭击珍珠港就是为了打击美国民众的士气，面对如此灾难，资本家们的反应将会是迫使华盛顿求和。“我们以为我们能轻松搞定他们，”一名日本高级将领后来承认道，“一个如此深陷物质享受，一心追求欢愉的种族，在精神上是堕落的。”^[82]

如果这些假设都没错，日本就会打赢太平洋战争，或许今天已经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了。哪怕只有一部分假设正确，日本或许也不至于沦落到为了保持主权完整而痛苦挣扎的地步，甚至还可能保留一部分海外占领区。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假设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米内大将和其他人参透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本的战败甚至在1941年12月便已可清楚预见。更糟的是，有些默许发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的人，也在一开始就预见到甚至预言它会失败。这样看来，太平洋战争其实是东京政治失败的产物——这种灾难性的失败，是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当日本武士阶级的精英第一次想要让他们封闭而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他们就知道自己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油和其他日本本土缺乏的自然资源。对外贸易满足了这种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和美国、英国、荷兰及其在亚洲的控制区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1940年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一基本经济环境，却还是选择和欧洲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它们不仅不是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而且还已经（或者即将）和向日本出口这些物资的国家开战，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致命打击。换言之，东京选择了和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敌，却和对自己固有的物资短缺毫无益处

的国家结盟，从而导致了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在原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被贸易封锁切断后，日本政府又错上加错，向在东南亚实力虚弱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潜在工业军事实力至少是日本十倍的国家（美国）发动进攻。

明治宪法为陆军和海军赋予了特权，将他们放在可以直接向天皇进言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天皇则拥有指挥武装部队的广泛权力。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天皇的权力已经被诸多法律先例一再削弱。（如果有一个比裕仁更强势的人在位，或许能把国家之船带入安全水域，但我们对此只能是猜测。）两大军种不仅主导着自己的资金预算和政策，其霸权甚至还伸向了国家的民政事务。不得到陆军和海军的共同认可，便不能组建内阁，也不能任命首相，这种认可还能随时撤回，导致政府垮台。但日本却没有能够解决两大军种之间争议的机制，而且除非陆海两军观点一致，否则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核心权力层的决策被达成共识的需要所左右，而两大军种自己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时最容易达成共识。日本政府的这一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变得代价更为高昂，陆海两军的内部竞争变得愈加激烈，他们都想要在经费和关键原材料的争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样，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也受制于军种之间争夺预算的目的。

几十年来，日本海军一直把美国当作他们制订计划时的“假想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找美国打一仗或是预计会与美国开战，而是因为这样对他们争夺预算有好处。海军制订“南进”攻取东印度群岛的战争计划，其主要原因是有这样一套计划才有理由建设一支大规模舰队。当1940年和1941年遭遇危机时，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在太平洋上开战，但他们却不能这么说，怕陆军会把对预算和原材料的控制权抢走。不过，大将们并不一定是海军中最重要的决策者。措施和决策开始

越来越多地受到军令部或海军省中那些中层军官精英的摆布，而这些人鲁莽地想要把日本拖入战争。这些年轻的鹰派中佐和大佐会编造各种估算和统计结果来支持发动战争的提案，并迫使他们的上级对其信以为真。那些逻辑合理的反对意见则会被吼回去。当负责战争动员的海军少将警告说日本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对美开战时，一名大佐哭求道：“这样的估算会让我们打不成仗的！”[83]不知何故，海军将领们无法承受那些不守规矩的惹事下级“近乎威胁的施压”。[84]他们被裹挟在了宿命论、一厢情愿和狂热好战交织而成的潮流之中。“许多人从最开始就知道，向盎格鲁-撒克逊人开战是非常不明智的，”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如是说，“但情势就这么发展了下去，他们身不由己地滑向了战争。”[85]福留繁将军后来觉得，决定开战的整个过程“十分奇怪”。他回忆道：“当我们面对面私聊的时候，我们[海军领导层]全都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当我们开会时，结论却总是一步步地指向战争。”[86]

在反对对美开战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总是反复向他的同僚强调这一点。他警告说，日本没有任何希望征服并控制美国，但美国征服并控制日本却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赌徒，山本意识到此举的风险收益比是十分不划算的。1941年之前，日本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向全亚洲的鲸吞蚕食面前守住了自己的独立和政治自主权。而选择对美开战时，日本人却押上了这最宝贵的财富——独立和自主——去赌那可疑的未来收益，即征服和统治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战争以日本人的海空两栖闪击战拉开了序幕，他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里的美国战列舰队，歼灭了菲律宾的美军航空兵和马来亚的英军航空兵，击沉了两艘在海上做足了战斗准备的英国战列舰，席卷了属于美国的威克岛和关岛，在爪哇海消灭了盟国舰

队，将英国人赶出了中国香港和缅甸，将麦克阿瑟的部队围困在了巴丹半岛，在新加坡俘虏了7.5万英军，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下了炸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似乎佐证了把日本带入战争的那些假设，让反对者闭了嘴，却也让尽早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失去了可能。日本人证明了自己是远比西方人原先想象中更强大的敌人，但是进攻之初的惊人胜利更多还是因为盟军在当地的力量弱于日军。在日本国内，这些早期胜利被大肆宣扬，但是随后战局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逆转却被小心掩盖了起来，公众无法得知，实际上除了军事高层圈子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这些事。在1942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日本的海军航空兵遭到了惨重打击而且再未真正恢复；舰船损失严重而且无法弥补，日本陆军也在瓜岛上丢掉了差不多3万人。日本海军的作战行动常常缺乏弹性而且可预测，美军也发现他们缺乏适应性并开始加以利用。许多一线军官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但是僵硬的指挥习惯已经令日本海军深陷其中。三个世纪前，著名的日本兵法家宫本武藏就指出要善于应变，他称其为“山海相易”。

“山海相易”的含义是，不要反复做同样的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对敌人使出招数时，如果第一次使用未奏效，那么再试几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彻底改变你的战术，改弦易辙。如果还不奏效，那就继续想别的办法。

因此兵法讲究“敌如山则我如海，敌如海则我如山”。这需要深思熟虑。[\[87\]](#)

到1942年底，美国经济的工业—军事实力已经体现在了战场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从所罗门群岛开始，沿着岛链向西北方推进，在1944年2月越过了日军在当地最强大的堡垒拉包尔。

据一名日本情报官估算，进攻盟军跳过了17座日占岛屿，将16万日军丢在了自己后方。没有一个被越过的岛屿上的守军能够完全撤回来，因此只能把他们留在岛上自生自灭，后面的战争中他们也就发挥不出作用了，其中大约1/4的人后来死于饥饿或热带疾病。[88]日本人对于这种越岛战略无计可施，对此恨之入骨，却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在北边同步展开的，沿着中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向西推进的另一路进攻则更具决定性。美国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至20日）中的胜利使日本航母航空兵遭遇不可逆转的彻底失败，而对塞班岛和关岛的占领则为新服役的B-29“超级堡垒”提供了足以打击东京和关东平原的机场。1944年6月至7月间的这些战局已经决定了日本最终的战略失败，而无论后续战役战况如何。

如果太平洋战争是一场高手之间的棋局，那就不必下到最后。一旦胜负已定，任何一个高手都会觉得没必要再下下去了。一旦预见到他的“王”很快就会被吃掉，日方棋手就应该弃子认输，和对手握手言欢了。但这是战争，不是下棋，而且日本的情况使其直到败局已定的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去议和。这样，在1945年8月棋局结束之前，还有150万日本军民如同牲口一般成为祭品。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亡的这150万人，占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

[89]

然而，即便在这最后一年的战争中，日本军队仍然展现出了十足的勇气和胆量，时不时还会打出漂亮仗来。日本陆军已经基本不再向纪律严明、武器精良而且工事坚固的盟军部队发动代价高昂的大规模刺刀冲锋。尤其是在佩里硫、硫黄岛和冲绳岛上，日本陆军充分发扬了其天才的地下防御工事或曰“蜂巢阵地”的优势，大大抵消了美军在炮火和空中力量上的优势。日本海军也造

出了一批新型战斗机，这些飞机在其残存的精锐王牌飞行员手中足以匹敌美军的“地狱猫”、“海盗”和“闪电”——只不过这种飞行员的数量已经不足以逆转战争大势。带着胜利者的洒脱，盟军航空专家还乐于承认日本川西公司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水上侦察机。“神风”自杀攻击为日本所特有，也只有在那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但是从战术上说，这些自杀机更像是未来的武器，它让日本人得以提前用上了制导导弹，而此时任何其他参战国都还没有这种武器，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战败后，日本人筋疲力尽，厌倦了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未来普遍充满忧虑。民众固然不用再担心政府来镇压自己了，但是另一方面，战后的生活和战时并无太大差别。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让日本骤然繁荣，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奇迹”。此时，腐败问题随处可见，陆海军军官会把大量军用物资偷出来，拿到黑市上去卖。当回国军人从各地港口涌入日本时，大批在1944年至1945年间离开城市的难民也掀起了回城潮——这样的难民大约有1 000万人，或者说每7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回流到被炸毁的城市。“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无法预知的危险，”竹山道雄在1945年秋季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找不到方向。过一天算一天，挣多少吃多少，这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90]

对战争的记忆已经淡去，一种沉默和遗忘的文化在战后的日本扎下了根。1947年，一名日本记者称，1942年就如同30年前那般遥远。^[91]在城市中，废墟被装在大车里拖走，灰烬上建起了新的高楼大厦，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整个社区都曾被烧成平地。然而，家家户户都把小房间或者壁龛布置成了小祭台，家人们在这里怀念自己死去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小祭台上摆放着照片和海外寄来的信件，烧着香，还有一个木质骨灰盒

——如果他们能收到骨灰的话。但这些都是极为私密的行为。井上仁志表示，他不想去回忆那些可恨的陈年旧事。他无疑说出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太平洋战争老兵的心声。当他从脑海中搜寻这些回忆时，井上更愿意自己一个人静静沉思。他觉得这些回忆不应该公之于众，不该成为集体共有的记忆，当然也不应该公开讨论或者在学校里教给学生：“我们谁能没有些不愿回忆的事情呢？或多或少都有吧。我们不想让别人来揭我们的旧伤疤。”^[92]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住在东京的一位老人说他一直在努力忘掉战争，但可怕的回忆还是会不时浮出脑海——当他在银座漫步时，“我看到某个地方后突然会想，‘轰炸时我就躲在这堵墙旁边’”。^[93]

关于这场战争，大部分日本人都只记得是日本遭遇了一场悲剧，却不记得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蓄意发起了这场巨大的恶行。关于战争责任和自我反思的话题通常是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许多日本人觉得，战争罪的事情已经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织的东京审判、终战条约以及重组日本政权清算过了。战后的审判法庭已经对甲、乙、丙三级战犯定了罪，日本人便相信罪犯们已经受到了正义的惩罚，普罗大众也就不再有什么战争责任了。时至今日，当论及战争责任及其带来的灾难时，许多日本人仍然倾向于拿战后的审判来回应，强调官方行为、政府声明或者条约条款。在日本公众看来，这个国家的动机是好的，日本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行固然可恶，但并不甚于其他国家的罪行，而且日本的战败是有价值的牺牲，因为它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中解放出来。有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宣称日本是别无选择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打破盟国的“包围”，事关国家存亡。1945年8月，当天皇的“玉音”通过广播传开时，整个国家突然做出了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的180°大转弯。那些曾经支持战时政府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把

自己的旧作藏进了档案柜，或者付之一炬，一切重新开始。那些原本在课堂上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老师现在宣布：“从此往后是民主的时代了。”[94]老师会要求学生们打开课本，把会惹麻烦的书页撕掉或者用墨水涂掉。能在这些原本必须顶礼膜拜的教科书上乱涂乱画，这可是个新鲜事，许多小孩子都兴高采烈。[95]原本要拿去造飞机的杜拉铝（一种硬质铝合金）现在被批发到了黑市上，卖给工厂重新做成消费品。过去说铸剑为犁，现在是铸三菱零战为簸箕和锅碗瓢盆。[96]

在占领期间，麦克阿瑟的诸多政策强化乃至激发了日本人普遍存在的遗忘症。按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日本公共部门未对战争历史遗迹做任何系统性的保留——没有纪念物，教科书里不提此事，也没有国家博物馆。把裕仁留在皇位上作为国家象征和尊崇对象（如果说不再是崇拜的话）的决定，带来了一种连续感。赦免天皇，看起来只是为了方便占领和在亚洲建立对抗苏联的堡垒所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批评天皇在战后的日本是被严格禁止的——被称为“菊禁”（chrysanthemum taboo，菊タブー）——日本的上层民意也认可他只是被军国主义者阴谋控制了橡皮图章而已。他治下的日本年号继续被称为“昭和”，直至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为止。

此时，距离马修·佩里准将的“黑船”开进东京湾，强迫不情愿的日本人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仅仅过去了92年。92年，不足一个世纪，长寿的人活过这么久也不稀奇。1945年，年纪最大的日本人还能记得自己儿时在德川幕府治下的生活，那时候统治国家的还是武士，他们身穿漆甲，用武士刀和长矛作战。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经历了历史性的剧变。他们一往无前地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他们的陆海军成了在全世界都令人生畏的力量，并令一些原本领先的西方国家遭受了耻辱的失败。在狂热军国主义

分子的统治下，他们出动大批军队和舰队，横行亚洲和太平洋，给整个区域带来苦难，使他们在邻国眼中变得可耻。噩梦以日本的彻底战败而告终。未来将会如何？躲在白头鹰的翼下，日本如何才能振兴？1945年时无人知道这一点，或许真正的答案还要再等92年才能揭晓。

从阿留申到新几内亚，从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到菲律宾的绿色丛林，在一处又一处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所罗门、吉尔伯特、阿德默勒尔蒂、马绍尔、俾斯麦、帕劳、东印度、马利亚纳、琉球、小笠原群岛，以及火山列岛——登陆滩头都是一片狼藉。锈迹斑斑、满身弹孔的登陆车艇被丢在浅水中或半埋在沙地上，任由海水冲刷。往内陆走几步，在树林边上，断裂、熏黑、炸碎的棕榈树干倒在地上，如同火柴棍般散落一地。在被摧毁的火炮阵地和碉堡里，钢筋歪歪斜斜地扭曲着，上面耷拉着破碎的混凝土预制板。废弃的散兵坑和暗堡成了老鼠、蛇和蜥蜴的家园。军人们丢弃的杂物散落在灌木丛下，堆在沟底：有口粮罐，用过的纸箱，血浆瓶，弹药箱，背包，水壶，担架，铲子，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东西——其中有些会被清洁人员扫走，有些被当作纪念品捡走，有些被当地人拿走，还有一些则会被时光逐渐掩埋，就像古代的化石那样。

在天气炎热、草木繁茂的南太平洋岛群上，密林很快会宣示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不到一年，藤蔓就会爬满那些锈迹斑斑的推土机、坦克、大炮。最终，绿色植物将彻底吞没这些战争遗迹。损毁飞机的残骸散落在被废弃的跑道旁——有斜倒在地上的，有底朝天的，有机翼和尾翼被拆下来的，乱作一团，油漆和机徽在日光的照射下逐渐褪色。在众多潟湖和锚地中，人们能看到数百艘生了锈，漏了油，满身盐渍的船壳：有运输船、油轮、辅助

船，以及设计时候就没打算用太久的移动干船坞，它们在二手市场上不值什么钱。这些废船中有些会被拖回去拆卖，废旧金属再利用；有些会被拖到大洋上自沉；其他的就这么遗弃在锚地里。马绍尔群岛的有些这种破船还被当作核武器试验的靶标。

许多岛上都有军人墓地——长长几排整齐的白色十字架，间或还能看到大卫之星。有些十字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头盔或其他纪念物，充当标记。在那些大规模的战场上，死者送来得太多太快，掩埋组来不及处理，这样死者有时就会被集中埋进大公墓里，这是推土机草草挖出的长沟，只插着一个大墓碑，写着埋葬日期。战死者的“狗牌”都会被取下，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每个死者的位置会被记下来。大部分埋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军人后来都会依照他们直系亲属的意愿而迁葬到另一处最终的安息之地：要么是海外的某处永久性军人公墓，要么是美国国内的国家公墓，要么是死者家乡的私人墓地。在全世界的279 867名阵亡美军中，171 539人的家属要求将其遗骨迁回美国。^[97]其余大部分也都进行了迁葬，至少迁葬了一次，有时是两次，迁移到国外的永久性大型墓园中。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其他所有军事领域的行动一样，这些迁葬工作的规模也很大。这项工作交给了美国陆军军需办公室的墓地登记处（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缩写GRS），其在高峰时雇用了1.8万军民。挖开战场坟墓时，墓地登记处的工人们都戴着面具和覆盖到胳膊肘的厚重的橡胶手套或皮革手套。他们会使用锅铲式的大铲子，把遗体从土里铲出来，翻到打开的帆布裹尸袋里，然后拉上袋子的拉链，用绳子将其拖到地面上。人们发现这套做法最为高效，而且最能保证士气，因为这样可以迁葬组的工人们“不会沾到腐肉和液化的遗骸”。^[98]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人都会把当天的衣服烧掉，第二天再换一套新制服。

在冲绳，美军墓园非常大，标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此常常需要打开多个墓园才能找到某一个人。根据墓地登记处的资料，有一次，他们“打开了84个墓地，只为了找一个不知道埋葬位置的人”。[99]如此，迁葬组的许多人都患上后来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综合征，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据权威资料，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死者总数为111 606人，包括31 157名美国海军官兵。其中大部分人都长眠于“戴维·琼斯的柜子”[100]里，迁葬组无法触及，永恒的蓝色大海就是他们的墓地。[101]

活着的人自然一心想着回家，越快越好。他们的家人也一样盼着他们回来。在华盛顿，白宫大门外每天早上都有人示威，要求把自己的丈夫、儿子、父亲送回来。信件也如雪片般飞向国会。有些美国人想要立刻停止征兵——但是其他一些人，包括那些仍然穿着军装的人，则游说政府扩大和平时期的征兵规模，这样替换的部队就可以派往海外，让那些老兵尽快回家。[102]眼见战后的种种威胁——苏联、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各种问题——正在东亚逐步显现，美国军队领导人提出警告，不要草率撤出亚洲，以防破坏这一区域的稳定。但是那些平民出身的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归自己的生活中去。正如太平洋上一名基层海军军官所言：“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应该立即回家，而且应该比其他人都更早回家，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不准我们这样做。”[103]

关于退伍的优先顺序，美军是有硬性规定的。那些“点数”最高的军人将被第一批运回去。“点数”是根据多个不同变量计算出来的，包括年龄、服役时间、海外服役时间、参战天数，以及所获荣誉的数量和类型。已婚军人会增加一些点数，如果是当了爸爸的，那么每个孩子也都会有一些点数。塞缪尔·海因斯写道，

那是个“足够理想的体系，没人抱怨。我们只要算自己的分数，排出离开的顺序，然后等着就行了”。[104]但是这样一来，第一批回国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是那些更年长、更富有经验的老兵，包括许多士官。他们的突然离开使得战斗部队在各个层级上都失去了领导核心和作战经验。野战部队和特混舰队指挥官不愿让他们最富经验的老将就这么走掉，因此想方设法钻空子把他们留下来。规则允许各地指挥官出于军事需要而对某些关键人员的退伍进行“冻结”。但这种冻结很不受欢迎，还在华盛顿引发了抗议。于是金上将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这种做法。1945年9月，他向所有海军舰船和基地发出了一份命令：“所有指挥官应当立即重新考虑所有达到退伍点数却基于‘军事需要’而被留下来的人的情况。如继续留用这些人，应当只基于对‘军事需要’一词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解读。”[105]

在太平洋上指挥一支航母特混大队的拉福德将军担心仓促的复员可能会给美国军队留下“一地鸡毛”，这一情况可能会被苏联所利用。在华盛顿，海军部长吉姆·福莱斯特警告杜鲁门总统，如果继续以这种不管不顾的速度复员军队，“那么陆军和海军都将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人员来维持其有效运行”。[106]乔治·C·马歇尔将军对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不叫复员，这叫溃散。”[107]

即便是那些达到足够点数的人也没法确保很快回家。大部分官兵还不得不继续等候，有时要等几个星期，才能在东行的船上得到一张铺位。华盛顿原本预计在德国崩溃后，太平洋战争还将再持续9个月，而日本的突然投降令他们的复员计划变成一团乱麻。许多军队复员所需的船运资源都被投向了大西洋。虽有数百架道格拉斯C-54和C-47运输机在东京、关岛、冲绳、吕宋、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飞例行航班，但那些座位要留给将军们、

战争通讯员、有关系的下级军官，以及重要的平民。在太平洋各处，中转兵营里挤满了无所事事的军人。在横须贺，一座飞机库里架设了800张吊床，人们排成长队领取被单、枕头和毯子。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就混住在这个又大又空旷的地方，直到命令下来让他们登船离开为止。在码头上，懊恼的人们即使没有接到命令，也想方设法要溜到一艘船上，有些人还成功了。据一名陆战队军官说，这种开小差的人大部分不会被追究，只是“随他们去”。[108]

在大复员的一片混乱中，腐败也油然而生。查尔斯·麦坎德利斯是一名“海蜂”军官，在马尼拉，一名文书长对他说，还有100个人在等自己的复员文件，因此麦坎德利斯需要等待。“我问他，给他100美元行不行。他说，给150美元，第二天就能拿到命令，我可以次日上午再来。”于是麦坎德利斯付了贿款，拿到了需要的文件。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向运输指挥部的一个人付了100美元，在一艘离开的船上得到了铺位。[109]

在一项被称为“魔毯”的行动中，战争海运管理处匆忙改造了546艘自由轮和胜利轮，以接运回国的老兵。[110]污水横流的不透气货舱里架起了木质上下铺，最高能达到9层。那些回国的军舰，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坦克登陆舰，都被拿来充作临时运兵船。航空母舰把舰载机转移到岸上，在机库里装了上下铺。每艘回国的军舰都带上了人——有些装数百人，还有的则装数千人。旧金山是太平洋老兵回国时走得最多的港口，在那里，渡船拉响雾号，消防艇把水枪大角度射向天空，市民们从金门大桥的步行通道向下欢呼。在码头旁的栈道上，老兵们列队走下舷梯，迎接他们的或许会有一支铜管乐队，可能还有一群自愿前来、笑靥如花的海军同盟会女士端着咖啡和曲奇等在那里。这样的接待令所有人心存感激，但是那些家在落基山脉以东的人却发现自己

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由于东向运力不足，他们还走不掉。兵营、航空基地、民用机场和火车站挤满了等候座位、无所事事的军人。美国海军警告军人家属不要前往加利福尼亚迎接他们返回的儿子或丈夫，因为“西海岸港口的住宿极度紧张”。^[111]有人想要给东部的家里打电话，但是在1945年，打通这样一个横跨大陆的电话绝非易事，这需要投一大把硬币，还要和交换机操作员商议半天。

圣迭戈的中转兵营里气氛忧伤，一名陆战队员形容这就像是“打完了比赛的更衣室，输掉比赛的那种”。^[112]人们要和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了数年的战友告别。“道别时心中感慨万千，这大多并非伤感或激动，”陆战队员约翰·沃林格说，“‘1945年活着回家’，我们做到了，几乎难以相信。”^[113]

把这大批复员军人跨越整个美国运往东部，令铁路的客运能力难堪重负。过时的火车从旧车场里拖出来临时启用，包括那些烧煤的火车头和从旧西部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木质车厢。离开旧金山的军人会先搭乘南太平洋公司的一艘巨大的火车渡轮，跨过海湾来到奥克兰。在附近的奥克兰终点站，覆盖着国旗的棺材会被吊索从货轮上吊起，安放到美国陆军运输部队的“停尸房”铁路车厢上。^[114]这些停尸车厢将被挂在一部分客运列车的后面，而这些客车将要送那些活着的老兵回家。

横跨美洲大陆的旅行漫长而艰辛。每一列火车都塞满了人，军人和百姓要么坐在过道的行李箱上，要么躺在头顶的行李架上。从旧金山到芝加哥，火车要走三天。一路上小孩哭闹个不停，灯光时明时暗，洗浴室污浊不堪。车厢里不透气，臭不可闻，而若是打开窗，一名水兵回忆道：“就会随风吹进来许多煤烟、煤灰、小石头和鸟毛。”^[115]运兵专列配有炉子、厨具和食品，但是储备的食物常常会吃完而无补充，这时候人们只能饿着

肚子。在沿途的火车站，他们会涌下车，伸伸胳膊拉拉腿，再买个热狗或者三明治垫垫肚子，但是只要他们走到月台上，就会有一名军官告诉他们，列车开动之前赶不回来的人，“都会被视为擅离职守，送上军事法庭”。[\[116\]](#)

打赢战争回到祖国之后，这些老兵对军队当局越来越不耐烦了。在许多列车上，纪律开始崩溃。路易斯·奥金克罗斯是个海军上尉，未来当了小说家。他被安排负责一列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开往纽约市的列车。这列火车被偷偷带上来很多酒。奥金克罗斯上尉坚持要在车厢里巡查，没收这些违禁品，直到他被几名士官长礼貌地警告，“如果再坚持搜查列车，那么我的脑袋被酒瓶砸开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明智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纪律就交给他们去管了。在这趟跨越大陆的旅程的剩余时间里，奥金克罗斯一直待在自己的客舱里，读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列车来到美国东部后，许多老兵越发按捺不住回家的渴望。但是如果他们不先拿到正式的退伍许可，就会被判为擅离职守而面临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每个人都想回家，”“乔克”克拉克将军写道，“我们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得到允许就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海军的规章没用了。”一名被控为逃兵的年轻水兵对克拉克说：“我想看我妈妈。”[\[117\]](#)为了避免逃兵现象过快蔓延，海军费了很大力气在体育馆和公共会堂建立了临时区域复员中心。有些水兵会被请求延长服役。所有人都在此被告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或称《军人重新安置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好处。那些退伍的人都收到了证明文件和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或汽车票。

第一批回国老兵在1945年夏季就从欧洲回来了，等待他们的是欢迎演说、彩旗飘飘、铜管乐队和欢庆游行。在美国西海岸，第一批回国军人也受到了相似的热列欢迎。但是大部分太平

洋战争老兵回国时已是1945年秋季或1946年春，此时，热情已经散去。美国人民急于忘记战争，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也再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些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战时管制措施正在民意和政治压力之下崩溃。工会要求涨工资，并在大部分基础产业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包括汽车业、炼钢业、煤炭业和铁路业。老兵们回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而没有遇到预期中的战后经济萧条，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许多人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工人大军中去。他们受不了工作场所的政治和内斗。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无聊至极，没有他们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统一目标。他们找不到原来在前线部队中那种不可或缺的战友情谊。老兵们发现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战争中形成的兄弟关系，即便是他们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和孩子也不行。如第1陆战师的列兵尤金·斯莱奇所说：“所有的美好生活和奢华消费，似乎都无法替代战斗中产生的友谊。”^[118]

许多年轻的老兵重新回到大学，或者参加职业训练课程，但是还有一些人会依靠政府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的“52—20计划”发放的生活津贴来过日子。山姆大叔每周会给每个老兵发放20美元，发一年，以帮助他们在复员后过渡到正常的社会中。为了解老兵们的情况，这些人每周都必须前往失业保障处报到，说说他们找工作的进展。许多年轻老兵安于在“52—20俱乐部”里吃满一年补贴，他们在邻近的酒吧里靠打牌和掷色子消磨时光，“用尽一切办法来遗忘过去”。^[119]第6陆战师的老兵乔治·尼兰每晚都和一帮老兵出去喝酒。有一天，他喝到早晨才回家，他的父亲，波士顿的一名消防员，拦住了他。“听好了，你小子，”老尼兰对小尼兰说，“你要么去工作，要么去上学，这里不许你再回来了。”^[120]于是尼兰搬了出去，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第6陆战师的另一个老兵比尔·皮尔斯买了一辆摩托车，骑

着它和其他几个流浪骑手一起环游全国。他的父母都责备他“游手好闲了一年”，但皮尔斯最后还是靠政府的资助回到了学校。他觉得这是“陆战队战士的又一次可怕经历，坐在那里学习英文、诗歌、商业、数学.....我快要疯了”。[121]

幽默作家鲍勃·约德尔发现女人们已经习惯自己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能够养活自己了，这很可能会颠覆两性之间的关系。看到一群女性技工在一辆汽车上工作，约德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学到的汽车结构知识已经超过了她们丈夫佯称了解的程度。”他开玩笑说：“留给男人们的或许只剩下一些轻微的脑力劳动了。成年男性会勇敢面对这种前景的。反正我们太帅了，不需要工作。”[122]玩笑归玩笑，困境却真实存在，许多夫妇在战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谢莉·哈克特之前一个人生活，靠在一家滚珠轴承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难如丈夫期待的那样去适应家庭妇女的角色。“我记得怎样换汽车轮胎，也能自己照看汽车引擎，但他却要我回到家里，好像我是疯了才觉得自己会做这些事。”[123]

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团体鼓励女人们放弃工作，把它们还给退伍回来的老兵。有些人便老老实实地离开了，因为她们愿意甚至急于回到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去。另一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却被赶走或者降了级。社会团体和各种广告都在竭力描述完美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声称厨房里满是能节约时间的现代化工具，而机器可以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繁重乏味的家务劳动。当丈夫从前线回来，说要看杂志和电影时，妻子应该听话照办。家庭必须是他的港湾，必须是他说了算。“战争结束后，风尚大变，”弗兰基·库珀如是说，她原先在一家轧钢厂里当起重机操作员，“人们都觉得你应该有女人的样子。我们丢掉了工装裤和格子衬衫，戴起鸟羽头饰，穿上荷叶边衣服和高跟鞋。这都是杂志和报纸上

宣传的，要让女人回到家里的‘正确位置’去。现在就回去，忘了你学会的东西，像个女人。回家，做你的面包，带你的孩子。忘了你曾将他们送进幼儿园，自己则穿起了长裤。”^[124]戴莉·哈恩的丈夫是个陆军航空兵中士，她曾经为他们的战后生活幻想出一幅详尽的画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她从《好管家》杂志的文章里看来的。在她的幻想中，她和丈夫住在城郊一座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我每天早晨7点起床，为丈夫做好早餐，而且在脑子里计划好当天的家务。11点半我会熨烫衣服，下午两点清扫厨房的地板，这天结束时，晚餐就会放在桌子上，而我将穿着晚礼服，拿着马提尼酒在门口迎接我的夫君”。但是哈恩嫁的并非《好管家》里描述的那种人。他更像是乡村音乐里唱的那种人。“我嫁了个醉鬼、赌棍，他还喜欢给我看他手帕上的口红印——那不是我的口红。于是我就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怎样才能当那见鬼的美国主妇？”^[125]当过起重机操作员的弗兰基·库珀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离了婚。之后她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工作中，当起了小学老师。“我已经不再是嫁给他时的那个人了，”她解释说，“我意识到我成长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不再除了父亲家和丈夫家便无处可去了……如果我变回他娶我时的那个小女孩，我丈夫将会很高兴——一个恋家的小女人，只会待在农场里，厨房里，只会滤牛奶。但我不再是那个人了。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变回去，但没用。后来我突然审视了自己，我说，不。不，你不必这么做。你不必回到你来的地方。”^[126]正如无数社会历史学家发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许多夫妻在1942年至1943年年轻男子即将登船远赴战场时仓促结了婚，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再度团聚后，他们带着羞怯和忧惧审视着彼此。如果运气好，他们或许会发现两人刚好脾气相投，于是过上了长久而美满的生活。其他许多人则很快意

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离了婚。后面这种情况导致离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6年，每1 000人中就有4.3对男女离婚或取消婚约——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最高纪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再未达到过。[127]

对于“战斗神经官能症”或曰“战斗应激反应”的症状，医学界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式。医生们只能忧伤地承认，他们的医疗手册和医院都无法提供这种“精神外科手术”服务。而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压力也使得患者羞于谈论此种病症。许多老兵并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帮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和所为。他们也不知道折磨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称其为“战争的魔鬼”。詹姆斯·科弗特如此评论他的哥哥：“他和他的朋友们有许多我作为十三岁少年无法理解的感觉。在那个年龄，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在战争中的那种经历。”[128]许多老兵都受到持续而痛苦的焦虑感折磨，并饱受噩梦和失眠的困扰。他们竭力不让自己回想战斗中那些残忍的见闻和气味。但往事却总是突然浮现在眼前，无论是在梦乡抑或是清醒时，响声或亮光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东西掉在地上，汽车回火的声音，或者有飞机从头上飞过。痛苦的记忆如同装在时间包袱里一样，会突然闯入眼前的生活中。闪回的片段可能会让战斗中最可怕那一刻的景象和声音陡然再现，也可能让难言的悲哀和伤痛猝然涌上心头，那来自丢下好友的悲恸，甚至是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忽然惊醒，心跳加速，衣衫被汗水浸透。退伍的水兵会抱怨说屋子太安静，无法入眠，他们已经习惯于舰船引擎那心跳般的低鸣。正如一名海军老兵所说：“太安静了，我没法睡觉。我听不见、感觉不到柴油电力机组的震颤。这怎么让人睡得着。”[129]他们还很难信任别人，即便待在好友或爱人的身旁，也会感到一种巨大而难以慰藉的孤独。他们有时会控制不住地颤

抖和流泪，忍受着身体上的肌肉紧张，这种紧张有时还会变成持久性的肉体痛苦和疲惫。他们发现在面对复杂工作时很难集中精力。许多人还感到很难和其他人沟通，因而选择独处。他们会回避那些可能勾起可怕回忆的情景，常常无法忍受人群。许多人发觉自己很难规划未来，或者做出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变得和自己的妻子、家人格格不入，还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小孩子般的不健康的过度精神依赖。他们会突然失控，毫无节制地向妻子和孩子发脾气。他们感到没有意义和空虚，对未来抱有无法克服的绝望感，还无法找到快乐的感觉，即便是那些原先会令他们开心的事情也不行。有些人会想到自杀，还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玛乔丽·卡特赖特，那个在旧金山度过了战争岁月，等着她的水兵丈夫从海军回来的西弗吉尼亚女人，发现很难再和她嫁的年轻男人融洽相处了。“我的丈夫从海军回来后，就很难适应老百姓的生活了。他面对不了。参军时他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是个逍遥乐观的人，回来时却充满幻灭感，十分痛苦。医生说经历了太多悲剧。”他在南太平洋瓜岛周围的几场海战中打过仗。他的军舰被击沉，舰上的许多战友都死了。卡特赖特回忆道：“他回家后会做可怕的噩梦。这令他在夜晚难以入睡。他说：‘每次闭上眼，都能看见我的兄弟们死在我周围。’他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被打掉脑袋，倒在他胳膊上。”^[130]他开始酗酒。“我丈夫无法控制他的感受，所以他呆坐着喝酒，忧虑不安。男人们之间当然会相互诉说他们的战争经历，但他觉得不能对我说，我理解不了，我也觉得我理解不了他，因为我没有他那种经历。”医生们想要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去，但他拒绝了。7年后，他们离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卡特赖特说，“和他在一起帮不了他，也改变不了他。我意识到我不得不为自己做些什么，因为我做什么都拯救不了我丈

夫。”^[131]

大约有90万非裔美国人穿上了军装。回家时，他们充满了自信，期待着拥有完整的权利和公民待遇。但是对于其中许多人而言，脱下军装意味着要重回参军前那不牢靠的地位中。在有拥军传统的美国南方，参过军的黑人对种族压迫制度形成了格外明显的挑战。和所有士兵一样，他们受过训练，站姿笔挺，昂首挺胸，姿势和仪态就如同在阅兵场上一样。许多人都受过近身格斗和操作武器的高级训练。他们毕竟是男人，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一个自己会被其他成年人称为“孩子”的地方，在那里，昂着头的黑人会被说成是“傲慢”。在美国南方的某些乡村地区，私刑和其他非法暴力行为还很普遍，其针对的正是那些曾经穿着军装为国效力的黑人。在1945年至1946年几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白人暴徒或警官会绑架、殴打、鞭打甚至杀害那些黑人老兵，按亚拉巴马州某人的说法，这些人“不许盼望或要求对他们出国之前的状况做任何改变”。^[132]即便是在表面上更加开明的美国北方，黑人老兵也普遍没有获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保障的全部权益。主流的大学不愿意接纳他们，至少不愿接纳太多，而原有的黑人大学的扩建速度也无法满足突然暴增的入学申请。支出给黑人老兵的住房贷款也少得可怜。

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战争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机会令美国南方的人大批涌向北方、中西部和西海岸。在所有地区，黑人都在向城市搬迁——把耕地交给了机械化农业，自己则进城寻找高薪工作——这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分布就从农村为主转变为城市为主。到1945年，黑人占据了军工业全部工作岗位的8%，这一比例与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很接近了。战争中有70万非裔美国人仍然留在南方，战后，他们还会继续外流。在整个

20世纪40年代，有约33.9万黑人迁移到这个国家的西半部。洛杉矶和奥克兰这样的地方都建起了大型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西比尔·路易斯从她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萨帕尔帕搬迁到洛杉矶，在道格拉斯飞机工厂里当铆工。她回忆道：“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想黑人不会得到他们现在的地位。战争和国防工作让黑人有机会去做他们此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望值也变了。钱会让人产生这种改变。你能感觉到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生活方式了。”^[133]如果没有打仗，路易斯觉得她会在俄克拉何马乡下当个小学老师，“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离开我的小镇，发现还有别的生活方式”。^[134]

由于达不到退伍所需要的点数，数十万美国年轻人被困在了太平洋上。许多人要在热带的骄阳下度过他们的一连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圣诞节了。这年12月，宾·克罗斯比的民谣《我要回家过圣诞》在军队广播服务处里无限循环——但是此时，歌中忧郁的歌词比往常更像是在讽刺他们的困境：“如果是在梦里该多好。”现在没有那么多义务要承担了，人们的工作开始转为和平时期的节奏，完成指定任务就行，不再额外努力。纪律性让位给了愤世嫉俗。一种冷漠感在宿营地和兵营里蔓延开来。人们靠打牌和晒日光浴来消磨时间。酒在黑市上畅行无阻，许多都是黑酒厂私酿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攒了多少退伍点数，还差多少点就能拿到回家的票。打赢了战争后，军人们被告知他们现在必须要“打赢和平”。但是正如一名海军上尉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没人想理睬这见鬼的‘打赢和平’。我们只想回家”。^[135]

飞行员们每天还得飞例行巡逻任务。有些人被派去向仍然由日军占领的岛屿投放传单，或者奉命在这样的岛上降落，接受日

本守军的投降。飞行事故没有战时那么多了，但其频率仍然令人忧虑。那些在日本投降后死于坠机的人尤其令所有人感到遗憾。曾经在空战中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勇猛的飞行员们，现在对于在危险天气下飞行牢骚满腹，还会向他们的指挥官发泄怒气。对于俯冲轰炸机老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而言，夜晚在东海上空的风暴中飞行令他感到了一种和战时经历截然不同的新的恐惧。身陷如此危境令他暴怒不已。战争已经赢了，“还要我独自在闪电和黑暗中半瞎着飞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毫无意义的夜间训练”。

[136]

第3两栖军的5万名陆战队员，包括第1陆战师和第6陆战师的大部分部队，被派往中国东北执行所谓“围攻”计划。他们的任务是稳定当地局势，监督日军投降，解除其武装，并遣送日本军队和其他外国人回国。众多从恐怖的佩里硫和冲绳血战中活下来的陆战队员现在又被卷入了这项行动，直到1946年春季才得以返回美国。他们第3陆战师的弟兄们留在关岛，必要时可以担任预备队。为了打发空闲时间，关岛上的军官们组织了志愿“学校”，任何在某一领域有特殊知识或者一技之长的陆战队员都可以来给其他战友授课，包括木工活、地质学、汽车维修、拉丁文、水彩画和几十种其他课程。少校和上校们也会坐下来听列兵和下士讲课。有个陆战队员曾在纽约学过水上芭蕾。这个师手中刚好还有一大堆炸药没用完。于是他们用炸药在海岸礁岩上炸出一个大池子，再配上灯光和音乐，让200个陆战队员在里面排队形游泳表演。“这个师就这样完全而彻底地忙起来了，”罗伯特·E.霍加博姆上校如是说，“我们绝对没有遇到在其他一些部队出现过的问题……这种‘让我们回家，让我们离开这里’的心态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师，因为我们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137]

对于大部分年轻的老兵来说，眼下还不是反思战争及其意

义，或者是琢磨这段经历如何塑造自己的时候。这只是一场磨难，一场对他们人生规划讨厌的打扰，放在他们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之间的一道坎。历史和命运把这场战争放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之路上，因此他们——而不是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得不去打这一仗，而且要打赢。战争期间，他们的生活一心只为了未来，为了回归和平，为了让自己回国，那时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他们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且因为打败了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展望未来，他们却不敢太过乐观。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世界未来还将再打几次这样的战争。大部分人对于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拍手称快，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原子武器的影响时，他们又开始为人类文明的前景担忧起来。诺曼·梅勒是个陆军中士，刚刚开始写小说，他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分享了他的想法：“还会有另一场战争的，不是二十年内，就是五十年内，如果有一半的人类活下来，那么再下一场战争又会如何呢？——我相信，为了生存，未来世界上的城市都会建在地下一英里深处。”^[138]即便是最乐观的人对未来也不敢有太高的期待。道格拉斯·爱德华·里奇是一名海军上尉，他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恢复和平的满足感——总的来说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不完美，但可接受，开心一下也没错”。^[139]

遗忘是一种美德，记忆也是。老兵们坚持要纪念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并且向他们致敬——但这只是个例外，在1945年和1946年，他们并不怎么想谈论战争的事情，老百姓也不怎么想听。他们的精力都聚焦在了未来，而非过去。本·布拉德利在太平洋战争中曾于驱逐舰上服役，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他在文章中写道，战后的时代精神没有为战时回忆留下什么空间。“1946年时，谁在乎你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围坐在一起谈论共同参与的战争，我觉得这样的人很烦。”只有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思考的深入，他才逐渐开始理解战争的经历怎样塑造了他和他这一代人。“今天听来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是那些年里你真的参与到了远远超越个人生活的事情当中——以后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让你和你所处的时代如此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140]当年37岁的海军军官詹姆斯·米切纳曾在南太平洋的后方基地服役，他是个特例。早在1945年秋，他便在思考“太平洋上的重要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当他开始动笔撰写后来以《南太平洋的故事》之名出版的小说时，米切纳知道他们这些老兵在1946年甚至是1947年对这样一本书不会有兴趣，也不会有出版社看好这本书的市场。但是再过三四年，当他们关于无聊、想家、恐怖、痛苦和哀伤的记忆开始淡化，老兵们就会带着好奇和兴趣去回看他们共同的这段经历。“显然，几乎无须多言，我认为如果你命令一代年轻人全都去爬珠穆朗玛峰，你就能期待这次爬山成为他们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当他们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们会骂娘，咒骂要他们爬山的人，但是几年后，当他们回看这段经历时，他们就会将其视为了不起的冒险，并拿起书来重新体验这段经历。”^[141]

1945年12月是“魔毯”行动的高峰期。在整个太平洋的各处港口和潟湖里，水兵们都在忙着修补船只，希望它们足以开出海并返回本土。官兵们挤上了任何一艘能带他们回家的船只。当护航航母“方肖湾号”在当年秋季回国时，它带上了几千名只能睡在机库甲板吊床上的陆军和陆战队军人。航母上第10混合中队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基本上都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飞机都被送到岸上，好为乘客们腾地方了。和陆军、陆战队士兵一样，他们也在飞行甲板上东游西逛，打牌，掷色子，读书，或者晒太阳。夜晚，军舰会打开航行灯，他们对这种和平时期的标准做法仍然感到不熟悉和紧张。每天训练时，高射炮手们会像表演哑剧

一样模拟装弹，用火炮瞄准，但不会射击实弹。军舰上拥挤而难受，但没人抱怨。他们是在回家，这就够了。

有天傍晚，第10混合中队的中队长小爱德华·J·赫克斯塔布尔看到太阳西沉到军舰的尾流之中，“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日落场面之一，带着紫色的光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紫光，而天空中的深色色调则和亚利桑那的日落一模一样”。但是，“方肖湾号”上的其他老兵则鲜有人注意到这一幕景色。他们见过上千次太平洋上的日落，这样的景色已经不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了。如果他们还在看海平线，那一定是向前看，向东看，那里是家的方向。第10混合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和赫克斯塔布尔一起站在飞行甲板上，他对赫克斯塔布尔说：“你知道的，上校，那帮家伙还不明白，这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段经历。”^[142]

[1] William D. Leahy diary, August 14, 1945, Leahy Papers, LCMD.

[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07.

[3] Sylvia Summers, oral history, Richardson and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p.98.

[4] Barbara De Nik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13.

[5] Patricia Livermor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12.

[6] Stanton Delaplane, “Victory Rio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ader*, p.198.

[7] Carl Nolte, “The Dark Side of V—J D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15, 2005.

[8]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15, 1945;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9]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72.

[1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49.

[11]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69.

[12]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6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1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14] Imperial Rescript of August 17,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34.

[15] “Speech of Prince Higashi—Kuni to the Japanese People Upon Becoming Premier,” August 17,1945, accessed June 4, 2019, <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1945—08—17c.html>.

[16]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General MacArthur and Japanese General Headquarters on Manila Meeting,” August 15—19,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ccessed June 7, 2019, <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1945—08—15b.html>.

[17] “General MacArthur’s Instructions to Japanese on Occupation Landings,” reprinted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45.

[1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7.

[1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51.

[20]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55.

[21]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2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Leaflets,” Box 2.

[23]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xxiv.

[24] Roland Smoot, oral history, p.192.

[25]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52—53.

[26] John C.Munn, oral history, p.86.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80.

[28]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575.

[29] Ibid.

[30]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51.

[31] Courtney Whitney, "Lifting Up a Beaten People," *Life* magazine, August 22, 1955, p.90.

[32] Courtney Whitney's recollections, quoted in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1.

[33]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447.

[34] Whelton Rhoades diary, August 30,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48.

[3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2.

[36]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37] Whelton Rhoades diary, August 31,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0.

[38]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August 31, 1945.

[39] Ibid.

[40] Stuart S.Murray, oral history, "A Harried Host in the *Missouri*," in Mason, ed., *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p.350.

[41] Jonathan M.Wainwright, *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 pp.279—80.

[42]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p.472—73.

[43] Whelton Rhoades diary, September 2,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2.

[4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72—73.

[45] Stuart S.Murray oral history, "A Harried Host in the *Missouri*," in Mason, ed., *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p.355.

[46] Lamar, “I Saw Stars,” p.22;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451.

[47]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7.

[4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p.360—61.

[4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5.

[50] 哈尔西和理查德森都注意到麦克阿瑟的双手在发抖。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523;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September 2, 1945.

[51]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524.

[52]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577.

[53] Associated Press, “Tokyo Aides Weep as General Signs,” September 2, 1945.

[54] Lilly, *Nimitz at Ease*, p.303.

[55] Whelton Rhoades diary, September 2,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4.

[5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472.

[57]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p.32—45.

[58]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p.452.

[59] James J. Fahey diary, October 22, 1945,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400.

[60] Ibid.

[61] Richard Leonard to Arlene Bahr, November 3,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318.

[62] Ibid., pp.318—19.

[63] 例如，1945年底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原本以为自己会“遭到虐待和奴役，要接受暴政的统治，忍饥挨饿，卑躬屈膝”。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55n7.

[64] Naokata Sasak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69.

[65] 日本孩子把give读成gibu。——译者注

[66]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258.

[67]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55.

[68] Ibid.

[69]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23.

[70] Ibid., p.49.

[71] Terasaki, *Bridge to the Sun*, p.200.

[72]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73]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255.

[7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Foreword, p.x.

[75]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9.

[76]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47.

[77] Document A45,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July 26,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27.

[78]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27.

[79] Junko Ozak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75.

[80] Terasaki, *Bridge to the Sun*, p.233.

[8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82] Chihaya Masataka quoted in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92.

[8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89.

[84] Ibid.

[8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86]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92.

[87]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quoted in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84.

[88] Eizo Hori, statistics ci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48.

[89]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在1937年至1945年的亚太地区战争中，有310万日本人丧生，包括230万军人和80万平民。在后者中，估计有50万人死于日本国内，30万人死于海外。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42.

[90] Michio Takeyama quoted in Takeyama and Minear, eds., *The Scars of War*, p.68.

[91]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s*, p.67.

[92] Hitoshi Inoue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80.

[93]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94] Kazuo Ikezaki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301.

[95] Fusako Kawamura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79.

[96] Yukio Hashimoto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181.

[97] Murrie and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Summer 2015.

[98] Steere, *The 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p.405.

[99] *Ibid.*, p.426.

[100] 传说有个叫戴维·琼斯的酒吧主会把喝醉、赖账的人装进橱柜扔进海里，因此水手用“戴维·琼斯的柜子”来指代“长眠海底”。——译者注

[101] 大多数由于非战斗原因而在海上丧生的人，包括因事故和疾病去世之人，也被葬于海上。美国海军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二战中共有25 664人在非战斗期间死亡。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NHHC) website, accessed August 4, 2019,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u/us—navy—personnel—in—world—waR-ii—service—and—casualty—statistics.html>.

[102] 例如，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军人诺曼·梅勒写道：“我很支持任何能缩短战

争时间、让我早点回家的事情，但这往往与更基本的古老原则相悖。举例来说，我希望和平时期的征兵能通过，因为如果不通过，复员的过程可能会痛苦而缓慢。” Letter to Beatrice Mailer, August 8, 1945,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pp.51—52.

[103] Lee, *To the War*, p.163.

[104]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7.

[105]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70.

[106] James Forrestal diary, October 16,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102.

[10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17.

[108] John C.Munn, oral history, p.91.

[109]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219.

[110]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13.

[111] “Plan of the Day,” Sunday, September 2, 1945, USS *Missouri*, p.2, “Notes,” accessed May 21, 2019, http://www.bb63vets.com/docs/DOC_6.pdf.

[112]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66.

[113]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114] Murrie and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Summer 2015.

[115]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26.

[116]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117]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45.

[118]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66.

[11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327.

[120] George Niland, oral history,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189.

[121] William Pierce, oral history,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193.

[122] Yoder, *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 pp.108, 112.

[123] Shirley Hacket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31.

[124] Frankie Cooper,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49.

[125] Dellie Hahne,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8.

[126] Frankie Cooper,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49.

[127] Randal S.Olson, "144 Year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One Chart," June 15, 2015, accessed June 2, 2019, www.randalolson.com. Data from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CHS).

[128] James Cover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3.

[129]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http://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130] Marjorie Cartwrigh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6.

[131] Ibid., p.228.

[132] Caro, *Master of the Senate*, p.196.

[133] Sybil Lewis,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51.

[134] Ibid., p.252.

[135] Lee, *To the War*, p.164.

[13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5.

[137] Robert E.Hogaboom, oral history, Marine Corps Project, No.813, Vol.1, p.235.

[138] Norman Mailer to Beatrice Mailer, August 8, 1945,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in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pp.51—52.

[139] Leach, *Now Hear This*, p.175.

[140] Ben Bradlee, "A Return,"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6.

[141] Michener, *The World Is My Home*, p.265.

[142] Edward J.Huxtable, commanding officer, Composite Squadron Ten, 1943—1945, "Some Recollections," pp.27—28, Huxtabl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参考文献

档案馆藏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of the
Marine Corps,**

Quantico, Virginia (USMC Archives)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No.2718

Arthur Vandegrift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ornia**

Bonner Fellers Papers Edward J.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and Notes”

William Neufeld Papers, 1942– 1960

Robert Charlwood Richardson Jr.Papers 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File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 (LCMD)**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Jr. Papers Ernest J. King Papers
William D. Leahy Papers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John
Henry Towers Paper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Norfolk, Virginia

LeGrande A. Diller, oral history, recorded September 26,
1982

Papers of Lieutenant General Richard K. Sutherland (RG-
30)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1848– 1964

Radio Message files, 1941– 1951

Records of Headquarters, U.S. Army Forces Pacific
(USAFPAC), 1942– 1947 (RG- 4)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aryland (NARA)**

Digests of Japanese Radio Broadcasts Office Files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CNO Zero- Zero Files")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RG- 77)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2006 (RG-38)

World War 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Naval Historical Collection,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Charles F.Barber,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

Thomas B.Buell Collection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World War II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Project (“Bates
Reports”)

**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HHHC)

Japanese Monographs (U.S.Army, Far East Command,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Richmond K.Turner Papers

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FDR Day by Day,” White House Daily Log FDR Safe Files
Stephen T.Early Papers Harry L.Hopkins Papers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The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1933–
1945

Press Conferences of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1933– 1945

John Toland Papers, 1949– 1991

White House Map Room Papers, 1941– 1945

口述史

**The 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CCOH),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John J.Ballentine Robert Blake Joseph J.Clark Edward
A.Craig Donald Duncan Graves B.Erskine James Fife Leo
D.Hermle Harry W.Hill Robert E.Hogaboom John Hoover Louis
R.Jones Thomas C.Kinkaid John C.McQueen William
W.Buchanan Robert Bostwick Carney Vernon E.Megee Charles
J.Moore John C.Munn Ralph C.Parker Dewitt Peck James
S.Russell Ronald D.Salmon Joseph L.Stewart Edward
W.Snedeker Felix B.Stump Henry Williams

**Oral History Program, U.S.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1969– 2005**

George W.Anderson Jr.

Bernard L.Austin Paul H.Backus Michael Bak Jr.

Hanson W.Baldwin Bernhard H.Bieri Gerald F.Bogan
Roger L.Bond Thomas B.Buell Arleigh A.Burke Slade D.Cutter
James H.Doolittle Thomas H.Dyer Harry D.Felt Noel Gayler

Truman J.Hedding Stephen Jurika Jr.

Cecil S.King Jr.

Edwin T.Layton Fitzhugh Lee Kent L.Lee David
McCampbell Arthur H.McCollum John L.McCrea George
H.Miller Henry L.Miller Catherine Freeman Nimitz et al.,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James
D.Ramage Herbert D.Riley Joseph J.Rochefort William
J.Se bald Roland N.Smoot Arthur D.Struble Ray Tarbuck John
S.Thach

政府出版物，军方出版物，官方历史，未出版的
日记，演讲，信件

Alexander, Joseph H.Closing in: Marines in the Seizure of
Iwo Jima.History and Museums Appleman, Roy
Edgar.Okinawa: The Last Battle.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48.

Bartley, Whitman S.Iwo Jima: Amphibious Epic.Historical
Branch, G- 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1954.

Bates, Richard W.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October 1944: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prepared for Bureau of Naval Personnel, 1958.

Bell, William A.Diary, December 1944 to January 1945.

Bell, William A. "Under the Nips' No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oyd, William B., and Buford Rowland. U.S. Navy Bureau of Ordnance in World War II.

Bureau of Ordnanc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Washington, DC, 1953.

Carter, Worrall Reed. Beans, Bullets, and Black Oil: The Story of Fleet Logistics Afloat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Clary, John W. "Wartime Diary." Accessed January 3, 2018. http://www.warfish.com/gaz_clary.html.

Commander in Chief,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Grey Book: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for the Pacific War."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Craven, Wesley Frank, and James Lea Cate, 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5. The Pacific: Matterhorn to Nagasaki: June 1944 to August 1945.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Davis, Elmer, and Byron Price. 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4.

Deal, Robert M. Personal account. USS Johnston Veterans Association pamphlet.

Donigan, Henry J.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Marine Corps Gazette, September 1994.

Accessed October 19, 2017. <https://www.sofmag.com/>

fury-in-the-pacific-battle-of -peleliu-battle-of-angaur-world-war-ii/.

Dyer, George C.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 Washington: U.S. Dept. of the Navy, U.S. Govt. Print. Off., 1972.

Fenoglio, Melvin. "This I Remember." Accessed April 21, 2019. <https://dd803.org/crew/stories-from-the-crew/melvin-fenoglio-account>.

Gayle, Gordon D. *Bloody Beaches: The Marines at Peleliu*. Diane Publishing, 1996.

Genda, Minoru. "Tactical Planning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rch 7, 1969.

Glantz, David M.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eavenworth Paper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1983.

Green, Maurice Fred.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Hansell, Haywood S.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A Memoir*.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U.S. Air Force, 1986.

Hayes, Grace P.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Historical Section,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3.

Heimdahl, William C., and Edward J. Marolda, eds. Guide to United States Naval 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Naval History Division, Dept. of the Navy, 1976.

Japanese Defense of Citi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Published by A.C. of S., G- 2, Headquarters Sixth Army, July 1, 1945.

Joint Army Navy Assessment Committee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Koda, Yoji, Vice Admiral, JMSDF (ret.).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Lecture with slides delivered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January 6, 2011.

Matloff, Maurice,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3– 59.

McDaniel, J.T., ed. U.S.S. Tang (SS- 306): American 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Riverdale, GA: Riverdale Books, 2005.

—U.S.S. Wahoo (SS- 238): American 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Riverdale, GA: Riverdale Books, 2005.

McEnery, Kevin T. The XIV Corps Battle for Manila, February 1945. U.S. Army, Fort Leavenworth, KS, 1993.

Nelson, Charlie. "Report of Captain Charlie Nelson, USNR." <http://destroyerhistory.org/fletcherclass>.

Parker, Frederick D. A Priceless Advantage: U.S. Navy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and the Battles of Coral Sea, Midway, and the Aleutians. Series IV: World War II, Vol. 5, 2017. 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ashington.

Price, Byron. A Report on the Office of Censorship.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5.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U.S. Army General Staff of G.H.Q., 1966.

Rigdon, William. "Log of the President's Trip to the Berlin Conference," July 6 to August 7, 1945.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1945.

Ryukyus: The U.S. 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14.

Sato, Kenry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Schwartz, Joseph L.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Shaw, Nalty, et al.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Central Pacific Drive.Historical Branch, G- 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1958.

Smith, Robert Ross.Triumph in the Philippines.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63.

Smyth, H.D.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Steere, Edward.The 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I.Q.M.C.Historical Studies No.21.Washington: Historical Section, Office of the Quartermaster General, General Printing Office, 1951.

Stimson, Henry L.Henry Lewis Stimson Diaries.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rmy, Far East Command.5th Air Fleet Operations, February– August 1945.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86.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publish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rch 14, 1962.

U.S.Army, Far East Command.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A Graphic Pres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Naval Organization and List of Combatant and Non- Combatant Vessels Lost or Damaged in the War.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116.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1952.

U.S.Civilian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Industrial Mobilization for War: History of the War Production Board and Predecessor Agencies, 1940– 1945.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75.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U.S.Govt.Print.Off., 1960.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History of the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and the Civil Engineer Corps, 1940– 1946.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Secre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4: "Battle Experience: Radar Pickets and Methods of Combating Suicide Attacks Off Okinawa, March–May 1945," July 20, 1945.

U.S.Department of War.Basic Field Manual: Regulations for Correspondents Accompanying U.S.Army Forces in the Field.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2.

U.S.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s.U.S.Naval Aviation in the Pacific.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Air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Washington: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Military Analysis Division, 1947.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Washington: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Pacific),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Effects of Air Attack on Japanese Urban Economy (Summary Report).1947.

—Effects of Atomic Bombs on Hiroshima & Nagasaki.1946.

—The Effects of Bombing on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Japan.1947.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1947.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1946.

—Effects of the Incendiary Bomb Attacks on Japan (a Report on Eight Cities).1947.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2 vols.1947.

—Japanese Air Power.1946.

—Japanese Merchant Shipping.1946.

—Japanese War Production Industries.1946.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1946.

—The Offensive Mine Laying Campaign Against Japan.1946.

—A Report on Physical Damage in Japan (Summary Report).1947.

—The Strategic Air Operations of Very Heavy Bombardment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Twentieth Air Force).1947.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1946.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1941–45.1947.

Vollinger, John.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ca.com/ww2_johann_memoirs.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 Chief of Staff, General of the Army H.H.Arnold, Commanding General, Army Air Forces [and]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States Fleet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7.

Wolfson Collection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The Wolfsonian Library, Miami Beach, Florida.

图书

Adams, Henry Hitch. Witness to Power: The Life of Fleet Admiral William D. Leah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Agawa, Hiroyuki. The Reluctant Admiral: Yamamoto and the Imperial Nav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

Albion, Robert G. Makers of Naval Policy, 1798–1947.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Allinson, Gary D.,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perovitz, Gar, and Sanho Tree.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Arnold, Henry Harley. Global Mission. 1st ed. New York: Harper, 1949.

Asada,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Astor, Gerald. Wings of Gold: The U.S. Naval Air Campaign in World War II.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4.

Auer, James E.,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Who Was Responsible?

Yomiuri Shinbunsha, 2010.

Badgley, John. Frigate Men: Life on Coast Guard Frigate U.S.S. Bisbee, PF- 46,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Vintage Press, 2007.

Baime, A.J.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FDR, Detroit, and an Epic Quest to Arm an America at War*. Mariner Book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Baker, Russell. *Growing Up*. Congdon & Weed, 1982.

Barbey, Daniel E.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Seventh Amphibious Force Operations, 1943– 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1.

Beach, Edward L. *Submarine!* Pocket Star Books, 2004.

Beaver, Floyd. *Sailor from Oklahoma: One Man's Two-Ocean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Becton, F.J., et al. *The Ship That Would Not Die*. Pictorial Histories Publ. Co., 1993.

Belote, James H., and William M. Belote. *Titans of the Seas: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arrier Task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54.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Black, Conrad.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Blaik, Earl H. *The Red Blaik Story*. Arlington House, 1974.

Blair, Clay.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1st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5.

Blum, John Morton. *V 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Harcourt Brace, 1977.

Boquet, Yves.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Springer, 2017.

Borneman, Walter R. *MacArthur at War: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Back Bay Books, 2017.

Bradlee, Benjamin C. *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 Simon & Schuster, 1995.

Bradley, James. *Flags of Our Fathers: Heroes of Iwo Jima*. Bantam, 2000.

—. *Flyboys: A True Story of Courage*. Little, Brown, 2006.

Bridgland, Tony. *Waves of Hate: Naval Atrocit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eo Cooper, 2002.

Brinkley, David. *Washington Goes to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ity and a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Bruce, Roy W., and Charles R.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Air Group 12*

Strikes the Heart of Japan.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Bruning, John R. *Ship Strike Pacific*. Zenith Press, 2005.

Bryan, J. III. *Aircraft Carrier*. Ballantine Books, 1954.

Budiansky, Stephen. *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 Free Press, 2000.

Buell, Harold L. *Dauntless Helldivers: A Dive- bomber Pilot's Epic Story of the Carrier Battles*. New York: Orion, 1991.

Buell, Thomas B. *Master of Sea Power: 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Little, Brown, 1980.

—. *The Quiet Warrior: A Biography of Admiral Raymond A. Spruance*.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7.

Buhite, Russell D., and David W.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Penguin Books, 1992.

Burgin, R.V., and Bill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A Marine at War in the Pacific*.

NAL Caliber, 2011.

Burlingame, Roger. *Don't Let Them Scare You: The Life and Times of Elmer Davis*.

Greenwood Press, 1974.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Buruma, Ian. *Inventing Japan, 1853– 1964*. Modern Library, 2003.

Byrnes, James F. *Speaking Frankly*. Greenwood Press, 1974.

Caidin, Martin. *A Torch to the Enemy: The Fire Raid on Tokyo*. Bantam Books, 1992.

Calhoun, C.Raymond.Tin Can Sailor: Life Aboard the USS Sterett, 1939– 1945.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Calvert, James F.Silent Running: My Years on a World War II Attack Submarine.Castle,2008.

Caro, Robert A.Master of the Senate: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Vol.3.Random House, 2003.

Carroll, Andrew, ed.War Letters: Extraordinary Correspondence from American Wars.
Scribner, 2001.

Casey, Robert J.Battle Below.Bobbs- Merrill, 1945.

—.Torpedo Junction.London: Jarrolds, 1944.

Childs, Marquis W.I Write from Washington.Harper, 1942.

Clark, J.J., and Clark G.Reynolds.Carrier Admiral.New York: D.McKay, 1967.

Cleary, Thomas.The Japanese Art of Wa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Strategy.Boston: Shambhala Classics, 2005.

Coffey, Thomas M.Hap: The Story of the U.S.Air Force and the Man Who Built It, General Henry H. “Hap” Arnold.Viking Press, 1982.

Coletta, Paolo E.Admiral Marc A.Mitscher and U.S.Naval Aviation: Bald Eagle.Edwin Mellen Press, 1997.

Colman, Penny.Rosie the Riveter: Women Working on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Crown Publishers, 1995.

Conant, Jennet. *Tuxedo Park: A Wall Street Tycoon and the Secret Palace of Science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 Thorndike, 2002.

Conrad, Joseph, and Cedric Thomas Watts. *Typhoon and Other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ok, Haruko Taya, and Theodore F.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The New Press, 1992.

Cooke, Alistair.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1942*.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Cooper, Page. *Navy Nurs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McGraw-Hill, 1946.

Crew, Thomas E. *Combat Loaded: Across the Pacific on the USS Tate*.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7.

Current, Richard Nelson.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Cutler, Thomas J.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23–26 October, 1944*.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Viking, 2017.—.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son, Joel R. *The Unsinkable Fleet: The Politics of U.S. Navy Expansion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Davis, Kenneth S.FDR: The War President, 1940– 1943: A History.Random House, 2000.

Davis, Robert T.The U.S.Army and the Media in the 20th Century.Combat Studies Inst.Press, 2009.

Davis, William E.Sinking the Rising Sun: Dog Fighting & Dive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A Navy Fighter Pilot's Story.Zenith Press, 2007.

Deacon, Richard.Kempei Tai: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Then and Now.Tokyo: Charles E.Tuttle Co., 1982.

DeRose, James F.Unrestricted Warfare: How a New Breed of Officers Led the Submarine Force to Victory in World War II.Castle Books, 2006.

Dixon, Chris, Sean Brawley, and Beatrice Trefalt, eds.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Fighting Words.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ABC- CLIO, 2009.

Dos Passos, John.Tour of Duty.Greenwood Press, 1974.

Dower, John W.Cultures of War: Pearl Harbor, Hiroshima, 9– 11, Iraq.W.W.Norton,2010.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W.Norton,1993.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Pantheon Books, 1986.

Drea, Edward J.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Essays 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Driscoll, Joseph. *Pacific Victory* 1945. Lippincott, 1944

Drury, Bob, and Thomas Clavin. *Halsey's Typhoon: The True Story of a Fighting Admiral, an Epic Storm, and an Untold Rescu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7.

Dull, Paul S. *A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1– 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8.

Dunn, William J. *Pacific Microphone*. Texas A & M Univ. Press, 1988.

Edgerton, Robert B.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W.W.

Norton, 1997.

Eichelberger, Robert L., and Milton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The Viking Press, 1950.

Eisenhower, Dwight D. *Crusade in Europe*. The Easton Press, 2001.

Eisenhower, Dwight 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ed. Robert Hugh Ferrell. The Easton Press, 1989.

Ellis, John. *World War II, a Statistical Survey: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ant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5.

Elphick, Peter. *Liberty: The Ships That Won the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Enright, Joseph F., and James W. Ryan. *Sea Assault: The*

Sinking of Japan's Secret Supership.

St.Martin's Paperbacks, 2000.

Evans, David, and Mark Peattie.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Evans, David C., ed.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In the Words of Former Japanese Naval Officers.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Evans, Hugh E.The Hidden Campaign: FDR's Health and the 1944 Election.Routledge,2016.

Evans, Walter R.Wartime Sea Stories: Life Aboard Ships, 1942– 1945.IUniverse, 2006.

Ewing, Steve.Thach Weave: The Life of Jimmie Thach.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Fahey, James J.Pacific War Diary, 1942– 1945.Houghton, 1963.

Feifer, George.Tennozan: The Battle of Okinawa and the Atomic Bomb.Ticknor &Fields, 1992.

Feis, Herbert.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 1950.W.W.Norton, 1970.

Ferrell, Robert H.Harry S.Truman.CQ Press, 2003.

—.Harry S.Truman and the Bomb: A Documentary History.High Plains Pub.Co., 1996.

Fisher, Clayton E.Hooked: Tales & Adventures of a

Tailhook Warrior.Denver, CO: Outskirts, 2009.

Forrestal, James.The Forrestal Diaries, ed.Walter Millis.The Viking Press, 1951.

Frank, Richard B.Downfall: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Penguin Books,2001.

Friend, Theodore.The Blue- Eyed Enemy: Japan Against the West in Java and Luzon, 1942– 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Fujitani, Takashi, et al.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s.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Fussell, Paul.Wartim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adbois, Robert O.Hellcat Tales: A U.S.Navy Fighter Pilot in World War II.Merriam Press, 2011.

Galantin, I.J.Take Her Deep! A Submarine Against Japan in World War II.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Garvey, John.San Francisco in World War II.Arcadia Pub., 2007.

Giangreco, D.M.Hell to Pay: Operation Downfall and the Invasion of Japan, 1945– 47.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7.

Gibney, Frank, ed.Senso: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ic War.Armonk, NY: M.E.Sharpe, 1995.

Gilbert, Alton.A Leader Born: The Life of Admiral John

Sidney McCain, Pacific Carrier Commander.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06.

Gluck, Carol.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Gluck, Carol,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Showa: The Japan of Hirohito. W.W. Norton, 1992.

Glusman, John A. Conduct Under Fire: Fou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ir Fight for Life as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1941– 1945. Penguin Books, 2006.

Goldstein, Donald M., and Kathryn V. Dillon. The Pacific War Papers: Japanese Document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6.

Goodwin, Doris Kearns. No Ordinary Tim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Simon & Schuster, 1994.

Grew, Joseph C. 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 1904– 1945. Ayer Co. Pub., 1952.

Grider, George, and Lydel Sims. War Fish. Ballantine Books, 1973.

Griffin, Alexander R. Out of Carnage. Howell, Soskin, 1945.

Groves, Leslie Richard. 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 Harper & Row, 1962.

Hachiya, Michihiko, and Warner Wells. Hiroshima Diary:

The Journal of a Japanese Physician, August 6– September 30, 1945: Fifty Years Later.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Halsey, William F., and J.Bryan III.Admiral Halsey's Story.Whittlesey House, 1947.

Hammel, Eric, ed.Aces Against Japan: The American Aces Speak.Pocket Books, 1992.

Hara, Tameichi, Fred Saito, and Roger Pineau.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earl Harbor, Guadalcanal, Midway— The Great Naval Battles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Harper, John A.Paddles! The Foibles and Finesse of One World War II Landing Signal Officer.Schiffer Publishing, 2000.

Harries, Meirion, and Susie Harries.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Random House, 1991.

Harris, Brayton.Admiral Nimitz: The Commander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ater.Palgrave Macmillan, 2012.

Harris, Mark Jonathan, Franklin D.Mitchell, and Steven J.Schechter, eds.The Homefront: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Putnam, 1984.

Hasegawa, Tsuyoshi.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ssett, William D. *Off the Record with F.D.R., 1942–1945*.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2001.

Hastings, Max. *Retribution: The Battle for Japan, 1944–45*. Vintage, 2009.

Havens, Thomas R. *H. Valley of Darkness: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World War Two*.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Healy, George W., and Turner Catledge. *A Lifetime on Deadline: Self-Portrait of a Southern Journalist*. Pelican, 1976.

Henderson, Bruce B. *Down to the Sea: An Epic Story of Naval Disaster and Heroism in World War II*. HarperCollins, 2008.

Herman, Arthur. *Douglas MacArthur: American Warrior*. Random House, 2017.

Hersey, John. *Hiroshima*. Pendulum Press, 1978.

Higa, Tomiko. *The Girl with the White Flag*. Dell Pub., 1991.

Hoehling, A. A. *The Fighting Liberty Ships: A Memoi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Holmes, W. J. *Double-Edged Secrets: U.S. 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9.

Hoopes, Townsend, and Douglas Brinkley. *Driven Patri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Forrestal*.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Hornfischer, James D. *The Last Stand of the Tin Can Sailors*. Bantam Books, 2005.

—. *The Fleet at Flood Tide: America at Total War in the Pacific, 1944– 1945*. Bantam Books, 2017.

Hoyt, Edwin Palmer.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imitz and his Admirals*.

Weybright and Talley, 1970.

Huber, Thomas M.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 June 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Hughes, Thomas Alexander. *Admiral Bill Halsey: A Naval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uie, William Bradford. *Can Do! The Story of the Seabees*. E.P.Dutton, 1944.

—. *From Omaha to Okinawa: The Story of the Seabees*. E.P.Dutton & Company, Inc., 1945.

Hull, McAllister H., et al. *Rider of the Pale Horse: A Memoir of Los Alamos and Beyond*.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5.

Hunt, George P. *Coral Comes High*. Harper, 1946.

Hynes, Samuel L. *Flights of Passage: Reflections of a World War II Aviato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Inoguchi, Rikihei, and Tadashi Nakajima. *The Divine*

Wind: Japan's Kamikaze Force in World War II. Translated by Roger Pineau.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Irokawa, Daikichi. 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 The Free Press, 1995.

Ito, Masanori.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trans. Roger Pineau. Jove, 1986.

Jackson, Robert H. That Man: An Insider's Portrai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ckson, Steve. Lucky Lady: The World War II Heroics of the USS Santa Fe and Franklin.

Carroll & Graf Pub., 2004.

James, Dorris Clayton.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1, 1880– 1941; Vol.2, 1941– 1945.

Houghton Mifflin, 1970.

Janssens, Ruud. "What Future for Japan?" : U.S. 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Postwar Era, 1942– 1945. Rodopi, 1995.

Jeffries, John W.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Ivan R. Dee, 1998.

Jernigan, Emory J. Tin Can Man. Vandamere Press, 1993.

Johnston, Stanley. Queen of the Flat-Tops: The U.S.S. Lexington and the Coral Sea Battle.

E.P. Dutton, 1942.

Joseph, Alvin M. The Long and the Short and the Tall:

The Story of a Marine Combat Unit in the Pacific. Burford Books, 2000.

Kakehashi, Kumiko, and Giles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An Account of War Based on General Tadamichi Kuribayashi's Letters from Iwo Jima. Translated by Giles Murray.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7.

Kase, Toshikazu.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Kawahara, Toshiaki. Hirohito and His Times: A Japanese Perspectiv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0.

Keene, Donald. So Lovely a Country Will Never Perish: Wartime Diaries of Japanese Writer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Keith, Don. Undersea Warrior: The World War II Story of "Mush" Morton and the USS Wahoo. Dutton Caliber, 2012.

Kelly, Cynthia C., 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in the Words of Its Creators, Eyewitnesses, and Historians. Black Dog & Leventhal, 2017.

Kennedy, David M.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Freedom from Fear, Part Tw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enney, George C. General Kenney Report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r.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9.

Kershaw, Alex. Escape from the Deep: The Epic Story of a

Legendary Submarine and Her Courageous Crew.Da Capo, 2009.

Kido, Kōichi.The Diary of Marquis Kido, 1931– 45: Selected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4.

King, Dan.The Last Zero Fighter: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WWII Japanese Naval Pilots.

Pacific Press, 2016.

King, Dan, and Linda Ryan.A Tomb Called Iwo Jima: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Japanese Survivors.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King, Ernest J., and Walter Muir Whitehill.Fleet Admiral King: A Naval Record.W.W.Norton, 1952.

Kiyosawa, Kiyoshi.A Diary of Darkness: The Wartime Diary of Kiyosawa Kiyoshi.Translated by Eugene Sowiak and Kamiyama Tami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Kort, Michael, ed.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Krueger, Walter.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The Story of Sixth Army in World War II.

Battery Classics, 1989.

Kuehn, John T., et al.Eyewitness Pacific Theater: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Atomic Bombs.Sterling, 2008.

Lacey, Laura Homan. *Stay off the Skyline: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6th Marine Division.*

Potomac Books, 2007.

Lane, Frederic Chapin. *Ships for Victory: A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under the U.S. Maritime Commission in World War II.*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1.

Laurence, William L. *Dawn Over Zero: The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 Greenwood Press, 1972.

Lawson, Robert. *U.S. Navy Dive and Torpedo Bombers of World War II.* Zenith Press, 2001.

Lawson, Robert, and Barrett Tillman. *U.S. Navy Air Combat, 1939–46.* Osceola, WI: MBI Publishing, 2000.

Layton, Edwin T., with Roger Pineau and John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 Pearl Harbor and Midway— Breaking the Secrets.* William Morrow, 1985.

Lea, Tom, and Brendan M.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Tom Lea’s World War II.*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8.

Leach, Douglas Edward. *Now Hear This: The Memoir of a Junior Naval Officer in the Great Pacific Wa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 Press, 1987.

Leahy, William D. *I Was There.* Whittlesey, 1950.

Leary, William M.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A Reade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Leckie, Robert.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of World War II*. Penguin, 1996.

Lee, Clark. *They Call It the Pacific: An Eye-Witness Story of Our War Against Japan From Bataan to the Solomons*. Viking Press, 1943.

Lee, Robert Edson. *To the War*. Alfred A. Knopf, 1968.

LeMay, Curtis E., and MacKinlay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Doubleday, 1965.

LeMay, Curtis E., and Bill Yenne. *Superfortress: The Boeing B- 29 and American Airpower power in World War II*. Westholme Publishing, 2007

Lerner, Max. *Public Journal: Marginal Notes on Wartime America*. Viking Press, 1945.

Lilly, Capt. Michael A., USN (Ret). *Nimitz at Ease*. Stairway Press, 2019.

Lingeman, Richard. *Don't You Know There's a War On?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45*. G.P. Putnam's Sons, 1970.

Litoff, Judy Barrett, and David C. Smith, eds. *American Women in a World at War: Contemporary Accounts from World War II*.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7.

—. *Since You Went Away: World War II Letters from American Women on the Home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ockwood, Charles A. *Sink 'Em All*. Bantam Books, 1951.

Lockwood, Charles A., and Hans Christian Adamson. *Hellcats of the Sea: Operation Barney and the Mission to the Sea of Japan*. Chilton Co., 1955.

Lotchin, Roger W. *The Bad City in the Good War: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Oakland and San Dieg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2003.

Lott, Arnold S. *Brave Ship, Brave Men*.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Lucas, Jim Griffing. *Combat Correspondent*.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4.

Lundgren, Robert. *The World Wonder'd: What Really Happened off Samar*. Nimble Books, 2014.

Luvaas, Jay, ed. *Dear Miss Em: General Eichelberger's War in the Pacific, 1942– 1945*.

Greenwood Press, 1972.

MacArthur, Douglas. *Reminiscences*. 1st ed. McGraw- Hill, 1964.

Mace, Sterling, and Nick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A Marine Rifleman's Combat Odyssey in K/3/5*. St. Martin's Griffin, 2013.

McWhorter, Hamilton, and Jay A.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acifica Military History, 2000.

Mahan, A.T., and Allan F. Westcott.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Mahan.Dover Publications, 1999.

Mair, Michael.Kaiten: Japan's Secret Manned Suicide Submarine and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It Sank in WWII.Penguin Group US, 2015.

Manchester, William Raymond.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 1964.

Little, Brown, 1978.

—.Goodbye, Darkness: 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Little, Brown, 1980.

Marsden, Lawrence A.Attack Transport: The Story of the U.S.S.Doye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6.

Marshall, George Catlett.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ed.Larry I.Bland and Sharon R.Stevens.Johns Hopkins Univ.Press, 2003.

Mason, John T., ed.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6.

Mason, Theodore C.Battleship Sailor.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Sailor's War.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 “We Will Stand by You” : Serving in the Pawnee, 1942– 1945.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McCandless, Charles S.A Flash of Green: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Authors Press,2019.

McCrea, John L., et al. Captain McCrea's War: The World War II Memoir of Franklin D.

Roosevelt's Naval Aide and USS Iowa's First Commanding Officer. Skyhorse Publishing, 2016.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Simon & Schuster, 1992.

McIntire, Vice- Admiral Ross T. White House Physician. G.P. Putnam's Sons, 1946.

McKelway, St. Clair, and Adam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Tales from The New Yorker. Bloomsbury USA, 2010.

Meijer, Hendrik. Arthur Vandenberg: The Man in the Middle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Melton, Buckner F. Sea Cobra: Admiral Halsey's Task Force and the Great Pacific Typhoon. Lyons Press, 2007.

Mencken, H.L., and Marion Elizabeth Rodgers. The Impossible H.L. Mencken: A Selection of His Best Newspaper Stories. Doubleday, 1991.

Mendenhall, Corwin. Submarine Diar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Merrill, James M. A Sailor's Admiral: A Biography of William F. Halsey. 1st American ed. Crowell, 1976.

Michener, James A. The World Is My Home. Random House, 1992.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 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Miller, Max.It's Tomorrow Out Here.Whittlesey House, 1945.

Miller, Merle, and Abe Spitzer.We Dropped the A-Bomb.T.Y.Crowell Co., 1946.

Monroe- Jones, Edward, and Michael Green.The Silent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The Story of the U.S.Navy Submarine Force in the Words of the Men Who Lived It.Casemate, 2012.

Morison, Samuel Eliot.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Vol.7.Aleutians, Gilberts and Marshalls, June 1942– April 1944; Vol.8.New Guinea and the Marianas, 1944; Vol.12.Leyte, June 1944– January 1945; Vol.13.The Lib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1944– 1945; Vol.14.Victory in the Pacific; Vol.15.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Little, Brown, 1947– 1962.

Morita, Akio, Edwin M.Reingold, and Mitsuko Shimomura.Made in Japan: Akio Morita and Sony.Dutton Books, 1986.

Morris, Ivan.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Tokyo: Charles E.Tuttle Co., 1982.

Newcomb, Richard F.Iwo Jima.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Naitō, Hatsuho.Thunder Gods: The Kamikaze Pilots Tell Their Story.Dell Pub., 1990.

Nitobe, Inazo.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69.

O'Donnell, Patrick K, ed. *Into the Rising Sun: In Their Own Words, World War II's Pacific Veterans*. Free Press, 2010.

Ohnuki-Tierney, Emiko. *Kamikaze Diaries: Reflections of Japanese Student Soldi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O'Kane, Richard H. *Clear the Bridge!: The War Patrols of the U.S.S. Tang*.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 *Wahoo: The Patrols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World War II Submarine*.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7.

Okumiya, Masatake, Jiro Horikoshi, and Martin Caidin. *Zero!* E.P. Dutton, 1956.

Oliver, Douglas L. *Oceania: The Native Cultures of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9.

Olson, Michael Keith. *Tales from a Tin Can: The USS Dale from Pearl Harbor to Tokyo Bay*. St. Paul: Zenith Press, 2007.

Overy, Richard James. *Why the Allies Won*. Random House, 1995.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The Day Man Lost: Hiroshima, 6 August 1945*.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2.

—. *Japan's Longest Da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3.

Parker, Robert Alexander Clarke.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hort History*. W. Ross MacDonald School Resource Services Library, 2011.

Perret, Geoffrey.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The American People, 1939– 19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erry, Glen C.H. “Dear Bart” : 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 Greenwood Press, 1982.

Perry, Mark.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 The Making of Douglas MacArthur*.

Basic Books, 2014.

Petty, Bruce M., ed.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Bluejackets Rememb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Phillips, Charles L. *Rain of Fire: B- 29s over Japan, 1945*. Paragon Agency, 2002.

Potter, E.B. *Bull Halse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 *Nimitz*.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Potter, E.B., and Chester W. Nimitz. *The Great Sea War: The Story of Naval Action in World War II*.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0.

Prados, John. *Storm over Leyte: The Philippine Invas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Nav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16.

Pyle, Ernie. *Last Chapter*. Henry Holt, 1946.

Radford, Arthur William, and Stephen Jurika.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The Memoirs of Admiral Arthur W. Rad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Radike, Floyd W.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2003.

Raines, James Orvill, and William M. McBride. *Good Night Officially: The Pacific War Letters of a Destroyer Sailor: The Letters of Yeoman James Orvill Raines*. Westview, 1994.

Reid, David. *The Brazen Age: New York City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Politics, Art, and Bohemia*. Pantheon Books, 2016.

Reilly, Michael F., and William J.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1947.

Reischauer, E. O. *The Japanese*. Charles E. Tuttle Co., 1977.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One: American Journalism 1938–1944; Part Two: American Journalism 1944–1946.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Reynolds, Clark G. *Admiral John H. Towers: Struggle for Naval Air Supremac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 *The Fast Carriers: The Forging of an Air Navy*.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Admiral Jocko Clark and the Fast Carrier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Rhoades, Weldon E.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7.

Rhodes, Richard.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Simon & Schuster, 1987.

Richardson, K.D., and Paul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An Oral History of December 7, 1941*.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5.

Rielly, Robin L.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Okinawa 1945*. Casemate, 2010.

Rigdon, William McKinley. *White House Sailor*. Doubleday, 1962.

Ritchie, Donald A.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Th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Press Cor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binson, C. Snelling. *200,000 Miles Aboard the Destroyer Cott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eder, George H. *The Censored War: American Visual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gers, Paul P. *The Good Years: MacArthur and Sutherland*. Praeger, 1990.

Romulo, Carlos P. *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 AMS Press, 1975.

Rosenau, James N. *The Roosevelt Treasury*. 1st e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1.

Rosenman, Samuel Irving. *Working with Roosevelt*. Harper,

1952.

Ruhe, William J. *War in the Boats: My World War II Submarine Battles*. Brassey's, 2005.

Russell, Dale.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Tillamook, OR: Bayocean Enterprises, 1995.

Russell, Ronald W. *No Right to W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Veterans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iUniverse, Inc., 2006.

Rynn, Midori Yamanouchi., and Joseph L. Quinn. *Listen to the Voices from the Sea: Writings of the Fallen Japanese Students*.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0.

Sakai, Saburo, with Martin Caidin and Fred Saito. *Samurai!* E.P. Dutton, 1956.

Sakaida, Henry.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ces, 1937–45*. Osprey Aerospace, 1998.

Sawyer, L.A., and W.H. Mitchell. *The Liberty Ships: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y Type Cargo Ships Constr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85.

Schaller, Michael.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hratz, Paul R. *Submarine Commander: A 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Korea*. Pocket Books, 1990.

Schultz, Robert, and James Shell. *We Were Pirates: A*

Torpedoman's Pacific War.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Scott, James.Rampage: MacArthur, Yamashita, and the Battle of Manila.W.W.Norton, 2018.

—.The War Below: The Story of Three Submarines That Battled Japan.Simon &Schuster, 2014.

Sears, David.At War with the Wind: The Epic Struggle with Japan's World War II Suicide Bombers.Citadel, 2009.

Sears, Stephen W.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The Best of American Heritage.Houghton Mifflin, 1991.

Sheftall, Mordecai G.Blossoms in the Wind: Human Legacies of the Kamikaze.NAL Caliber, 2006.

Shenk, Robert, ed.Authors at Sea: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Remember Their Naval Service.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Sherman, Frederick C.Combat Command: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Pacific War.Dutton, 1950.

Sherrod, Robert.On to Westward: War in the Central Pacific.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5.

Sherwood, Robert E.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Harper & Brothers, 1948.

Shillony, Ben- Ami.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kulski, Janusz.The Battleship Yamato.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Sledge, E.B. *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 Presidio Press, 1990.

Sloan, Bill. *Brotherhood of Heroes: The Marines at Peleliu, 1944: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the Pacific War*. Simon & Schuster, 2006.

—. *The Ultimate Battle: Okinawa 1945— The Last Epic Struggle of World War II*.

Simon & Schuster, 2009.

Smith, Holland M., and Percy Finch. *Coral and Brass*. Scribner, 1949.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 White House Notebook*. Harper & Brothers, 1946.

Smith, Peter C. *Kamikaze: To Die for the Emperor*. Pen & Sword Aviation, 2014.

Smith, Rex Alan, and Gerald A. Meehl. *Pacific War Stories: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Survived*. Abbeville Press, 2011.

Smyth, Robert T. *Sea Stories*. iUniverse, 2004.

Solberg, Carl. *Decision and Dissent: With Halsey at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Sommers, Sam.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World War II, 1939–1946*. Montgomery, AL: Black Belt, 1997.

Spector, Ronald H.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 Free Press, 1984.

Springer, Joseph A. *Inferno: The Epic Life and Death Struggle of the USS Franklin in World War II*. Voyageur Press, 2011.

Stafford, Edward Peary. *The Big E: The Story of the USS Enterprise*. Random House, 1962.

Starr, Kevin. *Embattled Dreams: California in War and Peace, 1940– 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nbuck, Jack, ed. *Typewriter Battalion: Dramatic Frontline Dispatches from World War II*. W. Morrow, 1995.

Sterling, Forest. *Wake of the Wahoo*. Riverside, CA: R.A. Cline Publishing, 1999.

Stillwell, Paul, ed. *Air Raid, Pearl Harbor! Recollections of a Day of Infam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 *Carrier War: Aviation Art of World War II*. Barnes & Noble, 2007.

Stimson, Henry L.,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Harper & Brothers, 1947.

St. John, John F. *Leyte Calling*. The Vanguard Press, 1945.

Stoff, Michael B., et al. *The Manhattan Project: A Docu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Atomic Age*. McGraw- Hill, 2000.

Stoler, Mark A.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Straubel, James H. *Air Force Diary: 111 Stories from the Official Service Journal of the USAAF*. Simon & Schuster, 1947.

Sturma, Michael. *Surface and Destroy: The Submarine Gun War in the Pacific*.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2.

Summers, Robert E., ed. *Wartime Censorship of Press and Radio*. H.W. Wilson Co., 1942.

Sweeney, Charles W. *War's En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Last Atomic Mission*.

Avon Books, 1997.

Takeyama, Michio. *The Scars of War: Tokyo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Writings of Takeyama Michio*, ed. Richard H. Mine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Tamayama, Kazuo, and John Nunneley. *Tales by Japanese Soldiers*. Cassell, 2001.

Tanaka, Toshiyuki,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Blatt Young.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New Press, 2010.

Tanaka, Yuki.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Routledge, 2019.

Taylor, Theodore.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Terasaki, Gwen. *Bridge to the Sun*. Rock Creek Books, 2009.

Terkel, Studs, ed. *"The Good War" :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New Press, 1984.

Thomas, Evan.Sea of Thunder: Four Commanders and the Last Great Naval Campaign, 1941– 1945.The Easton Press, 2008.

Tillman, Barrett.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 1945.Simon & Schuster, 2011.

Time- Life Books.Japan at War / World War II.Time- Life Books, 1980.

Toland, John.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 1945.Random House, 1970.

Tolischus, Otto David.Through Japanese Eyes.Reynal & Hitchcock, 1945.

Townsend, Hoppes, and Douglas Brinkley.Driven Patri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Forrestal.Knopf, 1994.

Truman, Harry S.Year of Decisions.Doubleday, 1955.

Tully, Anthony P.Battle of Surigao Strai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Tully, Grace.F.D.R.: My Boss.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Tuohy, Bill.The Bravest Man: Richard O'Kane and the Amazing Submarine Adventures of the USS Tang.Sutton, 2001.

Ugaki, Matome.Fading Victory: The Diary of Admiral Matome Ugaki, 1941– 1945.Translated by Masataka Chihay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Vernon, James W. *Hostile Sky: A Hellcat Flyer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Veronico, Nick. *World War II Shipyards by the Bay*. Arcadia, 2007.

Victoria, Brian Daizen. *Zen at War*. Weatherhill, 1997.

Wainwright, Jonathan M. *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 Doubleday, 1946.

Walker, Lewis Midgley. *Ninety Day Wonder*. Harlo Press, 1989.

Wallace, Robert F.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A Memoir of Anti-aircraft Training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01.

Wees, Marshall Paul, and Francis Beauchesne Thornton. *King- Doctor of Ulithi: The True Story of the Wartime Experiences of Marshall Paul Wees*. Macmillan, 1952.

Weinberg, Gerhard L.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eller, George, and Anthony Weller, ed. *First into Nagasaki: The Censored Eyewitness Dispatches on Post-Atomic Japan and Its Prisoners of War*. Three Rivers Press, 2007.

—. *Weller's War: A Legendary Foreign Correspondent's Saga of World War II on Five Continents*. Three Rivers Press, 2010.

Werneth, Ron, ed. *Beyond Pearl Harbor: The Untold Stories of Japan's Naval Airmen*.

Atglen, PA: Schiffer Pub., 2008.

Wheeler, Post. *Dragon in the Dust*. Marcel Rodd Co., 1946.

White, Graham J. *FDR and the Pres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9.

Whitney, Cour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Greenwood Press, 1977.

Willmott, H.P.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The Last Fleet A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nkler, Allan M.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1986.

Woodward, C. Vann.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Ballantine Books, 1957.

Wooldridge, E.T.,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1993.

Wray, Harry, et al. *Bridging the Atomic Divide: Debating Japan— US Attitudes 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Lexington Books, 2019.

Wukovits, John F. *Admiral "Bull" Halsey: The Life and Wars of the Navy's Most Controversial Comman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Yahara, Hiromichi. *The Battle for Okinawa*. John Wiley & Sons, 1995.

Yamashita, Samuel Hideo.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 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Selections from the Wartime Diaries of Ordinary Japa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Yoder, Robert M. *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2.

Yokota, Yutaka. *Suicide Submarine!* Ballantine Books, 1962.

Yoshida, Mitsuru, and Richard H. Minear.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Yoshimura, Akira. *Battleship Musashi: The Making and Sinking of the World's Biggest Battleship*. Translated by Vincent Murph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9.

—, *Zero Fighte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6.

Zacharias, Ellis M. *Secret Missions: The Story of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Zich, Arthur,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Life Books. *The Rising Sun*. Alexandria, VA: Time- Life Books, 1977.

文章

Anderson, George. "Nightmare in Ormoc Bay." *Sea Combat*. Accessed October 14, 2018. <http://www.dd-692.com/>

nightmare.htm.

Associated Press,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0>.

—. “Tokyo Aides Weep as General Signs.” September 2, 1945.

Bennett, Henry Stanley. “The Impact of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n the Civilians of Okinawa.”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6, February 1946.

Benoit, Patricia. “From Czechoslovakia to Life in Central Texas.” Temple Daily Telegram, August 23, 2015.

Bradbury, Ellen, and Sandra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4, 2015.

Ben Bradlee. “A Return.”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6.

Brown, Wilson. “Aide to Four President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1955.

Cosgrove, Ben. “V- J Day, 1945: A Nation Lets Loose.” Life, August 1, 2014.

Davis, Captain H.F.D. “Building Major Combatant Ships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1, May 1947.

Delaney, Norman C. “Corpus Christi, University of the

Air." Naval History, Vol.27, No.3, June 2013.

Delaplane, Stanton. "Victory Riot." In Hogan, William, and William German, eds.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ader.McGraw- Hill Book Co., 1962.

De Seversky, Alexander P.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The American Mercury, Vol.54, February 1942.

"Dewey Refuses to Say Directly That Roosevelt Withheld Pacific Supplies." The Courier- Journal (Louisville, KY), September 15, 1944.

Eckelmeyer, Edward H.Jr. "The Story of the Self- Sealing Tank."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Eller, Ernest M. "Swords into Plowshares: Some of Fleet Admiral Nimitz's Contributions to Peace."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6.

Ewing, William H.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Fedman, David, and Cary Karacas, "A Cartographic Fade to Black: Mapping the Destruction of Urba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 Issue 3, July 2012.

"General MacArthur's Instructions to Japanese on Occupation Landings." Reprinted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45.

Goldsmith, Raymond W. "The Power of Victory: Munitions Output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Affairs, 10, No.1, Spring 1946.

Guillain, Robert.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 August 1980.

Hagen, Robert C.,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 and Got It."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Halsey, Ashley Jr. "The CVL's Success Story."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8, April 1946.

Halsey, William F.Jr.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5/591, May 1952.

Hammer, Captain D.Harry. "Organized Confusion: Building the Base."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0, April 1947.

Heinl, R.D.Jr. "Naval Gunfire: Scourge of the Beach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Herbig, Katherine L. "American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Pacific: 1942– 1944." In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ed.Michael I.Handel, 260– 300.London: Cass, 1987.

Hessler, William H. "The Carrier Task Force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1, No.513, November 1945.

Holland, James. "The Battle for Okinawa: One Marine's Story." BBC History Magazine and BBC World Histories Magazine. Accessed May 2, 2019. <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second-world-war/the-battle-for-okinawa-one-marines-story/>.

Holloway, James L.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Vol.24, No.5, October 2010.

Hunt, Richard C.Drum. "Typhoons in the North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9, May 1946.

Jones, George E. "Intramuros a City of Utter Horro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Lamar, H.Arthu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X: The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Lardner, John. "D- Day, Iwo Jima." *The New Yorker*, March 17, 1945.

—.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The New Yorker*, May 19, 1945.

Laurence, William L.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Leary, William L., and Michie Hattori Bernstein. "Eyewitness to the Nagasaki Atomic Bomb." *World War II*, July/August 2005.

Liebling, A.J. "The A.P.Surrender." *The New Yorker*, May 12, 1945.

Mailer, Norman.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The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Manchester, William.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All."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87.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 End Speech Released in Digital Form."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 2015.(Includ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urrender rescript as it appeared in the newspaper on August 15, 1945.)

McCarten, Joh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The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Morris, Frank D. "Our Unsung Admiral."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Murrie, James I., and Naomi Jeffery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 Summer2015.

Mydans, Carl.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Nimitz, Chester W. "Some Thoughts to Live By." *The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Fredericksburg, TX, 1971.

Nolte, Carl. "The Dark Side of V- J D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15, 2005.

Ostrander, Colin. "Chaos at Shimonosek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2, June 1947.

Petillo, Carol M.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

A Note on an Imperial Bon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8, No.1, Feb.1979.

Portz, Matthew H. “Aviation Training and Expansion.” Naval Aviation News, July– August 1990.

—. “Why Primary Flight Training?”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0, No.496, June 1944.

Pratt, Fletcher. “Spruance: Picture of the Admiral.”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1946.

Price, Bryon.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in War- Tim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6, No.5, October 1942.

Ralph, William W. “Improvised Destruction: Arnold, LeMay, and the Firebombing of Japan.” War in History, Vol.13, No.4, October 2006.

Ryall, Julian. “Hiroshima Bomber Tasted Lead After Nuclear Blast, Rediscovered Enola Gay Recordings Reveal.” The Telegraph (UK), August 6, 2018.

Say, Harold Bradley. “They Pioneered a Channel to Tokyo.”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1, No.513, November 1945.

Sears, David. “Wooden Boats at War: Surigao Strait.” World War II, Vol.28, issue No.5, February 2014.

Selden, Mark. “A Forgotten Holocaust: U.S.Bombing Strategy, the Destruction of Japanese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from World War II to Iraq.” Asia- Pacific Journal,

Vol.5, No.5, May 2, 2007.

Siemes, John A. "Eyewitness Account,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by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http://avalon.law.yale.edu>.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President!" Life, August 19, 1946.

Smith, Steven Trent. "Payback: Nine American Subs Avenge a Legend's Death." World War II Magazine, October 24, 2016.

Sprague, Rear Admiral C.A.F., U.S.N.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The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Taoka, Eiko. "Testimony of Hatchobori Streetcar Survivors." The Atomic Archive.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Hibakusha/Hatchobori.shtml>.

Trumbull, Robert. "All Out with Halse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6, 1942.

Vandenberg, Arthur. "Why I Am for MacArthur." Collier's Weekly, February 12, 1944.

Vogel, Bertram. "Japan's Homeland Aerial Defense."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4, No.540, February 1948.

Waba, Masako. "A Survivor's Harrowing Account of Nagasaki Bombing." CBC News, May 26, 2016.<https://www.cbc.ca/news/world/nagasaki-atomic-bomb-survivortranscript-1.3601606>.

Waller, Willard. "Why Veterans Are Bitter." *The American Mercury*, August 1945. Wellerstein, Alex. "Nagasaki: The Last Bomb." *The New Yorker*, August 7, 2015.

Whitney, Courtney. "Lifting Up a Beaten People." *Life*, August 22, 1955, p.90.

Williams, Josette H. "Paths to Peace: The Information War in the Pacific, 1945."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IA. Accessed November 4,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

Williams, R.E. "You Can't Beat 'Em If You Can't Sink 'Em."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7, March 1946.

Wylie, J.C. "Reflections 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1. 1944年7月18日，切斯特·W. 尼米兹，欧内斯特·J. 金，以及雷蒙德·A. 斯普鲁恩斯站在第5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8英寸舰炮下方。拍完这张照片，三位将军就坐进斯普鲁恩斯的餐厅共进晚餐，在那里饱受一大群从附近塞班岛飞来的苍蝇困扰



2. 1944年7月28日上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威廉·莱希将军和切斯特·W. 尼米兹将军在怀基基海滩的霍尔姆斯别墅里摆姿势照相。拍完这张照片，摄影师和摄制组离开后，他们便开始正式讨论战略问题



3. 美国海军的主要航母打击力量，第38特混舰队。“所有军舰同时转弯，它们白色的尾迹会在大海上留出一片整齐的曲线。只需要一分半钟的时间，它们就可以完成90°转弯，稳定朝新的航向航行。”



4. 1944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驶入乌利西环礁的舰队锚地



5. 1944年9月15日，第一批突击登陆艇抵达佩里硫的登陆海滩。这张照片是从一架来自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BB—38）的水上飞机上拍摄的



6. 佩里硫岛上，一队陆战队官兵向满目疮痍的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前进



7. 1944年9月15日，美国海军LST—467号坦克登陆舰在莫罗泰岛搁浅，装甲推土机正涉水前往丛林，那里将修建一条通往机场的道路



8. 小威廉·F. 哈尔西上将，战后不久拍摄的标准照，此前他刚刚被晋升为五星上将



9. 栗田健男中将，摄于1942年前后的标准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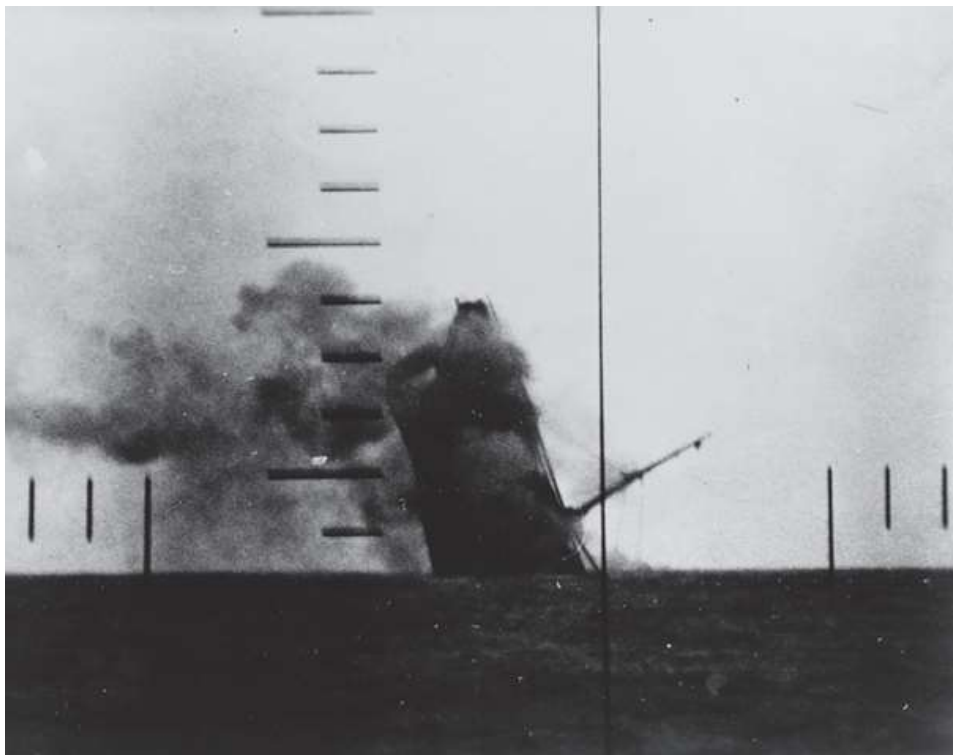
10. 1944年10月25日，恩加诺角海战中，“瑞鹤号”航母的舰员在军舰沉没前山呼“万岁”。它是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的6艘日军航母中最后被击沉的



11. “神风”队员们正在准备最后的出击。一名年轻的飞行员正在给他的战友戴上旭日头带



12. 1943年2月7日，美国海军潜艇“刺鲛号”（SS—238）在完成历史性的第三次战斗巡逻后回到珍珠港。它在潜望镜筒顶上绑了一支扫帚，意味着“扫清敌人”，还有一条飘带，上书“打死挂太阳旗的浑蛋”。位于舰桥右中部的是艇长达德利·W. 莫顿。图左侧（脚踩栏杆）的是副艇长理查德·H. 奥凯恩上尉



13. 一艘日本货船在黄海被击沉，这艘船后来被确认为“日通丸”。照片是潜艇“刺鲛号”（SS—238）通过潜望镜拍摄的，当时该潜艇刚刚用鱼雷将“日通丸”击沉



14. 1944年11月6日，莱特湾战役后不久，美国第3舰队军舰和辅助部队停泊在乌利西环礁



15. 1944年11月，在乌利西环礁的莫格莫格岛上放大假、喝啤酒的水兵们。摄影师：查尔斯·芬诺·雅各布斯



16. 1944年12月，在乌利西潟湖中第3舰队旗舰“新泽西号”上，尼米兹（居中者）和哈尔西（图左）商谈。此时，舰队刚刚在菲律宾海遭受台风重创。图右是尼米兹的副手，福里斯特·P. 谢尔曼少将



17. 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洛克希德飞机工厂里的一名铆工



18. 在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的海军飞行训练中心，飞行学员们在查看飞行记录牌。记录牌上方贴着手写的警告语：“不要飞进云里。”背后的机库里是一架波音—斯蒂尔曼N2S教练机，俗称“黄祸”。摄影师：查尔斯·芬诺·雅各布斯



19. 1945年2月15日，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们在空袭东京之前听取任务简报。参与这一前所未有的任务的战斗机飞行员中，超过一半人刚刚完成训练，还没有打过仗



20. 1945年2月23日，担架组从马尼拉古城（“王城”）的废墟中抬出一名受伤的美军士兵



21 .1945年2月，惨遭日军屠杀的菲律宾百姓。马尼拉城中尽是此景



22. 在硫黄岛的海滩上，被摧毁的两栖车、坦克和补给物资被遗弃在原地，任由海水冲刷。从海岸外的指挥舰上看到此景，霍兰·史密斯将军将其形容为“被狂风摧残过的一排板棚房”



23. 1945年3月，攻占硫黄岛后不久，一架TBM“复仇者”鱼雷机在折钵山上空飞行。可以看到火山北方大面积的开发工程



24. 在提尼安岛的西部机场，第462轰炸大队的B—29正在滑行



25.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寇蒂斯·E. 李梅将军



26. 东京日本桥区，背景是隅田川。这张照片摄于1945年3月10日的燃烧弹空袭后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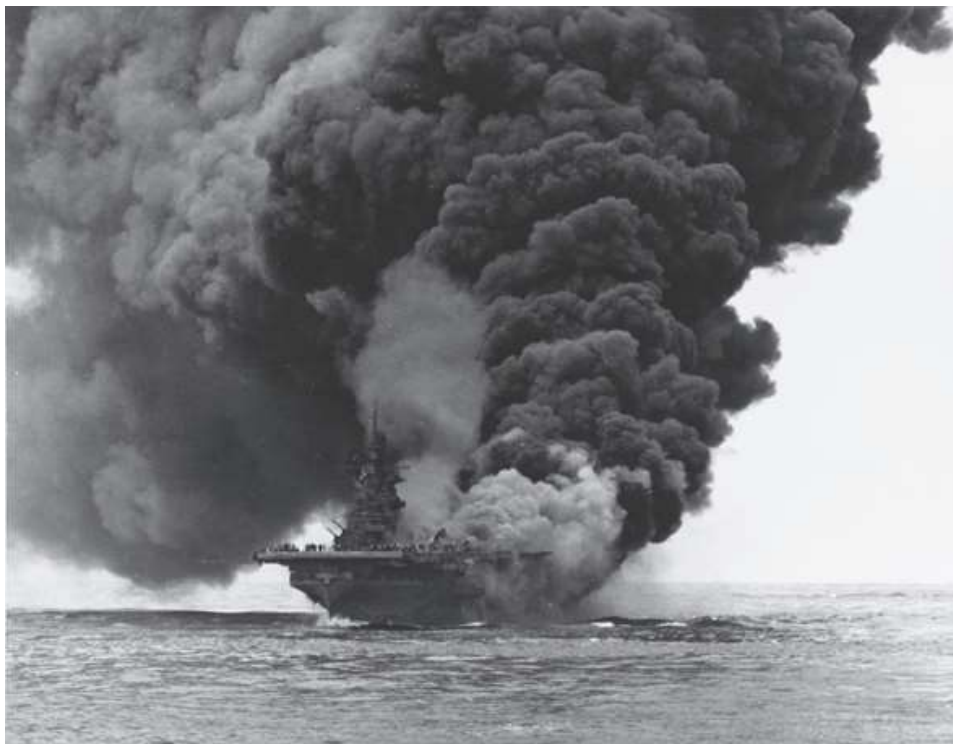
27. 1945年3月10日东京下町区的常见场景



28. 1945年4月，美军强大的特混舰队在冲绳岛的西海岸大胆出击，在距离日本本土不到400英里的地方开辟了滩头阵地。各种登陆舰艇使海面变为黑压压的一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里停着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29. 1945年4月12日，九州南部的知览机场。“勤皇少女”们向出发的“神风”机挥舞樱花



30. 1945年5月11日，被两架“神风”机击中的“邦克山号”，它是第58特混舰队马克·米彻尔将军的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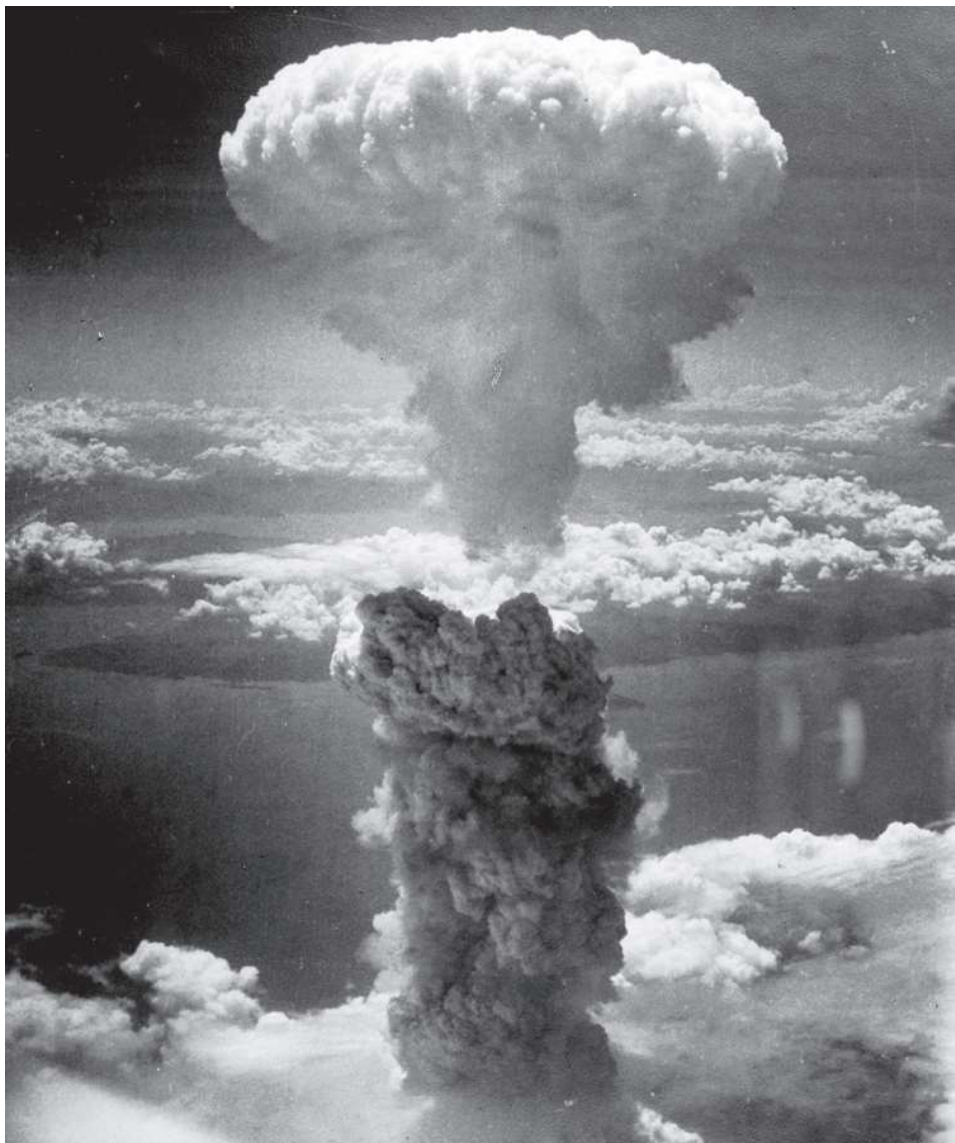
31. 美国战争消息办公室制作的一张宣传单，图中切斯特·尼米兹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勒紧了将原油从东印度群岛运回日本本土的海运线。1944—1945年，千百万张宣传单被投放到日本和日占区各处



32. 冲绳岛战俘营围栏里的日本战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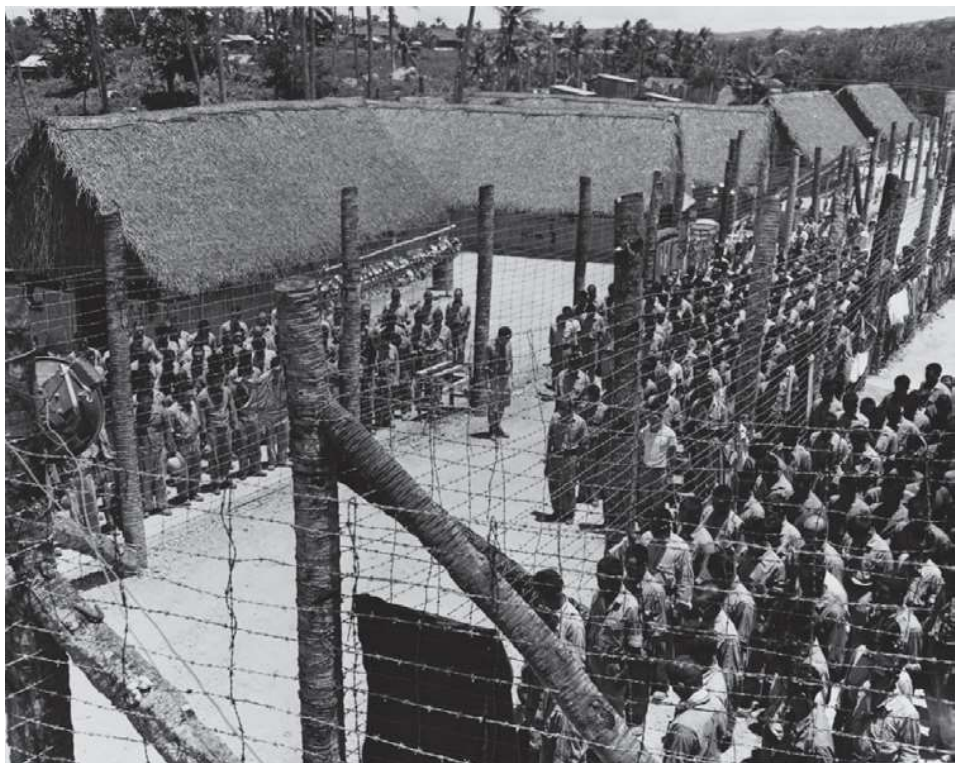
33. 1945年7月16日，准备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以及海军五星上将莱希。拍照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获悉“三位一体”核试验取得了成功



34. 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上空爆炸的第二枚原子弹



35. 1945年9月长崎的浦上河谷。背景中左边山上的是浦上天主堂的废墟，它曾是日本最大的天主堂



36. 1945年8月15日，在关岛的围栏里收听裕仁天皇投降广播的日军俘虏



37. 1945年8月15日，关岛上听到裕仁投降广播之后的一名日本战俘



38. 1945年8月29日，在日本横滨附近的青森战俘营获救的盟军俘虏



39. 1945年9月2日投降仪式结束后，哈尔西和约翰·S. 麦凯恩将军在东京湾里的“密苏里号”上交谈。不久，麦凯恩就启程返回美国。四天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多市的家中因心脏病去世



40.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的各层甲板上挤满了围观者、水兵和记者



41.日本投降代表团在等候麦克阿瑟将军到来。站在前排的是外交大臣重光葵（戴高帽和穿长礼服者）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军。重光葵的一名助手加濑俊一后来回忆道：“千万只眼睛像千万支带火的利箭以疾风骤雨之势射向我们……我从未意识到灼灼目光竟能带来这般痛楚。”



42. 尼米兹将军代表美国在投降文件上签字。在他背后，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相谈甚欢，福里斯特·谢尔曼则在看着他。图中右侧列队站立的是同盟国的签字代表。照片顶上能看到舷外的媒体平台



43. 1945年9月或10月，一名美军水兵在东京骑自行车，打着传统的日本纸伞遮阳



44. 1945年3月硫黄岛上的第5陆战师墓地，背景是折钵山



45. 1945年9月，在“魔毯”行动中充当运兵船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CV—3）。这艘舰把29204名太平洋战争老兵运回了家，比其他任何

一艘船都要多。此图首发于1945年10月号的《兄弟们》（*All Hands*）杂志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 (美) 伊恩·托尔著；谭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2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Twilight of the Gods : Wa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944–1945

ISBN 978-7-5217-3560-4

I. ① 诸... II. ① 伊... ② 谭... III. ① 太平洋战争 IV. 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190944号

Copyright © 2020 by Ian W. To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著者：[美] 伊恩·托尔

译者：谭星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754千字

版次：2021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4241

书号：ISBN 978-7-5217-3560-4

审图号：GS (2021) 5774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学派集成

全球化的 裂解与再融合

朱云汉 著



作序推荐

许倬云

台湾“中央研究院”
院士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院长

- 一天比一天更加分裂的世界，危机何在
- 全球发展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世界向何处去
- 面对美国“镶嵌”的裂解，
中国积极创造“再融合”

巨变时代来临，历史趋势大反转

中信出版集团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朱云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国学派集成”编辑委员会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序1 遍地烽火，何日河清：从镶嵌到融合

序2 全球化下的西方与中国

导言

第一章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曲终人散：西方国家五巨头最后一次抱团取暖

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反扑

脱欧公投为欧洲的梦魇揭开序幕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乡村包围城市”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国会山庄迎来不畏虎的初生牛犊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黄金年代”褪色与“镶嵌式自由主义”式微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存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器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美国民主的衰败

第三章 国际政治的双陷阱危机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一山不容二虎？
奥巴马的惆怅毕业之旅
四重矛盾的叠加
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需要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吗？
超越西方中心思维产物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可控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第四章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一个巴掌拍不响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跨境电子商务生机蓬勃
数字科技革命的无限可能
沙漠中的全球化奇迹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新亚欧大陆桥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美国政府的力量也有极限
网络时代的无硝烟战争
无法任性的巨人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第五章 中国道路与人类未来

回顾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中国速度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涵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维护地球生态与公共领域
中国的全球担当

第六章 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大战与大疫：“西班牙大流感”的历史痕迹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2020年的关键大选

“中国学派集成”丛书

“中国学派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孔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季红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升生 王绍光 王海龙 王海运 王晓泉 王维佳

王湘穗 白钢 张文木 李希光 李玲 汪晖

邱海平 张翔 肖裕声 武力 罗援 赵汀阳

胡钰 贾涛 高梁 黄平 韩毓海 鄢一龙

潘维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斐然，道路独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对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追求。

2015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推出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其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分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道路、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总结。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8年下半年，我们在《经济导刊》杂志开辟了“中国学派”专栏，围绕一些重要的议题，陆续组织相关学者进行高端访谈和开放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学派集成”系列丛书，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些问题存在多种认识和争议，不同的认识对于探索构建中国学派都具有启发意义，也将在本丛书的讨论中贯穿始终，逐步深化。

现代中国最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实践理论化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的自觉努力，构建中国学派也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这是艰难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进行尝试和努力。这种努力和推动形成了动力，包含了一种期待，在发展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构建相应的学术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球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究竟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瓶颈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一些学术研究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对中国道路的实践缺乏研究动力。我们需要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破除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西方的问题代替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方法代替中国的方法，以西方的标准代替中国的标准所形成的思想桎梏。我们要敢于挑战和打破各种流行思维和迷信，包括所谓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

任何学派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那个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学习、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时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直倡导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运用。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为文章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不是从教条中来，而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其实践性带有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他是中国学派的代表和旗帜。

学术研究和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学术研究也是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较狭隘的想法，认为学术一流才能国家一流。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能力和水平，由此，学术就有条件赶超一流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谈到发展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在2018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由此，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中国的大“势”正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

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不是狭义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同时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也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较研究，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性”要有深

刻理解，能够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以中国为立脚点，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让世界对中国思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所了解，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多年来，国际上通常以现有的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世界，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学派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这并不是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但是要打破西方思想的理论禁锢，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理论的适用与否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扬弃的是照抄照搬现象，逐步增强“自信”，破除“他信”。

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难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就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我们曾经批评过将西方的“普世价值”植入替代中国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和做法，并不是否定西方在自身的实践和道路上形成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我们的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不可能放弃本土的学术追求，否定中国自己的理论特色。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几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发展中国学派不可多得的丰厚底蕴。近百年来，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学派进行研究的根基，世界各国在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认识没有终结和边界，我们应突破固有的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而不是教条式地顶礼膜拜。有学者提出，我们推动发展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传承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不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指导中国的实践。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要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经艰难曲折，这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伟大实践，无法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因而，我们要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解决问题要在此岸，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就跑到彼岸去了。我们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最高品格。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中国学派要有平视世界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学术自强，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有了这样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创新，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

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看成一种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

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为我们国家提供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基本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中国学派要以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研究体系和学术队伍，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诉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发展改革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自己的使命！

孔丹
2018年10月15日

序1 遍地烽火，何日河清：从镶嵌到融合

许倬云

朱云汉教授撰成新作，讨论世界的裂解与融合，请我撰写序文，拜读之后，深有感触。2019年8月11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新闻，就有不少世界各地的动乱。仅各处新移民与当地主要族群的冲突的新闻，就不少于5条；冲突出现的地点，遍及挪威、瑞典、美国的得州、亚洲的克什米尔；牵涉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的事件，至少有7件，包括中美贸易战、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日韩贸易纠纷、欧盟与英国脱欧问题、中东石油国际禁运。每天打开报纸，触目之处，竟可说遍地烽火，狼烟四起，这一地球，几乎没有安宁土，没有清静日。

朱云汉教授讨论的主旨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世界各处政治经济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民族主义问题达到高潮。这一民族主义问题不是肯定自己，而是排斥他人。同时出现的是经济发展的混乱，也使得过去已经维持30多年的供应链几乎处处断裂。回忆当年，大约是1960年以后，世界各地都在讨论全球化。而到今日，在推动全球化发展中，也产生了去全球化呼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显著。

全球化这一梦想其实与“大同世界”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大同世界是无私的世界。20世纪讨论的全球化，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大家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分割。目前有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就是欧盟从一个产业结合体，演变为一个“欧洲大联盟”的雏形。凡此，都将加速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却被美国的领导者——特朗普总统悍然推翻。他或者主动退出协定，或者干脆废除协定，以至于曾经为了经济秩序而建立的种种约定与布局，正在化为灰烬。

全球化的现象，本来是基于经济资源配置和产品的流通，而构建彼此联结的供应链。但进入21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科技，将信息链的联系迅速转移到个人手中。信息链的紧密联系，让人们感觉“天涯若比邻”。任何地方的信息，俄顷之间，就可以到达另一地方，这增加了合作的机会，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构建全球化的前提，是经济合作和信息流通这两个文化现象。但从负面看，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消耗大量能源，使得本来“靠天吃饭”的农业，也变成了“戡天而毁之”。这些现象与因人类行为而导致的生

态危机叠加，使得人们开始警觉，地球只有一个：70多亿的“小蚂蚁”，只有“拳头大”的地球作为生存基地。这种同生死共存亡的感觉，为全球化增添了一个沉重的注脚。

如此顺畅推行的全球化，为什么忽然之间又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像特朗普那样的人物？族繁不及备载，不必一一提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唯我独尊。在富有的国家，典型的是“使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口号。而在穷困的地方，则是穷凶极恶地剥削百姓，使其上层比任何阶层都要优越。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全球化的梦想被我们抛在脑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分裂中的世界，而且这裂痕一天比一天大，因为美国还在不断制造危机。

朱教授特别提出两个陷阱。一个陷阱是经济方面，即不惜破坏全球融合的格局，代之以分裂与混乱，掉入失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另一个陷阱则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也就是全球掌有权力者，不允许另一个伙伴共享权力。也就是说，第一号掌权者要消灭第二号崛起者，擂台台主要把打擂台者扔到台下。在朱教授的新作里，就这两个现象列举了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例证。

朱教授特别提到两个名词，一个是镶嵌的格局，一个是融合的完成。这两个名词，其实也代表人类历史上的两种发展形态。我是学历史的，对朱教授所提的这两种对立的现象，深有同感。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常见镶嵌而罕见融合。而即使有融合的个例，也会或是毁己从人，或是化他为己。

从大历史现象看，我们从希腊世界开始，看看欧洲的发展历史。古代希腊世界常以雅典为首善之区。雅典文化发达，城邦富足，的确不愧这一领头身份。有了雅典的带头，配合斯巴达的合作，才能成功击退波斯的扩张。但是从彼时以后，“修昔底德陷阱”就出现了。雅典不容许斯巴达在其卧榻之旁鼾睡。最终雅典独占霸主地位，强令各国海军的建设必须由各国出资，却将舰队归属雅典控制。雅典先后压服可能的挑战者——斯巴达和科林斯，控制了希腊各城邦。雅典不为此满足，又以全力远征西西里，这导致了雅典最终的覆亡。希腊世界终于屈服于远在边陲的马其顿。这一亚历山大建立的马其顿帝国也不容许波斯与其并肩，所以亚历山大一生的努力就是东征西讨，却帝业未成，英年逝世。他尸骨未寒，亚历山大帝国就崩解为三个中东王国。

第二次出现大国，是在罗马时代。罗马城邦是仿照希腊城邦的模式构建的集合体，格局已经超越城邦体制，核心力量则还是罗马城邦。这个核心力量，依赖其独特的权力共享观念，由元老院代表贵族联合体，而罗马城外农夫，则以公民身份武装为罗马军团。罗马军团兵锋四出，遂使地中海四

周，北达高卢，南到埃及，都屈服于罗马之下。罗马的统治几乎涵盖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全部地区，只剩下迦太基依然保持其商业帝国的经营方式存在，富有而强大，成为罗马的挑战者。迦太基可能并不想挑战罗马，因其有自己发展的天地，比如非洲。但是罗马却容不得迦太基的存在。罗马屡次征战，三代经营，终于消灭了迦太基，随即屠戮其百姓，乃至引海水灌入良田，使其不能生产谷物。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中文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只是罗马作为的残酷，则不是这句中文言语的想象可及的。

罗马世界并不是一个融合的总体。各地都有罗马的属地。罗马容许其新占的各个领地保有自己的法律风俗，也并不将原有的统治者代之以罗马的官员，缺少人才、资源、文化在这个庞大疆土流转，进而逐渐融合。罗马帝国不是一个融合的集合体，而只是一个霸主宗邦，强制将许多城邦纳入其麾下。

古代的罗马帝国逐渐衰亡，首先出现“蛮族入侵”，他们成为雇佣兵，暗中偷换为罗马内部权力的质变：新侵入的“蛮族”，以基督教为名建立神权秩序。这个秩序无论是本来成为教廷的罗马，还是后来以“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建立的国际秩序，不同于中国秦汉以后出现的编户齐民制度，处处都是各种族群建立的城邦。有的是以封建方式，只承认宗主国权威，但是并不接受其治理；在封建小国内，也是封君与领主的从属，并不接受王者派遣的官员。

如今，欧洲尽管有一个共同的秩序，但依旧只是镶嵌格局，并不是融合的。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华夏”方式的“天下”，在不断进行的文化、种族的融合过程中，互相融合为庞大的有机集合系统。

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欧洲挥手告别了名义上的帝国体制，承认列国体制的秩序。从17世纪到今天，欧洲战乱不断，其原因都不外乎争夺霸权：地中海东、西之间的争霸，欧洲大陆上中欧与西欧的争霸。近代以来，欧洲的霸业争夺，表现为法国、德国、英国之间的征战。有一方坐大，另两方就合力而攻之，两次欧洲战争都是如此。

由世界格局论，大英帝国的扩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共生，其国旗飞扬各处。它一度占有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大半个地球的资源。但它与罗马帝国一样，是镶嵌的格局，而不是融合的秩序。在大英帝国内，印度还是印度，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甚至英语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处，一旦分出去，只是同语言的原因接受为同族，但绝对不会趋向国与国之间的融合。目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因为脱欧，自外于欧洲，其内部也可能分裂。

以上所说，两千余年来，西方世界的力量一步步扩大和强盛，最终成为地球上的统治群体。然而，西方称霸世界的时候，尤其是后半段，我们只看见他们抢占别人的领土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并没有看见以“和”引起的合作，而只看到以“力”进行的利益争夺。更可诟病的是，西方殖民各处，又往往以“一神信仰”的排他性，视各处有色人种为异类，悍然掠夺、奴役，甚至杀戮，何来融合的观念。

鄙意以为，自公元前四千年以前，高加索山下的人驯服了马匹，加长了活动距离，也扩大了其控制范围。很快西方人发展了骑乘技术。马上民族一拨儿又一拨儿，四下扩充。其中的一路涌向了南亚次大陆，后来者处于先到者之上，构成了千层糕一样的制度。而向西扩充的路线，将先到者推到大陆旁边，后来者占据主要地区，各处建国。他们冲击原住民的社会，改组原有格局：或以宗教信仰，或以结盟方式，构建列国体制。但是如此局面依然是镶嵌，而不是融合。最近的个例，原本可能逐渐走向融合局面的欧盟，却因英国的脱欧，引发了内部的矛盾。从此以后，欧洲融合的机会只会更渺茫。

美国在特朗普的治理下，悍然撕毁各种条约约定，或者努力将原有的合作条约重新签订。他要求各国接受霸主的约束指挥，凡参与新订条约的国家要承担义务，只有霸主美国可独享权力。原本似乎正在开展的全球化进程，因为美国一直以“霸主”姿态自居，以至世人终于发觉，全球化不过是一个幻影，其背后仍是“强者为王”的现实。今日，世人难得不做如此想法：历史竟是屡次不断地重现的错误。所谓大同世界，在世人的眼中，其实只是白人的天堂。“太阳城”不过是白人信仰的“一神信仰”教义中设想的境界，而不是人间可以期盼的理想秩序。

相对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融合过程，何尝不是刀光剑影，人喧马嘶。在春秋战国，经过不断的战争，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各国彼此学习，以至于秦汉统一之前，各国已纷纷实现了内部的郡县制度，也纷纷招纳客卿，借用贤才，为自己服务。它们无不推动资源流通，逐渐构建了资源流通的道路网络。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推动“书同文，车同轨”，规划度量衡标准化。出于同样心态，战国招贤纳士的政策，在秦汉帝国发展为察举制，延揽贤良为国家工作。汉代终于将中国融合成一个结实的集合体，华夏世界因而铸造成一个文化与经济共同体。中国的“天下”，其终极境界是大同世界。儒家讲究修己、安人，终于安天下百姓。《礼记·礼运·大同篇》盼望的大同世界是，选贤与能，人人有职业，老幼妇孺都受到照顾。人有能力，应当服务大众，而不是只为自己；资源属于大众，不在自己。当然，如此美好的世界，当然不易企及，却应是憧憬与努力的目标。

这种融合的思想，自古贯穿至今。这一核心力量的强大，足以将边陲的文

化融合在华夏文化的大圈子之内。大文化圈的增长扩延，也是不断地通过吸收各地乃至域外的文化，使其本体不断变化，终于融合，而不是镶嵌：犹如熬制一锅浓汤，五味杂陈，调和成味，而不再顾及其本来成分的味道。相对而言，美国的烤牛排，是肉归肉，配料归配料。美国的沙拉，诸种成分搅和，无非是一盘“镶嵌”菜肴。

这种不能融合的现象，也是骑马战斗民族的心态。扩张和掠夺是为“我”，而不是为他人。“我”为主，旁人为从。跟“我”走，“我”凌驾于你之上。美国原来标榜的自由主义，本来是人人拥有、众人应有的权利，现在却变成“我”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于是，自由主义成为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名称。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权利，乃至性别差异都不被作为界限。每个人坚持自己的选择之后，可以去除自己先天的性别，而是选择自己认同的性别。只认同“I”（我）这个字，最终超越“he”（他）与“she”（她）。

这一全盘放任的心态，使西方构建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开创的活力和冒险犯难的精神，但是也带来了蔑视他人、埋葬过去的短处。最后只剩下独立于万民之中，一个孤独的“我”。“自由”两个字被误解了，以至于在这种新的自由理想之下，“镶嵌”，最后导致裂解；自我肯定，终于丧失了尊重别人和融合为一体的心。法律规定，保护的是“利”，法律之外界定人际关系的是“力”。“利”与“力”结合在一起，就不再会有容忍他人、彼此尊重的宽容。譬如，一碗众味调和的佳肴，失去了这些互补，竟成为一口怪味。

在近现代医学史上，只有最近才认识到人体各个器官彼此之间的影响。至今还有人执着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观念，而没有想到要整体考虑这些器官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人体是一个整体，还要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宇宙也是一个整体。个体不能妨碍全部，而应对全体有所贡献，而且在全体中应当有所约束，而不是一定要取得“第一”的地位。朱教授这本大作的后半部分，之所以提出了“世界的今天”与“中国的未来”，也许他的想法也是我在这里通过历史的引证而呈现出的西方世界和中华世界之间巨大的差异。在中华农耕文明中，人与人的合作，土壤、空气与生物本身生机的结合，这些因素必须互相配合，才能构成一个鸟飞于天、鱼跃于渊的和谐、活泼的世界。

以上所说是我对朱教授大作的感想。提醒各位读者，也许我们可以相响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要在自己的周围，主动创造融合的局面，而不是镶嵌的裂解。我们盼望，特朗普现象只是过眼云烟。这种忽然出现的一个“另类”，终将会人类的正常心态中化解于无形。

我盼望，有朝一日，人人都能觉悟：个人不能离群独立生活，任何族群不能永远称霸，世界的和平必须建立于各族群之间的融合之上。何日河清？仰天祈祷，早日能见！

序2 全球化下的西方与中国

郑永年

朱云汉教授来新加坡参加会议时，提到他的新著《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即将出版，我向他祝贺，同时也很期待。这些年来，云汉教授笔耕不辍，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事物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写了不少洞见文字。但每次读后，总感觉到云汉教授还没有说完，因此就有了新的期待。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之后，云汉问我是否可以为他的新书写一个短序。我欣然答应，但同时告诉他，我答应写序主要是向他学习。我们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云汉长我几岁，对他的作品，我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看他的文字的确获益匪浅，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研究。所以，我这里的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序言，倒不如说是读书心得。

云汉的新著不长，文字也不多，但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是云汉多年来深刻思考的文字表达，加上深厚的知识背景，读者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消化，最终才会有所感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书涉及的“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上的分析。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赞扬或评判云汉的观点，而是借着学习云汉的论述，围绕他所思考的问题，也谈一些我的看法，既作为对云汉作品的“悟”，也作为对其观点的延伸。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在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东欧剧变，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日益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地，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看，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要不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 dom），要不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的推崇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建立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战和二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尽管苏联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

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民众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的反映。

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很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了“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做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都是传统贵族或新生权贵（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与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并不能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在宗教时代，还是在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仍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在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

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有所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与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因此，这个新时代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对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收入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从历史角度看，任何社会都有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不仅难以解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国家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些人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革的，那么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三层资本结构一旦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題，人们就必须要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更多的则是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的影响，与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导致了今天政府无能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体系”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

上，“三权分工合作体系”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的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能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这本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我自己觉得，读者不必要求自己从云汉的这本书中得到任何肯定性结论，但这本书肯定会成为读者思考问题的起点。

[1]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导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黎明破晓时分，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正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正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因此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英国脱欧，特朗普异军突起，意大利反欧盟联盟上台，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全球化引爆的政治两极化冲突的震荡，让不少经济研究机构纷纷发出警告，他们担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速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许多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百年来仅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西方国家抢夺医疗物资，囤积疫苗，完全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急迫需求，让世卫组织无法发挥统筹全球抗疫行动的职能，导致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陷入失控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信。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担心，世界经济因缺乏承担领导责任的大国以及缺乏有效政策协调机制而爆发系统性危机，也就是滑向“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危险，有增无减。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

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首位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这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醒的“修昔底德陷阱”之历史悲剧可能重演。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对于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可持续发展愿景与新型多边合作倡议半信半疑，甚至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正处于科技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包容文化多样性的文明冲突

而陷入四分五裂，因民粹政治人物煽动的种族主义与仇外思维而埋葬全球化。我们也可能身不由己走上邪路，放纵垄断性数字资本攫取支配新增生产力与主导社会秩序的绝对权力，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但我们也可能逐步构建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超越狭隘的但求自保的国族本位思维；可能借助科技革命的巨大赋能潜力，让世界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能源、水资源、疾病控制、生态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并有机会开启通往分享经济与共享社会的康庄大道。

本书就是我对令大众困惑的五个不确定性的初步观察、分析与思考。我的基本观察是，当中国越来越接近恢复其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复杂与险恶。“新冷战”威胁、“金德尔伯格陷阱”、“锐实力”等批评声浪此起彼伏。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精英的预想，一时之间他们的心理难以调适。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更是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曾拥有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所以在疫情消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对中国掀起新一轮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个议题。中国需要审慎因应当前美国冷战思维重现、战略对抗升高，以及仇中情绪高涨等挑战，预估攀登顶峰的最后一段路程可能产生的风险。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冷静与战略定力。我个人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在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时刻，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中国的国际担当已经难以推卸，但仍需量力而为，并在短期内沉着应对新旧秩序并存及多元模式磨合的过渡期必然发生的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在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会引导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以及激发网络经济的

蓬勃发展，而不是全球化的全面倒退。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

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而模式竞争优胜劣败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可以更有效地去发掘这些新科技对社会的巨大潜在效益并控制其风险，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5G通信进行数字化社会风险管理。这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政治体制能否为社会治理、生产组织、经济分工与合作模式、物质交换与分配机制的革命性演进打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先在自己的区域构建公共卫生共同体，以及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财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西欧带来经济活力。而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全球广大社会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源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与数千年智慧之积累，也是孙中山先生一生倡议的最高理想；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

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

第一章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曲终人散：西方国家五巨头最后一次抱团取暖

2016年4月25日，德国北部莱纳河畔的科技重镇汉诺威，迎来了西方国家五巨头——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伦齐、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最后一次赴德进行正式访问，这场告别之旅对奥巴马有特别意义，因为德国是他政治事业跃升的舞台。2008年，他还是一位初试啼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国际社会默默无闻，他资历中唯一亮眼的就是曾担任一届代表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2008年，他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访问德国，在盛夏的柏林举行了一场露天演讲。那天有一百万柏林市民涌进勃兰登堡门前广场，争相目睹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候选人的风采。那场演讲让奥巴马在全球媒体聚光灯下展现了他的口才与风度，并让他成为自肯尼迪总统以来最受德国人青睐的美国政治领袖。^[1]

在汉诺威，他与默克尔总理举行双边会谈，并与奥朗德、伦齐和卡梅伦相约在此举行一场五巨头高峰会。奥巴马此行给这四位欧洲领袖带来了温暖，他在当天稍早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再次向欧洲人民宣誓美国对北约集体安全体系坚定不移的庄严承诺，他反复强调，美国与全世界都需要一个强大、民主、团结、繁荣的欧洲。他也期勉欧洲公民千万不要对一个自由、和平、多元、奉行利伯维尔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欧洲失去信心，他赞扬过去30年欧洲能把28个国家整合成一个5亿人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乃是历史上罕见的成就。^[2]

奥巴马知道这四位领袖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此后不久英国要举行脱欧公投，而这场公投是卡梅伦首相想要摆脱“脱欧”议题纠缠的权宜之计。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人道主义立场而承诺接纳更多北非与中东难民的政策，已经让她的政治资本严重耗损，反移民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民调支持度已经降到历史新低，在他任内，法国经济毫无起色，面对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衰退的法国企业、愤怒的中产阶级与恶化的财政结构，他束手无策。同时，在他任内，法国爆发多起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让过去隐藏的社会歧视与族群对立难题浮现台面，穆斯林新移民第二代的宗教认同觉醒，给传统上以包容多元文化而自豪的法国带来巨大的考验。意大利是欧元区继希腊之后最可能爆发财政与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都摇摇欲坠，更因意大利选民情绪波动，议会小党林立，政党分合无常，内阁频繁更换且无力处理这些不定时炸弹而险象环生。这位在位超过两年、坚持中间路线的年轻总理伦

齐，被视为挽救意大利经济的唯一希望，也被欧洲主流政治人物视为唯一有能力抵御来自右翼与左翼的反欧盟势力夹击的中流砥柱。

当时，奥巴马仍然对维护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展露出满满自信，虽然他自己的任期即将在9个月后届满，而且他属意的接班人正陷入一场异常艰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竞争，一位来自美加边境佛蒙特州小地方的参议员桑德斯，居然在数场关键州的初选中让声势浩大的希拉里尝到败绩。不过，奥巴马仍深信，获得民主党当权派以及华尔街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高科技产业大佬坚定支持的希拉里，可以顺利获得提名并最终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可预期希拉里将延续他制定的重返亚太与全球战略再平衡路线，并借助他任内启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让美国夺回重组全球经贸版图与修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

这五位巨头都没有料到，这场聚会是西方国家集团主流政治领袖最后一次抱团取暖，此情此景无法再现，只能回忆。西方国家内部所积蓄的反全球化浪潮的政治能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都难逃被反主流政治海啸严重袭击的厄运。

[1] “US Elections: Obama Wows Berlin Crowd with Historic Speech,”The Guardian, July 24, 2008.

[2]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Europe,”Hannover Messe Fairgrounds, Hannover, Germany, April 25,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4/25/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europe>.

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反扑

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卡梅伦首相，因在2016年6月举行的脱欧公投这场政治豪赌中彻底失算而黯然下台，并赔上了英国的国运。奥朗德在2016年12月宣布放弃寻求连任，成为二战以来首位不敢寻求连任的法国总统。伦齐急于推动的宪政改革也惨遭滑铁卢。他把政治前途押在2016年12月一场关键修宪公投上，但没有料到反欧盟与反财政撙节的各股政治势力趁机集结起来进行政治反扑，他只好履行公投不过即辞职的承诺，意大利政局再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僵局。最让人意外的是，在2016年11月初举行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所属意的接班人希拉里被半路杀出的特朗普打败，导致他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政治路线无法延续；更可悲的是，特朗普上台后立刻撕毁奥巴马的精心杰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他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四位西方世界领袖遭遇的政治海啸，都来自同一个震源，那就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反扑，他们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挫折与愤怒通过网络相互感染，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

那时默克尔总理是唯一幸存的在位领袖。虽然西方世界主流精英仍寄希望于她能坚持信念与立场，成为抵御排外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民粹政治最终的中流砥柱，但她犹如过江泥菩萨，已经自身难保。

2017年7月，默克尔总理是G20汉堡峰会的东道主，这场在汉堡召开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领袖会议差一点儿就流产了，因为来自全欧洲的15万名抗议者涌进了汉堡，他们在三天三夜中掀起了德国战后以来最为暴力的一场抗议活动，让面积不大的汉堡整座城市陷入瘫痪。聚集在汉堡的抗议者多半属于比较激进的左翼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团体，他们的口号是“welcome to hell”（欢迎来到地狱）。这些愤怒的抗议者砸毁了很多警车，还有一些人四处纵火，愤怒的抗议群众数度突破警方的封锁线而逼近离会场不到两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榻的饭店还曾一度被抗议者攻占，默克尔从德国各邦紧急调动警力驰援汉堡才勉强得以控制局面。这批抗议群众不惜采取过激的抗议手段也要向G20政治领袖传达一个信息：你们这些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领袖必须要改变现状，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忍受！

紧接着，在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受到重挫，她历经三个月的艰苦斡旋才勉强组成新一届政府。激进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议会，并以接近13%的选票晋升为第三大政党。这个政党的日耳曼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诉求，让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德国纳粹党，而他们的追随者也毫不忌讳地公开怀念希特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发达国家反移民、反经济一体化、反全球化的社会声浪早已浮现，尽管这些底层的声音长期受到主流新闻媒体的忽视，但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它们已经开始扩散、凝聚并累积可观的政治动员能量，汉堡爆发的激烈抗议活动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陷入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的激烈冲突，虽然每一个国家引爆冲突的导火线不尽相同，反全球化浪潮所推动的具体政治诉求与寻求的政治宣泄渠道也大异其趣，而且通常都夹带了其他的社会矛盾，包括宗教冲突、价值观冲突或族群认同冲突等，但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全球化的经济成果与社会风险分配极端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国家都因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股势力的对抗，而陷入社会四分五裂与政治长期动荡不安的困境。西方社会原来长期支持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共识基础已经坍塌，分配正义冲突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以往运行平稳的政党竞争体制与民主决策机制的负荷能力。

脱欧公投为欧洲的梦魇揭开序幕

2016年6月23日，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世纪性公投登场，超过3000万的英国选民涌入投票所，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同时也为欧盟的前途投下关键的一票。这场举世瞩目的公投的投票率高达71.8%。投票结果超出许多观察家的预测，赞成脱欧的居然以51.9%的比例击败选择留欧的48.1%，世界为之震撼。

尽管在投票前夕从奥巴马到默克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到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耶伦女士，从金融大鳄索罗斯到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警示英国“脱欧”的严峻后果，但这些西方社会主流精英已经明显失去了英国基层民众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说服与深情呼唤，都劝阻不了心意已决的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疑欧”选民。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之后，许多西方主流媒体评论都责怪那些支持脱欧的选民不理性，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脱欧议题的复杂性，只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误导。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是，他们在事前无法预见公投的结果（如果能够预见，卡梅伦首相就绝对不敢进行这场政治豪赌），这场令他们错愕的公投反映出欧美社会主流精英与基层民众脱节太久，即便痛定思痛，他们仍无法充分理解“疑欧”选民的不满心理。

有三层因素激发多数英国民众选择脱欧。浅层因素是欧洲的长期经济衰退，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趁机率而入；中层因素是欧盟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以及过去10年成员国扩张过于快速；而深层因素则是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让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社会裂解不断加深的危机。

其结果是，一个英国分裂成两个社会：一半的人拥抱欧洲一体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却先蒙其害。在伦敦金融区上班的专业人士，享有优渥的待遇与分红，可以尽情享受伦敦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异国美食，并充分利用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便捷与商机。他们搭上“欧洲之星号”高铁，两小时一刻钟以后就抵达巴黎北站，然后到香榭丽舍大道与乔治五世大街交会口附近的名牌旗舰店大肆采购一番。相形之下，伦敦众多的中低阶层白领劳工却被不断飙升的高物价与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被排挤到距市中心一个半小时通勤的远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旧、常发生事故、票价又不断飙升的通勤火车，通勤支出平均高达上班族月薪的17%。几条铁路都是在撒切尔时代全面民营化的，私营铁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资回报率，完全无心于提升质量、更新设备或确保轨道运输安全。

欧盟作为超主权管辖体制的一场超大型制度试验，本来就成败难料。欧盟框架为成员国提供单一市场、统一货币、劳工自由移动、基本人权规范，以及生产与消费环节和环保领域的大量统一立法，但财税权、金融监管及各类执法权仍归各国所有。将传统主权国家的职能进行这样的分割，并无先例可循。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生效之初，仅适用于共同体12个原始成员国，其中德、法、英、荷四国为欧盟初期运作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这四国经济体制健全，工资水平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传统，不需要强大的外部约束即可自觉维持财政纪律与金融秩序。只有体制较弱的西班牙与葡萄牙需要西欧拉抬与布鲁塞尔的督促。

2002年欧元正式上路，两年内就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坐稳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宝座。欧盟试验初期的成功，让欧洲政治领袖对体制设计过于自信。从2004年开始，欧盟快速扩张，吸纳了大量的南欧与东欧国家。但是，大多数新成员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与西欧差距悬殊，财政纪律不佳，金融监管松弛。在欧元币值信用与欧洲央行隐性担保的大伞掩护下，这些国家一度享受到借贷成本大幅降低、投资热钱大量涌入的甜头。结果是消费信用急速扩张，资产泡沫加速膨胀。当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欧盟体制设计的缺陷就暴露无遗，欧债危机席卷欧洲。

欧债危机激化了成员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期待债务减免的南欧与坚持维护债权的西欧之间冲突不断。经济长期衰退也让欧盟财政纪律规范难以执行，生硬追求财政平衡反而导致经济收缩变本加厉，尤其是在被迫进行财政撙节的这些国家，反欧与脱欧的声浪节节升高。

成员国之间生产力增长速度始终存在严重落差，导致欧洲内部结构性经济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德国产业竞争力一枝独秀，长期独享巨额贸易顺差，撑高了欧元的汇率，却严重压缩其他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柏林仍一直坚持实施保守财政政策，更不断加大了欧元区通货紧缩压力。

在各国失业率普遍攀高之际，东欧移民不再受到西欧欢迎；当北非与中东难民大量涌现时，开放边境政策更饱受质疑；最后，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让反移民的情绪濒临失控。

英国脱欧公投给新自由主义政策路线一次重击，这个极右派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90年代席卷全球，成为加速全球化与区域整合的指导思想。历史的逆转经常以极具讽刺的形式出现。英国是孕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也是新自由主义革命的试验田，30多年之后却是由英国民众首先发难，阻挡经济一体化趋势，撒切尔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难以

瞑目。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的当选，预告了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与游戏规则都将被迫修正。全球化必须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相结合，经济利益受损者必须获得合理的补偿，弱势群体的需求必须得到更好的照顾。英国的脱欧也预告了欧洲的梦魇已经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长期高举脱欧大旗的法国“国民联盟”跃跃欲试，反欧盟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已经挤入执政联盟。在不少中欧与南欧国家，“脱欧”势力也蠢蠢欲动。

从特雷莎·梅接下首相职务开始，英国与欧盟展开了一场长达三年的马拉松式谈判。特雷莎·梅首相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从布鲁塞尔那里得到可以让英国民众满意的脱欧方案。她在2018年12月向议会提出的协议草案遭到否决，连保守党的议员都弃她而去。这场“离婚谈判”注定难以善了，因为欧盟领导人意志坚定地要让英国选民为自己的错误抉择付出可观的代价，他们心里很明白，绝对不能让英国顺利脱欧，否则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欧盟危在旦夕。在英国议会否决了梅首相的提案后，欧盟领导人关起门来拒绝了英国政府重开谈判的请求，布鲁塞尔宁可让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硬脱欧，并宁可让英吉利海峡两岸共同承受硬着陆带来的混乱与阵痛。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如果英国脱欧已经让欧盟各国领导人头痛万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革命”，就更让西欧国家胆战心惊。

首先对美国社会而言，2016年的大选是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惨烈选战，因为这场选举让美国民主体制的正当性基础严重折损，让主流媒体的专业伦理与社会公信力跌落至谷底，社会内部的价值观、阶级与种族矛盾全面爆发，使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彻底动摇。这场劲爆而激烈的选举，不但加深了美国社会原有的种族隔阂，加剧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政治恶斗、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更扩大了劳工阶层与主流精英群体之间的信任鸿沟，主流政策精英长期宣扬的自由贸易、全球化及国际干预与全球领导角色，面临70年来最严峻的质疑。

在选战过程中，面对完全不受传统政治禁忌约束的特朗普，目睹了大量愤怒基层民众通过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所发出的颠覆性政治诉求，美国主流媒体精英既感到震撼又心生恐惧。他们为了全力阻挡特朗普，已经顾不上自己长久以来所标榜的平衡、客观、忠于事实等专业标准。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主流媒体穷追不舍，开始对特朗普展开一场全面的无情的围剿与追杀，并不断质疑他与普京暗通款曲，相信特朗普若无俄罗斯在网络上散播假消息的暗助绝不可能当选；反过来，主流媒体对希拉里所有泄密与敛财的违法行为，以及在她国务卿任上克林顿基金会公然向外国企业与中东王室索取巨额捐赠的贪婪举措，却全然视若无睹。

有些观察家把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称为“特朗普革命”并不夸张。^[1]尽管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特朗普的当选情景与政策趋向都带有颠覆性的色彩。特朗普刮起的政治旋风完全颠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提供的政治动员平台，打破了两大政党主流政治精英的权力垄断，并冲破所有主流媒体对他的围堵。他冲撞了美国社会所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也搅乱了传统划分左右政治版图的坐标。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美国过去70年来所构建的自由化国际秩序，他并不信奉这个秩序的两大主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他反对根据民主、人权、多元这些价值标准来区分敌友与亲疏；他的广大支持者更深信过去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自由化与开放贸易体系，是导致美国产业空洞化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元凶。

特朗普要重新设定美国的国际角色，而且相信这样做就像把计算机关机后重新启动一样容易。在他眼里，所有美国过去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承担

的国际条约义务、长期信守的政策承诺以及一手创建的多边合作体制，都可以推翻重来，一切都要重新评估是否符合当前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需要。^[2]

他当选后的言行让所有西方盟国领导人都警觉到，他们将面对一个无法预测、难以捉摸的美国总统。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居然底线飘移、框架模糊，没有信念准则，而且摆明从此美国要给得更少却拿得更多。他还把自己随时可以重新设定游戏规则的这种任性霸道，当作吓唬对手、买空卖空的筹码来运用。

^[1] Richard Wolff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Nothing Short of a Revolution," *The Guardian*, November 9, 2016.

^[2] Josh Rogin, "Trump's Only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is Trumpism,"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5, 2018.

“乡村包围城市”

特朗普与希拉里的支持者最大的分野就是：特朗普的选民大量来自在快速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或被疏离的群体与地区；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则普遍拥抱全球化与经济开放，以及接纳与全球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包括反保护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鼓励多元文化，鼓吹所谓进步社会价值（摆脱基督教教条、包容同性恋、积极应对地球变暖危机等）。而特朗普则成功地调动了处于低就业状态、面临薪资长期停滞或饱尝职场压力与充满经济不安全感的选民，特别是从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低教育程度的白人群体。他把他们的失落、挫折、愤怒与恐惧导向三大替罪羊：非法移民、伊斯兰激进组织与不公平贸易，尤其是“中国通过巨额贸易顺差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从地域分布看，特朗普的选战策略是典型的“乡村包围城市”。美国3100个县（含与县同级的行政单元）中，特朗普赢得了2600个县，面积占美国国土的84%，而希拉里仅赢得500个县，这样的选票地域分布让特朗普赢得选举人团票的多数。希拉里之所以在普选票上赢过特朗普，是因为在人口最稠密的100个县中，她赢得了88个县（包括联邦政府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希拉里的选票集中在特大城市、东西两岸都会区、大学城与科技产业带，以及新移民比较集中的州，特别是夏威夷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最南部紧挨着墨西哥的几个县。而特朗普则赢得了几乎所有的乡村、中小城市，以及广袤的内陆。^[1]

简单来说，这场选战把美国分割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排斥全球化的美国，一个是拥抱全球化的美国。而且从历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票地域分布趋势来看，政治版图分布两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治版图的僵化更意味着两党政治人物都会倾向放弃中间路线，而急于讨好自己的忠实支持者，让所有政策冲突的妥协空间越来越小。

比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与英国脱欧公投的选票地域分布，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英国议会议员选区为单元，全国共有650个选区。选择留欧的选民集中在大伦敦地区、爱丁堡、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牛津、剑桥与诺丁汉等这些大学城，以及整个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地区；而选择脱欧的则遍布整个英格兰地区的乡村、中小城镇及老工业区。^[2]

同样地，倡导脱欧运动的意见领袖成功地运用了“乡村包围城市”策略。支持脱欧民众聚集的地区正是被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所遗忘的、疏离的及边缘化的地区。这些选区的普遍特征是年轻人出走，人口老龄化，失业率

高，自杀率高，更多家庭依赖政府的社会救助。

[1] 有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与民主党选票分布地图，可以参考<https://brilliantmaps.com/2016-county-election-map/>。

[2] 请参见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6/24/this-map-shows-britains-striking-geographical-divide-over-brex/?utm_term=.ac1ba55034ad。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莱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7年他在政治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特别针对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要重振其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先从修补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社会支持开始，而处方就是重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又称“内嵌自由主义”）。[1]

“镶嵌式自由主义”是由曾经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鲁杰所创，他用此概念来说明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配套设计。这个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通过国内的社会体制安排，来有效控制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并节制其破坏性与掠夺倾向，让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得到合理保障，以维护社会永续发展，并为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奠定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也就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2]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有将近40年时间，西方政治精英都牢牢记取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强烈感受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必须设法维持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和谐，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高累进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与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结果。政府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制定严格的劳动标准与受雇者权利，并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国家设置了各种市场监管机制，保护消费大众，节制托拉斯与不公平交易，并对公共事业普遍采取国有国营政策。

各国也记取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教训，对金融危机采取严密的预防风险措施，进行金融企业监管，实施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在证券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高筑防火墙。对于因市场开放与国际竞争受损的产业，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来对失业劳动力提供扶持与转业辅导。有将近4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运行在西方国家受到了层层节制，经济自由主义被镶嵌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层层框架里，所以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也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增长的多边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俗称美元本位制）扬弃了缺乏弹性的黄金本位货币秩序，而实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

率为锚定。各国货币则对美元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同时实施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严格控制汇率的波动，更不允许外汇的投机性交易。

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国带头逐步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实施有序的贸易自由化。当时，GATT框架下国际贸易规范也允许各国保留足够的防卫措施与调节工具，来缓冲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对本国的冲击。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有共识，必须将敏感的产业（例如农业）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目标之外。战后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也仅仅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内推行自由化目标。劳动的跨国移动是被严格管制的，各国允许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本国从事实体经济活动，但严格管制资本账下的兑换，限制外国投资机构或自然人参与本国资本市场，而且所有国家都在实施某种程度的外汇管制，根本不允许热钱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限制并大幅削弱资本家操纵资本的自由移动，增强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从而奠定了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体制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过去30多年，从撒切尔与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成为主流经济思潮。各国政府都在解除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全盘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把许多战后实行的保护与平衡措施进行逐一拆解。国有资本全面退场，并逐一取消各种税制的累进原则，也取消了对资本跨境移动的限制，让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追逐最大回报的最大自由。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普遍失去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政府的财政基础普遍恶化，社会福利体制不断被削弱，社会弱势群体被迫裸露在市场力量无情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金融波动，最终导致跨国资本的支配力量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凌驾于实体经济之真实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超级巨型跨国企业可绕过国家而直接制定新的经济游戏规则，“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逐渐花果凋零，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还勉强维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莱克提倡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诚可谓知易行难，因为资本家早已没有祖国，并将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动、支配政策的权力、低税环境与避税机会，以及各种投资优惠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除非经历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与更劲爆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重新启动“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

[1]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 First,"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Published online: 12 January 2018, pp.6-21.

[2]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79-415.

国会山庄迎来不畏虎的初生牛犊

莱克所期待的政治奇迹，在2018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露出一线曙光。这次国会选举对特朗普而言算是不小的挫折，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多数，意志坚定的加利福尼亚州女强人佩洛西再次出任众议院议长，她立即在美墨边境筑墙预算议题上给特朗普总统下马威，面对特朗普关闭联邦政府的苦肉计丝毫不退让。

这次选举也有为数可观的少数族裔第一次当选联邦众议员，其中最亮眼的国会新秀是来自纽约市第14选区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的当选具有世代交替与新时代开端的双重意义，她不仅仅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国会议员，也是第一位代表纽约市皇后区（Queens）及布朗克斯区（Bronx）的拉丁裔国会议员。她在民主党初选初试啼声并一鸣惊人，原因是她在2018年6月的民主党党内初选时，打败了在该选区连任十届的党内大佬乔·克劳利（Joe Crowley）。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克劳利有显赫的政治资历、庞大的竞选团队，并从纽约市金融业与地产业者那里募集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竞选经费；而科特兹参选时只有28岁，身无分文，一年前还在酒吧打工养活自己，唯一的从政资历就是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阶段的角逐者——桑德斯参议员的竞选志愿者。她拒绝了所有企业的政治捐献，与金主围绕的克劳利形成鲜明对比。

从抵达华盛顿的那一天开始，她就是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她的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超过两百万的粉丝。她在国会发起了一个净化政治联盟——“全新国会”，加入的成员必须宣誓从此拒绝接受任何企业或金主的献金。她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徒，推崇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她高举罗斯福的新政理念，推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政纲，要求国会尽快立法让美国在2035年以前将所有电力能源供给都转换为清洁能源；她还带领充满激情的支持者冲进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要求众议院马上把清洁能源法案列入议程。

在一个充斥着律师出身、男性与白人的国会殿堂里，科特兹是令民主党资深同事头疼的异类。她坚持拒绝政治献金的立场更让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心头不快，因为他们的政治本能告诉他们，金钱是选举政治最重要的支撑，他们很难想象没有金主簇拥的日子。

科特兹大胆主张恢复新政时期的高级距累进所得税制，至少要把最高所得级距的边际税率提高到70%—80%。这个主张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主流政治精英看来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因为这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早已

为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绑架，而这位不畏虎的初生牛犊，居然斗胆试图以一己之力把长期停顿在最右端点的政治钟摆拉回左边。

她提出的看似激进的税制改革主张，立即招致同党资深议员的嘲弄，批评她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像《华尔街日报》这些右翼媒体更是鸣鼓而攻之。她的主张不经意间激起了一场美国舆论界难得一见的政策辩论，甚至让上千位出席2019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全球企业界大佬也感受到余波荡漾之威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特别在《纽约时报》专栏评论中声援她，^[1]克鲁格曼借机推销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的研究成果，这位享誉全球的公共财政专家曾经与研究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权威学者塞斯，共同发表过最佳边际税率的理论模型估算。他们的结论是：在边际效益递减与竞争性市场的条件下，对最高所得者的最佳边际税率应该是73%。^[2]显然这个结论惹怒了保守派，所以共和党国会议员全力阻止戴蒙德担任美联储委员会的理事。

^[1] Paul Krugman, "The Economics of Soaking the Rich—What does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Know about Tax Policy? A lo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19.

^[2] Peter Diamond and Emmanuel Saez, "The Case for a Progressive Tax: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5, No. 4, (Fall 2011), pp. 165-90.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这场政策辩论也唤起了众多美国人的记忆，许多被尘埃淹没的历史资料得以重见天日。为呼应她的主张，好几位经济史学者特别制作了几个类似下面我引用的历史统计图（见图1-1）。这张图显示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三种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的历史演变，并标出哪一位总统任内推动立法改变税制。^[1]

从图1-1我们可以得知，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相比，科特兹的税制改革主张一点也不激进。在新政时期，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63%逐次提高到95%（不过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最顶端收入者才会适用这个税率）。二战结束后的头15年其基本维持在90%，在约翰逊总统任内降到70%，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还曾一度微幅上调，一直维持到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后的35年里，美国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都是在70%以上，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基本在5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革命浪潮兴起前，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类似的累进税制，这也是莱克演讲中所提到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镶嵌式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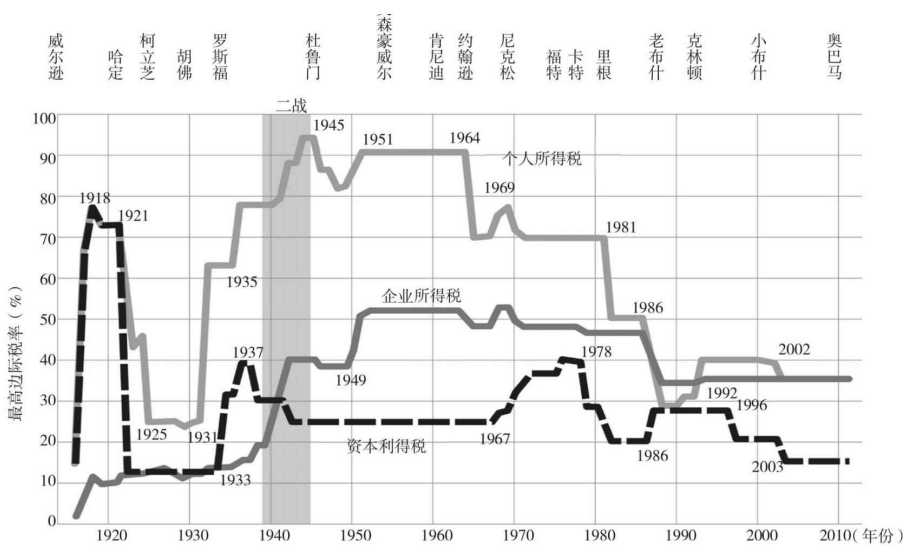


图1-1 美国三种税制的最高边际税率历史演变，1916—2011年

资料来源：Visualizing Economics。

克鲁格曼也特别指出，二战结束后的头30年，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这段时间，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5%，失业率普遍低于4%。这个历史记录直接驳斥了高边际税率会让民营企业窒息，会扼杀资本家发明新产品，会阻碍改良生产效率的动力，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会压制劳动力参与意愿等这些时下流行的供给侧学派观点。

事实上，只要主要的经济体采取类似的累进税制，高边际税率并不会影响投资意愿，反而可以让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进行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利于提升整体的经济福祉，也有能力帮助低收入者与落后地区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也有助于将社会总体需求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也是戴蒙德与塞斯的理论模型估算73%为最佳的最高边际税率的原因。

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一路调降，从70%降到50%，克林顿时期又降到40%。企业所得税也是一路调降，从50%降到35%，特朗普上台后，又大幅降到21%。经过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收都已经远低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基础。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社会晋升体系的公平，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教育与基础科研投资，没有能力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协助经济弱势群体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资本可以快速自由移动，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更可以把利润、所得或利得，通过会计手法在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或把大量现金与财富隐藏在“避税天堂”，所有国家都被迫竞相减税。只要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很低的边际税率，就会让那些想要维持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为它们很难阻止资本外逃，因此北欧国家也不得不将最高边际税率调降到50%左右。^[1]残酷无情的事实是，只要跨国企业与全球富豪阶层可以继续支配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维持过去30多年所实施的对资本高度友善的财税政策，他们就可以迫使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会让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遇到不少险阻。科特兹想要推行税制改革，就等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太岁头上动土。

[1] “Historical US Tax Rates Poster,” August 20, 2012, 2:30 pm by Barry Ritholtz. <https://ritholtz.com/2012/08/historical-tax-rates-poster-on-sale-for-10/>.

[2] 可参考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税率资料：<https://>

stats.oecd.org/index.aspx ? DataSetCode = TABLE_I7。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镶嵌式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年代，也是历史记忆所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年代，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因出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一夕成名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皮凯蒂所领导的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联邦政府的税务档案以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构建了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富分配数据库，有些数据可以回溯一百多年。下面我们引用的统计图（见图1-2）描绘了所得最高10%家庭与其余90%家庭，在总所得（含税前的薪资所得与资本收益）的分配变化趋势，统计数值序列几乎横跨一百年，从一战结束后一直到2010年。黑线代表10%的最高所得家庭的分配比例，灰线代表其余90%所占的比例。这幅图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桑德斯几乎可以阻断希拉里通往总统之路，特朗普可以半路杀出截断希拉里的总统美梦。

图1-2呈现三个重要历史性事实：第一，在经济大萧条前夕，出现了急剧的所得分配两极化，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基础，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而富豪阶层累积大量财富就会推升资产价格，最后因股市泡沫破裂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改为采用激进的所得再分配政策，二战期间又实施全面经济管制，还有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得以重新洗牌；二战后，各国都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10%的最高所得者分配到接近1/3的总所得，而其余90%的人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且这种分配比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稳定的所得分配比例代表着劳工与中产阶级可以等比例地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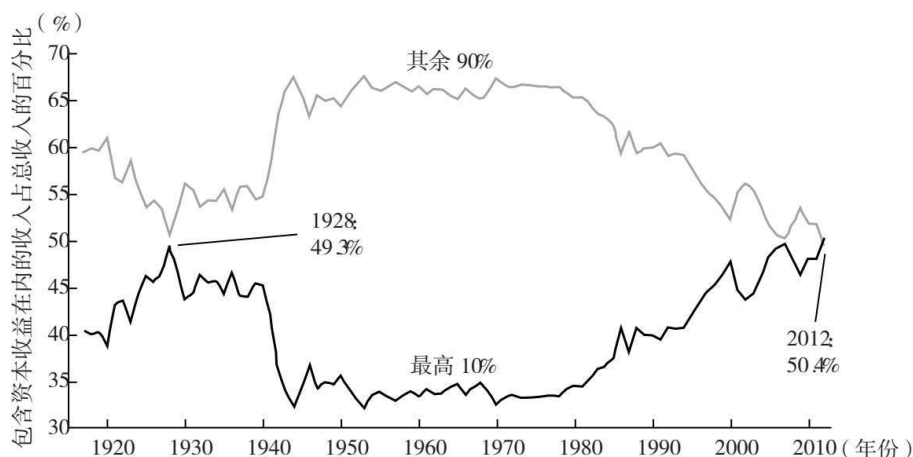


图1-2 美国最高10%与其余90%家庭的分配变化，1917—2012年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David Gilson “Charts: Income Growth Has Stalled for Most Americans,” Mother Jones com, September 28, 2013。

第三，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各种保障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体制逐步被削弱，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开始重演。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有的分配收入不断上升，而其余的90%则不断下降。到201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所得分配悬殊的程度甚至超过“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这段西方国家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这10年在欧洲被称为“疯狂年月”。这是金融财富快速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经济规模明显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并迈向顶峰的年代；这是放任经济思想再度盛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走向极端的时代；这是好莱坞攻占世界流行文化制高点的开端，是现代主义建筑与“装饰派艺术”（Art Deco）鼎盛的时代，也是克莱斯勒大厦与帝国大厦等摩天大楼纷纷耸立曼哈顿天际线的年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这个时代也因华尔街股市一夕崩盘而刹那画上句号。

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进行比对就会发现，两者真是有高度雷同之处。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急速萎缩，美国国会通过空前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是迅速点燃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战，世界贸易规模急速萎缩，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蔓

延。在经济全面崩溃与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权趁势而起。

如今，世界经济尚未完全摆脱2008—200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霾，右翼排外民粹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拆解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把WTO贸易规则踩在脚下，不惜挑起贸易大战，让人不由得担心20世纪30年代世界动荡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在二战后头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制，是因为有特殊历史条件。首先，在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并吸取惨痛教训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新古典主义学派深信自由市场配置效率，坚信市场可自动达成充分就业的总体均衡，这些核心假设饱受质疑。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从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开始，接着瑞典与德国政府也采取凯恩斯的政策建议，英国也出现如何有效对抗经济大萧条的政策大辩论。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实践过程中，凯恩斯经济学的确让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大规模金融危机反复出现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而凯恩斯经济学也正是战后西方国家采用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的指导思想。

其次，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环境与国际政治环境，都迫使资本家选择与劳工及中产阶级进行政治妥协。经过经济大萧条与世界大战的洗礼，各国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基础都受到严重削弱，大量的金融资产与固定资产都因漫长的经济衰退与毁灭性的战争而遭到损毁；传统上资本家所拥有的投资、雇佣与定价自主权力（经济决策的自由），都曾经被经济管制、物价控制、资源征用与实物配给等战争动员体制替代。在战后复原与重建的过程中，资本家仍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管制权力的逐步退场，而且在有些政策领域，政府还必须扩大经济职能或扩大公共部门投资，包括对战争伤员（及其家属）的抚恤与照顾，为数量庞大的复员军人返校进修或返回就业岗位进行安排与辅导，并调动资源来尽快重建被战争损毁的工厂、建筑物与基础设施，所以“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一开始就继承了这些既存的历史条件。

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还面临以苏联为主的共产主义扩张模式的生存威胁，资本家别无选择，必须与劳动阶级达成政治妥协，承认劳动阶级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与集体谈判权利。“镶嵌式自由主义”的政治功能就是使西方社会各阶级在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达成阶级共存共荣的妥协，以预防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兴起，并有效对抗共产主义的蔓

延。在“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别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所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抑大幅削弱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力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普及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西方社会对维持经济体系的对外开放，形成牢固的跨阶级、跨地域与超越左右政治竞争的社会共识，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虽然怀特与凯恩斯在如何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上持不同意见，凯恩斯提出的建立名为班克的超主权新国际货币方案，^[1]最终不敌怀特所提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议案，但他们两位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是有高度共识的。

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第一，必须扬弃加诸各国桎梏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因为这套机械式的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曰“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2]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必须构建全新多边合作体制，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难关；同时，必须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让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并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也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西方国

家为因应亚非民族解放与殖民地独立的大趋势，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前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和经济交换关系，并维持意识形态指导的优势地位，让西方国家仍能享受最有利的国际分工与交换模式，继续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西方企业扩张的腹地，以及廉价大宗商品和能源之可靠来源。在这样的缜密构思下，美国引领与会的同盟国集团内40多个国家的代表，[3]签署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的协议。[4]

凯恩斯与怀特所擘画的战后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在国际层面的体现。这套体制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阶级大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与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因东西方冷战的爆发，这套体制与战后国际安全秩序重建并不完全对接，其出发点主要是照顾西方集团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的利益，而苏联则自己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体制，但美国带头创设的这套体制的确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发挥了主导作用。

同时，同盟国领袖也深刻记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但完全摒除要求战败国接受屈辱性投降条件的念头，美国还积极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协助西欧的战后重建，德国与法国则抛弃历史仇恨，化干戈为玉帛，以建立“煤钢共同体”为起点，逐步推进西欧的经济整合。战后五强建立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虽然因冷战而无法充分发挥功能，但在法理层面确立了排除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合法手段的原则，再加上日后核武器的巨大吓阻效果，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再度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些历史发展也为“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1] 凯恩斯的方案是成立一个由所有主要国家参与的国际清算联盟（ICU）。各成员国将保持自己的货币和央行，同时接受以共同记账单位来为所有支付项计价。凯恩斯将这一记账单位称为“班克”（Bancor），并通过ICU来清算所有国际支付。Benn Steil,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 Harry Dexter White,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埃森格林教授认为，金本位制是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深渊的罪魁祸首，参见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强力主张战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必须考量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以及它们在国际贸易上所处的弱势地位。中

国代表团在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提供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发展融资为主要任务，以及在GATT中承认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优惠关税待遇等议题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参见Amy King,“China’s Economic Nationalists: From Bretton Woods to Ban dung,”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Series,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Oxford,26 January 2016。

[4] 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结论，原本预定成立权限更完整的“世界贸易组织”，后来因美国国会的抵制，而降格为GATT。

“黄金年代”褪色与“镶嵌式自由主义”式微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许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年代”^[1]。这是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表现在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期，那时各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强劲而持续，失业率也达到历史新低，同时所得分配也趋向平均，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达到历史新低，^[2]如此辉煌的纪录从此不再现。在法国，这段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强劲经济增长，被称为“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从1945年到1975年，法国平均增长率为5%，失业率低于2%。类似的亮丽经济表现也出现在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这个时期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基德爾斯基，特别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表现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的30年（1980—2009年），也就是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时期”，进行比较。^[3]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指标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华盛顿共识时期”。在“黄金年代”，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4.8%，而“华盛顿共识时期”只有3.2%，而且苏联计划经济的表现也相当突出。

但好景不长，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多数西方国家两度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境。第一次发生在1974—1975年，第二次发生在1979—1981年，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与物价快速上涨同时出现。停滞性通货膨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也给传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重返历史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掩护下，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开始集结，并对“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与制度设计发起严厉的抨击，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与管制，公共部门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对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泛滥，以财政刺激为名而导致财政纪律松弛，国营事业的垄断与低效率，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资本控制，赋予工会过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都是西方国家经济顽疾的罪魁祸首。^[4]

^[1] Stephen A.Marglin and Juliet B.Schor,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 Martin Wolf,Fixing Global Fin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 p.31.Robert Skidelsky,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Allen Lane,2009.

^[3] Martin Wolf,Fixing Global Fin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

p.31.Robert Skidelsky,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Allen Lane,2009.

[4] 直到今日，对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两次经济衰退成因的诊断，以及什么才是最适当的政策处方之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再度陷入停滞，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之间的争论再次涌现，也包括“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对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重新诠释。参见 Harcourt,Geoff,The Structure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The Core Contributions of the Pione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 [http : ||socialdemocracy21stcentury.blogspot.com/2011/06/stagflation-in-1970s-post-keynesian.html](http://socialdemocracy21stcentury.blogspot.com/2011/06/stagflation-in-1970s-post-keynesian.html)。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陆续上台，开始在西方国家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高举市场万能而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革命，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彻底执行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资本家在投资、借贷、避险、雇佣、定价等决策上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政府的干预或扭曲，甚至包括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的干预或管制也要降到最低，并把所有需求侧的政府干预与调节都视为百害而无一利。这场革命将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节制资本家决策与移动自由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赋予资本家的各种强制性社会义务，包括高边际税率的累进税制、劳动法规、工会权利、反托拉斯、市场监管、公平交易与消费者保护、雇主分担主要社会保险费用、公共事业国有化、严格金融监管、资本账户管制等，不是大幅削弱就是彻底拆除。

新自由主义革命思潮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使像德国、法国与北欧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也被迫改弦易辙，欧洲各国大型企业也抛弃自己的传统，而逐步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靠拢。新自由主义革命更经由美国政府通过贸易谈判与外交施压等进行强制性推销，并借助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经济政策处方提升话语权，在“华盛顿共识”旗帜下，把彻底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灌输给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在美国的施力下，日本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修正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华盛顿共识”一词是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森所创，最早出现于1990年。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共同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 and 改革。会上，约翰·威廉森总结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10项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等10个方面。他认为，上述共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1]

当时，世界银行正在准备一篇有关“东亚奇迹”的政策回顾报告，在这个报告的起草中，承受了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角力的巨大政治张力：日本政府希望呈现“东亚奇迹”中国对市场指导的正面角色，而美国坚持要突出市

场机制是起关键作用的，以符合当时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最后形成的文稿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写作小组只好淡化国家机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

新自由主义革命带来的所有变革中最关键的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强迫各国开放金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种变革如同纵虎归山，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人为障碍，彻底改变了资本家、劳工与国家三者间的权力均衡，也等于把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最核心的设计拆解了。^[3]从此之后，社会弱势群体在强大市场力量之下得不到公平保障，跨国资本获取左右国家政策与立法，通过修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达到支配各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1] 在1992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芭芭拉·斯托林斯（Barbara Stallings）教授主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我曾与约翰·威廉森有过一段激烈争论。我以东亚发展模式为例，批驳“华盛顿共识”政策与东亚成功的后起工业化的经验不符，其实东亚模式下国家刻意扭曲短期价格信号来引导产业升级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积极的启示意义。参见Yun-han Chu, “The East Asian NICs: A State-led Path to the Developed World,” in Barbara Stallings ed.,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这篇报告就是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1993)。美国政府在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介入，可以参考Robert Wade, “Japa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rt of Paradigm Maintenance: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1996)。

[3] Jonathan Kirshner, “Keynes,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No. 3 (Autumn, 1999), pp. 313-337; Jeffrey A. Hart and Aseem Prakash, “The Decline of Embedded Liberalism and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Keynesian Welfare State,” pp. 65-78, published on line: 19 Oct 2007.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我们回过头看，西方国家在战后以温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达成的所谓阶级大妥协，只是资本家的权宜性退让，他们始终在积蓄政治实力。拉拢媒体、政客与知识精英来引导公共舆论，并等待历史机遇来恢复他们的结构性权力，可以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逐步挣脱“镶嵌式自由主义”加诸他们身上的枷锁。他们可以耐心等待，等待人们逐渐忘却二战前惨痛的历史教训，等待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威胁消退，等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资本流动管制出现裂缝。

资本追求安全、回报与可变现性，其中可变现性十分关键。可变现性让资本可以非常便捷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以及非常机动地追求更高的回报。而金融资本的可变现性最高，所以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积累最终都会朝着金融资本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时。^[1]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笔下，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波全球化中，跨国金融巨头跃升为最强势的跨国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各国中央银行而拥有货币发行特权。当时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等）的中央银行都不是政府主控或拥有的，而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的私营再拆借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与德意志帝国银行（前身是普鲁士中央银行）皆是如此。^[2]

这批跨国金融巨头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大西洋，对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让各国政府身不由己地服膺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桎梏之下，他们也曾经成功打造了第一波金融全球化，可以让伦敦、纽约与苏黎世的银行利率同步调整，让大清帝国担保的中国铁路债券可以在各金融中心同步发行。^[3]

他们控制的庞大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的独揽大权，以及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权势，因两次世界大战与漫长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他们的社会公信力更因股市崩盘、金融体系溃散，以及金本位货币体系的解体而跌落谷底。^[4]他们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几乎没有声音，但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连续30年的经济繁荣，他们所控制的金融资产与政治实力也逐渐恢复。

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凯恩斯与怀特所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内找到第一个突破口：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并逐步累积至相当可

观的规模，这些累积在境外银行的美元需要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大力游说美国与英国政府，允许设在伦敦的跨国金融机构开辟“欧洲美元”的拆借、放款与主权联贷业务，排除适用更严格的境内金融监管与跨境资本流动管制，不再受美联储委员会的管辖。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网开一面，是因为不希望这些境外美元回流美国造成物价上涨压力或逼迫美国政府履行兑换黄金承诺，而英国政府则乐于借此恢复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们成功的政治游说，给战后金融全球化复兴开了一扇小门。

因美元币值信用危机的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1973年间迅速瓦解，这又给跨国金融利益集团一个良机。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支应约翰逊总统开启的“大社会”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以及日益庞大的越战等海外军费开支，必须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与增发美元，导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持有大量美元的欧洲国家与境外金融机构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履行以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一固定兑换比例的能力。

为彻底解除美元币值信用危机的压力，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突然宣布中止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美元黄金兑换承诺，导致战后固定汇率体系难以为继，各国被迫改为浮动汇率。为因应从事贸易厂商的汇率避险需求，各国政府不得不开放远期外汇的避险交易。接着，在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各种更复杂的避险与对冲工具纷纷出笼，外汇交易市场很快就膨胀成一个超级巨大的投机交易市场。再加上更多大宗期货交易的陆续开放，投机性交易很快就喧宾夺主，成为汇率与商品价格波动的主导力量，完全凌驾于企业实质避险需求之上，并不断吸引更多的投机性资金进入这个合法大赌场。

制定美国全球战略的决策者与跨国金融利益集团不久就发现，他们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美国历任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者把维护“美元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因为正如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法国财长时所指出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调动全世界储蓄，来为其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与私人债务买单，可以让美国不费力地维持天文数字般的国防支出与无与伦比的全球军事投射力量。要维护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需要打压任何其他可能成为美元竞争对手的货币，另一方面就必须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要储备美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国除了利用其军事威慑力量威胁利诱中东石油出口国采取石油美元计价，而创造所谓石油美元体制外，也积极构建“金融美元”体制，作为支撑美元霸权的第二根支柱。与此同时，美元霸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而更为凸显，因为各国央行除了必须储备大

量美元来支应经常账的进口结算需求外，还需要储备美元来因应日益膨胀的资本账结汇需求，为了吓阻国际金融大鳄炒作本国汇率更需要储备美元“子弹”。在金融美元体制下，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或富豪阶层想要分散其资产配置，都需要通过美元计价与美国控制的银行跨国清算与支付系统进行交易。

正如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所指出的：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美钞作为纸质印刷品，为什么能够通行世界数十年呢？简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5]

只要华尔街能开拓更多形态的跨国融资机制、投资渠道与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做大跨国金融交易规模，并吸引更多的全球财富追逐投机性交易的可观回报，金融美元的需求就越来越大。所以在过去20多年，美国政府非常积极配合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议程。而华尔街本来就直通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又可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思想与重要决策，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鼓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而且对接受其纾困方案的国家都提出开放资本市场与汇率市场化的要求。

[1]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Verso New and Updated Edition, 2010.

[2] 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关于主控英、美、法、德四大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跨国金融巨头，如何因他们僵硬的思维而让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参见 Liaquat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5] 史正富. 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EB/OL].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 2018, (2018-12-29). https://www.guancha.cn/ShiZhengFu/2019_01_20_487550.shtml?s=zwyzzwzbt.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有不少研究全球化的文献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称为超级全球化。^[1]所谓超级全球化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一个是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就把超级全球化界定为，以追求货物、服务、资金以及金融活动跨越国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出现于过去30年。^[2]跨境移动的交易成本不仅来自关税或贸易配额，也包含各国的市场监管规则、产品与技术规格、产品安全标准、知识产权规则、金融监管体制等。而超级全球化就是在最大可能范围内让跨国企业可以规避各国的规则与监管。从这个角度看，超级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正是开辟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

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范畴，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家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可能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移动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给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及去管制化的改革，同时压缩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各种国际评比指标的发布来加大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金融监管松绑，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框架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把更多的产品纳入免税或关税大幅减让范围，并基本上将所有信息技术类零部件与终端产品（计算机、手机、半导体等）都纳入《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全面享受免关税待遇。美国与西欧国家也试图深化WTO规则的管辖范围，把WTO的多边谈判推进到非关税贸易壁垒，涉及产品规格、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甚至劳动、卫生与环保法规等领域，也积极推进排除服务业的进入障碍。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基本上都以强化西方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保障其垄断地位，或有利其全球布局为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也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在德国与法国的主导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3年生效，欧盟实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高度一体化目标，并通过吸纳中东欧

新成员而扩大为一个覆盖5亿人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几乎同时，在克林顿政府主导下，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生效。这两个划时代的经济一体化协议激发其他国家与区域积极仿效。

[1] Martin Kessler and Arvind Subramanian.“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WP 13-6 , published on-line,July 2013.<https://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hyperglobalization-trade-and-its-future>.

[2] Dani Rodrik,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W.Norton&Co. , 2011) , pp.200-201.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存

我们也可以从全球化所实际达成的经济高度整合之结果来理解超级全球化。无论是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还是与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新启动的全球化相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供应链网络、贸易网络、运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出现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例如，精密度要求极高的苹果手机的制造过程，涉及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上千个零部件与关键芯片。这些分散在各国的供应商与负责终端装配的厂商（如富士康），可以在取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数字档案与订单后的几个月内，制造出在规格与性能上精密无误的零部件，并在跨境供货时间上与生产线运作衔接得天衣无缝，让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大厂，能准时将几千万部新手机运交全球数千个电信商营业网点或网络手机批发商。

不仅手机的跨国供应链如此运作，计算机、汽车、飞机、船舶、机床、重型机械、核能反应炉、人造卫星、高级运动鞋等都是如此。没有国家可以在这些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维持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至于没有运输成本与没有空间地域限制的软件设计、半导体设计与各种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更是可以随时灵活地重新组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前者有时甚至是后者的两倍以上，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是为了出口，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活动的贸易密度（trade intensive）不断增加。例如，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26%，加上服务出口贸易则达到33%，这个统计数字可能还低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服务出口贸易的急速发展。

其次，在这个超级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辐射作用在空间覆盖上，以及对社会生活穿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力量的作用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也把地球上大多数的个人、群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卷入这个经济整合过程，创造出无穷尽的交流、分工、协作、对话、碰撞与相互影响之机会与挑战。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大陆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被纳入这个全球范围的分工与交换体系，过去市场与信息穿透力量鞭长莫及的非洲大陆、中亚与南亚之穷乡僻壤也被唤起。所有因政变、战争、传染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或气候变迁引发的经济震荡，都会经过复杂而无远弗届的传导机制，而让千里

之外的群体受到难以预见的波及。

最后，过去30多年，全球化过程最突出的结构性变化，就是金融全球化的爆炸性成长与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活动之上。虽然一战前夕在金本位体系下，金融全球化也曾经达到当时交易工具与通信能力所能及的极限，但在过去30多年里，国际金融资本所驱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各种天文数字规模的高杠杆套利交易，以及那些不日落的虚拟交易，导致的价格波动与大规模热钱跨境流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山区种植咖啡的农夫，受雇于印度尼西亚甘蔗园的工人，国泰航空的空服员，还是在阿联酋打工的孟加拉国移民工，他们的生计都会受到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剧烈震荡的影响，无所遁逃。

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意放任，在过去20多年里，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以自我服务为主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对实体经济的干扰越来越大，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合成、编制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为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就衍生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在诱人的部门利润与经理人高薪奖励的驱动下，美国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将各种投机性虚拟交易（美其名为避险）的规模推升到科幻小说般的天文级数。

因为缺乏监管机制及各国法令统一的认定，很多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是场外交易，所以这些合约的真实规模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在2014年年中所做的初步统计，到2013年底全球柜台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高达710万亿美元，是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0倍，比2012年底增长了12%。这意味着，虽然金融虚拟交易曾经因2008—2009年金融危机而一度萎缩，但很快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估算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场外交易合约，把这些隐藏的交易合约也都纳入，曾有专家粗估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可能是全球GDP的20倍。^[1]这些虚拟交易合约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像连环套一样，任何一家大银行一旦倒闭，其交易对手将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难怪巴菲特曾经多次公开警告，这个超级庞大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巨灾。这个畸形发展的赌场资本主义绑架了所有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绑架了整个国家。

[1] Bruce Wilds, "Derivatives Could Explode Like A Bomb!" Seeking Alpha, Feb. 15, 2017 2:05 PM ET,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046338-derivatives-explode-like-bomb>.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器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超级全球化能高速推进，得力于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们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惊人的进步与突破。集装箱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及机动调整超远距离与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将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进行整合。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同步进行天文级数规模的金融商品和合约交易的下单、撮合、对冲、交割、结算与保管登录。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崛起反过来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与能量。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与交换体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到20年），吸纳像中国这样巨大规模新成员的先例。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也在最短时间内，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产业体系；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国。

在19世纪中叶开启的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欧洲曾经面临美国崛起的挑战与冲击。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新启动的全球化，也曾经让美国与西欧面临日本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的挑战与冲击，并一度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纺织、钢铁、汽车、造船与家电等产业出现结构转型困难。历史上，美国的崛起是惊人的，但其崛起的过程有半个世纪之长；战后日本的崛起也很可观，但规模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在一个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与信息）高度整合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单单看劳动人口比重，就知道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贡献十分突出。201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9%，但中国劳动力规模占全球劳动力的比重则高达24%。中国劳动力规模超过美国、西欧与日本的总和，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名列前茅，远高于人口规模也十分巨大的

印度。主要原因是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直追西方发达国家，女性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5%，而印度只有25%。^[1]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突飞猛进更是让世人震惊。如下面这张世界银行制作的统计图所示（见图2-1），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在2003年首次超越德国，在2007年一举赶上日本，到了2010年又超越了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然后一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这种追赶速度崛起，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覆盖面之广也达到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跨度。目前，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的所有工业产品。这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升级产业所必需的基础和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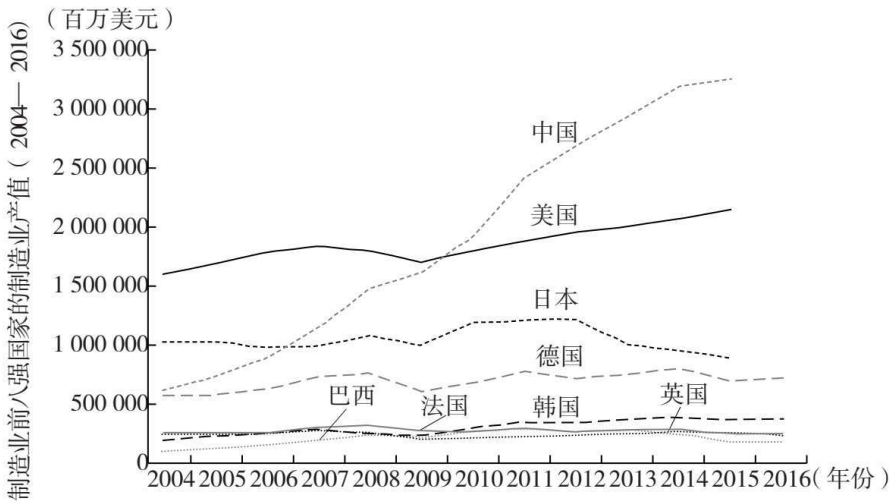


图2-1 中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harting International Labor Comparisons,”Chart 2.1 , September,2012.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而且过去30多年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所搭建的国内政策框架与国际经济秩序，必然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极度不均。

超级全球化的发展背景，让跨国企业领导层与超级富豪阶层名正言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他们成为在全球范围行使权力的主体。他们可以凌驾政府、支配社会游戏规则，并一步步地削弱保护弱势群体、劳工与中产阶级权益的经济监管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他们进行大规模改革，废除曾经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并借全球化去影响各国的法律，可以通过金权政治的运作来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美国政府主导的国际规则，也可以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和政策。

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因为超级全球化使极少数的巨型跨国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实体，将2017年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根据“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组织所做的统计，全球前一百大经济体只有31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跨国企业是沃尔玛，只有9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成为政治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1]

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也导致“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贸易和发展报告2017》就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2]典型的寻租就是地主坐收地租，不劳而获。现代经济中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借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借此压榨供应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攫取了越来越高的超额利润。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一百大的总市值是最后的2000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在过去20年中，前一百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UNCTAD的报告也指出，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获得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可通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或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税，以及设法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并通过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费者保护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自己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

难怪这几年美国国会最活跃的游说团体就是微软、苹果、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兽。2017年，亚马逊宣布要在美国选址设置第二总部，立刻就有238个城市积极提案争取。这些城市不断加码，从提供免费土地到价值70亿美元的租税减免，这些地方首长别无选择，只能双手捧上朝贡礼单。

[1] <https://www.globaljustice.org.uk/news/2018/oct/17/69-richest-100-entities-planet-are-corporations-not-governments-figures-show>.

[2] UNCTAD,“Corporate Rent-Seeking,Market Power and Inequality: Time for a Multilateral Trust Buster?”Policy Brief,No.66 , May 2018.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presspb2018d3_en.pdf.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驱使巨额的金融资本流向投机性的虚拟交易，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正因为这些投机交易导致的剧烈价格波动与不时制造的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各国的弱势经济群体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跨国资本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银行热衷于利用欧洲美元拆借市场缺乏松弛的空隙，给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超额联贷来赚取高额的中介费用，而不顾这些借贷国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等到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金融衍生品，并压迫各国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与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其结果是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轮轮的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国家遭遇区域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都深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级严峻纾困条件的折磨。它们终于认识到，这些西方国家主控的多边机构，都是以保护跨国金融机构的债权为优先，而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机于不顾。亚洲金融危机还陆续蔓延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与土耳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构建的数据库，从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开始到2008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08次汇率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和124次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1]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美国，最终也难逃金融危机的浩劫。2008年由不动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与欧洲带来空前的经济重创，直到今日也未痊愈，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隐患至今也未真正拔除。^[2]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因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大规模违约而申请破产。美联储与联邦政府只好动用高达4万亿美元的应急方案，来拯救AIG（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美林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把美国经济从崩溃的悬崖边救回来。美联储与财政部联手要求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经济稳定紧急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收购不良金融资产，并帮助所有大型银行重新注入资本，以修复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在目睹美国政府政策在紧急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被华尔街彻底绑架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不禁感叹，今日美国民主已经沉沦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3]

[1]

<https://>

www.researchgate.net/.../23533944_Systemic_Banking_Crises_A_New-Database.

[2]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年，美国大型银行对金融衍生品合约的风险部位仍然高居不下。美国货币监理署当时报告称，美国银行衍生品敞口总计237万亿美元。其中，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和美国银行这四大银行的市值超过219万亿美元。

[3]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化与所得分配不均的不断恶化，而且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贫富悬殊问题就越严重。分配正义问题在仍可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不太严重，因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绝对赢家。尽管所得分配长期趋向不均，但即使是最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感受到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输家，大量中产阶级面临薪资长期停滞，甚至因失业而跌入贫困。大量被解雇的制造业劳动力，无法再次找到固定或高薪的工作岗位，必须屈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底层工作，甚至沦为派遣工，或在各种高度剥削的人力市场中沉浮。

我借用伦敦《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在分析评论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专栏文章中引述的图。这张统计图（见图2-2）清晰地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普遍出现的中产阶级所得停滞现象。从2005年到2014年间，在25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中，有将近2/3的家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出现实际收入下跌或停滞。在意大利这个比例高达95%以上，美国超过80%，英国将近70%，法国超过60%。但也有明显的例外，像是基本上仍能维持社会民主体制的瑞典，这个比例只有20%。但北欧都是小国寡民，对计算发达国家实际收入受损家庭的跨国加权平均比例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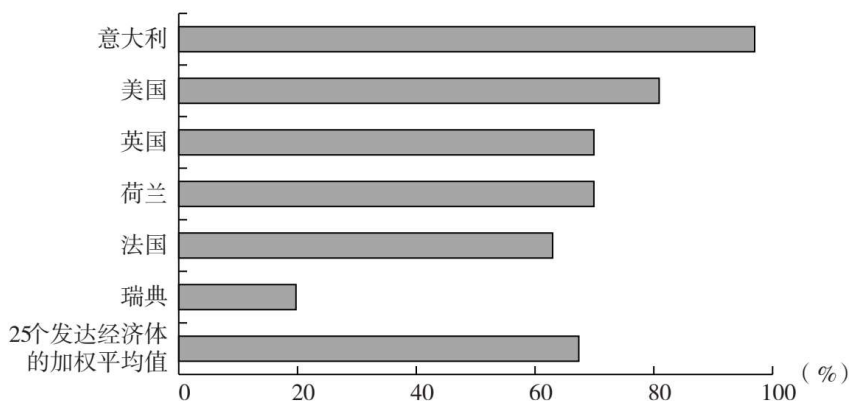


图2-2 发达国家遭遇实质所得下跌或停滞的家庭，2005—2014年

资料来源：Martin Wolf, “Seven Charts That Show How the Developed World is Losing its Edge,” *Financial Times*, July 27, 2017.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萎缩与大量高薪的制造业岗位消失，并不完全是产业外移或生产外包造成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变革、生产全球化与科技变革的相互作用。西方国家许多技术工人失业，是由于他们的岗位被自动生产线与机器人替代；许多白领阶层被解雇，是因为信息科技带动新的管理模式，许多企业组织都趋向扁平化，大量中间层的管理职位因而消失，甚至不少高级管理层的职务因频繁的企业兼并而消失。由于金融解除管制，市场监管松绑，劳动法令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之风盛行。擅长杠杆操作进行敌意收购的投资人在捕获猎物之后，通常都会进行组织瘦身与裁员，企图在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拉高盈余预估以冲高股价。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获得丰厚的薪酬奖励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股票选择权的价值倍增而裁减许多工作岗位，这是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很难避免的悲剧性结果。

超级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可以快速重组，供应长链中不同阶段的附加值活动可以迅速进行空间转移。在信息与通信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服务业也可以进行灵活的跨国供应链布局。美国医院病患计算机断层扫描档案可以由远在印度的医检技师撰写判读报告，英国的航空公司电话订位服务系统可以由远在孟加拉国的服务专员上线受理。这意味着生产要素价格会在全球范围出现趋同现象，这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受雇者必然不利，对可以自由跨境移动的资本与特殊专业技术拥有者必然极为有利。

高速全球化也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断恶化。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基础在不断流失，各国政府被迫不断调降个人所得、资本利得、企业所得及遗产税的边际税率，再加上企业及富豪阶层可以在全球范围灵活避税，各国政府被迫不断变卖国有资产，撙节支出与扩大举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是，政府几乎把可以处置的国有资产都变卖了，甚至把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卖的固定资产都通过财务安排而变现。例如，历届意大利政府把公立学校校舍、桥梁与公路打包出售，再签长期租赁或特许收费合约保证投资人的租金收入，真可谓饮鸩止渴。2018年，意大利热那亚的一座高速公路高架桥突然坍塌，导致43人死亡，就是因为这段高速公路在1999年私有化以后，控股财团不断压缩道路桥梁维修经费。^[1]这与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的公共危险灾难频发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所有欧洲民选政府都知道，财政撙节是很难推行的，一定会招致选民的反弹。虽然过去30多年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水平都缩水了，但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却仍继续增长。这是因为结构性失业不断

攀升，需要救济或转业辅导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更多，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日益老龄化，所以除了制造业竞争力强大的德国与有大量石油收益的挪威外，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捉襟见肘。

罗德里克认为，超级全球化架空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对西方的民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毕竟民主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体制，如果年复一年无论如何换届或轮替，民选产生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财政基础流失，财政结构恶化，社会福利缩水，产业空洞化，中产阶级跌入贫困，以及年轻一代低度就业这些问题，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念必然出现动摇，他们就很容易被民粹政治人物的激进主张煽动或蛊惑，甚至愿意考虑采取非民主手段来突破经济困境。这正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面临的危机。

其实，超级全球化只是导致民主体制合法性松动的充分条件，真正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主义革命拆除对社会弱势族群的保护。凡是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国家，政府必然逐渐丧失扭转资本主义下所得分配两极化的再分配功能，也逐渐失去维护弱势群体享有社会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市场参与者基本权益的能力，更失去约束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因此，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既无法维护公民的福祉，也无力满足公民的政策需求，其合法性基础自然受到严重侵蚀。

超级全球化的政治冲击已经动摇了过去西方政治学者的通行理论。他们相信，在最富裕的西方国家，民主是不可能倒退或崩解的，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周延”的制度安排、厚实的公民社会与坚实的民主信仰文化基础。但是两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讲师雅沙·蒙克及墨尔本大学罗伯特·斯蒂芬·福阿教授，陆续在《民主季刊》发表论文，列举各种民意调查资料，提出西方国家已经出现民主解体迹象的红色警报。他们特别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与不少欧洲国家，年轻人对民主体制的信心正在下降，支持专制政体的人数正在上升。他们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流失正是侵蚀民主合法性的主要因素。^[2]

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在初次投稿给《民主季刊》时，遭到匿名论文审查人的严重质疑，因为他们的论点挑战了过去所有研究有关民主问题主流学者的共识。《民主季刊》的主编破例主动征询所有编辑委员的意见，我也是大力支持刊登这篇文章的编辑委员之一。经过6个月的折腾，他们的第一篇文章才在2016年7月号上刊出。4个月之后，反体制的特朗普异军突起，当选美国总统，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这篇文章广为主流媒体所引述，也轻易打破《民主季刊》创刊以来新刊论文在发表后一年内被引用次数的历史纪录。

如果说经济困局与金融危机可能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解体，这不会是第一

次，因为许多西方民主体制也曾经无法承受上一轮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压力而崩解。当出版社在2012年再版金德尔伯格教授的经典名著《世界陷入大萧条》（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Bradford DeLong）与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这两位经济史专家，在为再版所写的前言中就曾提醒读者：“今日的欧洲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的类似之处非常醒目，让人越来越感到震惊与害怕，我们目睹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攀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金融震荡与经济压力无所不在，对极右或极左政党的政治支持正在兴起。”

在德隆与埃森格林提出他们的警告之后，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方兴未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不断攀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纷纷登上执政宝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经过三年的艰辛谈判，仍无法消除英国脱欧势力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巨大期望落差，只好引咎辞职，脱欧大将鲍里斯·约翰逊取而代之。约翰逊的硬脱欧主张，可能是继卡梅伦之后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政治豪赌。最坏的情况是硬脱欧将触发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寻求独立，而导致有近400年历史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式解体。

[1] “Italy’s Bridge Disaster: An Inquest into Privatiza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3,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874b7e4c-ac3f-11e8-94bd-cba20d67390c>.

[2] 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7, Number 3 (July 2016), pp. 5-17.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sites/default/files/Foa%26Mounk-27-3.pdf>; Roberto Stefan Foa, Yascha Mounk, “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8, Number 1 (January 2017), pp. 5-16.

美国民主的衰败

如果我们要深究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就必须正视新自由主义革命对美国民主社会基础的长期侵蚀。由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将近30年的繁荣表象，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祸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最为薄弱，而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也走得最远，再加上长期由共和党多数把持的最高法院，更不断为富豪阶层打开金权政治洪流的闸门，^[1]因此美国社会所累积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更为严重，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趋近停滞的问题也最为突出，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最终以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人物而得到暂时的宣泄，但这也为今后美国社会更严重的撕裂埋下伏笔。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以及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了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还可以驱动大律师事务所、大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与依靠企业主捐赠的东西两岸大小智库，帮它们出谋划策并引导舆论。

特朗普之所以能掳获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援，是因为这批选民迫切要知道未来足以维持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哪里，政府何时才能大幅更新残破不堪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与社会晋升机会，婴儿潮一代大批退休后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能否支撑，如何扭转过去30多年富者越富而中产阶级趋贫的两极化趋势。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主流政治人物纷纷失去这批选民的信任，因为这些熟面孔不是已经被利益集团彻底绑架，就是面对经济与社会难题束手无策，选民宁可寄希望于毫无从政经验的新手，如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相反地，他毫无章法的内政与外交举措，更让观察家担心，他可能是一个加速家道中落的败家子，不但不懂得珍惜前人累积的资产，反而轻率地将家底典当变卖。他对富人与企业的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剧恶化，2019年的联邦赤字首度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美国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极可能使这个长期以来让美国经济得到必要的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通道开始萎缩。他白宫团队中的鹰派大将更试图用各种威逼与迫害手段，来割裂曾经被超级全球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中美经济连体，并升级贸易战来迫使跨国企业把以美国市场为目的地的全球供应链撤离中国，来借此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但这些措施极可能损伤

美国经济自身的元气，让美国高科技产业更快失去在芯片与操作系统领域的独占优势，并让过去20多年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带给美国经济的低物价、低通胀、低利率的全球化红利烟消云散。

[1] 有关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如何为金权政治泛滥打开一道道洪水栅栏，可以参考曾经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这位内行人的精彩分析，Bernie Sanders, Our Revolution, Thomas Dunne Books, 2016。

第三章 国际政治的双陷阱危机

2018年5月，有1140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给特朗普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提醒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此时，特朗普刚刚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铁与铝制品加征25%的保护性关税，但暂时给予欧盟、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短期豁免，对中国的贸易战尚未揭开序幕。上千位经济学家在信中特别提醒特朗普不要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80多年前，美国率先筑起保护主义高墙，引发一场惨烈的贸易大战，将世界经济推入大萧条的深渊。但是特朗普对这封公开信视若无睹，仍然磨刀霍霍向贸易伙伴，以向支持他的选民证明他会履行竞选承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29年的同一历史场景。当时美国面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的严重经济衰退，金融机构破产，失业率暴增，保护主义声浪大涨，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把两万多种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关税大幅调升到65%。当时有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总统，呼吁他务必否决此法案，但胡佛置之不理，仍如期签署法案。结果引发美国所有主要贸易国的报复，在短短4年内美国的出口额急速萎缩61%，进口额萎缩66%，世界贸易规模也骤降近2/3，全世界陷入最严峻的经济大萧条。

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奥巴马任上谈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搁置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也立刻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同时，他公开批评世贸组织是一个灾难，誓言美国绝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WTO决议与仲裁结果。特朗普政府也刻意抵制WTO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不惜让仲裁机制瘫痪，他的代表对WTO任何新提案都采取负面立场。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两年一度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全球贸易领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这是WTO成立以来部长级会议第一次“交白卷”。这让长期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流外交精英非常担忧，他们担心战后70多年逐步搭建起来的多边贸易体制，可能在特朗普手中毁于一旦。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推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时，跨国企业便开始担忧它们精心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乱流。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特朗普上台后，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是一种激进的单边主义政策，他把手中所有的筹码与手段用到极致，从谈判对象或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最多而付出最少，追求美国短期的最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在他眼中，所有主流外交精英所标榜的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是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包袱，皆可抛弃；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等过去历届政府所高举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他的政府所继承的原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定均需重新检视与重启谈判。^[1]

这明显与奥巴马所标榜的多边主义背道而驰，也比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更为激进。小布什的单边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范畴：第一，对美国眼中的敌对政权，也就是他外交辞令所指控的所谓“流氓国家与邪恶政权”，采取铲除政权或片面军事侵略行动，而罔顾《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集体安全体制；第二，抵制各种对既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提议，拒绝考虑就新兴全球议题领域设置新的多边体制，也拒绝接受新增全球协议的约束与义务。例如，否认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而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的谈判，拒绝签署《禁止地雷条约》，等等。

但小布什政府在贸易领域仍坚定支持WTO框架，还要求国会授权启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他也高度重视与传统盟邦的集体安全体制，也仍旧遵守里根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中导条约》。小布什在卸任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希望新兴市场国家能配合推出财政刺激方案，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以及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充紧急借贷额度，首次在华盛顿召开G20首脑会议，把G20这个平台从财政部长层级，一举提升为全球最重要的全球议题大国协商机制，从而取代了G7（七国集团）的传统功能。整体而言，小布什政府推行的仅仅是选择性单边主义，而不是原则性单边主义。

但特朗普把单边主义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从贸易、投资、环境、反恐、移民、人权、货币到传统安全议题，包括反核扩散与限武。他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着又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订进程，之后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威胁要全面减少对联合国各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他的政府对世界银行的任务与功能持非常消极的态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在眉睫的增资计划非常冷淡。为了讨好美国犹太游说团体，他不顾联合国的历次决议以及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正式迁往耶路撒冷。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让西欧70年来第一次感到心寒。这位白宫主人可一夕间推翻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以及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他对传统盟邦不假辞色，一切都以美国利益至上为基本原则，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要从盟邦口袋里拿得更多却给得更少。他公开批评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占尽美国便宜，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北约预算。他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辜负德国与法国多年的心血，他还胁迫西欧跟进，不然将对与伊朗往来的欧洲企业进行制裁。他毫无预警地终止《中导条约》，让西欧未来可能暴露在俄罗斯中程导弹射程范围内。最让西欧感到不寒而栗的是，特朗普公然鼓吹要欧盟解体。他曾公然支持英国脱欧，他的谋士班农在比利时就成立组织，积极串联欧洲各国的极右势力，全力推动欧盟的裂解。

目睹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非常不安。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民主可以制造出这样一个怪胎，他能将美国战后70多年来经营的国际多边体制与同盟体系弃如敝屣，毫不在意地将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毁于旦夕。长期倡导自由国际秩序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就在《外交事务》评论文章里摇头叹息：“历史上强权所建立的秩序有兴有衰，但通常都是毁于谋杀（也就是敌人之手），而非自杀。”^[2]甚至像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这位在共和党阵营颇受敬重的新保守主义大将，也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因为他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但他对这些批评毫不在意，他还公开崇拜美国历史上展现残暴不仁本性的人物。^[3]他的外交团队在任何时候与任何谈判场合，一律把自己享有的不对称权力双边关系优势赤裸裸地运用到极致，试图威逼对手做出最大让步，不论亲疏，不讲情谊，也不瞻前顾后。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都不得不把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不择手段、随时变卦、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而这个标签，是小布什总统贴在朝鲜、古巴、伊朗与利比亚身上的。^[4]

2017年6月，我参加了台北论坛组织的访问团，走访美国东岸重要智库，沿途强烈感受到美国东岸外交精英对特朗普的敌视与担忧。一位曾担任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资深人士很沉痛地表示，他一辈子第一次在外来访客面前批评自己的总统。他们忧心忡忡，深知将很难弥补特朗普这四年对美国国际领导威望的损害。传统上，美国一向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傲，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设法积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因此过去许多民意调查数据都显示，在其盟邦与贸易伙伴的多数民众心目中，美国基本上被视为支持区域和平与繁荣的正面力量。

这批东岸外交精英的担忧果然一一成为事实。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国际声望一落千丈，甚至在传统上对美国有高度好感的国家也不例外。2019年2月1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应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这是欧洲一年

一度冠盖云集的全球性安全政策高端论坛。当他的演讲提到“我带来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会议的问候”时，他刻意停顿几秒等待掌声响起，没有料到会场陷入死寂般的静默，气氛极为尴尬。 [5]

各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国际氛围变化。美国“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支持的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近年来每年都在全球20多个重要国家进行有关美国国家形象的民意调查。根据2019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高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把美国视为日本的“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也骤然升高。他们发现自从特朗普上台，世界各国把美国的力量与影响力视为它们主要威胁的比例出现了快速攀升的趋势。在他们长期追踪的20多个国家中，把美国视为自己国家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为25%，2017年上升到38%，到2018年则高达45%。最令人关注的民意变化发生在德国，在2013年只有19%的民众视美国为主要威胁，到了2018年则高达49%。 [6]

[1] 在特朗普执政两年后，他的外交政策思路更为清晰，可以参见John Han nah,“Trump’s Foreign Policy is a Work in Progress,”Foreign Policy,published on-line,February 14,2019.

[2] John Ikenberry,“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 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7.

[3] Gideon Rachman,“Donald Trump is Updating America’s Historic Ruthlessness,”Financial Times,May 6,2019.<https://www.ft.com/content/c0f92d52-6db3-11e9-a9a5351eeaef6d84>.

[4] Robert Kagan,“Donald Trump’s America: The Rogue Superpower,”Financial Review,published on-line,June 2018.<https://www.afr.com/opinion/donald-trumps-america-the-rogue-superpower-20180615-h11f1y>.

[5]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ence-greetings-from-trump-silence-munich security-conference-2019-2](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ence-greetings-from-trump-silenc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19-2).

[6] [http :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14/more-people-around-the world-see-u-s-power-and-influence-as-a-major-threat-to-their-country/](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14/more-people-around-the-world-see-u-s-power-and-influence-as-a-major-threat-to-their-country/).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让全世界都战栗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升高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围堵，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也指控中国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2018年美国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在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他身边的鹰派在美国国会与新闻媒体上刻意炒作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科技剽窃”与“社会渗透”。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干员四处奔波，警告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要严防中国通过科技合作窃取美国高科技的秘密”，并蓄意在美国华人社群中制造麦卡锡主义时代的那种肃杀气氛。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推翻了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但其实不然，长期追踪美国外交政策圈内部政策辩论的观察家都早已察觉到，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后期，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精英已经在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向。奥巴马政府虽然有鉴于中美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私下里已经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希拉里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已成为民主党外交精英的共识。过去，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智囊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他们假设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6年4月，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及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纽约碰面交换意见，这两位学者都是我认识超过30年的学术界朋友。当时夏伟与我另外一位学术界好友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正在希拉里的默许下，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的名义下，召集了一个跨党派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全面回顾了中美关系并凝聚新阶段对华政策的共识。在言谈中，我已经强烈感受到，这个专家小组将向下一届美国政府建议对建设性交往政策进行调整的倾向。

这份报告原来准备在希拉里当选后立刻发布，但特朗普的当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后来他们调整了若干内容并修饰了文字，然后以比较超然的姿态

在2017年2月发布。这份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的报告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届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击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击。^[1]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着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国防战略报告》。不久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重新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评论，为这两份刚出炉的安全战略纲领做了注脚。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建设性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全球化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坎贝尔曾在希拉里麾下任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推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重返亚洲战略的灵魂人物。^[2]

所以合理的推断是，即便希拉里当选总统，她也会调整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并会认定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据此采取针对性措施。当然，希拉里的布局与做法必定与特朗普会有明显区别。特朗普粗暴对待传统盟邦，排斥多边主义，把全球主义者一一逐出白宫，而他身边的鹰派也摆出不惜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强硬姿态。

如果希拉里主政，她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政策时，应该会继续利用美国仍可以主控的多边主义体制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会设法继续主导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来为美国的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创造更有利的竞争平台，并同时减缓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会寻求与自己的传统盟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与经贸协同机制，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继续在人权、宗教、劳工、环境议题上挑战中国模式与压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希拉里的团队也可能同样会对“中国制造2025”采取反制措施，但不会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纠缠不休或试图用贸易战打乱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不可能轻易将中美关系推上全面对抗的轨道，如果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敌对，会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深不可测的风险。也就是说，希拉里针对中国的布局可能会更缜密，更有谋略，更有节奏，更注重包装，会更懂得运用美国传统上享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资源。

上述的推断，可以从夏伟与谢淑丽召集的跨党派中国问题专家小组的第二份报告得到一定程度印证。这个以亚洲协会名义运作的小组在特朗普当选后并未解散，而是持续观察与分析特朗普主政下的中美关系变局，并在他上任满两年后发布第二本政策建议书。这份标题为《道路修正：迈向有效、可持续的中国政策》的报告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中哪些论述、政策与具体做法是他们认可的，哪些是他们认为无效或不可持续

的，也就是他们认为特朗普之后的下一任总统不会继续推动的。 [3]

[1] Asia Society Task Force on US-China Policy,U.S.Policy Toward China: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2017.<https://asiasociety.org/center-us-china-relations/us-policy-toward-china-recommendations-new-administration>.

[2] Kurt M.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8 Issue.

[3] Asia Society Task Force on US-China Policy,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February 14,2019.<https://asiasociety.org/center-us-china-relations/course-correction-toward-effective-and-sustainable-china-policy>.

一山不容二虎？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在白宫任职，并一度主持《外交政策》杂志编务工作的著名外交评论家罗特科普夫曾经生动地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不断要找寻新的敌人。而服务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更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找出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1]美国国内各种群体也有努力不懈地找出下一个敌人的强烈动机：政客喜欢找出敌对目标，因为打击敌人可以激发群众情绪而转移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国防工业喜欢敌人，因为敌人可以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政论家与媒体喜欢敌人，因为敌人可以让他们卖更多的畅销书，吸引更多的观众锁定他们的新闻频道。^[2]

在小布什总统执政初期，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人物，例如副总统切尼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已经开始将中国锁定为潜在的威胁，酝酿针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战略。但由于“9·11”事件爆发，伊斯兰激进组织势力顿时变成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所以接下来的10年，美国的军力与政治精力完全被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消耗。奥巴马上任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准备让美国从这两个泥沼中逐渐抽身，并开始提出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计划，准备将全球战略布局的优先应对目标锁定快速崛起的中国。不过，这个战略部署的转向并不容易，需要国防、外交、经贸等各环节政策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一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结束，重返亚太战略推进得并不顺利，军事部署也未完全到位。他任内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重新掌握修订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强化美国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逐步构筑一个排除中国的紧密经济同盟。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开始推进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政策，中间已经相隔了17年，让中国很幸运地获得一个极为难得的和平发展历史机遇期，让中国有机会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并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态体系。

奥巴马的外交团队在构思因应中国崛起的挑战时，仍然是在美国战后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思考对策。他们认识到，过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也为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市场扩张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让美国许多跨国企业可以专营商品价值链中最高附加值的环节，而把利润微薄的环节转给境外供应商代工。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源源不断地铺满美国零售商的货架，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把它们赚到的美元外汇大笔大笔地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经济可以长期在低通胀与低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也让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与

中产阶级群体可以维持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尽管许多家庭面临薪资停滞不前与房价上涨的压力。

更何况民主党的建制精英与华尔街及西岸高科技产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维护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仍符合美国跨国企业与金融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奥巴马时代是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体系与裂解中美经济依存关系的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作为战略围堵的招数。

[1] David Rothkopf,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 (Public Affairs,2006) .

[2] David Rothkopf,“The Enemy Within,”Foreign Policy,April 23,2012.<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4/23/the-enemy-within-2/>.

奥巴马的惆怅毕业之旅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会的30多位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西湖畔，一起观赏张艺谋导演的《最忆是杭州》文艺演出。尽管这场融合交响乐、芭蕾舞、中国元素与高科技于一体的水上演出让全球观众惊艳不已，但坐在贵宾席上的奥巴马总统恐怕没有心情领略这场梦幻秀。

G20杭州峰会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亚洲行。回想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击，就是推动全球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尤其在他第二任上，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预想，给他们很大的心理冲击。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任期即将终了之际，G20杭州峰会反成为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议题引领者角色的里程碑，在这场设定全球议题的重要峰会上美国反而成为配角。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近三分之一，贡献程度超过G7的总和。在G20杭州峰会上，各国领袖对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寄予厚望，并对杭州在网络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的印象极为深刻。

奥巴马任内在中国周边部署战略围堵，的确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但这种陈旧的地缘政治思维并未得到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因为其与亚洲国家的殷切发展需求格格不入，对区域经济整合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华盛顿的经济筹码又如此拮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潜在能量相比，明显相形见绌。

奥巴马的外交团队在幕后挑起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并一手导演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场。2016年，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美国劝阻置之脑后，主动与中国修补关系并重启双边谈判，搁置南海领土争端。

奥巴马的外交团队对美国可用筹码屡屡未能做出务实的评估。2015年，尽管华盛顿竭力阻止传统盟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却让自己落得个灰头土脸。英法德意等美国的欧洲盟国首先发难，它们不顾华盛顿反对，坚定不移地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不久之后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请。在G20杭州峰会前夕，连美国最亲密的邻居也按捺不住，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参加峰会，带给习近平的见面礼就是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所有美国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亚投行门外。美国前财政部

长萨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叹，这是美国失去国际经济体最后责任承担人地位的开始。

四重矛盾的叠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排名，2014年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超过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历史性跨越，给美国政治精英带来极大的震撼，他们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面临中国的挑战。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这是激发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向的最根本原因。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战略对抗迅速升级的通道。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外，也源于特朗普时代与之前历届政府相比有两点关键性不同：第一，这个时期美国政治精英开始对自己的经济竞争优势与政治体制优越性之信心明显动摇，心理折射作用的结果，让他们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全方位竞争压力与挑战的感受特别强烈；第二，特朗普团队的民粹政治逻辑与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从根本上推翻了过去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精英深信不疑的长期目标，包括维护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体制与推进经济全球化。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全面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各种潜在矛盾，也在媒体上大肆妖魔化中国，包括对美国的“科技窃取”与“政治渗透”，甚至启动情报与司法机构，对美籍华人以及与中国有合作往来的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盘查，刻意制造一种麦卡锡时代的肃杀之气。

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他们不断试图说服特朗普动用手边所有的战略筹码，并采取各种“流氓国家”手段，摘下所有的面具，也不在乎打破文明国家道德与法律底线，压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以及迫使依赖美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同时，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之外，特朗普政府也给中美正常的文化、教育与专业领域交流设置各种政治障碍。

在很短时间内，四重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部被启动与激化。四重矛盾叠加在一起构成强大的疑惧与敌视中国的政治能量，席卷了国会内部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议员，把中美关系带入了战略对抗升级的轨道。双方要在短期内妥协、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来要重新回到建设性交往的轨道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必须克服下面四层政治障碍。

第一层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国国内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

间的分配矛盾已经累积到沸腾点，需要找到外来威胁作为宣泄口。擅长民粹操弄的特朗普趁势而起，并把受损者的挫折与不满导向两大替罪羊：中国与非法移民。

第二层是全球产业价值链龙头地位之争。如果中国甘于长期屈居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并在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附占领价值链最顶端的美国，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不但不会构成经济威胁，而且能不断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经济红利。但现在中国在所有核心及新兴科技领域全力寻求追赶与超越，这对仍想独占产业分工鳌头的美国自然构成威胁。

第三层是国际体系霸权地位之争。虽然中国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企图，在地缘政治上也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基本心态是“一山不容二虎”，他们深信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不容许自己失去对全球安全、科技、贸易、金融、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美国政治精英根据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深信强者必霸，所以当中国综合国力正快速逼近美国时，70年来美国第一次面对实力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挑战者，自然难以容忍。

第四层是社会体制优胜劣败之争。过去主张建设性交往的美国外交精英，都假设美国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导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并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这个天真假设破灭了。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笃信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优越性与普世性的西方精英来说如芒在背。现在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全球化新模式，并与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更让美国难以忍受，而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正面临民粹政治的严重撕裂，所以对中国带来的体制竞争威胁坐立不安。

所以，中国各界精英必须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的目标不变，只要综合国力持续攀升的趋势不变，美国政治精英就会出自本能地产生压制与围堵中国的冲动，美国的国家机器就会铆足劲儿阻挠中国正常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的安全、贸易、科技和金融体系。而且，美国不仅有强烈遏制中国之冲动，还有很大概率会时不时采取不理性的做法。这是因为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普遍无知，美国主流媒体又长期妖魔化中国，一般意见领袖也很容易被蒙蔽与误导，而民意取向更容易被哗众取宠的政客操纵。

这场战略对峙与较量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一场经济韧性、政治耐力与整体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长期较量，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或政党轮替而在短期内消退。美国政治精英需要折腾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当的学费之后，开始调适基本心态与重新判断形势，才有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兴超级大国，也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美之间其实没有无法化解的核心利益矛盾，与中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互惠交流、相互尊重，在许多全球与区域问题上寻求合作与妥协是唯一的务实选项。

这场战略较量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对抗。尽管短期来看，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表面上已经很快形成一致的反华立场，但长期而言，美国两党统治精英的底气是不足的，因为他们长期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忽视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数美国民众的信任。随着与中国战略冲突的战线拉长，他们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何需要对一个对美国不构成生存威胁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国家，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与代价相当高昂的冲突。^[1]

^[1] 可以参考《金融时报》专栏作家Janan Ganash（贾南·加内升）类似的观点，“Americans May not Be Ready for a New Cold War,”Financial Times,June 12,2019。

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19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会后在微信平台发表他的感受，他说在达沃斯20年从来没有见论坛如此焦虑和不安。这次论坛气氛之低迷超过金融危机高峰时期的2009年年会，也超过刚经历特朗普当选震撼的2017年年会。他在启程回国前收到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的一张贺年卡，卡上劲逸的手书写道：“超过所有的一切，今年我唯一的期许，是地球上的和平，愿变动的力量和你在一起。”很显然，这位在华尔街颇受敬重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创始人，展望2019年最担心的不是排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世界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再次爆发这些眼前威胁，而是担忧中美关系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如果爆发全面战略对抗，那将是世界经济的巨大灾难。

达利欧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此前不久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纽约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演讲。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这篇演说形同吹响了美国政府向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的号角。^[1]

艾利森是一位在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享誉50年的顶尖学者。他的第一本名著是对肯尼迪政府处理古巴危机的外交决策模式之深刻研究，这本书成为决策模式理论的经典之作，曾经畅销50万册。他在2017年出版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2]，此书已成为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精英必读之作。

艾利森以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摧毁整个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翔实记录与精辟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他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使战争不可避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过去500年国际体系的权力平衡面临改变的16个历史案例，发现其中有12个案例最终无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崛起中的强权与原有的霸权之间，一场对双方都造成毁灭性伤害的大战难以避免。

所以，他这几年四处奔波，不断向美国与中国的决策精英提出忠告，双方都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摸索出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和平共处之道。或许在核武器时代，中美双方都会管控军事摩擦，避免冲突升级引爆人类集体毁灭的悲剧，但即便是中美之间的全面冷战，也足以让全球化大幅倒退，并把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的深渊。他在历史个案分析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结论是，两个霸权之间爆发全面冲突，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它们主动挑起或蓄意发动的。

所以艾利森在2018年12月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特意走访台湾，并广泛接触蓝绿各阵营的代表人士。我也出面做东邀请江宜桦、苏起等多位重量级人士与他餐叙，并主持他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公开演讲。他在台北提醒听众，导致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冲突有两个比较大的可能：一个是朝鲜发展核武器导致美国发动奇袭，一个是“台独”导致中国决心动用武力。他不讳言，现在中美关系处于互信基础十分脆弱的阶段，而白宫决策核心又有像博尔顿（John Bolton）这样有冒进倾向的鹰派，台湾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容忍底线进行战略试探的牺牲品，这让他十分担忧。

艾利森私下也请教我的看法，我很坦率地表示，中美应该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他所列举的以爆发悲剧性军事冲突收场的12个历史案例中，有11个都发生在地理上邻近的两强之间，只有日本与美国之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例外。而美国对日宣战乃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引爆的，这个悲剧性的决定源于日本政治体系的失灵，而不是国际形势逼迫下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日本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堀田江理（Eri Hotta）根据细致而深入的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

堀田江理在《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3]这本名著中，对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的历史细节，包括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进行了详细分析。书中提到，日本自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实行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的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与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他的这本历史名著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

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的第一手日文资料，堀田江理描述了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展示了当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失灵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危险。他的历史分析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当时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的过程。例如，以山本五十六大将为代表的日本海军重要将领，均反对日本加入轴心国与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但是陆相东条英机所营造的爱国主义与反美情绪笼罩了整个日本社会，让在决策圈内那些理智上抗拒对美开战者都不敢公然反对，日本就被这股席卷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的非理性情绪一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

^[1] Graham Allison, "The US is Hunkering down for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3,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666b0230-cd7b-11e88d0b-a6539b949662>.

[2]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月出版。

[3] 堀田江理. *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M]. 马文博，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就客观而言，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或历史仇恨，没有不可化解的核心利益冲突。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美国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何况中美之间不但有保证相互毁灭的核威慑，也有保证经济相互重创的金融威慑。中美之间即使爆发仅动用传统武器的局部军事冲突，也将由此触发毁灭性的全球金融灾难，这双重的威慑将有效阻止中美走向全面军事摊牌。

尽管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中美关系长期陷入“修昔底德难题”（Thucydides's Conundrum）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所谓“修昔底德难题”就是双方之间爆发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让世界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板块，让所有国家都难以适从。这场21世纪的冷战与过去不同，将不再以军备竞赛与代理人战争为主轴，而是在贸易、产业链、科技、金融、通信、网络、数字资产等领域争夺龙头地位，并在发展模式话语权、国际经济规则、产业与技术标准、全球与区域多边体制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争夺领导权。它与过去冷战的相似之处就是“零和”思维，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对方的“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两败俱伤，只要能杀敌一万，宁可自损八千。

2019年5月初，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启动极限施压政策，扩大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这些非常举措让许多观察家担心特朗普政府已经全面启动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为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出现严重断裂。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身边的四位鹰派大将，正把中美关系推上“新冷战”的不归路。这四位鹰派大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白宫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这四人在此前两年里利用各种场合挑起“惧中”与“仇中”情绪，并引导特朗普不断抬高贸易谈判要价，就是刻意要让谈判受挫。他们所营造的“反中”与“防中”氛围，在很短时间内席卷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压制了各种基于务实或理性的不同意见，更让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许多政坛要角与媒体评论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们的主张。

特朗普身边的鹰派大将之所以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制造激昂的“反中”氛围，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发了三种深层的恐惧情绪，因此这场经济战夹带了极高的不理性成分。

第一种深层恐惧是害怕美国百年帝国基业的快速崩塌。美国制造业空洞

化，政府与民间过度消费、不断以债养债，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树敌与积怨太多，全球军事部署无法收敛，国力早已透支。这些结构性脆弱问题长期被掩盖，主要是因为霸权赋予它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华尔街占据全球金融体系龙头带来的特权。而支撑这些特权的权力基础一旦松动，所有危机都会爆发。

第二种深层恐惧是源于自己的阴暗霸凌历史与害怕冤冤相报。自从美国步上国际体系权力顶峰以来，不论是对其邻国、盟邦，还是其他涉及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双边关系中，美国经常利用其不对称权力关系来霸凌其交往对手。所以当美国政策精英首次面临一个未来综合国力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竞争对手时，自然会担心中国也会沾染这种邪门歪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种恐惧是基于种族偏见。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许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倾向，都与他们对黄皮肤人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见有关，我们不能排除西方人对“黄祸”的深层恐惧又被启动，从而成为影响当前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理性因素。^[1]他也为饱受各方指责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缓颊。拥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斯金纳，是出任主掌国务院内部智库这个要职的第一位非裔女性。2019年4月29日，她在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举办的论坛中表示，美国与中国是“全然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美国此前从未面临过这种对抗，因为“这将是美国首次面临一个非白种人的强权竞争对手”，而过去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仍是白种人内部的竞争。她的这段言论引发极大的争议，^[2]但马凯硕却认为，她只是说出了许多隐藏在道德面具背后的美国政策精英不敢公开言明的一项事实，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非白人国家，的确是影响中美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

就是因为不理性因素的强烈发酵，《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很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一场“百年冲突”。他参加了2019年度彼尔德伯格会议^[3]后感受特别强烈。他从与出席这场闭门会议的美政界重量级人物的互动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4]一种新的思潮正弥漫美国政策圈，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甚至把中美竞争定位为文明和种族战争，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认为目前这个趋势十分危险，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畴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面冲突。他更严肃地提醒读者：“在这场冲突过程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

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都将成为牺牲品，任何对此怀有侥幸心理的人都被蒙蔽了。”

马丁·沃尔夫刻意用《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的确用心良苦，他想唤醒美国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维，让他们意识到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而继续“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不然全球化、全球议题合作及战后多边体制都将成为陪葬品。他也在提醒美国决策当局，他们真的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两败俱伤、全球受损、深不见底的长期冲突吗？

客观来说，美国社会内部对于与中国进行一场漫长的全面冲突，根本缺乏共识与思想准备。美国社会各个群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准备坚持多长的消耗性冷战，来阻止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经济与持续推进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国防升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思考、评估与辩论过。正好相反的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来进行长期对抗，他们只是成功地鼓动了“反中”情绪。

特朗普不断试图用欺骗的手段来安抚美国民众，让美国选民相信他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科技围堵，必定会让中国臣服或损失惨重，但美国的经济却可以毫发无损。例如，他不断宣称增加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是向中国出口商加税，但事实上，这些关税是由美国进口商负担的，并且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在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后不久，包括沃尔玛、好市多（开市客）等600多家大型企业，在2019年6月13日向白宫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特朗普不要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并希望美国重返谈判桌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们在公开信中提出警告，如果针对其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征惩罚性关税，“将对美国企业、农民、家庭和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和长期的影响”。他们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刻全面取消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广泛实施关税并不是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有效工具，关税是美国公司支付的税收，而不是中国”^[5]。

特朗普信誓旦旦地宣称：“5G竞赛是美国一定要赢的竞赛，我们不容许未来任何国家在此强大产业赢过美国。”但事实上，美国根本没有研发5G通信设备的企业。特朗普团队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用外交施压轻易让美国的传统盟友和贸易伙伴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来对中国进行贸易、科技与地缘政治的围堵。但事实是美国动用了外交、情报与国防体系的各种渠道，都无法让英国、德国、意大利、沙特、菲律宾这些传统盟邦彻底抵制华为的设备与手机，更不用说要求它们参与对中国的经济围堵。

2019年6月11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CNBC）晨间电视节目专访时，甚至任意编造离奇的数字，说自从他就职以来，他已让中国损失了15万亿—20万亿美元，这真是信口开河。马上就有评论家跳出来打

脸，说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才13万亿美元，而且这三年中国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特朗普要吹牛也应该打草稿。^[6]

所以，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一厢情愿地打算设下一道“铁幕”，把中国隔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但美国的各界精英很快就会发现，在多数情况下，这道“铁幕”最后会笼罩在美国自己身上，只会让美国的消费者、农民、专业人士，以及跨国企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华尔街等，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交往与合作，却无法阻挡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享受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投资、能源、科技与文化交流合作带来的互利双赢。

事实证明，发动贸易战并没有让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赛中占到任何便宜。2019年夏天，美国股市对中美贸易战可能持续升高表达了高度的忧虑，股市的大幅修正促使特朗普在2020年初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份协议仍旧维持了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表面上，这份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人的反华情绪，迎合了一部分失去传统制造业岗位的蓝领工人群众体，但也导致许多群体遭受了实质性损失，尤其是仰赖中国价廉物美消费品的中等收入与中低收入家庭，实际上他们不得不为额外的关税买单。仰赖中国生产的设备或零部件的美国厂商，也是叫苦连天。特朗普鹰派智囊想利用贸易战来打击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之计谋也未得逞，从2018年到2021年，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不减反增，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减反增。最早从新冠病毒危机中恢复正常产能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彰显了超强的韧性，而且迅速成为抗疫物资的全球最大供应来源。在2020年的大选中，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反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攻击的对象。

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的拜登，在是否应该主动结束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的经济智囊都认识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失败的，对中国产品课征额外关税等于是对美国消费者的惩罚。尤其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反反复复，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各类原材料、商品以及运输价格节节升高，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绝对有助于舒缓通货膨胀压力。^[7]另一方面，拜登的政治基础相对脆弱，民主党恰好占参议院席位的一半，少一席就将失去主控权，因此，民主党非常担忧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有可能被共和党夺回多数席位，人气不减的特朗普也很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拜登的团队很怕被右翼媒体与共和党批评其对华软弱，他上台后迟迟不敢主动撤销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仍将陷入僵局。

美国的有识之士迟早会领会到马丁·沃尔夫的警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像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达利欧就看得比较清楚，他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想要运用手边的筹码使中国让步妥协，“宜早不宜

迟，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这种冷静的判断，在眼前民粹主义弥漫华盛顿政坛的氛围下，当然不会得到政客的青睐。不过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战线拉长，这种暂时被压制的务实意见将逐一涌现。^[8]所以，只要中国沉得住气，见招拆招，适度反击，但不主动升级这场冲突，不主动与美国经济剥离，这场冲突肯定不会延续百年，因为美国的对华鹰派能够裹挟美国社会精英与蒙骗美国选民5—10年就很不容易了。

[1] Kishore Mahbubani,“A‘Yellow Peril’Revival Fuelling Western Fears of China’s Rise,”East Asia Forum,5 June 2019.<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06/05/a-yellow-peril-revival-fuelling-western-fears-of-chinas-rise/>.

[2] Paul Musgrave,“The Slip That Revealed the Real Trump Doctrine: Talk of Clashing Civilizations Reveals the Racist, and Dangerous, Lens of the New U.S. Statecraft,”Foreign Policy, May 2, 2019.

[3] 彼尔德伯格会议，被某些国际媒体称为“全球影子政府”。这个闭门政策对话会议始于1954年，每年都有百余名受邀与会者，包括各国企业与政界精英。会议最初旨在促进欧美对话，后来成为以西方为主的各国政策精英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寻求共识与施加影响的年度集会。

[4] Martin Wolf,“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Financial Times, June 5, 2019.<https://www.ft.com/content/52b71928-85fd-11e9-a028-86cea8523dc2>.

[5]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almart-costco-hundreds-of-companies-send-trump-tariff-letter-2019-6>.

[6] <https://edition.cnn.com/2019/06/10/politics/trump-cnbc-interview-tariff-china-wine-fact-check/index.html>.

[7] 拜登的财政部长耶伦就在2021年7月对《纽约时报》公开表示，“2020年初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解决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她还警告说，“仍在征收的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很明显，她在为主动撤销关税进行舆论铺垫。参见：<https://cn.nytimes.com/usa/20210719/yellen-us-china-trade/zh-hant/>。

[8]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ideological-war-comparable-powers-small-world-ray-dalio-1f>.

需要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吗？

马丁·沃尔夫的担忧与约瑟夫·奈教授的警告正好前后呼应。奈是艾利森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以首创“复合相互依存”与“软实力”等重要概念而扬名于国际关系学界，并学而优则仕，曾出任国防部助理部长以及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不久，奈就撰文提醒美国读者，我们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时，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1]

奈教授目睹特朗普所采取的激进单边主义，包括任意退出多边协定，践踏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轻率抛弃国际领导责任。他认为当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角色时，我们需要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空白，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奈借用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金德尔伯格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提出他对特朗普激进单边主义的担忧。金德尔伯格教授的经典之作就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起源之分析。在麻省理工学院长期执教的金德尔伯格，也是美联储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老师，伯南克受他的启发而选择经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缺失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金德尔伯格在分析经济大萧条蔓延的基础上，针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后来国际关系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这个理论主张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要扮演两个角色：第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2]

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金德尔伯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曾经扮演过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支撑起了开放的贸易体系，确保了货币的稳定。但一战后英国元气大伤，无力也无心再担任这个角色；而美国则全面倒向孤立主义，虽然客观上有能力接替英国，主观上却完全没有意愿。于是，便出现了青黄不接、领导真空，造成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政治危机。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两极化，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纷纷崛起，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3]

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可以解释战后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二战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迎来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机，由此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的创建，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体制。在国际贸易领域，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大萧条的惨痛教训，战后在美国与英国引导下，同盟国之间形成共识，需要构建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逐步自由化建立规范；在货币领域，确立了在美国主导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以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在联合国体系下，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气象、劳工、卫生、难民、能源、核能、民航、通信、海洋、外太空等。

约瑟夫·奈在推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话题时还没有料到，特朗普即将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围堵，并不惜牺牲全球化、多边体制与大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成果。当时他只是担心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会像当年的英国，将逐渐退出主导角色，而中国好像还没有准备去承接。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特朗普不但抛弃国际领导责任，而且还主动发起与中国的全面冲突。这必然会导致全球化的倒退，严重撕裂多边贸易体制，并造成世界经济的巨大动荡。在“修昔底德难题”情境下，万一全球性金融危机再现，中美是否可以像2008年那样携手合作、协同政策来有效扮演危机管理者的角色，这将是—大悬念。

[1] Joseph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 09, 2017.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kindleberger-trap>.

[2]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Mar., 1986), pp. 1-13.

[3]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Chapter 14, “An Explanation of the 1929 Depre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 pp.291-308.

超越西方中心思维产物

奈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学者，他说明了美国过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何作为一个领导者，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提供不可或缺的功能，包括作为主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都做了选择性诠释。奈的观点所体现的是典型的美国主流外交精英的视角，他们对美国中心秩序的衰落预设了各种悲观的结论。他们倾向于夸大美国领导地位的关键作用，并低估了其他利益攸关者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能力与意愿，也不肯正视当前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世界”过渡到“后西方世界”的历史大趋势，更不愿意讨论在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能发挥积极性与建设性作用。回避了这两个重要课题，他的分析就只能是对现况与未来的一种片面诠释。

我一向认为，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中国既要重视“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的客观分析成分和警示作用，也要看清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尤其当美国处在逆势和困境的时候，其本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金德尔伯格所倡导的“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回避了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持续性等问题，掩盖了西方中心思维背后对有色种族的歧视与对非西方文明的排斥。

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际公共产品范围，也只是从维护西方国家长期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合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生态失衡与气候变迁、快速全球化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所引发的全球治理挑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抱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许多悲观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1]他们着重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也没有其他国家会提供，接下来就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

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里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其实，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在西方社会内部也遭遇合法性挑战，就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国内与国际双重层面长期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西方社会原来保障中产阶级与劳工权益的国内体制被弱化或肢解，在国际层面对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全缺位，这套极度有利于富豪阶层与跨国资本的国内与国际游戏规则，导致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极度不均。

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在国际社会也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现在更是危机四伏，亟须改革。在2015年举办的“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的亚非领导人峰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就表达了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心声和期望，“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一些国家不愿意正视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那些认为世界经济问题只能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解决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些富裕国家认为它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2]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革。

^[1] 最典型的就是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这家知名咨询顾问公司的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在2013年出版的书中所描绘的零极世界（G-Zero World），参见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hat Happens When No One Leads the World（Portfolio,2013）。

^[2] 佐科总统开幕致辞全文，请参见：http://www.bandungspirit.org/IMG/pdf/jokowi-jakarta_opening_statement-220415-bsn.pdf。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可控

如果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问题放在从西方中心秩序过渡到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架构下来思考，我们就不需要太悲观。

首先，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全面逆转，因为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利益攸关者，利益攸关者的数量远大于受损者，而且在这个日益紧密相依的全球体系里，没有国家可以选择独善其身或自扫门前雪，关于这点我将在下一章做更多的展开。

其实，现有的全球多边体制与规范并非全靠美国支撑，许多国际公共产品都是由集体提供，美国只是承担其中一部分的成本，而且美国的份额也在持续下降，所以全球经济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事实上，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立场基本上非常一致，它们不会跟进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不会轻易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中“选边”。2018年10月，在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声明里强烈表达他们对联合国体制，对WTO多边贸易体制，对维护整个以互惠、开放、自由为精神的贸易体制，还有对包括全球变暖问题的《巴黎协定》，以及伊朗核协定的坚定支持，也就是跟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限。虽然它们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

其次，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趋势仍然有着充沛的前进动力，非西方国家之间将会构筑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能源、科技、信息与金融交换和互助网络。这将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不是西方的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政策所能阻挡的。尤其是获得众多国家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

再者，奈所代表的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精英，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地协商，并承担起应负的义务与责任。

在联合国维和任务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人力派遣国，以及仅次于美

国的最大出资国。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刻意的忽略报道，大多数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不知道。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相当可观的“补充性或者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涉及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这也是十几年来中国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还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对体制构建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而且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毋庸讳言，欧洲国家面对中国开始扮演这个角色时心理非常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间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对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和退位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会刻意掩饰针对其他国家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

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而全面。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相反地，这个秩序有明显的排他性，以及基于文明及种族优越感的阶层秩序与歧视待遇。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是长期被排斥的。联合国体系建立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与苏联仍维持同盟国关系，所以苏联得以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也曾受邀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但以美元为锚货币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与贸易体系要想让所有主要国家放心参与，其必要条件是美国愿意通过借贷或援助，让缺乏外汇储备的国家能得到足够的美元头寸。在苏联正考虑是否加入布雷顿森林协定之际，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国与苏联对战后欧洲政治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杜鲁门总统就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战后重建所需的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选择放弃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的创始会员。^[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长期以来，在采取加权投票机制的国际组织内，美国坚决维持其最大份额决策权，长期独占关键领导职位，坚持保有对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的特权，并不断利用这些它可以主控的多边体制来抵制和惩罚那些与美国有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在采取多数表决制的国际组织内（例如联合国大会与许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美国一旦失去对多数会员国的号召力量，它就任由其职能弱化或局部瘫痪，甚至不惜退出。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维持最紧密关系的盟国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也就是美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这些国家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这些非西方同盟国等构成的第三层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

由于文明亲疏关系的远近，不同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如果我们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如何对待需要紧急纾困的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来比对其处理2009年欧债危机时，如何对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传统西方国家，就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国家开出的纾困条件远比对欧洲国家苛刻，对经济元气造成的伤害更大。^[2]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从全球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全球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以让位于资本市场或私人企业。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官员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案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弄得晦涩难懂，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这样，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因此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也明显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新兴全球议题，美国只对全球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攸关切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但放纵自己可以选择性适用或蓄意违反。也就是说，美国不时利用与其他国家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任意滥用霸权地位而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可以用国家安全为借口，以美国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自由派学者都会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

髓是“以规则为基础”。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本应在各合作领域带领成立多边机制、制定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促进合作共赢。作为国际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更绝不可滥用其霸权地位追逐自己的短期利益。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的短期国家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一直难以巩固。

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美元兑换黄金为锚定的固定汇率制度，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的颠覆性决定，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

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国家，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下的最大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逼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都一一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然后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表面上这是一种互惠协定，配合落实FATCA规定的国家，也可以要求美国提供本国纳税人在美国的金融账户资料。

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接着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

信息。

自CRS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而实际情况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以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之所以多半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过去，西方国家担心如果美国完全抛弃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可能回到一战前的剑拔弩张状态，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项时，它们宁可拥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尽可能忍让。在欧盟成立之后，西欧国家还勉强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地位在贸易、货币与金融领域约束美国，但也因此触发特朗普与班农产生想要拆解欧盟的念头。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它既是安全秩序的提供者，也是导致许多国家不安全的根源。西方主流关系学者都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他们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其实，只要我们抛开西方中心思维，支撑这个悖论的证据比比皆是。美国的地理环境赋予它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它与其他传统陆权地隔了两个大洋，南北两个邻邦与它实力悬殊，除了紧密依附于它别无选择。它很早就把西欧列强的势力驱赶出西半球，门罗主义让中美洲与南美洲成为自己的后院。所有与美国有潜在战略利益冲突的大国，都没有这样高枕无忧的地缘政治条件，而美国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的不对称性，借助军事盟友与远端打击力量，在自己对手国的后院或邻近区域煽风点火，让对手（甚至是自己的盟友）不得安宁。只有到苏联建立可靠的战略核武力量

后，美国本土才第一次直接暴露在生存威胁的阴影下。但美国还是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它可以摧毁对手，而自己却不受直接战火威胁的不对称优势，所以全面发展反导弹系统与推进太空武器研发。

美国在二战后长期享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因此它的外交与国防精英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他们界定的范围从军事安全到能源供给，从海洋到太空，从气候战到细菌战威胁，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到高科技优势，从意识形态到软实力，从全球监听到网络安全。这批外交与国防精英同国家相关部门，以及相关产业与智库早已形成一个牢固而庞大的利益结构，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在雷达屏幕上察觉到任何对美国国家利益有潜在威胁的目标时，就会放出风声、制造舆论，然后强力主张必须设法打击、围堵或铲除。

所以，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的社会不安。美国在世界各地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或宗教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并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不少地区刻意制造政治动乱，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来削弱或铲除反美政权，并加深传统盟邦对它的依赖。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新保守主义阵营在披着民主外衣的帝国主义思路下，推动的政权铲除与积极军事干预政策，并结合了犹太游说团体推进的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了中东、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生灵涂炭，并让周边国家与欧洲饱尝恐怖主义四下乱窜与大量难民涌入的苦果。

2007年，美国以“Stuxnet”（“震网”病毒，一种蠕虫病毒）计算机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得逞后，就不断加大对网络病毒武器的研发。2013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秘密监控全球网络通信后，备受国际关注。华盛顿除了被披露要高科技企业、互联网巨头在计算机系统“开后门”，以便情报人员监控通信外，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也会暗中搜集各式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弱点，研制种种网络攻击武器。未料2018年有黑客组织成功突破防线，取得一批由NSA研制的计算机系统入侵工具，并于网上公开。其中包括NSA针对视窗系统漏洞所研发的入侵工具“永恒之蓝”（Eternal Blue），结果不法分子有机会将它改写成勒索病毒“Wanna Cry”，肆虐全球。微软主席史密斯形容相关失窃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军‘战斧’巡航导弹被盗”。

美国另一种让各国饱尝恶果的公共之恶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放任美国巨型跨国企业在全世界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

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作一种进步的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很快就导致热钱流窜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而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在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那条思路洗脑了，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的被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性金融资产。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金融机构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可能一文不值，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也就是说美国把大药厂的利润看得比人命还重。

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也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例如，美国长期抗拒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设置国际监管机制，抗拒对数字科技集团收集与使用个人隐私资料制定国际规范，反对联合国机构对科技变迁的社会冲击进行全球追踪与评估，抗拒设置海洋污染的全球监控机制，等等。

此外，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又如美国历任共和党总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这些作为也是制造公共之恶。

过去30多年里，美国唯一新创设的多边协调机制就是G20峰会，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峻程度已经超出G7的能力范围，小布什总统不得不邀请新兴经济体领导人齐聚华盛顿，来协助美国与欧洲各国共同渡过世纪性金融危机。美国需要中国、印度、韩国、沙特等国家出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的短期融资机制，并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也需要新兴经济体同步采取财政扩张政策以扩大进口。

过去30多年里，面对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从《禁止地雷公约》《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到禁止发展人工智能武器。很多国际金融领域权威学者早已指出，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

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又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1] Michael David Bordo and Barry Eichengreen,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1993) .

[2] “Asia Sees Double Standards in IMF Greek Rescue,” Financial Times, April 30, 2010.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奈担忧特朗普抛弃国际领导责任，甚至主动削弱与拆解现有多边体制，会将世界经济推向“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确，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与激进单边主义，是损人而不利己的，现有多边体制面临严重冲击，世界贸易组织首当其冲，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分崩离析，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受到严重干扰。但危机也可能变为转机，美国的“退位”也可能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特朗普的“超级流氓大国”行径，迫使现有多边体制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必须挺身而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开放、互惠、非歧视原则的国际规约。新兴经济体也被迫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与建设性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中国应积极主动协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盟国家，对现有国际组织与多边体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恢复或提升其功能。

过去，在美国霸权统治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战后国际秩序，西方国家享有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它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经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不佳的问题，承受美国常将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也必须忍受强加于己的公共之恶。它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也只提供其意识形态体系认可的公共产品。它阻挠公共产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它独占鳌头的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而且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须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回应。比如，巨型跨国企业对市场的扭曲与垄断，以及对基本社会责任的回避；虚拟投机交易的系统性风险和受金融资本凌驾的实体经济；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水资源、疾病、生态等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网络时代信息安全、隐私、监控与道德风险等问题。

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

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它。

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已经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非西方国家必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开展全球治理改革，提出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景与改革议程，继续搭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并着手修正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果实能创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第四章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动手拆解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他把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特朗普的鹰派智囊又直接锁定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启动“印太战略”，试图拉拢印度来构筑新的对华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通过粗暴地对中国实行贸易与科技封锁，试图逼迫跨国企业把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美国还通过各种渠道胁迫自己的传统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乱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与经济增长势头。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让很多观察家开始担心，过去35年的高速全球化时代将一去不返，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此裂解，世界经济可能正步上逆全球化的通道。

如果我们观察一些经常使用的衡量全球化进程的指标，就会发现全球化的脚步的确从2008年开始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例如，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数据，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经连续出现两季度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尤其是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的下行幅度达到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但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了2017年后三季度与2018年前三季度，曾短暂出现过贸易额增长速度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其他年度与季度贸易额增长速度都低于经济增长。从长期趋势来看，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199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60%，但从2008年到2018年则缓跌至58%。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又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1/5，规模只剩下1.2万亿美元。^[2]在2007年，FDI曾经一度占全球GDP的3.5%，2018年却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这个比重在2007年之前不断攀升，自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跨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缩表，以及之后许多国

家陆续推出的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36%。另外一个衡量全球金融相依程度的指标，是外国投资负债（foreign investment liabilities）总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一个国家引入外国投资而产生的负债总规模，包括外国机构或个人拥有的四类资产：股票、债券、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借贷或投资。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这个比例在1995年还只有51%，到2007年快速膨胀到185%，2008年以后就不再跨越这个历史高峰。 [4]

[1] Fergal O'Brien, "World Trade Volumes Plunge at Fastest Pace in a Decade," Bloomberg, April 25,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4-25/world-trade-volumes-are-plunging-at-the-fastest-pace-in-a-decade>.

[2] UNCTAD, "Global Foreign Investment Flows Dip to Lowest Levels in a Decade," January 21, 2019.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1980>.

[3] "Briefing Slowbalisation," Economist, January 26, 2019, pp. 17-2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New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2017.

[4] "Briefing Slowbalisation," Economist, January 26, 2019, pp. 17-2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New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2017.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出现逆转，全球社会已经步上逆全球化的轨道？首先，我们不要被惊悚的媒体标题误导，也不要被一些统计数据的表象迷惑，我们要很理性地回答下面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之中？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力量，究竟何者为大？哪一种力量更具有主导性？第三，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各国，抗拒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相较于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在社会力量的平衡上哪一个更具优势？是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还是反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在日益壮大？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十分脆弱还是十分强韧的？这些基础是否脆弱到经不起关键行动者（例如一个“超级流氓大国”，或是恐怖主义组织）的破坏与干扰？还是它们有足够的强韧性及可依靠的厚实利益分享结构，可以对潜在的破坏行动起到强大的束缚作用？它们是否也有足够的弹性与灵活性来克服或绕过新增的障碍与险阻？一旦我们认真评估这四方面相互关联的问题，就可以摆脱可能的误判，就可以拨开云雾看清楚庐山真面目。

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

以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增长速度，的确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导致不少观察家做了轻率的判断，这主要是由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所导致的全球化退潮现象。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作用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是作为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转为内需，另一方面中国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有更高比例的中国制造产品转为就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也在不断深化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减少依赖进口的高附加值零部件、资本设备或软件。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一直是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在国内进行来料加工组装生产，然后再出口，一直承担着“世界组装工厂”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接着，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设备与零部件在取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

所以，中国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从2000年到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以上，分别达到41.1%与31.2%。同一时期，消费产品所占比例在2016年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正从组装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报道，到了2018年，在出口产品中本国创造的附加值比率上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在巨型经济体量的支撑下，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1]上述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出现贸易额增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与零部件现在已经改为由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甚至非洲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中国经济从2012年以后，进行了去产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由此导致全球各种原材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2008年以前那种石油、铁矿石、铜、铝全面飙涨的景况不再。这个价格退

烧的过程，导致了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似乎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中国在过去10多年出现两个趋势：国内需求增强以及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也多多少少在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出现。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9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从2007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也有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这解释了为何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2]

第二重变化，是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也正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甚至可以说扭转了过去将近200年全球化的运行规律。法国著名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3]的两位资深经济学家夫奎和于戈，建立了一个从1827年到2014年的双边贸易流向的完整数据库。他们的数据显示，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富裕国家的需求而展开的，他们定义的富裕国家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以色列与日本。^[4]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从战后到20世纪结束时，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平均达4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曾达50%以上；同一时期，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在多数年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都在25%以上。所以，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2/3。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很低，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都在10%—14%之间，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出口在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全球化时期更是微不足道。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它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连续超越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的增长。因此，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就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则从2001年的45%一路下滑到2014年的29%。两者已经旗鼓相当。如果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比重（在2014年为19%），合计就达到了48%，也就是说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到2014年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而这个大趋势仍在进行，也势不可当。

换言之，长久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在21世纪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未来，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倡议

正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会让上述的深层结构变化走得更快更远。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不但不会受其影响，反而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它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而且中国政府与企业还会以更大的力度，来协助这些经济体开发潜在增长能量与消费需求。总之，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逐渐超越以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活动，而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是有部分制造业活动在最近几年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保护主义的作用反而居其次。例如，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台资企业想要规避中美贸易战的风险，如果劳动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那自然会选择将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墨西哥。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的制造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因为在新技术条件下选择离岸生产的诱因降低，还不如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无论是因跨境交易成本变动、能源价格差异、劳动成本变动，还是因AI（人工智能）科技与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突破所引导的全球制造业活动重新布局，都不应该与逆全球化画上等号，尽管这些布局调整，有可能导致双边贸易量萎缩。事实上，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本来就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过去30多年的全球产业链就是因应集装箱运输、长途通信、电脑存储器与运算的成本急剧下降而生的。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的配合意愿也很高，但适合回流美国的制造生产活动十分有限，主要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美国本土已经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分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发现困难重重，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会拖累整条生产线。^[5]多数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运营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是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比重必然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比重必然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业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这个大趋势已经部分反映在传统的贸易统计资料里，也就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过去10年，虽然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减缓，但服务贸易仍维持强劲的增长动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物贸易高出60%，而且这个数值应该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有很

多种类型的服务贸易是通过网络交易，或非正式渠道交易，或个人境外消费的，很难有效追踪与统计。^[6]此外，目前有很多网络科技公司提供免费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账户服务，而这些服务其实都是有真实价值的，这些服务之所以免费，是因为这些公司可以通过收集用户的信息而牟利。

尤其是传统的贸易统计基本上无法区分出实体产品与非实体产品的价值比重，因为后者经常是与前者一起捆绑出售的。例如，上海振华重工出口一套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装卸系统，这笔交易不仅仅是实体装备出口，还包含规划设计、专业运送与安装服务、智能软件授权、操作人员培训、软件更新与升级，以及长期维修服务合同。维修合同里可能包括派驻现场技术指导人员，以及为客户提供全天候的设备使用状态的远程数字侦测、在线及时反馈与大数据分析报告等。所有这些非实体产品的销售总值往往会超过这套硬件设备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与实体产品捆绑的非实体产品销售，可以合并为一笔出口交易合同，或分拆为数笔交易合同，各项目的报价也可以弹性调整，完全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会计、税务、法律合规、财务与融资等各种考虑而做弹性安排。这些非实体产品的销售可以通过母公司、买方当地的子公司或任何获得授权的第三方公司来执行，所以可能全部纳入官方的货物贸易统计，可能部分纳入官方的服务贸易统计，也可能部分移转为第三国的服务贸易，甚至有可能一部分被归入FDI的统计。^[7]

所以，当前的贸易统计明显低估了服务贸易的真实规模。麦肯锡的研究团队做过估算，如果把自由网络服务的真实价值，以及跨境非实体交易的价值都考虑进来的话，当前跨境服务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物贸易。以2017年为例，官方贸易统计的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在扣除附带的非实体交易价值后，应该只剩下13万亿美元，而补上各项遗漏后的跨境服务贸易的规模应该为13.4万亿美元。所以，201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就不止官方统计所显示的21.8万亿美元，实际价值应该超过26.4万亿美元。^[8]

展望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被过度渲染。特别是保护主义浪潮与贸易战对全球化的打击不应被高估，想利用惩罚性关税来打击特定国家的产品出口的效果有限，因为不仅厂商可以用各种方式通过第三地简易加工再出口，而原产地证明的国际通行门槛是要求25%的当地附加价值，^[9]这并不难用浅层次加工外加会计手法克服，尤其在执法力度不严的国家。更何况，与实体交易捆绑的非实体交易很难确定其原产地来源，这些价值比重越来越高的非实体产品可以轻易通过网络完成跨境交易，并以各种灵活的交易形态向管辖机构呈现，要规避贸易战的烽火波及并不困难。

^[1] 中国报告：中国转向高附加价值产品生产[EB/OL].日本经济新闻，

(201903-14) .<https://zh.cn.nikkei.com/china/company/34693-2019-03-14-05-00-30.html>.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uary 2019.

[3] CEPII为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的缩写。

[4] 参见Michel Fouquin and Jules Hugot, "Two Centuries of Bilateral Trade and Gravity Data : 1827-2014 , " CEPII Working Paper, May, 2016. 他们对“富裕国家”范围的定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非富裕国家就是所有的其他国家。

[5] "A Tiny Screw Shows Why iPhones Won't Be 'Assembled' in U.S.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9.

[6]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Five Hidden Ways That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Mckinsey & Company, January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five-hidden-ways-that-globalization-is-changing>.

[7] 例如，一家智能装备公司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作为资产注入海外合资公司而转换为股权，这样就视为FDI，将来这家子公司的营收就不是母公司的出口营收。

[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uary 2019 , Mckinsey & Company) , p.7.

[9] 这是APEC (亚太经合组织) 经济体成员所采行的标准，至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还会设定区域内附加值比率。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当前全球化面临的裂解风险的确空前严峻。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现有的欧盟框架是否能避免进一步的裂解也是悬念。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

这批与时代潮流脱节的鹰派，不仅试图把俄罗斯、伊朗这些战略对手，逐出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还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惜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他们不仅动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离间中国与其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也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们不惜使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功能陷入瘫痪，不惜拆解过去30多年跨国企业所搭建起来的紧密、精致而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也不惜剥离中国与美国两个社会在金融、科技、卫生、环保、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在乎美国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能因此落后于最先进的5G科技潮流。

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名声大涨的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2019年在专栏中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1]他认为中美冷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后果比过去美苏冷战还要严重，因为苏联当时的经济模式失败且在逐步衰落，但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并将还不断发展壮大。此外，美苏之间经济联结极少，而中国则已完全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

鲁比尼担心全面冷战会把逆全球化带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将划分为两个不兼容的经济集团。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的贸易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数字领域也将变成“分裂网络”，西方和中国节点可能无法相互连接。他也预言，中国和美国都会希望所有其他国家“选边站”，不过大多数国家都会试图与两者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毕竟，许多美国盟友现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超过与美国的。然而，想要脚踏两条船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中国和美国分别主导了人工智能和5G等关键技术时，它们可能不得不“选边”。

[1] Nouriel Roubini,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of a Sino-American Cold

War,”Pro ject Syndicate,May 20,2019.

一个巴掌拍不响

鲁比尼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不过可能言过其实，因为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他假定美国单边施压各国“选边”的策略，一定会招致中国以同样手段反击；他也假定美国全面封杀中国高科技企业依托美国企业或机构主导的系统平台、基础性软件或技术规格，那么中国必然会选择开发一套平行而互不兼容的独立系统。这两个基本前提并不完全靠谱。

首先，在因应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最佳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会选择以更大的力度强化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也会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让全世界的生产者、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中国人的智慧是有容乃大，不会借着自己块头大而逼迫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削弱或切断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国也会继续欢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例如，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落地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2018年，中国政府在上海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政府还主动调降了包括汽车在内的进口关税，让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由2017年的9.8%降至7.5%。唯一不能享受关税下降好处的是美国的出口商，为了反制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中国也陆续对美国产品加增5%—25%的关税，让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达到20%左右。

另外，为了争取广大的全球消费者，中国在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产品时，自然会尽可能维持与西方主流科技规格的兼容性，无论是智能设备操作接口，还是制程工艺、IC（集成电路）设计、系统软件等。即使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以及欧盟开始给中国企业并购高科技公司设下更严的审查程序，中国在享有领先优势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同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合作仍在正常推进。从贵州的中国天眼、深海勘探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到2021年6月正式启用的“天宫号”空间站，中国欢迎国外科学家的各项合作研究提议，但过去长期拒绝中国参与太空合作的美国除外。

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单边施压各国政府与跨国企业“选边”的策略很难奏

效，因为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的。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睬美国施压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信设备，因为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并且5G牌照的进度至少会因此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单靠言词恐吓与毫无实据的通信安全疑虑指控就可以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1\]](#)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像高通、博通、美光、超微、英特尔这些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它们真的会被逼到生死存亡关头，所以它们也会想尽办法阻拦美国政府两败俱伤的做法。

[\[1\]](#) Gwénaélle Barzic, “Europe’s 5G to Cost \$62 Billion More if Chinese Vendors Banned: Telcos,” Reuters, June 7, 2019.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新闻焦点，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的发展态势，我们会看清楚，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但因为前者是默默进行，而后者是敲锣打鼓闹事，所以裂解力量的表面声势往往超过融合力量。此外，西方媒体通常有意无意忽视南南合作的良好势头，它们如果报道，那么这个领域的事件多半是负面的，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一旦超越了西方媒体的偏狭眼光，我们会发现，人口众多与发展势头仍看好的全球南方，也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给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各种深化双边或区域经济整合、多边开发融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共享、文化与教育交流，以及科技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加速创建、增长与强化。

传统上衡量全球化进程的指标，主要涉及货物、资金、人员与信息的跨境流动。在实体商品与资金流动方面，过去30多年推进全球化的主要行动者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关注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以及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的确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但如果仔细检视不同地区的个别趋势，则走势有明显的分歧，西方不亮东方亮。例如，过去1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在下降，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全球FDI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尤其在英国公投脱欧，以及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为吸引美国跨国企业资金回流的限时性减税法案之后。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19》，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整体规模仍在增长，而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在较差的2018年仍维持了12%的增长。此外，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唯有流入拉丁美洲与中东欧及原苏联地区的FDI明显减少。^[1]

更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过去10年，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就快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的流入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与荷兰这些传统来源地之外，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地。

如果我们看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那我们就更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

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为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到了2017年，全世界的国际移民人数大约为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2]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2/3，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低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国际移民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因最近几年欧洲与美国涌现反移民政治势力而有根本性的改变。不过，最近10年，跨境移民与移民劳工的流向更为多元化，过去移民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跨境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例如，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有100万。跨境移民就像境内移民一样，会带来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带来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的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国际移民向中低收入国家汇入大约290亿美元的侨汇，这个数值在2000年增加到740亿美元，并在2016年达到了4290亿美元。目前全球侨汇的规模是官方发展援助总数的三倍多。^[3]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的增长速度也相当可观，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的近500万。而中国既是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预计中国很快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移民、商务、留学与观光需求带动了人员跨境流动的持续增长，这可以从国际民航载客量得到印证。全球航空公司的收入客公里（RPK）仍然持续增长，在2009年总里程约为4.4万亿公里，到2017年增长到7.7万亿公里，其中64%是国际旅客。^[4]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乘客每年增长率都在7%以上，在亚洲廉价航空公司纷纷涌现的趋势下，亚洲城市之间新航线开辟速度非常惊人。此外，中东地区新兴航空集团与转运中心，更为来往于亚洲城市与欧洲中小城市、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旅客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转运服务。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中国自2012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国，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5]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2460>.

[2]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data?i=stock_abs&t=2017.

[3] 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8》。

[4] RPK为Revenue Passenger-Kilometres缩写，相关统计资料可参见[https://www.iata.org/publications/economics/Reports/pax-monthly-analysis/passenger-analysis-nov 2018.pdf](https://www.iata.org/publications/economics/Reports/pax-monthly-analysis/passenger-analysis-nov-2018.pdf)。

[5]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5588/international-tourism-expenditure-in-2017/>。

跨境电子商务生机蓬勃

跨境电子商务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新融合机制之一。这个新兴的商品交易渠道，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体户、微型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直接通向终端消费者，而不需要依赖跨国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渠道，可为全球中小企业及年轻人进入世界不同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提供更为公平的渠道。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也是电子支付系统最先进、使用最频繁、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现在中国正全力将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进经济模式推向全球，也大力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平台。由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倡议的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简称eWTP），在2016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被纳入公报。马云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非营利机构，与各国政府合作推进电子商务贸易平台。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与马来西亚发展数字经济的官方机构——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MDEC）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成立东南亚第一个eWTP的地区枢纽平台。2018年，阿里巴巴集团又与非洲卢旺达政府签约，协助成立非洲第一个eWTP的地区枢纽平台。

近年来每隔几天，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就会迎来世界各国的考察团，他们到此密集了解学习阿里巴巴电商生态、电商普惠发展思路、农村淘宝、科技金融、跨境电商、新旅游等内容。他们也通常会在杭州实地走访专营生鲜食材的盒马门店，以及去“中国淘宝村”临安白牛村调研，为中国数字化经验如何嫁接到他们国家寻找答案。

在全球范围，跨境电子商务正蓄势待发，其爆发潜力可以从一个具体指标看出来，像是国际包裹的数量从2007年到2017年10年之间增长率超过150%。而且这些包裹的商品价值很多都是少报甚至漏报，在官方贸易统计中根本无法准确显示。

数字科技革命无限可能

网络与数字科技更是加速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最重要机制。如今数字与通信科技让远距离通信、视频与巨量信息传递接近免费。2000年，全球互联网使用者的覆盖率仅为7%，到了2018年已经达到48%，全球有将近36亿人可以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各种便利与机会，从沟通、传播、协调、社会动员、出售劳务、金融交易、教育学习，到网络犯罪。

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衔接，几乎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甚至毫厘无误的境界。各种形态的跨境劳务外包服务的交易规模不断在增长，数字移民（telemigrants）的人数也不断在增加，让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劳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让个体生产者、设计者、消费者、借贷者可以弹性地进行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蓬勃发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交易与资本移动，可以绕过传统的金融机制、跨境支付系统与国家监管的换汇机制。

网络科技也让全球科学社群融合成一个实时交流、分享与紧密分工合作的知识社群，巨型科技项目的跨国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研究的典型模式，从遗传基因解码到暗物质探测均是如此。虽然部分西方国家政府仍沿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瓦森纳协定》^[1]，限制高科技设备与配套软件出口到中国，特朗普政府也在中美科技交流合作上设下许多新的障碍，甚至在一些美国大学校园制造类似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的肃杀气氛，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科学家快速融入全球科学社群的大趋势，因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对人类知识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发表的科学期刊论文总量，在2016年已经超过美国，不过美国在超高引用率期刊论文数量上仍居世界首位。^[2]

[1] 《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2] “China Declared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Scientific Articles,” Nature, January 18, 201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0927-4>.

沙漠中的全球化奇迹

2018年1月，我到阿联酋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目睹了全球化所造就的沙漠奇迹。阿联酋正是各种全球化融合力量汇流的节点，也是一个闪亮的展示橱窗。

在参访首都阿布扎比期间，我住在瑰丽酒店（Rosewood Hotel）。这是香港新世界酒店集团郑家第三代千金郑志雯全新打造的全球精品酒店，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晋升为世界精品酒店顶层，可以让全球高端客户体验中国文化元素的精致与婉约。把我从机场接到酒店的司机是印度人，酒店柜台的接待人员是尼泊尔人。酒店房间阳台正对面是一个体量超大的现代建筑，门牌上写着“Cleveland Clinic Abu Dhabi”（阿布扎比克利夫兰诊所）。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顶级医学中心之一，这个位于阿布扎比的拥有500张病床的现代化医学中心于2006年开业，是克利夫兰诊所唯一的海外分院，服务对象是中东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医院由美方管理，但医护人员就像联合国组织的工作人员一样来自世界各地。

在距离酒店不远的新填出来的半岛上，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于2017年11月举行了揭幕仪式。自开幕以来，来自全球的访客络绎不绝，他们不仅想目睹该分馆展出的珍贵艺术品（尤其是亚洲收藏品），也来欣赏这栋里外都像是个巨大飞碟的奇特后现代建筑，这是当代法国最著名建筑设计师努维尔（Jean Nouvel）的旷世杰作。

阿联酋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在亚洲名列前茅。如果计算该国公民的人均收入，应该超过10万美元。在100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200万是阿联酋公民，其余800万都是来此打工的外籍人士。本地公民不是在公共部门工作，就是参与经商，即使是务农的阿联酋人，也都是农场主。阿联酋虽然靠石油发迹，但是它的统治者非常有远见，善用石油财富来快速改造自己的经济体制，为石油枯竭未雨绸缪。如今阿联酋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高端服务业枢纽，集区域航运、物流、加工、维修、贸易、金融、消费、文化、医疗、高等教育中心功能于一身，石油收益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三成。其要诀就是筑巢引凤：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设置自由贸易区，全方位引进高端人才，然后再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形成集聚效应。

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于7个酋长国世袭统治者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决策机制，所有重要决定必须得到7位酋长中5位以上支持，这5票要包括最关键的两位酋长：阿布扎比与迪拜酋长。这两个酋长国既是兄弟，也像是相互竞争的两家集团，相互镜鉴与攀比，所以这两个酋长国同步发展了国际枢纽机场，也各自扶植了一家赫赫有名的国际航空

公司。

在20多年前，阿联酋就规划要成为中东航运枢纽，并争取成为国际人道救援转运中心。它先主动给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免费仓储与空运补贴，争取将人道物资调度中心落地迪拜。从世界各地征集的物资在此汇集，再转运到亚、非、拉丁美洲。等到调度中心逐步成形，联合国机构开始扩充常驻人员。接下来所有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国际人道组织都来此设置调度中心，就近协调与相互支持。现在全球唯一的国际人道主义城市已经呼之欲出。

阿联酋国有企业长期赞助卢浮宫美术馆活动，多年的耕耘终于带来丰收。2017年11月，迎来了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开馆，作为首都文化村的第一个贵客，接下来还有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阿联酋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个开放5G牌照的国家。迪拜酋长国与华为签署了一项高达500亿美元的合约，不仅5G通信将全面采用华为设备，而且还委托华为将迪拜打造成一座5G智能型城市。迪拜酋长为了庆祝与华为的合作，特别在2019年元旦那天在迪拜的828米162层地标性建筑外墙上，也就是全球最高建筑哈利发塔上，赠送华为3分钟的夜景灯光秀作为最高调的免费宣传。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化虽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失灵，以及政治精英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彻底绑架。整体而言，全球化仍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全球化的潜在利益攸关者将持续增长，而且是大量增长，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

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地理板块，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大于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与西欧的总和。非洲人口在2017年约有12亿，但增长速度惊人，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5亿，这里将是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惠于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超过2/3的非洲国家都出现连续10年以上的中高速增长；2008年以后，非洲国家的增长曾一度受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拖累，但从2016年开始，又逐渐恢复强劲增长。非洲是当前世界FDI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过去最贫穷的“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2018年共引进了320亿美元外资，增长率高达13%。2018年3月正式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fCFTA），将为非洲带来新的增长动力。这份非洲联盟倡议的贸易协议，旨在促进非洲国家形成区域单一市场，在55个非盟会员国中已经得到54国（厄立特里亚除外）的签署。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长期融资、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中国政府与非洲联盟从2015年启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由中方提供600亿美元的启动基金。“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消除贫穷、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每年前往中国接受培训的非洲官员与专业人士高达一万人次。

2017年，麦肯锡顾问公司完成一项针对中资企业在非洲活动的大规模调查。这个调查覆盖了中资最集中的非洲八国，有1000家企业参与调查。麦肯锡报告澄清了许多西方媒体对中资企业的偏颇报道。他们发现，中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的比例高达89%，2/3的企业提供在职培训，这1000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而目前非洲大约共有1万家中资企业。报告也指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美国与德国的总和。2015年中资企业在非洲的营收已经达1800亿美元，到2025年，将达到4400亿美元，并从目前它们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和资源领域，延伸到

服务业和物流等领域。这些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占非洲制造业总生产量的12%左右。^[1]

中国推动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都是覆盖整个区域的。最突出的就是由中国电信带领通信设备厂商启动的“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项目。该工程将铺设“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纤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骨干网络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82座城市，投资金额150亿美元，2015年启动，预计2023年完成。这个计划将带领几亿非洲人一步跨入宽带网络时代，并带动沿线国家规划宽带发展计划与网络经济。

中国物美价廉的科技产品，更让非洲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跨越。例如，在非洲大陆广受欢迎的中国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设备，让数亿非洲消费者立刻跨越了数字鸿沟，甚至让千万落后农村可以与世界同步分享最新的信息与知识。

目前在中国金融圈最火热的交易市场，是2019年7月22日启动的上海科创板股市，吸引众多投资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市场上名不见经传的一家手机制造商，叫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不曾销售一部手机，但2018年在非洲手机市场占有率接近49%。在功能机类别领域，这家公司出货量全球排名第一，2018年全球市场份额接近20%；在智能手机领域，全球出货量也排名第九。传音控股主要有itel、TECNO与Infinix三个手机品牌，分别主打三大不同客户群。itel是传音针对非洲与南亚低收入群体的大众市场开发的产品，只搭载最基本的手机功能，主打平价、耐用等特色，平均价格只要10美元；TECNO是智能手机，锁定非洲中高端消费群；Infinix则是针对新兴市场年轻消费者的高端智能手机。传音智能手机的平均价格也只有75美元。如此亲民的定价，让传音横扫非洲市场，也在印度大有斩获。

中国企业也让数字电视走进非洲最偏远落后的农村。不久前，收看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是非洲少数精英的特权，因为只有少数家庭付得起每月70美元起步的卫星电视费用，而且还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选。2002年，嗅觉敏锐的北京商人庞新星决定将自己办的四达时代公司从中国转向非洲，因为他在非洲看到了低成本电视运营商的商机。如今四达时代在非洲推出了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电视套餐，一个月最低才4美元，而且有上百个频道，用户已经逼近1000万。有了四达时代打下的基础，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很有底气地宣布启动“万村通”工程。

2018年夏天，肯尼亚中部一个叫利基的偏僻村庄变得格外热闹，因为由北京四达时代集团实施的“万村通”项目，在这个村里落地了，村里的球迷们第一次能够在家完整地观看世界杯足球赛。^[2]从2015年开始，“万村通”项目为撒哈拉以南25个非洲国家1万多个村落安装、接通卫星电视信

号，为每个村落公共区域免费配备2套太阳能投影电视系统、1套太阳能数字电视系统，为20户有电视机的家庭免费安装卫星接收系统，为公共区域免费提供电视节目不少于20个频道，为20个家庭用户提供的节目不少于30个频道。此外，项目还从当地农村选拔2万多名村民进行培训，让他们成为该项目后期运营维护人员，以此促进当地就业。

[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 June,2017.

[2] 四达时代“万村通”项目：让非洲人民“通世界”[EB/OL].<https://kknews.cc/sports/x2zgn4r.html>,<https://kknews.cc/sports/x2zgn4r.html>.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新亚欧大陆桥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创造更多的全球化受益群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于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方案，也意味着中国将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超越传统以西方跨国企业为主角，以贸易、投资、产业分工及金融自由化为主轴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而是由政府开发基金牵头，以区域政策协调与合作平台为支撑，以跨国运输、通信与能源等基础设施相联通为奠基，实现能源、环境、农业、卫生、通信、科技、司法互助、城市管理、文化与教育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指出，许多沿线国家过去都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政策法规不足，其贸易与吸引外资的巨大潜力无法释放，而“一带一路”倡议开辟的新亚欧大陆桥以及通往印度洋的经济走廊，将可为这些国家明显缩短运输时间与降低运输成本，还能带动贸易与投资。世界银行的专家估计，当这些新的运输走廊建设完成，沿线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输时间可以平均缩短12%，内陆国家的改善幅度将更为明显。沿线国家所生产的有保鲜期或需要争取时效的产品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会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将可让运输走廊沿线国家至少700万人脱离绝对贫困，也可帮助320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1]

相较于世界银行的评估，荷兰ING银行的智库评估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促进效果更为乐观，它估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陆续完成后，将可为世界贸易带来12%的增长。[2]2017年全球货物出口总额为17.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5.1万亿美元，合计为22.8万亿美元，12%的增量就相当于2.7万亿美元，目前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也不过是5400亿美元。

新亚欧大陆桥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中欧班列的开通。自2011年3月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正式开行以来，在短短8年时间，中欧班列的运输网络已经覆盖中国56个城市，在欧洲方面则联结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也有通往越南、巴基斯坦、伊朗的支线，运输路线将近70条。每年都有增开的路线，其中，最长的是从义乌到伦敦的线路，全程运行12451公里，由法国从海底隧道穿越海峡。过去从这些中国城市经由陆路与海运把集装箱运到欧洲内陆城市，往往需要33天到45天，但中欧班列可以把运输时间缩短为13天到21天，将来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沿线的铁轨改造以后，更可以缩短为7天到15天。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已经降到只有空运的

1/5，许多班次比较密集的路线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就可以与传统陆海运的运费相竞争，而运输时长却缩短了近2/3。

到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过12000列，而2018年中欧班列就开行6300列，同比增长72%，其中返程班列2690列，同比增长111%。2018年，以成都为起点或终点的开行班列达到1587列，重庆紧跟其后，开行1442列，相当于每天都有4个班列往返欧洲。班次最密集的还是由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这条路线全程约11000公里，主要货源是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信息产品。原来从欧洲返程的集装箱缺乏足够货源，但经过中国企业积极开发进口货源，以及改善沿途冷链仓储运输设备以后，不仅大批的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装修建材、电子产品和木材等可以从欧洲国家运回，各种原来依靠空运的保鲜食材也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现在一些中国沿海城市的超市或新型量贩店都可以买到从欧洲与中亚进口的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包括肉类、红酒、巧克力、矿泉水、谷类、蜂蜜、咖啡、茶叶及乳制品等。我的好朋友周阳山教授在金门大学教书，他经常搭渡轮去厦门采购这些新奇的商品。他兴奋地告诉我，过去少见的波兰巧克力、匈牙利猪肉、荷兰鲜奶、斯洛文尼亚果汁、冰岛矿泉水、西班牙熏肉等，现在都很容易在这些新型的超市里买到了。这些走入中国家庭的产品之背后，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千百万的机械技师、林场工人、养蜂户、养猪户、畜牧场主、葡萄酒商、石材师傅、瓷砖师傅等。

[1]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he Transport Corridors, 20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1878/9781464813924.pdf>.

[2] https://think.ing.com/uploads/reports/Tradebelt_final2.pdf.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十分强韧还是十分脆弱？还是有些环节强韧有些环节脆弱呢？让我先从一次亲身经历谈起。

2017年7月，我应邀参加一个很盛大的海上东西文化论坛，要搭一艘波罗的海邮轮参加12天的海上活动。这艘邮轮于7月1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邮轮码头16点准时开航，15点要完成报到手续。也就是说，你误了这个开船时点就错过了整个会议。我是7月12日晚从台北出发的，乘的阿联酋航班预定中午12点45分抵达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距离开船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而且这次航程的出席者来自世界各地，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海口、纽约等地出发，绝大多数航班都是当天上午抵达。结果全船400多位旅客，都实时抵达码头，顺利上了船，16点准时起航。

这样几乎天衣无缝的旅程衔接经验，并非特殊幸运所赐，而是全球千万名旅客的正常预期。全世界每年有二十几亿人次的跨境旅程，大多数旅客的行程基本都安排得非常紧，顶多预留几小时弹性时间。我们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才能让我准点完成这样的重要旅行。

仔细去想，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复杂。我拿了一本旅行证件到瑞典通关时，海关边防人员用机器一扫描就可以辨别旅行证件的真伪，也取得了我的身份资料，就挥手让我入关了。这中间有多少政府和政府之间、边防和边防之间的协议，所有国家护照的条码要统一，护照制作规格要统一，每一个国家海关边防的每一部扫描仪都要规范化。我乘坐的这班飞机从台北出发经过迪拜，飞跃过多少国家的领空，飞过多少航空管制区与防空识别区的交接，从一个空管当局到下一个空管当局。我在台北买机票用的是新台币，阿联酋航空公司跟我完成一个契约行为，它收我的新台币，然后把我准时送到斯德哥尔摩。这里面涉及多重的换汇与跨境清算机制，阿联酋航空需要用各种货币支付不同的开销，从飞机贷款、燃油、不同国籍雇员的薪资，到支付给沿途政府的机场使用费、领空通行费、营业税等。当然，还有很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航权协议与飞行器管理规约。

今日世界任何时点都有上万架飞行器在全球不同时点、不同的空域穿梭，它们都要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制定的规范下运行，遵守国际民航组织认可的航线与飞行高度，以规格化的班机识别方式穿越各国空域的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世界是高度有序的，因而能够保障成千上万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从事非常重要的跨国空间穿越。

仔细想想，这其实得来不易。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无数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以及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信、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流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流、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它们有些是政府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规则及相应构建的治理机制承载很多制度，履行很多规范，为国家、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以及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的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如臂使指般运营，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那样精密地运作。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支撑全球化的结构基础基本上相当厚实，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例如，“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在摸不清是否还有后续攻击的情况下，立刻下令境内所有飞机停航，北美空域全面禁航，所有民用机场关闭，所有正飞向美国的国际航班折返，美国与墨西哥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关闭，所有港口的装卸作业暂停，所有正驶向美国港口的船舶一律在外海停泊，华尔街股市无限期休市，等于是让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运行大范围停摆。不过，这个应对非常状态的紧急措施很快就逐步取消，因为不实时恢复常态的话经济损失将会难以估计，甚至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如美国这般强大也无法长期承受，所以北美空域全面禁航仅维持了48小时就陆续开放。停摆最长的是美国股市，休市长达13天，在这13天中许多金融违约交割的法律责任可以获得豁免。

美国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跨境货物、人员、信息与资金的常态流动。这个压力就体现了我之前所说的，全球化已经构筑了广大而厚实的利益交换与分享结构，这是支撑全球化的最重要社会基础。美国政府为应对“9-11”事件所采取的措施，除了美国社会本身需要付出成本外，所有美国的经济伙伴也需要帮忙承担，不过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都表达对美国的同情、支持与谅解。它们也都愿意承担短期经济损失，也愿意分担日后的全球反恐行动以及更严格飞行安全措施的成本。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从“9·11”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运作仍需仰赖国家公权力的配合。所谓配合包括提供人身与财产权保障，提供司法救济以确保跨境合约履行，维持跨境基础设施与金融联通机制的正常运作，让国内法规接轨国际通行商务规则，而这些机制都需要政府间的协议与互惠合作。所谓配合也包括各国政府大幅放宽对贸易、结汇、人员、信息与资本流动的管制，积极推进多边合作机制，提供贸易、投资与人员往来便捷措施，以促进区域与全球经济整合，甚至把部分主权（例如边境管制、货币发行等）让渡给超主权机构或多边体制。此外，也需要通过政府间多边体制与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包括国际清算、稳定汇率、航行安全、通信安全等，特别是在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危机时，发挥最终贷款人与信用担保人功能。

当然，不同国家政府公权力的作用差异悬殊，最关键的国家行动者还是那些极少数对全球经济有系统性影响力的政府。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必须在这类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国家行动者，可能选择牺牲一部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与资源分配效率，而强迫市场参与者与跨国企业让位于其他更优先的国家目标。过去30多年的总体趋势是，这些安全领域的目标被界定在越来越明确而逐渐指定缩减的范围内。而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可以享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与自由，而且拥护全球化的政治精英也认为，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与这些目标未必是互斥的。

从这个角度看，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这些基础结构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正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9·11”事件就像罕见的一场真实社会实验。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短暂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

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

费市场、最大制造业平台与最多数量科技专利，它们也有部分这方面能力，但其影响幅度和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除非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发动一场动用核武器的战争）。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输出国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影响力还是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见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这样一种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的社会代价大到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会经由复杂的机制传导与反馈，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美国政府的力量也有极限

虽然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拥有强大的系统性干扰、阻断与破坏能力，但美国也是当前全球化体系下最大的受益者。2017年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4.6%，但消费了全球17%的能源，总体商品与服务消费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还多出38%。美国不但享受到价格低廉的商品、农产品与能源的供应，还可以靠发行国债与印发美元来长期透支消费，同时美国还可以借助它拥有的跨国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技术规范与市场规则主导地位，攫取巨大的商机与特权。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驾驭国家机器的美国决策精英是不会轻易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龙头地位，以及对全球金融与网络通信枢纽的主控地位，而对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进行粗暴破坏以及制造不可测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一旦各国政府与全球市场参与者对美国主控的跨国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市场规则失去信任，要修补这种制度信用损失非常不易。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政治精英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来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采取激进单边主义措施，以及漫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

可叹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已出现严重失灵，才会让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巧夺总统宝座，才可能让特朗普身边的鹰派大将放任国家机器各路鹰犬各自四出寻找猎物，也才可能出现美国国会精英难以抑制对遏制中国的情绪性冲动，也才可能让美国政治体制内原有的利益妥协与权力制衡机制失去应有的节制作用。所以，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支撑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来源，特朗普的鲁莽作风也是对全球化利益分享结构与社会支持基础是否厚实的最大考验。现在看来，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准备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围堵，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剥离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也不易持久。

华为事件也是一场罕见的真实社会实验，一方面，让我们见识到美国国家机器的蛮横与粗暴本性，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国际体系日趋极化与超级全球化时代，强大如美国政府也有其能力之极限。特朗普政府可以说用尽了“洪荒之力”来封杀华为，但无法把华为一枪毙命。过去，里根政府利用司法诬陷手段封杀日本日立公司的半导体部门，奥巴马时期美国司法部门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击垮美国通用公司强劲对手——法国阿尔斯通（Alstom）集团，都是手到擒来。当然最大的区别是，当年日本政府与法国政府是无法支持本国企业抗衡美

国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标杆企业之合法权利被践踏，而今日华为有中国政府与中国市场作为靠山。尤其在中国政府于2021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后，中国政府有了法律武器，可以对有关国家的实体与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外，华为的先进技术实力、多重预备方案的后手准备，以及在全球通信产业供应链中的长线战略布局，也的确超出特朗普团队的想象，所以才会上演这样一幕旷世丑剧——一个超级大国居然需要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5G通信设备厂商。在美国国防、情报、外交、司法、金融、商务、贸易、通信、专利等联邦政府各部门祭出撒手锏之后，的确让华为在欧洲的5G业务发展受到压制，但包括德国、西班牙在内的许多欧盟国家仍顶住美国的压力，允许电信设备商采用华为5G通信设备。

拜登上台之后对华为的打压并未有任何放松的迹象，不过许多美国企业仍未放弃放宽禁令的希望。华为的芯片供货商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均私下游说新政府的商务部，希望针对华为禁令网开一面，它们担心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会受到挤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在谷歌停止对华为手机提供安卓（Android）授权后，华为采取断臂求生策略，把平价智能手机业务分割出来，让荣耀成为独立的手机制造商，绕开安卓授权的障碍。而华为自己的高端手机则采用自行开发的鸿蒙操作系统，并在2021年6月决定捐出鸿蒙全部基础架构，全力带领协力厂商共同打造鸿蒙生态系统。

网络时代的无硝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及一起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像2019年7月间韩国与日本之间爆发的贸易冲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冲突的起因是2018年10月和11月，韩国法院先后判决日商新日铁住金和三菱重工必须赔偿二战时期的韩国强征劳工。韩国法院随后裁定允许扣押新日铁住金在韩国的资产，韩方受难者家属接着要求法院裁定对三菱重工在欧洲的资产申请扣押。韩国的索赔行动招致日本政府严重不满，双方关系陷入冰点。日本政府于2019年7月1日突然宣布改变对韩国出口的优惠待遇，将对战略材料的出口采取更严格的管制（也就是必须逐次取得政府许可），并从7月4日开始，对三种化学产品实施出口管制。这三种化学产品是生产半导体、电视机和智能手机屏幕必备的关键化学原料。这个决定可能对韩国三星集团与LG集团造成严重的打击，甚至威胁韩国内存芯片和智能手机的全球供应。接下来，韩国民众发起了拒绝赴日旅游与拒买日货运动。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越高风险越大。^[1]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做相互伤害的事的。像日韩之间爆发的相互经济报复，是源于殖民时期遗留的历史债务，其损害范围应该是可控的，还不至于导致双边经贸关系的全面裂解。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信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博弈的武器来用的话，那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这种可以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主要是美国。尤其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这也是对美国抱持高度疑惧的国家，不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作为自保的终极手段的原因。

美国既是过去30多年超级全球化的塑造者，也是当前全球化面对的最大风险来源。随着美国国内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势力抬头，随着美国作

为后冷战时期唯一超强的权力基础不断流失，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美国的决策者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武器使用的冲动就会上升。但是，有识之士都明白，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武器使用的做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终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就在2019年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2]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撒手锏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因特网封锁。不过，即便在美国与苏联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撒手锏都仅仅在小范围内使用，只是针对特定的苏联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虽然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可能曾经设想对中国动用这些撒手锏，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这些武器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政策选项，因为如果美国对像中国这样在全球经济体系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巨量经济体动用这些武器，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首要敌对国家，例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因特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烈损失，但是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同时，因为制裁的对象并不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只有伊朗算是比较有分量的），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给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埃瓦尔德·诺沃特尼（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害SWIFT的信誉。^[3]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完成金融交易，它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因为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

必须接受欧盟的管辖。而且SWIFT也同时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这是因为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 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对SWIFT拥有重多的实质掌控机制。首先，美国与其盟友国家的银行会员代表在SWIFT理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其次，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负责运行CHIPS的纽约清算所及其会员的管辖权，让SWIFT不得不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且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也有权以反恐为名监控SWIFT的信息。最后，美国司法部还可以使用长臂管辖，根据国内法来起诉SWIFT理事会的成员，控告他们刻意协助特定金融机构或企业躲避美国对特定国家的经济制裁。

如果美国政府有一天欲将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毕竟，2017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公开谈话中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执行联合国通过对朝鲜经济制裁方案，美国将考虑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包括拒绝中国使用国际的美元体系。^[4]他的口头威胁隐约透露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曾经评估过，对中国使用这个经济制裁终极武器的可行性。当然，美国决策者会发现，这个选项的后果将严重到自身也难以承受。首先，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大型银行之间有盘根错节的交易关系，这些涉及天文数字且层层叠加的金融交易合约，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违约，必然会引爆连环违约，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华尔街利益集团一定誓死反对。我们可以设想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中美双方在金融领域不断升高制裁与报复措施，美国机构投资人手中持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应该说，只要有任何迹象透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相互毁灭的金融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从深层战略角度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国债境外第二大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将对美元作为世界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中国可以运用手中所有的经济与金融筹码，要求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自己的进出口商改用人民币报价与结算，并全力推进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石油期货、黄金与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交易平台，并大幅增加与美国以外国家央行的换汇规模，以便利双边贸易以本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同步改采以国债（就是以未来财政收入为担保）搭配一定比例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并指导金融机构全面使用在2015年已经启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而CIPS的功能之一本来就是作为SWIFT的备用系统，完全可以处理其他币种的跨境支付。

当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政策工具、谈判筹码及备用机制来应对美国的金融封锁时，美国决策者在理性评估之后就更难动这个念头。不仅如此，中国具备另起炉灶的能力时，就可以牵制美国霸道的单边主义，让美国在缺乏国际正当性的情况下，不至于轻易利用SWIFT的特殊管辖能力来对第三国采取金融制裁，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增加中国提供的替代性国际支付机制的吸引力。长期来看，像SWIFT这种在电报时代成长的机制，未来最大的竞争者将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国际支付系统，中国政府未来可以考虑支持一个以赋予人民币合理权重的去中心化网络支付体系，作为节制SWIFT独占地位的平行机制。^[5]

至于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因特网封锁这个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通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终于勉强同意放弃对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排他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在奥巴马总统卸任前，ICANN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去除一切控制和监督的最终协议，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ICANN正式转化为独立的国际非营利机构，以“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代替美国的单方管辖。所以理论上，美国政府已经无权直接下令ICANN撤销某个国家的特定网站域名（也就是让这些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从因特网的世界中消失）。

不过，尽管ICANN取得了独立地位，但仍留下一个尾巴。构成现今因特网技术的基础协议的，就是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四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IPv4），这也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IP地址长度为32位的规范。而ICANN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因特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6]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

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上仍属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法人，总部也仍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延伸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过去，网络世界的流量主要产生于美国，所以，以美国为中心枢纽的根域名服务器布局有其合理性，但随着亚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网络流量快速增加，以及这些地区使用者彼此之间的搜索与传递信息的需求大量增加，在美国境外开始增设许多根域名服务器镜像。例如，以前南美地区因特网访问的根域名服务器镜像设在美国迈阿密，后来南美洲本地流量增多，在巴西、阿根廷与智利设置了根域名服务器镜像，传递信息就不需要再绕道迈阿密。当中国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际网络使用者时，中国境内也开始增设根域名服务器镜像，像在北京就陆续设置了四个根域名服务器镜像，分别是I、J、F、L根域名服务器。在北京的I服务器镜像，与美国及欧洲的I服务器共享一个IP地址，内容是完全同步更新的，中国、美国与欧洲的系统管理者都无法私自单独修改内容。所以，美国过去独享的网络治理单方管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想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网络封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IPv6相对于IPv4的主要优势，不仅是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而且大幅提高了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IPv6的另一特点就是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从2015年到2018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划”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也成功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因特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1]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Introducing a New Paper o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Lawfare*, July 31, 2019.

[2] Ellie Geranmayeh & Manuel Lafont Rapnouil,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Secondary Sanctions,” A report for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5th June, 2019.

[3] “ECB’s Nowotny Opposes Ejecting Russia from SWIFT System,”Reuters,February 26,2015.[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ecbs-nowotny-opposes-ejecting-russia from-swift-system-report-2015-2](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ecbs-nowotny-opposes-ejecting-russia-from-swift-system-report-2015-2).

[4] “Treasury’s Mnuchin: China May Face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Reuters,September 27,201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sanctions-treasury/treasurys-mnuchin-china-may-face-new-sanctions-on-north-korea-idUSKCN1BN1P1>.

[5] 张岸元.超越SWIFT要有新路径[EB/OL].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 (2019-0801) .<https://mp.weixin.qq.com/s/kRI5yBDbFO8vN7KhPj5YMg>.

[6] DNS是域名服务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

无法任性的巨人

美国打造的全球化让自己越来越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在不知不觉中被众多的小矮人儿以各式各样的绳索与管线一层层缠身，虽仍有孔武有力的四肢，却难轻易对周边小矮人儿动手动脚。特朗普就像是一个亟欲指挥身体挣脱这些层层束缚的冲动大脑，但经过几番折腾，他终会发现这些缠身的束缚，并不单单是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绳索，也是帮身体与外部环境交换能量与养分的流通渠道，硬生生地拔掉这些渠道也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与痛楚。

过去，美国政府用霸凌手段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以及拆解法国电力设备巨头阿尔斯通，都顺利得手。美国也一向习惯于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个别击破，轻易就能让自己的贸易伙伴跪地求饶。如今美国想要如法炮制来对付中国却倍感吃力，从特朗普的鹰派智囊到拜登的“国安团队”都在这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之中挣扎。他们很不心甘情愿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美国企业无法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政府的债务信用与美元币值信用还需要中国剩余储蓄以及中国企业优质资产的支撑，也就是需要中国将贸易顺差中累积的外汇不断通过资本账户回流美国公债市场，以及不断吸引高获利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持续在美国上市。想要挥舞贸易战大棒就让中国屈从美国的不合理要求是不现实的，想用经济脱钩的筹码来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体制更是异想天开。所以拜登上台后，虽然出于国内政治考量不愿主动结束这场损人而不利己的贸易战，但也不敢再轻言抬升贸易冲突。

美国政策精英对于中国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多方面赶超，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恐惧。过去70多年，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从来没有面对过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他们无法想象美国不再享有科技领先优势的景况，因为他们担忧，一旦失去科技领先优势，美国的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就岌岌可危。所以从特朗普到拜登，都身不由己地不断升级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当他们发现尽管自己动用了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长臂管辖”来打击华为，却无法达到一剑封喉的效果，他们的失望与挫败更强化了深层的恐惧。美国行政部门就会绞尽脑汁、变本加厉，不断把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但是，美国高科技产业领袖对于中美科技产业脱钩的趋势，是忐忑不安的。他们深知，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会动摇美国高科技龙头在诸多高科技系统平台上的独占地位，这是一把双刃剑。

在美国威逼下配合出口管制的欧洲企业更是忧心忡忡。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光刻机巨头艾司摩尔（ASML）总裁温尼克在接受美国新闻媒体采访

时表示，由于最高阶的极紫外光刻机无法出口到中国，他担心一旦中国被逼急了，不出15年就会什么都自己做。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中国的生产成本较国际低，届时艾司摩尔可能就得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1]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间爆发全面冷战的概率并不高，因为经济代价将高到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与企业都不愿意承受，而逼使中国弃子投降的概率却接近于零。特朗普每一次加大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力度，都会给美国国内利益团体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零售行业已经明确告诉特朗普，新增的关税绝大部分都会转嫁给消费者；美国中西部种植大豆与玉米的农民已经叫苦连天，因为他们可能永久失去中国市场；一旦中国全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供应链体系，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必然要蒙受巨额损失。

^[1] 参见“Chipmaker CEO Says Washington’s Anti-China Tech Blockade is a Bad Idea,”Politico, April 23,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tech-sovereignty-china-peter-wennink-asml/>。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的，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板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得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现实，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2]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我们不要光看西方社会部分受损者的反扑，而忽视广大沉默的利益攸关者，更不能低估非西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广大潜在受益者对全球化的拥护。我们看到全球化在制度安排上的脆弱一面，但也不可低估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各种机制的弹性与韧性。

虽然，当下的世界的确存在类似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悲剧重演的风险，但形成系统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因为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与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几乎不可能做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政治工程。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以及很多中小型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实社会精英都明白自己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与国际规范。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度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其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超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新时代全球化方案，将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共商、共建与共享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中国还会持续开放市场，让各国企业可以借助中国广大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来增强扩张与升级动力，并

搭建新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与所有国家（但可能不包括美国）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长远来看，全球经济的深层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发达国家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中国是否要选择退出西方主导的体系，而是西方国家是否要积极加入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板块，而这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

[1] “US to Deny Tariff Relief for Apple Mac Pro Parts from China,”Nikkei Asian Re view,July 27,2019.<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Trade-war/US-to-deny-tariff-relief-for-Apple-Mac-Pro-parts-from-China>.

[2] <https://www.macrumors.com/2019/07/30/apple-mac-pro-united-states/>.

第五章 中国道路与人类未来

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超级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瓶颈的强烈意愿。第一次有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作为其他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的考量；而且作为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并尊重国情差异，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政变。这种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当前西方国家内部排外民粹主义涌现，全球经济正面临逆全球化政治潮流的冲击。尤其是美国推行的保护主义与激进单边主义，以及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对现有全球多边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也对全球化进程构成严重干扰。在此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关键时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正主动协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盟国家，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健康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给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各种深化区域经济整合、多边开发融资、双边与多方政策协调、跨国基础设施共享、扩大文化与教育交流，以及科技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加速创建、增长与强化。尤其是获得众多国家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并积极推进全球经济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促使经济全球化能与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增长目标更紧密地结合。

我们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中国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课题。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责任，也才能看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然后一步步发展成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么曲折，多么不容易。中国过去70多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在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其他各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中国在既有的发展道路上能够持续前进，那么她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未来。过去40多年，中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球化进程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未来中国还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回顾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专题报道。^[1]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非常醒目的历史地图,信息量很大。这张历史地图最早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采用,它是根据著名的世界经济史专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的历史估算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2]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在前面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西边,古有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以及环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等,后有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在它的东边与东南边,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的古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于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从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往西北移动,1820年以后,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加速,一直往西走,这就体现了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往西牵引。一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分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北大西洋中部。接下来又开始起变化了,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1960年就开始慢慢往东移动。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重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1980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快速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2010年以及预测到2025年,重心还将继续快速东移,当然之后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显然就是中国崛起,它是最大的一个牵引力量。这张图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甚至回到更早的两千年前的起点,也就是回归更悠久的历史常态。所以《经济学人》在这篇报道里感叹,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

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前进。

图5-1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根据过去200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3\]](#)这张图清楚显示，从1820年（也就是清嘉庆末年）到195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力达到顶峰时，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这些西方国家长期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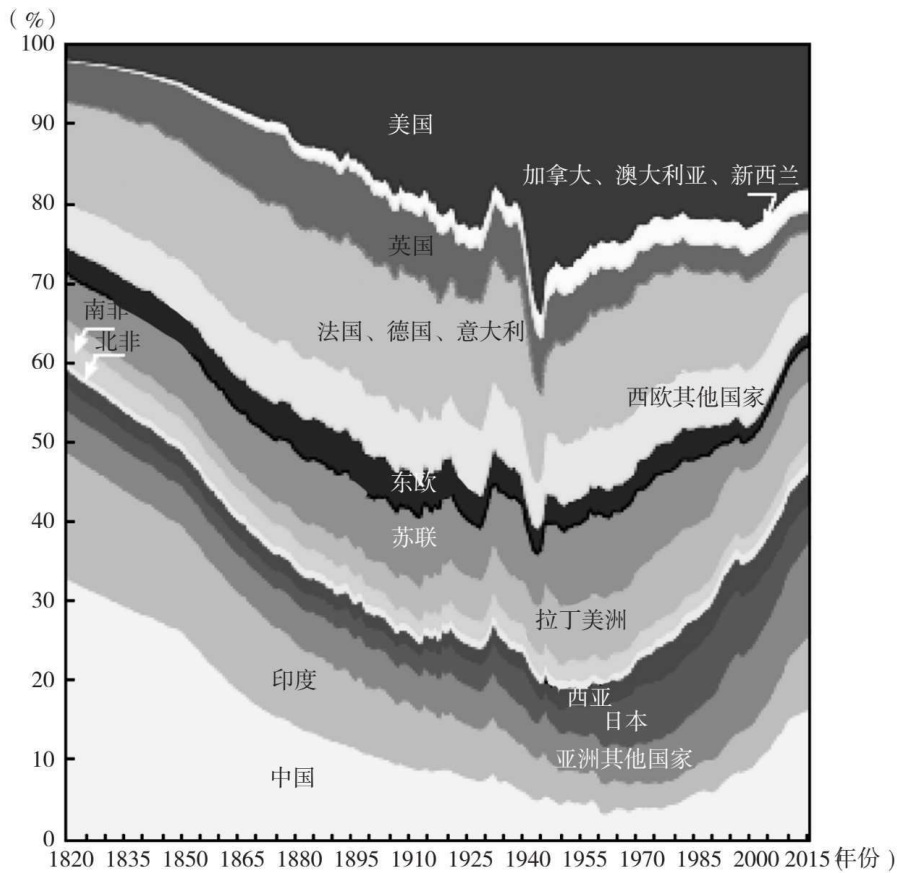


图5-1 全球经济份额两百年来变化，1820—2016年

资料来源：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

图5-1中最上面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

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后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接下来就是荷兰等中小型西欧国家，以上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上的“西方”。所以将近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西方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比重一路下滑，相继被葡萄牙、荷兰、法国与英国殖民的印度，下滑更为严重。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日本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40多年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趋势形成，尤其是亚洲的崛起，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后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非凡，因为这批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交换游戏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并积极把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它们从不依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依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而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则非常不同，从16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躏、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之上。

面对西方崛起过程中班班可考的弱肉强食、奴隶贩卖、种族屠杀、殖民掠夺，以及通过战争扩张领土与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残暴行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选择避而不谈，也对战争动员对激发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4]例如，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学派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他的作品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5]而后起之秀如哈佛大学的阿西莫格鲁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像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这些前殖民地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6]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以及降低交易成本。

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刻意轻描淡写西方国家发展过程普遍采取的产业政策之历史经验，剑桥大学的张夏准教授写的回顾西方国家发展策略的著作，取了一个有趣的书名——《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来讽刺西方国家知识精英的虚伪。也就是说，当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登上了工业化的楼阁之后，它们就把梯子踢开，重新杜撰与包装它们过去的发展经验，掩饰它们成功工业化的真正要诀，企图阻止发展中国家循着它们走过的工业化路径登上阁楼。^[7]

人类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年（1492年），有大约1.45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有90%以上灭绝，也就是有大约1.3亿人因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8]美国的崛起就是一部从13个州开始向西扩张领土的历史。而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对他们进行种族屠杀，也包括胁迫无暇他顾的欧洲殖民帝国（如西班牙、法国与沙俄），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原来仅仅在名义上拥有而其实是强占的土地。美国还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又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多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45万亿美元。^[9]同时，在将近两百年的殖民期间，累计有18亿印度人因严重剥削与生活条件极度匮乏而死。所以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二战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结束。

^[1] “A New Hegemon: The Chinese Century is Well under Way, Many Trends That Appear Global are in Fact Mostly Chinese,” *The Economist*, October 27, 2018.

^[2] 全球经济重心的位置估算，是根据当时各经济体的地理版图与经济总量的加权，来计算全球经济地理的三维空间均衡点所在。估算方法的详细说明请参考：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First published on-line, 05 January 201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758-5899.2010.00066.x>.

^[3] Lackshman Achuthan, “America First in Perspective,” Presentation at the 26th Annual Hyman P. Minsky Conference, April 2017. http://www.levyinstitute.org/conferences/minsky2017/achuthan_3_s1_2017.pdf.

^[4] 有关战争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关键作用，可参考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书有关“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的讨论。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Vintage, 2015)。

^[5]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6]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 , No.5 (December 2001) , pp.1369-1401.

[7] 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2002) .

[8] Alexander Koch,Chris Brierley,Mark M.Maslin,and Simon L.Lewis,"Earth System Impacts of the European Arrival and Great Dying in the Americas after 1492 ,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19,207 , pp.13-36.

[9] 参见Gideon Polya,"Legacy of Colonialism: Britain Robbed India of\$45 Trillion and Thence 1.8 Billion Indians Died from Deprivation,"Global Research,December 19,2018 ; 并参见两位印度学者完整的历史分析 , Utsa Patnaik and Prabhat Patnaik,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 。

中国速度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对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复制。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国加速器”（China accelerator）这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孵化器公司的副总裁，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库，比较了中美发展速度，来阐释何谓中国速度：从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

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大板块、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多少时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呢？美国总共花了117年。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而中国在建设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速度早已让美国瞠乎其右：到2018年，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现在中国已经有近13亿人用上4G通信，4G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远远超过美国。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体经常说“China Speed”？什么叫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版图上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7亿多人脱贫（按照国际极端贫困标准衡量），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年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从1990年开始，到2015年之前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能达成，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

下面这张图（见图5-2）说明了过去一百多年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是多么不容易，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也不断在增加。二战之后出现了婴儿潮，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尽管许多地区出现不错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努力在脱贫，但是全球范围的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趋势。

▲ 全球数据

▲ 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上的人每天生活费少于 1.25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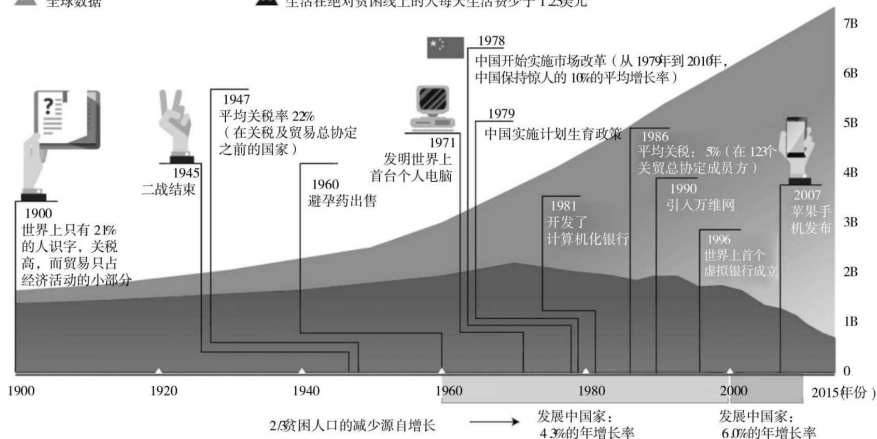


图5-2 世界贫困的“终结”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折点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不断快速下降，这里面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1990年中国还有7.5亿多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万人。^[1]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帮助它们消灭贫困的努力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达成后，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然，任何快速的经济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经济学术语叫作负面外部性。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以这样的神速发生变化，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中国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国的3.9倍。在很短时间里，中国碳排放量从非常小到迅速变大，尤其是在1980年后直线上扬。虽然中国人均的碳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1/4，但总量在2008年前后就已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这一趋势也将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1]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hart-end-world-poverty-sight/>.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涵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涵。整体而言，中国复兴带动世界秩序的重塑，具体而言，中国崛起带动了六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 4.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盛，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 6.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又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作用巨大到前所未见。因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的力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吸纳进来。全世界的地域或人群几乎没有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或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力量起到了关键的放大与加速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关键之一。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中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今日的美国与苏联解体后美国曾经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强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及路径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及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

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接着，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的导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国，这些亚非拉国家虽然独立了，但各方面都难以摆脱对曾经殖民过它们的西方国家的依赖。比如法语非洲国家长期高度依赖法国，自己的军队与情报人员都要由法国培训，甚至自己的外汇储备也都存放在法兰西银行。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都依赖英国。长期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比较薄弱。但是中国快速崛起后就不一样了，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可以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建立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然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了积极性与建设性作用。在G20框架下，中国倡议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地位。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正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它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金砖国家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包括联合国及G20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

最后，中国已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或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一向主张赋予国有开发基金、发展援助机构、多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主导的开发计划，在推进区域融合与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也积极倡议让更多个体与微型企业参与全球经济，为跨境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分享经济、万众创业等全球化新路径，打造有利生态环境。因此，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使西方国家非常不适应，西方社会精英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是预料中的。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改变了建设性交往政策而全面转向战略围堵，其根本原因是70年来美国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

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角色的转换心理非常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间很难调整。西方国家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仍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们对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与退位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中国要量力而为，不能挑超过自己能力的担子，或者在别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挑这些担子。同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承担国际领导者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是利人利己的，可以创造很多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

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最重要力量，中国不但会提前达成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顺势治理国内空气污染问题，以带动绿色能源产业发展，而且还将利用自己的技术与设备协助发展中国家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1]所以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做一个“领头羊”，尽力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至少将近1/3，有时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所以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

经济体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不到20%，在18%左右。

到2016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后来居上。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在短短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速度惊人。^[8]

根据AidData（援助数据库）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在官方发展融资领域，2011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2]当然在每个地区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还是最大的。在非洲的话，欧洲国家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绝对居于领先地位，不管是在通过经济互通有无拉抬欠发达国家方面，还是在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方面。

中国近年来提供大量机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人士来华进行在职进修与技术培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气象、工程、扶贫、能源、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或承接大项目时，不仅大量雇用当地人，也会提供在职培训，甚至将部分骨干成员带到中国培训，也就是在帮这些国家提升人力资源。^[3]此外，中国也扮演着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中国体量大，针对不同地区的合作需求，中国已经建立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例如，中国与非盟共同搭建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阿拉伯联盟合建的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与中东欧16个国家共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等等。这些协商与合作平台都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很多专项合作，展现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与全方位互联互通架构的强烈意愿。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构建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日后如何落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精神、传递的政策信号具有历史性跨越意义。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或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运作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与焦点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易的。^[4]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主要由两个集团主导，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还有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因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却逐步升级，已经变成“金砖+”，因为中国计划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这些重要新兴市场国家都吸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和西欧，但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获得广泛关注，该报告也被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引用。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E7）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5]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未来在世界经济中这些板块比较大的后起之秀更为举足轻重。根据购买力平价GDP来估算的话，在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了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持平了，当然在名义GDP上可能还有落差。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会是G7的两倍。在过去，这个变化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未来20年我们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也依据这份分析报告，替我们描绘了205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轮廓（见图5-3）。^[6]届时，以购买力平价GDP为比较基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非中国莫属，经济总量将达到前所未有的58万亿美元；印度的经济规模将可超过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屈居第三。传统的七大工业国，只有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还会进入前十大经济体。日本将下降为第八大经济体，而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与墨西哥在经济体量的排名上都会超越日本。

这也难怪美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在他的著作中，用“东方化”（easternis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21世纪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他认为从20世纪到21世纪，全球版图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国际政治与经济重心不断向东移，也就是向亚洲，特别是向东亚移动。他对亚洲日益上升的经济实力深具信心，东亚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贸易的最重要源头，而中国必然成为亚洲的龙头。在这个大趋势下，亚洲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就像欧洲曾是19世纪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舞台一样。^[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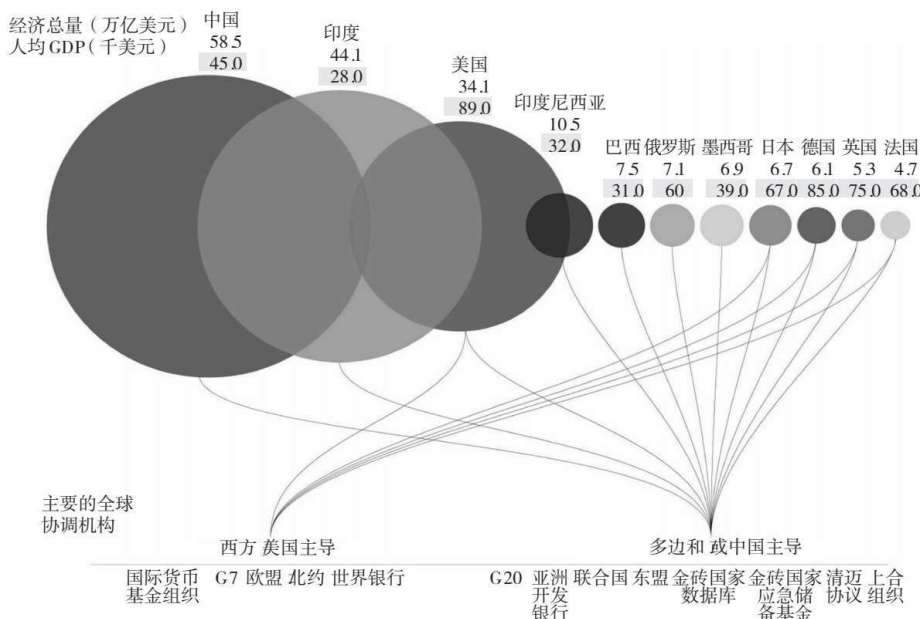


图5-3 205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预估

资料来源：All data for 2050 are drawn from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LLC'The World in 2050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February 2017 as of March 72018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 National economic data World Bank'GDP Current US\$webpage undated as of February 12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7 as of February 12201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9/19/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7>.

[1] Barbara Finamore, Will China Save the Planet ? (Polity, 2018) .

[2] “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Footprint: The Clearest Look Yet at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Worldwide,” AidData: A Research Lab at Williams&Mary. <https://www.aiddata.org/china-official-finance>.

[3] 可参考麦肯锡咨询公司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1000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报告《狮龙共舞》。根据这份报告，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用当地人的比例达到89%，

而且对64%的员工进行培训，参见：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 June 2017。

[4] “Hangzhou Communiqué: G20 Summit Concludes with Historic Consensus on World Growth,” Tralac, September 6, 2016. <https://www.tralac.org/news/article/10415-g20-summit-concludes-with-historic-consensus-on-world-growth.html>.

[5]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

[6] Michael J. Mazarr, Summary of Building a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ject (Rand Corporation, 2018), p.13.

[7] Gideon Rachman, 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 (Other Press, 2017).

[8] Jeff Desjardins, “Four Maps Showing China’s Rising Dominance in Trade,” Visual Capitalist, first published on April 27, 2016.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four-maps-showing-chinas-rising-dominance-trade/>.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在这些全球变化趋势下，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关系更加紧密。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福祉最关键的五个方面着手，协同其他国家追求普遍安全、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境界：第一，共同保护地球的生态和公共领域；第二，建立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第三，维持全球化的前进动力，并修正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促进包容性增长，扩大经济受益群体，让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更加坚实；第四，全面改善全球治理机制长期处于落后于全球社会发展需求的状态，并改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与质量不佳的问题；第五，携手不同文明体系共同探索科技大爆炸时代社会制度创新的机遇与挑战，发掘新兴科技的巨大经济效益，并引导新经济效益果实的合理配置，同时勇于实践创新型的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共同应对新兴科技蕴含的巨大社会风险。

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金融资本、军工利益集团或数字科技巨兽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愿意学习与引进其他国家最佳的实践经验，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

还有，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科技自主创新生态体系，在许多新兴科技领域开始走在世界前沿，既可以为14亿人开创全新的知识型经济与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又可以在全球科学知识群体中做出重大贡献，并有余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科技成果及协助培训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统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抱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许多悲观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1]他们着重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也没有其他国家会提供，接下来就会出现如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

济危机。^[2]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协商，并承担起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在联合国维和任务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人力派遣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出资国。因为西方主流媒体刻意忽视，大多数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不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甚至在有些领域中国还提供一些过去美国或西方国家不曾也不愿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的机制。面对东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整个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共同体，乃至面对整个非洲，中国通过“多加一”多边政策协商平台启动很多专项合作，并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美国花很大精力去搭建跟它最紧密的战略伙伴的军事联盟，基本上没有心思帮助欠发达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在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缺乏这种全方位的发展援助机制，最近30多年美国带头创建的美洲开发银行的角色不断萎缩。整个拉丁美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也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的出口结构过于单一，经济结构转型面临严重瓶颈，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巴基斯坦曾经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美国全球反恐行动中最倚重的帮手，但美国从来没有意愿与兴趣去协助巴基斯坦克服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发展障碍。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体制构建，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还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全球IPv6根域名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计价债券，增加发行境外人民币计价债券，培育伦敦与香港成为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办以人民币计价（并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格局。

[1] 最典型的论述就是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的“零级世界”论点，参见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New York: Portfolio,2012) 。

[2] Joseph Nye,“The Kindleberger Trap,”Project Syndicate,Jan.09,2017.<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kindleberger-trap>.

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让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科书模式，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举的市场万能主张有一定的保留，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创造市场架构并引导改革、重组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赋予整个国家机构政策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就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而且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西方国家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非常缓慢，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无法合理反映劳动生产力的提升速度。也就是说，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提升了，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而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1]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在国际劳工组织发布这份报告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官员都想知道中国是如何做到的。^[2]

其实，即使没有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份权威性报告，我们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许多家庭聘用的来自湖南、安徽与四川的家政服务员的待遇，最近十几年的年均涨幅几乎达到8%—10%。在政策力度方面，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每2—3年调整一次，沿海各省的政府也几乎同步上调公务员与老师的月退休金，以及上调低保的补助金额。以广州市为例，职工的年平均薪资在1991年为人民币4022元，到了2016年为89096元，在25年间增长了22倍。此外，

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救济。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绝对是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虽然不同项目各地服务质量仍有差距。

我考察过的从西北的新疆霍尔果斯到东北的吉林珲春，这几年新修的中小学硬件设施与沿海省份几乎没有差距。几乎所有的二线城市与地级市都已通了高速公路、动车或高铁，并能以高速公路连接邻近机场。再加上最近几年力度不断加大的全面扶贫与精准扶贫政策，甘肃、贵州等贫困省份的绝大多数偏远农村，都能达到村村通路、通车、通电、通自来水、4G通信覆盖及接上高标准的宽频光纤网，这种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连美国都做不到。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以2011年为例，运输成本中国是0.28元/吨公里，美国是0.54元/吨公里，美国是中国的1.93倍。考虑到当时中国油价比美国要高20%左右，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仅次于国土面积不到8万平方公里的捷克，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而排名靠前的都是幅员不超过中国一个大省的中小型发达国家，唯一例外的是美国（排第13名）。^[3]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以及各种形态的“淘宝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另外，中国的许多制造业与服务行业雇主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基本食宿作为雇用条件的通行做法，也让劳动要素在全国流动的转移成本大幅降低。这对扩大发达地区的经济外溢效果、人力资本的空间最优配置，以及避免内陆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等促进均衡发展目标都有明显的作用。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

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

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不同于其他依靠能源出口并不断受全球经济波动左右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以稳健的脚步，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下辅以开放的社会政策，来解决食品安全、环境与教育等国家发展问题，大力改善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并建设产业园区与规划经济特区，由上至下培养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动能。

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政治强人梅莱斯总理于2012年去世后，政局面临转型挑战与局部动荡，但国外投资机构仍普遍看好这里的经济前景，2014年以后，外资更是大量涌入。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的邻近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国企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其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埃塞俄比亚也是嗅觉敏锐的台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首选。例如，台湾知名的制鞋厂——兆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看准此地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投资环境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潜力，在2013年投资约5000万美元于博勒莱米（Bole Lemi）工业区设立制鞋工厂。设厂两年后，兆琪又于2015年开始打造新投资案，投入约1.2亿美元在首都东南方的莫焦（Modjo）市建设新生产基地。

[1] ILO, Global Wage Report 2018/19: What Lies Behind Gender Pay Gaps, December 2018.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

WCMS_650553/lang--en/index.htm.

[2] Jayati Ghosh, “What China Can Teach the World about Wage Growth, As Workers Globally Continue to Get a Raw De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2,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united-states/article/2177551/what-china-can-teach-world-about-wage-growth>.

[3] 关于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参见<https://lpi.worldbank.org/international/global>。过去有一种错误的流行观念，以为中国的物流成本非常高，其实不然。物流成本在中国的GDP中所占比重比较高，这只是反映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就是商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的规模特别大，与平均距离特别远，而并不反映单位物流成本。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华盛顿出刊历史最久的政论杂志，并在自由派阵营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周刊》，在2017年5月16日刊登了专栏作家劳伦斯的评论。他以毫不含糊的笔触提醒美国政治领袖，中国大陆在短短35年里使13亿人享有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及其带动的经济繁荣，如今中国准备将这个模式推广到整个欧亚大陆。^[1]从宏观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可以翻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下，中国试图带领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为逐渐失去动能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让被海洋时代抛弃的欧亚大陆内陆国家与中国广大西部地区，从全球经贸网络的边陲摇身一变成为前沿与要冲。“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移除所有妨碍资金、商品与信息专业人士跨国移动的障碍，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现在中国准备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跟美国在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将为全球化打造更厚实的基础，会远远超越传统区域整合所侧重的贸易自由化、旅游便捷化、投资便利化等范畴，而是全面推进基础设施、能源、金融、农业、环境、信息、医疗、科技、电子商务、城市管理、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它们意识形态里非常排斥的。在新自由主义

思维的影响下，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很多国家都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来解决你融资期短与回收期长导致的期限不匹配问题”。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何况这些项目需要全面动用国家公权力，它的长期收益应该归社会所有，而不是由少数境外私募基金攫取。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你现在去非洲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首都和首都之间没有民航航线，你得绕到迪拜或伊斯坦布尔，再飞到另外一个邻近非洲国家。很多邻近国家之间也没有铁路、高速公路或光纤网络，两个非洲国家的直线距离可能很近，但彼此之间的网络搜寻速度却很慢，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未来10年、20年、30年中，中国的这些新倡议，会给世界尤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最明显的应当就是非洲大陆，而非洲又正好是未来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大陆。现在非洲人口已经超过13亿，很快要向20亿迈进，人口对它而言是一个巨大负担，很容易产生饥荒、疾病、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等问题。所以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人类都很重要。

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比如现在中国电信带头与非盟合作，启动“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项目。采取中国典型的“八横八纵”的模式，此宏大的构想已经在逐步落实，大概2023年就可以完成。15万公里宽频光纤网络穿越非洲48个国家，覆盖至少1/4的非洲人口，而且每个国家会在骨干网络之外，铺设当地的枝干网络，将来它覆盖的范围会更大。这等于一口气把非洲的几亿人带入网络时代，给他们带来各种可能性，将来全球消费者可能在阿里巴巴或者其他网站可以直接找到非洲的店家。

另外，中国经济体量特大，产业结构已经全面提升，未来为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深度与广度上必然超越过去西方国家的想象。当然也因此招致西方媒体各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妖魔化的诬蔑，诸如“制造债务陷阱”云云。西方媒体的污蔑都是捕风捉影，倒是中国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促进，确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支撑。

AidData这个威廉玛丽学院的智库长期收集全世界与发展援助有关的所有数据，并且回溯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它也追踪了中国在2000—2014年，在全世界138个国家通过技术援助、工程援助或贷款援助的3485个大型项目，以评估它们的经济影响与作用。测量方法很简单，根据卫星的夜间空照图，看同样一个位置亮度层次与空间分布的变化，因为他们已经有非常完整的经验资料去支持这个模型。这些亮度信息经过测量以后，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当地真正的经济活动与它的人均实际所得，而且还可以看到它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是非常集中还是扩散程度非常大。结果AidData发现，中国投资的这些项目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又让它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覆盖程度进一步扩散，有助于当地所得分配更加均等化。这都是AidData根据14年来3000多个项目的地点的卫星夜间空照图，进行数学推算得出来的重要结论。^[2]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的高速公路，洲际的铁路运输，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很多邻近海洋的国家，如果没有好的深水港，没有好的集装箱码头和伸向内陆的铁路运输，是不好发展的，这两个要搭配在一起。现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进这两块业务。例如，希腊政府因债务危机前几年都快破产了，它把其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交给中远海运集团（COSCO）运营35年。

当然也有希腊本国人说希腊政府是在贱卖祖宗的资产，但其实整体来看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该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比雷埃夫斯港的吞吐量翻倍，未来甚至还可以再翻倍。而且马上开始配合兴建铁路，把连接的铁路一直往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世界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3]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离沿海300公里以上的地方，辐射作用越来越弱。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

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然后每年靠高价卖种子给当地农民来赚钱，这是孟山都公司（Monsanto）干的事。当然，孟山都公司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因为动了它的奶酪，让它以前赚取暴利的模式搞不下去了。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类似顺丰的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是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的，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轻易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1] Patrick Lawrence, "How China is Building the Post-Western World," The Nation, May 16, 2017.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china-is-building-the-post-western-world/>.

[2] Soren Patterson and Bradley Parks,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Reduce Inequal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idData, December 18, 2018. <https://www.aiddata.org/blog/chines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reduce-inequalities-in-developing-countries>.

[3] James Kynge, Chris Campbell, et al, "How China Rules the Wav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7. <https://ig.ft.com/sites/china-ports/>.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乌法（Ufa）市是俄罗斯辖下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距莫斯科1300多公里，地处东欧平原边缘，乌拉尔山南麓，位于联结东欧地区与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枢纽位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在2015年突然成为国际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因为这里举办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双峰会”。

2015年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此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上合组织还有四个观察员国，分别是白俄罗斯、蒙古国、阿富汗与伊朗，这是下一阶段受邀成为正式成员国的优先名单，此外还有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六个对话伙伴。这意味着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会员国也包括了全球七个被正式承认的核武国家中的四个。^[1]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但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的基本宗旨有根本性的区别。北约组织是封闭与排他性的军事结盟与政治集团，有明确的针对性与假想敌，也有意识形态集团对抗的历史背景。北约组织基本上完全依附美国，盟国军队听从美国指挥，基本上完全配合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需要。北约组织不追求普遍的安全，只是狭隘地巩固成员国自身的安全，并不在乎自身的国防方针与军事投射力量是否对周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这是典型的零和游戏思维，也就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集团外国家的不安全之上。从北约组织强势介入苏联解体后的地区的地缘政治重组，以及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就知道北约组织从来不是单纯的集体防御联盟，而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扩张主义倾向的政治集团。

上合组织体现的则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对话协商为手段、以共同发展为目标，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共同与普遍安全的指导理念下，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遵循公开、开放和透明的原则，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上合组织更不

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而结盟的政治集团，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把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强加于人，也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主义。

上合组织可以从最初的边境维稳、打击跨境恐怖主义与宗教激进组织等具体而微的安全议题合作开始，逐步开拓更广泛的安全与经济议题合作，并能成功吸纳南亚的两大宿敌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时入会，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约国，这既展现了主事者的政治智慧，也将必然考验主事者的胆识。在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指导原则下，以及上合组织和金砖峰会的协商与合作机制下，印度政府将有更强的意愿管控好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摩擦，印度的政治精英也会逐步降低对“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的疑虑，也更愿意正面评估中国倡议的“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区域经济整合构想。因为政治互信基础的逐步增强，印度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判断，不轻易落入美国与日本设下的“印太联盟”这个战略圈套。

2018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未来，上合组织还将建立开发基金与发展银行。由于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使上合组织可以就联合推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协商，并付诸实施，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推动力。

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同时也适时提醒国际社会，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形势明显向好，但仍不稳定，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更多挑战，部分地区冲突加剧、恐怖主义、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威胁急剧上升，引发的风险持续增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制定共同立场，有效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

《青岛宣言》特别强调上合组织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要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不断加强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更强化了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也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新的动力。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因为上合组织的成员组合蕴

含了各种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不利于在安全领域互信合作的条件，包括记忆犹新的军事冲突历史阴影，经济融合程度不高，文化交流根基不厚，宗教信仰高度多元，政治经济体制差异巨大，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大量跨境分布，边界领土争议一触即发，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有实际动员能力，区域外超强势力不断蓄意破坏和谐。在这些艰难的条件下，上合组织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并逐步实现所有国家与民族享有普遍的、可持续的安全环境，让文明与文明之间实现和睦相处，并且保障彼此发展机会之愿景。

[1] 2017年实现“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总面积为3435.7万平方公里，占亚欧大陆总面积的3/5，人口约30亿，约为世界总人口的43%。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我跟弗朗西斯·福山2017年在台北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我称之为“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开始探索而已。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地调整自己，去驾驭这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让所有社会群体都有机会享受更安全、健康、富足与充实的生活，让政府的施政方向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让公共服务职能更贴近人民的真实需求。这些都涉及生产组织的变革，社会保障模式的创新，公众表达、参与和问责机制的突破，以及数字资本的所有权、使用权与受益权的全盘制度设计。这才是21世纪社会模式与政治文明竞争的真正焦点所在。^[1]

从这个视角而言，雄安新区的试验的确是千年大计。它试图以全新的发展思路，摆脱以前中国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摆脱依赖土地批租与房地产开发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摆脱城镇户口的僵硬体制，而且首度实现全方位城市智慧管理，以及实施绿色GDP发展指标管理。雄安新区也必定是世界第一个实现5G时代全面无人驾驶的大规模城市。所以雄安新区是践行新发展理念の试验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这座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按规划要求，雄安新区将在2050年完全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雄安新区将充分吸收前沿理念来打造其能源系统：一是基于“互联网+”建设雄安多功能互补云平台；二是按照智慧交通的理念构建交通能源系统；三是用构建产业集群的理念支持地热能源资源开发利用。

从2017年雄安新区正式成立开始，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经过数千名规划人员夜以继日的探讨、论证与精心绘制，2019年1月，《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意味着，雄安新区规划蓝图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即将从规划编制转向大规模实质性建设阶段。

在雄安新区规划编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与可操作性较强的规

范体系。这既是一个由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规划编制过程。2018年，大队人马走遍雄安新区的33个乡镇637个村庄，踏勘形成的村镇报告使规划团队掌握了新区每一寸土地与每一个居民村落的实况。利用一年多时间，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的《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体现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规范性。这套规划的科学方法，未来通过定期评估、完善和提升，将成为引领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标准和示范。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而不是单纯地替代人，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而不是受损，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大家都是学生，没有师父可以跟着学，因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去适应。北欧现在正在开展“无条件基本收入”试验，到底这个试验要怎么去设计，怎么让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机器人产生的经济效益中的很大一部分能够适应社会重新分配，新的所得保障与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转轨与衔接，稳定的财政来源如何规划，现在来看都是难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突飞猛进，以及运算与储存成本快速下降，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非常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悬殊。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如果国家机构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来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甚至可以说是一条邪路。美国社会现在正饱受苦果，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平台来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的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甚至可以操纵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正如被拜登延揽到白宫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所描绘的，“少数几家大企业完全掌控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他强烈主张要强制拆解这些科技巨兽。^[2]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

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到了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3]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华盛顿雇用最庞大的政治游说队伍，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更不应该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应该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的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长期的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像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只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绝对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我最近在很多演讲场合都会提醒台下的听众，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篡改。除非一个人退出现代社会，与世隔绝，

否则无法遁逃于天地之间。纸币可能很快会彻底消失，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也许天堂就是这样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个人就都变成天使了，因为不能做坏事。

伴随超级透明社会而来的，可能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超级透明社会加上超级智慧政府，可以迎来夜不闭户、讲信修睦的人间净土，但也可能导向个人自由彻底消失的极权社会。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对应超级透明社会的应该是超级透明政府，政府针对民众权益的所作所为都应摊开在阳光下接受检验，所有公权力行为都应该留下记录，作为日后问责与纠偏的依据。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建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当政府部门使用替代人为判断的AI系统时，都需要从AI设计源头上内置伦理守则，任何逾越伦理守则界线的状况，都有自动揭露与自动纠正功能。此外，应该将个人所产生的各类数字信息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让不同类别的个人活动、社会信用与经济交易记录分散保存与平行认证，避免单一强制性机构集中保存与认证。

将来很多政府职能都是可以被智能化的，公务员可能被AI替代。现在中国海关很多工作人员工作量不饱和，因为几乎所有集装箱都是通过网上申请自动验关通关，事后再抽查。根据大数据计算机系统，对于记录优良厂商的申报马上就可以放行，事后还可以根据厂商的货料库存、出货量、能源使用、现金流等其他数据来比对稽核。所以海关的职能需要转型，人力资源需要重新配置，海关官员要干吗呢？可以做更多的企业咨询服务与政令倡导，或是根据大数据提供产业经济预测，或去接受新的专业培训，去贫困地区扶贫。^[4]

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将来公安的主要责任可能是维护网络安全、防治网络犯罪和金融诈欺。整个社会形态改变了，公共治理的挑战会变得完全不同。所以，中国若能在这些领域有一些好的制度探索与实践，对全人类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同样起点低、人口规模大、资源薄弱的国家而言，都有重大启发作用。如何驾驭这些科技，增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责

任重大，为了14亿人的福祉，需要迎接好挑战，对其他国家、民族产生示范作用更是如此。

[1] 长风文教基金会.从历史的终结到民主的崩坏：弗朗西斯·福山讲座[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

[2] Tim Wu,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Columbia Global Reports,2018.

[3] Edward Yardeni and Joe Abbott,“Stock Market Briefing: FAANGMs,”Yardeni Research,Inc. , August,2021.<https://www.yardeni.com/pub/faangms.pdf>.

[4] 朱云汉：《AI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及挑战》《AI对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暨产业之挑战及影响》，财团法人中技社主办，2017-02-22，台北。

维护地球生态与公共领域

位于青岛即墨区鳌山湾畔的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在2016年发起“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论坛”。首次会议于9月26日在海洋国家实验室召开，来自20个国家的60余家海洋院所负责人参会。这个论坛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科技领域的“G20峰会”。

在这个会议上，实验室主任吴立新院士向全球专业同行介绍了“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其中包括“海洋星簇”“海气界面”“深海星空”“海底透视”“深蓝大脑”五大计划。最终目标是借助卫星遥感、大型潜浮标、深海智能浮标、水下滑翔机等海洋技术装备，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超级计算机的超高运算能力，发展全球海洋智能模拟器，让科学家在实验室就能知道全球海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海洋的温度变化、水声通道的变化、鱼群的变化等，并能做出预测。

例如，“海洋星簇”计划就是通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观澜号”卫星、创新卫星遥感和组网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将主动微波扫描成像高度计+激光雷达水体剖面同步观测相结合的新体系，构建海洋从中尺度（10—100km）到亚中尺度（1—10km），从表面到海洋上层（500m）的天基观测系统，实现从空中将海洋看得透明。

这个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将以通过建设覆盖“两洋一海”（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的海洋观测系统，建立海洋环境、资源与气候变化的预报和预测系统为近程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与各国海洋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分享与合作，最终建成对全球海洋的海气界面、上层海洋，以及深层海洋的信息实时获取与近期变化预测能力。

“透明海洋”以优先覆盖“两洋一海”为目标，因为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为中国核心战略海区。“两洋一海”的透明化将成为支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基础。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火山、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带，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构成潜在威胁。

2019年3月，我到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调研。潘克厚秘书长给我做介绍时提到，2015年启动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在短短4年之间，已经初步构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区域海洋潜标观测网——“两洋一海”潜标观测网，突破了潜标实时传输这一全球性难题，首次实现深海数据长周期稳定实时传输并共享应用。海洋研究原来是中国科技能力的短板，而“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将为中国在海洋观测与探测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

转变提供一大助力。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向出席海军建军70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海军代表，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针对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正式提出的完整中国方案构想，这也可理解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实践方案。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联合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发海洋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建设美好的地球家园，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

这个倡议的提出，代表着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已经初步达成目标。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海洋领域综合实力，从造船工艺、海港设施建设能力、填海技术、商船运输能力、海洋观测与探测能力、海洋生物科技、海上执法能力，到海军远洋巡弋能力，都逐步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果欠缺这些综合能力，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是无法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唯有具备对全球海洋生态体系变迁理论的系统性理解与精确数据掌握，才可能形成更有效的对抗全球变暖的方案。唯有具备对上层海洋与深层海洋的全覆盖，以及高精度尺度的观测与探测能力，才可能引导国际社会对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形成共识。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是人类生存发展最根本的依托，而地球表面积超过71%的是海洋。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如何保护好上天赋予人类的这个共有资源，节制滥用，做好管理、分配与共享，避免悲剧性的生态失衡，留下永续造福人类的“蓝色银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无法逃避的全球议题。

人类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已经让地球没办法负担了。以前我们认为海洋无限宽广，不管倒多少废水，倒多少重金属，排多少废油都无所谓，它自己会稀释掉。其实不然，我们已经破坏了整个海洋生态平衡。很多国家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某些技术先进国家还试图借助自己技术先进，占用更大的资源。知道鱼群在哪里就设法捕获更多的鱼，知道石油、天然气在哪里，就赶紧开采。不只是自扫门前雪，还非常自私自利地攫取、掠夺和滥用。从这个角度看，海洋治理规范与机制的完善化，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经是刻不容缓。

中国的全球担当

从促进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保障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完善地球公共领域治理，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到驾驭新兴科技的巨大潜力，这些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都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很多涉及区域与全球层级新规范、新规则、新治理机制的建立。在这些领域，中国有无法推卸的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责任。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科技大爆炸所带来的一些新挑战，可能都需要在区域与全球层次建立一些辅助性机制，来支撑每个国家内部的体制改革和法律完善。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AI使迷信武力的国家发动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的心理门槛大大降低。此外，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过去35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处于分配最不公平的时期。大多数群体的收入处于下降状态，消费能力不够，经济也失去增长动力。一些富豪炒金融资产、房地产，将实体经济空壳化，创造虚拟金融交易，因而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对不良房地产资产包装，产生次贷，泡沫破裂，又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损伤，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补窟窿并滥印美元，增加美债，这就是2008—2009年发生在美国的故事。^[1]

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者独厚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小微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里面，让国有企业与

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有一席之地，产业生态会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交易对象，然后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了，只是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另外，一定要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偷税漏税。一些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难以去规范它们，这需要所有国家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否则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趋势不可阻挡，非西方国家之间将会构筑越来越绵密的经济、能源、科技、信息与金融交换与互助网络。这将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这也不是西方的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或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围堵政策所能阻挡的。

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要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需要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集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都将会在这里落地生根。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虽然这个倡议现在还没有开始落实，但引起了欧亚大陆沿线很多国家的兴趣。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的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它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

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全球各地区由于时差，发电与供电的尖峰与离峰彼此错

开，理论上电源完全可以共享。如果将来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等于说，人类把最重要的基础性需求——一天也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捆绑在一起，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再打仗了，也不可能再用网络病毒彼此攻击了，因为大家已经难分难解了。

[1] Joseph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W. Norton & Company, 2012.

第六章 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年4月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赵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让他很感伤的新闻：位于丹佛市联合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就歇业了。《丹佛邮报》的记者很感慨地写道，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等不到顾客上门而不得不关门歇业。^[1]

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印度总理莫迪于2020年3月24日突然公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实施为期21天的封锁抗疫措施。在孟买行医的海尔马斯（Dr Jagadish J.Hiremath），目睹政府的封城禁令让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印度穷苦民众进退失据，于是他在推特上写下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能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免洗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2]

这两则对比强烈的新闻，鲜活地描绘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与状态下的群体，带来截然不同的冲击与损害。这两个具体而微的例证也凸显了一个共同点：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给全球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在暴发后的短短4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它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给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行带来的窒息性打击将远远超过“9·11”事件。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等空运枢纽机场门可罗雀，它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面临断链危机，它让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至少连续好几个月基本处于休克状态，它让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出于无奈而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离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已经正式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正好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的。^[3]

虽然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球社会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持续突变的新冠病毒是否会在每年冬季卷土重来，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否能在短期内问世，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也试图解读这场突发疫情对人类历史发展各方面的长期影响，包括从价值与伦理观念、社交与消费行为、公共卫生医疗体制、社会风险管理、国家权力边界与基本职能、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政治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到全球治理机制所可能出现的永久性调整与改变。

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将会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或新的趋势。其中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是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里宣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也支持尼布利特的看法。他预言，今后跨国公司都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而且宁可牺牲效率及利润，也要增加替代来源及安全库存，来增强供应链抵御突发事故风险的韧性。^[4]著名的英国评论家莱格兰

（Philippe Legrain）也预测新冠病毒将终结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这场疫情彻底凸显国际整合的风险，将赋予各国政府采取限制全球贸易与跨境人员流动措施的正当性。^[5]

二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例如，主管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规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年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评论。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说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资格的话，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扮演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6]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特朗普政府却显露出的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权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彻底崩解，难以修复。^[7]《大西洋月刊》的主笔悲愤地写道，“病毒并没有打碎美国，而是揭露了一个早已破碎的国家”，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

到了2020年4月下旬，目睹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人数逼近90万，死亡病例超过5万，失业人口暴增至2600万，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教授艾希（Timothy Garton Ash）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感到极度悲伤”，这次新冠病毒危机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过去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次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8]

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第一，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攫取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9]第二，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10]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11]

这次危机让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12]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

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也特别联名发表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13]

四是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派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病毒危机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14]资本拥有者为了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生产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产业空洞化，并创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15]尤其在新自由主义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障医护人员。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在完全缺乏专业防护装备与无法获得检测的情况下，被迫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由此导致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急速、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美联储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4万亿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许多濒临倒闭的欧美大企业最后都有可能走上国有化一途。曾经是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16]

应该如何评断上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新冠病毒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一些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其实还言之过早，目前很多评论家的分析可能过于武断。

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观之，自从人类文明出现细密的经济分工与交换体系，建立各种保障社会存续功能的阶层组织，构建国家统治机构与治理职能，塑造集体认同与历史记忆，以及发展出有限度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和国际社会互动规则以来，任何大型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冲击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出现的，也可以说不是在“社会真空”的条件下出现的。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

一个社会既存物质生活状态及这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影响不同群体如何理解与总结这场灾害的教训，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与长期影响。

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或导致结构性的改变，或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同时设法找出一些有对比价值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

[1] <https://www.denverpost.com/2020/04/07/coronavirus-brown-palace-closed-128years/>.

[2] [https://www.msn.com/en-gb/news/spotlight/a-viral-reminder-that-social-dis tancing-is-a-privilege-that-poor-people-cannot-afford/ar-BB11VQOS](https://www.msn.com/en-gb/news/spotlight/a-viral-reminder-that-social-dis-tancing-is-a-privilege-that-poor-people-cannot-afford/ar-BB11VQOS).

[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0-The-Great-Lockdown-49306>.

[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0/world-order-after-coronavirus-pandemic/>.<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12/coronavirus-killing-globalization-nationalism-protectionism-trump/>.

[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0/world-order-after-coronavirus-pandemic/>.<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12/coronavirus-killing-globalization-nationalism-protectionism-trump/>.

[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 co-ronavirus/](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3/23/death-american-competence-reputation-co-ronavirus/).

[8]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3/world/europe/coronavirus-american-ex ce-ptionalism.html>.

[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poland-hungary-autho ritarians-by-slawomir-sierakowski-2020-03>.

[10] 在西方国家中也有例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疫情的控制上表现相对较好，它们得益于岛国的地理条件以及南北半球气候的颠倒。

[11] 福山试图拆解控制疫情绩效与政体的联结，而强调抗疫绩效取决于国家能力与政治文化（特别是对权威的信任），但他回避了为何绝大多数的西方民主国家欠缺国家能力与政治信任这个问题。

[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crisis-pits-liberal-de mocracy-against-china-by-ana-palacio-2020-04>.

[13]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4-13/coronavirus-pandem ic-is-wake-up-call-to-reinvent-the-state sref=yQynBrwF>.

[14]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interview/chomsky-on-covid-19-the-latest-massive-failure-of-neoliberalism/>.

[15] <https://mronline.org/2020/04/18/coronavirus-crisis-and-the-end-of-neoliberalism/>.

[16] https://www.lepoint.fr/editos-du-point/sebastien-le-fol/francis-fukuyama-nous-allons-revenir-a-un-liberalisme-des-annees-1950-1960-09-04-2020-2370809_1913.php.

大战与大疫：“西班牙大流感”的历史痕迹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历史的前进轨道因为一场大流行病而彻底改变的例子有，但并不多。^[1]当不少评论家在对“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种大胆预测的同时，也有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大流行病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更鲜明地暴露已经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蓄势待发的冲突与矛盾。

例如，总部位于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撰文提醒读者，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历史转折点，“后新冠病毒世界”不会是一个无法辨识的世界，这场大流行病更多地将加快世界历史的前进速度，而不太可能改变其方向。他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崩解、大国关系失和，所有这些原本存在的国际环境特征与趋势，在这场疫情之后只会更凸显。^[2]

以研究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体制三者间结构性矛盾而著称的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也敏锐地指出，一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会诱发特定方向的验证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观察家会倾向于将事件视为支撑他们既有世界观的证据，并努力在这场危机中找到自己期待的未来经济与政治秩序出现萌芽的迹象。^[3]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历史案例作为解析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佳参照，那非“西班牙大流感”莫属。这场暴发于1918年1月的大流感，是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过的最惨烈的大流行病。在短短两年内，地球上有近5亿人被感染，病毒在全球夺走了5000万条性命^[4]，而当时世界人口约为17亿。在美国，估计应该有50万以上的人因大流感而丧生，而当时美国的人口约1.01亿，如果以这个死亡率套上今日的美国人口数，那就相当于150万的死亡人数。当时最多的死亡人数出现在印度，在这个人口密集的英国殖民地，估计超过1200万人死于大流感。

为何“西班牙大流感”是比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有意义的历史参照，是因为“西班牙大流感”是一场真正蔓延全球的大流行病。疫情迅速扩散到五大洲，波及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连远在天涯海角的太平洋小岛都难以幸免。这也是一场暴发在全球化时代的大流行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殖民、贸易、投资、移民、金融资本与电报通信网络，已经将世界联结成非常紧密的经济体。伦敦金融市场的股票与期货波动会在几个小时内传递到全球其他的金融中心，大清帝国的铁路债券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发

行，来自波士顿与纽约的金融资本深度参与全球鸦片、棉花、蔗糖、咖啡、橡胶的生产与贸易。当时虽然没有民航运输，但国际旅行比现在受到的限制还少，因为我们熟悉的护照与签证制度是1920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的。当时任何人只要有钱买张船票，就可以跨国旅行或举家迁徙。所有我们熟悉的现代国家官僚体系、跨国企业、国际金融、超级都会城市，在20世纪初期也都初具规模。

与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大的不同在于，“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在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末期，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承平时期，而且是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最长承平时期。“西班牙大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只因为西班牙是一战中的少数中立国，没有实施新闻管制，所以最早公开披露疫情。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或让敌军掌握疫情对战力影响的信息，美、英、法、德等参战国的疫情都因严格的新闻管制而被掩盖。

目前有记录的证据显示，病毒最可能起源于美国纽约（也有起源于堪萨斯州一说），然后随着大量投入欧洲战场的美军而扩散到协约国，被俘的英法士兵又把病毒传给德军。病毒也经由商旅、贸易渠道，以及欧洲列强在全球各地进行的殖民地战争动员（例如英国动员殖民地组织远征军），而快速向世界各地蔓延。之后又经由从欧洲战场复员的美军再次回流美国本土。

“西班牙大流感”的疫情如此惨烈，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各国医疗与卫生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大疫暴发在大战末期，欧美各国主政者都以赢得这场关系民族（与政权）生死存亡的战争为最优先目标，所有资源都优先投入战场，连医护资源也随着战时动员而大量调度到前线，没有太多余力来防治病毒扩散或照料后方的病患。战争动员本身也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军营的封闭与密集环境、大部队的远距离调防（美国共动员了高达140万人的部队投入欧洲战场，英国从印度、非洲、澳大利亚等殖民地调度军队），以及战争末期惨烈的肉搏战，都是加速病毒扩散的最佳温床。与今日相同的是，当时应对病毒扩散的最有效手段还是隔离，因为没有特效药。

如果我们要问一百多年前这场空前惨烈的病毒大流行病，给人类历史发展轨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美国与欧洲的社会制度或观念思维带来哪些永久性的改变，其实比较有限。大流感可能让欧洲战事提前几个月结束，因为交战双方的部队都饱受病毒打击而损失战力与丧失斗志。但是大流感不是决定一战结局的关键因素，真正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负的关键历史事件有两个：一是1917年4月美国决定参战；二是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美国惊人的工业生产能力、高达300万人的军队动员规模，以及华尔街为

战争筹款的巨大融资能力，让欧洲战局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占优势，演变为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占优势的局面。即使大流感不曾暴发，从1918年5月开始，美国远征军大批登陆欧洲，让协约国军队的士气大振。德军在协约国最后一波“百日攻势”下损兵折将，当时其盟友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早已高举白旗投降，奥匈帝国更形同解体而自顾不暇：同盟国大势已去。

如果说美国的参战让协约国在欧洲战场逐步反败为胜，俄国革命的作用则是在德国内部瓦解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基础。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震惊世界。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以及无产阶级翻身的革命思潮快速向德国传播。从1917年开始，在左翼工人团体带领下，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开始发起一拨拨的罢工行动。1918年1月底，柏林50万工人大罢工，要求建立议会共和，以及比照苏俄的提议，与协约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罢工风潮迅速扩展到了汉堡、基尔、莱比锡等城市，接着革命思潮开始渗透部队底层。厌战情绪迅速在德国士兵之间传播，最终在1918年10月底引爆基尔港4万名海员兵变，工人与士兵迅速占领各地议会并宣布成立共和，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1月11日，德军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战的过程与结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续到今日。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总体战，这不仅是一场杀伤力空前惨烈的战争，也是第一场社会总体动员的战争，动员机制覆盖了所有的社会部门、各个群体以及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这场战争塑造了我们熟悉的现代国家机构的权力、职能、角色以及合法性基础的基本形貌。

一战也孕育了主导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两大历史事件：美国的崛起以及苏维埃体制的诞生。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一战后明显超越英国，并快速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纽约跃升为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俄国革命在欧洲社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也在世界各地带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殖民地民族解放风潮。在超过半个世纪后，苏维埃共产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竞争对手，逼使西方国家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妥协，也迫使推行帝国主义的列强最终不得不放弃殖民统治。

一战结束后，短视的英法领袖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期间，坚持对德国实施严苛的政治与经济惩罚，以及美国威尔逊总统因国会掣肘而无法落实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体制，注定为日后爆发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一战使德意志、沙俄、奥匈与奥斯曼这4个帝国解体了，触发了民族独立运动，也引发了列强间新一轮的势力范围争夺。

英法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与西亚遗留下来的政治地盘，意大利趁机角逐巴尔干半岛与北非，日本试图吞并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逐步侵占中国东北与华北。严苛的战争赔款条件，让德国经济濒临崩溃，并长期陷入超级通货膨胀的深渊，酝酿了挣脱《凡尔赛条约》桎梏与洗刷割地、赔款与裁军屈辱的强烈情绪，最终造就了法西斯政权的兴起。

“西班牙大流感”并没有给所有上述一战之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轴带来明显改变。大流感虽然造成的死亡人数极为惊人，但对当时主要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冲击，却被大战的巨大影响掩盖了很大一部分。大流感的第一波暴发在1918年春天，疫情消息的传播被战时新闻管制压制。此时美国与英法正在全力准备对德国的军事大反攻，各国政府选择忽视疫情风险，仍按计划部署军队调动与生产动员。大流感的第二波暴发在1918年秋天，疫情比第一波更为惨烈，但疫情造成的经济打击、社会恐慌与心理冲击，很快又被战争结束后各国急于启动战后重建、部队解编复员，以及恢复社会与经济正常运作的强大需求掩盖，所以受感染国家只有个别城市采取短暂封锁措施，没有全国范围的封锁。世界贸易从1919年就重回增长轨道。

大流感对人类历史的后续发展轨迹，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大流感肆虐的高峰期并不长。第二波疫情大暴发到1919年春天就迅速缓和下来，等到1919年冬天出现第三波暴发时，大流感已经如强弩之末，传播速度与毒性都明显减弱。疫情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

“西班牙大流感”比较明显的长期影响还是集中在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这场灾难既加深了西方社会对病毒引发的流行性疾病强大摧毁力量之认识，也让欧美社会富豪阶层意识到大流行病威胁的对象是不分阶级与种族的，有效防疫必须动员社会整体资源。这场惨烈疫情激发了各国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制，并带动了各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让高度私有化的医疗体制走上社会化道路。事实上，苏俄是在一战之后首先创立覆盖全民的强制医疗保险的国家，随后北欧、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美国则走上了另一条轨道——医疗保险与雇佣合约捆绑在一起。美国从1925年开始逐步建立了疾病通报系统，作为对抗传染病的重要预警机制，其他西方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5]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前身，是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传染病中心是二战后（1946年）创立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扑灭疟疾。

^[1] 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纪暴发的黑死病，欧洲大约有2500万人死亡，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进而动摇封建体制与庄园经济的社会基础，可参见经典之作：Barbara Tuchman,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另外一个常被引述的例子是欧洲殖民者将天花病毒带到

美洲新大陆，导致美洲原住民的灭绝，可参见Jared M.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W.Norton&Company,1999)。

[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4-07/pandemic-will-accelerate-history-rather-reshape-it>.

[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ill-covid19-remake-the-world-by-dani-rodrik-2020-04>.

[4] 有关“西班牙大流感”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当时很多国家的人口统计不是很精确，所以很难有高度可信的数据。5000万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数据，乃根据迄今为止最新的研究结果，可参见Johnson,N.P.and Mueller,J. (2002) –Updating the Accounts: 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Spanish”Influenza Pandemic,i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76 (1) , pp.105-115。

[5]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how-1918-flu-pandemic-revolutionized-public-health-180965025/>.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可能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移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和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多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

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导致邻近国家汽车厂装配线受到波及；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60%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暴增时，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环境下。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放大效果。在平时，企业管理层一定尽可能采取生产外包策略，尽量多雇用临时工，把库存生产备料压到零，目的是把股票估值拉抬到极致；医疗体系管理层一定把人力资源、病床及其他设备做最优化配置，以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对冲基金与投资银行一定把融资杠杆率发挥到极限，并用尽各种叠加的衍生金融合约；消费者倾向于将不动产抵押与信用卡融资额度用尽；多数民选政治人物都倾向于尽量变卖国有资产，把政府举债额度用尽，把个人与企业税率降到最低。

像挪威这样愿意把大量石油收益以主权财富基金方式保留给下一代的国家是罕见的异数。多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都没有余裕，没有储备，没有闲置资源，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社会，处

在社会悬崖边缘的人口就越庞大。多数美国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拿不出500美元的应急现金，只要失业就可能失去医疗保险、汽车与房子；美国提供的失业保险给付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单薄，各州的给付金额不同，全美50个州的平均给付金额是每周385美元，最多只能领26周，且必须满足过去三年全职上班的条件。^[1]专家估计在美国有高达40%的劳动参与者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2]论件或按时计酬，经常朝不保夕，而且他们多数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也必须自费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4]

最后，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病毒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笼罩而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其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自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根本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必须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感到挫败的是，在对抗新冠病毒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病毒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3]

^[1] 因为现有的失业救济补助如此单薄，为了避免社会崩解危机，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紧急救助法案，给每一个中低收入家庭额外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最多可以领4个月，参见<https://www.cnbc.com/2020/03/26/coronavirus-relief-act-expanded-unemployment-payment-and-eligibility.html>。

^[2] <https://wtfeconomy.com/how-big-is-the-gig-economy-e674c7986a28>。

^[3] 班农创办的网络媒体就炒作这个议题，参见<https://www.breitbart.com/politics/2020/04/17/andrew-cuomo-sounds-national-security-warning->

everything-we-need-is-made-in-china/.

[4] Kathleen Thelen, "The American Precariat: U.S. Capit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ume 17, Issue 1, March 2019, pp. 5-27.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rofessor Thelen's 2018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perspectives-on-politics/article/american-precariat-us-capitalism-in-comparative-perspective/13BFEA02B83DBBD792D05107A9149D2D>.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场疫情暴发前就已经逐一浮现，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硬生生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有一部分移出中国大陆，转入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做出悲观预测，因为他们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不过，我们不必因这些预测而过度悲观，因为大流行病在各个领域造成的

长期影响经常是双向的，而非单向。危机也经常蕴含激发新的思维与加速寻找替代机制的可能性。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福祸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演，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导致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1]四是加速5G+物联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全球范围5G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空间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艺活动将大量涌现，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会加速推广。2020年广交会第一次在线上举办，虚拟商展未来有可能常态化。目前在中国大陆普遍实行的手机健康码凭证，将来可能成为国际通行的跨境人员移动的数字健康管理制度。云端交响乐演奏、视频学术论坛、留学境外虚拟校园也将成为常态。

总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历史走向既受制于主观不能左右的客观因素，但也取决于包括美国、中国、欧盟以及其他重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精英，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什么选择，如何亡羊补牢，以及如何总结教训。如同《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金融时报》评论中指出的，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决于人类社会在这场危机中如何面对两个关键抉择：一个是选择极权监控还是公民赋权，另一个是选择民族主义孤立还是全球团结。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走上分裂道路，各国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但会让疫情危机更看不到尽头，也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全球灾难。^[2]

^[1] 正如同在G20临时峰会举行前夕，英国前首相布朗领衔及92位卸任总统、首相联署的公开信所呼吁的：G20必须发挥协同的全球领导角色，立刻采取果断的全球协同行动，来控制大流行病以及拯救全球经济，参见<https://www.globalgovernmentsforum.com/former-world-leaders-call-for-g20-to-coordinate-corona-response/>。

^[2]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彻底经济剥离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的牢固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全球化仍拥有广大社会支持基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首先，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本国的经济社会常态运作根本脱离不了过去70多年形成的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所以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抱有很高的期待。美国虽然在能源与粮食上可以自给自足，但除非愿意牺牲生活水平，不再独享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否则去全球化也不是现实选项。

在疫情暴发高峰期，不少国家饱受无法自行生产防疫物资之痛，也饱尝争夺防疫医疗用品与设备之苦，所以在疫情消退后，条件允许的国家必然会改弦易辙，将医疗资源视为与粮食和能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建立战略储备，以及确保一定比例的本国自制能力。

但毕竟只有少数富裕国家有能力储备大批的医疗资源，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具备高端医疗科技与完整产业体系的大国，才有能力生产从医用口罩、呼吸机、断层扫描仪、病毒检测设备、药品原料、抗生素与疫苗，到加护病房设备等全方位医疗产品。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应急储备有其极限，要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急速暴发的大流行病，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应急资源互助机制，以及医疗物资紧急生产动员与跨国调配机制，一方有难八方驰援。中小型国家及落后国家更需要这个互助机制，大国必须通过这套机制集体履行对小国的救援职责，否则自身也难逃池鱼之殃。从长远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与公共卫生全球互助机制势在必行。就好像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惨痛教训后，决心创建清迈协议，必要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相互支持，来协助各国有效抵御国际游资流窜带来的外汇与金融震荡，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也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的确，这场疫情冲击凸显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跨

国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因而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1]

不过，这些预测可能随着疫情发展而持续修正。在疫情第一波暴发的高峰期，武汉的封城与中国大陆的大范围停工，激发了全球供应链将加速撤离中国的想象。不少印度观察家还乐观预期，可以趁机接收许多迁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但等到2020年3月，欧洲与北美成为疫情第二波暴发的重灾区，到了4月，第三波疫情开始在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迅速升温，地球上几乎找不到“净土”。

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无论是从广州采购零部件，还是从邻近的墨西哥，都无法躲过大流行病带来的断链风险。所以，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更何况，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以及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有序复工，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反而有比较优势。^[2]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3]

美国反华鹰派所鼓吹的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冷战，让中美经济彻底剥离，本来就是损人不利己的选项，而且杀敌五千可能自损一万，所以很难贯彻到底。尽管鹰派想借助疫情失控引发的美国民众的不满与挫折感，加速推进中美经济剥离，但这个政策也必然面对经济因素的制约。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要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技术工人。因此郭台铭去威斯康星州生产液晶面板的投资计划落得虎头蛇尾。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支付美国企业所有搬迁费用，把在中国大陆（或亚洲）的生产线迁回美国，也未必会有很多企业响应。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而且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能竞争。如果美国政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那么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对一个负债总额早已濒临爆表的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

后果。

马斯克非常清楚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他把特斯拉的前途押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上，这个关键性决定经过了新冠病毒危机的初期考验。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复工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上海工厂2020年2月10日起就开始全面复工。据中国工信部合格证产量数据显示，其复工后产能已超过疫情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特斯拉在纽约以及加利福尼亚州费利蒙（Fremont）的整车工厂被迫停产，到5月22日才恢复正常生产，有整整两个月上海工厂成为唯一能制造整车的特斯拉工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一期的第一阶段于2019年1月正式动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工建成，高效的项目审核与建设速度引发全球业界瞩目，也让特斯拉的股价从谷底反弹。上海超级工厂第一期的第二阶段也在2021年6月27日竣工，并在7月5日正式开始调试。

少数极为激进的反华鹰派甚至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与上述极端主张一样疯狂的是，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声讨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都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

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中国不再扮演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眼下对于全球多边体制式微的悲观预期，都假定美国的领导角色是支撑当前全球多边体制不可或缺的关键，没有其他大国或多国集团可以替代这根支柱，这个假设未必符合实际。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单边主义的确削弱了许多现存的多边体制，但另一方面，全球变暖、大流行病、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大萧条风暴等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机，反而更凸显全球层次政策协调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

在G20成员中，没有国家跟随特朗普的反时代潮流做法，美国的长期盟友也反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从未松动它们对现有多边体制的支持。2020年4月15日，特朗普公开批评世卫组织并宣布暂停拨付资助经费后，刚从医

院返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发言人表示，英国不会跟随美国暂停拨款的决定，并强调世卫组织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随后举行的G7视频峰会上，特朗普完全孤立无援，六国领袖都表达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4]

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敌视立场也不代表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或众多专业群体的立场：美国医学会（AMA）公开呼吁请特朗普收回成命；比尔·盖茨夫妇马上宣布在原先对世卫组织1亿美元的捐赠基础上，再追加1.5亿美元；由美国流行乐坛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发起的全球慈善演唱会《一个世界，一起在家》，在几个小时内为世卫组织设置的团结基金募集了将近1.3亿美元。

其实，在特朗普任期，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各国都在设法如何在美国退出甚至阻挠的情况下，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绝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清楚地认识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时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同舟共济。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医药科技强国，都明确支持以紧密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新冠肺炎特效药与疫苗的研发，而且承诺成果由全球分享。在这个议题上只有美国不曾明确表态。

相反，特朗普政府曾于2020年3月中旬试图以10亿美元重金挖角德国疫苗公司Cure Vac的研发团队，并约定未来疫苗研发成果独家供应美国，但遭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阻止。[5]许多国家都担心，如果美国在疫苗研发上抢占先机，特朗普政府会把COVID-19疫苗当作战略筹码，并谋取商业暴利。墨西哥领衔在联合国提案，要求确保各国能够经由公平、透明、平等、实时与有效的途径取得未来的COVID-19疫苗。在美国代表团来不及私下阻挡的情况下，2020年4月20日联合国大会以网络投票无异议通过该决议案。[6]

[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economy/globalization-regionalization-covid/>.

[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4-21/China-s-supply-chain-competitive-in-the-global-network-PS8TX3zxc/index.html>.

[3]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78940/why-coronavirus-crisis-wont-weaken-chinas-position-global-supply>.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6/g7-backing-for-who-leaves-trump-isolated-at-virtual-summit>.

[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confirms-that-donald-trump->

tried-to-buy firm-working-on-coronavirus-vaccine/.

[6]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us-failed-to-block-un-virus vaccine-resolution](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us-failed-to-block-un-virus-vaccine-resolution).

2020年的关键大选

是否应该与中国经济脱钩，是否应该追求碳中和与全面推进新能源发展，应该欢迎还是严格限制新移民，面对这些重大议题，美国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相反，美国社会高度分裂，从奥巴马上台到特朗普执政，美国政治精英间的裂痕不断深化。2020年11月的大选又是一场城市与乡村政治板块的较量，以及支持全球化与排斥全球化群体的对决。这场异常激烈的选举把投票率推升到罕见的66.8%的水平，美国的建制精英与主流媒体铆足全力才助拜登胜选。让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尽管特朗普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表现几乎是荒腔走板，拜登仍然赢得如此惊险。特朗普获得的普选票居然超过7100票，成为历史上普选票得票第二高的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的地域分布上，跟2016年非常相似，拜登的选票集中在特大城市、东西两岸都会区、大学城与科技产业带，以及新移民比较集中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最南部紧挨着墨西哥的几个县。而特朗普则赢得了几乎所有的乡村、中小城市，以及广袤的内陆。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在大选接近尾声时，在美国的2974个县中，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县，拜登赢得477个，只比2016年希拉里的472个县多5个。当然拜登赢得的县多数是人口较稠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所以他赢得的县的经济占美国的七成。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延续奥巴马，他试图重新团结西方盟友来维护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并试图重新确立美国在多边体制内的主导地位，发挥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软实力，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并继续把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移到亚洲，以全力对抗中国崛起与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拜登上台之后，他的几项重返多边体制的决定符合众人预期，例如，他宣布重回《巴黎协定》，重返世卫组织并恢复拨款，准备重新启动与伊朗有关核协议的谈判。他的首要外交目标是修复与西欧盟邦的裂痕，并试图重振G7机制，利用G7重新夺回在G20框架内的议题主导角色，例如推动跨国企业全球最低税负。但拜登在某些领域也必然会做出调整，因为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他无法忽视特朗普的巨大身影。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社会全面挑起对“中国威胁”的同仇敌忾，所以他的团队必须证明自己比特朗普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带来的挑战；同时，他无法忽视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协定导致美国制造业空洞化与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指控（虽然特朗普也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对策）。2016年民主党流失了不少蓝领白人选民的票源，所以拜登在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议题上，不能仅仅满足美国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需要，也

不得不考量如何缓和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中产阶级与劳工的冲击。

再者，拜登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身影。他的团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风潮，并持续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在某些领域不排除模仿中国的做法。例如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联邦政府预算来更新美国陈旧的桥梁、道路、铁路、通信以及电网；拜登还推出了美国版产业政策，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与电信设备产业供应链，以及补助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瞻科技研发。拜登还在2021年6月的G7峰会上推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基础设施计划，以抗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过，不少观察家认为B3W无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更何况这个政策宣示还未见后续的财务安排。^[1]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在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社会支持基础流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社会强力反弹。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世代的高度支持。

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务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这次新冠病毒危机在西方带来如此严重的健康与经济灾难，除了源于西方人对亚洲人种族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导致轻忽疫情风险外，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贻害也暴露无遗，尤其是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会在疫情消退后在广大发展中世界得到更高的认可，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也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严重衰退。

“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供跨国信息、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创建多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医疗卫生、智能化治理等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支持与人才培育；第二，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导性开发项目、教

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资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一带一路”倡议下启动的许多合作项目当然不免因疫情冲击而延迟，有些项目融资安排可能需要进行务实调整。但整体而言，中国引领的深化南南经济合作在疫情消退后的复原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因为经济互补优势不变，经济增长潜力不变，网络经济的巨大赋能能量不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中国协同全球经济伙伴开辟全球化与区域融合新路径的积极作为，必然会遭遇来自西方国家更大的阻力与更恶毒的攻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会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些新路径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以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中国从未排除西方国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对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开放。

深化南南合作的势头并未被新冠肺炎疫情遏制，我们可以从贸易统计数据中看出端倪。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了4.4%，全球贸易更是大幅萎缩了9%，在此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仍出现逆势增长，同比增长0.7%，达到1.4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创新的纪录，达到29.1%。作为欧亚大陆重要陆上通道中欧班列，在疫情笼罩的2020年也出现逆势增长，全面开行1.24万列，发送113.5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50%、56%。202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也

呈现逆势强劲增长，双方贸易额达6846.0亿美元，增长6.7%。从2019年开始东盟就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退居第三。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巴经济走廊在确保70个项目以及2.6万多名中巴员工有效防疫和生命健康的前提下，所有项目实现建设运营基本正常。同时，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社会民生、农业、科技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具有标志意义的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的苏库尔-木尔坦段，也在2020年12月正式移交通车。

从比较长程的角度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加速。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开始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明显退潮与反转，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

第一，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

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代议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

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去30多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响应包容性增长需求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

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

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仅没有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改变，反而会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快步伐。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教训，并非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与巨量跨国流动带给各国空前的健康、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不是让经济全球化逆转，而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让深刻体认全体人类命运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能超越狭隘的但求自保的国族本位思维。

[1] Dnyanesh Kamat, "Biden's B3W Proposal No Serious Threat to China's BRI," Asia Times, June 14, 2021. <https://asiatimes.com/2021/06/bidens-b3w->

proposal-no-serious-threat-to-chinas-bri/.

“中国学派集成”丛书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朱云汉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1
(中国学派集成)

ISBN 978-7-5217-3596-3

I. ① 全... II. ① 朱... III. ① 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89867号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著者：朱云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16千字

版次：202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3596-3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比较译丛
钱颖一 主编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创造性破坏 的力量

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法] 菲利普·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

赛利娜·安托南
(Céline Antonin)

西蒙·比内尔
(Simon Bunel) 著

余江 赵建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法]菲利普·阿吉翁 [法]赛利娜·安托南 [法]西蒙·比内尔 著

余江 赵建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比较译丛”序

中文版序

原版序

第1章 新的范式

第2章 起飞之谜

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第4章 竞争的得失

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

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

第9章 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

第11章 创造性破坏、健康与幸福

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

第13章 应对全球化

第14章 投资型政府与保障型政府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结语 资本主义的未来

致谢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中文版序

本书总结了我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以及我对创新和增长长达33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发轫于我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该范式运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发展趋同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微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

我与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从2019年11月着手本书的写作。4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危机袭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危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演变，以及我们想要如何重塑社会。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是这场讨论的核心：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导致众多企业破产，与此同时，危机又给新的创新活动开拓了空间。

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

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

熊彼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他预言，前一波创新者将变成因循守旧的大企业集团，排挤新兴的小创新企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家的消失、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而我们在本书中倡导“乐观意志”或者说“斗争的乐观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指出，通过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构成的神奇三角，如何避免熊彼特预言的悲观结局，实现可持续增长。

借助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本书瞄准三个主要目标：

（1）洞悉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某些重大谜题，例如：为什么工业起飞在1820年左右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美国经济却从21世纪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某些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放缓步伐，甚至陷入停顿。

（2）质疑某些有缺陷的习惯思维（common wisdoms）和政策建议，例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解决失业问题；借助保护主义措施应对外国竞争、保护价值链；为应对气候变化倡导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3）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尤其是，能否把美国模式的优点（创新生态系统）同丹麦模式的优点（更多的保障和更大的包容性）结合起来。

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

对？

我们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径和方案，实现共享的绿色繁荣，正如它在短短40年里成功带领民众走出贫困，并跻身世界创新前沿。如果本书能对中国思考并讨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前进有所助益，我们自当欣喜不已。

菲利普·阿吉翁

原版序

我们于2019年11月开始本书的写作。4个月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席卷了全球。疫情危机刺激了事关重大的讨论：疫情过后，人类社会将变成怎样以及我们想要如何改变它。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居于讨论的核心。的确，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令许多企业走向破产。但与此同时，危机也为新的创新活动创造了空间。

巴里·艾肯格林在《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目颇引人深思的文章《熊彼特的病毒：创造性破坏如何拯救新冠经济》^[1]。其中指出，零售业将比过去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因为顾客不会放弃在社交隔离期间养成的在线购物习惯。同样，隔离还展示了远距离办公和视频会议的优点，人们对利用电话或视频接受医疗咨询也更习以为常。

然而，创造性破坏可以作为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增长杠杆，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仍构成挑战。一方面，他们必须提供保护，扶持有活力的企业，挽救工作岗位及企业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做好再配置，鼓励更有效率、更能响应消费者新需求的新企业和新活动的进入。换言之，他们必须顺应而非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更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危机敲响了警钟，警示困扰世界各国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更深层问题：美国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体系失效，欧洲的创新体系活力不足，其他一些国家缺乏透明度或

过分集权等。

更一般地看，由于过去数十年来的不平等加剧、租金收入集中化、就业越发缺乏保障以及健康和环境问题恶化，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激进变革的呼声，乃至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但在本书中，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非完全废除资本主义，而是发明一种更好的资本主义，能够驾驭创造性破坏的威力：创新固然会制造破坏和混乱，但在过去200年中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深入理解创造性破坏的基础，将其威力引导至我们预想的方向。我们如何让创造性破坏走向更绿色和更平等的增长路径？如何防止过去的创新者利用其租金收入妨碍新的创新？如何尽量减少创造性破坏对就业、健康与幸福的潜在负面影响？在引导创造性破坏的正确走向时，我们需要哪些力量的支持：企业、政府、宪法、民间社会……这些将是后续各章试图探讨的议题。

本书的原始素材来自几位作者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背后则包含三十多年对创新与增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素材的充实和重组均围绕如下主题：创造性破坏为何拥有巨大威力，资本主义能够如何加以改造，以利用这一威力实现更可持续、更包容的繁荣。

[1] Barry Eichengreen, “Schumpeter's Virus: How ‘Creative Destruction’ Could Save the Coronavirus Economy”, *Prospect*, 2020年5月26日。

第1章

新的范式

本书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旅程：一场穿越经济史的旅行，更确切地说，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之谜的旅程。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做到：

- 1.洞悉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谜题，如工业起飞、重大技术浪潮、长期停滞、不平等的演化、各国发展的趋同与分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

- 2.再探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增长有关的某些伟大争论:对于推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以及保护环境与缓解不平等，我们能否和谐兼顾？创造性破坏对就业、健康和福利的危害能否避免？对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是否不得不感到恐惧？

- 3.重新思考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作用:在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从而增进各国的财富方面，它们各自能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如何保护公民与经济免受过度资本主义之害？

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1]本书的最后章节（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结语）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1. 测算各国的财富

人们喜欢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各国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枯燥的统计数字，而非更为实在的指标，如福利、消费或幸福感？理由之一是，亿万人类的物质福利水平与自己所在国家的人均GDP密切相关。例如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就对应着人均GDP在长期停滞之后的起飞（详见本书第2章）。

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使其中很大部分人口实现了19世纪之初仅有少数特权群体能享受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贫困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不充分，则意味着数亿人口至今依然生活在非常艰难而危险的环境里。可见，要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某些国家凋敝，为什么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弄清楚人均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此外，人均GDP还便于做跨国比较，不仅是给定时点的比较，还可以做跨时期的比较。

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效用意指在一个国家里有用的或者说能带来福利的东西。许多效用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上交易，由此

被纳入了GDP的核算，但还有些效用不属于此类。例如，相比在火车站或旅行社排队购票，通过互联网预订车票节约的时间，就没有计入GDP。又如，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拍照不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也不计入GDP。而在数码照相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购买胶卷，并且付费冲印照片，所有这些开支都纳入了GDP。还有些技术进步，例如让我们获得牙医服务比40年前变得轻松了许多。此类进步同样没有反映在GDP里，那我们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

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例如，丹尼尔·卡尼曼与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曾强调，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Kahneman and Deaton, 2013）。

[3] 本书第11章将详细探讨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如新产品和新活动的数量，以及创新的类型等。第9章将关注绿色创新，并探讨测算与促进它的方式。最后，还有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它反映一国收入分配距离完全平等状态有多远。我们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有关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议题，将在第5章和第10章做深入讨论。[4]

2. 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

答案很直观：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急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理论上的理由

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5\]](#)

索洛模型的简洁与优美使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课程的必然出发点。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也就是GDP）的某个固定比例。

这样的经济体看起来会一切运转良好：储蓄资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促使GDP增长，然后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资本，使GDP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或者说，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该经济体也能实现持续增长。

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机器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失去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实证上的理由

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

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 [6]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

[7]

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该理念对应着索洛的结论，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入。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入。更一般地说，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

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也就是说，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

于是，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如上文所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但我们的回复是，有可能克服这一矛盾，或者说可以做到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借用拉古拉迈·拉詹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于2004年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来说，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8\]](#)

4.创造性破坏：现实

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我们能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中感受到它，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测算。[\[9\]](#)图1.1显示的是1900—2000年美国各州人均GDP年增长率与这些州每年登记的专利数量的对应变化。[\[10\]](#)从中可以看到创新密度与生产率增速之间呈现清晰的正相关，创新更多的州增长速度更快。[\[11\]](#)

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出发点，让我们可以找到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从表1.1可以看到，在2005年，新创企业，即

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创造的净新增就业占全美国的14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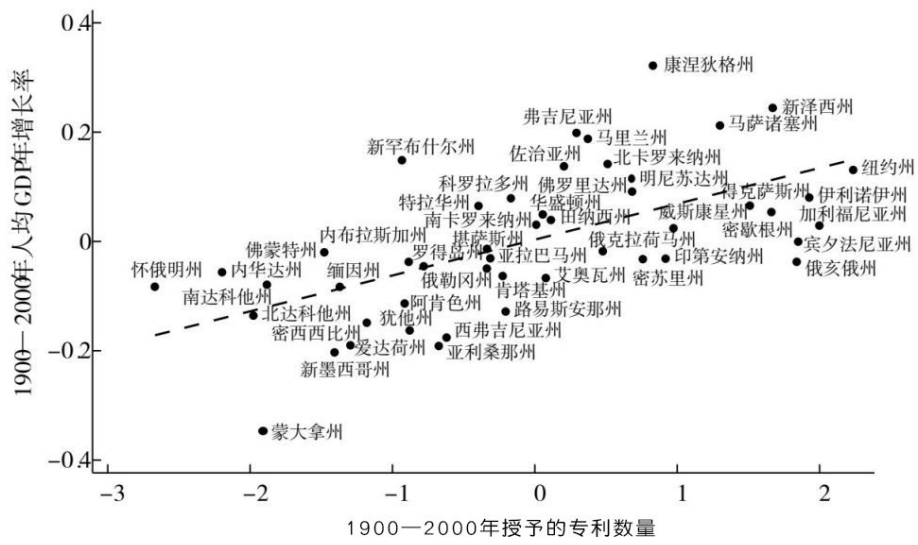


图1.1 人均GDP增长与专利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注：横轴与纵轴的刻度代表相对于1900年GDP对数值的余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J. Grigsby and T. Nicholas,“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the Golden Age”
 （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 ） , 图6。

表1.1 2005年美国私人部门不同年限企业创造的新就业数量

企业年限 (年)	创造的净就业数量 (千)	在净就业创造中的占比 (%)
0	3 518	142
1	- 189	- 8
2	- 178	- 7
3	- 151	- 6
4	- 74	- 3
5	- 103	- 4
6 ~ 10	- 339	- 14
11 ~ 15	- 161	- 6
16 ~ 20	- 154	- 6
21 ~ 25	- 141	- 6
26 +	417	17
总计	2 481	100

资料来源: J. Haltiwanger, R. S. Jarmin and J. Miranda,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no. 2 (2013) :347 -361.

图1.2a显示的是就业增长率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最年轻的企业在净就业增长方面强于成立已久的企业。图1.2b显示的是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较年轻的企业的退出率远高于成立已久的企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进则退”现象：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由于其中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摧毁；但在这一达尔文式演化淘汰过程中幸存的企业则会继续创造就业并发展壮大。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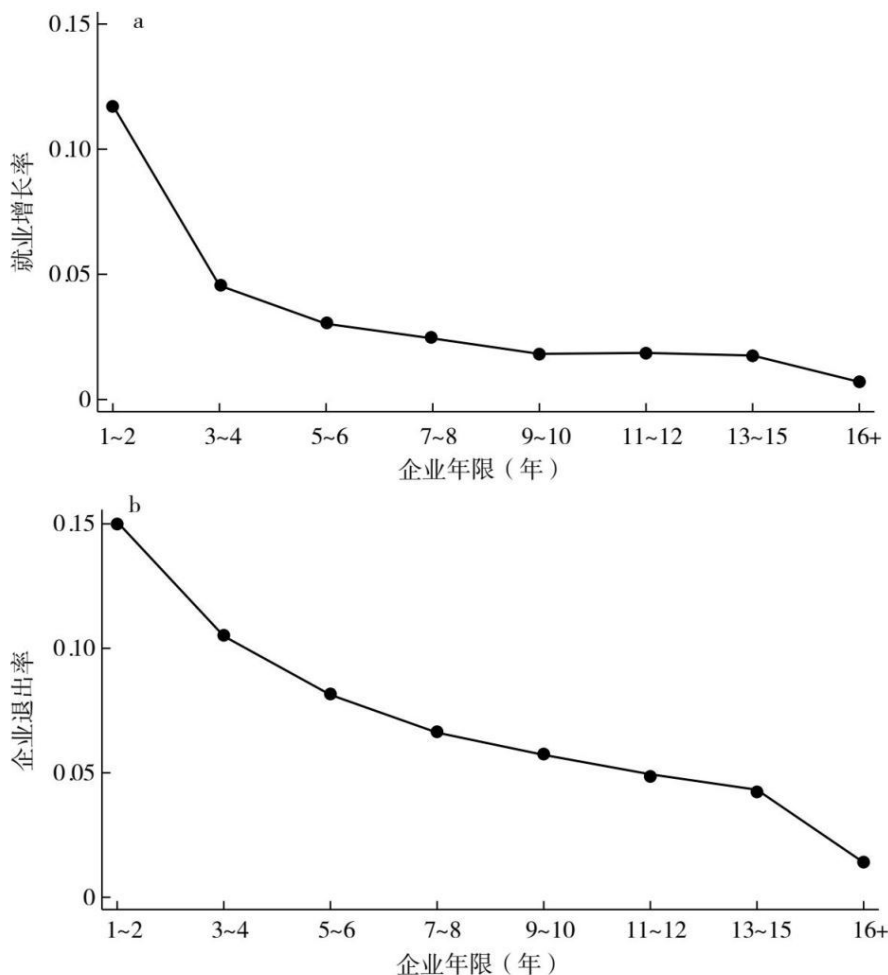


图1.2 不同年限的企业的净就业增长与退出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J. Haltiwanger, R. S. Jarmin and J. Miranda,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no. 2 (2013): 347-361, 图4B和图5。

最后，我们可以用企业创造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这是研究企业与就业动态变化的文献最常采用的指标。[\[13\]](#)该指标与人均GDP增长又该如何联系起来呢？图1.3

包含了17个欧洲国家的587个地区2012—2016年的数据，表明在这一时期，创造性破坏平均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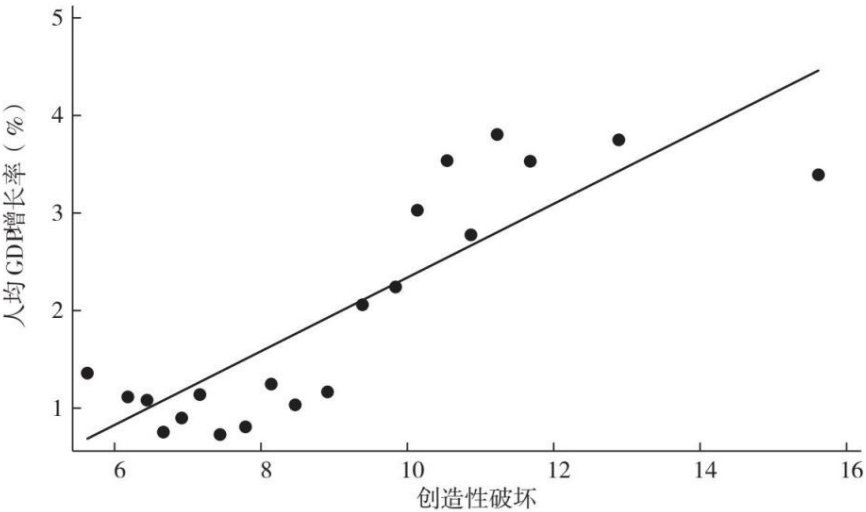


图1.3 人均GDP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注：图中数据包含的国家有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班牙。
资料来源: Eurostat。

一边是用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另一边是用新专利数量来测算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两个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在美国，1985—2010年就业创造与摧毁率最高的各县，也是产生新专利数量最多的地区。该数据覆盖了1 100多个县，相关系数为0.456。这一相关关系主要源于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是年轻的小企业，它们也是创造和摧毁就业岗位最多的企业。事实上，从图1.4可以清晰地看出，（以单

位员工专利数量测算的) 创新密度随着 (以员工数量测算的) 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 创新概率就越低。此外, 与较大的企业相比, 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 影响更深远。[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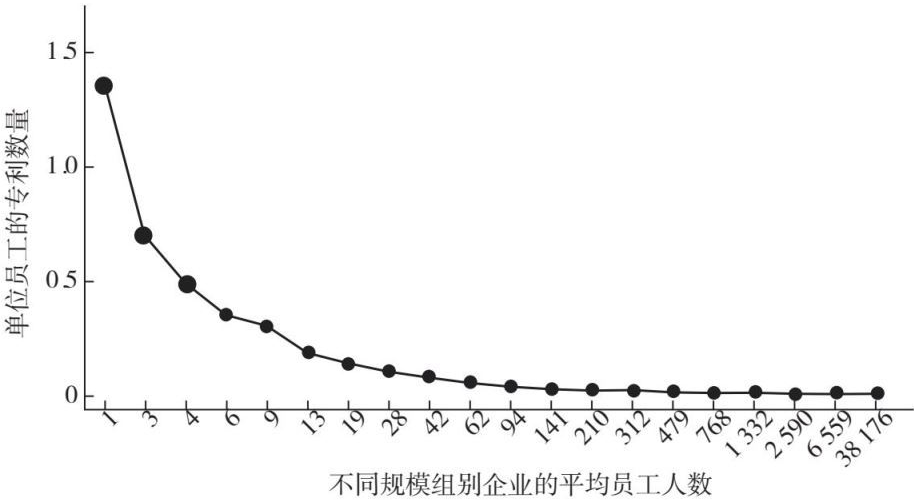


图1.4 美国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密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and W. R. Kerr,“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 图2。

在总结这段对创造性破坏现实的介绍时, 我们还想与读者分享两颗思想的“种子”。图1.5展示了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的工厂规模 (以员工数量测算) 随工厂年限的变化。[15]从中可以看到, 相比墨西哥和印度, 美国的工厂规模随工厂年限增长的变化更为迅速, 这反映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 其一是美国企业更容易找到支持增长必需的融资; 其二是美国金融体系会选择业绩最好的企业, 或者说最具增长潜力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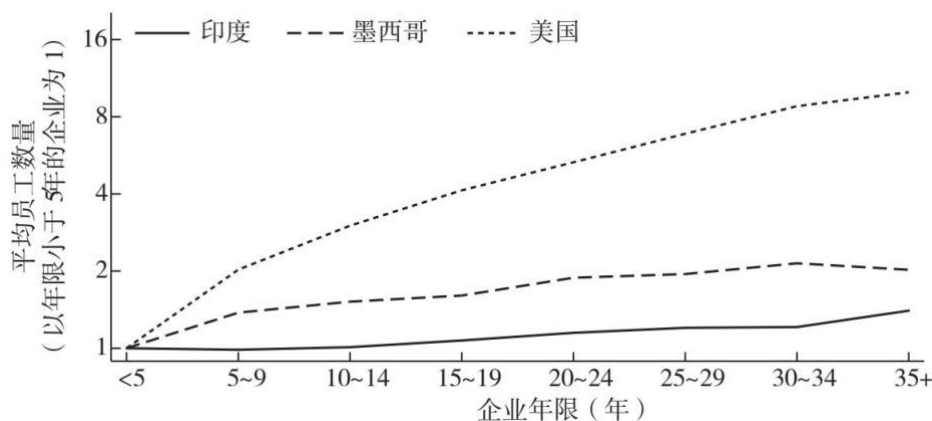


图1.5 工厂规模与工厂年限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3 (2014): 1035-1084, 图IV。

图1.6对美国 and 法国做了类似的比较，即就业在不同年限的企业间的分布，它反映的事实是，相比法国同行，美国老牌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好，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增长所需的融资。[\[16\]](#)因此不出意料，从最古老的企业在全体就业中所占的份额看，美国远远高于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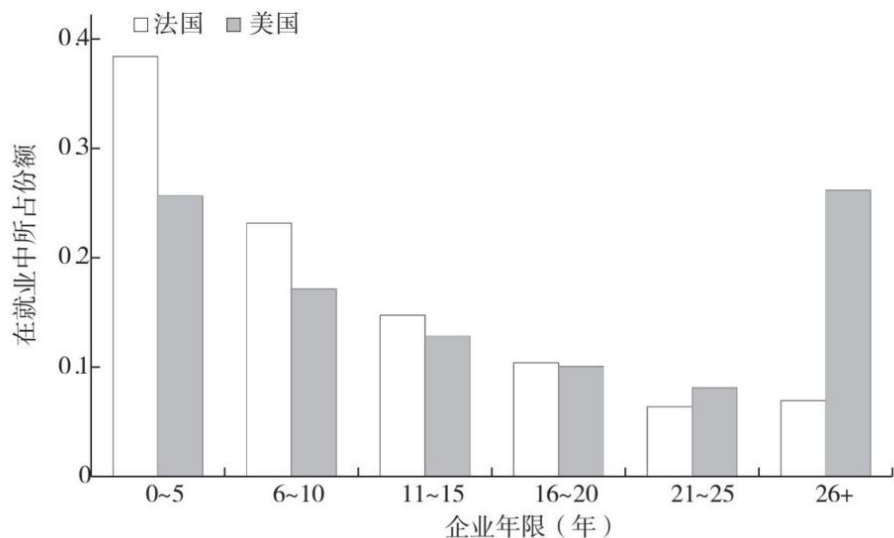


图1.6 不同年限的企业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 “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956, 图6。

5. 有关增长的几个谜题

我们对经济学模型和范式的评判标准是，它们能否解释某些现象，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洞悉与增长有关的几个谜题，我们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五个。

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

本书第2章将详细阐述，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于2001年的估计，公元1000年时的全球人

均GDP同公元元年相近，[17]1820年的全球人均GDP仅比1000年高出53%，相当于在820年里保持年均0.05%的极低增速。经济起飞发生在1820年，首先是英国，法国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起飞力度非常显著，使年均增长率从1820年之前的0.05%跃升至1820—1870年的0.5%。此后，全球增长持续加速，在1950—1973年间达到近3%。

我们该如何解释经济增长在近代的这一突然腾飞？为什么它是发生在欧洲，而非从中世纪以来曾做出过许多重要发现的中国？更一般地说，其他经济转型现象又如何解释，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追赶经济转向创新经济？

新古典模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没有解释增长率随时间的变化。与事实相反，在新古典研究范式中，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通常会随时间下降，因为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而资本回报率会递减。我们将在本书第2章及第7~8章看到，熊彼特范式则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竞争与增长

有人或许认为，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利润减少，如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它们会自动削弱创新激励，因此竞争加剧意味着创新减少、增长失速。然而，英国经济学家对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竞争与创新之间，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这一似是而非的结果该如何解释？

新古典理论对此谜题并无说法，因为它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熊彼特范式能对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有更多启示吗？我们如何把增长和竞争的理论 with 实证发现协调起来？我们是否必须抛弃包

括熊彼特模型在内的所有现成理论，从头开始思考？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是否应该忽略实证挑战，继续研究模型，对矛盾现象视若无睹？本书第4章将探讨，创造性破坏的范式如何解答这一谜题。

中等收入陷阱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左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在此位置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差距并未缩小。但自那之后，阿根廷的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开始下跌。为什么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向美国的趋同会陷入停滞，而且走向倒退？还有些更发达的经济体也出现过增长中断现象，日本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从二战结束到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和技术水平经历了辉煌的增长，然后又进入漫长的停滞期。

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发展趋势中的这种中断现象。在该模型中，增长率随着资本积累逐渐下降，但趋势不会中断。熊彼特增长理论提供的解释则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采纳的制度或政策有利于通过资本积累特别是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增长和经济追赶，但它们没能为转向创新经济而相应调整制度。这一论题将在本书第7章探讨。

长期停滞

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指出，他认为美国注定陷入长时间的弱势增长，并将其命名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19]当

时的美国刚刚走出大萧条。从更近期看，2008年金融危机让劳伦斯·萨默斯（2013）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启用了长期停滞的说法，以描述他们眼中同汉森在1938年看到的类似景象。[\[20\]](#)

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美国的增长率自2005年后仍显著下跌？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长期停滞的谜题，因为该理论推测增长率将因为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而持续下降。那么创造性破坏范式能做得更好吗？

创造性破坏范式认为，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来的情况会比萨默斯或罗伯特·戈登（2016）的看法更乐观。[\[21\]](#)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和永远地改进了新思想的生产技术。[\[22\]](#)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同时发生的全球化过程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回报（规模效应）以及不创新的潜在成本（竞争效应）。相应地，最近数十年来的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加速。至于这一加速为什么没有体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上，本书第6章将予以回答。

不平等与创新

最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快速扩大，尤其是在收入阶梯最顶端的部分。“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速攀升。[\[23\]](#)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变化？

一种办法是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把资本积累视为发财致富的唯一源泉。另一种办法则是基于创造性破坏范式（在本书第5章和第10章展开），把创新及其产生的租金视为致富和顶层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又一重要根源。[\[24\]](#)

有哪些不同方法可以测算不平等？创新会如何影响这些不同

测算？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扩大有一部分来自创新，而不仅是房地产租金和投机所得，弄清楚这点为什么至关重要？

在第5章的详细阐述之前，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相比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原因，创新有着特别的优点。创新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发动机。创新在短期内的确会让其发明者和实践者受益，但从长期看，创新租金却会因为模仿和创造性破坏而消散。或者说，创新造成的不平等是暂时现象。最后，创新能带来社会流动性，让新的人才进入市场，并全部或部分地取代在位企业。

创新同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来源之间的差异，还启发我们思考设计这样一种税收政策：既具有再分配性质，又能促进创新和增长，并区别处理创新和其他不平等来源。相反，打击创新的税收政策不仅会妨碍经济增长，还将因为不鼓励创造性破坏而影响社会流动性。

6. 公共政策、政府与民间社会

我们对经济研究范式的评判，还要考虑它们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力。

没有范式指导的经济增长政策

不依靠任何范式的增长政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约翰·威廉姆森命名的“华盛顿共识”。[\[25\]](#)他采用的“共识”一词是指代如下事实：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

财政部都支持正在开展改革的拉丁美洲、亚洲和前苏联阵营的国家采纳同一套增长政策。该共识包含三条关键的准则：经济稳定化，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这些政策建议并非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但它们不是来自某个既定理论架构的系统论证。

“华盛顿共识”遇到了若干批评。尤其是，我们的同行豪斯曼等人（Hausman、Rodrik and Velasco, 2008）明智地指出，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在没有严格遵照此类建议的情况下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从未对大型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韩国则没有完全开放对外贸易。^[26]相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却没有显著提高增长率。豪斯曼等三位经济学家建议以“增长诊断”的观念为基础，采用另外一套务实的做法。他们的想法是找到各个国家分别面临的主要增长障碍，如教育体系缺乏效率、信贷约束或者基础设施匮乏等。

增长政策与新古典范式

第二种方法是借助新古典范式来设计增长政策。该模型认为，对实物资本装备的累积投资将促进人均GDP增长，但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这存在某个上限。该模型还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促进增长，尤其是对教育和知识的投资。可是新古典理论的启示到此便止步了，它并未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竞争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的作用，以及如何把教育政策同研究和创新投资结合起来等内容。

增长政策与创造性破坏范式

读者们应该记得，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一个关键思想是，持续的创新是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但由于人们不会把自己的创新给全社会带来的集体知识进步效应以及未来创新者能够利用这些进步的效应内部化，每个人的创新投入都将不足。于是政府需要扮演创新投资人的角色。针对这一课题，我们将在本书第10章探讨教育和科学对创新过程的作用，在第12章探讨创新融资，然后在第14章分析政府作为投资人的作用。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二个关键思想是，创新激励来自通过垄断租金获得回报的前景预期。该原则意味着，政府的第二个角色是充当创新的产权保护者。对此，我们将在第4章探讨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的互补性质，在第5章分析税收政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三个关键思想是创造过程中的破坏，每个新的创新都会摧毁之前创新产生的租金。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任何新的创新都将遇到在位企业的抵制，因为它们愿意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租金。拉詹和津加莱斯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诠释：这些企业还能获得雇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现有经济活动的破坏将使自己失去工作。[\[27\]](#)

面对这一反对创新的联盟，政府需要扮演双重角色。首先，政府应该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保证竞争与新创新者的自由进入，这是竞争政策、规制游说活动和打击腐败等政策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第6章和第15章详细讨论。其次，政府必须保护雇员们免受工作岗位消失的潜在危害。本书第11章将结合创造性破坏与健康和幸福度的关系探讨此课题，第14章将分析保障型政府的兴起。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另外两个启示

创造性破坏范式提供的视角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国财富增进过程的另外两个基本方面。

模仿与前沿创新。[28]推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搞创新，让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

我们将在第7章深入解释，某些国家因为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式增长和经济追赶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在初期实现了强劲增长，可是它们没有为转向创新经济而调整制度与政策。然而，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发达，距离技术前沿就越近，就越需要用前沿创新来取代技术追赶、充当增长发动机。[29]于是，有些国家未能维持强势增长，在人均GDP水平上没有向最发达国家完全趋同。

环境问题与创新方向。在位企业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试图阻止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市场，还关系到看待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保守态度。本书第9章将对此做详细阐述，过去在内燃机领域有创新成果的汽车生产商，通常会在未来继续致力于该领域的开发，因为这是其优势所在，它们不会自发地选择转向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作“路径依赖”。为推动企业转向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有必要依靠政府利用多种工具加以干预。

如何让政府妥善履行职责？

为什么政府会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作用？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鼓励新创新者的进入，抵制在

位企业的腐蚀拉拢？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建立保障和制衡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

我们将在本书第14章和第15章尝试回答此类问题。在有关政府议题的这些章节，我们把国际竞争与民间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视为迫使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两个杠杆。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将不像熊彼特那般悲观。这些力量迫使市场经济持续改善自身及其规制，并给我们带来实现更环保、更包容的繁荣发展的希望。

7.本书大纲与读者手册

本书第2章将探讨增长起飞的谜题：如何解释世界GDP在19世纪初期之前的长期停滞，以及随后在英国乃至法国出现的工业起飞？这一章将展示，创造性破坏范式如何为理解起飞现象提供有用的视角。

第3章将介绍重大技术革新浪潮：为什么技术进步以浪潮形式出现，为什么过去的技术革命与自动化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岗位？

第4章将分析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的关系：竞争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促进创新与增长；我们该如何协调竞争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为什么竞争与产业政策并不矛盾？

第5章将分析创新与不平等的关系：如何测算不平等程度；为什么作为“顶层不平等”来源之一的创新同其他不平等来源有所不同；创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带来社会流动性；游说活动如何影响增长与不平等？此外还涉及，为什么对资本征税并非使增长变

得更加平等的唯一工具？

第6章将探讨长期停滞的谜题，尤其是试图解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的下滑：为什么生产率增速的测算不正确；为什么商业活力下降伴随着租金上升与超级明星企业的出现；以及为什么长期停滞并非不可避免？

第7章将探究中等收入陷阱的谜题，也被称为“阿根廷悖论”：为什么某些国家最初能快速增长，然后停滞在中游；为什么促进技术前沿创新型增长的制度不同于鼓励追赶型增长的制度；为什么自由对技术前沿的创新和增长尤其重要；危机如何帮助某些国家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8章将考察去工业化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原因：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转型？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的必要步骤，还是说不需要大规模工业化就能实现从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直接转型？

第9章将探讨绿色创新：为什么放任式经济不会自发转向绿色创新；政府为什么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干预，以引导绿色技术的创新；为什么碳税并非实现更绿色增长的唯一工具？

第10章将深入探究创新议题：哪些人是创新者？我们对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哪些了解？为什么教育政策和研发政策在促进创新引领的增长方面有互补作用，为什么创新不能离开基础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依赖于学术自由和开放？

第11章将分析创造性破坏同失业、健康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创造性破坏会导致失业？失业对个人有哪些情感影响，对人们的健康有何危害？为什么辅以恰当的公共政策，创造性破坏可以不妨碍人们的健康与幸福感？

第12章将聚焦于对创新的融资：为什么股权和风险资本融资

非常适合支持前沿创新；为什么机构投资者与慈善家也在鼓励承担风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什么政府可能过分专注对大企业的研发补贴，结果伤害了更具创新力的中小企业？

第13章将聚焦于创新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也包括人的全球化：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如何影响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创新；为什么出口市场的扩张会刺激创新，为什么投资与创新是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的维持价值链控制的方式；为什么技术移民对迁入国的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14章将从历史角度分析，能够同时投资创新并管理相应风险的政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战争风险与国际竞争如何促进了致力于教育、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国家逐渐兴起；战争与重大经济危机如何推动各国政府采纳相应政策，以保护个人免受创造性破坏的内在风险，或保护企业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第15章将分析，对行政机构的制衡如何制止妨碍新创新活动进入的滥权和腐败。我们将介绍几种可以监督行政权力使用的宪法工具。但在许多情形下，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些工具仍不能发挥实际效用：民间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充当权力分立与行政权力监督的最终保障；为什么“市场—政府—民间社会”这个三角结构对创新经济的正常运转不可或缺？

最后，基于之前各章的分析与讨论，本书结语部分将邀请读者一起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对其进行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和更公平的繁荣？

在结束这一引言部分的时候，我们再做三点补充。第一，我们将以特定的熊彼特研究范式或者说创造性破坏范式，来探讨与增长过程有关的谜团和问题。如前文所述，其他研究方法也曾被用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但归根到底，正是经济思想史中的创造

性破坏过程筛选出了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模型与范式。第二，在分析和推理的表述中，我们将依据：（1）启发性的经验证据，意指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性；（2）更靠近因果解释的经验证据，包括利用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借助自然实验或随机实验等方法。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将尽可能明确地告知读者，有关的经验事实只是启示性的，还是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我们选择用众多图表来描述某些论证，目的是让某些不那么直观的内容变得更加清晰、友好和有趣。

[1]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 (195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

[2] 这一名言来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由马克思于1845年撰写，但直至1888年才由恩格斯帮助出版。近期的英文译文来自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trans. W. Lough,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2,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theses/theses.htm>.

[3] Daniel Kahneman and Angus Deaton,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38 (2010) :16489 -16493.

[4] 关于发展指标的关键内容，可以参见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 and Jean Fitoussi,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MEPSP, Paris, 2009, <https://www.uio.no/studier/emner/sv/oekonomi/ECON4270/h09/Report%20in%20English.pdf>.

[5] See Robert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no. 1 (1956) :65 -94.

[6] 罗默发展出了一种不包含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引领增长模型。See Paul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5 (1990) :71 -102. 对于从索洛模型到熊彼特模型的增长理论综述，可参考下列文献：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 Elhanan Helpman, ed.

,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Charles I. Jones,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and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d Peter Howitt, “What Do We Learn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 515 -563 (Amsterdam: Elsevier, 2014). 最新的熊彼特模型版本纳入了企业的动态作用; 最早由Tor Jakob Klette与Samuel Kortum提出, 参见Tor J. Klette and Samuel Kortum, “Innovating Firms and Aggreg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no. 5 (2004): 986 -1018; 后续研究做了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Ufuk Akcigit及其合作者的成果。

[7] 该模型于1987—1988学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提出, 当时阿吉翁刚担任助理教授, 彼得·豪伊特 (Peter Howitt) 从加拿大西大略大学来此做访问学者。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no. 2 (1992): 323 -351; Aghion, Akcigit, and Howitt, “What Do We Learn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8] 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3)。

[9] 这里无法全面介绍用专利来测算创新的大量相关文献, 我们想提到该领域的若干先驱人物, 例如Pierre Azoulay、Ian Cockburn、Zvi Griliches、Bronwyn Hall、Dietmar Harhoff、Adam Jaffe、Jacques Mairesse、Ariel Pakes、Mark Schankerman、Otto Toivanen、Manuel Trajtenberg、Reinhilde Veugelers等,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他们的网页上深入了解。

[10] U. Akcigit, J. Grigsby, and T. Nicholas, “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

[11] 人们或许怀疑这一相关性是偶然形成, 但在Akcigit、Grigsby和Nicholas的文章“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中, 他们从历史数据发现, 创新与增长之

间确实具有因果关系。

[12] J. Haltiwanger, R. S. Jarmin, and J. Miranda,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no. 2 (2013) :347 -361.

[13] 读者可以参考Steve Davis、John Haltiwanger及其合作者关于企业和就业的创造与破坏的开创性研究文献。See, for example, S. J. Davis and J. Haltiwanger, “Measuring Gross Worker and Job Flows,” in *Labor Statistics Measurement Issues*, ed. J. Haltiwanger, M. E. Manser, and R. Topel, 77 -12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S. J. Davis and J. Haltiwanger “Gross Job Flows,”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d.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vol. 3B, 2711 -2805 (Amsterdam: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99) ; Haltiwanger, Jarmin, and Miranda, “Who Creates Jobs?”; R. Decker, J. Haltiwanger, R. Jarmin, and J. Miranda,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Dynam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no. 3 (2014) :3 -24; S. J. Davis and J. Haltiwanger, “Labor Market Fluid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4) .

[14] U. Akcigit and W. R. Kerr,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1374 -1443.

[15]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3 (2014) :1035 -1084.

[16] 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 “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 -956.

[17]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Paris: OECD, 2001) .

[18] See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J. Van Reenen, “Dynamic Count Model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nomic Journal* 105, no. 429 (1995) :333 -344;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J. Van Reenen, “Market Share, 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in a Panel of British Manufacturing Fi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no. 3 (1999) :529 -554; and S. J. Nickell,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no. 4 (1996) :724

[19] A. Hansen,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ecember 28, 193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 no. 1 (1939) :1 -15.

[20] L. Summers, presentation at the IMF Economic Forum: Policy Responses to Crises, 14th Jacques Pola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9, 2013.

[21] R.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2] S. Baslandze, "The Role of the IT Revolution in Knowledge Diffusion, Innovation and Reallocation," 2016 Meeting Papers No. 1509,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6.

[23] A. B. Atkinso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 1 (2011) :3 -71;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4]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1 (2019) :1 -45.

[25] J.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 J. Williamson, vol. 1, 90 -120 (Washington, DC: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

[26] R. Hausmann, D. Rodrik, and A. Velasco, "Growth Diagnostics," 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ed. N. Serra and E. Stiglitz, 324 -3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7] 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 no. 1 (2003) :5 -50.

[28] 技术前沿是指技术发展的最先进水平，或者说“今天”可用的最高效的生产技术。由于创新的作用，这一前沿显然会随着时间而向前推进。

[29] D. Acemoglu, P. Aghion, and F.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第2章

起飞之谜

18世纪末兴起的持续且无间断的增长，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一个增长几近停滞的世界中，突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累积式扩张过程，带来人均生活水平的指数式提高。人类在18世纪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住房、营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在当前的发达国家，饥饿或寒冷导致的死亡已几乎绝迹，而19世纪末时仍极为普遍。在17世纪，25%~30%的新生儿会在1岁前夭折，50%活不到20岁。今天欧盟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则仅有4%。

如何解释全球GDP与人口在1820年之前的停滞？为什么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是许多重大发现的诞生之地，却直到1820年才启动持续的增长？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非其他地方，特别是曾发明轮子与算盘的中国？起飞的发动机是什么，技术进步还是制度进步？我们将尝试在本章解答上述问题，用历史事实和数据来印证不同的增长理论。

1. 长期序列数据的启示：安格斯·麦迪森 [1]

收入与人口的持续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在公元1000—20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300倍，人口增幅则为23倍，或者说这期间的人均收入提高至原来的13倍。作为鲜明对比，在之前的1 000年中，人口仅增长了1 /6，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增长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1820年前后，距今不过200年时光。所以，我们今天感觉自然而然的人均GDP增长，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却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图2.1）。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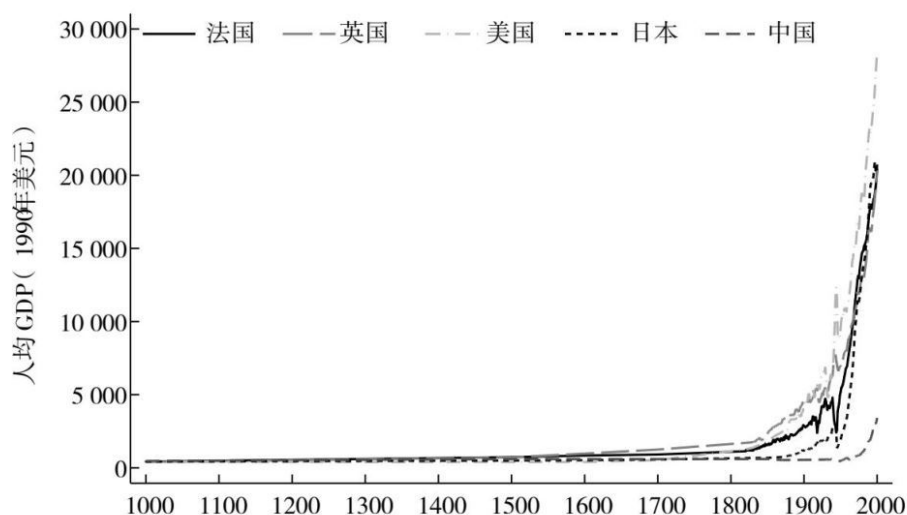


图2.1 1000—2008年全球人均GDP

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 (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增长伴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在公元1000年时，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仅为24岁，其中1 /3会在1岁前夭折。转折点同样出现在1820年。这之前的预期寿命增长非常有限，全世界新生

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820年仅为26岁，但此后进入了指数式增长，1999年达到66岁。

人口状况呈现与GDP极为类似的变化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出生率很高，接近40‰，但死亡率也一直很高，接近38‰，因此人口增长缓慢。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到1000年仅增长了18%，而在1000—2000年却增长了23倍。作为首先经历起飞的地区，欧洲各国也最早出现人口的显著增长。事实上，法国的人口从1750年起便明显增加（图2.2）。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生育率直至1880年才开始下降。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婴儿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现象，而在瑞典、比利时与丹麦等国，婴儿死亡率下降明显早于生育率下降。经济起飞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令人好奇：这两个现象是各自维持的吗？还是说GDP增长导致了人口爆炸？点燃爆发式增长的火花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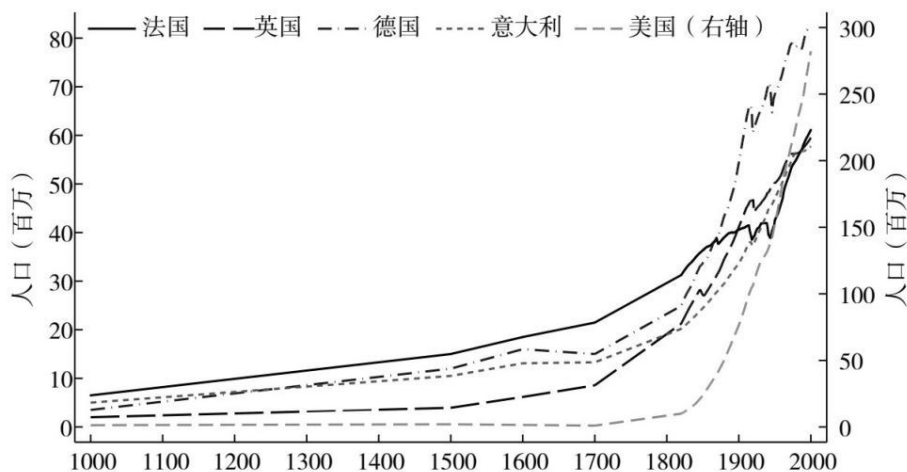


图2.2 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 Maddison Historical Studies Project (2010) , Groningen

除人口变化外，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在19—20世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初期开始，农村人口大量迁出。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大多数人口住在农村，城市化率很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与荷兰。当时荷兰的城市化率达到37%，为整个欧洲之最，紧随其后的英国和比利时约为20%。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与葡萄牙等另外几个欧洲国家，由于之前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城市化率也突破了15%。^[2]不过直至19世纪初，农村人口占欧洲全部人口的比重依然接近90%（图2.3）。^[3]该比率自1800年开始下降，到1975年降至36%。^[4]在1800—1980年间，居民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的数量增长了4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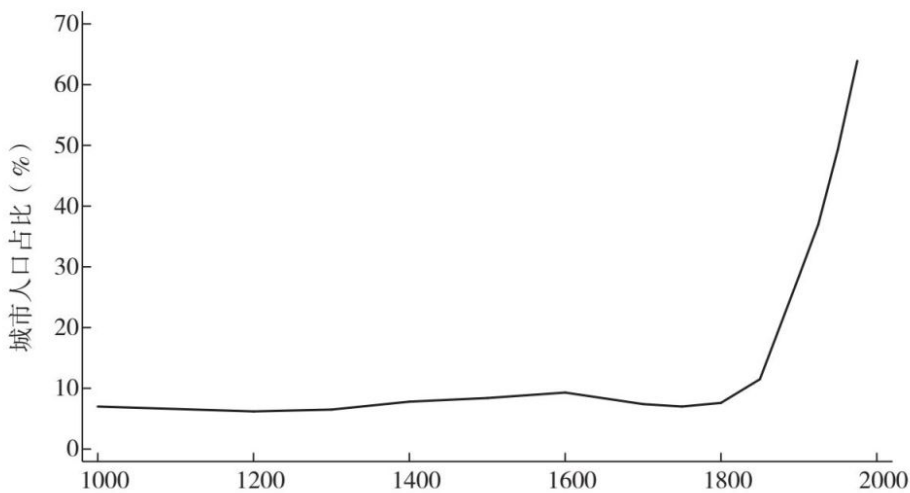


图2.3 1000—1975年城市人口占整个欧洲人口的百分比变化

注：城市人口的定义是居住在超过5 000人规模以上城市的居民。
资料来源: J. V. Grauman (1976) ,“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8 (1976) :16 -33。

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追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由于数据零碎不全，当时也完全没有国民核算的概念，必须依靠各种线索和推测来计算（见专栏2.1）。

专栏2.1 国民账户的发明

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总在设法测算其管辖疆域中的财富创造情况。在封建时代，国民经济基本上限于农业，农业也就成为税收测算的基础。在1690年的英格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发明了政治算术的概念，这是国民账户的前身。增加税收的愿望促使配第与后来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尝试测算国民总收入：要么是各种生产要素产生的收入之和，要么是各种支出之和。^[5]在法国，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lebert）与马雷查尔·沃邦（Marechal Vauban）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国民收入。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发明了第一个从宏观经济角度包含完整国民核算体系的动态理论模型，当然，这一重农学派模型描述的经济是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6]

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

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

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7\]](#)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8\]](#)同时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约翰·凯恩斯的鼓励和建议下，也准备了一套估测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办法。[\[9\]](#)

法国方面的先驱人物则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他于1955年在应用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e）首先开展相关的量化分析。[\[10\]](#)但在二战后的30年里，关于法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参考意义的研究是卡雷等人的成果（Jean-Jacques Carré, Paul Dubois and Edmond Malinvaud, 1972）。[\[11\]](#)他们的目标是基于国民核算已经取得的进展，识别和评估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这项研究在几个国家并行开展，推动了战后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创建。在联合国、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跨国专家工作组的支持下，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

麦迪森与历史数据重建

麦迪森收集了大部分国家自1950年以来的国民账户数据，但重建更早期的GDP和人口数据，则需要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方法。

对1820—1950年，麦迪森采用的是登记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历史上收集的收入与人口数据。他首先以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成果为基础，完成数据收集工作；然后以各国采用的技术水平的差异为函数，对估计数据进行适度修正，以实现跨国估计的一致性。例如对法国，麦迪森重点参考了杜丹的研究成果（Jean Claude Toutain, 1987）。[12]为测算GDP，他重点考察主要经济部门的产出。他根据法国的农产品（如谷物、葡萄酒、木材和肉类）与产品价格的档案，估算农业产出。针对制造业，则包含23个分支，共113个序列数据，覆盖1789—1938年的所有工业门类，例如开采加工、冶金、食品、纺织、化学和建筑业等。接下来，麦迪森把测算结果同其他人的估算（Lévy-Leboyer and Bourguignon, 1985）做交叉比对。[13]然后针对19世纪的国境范围做出调整，最终得出了法国自1820年以来的人均GDP数据变化（表2.1）。

表2.1 1820—1913年对法国人均GDP的估算结果（单位:千，1990年国际元）

	1820	1870	1913
麦迪森	1. 218	1. 858	3. 452
杜丹（1987）	0. 983	1. 858	3. 452
莱维－勒博耶（1985）	1. 123	1. 836	3. 452

资料来源: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Paris:OECD, 2001) 。

对1500—1820年，麦迪森利用近似法测算GDP。他采用的是登记机构留下的人口数据，这在欧洲国家尤其具有可靠性。结合某些历史事件（如战争和疾病）的影响，他对数据做了修订。至于GDP的测算则包含三种可能的情景：某些国家有部门产出数据，特别是比利时；其他一些国家没有留下此类数据，但经济状况与邻国非常相似，于是麦迪森假设法国的人均GDP增长与比利时相同；对本国和邻国都缺乏数据的最后一种情景，麦迪森只能凭经验推测，例如假设俄罗斯的人均GDP以每年0.1%的速率增长。尽管这些推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都很低，各国之间可能的差异从很长时间跨度来看会被抚平。

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间，对人均收入变化的测算要粗糙得多，因为麦迪森唯一能参考的只有人口数据。他知道欧洲和亚洲在公元1000年的城市化率（居住在1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比率），继而假设，某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有过剩农业产出，经济中非农活动的比重因之上升。在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欧洲的城市化率近乎为零，因此麦迪森推断，人均GDP接近生存水平，约为今天的每人每年400国际元。中国的城市化率略高，约为3%，麦迪森推测其人均GDP达到了450国际元。

麦迪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让我们能够修订对西欧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他于2010年去世后，格罗宁根大学发起“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以延续其研究，目标是继续收集关于GDP、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数据。对1820年之后的时期，麦迪森的估计结果没有被大幅修正。对1300—1820年，麦迪森项目开展了重大的历史计量学研究。[\[14\]](#)但从长

期看，与1820年之后的起飞相比，此前的增长依然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地球还在转

尽管历史长河中的增长远远比不上1820年后的起飞，但此前的经济并非处于没有任何增长的永恒停滞状态。[\[15\]](#)凯恩斯就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表述了某种微妙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生活水平没有陡然变化，却有上下起伏，某些时候甚至可能在几十年里让人均财富翻番。[\[16\]](#)富凯（Roger Fouquet）与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更近期的研究则指出，若关注1300—1820年这个时间段，会看到人均GDP或上升或下降的显著运动（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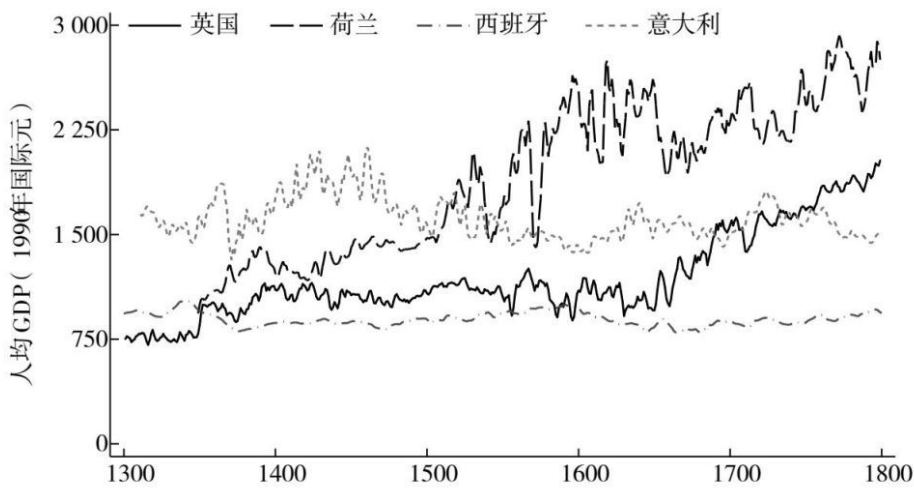


图2.4 1300—1800年部分经济体的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 “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有两个国家因持续的长期增长而显得出类拔萃。[\[17\]](#)在1350—1420年间，即文艺复兴初兴之际，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了40%，相当于70年间的年均增速为0.8%。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大瘟疫造成人口急剧下降，使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本增加，加上意大利各城市在海运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弗兰德斯、法国、德国与巴尔干地区）、西方国家与东地中海以及西方国家与远东的贸易发展中扮演了尤其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只负责促进产品贸易的繁荣，如香料和丝绸等，也加强了来自亚洲、埃及和拜占庭的技术引进，如纺织品生产、玻璃吹制、水稻和甘蔗种植等。威尼斯还处于制度创新的最前沿，特别是引入了新的合同类型来组织12世纪的贸易与投资。具体而言，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贸易必须有不菲的投资并承担巨大风险，如遭遇海盗、海难或延误等，但可以用极低的概率获得极丰富的财务回报。为实现可接受的风险分摊，威尼斯人发明了一种名为“联合会”（*colleganza*）的合同，属于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这种制度是投资人与商人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为商人提供商品，商人负责运输并出售，合同提前约定好潜在利润的分配办法。此类合同让很大一部分人口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正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达到了繁荣与权势的巅峰。

进入17世纪，轮到英格兰经历快速增长，其人均GDP在这个世纪中实现了翻番。1642—1660年的内战是标志王室权力转型的关键一步，在短暂的共和国体制后，决定性地迈向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得以明确。在君主立宪制下，议会居于国王之上，使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18\]](#)这一前所未闻的政治形态给创新带来了有利的环境，进而为工业革

命创造了条件。

1300—1800年这一时段也出现了下降期。例如，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有过三个下降期：1450—1600年、1650—1700年以及1750—1800年。这些下滑部分源于人口增长的反弹、若干敌对城邦（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市场的分割，以及欧洲人在15世纪末抵达美洲之后，贸易重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欧洲各经济体在1820年之前经历过一系列增长期和下滑期，远非停滞不变。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1820年之前的时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起飞究竟有何区别？针对这个疑问，富凯与布劳德伯利（2015）的研究分析了每个国家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其定义是在至少连续4年里维持1.5%以上的增长率（表2.2）。他们的假设是，连续4年超过1.5%的增长率对应着起飞的到来。^[19]在5个世纪（1300—1799年）中，该研究考察的6个国家（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都非常低，仅1%~2%。在19世纪，此概率提高到5%，到20世纪则升至40%。于是，富凯与布劳德伯利证实了如下假说：持续经济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表2.2 1300—2000年6个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或下降时期（所占比例）

	连续 4 年增长率 $\geq 1.5\%$ 的 年份所占比例	连续 3 年增长率 $\leq -1.5\%$ 的 年份所占比例
14 世纪	1.1	1.6
15 世纪	1.0	8.0
16 世纪	2.3	8.7
17 世纪	1.3	4.3
18 世纪	1.3	5.8
19 世纪	5.3	2.0
20 世纪	40.0	3.2

注：数据包含的国家为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

资料来源: 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 "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no. 4 (2015): 227-244.

2.对起飞的技术因素解释

为什么增长起飞直到19世纪初才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前的发明创造，例如轮子、印刷术或指南针没有带来累积式增长？为什么这一切变化是从英国这个欧洲小国开始，而非中国那样的大国？

起飞之前：马尔萨斯陷阱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对世界经济在1820年之前未能起飞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他的理论说明了两个现象的并存：在19世纪之前，人均GDP的停滞与人口数量的停滞。在

《人口论》这部名著中，马尔萨斯阐述的前提是农业产出来自劳动与土地的结合。^[20]由于土地是固定的生产要素，人口的任何增长都将自动导致人均GDP下降，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劳作。与此同时，人均GDP（即平均生活水平）的任何提升，例如由新发明或扩大贸易开放所致，都会带来人口的增加，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会鼓励家庭养育更多子女（比如《格林童话》里的汉塞尔与格莱特、大拇指汤姆的故事），或者会暂时降低死亡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则会造成我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永远不能给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带来可持续增长，因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维持生存的水平。

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只有因为节欲或限制生育等导致的人口下降可以使人均GDP提高。生产率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似乎给前工业化时代提供了可信解释。然而1820年之后同时出现的经济增长与大幅人口扩张，则暴露马尔萨斯学说的局限性。人类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

技术因素解释

纯技术的观点能解释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吗？一种经常被引用的说法是，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使人类可以摆脱土地这一固定生产要素，用资本予以替代。与土地不同，资本随时间而增加。所以用资本替代土地，就能消除马尔萨斯理论范式中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负面影响。但假设事实如此，那为什么人类会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很快用资本替代土地呢？这里我们再次用纯技术观点来解释，它认为制造技术的引入需要付出较高成本，在人

口充分增长、人均农业产出被充分压低之前，做这样的投资并不合算。对于从农业生产转向制造业的一种类似解释是，当人口达到某个关键临界点时，就会出现农村人口大批脱离，把劳动力解放到制造业里去。还有学者强调需求效应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当需求超越某个关键的临界点后，各种产业同时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才有利可图。[\[21\]](#)总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依赖于一种临界点效应：人口临界点、需求临界点、投资临界点。可是为什么起飞会在1820年发生，又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那样兼具创新力和稠密人口的国家？

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

第二种解释则基于两种效应的结合：人口对创新的规模效应，以及人口转型效应。该理论模型由克雷默提出（Kremer, 1993），后来被盖勒与韦尔发展完善（Galor and Weil, 2020）。[\[22\]](#)

我们可以把规模效应概括如下，人口密度或数量增加会使所有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创新租金，所以人口对创新和增长具有正面效应。[\[23\]](#)此外，人口密度增加会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从而加快创新生产乃至增长。[\[24\]](#)那么由规模效应带来的技术进步加速是否足以让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尔萨斯设想的世界中，技术进步的加速都会带来人口增长加速，也就是会导致人口爆炸，最终妨碍人均GDP的起飞。

因此，为逃离马尔萨斯陷阱，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杠杆，即人口转型的杠杆。简单地说，随着技术进步加速，人们必须通过更

多的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是先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越多，以便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

[25]接下来，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将影响父母在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选择，促使他们倾向于养育数量更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代。[26]

这样的人口转型杠杆将缓和人均GDP增长对人口的马尔萨斯效应，从而防止人口规模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自动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相反，在人均GDP超出一定水平后，父母会选择更小的家庭规模，以便对子女教育做更多投资，并更多享受技术进步的收益。[27]因此，人口转型与规模效应的结合可以使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乍看之下，历史数据似乎符合基于人口转型的这一观点：直至1870年，人均GDP的加速增长依然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然而到1870年之后，人均GDP的增长却与人口增长率下降同步发生。事实上，最发达的国家恰恰成了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国家。

转向制度因素解释

起飞来自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相结合的观点遇到了经济史学家提出的若干实证挑战（Mokyr and Voth, 2010）。[28]首先，这批学者指出，英格兰的人口在工业革命前的1700—1750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并不存在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人口爆炸。另外，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650—1750年间增长了3.2倍，创新水平也不亚于欧洲，却没有出现增长起飞。最后，规模最大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比其他国家更强劲的增长。这些思考促使我们为起飞寻找纯技术之外的解释，即把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的解

释。

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克尔 [29]

本节探讨的制度研究方法经常会提及本书第1章介绍的创造性破坏范式。它的三个基本理念是：（1）增长来自知识的逐渐累积，每个创新都要利用之前创新包含的知识，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创新需要友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对财产权利的有力保护；（3）创新将摧毁现有租金，因此需要保证新的创新企业能持续进入的竞争性环境。

科学与技术共同演化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历史不时出现技术创新。但与工业时代不同，这些创新是孤立、异质性的，没有带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时期。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命题性知识的进步是发现，规范性知识的进步则是创新。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

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

如我们的同行大卫·恩考瓦（David Encaoua）在2011年所述，“这个时代搭建了从技艺（technique）主导的知识王国向应用技术（technology）主导的知识王国的通道，也就是说，走向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30]例如在化学领域，人们了解各种化合物的配方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只有当我们把化学合成的理论提炼总结出来后，才能制造出新的化合物。与之类似，显微镜的发明则给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例如，数学为牛顿力学定律的概括提供了工具，后者又用来解释抛物运动，促进了弹道学的发展与新的科学发现。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莫克尔提到了三个要素，同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条原则恰好匹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让累积式创新成为可能；国家之间的竞争让创造性破坏成为可能；保护创新者的财产权利的制度得以出现。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18世纪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要感谢平价邮政服务的兴起和印刷成本的下降。当时报纸的印数激增（表2.3），并出现了多种百科全书。^[31]例如，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于1704年在伦敦出版了《技术词典》（Lexicon Technicum），被视为首部现代英语百科全书，并为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于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打下基础。实际上，狄德罗（Diderot）与阿

兰贝特（Alambert）最初的计划正是把这部全书翻译为法文，但后来转向了更志向远大的项目。他们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简称《百科全书》）希望把当时所知的全部知识与技巧都编纂进来，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撰稿，首卷于1751年出版。^[32]这些著作的传播让技术和科学知识广为人知，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积累过程。

表2.3 1790—1840年美国邮政局递送的信件与报纸数量

年份	信件数量（百万）	人均信件数	报纸数量（百万）	人均报纸数
1790	0.3	0.1	0.5	0.2
1800	2.0	0.5	1.9	0.4
1810	3.9	0.7	—	—
1820	8.9	1.1	6.0	0.7
1830	13.8	1.3	16.0	1.5
1840	40.9	2.9	39.0	2.7

资料来源: R. R. John, *Spreading the News: 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接下来，鼓励知识分享和增进的社团与俱乐部开始兴起，这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当时的情形与15世纪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知识被行会与同业公会等严密控制。而到了18—19世纪，真正的信息分享文化开始兴起。结果使发明家不再需要每项发明都从头起步，他们得以继承过去一切发明包含的知识财富，真正站到“巨人的肩膀”之上。

开放性，即发明家之间与各国之间的自由思想交流，对累积创新过程及后来的起飞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莫克尔坚持认为，跨

越国境的“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社群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文人方面产生了卓越影响。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这一文学界社群把创新者推上全欧洲的跨国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比本国同胞更大的受众群体。在本书第10章，我们还将探讨开放性对创新过程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竞争的重要性

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33\]](#)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 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本书第15章还会详细讨论威尼斯的案例。

财产权利

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是实现增长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起飞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之后才扩展至法国。技术因素对此无法提供全部解释，因为在18世纪末，英法两国达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大体相当。要知道，法国正是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开创性地编纂知识体系的地方。然而，英格兰在保护财产权利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取得了超越国王的地位，首次确保了财产权利不受政治干预，从而为创新注入了激励。^[34]光荣革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前，后者只是为建立对创业和创新更友好的制度创造了初始条件，真正的起步是《拿破仑法典》，直到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深刻教育改革。

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在此之前，各行业都由行会保护，它们对自己的累积技术知

识严格保密。这些行会极力在相应的城市建立垄断，把附近城市排斥出自己的市场，例如布鲁日与根特或者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就有此类激烈角逐。只有值得信任的学徒才能获得机会，完全掌握所在行业采用的技术。而任何泄露行会秘密的人则会遭到厄运！乔治·雷纳德（Georges Renard）这样介绍1454年的威尼斯法律：“如果一名工人把技术或工艺带到其他国家，给共和国造成危害，他将被勒令返回；若不从命，他的近亲将被监禁，以利用家庭亲情劝告他返回；如果坚持不从命，则会采取秘密措施取其性命，无论他身处何地”。[35]哈尔·范里安（2004）称15世纪的威尼斯在两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水晶玻璃与造船。水晶玻璃（又称穆拉诺玻璃）的制造工艺受到严格控制，要求生于穆拉诺岛（Murano）的任何人都永远不得离开，以防止泄密风险。类似地，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观察威尼斯军械厂的船只建造过程。[36]

专利制度的出现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专利让发明家至少暂时获得了发明应用的垄断权，保护了创新租金，提供了创新动力。其次，专利又迫使发明家分享其发明所依赖的知识，让其他人能利用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开展后续创新。

[37]

金融的发展

金融的发展，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创建，股权融资和股票交易所的兴起，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等，对推动欧洲19世纪的创新和工业起飞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

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38]具体而言，他们展示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如何伴随着若干金融发展指标的提升，如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率，以及股权融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的比率等。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在本书第12章，我们还将就创新融资的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大卫·赛夏与发明家的苦难

很少有小说家像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那样，讲述19世纪的发明家在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融资机会时遭遇的磨难。该书的第三部名为《发明家的苦难》，描述了大卫·赛夏遭遇的痛苦。

赛夏是一位印刷商的儿子，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工艺。这套工艺使他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然而，他最直接的竞争者库安泰兄弟通过不道德却并不违法的手段获得了这套工艺的所有权，他们通过伪造签名，要求赛夏偿还其朋友吕西安（即该书的主人翁）欠下的债务，从而迫使赛夏及其印刷厂破产。库安泰兄弟掌控了局面，着手向赛夏施压，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要求把他的发明无偿且永久授予他们。虽然发明带来的收入贴现值远远超过债务额，赛夏却因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不得不接受了极端不利的协定。

与赛夏所在的19世纪上半叶相比，这种不幸在今天的法国更不容易发生，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专利申请的cost有关，如今这一费用约为600欧元，而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相当于赛夏的印刷厂市值的10%。其二是，赛夏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找融资（如通过银行、风险资本家、机构投资者等）要容易得多，因为有形的知识产权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可以对专利做价值评估，以之作为筹资或借款的抵押品。

如果大卫·赛夏穿越到今天，他就能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从银行或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融资，以实现技术应用。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将代他偿还对库安泰兄弟的欠款。或者赛夏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专利，利用这一收入来还债，同时仍能够保留富余的款项。

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揭示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好处，与19世纪的情形相比，发明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获得专利制度的保护。还有，更发达的金融体系能保护发明家免受某些债权人的挟持（特别是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债权人）。

伊莱·惠特尼与他的轧棉机

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种把棉籽同棉花分离的机器。该发明于1794年3月获得了专利。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惠特尼为保护其发明免遭仿冒，耗尽了自已从发明中获得的全部利润，最终让他的企业在1797年破产。这位发明家决定再也不申请专利，并留下了如下名言：“一项发明可以如此值钱，以至于让发明人一无所获。”如今，伊莱·惠特尼毫无疑问能成功保护他

的发明，并获得让公司继续运转的融资。[39]

4. 结论

起飞的奇迹与多种因素有关，它们的结合造就了自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不过，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桥接能够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起飞发生在19世纪初，而非更早时期；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从英格兰起步，再到法国——而非世界的其他地方。印刷与邮政服务等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新兴制度给创新者带来了保障，鼓励了对创新的投资。

总之，工业革命可以作为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绝好展示：累积式创新成为增长的驱动力；制度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保护创新租金乃至普遍促进创新的财产权利；必须存在竞争，以克服在位企业和政府为防止新进入者挑战自己的租金或权力而设置壁垒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一范式将贯穿全书，指引后续分析，但同时我们也将在今后的章节里不断用实证数据对其反复检验。

[1] 以下分析以安格斯·麦迪森的两项主要研究成果为基础：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Paris:OECD, 2001) ; and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Historical Statistics*,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Paris: OECD, 2003) 。2010年，格罗宁根大学的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麦迪森历史统计项目”（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Project），以延续麦迪森的研究，并继续对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做严格测算。

[2] Paul Bairoch and Gary Goertz, “Factor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 *Urban Studies* 23, no. 4 (1986) :285

[3] 这些数字根据不同来源略有出入。Bairoch和Goertz (1986) 的估计是, 1800年的工业化率为10.9%, 联合国的估计则为7.6%。另外, 由于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城市化率在17世纪略有下降。

[4] J. V. Grauman, "Orders of Magnitude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in History,"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8 (1976) :16 -33.

[5]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k" (1676; pub. London, 1690), in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2 vols., ed. Charles H. Hull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99), vol. 1, 233 -313; Gregory King,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England" (1696), in *Two Tracts by Gregory King*, ed. George E. Barn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6) .

[6] 读者可以参考魁奈的《经济表》: François Quesnay,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xtes*, ed. C. Théré, L. Charles, and J. C. Perrot, 2 vols.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2005) .对国民账户历史由来的深入介绍, 可参阅Alfred Sauvy, "Historique de la comptabilité nationale,"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14, no. 1 (1970) :19 -32.

[7] 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1929 -1932" (Bulletin 4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34) .

[8] Wassily Leontief,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1939 :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quilibrium Analysis*, 2nd enl.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9] J. Meade and R. Stone,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4th ed. (London: Bowes and Bowes, 1957) .

[10] François Perroux, "Prise de vues sur la croissanc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1780 -195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 no. 1 (1955) :41 -78.

[11] J. J. Carré, P. Dubois, and E. Malinvaud,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 un essai d'analyse économique causale de l'après-guerre* (Paris: Seuil, 1972) .

[12] Jean-Claude Toutain, "Le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982," *Économies et Société*, Cahiers de l'ISMEA, Série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1987, 15.

[13] M. Lévy-Leboyer and F. Bourguignon,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XIX:*

siècle: *Analyse macro-économique* (Paris: Economica, 1985) .

[14] 历史计量学是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问题的学科。

[15] Roger Fouquet and Stephen Broadberry, “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 no. 4 (2015) :227 -244.

[16] J. M.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Norton, 193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17] 还有荷兰:在1570年之前,该国南部地区(如今的比利时)成为经济活动与繁荣的中心;不过在1590年后,北部地区(如今的阿姆斯特丹)占据了领先地位。

[18] 关于知识产权的议题,主要可参考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no. 4 (1989) :803 -832.

[19] Fouquet and Broadberry, “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20] T.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J. Johnson, 1798;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

[21] See, for example, K. M. Murphy,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no. 5 (1989) :1003 -1026.

[22] Michael Krem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 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no. 3 (1993) :681 -716. Oded Galor and David N. Weil,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no. 4 (2000) :806 -828.

[23] 这一“市场规模”效应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型(包括熊彼特模型)的内在特征。读者可以从如下文献中看到部门数据和企业数据所证实的这一规模效应: Daron Acemoglu and Joshua Linn, “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no. 3 (2004) :1049 -1090; and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J. Melitz,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y 2018, rev. October 2019) .

[24] See Charles I. Jones and Paul M. Romer,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no. 1 (2010) :224 -245; 以及本书第10章。

[25] 背后的理念是，技术进步会导致教育回报增加。

[26] Richard R. Nelson and Edmund S. Phelps, “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no. 1 -2 (1966) :69 -75.

[27] Nelson and Phelps, “Investment in Humans.”

[28] Joel Mokyr and Hans-Joachim Voth, “Understanding Growth in Europe, 1700 -1870: Theory and Evidence,”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 vol. 1: 1700—1870*, ed. Stephen Broadberry and Kevin H. O'Rour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9] 本节是对莫克尔的分析的拓展，参见Joel Mokyr,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对他这部著作的更多介绍，参见Hal R. Varian, “Review of Mokyr's Gifts of Athen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 no. 3 (2004) :805 -810.

[30] 引自David Encaoua, “Interactions science-technologie: quel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Revue Française d'Économie* 25, no. 4 (2011) :75 -119.

[31] Diego Puga and Daniel Treff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2 (2014) :753 -821. R. R. John, *Spreading the News : 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2] 例如，Alembert负责数学部分，Daubenton负责自然史部分，Bordeu与Tronchin负责医药部分。在该《百科全书》收入的72 000条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技术的内容，例如玻璃制造（44页）、磨粉工艺（25页）等。

[33] Puga and Treff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34] 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no. 4 (1989) :803 -832.

[35] Georges Renard, *Guild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J. B. Bell and Sons,1918) .

[36] Varian,“Review of Mokyr's Gifts of Athena.”

[37] 作为专利问题的学术文献的切入点，我们推荐读者参阅如下作者的成果：Pierre Azoulay, Bronwyn Hall, Adam Jaffe, Jacques Mairesse, Mark Schankerman, and Reinhilde Veugelers.

[38] 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3) .

[39] 我们要补充一点，惠特尼这项发明带来的一个间接影响，是加速了美国南部各州对奴隶劳动的使用。

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对技术革命，我们应该担忧还是期盼？一方面我们或许感到害怕，因为技术革命会加快工作的自动化，用机器取代人力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则会持欢迎态度，因为它们会催生一系列次级创新，影响经济中的所有部门，促进增长。

毫无疑问，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詹姆斯·瓦特于18世纪70年代发明了触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也就是第2章提及的第一次重大技术革新浪潮。这场革命始于英格兰与法国，然后扩展至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电力的发明则启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革命始于托马斯·爱迪生于1879年发明灯泡以及维尔纳·冯·西门子于1866年发明发电机。罗伯特·戈登（1999）把这次技术浪潮称作“一波巨浪”，它从相反方向跨越大西洋，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美国，到二战后扩展至其他工业化国家（见图3.1）。[1]这次浪潮之盛大，在欧洲和日本尤胜美国，因为它们既需要战后重建，又得在技术上追赶美国。最后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始于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费德里克·法金（Federico Faggin）、马西安·霍夫（Marcian Hoff）与斯坦·马泽尔（Stan Mazor）在1969年发明的微处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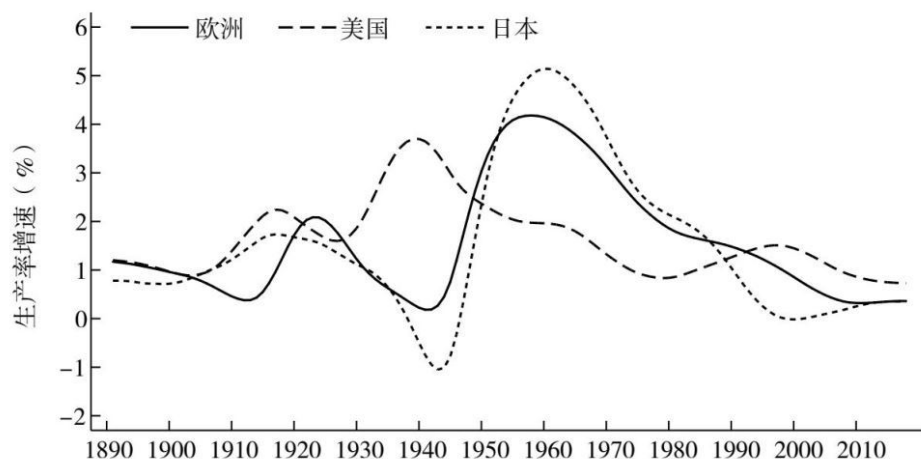


图3.1 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 A. Bergeaud, G. Clette and R. Lecat, “Productivity Trends in Advanced Countries between 1890 and 2012,”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2, no. 3 (2016): 420-444.

不过，在启动浪潮的技术发明与实现浪潮的增长起飞之间有显著迟滞。市场上最早出现蒸汽机是在1712年，但直至1830年，我们才观察到英国的人均GDP增长加速。[\[2\]](#)与之类似，尽管灯泡在1879年已经发明，又过了50多年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才出现加速。此外，自21世纪初以来，我们看到美国与欧元区的生产率增速其实有所下滑。[\[3\]](#)

从通用发明出现到后续增长加速之间的迟滞因何出现？为什么此前的技术革命都没有如19世纪的英国工人内德·卢德和1930年的凯恩斯担心的那样带来大规模失业？[\[4\]](#)人工智能革命的前景如何：是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这些正是本章将探讨的谜题。

1.浪潮的扩散为何存在迟滞？

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谈道，“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已无处不在，只有生产率统计数据例外”。^[5]他率先提出了如今人们所说的“索洛悖论”：在微处理器发明18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依旧疲软。又过了几年，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增长浪潮才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起势，并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

为理解信息技术扩散中的这一迟滞现象，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技术革命的某些特征。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6]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上述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7]

下面我们来分析以上几个特征如何帮助解释通用技术背后的创新发生时间与经济增长显著加速时间之间的延迟现象。

次级创新的重要性

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属性，将它应用于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必须依靠次级工艺创新。每个次级创新都是让通用技术适应特定部门的需要。例如，生产装配线就是电力革命应用于汽车制造业的一种次级创新，在线购物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应用于商业服务业的一种次级创新。此类次级创新改进了企业生产工艺，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因而成为长期增长的源泉。

不过，次级创新需要时间，这个因素能帮助解释增长的迟滞。另外开展次级创新需要从生产中转移部分资源，也会导致GDP增长率在短期内下降，或者至少推迟人们期望的通用技术激发的增长提速。[\[8\]](#)

新通用技术带来的每个次级创新浪潮都对应着创新成果的激增，表现为特定时期的人均专利数量显著提高（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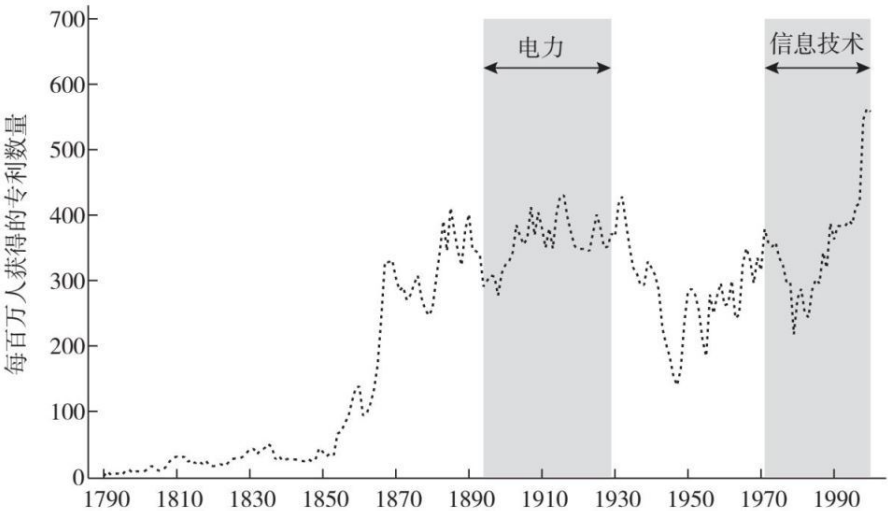


图3.2 1790—2002年美国每百万人获得的发明专利数量

资料来源：转引自B. Jovanovic and P. L. Rousseau,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vol. 1, 1181 -1224 , 图12。

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

例如在1869—1900年，制造业逐渐减少了对水轮和水力涡

轮机的使用，同时蒸汽发动机和涡轮机相应增加（图3.3）。然后从20世纪开始，蒸汽动力机器让位于电力机器，起初较为缓慢，然后加速推进。最终，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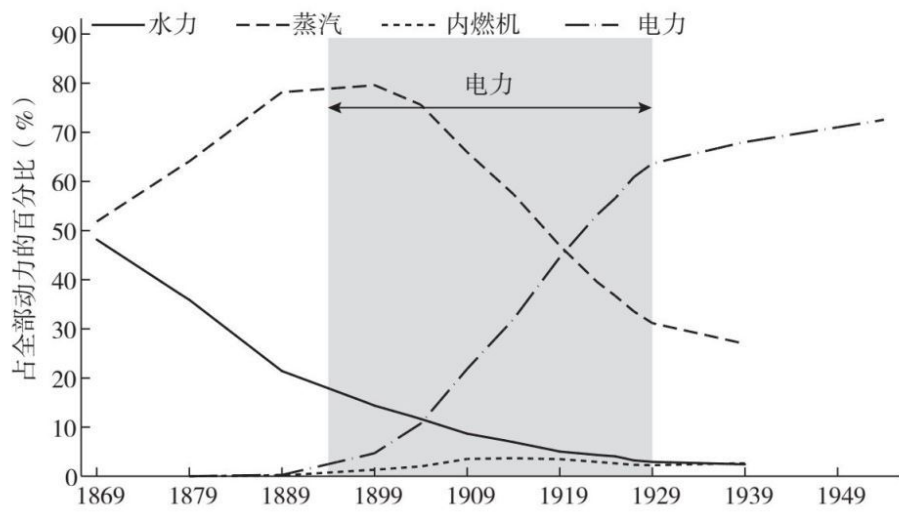


图3.3 1869—1954年美国制造业采用的主要能源类型占全部动力的比例

资料来源：转引自B. Jovanovic and P. L. Rousseau,“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 Elsevier, 2005),vol. 1,1181 -1224 , 图2。

企业内部技术推广的迟滞：发电机与计算机

经济学家保罗·大卫（ Paul David ）对电力和计算机在企业内部获得应用的历史做了对比，极好地诠释了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过程。[\[9\]](#)尽管工程师们早就看到电力的巨大革新潜力，但美国的企业直至1899年仍很少采用。事实上，工厂的内部组织方式自

采用水轮动力的时代以来并未改变，依然围绕动力轴布局：通过水力驱动厂房天花板上安装的动力轴转动，每台机器都直接通过一套传送带与这根动力轴连接。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蒸汽开始逐渐取代水力作为工厂的主要动力源，可是生产布局体系并未改变。然后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某些工厂选择继续沿用蒸汽动力，其他一些转向电力，但起初生产组织结构仍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动力轴体系并未受到质疑。

然而，动力轴体系的某些重大缺陷限制了其效力。例如，类似的机器必须一台接一台地放置，以便于输送来自传动轴的动力。这种布局并不理想，因为从产品制造所需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必须有很长的物理距离。

这里成为次级创新登场的地方。20世纪10年代早期，亨利·福特意识到电力可以做到蒸汽动力无法实现的两样事情：利用电缆传输能源，以及使发动机小型化。这些次级创新改变了世界。自此之后，直接由电缆提供动力的机器在布局上可以完全彼此独立。于是，福特得以取消动力轴，根据各种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任务顺序安排其位置：装配线由此诞生，并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率。

保罗·大卫发现，电力在19世纪末的低效应用与计算机技术在20世纪末的情形大致相似。虽然计算机一经出现，便可以并且应该带来各种数据处理任务的电子化，但事实上传统的纸质工作流程仍在沿用，任务存在重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未带来生产率的进步。在某些情形下，社会甚至永远不会转型采用新技术的最优利用方式，因为没有出现次级创新，或者人们并不普遍接受。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一个案例就是传统键盘的绝对支配地

位，我们无视次级创新，放弃了生产率提高的机会（见专栏3.1）。

专栏3.1 传统键盘：路径依赖的案例

传统键盘（QWERTY）被所有英语系国家采用，但该键盘的布局设计远远说不上最优，其他一些键盘能实现快得多的打字速度。那我们为什么会持续采用这种键盘呢？键盘的发展史能提供答案。故事从1873年说起，雷明顿（Remington）开发出了第一台获得商业成功的打字机，采用“QWERTY”开头的布局，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让字键的金属杆不容易被卡住。

1936年，奥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申请了新键盘布局的专利，名为德沃夏克简化键盘。这一布局有着比传统键盘更先进的人体工程学设计，能实现创纪录的英语打字速度。美国海军于1940年开展的测试表明，只需10天时间，使用德沃夏克键盘带来的效率改进就可以弥补打字员重新培训花费的成本。可是，德沃夏克键盘并未取代品质更差的传统键盘，原因何在？

保罗·大卫认为有两方面原因。[\[10\]](#)第一是协同问题的影响：雇主愿意购买传统键盘打字机，因为他判断打字员应该受过这种键盘的训练；打字员听到的建议也是学习传统键盘，因为人们以为大多数企业会采用这种打字机。技术上的这类相互依赖有利于更早出现的技术，也就是传统键盘。第二是采用新标准涉及的规模经济问题，随着整个产业趋于采用单一标准，采用该标准的平均成本会下降，某家企业转而采用其他键盘的成本则会高得多。

德沃夏克键盘代表的次级创新来得太晚了，也可以说，没有人足够快地抓住这次机遇，以推动打字操作的激进变革。于是，企业和用户依然在使用非最优的传统标准。

最后，我们注意到从旧通用技术向新通用技术转型会强化创造性破坏过程。这是因为与在位企业不同，新企业拥有不需要承担新旧技术转型成本的优势。与之对应，新通用技术的出现将伴随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如果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股票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交易所的新上市企业的市值与股市总市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企业进入状况，我们的确会看到：在电力与信息技术的推广期，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流量都出现了上涨，或者说创造性破坏趋于加速。

通用技术使用的改进

新通用技术不是立刻见效的，人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如何高效地使用它。边干边学的过程表现在包含新通用技术的资本价格的时间变化上：随着新机器采纳通用技术的效率提高，采用同样技术的早期版本的现有机器的价格将下跌。例如在法国，运行时速达320公里的第二代高速列车的出现，就使最高时速为260公里的第一代高速列车降价。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的价格下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在25年的时间里，同等品质的计算机的价格更是下降到万分之一。

居民家庭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

与企业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从迟滞到加速相似，居民家庭对待新技术也有类似的现象，主要是源于价格的下跌。例如，便携式计算机的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下降就导致家庭对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加速（图3.4）。有意思的一点是，使用电力的家庭占比与使用信息技术产品的家庭占比表现出了类似的演化趋势。在两个案例中，推动家庭采用的通用技术品质改进都与网络效应有关：随着电网的地理延伸和品质改善，其使用也日渐增加。与之类似，信息技术的采用也取决于建立足够快的互联网接入设施。

地方基础设施与制度的缺陷

如图3.1所示，与电力革命有关的技术浪潮用了近20年才从美国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与日本。有学者认为（Bergeaud、Cette and Lecat, 2018），这一延迟是由于那些国家因二战导致制造设备破旧、生产组织失序和人力资本损失，它们必须建设适合采用电力的新型工厂，并改变管理方式。[\[11\]](#)而在战争结束、国际贸易重启之前，这些都无法做到。必须在完成结构变革后，电力革命浪潮才能抵达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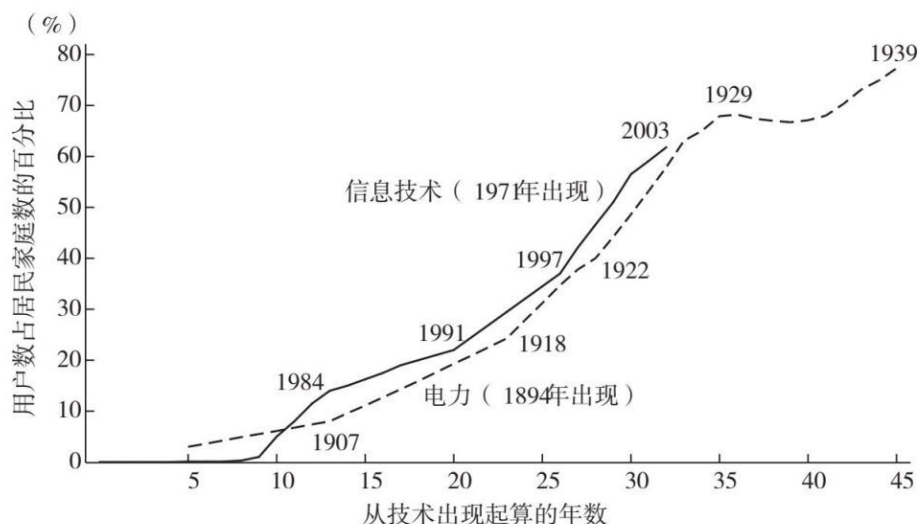


图3.4 在两次通用技术推广时代，使用电力服务与个人计算机的居民家庭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B. Jovanovic and P. L. Rousseau,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vol. 1, 1181-1224, 图8。

与此相似，图3.1还表明发端于美国并在2000年达到浪潮顶点的信息技术革命迄今尚未在日本与欧元区形成类似的波峰。对此，这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推广的延迟源于不容易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与制度，尤其是开放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有投资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等领域。我们再次看到，结构调整成为技术浪潮推广的前提条件。关于什么是合适的增长政策，我们将在第7章再做详细探讨。

生产率测算的困难：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

新通用技术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有时很难测算，尤其是在通用

技术引入之后的短时期内。让我们回到本章开篇时提到的索洛悖论问题。无可否认，信息技术促进了生产率提升，不只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思想观念的生产。如借助Skype和Zoom等软件，来自不同大学与不同国家的学者能够比过去远为便利地交流，更好地在研究项目上开展合作。但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相比，信息技术给思想生产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可能更难测算。[\[12\]](#)

还有，信息技术的成果集中在服务业，而服务业生产率比制造业更不易测算。有研究指出（Brynjolsson and Yang, 1996），“品种的增加、送货的及时性提高、客户服务的个性化，这些服务改善在生产率统计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13\]](#)我们将在第6章深入讨论此类测算问题。

人工智能：未来的新增长浪潮？

我们是否处于人工智能（AI）驱动的新增长浪潮的门槛上？人工智能可以让过去认为无法自动化的任务实现自动化，例如汽车驾驶或心电图分析。这种大规模自动化可以用能无限积累的资本替代供给有限的劳动力，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创意和创新的生产，从而给增长助力。[\[14\]](#)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出现飙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和研究的某些关键投入仍不能实现自动化。[\[15\]](#)由此导致尽管其他许多任务已实现自动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依然不可或缺。于是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要素，使其价格即工资逐渐提高。与此同时，由于不可或缺且供给有限，劳动力制约了人工智能带来加速增长的潜力。本书第8章将对此展开更详细的分析。

第二种解释（将在第6章展开）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技术革命可能反而会成为增长的障碍而非催化剂。具体来说，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在缺乏有效竞争政策的情形下，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可能会打击创新。

2.工业革命与就业：不可调和的对立？

来自历史视角的考察

人们对机器会摧毁人类工作岗位的担心由来已久。早在1589年，当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织袜机以后，劳工阶级对其后果就异常害怕，致使李四处碰壁并遭到威胁。李于是把发明敬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获得专利，但女王以如下宣言表示拒绝：“至于你的发明可能给我可怜的臣民带来的影响，肯定会剥夺其工作岗位，使之沦为乞丐，毁掉他们。”^[16] 随时间推移，竭力保护特定行业免受技术进步侵害的职业行会逐渐丧失了影响力。1769年的一部法律规定要保护机器免受破坏，但随着织布机的普及，破坏行动事实上有所加剧，在1811—1812年的卢德暴动中达到高潮。这一暴动是由内德·卢德领导的手工纺织业者对抗用机器生产棉毛纺织品的制造商。1812年，议会通过法律，把破坏机器定为死罪。官方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态度转变因何而来？最主要是来自从制造品出口中获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大力宣扬技术进步给生产、出口和就业带来的正面效应。这些“资本家”在英国议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代表，而议会的势力又逐渐超越了王权。^[17]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性失业，这一术语是由凯恩斯引入的。他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感染一种新的疾病，某些读者或许还不知晓这种疾病之名，但今后数年将频繁听到，那就是技术性失业。”^[18]约20年后，列昂惕夫于1952年指出：“劳动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多的工人将被机器取代，我认为这些新产业不可能聘用所有希望得到工作的人。”^[19]

什么样的工作最为脆弱？在19世纪，由于资本对技能劳动力的取代，手工业者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最大风险。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有所改变，实物资本与教育构成了互补性的投入，于是非技能工人成为自动化的受害者，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一趋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关“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的研究文献，其含义是，技术进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增加，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拉大。^[20]

总量层面的自动化与就业

我们如何测算自动化对就业的总体效应？要找到一个自动化衡量指标来考察与就业的相关关系，是艰巨的挑战。我们首先会遇到商业机密问题，但最困难的地方是对自动化本身的测算：是否只需要看机器的数量？假定如此，是哪些类型的机器？如何把各种机器“累加”起来？是否要考虑它们的功效？

国际机器人联盟（IFR）跟踪了若干国家的不同部门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使用的工业机器人的数量，为自动化提供了第一个可用的衡量指标。^[21]阿西莫格鲁与雷斯特雷波的开创性研

究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关于各部门采用的机器人总数，估计了1993—2007年机器人对美国就业状况的影响（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22]为此，他们对比了722个通勤区的就业与当地自动化水平的关系。但问题在于，目前的机器人数据只收集到国别层面，没有按通勤区划分。于是他们又构建了一个通勤区层面的自动化指数，该指数是以全国层面每个产业的机器人数量变化，结合各产业在每个通勤区总就业中的相对权重计算得出。

利用这个地区自动化水平指标，这两位学者发现自动化对就业和工资增长具有负面效应：通勤区每增加1个机器人，会导致6个工作岗位损失，以及小时工资率下跌。我们利用法国的数据重复这一分析，发现了类似量级的效应，似乎还更为严重：通勤区每增加1个机器人，会导致11个工作岗位损失。此外，机器人普及看起来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就业威胁更大。

这一分析毕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是测算方法：为什么只看机器人？机器人和其他机器真的不同吗？机器人的自动化程度确实较高，但就完成的任务而言它们同其他机器未必有本质的差异。国际机器人联盟对机器人的定义其实非常狭窄，主要对应汽车制造业采用的机器人。与测算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地方层面的数据，导致我们必须基于如下假设来构建数据：某个产业的所有工厂拥有相同数量的机器人，意味着采用同等水平的技术。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恰恰是因为工厂之间采用的技术有所不同，才造成了工作岗位的创造与破坏。

企业层面的自动化与就业

对企业或工厂层面的自动化水平做测算面临若干困难，上文

已做过介绍。在近期同加拉威尔 (Xavier Jaravel) 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试图引入一套测算工厂微观层面的自动化水平的指标，以克服上述困难。[\[23\]](#)我们把自动化技术定义为：“在预先编制好指令或设定好程序后，即能相对自主地实现运转的电动机械设备。”[\[24\]](#)在该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把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的发动机的年度电力消耗量作为工厂层面的自动化指标。

接下来，我们试图在个体工厂层面测算给定时间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对当时就业的影响，以及对2年、4年和10年后就业的影响。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自动化对就业其实有正面促进作用，而且随时间加强。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在当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2年后的就业提高0.25%，使10年后的就业提高0.4%（图3.5）。特别需要指出，这个效应对非技能制造业工人依然为正。或者说，与人们的预想相反，自动化给工厂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就业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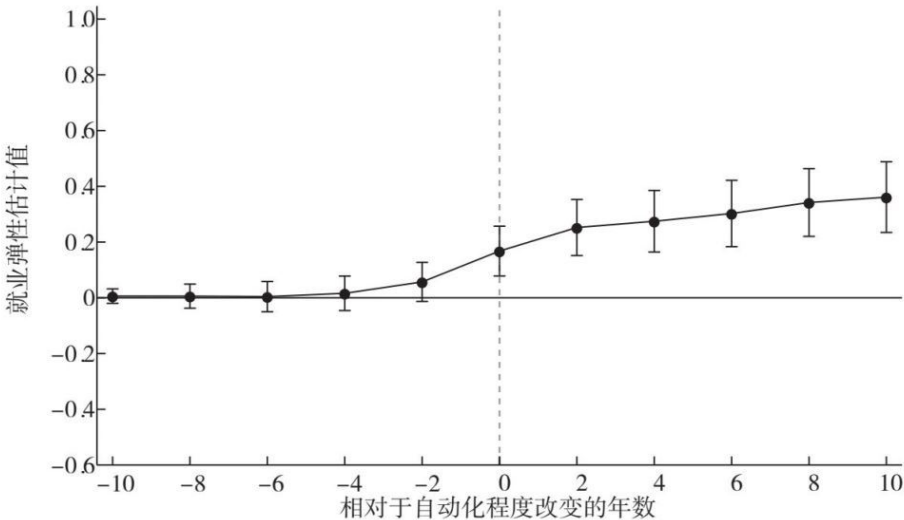


图3.5 工厂层面的自动化程度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C. Antonin, S. Bunel and X. Jaravel, “What Are th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Effects of Automation? New Evidence from Fra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1444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March 2020，图3B。

应该看到，自动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止于就业方面。我们还发现，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因此，它促进的生产率收益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分享。

那么，如何解释自动化水平与就业在企业层面的这种正向关系？我们很快能想到的一种解释是，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使它们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反过来，市场份额的提升促使积极推进自动化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雇用更多的员工。

如果从个体企业提升到产业层面，乃至整个经济层面，结果又会怎样？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的就业会增加，还是减少？在这里，我们再度发现自动化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恰恰是就业增加最多的产业。总体而言，更多的自动化伴随着更多的就业。所以，试图减缓国内企业开展自动化的任何措施，例如对机器人征税，最终结果可能都不利于生产。

自动化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自动化使生产过程变得现代化，让企业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新市场，雇用更多员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率效应。由蒸汽机和电力推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样出现过这种生产率效应，也同样可以由此解释为什么当时都没有造成某些人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前文提到过更为悲观的发现，即自动化对通勤区的就业产生了负面效应。我们该如何调和上述乐观结论与悲观发现？一种思

路是，之前已经提到，对通勤区的自动化或机器人利用水平做测算存在困难。第二种可能的思路是，推进自动化不力的企业会减少员工规模，把生产外包，或者关门破产。这反映了自动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如图3.6所示，对新工业设备大量投资的企业与投资不足的企业相比，在今后10年歇业的概率会大大下降。

因此，工作岗位减少并不是由推进制造过程自动化的企业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那些错失自动化的关键节点而被迫缩减生产规模乃至退出市场的企业。也可以认为，自动化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

3.结论

本章挑战了有关技术革命的两个普遍的先入之见。第一是技术革命必然导致增长加速，第二是技术革命必然不利于就业。然而现实完全相反。虽然增长的确会加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定时滞才会发生。特别是，不合时宜的制度可能阻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潜力。另外，过去的技术革命历程表明，它们都没有造成许多人预想的大规模失业。事实上如我们所见，致力于生产活动自动化的企业或工厂会成为就业的净创造者；开展自动化不力的企业才会破坏就业，因为自动化推进不成功会导致它们走下坡路，甚至退出市场。我们在本章的分析带来的一个有意思的启发是，对机器人征税可能造成反生产的效果，因为这种税收不利于自动化，将束缚企业开展创新、拓宽市场和创造新就业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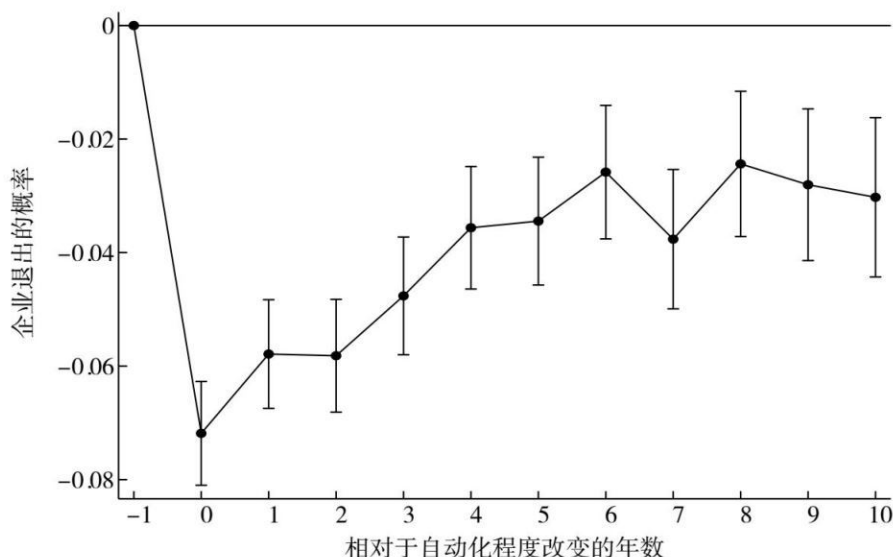


图3.6 工业设备投资对市场退出概率的影响

注：对工业设备的投资多于中位数水平的企业，在之后数年的退出概率较低（相对于投资少于中位数水平的企业）。

资料来源: P. Aghion, C. Antonin, S. Bunel and X. Jaravel, “What Are th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Effects of Automation? New Evidence from Fra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1444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March 2020.

[1] “One big wave,” see Robert Gordon, “US Economic Growth since 1870: One Big Wa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no. 2 (1999): 123-128. 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and Rémy Lecat, “Productivity Trends in Advanced Countries between 1890 and 2012,”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2, no. 3 (2016): 420-444.

[2] 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and Rémy Lecat, *Le Bel Avenir de la croissance. Leçons du XXe siècle pour le futur* (Paris: Odile Jacob, 2018).

[3] 我们将在第6章对此现象展开探讨。

[4] See John M.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rep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5] Robert M. Solow, “We’d Better Watch Out,”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87.

[6] See Timothy F. Bresnah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5, no. 1 (1995) :83 -108. 我们建议读者参考如下著作中收录的各位作者的成果: E. Helpman, ed.,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

[7] Boyan Jovanovic and Peter L. Rousseau,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1, 1181 -1224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

[8] Elhanan Helpm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 “Diffusion of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ed. E. Helpman, 85 -11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

[9] 本节内容是以Paul David的主要观点为基础, 参见Paul David,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no. 2 (1990) :355 -361.

[10] Paul David,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no. 2 (1990) :355 -361.

[11] Bergeaud, Certe, and Lecat, *Le Bel Avenir de la croissance*.

[12] Salome Baslandze, “The Role of the IT Revolution in Knowledge Diffusion, Innovation and Reallocation,” 2016 Meeting Papers No. 1509,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6.

[13] Eric Brynjolfsson and Shinkyu Y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Advances in Computers*, ed. Marvin Zelkowitz, vol. 43 (1996) :179 -214.

[14] See Joseph Zeira, “Workers, Machine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 (1998) :1091 -1117; 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 no. 6 (2020) :2188 -2244; Philippe Aghion, Benjamin F. Jones, and Charles I. Jo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92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7) .

[15] Aghion, Jones, and Jo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

[16] Gravenor Henson, *The Civil, Political, and Mechanical History of the Framework Knitters in Europe and America* (Nottingham: Richard Sutton, 1831) ,45.

[17] 但直至1832年的《改革法案》（ Reform Bill ） , 英国议会才不再受贵族大地主阶层的主导。

[18]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 Wassily Leontief, “Machines and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187, no. 3 (1952) :150 -164.

[20] 对这些文献的更完整综述 , 可参见Philippe Aghion, Céline Antonin, and Simon Bun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 Role of Policy,”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10 -511 -5 (2019) :149 -164.

[21] 服务业也有这一数据 , 但高度综合 , 更难以做具体分析。

[22] Acemoglu and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23] Philippe Aghion, Celine Antonin, Simon Bunel, and Xavier Jaravel, “What Are th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 Effects of Automation? New Evidence from France,” Working Papers, Observatoire Français des Conjonctures Economiques (OFCE) , January 2020.

[24] 定义来自*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15) , “Automation.”

第4章

竞争的得失

竞争似乎有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某些人认为竞争是模仿、复制的过程，或者是更广义的侵蚀创新租金、打击创新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竞争看作永不停歇的驱动力，为保持领先而必须持续改进发明。从现实看，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何种占据主导？更一般地讲，对于竞争与创新、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反思？美国的竞争是否有所退化，是否导致了美国增长率下跌？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关系该如何协调？这两类政策是彼此抵触，还是有互补的作用？我们能否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尤其是，能否设计出促进竞争、鼓励而非妨碍新企业进入的产业政策？

解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楚如何测算竞争程度。

1.对竞争的测算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要了解的一个知识是，如果某家企业是特定产品市场上的唯一供应方，它将居于垄断地位；如果有其他各家企业在市场上生产同类产品或很好的替代品，或有能力从事此类生产，则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企业所处的环境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

间。为评估这种中间状态，实证研究者喜欢采用的竞争程度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在企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定义是：用1减去某企业的净利润与附加值之比。该指数越接近1，企业的垄断租金就越少，表明市场上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则对应该产业所有企业的勒纳指数的加权和。若干开创性研究都是采用勒纳指数来衡量竞争水平（例如Blundell、Griffith、Nickell和Van Reenen等学者的成果）。[1]

竞争程度的第二种测算指标是新企业进入率或创造性破坏率，具体定义为企业或就业岗位的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平均数。该指标便于我们用来检验熊彼特范式，它预测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有正向关联。从本书第1章（图1.3）我们已经知道，在年度平均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欧洲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因此，当我们用创造性破坏率测算竞争程度时，对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符合熊彼特理论。但下文会介绍，如果用租金和勒纳指数测算竞争程度，理论与实证分析似乎存在矛盾：理论预测竞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实证结果却相反。我们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呢？

第三种测算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生产的集中度。集中度由产业中最大几家企业（以销售额或就业人数排序）在全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代表，该份额提高时，集中度随之上升。当某家企业完全垄断所在产业的生产时，就实现了最大的集中度。图4.1显示了美国服务业在过去20年的集中度提高趋势。[2]图中的黑色圆圈组成的曲线表明，在1982—2012年，销售额前4位的企业在该产业全部销售额中所占份额快速攀升（灰色圆圈组成的曲线则代表销售额前2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黑色三角形组成的曲线表明，就业人数前4位的企业同期在该产业全部就

业人数中所占份额增加，灰色三角形组成的曲线说明就业人数前2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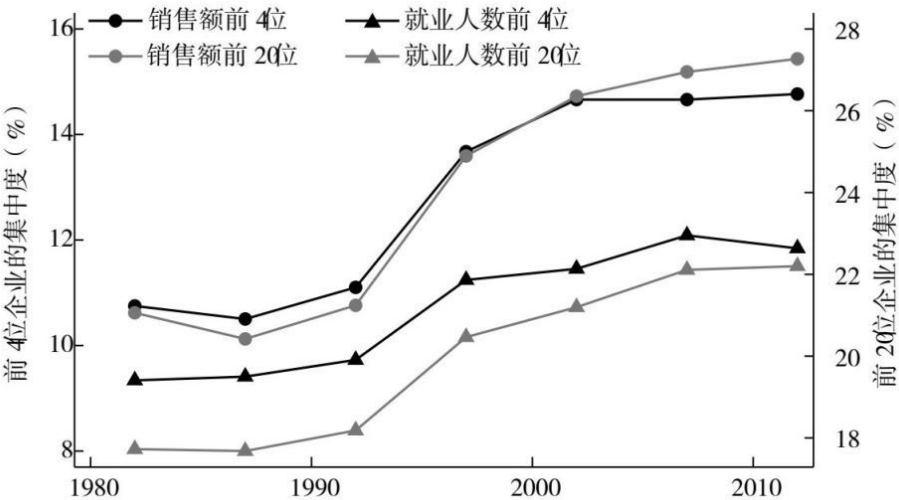


图4.1 服务业的产业集中度

注：分别代表前4（20）位的企业在就业人数（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 :645 -709，图IVD。

利用集中度指标测算竞争程度需要谨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误解。有些产业部门只有一家企业经营，但用勒纳指数测算仍极具竞争性。此类产业部门被称为“可竞争市场”，意指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进入成本不高，因此在位企业的任何涨价行动都将很快引来生产相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进入。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3\]](#)由此涉及第四种测算竞争程度的指标，即市场的“可竞争性”。可竞争性的计算方法是：当某个市场的在位企业把价格提高到“限定价格”之上时，引发新企业进入的概率。[\[4\]](#)

2.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谜题

我们知道，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个核心理念之一是：创新来自企业家的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而这些投资的激励来自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租金。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对创新租金的任何打击，尤其是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都将削弱创新激励。于是，竞争的加剧就会制约创新乃至经济增长。最早期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确也预测，竞争对创新和增长会有负面影响。[\[5\]](#)

然而，布伦德尔等人（Blundell、Griffith and Van Reenen）与尼克尔（Nickell）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以勒纳指数测算的产业竞争程度与该产业的生产率增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6\]](#)也就是说，竞争加剧似乎伴随着更频繁的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谜题，实现理论同实证分析的统一？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抛弃熊彼特模型，从头开始，哪怕它的其他理论预测得到了实证研究的佐证？还是说，我们不用在意实证提出的挑战？

我们选择的道路是重新思考基本的熊彼特模型，找出导致竞争与增长的负向关系结果的限制性假设。[\[7\]](#)我们最终发现了问题的源头：初始的熊彼特模型假设，只有新进入的企业开展创新，而在位企业完全不创新。对开展创新的企业而言，会从创新前的零利润变成创新后的正利润。而竞争加剧将降低创新后的利润，所以会削弱创新激励。

可是在现实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它们对竞争有不同的反应。一类是靠近所在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接近

该产业的最高水平。[8]另一类是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远低于所在产业的最高水平。靠近前沿——理查德·纳尔逊与埃德蒙·菲尔普斯称之为“最佳实践”——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9]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技术前沿。

为理解这两类企业为什么对竞争有不同反应，我们可以用一个班级的学生来做个比喻。某些学生在班里成绩很好（学生的成绩相当于企业的利润），其他学生成绩较差。假设有一天班里来了一位很出色的新同学，使学习竞争加剧了，学生们会有何种反应呢？新学生的出现会激励成绩原本很好的优秀学生，使他们为了留在前列而加倍努力。但成绩较差的学生可能受到打击，因为追赶的难度变得更大了。

惊人的是，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行为与学生们相似。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为了超越竞争而更多地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会受到竞争的打击，后者与只有外来者开展创新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设想一致。第一项对此预测做检验的研究是依据英国的企业数据。[10]在该研究中，特定产业的竞争程度通过外国企业的进入率（外国企业在该产业的就业中所占比例）测算，创新水平则以企业层面的专利数量测算（图4.2）。图4.2中靠上的曲线代表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靠下的曲线代表远离前沿的企业。研究结果证实，随着竞争程度加剧，靠近前沿的企业创新增加，而远离前沿的企业创新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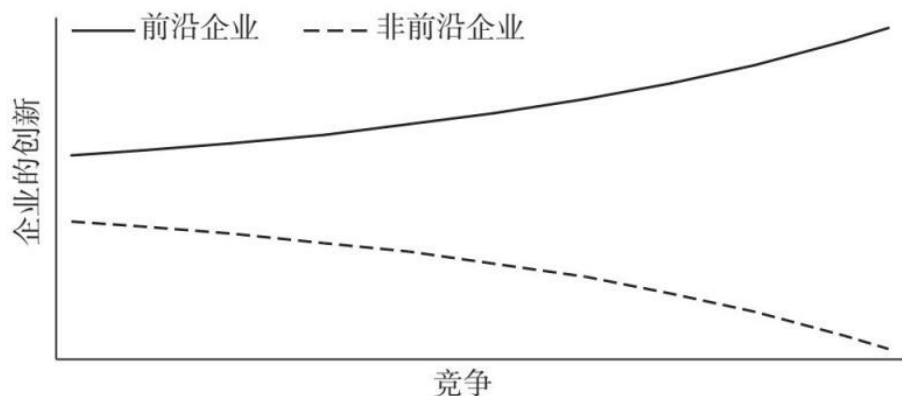


图4.2 竞争程度与创新密度、离技术前沿远近的关系

注：靠上的曲线代表比中位数企业更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均值，靠下的曲线代表比中位数企业更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均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图3。

3.三个推测

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以此拓展熊彼特模型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竞争与增长之间的正向联系，还能产生新的推测结论，并同样可以用微观经济数据做实证检验。

与前沿的距离以及竞争对创新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第一个推测是竞争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

这个结论的后果之一关系到国际贸易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例如与远离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相比，出口市场扩大对初期靠近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的创新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11\]](#)背后的解释是，新市场的出现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新企业也进入这些市场，使竞争加剧，从而刺激了最先进的法国企业的创新（尽管它们能通过扩张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类似的是，对进口开放国内市场会给远离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的创新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而靠近技术前沿的法国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对这些内容，我们将在第13章再来讨论。

另一个后果涉及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增长政策的设计有关。某个国家越靠近技术前沿，或者说整体生产率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目前是美国），竞争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事实上，一国越靠近世界技术前沿，该国内部靠近前沿的企业与远离前沿的企业之比例就越高。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所占的比例越高，在该国平均来说，“超越竞争”的创新效应就越能压倒打击创新的效应。

所以，一国越靠近技术前沿，竞争加剧对其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也可以认为，各国的发达程度越高，越应该采纳促进竞争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本书第7章将指出，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大型在位企业的反竞争态度。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竞争者的进入，还反对采纳意图强化竞争的公共政策。但随着一国在技术上更趋发达，恰恰更需要强化竞争的政策来促进创新和增长最大化。

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

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倒U形曲线（图4.3）。这一曲线是综合效应的结果，既包含竞争对靠近领先位置的“前沿”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包含对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的负面效应。[\[12\]](#)在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竞争和创新数据的国家，倒U形关系都得到了证实。从直觉上看，该现象可以做如下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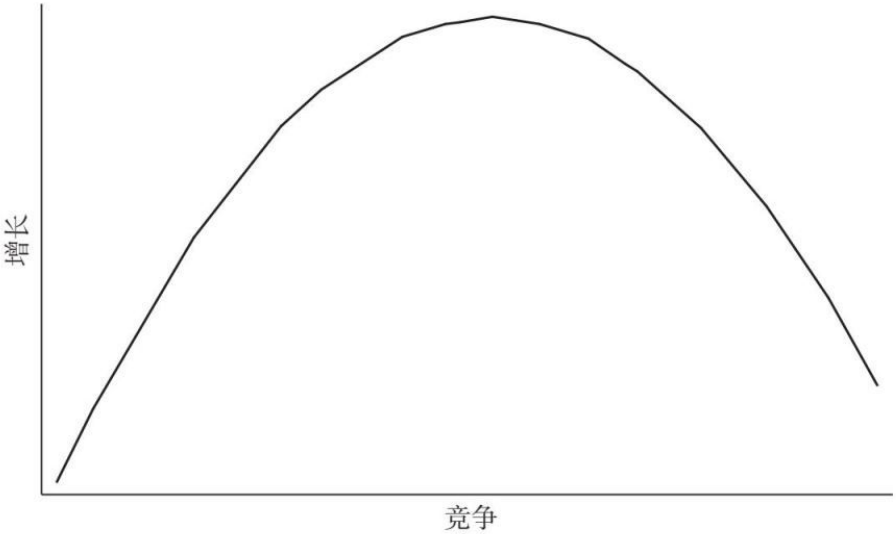


图4.3 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 P. Aghion, 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P.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no. 2 (2005) :701 -728。

当初期竞争力度较弱时，我们位居图4.3中的左侧。在此情形下，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如果赶上，它们的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由此导致，当我们在某个时点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属于前沿企业。但前文已提到，前沿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积极反应。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较低

程度的竞争，那么随着竞争加剧，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正面促进，因为“超越竞争”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当初期竞争程度较强时，我们位居图4.3的右侧。高度的竞争将刺激前沿企业创新，以压倒竞争对手（超越竞争）。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把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因此当我们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远远落后于前沿。但我们知道，远离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对竞争加剧有消极反应（打击效应）。所以当出发点的竞争较强时，加剧竞争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打击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互补关系

某种流于表面却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与专利制度（或者说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冲突。

一方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拥护者。这个派别认为，知识产权至关重要，因为它保护创新租金，使创新者免遭潜在对手的抄袭模仿。作为推论，他们呼吁限制竞争，以维护创新租金，鼓励企业创新。这种极端立场背后的世界观认为，只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才开展创新，老企业永远不会。在那样的世界中，创新使企业的利润从零提升到某个正值，于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提升利润水平，而强化竞争则会降低利润水平。^[13]

另一方则站着鼓励竞争、反专利制度的人士，尤其是米歇尔·博俊（Michele Boldrin）与大卫·莱文（David Levine）。^[14]这些学者把竞争和新市场进入者视作创新驱动型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限制竞争和市场进入的任何事物，特别是专利制度，都对创新驱动型增长有害。

除了赞成或反对专利制度的分歧，以上两个派别却都认同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彼此冲突的观点：如果其中之一能促进创新，另一个必然妨碍创新。

我们之前描述的更复杂的模型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这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角。该模型表明，竞争实际上可以与知识产权形成互补关系。设想有家前沿企业同其他前沿企业在“班级顶部”展开激烈竞争，并驾齐驱。此时，如果该企业不推进创新，则竞争加剧会蚕食其租金 P_0 。如果该企业推进创新，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增加其租金 P_1 。因此两种政策都会增加该企业创新的净收益，即 $P_1 - P_0$ 。这是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故事。保护知识产权让胡萝卜变大，加强竞争则让大棒变得更厉害。相应来说，同时采纳这两种政策非常重要：一方面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维持竞争态势。由此涉及本书的中心思想之一：资本主义必须有所规制。资本主义需要奖励创新，同时也必须加以规制，以防止创新租金窒息竞争、妨碍未来的创新。

竞争与专利之间的互补性得到了实践检验，鼓励竞争的欧洲单一市场的实施，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得力的欧盟国家对创新发挥了更大的刺激作用。[\[15\]](#)

理论学者与实证学者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

总体而言，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对话有相互促进的效果。研究增长的理论学者认识到，为什么以及该如何修订模型。他们学会了考虑竞争对增长的两种（而非一种）基本效应，并能识别出在何种条件下，某种效应会占据主导，然后推论出倒U形曲线。实

证学者同样发现，竞争与增长的关系比他们从之前研究中看到的结果更为复杂。

4.美国的竞争与增长

托马斯·菲利普蓬（Thomas Philippon）在《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竞争与反垄断政策遭到削弱，并认为这与21世纪初以来的生产率增速下滑有关。[\[16\]](#)

竞争的削弱？

多种指标显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在过去数十年来有所削弱。菲利普蓬在书中展示了若干与之密切相关的案例研究。他从自身经历谈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次来到美国时，他发现订购品质相同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乃至国内航班的费用均远远低于欧洲。但20年后，情况完全逆转。欧洲消费者在这些产品上获得的性价比高得多。菲利普蓬把这一变化归因于美国与欧盟采纳的竞争政策存在差异。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援引了几个案例研究。首先他提到金融部门，认为技术进步并未降低客户的成本。菲利普蓬将其归咎于缺乏竞争：新的进入者太少，创造性破坏率非常低，主要原因是在位企业通过密集的游说活动限制了新牌照的发放。

第二个案例是医疗体系。菲利普蓬注意到，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21世纪初以来持续提高后，在2014—2016年下降了，但美国家庭的医疗支出却居高不下。他的解释是，美国医疗产业的集中

度自2000年以来提高，医院的市场支配力不断加强。例如，自2010年以来每年的医院合并超过70起。医院集中度提高与保险产业的集中度加强有关。面对已成为准垄断机构的保险商，为维持谈判能力，医院也不得不合并。

第三个案例是互联网巨头，如GAFAM（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和Microsoft），乃至更普遍的“超级明星”企业，但菲利蓬淡化了它们对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除托马斯·菲利蓬的著作外，还有某些迹象表明美国的市场竞争状况在最近数十年止步不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邦巴迪尼（Matilde Bombardini）与特雷比（Francesco Trebbi）关于美国游说活动加剧的研究，我们将在第5章对此做深入介绍。[\[17\]](#)

其他指标同样显示，美国在过去20年的竞争出现衰退。尤其是，以最大企业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占比测算的集中度在美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均大幅提升。[\[18\]](#)例如在服务业（图4.1），零售贸易、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业均显示出类似情况，批发业和制造业也存在程度略轻的相似趋势。此外，图4.4表明，美国企业在过去20年的利润增加。图4.5则反映，同期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显著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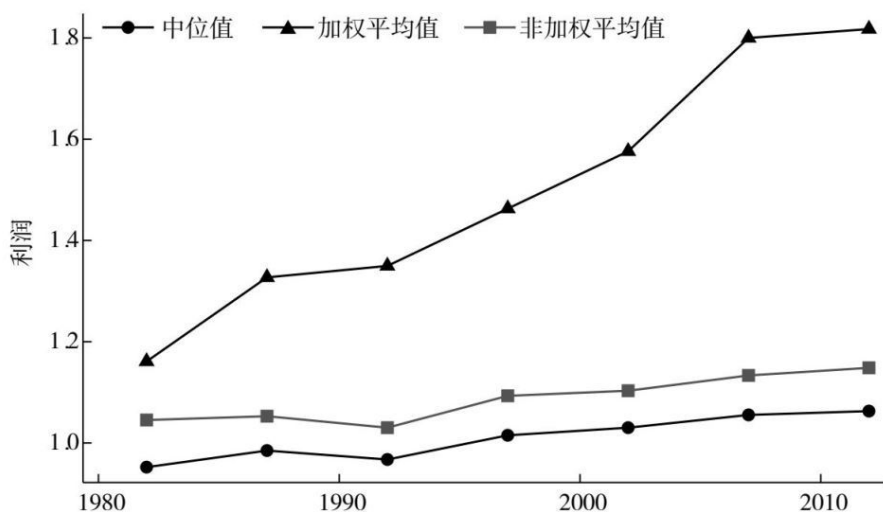


图4.4 美国企业的利润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 :645 -709 , 图X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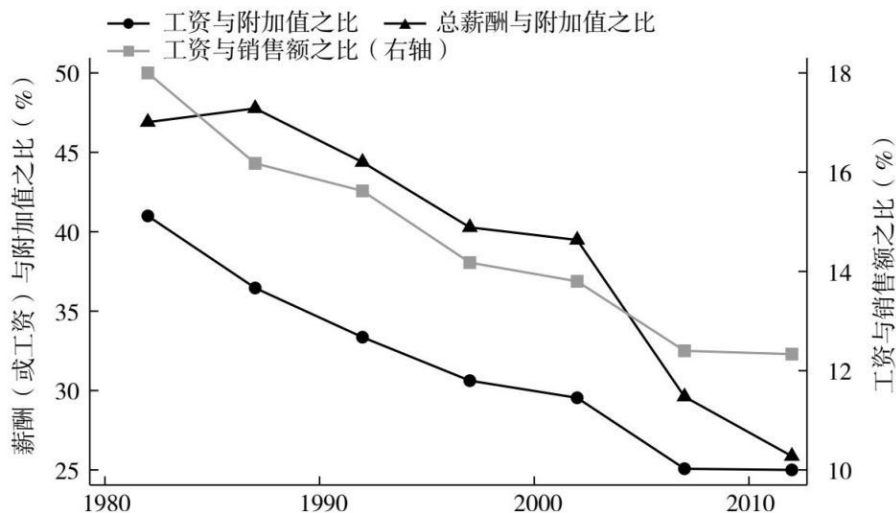


图4.5 劳动收入在制造业收入中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L. F.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 645-709, 图II。

对此有两点提示。首先，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竞争程度削弱。我们已经看到，某些表面上垄断的市场实际上属于可竞争市场，即新企业进入的威胁迫使在位企业维持低价销售。更重要的是，当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集中度也会提升。这样的创新让企业能以比对手低廉的成本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

其次，与前一点直接相关，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增加可能代表企业的利润普遍增加，也可能代表某种综合效应。后者意味着，高利润企业逐渐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总体来看，仅根据平均利润或集中度的增加，我们还不能确定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竞争程度削弱。

美国增长率的下滑

虽然要明确美国的竞争在过去20年有所削弱比较困难，但其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下跌则毫无疑问。有三个实际情况提醒我们对此做深入考察。[\[19\]](#)首先，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起下跌之前有过10年特别高速的增长期（1996—2005年），年增速接近3%（图4.6）。其次，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跌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的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高速增长期与产业集中度提升最快的时期（即1995—2000年）存在部分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并未伴随着创新与增长的减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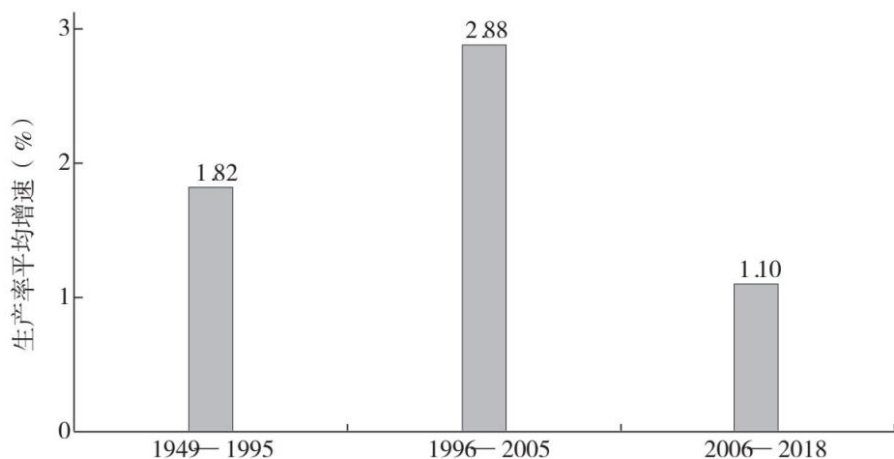


图4.6 1949—2018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 , 图1。

有理论认为，1990年之后竞争被削弱，这是自2005年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三个现实情况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将在第5章再来讨论美国增速下滑的根源。

5. 竞争与产业政策

在二战后的多年里，各国的产业冠军企业是许多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关注焦点。例如在法国，这种扶持冠军企业的政策成为经济重建与战后30年增长的支柱。在美国，类似政策在国防、航空和航天产业尤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争取压倒苏联。与此同时，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指挥下的世界

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

幼稚产业学说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创，后来为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所发展，其大意可归纳如下。[\[20\]](#)设想某个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较大的农业部门，一个新生的制造业部门。该国希望发展制造业，因为这能给整个经济带来积极的技术外部效应。然而，制造业需要很高的初始固定成本，这种成本随着经验积累、边干边学的过程会逐渐下降。如果立刻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则该国会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制造品，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更低。由此将导致本地的制造业活动衰退，边干边学的机会减少，技术进步和国内增长都将随之放缓。为避免此恶果，幼稚产业学说的拥趸建议采取临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暂时性关税壁垒，以便让本国的幼稚产业得到成长，并追赶技术前沿。

随着时间流逝，产业政策不再受到青睐。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在现实中造成的若干问题。第一，产业政策有利于现有国内大企业或国家冠军企业，因而会限制或扭曲竞争。但我们需要产品市场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为超越对手而寻求突破，以促进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第二，各国政府并不擅长挑选赢家，也就是说，不擅长选择最适合用补贴或关税来支持的企业，因为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还有，政府容易受到在位大企业的游说活动的影响。这些企业掌控的资源越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就越强。安妮·克鲁格就是对产业政策有效性发起挑战的经济学家之一。[\[21\]](#)

这一挑战促成了采用现在所说的用“横向”政策刺激创新和增长的倾向，所谓横向政策意指对经济中所有部门普遍适用的政策。[\[22\]](#)主要的横向政策包括：（1）投资知识经济，尤其是高等

教育和研究；（2）通过恰当的竞争政策、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等，改革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使它们更具活力；（3）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创新提供融资。

这些横向政策足以达成目标吗？政府是否仍需要在产业发展中扮演角色，如果需要，是什么样的角色？对于20世纪50—80年代的产业政策的异议很难反驳，特别是后来的研究成果，例如拉丰与梯若尔发现了政府干预缺乏效果的几个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某些私人行动者与政府之间形成串谋的可能性等。^[23]不过，仅此尚不足以否定政府干预，因为也有几方面的支持理由。首先是存在正向的知识外部性（如专利）。个人决策不会考虑这个因素，个人在决定是否投资教育或研发时，并不关心其行为对合作者乃至整个经济的正外部性。因此，个人对教育和研发往往会投资不足。另外，信贷约束会加剧这一倾向。当然，这些理由并不支持非横向性质的政府干预。

支持非横向产业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本书第3章通过传统键盘的例子介绍过路径依赖的概念，它显示习惯的力量与变革的高成本如何妨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哪怕新技术的效率更高。绿色创新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近期有项研究指出，在过去获得过内燃机技术创新成果的汽车制造商，未来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倾向于继续推进内燃机创新。^[24]此时，征收碳税或者为绿色创新提供补贴可以降低采纳新技术的成本，把汽车制造商的创新方向转向电力发动机。这个例子表明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不仅是普遍地促进创新，而且可以通过精准干预引导创新走向。我们将在第9章继续这一讨论。

另一个支持理由与协同问题有关。博尔顿与法雷尔以及罗伯的研究都指出，政府行动可以帮助解决协同问题，从而使初始固定进入成本极高的战略产业可以有新企业进入，或者加速其进

入。[\[25\]](#)设想有一个新的潜在市场，进入成本颇高，未来的利润回报不确定，且取决于市场活跃之前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信息（如消费者的需求水平）。此时，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第一个付出固定进入成本。每家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首先承担固定成本，让自己了解相关信息，而无须承担获取信息的风险与成本。或者说，缺乏政府干预会导致“搭便车”现象，造成市场的创建被拖延甚至陷于僵局。为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可以给第一家进入的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其他企业效仿。

这个理由可以解释政府干预在航空产业（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等）取得的成功，其固定成本极高，需求不确定。还可以解释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的案例，该机构于1958年设立，目的是促进突破性创新（所谓的硬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与推广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人的协同努力。[\[26\]](#)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帮助美国把人类送到了太空和月球，并最终催生了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重大创新。

在认识到产业政策可以带来帮助后，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产业部门需要政府干预？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和社会优先议题，如防止气候变化、开发可再生能源、医疗与国防等。在这些之后，他们应关注利用高技能劳动力或存在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有研究通过对国际微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面向技能密集型产业的公共投资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更为高效。[\[27\]](#)类似的是，基于中国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面向竞争程度更高的产业的公共投资更有助于生产率增长。[\[28\]](#)

然后我们会遇到政府产业扶持的治理问题。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扶持措施应维持或强化该产业的竞争。此外，

政府的产业扶持应该做定期评估，以避免没有成果的项目持续下去。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联合融资（如通过各家开发银行），能帮助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一点是，给在位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妨碍更有创新力的新企业进入，形成再配置效应：补贴会让在位企业拉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这点将在下文详细阐述）。所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简而言之，产业政策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的治理体系，使之与竞争以及更普遍的创新引领式增长更加兼容。

6. 企业活力与补贴在位企业的成本

企业从市场进入到成长、再到退出市场的生命周期与增长过程有何相互作用？对在位企业的补贴会如何影响创新型新企业的进入与成长？新冠疫情危机已证明这类问题有多么重要：一方面，各国政府必须帮助现有企业，尽量减少破产，维持就业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政府不能妨碍潜在的新企业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

本书第1章介绍过，熊彼特模型推测创造性破坏与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向联系。至于企业活力与增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些补充。[\[29\]](#)通过比较美国与法国的就业岗位在不同年限企业间的分布，我们发现，从最老的那部分企业（成立时间超过26年）在就业中的占比看，美国明显高于法国（图4.7）。这表明与法

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更强。此外，创造性破坏现象在法国比在美国更剧烈。图4.8比较了法国与美国的企业退出率。无论哪个年限的企业，法国的退出率均更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图4.7和图4.8描绘了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在法国，即使最具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也难以超越某个规模，这让效率较低的企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得以生存下去。从长期看，这影响了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

哪些因素在妨碍法国企业的成长？其中之一是创新企业缺乏融资渠道。[\[30\]](#)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创新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法国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将在第12章回来讨论这一点。第二个因素是规制的影响，尤其是劳动领域的规制，当企业雇员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适用。这些规制会打击靠近临界点的企业的创新。[\[31\]](#)那么，政府是否应该通过补贴在位企业的研发来缓解此类束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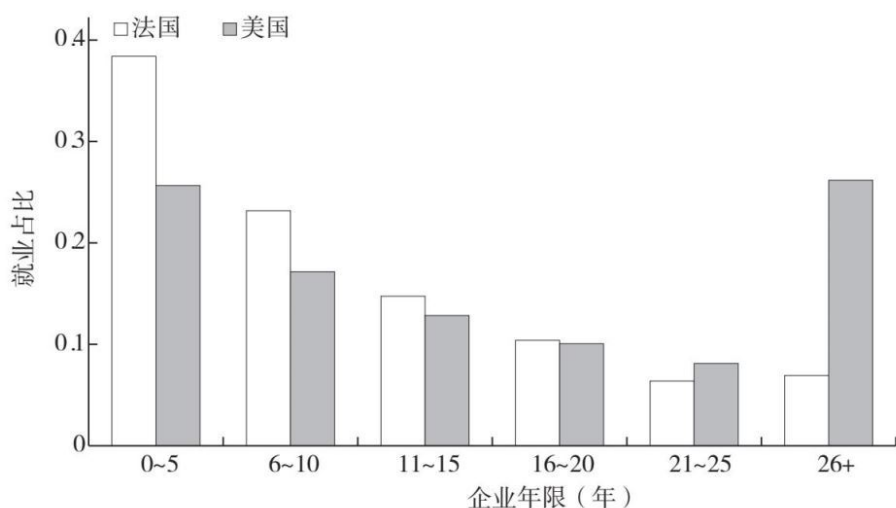


图4.7 不同年限企业在就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 -956 ,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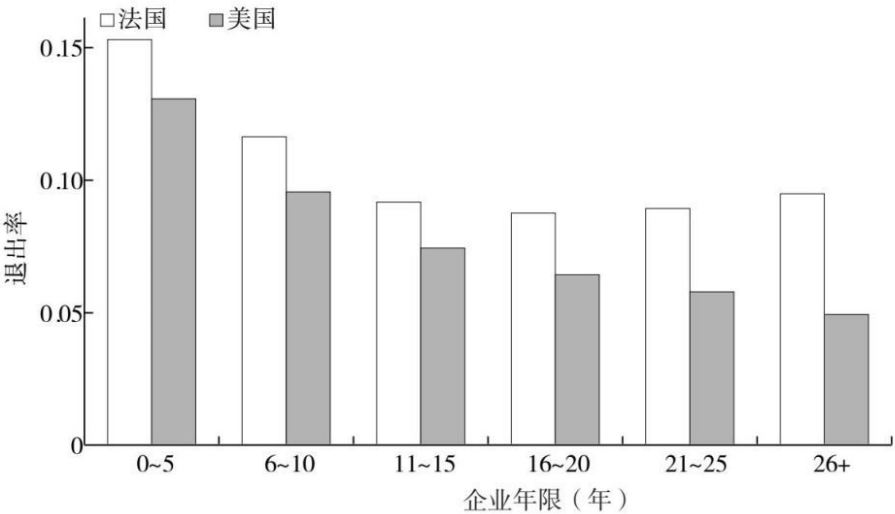


图4.8 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 -956 , 图8。

近期有项研究告诫我们，此类补贴有负面效应，可能挫伤效率较高的新企业的进入。[\[32\]](#)对现有企业提供补贴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成本，而成本攀升会削弱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打击它们进入市场的决心。

这一再配置效应得到了更近期一项研究的印证，该研究分析了欧洲中央银行于2012年2月实施的欧元体系附加信贷申请计划（Eurosystem's Additional Credit Claims, ACC）如何影响法国企业的活力。[\[33\]](#)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创立该计划的目的是防止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欧元区衰退，其基本设

想如下：在欧元区，各银行可以用高质量的企业贷款作为抵押，从欧洲央行获得再融资；这些贷款将使银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偿还贷款可能性最大的企业获得的评级为1，之后随着偿还贷款概率逐渐降低，评级依次降为2~5，接近破产的企业则评级为P；在2012年2月前，各商业银行只能以评级为4以上的企业贷款作为向欧洲央行再融资的抵押品；后来，该计划又把范围延伸到了评级为4的企业。

上述计划实施后的情形如何？第一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于评级更差的企业（特别是评级在5以下的企业）有所增加。第二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速提升，或者说，放松这些企业的贷款约束让它们得以扩大投资，特别是用于创新的投资。然而这一正面效应被再配置效应抵消了：附加信贷申请计划的实施导致评级为4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减少，而且受影响最显著的是之前生产率最低的企业。或者说，该计划妨碍了评级为4的企业中经营最差的企业被更高效率的新企业替代。

上述研究证实的再配置效应表明，任何补贴企业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对现有企业的影响，还要顾及目标产业的潜在进入者。

7. 结论

本章考察了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我们看到，总体而言，竞争会促进创新与增长，竞争对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与增长有正面作用，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则有负面作用。我们分析了美国的竞争程度削弱与增长率下降之间的联系，然后指出竞争与知

识产权保护具有互补性，并捍卫了竞争与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兼容的观点。[34]在后续章节，我们还将回到其中某些议题，在第6章探讨美国增长率下降现象，第7章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第13章讨论全球化。

[1]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John Van Reenen, “Dynamic Count Data Model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nomic Journal* 105, no. 429 (1995): 333-344;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John Van Reenen, “Market Share, 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in a Panel of British Manufacturing Fi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no. 3 (1999): 529-554; Steve Nickell,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no. 4 (1996): 724-746.

[2]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John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 645-709.

[3] See William J. Baumol, *Microtheory: Applications and Origi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ch. 3,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40-54.

[4] 关于“可竞争市场”的概念，参见 William J. Baumol, John C. Panzar, and Robert D.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no. 2 (1992): 323-351.

[6] Blundell, Griffith, and Van Reenen, “Market Share, Market Value and Innovation”; Stephen Nickell and John Van Reene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d. Benn Steil, David G. Victor, and Richard R. Nel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See Philippe Aghion, Nick Bloom,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no. 2 (2005): 701-728; Philippe Aghion, Rachel Griffith, and Peter Howitt,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no. 2 (2006): 97-102; Philippe Aghion, Richard

Blundell, Rachel Griffith, Peter Howitt, and Susanne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no. 1 (2009) :20 -32. See also Xavier Viv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6, no. 3 (2008) :419 -469.

[8] 这里用劳均产出或全要素生产率来测算生产率。

[9] Richard R. Nelson and Edmund S. Phelps, “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56, no. 1 (1966) :69 -75.

[10] Aghion, Blundell, Griffith, Howitt, and Prant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11]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thee Gigout,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Melitz, “Spreading Knowledge across the World: Innovation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Expan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2019,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aghion/files/spreading_knowledge_across_the_world.pdf.

[12] Aghion, Bloom, Blundell, Griffith, and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13] 这意味着在增长模型里，创新会增加产品的类型。See, for example, Paul M.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5, pt. 2 (1990) :71 -102.

[14] See, for example, 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 Levine,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 Levine, “Perfectly Competitive Innov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 no. 3 (2008) :435 -453; Michele Boldrin and David K. Levine, “The Case against Pat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1 (2013) :3 -22.

[15] 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 and Susanne Prantl, “Patent Rights, Product Market Reforms,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 no. 3 (2015) :223 -262.

[16] Thomas Philippon, *The Great Reversal :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7] Matilde Bombardini,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bby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5, no. 2 (2008) :329 -348; Matilde Bombardini and Francesco Trebbi,“Empirical Models of Lobbying,”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2, no. 1 (2020) :391 -413; Marianne Bertrand, Matilde Bombardini, and Francesco Trebbi,“Is It Whom You Know or What You Know?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obbying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no. 12 (2014) :3885 -3920.

[18]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and John Van Reenen,“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 :645 -709.

[19]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Peter J. Klenow, and Huiyu Li,“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 .

[20] See, for instance,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tuttgart: J. G. Cotta, 1841) .

[21] Anne O. Krueger,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 Anne O. Krueger,“Policy Lessons fro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Jere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vol. 3B, 2497 -2550 (Amsterdam: Elsevier, 1995) .

[22] See, for example, 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Distance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no. 1 (2006) ;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Appropriate Growth Policy: A Unifying Framework” (Joseph Schumpeter Lec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no. 2 -3 (2006) :269 -314.

[23] Jean-Jacques Laffont and Jean Tirole,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

[24] Philippe Aghion,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David Hemous, Ralf Martin, and John Van Reenen,“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no. 1 (2016) :1 -51.

[25] Patrick Bolton and Joseph Farrell,“Decentralization, Duplication, and

Dela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4 (1990) :803 -826; Rafael Rob,“Learning and Capacity Expansion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no. 4 (1991) :655 -675.

[26] See Pierre Azoulay, Erica Fuchs, Anna Goldstein, and Michael Kearney,“Funding Breakthrough Research: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 ARPA Model,’”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9 (2019) :69 -96.

[27] Nathan Nunn and Daniel Trefler,“The Structure of Tariffs and Long-Term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no. 4 (2010) :158 -194.

[28] Philippe Aghion, Jing Cai, Mathias Dewatripont, Luosha Du, Ann Harrison,and Patrick Legros,“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 Macroeconomics* 7, no. 4 (2015) :1 -32.

[29]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and Simon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 -956.

[30] See Philippe Aghion, Thibault Fally, and Stefano Scarpetta,“Credit Constraints as a Barrier to the Entry and Post-Entry Growth of Firms,” *Economic Policy* 22,no. 52 (2007) :732 -779; Philippe Aghion, John Van Reenen, and Luigi Zingales,“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1 (2013) :277 -304.

[31]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and John Van Reenen,“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cember 2019, 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media/en-philippe-aghion/UPL9083408753564555677_The_Impact_of_Regulation_on_Innovation.pdf.

[32] Daron Acemoglu, Ufuk Akcigit, Harun Alp, Nicholas Bloom, and William Kerr,“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no. 11 (2018) :3450 -3491.

[33]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Remy Lecat, and Hélène Maghin,“The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Acces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Coase Lecture) , *Economica* 86 (2019) :1 -31.

[34] 关于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乃至其他与竞争政策有关内容的相互关系，建议参考Emmanuel Combe, *Economie et Politique de la Concurrence*

(Paris:Dalloz, 2005).另外可参考近期有关竞争政策的另一本著作Richard J.Gilbert, *Innovation Matters :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High-Technology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0) .

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

作为反复出现的公共讨论议题，自安东尼·阿特金森、托马斯·皮凯蒂与伊曼纽尔·赛斯的研究发表后，收入不平等激发了尤为热烈的反响。[\[1\]](#)这几位学者极力呼吁，应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最顶层群体获得的收入份额激增现象，即所谓的顶层收入不平等。图5.1显示了美国的情形：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全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历史变化。[\[2\]](#)



图5.1 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图8.6。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该图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应该主要以顶层1%群体的收入作为不平等的测算指标，是否还有其他同样适用

的指标？第二个很快能想到的问题是不平等的来源，尤其是富人的致富途径？创新驱动型增长是否会造成不平等，以及会造成何种类型的不平等？创新与导致不平等的其他来源有何区别？我们是否应该主要依靠税收来增强社会流动性？我们如何能够既加强增长的包容性，又不至于窒息增长？

这些是本章将探讨的话题。

1.如何测算不平等？

在提及不平等时，需要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何种类型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有多种测算方法，它们的含义大不相同。首先，有测算不平等的广义指标，反映一国整体上距离“完全平等”的状态（所有人的收入均相同）有多远。其中最普遍采用的测算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见专栏5.1），一国距离完全平等状态越近，基尼系数就越接近0；反之，收入越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基尼系数就越接近1。

专栏5.1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

图5A中的黑色点状线名为洛伦兹曲线，代表按收入水平递增排序的百分位人口数及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其构造如下：点A表示总收入中归属收入最低的20%人口（即十分位的前两位）的份额，如图所示，前两个十分位人口在总收入中仅占3.4%；点B表示总收入中归属前四个十分位人口群体的份额，即12%；如此类推，直至最后一个十分位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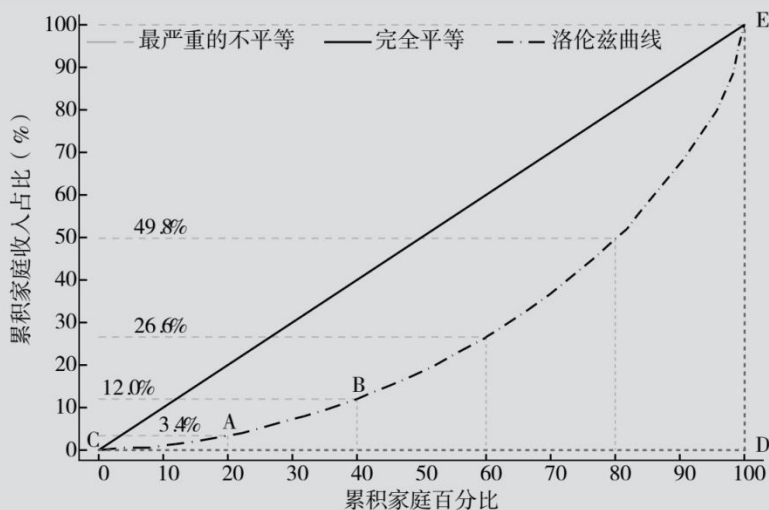


图5A 美国2009年的洛伦兹曲线

资料来源: C. DeNavas-Walt, B. D. Proctor and J. 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9,”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 -238, U. S. Census Bureau, September 2010.

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平等，该点线将与45度斜率的实线重合：第一个十分位群体获得总收入中的10%，前两个十分位群体获得总收入中的20%，以此类推。与之相反，如果全部收入只归属一个人，其他所有人没有收入，则洛伦兹曲线将变得高度凸性，初期与横轴完全重合，直至100%位置时突然跃升到1。99.9999%的人口收入都为0，而0.0001%的人口占据收入份额的100%。这种情形对应图中的灰色虚线。

测算总体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其实就等于45度斜率线与点状曲线之间的面积 S 除以三角形CDE的面积 T 。在完全平等的情形下，点状曲线与斜线重合， $S = 0$ ，基尼系数也为

零；在最严重不平等的情形下， $S = T$ ，基尼系数则为1。

第二种测算不平等的办法是关注收入分配顶层的不平等程度。最普遍采用的顶层不平等指标是观察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图5.1显示的就是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该指标的计算方式很简单，我们从某个国家收入最高的人开始，接下来加上收入第二高的人，然后是第三高的人，直至纳入全部人口中最富有的1%群体。我们把这个群组中所有人的收入累加起来，计算其总和与该国全部劳动人口的收入总和之比率。这一比率即代表总收入中归属顶层1%群体的份额。图5.1表明，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呈现U形曲线的轨迹，在1980年之前下降，自那之后便迅速提升。

第三种测算收入不平等的办法具有动态性质，它反映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即子女拥有与父母类似的收入水平的概率。子女收入水平与父母的关联度越高，一国的社会流动性就越小。图5.2显示了经合组织各国的情况，包括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横轴）与以父母和子女收入关联度测算的动态不平等（纵轴）。不出意料，北欧诸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它们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反过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在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高水平，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严重，而社会流动性最低。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不平等同动态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最小平方线”——代表各点与趋势线之间距离的平方和的最小值——明显向上倾斜。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越高，其收入不平等会越小。
[3]经济学家们借用菲茨格拉德小说中的经典人物，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美国梦然后走向幻灭的百万富翁，将其称为“了不

起的盖茨比曲线”（ Great Gatsby Curve ）。

更近期以来，几位经济学家在非常精细的地理尺度上（通勤区）测算了社会流动性水平（Chetty、Hendren、Kline and Saez, 2014）。[4]图5.3显示了他们得到的各通勤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对比：在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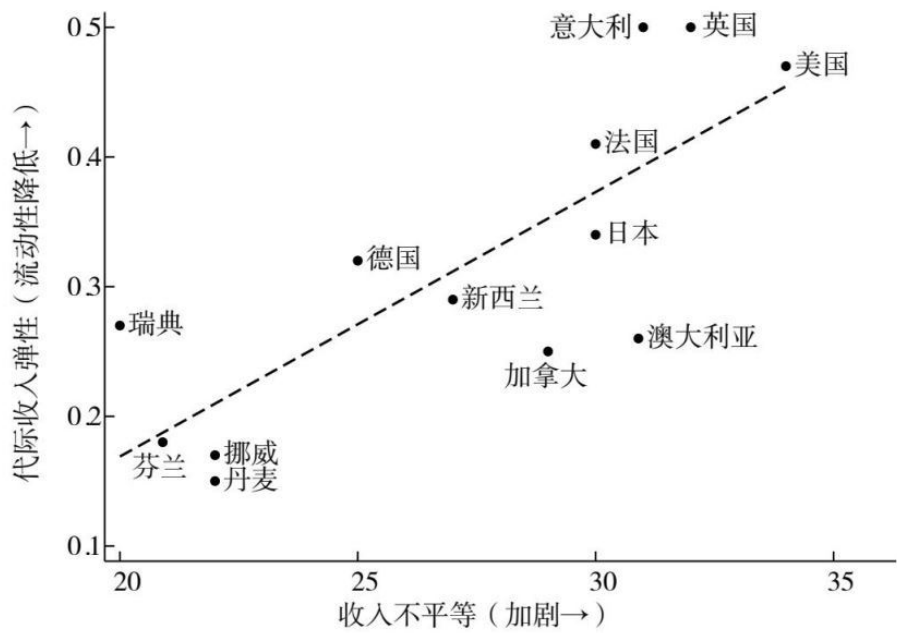


图5.2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各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转引自Miles Corak,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 (2013) :79 -102 ,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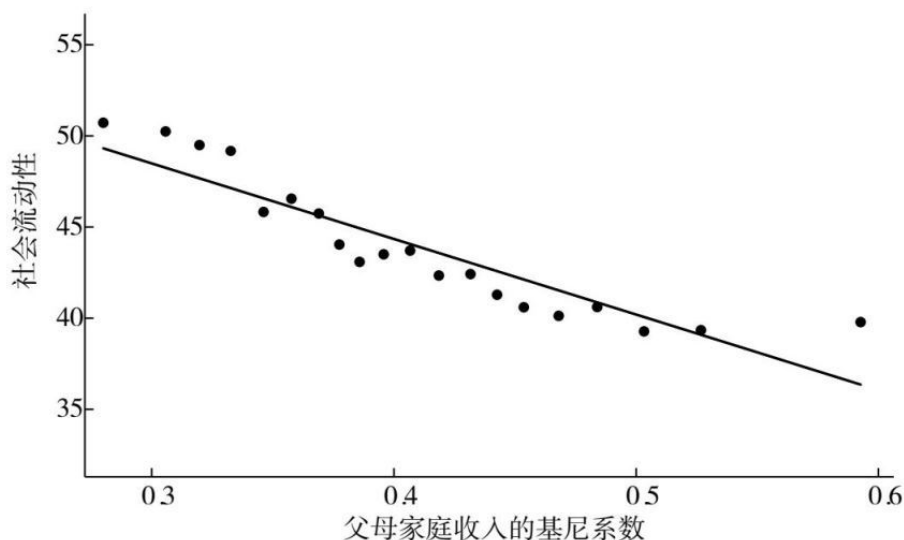


图5.3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美国

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4 (2014): 1553-1623。

那么，动态不平等（即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之间是否有类似的关系？根据图5.4，回答是肯定的。在美国各通勤区中，我们发现社会流动性越高，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越低。不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很确定：社会流动性与总体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图5.4中仅为-0.190，远低于图5.3中的-0.578。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最高的通勤区大多位于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等创新力极强的州。这个现象很自然让我们想到，创新或许是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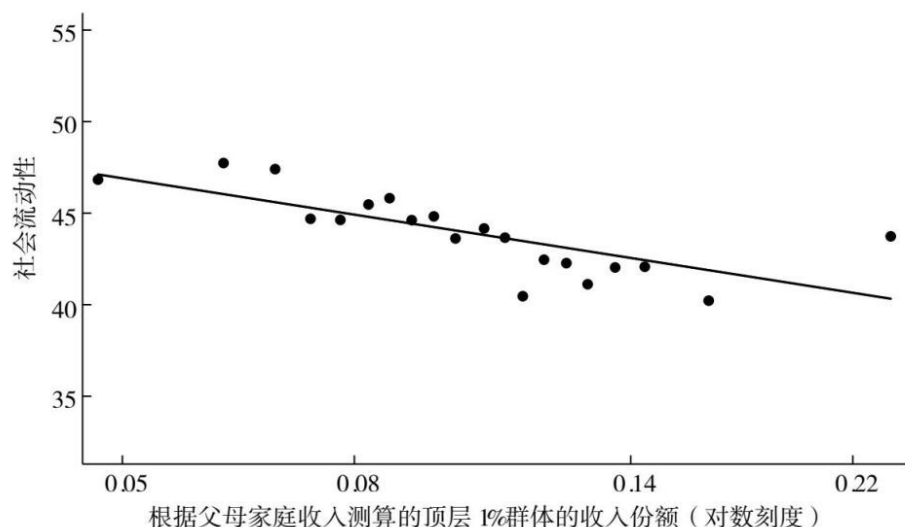


图5.4 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4 (2014): 1553-1623.

2. 创新与不同类型的不平等

根据创造性破坏范式，创新驱动型增长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都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有所启示。

第一个观念认为，创新来自企业家的开创性活动，其动力是获取创新租金。租金大小取决于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莫克尔（2005）曾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专利制度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5]创新租金让发明家们有机会在收入阶梯上攀登，加入顶层1%群体。例如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公

司，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而致富，而作为Skype软件的创始人之一，尼克拉斯·詹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öm）也得以跻身瑞典最富有人群的行列。

更一般地说，每项创新都使创新企业提升其产品品质，超越现有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创新者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创新还能使创新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这将进一步增加创新者的利润（相对于工资）及其收入。^[6]因此创造性破坏范式推测，创新会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越活跃，顶层1%群体在当地收入中的份额就越高。

熊彼特增长理论背后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的创新会替代旧的技术，摧毁原先的创新者的租金。新的创新同新的市场进入者密切相关，新创新者的租金增加，同时在位企业的租金减少。Skype软件的发明家在20年前并不属于豪富阶层，创建苹果公司时的乔布斯也是后起之秀。所以，熊彼特范式的第二个推测是，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源泉，特别是市场新人带来的创新。

创新既会提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顶层收入不平等），又会推高社会流动性，这看似有些矛盾。不过对美国各州的比较可以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目前创新力最强的之一，而亚拉巴马州是最弱的之一，我们从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看，加利福尼亚州明显高于亚拉巴马州。与此同时，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加利福尼亚州也明显高于亚拉巴马州。

创新既会扩大顶层不平等，也会提升社会流动性，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难以仅凭逻辑去推断创新会如何影响基尼系数等更广义的不平等指标。因此，熊彼特范式的第三个推测是，创新与广

义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那么，对于创新与各种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关系，数据能有何启示？若干学者通过分析美国各州1975—2010年的产出数据、专利质量和收入分配状况，发现创新确实是解释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Aghion、Akcigit、Bergeaud、Blundell and Hémous, 2019）。[7]

图5.5和图5.6对此有清晰展示。图5.5表明，创新对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实线），另外创新与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不平等状况之间（虚线）并无相关性。图5.6则描述了从通勤区获得的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这里对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来自较底层背景的人（其父母在1996—2000年属于收入分配底层20%群体）在成年后的2010年进入收入分配顶层20%群体的概率。创新密度的测算方式是：各通勤区单位居民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的专利数量。该图表明，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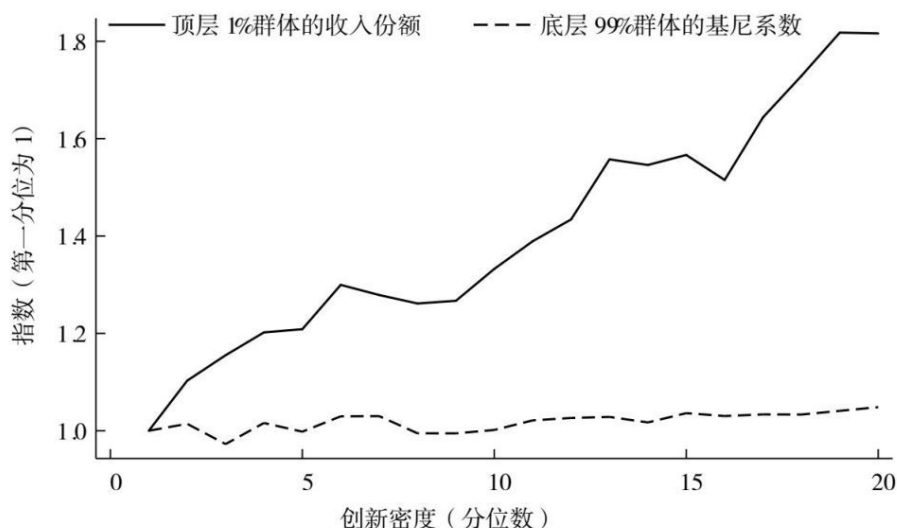


图5.5 创新、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

注：基尼系数是截止到第99百分位的基尼系数，计算时排除了顶层1%的群体。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1 (2019): 1-45,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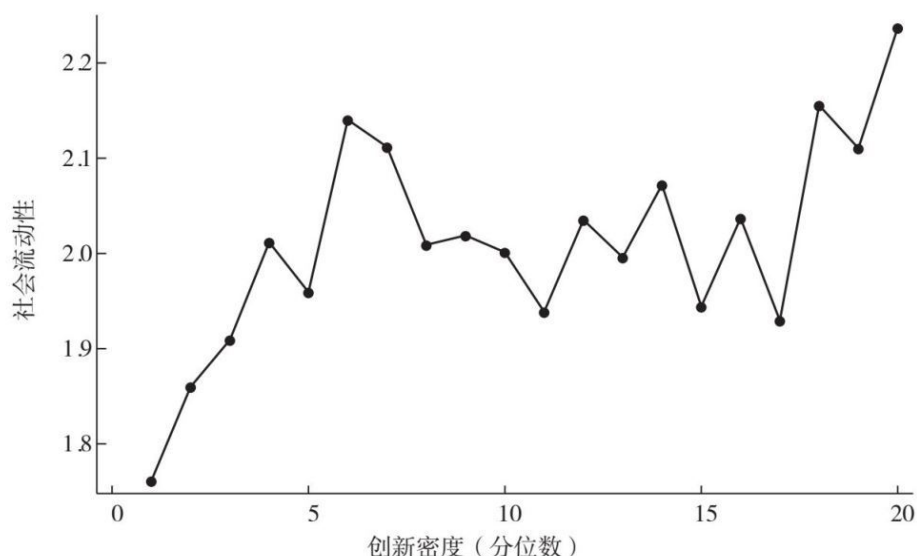


图5.6 创新与社会流动性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1 (2019): 1-45, 图3。

2019年这项研究还指出，新进入者的创新与社会流动性有正向关联。该发现符合如下理念：创造性破坏是一种通过创新带来社会流动性的机制。

总之，创新确实会使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但也伴随着三方面的益处：不会使总体不平等程度恶化，会提升社会流动性（尤

其是当新创新者进入市场时），并且会促进生产率增长。[8]

3. 创新企业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杠杆

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正向关联不只源于新创新者对老创新者的取代。创新企业本身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潜在杠杆，因为它会培训和提升员工，特别是最缺乏技能的员工。针对2004—2015年英国数据开展的一项近期研究发现，创新企业给员工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进步阶梯，包括低技能与中等技能员工：如仓储员工、秘书、保安、特种蓝领员工、运输业员工和销售员等。

[9]

图5.7描述了低技能员工的小时工资率随年龄的变化，包含被创新企业雇用（实线）和被非创新企业雇用（点线）两类。只要有至少1欧元的研究投入，就符合创新企业的定义。我们首先观察到在所有年龄段，低技能员工的工资在创新企业都显著高于非创新企业。第二个不那么惊人的现象是，无论被哪种企业雇用，员工的工资都随年龄增加，反映了他们在企业内部获得的经验带来的收益。不过，创新企业的工资随年龄提升的幅度高于非创新企业。换言之，创新企业确实给最缺乏技能的员工提供了上升的社会阶梯，因为它们给员工做了长期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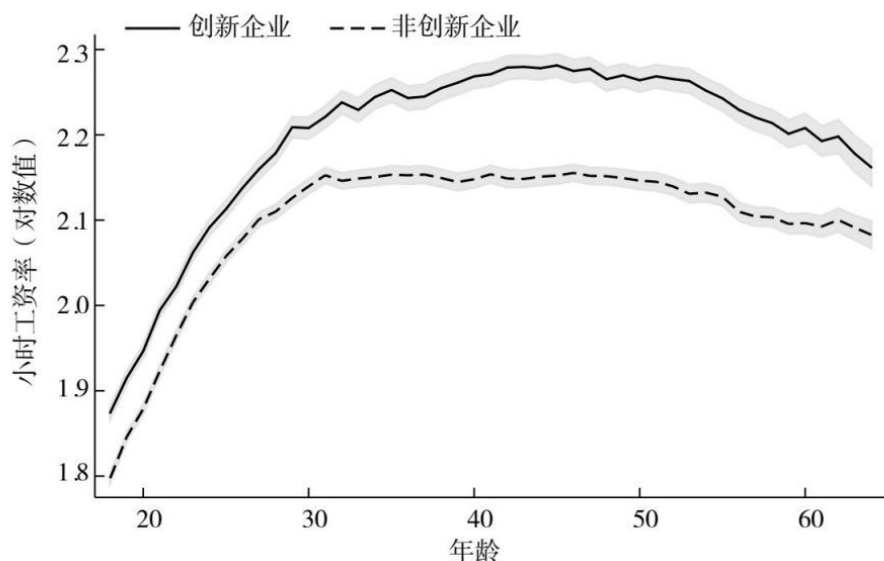


图5.7 低技能员工的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 “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图1。

高技能员工（例如经理、工程师与科研人员）的情况又如何？图5.8显示，他们也获得了随时间逐渐增加的经验溢价的好处。然而，无论他们是被创新企业还是非创新企业雇用，这种经验收益的增长趋势相同，即高技能员工在创新企业工作并没有额外的收益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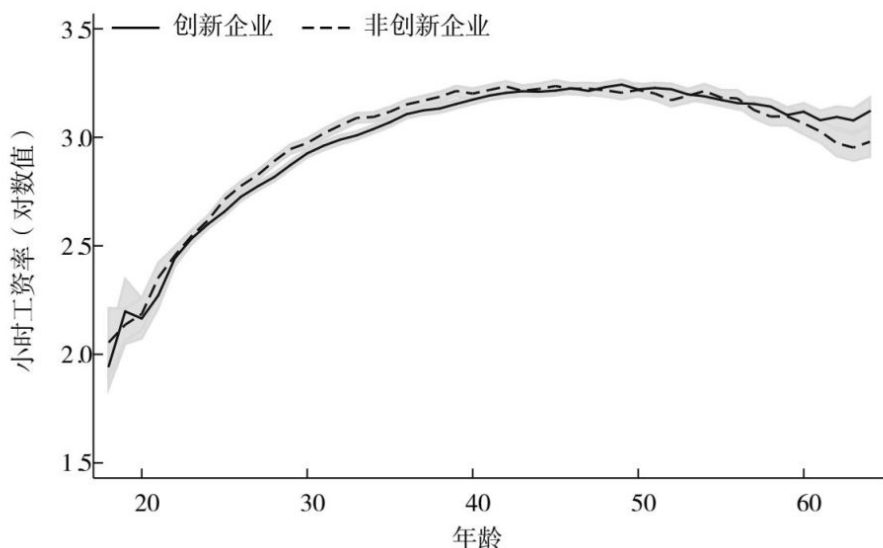


图5.8 高技能员工的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 “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图3a。

最后，图5.9显示的是高技能、中等技能、低技能员工的小时工资率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的关系，后者由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测算。我们再次看到，最高技能员工的工资没有随就职企业的创新密度发生太大变化（点状曲线几乎保持水平），而最低技能员工的工资随企业创新密度大幅提升。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该研究给出的理由是，最高技能员工主要是靠他们的毕业文凭和简历中展示的硬性技能来评价，而最低技能员工主要根据他们在企业中逐渐掌握的软性技能来计酬，这使后者的利益与企业的成功更加密不可分。一家企业的创新力越强，就越需要低技能员工掌握好软性技能，尤其是被视为高度可靠的员工。如果这些员工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则

企业将遭受很大损失。这是因为企业的创新力越强，员工个人与企业其他资产之间形成的互补作用也会越强。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与非创新企业相比，创新企业的低技能员工有较高的工资溢价。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创新企业的管理者有强烈的激励提升底层员工的技能，特别是通过培训等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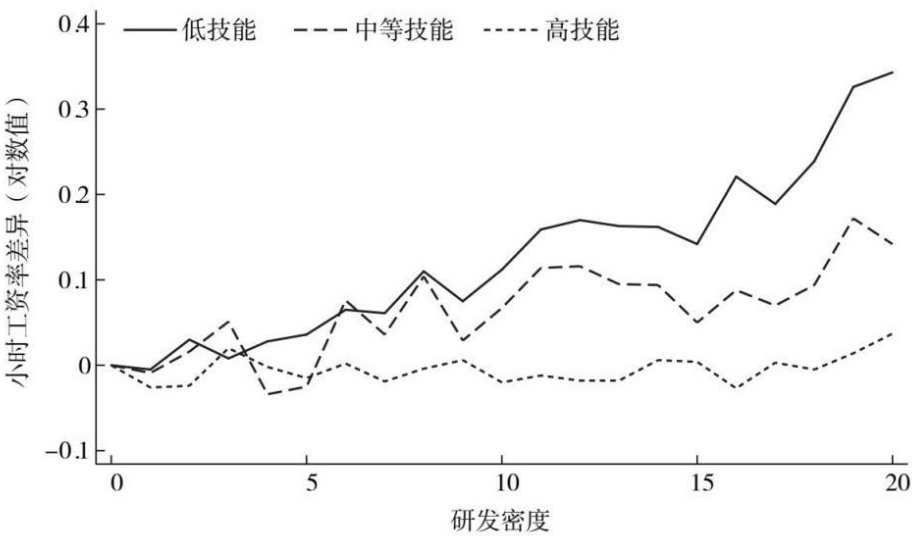


图5.9 不同职业类别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创新密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R. Griffith, “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总之，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在创新企业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员工的工资变化轨迹上。而且政府也有现成的工具帮助创新企业发挥社会上升阶梯的作用，这一工具就是给职业培训提供补贴。

4.进入壁垒是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另一种来源

史蒂夫·乔布斯还是卡洛斯·斯利姆

如果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并非来自创新，而是来自在位企业设置的产业进入壁垒，则未必会带来上述正面促进效应。进入壁垒会阻挡新创新者加入，干扰创造性破坏过程，由此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此外，鉴于进入壁垒既会增加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又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所以很可能还会造成整体不平等状况恶化。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一方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通过创新致富的典范；另一方是墨西哥商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富豪。斯利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参与国有电信运营商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将其改造为私人垄断企业，从中大发横财。他获利的关键是：墨西哥电信业受到的政府规制很少，尤其是不受该国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的监管。

游说对增长与不平等的影响

在位企业高度依赖游说活动来限制新企业的进入，保护自身租金。最开始，“游说”（lobby）一词是指英国下议院的前厅或会客室，19世纪时，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来此与议员们磋商。如今，根据2017年的盖洛普年度调查，58%的美国人把游说业者的道德水平评为“低”或“极低”，远远不及银行家（给相同评分的比例为21%）。[10]

哪些人在从事游说，游说活动有多广泛？在美国，游说活动每年的花费近3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的游说支出则为每年约11.4亿欧元。正如康斯坦丁诺斯·德利斯（Konstantinos Dellis）与大卫·桑德曼（David Sondermann）所述，以销售额计算的最大型企业发起的游说活动最为密集。此外，游说支出较多的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利润率高于其他企业。最后，高竞争产业中的企业相比低竞争产业中的企业，游说支出更多。[\[11\]](#)

有项研究从意大利的数据中同样发现了企业与政客之间的联系（Akcigit, Baslandze and Lotti, 2018）。[\[12\]](#)如图5.10所示，企业的市场份额越高，在图中居于越靠左的位置，其雇员在基层、地区和国家层面兼任政治职位的比例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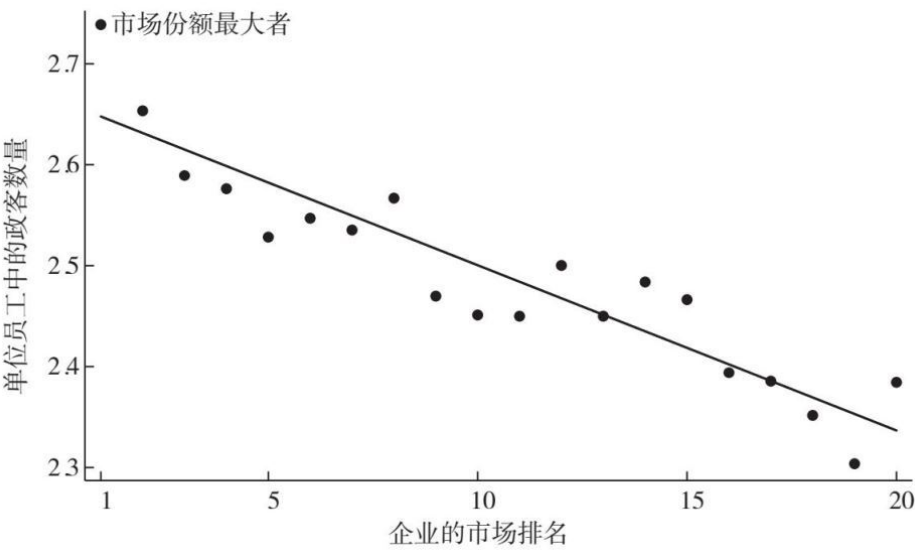


图5.10 市场份额与政治联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 “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图5。

接下来我们自然会想到：游说是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有用的专业参考意见，还是只为阻止新竞争者加入市场而施加压力？利用美国参议院和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公开档案，有研究分析了美国1999—2008年活跃的游说团体及其向竞选活动的捐助金额（Bertrand、Bombardini and Trebbi, 2014）。[13]该研究尤为关注游说者的个人背景，以判断他们是属于“专业型”还是“关系型”。对此的定义是，专业型游说者的任务集中在少数领域，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在这些领域确有真才实学。关系型游说者的特点则是与某位政策制定者有特殊通道，要么源于他们属于同一党派，要么因为游说者资助过该政客的一次或多次竞选活动。

该研究发现，关系型游说者的比例在1998—2008年有所提升。此外在2008年，超过3/4的游说者并非专业型，近54%明显属于关系型，没有特殊关系的纯专业型游说者的占比不到1/7。最后，这几位学者还指出，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参议院的2002—2007年，与共和党政客有联系的游说者的收入平均来说比其他同行高出25%。总体上该研究认为，虽然某些游说者确实属于专业型，并为社会贡献了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可是大多数游说群体属于政治关系型，不具有专业素养。另外，即使游说者能因为专业素养而获得收入溢价，这一溢价也小于政治关系带来的好处。

既然游说活动大多与政治联系有关，它对不平等又有何影响？图5.11描述了1998—2008年美国各州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与游说活动密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游说变得足够密集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这一结果证明，游说活动的确是顶层收入不平等除创新之外的另一个来源。

游说活动导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这根本不令人奇怪。关系型游说者能帮助在位企业维持市场支配力，继续占有

租金。具体来说，游说活动不仅通过设立关税保护在位企业所在的产业免受竞争，还能支持它们拿下采购合同、轻松获取银行贷款、减轻税收负担以及获得更多公共补贴等。

游说活动对公司税收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我们可以证明，积极开展游说的企业纳税更少（尤其是债务水平最高的企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申报的研发支出较多。游说活动使这些企业在研发支出上能获得税收抵免，并在某些类型的设备上取得更有利的纳税折旧方案。[\[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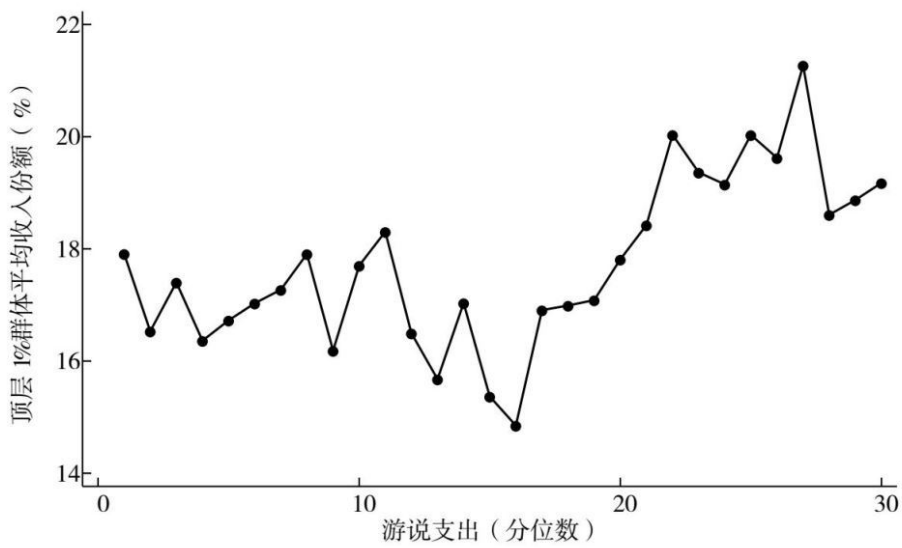


图5.11 1998—2008年游说支出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注: x轴的每个点对应游说支出的特定水平，在不同年份，同一个州可能出现左右移动。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1 (2019): 1-45。

图5.12来自同一数据，显示美国某个州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

体收入不平等如何随该州的游说密集度而变化。[\[15\]](#)当游说活动变得足够密集时，总体不平等水平显著提升。这一情形与创新对总体不平等的效应（或者说无效应，图5.5）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我们应该预期到的结果：鉴于游说主要属于拉关系性质，它会阻挠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削弱社会流动性，同时加剧顶层收入不平等。与之相反，创新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因此对总体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下面我们来探讨游说活动对创新与增长的影响。图5.13是对图5.10的补充，用一条曲线显示企业的创新密度同其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企业的销售额越高，创新密度就越低。这张图有力地说明，随着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支配力，走向市场统治地位，它用于创新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用于培养政治关系与游说活动的资源却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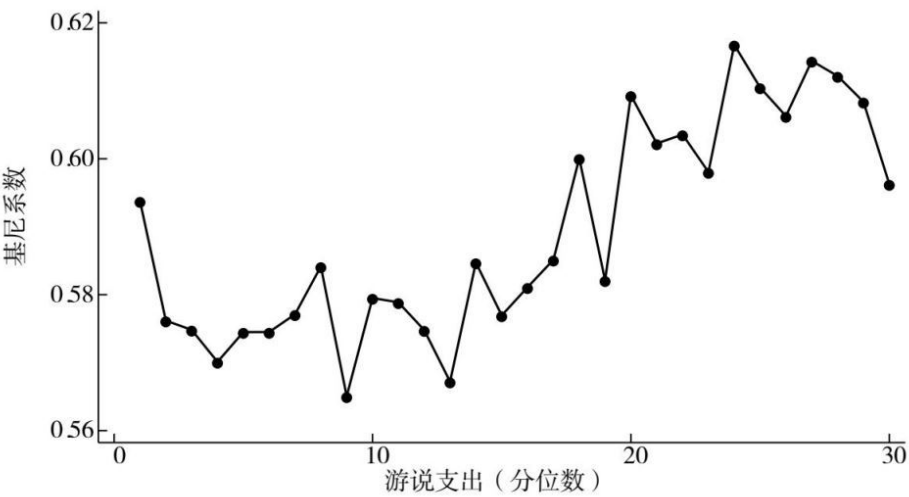


图5.12 游说支出与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Bergeaud, R. Blundell and 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同一项研究还表明，意大利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与它们对政治关系的投资负相关。与之相反，企业的就业增长则与其政治投资正相关。对此的解释是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克服政府的官僚主义束缚，但要牺牲对创新的支出，而后者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总体而言，游说活动的投资对增长有害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随着在位企业的成长，它们对游说的投资越来越多，以牺牲创新作为代价；其二，企业与政客之间通过串谋抬高了市场进入的成本，打击了创造性破坏。一个产业中政治关联型企业占比越高，产业的活力越小：进入市场的企业减少，现有企业的退出减弱，企业的平均年龄变得更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有哪些主要结论？首先，尽管创新可能是顶层收入不平等的来源之一，它却具有某些独特优点，不同于游说和产业进入壁垒等其他不平等来源。创新毕竟是生产率和企业活力的基础，政治关系则不然。其次，创新与社会流动性具有正向关联，尤其是新进入企业的创新，而游说会削弱产业进入乃至社会流动性。最后，创新似乎与总体不平等程度并无关联，而游说活动会加剧总体不平等。所以，假如我们的目标是降低顶层收入不平等，那么对它的各种来源绝不能等视之。特别是，我们不能把创新者等同于有政治关系的在位企业或个人。如果用打击创新的方式来解决顶层收入不平等，那将削弱社会流动性，可能在损害增长的同时导致总体不平等恶化，最后自食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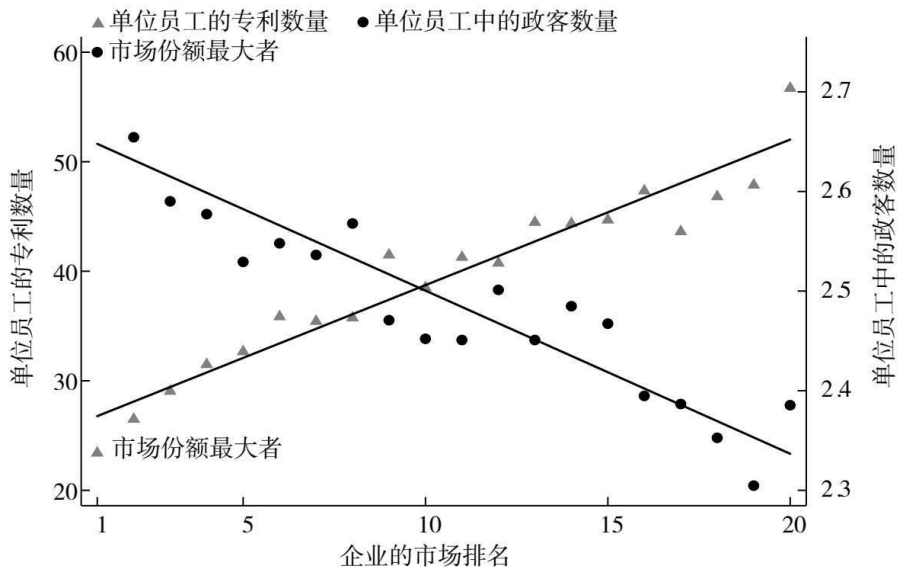


图5.13 市场份额、创新与政治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 “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 , 图5。

第二个结论是，我们依然要关注富人群体，包括那些通过创新致富的人，因为昨天的创新者往往成为今天的保守在位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游说活动与政治关系，减少创新支出。我们如何能既奖励创新，又防止过去的创新者利用其租金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我们如何能够鼓励新的史蒂夫·乔布斯的出现，同时尽可能防止他们在日后变成卡洛斯·斯利姆？依靠税收工具，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收，这样做是否足够？还是有必要寻找其他征税方式和采用其他政策工具？

5.如何利用税收工具

瑞典的案例

1991年，瑞典对税收体制做了激进改革，创立了针对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二元税制。[\[16\]](#)改革的两个支柱是：把最高边际税率大幅削减，从88%降至55%；引入针对资本收入的30%的单一税率。而在1991年之前，对资本收入累进征税，最高边际税率超过72%，平均税率为54%。这一税收改革伴随着瑞典人均GDP在1993年之后的显著起飞：1994—2007年，瑞典的人均财富增速达到年均3.4%，而欧元区国家和欧盟国家分别为2.4%和2.7%。此外，图5.14显示，瑞典的创新活动也同时起飞，1991年后的专利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17\]](#)

这些现实结果具有启发性，但不能证明税收改革对增长与创新有何因果效应。尤其是，1991年税收改革伴随着货币贬值以及政府体制改革，赋予了行政机构与市政当局更大的自主权，并对公共支出建立了更严格的控制。因此，我们难以把税收改革的特定效应分离出来。但无论如何，在改革生效前后，创新与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的突变。

1991年的瑞典税收改革对不平等有影响吗？图5.15显示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略有增加，[\[18\]](#)图5.16则显示总体收入不平等稍有增加，但增幅不大。瑞典依旧比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葡萄牙等）更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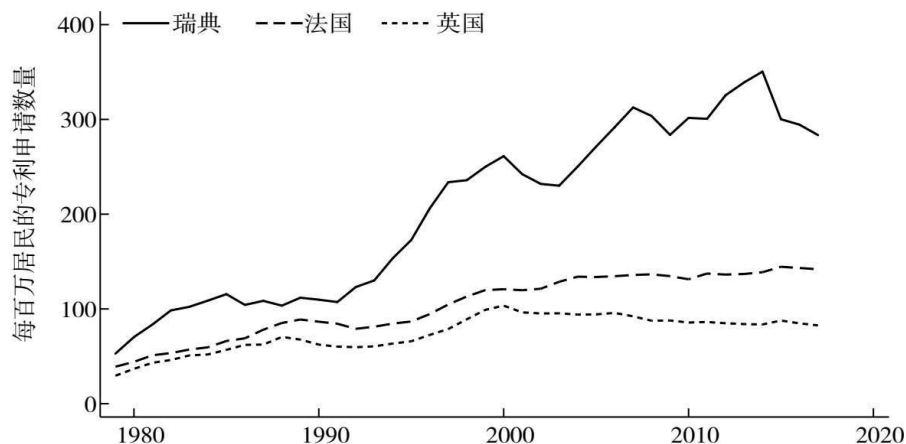


图5.14 单位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 Eurost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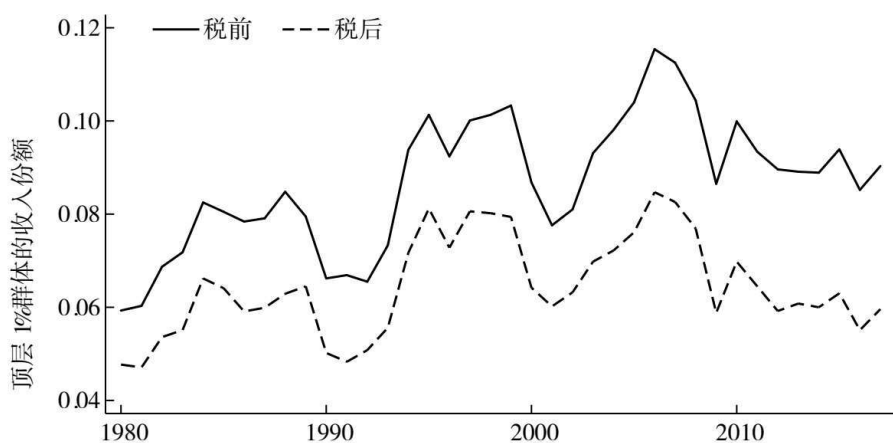


图5.15 瑞典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 T. Blanchet, L. Chancel, A. Gethin, “Why Is Europe Less Unequal Tha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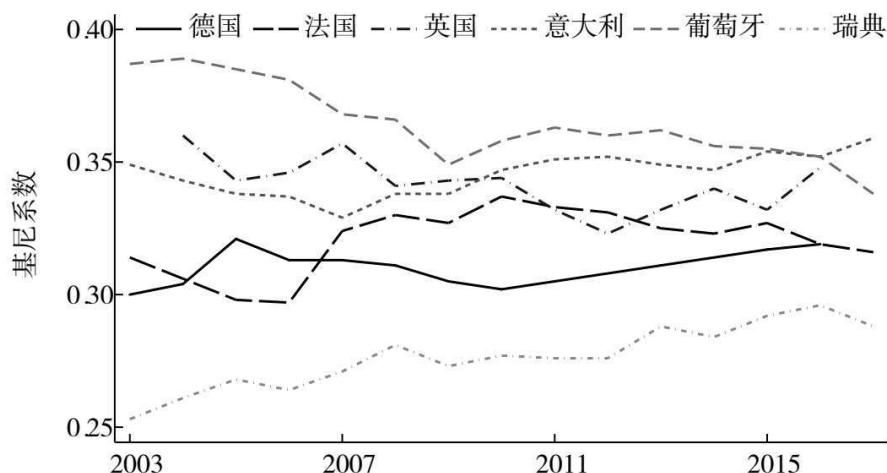


图5.16 欧洲各国的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 WorldBank。

总之，瑞典在1991年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增长与创新的加速，而没有使不平等显著扩大。事实上，瑞典的改革目标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经济而刺激创新，同时保留以平等收入分配和强势公共投资（尤其对教育和医疗领域）为特色的社会模式。通过这条路径，瑞典试图走向能更好地满足公平和效率双重要求的制度体系。[\[19\]](#)

专栏5.2 法国的资本所得税与收入流动性

我们之前提到，创新和创新企业可以成为社会流动性的杠杆，政府则可以用恰当的政策措施激活这些杠杆。然而，从业已较高的初始水平上再提高资本收入税率，至少从短期看并非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措施。测算两个日期之间收入流动性变化的一种方法，是比较个人的“排名”变化，即人们

在收入等级上所处的位置。利用个人在日期1和日期2的排名之间的相关性，计算一国所有人的相关性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全国层面的收入流动性的逆指标。该相关性越强（其值越接近于1），这个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越弱。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法国在2006—2017年的平均收入流动性较弱，个人在2017年的收入排名与2006年的排名的相关系数达到0.69。更令人惊讶的是，收入流动性在2006—2011年以及2012—2017年这两个时段几乎相同：个人在2011年和2006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为0.78，在2017年和2012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则为0.80。[20]

不过，法国在2011—2013年推行了若干税收改革，尤其是在2013年统一了资本所得税与工资所得税，在2012年修订了财富税纳税等级，对所得税引入45%的新税档等。这些改革激起了大量讨论，但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掌握不同收入税档的个人纳税者的申报收入变化的数据。[21]

有人或许认为，在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统一之后，2013—2017年这个时期过于短暂，不足以评估税收改革的效果。然而，2006—2017年整个时期中收入流动性几乎保持不变，以及在2012—2013年改革前后没有出现任何间断，让我们怀疑对资本收入加重征税能否成为短期内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手段。

研究税收与创新关系带来的启发

近期的几项研究证实了税收对创新的因果效应。首先，税收对发明家的地理流动性产生了影响。有几位学者分析了税收与人

才外流之间的关系（Akcigit、Baslandze and Stantcheva, 2016）。[22]尤其是，他们考察了这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更适用于“超级明星”发明家，即根据专利影响指数排名位居顶层1%群体的人。该指数的构建方法是：发明家申请的专利数量，并将每项专利在未来创新中的引用次数作为权重。此方法给受到频繁引用的专利赋予更大的权重，因为它们对未来的专利有更大的贡献。该研究采用了国际专利数据，即1977—2003年间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及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学者们首先考察了最高收入等级的边际税率同留在母国的发明家占比之间的相关性，对超级明星发明家来说，该相关性呈强烈的负值，但对其他发明家来说基本为零（图5.17）。这些普通发明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反事实例证，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获得极高收入，也就不容易适用于最高等级的边际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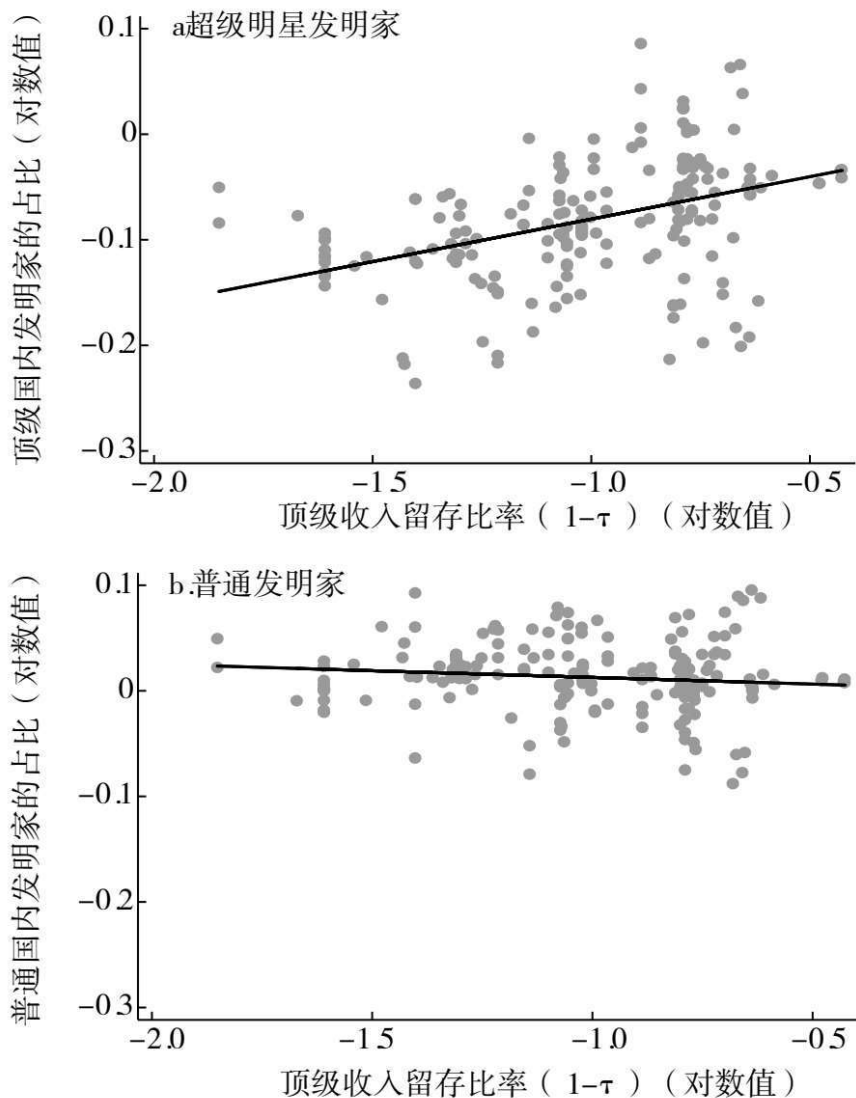


图5.17 顶级税率与留在国内的发明家占比

注: x轴表示以最高边际税率纳税时的留存收入占比(百分比对数值)。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为40%,则收入留存比率为60%。越靠近右侧,表示最高边际税率越低。

资料来源: 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这几位学者还利用了两个自然实验。第一个是苏联解体使其科学家具有了国际流动性。图5.18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前，其发明家的移民与税收方面的动机无关，因为政府禁止他们外迁。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与迁入该国的俄罗斯发明家占比之间有强烈的负相关性。俄罗斯科学家主要向税率最低的国家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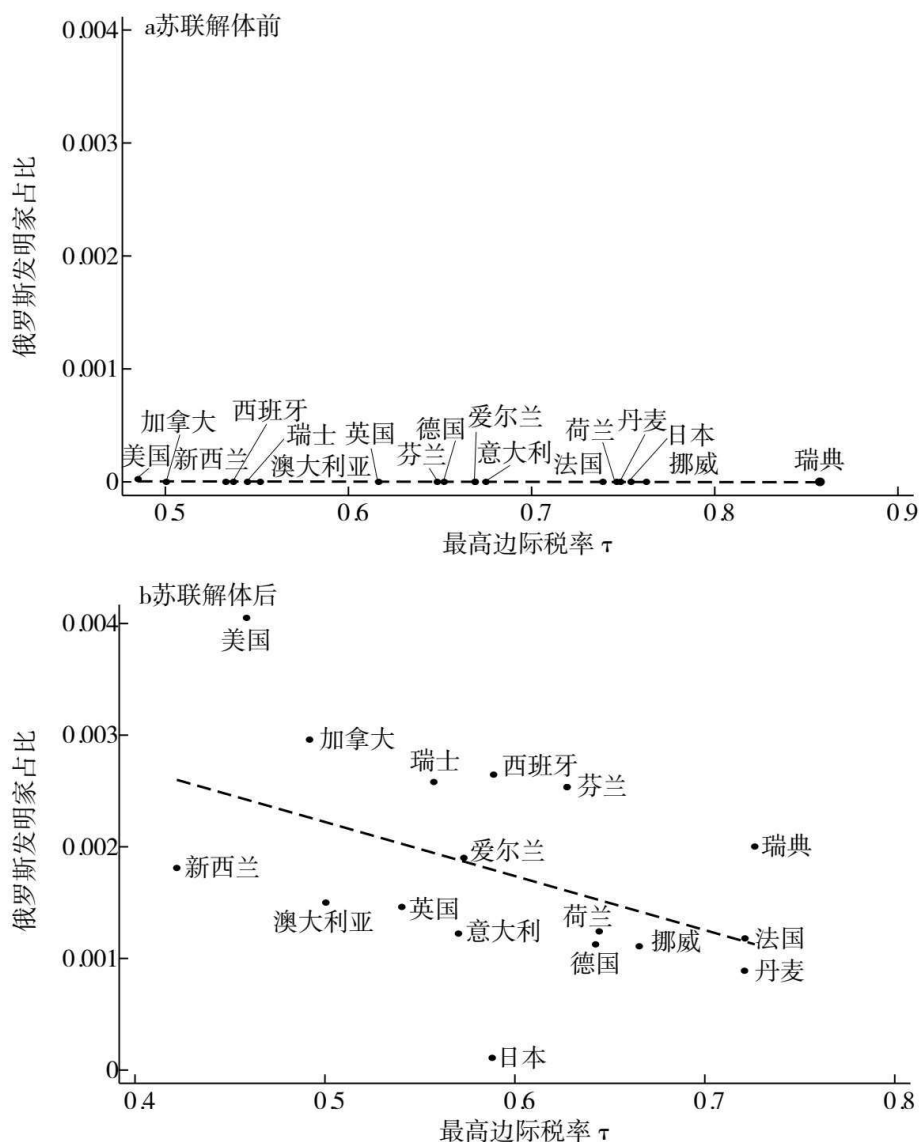


图5.18 最高税率与俄罗斯发明家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0 (2016): 2930-2981, 图6A和图6B。

第二个自然实验是利用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的减税。里根把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调至28%，在图5.19中表现为带黑点曲线的变化。这一改革对科学家迁入美国的移民行为有何影响？结果表明，外国的超级明星科学家迁入美国的数量出现显著增加（实线）。作为对比，我们利用其他发达国家的信息构建了一个反事实场景，反映美国不实施1986年减税的结果。可以看到，若没有减税，迁入美国的发明家的数量将不会有显著变化（虚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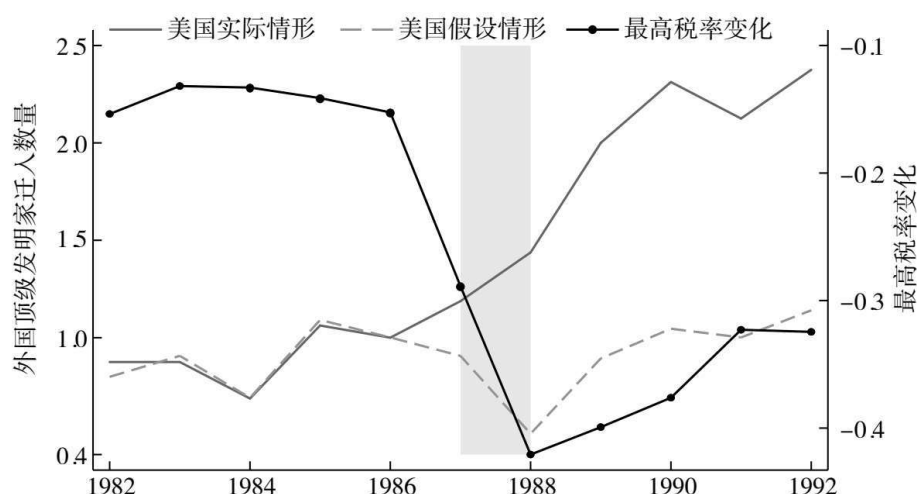


图5.19 1986年税收改革与迁入美国的外国发明家的数量

注:1986年税收改革措施在图中灰色区域的年份推出。超级明星发明家的标准是专利影响指数位居顶层1%的群体。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0 (2016): 2930-2981, 图8A。

在考察税收对发明家流动性的影响之后，接下来我们探讨税收对创新有何种效应。阿克西吉特及其合作者（2018）建立了

一个新的数据库，包括自1920年以来申请过专利的美国发明家的详细名单、申请的专利内容，以及他们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等信息。[23]

这些学者使用两种估计方法证明了税收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种方法是利用美国各州之间的税率差，分析州税收如何影响发明家的行为。第二种方法是比较联邦税率变化对分别位于州界两侧的两个相邻县的效应。

两种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税收与创新有因果联系。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发明人数量与专利引用数量下降4个百分点。公司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减少6%~6.3%，发明人数量减少4.6%~5%，专利引用数量减少5.5%~6%。

现在来看看州层面的税收与创新的时间变化。图5.20显示了密歇根州在1967年实施2.6%的州所得税，以及在1968年将税率提高至5.6%，引起创新率（专利数量的对数值）的相应变化。我们发现创新有严重下滑。图中的虚线代表密歇根州的反事实情形，基于美国其他州的数据重建，反映密歇根州如果不改变税制的可能结果。在这一反事实场景中，我们发现创新率没有下降。如果分析发明人的数量而非专利的数量变化，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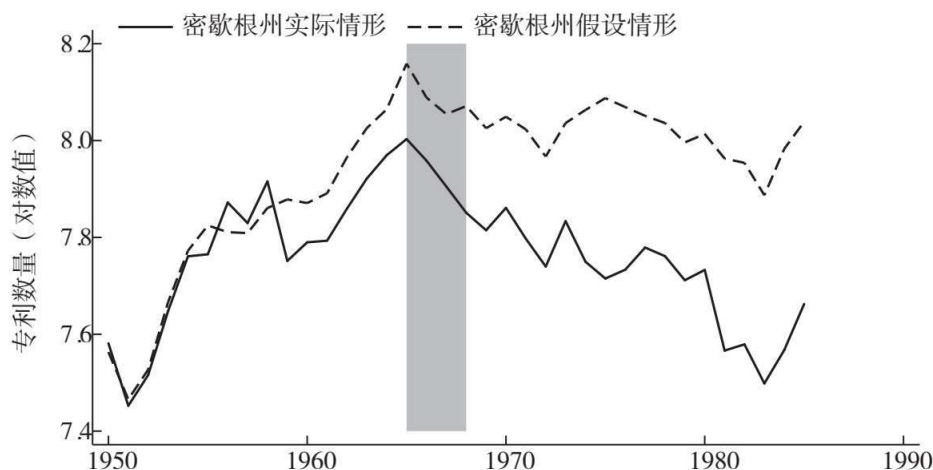


图5.20 1967—1968年对密歇根州税收改革的案例研究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J. Grigsby, T. Nicholas and S. Stantcheva, “Tax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9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8) , 图A10。

这些研究证明税收对创新有负面影响。当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分析的一个假设是公共支出（也就是公共投资）保持不变。但本书第11章和第12章将会指出，公共支出可以通过给研究和教育体系提供资金，对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政策而促进创新。考虑到税收是支持此类公共投资的必要手段，我们有必要核实，政府确实把税收收入用在了支持经济增长的投资上，如教育、医疗、弹性保障和产业政策等领域，而不是拿去满足政客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近期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税收、创新驱动型增长与政府腐败程度的关系（Aghion、Akcigit、Cagé and Kerr, 2016）。[24]该研究利用公司税最高边际税率来测算税收负担，借助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来测算腐败程度。

他们把各国分为两种类型：腐败指数高于中位数的“腐败国家”和腐败指数低于中位数的“民主国家”。在腐败国家中，税负与增长表现为负向关联，而在民主国家中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联。

为了更加严格地证明因果关系，这几位学者重点分析美国，比较了美国不同州的时间变化，以及州内不同县的变化。他们用被定罪的公务员或州政府雇员的数量来测算各州的腐败程度，用所得税收入来测算税负水平。[\[25\]](#)由此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拉弗曲线，即税负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图5.21）。在某个水平的税负之前，提高税收会加快增长，但越过临界点之后，增税的效果会适得其反。这一倒U形关系是前文论述的税收对增长的两种相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税收一方面让政府有财力进行公共投资，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率，因而促进增长；另一方面，税收要为筹集公共资金而拿走创新产生的部分净利润，由此打击创新。在某个税率之下，税收的正面效应超出负面效应。超出该税率后，负面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以刺激增长为由不计成本地减税并不是好的政策，过度增税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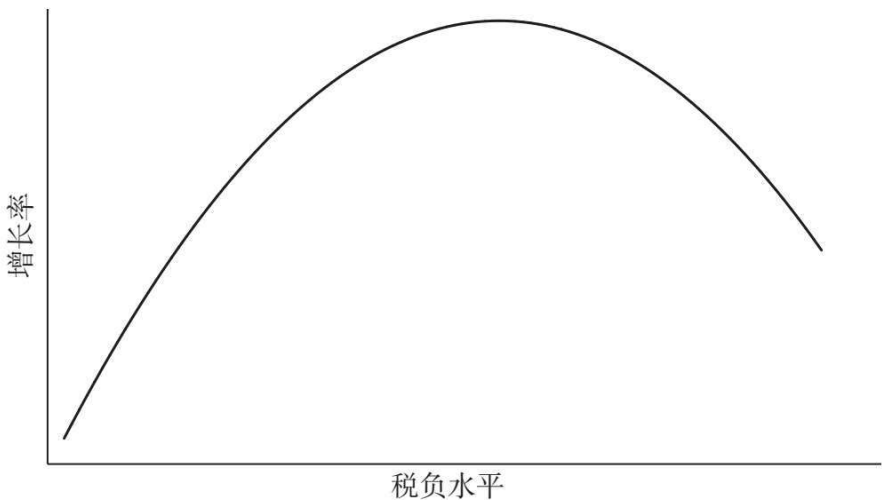


图5.21 税收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曲线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J. Cagé and W. R. Kerr, "Taxation, Corruption and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86 (2016): 24-51, 图1。

不过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关于腐败与上述结果有何相互作用，会使倒U形曲线有何变化。对美国的州和县层面的分析显示，政府越腐败，税收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税率门槛值越低。

6. 结论

在本章，我们分析了创新、不平等与税收政策之间的联系，并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有多种测算不平等的方法：收入分配中的顶层群体（如顶层1%）所占的收入份额；衡量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即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同人人收入相同的理想状况的对比；父母收入同子女收入之间的关联度，则是反映社会流动性水平的动态不平等指标。

其次，创新会扩大顶层收入不平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造成类似结果，尤其是产业进入壁垒与游说活动。创新具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效应，如促进增长，与社会流动性呈正相关，且对基尼系数并无显著影响。游说活动则恰恰相反，既会打击创新与增长，又使总体不平等恶化。

我们探讨了创新企业起到的社会阶梯的作用，特别是对低技能员工。因此，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创造优质的工作岗位，对员工做有益的职业培训，特别是针对最欠缺技能的员工，以提高社会流动性。

税收是促进增长及其包容性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既是因为它让政府有财力投资于教育、医疗、研究和基础设施等增长杠杆，也源于政府可通过税收实施财富再分配，并保护人们免受失业、疾病和技能淘汰等异质性风险，以及战争、金融危机和大流行病等宏观经济风险。[26]当然，这一工具必须谨慎使用，除专栏5.2中介绍的税收对社会流动性的短期效应尚未被证实外，过高的税收还可能打击创新，妨碍经济增长。[27]

最后要提示的一点是，本章没有涉及参与创新活动的平等问题，尤其是一个人成为创新者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身，以及父母的收入、教育和职业类型？我们将在第10章回到这个问题，并讨论教育政策与创新政策在发挥增长和社会流动性杠杆作用上的互补性。

[1] A. B. Atkinson, *Inequality :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A. B. Atkinso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 1 (2011) :3 -71; Thomas Piketty, “Income Inequality in France, 1901 -199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no. 5 (2003) :1004 -1042;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T. Piketty and E.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 -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 :1 -41; E. Saez and G.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no. 2 (2016) :519 -578.

[2]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3] Miles Corak,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 (2013) :79 -102.

[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4 (2014): 1553-1623.

[5] Abraham Lincoln,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speech in Jacksonville, Illinois, February 11, 1859, quoted in Joel Moky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1B, 1113-1180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Also see B. Zorina Khan and Kenneth L. Sokolof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 no. 3 (2001): 233-246.

[6] 这一推测通过美国与芬兰的数据做了检测（参见第10章）。

[7]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tonin Bergeaud, Richard Blundell, and David Hé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1 (2019): 1-45.

[8] Charles Jones和Jihee Kim利用创造性破坏范式来解释顶层收入群体的动态不平等。他们认为增长既来自在位企业获得的经验积累，也来自新企业进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前者会加剧不平等，而后者会减少不平等。参见Charles I. Jones and Jihee Kim, “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Top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5 (2018): 1785-1826.

[9]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Richard Blundell, and Rachel Griffith, “The Innovation Premium to Soft Skills in Low-Skilled Occup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10] Gallup annual survey of Honesty and Ethics in the Professions,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54/honesty-ethics-professions.aspx>.

[11] Konstantinos Dellis and David Sondermann, “Lobbying in Europe: New Firm Level Evidence,” Working Paper 2071, European Central Bank, June 2017.

[12] Ufuk Akcigit, Salomé Baslandze, and Francesca Lotti, “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

[13] Marianne Bertrand, Matilde Bombardini, and Francesco Trebbi, “Is It

Whom You Know or What You Know?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obbying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no. 12 (2014) :3885 -3920.

[14] Brian Kelleher Richter, Krislert Samphantharak, and Jeffrey F. Timmons,“Lobbying and Tax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 no. 4 (2009) :893 -909.

[15] 一个州越靠近 x 轴的左侧，该州的游说活动越密集。由于不同年份的游说密度不同，同一个州可能在 x 轴方向上左右移动。

[16] 关于这次不仅影响瑞典而且波及其他三个北欧国家（挪威、芬兰和丹麦）的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可参阅Céline Antonin and Vincent Touzé,“Loi des finances 2018 et fiscalité du capital. Fondements et impact sur les taux marginaux supérieurs,” *Revue de l'OFCE* 161, no. 1 (2019) :77 -112.

[17] Philippe Aghion and Alexandra Roulet, *Repenser l'Etat. Pour une social démocratie de l'innovation* (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 République desidées, 2011) .

[18] Thomas Blanchet, Lucas Chancel, and Amory Gethin,“Why Is Europe Less Unequal Tha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https://wid.world/wp/content/uploads/2020/10/WorldInequalityLab_WP2020_19_Europe-2.pdf.

[19] 尽管如此，近期有批评认为，瑞典在1991年改革之后的某些后续改革中取消了财产税与遗产税，这走得太远了。

[20] Ufuk Akcigit, Salomé Baslandze, and Stefanie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0 (2016) :2930 -2981.

[21] 这些面板数据让我们能精确追踪法国的个人收入变化轨迹，是公共财政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Public Finance）通过安全数据接入中心（Secure Data Access Center, CASD）提供给研究人员的关于所得税的匿名信息。

[22] Ufuk Akcigit, Salomé Baslandze, and Stefanie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0 (2016) :2930 -2981.

[23] Ufuk Akcigit, John Grigsby, Tom Nicholas, and Stefanie Stantcheva,“Tax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9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8) .

[24]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Julia Cagé, and William R. Kerr, “Taxation, Corruption, and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86 (2016) :24 -51.

[25] 对于增长、腐败和税收收入等变量，该研究均采用5个子时期的平均值，对47个州与4个子时期做了回归。

[26] 参见本书第10章、第11章和第14章。

[27] Philippe Aghion, Vlad Ciornohuz, Maxime Gravouelle,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Income: Evidence Using New Panel Dat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ly 1, 2019, 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media/philippe_aghion/UPL8158439681301526632_Tax_Reforms.pdf.

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

在《好的经济学》一书中，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对比了乔尔·莫克尔关于创新和长期增长的乐观展望同罗伯特·戈登的悲观看法。^[1]在戈登眼中，伟大创新（如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如今进入了创新收益急剧下降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增长率的持续下跌。^[2]莫克尔则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加上贸易全球化为创新与增长的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我们将在本章尝试解释，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创新经济体在过去20年的生产率增速会下降，并调和戈登与莫克尔的观点。

我们将给读者介绍几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种是：已成为领先者或超级明星的企业会打击其他企业的创新。

1. 关于长期停滞的争论

1938年，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谈到，他相信美国注定会陷入疲弱增长状态，并将此命名为“长期停滞”。^[3]当时整个国家刚走出大萧条，汉森也没有预见到随着二战的到来，公共支出以及总需求会再度反弹。

此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重大金融危机（2007—2008年危机），这让萨默斯与其他经济学家重新启用长期停滞的说法来描述与汉森在1938年看到的类似景象。[\[4\]](#)萨默斯论述说，投资需求极为疲弱，只有负利率能让我们恢复到充分就业。

然而在罗伯特·戈登看来，长期停滞的风险反映的是“供给侧”而非“需求侧”的问题。借用果树作为比喻，戈登认为伟大的创新已经过去，最甜最可口的果实都位于低垂的枝头，在将其轻松收获之后，我们必须爬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找品质更差一些的果实。例如，波音707飞机于1958年投入运行时，让人们的旅行时间出现了指数级下降；但自那以后，旅行时间并未继续减少，反而为了节省燃油而回升。[\[5\]](#)

相比萨默斯和戈登，莫克尔与熊彼特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看法更为乐观，至少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善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还持久并显著地提高了思想创意的生产技术。[\[6\]](#)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相伴的全球化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收益，同时通过竞争效应加重了不创新的潜在损失。

最近数十年来，我们的确看到创新的数量与质量在加速提高，这反映在专利的数量与影响上。但为什么创新的加速没有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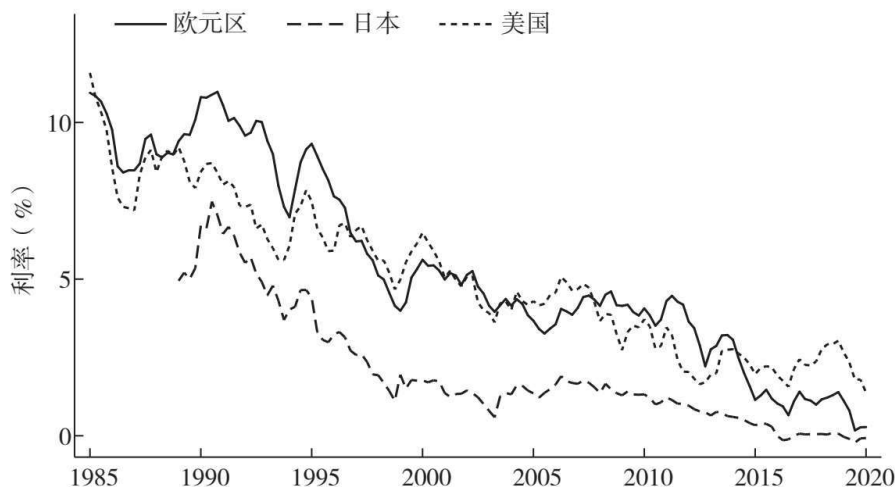
本书第3章提出的一种解释是，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和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瑞典与日本的例子可作为参考：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瑞典的生产率增长加速，而日本减速。瑞典从90年代早期开始实施了有力的改革（见第5章），而日本的强劲增长在80年代末结束后，进入疲软增长期，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加

上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占据了统治地位，束缚经济和创新，阻碍新企业进入。^[7]经合组织测算的整体生产率年增速显示，从1985—1993年到1994—2007年，瑞典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日本下降了1.1个百分点。日本的制度改革被拖延，使其未能充分享受新技术浪潮的收益。这可以部分解释日本及其他部分发达国家增长疲软的结果，但不足以说明美国自21世纪初以来的增长放缓。

第二种解释强调信贷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并因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度宽松货币政策而加剧。图6.1追踪了长期利率的持续走低趋势。根据这种说法，信贷条件放松使低效率企业在市场上苟活，因而妨碍了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例如，自2008年以来“僵尸企业”（指成立年限在10年以上，但盈利状况极差，已连续3年收入无法偿还利息成本）的数量大幅增加。国际清算银行于201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1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僵尸企业占比从1990年的1%提高至2015年的12%。^[8]本书第4章提到，利用马里奥·德拉吉在2012年实施的附加信贷申请计划开展的自然实验，人们发现放松在位企业的信贷约束会给整体生产率的增速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在位企业的信贷约束放松让那些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也能留滞在市场上，不利于生产率更高的新企业进入。

那么信贷条件真的有所放松吗？请注意，企业为获得融资，必须负担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企业的资本由贷款人（主要是银行）持有的债权与股东持有的股权共同组成。因此，资本的成本取决于两个参数：借款成本与股权成本。前者比较容易确定，后者主要来自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预期。如果经营风险较高，投资者就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和较高的回报率；如果经营风险较低，要求的风险溢价也较低。于是，我们对股权成本的测算方法是：无

风险成本——通常为10年期主权债务的利率——加上风险溢价。图6.1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贷款成本与无风险利率成本都无可争议地下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更甚。然而，风险溢价却在上升。[\[9\]](#)结果导致，企业必须负担的总资本成本在过去20~30年里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资料来源: OECD。

图6.1 长期利率变化

本章以下部分将考察另外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与罗伯特·戈登的观点类似，认为新思想的发现将变得愈发困难。第二种解释认为，我们不能准确测算增长率，而且这些测算并未反映创新的真实贡献。第三种解释强调，这轮新技术浪潮（信息与数字技术）催生的超级明星企业如今正在妨碍后起的创新企业进入。

2.新思想的发现愈发困难

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及其合作者试图捍卫研发活动的生产率长期下降的观点：要达到一定水平的生产率增长或一定的创新数量，必须投入的研究人员变得越来越多。[\[10\]](#)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过去的一项先驱研究已指出，自1953年以来，研发部门雇用的研究员与工程师的人数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生产率增长的显著起飞。[\[11\]](#)

图6.2凸显了这一现象在1930—2000年的情形。图中的实线代表生产率增速，虚线代表研究人员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人员数量随时间快速增加，而生产率在此期间没有起飞。因此上述学者认为，从整体经济层面看，研究给生产率增速带来的回报似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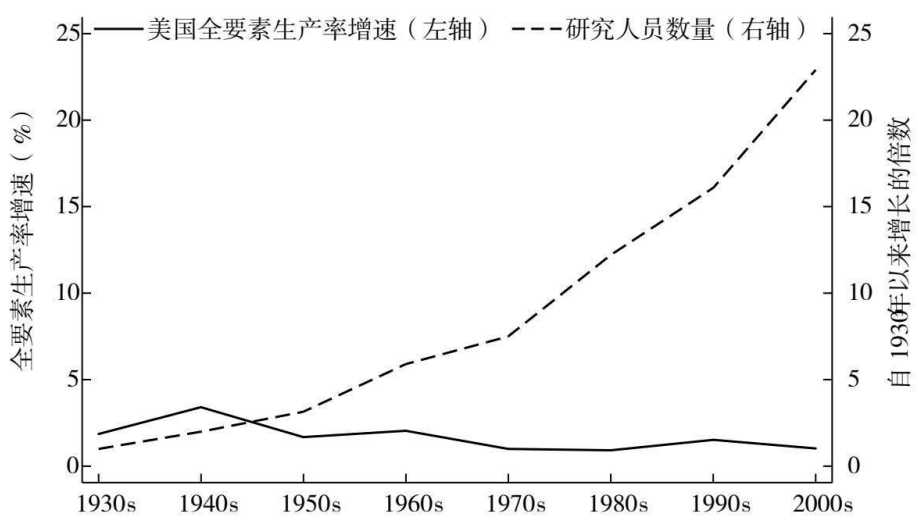


图6.2 美国的研究人员数量与生产率增速

注：数值代表10年期平均值。例如，1950s的点位对应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N. Bloom, C. I. Jones, J. Van Reenen and M.

Webb,“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no. 4 (2020) :1104 -1144 , 图1。

布鲁姆及其合作者不只停留在整体经济层面，还进一步分析了研究与增长在特定经济部门的关系，尤其是半导体、农业和医疗等产业。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摩尔定律预测，计算机芯片上包含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左右就会翻番，对应的年增长率约为35%（图6.3）。摩尔定律并非来自科学的论证推导，而是从半导体产业的观察数据中推测得出，自1970年来始终保持这一相当稳健的发展态势。每个芯片上包含的晶体管数量持续增加，使芯片性能得以稳定改进，其指标是每秒钟能完成的操作任务的次数。由于芯片是计算机、机器人和智能手机的核心，它们的性能改进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的品质提升。资料来源: Wikip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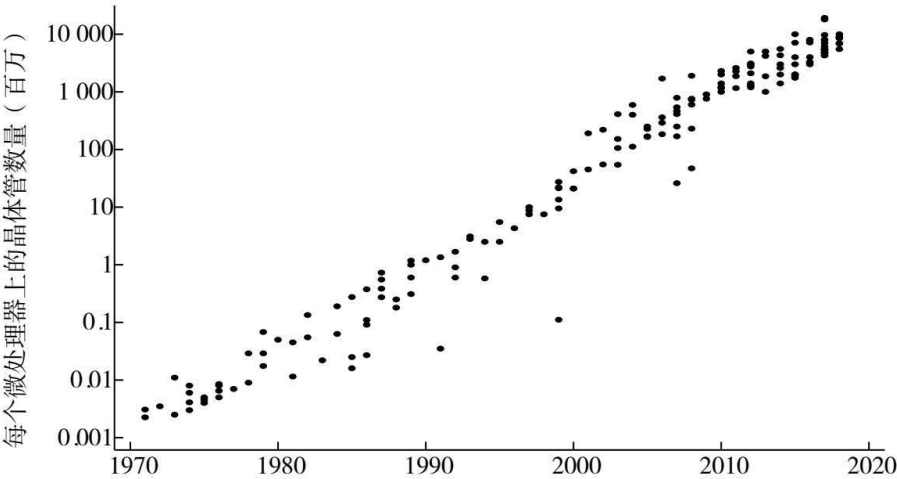


图6.3 摩尔定律

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们再统计大型半导体企业（如英特尔、仙童、美国国家半导体、得克萨斯仪器、摩托罗拉等公司）的研究人员数量，看看为实现摩尔定律的预测，研究人员增加了多少。结论很清楚：为使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翻番，如今需要的研究人员数量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18倍。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或许是因为半导体技术前沿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之类似，如果考察制药产业的进步，我们看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的增长率在下降，而各制药企业雇用的研究人员的数量则在持续增加，如图6.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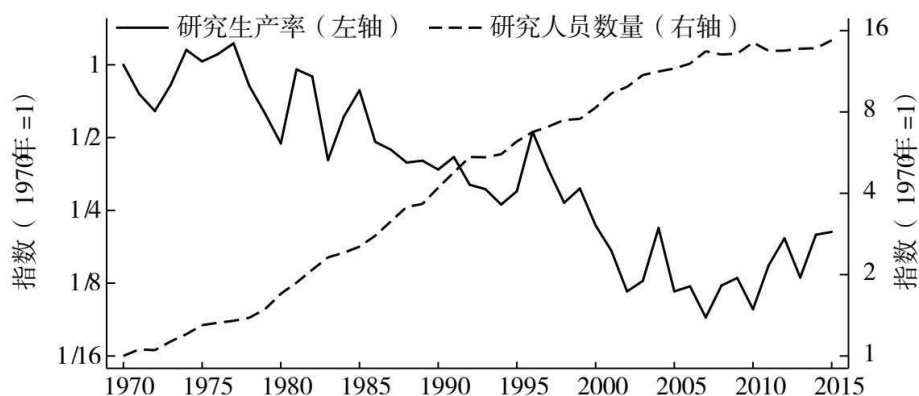


图6.4 制药业的研究生产率与研究人员数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 N. Bloom, C. I. Jones, J. Van Reenen and M. Webb, “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no. 4 (2020): 1104–1144.

这些现象令人震撼，论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也带有若干疑问。第一，我们应该用某种具体技术还是能实现特定用途的一组技术来代表整个产业？摄影就是个鲜明的案例，随着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取代胶卷相机，柯达公司的盈利状况受到沉重打击。这

里的每项发明都对应一次重大技术革新浪潮，并引领了一系列累积式次级创新，如图6.5所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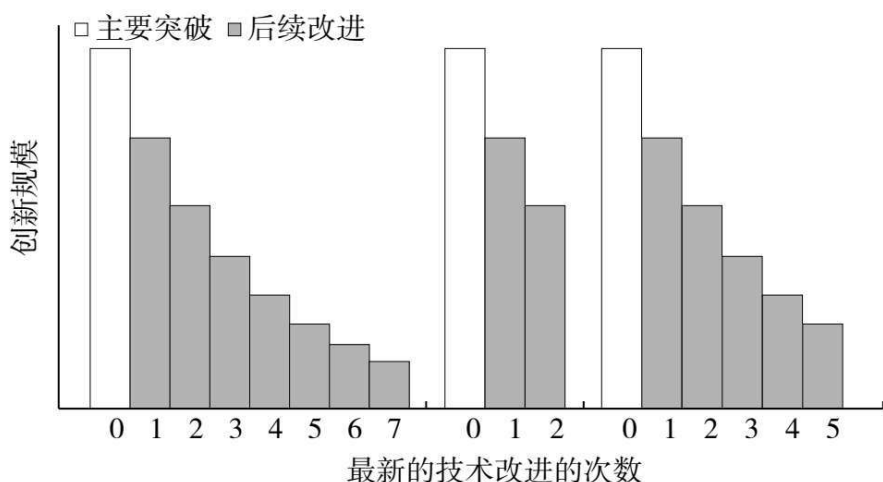


图6.5 主要创新与次级创新

资料来源: U. Akcigit and W. R. Kerr,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1374-1443, 图6。

第二，半导体生产商的业务远不只制造计算机芯片。例如，英特尔公司的业务包括开发软件、生产计算机并建设数据中心等。2010年，该公司仅有8%的专利属于半导体方面的发明，而1971年是75%，说明其经营领域有了巨大拓展。因此，在分析英特尔公司作为半导体制造商的生产率时，泛泛地计算其研究人员的总数可能带来误导。在该公司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是从事半导体之外的工作。

即使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人员内部，也并非所有人都在忙于增加单位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除晶体管密度增大之外，新的芯片还比老的芯片更加便宜，能完成更多任务。这可能是由于芯片

上的晶体管布局更为高效，能通过更快的散热来改进性能。^[13]所以即使在半导体这一狭窄领域中，所包含的产品和服务种类也可以随时间持续扩充。如果希望用生产率增速与研究人员数量之间的比例测算该部门研发活动的生产率，我们必须考虑计算机芯片提供的服务类型的增多，把研究人员的数量除以一个相应的系数。这样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研发的回报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逐渐下降。

第三，某些研发支出看似很大，是因为有若干竞争企业为争夺某种产品类型的领先地位而重复投入，例如电动汽车的电池等。

最后，某些研发支出其实是在位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而付出的防御性投资。经济学家约翰·萨顿（John Sutton）在《垄断的秘密：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一书中对此有过解释：某些看似用于研究和创新的支出其实是为了防止新企业进入。^[14]积累防御性专利已成为在位企业保护其租金的主要防卫策略之一。

总之，生产新思想的难度加大导致生产率下降的观点可能受到质疑，尽管创新确实是以一次次浪潮的方式推进，每次浪潮的收益会递减。

3. 生产率增速的测算不准确

在过去40年里，以专利数量测算的美国创新步伐有所加快（图6.6）。那为什么生产率增速没有充分反映创新的加速呢？一种很自然的说法是，创新率与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分化说明存在测算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来，尤其是21世纪之后变

得更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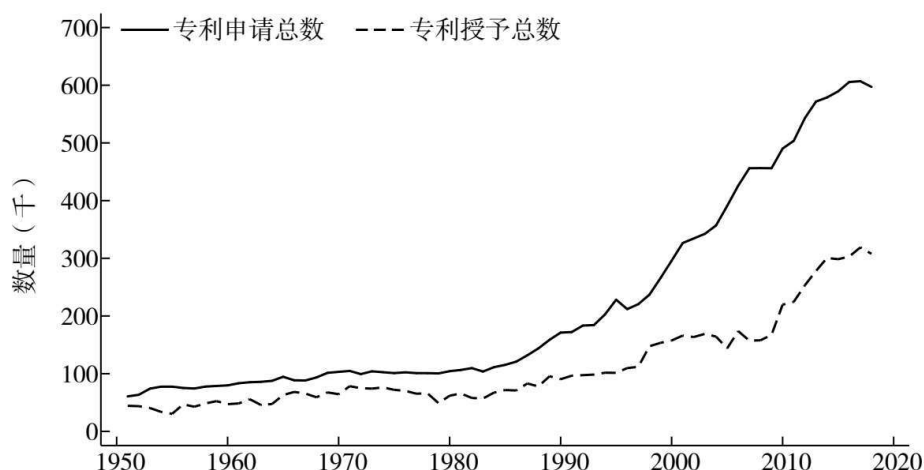


图6.6 美国的专利申请与授予数量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数字化与信息技术的作用

首先，GDP计算方法本身就存在测算问题。它的定义是某个国家在给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之和，因此GDP基本上是对生产的测算，它比较适用于实物产品生产占据主导的经济体，却不能很好地反映服务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品种与日俱增的现实。

尤其是，传统上定义的GDP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使用方式的改变。如谷歌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所述，摄影市场对此同样提供了绝好的案例。[\[15\]](#)2000年，全球共拍摄了约800亿张照片。但智能手机的引入改变了整个版图:2015年，拍照的数量增长了20倍，达到约1.6万亿张。而与此同时，拍摄一幅照

片的边际成本从大约50美分下降到近乎为零。胶卷与相机的销量大跌，相片冲洗业务也大受影响，因为今天人们拍的照片通常用于分享，而非出售，在本质上变成了非市场产品。摄影活动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如今的相机性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但由于人们主要是自己给自己生产照片，摄影就不再是生产性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就不体现在GDP和生产率的指标中。

更一般地讲，数字技术刺激了众多非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兴起。如维基百科之类的免费网站与开源软件提供免费的内容接入，没有纳入GDP测算，但它们往往取代了传统百科全书或商业软件等需要付费的产品与服务。

GDP测算还难以反映质量的改善。范里安提到智能手机的例子，手机不仅部分取代了相机，还可以用作GPS定位仪、录像机、电子图书、音频阅读机、闹钟、互联网浏览器、计算器和录音机等。把所有这些功能集成到智能手机上可能使相关产品的销售减少，从而使GDP的测算值减少，同时又没有反映手机本身的质量进步。

为什么测算智能手机等新产品对GDP增长的贡献如此困难呢？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价值链的国际化。例如，智能手机的组装主要在海外完成。苹果手机的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在美国加州开展，而实物组装发生在中国的深圳，其部件则来自28个不同国家。还有，许多数字服务的无形性质使我们难以把特定活动与固定地域联系起来。这种情形有利于该产业的大型企业（包括脸书、亚马逊、微软、苹果、网飞、谷歌等公司）的税收最优化。此类税收最优化操作对GDP测算有直接影响，例如在真实发生交易的国家不发生支付，或者操纵集团内部的定价、使高税收管辖地的分支机构发生财务亏损等。

测算近期创新对增长的影响面临困难，尤其是在信息和数字技术领域，这是否足以解释美国增长率的下滑？对此问题，若干学者着手观察美国生产率（以单位工时GDP计算）增速在1978—2014年的变化（Byrne、Fernald and Reinsdorf, 2016），结果见图6.7。[16]对于图中的3个子时期，即1978—1995年，1995—2004年，2004—2014年，柱体的高度分别对应每个时期的单位工时GDP年均增长率。该图表明，1995—2004年出现了显著增长，2004—2014年则明显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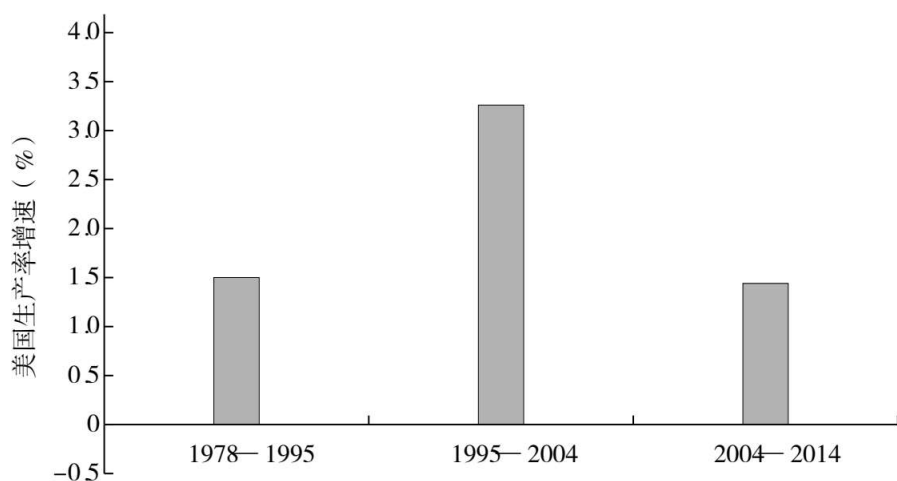


图6.7 美国生产率增速的变化

资料来源: D. M. Byrne, J. G. Fernald and M. B. Reinsdorf,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or a Measurement Proble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6): 109-182。

接下来，这几位学者试图修订对增长率的测算，以考虑测算方面的遗漏，如计算机质量的改进、软件质量的改进、无形投资以及互联网接入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图6.8）。

总体而言，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最近数年的生产率增速被低估，它们的整体影响依然较小。因此，这仍然不能解释增长率在1995—2004年与2004—2014年之间下滑的谜团。最后，查德·西维尔森（Chad Syverson）近期的研究指出，测算误差只能解释增长下滑的一小部分，并不支持测算问题是主要原因的观点。[\[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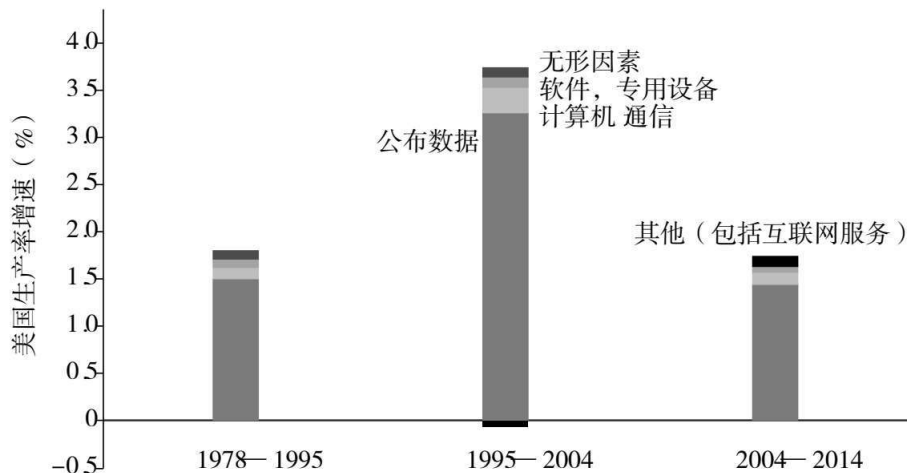


图6.8 对生产率增速测算值的调整

资料来源：转引自D. M. Byrne, J. G. Fernald and M. B. Reinsdorf,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or a Measurement Proble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6): 109-182, 图1。

创造性破坏的作用

以上讨论表明，数字经济活动的测算困难不足以解释美国生产率增速为什么下滑到目前的低水平。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

对此提供另外一种思路（Aghion、Bergeaud、Boppart、Klenow and Li,2019）。[18]其设想是，引发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创新（导致新产品对现有产品的取代）对增长的贡献很难测算。在创造性破坏程度较低的地方，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与美国各州的生产率增速密切相关。而在创造性破坏程度较高的地方，就看不到这样的密切联系。

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难测算，可以看一个简化例子，设想你昨天和今天在某家商店看到同一台打字机，但其价格却有所上涨。涨价完全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打字机没有任何改变。再设想从昨天到今天，该打字机的质量略有改进，例如字体变得更加美观，另外价格从昨天到今天仍有所上涨。此时你比较容易从价格涨幅中区别出机器质量改进的部分与通货膨胀的部分，只需要把新打字机的价格同其他打字机做个对比即可。接下来再设想，这里出现了创造性破坏性质的创新，使打字机在一夜之间被个人计算机取代了。计算机除了替代打字机的文字打印功能外，还有其他用途，使工作方式变得更为高效和友好，但价格更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在打字机到计算机的价格涨幅中区分质量改进的部分与通货膨胀的部分。那应该如何处理呢？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统计机构对此都采用“外推法”和“填充法”（imputation）的技巧，即针对每种产品类型，在计算平均通胀率时忽略其中受到创造性破坏影响的部分。[19]这样做通常会低估生产率增速，因为创造性破坏式创新带来的质量改进很可能大于渐进式创新带来的改进（见专栏6.1）。例如，相比我们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用略有改进的翻盖式手机替代一种旧手机（渐进式创新），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用智能手机替代普通手机（创造性破坏式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

然更为突出。

专栏6.1 统计填充法与增长率低估

以下例子可以说明，统计填充法如何导致生产率增速被低估。假设：（1）某个经济体中80%的产品是第一代打字机，其品质从昨天到今天并无变化，价格则以4%的通胀率上涨；（2）10%的产品是第二代打字机，其品质从昨天到今天有渐进式改进，质量调整后的价格下跌6%（其通胀率为-6%）；（3）10%的产品由于从昨天到今天的创造性破坏而发生品质改进，类似于用计算机取代打字机，导致质量调整后的价格也下跌6%。[\[20\]](#)

此时，整个经济体的平均通胀率应该为2%：

$$(80/100) \times 4\% + (20/100) \times (-6\%) = 2\%$$

我们再假设，名义产出以4%的速率增长，这使得实际GDP的增长率为2%（即4%的名义增长率减去2%的通胀率）。

如果统计机构利用填充法计算平均通胀率，结果会怎样？填充法意味着，统计机构在测算整个经济的通胀率时将忽略受创造性破坏影响的产品，只考虑不受创新影响的产品以及不受创造性破坏式创新影响的产品。

于是，统计机构将如此测算整个经济的平均通胀率：

$$(8/9) \times 4\% + (1/9) \times (-6\%) = 2.9\%$$

再假设统计机构（正确地）测算出名义GDP增长率仍为4%，则其（不正确地）得出的实际GDP增长率为：

$$4\%-2.9\% = 1.1\%$$

由此可以看到，统计机构对实际GDP增速的低估幅度为：

$$2\%-1.1\% = 0.9\%$$

表6.1显示了统计测算的生产率增速（第2列）、真实的生产率增速（第3列）与遗漏的生产率增速（第1列）。遗漏的增速等于真实增速与测算增速之差。美国的测算生产率增速在1996—2005年大幅提高，然后在2006—2013年骤然下跌，而遗漏增速在这两个时段之间有所提升。不过，即使把这部分遗漏增速加上，仍不足以解释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因为真实增速从1996—2005年到2006—2013年依旧显著降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法国的遗漏生产率增速，得到的结果与美国相当接近：在1996—2005年的年均值为0.47个百分点，2006—2013年的年均值为0.64个百分点。[21]

表6.1 美国生产率的遗漏增长率与真实增长率（单位：%）

年份	遗漏增长率	测算增长率	真实增长率	遗漏增长率占比
1983—2013	0.54	1.87	2.41	22.4
1983—1995	0.52	1.80	2.32	22.4
1996—2005	0.48	2.68	3.16	15.2
2006—2013	0.65	0.98	1.63	39.9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no. 8 (2019): 2795-2822。

可见，统计机构对生产率增速的低估只能解释21世纪以来增

速下滑的一小部分。我们还必须到其他地方寻求答案。[22]

4. 领先企业或超级明星企业对新进入者的打击

第4章曾提到托马斯·菲利蓬的著述，他认为美国增长率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反垄断政策被削弱。[23]在菲利蓬看来，反垄断政策越弱势，经济中许多产业的集中度就越高，商业活力就越低，尤其是反映在新企业的创立上。他的这一观点涉及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作用过程，却没有把技术与创新置于解释增长放缓的核心位置。另外有两个现实给菲利蓬的分析提出了挑战：首先，增长放缓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似乎集中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其次，尽管租金和集中度提高可能是因为竞争壁垒，但也可能是源于创新。

在我们看来，更好的方法是把创新放到分析的核心。在本章剩余部分，我们将做两个尝试，用熊彼特式理论架构解释租金的上涨以及增长的放缓。在这一理论架构下，租金至少部分源于创新，企业根据预期的租金高低决定开展多少创新，而新的创新将使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我们的两个尝试都假设租金来自过去的创新，但昨日的创新者一旦成为某个产业部门的领先者或超级明星，就会打击所在部门的潜在参与者的创新。[24]

来自领先者的打击

阿克西吉特与阿特斯首先通过一系列经验结果说明，美国经济的活力自21世纪初期以来趋于下降。[25]他们着重指出，多个

经济部门的产业集中度与利润出现上升，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则在扩大。另外，在特定部门已成为领先者（已积累了最多数量的专利）的企业也是继续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出于防御目的购买数量巨大的专利，以打击相关产业的潜在进入者的创新。

在解释上述事实时，这两位学者设想的世界属于如下情形：在每个产业中，领先企业开展创新，落后企业追赶。我们在第4章分析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时曾讨论过同样的范式，落后企业必须首先追上领先企业，才能考虑超越对方。

这两位学者提出的观点是，落后企业要追赶领先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因之一是领先企业越来越善于阻止其积累的知识传播出去，例如通过防御性质的专利。于是，领先企业更愿意投资于创新，以巩固其相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优势，使后者愈发不可能追赶自己、觊觎租金。其结果是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平均差距扩大。此外，生产将日益集中到领先企业手里，它们的租金随之增加，落后企业的创新激励因此受到打击。鉴于新进入市场的企业是从落后位置起步的，新企业的进入也会受到打击。

信息技术革命与超级明星企业带来的打击

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另外的实证发现（Aghion、Bergeaud、Boppart、Klenow and Li, 2019）。[26]第一个现象是，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降的转变（图6.9）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表现更为突出。第二个现象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更主要表现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里（图6.10）。更关键的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各企业内

部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渐减少，而更多反映了构成效应，即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对应的是，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平均份额逐渐提高。这一提高同样源于构成效应，也就是说，并非企业自身的利润水平增加，而是因为通常来说利润较高的超级明星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权重提升。 [27]

如下的故事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三个实证发现。设想某个经济体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超级明星企业与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积累了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与技术诀窍，或者发展出了强大的网络。例如，星巴克和沃尔玛这些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物流程序都非常难以复制，更难以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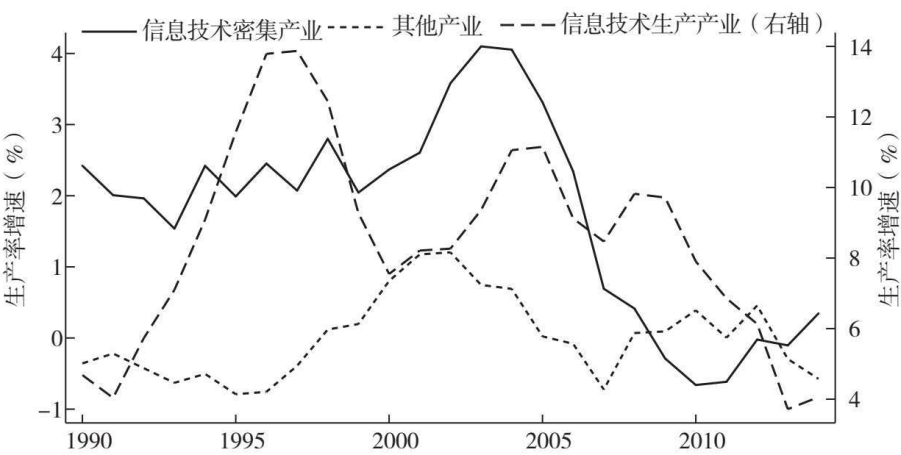


图6.9 生产率增速与信息技术密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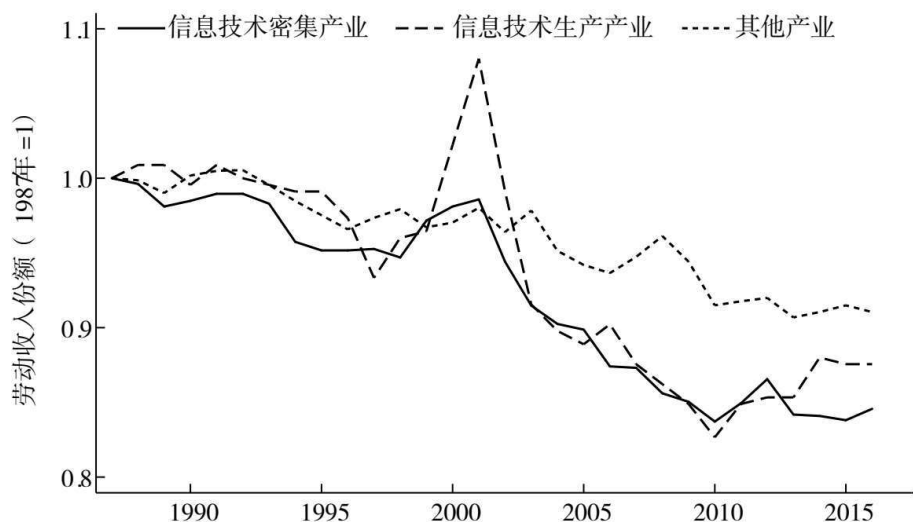


图6.10 劳动收入份额与信息技术密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 图6。

每家企业可以有几条产品线，也就是说它们销售多种类型的产品，并对每种产品开展创新，由此可以形成创新租金。通过创新，企业还可以拓展其控制的产品线的种类数量。

有哪些因素会阻止单一企业控制经济中的所有产品线？答案是时间约束，以及随着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增加，需要的固定成本会超比例上升。由于时间约束，企业CEO（首席执行官）不得不将其经营的产品类型限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超出界限之后，业务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此时信息技术革命来了。这场革命给CEO节约了时间，扩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即增加了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的数量。然而，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

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因此，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展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

在短期内，信息技术革命会让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经济体中更高比例的产业，从而提升生产率增速。这可以解释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在1995—2005年的上升，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相关部门。可是从长期看，信息技术革命可能给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超级明星企业给其他企业造成了打击。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租金。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将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

信息技术革命对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利润又有何种影响？相比普通企业，超级明星企业通常有更高的利润率和更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信息技术革命会强化超级明星企业的霸权，通常将导致平均利润水平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但这也是来自构成效应。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企业内部观察，可能看到某家企业的特定产品线的利润下降，而非提高，因为很可能会有超级明星企业进入这条产品线，成为其直接竞争对手。然而，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水平却会上升，因为超级明星企业控制了更大比例的产品线，而它们的利润明显高于普通企业。[28]

这个故事对经济政策有重要启发。特别是，有利于兼并收购的政策会帮助超级明星企业成长，掌控更多的产业部门。在短期内，此类做法能促进增长。但从长期看，超级明星企业会妨碍创新与增长。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竞争政策，尤其是规制并购的反垄断政策，使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革新在短期和长期都能促

进增长。我们赞同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在近期著作《创新很重要：高技术经济的竞争政策》中的观点（见专栏6.2）。[29]同样的技术革命有可能给长期增长带来全然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竞争政策作为辅助。技术革命并非抽象的事物，而是需要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变革相结合，以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前景。

专栏6.2 面向数字经济的竞争政策调整

理查德·吉尔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的竞争政策未能阻止试图收购或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妨碍新企业进入的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30]基于这个观察，他建议从关注价格与市场份额的静态竞争政策转向关注创新的动态竞争政策。为实现这一转向，我们必须先解决若干问题。首先，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法是对相关市场与市场份额做出界定。这种方法禁止使企业获得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主要目标是防止企业提高价格。

然而，监管当局并未评估并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击新的创新企业进入、打击竞争对手的研发投入，或者威胁新生市场上的竞争。或者说，反垄断规制忽略了市场集中化的动态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动态影响是超级明星企业的兴起，它们可能打击创新和其他企业进入，从而导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滑。

我们如何让竞争政策摆脱纯静态性的分析？理查德·吉尔伯特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美国的反垄断法，但可以调整其适用方式，以促进“动态竞争”，即创新、新企业进入和新市场创造等。特别是，反垄断监管机构不应再把界定相关市场作为

主要指导。此外，在分析并购案件的成本收益时，应该考虑对创新与新市场创造的预期效应。在我们看来，参考吉尔伯特对美国的批评，欧洲的竞争政策有着同样的缺陷，也值得采纳同样的建议。

5. 结论

对于创新与长期增长前景，我们应该赞同莫克尔的乐观态度，还是戈登的悲观主义？本章的分析表明，虽然莫克尔对未来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的乐观看法言之有理，但戈登的悲观主义也反映了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对必要的制度变革的阻碍。尤其是，如果竞争政策不考虑创新议题，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有可能束缚创新与增长，而非发挥促进作用。本章和第5章的讨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充分考虑创新的竞争政策不仅有助于增长，还会提高社会流动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方面，此类政策与累进式税收政策同样重要，并能够形成互补。

[1]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

[2] Robert Gordon and Joel Mokyr, “Boom vs. Doom: Debating the Future of the US Economy Debate,” presentation at the 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 October 31, 2016. 关于他们观点更完整的陈述，可参见 Robert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and Joel Mokyr, “Secular Stagnation? Not in Your Life,” in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ed. C. Teulings and R. Baldwin, 83 -89 (London: CEPR Press, 2014) .

[3] Alvin Hansen,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presidential addres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 no. 1 (1939) :1 -15.

[4] Lawrence H. Summers,“Reflections on the New 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 in *Secular Stagnation : Facts, Causes and Cures*, ed. C. Teulings and R. Baldwin,27 -38 (London: CEPR Press, 2014) .

[5] 1969年投入市场的超音速协和客机可以大幅缩短航空旅行时间，但只能服务于极少数乘客，并最终于2003年退出运营。

[6] Salomé Baslandze,“The Role of the IT Revolution in Knowledge Diffusion,Innovation and Reallocation,”2016 Meeting Papers, No. 1509,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6.

[7] 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将在本书第7章详细探讨。

[8] Ryan Banerjee and Boris Hofmann,“The Rise of Zombie Firm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18) :67 -78, https://www.bis.org/publ/qrtrpdf/r_qt1809g.pdf.

[9] Ricardo J. Caballero, Emmanuel Farhi, and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Rents,Technical Change, and Risk Premia Accounting for Secular Trends in Interest Rates, Returns on Capital, Earning Yields, and Factor Sha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no. 5 (2017) :614 -620.

[10] Nicholas Bloom, Charles I. Jones, John Van Reenen, and Michael Webb,“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no. 4 (2020) :1104 -1144.

[11] Charles I. Jones,“R&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no. 4 (1995) :759 -784.

[12] Ufuk Akcigit and William R. Kerr,“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1374 -1443.

[13] David Byrne, Stephen Oliner, and Daniel Sichel,“How Fast Are Semiconductor Prices Falling?”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4, no. 3 (2018) :679 -702.

[14] John Sutton, *Sunk Costs and Market Structure : Price Competition : Advertising,and the Evolution of Concentr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

[15] Hal R. Varian,“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special issue“Smart

Technology Takes Flight,” *Finance & Development* (IMF quarterly report) 53, no. 3 (2016) :6 -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9/pdf/fd0916.pdf>.

[16] David M. Byrne, John G. Fernald, and Marshall B. Reinsdorf,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or a Measurement Proble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6) :109 -182.

[17] Chad Syverson, “Challenges to Mismeasurement Explanations for the US Productivity Slowdow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 no. 2 (2017) :165 -186.

[18]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Peter J. Klenow, and Huiyu Li, “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no. 8 (2019) :2795 -2822.

[19] 美国等许多国家采用这一方法，但法国等国却较少采用。

[20] 这个例子来自如下论文：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Peter J. Klenow, and Huiyu Li, “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no. 8 (2019) :2795 -2822.

[21]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and Simon Bunel, “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 no. 4 (2018) :933 -956.

[22] 对此问题的另一看法，可参阅Stephen Redding的论文，尤其是Stephen J. Redding and David E. Weinstein, “Measuring Aggregate Price Indexes with Taste Shocks: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ES Pre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4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016) .

[23] Thomas Philippon, *The Great Reversal :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4] 还有两种同样采用创造性破坏范式的思路值得关注。第一种来自Ernest Liu、Atif Mian和Amir Sufi。他们强调，过去20年利率持续走低提高了成为领先企业的现值，因而提高了企业扩大对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的现有收益。于是，利率下跌促使各个产业的领先企业为巩固其地位而更多开展创新，给普通企业的创新造成打击。产业集中度随之提高，总创新和总增长率却可能下降。可参见Ernest Liu, Atif Mian, and Amir Sufi, “Low Interest Rates, Market Power,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une 2019).第二种思路来自: Laurent Cavenaile、Murat Alp Celik和Xu Tian。他们强调,生产与创新集中度提高有利于超级明星企业,却伴随着整体研发效率降低。可参见Laurent Cavenaile, Murat Alp Celik, and Xu Tian,“Are Markups Too High? Competition,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ynamics,”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v. September 8,202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59775.

[25] Ufuk Akcigit and Sina T. Ates,“Ten Facts o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nd Lessons from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75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9).

[26]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 Boppart, Peter J. Klenow, and Huiyu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November 2019).

[27] 这一观察来自David Rezza Bagaee and Emmanuel Farhi, “Productivity and Misallocation in General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no. 1 (2019):105 -163; and by Jan De Loecker, Jan Eeckhout, and Gabriel Unger,“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no. 2 (2020):561 -644.

[28] 近期的一篇论文 (Tania Babina、Anastassia Fedyk、Alex He and James Hodson) 提及人工智能的影响,与本章介绍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类似。这些学者指出: (1) 促进某个产业的人工智能投资的因素也会提升其产业集中度; (2) 集中度的提高不是来自企业层面或给定产品线的利润增加; (3) 人工智能导致企业经营的市场、产品和产业的数量增加。总体上,该研究证实人工智能对产业集中度的增进效应主要源于:超级明星企业是人工智能的最大投资者,因此业务范围的扩大也最为突出。或者说,人工智能对产业集中度和利润的增进效应是来自产业构成的变化。参见Tania Babina, Anastassia Fedyk, Alex He, and James Hods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rm Growth, and Industry Concentr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v. September 22,2020,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51052.

[29] Richard Gilbert, *Innovation Matters: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High-Technology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0).

[30] Richard Gilbert, *Innovation Matters: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High-*

Technology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0) .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倍，与日本和加拿大接近，甚至略高于法国。阿根廷在这一相对水平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更准确地说，统计学上的邹氏检验表明到1938年左右才出现分化（见图7.1）。此后，该国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值持续走跌。[\[1\]](#)

这一下跌该如何解释？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进口外国机械，并引入外国资本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2\]](#)但不幸的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和出口的这一专业化分工让该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农产品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走向衰落的时候恰逢大萧条。为避免这一衰落，阿根廷本应该让本国生产走向多样化，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工业化，并投资于创新。然而，该国选择了故步自封，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非拓展出口、正面迎击国际竞争。概言之，它未能改变自身的制度，从以积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工业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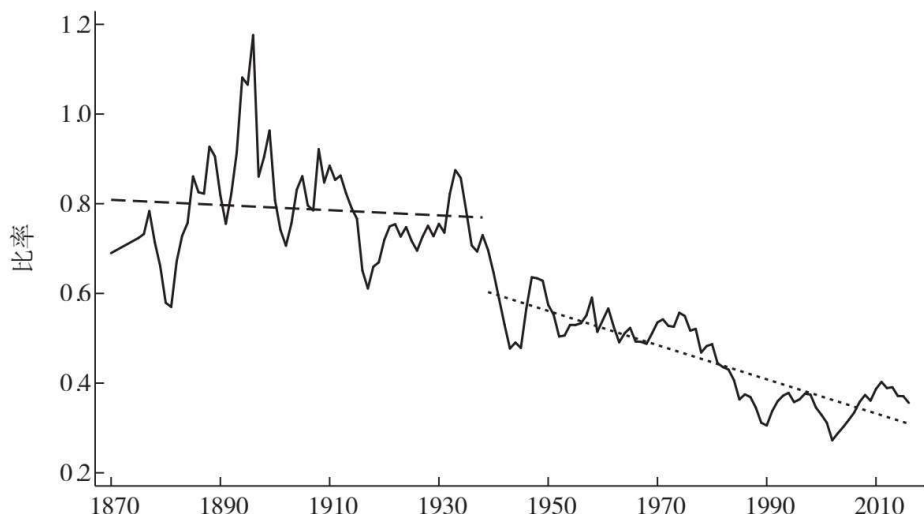


图7.1 阿根廷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水平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图5。

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中等收入陷阱的谜团也带来了其他疑问：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或分化，取决于哪些基本因素？与积累型和模仿型增长相比，创新驱动型增长依靠哪些不同的杠杆？为什么有的国家未能改变自身制度，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本章将探讨上述问题，并在最后以韩国为例阐述我们的分析。1997—1998年

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之前处于追赶阶段的韩国实施制度改革，使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增长模式，成功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1. 导致趋同或分化的因素

平均而言在趋同

各国的生活水平是否会趋同？图7.2和图7.3对此可以给出初步回答，这两幅图描述的是1961—2017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初始发展水平（以1960年的人均GDP测算）之间的关系。图中的每个点对应一个国家，位居两幅图左侧位置的国家在1960年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位居右侧位置的国家的初始水平较高。为反映1960年初始人均GDP同1961—2017年平均增速的关系，我们画出了“最小二乘法趋势线”（各点到直线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的趋势线）。在这两幅图中，该趋势线均显著向下倾斜，也就是说，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初始更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因此平均而言，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在向更发达的国家趋近。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内部时，该趋势线更为倾斜（图7.2）。这说明，趋同现象在彼此类似的国家中表现更为突出，我们称之为“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反在经合组织以外的各个国家，由于差异性较大，趋同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一方面，绰号为“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和“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亚洲经济体快速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另一方面，最落后的非洲各国停滞不前或者增长势头疲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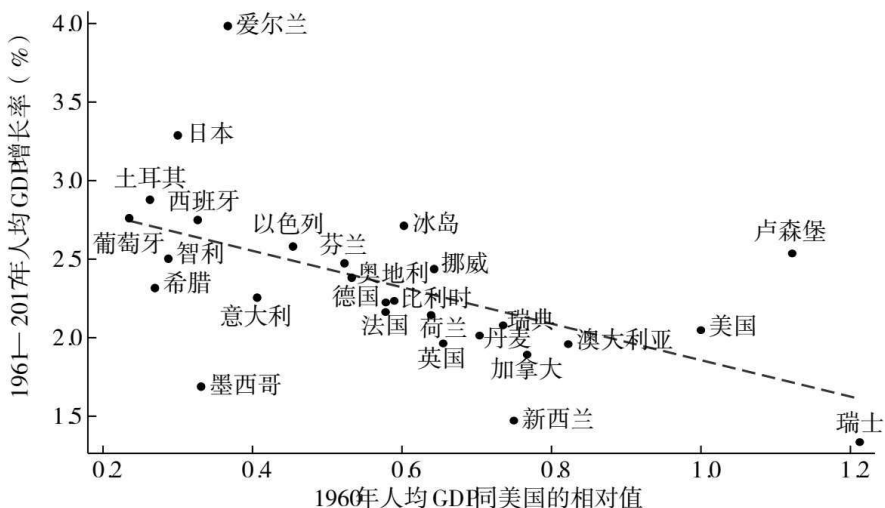


图7.2 经合组织国家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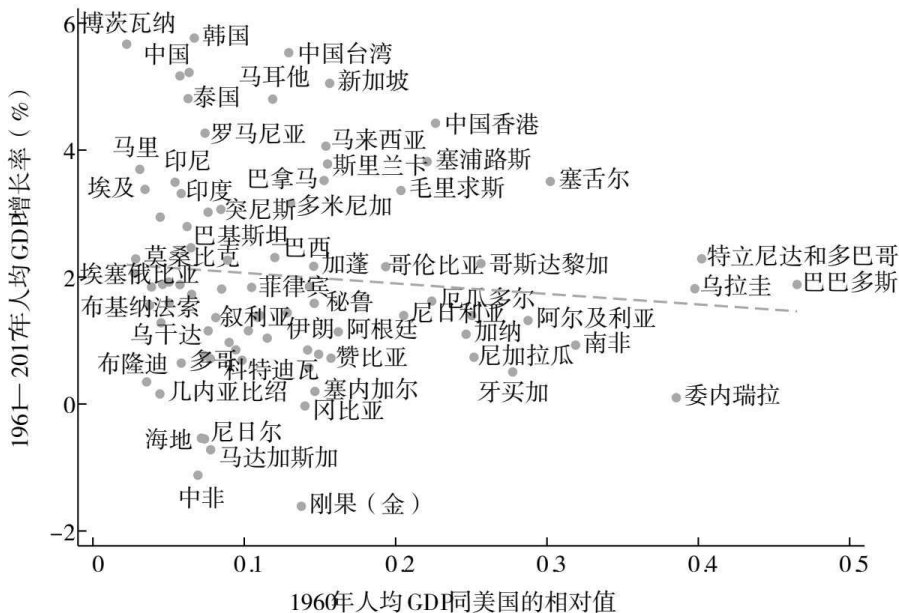


图7.3 非经合组织经济体1961—2017年人均GDP增长率与1960年生活水平的关系

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阅读方便，没有把所有经济体的名称标出。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极值处在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趋同现象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成立。并非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在向最发达国家趋同，特别是，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的人均GDP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比率在持续扩大。如果说趋同确有发生，那其实是俱乐部趋同，某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而另一些国家落到了后面。具体而言，受普利切特的研究启发（Pritchett, 1997），并利用麦迪森关于人均GDP变化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表7.1，从中看到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率在1897—2016年间呈爆炸式扩大，从1870年的15.1倍激增至2016年的85.6倍。[\[3\]](#)

表7.1 人均GDP的分化

	1870	1960	2016
美国的人均 GDP（A，美元，购买力平价）	3 736	18 058	53 015
最贫困国家的人均 GDP（B，美元，购买力平价）	247	514	619
最贫困国家	朝鲜	莱索托	中非共和国
比率：A/B	15. 1	35. 1	85. 6

注：最贫困国家在所涉年份有数据可查的各国中选出。
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8）。

最贫困国家与最富裕国家的差距拉大不只源于它们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事实上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961—2017年间甚至有所下滑，也就是人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图7.4）。

相反，某些国家经历了超过8%的高增长率。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两国的GDP增长幅度大大超出西方七国（G7）的总GDP增长（图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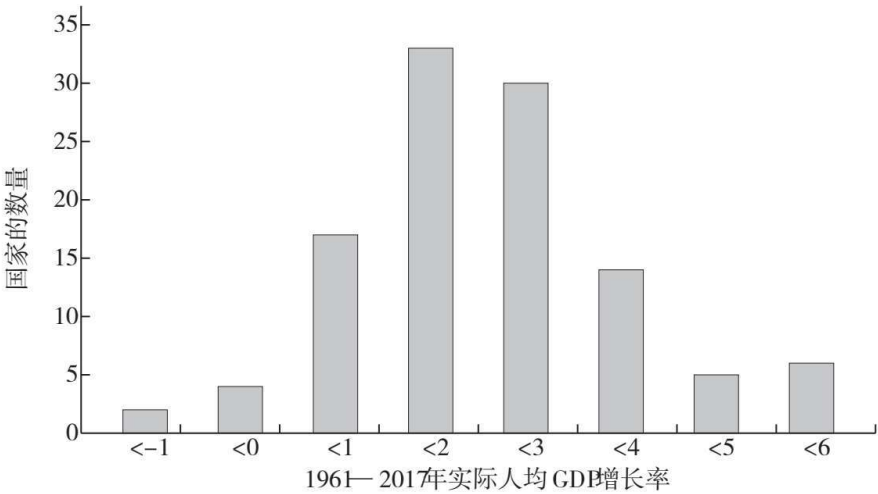


图7.4 1961—2017年增长率的分布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9.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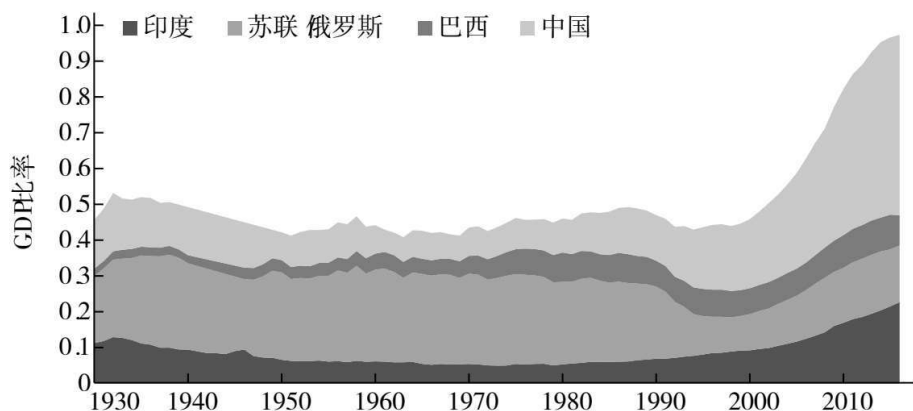


图7.5 西方七国的GDP与金砖国家的GDP比率

资料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 ,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全世界收入分配格局的走势如何？

平均水平的趋同与极端水平的分化对世界收入分配总格局的变化有何影响？萨拉-伊-马丁（2006）整理了138个国家在1970—2000年间的收入分配变化。[\[4\]](#)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居民家庭调查来构建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分析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然后比较1970年与2000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例如在中国和印度，收入分配差距在1970—2000年有所扩大，说明两国内部的不平等恶化。而在美国，高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在1970—2000年扩大，符合我们在第5章介绍过的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现象。

接下来，萨拉-伊-马丁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各国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5\]](#)为此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比较各国的人均GDP变化，假设各国有相同权重，忽略其规模大小（例如表7.1）。由此得出

的结论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全球不平等程度亦随之上升。但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如果收入极低的国家与收入极高的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则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全貌。

萨拉-伊-马丁于是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分析全球范围的个人收入分配。他面临的问题是，居住在某个国家的个人的收入未必能与另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可比。为克服此困难，他利用购买力平价对个人收入加以调整。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换算因子，对每个国家单独测算，以使用统一单位来反映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开展国际比较。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甲国的个人购买力同乙国的个人购买力做对比，由此构建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无论居住于何地，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重（见图7.6）。

初步看，图7.6中的收入分配随时间向右侧移动，这表明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增长，位于极端贫困线（垂直线）之下的人口百分比持续下降。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若把贫困线定义为年收入495美元，则全球贫困率从1970年的15.4%下降至2000年的5.7%。如果用基尼系数测算全球不平等程度，则会发现该指标趋于下降。基尼系数下降显示，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1979—2000年间减少了4个百分点（见图7.7）。这一全球不平等下降主要由中国推动。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基尼系数在同期不降反升。所以总体而言，世界范围个人间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有所下降，但如果聚焦于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人均GDP之比，则会得出全球不平等在1970—2000年间恶化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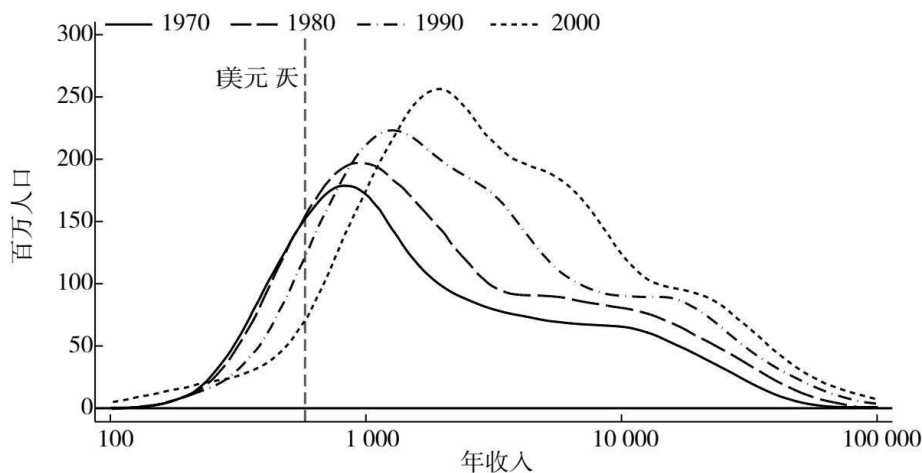


图7.6 世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 (2006): 351-397, 图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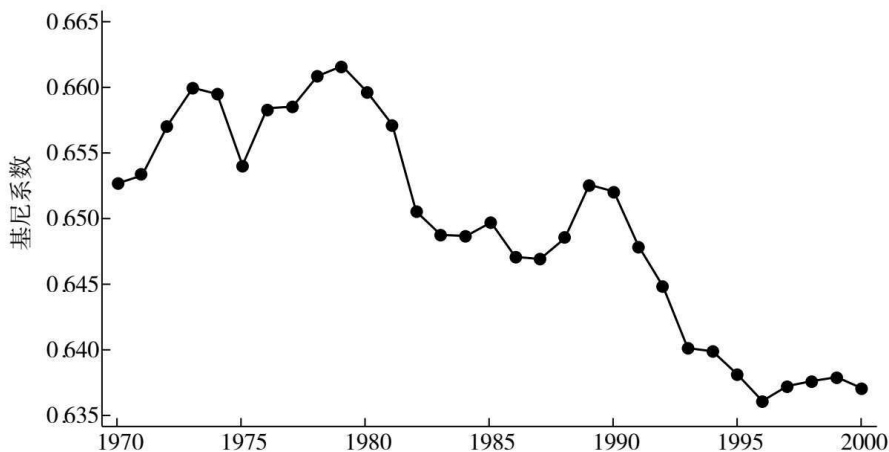


图7.7 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X. Sala-i-Martin,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 (2006): 351-397, 图VIII。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平均意义上的趋同，以及所谓“俱乐部趋同”，即某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向更发达国家趋同，其他一些国家距离发达水平越来越远，甚至绝对生活水平也出现下降的现象？

两种可能的解释

增长经济学家对趋同现象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以资本积累收益递减为中心。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来自索洛模型（1956），[6]并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5）进一步发展，[7]他们认为消费品生产需要实物资本，但资本回报随着其数量积累而递减。也就是说，如果从没有装备（机器数量为零）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非常高；但如果从100台机器起步，增加1台机器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很少。根据这一思路，有大量机器存量的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会低于实物资本存量较少的落后国家。

这种简单明了的解释固然具有吸引力，却经不起较为严格的实证检验。首先，如果初始资本很少的国家有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些国家的增长应该比富裕国家更快。然而，基于收益递减的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何最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对于最富裕国家持续恶化，也难以理解俱乐部趋同现象。这一点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卢卡斯悖论”遥相呼应。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指出，既然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那我们理应看到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困国家，可是事实恰恰相反。[8]

还有，基于资本收益递减的思路不能解释“阿根廷悖论”，即某些国家已进入强势增长期，本有望同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接

近，之后却遭遇反转。该思路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会被过去落后于自己的国家超越。例如，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在20世纪初曾远远领先于加拿大，如今却明显落伍。

最后，严格地说，关于资本积累的索洛增长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走向发达，其增长率会越慢。然而当我们随机抽取连续20年的观察期时，会发现在1700—1978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在后一个10年更快的概率在经合组织国家要比其他国家高出50%。[\[9\]](#)

这些观察启发我们探讨关于趋同的第二种解释思路，即技术追赶理论，它比收益递减理论更具有熊彼特主义的特征。按照这一范式，增长都来自创新，但具体而言，这里的创新是指落后国家的企业“模仿”或“采纳”先进国家发明的前沿技术。也可以说，趋同现象源于落后国家通过投资于技术模仿追赶更先进的国家。

若干学者曾强调知识跨国传播对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1971—1990年的国际数据尤其显示，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0\]](#)更近的一项研究则利用专利数据证实了国家之间知识传播的重要意义（Aghion、Bergeaud、Gigout、Lequien and Melitz, 2019）。[\[11\]](#)图7.8描述的是：当一家法国企业开拓一个新的国家市场时，其专利被在当地经营的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比率有何变化，日期 $t = 0$ 代表法国企业进入新的外国市场的时候。该图表明，法国企业的专利被当地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次数在 $t = 0$ 之后开始增加。也就是说，在进入这个外国市场之后，该企业向当地的技术转移密度随之提高。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一基于技术追赶的思路能否解释上述现实情况。首先，针对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

距离领先国家越远，其国内企业距离所在产业的技术前沿通常也越远。因此，这些企业在模仿或采纳前沿技术时取得的技术飞跃会越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发优势”。中国的增长速度比法国更快，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采纳前沿技术时实现的技术飞跃幅度大于法国企业在创新中取得的进步，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起点比法国企业更低。

如何解释俱乐部趋同现象呢？无论模仿创新还是前沿创新，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活动，特别是在更难以找到研究人员和技能工人、更难以给研发投入找到融资的不发达国家。所以，除非创新租金足以补偿这些更加高昂的成本，否则创新不会发生。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国家，预期的创新租金过低，不足以刺激创新。被排挤出俱乐部趋同行列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因此，虽然这些落后国家在各项创新中有更大的潜在技术进步空间，它们的真实增长率却可能低于发达国家。产权保护不力的穷国最终陷入停滞状态，不能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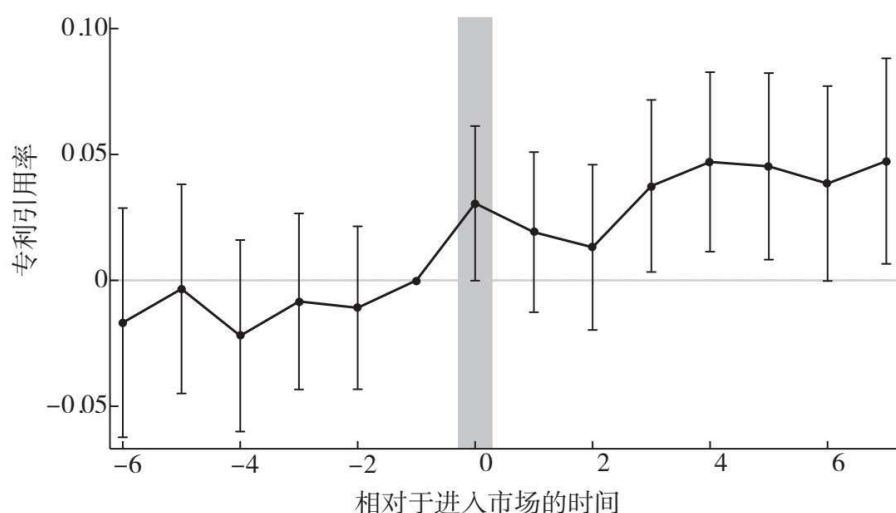


图7.8 开辟新出口市场的法国企业的专利被当地经营的非法国企业引用的比率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Bergeaud, T. Gigout, M. Lequien and M. Melitz, “Spreading Knowledge across the World: Innovation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Expan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2019.

2. 技术追赶与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

为什么某些新兴国家一开始向富裕国家趋同的速度较快，但在某个时点后脱离轨道，甚至变得更加远离技术前沿？我们将利用之前介绍过的技术追赶模型的一个变形来解释。在这一修订模型中，所有国家的企业都能够在技术追赶与前沿创新（自身的革新）之间做选择。在落后国家，大多数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起初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12]

我们把这一观点展示在图7.9中。“追赶策略”由图中标记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支持前沿创新的策略则由标记为“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曲线表示。图7.9揭示了何种策略能带来最高的增长率，帮助某个国家向技术前沿最快地收敛。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右侧，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越近；一个国家越靠近该图的上部，距离未来的技术前沿越近。“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技术追赶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

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则显示，如果这个国家采用前沿创新策略，它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能在如今和未来之间缩短多少。只要一个国家距离如今的技术前沿足够远（位于标记为 $\hat{a}$ 的临界值之下），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追赶策略；而如果一个国家足够靠近如今的技术前沿（位于标记为 $\hat{a}$ 的临界值之上），最大化增长策略就是创新策略。总体来说，最大化增长策略由图7.9a中的粗线条代表，在 $\hat{a}$ 点处发生弯折。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我们的解释是前沿创新政策不利于在位企业。这里的关键之一是竞争政策，本书的第4章已做过阐述。通常而言，在追赶阶段充分获利的企业希望保住自己的租金，不愿面对加剧的竞争。相应地，它们会利用一部分积累的财富给政客和法官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引入和实施支持竞争的新规则。日本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其竞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1949年建立的强势的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限制进口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还给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的投资提供补贴。鉴于政治权力、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相互渗透，日本的经济增长从1945—1985年令其他发达国家羡慕的势头强劲，急剧转向1995年后的孱弱无力，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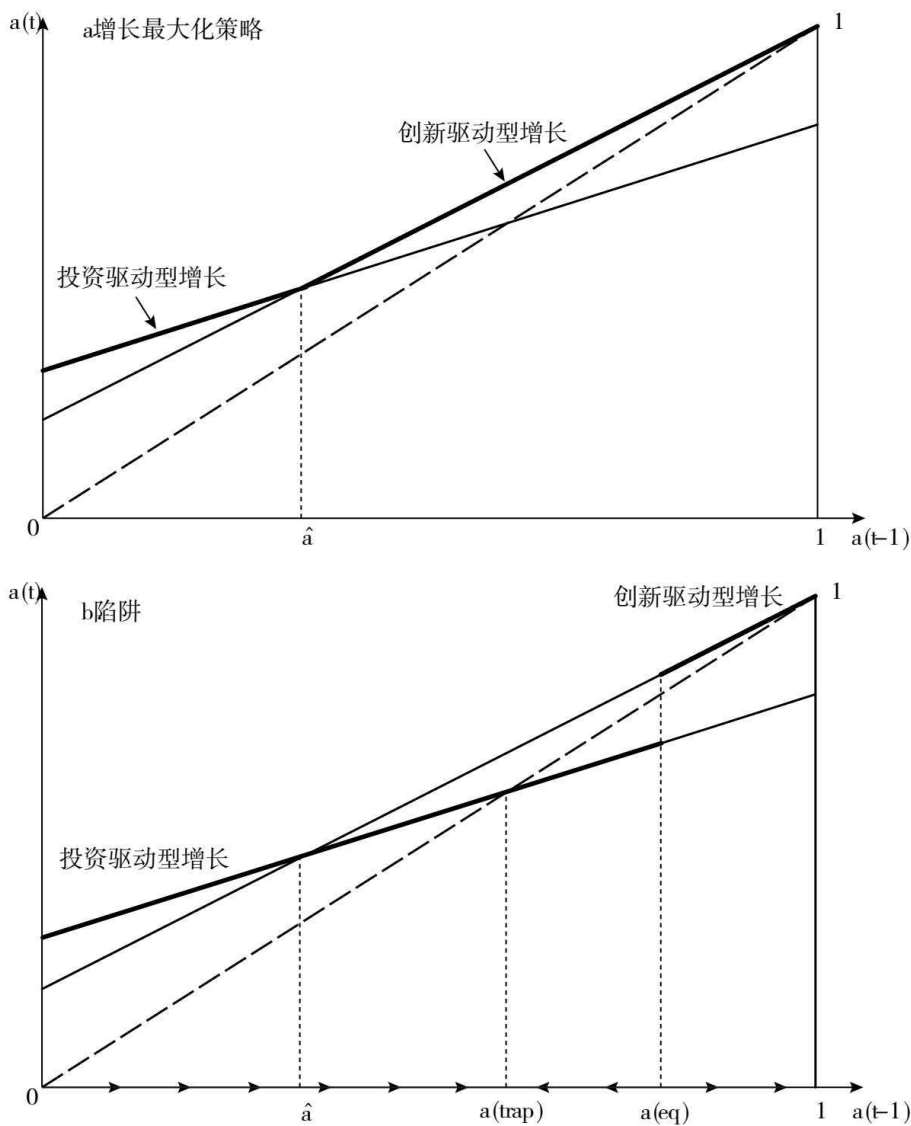


图7.9 与前沿的距离和增长策略选择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and F.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no. 1 (2006): 37-74, 图2和图3。

另一个鲜明案例是韩国，其政府蓄意扶持大型企业集团（财阀）的成长，以促进出口。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财阀的衰落，刺激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同时开辟了结构改革的通道，这使韩国在短暂下滑后重回快速增长，并且至少维持到2003年。

前沿创新政策与追赶政策

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

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

[13]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图7.10显示，在更靠近技术前沿的美国各州（如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投资对生产率增速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在相对落后的各州（如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本科教育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州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研究生教育投资对当地创新的促进效果（以该州产生的专利数量测算）越突出。[14]

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见第4章）。[15]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

路。与图7.2相似，图7.11展示了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但把各国做了区分。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高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弱；另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低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强。[16]对于各个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用在该国注册新企业所需的天数来测算。图7.11a是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b是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在每个图中，较落后的国家偏向左侧，较发达的国家偏向右侧。从两幅图的对比能看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a）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图7.11b）。然而这对最落后的国家并不成立，进入壁垒较高的落后国家的增长率没有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落后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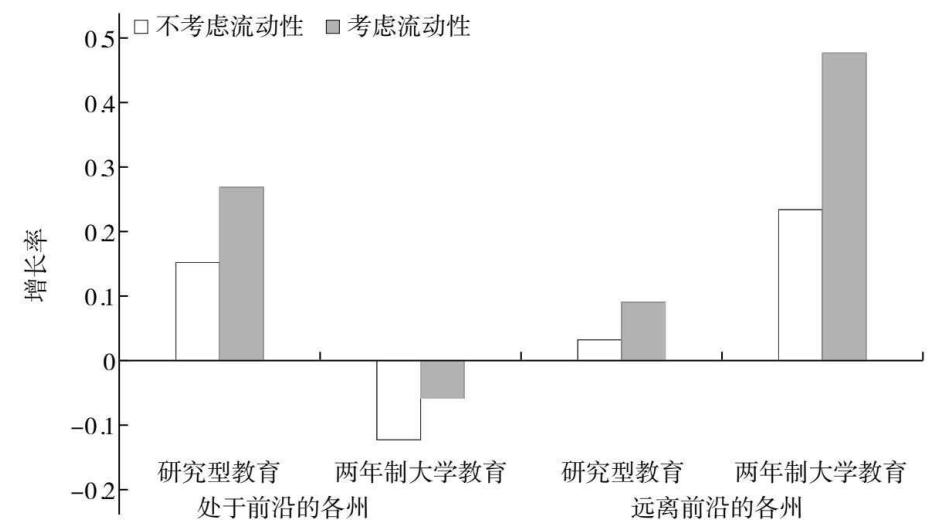


图7.10 增长与教育投资的关系

注：人均1 000美元教育投资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 P. Aghion, L. Boustan, C. Hoxby and J. Vandenbussche, “The Causal Impact of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U. 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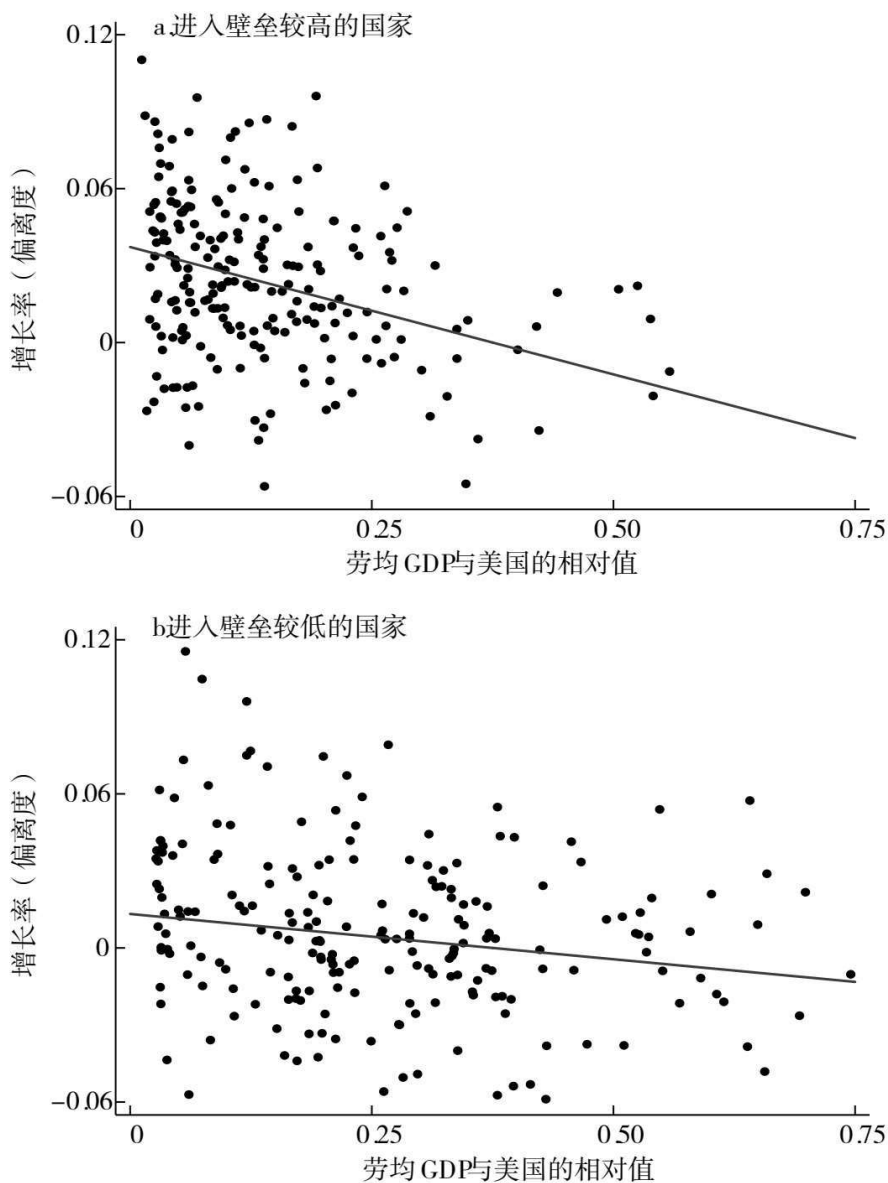


图7.11 劳均GDP、GDP增长率同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F. Zilibotti, "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5 (2017): 943-988, 图5a和图5b。

发展水平与竞争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一个国家增长的影响，同腐败现象有着重要联系。腐败越严重，在位企业越有办法操纵政客，以削弱竞争、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因此，我们会看到腐败对发达国家增长的束缚更为严重。如图7.12所示，事实的确如此。[\[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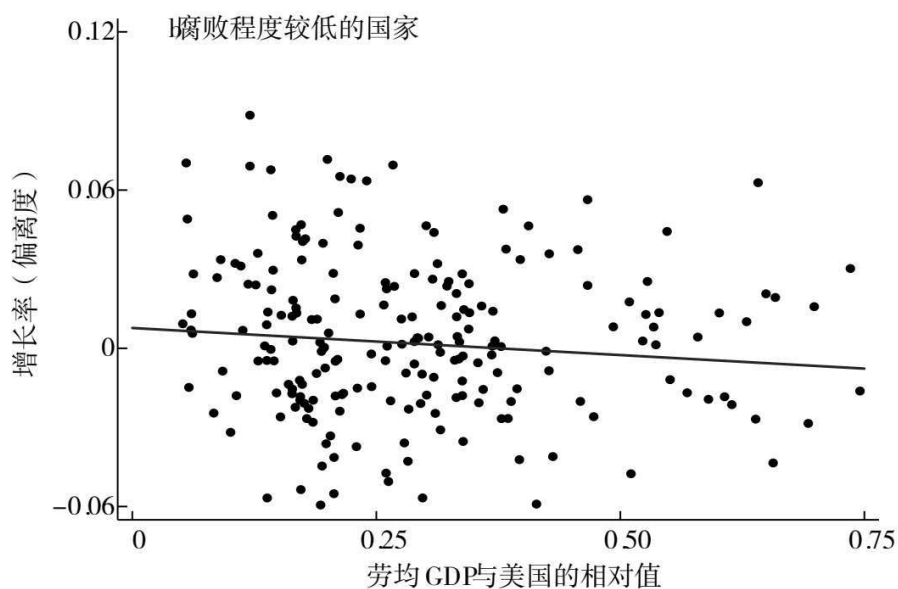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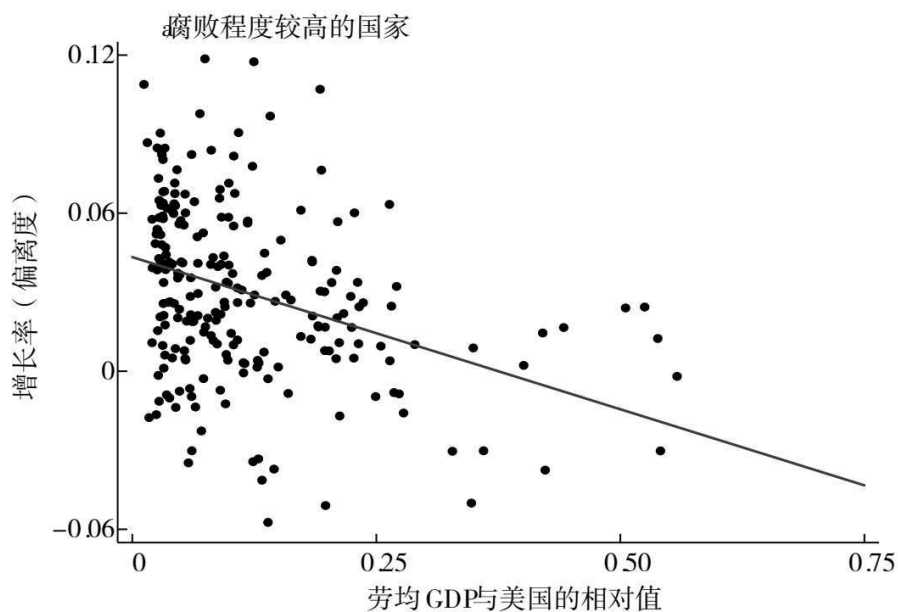


图7.12 劳均GDP、GPD增长率同腐败程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 F. Zilibotti, "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5 (2017): 943-988, 图6a

和图6b。

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18]

下面我们来看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联合国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5岁以上人口中有78.6%完成了中等教育，巴西和印度分别为59.5%和51.6%。为实现这一教育成就，中国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又大力投资于大学本科教育。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心态似乎仍停留在模仿阶段，还需要努力跨越通向前沿创新的临界点（见专栏7.1）。

专栏7.1 基因测序：技术的国际传播

有学者利用近期以来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Verluis and Bergeaud, 2019），尤其是“自动化专利图景”方法，详细考察了基因测序技术。[19]他们的方法是，把相关技术涉及的少数核心专利定义为专利“种子”，接下来借助自动化语言处理手段来“学习”这些专利种子的特定语义学特征，最后对全球专利库进行自动挖掘，以找出与专利种子有类似任务描述的发明。通过该方法，他们得以追踪某种技术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他们详细追踪了基因测序技术的演变。利用300项专利组成的种子，他们找到了G7国家与许多新兴国家的专利管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9年发布的近16 000项专利。虽然要推导出国际技术传播的典型模式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方法依然揭示了基因测序技术的若干关键事实。

他们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与基因测序有关的专利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行为人手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这项技术近70%的专利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第二名是中国（11%），但与美国相去甚远，随后是日本（8%）与加拿大（6%）。此外，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数量从21世纪初就已起飞，直至21世纪10年代该技术才扩展至中国。但自那以后，中国奋力追赶。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授予中占据了近20%的份额（图7A）。而当我们分析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的来源时，图景又有很大不同。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专利管理机构在整个考察期授予的专利份额合计不到3%，但这三国的国民在每年的全球专利登记中却各自占据2%~3%的份额。因此，从来源国的角度看，它们在专利登记中的表现更为突出。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民从专利起源的角度看所占的比例更低。这一对比说明，专利技术国际传播背后的运行机制或许并不完全反映本国国民掌握某种技术并拓展其前沿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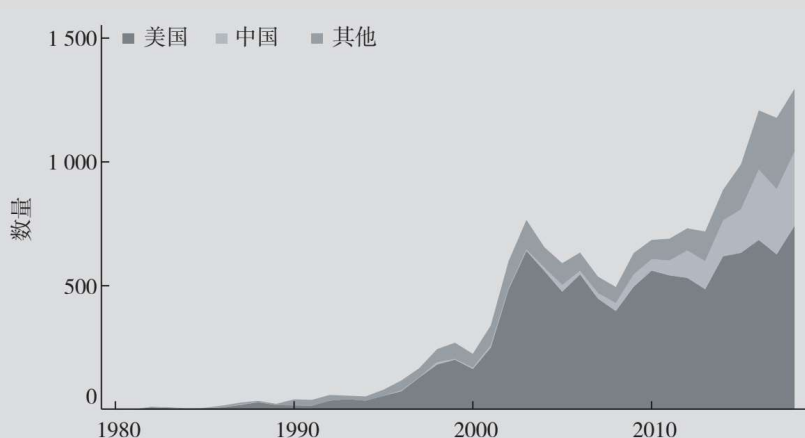


图7A 基因测序有关专利的申请人的主要来源国

资料来源: C. Verluise and A. Bergeau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A New Approach and Some Fa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促进落后国家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改善资源配置。在中国大陆，投资研发的企业和不投资研发的企业有类似的增长率，而不论其初始的生产率水平如何。可是在台湾地区，投资研发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有更强劲的增长，特别是初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对比说明，中国大陆的研发投资配置现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

促进模仿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措施是提高管理技能。最优秀的经理人往往能够发现新业务和新技术，将它们引进并适应本地需求，从而领导企业成长。世界管理调查从全球大量企业样本中收集管理实践信息，显示管理实践排名最高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典紧随其后（图7.13），排名垫底的则是坦桑尼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该图表明，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也是管理实践最糟糕的国家。这一相关性意味着，对改善管理

实践进行投资或或许能促进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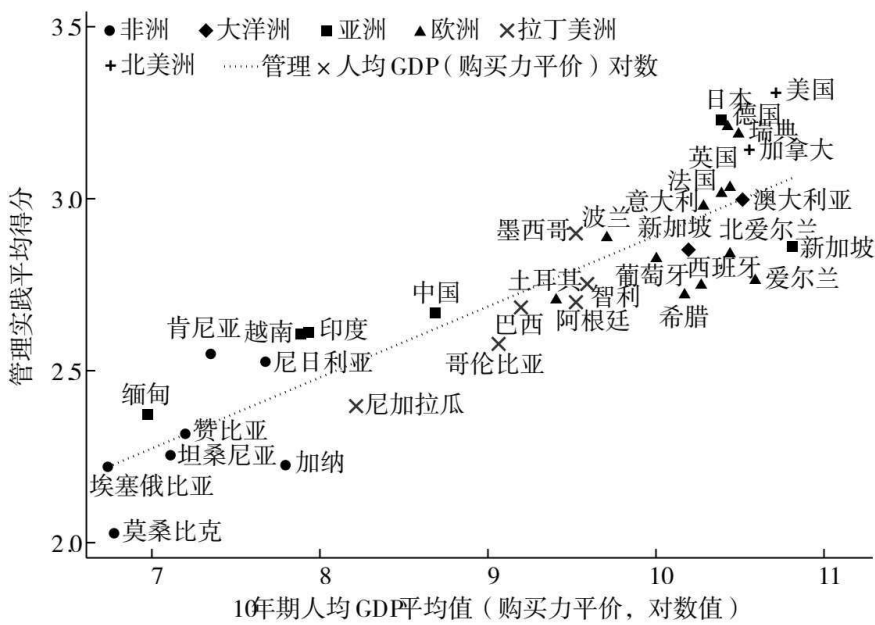


图7.13 增长与管理实践的关系

资料来源: World Management Survey (April 2013 version) 。

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谢长泰与克雷诺制作了图7.14，该图描述了印度企业和美国企业的生产率分布状况（Hsieh and Klenow, 2009）。可以看到，相比美国，印度在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分布似乎更发散，低生产率企业所占的比例也高得多。[\[20\]](#)图7.15（即本书第1章中的图1.5）则显示了若干国家的企业平均规模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美国企业持续成长的时间比印度企业更为长久。[\[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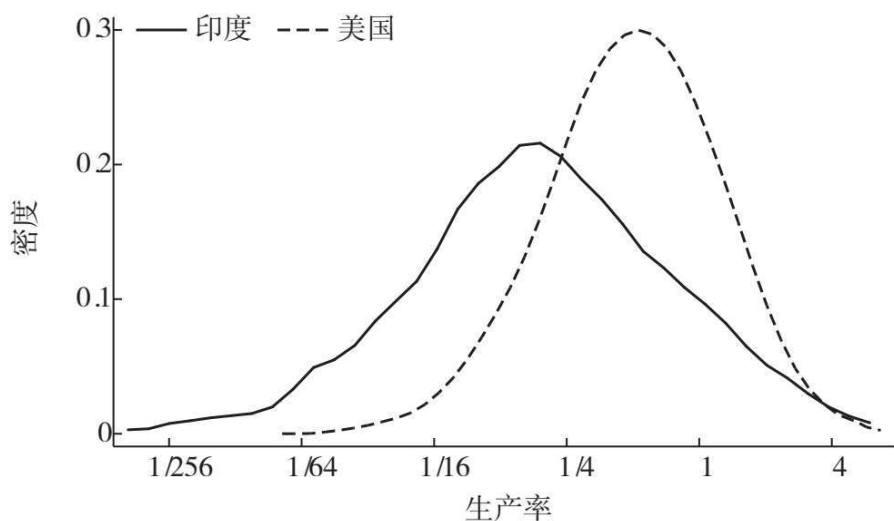


图7.14 印度企业（1994年）和美国企业（1997年）的生产率分布

资料来源: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no. 4 (2009): 1403-1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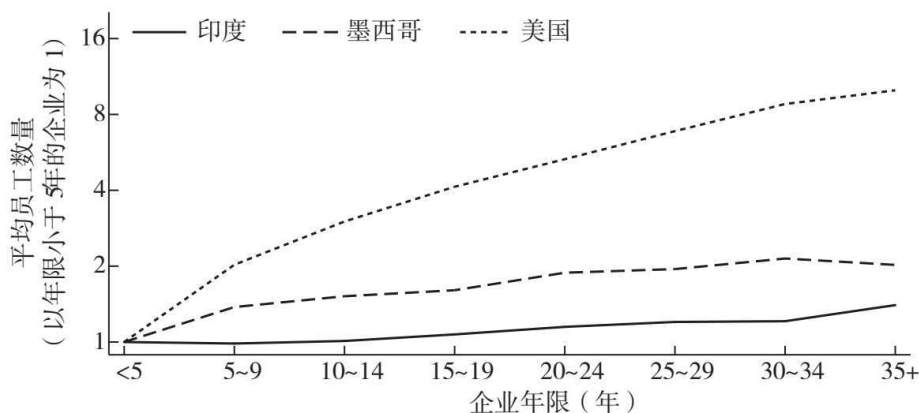


图7.15 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年限的关系

资料来源: 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3 (2014): 1035-1084, 图IV。

这两幅图描述的情况对印度经济整体而言有重大启示。它们表明，印度企业（包括最具生产性和创新力的企业）的成长无法超过某个规模，这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存续。最终结果导致总体上更缺乏创新，印度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增速被拖累。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印度企业的成长？原因之一或许是，在大多数印度企业，由于难以找到可靠的管理者，高管职位依然由家族内部人士担任。于是当创始人家族找不到更多有能力经营新机构的成员时，企业就会停止增长。进一步说，印度经理人市场的薄弱或许源于该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及信贷市场不完善。[\[22\]](#)

3. 韩国遭遇1998年危机：焉知非福？

韩国是个至少暂时来看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23\]](#)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的作用，促使韩国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1998年危机之前的韩国增长模式是以技术模仿为基础的，下文做简介。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低人均GDP水平起步，开启了不同寻常的增长，196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

韩国的模仿驱动型增长以创建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财阀）为核心。政府通过若干手段给财阀提供支持：优惠和补贴贷款、利用货币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补贴、公开和隐性的救助担保等。尤其是，韩国政府限制其他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抬高创立新企业的成本，限制新的外国投资人进入（规定外国投资人持有韩国企业的股份不能超过26%），并非常消极地执行反垄断法

规，以极力压制竞争，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阀势力发展到顶点，销售额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的产值占韩国GDP的16%，其中最大的5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占韩国GDP的10%。这些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在1960—1995年快速腾飞的载体。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以创建民族工业，韩国可能依然是个农业经济体。而在短短30年的发展之后，韩国已成为电子与电信产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接下来爆发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大宇等财阀破产，其他一些也遭受重创。打击来自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信贷收缩，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韩援助的条件所要求实施的政策。特别是，IMF要求韩国开放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是外国人在韩国企业中的最高持股比例限制于1997年提高至50%，1998年提高至55%。IMF还坚持大幅强化反垄断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效果：1998—2000年，反垄断修正指令的发布次数增加到危机前的3倍，对反竞争行为的财务惩罚额度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些使韩国经济重新对国内和国际竞争开放。

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生产率增速、创新与企业活力有何影响？在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仅为德国的1/8，但在2012年，其申请数量已比德国多出30%，尽管人口仅为德国的一半。此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财阀企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其他企业，危机后则出现反转，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停止增长，其他企业的申请则加速。

在生产率方面，生产率在危机爆发前已出现停滞甚至下跌，但在1997—1998年后重新出现快速增长，无论财阀企业还是其

他企业均如此。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这一反弹在之前由财阀控制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产业受危机与后续改革的影响最深刻。还有，危机显著促进了非财阀企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的进入。

总之，1997—1998年金融危机使财阀企业的影响力受到约束，并重新开放竞争，鼓励之前一直受政府与财阀串谋束缚的其他企业开展创新，从而刺激了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危机带来了生产率增长加速，主要源泉则是非财阀企业的产业进入与创新行动。[\[24\]](#)

4. 结论

本章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以向先进国家趋近，其他一些则停滞不前。我们揭示了俱乐部趋同现象：某些国家（新兴经济体）采纳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技术追赶和模仿，其他一些国家则未能实现起飞。但在启动趋同进程的国家里，某些于中途停步不前，尤其是那些制度调整太慢或完全失败的国家，未能从追赶型经济变身为前沿创新型经济。这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促进竞争乃至帮助国家从模仿驱动型增长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任何改革。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迫使各国政府采取适宜的结构改革措施，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老牌企业，让韩国企业重新迎来开放竞争格局，帮助该国加入了创新国家的俱乐部。

[\[1\]](#) Philippe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Fayard,

2016) .

[2] Antonin Bergeaud, Gilbert Cette, and Remy Lecat, *Le Bel Avenir de la croissance Leçons du XXème siècle pour le futur*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2018) .

[3] Lant Pritchett,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no. 3 (1997) :3 -17.

[4] Xavier Sala-i-Martin,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Falling Poverty and. .. Convergence, Perio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no. 2 (2006) :351 -397.

[5] 本书第5章解释过这一指标如何构建。

[6] 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no. 1 (1956) :65 -94.

[7]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 GrawHill, 1995) .

[8] Robert Lucas,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no. 2 (1990) :92 -96.

[9] 保罗·罗默研究了187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11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See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no. 5 (1986) :1002 -1037.

[10] David Coe and Elhanan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no. 5 (1995) :859 -887.

[11]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Timothee Gigout,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Melitz, “Spreading Knowledge Across the World: Innovation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Expan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2019,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aghion/files/spreading_knowledge_across_the_world.pdf.

[12] 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no. 1 (2006) :37 -74.

[13] Jerome Vandenbussche, Philippe Aghion, and Costas Meghir, “Growth, Distance to Frontier and Composition of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no. 2 (2006) :97 -127.

[14] Philippe Aghion, Matthias Dewatripont, Caroline Hoxby, Andreu Mas-Colell, and André Sapir,“The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the US,” *Economic Policy* 25, no. 61 (2010) :7 -59.

[15] 前沿企业是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其生产率接近所在产业的领先水平。

[16] Fabrizio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5 (2017) :943 -988.

[17] See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18] Boubacar Diallo and Wilfried Koch,“Bank Concentration and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0, no. 3 (2018) :489 -501.

[19] Verluise, Cyril and Antonin Bergeaud (2019)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a New Approach and Some Facts,” mimeo, College de France, 2019。自动专利图景方法可参阅: Abood, Aron and Dave Feltenberger (2018) ,“Automated patent landsca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6 (2) , pp.103 -125。

[20] Chang T. Hsieh and Pete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no. 4 (2009) :1403 -1448.

[21] Chang T. Hsieh and Pete Klenow,“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3 (2014) :1035 -1084.

[22] Ufuk Akcigit, Harun Alp, and Michael Peters,“Lack of Selection and Limits to Delegation: Firm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9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6) .

[23] 本节内容基于以下研究: Philippe Aghion, Sergei Guriev, and Kangchul Jo,“Chaebols and Firm Dynamics in Kore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13825,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June 2019.

[24] Aghion, Guriev, and Jo,“Chaebols and Firm Dynamics in Korea”，该研究截至2003年，因为有数据可查的期间为1992—2003年。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3年后放缓，这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趋势（见第6章）基本同步。另外，或许是因为财阀企业后来重新掌握了权力。

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

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的经济、领土与社会版图经历了激烈变化。如本书第2章所述，经济增长的起飞伴随着英国、法国和美国相继从农业经济体向工业经济体成功转型。但更近期以来，制造业又被服务业取代。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有2 /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2018年，则有超过2 /3的人在服务业工作。大产业层面发生的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被称为结构变革。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对此解释说：“经济结构转型的速率很快，结构变革的主要方面包括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转移，以及近期以来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1]

图8.1显示了美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在1840—2000年的变化。我们看到，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在1840年后持续下降，制造业的份额在1950年之前上升，然后下跌，服务业的份额则持续提升，并且在1950年之后开始加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出现的这种结构性变革被称为“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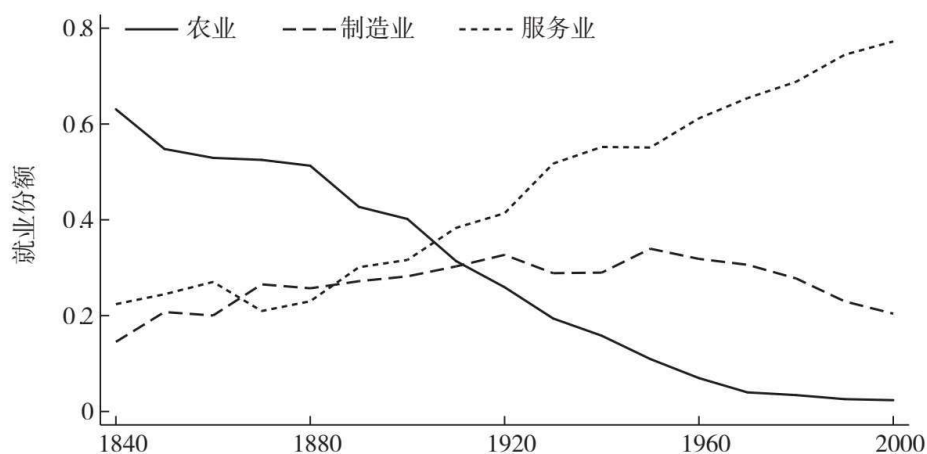


图8.1 1840—2000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855 -941。

有些矛盾的是，在这些相继发生的典型变化中，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却在长时期里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以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命名的“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即指出，劳动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变化，如图8.2所示的美国在1948—2012年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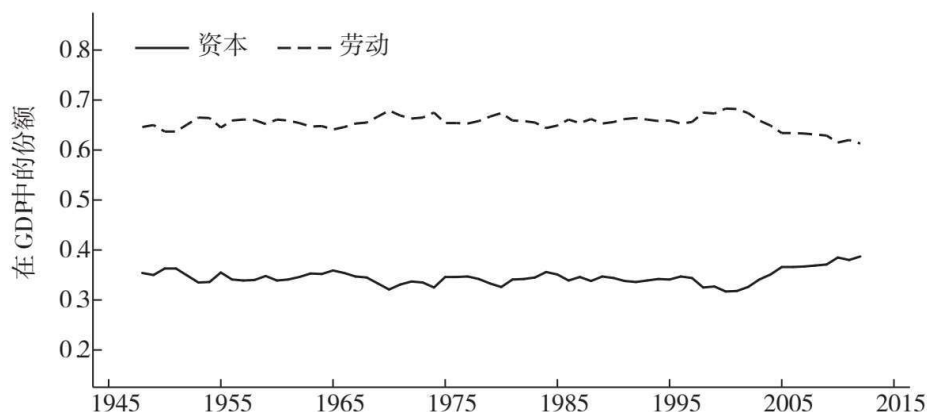


图8.2 劳动与资本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4)。

我们该如何并行诠释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大规模工业化是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中间步骤？这些将是本章探讨的主题。

1.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

结构变革：库兹涅茨事实

本书第2章提到，西蒙·库兹涅茨是国民账户核算的先驱研究者之一，他在增长、商业周期、经济发展及其他领域的成果也令人称道。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库兹涅茨根据对国民产出及其组成的传统测算的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经验规律后来被称作“库兹涅茨事实”。其中第三个事实与此处的讨论关系尤为密切，即发展过程总会伴随着结构变革：首先是

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然后是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库兹涅茨的研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无论我们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一个国家的时间演变），还是比较分析法（对比考察各国的人均GDP水平），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结构变革现象。

根据历史分析法，三次产业部门相继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图8.3再次确认了图8.1描述的结构变革，区别在于，图8.3显示的是三次产业在美国的总消费（而非就业）中所占份额的变化。^[2]该图表明，结构变革与消费者的偏好及其时间变化有关。图8.4和图8.5则展示了三次产业在法国和英国GDP中的份额自1840年以来的变化，同样证实了库兹涅茨事实的存在。^[3]

图8.6采取的则是比较分析法，显示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变化，及其与10个工业化国家（即比利时、西班牙、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生活水平用麦迪森数据库中的人均GDP衡量。对于所有这些国家，农业在就业中的份额占比均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图8.6a），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持续提高（图8.6b）。如果集中分析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则会看到倒U形曲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先提高，然后下跌（图8.6c）。因此，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有着较大规模的农业部门，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很不发达。相反，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大多数人将从事服务业工作，制造业的规模相对而言将重新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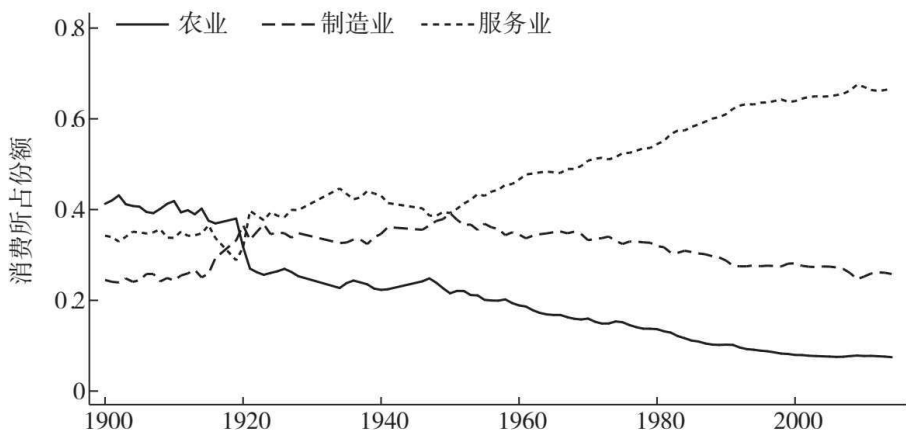


图8.3 美国消费支出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转引自S. Alder, T. Boppart and A. Müller, “A Theory of Structural Change That Can Fit the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469,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2019，图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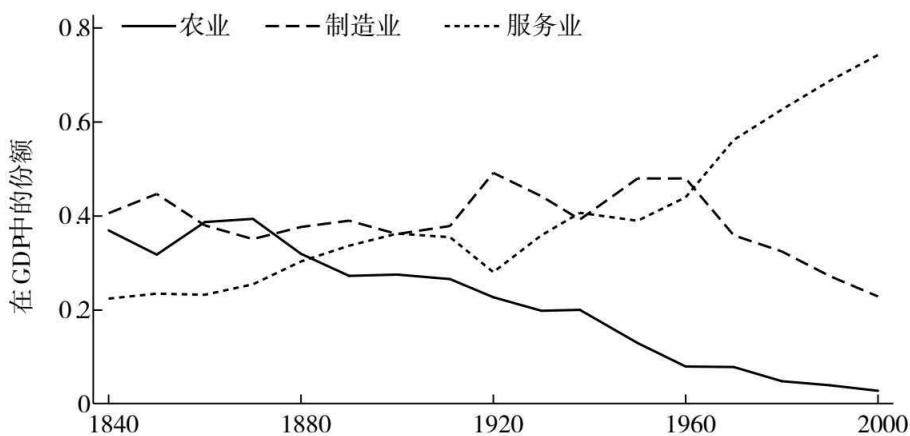


图8.4 法国GDP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Elsevier, 2014) , vol. 2,855 -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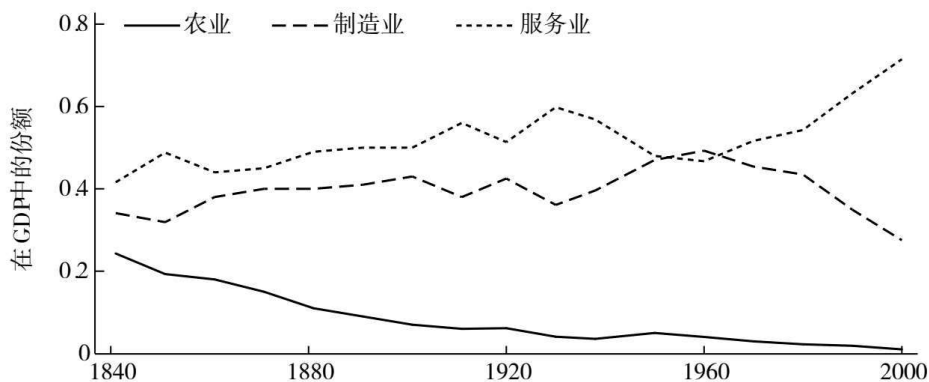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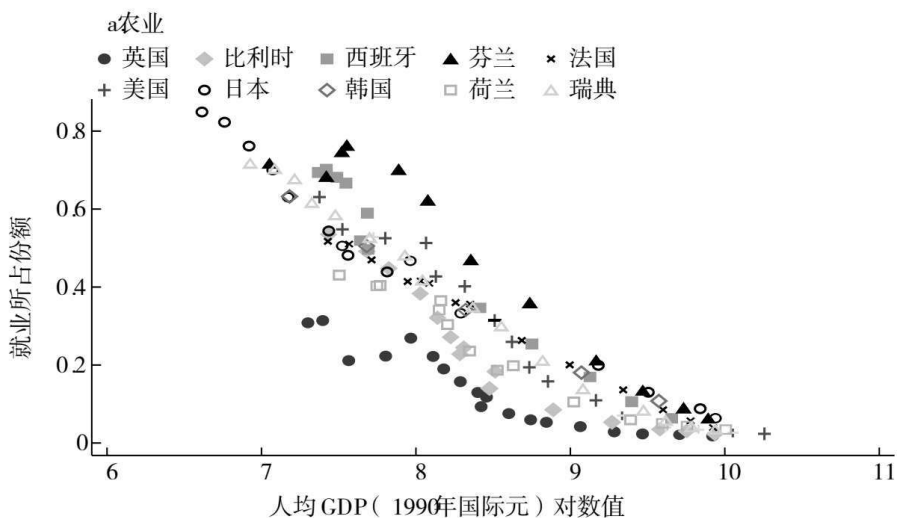


图8.5 英国GDP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Elsevier, 2014) , vol. 2,855 -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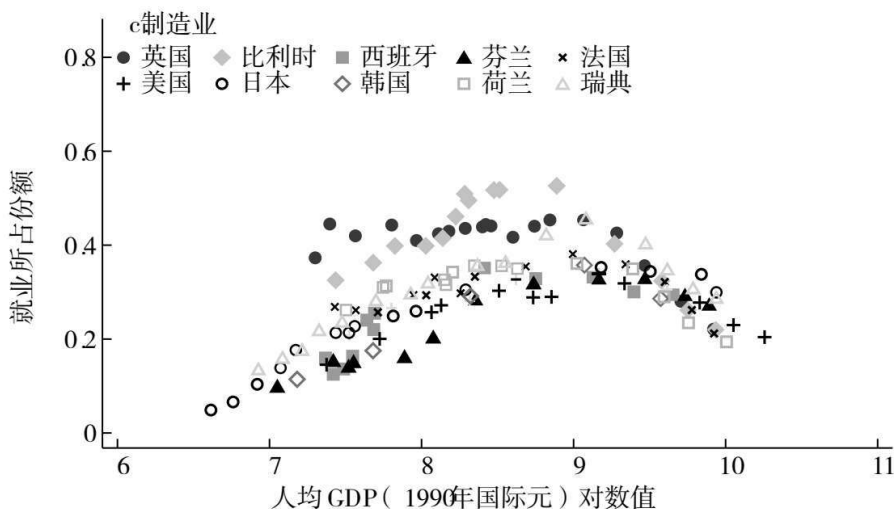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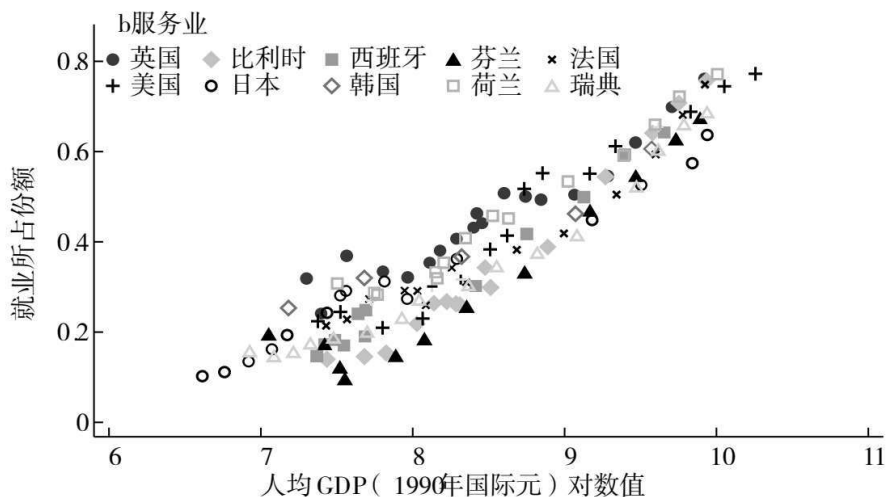


图8.6 各产业在就业中的份额与生活水平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 Aghion and S. Durlauf (Amsterdam:Elsevier, 2014), vol. 2, 855-941, 图6.1。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职业生涯早期追随新古典理论，后来则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带头人之一。作为剑桥大学教授与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顾问，他为若干领域的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从不完全竞争到资本理论等，尤其以对增长、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而著称。1961年，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事实，其中包括：从长期看，资本回报率、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均基本保持稳定。^[4]他在1955年指出：“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劳动的资本积累数量及人均实际收入在过去100余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收入份额却维持了相对稳定，若不能对此成功给出解释，则关于收入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的任何学说恐怕都难以令人满意。”^[5]图8.7和图8.8分别展示了英国在1770—2010年和法国在1820—2010年的资本回报率基本维持稳定的情形。^[6]图8.9则显示，美国的资本收入占GDP的份额在1948—2012年也大致保持稳定。

最后我们看到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的份额略有上升，资本收入的份额略有下降，这对1770—2012年的英国（图8.10a）和1820—2010年的法国（图8.10b）均成立，并且前文图8.2描述的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大致稳定的情形也有此趋势。^[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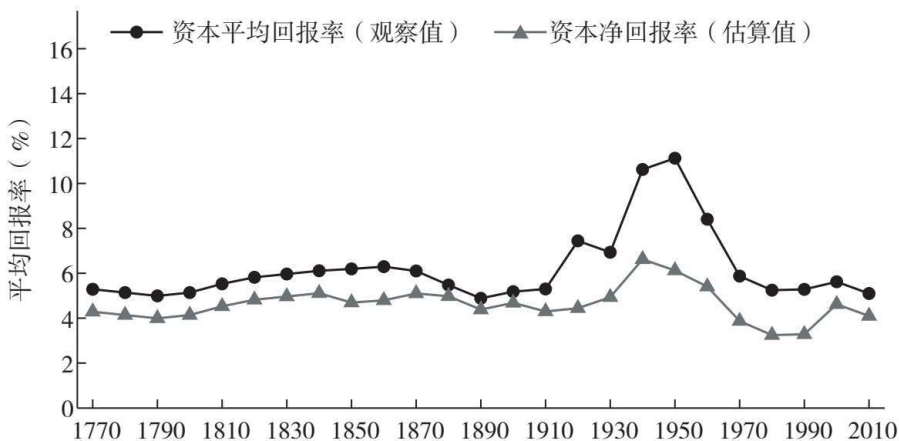


图8.7 1770—2010年英国的资本回报率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图6.3。 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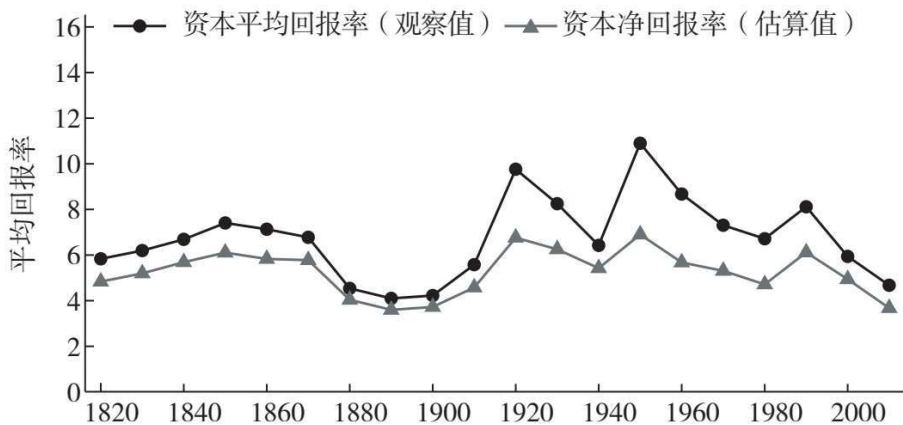


图8.8 1820—2010年法国的资本回报率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图6.4。 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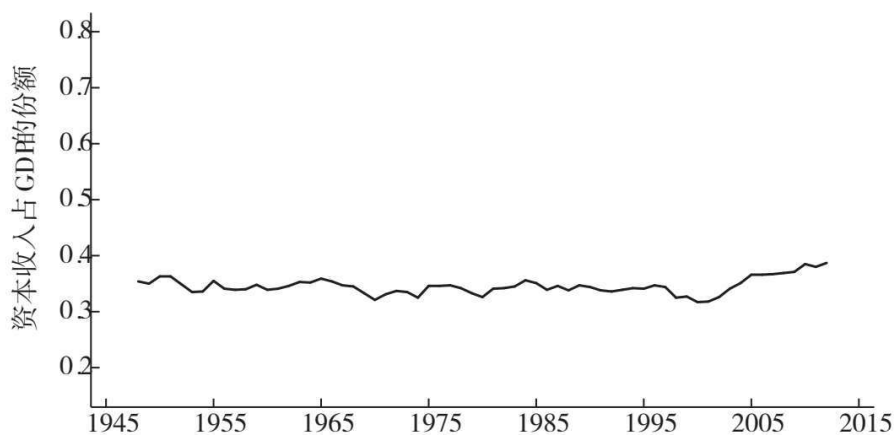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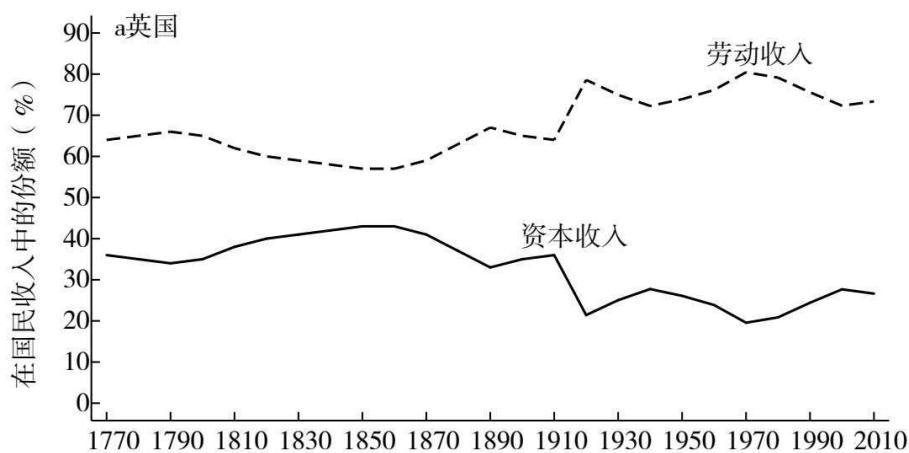


图8.9 美国资本收入占GDP的份额

资料来源: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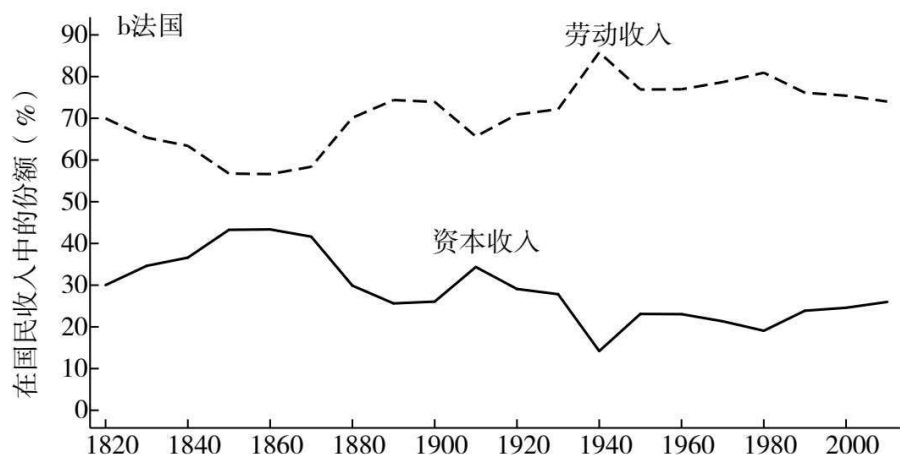


图8.10 劳动与资本在英国和法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图6.1和图6.2。 Copyright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对库兹涅茨事实的解释

本书第2章曾试图解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我们特别提到乔尔·莫克尔及其对工业创新的作用过程的分析，工业创新来自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启蒙运动与知识传播的进步，特别是源于邮政服务的效率提高、出版业的扩展，以及由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促进的知识成果整理；产权保护的进步，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兴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刺激了为超越邻国而创新，帮助在本国遭遇束缚的发明家迁移到邻国去发展。这一制度解释强调了市场的“供给侧”，也就是让创新变得更容易、成本更少的条件，但忽略了同样关键的第二个支柱，即需求和消费的作用。

需求侧与供给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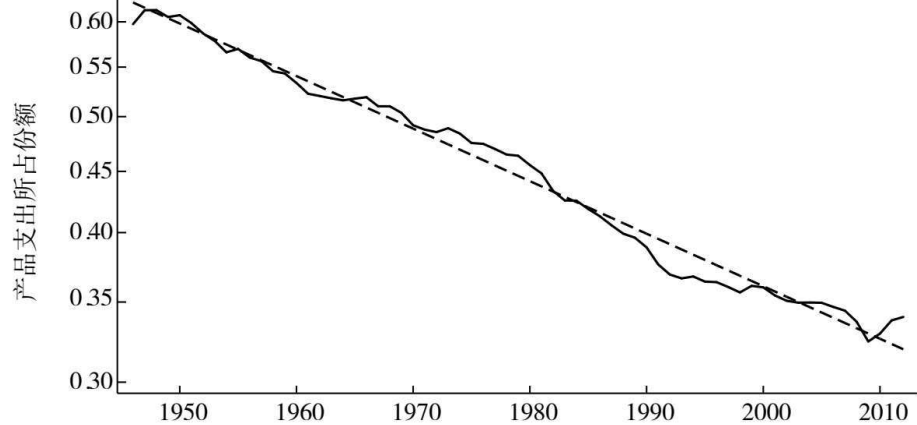
如何解释使农业和工业产出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双双下降的服务业的兴起？答案在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这一课题的主要参考来自蒂莫·波帕特（Timo Boppert, 2014）的研究。^[8]

波帕特分析了消费者购物组合随时间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居民家庭在农产品、制造品以及服务之间的选择。有两种力量促使消费者逐渐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费在服务消费上。从需求侧看，消费者享受到“收入效应”：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收入比重会下降。从供给侧看，则有“替代效应”的作用：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比服务的生产成本下降更快。由于企业把成本节约反映到价格下调上，农产品和制造品的价格降幅就比服务更多，由此也导致居民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放在服务上。

有待解释的三个经验事实

波帕特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经验事实。^[9]第一，农产品和制造品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a），而且在每个五分位收入群体内部，这个事实依然成立（图8.11b）。第二，产品价格与服务价格之比也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c）。第三，在每个时点上，贫困居民用于购买产品的支出占比均高于富裕居民（图8.11b）。

a. 产品支出在居民家庭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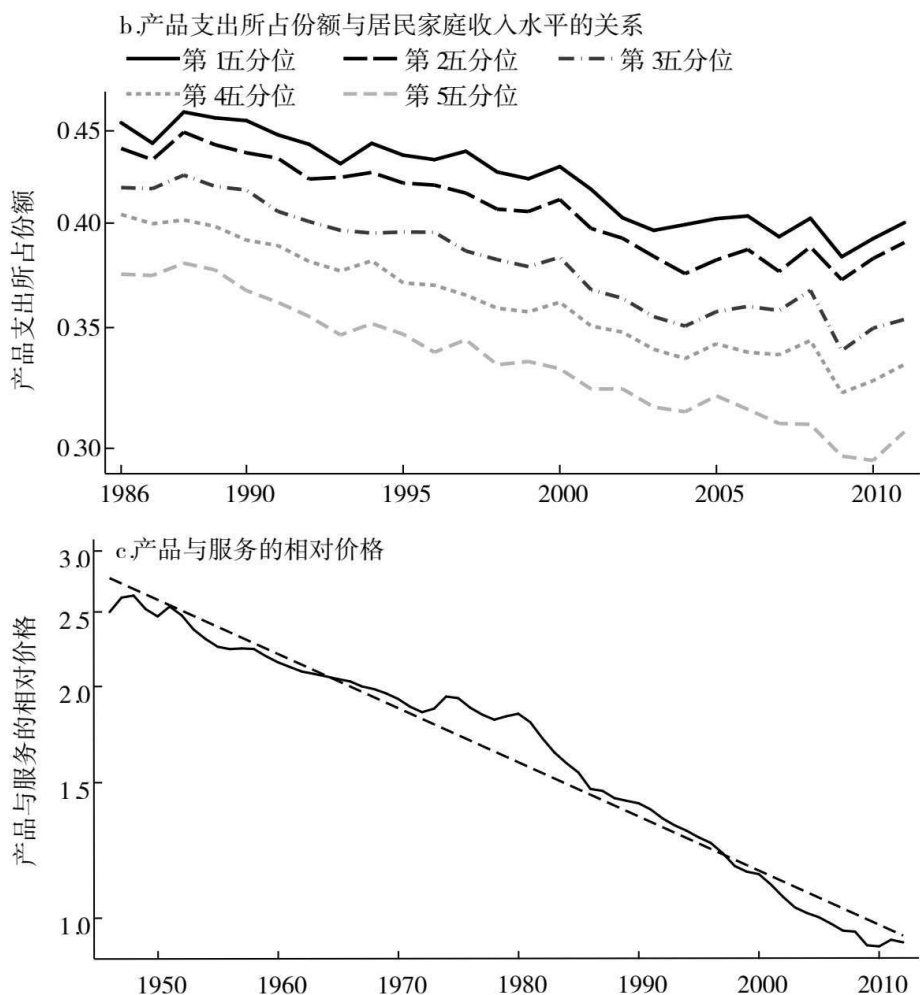


图8.11 三个经验事实

资料来源：转引自T. Boppart,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 *Econometrica* 82, no. 6 (2014): 2167-2196, 图1、图4和图2。

以上图示中介绍的经验事实来自美国，但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趋势。作为解释，波帕特提到了两种主要经济作用力：供给

侧的鲍莫尔定律，以及需求侧的恩格尔定律。

供给侧与鲍莫尔定律

威廉·鲍莫尔（1922—2017）是新古典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有丰硕研究成果，包括企业家精神与竞争。他最有名的贡献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 1965），或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Cost Disease）。[10]为理解这一理论，我们设想有A、B两种产品，其供给随时间的增长速度并不相等，原因或许是A产品所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B产品所在产业。由于稀缺效应，供给增长较慢的B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供给增长较快的A产品而言必然会上涨。相应地，即使经济行为人（居民或企业）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上涨。换句话说，A产品的生产率增速更快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B产品。

接下来我们分析农业和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由于规模经济和自动化技术的作用，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取得了极大进步。相反，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实现同等改进，因为文化、休闲、房产中介、教育和育儿等服务活动不那么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为说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弱势增长，我们可以看看艺术领域的案例：演奏舒伯特乐曲的四重奏组合。为完成这部作品演奏所需的音乐家人数，从19世纪至今没有任何改变。此外，在演奏乐曲的小提琴家身上获得的“回报”无法提高。同样，剧院演出公司在编排莎士比亚戏剧时通过削减演员人数来提高生产率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古典音乐和戏剧中的劳动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因为其中的人力要素

投入几乎是无法削减的。[11]与此同时，为继续吸引劳动力，服务业的雇主必须使工资与产品生产部门保持同步增长。工资上涨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服务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由于生产成本会被传递到价格上，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而言即上涨（图8.11c）。再回到舒伯特乐曲四重奏的例子，音乐家的实际工资水平自19世纪以来大幅提高，其生产率却没有变化。由于劳动成本上涨没有被生产率提高抵消，人力要素投入又不可或缺，结果就使得演出票价持续上涨。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成本病”。

不过，基于供给侧和鲍莫尔定律的这一理论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逐渐减少（图8.11a），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任意时点上，富裕居民的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低于贫困居民（图8.11b）。这里我们还得求助于需求侧和恩格尔定律。

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定律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1821—1896）于1857年从比利时居民家庭的行为中观察到的经验规律。[12]这一定律认为，居民家庭的收入越高，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越小。事实上，产品尤其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论居民的支出规模大小，都必然包含在购物组合中。而服务的必需性质更弱，如果居民的支出未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会包含在购物组合中。因此，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13]与图8.11b类似，图8.12也描绘了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份额随收入增长而下降，这些来自法国的调查数据再度证实了恩

格尔定律。

破解库兹涅茨事实的谜团

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消费类产品的份额会随时间下降？一方面，鲍莫尔定律表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跌，这应该鼓励人们购买更多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服务价格的相对提高会自动提升居民支出中用于购买服务的份额。这两种效应中哪种占据主导？

把恩格尔定律与鲍莫尔定律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解开谜题。首先，鲍莫尔定律显示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降，是因为产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部门。若其他条件不变，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下降会鼓励居民购买更多产品。但产品价格下降会提升居民的购买力，或者说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会带来收入效应。富裕程度提高后，居民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此时恩格尔定律将发挥作用，使购买力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促进服务的消费。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用于服务的支出份额将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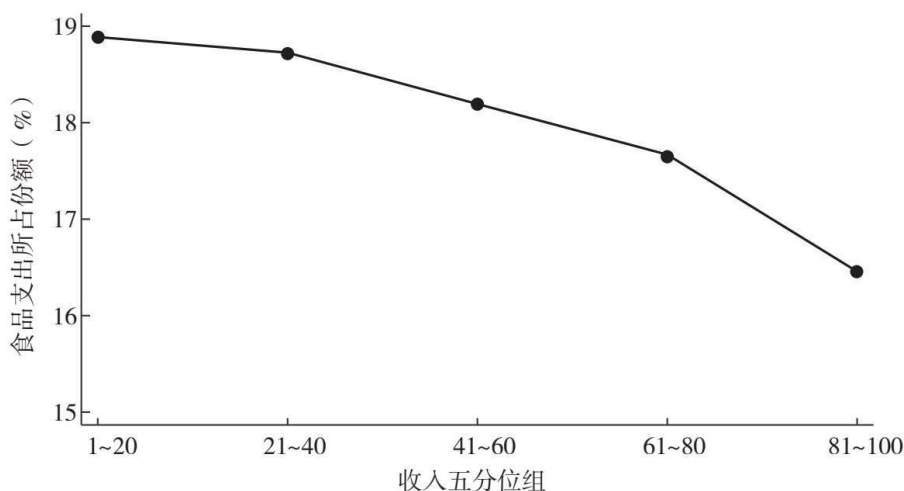


图8.12 法国不同收入分位群组中居民收入用于食品的份额

资料来源: Insee survey *Budget de famille*, 2010 -2011。

3.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的统一

我们该如何对库兹涅茨事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比服务业更显著，使消费更多向服务倾斜）与卡尔多事实（资本与劳动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保持稳定）做出统一解释？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的影响：尽管有技术革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仍保持稳定，该如何解释？

实际上在上述两种情形里（第一种情形是指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现有工作任务的自动化），结构变革都导致在现有生产中用资本替代劳动，并引入更多劳动力密集型的新生产活动：第一种情形是指新的服务的生产，第二种情形是指潜在的新工作任务。

我们将讨论对这一谜题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市场规模和定向技术革新作为基础，第二种解释再次用到了鲍莫尔定律。我们首先介绍面向技能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理念，然后尝试用此理念调和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

市场规模与定向技术革新

这一核心理念可概括如下：当某个市场的规模扩张时，企业发现为响应需求的增加，把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将有利可图。

[14]有若干例子可说明这种情形。

第一个例子是婴儿潮与工资不平等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婴儿潮世代开始加入劳动力市场。这个世代的受教育程度比之前群体更高，很大程度上得感谢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的《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通过各类计划提供了大量联邦补贴，帮助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获得大学学位。由此，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1970年以后快速增加。短期看，技能劳动力过度丰沛导致了技能溢价，即有大学学历的人同仅有高中学历的人的工资比率降低。[15]也就是说，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1970年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图8.13）。然而技能溢价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又急速扩大，这是为什么？

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如下解答：技能劳动力供给在1970年突然增加使这个群体使用的机器的市场规模扩大，继而提高了此类机器的创新租金，由此使创新更多转向改善技能劳动力使用的机器的品质，然后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国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不平

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重新扩大的现象。[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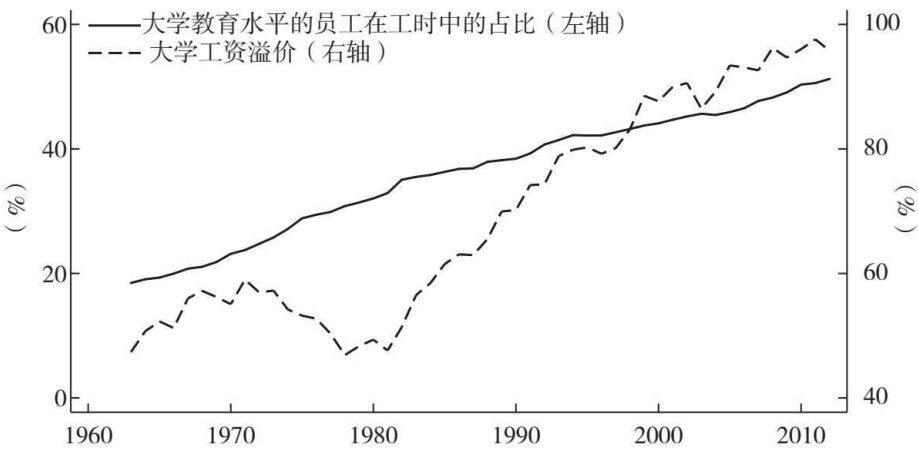


图8.13 技能劳动力供给与技能溢价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Skill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the ‘Other 99 Percent’,” *Science* 344, no. 6186 (2014):843 -851，图3。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碳税和绿色创新。后面的第9章将详细阐述，企业不会自发转向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汽车生产等。企业过去针对污染类活动的创新越多，如今就越愿意在相同领域继续开展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为路径依赖。不过有多项研究表明，碳价的提高，例如通过加征碳税，可以把创新方向引到绿色技术领域。[17]理由很简单，碳价提高会增加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然后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创新租金，从而诱使企业更多开展这方面的创新。

定向创新与卡尔多事实[18]

我们如何利用定向创新的理念，对关于结构变革的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做出统一解释？

我们已经看到，与服务业相比，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更高，因为产品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于服务生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解放了劳动力，同时推动工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意味着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因为劳动成为生产中不那么必需的投入要素。

然而，上述效应被定向创新效应抵消了，后者可以做如下解释。由于产品部门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降低，这导致面向新服务的创新的租金提高：此类服务的生产更多依赖劳动，所以工资降低使新服务活动的利润增加，结果催生了更多面向新服务的创新。这些创新本身有两种影响，第一种影响是促进服务业增长，这是对库兹涅茨事实的另一个（或者说补充性）解释，并不依赖恩格尔定律。第二种影响是服务业扩张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继而推高工资，从而恢复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

基于鲍莫尔定律的解释

把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统一起来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如下理念入手：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19\]](#)假设消费品生产需要多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每种投入品或者由劳动生产（相关生产活动没有实现自动化），或者由资本生产（相关生产活动实现了自动化）。再假设由于数字技术革命，自动化会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的投入品。更确切地说，设想在每个时刻都有固定比率的之前由劳动生产的投入品，由于自动化进步而变成由资本生产。

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在发挥作用。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扩展，资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导致资本的收入份额持续扩大，属于数量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而劳动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总是有一部分投入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并且所有投入品对消费品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因此，劳动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总是在持续上升。这是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属于价格效应。在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作用下，尽管自动化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4. 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从农业经济到制造业经济，再从制造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这一两步走的结构变革是不是所有发展过程的原型？还是说，有可能跨过工业化阶段？对目前依然处于农业经济主导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关键，它们或许能够跨过工业化阶段，开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加纳与韩国

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借助加纳与韩国的比较展示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优点。
[20]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

22 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 298美元，这该如何解释？[21]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韩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即稻米生产），很可能会走上与加纳相同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没有历届政府在60年里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政策，韩国或许能成为全球最高效的稻米生产国，但人均GDP不会起飞，不可能成为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不过我们下文还要讲加纳，它从2010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工业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加纳与韩国的对比是否足以证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韩国的成功故事还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尤其是建立了促进技术追赶型增长的包容性制度。[22]因此，产权保护、大规模教育投资，以及利用优惠贷款、政府采购合同和出口补贴等手段扶持大型领军企业发展，或许都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关键的助力。

为什么一个国家为加速经济增长，更快向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趋近，需要更关注制造业而非农业或服务业呢？有如下几个理由支持工业化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这一观点。

理由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具体而言，某个产业的工业化会促进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的增长。DVD生产商就是与上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会推动光驱乃至更广泛的多媒体产业的发展。牛奶加工厂则是与下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可以带动冰激凌工厂的发展。

理由之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

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工业进步会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进步则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甚微。

工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存在技术外部性，这让斯蒂格利茨及其他部分经济学家重新想到了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的“教育型保护主义”（educational protectionism）观点。^[23]李斯特在19世纪主张利用暂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抵御外国竞争，帮助本国的幼稚产业发展。在初期阶段保护国内工业，可以使它们在规模经济或生产率上追赶世界前沿水平。通过这种方法，工业企业能够积累利润资金，并增加知识和国内人才储备，然后外溢到国内的非工业部门。^[24]该逻辑的隐含假设是其他产业部门，即农业和服务业部门，没有同样的积累知识和人才的能力，或者说，它们产生的知识没有能力充分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

理由之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这些还将在第13章详细讨论。而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理由之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例如，韩国财阀的发展推动了信贷体系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购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的设立。这些制度和政策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经济起飞与技术追赶，虽然如第7章所言，它们在后来变成了增长的障碍。

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尤其是，城市化使得在创建新基础设施和新制度时不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帮助经济行为人更密切地相互交往，从而促进思想交流与新理念的产生。

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工业化对增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除发

达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阶段的历史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亚洲四小龙以及更近期的亚洲小虎案例。中国也是一个典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起飞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真的不可或缺吗？

服务引领的增长：印度的独特案例

从若干方面看，印度与中国这两个重量级选手的对比颇有意义。它们有着相当的体量，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当然中国的增长率几乎达到印度的两倍：在1990—201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8.8%，印度则为4.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不过，两国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样参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制造业在2018年的中国GDP中占41%的份额，而印度仅为27%。

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有许多指标显示，印度的命运远远说不上败局已定。

[25]

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下面两个图示能为此提供佐证。图8.14让我们能看到分地区的发展情况，印度各地区被根据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四类，第一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低的地区（Q1）……第四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高的地区（Q4）。该图显示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87年（图8.14a）到2011年（图8.14b）的变化。在这两个时期中，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服务业。另

外，1987年与2011年之间的对比表明，服务业在后期已成为最富裕地区的主导产业，而它们在1987年时还是农业占主导。

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生活水平随发展进程提高，这会带来对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服务业扩张。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张则会提高服务业创新的潜在租金。因此，服务业的创新会加速，进而刺激该地区的人均GDP继续提高。

总之，尽管我们依然要肯定工业化的优点，但不应该忽视服务业同样能够成为增长的潜在杠杆。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从环境保护的立场看，这个结果也更加有利，因为工业化的推进会给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影响：事实上目前的测算显示，如果把交通运输排除在外，则全球范围内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仅为制造业的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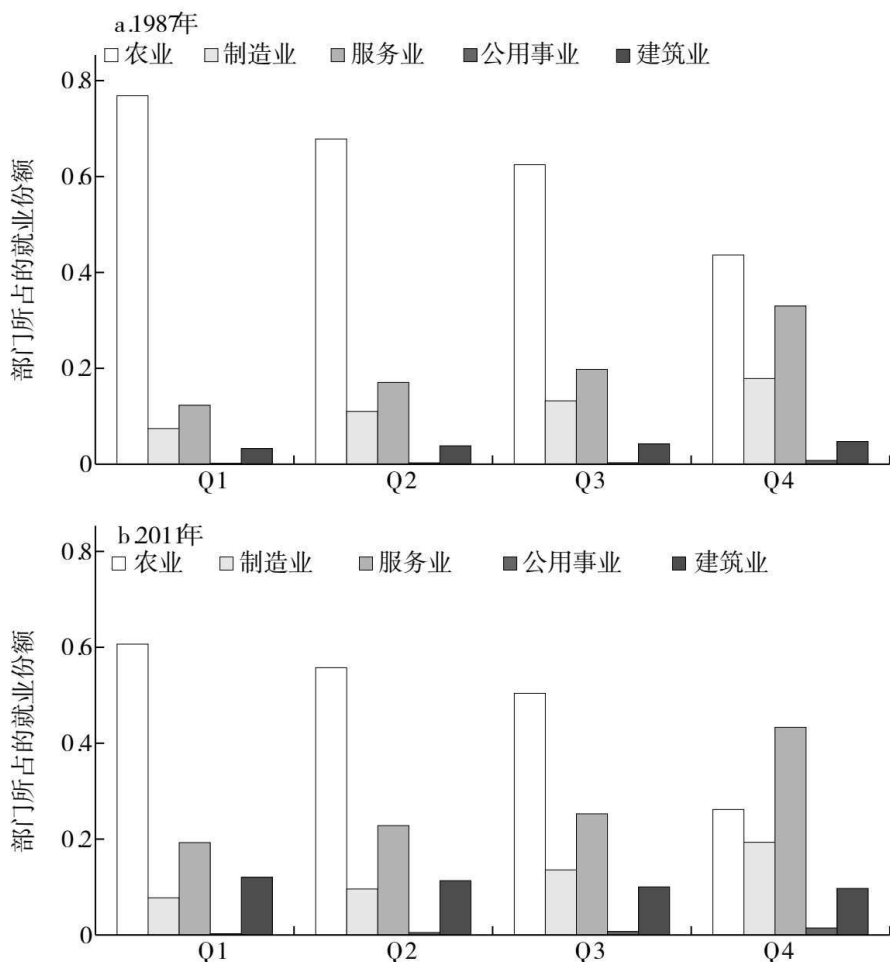


图8.14 印度不同产业部门在就业中的份额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 T. Fan, M. Peters and F. Zilibotti, “Service-Led or Service-Biased Growth?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cross Indian Distri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ugust 2020.

我们在本节开头对韩国与加纳做了历史比较，表明韩国占据优势。但从2010年以来，加纳的GDP年增长率已大幅提高，2011年达到11%。从21世纪头10年后期到10年代早期，加纳的

大部分经济发展来自服务业。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似乎能成功实施服务引领型发展策略的例子，不必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么，为什么加纳能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比20世纪60年代做得更好？这两个时期的一个重大差异与20世纪80年代后加速的全球化有关。如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让致力于服务生产的国家可以进口更多制造品，而出口服务或与产品捆绑的服务。这给服务产业的创新带来了更强的激励。

5. 结论

库兹涅茨把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革过程描述为两个有顺序的步骤，第一步是农业发展让位于工业发展，第二步是工业由服务业取代。我们看到，为理解这个进程，既要考虑供给侧的因素（即产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变化），也要考虑需求侧的因素（由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导致）。

工业化阶段是否不可避免？一方面，丹尼·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强调制造业对促进制度发展、城市化和整个经济的技术知识传播的关键作用。[\[26\]](#)另一方面，印度提供了以服务业为发展基础的有趣反例，说明或许有另外的发展模式，让目前依然以农业为主导的某些国家能够避免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未来将告诉我们，在贸易全球化、数字技术革命和服务业创新的帮助下，这种新的模式是否真正可行。直接向服务引领型经济转型的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环境保护效应。如前文所述，如果把交通运输业排除在外，则全球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为制造业的 $1/4$ 。因此，让某些国家甚至大洲跳过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对于在全球层面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来说，无疑有重要意

义。环境与绿色创新正好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1] Simon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Nobel Lecture, December 11, 197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no. 3 (1973): 247-258.

[2] Simon Alder, Timo Boppart, and Andreas Müller, “A Theory of Structural Change That Can Fit the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469,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January 2019.

[3] Berthold Herrendorf, Richard Rogerson, and Akos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 855-941 (Amsterdam: Elsevier, 2014).

[4] Nicholas Kaldor,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d. F. A. Lutz and D. C. Hagu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5] Nicholas Kaldor,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 no. 2 (1955): 83-100.

[6]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 不过在第6章中，我们曾指出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21世纪初以后下降，表明卡尔多事实在过去20年的美国不那么严格成立。

[8] Timo Boppart,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 *Econometrica* 82, no. 6 (2014): 2167-2196.

[9] 波帕特采用了美国的两个数据来源: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10] 这一定律最早由述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提出规范描述，参见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no. 1/2 (1965): 495-502.也可参见William J. 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no. 3 (1967): 419-420.

[11] Baumol and Bowen,“On the Performing Arts.”

[12] Ernst Engel,“Die Productions und Consumtionsverhältnisse des Königreichs Sachsen,”*Zeitschrift des Statistischen Büreaus des Königlich-Sächsischen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8 (1857) :1 -54.

[13] 需求侧在分析结构变革中的重要性，参见Diego A. Comin, Danial Lashkari, and Martí Mestieri,“Structural Change with Long-Run Income and Price Effec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59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5, rev. April 2020) .

[14] 关于市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oshua Linn,“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no. 3 (2004) :1049 -1090; and Philippe Aghion, Antonin Bergeaud,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J. Melitz,“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y 2018, rev. October 2019) .创新和技术革新可以定向的概念最早参见如下研究: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owth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 no. 1 (1996) :49 -93.之后又得到若干发展: Daron Acemoglu及其合作者，尤其是Daron Acemoglu,“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no. 4 (1998) :1055 -1089; Daron Acemoglu,“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no. 4 (2002) :781 -809; Daron Acemoglu,“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 *Econometrica* 75, no. 5 (2007) :1371 -1409.还可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no. 6 (2018) :1488 -1542.

[1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8) .

[16] Acemoglu,“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17] See, for example, David Popp,“Induc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no. 1 (2002) :160 -180; Philippe Aghion,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David Hémous, Ralf Martin, and John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 no. 1 (2016) :1 -51.

[18] 本节内容基于如下研究: Timo Boppart and Franziska J. Weiss,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and Industry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ne 2013; Acemoglu and Restrepo,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19] Philippe Aghion, Benjamin F. Jones, and Charles I. Jo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n Agenda*, ed. Ajay Agrawal, Joshua Gans, and Avi Goldfar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

[20] Joseph Stiglitz, “From Resource Curse to Blessing,” *Project Syndicate*, August 6, 2012.

[21] 2010年美元价值。

[22] 我们这里采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术语，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2012) , 529. 他们指出，包容性制度 (inclusive institutions) 鼓励创业和创新，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打击创新和私人企业，对产权保护不力，教育体系缺乏效率。

[23]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tuttgart: Cotta, 1841) .

[24] 需要注意，李斯特主张的是暂时而非永久性的保护主义。一旦本国企业成熟到足以面对外国竞争，就应该对自由贸易开放。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只有在经济成熟度相似的国家之间才是可接受的。

[25] Tianyu Fan, Michael Peters, and Fabrizio Zilibotti, “Service-Led or Service Biased Growth?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cross Indian Distri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ugust 2020.

[26] Dani Rodrik, “Normalizing Industrial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3,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第9章

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早在20世纪70年代，自然资源的损耗就成为经济观察家与决策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1970年，罗马俱乐部委任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提交了《米多斯报告》（Meadows Report），认为有必要结束由工业革命自1820年启动的增长过程，让人类转入零增长轨道：“鉴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有限且日渐减少，以及地球上的空间有限，我们必须普遍接受如下原理，人口增长最终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更多的复杂问题。”^[1]

更近期以来，对另一个现象的关注强化了停滞不可避免的观点，这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克里斯蒂安·戈利耶（Christian Gollier）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月末后的气候》中清晰地指出，直至19世纪初，大气中的碳浓度一直稳定在百万分之280（280ppm）以下。^[2]海洋与植物的光合作用足以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然而随着1820年开始的工业起飞及大规模煤炭开采，这一平衡被打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那个世纪初的280ppm持续增加，至2018年达到410ppm。二氧化碳浓度的急剧提升造成了温室效应，引起全球气候显著变暖。全球变暖对环境有诸多后果：干旱、野火和洪水变得愈加频繁与严重，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全球变暖对人类活动也产生了影响，例如，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引发的死亡增加，热浪导致生产率明显下降等。

自然资源的损耗与迎接气候变化挑战的必要性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自然资源的有限存量与气候变化的约束是否注定经济将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我们该如何设计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各国政府为抗击气候变化，并继续促进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有哪些主要的政策杠杆？

这些将是本章思考的主题。

1. 可持续增长：熊彼特还是马尔萨斯

我们在第2章讨论过马尔萨斯陷阱：长期增长在这一模式中不可能实现，因为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导致人口扩张，把人均GDP拖回到基本生存水平。该理论范式看似颇为极端，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其实都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只是不自知而已，如莫里哀的《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就不自觉地讲过这种道理。把“反增长”视为自然资源约束和气候变化危机的唯一应对办法的任何人，事实上同样如此。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设想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完全来自资本积累，最终生产的消费品（最终产出）需要资本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投入。资本积累——投资——等于储蓄，而储蓄则是最终产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均用于消费。^[3]再假设自然资源的存量有限，于是我们可以证明，无论资本积累的回报率随积累数量增加上升或是下降，以下两个命题都成立：第一，这个经济体在极长期里必然陷入停滞；第二，短期内的增长减速会延长经济体的整体寿命。

为证明经济体在极长期里必然陷入停滞，我们可以用反证法。假设经济体以正速率维持无限增长，则最终产出不会向零收

敛，那么，自然资源的开采消耗必须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可是，自然资源的存量将在有限的时间内耗尽，一旦存量耗尽，最终产出就将立刻跌落到零水平。这与最终产出永远增长的初始假设相矛盾，所以从长期看，唯一可能的增长率必然为零。

第二个命题，即短期内增长减速会延长经济体的整体寿命直接来自如下逻辑：任何短期增长放缓都会节约自然资源，从而使资源消耗的时间可以变得更长，也就延长了最终产品能够被持续生产的时间。

正是这些合乎逻辑和具有说服力的推理启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零增长论者，也为如今的反增长倡导者所继承。那么我们能逃脱这一逻辑吗？与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形类似，答案可以用一个词简单概括：创新。只有创新能推迟可能性的极限；只有创新可以在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消耗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排放越来越少的二氧化碳；只有创新能帮助我们发现更清洁的新能源，例如，核能发电站的建设就帮助法国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

创造性破坏是极其强大的变革发动机，它不仅能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且能开辟生产工艺深刻变革的通路。环境危机呼吁在某些领域推动激进变革，例如改变能源消耗构成，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这要求整个能源产业改变商业模式。此处的关键问题是，创新会不会自发转向污染更少、更节约自然资源的技术，还是说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下面我们将就此展开讨论。

2.绿色创新、路径依赖与政府角色

企业是否总会自发选择绿色创新（专栏9.1）？通过对汽车产业的分析，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4]几位学者从8个国家的汽车公司在1978—2005年申请的专利数据中，区分了支持电动车发展的“绿色”创新与支持内燃机汽车发展的“污染”创新。^[5]利用这些数据，他们考察企业的创新历史，以分析决定企业倾向于开展绿色创新而非污染创新的因素。过去在污染技术领域取得过创新成就的汽车公司，是会继续之前的路径，还是会转变轨道、开展绿色技术的创新？

专栏9.1 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又名生态创新或环境创新，意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能减少环境风险、污染和资源消耗负面影响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方法。

这些创新不仅来自以环境保护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如资源回收企业、生产或储存可再生能源的企业等，也来自业务看似远离生态领域的其他企业，如建筑、汽车或化学等产业。此外，绿色创新未必都属于技术领域，也可以是组织、制度或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革新。

改善资源循环的绿色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超越了渐进式创新（例如提高现有机器的能源效率），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循环经济是真正的模式变革，它打破了开采、制造、消费、丢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转而采取环形经济模式：开采、制造、消费、回收、制造……形成不间断的良性循环过程。

有人或许认为，过去开展内燃机创新的企业因为看到此类创

新收益递减，会认为转向电动车开发更有利可图。但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家企业过去在内燃机创新上的成果越多，就越倾向于延续该领域的创新。或者说，企业会坚守自己已经掌握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这种路径依赖意味着，如果任其自由选择，已经取得内燃机开发经验的企业不会自发转向关注电动车。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激励企业调整创新活动的方向，从污染技术转向绿色技术。

为判断一项专利或者说创新属于绿色性质还是污染性质，这些学者采用了国际专利分类法（IPC，见表9.1），尤其关注代表重大知识进步的专利。为此，他们集中考察了三合一专利，也就是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都有登记的专利。图9.1显示的是8个国家汽车产业的绿色性质与污染性质三合一专利在1986—2005年的数量变化。绿色创新在很长时期里几近于无，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尽管目前尚未赶上污染创新的数量。

表9.1 把专利区分为绿色性质或污染性质

描述	分类编号
绿色专利	
电动车	
依靠汽车内部供应的电力驱动	B60L 11
电动车上为安全目的服务的电子设备；监控速度、减速和电力消耗等运行指标	B60L 3
控制牵引力（电动车的电机转速）的方法、电路或设备	B60L 15
电力驱动单元的配置或架设	B60 K1
对不同类型或不同功能的汽车子单元的联合控制，包括电力驱动单元（如电动机或发电机）控制、能源储备手段（电池或电容器）控制等	B60W 10/08， 24， 26

描述	分类编号
混合动力车	
对共同或通行驱动用途的多种主要发动机的配置或架设，如包含电动机和内燃机的混合驱动系统	B60K 6
专门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包含两种或更多主要发动机的汽车，如电动机和内燃机，均为汽车驱动服务）的控制系统	B60W 20
再生制动	
动态电力再生制动	B60L 7/1
制动时，为包含发动机驱动发电机的汽车的主要发动机提供再生能量	B60L 7/20
氢能车/燃料电池	
对不同类型或不同功能的汽车子单元的联合控制，包含对燃料电池的控制	B60W 10/28
依靠汽车内部供应的电力驱动——利用原生电池、次级电池或燃料电池供应的能量	B60L 11/18
燃料电池及其制造方法	H01M 8
污染专利	
内燃机	
活塞式内燃机；一般内燃机	F02B
内燃机控制	F02D
内燃机的气缸、活塞或罩体；内燃机的密封设置	F02F
向内燃机供应可燃混合物及其构成	F02M
内燃机的发动	F02N
内燃机的点火（除压缩点火之外）	F02P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 no. 1 (2016) :1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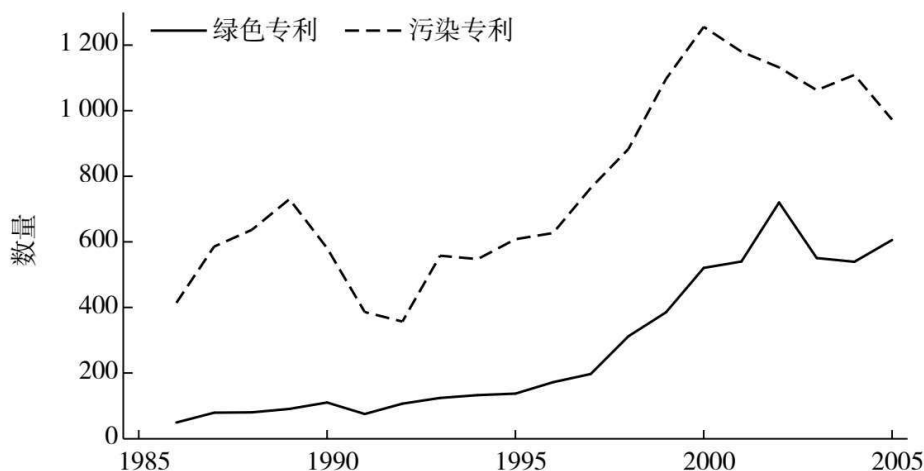


图9.1 1986—2005年汽车产业的绿色与污染三合一专利的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 no. 1 (2016): 1-51,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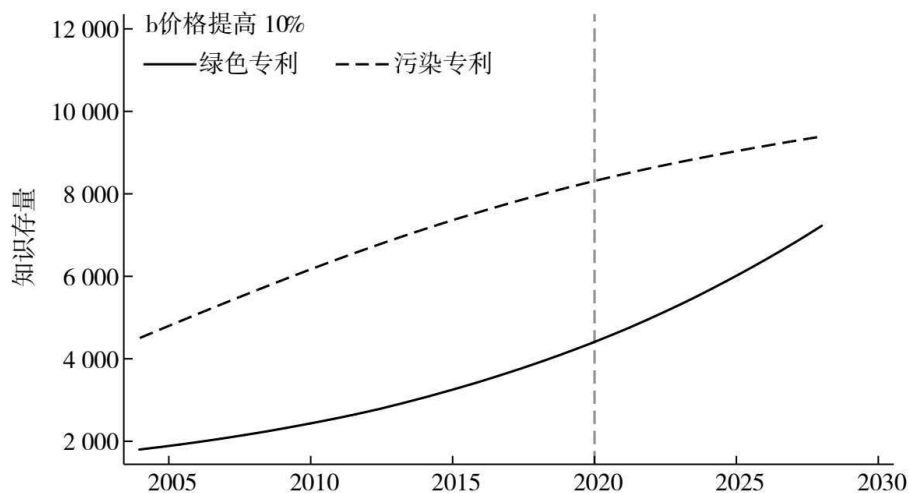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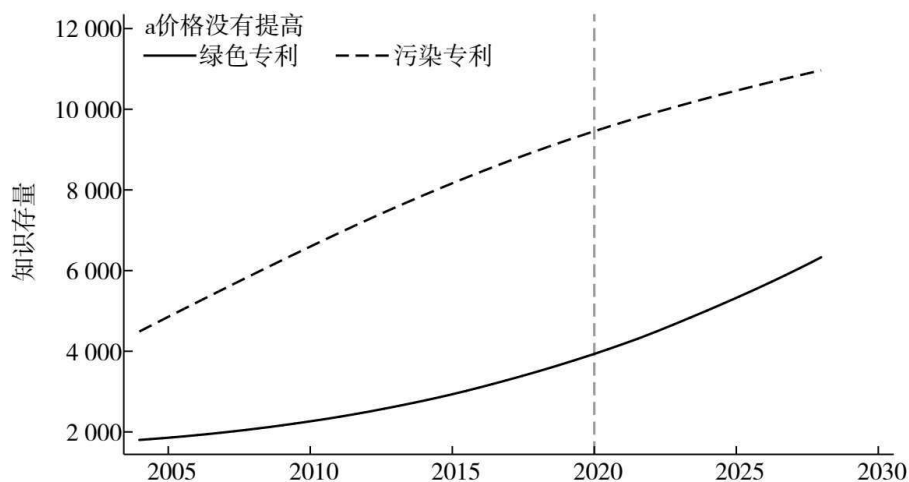
针对每位创新者（无论企业或个人），以及1978—2003年间的每一年，这些学者不仅知道每位创新者在当年获得的绿色和污染专利的数量，还包括同一位创新者在历史上获得的专利情况。这些信息让我们能够分析：企业对绿色技术或污染技术的创新倾向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过去积累的专利成果属性。

这些学者发现，如果一家企业过去的专利中有超过10%是绿色技术，则该企业后来推出绿色专利的概率会提高5%。与之对称，过去登记了较多污染技术专利的企业后来获得污染专利的概率也更高。因此，企业在选择开展何种创新时表现出了路径依赖现象，我们不能只依靠私人部门把创新方向调整到绿色技术上，而无视政府干预。

好消息是，公共政策可以有效地把创新引向绿色技术领域。

这些学者指出，企业面临的燃料价格每上涨10%，开展绿色创新的概率即会提高10%。这种调整来自本书第8章介绍过的市场规模效应：燃料价格上涨会降低使用内燃机的汽车的市场需求，从而使污染技术创新的概率下降，让企业转向绿色技术创新。

这些学者模拟了不同政策的效果：提高2005年的汽油价格，对2028年之前的绿色专利（图中实线）和污染专利（虚线）数量的影响。图9.2a展示的是没有汽油价格上涨时的结果；图9.2b、图9.2c和图9.2d分别展示的是汽油价格在2005年提高10%、20%和40%时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提价40%的情况下，两条曲线将在2020年出现交汇；此后，企业将自发地选择绿色技术，因为它们积累的有关绿色技术的专业知识已变得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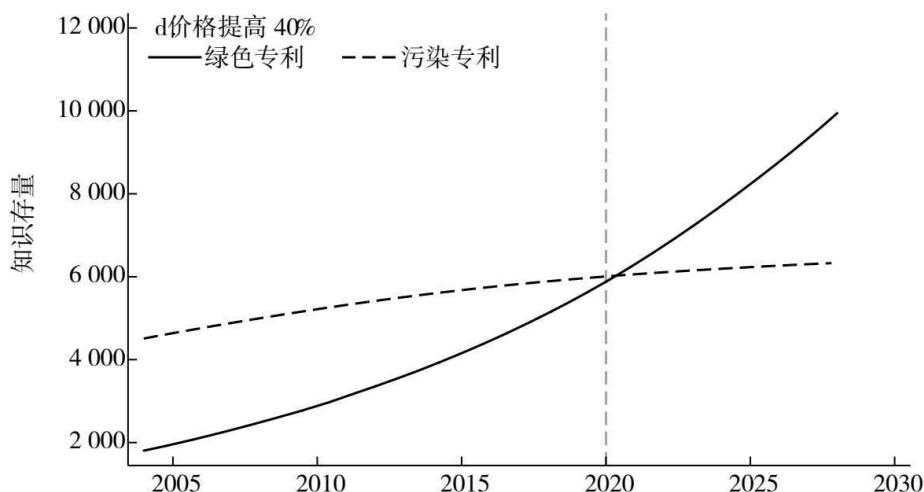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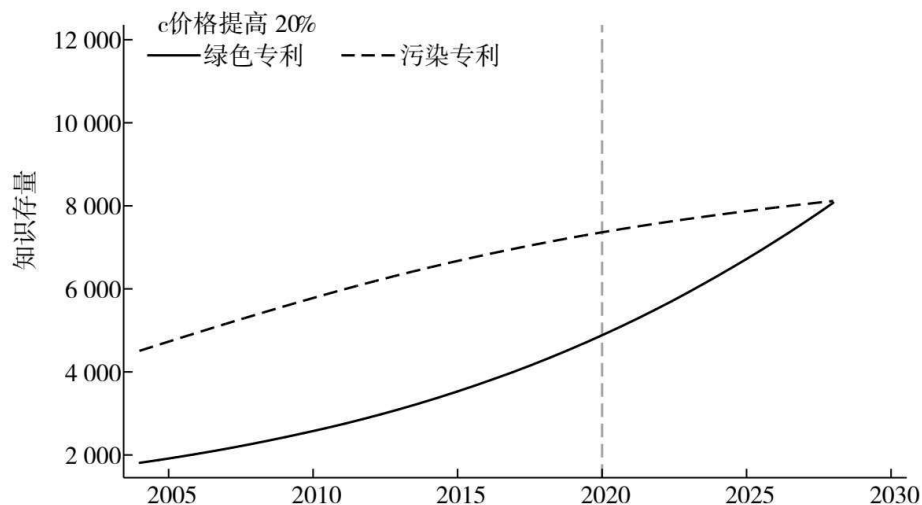


图9.2 模拟提高汽油价格产生的效果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Dechezleprêtre, D. Hémous, R. Martin and J.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 no. 1 (2016): 1-51, 图6a、6b、6c、6e。

无疑会有读者提出合理的反驳，认为40%的汽油价格涨幅并

不现实，因为这给当前世代增加的成本过高。实施惩罚性生态税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是颇具煽动性的主意，可能引发公众的反对，例如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时，引起人们暴力抗议的部分原因就是燃油价格上涨。^[6]不过，碳税并非唯一的政策工具。我们有必要将讨论加以扩展，继续考察把研究转向绿色创新的其他政策杠杆。

3. 哪些政策可以促进绿色创新？

威廉·诺德豪斯对阵尼古拉斯·斯特恩

为研究全球变暖对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经济学家开始把气候变化纳入传统的增长模型。^[7]其中一个例子是威廉·诺德豪斯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该模型中的最终产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8]随着技术进步，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都逐步提高。此外，生产率与环境质量有正向关联。环境则受到经济总产出造成的气温升高的负面影响。该模型的隐含假设是，生产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继而引起全球变暖。

这个经济体唯一的效率缺失源于：个体生产者并不考虑其活动对二氧化碳排放乃至生产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排放形成了负的环境外部性。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个体生产者没有把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由于经济中只有这一种外部性，那么仅靠一种政策工具就足以把经济拉回有效率的轨道，这种工具就是碳税，即根据碳含量按比例对化石燃料开征的税

收。采用该模型的经济学家要解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分配环境政策的负担。

是选择从一开始就设置较高的碳税率，给当前世代造成强烈影响；还是逐渐提高税率，让当前世代与未来世代更平均地分担成本，哪种办法更好？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选取今天与未来之间的贴现率。这也是威廉·诺德豪斯的乐观主义方法与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悲观主义方法的差别所在。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曾于2000—2003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他是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尤其以《气候变化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报告为大众熟知。^[9]该报告由英国政府于2006年发表，是第一份由经济学家而非气候学家牵头撰写的相关报告：首次把经济学领域的人才动员起来，评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该报告的结论可谓旗帜鲜明：只有采取强烈而果断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才能让我们避免世界范围内每年5%~20%的GDP损失。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经济学家，执教于耶鲁大学。他与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一起率先为气候变化建立模型，尤其以环境经济学研究著称，特别是上述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环、气候变化、气候灾难与气候政策等因素。

诺德豪斯认为，到2100年，地球气温提高3摄氏度将导致全球GDP下降2.1个百分点，提高6摄氏度会导致GDP下降8.5个百分点。^[10]可见，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将非常小，因为全球GDP在一个世纪中出现8.5%的跌幅只相当于每年的增长率下降不到0.1个百分点！许多气候学家对这一乐观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

这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

诺德豪斯设定了一个较高的贴现率，从而赋予未来世代相对于当前世代较低的权重。他的乐观态度来自如下理念：经济增长将使未来世代比当前世代富裕得多，所以他们将有更好的条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由此建议采取更加渐进式的碳税。而斯特恩采用的贴现率较低，主张采取强烈而迅速的行动。

环境与定向创新^[11]

让我们设想，某个经济体既生产内燃机汽车等污染产品，也生产电动车等非污染产品。^[12]只有污染产品的生产会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从而使全球变暖。技术进步的方向是朝向污染产品还是非污染产品，将由内生机制决定：取决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是投入污染技术还是绿色技术。

在这个技术进步由内生决定的经济体中，存在两类外部性。第一类是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产品生产及其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第二类外部性则与创新的路径依赖有关：当企业决定开展污染技术而非绿色技术创新时，它并未考虑这一决定会促使自己在未来更多投入污染技术的创新。我们都会自发地在自己原本擅长的领域开展创新。如果你擅长烹饪，而不是跳舞，那你很自然地会继续关注提高厨艺，而非舞技。

把定向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源泉，可以在环境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深化相关分析，并改变议题的性质和条件。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启示是，即使接受诺德豪斯的较高贴现率，我们可能仍需要立刻采取行动，把创新方向调整到非污染技术上。为理解这点，可设想在初期阶段，内燃机的生产技术比电

动车技术发达得多。由于路径依赖，在没有政府干预时，企业都会继续从事内燃机创新，因为这是它们最擅长的领域。于是，内燃机技术与电动车技术之间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等到未来再采取调整创新方向的政策时，将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用牙疼做类比，如果你总推迟去看牙医，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今后的治疗将需要更长时间，也更为痛苦。

推迟政府干预会带来多大的成本呢？无论我们采用斯特恩还是诺德豪斯的贴现率，代价都非常高昂。若采用较为合理的参数值，在两种贴现率下得出的最佳策略都是立刻把研究方向调整到绿色创新上。

第二个启示是，政府干预是暂时性的。一旦电动车技术追赶上燃油汽车的技术，企业就会自发地继续开展电动车创新。同样是路径依赖在起作用，但这次是对绿色创新有利。

第三个启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两类效率损失，即环境外部性与路径依赖，因此我们需要两种经济政策来调节。碳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环境外部性，补贴绿色创新则是为打破路径依赖。虽然如上文所述，设置较高的碳税确实会削弱污染创新的激励，但采用碳税与绿色创新补贴双管齐下的办法，则可以适度降低有效抑制全球变暖所需的碳税增幅。

绿色创新的推广

由于环境是全球公共品，一个国家对环境政策的单方面投资会让全世界受益，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所以，每个国家都希望搭便车，让其他国家承担生态行动的成本。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希望为抗击气候变化而开展有意义的国

际合作？

当今时代，新兴国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它们表达了对实现经济发展的合理愿望。它们的立场是，发达国家已从两个世纪的污染性增长中获益，如今不能剥夺新兴国家沿着同一路径追赶的权利，这样的理由很充分。因此，新兴国家不愿意对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做出正式承诺。

不过，绿色创新的推进可以改变如何以全球协同方式抗击气候变化的讨论。^[13]虽然巴西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对全球层面的创新有所贡献，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以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已经发明的技术为主（见第7章）。

假如发达国家共同决定把创新方向调整到绿色技术上，然后开放这些新的绿色技术，以促进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再假设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采纳绿色技术与污染技术之间做选择。在此情形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旦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的先进程度足以与污染技术抗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更有利可图的做法是放弃旧的污染技术，转而采纳新的绿色技术。例如，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的世界领先者，并正在大力投资电池与电动车研发。

总之，我们并不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全体协调行动。仅依靠发达国家之间对转向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再加上把这些技术向欠发达国家推广的坚定政策，就足以成功抗击全球变暖的趋势。

当然，以上推理尚未充分考虑全球化，尤其是新兴国家自由加入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把自由贸易纳入分析会给上述乐观结论带来疑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若干追求良性循环的国家单方面决定投资于绿色创新，如通过碳税或者补

贴“绿色创新”等措施，停止污染创新，则这个群体之外的部分国家有可能选择成为“污染天堂”。该术语是指，这些国家专注于开展污染性经济活动，或者引进专注于污染生产和创新的跨国企业。此类企业不能继续在良性循环的国家开展经营，但可以转移到“污染天堂”。再借助自由贸易，它们可以把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追求良性循环的国家。最终，不仅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会趋于恶化，而且转向绿色创新的技术变革也会被延迟，甚至遭遇滑铁卢。

正是为了避免良性气候政策的这一适得其反的后果，各国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以推广绿色技术，并给落后国家采纳这些技术提供补贴。此类政策还必须包括碳关税，对那些可以得到绿色技术，却仍选择做污染天堂的国家实施。我们不能忘记：把绿色技术推广到其他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原创国而言要付出极其巨大的成本，创新者会为此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创新会被其他国家模仿，不再能获得租金。所以原创国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补偿，这些都是成本。

激励（胡萝卜）加上碳关税威胁（大棒）的组合可以增加单方面气候政策的可信度，使其效力扩展到其他国家，以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抗击全球变暖。

4.消费者、竞争与绿色创新

如果就此结束分析，我们传递的主要信息将是：若要把技术变革导向绿色创新并避免环境灾难，政府的干预不可或缺。若没有政府干预，企业会自发选择开展污染技术创新，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它们的这一倾向性将日益明显。于是污染情况会恶化，

全球变暖将加速。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是生态转型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人？或者说，民间社会是否也能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在他之前的阿瑟·庇古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4]他们认为，企业就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让政府来处理各种失灵问题，包括交易成本、不对称信息和负外部性等，还有用再分配等手段来缓和的不平等状况。极端自由主义与强势政府的拥护者都赞成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因为两派均希望尽量压缩民间社会的角色。

然而如罗兰·贝纳布与让·梯若尔所述，政府能达成的目标是有局限的。^[15]局限之一在于，政府官员经常受到各类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见本书第5章）。局限之二在于，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问题，不可能仅靠任何一个国家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样借助民间社会的力量，尤其是让消费者在做选择时更多考虑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因素？

消费者确实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力量。^[16]因此在消费者真正关心环境的国家，汽车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会促使生产商开展更多绿色技术创新，如电动车等。这背后的基本思想很直观。我们在第4章讲过，竞争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产品价值，以取得领先地位。类似的理念也可以适用于开展定向创新、消费者支持环境保护的经济体。在此情形下，激烈的竞争将驱动企业开展相关创新，以压低产品价格与环境影响的比率，也就是说利用更加环保的技术来超越竞争。相反，在消费者更加关心产品价格而非环境后果的经济体中，竞争加剧就不太会刺激绿色创新，反而可能使环境问题恶化。此情形可以称作“发展综合征”：竞争加剧使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导致更大的产出与更多的污染。

图9.3显示了美国人在1984—2019年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增长关注度的变化，数据来自盖洛普调查。[\[17\]](#)可以看到，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2000—2010年间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后趋势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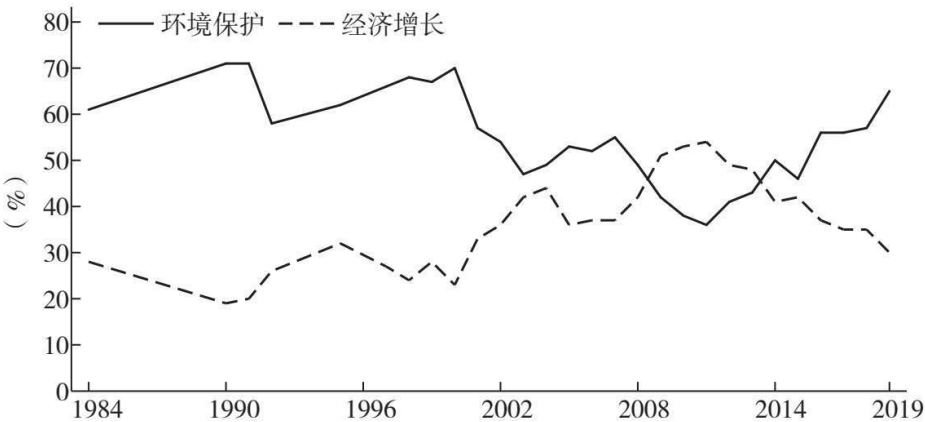


图9.3 美国人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偏好态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 Gallup。

为测算环境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我们采用了1998—2002年以及2008—2012年开展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的数据，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这些调查向相关国家的消费者发放相同的问卷，其中的问题包括：“为保护环境，你愿意付出多高的价格（或税收）？”以及“你是否愿意放弃一部分收入，如果确信这些钱将被用于减轻污染？”等。此类调查涉及42个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

为测算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我们采用了各国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世界银行编制的一项指数），以及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即经合组织的竞争指数的倒数）。

这项研究把重点放在汽车产业，以分析竞争程度与社会环保态度如何影响企业开展内燃机或电动机创新的概率。研究得出的主要发现是，在碳税之外，产品市场竞争加上消费者对环境的关心构成了强大杠杆，推动企业走向绿色创新。该结果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揭示了在碳税与研发补贴之外另一条抗击气候变化的补充途径。这一途径就是实施教育政策，以增强消费者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加强竞争，尤其是通过开放产品市场和约束游说活动。

5.中间能源与能源转型

如果有中间能源（污染小于煤炭和石油，但大于可再生能源）可供选择，我们又该如何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天然气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同属化石能源，它却被视为最清洁的碳氢化合物，其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少30%，比煤炭少50%。因此，页岩气这种非传统的天然气也作为中间能源重新受到了关注。[\[18\]](#)这里不对页岩气的开采做深入讨论，我们只是用它作为例子来阐述利用中间能源的利弊得失。[\[19\]](#)

腾飞的页岩气已成为美国天然气市场上的革命性角色。图9.4展示了美国页岩气产量的变化，我们看到从2008年开始急剧加速（号称页岩气繁荣），产量在2008—2018年间增长了约500%。图9.5则显示，从2008年开始，天然气取代煤炭的速度大大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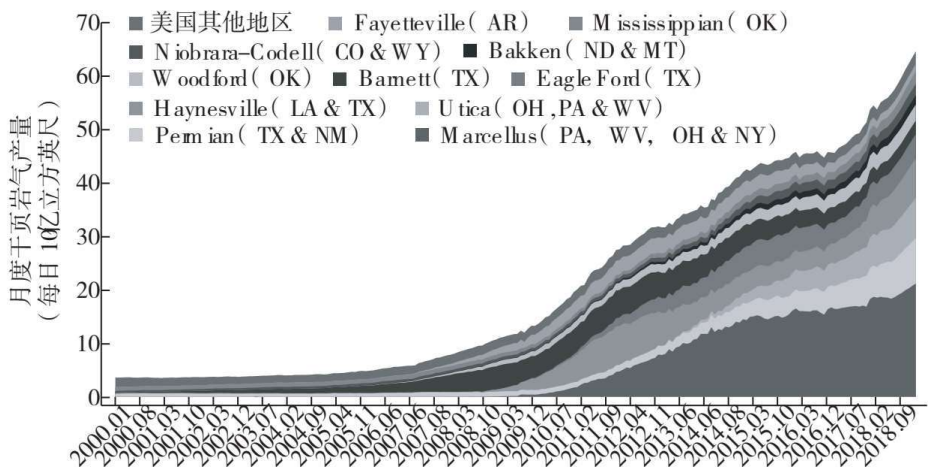


图9.4 页岩气繁荣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L. Barrage and D. Hémous, “Climate Change, Direct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ebruary 28, 2019,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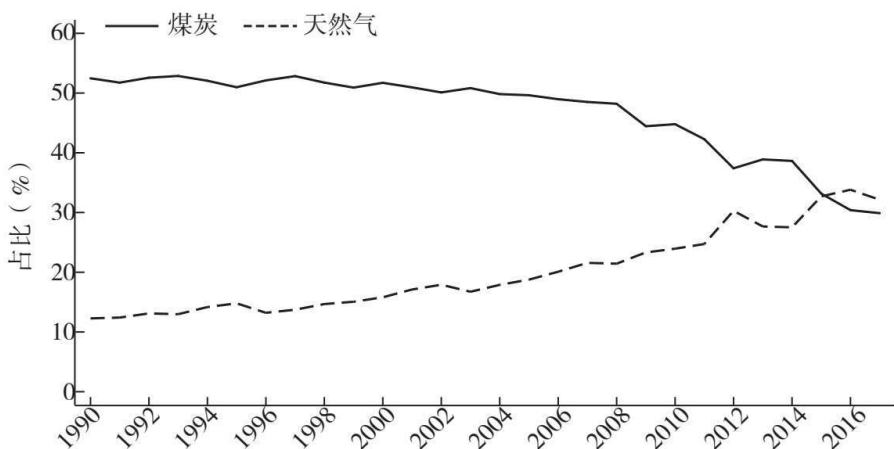


图9.5 煤炭与天然气在发电能源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L. Barrage and D. Hémous, “Climate Change, Direct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ebruary 28, 2019, 图1。

从煤炭向天然气转型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何影响？图9.6显示，二氧化碳密度（即单位能量产出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了急剧下降（图中虚线）。这一下降属于替代效应的结果：由于高污染的煤炭被低污染的天然气部分取代，单位能量产出带来的污染随之减少。然而，该效应可能被规模效应完全抵消并超过：页岩气作为补充能源引入后，会增加能源的总体供给，使能源价格乃至企业生产成本被压低，从而鼓励企业扩大产出，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图9.6显示，实际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在长期持续攀升后，从2008年起开始减少（图中实线），说明替代效应占据了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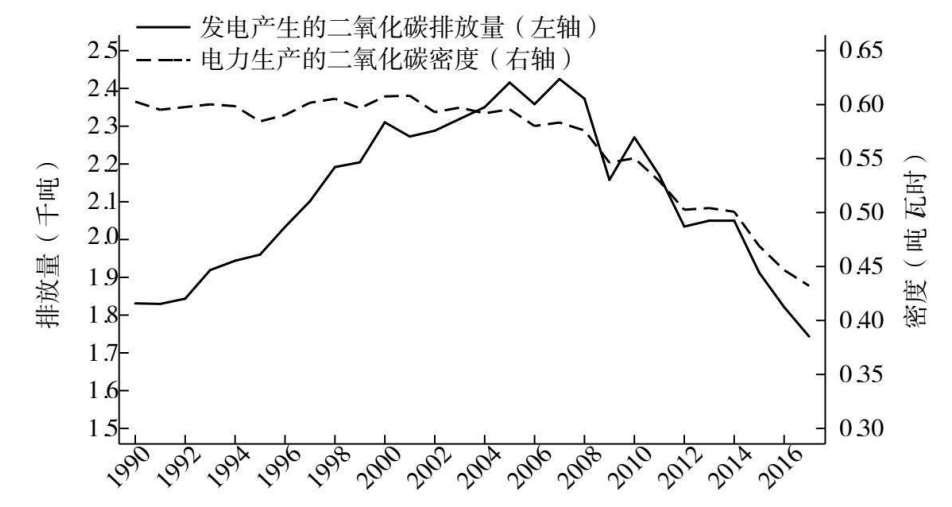


图9.6 发电产生的排放与二氧化碳密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cemoglu, P. Aghion, L. Barrage and D. Hémous,“Climate Change, Direct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unpublished

先不管与污染效应有关的批评意见，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规模开采页岩气呢？同样，如果把创新效应纳入考虑，我们就必须重新评估上述推理。近期有一项研究提出，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最终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三种能源：煤炭、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20]煤炭造成的污染大于页岩气，后者又大于可再生能源。企业可以选择投资于化石能源（煤炭与天然气）的技术创新，或者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在上述条件下，页岩气繁荣对二氧化碳排放在短期和长期分别有何影响？

在短期内，依靠现有技术，页岩气的引入会带来上文提到的两种相反效应：减少污染的替代效应与加重污染的规模效应。如图9.6所示，替代效应似乎能占据主导。那么在考虑到创新因素，企业需要在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两类技术之间做选择时，长期又会产生何种结果？化石燃料繁荣会刺激企业至少暂时放松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因为化石燃料的市场规模和租金都在增长。事实上，从图9.7也可以看到：可再生能源的专利数量占美国全部专利的比例在之前持续提升后，于2008年开始急剧下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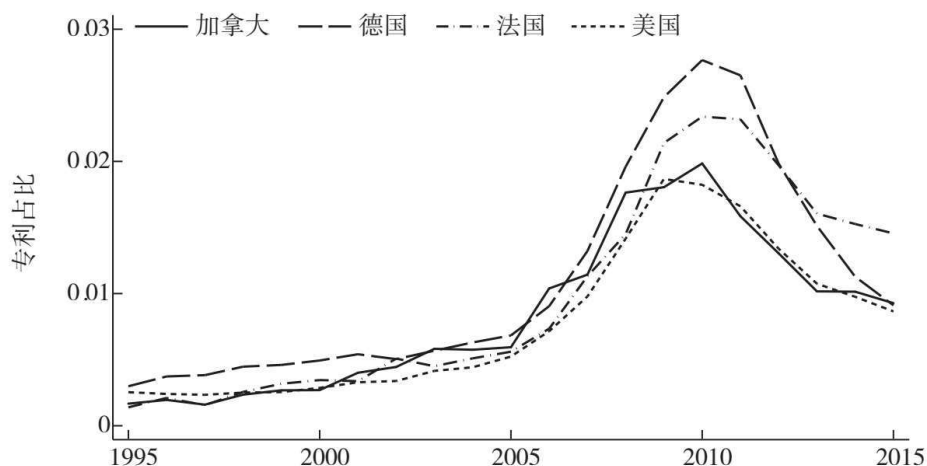


图9.7 可再生能源专利在总专利数量中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D. Acemoglu, P. Aghion, L. Barrage and D. Hémous, “Climate Change, Direct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ebruary 28, 2019。

所以，页岩气繁荣或者会推迟向绿色创新的转型，或者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完全阻碍这一转型。受页岩气繁荣的影响，化石燃料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会促使企业无止境地继续开发这些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间能源陷阱”。在这两种情形下，页岩气的引入都会在长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和潜在的气候灾难，而在没有页岩气繁荣时本可以避免。

这是否表明人们应该忽略中间能源，或者说有更好的办法，能让我们利用它们在短期的积极效应，但尽量减小其对创新的长期危害？我们认为，如果在模型中采用合理的参数值，则最优政策选项是在利用页岩气繁荣的同时大力补贴可再生能源创新，并显著但不过度地提高碳税（增幅2~3个百分点）。这样的政策可以成功避开中间能源陷阱，加速向绿色创新的转型。

6. 结论

我们在本章的讨论有四个主要思想。第一，尽管受自然资源存量有限的制约并必须抗击全球气候变暖，创新仍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品质持续改善。第二，创新不会自发转向环境友好型，过去在污染技术上开展生产和创新的企业倾向于继续停留在污染技术领域（路径依赖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干预把创新引向绿色技术。当然政府不能替代企业，而应该通过激励来发挥影响。我们由此讨论了促使企业转向绿色创新的几种杠杆措施：碳税、绿色创新补贴、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以及惩罚污染天堂的碳关税等。第三，对天然气等中间能源的利用可以在短期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可能让创新焦点陷入中间能源领域，从而妨碍向清洁能源转型。这里再度需要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以防止各国在能源转型的中间位置停滞不前。第四，民间社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鼓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我们提到了消费者的作用，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内容也都与此有关。关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协同作用，我们在第15章还将述及。

[1] Donella H. Meadows, Denis L. Meadows, Jø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

[2] Christian Gollier, *Le climat après la fin du moi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9) . ppm是反映空气污染程度的浓度指标，意指100万个空气分子中包含的污染物（此处为二氧化碳）分子数的数量。

[3] 即本书第1章介绍的索洛增长模型的同类模型，唯一区别是，此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还需要自然资源投入。

[4] Philippe Aghion,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David Hémous, Ralf Martin, and John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no. 1 (2016) :1 -51.

[5] 电动车是否应该划入“清洁”类型仍存在争议。电动车制造中采用的许多部件的生产未必是生态友好型的，例如电池（ADEME, April 2016, <https://www.ademe.fr/sites/default/files/assets/documents/potential-electric-vehicles.pdf>）。

[6] 当“黄马甲”运动于2018年秋季在法国兴起时，由于进口石油提价，汽油价格已经非常高，而不是因为于每年1月1日设定的碳税提高。但该运动的激烈程度促使法国政府在2018年预算法案中下调了碳税的年度上调计划。

[7] 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若干开创性环境经济学论文包括：Martin L.Weitzman,“On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no. 1 (2009) :1 -19;Mikhail Golosov, John Hassler, Per Krusell, and Aleh Tsyvinski,“Optimal Taxes on Fossil Fuel in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82, no. 1 (2014) :41 -88;John Hassler, Per Krusell, and A. A. Smith,“Environmental Macroeconomics,” in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ed. John B. Taylor and Harald Uhlig, vol. 2,1893 -2008 (Amsterdam: Elsevier, 2016) ; Michael Greenstone and B. Kelsey Jack,“Envirodevonomics: A Research Agenda for an Emerging Fie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3, no. 1 (2015) :5 -42.

[8] William D. Nordhaus,“The ‘ DICE ’ Model: Background and Structure of a 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 of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1009, 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February 1992.

[9]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0] William D. Nordhaus,“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 no. 3 (2007) :686 -702.

[11] 本节内容，另可参见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Leonardo Bursztyn,and David Hémous,“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no. 1 (2012) :131 -166.

[12] 参见本章注释5中关于电动车是否属于绿色技术的疑问的介绍。

[13] 我们这里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同一论证也适用于不同技

术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14] Milton Friedma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0, 32-33, 122-124; Arthur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

[15] Jean Tirole and Roland Bénabou,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onomica* 77, no. 305 (2010) :1-19.

[16] Philippe Aghion, Roland Bénabou, Ralf Martin, and Alexandra Roulet,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s: Is Market Competition Clean or Dir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9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20) .

[17] “Americans' P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s. Economic Growth, 1984-2019,” Gallup Poll, <https://news.gallup.com/poll/248243/preference-environment-economy-largest-2000.aspx>.

[18] 页岩气是包含于沉积岩中的天然气。与埋藏于渗透岩中、易于开采的传统天然气不同，页岩气所处的岩层渗透性很低，孔隙少。因此其开采更为复杂，需要水力压裂等专门技术，把水和化合物以高压注入，以碎裂岩层。

[19] 页岩气的环境影响仍存在激烈争议。Robert Howarth及其合作者指出，与传统天然气开采相比，水利压力排放的甲烷至少多出30%，另外我们知道，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更为严重。还有，水力压裂技术也存在争议，因为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参见: Robert W. Howarth, Renee Santoro, and Anthony Ingraffea, “Methane and the Greenhouse-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s,” *Climatic Change* 106, no. 4 (2011) :679-690.

[20] 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Lint Barrage, and David Hémous, “Climate Change, Direct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 2019 Meeting Papers, No. 1302,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https://scholar.harvard.edu/aghion/publications/climate-change-directed-innovation-and-energy-transition-long-run-consequences>.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创新当作黑匣子来处理：某个抽象的人物投资于研发活动，按照与投资性质有关的概率，他将产生创新成果，随后申请专利并开发其市场价值。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遇成为创新者。家庭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父母的收入水平、教育和职业等，都影响个人从事创新的倾向性。内在的创造力和天赋在个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也会发挥作用。我们能否识别哪些因素对个人成为创新者的影响最大？此外，创新会在多大程度上让同一企业的其他人（包括雇员和经理人等）获得好处？

其次，创新并不等于在某个给定时刻投资于研发活动，然后就能以给定概率在将来收获成果。创新是包含若干阶段的整体过程。第一阶段通常是基础研究，即研发中“研”的部分。这些研究得出的成果未必可以用来申请专利，其主导者也未必是为了盈利动机而工作。接下来是应用研究和开发阶段，即研发中“发”的部分。基础研究的动力来自哪里？基础研究如何与更直接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相结合？什么样的制度对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最适用？这些将是本章试图解答的问题。

1. 谁会成为发明家？

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概率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根据本节的讨论需要，我们把发明家定义为在其一生中至少能获得一项专利的人。[\[1\]](#)图10.1a显示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人在1996—2012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一项专利的概率同他父母的收入有多大关联。[\[2\]](#)父母的收入以x轴的点表示，划分为百分位。该图展示了对应每个百分位的父母收入，有子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比率。图中的J形曲线说明，当父母的收入较低时，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很低，而且随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多少提升。相反，如果进入收入分配的较高部分，特别是最高的20%，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迅速上升。

基于美国历史数据的图10.1b则显示，父母收入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在更长和更早的时期里（1880—1940年）有着同样的J形关系。[\[3\]](#)

最后，图10.1c利用1988—2012年芬兰的数据，再次证明父亲的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之间存在这种J形关系。[\[4\]](#)这一相似性很令人惊讶，因为芬兰的受教育机会比美国平等得多。根据PISA项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评估成绩，芬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非常出色：在2018年的PISA阅读测试中，芬兰在77个国家里排名第7位，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排名第13位和第23位。[\[5\]](#)另外，芬兰从幼儿园到博士的教育完全免费提供，因此是全民可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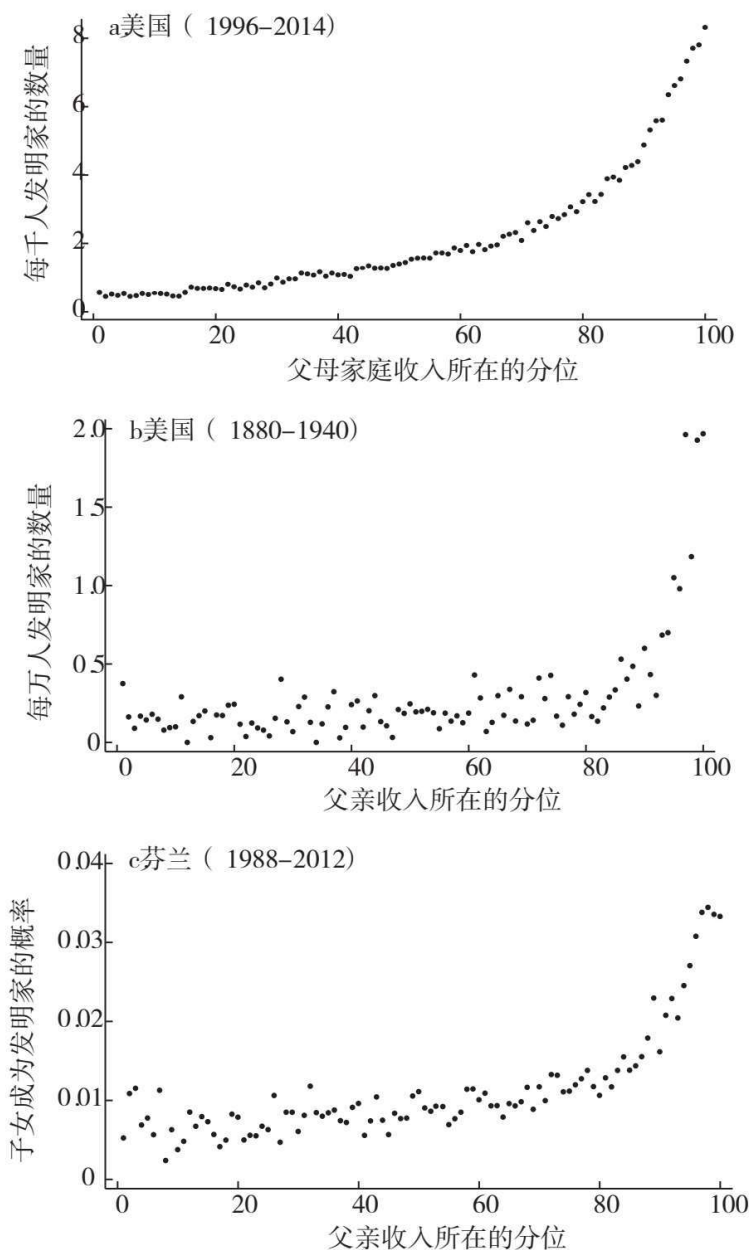


图10.1 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

资料来源: a.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 no. 2 (2019): 647-713, 图1A; b.转引自U. Akcigit, J. Grigsby and T. Nicholas, “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 图8A; c.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 “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 图1C。

美国的J形曲线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芬兰这样平等程度高得多的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曲线？

美国社会与家庭因素对创新的阻碍

为解释美国的J形曲线（图10.1a），我们首先想到两个因素。首先，父母的收入对个人能力有初始影响：遗传差异，表现在从事创新类职业的天赋和愿望上。此外，收入较高的父母还能帮助子女克服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

图10.2展示了个人在一生中做出发明的概率（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家的数量）与他的自身能力（横轴表示标准化的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三角形曲线代表父母收入属于最高的20%群体的子女，圆点形曲线代表其他父母群体的子女。对这两种情形而言，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与自身能力的关系均呈现J形曲线。即是说，能力一般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较低，能力突出的则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图中最右侧部分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则说明，对于有类似极高天赋的子女而言，如果父母的收入状况很好，他们做出创新的概率将大幅提升。这种差距在能力普通的子女中间则并不突出。总之，该图证实了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

同时显示父母收入状况对于天赋出众的孩子取得成功也非常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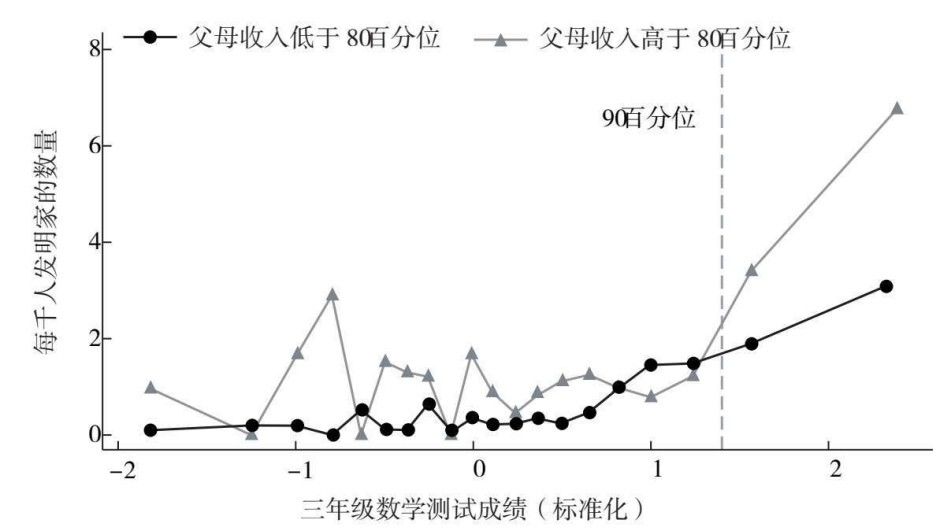


图10.2 获得专利的比率与三年级数学测试成绩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A. Bell,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 no. 2 (2019) :647 -713 ,图IV (A)。

为了区分自身能力同家庭环境对发明创造概率的影响，亚历山大·贝尔（Alex Bell）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划分出两组群体：位居收入分配顶部的20%群体，以及剩余的80%群体。[\[6\]](#)在此基础上，他们模拟了一种虚拟场景：三年级学生的自身能力在这两组群体中呈均匀分布。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社会环境对这些学生自身的能力没有影响。在此假设之下，他们证明两组学生在创新成就上的差异有68.8%（超过2 /3）可归因于社会背景。我们需要留意到，上述假设过于严格，因此68.8%的估计是个下限值，社会环境对子女们做出发明创造的概率的影响无疑还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推测，有多种影响创新的社会壁垒。首先有财务壁垒，父母收入有限会使子女在追求学业时面临不利条件。其次有知识壁垒，较富裕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知识传授给子女。最后还有文化和志向的壁垒，子女会受父母期许的目标以及父母自身职业选择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描述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从地理维度看，我们观察到子女所处的就业区的创新性越强，他们后来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从父母的职业维度看，父母从事的产业创新性越强，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也越高。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与子女在创新领域上存在重合现象，创新者的子女如果能做出创新成果，其创新领域几乎总是与父母的相同。

从美国关于发明的社会与家庭背景的数据中，我们能得出哪些启示？首先，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创新概率之间有明显关联，特别是对高收入父母群体。这种关联部分源于家庭背景对子女自身能力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因为下层家庭的子女从事创新要面临各种进入壁垒。另外还有明显的文化壁垒，子女的目标选择因为家庭出身而存在差异。

芬兰的谜团

在观察芬兰时，我们看到父母收入水平与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之间存在与美国类似的关联性，然而芬兰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美国，这个悖论何解？有研究试图对此做出回应，^[7]依据是芬兰在1988—2012年的三个数据库，包括该国关于收入、社会职业状况、父母教育水平的行政数据，欧洲专利局关于12 575位芬兰发明家在此期间的数据，以及芬兰的义务兵役制度提供的

全体男性国民（包括发明家在内）的智商成绩。虽然智商的测评方法有时存在争议，却与上述三年级测试成绩类似，依然可作为对个人能力的一种度量。

图10.3展示的是，个人做出创新的概率与父母教育水平的关系（其中图10.3a是父亲，图10.3b是母亲）。从中可见，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越大。尤其是父母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时，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比其他入明显更高。

我们来看看对芬兰谜团的解释。在估计芬兰的创新概率与父母收入的关系时（图10.1c），我们也发现了熟悉的J形曲线：发明概率随父母收入上升。根据这一基本关系，我们模拟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场景：发明概率是父亲收入在全国收入分配阶梯中的位置的函数（图10.4中的实线）。区别在于，这里的父母收入不是连续测算，而是划分为多个等级。较低的收入等级位于图中的左侧，较高的收入等级位于右侧。

接下来，我们对发明概率与父亲的收入等级做回归测算，得到了与图10.1c相同的图形：发明概率随父母收入的等级上升而提高。从基本的实线开始，我们分析了在控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图中虚线），发明概率与父母收入变化的关系。^[8]我们看到曲线变得略为平缓了一些，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发明概率存在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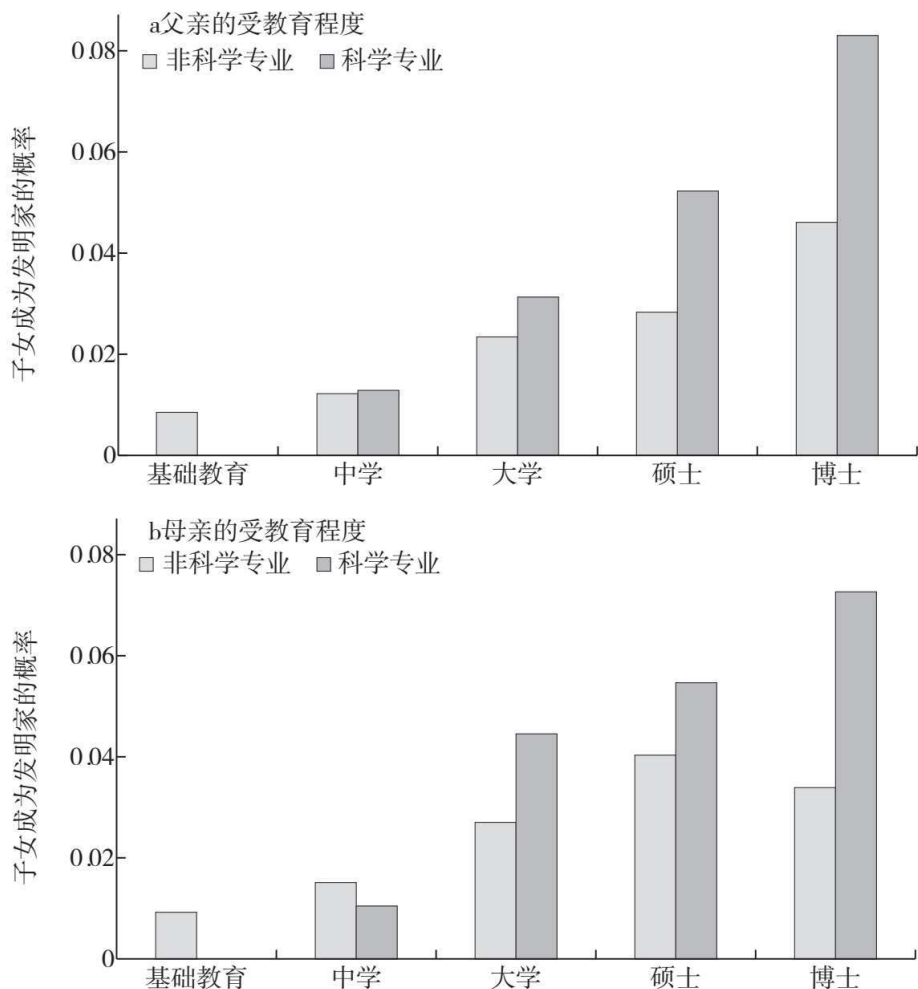


图10.3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成为发明家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 “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 , 图5A和图5B。

接下来我们控制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图中虚点线）：该曲线变得平缓了许多，尤其是在父母的高收入水平上。这一结果确认

了教育对解释芬兰的J形曲线的重要意义：较富裕家庭的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较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较高，这对孩子有影响。尽管芬兰的教育体系有高度平等性和很高质量，父母的影响依旧是一个决定因素。此类影响无疑是通过知识传授产生的，另外也与父母可能给子女赋予的目标有关：一般来说，在科学领域有博士学位的父母会激发子女更强的人生志向与奋斗目标。

最后，我们考虑了个人的智商因素（图中点线）：使J形曲线变得更平直。它表明父母收入与子女智商之间存在正向联系，对此该如何解释？这里我们感到缺乏把握，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显然比经济学家更有资格作答。[\[9\]](#)一种可能的说法是较富裕家庭的子女对智商测验的准备更充分。另一种说法是较富裕的父母有更高的技能，而父母的技能水平同智商之间有正向关联，父母的智商与子女的智商之间同样有正向关联。

简单来说，芬兰谜团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收入较高的父母往往追求更高的学业，继而影响了其子女做出创新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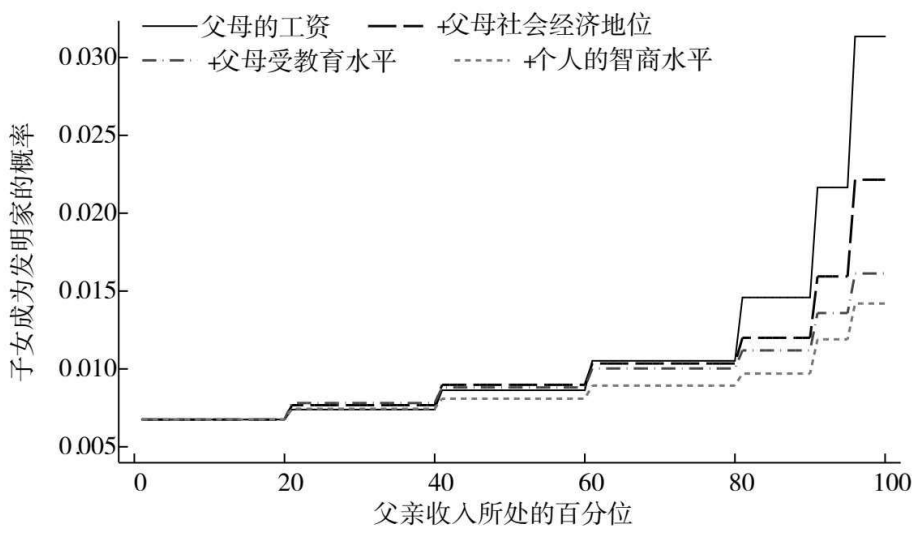


图10.4 分解父亲收入的影响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 “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 , 图7。

与美国的案例相比，在芬兰的案例研究中利用了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数据，证实了教育和目标设定在培养创新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显示了另一个因素的作用：子女智商与父母收入之间的联系。

芬兰的数据还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家庭环境可能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出现的障碍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设想有两个兄弟A和B，其父亲的收入属于最低的20%群体。A的智商接近平均水平，B的智商则非常高。如果我们把这位父亲替换为收入极高的人，则数据显示，这会使B做出创新成就的概率提升幅度达到A的提升幅度的3倍以上。更一般地说，与普通人相比，高智商的人成功做出创新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而提高的速率会快得多。或者说，较为贫穷的父母由于先天缺乏教育和人际关系资源，会制约高智商子女的创新潜力。所以，家庭背景的差异会让我们损失潜在的爱因斯坦。

教育政策与研发补贴之间的互补性

个人在先进知识的获得、科研职业的吸引力以及智能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现实直接影响增长政策的选择。有研究指出，人们会出于至少两方面原因而回避科研与创新类职业（Akcigit、Pearce and Prato, 2020）：要么缺乏从事此类职业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要么拥有这些资源，却愿意选择其他发展路径。

[10]

研发补贴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科研与创新职业的回报（尤其是减少使用实验室设备的成本、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以鼓励有资质的人更多选择此类职业。另一方面，公共教育投资让出身平凡的人才能够追求更高学业，从而获得成为研究者与创新者的机遇。公共研发补贴与公共教育投资这两类政策可以鼓励不同人群从事科研职业，因此对创新与增长具有互补的积极效应。

当政府预算较为紧缺的时候，它应该把大多数资源投入教育，以使创新引领型增长最大化。相反，如果预算资源更为充足，最优创新政策应该把公共教育投资与研发补贴结合起来，不至于为后者而牺牲前者。只有当足够数量有天赋之人达到知识前沿，并可以决定是否从事科研职业的时候，公共研发补贴才能对创新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 [11]

谁是企业创新的获益者？

在分析不同类型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把创新者视为个体创业者，全部创新租金将归其所有。但在现实中，创新经常是在企业内产生，由此带来了创新租金如何在创新者与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分配的问题。

近期有项研究试图解答上述问题，同样是参考芬兰的相关数据（Aghion、Akcigit、Hyytinen and Toivanen, 2018）。该研究分析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依据是企业招募每名雇员的详细信息：个人的工作类型（蓝领或白领等）、薪水状况等。 [12] 学者们收集了1988—2012年的此类信息，并与欧洲专利局的专利数据做匹配。与之前的例子一样，把发明家定义为在1988—2012

年从欧洲专利局至少获得一项专利授权的人。从数据中能够直接看到一个人是独立工作还是在企业内工作。该研究只针对在企业内工作的发明家，以及白领雇员、蓝领雇员和企业主等，[\[13\]](#)并且集中分析刚从欧洲专利局获得某项专利授权的发明家，关注这一事件对他们的收入及企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人会带来何种影响。

研究者把创新从专利获得前5年到之后10年产生的总收入做了分解，划分到企业中的四类角色身上：企业主、发明家、白领雇员、蓝领雇员。图10.5描述的分解结果显示，企业主占据创新回报的最大份额，达到44.6%。之后为人数比其他类型员工更多的蓝领雇员，占比为25.7%;白领雇员占比为21.8%;最后是只占总收益7.9%的发明家。总体而言，雇员在创新回报中的占比接近47%。这种情况是芬兰独有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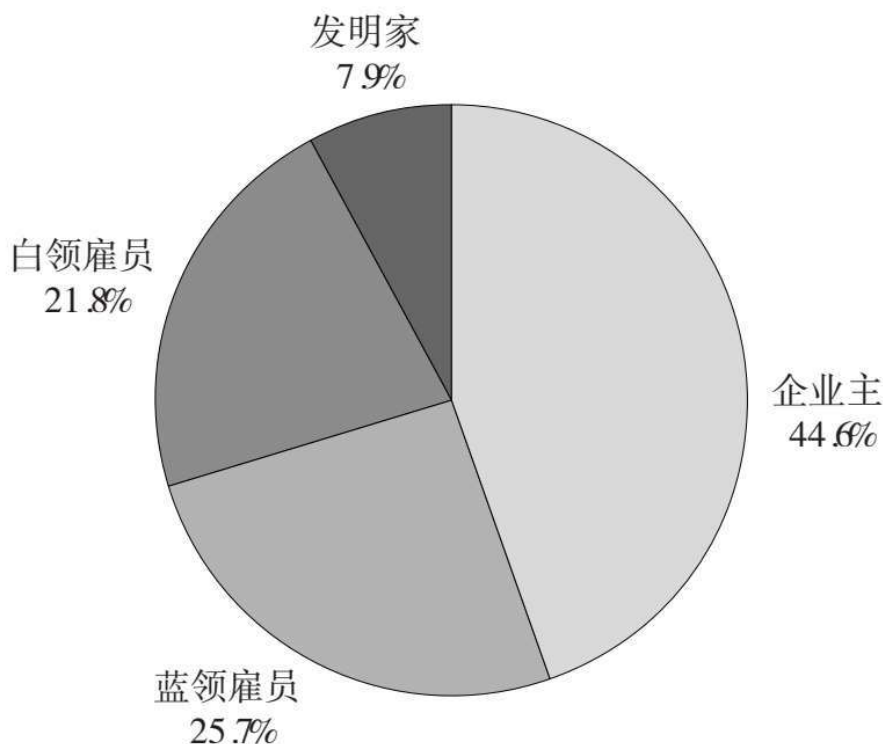


图10.5 根据社会职业类别划分的创新回报的份额分配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U. Akcigit, A. Hyytinen and O. Toivanen, “On the Returns to Invention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Finland,”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2018): 208-212, 图2。

有项类似研究采用的是美国企业与雇员的纳税数据，结合美国专利商标局在2000—2014年的登记数据（Kline、Petkova、Williams and Zidar, 2019）, [14]主要针对有税收和专利数据可查并首次获得有高潜在价值的专利的美国企业。[15]这一样本共包含约2 000家企业。此类企业的规模通常小于在美国递交专利申请的企业的平均水平：在考察期内，其平均雇员人数为61人。研究者希望弄清楚，新专利带来的收入冲击对企业雇员的薪酬有何影响。为此，他们对比了专利申请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批准的

企业与相同技术领域的申请被驳回的企业。

该研究首先发现，近30%的专利收益以工资形式归属了雇员，这个比例小于芬兰的47%。另外，工资涨幅对不同类型的雇员有所区别。新专利对新近入职的雇员的薪酬没有影响，只有资深雇员从创新中获益。而在这些资历较深的雇员中，男性员工从创新中获益最多，也就是说创新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最后一点是新专利带来的薪酬提高集中在公司收入最高的25%群体（即第4个四分位群体）。这对应着我们在芬兰看到的情形：在芬兰的企业中，白领员工人均获得的创新收益更高。

所以，本节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创新不只奖励了企业内部的发明家，还让该企业的员工与企业主获益，但根据其社会职业类型、资历和性别存在显著差别。上述分析的一个有意思的启示是税收对创新的影响：我们不能只关心所得税对发明家本人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对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净收入的作用。为理解这一点，可以设想发明家属于收入分配中最高的5%群体，企业主则属于顶层0.1%群体。采用过于简化的推理可能认为，只提高最顶层0.1%群体适用的税率，而不改变顶层5%群体的税率，将不会影响创新。然而这一推理并未考虑企业主在创新进程中的重要性。通常来说，企业主需要牺牲自己的一大笔收入，以支持创新投资。打击他们也可能让整个创新进程遭到破坏。

2.基础研究的推动力

企业家和创新者居于此前三章中揭示的熊彼特范式的核心，[\[16\]](#)他们依靠前人积累下的知识，投资于研究开发，以提高实现成功创新的可能性。为什么要创新？因为创新可以市场化并带来

货币租金。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发挥着关键作用，保护创新者及其货币租金不被抄袭模仿侵害。这一范式为理解之前各章提到的若干事实与经验谜团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思路，不过与经济学中所有范式一样，它们反映的现实本身更为复杂。

我们先谈谈知识积累过程。在现实中，创新不只是基于过去的创新，还更主要地依靠基础研究，后者并不遵循企业研发的逻辑和激励。学术界与独立实验室的研究者往往比企业中同等水平的研究人员待遇更低。[\[17\]](#)那为什么本可以在企业获得更高待遇的人会选择大学的职位呢？此疑问可以用一个词回答：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他可以投入某个新项目，但在中途选择放弃，转到新路径上去探索。他可以自由地启动结果并不成功的研究项目，或未必有市场化应用前景的项目。此外，他可以同其他科研人员开放交流，自主决定与哪些人开展合作，并自由地传播推广其研究成果。因此，这是在薪酬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

大学的学术自由与企业的专注研究

为什么我们既需要基础研究，又需要应用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主要在以学术自由为规则的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和商业创新主要在企业进行？为简化起见，我们设想所有创新并不像之前讨论的那样只需要一个步骤，而是如图10.6所示包含两个阶段。[\[18\]](#)第一个阶段是基础研究的发现，例如发现一个新定律、一个新分子式或一种新的细菌。这称为阶段0，从事基础研究。之后，基于这个理念或初始发现，将有第二个发现来完成创新进程，并产生市场化的产品，例如某种疫苗或新药。这称为阶段1，从事应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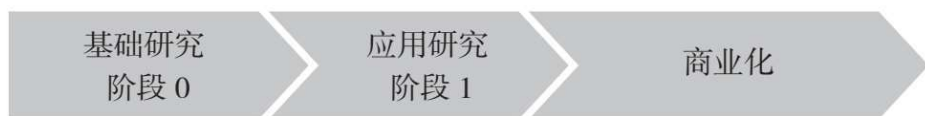


图10.6 研究开发进程的图示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每个阶段都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未必都能得到预期结果。尤其是，如果阶段0的基础研究未取得成功，则不会有后来的阶段1。从理论上讲，每个阶段都可以在学术界开展，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和传播成果；也可以在企业里开展，研究计划与成果传播受严格管束。那为什么现实中的基础研究大多数时候是在大学里进行呢？

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19\]](#)基础研究尤其具有不确定性，依靠试错推进：研究者在探索新领域时，并不清楚可能有何种具体应用。允许研究者自由选择研究策略具有双重优势：其一是信息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的学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为取得最大成功概率应该如何前进、选择哪条路径以及放弃哪些方向；其二是财务优势，为换取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通常接受比企业研究人员更低的薪酬。如果在研究进程的所有阶段（包括那些并不带来更加实用的可市场化的研究）都按私人部门的水平支付薪酬，无疑会过分昂贵。最后还有第三个优势：研究人员之间的开放思想交流。基础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之间的自由交流，以及每位研究者都能在开展项目时自由地参考同行在过去获得的成果。A学者提出某个思想，但没能看到最终的结论，不过B学者知道如何把这一萌芽转化为成熟的理念，或许还能在后期（阶段1）实现市场化。如果限制阶段0的开放式思想交流，则能够进入阶段1（具有成功创新潜力）的思想流量必然萎缩。

基础研究人员并不总能预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条研究道路（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解决它们同样关键），可是对阶段1的应用研究而言，前进的方向却较为清晰。为了在阶段1实现可市场化的创新，研究队伍必须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特定的创新领域。企业的作用是预先弄清楚准备投资于哪条产品线，然后把极为准确的指令传递给自己雇用的研究人员。于是，这些研究者不能自由决定研究计划，也没有同其他研究人员交流相关工作信息的自由，因为企业必须防范创新被窃夺的风险。越是靠近市场化的创新，此类风险越突出。而自由的这种双重损失则依靠比学术界更高的薪酬来弥补。

简言之，学术研究有三个特点：比私人部门的研究成本更低；允许研究者自由决定研究计划；允许研究者利用学术自由与其他同行开放交流。[\[20\]](#)妨碍学术界研究者的自由只会干扰创新进程，最终削弱新思想的流动与丰富，也不利于新的研究者进入学术界，让他们转向其他职业。

我们暂时设想在这个世界中，每一步研究进展和每一个新定理都以专利形式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每一位应用研究者都必须为参与阶段0的所有基础研究者支付专利费，为此要承担巨大的财务和行政成本，因而可能严重制约阶段1的工作开展。例如，众多的专利拥有人可能阻塞某种新药物的研究路线，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公地悲剧”，意指公共品的产权过于碎片化，以至于妨碍了潜在的创新。[\[21\]](#)虽然确实应该利用专利保护商业创新及相关应用研究的产权，但如果将其滥用于基础研究阶段，则可能变得事与愿违。这个范式的另一个启示是，最具突破性的商业创新更容易出现在更自由的制度环境中。

老鼠与学术

扩大基础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对创新有何影响？菲奥娜·穆雷等人（Fiona Murray, 2016）在《论老鼠与学术》一文中以美国的生物学界为例，分析了削弱基础研究的产权（相当于扩大开放度）的自然实验对创新的影响。[\[22\]](#)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对推动生命科学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在30年前，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科学革命：人们有能力培育经基因改造的老鼠，例如可以加入或删除一个导致癌症或糖尿病的基因。[\[23\]](#)类似基因实验在超过1.3万只老鼠身上开展，每个实验都在科学期刊上刊登出首发成果。我们可以把此类首发文献称为“老鼠—论文配对”。这一技术革命包含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展出了Onco（癌基因）技术，用于制造“肿瘤老鼠”（Onco Mouse，源自希腊语中的肿瘤一词onkos），即植入致癌基因的转基因老鼠，使之有很高概率患上特定类型的癌症。[\[24\]](#)做这种基因改造的目的是推进癌症研究。1988年，该发明获得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批准。杜邦公司由于为此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因而掌握了该专利的排他性控制权。接下来的第二步，杜邦公司开发出了Cre-lox（重组酶）技术，通过它可以制造出特定基因能被打开或关闭的老鼠。

自然实验的由来如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要求杜邦公司同美国政府及杰克逊实验室（Jackson Labs）——位于缅因州巴尔港的老鼠资源库——签署与Onco和Cre-lox技术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作用是取消杜邦公司的产权，让学术研究者更容易获得这两项技术以及由此改造的老鼠。Cre-lox和Onco技术的谅解备忘录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签署。于是通过备忘录签署前后的情况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技术的获取便

利性是否对基础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根据我们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分析，这一自然实验应该首先带来基础研究中的新思想的更多涌现，然后会促进研究理念的多样性和新奇性。穆雷等人看到的结果正是如此。具体来说，他们分析了截至2006年引用过一次或多次1983—1998年“老鼠—论文配对”文献的全部论文。总计有2 171篇这样的原始配对文献，被引用次数超过43.2万。这些学者发现，在Cre-lox技术备忘录签署后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与经过该技术改造的老鼠有关的配对文献的引用次数增长了近20%；第二，引用次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有新鲜内容的论文、[25]新作者发表的论文、之前从未引用过此类配对文献的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以及新创立的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Onco技术备忘录产生的效果与之类似。由此可以认为，提高基础研究的开放性确实促进了创新。

基因测序

人类基因组测序是另外一个案例，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基础研究的发现产生负面效果。对此的开创性研究来自海蒂·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 2013）。[26]基因组测序意味着分析构成基因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基因是DNA片段，包含制造一种或多种蛋白质的指令。这些蛋白质决定每个人的全部显性特征，名为表型（phenotype）。基因型（genotype）是指一个人的基因构成，它会导致每个人特定的表型。由于基因型与表型之间的联系，“异常”基因会给出制造异常蛋白质的指令，引发病症。[27]例如，囊性纤维化、血友病或亨廷顿病等遗传疾病就是由病人的基因所致。DNA测序的意义何在？它可以给我们展示基

因型与表型的具体联系，以便检测出疾病，并可能开发出基因疗法，即尝试用健康的基因替代导致疾病的基因。

海蒂·威廉姆斯构建了一个数据库，以追踪基因组测序的时间进展。从图10.7能看到，该领域的两个主要参与者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牵头协调的公共资金支持研究项目；以及赛雷拉公司（Celera Corporation），专业从事基因测序的私人企业。1998年创立的赛雷拉公司拥有若干基因的知识产权，从1999年启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但在2001年中断，只完成了部分基因的测序（名为“赛雷拉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则始于1990年，目标是把全部测序成果公开。该计划持续到2003年，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也包括赛雷拉基因。到2003年4月，全部基因的测序信息都已免费提供给公众，包括被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测序的赛雷拉基因。



图10.7 基因测序的关键事件的时间线索

资料来源: H. L. Willia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Human Gen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 no. 1 (2013) :1 -27 , 图1。

2001—2003年，赛雷拉公司试图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它已经做完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尚未开展的那部分基因测序。设想另一家公司（如辉瑞）根据赛雷拉已获得知识产权的某个基因发现了某种遗传病的检测方法。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辉瑞公司与赛雷拉公司最后会达成一份互利的授权协议，使该检测的累积式研究进程不会遇阻。然而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例如当研发成本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两家公司或许就无法达成协议，使基因检测方法不能被开发出来。

赛雷拉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涉及相关基因的科学发表有何影响？海蒂·威廉姆斯的研究显示，在赛雷拉公司的基因信息于2003年被人类基因组计划重新测序并公布之前，与之有关的研发活动比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并立刻公开的其他基因少20%~30%。此外，赛雷拉基因产生的科学发表成果在2001—2009年比其他基因少大约40%。最终使得赛雷拉基因被用于诊断检测的机会减少了38%。因此，该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都造成了负面效应。

私人企业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我们的多步骤研究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基础研究要在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多见于企业。但在现实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这一区分并不如模型所示的那般鲜明。首先，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应用性或偏向基础性的大量研究。其次，在给予研究者充分自由的大学与完全指挥其行动的企业之间，还有些企业允许研究人员有部分自主权，例如谷歌公司。最后，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也经常有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基础，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应用。

近期有研究区分了企业内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28\]](#)许多企业有不只一家工厂，往往对应不同的产品线，这些产品线可以属于相同或不同的产业部门。该研究表明，一家企业内部经营的产业部门数量越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越多。对此的基本解释是，基础研究要为多个产业的应用研究发挥阶段0的作用，而应用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特定产业。这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础研究促进了创新的多样性。当然，由于基础研究会带来比应用研究更多的正外部性，而这些外部性对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同样有利，故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通常还是不足。[\[29\]](#)因此，政府与大学仍然要扮演关键角色。

3. 结论

本书第5章提到了创新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观念。然而如本章所示，个人成为创新者的机遇存在严重不平等，尤其是，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子女做出创新成就的关键决定因素。相应地，学校在促进机会平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有效传播知识，并激发学生成为未来的创新者。

本章还把创新描述为一个多步骤的进程，从基础研究起步，再进入更实用阶段，并推出市场化的新产品。我们强调了大学作为学术自由和开放精神的守护者的角色，这些环境对保证基础研究必不可少，而应用研究阶段自然更适合在企业内部开展。至于大学的治理及其与外部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何有助于它们发掘最大的创新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尚待探究的课题。[\[30\]](#)

[\[1\]](#) 需要注意到，从更为广泛的创新视角看，这一定义或许过于严格。

[2] Alex Bell, Raj Chetty, Xavier Jaravel, Neviana Petkova, and John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 no. 2 (2019) :647 -713.

[3] U. Akcigit, J. Grigsby, and T. Nicholas,“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04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anuary 2017) .

[4]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ri Hyytinen, and Otto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7) .该研究对于发明的定义是，向欧洲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5] 如果看数学和科学的测试成绩，则芬兰在77个国家里排名第10位，美国 and 法国分别居于第25位和第26位。

[6] Bell, Chetty, Jaravel, Petkova, and Van Reenen,“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7] Aghion, Akcigit, Hyytinen, and Toivanen,“The Social Origins of Inventors.”

[8] 我们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为四类:蓝领、低层白领、高层白领、其他。

[9] 关于这一主题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是Steven Pinker的*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2002) .

[10] Ufuk Akcigit, Jeremy G. Pearce, and Marta Prato,“Tapping into Talent:Coupling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86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 September 2020) .

[11] 与芬兰的案例分析一样，这项研究在估计中利用智商测试成绩（但这次是丹麦的数据）来测算个人的初始能力。而Bell et al. (2019) 对美国的研究则是采用三年级的数学测试成绩。参见Bell et al.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12]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ri Hyytinen and Otto Toivanen,“On the Returnsto Invention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Finland,”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2018) :208 -212.

[13] 企业主的含义是占企业资本份额不低于50%的股东。

[14] Patrick Kline, Neviana Petkova, Heidi Williams and Owen Zidar, “Who Profits from Patents? Rent-Sharing at Innovative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 (2019) :1343 -1404.

[15] 专利的潜在价值由专利申请中的某些客观特征来判断。

[16] 与前一小节不同，我们在本节中对企业主与创新者的身份不做区分。

[17] Scott Stern考察了同时收到大学与企业的职位邀请的研究人员的情况，并证明选择在大学工作会有财务损失，参见Scott Stern, “Do Scientists Pay to Be Scientists?” *Management Science* 50, no. 6 (2004) :835 -853. See also Jeffrey L. Furman and Scott Stern, “Climbing atop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Cumulative Resear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no. 5 (2011) :1933 -1963.

[18] 对研究进程的这线性描述本身也是高度简化的。在现实中，经常有基础研究的新思想来自靠近市场化的应用研究。

[19] Philippe Aghion, Mathias Dewatripont, and Jeremy C. Stein, “Academic Freedom, Private-Sector Focus, and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9, no. 3 (2008) :617 -635.

[20] 我们对大学作用的分析集中在研究上，而没有涉及教学。对这两种活动的互补性的社会学分析，可参见Pierre-Michel Menger, “Academic Work: A Tale of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Teaching,” *Sociologisk Forsking* 53, no. 2 (2016) :175 -192.

[21] 私有化可能是避免公共品滥用的好办法。因为利益所系，私人所有者会关心资源的保护。然而，私有化可能导致产权的过分碎片化。如果众多私人利益方共享同一资源的所有权，每一方都可能妨碍其他人对其利用，正如专利的情形所示。参见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Harvard Law Review* 111, no. 3 (1998) :621 -688.

[22] Fiona Murray, Philippe Aghion, Mathias Dewatripont, Julian Kolev, and Scott Stern, “Of Mice and Academics: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Openness on Inno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 Economic Policy* 8, no. 1 (2016) :212 -252.

[23] 生物学家Mario R. Capecchi、Sir Martin J. Evans和Oliver Smithies获得

了2017年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的利用胚胎干细胞对老鼠做特定基因改造的原理”。

[24] 致癌基因（oncogene）指可以使普通细胞转化为癌细胞的基因。

[25] 论文内容的新奇度由其包含的新的关键字的比例测算。

[26] Heidi L. Willia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Human Gen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 no. 1 (2013): 1-27.

[27] 事实上，同一基因可能是多个基因型-表型连接的组成部分，某个基因型-表型连接也可能涉及多个基因。

[28] Ufuk Akcigit, Douglas Hanley, and Nicolas Serrano-Velarde, “Back to Basics: Basic Research Spillovers, Innovation Policy an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aa061>.

[29] 不过，我们仍可以考虑帮助提高阶段0的创新者的报酬的政策。有关研究可参考Jerry Green and Suzanne Scotchmer, “On the Division of Profit in Sequential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6, no. 1 (1995): 20-33. 这两位学者认为，连续创新（进程中的每个阶段由不同企业完成）产生的利润应该更公平地在各个阶段之间予以分配。因此，延长阶段0的专利的有效期，可以让承担基础研究成本的企业分得更大比例的利润，最终使基础研究投资提升到更合理的水平。另可参见Suzanne Scotchmer,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Cumulative Research and the Patent La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no. 1 (1991): 29-41; Suzanne Scotchmer, “Protecting Early Innovators: Should Second-Generation Products Be Patentabl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no. 2 (1996): 322-331.

[30] 这方面的一些初步回答可参见：Philippe Aghion, Mathias Dewatripont, Caroline Hoxby, Andreu Mas-Colell, and André Sapir, “Why Reform Europe's Universities?” Breugel Policy Brief 4 /2007, Brussels, 2007.

第11章

创造性破坏、健康与幸福

自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每个月都有关于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新书或文章发表。这些著述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并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这里不打算与之争锋，而是想在公式中加入一个变量：创造性破坏以及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以创新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经常遭到非议，指责它给人们带来了新型风险：同企业和生产活动的创造、毁灭相伴的风险。安妮·凯斯（Anne Case）与安格斯·迪顿指出：“所有创新都伴随着如下问题……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不只是创造，还有破坏。它消灭了过去存在的工作岗位，并受医疗保险费用的加速推动，把劳动者扔进越来越不利的、缺乏社会安全网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工作岗位支撑的生命与社区因此面临风险，甚至走向绝望和死亡。”^[1]

人们可以把整个职业生涯献给一种职业或一家企业的有就业保障的时代已经终结。创造性破坏在创造新工作的同时消灭现有工作，迫使人们不断重新检讨自己，接受没有什么可以一劳永逸的现实，并反复矫正自己的职业道路。

创新在何种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因为岗位丢失、工资停滞或学历过时而失去位置的风险？这一风险对健康与幸福有何影响？我们能做些什么，使创新给生产活动与劳动者带来的更大流动性不至于造成大多数人的不安和失业？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最有

助于实现创新引领型增长与个人幸福的协调？本章将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1.创造性破坏、失业与地位的丧失

我们首先分析创造性破坏在何种程度上增加了个人失去工作的概率，以及导致其原有的知识和学历变得过时。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2]

创新会通过创造性破坏，即用新的生产活动取代旧的活动，加大还是减少雇员失去工作的概率？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3]一方面，创新使某些业务活动变得过时，摧毁了部分岗位，把原先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推回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市场有摩擦，找工作的人不会马上得到新的岗位，失业率因此会上升。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相反的效应，创新制造了新的岗位，这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最后还有第三种所谓“资本化效应”，其含义是：更高的创新率带来更高的增长率。[4]创造新业务的任何投资都是以未来的利润作为回报，随着经济的整体成长，这些利润将增长得越来越快。换句话说，增长率越高，创造新业务就越有利可图，继而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以降低失业率。请注意这三种效应并非同步，工作摧毁效应在短期发生，工作创造与资本化效应则在更长期起作用。下文将指出，有关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经历的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感受确实多发生在短期。

下面我们转入对创造性破坏的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斯蒂芬

·戴维斯（Steven Davis）与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研究了美国就业与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受此启发，近期阿吉翁等人（Aghion、Akçigit、Deaton and Roulet）考察了美国各就业区内的创造性破坏与就业之间的关联。^{[5][6]}该研究采用的地方就业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创造性破坏率的数据则来自商业动态统计（Business Dynamics Statistics），包含地方层面的工作创造与摧毁率以及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数据。创造性破坏率的计算方法是，把相应就业区内的工作创造率与工作摧毁率相加。^[7]这些比率的测算则利用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中包含的全体美国企业的信息。图11.1表明，在2005—2010年间，美国的工作创造与工作摧毁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工作摧毁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工作创造率最高的地区。这恰恰符合创造性破坏的本意：工作的破坏与工作的创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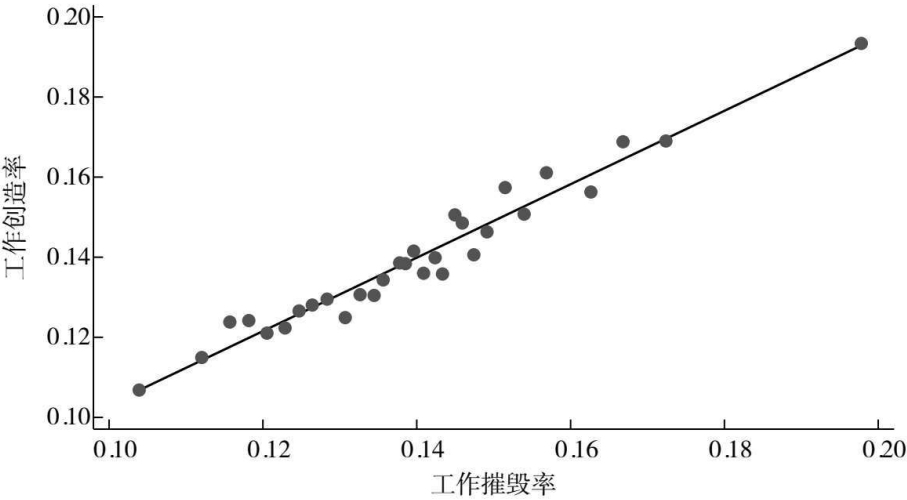


图11.1 美国的工作创造率与工作摧毁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ç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 (2016) :3869 -3897。

图11.2则描述了创造性破坏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平均而言，在2005—2010年间有最高创造性破坏率的就业区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也就是说，身处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就业区的人们在某些时点有更大的概率经历失业。然而，这一失业经历并不注定是终身性的，因为如图11.1所示，此类就业区中的工作创造数量也更为密集。当然，创造性破坏毕竟意味着在某些时点面临更高的失业概率。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们将讨论失业经历给人们的健康与福利造成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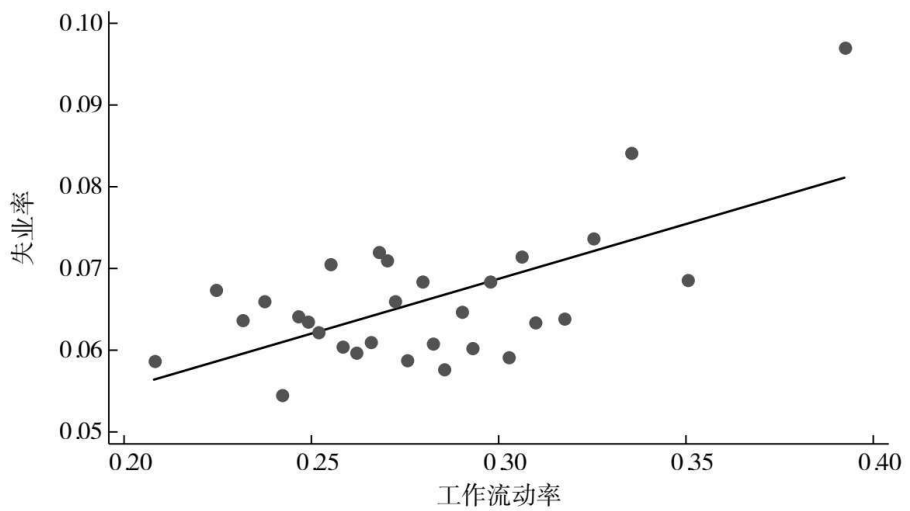


图11.2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的关系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 (2016) :3869 -3897。

创新与学历过时

创新对原有学历与技能会有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几位学者汇总了芬兰在1988—2012年间关于个人收入、企业层面的核算和专利的若干数据库（Aghion、Akçigit、Hyytinen and Toivanen）。[8]我们从之前关于发明家的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如何分配的研究入手（见本身第10章），发现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存在不均等的现象。事实上在创新出现之前的5年中，蓝领员工的工资平均会损失1%，在创新后则会增加2.3%。而白领员工的工资在创新前没有损失，在创新后会增加2%。所以，创新给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最缺乏技能的员工，他们的平均收入在创新成果出现前的数年有所下跌。

我们还分析了差异的另一种来源，即个人的年龄以及距离其获得最后一个学位的时间。初步看，年龄似乎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较年轻的员工能从创新中获得好处。此外，平均而言创新与员工丢掉工作的概率呈正相关。这符合我们以往的发现：创造性破坏与失业在美国的总量数据上有正相关关系。创新与失业概率的关联似乎在较为年长的员工中更为突出。当然，如果另外引入一个因素，即距离员工获得最终学位的时间，它反映了人们“同知识前沿的距离”，结论会大为不同。距离最终学位的时间越长，个人的创新收益越低，这一时间每增加1年，创新收益将缩水5个百分点，失业概率增加0.4~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创新使学历较为老旧的人失去了地位。

总体上，创新造成了工作与地位的丧失。稍后，在探讨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2.创造性破坏与健康

健康与创新：光明的一面

在本书第2章，我们考察了创新对解释全球层面的人均GDP起飞的核心作用，并观察到经济起飞同预期寿命起飞的同步性。这一重合意味着两个起飞有共同的起源。从表11.1中明显可见，创新对预期寿命提高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人均GDP的促进作用。[\[9\]](#)该表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在1961—201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上都向发达国家趋同。不过，预期寿命的趋同要突出得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的增幅是发达国家的2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幅（377%）仅略高于发达国家（324%）。

表11.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

	1961	2017	1961—2017 年的 变化	1961—2017 年的 增幅
发达国家				
人均 GDP	10 585	44 901	+ 34 316	324%
出生时预期寿命	68. 5	81. 5	+ 13. 0	19%
国家样本数量	27	27		
发展中国家				
人均 GDP	2 346	11 195	+ 8 849	377%
出生时预期寿命	49. 2	69. 2	+ 20. 0	41%
国家样本数量	84	84		

注：发达国家的样本包含27个经合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包含自196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10 (2015) :3150 -3182 (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www. ggdc. net/pwt](http://www.ggdcd.net/pwt)) ; World Bank.

在1961—2017年间，预期寿命的趋同比人均收入更显著，这一事实与创新直接相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现的青霉素和抗生素，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医疗进步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安格斯·迪顿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在1900年之前，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高于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0]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疫苗的引进和其他技术进步，这一现象被逆转。与之类似，在1950年之前，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而在此之后，50岁以上的人的预期寿命则大幅提高。虽然该进步有部分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吸烟的减少，但创新依然功不可没。例如，治疗高血压的利尿剂的发明，使美国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随后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

总而言之，创新在20世纪让全球的人类预期寿命得以显著提高，并使富国与穷国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预期寿命趋同。不过，创新的光明面因为黑暗面的存在而部分失色，这是下文的主题。

创新与健康：黑暗的一面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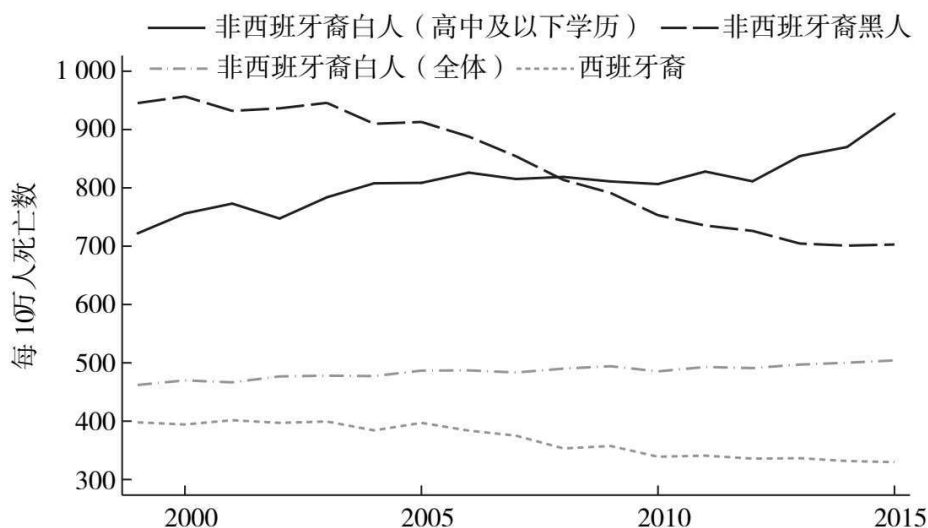


图11.3 美国不同种族和民族50~54岁人口的死亡率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7): 397-476, 图1。

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图11.4显示了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由于绝望而死的比率的变化，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的对比。在美国，该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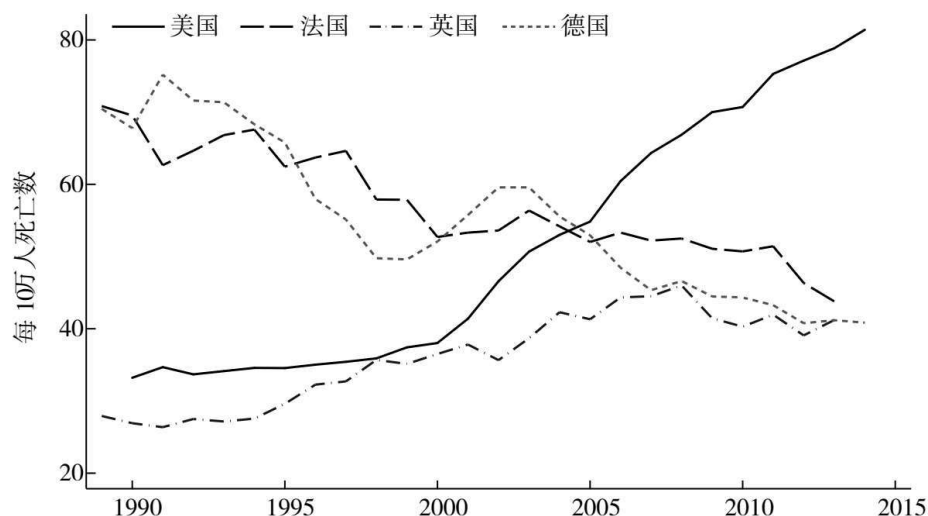


图11.4 各国50~54岁人群的绝望而死现象

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7) :397-476, 图5。

对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转趋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保障被削弱，并带来家庭不稳定加剧等后果。我们已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人们可以预期把整个职业生涯放在一家公司，从事一种工作，有确切的向上发展轨迹——走向一个创造性破坏成为惯例的新世界。创造性破坏尤其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贵族”群体，他们的工作、地位和收入丧失的风险加剧。这种风险感受导致的焦虑造成抗焦虑药品、阿片类药品与酒精的消费增加，继而使药品滥用、酒精中毒、肝病与自杀的风险提高，这些都引发死亡率的上升。

丹尼尔·苏利文 (Daniel Sullivan) 与蒂尔·瓦赫特 (Till Von Wachter) 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对美国的死亡率有显著影响。[\[12\]](#)该研究利用20世纪70—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就

业与收入的行政数据，并与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业前为同一家雇主至少连续工作3年的员工。发现这些员工的死亡率在失业后的1年上升了75%以上，并长期稳定在比未失业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该研究随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因素。从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来自解雇导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20%）。从长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个人对健康的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

丹麦奇迹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13]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1993年，丹麦在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中引入了名为“弹性保障”的新体系，它包含两个支柱。首先，企业的解雇程序被简化，例如给离职金设限额，很少发生诉讼，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14]其次，作为提高灵活性的补偿，有两种类型的保障：相当于工资90%的失业金（但金额有封顶），最长领取时间达三年；加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大力投资，让劳动者尽快掌握返回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

在这一研究中，罗莱特主要依据丹麦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数据库，包括个人纳税记录、与员工信息匹配的企业层面信息、失业保险机构的数据以及死亡记录等。为测算失业对个人

健康或药物上瘾的负面影响，她利用了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购买记录以及酒类消费作为指标。反映健康恶化的其他指标包括住院记录和医生的疾病诊断记录等。罗莱特对比了在2001—2006年间关闭的就业机构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与就业机构未受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龄、工作履历和技能等）类似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企业关闭似乎对各种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包括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消费以及找全科医生咨询的次数等。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企业关门对其员工的死亡率也没有显著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对比意味着，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存在与否，对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健康和预期寿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将考察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

3.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

人均GDP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提供了具体而客观的测量。不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人均GDP，为什么把人均GDP增长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比较确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幸福感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15\]](#)不过，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指出，相对于全体人口的比例而言，197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并不比1942年更多。[\[16\]](#)身处一个极端的人们认为，我们必须追求人均GDP的客观增长，因为这是一切繁荣和就业的源泉。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增长派，他们认为人均GDP增长及支持此类增长的政策是不幸福的根源：导致环境退

化、不平等恶化，并给大多数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压力和不安。

我们的几位经济学研究同行，如让-保罗·费杜斯、阿马蒂亚·森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认为除了人均GDP，我们还应该把其他发展指标纳入考虑，特别是反映环境、教育和健康的质量，以及控制失业和不平等的内容。^[17]

从之前各章到本章，我们讨论过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如何促进人均GDP增长同其他发展目标的协调。这里还能更进一步：来自民意调查的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直接分析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同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指数有何联系。不过与之前一样，在深入解析数据之前，我们最好还是从理论视角讲起。

理论上做何预测？

创造性破坏的第一个效应是消灭工作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者失业的概率。这至少会在短期破坏幸福感，尤其是当失业导致短期收入立即而显著下跌，并增加了更长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反映这一短期满意度打击的最佳民意调查办法是询问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水平。

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效应是创造新的岗位，从而提高未来找到新工作的概率。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还会推出新的业务、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使消费者的货币变得更有价值。创造性破坏的“创造”一面大多在长期发挥作用，通常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

最后是第三个效应，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更光明。

以上理论推导能够得出至少四个可以开展实证检验的预测：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增加压力或焦虑，主要源于它提高了人们遭遇失业的概率；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促进增长、创造就业，这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短期内消极影响占据主导，积极效应在更长期里较为突出；最后，当失业保障较为充分时，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效应也更为正面。

对理论的检测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工作替换率（新工作对旧工作的替代）或机构替换率（新机构对老机构的替代）来客观衡量创造性破坏的力度。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盖洛普的健康之路项目（Heathways）在2008—2011年开展的民意调查。盖洛普公司通过对近1 000名随机抽取的美国人的电话访谈，收集了超过35万个对其问卷的回答，据此测算出生活满意度指标。

第一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相反，是记录受访者报告的焦虑程度。它来自对如下问题的二选一回答：你是否在昨天的很多时候感到担忧？第二个指标基于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该表源自以民意调查研究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坎特里尔。[\[18\]](#)坎特里尔阶梯表是基于如下问题：设想有个自下而上从0到10排列的阶梯，顶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底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差生活，你感觉自己此时正站在哪级阶梯上？你预计自己在五年后会站在哪级阶梯上？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

这些满意度指标对创造性破坏有何反应？[\[19\]](#)图11.5表明：

创造性破坏增加了焦虑，但在控制了创造性破坏对失业的影响后，程度将减轻（虚线）。或者说，失业是创造性破坏加剧焦虑的作用渠道之一，但并非唯一渠道。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或许能看出，学历过时以及更普遍的失去企业中的位置也会造成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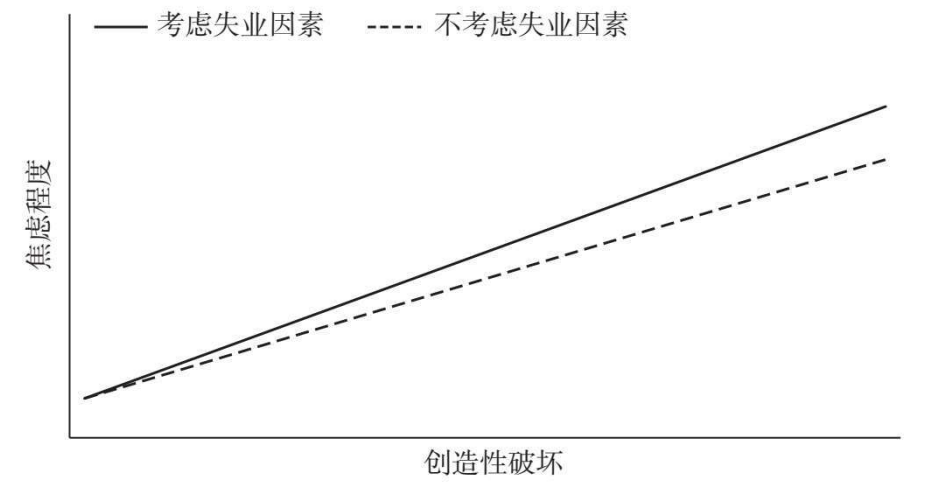


图11.5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程度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图11.6a则显示，即使考虑到对失业的影响（实线），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总体效应仍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工作破坏的负面效应被工作创造和增长的正面效应抵消了。而当我们忽略对失业的负面影响时，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具有积极效应（虚线）。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一个预测。

图11.6b是类似的情形，但利用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作为满意度指标。从中可以发现，较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对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提升甚至超出当前情形，两条曲线都比图11.6a中的对应曲线更为陡峭。事实上，即使我们考虑创造性破坏对失业造成

的影响（实线），其整体效应仍然为正面。也可以说，当人们展望五年后的情形时，他们通常会淡化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即失业），而强调其正面效应（即工作创造和经济增长）。

最后，图11.7比较了美国失业保障较为慷慨的各州（图11.7a）与失业保障较差的各州（图11.7b）。这些图表明，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用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测算）在失业保障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由此证实了类似丹麦模式的失业保障或弹性保障制度的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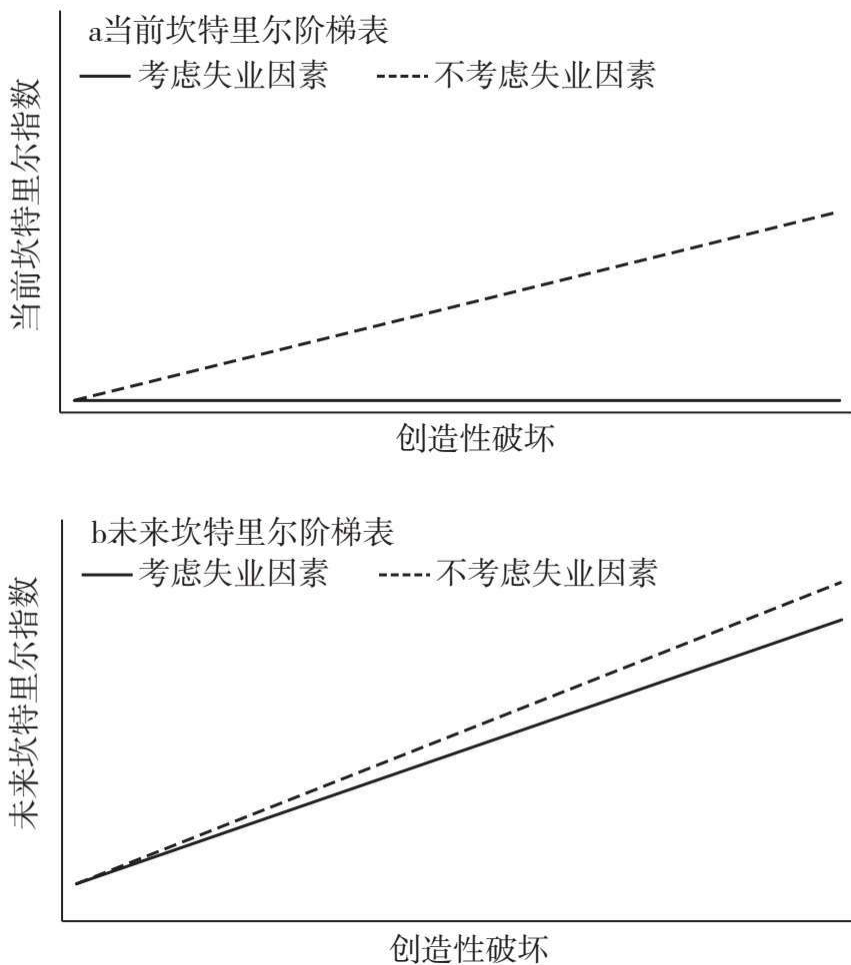


图11.6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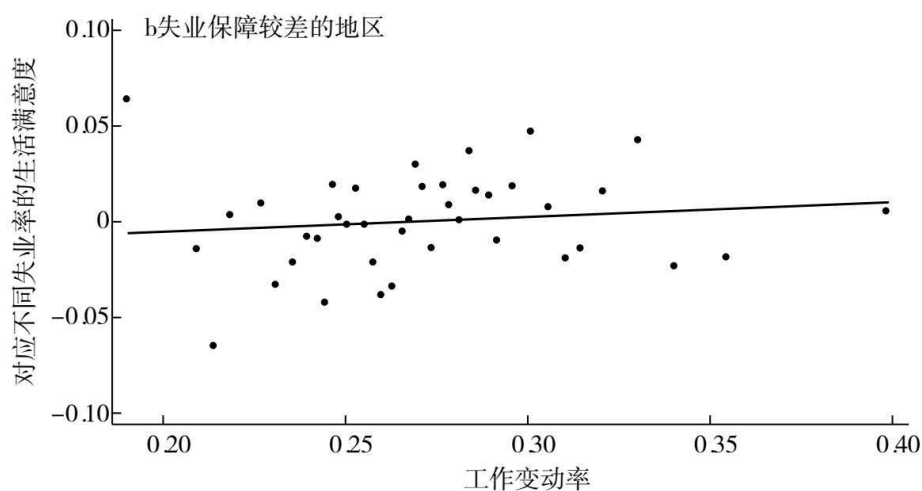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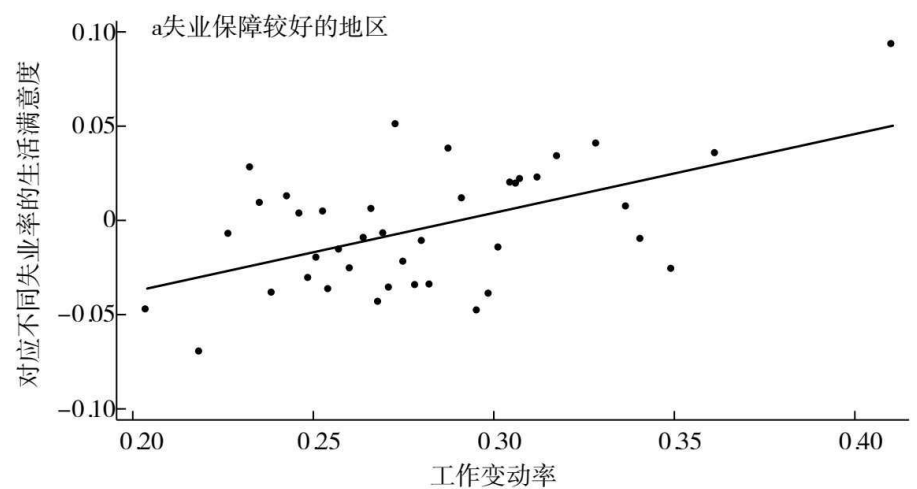


图11.7 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失业保障较好与较差地区的对比

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 (2016) :3869 -3897。

让弹性保障发挥作用

丹麦的弹性保障模式具有双重优势，既减少了可能制约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劳动力市场的僵化，[20]又给人们的职业道路提供某些保障，使他们能更为平缓地度过失业期，减少收入损失，并有望快速回到就业状态。对劳动者而言，弹性保障意味着从“岗位保障”转向“就业保障”或者说“就业能力保障”（employability），便于适应创新带来的更频繁的职业转换。欧盟理事会认为，弹性保障“需要灵活可靠的合同安排……全面的终身学习策略，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21]

正如该机构所述，职业培训与技能培训是成功的职业转换的关键因素。为强调这点，两位丹麦学者奥维·彼得森（Ove Kaj Pedersen）与索伦·安德森（Søren Kaj Andersen）发明了“流动性教育”（mobication）的概念，把流动性（mobility）与教育（education）结合起来。[22]此概念背后的思想是，技能发展不仅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性，还可以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例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人工智能革命等新挑战。

4. 结论

创造性破坏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真实生活经历？在本章中，我们指出创造性破坏将提高失业乃至更普遍的失去地位的概率。此外，它对美国人的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但在丹麦并非如此。最后，创造性破坏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双向作用：一方面增加焦虑感，另一方面提升对未来就业和增长的期望。总体而言，创造性破坏未必会导致健康恶化、幸福感下降，一切还取决于制度环境。为争取支持并避免滑向民粹主义，必须有社会安全网来辅助

创造性破坏过程。如近期的新冠疫情所示，第一个安全网是全民普及的高质量医疗服务。第二个安全网是最低收入体系，以消除贫困陷阱。第三个安全网则是弹性保障体系，给予创新企业招募和解聘员工所需的灵活性，同时给人们的职业发展提供保障。这样的保障以充分的失业保险和有效的终身培训相结合为基础，让人们能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这里也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保险人应对创造性破坏和失业带来的风险，以及作为投资人促进教育和创新。我们将在第14章以及全书结语部分更详细地探讨最后一点，并总结资本主义的未来。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2] 本节和第3节介绍的实证结来自: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gus Deaton, and Alexandr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12 (2016) :3869 -3897.

[3] 对此问题的不同分析视角，可参阅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no. 3 (1994) :477 -494; Dale T. Mortensen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no. 3 (1994) :397 -415; Andreas Hornstein, Per Krusell, and Giovanni L. Violante, “The Replacement Problem in Frictional Economies: A Near Equivalence Resul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 no. 5 (2005) :1007 -1057.

[4] Aghion and Howitt,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

[5] 参见本书第1章有关参考文献，比如Steven Davis and John Haltiwanger, “Labor Market Fluid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December 2014) .

[6] Aghion, Akcigit, Deaton, and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7] 日期 $t-1$ 到日期 t 的工作创造率是指现有机构扩张或新机构创立带来的全部新工作的总数，除以该就业区在日期 $t-1$ 到日期 t 的工作岗位平均数。与之类似，工作摧毁率指机构收缩或关闭导致的工作损失的总数，除以该就业区在该时段的工作岗位平均数。

[8]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ri Hyytinen, and Otto Toivanen, “On the Returns to Invention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Finland,”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2018): 208-212.

[9] 表11.1来自如下研究的启发: 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 and Fabrice Murt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Growth: When Lucas Meets Nelson-Phelp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rch 2010), 并更新了1961—2017年的数据。

[10] A. Deaton,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2017): 397-476.

[12] Daniel Sullivan and Till von Wachter, “Job Displacement and Mortality: An Analysi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no. 3 (2009): 1265-1306.

[13] Alexandra Roulet, “The Causal Effect of Job Loss on Health: The Danish Miracle,” in “Essays in Labor Economics”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14] 对任职时间不足12年的管理层员工，不存在离职金。对任职时间为12~17年的，离职金等于1个月的工资。对任职时间超出17年的员工，离职金最多为3个月的工资。

[15] Andrew E. Clark and Claudia Senik-Leygonie, eds., *Happi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Less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ee also Cecile Daumas, “La croissance harmonise le bonheur de tous,” interview with Claudia Senik, *Libération*, October 24, 2014.

[16] See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Claudia Senik对这一悖论的解释是，繁荣与标准化的幸福度指数其实密切相关:福

利国家的发展让有形公共品（教育和医疗）与无形公共品（公民权利、政治多元化）变得更为广泛可及。

[17] See 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 and Jean Fitoussi,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MEPSP, Paris, 2009.

[18] Hadley Cantril,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

[19] Aghion, Akcigit, Deaton, and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0] 关于法国的弹性保障，参见Olivier Blanchard and Jean Tirole, *Protection de l'emploi et procédures de licenciement*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3) .

[21] See “Towards Common Principles of Flexicurity: More and Better Jobs through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OM (2007) 359, Brussels, June 27, 200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07DC0359>.

[22] See, for example, Ove K. Pedersen, “Flexicurity, mobication og europæisk beskæftigelsespolitik,” in *Dansk flexicurity : Fleksibilitet og sikkerhed på arbejdsmarkedet*, ed. Thomas Bredgaard and P. Kongshøj Madsen, 265-287 (Copenhagen: Hans Reitzels Forlag, 2015) .

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

在第2章中，我们谈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的主人翁、印刷商大卫·赛夏的不幸。赛夏发明了一种更廉价的造纸新工艺，但不得不将发明权出售给库安泰兄弟，以偿还自己的债务。今天的赛夏则可以向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寻求对其发明的资金支持，一旦他的发明能表现出足够的营利性，后者会愿意代为偿还对库安泰兄弟的债务。[\[1\]](#)

虽然今天的发明家相比工业化时代初期更容易找到投资，却极少有国家能产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支持颠覆性发现与革命性观念的资金来自哪里？导致这些发现与创新的基础研究通常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此外，途中还密布着荆棘，因为发明是在探索未知的领域。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最具颠覆性的项目往往是由新加入者推进的。

首先，在位企业要推广自己过去的创新制造的产品，不希望它们被新的创新挤出市场，或者说，这些企业不打算取代自身。[\[2\]](#)其次，现有创新者和企业会受过去行为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第9章讲过的路径依赖特征，在大型企业尤其根深蒂固。[\[3\]](#)

在本章中，我们将跟踪创新的各个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市场推广，并试图找出每个阶段的融资工具。[\[4\]](#)来自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资金是否足够为革命性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为什么必须有风险资本支持有能力产生和实施颠覆性创新的新企业？我们

如何鼓励风险承担，并促进大企业开展更彻底的创新？政府能够如何激励创新？这些将是本章要探讨的主题。

1. 为革命性新观念提供融资

对于产生革命性新观念，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为什么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作为创新杠杆的作用

本书第10章提到，大学通过确保学术自由和开放性而促进基础研究。但资金对基础研究同样关键。图12.1揭示了各个经合组织国家对每名大学生的平均支出同该国的“上海排名”（Shanghai Ranking，反映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成就的指标）之间的联系：单位学生支出水平同排名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5]基础研究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政府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冷战高潮阶段，美国创立了三个联邦科研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国家宇航局。

有人或许认为，这些研究机构提供的资金会取代大学的资金。但恰恰相反，美国的例子表明，大学提供的资金与研究者从政府研究机构获得的额外资金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联。^[6]对这种互补性的一种解释是，各大学之间对研究拨款的竞争促进了创新。但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着作用，例如，突破性研究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尤其是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问题在于，有前景的研究项目太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依然难以支持全部

项目所需的固定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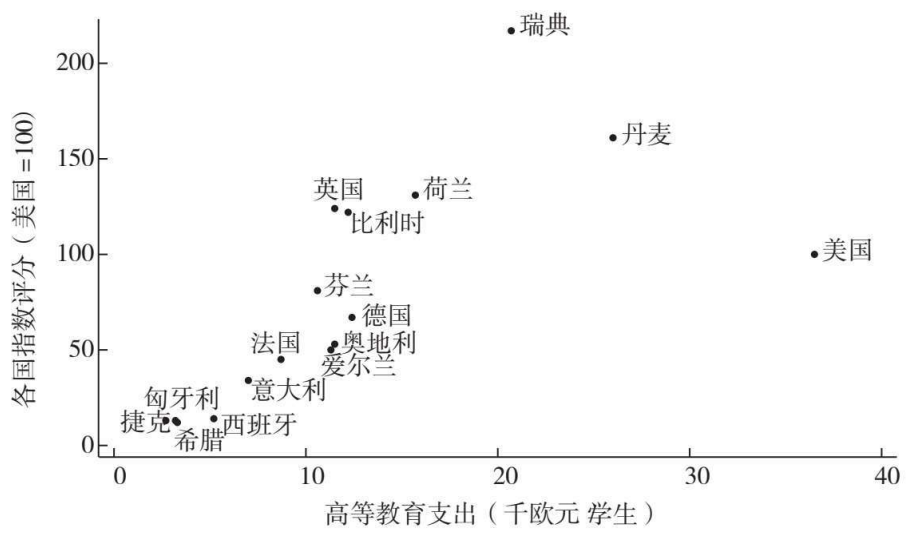


图12.1 高等教育生均支出与“上海排名”的联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M. Dewatripont, C. Hoxby, A. Mas-Colell and A. Sapir, “Why Reform Europe's Universities?” Policy Brief 34, Bruegel, Brussels, September 2007，图1。

基金会的角色

在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资金不够充裕的情况下，“颠覆性”研究者可以向私人企业寻求帮助。但如本书第10章所述，在与企业合作时，研究者可能要接受某些妥协让步：企业或许会限制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使之聚焦于自身的商业目标。另外，企业可能希望限制研究者与其他同行的交往，以防止知识产权流失。

还有，企业可能把研究者调离创新研究路径。以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öm）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在1991年关于企业“多任务代理人”的理论为基础，古斯塔沃·曼索 (Gustavo Manso) 提出了这一思想。^[7]该理论认为，作为代理人的雇员或借款人可能要为委托人（企业或投资人）完成多项任务，此时委托人提供的工作激励往往使代理人更关注不确定性最小、最循规蹈矩的任务，因为这种任务的回报最容易预测和测量，对委托人来说风险最小。^[8]承担多任务代理人角色的研究人员也总是面临选择：是投身于开发性研究还是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需要踏入未经尝试的全新研究路线，而开发性研究则是沿着已经明确的路线推进。多任务代理人理论预测，企业或投资人通常会鼓励研究者选择开发性而非探索性研究，因为前者的回报更容易预测，风险更小。

曼索把时间维度加入这一推理中。设想研究工作包含两个时期，无论选择哪种研究方向，每个时期的成功概率都与研究者的努力有关。接下来再设想，探索性研究比开发性研究在第一个时期的成功概率更低，但如果在第一个时期未取得成功，会使探索性研究在第二个时期的成功概率提高。图12.2显示了每个时期末的成功与失败概率，以及每个步骤的相应奖励 w 。委托人在第一个时期末根据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给代理人支付奖励，分别标记为 w_S 和 w_F 。在第一个时期取得成功时，第二个时期末再根据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给代理人支付奖励，分别标记为 w_{SS} 和 w_{SF} 。在第一个时期遭到失败时，第二个时期末也根据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给代理人支付奖励，分别标记为 w_{FS} 和 w_{FF}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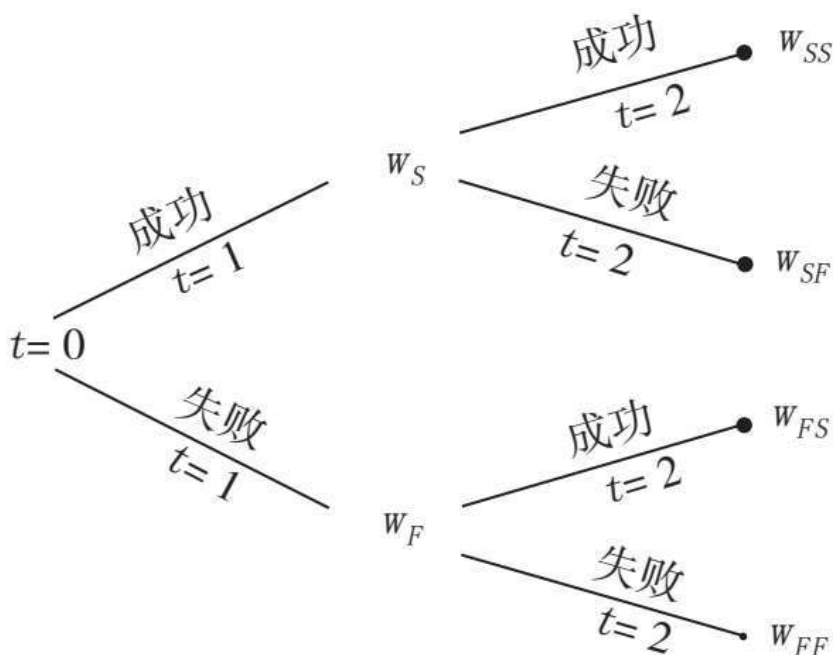


图12.2 与两个研究时期有关的成功和失败概率以及相应的奖励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注重短期利益的委托人（企业或投资人）会倾向于“惩罚”研究者在第一个时期的任何失败，以激励他们加大努力，并专注于短期内风险较小的开发性项目（图12.3a）。简言之，委托人可以在第一期期末或第二期期末的失败情形下给研究者支付零奖励（ $w_F = 0, w_{FF} = 0, w_{SF} = 0$ ）。然而，较为重视实验及其带来的参考信息价值的委托人会选择完全不同的策略（图12.3b）。为鼓励研究者在第一个时期从事探索性研究，委托人不会对这个时期的失败施以惩罚。相反，他会保证在第一期期末遭遇失败时提供正奖励（ $w_F > 0$ ），反而对取得成功实施零奖励（ $w_S = 0$ ），以免研究者选择循规蹈矩的研究方法。如果探索性研究在

第一个时期失败，委托人会鼓励他转向开发性研究，并避免在第二个时期逃避责任。于是，如果在第一期失败后，第二期获得成功，委托人会给研究者正奖励（ $w_{FS} > 0$ ）。但如果第一期的探索性研究取得成功，委托人将鼓励研究者继续探索，因为在第一个时期的探索性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第二个时期的探索性研究可能更有利可图。于是，如果在第一期成功之后，第二期又获得成功，委托人将在第二期期末给研究者一笔很大的奖励（ $w_{SS} > 0$ ）。

从现实看，我们能如何鼓励探索性研究？在企业内部，一种选择是确保代理人的报酬与岗位不受企业短期业绩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文将介绍，这是机构投资者要做的事情，也是破产法的目标，如美国《破产法》中著名的第11章，保护债务人免受在债权人压力下被过早清算的风险。[\[9\]](#)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从企业内部的角度讨论问题。而对于企业之外的科学家，又能如何鼓励他们从事固定成本很高的探索性研究呢？我们可以看看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Medical Institute, HHMI）的例子，它是美国学术性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私人资金来源。该机构的一个项目名为“研究员计划”（Investigator Program），挑选有能力做出基础性发现的年轻科学家，以拓展生物医学研究的前沿。总体上，该计划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共挑选了73位科学家。与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国立卫生研究院不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注重选人，而非支持具体的项目。另外，前两个机构对项目的资金支持仅有三年，而后者对大多数入选研究者提供至少五年的资助。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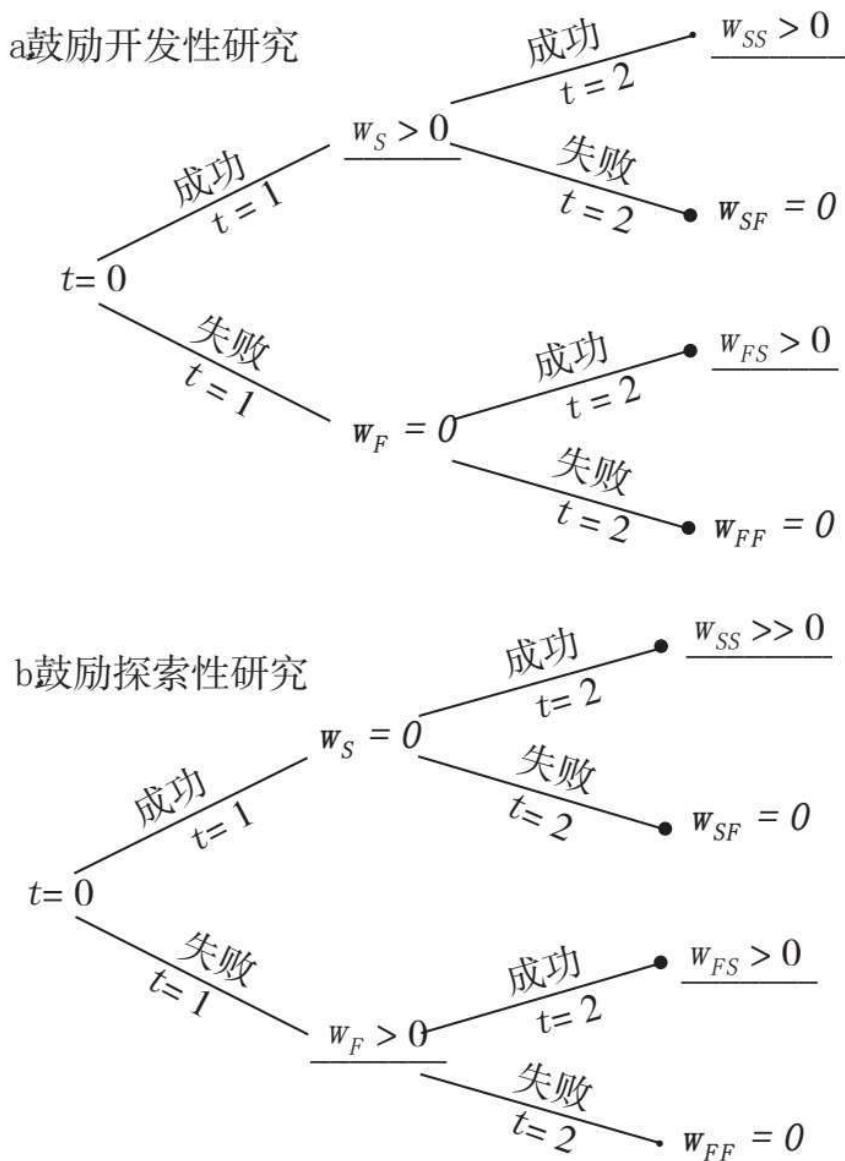


图12.3 委托人为鼓励开发性研究或探索性研究而提供的合同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这一资助策略的效果如何？首先，已经有超过20位该项目的

研究员荣获了诺贝尔奖。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资助对学术发表数量产生了惊人的效应，如图12.4所示。图中的实线代表“实验组”的发表数量的变化，即接受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助的人，0点对应研究员开始接受资助的年份。虚线代表“控制组”科学家的发表数量的变化，即未获得该机构资助，但有着类似特征（包括年龄、供职的学术机构、研究领域与成果等），并在职业生涯早期接受过其他研究资助（例如Pew、Searle、Beckman、Packard和Rita Allen Foundations等组织的奖金）的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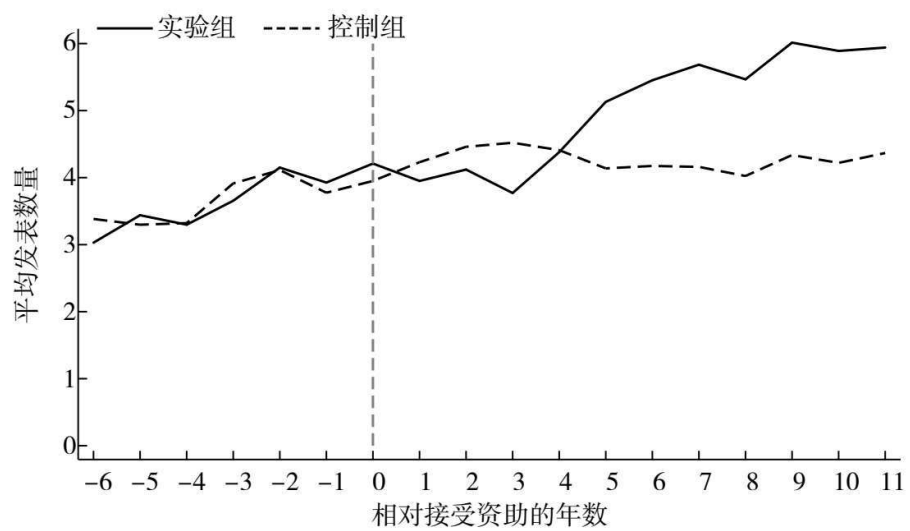


图12.4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资助对总发表数的动态影响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zoulay, J. S. Graff Zivin and G. Manso, “Incentives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Academic Life Scienc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2, no. 3 (2011): 527-554, 图4A。

从图中能看到，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提供资助前，实线与虚线非常靠近，控制组的科学家的表现可以同接受资助者媲美。不过从接受资助开始，两条曲线出现分化，测算显示接受资

助者的发表率相比同等的未受资助者平均提高了39%。

2.给颠覆性企业融资：风险资本的角色

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理论上的说法

风险资本是什么？是指从初创企业获得股权，并计划在其发展进程中出售股份以谋利的投资人。为什么初创企业是利用风险资本融资的最常见的机构类型？

我们首先分析融资结构与控制权。在不久之前，公司金融领域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还是企业收益如何在所有者与投资人之间分配。债务被定义为由贷款人获得固定回报的合同，剩余收益归企业所有。[\[11\]](#)股权融资则被定义为让股东、企业所有者获得一部分收益的合同安排。

另一种公司金融理论更强调控制权。[\[12\]](#)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设想有一个企业家（或家族企业），除自身资产外，该企业还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持一个创新性的新项目，于是打算寻找投资人。企业家与投资人都希望项目成功，但目标可能有所不同。投资人看重货币回报，希望使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家则更希望打造一份宏大事业，梦想为自己树立创新者的形象。这样的动机可能让企业家不惜代价维持企业运转，哪怕牺牲短期的货币回报。在“不完备合同”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预测每个偶然场景会有何结果，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控制权配置就成为双方合同的关键内容。于是，不同融资安排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如何在各方之间分配控制权，而非如何分配企业的收益。对此，阿吉翁与博

尔顿探讨了控制权配置的三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发行有投票权的股份，这可以视为迫使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合同，让投资人能够实施企业家本来不会做出的决策，例如在遭遇财务困境时关闭企业。第二种，发行无投票权的股份，让企业家在不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情况下获得融资。不过投资人通常会拒绝此类合同，特别是如果企业家没有个人资金或有形资产（设备、建筑和土地等）的时候，因为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时不能获得补偿。第三种，债务融资，双方之间达成或然形式的控制权安排。当企业经营正常时，企业家保留全部控制权；如果情况恶化，企业家的控制权就可能被投资人夺走。破产也是企业财务状况遭遇严重恶化时转移控制权的一种机制。

我们再回到那家试图为创新项目融资的初创企业。为维持控制权，企业希望尽可能地发行无投票权股份。但如果投资人拒绝，加上缺乏充裕的金融资产或有形资产作为抵押品，企业家可能被迫向投资人转移部分控制权。这就是风险资本登场的时候。

风险资本是一种多阶段融资合同。首先，此类合同给予投资人较大比例的企业收益，以及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但在后续的各个阶段，风险投资人会逐渐把控制权交还给企业家。

基于阿吉翁与博尔顿的研究，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与佩尔·斯特罗姆贝格（Per Strömberg）解释了为什么此类融资形式尤其适用于年轻的创新企业。^[13]这些企业起步时通常股份很少，并缺乏有形资本。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保护，投资人会坚持占有一定的股份份额——包括在企业取得成功时——同时要求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以防止企业选择让投资人遭受巨大损失的创新路线。于是投资人不会接受无投票权的股份和债务

融资，而愿意选择有投票权的股份。此类合同鼓励投资人加入企业的决策，不仅为了阻止过于危险的决策，更重要的还可以把投资人的经验、知识、诀窍和人脉关系分享给企业家。后者在很多时候缺乏阅历，对市场运转了解不多。当然，随着企业成长和留存利润增加，投资人会接受把部分控制权还给企业家，并减少自己的分红份额，因为即使遇到麻烦，留存利润也可以充当保障。留存利润或其他外来资金增长得越快，投资人就会越快同意把控制权还给企业家。

根据14家风险投资人对11家美国企业的213笔投资的信息，卡普兰与斯特罗姆贝格证实了上述理论。他们首先指出，当企业财务业绩良好时，风险投资人会接受削减股息与投票权，而当业绩欠佳时，则要求提高投票权。其次，风险投资人如果看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的指标，尤其是当企业积累起足够数量的满意客户时，会放弃投票权。例如在制药业，就是某种新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或新专利被认可的时候。最后，他们发现随着企业的成长，风险投资人会放弃部分控制权。所有这些实证结果都表明，随着企业财务状况变得更好，投资人愿意给予企业家更大的控制权。

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数据的启示[\[14\]](#)

阿克西吉特等人近期的一项研究凸显了风险资本对扶持年轻创新企业的重要性。[\[15\]](#)这项研究把美国的企业和机构的若干数据库结合起来，包括：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提供就业、工资、企业和机构年限等信息；汤森路透收集的接受过风险投资的美国企业的VentureXpert数据库，提供风险投资的日期和金额等信息；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库，提供授予美国企业的专

利及其被引用状况的信息。

该研究显示，风险资本融资集中在新企业：受风险投资支持的美国企业有42%是在招募雇员的第一年接受融资，15%是在招募第一位雇员之前获得首笔融资。还有，风险资本集中在有高成长潜力的企业，意指企业的雇员人数在成立的头三年中增长极快。类似的是，风险资本主要面向在初创年份中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图12.5）。[16]在创新活动上属于底层1/5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注入的概率仅为1%，而顶层1/5的企业则为6%，是前者的6倍。

总之，风险资本追求有强劲增长和创新潜力的新企业。它们的资金支持对创新有何影响？图12.6展示了对比结果：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实线）与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类似企业（虚线）在就业人数（图12.6a）与创新活动（图12.6b）上的不同表现。[17]从图中明确可见，自接受风险投资的日期开始，前者的增速比后者快得多。或者说，受风险资本扶持的企业扩张规模与增加创新活动的概率有显著提高。这一事实反映了风险资本选拔有较高创新和增长潜力的企业的眼光，以及为此类企业提供指导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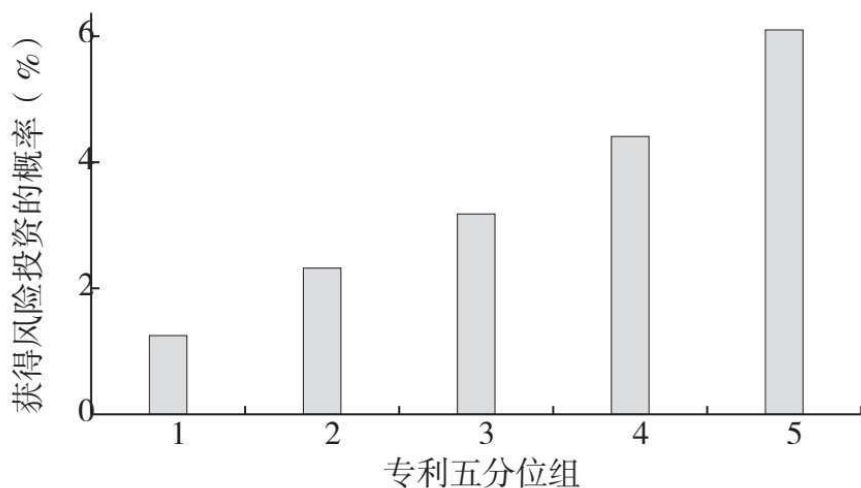


图12.5 风险资本融资与创新的概率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E. Dinlersoz, J. Greenwood and V. Penciakova, “Synergizing Ventur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19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ugust 2019) ,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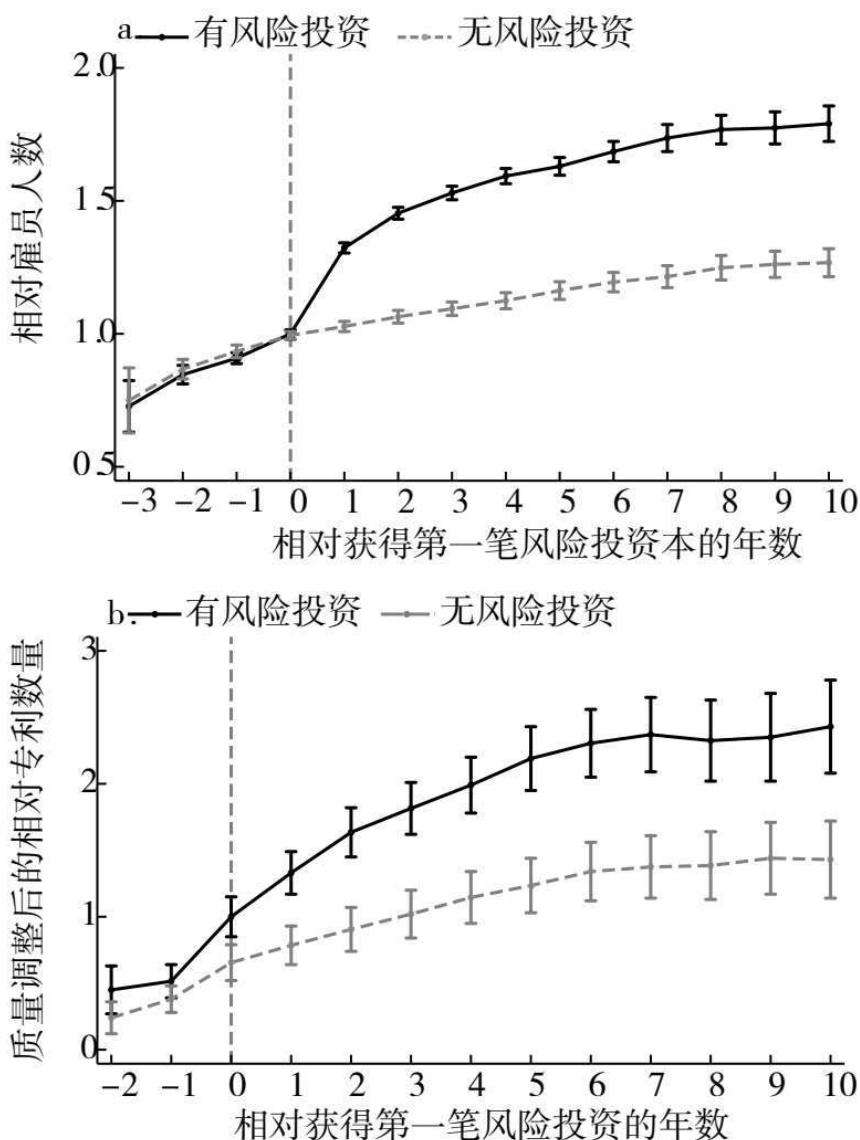


图12.6 有风险投资支持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就业和创新发展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E. Dinlersoz, J. Greenwood and V. Penciakova, “Synergizing Ventur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19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ugust 2019) , 图4和图6。

美国与法国的对比

基兹莱恩·凯塔尼（Ghizlane Kettani）从美国与法国风险投资人的特征入手，分析了两国风险资本活动的主要差异。[\[18\]](#)在美国，典型的风险投资人最初是接受风险投资支持的创新企业家，其成功捷径是通过上市卖掉企业。利用上市获得的收益，这些人自己成为风险投资人。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个人经历积累了必要的专业能力和技巧，可以帮助遴选最有前景的项目，并为从事这些项目的后起企业家们提供建议。此类风险投资人本身有创业精神，对创办新企业非常热心，也愿意投入个人财富来帮助初创企业发展，他们被称为创业天使。

相反，法国的风险投资人大多是金融专业人士，过去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并没有必要的实际创业经历或技术背景为初创企业提供建议。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法国的风险投资人仅给年轻的创新企业投入了3.53亿欧元，而美国的金额高达45亿欧元。当然，这样描述美国和法国的风险投资人未免有些简化与夸张。某些法国风险投资人也曾做过企业家，而美国也有些风险投资人出身于金融专业。

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比法国发达得多。因此，企业上市带给美国风险投资人的回报高于其法国同行。最后，机构投资者在美国的作用远甚于法国，特别是养老基金举足轻重，这些机构投资者也参与风险资本融资。[\[19\]](#)机构投资的另一个优点是鼓励大企业的创新，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3.大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如果说风险资本在新企业的创新融资中扮演决定性角色，那么当这些企业变得足够成熟，可以到股市挂牌后，谁又来接班？美国出现了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的现象：它们在公开上市企业的所有权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9.4%提高到2005年的61%。[\[20\]](#)

机构投资者的地位如此强势升高对它们所投企业的创新有何影响？我们的初始假说认为这一效应必然是负面的，因为人们感觉机构投资者是短视而浮躁的，并不支持创新，更不用说颠覆性创新。可是实际数据推翻了这一预感：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有正向关联。[\[21\]](#)对此应当如何解释？

职业发展理论[\[22\]](#)

职业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经理人希望展示其能力，以确保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并提高其声誉（乃至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格”）。能力的第一个指标是经理人所在企业的业绩。不过，企业业绩不能完美地反映经理人的能力，它取决于能力和运气两方面因素：无论经理人能力如何，项目总有失败的风险。在此情形下，经理人会对启动颠覆性项目感到犹豫，因为与其他项目相比风险更高，失败概率更大。如果经理人属于风险规避型，担心失去工作和市场声誉，就会更加迟疑不决。那么，机构投资者在企业所有权中的强势兴起会如何制衡经理人对创新的这种回避态度？

答案在于，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获得经理人能力的信息。当然这样做有成本，并且只有在机构投资者掌握企业的较大比例股

份时，投入固定成本获取这些信息才物有所值。如果信息是积极的，即机构投资者发现经理人确实有能力，则可以使其免受创新风险的影响。于是，经理人对开展创新项目将不再犹豫：即使项目失败，机构投资者也会保留他的职位，使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如果项目成功，经理人的声誉将大大提升。[23]

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的财务利益越大，就越会保护经理人免受创新项目失败的打击，从而愈加强化经理人启动颠覆性项目的激励。这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机构投资者股权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的正向联系。

对该理论的实证检验

作为对上述理论的实证检验，阿吉翁等人分析了Compustat数据库中包含的803家美国上市公司在1991—1999年的信息，[24]美国专利商标局关于这些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信息，以及Compact Disclosure数据库中包含的机构投资者在这些企业持有的股份比例的信息。

我们得到了如下几个发现。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比例对企业专利的数量和质量有积极影响。另外，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度会强化这一积极效应。图12.7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的创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25]原因在于，竞争增加了项目创新失败可能使企业面临的损失，加剧了创新伴随的风险，也就是模仿与创造性破坏的风险。恰恰是在项目遭遇失败时，机构投资者能提供保护，使经理人不至于失去工作和声誉。对于面临更激烈竞争的企业经理人而言，这种保护显得尤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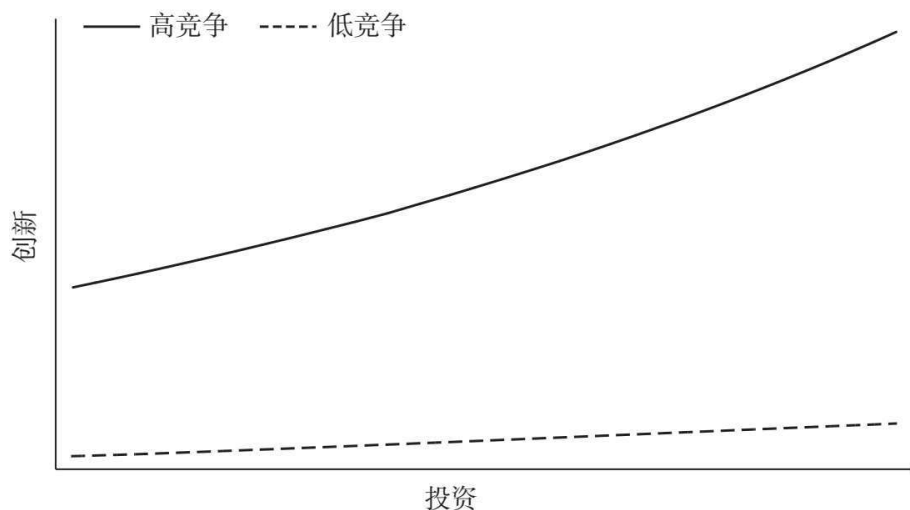


图12.7 不同竞争程度下创新与机构投资者的关系

资料来源: P. Aghion, J. Van Reenen and L. Zingales,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1 (2013): 277-304.

另一个发现也同职业发展理论相符，即当经理人有其他机制提供保护时，机构投资者对创新的影响会减弱，例如在恶意并购受到更严格监管的美国各州。这里的逻辑是：此类监管形成了对机构投资者保护的替代机制。最后，职业发展理论预测，机构投资者会减轻经理人在企业业绩不佳时丢掉工作的风险，数据表明确实如此。总体上与我们的初始假说相反，机构投资者促进了上市企业的创新，因为它们保护了经理人免受与创新有关的潜在职业风险的冲击。

对法国与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所占权重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由于养老基金的重要地位，美国再次遥遥领先。2017年，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相当于美国GDP的145%，法国仅为10%。[\[26\]](#)此外，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在2018年为年轻的创新企业提供了

560亿欧元资金，而法国的机构投资者仅提供了6.65亿欧元，前者是后者的84倍之多。[\[27\]](#)

4.企业创新与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

政府如何能鼓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资？税收激励是个合理的考虑。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可以采取税收抵扣（tax deduction）形式，降低应税收入，这是英国采用的机制。也可以采取法国的免税额度（tax credit）的办法。[\[28\]](#)

英国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始于2000年，最初仅针对中小企业，2002年被扩展到大企业。不过，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力度依然更大：截至2007年，雇员人数不足250人、资产少于4 3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5 000万欧元的企业仍得到比大企业更优惠的研发支出税收抵扣待遇。2008年，英国对该体制加以改革，放松了中小企业的资质门槛：目前的税收优惠办法对雇员人数不足500人、资产少于8 6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1亿欧元的企业适用。这一改革给创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图12.8描述了2009—2011年企业平均年度研发支出同企业规模（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企业年度研发支出同资产额有正向联系，表明资产较多的大企业能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可是，在8 600万欧元的资质门槛上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对于刚好低于门槛值的企业（能得到更大的税收优惠），平均研发支出要多于刚好高于门槛值的企业。企业在2009—2013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变化与研发支出类似，我们再次观察到非连续性：在门槛值前后，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都随着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而增加，但在门槛值处却出现显著下跌。[\[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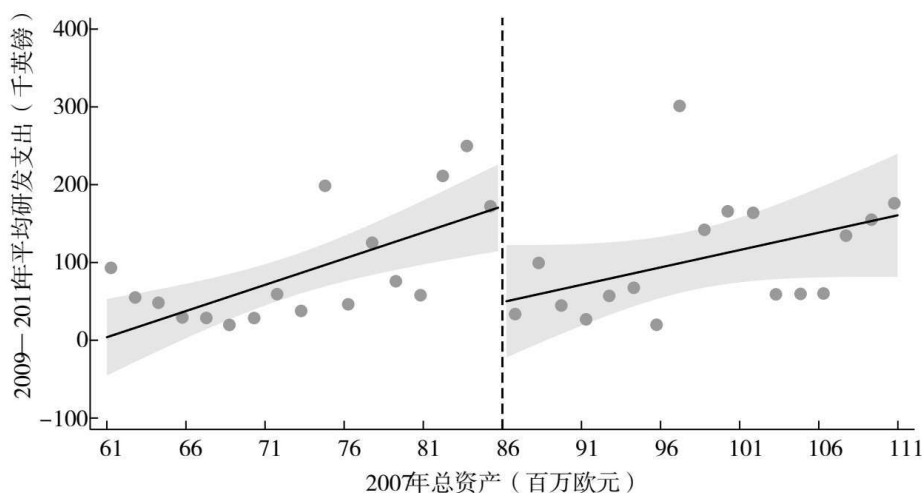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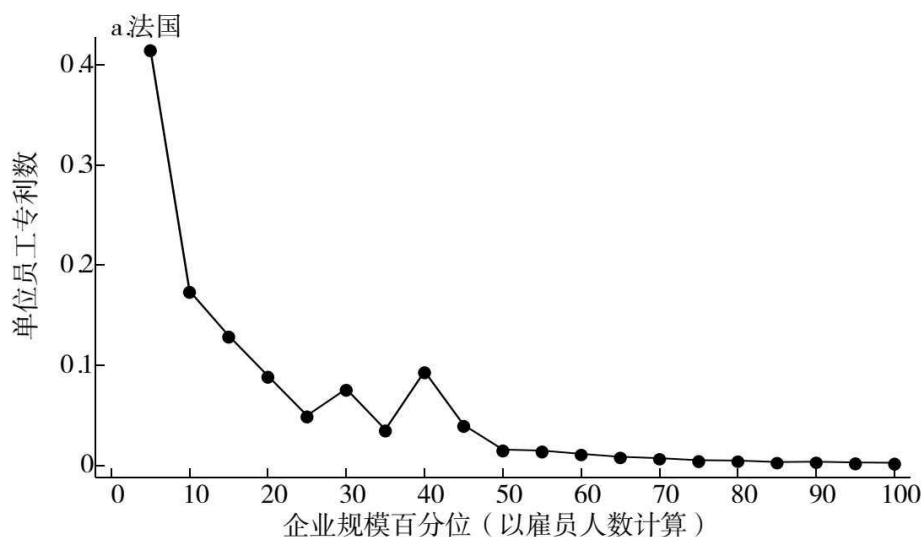
图12.8 2009—2011年平均研发支出与企业总资产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A. Dechezleprêtre, E. Einiö, R. Martin, K. -T. Nguyen and J. Van Reenen, “Do Tax Incentives for Research Increase Firm Innovation? An RD Design for R&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图2。

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税收研发激励体制尤其面向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更活跃（以每千名员工获得的专利数计算），法国（见图12.9a）和美国（见图12.9b）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政策选择就是合理的。[\[30\]](#)此外，中小企业产生的创新更为激进、更有影响力。不过，英国体制的这个优点并没有被其他发达国家借鉴，包括法国在内（图12.10）。2018年，法国对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率很高，但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幅度基本相同（均为43%）。[\[31\]](#)英国的这一补贴比率总体上更低，但中小企业受益幅度（27%）明显高于大企业（11%）。

在法国，获得免税额度的资质门槛不是根据企业规模而是根据研发支出金额设定的：1亿欧元以内的研发支出可获得30%的补

贴，超出部分则为5%。不过很少有企业的研发支出能超过1亿欧元，于是几乎所有开展研发的企业都获得了30%的补贴。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即使没有对研发的税收补贴，研发支出超过1亿欧元的特大型企业也会在研发上做非常大笔的投资。也就是说，门槛内的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对这些大企业而言纯粹属于意外收获，对它们的研发投资决策并无实际影响。然而在2014年，100家最大的法国企业在全部研发税收补贴中的占比却达到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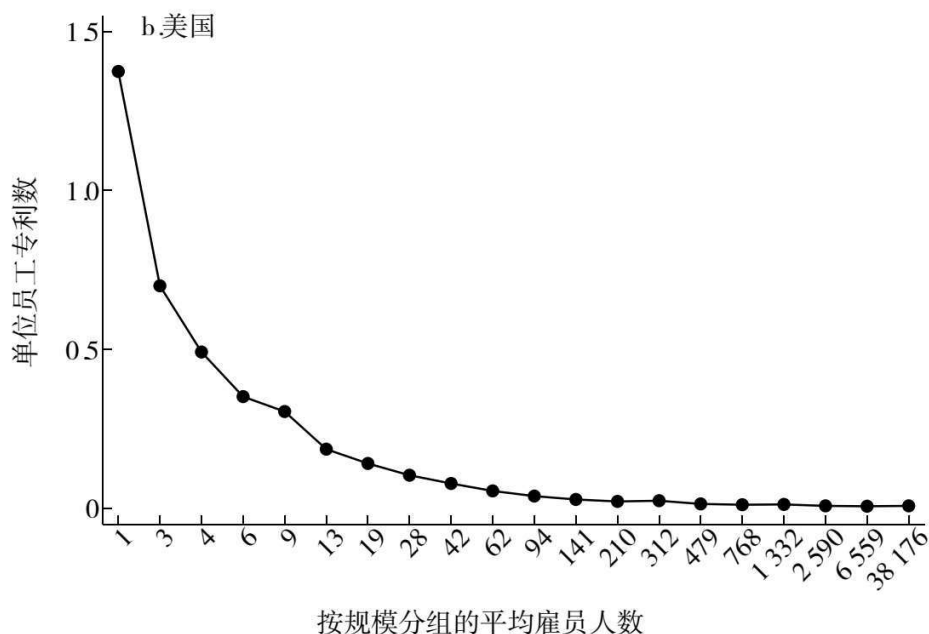


图12.9 法国与美国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密度

资料来源: a.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DADS) and Patstat; b. 转引自U.Akcigit and W. R. Kerr,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1374-1443 ,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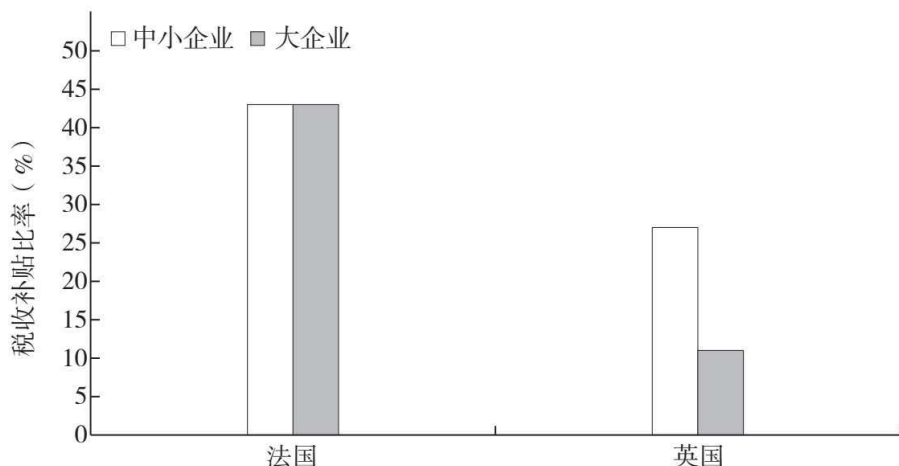


图12.10 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补贴比例

资料来源: OECD。

为使研发税收补贴不那么向大企业倾斜，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模仿英国体制，针对企业规模设立门槛。另一种较中庸的解决方案是设立边际补贴比例，随企业研发密度（其定义为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之比）的提升而增加。[\[32\]](#)

5. 结论

为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的不同阶段提供融资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在基础研究阶段，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资金对促进革命性发现往往还不够充足，为有潜力的研究者提供支持的私人基金会要扮演关键角色。在开发阶段，我们指出除财务考虑之外，投资人对企业项目的参与程度也关系重大。在早期创业阶段，风险资本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会随时间变化，成为促进

颠覆性创新和企业成长的一种关键机制。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机构投资者将接替这个角色，他们为从事创新项目的经理提供保护，从而鼓励其承担更多的风险。最后，政府也在创新融资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通过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另外还可以利用采购合同以及更普遍的产业政策工具（见本书第4章和第14章）。

总之，金融生态体系对创新有重大影响。美国受益于研究基金会、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人形成的强大网络，他们有足够的经验辅导新企业走向成功。这一网络增进了美国在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当然，融资必须加以监管，以防止其成为增长的障碍。有关内容可参考专栏12.1和第14章。

专栏12.1 融资的陷阱

本章描述了不同的创新融资方式，但融资也伴随着某些危险。

投资者（包括公共部门、风险投资人和机构投资者等）在决定是否支持某个创新项目时可能犯两种类型的潜在错误。第一类错误是错过好项目，第二类错误是支持坏项目。如我们所知，熊彼特式的创新者有很高的失败概率，这意味着项目易遭受挫折，但较低的成功概率却对应着极高的回报。因此在创新融资中，犯第二类错误并不罕见。投资者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少犯第一类错误的风险，即错过后来有丰厚回报的好项目。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某些投资人在脸书或谷歌之类的公司创立时错失了参与机会。

但本书第3章谈到，重大的通用技术发明后会出现众多次级创新，而它们的成功机会较大。由于投资人担心犯第一

类错误，金融业可能出现投资热潮，图12。 A显示了股票上市发行金额与GDP比率的变化。[\[33\]](#)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力的引进出现了投资高潮，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同样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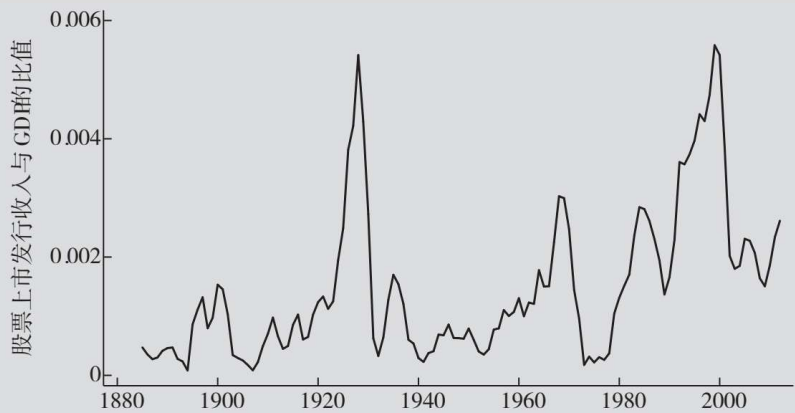


图12.A 股票上市发行收入与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T. Philippon, “Has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Become Less Efficient? O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4 (2015) :1408 -1438 , 图13。

投资者之间为避免错过好项目开展的激烈竞争使他们放松了对项目质量的审查，纷纷投入没有前途的项目。因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结果使他们犯下更多的第二类错误。这种倾向可以解释与通用技术创新相伴的金融泡沫现象，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即是典型。

公司创新融资的第二个低效率根源是，企业可能陷入金融市场预期的陷阱，放弃自身目标。[\[34\]](#)企业可能面临选择，要么扩大销售，要么通过降低成本和改进生产来巩固现有客户基础。如前文所述，企业经理人关注自身的声誉。由

于经理人希望向金融市场展示自己的 ability，他可能倾向于按照金融市场的期望去行动。如果金融市场把销售增长作为企业成功的指标，经理人就会集中精力扩大销售，而忽略生产的改进。而如果金融市场认为企业在追求增长战略，他们就会更加看重增长指标。这一双向反馈过程会构成恶性循环，导致企业重心永远不能从扩张转向生产精益化，并最终走到触发系统性危机的境地。

[1] 当代的大卫·赛夏还可以把发明专利出售，其条件会远远好于库安泰兄弟的报价。参见Ufuk Akcigit, Murat Alp Celik, and Jeremy Greenwood, “Buy, Keep, or Sel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Econometrica* 84, no. 3 (2016): 943-984.

[2] 这一现象被称为阿罗替代效应 (Arrow replacement effect)，可以解释为什么重要创新通常来自新企业，而非在位企业。

[3] 关于“构造创新”的开创性论文中，Rebecca Henderson与Kim Clark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的案例，商用喷气式飞机由新入行的波音公司推出，而非当时的支配性制造商麦道公司。参见Rebecca M. Henderson and Kim B. Clark,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 no. 1 (1990): 9-30.

[4] 关于金融与创新引领型增长的综合分析，参见Philippe Aghion, Peter Howitt, and Ross Levin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Led Growth,” in *Handbook o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ed. Thorson Beck and Ross Levin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8) .

[5] Philippe Aghion, Mathias Dewatripont, Caroline Hoxby, Andreu Mas-Colell, and André Sapir, “Why Reform Europe's Universities?” Policy Brief 34, Bruegel, Brussels, September 2007.

[6] Philippe Aghion, Mathias Dewatripont, Caroline Hoxby, Andreu Mas-Colell, and André Sapir, “The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the US,” *Economic Policy* 25, no. 61 (2010): 7-59.

[7] Gustavo Manso,“Motivat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66 (2011):1823 -1860; Bengt Holmström and Paul Milgrom,“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 (1991) :24 -52.

[8] 委托代理的表述是指如下的经济关系:委托人的行动取决于代理人的行动或特征,但委托人并不掌握代理人的完全信息。例如,委托人可以是一家企业,不掌握其雇员如何工作的完全信息。或者委托人是一家银行,并不掌握其顾客的完全信息。Bengt Holmström与Paul Milgrom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发现,当代理人同时承担几项任务时,这一关系中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根源。

[9] 根据美国的《破产法》,企业申请第11章规定的保护,将暂停债权人的权利要求以及偿还债务的法律诉讼。在此程序下,企业将继续经营,从而能给债权人之间达成重组协议提供时间。

[10] Pierre Azoulay, Joshua S. Graff Zivin, and Gustavo Manso,“Incentives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Academic Life Scienc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2, no. 3 (2011) :527 -554.

[11] 如果企业利润低于对贷款人承诺的固定回报,则全部利润归贷款人。

[12] Philippe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no. 3 (1992) :473 -494.

[13] Aghion and Bolton,“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Steven N. Kaplan and Per Ströberg,“Financial Contracting Theory Meets the Real Worl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 Contrac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 no. 2 (2003) :281 -315.

[14] 若干研究强调了风险资本对创新融资的作用,最早见于Samuel S. Kortum and Josh Lerner,“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1, no. 4 (2000) :674 -692. See also publications by Josh Lerner and Paul Gompers: Paul Gompers and Josh Lerner, *The Venture Capital Cycle* (Cambridge, MA: MITPress, 2004) ; Paul Gompers and Josh Lerner,“The Venture Capit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no. 2 (2001) :145 -168.

[15] Ufuk Akcigit, Emin Dinlersoz, Jeremy Greenwood, and Veronika Penciakova,“Synergizing Ventur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19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ugust 2019) .

[16] 创新的测量指标是企业获得第一项专利之后的3年内，其专利被引用的总次数。

[17] 创新活动的测算指标是专利的数量结合质量（以专利被引用的次数计算）。

[18] Ghizlane Kettani,“Capital-risque, innovation et croissance”（Ph. D. diss. ,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2011 ）.

[19] 机构投资者是指筹集储蓄资金，并代表自身或客户把资金投资于市场的组织。机构投资者包含3种类型:养老基金，在养老金由资本化资金支持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负责管理退休储蓄；投资基金；保险公司。

[20] Philippe Aghion, John Van Reenen, and Luigi Zingales,“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1 (2013):277 -304.

[21] 研发密度的测算办法是考虑专利质量权重后的专利数量。

[22] 这一“职业发展”理论来自: Bengt Holmström,“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s: A Dynamic Perspectiv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no. 1 (1999):169 -182.

[23] 我们的隐含假设是，市场知道项目的创新程度如何，创新项目成功给经理人带来的声誉提升幅度比传统项目成功更大。

[24] Aghion, Van Reenen, and Zingales,“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25] 竞争力度以垄断租金的相对值来测算。

[26] 世界银行数据。

[27] 法国的数据来自France Invest;美国的数据来自Prequin。

[28] 与税收抵扣不同，免税额度影响的不是应税收入，而是实际纳税额。它直接从纳税额中扣除，如果免税额度超出应缴税额，甚至可能导致退款。

[29]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Elias Einiö, Ralf Martin, Kieu-Trang Nguyen, and John Van Reenen,“Do Tax Incentives for Research Increase Firm Innovation?An RD Design for R&D”（NBER Working Paper No. 224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uly 2016 ）.

[30] Ufuk Akcigit and William R. Kerr,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4 (2018) :1374 -1443.

[31] 关于研发活动的隐含税收补贴率，来自OECD的测算。

[32] 企业规模可以由雇员人数、资产金额或销售额来测算。

[33] Thomas Philippon, “Has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Become Less Efficient? O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4 (2015) :1408 -1438.

[34] Philippe Aghion and Jeremy C. Stein, “Growth vs. Margins: Destabilizing Consequences of Giving the Stock Market What It Wants,” *Journal of Finance* 63, no. 3 (2008) :1025 -1058.

第13章

应对全球化

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言，国际贸易有利于更好的劳动分工，继而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世界范围的繁荣。那么，为什么贸易全球化近来在发达国家遭遇日趋激烈的反对？部分答案显然在于，全球化可能导致广泛的生产外包与去工业化。确实在过去50年里，美国铁锈地带、英格兰与威尔士北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南部的矿区，以及法国东部与德国的钢铁生产区都出现了相当多工厂关门与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先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是新冠疫情暴发，让有关全球化的经济影响的讨论重新点燃。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当选时，承诺要对外国进口产品树立关税壁垒，以保护美国的工业与就业。2018年，美国对漫长清单上的外国产品实施加税与进口配额。例如在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提高了太阳能板与洗衣机的关税。3月，又对铝材、钢材、汽车及其配件加征关税，全都假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随后，又是针对各种类型中国产品的一系列大幅加征关税。此外，欧盟对美国出口的价值75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也从10%被抬高至25%，包括法国的葡萄酒、意大利的奶酪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等。这些措施加起来将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1\]](#)

全球增长还遭遇了更新的一轮灾难：新冠疫情。经济预测师们起初抱有较乐观的展望，估计疫情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在中

国达到峰值，然后较为平缓地传播到其他国家。但事实上疫情蔓延迅猛，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当年全球经济将下滑3%，发达国家首当其冲，法国经济将比上年收缩7.2%，美国则为5.9%。^[2]

特别是，新冠疫情凸显了“价值链”（也称为供应链）的重要性，即连接各国的跨境生产过程。链条上的每个国家都提供最终产品中包含的某些原材料、服务或者部件。经合组织认为，目前约70%的国际贸易涉及全球价值链。中国在越来越多的价值链中扮演着中间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包括信息技术、电子、制药和运输设备等产业。所以，中国经济的任何减速都将给全球总产出造成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由于发达国家广泛采用准时制（Just in time）生产方式，这一效应可能变得特别突出。

本章将聚焦于全球化与创新的关系，并涉及国际贸易和移民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来自它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和欧洲的就业与创新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表明特朗普大规模提高关税的行动师出有名？可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为什么出口市场扩张会刺激创新？移民迁入对创新有何作用？下文将展开有关的讨论。

1.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

中国产品在全球总进口中的份额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出现跃升，从1999年的3%到2012年的10%。图13.1显示中国在美国和欧洲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有惊人提升（1980—2007年），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份额则维持稳定。^[3]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那我们应该担忧来自中国的

竞争加剧吗？我们又该怎样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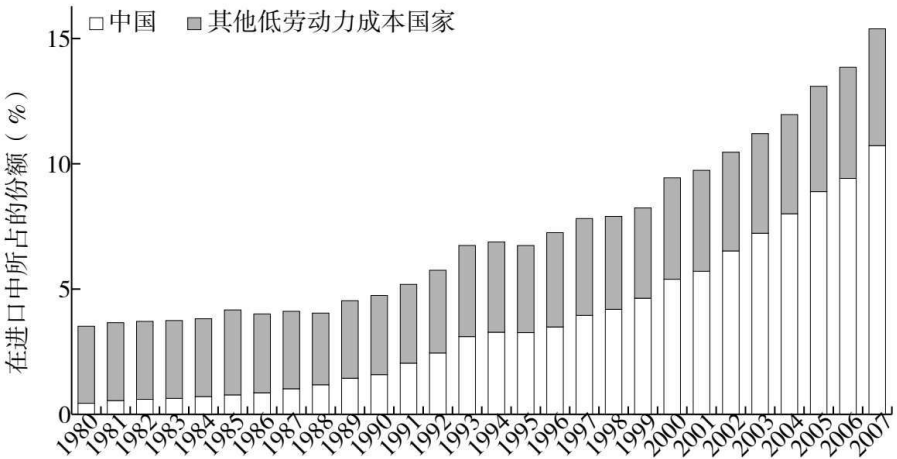


图13.1 来自中国与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进口在欧洲和美国总进口中的占比

注：欧洲的数据包含如下12个国家：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Bloom, Draca and Van Reenen (2016)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 no. 1 (2016) :87 -117 , 图1。

中国进口冲击的负面影响

对就业与工资的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有何影响？从理论上并不容易推导出答案。我们设想美国有个特定地理区域（地区R），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如何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对此，我们需要考虑两个相反的作用。首先，中国入世会加剧地区R出售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对其就业与工资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中国生产汽车，地区R也专业从事汽车生

产。因此，来自中国的汽车进口增加会使对R地区的产品的需求减少，继而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效应。但同时，中国入世也增加了中国自身对汽车的需求，这可能促进地区R的产出增加，从而给当地的就业和工资带来正面效应。

目前看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意味着中国冲击的负面效应会超出其正面效应。[\[4\]](#)而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会看到，美国的制造业部门面对中国进口冲击的表现尤其脆弱，这部分源于生产外包，部分源于美国本土企业的裁员，还有部分原因是工资下降。[\[5\]](#)

图13.2是来自戴维·奥托等人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显示了中国进口产品在美国的市场渗透率变化（图中实线），以及美国的工业就业人数在全体人口中的占比变化（图中虚线）。[\[6\]](#)该图表明，中国进口渗透率在整个时期中稳步提高，从1991年的0.6%增至2007年的4.6%，而且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加速。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就业人数的占比从1991年的12.6%降至2007年的8.4%，并且在21世纪头10年加速下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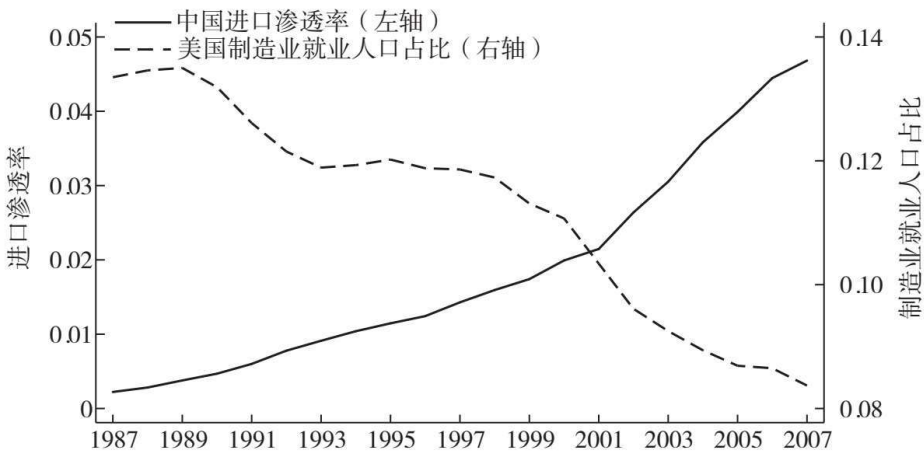


图13.2 中国进口渗透率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6 (2013): 2121-2168, 图1。

不过，美国的这一总体景象是否真实反映了各地方经济的实情？或者说，受中国进口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否也是制造业就业下滑幅度最大的地区？对于这些问题，上述研究的作者们采用了名为“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instrument）的经济计量方法。其基础是构建一个反映中国进口对各地冲击程度的指标，包含地方经济的产业构成信息，以及全国层面的产业冲击程度的信息等。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假设美国汽车产业对来自中国的汽车进口增加尤其敏感，于是，本土汽车产业集中的地区将遭受强烈冲击。相反，很少人从事汽车制造的地区则几乎不受什么影响。该研究最终发现，某个地区的中国进口渗透率高会导致当地的工业就业岗位显著减少。在这些工作岗位损失中，25%源自失业增加，75%源自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降低。^[7]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最容易受工业就业减少的打击。此外，工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并未得到非工业就业增加的补偿。工业就业减少更多是被服务业就业岗位替代。平均而言，在1990—2007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中，有21%是因为中国进口的竞争加剧，这相当于使150万劳动者失去了生计。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呼吁美国制造业返回国内，主要是为动员这批工人以及其他类似群体。

工作岗位损失并非中国进口冲击的唯一后果，工资也相应下跌。因此，中国进口冲击对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工资下跌导致对本地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劳动力

供给却在增加。

对创新的影响。中国进口冲击对创新有何影响？对此的初步回答可以参考近期的一项研究，关于中国进口与创新（用专利测算）之间的关系。[8]图13.3描述了1975—2007年专利申请数量以及1990—2007年中国总进口的变化。在1991—2001年间，中国进口的增加伴随着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对此图的一个直观感受或许认为，中国进口促进了创新。不过更细致地看，中国进口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出现加速，而美国的专利申请却在此时点后开始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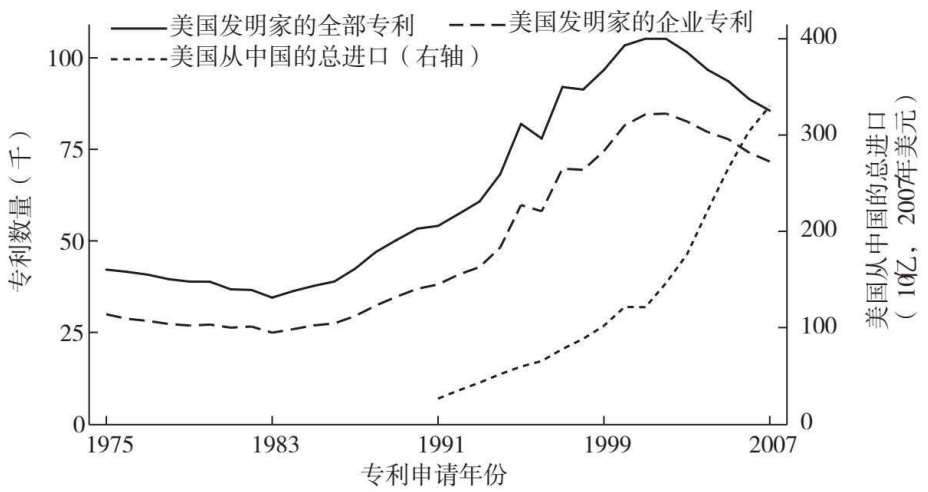


图13.3 美国专利申请数量与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G. Pisano and P. Shu,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US Pat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 no. 3 (2020): 357-374, 图1A。

但需要注意，我们这里谈的是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那么，具体企业遇到的情况如何？上述研究的作者发现，当某个产业部

门的中国进口渗透率上升时，美国该产业中的企业创新力下降。

[9]

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工业企业创新力的负面影响该如何解释？一个自然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压缩了美国企业的利润水平，使它们的投资激励和投资能力下降，尤其是对创新的投资。上述研究则指出，某个产业的中国进口渗透率提高不仅会打击美国企业的总收益，还会削弱其研发投入。总之，该研究认为中国进口对美国企业的创新总体上具有负面效应。然而，这一效应是对所有企业都适用，还是根据企业的性质而有所区别？

中国进口冲击的不同效应

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本书第4章提到，竞争加剧会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加强创新，以超越竞争。相反，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则会受竞争加剧的打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进口冲击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的负面效应可能更大，但对靠近前沿的企业有正面效应。我们再回想下那个优秀的新学生加入班级的比喻：其他好学生会受到竞争的刺激，为保持名列前茅而加倍努力，但成绩较差的学生会因为新同学加入而愈加灰心，从而拉大落后的距离。

这正是我们看到的法国在1995—2007年的情形。[\[10\]](#)平均而言，中国进口冲击对法国企业的总收益、就业人数与生存概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同之前有关美国的研究一致。但如果把靠近技术前沿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分开，就会证明上述推测：中国进口冲击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低的10%）具有负

面影响，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定义为生产率最高的10%）却有正面影响。这一发现说明，应对中国进口冲击的正确方式不是抬高关税，以削弱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鼓励创新投资，同时把资源和就业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转移到较高的企业。

上游冲击还是下游冲击？第二个可能性是，中国进口冲击其实是两个不同类型冲击的组合：一方面是对企业产品链的下游（即最终产品市场）的冲击，会直接加剧该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对上游的冲击，影响企业用以制造产品的投入品的市场。以法国的汽车产业为例，在进口冲击影响到整车市场时，汽车企业的创新激励可能减弱，因为潜在的创新租金变小了，这是对下游的冲击。相反，如果进口冲击影响的是汽车配件市场，使该市场的竞争加剧，则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能下降。于是创新租金可能增加，企业的创新激励会变强，这是对上游产业的冲击，其预期效应可能同下游冲击相反。从实证数据中我们发现，与美国市场相比，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更多发生在法国生产链的上游位置。[\[11\]](#)

我们可以把进口冲击分解为上游冲击与下游冲击，以分析其对创新的不同作用效果。[\[12\]](#)结果发现，上游冲击对于创新有轻微的正效应（图13.4a），不过下游冲击对创新具有强烈的负效应（图13.4b）。[\[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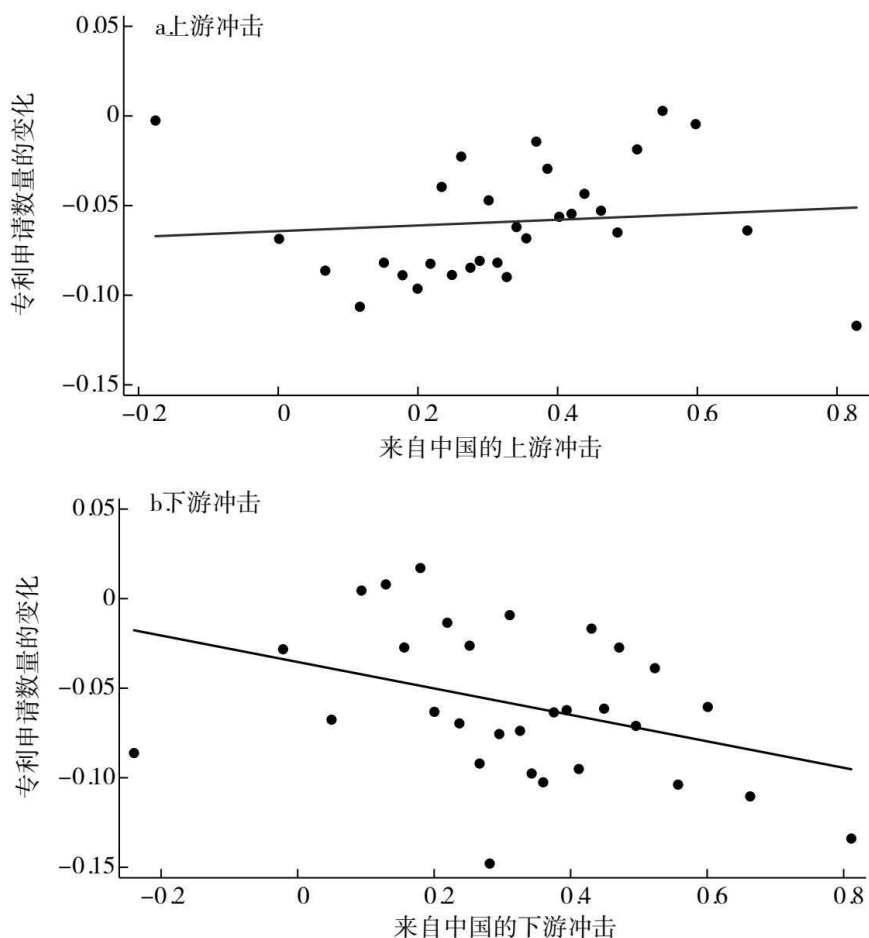


图13.4 下游冲击和上游冲击对创新的不同效应

注：纵轴对应1993—2000年与2000—2007年之间的平均专利申请数的变化。横轴对应这两个时期企业上游或下游市场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 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M. Melitz and T. Zuber, “Impor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Dat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这再度表明，无差异的保护政策并非对外国进口冲击的最佳反应策略，特别是因为此类政策可能引起出口国的报复，如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那样。当年3月8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钢铁进口和铝制品进口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3月22日，美国又公布了要加税的更多中国产品清单，包括平板电视、卫星和医疗设备、汽车部件以及电池等。几天后，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对包括大豆、汽车和葡萄酒在内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而我们下面要指出，出口对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出口与创新

我们的增长理论认为，打开新的出口渠道能促进创新。原因何在？一是因为市场规模效应，如果企业能把产品出口到新的国家，其市场规模将扩大，创新租金也会提高，创新产品能卖到更广阔的地方，强化对创新的激励。第二个因素是，在更广阔市场上经营的企业将面临其他同行的更激烈竞争。如前文所述，竞争会促进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因此，打入新的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创新，尤其是对靠近技术前沿的最具生产效率的企业。

数据能为此提供支持吗？1988年底，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为分析新出口市场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想场景。[\[14\]](#)该协定大幅降低了美加两国之间的关税。对希望把理论付诸实践检验的计量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天赐良机，提供了观察企业如何对关税下调做出反应的自然实验。图13.5明确显示，该协定促进了加拿大的制造业厂商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一研究还指出，贸易自由化不仅增加了加拿大的出口额，也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应，意味着对创新有所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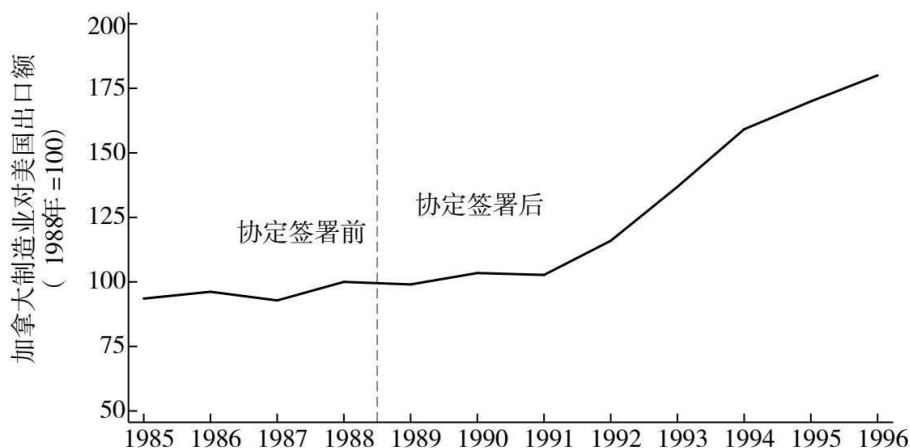


图13.5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制造业向美国出口的作用

资料来源：转引自A. Lileeva and D. Trefler,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 for Some Pl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no. 3 (2010) :1051 -1099 , 图III。

出口市场与创新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利用法国1994—2012年间的微观经济数据，阿吉翁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出口对于法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和质量都有影响。[\[15\]](#)图13.6表明，在出口最多的企业中，创新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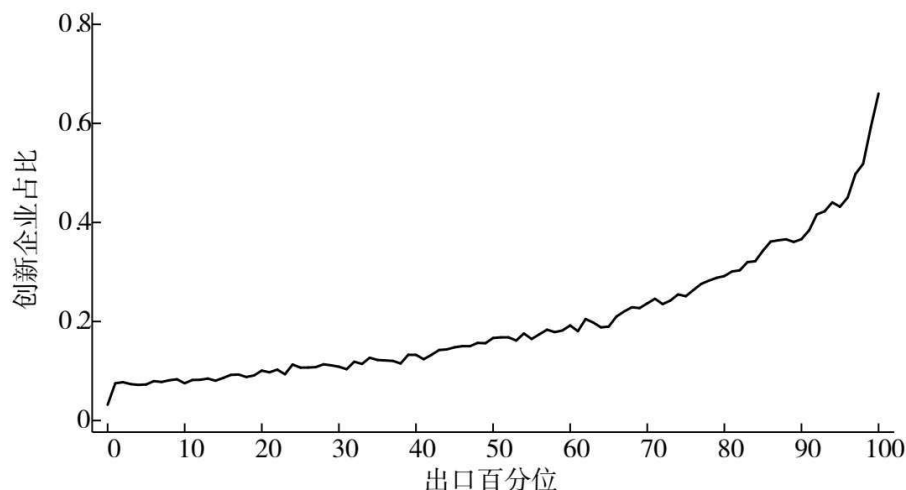


图13.6 创新企业在出口百分位组别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and M. J. Melitz,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May 2018), 图2。

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出口与创新存在同步，并不等于说其中之一是另一个的原因。相关性或许是源于同时对二者有影响的第三个因素。于是，我们分析了企业的出口市场扩张，即出口冲击对企业若干特征（包括销售额、雇员人数、以专利数量和质量反映的创新力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出口冲击对企业的销售额和雇员人数有即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出口冲击产生了短期的市场规模效应。其次，出口冲击对创新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包括开创性专利（在先专利）的数量，以及企业专利在获得授权后的五年内被引用的次数。相比营业额或雇佣等方面的决策，创新是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过程，因此我们很自然会看到需求冲击同创新作用之间存在某些时滞。再次，该

研究还发现与前一节的推测相符，出口冲击对专利数量和引用次数的积极效应在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则相反。

总之，扩大出口市场显然激发了创新。试图用笼统而不加区别的保护主义政策缓解竞争冲击，似乎并不是最佳应对策略。

3.应对贸易冲击

有两种方式应对外国竞争：一种是提高进口税率（关税），另一种是鼓励本国企业创新，特别是为研发投资提供补贴。

提高进口关税可能有危险性，出于如下三个原因。第一，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可能需要上游的中间产品。[\[16\]](#)统一提高进口关税会不加区别地影响到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可能大幅提高投入品价格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为维持利润，企业必须提高产品售价，这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并压缩企业的市场规模。例如，有家美国汽车制造商从中国供应商手中购买后视镜，如果美国提高全部中国进口产品的进口税，则中国生产的汽车与后视镜的价格都将受到影响。虽然对中国汽车的关税提高或许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销售有正面效应，但加征后视镜的关税却会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成本。

第二，跨国企业可以轻松化解对某些国家征收的关税，把生产转移到不受关税政策影响的其他国家。例如有家美国鞋类制造商，其大部分生产已外包给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生产的鞋类加征关税，以惩罚此类外包，该公司完全可以把生产转移到尚未受该政策影响的越南。于是，关税提高政策无助于把鞋类的制造带

回美国本土。

第三，前文已经讨论过关税或许对创新有负面影响。一方面有市场规模效应，针对特定国家的惩罚性关税可能引发报复，这些报复措施将缩小本国企业的出口市场，从而打击创新。另一方面还有竞争效应，树立关税壁垒会削弱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度，使本国企业丧失创新激励，无论它们是在本国同进口产品开展竞争，还是在出口市场同外国企业竞争。

对此，图13.7可以提供启示——该图来自阿克西吉特等人的研究（Akcigit、Ates and Impullitti, 2018），[\[17\]](#)并基于梅里兹（Marc J.Melitz, 2003）的开创性论文，梅里兹提出，只有超出某个生产率门槛的企业才具有出口能力。[\[18\]](#)其基本思想是，出口需要一定的固定成本，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通常是最大的企业，才有投入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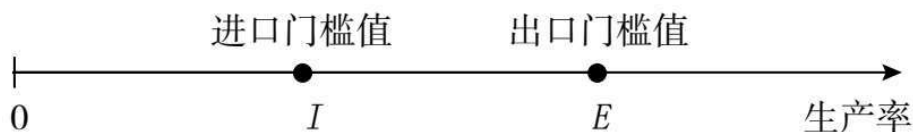


图13.7 进口能力和出口能力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设想有家企业生产中间产品，然后将其卖给生产最终产品的其他企业。采购方企业可能和生产方企业同处一个国家，也可能分属不同国家。另外，生产方企业与外国企业存在竞争。例如，有家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法国企业M，希望把产品卖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整车制造商。M与外国的发动机生产商存在竞争，如果

它的生产率不够高（处于图13.7中 I 点的左侧），性价比较低，则作为其潜在客户的各国整车制造商（包括法国厂商在内）都会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动机。所以 I 点被称为“进口门槛值”。如果 M 的生产率超出了这个水平，则法国的整车制造商愿意从它手里采购，而不再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

从图中的生产率横轴再向右侧移动，我们将来到 E 点。此时，企业 M 的生产率提高到可以出口产品的水平，也就是说，该企业不仅能把发动机卖给法国整车制造商（已位于 I 点右侧），还能开拓外国客户，市场规模自然随之扩大。 E 点由此名为“出口门槛值”：超出这个生产率水平后，该中间产品生产商（法国的发动机公司）就能进入外国市场。

下面来看看国内企业的创新。为改进质量，提高性价比， M 必须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或者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压低发动机价格）。当这家中间产品生产商的生产率在图13.7中从左向右移动时，其创新密度会如何变化？答案可见于图13.8。从最左侧开始，随着该企业更加靠近进口门槛值 I ，创新密度逐渐提高。因为越靠近进口门槛值，该企业在本国中间产品市场上面临的外国企业竞争就越激烈，创新动力也会越强。学者们将其称为“防御性创新”，意思是旨在守住本国市场的创新。

而一旦该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 I ，其创新密度会下降，因为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已经没有外国企业的挑战，通过创新来超越竞争的动力随之消失。然而当该企业更靠近出口门槛值 E 的时候，它同外国企业争夺外国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于是我们重新看到该企业的创新密度提高。学者们称其为“扩张性创新”，意为旨在夺取新的外国市场的创新。

请注意，当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或出口门槛值以后，创新密

度并未立刻下跌。事实上，如果企业在跨过任何门槛值后就马上停止创新，则很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市场，换言之，竞争对手的性价比稍有提高就会让战局反转。总体上，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创新密度曲线类似于一条有两个峰值的山形，如图13.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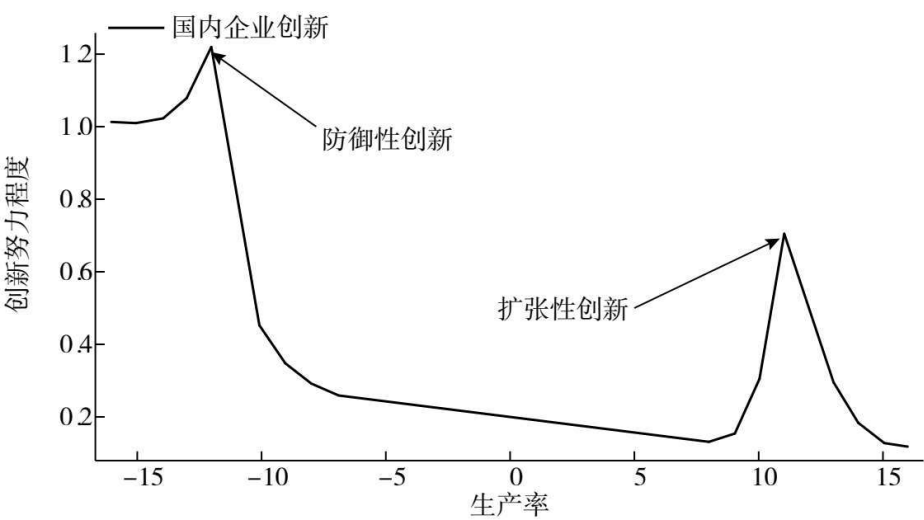


图13.8 创新密度与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 “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 , 图9A。

在了解这一普遍模式后，我们再来探讨进口关税提高会如何影响该曲线。从理论上讲，关税提高会使进口门槛值向左移动（见图13.9），曲线则会从原先的实线变成虚线。外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被加征关税，增加了其生产成本，使外国企业更难在本国市场上竞争。于是，国内企业赢得市场所需的生产率门槛将下降。进口关税带来削弱竞争的效果，从而减弱了防御性创新（确

保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导的创新)。但与此同时,扩张性创新的需求将维持不变。所以总体看,保护主义关税的长期影响将是削弱本国中间产品制造商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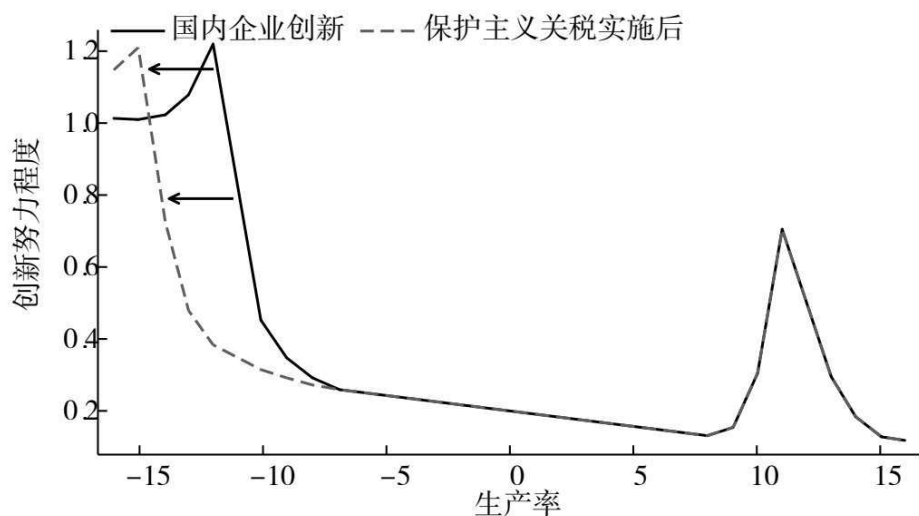


图13.9 实施保护主义关税造成的曲线变化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 “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 图13B。

相反,为生产中间产品的国内企业提供研发补贴会有不同的效果。如图13.10所示,此类补贴会使曲线向上移动(从原先的实线到虚线),因为它给所有企业都带来了创新激励。研发补贴会给防御性创新和扩张性创新都带来促进作用。相关的研究还发现,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与居民消费增长基本上可以抵消补贴所需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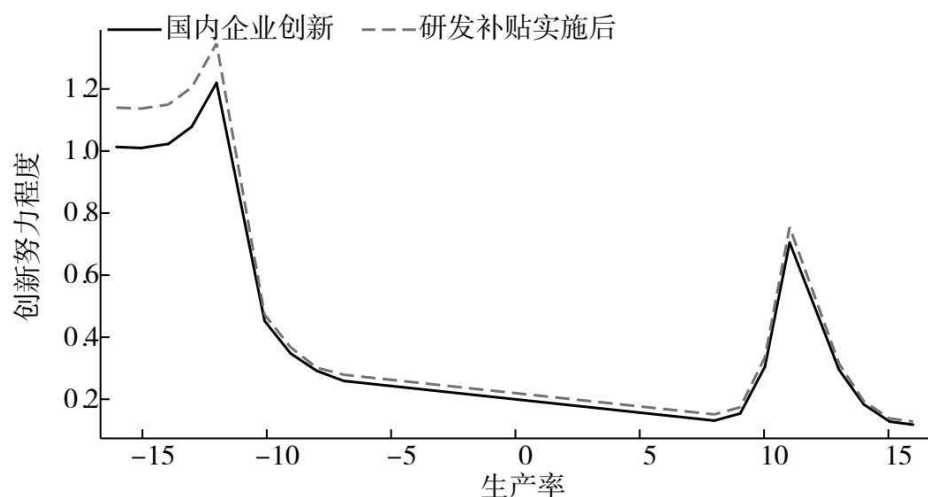


图13.10 研发补贴造成的曲线变化

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 “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16A。

以上讨论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无须考虑保护主义政策。在处理有社会倾销或环境倾销行为的外国企业时，或许有必要动用此类政策。[\[19\]](#)我们这里的分析是说，仅就应对外国企业并无不公平的竞争而言，相比大幅提高进口关税，采用对知识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及产业政策等工具，更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繁荣。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比较法国与德国对抗击新冠的产品和设备的政策。我们发现，德国对抗击新冠产品所需的生产价值链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包括药物（试剂、药品和活性成分等）、医疗设备（特别是呼吸机）与防护设备（手套、口罩等）。[\[20\]](#)实现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和创新，而非保护主义措施。图13.11显

示了法国（灰色曲线）与德国（黑色曲线）自2000年来上述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变化。德国的出口在2002年与法国处于类似水平，此后快速提高，远远超过法国。这并非由于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德国进口的抗击新冠类产品同样在增长。德国人取得这样的结果是靠维持高水平的竞争力（即高性价比），源于对质量改进创新的大规模投资和培育社会对话机制。其成就毋庸置疑：如今的德国在呼吸机和检测上都拥有更好的物质装备，能比法国更好地应对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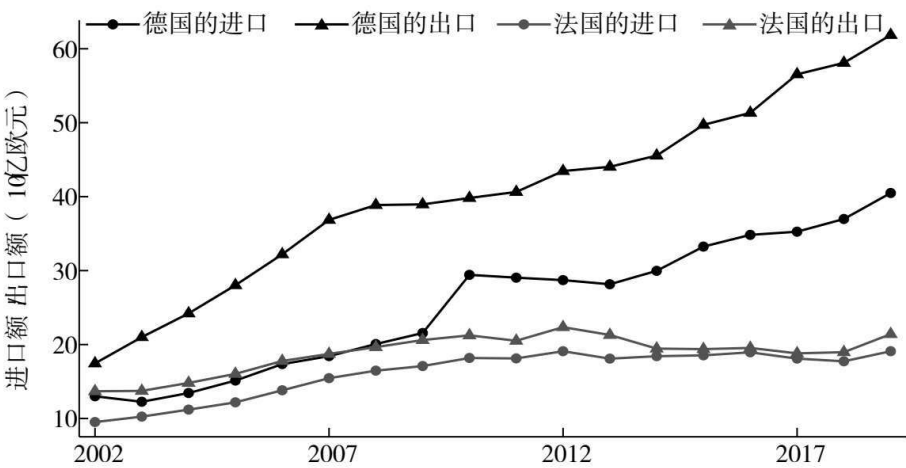


图13.11 抗击新冠所需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 Aghion P. , Bellora C. , Cohen E. , Gigout-Magiorani T. , Jean S. , “Masques, respirateurs, tests ... Pourquoi la France doit repenser sa politique industrielle après la crise du coronavirus”, *Challenges*, 8 April, 2020.

4.移民与创新引领型增长

除产品外，全球化还促进了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在技术领先的国家之间。本节我们将探讨对高技能人员的移民限制如何影响创新。[\[21\]](#)

历史上欧洲人对美国的移民尤其具有启发性。阿克拉基斯等人（Arkolakis、Lee and Paters）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指出，1890—1920年的两个并行进程值得关注。[\[22\]](#)第一个进程是，美国追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技术最发达与从人均GDP来看最富裕的国家。第二个进程是，美国迎来了大量移民，主要来自欧洲。该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证明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证明欧洲移民推动了美国取得技术领先地位。

这些学者收集了包含移民来源国与抵达美国日期的移民记录，并与1880—1920年的专利记录匹配，得以评估欧洲移民对美国创新与增长的影响。图13.12显示的是，如果美国没有对欧洲移民开放，其人均GDP会遭受的损失。在该图背后的增长模型里，创新根据专利和移民数据测算。更具体地说，若美国在1880年对全体外国移民关闭边境，它在1920年的人均GDP将比历史上的实际水平低30%（圆点标志线）。该图还显示，如果美国对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移民封闭（三角形标志线），以及对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封闭（方形标志线），其收入水平可能遭受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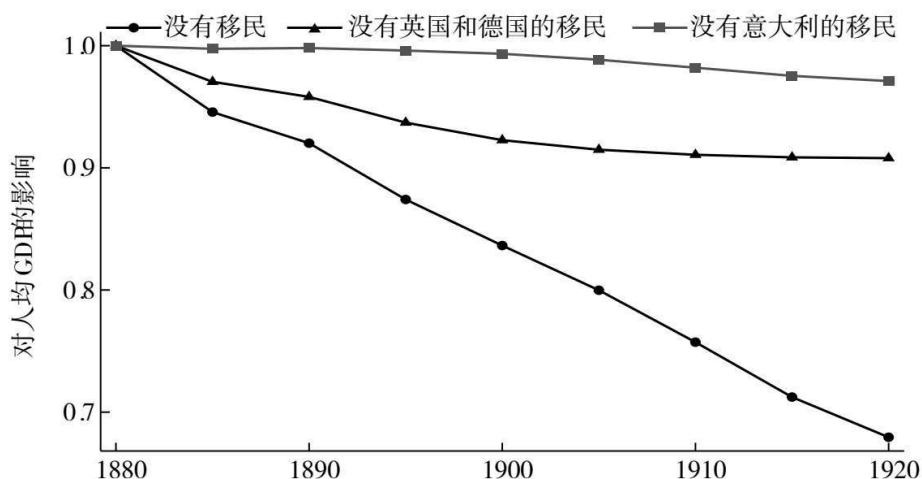


图13.12 封闭边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 C. Arkolakis, S. Y. Lee and M. Peters,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ne 2020。

为什么移民促进了150年前的创新与增长？原来，从欧洲迁往美国的移民会成为多产的创新者，但必须在他们抵达美国几年之后。图13.13根据1880—1920年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居住满10年及以上的欧洲移民产生的创新，要多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以及更近期抵达的欧洲移民。上述学者提出的一个自然解释是，这些移民在美国永久扎根下来以后，能够把他们在母国形成的创意付诸实践，推出创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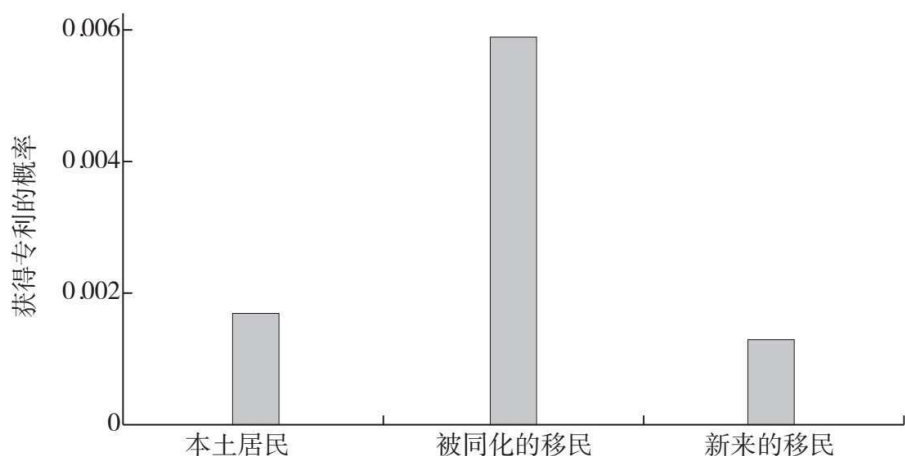


图13.13 不同群体获得专利的概率

资料来源: C. Arkolakis, S. Y Lee and M. Peters,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une 2020。

如今的移民与创新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近期由伯恩斯坦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利用1976—2012年的数据发现，出生于其他国家、在20岁后才来到美国的人群贡献了23%的总产出（图13.14），这超出他们在美国的创新者中的人数占比（16%），更高于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10%）。[23]因此，从近期和较为久远的过去看，生于外国的移民对美国的创新显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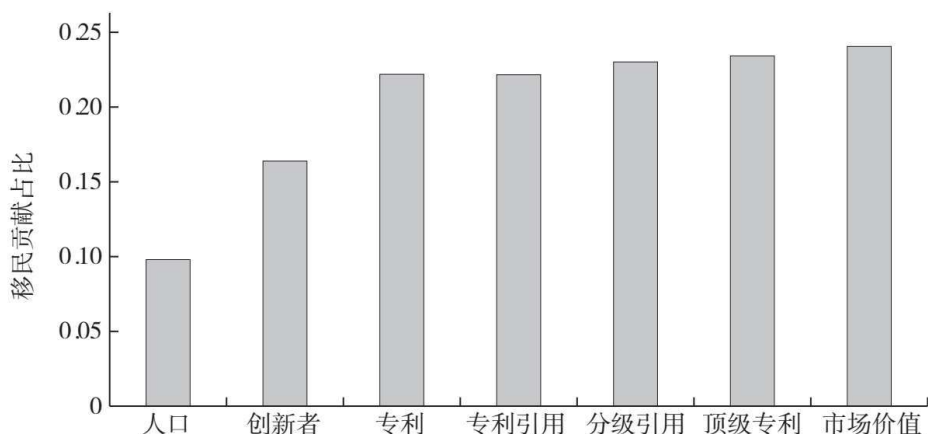


图13.14 移民在不同组别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转引自S. Bernstein, R. Diamond, T. McQuade and B. Pousada, “The Contribution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to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no. 3748,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November 6, 2018，图1。

还有，该研究表明创新者的意外或过早死亡会影响其合作者群体的生产率，测算指标是这些合作者申请的专利数量。创新者的意外死亡可以理解为对合作者群体的突发性负面冲击。[\[24\]](#)与本国出生的人相比，当创新者是出生于外国时，其意外离世对生产率造成的打击更为严重。

睿智的移民带着自己在母国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而来，在某些领域，他们可能在迁入国居于先进位置。我们以迁往其他国家的以色列创新者为例，由于以色列在水生产技术上领先于全世界，接收大量以色列创新者的国家将更有希望在水生产领域取得突破。[\[25\]](#)更一般地说，我们可以证明，拥有某些专长的外国创新者迁入与迁入国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创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专业从事某种技术的外国创新者的人数如果增加1倍，移民接收国未来10年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的概率将提高25%~60%。[\[26\]](#)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素质个人组成的人群的多样性也能促进创新。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可以把互补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融合起来，从而深化思想认识。事实表明，多样化的高技能移民对迁入国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有积极影响，表明移民的多样性促进了创新。[27]

那么，高技能移民的加入为何能促进迁入国的创新？原因之一与教育有关，例如威廉·科尔（William Kerr）发现，1995—2008年迁入的移民占美国有大学学历的劳动人口增量的29%。[28]移民尤其集中在理工科专业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所谓的STEM）。在理工科领域被引用最多的250名学者以及诺贝尔奖得主中，出生在外国但定居在美国的人远远超出其人口所占的比例。[29]原因之二与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的概念有关，科尔也对此做了相关研究。此概念基于两个统计现象，一是与本土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及其子女严格来说并未在理工科领域表现更好，但他们选择这些专业的人数更多，因此也有更多人脱颖而出。二是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上，移民的创造力似乎更强。这两个现象合起来表明，移民比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更有进取心、更意志坚定，也更愿意承担风险。这一内在动力源自哪里？有两个源头，首先是个挑选过程，只有最具进取心和动力的人才有足够的意愿成为移民，肯接受迁移的风险。其次，移民过程本身能帮助培养争取成功的信念。

虽然移民对创新有积极作用，但对输出国而言却有人才外流的忧虑。从贫困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不应该使输出国丧失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人才。在理想情况下，应该让高技能人才能够返回母国，同时又不至于切断同接收国的联系。如果在母国的发展不够顺利，应该允许他们再回到移民接收国。构筑这样的安全网，而非永久性地关闭国门，才是鼓励高技能人才返回自

己出生国的最佳策略。[30]

5. 结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之后的进口冲击给美国的就业和工资总体上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没有美中贸易额在1990—2007年的增长，2007年的美国制造业会多出15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个错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自己有利呢？答案是否定的，基于至少三个原因。首先，如本书第11章论证的那样，失业风险可以用建立社会安全网等方式来更好地应对。其次，贸易的发展降低了商品价格，使美国居民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大约1 171美元。[31]再次，发动贸易战有招致对方报复的风险，反过来压缩本国企业的出口市场，对促进创新不利。

相反，给本国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有更好的效果，既能推动创新，又有利于增强对价值链的控制。事实上，赢得竞争力角逐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投资和真正的供给侧政策。德国的案例可以为此作证。21世纪初，德国和法国在抗击新冠类产品（如口罩、呼吸机和试剂等）上几乎并驾齐驱。但在随后数年，德国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维持了对战略性医疗产业价值链的控制。德国的成绩并非依靠保护主义，而是源自创新、产业政策和社会对话机制，综合起来提升了德国生产商的竞争力。

最后，虽然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应该尽可能避免，但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用关税工具。对于制止社会倾销或环境倾销，关税可能是必需手段。我们在第9章指出，碳关税可以成为在国际上打击“污染天堂”的武器。当然这类关税的设计与实施

必须有跨国框架（如世界贸易组织或欧盟等）作为支持，而不能由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行动。

最后，近期研究还表明，移民对迁入国的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高技能或充分融合的移民群体。

[1] 关于美国贸易战对价格和福利的影响的出色综述，可参见M. Amiti, S. J.Redding, and D. Weinstein,“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 S.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 no. 4 (2019) :187 -210.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The Great Lockdown*,April 2020.

[3] N. Bloom, M. Draca, and J. Van Reenen,“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 no. 1 (2016) :87 -117.

[4] 例如2018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的3倍。

[5] See A. B. Bernard, J. B. Jensen, and P. K. Schott,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 no. 1 (2006) :219 -237;J. R. Pierce and P. K. Schott,“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no. 7 (2016) :1632 -1662;D. Acemoglu, 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B. Price,“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no. S1 (2016) :141 -198;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J. Song,“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4 (2014) :1799 -1860.

[6] See D. H. Autor, D. Dorn, and G. H. Hanson,“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6 (2013) :2121 -2168.中国进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等于中国进口产品价值占美国国内市场总销售额的比率。

[7] 在这一研究中，美国被划分为722个地方性劳动力市场。

[8] 该方法非常类似于有关中国进口对地方层面的就业与工资的影响的研究方法，唯一区别在于，这里是针对具体的企业。参见D. Autor, D. Dorn, G.

H.Hanson, G. Pisano, and P. Shu,“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US Pat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Insights* 2, no. 3 (2020) :357 -374.

[9] David Autor及其合作者只考虑了Compustat数据库中包含的大企业。

[10] 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M. Melitz, and T. Zuber,“Impor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Dat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11] 更普遍地说，相比美国，欧洲遭遇的中国进口冲击更多发生在上游产业。

[12] Aghion, Bergeaud, Lequien, Melitz, and Zuber,“Imports and Innovation.”

[13] 上游产业冲击具有正面效应，加上中国进口冲击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多发生在上游产业，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研究（Bloom, Draca, and Van Reenen,“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发现，从欧洲的数据看，中国进口冲击对创新总体上具有正面效应。

[14] A. Lileeva and D. Trefler,“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 Level Productivity. .. for Some Pl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no. 3 (2010) :1051 -1099.

[15] P. Aghion, A. Bergeaud, M. Lequien, and M. J. Melitz,“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46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May 2018）.

[16] A. Flaaen, A. Hortaçsu, and F. Tintelnot,“The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Price Effects of U. S.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Washing Machin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no. 7 (2020) :2103 -2127.

[17] 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 “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

[18] M. J. 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no. 6 (2003) :1695 -1725.

[19] 见本书第9章有关跨境征收碳税的讨论。

[20] 关于价值链的讨论，建议参考如下文献: P. Antràs, “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4, no. 3 (2020): 551-574; P. Antràs and D. Chor,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 81, no. 6 (2013): 2127-2204; and P. Antràs, D. Chor, T. Fally, and R. Hillberry,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no. 3 (2012): 412-416.

[21] 关于移民与创新的关系，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是: William Kerr, *The Gift of Global Talent: How Migration Shapes Business, Economy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 Costas Arkolakis, Michael Peters, and Sun Kyoung Lee,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2019 Meeting Paper No. 1420,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2019.

[23] S. Bernstein, R. Diamond, T. McQuade, and B. Pousada, “The Contribution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to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no. 3748,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November 6, 2018.

[24] 这一思想启发的研究成果包括 P. Azoulay, J. S. Graff Zivin, and J. Wang, “Superstar Extin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no. 2 (2010): 549-589; and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A. Bell, “Team-Specific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no. 4-5 (2018): 1034-1073.

[25] D. Bahar, P. Choudhury, and H. Rapoport, “Migrant Inventors and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of Nations,” *Research Policy* 49, no. 9 (2020)。另外建议读者查阅该论文附录的参考文献。

[26] 类似的研究[如 George Borjas and Kirk Dora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American Mathematicia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no. 3 (2012): 1143-1203]表明: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数学家移民对美国的新知识生产带来了积极效应。

[27] A. Alesina, J. Harnoss, and H. Rapoport, “Birthplac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 no. 2 (2016): 101-138. 请注意，作者没有直接研究多样性对东道国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影響。

[28] Kerr, *The Gift of Global Talent*.

[29] See P. E. Stephan and S. G. Levin,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to US

Science by the Foreign-Born and Foreign-Educated,”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 no. 1 -2 (2001) :59 -79.

[30] See P. Aghion and A. Roulet, *Repenser l'État* (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 République des idées, 2011) .

[31] X. Jaravel and E. Sager, “What Are the Price Effects of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U. S. and Implications for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no. 2019 -068,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ugust 2019.

第14章

投资型政府与保障型政府

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平息，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就开始呼吁回到最小政府，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尽可能减少公共支出既有利于平衡财政预算，又能降低税收，而降低税收将帮助企业恢复利润水平，为增长而投资。

可是这一逻辑忽略了如下事实：在自由放任经济中，自行其是的经济行为人（无论个人或企业）通常会对知识和创新投资不足。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对未来创新的正外部性。例如，个人在对自身做教育投资时不会考虑这将给同事或家人带来的积极效应。又如，企业在对创新做投资时也不会考虑其取得的技术进步对将来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投资型政府为促进知识和创新经济而投资。

同理可证，自由放任经济往往会导致不平等恶化，社会流动性下降，并忽略创造性破坏（尤其是失业）对健康与福利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保障型政府，帮助人们防范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伴随的风险。政府作为保险人的角色不限于应对异质性风险，还能帮助个人和企业防范宏观经济衰退，特别是由于战争、重大金融危机或流行病疫情等带来的冲击。

本章将探讨：历史上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对创新引领型增长至关重要的、可以扮演投资人和保险人角色的政府的兴起。

1.战争的威胁与投资型政府的兴起

马克斯·韦伯于1918年发表题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的演讲，认为政府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内拥有宣布正当使用武力的垄断权”。^[1]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一种政治组织，通过特定的管理结构，有能力直接或通过授权执行法律和征收税赋。政府实现此类目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军队、法院和警察等机构来维持秩序。

法律与秩序为什么不足以带来创新引领型增长

如果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则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我们可以回顾下创新引领型增长所需的三个熊彼特式杠杆：累积式的知识进步，让每个发明家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对创新租金的保护，尤其是通过专利制度；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摧毁过去创新的租金，由此可能激起昨日的创新者对新进步的反抗。

中国古代的皇帝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威，非常符合韦伯定义的国家政府的功能。然而，这样的权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首先，大多数国民缺乏教育；其次，没有权力分立来保证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自由；再次，缺乏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例如，法国的国王与贵族可以在任何时候剥夺商人或工匠们的租金。当时也没有创造性破坏，因为那样的社会必须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势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对当权者构成挑战。

政府进化的第一步是英国在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然后是法国在1789年的大革命。其做法是通过扩大议会的权力来限

制君主的权威，一些新兴经济势力可以在议会中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2]于是出现了走向孟德斯鸠主张的分权的渐进运动，得以限制权力滥用，给经济行为人（尤其是企业主）提供保护。[3]在历史上，对租金的保护和专利体系的建立也是源于这个制度进程，专制色彩逐渐减弱，权力分享加强。

第二个同属渐进性质的步骤涉及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与托尔斯滕·佩尔松（Torsten Persson）所说的政府的财政能力，即获取税收并将其投入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主要公共服务的能力。[4]贝斯利在致敬阿瑟·刘易斯的演讲中引用了两句话。[5]第一句出自刘易斯本人：“自动持续增长的两个条件是，一个国家有本土的企业家和公务员队伍，以及充分的储蓄和纳税能力。”[6]第二句出自约瑟夫·熊彼特：“人类的财政史是人类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政府必须抽取的经济血液，以及这些资源被用到哪里。”[7]

图14.1描述了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随时间的演变。[8]每条曲线都代表采用特定税收工具（所得税、代扣所得税、增值税等）的国家的占比变化。例如，S形的实线表明所得税逐渐被18个国家采用，与某种通用技术的普及曲线类似（见本书第3章）。一开始，很少国家实施所得税。此后，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明显起飞，直至样本中的所有国家都采纳。代扣所得税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虚线）以及增值税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为什么各国都逐渐决定开征这些税收？下面我们尝试做些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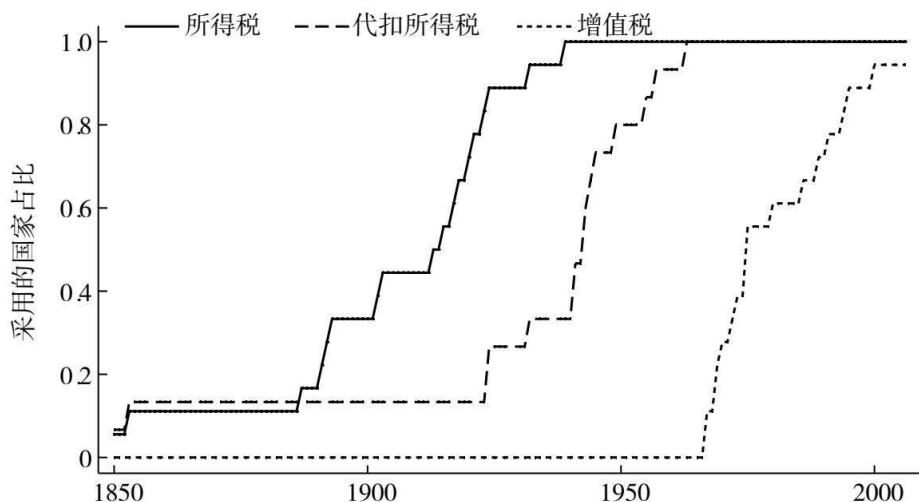


图14.1 18个国家的财政能力的历史演变

注：图中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转引自T. Besley and T. Persson,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ed. A. J. Auerbach, R. Chetty, M. Feldstein, E. Saez (Amsterdam:Elsevier, 2013) , vol. 5, 51 -110 , 图4。

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公共教育投资[9]

我们在第2章指出，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工业起飞。国家竞争对政府的作用和组织的演化也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军事竞争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财政能力和投资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10\]](#)公共教育的发展就完全不属于自发性质，在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的出现都来自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推动。

法国案例：从色当战役到朱尔·费里

法国教育体系是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后发展起来的。法国在1870年9月的这场战役中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次年2月，德国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一刻骨铭心的败局引发了法国教育体系的革命。1870年之前，法国的教育落后于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11]大多为私人学校，由教会管理。在当时依然以农业为主的法国，教师通常由本地的神父或者某位识字的村民兼任，教室在乡间建筑或庭院里临时借用。因此，大多数国民依然是文盲。1863年，相当于全体人口1/5的750万法国人还只会说自己的方言。统治精英很清楚这一教育缺陷，拿破仑三世于1863年任命的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Victor Duruy）建议开展全面改革，并大规模投资于教育体系。但此建议并没有引起重视，直至色当战役失败、拿破仑三世垮台后，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朱尔·费里才把杜卢伊主张的全面改革付诸实施。

费里的改革颇为激进：1881年，学校实行免费；1882年，对6~13岁的全体儿童推行义务教育；1883年，要求有至少20名适龄儿童的村庄必须设立学校；1885年，政府制定了提高教师待遇和加强学校建设及维护的宏大投资计划。教育扩张成效显著，法国新设立了17 320所学校，扩建了5 428栋学校建筑，8 381所学校得到翻修。[12]这些改革不只为全体法国儿童提供了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教师培训计划保证教学质量。此外，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做了彻底修订，突出阅读、拼写、历史、地理和公民教育等内容，并且给年轻人树立爱国主义。结果不仅降低了国民的文盲率，更重要的是还培养了学生以通用法语阅读、推理和交流的能力。

日本的案例：从《神奈川条约》到明治维新

1603—1867年，日本被德川幕府的将军们统治。这一时期的政权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经济对外封闭，教育仅限于极少数武士精英阶层，并且以儒学修养为核心。1853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派遣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完全开放国际贸易，就将面临战争。为强化威胁，美国人的战舰进逼到日本海岸。在威逼之下，日本于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允许西方国家的船只进入下田和函馆的港口，以获得补给。这一羞辱成为广泛的政治与教育改革的催化剂。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反叛方拥戴明治天皇执政。新政府决定大规模投资国家和教育体系的现代化。1872年，对全体儿童实施四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建立起全国性的教师培训体系。另外，儒学教育被淡化，更多强调科学。这场改革结出了硕果：在1865—1910年间，日本的男性识字率从35%提升至75%，女性从8%提升至68%。

法国和日本的案例表明，军事竞争可以促进教育体系的进步。这一推测能否得到更普遍的证明？回答是肯定的。阿吉翁等多位学者2019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166个国家在1830—2010年的年度数据，测算了学校入学率随战争或军事威胁（以邻国领导人发表的演讲的敌对程度来代表）而上升的幅度。[\[13\]](#)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对教育的投资确实会因为军事威胁和竞争而提高。

然而，对一个国家增加公共品投资而言，战争威胁总是必不可少的吗？好消息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上对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可以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制度改革与经济推动力。关于各国现状的透明易得的信息，加上对教育和医疗等指标开展的国别比较，同样能发挥竞争标杆的作用，推动体制变革。例如来自东南亚各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的竞

争，无疑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的催化剂，使中国把重心从军备发展调整到经济建设上。就法国而言，法国各大学在上海高教排名上的失色表现推动了对大学体系的广泛改革，2010年发起的“投资未来”（Investment for the Future）计划包含了对各所大学的大规模公共投资。

产业政策: DARPA模式的兴起

产业政策是各国促进创新引领型增长的又一类工具。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有多方面理由的支持，尤其是在航天等固定成本极高而需求极不稳定的产业，有必要对资源和参与者加以协调（见本书第4章）。

对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它是美国国防部里负责军事应用创新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的成功历史说明，有效实施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而非制约创新。DARPA的创建源于美国在太空竞赛的一场搏斗中输给苏联: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成为进入环绕地球轨道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凸显了苏联太空项目的进步，令美国公众震惊。时任参议员的林登·约翰逊写道：“看到可能有另一个国家取得超出我们伟大美国的技术优势，真可谓沉重打击。”^[14]在短短5个月内，即1958年2月，甚至在美国宇航局成立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设立了DARPA，作为同苏联开展军事竞赛和太空竞赛的重要工具。

这个机构至今依然存在，其模式已被各方做了细致研究。^[15]在国防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和市场化

的转化较为困难。从图14.2能看到，技术进步沿着S形曲线发展。曲线的开端代表某个理念的出现，此时投入的开发努力并不多，因为努力的回报较低。曲线中部对应起飞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有所提高，使技术的进展加快。在最后的成熟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递减，技术的进展随之减速。由于初始阶段需要很大的努力，为引起DARPA的关注和资金投入，必须把未来开发产生的社会收益考虑进来。所以，得到该机构支持的项目有三个特征：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目标部署研究工作；存在协调问题，在没有公共干预时难以开展大规模融资和测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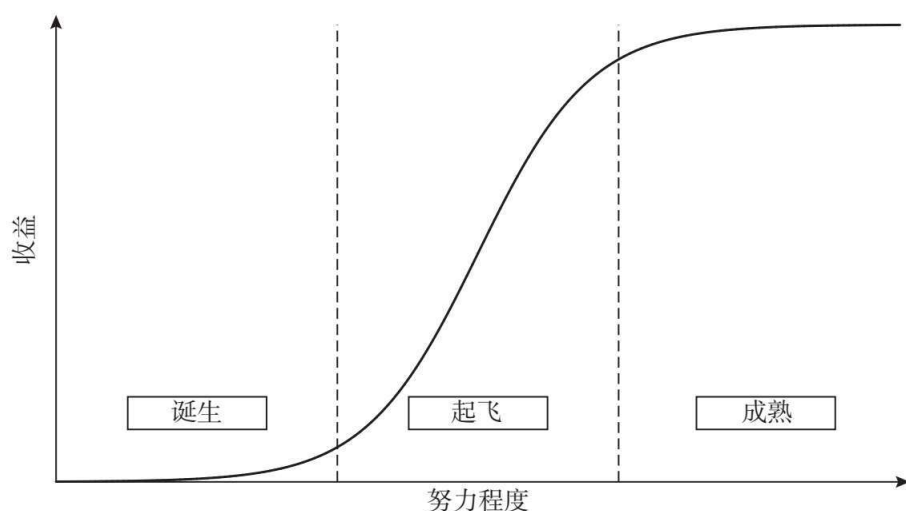


图14.2 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DARPA模式尤其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自上而下方式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结合。[\[16\]](#)在自上而下方面，美国国防部出资支持项目，挑选项目负责人，并提供3~5年的聘用期。在自下而上方

面，来自学术界、私人企业或投资方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有全面的解释和管理权，可以在初创企业、大学实验室和大型工业企业之间自由组建合作关系，并在招募合作者方面享有极大的灵活性。

这一科学发展模式让美国能够在太空竞赛中稳步赶超苏联。虽然在该机构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依靠同样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他们在1957年第一个把动物送上太空，在1961年和1963年把第一位男性和第一位女性送上太空，在1966年第一个实现无人登月；但美国人于1969年赢得了最终胜利，首次实现载人登月。

如今，DARPA的年度预算超过30亿美元，资助的项目超过100个。该机构在若干有高度社会价值的高风险项目的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包括初期名为阿帕网（Arpanet，因为当时DARPA被更名为ARPA）的互联网，及GPS等。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考虑复制这一产业政策治理模式，设立自己的相应机构。一个建议是成立欧洲的DARPAs，首先是组建法德两国的联合机构，再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欧洲设立类似机构的主要动力，是在美国从全球收缩的背景下，让欧洲承担更大的防卫责任。另一个动力则来自欧洲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特别是在能源、环境、数字和医疗等产业。欧洲DARPAs的项目资金将直接来自参与国的政府预算。因为不属于欧盟的预算，这些资金将不受公平回报原则（*juste retour*，公平回报是指各成员国能“收回资金”，获得不低于其出资的货币回报）的约束，同时避免受困于各成员国的否决权。

2.保障型政府的兴起

防范异质性风险：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

法国在二战后30年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充分就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其毕生职业是在同一家企业从事同一种工作。在此环境下，社会政策主要是通过社会补贴、教育补贴和家庭补贴扶持低收入者。这种体系源自政府提供的社会安全网制度的长期演变。

“俾斯麦模式”被广泛视为福利国家的首个榜样，由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建立，基本设想是让劳动者缴纳保险基金，以帮助他们防范与疾病、工伤事故、衰老和残疾有关的各类风险。在发布此类法律时，德国也出现了第一批工会，俾斯麦希望通过提供保障避免国家走向激进社会主义。[\[17\]](#)或者说，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在创建福利国家时，一个关键因素是感受到了对自身权力的威胁。

福利国家兴起的第二个典型案例是英国。1942年，应英国政府要求，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交了名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的报告，为另一种模式奠定了基础，目标是为国民提供保障，无论其是否处于就业状态。[\[18\]](#)该报告是在战争导致的极度困难时期发布的，希望确保任何人都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我们再度看到冲击对推动福利国家兴起的重要作用——这次是战争冲击。

贝弗里奇报告为实现国家凝聚力的社会福利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秉承类似思路的公共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业已出现，以应对大萧条及其造成的广泛失业问题。早在1935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其中既包含保险机制，例如用工薪税

支持的养老金体制；又包含福利机制，例如对未成年儿童的家庭补贴，给面临抚养困难的父母提供福利金等。

二战的冲击也帮助法国建立了真正的福利国家制度，成为新政府的国家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为改善经济状况，法国引入了计划控制、国有化和公共干预。在此背景下，1945年10月4日和19日颁布法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推动这一改革的雄心起源于战争时期，全国抵抗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sistance）于1944年制订的计划已列入了国家光复后将实施的改革，包括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以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19]此外，战争让工会掌握了更大的谈判权。作为光复后主要政党之一的法国共产党也调整了政治策略，从反对党变成联合参政党之一。^[20]

现代法国社会保障体制是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混合，在历史上则是植根于保险模式。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主要是对战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造，帮助劳动者应对与疾病、衰老、残疾和工伤事故有关的风险，并提供家庭补贴。这一普遍体制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但也允许保留某些特殊的体制。因此，尽管政府在新体制中扮演主要角色，传统的合作社与工会依旧重要。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在1960年扩展到农民，1962年纳入医疗专业人士。法国的福利国家模式在变革中一点点借鉴了贝弗里奇模式的元素，既包括福利方面（1956年设立了最低养老金制度，1986年设立了最低保障收入），也涉及筹资方面（例如对所有类型的收入征收的专门用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特别税）。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后，面对自由市场精神的强势回归，福利国家制度仍能够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21]新的模式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荷兰实施的弹性保障制度，之后被丹麦借鉴（见本书第11章）。不过，荷兰模式与丹

麦模式有所不同，前者主要保护最缺乏稳定的工人群体，后者更具有普遍性，并以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基础。所以，这一模式似乎更多反映了特定的国情，而不是预先设定的策略。在福利国家构建的每个步骤中，劳动者、管理层与政府机构之间不断达成妥协，形成新的范式。荷兰的例子说明了这些参与方之间进行谈判（社会对话机制）的意义，因为1997年制定的弹性福利和保障法规正是工会与政府之间长达数月磋商的成果。社会对话在福利国家制度构建中的重要性不是20世纪后期或弹性保障制度出现后才有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瑞典曾暴力镇压劳工运动。

[22]此时在绰号为“牲畜市场”（Kuhhandel）的红绿联盟旗帜下兴起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使国家体面地走出了危机。起初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这一联盟尤其主张强化政府的作用，但也赋予民间组织制衡政府权力的责任（见第15章）。

如今，福利国家历史上最新出现的弹性保障体制似乎是较为合理的工具，既能让创造性破坏变得更为人道，又能鼓励人们继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我们已讨论过改进弹性保障效率的几种可能措施，但即使有这些改进，它是否足以保护人们免遭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风险？若干理由表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更多事情。首先，个人不断更换岗位、在职业生涯中革新自己的能力有限。例如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21世纪的21个教训》中提出，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导致工作更换频率与技能过时速度加快。[23]他认为，这样的双重加速表明应该给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以满足在某个生命阶段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不管人们如何度过这段时光。莫尼克·坎托·斯珀波则在《自由的终结》中提到，大量18~19岁的年轻人既缺乏基本的职业训练，也没有必要的资源去寻找合适的工作，以帮助自己进步，以及在后来转向其他岗位。因此她认为，这部分人群也应该得到充分的物质支持。[24]

此类理由让部分经济学家同行提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理念。坎托-斯珀波认为该收入“有助于解放个人，使其不仅能实现自身生存，还能帮助其自我定位，以获取相应的资源，例如培训机会、合适的工作岗位以及可以决定人生走向的能力等”。[25]秉持此类观点的人同主张“小政府”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与自由观。对后者而言，福利开支是一种奖励懒惰的施舍。但在坎托-斯珀波等人看来，给予人们基本生活支持可以激发其创造力。

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最优方式，目前已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之一是给所有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无论穷人或富人，年轻人还是老人。问题在于，这一机制从财政和税收角度看成本可能太高。另一个建议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2年首倡，对低于某个收入和资产门槛的人实行负税收。[26]还有一个建议是，给每个年轻国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积分点”，可以用来支付教育、住房和职场初期的某些开销。有关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可行及应该如何实施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对该措施的合理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思考：有什么最佳方法可以应对创造性破坏和新技术革命的不利后果。

防范宏观经济风险：逆周期政策的作用

逆周期政策是如何出现的？在很长时间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思想是自由放任，相信市场体制的力量总会把经济活动拉回均衡状态。后来，凯恩斯为政府干预和逆周期政策提出了一个理论基础。但如果离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我们将难以充分理解他的政策思想。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凯恩斯观察到英国的失业在快速增加，1922年有近250万人失业，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在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领导下，自由党提出了公共

工程计划和其他解决就业不足的措施。凯恩斯在1929年同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合作发表《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一文，对此表示支持。他们在文中认为，每当有失业者找到工作时，就会自动创造出更多工作。^[27]不过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还是美国的大萧条。面对通货紧缩与严重危机，加上自由市场政策的溃败，已不可能再无所作为，坐等价格和经济行为人的调整适应来恢复均衡。从1933年起，美国开始实施新政，这标志着干预主义政府的兴起，并为福利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

直至1936年，随着凯恩斯的名著《通论》出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的干预行动才获得理论依据。^[28]这一划时代著作是有关政府干预思想的决定性突破，其主旨是，当需求不足，尤其是因为失业增加所致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通过扩大总需求刺激经济活动。理由如下：在公共就业中每增加1元钱的公共支出，会产生多于1元钱的经济活动，因为工人将把增加的工资用于支出，从而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此类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起被广泛采用，也被称为“停停走走政策”（stop-go policies）：意思是当经济活动放缓、失业增加时，采取刺激经济活动的政策（走）；而当面临通胀上升、经常账户恶化时，则采取抑制经济活动的政策（停）。

到20世纪70—80年代，需求侧政策受到批评，特别是因为在石油冲击时代出现了滞胀现象，即同时发生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关键在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经济体中，通过刺激需求调节经济周期似乎不再那么有效了。开放经济体的公共支出增加会导致进口增加、贸易赤字扩大，而非国内经济活动复苏。爱尔兰国防部长威利·奥迪尔（Willie O'Dea）于2009年对此做了精彩总

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试图用财政刺激手段应对石油冲击，但由此带来的爱尔兰消费者购买力增长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进口增加，反而使情况更为糟糕。完全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情景不会再度出现……从爱尔兰的角度看，最好的财政刺激是让我们的贸易伙伴国采取刺激行动，那将促进对我们出口产品的需求，且并不花费我们的成本。”[\[29\]](#)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发达国家逐渐转向以供给侧为中心的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供给侧政策主要强调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一个目标是让企业在整个商业周期中维持投资水平，否则，被衰退打断的研发投资可能难以补救。

让我们假设如下场景，获取信贷永远不成问题。如果投资项目从长期看有利可图，企业就总能借到资金，同时短期波动也不会对此产生影响。于是当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投资时（而非短期投资），它们就能确信这些投资不会受经济波动左右。相应地，在这个场景下，政府也无须在衰退中加以干预，去扶持企业。

反过来，如果企业面临信贷约束，它们能从银行借到的金额由当期收入而非未来的利润决定，那么当衰退导致企业当前收入减少时，企业就难以应付流动性冲击，而不得不削减研发支出。这样做会使企业在创新竞争方面自缚手脚。

假如在开始阶段，企业需要做出决定，是开展一个创新项目，还是一个更为传统的项目。此时，由于预见到经济衰退可能迫使自己退出创新竞争，该企业将放弃创新项目，而选择传统项目。[\[30\]](#)政府该如何扭转这一不利于创新的结果呢？答案在于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逆周期财政政策要求政府在衰退时借入资金，用以扶持面临流动性冲击的创新企业，然后在经济扩张时偿还债务。逆周期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在衰退时下调短期利

率，并在必要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支持面临流动性冲击的创新企业，让它们不必削减研发开支。[\[31\]](#)到经济扩张期，中央银行则将提高利率，结束量化宽松。总之，某个国家的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创新的促进效果就越显著。[\[32\]](#)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试图同时采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逆周期政策。在供给侧，大多数国家自2009年开始依靠自动稳定器机制来缓解衰退冲击。[\[33\]](#)此外，许多国家在2008—2010年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组合计划。

在需求侧，欧洲国家于2008年12月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扶持企业，以欧盟的《小企业法案》（Small Business Act）为例，该法案在2008—2011年间为中小企业提供了300亿欧元贷款。各国中央银行从2008年起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是供给侧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从近期看，哪些国家采取的逆周期政策最为强烈？在财政政策方面，图14.3比较了15个经合组织国家的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或逆周期强度。其定义是，财政赤字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越多，在经济扩张时减少越多，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质就越强。该图显示，北欧国家（丹麦、瑞典和芬兰）的财政政策的逆周期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另外，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财政赤字在经济繁荣期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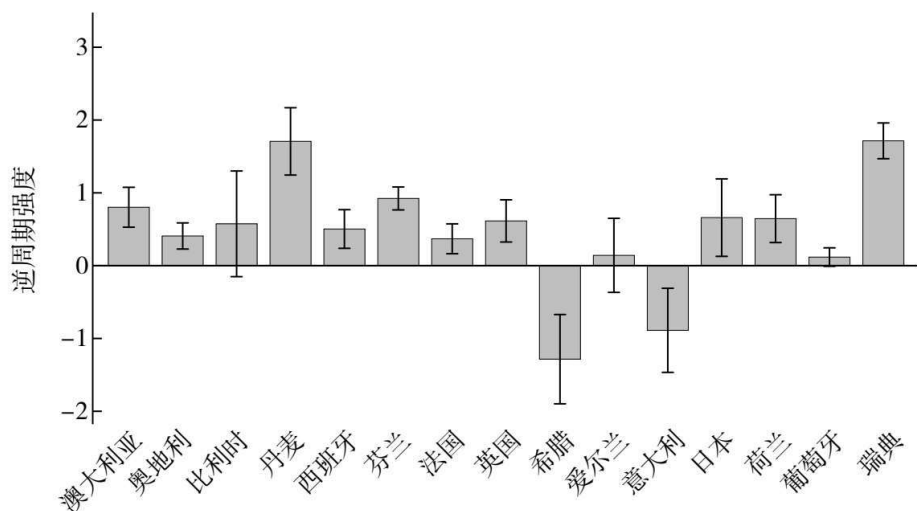


图14.3 1980—2005年财政政策的逆周期强度

注：数值为正代表逆周期财政政策，数值为负代表顺周期财政政策。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D. Hémous and E. Kharroubi, “Cyclical Fiscal Policy, Credit Constraints and Industry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2 (2014): 41-58, 图2。

有两个因素影响各国财政政策逆周期的强弱。第一个是政府做出的在整个商业周期中维持若干福利支付的承诺，也就是对自动稳定器机制的利用。在这些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较高。反过来，推行小政府政策的国家难以给国民提供对宏观经济风险的防护。

第二个因素是财政纪律，它让较为自律的国家能够在危机时期实施更宏大的刺激计划，也就是逆周期性更强的财政政策。这比较好理解：财政纪律严格的国家更容易在衰退期间从国际市场上借到资金，因为贷款人相信周期反转时会得到如数偿还。

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就观察到这一现象。例如，意大利危机前的公共债务已超过GDP的100%，只实施了较小规模的

刺激计划，短期内的赤字增加不多，却加重了经济衰退。还有，从2010年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以尽快削减赤字的欧元区国家，也正是危机前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即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而财政纪律最严明的国家，如德国与荷兰等，则能够延长复苏期。希腊和北欧国家代表着两个极端：希腊在2008年危机前财政纪律松弛，是图14.3中顺周期性质最突出的国家，不得不在周期的最低点削减财政支出。[\[34\]](#) 北欧国家则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在图14.3中表现为最强的逆周期性。

新冠疫情危机同样证实了财政纪律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时的重要性。得益于财政盈余的积累，德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在2019年已回到GDP的60%以下，使得它有充分灵活度实施空前规模的逆周期政策来克服疫情危机的后果：到2020年6月初，德国的财政刺激加债务重组规模达到GDP的24.6%，相比而言，法国仅为12.3%。[\[35\]](#)

最后，我们要看到银行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关键作用。2008年危机后，有种观点认为银行应该遵守比《巴塞尔协议I》和《巴塞尔协议II》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以预防新的金融危机。这类人士相信，银行资本金同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应该大幅提高。但该思路的问题在于，其风险会在衰退时增加。这类资本金要求会鼓励银行在经济扩张期比衰退期更多放款，或者说，为满足监管要求而实施顺周期贷款策略。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对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金要求，即在衰退时期，它们可以维持更低的资本金/资产比率。这种制度能让银行在衰退期给企业提供更多贷款，以帮助稳定经济周期。逆周期资本金规则的思想构成了《巴塞尔协议III》的基础，虽然有关的支持理由并非出于增长方面的考虑。[\[36\]](#)

3. 结论

创新主要依靠市场和企业，但也需要政府发挥投资人和保险人的作用。历史上的国际竞争，包括军事、商业和工业等各方面的竞争，推动了有必备财政能力（税收获取能力）的投资型政府的兴起。如果不是普法战争中色当战役的溃败，朱尔·费里或许难以在法国建立起公共教育体制。与之类似，重大经济危机（如1929年大萧条和近期的新冠疫情）与世界大战推动了保障型政府的兴起。为应对大萧条，美国采取新政重振总需求，拉动经济走出衰退。当今时代，各国政府利用强有力的逆周期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周期，尤其是财政政策。但是，只有当政府能够在危机以外的时期严格执行财政纪律时，此类政策才可以充分发挥效力。

当然，政府作为保险人并非只应对宏观经济冲击，还要缓解异质性风险。所以20世纪上半叶的危机和战争推动了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家庭补贴的发展，以保证最低收入水平，防范疾病等风险。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自由化与贸易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尖锐的新型风险——失业风险。丹麦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弹性保障模式，希望一方面应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创新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保护人们免受失业的负面影响。这种模式可以继续改进，包括鼓励终身职业培训，防止人们滑落到贫困线之下。负税收可以成为缓解失业风险的另一种办法，该风险对季节性或临时性员工来说尤为突出。

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政府过分强势或无所不在的危险，以及政府失灵和功能不足的问题。我们将重点分析制衡机制和其他预防措施，以减轻行政部门权力滥用的风险。更具体的内容还包括，媒体、工会、非营利组织乃至各种类型的民间社会组织如何

能最终保证权力的分立，以及对行政部门的监督。

[1]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8 -1919), in *The Vocation Lectures*, ed.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Indianapolis:Hackett, 2004), 33.

[2] 本书第2章对此进程做了详细阐述。

[3]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Geneva: Barrillot & fils, 1748);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 and trans.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Timothy Besley and Torsten Persson, “Fragile State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 no. 3 (2011) :371 -398.

[5] Timothy Besley,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r Arthur Lewis Distinguished Lectur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January 25, 2019.

[6] Arthur Lewis, “The Slowing Down of the Engine of Growth,” Nobel Prize Lecture, December 8, 1979.

[7] J. A. Schumpeter, *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s* (Austria: Leuschner and Lubensky, 1918). Translated as J. A. Schumpeter,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 Richard Swedberg, 99 -14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Tim Besley and Torsten Persson,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ed. A. J. Auerbach, R. Chetty, M. Feldstein, and E. Saez, vol. 5, 51 -110 (Amsterdam: Elsevier, 2013). 样本中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数据来自Brian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3 vol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9] 本节的内容基于如下研究: Philippe Aghion, Xavier Jaravel, Torsten Persson, and Dorothée Rouzet, “Education and Military Rivalr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7, no. 2 (2019) :376 -412.

[10]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Besley and Persson, “Fragile

State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1] 拿破仑一世在耶拿战役击败普鲁士，促使普鲁士国王大规模投资学校、大学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用了洪堡兄弟。

[12]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 -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3] Aghion, Jaravel, Persson, and Rouzet, “Education and Military Rivalry.”

[14] Lyndon B.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

[15] Pierre Azoulay, Erica Fuchs, Anna P. Goldstein, and Michael Kearney, “Funding Breakthrough Research: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 ARPA Model,’”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9, no. 1 (2019) :69 -96.

[16] 自上而下方式代表的程序是，政府作为决策者，把决策指示给分散的行为人。相反，自下而上的方式是指，政府确立大致的政策方向，让地方行为人决定如何实施。

[17] 1878—1890年间通过了几项反社会主义的法律。

[18] Sir William Henry Beveridge,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2) .

[19]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sistance, “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March 15, 1944.

[20] 工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有相当多代表，法国总工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GT）在1945年有400万会员。

[21] See Pierre Rosanvallon, *La Crise de l'Etat-providence* (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Points Politique, 1981) .

[22] 电影《阿达伦31》讲述过这一悲剧，参见Bo Widerberg, dir. , *Adalen 31*, Svensk Filmindustri, 1969.

[23]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8) .

[24] Monique Canto-Sperber, *La Fin des libertés : Ou comment refonder le libéral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9) .

[25] Canto-Sperber, *La Fin des libertés*.

[26]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27] John M. Keynes and Hubert D. Henderson, *Can Lloyd George Do It :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beral Pledge* (London: The Nation and Athenaeum,1929) , reprinted in John M. Keynes,“Can Lloyd George Do It?”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86 -12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28] 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36) .

[29] Willie O'Dea,“Why Our Response to Crisis Isn't Wrong,” *Irish Independent*, January 4,2009.

[30] Philippe Aghion, George-Mario Angeletos, Abhijit Banerjee, and Kalina Manova,“Volatility and Growth: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nvest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7, no. 3 (2010) :246 -265.

[31] 量化宽松是一种财政政策，中央银行从金融机构那里购买数额庞大的债务，特别是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

[32] Philippe Aghion, David Hémous, and Enisse Kharroubi,“Cyclical Fiscal Policy,Credit Constraints, and Industry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2 (2014) :41 -58; Philippe Aghion, Emmanuel Farhi, and Enisse Kharroubi,“Monetary Policy,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Growth,” *Economica* 86,no. 343 (2019) :431 -470.

[33] 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和政府支出针对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不需要经过任何立法行动。例如在经济扩张期，由于消费和就业增加，政府的所得税和工薪税收入也会增加，失业金等转移支付项目的支出则会减少。相反在经济衰退期，政府的税收减少与福利支出增加将有助于维持经济活动。

[34] Céline Antonin,“La fatalité grecque: un scénario prévisible?” *Lettre de l'OFCE* 323, September 21,2010,1 -4,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01023902/>.

[35] Département analyse et prévision de l'OFCE,“Évaluation de l'impact économique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et des mesures de confinement sur l'économie mondiale en avril 2020,” *OFCE Policy Brief*, no. 69, June 2020.

[36] 危机之后出现的一个共识是，监管机构应该把宏观审慎的内容纳入考虑。《巴塞尔协议III》不仅强化了对资本金的要求，还加入了反周期缓冲，占资

产总额的0~2.5%。《巴塞尔协议III》允许在借款加速时期提高资本金要求，在经济下滑期放松要求。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在第14章里，我们把政府视为同质性的单一体。但在现实中，政府是个复杂的综合体，由愿意献身公共服务的人构成，但这些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并对各种激励做出响应，包括财富、职业发展或地位等级的激励等。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让-雅克·拉丰还就此引发过一起公共事件，那是在1997年，若斯潘总理创建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French Council of Economic Analysis）之后不久，拉丰教授在委员会面前讲出了上述常识。[\[1\]](#)

总体而言，政府的行动更多取决于约束权力的制度保障，而非行使权力的具体人物的个性。本章将集中讨论限制政府行政部门同私人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制衡机制，这种勾结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妨碍创造性破坏过程以及新企业进入市场。[\[2\]](#)

强势的政府行政部门有哪些优点和缺陷？从理论上讲，有哪些宪法工具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司法部门作为制衡权力有怎样的作用，有哪些局限？为什么媒体和民间社会对确保权力分立与有效制约行政权力不可或缺？为什么创造性破坏取决于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形成的恰当的三角关系？这些将是本章要回答的具体课题。

1.政府对创造性破坏的妨碍：威尼斯的案例

政府可能妨碍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迭戈·普加（Diego Puga）与丹尼尔·特雷弗勒（Daniel Treffer）通过分析威尼斯在中世纪的兴衰历史揭示了这点。[\[3\]](#)威尼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推行开放贸易，实现了巨大的繁荣，但从14世纪初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与衰落。

在初期阶段，开放贸易得到了三个重大制度创新的支持，得以约束作为共和国政府首脑的总督（doge）的权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于1172年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组织：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由贵族代表和由提名委员会每年更新的100名成员共同组成，形成了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之后几十年中，大议会利用其权力逐步通过另外两个制度创新来制约总督。其一是设立就职宣誓制度，为担任职务，总督必须当众宣誓服从大议会设定的所有限制规范。这意味着总督不能侵占政府资产，或者在司法纠纷中偏袒自己。其二是另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要求总督在做任何重大决策前必须同该委员会协商。这些制度创新促进了独立的法官、处理合同与破产的新法规以及首个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类名为“联合会”的合同安排，它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身。[\[4\]](#)这种合同为远途贸易服务，而贸易是威尼斯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最简单的联合会合同是投资人与行商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提供商品，行商负责运输及出售，主要面向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合同里约定好风险和利润的分配办法。联合会合同让威尼斯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推动城邦步入鼎盛时期。

联合会合同类似于我们在第12章介绍的投资人与创新者之间的协议，给远途贸易提供了融资的可能，此类业务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商品、船只等），成功概率较低但回报极为丰厚。该制度还给通常出身贫民背景的威尼斯行商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能够加入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可以同贵族一起参与政府事务。这样的过程伴随着更多的创造性破坏：每出现新一波通过联合会制度致富的行商，都会削弱属于之前精英群体的利润份额和政治权势。

反对行动不久也随之出现。1286年，大议会规定，父亲和祖父不曾担任大议会成员的新候选人将不会被自动接纳。1297年，大议会又投票决定，在过去四年曾服务于大议会的成员将自动连任。这种制度倒退被称为“封闭”（Serrata），随即造成经济倒退。首先，联合会制度被限于威尼斯最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才能采用。其次在1314年，贸易活动被部分国有化，对希望从事商业的上进者课以重税。从1297年实施封闭制度开始，普通人参与的联合会合同的数量和占比大幅下降（见表15.1）。与此同时，大议会中分配给寡头们的平均席位数开始增加，在1339—1342年达到高位。

表15.1 平民参与联合会合同的状况

	平民参与的 联合会的数量	平民参与的 联合会的占比	商人家族在各届大议会中的 席位中位数
1073—1200	27	42	1.5
1201—1220	24	38	1.0
1221—1240	42	53	0.9
1241—1261	30	51	0.8
1310—1323	22	27	3.0
1324	0	0	1.8
1325—1330	1	5	4.8
1331—1338	0	0	5.4
1339—1342	0	0	13.6

资料来源: D. Puga and D. Trefl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2 (2014): 753-821。

于是，贸易被贵族们垄断，由此导致了威尼斯经济的衰败，其人口数量在1400—1800年持续减少。

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到了其他类似案例，当权的政府官员由于担心创造性破坏会侵蚀自己的权力，而选择阻碍经济增长。^[5]例如在奥斯曼帝国，迟至古腾堡印刷术发明300多年后的1727年，当局才允许开设第一家印刷厂。他们的想法是限制新思想的传播，故意压低民众的识字率——直至1800年该国的识字率依然低于3%。该书还提到15世纪的西班牙，当时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受到行会制度的严密控制。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导致该国禁止开办新型棉纺厂与金属铸造厂，以避免出现有组织的聚集起来的工人阶级，另外还限制铁路的发展，以防止人口流动带来的威胁。

2. 创新需要民主制度

为什么民主制度对技术前沿的创新至关重要？最关键之处在于，在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较小，政权更难被腐蚀。随着腐败的减少，创新将会增加。

[6]这是因为，首先，腐败减少有利于新企业和新技术的市场进入，图15.1a显示了一国的反腐败指标同新企业进入壁垒之间的负向关联。[7]其次，新企业进入会促使在位企业加强创新，以应对新的竞争对手，如图15.1b所示，一国的反腐败指标同人均专利数代表的创新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罗列了20世纪最具革命意义的创新成果，并指出它们都产生于民主国家。[8]拉里·佩奇（Larry Page）与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能够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究中开发出后来成为谷歌搜索的软件，首先应归功于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希望探索的方向，在决定论文题目时无须遵从导师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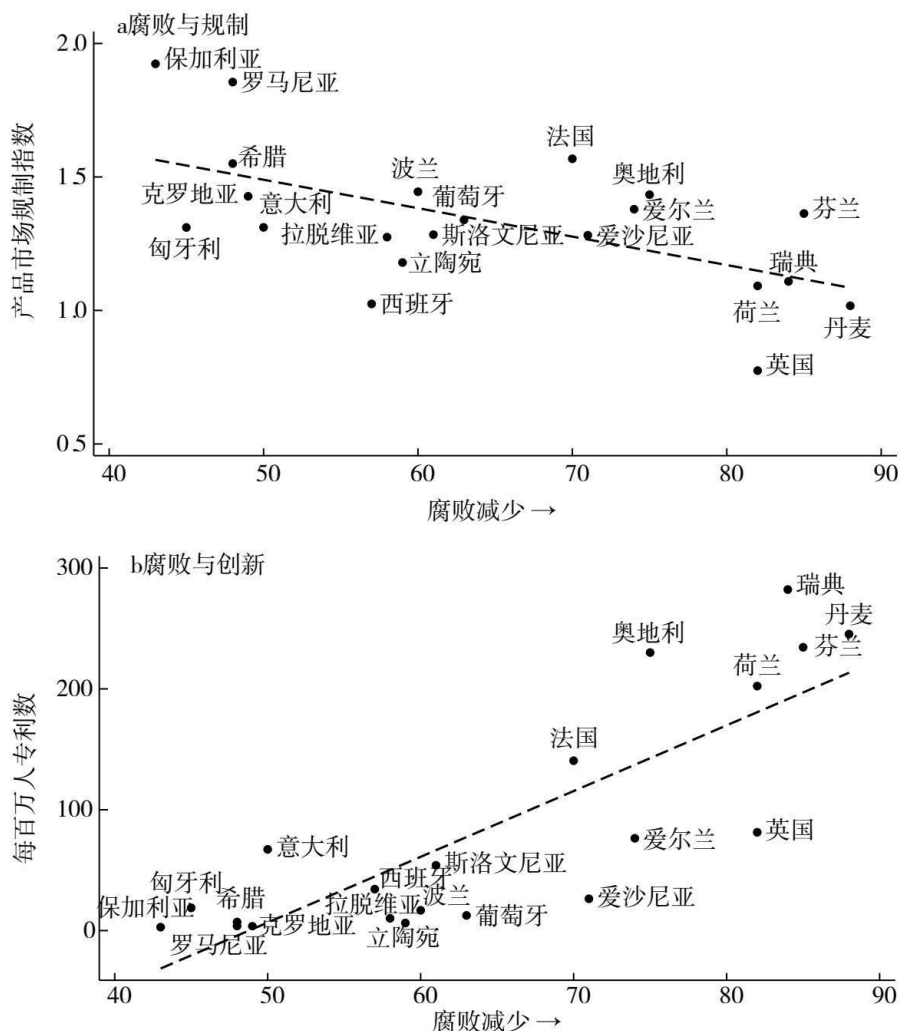


图15.1 腐败、规制和创新的关系

资料来源: 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d OECD; b.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nd Eurostat.

我们能否由此推论出，促进创新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在第14章里我们看到，创新需要政府有能力征收税赋、开展投资、帮助人们防范风险，并实施逆周期财政政策。如何能把这些要求

同行政权力的制衡协调起来？在过于强悍的专制统治与虚弱无力的行政机构之间，有没有令人满意的中间选择？

3.宪法的作用

作为不完备合同的宪法[9]

在授予政府官员权力与控制他们如何行使权力之间，必须找到平衡，以避免暴政的结局，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例如，孟德斯鸠于1748年提出的权力分立，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宪法理论，詹姆斯·布坎南在1960年的开创性论文，以及他与戈登·塔洛克在1962年的论文，均以此为出发点。[10]我们还可以引用两段颇为透彻的表述，一段来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们这代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激烈情感的不停拷问，既需要被人领导，又渴望保持自由。”[11]另一段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在捍卫美国宪法（1787—1788年）创立的集中式政府的一篇合著文章里指出：“理所当然……所有明事理的人都会赞同必须有充满活力的政府行政部门……构成活力的这些要素与构成共和主义者安全感的其他要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结合起来？”[12]

一个国家的宪法把权力分配给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由此形成法律架构，同时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范围和限制。[13]为理解宪法设定的分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宪法是国民之间达成的一种不完备合同。[14]什么是不完备合同？设想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能被完美预见，而且事件的发生可以得到第三方（法官）的证实。那么在这样的世界

里，社会可以预先决定酌情行动方案：如果发生事件 x ，则必然采取行动 y 。此时可能就不需要宪法来分设权力，因为所有事情可以预先决定，而且法官可以证明确实采取了酌情行动。这样的世界就属于“完备合同”的场景。

可是，现实大不一样，我们不可能预先知晓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甚至某个预想事件是否真正发生有时也难以证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宪法能做到的最佳结果就是制定决策权分享的规则以及防止权力滥用的措施，也就是说，这样的宪法属于“不完备合同”。

为什么限制行政权力非常重要？有哪些宪法工具能对此提供帮助呢？

在过大与过小的行政权力之间找到平衡点

强势行政部门的优点是，给予政治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的灵活度，以推行重大改革和投资。这一优点在战争或危机时期尤其突出：必须做出快速决策，军事等方面的行动还必须保密。

然而，过分强势的行政部门也有缺陷：政治领导人可能滥用权力，以压制威胁自身权力的创新；可能谋取私利，而非开展有效改革；长期看，他们可能会为了永续执政而无所不用其极。或者说，过分强势的行政部门可能滑向专制，滋生腐败，遏制创新，损害一国的经济繁荣。

在促进创新与增长方面有一个最优的竞争水平，同理，行政权力的大小也存在一个最优水平。权力过小可能损害政府推动改革的能力，权力过大可能导致“非自由民主制度”或专制统治。权力过大与过小之间的最佳妥协取决于诸多考虑，一方面涉及改革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关系到财产征收的风险和成本等。在战争、危机或迫切需要改革的时期，赋予执政者更大的权力是可取的。但在正常时期，限制其权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15\]](#)

如果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位企业可能用租金阻碍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并为此向政治领导人展开游说。政府官员的权力越不受限制，企业试图影响乃至贿赂他们的愿望就越强烈。

宪法如何限制行政权力？

宪法如何通过政府内部的决策规则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

一种方式是为制定法律设置投票规则。宪法可以规定，普通的法律采取简单多数规则，要求超过一半的票数，但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更低或更高的票数，以增强或削弱执政者的权力。例如，如果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求在议会获得远超过50%的超级多数票，则改革道路将在事实上被封锁。在法国，宪法的修订需要适用绝对多数规则：达到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总数的 $\frac{3}{5}$ 。这一规则旨在有意识地增加政府修订宪法的难度，超出普通法律适用的情形。我们希望让政府有能力推动改革，同时防止其滑向专制主义，例如，避免执政者借助议会中对其效忠的简单多数群体来修改宪法，以无限期延长执政。

立法投票中的“现状规则”（Status quo rules）也能对行政部门的权力产生影响。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当国会无法就预算达成协议时，将自动重复执行上一年的预算。而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这些现状规则有了重大修改：如果国会未能通过预算，则由行政部门决定预算方案。这一宪法修订显然增强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它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推动了因第四共和国接连发生宪法

危机而受阻的法国工业现代化。消极影响是加剧了某些腐败行为，例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土地担保丑闻（Garantie Foncière Scandal），当时有某些靠近政府核心领导层的人士，通过参与巴黎核心区两个大型社区的翻修和现代化改造而大发横财。

我们再看看制约行政权力的另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法律草案修订的参与权。在美国，当某个政党掌控众议院时，它可以通过所谓“封闭规则”（closed rules）决定立法议程，不允许再做修订，并限制辩论时间。当众议院多数党与总统同属一个党派时，就可以借助这个特殊规则来显著削弱国会发挥的制衡能力。

选举制度的类型是另一种制约行政权力的方式。“多数选举制度”让赢得议会选举的政党能获得舒适的多数党地位，它得到的议员席位占比将远远超过全国范围内得到的选票占比。相反，“比例选举制度”根据各党派得票数量按比例分配议员席位，可以给少数党更多的议席。严格实行比例代表的制度会让执政者变得更为脆弱，可能迫使其组成出人意料的执政联盟，例如以色列和意大利的情形。

最后，政治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和届数限制可以成为制约或增强执政者权力的终极手段。政治领导人在任时间越长，其实施改革的灵活度越大。但与此同时，在位企业越容易通过游说阻碍新的创新企业的进入。

由此自然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宪法会向强化或弱化行政权力的趋势演化。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此问题，分析民间社会对政府制度变革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先介绍司法部门在对行政权力的宪法制衡中扮演的角色。

4.司法部门的角色与局限性

作为制衡力量的司法部门

自孟德斯鸠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家就坚持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制衡行政部门的权力。哈耶克认为，法官发挥的权力制衡作用必须首先以司法独立为基础。[\[16\]](#)法官有两种基本职责：第一，对法律做出解释，并将其适用于具体的实际案例，行政部门则负责强制执行；第二，只有法官拥有合宪审查权，或者说宪法的解释权，以确认法律符合宪法规定，并否决不合宪的法律。

创新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这两座基石。司法独立是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可以制约行政当局剥夺创新租金、打击创新激励。另外，司法独立还保证了纠纷的公正裁决，尤其是在当事方享受政治优待的时候。合宪审查则对政府官员形成了限制，以防止他们通过法律法规为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服务，包括意图保护在位企业、排斥新的创新企业进入的法律。

我们可以对不同国家的体制加以比较，以测算司法部门的独立程度，以及有多大授权做合宪审查。[\[17\]](#)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可以综合三个指标来测算，前两个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如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法官的任期长短，以及行政法官的任期长短，例如有终身任期的法官更不容易受政治和经济压力的胁迫；第三个指标是过去的判例在法院判决时的影响权重，因为当判例能发挥影响时，法院就成为法律的一个来源，而不仅是解释者。另外，为反映司法部门在解释宪法方面有多大的终极权威，我们综合了两个指标：法律规范是否存在等级层次，以及能否挑战法律的合宪性。

法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真实历史案例。1974年10月29日，宪法委员会的管辖规则得到改革，扩大了挑战法律合宪性的权利。该委员会于1958年建立时，只有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国民议会议长或参议院议长才能发起合宪审查行动。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反对派不可能对新法律的合宪性发起挑战程序。在1974年改革后，包含60名参议员或60名国会议员的任何团体将有权启动宪法委员会的审查，从而在事实上赋予了反对派对新法律合宪性的挑战权。这一改革使宪法委员会成为真正的权力制衡力量。

通过对71个国家的国际比较，拉斐尔·拉波塔等人发现，司法独立性最稳固的国家对产权保护做得更好，设立新公司的行政程序更简便。[18]

对司法不公的制约

在现实世界中，法院判决会受到多种偏向的影响，这与司法部门发挥制衡作用的观点有冲突。首先存在政治上的偏袒，例如有研究表明，美国的民主党人法官做出的判决不如共和党人法官严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政党属性可以解释判决严厉性差异的38%。[19]

其次是媒体带来的偏向，例如，阿诺德·菲利普（Arnaud Philippe）与奥雷利·乌斯（Aurélié Ouss）近期利用法国数据开展的研究分析了同期新闻报道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刑事法庭的判决，该法庭是由少数职业法官加上从居民中随机挑选的多数陪审员共同组成。[20]研究者对比了两类判决：一类是在媒体集中报道犯罪事件（与受审的案件无关）之后很快做出的判决，另一类是在犯罪事件报道较少的时期之后做出的判决。结果发现，在审

判的前一天增加对犯罪事件的报道，会使陪审团判决的刑期加长，而且只有这一天的媒体报道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反，在媒体发出有关司法错误的报道之后，判决会变得更为宽大。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指出媒体报道对职业法官在刑事案件中的判决并没有影响。

司法决定中的第三个偏向是经济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会如何影响不合理安排案件的裁决？伊万娜·马尼内斯库（Ioana Marinescu）根据英国的有关数据发现，失业率上升或破产数量增加会显著影响法官的判决，降低有利于被解职雇员的裁决概率，更多支持企业基于经济考虑而裁员。[\[21\]](#)

最后还有心理或者声誉方面的偏向。例如，一个广泛存在的心理偏向“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就会引导人们走向逻辑错误：在玩抛硬币游戏时，若连续5次抛出正面，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下次抛出反面的概率将大于正面。但这个预期是错误的，因为每次抛掷是相互独立的事件，出现反面的概率仍为50%。以法官为例，在之前处理避难申请时态度较为宽容的法官，会在之后的案件中表现出更高的拒绝申请的倾向。[\[22\]](#)然而，过去的决定本来不应该影响未来的决定，因为他们审理的前后案件之间并无任何客观因素的联系。心理偏向可能因为与法官声誉有关的偏向而变得更复杂。如果法官在过去的案件中同意避难申请，但希望维护自己判决严厉的声望，就可能在后来的案件中更多拒绝避难申请，以支持自身的人设。

与之类似，疲乏也可能导致法官的判决更宽大，无论是从工作日角度还是整个职业生涯角度看均有此倾向：法官在午餐前或下班前做出的判决比较宽松（见图15.2）；随着法官年龄增大，判决也变得更宽松。[\[23\]](#)另外还发现了更令人惊讶的其他心理偏向，例如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在著名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意外

失利后做出的判决更为严厉，在被告人生日当天做出的判决则更为宽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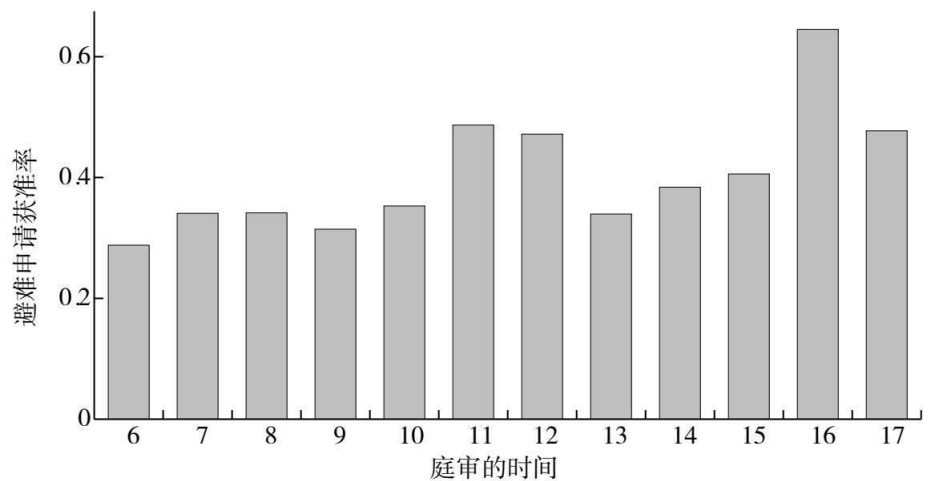


图15.2 避难申请获准率与庭审时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D. L. Chen and J. Eigel, “Can Machine Learning Help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sylum Adjud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017) :237 -240 , 图1。

法官不够公正的这些缺陷让某些研究者怀疑，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取代法官是否更好。具体来说，机器学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上述人类偏向？

每年在美国有近1 000万人被逮捕，之后，法官可以下令将其拘押候审。从法律角度看，此类命令要求满足某些风险条件，包括被告人是否会如期出庭（有没有逃跑的风险），是否会给社会造成新的伤害等。如果法官判断这些风险较高，就可以将被告人拘押，从而降低逃跑风险，但由此会增加收监人数。若法官判断风险较低，则要承担获释者可能逃跑及继续犯罪的风险。乔恩

·克莱茵贝格 (Jon Kleinberg) 等学者利用纽约市在2008—2013年逮捕的75万余人的信息设计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可以预测获释的候审人未能出庭的概率。[25]

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该算法的结果，对逃跑风险最高的人下达拘押候审命令。算法的决策与法官的判决孰优孰劣？答案较为复杂。法官具有偏向，计算机在这方面应该更少。[26]不过，法官能够获得档案里没有的信息或信号，例如被告人在法庭的现场表现等。算法预测的未出庭比率同被释放被告人的实际未出庭比率之间有几乎完美的相关性，表明算法在根据被告人档案信息预测逃跑风险上做得非常出色。那么纽约市的法官们的判决准确度如何？对于算法预测有60%未出庭概率的被告人，他们释放了其中的近50%；而对于算法预测仅有20%未出庭概率的被告人，他们羁押了其中的约30%。

按照这一研究，如果基于算法预测的未出庭风险做收押决定，将可以在不增加收监总人数的情况下，把未出庭概率降低25%；或者在不增加继续犯罪数量的前提下，把收监总人数减少42%。但这种方法显然会带来伦理问题。人们有着不依赖算法的天然倾向，部分源于我们希望把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生命来对待，而不仅仅是某个数字。

总之，虽然司法独立能给财产权利和经营自由提供更大保护，现实生活中的法官在决策时仍会受到政治、媒体、经济和心理等各类偏向的影响。法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可以帮助减轻这些偏向。但在司法体系之外，我们不能忽略民间社会对政府制度（包括司法制度）演化的重要推动作用。下面将转入这一议题的讨论。

5.民间社会的作用

上文讨论了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陷，然后分析制约和监督行政部门权力的不同制度工具。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是不完备合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些工具可以到位并真正落实。这里就需要民间社会扮演关键角色，确保不完备合同的有效执行。

不完备合同与民间社会

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温迪·卡林（Wendy Carlin）指出，当合同不完备时，无论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或者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合同，其效果既取决于合同中明确的权利义务安排，也有赖于现行的社会习俗。^[27]此类交易不仅指经济活动，也包括政治和社会活动。例如，社会习俗及作为其化身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防止雇主或贷款人滥用权力。图15.3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思想，即由政府、市场、民间社会分据顶点构成的三角关系。“市场”代表私人经济参与者（企业家、消费者和雇员等）及其相互作用的组织（企业和交易场所等）。越靠近市场这一极点，经济活动越依靠市场力量与自由放任。“政府”代表国家行政部门。越靠近这一极点，行政部门的行动越不考虑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因素，其极端情形是中央计划与专制制度。^[28]而越靠近“民间社会”的极点，就越类似一个自治社会，^[29]极端情形是无政府状态。^[30]对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来说，理想的组合是位于三角形的内部，也就是说需要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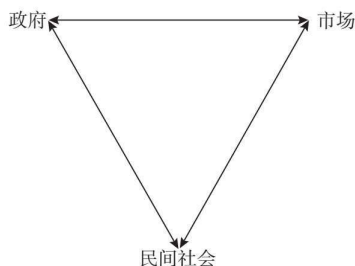


图15.3 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的三角关系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民间社会能够帮助履行雇主与雇员之间、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不完备合同，还可以推动执行同样属于不完备合同的国家宪法。民间社会在这里的作用是为上文提到的保证手段提供现实支持，[31]让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法规定发挥效力，或者说把保证手段从理论王国带到实践领域。

两个案例：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

新冠疫情。鲍尔斯与卡林近期的研究着重指出，民间社会是政府与市场这对组合控制新冠疫情蔓延的必要补充。[32]他们承认市场与竞争在促进发现新疗法和疫苗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肯定政府在短期控制医疗危机、在中期重启经济方面不可或缺的贡献，但尤其从韩国的例子看，他们呼吁同样要重视作为阻止疫情扩散必需的第三支柱，即民间社会。该研究认为，韩国的出色抗疫表现与当地民众普遍的自律和公民意识关系甚大，这些条件让国家能从很早开始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从而限制病毒传播，并可以立即帮助受感染者。如果完全依靠政府与胁迫手段，控制病毒的整体公共卫生策略将难以有效运转。

糟糕的是，公民意识在其他许多国家较为欠缺。例如在法国，我们看到大量巴黎人在春假期间违反隔离指示。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本人甚至利用推特账户支持各地反对隔离的抗议行动，违背自己的政府给出的建议。

气候问题。我们在第9章介绍了可以促进绿色创新的若干政策杠杆。碳税和绿色创新补贴等工具依靠政府与市场这对组合：政府可以采用此类工具，把企业创新引向环境友好型技术。碳税可以削弱污染技术的生产和创新激励，补贴可以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支持环保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及其与竞争的相互作用。社会价值观与竞争的互动能把市场与民间社会这对组合利用起来。民间社会可以培育环境友好型价值观，市场则是开展竞争与创新的场所。^[33]首先我们看到，如果国民表现出更强的环境偏好，并愿意支付更高的金额推动绿色经济，企业就会有更强的动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其次，我们已指出，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力度会强化社会对绿色创新的偏好。在消费者关心环境问题的国家，竞争会推动企业开展环境创新，以超越对手。最后是政府与民间社会这对组合，涉及公众行动与政府决策的相互作用。当公众更重视生态问题时，政府将受到压力，从而制定有利于环境的法律或政策。总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需要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三个支柱的配合来取得成功。

民间社会如何把民主制度变成现实

美国的民权斗争。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表明民间社会如何发挥了必要作用和激发力量，推动立法、提起诉讼并迫使行政部门的官员忠实执行法律。

南北战争后，美国宪法得到修订，赋予所有种族相同的权利。但某些州的政权破坏了这些保障，在军队、学校、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等场所，它们通过法定的种族隔离否定黑人的政治权利与平等地位。虽然宪法第15修正案赋予了美国黑人投票权，南方的许多州仍以人头税为由，或要求黑人选民参与不公平的文化测试，在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甚至在最高法院做出历史性的禁止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之后，许多学校依然拒不改正。

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进入高潮，尤以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于1955年12月1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男子为标志。她的行动催生了一长串的事件。首先出现了对蒙哥马利市公交车的抵制行动，接下来从1957年开始，马丁·路德·金等领导人组织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抗议。然后，九名黑人学生在前往过去的纯白人高中上学的第一天，同阿肯色州州长派遣来阻止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对峙。这一事件开启了美国总统调集联邦军队强制废除种族隔离的先河，并在随后的若干案例中如法炮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市，四位黑人大学生拒绝离开“只接纳白人”的午餐柜台，引发了席卷南方的类似静坐抗议。由黑人和白人参与者共同组成的自由乘车运动者在南方各地乘坐公交车抗议种族隔离，也屡次遭遇危险的暴力袭击。除了这些著名事件，还有若干组织的行动作为补充，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所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努力于1963年8月28日汇聚成华盛顿就业与自由大游行，其间，马丁·路德·金在大约25万人面前发表了享誉至今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这些重大事件与民间社会成员的众多其他行动，加上媒体的广泛报道，成为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背景。该法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原籍国家的

雇佣歧视。还有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以文化测试来决定选民资格，并向某些选区委派联邦审查员。

民权运动的目标今天仍属于未竟之事业，美国社会依然在通过示威、诉讼和其他行动，争取完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平等。

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与对法律合宪性的争议权。我们在前文提到，由于1974年10月29日的修宪改革，要求法国宪法委员会发起法律合宪审查的权利得到了扩展。这一改革由当时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瓦勒里·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议，增强了议会反对派的力量，允许不少于60名国会议员或60名参议员的团体向宪法委员会提起合宪审查动议。改革立竿见影，合宪审查的案件数量从改革前10年的5起，猛增至改革后10年的94起，增幅达到19倍。德斯坦本人在被问及发起改革的动因时，将其与1968年5月由学生主导的骚乱直接联系起来：为防止今后爆发类似规模的骚乱，有必要扩大反对派的权利并加强多数派同少数派的对话。我们再次看到，1968年学生运动代表的民间社会力量促使政府官员修订宪法，以强化对行政部门的权力制衡。这些例子证明，民间社会的行动可以迫使执政者交出权力，从而把宪法中的契约内容变成事实。

以扩大公民权利作为承诺工具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用规范理论阐述了扩大公民权利可以成为防止骚乱或革命的手段。^[34]他们的模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民间社会的压力下，英国的选举权在1820—1920年间得以稳步扩大（见图15.4）。1832年之

前，只有寡头精英阶层享有投票权。1832年，选举权要求的最低财富和房产门槛被降低，公民权利扩大至全国1 /7的男性。到1867年，公民权利扩展至生活在城市区域且拥有房产的所有男性。1884年的选举改革把这一权利扩展至在农村拥有房产的男性。到1919年，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与年满30岁的女性都获得了投票权。

为什么英国精英阶层要不断扩大选举权，由此导致公共投资与再分配增加，最终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答案在于，扩大公民权利是精英阶层对建立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的一种可信承诺。借用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革命。简单地做出再分配承诺是不够的，为使此类承诺具有可信度，必须通过扩大公民权利给民间社会更大的控制权。[\[35\]](#)正是来自民间社会的革命威胁迫使执政当局通过扩大公民权利来完善社会合同，从而增强了妥善履行合同的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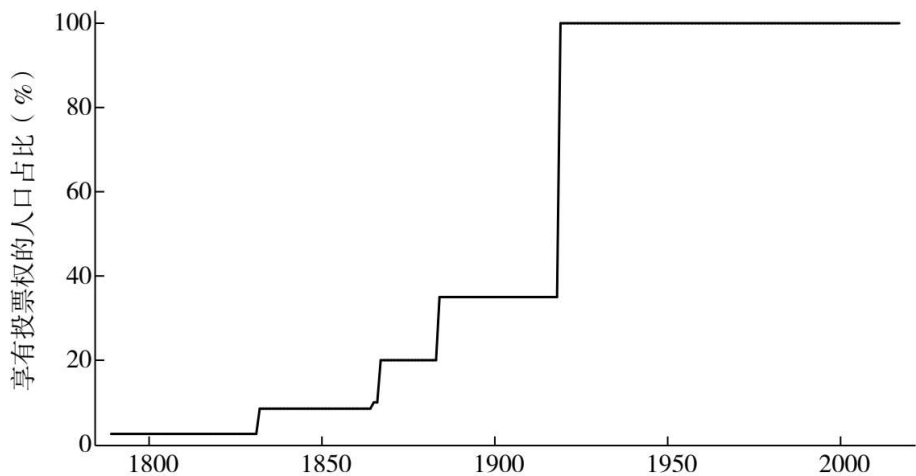


图15.4 英国享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托克·艾德 (Toke S. Aidt) 与彼得·詹森 (Peter S. Jensen) 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借助12个欧洲国家1820—1938年的历史检验了上述假说。[36]该研究分析了革命威胁对一个国家选举权扩大的影响。公民权利由立法机构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来反映，革命的威胁程度由相邻国家发生的革命事件来测算，因为革命会在各国之间传播。[37]结果发现，平均而言革命威胁对投票权利扩大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具体来说，欧洲某地发生的一次革命带来的短期效应是让一个国家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提升约2%。

然而，对起义的恐惧并非当权者扩大民主参与的唯一原因。例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倡议的宪法改革就并非来自这种恐惧。那场改革增强了议会反对派的权力，尤其是允许在任何法国公民申请下，把法律提交宪法委员会做追溯审查，即在法律生效后的审查。[38]他推动改革的动机乃是希望更普遍地联合反对派，以开展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我们今天可以忽略重大动乱的风险吗？类似的进程在如今是否还有意义？法国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的“黄马甲”运动证明，我们依然必须严肃看待这种风险，过于自负的执政者仍可能遭遇强烈反对。

忽略民间社会的代价：“黄马甲”运动

马克龙在奥朗德政府中出任经济部长后，于2017年赢得了法国总统大选。[39]一个月后的2017年6月，议会选举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这场胜利。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发展成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席位，而

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遭到大幅削弱。这个结果使马克龙可以依靠强势多数地位发起改革，他也确实从2017年夏季就全速开进。新总统瞄准的目标是通过改革资本收入单一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促进长期增长，降低失业率。[\[40\]](#)所有这些改革议程都曾出现在他作为候选人的计划里，目的显然是为当选后的施政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性。

尤其突出的一点是，马克龙政府多次借用一条宪法规定，让行政部门能够绕开议会，强行通过由政府起草的法律，除非议会以不信任投票加以否决。这个程序回避了议会辩论，加快了改革进程。该宪法条款的规定是，议会授权政府制定针对特定领域和适用期有限的法律，但放弃对法律内容讨论的参与。[\[41\]](#)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改革和劳动法改革等都是以这种程序实施的。

看到议会的反对派不成气候，并自信工会已被边缘化之后，马克龙政府此时决定引入竞选纲领中没有提及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措施：取消对退休金的通胀调整，这给退休金较低的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下调对学生的住房补贴；把道路限速从每小时90公里降低至80公里；以及最为重要的环节，大幅提高碳税，这最终点燃了危机。

虽然反抗行动的最初原因可回溯到2018年初，但碳税上调才是“黄马甲”运动这一来自民间社会的抗议运动的真正起点。在主张提高碳税的人看来，这样做能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彰显政府的环保追求。然而，这一措施的设计者没有考虑到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在上班通勤和接送子女时只能开车的郊区民众受到的强烈负面冲击。运动发端于2018年11月，到12月1日，已发展为一场城市游击战。马克龙在阿根廷出席G20（二十国）峰会时，从电视上看到凯旋门遭到肆意破坏，香榭丽舍大街变成示威者与警察激烈冲突的战场。正是在当天的城

市骚乱之后，这位法国总统于12月5日宣布取消上调汽油税。忽略民间社会的代价不仅是用于扑灭骚乱之火花费的1 800万欧元，更关键的是让改革进程就此延宕了近一年时间。

但“黄马甲”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导致法国的政治体制更加走向分权化与去中心化。尤其是，这推动了“公民气候大会”的成立，由150位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为抗击全球变暖给出建议。马克龙总统承诺将无保留地把这些立法和监管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或议会表决。可见，对抗议运动风云再起的担忧重新成为法国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触发了制度变革，还保证这些变革将被付诸实施，而非流于形式。

“黄马甲”运动的另一个影响是肯定了社交媒体在权力制衡中的真实作用，特别是通过脸书网站，让国民能够在没有建立正式组织时采取协调行动。社交媒体的兴起值得引起民间社会的传统发言人即新闻媒体的反思。

媒体的角色

在讨论民间社会的作用时，我们难以忽略媒体作为扩音器扮演的关键角色。

对媒体的积极作用的案例研究。媒体的用处之一是向公众发出政府滥用权力的警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队在阿布格拉布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和视频被曝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4年4月，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电视台收到一组照片和视频文件，详细展示了伊拉克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囚行为。作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联系该新闻台的负责人，请求至少暂时不要播放，以保护美国驻伊部

队。可是三周后，CBS新闻台获知《纽约客》杂志可能发表这些照片，为避免坐失独家报道的良机，CBS将照片公布，丑闻就此被掀开。到2006年，监狱管理权被转交给伊拉克政府。该丑闻的揭发，尤其是利用水刑的行径，迫使美国政府下令任何政府机构在审问时禁止采用。

可见，独立媒体的存在是民间社会影响政府的一种手段。此外，媒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对它们发挥权力制衡作用提供了助力。身份的独立与竞争的存在这一双重自由让社会合同变成了现实。

媒体与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新冠疫情在不同程度上给审查和胁迫媒体提供了借口。为了给压制新闻自由寻找合法性，许多国家的政府以打击“假新闻”为旗号，号称要确保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这是它们不时用来窒息独立媒体的伎俩。也就是说，疫情变成了政府打压民间社会、巩固自身权力的托词。

2020年4月中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称，记者们不对抗击疫情做贡献，反而散布虚假消息和不实言论，简直比病毒还要危险。他指责反对派的媒体“对自己的祖国发起战争”。在印度，最高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指示媒体只能参考和发表官方对疫情发展的说法，宣称这是防止广泛恐慌的必要之举，并呼吁媒体应该有“责任心”。2020年3月30日，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授予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无限期的施政令治理权，并对散布有关病毒或政府措施的“虚假信息”的行为处以最高可达5年的刑罚。由此可见，某些专制主义政权有可能利用公共卫生危机强化其权力。

信息控制总是具有政治意义，但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突出。控制手段从内容审查到针对个人的直接威胁不等，如肆意收监或者暴力伤害等。例如，摩洛哥、约旦和叙利亚以可能传播病毒为由，禁止出售新闻用纸。审查行动加强伴随着新闻记者遭到攻

击、威胁或监禁的数量增加，例如在土耳其、约旦、津巴布韦和乌克兰等国。另外，记者们对数字跟踪软件的使用也感到担忧。这些工具原本是为了帮助抑制新冠病毒扩散，但也被用来监视媒体。在自我审查已成为常态的许多国家，威胁和监视被进一步强化。

6.结论

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创新经济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执政权力的监督可以约束政府官员同试图维护租金的在位企业勾结，也就是说，权力监督有助于支持新的创新企业进入，从而促进创造性破坏进程。

制约行政权力的第一种方式是宪法。在不完备合同的环境下，宪法确立了成体系的习俗和权力分享规则，特别是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权力分立，以及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宪法还决定了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制度及议会内部的投票规则、参与议案修订的权利、申请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利及官员任期限制等事项，这些都对执政者的权力范围和约束具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离开积极而警惕的民间社会的支持，所有这些宪法保证也只能是空话。

由此可见，以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经济体的良好运转，需要市场、政府和民间社会构成的三角关系的支撑。市场提供创新激励，构筑创新企业彼此开展竞争的框架。政府保护创新形成的财产权利，确保合同执行，并充当投资人和保险人的角色。民间社会，包括媒体、工会、非营利组织等，帮助或呼吁落实制约行政权力的宪法条款，并保证市场运行有更高的效率、道德标准和公平性。

历史证明，充分动员的民间社会可以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向规制更完善、包容性更强、给国民更多保护、对环境更为友好的体系发展。当然，这种演化不是直线式的，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速率。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哪些不同类型？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理想模式？下一章将讨论这些问题，并给我们的创造性破坏探索之旅做最后的总结。

[1] Jean-Jacques Laffont, “Étapes vers un État moderne: une analyse économique,” in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December 16, 1999, on State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CAE, *Etat et gestion publique. Actes du Colloque du 16 décembre 1999*, 117 -150,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2] 世界经济史上随处可见在位企业同政府勾结，以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的例子。这样的勾结在全国层面和地方层面比比皆是。德国的鲁尔-萨尔地区是地方层面勾结的典型案列，12世纪末，当地的在位企业借助地方政府来阻碍新企业进入，理由是扰乱本地劳动力市场。

[3] Diego Puga and Daniel Trefl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no. 2 (2014) :753 -821.

[4] 在欧洲其他地方，此类合同被称为康曼达（commenda）。

[5]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2012) .

[6] Philippe Aghion and Alexandra Roulet, *Repenser l'État* (Paris: Seu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 République des idées, 2011) .

[7] 腐败感知指数是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根据专家和企业高管对一个国家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的感知来排名。得分接近0代表腐败非常严重，接近100代表腐败程度较低。产品市场规制指数（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index）由经合组织编制，是测算公共政策对市场竞争的促进或限制程度的综合指标。

[8] János Kornai,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8, no. 4 (2010) :629 -670.

[9] 不完备合同理论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重视，为此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Oliver Hart与Bengt Holmström。我们推荐相关参考书目：Oliver Hart, *Firms : Contracts :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 .最早两篇利用该理论来分析宪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论文为：Philippe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Incomplete Social Contrac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no. 1 (2003) :38 -67; and Philippe Aghion, Alberto Alesina, and Francesco Trebbi,“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no. 2 (2004) :565 -611.

[10]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Geneva: Barrillot & fils, 1748) ;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 and trans. Anne M. Cohler, Basia Carolyn Miller, and Harold Samuel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Abingdon, UK: Routledge, 1960) ; James M. Buchanan,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1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and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 (183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12]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Federalist No. 70 (1788)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Clinton Rossit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

[13] 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即便没有以之作为名称的文件。例如，英国从正式文件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宪法，但从实质来看，却有规范政治制度运转的成文和不成文规则。英国还有作为宪法基础的若干文件，包括古代的（如Magna Carta of 1215, Bill of Rights of 1688）和现代的（如Parliament Acts of 1911,1949）。

[14] Aghion and Bolton,“Incomplete Social Contracts.”

[15] See Aghion, Alesina, and Trebbi,“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之前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文章，可参见：Per Krusel and Jose Victor Rios-Rull,“On the Size of U. S. Government: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no. 5 (1999) :1156 -1181.

[16]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7]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ópez-de-Silanes, Christian Pop-Eleches, and

Andrei Shleifer, “Judicial Checks and Bala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no. 2 (2004) :445 -470.

[18] La Porta et al., “Judicial Checks and Balances.”

[19] Daniel R. Pinello, “Linking Party to Judicial Ideology in American Courts: A Meta-Analysis,” *Justice System Journal* 20, no. 3 (1999) :219 -254.

[20] Arnaud Philippe and Aurélie Ouss, “‘No Hatred or Malice, Fear or Affection’: Media and Senten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no. 5 (2018) :2134 -2178.

[21] Ioana Marinescu, “Are Judges Sensitive to Economic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UK Employment Tribunals,”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64, no. 4 (2011) :673 -698.

[22] Daniel L. Chen, Tobias J. Moskowitz, and Kelly Shue, “Decision Making under the Gambler’s Fallacy: Evidence from Asylum Judges, Loan Officers, and Baseball Umpi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no. 3 (2016) :1181 -1242.

[23] Daniel L. Chen and Jess Eigel, “Can Machine Learning Help Predict the Outcome of Asylum Adjud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017) :237 -240; Daniel L. Chen, “AI and Rule of Law: Machine Learning, Causal Inference, and Judicial Analytics,” course at the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2019.

[24] Ozkan Eren and Naci Mocan, “Emotional Judges and Unlucky Juvenil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 Applied Economics* 10, no. 3 (2018) :171 -205; Daniel L. Chen and Arnaud Philippe, “Clash of Norms: Judicial Leniency on Defendant Birthday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ebruary 202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03624.

[25] Jon Kleinberg, Himabindu Lakkaraju, Jure Leskovec, Jens Ludwig,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 “Human Decisions and Machine Predi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no. 1 (2018) :237 -293.

[26] 计算机或者说算法也可能有偏向性，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依靠机器学习的算法包含了人类法官的偏向性，他们的决策是机器学习行为的基础。可参见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6)。

[27] Samuel Bowles and Wendy Carlin, “Shrinking Capitalism,”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0 (2020): 372-377.

[28]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近期关于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狭窄通道”的研究中，把不受限制的政府称为“残暴的利维坦”。这一观点借鉴于霍布斯的《利维坦》：把政府描述为能制止“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以自己的至高权力来保证社会和平状态的实体。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London: Penguin, 2019)。

[29] 关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必要的互补性，参见Monique Canto-Sperber, *La Fin des libertés. Ou comment refonder le libéral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9)。

[30]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The Narrow Corridor*用“缺位利维坦”来描述无政府社会。他们以尼日利亚的Tiv社群为例，描述民间社会取消政府的情形。该社群建立了一套社会习俗和惩罚体系，以防止任何人将其意指强加于他人。

[31] Aghion和Bolton利用不完备合同的概念，发展出了基于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控制权及其分配的公司债务融资理论。参见Philippe Aghion and Patrick Bolton,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no. 3 (1992): 473-494.

[32] Samuel Bowles and Wendy Carlin, “The Coming Battle for the COVID-19 Narrative,” *VOXeu*, April 10, 2020.

[33] 政府可以用竞争政策来改变竞争力度，用教育和宣传政策来影响社会价值观，从而鼓励这种机制的作用。

[34]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no. 4 (2000): 1167-1199.

[35] 组织理论中已经采用过把转移控制权作为承诺信号工具的思想，可参见Philippe Aghion and Jean Tirole,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no. 1 (1997): 1-29.

[36] Toke S. Aidt and Peter S. Jensen,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ranchise Extensions and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Europe, 1820-1938,”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2 (2014): 52-75.

[37] 例如，1830年法国革命（光荣三日）；1848年的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民族之春）；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当时的若干重大革命事件之一。

[38] 在此之前，宪法规定只能在法律通过前做合宪审查。

[39] 这场运动的名称强调要超越传统政党，创立新的党派，无疑为选举胜利发挥了决定性推动作用。马克龙的当选还得益于当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左右两翼提名的初选候选人的定位都比较极端化，同时右翼初选获胜者François Fillon诉讼缠身。

[40] 这些名为“马克龙法律”的法规于2017年9月22日签署生效，限制了滥用解雇的损失赔偿金额，确立了企业内部劳资谈判的优先地位。

[41] 以这种程序制定的法规被称为法令（ordonnances）。当然，这一过程中议会并没有完全缺位，而是有两次表决。第一次是通过法律，授权政府在特定领域颁布法令。第二次是修订这些法令。不过议会的作用受到了严重限制，不仅是因为议员们难以修订已经生效的法令，也由于拒绝批准法令会引发不信任投票，导致他们自己的辞职和重新举行选举。

结语

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过去15年里，不平等恶化，经济增长停滞，极端天气加剧，如今的新冠疫情又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对孤立主义者和终结全球化、反对增长、放弃资本主义的倡导者而言，这些真实现象提供了论争的素材。

资本主义正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没有人否认，尤其在缺乏规制时，资本主义会产生若干消极后果：加剧不平等，导致弱肉强食；制造社会分裂，破坏共同体精神；动摇就业稳定性，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增大精神压力；放任在位企业借助游说活动阻碍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加速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诱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类似1929年或2008年的严重衰退等。

然而，彻底抛弃资本主义并非解决之道。20世纪见证了另一种制度的大规模实验：苏联及中东欧部分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那个制度没能给人们提供开展前沿创新所需的自由与经济激励，参与实验的各国也未能超越中等发展水平。[\[1\]](#)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一位著名人物亨利·韦伯（Henri Weber）曾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军人物，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与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他在解释自己皈依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程时提到北欧国家的经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党人近距离目睹了苏联的农业和企业集体化的灾难，率先打破了推行生产工具社会化和以中央计划委员会管理

经济的教条。在控制和调节经济方面，根本没有必要剥夺管理者，把企业国有化，或者消灭市场……也没有必要让社会失去企业家们的创造力、经验智慧与活力。在适当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激发他们的才干为公共利益服务。”[2]市场经济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因此从本质上具有破坏性。但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繁荣的强大发动机，把人类社会推高到两个世纪前不可想象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是否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诸多严重缺陷，作为创造繁荣和战胜贫困的必要代价？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深入理解创造性破坏的增长进程与竞争、不平等、环境、金融、失业、健康、幸福和工业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贫困国家如何追赶富裕国家。我们分析了在恰当约束执政者的前提下，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财富创造，同时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从市场力量各行其是的放任自流型资本主义转向政府和民间社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打击创新的同时提高社会流动性，缩小不平等差距。我们还看到，如何能够用恰当的竞争政策制止增长下滑，如何能够把创新方向转向绿色技术，以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可以不放弃全球化，而是通过创新投资提升自身竞争力，利用有效的安全网保护失去工作的国民。最后我们发现，在民间社会的必要支持下，可以制约过去的创新者同政府官员勾结，防止他们拆掉身后的梯子，阻碍后来的创新者前进。

某些人或许会批评我们太幼稚，对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过分乐观，他们的理由是许多国家目前的制度极为僵化，并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充满了灾难、不公、世界大战和殖民压迫。

从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我

们是该追随美国更具创新力的模式，还是德国和北欧国家更具保障性的模式？我们是否必然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设想一种兼具各自模式的积极元素的“两全其美”型资本主义？

持非此即彼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分为“残酷资本主义”与“温和资本主义”。[3]美国是残酷资本主义模式的化身，北欧国家则是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代表，还有程度略轻的德国。依这种观点看，只要技术前沿的创新依赖于强大的金钱激励，追求前沿创新的国家就应该放弃保障和平等的目标，或者说，它们需要抛弃温和模式，迎来更残酷的资本主义。而对选择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靠模仿前沿国家的技术发明。这些国家能给民众提供更大的平等和保障，但增长最终依赖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的进步。可以认为，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在为世界其他地方做贡献。

美国同德国及北欧国家之间的比较，能够支持上述看法吗？我们首先来比较这些国家的创新成就。表C. 1表明，在2010—2017年间，美国每百万居民的年均专利数量远远领先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在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的专利中，美国的优势更加惊人。

表C. 1 2010—2017年各国专利数量的平均数

	百万居民 专利申请数	被引用次数居于 前 5 % 的专利数	被引用次数居于 前 5 % 的专利占比（ % ）
德国	617. 1	170. 5	0. 4
丹麦	87. 4	0. 0	0
美国	1 186. 4	32 678. 0	71. 7
法国	231. 1	5. 9	0
挪威	316. 4	0. 3	0
瑞典	129. 8	0. 3	0

资料来源: Patstat , 作者的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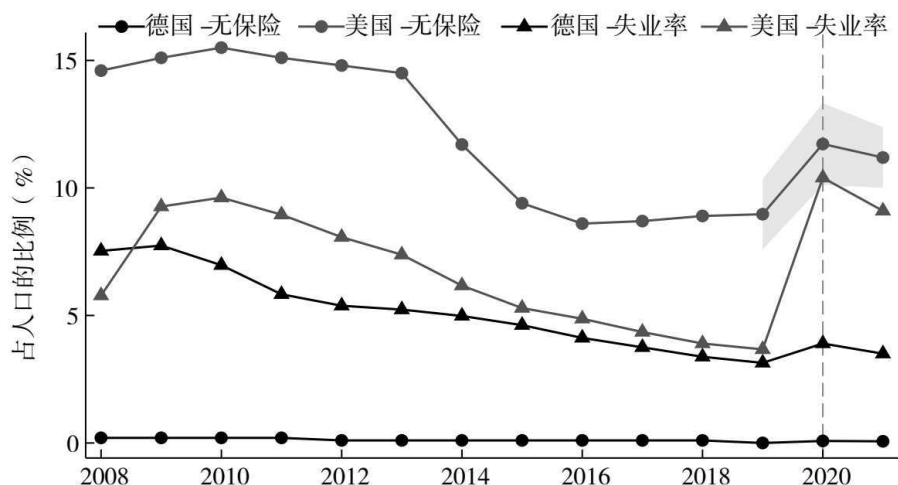
表C. 2展示了这些国家在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上，[\[4\]](#)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相比，美国明显更为严重。

表C. 2 2017年各国的基尼系数和贫困率

	基尼系数	贫困率
美国	0. 390	0. 178
德国	0. 289	0. 104
瑞典	0. 282	0. 093
挪威	0. 262	0. 084
法国	0. 292	0. 081
丹麦	0. 261	0. 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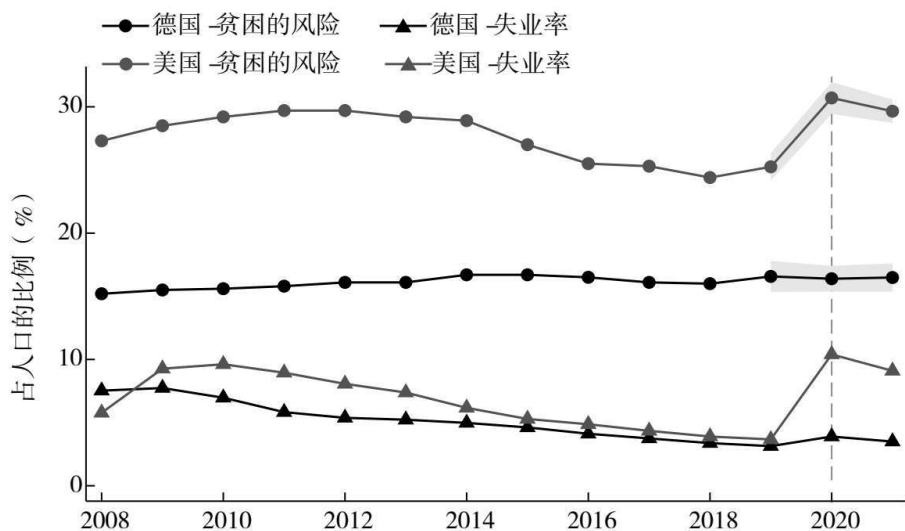
注：丹麦为2016年的数据。资料来源: OECD。

对保护人们免受宏观经济冲击做得如何？[\[5\]](#)图C. 1显示的是，德国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自2008年以来的变化。德国的比例为零，因为全体国民都有医疗保险。然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很突出。2014年，得益于奥巴马医改计划而下降（见下文），但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因为危机造成的失业率剧增而又大幅上升。原因在于，美国人通常是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在失去工作时会同时丧失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与之类似，图C. 2展示的是，德国和美国面临滑入贫困处境的人口占比自2008年以来的变化。同样，随着新冠疫情袭来，与德国相比，美国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更显著地增加。



图C.1 德国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与失业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 “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VoxEU*, June 25, 2020, 图1。



图C.2 德国和美国面临贫困风险的人口占比与失业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 “Covid and the

一方面是创新成就的国别比较，另一方面是不平等、贫困、宏观经济冲击保护的指标比较，初步看，结果似乎证明了非此即彼的推测。但我们想强调，这些国别比较是针对特定时间期限（2010—2017年）或特定年份（2017年）的，并未揭示各国的长期变化。另外，北欧国家和美国近期的某些演化趋势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融合。

对于北欧国家，我们曾在第11章和第14章介绍过丹麦的弹性保障制度。这一政策背后的考虑是，在劳动力市场引入更大灵活性，以鼓励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同时保障被裁员劳动者的收入，并让他们得到再培训，更容易找到新工作。改革推动了丹麦的创新，却并未动摇其社会保障模式，如今的丹麦依然是全球平等程度最高、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的例子同样有意思。1991年，以刺激创新为目标，瑞典对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最高收入组别的所得税边际税率从88%下调至55%，资本所得税按照30%的单一税率征收。^[6]加上瑞典克朗贬值，这些税收改革推动了该国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改革后的生产率年增速达到原来的4倍，创新也从1990年起飞。这个过程是否以削弱再分配为代价？虽然从1990年以来，以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测算的不平等显著扩大，可是全球通行的以基尼系数测算的不平等以及贫困率几乎没有增加，瑞典依然位居世界上保障最完善、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行列。^[7]

总体而言，丹麦和瑞典在开展促进创新的改革的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来的基本要素。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有可能把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两全其美的新类型。美国同样采取了加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性质的改革，尤

其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俗称《奥巴马医改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让更多美国人能够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其主要条款之一是禁止保险公司拒绝承保身患某种疾病的人，或者向他们收取更高的保费。尽管遭到激烈反对，该法案仍于2013年底被通过，到2016年使无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半。共和党方面曾多次试图废黜该法律，但到本书写作时无一得逞。当然，奥巴马医改只是美国走向更为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一步，前方的路还很长。

更一般地说，自200余年前诞生以来，资本主义在历史之初的很长时期里是颇为残酷的制度，即便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亦不例外。如今的瑞典距离电影《阿达伦31》里描述的情形有万里之遥，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当前的法国同埃米尔·左拉的《萌芽》的差距。^[8]

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日益变得具有保障性和包容性，这首先要感谢民间社会领导的斗争，包括工会、进步党派与媒体等组织。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推动了政府的演变，以顺应民间社会的压力，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利昂·布鲁姆在1936年为法国建立带薪休假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推行新政，威廉·贝弗里奇在1942年为英国创建福利国家制度，1945年推行全国抵抗委员会计划的夏尔·戴高乐，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洛夫·帕尔梅，2010年推出医疗改革方案的巴拉克·奥巴马等。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某些改革家推动了保障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调整，如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弹性保障制度之父波尔·拉斯姆森（Poul Nyrup Rasmussen），1991年瑞典改革的策划者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具创新力。

虽然有部分进步，美国还远不是一个能提供充分保障的国家，包括应对失业、疾病、2008年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等宏观经济冲击，以及环境风险等。欧洲国家则受困于另外一种烦恼，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大学、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人、慈善事业、国家科研支持机构等，以担当未来技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跟随者，并且有可能在不久后被中国超越。

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坚信两全其美的新模式，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国开展的加强保障和包容性的改革没有束缚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德国和北欧国家开展的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其次，如本书的分析所示，创新与包容、创新与保障并非零和博弈。事实恰恰相反，帮助创新企业进入、鼓励年轻人从事科研事业，既能加速创新与增长，也能让增长变得更具包容性。精心设计的弹性保障制度可以让人们免受失业的负面影响，同时鼓励他们掌握新的技能，为新工作做好准备。这样做既能加强对民众的保障，又不会妨碍创造性破坏进程。

资本主义是一匹活力十足的骏马，随时准备挣脱缰绳，腾空而起。但如果我们能牢牢把控，就能让它按人的意志前进。在本书中，我们考察了引导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路径，并探讨了驾驭它在这些路径上疾驰的杠杆措施。

新冠疫情令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缺陷与不足充分暴露。在美国，疫情让成千上万缺乏失业和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深陷困境。在法国，疫情凸显了价值链过度外包（包括医疗等战略产业）的经济体的脆弱性；还证明了过度集权的官僚主义政府的局限性，没有充分信任民间社会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在其他一些国家，疫情揭示了缺乏言论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危险性：信息封锁和自我审查使新型病毒的危害性迟迟未受重视，最

后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这场危机将不可避免引发如何塑造未来的生死攸关的大讨论。虽然我们难以预测讨论的具体走向，但可以确信，其内容必然包含本书述及的许多主题和分析。针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怎样”的疑问，我们借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名言来作答：未来不在于我们将遇到什么，而在于我们要做些什么。

[1] See János Kornai,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8, no. 4 (2010): 629-670.

[2] Henri Weber, *Rebelle jeunesse*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8).

[3]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and Thierry Verdier, “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 no. 5 (2017): 1245-1305.

[4] 参见本书第5章。

[5] 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 “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Vox EU*, 25 June 2020, <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and-nature-capitalism>.

[6] 改革前，资本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征收，最高边际税率达72%，平均税率为54%。

[7] 部分经济学家（包括Per Molander）认为瑞典在市场导向改革上走得太远，例如，分几个阶段开展的教育改革引入了学校之间的竞争，给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提供大笔补贴。这一改革的广泛后果是让成绩普遍膨胀，而非改进教育质量。在税收方面，为了给投资者发出更强的信号，佩尔松总理（Goran Persson）在2002年决定取消遗产税，保守派的财政部长努德（Per Nuder）在2006年取消了房产税。参见：Per Molander, “Dags för omprövning” (2017), <https://eso.expertgrupp.se/rapporter/politiken-forvaltningen/>.

[8] 政治题材电影《阿达伦31》讲述了1931年瑞典军队对专业从事锯木产业的阿达伦地区工人示威活动的血腥镇压。参见：Bo Widerberg, dir., *Adalen*

31, Svensk Filmindustri, 1969。左拉的名著《萌芽》描写了19世纪末法国警察和军队镇压矿工罢工活动时爆发的暴力事件。参见Emile Zola, *Germinal*, trans. Roger Pearson (London: Penguin, 1885) .

致谢

伊恩·马尔科姆 (Ian Malcolm) 鼓励我们创作本书，并帮助收集了主要论据。在过去数年同伊恩的交流真是极大的荣幸。

本书要特别感谢Jodie Cohen-Tanugi把法文翻译为英文。Jodie以极大的耐心对待作者，并在各个阶段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追求完美的精神，直至书稿付印。他堪称本书事实上的合著者之一。

Martin Hellwig与另一位匿名审稿人对书稿改进提供了极有帮助的建议。Kate Brick完成了文字编辑的杰出工作。我们还要感谢Arthur Goldhammer在通读书稿后提供的宝贵建议，以及Louise Paul Delvaux帮助完善了注释的内容。

若干学术交流对本书内容产生了直接影响，对于众多学者的详细评论以及为本书各章内容的贡献，我们深表感谢，其中包括：Daron Acemoglu、Ufuk Akcigit、Nadia Antonin、Antonin Bergeaud、Benedicte Berner、Tim Besley、Olivier Blanchard、Nicholas Bloom、Richard Blundell、Patrick Bolton、Matilde Bombardini、Timo Boppart、Leonardo Bursztyn、Monique Canto-Sperber、Emmanuel Combe、Beatrice Couairon、Angus Deaton、Mathias Dewatripont、Timothée Gigout Magiorani、Maxime Gravouelle、Jerry Green、Rachel Griffith、Oliver Hart、Martin Hellwig、David Hémous、Peter Howitt、Xavier Jaravel、Chad Jones、Enisse

Kharroubi、Pete Klenow、Matthieu Lequien、Huiyu Li、Yinan Li、Eric Maskin、Marc Melitz、Pierre-Michel Menger、Joel Mokyr、Torsten Persson、Michael Peters、Edmund Phelps、Chris Pissarides、Anasuya Raj、Stephen Redding、Alexandra Roulet、Juliette Sagot、Michael Sohlman、Stefanie Stantcheva、Nicholas Stern、Jean Tirole、Otto Toivanen、Francesco Trebbi、Daniel Trefler、John Van Reenen、Cyril Verluise、Fabrizio Zilibotti以及Thomas Zuber等。

本书写作这一年深受新冠疫情及后续封锁行动的影响。我们要特别感谢各自的家人在此期间的不懈支持与鼓励。

最后，我们希望将本书献给于2020年7月去世的伊曼纽尔·法利（Emmanuel Farhi），一个美丽的心灵，一位天才的学者。被视为同辈人中最出色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的伊曼纽尔，同时也是位杰出的友人，始终愿意倾听我们的观点，并报以建议和支持。我们怀念他的聪颖智慧、开阔心胸、无尽的好奇心与不凡的慷慨豁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 (法) 菲利普·阿吉翁, (法) 赛利娜·安托南, (法) 西蒙·比内尔著; 余江, 赵建航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11

ISBN 978-7-5217-3551-2

I. ①创... II. ①菲... ②赛... ③西... ④余... ⑤赵...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 ①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81622号

Le Pouvoir de la destruction créatrice by Philippe Aghion, Céline Antonin and Simon Bunel

Copyright © Odile Jacob, 202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著者: [法] 菲利普·阿吉翁 [法] 赛利娜·安托南 [法] 西蒙·比内尔

译者: 余江 赵建航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 346千字

版次: 2021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 01-2021-5429

书号: ISBN 978-7-5217-355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

Robert Kolker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
绝望与希望

隐谷路

〔美〕罗伯特·科尔克

著

黄琪

译



ATGCAGGAAGAAAGATTACTTTT
AAGTGGTATAGACTCAATTTTAA
TATAAGACAATGATCCCTATTCTT
ATACTTCATACGACACAAAATTTA
TCTAGATGGGTGAAATTCACACAT
AAGGTAAGAACCATAAAACCTCTAGGAA
CATAGGATGTTACCTTCACGACCTTG
GTAGACAAAAGAGATCTAAAGCACAAAC
AAAAAATGCAAACTGTGATTGGAGGC
TGATAAATTTGGACTACACTGAGATTA

中信出版集团

隐谷路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美]罗伯特·科尔克 著

黄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推荐与赞誉

推荐序

序言

加尔文一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第一部分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二部分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三部分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致谢

关于本书资料的说明

参考文献

献给朱迪和乔恩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长短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忍耐力。

——安·泰勒[\[1\]](#)

[\[1\]](#) Charles McGrath, “Attention, Please: Anne Tyler Has Something to Say,”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8.

推荐与赞誉

从当代科学的眼光来看，精神分裂症是遗传的易感素质与个体成长过程中各种不良经历磨合的结果。然而，要找到帮助患者解脱“心魔”的路径并消除疾病带给患者的各种折磨，从正常人的角度艰难地去感悟和理解患者那种“疯狂”的感受，有时比努力寻找致病基因更有意义。《隐谷路》对一个高发精神分裂症家庭经历的细致描述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剂良药，我相信它在这方面能达到的效果会远远超出了解这种疾病本身。

李凌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我在儿童医院的工作中接触过与《隐谷路》中故事类似的家庭，但这本书揭示的苦难比我既往了解到的还要深重许多倍。人类的幸福有上限，但苦难深渊的下限深不可测，永远有更惨烈的痛苦让人目不忍视。但直视这样的痛苦是征服它们的必要前提，感谢那些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去直面和征服这些苦难的科学家和医生。那些不幸罹患如此隐疾的人不应该是被社会隔绝、被人类抛弃的怪物，而是亟待拯救的正在忍受大不幸的人。中信出版集团敢于引进这样的作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很多读者会本能地回避苦难，希望这本书能够让社会减少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带来助益。

李清晨

外科医生、科普作家，《心外传奇》作者

精神分裂症是人类现代医学史上第一种被发现与遗传因素有关的脑疾病。这本书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也是人类社会对遗传与基因爱恨交加的世纪。从一开始对基因的无比崇拜，到纳粹灭亡后所有人都对导致疾病的遗传因素讳莫如深，现代医学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隐谷路》提供了一份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绝佳资料——一个被疾病困扰的大家族的故事。在逐渐解开精神分裂症神秘面纱的同时，医生也发现了各种药物，可以逐渐减轻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痛苦。人类也许暂时还无法治愈精神分裂症，但无数医生和科学家的孜孜探索终将使人类摆脱精神疾病的困扰。

仇子龙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一项杰出的病例研究，一部调查报道的力作。

西尔维娅·娜萨

《美丽心灵：纳什传》作者
普利策奖、美国书评人协会奖获得者

一部叙事新闻的杰作，也是对同理心的研究。作者罗伯特·科尔克以饱含同情的笔触讲述了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同时也追踪了医学界在诊治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科学进展。

《纽约时报》

科尔克讲述加尔文一家故事的笔触既饱含同情，又让人不寒而栗……他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一名人性角落的探索者，利用这些技巧逐一记录了这个家庭14个成员的人生。

《华盛顿邮报》

《隐谷路》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心世界，还讲述了这种疾病对患者家庭成员的折磨……科尔克拥有伟大小说家级的写作技巧，他的文字使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比鲜活。

《华尔街日报》

在局外人看来，加尔文一家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完美的美国家庭，但事实上，这个家庭却饱受暴力和精神疾病的折磨……《隐谷路》同时也有医学探索的元素，讲述了科学家们研究这个家族的基因，试图解开精神分裂症这种令人深感困惑的疾病之谜的故事。尽管加尔文一家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创伤，但在科尔克饱含同情的笔触下，他们的故事仍然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

《时代》周刊

科尔克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一流的调查记者……这本令人难忘的著作必将会增加大众对精神分裂症这种可怕疾病的了解。

《泰晤士报》

必将成为非虚构叙事写作的经典之作。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推荐序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极其孤独而脆弱的群体。抑郁焦虑患者在确诊后可能会得到来自亲友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谅，自闭症儿童会被父母当作“折翼的天使”悉心呵护，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则可能大为不同。这种反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的后期尤其明显：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会变成一堵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尚有自知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些内心世界的信息，但因为疾病的影响往往会被他人所忽视；或者，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常人，因而不敢与其他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分享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是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生活懒散、对他人和未来的关心极少——这往往更突显出他们“异于常人”。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当代社会，一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家也常常表现出退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不怪任何人，只是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还太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容易被人错认为是“疯子”。虽然这体现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和某些偏见，但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偏见也确实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幻听，他们会声称自己总是听到某

种声音，会说这些声音给了他们某种指示，让他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不可理喻，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常见症状是妄想，最常见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比如，患者相信自己正在被人追杀，他们必须要躲起来或者去攻击追杀他的人；或者相信自己正在受到他人的排挤，他人的正常交流会被患者认为是在对他进行诋毁的交头接耳；再如《隐谷路》中描绘的加尔文一家患病的大儿子，他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而非父母亲生。有些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这种自知力。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没有自知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从而越发使人坚信他们是“疯子”，坚信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性。

近些年来，我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在逐步提升，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和理解度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认识到抑郁症患者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认识到焦虑、抑郁病人悲观厌世的念头万万不可忽视，也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表现出的反常和偏激不是患者本身的错。总之，单从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疾病来讲，人们的认识不再如以前那般片面和偏激。然而，这种“理解”和“包容”在遇到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时难免又变成了“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很难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群体。虽然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有攻击他人或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或少有这样的攻击性行为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患者表现出的大多数攻击性行为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且在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治疗后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举个例子，当提到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这么做？”，而当被告知一个犯罪者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则是“难怪是他”，这就是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我们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加以提防，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_全，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地给精神分裂症患者贴上“暴力危险”的标签。

《隐谷路》中提到，加尔文家族患病的几个兄弟在发病前都表现出了高于常人的某种天赋或者能力，有的冰球打得极棒，有的钢琴弹得极好。事实上，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都是正常的，有些患者甚至智力超群。数学家约翰·纳什人生跌宕，30岁时就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数学家之一的他，却在刚刚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职位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会一身婴儿打扮出现在隆重的新年晚会上，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坐满教授的办公室里宣称自己正在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人们对他的态度从追捧变成了躲避。因为自身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偏见，这样一位学术之星差一点就被学术界遗忘了。不过在自身的不懈钻研以及亲友的理解和支持下，纳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正了名——他们绝不是于社会无益的人，更不应被视作家庭的拖累和羞耻，他们不同于常人，但绝不是异类。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于患者自身还是于其家庭而言，精神分裂症确实是一种折磨，所以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索这一疾病的致病因素和临床治疗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研究变得更加容易了，研究者们如今比以往更容易找到精神分裂症个体的某个风险基因。但这些发现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科学界认识、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道路仍将百般曲折。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成长环境也被认为至关重要。有些携带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的个体并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的致病因素也是阻碍科学

界尽快理解这一疾病的重要原因。与发现致病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书中提到“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在过去，因为对这种疾病没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和耐心，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往往简单粗暴。值得欣慰的是，医学的发展使现在有了科学、系统的治疗方案，但如何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通过《隐谷路》，我们呼吁大众正视这个群体，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和鼓励。我们感谢加尔文家族以及其他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数据，感谢作者如此客观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感谢为了攻克精神分裂症一直在不懈努力的科学家们，感谢悉心关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精神分裂症不再是社会的隐痛。

陆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序言

1972年

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一对兄妹从家中厨房通往露台的门里走出来，一起来到后院。两人有些古怪。唐纳德·加尔文（Donald Galvin）27岁，双眼深陷，头发剃得精光，下巴上的胡子邋里邋遢，像是从《圣经》里走出来的人物。玛丽·加尔文（Mary Galvin）7岁，只有唐纳德一半高，长着淡得发白的金色头发和塌鼻子。

加尔文一家住在樵夫谷，那里是一片广阔的森林和农场，位于科罗拉多州中部，依偎在险峻的小山丘和砂岩平顶山之间。他们家的院子散发出松木香甜的气味，带着泥土的清新。灯草雀和蓝松鸦在露台附近的石头花园周围飞来飞去。家里的宠物，一只叫作阿瑟尔（Atholl）的苍鹰，待在他们的父亲多年前搭的鹰舍里，站岗放哨。小姑娘走在前面，兄妹两人从鹰舍边经过，爬上一座小山。他俩对脚下长满地衣的石头路再熟悉不过了。

加尔文一家总共有12个孩子，除了老大唐纳德和老幺玛丽，还有10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总爱开玩笑说，这么多孩子，足够组个橄榄球队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尽可能找理由离唐纳德远远的：那几个年纪还没到搬出去住的孩子会去打冰球、棒球，或者橄榄球；家里的另一个女孩，年纪跟玛丽最近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要么跟邻居家的斯卡克姐妹在一块儿，要么就在路那边的肖普托夫家。二年级的玛丽放学后没处可

去，只能待在家里，况且除了唐纳德也没人照顾她。

唐纳德身上所有的事都让玛丽弄不明白，无论是他的光头还是他的衣服。所谓的衣服其实只是一条红棕色的床单，唐纳德把它披在身上，仿佛一个修道士。有时候，他会拿弟弟们玩的塑料弓箭给衣服加点装饰。无论什么天气，唐纳德都穿成这样在家附近几英里几英里地走，走上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他一般会沿着这条名叫“隐谷路”的土路走下去，经过樵夫谷的修道院和乳牛场，顺着路肩走上公路的分隔带。他常在父亲工作过的美国空军学院前面停下来，这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假装不认识他。快到家时，唐纳德会看着本地小学操场上玩耍的孩子，把身子挺得笔直，用爱尔兰人的欢快语调，拖着音，宣布自己是这里新来的老师，直到学校的校长叫他走开。每当这种时候，二年级的玛丽总是为这个世界如此狭小而难过万分，大家都知道，她是唐纳德的妹妹。

玛丽的母亲对这种情况则已经司空见惯，一笑了之，不会大惊小怪。与其补救，不如承认自己对此束手无策。她不知道家里到底怎么回事，更不懂如何阻止这一切。玛丽除了暗自难过，别无他法，只能也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她注意到父母现在密切监视着所有孩子的危险信号：彼得（Peter）生性叛逆，布莱恩（Brian）毒瘾缠身，理查德（Richard）被学校开除，吉姆（Jim）打架生事，而迈克尔（Michael）则干脆离家出走了。玛丽知道，抱怨、哭泣，或者流露出任何情感，都会让人觉得她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其实在玛丽看来，穿着床单的唐纳德已经比其他时候要好得多了。有时放学回家，玛丽会发现唐纳德正做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事。比如把家具一件接着一件全搬到后院，或者向鱼缸里倒盐，毒死所有的鱼。有时候在浴室里，唐纳德会把吃下的药都

吐出来：三氟拉嗪、氯丙嗪、氟哌啶醇、氟奋乃静、苯海索。有时候，他则会一丝不挂地安静地坐在客厅中间。而另一些时候，母亲则不得不把警察叫来，制止唐纳德和兄弟之间的冲突。

然而大多数时候，唐纳德都沉浸在宗教事务中。他向别人解释说，圣依格那修赋予了他某种“精神修炼和信仰”。几乎每一个白天，以及大多数的夜晚，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高声诵读《使徒信经》和《主祷文》，以及他自己想出的一长串祷词，他称之为《神父圣职》，里面的逻辑只有他自个儿明白：

献给至高无上的上帝、本笃会、耶稣会士、圣心圣职、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圣母玛丽、纯洁的玛丽、神父奉献会、梅一家人、黑衣修士、圣灵、修道院的方济会修士、唯一神圣的宇宙、使徒式、苦修派……

在玛丽看来，这些祷词就像水龙头，滴滴答答没个完。“别说了！”可玛丽的尖叫从来没办法阻止唐纳德的诵读，他只是稍稍停下吸口气，然后继续。玛丽觉得唐纳德的行为像是对整个家庭的控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父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很崇拜父亲，加尔文家其他孩子也是如此，甚至包括生病之前的唐纳德。玛丽甚至有些嫉妒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家中。通过整天拼命工作，父亲获得了对自己活动的掌控权，她能想象那种享受感。拼命就能跳脱出去。

最令玛丽受不了的，是唐纳德对她与众不同的态度。这倒不是说他凶狠，实际上他对玛丽很和善，甚至温柔。玛丽的全名是玛丽·克莉丝汀（Mary Christine），因此唐纳德常常称呼玛丽为“圣洁的处女，耶稣的母亲”^[1]。“我才不是！”玛丽非常讨厌这个称呼，她的其他哥哥也常常用这个称呼寻她开心，相比之下，

唐纳德这样说的時候却是一本正经，热切又毕恭毕敬。但这只会让玛丽更为恼火。唐纳德把玛丽作为他祷告的崇高对象，仿佛在邀请玛丽进入他的世界，而这却是玛丽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玛丽最终想到了一个对付唐纳德的办法，就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怒火。玛丽发泄的计划，其灵感来自她母亲有时在电视上看的魔幻史诗电影。她对唐纳德说：“我们去山上吧！”他同意了，对于“圣母”他总是有求必应。玛丽提议去山上搭个秋千，“我们带上绳子吧”。唐纳德照做了。到达山顶后，玛丽挑了一棵树，一棵高高的松树，说想把唐纳德绑在树上。唐纳德也同意了，还把绳子递给了她。

就算玛丽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要像电影里烧死异教徒那样，把唐纳德绑在树桩上烧死，大概他也不会会有什么异议。唐纳德紧贴着树干，沉浸在自言自语中，玛丽则拿绳子绕着树，一圈接着一圈，直到确认他无法挣脱为止。唐纳德依旧没有反抗。

玛丽告诉自己，如果唐纳德突然不见了，也没人会想他，更不会有人怀疑是她做了什么。她抱来一堆树枝，作为柴火丢到他的赤脚边。

唐纳德准备好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抗拒自己心中的“圣母”。他现在安静、平和，耐心地等待着。

他崇拜她。

其实玛丽那天并不算太当真，她没带火柴，也就没法点火。更重要的是，她跟她哥哥不同。她是理智的，她的思想扎根在现实世界里，或者至少她需要证明这一点，不仅向她的母亲，也向自己证明这一点。

玛丽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她把唐纳德丢在山上，让他一个

人在蝇虫和白头翁花的围绕中独自祷告。玛丽终于可以长时间一个人待着了，但这也不会太久，因为唐纳德最终还是下山回家了。

想起这些过去，玛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和玛格丽特会觉得这些往事好笑，”她说，“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觉得如此。”

往事如烟。那一天整整45年后，2017年冬日一个清冷的下午，这个曾经名叫玛丽·加尔文的妇女在科罗拉多泉市的松尖园护理院门口走下车，去看望那个她曾幻想着要活活烧死的哥哥。50多岁的她，眼睛还像小时候那样碧蓝，不过如今的她有了另一个名字：琳赛（Lindsay）。成年离家后，玛丽想要跟过去一刀两断，于是她改了名字，寻求一个崭新的开始。

琳赛如今的家在科罗拉多州特柳莱德镇外，距离护理院6小时车程。她自己开了一家策划企业活动的公司。跟父亲一样，她拼命工作，在家和丹佛之间来回奔波。琳赛揽到的大部分活动都分布在这条路线上，还有些在科罗拉多泉市市内。这样她就可以在工作之余，兼顾唐纳德和家里其他人。她的丈夫，里克（Rick），在特柳莱德镇的滑雪训练学校当教练。里克与琳赛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高中，另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如今见到琳赛的人，很难看穿她一贯挂在脸上的笑容，看见那沉稳自信背后的自制。多年的历练使她哪怕在极糟糕的情况下，也能巧妙地假装一切如常。但她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尖刻的言论，透露出平静表面下正涌动着的忧郁而无法改变的暗流。

唐纳德正在一楼的休息室等她。他随意地套着一件皱巴巴的牛津纺衬衫，衣角露在裤子外面，下身是一条齐膝的棉短裤。这

个最年长的哥哥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两鬓斑白，下巴中间有条美人凹，眉毛浓密黝黑，看起来别扭又显眼。要是他的声音不这么轻柔，步态不这么僵硬，倒可以去演警匪片。“从他走路的步子中还能看出一点氯丙嗪留下的后遗症。”护理院的经理克丽丝·普拉多告诉琳赛。唐纳德现在服用的是氯氮平，这是精神病治疗中最后的选择，效果极佳，伴随的风险也极高。这些极端的副作用包括心肌炎、白细胞数量降低，甚至癫痫。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

唐纳德看见了妹妹，他站起身，抬脚就要往外走。因为平时琳赛来访时，都会带他出去看望其他家人。琳赛笑吟吟地说，今天不出去。她这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他身体怎么样，还要跟他的医生谈谈。唐纳德也干笑一下，坐了回去。除了琳赛，没有其他家人到这儿来看过他。

琳赛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理解自己的童年。而从各个方面而言，这项工程仍在继续。事到如今，她已然明白，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尽管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仍然在这一疾病的门口打转。人们或许可以列出一个症状清单——幻觉、妄想、幻听、类似昏迷的神志不清，以及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无法理解最基本的语言修辞，乃至用精神病学家的话来说“联想松弛”和“思维瓦解”。但医生们仍然难以解释，是什么导致唐纳德时而兴致勃勃，甚至安然自足，时而又沮丧不安，让琳赛驾车带他到普韦布洛的州立精神病医院去。在过去的50年里，唐纳德经常说想要住在那里，而事实上也不得不如此。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唐纳德总要买两瓶万能牌衣物洗涤液，并兴高采烈地表示：“这是最好的沐浴液！”50年后，唐纳德依旧会背诵那些宗教祷文：“本笃会、耶稣会士、圣心圣职……”多年来，他始终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为什么这样？对于这些，琳赛只能自行揣

测。

或许这才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怕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他脑部疾病，比如自闭症或者阿尔茨海默病，往往会削弱和消磨一个人最具有辨识性的个性特征。相比之下，精神分裂症导致病人过于情绪化，使病人的个性更为突出。而此时，病人根本无法觉察自己的激烈表现。对于病人的亲朋来说，这种疾病是难于理性地去面对的，而这会引来恐惧。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但加尔文一家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在12个孩子中，唐纳德只是第一个出现明显症状的。在他之后，另外5个弟弟也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彼得，家中最小的儿子，叛逆、狂躁、好斗，多年来拒绝一切帮助。

马修（Matthew），擅长制陶，一会儿认为自己是保罗·麦卡特尼，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情绪可以左右天气。

约瑟夫（Joseph），家里性情最温和的孩子，痛苦地觉察到兄弟们的病态，但自己也难逃这一宿命。他的耳畔时常响起虚幻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吉姆，特立独行的次子，与唐纳德长期不和，一直欺凌家中最没有反抗能力的成员，尤其是他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玛格丽特。

还有布莱恩，完美的布莱恩，家里的明星，把自己的恐惧深藏心中，直到一次莫名其妙的爆发，永远地改变了所有家人的人生。

加尔文家12个孩子的出生贯穿了整个婴儿潮时期。最大的唐纳德生于1945年，最小的玛丽生于1965年。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属于美国的时代。他们的父母“咪咪”（Mimi）和“多恩”（Don）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于大萧条时期相识，二战期间结婚，冷战时期生子。那些年，咪咪和多恩身上似乎具备着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美好品质：富有冒险精神、勤奋、责任感强、乐观。对于最后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他们的12个孩子，最小的几个还是违抗医生的建议生下来的，这样的人绝对是乐观主义者。随着家庭的不断壮大，咪咪和多恩见证了整个反文化运动的开端和结束。从某种角度来说，加尔文一家也为这种文化做出了“贡献”：对他们的病例研究成了人类疑难杂症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在加尔文家六个男孩开始发病的年代，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并不了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彼此相悖，这使他们的一切从此完全被对病因的探寻所笼罩。他们经历了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电休克治疗的年代，经历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论战的年代，大海捞针般地寻找过这种疾病的遗传标记物，也听说过关于病因的多种深刻见解。唐纳德、吉姆、布莱恩、约瑟夫、马修和彼得，每个人的发病特点各不相同，遭受的痛苦也都不一样，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治疗手段。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各式各样的诊疗，催生过很多有关精神分裂症本质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常常彼此冲突。其中的一些理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非常残酷，因为他们常常要承受指责，好像是他们的言行导致孩子患了精神疾病似的。这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也是一部朦胧的精神分裂症科学史，一部几十年来追溯精神分裂症病因和本质的历史。

在很多方面，家中没有患精神病的其他孩子跟他们的兄弟一

样，也受到了影响。在有着12个孩子的家庭里想要与众不同就很不容易，但在这个家中，成员间的互动与别的家庭都不一样，出现精神问题是家庭生活的常态，一切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对于玛丽和玛格丽特，还有其他兄弟约翰、理查德、迈克尔和马克（Mark）来说，身为加尔文家的一员意味着要么自己变成疯子，要么看着家人变成疯子。他们在一种永不消逝的精神病氛围中长大。他们即使没有陷入妄想、幻觉或偏执——比如相信房子正受到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搜查，或者有魔鬼藏在床下面——也会觉得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在蠢蠢欲动。他们会想，还有多久就会轮到自己？

作为最小的孩子，玛丽的经历最糟，处境也最危险，受到来自挚爱亲朋的伤害也最直接。儿时，玛丽希望自己能变成别人。成年后的她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远走他乡，改名换姓，告别过去。她原本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而此刻，琳赛却在松尖园护理院里，为这个自己曾经畏惧的哥哥操心：了解他是否需要做心脏检查，该填的表是否都填了，医生是否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注。她也在为其他患病但还活着的哥哥做着同样的事。探望期间，唐纳德在大厅里溜达，她还时时留意着他的行动，担心他无法照顾自己。她希望他一切都好好的。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她还是爱他的。这份爱怎么可能变呢？

这种一个家庭多人患病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似乎很难估计，像加尔文一家这样长久维系完整的就更是如此了。精神分裂症的准确遗传模式还未被摸清，但只要发病，这些模式就如同洞穴墙壁上跳跃的影子那样不证自明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专家们已经发

现，精神分裂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遗传。但矛盾的是，精神分裂症似乎并不是通过父母直接遗传给孩子的。精神病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都认为，一定存在破解这种疾病的密码，只是这种密码目前尚未被发现。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的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六兄弟处于相同的遗传谱系中，这让专家们得以切入精神分裂的遗传过程中一探究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家们就开始研究加尔文一家，以求找到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关键。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以及多家大型制药公司分析了加尔文家的遗传物质。同所有其他受试对象一样，他们的参与也都是保密的。在经过近40年的研究后，加尔文一家对理解精神分裂症所做出的贡献如今已经明晰可见。他们的遗传物质样本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的基石。通过分析这家人的DNA，并将其与普通人群的基因样本进行比较，专家们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预测，甚至预防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直到最近，加尔文一家才意识到他们的情况会给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带来帮助与希望。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始于咪咪和多恩，他们的人生起初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自信，之后却在悲剧、混乱和绝望中分崩离析。相比之下，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科学成果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对于琳赛和她的姐姐以及十个哥哥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将他们的童年比作哈哈镜中的美国梦，那后来的事就如同哈哈镜碎裂后的残影。

故事中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他们还在调查自己童年的谜，同时也尝试着复原父母美梦的碎片，重塑新的梦境。

这还是一个努力重新发现自己兄弟身上的人性的故事，尽管他们被大多数人视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坏事发生后，一家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苦难的本质。

[1] Christine在英语中还有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之意。——译者注

加尔文一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父母

“多恩”（**Don**）

唐纳德·威廉·加尔文（**Donald William Galvin**）

1924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

2003年1月7日去世

“咪咪”（**Mimi**）

玛格丽特·肯尼恩·布莱尼·加尔文（**Margaret Kenyon
Blayney Galvin**）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2017年7月17日去世

子女

唐纳德·肯尼恩·加尔文（**Donald Kenyon Galvin**）

1945年7月21日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

与吉恩（**Jean**）结婚（已离婚）

“吉姆”（**Jim**）

詹姆斯·格里高利·加尔文（**James Gregory Galvin**）

1947年6月21日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与凯西（**Kathy**）结婚（已离婚），两人育有1个孩子

2001年3月2日去世

约翰·克拉克·加尔文（**John Clark Galvin**）

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

与南茜（**Nancy**）结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

布莱恩·威廉·加尔文（**Brian William Galvin**）

1951年8月26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1973年9月7日去世

“迈克尔”（**Michael**）

罗伯特·迈克尔·加尔文（**Robert Michael Galvin**）

1953年6月6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阿黛尔（**Adele**）结婚（已离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

与贝琪（**Becky**）结婚

理查德·克拉克·加尔文 (**Richard Clark Galvin**)

1954年11月15日出生于纽约州西点

与凯希 (Kathy) 结婚 (已离婚) , 两人育有1个孩子

与蕾妮 (Renée) 结婚

“乔” (**Joe**)

约瑟夫·伯纳德·加尔文 (**Joseph Bernard Galvin**)

1956年8月2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市

2009年12月7日去世

马克·安德鲁·加尔文 (**Mark Andrew Galvin**)

1957年8月20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市

与乔安妮 (Joanne) 结婚 (已离婚)

与莉莎 (Lisa) 结婚 , 两人育有3个孩子

“马特” (**Matt**)

马修·艾伦·加尔文 (**Matthew Allen Galvin**)

1958年12月17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彼得·尤金·加尔文 (**Peter Eugene Galvin**)

1960年11月1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加尔文·约翰逊 (Margaret Elizabeth Galvin Johnson)

1962年2月2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克里斯 (Chris) 结婚 (已离婚)

与怀利·约翰逊 (Wylie Johnson) 结婚；两人育有2个女儿，艾丽 (Ellie) 和萨莉 (Sally)

“琳赛” (Lindsay)

玛丽·克莉丝汀·加尔文·劳奇 (Mary Christine Galvin Rauch)

1965年10月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里克·劳奇 (Rick Rauch) 结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杰克 (Jack) 和凯特 (Kate)

第一部分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1章

1951年

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有时，咪咪·加尔文会在又做了一件她从没想过会做的事情时停歇下来喘口气，思量起自己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因为她为了爱情，不管不顾地放弃上大学，在战争期间早早地结了婚，还是因为哪怕接二连三地怀孕，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生个不停，多恩也打算接着生，抑或是因为她突然搬到西部，对环境完全不熟悉？这个纽约富贵家庭出身、教养良好的得克萨斯女孩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一手抓着活鸟，一手拿着针线，想要把鸟的眼睑缝起来，而这仅是她不同寻常经历中的一页。

一天夜里，咪咪突然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叫声惊醒，丈夫多恩和儿子们仍在酣睡。之前就有人警告过刚搬来泉市的加尔文一家，当地有郊狼和美洲狮出没，但这叫声不一样，音调很高，听得人心里发毛。第二天早上，咪咪在离家不远处的棉白杨树林边看见一小撮散落的羽毛。多恩提议把羽毛带给他新认识的朋友鲍

勃·斯特伯勒看看。鲍勃是一位动物学家，在加尔文一家附近的科罗拉多学院教书。

斯特伯勒博士的家跟他们在纽约见过的其他住宅都不一样：既是住房，也是仓库，里面饲养着很多爬行动物，主要是蛇。一条食鱼蝮没被关起来，盘在一把木头椅子的椅背上。多恩和咪咪把3个儿子也带来了，他们分别6岁、4岁和2岁。看到一个孩子冲到蛇跟前，咪咪尖叫起来。

“怎么？”斯特伯勒笑着说，“怕蛇咬你的孩子吗？”

凭着多年训练鹰隼的经验，这位动物学家轻松地鉴定出那撮羽毛的主人。多恩和咪咪此前对驯鹰一无所知，勉强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听着斯特伯勒滔滔不绝地讲解：中世纪时期，只有伯爵头衔以上的人才才有资格饲养游隼；科罗拉多这片地区曾经是草原隼的主要栖息地，后者是前者的近亲，漂亮而尊贵。咪咪和多恩不由得听入了迷，好像走进了一个缓缓铺开的神秘世界。他们的新朋友把驯鹰描述得有点邪乎，说这种古老的娱乐方式如今只有很少人在偷偷玩。鲍勃和他的朋友正在训练的鹰跟过去成吉思汗、匈奴王阿提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亨利八世饲养的是同一类，训练方法也一样。

或许，多恩和咪咪要是在50年前就搬到科罗拉多泉市就好了。当时，这里是很多人的向往之地，马歇尔·菲尔德、奥斯卡·王尔德、亨利·沃德·比彻都曾到此领略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1]这里有以探险家泽布伦·派克的名字命名的14 000英尺^[2]高的派克峰，不过泽布伦自己却没有成功登顶过。这里有众神花园，巍然屹立着如同复活节岛石像那样的巨大砂石岩层，像是大自然无心的摆设。还有曼尼托泉，美国富裕的上层阶级曾往来其间，体验着当时最时尚的伪科学疗法。多恩和咪咪搬来时已是1951年

的冬天，当地的上等社会那时早已褪去光鲜，科罗拉多泉市也已经变回那个旱灾肆虐的闭塞小城——在地图上只有针尖大小，甚至在这里举办的国际童子军大会的规模都比整个小城大。

驯鹰这么一个象征着贵族王权的光荣传统，在多恩和咪咪心中引起了一阵激荡，唤醒了他们对历史文化和体面的崇拜。他们不可救药地沦陷了。不过，加入驯鹰俱乐部是需要时间的。除了斯特伯勒博士，没有其他人愿意跟加尔文夫妇聊驯鹰的事。当时传统的观鸟组织对鹰还不感兴趣，驯鹰属于一门独特的学问。

咪咪一点儿也想不起细节了，不过多恩想办法弄到一本关于驯鹰的书《巴兹-纳马-伊-纳西里：波斯猎鹰论》，过去几十年里，这本书被从波斯语翻译成了英语。^[3]咪咪和多恩研究了这本书，用铁丝网做了一个拱顶，安在一个呼啦圈大小的圆形框架上，完成了他们的第一个捕鸟笼。按照书中的指导，他们在捕鸟笼中放了几只死鸽子作为诱饵，上面连着鱼线。鱼线的一头吊在铁丝网上，另一头系有活结，用来捕捉上钩的鸟。

第一个光顾的是一只红尾隼，它带着整个捕鸟笼飞了，但他们的英国雪达犬跟在后面追，把它拉了下来。这是咪咪第一次亲手抓到一只野鸟。

毫无经验的咪咪抓着这只野鸟去找斯特伯勒博士。“喔，干得漂亮，”他说，“你得把它的眼睑缝起来。”

斯特伯勒解释说，当隼以每小时200英里^[4]的速度直冲云霄时，眼睑起着保护的作用。要想像亨利八世的驯鹰师那样训练鹰隼的话，就得把它们的眼睑暂时缝起来。失去了视觉之后，隼就不得不依赖于驯鹰师的声音和触碰了。斯特伯勒提醒咪咪，别缝得太紧，也别缝得太松，而且千万不能扎到隼的眼睛。咪咪现在怎么做起了这种以前想也不会想的事情？

她虽然很害怕，但不至于无从下手。咪咪从母亲那儿学到了缝纫的手艺，后者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做过裁缝，甚至开了家服装店。咪咪尽可能小心地将红尾隼的眼睑缝起来，然后在长长的线头上打了个结，掖在鸟头后面的羽毛里，不让隼挠到。

斯特伯勒称赞了咪咪的手工。“现在，”他说，“要让它在你们的拳头上待满48小时。”

咪咪怔住了。多恩是个新闻发布官，他怎么能手腕上立着一只瞎眼的隼，在恩特空军基地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呢？而她自己要做家务，还要照顾3个小男孩，这怎么行呢？

于是夫妻俩分了工，咪咪负责白天，多恩负责夜晚。在基地值夜班的时候，多恩会把鸟拴在他值班室的椅子上。不过有一次，一位高级军官走进来，导致隼“奋翼”（bate）——驯鹰术语，指的是鹰惊慌地飞走——起来，机密文件被扇得到处都是。之后，多恩就在基地里出名了。

经过艰苦的48小时，咪咪和多恩成功驯服了这只隼。他们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仿佛充满野性的大自然向他们展开了怀抱，也臣服在他们的前面了。驯服这种鸟非常残忍，很消耗体力。但只要坚持下来，投入精力并训练有方，就会收到无与伦比的回报。

他们经常想，这跟抚养一个孩子没两样。

咪咪娘家姓布莱尼，小时候，她常常坐在家里的三角钢琴边，听外婆弹奏肖邦和莫扎特的乐曲。有些夜晚，外婆会拉起小提琴，姨妈跟着音乐跳起吉卜赛舞蹈，身后的壁炉响起“噼噼啪啪”的伴奏。咪咪看得眼睛都不眨。家里的留声机大多数时候都

是坏的，家里的唱片——跟厚盘子一样，上面刻有凹纹，不像黑胶唱片，更像是轮毂盖——里全是咪咪渴望听到的歌曲。要是没其他人在场，这个不到5岁，有着深色头发的女孩会在留声机上搁一张唱片，搭下唱针，用手指拨转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听唱片上的两段歌剧。



咪咪，摄于20世纪30年代

咪咪的外公霍华德·普尔曼·肯尼恩（Howard Pullman Kenyon）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早年成立了一家公司，为5个州清理河道，并沿着密西西比河修建防洪堤，后者一直发展得很顺利。咪咪的妈妈，威廉明娜（Wilhelmina）——大家都叫她比莉（Billy）——在达拉斯市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时，老师问她：“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她会腼腆地回答：“他是挖沟渠

的。”在“咆哮的20年代”[5]，肯尼恩家族发展得非常兴旺，在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附近的瓜达卢佩河口拥有自己的小岛。霍华德在岛上挖了一个湖，在里面养鲈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家人都住在休斯敦市卡罗琳大道一座气派的旧宅中。私家车道上停着两辆皮尔斯——箭牌豪华汽车，家里的5个子女每到成年，家里就会增加一辆皮尔斯——箭，逐渐形成了一支车队。

咪咪是听着肯尼恩家族的故事长大的。长大后，她常常把这些故事当作守也守不住的秘密，讲给朋友、邻居和遇到的人听。肯尼恩家将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座房子卖给了霍华德·休斯[6]的父母……霍华德·休斯本人是咪咪母亲在理查德森学校的同班同学，他来上学是为了给自己的上层阶级身份镀金……肯尼恩外公非常着迷于采矿，曾经跑到墨西哥的大山里寻找金子，被潘丘·比利亚短暂地囚禁过。肯尼恩外公深谙当地环境，令这位墨西哥革命家钦佩不已，两人很快成了朋友。也许因为心底隐隐的不安，也可能单单是因为头脑过于活跃，咪咪常常提起这些事，来表明自己的地位和家世。它们可以提醒她自己出身优越，让她感觉好过点。

咪咪的母亲比莉找到了一位符合肯尼恩家标准的如意郎君。约翰·布莱尼（John Blayney）是个26岁的棉花商，他的父亲是一位周游世界的学者，也是银行家和慈善家奥托·卡恩的信托顾问。两人门当户对，他们的婚姻很受众人看好。比莉生了两个孩子：1924年生下咪咪，两年半后生了她的妹妹贝蒂（Betty）。1929年年初，比莉和约翰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原来，咪咪的父亲并不是方方面面都无可指摘，他让比莉染上了淋病。

肯尼恩外公带着一把来复枪去找他的女婿，火速帮女儿办好了离婚手续。比莉和女儿搬回了休斯敦。比莉感到非常无助，几

近绝望。一个怒气难平的离婚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咪咪5岁，贝蒂3岁——根本没有办法在肯尼恩家的社交圈生活。日子似乎一筹莫展，但几个月后，比莉爱上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画家。

本·斯柯尼克（Ben Skolnick）当时要去加利福尼亚创作一幅壁画，正好经过休斯敦。本的品位不俗，从小在一个很有艺术造诣的家庭中长大。他在休斯敦受人关注，不仅仅因为他的营生手段，也因为他是犹太人。比莉的父母约本在市区外见面，生怕其他人看见。不过当本求婚时，比莉的母亲还是欣然希望女儿答应。不管比莉的家人对本·斯柯尼克个人或对犹太人有什么看法，他们都明白，这是比莉最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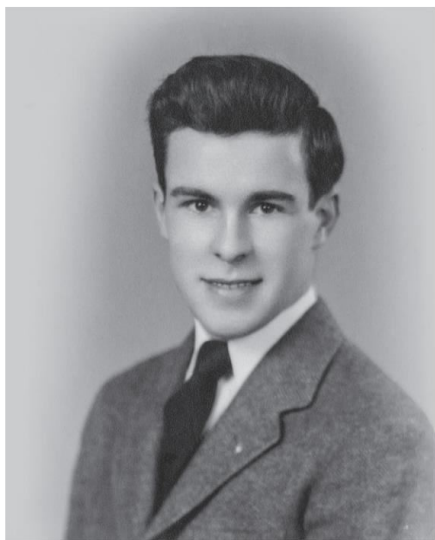
1929年夏天，肯尼恩外公驾车载着比莉和两个外孙女去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岛，从那里乘船顺着墨西哥湾向东，在新奥尔良登上冠达航运公司的大型邮轮来到纽约。未来的斯柯尼克太太和女儿们受邀与船长同席，她们要表现出完美的进餐礼仪，包括进餐后使用洗指碗。咪咪动不动就晕船，稍微舒服点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待在船上的感觉。她不止一次地想，人生中还有什么事能比坐船更难受。

新组合的家庭很快就遇到了种种问题。股票市场崩盘后，本找不到绘制壁画的工作了。比莉凭着自己良好的教养和对上等布料的鉴赏力，在梅西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很快在曼哈顿的时装街区开了一家服装店，给家里带来一点稳定的收入。比莉打理店里时，本和他的家人在皇后区贝勒罗斯大街的小房子里照顾女儿们。房子在纽约市的边缘，差不多挨着长岛。

咪咪渐渐爱上了纽约。她和妹妹会带着午餐袋，花5美分乘

公交车和地铁，从遥远的皇后区坐到曼哈顿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穿过中央公园，经过克里奥帕特拉方尖碑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在天黑前赶回家。“振兴公共事业”的新政使咪咪可以在球场和高中的礼堂里欣赏戏剧。学校组织的活动让她第一次参观了水族馆和天文馆。她第一次看的芭蕾舞剧是莱奥尼德·马辛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演出。咪咪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个大老远从俄罗斯跑来跳舞的12岁小女孩，仿佛她们是专程来为她演出的一样。同咪咪最初了解的留声机、三角钢琴、乡村俱乐部和休斯敦女性青少年联盟组成的世界相比，她更加热爱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我喜欢在纽约长大，”她会说，“住在这里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以后的人生中，每当不如意，咪咪就会回想纽约梦幻般的童年和休斯敦的辉煌家族史，来掩盖眼前的愁云惨雾。大萧条时期，肯尼恩外公遭遇不顺，解聘了家中服务多年的仆人，却仍好心地允许他们免费继续住在自己的宅子里……有一次，咪咪和妈妈在去得克萨斯州的火车上碰到了查理·卓别林，有机会跟在电影中扮演他孩子的小孩们（这些小孩都是捣蛋鬼）一起玩……30年代时，咪咪的妈妈比莉曾陪肯尼恩外公回过一次墨西哥，在那里跟弗里达·卡罗一起喝过酒……



高中时代的咪咪和多恩

跟咪咪有关的那些故事，也有些是她不愿提及的。比如本·斯柯尼克非常喜欢喝酒；比如亲生父亲约翰·布莱尼在她生命中的消失，这让她伤痛不已；比如她一直渴望自己的人生能安稳、有保障，并且精彩。

1937年，咪咪遇到了一个能给她带来这种生活的男人，或者说男孩。那一年，多恩·加尔文14岁，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也是一头深色的头发。咪咪比他小一岁，学习用功，也爱玩。他们参加同一个游泳比赛，哨子还没吹，她就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多恩被派去把她领回来。这次相识后，多恩开始约咪咪出去玩。这是第一次有人约她。她答应了。

多恩是个很正经的男孩，爱读书，即将上大学。这些都很让咪咪动心。他还有那种典型美国式的健康与帅气：突出的长下

巴，大背头，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偶像明星。多恩不算外向，但人们似乎都愿意听他说话。他的声音比话语更吸引人，他那情歌王子般的好嗓音，说起话来仿佛在唱歌，音色性感而迷人。后来，多恩的儿子约翰回忆说，多恩可以完全用他的嗓音“调动别人的情绪”。

比莉对这个男孩却不以为然。其中多少有点势利的原因。加尔文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圣公会的肯尼恩家族来说相当于异类，就像当初比莉遇到本的犹太家庭一样。多恩的父亲是一家造纸公司的效率专家，母亲是名教师。但在咪咪的妈妈看来，这只能算是普通家庭。

事实上，两家互相都有点瞧不上对方。多恩的妈妈注意到，在两个年轻人的交往中，咪咪是占主动的那一方，这是不是说明以后她最小的儿子会受制于咪咪？因此，两家人老拿“你们俩年纪都太小”的借口来搪塞他们。

但对于才十五六岁的咪咪和多恩来说，两人相信彼此是天生一对，没有什么可以动摇这一点，尽管他们兴趣各异——多恩喜欢棒球，是道奇队的拥趸，而咪咪喜欢看芭蕾表演。咪咪说服多恩带她去看《彼得鲁什卡》，主演是和乔治·巴兰钦一同离开苏联的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多恩看得如痴如醉，回到家被兄弟们揶揄了好几天。那年夏天，比莉带咪咪出门旅行，表面上是去看望肯尼恩外公，实际上是要咪咪离开多恩一阵子。但这不管用：咪咪和多恩一直保持通信。咪咪一回家，多恩就带她去看《绿野仙踪》，回家时两人一路边唱边跳。那年秋天，他们一起去舞会，看学校的篮球赛，参加集会和周五晚上的篝火晚会。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驾车去长岛南岸的雪松海滩参加海滨野餐。

慢慢地，家人的态度缓和了。多恩快毕业时，他的父母邀请咪咪和她全家来吃饭。加尔文家住的房子比咪咪家漂亮，属于荷兰殖民地复兴时期的风格，客厅非常大，铺着厚厚的深红色东方地毯。比莉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从那以后，多恩成了咪咪家的座上宾，周五晚上常来玩拼字游戏。去多恩家拜访时，咪咪也会和多恩还有他的两个哥哥玩闹。乔治和克拉克像多恩一样长相英俊。有次咪咪和多恩相约去修道院博物馆，多恩的妈妈没再干涉。咪咪还为多恩写了一篇关于修道院博物馆挂毯的校报文章。多恩的妈妈看到咪咪在帮她儿子进步，也开始觉得她不错。

两小无猜的感情也不都是轻松的。每个周末，多恩要作为SKD联谊会的跳舞高手主持舞会。咪咪每周都挖空心思缝制新裙子，坚决不让别人跟多恩一起跳舞。但和牙买加高中校报所谓的“高年级校草”交往，是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要让保守又害羞的多恩·加尔文先生聊聊让他心动的女生，只会遭到他的拒绝。

除了相貌英俊，多恩身上还有一种洒脱不羁的自信，这种特质让人难以抗拒，也让人有点难以企及。在他的一生中，这种隐秘的特质都会对他有利。从一开始，就好像咪咪是专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所有人一样。

咪咪喜欢多恩的进取心，不过她心里更愿意他离家近一些。高中毕业后，多恩告诉咪咪，他想进入美国国务院，想周游世界。1941年秋，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多恩入读了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一年后，为了离多恩近一些，咪咪去了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胡德学院。没过多久，战争就波及他们了。

1942年，在乔治敦大学上大二的多恩入伍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预备役士兵。第二年，海军派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拉诺瓦，接受为期8个月的机械工程训练。课程结束前，学员们获得了去前线的捷径：如果愿意去，可以直接调到海军，保证进入候补军官学校，多恩接受了。1944年3月15日，他被调到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帕克，接受候补海军军官的基本训练，然后去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等待任务。11月，多恩接到命令，他将担任全新的攻击运输舰“格兰维尔号”的登陆艇驾驶员，被部署到南太平洋。多恩要上战场了。

出发前几周，圣诞节前不久，多恩从科罗纳多给咪咪打了长途电话，问她能否过去看他。比莉答应了咪咪的请求。一到科罗纳多，咪咪就多恩驾车去蒂华纳登记结了婚。回科罗纳多的行程成了他们短暂的蜜月，之后便是挥泪道别。在回家的路上途经得克萨斯州时，咪咪看望了肯尼恩家族的亲戚，其间她经历了第一次晨吐。

两人闪电般的结婚突然变得非常合理：因为在咪咪去加州看多恩的几周前，多恩曾最后一次来过纽约，咪咪在这期间就怀孕了。

多恩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两人在蒂华纳登记结婚非常不满。在“格兰维尔号”出发前，多恩又请了几天假，长途跋涉地赶回来。1944年12月30日，多恩和咪咪在皇后区贝勒罗斯大街的圣格里高利大教堂再次宣誓结婚。第二天，多恩把他海军信息表上“至亲”一栏里的“父母”改成了“唐纳德·加尔文太太”。

随后的几个月里，新娘不停地呕吐。咪咪12次怀孕都经历了长时间并且无法抑制的呕吐。1945年5月，多恩的船抵达了日本海域，其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正值高潮。多恩的职责是用

登陆艇将士兵从军舰运到岸上。通过广播，咪咪时刻关注着有关“格兰维尔号”的消息，当听到东京广播电台宣布多恩的船被击毁时，她差点当场崩溃。虽然后来证实这是虚假报道，但战况确实是九死一生。

多恩的船停靠在冲绳岛附近，他们两边的船都被“神风特攻队”炸沉了。多恩花了很长时间把死去的战友拖出水面。他后来从来没有对咪咪提起过他在战役中的这些所见所为。不过他活了下来。1945年7月21日，在美国投下结束战争的那两枚炸弹两周前，多恩在“格兰维尔号”上收到了来自西联公司的电报：是个男孩。

[1] Sprague, *Newport in the Rockies*.

[2] 1英尺 $\approx$ 30.48厘米。——译者注

[3] Husam al-Dawlah Timur Mirza, *The Baz-nama-yi Nasiri: A Persian Treatise on Falconry*, trans. Douglas C. Phillott (London: B. Quaritch, 1908).

[4] 1英里 $\approx$ 1.61公里。——译者注

[5] “咆哮的20年代”是指1920年至1930年的十年。在这十年间，西方世界经济持续繁荣，文化广为传播。——译者注

[6] 霍华德·休斯，美国著名商业大亨、飞行家、电影制片人。——译者注

第2章

1903年

德国，德累斯顿市

可以想象，精神方面偏执、有重度妄想症的人所提供的个人记述，会被专家细致地剖析、解读，但一般人读来肯定是很费劲的。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他的父亲莫里茨·施瑞伯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育儿专家，经常拿自己的孩子作为自己的第一批实验对象。孩提时期的保罗和他的哥哥曾经历过冷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使用过“施瑞伯直支架”——一种用木头和绷带做的装置，用来矫正孩子的坐姿。尽管有这样的童年，长大后的施瑞伯仍然很有出息，先是当了律师，然后又做了法官。他顺利地娶妻生子，除了40多岁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抑郁外，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很完美。可就在51岁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垮了。1894年，施瑞伯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错乱”，接下来的9年都在德累斯顿附近的索嫩斯坦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里是德国第一家为精神病患者建立的公立医院。

在精神病院度过的那些岁月构成了《我的精神病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一书的写作背景。[\[1\]](#)这本著作

首次写到了当时被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神秘疾病，这种病在几年后被重新命名为“精神分裂症”。《我的精神病回忆录》出版于1903年，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成为有关精神分裂症讨论的重要参考资料。加尔文家的6个男孩生病时，现代精神病学对他们的诊断和治疗都受到了施瑞伯病例相关理论的影响。施瑞伯本人倒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真实经历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他写回忆录主要是为了请求出院，从书中多处可以看出，他似乎是在向同一位读者倾诉，这位读者就是要求他住院的医生保罗·埃米尔·弗莱西格（Paul Emil Flechsig）。书的开头是一封写给弗莱西格医生的公开信，施瑞伯在信中为可能冒犯到弗莱西格表达了歉意。施瑞伯只想搞清楚一件小事：过去的9年中，弗莱西格是不是一直在往他的脑子里传输秘密信息？

施瑞伯用200多页文字描述了他遭遇到的各种古怪经历，其中第一个就是与主治医生之间的宇宙心灵感应——“即使遥遥相隔，你还是对我的神经系统施加了影响”。这部分可能已经算是逻辑最清晰的部分了。用一种或许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方式，施瑞伯充满激情地写到自己看到天空中有两个太阳，其中一个无论他去哪里都跟着他。他使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文字，花了很多页解释某种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隐秘的“神经语言”。他写到，很多人的灵魂使用这种神经语言向他传递重要的信息：金星上“发洪水”了，太阳系“失联”了，仙后座的星体要“整合成一个独立的恒星”了。

在这方面，施瑞伯和加尔文家的长子唐纳德有很多共同之处。多年后，隐谷路家中的唐纳德常常会在7岁的玛丽面前诵读《神父圣职》。施瑞伯和唐纳德一样，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只是身体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施瑞伯、唐纳德，以及加尔文家的其他男孩都没有用好奇而客观的态度隔开一段距离来审

视自己的妄想，而是置身其中，时而兴奋，时而震惊，时而恐惧，时而绝望，这些情绪有时也会同期而至。

施瑞伯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便竭力拉上别人一起来体验。他可以一会儿狂喜不止，转瞬间又变得极为脆弱。在回忆录中，施瑞伯指责他的医生弗莱西格利用神经语言对自己实施“灵魂谋杀”。（施瑞伯解释说，灵魂非常脆弱，好比“棉絮或蛛网”，是“一个大球或一大包什么东西”。）接着出现了“强奸”事件。“我因为生病，”施瑞伯写道，“而与上帝发生了特殊的关系。”他说这种关系最初有点像圣灵感孕，“我长了女性生殖器，不过没发育好，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人类生命最初的胎动……也就是说，受精成功了”。施瑞伯说，他的性别转变了，他怀孕了。虽然获得了上帝的恩典，但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侵犯。上帝“就算不是教唆者”，也是弗莱西格医生的共犯，他们合谋把他“变成了淫妇”。很多时候，施瑞伯的世界满是紧张和恐怖。

施瑞伯有一个宏伟的理想。他回忆说：“我的目标，仅仅是要增进宗教这个重要领域对真理的掌握。”结果并非如此。施瑞伯写的书倒是对争议渐长的新兴的精神病学更有价值。

起初，在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之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疾病，病人需要被关押、流放，或者进行驱邪。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灵魂不同于肉体，是人的本质，既可以与上帝对话，也可能着魔。《圣经》中描绘的第一个疯人是扫罗王，上帝的圣灵离弃他后，他受到恶灵的控制，发了疯。^[2]在中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能听到撒旦邪恶的话语，在贞德死后，这种声音又被描述成来自一位先知。^[3]可见在那时，对精神失常的定义也是游移不定的。

对于细心研究的人来说，不难发现精神失常频发于家族内部。最常见的是王室成员。15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起先表现得非常偏执，后来变得沉默寡言，最后得了妄想症。他的疾病导致了玫瑰战争，成为权力之争的托词。亨利六世的精神病并非毫无渊源，他的外公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查理的母亲波旁的让娜，以及查理的舅舅、外公和曾外公也是同样的情况。直到施瑞伯的年代，科学家和医生才开始从生物学层面考量精神失常。189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使用“早发性痴呆”来表明这种疾病发病较早，不同于老年性痴呆。^[4]克雷佩林认为早发性痴呆是某种“毒素”引起的，或者与脑部出现的“某种未知损伤相关”。^[5]12年后，瑞士精神病学家厄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创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来描述“早发性痴呆”的大部分相同症状。^[6]布洛伊勒也怀疑这种疾病具有生理方面的致病因素。

布洛伊勒之所以选择这个新词，是因为它的拉丁语词根“schizo”隐含有精神官能急剧分裂的意思。这个名字引发了不少麻烦。从那之后，大量流行文化，从电影《惊魂记》到《心魔劫》，再到《三面夏娃》，都将精神分裂症与人格分裂的概念混为一谈。两者其实相去甚远。布洛伊勒想要描述的是病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世界之间的撕裂——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精神分裂症不等于多重人格，而是在自身与意识之间筑起一面高墙，两者开始只是存在些许间隔，之后则完全断离，病人不再能出入一般人理解的现实世界。

无论精神病学家如何看待这种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它的确切本质仍然极难把握。起初，似乎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可以遗传，但在一些独立发病的个人病例上——包括施瑞伯的情况——这就解释不通了。这一关键问题让好几代理论家、治疗专家、生

物学家，以及后来的遗传学家绞尽了脑汁。要是搞不清楚它源自何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呢？

施瑞伯的回忆录出版8年后，1911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终于破解了其中的谜团。施瑞伯书中的内容令弗洛伊德兴奋不已。[\[7\]](#)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理论家，被推崇为心智运作机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前他对施瑞伯这样的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兴趣。在作为精神科执业医师时，弗洛伊德曾见过这样的病人，但他从未认为他们值得躺到精神分析专家的沙发上。[\[8\]](#)他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意味着无药可治——病人太过自恋，无法投入到与精神分析医师的有效互动，或“移情”中。

但弗洛伊德的门生、瑞士治疗专家卡尔·荣格寄给他这本书，并恳求他阅读。这本回忆录最终改变了弗洛伊德的观念。通过阅读，弗洛伊德不必离开自己的扶手椅，就能近距离了解到一个精神病患者脑中的所有想法。这本书证实了弗洛伊德之前对潜意识机制的理解。弗洛伊德写信对荣格表达感谢，称这本回忆录是“某种天启”。[\[9\]](#)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施瑞伯本人“具有当精神病学教授和精神病院院长的潜质”。[\[10\]](#)

191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关于一例妄想症（妄想痴呆）患者自述的精神分析笔记》一书。[\[11\]](#)（同年，施瑞伯在他母亲去世后再次入住精神病院，之后也不幸离世。）基于施瑞伯的回忆录，弗洛伊德这时确信精神妄想近乎白日梦[\[12\]](#)——病因同常见的神经官能症一样，也可以用分析神经衰弱的方法来解释。弗洛伊德写道，他发现的那些出现在梦中的象征意象和隐喻（这些发现让他名声大噪），[\[13\]](#)全都清楚明白地出现在了施瑞伯的回忆录中。弗洛伊德认为，施瑞伯的性别转变和圣灵感孕是出于对

阉割的恐惧。[14]他总结说，施瑞伯对治疗自己的精神病医生弗莱西格的依恋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别忘了，施瑞伯的父亲就是一位医生，”[15]弗洛伊德写道，文字中满含着胜利的骄傲感，“他（施瑞伯）身上出现的荒唐行为就像是对他父亲医术的一种讽刺。”

荣格却对弗洛伊德的话感到非常困惑。1911年3月，荣格在瑞士伯戈尔茨利的家中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手稿，并立刻给他的导师写信，说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书“十分有趣”“写得很好”，[16]但自己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17]两人观点分歧的核心是妄想型精神病的本质：精神分裂症是与生俱来的脑部疾病，还是在生活中遭受的损伤？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学家不同，他确信这种疾病完全是“心因性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产物，并认为这很可能与患者在童年成长期的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性方面的经历）有关。荣格坚持的观点则更为保守，他认为精神分裂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器质性、生理性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师生两人就这个问题断断续续争论了很多年。[18]对于荣格来说，这件事是最后一根稻草。他告诉弗洛伊德，不是所有问题都与性有关——人患精神病有时也会因为其他原因，可能是生来就有的毛病。“我认为，力比多[19]这个概念……需要增加遗传因素方面的解释。”荣格写道。[20]

荣格在几封信中一再表达相同的论点。[21]弗洛伊德对此却无动于衷，这让荣格非常愤怒。1912年，荣格怒不可遏，对弗洛伊德展开了人身攻击。“你把学生当病人般对待的方式愚蠢至极，”荣格写道，“你调教出来的要么是唯命是从的儿子，要么是目中无人的狗崽……而你则扮演着高高在上的父亲。”[22]

同年晚些时候，在纽约市福特汉姆大学的一群观众面前，荣格公开表示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并特别针对施瑞伯的病例，猛烈抨击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荣格表示，精神分裂症“不能仅仅用缺乏性欲来解释”。[23]

荣格知道弗洛伊德会把他的话当作异端邪说。“他错得很离谱，”荣格后来反思说，“因为他根本没有摸清精神分裂症的实质。”[24]弗洛伊德和荣格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对精神失常本质的认识不同。两位早期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伟大友谊结束了，而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起因和实质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一个世纪后，据估计，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全世界约1%的人口[25]——全世界8 200万人，包括300多万美国人。按某一种标准算，美国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占据了全美所有精神病医院床位的三分之一。[26]按另一种标准算，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中，每年约有40%的人完全没有得到治疗。[27]每20例病患中就有1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28]

如今学术界有数百篇关于施瑞伯病例的论文，其观点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都大相径庭，每一篇都围绕着施瑞伯和这种痛苦的疾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之父”雅克·拉康认为，施瑞伯的问题来源于他无法成为自己母亲渴望的阴茎而引发的沮丧心理。[29]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和反文化偶像米歇尔·福柯将施瑞伯看作殉道者，认为他是社会力量企图摧毁个人精神的牺牲品。[30]直到今天，施瑞伯的回忆录仍然是绝佳的解读对象，施瑞伯本人也因为无法自我辩解成了理想的精神病人。同时，施瑞伯病例引出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问题——先天还是后天？——也成为理解这种疾病的必要

一环。

加尔文一家生来便注定会陷入这样的争论。加尔文家的男孩们成年时，这个领域正在像细胞分裂那样不断扩张，有人说这是生化问题，有人说是神经问题，有人说是遗传问题，还有人说是环境、病毒或者细菌问题，仅过去了一个世纪，就冒出了数百种理论。“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有非常多的理论解释。”^[31]多伦多的精神病学史家爱德华·肖特曾说。一直以来，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真相，无论是发病的原因还是缓解的方法，都尚未被揭示，仍然被囚禁于病人自身的世界里。

试图从生物学层面理解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学专家都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或者实验，以彻底解答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如果出现一个家庭，家庭成员中有很多像施瑞伯这样的病人，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谱系，情况会怎样呢？有稳定的样本和足够的发病量，在这个家庭中的某些人，甚至所有人身上，会不会找到显而易见的特征？

比如像多恩和咪咪·加尔文拥有12个孩子这样的家庭？

[1]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2] Freedman, *The Madness Within Us*, 5.

[3] Freedman, *The Madness Within Us*, 5.

[4] Arieti, *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10.

[5] McAuley, *The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35, 27.

[6] Gottesman and Wofgram, *Schizophrenia Genesis*, 14—15; DeLisi, *101 Questions & Answers About Schizophrenia: Painful Minds*, xxiii.

[7] Bair, *Jung: A Biography*, 149.

[8] Thomas H. McGlashan, “Psychosis as a Disorder of Reduced Cathetic Capacity: Freud’s Analysis of the Schreber Case Revisited,”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5, no. 3(May 1, 2009): 476—81.

[9] *The Freud/Jung Letters*, 214F (October 1, 1910).

[10] *The Freud/Jung Letters*,187F (April 22, 1910).

[11] Reprinted in Freud,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 12.

[12] Lothane, *In Defense of Schreber*, 340, cited in Smith, *Muses, Madmen, and Prophets*,198.

[13] *The Freud/Jung Letters*, 214F (October 1, 1910).

[14] *The Freud/Jung Letters*,218F (October 31, 1910).

[15] *The Freud/Jung Letters*,218F (October 31, 1910).

[16] *The Freud/Jung Letters*,243J (March 19, 1911), cited by Karen Bryce Funt, “From Memoir to Case History: Schreber, Freud and Jung,”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0, no. 4 (1987): 97—115.

[17] Karen Funt, “From Memoir to Case History”; Zvi Lothane, “The Schism Between Freud and Jung over Schreber: Its Implications for Method and Doctrine,”*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6, no. 2 (1997): 103—15.

[18] *The Freud/Jung Letters*, 83J (April 18, 1908) and 11F (January 1, 1907).

[19]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力比多”指的是性欲。——译者注

[20] *The Freud/Jung Letters*,282J (November 14, 1911).

[21] *The Freud/Jung Letters*,287J (December 11, 1911).

[22] *The Freud/Jung Letters*,338J (December 18, 1912).

[23] Jung, *Jung Contra Freud*, 39—40.

[24] Bair, *Jung: A Biography*, 149.

[25] 大多数相关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1%左右。

最近一项研究见：Jonna Perälä, Jaana Suvisaari, Samuli I. Saarni, Kimmo Kuoppasalmi, Erkki Isometsä, Sami Pirkola, Timo Partonen,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of Psychotic and Bipolar I Disorders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4, no. 1 (January 2007): 19—28.

对这一数字更为细致的分析来自Michael J. Owen, Akira Sawa, and Preben B.Mortensen, “Schizophrenia,” *Lancet* (London, England) 388, no. 10039 (July

2,2016): 86—97: “全世界都有人患精神分裂症，几十年来学界普遍认为该病的终生患病风险在时间、地域和性别上没有差别，约为1%。这一观点意味着要么环境因素不太会增大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要么所有被研究人群的相关暴露是相同的。2008年，一系列荟萃分析的研究结果完全推翻了这种相同风险的观点（McGrath and colleagues, *Epidemiologic Reviews* 30 (2008): 67—76）。论文作者给出的患病率为每年每100 000人中大约有15名男性和10名女性患病，时点患病率为0.46%，终生患病率为0.7%。这些估计数字是按照比较保守的诊断标准得出的，如果按更宽泛的标准——包括其他精神障碍，如妄想性精神障碍、短时精神障碍以及其他未明确分类的精神病——那么患病率会翻2到3倍。”

[26] “U.S. Health Official Puts Schizophrenia Costs at \$65 Billion.” Comments by Richard Wyatt, M.D., chief of neuropsychiatry,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at a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the Schizophrenia homepage (<http://www.schizophrenia.com/news/costs1.html>), May 9, 1996.

[27] NIMH statistic, cited in McFarling, Usha Lee, “A Journey Through Schizophrenia from Researcher to Patient and Back,” *STAT*, June 14, 2016.

[28] Kayhee Hor and Mark Taylor, “Suicide and Schizophreni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tes and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 (Oxford, England) 24, no. 4, supplement (November 2010): 81—90.

[29] Jacques Lacan, “On a Question Preliminary to Any Possible Treatment of Psychosis,”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7), 200—201, cited by Martin Wallen, “Body Linguistics in Schreber’s ‘Memoirs’ and De Quincey’s ‘Confessions,’” *Mosaic: A Journal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Literature* 24, no. 2 (1991): 93—108.

[30]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4; Noam Chomsky and Michel Foucault, *The Chomsky-Foucault Debate*, 33.

[31] Author’s interview with Edward Shorter.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3章

刚结婚那几年，咪咪爱开玩笑说，她丈夫每次回家待到让她怀孕就又要出门。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唐纳德·肯尼恩·加尔文，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几天后接受了洗礼。唐纳德的出世没有给咪咪造成一点痛苦，也是咪咪12次分娩中唯一接受麻醉的一次。婴儿和母亲住的小公寓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森林山，靠近著名的森林山网球俱乐部，周围非常宁静。整整6个月，咪咪都和小唐纳德单独待在一起，听着来自南太平洋的新闻报道，挂念着孩子的父亲何时能回家。

圣诞节刚过，多恩就回到纽约同家人团聚了，并执行一项为期几个月的短期任务，在新泽西州的卡尼镇担任一家造船厂的安全专员。随后他在华盛顿待了3个月，在乔治敦大学完成他的本科学业。之后，1947年夏天，就在咪咪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吉姆几周后，多恩去了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海军总政学院，这次他把咪咪和两个孩子带在了身边。一年后，他又被调派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首先在美国海军的“亚当斯号”驱逐舰上服役，之后又被调派到“朱诺号”巡洋舰上，往返于纽约与巴拿马、特立

尼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之间，其间咪咪和孩子们独自留在家里，一待就是几周。

战后，咪咪一直对他们的生活怀有完全不同的憧憬。她希望丈夫能像她两个叔叔和爷爷托马斯·林赛·布莱尼那样，去法学院上学。咪咪很崇拜爷爷，尽管她爸爸已经不跟她们一家往来了。咪咪想住在纽约，那里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可以和叔叔婶婶待在一起，同表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咪咪自己被剥夺了这样的童年，因为她小时候被迫离开了得克萨斯。

多恩也有此意，至少表现得如此。但他也有梦想。他用魅惑的声音做梦般地解释说，海军对他来说只是跳板——他想让海军资助他上法学院，最好还能资助他真正爱好的政治学。不过多恩在这方面失算了。虽然指挥官给他的评价和推荐都是出自真心的溢美之词，但他每次申请研究生课程时都遭到了拒绝。似乎总有某个后台强大的人，国会议员的儿子或参议员的侄子什么的，把机会夺走了。

多恩出海时，咪咪在诺福克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海军发的钱很少，一周约35美元，有时在邮寄过程中还会丢失，她常常依靠邻居的帮助才能负担日用品和食品的费用。多恩在港口执行任务时，情况则不同。他是一名海军上尉，年轻英俊，拥有乔治敦大学的学位，掌握多门语言，深谙国际关系，给人印象非常好。在“朱诺号”上，他不仅是随舰秘书，也是一位屡战屡胜的国际象棋大师。工作之外，多恩经常陪舰长打网球。他和咪咪同诺福克的武装部队参谋学院的要员关系不错，并且因为会调“铁幕”鸡尾酒知名，这是一种用伏特加和野格酒调制的烈酒，价格还很便宜。多恩处事圆滑，又带有一股学术气质，颇得很多海军将官的好感——至少给一位碰巧搭乘“朱诺号”去巴拿马的将军夫人印象不错。

战舰上虽没有多少隐私可言，倒也暂时相安无事。一旦回到岸上，秘密就不那么好保守了。那位军官夫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一位朋友恰巧认识多恩·加尔文的太太。咪咪听说了“朱诺号”上的风流韵事，感到自己海军上尉夫人身份仅有的一点风光也很快磨灭了。咪咪本来就非常依赖多恩，现在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她非常清楚，相比多恩对她的依恋，她需要多恩的地方更多。

多恩想申请一项法律课程，作为交换，他需要再为海军效力6年，但申请遭到了拒绝。他要求调到巴拿马、古巴或者大西洋防区——只要有海军法律课程的地方都行，也没有被获准。

咪咪再次怀孕了，孕吐仍然非常厉害。1949年末，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约翰在诺福克降生。这次多恩不在他们身边，他在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尔市接受为期4个月的军官集训。咪咪和儿子们留在诺福克，多恩则总在外工作，被调遣来调遣去。这时，多恩接到消息说，“朱诺号”要把母港迁到西海岸的普吉湾，那里离即将爆发战争的朝鲜半岛更近。

咪咪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多恩必须离开海军。1950年1月23日，多恩在递交的辞呈中把辞职理由归结于自己的家庭问题。“缺乏良好的家庭生活让我必须辞去工作，”多恩写道，“留在海军将会剥夺我的妻子和3个儿子正常的家庭生活。”多恩也对他的申请多次遭到拒绝感到恼火——海军军方一直都在忽视他的潜力。他也不在意法学院了。他写道：“只有主动愿意，或者有人帮助树立信心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做一件事。我在海军没有感受到什么动力。”

咪咪如释重负。她在偏僻陌生小镇的漫长流放终于要结束

了。他们计划回到纽约，多恩在布朗克斯区的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夫妻俩将重新过上咪咪一直想要的生活。他们要在莱维顿镇买一栋房子，那里是长岛的新飞地，造有大量价格低廉的房子，驾车去城里也方便。他们看中了一座适合小唐纳德、吉姆和约翰的大房子，再生几个孩子也都住得下。

咪咪不知道的是，多恩也咨询了自己的哥哥克拉克，克拉克最近成了美国空军的一名军官。跟海军不同，空军发展得还不成熟，仍有些新鲜感。飞行员那时还没有蓝色制服，仍跟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样，穿着战时遗留的“粉粉绿绿”的卡其布军装。空军当时急缺人——多恩听说，如果他去了，可以立马当上军官。

1950年11月27日，在离开海军10个月后，多恩加入了空军，成了一名空军中尉。咪咪难以相信多恩就这么轻易地违背了之前美好生活的诺言：美国正在把部队运往朝鲜半岛，难道他又想回去？为什么他总是与她步调不一致，总是将他们的生活置之度外，总是不替她考虑呢？

多恩对咪咪进行了一番苦心劝说。克拉克有天带他去参观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那里是美国空军总部所在地。多恩问克拉克，他去布朗克斯区学法律或是去长岛接受训练，对于咪咪来说真的有什么不同吗？他们都还在莱维顿呀。何况，多恩还有梦想呢。美国正在引领全世界筑建未来。刚刚打败了法西斯的美国航空部队的战机会在他和咪咪的屋前屋后飞来飞去。难道他只能在写字楼里把文件一塞，每天晚上赶5：07的火车回家吗？为什么他不去当一位专家，有朝一日分析国际事务，连总统也要听他的意见呢？

咪咪和多恩在一栋房子上付了不菲的定金。快要入住时，空军突然宣布，新的总部要迁到科罗拉多州中部地区。这次多恩也

跟咪咪一样吃惊。转移总部的计划早就在华盛顿秘密商议过了，只是之前没人知道。

震惊之余，他们拿回了房子的定金。1951年1月24日，多恩到科罗拉多泉市的恩特空军基地报到。情人节那天咪咪带着孩子也一起搬了过来。

咪咪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是石头——连绵不绝、深深浅浅的红色岩石分布在冰川碾平的广阔草原上，平地表面堆叠着大片岩层，如同舞台布景，令人望而生畏。这里有曼尼托泉疗养院，据说这儿的矿泉水具有神奇的疗愈功能。这片山区19世纪出现过淘金热，在科罗拉多州的地图上有了一席之地。咪咪被美景环绕，却无心欣赏。

他们来到这里时，小镇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咪咪和孩子们到达时，正逢一场旱灾。水的供应甚至已经到了配给的地步。以前，咪咪的妈妈在纽约的房子周围种着绿草繁花，可现在，目之所及，一片褐黄。这里没有芭蕾舞演出、没有艺术、没有文化——跟咪咪童年时梦想的生活一点不沾边。多恩本以为自己找的房子在科罗拉多泉市的闹市区，结果那里只是一条寂静的街道，叫作尘洞街。房子跟之前他们在莱维顿选的那座完全不同，这是一幢由谷仓改建的老屋，楼梯的木板弯曲变形，让人丧气。

咪咪闷闷不乐，哭了好几天。她说，房子像垃圾场，镇子也在偏远的乡下。他怎么把她拐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

但多恩毕竟是她丈夫。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他们还打算多生几个——多恩是天主教徒——无论在哪里生活，她要干的活儿不会少。咪咪决定过得开心点。这里的鸟倒是很有意思，有灯草雀、灰头领雀和北美白眉山雀。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棉白杨

树，咪咪仔细观察了这里的褐色土壤，发现还是有野花生长的。她决定开辟一座花园。

尘洞街的新邻居以为咪咪是那种研究大部头的读书人，猜测她知晓大不列颠每一个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可以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如数家珍。他们很快从咪咪那里听到肯尼恩外公、潘丘·比利亚、霍华德·休斯和她自己在纽约的闲闻逸事。虽然丈夫收入不高，但咪咪也拐弯抹角地暗示这份工作不寻常。咪咪从小跟母亲学会了鉴赏上等布料，要是在二手商店淘到一件羊绒衫，她也会炫耀半天。她加入了当地的唱诗班，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歌剧团。歌剧团刚开始不愿意演出她最爱的莫扎特的歌剧，她暗自嘲笑莫扎特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不过后来她如愿以偿，按照传统标准为《游吟诗人》和《蝴蝶夫人》挑选了演员。

很快，咪咪喜欢上了周围的美景。曾经陌生的植被和地理环境，如今就像纽约中央公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玻璃后的景象，真实地跃然眼前。她还跟多恩一起发现了驯鹰的乐趣。训练这种野生鸟类，就像建立新家园一样，需要大量的智慧去驾驭野蛮和未知。

咪咪和多恩发现，驯鹰不仅仅是布陷阱，还需要不断投入精力，保持控制力，直到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的情结，不再希望展翅翱翔，而是更喜欢黏着主人，接受饲养。他们先戴着防护手套，让那只瞎眼的隼在手上站了两周，之后在隼身上系了一根100英尺并且轻如钓丝的细绳进行训练。他们鼓励隼飞得越远越好，然后从皮袋里取出肉抛到空中，让隼学会俯冲接食。他们俩非常乐意观看隼俯冲的过程，那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0英里。

驯化野生鹰隼的方法环环相扣。咪咪和多恩发现，遵照驯鹰方法，会收获一只规矩、听话、得体的鸟。咪咪在家里也孜孜不

倦地训练隼，有时候在驯鹰方面花的钱比花在孩子们身上的还要多。车库的架子上都是鹰隼用的皮革头套，车库最终成了鹰舍。有邻居去卫生局举报了他们，幸好多恩平时把鹰舍打扫得很干净，没有引起麻烦。咪咪买了一套廉价的水彩画工具，画起了鹰隼。他们俩把自己的新爱好教给儿子。长子唐纳德到上小学的年纪时便开始自己逮鸟，抓到了他的第一只鸟——一只雌雀鹰。奥斯汀崖海拔6 600英尺，过去有家肺结核疗养院，将来那里会建起一座大学。在周围观鸟时，他们发现树洞里有一只雀鹰。因为它的叫声很像“叽—哩—”，咪咪给它取名“叽哩—叽哩”（Killy-Killy）。这只雀鹰完全由唐纳德来训练。有一次，它抓到了一只蚱蜢，飞到门上，准备把蚱蜢当冰激凌甜筒一点点啄掉。唐纳德站在下面，耐心地呼唤：“叽哩过来！叽哩过来！”在屋子里时，唐纳德会让叽哩自由活动，叽哩撅起尾巴拉屎，他们也都不去管它。

两个大孩子，唐纳德和吉姆，开始上学了。老三约翰还在蹒跚学步，老四布莱恩和老五迈克尔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降生。这些孩子小时候吃的是母乳，但咪咪认识的大部分妈妈都不太愿意母乳喂养。刚开始，咪咪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扛下所有事，感觉非常好——用不着奶妈和保姆。咪咪想，自己才是教导孩子的最佳人选，哪里还需要其他人？孩子们大一点，她还能教他们唱歌剧、画画、观察有趣的鸟和奇怪的昆虫、辨认野外的蘑菇。科罗拉多泉市有几个孩子认识带红色斑点的鹅膏菌？

孩子一个接一个得了腮腺炎、麻疹和水痘。每生一个孩子，就会多一个人去博取咪咪的关注，消耗她的时间。但即使在生了5个儿子后，多恩和咪咪也没有想过不再生了。两家的亲戚总不停问：生这么多孩子干什么？毕竟，咪咪追求的精致生活——文化、艺术、社会地位——和填饱这么多张嘴，是很难兼得的。不

过咪咪觉得如果得不到前者，得到后者也甘心。生很多孩子，和做一个游刃有余的母亲，是两码事。

咪咪渴望拥有一个大家庭，不全是因为什么雄心壮志，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孩子能满足她过去不曾预期的需求。从小，咪咪就学会掩盖人生中的痛苦与失意：失去父亲；被迫离开休斯敦；丈夫长期不在身边。即便她不承认，这些伤痛也已悄然生根发芽。然而，生育这么多孩子让咪咪焕然一新了——至少咪咪不再惦记过去，人生的主题变了，缺失被填补了。以前，她总觉得自己遭到抛弃了，而现在 she 可以亲自创造出能陪伴自己的人。

多恩的母亲玛丽·加尔文则在皇后区的家中愤愤不平，刻薄地表示生这么多孩子都是咪咪的精心安排——现在咪咪操控着多恩的人生，是家中的一把手，让家里的非天主教徒多过了天主教徒，而她能通过不断怀孕简单地赢得地位之争。

咪咪对此不置可否。她只说，孩子们让多恩感到幸福。

多恩不像一个军人，倒更像一个学者。咪咪对他感到又爱又气。他既想拥有满屋的孩子，又想拥有清净有序的精神生活。无论咪咪把家里收拾得多么井井有条，他总能找到理由不回家。

作为恩特空军基地的情报官员，多恩深知冷战军事工作的机密性。“如非必要，不要多说一个字”，他常常这么说，那一套顾左右而言他的辞令显得好像大家心照不宣似的。咪咪也确实不知道多少事，多恩对咪咪掏的心窝子顶多是跟他交接的将军看上去不是很聪明。多恩虽然工作做得不赖，但在空军基地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丹佛建立夏季白宫时，是多恩为总统撰写的情报汇总，但这种级别的军事工作也

没让多恩觉得有意思，这使他更决意去读个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鹰最初是多恩和咪咪两个人一起驯的，但后来情况变了。多恩把更多时间扑在了外面，跟当地的驯鹰人一起诱鸟，咪咪则在家无休无止地照顾孩子。关系的疏离或许不算新鲜，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相处可能就是这种模式。从两人认识的第一天起，多恩的生活就有那么点不接地气，而咪咪会耐心地等他，做事脚踏实地。多恩跟他的鸟儿相处得很好，它们在哪儿飞，什么时候回来，都由他做主。咪咪发现多恩就像一只鹰，而自己很不情愿地也成了驯鹰人：要驯服多恩，劝他回家，并且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已经完全驯服他了。

咪咪找了些事打发时间，特意让自己和多恩走得更近些。她以前向多恩的家人许诺过，于是花了几年时间改信天主教。和丈夫信奉同样的宗教让一家人更像一家人，这又攻克了一座大山，所以即使改宗她也乐意。咪咪和导师罗伯特·弗洛登斯坦神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弗洛登斯坦是当地的牧师，在鸡尾酒会上给咪咪传授了耶稣变容、贞女生子等概念。他是咪咪欣赏的那种牧师：他管自己叫弗莱迪，家里有点钱，也不怕展现家世，驾驶起自己的敞篷车速度飞快，停车时惊得房子周围鸟雀四散。弗莱迪会给孩子们变戏法、讲故事。他会跟咪咪和多恩聊书籍、艺术和音乐，让他们感到在异乡没有那么格格不入。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来丹佛时，他带咪咪和多恩一起去看了演出。弗莱迪很快变得像他们家的家庭成员一样，只要他想摆脱圣玛丽教区的上司，他就可以随时上加尔文家来。“噢，基普先生又对我发火了，”他会说，“我能跟你们一起吃早餐吗？”咪咪从不拒绝。

对于这段友谊，咪咪的母亲表达了合理的怀疑。在开着自己的斯蒂庞克来西部并住上一段时间后，比莉开始对咪咪管理家庭的方方面面评头论足。而弗莱迪是她最常提起的话题。比莉会

说，嫁给一个天主教徒也就算了，干吗还老让一个牧师在家里晃来晃去？但在咪咪看来，弗莱迪的到来是她改信天主教最令人开心的惊喜了。她觉得离多恩更近了，自己可以引领起全家的精神生活，在改宗这种孤独的新体验中，她甚至感到一丝亲切和乐趣。

比莉感到受不了，因此回去了。母亲的判断现在对咪咪的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咪咪生的孩子比她妈多，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随着孩子越生越多，咪咪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不再是多年前那个怨妇。加尔文一家未来还会多次搬家：1954至1955年间，空军基地迁到了魁北克，之后他们在加州北部的汉密尔顿空军基地住了3年。1958年，他们带着8个儿子回到科罗拉多泉市。1954年生了理查德，1956年生了乔，1957年生了马克。

在家时，多恩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他平日沉默寡言，只有每天天亮的时候会喊：起床！起床！手举起来，出列，排好队！把地板楼梯前前后后都扫干净，6点准时到餐厅吃饭！其他时候，都是咪咪打理一切——她不会轻声细语，而是疾言厉色，不容懈怠。她像个雄赳赳的战士一样迎接着每个庸常的清晨、中午和夜晚。

所有的孩子都要穿运动服和乐福鞋，都要系着领带去参加主日弥撒。

军队和教堂给他们准备了两套规矩：美国式的规矩和上帝的规矩。

咪咪把控着孩子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她认为不能有一丝马虎。她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格言：“人之美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早晨，每个孩子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铺桌子、准备午饭、烤吐司、清扫灰尘、擦厨房的地板、清理桌子、洗晾衣服。每周的任务都会调整。孩子们还要去上速读课。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出去观鸟或采蘑菇。客厅里没有《读者文摘》或《家庭妇女》杂志，只有《史密森尼》和《国家地理》杂志。邻居家的孩子来加尔文家画画时，也知道不会听到表扬，只会听到自己做错的地方被分析得清清楚楚。“她想让每个人都做到完美。”加尔文家的一位老朋友回忆说。

咪咪当时不知道，她这样的脾气最后会害了自己。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学已经开始研究像她这样的母亲了。美国精神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样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第4章

1948年

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

栗居精神病院成立于1910年，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乡下，是一栋朴素的四层砖房。这里曾经是旅馆，四周绿树环绕。在最初的25年里，有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主要是休养和作业疗法。医院的创始人住楼下，病人住楼上。人们对这里评价不高，不过情况在1935年发生了改变，医院新来了一位治疗专家，名叫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1]

弗洛姆-赖克曼是犹太难民，刚从战争阴云笼罩的德国逃到美国。她虽然身形矮小，但做事雷厉风行，才过40岁的她在战前就已是一位自信的精神治疗医生了。不可否认，她带来的理念非常新颖。同栗居精神病院的老古董们不同，弗洛姆-赖克曼属于新一派的分析师，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想要在病人身上做大胆的尝试。没多久，弗洛姆-赖克曼创造的奇迹就流传开了。

有一次，赖克曼试图跟一个年轻人交谈，却遭到他的攻击。[2]她每天晚上都守在他门口为他祈福，守了3个月，终于被他请进了屋里。

有个男病人在接受她的治疗期间，好多个星期都一言不发。[\[3\]](#)但有一天，他在赖克曼要落座的地方铺了张报纸。他对赖克曼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想让她把裙子弄脏。

有一个女病人曾一边向她扔石头一边叫喊：“上帝诅咒你的灵魂下地狱！”[\[4\]](#)几个月后，弗洛姆-赖克曼对那个女病人说，她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这样对她自己没什么好处。“干吗不消停消停？”女病人便消停下来了。

这样的医生完美得难以置信？或许是吧。在弗洛姆-赖克曼看来，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愈的，她认为持相反观点的人只是对病人不够关心。[\[5\]](#)加尔文一家没见过她。但她改变了当时美国所有对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看法，这可以说既是进步，也是灾难。

弗洛姆-赖克曼来美国时，精神病学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流方法并没有效果，也很不人道。精神病院里满是受试对象，他们被迫服用可卡因、含锰药物和蓖麻油，被迫注射动物血液和松节油，被迫吸入二氧化碳或高浓度的氧气（这是所谓的“气体疗法”[\[6\]](#)）。20世纪30年代，治疗方法是胰岛素休克疗法：病人被注射胰岛素，从而进入短暂的昏迷状态。[\[7\]](#)这种方法的理论认为，只要每天进行一次，精神病症状就可能慢慢减弱。后来有了额叶切除术，将病人的额叶神经切断——英国精神病学家W. F.麦考利（W. F. McAuley）曾措辞微妙地称，额叶切除术“能消除病人某些使他们无法适应环境的特质”。[\[8\]](#)

研究精神分裂症生物学病因的医生在治疗方面同样毫无进展。德国的埃米尔·克雷佩林是研究早发性痴呆的先驱，他建立了一所机构，研究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关联，也没有结果。[\[9\]](#)他

的研究所有一位名叫恩斯特·鲁丁（Ernst Rüdin）的研究人员是优生学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首批叫嚷着要给精神病患者绝育的人之一。^[10]在鲁丁的学生中，有个叫弗朗茨·约瑟夫·卡尔曼（Franz Josef Kallmann）的人更为极端。他战后在美国宣扬优生学，呼吁找到精神分裂症基因后，也对这种基因的“未感染携带者”实施绝育。^[11]生物精神病学界的领军人物似乎认定精神病患者已经不是人了。^[12]

社会上各种理论异军突起，像弗洛姆-赖克曼这样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精神分析师完全拒绝承认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病因，倒也并不奇怪。为什么要将精神病学变成把人当马来繁育的学科？弗洛姆-赖克曼认为，病人的内心深处企盼被治愈——他们等待着帮助，就像受伤的鸟儿或脆弱的孩童渴望理解一样。“每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都隐约有一种非现实感和孤独感。”她写道。^[13]治疗专家的工作——在这个领域领跑的美国精神分析师们很快就承担起的崇高事业^[14]——是攻破病人筑起的壁垒，把他们从那个虚妄的世界中拯救出来。

1948年，栗居精神病院接收了一位名叫乔安妮·葛林柏（Joanne Greenberg）的少女，^[15]她将给弗洛姆-赖克曼带来不朽的名声。葛林柏196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是《我从未许诺你玫瑰花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她之后称其为一本虚构的回忆录。书写了一个名叫黛博拉·布鲁（Deborah Blau）的少女，受困于一个叫作Yr的虚幻国度。黛博拉认为自己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就像半个世纪前的丹尼尔·保罗·施瑞伯那样。“还有其他的力量想要操纵她。”葛林柏写道。^[16]黛博拉似乎被永远地挡在了真实世界之外，直到她的治疗师弗里德医生突破重围拯救了她。很容易看出来，医生是弗洛姆-赖克曼的化身，而他的名字无疑是在影射弗洛伊德。弗里德医生

理解小黛博拉身边的恶魔是什么，知道它们的根源和存在的原因。“病人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自身难以自控的力量！”小说中的弗里德医生思索道，“他们不知何故，不认为自己也是人，脾气还不小！”[17]

书中弗里德医生对黛博拉的治疗影响了一代精神病治疗师。同《奇迹缔造者》（*The Miracle Worker*）中的安妮·沙利文一样，弗里德医生有洞察力和同情心，干劲十足，耐心又热情地与病人共克难关。他总结说，关键之一在于要意识到，是黛博拉的父母无意中在女儿身上扇动了精神疾病的火苗。“很多父母说——甚至真这么想——他们想为孩子寻求帮助，却又有意识地表示，其实孩子也不知不觉毁掉了父母自己的人生。”[18]弗里德医生表示，“孩子的独立对于某些心理状态不稳定的父母来说是一项很大的风险”。

精神分裂症的谜团表面上像是解开了：优生学家们错了。人不是生来就有精神分裂，他们的父母才是罪魁祸首。

早在1940年，弗洛姆-赖克曼就曾发出过警告，称“严厉专制的母亲对于孩子的发展会产生危险的影响”，她把这样的母亲称作“家庭的主要问题”。[19]8年后，乔安妮·葛林柏成了她的病人，弗洛姆-赖克曼发明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个术语，它将成为咪咪·加尔文这样的女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摆脱的阴影。赖克曼写道，“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母亲，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幼年遭到了严重的冷落，性情受到了严重的扭曲，这使他们“痛苦地怀疑和厌恶他人”。[20]

赖克曼不是第一个把责任归咎于病患母亲的精神分析专家。事实上，弗洛伊德将每一种神秘的冲动都解释为童年经历对潜意

识的影响。战后，在美国繁荣的新时代到来之际，很多治疗专家担心起了新问题：那些拒绝像自己母亲的母亲们。弗洛姆-赖克曼提出“精神分裂症妈妈”概念一年后，费城一位名叫约翰·罗森的精神病学家写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具有反常的母性。”^[21]

弗洛姆-赖克曼在自己的书中担忧地表示，“美国女性往往是家中的领导者，受到男性的服侍，就像欧洲家庭的丈夫受到妻子服侍那样”“妻子和母亲往往是家族中的权威”。^[22]她尤其不喜欢多恩和咪咪夫妇这样的角色分配：多恩·加尔文成了孩子的知心伙伴，而咪咪则负责严格管教子女。自从弗洛姆-赖克曼给这样的母亲取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个名字后，这个概念便流行开来。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约翰·克劳森（John Clausen）和梅尔文·科恩（Melvin Kohn）将精神分裂症妈妈描述为“冷酷”“完美主义”“焦虑”“控制狂”“爱限制别人”。^[23]心理学家苏珊娜·雷查德（Suzanne Reichard）和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卡尔·蒂尔曼（Carl Tillman）对精神分裂症妈妈的描述是，“她们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女性：不苟言笑，举止得体，但完全缺乏真实情感”。^[24]

这些描述似乎有点前后矛盾。^[25]这样的母亲到底对自己的孩子做过什么？她们究竟是专制还是软弱，是对孩子咄咄相逼还是疏忽不管，是虐待狂还是情感冷漠？1956年，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26]的丈夫——将精神分裂症妈妈各种所谓的罪行整理成了一套理论，称之为“双重束缚”（double-bind）。^[27]他解释说，双重束缚是某些母亲为孩子设置的两难困境。母亲说，“把袜子拉上去”，她说话的语气却表达了相反的含义——“别这么听话”。于是，即使孩子照做，母亲也会表示不满。孩子会感到无

所适从、害怕、受挫、焦虑，乃至进退两难，无路可走。根据双重束缚理论，如果孩子经常陷入这种境地，就会发展出精神病来应付困境。在受到母亲的折磨后，他们会退缩进自己的世界中。

贝特森提出这套理论的依据并不是临床的精神病诊疗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传播。双重束缚理论和精神分裂症妈妈概念一起，将怪罪母亲变成了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精神分裂症研究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病治疗师都会或多或少把情感或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自闭症被指责为“冰箱妈妈”（refrigerator mother）的罪过，因为她们对幼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爱；强迫症被认为是孩子两三岁接受母亲如厕教导时抵触母亲产生的问题。公众无可救药地将“精神失常”同“恶母”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1960年，在电影《惊魂记》中，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将有名的妄想型杀人狂诺曼·贝茨的责任一概推到他已逝的母亲身上，这在世人看来合情合理。

加尔文家的男孩们开始发病时面对的状况便是如此。一群大胆的专业人士占据着道德高地，打压着邪恶的优生学以及外科和化学实验，并试图为这种疾病寻找一种新的解释——一种与家庭相关的解释。1965年，因为将精神分裂症归因于家庭关系而知名的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西奥多·利兹（Theodore Lidz）指出，精神分裂症妈妈“是男性的大敌”，“阉割”了自己与丈夫的良好关系。^[28]作为一种通用的诊疗方法，利兹会建议精神分裂症病人与自己的家庭彻底脱离关系。

多恩和咪咪那个年代的父母无须知晓双重束缚理论或精神分裂症妈妈，也可以预料到孩子身上的不对劲会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怀疑。他们照顾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父母？那个时代的经验非常简单，孩子有什么不正常，千万别告诉医生。

[1] 除特别说明外，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的传记资料和栗居精神病院的历史信息均来自：Fromm-Reichman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Foreword by Edith Weigert, v-x.

[2] Fromm-Reichmann,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Mental Disorder” (1946),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20.

[3] John S. Kafka, “Chestnut Lodge and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Psycho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9, no. 1 (February 1, 2011): 27—47.

[4] Fromm-Reichmann, “Problems of Therapeutic Management in a Psychoanalytic Hospital” (1947),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147.

[5] Fromm-Reichmann, “Transference Problems in Schizophrenics” (1939),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119.

[6] Heinz E. Lehmann and Thomas A. Ba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pharmacology of Schizophreni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2, no. 2 (March 1997): 152—62.

[7] W. C. Shipley and F. Kant, “The Insulin-Shock and Metrazol Treatments of Schizophrenia, with Emphasis on Psychological Aspec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7, no. 5 (1940): 259—84.

[8] McAuley, *The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132.

[9] Gottesman, *Schizophrenia Genesis*, 82.

[10] Martin Brüne, “On Human Self-Domestication, Psychiatry, and Eugenics,” *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2, no. 1 (October 5, 2007): 21.

[11] Müller-Hill, *Murderous Science*, 11, 31, 42—43, 70.

[12] 对精神病患者和“低能者”实施绝育的想法多年前就曾在美国盛行。优生学是美国世纪之交“进步主义时期”的标志，影响了卡尔曼、鲁丁等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纳粹分子。

[13] Fromm-Reichmann, “Transference Problems in Schizophrenics” (1939),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118.

[14] Silvano Arieti, “A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 to Schizophrenia,” in Kemali, Bartholini, and Richter, eds., *Schizophrenia Today*, 245.

[15] Greenberg,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16] Greenberg,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83—84.

[17] Greenberg,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46.

[18] Greenberg,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33.

[19] Fromm-Reichmann, “Notes on the Mother Role in the Family Group” (1940),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291—92.

[20] Fromm-Reichmann,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cs by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1948),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163—64.

[21] Rosen, *Direct Analysis*, 97, 101, cited by Carol Eadie Hartwell,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Concept in American Psychiatry,” *Psychiatry* 59, no. 3(August 1996): 274—97.

[22] Fromm-Reichmann, “Notes on the Mother Role in the Family Group.”

[23] John Clausen and Melvin Kohn, “Social Relations and Schizophrenia: A Research Report and a Perspective,” in Don D. Jackson, *The Etiology of Schizophrenia*, 305.

[24] Suzanne Reichard and Carl Tillman, “Pattern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13, no. 2 (May 1950): 253, cited by Hartwell,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Concept in American Psychiatry.”

[25] Hartwell,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Concept in American Psychiatry,” 286.

[26] 玛格丽特·米德，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译者注

[27] Gregory Bateson, Don D. Jackson, Jay Haley, and John Weakland,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Behavioral Science* 1, no. 4 (January 1, 1956): 251—64.

[28] Lidz, *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 98, 83, cited by Hartwell,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Concept in American Psychiatry.”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5章

1958年，在度过派驻外地的4年时光后，加尔文一家回到了科罗拉多泉市，那个灰蒙蒙的小镇已不复当年。这几年，当地建起了美国空军学院，吸引来了无数人，包括军校学员、军校教官，以及大型军事机构所需要的各种工作人员。这些都在飞速地改变着这里。镇上过去有条土路，路面上有几道车辙的凹痕。路被带刺铁丝网做的门拦着，人们经过时得自己把门打开才能通过。现在土路变成了学院大道，铺得平平整整，大门有人把守，好像东西柏林间的边防站似的。学院里有自己的邮局、杂货店和电话局。学院的新大楼是现代建筑的杰作——由美国最大的建筑公司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一座座前卫通透的玻璃房，在西部的红土地上熠熠宣告着新时代的来临。

多恩可以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跻身于新时代了。之前被派驻加州北部时，他在斯坦福大学熬夜苦读，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眼下他回到科罗拉多，作为教官加入了空军学院，准备一展身手。

空军将他们安置在新校园密集的平房宿舍里。他们的房子在一座小山上，坐北朝南，门前有一小片草坪。多恩和咪咪在地下

室给8个儿子准备了4张双层床。床位本来是够的，不过10月时咪咪生下了第9个儿子马修。长子唐纳德现在13岁，他和年纪相近的兄弟们把空军学院的操场当作游乐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室内室外的健身中心、溜冰场、游泳池、体育馆、保龄球馆，甚至高尔夫球场，应有尽有。他们想在哪儿玩都行，没人拦着。在那个因循守旧的年代，空军学院里仍存有一丝开放的气息，那或许是西部的边疆精神，又或许是新一代人从战争中回到家园，在平静满足的心境下建造未来学府时，所流露出的乐观精神。

这里的很多教师都跟多恩一样，是二战退伍的英雄学者，年轻气盛、博学多才。他们比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的那些人更开明，因此开设了哲学和伦理学课程，这使空军学院不同于那些陈腐的军事学院。多恩的人生按部就班地展开，他走在学院里，从头到脚散发着自信。他左右逢源，就像当高中学生会主席时以及在海军跟“朱诺号”的舰长打网球时那样风光无限。

当然，过去的4年只能说过得半好不坏，也不如多恩所愿那般顺利。在加拿大时，他承担的任务似乎与那里的环境格格不入，这让他心中颇为不快。作为新闻发布官，他处理的都是机密信息，他曾谨慎地对咪咪说起过那里敷衍了事的行事标准。谈到文件被无所谓地乱扔，多恩的抱怨多到不由得让咪咪惊讶。他的心理状态变得非常脆弱，不得不请病假，住进了纽约的桑普森空军基地医院，后来在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医院也短暂待过。咪咪似乎认为多恩只是精神紧张，跟参加过战争的很多士兵一样，尤其是那些对作战经历闭口不谈的老兵。在被派到加州后，多恩的身体好多了。他所在的基地就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因此可以去那儿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现在回到科罗拉多，他和那一辈很多人一样，相信万事功到自然成。



加尔文家的8个男孩，摄于约1959年

空军学院创建前一年，多恩曾写信给负责学院组织建设的休伯特·哈蒙将军，提议将鹰隼作为空军的标志——陆军的骡子和海军的山羊也都是征信选拔的。多恩不是唯一一个写信给空军推荐吉祥物的人，学院的档案室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热心市民的来信，推荐的动物既有艾尔谷犬（谐音“空军”）也有孔雀。不过多恩是第一个建议鹰隼的人，他老和咪咪说，要是空军采用这个点子，他们就算对美国军事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在被派驻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亚时，加尔文一家会将几只鹰塞在道奇牌木质旅行车后座的笼子里，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如今在空军学院安顿了下来，多恩接管了驯鹰课程，投入劲头不亚于一

个狂热的牧师。他给全世界的鹰隼驯养者写信，让他们为空军学院的鹰隼储备尽一份力。他收到了沙特国王赠送的两只隼，忙着从日本引进几只鹰，并写信给马里兰州的相关部门，申请在那里猎鹰的许可。从迈阿密大学到雨中的洛杉矶体育场，他的学员们在全国各地的体育馆表演驯鹰，吸引了数万观众，他们在达拉斯的棉花杯橄榄球赛上的表演还在全国电视上转播了。多恩和鹰隼的故事在《丹佛邮报》和《落基山新闻报》上被报道过不止一次，科罗拉多泉市当地的《公报》还登过他的一张立照。鹰隼也随他们回了家。他们一家人一起训练过一只从德国和沙特阿拉伯多次交换得来的雌苍鹰，叫作芙蕾德莉卡。不拿爪子挠人的时候，芙蕾德莉卡会踞坐在前院的栖木上，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同时也被附近的一只哈士奇犬虎视眈眈地盯着。有一次没被拴牢，芙蕾德莉卡向狗扑了过去。哈士奇仓皇逃窜，可怎么也甩不开牢牢嵌入自己皮毛的鹰爪。

加尔文一家渐渐被众人所知了，毕竟，这么大一家人，父亲还是个很懂驯鹰的军官。小唐纳德则扮演起了父亲的猎鸟犬的角色。多恩参与筹建了北美鹰隼学会，他在学会的简讯刊物《鹰天地》上写道：“唐纳德是一名‘得力助手’，跑在父亲的前面，把兔子赶出来，父亲则负责放鹰。”如果有些鹰没回来，唐纳德和几个年纪稍大的弟弟——约翰、吉姆、布莱恩——会早上五点起床，循着绑在鹰腿上的小铃铛发出的声音搜索它们的踪迹。年纪小些的孩子站在房子所在的小山上，用望远镜看他们的爸爸和哥哥沿山而上或者绕绳而下。



多恩和阿瑟尔

在家中，多恩享受着男性大家长的地位，而咪咪则打点着杂务。驯鹰再次给多恩带来了好处，不仅充实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有理由远离那些他无心参与的家庭事务。长期以来，他习惯以数字称呼儿子们。“老六，过来！”他会这样叫理查德。当多恩开始到科罗拉多大学上夜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他必须得有所牺牲。但他没有舍弃空军学院驯鹰主管的职责，而是不再训练儿子们组成的运动队了。咪咪说他变成了“甩手掌柜”。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父母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忙碌。钱和时间永远不够用。不过正确的态度必须要有，多恩和咪咪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加尔文家的男孩都是祭台助手，其中一个一周要负责做七天弥撒。老朋友弗洛登斯坦神父仍出现在

他们的生活中，他已经从科罗拉多泉市调走，去管理这片草原上的三个教区。对于弗莱迪来说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升职，因为大部分牧师都想要去管辖范围更大的教区。他继续给咪咪提供精神上的告慰，并且很受加尔文家几个男孩喜爱。在为教众主持弥撒之余，弗莱迪会为他们表演老掉牙的魔术，还会给几个大孩子看他收藏在丹佛东部家中地下室的玩具火车和投币自动售货机。弗莱迪嗜好烟酒，有一次被吊销了驾照，小唐纳德当时在上高中，跑到弗莱迪那里待了一周，给他当司机。

那些年，因为孩子们要帮着外出驯鹰，多恩见到他们的时间不多。多恩要工作，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咪咪操持家务，严格管控着日常生活。她一周采购两次生活用品，每次买回20.5加仑[1]牛奶、5盒麦片和4块长面包。不止一次，她把孩子们没有收回屋的玩具直接扔掉了。每天早晨，她会把孩子们床上的硬币掸掉。每天晚上，她要做11个人的晚餐，包括用球生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拌的沙拉，配上盐和胡椒的快熟薄牛排，以及用一袋去皮土豆捣成的土豆泥。多恩在家时，晚饭后会摆上四五盘国际象棋，让几个孩子排成一排，同时和他们对弈。上学的晚上，孩子们只准做功课和练习弹钢琴，不准出去玩。深夜，咪咪还要洗衣服、叠尿布。

1959年，多恩参加了一个狂欢节派对。派对在科罗拉多泉市豪华的布罗德摩尔酒店的水晶舞厅里举行，他头上包着头巾，左手上停着一只活的短翅鸢，穿得像个古代先知或潜修者。当时的照片上了报纸。

咪咪在他身边笑容满面。由于孩子的缘故，她给人的印象跟多恩正相反。《落基山新闻报》曾刊登过咪咪制作羊排咖喱的秘方：用洋葱、苹果、蒜瓣调味，浇在煮好的米饭和青豆上，搭配切碎的杏仁和洋蓟心。文章的标题是“她给9个儿子做异国食

物”。

加尔文家的长子唐纳德要么和空中童子军一起从C-47运输机上跳伞而下，要么学习古典吉他，或者练习柔道、打冰球，又或者跟他父亲一起索降。他是一名田径明星，参加了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学院的高中橄榄球队，他是77号。看他比赛常常是全家的周末活动。高三时，唐纳德赢得了重量级摔跤的全国大奖，他所在的橄榄球队也得了国家级的奖项。他当时谈了个啦啦队的女朋友，女孩的父亲刚好是他父亲的上司，管辖空军学院的将军。从很多方面看，唐纳德都像他父亲，帅气、矫健、讨人喜欢，在兄弟们的眼里，他是个难以效仿的楷模。

不过，唐纳德和其他人以为的样子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多恩和咪咪要么没注意到，要么选择了视而不见。唐纳德比多恩在高中时更安静。虽然他在球场上叱咤风云，但他是那种不会被大家推选为班长的人。他的文化课成绩平平，最后上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而不是更难进的科罗拉多大学。他长得跟英俊潇洒的父亲有点像，但缺乏真正的个人魅力。从青少年时期起，唐纳德身上似乎就有什么东西让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在户外爬山、索降、跳伞，一个人很自在。但唐纳德在征服大自然方面的表现并没有受到周围人的欣赏。

在家中，唐纳德对弟弟们表现出了一种至高的权威，刚开始时像个家长，后来就没那么和善了。父母不在时，他会捣蛋，欺负弟弟，制造混乱。起初只是无心的玩闹，但弟弟们恐惧地发现他逐渐开始动真格了。当多恩和咪咪不在家时——多恩跟驯鹰班的学员一起训练，或者去当地学院教授临时课程，或者为考博学习时；咪咪忙于歌剧团的事情时——年纪最大的唐纳德不情愿地

担负起了照顾弟弟们的职责。他会捉弄弟弟们寻开心：“张开嘴，闭上眼睛，我要给你一个惊喜”，然后把一大勺淡奶油塞到弟弟嘴里。

玩着玩着性质就变了。唐纳德会重击弟弟们的胳膊，狠狠地打在他们最痛的地方。他会要求大家打架玩：迈克尔对理查德，理查德对约瑟夫。他会让两个弟弟按住某个弟弟，自己打他，还叫别的弟弟轮流打这个无法动弹的弟弟。他发出的命令让几个兄弟难以忘怀：“要是不打，或者打得不够狠，你就是下一个挨打的人。”

起先，多恩和咪咪似乎并没有干预这种事情。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们不相信唐纳德会做出兄弟们指责他的那种事来。比唐纳德小4岁的三弟约翰后来说：“我央求爸妈别把他和我一起丢在家里。我觉得唐纳德是爸爸最喜欢的儿子，他把唐纳德的话看得比其他人重。与此同时，我还得找地方躲藏。”约翰还说，咪咪“也完全不知道实情，我想要跟他们说说大哥的事，他们根本就不睬我”。再造谣，舌头掉.....[\[2\]](#)

咪咪和多恩觉得，少年兄弟间的小打小闹全然不值得刨根问底。在孩子多的家庭，不可避免地会有排行之分。多恩和咪咪不在时，唐纳德就是老大，唐纳德不在时，吉姆自然就是头头。“年长一点的会占上风”，迈克尔回忆说——他是老五，比唐纳德小8岁——除了有一次，迈克尔被更小的理查德打得手肘脱臼，输给了他。迈克尔也有一次用力扇过马克，马克半边脸都紫了。上学的路上也不太平：如果每天不跟几个兄弟重新组成联盟，基本上都会挨打。

多恩和咪咪有时会想，这些小冲突最好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过多的干预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让他们学不会跟别人的

相处之道。但就算他们想把每次争端谁对谁错评判个清楚，他们也没法真的做到。因为在唐纳德用铁拳打压弟弟们的同时，吉姆也在试图撼动唐纳德的统治地位。

如果说唐纳德是模范儿子，那么吉姆就属于特立独行的那一类人。他是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的狂热拥趸，穿皮夹克飙车，发出不羁的咆哮。他也曾试图模仿唐纳德，但做不到。作为橄榄球队的端锋接球手和防守后卫，吉姆一度可以在同一场比赛中既拦截对方的弃踢球（punt）又触地得分，但在橄榄球方面他还是比不上唐纳德，在驯鹰方面也不行。很快，他觉得努力也毫无希望。吉姆无法不注意到父母的期待和关注总是会绕过自己而落在哥哥的身上，这令他又气又恼。自然，他的怒气针对性很明显：从青少年时期起，吉姆似乎总在找唐纳德的碴。“就好像他发誓要跟唐纳德为敌似的。”迈克尔说。

地下室、卧室、后院的灌木丛，吉姆和唐纳德似乎动不动就摔跤打架。吉姆体型小一些，每当他被唐纳德打败后就会跑去举重，或者张罗几个弟弟一起对付唐纳德。但这从来也没用。弟弟们都怕他们俩。有一次，吉姆把门向四弟布莱恩的方向猛地一摔，砸破了布莱恩的嘴。这样的小冲突开始只发生在多恩和咪咪晚上不在家的时候，后来白天父母不在眼前时兄弟们也会打架，到最后只要早上两眼一睁打斗就开始了。有一次他们打到了客厅，多恩和咪咪知道必须得插手了。迈克尔记得当时他三年级，他看见平常不闻不问的父亲冲到十来岁的唐纳德跟前，一把抓住他，不许他再伤害某个兄弟。迈克尔对这个场面印象很深。不过多恩觉得兄弟间这样闹腾总会过去的，唐纳德是橄榄球明星，所有孩子也都会很快长大。

多恩想要因材施教。对他来说，这种事好比唱歌定好调子。家中雄性激素的气氛过于浓厚，他有责任引导每个儿子根据各自的特点成长。作为和蔼的老父亲，多恩常推荐孩子们读些提升人格的书，磨平自己身上的棱角，比如《积极思考的力量》。还有麦克斯威尔·马尔茨出版于1960年的自助类畅销书《心理控制方法》，这本书向大众解释了创造性想象的概念。多恩觉得这些书或许可以开导孩子们走出冲突的困境。他常把他们召集到吃饭的长桌周围，教导他们要和睦相处。发现好好说不管用后，多恩决定，至少可以用军队的那一套来约束他们。于是他买来家用拳击手套，还制定了新规矩：打架必须戴手套。

理查德——老六，比唐纳德小9岁——记得自己戴上这种拳击手套时的恐惧。“所有兄弟都精力饱满，你想想，都像那种顶级运动员，”他说，“所以一旦开打，真的打得不可开交。”

加尔文家成了同时存在两种场景的地方——既是摔跤场又是唱诗班。一面是无法管束的狂野，一面是多恩和咪咪以为的那种模范和谐。小打小闹似乎无伤大雅，何况在军人家庭看来，体力和权力的争斗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长期的摩擦中，约翰、迈克尔、理查德和马特逐渐产生了失落感，甚至有遭到冷落的感觉。他们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仿佛不是一个人，只是家中的一个数字，所谓的受保护不过是一种错觉。

有时，这一家子人前人后风格迥异的特点也让其他亲朋好友难以适应。去皇后区看望表亲时，男孩们会逮住每个没人看管的时机随心所欲地搞破坏——爬到车库顶上，拿气枪打窗户和小鸟，让东海岸的表亲们又惊又恼。但几个月后，表亲们又会收到

多恩、咪咪和孩子们寄来的圣诞卡片，上面印着安安分分的一家人，穿着睡衣睡裤站在圣诞树旁。这种差异在当时就已经让表亲们觉得怪怪的了。

眼下，多恩和咪咪选择无视家里的鸡毛蒜皮。他们都是男孩，而且家里的住房空间非常紧张，要想他们不打架是不现实的。何况老大唐纳德还是他们的骄傲——他的一张照片登上过《丹佛邮报》，占据了近半幅头版：一个清秀的少年，从教堂岩高处的鹰巢上索降而下，跟他父亲一个样。

老十彼得出生于1960年11月15日。这次生产后，咪咪出现了严重的子宫脱垂，左腿还出现了血栓，因此在医院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没人开玩笑让咪咪晚上带着大蒜睡觉来躲丈夫了。她的医生严肃地告诉她，她不可以再生了。15年左右不断的怀孕、分娩对任何人来说都足够了。但咪咪似乎没听进去，也不管其他人的劝解。

“真的，宝贝，你应该在医院吓吓可怜的‘加尔文少校’，”咪咪的爷爷林赛·布莱尼在信中对她说，“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担心你。”

事实上，叫咪咪和多恩生完10个孩子就罢休，就像让一个跑马拉松的人跑上25英里后就停下来一样。就此作罢对他们来说简直可笑——多恩在空军学院的地位正在上升，夫妻俩在科罗拉多过得挺舒服。况且，其他人难道都没注意到吗？他们还缺个女儿呀。

1961年，生完彼得没几个月，咪咪第11次怀孕了。过完圣诞节，快要生产前，她和多恩还有10个儿子在空军学院用于集合的阿诺德厅拍了张照片。大家都站在中央大厅的大楼梯上，男孩

们穿着外婆比莉从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买来的伊顿西装。咪咪的爷爷林赛收到寄来的照片后说“太让人惊叹了”——所有的孩子站成一溜，好像没有尽头似的。他预测咪咪这次会生双胞胎，人数正好算一打。

他没预测对，不过1962年2月25日，咪咪确实创下纪录，生下了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加尔文。科罗拉多的《格里利每日论坛报》用简短的文章报道了这个消息：“终于，生的是女儿！”多恩预计就会是个女孩，但他还是忍不住跟学员们开玩笑说：“倒霉，本来要生个四分卫的。”

咪咪倒毫不隐藏自己的喜悦之情。“她是降生在我们家的最漂亮的孩子，”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有这样一个孩子是每个母亲的梦想。”她还见缝插针地夸其他孩子。关于唐纳德，她说：“他的古典吉他弹得棒极了，还是个出色的高中运动员。他的学习成绩欠佳，但就像他的校长说的那样，‘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像唐纳德那样优秀’。”说到吉姆，咪咪写道：“他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是我的好帮手。”老三约翰“有着卷曲的褐色头发和明亮的蓝眼睛”，酷爱吹单簧管和弹钢琴，还负责一条有65户人家的送报专线。老四布莱恩“现在是我们家的天才小神童”，可以把肖邦悲怆的前奏曲弹得“无比悲怆”，把雅克·奥芬巴赫的《快乐的巴黎人》里的康康舞曲弹得“无比欢快”。老五迈克尔，会吹法国圆号，热爱阅读，是“家里的娇宝宝”。老六理查德是“数学家”，也想上钢琴私教课，“不过已经有两个孩子在上私教课了，他得再等段时间”。老七乔在上幼儿园，学习数数、写字和语音。最小的三个男孩马克、马修和彼得“总是在家陪我。他们就像泰迪熊，不断惹麻烦。有一天，我发现他们用新买的伊莱克斯吸尘器把厨房水槽里的菜渣吸了出来！”。

无论多恩去当地的学院兼职上多少堂政治学课，家里的钱还

是比以往更紧张。每个孩子在教区学校的服装——两双鞋，两件衬衫，还有裤子——就要花掉大约100美元。在给婴儿喂奶和为其他孩子准备饭食的间歇，咪咪一刻不停地踩着她的贝妮娜牌缝纫机，自己做衣服。不过咪咪会说，从玛格丽特出生的那一天起，生活就开始出现了曙光。好像被施过魔法似的，生活终于顺利起来，让她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她还说她想再生一个，这让多恩很高兴，却让她的产科医生很担心。

第12个孩子，也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玛丽，在1965年10月5日降生，当时咪咪已经40岁了。医生直率地告诉她，如果她再次怀孕，他会拒绝为她接生。他催促咪咪做子宫切除手术，咪咪不情愿地同意了。她和多恩估摸着，反正迟早就要带孙子了。

到11月底，咪咪能下床了，并且告诉科罗拉多泉市的《公报》，科罗拉多泉市歌剧协会即将上演威尔第的《假面舞会》，演员都已经选定了。同一年，圣母大学的克努特·罗克尼橄榄球队在当地的球迷俱乐部将多恩·加尔文评选为“年度父亲”。“我生了这么多孩子，”咪咪会用她在心中酝酿过无数次的语言，满怀幸福感并毫不掩饰地说，“而他收获了所有学位和掌声。”

大约17岁时的一个晚上，唐纳德站在厨房水槽前，一下子砸碎了10个盘子。

多恩没太把这当回事，咪咪也是。唐纳德还是个少年，情绪不稳定。那是20世纪60年代，别家孩子的表现比这更过分呢。

但唐纳德心里清楚自己不对劲，而且已经有一阵子了。

他知道自己除了发际线、大腮帮子和运动天赋跟父亲很像以外，其他地方一点都不像，而且永远也不会像。他知道自己成

绩很普通，作为家里其他孩子眼中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儿子，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成绩。他曾试图像一名家长一样管教弟弟们，但他频频和他们打架，这一点也不像个父亲该做的。这方面他也不行。

他知道，当橄榄球场上的明星和与他人做朋友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他后来说，有时候他觉得其他人就好像他在电脑上读取到的信息。他知道这一点跟别人很不一样。

唐纳德意识到自己经常感到被困住了，懊恼自己没有成为理想中的样子。另一些时候，他会感到自己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像一个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不在乎的陌生人，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究竟有什么正在悄然发生，他说不清楚，但他感到很害怕。

[1] 1加仑 $\approx$ 3.79升。——译者注

[2] 这是英语中的一首童谣。——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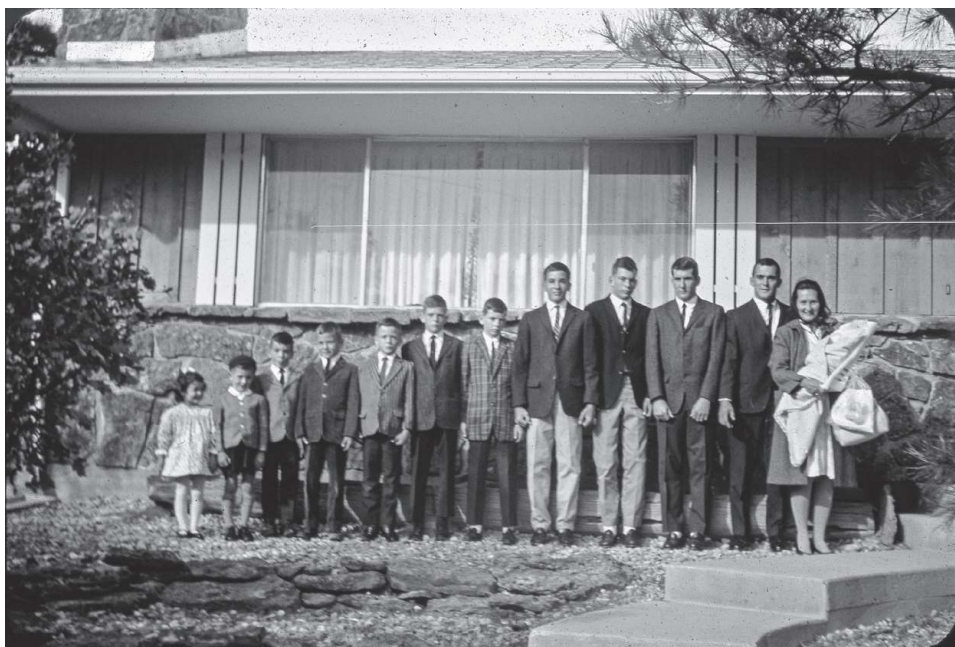
第6章

1963年秋天，加尔文一家从空军学院的宿舍搬到樵夫谷一座新建的房子里，房子室内的地面处在不同的水平高度，周围是乳牛场，环绕着浓密的松树。这里离科罗拉多泉市市中心只有几英里远。多恩花几千美元买下了隐谷路西头的3英亩[1]地。隐谷路是一段4英里长的土路，最后那部分是一条碎石铺的死路。他们家的房子是第一批提供给空军学院家属改善居住条件的郊区住房。施工前，咪咪在他们家旁边围了绳子，不让承包商把周围的树和灌木丛砍掉。

对于很多他们学院的朋友来说，樵夫谷是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但自从12年前第一次来到科罗拉多，咪咪对旷野的看法就变了，她喜欢乡村的那种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科罗拉多泉市很多地方都在为军方造房铺路，不仅是空军学院，还有彼得森空军基地、卡森堡，以及最近才建起来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这是负责协调核防御的指挥部，隐藏在位于科罗拉多泉市和普韦布洛之间的夏延山防御堡垒里。从樵夫谷开车去科罗拉多泉市仅需15分钟，对于咪咪来说，住在这里却好像远离了核时代——这儿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一切都那么天然，那么本真。[2]

从他们的新家走上短短一程，就能看到一座女修道院，过去这里是家结核病院，以周边的地方命名，叫美国樵夫谷现代疗养院。相比科罗拉多泉市其他地方，山谷的地质没有那么红，更偏白，这是因为这里的山经过数百万年的侵蚀，留下了大量长石和石英碎块。松树林那头有巨大的岩层，一度被作为旅游景点，叫丰碑公园，男孩们可以整天探嬉于这些山石间。这里的每座山石都有响亮的名字，狗岩、格伦迪奶奶岩、铁砧岩、荷兰婚礼岩。隐谷路的神奇之处在于，茂密的树木和起伏的山头形成的森林宛如藏身于滚滚岩阵之中。早餐时会看到小鹿徘徊在露台的门外，也能听到头顶上松树枝间传来蓝松鸦的叫声。

房子建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一栋低矮的箱式建筑，外面是常见的墙板和石头的混合装饰。在屋内，起居室铺了地毯，与兼作厨房和餐厅的区域相连。就餐空间非常大，一位世交给他们做了张巨大的餐桌，桌子的两端都可以并排坐下两个人，如果需要，每个长边可以坐下六个人。前厅里有半段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另有半段楼梯通向地下室，那里在需要的时候也常被用作睡觉的空间。玛格丽特-多恩和咪咪的第11个孩子——已经18个月大了，她和彼得住一个房间。房间在楼上父母的卧室旁边，地上铺了淡绿色的地毯，能看到窗外高大的松树。马克和乔合住同一层的另一间屋子。彼得和马特在一楼共用一个房间，一人一张小床。尚未离开家的大孩子们睡在地下室，晚上把角落里的沙发展开当床用。



咪咪（怀中抱着玛丽）和加尔文一家的其他11个孩子在隐谷路家前的台阶上

对咪咪来说，隐谷路这个家的一切都称心如意：起居室大到可以举办摔跤比赛；厨房设施完备，她可以整天待在里面为全家做吃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出去呼吸呼吸旷野的气息，也可以出去踢橄榄球、骑自行车或者放鹰。咪咪和几个大孩子在每面墙上都刷了三层漆。她自己还着手布置起了后院的石头花园，芙蕾德莉卡则在一旁守护观看。多恩在后院的小山顶上做了一个巨大的A形鹰舍，养了更多鹰，其中包括韩塞尔和格蕾特。多恩他们常带鸟去卡尔森家附近的乳牛场，在一望无际的草坪上放鹰。他们最宝贝的鹰——芙蕾德莉卡，还有后来的阿瑟尔——被准许在起居室的咖啡桌上停歇。或许在这段时期，加尔文一家第一次有了安顿下来的感觉。

搬到隐谷路的那年，正好是唐纳德上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第

一年。他没有流露内心的恐惧，至少没让家人知道。他告诉家里人自己想当医生，他们听到这个想法时脸上显出了骄傲的神情。离开家后，唐纳德仍想维持表面的光鲜，不显露出真实的自己。在家里，兄弟间的权力分级依旧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吉姆早已不再和哥哥在他擅长的领域争斗了，但却开始在唐纳德最薄弱的领域占上风。如果说唐纳德打赢了第一轮——童年的话，那么吉姆就打赢了第二轮——现实生活。吉姆试图在弟弟们面前树立自己威风大哥的形象，身穿机车夹克，开着57年款的黑色雪佛兰，还会往弟弟们的可乐里倒百加得酒。弟弟们有时会买账，但大多数时候会很警惕，尤其是在吉姆开始勾搭起弟弟们带回家的女朋友之后。吉姆喜欢给人一种爱找人麻烦的印象，最好时不时能吓吓人。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其他兄弟欠缺的自信，或者说气概。“16岁时，我们就知道他有点问题了，”比吉姆小7岁的理查德说，“那时候我们觉得没关系，出去喝酒、作乐、犯点事、逃学，这些都是男孩子会干的事。”

不再受到家里事事完美的要求的束缚后，吉姆喝酒比唐纳德喝得更多了，也更常出去玩，更常陷入麻烦。高中最后一年，也是他们搬到隐谷路那年，吉姆被空军学院附属高中开除了。他和一个朋友跑到空军学院的喷气机中心胡闹。他爬进一架喷气机的驾驶舱，朋友则站在外面。吉姆按下按钮，飞机缓缓动了起来。那个男孩被吸了过去，撞到了机尾，要是偏一两英寸^[3]可能就没命了。吉姆被强制转学到了当地的天主教学校——圣玛丽高中。如果这事发生在唐纳德身上，绝对会是个打击，但对吉姆却不是。一错再错会降低人的期待，吉姆已经不可能更糟了。

这次勒令退学没有让加尔文家像一个骄傲上进的家庭理应表现出的那样觉得受到了羞辱。咪咪懂得如何消化最坏的消息，那就是不予理会，好像不值得为之纠结一样。她父亲让全家背上丑

闻那会儿，她看到母亲就是这么做的。多恩也知道怎么回避生活中的不愉快，那就是根本不去讨论那些话题，比如他从来不会谈起自己在战争中亲眼见到的恐怖场面，也不会谈起他在海军的晋升失败，以及派驻加拿大时烦心的住院经历。他们在科罗拉多的生活正有起色，可不能让这个倔强小子的荒唐错误影响全家。多恩和咪咪轻松地觉得，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吉姆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他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很快就能自食其力了。或许他可以去上一年社区大学，不用去真正读四年大学。不管怎样，就像多恩常跟咪咪说的，吉姆迟早会长大，就像所有其他孩子一样。

对于咪咪来说，搬到隐谷路意味着一家人期待已久的冯特拉普（von Trapp）^[4]式的田园生活开始了。唐纳德不在家住，吉姆也快搬出去了，她感到那种理想生活已经近在咫尺。大家——唐纳德、吉姆，以及其他所有孩子——会不会还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她希望家中流淌着音乐，因此让儿子们来帮助她实现这个梦想。咪咪和多恩在购物中心花850美元买来一架廉价儿童三角钢琴，让男孩们学习弹奏。约翰、布莱恩、马特，连小彼得都学会了吹奏长笛。周末，咪咪会用唱机播放交响乐，给孩子们解释音乐背后的故事，细节详尽得如同百科全书。后来男孩们有了台录音机，他们会为她录制周六早晨大都会歌剧院的广播节目，咪咪则会一整周都放这些曲子，也会换着听伯尔·艾夫斯和约翰·雅各布·尼尔斯的民谣，还会跟着一起哼唱。加尔文家的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斯卡克家的、霍利斯特家的、特里家的、沃灵顿家的、伍兹家的和奥尔森家的——会在附近玩游戏，踢罐子、抢旗子、踢球戏、“西蒙说”（Simon Says）。在樵夫谷的田野和森林里，咪咪会教孩子们如何辨别野生动物，比如生活在路尽头白色悬崖的小黑洞里的一种短尾猫。

随着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变迁，年轻一代的习惯和想法让加尔文夫妇那一辈的父母们觉得难以理解。但多恩和咪咪不在其列。加尔文夫妇是新边疆时代虔诚纯良的开明天主教徒，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思想开放，但言行保守。搬到隐谷路几周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他们为他祷告也为新总统祈福。越南的冲突日渐加剧，作为空军上校的多恩对自己的感想只字不提。很久以后他才对儿子说，那些不幸被派去东南亚打仗的人不过是“身穿制服的杀手”。大多数加尔文家的男孩会去参加聚会，玩摇滚乐，很晚才回家。只要他们周日能回来，做弥撒时衣着得体，多恩和咪咪会放任他们平时想怎样就怎样。

加尔文家的人从来都规规矩矩的，如今，如同多恩坚信的那样，好运似乎正在向他们走来。

搬家前，服役近20年的多恩被调到了北美防空司令部担任信息参谋。这也是份向军官传达情报的工作，跟他多年前干过的差不多，只是现在这个工作还有公关的职能：他需要前往全国各地，给那里的俱乐部和机构做报告，向他们介绍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职责。这个国际防御控制中心负责协调北美第一个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并在需要的时候向美国和加拿大的800个军事设施下达核武器使用指令。加尔文家的男孩和他们的同学是在核毁灭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会在晚饭后偷偷听父亲用厨房里的电话给将军们做末日简报，并因此兴奋不已。在总部，多恩负责带领记者和行政官员参观巡视，常会提起自己那一大群孩子和深爱的鹰隼。加尔文上校“显然对鸟类很有研究”，路易斯安那州哈蒙德《每日星报》的专栏作家写道，“他不断告诉寻访小组他的驯鹰之道，此外，他在空军学院的运动队得名‘老鹰队’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

最好的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多恩从空军退役，拿到政府拨款，为各个州监管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先是作为科罗拉多州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副主席，后来又担任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的第一位全职执行理事。这个新机构包括从蒙大拿州到新墨西哥州的美国西部7个州。不久，亚利桑那州也加入其中。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是一个准政府组织，目的是帮助地方招揽工业、银行业、艺术业和大型交通工程。联合会主席由各成员州州长轮流担任，但负责日常事务的还是多恩·加尔文。他将自己的政治学知识和军事经验运用到实践中，成了处理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事务的协调人。年纪已经较大但仍住在家中的儿子们对父亲无比敬畏。“他在教州长做事”，多恩接受这个工作时，老六理查德只有12岁，“你知道他本来就气质不凡，他的声音，噢，更是铿锵迷人”。

随着新事业的崛起，多恩——包括咪咪——的眼界也在不断拓宽。过去在科罗拉多鹰隼国度里的平静生活，如今像是一脚迈上了世界舞台。多恩在华盛顿四处游说，打算筹建一条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到怀俄明州的夏延山的新铁路，搭建一条将加拿大或阿拉斯加的水引到南方的管道，还要修建美国西部第一座公共电视台。联合会为实验性的工业项目筹集风险资金，寻找新的矿物和水资源，为科技发展成立科学顾问委员会，为推广旅游业进行艺术巡展，支持丹佛、菲尼克斯、犹他交响乐团和犹他城市芭蕾舞团——后来被多恩重新命名为“西部芭蕾舞团”。这个新名字实际上是咪咪想出来的。“‘犹他城市’这几个字听起来有点摩门教的味道。”她翻了个白眼说。霍华德·休斯当时刚把自己的新航空公司取名为“西部航空”，因此咪咪建议说，要是跟着休斯改名为“西部芭蕾舞团”，说不定他将来会捐点钱。

在获得美国艺术基金会的资助拨款后，多恩开始向东海岸最

有成就和影响力的舞者、编舞和指挥家提供驻留机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恩和咪咪还常常带着年龄尚小因而无法单独留在家的孩子去阿斯彭和圣塔菲参加音乐会、募捐会、研讨会和各种庆典。在多恩主导联合会工作的过程中，咪咪过去憧憬的拥有文化艺术生活并且事事如意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先是住进梦想的房子，然后又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在圣塔菲，加尔文一家经常参加聚会，嘉宾有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穿戴着她标志性的黑帽子和黑色长裙，头发挽成长长的辫子拖在背后——还有艺术家安德鲁·怀斯的姐姐亨利特·怀斯，她提出给多恩和咪咪的两个小女儿玛格丽特和玛丽画油画，她们要穿薄纱，因为这样看上去就像是庚斯博罗的双人肖像画中走出来似的。在咪咪心里，最欣喜的体验是去亨利特·怀斯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的农场的那一次。亨利特和她的画家丈夫彼得·贺尔德站在谷仓里画画，贺尔德还带咪咪的两个小女儿远足去看橘子树和三齿蒿，玛格丽特被三齿蒿呛得直打喷嚏。还有跟传奇指挥家莫里斯·阿布拉万内尔和编舞家阿格尼斯·德·米尔一起吃早餐那次，后者跟乔治亚·欧姬芙一样，对小玛格丽特和玛丽完全不感兴趣。还有一次，多恩对大卫·洛克菲勒大拍马屁，成功地让他为联合会的新公共电视项目投了钱。

他们也结识了新朋友，比如石油投机商塞缪尔·加里。塞缪尔·加里1967年在蒙大拿州贝尔溪油田开采出约2.4亿桶石油，是当时密西西比河以西开采量最大的一次。在联合会的帮助下，贝尔溪被建成了一个能容纳数百名新石油工人的城镇，因此山姆[5]对多恩信赖有加。贝尔溪的大街上如果需要安装新交通灯，打个电话给多恩·加尔文就能搞定。20世纪60年代末，加尔文夫妇带着玛格丽特和玛丽拜访了加里在丹佛樱桃山的高档住宅。山姆和妻子南希有8个孩子，其中几个女儿跟玛格丽特和玛丽年纪

相仿。大人们打网球、聊政治，小孩们则在一边玩。加里一家人喜欢看多恩驯鹰，作为空军学院的驯鹰大师，多恩早已声名远播。有次加里一家来加尔文家作客，多恩和咪咪让小唐纳德教山姆、南希和几个孩子从教堂岩上练习索降。还有一次，加里一家驾着他们那架机舱内不恒压的小型私人飞机，带多恩和咪咪去爱达荷州雪松泉市的天鹅湖，咪咪在飞行中感到头昏目眩，晕了过去。

之后，咪咪和多恩常常参加各种晚宴，多恩会用专业的口吻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工业和艺术。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咪咪优秀的丈夫身上。每每这样的晚上，咪咪都觉得人生该有的都有了。多恩英俊、聪明，还懂得和她调情。她的朋友们都叫他罗密欧。

可世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咪咪很快就体会到这个道理。她发现自己只能眼巴巴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精彩，自己却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大学学历，她和多恩也没有钱。她的家世，肯尼恩外公和他的防洪堤，在新西部的那些百万富翁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最多只能算是心理安慰。哪怕最和善的山姆和南希夫妇，他们的千万身家也随时在提醒着咪咪和多恩，那个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那个由联合会、州长、石油投机商、世界一流艺术家、舞者和交响乐团指挥等名流组成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们。

当然，加尔文家的世界并不像咪咪渴望的那样完美，她当时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向别人提起。其实她的两个大儿子一回家就能让她意识到这一点。唐纳德和吉姆仍然会打架，也会和其他弟弟打。每次回到隐谷路，比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时，家

里总有人会落得伤痕累累。理查德记得有一次看见唐纳德一路追赶吉姆，抓到他后，一个上勾拳把他打倒在地。理查德从来没见过有谁挥拳这么重过。

从理论上说，唐纳德和吉姆已经近乎成年，有能力自己做决定。现在他们不在家住，这让咪咪觉得轻松不少，她对自己的释然也有些惊讶。她同样知道，倘若稍微承认自己的家庭并不尽善尽美，就有可能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无论是多恩新职业的前景，其他孩子的形象，还是家族的名声。

所以在大部分时候，当孩子们出了点岔子时，咪咪往往会同意多恩的话——男孩子不能娇惯，应该离家，自己犯错自己总结教训，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会成长。

咪咪也会想到他们的生活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中，丈夫的幸福在她看来总是那么脆弱，有时似乎任何地方稍有差池，这一切就会轰然垮塌。

[1] 1英亩 $\approx$ 4 047平方米。——译者注

[2] 樵夫谷的地质信息来自：John I. Kitch and Betsy B. Kitch, *Woodmen Valley: Stage Stop to Suburb* (Palmer Lake, Colo.: Filter Press, 1970).

[3] 1英寸 $\approx$ 2.54厘米。——译者注

[4] 此处的冯特拉普指的是奥匈帝国海军少校格奥尔格·冯特拉普一家，电影《音乐之声》就是根据这个家庭的故事改编的。——译者注

[5] 山姆是塞缪尔的昵称。——译者注

第7章

1964年9月11日，在科林斯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刚上大二的唐纳德·加尔文第一次走进了校健康中心。他的左手大拇指受了点小伤，被猫咬了个口子。他没有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没说为什么猫会被激怒，为什么不是抓他而是咬了他。

第二年春天，唐纳德再次来到健康中心。这一次，他的问题隐私性更强，也很古怪。他说他发现室友得了梅毒，他害怕自己会不小心被室友传染上。唐纳德曾经告诉过父母自己想学医，而现在，医生需要让他相信梅毒是通过性交传染的，日常接触不会传染。

几周后，1965年4月，唐纳德第三次造访健康中心。他说在隐谷路的家里时，有一个弟弟（他没说是哪一个）向他扑来，从后面袭击了他。他被诊断为背部扭伤，在医务室住了一晚。

然后出现了烧伤。

196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唐纳德摇摇晃晃地走进健康中心，身上有多处烧伤。他说他的运动衫在橄榄球队的动员会上着火了。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医务人员发现实际上是唐纳德自己跳进了篝火里。或许是为了博取关注，或许是为了让朋友惊叹，

或许是想要求助，他也说不清。

医务人员让唐纳德停止上课，把他送去接受精神状况评估。空军学院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里德·拉森少校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接诊了唐纳德4次。这是唐纳德第一次接受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检查，也是唐纳德的父母第一次被迫面对大儿子可能不正常的事实。不过当拉森少校拿着报告回来时，多恩和咪咪对唐纳德的担忧消退了。“我们没有发现严重思维障碍的证据，也没有发现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症状。”拉森少校在1966年1月5日这样写道。

即使医生的证明不能算多确定，但多恩和咪咪的心还是放下了。拉森少校指出，唐纳德的治疗先要使用阿米妥钠——一种“吐实药”（truth serum）[\[1\]](#)。服用阿米妥钠接受心理治疗倒也不完全算新鲜事，但主要是用于有交流障碍的病人，或者具有紧张性精神分裂症表现的病人。少校认为唐纳德可以回去上学，但前提是他要继续接受精神病学治疗。“我们确实发现加尔文先生身上存在大量矛盾的情绪，我认为这对他造成了困扰，可以解释他在学校期间的异常行为。”他写道。他还说，军队针对军属的新医保计划会支付唐纳德的治疗费用。

是什么让唐纳德受到如此大的困扰，以至于他要跳进熊熊燃烧的火堆里？没人能对此做出解释。1966年年初，唐纳德勉强回到校园，决心补回落下的学业。他极度渴望与别人接触，尤其是女孩，可他似乎完全不知道怎么交女朋友。他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鸿沟愈加分明。但他还是原来那样矫健和帅气，他觉得他还是非常有可能变成父母期待的样子。

唐纳德开始和班上一个叫玛丽莉的女孩约会。没几个月，他们甚至开始谈婚论嫁了。这样的速度对唐纳德来说倒也不算太

快，因为他急着过上正常的生活，急着做爱但又不用把这视为罪恶，急着拥有一个像自己家庭一样的新家，急着好起来。但他的家人却从没有机会认识玛丽莉：他俩不久就分手了，唐纳德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分手后，他花了150美元打长途电话给玛丽莉，这使他没钱付房租，但他也不敢告诉父母。唐纳德的解决办法是找一个可以免费居住的地方，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直到他想出下一步该怎么走。

1966年秋天，唐纳德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被废弃的旧水果地窖，地窖里通了电但没有水，有台旧电暖器。他一个人睡在垫子上，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自找的困境。一天天过去，过了几周，又过了几个月，直到11月17日，唐纳德回到健康中心，再次报告说自己被猫咬了。

在听说这是他两年内第二次被猫咬后，医生当天就送他去精神科做了全面检查。这一次，唐纳德的麻烦终于清楚地显现了出来。他向医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坦诚。病历上提到唐纳德承认做过更多“具有自毁倾向的怪事”：“跳进篝火中，用绳索紧绕脖子，打开煤气，去殡仪馆打听棺材的价格。他无法明确给出做这些事的动机。”

在接受医学观察期间，唐纳德继续让人震惊不已。他告诉医生，他觉得自己杀死过一位教授。几天后，他又分享了一个念头——他在橄榄球赛中杀了一个人。他越来越多地聊起过去，其中有一段坦白让医生觉得尤其不解。病历上写得很简短：12岁时曾两次试图自杀。

没人知道唐纳德这两次试图自杀时究竟做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唐纳德是否告诉过其他人这些事。假设他真的自杀过，也没人

清楚他的父母是否知道。不过治疗唐纳德的医生觉得，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了，尤其是在知道发生在那只猫身上的事情之后。

“他用缓慢而痛苦的方式杀死了一只猫，”医生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猫之前跟着他生活了两天。那只猫明显还带来了另一只猫（可能是只公猫），把住的地方弄得很难闻。猫抓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虐待并杀死这只猫。他说起这些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

唐纳德在叙述这一切时不仅显得茫然，而且还很害怕。

“这个男孩不仅可能伤害自己，还可能会伤害别人，”医生写道，“这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坐在车里，唐纳德喃喃地说着上帝、玛丽莉，还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在找他之类的话。回到家，在书房里，唐纳德心中的恐惧爆发了出来，他厉声叫着：“趴下！他们在开枪射我们！”大家都慌作一团，跑去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时是1966年年末，多恩正开始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的新工作，其他人的新生活也正要展开。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医生说，在接受其他评估和治疗之前，唐纳德不能继续上学了。多恩和咪咪立即开车去科林斯堡看望儿子。在见到唐纳德时，他正在用啤酒洗头。他们决定带他回家。现在到家后，他们却完全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唐纳德需要帮助。但他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即使唐纳德愿意去私立医疗机构，比如马里兰州的栗居精神病院或者托皮卡市的梅宁格诊所，或者离家近一点的科罗拉多泉市的雪松泉医院，这些费用对于加尔文家来说也都太昂贵了。而公立医院则非

常可怕，用精神安定剂和约束带来换取平静，就像1963年上映的塞缪尔·富勒的电影《恐怖走廊》里那样。1967年，马萨诸塞州的一次上诉登上了新闻头条。该州要求停止播放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电影《提提卡失序记事》，因为这部影片揭露了马萨诸塞州布里奇沃特州立医院里的非人境况。影片中都是病人被剥光衣服、强迫进食的画面，那些本应保护病人的工作人员却对病人百般凌辱。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有一座非常大的州立精神病院，离隐谷路有1小时的车程。这里用胰岛素休克疗法和一种叫氯丙嗪的强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非常有名。多恩和咪咪坐在桌边把每种方案都讨论了一遍，就是不同意送唐纳德去普韦布洛。像普韦布洛那样的州立医院是用来收治无药可救的病例的，他们儿子这样的健康男青年才不需要去那儿。

除此以外，还有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咪咪看来也不太令人满意。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和其他一些人建议病人们可以去丹佛的科罗拉多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隶属于科罗拉多大学系统，精神分析方法非常有名。医院致力于将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诊疗的侧重点是精神疾病的“精神动力”源头——“精神分裂症妈妈”。咪咪和多恩可能对这种疗法的细节并不清楚，比如，精神分析专家会想要知道养育唐纳德的具体过程，以及父母是否做过不同寻常的事情。但他们明白，不管怎样都要把儿子送到一家精神病院，这道坎一定要跨过去。

他们再一次想，情况真的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了吗？毕竟，在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上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甚至直到如今很多方面仍旧如此。他们觉得唐纳德的那些症状都不是很像精神分裂症，医生或许没注意到其他可能的病。14年前，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了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书中对精

精神分裂症的定义有近3页，包括最初由厄根·布洛伊勒提出的精神分裂症的亚型——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单纯型精神分裂症——和后来增加的5种：分裂情感障碍、儿童期精神分裂症、残留型精神分裂症、慢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和急性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这则定义受到了广泛的抨击。1956年，著名精神病学家伊万·贝内特（Ivan Bennett）称DSM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属于“诊断分类的废纸篓”，[2]而他更看重哪些药物能够缓解哪些症状。从此，DSM每新出一版，都要根据当时流行的治疗手段修改对精神分裂症的描述。1968年出版的第二版DSM添加了“急性精神分裂症”，其特点是幻觉和妄想，别无其他。[3]不过关于精神分裂症到底是什么，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它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还是某种综合征？是遗传还是创伤导致的？多恩和咪咪明白，对于那些跟唐纳德情况差不多的人来说，有没有得精神分裂症通常取决于所求诊的医院的检查标准。

这种病没有预防措施可言，也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如果他们将唐纳德送进任何一家有点像精神病院的机构，一定会丢人现眼，他的大学教育也会终止。这还将是多恩职业生涯中的污点，他们家在社区中的地位也将急剧下跌。最终，他们家其他11个孩子本应有的正常而体面的生活将不复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咪咪和多恩来说，最明智，或者说最现实的决定，只能是希望唐纳德自己康复。他们越考虑，越觉得必须乐观。为什么唐纳德不能忘掉玛丽莉，重整旗鼓，搬出水果地窖住进宿舍，让一切好起来呢？他们需要相信唐纳德可以做到这些。因此他们要去找一个他们认识并且信任的人来治疗唐纳德，帮助他度过这次危机，让他重返校园，步入正轨。

他们觉得，第一选择显然是空军学院的医院，因为加尔文家

在那里有点人脉，这可能有助于治疗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次，给唐纳德做检查的医生是加尔文家的老朋友劳伦斯·史密斯少校。他从1960年开始在空军学院工作，与多恩有过3年的工作交集，他还一直关注小唐纳德在橄榄球队的表现。

12月8日，史密斯少校代表唐纳德写信给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将唐纳德的“急性情境适应不良”归因于一连串倒霉事件的共同作用，比如他不太理想的住宿条件、糟糕的感情经历以及期末考试的压力。少校的信语气慈爱，充满善意，很让人宽慰。“我同意他在12月表现出的反应的确很怪异，”他写道，“不过，我觉得他已经从那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并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状况，在我看来，他应该不会再做出同样的事了。”

一年中第二次，多恩和咪咪为儿子争取到返回校园的机会，避免了丑闻的发生。少校没有提到唐纳德杀猫的事，也没有提到他的杀人妄想。理由很简单，史密斯少校没被告知这些细节。他也没有跟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为唐纳德做检查的医生交流过，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告诉他。

自然，唐纳德也不会主动提起这些事。

圣诞节假期后，唐纳德回到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水果地窖已经成为过去，他回到了同学们中间，不再形单影只。唐纳德一直要去健康中心接受治疗，偶尔进行精神病评估。终于有一次，他的评估医师写道：“该生没有精神病。”

再一次，唐纳德似乎急着要变好，变成父母期待的儿子，他甚至开始约会。那年春天，他宣布自己在和一个新的女朋友交往。她名叫吉恩，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唐纳德有次也说过，她是个假小子。唐纳德还保持着橄榄球运动员的身型，吉恩这方面

跟他挺配。她跟唐纳德一样，野心勃勃。她想要读博士学位，唐纳德也还在想着当医生。

他们交往几个月后，唐纳德告诉父母自己又订婚了。咪咪和多恩很受打击。同时他们又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表明唐纳德想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他们自己的经验也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意孤行的年轻人根本不会把家庭的反对放在眼里。至少在一个方面，咪咪还感到了一丝解脱。她和多恩一直对外界保守着唐纳德精神崩溃的秘密，希望这事能被淡忘。她只希望唐纳德能自己好起来。如果唐纳德能安定下来，找到人生的方向，按部就班，老老实实，成功而快乐起来，她怎么会反对呢？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男孩遇到女孩，相爱，然后结婚。

他们也知道这桩婚事会很糟糕，这一点大家都预料得到。除去唐纳德的个人原因不说，两人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上并不合拍。认识唐纳德的人都警告他说，吉恩明确说自己不想生孩子。她要继续读遗传学的研究生，致力于治疗疾病。生孩子完全不在她的计划中。

可唐纳德不听劝。一想到不能有个自己的家庭，他就会非常难过，他甚至都不相信吉恩说过的那些话。

婚礼前几个月，1967年5月，唐纳德在大学精神科医生那里进行常规检查时，聊起了鹰隼的事。他盯着一张卡片上的抽象图案，说看到的是一座悬崖，悬崖上有个洞。他说洞里有一个鸟巢，他能在那里找到初生的小鸟并把它们带回家自己养。

医生接着给唐纳德看了第二幅图。唐纳德认为这是一个像产道一样神秘幽暗的通道，他可以通过这个通道看到一个新建立的家庭。唐纳德这是在接受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4\]](#)，刚看

了两幅图就已经让医生应接不暇了。

看着这第二幅图，唐纳德想到了诱惑。他看到一个女人想要跟一个男人性交，而这个男人，医生在诊断笔记上写道，“在犹豫应不应该接受诱惑，这使他在精神上备受煎熬”。最后这个男人决定“保持自己品行的高洁”，没有同女人性交。

第三幅图让唐纳德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嬉皮士，“他在吸毒，我猜——他已经失去意识了”。

第四幅和第五幅图让唐纳德想到了一对父子。他看见儿子躺在床上，父亲过来道晚安。唐纳德说那个父亲正准备走出门，他看见儿子伏在父亲肩膀上哭泣，想要寻求帮助。据唐纳德说，儿子做了错事，父亲正要给儿子一些指点。

看到第六幅图时，唐纳德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幅暴力感十足的画面——一个男人正在构想复仇，一个女人在劝他别这样做。“他半听不听的。”唐纳德说。

第七幅图在唐纳德看来也是复仇的场景。这次，是一个儿子正在为父亲的死复仇。唐纳德说，儿子“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理所应当，因为那个人对他和他的家人做过不道义的事”。

在最后一幅图里，唐纳德看到了自己。

“我爬上悬崖，”他说，“我站在山顶，一些老鹰朝我俯冲下来。”

[1] “吐实药”指的是能让不愿意或者无法提供自己信息的病人吐露实情的药物。——译者注

[2] McNall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chizophrenia*, 153—54.

[3] Seymour S. Kety, ed., “What Is 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Bulletin* 8, no. 4(1982): 597—600.

[4] 罗夏测验是一种人格特征分析方法。医生会给受试者看一系列有墨渍的卡片，受试者会被要求回答他们看到了什么，医生随后会据此分析并诊断受试者的人格特征。——译者注

第8章

唐纳德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屡遭不顺，而特立独行的二儿子吉姆在高中毕业后到当地一所专科学院念了一年书，打算在学业上再博一次。让大家惊讶的是，他成绩不错。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吉姆转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人人都知道，至少吉姆肯定知道，他上的新大学比唐纳德的大学好。在他和唐纳德的竞争中，吉姆一直在加分。

在博尔德待了快一年的时候，吉姆遇到了凯西。当时他20岁，凯西19岁。在一家叫朱塞佩的既能吃饭又能跳舞的俱乐部里，吉姆一眼就看中了凯西。那次她是和高中的一个老朋友一起来的，吉姆找了个机会上前搭讪。凯西当时和父母住，吉姆去她家找她，两人开始约会。有一阵子，凯西总会问起吉姆为什么鄙视他的父母。“他们总在生孩子，却不管那些小的。”他有一次这样回答说。他会抱怨自己痛恨的兄长，觉得唐纳德在高中的时候是个大英雄，而他自己却从来没让人满意过。在凯西看来，现在这些不快都过去了，至少也应该过去了。

凯西怀孕了，吉姆没多想就向她求了婚。这样的结局在多恩和咪咪看来并不理想。但说实话，他们在吉姆这个年纪干的事也

差不多。总之，现在多说什么也没有意义。吉姆就是这样，他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何况多恩和咪咪祝福过唐纳德和吉恩的结合，此时反对吉姆和凯西也说不过去。

1968年8月，吉姆和凯西举办了婚礼，比唐纳德和吉恩的婚礼晚一年。他们搬进了市区一座红砖小平房，有时候会邀请吉姆的弟弟们过来，却从来不请唐纳德，绝不。凯西跟加尔文家其他兄弟都相处得不错，但跟吉姆的母亲关系很紧张，她的来访更像是检查工作。咪咪会说：“你没有清理灰尘。”而凯西则会回答：“我没时间。这是抹布，你想打扫的话可以用。”吉姆倒是喜欢凯西这么顶他妈妈。

凯西生了个儿子，名叫吉米，比咪咪最小的女儿玛丽只小几岁。吉姆随后退了学，去酒吧做服务生，这与他原来像父亲那样当一名教师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似乎也没什么，他现在有家庭，在每个他自己能想到的方面都比唐纳德更优越。他盘下了布罗德摩尔酒店里一个常举办现场表演的酒吧，那是镇上最时髦的地方之一，这份荣耀让吉姆觉得自己赢了。

虽然吉姆沉醉于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但他还是会利用一切机会背叛婚姻。结婚前他就爱在女人堆中鬼混，现在也没有改邪归正的打算。

有一天晚上，凯西在一个酒吧门外看见了吉姆的摩托车。她走进酒吧，来到吉姆和他约会的情人桌边，把一扎啤酒浇在他们身上后扬长而去。她想警告吉姆，让他知道她也有尊严。

之后，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吉姆开始了他的报复。凯西决定辞掉白天的工作，回学校攻读一个教育学位。但吉姆会拔掉她车子的火花塞，让她没法去上课。“去找工作。”他说。有一次，凯

西搭她妈妈的车出门，回到家时吉姆早就在等着她了。他照着她的脸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随着吉姆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凯西意识到自己最后的一种办法就是威胁他说自己会离开他。有次她说了这种话，脸被吉姆狠狠揍了一顿，缝了好多针。她做不到真正离开他。每次凯西想要走，又觉得或许他会变好，或者他们的儿子需要父亲。偶尔有几次，她鼓足勇气离开家一两晚，可是小吉米会说：“我想回家找爸爸。”

还有一个原因令凯西无法决然离开。她注意到，吉姆似乎在经受着某种折磨，这种折磨与她毫无关系，但引起了她的同情。吉姆会听到各种声音。“他们又在跟我说话了。”吉姆会说。有人在监视他，有人在跟踪他，同事在合谋对付他，在描述这些“情况”时，吉姆往往情绪激动。

吉姆不再睡觉。他整夜站在炉子边，把煤气灶打开又关掉，打开又关掉。这种时候，他表现得冲动而暴力，不是朝凯西和儿子，而是朝自己。

有一次在科罗拉多泉市市中心，走着走着，吉姆把头对着一面砖墙狠狠撞过去。

还有一次，他穿戴整齐，跳进了一个湖里。

吉姆第一次去医院看精神病是在1969年的万圣节夜里，那时小吉米还是个婴儿。他住进了圣弗朗西斯医院，但不到一天就出院了。凯西为自己和儿子感到害怕。她也为吉姆担心，毕竟他还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现在要离开他似乎不大可能了。

凯西从来没喜欢过吉姆的父母，但她觉得必须得告诉多恩和咪咪吉姆的情况。她几乎不能相信他们的反应。她以为他们会

哭，或者至少表现出些许怜悯和同情。但凯西却发现多恩和咪咪在竭力假装他们的谈话根本没发生，甚至当凯西进一步催促的时候，他们反倒质问她究竟有什么企图。情况真的像凯西说的那样吗？吉姆的父母一贯不认为他们的儿子会有半点错，或者会出什么危险。他们反过来把这种状况归结于年轻夫妇之间的婚姻问题，吉姆和凯西应该努力自己解决。

事后想想，最不寻常的部分其实多恩和咪咪没有说：吉姆的哥哥唐纳德也出现了怪异的行为。他们没对任何人说过唐纳德的事，也没有打算告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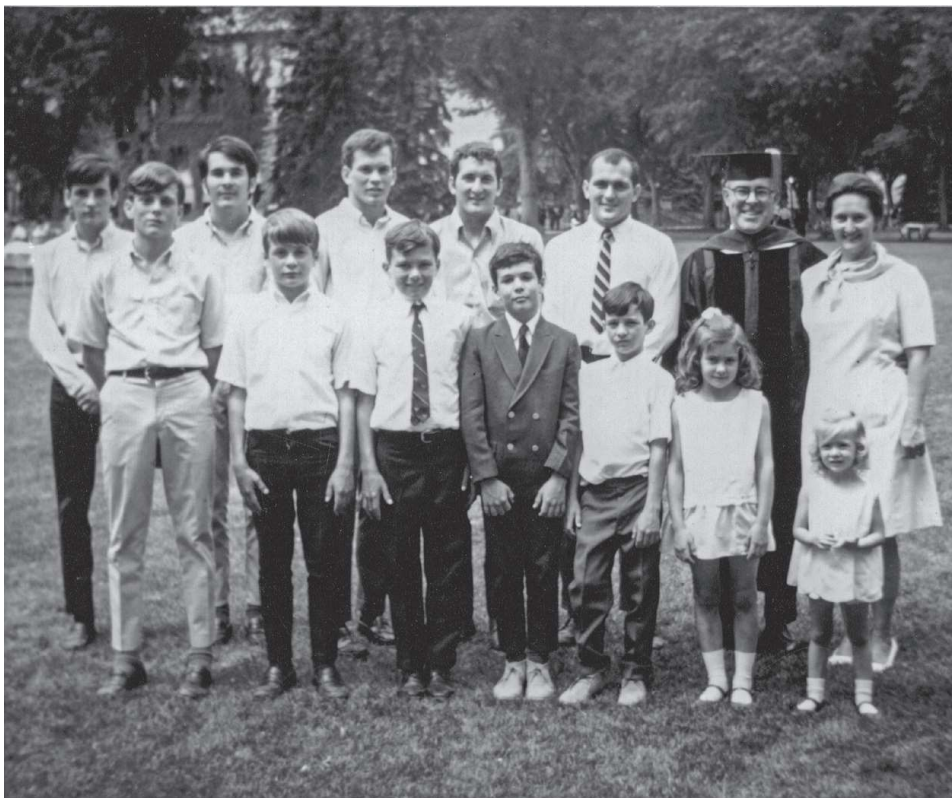
跟他们谈过之后，凯西听从多恩和咪咪的建议，带吉姆去见了一个牧师，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效果。一天夜里，吉姆完全失控了，凯西只能送他去丹佛的科罗拉多大学附属医院。吉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回到家，他答应在科罗拉多泉市的派克峰心理健康中心作为门诊病人接受诊疗。医生给他开了药，他的情况稳定了一段时间，让人感觉到了希望。

只是他仍会不时发脾气打凯西。有一次警察上门来，但凯西拒绝起诉。有一次邻居打电话报警，警察把吉姆押走了，但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不管怎样，他都是这副老样子。后来那些年，多恩和咪咪从来不过问他们之间的事。“除了那几次离家出走外，吉姆会过去跟他们住，”凯西回忆说，“我可以接受。反正他还会回来。”

1969年春季的一天，加尔文家的12个孩子相对平静和睦地参加了父亲在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典礼。44岁的多恩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为纪念这一天所拍摄的照片，是加尔文家唯一一张父母孩子所有人同框的相片。多恩穿戴着博士帽和博士袍，头发已经有些斑白。咪咪站在他身边，一身乳白色春装，系一条金黄色

丝巾，头发梳到后面。两个女儿，玛格丽特和玛丽，穿着相称的白色连衣裙站在父母前面。10个儿子都在父母的右边，排成两行，像保龄球瓶那样挺得笔直。

吉姆站在后排，左数第四个，黑头发有些蓬乱，苍白的脸上挂着汗珠。在之后的岁月里，咪咪常指着照片说，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当时她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吉姆遇到了大麻烦，不单是他一直表现出的特立独行，而是丧失了理智，跟唐纳德一模一样。



1969年，12个孩子及咪咪和多恩，庆祝多恩获得博士学位

第9章

1964年

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

大萧条时期的一个春日，在美国一个熙熙攘攘的市镇，一对情绪不佳的夫妇迎来了四个一模一样的女儿——妻子生了四胞胎。记者赶去采访这个罕见的故事，而四胞胎的父母因为才思枯竭，便允许一家当地报社举办征名比赛，为四姐妹取名字。他们接受了当地乳品厂的热情赞助，让四个女儿为牛奶做广告，还收取费用让访客一睹四胞胎的模样。

但钱无法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其中一个女儿在22岁时精神崩溃，其他三个也接连发病。四姐妹在23岁时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1955年年初的几周里，这四名25岁，DNA完全相同的姐妹被转到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

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明白，这四姐妹的病例是一次罕见的机会。他们估计，四胞胎同时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大约为15亿分之一。四姐妹由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和研究者大卫·罗森塔尔（David Rosenthal）负责诊治，他后来成为20世纪精神分裂症遗传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专家，部分原因正是他对这四胞胎的研究。

四姐妹在精神卫生研究所待了3年，在此之后，罗森塔尔和他的团队（由20多名专家组成）还对她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研究，其间用化名来保护她们的隐私。他们给姐妹们取了个姓氏，叫吉内恩（Genain），这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不幸的降生”，而名字则取自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首字母NIMH，分别是诺拉（Nora）、艾瑞斯（Iris）、米拉（Myra）和海斯特（Hester）。她们所生活的城市从未被披露过，她们的父母被称为亨利（Henry）和格特鲁德（Gertrude）。1964年，加尔文一家刚搬进隐谷路的新家那年，罗森塔尔出版了《吉内恩四胞胎》（*The Genain Quadruplets*），这本600页的专著研究了家族性的精神分裂症，后来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这份病例研究严谨而细微地探析了先天与后天的问题，当时的学界认为，这本书对于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堪比丹尼尔·保罗·施瑞伯的病例。[\[2\]](#)

吉内恩姐妹来到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时候，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生理或遗传标记物的探寻在精神分析领域已经不再流行——这些观点似乎已经被包括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在内的新一代治疗师彻底驳倒了。而在另一片天地里，在精神分析师不曾涉足的大学实验室和医院，神经病学家和遗传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在寻找精神分裂症的生物标记物。这些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对双胞胎的研究。要确定遗传因素对某种疾病影响的大小，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并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共患这种疾病的概率。欧洲和美国的研究者们开展了很多这种类型的双胞胎病例研究并发表了重要发现，[\[3\]](#)其中开先河的是埃米尔·克雷佩林1918年的研究。在这之后的1928年[\[4\]](#)、1946年[\[5\]](#)和1953年[\[6\]](#)，也有其他人陆续涉足这个领域。每一项研究得到的数据都表明，精神分

裂症存在遗传因素，尽管数字还不算特别令人信服。每一次，精神分析学家的回应都几乎一样：你怎么知道这种疾病在家族中发生不是因为家庭环境，不是因为患病者的母亲？

在精神卫生研究所，大卫·罗森塔尔很快意识到，这个共患精神分裂症的四胞胎可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争论。“在得知这四胞胎既是同卵四胞胎，又患有精神分裂症后，”罗森塔尔写道，“任何人都会忍不住想得到更多证据。”^[7]但他也知道这并不容易。他在关于这个病例的记述中提到，很多精神治疗专家，包括他在精神卫生所的很多同事，并没有被说服。吉内恩姐妹的父母基本上是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她们的：给她们穿相同的衣服，送她们去相同的学校，让她们结交相同的朋友。有人说，正是因为父母对待她们如出一辙才导致她们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罗森塔尔和同事们收集了吉内恩一家的家族史，发现了至少一例精神疾病病例。女孩们的奶奶在青少年时期明显有过一次精神崩溃，所表现出的症状被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病例调查员确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遗传因素只能解释四胞胎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她们在很多方面其实大不相同。诺拉是老大，相当于四胞胎的代言人，钢琴弹得最好，智商也最高，但也爱耍性子；^[8]艾瑞斯被认为“脑袋空空”的，但挺会做家务，懂得穿衣打扮；^[9]海斯特则安静、持重、孤僻，被罗森塔尔描述为“蓬头垢面，总是一副灰姑娘的样子”；^[10]米拉的个性更为“光芒四射”，但矛盾的是，有时她显得感情淡漠，好像在扮演着别人的角色，而且演得不够到位。^[11]从幼年时起，她们的妈妈就尽量让诺拉和米拉同艾瑞斯和海斯特分开，因为她认为诺拉和米拉比另两个女孩聪明。^[12]

这一家的家庭生活也有问题。研究者了解得越深入，事情就越显得蹊跷，先只是奇怪，后来则骇人听闻。这家父母两人都虐

待孩子。父亲酗酒、出轨，据说还性侵过两个女儿。而母亲在有一次发现其中两个女儿在互相手淫后，晚上会把两人绑束起来，给她们服用镇静剂，最终还强迫她们做了割阴手术。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格特鲁德就是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和格雷戈里·贝特森所描述的那类母亲：控制欲极强并且极度焦虑，以至于其行为会使女儿遭受某些形式的创伤。“很容易看出，她的家人越长时间表现出体弱多病，她的满足感就会越持久，”罗森塔尔写道，“她的家就是她主宰的医院。”^[13]

吉内恩姐妹的童年从未有过一点正常之处，包括她们的就学，当然也包括她们性方面的发育。罗森塔尔甚至把这些女孩的经历比作由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和创伤理论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提出的所谓“极端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制于无法逃脱的情境，没有保护，永远摆脱不了危险。^[14]“几乎从四胞胎被从医院抱回家那一刻起，一种对外界的恐惧、猜忌和不信任的氛围就在她们家蔓延开来，”罗森塔尔写道，“窗帘拉起来，篱笆扎起来，枪支准备就位，吉内恩先生时刻在巡逻……他们常怀着对孩子遭绑架的担忧……觉得威胁无处不在。”^[15]

四胞胎童年的经历似乎影响了实验的说服力。如果吉内恩姐妹的家庭像，比方说，加尔文一家那样更主流、更具中产阶级特点的话，精神卫生研究所做的这种先天/后天实验一定会更令人信服。

即便如此，将吉内恩姐妹身上发生的事归结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还是让罗森塔尔觉得非常稳妥。在学术界，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单个基因异常导致的，也有人觉得纯粹是环境的问题。这两种观点罗森塔尔都不认同，他在《吉内恩四胞胎》中首次指出，遗传和环境因素可能会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精神分

裂症。他还探讨了未来应该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以打破僵局，厘清遗传和环境因素在这种疾病中扮演的角色。

“在理论的构建上我们一定要更为谨慎和准确，”罗森塔尔写道，“那些强调遗传作用的人很少会认真考虑环境因素的作用，而环境决定论者往往对于考量遗传因素也非常敷衍。”^[16]他表示，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这两种观念之间架起桥梁。“当然，遗传和环境，”他写道，“两者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罗森塔尔的结论让两方都不满意，但他仍然始终坚持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他完全不知道这种理论需要多久才能被广泛接受。他决心跳脱出自己的时代，用吉内恩姐妹的病例去证明精神病可能不单纯来源于先天或后天，而是两种因素结合的产物。

^[1]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关于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吉内恩一家的研究都来自：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2] Irving I. Gottesman,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no.5427 (1965): 114.

^[3] Mads G. Henriksen, Julie Nordgaard, and Lennart B. Jansson, “Genetics of Schizophrenia: Overview of Methods,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1 (2017).

^[4] H. Luxenburger,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psychiatrische Serienuntersuchungen an Zwillinge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116 (1928), 297—326.

^[5] F. J. Kallmann, “The Genet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an Analysis of 691 Schizophrenic Twin Index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3 (1946), 309—22.

^[6] Eliot Slater, “Psychotic and Neurotic Illnesses in Twins” (1953), in Slater, *Man, Mind, and Heredity*, 12—124.

^[7]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7.

- [8]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362.
- [9]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16—17.
- [10]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16—17.
- [11]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364.
- [12]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73.
- [13]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567.
- [14]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548.
- [15]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566.
- [16] Rosenthal, *The Genain Quadruplets*, 579.

第10章

一天，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咨询中心，唐纳德跟精神科医生反复说起自己同吉恩婚姻的幸福问题。

他一会儿说他们曾去墨西哥宿营，共度过6周开心时光，一会儿又承认自打婚礼后，日子就没好过。1970年，也就是婚后第3年，他开始认为自己之所以娶吉恩，是因为他在遭到前任未婚妻玛丽莉的拒绝后感到消沉失意，他还认为现在与吉恩的生活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婚姻。

这原本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唐纳德聊起来却并没有显得很难过，而是表现得固执、漠然、苛刻，甚至有些多疑。他的医生是科林斯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精神病学家，名叫汤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他注意到唐纳德身上有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质，一种抹平他所有个性的严格的自制，好像他在努力压着一个盖子，不让盖子下面的自己爆发出来。“他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他写道。

唐纳德和吉恩现在都已毕业，但还住在科林斯堡。唐纳德是研究助理，在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仍然梦想有朝一日能从医，吉恩也在攻读她的硕士学位。那天，唐纳德说他之所以来学校的咨

询中心，是因为有熟人建议他找一个敏感性训练小组，帮他更好地与妻子沟通。但没多久，他坦白了自己来这里的真正原因：吉恩跟他说，三周后她会离开他。



唐纳德

唐纳德坦诚地对帕特森说最近情况非常糟。吉恩抱怨说唐纳德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家的时候又让她觉得很受威胁。以前都是她不愿意做爱，现在只有她求欢，唐纳德才会同意，大约一周一次。他们分开吃饭，睡在各自的卧室里。唐纳德承认自己不怎么跟吉恩说话，有时候还会对她恶语相向威胁她。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吉恩似乎已经受够了。她受邀秋季去俄勒冈州立大学担

任一个博士课程的带薪助理，不再需要唐纳德来养她。“换句话说，”帕特森写道，“这是一段恶劣的婚姻关系，两人实际上是同床异梦。”

虽然唐纳德看起来很平静，但帕特森知道，自从多年前第一次跳进火堆后，唐纳德已经看过很多医生。帕特森甚至记得观看唐纳德做罗夏测验的场景，他当时觉得唐纳德的表现“非常病态”。6月的那天，帕特森试图走进唐纳德的内心，他希望唐纳德暂时放下目前的婚姻危机，更多地谈谈他自己。他们的谈话很快就发展成了真正的治疗。唐纳德告诉帕特森，多年来他一直浑浑噩噩，只是在努力成为其他人希望他成为的样子。他说他努力揣摩人们的面部表情、手势和话语，尽可能从中寻找提示，以便做出回应。他把那次冲进学校篝火的疯狂举动解释为寻求关注，说自己在多次精神检查中撒过谎。他还说他最近参加了一个东方哲学的活动，在活动中斋戒了4天，并带着炫耀的口吻说现在自己的体重已经降到了158磅^[1]。帕特森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无论唐纳德在谈话中抛出什么东方术语，只让帕特森觉得他越发无趣——谈不上虚伪，但也不算真诚。帕特森常常觉得唐纳德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却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帕特森认为，要是唐纳德曾经表现出一丝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征兆，甚至“做过一些古怪或暴力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与现实世界有良好的接触，”帕特森在笔记中写道，“但他有些逃避，可能在与别人的深度交往中不是很投入……他对挫折的耐受度很差，对于威胁到自己的人或情况容易放弃。”帕特森怀疑唐纳德压抑的情感是因为过久地抑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这种观点将唐纳德的问题全部推到了吉恩的身上。“他屈服于她的欲求，”他写道，“长期严重压抑自己的感受，这导致他现在难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帕特森结束了治疗，让唐纳德第二天再回来多谈谈。唐纳德再来的时候，像是奇怪地变了个人——状态轻松，甚至很高兴。他说他和吉恩谈过，她听说唐纳德在看医生，便取消了离开的时限。唐纳德说他俩还一起出去吃了饭，并且吉恩同意和他一起接受婚姻情感治疗。

帕特森深受鼓舞，但既然唐纳德想要他的帮助，他觉得他也可以从唐纳德那里获取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说他考虑对唐纳德和吉恩进行婚姻情感治疗，需要唐纳德同意他查看其医疗档案，了解他的精神病史。

唐纳德有些不快。他告诉医生自己不相信心理测试。他认为他做的那些测试站不住脚，确信自己的医疗档案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由于这类原因，治疗很难开展，”帕特森写道，“他能顺畅地跟人交流吗？”

在离开诊室前，唐纳德谨慎地接受了一份个人测试问卷，带回家用铅笔填写。他的回答如下：

填写句子，表达你的真实感受。

尽量填完每一题。每个句子要写完整。

我喜欢：驯鹰、做爱、游泳、旅游、滑雪、与人沟通。

家：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好地方。

男人：应该在思维方面更灵活一些。

母亲：应该关心孩子的成长。

我觉得：紧张。

我最大的恐惧：不能坚持我的初衷。

在学校：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不会：说“我放弃”。

运动：能培养性格。

当我是个小孩子时：我现在还是小孩子。

我痛苦：因为我自怜（不太厉害）。

我失败：在化学上。

有时：我不是很在乎。

我的痛苦：主要来自他人。

我偷偷地：希望一个人待着时能有好心情。

我想要：太多。

我最大的担心是：决定做什么。

不到一周后，6月一个周五的晚上，唐纳德和吉恩又吵了一架。吵来吵去还是老一套，只是这次更为剑拔弩张。吉恩没法忍了，因此离开了他们的公寓。唐纳德跟着她，发现她没走远，坐在一条灌溉渠旁边的地上。她大概是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想躲着他。唐纳德一看到她，就说想把她扔进渠里淹死。

吉恩劝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两人勉强一起回到公寓，不过吉恩把话说得很清楚：她要一个人搬去俄勒冈，不带他去。

第二天是周六，唐纳德早上还在为前一晚的争吵生气，也气吉恩决定要离开他。他吃了一些麦司卡林（mescalinum），后来他说这种药不仅让他头脑清楚，还让他想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一个完美的计划。

那天晚上——1979年6月20日——唐纳德带回了两粒氰化物片剂，很有可能是从学校实验室里弄来的。唐纳德把药放进一杯盐酸中，然后抓住吉恩，试图让她不能动弹——两人的脸就在玻璃杯的正上方，氰化物已经开始挥发，正从杯中飘散出来。

他的计划是两人一起死。

此后，唐纳德没有来接受预约的治疗。帕特森周一早上打开报纸才知道原因。

科林斯堡警方：早上10：20，住在阿吉村27G的唐纳德·肯尼恩·加尔文，24岁，受到保护性拘留，涉嫌自杀和谋杀他人。今天早晨他被地方检察官关押进市监狱。他之前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生健康中心接受过治疗。

唐纳德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许是他放开了吉恩，或许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抓紧。吉恩挣脱出来，发疯似的跑出去报了警。读到报纸上这则消息后，帕特森在一家医院见到了唐纳德，他在那里接受“禁闭治疗”。与此同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决定是对他提出指控，还是强制他住院。帕特森惊讶地发现，唐纳德仍没有从这次事件中走出来。他说话时表现得欣喜若狂，甚至在自吹自擂，就像漫画里一眼就能看穿的反派在炫耀自己骗了别人好多年一样。他说起了他杀死的猫，不过这次的情绪不再是害怕，而是

洋洋得意。他还说最近他在浴缸里肢解了一只狗，只是为了激怒吉恩。

从帕特森的治疗笔记中看不出唐纳德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究竟是之前故意蒙蔽了帕特森，还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崩溃了？是帕特森没有注意到他身上的暴力征兆，还是帕特森太过信任唐纳德了？

不过，这一切都结束了。唐纳德得到了新的诊断。“他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帕特森写道，“他从喜悦到沮丧之间的情绪变动很大……我认为住院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

科罗拉多州立医院位于普韦布洛，由一系列普通而高大的砖石建筑组成。由于病人越来越多，医务人员的人数也在增长，周边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这些医务人员就住在小镇上。这座医院建于1879年10月，最初叫科罗拉多州立精神病院，只有十来个病人，设施不过是一座农舍。^[2]在当时，即使是丹佛以南100英里处的普韦布洛，也只是平阔沙漠上的一座沉睡的市镇。医院在1917年改了名，从此收治的病人增加到了2 000多人。每个住到那里的病人都对出院不抱什么希望。

普韦布洛医院早期的病人接受的是无休无止的化学和电休克治疗，目的是使他们镇静下来。20世纪20年代，优生学运动势头凶猛，普韦布洛的医生们在没有得到合法批准的情况下给这里的女性病人做了绝育手术。没人觉得这会有什么不好。“我们认为这是个小手术，”医院长期的主管医生弗兰克·齐默尔曼（Frank Zimmerman）多年后说，“这样她们就不会生出更多有精神缺陷的孩子了。”^[3]

到20世纪50年代，医院收治的病人已经超过5 000人，[4]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区，规模比科罗拉多州最大的县城还要大，很多家庭一家三代都在这里工作。医院无法依赖州议会获得拨款，因此安排病人自己种粮食，运营乳牛场、养猪场、花园和纺织品工厂，普韦布洛成了精神病人的永久聚集地。当时最常用的治疗手段有治疗抑郁症的电休克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治疗躁狂症的水疗法和治疗三期梅毒的发热疗法。

直到栗居精神病院这样的机构改变了各界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后，普韦布洛和其他州立医院中盛行的残酷治疗才成为世人广泛讨论的话题。揭露这种现象的最早期也最有力的作品，是玛丽·简·沃德1946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蛇穴》。小说讲述了纽约一家州立精神病院的病人被滚烫的洗澡水烫以及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故事。小说后来被翻拍成了电影，由著名影星奥利维娅·德哈维兰主演。1959年，普韦布洛的科罗拉多州立医院也被写进了一本书里。这本书的书名叫《护工》，是一个名为达里尔·塔尔法的前员工写的具有煽动性的影射小说。抛开《护工》里那些肥皂剧桥段不提，这部小说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一些常用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如电休克疗法、氯丙嗪、镇静剂、单独关禁闭、苯巴比妥钠、阿米妥钠等。通过一个人物漫不经心的描述，这本书鲜活地展现了医院高安全级别病房里的情况：“这些人大多是变态的精神病患者。在这里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大多数时候他们想要性交，想快活和喝酒。因为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癫狂，所以需要让他们忙起来。得让他们干活，一个都不能闲着。我看护的病房里有一个人都被绑住两个星期了。她的记录表上写着，她接受过200多次电休克治疗。200多次！想想有多恐怖吧！”[5]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中，书评作者说《护工》吹响了

调查改革州立精神病院的号角。[6]1962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发表了一篇30页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普韦布洛医院。[7]这篇文章揭露了很多《护工》中提到的问题：忽视和虐待病人；医生无证上岗（至少有一名医生醉酒上岗）；病人逃走，到处乱跑；医疗职业学校成了“堕落活动中心”；医院操场的一处阴暗区域甚至成了病人相聚和性交的场所，被称为“树丛维尔”。另有一次，周一被汇报的病例一直到周六才被处理，结果造成病人死亡。

事实表明，改革近在咫尺。约翰·肯尼迪总统1963年推行的《社区精神卫生法》——这项法令的缘起主要是肯尼迪最大的妹妹罗丝玛丽悲剧性地被切除了额叶，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下令缩减像普韦布洛医院这样的大型收容机构的规模。这本应是个好消息，可以让那些并非必须住院的人出院，让每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得到更多的照顾。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联邦政府为精神病患者腾空大型收容机构的同时，普韦布洛的医生正倾尽全力在病患身上使用一种神奇的新型神经安定剂，免除了医生——照料病人的高昂成本。

这种药物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精神病学领域之外的发明，但在20世纪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药物中，影响力却最大。1950年，一位名叫亨利·拉博里（Henri Laborit）的法国外科医生将麻醉剂、镇静剂和安眠药混合在一起，试图研制出一种新型的战地麻醉剂。他将这种药称为氯丙嗪，并在1952年首次进行了人体试验。拉博里描述说，使用他这种新药的病人表现出“快乐而安静的状态”，变得“平和而昏昏欲睡，表情放松而漠然”。[8]拉博里甚至把新药的效果比作“化学额叶切除术”。[9]1954年，氯丙嗪在美国上市，商品名是“托拉灵”。

在加尔文家兄弟长大成人的那些年，氯丙嗪被广泛认为是一

种特效药，能够使病人镇静下来，避免手术和电击治疗。1970年，当唐纳德被送到普韦布洛时，市面上已经有20多种氯丙嗪类药物。对普韦布洛医院这样的大型州立医院来说，这些药物能一举多得，达到其他疗法无法达到的效果：实现肯尼迪时代对于精神病治疗的愿景，不用再监禁病人，使更多病人能恢复出院。然而氯丙嗪并不能治愈精神病，它的确能减缓某些症状，但最多也只是让病情暂时缓和一下而已。此外，医学界从一开始就发现这种药存在副作用，比如震颤、烦躁不安、肌张力降低、体位异常。[\[10\]](#)在拉博里看来的“平和而昏昏欲睡”，在其他人的看来更像是病人被打晕失去了知觉。有些病人甚至一直就处于这种药物导致的木然状态中，一旦他们停止服药，下一轮出现的精神病症状往往比之前更为剧烈。然而，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许是氯丙嗪是如何起效的？

甚至时至今日，也没人能确定氯丙嗪以及其他精神安定剂的起效原理。几十年来，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生理机制始终欠缺明晰的认识，但一直在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起初，研究者能做的只是检查氯丙嗪对病人脑部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理论。第一套可信的理论出现于1957年，提出者是一位名叫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的瑞典神经药理学家。[\[11\]](#)卡尔森认为，氯丙嗪可以阻断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消除很多难于遏制的疯狂幻觉，从而达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卡尔森的理论奠定了“多巴胺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过于活跃的多巴胺受体导致了精神分裂症。[\[12\]\[13\]](#)然而多巴胺假说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另一种精神安定剂氯氮平可以比氯丙嗪更好地缓解精神分裂症状，但它对多巴胺受体的作用方式与氯丙嗪正相反——氯丙嗪是抑制受体，而氯氮平则是提高多巴胺的水平。[\[14\]](#)如果两种抗精神病药物能在不同方向上影响多巴胺的水平并且都有治疗

效果，那么就需要某种多巴胺假说以外的理论来解释它们的作用原理了。

实际上，从唐纳德那时起直到现在，每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都是以氯丙嗪或者氯氮平为基础研制的。氯丙嗪和它的类似物成了众所周知的“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而氯氮平类药物则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两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不过氯氮平跟氯丙嗪一样也有危险：由于它会引起血压急剧下降和癫痫，公众对此非常担忧，这导致这种药物一度被下架了超过十年。即便如此，药物治疗仍然成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见手段，精神病学界内部原本就已经很大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大型州立医院的医生们认为精神分裂症需要药物治疗，而远离临床的治疗专家们仍在建议心理治疗。

同大部分家庭一样，加尔文家也受制于空有其名的精神卫生保健系统，只能被迫接受他们无法评估的选择。最终，影响他们决定的是费用的问题。尽管保险公司会为空军职员的子女支付医疗费用，但唐纳德已经24岁了，已经超过了承保年龄。最终的决定由不得他们，普韦布洛是他的唯一选择。

唐纳德在看守所等待6天后才被送到普韦布洛。在这6天里，一想到要进精神病院，他就越来越感到害怕。入院面谈时，他说他有非常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他拿氰化物对吉恩和自己所做的事：他在这之前几周第一次服用了拍约他碱，后来他听说这种药物是一种致幻剂。他说他现在没问题了，不会反对他妻子离开他，还说在第一任未婚妻离开他时他也像这样“紧张”过，后来也好了。

普韦布洛的医生很警觉。“要考虑精神病发作，”病历上写道，“诊断：抑郁性神经官能症，或精神病性抑郁症。”

第二天与医生见面时，唐纳德紧紧攥着桌子，准备自己站起来，还坚持说自己很健康。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想住院。虽然医生不是非常相信他，但如果抛开氰化物事件不谈，他们也不是很确定唐纳德的病情究竟有多严重。最后，医生给出的新诊断是“中度到重度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症，有强迫症的特征”。

唐纳德住进普韦布洛的时候，那里病人的数量已经从顶峰时期的6 000人缩减到2 000多人。不过真正可以照顾病人的医生寥寥无几，因此这里的医疗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改进。照顾病人的员工被称为“精神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基本的护理训练，但大多没有取得护士学位。精神技术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分发氯丙嗪、氟哌啶醇等药物。这些药片基本代替了医生的工作，被大批量地送到病房，由精神技术人员派发给病人，药量也常由这些技术人员自行决定。“就跟发点心似的。”曾在普韦布洛医院担任过几十年医学总监的阿尔伯特·辛格尔顿回忆说。

医生给唐纳德开了两种药。一种是盐酸丙咪嗪，这是一种百忧解出现前使用的抗抑郁药物，副作用比百忧解严重。另一种是盐酸硫利达嗪，这是根据氯丙嗪的作用机制生产的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但这种药后来被发现有时会引起心律失常，最后被下架了。在接受了几周的治疗后，1970年7月15日，唐纳德从普韦布洛出院。由于他接受过精神病住院治疗，因此不需要继续坐牢。

在他住院期间，吉恩递交了离婚申请书。

唐纳德回到了隐谷路的家中，多恩和咪咪也随之需要做出选择：他们应该停下手头的事待在家里陪生病的儿子吗？还是给他机会自己照顾自己，夫妻俩继续出去完成联合会的工作？

最后，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选择。联合会不仅是让他们过

上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的唯一途径，还是家庭收入的仅有来源。要是多恩和咪咪不去参加联合会的那些活动，要是多恩一个人去圣塔菲或盐湖城，告诉别人他们成年的儿子患病待在家里，而且婚姻也失败了，那么就会引发很多他们不愿回答的问题。出于这些原因，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改变现状。

因此，他们帮唐纳德在丹佛一所商学院的招生部找了份工作。唐纳德随后被派去北达科他州招生，离家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咪咪和多恩在9月飞到盐湖城参加了西部芭蕾舞团的演出，又在11月再次飞到盐湖城，出席了欢迎阿根廷驻美大使佩德罗·爱德华·里奥及其妻子的午宴。“我坐在来自墨西哥城的领事旁边，”咪咪用酒店的信纸写信给她妈妈说，“他和他的妻子用西班牙语和多恩交谈，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咪咪还得意扬扬地提起多恩给交响乐团、芭蕾舞团等组织拨款75 000美元。“你会对他在这么多领域的建树感到骄傲的！”在信的结尾，咪咪也提到了女儿们：“玛丽和玛格丽特非常想见你。她们长得很快，今年可能是全家所有人聚到一起来看你的最后一年了！”

和唐纳德住院相关的事情，无论是他攻击妻子、离婚、住进普韦布洛医院，还是接受药物治疗，咪咪都只字未提。她不敢。

唐纳德出差去的北达科他州离吉恩当时居住的俄勒冈州一点也不近。但他还是借此机会西行一千多英里，去跟即将和自己离婚的吉恩面谈。两人只谈了5分钟，吉恩就告诉唐纳德自己不会再见他了。唐纳德的伯父克拉克住得不远，他找到唐纳德后把他送回了家。

回到隐谷路后，唐纳德声称他和吉恩的婚姻在精神方面依旧存在，因为教堂还没有签署他们的离婚证明。他宣布自己想当牧

师，并向教区递交了申请。教区派了一些人来见他，唐纳德滔滔不绝地聊起自己的梦想，说要建造一所新教堂来纪念圣裘德，来者观察了几分钟，会面差不多就结束了。唐纳德再也没有收到回音。

一天下午，8岁大的玛格丽特放学回到家，看到唐纳德赤裸着身子在尖叫。她环顾家中，发现屋子完全空了。她哥哥把每一件家具都搬出去，堆到了山上。玛格丽特还记得妈妈叫她把自己锁在主卧里时脸上那副忧心忡忡的表情——主卧是家里唯一有锁的房间。她还记得看到5岁的玛丽已经在主卧里等人来做伴了。过了一会儿，妈妈也来了。咪咪说她们不能乱跑，必须等警察来把唐纳德带走。

通过锁着的门，玛格丽特听到唐纳德喊着《圣经》里的语句和一些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她还记得警察过了很久才到。最后，她听到车子碾轧碎石子车道的声音，看到卧室墙壁上映照的红蓝色闪光。

她还记得妈妈走出卧室，告诉警察：“他可能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其他人。”

她还记得自己走出主卧，看到哥哥坐在警车的后座上，还记得自己看着红蓝色的光渐渐隐没在远方。

她还记得，不知过了多久，唐纳德又回到了家。

[1] 1磅≈453.6克——译者注

[2] Nell Mitchell, *The 13th Street Review*, 7.

[3] Mike Anton, “Colorado Routinely Sterilized the Mentally Ill Before 1960,” *Rocky Mountain News*, November 21, 1999.

[4] Nell Mitchell, *The 13th Street Review*, 47.

[5] Telfer, *The Caretakers*, 218.

[6] Frank G. Slaughter, “Life in a Snake-Pi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1959.

[7] “Pueblo Grand Jury Blasts State Hospital Program,” *Colorado Springs Gazette Telegraph*, May 19, 1962.

[8] M. Lacomme et al., “Obstetric Analgesia Potentiated by Associated Intravenous Dolosal with RP 4560,”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de Gynécologie et d’Obstétrique de Langue Française* 4: (1952): 558—62, cited by Bertha K. Madra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Antipsychotic Dopamine D2 Receptor: A Basis for the Dopamine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22, no. 1 (January 1, 2013): 62—78.

[9] H. Laborit and P. Huguenard, “L’hibernation artificielle par moyenns pharmacodynamiques et physiques,” *Presse médicale* 59 (1951): 1329, cited by Heinz E. Lehmann and Thomas A. Ba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pharmacology of Schizophreni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2, no. 2 (March 1997): 152—62.

[10] Theodor Kyziridis,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Schizophrenia,” *Germ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8, no. 3 (2005): 42—48.

[11] Arvid Carlsson and Maria L. Carlsson, “A Dopaminergic Deficit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The Path to Discovery,”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8, no. 1 (March 2006): 137—42.

[12] Bertha K. Madra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Antipsychotic Dopamine D2 Receptor: A Basis for the Dopamine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

[13] 多年后，卡尔森与人合作，将第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重吸收抑制剂投入市场，这种药物正是百忧解的前身。他在多巴胺领域的研究对帕金森病的治疗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使他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

[14] S. Marc Breedlove, Neil V. Watson, and Mark R. Rosenzweig, *Biological Psychology*, 5th ed. (Sunderland, Mass.: Sinauer Associates, 2007), 491.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11章

1971年6月一个明媚的周一，一架喷气式飞机载着70名西部芭蕾舞团的成员降落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萨尔迪机场。每年夏天，这个来自盐湖城的芭蕾舞团都会来阿斯彭短暂驻留，为一群在这里也购置了漂亮房产的富裕而友好的观众演出。但这年夏天有些不同，西部芭蕾舞团要提前彩排并演出6个新剧目，以筹备夏末进行的欧洲巡演。此外，还会有几位客座出演的明星加入，包括旧金山芭蕾舞团的琳达·梅耶、伦敦节日芭蕾舞团的卡雷尔·西莫夫，以及他们那一代最优秀的男性舞者之一，来自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雅克·丹波瓦。

机舱门打开，走出三位客座舞者，他们笑容满面，魅力四射。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长筒袜、木底鞋和妈妈手工缝制的薄纱裙，爬上舷梯。玛格丽特·加尔文当时只有9岁，黑色的长发梳着中分，脸上露出顽皮的微笑。她将一束鲜花献给雅克·丹波瓦。她是迎宾团的一员，被选中代表父亲运营的西部芭蕾舞团前去献花，这让她很开心。

多恩和咪咪随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去阿斯彭，让玛格丽特开心得不得了。她当时唯一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加入西部芭蕾舞团跳

舞，她甚至学芭蕾舞团的舞者，穿着他们爱穿的那种纯蓝木底鞋。夏天，玛格丽特会穿着妈妈给她在时装店买的衣服，在阿斯彭上课，一天三节，还学哑剧和踢踏舞。12岁时，玛格丽特凭加尔文家的人脉进了芭蕾舞团，在阿斯彭每天从早上7点练习到下午3点，然后直接去彩排，之后匆匆回家扒两口饭，晚上参加演出。玛格丽特的妹妹玛丽大一点后，常常和玛格丽特一起外出，在阿斯彭冒险。她们会沿着褐溪来回散步，寻找蘑菇，在阿斯彭高地一起乘坐吊椅索道。姐妹俩都注意到人们希望跟她们的父亲聊天，寻求他的意见，而他跟任何人在一起都那么从容自在，手中一般会端着一杯马提尼。她们的母亲看上去也很开心，尽管咪咪有的晚上会一边喷着雅诗兰黛香水，一边焦躁地跟女儿们抱怨说家里没有钱让她买需要的衣服。

男孩们呢？在唐纳德住进普韦布洛医院前的那些年，他很大程度上已经跳脱出了加尔文家的生活。他结了婚，住在离隐谷路至少两小时车程的地方。生病后，他有时在家，有时在医院，有时试着独立生活，他有时会在一些商店里工作，有时会挨家挨户地卖东西。只要唐纳德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住在外面的，去阿斯彭和圣塔菲的那些旅行就可以继续。

吉姆也已经结婚了，同凯西和吉米住在科罗拉多泉市市中心。更小的几个兄弟里，约翰和布莱恩在上大学，迈克尔和理查德还是高中生。他们偶尔会去阿斯彭和圣塔菲，其余时间则留在家照看四个弟弟乔、马克、马特和彼得，带他们去参加集体训练，保证他们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参加联合会的旅行，不过他们宁愿去打篮球或者冰球。

而对于两个女孩来说，出门旅行意义重大。玛格丽特会装作自己一直生活在当地，没有其他烦恼。要是哥哥们也和她们一起来了，魔咒就会被打破。你们不能待在这里，玛格丽特看着

乔、马克、马特或者彼得甩着毛巾或在泳池里打水仗时，心里会这样想。这里是我的地方。她不想跟任何哥哥待在一起——无论是在隐谷路还是其他地方。

1963年刚搬到隐谷路时，玛格丽特才刚刚学会走路。在那些欢乐的童年时光里，她的存在主要是作为哥哥们的“玩物”。她的哥哥们也都有过这种经历。“我们就像一个球。”她的哥哥理查德说。据他回忆，在他还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时，曾在陈旧的客厅里被踢得团团转。作为女孩，玛格丽特和玛丽也都做过大家的玩具。

十个男孩会聚在一起，嬉笑逗弄玛格丽特，还会排成一排打她的屁股，纯粹为了打发时间。刚开始玛格丽特觉得很好玩，因为她崇拜哥哥们。她比最小的哥哥彼得小2岁，比最大的唐纳德小17岁。在长大一些后，她会穿过后院的矮栎，爬上松树，看哥哥们在山顶搭建三层高的树堡，还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在男孩们建好树堡后，玛格丽特有时会有点不敢爬上去，哥哥们就会笑她是小娘们儿，于是她还是会爬上去。

玛格丽特非常敏感，兄弟之间的争端哪怕跟她没有关系，她都会放在心上，无论是摔跤还是打架。很快，这些打斗就牵扯上了她。随着她慢慢长大，她不再像个吉祥物，更像个攻击的靶子。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哥哥们会从山顶朝她扔松果或者装了水的气球。她一到家，打屁股的“游戏”也已经准备就绪，但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性侵害的意味。有一次，马克被哥哥们教唆着冲上去把玛格丽特“办了”。她被奇怪地摸了一番，但在一些哥哥看来，这种恶劣的欺凌不仅没有恶意，而且十分有趣。



顺时针从最上开始：彼得，马克，乔，马特

这算是性侵吗？或者只是一群活跃的男孩不知分寸，没有规矩，互相动手动脚，正好她是其中的女孩子？玛格丽特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她太弱小了，无法公然与他们对抗。她渴望受到宽慰和保护。在隐谷路的家，24小时都是摔跤比赛，安全感无处可寻。

玛格丽特成长期中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布罗德摩尔世界冰场的观众区观看哥哥们的训练和比赛度过的，妹妹玛丽后来也是如此。这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四个男孩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一起打比赛，冰球是他们最拿手的运动。乔秉性温和，善于内省；马克是象棋天才，敏感细腻，至少按照加尔文家的标准，乖得超乎寻常；马特更喜欢捣乱，但有制作陶器的天赋；年纪最小的彼得是

家中最大的反叛者，比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叛逆，除了说“不”，不会跟咪咪和多恩说别的。几乎每周，四个男孩中总有一个会因为冰球比赛中的出色表现而登上科罗拉多泉市的《公报》，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当四兄弟中有三人都在读高中，并且属于同一个球队时，如果乔和马克在比赛中助攻马特进了球，播报员会播报说“球被加尔文传给了加尔文，加尔文又把球传给了加尔文”。

不训练在家时，男孩们会互相考有关运动的冷知识，只要电视上有比赛就都会看，会摔跤和打架。有一次，马特在冰球比赛中撞碎了下颌还伤到了大脑的枕叶，被匆忙送往急诊室，连续几周头上都满是钢钉和密密麻麻的缝线，而这种事在加尔文家男孩们中属于家常便饭。为了寻求庇护，玛格丽特会待在厨房里帮助妈妈做家务，听她絮絮叨叨抱怨每天的烦心事。她会跟妈妈一起去市场，她们一人推一辆购物车，里面装着足够一大家子需要的日用品。妈妈会对她的言行、学业和绘画不住地指责，她则始终保持顺从，不敢回嘴。

6年级时，老师表扬了玛格丽特的绘画，这使她的心中产生了涟漪。只有跳舞时她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她感到自己可以凭空创造出东西，有意义的东西，比哥哥游戏房里的家具更有价值的东西。她曾仔细观察过妈妈画水彩画，画那些蘑菇和小鸟。现在她在考虑自己是否有一天也能做这样的事情。

但玛格丽特有点容易被咪咪吓到，不敢在这方面跟妈妈比。她总是想从咪咪那里获得更多赞许、肯定和支持，多到超出妈妈愿意给予的程度。于是她只能暂时把脑中的想法放到一边。

加尔文一家搬到隐谷路时，唐纳德已经在上大学了，偶尔会

回家。从普韦布洛出院后，他似乎要永久地在家里住下了，直到病情好转为止，或者至少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独立生活为止。这样的日子在大家看来都遥遥无期，当时玛格丽特8岁，跟他共处的每一天恐惧都在增加。唐纳德会举行一个人的弥撒，喊着“真福八端”“万福玛丽亚”和《圣经》中的段落，而信众也只有他自己。在这之后，他会去艺术品商店买些廉价的画框，挂满家里的墙壁，框里都是一词箴言，比如“真诚”什么的。要是感到在家太压抑，他会在房子周围、镇子，甚至州内走上数百英里。

每周日的弥撒，咪咪都要求孩子们为唐纳德祈祷。不过在外人面前，她会紧张地笑着说，他们这个12个孩子的大家庭显得有些疯狂，或者古怪，或者可爱，就像电影《浮生若梦》里的那家人一样。关于唐纳德，她说得最多的是自从他妻子离开后他就变了。她还说那个女人不适合唐纳德，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现在他怎么也忘不了她。“她根本算不上一个妻子——她不是。”咪咪会摇着头说。虽然咪咪没有明说，但她实际上在暗示儿子的问题出在受到的感情伤害上。

随着咪咪越来越追求完美主义，女儿们成了她最信赖的助手。两个女孩都努力帮妈妈做事，倒垃圾、擦地板、洗盘子、布置桌子、吸尘、清理浴室，就好像在院子里乱走或者在地板上打滚的25岁的哥哥不存在一样。18点永远是晚餐时间，只要在家，哪怕是穿僧袍转悠一天的唐纳德，都要坐下来吃饭。咪咪也想拉着唐纳德跟家里其他人一起出游，但结果不一定好。她曾经带唐纳德去看过冰球赛，但他却在人群中间跪了下来并开始祈祷。那天晚上，他嚼着满嘴的牛排，对桌上的人说他在吃他父亲的心脏。

唐纳德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9岁、10岁、11岁，玛格丽特一天天地长大，唐纳德的状况始终支配着他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

面。玛格丽特和玛丽已经习惯了他和还住在家里的其他哥哥们拳脚相向。有一次，唐纳德认为一个弟弟偷了他的药，就想要掐死他。还有一次，唐纳德吞下了一整瓶药片，又把救护车招来了。唯一愿意公开聊聊唐纳德的问题的人是吉姆，特立独行的二儿子。他喜欢回家来坐坐，把大家心里都在想的话说出来：你他妈闭嘴！滚出去！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滚出这里？你这个年纪还住在这里干什么？

吉姆给唐纳德起了个外号：“黏答答”。这个名字被大家叫开了。年纪小一些的弟弟妹妹们一天要嚷嚷这个名字好几次。戏弄唐纳德比躲着他感觉好多了，不用再遮遮掩掩。把唐纳德当作玩笑的对象，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把握无法解释的局面的掌控感。无论唐纳德什么样，他们是不可能跟他一样的。

一天下午，唐纳德把刀架在了咪咪身上。玛格丽特冲到厨房，想要打电话报警，不过这次唐纳德猛地蹿过来，一把将电话从墙上拽了下来。玛格丽特大哭起来，啜泣不止。电话线中的电流刚刚击到了她。

咪咪试图控制住局面，她再次叫玛格丽特躲到主卧里并锁上门。玛格丽特照做了，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过了很久，她听到厨房里传出了扭打声，还听到了叫喊声，不过是其他人的声音。

乔和马克冰球训练后回来了。他们保护着咪咪，与唐纳德对峙。玛格丽特这时觉得，妈妈大概得救了。

唐纳德气势汹汹地跑了出去，发誓自己再也不要回医院。后来，玛格丽特没有听到别的动静，只有妈妈的哭泣声。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12章

吉姆常常介入进来，保护弟弟妹妹免受唐纳德的伤害，这让他备感满足，甚至像是一种胜利宣言。吉姆经常让弟弟妹妹到自己家过夜。他带玛丽和玛格丽特去看电影、溜冰、游泳，还带她们去他工作的布罗德摩尔山坡上滑雪，乘坐著名的曼尼托索道。他还教会了玛格丽特放风筝和骑自行车。家里的孩子们都坐过吉姆的雅马哈550摩托车。

家里气氛太紧张时，咪咪和多恩会带女儿们去吉姆和凯西那里住上整个周末。凯西就像两个女孩的妈妈，给她们梳头、卷发，三个人一起看桑尼和雪儿的综艺节目。

对于两个女孩来说，做出选择非常容易。只要能避开唐纳德，她们更愿意跟吉姆和凯西在一起。对于咪咪和多恩来说，吉姆是救星，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卸下了他们肩头的负担。

吉姆对妹妹们非常好，既好客又殷勤，当他开始对她们动手动脚时，似乎没有人看出有什么不对劲。

他每次的手法都差不多，总是会在深夜。他通常在酒吧换班后喝得醉醺醺地回来。电视开着，凯西睡了，他会走进客厅，躺到玛格丽特睡的绿碎花沙发上。玛格丽特还记得鱼缸里发出

的“咕噜咕噜”的气泡声，还记得沙发——那是咪咪不要了给他们的——的蓝绿色锦缎花纹，藤编的摇椅面朝着厨房，地板上煤渣砖之间码着一排唱片，窗户朝院子开着，还记得对面也是一栋两层楼，电视台结束节目时播放着国歌。吉姆会把手指伸进她的身体，他也试过用阴茎，不过从来没有成功过。

玛格丽特记得，吉姆最初碰她是在她大约5岁的时候——1967年左右——在唐纳德第一次去普韦布洛之前几年。那时她开始偶尔在吉姆家过夜。但她太小了，不懂这种行为属于暴力。控制、关注以及吉姆对她的动手动脚交错在一起，到最后她觉得这一切好像有点像爱恋了。随着偶尔的过夜变成整个周末都住在吉姆家，一切变得自然而然。有一次，她跟吉姆去一家卖石头饰品的商店，她久久地盯着一枚叫作“虎眼”的石头看，吉姆就买下来送给她了。多年来她一直都很喜欢这枚石头，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

大约12岁时，玛格丽特对吉姆的感觉发生了转变，那时她还没来月经。她开始在晚上推开他、拒绝他。直到那时，她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吉姆对她做过的事。她尤其不会告诉小妹妹玛丽，因为在玛格丽特看来，玛丽太小了，不可以知道这种事。玛格丽特没想到的是，在被自己拒绝后，吉姆把手伸向了玛丽。

当玛丽七八岁的时候，她在跟姐姐的一次独处时间问玛格丽特有没有被吉姆骚扰过。玛格丽特的回答言简意赅，让人无法接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多年后，两姐妹才会再次聊起吉姆的事。

两个女孩是最先注意到吉姆一点一点变得像唐纳德那样反复无常的。除了晚上会对妹妹们不轨，他还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与

凯西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虽然吉姆从来不打她们，但她们见过他有时打凯西，脾气说来就来，好像瞬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又会变回原来的吉姆。但后来，吉姆开始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玛丽还记得，为了躲开吉姆，她曾不止一次不得不跟着凯西和吉米离开屋子。

姐妹俩十多岁的脑袋估量着，要躲开隐谷路的家，获得几天清静，就得忍受吉姆对他妻子的暴力，还得晚上提防着他。

但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同凯西和吉米待在一起，给了她们在家无法得到的归属感，因为在家时注意力都被放在了别处。在家时，她们害怕吉姆在和唐纳德的争斗中赢，因为唐纳德随后会表现得很可怕。光是这一点就能解释她们为什么还要不断去吉姆那里。

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

她们确实太小，不是很清楚吉姆的行为对不对，因为吉姆不是第一个对她们做出这种事情的哥哥。

关于童年，玛丽最早的一段记忆，是布莱恩在她大约3岁时猥亵过她。玛格丽特也记得布莱恩不止一次越轨地摸过她。布莱恩是大家都喜欢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很快离开了家，两姐妹没有跟别人说过布莱恩的事。

这就是加尔文一家的真实情况，咪咪和多恩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过，也绝不会允许自己看到。当吉姆侵犯两个妹妹时，隐谷路这个家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在为所欲为，无须担心任何后果。

第13章

如果说唐纳德是加尔文家男孩中让人望而生畏的老大，吉姆是人人厌恶的老二，那么老三约翰·加尔文却总是极力置身事外。他是家中最热爱古典音乐的人，专注练习音乐，认真履行学业，在家里尽可能躲开其他兄弟。1968年秋天，他获得了奖学金，离开家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学习音乐，从此很少回隐谷路。

1970年秋天，约翰大三那年，他恋爱了。带着些许惶恐，他将新女友，同为音乐生的南茜，领回家见了家人。刚踏入家门，约翰就感到不应该安排这次见面。家里比他离开时更糟了。整个家已经变得与外界格格不入。过去大家还常常去野外放鹰、爬山，如今他们尽可能把唐纳德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他发现妈妈早已准备好了一些话题，绝不让谈话转到唐纳德身上。她大谈特谈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炫耀自己认识很多名流，显露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优越感，还有关于肯尼恩外公老掉牙的故事以及乔治娅·欧姬芙的新八卦。当时的唐纳德在对着垃圾桶喃喃自语，或者踱来踱去，烦躁地说个不停。大家都看得出来，咪咪的状态从来没有这么糟过，但她仍试图驾驭住留在家中的8个孩子，至少让外人相信家里没什么问题。

约翰和南茜假装让气氛轻松一些。他们为咪咪弹钢琴，从马拉加舞曲、肖邦的练习曲到贝多芬的奏鸣曲，一直弹到深夜，这让咪咪很开心。可能是因为新的情侣有时能接受伴侣直视自己羞于承认的事实，这使南茜对眼前见到的一切更敢于发声。南茜说她来自一个人数“正常”的小家庭，而且不停地说隐谷路的这座房子像一片陷入混乱无序中的感情废墟。无休止的打斗，缺乏个人空间，四套上下铺，没有人能够独处。一个母亲怎么能在这种“高压锅”里抚养这么多孩子呢？而且其中还有两个小女孩，她们到底有没有隐私可言？住在这里的人哪里还可能有时间静下来思考？

约翰看着自己的父母，看到两人在竭力挽留昔日的荣光。他们的早年曾充满希望，现在的生活却近于一无是处。约翰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次他回家，父亲把他拉到一边，叫他要比自己更成功，叫他放弃音乐，学习政治。“搞音乐是个自私的职业，”多恩说，“你把大量时间花在练习室里，不跟人打交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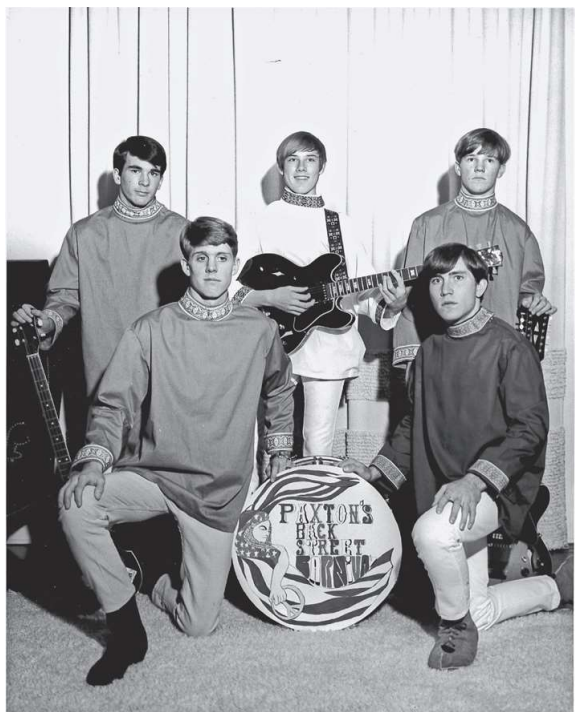
父亲的话让约翰很难过，但并不惊讶。他从来不觉得多恩会认可他。在童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太多人在意他，他不觉得自己引起过父亲的注意，更不觉得自己给他留下过什么好印象。不只是约翰一个人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多恩·加尔文在儿子们的生命中保持着高大的形象，驯鹰者、知识分子、战争英雄、机密情报官员，如今又是州长和石油大亨的顾问。10个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认为自己无法成为父亲那样厉害的人物。

在1971年约翰和南茜的婚礼上，多恩向新娘的母亲袒露心声说：“她嫁的是我这群崽子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听到这句话，没有谁会比约翰更震惊了。

老四布莱恩·加尔文是加尔文家相貌最俊的男孩，甚至比轮廓刚毅、具有典型美国长相的唐纳德更帅气。多恩给他起了个“黑骑士”的外号，因为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其他兄弟相比，布莱恩跑得更快，投球更狠，音乐天赋也非他人能及，甚至超过了用功的约翰。有一次，多恩和咪咪发现，在听完广播里的一首曲子后，布莱恩立刻就能一丝不差地在钢琴上弹奏出来，无论是古典音乐、爵士乐、布鲁斯、摇滚乐，还是其他任何类型。他们立刻就开始送他去上私教钢琴课。

布莱恩虽然才华横溢，却安静、腼腆。他经常跟小自己6岁的老八马克下棋，而马克碰巧又是个象棋高手。布莱恩虽然内向，但却是那种轻而易举就能吸引父母最多关注的孩子，他的疏离、神秘，反倒让父母更想取悦他。多恩和咪咪也折服于布莱恩的才能，唐纳德情感状态的大起大落让他们非常担忧，于是他们把期待寄托在了其他儿子的成功上。因此，当布莱恩和一些高中朋友要组一个摇滚乐队时，多恩给布莱恩买了一把崭新的哈佛纳牌贝斯，跟保罗·麦卡特尼的那把一模一样。

男孩们给乐队起名为“帕克斯顿后街嘉年华”，名字来自草莓闹钟乐队一张唱片中的一首歌。他们翻唱过披头士乐队、大门乐队、荒原狼乐队、滚石乐队、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和僵尸乐队的歌曲。布莱恩负责弹奏贝斯和吹长笛，也是乐队指挥，懂得每首歌曲的细枝末节，脑中能记住谱子，做到分秒不差，还要把曲子教给乐队的其他成员。有一个暑假，他开始自学电吉他，秋天就胜任了电吉他手的角色。“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他是我们中最有才华的那一个。”乐队的电风琴手和领唱鲍勃·摩尔曼说，他也是空军学院的负责人托马斯·摩尔曼将军的儿子。



布莱恩（最左）和他的乐队成员

布莱恩的乐队在全州各处演出，从格伦伍德斯普林斯，到丹佛，到南特立尼达。演出的场合也花样繁多：高中毕业舞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舞会、在丹佛召开的天主教青年组织全国大会，虽然布莱恩他们尚未成年，但还在当地一家叫作VIP的酒吧定期演出。1968年春的一天，他们正在丹佛表演，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枪声——原来是马丁·路德·金遇刺引起的小规模骚乱。科罗拉多泉市在越战时期有点类似军事基地，但帕克斯顿后街嘉年华乐队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气质，深得老一辈人喜爱。摩尔曼将军出了一些力，让乐队发展得更为顺利。他会在天气恶劣时派人探查州际公路的路况，保证男孩们驾车演出的路上平安无阻。放学后，布莱恩和乐队队友会去摩尔曼家。摩尔曼家位于空

军学院高中的一角，是一幢很大的私人住宅，有更多空间可以排练。乐队表演成了学院的保留节目，他们会为来访的重要人物表演。一次，著名演员露西尔·鲍尔在空军学院拍了一集（分上下两部分）她的新剧《露西来了》。露西尔在拍摄完后有礼貌地听了帕克斯顿后街嘉年华的演唱，还和每位成员握了手，大家都很好奇露西尔会怎么评价他们。当理查德·尼克松来学院参加学员的毕业典礼并讲话时，5名黑衣特工打断了乐队的彩排，他们不相信空军学院负责人的车库里竟然会有一支摇滚乐队在排练。

多恩和咪咪出门时，比如带女儿们到阿斯彭或圣塔菲去的时候，布莱恩会在家里办派对，几乎所有高中同学都会来，其中大多数人会围着布莱恩的弟弟们抽大麻。布莱恩也开始吸食LSD致幻剂。不过对于多恩和咪咪来说，布莱恩从来都没有问题，他才华出众，又相貌堂堂。他们从来没想到，布莱恩可能跟唐纳德一样，正在遭受不为人知的精神疾病的折磨。

毕业后，布莱恩像约翰一样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学习音乐。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发现大学不适合自己的。不再有什么能让他有归属感，帕克斯顿后街嘉年华也不再是让他魂牵梦绕的寄托，于是他计划去西部，希望新组一个乐队玩音乐。布莱恩他们在本地的最后一次演出引起了轰动，但原因并不是音乐本身。1971年6月10日，演出在丹佛郊外一个叫作红岩的露天剧场举行，以翻唱杰思罗·塔尔乐队的歌曲开场。演出门票早早就已售罄，而且有一千多名歌迷无票到场，挤不下的人群便被引流到稍远一点的一个场地。这中间有的人开始攀爬露天剧场的围墙，有的人则冲向大门。最后警方出动了直升机，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

这场演出后来被称作“红岩骚乱”，几十年后依旧有人记得，算是滚石乐队“阿尔塔蒙特骚乱”的科罗拉多迷你版本。在这场骚

乱中，有28人受伤并在当地医院接受医治，其中包括4名警官。当时16岁的理查德和18岁的迈克尔·加尔文都记得自己站在离骚乱很远的安全地带，观看他们的摇滚明星哥哥。当警察开始使用武力驱散人群时，布莱恩还在前面吹着长笛。据迈克尔回忆，当时“只有他和那个吉他手”还在演奏，并不是因为布莱恩离得太远闻不到催泪瓦斯，而是他太投入音乐了，完全没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

同一年夏天，1971年，迈克尔·加尔文——家中的老五，也是唯一欣然接受嬉皮士标签的儿子——高中毕业了。他对未来毫无计划，却对此颇为得意。迈克尔不是个有野心的人，上大学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不知怎么总是能找到法子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1969年至1970年间，相继发生了阿尔塔蒙特骚乱、曼森杀人案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1]，但对1971年的迈克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60年代的劲头还没消退。尽管越战愈演愈烈，他从未想过报名参军，但不愿参战并不是因为他是一名良心反战者[2]。如果说迈克尔有计划的话，他的计划就是见缝就钻、静观其变。

迈克尔在这个夏天离家独立，开始筹划自己的人生。他先搭顺风车去了阿斯彭，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读哈利勒·纪伯伦的《先知》和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巫士唐望的教诲》。迈克尔也翻了翻这两本书，从此就再没把它们放下过。并不是作者说的什么具体的话让他开了窍，而是因为书中所呈现的价值观，与他从小被迫接受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完全不同。在吸食了大麻和LSD致幻剂之后，这些新思想很容易被吸收，而这还只是大千世界诱惑的一部分。

从阿斯彭出发，迈克尔和一个朋友一起搭顺风车去了印第安纳州，之后独自继续东行，期望及时赶到纽约，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为孟加拉国筹款的演唱会。但他没能到达纽约：他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耶路撒冷的河里洗澡被捕了。迈克尔在看守所待了11天，法官可怜他才放了他。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隆再次被捕，这次是因为非法游荡。面对法官，他完全不配合。

“你从哪里来？”法官问。

“我来自地球。”迈克尔说。

在看守所被关了几天后，他才决定打电话回家。

“你有什么能帮我的吗？”迈克尔问父亲。

“我给你寄张机票。”多恩说。迈克尔记得，在他父亲为他担保后，他就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

像这样的挫折并没有给迈克尔带来什么打击。“我想我已经可以从容面对一切了。”他后来回忆说。进看守所、在公园露宿、在河里洗澡，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拓宽眼界的冒险，也让他逐渐明白现实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他从小笃信的那些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真的。

然而，迈克尔始终无法适应家中的生活。他猜想，20世纪60年代的热潮悄无声息地绕过了隐谷路。其他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找寻自我，他和兄弟们却一个个穿得差不多，至少在去教堂做礼拜时是如此，无一例外地穿着大衣系着领带。大家就像是在军营里一样，服从安排，整齐划一。如果加尔文家有男孩敢质疑咪咪——迈克尔经常这么干——她很少会妥协。

咪咪——而不是多恩——是迈克尔生来就注定会针对的家中

权威。“我父亲是空军军官，但我母亲才是空军背后的总指挥。”迈克尔说。他还说，“父亲当时不在家”，不仅兼着两份职，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负责管教我们。我们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把床铺得像镜面一样平整，都是因为母亲的要求，不是父亲。”咪咪对儿子们的说教常常没完没了，她对异议无动于衷的态度也令人难以想象。“你是说不动她的”，迈克尔说，咪咪的意志“就像一条单行道”。

作为青少年，迈克尔的办法是尽量不回家。他与朋友结伴，手上夹着大麻烟卷在外面闲逛。他喜欢想象多恩50年代末在斯坦福的样子，那也是肯·克西的时代，这位反文化偶像因为写过小说《飞越疯人院》而知名，后来和美国各地尝试LSD致幻剂的流浪汉成立了一支乐队。想到“驯鹰者”多恩·加尔文上校服用迷幻剂的场面，大家就会狂笑不止。在家里，迈克尔越发胆大。他违抗加尔文家的着装规范，切掉了乐福鞋的鞋跟，弄得跟美洲原住民似的。每当迈克尔显露出抽完大麻后飘飘欲仙的样子，多恩就会坐下来劝导他，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情况越来越糟。因此，1968年秋天，多恩和咪咪把当时15岁的迈克尔送到了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跟叔叔婶婶住一个学年，让他有机会清醒一下头脑，学会独立，少给父母添麻烦。当时的迈克尔并不知道，父母正在焦头烂额地处理唐纳德的事情。迈克尔很快就喜欢上了佛罗里达。他的堂弟们都比他小一点，很喜欢他水瓶座的性格。他在新学校交朋友也完全没有障碍。迈克尔第一次服用致幻剂是在1968年11月22日，之所以会记得日期是因为当天晚上著名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在杰克逊维尔演出。迈克尔和他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巴奇·特拉克斯一起去看了这场演出，巴奇当时刚和一个叫杜安·奥尔曼的人组了个摇滚乐队，迈克尔那年经常待在巴奇家里。第二年，也就是1969

年，巴奇和杜安的乐队变成了后来著名的奥尔曼兄弟乐队。

迈克尔那时已经回到科罗拉多，高中最后时光还是约束在加尔文家的条条框框中。唯一一次打破这种陈规的机会是在1970年，当时隐谷路的家已经变成唐纳德的精神病院，他在离婚和住院后变得非常迷茫，情绪不稳定。迈克尔完全无法理解唐纳德，也不太能容忍唐纳德痴迷于专制的天主教。他开始对唐纳德发脾气，多恩和咪咪不知道他俩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唐纳德的错还是因为他俩太像了。唐纳德的状况，加上吉姆不时发作的妄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多恩和咪咪清醒过来。如果两个儿子都无法融入现实生活，他们觉得迈克尔大抵也会如此。

情况果然如此。1971年秋天，年轻的迈克尔人生中决定性的阶段出现了。他高中毕业了，开车做了一趟公路旅行，进了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看守所。在这之后不久，多恩和咪咪就把他送到了丹佛总医院，住进顶楼的精神科病房进一步观察。

迈克尔需要服用三氟拉嗪，一种跟氯丙嗪差不多的抗精神病药物。他只住了一周左右，就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他觉得自己没疯，或者正在好转，因此要离开这里。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儿，于是他出逃了。

他瞅准机会——也是第一个机会——溜出医院，搭顺风车来到了一个朋友家并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你们不能逼我回那里，”他说，“我也不打算回家。”

多恩和咪咪感到进退两难。迈克尔已经18岁了，严格说来已经不再受他们的管控。因此他们便提出一个权宜之计：他觉得去加州看望哥哥布莱恩怎么样？

迈克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离开科罗拉多后，布莱恩还不时与兄弟们联系。有一次，理查德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支大麻烟卷，裹着红白蓝色的包装纸，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享用来自杰弗森飞机乐队的礼物”。

几个月后，兄弟们听说布莱恩实现了他最初的目标。他成立了一个新乐队，名叫“袋边街”，是以《霍比特人》中比尔博·巴金斯家附近的一条街命名的。这正是迈克尔眼下最渴望进行的那种冒险。对他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便是有机会去旧金山湾区，让他那个红头发的英俊天才哥哥把他引进嬉皮士和音乐家的圈子。

但迈克尔在到达以后才发现，布莱恩的新生活并不像他夸耀的那样精彩。布莱恩甚至都没有到达湾区。他和他的乐队在萨克拉门托租了个房子，离海滨有1小时的车程。布莱恩为了付房租得整天工作，大部分时间迈克尔都是一个人待着。之前期待的完美旅行如今有点让人失望。不过袋边街乐队很不错，表演的音乐与摇滚、爵士、布鲁斯都沾边，布莱恩负责吹奏长笛，也是乐队最大的亮点。和以前一样，布莱恩再次成为乐队中最突出的乐手。这支乐队跟他高中那支不一样，做的是原创音乐，还打算录制唱片。迈克尔偶尔会跟着他们去巡回演出，帮他们把哈蒙德电风琴从货车上抬上抬下。

迈克尔只待了一个月，没多久就惹上了麻烦。一天，独自待着无聊，迈克尔决定去看看太平洋。他知道路很远，因为这里是萨克拉门托，但他有时间，也知道方向，心想只要沿着某条运河走，就能到达太平洋海岸。他走了大半天，最后放弃了，开始往回走。路上他抄小道经过一个拖车停车场，走上了一条土路。他看到路中间有一个花园用的软管接头，于是把它捡了起来，放在

最近的一辆拖车的台阶上，然后敲了敲门。这个举动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警察在离布莱恩住处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抓到了迈克尔。在听到有个警察提到“非法侵入”和“盗窃未遂”时，他很吃惊。他不懂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觉得可能因为自己是嬉皮士，所以招人忌恨了。他发了一通火，之后才意识到萨克拉门托的警察可不像宾夕法尼亚州耶路撒冷的法官那样宽宏大量。

在看守所，迈克尔明白了盗窃未遂是一项重罪指控。他从未在法律方面惹过这么大的麻烦。在等待开庭期间，迈克尔试图交朋友。关在隔壁牢房的人教他用餐食里的奇迹牌面包做吐司：把卫生纸卷起来，用点香烟的火柴把卫生纸点燃，生一小堆火，把面包放在上面烤。迈克尔学会了，然后被逮了个正着，被单独关进了一间小黑屋。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有这种地方存在。

在被单独关了几天后，他得到了一个见医生的机会。迈克尔同意了，那位医生把他转到了看守所的医院。迈克尔有了室友和电视，一切似乎终于回到了正轨。但接下来情况又发生了彻底的反转：由于萨克拉门托总医院没有足够的病房，迈克尔要被转到加州臭名昭著的阿塔斯卡德罗精神病医院，这座精神病医院拥有最高的安全等级，关了2 000名精神病人。

迈克尔在一年中第二次被进了精神病医院，而且这一次的精神病医院还很像一座监狱。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脑子没有问题。被关在这里的人要么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要么杀了自己的银行客户经理。直到这时迈克尔才醒悟过来，眼下不再是儿戏，而是真实的人生。

迈克尔被告知他只是在阿塔斯卡德罗接受观察，但没人告诉他要待多久，这种悬而未决更让人不安。

他父亲来探望过他，但这次已经是爱莫能助了。

布莱恩也来过，但他给弟弟的最大程度的安慰只是“人生在于旅途的过程，而不在于终点”。

5个月后，法庭同意迈克尔认罪以换取减刑。没有辩说的余地，迈克尔只能忘掉一切，继续过日子。他在阿塔斯卡德罗的时光也不是完全没有乐子：迈克尔遇到了一个雅基印第安人拳击手，跟他讲自己的哥哥曾经和著名拳击手舒格·雷·罗宾逊打过比赛。不过这种机缘巧合没引起迈克尔的兴趣。他同意布莱恩的话，人生的确在于旅途的过程，但旅途也有好坏之分。

有一点迈克尔很确定：他跟唐纳德不同。他没疯。他会用余生向所有人证明这一点，包括他的父母。他认为他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观点与别人不同，不代表就有精神分裂症。要是那样，每个嬉皮士都可以说是疯子。

他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潮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只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权威或者军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有可能被当权者贴上“疯子”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大众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已经不再限于弗洛伊德和氯丙嗪，人们开始谈论把一个人简单地诊断为精神病人这种行为，认为这是一种陈规和权力的工具，是一种管制独立思想和自由的手段。

这种反文化现象的根源要追溯到反精神病学运动。在十多年前，一批精神病治疗师几乎不假思索地完全拒绝接受关于精神失常的传统假说。50年代，让-保罗·萨特提出，妄想只是一种超越“现有的平庸”并迎接想象世界的极端方式。^[3]1959年，受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的影响，反传统的苏格兰精神病学家罗纳德

·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指出，精神分裂症是遭受创伤的灵魂对自我的保护行为。[4]莱恩曾言辞尖锐地谴责说：“额叶切除手术和镇静剂在病人体内圈出了一座疯人院。”[5]他认为精神病分裂症病人退缩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因为他们不想招致他人的关注，以此保护自己的自主权。毕竟，病人主动变成石头，总好过被别人变成石头。[6]1961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出版了著作《精神病院》。他在书中探究了精神病院中的生活，并得出结论：是医院将疾病的概念灌输给了病人，而不是反过来的情况。[7]同年，芬兰精神病学家马蒂·奥拉维·西伊拉拉（Martti Olavi Siirala）指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就像先知，能看到社会的神经官能症——我们集体无意识的共同精神病。[8]还是同一年，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教父托马斯·沙茨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作品《精神病的神话》，书中称精神病是掌权者用来对付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一种概念，是将有不同思想的社会群体去人性化并投入贫民窟的一种手段。[9]

一年后的1962年，一本小说横空出世，使反精神病学运动进入了社会主流。《飞越疯人院》描述了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中的残酷现实，暗喻社会管控和权力压迫。小说讲述了“麦克”——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默菲，一个轻微犯罪分子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反叛者，在疯人院里与医护人员斗智斗勇，最后被恶毒的权威力量击败的故事。[10]在被拍成电影前，《飞越疯人院》就已经成为反文化运动的奠基性迷思，与电影《逍遥骑士》和《雌雄大盗》一样浪漫而影响深远，极好地解释了世界的运行方式，揭露了扼杀上一代人文化的原因。

当然，再往回深溯，社会上将精神疾病与有创意的艺术冲动等而视之的观念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艺术家是反叛旧习和讲真话的人，是疯狂世界里唯一清醒的人。甚至连弗里达·弗洛姆-

赖克曼在1957年去世前的几年，也开始相信在一些精神病患者的孤独精神世界中，有一种“次要因素”使他们“成为更敏锐、更敏感、更无畏的观察者”。^[11]她列举了患有精神疾病的作曲家、画家和作家，指出他们之所以才华横溢，是因为他们无法与他人达成直接、常规的交流。弗洛姆-赖克曼认为，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就像宫廷小丑，他们讲述的让人不适的真相是我们其他人不愿意听到的。她还用塞万提斯的小说《玻璃人》为例来阐述这种观点。小说写的是一个村里的傻子一直受到周围的人的善待，因为他嘴里冒出的话虽然是让人痛苦的事实，但仍可以被大家视作疯言疯语，一笑置之。后来这个人开始康复了，周围的人却百般阻挠，因为害怕他们突然需要把他说的每个字当真。

到20世纪60年代末，反精神病学运动不再只关注精神疾病的治疗，以及与之相关的创造性和艺术，也开始涉及政治、正义和社会变革。莱恩在自己1967年出版的书《经验政治学》中指出，精神失常的人其实一直都是神智正常的，并且认为将人定性为精神分裂在本质上是一种迫害。“如果人类继续存在，我猜想未来的人会将我们自以为的开明时代视为不折不扣的黑暗时代，”他写道，“他们应该比我们更能饶有趣味地体会到这种情况下的讽刺性。我们会成为笑柄。他们会看到，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是一种形式的启蒙，这种启蒙常常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像光一样照进我们完全闭塞的思想。”^[12]

迈克尔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错误，在于他是在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其中存在某种压迫。”他会说。迈克尔认为强制服从会侵害一个人的健康，他把兄弟们身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此。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在他看来，他们似乎是作茧自缚，没有人，包括他在内，能找到办法解放他们。

1972年，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在他们受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作品《反俄狄浦斯情结：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指出，家庭结构是专制社会的隐喻。^[13]他们认为，家庭和社会都会试图控制自己的成员，压抑他们的欲望，如果他们反对大集体的组织原则，就会被宣判精神失常。

精神分裂症此时已经成为一种隐喻。理论家们完全抛弃了疾病的概念，执着于对其进行彻底颠覆。与此同时，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成了文化战争的附带牺牲品。

^[1] 1970年5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在肯特州立大学举行反越战抗议活动的学生开枪，造成4名学生死亡，9名学生受伤。——译者注

^[2] 此处的良心反战者，或者说良心拒服兵役者，是指出于个人良心、宗教信仰等道义理由拒绝服兵役的人。——译者注

^[3] Sartre, *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169, cited by Laing, *The Divided Self*, 84—85.

^[4] Laing, *The Divided Self*, 73, 75, 77.

^[5] Laing, *The Divided Self*, 12.

^[6] Laing, *The Divided Self*, 51.

^[7] McNall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chizophrenia*, 149.

^[8] Arieti, *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125—26.

^[9]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188, 176.

^[10]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1] Fromm-Reichmann, “On Lonelines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essa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328.

^[12] La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107.

^[13]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34—35.

第14章

1967年

波多黎各，多拉多海滩

6月末的骄阳下，在地处热带的一家酒店里，大卫·罗森塔尔参加了一场精神病学界顶级思想家云集的学术峰会，探讨精神分裂症以及这种疾病究竟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导致的，这一争论从未停止过。问题很有必要开会讨论了，因此才出现这种空前的盛况。^[1]

到20世纪60年代，氯丙嗪引发的革命大大提高了讨论的必要性。对于那些赞成遗传或者说先天论的人来说，抗精神病药的药效至少证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生物学过程。但在持后天论的精神病学家看来，氯丙嗪之类的药物仅仅抑制了症状，不过是顶着光环的镇静剂。要治疗精神分裂症，除了深入探究引起这种疾病的无意识冲动，别无他法。这次会议是一次打破僵局的谨慎尝试。罗森塔尔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分裂症方面的首席研究员，也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心理治疗阵营的参会者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专家，其中有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家庭动力学的研究先驱西奥多·利兹（Theodore Lidz）。为了体现对生物学家和谈话治疗师不偏不倚的态度，会议颇费心思地起了“精神分裂症的传播”这个名称。甚至会议地点选在波多黎各的多拉多海

滩，都意在缓和紧张气氛，创造和平友好的环境。

在关于吉内恩一家的书出版之后的3年里，罗森塔尔一直在从不同角度研究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四胞胎方面的工作接近尾声时，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研究相同环境下长大的兄弟姐妹具有局限性。于是他开始好奇，如果让有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孩子在其他家庭环境中长大会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先天易感并与至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一个遗传背景相同但被基因不同的人收养长大的孩子，哪一个更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在这次会议上，他准备宣布他的初步研究结果。根据这些研究结果，他认为先天论的观点是正确的。

罗森塔尔和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所长西摩·凯蒂（Seymour Kety）在丹麦为他们的研究找到了实验人群。[\[2\]](#)丹麦是很多遗传学研究者倾心的国家，因为这里的医疗记录保存得极好，也愿意将资料分享出来供科学研究。他们得以查阅档案，寻找被收养后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随后又研究了收养这些患者的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健康记录，寻找关联，并排除了大量患病孩子正好被患病家庭收养的病例。最后，他们将患病的被收养者与对照组，也就是那些在自己亲生父母家中长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搞清楚先天和后天到底哪一个因素会造成更多的精神分裂症病例。

他们的研究发现，两者差别很大。在多拉多海滩的会议上，罗森塔尔宣布，生物学因素，而非与有精神分裂症史的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可以解释几乎每一例精神分裂症病例。成长的地点和抚养者，似乎都与发病毫无关系。整体而言，虽然精神分裂症很少从父母直接遗传给孩子，但有精神分裂症史的家庭将这种疾病传给后代的可能性是其他家庭的四倍多。

这份结果充分说明，精神分裂症在家庭中会曲折地传递下去。单这一点就让人极为震惊。但在分析收养病例的过程中，罗森塔尔和凯蒂还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后天论”，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遗传学上和养父母没有关联的孩子，没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可以从患病家长身上传播到被收养孩子的身上。罗森塔尔总结说，如果一个人在遗传上对精神分裂症不易感，那么这个人就不太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

罗森塔尔认为自己终于解决了争议，并且证明了教养不良不会导致精神分裂。在会上，他发现至少有一个持相同观点的人——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欧文·戈特isman（Irving Gottesman）。戈特isman和他的合作者詹姆斯·希尔兹（James Shields）当时刚发表了一项研究，结论与罗森塔尔的很相近。^[3]这篇题为“精神分裂症的多基因理论”（A Polygen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的论文指出，精神分裂症可能并不是由一个基因导致的，而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各种环境因素激活这些基因导致的。他们的证据包含很多双胞胎病例，但他们的理论有个特别之处：他们不认为是一个显性基因或两个隐性基因导致了精神分裂，而是提出存在一个“易感阈值”（liability threshold），易感性超过这个理论值的人可能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他们看来，遗传和环境因素——比如家族病史和童年遭受的创伤——可能联合起作用，使一个人的易感性接近这种阈值。但如果各种因素累加起来没有达到临界值，那么一个携带精神分裂症基因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表现出症状。

戈特isman和希尔德的理论被称为“素质—应激假说”，其核心是后天因素激活了先天因素。几十年后，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极具先见之明，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荣格时代的大讨论至此开始走向终结。从某些方面看，素质——应激假说有些像是在先天论和

后天论两个阵营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如果假说成立，那么无论氯丙嗪等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机制是怎样的，这些药物都只可能作为精神分裂症长期治疗的一部分手段而已。

然而，在多拉多海滩的会议上，戈特斯曼和希尔德的理论一如既往地不被接受。甚至罗森塔尔的一位同事也驳斥说混乱或贫困的童年也可能是病因：新的研究表明，城市越大，社会阶层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就越强。[\[4\]](#)这位同事还提出了一个有关因果性的问题：究竟是贫穷导致了精神分裂，还是这种精神疾病是先天性的，致使家庭陷于贫困中？

精神分裂症妈妈的问题又回来了。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参会者在做报告时公开批评那些“严厉、强势、缺乏温情”和“焦虑、没有安全感，并且常常带有强迫症倾向”的母亲。[\[5\]](#)如果母亲真是罪魁祸首，为什么同一个母亲的多个孩子，有的会患精神分裂症，有的却不会？对于这个问题，这位治疗专家却无法给出解释，他只坚持说患病的原因肯定是粗暴的妈妈。

接下来轮到西奥多·利兹解释他的家庭动力学。他说，如果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的养育方式不正确，或者遭受了严重的创伤”，那么这个孩子的发育就会不正常。[\[6\]](#)除了他个人在精神分裂症家庭方面的研究结果外，这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没有引用数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这样的讨论进行了一周，7月1日，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森塔尔作为组织者总结了这个领域的现状。他举重若轻，先讲了个笑话。他说精神分裂症方面遗传论与环境论的争论让他想起一场“白衬衫法式决斗”，决斗双方“努力完全避开对方，以至于一点也没有暴露自己，连彼此传染上感冒的风险也不会有”。[\[7\]](#)罗森塔尔接着使用起了外交辞令，颇为周全地说，大家能齐聚一堂

是个好的开始，“这一周以来，我们天天坐在这里听大家详细论述各自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和我们自己的观点相一致，也有的和我们自己的观点相悖。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留下什么不快，我希望留下的只有大家认真求索数据和观点的精神”。

两方真正的和解并不会来得太快。事实上，三年后，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家庭研究方面的首席研究员，同样参加过多拉多海滩会议的大卫·赖斯仍然将遗传学家和环境论者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8]此时，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仍然在激烈地辩论，但对像加尔文家这样依赖于他们救助的很多家庭来说，他们仍然无法提供太多帮助。在多拉多海滩会议的闭幕词中，罗森塔尔说，精神分裂症病因的谜或许要等到下一代人才能逐渐解开。

罗森塔尔还说，好消息是“过去所提出的所有合理的疑惑都得到了解答，遗传论比较能让人信服”。[9]他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因为研究家庭互动的最优秀的学生都明确并公开地认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过程中涉及遗传因素这一点”。

但这引发了一个让人更为困惑的问题。“严格说来，遗传的不是精神分裂症，”他说，“可以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携带精神分裂症基因的人都会发病。”[10]精神分裂症确实有遗传性，但并不总是会遗传。于是大家不由得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相关基因的致病机理，”罗森塔尔说，“我们目前还不甚清楚。”[11]

[1] 有关波多黎各学术峰会的内容来自罗森塔尔和凯蒂编辑的*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2] David Rosenthal, “Three Adoption Studies of Heredity in the Schizophrenic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 no. 1/2 (1972): 63—75.

[3] Irving Gottesman and James Shields, “A Polygen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58, no. 1 (July 1, 1967): 199—205.

[4] Melvin L. Kohn, “Social Class and Schizophrenia,” in Rosenthal and Kety, eds.,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156—57.

[5] Yrjö O. Alanen, “From the Mother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to Interactional Family Dynamics,” in Rosenthal and Kety, eds.,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201, 205.

[6] Theodore Lidz, “The Family, Languag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in Rosenthal and Kety, eds.,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175.

[7] David Rosenthal, “The Heredity-Environment Issue in Schizophrenia: 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 and Present Status of Our Knowledge,” in Rosenthal and Kety, eds.,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413.

[8] David Reiss, “Competing Hypotheses and Warring Factions: Applying Knowledge of Schizophrenia,” first presented in 1970 and later published in *Schizophrenia Bulletin* 8 (1974): 7—11.

[9] Rosenthal, “The Heredity-Environment Issue in Schizophrenia,” 415.

[10] Rosenthal, “The Heredity-Environment Issue in Schizophrenia,” 416.

[11] Rosenthal, “The Heredity-Environment Issue in Schizophrenia,” 416.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乔 吉姆 马克 约翰 马特 布莱恩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第15章

对咪咪来说，没什么比一个完美的感恩节更重要了。她会花上一整天来做饭，通常还会提前做好一个姜饼屋用来装饰。近些年，咪咪不得不强迫自己无视儿子们拿食物打架、用毛巾互抽的场面了，但每年11月，她的心中仍会重新憧憬起来，希望能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1972年的感恩节，约瑟夫和其他三个打冰球的弟弟以及两个妹妹仍住在家里。唐纳德从普韦布洛回来了。吉姆和凯西也带着小吉米回来了，布莱恩、迈克尔和理查德也回到了家里。只有约翰去他妻子南茜家过节了。但加尔文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容易爆发冲突。刚开始的小打小闹一直持续到饭点，男孩们互相指责谁吃得太多，谁应该收拾餐盘，谁是娘娘腔，谁是浑蛋。

你盛得太多了！

吃不完怎么办？

你没给我留点。

你太可怜了！

滚开！

你臭死了。

你烂透了。

去你妈的！

你个浑蛋！

没轮到洗盘子。

你从来不来帮忙。

娘娘腔。

你跟个娘们儿似的！

把这个拿出去。

长点脑子！

玛格丽特只能强打起精神。她当时10岁，感恩节时她要熨平亚麻桌布，还要把银质餐具和餐巾摆放到桌上。这些家务可以让她贴在妈妈身边，远离男孩们。按照传统，家里每个人都有指定的座位。大家长多恩坐在桌子的东面，唐纳德紧挨着坐在他右边，这样多恩可以随时留意他。咪咪的位置在桌子的北面，面对窗户，爱象棋的马克和爱内省的乔在她身边，叛逆的彼得离她最近，她好管住他。玛格丽特因为是左撇子，所以总是坐在桌子的一端，小玛丽当时才7岁，坐在离玛格丽特不远的地方。马特在她们对面，旁边是吉米和凯西。但他们还没有落座，就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如今的吉姆和唐纳德比以往更相互看不顺眼，只要待在同一个屋子里就会吵架。或许是因为在吉姆的眼里，唐纳德变成了一

个孱弱的对手，终于可以被他打败了，又或许是因为吉姆和以前一样，满脑子妄想，觉得自己同样不受欢迎。不管是哪种情况，唐纳德都是那个需要解决掉的人，而这个事就应该由他吉姆来干。而在唐纳德眼里，吉姆就像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浑蛋，遭受过无数的羞辱：妻子不同意继续保持婚姻关系，兄弟们也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听他的话。对唐纳德来说，把吉姆赶出家门，确认自己才是老大，是对吉姆最彻底的羞辱。

两个人很快就打起来了，一开始是像过去那样，在客厅里扭打在一起。唐纳德过去拥有的优势此时已不复存在，他住过院，体力被抗精神病药物削弱了，两人现在势均力敌。有人把小玛丽拉到了安全的角落，他俩的打斗在这之后升级了。

没多久，他们从一个房间打到了另一个房间。

加尔文家的客厅朝向餐厅。如果想到后院里去打一架，就必须得经过餐厅。这年感恩节，兄弟俩沿着这个方向你追我打，唯一挡住去路的是那张大餐桌。

唐纳德跑到餐厅的远端，把桌子抬了起来。吉姆从另一端向他靠近。玛格丽特记得，当唐纳德掀翻桌子时，桌上的所有东西都乒呤乓啷地掉到了地上。但据马克回忆，唐纳德实际上把整个桌子举起来砸向了吉姆。总之，咪咪期盼已久的完美感恩节毁了。

咪咪看着家里翻倒的桌子，散落一地的盘子和银餐具，以及拧成团的桌布。她最大的恐惧莫过于眼前真真切切发生的这一幕——她好心好意的准备，对家人细致入微的关怀，是的，她的爱，被碾轧得支离破碎了。美好的错觉荡然无存。她自己的母亲比莉如果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肯定会明白情况有多糟糕。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咪咪彻底失败了。

咪咪没理会其他人，径自走进厨房。大家紧接着听到了一个沉闷的声音，姜饼屋被它的制作者砸碎了。

“你们这些孩子配不上它。”咪咪泪流满面地说。

在隐谷路的尽头，有一条将加尔文家和斯卡克家分开的小路，多年来人迹罕至。一天，斯卡克家买了一辆本田90型小型摩托车。跟玛格丽特差不多大的卡罗琳·斯卡克会骑摩托车顺着小路去其他朋友家玩。这条路严格说来在斯卡克家的地盘上，但从来没人提过这事，直到卡罗琳开始骑摩托为止。

一天，卡罗琳从山上骑车下来，在山底快到家的路上，她幸运地注意到一条电线粗细的绳索横向拦住了隐谷路的尽头。她在最后一刻及时偏转了方向，否则就会连人带车被绊倒。卡罗琳吓得半死，把事情告诉了她妈妈。在搞清楚状况后，她妈妈冲出家门，穿过小路，去加尔文家找咪咪。

卡罗琳至今还记得这两个平时客客气气的女人站在小路上对峙的那一幕，就像火冒三丈的棒球教练和冥顽不化的裁判。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卡罗琳的妈妈喊道。

“我不喜欢那种噪声。”咪咪说。

这句话让卡罗琳的妈妈的脾气再也压不住了。

“警车天天到你家我们都忍着，我们一辆本田90你就受不了了？”

人人都知道加尔文家出了事。附近的邻居开车从自家的车道驶上隐谷路时都会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知道很可能会碰到唐纳德在路尽头转悠，向开车经过的人布道。他家的弟弟们也变得远近

闻名。有一次，马特从一个邻居家偷东西，正好撞上回到家的主人，被抓了个正着。彼得一脸苦相，表情凶狠，惹得其他女孩指指点点。一次，彼得把一个女孩的脸埋到雪里，使她无法呼吸，之后却狡辩说他只是在开玩笑。

实际上，大家都已经不再登门拜访加尔文一家了。赫夫利家的孩子被禁止去加尔文家玩。周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谁家的邮箱被破坏了，或者谁家失窃了，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把责任追究到加尔文家头上。

咪咪习惯了否认这一切：“我家孩子才不会干那种事情。”但没人相信她，她正在无声地沦陷。她需要一个人面对难以应付的局面，而且她没有工具，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天资。她和多恩喜欢驯鹰是因为这中间有逻辑可言，但他们的孩子的行为却毫无逻辑。他们试图给孩子们灌输秩序和常理，但孩子们不是鹰。

这一切使咪咪变得愁容满面。如果现在有孩子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她已经不再是欣然迎战的战士，而是成了暴跳如雷的将军。当迈克尔、马特、理查德或彼得不听话时，她经常会说“你就跟唐纳德一个样”。她或许没意识到这句话的伤害性有多大。指责儿子们跟“黏答答”一个样可能是她能对他们说出的最重的话了，因为这句话提醒着他们，他们和那个把这个家变成难于容身之地的奇怪的人，那个毁掉他们所有人生活的人，有着共同的血脉。

有断断续续的时间，一周或一个月，唐纳德会表现出片刻的清醒，甚至还能工作，当动物管制员、地产销售代理、建筑工人。1971年，他开始改服另一种相关的抗精神病药物——三氟拉嗪，整个人的面貌随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短短一个周末，

他就意识到他脑中的很多思虑不过是自己的想象，而非现实，”普韦布洛的一位精神病学医师路易斯·奈姆瑟写道，“他说自己非常想建造一座教堂，因为这样会使他更像他前妻的父亲。他有个想当然的愿望，认为如果自己更像她父亲，她就会重新接纳他。”

唐纳德的病情好转了几个月。1972年4月，他再一次去俄勒冈找吉恩，但吉恩没有见他。他随后去天主教教区办事处拜访了一位牧师，谈了一下自己的婚姻问题。牧师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在教堂方面看来，他与吉恩的结合已经彻底失效了。这句话将他重新送回了普韦布洛，奈姆瑟医生同情地记录道，“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奈姆瑟医生参考弗洛伊德和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的观点，认为唐纳德有能力摆脱目前的状态，他“似乎自己选择了再次发作精神病”。因此奈姆瑟医生决定，医护人员应该尽力帮助唐纳德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费心费力地去体会唐纳德的感受，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为他感到难过。这种方法的确对唐纳德产生了点作用。“他更加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对吉恩的看法，”奈姆瑟写道，“说他真的还喜欢她，希望吉恩有一天能联系他。不过他拒绝再主动联系她，因为每次他这么做，最后结果对他来说都是灾难。”

唐纳德的状态越来越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他还利用一天的外出假找到了一份吸尘器销售员的工作。这份工作挣钱多，时间灵活，非常理想。1972年5月2日，他出院了。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但这一次他的行为非常恶劣：他对多恩和咪咪发出了死亡威胁。多恩和咪咪不得不向当地法庭提出申请，在8月把唐纳德强制送回普韦布洛。在普韦布洛，当医护人员要关他禁闭时，唐纳德一把从门上拔下钥匙，把护理员推进禁闭室锁了起来。但

他并没有试图逃跑，而是坐在禁闭室门外，说他只是想给护理人员一点教训。医生给他服用了大剂量的氯丙嗪和小剂量的三氟拉嗪。渐渐地，他的精神病症状消失了。8月28日，带着预后谨慎的警告，他出院了。

第二年春天，唐纳德再次试图去找吉恩，因此被送进了俄勒冈州立医院。他的收治记录上对他的描述是“非常不合作，难以控制”以及“思维混乱，晕头转向”。比如，尽管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住进这家医院了，但他却说不记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住院间歇，唐纳德回家参加过一次家人的婚礼，这次比一年前约翰的婚礼还要让人不快。老六理查德一直是加尔文家心机很重的孩子，有野心，胆子大，有创业头脑，为达到目标懂得随机应变。在空军学院高中上高一时，他想办法用口香糖打开门锁，溜进了学校的杂货店。他和朋友连续几个月从店里偷牛仔裤、食物和其他任何能拿的东西。最终，他在一次偷东西时被抓住了，被罚停学一年并被强制转到另一所高中，这件事让他父亲怒不可遏。“你要是一直这么胡闹下去，迟早会闯大祸的。”多恩说。

1972年，理查德回到空军学院高中完成了高年级的学业，还在全州冰球锦标赛上打进了制胜球。比赛结束后，对方球队啦啦队的一个女孩问他会不会去参加庆祝派对，理查德告诉她他会去。那天晚上，这个女孩怀孕了。

几个月后，多少有些被逼无奈，他们在科罗拉多泉市的地质奇观——众神花园举办了婚礼。理查德嗑了药，在婚礼上表现得异常兴奋。他的朋友达斯汀用吉他弹奏起了《他们的时代正在改变》。一切原本进展得挺顺利，但婚礼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了。唐纳德爬到公园的岩石顶上，大声喊道：“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场婚姻不是上帝的旨意！”

吉姆和多恩制服了唐纳德，婚礼得以继续进行。

1973年5月，多恩和咪咪再次同意把唐纳德从普韦布洛接回家。这一次他安分了4个月。

9月1日，治安官办公室的警员按照他父母的请求，再次将唐纳德送入州立医院接受“禁闭治疗”。唐纳德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当天已经遵医嘱吃了三氟拉嗪，但当他向咪咪要一些苯海拉明时，咪咪拒绝给他，担心苯海拉明让他困倦，驾车会不安全。唐纳德这时失控了，他掐住咪咪的喉咙，开始摇晃她。好几个男孩上前阻拦他才没把自己的母亲掐死。

回到普韦布洛后，唐纳德要求见一位天主教牧师。“他否认自己有幻觉和偏执妄想，”医务人员的会诊笔记上写道，“他仅仅承认自己跟家人相处时有情绪问题，显然，其中还包括一些肢体冲突。”他的预后诊断再次被定为“谨慎”。

没过几天，唐纳德的问题就被家人抛在脑后了。

第16章

布莱恩从加州驾车回来探亲了。这给罕有片刻安宁的家带来了些许安慰和活力，让大家都松了口气。毕竟，他是摇滚明星，至少加尔文家是这样认为的。布莱恩还带来了他的女友，这让大家很好奇。他俩在客厅里跟家人聊天，一盘接一盘地放布莱恩他们袋边街乐队的磁带。布莱恩还带了吉他，并和兄弟们一起弹奏歌曲，家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咪咪甚至让他俩一起睡在楼下的房间。这项特殊的待遇表明布莱恩在家里享受的地位很不一般。

罗蕾莱·史密斯是加州人，朋友们叫她“诺妮”。她聪明开朗，性格直爽，一头金发被晒得颜色略深，脸上总带着友好的微笑。她比布莱恩小3岁，童年比布莱恩过得要富贵得多。诺妮的孩提时代是在萨克拉门托一个叫洛迪的小镇上度过的，卧室的墙上挂满了马术比赛的奖章。但吸引布莱恩的却是诺妮生活中的那些悲伤和不顺，因为他向来对人类境况中的黑暗面更感兴趣。诺妮才十几岁时，她母亲就因为服药、饮酒死了。她父亲是镇上有名的儿科医生，续娶了一个马术表演行业的女人，比诺妮大不到10岁。诺妮从此没有再跟父亲一起生活。她在寄宿学校待了3年，高中住在洛迪镇自己姐姐的家里，在本地的高中完成了学业。和布莱恩交往时，她一边在读商学院的课程，一边在洛迪镇的兽医

诊所工作。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镇上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诺妮了。她的父亲、继母和姐姐都已经去世。她姐姐的前夫记得她是个快乐的女孩，很招人喜欢。她在洛迪镇高中待了一年，时间不长，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与诺妮同时代并且还活着的晚辈是她姐姐的儿子，现在的他已经是成年人，年纪差不多是1973年时的诺妮的两倍。这位侄子只隐约记得，曾经有个叫诺妮的女孩被她男友开枪打死了。之后，那个男友的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加州前，布莱恩就很喜欢琢磨嬉皮士式的哲思。他会谈论死亡，但不会太认真。他也不相信宿命论，而是将思考死亡当作一种精神状态，使他进入到另一个境界。“对他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老三约翰说。约翰和布莱恩都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学音乐，同住过一年。“死亡就像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他总对我说要去另一个世界。”

在约翰看来，布莱恩谈论死亡的方式并没显得多紧急和危险。“我们当时住在一起，那是个迷幻的时期。”约翰说。这种状况部分可能是毒品促成的，加尔文家的男孩中吸毒最厉害的就是布莱恩。但布莱恩身上的阴暗面却从没引起过兄弟们的顾虑，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过这种阴暗面，或者他们不想看见这种阴暗面，又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挺有男人味的。

1973年9月7日是周五，这天下午洛迪镇警方接到诺妮老板的妻子从切诺基兽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她担忧地说诺妮中午回家吃午饭后就再没回来。^[1]员工失踪一两个小时一般很难上升到需要警方介入的程度，除非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诺妮身上会有事发生，知道她的处境非常危险。

诺妮和布莱恩大约一个月前分手了，那之后他们一直在争吵，现在她一个人住。

第一位到达胡桃街404 1/2号的警员发现公寓的门敞开着。他走进去，发现地板上躺着一对年轻人，旁边是一把点22口径的步枪。诺妮面部中枪，脸上满是鲜血。布莱恩的枪伤则在头部，现场的警察勘查后确定是他自己开枪造成的。

最小的三个孩子，彼得、玛格丽特和玛丽被母亲的抽泣声惊醒了。

楼下，咪咪在厨房的桌子上点起蜡烛，马克正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多恩在打电话，安排唐纳德从普韦布洛短暂出院，好回来参加弟弟的葬礼。

对外的解释——至少对年幼的孩子们是这么说的——是这是一场自行车事故。玛格丽特当时11岁，玛丽连8岁都不到，都太小了，不能跟她们说布莱恩杀死他的女友后开枪自杀了。很多其他人也不太清楚全部的细节，有人以为这对年轻人是被入室抢劫的匪徒杀掉的。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警方发现了什么：布莱恩前一天在当地一家枪支店买了行凶的武器，洛迪镇上的这件惨案是蓄意谋杀。

多年后，家里的其他人想出了一些其他的解释，比如布莱恩和诺妮是商量好一起自杀的，或者两人在一起吸了LSD致幻剂后发生了意外。只有咪咪和多恩知道一个事实，多年来他们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在布莱恩死之前的一段时间，医生曾让他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替沃噻吨。在布莱恩的医疗档案中，并没有那些往往需要服用这种药物的诊疗记录，没有狂躁症，没有抑郁型精神病，没有创伤引发的精神病，也没有因为长期服用迷幻药而触发

的精神失常。但有一点多恩和咪咪一定十分清楚，那就是替沃噍吨还能治疗精神分裂症。家里又有一个儿子疯了，而且还偏偏是优秀的布莱恩，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把布莱恩的病情公之于众。

在得知布莱恩的死讯后，迈克尔显得很木然。在到达加州后，他逗留在了洛杉矶，想过一段时间再北上去看布莱恩。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或许当时需要一个人阻挠布莱恩的计划，而自己没能帮上忙。现在，又需要他帮忙了：他父亲想让迈克尔跟他一起去加州，把布莱恩的遗体运回来，并处理掉布莱恩的遗物。在到达警察局后，一名警员向迈克尔和多恩解释了警方的揣测，迈克尔这时再也无法承受了。当他听到“谋杀他人后自杀”的字眼时，他拒绝再听下去，一个人跑了出去。

虽然不知道布莱恩的病情，弟弟们还是把布莱恩的事和其他哥哥的情况联系到了一起。先是唐纳德，然后是吉姆，现在是布莱恩。约翰的妻子南茜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中的猜测：加尔文家的男孩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肯定具有某种传染性。她和约翰随后离开了科罗拉多，在爱达荷州各找到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其他几个儿子也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老七乔，打冰球的四个男孩中最年长的那个，高中一毕业就去丹佛的航空公司找了份工作。老八马克一年后高中毕业，入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参加完弟弟的葬礼后，唐纳德回到了普韦布洛。根据当年的医护报告，“他对他的宗教非常认真”，“在情感上非常克制”，但“暗藏的敌意随时可能显露出来”。唐纳德在医院住了5个多月，于1974年2月带着新开的两种药回了家。一种药是与氯丙嗪的作用类似的氟奋乃静。另一种是卡马特灵，这是一种治疗帕金

森病的药物，经常用来缓解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不算唐纳德，家里这时已经只有四个年纪最小的孩子了：马特、彼得、玛格丽特和玛丽。

[1] “Apparent Murder-Suicide of Lodi Girl, Boyfriend,” *Lodi News-Sentinel*, September 8, 1973.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马克 吉姆 马特 约翰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乔

第17章

多年来，多恩都在试图与孩子们保持距离。甚至儿子们发病后，他也没有停下工作。工作既是出于需要，也可以将他从日常的鸡毛蒜皮中解放出来。他一贯如此。布莱恩去世两个月后，他在联合会多了一个职业头衔：新成立的落基山艺术人文基金会的主席。

但在多恩和咪咪的心头，布莱恩的惨剧是挥之不去的。咪咪想着法子让自己忙碌于照料家中的孩子，多恩则把一切憋在心里。1975年6月的一个清晨，在正准备出门送彼得去参加冰球晨练时，多恩突然倒在了地上。

这次中风让多恩在医院住了6个月。他的右侧肢体瘫痪了，而且似乎完全丧失了短期记忆能力。在逐渐可以控制身体后，他仍然不记得大家的名字，也想不起二战后生活中的大部分经历。

多恩只能不情愿地宣布退休。来自联合会的告别信虽然有些言辞冷淡，但也不失礼貌。“鉴于你近期的中风，”负责联合会的董事——他手上的杂事都是交给多恩干的——写道，“你想要找一份可以充分掌控时间、差旅、责任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非常明智，也很合理。”

一直以来，多恩都把照顾孩子们的重任托付给了妻子，如今他自己也需要咪咪来照顾了。多恩以前总认为患病的儿子们应该出去接受治疗。他常常说“自助者天助”，如果孩子自己不努力，别人也帮不了他们。而现在，咪咪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多恩也没有半句怨言。这一方面是因为多恩生病后失去了做决策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必须忘掉布莱恩的事情，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自己的问题上来。

多恩过去的那些抱怨和观念——说咪咪太惯坏了儿子们，说他相信学校的棍棒教育，说他给儿子们看的自助书籍是教他们自食其力——再也不管用了。已经发生过最糟糕的情况了，咪咪不会再让自己失去任何一个患病的孩子。

十兄弟中最小的彼得已经14岁。他似乎受够了家中权威的约束，开始完全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一有机会就反驳、违抗父母的命令。彼得非常叛逆，如果在一二十年后，他或许会被诊断为患有对立违抗性障碍。咪咪则习惯于说他很“朋克”，严厉批评他所做的任何不符合她观念的事。这似乎看上去有点苛刻，不过咪咪却觉得合情合理。彼得似乎还嫌家里麻烦不够多似的，总是故意做出些事情来火上浇油。最让咪咪最担心的是，如果彼得走得太偏，他可能也会走上唐纳德、吉姆和布莱恩的老路。

彼得向来就性格乖戾，父亲的中风——他当时在场，在不远的地方无助地看着——似乎进一步抹除掉了他曾经拥有的那么一点自控能力。他被人看到偷东西，甚至纵火。多恩中风后没多久的一个早晨，彼得在上九年级的代数课时突然向周围的同学胡言乱语起来。老师试图阻止他，但彼得走到她身边，坐在讲台的边沿继续说个不停。在老师把他弄回他的座位后，校长和教务长也

赶来了。他们担心彼得会有暴力倾向，因此还带了个体育老师过来。

彼得被送进了科罗拉多泉市的彭罗斯医院，不过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医生只是给他注射了些镇静剂。彼得回家后，咪咪因为忙着多恩住院的事，所以决定按预先安排的那样把彼得送到冰球训练营去。在冰球训练营期间，彼得彻底精神失常了。他尿床，在地板上吐痰，还殴打其他营员。他随后离开训练营，去了科罗拉多泉市一家名为布拉迪医院的私立精神病诊所。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那里的医生都不让任何人探视他。

9月初，咪咪终于可以去探视彼得了。她看到他只穿着内裤被绑在床上，身上也没有盖被子，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尿骚味。咪咪立刻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走之前，医生给他开了小剂量的康帕嗪——一种通常用来治疗恶心呕吐的药。

咪咪就快没辙了。对于彼得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普韦布洛的州立精神病院治疗唐纳德的方法太过极端了。因此，1975年9月一个周六的晚上，彼得被送到了他的下一站——丹佛的科罗拉多大学附属医院。在等了很久后，他开始在候诊室小便起来。入院后，他说的话含混不清，别人都听不懂。

“让人很难过的一点是，病人变得越来越乖戾了，”医生写道，“而他的家人却认为这是他正常的状态。”

当彼得病情有所好转，咪咪和多恩来探视他时，医生留意到，他们曾提到彼得是几个儿子最近发疯的一个。没过多久，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就都知道加尔文家其他男孩的事情了。

他们听说了唐纳德的情况，知道他和彼得的境况就像是被绑在一起一样——唐纳德表现得越古怪，彼得越容易在学校惹来别人的嘲笑，回家便会越多地把怒气撒在唐纳德身上。“当老大多

容易，”彼得常说，“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当老十的。”

他们听说了吉姆的情况，知道吉姆碰巧也在同一家医院的成人精神科病房，他的病被叫作“严重偏执增强型急性精神分裂症”。

他们也听说了布莱恩的情况，知道他先枪杀女友然后自杀的事情。他们还目睹了内省的老七乔有点不对劲。乔来病房看望彼得时，一位医生写道：“他告诉彼得的医生，说自己过去有时也出现过和彼得类似的症状。”

看来第五个病例出现了。除了密切观察他有没有出现其他兄弟表现出的精神病迹象外，医疗档案中没有对乔采取过其他措施的记录。一切都证实了多恩和咪咪的担忧。儿子们的确一个接一个地出问题了，先是唐纳德和吉姆，然后是布莱恩，现在是彼得，很快就可能轮到乔。他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切，也不知道这一切有没有尽头。

咪咪和多恩冥思苦想，想搞清楚每个儿子的病会不会是某种情感伤害导致的：唐纳德和吉姆是婚姻问题，布莱恩是与诺妮分手，彼得是见到父亲中风倒地。咪咪也调查了他们的家族史，试图在远房亲戚中寻找先例。多恩的母亲曾经抑郁过一阵，多恩在战后也抑郁过。儿子们的病和多恩在加拿大出现的情绪问题有关吗？那属于精神崩溃吗？多恩的身上会不会潜伏着一种疾病，儿子们注定或早或晚会患上？

或许要怪那些药？男孩们过去爱听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现在他们爱放奶油乐队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布莱恩、迈克尔和理查德都吸食LSD致幻剂，就连性格温和的乔也是。象棋天才马克爱吸“黑美人”等安非他明类的毒品。多恩和咪咪当时至少发现了些蛛丝马迹，但对于这么多儿子的问题却无能为力。他们从

来没想到毒品会突然变得如此普遍，至少没料到他们自己这些优秀的孩子会染上毒瘾。

现在，在他们看来，反文化运动也有了致病的嫌疑。男孩们的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个动荡而反叛的时代上？

但在见到彼得后，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在彼得1975年的住院记录中，医生对咪咪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一位医生写道，她“不愿意或者不能听不好的消息”，非常善于向彼得传达“混乱的双重信息”，并且“让他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矛盾的立场”。这似乎是在指咪咪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非常恶劣，就像双重束缚理论所描述的那样。

一位医生还注意到，在治疗过程中，当彼得想要提起自己的幻觉和恐惧时，咪咪会打断他，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很显然，母子间的这种关系在别的儿子身上也存在。”这名医生写道。

尽管如此，咪咪和多恩对儿子的担心是毋庸置疑的，咪咪也无疑是儿子的极大安慰。“在全家聚到一起时，”医生写道，“病人有时会将头靠在他母亲的胸口，脸上带着微笑，让人觉得他是个心满意足的婴儿。”在医生看来，这种动态关系——无所不能的母亲和依赖性很强的孩子——至少“对母亲和孩子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咪咪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去探视彼得时，她和多恩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边，两旁的医生直接向他俩灌输“精神分裂症妈妈”的理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在一步步地认定她是彼得患病的始作俑者。进而言之，她是所有其他儿子患病的推动者。夫妻两人惊呆

了。咪咪先是感到震惊，然后是感到恐惧，最后开始产生了戒心。

她决心再也不让这些大学里的医生靠近她的儿子们。她决定从此之后，只送患病的孩子去普韦布洛，不再去其他任何医院。

在待人接物上，以前的咪咪称得上得心应手，而如今，她的生活毫无逻辑可言。每有一个儿子生病，她就变得更像一个犯人，被秘密囚禁，被精神病带来的羞耻感压得不能动弹。

现在，假装正常都成了一种奢望。她再也无法幻想自己可以摆脱多年来闭口不谈的痛苦了。

究竟是什么使咪咪·加尔文陷入这种境地的？一个儿子死了，还杀了人；丈夫因为中风而卧床不起，失去了行动能力；家里还有两个病情严重的儿子，完全需要她一个人照顾。家里还有16岁的马克、13岁的玛格丽特和10岁的玛丽。无论是对咪咪还是其他任何人来说，要照顾这么多人，而且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还有人患病，这样的负担太重了。

1975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加尔文家厨房里的电话响了。咪咪接起电话。是石油大亨塞缪尔·加里的妻子南希打来的，她是多恩和咪咪在联合会的朋友。

在家里现在这种情况下，南希并不是最符合咪咪期望的倾诉对象。听到南希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就事论事的声音，咪咪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过去生活的回音，那个声音在呼唤她，在嘲弄她。乘坐南希和山姆的私人飞机去盐湖城或圣塔菲是她不可能再拥有的生活。别人都可能拥有那样的未来，但她不可能。

后来的事实表明，南希是当时最合适的求助对象。当她问起

咪咪的近况时，咪咪第一次放下了戒心。她做出了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向一个勉强称得上朋友的女人袒露心扉。

南希不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要说她有什么长处，那就是利用她丈夫的财富去解决问题。

“你必须让女孩们离开家里。”南希说。接着，她就像是在订客房服务一样，轻快地补充说：“把玛格丽特送过来。”

玛丽·加尔文知道不应该流露自己的情绪。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要是两姐妹中有人难以管控，那么妈妈就会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但姐姐玛格丽特，家中唯一最接近于自己盟友的人，现在却要打包离开了。玛丽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伤心、更大声。多恩和咪咪能看出来，玛丽非常伤心。他们担心在把玛格丽特送到加里家后，玛丽会大吵大闹，因此没有让玛丽一起去送玛格丽特。

但1976年1月的那天永远地烙在了玛丽的记忆中。10岁的她站在隐谷路家的前门，无法自制地哭嚎，目送着父母带着13岁的姐姐驾车远去。家里只剩下她、唐纳德、彼得和吉姆。咪咪和多恩让吉姆看好兄弟和妹妹，为他们提供所谓的保护。但玛丽当时就很清楚，那不是保护。年幼的她那时就体会到了一种孤苦无依的无助感。

第二部分

第18章

1975年

华盛顿特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琳恩·德利西（Lynn DeLisi）都感到自己仿佛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她觉得自己也许不属于科学界，觉得自己身处科学圈的想法也许愚蠢至极。但这些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情况。在情况最糟的那一天，她被告知可能是她把自己的孩子逼疯的。

做出这个诊断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美国精神病学界公认的研究领跑机构——的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他是在一次讲座中顺便提到的。德利西是在场的几位女性听众之一，她是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第一年住院医师，也是其中唯一一位做母亲的，有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此刻正在家中由保姆照看。和耶鲁大学的西奥多·利兹一样，这位做讲座的精神病学家也是一位家庭动力学专家。他似乎认为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和职业女性的数量增长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告诉在场的住院医师，在孩子生命中的头两年里，母亲们应该把所有精力用在陪伴和照顾他们上。

德利西不由得感到这话像是专对她一个人说的。她住在弗吉尼亚州安南达尔市的郊区，但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她是社区里唯

——一个把孩子留给保姆，自己出去工作的母亲。当然，她的丈夫也工作。因此，为了照顾孩子，她不得不想尽办法灵活调整自己的工作安排。比如，为了不上夜班，她只能做些特殊的调整，延长正常的工作时间。

其他第一年的住院医师都没说话，但德利西却开始发问，要求给出证据。“证据在哪里？”她说，“我想看看数据。”

但这位精神病学家没有数据。他所引用的不是自己的研究，而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之后的几周里，德利西不住地想，在没有实验证据，只有传闻和偏见的情况下，那位精神病学家怎么可以把话说得那么言之凿凿。那天发生的事深深地影响了德利西，彻底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当时，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学界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精神分析治疗，另一派则拥护精神活性药物治疗。而德利西却被第三种途径吸引住了：她想寻找并证实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神经方面的原因。

德利西在新泽西州的郊区长大，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她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支持并鼓励女儿追寻梦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唯一支持女儿追寻这个梦想的人。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大学时，德利西最初希望在未来研究大脑及其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因此阅读了大量有关致幻药物对神经系统影响的资料。但于她而言，时机并不是很理想。她毕业时是1966年，当时正值越南战争，班里很多男同学都向学校的医学院提交了博士入学申请，希望避免被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些男生一起提交申请的女同学自然没有优势：任何被医学院拒绝的男生都可能被送上战场，既然如此，医学院为什么不优先把机会留给男生呢？

面对这种不利因素，德利西努力想出了一个办法。毕业后，她休息了一年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一份科研助理的全职工作，晚上则在纽约大学上生物学的研究生课程。在科学图书馆，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一个名叫查尔斯·德利西的研究生。在两人举办婚礼前，她被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录取了，这也是唯一一所愿意录取她的医学院。一年后，德利西曾试图申请转学去纽约的医学院，因为查尔斯也在纽约读研。在面试时，有位面试官问她，对她来说家庭是不是比职业更重要，另一位面试官则问她是否考虑过避孕。没有学校愿意接受她。

甚至她丈夫也希望她放弃医学院，读个轻松点的研究生课程。但在校长的帮助下，德利西还是留了下来。这位校长也是女性，长期支持女性学医，她给德利西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安排了第二年的学习课程。次年，德利西的丈夫在耶鲁大学找到了一个博士后的职位，两人随即搬到了纽黑文市。在这之后，德利西要去费城的女子医学院上课就需要乘火车通勤。怀第一个孩子时，那位女校长再次伸出援手，为她在耶鲁安排了最后一年的课程。

1972年，德利西从医学院毕业。为了查尔斯的工作，全家再次搬迁，这次搬到了新墨西哥州。在这里，琳恩开始执业，为贫苦的移民工人提供全科诊疗。她还在新墨西哥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但当丈夫收到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工作邀请时，她也向那里的医院提交了住院医生申请。“我之所以对精神分裂症感兴趣，是因为这是真正的脑部疾病，”德利西后来忆说，“你知道，这不仅仅是日常的焦虑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神经疾病。”华盛顿的医院离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很近，德利西认为在那里能找到和她有相同想法的人。

但找到和她有相同想法的人并容易。虽然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病房里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将精神分裂症作为躯体疾病来研

究并不热门，至少这一疾病没有受到德利西培训督导们的重视。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病情似乎从来不会好转。哪怕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抑郁症、厌食症、焦虑症甚至双相情感障碍的诊疗上，都至少还有一点希望，因为传统的谈话治疗有时会对这些疾病产生些许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已经在学界持续了数十年的先天/后天的争议。负责德利西住院医师阶段培训的是精神分析师，而不是如她所愿支持药物治疗的精神病学家。在住院医师期的第三年，像德利西这样对精神分裂症感兴趣的医生可以在栗居精神病院工作。在那里，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过去的诊疗部门还在运行，就在马里兰州郊区沿公路过去几英里的地方。那里的医生仍然将童年创伤视为导致严重精神疾病的主要病因。德利西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很多老师也持相同的观点。

德利西如饥似渴地查阅她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生物机制的资料。一个反复出现并且与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理查德·怀亚特（Richard Wyatt）。怀亚特是一位神经精神病学家，研究的不是治疗方法，而是精神疾病对大脑本身的影响。和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其他精神病学研究单位不同，怀亚特的实验室位于特区另一端的威廉·A·怀特楼里。怀特楼是一幢有百年历史的红砖结构建筑，位于圣伊丽莎白医院内，病房很多，足够容纳长期研究的病人。1977年，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住院医师阶段接近尾声时，德利西为了谋求一个职位去见了怀亚特。怀亚特显得并不太热情，他告诉德利西，他会看看他能不能做点什么，还说自己实验室的职位通常都是提供给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者。此外，他还说，没人会相信两个孩子的母亲能胜任这里的工作强度。

这一次，德利西没有感到愤怒，只是非常受挫。虽然由于家

务等原因，她早就做好了延长住院医师阶段的准备，但她还是通过加倍努力按时完成了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她不比任何男性研究者差，不管他们是来自哈佛还是来自其他什么地方。怀亚特实验室的男性研究者中有多少是有孩子的，有人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吗？

负责住院医师培训的导师不理解德利西为什么会如此沮丧。他们说，如果她真的想研究精神分裂症，为什么最后一年不去栗居精神病院呢？

在这之后，意料之外的机遇开启了德利西的职业生涯。怀亚特向她发来了邀请，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在他的实验室完成住院医师阶段的最后一年。但怀亚特说这个额外的职位是无薪的，因此不勉强，但如果她表现出色，可以作为正式员工继续干下去。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过她可以申请。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后门让你进来。”怀亚特说。

在怀特楼里，怀亚特的研究组占据了整整三层楼，有各式各样的独立研究室：脑生物化学实验室、神经病理学实验室、电生理学实验室、睡眠实验室，还有一个专门用于采集和制备用于研究的人脑组织样本的实验室，甚至还有一个研究脑组织移植的动物实验室。怀亚特的主要兴趣是分离出影响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化学因子，比如血小板、可能引发精神病或幻觉的淋巴细胞标记物和血浆蛋白。他的病房里有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病人，每个病房有10~12人。这些病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愿意尝试药物试验。照顾这些病人的实验人员就是像德利西这样的研究人员。

怀亚特研究组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在利用新的CT扫描技术寻找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部的异常之处。他们已经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大脑中发现了充分的生理学证据，足以让很多人不再认为环境

是这种疾病的致病原因或者致病因素。1979年，怀亚特团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室中存在更多的脑脊液。^[1]脑室是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组织中的空隙网络。边缘系统有很多功能，其中之一是使我们对周围的环境时刻保持关注。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hippocampus）都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怀亚特团队的研究发现，脑室体积越大，病人对氯丙嗪这类抗精神病药物的耐受性就越强。此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是源于生理因素，而非环境因素。正如这篇脑室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富勒·托里（E. Fuller Torrey）指出的那样，“如果是因为父母教育不良而导致这些疾病的话，那人类早就麻烦重重了”。

唯一的难题是没有办法确定脑室增大是这种疾病的原因还是结果——是病人生来就这样，还是患病后逐渐发展出的症状，又或者是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德利西认为，这正是遗传学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但在1979年，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不应该把过多精力花在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上，因为和阿尔茨海默病以及癌症一样，精神分裂症显然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导致的。由于当时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有限，类似的病症对于遗传分析来说太过复杂了。怀亚特实验室因此把重点放在了更为实际的手段上，如MRI（磁共振成像）、CT扫描以及最新的PET扫描（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等等。有段时间，德利西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

在怀亚特团队工作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会发生冲突。德利西记得有一次，在从事一项可能会获奖的研究时，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她不止一次感受到一种被压榨感，比如有一次为了让一位男同事被顺利提拔，就让她来承担他的过失。她拒绝了。她厌恶跟这些男同事相处，而拒绝保持合作让她和怀亚特的关系变得非常恶劣。“过了两年，他和我说话的态度才逐渐变

得像他和实验室的男同事说话的态度，”德利西回忆说，“他们可以随便闯进他办公室找他，而对我，他总是说没时间。”

最终，在德利西成功证明怀亚特长期以来对一种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的效果所持的猜想不正确后，怀亚特羞窘地当着这些男性同事的面承认，德利西做得比他们都出色。“他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德利西后来说，“不过那些男人可就不开心了。”

德利西加入怀亚特实验室后不久，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一位声名显赫的老前辈来找她。此时距离大卫·罗森塔尔发表第一篇关于吉内恩四胞胎的研究成果已经二十年了，他觉得是时候进行追踪调查研究了。四胞胎姐妹此时都还在世，已经50岁了，这次她们要回来做一系列新的身体检查，看看她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共同之处。

德利西很高兴能有机会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生理根源。她很喜欢跟吉内恩四姐妹在一起，看她们中的某个人说了点什么，然后其他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模仿她。她给她们做了CT扫描、脑电图，以及血液和尿液检查。不过对于德利西来说，跟四个患不同程度同种疾病的同卵四胞胎待在一起带来的真正冲击是，这让她对遗传学研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

在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员中，唯一一个关注遗传学的是艾利奥特·格森（Elliot Gershon）。1978年，格森和其他研究者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确认精神疾病的遗传标记物的最佳方法。^[2]他想研究不止有一位成员患病的家庭，并把这样的家庭称为“多发性家庭”（multiplex family）。格森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不仅要关注患病的家庭成员，还要关注没有患病的每一个人，甚至最好是关注一代人以上。如果研究者

能发现一种只出现在患病的家庭成员身上，而其他健康家人身上没有的基因异常，那这将会是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铁证。

德利西去找了格森，并提起了吉内恩姐妹。她告诉格森，这家人——研究所各精神分裂症研究团队眼中的至宝——全都患了这种病，她们会回来再次接受全面的检查。“你希望做什么样的调查？”德利西问。

格森的回答让德利西非常惊讶。“我不想参与这事。”他说。

德利西问他原因。格森一解释，她立刻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问得有多荒谬。

“利用这个家庭，你只能做单病例研究。”格森说。这意味着只有一组数据，没有变量，“你不会得出任何真正有意义的结论”。

虽然四姐妹有相同的遗传密码，但研究者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和她们进行遗传学上的比较，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正因为如此，格森觉得研究她们没有意义。他告诉德利西，家庭确实是要研究的对象，但得是合适的家庭：基因的来源要相同，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变化和组合，家中患病孩子的数量要越多越好。

格森说，如果德利西要追踪研究这样的家庭，他一定会全力支持。

[1] Daniel Weinberger, E. Fuller Torrey, A. N. Neophytides, and R. J. Wyatt, “Lateral Cerebral Ventricular Enlargement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6, no. 7 (July 1979): 735—39.

[2] R. O. Rieder and E. S. Gershon, “Genetic Strategies in Biological Psychiatr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5, no. 7 (July 1978): 866—73.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马克 吉姆 马特 约翰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乔

第19章

玛丽·加尔文最早期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70年，那时她大约5岁。一天深夜，她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听到大哥唐纳德从医院回来，在父母卧室门外的过道里哭嚎。

“我好害怕，”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

玛丽还记得父母努力劝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会找医生搞清楚情况。

她还记得唐纳德不时会离家出走，大多数时候是去俄勒冈找吉恩，而父母则不得不追循他的行踪，给他寄去机票或者长途汽车票。

她还记得有天晚上，惊恐万状的唐纳德呼喊着想让大家躲到安全地带去，说房子里有想要伤害他们的人。

她还记得自己相信了他的话。毕竟，他干吗要撒谎呢？

玛丽和姐姐有所不同。玛格丽特感情细腻，富有同情心，多愁善感，家人的困苦她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以至于难以承受。玛丽也一样脆弱，但她更为精明实际，也更为独立。一年级

时，班里模仿总统竞选，她是唯一举手支持乔治·麦戈文而非理查德·尼克松的孩子。后来，她被发现在学校抽烟，母亲问她应该怎么办，玛丽说：“张贴禁止抽烟的标识呗。”



玛丽，家中最小的孩子

玛格丽特被南希和山姆带到丹佛去后，玛丽的状态不时会从愤怒转为沉默。姐姐的离开让玛丽心绪不宁。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被丢下。父母解释说，是因为她的年龄太小，不够玛格丽特在那边上的私立学校的入学年龄，但这种理由在玛丽来说不通，无法抚慰这种突变带来的震惊。

1976年，已经上五年级的玛丽变得形单影只，只能看着哥哥们在家里继续打个不停。彼得挑战着身边每个人的底线，不断

地住院出院，还和家里最小的冰球男孩马特冲突不断。唐纳德搬进了玛格丽特的房间，就在玛丽的隔壁，这是为了让他离睡在楼下的其他兄弟远一点。但这样一来，玛丽就更难躲开唐纳德了。没有在睡觉或沉思时，唐纳德会踱来踱去，一边比画，一边自言自语。玛丽觉得尴尬，会没好气地用言语挤对他，如果不起作用，她就会央求他。要是还不管用，玛丽就会哭喊，但如果有人在就不会。她长时间待在卧室里，不停整理壁橱和写字台的抽屉，满怀思绪，希望能有一点控制感。

进入初中后，玛丽在跟人交往时总是满面笑容。她的人缘很好，在朋友家的时间比在自己家的时间还要多。她知道别的孩子不再被允许上她家去，而她自己也不想在家待着，于是她尽可能长时间地离隐谷路远远的：下午放学后去踢足球，晚上和周六去科罗拉多学院的芭蕾舞室，或者在赫夫利家待很久，给她们家的马厩打扫卫生。去哪儿都行，就是不想回家。

在向南希倾诉了自己的无助并让他们把玛格丽特接走后，咪咪试图重归原样，向人呈现勇敢乐观的形象。她向玛丽证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和闭口不语非常重要。不能哭，不能失控，不能流露一丁点情绪。咪咪希望孩子们都能表现出这种故作镇静。在开车从学校到训练地点，或者到科罗拉多泉市的切努克书店，又或者在去跟克洛科特或格里菲斯一家喝茶的路上时，咪咪不会对玛丽解释哥哥们出问题的原因或者解决的办法。她最多会说，跟哥哥们经历的麻烦相比，11岁的玛丽遇到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事。

在感到极为无助的时候，玛丽会在后院山坡另一面离家几百码^[1]的樵夫谷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孩子们有时把那里称作仙女岩。玛丽会假装仙女岩是自己的家，在那里假装做饭、睡觉、醒来，一个人自由自在。

玛丽的父亲常会带玛丽去学院里的社区游泳池，因为他想要游上几圈，做点中风后的复健运动。多恩现在能认出人了，但他的短期记忆还是不行，至少看上去不像能完全恢复的样子。过去他能一天快速阅读两本甚至三本书，现在他只能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而在以前，他是完全不屑于在家里装电视机这种玩意儿的。驯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完全不可能回去工作。山姆·加里帮他联系过几个给石油企业做顾问的活儿，但多恩都没法胜任这些工作。

除了发给多恩的军人退伍金，家里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照顾唐纳德和彼得的压力毫无疑问非常重，但每当多恩尝试提出唐纳德和彼得住出去时，咪咪总会说：“他们能去哪儿？”现在他俩都清楚，咪咪才是当家的那一个。虽然父亲的话不起作用，但对玛丽来说还是有些意义的，至少他为家里没生病的孩子争取过。

多恩的记忆力只有以前一半了，精力也大为衰减。每当父亲看电视上放的高尔夫球比赛时，玛丽就会坐在一边看着他。父亲是唯一愿意看清她的处境，同情并支持她的人。在单独与父亲相处时，玛丽会问他，发生这么多糟糕的事之后，为什么他还笃信天主教，为什么他还信仰上帝。这对玛丽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她每个礼拜天仍然需要去做弥撒，她想知道这究竟有什么意义。

多恩告诉她，自己一生中也曾多次疑惑过，但通过阅读和自己的领悟，他得以重拾对上帝的信仰。

他没有鼓励玛丽也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玛丽是一个不能被强迫的孩子。

有时在玛丽看来，自己的家好像一分为二了，但不是分成疯

了的和清醒的两类人，而是分成了留在家里和离开家的两类人。在留在家的人里面，哥哥马特是玛丽的足球教练，有时也是她的守护神。玛丽曾在一篇作文里写过他，把他描述成她最仰仗的人。但1976年春天，马特高中毕业后也离开了家。家里的人员构成在这之后就没有变化了，除了多恩和咪咪，只剩玛丽和两个生病的哥哥，彼得和唐纳德。隐谷路的家成了所有患病兄弟的大本营，当他们在别处碰壁时就会回来，其中也包括当时在和凯西约会的吉姆。

给儿子们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以及想办法保护大家的责任都落在了咪咪一个人的肩上。咪咪仍旧深信会有奇迹发生。她一度以为，自己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一位名叫卡尔·菲佛（Carl Pfeiffer）的药理学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办法。菲佛对药物的研究不算正统，有些还极为怪异。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找了几个药理学家在犯人身上进行致幻剂方面的实验（实验征得了犯人的同意），[\[2\]](#)菲佛就是研究者之一。他还担任过埃默里大学药理学系的主任，但在1960年离开了传统学术圈，开始接连发表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都缺乏标准的双盲实验，而是基于一种狂热的理念：大脑中的正常化学活动依赖于维生素的平衡，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保持精神健康。菲佛同时还向有需要的人有偿提供这平衡搭配的复合维生素。

1973年，菲佛创建了脑生物中心。这是家私人诊所，后来几十年成了菲佛的业务总部。咪咪一直在阅读改善脑化学方面的资料，在菲佛独立营业几年后听说了这个人。在两人建立联系后，菲佛来到科罗拉多看望这位多个孩子患病的母亲。这次见面后，他邀请加尔文一家去新泽西做一套彻底的检查。

所有还住在家里的人都去了普林斯顿。玛丽记得有人查看了她指甲上的小白点，说她缺锌，她妈妈认认真真地记下了每一句

话。菲佛告诉来脑生物中心的每个人，大多数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病很有可能都是营养缺乏导致的。他还说，如果玛丽莲·梦露和朱迪·加兰调整一下她们的补血营养液，那么她们现在就很可能都还活着。在一篇论文中，菲佛曾经把精神病医院称为“储罐”。^[3]对于一个感觉时时遭到医生和丈夫批判的母亲来说，这种话说到了咪咪的心坎里，尤其是他们都建议她把儿子们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回到家后，咪咪亲手为每个孩子做了个陶瓷杯。每天早上她都会往那些牛油果色的杯子里倒满橙汁，让孩子们吞下菲佛医生开的药，雷打不动。上学的路上，玛丽总感到想吐，橙汁和维生素让她的胃烧灼得难受。她开始把药片藏在口袋里带出门，没人时赶紧扔到小树林里。

玛格丽特离开家两个月后，1976年3月，科罗拉多州的一名高速公路巡警注意到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在24号公路上一路朝东走。这个人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沿着双黄线走在路的正中间，车辆从他两边嗖嗖地驶过。这个人是唐纳德。巡警叫他走到路边来，但唐纳德拒绝了。巡警因此试图逮捕他，唐纳德开始推搡挣扎。几个巡警加上当地几个消防员一起才制服了他。在科罗拉多泉市的看守所，警察了解到唐纳德已经好几个月没服药了。

警方把唐纳德转到了普韦布洛的精神病医院，他在那里已经很有名了。医生了解到唐纳德1月才刚刚回家。这次，他又是去俄勒冈找吉恩，但被告知吉恩加入了美国和平队。他在俄勒冈待了一阵，在一艘捕虾船上打工。当他回来时，多恩和咪咪同意他住在家里，但要他答应定期去科罗拉多泉市的派克峰心理健康中心接受药物治疗。唐纳德刚开始时同意了，但后来又反悔了，现

在成了普韦布洛的医生们所谓的“管理难题”。“他们家还有几个男孩子，”普韦布洛的一份报告写道，“他和家人都认为他不应该再住在家里，因为他年纪不小了，而且对家中其他孩子会造成恶劣影响。”这份报告中写道：

他否认自己有幻觉，但会频繁转动他的头并看向两边，就像在倾听什么声音。他有很多关于宗教的思考，会说起脑中不断出现的象征符号。他描述过一个婴儿的形象，上帝的光辉照耀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在和他交谈时，他很多时候都显得非常紧张，表现出敌对情绪，例如想要把我的书写垫板打掉……

几天后，唐纳德仍然思维混乱，坐立不安，具有攻击性。或者像医护人员所说的那样，“想要攻击、毁灭、吵架、自杀，过于活跃、话多并且言辞夸张”。报告上还说他在“公开场合自慰”和“暴露自己的隐私部位”，溜进女病人宿舍，有次还闯入了女浴室。普韦布洛的医生给唐纳德服用氟奋乃静让他安静下来，但他仍坚持说自己脑中会闪过各种符号。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医生视为情况足够稳定，在4月出院回家。

周末的时候，吉姆的儿子吉米——玛丽的侄子，只比玛丽小几岁——会和玛丽组成一个小小的两人一日游团队。吉姆会对多恩和咪咪说他要带他们去教堂，而实际上他们是出去玩，要么去滑冰，要么去公园。渐渐地，玛丽和吉姆以及凯西共度周末成了父母期待的事情。“危机来临前，”玛丽后来说，“妈妈会打电话给吉姆和凯西，叫他们来接我。”

凯西仿佛变成了玛丽的代理母亲，吉姆相应地也就成了她的代理父亲。

自从玛格丽特走后，当玛丽在吉姆家的时候，吉姆会在晚上来到玛丽的床边，那时玛丽大约10岁。他会把手指伸进玛丽的身体，还会强迫玛丽给他口交。玛丽会感到困惑不解，但在拒绝一下之后还是会服从。玛丽没太反抗，因为她和姐姐有一样的想法：因为她喜欢凯西；因为这总比待在家里强；因为她也有点习惯了不反抗，把吉姆的这些行为理解为是吉姆喜欢她。

玛丽进入青春期后，情况变了。吉姆从未停止过殴打凯西，但现在玛丽看待这件事的方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她觉得这种行为不合理，觉得这种行为丑陋、恐怖，是不对的。但她不能抛弃凯西，所以即使是在这时，她还是会不断回来。为了不抛弃凯西，她继续忍受着吉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玛丽某种程度上明白，这一切必须终止。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就像姐姐那样。她觉察到吉姆对她正变得得寸进尺。她想过如果吉姆在她身上为所欲为的话将意味着什么，想过那是否意味着她会生一个孩子。

她尽力不去想这件事，但事实就在眼前。她想要逃避，却不能永远躲开。

[1] 1码 $\approx$ 0.91米。——译者注

[2] “Private Institutions Used in C.I.A. Effort to Control Behavio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 1977.

[3] Carl C. Pfeiffer, “Psychiatric Hospital vs. Brain Bio Center in Diagnosis of Biochemic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 5, no. 1 (1976): 28—34.

第20章

加里夫妇家有一个修剪树篱的园丁，一个给全家人洗衣服的女工，还有一个会为晚餐制作牛排和土豆的德国大厨。他们家总共有7名员工，这还不包括开飞机的飞行员和私人滑雪课程的教练。

加里一家住在丹佛南部的樱桃山社区，这里很清静，远离市中心的喧嚣。房子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马场，私家车道上停着一辆保时捷和一辆奔驰，后院有一个巨大的蹦床。室内玄关处的右边有一个游泳池，池水一片碧蓝，散发着氯气的味道，也让游泳池的周围湿气重重，游泳池里还装了龙卷风滑梯和泡泡屋顶。所有过道的墙上都挂满了油画：莫迪利安尼、德·库宁、夏加尔、毕加索。游戏室里有一张巨大的秋千和一座实物大小的玩具屋，里面有可以过夜的双层床。玛格丽特的房间里有一张水床，她刚开始觉得非常震惊。睡了几个晚上后，她才敢鼓起勇气要一张普通的床。他们给她换了一个。

玛格丽特和管家特鲁迪熟悉起来。特鲁迪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加里家的所有孩子和他们的朋友。还有洗衣女工凯蒂，每个工作日会把玛格丽特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好送到她的房间。玛格

丽特也和加里家的8个孩子熟悉了起来，并且和苏西以及蒂娜成了好朋友。苏西比玛格丽特小几岁，是个小捣蛋，蒂娜要大几岁，是个乖乖女。玛格丽特跟着他们一家去过佛罗里达群岛和滑雪胜地维尔小镇很多次，他们在维尔镇的主街上有套公寓。玛格丽特可以走进各种商店，无论是滑雪服、新款的马克四号滑雪板还是缆车票，她想要什么就能买什么。滑完雪，她还能在糖果店买零食吃。南希·加里从来不出去购物，商店会把东西送上门。没多久，玛格丽特也穿上了跟加里家孩子们一样的法国鳄鱼牌衬衫和橄榄球衣。

夏末，他们一家人会飞去蒙大拿的家。那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有一整面玻璃墙，透过玻璃墙能看到弗拉特黑德湖，视野远及鲍勃·马歇尔联邦荒野保护区。在加里一家数百英亩的地产上，有一个小海湾用来停放滑水和漂流用的摩托艇及双桅纵帆船，一个可以招待专业网球运动员住宿的网球场，一个开放采摘的樱桃园，和一个可以骑马的马场。来蒙大拿度假时，他们会专门把马从丹佛运来。用人也会一起来，负责照顾起居和准备饭食。在蒙大拿，南希·加里就像是负责所有孩子活动的CEO，而管家特鲁迪则是她的副手，扮演着夏令营辅导员的角色，安排每个孩子的网球课、骑术课和滑水课。山姆·加里仍然需要经营自己的石油帝国，因此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蒙大拿和丹佛之间，回来时会教孩子们滑水。他会坐在码头边缘，伸出脚，架住孩子们的腋窝，直到摩托艇开动，把孩子向前拽去。

玛格丽特的父母会说，他们给过她选择的机会，可以留在这里，不去加里家。但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根本不算真正的选择。她得到了一个不再做母亲助手的机会，不用再打扫餐具柜，不用再给楼梯吸尘，不用再搬运日用品，不用再喂鸟或者为早餐烤两条面包。对她来说，阿斯彭和圣塔菲的夏日舞会早就已经可望而

不可即了。事实上，这些娱乐活动在父亲中风并离开联合会后就已经终止了。而现在，她有机会不用再被迫去观看冰球、棒球和足球比赛；不用去空军学院高中或者可怕的圣玛丽高中上四年学；不用去上体操课，不用跟合不来的教练相处；不用去跑道上跟那些比她快的人赛跑；尤其不用去参加她讨厌的啦啦队。

玛格丽特得到了一个逃离哥哥们的机会。除了随时可能会爆发的唐纳德和彼得外，还有住在路那头的哥哥，那个经常留她过夜，晚上不断骚扰她的哥哥。

最后这个原因——吉姆——才是让玛格丽特下定决心的关键。当她扪心自问时，她非常清楚，其他原因都只是借口。

由于这样的原因，去加里家对玛格丽特来说也不是一件至美之事。无论她玩得有多么开心，她总忍不住觉得自己像是受到了驱逐或者流放。她会想，为什么吉姆仍然是家庭的一员，显得那么重要，甚至受人尊重，而她自己却被打发走了呢？

被南希从隐谷路带走后不久，1976年2月，玛格丽特迎来了自己14岁的生日。在家时，玛格丽特得到的生日礼物通常都很普通，比如一双溜冰鞋，或者从斯宾塞礼品店买来的收音机。而在加里家，桌上铺满了手表、弗莱牌皮靴，还有满满一柜衣服，供她在肯特丹佛高中上学时搭配。加里家的孩子上的也是这所贵族私立学校。

玛格丽特很努力才跟上了肯特中学的学业。肯特中学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车、自己的银行账户、自己的零花钱和置衣金，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都能回忆起和家人一起去国外游玩的经历。在入读肯特中学以前，当玛格丽特在做弥撒和帮助妈妈照顾14个人的大家庭时，在肯特中学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学制陶和绢印T

恤。这使他们似乎都比玛格丽特更有艺术创意，思维也更开阔，制作出的雕塑简直就像是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作品一样。在各项比赛中，玛格丽特往往在预选赛时就会被淘汰，创意写作课也只能得“中”。在这里的第一年里，玛格丽特挣扎于感恩和恐惧之间，执迷于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她告诉自己，那些排挤自己的女生都是势利眼，但她还是忍不住暗暗和她们比较。

在新学校，玛格丽特被指定要读的第一本书是《远大前程》。这本书正好戳中了玛格丽特的软肋，因为她和书中的主人公皮普一样，都受惠于一位神秘恩人的帮助。只不过在玛格丽特的情况中，神秘性更深不可测，因为加里一家怎么会那么友好，似乎要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分享给她。她同这家人的关系让她困惑不解。有一次，那是在蒙大拿时非常平常的一天，南希在切一块巧克力蛋糕。她动作夸张地给玛格丽特、其他人和自己切下一块，然后再切下一块，再切下一块，表现得好像她是在试图把蛋糕分得特别平均一样。看着这滑稽的一幕，玛格丽特笑了。但她很快明白，其实这蛋糕不属于她，只是一份礼物，永远只是这样。

山姆·加里跟多恩·加尔文年纪差不多。他跟多恩一样，也在纽约长大，不过他的家不是在皇后区的郊外，而是在公园大道。二战后，山姆在海岸警卫队服役。一次休假的晚上，他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一个舞会上遇见了南希。1954年，就在加尔文家搬到科罗拉多泉市没几年之后，加里一家搬去了丹佛，当时石油开采业正在迅猛发展。

跟多恩一样，山姆为人和善，讨人喜欢，性格沉静而谦逊。但两人也有差别：多恩善于搞学术，而山姆善于做生意，是个天

生的商人。20世纪50年代，南希对这位未来丈夫的主要印象是他坐在别人家前廊的摇椅里，和他想钻井的某块地的主人闲扯。“最后，山姆会说，‘要不把你北边那块40英亩的地租给我吧’，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那些人会说，‘没问题’。他在这方面很在行，很善于跟人打交道。”

山姆也天生爱冒险。多年来，他在丹佛被人称作“干洞山姆”，做决策时冲动冒失，总会在错误的地方钻井。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采石油的人都在怀俄明州钻井，山姆却在蒙大拿州东南角的洲际线以北钻井。他一连钻了35口井，却全都是干洞，一个都不出油。他不止一次说不再干这种行当了，可又总是回头继续钻井。1967年，山姆开始在一片4万英亩的土地上钻井，业内的其他人都确定那片地下面什么都没有。他后来说，自己之所以最后会有这么一大片土地，“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我再也卖不出去了”。但他在联合会的好朋友多恩·加尔文向他伸出了援手，帮助他获得了这片土地的钻探权。

多恩在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为华盛顿特区的监管者和投资美国西部的企业家牵线搭桥。当多恩需要人支持一个艺术或文化项目时，山姆会是他求助的人之一。而当山姆需要找投资者在不被人看好的地方钻油井时，多恩也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他。对山姆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多恩会把自己在华盛顿听到的政府土地租赁和到期的风声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他。1967年6月29日，山姆在蒙大拿州贝尔溪钻的一口新井出油了，这是他钻的第36口井。此后，山姆开了400口新油井，最后保留了30%的所有权。大器晚成的山姆成了落基山脉地区的顶级富豪之一。多恩和山姆谁也没挑明，其实是多恩想办法，帮助山姆得到了那块最终决定他命运的土地。不过在山姆的油井出油后，他们之前的泛泛交往变得更密切了。

玛格丽特后来发现，在加里家的生活也有不容进犯之处。跟加尔文家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家族病——肌强直性营养不良。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遗传病，会导致身体肌肉不断萎缩。在南希和山姆的8个孩子中，有4个在小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某些症状，他们最后都会因为这种病在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与加尔文家不同的是，尽管山姆和南希面临着重重困镜，他们似乎仍然决心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背包旅行和滑雪。有钱还是管用的：他们的暴富减轻了一点他们的负担，他们也会把自己拥有的东西与人分享。玛格丽特并不是加里一家收留的唯一一个孩子。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他们去墨西哥旅行时遇到的男孩和一个来自丹佛的女孩。山姆从不隐藏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觉得虽然自己的成功和努力工作分不开，但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很幸运，因此他觉得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加里家第五个患病的孩子曾在私立的梅宁格诊所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家诊所也善于诊治精神分裂症。南希和山姆知道，这家诊所是多恩和咪咪负担不起的，但他们的帮助当然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帮助加尔文家的所有孩子，所以他们带走了一个女孩，年纪足以上肯特丹佛高中的大女儿。

即使在玛格丽特过得最舒坦的那些日子，她都会思考这份善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想法现在成了她最大的敌人。她开始琢磨各种假设，这种思绪让她越来越感到如履薄冰。如果山姆从来没让她父亲帮他获取那些无人看好的钻探权，情况会怎样？如果山姆放弃了第35次钻井的计划，从来没发财，情况又会怎样？如果她没有从家里过来呢？另外，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因为山姆和南希真心想帮助她，真心喜欢她，还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愧？

不可避免地，玛格丽特开始把心绪宣泄出来。她开始偷些小东西，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拿去跟别人比。她在洗劫苏西的储蓄罐时被特鲁迪当场发现，但没有受到惩罚。这件事再次让玛格丽特感到愧疚，觉得自己欠加里家的，认为他们是出于慷慨才不予追究的。

但慢慢地，她适应下来了。在野外、河流以及圣胡安山脉的多年旅行使她成了一名特里马滑雪好手和出色的背包客。肯特中学的男生们之前都无视她的存在，后来才发现她原来这么善于运动。成为男生中的一分子并不能让玛格丽特博得女生们的好感，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玛格丽特在肯特中学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家伙，他帮玛格丽特打开了社交的大门。玛格丽特和他一起吸过当时肯特中学流行的各种毒品，从大麻到鸦片都有。她在红岩举行的一场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演唱会上试过可卡因，还在丹佛大学举行的一场肯尼·罗根斯的演唱会上因为吃了太多大麻布朗尼蛋糕而晕过去。

她也跟那个男朋友做爱了。在经历过吉姆对她做的那些事之后，这似乎是她在努力回归正常，努力寻找一种被爱的感觉。她花了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多精力来回避家人生病带来的耻辱感，并努力遗忘吉姆对她的伤害。

玛格丽特从没告诉过她在肯特中学的朋友自己有个哥哥死了，也没告诉过他们自己还有三个哥哥是精神病医院的常客。要想让这些秘密成为尘封的往事，玛格丽特就永远不能解释她跟加里一家一起生活的原因。她心中很清楚肯特中学给她提供了怎样的教育机会，而她能得到这种机会是多么幸运。隐瞒事实也许会让她在某些同学眼里显得有点虚伪，但只有这样她才能熬过每一天，才能筑造让她不太害怕的生活，才能活下去。

对玛格丽特来说，隐谷路如今既是家，又不是家。加尔文一家似乎已经离她很远了。尽管这会使她产生阵阵愧疚，但也让她如释重负。她父母来看她那天，开着那辆老掉牙的奥兹莫比尔从加里家的奔驰旁驶过，这让玛格丽特羞赧不堪。她对母亲的着装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玛格丽特只会在假日回隐谷路，而这绝非回家探亲的好时机，因为这时每个生病的哥哥都挤在家里。有一年，乔一个背摔把马特摔在露台上，导致马特后来不得不去医院检查脑震荡。而当马特的头撞到混凝土地面，鲜血开始往外冒时，其他人却变得兴奋了。几乎没歇一会儿，楼下又有人开始打架了，这次多恩只好过来拉开双方。多恩当时还在中风恢复期，但他实在太生气了，感到必须做点什么来结束这场混乱。

玛格丽特记得车库的木门被撞得七零八落，争斗最终停止了，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最后，救护车过来，把马特带走了。

1976年，马特进入劳莱特高地学院念美术，这是丹佛当地的一所私立学院，离加里家不远。马特是多恩和咪咪的第九个孩子，冰球男孩之一，比玛格丽特大4岁。他会制陶，而且手艺很好，甚至咪咪也这样说。南希·加里也会鼓励马特，她是劳莱特高地学院董事会的一员。加里一家还告诉马特，他们随时欢迎他来家里玩。

一天，马特带着自己制作的一只花瓶来到加里家，想给他们看看自己的技术。玛格丽特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声，这时，马特浑身赤裸来到了楼上。他在上楼前已经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把花瓶也砸碎了。加尔文家其他男孩发病前至少都会表现出一些先兆，马特的发病实在太突然了，让人难以接受。折磨着哥

哥们的那种东西仿佛正在加快速度。

玛格丽特的旧世界就这样击碎了她的新世界，提醒着她，她不属于那里，没有什么安全之地。她感到她在肯特中学的朋友们迟早会知道有关她家的真相，有关她的真相。

第21章

“这里的心灵感应信号很强，”一个瘦巴巴的男人浅笑着对周围一圈西装革履的人说，“如果你们安静一点，就能感觉到。”[1]

斯蒂芬·加斯金是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士兵，[2]身高6英尺4英寸，[3]蓄着金色的山羊胡，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一蓬不服管束的长发仍旧飘荡在肩膀上。在军队服役的时光早已过去，他沉浮于世，变成了一位预言家。20世纪60年代末，加斯金最先通过一系列名为“周一晚间课”的演讲在旧金山招揽了一群仰慕者。[4]他通常在可容纳两千人的舞厅发表长篇大论，说辞中包括迷幻之旅、超自然活动，以及和平追寻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式。1970年，加斯金决定带着“周一晚间课”上路。他和400名追随者用60辆巴士组成车队在全国各地巡游，吸引了大批媒体的关注。车队的标语上写着“去拯救世界”。[5]在全国转过一圈后，加斯金的新社群——一个由老练的革命分子组成的四处漂泊的群体——支付了近12万美元买下了田纳西州萨默敦树林一片1 700英亩的土地，于1971年春天在那里定居下来。[6]几年内，这片被加斯金命名为“大农场”的地方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公社。[7]

1974年，迈克尔·加尔文第一次来到大农场，一方面作为嬉

皮士寻找着新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也因为走投无路。布莱恩和诺妮的悲剧让家里每个人颜面尽失，但陪多恩去看尸体，听警察用冷冰冰的医学术语解释哥哥和那个女孩不幸的人，是迈克尔。他坚信，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他是可能帮到哥哥的，也许如果他当时直接去萨克拉门托，而不是洛杉矶，就有可能及时赶到，挽回点什么。但究竟能帮什么，他也说不好。

咪咪和多恩一定觉察到了这件事对迈克尔的打击。他们决定送他去纽约，跟多恩的另一个兄弟乔治待一段时间。乔治在长岛铁路局工作，是一名列车长。咪咪和多恩认为，或许乔治能帮迈克尔找个司闸员的工作。但迈克尔没能通过技术测试，因此去新泽西找他外婆。在那里，外婆想出了一个新主意。

当时大农场名气正盛，吸引了约大约1 500人前来。[\[8\]](#)迈克尔大概是唯一一个坐外婆开的别克车来到大农场的人。进入农场前，迈克尔被告知了农场的规章——不能公开发脾气、不能撒谎、不能私自存钱、不能吃动物制品、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使用人造致幻剂（如LSD）、不能有婚外性行为。对于这些规定，迈克尔全盘接受。关于婚礼，史蒂芬·加斯金获得了田纳西州的授权，可以主持婚礼。[\[9\]](#)他经常帮人办结婚手续，更喜欢同时结合两对夫妇，他管这叫“四人婚姻”。[\[10\]](#)

尽管加斯金全心全意支持密宗性爱，[\[11\]](#)还向人大量提供自己家乡产的致幻蘑菇，[\[12\]](#)但很快，迈克尔就发现大农场不是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大家的行动一直都在受到监视，监视者通常就是加斯金本人，他常常抱怨自己整天的时间只够帮大家解决争端。[\[13\]](#)住在农场的这群反威权主义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现金、车子、房产，甚至继承权，却从来没有质疑过统治他们的领导

人。加斯金决定着每个人可以吃什么样的致幻剂，谁可以和谁上床，乃至公社里的资金流动。[14]他还制定了一个叫作“30天流放”的惩罚机制，这期间“农场人”可以“洗心革面”。[15]他曾经说，“树不修不成材”。[16]加斯金要求别人保持贞洁，自己却和另外两个男社员分享三个妻子，这是属于他的“六人婚姻”。[17]其中一个妻子，伊娜·梅·加斯金，后来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精神助产术》的书，颠覆了美国人对自然分娩的看法。她擅长助产是有原因的：农场每个月都有超过4个婴儿出生，这让伊娜·梅和她的助产士学徒们忙个不停。[18]她总说：“农场人是群特殊的嬉皮士：他们愿意干活。”[19]

迈克尔发现自己并不讨厌干活，甚至还有点渴望干活。加斯金坚称农场不是邪教，而是一种展示不同生活方式的集体项目。他会在演讲中提到西藏瑜伽士米拉日巴（Milarepa）的教义，说米拉日巴的师父将他投进绝望的深渊，就是为了塑造他的品格。[20]他还说关键不是要像个典型的嬉皮士那样满不在乎，而是要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要能听到动静。“如果你太过习惯而不再注意，那就会像住在瀑布旁边一样，”加斯金说，“住在瀑布旁边的人是听不到这些动静的。”[21]

加斯金在每个周日上午做演讲，农场的每个人都要参加，一起集体冥想。迈克尔觉得这比他以往参加过的任何天主教弥撒都更有意义。迈克尔曾经猜测的事情在这里得到了解答和证实——科学只能解释客观世界，却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他喜欢加斯金所谓的“圆融”的理念：如果你与他人一度变得疏远，一定要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不留误会。在隐谷路时，家里从来没有这种“圆融”的状态，只有兄弟姐妹间层层累积的纷争，甚至父亲的干预也没能让大家和睦相处。他们或许能一起坐下来看场橄榄球赛，但却无法消除分歧。还能有别的生活方式吗？

对于迈克尔来说，最紧张的一刻发生在一个叫“磨石机”的帐篷里。[\[22\]](#)这个帐篷扎得离公社很远，加斯金把他认为太喜欢寻衅挑事的男社员都送去了那里，让他们去互相剖析对方的问题：你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按照加斯金的理论，他们要一直探讨，直到粗糙的棱角被磨平为止。对农场上被“派出去”的那些人——这些人要么容易心神不安，要么易怒，要么不能共情，要么太懒——加斯金总不吝惜自己“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23\]](#)“你是你可以掌控的唯一变量，”他常说，“你要是总过得不开心，就去搞清楚你为什么过得不开心，把问题解决掉。”[\[24\]](#)

迈克尔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话。他家一直以来奉行的都是自上而下的专制原则，这种啄序关系使年纪大的孩子有机会侵害年纪小的孩子。没错，农场也有一个领导，但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并且会不断挖掘问题的潜意识根源，直到所有人理解问题的所在为止。

这种态度和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很类似：对事情的否认、压制和掩盖与事件本身一样恶劣。

迈克尔爱上了“磨石机”帐篷。农场的一切在他看来都那么健康，开明、心善的人们总是善待彼此。但在农场期间，他对自己家庭的厌恶却与日俱增，有时甚至盖过了他当时感受到的美好一面。他忘不掉父母曾经想把他送去住院的事，到底什么样的家庭和体制才会想把一个没有疯的人送进精神病医院？迈克尔确信，多恩和咪咪的独断是他们家庭问题的部分原因。

8个月后，迈克尔和他在“磨石机”的伙伴已经被隔离得太久了，加斯金不得不下命令让他们回来，住得离公社近一点。在离开“磨石机”之前，迈克尔从帐篷下面掏出了一个他之前放在那里

的包。当到达新住处并打开包后，他看到无数粒细小的虫卵从包口溢了出来。

迈克尔把这个细节看作自己应该结束农场生活的信号。他去找加斯金，说自己要离开了。正好这时有一辆去阿尔伯克基的大巴，带着一套全新的生活技能，迈克尔登上大巴离开了。

但迈克尔还没准备好回家。他有个老朋友正要去夏威夷，因此他花130美元买了一张机票，从洛杉矶跟了去。他在夏威夷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做些搭石膏板的短工，靠政府发的食物券吃饭，没有父母或农场大家庭的帮助，完全凭自己的力量生活。

渐渐地，他淡忘了一些过去的悲伤，并打算和几个朋友搬去菲律宾。但他妈妈打电话来说很想念他，想给他寄一张回家的机票。

从农场学来的经验此时正好可以运用到他早就抛诸脑后的家人身上。迈克尔回到科罗拉多泉市的家里，报名上了一所社区大学，学习机械制图。他没有料到自己会陷入更多的冲突中。唐纳德这时住在家里，迈克尔总会被他激怒。迈克尔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唐纳德总是做些对他自己毫无益处的事，他是不是已经无可救药了？家里现在的情况比迈克尔走之前更糟了。父亲中风了，彼得也生病了。一切都比他印象中失控得更严重。也没人听取他的建议。他想让他们吃糙米和冥想，他们却一点也不愿意。

迈克尔备感挫折。怎样才能让兄弟们愿意做他做的那些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突破自我？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注意到周围那嘈杂的瀑布声？

[2] “Why We Left the Farm,” *Whole Earth Review*, Winter 1985.

[3] Jim Ricci, “Dream Dies on the Farm,” *Chicago Tribune*, October 2, 1986.

[4] “Why We Left the Farm,” *Whole Earth Review*, Winter 1985.

[5] Moretta, *The Hippies*, 232.

[6] Moretta, *The Hippies*, 232.

[7]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estimate, cited by Ricci, “Dream Dies on the Farm.”

[8] Moretta, *The Hippies*, 236.

[9] Moretta, *The Hippies*, 233.

[10] Moretta, *The Hippies*, 240.

[11] Moretta, *The Hippies*, 240.

[12] Moretta, *The Hippies*, 242.

[13] Gaskin, *Volume One*, 11, 13, 14.

[14] Moretta, *The Hippies*, 238.

[15]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786, Kindle.

[16]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786, Kindle.

[17]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786, Kindle.

[18]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786, Kindle.

[19] Moretta, *The Hippies*, 233.

[20] Gaskin, *Volume One*, 19—21.

[21] Gaskin, *Volume One*, 13.

[22] Moretta, *The Hippies*, 240.

[23]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218, Kindle.

[24] Stiriss, *Voluntary Peasants*, chapter 3, loc. 218, Kindle.

第22章

玛丽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去看望玛格丽特。如果加里一家没有乘飞机去其他住处的话，她父母每隔几个月就会让她去丹佛过周末。有一年的夏天，加里一家还出钱让玛丽去参加了为期两周的日内瓦峡谷夏令营。那是个全程在外住宿的夏令营，会让营员体验很多精心设计的场景，比如圆桌骑士，比如印第安人的传统。玛丽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吉姆，可以放下防备，卸掉伪装，忘却家中的糟心事。1976年夏天，第一次离家之旅临近结束时，玛丽打电话回家请求留下来。加里一家承担了她接下来8周的衣食住行。之后每个夏天她都会回加里家，直到上大学。

每年夏天的最后两周，加里一家会让一群孩子——包括朋友和表亲家的孩子——去他们在蒙大拿的住宅。玛丽也一定会去。她和苏西·加里很投缘，她们都爱玩闹，一起偷喝山姆的酷尔斯牌淡啤酒。玛丽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玛格丽特能长期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而自己求了好久却只能偶尔过来。随着玛丽逐渐长大并且和加里一家更加熟悉，山姆开始更多地和她聊起她的未来。每当玛丽说想在未来为社会做点善事时，山姆的回答总是一样：“如果你想做那样的工作，那么就赚些钱，然后把这些钱捐出来。”

玛丽和玛格丽特都很喜欢来蒙大拿，但这里给两人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对玛格丽特来说，蒙大拿从来没有给过她家的感觉，而对玛丽来说，蒙大拿是一种摆脱自己家的生活滋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罗拉多泉市家中的焦点人物都是马特。在那段时间里，他自称是保罗·麦卡特尼。

那次在加里家发病后，1977年，马特终止了在劳莱特高地学院的制陶课程，回到家和唐纳德以及彼得一起住。12岁的玛丽是家中唯一神智正常的孩子，已经不再把马特当作保护自己的人，因为现在马特自己就是个麻烦，是个祸害。一天，玛丽被彼得烦得受不了，于是去向马特求助。父母当时都不在家，唐纳德也不在。两兄弟在客厅打了起来，就像过去唐纳德和吉姆那样。一旦拳脚相见，打架的理由就不再重要了。马特和彼得都失控了，仿佛释放出了某种原始的力量，某种玛丽未曾见过的力量。她确信他们会杀死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已经学会了固定不变的应对方式。她冲进多恩和咪咪的卧室，扣上锁，打电话报警。这让马特对她大为光火，因为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警察上门。玛丽浑身发抖，坐在卧室里，手中拿着电话，而那个曾经她最景仰的马特，正试图把门撞开。

所幸警察及时赶到，把马特送去了医院。这是玛丽第一次亲手把一个哥哥送进医院。她后来惊讶地发现，在自己对患病的哥哥们满怀愤怒这么多年后，她竟然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

同样让她惊讶的是，自己实际上并不希望哥哥们伤害彼此。在对他们积蓄了如此深厚的憎恶后，她发现自己还是在乎他们

的。

马特第一次住进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是在1978年12月7日。5天后，彼得也住院了，这是他一年中第三次去普韦布洛。唐纳德那年在普韦布洛进进出出。加尔文家的三兄弟住在同一家医院的不同病房，而这并不会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只要玛丽单独和马特以及彼得待在家，她就会把自己锁在父母的房间里，直到其他人回家。

彼得是年纪与玛丽最相近的哥哥，只比她大4岁。在家里，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拒绝任何帮助和建议。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任何医疗照护，也不认为自己需要每三个星期注射一次氟奋乃静。

到1978年彼得18岁时，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的医护人员都已经很熟悉这家人了，尤其熟悉咪咪，知道她是每个儿子热情的代言人。如果只是去看门诊，彼得会住在隐谷路，直到他实在无法继续待在家里，或者他父母难以忍受他，把他送走为止。他会在桥下面扎营，一住好多天，或者搭顺风车去维尔小镇，沿着主干道溜达。

彼得那年住了6次院。科罗拉多泉市一个叫作看护之家的公益住宿组织曾经短期收容过他，但他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不告而别，从此上了那里的“黑名单”。7月2日，彼得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说他们拿了他的氟奋乃静，愤怒的他砸碎了家里四扇落地窗。事后彼得解释说他“真没想把事情闹那么大，但脾气上来了拦不住”。于是父母再次将他赶出了家，只是这一次，他到了可以被送进普韦布洛州立精神病医院的年纪。

在彼得进进出出普韦布洛三次后，医护人员们开始注意到他

的两面人格。他可以非常招人喜欢，“在面谈的时候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举止得体，机敏又亲切”。一旦话题涉及他的家庭，“他整个人就会明显变得浮夸，满是妄想”，还会表现出“攻击性”，“充满敌意”。彼得会说自己曾面试过一个修建艾森豪威尔隧道的工作，会说自己决定几个星期后去做一名滑雪教练，还会提到自己最近为电视连续剧《查理的天使》做过滑雪替身。普韦布洛的医护人员有时不得不给他穿上束缚服，但只要一脱下束缚服，彼得就会逃出去。有一次，他逃到了普韦布洛以东50英里的奥德威，那是个只有一千人口的小镇。他在那里跳上一辆轿车，企图再跃上一辆行驶中的卡车，差点被撞倒。另一次，他说自己是为英国女王服务的特工。“彼得目前精神错乱，说话漫无边际，”一份报告写道，“与他的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和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大概第一次对彼得“易怒、要求不断、比较亢奋和有控制欲”的特点感到非常震惊，怀疑彼得的毛病很有可能完全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双相情感障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彼得的太不稳定，不能长期服用当时被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锂盐。在抗精神病药物中，锂盐是少数几种轻微过量使用就会引发危险的药物，因此病人服用锂盐不仅要严格遵循医嘱，还要配合医生检测血药浓度。在这一点上，彼得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但只要彼得还在使用氟奋乃静，那他从表面上看就多少还能过得去。于是医生决定还是将精神分裂症作为他的诊断结果，总结说“在现阶段区别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实际意义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医生给彼得开的药都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尽管他有可能患的是另一种病。

即使唐纳德不在家，或者要去科罗拉多泉市的派克峰精神健

康中心看门诊时，他仍然会每周去外面走上200英里。他的工作换了又换，但行走是他永远不变的主题，他的宗教见解和布道也是。但他的晃荡不时会让他陷入麻烦。1978年9月，他在一家运动品商店和售货员发生了口角，之后被送回了普韦布洛。他住了近3个月的院，其间说自己打算在圣诞节离开美国，放弃他的公民身份。

一年后，唐纳德和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的护士又发生了争执，再次被送回了普韦布洛。这期间，他开始说起天上各种各样的星星，说这些星星能指引他找到地下特定的元素，还说这些元素和他所谓的“岩刀化学”有关。他认为自己必须找到这些元素，然后用锤子把它们砸成粉末后吃掉。

1980年1月7日，唐纳德出院了，但3月时又入院了。这是他10年间第6次住进这家位于普韦布洛的州立医院。事情的起因是多恩和咪咪对他失去了耐心，叫他自己去找公寓住。在病房里，唐纳德叫嚷着有关耶稣的话题，他的氯丙嗪用药剂量被加大了好几次，但效果甚微。医生后来给他使用了一种叫作琥珀酸洛沙平的抗精神病药物，使他的状态稳定了下来。6月，唐纳德再次出院了。

但他在11月又被送回去了。他停止了服药，一天有18个小时都醒着，在屋内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声嘶力竭地喊叫。吉恩又回到了他的思绪里。他还把吉恩称作自己的妻子，并且会提到刀和枪。

医院的报告上说，咪咪和多恩非常害怕他们的长子。“他们希望唐纳德能清楚认识到父母是爱他的，但在他接受药物治疗、病情稳定之前，他们无法接受他。”

当音乐教师的约翰住在爱达荷州。理查德，那个曾经家中心机最重的男孩，正试图在丹佛做生意。两个没有患病的冰球男孩，马克和乔，分别住在博尔德和丹佛，回家需要好几个小时，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使他们没有目睹家中最困难的时刻。在知道他的冰球队友马特和彼得身上发生的事后，家里曾经的象棋天才马克备感心痛。乔在机场找到了一份开燃料卡车的工作，生活得很平静，但他似乎也表现出了一些精神病的征兆——与日常生活完全脱节，并且在理解基本的社交原则上有障碍。

还有吉姆。

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再清楚不过了：玛丽绝对不能聊起大家生病的话题。但家人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玛丽都看在眼里，她对此很气愤，心中甚至已经在暗暗准备接受自己将是下一个患病孩子的现实了。她长大一些后，玛丽不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焦虑。她差不多已经13岁了，不再是个小女孩，不能再被敷衍了。晚上，她毫无歉意地狠狠捶着墙壁，企图让唐纳德安静一点。

玛丽也注意到了其他的变化。白天，她发现父母正在彼此疏远对方。咪咪现在似乎只是多恩的护理员，而不再有其他身份。有一次，咪咪甚至离开家去跟她在东部的妹妹贝蒂住了几周，把玛丽和她父亲以及哥哥们丢在家里。又一次离弃，又一个逃兵。

咪咪一定注意到了玛丽的这些想法。她觉察到了玛丽心里的怒火，甚至能够理解她的怒气。于是她开始带玛丽去市中心购物，就她们两个人，还带她去和朋友一起喝茶。虽然没有明说，但咪咪在努力讨好玛丽，试图告诉她，妈妈也爱她。尽管有点不情愿，但玛丽还是很喜欢与母亲独处的时光。尽管玛丽认为她唯一的愿望就是逃离这个家，但她真正想要的，或许是这种亲近的感觉。一种并不复杂的爱，没有困惑，也没有危险。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马克 吉姆 马特 约翰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玛丽 琳赛 乔

第23章

玛丽尝试过跟玛格丽特一样去肯特中学上学。但她提交的七年级入学申请被拒绝了，这让她极为生气。我进不了肯特？我姐姐就在肯特！

1978年，即将上八年级的玛丽告诉父亲自己想去寄宿学校。多恩向山姆·加里征询了建议。山姆问玛丽，他自己的母校，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基斯中学那样的地方对她有没有吸引力。严格说来，山姆是被霍奇基斯中学开除的，但学校和他之间的纠葛现在已经化解了。

玛丽没有一丝犹豫。如果她能入读离家2 000英里的高端寄宿学校，她就有机会不用再回家了。

玛丽申请了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埃克塞特中学、霍奇基斯中学和塔夫特中学，全都通过了。她最终选择了霍奇基斯中学，因为这所学校看起来最漂亮，也离市区最远。学校附近的伯克夏尔似乎比较能替代科罗拉多的大山，是她最好的选择。

玛丽的学费是由另一名校友赞助的奖学金支付的。加里一家则负责她的其他开销，比如交通费。在过去的三年里，玛丽一直

在寻觅逃离这个家的途径。现在，她终于赢得了她的车票。

这将是不寻常的一个晚上。玛丽知道这一点。

她13岁。吉姆31岁，还和凯西在一起，也还在曼尼托索道工作。山顶的索道站后面有个霉迹斑斑的小木屋，里面有几个旧垫子和睡袋。作为索道经理，吉姆可以随意使用这座小木屋。有时，他并不在家里招待弟弟妹妹，而是邀请他们上这里，在索道顶上住，这样可以单独待在一起。

这次，1979年春天一个凉爽的夜里，玛丽和马特来了。吉姆邀请他俩上来宿营，抽大麻、喝啤酒。夜深后，玛丽在小木屋的一个房间里睡着了，两个兄弟住在另一个房间。马特昏睡得不省人事，但灯还亮着。和过去一样，尽管玛丽知道吉姆会来找她，她还是尽力假装熟睡，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假装这些事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好像这种自欺欺人可以帮她解脱一样。

但玛丽那天晚上没法应付过去，因为她来例假了。相比吉姆遭她拒绝后的愤怒，她更害怕怀孕。

因此，当吉姆向她走来时，她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说出了自己也没料到的话。走开。离我远点。我恨你。

但吉姆还是侵犯了她。他进入了她的身体，这是他从来没对玛丽的姐姐玛格丽特做过的事情。吉姆还把精液射在了玛丽的身体里，但在之后，他再没跟玛丽提起过这件事，基本上总在躲着她。

之后的几周里，玛丽一直很害怕自己可能会怀孕。在发现自己没有怀孕时，她原以为自己会感到如释重负。毕竟，她反抗过，试图保护过自己，他再也不敢那么做了。想到这一点，她几

乎会感到欣喜若狂。

但有些意外的是，吉姆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这一点竟会让她感到非常痛苦。她试图忽视这种感觉，但这种痛苦却是真实存在的，她感到万分伤心。她像一个孩子那样真心地认为，那就是爱。

现在，玛丽自由了。她的生活中已经不再有吉姆，彼得、马特和唐纳德很快也会消失。她的未来属于她自己。八年级末，在被霍奇基斯中学录取后不久，玛丽收到一位朋友的哥哥的邀请，去参加一个高中聚会。她立刻就答应了。

玛丽告诉她妈妈，她要在朋友家过夜，但没提聚会的事。当她到达时，那位大哥哥已经在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喝七七牌威士忌了，她加入了他们。

男生们约玛丽和她朋友去镇上一个有名的幽会场所喝酒。她朋友拒绝了，因为她要留在家照顾妹妹们。玛丽接受了邀请，和男生们一起上了车。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玛丽的朋友和她妹妹已经睡了。玛丽喝得酩酊大醉，甚至没法走进房里。

男生们找到一个内嵌式壁橱，打开门，悄悄地引导玛丽走进屋，然后一个一个地跟了进去。

几小时后，玛丽醒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打开壁橱门，摸索着进了客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玛丽一阵发抖。按约定，她妈妈会来接她。她跌跌撞撞地走到屋外，捂着肚子，在马路牙子上等，回想着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母亲原本计划带她去看牙医。“我去不了，”玛丽一钻进车里就说，“我不舒服。”咪咪大概也猜到女儿昨晚喝酒了，但什么

也没说。毕竟，这已经是她第12个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了。

在回家的路上，前一晚的记忆突然一下子涌入了玛丽的脑海：两个男生轮流过来，另一个男生在一旁不是很积极地阻止他们。玛丽差点吐了自己一身。对于一个坏女孩来说，这是合适的惩罚，她当时想。谁叫她对妈妈撒谎呢，谁叫她喝醉呢，谁叫她不逃走呢。

玛丽的脑子里满是羞辱感，她只能把错都怪在自己身上。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但觉得她认识的所有人迟早都会知道。那天，她暗暗下定决心，去了霍奇基斯以后，再也不回来。

不会再有壁橱里的男孩。

不会再有索道顶木屋里的吉姆。

不会再有唐纳德、马特、彼得或其他人。只有她自己。

现在还在适应期，不要过早给别人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她想。她只希望霍奇基斯中学不要有人觉得她与众不同。但一位第一次见到她的老师在读了她的名牌后皱了皱眉。

“这个学校已经有一个玛丽·加尔文了，”这个老师说，“你的中间名是什么？”

玛丽没有立刻回答。她知道她的名字会透露出很多自己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她想短暂地遗忘玛丽·克莉丝汀这个名字，这个使她在哥哥唐纳德眼中成为基督的贞洁圣母的名字。坐在那些家世显赫的男女同学中间，玛丽深切感受到了这里的新教白人精英气息，她觉得自己的天主教名在大声说，她不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

玛丽立刻想到了一个名字。托马斯·林赛·布莱尼是她曾外祖父的名字。林赛是家族中的学者和佼佼者，就像老一辈和善聪慧版本的多恩·加尔文。林赛一直跟他们家往来密切，常给多恩和咪咪写信，很疼爱曾孙辈的孩子们。

对玛丽来说，“林赛”就像一个专门为预备学校准备的名字，更好，更有霍奇基斯味。她不小心拼读错了字母，将“林赛”（Linsey）说成了“琳赛”（Linsay），不过这反而使这个名字为她一人所独有。她必须采取行动，抹去过去13年生命中的一切。

“琳赛。”玛丽说。

从那天起，“琳赛”成了玛丽的名字。

第24章

1979年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医学中心

罗伯特·弗里德曼和琳恩·德利西从来没在同一个实验室，甚至同一家研究机构或者医院共事过。他们只是世界上成百上千名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专家中的两个。他们的专长也不同，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德利西想要找到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因素，而弗里德曼则在追寻对这种疾病的生理学解释。她想搞清楚这种疾病的原因，而他则想搞清楚这种疾病的机制。

他们俩都不知道，他们的研究道路有一天会汇集到同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上，而他们从这个家庭窥得的信息将会帮助解锁对精神分裂症的新认知。

与德利西的医学生涯困难重重不同，弗里德曼的医学研究之路走得顺风顺水。他196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比德利西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晚两年。在这之后，他直接进入了哈佛医学院。研究生期间，弗里德曼痴迷于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思想是可以自己形成的，是完全独立的另一种现实。“在我看来，如果有一种专属于人类并且具有哲学意义的疾病，那就是精神分裂症。”同时，弗里德曼也对机体非常着迷，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行机制。从医学院毕业后，他把研究大脑设定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

向。他相信，像氯丙嗪这样的抗精神病药物起效的原因一定可以有更好的解释。

通过一些初步的新研究，弗里德曼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难以用有效的方式处理中枢神经系统感受到的全部信息。这种“脆弱性假说”^[1]是一个来自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于1977年提出来的。这个团队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某些遗传特征对大脑的感觉和信息处理功能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大脑在面对环境中的触发因素时变得非常脆弱。这一假说算得上是欧文·戈特曼1967年提出的“素质—应激假说”的升级版，^[2]或者说是先天/后天之争中找到的中间派解释。这些研究者认为，无论是日常遭受的情感伤害，长期的贫困，还是童年时受到的创伤性虐待，这些经历都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但会提供“让脆弱生根发芽的机会，最终发展成精神失常”。^[3]很多人认为，这种脆弱实际上与“感觉门控”（sensory gating），或者说大脑正确处理即时信息的能力（或失能）有关。^[4]发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身上的精神分裂症就常常被认为是感觉门控异常导致的。^[5]纳什可以探究别人无法理解的数学模型，却依然会出现妄想，幻想有人来抓他。他人格的这两个方面都被认为是大脑信息处理能力过于敏感导致的。

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synapse）进行交流，这些突触是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传递神经信息的重要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点。很多当时的研究者开始猜测，那些像约翰·纳什那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修剪自己的突触。^[6]这些研究者认为，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对令人分心的声音极为敏感，容易被太多信息所吞噬，就像彼得·加尔文有时会感到的那样，或者像1897年丹尼尔·保罗·施瑞伯所

经历的体验那样。有些患者可能会反应过度，小心谨慎，甚至偏执，就像唐纳德·加尔文莫名其妙地受到启发，把隐谷路屋子里的所有家具搬出去那样。还有些患者则无法放心地做出选择，可能会妄想，有幻视和幻听，就像吉姆·加尔文那样。

在当时，感觉门控只是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众多理论中的一种。1978年，当弗里德曼作为一名研究者在丹佛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中心接触到这个课题时，他开始研究测量大脑感觉门控能力的方法。最终研发出的方法简单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稍加扩展就可以间接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脆弱程度。弗里德曼发现，在测量受试者对各种光线、声音等刺激的反应时，当时致力于感觉门控的其他研究者恰恰忽略了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弗里德曼知道，在一个人运动时，除了向肌肉发出运动指令的神经元外，还有一些神经元会向相同的肌肉发出抑制指令。例如，要走路，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需要有控制行动和抑制行动的两种神经元，否则就会摔倒。作为一名神经生理学家，弗里德曼清楚机体的反射及其与大脑之间的这种独特甚至反直觉的关系。那么思考这种活动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顺着这个思路，弗里德曼进一步猜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问题，会不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众多刺激做出响应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刺激不做出响应的能力？他们的大脑会不会并没有过载，而只是缺乏抑制，每分每秒都在被迫处理所有接踵而来的信息？

1979年，弗里德曼一直都在丹佛的实验室里做研究，那里离隐谷路的加尔文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发明了一种测量抑制过程的方法，只需在受试者的头皮上贴一个小电极，电极就能以电波的形式检测到脑电活动，并且不会给病人造成痛苦。电波的波动幅度反映了大脑活动的强弱，幅度越大，大脑的活动越

强，反之亦然。在实验中，弗里德曼测试了受试者听到一模一样声音时的反应。他会把相同的“咔嗒”声播放两次，两次之间只有短暂的时间间隔，通常是半秒钟。

弗里德曼的研究发现，只要是所谓的“正常”大脑，也就是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对第一次咔嗒声的反应都比对第二次的反应大。这说明正常的大脑会从自己所感知到的信息中学习，如果收到相同的信息，就不用从零开始。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却做不到这一点。弗里德曼的实验室经过不断测试确认，患者脑部对两次咔嗒声反应的脑电波幅度完全相同。对于第二次咔嗒声，他们的大脑仿佛要重新反应一遍，尽管他们在不到一秒钟之前刚听到过相同的声音。

这种双咔测试本身并不是为了检测精神分裂症，而是为了测试大脑的感觉门控能力，而感觉门控能力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特征之一。测试结果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感觉门控异常很可能是遗传所致，因此研究人员就可以在几代人中追踪这一特征。弗里德曼预感自己即将迎来一项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有助于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还可能有助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如果他分离出对双咔测试反应不正常的基因异常会怎么样？如果能分离出这种异常，并且具有这种基因异常的病人确实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他就证明了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确实存在，从而打开这种疾病基因疗法的大门。

很多人都曾想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从未有人真正实践过。这种策略在其他疾病的研究中很常见。以糖尿病为例，研究表明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基因可能有10~20个，而第一代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只针对其中一个基因。

弗里德曼知道，如今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鉴定出一个这

种基因。他认为，要开展这样的研究，可能需要一个发病率极高的大群体——一个大家庭。

去哪儿找这样的家庭？弗里德曼对此毫无头绪。但这样的人一定存在。很可能比他想象得还要近。

[1] Joseph Zubin and Bonnie Spring, “Vulnerability—A New View of Schizophren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6, no. 2 (April 1977): 103—26.

[2] Irving Gottesman and James Shields, “A Polygenic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58, no. 1 (July 1, 1967): 199—205.

[3] Zubin and Spring, “Vulnerability.”

[4] Freedman, *The Madness Within Us*, 35.

[5] Robert Freedman, “Rethinking Schizophrenia—From the Beginning,” Lecture at the Brain and Behavior Research Foundation, October 23, 2015.

[6] 198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欧文·费恩伯格（Irwin Feinberg）将这个概念命名为“修剪假说”。（Irwin Feinberg, “Schizophrenia: Caused by a Fault in Programmed Synaptic Elimin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7, no. 4 (1982—1983): 319—34.）他提出，精神分裂症之所以经常出现在青春期后期或青春期刚结束时，是因为“[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此过程中“突触被过多、过少或错误地清除了”。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马克 吉姆 马特 约翰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琳赛 乔

第25章

加尔文家的两姐妹都生得漂亮，有着高高的颧骨、动人的明眸和酒窝，以及一头褐色的长发。二十岁出头时，她们甚至还为平面广告和户外杂志做过模特。琳赛在山脊上摆出滑雪的姿势，长发飘扬在紫色的派克大衣上。她们都交过男朋友，还挺不少。她们也都吸过毒，主要是大麻，但似乎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毒品更多是用来遗忘和逃避过去的。

两姐妹小的时候算不上特别亲密。即便在搬到加里家去之前，玛格丽特也总是忙着去其他地方待着，不怎么和小她3岁的妹妹玩。而在这之后，琳赛因为玛格丽特的离开备受打击，变得非常嫉妒玛格丽特，气愤于姐姐可以离开，自己却不能。不过当姐妹俩发现自己都已经远离隐谷路，走在了相似的道路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非常爱这个姑娘，大学时的玛格丽特在日记中写道，她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姐妹关系非常好——我们非常亲密，这太不可思议了。

琳赛也给玛格丽特写了一首以她们当时的亲密感情为主题的诗。

她不是每天无谓的存在
她成了我的一部分
她塑造，打开，找到我
窥进我，看到我
变成我的一部分
她登上高山
我便成功
她吸入空气，我便呼出空气
大自然填满她的内心
又溢入我的心田
她是山峦、空气、树木和植物的一部分
她也是我的一部分
噢，我俩
她哭时我笑了，她笑时我哭了
她的喜悦，我的伤悲
我的哀伤，她的欢乐
我能感受她的痛苦，她的愉悦也能触及我
身处异地却心系彼此
噢，我俩。

家里很多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琳赛的新名字。还有人，比如她妈妈，却永远也叫不惯。琳赛并不介意。起这个新的名字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她崭新的生活。即使在新的伪装下，或

者说在改头换面之后，琳赛在霍奇基斯中学从一开始就仍然是非常惹人注意的。这里的大部分学生入读时都已经10年级了，而琳赛入读的是9年级，这一点足以成为其他孩子们的谈资。不按部就班上学的人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她是被别的学校开除了吗？她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吗？还是有什么值得大家发挥想象力猜测一下的其他好戏？



琳赛（左）和玛格丽特

琳赛在其他方面也引人关注。她穿格子裙和有领衬衫，像个预备学校的女生，不知道霍奇基斯中学的女生都是一副颓废嬉皮士的打扮。琳赛从小受父亲自由派政治观念的影响，如今在这里

却听到有同学在大谈特谈领救济金等于占别人的便宜。她认识了几个富有同情心的大人，其中包括一位英语老师和一位哲学老师，他们不介意琳赛冲进办公室，眼泪汪汪地问，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她也想出了一种生存策略。显然，她是不会被别人邀请去曼哈顿购物的，也不会在春假时去巴黎度假。但通过努力，她成了学校的一名运动员，主要是踢足球，也打长曲棍球。这些课余活动足以让她挨过在霍奇基斯的时光了。

琳赛长期以来都在练习压抑自己的情感，这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她总面带微笑，一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的样子。这种不求人的态度也使她付出了代价：她没能如愿拿到全优的成绩。跟霍奇基斯的其他学生一样，她也会读《瓦尔登湖》。梭罗的超然主义像一帖强心剂，鼓舞着她走进大自然，就像她母亲那样。远离母亲之后，琳赛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和母亲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琳赛在心中仍然认为自己不配进霍奇基斯。她表面上装作无忧无虑，实际上心神却总漫游到别处，想着其他事情。她会时不时地感到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一次，琳赛和朋友去看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飞越疯人院》，没看10分钟就离场了。她流着眼泪冲出了放映厅，她的朋友非常担心。在琳赛低声含糊地说自己家有人是精神病患者后，朋友便没再多问。

1982年，当琳赛在霍奇基斯上学时，冰球男孩中最年长的乔，那个温和、体贴的老七，那个比琳赛大7岁的哥哥，精神也出问题了。

十年前乔去看望彼得的时候，见过乔的医生都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在家人看来乔好端端的，至少完全能独立生活和工作。高

中毕业后，乔在丹佛机场找到了一份工作，不时还会带琳赛去滑雪，让她离开家，调节心情。后来他在芝加哥的美联航做行李搬运工，搬去那里后，他爱上了一个医生的女儿。快结婚那阵，乔的一次升职机会被否决了。这似乎是乔在芝加哥工作以来所能忍受的羞辱的极限。在此之前，他有一次膝盖受伤都忍着没向公司提工伤索赔。乔开始给他的老板寄威胁信。在美联航解聘他后，他还寄了更多的威胁信件，甚至寄到了白宫。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乔就失去了一切，他的车、他的公寓，还有他的未婚妻。接着，他开始出现幻觉。先是唐纳德和吉姆，然后是布莱恩和彼得，现在是马特和乔，12个兄弟中有6个人疯了。

琳赛在精神上再次受到了打击。她飞到芝加哥，和父母一起去医院看望乔。所见的景象让她惊恐不已。乔被注射了药物，对他人毫无反应。琳赛突然想起她从来没有去普韦布洛看过其他哥哥，从来没见过彼得、唐纳德和马特不在家时的模样。她第一次开始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外的东西，开始思考适合他们的医疗措施。

乔回到了科罗拉多泉市，和彼得、唐纳德还有父母一起住在隐谷路。现在的他总能听到各种声音。一天夜里，在市中心的街中央，他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有狼在追我！”最终，两个身高6英尺的士兵一起才把他制服。1982年5月的绝大多数时间，乔都是在普韦布洛的州立精神病院度过的。

在大农场待过的嬉皮士迈克尔这时也住在附近。对于乔的变化，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他仍然觉得，如果兄弟们的教养方式没那么压抑，他们就绝不会发疯。他认为乔病得还不严重，也许自己能帮助乔恢复健康。迈克尔回家去看了乔，花了一

个晚上驾车带他兜风，试图让他释放心中的苦闷，想要理解他隐秘不宣的内心。我们得谈谈。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迈克尔把乔带到空军学院的操场上。嘿！发泄出来！迈克尔记得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

没有效果。乔无动于衷，神情困惑，经常在恍恍惚惚地想着别的什么事。迈克尔觉得自己好像在跟一个酒鬼说话，这个酒鬼完全只关注自己当时的状态，没法想象其他状态。迈克尔不禁觉得精神病不过是另一种选择，乔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如果说乔的病情让迈克尔深感沮丧的话，回到寄宿学校的赛琳却发现自己内心的愤恨消散了，这让她无比意外。和玛格丽特一样，琳赛也感到在这所高端的私立学校里被边缘化了，但她不觉得否认家人的存在是解决办法。她反而感受到了和生病的哥哥们亲近的一面：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排挤，有时候她也有相同的感觉。

1980年秋，玛格丽特东行去纽约州北部的斯基德莫尔学院上大一，学院离霍奇基斯中学有两小时的车程。在斯基德摩尔学院，玛格丽特经历了之前在肯特中学遭遇过的同样的文化冲击。与此同时，她的妹妹也在体验着类似的冲击。玛格丽特的同学们来自美国东海岸的上等家庭，沐浴在纽约的光环下，每天读的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但玛格丽特却向往户外活动，宿营、徒步、登山、骑行以及划艇。在一个朋友的引领下，她第一次参观了艺术系。她知道那是她憧憬的地方，但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太过奢侈，她负担不起。

在大学，玛格丽特已经不再接受加里一家经济上的扶助，而是开始勤工俭学，在餐厅里为同学们端递食物、清理垃圾。这让她

开始意识到，过去几年因为加里一家的慷慨而过上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是一种错觉。大一学年末，玛格丽特决定转校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那里的学费相对便宜，她可以用佩尔助学金来承担这笔费用。她在那里还有朋友，而且那里离家的距离足够远，足够安全，远到刚好不用每天往返，远到不想回家时可以央求几句就不用回家。

可以说，玛格丽特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以不用回家为前提的。家，是彼得在地上撒尿的地方，因为房子下面有魔鬼；家，是唐纳德在离婚十年后还在为前妻痴语发狂的地方；家，是马特在加里家发病后休憩的地方；家，也是吉姆想来就随时可以来的地方。

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玛格丽特的班上有很多以前肯特中学的老朋友，那些夏天会去法国或者葡萄牙旅行的有钱的同学。玛格丽特则尽力攒钱，至少能在国内玩玩。她在史蒂夫冰激凌店做店员，并且不定期帮一个比她老得多的毒贩卖致幻蘑菇。这个人对她总是色眯眯的，不过从来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玛格丽特和肯特中学过去的一个男朋友一起，在全国各地看过感恩至死乐队的50场演唱会，边看边吸毒。她想要感受自己的力量，感受自己的能力，感受自己的独立性。但她的内心却在等待着被解救，希望自己不再与任何深层次的痛苦有直接的瓜葛。

我为什么还要回家？我的脑子就像被上满了发条，会旋转个不停。我不理解，也应付不了我的哥哥们，尤其是马特、彼得、乔和唐纳德。现在我泪流满面，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些事……生活是家人永远纠缠在你身上的根。我的家人让我压抑，他们在很多方面阻碍了我的发展。我被疯狂困住了，没有人应该一辈子努力去遗忘……

玛格丽特的日记，1983年4月3日

那年夏天，玛格丽特跟着感恩至死乐队东行，没想到自己能被心仪的对象大献殷勤。克里斯是斯基德摩尔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当时注意到了玛格丽特。在大学里，克里斯被人称为“热刀”，这个词表示的是一种抽大麻的方法：把一块大麻浓缩提取物放到两把烧红的刀上并压碎，然后吸入散发出来的烟。这一次，当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派对上再次见到玛格丽特时，克里斯采取了行动。

克里斯比玛格丽特大几岁，机敏聪慧，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气质。他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总裁。克里斯是父亲的游艇俱乐部的常客，参加过世界各地的激光级帆船锦标赛。他出机票让玛格丽特8月时飞到缅因州来看他。他们驾船去乔治敦和布斯贝湾附近的岛屿，喝血腥玛丽和蓝莓得其利鸡尾酒，吃龙虾，带着19只龙虾回到康涅狄格州，然后克里斯带玛格丽特去见了他的父亲。第二天，他们开着克里斯的宝马飞驰进曼哈顿，去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和布鲁明戴尔百货店购物。对玛格丽特来说，克里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男朋友，而是一页全新的篇章。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么慷慨的人，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想要与我分享他的一切。

玛格丽特的日记，1983年8月31日

9月，玛格丽特又去看了克里斯。10月，克里斯飞到科罗拉多来看她，感恩节时又来了一次。元旦前夜，他们一起在曼哈顿的彩虹厅酒店，盛装迎接新年的钟声。他俩被香槟和大麻迷得半

醉半醒，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后，克里斯坏笑着向玛格丽特靠过来。

“你能保密吗？”

“行。”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不能嫁给这个人。太荒谬了。”

说这话的人是怀利，玛格丽特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同班同学。他也是玛格丽特的情人，至少他希望自己是。克里斯是一名争强好胜的水手，而怀利则喜欢把夏日的时光花在粉刷房屋上。怀利平时头脑冷静，说话轻声细语，但玛格丽特要嫁给克里斯的消息和她手上的戒指让他非常意外。

但玛格丽特是认真的。除了克里斯，没有人再会照顾她了，无论是她的家人还是加里一家，都不会。何况克里斯已经准备好了，去德国、克里特岛和埃及的行程全都安排好了。

琳赛理解玛格丽特。她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知道玛格丽特想要逃离什么的人。这是她姐姐获得一个新家庭的机会。

咪咪和多恩也同意了。他们意识到克里斯家很有钱，便以自家的房子作抵押，尽力为女儿办了一场最美的婚礼。咪咪按照著名时装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的款式亲手制作了所有的服装，用粉色的丝绸在裙子的上身和臀部缝上了饰边。

他们把日子定在了8月。玛格丽特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从9个哥哥中间穿过，然后走向圣坛，并且不让他们闹出什么笑话。

在玛格丽特婚期几个月前，彼得在维尔镇被捕了，因为他在

街上到处拉人为一个癌症协会筹款。在医院里，他请求医生给他穿上防弹背心以保护自己。他说维尔镇的警察嫉妒他，要来抓他。最后，彼得跟咪咪和多恩回了隐谷路的家，成天躺在床上，不洗澡，靠咖啡和香烟度日，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情绪爆发。有一次，他把咪咪锁在屋外，将自己的药放到全家人的咖啡里。

另外两个冰球男孩，乔和马特，这期间也不断在普韦布洛的精神病院出出进进。乔沉迷在天主教的臆想中，跟唐纳德很像，只是没唐纳德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自己脑中的声音不是那么邪恶，只是有点烦人。马特的幻想更为偏执，这让他很难长时间保持稳定。在住院的间歇，他曾经因为在科罗拉多泉市非法游荡而被捕，被判缓刑。

在1980年最后一次被送进州立精神病院后，唐纳德出院以后一直待在家里，还算平静。现在大家最警惕的反倒是吉姆。

那年早些时候，在度过16年的婚姻后，凯西终于离开了她有家暴行为的丈夫。这些年来，她一边工作、抚养儿子吉米，一边还要应付吉米情绪的起落。凯西的朋友都知道吉姆的情况，知道他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凯西对此默默忍受，直到她第一次目睹吉姆打吉米。吉米当时14岁，吉姆此前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那天，吉米看见父亲要打母亲，想介入调解，这是他为了保护母亲第一次与父亲发生正面冲突。当吉姆一拳打在儿子的肚子上时，凯西立即报了警。之后，她很快带着吉米离开了家。

吉姆现在一个人住，定期去门诊注射抗精神病药物，以控制他的症状。他现在不怎么工作，酒喝得越来越多。家里没人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玛格丽特婚礼前几天，吉姆来到隐谷路的家里，琳赛这时也和男朋友在家里度周末。吉姆到家时，琳赛正巧不在，但她男朋

友的车在外面。家里的其他人看着吉姆一边把那辆车的四个轮胎割开，一边大声地骂骂咧咧。做完这一切后，吉姆又在众人的注视下驾车扬长而去。

住在家里的所有人都被迫暂时搬出去，不想被吉姆找到。如果说琳赛此前对玛格丽特与克里斯建立新生活的决定还有些许怀疑的话，这种怀疑现在也完全消失了。她希望自己也能够逃离。

婚礼前的预演晚宴安排在众神花园乡村俱乐部。至少会有200人参加教堂的仪式，之后会在一个世交的新家后院里举办招待会，他们的家位于科罗拉多泉市最时髦的老北角。

怀利在婚礼前夜最后一次尝试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他当时在马萨诸塞州，和家人在一起。“如果你决定不嫁给他，我会给你寄一张飞过来的机票。”他说。

玛格丽特为此哭了很久。琳赛把冰袋敷在玛格丽特脸上，帮她消除哭泣后留下的水肿。玛格丽特知道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自己要嫁的那个人，知道这桩婚事不靠谱。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飞去找怀利？靠在他肩上哭一场？告诉他自己的一个哥哥猥亵了她很多年，另一个哥哥自杀了，而且家里还有四个这样的哥哥？

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怀利想从她这里得到的比她能给予的更多，她能给怀利的只有自己家冰冷的现实。但跟克里斯在一起时，她不需要再想自己家里的事。

第26章

琳赛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思念那些大山。

1984年，琳赛以全班排名靠前的成绩从霍奇基斯中学毕业。她原本可以去比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离家更远的大学，但她惊讶地发现，科罗拉多在召唤自己。准确地说，不是隐谷路，而是科罗拉多这片土地让她觉得有家一般的感觉。在她回来后，琳赛总想要爬遍所有的“十四峰”（fourteener）^[1]。很快，她有了归属感，直到过去的那些恐惧重新回来。

在科罗拉多大学，琳赛基本没打工，一门心思拿全优，但有时候她会突如其来地感到恐惧。她有社交，有男友，会参加派对，也嗑药，但什么都不能消除她的焦虑。她读过所有能在书店里找到的自助书，想要搞清楚原因。

当琳赛第一次尝试致幻蘑菇时，她认为那种感觉应该很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受：一种绝对的恐惧。其实她不用毒品也能感到恐惧，她需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

她厌倦了假装一切正常。她在寻求帮助，却又不确定去哪里寻找。

“告诉我一些你家的情况。”学校的治疗师说。

琳赛开始了倾诉。当她说自己有10个哥哥，其中6个都有精神分裂症时，治疗师的表情变了。

刚开始时，治疗师似乎还不怎么相信琳赛的话，以为她在编故事。这时的琳赛才明白治疗师在想什么。治疗师想知道，这些事里有多少是琳赛凭空想出来的，她觉得琳赛才是发疯的人。

治疗没什么效果。谁会真正倾听琳赛的心声，相信她的话呢？

那年秋天，琳赛开始和一个认识多年的男生约会。蒂姆·霍华德是山姆和南希·加里的侄子。他和琳赛一样，一生中都是加里一家在蒙大拿湖边住宅的常客，是山姆和南希经常邀请的孩子中的一员。蒂姆和很多男孩一样，一直很敬重加尔文姐妹俩，她们既漂亮，又擅长运动。两人开始交往时，蒂姆和琳赛一起在科罗拉多上大学。

在琳赛和蒂姆开始约会几个月后，一次学校放假，加里一家邀请他们去维尔镇，住在主街的公寓里。其他人要么去滑雪了，要么去购物了，这使他们终于有了可以独处的机会。他们俩差点就有更亲密的举动了。

琳赛说她不能这么做。

蒂姆问她怎么了。

琳赛看着他。

这不是一个在要求做爱的生气男友，而是一个比她小差不多1岁并且暗恋了她快10年的男孩，一个真心喜欢她并且不会妄加

评判她的男孩。他对她家的事已经有所耳闻，尽管他并不清楚其中那些最可怕的细节。眼前的是蒂姆，不是什么陌生人。玛丽还没遇到过一个更适合倾诉的人。

琳赛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这最初让蒂姆有点不知所措。玛丽在他眼里从来都是那么坚强，总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是山姆口中的“女强人”。蒂姆留了下来，听她诉说。

就在吉姆的名字即将脱口而出时，琳赛停了下来。她没说谁侵犯了她，蒂姆也没有问。此时的蒂姆苦苦思考着该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蒂姆说，“但有人知道。”

他们穿好衣服，走出公寓。蒂姆看见南希·加里从远处沿主街朝他们走来。蒂姆留下琳赛，向他的阿姨跑去。“我能跟您谈一谈吗？”

蒂姆和南希交谈时，琳赛站在原地，周围的地面上落满积雪。没过一会儿，南希从蒂姆身边转身朝琳赛大步走来。琳赛和南希走进公寓，聊了起来。

露易丝·斯尔文现在还记得1984年第一次见到琳赛时的情景。当时的她听着这个漂亮的19岁女孩冷静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和遭遇。琳赛对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的细致讲述，无疑是露易丝从所有病人那里听到过的最痛苦的故事。当听到琳赛说起大学里的健康治疗师不相信她的话时，露易丝非常愤怒，因为她始终认为，医生的第一职责就是不让病人有病难言。

有一种说法，或者说谬见，认为我们的社会过分沉迷于创伤和治疗了，对于儿童遭遇的侵犯这种难于启齿的问题尤其如此。这种谬见始于误认为儿童是没有能力倾诉自己遭受的侵犯的。但

事实上，如果一位治疗师足够敏感、亲和，是可以打开孩子的心扉的。这正是《我从未许诺你玫瑰花园》中的弗里德医生（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的原型）采取的方式。一旦孩子袒露心扉，创伤便会如噩梦般散去，病人会康复如初，仿佛放下了心中的重负，得以重新拥抱这个世界。在书籍和电影中，这个过程往往会发生在一个伤感、愤怒和悲痛的场景中。可能在深夜，一场小小的危机触发了病人心灵深处尘封多年的秘密，终于使治疗有所进展。

琳赛的情况完全不支持这种谬见。斯尔文是琳赛的第二位治疗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工作，南希·加里专门请她来诊治琳赛。琳赛觉得斯尔文是一位专业的倾听者，能通过敏感和亲和营造一个让人产生接纳感的空间。这让琳赛感到安全，觉得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讲述自己的遭遇。

当治疗有突破时，谬见自然而然就粉碎了。对于琳赛来说，这种突破如同循循而来的渗透，在一周三次稳步而紧张的治疗中渐渐显露出成效。在拿着全优的成绩、跟男友约会、滑雪、爬山之余，琳赛每周还要匆匆赶去向治疗师倾诉一个小时的家庭秘密，有时甚至要倾诉两三个小时。治疗过程较为漫长，但斯尔文一直没有催促、急躁。她与那些电影里的治疗师不同，并不想过于关注每段治疗的结果。这种压力会使病人变得就像表演的海豹，只会做出他们认为治疗师希望他们做出的反应。在情况最糟的时候，这种压力甚至会让病人的情况雪上加霜。

开始时，斯尔文几乎什么都不做，在好几次治疗过程中，都只是仔细听琳赛诉说，留心那些把琳赛压垮或者说把她压得“支离破碎”，使她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的话题。斯尔文解释说，“支离破碎”意味着病人被完全隔绝于自己难以面对的因素，而这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难以面对，更加根深蒂固，从而造成更大的

伤害。解决办法，或者说治疗的目标，是帮助琳赛找到自身的力量，让她自己解决难题，将精神上的碎片“拼合起来”，而不是避而不谈。

当然，琳赛希望治疗能快一点。她想把问题解决掉，想找个人——任何人都行——驱散她的担忧。为了哥哥们和她自己，她也希望斯尔文能解释清楚精神病的本质以及诱因。创伤或性侵会造成精神失常吗？彼得、乔、马特之所以进精神病院，会不会是因为吉姆对他们做过什么？

这种解释似乎挺说得通的。虽然还没有研究表明性侵会造成精神分裂症，但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意味着琳赛也有患病的可能。

琳赛也害怕自己患上精神病。斯尔文明确地告诉她，要克服这种恐惧，需要非常的勇气。

治疗的费用是琳赛自己付的。斯尔文将她没能支付的数目记在账上。毕业之后的很多年里，琳赛坚持继续偿还这笔费用，最终在快30岁时用做生意的钱付清了所有的欠款。

琳赛从没要求父母支付这笔钱。咪咪和多恩根本就不赞成她接受治疗。为什么又把这档子事翻出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正是父母的这种态度让琳赛在吉姆最初对她动手动脚时羞愧不已，不敢告诉他们真相。

斯尔文一心希望琳赛说出自己的故事，希望琳赛变回这一切发生之前的那个她。这不仅仅是面对现实那么简单，还需要移除掉强加在她身上的所有“有色镜片”。斯尔文解释说，孩子会依赖身边的成人来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们会利用父母已经

成形的观念系统来判断是非，或者判断他人是否可以依靠。她还说，当身边的大人无法帮助他们时，孩子们会借助耻辱感和愧疚感来应对创伤。

对于琳赛来说，问题的关键当然就是吉姆。

吉姆仍然置身于加尔文家所有成员的生活中，地位稳固。在凯西离开他后，他回自己家住过一段时间，但每当琳赛在假期回到家时，他一定会出现。在回到科罗拉多后，琳赛尽量让自己适应这种状况，尤其是在一些大事上。比如，在玛格丽特的婚礼上，琳赛就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就好像一切都好。但吉姆在妻儿离开后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琳赛也逐渐厌烦了假装一切正常。

琳赛后来问斯尔文：当吉姆在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感到自在？在知道他随时会过来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回家？如果选择不回家，我该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不安？

斯尔文会帮助琳赛构想如何处理对吉姆的怒意。琳赛曾不止一次想过杀掉吉姆，但马上又会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愧疚。然而她最大的担忧，甚至大过面对吉姆的恐惧，是她必须向母亲坦白这件事。如果咪咪不相信她怎么办？那我就会成为另一个发疯的孩子。

琳赛再次陷入了年少时的困境——只要表现出愤怒，就表示她的精神不稳定了；如果因为考试得了“良”而哭泣，那么或许你就是时候去普韦布洛了。

在琳赛的眼中，多恩依旧保持着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多恩的身体虽然已经有些孱弱，但他仍然是琳赛在家中唯一的盟友。琳赛曾多次和斯尔文聊到咪咪让她保持沉默的方式。咪咪不会直接说“闭嘴”，而是会问：“你觉得你有麻烦了吗？”她会一步步地弱

化琳赛的情感，对它们表现得不屑一顾，或者让琳赛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

据斯尔文介绍，在加尔文家，表达情感是一件可怕的事。这种恐惧难于控制，让人别无他法。

按照斯尔文的说法，复原力（resilience）是“一个美妙的术语，描述的是一种我们仍然不太了解的能力”。当然，复原力其实是无数学术研究的主题，而且如果有人能把它搞得一清二楚，一定会把这种能力打包出售。斯尔文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拥有从创伤中恢复的能力有时需要靠点运气：如果一个人恰好有可以消解创伤的性格特征，那么他就能用“护具”把自己包裹起来，接受人生的历练，开始新的生活。

应对创伤的机制有很多，但其中一些比较局限于自我。琳赛是个坚强的孩子，从童年时代起就会用自立和倔强的面具很好地隐藏自己。最终，这张面具融入了她的真实面孔中。问题是，这张面具现在对她还有多管用？如今的她高度警觉，难于接受失败，害怕展示不完美的自我。

斯尔文告诉琳赛，当一个人用越来越厚的“护具”来应对问题时，“护具”最终会成为一种阻碍。前进的道路会变得狭窄，你会处处设防，如同患上幽闭恐惧症一样。她希望琳赛能换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希望她去信任新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卸下“护具”。

要实现这个目标，琳赛必须学会在创伤后应激反应出现时及时意识到这一点。比方说，她必须意识到，她和一个朋友之所以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至少部分是因为电影中有强奸的镜头。

在治疗期间，有一阵琳赛决定谈一谈八年级派对那晚发生在壁橱里的事情。刚开始时她有点含糊其词，“我有件事跟几个男孩有关”。

斯尔文知道，琳赛得按自己的节奏来倾诉，得先克服自责的心理。

琳赛说她对母亲撒了谎，去了不应该去的派对。后面发生的事难道不是她活该吗？

别这么说，斯尔文告诉琳赛，不是你活该。

是我主动邀请别人占我便宜的吗？

不是的，斯尔文说。

是我像被哥哥性侵时那样，以不恰当的方式把性和爱等而视之，发出了某种性信号吗？是我自找的吗？

不，当然不是。

当时为什么我不离开壁橱呢？

因为壁橱里有三个男生跟你在一起。

这时斯尔文冒险使用了那个词。

“他们强奸了你。”斯尔文说。

琳赛没有对斯尔文的措辞感到震惊，反倒有些释然。这件事必须得有个词来表达。

如此犀利的表达就像一杯泼到琳赛脸上的冷水，性侵就是性侵，强奸就是强奸，受害就是受害。那天晚上她无法离开壁橱的原因，跟她无法离开曼尼托索道顶的小木屋的原因一样：比她身

强力壮的人践踏了她的信任，侵害了她，她无力反抗，只能服从。

接下来是小心翼翼地描述细节。重述这些过去会完全回避的细枝末节可以帮助琳赛重新获得控制感。这些细节充分表明，琳赛过去的一些自责是多么不切实际。虽然不切实际，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孩子在应对创伤时往往无法跳脱出自己的经历，因此常常会责怪自己。在向斯尔文倾诉之前，琳赛从未将这些细节告诉过别人。她惊讶地发现，真的有人会在了解完她所经历的一切后，仍然关心她，希望看到她变得强大，尊重并理解她。斯尔文以一种琳赛的家人都不曾有过的的方式，给琳赛提供了一个可以保有自己的情感，并把这些情感经常表达出来的环境。

对于琳赛来说，把被那些男孩强奸的经历告诉治疗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为接下来的一步做好了准备：她将同样清楚地向家人坦白，只不过坦白的内容事关吉姆。

琳赛和母亲驾车去咪咪的朋友艾莱诺·格里菲斯家。她们把车停在房子旁，慢慢走向大门，发现艾莱诺还没到家。

这时只有母女俩，没有别人，琳赛决定跟母亲谈一谈。

琳赛此前曾经向咪咪敞开过很多次心扉。在学校时，她经常给咪咪写长信，对家庭和疾病表达哲思。她写到过在唐纳德身边长大的感受，写到过没人注意到她的痛苦，还写到过这些年来笼罩她的恐惧。咪咪的回应总是那样，先承认女儿说的没错，然后敦促她往前看，提醒她有些人过得还不如她，让她学会原谅。然而母亲的这种高超柔术——对女儿的遭遇只会动动嘴皮子——实际上却是在磨灭事实，淡化事情的意义，抹去大家的记忆。

因此，当琳赛在格里菲斯家门口告诉咪咪过去几年来她被吉姆性侵过无数次，而咪咪告诉她自己小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时，琳赛并不感到惊讶。

咪咪所描述的那个迷人的纽约童年，那个她不断得意地讲给女儿、朋友和邻居的故事，有一个更真实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咪咪的妈妈在曼哈顿做服装生意，而她的继父、画家本·斯柯尼克则在家教她音乐和美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她欣赏文化。这倒是事实。他用唱片机给她放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如果她扭伤了脚踝，他会建议她听《卡门》。

但同时本也酗酒，会对咪咪为所欲为。在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开始出售咪咪的妈妈制作的A字裙后，由于她的制衣速度不够快，因此大多数晚上都住在城里，让咪咪留在家和继父待在一起。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本·斯柯尼克对咪咪有了非分之举。

咪咪故意对细节轻描淡写，琳赛也没有追问，但显然继父侵犯了咪咪，对她有了不当的行为。

在咪咪对琳赛讲述这些事时，琳赛感到母亲童年里那些令人诧异的变化一下子都有了头绪。她明白了比莉和本在战后就分开的原因。咪咪说当本开始对她的妹妹贝蒂动手动脚时，她把事情告诉了母亲。这让琳赛瞬间对母亲有了全新的看法。

琳赛清楚，身处那种境地的女孩说出实情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等于是为了救妹妹赌上了自己的名誉。琳赛感到，如果母亲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自己对母亲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了解。

那次与母亲推心置腹的谈话大概是琳赛一生中最百感交集的

时刻。她被母亲的坦率震撼到了，在听完母亲的故事后，她感到与咪咪前所未有的亲近。但与此同时，琳赛也感到自己仿佛遭到了拒斥，她的不幸再一次被别人占先了。咪咪谈着自己的经历，恰好绕过了琳赛希望谈的——有关吉姆的细节。琳赛需要咪咪站在自己这边，告诉自己吉姆的行为是错的。

但咪咪没有。在健康的孩子和患病的孩子之间，她以前从来没有站在过健康的孩子那一边，现在也不会。她反倒开始说吉姆的精神病很严重。

琳赛气得脸都红了。她认为精神分裂症不能作为吉姆侵犯她的借口，不会有主流的研究者或者精神病学家说，吉姆是因为有精神妄想而变成恋童癖的。

但咪咪并不打算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琳赛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被深深地伤害了。为什么除了自己的儿子，母亲对任何人都没有同情心呢？她仿佛把所有的同情心都用在了患病的孩子身上——也包括吉姆——而没有给其他人留下任何东西。

但那一天，琳赛准备好了。她告诉母亲，她不会再跟吉姆共处一室。

吉姆原本不应该出现的。父母向琳赛保证过他不会来。

在很长时间没回家后，琳赛在一个周日回隐谷路的家吃晚饭——自从在格里菲斯家那晚后，这是她第一次回来。父母都在家。还有乔，他服了药，头脑清醒。跟其他患病的哥哥不同，他完全清楚自己有病。这原本是加尔文家一个平静的夜晚，直到吉姆走了进来。

多恩让他马上离开。“吉姆，你不属于这里，请回你自己

家。”

“为什么我不属于这里？”吉姆问。

咪咪没说话。

琳赛咬着嘴唇，但没用，她控制不住自己了。她站起来，开始尖叫。

“你他妈的浑蛋！你性侵了我！”

吉姆当时的状态不太好。他的妻儿都已经离他而去。他仍然在大量服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他已经变得很胖了。但他没有承认什么，而是准备反击。他抓起地上的一把吉他，将它摔成两半。吉姆说琳赛在撒谎，他开始大吵大嚷起来。

“没这回事！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但吉姆感受到了房间里其他人的反应。他发现没人听他的。他看见父亲叫他滚出去，说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

吉姆离开了。整晚琳赛都忍不住在哭。父母退到厨房去洗盘子，让她独自待着。乔过来安慰她。“你没有撒谎，”他抱着她说道，“我知道你没有撒谎。”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琳赛常常会想起这一幕——哥哥乔相信她，父亲也相信她。

[1] “十四峰”是美国西部的登山术语，指的是海拔超过14 000英尺的山峰。科罗拉多是拥有这种山峰最多的州，一共有53座。——译者注

第27章

新的成像研究——包括CT扫描和PET扫描——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部的一些生理异常。如今，利用这些成像技术和其他一些手段，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在精神病学家琳恩·德利西的带领下，正努力在不止一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中寻找这种疾病的遗传标记物。

这项研究既需要家庭中的患病成员参与，也需要健康的家庭成员参与。患者将由他们此前的医生继续治疗，研究参与者会有经济报酬。

若有意参与可联系琳恩·德利西医生：496—3465。

《华盛顿邮报》

1984年7月20日[1]

琳恩·德利西坐在加尔文家厨房的长木桌旁，立刻就看出了咪咪这么多年来所承担的重担。

她的丈夫卧病在家，身体虚弱，虽然能帮着做点家务，甚至可以驾车，但每天晚上睡觉时都会担心自己第二天是否还记得前一天读过的书的内容。

长子唐纳德现在基本上也一直住在家里。另外三个患病的儿子——乔、彼得和马特——则不断往返于医院与家之间，他们有

时会住在自己的公寓，不过最后还是回来。甚至吉姆也不时会回来，但多恩一看到他就会命令他立即离开。

暴力的打斗近来少了一点。儿子们年纪都大了些，而且都在持续服药。咪咪要负责让他们保持锻炼，处理各种鸡零狗碎，送他们去就诊并分发药物。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德利西被加尔文家的这位女家长表现出的快乐情绪震惊了。“你总不能每天都以泪洗面吧。”咪咪会这么说。

在琳恩·德利西踏进加尔文家家门之前那些年，还没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理论。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一直是个谜，关于先天/后天的论战还在继续。但这个领域正在缓慢而悄无声息地发生一些变化。

流行了近三十年的“精神分裂症妈妈”理论开始受到了质疑。1982年，一位名叫戈登·帕克（Gordon Parker）的澳大利亚精神病学家在《神经与精神疾病》（*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精神分裂症妈妈”研究的综述，认为尽管情感淡漠、控制欲强的母亲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证据表明相比其他人，这样的母亲养育出精神分裂症孩子的可能性更高。^[2]第二年，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曾经领导的那家栗居精神病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弗洛姆-赖克曼领导期间，这家精神病院坚定地拒绝将精神分裂症当作一种生物学疾病来治疗。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托马斯·麦克格拉逊（Thomas McGlashan）的治疗师加入了栗居精神病院。他研究了这家医院1950年至1975年间收治的所有病患的病历记录的，并发表了一篇论文。^[3]他的结论是，在栗居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只有三分

之一勉强有所改善或者恢复。如果你跟栗居精神病院的精神分析师一样，认为合适的治疗手段就能治愈任何精神病人，那么33%的成功率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更要命的是，医药行业当时宣称，使用药物治疗精神病的成功率比这高得多。“弗里达.....进行了一项重大的实验，”麦克格拉逊当时说，“但数据摆在那儿，实验失败了。”[4]

在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后，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思考似乎终于沉淀在了这种病的生理学本质上。1983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富勒·托里在《菲尔·唐纳修脱口秀》上宣传了自己的书《战胜精神分裂症》（*Surviving Schizophrenia*）。[5]此后多年，这本书一直是精神分裂症方面最有影响力也最畅销的作品。托里向观众展示了健康人和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脑部CT扫描影像，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脑室比健康人的脑室更大。托里告诉观众：“你们看到的是一种脑部疾病。”[6]在同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托里和理查德·怀亚特的团队合作，排除了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脑室增大的可能性。[7]这表脑室增大是这种疾病导致的，而不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托里开玩笑说，要是有人现在还不承认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生理疾病，那他的阅读面真是有点狭窄了。“不幸的是，精神病研究领域有那么一部分人只读《国家地理》杂志，”托里说，“他们还不知道这些新发现。”[8]

那时，精神病学已经进入生物精神病学的时代，精神药理学也在高速发展。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1980年，第3版）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变得更加严格，精神分裂症不再像一种综合征，而更像一种明确的病症。[9]按照这种新标准，《我从未许诺你玫瑰花园》的作者乔安妮·葛林柏据说也是被栗居精神病院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1981年，一个研究团队指出，这名产生妄想的少女得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症，她只是有

过一段时间的躯体化障碍，有短暂的幻觉以及急性而暂时的生理性疼痛，这种病症在过去被称为“癔病”。^[10]这位精神分裂症的“明星病人”刚开始时可能病得并不太严重。

然而，在先天/后天之争中宣布胜利还为时尚早。随着谈话治疗逐渐退出舞台，抗精神病药物开始崭露头角。这些药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在他们与妄想之间拉开了些许距离。在大众的印象中，甚至很多医生也认为，抗精神病药物就像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一样，是一种特效药。但如果精神分裂症仍然神秘难解，药物本身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这又怎么可能呢？服用这些所谓的“神药”会使一些病人发胖，另一些病人则会肢体僵硬、举止笨拙，甚至全身僵直。对于长期的精神病患者来说，被这些药物“成功”治疗后的表现其实和不成功时的表现相差无几。

毫无疑问，这些药物唯一真正的受益者是制药公司。所有这些药物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研发的氯丙嗪的基础上研发的，而这些新药的效果又打压了创新。为什么每次投入市场的新药不是氯丙嗪的某种类似物，就是氯氮平那样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为什么没有第三种类型的药来打开新局面？

大量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开始出来发声，他们形成宣传组织，发动病患权利运动，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儿子、兄弟、姐妹、妻子和丈夫在夹缝中挣扎的经历传达给大众。他们希望告诉大众，这些病痛并没有被传统的精神病心理疗法治好，但另一方面，药物也只能缓解其症状。对于那些感到药物治疗毫无效果的病人来说，将精神分裂症划为一种生理疾病无疑等于用绝望扼住了他们的咽喉。这些病人的困境真实而痛苦，而且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尽管反对药物治疗的人——比如20世纪60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中的罗纳德·莱恩——宣称，不是每个社会都会遏制反传统的思考者。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至亲来说，是很难无视病

人所经历的痛苦的。除了药物之外，他们更想象不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在精神分裂症被认识得更透彻，秘密被破解，进而出现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这些病人，包括加尔文家的孩子们，都只能悲哀地身陷商业利益的牢笼，听任市场的摆布。

1984年，作为艾利奥特·格森实验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德利西开始收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遗传物质。这时距离她加入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时间了，当年遥不可及的目标如今正变得越来越近。分子生物学当时正发展迅猛，研究人员已经可以轻易地无限扩增一段DNA。遗传密码，这片曾经无人涉足的人类生物学的疆土，第一次可以被深入探究了。借助这些新的工具，其他机构的研究者鉴定出了导致苯丙酮尿症（一种会导致智力残疾的疾病）的基因，也有人在研究亨廷顿舞蹈症。但这些疾病与精神分裂症不同，因为后者被公认为是一种多基因异常导致的疾病。对于精神分裂症这样复杂的疾病，其基因异常的组合很可能是当时的技术手段无法解析的。在研究所其他实验室的很多同事看来，在全国各地收集病人家族成员的DNA简直是徒劳无益的傻事。

但德利西始终坚信这些精神分裂症多发的家庭会给出答案。她不介意别人认为她过于自信一根筋。“琳恩会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思路思考问题，”格森回忆说，“她会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向。”

德利西没有离开医院就找到了第一个这样的家庭。格森长期治疗的一个病人正好有一个哥哥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德利西了解到，两兄弟的父母吉姆和卡罗尔·豪伊是美国精神病病人联盟的创建者。这个组织1979年创立于明尼苏达州，并且不断

在全国增设新的分会。德利西认为，如果想迅速找到可供研究的家庭，精神病病人联盟会是绝佳的帮手。

德利西联系了联盟的地方分会，请他们在内部通讯刊物上宣传她的研究项目。报名的家庭通常有两三名精神分裂症病人，有一两个家庭有多达四名病人。随着报名的家庭越来越多，德利西没办法亲自去每一家了，因此雇了个社工来做这份工作。但当德利西听说了科罗拉多泉市的加尔文一家的情况后，她知道自己一定要亲自飞过去见见他们。

德利西一走进隐谷路加尔文家的家门，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研究样本。这可能是全美国病得最厉害的精神病家庭。

德利西要求加尔文家的每个人，包括当时诊断为未患病的人，都接受精神病学面谈评估，以确定或排除每个人是否患病。之后她抽取了每个人的血液样本，希望能在这个家庭的基因中找到引发精神分裂症的蛛丝马迹。她认为，加尔文家有的家庭成员可能是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只是还没有发病。她还认为，每个人可能都携带了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标记物。

在咪咪的密切关注下，加尔文家所有患病的男孩在检查中都没有惹事，这让德利西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另外6个健康的孩子中多数都同意参与，老三约翰在爱达荷州做音乐教师，因此在当地抽血后将样本寄到了德利西的实验室。只有老六理查德，那个从小心机较重的孩子，因为对家族疾病仍然紧张兮兮而不愿参与兄弟的治疗，他这时已经是丹佛的一名矿业投资人。

琳赛和玛格丽特非常期待这项研究未来能做出突破性的发现。咪咪脸上的表情则始终平静安详。在她看来，最重要的突破

已经出现了：她一直在等一个像琳恩·德利西这样的人来敲开她家的门，等了好几十年，这个人现在终于来了。

罗伯特·弗里德曼在琳恩·德利西访问加尔文家之后不久也第一次造访了隐谷路，随后还多次邀请加尔文兄弟访问他在丹佛的实验室。在那天以及加尔文兄弟访问弗里德曼的实验室期间，弗里德曼和他的研究团队记录了他们的脑电波，抽取了他们的血样，还让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逐渐对这家人熟悉后，弗里德曼非常惊讶咪咪让这些孩子在家待的时间比很多其他家庭都要长。“她很讨人喜欢。”他说。

把一个女儿——玛格丽特——送去跟别的家庭生活，这让弗里德曼很震惊。他思量着这一家人的情况得有多可怕，才会让咪咪和多恩做出这样断然的决定。弗里德曼看到多恩的健康每况愈下，生病的男孩们又不省心。但他也和德利西当时一样，惊讶于咪咪照顾孩子们的坚定心态。“过去的药物治疗让男孩们肢体僵硬，反应迟钝。他们像傻大个似的坐着，也不怎么说话，咪咪要一一照护他们，像个出租屋的房东一样忙前忙后。”

德利西知道弗里德曼一直想寻找患病家庭来检验他的感觉门控理论，因此把加尔文一家推荐了给他。20世纪8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一直都在开展他的双咔研究，希望用这种测试来测量大脑筛选信息的能力。他始终认为感觉门控是大脑的一种运行机制，具有遗传性，并认为感觉门控异常会使某些人成为精神分裂症的易感者。他感到自己离真相正越来越近。1984年，在见到加尔文一家之前不久，弗里德曼研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感觉门控能力，发现有一半直系亲属与病人一样，也表现出了感觉门控异常。[\[11\]](#)这再次表明他走的路是对的，感觉门控

是可遗传的。

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中，同样是感觉门控异常的兄弟姐妹，有一些会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有一些则不会，其原因仍然是一个谜。弗里德曼下一步希望确定大脑中负责感觉门控的具体部位。多亏德利西，弗里德曼现在找到了一个不同寻常并且无比复杂的患病家庭。

1986年2月，在首次拜访加尔文家数月后，德利西利用这些数据证实了理查德·怀亚特团队发现的结果：精神分裂症与脑室增大具有相关性。^[12]一年后，她又使用这些数据做了一项研究，分析精神分裂症和人类白细胞抗原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后者是人体中参与免疫系统调控的基因复合体）。^[13]她的研究没有发现这种关联，但多发性患病家庭的数据库仍在不断提供着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信息。对于德利西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德利西随后把加尔文一家的血液样本寄给了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柯里尔医学研究所，这家机构保存有大量疾病的细胞系。在这之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可以获得加尔文家的DNA并开展研究了。德利西坚信，如果她能在像加尔文家这样的家庭的遗传数据中找到精神分裂症的标记物，那么精神分裂症就有可能变得像心脏病一样，具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致病风险因子，而且这些指标都可以被测量。1987年，德利西离开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转而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作。石溪大学给她提供了教授职位，并让她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在那里，德利西继续研究多发性的精神分裂症患病家庭，手上已经有包括加尔文一家在内的40个这样的家庭。此后，她利用之前研究所的拨款，进一步扩充了这个名单，最终积累了1 000个这样的家庭，远超同侪。

在之后的几年里，德利西的研究几乎毫无进展。家系研究在其他一些疾病的研究领域（如早发型乳腺癌和阿尔茨海默病）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在精神分裂症方面却再无突破。1995年，德利西汇总整理了自己收集的患病家庭数据，发表了两项研究。第一项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的致病基因与其他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或分裂情感障碍——存在关联。[\[14\]](#)第二项研究没有发现精神分裂症与双相情感障碍之间存在联系，至少在当时已经发现的似乎与双相情感障碍存在关联的一条染色体上没有发现联系。[\[15\]](#)德利西仍然相信，也许有一天有人能在这个数据库中找到致病基因的痕迹，从而证明对这种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先天因素，而非后天因素。“我完全不相信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德利西在1999年告诉一名记者。[\[16\]](#)

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没再有更多进展，但仍然有人支持德利西的工作。“不要过早地失去信心，这很重要，”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肯尼斯·肯德勒（Kenneth Kendler）在1993年给德利西的一封信中写道，“人类的大脑非常复杂，要研究清楚相当困难。”[\[17\]](#)但德利西在理查德·怀亚特实验室的一个老同事，丹尼尔·韦恩伯格（Daniel Weinberger）却开始怀疑研究患病家庭的方法行不通。“根据现行的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中90%以上都没有患病。”[\[18\]](#)他在1987年告诉一名记者。

韦恩伯格的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个家庭中有兄弟姐妹同时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的确很低。[\[19\]](#)但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属患病的概率仍然大约是无病家庭的人患病概率的10倍。[\[20\]](#)与其他多种疾病的遗传率相比，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率实际上非常高，甚至高于心脏病和糖尿病。[\[21\]](#)这样看来，不继续研究患病家庭是非常愚蠢的。

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者仍然在寻找精神分裂症的生理表现，不过研究显得没有方向性，令人茫然。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怀亚特的实验室扫描了一些同卵双胞胎的大脑，并比较了两海马的大小。这些双胞胎中有一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人没有患。不出意外，他们在1990年发现两者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海马比健康人的海马要小。[\[22\]](#)和十年前脑室增大的发现一样，这项新的发现似乎也揭示了一些这种疾病的机理：海马的功能是随时提醒一个人自己身处何处，而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海马发育不够充分，这使他们容易丧失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我们对这个发现兴奋不已，”这两项研究的联合作者丹尼尔·韦恩伯格回忆说，“但我心中还有一种不安在折磨着我。”他认为，所有这些关于大脑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同一件事，那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在生理方面异于正常人的大脑。在那些平常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医护人员看来，这不足为奇。“你只要跟病人聊上五分钟，”韦恩伯格说，“就会发现他们的大脑转得跟一般人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磁共振成像研究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只能算是更大拼图上的边边角角。韦恩伯格怀疑，一些研究者喜欢开展这类研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拥有相关的成像仪器。“有句老话可以很好地概括精神病学研究，‘只在有光的地方找钥匙’。一切都像是，‘嗯，我们有这种工具。我们有锤子，那我们就去找钉子’。我们是会找到点什么，因为这是现象学的本质，你总能找得到东西。”只是没人知道你找到的东西会把你引上正轨还是带着你越走越偏。

1987年，韦恩伯格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一理论改变了每一名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对这种疾病的看法。[\[23\]](#)在此之前，研究者

一直都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最早出现于青春期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脑扫描研究似乎也支持这一点：一方面，额叶是人类大脑中最晚发育成熟的部位，要到青春期后期才会发育成熟；另一方面，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部的磁共振扫描影像都显示额叶的活动存在异常。但韦恩伯格在他的新理论中提出，脑部的异常在更早期的阶段就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他将精神分裂症重新定义为一种“发育障碍”：患者在出生时，甚至在子宫中，就已经出现了发育异常，这些异常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使大脑的发育越来越偏离正轨。韦恩伯格认为，基因的作用是为大脑的发育和功能提供一份蓝图，具体的发育过程是在环境因素的帮助下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

如果韦恩伯格是对的，那么大脑最终发育成熟的青春期阶段就只是故事的尾章而已。患病的大脑在妊娠期、出生时和童年期都在经历着发育障碍，只不过到发育的最后阶段，当大脑成熟时，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这么看来，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有点像一个脱手时微微偏左或偏右的保龄球，刚刚滚出的几英尺显得一切正常，笔直朝前。但随着球距离球瓶越来越近，局面开始明朗起来：球已经逐渐偏离了球道，最终只能击倒边角的一只球瓶，或者直接滚入边沟中。早在1957年，爱丁堡大学的康拉德·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就曾用类似的比喻来解释细胞发育和增殖的多种可能。他假想有一包弹珠从一个沟壑纵横的斜坡上滚下来，每个弹珠滚下来的路径都各不相同。沃丁顿把这样的斜坡称作“表观遗传学景观”（epigenetic landscape），并认为每个弹珠滚下来的路径部分取决于景观固有的形态，部分取决于运气。[24]，[25]

根据自己的直觉，韦恩伯格感到沃丁顿的比喻有道理。对所有人来说，青春期都是一个关键阶段。经过十多年的拼命扩张和

更新后，大脑这时需要必要的大扫除。大脑发育的这个特殊阶段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例如，青少年为什么需要更多睡眠，或者为什么在青春期之后，大多数人学习外语或者修复脑部损伤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的基因有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那么这种疾病往往会在青春期时表现出症状。韦恩伯格的发育障碍假说未必能解释所有现象，但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人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另一人患病的可能性大约为50%，但两人将疾病传给后代的概率又是完全相等的。“不管有没有发展出病症，”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遗传学家凯文·米切尔（Kevin Mitchell）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风险都会被传下去。”^[26]

情况似乎是，得病还是不得病，取决于“保龄球接触球道的那一刻”。

在随后的很多年中，随着遗传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目标越来越远大，发育障碍假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支持。在发育障碍理论的支持者们看来，要想有效防控精神分裂症，必须在病人表现出症状之前就开展治疗。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就意味着研究者需要鉴定出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因素。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加入到了德利西和弗里德曼对基因突变的探索中来，他们的研究或许最终能帮助科学界彻底解开精神分裂症之谜。

^[1] Sandy Rovner, “The Split over Schizophrenia,” *Washington Post*, July 20, 1984.

^[2] Gordon Parker, “Re-Searching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0, no. 8 (August 1982): 452—62.

^[3] Anne Harrington, “The Fall of the 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The*

Lancet 379, no.9823 (April 2012): 1292—93.

[4] Ann-Louise Silver, “Chestnut Lodge, Then and Now,”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33, no. 2 (April 1, 1997): 227—49.

[5] Peter Carlson,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Washington Post*, April 9, 2001.

[6] Modrow, *How to Become a Schizophrenic*.

[7] Daniel Weinberger and R. J. Wyatt, “Cerebral Ventricular Size: Biological Marker for Subtyping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 Earl Usdin and Israel Hanin, eds., *Biological Markers in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505—12.

[8] Modrow, *How to Become a Schizophrenic*.

[9] Seymour S. Kety, “What Is 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Bulletin* 8, no. 4 (1982):597—600.

[10] Dava Sobel, “Schizophrenia in Popular Books: A Study Finds Too Much Hop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81.

[11] C. Siegel, M. Waldo, G. Mizner, L. E. Adler, and R. Freedman, “Deficits in Sensory Gating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Evidence Obtained with Auditory Evoked Respons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1, no. 6 (June 1984):607—12.

[12] L. E. DeLisi, L. R. Goldin, J. R. Hamovit, M. E. Maxwell, D. Kurtz, and E. S. Gershon, “A Family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creased Ventricular Size with Schizophrenia,”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3, no. 2 (February 1986): 148—53.

[13] Lynn R. Goldin, Lynn E. DeLisi, and Elliot S. Gershon, “Relationship of HLA to Schizophrenia in 10 Nuclear Families,” *Psychiatry Research* 20, no. 1 (January 1987):69—77.

[14] Sarah Henn, Nick Bass, Gail Shields, Timothy J. Crow, and Lynn E. DeLisi, “Affective Illness and Schizophrenia in Families with Multiple Schizophrenic Members:Independent Illnesses or Variant Gene(S)?,”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5(January 1995): 31—36.

[15] Lynn E. DeLisi, Ray Lofthouse, Thomas Lehner, Carla Morganti,

Antonio Vita, Gail Shields, Nicholas Bass, Jurg Ott, and Timothy J. Crow, "Failure to Find a Chromosome 18 Pericentric Linkage in Families with Schizophrenia,"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60, no. 6 (December 18, 1995): 532—34.

[16] Jamie Talan, "Schizophrenia's Secrets: 'Hot Spots' on Chromosomes Fuel Academic, Commercial Studies," *New York Newsday*, October 19, 1999.

[17] Kenneth S. Kendler and Scott R. Diehl, "The Genetics of Schizophrenia: A Current, Genetic-Epidemiologic Perspective,"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9, no. 2 (1993): 261—85.

[18] Deborah M. Barnes and Constance Holden, "Biological Issues in Schizophrenia," *Science*, January 23, 1987.

[19] Gottesman, *Schizophrenia Genesis*, 102—3.

[20] Kevin Mitchell, *Innate*, 221.

[21] Kevin Mitchell, *Innate*, 221.

[22] R. L. Suddath, G. W. Christison, E. F. Torrey, M. F. Casanova, and D. R. Weinberger, "Anatomical Abnormalities in the Brains of Monozygotic Twins Discordant for Schizophren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2, no. 12 (March 22, 1990): 789—94.

[23] Daniel R. Weinberger, "Implications of 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Schizophrenia,"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4, no. 7 (July 1, 1987): 660.

[24] Weinberger and Harrison, *Schizophrenia*, 400.

[25] 沃丁顿1957年提出的这个“表观遗传学景观模型”虽然当之无愧地有名，但不应与后来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或者环境激活基因的概念混淆。

[26] Kevin Mitchell, *Innate*, 75.

第28章

当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和丹佛的研究人员们来到隐谷路时，他们发现唐纳德沉默不语，眼神呆滞，身体日趋肥胖，行动也很僵硬。他差不多已经不再尝试找工作了，甚至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周边溜达。除了吃饭的时候，他在其他时候表现得像个隐士。看到他这样，咪咪心里很难受。但有唐纳德在家也有好的一面，他平时会陪咪咪购物，帮她做家务，还会给咪咪带来一种目的感。

唐纳德已经有7年没去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了，而是定期去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取药，有抗精神病的盐酸硫利达嗪片，还有针对狂躁症的碳酸锂缓释片。他偶尔会尝试出去住，但从来不会很久。就在那段时间，1986年的圣诞节前后，唐纳德出现了彻底的代偿失调。1月，他第8次住进了普韦布洛。或许是因为仍然对与吉恩的失败婚姻难以释怀，他拒绝回答任何关于自己婚姻状况的问题，还总是拿《圣经》中的内容来说教。病情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时，他还说有立陶宛人在追捕和迫害。

当医护人员问他为什么停止服药时，唐纳德说是因为他的手表不走了。当他被问到他的母亲时，他称她为“我父亲的妻子”。

他坚持说咪咪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因为他小时候在医院被调包了，还说自己是章鱼的后代。当被逼问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时，唐纳德讲了自己因为买车的问题和父母发生的争执。当被问起他是否持有驾照时，他说他有“金凤花和三只小熊”版的科罗拉多驾照。

几周后，新的药物稳住了唐纳德的病情，他再次回到了家中。1990年早春，在自己的房间不受打扰地住了几年后，唐纳德听说彼得好几次独立生活的尝试都失败了，可能会搬回隐谷路。他估计彼得会占用自己的房间，因此决定采取行动。他给美国陆军和空军打电话，要求把他调到格陵兰岛去。他宣布自己宁愿在房间里吃饭，也不会去厨房。他去市场买来生的章鱼，带回房间，任其腐烂。咪咪这时注意到唐纳德已经很久没有去医院注射癸酸氟哌啶醇了。当唐纳德拒绝吃一天两次的卡马特灵时，咪咪和多恩就又把他送回了普韦布洛。

“我和家人因为经济问题闹掰了，”唐纳德到达普韦布洛时宣布，“我不想跟彼得住在同一座房子里。”

吉姆还是一个人住，靠氟奋乃静勉强支撑，那些偶尔看到他的人会以为他正在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多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磨灭了他的锐气，他的身体变得既臃肿又羸弱。他的心脏很虚弱，每次呼吸都会导致胸口疼痛，但他的偏执和妄想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虽然吉姆现在已经被逐出家门，但咪咪还是会去看他。毕竟，他是她的儿子，她是永远不会对任何一个孩子闭上心门的。女儿们从来不会问起吉姆，咪咪也尽量不在聊天时提起他。

在所有患病的哥哥中，乔最让玛格丽特和琳赛觉得心痛。乔和马特住过一阵子，后来住到了政府资助的八区公寓里。乔知道

自己看到的東西是不真實的。他不斷說起中國的歷史，說自己前世生活在中国，儘管他自己也意識到這非常怪異。有一次，他激動地指着天空，告訴琳賽雲是粉紅色的，還說有一個他前世時代的中國皇帝正在和他說話。“我產生幻覺了，”他說，但又半信半疑地加了一句，“你看到了嗎？”

喬的情況可以允許他獨自住在科羅拉多泉市的一間公寓里，但還沒好到足以使他徹底獨立的程度。當醫保也无法支付他的醫藥費時，他信用卡上的債務開始越積越多，怎么也還不完。在邁克爾的幫助下，喬申請了破產。邁克爾告訴喬不要再辦信用卡了，但他還是辦了一張，說他就想擁有一張印着丹佛野馬隊隊徽的信用卡。喬過去清瘦俊朗，現在體重漲了很多，肥胖讓原本很小的問題也變得更糟糕了。他的視力減退了，而且已經到了罹患糖尿病的邊緣。除此以外，他跟吉姆一樣，胸痛、精神錯亂、緊張、恐慌。但喬仍然保留着他的幽默感，至少還有一点点。他總跟邁克爾聊起超驗冥想，籌劃着去印度。在一些小細節上，他還是原來的那個喬。“他好像有一種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擺脫這一切的能力，”琳賽說，“他會說，‘我不想像現在這樣’。”

喬從未想過跟家人斷掉聯繫。他會寄來宗教主題的生日卡片和不願花在购买禮物上的錢。有一次，邁克爾一個正在讀大學的女兒抱怨沒錢買課本。聖誕節時，她的郵箱里出現了一個信封，信封里裝着500美元和一張紙條，上面寫着“用來買書”。大家都知道，除了喬，没人會做這種事。

曾經擅長制陶的馬特是四個冰球男孩中第二小的。據他自己說，從他年少時在加里家發病，母親決定把他送去看精神病醫生那天起，他的人生就徹底改變了。“1977年，媽媽送我去科羅拉多大學的醫學中心，”他說，“他們把我安排在精神病科病房，但那並不意味着我就是精神病。”

中年的马特头发日渐花白，比吉姆、乔和唐纳德都胖，毛发倒是很浓密，蓄着厚实的络腮胡，说话粗声粗气，有种地狱天使般的威猛劲。跟马特最亲近的朋友都是些越战老兵和流浪汉，他们跟马特一样，靠社保和八区的住房补贴过活。马特的医生知道，他会在街头出售自己的药，而且卖掉的药比他吃掉的还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马特都不断在普韦布洛进进出出。1986年，医生把他的药换成了氯氮平。在服下第一剂这种药后，马特就注意到了变化。他开始一次不落地去医院复诊。他告诉家人，他就像从噩梦中醒来了一样，不再认为自己是保罗·麦卡特尼。氯氮平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与氯丙嗪那样的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生效原理有些不同。氯氮平对唐纳德和乔都很有效，但对彼得似乎效果不太好。“在氯氮平有效的时候，”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的医学总监阿尔伯特·辛格尔顿说，“氯氮平和其他药物在效果上的差别，就像高效镇痛药奥施康定和阿司匹林之间的差别一样。”

只要有辆车可以开，马特就会整天为朋友们跑腿。他做这些事时很有成就感，他也确实可以帮上忙。多年来他作为志愿者在公益厨房为无家可归的老兵做饭，他帮助过的很多人都成了他的朋友。退伍军人事务部曾经专门给他写过感谢信，感谢他的这些付出。“马特对其他人的小小责任感支撑着他，”迈克尔曾说，“我想我们所有人也都需要这种责任感。”

虽然换了更有效的药物，但马特还是会陷入一阵阵长时间的自怜，对家里所有人和政府充满怨愤。每个月去科罗拉多泉市的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看病时，他都竭力劝说医生，说自己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每个月他都失望而返。与擅自停药彼得不同，马特的应对方法只是抱怨，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作对，觉得家人已经彻底放弃他了。只有在他最愤怒的时候，马特才会对现

实感到无力。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深信，药物治疗不仅是不必要的，更是世界上发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原因。

“他们给我吃的药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死掉，”马特曾经说，“你要是看了最近的新闻就知道，有480人死于4起飞机失事；有8 000人在喜马拉雅的地震中丧生；有150人在尼日利亚被射杀；有22人在教堂被杀；有22人死于另一次空难。别再给我吃药了，不然这种灾难还会不断发生。”

“我就是你常听说的那个预言家！”

1985年11月，25岁的彼得·加尔文被人发现在科罗拉多泉市市中心的大街中央祷告。此时的他瘦得像根竹竿，打冰球时的大块头早已成为历史。几天后，警察又看到了他，当时的他躁动不安，充满敌意。当警察告诉他他应该去州立精神病院时，彼得变得怒不可遏，扬言说谁敢动他他就要跟谁动手。当一名警员向他靠近时，彼得说自己要撕开对方的颈动脉，接着就真的动手了。

这是彼得第8次进普韦布洛。到医院时，他怒气冲冲，拒绝进食。在医院观察期间，医护人员都熟悉了彼得变化无常的特点。“观察他的反应很有意思，”一位精神病学家写道，“他说他会吃药，但是当摆出他最近拒绝吃药的事实时，他又会说，‘没错，我是拒绝过’，就好像出尔反尔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似的。”

普韦布洛的医生决定，等彼得的病情一稳定，就送他去法庭面对袭警的指控。在此之前，他被安顿在看护之家，这里多年前曾拒绝接纳彼得。彼得试图逃走，四天内四次从相同的窗户爬出来，回到隐谷路。每次咪咪都驾车把他送回来，但第二天又会看到他走进家门。

很多年来，彼得的医生都对他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有疑惑。他们最终开始给彼得开碳酸锂，认为他的症状更接近双相情感障碍。但碳酸锂也只有吃下去才会有效。咪咪和多恩原本就已经被彼得和唐纳德的冲突搞得焦头烂额了，现在，彼得又开始拒绝服用碳酸锂和氟奋乃静。在一份医学报告中，附有一段咪咪的陈述。根据这份记录，彼得“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也不说话，只盯着家里人看，完全没有反应，偶尔会突然爆发出强烈的情绪”。关于咪咪的看法，这份报告记录道，“病人的母亲认为彼得正试图绝食，有求死之心……另外，万圣节前后，彼得突然失控，跟一个哥哥大打出手”。这个哥哥应该是唐纳德，唯一还住在家的兄弟。“家人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威胁，病人的母亲‘被可能发生的后果吓得面色煞白’。”

医生们仍然猜测，或者说希望，存在一种完美的药物组合，能把彼得的病情拉回到可以控制的状态。在普韦布洛的一次会诊中，咪咪说她认为碳酸锂和氟奋乃静对彼得效果很好，但多恩说他有些担心彼得服用氟奋乃静后出现的震颤。因此医生建议彼得把氟奋乃静换成另一种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痛痉宁。彼得同意了，不过他对医生的态度还是非常狂躁多疑。

彼得对精神科医生说他想写一本关于自己人生的书，说他打算去西藏学习武术，说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后来又复活了，还说他的身上满是基督的血。有的时候，他还会突然放声歌唱。“我被治好了，我很健康，”他在1986年5月第9次回到普韦布洛时说，“牧师给我抹圣油，治好了我的身体……我相信你只要被涂了圣油，就意味着你做了忏悔，你不用吃药就会被治愈。”

两个月后的7月，彼得拿着一本《圣经》走进房间，接受医护人员的面谈评估。他吹嘘说自己在前一天晚上让几个病友改信

了基督教，还说 he 知道自己有病，知道服用碳酸锂是为了让他“不要太紧张，不要一天24小时都保持兴奋，好像同时在做三份工作似的”。他说如果不吃碳酸锂，“我的血液就会泵得非常快”。

大概在这个时候，彼得接受了一项评估，并且在评估过程中流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他先是表现得像往常那样玩世不恭。当被问到婚姻状况时，他说“我把美国休了”；当被问到是否受过特殊的职业训练时，他说“我在联邦政府工作”，似乎是在表达对父亲以前工作单位的认同；当被问到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时，他说他对碳酸锂和氟奋乃静都过敏。

医生接着问了一些有关精神健康的常规问题。

你是否听到什么声音？

“我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他告诉我要遵守诫训，对人友爱。”

你是否有过自杀的念头？

“有，如果我手上有一把刀或者一个勺子，我就会把它们吞掉。我曾经吃过一整瓶碳酸锂。”

你是否伤害过其他人？

“伤害过，各种各样的人。”

你是否受到过虐待或者性侵？

“有过，”彼得说，“我小时候被一个哥哥性侵过，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哥哥。”

其他没有患病的兄弟都在努力地生活，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约翰，那个用功的古典音乐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搬到了博伊西市，但发现那里与世隔绝，实在没有意思。在这之后，他第一次去玩飞蝇钓。他发现自己感觉不到任何束缚感，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片新天地。约翰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加尔文家族的双重特质：既爱户外运动，又爱钻研书本；身材矫健，同时沉迷于精神生活。在加尔文家的男孩中，他是唯一将儿时所学的钢琴课派上用场的人，成了一名小学音乐教师，收入稳定。约翰和同是音乐教师的妻子南茜很少回科罗拉多，据他说是因为往返费用对他们这样的教师家庭来说太高了。

不回来也会省掉很多麻烦。发生在兄弟们身上的事完全吓到了约翰和南茜。每一次回到科罗拉多，他们内心的恐惧都会加深。一次，夫妻俩把两个年幼的孩子留给父母照看，出去了几个小时，回来时发现车道上有灯光在闪烁。闪烁的是警灯，生病的兄弟们又打起来了。咪咪把约翰和南茜的孩子藏在壁橱里，直到警察赶来。虽然孩子们没事，但约翰和南茜此后回来得更少了，而且没再在隐谷路过夜。

在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看来，约翰好像彻底抛弃了这个家。但从约翰的角度来看，他感到和家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拥有一个家的权利。当是时候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有6个患精神病的叔伯，或者家族中遗传的基因有一天可能会让他们也患病时，约翰和南茜选择了沉默。约翰有患病兄弟的事从未成为过家中的话题，他的儿女在20岁前从来没听说过自己的家族病。

在离开大农场后，迈克尔在与科罗拉多泉市毗邻并且嬉皮文

化盛行的曼尼托泉安顿了下来。他结了婚，育有两个女儿，之后离婚了。他到处打零工：照顾老人、维修房屋，偶尔还会在各种地方弹古典吉他。迈克尔对医疗机构给兄弟们安排的治疗方案仍然心存疑虑，仍然对自己早年的误诊耿耿于怀，仍然不甘于循规蹈矩，仍然相信兄弟们的病能好起来。

理查德，那个改头换面的心机少年，更像咪咪的肯尼恩外公：自负，不安于现状，冲动。当然，这些只是表象。布莱恩的死让理查德开始好奇，自己是不是早晚也会发疯。“我胆都吓破了，”他后来说，“20年来，我不断麻痹自己，希望自己没事，希望把家人从大脑中抹掉。”因为女友怀孕，理查德在十几岁时就仓促结婚，但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太久。离婚后，理查德努力跟儿子保持联系，但20多岁的他也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其他事情上：参加派对，晚上去当地俱乐部弹奏爵士钢琴，如果弟弟妹妹问他要可卡因，他还会和他们一起吸。他越来越不怎么回家，只会在感恩节或圣诞节回家时了解一下家里近期的危机。“每当听到那些可怕的事情时，我都会想‘噢，我的上帝，你不会相信唐纳德都干了些什么’，或者吉姆干了些什么，或者马修、彼得、约瑟夫干了些什么。”

20岁出头时，理查德开始在一家采矿企业上班，这家公司跟科氏石油家族以及亨特石油家族都或多或少有点关系。他花了很多年来开拓这种关系并张罗演出，为世界各地的开矿项目招揽投资商。理查德一直不想让家里的事情败坏他的前程，所以总是离得远远的，但当兄弟们出事的消息偶尔传到他耳朵里时，还是会让他挂心。1981年，罗纳德·里根遇刺。理查德正好认识枪手小约翰·辛克利的一位近亲，他听说联邦调查局去找了辛克利的家人并收集了一些信息。一个念头突然闯入了理查德的脑海：联邦调查局会不会很快也来找他？

据理查德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买下了一片矿场。但在这之后，那里被美国环保署列为了超级基金地块[1]。他跟前矿场老板的官司打了20年，损失了300万美元，之后就破产了。在此期间，他还在做其他生意，对兄弟姐妹吹嘘自己的成功。当遗传学研究者来检查他家人时，理查德参与得很少，抽过血，谈过话，那之后就与这些医学事务不沾边了。他会单独来看望母亲，给咪咪带来些许慰藉，让她暂时抛开那些烦心事。他和其他人一样惊讶地发现，他还挺喜欢和咪咪这样亲近的，因为年幼时母亲在他眼里一直都不苟言笑。

老八马克一度看起来像是家中最聪明的儿子，10岁时就能下象棋，没有任何哥哥能赢他。小时候他是家里的和事佬，总想阻止别人打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妈妈的小天使，”他后来说，“她好像对我没有对哥哥们那么严厉，因为我没犯过什么错。”但这么多哥哥出事让马克心里很不好受。他后来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辍学，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再也没回到校园。在这之后，他离婚，再婚，最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科罗拉多大学书店当经理。“我觉得他只是决定要卸下所有负累，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琳赛说，“那是他应对压力的方式。”

马克和父母还有妹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有心绪重的时候，想起过去会大哭一场。他虽然没病，却受困于疾病的阴影。乔、马特和彼得曾是他的队友，是他孩提时朝夕相处的亲人。他们四个是冰球兄弟，其他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方都要往后靠。他们一个接一个发病，对马克来说，如同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

加尔文家的男主人如今已经60多岁了，中风使他衰老了很多，而且最近又新增了一些其他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多恩收到了他的第一份癌症诊断书：他的头顶长了一个5分硬币大小的肿瘤，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接受了3次手术，包括开胸从45个淋巴结中清除癌变组织，前列腺手术，以及切除结肠息肉。20世纪90年代，他被检出有高血压并开始服降压药，此后又面临着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威胁。

随军队周游世界、在北美防空司令部为国效力、为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应酬政客，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多恩现在整天都待在家，研究阿拉斯加的地图，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计划着跟过去的驯鹰同好一起跋山涉水去找苍鹰。然而这些计划都是空想。他的脚踝肿得很大，心脏里有血凝块，精神状态也已经非常差，根本就没有能力出行了。但多恩会跟那些鹰友打电话，给他们写信和卡片，抓着驯鹰的念想不放，认为“驯鹰”这两个字概括了他过往的人生。他想象着自己和那些王公贵族、鸟类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一样，拥有精湛的驯鹰技艺。假如没有驯鹰，如今的他可能已经称得上一无所有了。

多恩一生中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学位、他的军衔、他的业务能力，如今已然毫无意义。仿佛这样的打击还不够。过去，他上完一天班回到家，看到孩子们，会觉得自己是某项伟大事业中的一分子，是显赫部落的骄傲首领。而如今，他只能无力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多恩会和来访的客人一起翻看相片簿，笑着指出一个个生病的儿子，苦涩地谈起他们每个月从政府领到的补助。“这个儿子能领493美元，这个能领696美元……”

琳赛有时会想，父亲是不是对他们每个人都感到失望，即便是没有患病的6个孩子，在某些方面是不是也让他不满意。无论

是约翰、迈克尔、理查德、马克、玛格丽特还是琳赛，常常都会觉得自己辜负了父亲曾经的期望。这份期望对他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他们也都感受到了这份期望，但也都觉得自己差得很远。

[1] 超级基金地块是美国环保署根据《超级基金法》认定为被严重污染，需要整治清理的地块。——译者注

第29章

一天晚上，加尔文家的两姐妹在博尔德相聚，坐着聊天时，琳赛终于提起了那件事。在她看来，这有点冒险。她还记得那次她跟姐姐说起的时候，被她打断不想再谈的样子。

但这次不同。这次，玛格丽特说：“你，也是吗？”

玛格丽特不记得琳赛曾经和她提起过吉姆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始终都坚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生活。但现在，她们都准备好了。她们比较了吉姆性侵她们的细节。是的，他同时对她们两个下手，但她们都不知道对方也在受到伤害。一开始，她们都惊讶于彼此的经历竟如此相似，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一样。

之后她们都感到一种被掏空的疲惫，对所说的话感到恐惧，甚至后悔。谈论这件事让她们产生了比亲身经历还要真实的感觉。

这种感觉紧接着又被一种庆幸所取代，庆幸的原因很简单：还能有人懂得自己所谈论的秘密，还能有人理解自己那份深刻的痛楚。她们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经历和体会过一样的不幸，对她们彼此来说这也算是一份少有的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

们一直都在回避着对方，后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触，都不希望戳破对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那层虚幻的肥皂泡。现在，她们终于发现可以相互安慰了。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姐妹俩无所不谈。你还记得那个吗？那件事真的发生过吗？还记得那天晚上吗？她们一起做饭，一起锻炼，一起解构童年。这一段时间是她们最亲密的时光，她们都希望搞清楚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她们的身上，这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她们约定，如果她们中谁动了一点点自杀的念头，一定要给对方打电话。

琳赛告诉了玛格丽特自己得到的帮助——她怎么样把事情告诉了蒂姆，蒂姆又告诉了南希，南希怎么样帮助她找到了合适的治疗师，玛格丽特认真地听着。琳赛推荐了一本书《治愈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玛格丽特答应去读一读。

玛格丽特和克里斯的婚姻只维系了一年。他们去希腊和开罗度了蜜月，克里斯的父亲（那位石油公司的总裁）在开罗给他们安排了私人导游。回到家没多久，玛格丽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计划怀孕，现在有了身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克里斯要求她去堕胎，并威胁说如果不照做，他就会离开她和孩子。玛格丽特立刻明白了，他们根本不该结婚。

玛格丽特去做了手术，但克里斯后来还是提交了离婚申请书，他们的婚姻戛然而止。此时离玛格丽特发现自己怀孕仅过了9个月，这个时间点太特别了，她不可能忘掉。她搬回了博尔德，住得离妹妹很近，想要完成大学学业，重新开始。1986年，玛格丽特获得了大学学位。在此之前，她还经历了一段感情，只是依旧所托非人。那是个做蘑菇买卖的人，爱好登山，肌

肉紧实，身材魁梧，蓝色的双眼炯炯有神，每天早晨都会吸大麻，然后去埃尔多拉多大峡谷采蘑菇。毕业后，玛格丽特把他用了。太好了，我巴不得呢，他这么对她说。在他看来，加尔文家两姐妹都挺没劲的。

月亮现在一定落在天蝎座……我一直努力想好起来，但抑郁的情绪让我想死。我的感觉都麻木了，对周围的反应也不太好。或许是因为我不够积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的日记，1986年4月23日

玛格丽特找了一家戒毒门诊，每周去和治疗师谈一次心。她不再每天早上吸大麻，而是去旗杆山跑上一圈。她在珍珠街购物商城的一家小饰品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练习瑜伽，寻找新的思考方式，比如“走进自我柔软的内心”。她有时感觉这种体验就像交了一个新朋友。

跟妹妹不同，玛格丽特不是很想弄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也不想寻求更彻底的治疗。她就想对自己好一点。她去犹他州的莫阿布宿营、骑山地自行车，被一望无际的红色岩石深深吸引。在峡谷地国家公园，她花了4天3夜沿白缘小径骑了100多公里。《营养年鉴》（*Nutrition Almanac*）成了她的新圣经，科罗拉多唯一的一家健康食品超市几乎成了她唯一的购物场所。慢慢地，她觉得自己能够去思考那些过去一直在逃避的问题了，无论是婚姻破碎的痛苦，吉姆的性侵，还是整个家庭尚未解决的问题。

她和琳赛找到一个新公寓合住，平摊租金。我们拥有彼此实在太幸运了，玛格丽特在1987年的日记里写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点。怀利到科罗拉多来看她。他是一个性格沉稳的

人，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上班。玛格丽特在结婚前就认识他，而他一直想跟玛格丽特在一起。

尽管怀利十分适合玛格丽特，但她还是害怕，因为跟怀利在一起可能意味着需要坦诚地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他。他人很好，玛格丽特在日记中写道，愿意告诉我他的一切，这让我想退缩。

继琳赛之后，玛格丽特也和吉姆发生过对峙。琳赛是在情急之下当面怒斥吉姆的，而几年后，玛格丽特是隔着安全的距离打电话的。

吉姆还是像以前那样否认一切。当玛格丽特对母亲开诚布公地谈起吉姆时，咪咪的反应也跟上次对琳赛一样——她坦白了自己跟继父的关系，然后以吉姆有病为由，还是更倾向于相信吉姆。

玛格丽特非常愤怒，几周都没缓过来。她现在就像站在一个很高的山峰上，四面都是悬崖，无路可走。她感到如果她一直对自己的家庭羞惧交加，那么自己很可能都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但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怀利现在是玛格丽特的依靠。她需要一个值得她信任的人陪伴，同时她也在思考性以及亲密关系对她的意义。他们在芝加哥一起生活了几年，然后一起搬回博尔德。两人在1993年组建了家庭，玛格丽特仍然在寻找让生活继续的方式。

她找到了一位治疗师，是琳赛的治疗师推荐的，除此之外还接触到了无数营养和锻炼养生法以及一些非传统的治疗方式，后者很有点儿博尔德的地方特色。她跟着纳罗帕大学一位备受尊崇

的老师进行艺术治疗，并跟一位佛学导师学习冥想。她还用霍夫曼法训练自己，这是一种将东方神秘主义、格式塔和集体疗法结合起来的向内疗法。在这个过程中，她需要创想出一个丰富的视觉空间，并让自己沉浸其中——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想象成一头恶龙，然后把它杀掉。有那么几年，她在脑点疗法中找到了慰藉，这种另类的创伤疗法的核心是在人创想时控制其眼球的运动。脑点疗法是有名的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的分支，意在帮助病人在有控制感和安全感的前提下重新经历创伤过程。“我们正在激活这个孩子的记忆，她正在得到呵护。”玛格丽特的治疗师玛丽·哈特奈特会这么说。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会追踪玛格丽特视野的方向和焦点，而玛格丽特需要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伤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开始——在她婚礼前那一晚，吉姆割破了琳赛的车胎；唐纳德赤裸裸地躺在地板上，房间空空的，所有家具被他搬到了院子里；马特在加里家脱得精光。在治疗师的引导下，玛格丽特逐渐回忆起那些重大的创伤，包括吉姆对她的性侵，以及布莱恩杀了女友后自杀。在治疗期间，玛格丽特有时会哭，甚至一哭就会哭上一个半小时，为这些不会发生在正常家庭的灾难而哀痛。治疗结束后她会径直回家，蒙头睡到大天亮。

反省人生时，玛格丽特总会想到母亲，想知道为什么她要生这么多孩子，为什么她不惜牺牲健康的孩子也要保护生病的孩子，为什么她明知吉姆精神不正常还要把两个女儿周末送去跟他住。慢慢地，她努力地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母亲。她开始认识到，咪咪没有能力目睹性侵在她眼皮底下发生，她甚至从来没承认过自己遭受过性侵。这会不会是咪咪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没有分寸、没有节制的原因？她的母亲不断扩充这个家庭，其实只是为了逃离过去，她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家，一个没有瑕疵的家。

长久以来，玛格丽特第一次体会到了与母亲同为幸存者的共鸣。玛格丽特的情况正在一点点好转，除了妹妹，她需要远离其他家人才能彻底抚平创伤。

第30章

琳赛去了博尔德的看守所，在那里待了很久，好好地探望了哥哥。彼得已经31岁了，但看上去仍像个大学生的，脸蛋红扑扑的，穿着运动式的羽绒服、羊毛袜和登山靴。他在很多方面仍是那个叛逆的少年，聪慧、健谈、讨人喜欢，总爱惹麻烦，跟父母作对，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但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现在似乎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但琳赛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状态，或许可以帮助他。

彼得和父母在家时，动不动就会发火，有一次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砸了。还有一次，在去彭罗斯医院的路上，他突然酒瘾发作，感到皮肤上好像有虫子在爬，看到蛆从天花板上掉进自己的嘴里。医疗记录上说他“在病房里非礼护士”，甚至要殴打一名护士。出院后，彼得在街头流浪过，也跟熟人发生过冲突。一次，他在路边往开车路过的司机的眼睛反射阳光，被捕后争辩说他是飞行员，要拯救这个城市。异想天开的时候，他发誓说自己要像父亲那样管理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为家里重振昔日的荣耀。

法庭要求彼得待在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但他擅自决定去博尔德。他走出医院，搭顺风车去看妹妹们。一到博尔德，他就惹

麻烦了。1991年5月18日，彼得被人看到在便利店偷一包香烟。店里的人跟着他追出来，看到他坐在门口，不愿意移动。两名警察过来，问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彼得回答“1851年”后撒腿就跑。当警察试图拦下他时，他惊恐万状，对着警察的脸挥拳就打。彼得后来说他只是想摆脱他们，但警察铐住了他，对他提起二级袭警的指控。

在琳赛去看看守所看望彼得之后，法院把他转到了普韦布洛，因为他没有行为责任能力，所以这一案件不再受理。9月，彼得再次被送回看守所，琳赛抓住这次机会把彼得保释出来，带回了家。琳赛有个计划。她认为在妹妹的支持下，加上一些医疗手段，彼得应该能够走上正轨，不用再徘徊于家和普韦布洛之间。彼得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因此琳赛觉得也许他病得还太离谱，在所有患病的哥哥中康复的希望最大。彼得从14岁起就进了医院，在琳赛看来，这是自己家和整个医疗系统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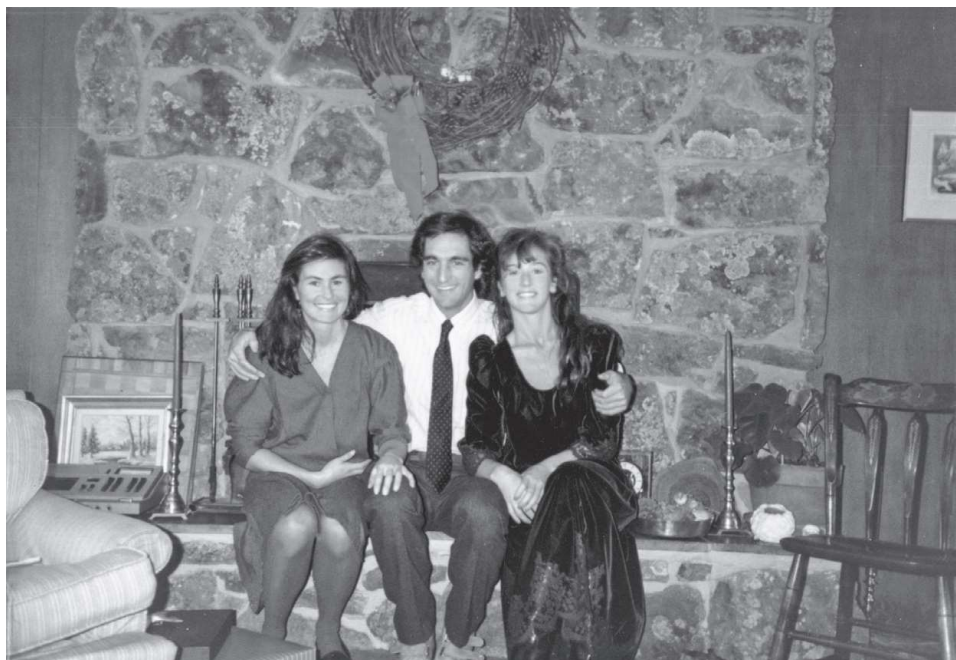
琳赛把计划告诉了母亲。她原以为母亲会感到被冒犯，并且会伤心、不屑和警觉，但母亲只是害怕。

“噢，玛丽，你不会想掺和进这摊事的。”

“我必须得试一试，”琳赛说，“我是说，如果不试试，我会一直惦念着的。”

此时，琳赛接受治疗师露易丝·斯尔文的治疗已经7年了。大学毕业后，她凭借自己市场营销的学位在埃尔多拉滑雪区找了份活动策划的工作，比如为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安排赛程。一两年内，她成了滑雪区的销售主管，负责为景区协调和筹办团体活动。在埃尔多拉工作期间，琳赛遇到了男友里克，两人在几年后就结婚了。在遇到里克时，琳赛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了，并准备更投入地谈一段恋爱。1990年，利用自己在滑雪

景区的人脉，已经有3年工作经验的琳赛自己出来单干，成立了一家团体活动策划公司。20多岁时，她最厉害的成就或许是那次带着父母出去吃了一顿饭，还偷偷地结了账。



玛格丽特、彼得和琳赛在隐谷路的家中

琳赛的工作热情从来不会减退，只要还有精力，她就会工作个不停。但这种成功感持续不了太久，总是会出点小岔子，有待她去解决。最终，琳赛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意识到，残酷的命运打击的是哥哥们而自己幸免了，她为此产生了一种愧疚感。她想让一切变得正常起来。琳赛欣喜于治疗给她带来的变化，因此免不了会想，或许哥哥们不应该再被送进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而是应该给他们提供改变了她人生的那些心理治疗。

在琳赛的这个新想法中，隐含着对母亲强烈的质疑。琳赛坚

定地认为，在童年阶段，咪咪一直把普韦布洛作为一种管控哥哥们的手段，压制他们、软化他们，让他们在最脆弱的时候寸步难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哥哥们接受的治疗中（比如迈克尔接受的治疗），似乎总是缺失了一项：哥哥们从未获得过自己的治疗师给自己提供的那些帮助——吐露心声，从而得到恢复。

琳赛认为哥哥们受到了不当的治疗甚至虐待。医院不过是给他们开了点药，并没有做什么其他治疗。在琳赛看来，无论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有多合理，都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额叶切除手术，都在禁锢哥哥们的灵魂。会不会还有别的办法？如果有人询问哥哥们的需求，切切实实地倾听他们的声音，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另外，琳赛还想在家里扮演新的角色。吉姆已经不会再在家里出现了，因此她不再需要躲着吉姆。她觉得在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并让生活恢复正常的努力中，下一步应该是回到家中去帮助那些被落下的人。

为什么不是我发疯呢？琳赛常常想。我欠他的，因为疯的不是我。

玛格丽特没有心情协助琳赛的新计划。她觉得这个想法太突兀了，完全是心血来潮。她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其实玛格丽特心里也挺害怕的。她在年龄上比琳赛更接近彼得。小时候，她是四个冰球男孩嘲弄欺负的对象，彼得也这么干过。现在，彼得更出格了，砸窗户、打警察。一想到要接近彼得，就会让她浑身不自在。她的反应跟琳赛正好相反：我不愿意自己的人生中有这种事。我不能让我的生活跟这种事沾

边。我不想靠近他们。

琳赛无法理解玛格丽特的这种反应。琳赛想要站在风暴之眼，尽管那是她痛苦的来源。她渴望有机会直面父母，指出他们的过错，让他们知道他们把问题处理得有多糟。她想以孩童时从未有过的方式主宰自己的命运。

玛格丽特只想淡化这一切，让自己的童年看起来就像普通孩子的童年，想挽回曾经迷失的那些东西。琳赛则决心不再像个孩子一样只是被人主宰。

26岁的琳赛成了彼得的指定监护人。在这之前，她在全职工作之余填写了大量的申请表格。但现在她可以为彼得处理补贴支票，安排他的治疗，为他申请联邦八区的住房了。几个月来她不断去博尔德的警署，消除对彼得的犯罪指控。1991年12月，彼得先是在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回到了博尔德，准备在琳赛的监护下生活。

琳赛送彼得去预约好的医疗机构接受会诊，并让他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接受治疗。大学免除了他的治疗费用，并把他介绍给了博尔德精神健康中心，那里主张药物和谈话联合治疗。琳赛会陪着彼得去接受诊疗，她觉得彼得似乎对此很满意，因为精神健康中心的医护人员能体会他的心绪，让他觉得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他经历的痛苦是值得同情的。

琳赛对彼得的病情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虽然大多数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最终都会向精神病诊疗体系低头，但彼得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琳赛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让她好奇的是彼得抗争的原因。据彼得的医生说，很多病人都会因为受到强迫而发飙，但彼得的行为却非常少见：他会就自己疾病的核心

问题，针对精神病诊疗体系的弊病侃侃而谈，指出这样的体系会阻碍他恢复健康，或者至少限制了他的合法权利。这种态度使他的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得知这一点让琳赛更加确定自己收留彼得这件事做对了。她要在博尔德照顾他，打破他反抗和发病的循环，帮他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她和彼得现在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家很重要。别试图掩盖问题。为什么生活一定要像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琳赛的男朋友里克带彼得去滑雪和溜冰时，彼得的肌肉记忆苏醒了过来，整个人进入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身体突然有了过去和兄弟们一起打冰球时的活力。“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里克回忆说，“他的语气里透着自信，在冰场上显得神采奕奕。”彼得似乎在努力，也有可能能够找回原来的那个他，这让琳赛和里克感到高兴，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琳赛觉得彼得非常希望向所有人，包括他自己，证明他可以恢复健康，或者证明他没有疯。在琳赛看来，情况在好转。彼得现在总是爱嚷嚷，不仅冲动还争强好胜，但总是情绪高昂，显得那么可爱。通常情况下，他已经不再会有幻觉，而是能够分得清现实，并且可以应付简单的工作。

博尔德的一名病例管理人员注意到，彼得似乎在努力尝试解决问题：他清楚围绕自己的心理健康医疗系统的现状，知道其弊端，并积极地投身于改进这个体系中。一次，琳赛带着彼得去参加科罗拉多精神病病人联盟的一个会议。彼得在会上令人动容地谈起了自己和警察的摩擦，谈起了像他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变得足够敏感，才能不让人感到受到了威胁，才不会惹事。

琳赛认为彼得知道她和玛格丽特的童年经历，知道她俩现在

都活得好好的。她感到彼得也开始认为自己同样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顺利的阶段持续了一个月或者稍长一些，直到彼得开始确信自己不用再吃药了。在这之后，他会整夜不睡，急速地说话——快到几乎不喘气的程度——将从前要管理父亲的联合会的幻想讲个不停。他会一趟又一趟，一趟又一趟地骑自行车去博尔德大峡谷的山顶，然后返回。由于焦虑，他开始喝酒和吸大麻，用有劲的东西自我治疗。他整天待在博尔德人流最多的珍珠街商贸城，跟流浪汉坐在一起，放着录音机，还经常把新朋友带回琳赛的公寓开派对。

正因为这样，执法部门再次注意到他。这次他不用去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而是需要去丹佛一家叫洛根堡的州立医院，直到病情好转才能被琳赛带回家。

一天晚上，在珍珠街，彼得放着音乐，抬头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看着他。小男孩身边的那个男人彼得认识。他笑了。

“嗨，弗里德曼医生！”

罗伯特·弗里德曼此时已经非常了解这家人，他曾在丹佛的实验室里检测过他们大多数人的感觉门控能力，但弗里德曼当时并不知道彼得在博尔德。在彼得到达洛根堡医院之后，弗里德曼开始用心地治疗彼得，并向琳赛介绍彼得的情况。见过几次面后，琳赛注意到弗里德曼在使用“脆弱”这个词描述哥哥，这意味着最微小的事情——例如晚上没睡好，或者漏吃了一次药——都可能会引起精神病发作。

弗里德曼告诉琳赛，这是多年来治疗不到位的结果。问题不仅仅是彼得拒绝吃药，还因为他被先后诊断出精神分裂症、分裂

情感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时医生开的药都不对。整个治疗不到位似乎要归咎于病人自己，但让琳赛尤其心痛的是，她觉得自己帮助哥哥的时机太晚了。这么多年来，彼得吃的药甚至都可能不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对的药的话。

其他哥哥的情况让琳赛感到更难过。哥哥们这么多年来吃的那些原以为正确的药让他们变得脆弱不堪，甚至更糟。他们比彼得更沉默，生活中出现一点点变动都应付不了。琳赛总忍不住想，无论哥哥们吃的药对错与否，他们都受到了诅咒。

琳赛的尝试开始显露出了失败的迹象。她的付出无法一直让彼得远离精神失常的旋涡。弗里德曼警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的状况会恶化，更适合他的医生不在洛根堡，而是在普韦布洛。

通过弗里德曼，琳赛了解到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易感性——丹尼尔·韦恩伯格的发育假说称其为脆弱性——可以被环境中的应激源触发。无论彼得的应激源是什么，或许琳赛都无能为力。

在思考先天和后天的综合影响时，琳赛意识到既然自己和哥哥们有相同的易感性，那么她没有患病这一点就是环境因素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她经历了创伤后，由于得到了适当的治疗，她并没有像哥哥们那样发病。她的创伤是性侵，哥哥们也有各自的伤痛：唐纳德的妻子离开了他，布莱恩和女朋友分手了，乔的未婚妻弃他而去，马特则有过两次严重的脑部受伤——一次是在打冰球时，另一次是跟乔打架时头砸到了露台的地面上。

彼得的创伤似乎就更显而易见了，他在14岁时目睹了父亲中风的过程，几周后他自己也住院了。不过还有别的原因。在琳赛

和彼得的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后，琳赛问彼得是否像自己和玛格丽特那样，也曾经遭受过吉姆的性侵。彼得承认了，但没有多说什么。

琳赛并没有感到很意外，吉姆好像对年幼的弟弟和妹妹都有过非分的举动。这难道不也是她的伤痛吗？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琳赛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境遇。她的脑化学、她的基因，以及她对谈话治疗的全情投入，这些让她最终没有变成彼得那样。

多恩 咪咪

唐纳德 马克 吉姆 马特 约翰 彼得 迈克尔 玛格丽特 理查德 琳赛 乔

第31章

琳赛和玛格丽特一直觉得惊讶，为什么在隐谷路之外的人眼中，她们年迈的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可以用“神圣”来描述。1987年，一位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写道：“尽管她自己也有一些病痛，但她似乎从来没被这种事打倒过。她的态度是，她要坚持下去，船到桥头自然直。”

无论在普韦布洛、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彭罗斯医院，还是在儿子们偶尔落脚的看护之家，咪咪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她能用歌剧、乔治亚·欧姬芙，以及她外公和潘丘·比利亚的故事把医生逗得很开心。“她总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派克峰精神健康中心主任霍尼·科伦达尔回忆说，他曾在不同时期收治过加尔文家的几乎所有男孩。“从没见她情绪失控或者脸色难看过，但她总说，‘你得放下手上的事处理一下这个事，先把这个事处理了’。”咪咪再次成了快乐的斗士，但战斗变了。

跟患病的儿子独处时，咪咪比外人想象的更容易发脾气。她会斥责马特不讲卫生，骂彼得没有礼貌，数落乔长得胖。她对唐纳德的耐心稍微多一点，毕竟她跟大儿子的关系最亲。在看护院住了很多年后，唐纳德最终搬回了隐谷路，似乎要永远待下

去。“他没法容忍跟其他病人在一起。”咪咪解释说。在她看来，这个儿子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唐纳德的双手现在会出现震颤，医生称之为迟发性运动障碍。这是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病人的动作会变得僵直，并且肢体会不由自主地颤动。唐纳德则认为，他之所以会表现出震颤，是因为父亲“想要我们当医生，让我们站军姿”。

唐纳德每天说的很多话都和现实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但服药让他的病情有所缓解，使他有的时候处于清醒的状态。天气好时，他会和咪咪出去观鸟，在看到某些鸟时还会表现得有些活跃，“噢，有只红尾隼！”“有只鹰！”。这些时刻会让他回想起和父亲一起驯鹰的日子。咪咪走亲访友时也会带着唐纳德，他就像母亲的护卫，安静地坐在一旁，直到动身回家。但一年年过去，咪咪开始厌烦唐纳德难以驾驭的个性。她把家庭相册藏了起来，以免唐纳德把纸页抽出来撕掉。他砸坏过咪咪放在壁炉边多年的圣约瑟夫的大雕像。一次跟咪咪去银行时，唐纳德告诉柜员他想开一个账户，改掉自己的名字。但大多数时候，唐纳德根本不会离开自己的房间。即使是在圣诞节时，他也只是给每人一个拥抱，然后又躲回自己的天地里。有一次，在发现了唐纳德的踪迹后，咪咪一个5岁的孙女对她说，“咪咪”——孙子孙女们喜欢像玛格丽特和琳赛那样亲切地叫她的名字——“唐纳德坐在壁橱里”。

即使是在这些时候，咪咪的心还是会向着唐纳德。“节日尤其难过，”她后来说，“大家聚在一起，都在聊着要去哪儿，要做什么，孩子的事情，等等。这种时候对他来说不好过。”这样的時候对咪咪来说也不好过，她会想起曾经对唐纳德的期望。当她看着唐纳德时，经常会想起他生病前的样子。“别人那时经常说，‘哦，他真有礼貌’。他们都不了解他的真实情况。”

在聊天中，咪咪提到了一本别人给她的书，书名叫《圣人、学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讲的是在爱尔兰的一些社区，精神病患者会得到照料，甚至被视为对未知世界有独到见解的人。哪怕仅仅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对咪咪来说也是一种慰藉。也许唐纳德和其他患病的儿子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稍稍弥补他们缺失的一面。

当家里开始笼罩上精神病的阴影时，咪咪的人生也彻底改变了。在她的心中，她所期望的未来原本就像东方即将升起的旭日，很快就会降临。但现在，这样的未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她从未当着任何人的面抱怨过，但有时女儿回来时会注意到她言辞中多出的那一份怨愤。她挂在嘴边的故事变了，不再就霍华德·休斯和雅克·丹波瓦说个不停。她谈起自己曾希望自己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当一名律师，但他却坚持要参军。她说自己一直想住在东海岸，但多恩却带着她全国到处跑，来到了科罗拉多。她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自己会生12个孩子，但多恩想要12个，那他们就生12个。她做了一个妻子可以做的一切，甚至改信了天主教，因为那是她的责任。她为其他人奉献了一辈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心情最差的时候，咪咪责怪过多恩的家族，觉得是他们把疾病传给了孩子们。多恩哥哥家有一个儿子现在也有点精神失常，似乎是双相情感障碍。她会说，科学迟早会证明她的孩子们的病都是从加尔文的家族遗传来的。

这话让琳赛和玛格丽特觉得既刻薄又残忍。她们的父亲如今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只是过去的一抹残影，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视机前。每当家人谈起男孩们的病时，他似乎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场面。要是有人说起吉姆对妹妹们做的事，他的下巴就会止不住地颤抖。至少在玛格丽特看来，多恩当年没有尽到保护她和琳

赛的职责。但现在的多恩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谓了，置身于这样的谈话中，他会泪流满面。何苦现在要这样折磨他呢？

有一件事让咪咪心里不舒服——跟女儿们有关。她知道在她们眼中自己既是家里的恶霸，又是全家的英雄。一方面，她是一个不喜欢给予人肯定的母亲，因为更喜欢患病的儿子，会没心没肺地忽视女儿们；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独自照顾病儿，力争维持家庭完整的母亲。咪咪能觉察到有人对她评头论足，但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己的一些孩子似乎也没有对她心存感激。对此她只能默默忍受。

20世纪90年代，咪咪听说了一件让她始料未及的事。这件事让她非常心痛，而且越想越后怕：唐纳德非常突然地告诉她，自己青少年时期曾被人性侵过。当咪咪问起性侵者的姓名时，唐纳德说是咪咪的一位亲近好友。

20世纪50年代后期，还是小孩的唐纳德是家里第一个去圣玛丽教堂为罗伯特·弗洛登斯坦做祭台助手的男孩。弗洛登斯坦就是那位引导咪咪改信天主教并为她洗礼的牧师。那些年“弗莱迪”跟他们家走得很近，是咪咪和多恩的知心好友，小唐纳德跟他关系也很好。唐纳德16岁时曾跟弗莱迪去草原上住过一周，因为弗莱迪的驾照丢了，唐纳德过去帮他开车。现在唐纳德告诉咪咪，自己受到过弗莱迪的性侵。

咪咪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她已经年近70，还能承受得住多少这样令人震惊的秘密？唐纳德总是话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胡言乱语，因此咪咪试图不去想这件事，但唐纳德不断用他那冷幽默般的平淡语调告诉她这是真事。当时的新闻里也在报道天主教堂的性侵危机，从公开的那些案件看，似乎大多数受害者都会

像唐纳德那样，因为羞耻感或者受到威吓，几十年后才敢吐露实情。

弗洛登斯坦神父从来没因为这种事上过新闻。但咪咪忍不住会想到他，想到自己本应该保护好儿子，却发生了这种事，这让她的的心情前所未有地沮丧。这是自布莱恩的死后咪咪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想得越多，她就越意识到弗莱迪侵入自己家的生活有多深：他是如何变成自己不可或缺的朋友的，而自己又是多么信任他，才放心把唐纳德以及其他大一点的男孩都交给他。牧师性侵小男孩的新闻她听得越多，就越忍不住想自己有几个孩子可能遭到过侵害。

刚开始，好像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何况唐纳德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几十年来服了大量药物。但唐纳德会毫无保留地对问起的人重复他坦白过的事。其他的弟弟对弗莱迪的回忆各不相同。约翰记得自己被弗莱迪挑逗过，迈克尔和理查德回忆说他们很喜欢弗莱迪。理查德记得弗莱迪有次带着几个哥哥——唐纳德、吉姆、约翰和布莱恩——去格伦伍德斯普林斯徒步过两天。“爸妈都很放心，”理查德说，“他们有一个信任的牧师。”

峰回路转，理查德完全出于偶然对弗莱迪有了更多了解。理查德的女友蕾妮有个近亲，名叫肯特施努布什。他告诉他们说，1966年，自己还是青少年时，就认识这位牧师，说他当时受到了弗洛登斯坦的勾引，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多年后，在参加牧师性侵幸存者联盟科罗拉多分部的会议时，肯特提到了弗洛登斯坦的名字。在参会者中，还有两个人说他们听说过弗莱迪，说他是同性恋并且酗酒。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多次被调到小的教区而且从未在教会中晋升过。弗莱迪于1987年退休，生命中最后几年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于1994年去世。

会议结束后，肯特决定向主教管区举报弗莱迪，并看看这个性侵过自己的牧师还干过什么好事。会面相当简短，内容却让他惊骇不已。管区的牧师没有搪塞肯特，而是直接问他想要多少赔偿。肯特完全没预料到管区是这样一种反应，因为相比赔偿，他更想求一个结案的安慰。他回答说8 000美元，管区给了他10 000美元。

在肯特把这件事告诉理查德和蕾妮时，震惊的不只是理查德和蕾妮。肯特也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在侵犯自己的好几年前，弗莱迪就已经和加尔文家的男孩们熟识了。肯特认识弗莱迪的时候18岁，和给弗莱迪做司机时的唐纳德一样，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在听说肯特的经历后，咪咪心中的怀疑已经确证无疑，不仅有了进一步的佐证，连犯罪手法也已经非常明显。对此时的咪咪来说，弗莱迪的名字有没有被性侵幸存者和民间组织公开，弗莱迪有没有被起诉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觉得该来的是总会来的。谁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事没有被公开，还有哪些龌龊的牧师在隐藏自己的罪恶呢？咪咪相信，当时的弗洛登斯坦就像是在超市选麦片一样，细细地比较着她的儿子们，然后选择他最中意的那一个。“他特意选择了我们家，他知道我们家男孩多。”

打这起，咪咪就把弗洛登斯坦神父视作一切问题的原因，是他们家出事的罪魁祸首。她会说，弗洛登斯坦神父性侵了唐纳德，这些创伤使唐纳德用暴力对待自己的弟弟们，而至少其中一个弟弟，吉姆，又性侵了自己的妹妹们，这不是很说得通吗？吉姆有没有可能也被弗洛登斯坦神父猥亵过呢？这是否就能解释吉姆的恋童癖？家里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之所以患病，会不会都是这一连串性侵引发的焦虑导致的？在此之前，咪咪真心觉得这种病是遗传导致的。但看看唐纳德和彼得，他们俩在病得最重的时

候对宗教的笃信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真的完全是巧合吗？或者是因为天主教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人受到创伤后那些意象就会降临？

当然，咪咪构想过好几种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侵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即使真的像咪咪猜想的那样，家里很多孩子都遭受了性侵，也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例精神病。琳赛知道咪咪把性侵和精神病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也知道咪咪为什么会这样。把责任推到弗洛登斯坦神父身上，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咪咪所遭受的指责。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一对父母究竟有多疏于照料，才会让不怀好意的牧师对自己的孩子们有那么多可乘之机。

咪咪不再信天主教了。她告诉孩子们，她不想在去世后举行天主教的葬礼，而是希望被火化。她再也不想掺和天主教的事。她的时间不多了，她想让全世界知道谁该对此负责。

在听唐纳德讲完弗洛登斯坦神父的事情后，过去总强调自己家在被精神病击垮前是一个完美家庭的咪咪，决定更加坦诚地谈论过去，告诉了女儿们自己以前从未想过要说的事情。让两个女儿始料未及的是，咪咪揭开的是她们父亲的往事。

咪咪开始细数婚姻中的一段段经历，她觉得这些片段都能反映多恩的另一面。第一次是在1955年，一家人刚从科罗拉多泉市调到加拿大不久，多恩就进了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按照咪咪现在的说法，入院是因为多恩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之后他们住在加州北部时，多恩也出现过类似恐慌发作的轻度症状。这些年多恩都待在家里，大家都看得到，经历过一系列健康危机的他变得愈加消沉。咪咪现在认为，多恩一生都有临床

抑郁症史。

琳赛和玛格丽特都不太相信，至少刚开始时很怀疑。她们觉得咪咪可能又在搞什么障眼法，或许是想把儿子们的精神病怪罪到多恩的基因上去，好减轻自己所受到的指责。但两姐妹也不觉地回忆起父亲的行为举止。会不会是战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渗入了父亲对他们童年的影响中？他的这些创伤会不会以某种方式转移到男孩们的身上？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多恩的家族中是否存在暴力特质，这种特质让唐纳德打吉恩，让布莱恩杀了诺妮，让吉姆对其他人做出了那些令人不齿的事？这么多年来，玛格丽特和琳赛关注的都是母亲的所作所为，现在又出现了她们从未料想到的新问题。

让姐妹俩更想不到的是母亲接下来的话。咪咪说，在多恩中风前的很多年里，他有过很多个女人，她猜至少有6个。第一个是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那是战后不久，当时多恩正随“朱诺号”沿着大西洋海岸四处巡游。咪咪说有一次她原本也要带当时还年幼的唐纳德和吉姆同行的，但后来没有成行。她说多恩就是在那一次遇到一名高级军官的妻子并有了外遇的。她告诉玛格丽特，如果自己那次跟多恩同行，那么这场外遇就绝对不会发生。咪咪说她是后来才发现这件事的，之后他们就从诺福克调走了，但多恩并没有就此收手。

听到这时，姐妹俩都惊呆了，但对父亲的新认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填补了她们对父母关系的认知空白。她们在家里看到的很多事，现在就更说得通了。比如父亲在官职最大的时候，似乎总不在家。还有在克洛科特家的晚宴上，邻居们的妻子会管她们的父亲叫“罗密欧”。她们越回忆，就越觉得这些外遇解释了童年的很多事，甚至解释了咪咪对完美家庭的渴求。

咪咪现在这样如实相告，是想告诉女儿们，父亲只是人，并不完美，对他的要求只要跟其他人一样就好。她的这些经历和态度使姐妹俩现在倒想更多地了解她了。为什么她一直留在多恩身边？她不离开是因为她不想离开，还是因为她生完多恩想要的孩子后已经别无选择？为什么她愿意听任丈夫的摆布，而他自己却可以在外面风流快活？

玛格丽特想起了母亲画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匹诺曹。那幅画现在在琳赛那儿，被绳子穿着挂在一个隼标本弯曲的喙上。玛格丽特觉得那幅画仿佛是母亲感受的贴切隐喻，她不得不照顾12个孩子，而丈夫却远在天边。她开始怀疑，那些她曾以为全都遗传自母亲的特质——譬如无法真正集中注意力、精神脆弱，等等——会不会实际上都来自父亲。母亲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是，但至少她从没抛弃过这个家。她从未放弃过努力。

第32章

1998年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医学中心

20世纪90年代，加尔文家住在科罗拉多的成员——咪咪、多恩、琳赛、玛格丽特、理查德、迈克尔和马克，以及患病的唐纳德、乔、马特、彼得——都曾先后去过丹佛，在罗伯特·弗里德曼的实验室接受耗时数天的测试。弗里德曼一有机会就会谈起他的研究。至少在琳赛看来，弗里德曼对感觉门控和易感性的描述，以及精神分裂症大脑处理信息存在障碍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她会回想起某个患病的哥哥有时会对背景噪声特别敏感，比如电扇的嗡嗡声。

弗里德曼从来没想到，自己开展的脑部电生理学实验——那些测量病人感觉门控能力的双咔测试——会成为精神分裂症检测的标准测试。他原本只是把这种测试视作考察受试对象脑内情况的很多种策略中的一种。在研究加尔文一家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发现他们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没有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员（比如琳赛），都无法抑制对第二次咔嗒声的反应，但也有一些人能抑制。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是搞清楚相较于能抑制这种反应的人，那些无法抑制这种反应的人是否具有某种相同的遗传性状。

这使弗里德曼进入了一个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是研究中枢

神经系统的，不是琳恩·德利西那样的遗传学家。“我是后来才搞遗传学的，”他说，“琳恩比我早得多。”

弗里德曼熟悉的是脑的功能。他知道海马——左右大脑半球中的一对海马形状的结构——是如何帮助大脑产生位置感的。这个过程使一个人随时都清楚自己身处何处，以及身处此处的原因和到达此处的过程。他的双咔测试也证明，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神经元（也就是脑细胞）传入感觉信息，还需要抑制性的中间神经元即时擦除大脑这块白板上的情境信息。没有这些抑制性的中间神经元，我们就需要从头再次处理相同的信息，这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磨损”我们的“硬件”，令人变得不知所措，或许还会引起焦虑、偏执，甚至妄想。

弗里德曼这时开始好奇，这些抑制性的中间神经元会不会是通过开关某种细胞层面的东西来实现这一点的，而加尔文家的男孩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这种机制出现了异常。弗里德曼实验室随即开始用大鼠的脑细胞开展相关研究，并发现抑制性神经元的开关环路是受海马细胞中的一种关键分子控制的，这个分子叫作 $\alpha 7$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这个分子存在的意义却简单直接。这种 $\alpha 7$ 受体就像一位沟通大师，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保证系统能正常运作。要完成这项任务， $\alpha 7$ 受体需要和一种叫作乙酰胆碱，起神经递质作用的化合物结合。弗里德曼怀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alpha 7$ 受体出了问题，或者缺乏足够的乙酰胆碱，使 $\alpha 7$ 受体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弗里德曼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加尔文家某些兄弟之所以患病，就可能是因为维持他们大脑清醒的机器的燃料用罄了。

要证明这一点，弗里德曼需要以人为对象开展研究。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项遗传学研究。他采集了包括加尔文家在内的9个家庭的数据，一共104

人，其中36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那些对双咔测试反应不正常的家庭成员中寻找共有的遗传模式。通过分析他们的组织样本，弗里德曼追踪到了受体问题发生的准确位置。在染色体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叫作CHRNA7[1]的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正是 $\alpha 7$ 受体。

1997年，弗里德曼鉴定出了CHRNA7基因，[2]这也是科学界鉴定出的第一个确定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3]他和同事一起创造了历史。但更重要的是，他向理解精神分裂症的机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下来，他需要搞清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个基因出了什么问题。他已经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那些他研究的患病家庭成员（包括加尔文兄弟）的大脑中， $\alpha 7$ 受体的数量虽然只有正常大脑的一半，但这些存在的 $\alpha 7$ 受体仍然能够正常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病人的脑中没有足够的乙酰胆碱来打开这些开关，进而制造更多的受体。

玛格丽特还记得她有一次走进弗里德曼的实验室的那一刻，香槟啖的一声开启的情形。她和怀利那次是去咨询弗里德曼自己是否可以生孩子。弗里德曼和他的团队当时刚发现CHRNA7基因，他很乐意从欢庆中抽空给他们解释一下这个新发现对加尔文家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非常不想打击玛格丽特和怀利要孩子的念头。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兄弟姐妹患这种病的概率确实比普通人高，是常人患病概率的10倍，但弗里德曼也强调说，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适用于父母和子女或者叔伯与侄子侄女。他认为玛格丽特家族成员的基因异常未必表明存在某些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超级基因”。精神分裂症会在家族中消失，之后再次出现，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玛格丽特生的孩子一定会患精神病。

似乎很难想象玛格丽特和怀利的孩子患病的概率会和普通人的孩子一样低，但弗里德曼就是这么说的。那他的实验室刚发现的跟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又怎么解释呢？在一块大白板上，弗里德曼写满了对应染色体上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位点的信息。能得出这些成果，得益于玛格丽特家的数据。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基因异常不能被用来预测精神分裂症，只能在异常出现时为治疗提供一份方案指南，而且他很清楚应该如何运用这份指南。

弗里德曼的发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几十位其他研究者也在研究其他染色体上的基因突变。截至2000年，研究人员已经鉴定出至少5个问题区域，后来又发现了更多。[\[4\]](#)

由于其与尼古丁的特殊关系， $\alpha 7$ 受体格外引人注意。烟民的体会是最真切的：尼古丁能增强乙酰胆碱与 $\alpha 7$ 受体结合后产生的效果，而烟民，或者说他们脑中的 $\alpha 7$ 受体，喜欢乙酰胆碱的效果增强引发的体验。烟民之所以喜欢吸烟带来的体验，是因为尼古丁在短时间内会使他们精神更集中，或者使他们感到镇静。弗里德曼很好奇，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譬如彼得·加文——总是不停吸烟，难道只是巧合吗？在他看来，尼古丁可能给这些患者提供了抽离妄想的片刻解脱。如果想办法增强这种效应——在实验中模拟和确认尼古丁的效果，然后以药物的形式把它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那么会不会可以更有效地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并且副作用比氯丙嗪更小呢？

首先，他需要更多的证据。1997年，弗里德曼设计并开展了一项实验。他把尼古丁——通常以尼古丁口香糖的形式——分发给精神分裂症患者，然后用双唑测试测量他们的脑电波。[\[5\]](#)实验结果非常明确，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咀嚼了三片尼古丁口香糖

后轻松地通过了测试。和没有患病的人一样，他们对第一声咔有反应，但对第二声咔没有。尽管在尼古丁的效力消退后，这些患者对第二声咔恢复了反应，但这一结果足以让弗里德曼感到震惊。

弗里德曼的研究为他赢得了很多同行的赞许，包括理查德·怀亚特。对于这项尼古丁口香糖实验，琳恩·德利西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这位前领导的评价是“重要而且令人兴奋”，他的直觉告诉他尼古丁疗法“非常有前景”。^[6]弗里德曼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尼古丁的研究中。他计划研发一种同样作用于 $\alpha 7$ 受体的药物，但效果要比尼古丁更好，能够让精神分裂症患者脱离妄想之苦的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数小时，甚至数天。他从美国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如今的名字是脑与行为研究基金会）争取到了药物试验的经费。和美国癌症协会一样，这家机构的资金来源也是捐赠者的捐赠。“我们想研发出一种更好的尼古丁。”他说。

弗里德曼的研究发现，一种名叫毒藜碱的天然物质可以模拟尼古丁的功效。在佛罗里达，有一位研究者一直在人工合成毒藜碱，只是不敢确定这种药的实际用途。他后来说，他等待弗里德曼这样的人来找他已经等了10年。以这种化合物为基础，弗里德曼研发出了一种被称为DMXBA（3-2,4 dimethoxybenzylidene anabaseine的缩写）的药物，并开始对其展开测试。这种药在双咔测试中具有和尼古丁相同的效果。2004年，弗里德曼在一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开展了这种药物的双盲对照实验，结果出奇地好。^[7]一位服用了这种药物（而非安慰剂）的受试者告诉弗里德曼，她之前一直无法写完自己正在创作的短篇小说，现在她能集中精神写完了。另一位受试者说，“我现在不会注意自己的声音了”。第三位受试者的母亲则说，她的儿子第一次能够注意到

周围的风景了，看到院子里的兔子会很开心，不会受到自己幻觉的干扰。

一年内，几家不同的制药公司都开始努力研制这种药物的类似物。弗里德曼的药品专利归佛罗里达大学所有而且很快就要到期了，没有公司愿意购买一份几年后就会到期的专利。“我们已经开始对这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了，所以制药公司对这种药物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动力，”弗里德曼说，“因此他们得自己去研发。”

作为不拿薪水的顾问，弗里德曼告知了每家公司这种药物的特性，希望他们使用他建议的方法来研制自己的类似药物。有几家公司的药物研发和试验走得很远，但最后都未能成功。一家名为论坛制药（Forum Pharmaceuticals）的公司在很多位受试者出现便秘后暂停了试验。另一家公司——雅培公司的研发分部艾伯维公司——在DMXBA的基础上研发出了一种新药，但这种药物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非常混乱，很难确定是否有效，因此只能终止研究。弗里德曼认为，问题出在艾伯维一天一次的给药方式上。他的团队之前的研究发现，只有采取一天分三四次，每次剂量都较小的给药方式，他的药才会奏效。艾伯维认为，一种需要频繁严格按时服用的药物是没办法营销的。彼得·加尔文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不断漏吃药，这导致他病情不断复发。弗里德曼团队也曾尝试过一天一次的给药方式，但实验也失败了。“艾伯维的药理学家很优秀，我认为他们应该清楚这一点，”弗里德曼说，“但公司的营销部门左右着他们研发药物的方式，因此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注定会失败。”

弗里德曼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制药公司运作的经验教训。“这太令人失望了，我原本以为他们能研发出一种好药的。”在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后，弗里德曼决定从头开

始。要想以 $\alpha 7$ 受体为靶点增强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弗里德曼必须另辟蹊径。

[1] 在生命科学领域，有许多基因和蛋白都没有对应的中文名称，即使有中文名称，常常也有多种译法而且中文名称可能非常冗长。此外，无论有没有对应的中文名，中文科学文献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统一使用基因和蛋白的英文名。本书中文版依照这种惯例，基因和蛋白都统一使用英文名。——译者注

[2] Robert Freedman, H. Coon, M. Myles Worsley, A. Orr-Urtreger, A. Olincy, A. Davis, M. Polymeropoulos, et al., “Linkage of a Neurophysiological Deficit in Schizophrenia to a Chromosome 15 Loc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4, no. 2 (January 21, 1997): 587—92.

[3] Carol Kreck, “Mental Institute to Focus on Kids,” *Denver Post*, March 3, 1999.

[4] Ann Schrader, “Schizophrenia Researchers Close in on Genetic Sources,” *Denver Post*, August 13, 2000.

[5] Freedman et al., “Linkage of a Neurophysiological Deficit in Schizophrenia to a Chromosome 15 Locus.”

[6] Denise Grady, “Brain-Tied Gene Defect May Explain Why Schizophrenics Hear Voic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7.

[7] Laura F. Martin, William R. Kem, and Robert Freedman, “Alpha-7 Nicotinic Receptor Agonists: Potential New Candidat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Psychopharmacology* 174, no. 1 (June 1, 2004): 54—64.

第33章

2000年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从琳恩·德利西初次见到加尔文一家算起，已经过去10年了。这些年来她一直在坚定地寻找更多的精神分裂症家庭，采集这些家庭的成员的DNA样本，希望找到能够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基因异常。但她一直运气不佳，其他人也一样。199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关精神分裂症研究的调查，指出医学界对这种疾病几乎仍然一无所知，治疗方面也毫无进展。^[1]医生所能做的似乎还是多年来的那一套：开点药，然后寄希望于病人的状况能有所好转。在《自然》杂志几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编辑认为精神分裂症“无疑是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所有疾病中对人类伤害最深的疾病”。^[2]

然而，1995年，德利西的研究引起了一家资金充裕的投资方的注意。这是一家名为塞奎娜医疗公司（Sequana Therapeutics）的民办医疗企业，后来和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合作，联合研发各类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塞奎娜公司的遗传学部主任杰伊·里希特很清楚德利西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德利西博士和她的合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家庭信息，这些家庭的成员中有一个或多个子女患有精神分裂症。”^[3]塞奎娜公司认为这些是德利西

所具有的优势，可以帮助她发现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遗传因素，取得众人期待的进展。作为回报，公司向德利西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基因分析设备。“这种技术超越了一家小型实验室可能具备的能力，”她说，“因此我们希望能更快地取得结果。”^[4]

在德利西的领导下，塞奎娜公司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专门研究多发性的精神分裂症家庭，德利西是研究的唯一负责人。这项研究也是截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将会研究大约350个不同的遗传标记物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这些遗传标记物遍布整个基因组。^[5]加尔文一家的DNA也包含在这项研究的样本中。德利西似乎很有把握取得突破，但短短几年内，她就和罗伯特·弗里德曼一样，切身体会到了市场的变幻莫测和残酷。2000年，帕克-戴维斯公司被辉瑞公司收购。德利西很快就听说辉瑞将会终止她的研究项目。所有的研究将会立刻停止，她在帕克-戴维斯积累的所有遗传样本，包括加尔文一家的DNA，都将成为辉瑞的资产。除非德利西能找到其他公司支持她的项目，否则她将不能再使用这些样本。

为什么辉瑞对德利西的家庭研究不感兴趣？她一直在缓慢地取得进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研究领域，如果有人在赶超你，那么你必须加快步伐。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引发媒体广泛关注的工程，旨在绘制和理解人类每个基因的结构、组织和功能。换句话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绘制出一幅完整的人类DNA图谱。^[6]这项工程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能源部发起，当时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都在为这项计划筹钱，很有点友好竞争的意味。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研究资金估计有30亿美元。这相当于生物学界的登月工程。如果这个项目真的能成功绘制出人类的基因组图谱，那么所有遗传疾病的研究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神分裂症这样复杂的疾病也不例外。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前，琳恩·德利西和其他精神分裂症研究者都明白，如果希望寻找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突变，相对容易的方法是研究加尔文一家这样的家庭。但到当时为止，他们的连锁研究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认为这充分说明精神分裂症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研究策略——在普通人群的基因中寻找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突变——似乎显得荒谬至极。但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后，情况就不同了。

人类拥有超过2万个基因，这些基因编码蛋白质，而蛋白质构建起了我们的身体，并使身体保持正常运行。正因为如此，基因在使我们每个人各不相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从数量庞大的基因中筛选出与疾病相关的某个基因，无疑是大海捞针。但理论上，一旦人类基因组计划收集并绘制出足够多人的遗传信息，大海就不那么漫无边际了。有了人的基因组信息，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将病人——任何遗传病都行——的基因组与对照组的基因组进行比对。通过这种比对，无论患病人群的基因组中存在什么样的异常，研究人员都能发现。在发现相关的基因后，制药公司就能以这个基因为靶基因，用药物干预相应的遗传学过程。

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帮助，针对任何疾病的新型治疗手段的研发时间似乎都能缩短好几年。1995年，癌症研究专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rmus）在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精神分裂症研讨会。^[7]瓦姆斯曾和迈克尔·毕晓普（J. Michael Bishop）因为鉴定出某些癌基因在细胞中的来源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瓦姆斯邀请了很多长期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学者来展示他们的最新研究，包括富勒·托里、欧文·戈特斯曼、丹尼尔·韦恩伯格，以及耶鲁大学的帕特丽夏·戈德曼-拉基奇（Patricia Goldman Rakic）。瓦姆斯对他们的研究成

果反应平淡。据韦恩伯格回忆，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疾病研究部新上任的主任扎克·霍尔突然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都研究这种病30年了，按我说，你们真的是一事无成。”^[8]这些话让参会的研究者目瞪口呆，有人绵里藏针地回击了几句。这时瓦姆斯插了进来，说出了他心中或许酝酿了很久的话。“你们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瓦姆斯看来，在场的人可以不去管他们的酶学研究，他们的磁共振扫描，他们的CT扫描，他们的PET扫描。但是如果你不研究基因，瓦姆斯说，“你的研究就会很原始”。

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来自全球各地，他们原本预计这项工程要花15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整个计划在2003年就提前完成了。人类不仅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完整地读取这本生命之书，而且科学家在基因组测序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遍布基因组的新的遗传标记物，可以用于开展相关研究。在此前的研究中，德利西只能利用基因组中的几百个不同标记物，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使科学家可以利用的标记物的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个。有了如此丰富的新标记物，研究者得以研发出一种可以快速分析基因组的工具，从而找到DNA上与疾病相关的区域。这就是所谓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简称GWAS）。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要想成功，首先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目标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DNA样本，还要收集大量没有患这种疾病的健康人的DNA样本，样本越多越好。在电脑的辅助下，开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研究人员会比对两组人群的信息，寻找患病人群共有的遗传标记物。经过比对，研究人员在理论上可以揭开任何疾病遗传标记物的神秘面纱，让病因立刻水落石出。

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里，科学家几乎对每一种可能有遗传性的疾病都开展了一项或多项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如心脏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克罗恩病、双相情感障碍、高血压，等等。2005年，德利西在波士顿主持了一场国际精神病遗传学学会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博德研究所（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的专家爱德华·斯科尔尼克宣布，博德研究所计划成为全球精神分裂症遗传数据的信息中心，并致力于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来鉴定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到2008年时，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的几乎所有研究者，包括德利西，都加入了精神病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联合会（这个组织现在的名称是“精神病基因组学联合会”）。这个组织汇集了大约5万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的DNA样本，其中也包括德利西从加尔文一家采集的样本。2009年，利用这个联合会提供的信息，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3 000名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75 000个基因异常，发现了“数千个病人共有的等位基因（可能是突变基因），这些基因对病情都有一些微小的贡献”。[9]

这项精神病学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了很多可能相关的基因的位点，位置遍布整个基因组，为精神病是如何在脑中发生的提供了更深刻的新认识。这些新发现后来使遗传学家们认识到，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与基因的复制错误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在基因的复制过程中，有的时候一整段的DNA会被过度复制，有的时候又会丢失，这将导致不同的人的同一个基因存在基因拷贝数差异（copy number variation，简称CNV）。[10]对于那些希望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找到几个关键基因来“定罪”的研究者来说，这项研究结果显得不太鼓舞人，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随后开展的精神分裂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定出了最初一批似乎与这种疾病紧密相关的基因位点。在一项2013年发表于《自然 遗

传学》(*Nature Genetics*) 杂志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21 000个遗传学样本，发现了22个这样的位点。[11] 另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自然》杂志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则涉及36 989位病人，发现了108个位点。[12] 罗伯特·弗里德曼的CHRNA7基因也位居这些可疑位点之列，这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些许证据。但研究者发现的位点越多，这些结果就越显得意义有限。

把这些基因异常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看，每个基因异常只会轻微增加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面对这样的难题，研究者们把所有微小的因素纳入考虑，设计出了一种“多基因风险评分”来评估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13] 但很多研究者认为，多基因风险评分只是把一堆不重要的细节变得稍稍重要了一点而已。即使把《自然》杂志2014年发表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鉴定出的遗传标记物综合到一起来看，这些基因异常也只能把一个人的患病概率提高大约4%。[14] “这种评分机制挺无脑的。”[15] 德利西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前领导艾利奥特·格森说。他在德利西离开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几年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多基因风险评分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并没有像瓦姆斯等遗传学家预期的那样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面对这种巨大的失望，博德研究所领导精神分裂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的科学家们决定加大投入力度，开展更大更好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我的同事估计我们需要25万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博德研究所斯坦利精神病研究中心主任史蒂文·海曼说，“这个数字大得惊人，但对于这种病来说是可以实现的。”[16] 海曼预计，当研究完成时，“将会发现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数百个基因的数千个变异体”。[17]

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研究可能会把学科带偏，使研究者们

再一次只在有光的地方寻找钥匙，而不是去寻找钥匙的真正位置。经过这么多探索后，科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深层本质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精神病遗传学家肯尼斯·肯德勒在2015年提出疑问说：“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经典的器质性生物学疾病吗？还是某种在家族中聚集出现的综合征谱系的极端表现？”^[18]

琳恩·德利西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多年来她一直很清楚。“我认为这数百个基因或者标记物不会带来什么发现，”她说，“我想要看看在加尔文家这样的大家庭里造成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2000年，在辉瑞公司取消掉德利西的精神分裂症家庭研究项目后，她被迫停下了所有工作。就像离婚一样，她和辉瑞分割了这些家庭的生理学标本。每一份血液样本都被一分为二，她和辉瑞各获得一份，理论上足够双方继续开展研究。但讽刺的是，谁也没有继续下去。德利西有想法却没钱，辉瑞有钱却缺乏意愿。

为什么大型制药公司都不愿意投入精力研发更好的精神分裂症药物，一种以某个关键基因为靶点，可能解决氯丙嗪类药物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药物？和这些药企打过交道的专业人士都很清楚原因。即使有弗里德曼的 $\alpha 7$ 受体这样明确的靶基因，研发和测试新药的整个过程依旧会耗资巨大，而且还需要有愿意承受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的受试者。如果在整个过程完成后有望获利，那倒没问题。但事实是，氯丙嗪类药物已经被研制出来很久，几乎每家制药公司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药物在缓解精神病发作方面效果很好，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再拨款研究其他新药。

德利西把自己与辉瑞的纠葛称作“一场灾难”^[19]。她别无选

择，只能把手上300个家庭的1 000多份血液样本——包括加尔文家的样本——保存在她的新工作地纽约大学的冷库中。2003年，纽约市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停电，德利西不得不把这些样本送到其他研究机构的同行那里保存，先是保存在冷泉港实验室，然后又转移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德利西的精神分裂症家庭样本在漂泊中没有遗失，但她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把它们拿回来。

[1] William T. Carpenter and Robert W. Buchanan, “Schizophreni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0, no. 10 (March 10, 1994): 681—90.

[2] “Where Next with Psychiatric Illness?,” *Nature* 336, no. 6195 (November 1988): 95—96.

[3] “Sequana to Participate in Multinational Effort to Uncover the Genetic Basis of Schizophrenia,” *Business Wire*, April 20, 1995.

[4] “Sequana to Participate in Multinational Effort to Uncover the Genetic Basis of Schizophrenia,” *Business Wire*, April 20, 1995.

[5] “Sequana to Participate in Multinational Effort to Uncover the Genetic Basis of Schizophrenia,” *Business Wire*, April 20, 1995.

[6] Bijal Trevedi, Michael Le Page, and Peter Aldhous, “The Genome 10 Years On,” *New Scientist*, June 19, 2010.

[7] Samuel H. Barondes, Bruce M. Alberts, Nancy C. Andreasen, Cornelia Bargmann, Francine Benes, Patricia Goldman-Rakic, Irving Gottesman, et al., “Workshop on Schizophre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4, no. 5 (March 4, 1997): 1612—14.

[8]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with Daniel Weinberger, conducted by Stephen Potkin at 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in Boca Raton, Florida, December 12, 2007.

[9] Shaun M. Purcell, Naomi R. Wray, Jennifer L. Stone, Peter M. Visscher, Michael C. O'Donovan, Patrick F. Sullivan, and Pamela Sklar, “Common Polygenic Variation Contributes to Risk of Schizophrenia and Bipolar Disorder,”

Nature 460, no. 7256(August 6, 2009): 748—52.

[10] James R. Lupski, “Schizophrenia: Incriminating Genomic Evidence,” *Nature* 455,no. 7210 (September 2008): 178—79.

[11] Stephan Ripke, Colm O’Dushlaine, Kimberly Chambert, Jennifer L. Moran, Anna K. Kähler, Susanne Akterin, Sarah E. Bergen,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 Identifies 13 New Risk Loci for Schizophrenia,” *Nature Genetics* 45, no. 10(August 25, 2013): 1150—59.

[12] Stephan Ripke, Benjamin M. Neale, Aiden Corvin, James T. R. Walters, Kai How Farh, Peter A. Holmans, Phil Lee, et al., “Biological Insights from 108 Schizophrenia-Associated Genetic Loci,” *Nature* 511, no. 7510 (July 22, 2014): 421—27.

[13] Brien Riley and Robert Williamson, “Sane Genetics for Schizophrenia,” *Nature Medicine* 6, no. 3 (March 2000): 253—55. (对这种风险评分机制的完整解释见：“Analysis of concordance in first-, second- and third-degree relatives suggests that variants at three or more separate loci are required to confer susceptibility, and that these allelic variants increase risk in a multiplicative rather than additive manner,with the total risk being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individual risks conferred by each variant.”)

[14] Jonathan Leo, “The Search for Schizophrenia Genes,”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2, no. 2 (2016): 68—71.

[15] Author’s interview with Elliot Gershon.

[16] Author’s interview with Steven Hyman.

[17] 对于某个基因来说，在不同的人或者人群中，基因的序列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有时是非常微小的差异），这些同一个基因的不同版本被称为这个基因的变异体（variant）。与其他变异体相比，一个基因的某个变异体可能对人体更有益，也可能更有害，还可能两个变异体间没有明显的差别。——译者注

[18] Kenneth Kendler, “A Joint History of the Nature of Genetic Variation and the Nature of Schizophrenia,” *Molecular Psychiatry* 20, no. 1 (February 2015): 77—83.

[19] Joan Arehart-Treichel, “Psychiatric Gene Researchers Urged to Pool Their Samples,” *Psychiatric New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November 16, 2007.

第34章

彼得在博尔德和琳赛住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往返于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和隐谷路的循环中。琳赛放弃了对他的合法监护权，这样彼得可以作为科罗拉多州的被监护人得到治疗，有必要的还可以在州立医院长期住院。医院目前对他的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伴有偶发性的妄想。十年间，彼得每次住院的时间都很长，直到他可以独立生活时才会出院。每次回到现实世界，只要按时服药，他都能撑一段时间。

2004年，彼得已经43岁了，情况也更不乐观。他更瘦了，脑子也更糊涂了。2月26日，在普韦布洛住了2个月后，医生让彼得出院了，并给他开了一种叫维思通的抗精神病药物以及双丙戊酸钠，后者是一种抗癫痫药物，也被用作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稳定剂。但彼得两种药都没吃。3天后，2月29日，他又被送进了普韦布洛，他当时坚信乔治·布什要轰炸科罗拉多泉市市中心的布罗德摩尔酒店。这是他第25次住进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

医生这次给他开了三种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每两小时服一次氯丙嗪，另外两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和再普乐一天

服两次。每天他还要服一次加巴喷丁，这是一种抗癫痫药物，有时候也用来治疗酗酒。但这些药都没什么效果。4月，医院里的两名女性病人说彼得抓住并强行亲吻了她们。6月，有人看到他故意把自己的药扔到厕所里。夏天的时候，他曾冲向一名医护人员，捶墙，还骂其他病人是“娘娘腔”“杂种”“浑蛋”。他对一名工作人员说，“别拿着你的药靠近我，贱人”，他还对另一个人说，“我要杀了你”。他会在其他病人打电话时一把抓过听筒，把电话挂断，在别人看电视时关掉电视机，还会把浴室弄得水漫金山。他还开始对周围的人布道：“我是摩西。你会下地狱。脱掉你的衣服。你们都有麻风病。你已经死了。我要打你的头。闭嘴，不然我可要揍你。”因为这些行为，他不止一次受到了当时最严厉的训诫——关禁闭和穿拘束服。到8月时，彼得使用的药物已经多达8种：齐拉西酮、利培酮、加巴喷丁、利培酮长效注射剂、再普乐、氟奋乃静、奥卡西平和氯丙嗪。但这些药也都不管用。

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在9月14日获得了法庭的相应授权，第一次对彼得进行了电休克治疗。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精神病治疗方法中，没有哪一种治疗手段像电休克疗法那样，在文化上经历过如此大的认知反转。在《飞越疯人院》中，肯·克西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麦克默菲遭受的种种野蛮对待。或许自那一刻起，这种通过用电引发痉挛来镇静大脑的方法就成了一种简洁的文化符号，成为几十年来医疗酷刑的缩影。但在彼得第一次接受电休克治疗时，这种技术已经相当精细，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甚至接近无痛的。[\[1\]](#)通过电休克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狂躁可以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一点已经有广泛的文献报道，因此彼得或许迟早都会接受这种治疗。

改进过的新型电休克疗法的出现或许就是为了推翻大众几十年来对它的成见。病人在接受电击前会使用镇静剂，肌肉松弛剂可以减轻他们的焦虑情绪，电击在病人沉睡过去后才会开始。医学界知道这种疗法会损害病人的记忆力，多次电击尤其如此。但在有些病例中，电休克疗法似乎比任何药物都能更有效地改变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水平。据说很多才华横溢的名人，包括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参议员托马斯·伊戈尔顿、音乐家塞隆尼斯·蒙克、演员凯丽·费雪和电视明星迪克·卡维特，都多少接受过电休克治疗。

但多次接受这种治疗会出现什么后果则是另一个问题。彼得会因此失去记忆、自我意识和个性吗？先不谈风险，接不接受治疗并不由彼得说了算。彼得现在是科罗拉多州的被监护人，他的医生可以代表他向法院提出申请。咪咪是不太会跟医生的决策过不去的（如果医生征询了她的意见的话）。她会说，这也许是能真正帮助彼得的唯一方法了，如果不接受电休克治疗，他的情况还会进一步差到什么程度？

在普韦布洛精神病院二楼接受电休克治疗时，彼得会换上病号服，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全身麻醉。他会戴上一个面罩，通过一台机器辅助呼吸。他还需要服用一粒含有咖啡因的药片，以帮助降低他痉挛的阈值，这样医生可以减小电击使用的电压。治疗前，他还得吃胃长宁，一种防止流口水的药。他的身体会被固定住，除了下颌外，其他部位都不能弯曲，也不能做任何动作。醒来后，彼得会感到头脑昏沉，需要摄入更多咖啡因——通过服药或者喝咖啡——才能彻底清醒过来。

彼得不喜欢这样。“我不要做那些破事，”他在2004年11月8

日说，“我的骨头都被搞坏了。我要打电话给空军学院，让他们炸了这个地方。”

10月，彼得多次被套上拘束服关禁闭，有一次一连关了40个小时。他一周接受一次电休克治疗，但总是完全不配合。他对一名医护人员说：“你是个婊子。你要是跟我和我的律师作对，你就会被炒鱿鱼。我要起诉你，要求你赔偿5万亿亿亿美元……你是巴比伦大淫妇[2]……我的胳膊昨晚断了，不过我自己把它治好了。”

一位医护人员嘱咐彼得在接受电休克治疗的前一个晚上不要饮用任何液体，但他回答说：“去你妈的，婊子。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去死吧。”同一个月，彼得踢断了一位护工的肋骨。

精神病院需要申请更多的法庭授权才能对彼得开展更多的电休克治疗，但随着治疗频率的增加，医生们注意到了彼得的變化。在连续3周，平均每周3次的电休克治疗后，电击频率在2005年1月调整到了每周2次。医生最终在5月宣布，彼得的症狀彻底消失了。“他没有表现出对他人的危险性，因此可以出院了，他和家人相处得也不错，”他的出院文件写道，“问题在于加尔文先生仍然对自己的疾病缺乏清醒的认识……加尔文先生不相信他未来病情的稳定需要电休克干预，或者说他意识不到电休克治疗会不断出现在他的人生中。”正因为如此，他的长期预后诊断书上的诊断意见是“谨慎”。

一年后，2006年6月，彼得再次被送回了普韦布洛精神病院。这一次，他宣称“我已经修复了灵魂”。他拒绝进食，认为自己的食物被人投了毒。他一直在跟耶稣说话，他说他是圣彼得，魔鬼正在抓他。

普韦布洛的工作人员申请召开了更多的听证会，向法庭申请

维持彼得电休克治疗的频率：一周一次，如果有需要可以更高。彼得不想这样，但决定权不在他，从来都不在他。正如他在一次入院面谈时——他再一次被要求复述他的病史——说的那样，“精神问题控制了我，毁掉了我的一生”。

[1] Scott O. Lilienfeld and Hal Arkowitz, “The Truth About Shock Therapy :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s a Reasonably Safe Solution for Some Severe Mental Illnesses,”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 2014.

[2] 巴比伦大淫妇是《圣经》中提到的寓言式的邪恶人物。——译者注

第35章

几周以来，吉姆·加尔文去了科罗拉多泉市彭罗斯医院的急诊室好几次，抱怨头痛和四肢刺痛。医护人员每一次都让他回家，诊断书上说他的情况只是他常有的妄想症状。

最后，吉姆认为自己的胸口上有个洞。“你看不到我被枪击了吗？”他说。

2001年3月2日，吉姆在自己位于科罗拉多泉市的公寓里子然死去，年仅53岁。医院的记录说他死于抗精神病药物引发的心力衰竭。基于这一诊断，他的家人认为他的具体死因是抗精神病药物恶性综合征。这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罕见病症，往往由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引起。有一些研究者反对滥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认为这会导致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于这种综合征。[\[1\]](#)抗精神病药物恶性综合征的某些症状——比如焦躁不安和妄想——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精神错乱引起的，另一些症状——如痉挛和震颤——在表现上也和一些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完全相同，因此这种综合征往往只能在患者死亡后才能被确诊。吉姆死亡时的症状无疑非常明显，因为医生给他开了丙环定，一种通常用于减轻帕金森病症状的药物。

玛格丽特和琳赛认为，吉姆的死传达了非常清楚的教训：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和精神分裂症本身一样危险。数数家里的另外四个哥哥——唐纳德、乔、马特、彼得，姐妹俩不由得想谁会是一个。

与此同时，咪咪继续把吉姆的精神病归因于他的人生境遇——不幸的婚姻，或许还有先被邪恶的牧师性侵，然后又性侵他人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她从没想过彻底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哪怕是吉姆，哪怕女儿揭露过他的恶行。“我认为婚姻不幸的影响和其他因素一样大，”咪咪会说，“还可能因为他自己在良心上也感到了愧疚。但家里所有孩子都很喜欢他啊。”

吉姆的前妻凯西和儿子吉米没有来参加葬礼。他们现在住在加州，在重建自己的生活，试图忘记那个折磨过他们的男人。

在吉姆去世前，有一个问题玛格丽特和琳赛一直都没有提过。多恩和咪咪很早就知道吉姆刚结婚不久精神状况就不稳定，甚至知道他住过院。为什么他们还允许两个女儿在吉姆家过夜，很多个周末都单独跟他待在一起？

2003年的一天，玛格丽特手里拿着录音机，直截了当地向咪咪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那时候一直让我去吉姆家？”

咪咪立刻回答说：“因为他已经恢复了啊。他恢复健康，回去工作了，有他老婆照顾，一切看上去都好好的。虽然他复发过几次——他一直在看一位私人诊所的医生——但最后也恢复了，半年都好好的。”

玛格丽特说话时声音已经嘶哑了，微弱得像个孩子。

“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他有病。”

“噢，老天！”咪咪说。比起震惊，她对重新提起这件事更感到恼怒。

“我一直都不知道。”玛格丽特说。

“玛格丽特，你要知道，患病的哥哥们当时也不知道啊，”咪咪说，语速加快起来，“你知道吗，他们似乎突然就好起来的。吉姆也确实好了。他回来了，可以回去工作，而且状态一直不错。只是他总是好过头了。他不仅干一份工作，还想做两份工。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差不多这样，最后又病倒了。他还酗酒。是的，他一直酗酒。”

2003年1月7日，癌症最终带走了饱受病痛折磨的多恩·加尔文。去世时多恩78岁，体重不足100磅。空军学院在小礼堂为他举办了军葬仪式，这座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是多恩生前发起建造的。学院的一只演出隼也参与了葬礼，其间一直停栖在一名空军军官的手上。

众人进入葬礼现场时，迈克尔弹起了古典吉他。男孩们以前的钢琴老师则弹奏了开场圣歌《不要害怕》。过去的天才棋手马克大声朗读了《传道书》第39章里对一位智者的描述，这段文字很贴合多恩希望自己被世人看待的形象：明智人必考究历代古人的智慧，必专务先知的预言/必保留名人的言论，必领悟比喻的妙理.....[2]

理查德读的则是《约翰福音》。做音乐老师的约翰从爱达荷州赶来，主持了信众的祷告。近60岁的唐纳德读了《圣经》“八福”中关于四种美德的部分：审慎、正义、刚毅和克己。迈克尔和琳赛都读了诗。玛格丽特念了悼词：“他的记忆力在晚年衰退

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很平凡。他的一生非同寻常。”

葬礼在《鹰之翼》的旋律中结束。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表演队原本计划在空军学院上空举行飞行表演来纪念多恩的，因为这里是给多恩带来最多快乐的地方，但糟糕的天气使表演未能进行。

多恩的遗体随后被送到了科罗拉多大学，罗伯特·弗里德曼的团队检视了他的大脑。他们惊讶地发现，多恩的大脑没有表现出任何与精神异常或者精神疾病相关的迹象。

咪咪对此并无多言，有些事她心知肚明。

秉性温和的老七乔一个人住在八区公寓里。在最后一次跟母亲交谈时，他说自己的双脚感到麻木，无法行走。当时正在下雪，这种恶劣天气下咪咪无法驾车出门。她说第二天一早去看他。但第二天已经太迟了。

2009年12月7日，约瑟夫·加尔文独自死于家中，年仅53岁。当地的验尸官报告说死因是氯氮平中毒引起的心力衰竭。这种强力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乔有所帮助，但其副作用也在缓慢地摧毁他的身体。乔的死就像是吉姆之死的重演，很可能也是抗精神病药物恶性综合征导致的。

琳赛和玛格丽特在吉姆去世时都没有感到特别难过，但乔不同。两姐妹小时候都幻想过没有哥哥该多好。但事实是，看着乔以及其他她们深爱的哥哥患上精神分裂症，就像是看着他们一个个从地球上消失一样。这种失去亲人的伤痛在乔真的消失时卷土重来，让人难以接受。

一家人一起分撒了乔的骨灰。彼得虽然衣衫褴褛、浑身烟

味，但面色红润，蓝眼睛亮亮的，一头乌发，仍有些青年人的模样。唐纳德跟大家说他要是死了，就让大象来吃掉他的遗体。迈克尔让大家在他死后撒掉自己的骨灰，只是还没想好地点。理查德倒是想好了位置：落基山脉的北风关。玛格丽特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阿斯彭的褐溪。琳赛则选了维尔镇的碗形后雪区，那里是滑雪者的天堂。

大家回忆起了和乔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唐纳德提到了看乔打冰球的日子，马克想起了乔用自己的GTO跑车跑赢了一辆达特桑240Z，彼得回忆起了自己和乔在芝加哥共同生活的短暂时光，那时乔还在为美联航搬运货物。玛格丽特说起了乔在阿拉帕霍公路附近教自己手动换挡的情景。

咪咪说起了更为久远的过去。此时的她或许不仅想到了小时候的乔，也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家中的男孩那时年纪都还小，当时的欢乐仿佛也预示着精彩的未来。她说乔还是个婴儿时，睡觉的样子非常美，就像一个天使。

[1] Whitaker, *Mad in America*, 207—8.

[2] 作者此处有误，这段文字出自《德训篇》第39章，中文译法引自简体中文版《思高圣经》。——译者注

第36章

2009年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截至2009年，斯特凡·麦克唐纳（Stefan McDonough）已经在安进公司（Amgen）工作7年了。这位神经生物学家之所以离开学术界，是因为安进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之一，在这样一家机构研发真正的药物和疾病治疗方法对他更有吸引力。在最初的几年里，麦克唐纳一直在研发新型的疼痛管理药物。在这之后，他在神经科学部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脑部疾病。安进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靶基因，希望通过改变这个靶基因来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麦克唐纳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基因，安进就能针对这个基因研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在他剑桥市的办公室里，麦克唐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研究工作中。他对基因组学的革命性前景极富热情，甚至跑去哈佛大学旁听研究生的遗传学课程。他周复一周地在下班后坐在一把只有一个扶手的老课椅里，梦想着自己找到了引发精神分裂症的关键基因。但麦克唐纳很快就备感沮丧。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科学界已经鉴定出了100多个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位点。尽管有不少人很看好这些发现，但每一个这种位点对精神分裂症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因此以任何一个这样的位点为靶点来研

制药物都显得颇为荒谬。面对这种情况，麦克唐纳开始探寻新的方法，希望缩小关键基因的搜寻范围。与其盲目地研究成千上万无关的人的基因，为什么不去研究具有共同的基因异常，同时又都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少数人群呢？

为什么没人研究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家族？

对于这样一种研究策略，麦克唐纳也意识到了其短板。他知道一个家庭中的基因突变——或者按学界现在的说法，“引发疾病的基因变异体”——有可能是这个家庭独有的，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单个家庭也许对理解精神分裂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他也明白，一个家庭的基因异常可能会揭露出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他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一个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家庭领域的专家——来给他更多的指导。每天从家去剑桥市上班的路上，麦克唐纳都会经过哈佛大学。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位教授，她很乐意和麦克唐纳谈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部成像的话题，不过患病家庭研究不是她的研究领域。

但她认识琳恩·德利西。

“我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德利西说，“我只想找到那些基因来帮助解决这种疾病。”

德利西当时刚加入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在波士顿的医疗保健系统，在精神病部上班，工作地点在布罗克顿，离麦克唐纳不远。同样是在2009年，她从纽约搬到了马萨诸塞州。除了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保健系统工作外，她同时还在哈佛医学院授课。自从2000年与辉瑞分道扬镳后，德利西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因为没有公司有兴趣捡起这些帕克-戴维斯公司收购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但现在情况有了转机。

听着麦克唐纳阐述他的想法，德利西心中百感交集。她既惊讶于一家制药公司在这么久后竟仍然对她的工作感兴趣，又没有信心从头再来。德利西的丰富资历让麦克唐纳印象深刻：她是全世界这个领域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者，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临床医师，看重与病人的直接交流，同时还是一位决意要找到一种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的遗传学家。但对麦克唐纳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他还没高中毕业时，德利西就开始收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数据了。而且德利西人很和善，不少学术研究者对制药产业的人是颇怀戒心的。

德利西邀请麦克唐纳和她一起去她所在医院的精神病科病房查房。这是麦克唐纳作为生物科技研究者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他想要治愈的疾病的患者。麦克唐纳看着德利西柔声细语地和一名病人交谈，言辞干脆而坚定。这名病人看上去非常平静，他的妄想被控制得很好，麦克唐纳后来才得知他曾犯下过不可言说的罪行。这里其他病人的病情看起来似乎都被药物控制住了，然而事实上他们都还有幻听。一名病人告诉德利西和麦克唐纳：“有声音叫我杀人。”

麦克唐纳注意到有一些病人其实是有自我意识的，但缺乏正常人对当下情景所表现出的应有的情绪。有一次，他目睹了一名病人病情剧烈发作的过程。这名病人把自己房间的门锁了起来，并对周围的护理人员大发雷霆。麦克唐纳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那里每一个病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都被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想，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型药企在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研发这个问题上那么变幻无常，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人能找到新的药物靶点：这些病人无法表达他们的需求。

德利西最终与安进公司达成了协议，和麦克唐纳一起着手新的精神分裂症研究项目。要走的官僚流程让人应接不暇。首先需要确定德利西是否真正拥有那些家庭样本的所有权，因为大部分样本都是她在纽约州立大学期间采集的，而且她也已经从那里离职。接着，安进公司需要文件证明德利西采集的每一份样本的当事人都同意基于这些样本的生物学数据被用于医学研究。在数百封电邮往来后，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终于取回了德利西保存在柯里尔研究所的一部分样本，这些保存完好的DNA样本来自大约300个家庭。

当他第一次看到德利西过去的研究内容时，麦克唐纳震惊不已。在20世纪90年代，对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德利西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所处的时代。现在，在这个有强大计算机辅助的遗传学分析的时代，这些样本像瑞普·凡·温克尔[\[1\]](#)一样被重新唤醒了。分析工作比过去更容易，更精准，更细致了。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德利西和麦克唐纳打算只以那些病情最严重的多发性患病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家庭必须至少有3人患精神分裂症，并且家中还要至少有3名没有患病的成员。他们锁定了9个家庭，其中4个是德利西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医院工作时接触到的，另外5个是她过去寻找并联系上的。加尔文家属于后者，是兄弟姐妹数量最多的家庭。

通过研究这些家庭，麦克唐纳和德利西希望看看这些家庭的患病成员是否都携带某种罕见的基因突变或基因异常。要搞清楚这些异常和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家庭成员的数量至关重要：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携带的任何基因变异体，都有可能会碰巧出现在患病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身上，但这样的基因变异体未必就是导致他们患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毕竟，父母与

每个子女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一个孩子携带的基因变异体也有50%的概率会出现在另一个孩子身上。但随着患病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如果每个成员都携带同一个基因变异体，那么这种基因突变是无害的或者与精神分裂症无关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原因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在麦克唐纳和德利西看来，任何他们能发现的罕见突变都可能为理解这种疾病提供新的信息。“即使某种突变可能只出现在一个家庭中，”德利西说，“这种突变影响到的或许仍然是所有精神分裂症病人体内异常的生物化学通路的一部分。”

在加尔文一家身上，德利西和麦克唐纳果然发现了值得注意的地方。德利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采集过一些加尔文兄弟的生物学样本，她和麦克唐纳发现这些兄弟都携带了一个相同的基因突变。^[2]这个突变位于一个叫SHANK2的基因上，会影响大脑中的一个重要过程，而这个过程似乎又与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在大脑中，SHANK2基因所编码的蛋白扮演着脑细胞通讯助手的角色，能帮助突触传递信号并协助神经元迅速反应。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的研究发现，加尔文兄弟携带的突变显著地改变了SHANK2蛋白。“我们发现突变出现在SHANK2基因一段功能已知的区域，”麦克唐纳说，“这个区域对SHANK2基因的功能非常关键。”正因为如此，这个SHANK2基因的突变指出了理解精神分裂症的新方向，一个可能普遍存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分子层面的异常。精神分裂症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出现异常导致的。“按照科学界的标准，这个发现肯定不能证明SHANK2基因突变导致了精神分裂症，”麦克唐纳说，“但它确实给出了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可能的致病机制。”

在其他疾病的研究中，科学家也发现过罕见的基因变异体。以帕金森病为例，研究者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家庭中发现过 α -

synuclein蛋白的一种突变，这一发现为药物研发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最了不起的例子要数他汀类药物的研发，这类药物降低了无数心脏病高风险人士的胆固醇水平。科学家多年来就知道高胆固醇会导致心脏疾病，但降低胆固醇水平方面的工作却毫无进展。直到后来，位于达拉斯的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两名研究者发现，在一些有早发型心血管疾病病史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携带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突变，这些突变影响到了机体从血液中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能力。虽然大多数心脏病患者都没有携带这类突变，但这并不重要。对这些突变的研究发现了降低胆固醇水平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对那些患病家庭成员有效，而且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研制出了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药物，这些药物后来被证明引发了一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革命。

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的真正奇迹，或许不是为找到某个独一无二的致病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提供了机会，而是使科学家拥有了研究清楚精神分裂症在大脑中发生机制的能力。SHANK2基因只是诸多研究发现中的一例，还有一项是罗伯特·弗里德曼的CHRNA7基因，这个基因负责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在德利西和麦克唐纳开展研究的同时，位于剑桥的博德研究所——那个隶属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主导精神分裂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机构——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引发高度关注的研究成果。这个团队在一个叫作C4A的基因上鉴定出了一个突变，这个突变似乎会导致突触的过度修剪。[\[3\]](#)这个突变在人群中出现的比例虽然比SHANK2基因上的那个突变更高，但仍然非常罕见，因而暂时还没有针对这种突变的药物。这项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在青少年时期修剪掉了一些大脑中未来需要的突触，这是对精神分裂症发生机制的另一种解释。虽然不

太清楚加尔文家的成员是否携带C4A基因的突变，但他们还是为这项研究做出了些许贡献：他们是最早把自己的DNA捐赠给数据库供博德研究所的团队分析的家庭之一。

2016年末，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的研究发表在了《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上。虽然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是SHANK2基因的这个变异体导致加尔文兄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但这个结论与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的发现至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从德利西第一次在樵夫谷加尔文家的客厅里见到这家人算起，已经过去30年了。她或许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可以回答一直困扰着这个家庭的那个问题：为什么？

伴随这个答案而来的也有惊讶。首先，基因组中有三个不同的SHANK基因（SHANK1、SHANK2、SHANK3），这些基因不仅与精神分裂症有关，也和其他一些精神疾病存在联系。在此之前，有研究者分别研究过每个SHANK基因与自闭症以及其他一些脑部疾病之间的关联。[\[4\]](#)现在，综合所有这些研究发现，科学界认为至少一部分精神疾病其实都是同一个精神疾病谱系的一部分：在携带某些SHANK基因突变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会患自闭症，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患双相情感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

这种疾病谱系的概念似乎非常符合加尔文一家的情况。例如，医生对彼得的诊断就游移在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之间，而唐纳德在患病早期也曾被诊断为躁狂症，服用过锂盐，后来医生才让他改服常见的抗精神病药物。乔的所有症状都跟吉姆不同，吉姆的症状又和马修不同，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没有人的症状和布莱恩一样。然而在这项研究中为德利西提供过样本的所有7个兄弟——其中有一些尚未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携带的都是同一个突变，而且突变所在的基因在其他精神疾病中也表现突出。

“琳恩是对的。”麦克唐纳说。对多发性精神疾病家庭的研究，最终都会落到家庭成员所携带的相同基因上。但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的，“这些家庭都有不止一人患病，他们在症状上的差异表明，相同的遗传因子会导致个体患上有着细微差别的不同疾病”。

类似加尔文家的突变这样的发现，或许早晚会引发对精神疾病的全新认知。在一些领域中，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了。2010年，当时的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精神病学家托马斯·因瑟尔呼吁研究界将精神分裂症重新定义为“一系列神经发育障碍”，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5\]](#)停止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种单一疾病或许是一个开始，将使各界慢慢不再视患有精神分裂症为耻。精神分裂症会不会不是一种疾病，而只是一种症状？

“我做一个对比，很多年前，临床医师还把‘发烧’视作一种疾病。”约翰·麦格拉斯说。麦格拉斯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精神卫生研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也是精神病患人口量化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之后他们把发烧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再然后他们意识到发烧只是一种很多疾病都会有的非特异性反应。而精神病只是大脑运转不良时人表现出的状态。”

第二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和咪咪有关。几十年来，咪咪一直坚称孩子们的病源自多恩的家族那一边。在她看来，多恩的抑郁史可以证明这一点，研究加尔文一家的专家也没有可以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我们一直在寻找从这一家的父亲身上遗传的东西。”麦克唐纳说。

然而德利西和麦克唐纳的研究发现，SHANK2基因的突变源自咪咪这一边，这表明咪咪才是导致加尔文兄弟患病的突变基因

的携带者。在另一项有关SHANK2基因和精神分裂症的关系，与麦克唐纳和德利西的研究几乎同时发表的论文中，研究者报道了另外几个未患病的母亲将突变遗传给儿子，从而导致其患病的病例。[\[6\]](#)父亲也可能是未患病的携带者，因为SHANK2基因没有性别特异性，这个基因并非位于性染色体（X染色体或Y染色体）上，而是在第11号染色体上。

为什么10个男孩中有6个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2个女孩却都没有患病？一种可能是这完全是运气——没有患病的两姐妹和另外四个兄弟可能只是命运的骰子掷得好。但也有可能像德利西和合作者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加尔文家SHANK2突变引发的问题表明，存在一种能影响精神分裂症发生的“与性别有关的未知影响因素”。但假如真的存在这种因素的话，这种因素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另外4个儿子没有患病。

或许孩子只有在同时携带咪咪的SHANK2突变和遗传自多恩的某种遗传因子时才会患病？也就是说，或许单独的SHANK2突变并不会导致患病，只有另一种突变也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会患上精神分裂症。这就是基因突变有时候导致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方式。遗传学家凯文·米切尔曾指出，某些突变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同样的突变在有些人身上会引发癫痫，在另一些人身上会引发自闭症或者精神分裂症，而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7\]](#)有时，一个人基因组上的另一种罕见突变会和第一种突变共同作用，对人体产生某些影响。

导致加尔文兄弟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因缺陷可能不仅仅是咪咪或者多恩一个人的错，而是两个人基因缺陷的共同结果。这种共同的结果就像一杯完全原创的鸡尾酒，威力之强足以改变这个家庭所有人的生活。

[1] 瑞普·凡·温克尔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次在山中喝了仙酒，睡了一觉，醒来后下山，发现世间已过去了20年。——译者注

[2] O. R. Homann, K. Misura, E. Lamas, R. W. Sandrock, P. Nelson, Stefan McDonough, and Lynn E. DeLisi,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n Multiplex Families with Psychoses Reveals Mutations in the SHANK2 and SMARCA1 Genes Segregating with Illness,” *Molecular Psychiatry* 21, no. 12 (December 2016): 1690—95.

[3] Aswin Sekar, Allison R. Bialas, Heather de Rivera, Avery Davis, Timothy R. Hammond, Nolan Kamitaki, et al., “Schizophrenia Risk from Complex Vari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4,” *Nature* 530, no. 7589 (February 2016): 177—83.

[4] Audrey Guilmatre, Guillaume Huguet, Richard Delorme, and Thomas Bourgeron, “The Emerging Role of SHANK Gene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SHANK Gene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74, no. 2 (February 2014): 113—22. 另见：Ahmed Eltokhi, Gudrun Rappold, and Rolf Sprengel, “Distinct Phenotypes of SHANK2 Mouse Models Reflect Neuropsychiatric Spectrum Disorders of Human Patients with SHANK2 Variants,” *Frontiers in Molecular Neuroscience* 11 (2018).

[5] Thomas R. Insel, “Rethinking Schizophrenia,” *Nature* 468, no. 7321 (November 11, 2010): 187—93.

[6] S. Peykov, S. Berkel, M. Schoen, K. Weiss, F. Degenhardt, J. Strohmaier, B. Weiss,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Rare SHANK2 Variants in Schizophrenia,” *Molecular Psychiatry* 20, no. 12 (December 2015): 1489—98.

[7] Kevin Mitchell, *Innate*, 233—34.

第37章

2016年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医学中心

德利西和安进公司的新搭档们在剑桥追踪SHANK2基因的同时，罗伯特·弗里德曼则继续在丹佛开展他的研究工作。和德利西一样，弗里德曼在研究早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曾感受到希望，但随后又经历了痛苦的反转：先是分离出了第一个确定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基因，体会过随之而来的那种兴奋，然后又眼看着激活这个基因所编码的受体的药物试验失败，感到心痛不已。他遇到了死胡同，现在正在寻求其他出路。他知道这个基因很重要，因此在寻找修复或者增强这个基因的新策略。

对于他十分看重的CHRNA7基因，有一个想法一直盘桓在弗里德曼的脑海里。他认为当研究者们发现一个人的CHRNA7基因存在异常时，或许已经太晚了，因此无法帮助像加尔文兄弟这样的成年患者。和很多基因一样，CHRNA7基因在胎儿还在子宫中的时候就开启了。弗里德曼倾向于将婴儿的大脑发育视为一系列电脑升级：胎儿最初搭载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系统”，随着生长发育，会“安装”更为复杂的系统。根据弗里德曼的了解，这个基因在子宫中被开启后的作用是帮助“安装”最终版的“操作系

统”，我们成年后使用的就是这个系统。这意味着在婴儿出生之前，骰子就已经被掷出了。如果一个人是否患精神分裂症取决于CHRNA7基因的情况，那么避免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他（她）出生前“修好”这个基因。

弗里德曼的目标非常明确，如果能修复子宫中的胎儿的CHRNA7基因的缺陷，就有机会将精神分裂症遏制在萌芽状态，防止疾病最终发生。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弗里德曼或许就能使有精神分裂症遗传易感性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避免患病。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最为现实的目标。然而要想以孕妇为受试者开展药物研究，需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但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直接给未出生的胎儿使用药物则几乎绝无可能。

弗里德曼需要的是一种不涉及手术也不涉及合成药物的方法。神奇的是，他发现乙酰胆碱——大脑中负责执行他希望纠正的那个信息处理过程的物质——并不是CHRNA7基因编码的蛋白[1]一开始时最需要的。在胎儿期，这个蛋白实际需要的是一种没有毒性的良性营养素，可以在美国每一家营养品商店买到。

胆碱存在于人们日常所吃的各种食物中，包括蔬菜、肉类、蛋类和禽类。通过羊水，孕妇腹中的胎儿每天都可以从母亲那里获取到胆碱。弗里德曼的想法很简单：对于那些怀的孩子有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孕妇，如果在孕期服用大剂量的胆碱会有什么效果？胆碱或许也可以被用作营养补充剂，使原本有患病风险的孩子的大脑健康发育。这有一点类似为了防止婴儿出现脊柱裂和腭裂，孕妇被建议服用含叶酸的产前维生素。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这项实验。弗里德曼在丹佛的团队开展了一项双盲研究，让一些准妈妈摄取高剂量的胆碱，同时确保

对照组的孕妇食用足够的肉类和蛋类，避免出现有人胆碱摄入量不足的情况。研究团队在婴儿出生后对他们开展了双咩测试，他们发现在子宫中得到胆碱补充剂的婴儿的听觉门控能力要优于对照组的婴儿：76%的实验组婴儿拥有正常的门控能力，而门控能力正常的对照组婴儿的占比只有43%。[\[2\]](#)在这项实验中，甚至很多携带异常CHRNA7基因的婴儿也拥有正常的听觉门控能力。随着这些婴儿慢慢长大，好消息也持续而来。弗里德曼的团队在第40个月时发现，与实验组的婴儿相比，对照组婴儿的注意力更容易不集中，而且表现出更强的社交退缩行为。胆碱似乎对所有人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弗里德曼有关胆碱的研究最终于2016年发表，[\[3\]](#)博德研究所有关C4A基因的研究以及德利西有关SHANK2基因的研究也在同年发表。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脑部发育疾病。[\[4\]](#)从弗里德曼开始研究精神分裂症算起，已经过去30年了。在研究的道路上，他至少有一次走入过死胡同。对于那些在出生前高剂量摄入胆碱的孩子，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他们的机体会受到何种影响。但通过与加尔文一家的合作，弗里德曼至少找到了一种能够扭转局面，预防精神分裂症的方法。

2015年秋，弗里德曼去纽约参加了一个由脑与行为研究基金会赞助的年度研讨会。这个组织以前叫美国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为精神疾病新疗法的研究筹集过数百万美元。弗里德曼有关胆碱的研究成果这时已经在领域内传播开，他此次来是要接受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精神分裂症研究杰出成就奖（利伯奖）。

在纽约，与弗里德曼一起庆祝的是南希·加里，她和丈夫山姆曾经资助过弗里德曼所在的科罗拉多大学精神病学系。弗里德曼的胆碱研究引发了南希的无限遐想。很多年前，她和山姆曾捐资为科罗拉多大学医院的精神疾病患儿建造了一个活动馆。如今，南希已经80多岁，山姆则已经超过90岁，他们都承诺要继续支持弗里德曼接下来的工作，追踪那些在子宫中高剂量补充了胆碱的孩子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成长。他们明白，如果胆碱真的作用非凡，那么某些类型的精神分裂症将会像腭裂一样容易治疗。“这个人太优秀了，”南希说，“无论他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他，因为他太棒了。”

南希还邀请了一个人和她一同乘私人飞机来纽约，这是一位弗里德曼好几年没见的故人。自从她和哥哥彼得一起住在博尔德后，弗里德曼就再没见过她。直到南希重新把琳赛介绍给他时，弗里德曼才想起他们之间的联系。这和电视剧《这就是生活》中的情节很像：他最慷慨的一位赞助人也一直在帮助他所研究的最大的家庭。

在博尔德生活了很多年后，琳赛和里克搬到了维尔镇，琳赛继续做着公司活动策划的生意，而里克成了一名滑雪教练。他们一起养育了两个孩子，女儿凯特和儿子杰克，现在都已经十几岁了。琳赛和南希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直到有一天她们在维尔镇的滑雪坡上偶遇，当时杰克和南希的一个孙子正好在同一个滑雪组。这次重逢让南希非常开心，她邀请琳赛和玛格丽特姐妹俩参加她在维尔镇的家庭聚会。咪咪没有参加这次重聚，她和南希·加里的交往早就已经成为往事，但琳赛和玛格丽特对重新联系上加里一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个家庭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琳赛带着女儿凯特去参加了纽约的研讨会。南希把她们安顿在皮埃尔酒店，并且大家坐在一起听弗里德曼发表获奖感

言。“那些涵盖人从出生到死亡全过程的研究有很多让人感到不幸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你和被研究者在一起变老并走向死亡。”弗里德曼的开场白引得观众哈哈大笑。“等我们完成这项研究的时候，我都要135岁了。到时候这个项目的某个年轻研究者必须来养老院找我，告诉我研究有没有按我计划的那样发展。”

会后，当弗里德曼有空聊天时，南希笑容满面地告诉他说，是她把琳赛送到霍奇基斯中学，在加尔文家最糟糕的时候带琳赛姐妹俩逃出生天的。

琳赛默默地微笑着，决定不去争辩。严格意义上说，给琳赛支付霍奇基斯中学学费的不是南希，而且她姐姐比她早离开家3年。当南希赞扬起琳赛和她做过的一切时，琳赛笑得更真心了。南希告诉弗里德曼，这是她拯救下来的那个女孩，那个躲过不幸活下来的女孩。

[1] 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 $\alpha 7$ 受体。——译者注

[2] 要记住，双咭测试是用来检测感觉门控能力的，而感觉门控能力异常只是精神分裂症诸多表现——具体有多少种目前仍然未知——中的一种，因此用双咭测试来预测精神分裂症未必会百分之百准确。基于这些原因，对照组中那57%感觉门控能力异常的人仍然有可能不会患精神分裂症。

[3] Randal G. Ross, Sharon K. Hunter, M. Camille Hoffman, Lizbeth McCarthy, Betsey M. Chambers, Amanda J. Law, Sherry Leonard, Gary O. Zerbe, and Robert Freedman, “Perinatal Phosphatidylcholine Supplement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Behavior Problems: Evidence for CHRNA7 Moder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3, no. 5 (May 2016): 509—16.

[4] Carrie Dennett: “Choline: The Essential but Forgotten Nutrient,” *Seattle Times*, November 2, 2017.

咪咪

唐纳德 彼得 约翰 玛格丽特 迈克尔 琳赛 理查德 马克 马修

第38章

嗨，加尔文家的家伙们：

来自研究前线的新消息！哈佛的研究团队希望抽取咪咪和爸爸孙辈的血液样本，但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才行。这是在继续为精神分裂症研究做贡献。

咪咪和爸爸从70年代后期就一直积极参与研究。今年秋天德利西博士会派一个采血员来。我想我们可以就此庆祝一下。

我知道大家都想找到这种悲剧性疾病的解药。相聚的时间和地点待定。

爱你们！

玛丽

琳赛给家人的电子邮件
2016年9月9日

11月的一个星期天，加尔文家的十几个人应邀来到玛格丽特在博尔德的家里。这次家庭聚会的目的是要从没有患病迹象的加

尔文家人身上采集尽可能多的DNA样本，用作研究者已有样本的对照材料。德利西的一名助手和一名采血员为此专门乘飞机赶来，采集到的样本会被采血员带回波士顿。

“这就像一个抽血派对，”玛格丽特说，“应该在万圣节的时候举行的。”

那年夏天，在有关SHANK2基因的研究结果发表前，德利西联系了加尔文一家。家里当时完全没人能想象到他们的血液样本会成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探究精神分裂症遗传学基础的基石——之后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中都包含了从加尔文一家获得的研究数据。德利西已经有几十年没和这个家庭联系了。联系或许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断掉的，当时德利西的一位同事在她初次访问加尔文一家后接过了与这个家庭联系的工作。当这名研究者打来电话时，不管接到电话的家庭成员是谁（现在已经很难查清了），他（她）都不愿意安排见面，并且让对方别再打来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时有些家庭会改变主意，有时则是因为研究者的电话来得不是时候。

当然，德利西的研究中并没有写明加尔文一家家庭成员的姓名。但她还是很热切地把有关基因突变的消息告诉了琳赛，琳赛又告诉了她姐姐和母亲。刚满90岁的咪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羞愧。多年来她都把病因归咎于多恩的家族那边，现在她无话可说，只能羞愧地笑笑。虽然母亲的猜测现在被实打实地证明错了，但琳赛和玛格丽特没有丝毫幸灾乐祸。不过她们也很兴奋，因为这项很早之前就开始的研究如今还在继续，而且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发现。这么多年来，她们第一次感觉到了希望。

研究人员未来不会告诉被抽血的人他们携带的是不是突变的SHANK2基因，DNA测序的结果也只会用于研究，并且是匿名

使用的。“在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只有数字编号，没有名字。”玛格丽特说。但当玛格丽特和琳赛看到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来时，她们还是有点惊讶——有人愿意接受自己可能携带了问题基因，也有人立刻表现得好像问题从来不存在似的。她们的哥哥迈克尔来了，但他好像不是很高兴，对他来说这有点像是在旧伤口上撒盐。咪咪的妹妹贝蒂已经年近90，她结婚后生下的孩子似乎都没什么精神问题，这对咪咪一家打击很大。贝蒂现在仍然生活在东海岸，因为路途太远所以没来，她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没来。晚辈们尤其来得参差不齐。迈克尔的孩子们来了，马克的孩子没来，理查德17岁时生的儿子甚至光听到要来的建议就非常恼火。

医务人员告诉琳赛，有人不来很常见，他们害怕这种疾病，甚至都不愿意想起。

一周后，我访问了加尔文一家。咪咪从卧室小步挪下一段楼梯。她走得很稳当，助行器边上挂着一个便携式的氧气瓶，最后在厨房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我的关节炎很严重，已经换过关节，”几个月前她曾在电话里说，“我就像电视剧《无敌女金刚》的那个女主角。”她觉得我会笑，又说：“这并不好笑，亲爱的，等你老了就知道了。我动过两次髋部手术，现在90岁了，他们可能还会让我做一次手术，可是我太老了。我真的太累了。”

咪咪眼睛里有一个血凝块，阅读对她来说变得很困难。“捧着一本好书阅读的感觉再好不过了，”那天她在厨房里说，“只是我的手现在状况太差，已经拿不住书了。”她的两只耳朵都配了助听器，得不停地摆弄，要是有很多人同时说话，还是会听得很

费劲。但她能听萨尔茨堡音乐节录音版的《唐璜》。“一个人在家时，我可以把歌剧的声音想调多大就调多大，还能听芭蕾，什么都行。”她的脑子还像从前那样清醒，还是那个倔强的自己——聪明、坚强、博览群书，经受得住各种可怕悲剧的打击，仍然很不喜欢自我反思。

姐妹俩都非常熟悉咪咪想要转移话题时的娴熟技巧，知道她可以把让人不适的谈话巧妙地引导到她在联合会时的经历上去，比如“我们那时遇到的人，那些美妙的夜晚，我几乎都可以写本书了……”。或者她会说起自己还是一名少女时对纽约的探索，又或者会谈起多恩的军旅生涯。她还把用鹰作为空军吉祥物的点子归功于自己。“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建议用鹰作吉祥物的人，”她说，“这些都是假话。”

姐妹俩小心地想把她引到更有意义的话题上，尽管这会让咪咪不太舒服。咪咪没有主动挑起话题，但她回答了几个关于南希·加里的的问题，说起以前她、多恩、南希和山姆交往的岁月。“我们当时关系挺近的。”她说。但她没有和南希发展出单独的亲密友情。“据我了解，南希从来不是能发展成闺中密友的那种人。”咪咪冷冷地说。

“那我那时为什么要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呢？”玛格丽特问。

咪咪转向女儿说：“噢，因为我们当时有4个孩子同时在医院。”

“我知道，我知道故事的这部分，”玛格丽特说，“但如果你们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会收留我呢？”

咪咪摆摆手，随口打发掉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哦，她知道布莱恩死了，就打电话过来了。”

咪咪越觉得左右为难，就越会固守自己的完美主义。“我不再画画了，”咪咪看了看玛格丽特说，“主要是因为我的女儿们长大了。”玛格丽特后来拾起了画笔，跟自己长大了一些的女儿们一起画，而且画得很不错。和母亲过去的油画一样，她也以自然为主题，但更为大胆，更有创意，甚至还卖出去了几幅。

咪咪转过身，看着琳赛。“她总有事情做，会办很大而且很漂亮的派对。但她没签下那份合同！”她轻声笑了起来，又说：“为了和那家石油公司签这份合同，她花了很大一笔钱办了一个派对。”

琳赛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意。她尽可能地提起自己最近承办的几个活动，甲方分别是一家投资公司和一家医疗保健公司。

“她已经入行20年了，现在手里有非常多的客户，”咪咪说，“她曾经说：‘妈妈，我做这个的时间不会长，这不是什么费脑子的工作。’但收入挺高的。她本来应该去读研究生的！”

咪咪转向琳赛。“你明年打算退休吗？”

“希望吧。”琳赛说。

“希望吧，”咪咪重复说，“然后她要开一家书店，这样她就能读书了！”她凝视着两个女儿。

“我们俩，我们三个人，都喜欢读书，”她说，骄傲地露出笑容，“我们都是书虫。”

儿子们现在都没有和咪咪住在一起。三年前，咪咪因为中风歇了几个月。她的身体在这之后太虚弱了，没法再在家照顾唐纳

德，因此唐纳德搬到了松尖园护理院。为此咪咪很难过。她喜欢有唐纳德的陪伴。但咪咪还是会见到他们，还是会对生病的儿子们厉声斥责，尤其是彼得和马特，他们的卫生状况让她咋舌。把裤子拉链拉起来！你的皮带呢？去冲个澡。

对于咪咪的这种态度，玛格丽特和琳赛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但他们系上领带，穿上运动外套就会好一些了吗？这些不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吗？“她没法跟我们袒露她对任何重要事情的真正想法，”玛格丽特用母亲听不清的音量说，“但对米饭的做法却能侃侃而谈。”

坐在厨房桌边的姐妹俩都笑了起来。

“妈，”琳赛逗她说，“如果你多对我们表示一点肯定，家里就不会有人得精神分裂症了。”

咪咪立马回她说：“我的问题，就是对你们肯定得太多了。”

慢慢地，在女儿们的引导下，咪咪说起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她的真实感受。

她记得吉姆在16岁时曾举着一个大罐子威胁她，也记得唐纳德在自己的药被放错地方后想要掐死她。“这把我吓坏了，”她说，“要不是还有三四个其他男孩在，我估计我已经死了，因为他当时真的掐住了我的脖子。”

吉姆和乔都死于本该有益于他们的药物，对此咪咪并不懊悔。“这两个孩子经常去医院，抱怨自己胸痛，但没人理他们，”她说，“因为他们有精神病，而且心脏也都有问题。”

她回忆起在知道弗洛登斯坦神父的所作所为后自己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咪咪说她和多恩从来没怀疑过，因为谁会怀疑这种

事呢？“唉，我们完全不是那种警觉的父母，一天天就这么没心没肺地过。”

她谈到了多恩脆弱的精神状态，认为这跟他的战争经历有关。“他亲历过很多战斗，但从不说这些事。我觉得他只愿意把这些经历留在心底。”战争结束10年后，多恩在被派驻加拿大期间曾经住过院。“空军部很惊慌，因为多恩是情报官员，他们想让他赶紧出院。于是他被转到了沃尔特·里德医院。没发现他有什么病。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

当谈到自己因为儿子的精神病而受到的指责时，咪咪坐直了身子：“我和多恩都跟医生探讨过孩子们的病情，但其他人却把我们钉上了耻辱柱。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差的父母。这让我们感到糟透了，重重地伤害了我们。我和多恩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你会觉得无能为力，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人可以倾诉。我们过去是个体面的家庭，人人都把我们当楷模。发生了这种事，我们感到非常羞耻。”

咪咪现在终于卸下了重担，能坦然谈论这种耻辱感。“噢，这就是事情的全部，非常让人难堪。其他人对我的指责让我很受伤，我甚至觉得自己无法跟朋友谈起这件事，只能搁在心里，这很难。那时候我对教会的依赖多少帮助了我，我把教会视作我命中注定的信仰。”

“我很受打击，”咪咪说，“因为我认为我是个好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烤个蛋糕，做个馅饼，或者至少会做个淡奶油果冻。”

玛格丽特心里会不断涌起对母亲的同情，同时又无法挥去对她的责怪：为什么母亲无视其他事情——包括自己所期望的那种

亲密的母女关系——把生命中的一切都花在了唐纳德和其他患病的儿子身上？“我永远得不到我的母亲，”玛格丽特说，“就因为唐纳德。”她幽幽地看着母亲，觉得她是在自食其果。“她总是这样我行我素，”玛格丽特说，“这严重影响到了她和我们这些没患病的孩子的关系。她最后是输了，她把那些本可以对她好的人都拒于千里之外。”

在玛格丽特眼中，被咪咪拒于千里之外的人还包括她的父亲。“我不知道，我不是在为他的婚外情开脱，但我觉得他们双方都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玛格丽特现在能想通很多年轻时不能理解的事了。这么多的一大家子，情况不失控、一点事情不出才叫奇迹呢。

“首先，我觉得生12个孩子就是欠考虑的，”玛格丽特说，“而且他们还期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为最佳美国人。”

玛格丽特和怀利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十来岁的女儿，艾丽和萨莉，但童年时可怕的记忆仍在她脑中挥之不去。玛格丽特永远不会忘记儿时唐纳德和其他哥哥给她造成的那种不安全感，因此她不会独自去看唐纳德，也不想唐纳德靠近她的孩子。现在的她结了婚，有了家庭，生活安逸，拥有了很多哥哥没能拥有的幸福生活，但这又会使她感到愧疚。哪怕是在露露柠檬（Lululemon）服装店给女儿们买价格不菲的打底裤，也会让她陷入一阵惶恐的自我评判中。她几个生病的哥哥从来没有机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过去，当他们一点点变疯的时候，我在乡村俱乐部游泳，玛格丽特在日记中写道，现在，他们仍然是疯的，我还在同一家乡村俱乐部游泳。

于是玛格丽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她远远地伸出援手，寄去钱和礼品卡，在电话里给妹妹打气，一边听一边表达同情。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太脆弱了，无法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这就好像往一个没有底的玻璃杯里倒水，你是永远没法把杯子装满的。任何帮助他们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不是他们不想变好，而是没办法变好。我没法像琳赛那样，只能老老实实待远点。”她几乎不再去医院探望患病的哥哥们，少数几次去也没有带上自己的孩子。

“我在摆脱家庭创伤的自我治愈之路上非常孤独。”玛格丽特说。

琳赛很庆幸有个姐姐可以倾诉，因为“这让你知道还有其他人懂得你在说什么，并且理解你所承受的那种深刻痛苦”，但玛格丽特与全家的疏离如今更像一种离弃。琳赛决定做的事情跟姐姐正相反，她继续关心着哥哥们，去看望母亲，做该做的事。让母亲和哥哥们头疼的那些跑机关部门的差事都是琳赛去办的，包括争取社保福利、采买住在精神病院等机构时最适合的生活用品、代为管理他们的医保、所吃的药效果不佳时跟医生申请换药，等等。哥哥们和咪咪的代理责任她也都接管了过来。在扛起照护整个家庭的重担时，琳赛觉得儿时崇拜的母亲好像附身到了自己的身上。这种孜孜不倦的奉献热情让两位医生——德利西和弗里德曼——在第一次拜访时就印象深刻。

“我的父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琳赛说，“我父亲真的垮了，我母亲也完全变了个人，要照护全家。”

琳赛知道自己的行为跟姐姐完全相反。玛格丽特选择躲避，而琳赛觉得不能对明显应该做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会竭尽全力，不求别人帮助，”琳赛说，“要是求别人，我会厌恶我自己的。”

2017年年初，咪咪又中风了，琳赛照例是第一个赶回来的。咪咪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后，迈克尔和马克也过来跟琳赛换班看护母亲。连马特也来了。

3月，咪咪回到家接受临终医疗关怀。她躺在床上，但没有连接任何监测设备。除非请人全天候看护病人，否则临终医疗关怀其实算不上真正的照顾，只是家属自己给病人注射吗啡等药物，并根据照护指南满足病人的需求。就咪咪而言，这意味着她的家人需要处理失禁和导管之类的事情。

咪咪回家后，玛格丽特也加入到了照顾母亲的队伍中。她握着咪咪的手，给她做轻柔的按摩。迈克尔在一旁用吉他弹奏着巴西风情的旋律。琳赛忙着整理屋子。兄妹三人会聊起那些老电影，享受着彼此相伴的时光。这样过了10天后，咪咪突然又开始进食了。

“我以为我快死了，”她说，“所以我才一直不吃东西。”

然后她要了一只嫩嫩的水煮蛋。

玛格丽特的大女儿艾丽计划去一次西海岸，参观各所大学。在听取了琳赛的意见后，玛格丽特决定为了艾丽，她应该一起去。

但就在玛格丽特出发那天，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让琳赛措手不及。

先是哥哥马特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回来了。他过去教过琳赛踢足球，现在仍然在服用氯氮平，住在政府补助住房里。

然后迈克尔开车把彼得也接来了。他曾经在博尔德和琳赛住过一段时间，现在是普韦布洛精神病医院的住院病人，在接受常规的电休克治疗。

接着是唐纳德，咪咪的保姆黛比从看护中心把他接回来了。他是孩子中年纪最大的负担，琳赛小时候曾经幻想过把他绑在木桩上烧死。

三个生病的哥哥都回到了家。很快就会只剩下他们仨，他们的母亲以及琳赛了。

玛格丽特马上就要出门了。

琳赛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事，哥哥们只是过来看看。但这不重要，刹那间，琳赛仿佛变回了10岁的自己，又成了那个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小女孩。她竭力控制自己，但那种感觉就像肌肉记忆一样迅速袭遍她的全身：曾经的一切又回来了。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玛格丽特会过来待上一两个小时，但坚决不会多待。4月，她按计划跟朋友结伴去卡波圣卢卡斯度假，又从那里前往科罗拉多州的王冠峰，在那里与怀利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段假期。

琳赛对姐姐感到非常愤怒。只要家里有谁没来看咪咪，都会让琳赛窝一肚子火。马克住在丹佛，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是被什么绊住了，不能驾车回来待一天？理查德也是，过去对咪咪很关心的，现在跑哪儿去了？甚至琳赛崇拜的约翰，都选择不回来看望咪咪了。他说他宁愿用记忆中咪咪的样子来想念她，而不

是咪咪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觉得我事事亲力亲为很奇怪，”琳赛说，“我觉得他们什么都不做才奇怪呢。”

唯一例外的是哥哥迈克尔。2003年，这个曾经的大农场嬉皮士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贝琪。贝琪是附近曼尼托泉市市议会的议员。迈克尔仍然留着马尾辫，一边帮贝琪经营她的园艺生意，一边还会接活在当地的餐馆演出。迈克尔如今过着完全健康、务实的生活，没再发过精神病，不再有妄想，已经告别了精神分裂症。迈克尔对生病兄弟的照顾让琳赛更爱他了。“迈克尔认为传统的精神病治疗毁了他们，这是真的。我是说，这一点毫无疑问。”她说。琳赛认为，只消看看哥哥们的状态——体重超标、震颤、旧习难改、自顾不暇——你就会发现自从他们第一次发作精神病以来，他们就从来没有朝治愈的方向前进过一步。

琳赛后来尝试过其他一切办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她说，“我只能说，‘好吧，迈克尔，如果你愿意把他们带回你家，不再吃药，当然可以，就这么做吧’。”

迈克尔在临终关怀方面有些经验。多年来，他照顾过博尔德的一个男病人，甚至他岳父，还有父亲多恩，也都是他照顾到最后的。琳赛叫迈克尔过来照顾咪咪，和保姆黛比以及一位叫杰夫·切尼的世交分摊工作。三人都由咪咪的账户支付薪水，账户里的钱来自多恩的军人退伍金以及琳赛负责照管的存款。

这笔钱迈克尔用得上，但真正令他难以拒绝的原因是，要照顾的这个人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但迈克尔很快就发现，无论咪咪多么虚弱，掌控一切的仍然是她。比如，迈克尔知道她爱吃肯德基的食物，因此告诉她晚上会带肯德基的炸鸡给她当晚餐，但咪咪会拒绝，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吃过了，而如果迈克尔改煮意大

利面，咪咪又会说面煮太多了。

“真让人不懂，”迈克尔说，“我气得差点就把面倒在她头上。”

咪咪

唐纳德 彼得 约翰 玛格丽特 迈克尔 琳赛 理查德 马克 马修

第39章

“我必须——非常慢。”咪咪一字一顿地说，她的话有点含糊，但笑容不减。“我有，我有闹部——脑部——问题。所以我的脑子很乱。你得说清楚点儿，声音大点儿。”

从咪咪嘴里说出的话，有一半都不是她本来想说的。整整一分钟，她都在反反复复地说着“奥地利”这个词，而实际上她想说的是“印度”。“她说的大部分话都像没关闸流出的水一样。”加尔文家的老朋友杰夫·切尼说。他是过来照顾咪咪的。但咪咪仍不放弃解释，而且还会一边说一边咯咯笑。

“玛格丽特在这儿。她那样——你知道的。我的嘴巴在那里——也许也要走了——我们等着看——但因为我——你知道——我的最初是因为变老，变得特别老而8美元。”

咪咪无力地嗤嗤笑着，有点恼火。“太糟糕了。但我会努力试的。我有时会练习说男孩，学校，但今天只练习说男孩或者书！”

她又笑了起来。“所以我在一点点努力。真糟糕。情况不太好。我想，到现在，我已经完了。”她笑的声音更大了，然后说

了句比较清楚的话。“那个，就像玛丽说的，‘妈妈，你现在只是说话时需要多花点时间而已！’。”

咪咪身边的人已经学会解码她在失语症的混乱中试图表达的意思。他们在地下室放了一张医院的病床，让护理她的人方便起居。每天都会有新情况，膀胱感染、胃不舒服、恶心想吐，接连不断的病痛只能靠吗啡来缓解。但咪咪还能看电视，无论是电影、有线新闻，还是她最爱的《雷切尔·玛多秀》。虽然她早已习惯了孤独，但现在还是感到无助，一个人待着，想到需要做的杂事，就会感到不安，直抹眼泪。大部分事情都是她臆想出来的，但那些想法就像从已经满了的污水处理池漫出的污水一样，不断冒出来。咪咪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妄想。

琳赛在咪咪身边待得越久，就越能理解母亲，或者认为自己是理解的。当需要把一个复杂的想法告诉咪咪时，琳赛有时会把想法写在便条上。当咪咪不断拒绝食物，要求吃别的东西时，琳赛会在给她的纸条上写说，她认为这都是母亲想在人生尽头试图操控一切的最后努力。咪咪同意这一点，但她还是会固执己见。

因为失语症，咪咪不再像过去那样能控制谈话。“这是我儿子。”咪咪会介绍唐纳德说。她的长子最后决定来看她，还带来了鲜花，咪咪显然非常喜欢。“他不是经常来看我。”咪咪说。“我们今天探了天，但过去不在家的人现在也回来得多了。一个疯子，你知道的。”她笑起来。

唐纳德穿着平常的工装短裤，牛津衬衫没有扎到裤腰里。他坐在母亲病床的尾端。他对咪咪的病情没有什么反应，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唐纳德现在大部分时候都很安静，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但琳赛注意到，自从他住进护理院，他的步态就更轻盈了，笑容也多起来。“我感觉过去母亲让他在家与世隔绝真的对

他不好。”琳赛说。咪咪的保姆黛比还兼职陪护唐纳德，每隔几天会去接他，载他去外面转转，或者去林地公园散散步，更多时候的计划是让他来看望咪咪，但唐纳德往往最终又决定不来。“她太爱指使人了。”唐纳德对黛比说。

但今天，他来了。由于咪咪无法打岔，唐纳德可以尽情谈话，不会被打断。他还准确记得家里所有人的名字，甚至记得弟弟妹妹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的名字，以及他们居住的城市。这些年来他似乎一直都很关注身边的情况。但没过多久，他就分心进入了幻想中，仿佛开车拐下公路，驶入了无人之境。

“我承包了学院的驯鹰系统，”他说，“吉祥物，是我想出来的。我也是那方面的建筑师。我设计了学员教堂。我们的圣母建造了它，但她为了感谢我所做的一切，使用了我的设计。”

唐纳德说多恩和咪咪不是他的亲生父母，说他实际上比出生证上的出生日期早出生5年，并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爱尔兰，出生在另一个也姓加尔文的家庭。“我父母用了加尔文这个姓，但他们的祖上并不姓加尔文。”唐纳德说。他还说，他是在他的亲生父母去世后才来到现在这个家庭生活的。

唐纳德把咪咪称作自己的妻子，把已故的父亲称为“她的丈夫”。唐纳德还说，养育他的多恩·加尔文是“一个圣人”，一个在神经外科领域训练自己的“神经外科医生”，但自己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成了一名生物学家，同时还是通晓各个医学领域的科学家。我能从事9万种行业，但我只做过6 006种。”

他说他最爱的是“驯鹰”。

在他所有的故事中，唐纳德似乎特别沉迷于做家中老大的角

色——因为他患病前确实如此，而如今只能在疯狂的白日梦中幻想一下。在他的幻想中，自己不仅掌控着一切，而且具有超出人类的生育能力。他说自己是家里所有人的父亲，那几个他不喜欢的人除外，比如彼得，被他叫作“抱养来的孩子”，马特也是。他说弟弟妹妹们虽然是他的后代，但都不是通过性行为诞生的。唐纳德说他是通过“美式皱眉”授精并创造出——他用的词是“繁殖”——这些孩子们的，他只要用正确的方式盯着某个人，就能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到她们身上去。

“盯着人的时候要想着自己的睾丸，脑中死死地想着，然后像这样转动眼睛。”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快速眨了一下。“这就是皱眉，美式皱眉。这样可以把迪克·特雷西^[1]种子传入一个女人体内。种子会进入她的眼睛里，并在数学化以后沉入子宫中。种子通过数学的方式渗透进去，充满整个身体。孩子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被问起时，唐纳德简单地说了几句有关那个性侵过他的牧师的事情。“他很邪恶，他是被人雇来伤害我的。”他说。唐纳德说他不知道这个牧师有没有伤害过其他人，还说他只被性侵过一次。他现在对此非常坦然。“我受到过创伤，结痂了，恢复了。是自然的恢复。”

他提起了自己必须服用的药物，一说就没完没了。“这些药物对我帮助很大。”他说。“这个药是治疗葡萄球菌感染的，因为我住在人多的地方。氟哌啶醇解决的是跟大家一起住在走廊里的问题。我是个药剂师。作为建筑师，我在美国建了9 000座新药房。这就是我必须当药剂师的原因，我要吃药。中国政府愿意给我机会试试，我们要征服世界，给所有人开药房。所以我爱中国。我是神经生理学药剂师。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在自己的科学领域做的就是这个。”

唐纳德微笑着。咪咪也恹恹地笑了。

“是啊，”唐纳德说，“生活要向前，不是吗？”

2017年7月13日，琳赛来到科罗拉多泉市帮马特。几周前，马特的破旧卡车因为事故彻底报废了，现在他需要搭车去看病。琳赛先载他去抽了血，接着在药房开了氯氮平，然后去诊所拿了处方药所需的票据，又回到药房取药。琳赛之后还跑了几趟，为两位残疾朋友送东西，他们在马特有卡车时都仰仗他的帮助。

把马特送到他的公寓后，琳赛去隐谷路看了母亲。咪咪现在都不下床了。这天，咪咪的头疼得厉害。看护她的杰夫给她吃了扑热息痛和一种叫劳拉西洋的镇静剂，但情况变得更糟了。

琳赛隐隐有一种预感。上一次也一模一样，也是从剧烈的疼痛开始的。

“她中风了。”琳赛说。

母亲不愿意琳赛离开她的床边。每次琳赛想到楼上去休息一会儿时，咪咪都会用含糊不清的声音竭力叫喊：“玛丽？玛丽去哪儿了？”

通过电话，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人让琳赛给咪咪注射更多吗啡，每小时10毫克。四五个小时后，咪咪的疼痛终于退去了。下午大约4点时，咪咪出现了剧烈的痉挛。她抓着琳赛，不由自主地颤抖，吃力地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她已经失去意识了。

琳赛、杰夫和迈克尔轮流去睡觉，换人坐在咪咪身边，按时

给她注射吗啡并喂她口服氟哌啶醇。如果他们不按时给咪咪使用药物，咪咪就会极度躁动，浑身不舒服。有了药物的作用，她的呼吸声虽然仍然很大，但节奏均匀。通过一个婴儿监视器，他们能听到咪咪的呼吸声就像风箱拉动的声音一样在屋子里回荡。咪咪的呼吸偶尔会暂停几秒钟，每一次他们都以为她走了，不过她的呼吸之后又会恢复过来。

3天过去了。周日那天，琳赛驾车去普韦布洛把彼得接了回来。彼得给咪咪带了一大束粉色玫瑰，还为她念了《玫瑰经》。琳赛还从松尖园护理院把唐纳德接来了，也把马特从他在科罗拉多泉市的家里接来了，让他们俩回来道别。马克来了，理查德和蕾妮也来了，蕾妮为大家做了饭。约翰在爱达荷州，计划一周后赶来。玛格丽特从王冠峰打来了电话，说她早已和母亲和解，不用驾3个小时的车赶来再看她一眼。

7月17日，周一，早上的时候，琳赛给咪咪喂了一剂止痛药，然后回楼上睡觉。下午2点，迈克尔从监视器里听到咪咪的呼吸声发生了变化，便过去查看。他站在母亲旁边，看着她深深地吸气呼气，大约有10次。

之后，便沉寂了。

迈克尔叫醒了琳赛，他们之后都没再睡觉。琳赛哭了起来，兄妹俩就这样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点燃蜡烛和香，坐在后院的平台上，听着雨声。那声音有一种宽慰人心的力量。

雨仍下个不停。琳赛打开屋子的前门。天空一片阴沉，但还有些阳光，使雨云泛出微蓝的光。琳赛走到前院里，在那里站了好久。她伸出胳膊，凝视着天空，雨打在她的身上。

琳赛向迈克尔打手势，让他也过去，迈克尔因此加入了她。他们一起在雨中笑着，任由雨将他们淋湿。琳赛晕晕乎乎地叫迈克尔和她一起跳舞，却发现哥哥连基本的方形步都不会。“我是音乐家，我都是坐在舞台上的！”迈克尔说。

琳赛笑了起来。当迈克尔抓起妹妹的手时，他突然僵住了。他感受到了一种很久以前经历过的感觉：这只手很像记忆中母亲的手。

[1] 迪克·特雷西是美国著名漫画《至尊神探》的男主角。——译者注

第40章

母亲葬礼的前一天，7月烈日炎炎。在河畔疗养院——离普韦布洛精神病院只有几个街区远——彼得的房间里，廉价的录音机大声放着经典的摇滚乐，房间里的大屏幕电视也开到了最大声，但彼得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

“太好了，”彼得看着周围说，“我有《圣经》，什么都有。”而琳赛，就站在他的身边。

他打开一本相册，里面都是加尔文家的照片。彼得指着一张张脸，念着他们的名字。

“多恩、吉姆、约翰、布莱恩、罗伯特、理查德、约瑟夫，这是我，彼得，玛丽坐在椅子上。”他说，用颤抖的食指对着相片指指点点。“他们都很棒。这是我爸爸，他那时是空军中校。他会在空军的橄榄球赛事开场前放鹰，雷鸟飞行表演队则会在半场休息时做飞行表演……多恩、吉姆、约翰、布莱恩、罗伯特、理查德、约瑟夫、马克、马特，这个是我，彼得。玛格丽特、玛丽，”他笑了，“这是我的小妹妹。她非常棒。”

“彼得，你能带上《圣经》吗？”琳赛说。

“可以，可以。我想我应该带着，而且不仅应该带着，还应

该配合《圣经》。我爱你！”

“杰夫明天早上会来接你，”琳赛说，“我们今天只是一起去吃午饭。”

“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琳赛笑了：“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原定的计划。

彼得现在不只是瘦，简直是皮包骨头，裤子得用腰带系紧才不会掉下来。他笑着从房间里走出来见妹妹。他穿着鼠灰色的滑雪夹克，里面是冰球套衫和法兰绒格子浴袍。他还戴着一顶棒球帽，脚上是厚重的工靴，手上是冬季戴的手套。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脸上胡子拉碴。他还是那么爱玩笑，电击导致的疲惫对他的情绪影响并不太大。琳赛来访的这天恰好是周二，彼得刚从医院做完一周一次的电休克治疗回来。

在没有长篇大论地阐述他的医生为撒旦工作的时候，医生们发现彼得还是挺有魅力，甚至很贴心的。“我格外关注他，他是唯一一个我会带着出去散步的病人。”彼得的一位医生马特·古德温说。在普韦布洛长期住院期间，彼得一直都由古德温负责治疗，古德温也常给彼得做电休克治疗。“我经常带他出去吃午饭。”在病房里，彼得常用自己的录音机给病友和医生们播放《昨天》《由它去》《漫漫崎岖路》等歌曲。每年圣诞节，他会拿出全家人在空军学院楼梯上拍的那张照片，指给大伙儿看谁是谁，滔滔不绝地聊着和父亲一起放鹰的往事。

2015年，古德温向决定彼得照管权的法院提出申请，试图让普韦布洛所在的埃尔帕索郡在当地的辅助生活机构为彼得开放一个入住机会。古德温的理由是，只要彼得按时去接受电休克治疗，就不需要住在普韦布洛精神病院里。一个月后，12月17日，彼得搬到了河畔疗养院，这里住的主要是阿尔茨海默病和痴

呆症患者。彼得是目前最年轻的入住者，他的诊断书上的诊断是I型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病，需要服用的药物包括心境稳定剂双丙戊酸钠、抗精神病药物再普乐，以及一种经常用来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抗抑郁药物鲁拉西酮。

在河畔疗养院，彼得想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他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抽烟，否则就会烦躁不安。“每天的生活太单调了，”河畔疗养院的一位管理人员说，“这能让他有点活动调剂调剂。”彼得从来不会动手打人或者挑事，但有时候会大声说话和固执己见。（“你说过你要带烟给我的！”）他经常在街对面的一个长期护理院播放他的录音机，那里的病人都会为他鼓掌，要他多放点歌。如果病人愿意，彼得每天都会去。

出去吃午饭前，琳赛好说歹说让彼得把浴袍脱了。此时正值盛夏。治疗耗尽了彼得的精力，他从前一晚开始就没吃过东西，跟琳赛一起出去却让他非常活跃。“我想喝一杯38盎司[1]的大可乐，”他说，“我还想要一杯咖啡。我喜欢咖啡.....我用香波洗了头发，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了，穿了袜子、新鞋和新内衣.....嘿，我们能不能停一下，买包烟？我想停一下，用5块钱买包烟。”

他对电休克治疗怎么想？

彼得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们会把我弄晕，用氧气把我冷晕。”

之后他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完全配合，他们说什么就照做。”

出去时，彼得在大厅停了下来，拿出他的录音机，放了一首他最爱的圣诞歌曲——《天使歌唱在高天》，然后动作僵硬地走

出门。

“我想要吃汉堡！”他坐在琳赛的SUV后座上说。他从钱包里掏出钱。“钱我都有。25块钱，放这儿。”

“没关系，我有钱。”琳赛说。

“好，我完全配合。”

“那，明天会有一大群人哦，彼得。”琳赛说。

“是啊，会有一大群人。”

“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可以穿？”

“有。”

“咪咪的孙辈和曾孙辈都会来。”

“我要抽烟！真希望我带了烟啊。”

“吃完午饭我们可以去买点烟。”

他们在普韦布洛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门前停了车。彼得点了一大杯可乐，还有汉堡、薯条、番茄酱，并且立刻就拆开了薯条。酒吧里有些河畔疗养院的员工注意到了彼得，走过来打招呼，笑着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

“他们是谁？”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后，琳赛问。

“我不知道。”彼得说。

“他们是医院的人吗？”

彼得没有回答。

“你今天感觉还好吗？”

“不好。我烦透了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想买包烟，然后再

配合。我要自己买，然后就会完全配合你，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你别抽我的烟。我要自己抽.....我吃不了这个有芝士的番茄酱。我的胃有点儿闹腾，这个番茄酱让我觉得不舒服.....我会完全配合。我想配合，为你做我能做的任何事都行。”

午饭后，琳赛把车停在一家商店前，让彼得自己去买烟，这样自己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他的病情。“弗里德曼医生向我解释过，”琳赛说，“在过度用药很多年之后，他们现在只能对彼得开展电休克治疗了，因为药物已经对他不管用了。”这是一个她所有患病的哥哥都面临的问题。但如果不按时服药，情况又会变得更糟，发病会更频繁，并且越来越难于控制。面临这种矛盾，挚爱的家人就像痛苦地受困于“第22条军规”中一样：不服药会让他们病得更重，因此他们需要服药，但服药有的时候又会让他们的病情变得比不服药时更严重。琳赛知道，服药后病情加重的情况不同于不服药导致的情况，但前者导致的仍然是一种病态。

“弗里德曼医生说药物最终都会不再有效，”琳赛说，“而且电休克治疗确实会导致大部分记忆丧失，会造成思维混乱，让人无法回答问题。还让他不停念叨‘我完全配合’这种口头禅。”

这个口头禅的意思非常明确，因此对彼得一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琳赛说，多年来父母和医生都说彼得不配合，或许这一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彼得跳回车里，笑着说：“天啊，买个东西真快。我买了一整包烟。我能在车里点一根吗？”

“不可以！”琳赛笑呵呵地说。

“好吧，”彼得回答说，然后咕哝起来，“我完全配合。”没过

多久，他的情绪又好了起来。“我有一整包万宝路。你们都太棒了。”

琳赛那天的下一站是马特家。他住在科罗拉多泉市的城堡公寓，屋子很小，也没什么装饰，租金靠的是八区公寓的住房补贴。马特从不在意个人卫生，但却像个爱整洁的囤积者一样，把堆成山的东西码得很规整。“我打赌他买了不少黑胶唱片。”琳赛一边说一边把车开进停车位。

马特最宝贝的收藏是他那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有DVD，也有录像带。在跟家里人通电话时，马特那头大多数时候都响着电影《荒野大镖客》或者《黄金三镖客》里的声音。“我跟他讲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共和党人，”琳赛笑着说，“他听到后非常失望。”不过他还是会看伊斯特伍德演的所有电影。

在去他家探望他或者和他通电话时，马特的状态从来都无法预测。有时他会因为被人贴上“精神病”的标签而大发雷霆。无论是母亲让他进行药物治疗，他说起科罗拉多州政府因为建造那些路和桥而欠了他几百万美元，还是精神健康这个行业如何毁掉了他的父亲以及哥哥吉姆和乔，都会让他生气。“他们不如杀了我！”他会埋怨说，还会说他活得没什么奔头了。但这天，在母亲葬礼的前一天，马特心情还行，没有出现妄想，只是跟往常一样有点沉闷，有点爱拌嘴。琳赛来的时候，他还在看电影《吊人索》。他穿着牛仔裤和骑行背心，高高壮壮，长头发和胡须显得潇洒不羁，深深的眼睛跟唐纳德一样。每次见到马特，琳赛的孩子都会说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里的鲁伯·海格，就连他的声音也像海格一样含混低沉。

“哎呀，我的肩膀疼得不行。”马特一边坐进SUV的后座一边

说。

“还好，你已经跟医生预约了！”琳赛赞许地说。马特从来都不喜欢看医生，琳赛这些年一直让他去修整牙齿，但他觉得牙医会在他脑袋里植入什么东西。

“我8月10号有个预约，在帕克维尤医学中心。”马特说，然后开始大谈其他老旧话题，说要把卡车出事的事情处理好，这事在咪咪去世前一直由琳赛在帮着处理。事故发生时马特其实正在做好事。当时他开车送他的朋友布罗迪——一位下半身瘫痪的越战退伍老兵——去丹佛，为他的导尿管买新的尿袋。那天是周五，他们回程时遇上了晚间的车流高峰期。马特突然看见中间车道上停着一辆车，赶紧踩了急刹车。他没撞到那辆车，但后面两辆车连环撞上了他的车。

“拖车场给我发了通知，说我需要付850美元？”

“我知道。”琳赛说。她跟警察、法院和保险公司在电话里沟通了很长时间，还寄去了马特签名的律师文件复印件，证明她可以全权代理马特的案子。“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或者有任何事情，又或者需要写任何材料，都交给我。”

“我想把事情解决掉。”

“我们会解决的，只是要花点时间，马特。法院甚至都还没给这个案子编号呢。”

琳赛试图把话题引到第二天的葬礼上，但马特一个字也没说。在附近的地铁站吃完一个三明治后，他又一个劲地说起自己这里或那里受过的伤。“我做过6次牙齿手术，还在1979年做过一个脑血栓清除手术，那时我才12岁半。”

“那场冰球比赛我也在场。”琳赛说。

“那是在空军学院，”他说，“那是场冠军联赛。我们打败了米切尔队。他们有22名队员、2个守门员，还有一名教练。我们有11个人。你知道你说了什么吗？击你妈的球去吧！”

琳赛笑了。她习惯了马特的笑话，大部分都带点儿脏话。

“我们队打进了州赛，”马特说，“但我没能参赛，因为我的脸撞伤了。有个人从背后把我铲翻，使我撞在了挡板上。”

“我记得！”琳赛说，“我坐在车的后座上，就在你旁边，你的眼球都快从眼眶中掉出来了。”

马特给琳赛看他侧脸上的伤疤。

“我缝了157针，”马特说，开始了他一贯的夸张叙事，“我奄奄一息，他们给我用了电击。你知道那个叫《急诊室的故事》的连续剧吗？里面也有电击的情节。他们电击了我10次，我的心电图连续7分半钟都是平的。他们最后说再电一次。第11次时，我终于有了心跳，两周半后我醒了。”

马特回忆起了一些在劳莱特高地学院时的往事，宿舍里的女生、走廊里的飞盘，以及他在那里认识的冰球队员。他记得自己辍学过一年，去保龄球馆打过工，卖过报纸，跟乔一起生活过一阵子。

“乔死后，我、马克还有迈克尔三个人过去，把他的东西分了，”他沉重地说，“我拿了他的电视。”

一提到乔，马特就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唐纳德把我的人生变成了噩梦，”马特说，“他把怒气发在全家人身上，他在地板上揍我。”越多地说起童年，马特就越沉浸到自怜的情绪中。琳赛还记得，马特曾经训练过她的足球队。她还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作文，把他称为自己的英雄。她很清楚，马特是真正的受害者，

就和自己一样。

“唐纳德、布莱恩、吉姆，都欺负过我。”马特说。但这是马特的一家之言，很难判断其真实性。“于是我离开家待了8到10年。后来我回来了，吉姆发了心脏病，就在主街那里。乔也发了心脏病。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妈妈也死了。我失去了家人，而且完全无能为力。”

“还有我在这里。”琳赛说。

她哥哥看着她。“有人在真好。”

那天晚上，隐谷路的家里来了一大群加尔文家的人，他们都是来参加咪咪的葬礼的。迈克尔和妻子贝琪以及一个女儿一起从曼尼托泉驾车赶来了。他还在不停地分享照顾咪咪到最后一刻的那些体验。“我跟玛丽说，像这样照顾一个人实在是一种荣幸，”迈克尔说，“因为当你必须做某件事时，你就只能去做。但因为不缺钱，照顾病人这样的事已经不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非做不可的了。”

“嘿，阳光宝贝儿！”约翰看到迈克尔后喊道。

当音乐教师的约翰现在已经退休，这次跟南茜一起从爱达荷州过来。他们上次回家已经是三年前了，当时是为了庆祝咪咪的90大寿。

迈克尔面露喜色。“嗨，他来了！”兄弟俩拥抱在一起。“我看你像是缩了几英尺啊，兄弟。”

“呃，可能是有一点。”约翰说。

“不是可能，我确定你是矮了，”迈克尔说，“以前你都比我

高的，不是吗？”

“嗯，是的。”约翰说。两年前他从梯子上摔下来，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3次背部手术、4次膝盖手术、3次脚踝手术，过去两年我离残废只有一步之遥。”

“嘿，我还有点儿需要爬梯子的活儿，如果你想干的话。”迈克尔坏笑着说。

约翰和南茜退休后挥霍了一把，买了辆房车，这次就是开着这辆房车过来的。他们在博伊西度过了半辈子，如今进入黄金岁月[2]，开始有了一点物质方面的享受：他们有一台精心呵护的古董钢琴，在后院开辟出的池塘里养起了锦鲤，还搭了个小凉棚种葡萄，自己酿小批量的葡萄酒，甚至还制作了标签。他们开着房车到处旅游，如果想来科罗拉多的话是很方便的。但他们却与其他家人保持着距离，部分是有意为之，部分——按他们的说法——是因为需要。“玛格丽特和玛丽扛下了几乎所有负担，照顾家里患精神病的人，对他们有求必应，”约翰说，“她们的经济状况也负担得起这些事。”

刚到不久，约翰就不禁有点恼火。他为母亲的葬礼练习了一支钢琴曲，但现在得知他无法表演。琳赛把场地安排在了草地上，约翰原以为他们会为母亲准备一个更为正式的仪式。不过理性告诉他，自己其实无权这么想，因为葬礼的时间是迁就他的到达时间定的。尽管如此，这场告别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这还是让他有一点不开心。约翰还发现，周围的一切自己都不再熟悉，因此完全没有参与感。但事情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你像约翰一样离开了家乡，那么你就可以按自己的原则办事。可是一旦回家，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有可能与你的原则和风格截然相反。虽然约翰是主动离开的，但这种情况下还是会觉得自己受

到了排挤。

很多年前，约翰决定尽可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从没想过要照顾兄弟们。“每次我过来的时候，如果马修和彼得有空，我会去看看他们，大概一年一次吧，”他说，“不过我的大哥唐纳德，哦，你是完全没法跟他聊什么的。”

马特决定不来吃晚饭。那天的午饭他和琳赛一起已经吃得很饱了，但看到大家都在隐谷路又让他很为难。彼得没收到邀请，让他在葬礼前夜跟一大家人相聚太难为他了，不仅很消耗他的精力，也很消耗其他人的精力。但马特和彼得第二天都来参加了葬礼，马特在一边晃来晃去，流汗不止，彼得在大家面前笑容满面。葬礼结束时，彼得用自己的录音机放了一首《我最爱的事》，收获了一片掌声。在大家的要求下，他又絮絮叨叨地念起了《尼西亚信经》：“我相信天堂和人间全能的神……”

马克·加尔文从丹佛回来了，赶上了葬礼前夜的晚餐——他是老八，过去的冰球明星和象棋天才，也是如今家里健康的儿子中最年轻的那一个。马克身材魁梧，已经谢顶，蓄着山羊胡子，跟家里其他人长得都不像，但说话的样子挺像的。他和约翰、迈克尔颇有见解地聊起政治、音乐和象棋，这些都是他们的母亲当年一直希望培养的。马克已经从大学书店的管理岗位退休，开始领州编制的养老金。退休后，马克为博尔德两家最豪华的酒店——圣朱利安酒店和博尔德拉多酒店——提供私人出租车服务，生意很稳定。这份新职业让马克接触到了一些人，要是咪咪在，一定很爱听他们的八卦，比如博尔德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她曾雇马克为她从机场接送宾客。“我搞到了一月维瓦尔第的票，”马克说，“我送世界级的钢琴家西蒙娜·黛纳斯坦去机场，他们送了

我音乐会的门票。”

其他的冰球男孩要么得病，要么已经去世了，这让马克几十年来在家中感到格外孤独。有时他会觉得整个童年仿佛是一片空白。他时常有种冲动，想要忘掉过去，好好继续生活，或者至少终止曾经的伤痛，但有几段鲜活的记忆从未褪色。他清晰地记得45年前的感恩节那天，唐纳德和吉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记得唐纳德抬起餐桌砸向吉姆的那一幕。“这里是疯人院。”马克摇着头说。

在健康的孩子中，只有理查德和玛格丽特没来隐谷路吃晚饭。理查德似乎想避免与妹妹们发生正面的冲突。因为咪咪遗嘱的事情，他最近和琳赛在电邮上吵得不可开交。理查德认为琳赛不应该作遗嘱的执行人，但其他健康的哥哥姐姐都支持琳赛。

琳赛认为，理查德生气是因为咪咪的遗嘱中没有提到他。但咪咪决定不分遗产给理查德，是因为几年前为了帮他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多恩和咪咪已经给了他一笔钱。“我父亲受不了理查德。”琳赛说。但她也承认，咪咪对理查德的生活并非不管不顾，每次理查德来，咪咪都和他谈笑风生。“咪咪只顾自己开心，让我们兄妹互相作对，”琳赛说，“这种个性我得很小心别学去。”

过去看到理查德讨咪咪欢心时，迈克尔都会笑。“理查德想跟父亲一样，左右逢源，”他说，“我想他过于钻营了。”

但理查德却不这么看。据理查德说，他和琳赛发生冲突是因为他觉得琳赛挂念的都是生病的兄弟们。“我很生气。我说，‘玛丽，我想吃饭的时候聊聊月亮、星星和天空，不想谈精神病的事’。我听到那些会很压抑。”

理查德更像母亲，而不像父亲，他只愿意聊愉快的话题，比如去圆石滩和卡波的旅行，或者他在迪拜的生意之类的。理查德和咪咪一样，相信名门世家那套价值观。这能从他讲起父亲的过往时看出来，他的描述方式和家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理查德口中的父亲，不是“朱诺号”上的副指挥官，而是舰长；不只是恩特空军基地的情报官员，更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私交；不仅是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的首位执行理事，更是这个机构的创立者；他的“年度父亲奖”不是克努特·罗克尼俱乐部颁发的，而是尼克松总统直接授予的；他不只是科罗拉多泉市当地鸟会的主席，还“为西部带来了奥杜邦”[3]。

多恩·加尔文也不仅仅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名通信军官。“我爸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也就是后来的中央情报局。”理查德说。

理查德会滔滔不绝地聊起父亲在冰岛、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秘密行动，说他在空军学院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工作只是一种掩护。他还说这些都是从和母亲的闲谈中分析得出的，因为“她说这些都是父亲绝不会说起的事情”。

没有任何军事单位或情报机构有哪怕一丁点证据可以证实多恩·加尔文曾经是一名间谍。但这种对父亲的浪漫化加工却让理查德很受用。比如，这至少可以解释父亲的军事生涯为什么会突然终结——或许是因为他持有的是学者一贯偏好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而不是一名军官应有的鹰派观点，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被放逐去做表面光鲜的公关工作时他会咬牙接受下来。

不过理查德不愿过多地去想这些，而是更愿意沉溺于方便的自我妄想中，但这种妄想并非《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描述的那种妄想。毕竟，我们每个人讲故事都有自己偏好的版本。

玛格丽特之前告诉过琳赛，她不想去隐谷路过夜，说她宁愿第二天早上跟怀利和两个女儿一起来参加葬礼。琳赛再次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绪。晚上大部分时间，她都没提这事，直到在厨房里约翰问起她。

“那么，玛格丽特没来？”

“是啊，随她吧。”琳赛说。

“怎么了？”

琳赛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该如何妥帖地回答。

“我猜玛格丽特是感到太愧疚了，”她最后说，“她从来没有帮过忙，他妈的一根手指头也没动过，从来没有。”

“是啊，她都在忙自己的事。”约翰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谈话的分寸。

“她有自己的事要忙。”琳赛说，大笑起来。“没错，你说对了。这就是她的理由。”

琳赛走到露台上，抱了抱迈克尔和马克。他们聊着葬礼上谁可能会不来，聊到这次的好天气能持续几天，因为天气预报说一场暴雨快来了。然后大家开始回忆往事：那次为了参加1964年的纽约世博会，全家人展开的跨越全国的漫长公路之旅；父亲错误地估计了A&W餐厅的车道空间，急停车后行李从车顶飞了出去；所有行李都飞进了另一辆车里，跟孩子和鸟塞在一起。

“在肯塔基的另一场暴雨里，他不是还把车子开出公路了吗？”马克说。

“是啊，”约翰说，“暴雨中有一个石块砸中了卡车，就是那辆大巴。他得把车开到纽约新帕尔茨的维修商那里。他后来又把一枚螺丝落在刹车盘里了，修车师傅最后在刹车盘里找到了那枚螺丝。”

“我还记得那场暴雨，”迈克尔说，“但其他事我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石头砸到车子了？”马克问。他们都笑起来。

“谁现在还养鹰啊？”琳赛说，“每次我跟别人说起鹰的事，他们都说：‘啥？’”

“我开出租车总会跟别人说起这些故事。”马克说。

约翰想起葬礼的事，突然很认真地对琳赛说：“如果下雨怎么办？”

“有伞，”琳赛说，“如果下雨，约翰，你就可以在酒店弹琴了。”

“那个键盘是电子的，”约翰说，“那感觉可不一样。”

琳赛笑着指了指咪咪还保留在家中的钢琴。“那我就说服他们把这台钢琴从地下室抬到草地上去。”

大家又哄笑起来。

客厅里只有唐纳德一个人，离大家远远的。如果有人朝他微笑，他也会礼貌地回笑一下。这天恰巧是他72岁生日，琳赛嘱咐过黛比准备一个生日蛋糕作为惊喜。但唐纳德一直沉默不语，直到有人问他，他有没有在母亲去世前与她道别。

“有，那次她先走的，”唐纳德说，“她和我说‘谢谢’，我也对

她说‘谢谢’。我感谢她在我身边。”

他会想念她吗？

“不会，”唐纳德说，“她已经转世了，没受到过伤害。我是说，她现在在海里，是三胞胎之一。”

他妈妈是个三胞胎？

“我让她作为三胞胎之一出生的，她现在在海里。”

她是人还是鱼？

唐纳德面露不悦，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是人”。

但她在海里？

“是啊，”唐纳德说，“他们和一只章鱼一起生活。”

人和章鱼一起生活？

“是的。章鱼可以生出人，可以生出很多人，还可以生出所有其他动物。当洪水来临时，章鱼有时会把他们养在水里。”

那咪咪作为三胞胎之一，现在在海里？

“是的。她现在还小，是个小宝宝。她就在海里，现在大概有5个月大了。”

你想去世后也一样吗？

“哦，我不介意啊。”唐纳德说。

就在唐纳德要回松尖园护理院前，大家把蛋糕推了出来。这是个巧克力蛋糕，顶上有切碎的士力架小块。整个晚上唐纳德都非常安静，就像一个影子，大家甚至可能注意不到他也在。但此

时大家的关注让他很高兴，他温和地抿嘴笑着。

黛比点上蜡烛，把蛋糕拿到露台上，大家这时都坐在这里。这里曾是他们养芙蓉德莉卡和阿瑟尔的地方。在和乔打架时，马特的头也曾被摔到这里的地上。大家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唐纳德，现在家里最年长的人，家中的老大，站在蜡烛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双臂交叉在胸前，闭着眼睛，好像在许什么愿望。

[1] 1盎司 $\approx$ 28.35克。——译者注

[2] 在英语中，“黄金岁月”指的是退休后的时光。——译者注

[3] 此处的奥杜邦指的是奥杜邦学会，该学会以法裔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约翰·奥杜邦命名，致力于鸟类以及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工作，有数百个地方分会。理查德这里的意思是在多恩的努力下，美国西部地区也建立起了奥杜邦学会的地方分会。——译者注

第三部分

第41章

在13岁离开隐谷路时，琳赛决意从此再也不回家。她从博尔德搬到维尔镇，后来又搬到特柳莱德，就是为了与原来的家保持距离。而如今，在咪咪去世后，琳赛回来得比前些年更频繁了。她会去探望唐纳德，会去看看马特的情况，会驾车去更远的地方看彼得，还要准备把老房子卖掉。驾车行驶在科罗拉多泉市的街上时，一段段往事浮上琳赛的心头，比如市西头的那些小房，过去当吉姆施暴时，琳赛和凯西就曾躲在附近。“我现在每次都会经过那里。”她说。

琳赛仍然觉得自己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觉得家人经历的一切都会沉淀到她的身上。她心里总惦念着把事情梳理清楚，也总感到有点孤单，没有安全感，就好像在刀锋上行走一样。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因，除了承担起患病哥哥们的医护责任外，琳赛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注重细节、无比谨慎的性格也不失为一种优点。“露易丝在治疗的时候曾开玩笑说，生活中初现端倪的冲突不过是个红旗警告，还说这不失为一个健康的应对机制，可以提醒你该整理整理装袜子的抽屉了，”琳赛笑着说，“我可是非常爱整洁的。”

为什么选择留下来，而不是放下这一切？对于这个问题，琳赛自己也很困惑。

“在我接受过的那么多治疗中，”她说，“我的治疗师都说：‘见鬼了，你在开玩笑吧。过去那些事你都忘了吗？’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沉湎于过去？那会是什么样？做个瘾君子？我不知道。从小时候一直到青年时期，我都非常希望那些患精神病的哥哥们全都死掉。但这种想法其实很让人心痛的，挺折磨我的。”

在咪咪的葬礼结束几个月后，隐谷路的老房子被挂牌出售了。2008年夏天，最终的买家给房产经纪人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

加尔文家的朋友们，早上好，

感谢你们让我和我丈夫有幸在昨晚参观你们的住宅——这座房子真的很好。在房子里转悠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座房子里曾经弥漫的关怀和爱意，并立即希望能再延续它的故事。我们想要在这里组建我们的家庭，希望你们能多加考虑我们的购买意愿。

谢谢！祝你们生活愉快！

在一次去科罗拉多泉市的途中，琳赛拐去了普韦布洛精神病院，想看看哥哥们过去的医疗记录还留下了多少。当时她或许应该做一些心理准备，准备好家里还有一些未曾揭开的秘密。在医院主楼的地下层，琳赛翻阅着两辆手推车上堆满的文件夹。这些厚厚的文件夹中塞满了文件，纸张从边边角角中戳出来。从这些纸页上，琳赛第一次得知唐纳德曾试图用氰化物和酸剂杀死他自己和妻子吉恩。那些年，咪咪只是说唐纳德的病是他的妻子离他

而去导致的，但真相却根本不是这样，反倒跟三年后布莱恩杀死诺妮的情况很类似。

在科罗拉多州的医疗报告中，琳赛看到唐纳德说过自己12岁时曾企图自杀，这也是弟弟妹妹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或许咪咪知道，但即便如此，她也是决不会提的。她只会觉得，唐纳德出事是在离家后，而不是还在家的时候。

在听说这件事后，玛格丽特感到自己被蒙骗了。“我完全不知道唐纳德企图杀死他的妻子，”她说，“这样就能解释通很多事了。一直以来我都不满意那些含糊的解释，都只是唐纳德生病了。”直到去世时，咪咪都在营造着一种幻象，想要维持“生病前”的美好，直到无可维持。玛格丽特不禁好奇，如果父母对唐纳德的事更开诚布公一些，如果大家都知道他对吉恩做的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大家会不会对布莱恩的精神状态更注意一些？如果她的父母能更加坦诚一点，布莱恩的悲剧是不是还会发生？诺妮会不会直到今天还活着？

对玛格丽特来说，这个秘密是一种侮辱，更是一种拒斥。“我像是被父母喂了很多大便。我觉得他们是想让我以为唐纳德的情况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普韦布洛，琳赛不仅找到了所有哥哥的文件，还发现了一份关于父亲的文件，这份文件让她大感意外。琳赛从这份文件中得知，多恩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会定期来普韦布洛接受电休克治疗。文件上给出的理由是，在经历过癌症多次复发和一个兄弟去世的打击后，多恩在20世纪90年代初患上了抑郁症。这个新的信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他们的父亲之所以接受电休克治疗，是因为患上了一种可遗传并且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抑郁症吗？这会不会像咪咪曾经猜测的那样，跟他1955年在加拿大时的情况一

样？还是多恩在晚年患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抑郁症？毕竟在他这种境遇下——一个儿子先谋杀他人然后自杀，另外五个儿子有妄想症，其中一个还会无法自控地猥亵儿童——谁会不抑郁呢？毕竟，他人生的进展与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咪咪一定是知道多恩接受电休克治疗这件事的。她一定是跟他一起去，之后驾车送他回家的，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月一次的频率。她也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事。作为加尔文家的一员，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家族史中的地雷。这些雷被埋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的是避免让家族蒙羞。

琳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再次默默咽下这个秘密带来的伤害，并努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她觉得或许她家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那些秘密，并不只是关于精神分裂症，还是——在弗里德曼和德利西博士的帮助下——让其他人生活得更好的钥匙。

他们经历的这一切值得吗？不能这么说，但琳赛至少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收获。罗伯特·弗里德曼的胆碱试验和琳恩·德利西有关SHANK2基因的发现让她认识到，他们一家的牺牲可能会给未来一代又一代人带来助益。这难道不是科学的价值，不是历史的价值吗？

第42章

咪咪生病前几年的一天夜里，玛格丽特做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梦，哭着醒了过来。

在这个梦里，玛格丽特和妹妹在维尔镇滑了一天雪。琳赛没说她们要去哪儿——琳赛知道要去哪儿，但玛格丽特不知道，这个细节中或许就隐藏着一些信息——但玛格丽特很快意识到她们是在前往山姆和南希·加里的公寓。她们到那儿时，门没锁。

琳赛走进去，玛格丽特跟着，只有她们俩。房子保养得不是很好。琳赛说山姆的孩子们目前住在这里。玛格丽特想起了她过去认识的加里家的所有人，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这时南希和山姆走进门来，还有他们的孩子和朋友们。他们似乎是在开派对庆祝什么事情。

玛格丽特觉得很窘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当她看到妹妹拿着卷尺在测量房间的大小时才明白，她们是被请来给山姆和南希筹划派对的。

但现在策划已经太迟了。宾客络绎不绝地走进来，沿着木制走廊来到客厅。玛格丽特看见了山姆的秘书、加里家的司机，他们的厨师和管家，甚至还有来过蒙大拿湖边小屋给玛格丽特和其他人上课的网球教练。他们都老了一些，但玛格丽特还能认出他

们。

她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加里家的一名私人教师微笑着走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这么久，”玛格丽特告诉他，“你们都是非常好的人。”这名教师回答说：“好了，我们要把你写入我们的家庭史。”

玛格丽特感觉好多了，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她听到宾客们提到了一些她没有受邀参加的派对。突然，那些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丹佛社交圈中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她是多么无法融入其中；她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自己家庭的悲剧。这一切再次把她推下了被抛弃的痛苦深渊。眼泪汹涌而至。

当你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找不到爱和归属感时，你就应该去别处找找看。不幸的是，玛格丽特-琳赛或许也是这样——寻找之路的第一站是吉姆家。在这里，可以离家远远的，但在这里，一个家人一直对她虎视眈眈。对玛格丽特来说，加里家和丹佛的肯特中学为她提供了更多找到归属感的机会，当然它们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这之后，玛格丽特经历了几年漫无目的的流浪生活，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无业游民到处旅行，还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回过头来看，她感到自己能熬过这一切非常幸运。我20岁的时候真的嫁给过一个毒贩吗？她在日记里写道。

最后，她决定和怀利一起安定下来，组建家庭。“我喜欢叫他我的安全港湾。”她说。

玛格丽特和怀利生了两个女儿。她转型成了全职母亲，专心致志地维持着情感的平衡。“你掌控着全家的情绪。”咪咪常常

这么跟玛格丽特说。至少在这一点上，玛格丽特和母亲的意见是一致的。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玛格丽特曾说过，布莱恩的死是她童年时代的关键事件，甚至跟她所经历的性侵一样令她痛彻心扉。她当时11岁，能看出布莱恩的死对所有人的打击都很大。但她最无法释怀的是那种遭到遗弃的感觉，不仅是被送到加里家，还有对父母重视哥哥们和妹妹但忽视自己的怨愤。“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孩子往往是最需要爱的孩子，”玛格丽特说，“至少这是我的感受。”

玛格丽特经常想起母亲评价她和妹妹时说的话：“玫瑰花丛中的每一朵玫瑰都是在荆棘中绽放的。”她和琳赛是玫瑰，十个哥哥是荆棘。这在很多外人看来是一种体贴，但对玛格丽特来说却无比丑陋，是在变相地鼓励侵犯。从小听着母亲说这样的话，哥哥们会是什么感受？听着这种明面上表扬，语气里却暗含着不耐烦的嘲讽的评价，女儿们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

作为母亲口中的“玫瑰”，玛格丽特却从未感受到母亲的爱。如果咪咪真的爱她，就绝不会把13岁的女儿送出家门。玛格丽特有时觉得她在加里家的时光永远地阻隔在了自己和母亲之间，她永远无法忘记那种被遗弃的感觉，一辈子都在试图让自己避免再受这样大的伤害。我像个一次性用品一样被丢弃了，像不要了的旧衣服，玛格丽特曾在日记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发觉得自己有权与家里人保持距离。我想要一个正常家庭的亲密感，但老实说我的原生家庭并不正常。

对玛格丽特来说，妹妹和母亲在风格上极为相似，并且很关爱彼此。咪咪会把家里的家具送给琳赛甚至给她缝衣服，而琳赛在照顾咪咪这件事上也从未表现出半点犹豫。玛格丽特有时会讨厌她们俩，尽管她也需要她们。

对于被从隐谷路送走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布莱恩死后的那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她看着父亲和几个哥哥相继生病——玛格丽特最清晰的记忆之一是母亲在孩子们都上床后仍很久不睡，一个人在那里画画，大多数时候画的都是鸟和蘑菇。之后回想起这些时，玛格丽特都非常困惑不解。在那样的时候，咪咪怎么还有闲心在屋前屋后晃悠，怎么还有精力提防可能出现在后院的狐狸和鹿群，怎么还能注意到有很多鸟没到喂鸟器边取食？同样是这个人，前不久还在因为布莱恩的死号啕大哭啊。母亲具有什么玛格丽特没有的东西吗？是她的力量，拒绝接受现实的性格，还是某种玛格丽特搞不懂的东西？直到后来玛格丽特才想明白，是咪咪所热爱的科罗拉多的自然世界给她提供了某种慰藉，让她得以暂时逃避现实中的悲剧。

成年的玛格丽特终于鼓起勇气开始绘画，而她所画的主题，却是她穷其一生想要避开的：她的家人。她以饱含情绪的现实感画母亲喜欢的那些花。她画了一幅有关加里一家的油画，名为《灰色安逸》。另一幅《世故》表达的则是她学会接受自己脆弱一面的过程。还有一幅作品的名字叫《打包悲伤》。她以加尔文家12个孩子为素材，画了一组震撼人心的抽象画。唐纳德是红色和白色的，吉姆是黑白的，像鬼魅一般，约翰、布莱恩、迈克尔和理查德是色调各不相同的黄绿色，约瑟夫是渗透着红色的黄色，马克、马修和彼得都是红色，只有彼得有几丝蓝色。

玛丽是一个用柔粉色的粗线条交织而成的图案，点缀着一点黑色。玛格丽特自己和玛丽差不多，只是粉色少一些，多了些鲜明的锈红色斑点。

在咪咪去世几年前，玛格丽特曾帮助彼得搬到护理院，这件

事让她创作了另一幅画《帮彼得搬家》。这幅画是她技艺上的进步，复杂、有层次，充满着她难以用其他方式传达的情绪。“感情就这样不自觉地喷薄而出。”玛格丽特说。

南希·加里看中了这幅画，赶在玛格丽特肯特中学的一个老同学出手前把它买了下来。

第43章

我们的文化将疾病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对每一种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的发展都会像脊髓灰质炎一样，先是无法治愈，然后神药出现，最终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疾病的情况都符合这种模式。更多的时候，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未必能走出实验室并应用到更多人的身上。无论是对弗洛伊德学派、克雷佩林学派，还是家庭动力学领域的专家或者遗传学家来说，拒绝合作都让大家饱尝了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之苦，每个人就像井底之蛙一般。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卢·克伦威尔曾描述过这种困境：“就像人在骑旋转木马时要选一匹马。人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马是领头的。一轮转完，人从马上走下来，才看清楚这马其实哪里也没有去。不过那种经历倒是挺让人开心的。甚至让人想再玩一轮。”^[1]

还有一种与脊髓灰质炎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解决疾病问题的并不是简单的突破。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渐到来的，往往还伴随着痛苦。很多人会为此倾其一生，他们会失败、会争论，最终又会和解。或早或晚，有些理论会消逝，有些理论会存留。我们或许要在很多年后才能看清取得的进展，再决定前进的方向。

精神分裂症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进展？如果加尔文家的男孩晚

半个世纪出生——比如生长于如今这个时代，而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治疗他们的手段会不会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看，并不会有多少改变。业界对新的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的研发仍然兴趣不大。即使是早期的试验，抗精神病药物的测试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冒巨大的风险，而且试验无法用老鼠代替人。有关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先天/后天争论仍在继续，只是讨论发展到了更为细琐的层面。过去的争论围绕的是弗洛伊德，现在则在讨论表观遗传学，也就是环境因素是如何改变基因的开关状态的。现今的研究者探讨的是触发这些变化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是像大麻那样可以摄入的东西，还是像细菌那样具有传染性的物质？除了这两者外，研究者还提出了各种其他的可能性，譬如头部损伤、自身免疫性疾病、脑部炎症以及寄生微生物，每一种说法都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大家还是会去旋转木马挑选自己的坐骑，并且都希望自己是领头的那一个。

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围绕精神分裂症的氛围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大众变得更宽容了。反精神病学运动也以另一种形式重生了，一场名为“听见脑中的声音”（Hearing Voices Movement）的运动试图将幻觉的概念合理化和常规化，[\[2\]](#)就像呼吁把失聪和失明解释为人的差异而不是一种残疾的那些运动一样。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这个常常被用来描述其他疾病——比如自闭症——的名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精神分裂症，这是几十年前加尔文兄弟接受治疗时从未经历过的。现在仍然有坚定反对药物治疗的运动，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士会展示他们寻找到的[一些研究结果](#)，试图证明在不服药的情况下，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从长期来看会有更好的表现。[\[3\]](#)这项运动得到了很多治疗师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愿意精神病学治疗被简单地等同于开药和服药，而且他们也很怀念心理治疗的那个黄金时代。在那时，医生

会先和病人长谈——而不是只谈几分钟——然后再开药。

如果说真有什么显著变化的话，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非常模糊，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每年都会出现更多的证据，证明精神病存在一个谱系。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之间存在重叠，而双相情感障碍又和自闭症之间存在重叠。[\[4\]](#)最新的研究提示，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多少都有点精神疾病。2013年发表的一份荟萃分析发现，总人口中有7.2%的人经历过幻觉或妄想。[\[5\]](#)另一份发表于2015年的研究得出的数据是5.8%，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只出现过一次幻觉，另三分之二则表现出持续的症状。[\[6\]](#)这类研究结果至少表明，在异常行为的医学应对上，医生需要特别注意区分哪些人有必要接受传统的治疗，哪些人暂时只需要留意观察。这些医疗决策的风险很高。毕竟，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每次后续发作的精神崩溃都会对大脑造成永久的损伤，影响到对信息处理至关重要的灰质。

可悲的是，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的两难困境依然如初。定期服用药物的确可以延缓精神病的发作，但同时病人也在承担着受长期副作用伤害的风险。此外，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病情控制住之后继续服药的病人的复发率和停止服药的病人一样高。尽管目前仍然活着的加尔文兄弟还像过去那样依赖于抗精神病药物，但对他们之后的病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他们不必再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这两者中只选其一了。甚至最为资深的传统精神分裂症研究者，现在也在推动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首席精神病学家杰弗里·利伯曼所称的“早期发现和干预的治疗模式”。[\[7\]](#)较新的一波研究支持所谓的“软干预”，也就是以谈话治疗和家庭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治疗病人，从而把药物的使用量降到最低。[\[8\]](#)在假定迈克尔·加尔文当时也有可能患病的情

况下，你可以说他在田纳西大农场公社的“磨石机”帐篷里就获得了软干预。过去几十年间，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一直在尝试这种更具替代疗法特点的方法，据说获得了一些成功。[\[9\]](#)这种方法的难度在于要能够确定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成功治好哪些人，对哪些人帮助不大，以及哪些人长期服药后引发的痛苦不亚于疾病本身。

对于更多的研究者来说，问题的核心是预防，而这面临的挑战是在一个人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前诊断出他（她）有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哥伦比亚大学的利伯曼正在研发一些新技术，试图测量海马的功能。[\[10\]](#)也许有那么一天，研究人员能够找到可以延缓精神分裂症发作的新药，就像现在正在研发的那些可以缓解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药物一样。除此之外，还有胆碱。在加里夫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下，罗伯特·弗里德曼在丹佛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这是他首项胆碱长期研究的延续。他会从准妈妈开始服用胆碱补充剂时起，追踪孩子的情况，直到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期，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高发期。在纽约的颁奖仪式上，弗里德曼表示，当这项实验得出结论时，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加里夫妇和很多其他资助者也同样如此。“他们是一群创立者，是推动发展的人，比如南希这样的石油大亨，”弗里德曼说，“他们说，‘噢，好的，我们都要参与。我们就把这当作做生意好了’。”他们还说，如果实验中途失败了，那大家就一起吃个饭，把它当作一次美好的旅行。

弗里德曼也开始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脑发育利伯研究所合作，从全新的角度关注胎儿健康，研究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是否与孕妇胎盘的状态有关。[\[11\]](#)这个机构的创始人之一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者，精神分裂症发育假说的提出者丹尼尔·韦恩伯格。他和弗里德曼一起，开始研究胆碱在改善胎盘

健康状况方面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两位研究者都希望在很多婴儿出生前就消除他们的精神分裂症患病风险。

对于弗里德曼来说，预防不仅需要有效的药物，也需要常识。业界每年花在抗精神病药物研发方面的钱高达数十亿美元，但这些药物都是在疾病出现症状后使用的。如果把一部分钱用在预防上——不仅在胎儿期，也用在儿童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想想那些年幼时就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有没有可能在患者发病甚至自杀前，对他们的脆弱加以防范，以免情况恶化？“在胎儿预防研究方面，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每年只会投入430万美元，而且这些费用全部都被用在以小鼠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而他们每年的总预算是14亿美元，”弗里德曼最近表示，“校园枪击案的作案者中有一半都患有精神分裂症。”[\[12\]](#)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文化认知没有那么僵化，病人没有被与主流社会隔绝，在危险信号最初出现时就积极干预的话，加尔文兄弟的人生会不会发生改变。但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五十年，像加尔文兄弟这样的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认为趋势还是会回到家庭。”琳恩·德利西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家驾驶了一小段距离过来喝咖啡聊天。2016年——当时她也在研究SHANK2基因——德利西在《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对精神分裂症家庭的研究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3\]](#)好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后，她不再是唯一这样想的科学家了。

“我觉得家庭研究极为重要。”丹尼尔·韦恩伯格说。韦恩伯格

和德利西曾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共事过，他一度对家庭研究提出过质疑，并且对德利西的方法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也像德利西一样重视起来，认为这些患病家庭的价值就像一个个“研讨会”或者说“检验室”，可以用于评估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提出的各种理论。“最终，在从遗传学到具体病例的转化研究中，家庭病例是至关重要的。”韦恩伯格意识到，对加尔文家这种家庭的研究能指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无法注意到的新的治疗方法。“有人曾问我，‘如果你确定了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基因型，就能理解精神分裂症究竟是什么吗？’。在我看来，仅仅从每个人的基因序列是无法理解这种疾病的。这无法解释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研究能说明很多风险方面的问题，但我怀疑我们不能从中得出全部答案。”

过去很多年来，德利西的工作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如今的她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局外人，在哈佛医学院教书。虽然她还活跃在各个国际精神分裂症研究小组中，但并没有像同一领域中她的同代科学家那样获得奖项的认可，研究经费也不是太多。即使她有关SHANK2基因的研究再次引发一个重大突破，她的贡献可能也不会被认可。科学进步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跻身于少数几个不朽的人物中，那么你就将泯然于科研工作者的人海中，就只是一部宏大史诗剧幕中一个不起眼的演员。“我觉得我在一定程度上会难以释怀，”德利西说，“但我心中早已非常坚决。最重要的是我的发现使现在的这些进展成了可能。”

有关SHANK2基因的研究发表时，斯特凡·麦克唐纳已经离开了安进公司。那之后不久，德利西在和他通电话时了解到他已经跳槽到了辉瑞公司，也就是16年前终止了德利西对精神分裂症多发性家庭研究的那家药企。

德利西心里还小小地喜欢这种讽刺。如果你活得够久，什么事都可能会轮转到你的你头上，咪咪·加尔文对这一点应该深有体会。

德利西之前没对麦克唐纳提起过这件往事。他只知道德利西的数据都是她自己的，没听说过2000年那次切割数据的事情，德利西拿了一半，辉瑞拿了另一半。这次在电话中，德利西告诉麦克唐纳，辉瑞手上还有一批她的精神分裂症多发性家庭的生物学样本，其中包括那些他们曾用来研究SHANK2基因的家庭。

德利西和麦克唐纳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辉瑞没有因为冷库需要空间而把这些样本销毁掉，那么德利西的样本——包括加尔文一家的样本——就都还静静地待在某个角落里。德利西不清楚这些样本现在被保存在什么地方，即使知道，她也无权决定如何使用，什么时候使用，甚至能否使用这些样本。

“你当时是和这里的谁对接这项工作的？”麦克唐纳问。或许他能找到那个人问问。

德利西告诉了他一个名字。

麦克唐纳简直难以置信。偌大的世界，上万的辉瑞员工，那个他们要找的人，此刻就坐在离他几英尺的地方。

麦克唐纳很难按捺住自己了，当时正值年末，他的预算里还剩下些钱。“我把其中的一些样本测了序。”他说。他选择的是那些他能找到的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数最多的家庭。加尔文家以前已经被分析过了，但还有一些患病人数或许没有加尔文家多，但人数也不少的家庭。

“这再一次证明，琳恩是领先于她的时代的，”麦克唐纳说，“我们打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辉瑞对使用这些结果

研发自己的药物不会感兴趣，因此我们非常希望把它们发表出来，分享给整个科学界。”

这些家庭仍然有话要说。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听了。

[1] Rue L. Cromwell, “ Strategies for Studying Schizophrenic Behavior,” *Psychopharmacologia* 24, no. 1 (March 1, 1972): 121—46.

[2] Leudar and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Voices of Insanity*.

[3] M. Harrow and T. H. Jobe, “Does Long-Term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Facilitate Recovery?,”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9, no. 5(September 1, 2013): 962—65. 另见：M. Harrow, T. H. Jobe, and R. N. Faull, “Does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Eliminate or Reduce Psychosis? A 20-Year Multi-Follow-up Stud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4, no. 14(October 2014): 3007—16.

[4] S. Guloksuz and J. van Os, “The Slow Death of the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and the Painful Birth of the Psychosis Spectrum,”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8, no. 2(January 2018): 229—44.

[5] R. J. Linscott and J. van Os. “An Updated and Conservat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on Psychotic Experiences in Children and Adults:On the Pathway from Proneness to Persistence to Dimensional Expression Across Mental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3, no. 6 (June 2013): 1133—49.

[6] John J. McGrath, Sukanta Saha, Ali Al-Hamzawi, Jordi Alonso, Evelyn J. Bromet,Ronny Bruffaerts, José Miguel Caldas-de-Almeida, et al., “Psychotic Experience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31,261 Respondents from 18 Countries,” *JAMA Psychiatry* 72, no. 7 (July 1, 2015): 697—705.

[7] “Early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of Psychotic Disorders: Ready for ‘Prime Time’?,”lecture by Jeffrey Lieberman for the Brain and Behavior Research Foundation,February 12, 2019.

[8] John M. Kane, Delbert G. Robinson, Nina R. Schooler, Kim T. Mueser, David L. Penn, Robert A. Rosenheck, Jean Addington, et al., “Comprehensive

Versus Usual Community Care for First-Episode Psychosis: 2-Year Outcomes from the NIMH RAISE Early Treatment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3, no. 4(October 20, 2015): 362—72.

[9] Benedict Carey, “New Approach Advised to Treat Schizophreni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7.

[10] “Early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of Psychotic Disorders: Ready for ‘Prime Time’?,” lecture by Jeffrey Lieberman for the Brain and Behavior Research Foundation, February 12, 2019.

[11] Gianluca Ursini, Giovanna Punzi, Qiang Chen, Stefano Marengo, Joshua F. Robinson, Annamaria Porcelli, Emily G. Hamilton, Daniel Weinberger, et al., “Convergence of Placenta Biology and Genetic Risk for Schizophrenia,” *Nature Medicine*, May 28, 2018, 1.

[12] Peter Langman, “Rampage School Shooters: A Typology,”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4 (2009): 79—86.

[13] Lynn E. DeLisi, “A Case for Returning to Multiplex Familie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Heritability of Schizophrenia: A Psychiatrist’s Perspective,” *Molecular Neuropsychiatry* 2, no. 1 (January 8, 2016): 15—19.

第44章

在咪咪的葬礼后，玛格丽特和琳赛有6个月没说过话，也没互发过消息。不想联系的人是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觉得琳赛承担了太多，多到会伤害她自己的程度。琳赛把自己沉浸在加尔文家的烂摊子里，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甚至可能牺牲了她与丈夫和孩子的和谐关系。但与此同时，琳赛也会责怪其他人没有尽责。玛格丽特从没见过琳赛撂挑子，甚至没见过她松懈过。“我觉得我们家很有摆布他人的传统，”玛格丽特说，“我们都摆布过别人，也都被别人摆布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家人是什么样了。你知道吗，我受够了。”

当母亲不再是她们共同关心的焦点时，玛格丽特才蓦然看清自己和妹妹的不同。“在维系整个家庭这个问题上，迈克尔和琳赛不喜欢我不介入的态度，”玛格丽特说，“但划清界限对我有好处。”

琳赛认为，玛格丽特总说跟家人联系会影响她的健康，这不过是一种躲避策略罢了，可以作为她不介入的借口，使她免受指责。在琳赛看来，玛格丽特一心关注自己，实际上是因为她无法释怀。“玛格丽特对父母处理问题的方式仍然耿耿于怀，”琳赛说，“她对生病的哥哥们也非常生气，尤其是唐纳德和吉姆。我看她还是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琳赛一直在坚持自己从南希·加里和以前的治疗师露易丝·斯尔文那里学到的某些品质。如果扪心自问并且足够坦诚的话，她还会明白这些品质也来自自己的母亲。“她们教会了我要接受手里有的牌，不然就只能等死。如果你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你就会发现只有通过爱和互助，才能让你从创伤中找到平静。”琳赛觉得，这一点是她和姐姐最大的不同。

“我们都很努力地去拯救自己，”琳赛说，“但她没有把帮助大家作为解救自己的一种方法，而我正相反。”

几年前，琳赛曾经问过山姆·加里，为什么自己没有像玛格丽特一样被送到他们家。“我和我的父母都觉得你心智更坚强，”山姆说，“你不像你姐姐那么脆弱。”这是琳赛第一次听人这样说。

但琳赛也是人，她也需要帮助。在她成年后的人生中，每当家里的某些事情啃噬她的心灵时，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理解她的人。当琳赛的心情处于低谷时，她还有姐姐，她并不孤独。当玛格丽特没有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时，琳赛会觉得自己失去的不单单是母亲，还有姐姐。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自己怎么能承受得住这一切。”琳赛说。

嗨，大家伙儿，

在马特的新卡车报废一年后，上周他的车又被偷了——这不能怪他——哈！

没错，这个可怜的家伙总坏运不断。

就好像得了精神分裂症就会发生这种好玩的事情似的.....

我刚订了些日用品，明天早上会送到他家。非常方便。
<https://www.instacart.com>.....

他没办法买到这些东西，老实说，他也没法自己去采购。

他想搬家，因为他住的那个地区太差了。我在联系八区公寓和费拉尼之家，他们说他们愿意让马特住进其中一栋楼里。在喜互惠超市里看到大家都认识马特太好玩了。大家都会和他打招呼说：“嘿，马特！”

你们谁要是能打个电话，道一声好，我会非常感谢的。不要内疚，我只是想寻找一点真正的人情味和善意。

谢谢，

玛丽

琳赛发给玛格丽特、迈克尔、约翰、理查德和马克的邮件
2018年6月

多恩和咪咪·加尔文仍然活着的孩子都明白，卖掉老房子对3个还在世的患病兄弟是好事。琳赛和迈克尔就这笔钱能做什么事聚在一起想了很久。马特能买一辆新卡车；彼得可以得到宠物治疗或者音乐治疗，哪怕一支新的次中音竖琴也会让他很高兴；唐纳德喜欢歌剧，这笔钱可以雇一个人陪他去电影院，欣赏那里播放的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想想就觉得不赖。

在考虑这些时，琳赛发现真正了解哥哥们喜好的人，真正知道什么会对他们有助益的人，还是自己的母亲。这个发现常常让琳赛深夜难眠，原来家中真正的冠军、共情能力的金牌得主，一直都是咪咪·加尔文。“现在突然她不在了，”琳赛说，“我才真正

明白她的帮助有多大。”

琳赛过去喜欢跟母亲谈论先天和后天的话题。但始终担心被人指责的咪咪认为，自己家发生的这一切完全和后天养育无关。“嗯，这病是遗传的。”她常说。琳赛说自己不确定。她认为有些有遗传易感性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这取决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和遭受的创伤的严重程度”。有些东西可能会起很大作用，比如“爱和归属感”，琳赛说。

但琳赛已经不再怪母亲了。“我认为父母确实没有给我们应有的帮助，”她说，“但他们自己也是毫无头绪。”

无论是什么让母亲和患病的哥哥们能够心灵相通，琳赛都决意努力去尝试。很多人，包括她健康的哥哥们，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把唐纳德、彼得和马特当人看待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难以让人接近，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或许是这种疾病最具毁灭性的特点。

但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也是一种诱惑，尤其是对患者亲属来说——是将这种不可接近和丧失自我等同起来。“情感总会紧随某种认知过程而来。”精神病学家西尔瓦诺·阿里蒂（Silvano Arieti）曾经写道。^[1]20世纪50年代，阿里蒂的著作《对精神分裂症的阐释》（*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中的观点在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主流认识中居于统治地位，这本书的第2版还在70年代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种认知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自发的，也可能是扭曲的，但总是存在。”

琳赛注意到，只要有人对哥哥们表达善意，他们身上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据琳赛说，在她帮马特买了日用品后不久，“马特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简单平常地表达了感谢”。她还说，她“希望能把他的这种优点激发出来”。

在琳赛细心的引导下，几个健康的哥哥也开始向患病的兄弟伸出援手。理查德和蕾妮打电话来询问了患病兄弟们的电话号码。琳赛打算给马特搞到科罗拉多大学冰球赛季的门票，马克或许愿意带他去，毕竟他们过去都很喜欢打冰球。“大家曾经把他们当作瘟疫一样敬而远之。但如果我小心翼翼又明明白白地说：‘嘿，你能不能带他们出去，你知道，干点什么都好，喝杯咖啡，吃个甜甜圈怎么样？’他们都会照做的。”

半年后，玛格丽特和琳赛才重归于好。在各自度过圣诞假期后，1月时她们开始有了联系。在一次面对面的聊天后，琳赛对一些问题看得更透彻了。“我发现自己最后会生家里所有人的气，因为他们不帮我照顾妈妈，”琳赛说，“而玛格丽特则认为我这么费心费力未必是好事。”

而在另一边，玛格丽特也承认琳赛对家庭做出了额外的贡献。但她们之间的鸿沟仍然没有被填平。

她们谈到了玛格丽特没能照顾咪咪，以及这件事让琳赛有多恼火。“我真的做不到。”玛格丽特说。琳赛也畅所欲言，说她觉得姐姐的这个决定很不妥，“让我觉得既伤心又沮丧，还很生气，感觉好像所有事情全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一样”。

她们还谈到了童年创伤中的幸存者这个话题。这些人往往会在之后的人生中主动寻找会伤害他们的人，从而继续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使自己得到帮助。琳赛和玛格丽特在为彼此扮演这样的受害者吗？

谈话快结束时，琳赛问了姐姐一个问题：她们愿不愿意接受彼此原本的样子，还是要继续把对方看作受到过伤害但又无法亲近的人？

这次见面后，琳赛决定她需要接受所有家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就像她有自己自由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途。”琳赛说。她还说自己也要处理好与他人的距离。“大家的人生都是边走边摸索的。”

琳赛从家人的身上看到，无论实际情况有多糟，大家都有很强的适应现实的能力。我们可能终身都生活在一个泡泡里，但仍然自得其乐。我们可能会拒绝承认生活中的其他可能，尽管这些可能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真实。现在琳赛思考的已经不再只是患病的哥哥们，而是大家——所有的家人，包括她的母亲和她自己。

“我可以像哥哥理查德那样表现得像个千万富翁，或者像约翰那样搬到博伊西去，或者像迈克尔那样成天弹古典吉他。我们都可以这样。大家都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我们都活了下来，大家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没错。”

琳赛终于更加理解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一点了。过去她母亲总为自己辩护，坚持说精神分裂症是先天的。从一个方面说，咪咪是对的，生命从某种程度说具有宿命性，这一点无须否认。但琳赛也明白，人绝不仅仅是基因这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

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

[1] Arieti, *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216.

第45章

琳赛的女儿凯特长大了，跟琳赛长得非常像，同样明亮的眼睛，一样轻松的笑容。跟玛格丽特和怀利一样，琳赛和里克在生孩子前也曾咨询过弗里德曼医生。他告诉琳赛夫妇，哪怕是像加尔文一家这么极端的病例，精神疾病的亲子遗传概率仍然很低。但身为父母总是会担心的，何况琳赛从来都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

从小时候起，凯特在游乐场和教室这类吵闹的环境中就开始表现出畏缩情绪，并且出现过精神崩溃的情况。这些都表明她的感觉处理过程存在一些问题，显然需要作业疗法来干预。但如果你有6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哥哥，你的孩子又开始出现无法控制的情绪问题，你肯定会想，这会不会是不祥之兆？

琳赛考虑了最坏的结果。她在凯特身上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送凯特去跟治疗师学习自我安抚的方法；给凯特在卧室里装了吊床，帮她减压；还囤了很多精油，帮女儿镇定情绪。她究竟是过度警觉了，还是做了一个主动尽责的母亲应该做的事？琳赛不知道。但至少这些方法奏效了，或者至少没造成伤害。

凯特在茁壮地成长。她在高中最后一年修了大学预修课程，得了全优，在其中一门艺术课中，她一系列有关精神健康的作品

还获了奖。她后来还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但她没去。2016年秋，凯特入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并且直接开始上大二。在那里，她仍然门门全优，夏天也还在上课。凯特跟她妈妈一样是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对童年不抱一点虚妄的幻想，急切地想早早变成大人。

事实上，每当回忆起童年时，凯特印象最深的都是当她度过了自己的情绪危机开始表现正常后，母亲的担忧和注意力就又从她转到弟弟杰克的身上了。

为了保险起见，杰克小时候也接受过预防性的治疗。他后来告诉父母，这些治疗和测试使他的神经绷得很紧。杰克总感觉自己被人盯着，他的感觉没错：琳赛和里克都明白，加尔文一家的家族病没有影响到2个女儿，但影响到了6个儿子。杰克是多恩和咪咪·加尔文的外孙，他的父母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高一时，杰克开始逃课，跟几个刚认识的朋友去滑板公园闲逛。他被诊断有注意力缺陷障碍，需要服药，还偷偷吸大麻。青少年时期，大概是出于无聊，杰克特别爱做些吸引人眼球的事。跟母亲一样，杰克和凯特在学习方面也很有天赋，但当在课堂上被提问时却不知道如何应对。

对于琳赛和里克来说，加尔文家出了一个吸大麻的男孩，这无异于最高危机。他们四处寻求建议，却发现只有两个人既懂如何应对儿童疾病，又清楚他们家的特殊情况：山姆和南希·加里。

2015年劳动节后，杰克参加了“广阔天空”青少年治疗项目。这个项目为期90天，通过户外活动达到预期效果。在同类项目中，“广阔天空”的费用是最高的，目标是将孩子们从有害或者失能的环境中拉出来，重塑他们的价值观。项目的指导思想是佛

学，通过冥想等方法帮助年轻人消除对立违抗性障碍、吸毒、酗酒等问题。费用是由加里夫妇支付的。“我不会让玛丽-玛格丽特也一样——再因为那种事遭受不幸，”南希说，“她想做什么，我都会帮助她。”

“广阔天空”这样的短期项目通常只是长期治疗的序曲。在结束90天的治疗后，杰克进了一所叫作蒙大拿学院的寄宿治疗学校。课程为期21个月，每月的费用为8 300美元，还是山姆和南希付的钱。蒙大拿学院接收的学生都有吸毒、酗酒或者各类精神健康问题，譬如贪食症、厌食症、焦虑障碍等。琳赛和里克在那里得知，杰克的问题跟大麻以及注意力缺陷障碍关系不大，更多是与焦虑情绪，也就是对患上精神病的恐惧有关。

面对这样的结论，杰克很愤怒。他被遗传了自己无力左右的基因问题，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疯子。琳赛因此特别自责。“我费了好的大劲，让我的孩子多接触和了解我那些患精神病的哥哥，是不想让他们对这种病有偏见和羞耻感。结果却有点适得其反。”

但影响杰克的并不只是这些患病的舅舅们。杰克和凯特从小就目睹了母亲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负担，这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这么多年来，我的孩子们看到了这种疾病所能带来的痛苦，我想他们是想保护我，”琳赛说，“每当我要去应付那些事时——和姐姐，或者母亲，或者某个哥哥有关的事——都会引发焦虑和沮丧的氛围。”

每当琳赛看着杰克时，都会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的样子，胸中满是愤怒和羞耻，在哥哥唐纳德身上一圈又一圈地绕绳子，拉紧，想把他绑在树桩上烧死。

在杰克的治疗项目即将开始时，琳赛叫姐姐陪她一起送杰克去蒙大拿，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过去一样，加里夫妇还是用自己的塞斯纳飞机送她们过去。这对夫妇总是欢迎她们，随时帮助她们。姐妹俩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穿梭——绿色、黄色、褐色交织的草甸，树上覆盖的白雪，美丽的房子，网球场、果园和马。甚至管家特鲁迪也在，热情地迎接她们。

那个周末，玛格丽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起往事，不仅是因为与山姆和南希在蒙大拿重聚了，还因为琳赛和里克即将送走他们的儿子，就像当年自己的父母把自己送走一样。不过她是过来帮琳赛的，不是来重温过去的。琳赛自己的情绪也起伏不定。一方面，她明白自己非常幸运。另一方面，她的儿子要离开她身边整整两年。什么样的母亲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当然，她和玛格丽特都明白，这么做是迫不得已。

跟加里一家相聚让姐妹俩想起了昔日的那种感觉，那种同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的感觉。

回到家后，杰克的表现很好。他专心上学，不再吸毒，成绩也恢复到了优秀的水平。他还学会了通过攀岩、冥想，甚至写日记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他很快也认识到，这些办法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没有真正能够对付焦虑的方法，”他说，“你必须自己承受。”从某种程度上说，杰克已经久病成医了。“他总是会指出我们的问题，用的都是专业语言。”琳赛说。她终于可以放心了。

南希送了杰克一根飞蝇钓竿作为毕业礼物。“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南希说。杰克想在大学时学习早期儿童教育，并想在毕业后从事户外活动来开展治疗的工作。

当琳赛现在看着杰克时，她想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彼得、

唐纳德、马特和其他所有生病的哥哥们。在他们当年彻底被药物毁掉之前——这些药物没有治好他们，并且抹去了他们的个性——会不会原本可以有某些早期的干预方法能帮助到他们？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无法获得她儿子获得的那种治疗的。其中有人是因为缺乏各种资源，有人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把精神疾病视作一种耻辱，选择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的生活又该有多难熬呢？

“有资源的人各有各的选择，没资源的人什么都没有，”琳赛说，“这个孩子现在走上了正轨，一切顺利，但他的人生原本是很可能偏离到另一条轨迹上去的。我真心觉得如果我的哥哥们能有同样的机会，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2017年夏天，在他丹佛的实验室里，罗伯特·弗里德曼做了一个不常见的决定：允许一名大学生到实验室来跟着他实习。这个年轻人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医学预科生，对神经科学特别感兴趣。她想当一名弗里德曼那样的研究者，研究她自己家族的疾病——精神分裂症。

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凯特第一次走进弗里德曼的实验室，见到了实验室的技术员、助理和所有研究生，有的研究生比她年长5岁之多。当听说凯特才18岁时，大家都很惊讶，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难求。有人开玩笑说大概是她家捐了不少才有机会把她弄到这里来的。

凯特略带嘲讽地笑着说：“嘿嘿，你的意思是捐的钱吗？还是组织？”

凯特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和自己的母亲、姨妈和几个舅舅当年一模一样。在她出生很多年前，这些家人来过这里。研究人

员给他们的头贴上电极，然后让他们听那些“咔嗒咔嗒”的声音，测试他们的听觉门控能力。她身边的那些柜子里曾经保存着她的家人和其他家庭的遗传物质，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遗传物质，研究者发现了CHRNA7基因异常的证据。那些胆碱补充试验中出生的孩子的数据也保存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由于她6个舅舅的贡献，这些试验可能会改善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状况。

她外公的大脑或许也保存在实验室的某个角落里。她很好奇，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看看它。

致谢

2016年年初，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乔恩·格拉克把我介绍给了玛格丽特·加尔文·约翰逊和琳赛·加尔文·劳奇。她们两姐妹一直在寻找办法，想让世人了解她们家的故事。她们知道，要还原事情的真相，需要每位在世的加尔文家成员的参与，把那些之前非常隐私而敏感的家庭事务毫无保留地袒露出来。而写作者也需要独立和全方位地跟进整个故事。我非常感激大家都同意了。我要向玛格丽特和怀利·约翰逊、琳赛和里克·劳奇、彼得·加尔文、马修·加尔文、马克·加尔文、理查德和蕾妮·加尔文、迈克尔·加尔文、约翰和南茜·加尔文，还有唐纳德·加尔文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要非常沉痛地向咪咪·加尔文表达我的谢意，感谢她愿意在2017年去世前公开自己的生活。本书得以出版，证明了加尔文全家的慷慨和坦诚，他们也相信自己家的故事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琳赛和玛格丽特尤其值得我致敬。作为她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和患病兄长的合法代理人，琳赛不知疲倦地寻找无人问津的医疗记录，申请获取了大量的文书，并联系了很多精神健康专家和医院管理者。玛格丽特提供的数十年来的个人日记和传记文章则是有关隐谷路生活的详细而宝贵的资料。姐妹俩都花费了无数时间与我沟通，在面谈、电话和电邮中从未因为我微不足道，或者有些冒犯的问题和请求而回避不答。我真心感谢她们的付出。

我还要向研究加尔文一家的精神病学家和研究者们表达无尽的感激。琳恩·德利西、罗伯特·弗里德曼和斯特凡·麦克唐纳都付

出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向我解释他们的研究，并在加尔文一家的同意下，第一次公开把他们的工作和加尔文家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还有几位遗传学、精神病学、流行病学和科学史领域的专家帮我更全面地了解了精神疾病领域理论和争议，他们是尤安·阿斯利、冯国平、艾利奥特·格森、史蒂文·海曼、约翰·麦格拉斯、本杰明·尼尔、理查德·诺尔、爱德华·肖特、富勒·托里和丹尼尔·韦恩伯格。我会永远感恩凯拉·邓恩，她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帮助我在写作初期提出合适的问题，使我最终避免犯很多尴尬的错误。（书中仍有的错误责任都由我承担。）

我还要感谢加尔文家的其他一些成员，他们中很多人的受访内容本书都未能直接引用，但他们都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对讲述书中的故事大有帮助，他们是艾琳·加尔文·布洛克、凯文·加尔文、莱文娜·加尔文、梅丽莎·加尔文、帕特里克·加尔文、贝蒂·休尔、乔治·休尔、艾丽·约翰逊、萨莉·约翰逊、玛丽·凯莉、凯西·马提索夫、杰克·劳奇和凯特·劳奇。我要感谢南希·加里（她称得上是加尔文家的荣誉成员了），还有治疗师玛丽·哈特奈特和露易丝·斯尔文，感谢她们提供的对玛格丽特和琳赛的分析。我还要感谢很多治疗过加尔文兄弟的精神健康专家，他们是霍尼·克兰道尔、克里斯·普拉多、雷切尔·威尔肯森，以及来自普韦布洛科罗拉多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卡门·迪比亚索、凯特·科特娜、希拉·法布里齐奥·潘特里奥、马修·古德温、朱莉·米克和阿尔·辛格尔顿。

另外还有一些就专门的话题向我提供意见的人。鲍勃·坎贝尔、杰夫·切尼和艾希莉·克洛科特对科罗拉多泉市的生活提供了非常棒的描述。我也非常感谢其他相关的家族友人和邻居，他们是麦克·博西、玛丽·切尼、安·克洛科特、贝克·费舍、珍妮斯·格林豪斯、梅利·肖普托夫·霍根、蒂姆·霍华德、艾利·克洛科特·杰夫斯、苏珊·金、埃德·拉多瑟、珍娜·马霍妮、凯瑟琳·斯卡克·麦克格

拉蒂、卢·麦克肯纳，琳恩·穆里、乔伊·肖普托夫、凯洛琳·斯卡克·索尔塞斯、麦尔汉·维金和马克·维格雷特那。感谢麦克·杜普伊分享他的驯鹰知识。感谢杰瑞·克雷格、梅丽尔·伊斯特科特、雷尔·瓦·莉莉、小乔治·T. 诺尔德、维恩·塞弗特、哈尔·韦伯斯特和来自美国空军学院档案室的玛丽·伊丽莎白·鲁维尔向我提供有关多恩·加尔文驯鹰的辉煌历史。感谢尼克·乔纳克斯和罗宾·麦克基尼·马丁提供落基山脉诸州联合会以及阿斯彭和圣塔菲的活动信息。感谢内尔和鲍勃·米切特提供普韦布洛精神病院的历史。感谢肯特·施努布什、李·卡斯帕里、克雷格·哈特，以及来自丹佛天主教教区的道格拉斯·图名内罗讲述自己对罗伯特·弗洛登斯坦神父的看法。感谢布莱恩·加尔文以前的乐队成员斯各特·菲博特、罗伯特·穆尔曼和约尔·帕默提供对布莱恩的回忆。感谢罗伯特·盖茨、布兰登·盖茨和克洛蒂亚·舒尔茨提供对罗蕾莱·史密斯，也就是“诺妮”的回忆。

10年间，我非常幸运得到了两位优秀代理人的支持，他们是大卫·格纳特和克里斯·派瑞斯·兰姆，从一开始他们就坚信这本书会成功，并把我推荐给理想的双日出版社。感谢比尔·托马斯和苏珊·赫兹，还要格外感谢我优秀的编辑克里斯·坡博洛，他请我吃了几盘希腊鱼子酱，并在进餐中帮我厘清了这本书的大致框架。感谢丹·梅耶在图文编辑方面的协助，谢谢约翰·方塔娜的书封设计，谢谢玛丽亚·卡雷拉为书整体的设计，谢谢丽塔·马德里格尔负责生产管理，谢谢加拿大兰登出版社的安·科林斯为书稿做校对的辛苦付出。在写作本书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得到过很多编辑的指导，他们是杰里·伯克维茨、罗伯特·布劳、丹·费拉拉、巴利·哈勃、戴维·赫舍、亚当·莫斯、拉哈·纳达夫、吉纳维芙·史密斯和辛迪·斯蒂夫斯。

除了把我介绍给加尔文一家外，乔恩·格拉克还在本书写作

过程的各个阶段给我提了很多建议。珍妮弗·赛尼尔在我毫无头绪和纠结的时候帮我厘清思路。他们和其他朋友、同事以及我所爱的人在本书写就的初期好心帮我校对，他们包括克里斯汀·贝克、克里斯滕·丹尼斯、凯西·埃文舍夫斯基、乔希·戈尔德费恩、彼得·洪堡、吉尔伯特·霍尼德菲尔德、埃里克斯·科尔克、凯洛琳·米勒、克里斯·派瑞斯-兰姆、威廉·雷德和弗兰克·蒂普顿。还有一些朋友给予了我热情、鼓励、人生开导和美食招待，他们是弗兰克·巴斯吉奥、彼得·贝克、伊凡·布朗、布鲁斯特·布朗维尔、加布里埃尔·菲尔德伯格、李·菲尔德逊、克里斯滕·佛马格里奇、托尼·夫莱塔斯、大卫·甘德勒、梅里尔·戈登、艾米·格罗斯、琳达·赫维克斯、麦克尔·凯勒赫、伊莱恩·克莱恩巴特、马克·莱文、凯文·麦克科米克、道格·麦克穆伦、本尼迪克特·莫雷利、肯尼斯·穆尔勒、艾米莉·纳斯伯恩、索尔·罗、南希·罗姆、菲尔·塞拉费诺、阿比盖尔·施耐德、蕾贝卡·索科洛夫斯基、克利夫·汤普森、约翰·特洛姆布力和沙里·兹斯曼。两位研究者萨米亚·布兹德和约书亚·本·罗森在本书选材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还有可爱的朱莉·塔特做了重要的事实核对工作。

我的母亲朱迪·科尔克是本书第一位真正的读者，她先于其他人告诉我，她在阅读时能听到我的声音。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一家当地医院做了25年的精神病学顾问。在本书计划写作时，我就跟母亲聊起过，希望能给她看书稿，并得到她非常细致的审读建议。2018年5月23日，在加尔文家失去他们的女性家长咪咪后不到一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享年79岁。失去她对于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本书献给她和我的父亲乔恩。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父亲是我们坚强、敏锐、慷慨和从容的楷模。他们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父母。我要向我的哥哥埃里克斯·科尔克和姐姐弗丽茨·哈洛克表达我的爱意和感谢，他们

都是我的榜样，还要向我的所有家人，包括在马里兰州和艾奥瓦州的科尔克家人和哈洛克家人，在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丹尼斯家人表达感谢。

最后，谢谢在写作上非常有才华的奥黛丽和为我提供多方面建设性意见的内特，谢谢你们牺牲的时间和精力。谢谢我珍爱的妻子克里斯滕，谢谢你的爱、美和启发。我把所写的一切都献给你。

关于本书资料的说明

《隐谷路》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写作材料源自作者与加尔文家中每一位在世成员的采访录音（包括咪咪·加尔文，采访于她2017年去世前），以及对他们的几十位朋友、邻居、老师、治疗师、护理人员、同事、亲戚和研究人员的访谈，录音时长达数百小时。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情节。所有对话都由作者亲见和记录，或基于出版文献，或来源于当时在场人员的回忆。

用于帮助讲述加尔文家故事的补充资料主要包括：与精神分裂症研究者琳恩·德利西、罗伯特·弗里德曼和斯特凡·麦克唐纳的大量访谈；加尔文兄弟和多恩·加尔文的所有可查询的医疗记录；多恩在海军和空军的服役档案；咪咪和多恩的私人通信；在2003年和2008年对咪咪的一系列简短采访录音，采访由玛格丽特完成；几篇玛格丽特的个人日记和传记性文章。本书中的所有材料均有明确出处。

所有需要进一步引证的资料，包括有关精神分裂症、遗传学和精神药理学的段落和章节，都会在正文后一一列出。

参考文献

Arieti, Silvano. *American Handbook of Psychiatry*, Vol. 3.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 *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2nd ed.,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Bair, Deirdre. *Jung: A Biography*. Boston: Little, Brown, 2003.

Bentall, Richard P. *Doctoring the Mind: Is Our Current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 Really Any G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eedlove, S. Marc, Neil V. Watson, and Mark R. Rosenzweig. *Biologic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5th ed. Sunderland, Mass.: Sinauer Associates, 2007.

Brown, Alan S., and Paul H. Patterson, eds. *The Origins of Schizophren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Buckley, Peter, ed. *Essential Papers on Psychos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omsky, Noam A., and Michel Foucault. *The Chomsky-Foucault Debate: On Human Nature*. New York: New Press, 2006.

Conci, Marco. *Sullivan Revisited—Life and Work: Harry Stack Sullivan's Relevance for Contemporary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Trenton, N.J.: Tangram, 2010.

Cromwell, Rue L., and C. R. Snyder. *Schizophrenia: Origins, Processes, Treatment, and Outc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s, Kenneth L., Dennis Charney, Joseph T. Coyle, and Charles Nemeroff, ed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Progres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02.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DeLisi, Lynn E. *100 Questions & Answers About Schizophrenia: Painful Minds*. 2nd ed. Sudbury, Mass.: 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 2011.

Dorman, Daniel. *Dante's Cure: A Journey Out of Madness*.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3. Eghigian, Greg, ed.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Madness and Mental Health*. Milton Park, Abingdon, Oxfordshire,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Foucault, Michel, and Jean Khalfa. *History of Madness*. New York: Routledge, 1961/2006. Foucault, Michel, and Alan

Sherida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London:Penguin, 1975. (References to second Vintage Books ed., 1995.)

Freedman, Robert. *The Madness Within Us: Schizophrenia as a Neuronal Proces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reud, Sigmund, James Strachey, Anna Freud, and Angela Richard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2: *The Case of Schreber, Papers on Technique, and Other Work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6.

Freud, Sigmund, and C. G. Jung. *The Freud/Jung Letters*. Ed. William McGuire. Trans.Ralph Manheim and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Fromm-Reichmann, Frieda. *Principles of Intensive Psychotherap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Selected Papers of Frieda Fromm-Reichmann*.Foreword by Edith Weige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Gaskin, Stephen. *Volume One: Sunday Morning Services on the Farm*. Summertown: The Book Publishing Co., 1977.

Gillham, Nicholas W. *Genes, Chromosomes, and Disease: From Simple Traits, to Complex Traits,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 Upper Saddle River, N.J.: FT Press, 2011.

Gottesman, Irving I., and Dorothea L. Wolfgram. *Schizophrenia Genesis: The Origins of Madness*. New York:

Freeman, 1991.

Greenberg, Joanne.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3.

Hornstein, Gail A. *To Redeem One Person Is to Redeem the World: The Life of Frieda Fromm-Reichman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Jackson, Don D. *The Etiology of Schizophrenia: Genetics, Physiology, Psychology,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Jaynes, Julian.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Johnstone, Eve C. *Searching for the Causes of Schizophre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ung, C. G., Sonu Shamdasani, and R.F.C. Hull. *Jung Contra Freud: The 1912 New York 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Kemali, D., G. Bartholini, and Derek Richter, eds. *Schizophrenia Today*.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1976.

Kesey, Ke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New York: Penguin, 1962.

Laing, R. D.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London: Tavistock, 1959.

———.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New York: Pantheon, 1967.

———. *Sanity, Madness, and the Family*. London: Penguin,

1964.

Leudar, Ivan, and Philip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Voices of Insanity: Studies of Verbal Hallucin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Lidz, Theodore, Stephen Fleck, and Alice R. Cornelison. *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5.

Lieberman, Jeffrey A., and Ogi Ogas. *Shrinks: The Untold Story of Psychiatry*. 1st ed.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5.

Lionells, Marylou, John Fiscalini, Carola Mann, and Donnel B Stern.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Lothane, Zvi. *In Defense of Schreber: Soul Murder and Psychiatr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1992.

Macdonald, Helen. *Falcon*. London: Reaktion, 2006.

———. *H Is for Hawk*. London: Random House, 2014.

McAuley, W. F. *The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Bristol: John Wright, 1953.

McNally, Kieran. *A Critical History of Schizophreni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Mitchell, Kevin J. *Innate: How the Wiring of Our Brains Shapes Who We A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Mitchell, Nell. *The 13th Street Review: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Colorado State Hospital (Now CMHIP). Pueblo: My Friend, The Printer, Inc., 2009.

Modrow, John. *How to Become a Schizophrenic: The Case Against Biological Psychiatry*. Everett, Wash., and Traverse City, Mich.: Apollyon Press; distributed by Publisher's Distribution Center, 1992.

Morel, Benedict A. *Traite des maladies mentales*. Paris: Masson, 1860.

Moretta, John. *The Hippies: A 1960s Histo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7.

Müller-Hill, Benno. *Mur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Germany, 193—1945*. Woodbury, N.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88.

Nasar, Sylvia. *A Beautiful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Niederland, William G. *The Schreber Case: Psychoanalytic Profile of a Paranoid Personalit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1984.

Noll, Richard. *American Madn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mentia Praeco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store, Nicholas. *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49.

Peterson, Roger Tory. *Birds over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1948.

Powers, Ron. *No One Cares About Crazy People: The Chaos and Heartbreak of Mental Health in America*. New York: Hachette, 2017.

Richter, Derek. *Perspectives in Neuropsychiatry;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Frederick Lucien Golla by Past Pupils and Associates*. London: H. K. Lewis, 1950.

Rosen, John N. *Direct Analysis: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53.

Rosenthal, David, ed. *The Genain Quadrupl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Rosenthal, David, and Seymour S. Kety, eds. *The Transmission of Schizophrenia: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Research Conference of the Foundations' Fund for Research in Psychiatry, Dorado, Puerto Rico, 26th June to 1 July 1967*.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9.

Saks, Elyn R. *The Center Cannot Hold: My Journey Through Madness*. New York: Hachette Books, 2015.

Sartre, Jean-Paul. *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1940). London: Routledge, 2016.

Scheper-Hughes, Nancy. *Saints, Scholars, and Schizophrenics: Mental Illness in Rural Ire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Schiller, Lori, and Amanda Bennett. *The Quiet Room: A Journey Out of the Torment of Madnes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1.

Schreber, Daniel Paul.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and London: Bloomsbury, 2001.

Sheehan, Susan. *Is There No Place on Earth for 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Slater, Eliot, James Shields, and Irving I. Gottesman. *Man, Mind, and Heredity: Selected Papers of Eliot Slater on Psychiatry and Gene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Smith, Daniel B. *Muses, Madmen, and Prophet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Science, and Meaning of Auditory Hallucination*. New York: Penguin, 2007.

Sprague, Marshall. *Newport in the Rockies: The Life and Good Times of Colorado Springs*. Athens: Swallow Press/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iriss, Melvyn. *Voluntary Peasants: A Psychedelic Journey to the Ultimate Hippie Commune*. Warwick, NY: New Beat Books, 2016. Kindle.

Sullivan, Harry Stack, and Helen Swick Perry. *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Szasz, Thomas.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Telfer, Dariel. *The Caretak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9.

Thomas, Philip. *The Dialectics of Schizophr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7.

Torrey, E. Fuller. *American Psychosis: Ho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estroyed the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Schizophrenia and Manic-Depressive Disorder: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Mental Illness as Revealed by the Landmark Study of Identical Twi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Surviving Schizophrenia: A Family Manu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Wang, Esmé Weijun. *The Collected Schizophrenias: Essays*. Minneapolis: Graywolf Press, 2019.

Ward, Mary Jane. *The Snake P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6.

Weinberger, Daniel R., and P. J Harrison. *Schizophrenia*. Chichester, West Sussex, and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1.

Whitaker, Robert. *Mad in America: 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Revised paperback.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White, T. H. *The Goshaw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1.

Williams, Paris. *Rethinking Madness: Towards a Paradigm Shift in Our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Psychosis*. San Francisco: Sky's Edge,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 (美) 罗伯特·科尔克著；黄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0

书名原文：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
ISBN 978-7-5217-3514-7

I . ①隐... II . ①罗... ②黄... III . ①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 第184010号

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 by Robert Kolker

Copyright © 2020 by Robert Kolk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著者：[美] 罗伯特·科尔克

译者：黄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12千字

版次：2021年10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5177

书号：ISBN 978-7-5217-3514-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祝羽捷 编著

羽来信

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_

我时常怀疑
自己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
所谓的“文青”似乎变得有些可笑
对人生的思考和疑惑让自己苦不堪言

我们有没有正视过自己的暗面
我们的思考也许更需要被看见

这些提问也许不能改变世界
但至少可以理解自己

中信出版集团

羽来信

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

祝羽捷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如何建构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与她们同行

让“她们”成为“人”

婴儿看着水仙花

女性的故事还要讲多久

女人首先要穿得自由

30岁就是那道帮人顿悟的光

任何微小的美好都不容小觑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吃货也蛮好

属于任何生命的时间都太少了

以手艺度己度人而不自知

走吧走吧，去敦煌

“反旅行”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

爱与艺术是见自己的过程

记住我们都是弗里达

时间与寂寞自会淘洗掉生活里的杂质

写作是逆流而上的行为

作家其实是写作困难的人

明知不可为而为，大概是译者的宿命

向人生发问

文青们后来发生了什么
30岁之后，我更加愤怒了
选择了就去努力，放弃了就不必纠结
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并完全生活
生命的笃定与模糊，都在咖啡馆里

当年轻人问年轻人

当一个抑郁症朋友没有赴你的约
再也不用为不甘寂寞痛苦了
相信要认识的人一定会认识
死神来临之前不顾一切狠狠爱
至少还有个地方聊以慰藉

何为理想生活

但愿我们还能再次爱上花花世界
日积跬步，不舍昼夜
我是个年轻人，我只想开书店
做愉快的“田野”女孩

后记 往“有信”的方向行走

爱、信念与我们的困惑

序 如何建构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通信人 陈嘉映 哲学教授

每一个思想者都是谦抑的思想者，

思的目标不是伟大，而是真诚。

陈嘉映老师：

你好！很高兴以书信的形式和您交流，这也是我一整年都在努力尝试和恢复的——能不能回到一种更加古典的方式和诸位老师们沟通。回到鱼雁往返是不现实了，但至少不只是在手机上给大家点赞，转发和评论微博，或者在直播上看到大家，给大家送上虚拟的花束。我喜欢的艺术家马列维奇说过“人类生发出来的知觉比人类本身更加强烈”，他认为人类造飞机的初衷不是为了把商业信函从柏林运到莫斯科，而是为了满足对于速度、飞翔的知觉。我想这也能解释我为什么开始这个通信计划，并非真得铺开信纸、贴上邮票，大费周折地投送，而是需要共同找回典雅交流的知觉。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每个人不能出门，我像只痴情的蜘蛛趴在互联网上，疾速地缉捕新闻，立竿见影做出反应。为不相干的事情，网友们时不时地厮打成一团，片言难尽，鱼死网破，很少人愿意饱含耐心地听你把话说完，交流变得即时且粗暴，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假死”的状态——他们不再表明自己的态度，曾经不少网上的大V“金盆洗手”，不问网络，沉默是另一种态度，更是失望的表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见过家人以外的任何一个朋友，有人在网上建了一个直播房间，邀请我进去和大家“云喝酒”，仿佛网络为我们提供了穿越时空的可能性，可那并不是真正的“在场”，终归不能感受到彼此身体的温度，也不能听见酒杯真正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如果空间的改变还只是浮光掠影，我感受到人们相处时的心态、共鸣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我坚信，与人分享感情和记忆是每个人的本能，比任何时候，我都渴望与人交流。

有个朋友开旧书店，偶然间在收回来的旧物里发现了几封1982年的手写信，东西是以接近废品的价格买回来的，朋友打电话过去问需不需要送还。卖旧物的人回答说，信是父亲和朋友写的，父亲在医院，情况并不乐观，东西都不要了。朋友把信用坚固的透明文件夹保存起来，恰好被我看到，我如获至宝地读，仿佛走进了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写信人是重庆机械厂的工人，写给上海钢铁厂的另一位工人，先是关心了彼此身体的状况，然后讲起喜欢的古典乐，谈到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并拜托对

方用录音机转录这些音乐家的磁带。一纸写竟，有些字写错了，写信人就划掉改正。这样一封信在世上存留了四十年，纸张发黄，薄如蝉翼，再次读的时候仍觉得鲜活，这样感染人，唤起了我对于书信的记忆。

我从小过着平静规律的生活，觉得有人来递信、大人拆信、读信、裁下五花八门的邮票都是顶有意思的事情。对书信的兴趣被激起，我才惊觉自己书柜里就有不少书信集。奈保尔、傅雷、梁启超、曾国藩的家书，都颇具智慧；在民国文人的情书里，徐志摩肉麻直白，读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最喜欢的是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活泼生动，怪不得大家都说他一生就干过两件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给宋清如写情书；谷林与扬之水持续了二十年的百余封通信，内容围绕约稿、校对展开，谈到读书考证和生活，最让人心折的是信中流露出的亲切古意。

怀着好奇心，我开始阅读一些针对书信的书籍，得益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学者肖恩·亚瑟等对书信的痴迷，他们收集了女王、皇帝、明星、总统、首相、诗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集中营里的受难者、探险家、人权斗士等各色人物的书信，有道歉信、求职信、情书、公开信、公告、家书、决斗书、外事交涉、战争宣言等题材，让我重温了书信的发展。这些珍贵的书信像琥珀一样，封存着历史关键时刻背后人的情感和内幕，为世界史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更加私密，更加感性。

很可惜，书信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手机、互联网普及而结束。我们对科技抱有期待，以为会迎来更加紧密的连接，可惜事与愿违，即便对话框可以随时跳出，我时常觉得比十年前更加孤独——交流的工具越简单，我们越不会交流。西蒙·蒙蒂菲奥里说：“书信是对症生命无常的文学解药，当然也是人们面对互联网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所需的良药。”有时候，我想刻意避免一些这个时代给的便捷，能与朋友见面的事就尽量不打电话，能写一封信就尽量不用微信沟通，用不便利来改变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从中延缓急切以及减少浮躁。

我也是在看嘉映老师书的时候得到一些启迪，看似交流在高度流通，一切变得急切和脆弱，哲学大师们认为人活着就是对话，荷尔德林说：“人已体验许多。自我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聆听”在当下尤为困难。现代化让生活变得简单容易，简化后的生活每个人好似在干巴巴地活着，心是孤独的猎手。我开始写信，也是因为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以及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常常觉得无力还手，也来不及思考。如果人们越来越干巴巴地活着，缺乏精神活动和深度交流。我常常一段时间不看微博就发现自己落伍了，一些新兴的词汇和热门事件不知道来龙去脉，更不可能和朋友以此打趣，大家使用着同质的话语，你很容易掉队，也很容易变成不重要的边缘人。更可怕的是，被煽动起来的集体意识像癌细胞一样快速繁殖，只有情绪没有理性。网上硝烟如云，布满看不

见的狙击手，稍有不慎你就会被打成筛子，我已经以身试法过了，滋味很不好受——抨击者并不真正想要说服你，只想迅速压倒你。

这是我一点粗鄙的思考，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不适感并不只是因为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更多时候是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评判标准彻底改变了。我常常怀疑手上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所谓的“文青”变得有些可笑，对人生的思考和疑惑常常让自己苦不堪言。跟大家在纸上娓娓谈心，用写信互诉衷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逐渐克服了羞耻心，越来越勇敢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实际上，这也是我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你写得/说得越多，就越暴露底牌。如今跟大家交流，我不想抖机灵，也不想为了冒充聪明说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我不再担心被看到幼稚和不够高明。因为我知道，想要得到真诚的回应，就不能遮遮掩掩，笨嘴拙舌也是因为真实和强烈，就像一个真正坠入爱河的人那样丧失技巧。比起谋求共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宽容。华丽的表象总会褪去，希望我们都能接受真实的自己，用最朴素的方式袒露心声。我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多困惑：爱、孤独、隔离、身份焦虑、性别偏见、事业、分别、死亡、信仰、旅行、艺术、倦怠与丧、隔离与宅……这些困惑化作书信流转，我忍不住感叹：原来有趣的灵魂跟自己挨得这样近。

我喜欢陈嘉映老师说过的一段话：“未来之思不是哪个伟大思想家之思，而只能在思想者的交谈之际生成。每一个思想者都是谦抑的思想者，思的目标不是伟大，而是真诚。”我们都期望自己可以获得理想中的生活，怀揣着对这个时代的怕与爱，我们能不能再次找回一种对话方式，建立深度沟通的可能性，一起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起独自在黑暗中踉跄，我更向往建立你我之间的对话，犹如在黑夜中点燃火把，映照彼此的脸。

附近消失，友邻形同陌路，近在咫尺的人充满误解和敌对，与远方的人共享恰如一封信的距离，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经之路。日子一天天在手机上划过，内存里是漂亮的照片和碎片化的感受，我想能不能用对话重现个体，用对话接近真实，用对话获得见识，最终建构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伫候明教。

祝羽捷上

祝羽捷好！

谢谢你的来信，信中所言差不多我都有同感，我自己也常常想到这些，这里那里谈过一点儿。

记得在哪里读到，考古学家找到古埃及一位富豪的几封家书，他出差在外，向家人讲述他的差旅，指示怎样处理各种家务，印象不大准确，记得这些家书距今应有三千年了吧。我还模糊记得，发掘出来的汉简里也有不少是戍卒的家书，如今都是珍贵的历史学资料。唐诗宋词里，怎能没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科学革命开始之后的很长时间，哲学——科学的演变和发展有一半要从思想家的广泛通信中寻觅踪迹，莱布尼茨的通讯录几乎包括欧洲当时所有重要的思想者。

在我们年轻时候，远程交流全靠写信，箱底至今还积压着大批信件，也积压着好多古老的故事。1968年冬天，我从插队所在的内蒙突泉回北京，有朋友从内蒙乌旗来信，附有给秦生的信，要我转交——这既可省去8分钱的邮票，也有意邀我旁听两位亲密友人之间的交谈。我们那时唱苏联歌曲，一句“Kakim dei beil,takim ostaltsia”（“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流传在青春的忧伤里，这封致秦生的信就沿着这句歌词作结：“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将来不会是这样了。”青春无论多少混乱和迷惘，似乎青春总有未来。我揣上信，暮色中走向邻楼，楼门口围着一圈年轻人——秦生在我们这一带是出名顽主，楼前常有年轻人扎堆。我远远地喊秦生，他们转过头来，我却没有听到期待中的欢快回音；片刻沉默之后，有几个朝我跑来，直迎到我跟前，压着声音：秦生走了。到哪儿去了？两个小时之前，一场时不时会爆发的街头斗殴，一把三棱刀捅进他的后腰。

不多说这些私人回忆，说点儿宏大的。我常说，这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文字主导的历史。读写是高标特立的精神活动，没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动可以替代。书信又不同于一般著述，它写给特定的人，即使写信人想着将来会公开于世，特定读信人的影子仍在他的笔端。随手抄一段旧时来信——

嘉映：

自7月中旬以来，一直忙着给你写东西，不料又出了一大堆废纸。“说者容易做者难”，真要让我办个专栏，恐怕要误事。不过，人是逼出来的，也许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动力亦未可知。眼下我是江郎才尽，差不多已活生生地感觉到头脑的枯竭。写了论非暴力原则，论及革命运动中的道义、策略与领袖三者间的关系问题，论及病态的理论兴趣问题等等（不止这些，实在不好意思再多说了）。多篇未完成稿，都觉得太臭，提不起兴趣来修改。我觉得我也许已误入歧途：本不是革命者，却煞有介事地反思革命。与胡君相比较，我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下笔不自信，总觉得写出来的东西都十分可疑。常想起《圣经》上的话（我近来又在反反复复地读它）：“你不可论断人，以免别人也同样地论断你。”胡君的反思论道精辟，虽然也有有失武断之处。我的反思就未免像个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批评家”。我

眼下害怕一本正经的腔调，虽然我又已经写了好几万字一本正经的文字。且不谈它，我想我总会给你寄点儿东西的（我现在觉得除了写点东西，真不知还可以干什么）。

这些话在你读来也许平平常常，在我，却写着时代的转折，写着这一转折给一代人带来的困境。这封信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最后收到的长信之一。没多久，普通人开始用上了fax，私信也沾上了公文的身份。转眼又被email取代。再后，你们年轻人就更熟悉了，微信，facebook。是的，将来不再像从前那样了。那是怎样的将来呢？神经科学最近证实，“数字原生代”的大脑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在智商测验中的表现、反应时间以及工作记忆提高了，同时，共情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进取心降低了很多。

我知道无论哪个时期都有人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但我还是固执自己的看法：两千多年的文字时代正在我们眼前落幕，书信的消失应是一个明显的标记。常听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了，而“书”这个字从前更经常用来指书信。太史公《报任安书》，曾国藩家书，确实像典籍那样值得反复咏诵。微信的文字则是一个不同的族类，它们只为传达信息；情感也已转换为信息，编码在表情符号里——这些符号不似纸上的笔迹，体现着独有的经历和心情。无数的比特在基站之间以光速生灭，与之相比，鱼游雁翔的确太慢，受到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书，倒还有几个人在读，却没谁还在写信了。

非非叟原本借读写讨生活，看着文字时代逝去，难能无动于衷；你尝试重拾这种交流方式，闻知而喜。读来信，好像是你偶然读到旧书店淘来的书信而起的因缘，让我想起陋室的角落里还存着一两箱恐龙时代的旧书信，上引的那段就是从中翻检出来的。一直有意整理这些信札，却一直拖着。现在，我应该会及早去做这件愉快且有益的事情吧。倒不是妄想扭转历史大势，但将来的世界，不管怎么发展，总要时时能听到往昔的回声，才算得上人类继续生存。祝愿你继续你的尝试，并得到更多朋友的响应。也希望及早会面，如果不更早，3月份应能在上海相见。

陈嘉映

2021年1月22日

与她们同行

阎连科 黎戈 辽京 Catie 赫恩曼尼

没有所谓正当的生活，
也没有最好的时代，
我们没有必要为此焦灼。
但如果无法避免焦灼，
那就享受焦灼，
一半寻觅，一半抵御。

让“她们”成为“人”

通信人 阎连科 作家

我唯一去想的，就是要把“她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去理解。

阎连科老师：

你好哇！很感谢赠书，我很快就读完了《她们》，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劲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老实说，你会触碰这个题材，我很意外也很惊喜，甚至对不少朋友说，这本书代表着中国男作家对女性形象描写的新里程碑，因为跟过去许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比，这本书里的女性不再是男性叙述者的“他者”，不再只是被摆弄或者附属于男性的牺牲品。书中虽然描述的是一个偏远村庄里的女性群像，仿佛是人类学者对农村女性生存状况的田野调查，又饱含着对这些女性的爱与尊重，我们在这些故事中感受到她们身上原始的女性主义色彩，是一种女性反抗的自觉意识。

叙述者虽然是男性，却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叙述的。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我激动不已。也许有人会问，男作家带有女性主义视角很难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了，一个男作家主动愿意平等地书写女性，当然是顶顶了不起的事情。回忆一下我们读过的文本，对“好女人”的定义往往是乖巧顺从的弱者形象，她们会被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作为奖励，而那些不依附男性的女性，总被刻画成面孔各异的“荡妇”，最终往往落到流离失所或孤苦伶仃的下场，暗含一点道德的警醒。

西方也是这样，从莎士比亚开始，故事里的人物就流露出厌女症，比如哈姆雷特憎恶自己的母亲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啊，罪恶的仓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显然哈姆雷特认为一位好母亲应该是至死都对丈夫忠贞不渝的，他作为儿子替男权社会对母亲进行审判。他对待恋人奥菲莉亚也是粗暴的，由于奥菲莉亚没有听命于自己，而是顺从了父兄，他两次把她推倒在地，劝她去修道院，让人感受到他对女性的厌恶。说白了，跟很多男性不允许女性不听话是一回事，不顺从让一些男性感受到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恐惧导致攻击。

最近又有人提议为了社会和家庭的和谐稳定，让女性重新学习女德，我下意识看了一眼台历，嚯，今年是2020年啊，我还以为穿越时空了呢。女德也称妇德，旧指妇女应具备的三从四德，强调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

工。“三从”指的是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就是剥夺女性的主体性，“德”就是要求女性。为什么这个社会总对女性有诸多要求呢？社会和家庭的不和谐都是女性造成的吗？从性侵、家庭暴力到社会上的犯罪事件，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女性，为什么不对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施暴者提出要求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呢？

我曾经在蒋勋老师书中看到过他对“三从”的解读，他说“过去女人的爱那么简单，在家里反正就听爸爸的，结婚以后就听丈夫的，丈夫死了就听儿子的，这么简单的三从规则，就够用了。她从来不用去烦恼或担忧自己的爱情如何释放，因为社会的礼教已经全部为她设定好了，甚至她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的异性。”抱歉，这段话里我只认同最后一句，其他的我认为都是男性用男权视角对女性的解读——女性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倒被看成获得一种简单明了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心知肚明，过去的女人并非没有欲望，若把“情爱自由”看成是一种麻烦那就太反智了。

上面也许是我言重了。让吃着性别红利的男性作家主动写两性议题，还能拥有平视视角，难上加难。很多男作家写女性成了最提心吊胆的事，一怕自己犯错，二怕被女权主义者攻击。上野千鹤子指出，一些对母性的讴歌有时也是男权奴役女性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少狡猾的男人，借着对女性的赞美，把女性描绘成“圣女”“贤妻”“伟大的母亲”，把女人捧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度，实际还是在鼓吹自己的男权思想，贬低女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向歧视。就像陈丹青老师说的，“不让须眉”“女子丈夫”，中国人常拿这类屁话奉承女性，其实呢，主语还是“须眉”，还是“丈夫”，分明借此抬举爷们，哪里是尊重女性！

在国内，尽管有一小撮人一直在积极探讨两性议题，可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女性身上，仿佛女性们已经获得了不少平等的待遇。我们都忘记了那个最庞大的女性群体，她们在农村，有可能是默默无声的，不会在网上讨论自己和身边女性的遭遇，也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阎连科老师把镁光灯投向了这些生命，她们是土地最忠实的守候者，是家族里的连接人，她们有的是阎连科老师家庭里的女性，有的是采访的非家族成员的女性，她们正是被书写得最少的一群人。男性故事的代际相传往往被看作是家族、部落的历史，充满了脸谱化的英雄人物，而她们的故事，她们的欲望，她们的声音，总被排斥在“正典”之外，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

某些时刻，我感受到阎连科老师书写女性时流露出了愧疚和尴尬，有一股“原罪”感，尴尬的是男性群体带给这些美好个体的压制，愧疚的是自己也是深受其益的男性。能够自我怀疑的人都是善良的。不同于其他男性作家对女性奉献和牺牲的歌颂，老师笔下的这种尴尬恰恰才是对这些女性的感同身受，我也看到了老师的赤诚和不躲、不回避是需要勇气的。

有些奋力抗争而不惜代价的女人，颇有美剧Why women kill中的决绝，卷进命案来对抗命运的压迫，一个人要被推向多么不能忍受的境地才会逼自己如此冷酷凶悍。最令人动容的是，有些女性在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中实践着妇女解放运动、婚育自由，她们身上萌发着女性意识，在环境的矛盾中挣扎和平衡，她们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外婆和所有让我尊重的女性，相似的命运，相似的付出，应了老师的那句话——“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如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祝老师工作和生活顺利！

祝羽捷

羽捷：

读到来信，忽然有些哑然。

非常高兴你能喜欢《她们》。但说到书中的“女性主义”，其实有些超出了我写《她们》时的预感。所以，这些天面对围绕着《她们》的讨论，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常常觉得不知该怎样回答，总是如你说的那样，落入“愧疚和尴尬”。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直男。每每读你们的文章，都觉得自己是被淘汰的人，从学识到观念的狭隘、落后让我如蜗牛见了触动它的手，除了躲进壳里去，就别无行路了。你在信中提到从《她们》中读到了“自觉”“勇气”“里程碑”“原罪感”等，反而让我越发羞愧了。因为写作《她们》时，丝毫没有去想这些。唯一去想的，就是要把“她们”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去理解。而且这种理解非常原始和粗浅，觉得自己是人，“她们”为什么就低人一等了。自己能理解自己渴望被尊重，她们难道不是同此心理吗？虽然在书中也谈到一些“平权”“女性学”“第二性”“两性”和“多元性别”等，但初衷都是为了拓展散文写作的疆界去写的，真的没有想到我是在为女性主义说话和写作。

我是太迟钝的一个人，愚到常常在生活中成为别人的笑柄、人家茶余饭后的甜点或者开胃酸梅汤。就是说到书中的“尊重”，也是以我家的亲人为圆点、轴心的。首先把母亲、姐姐、嫂子当作“作为人的女人”——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是从这儿去理解自己的亲人、亲属、朋友和不相熟的那些女性们。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我的狭隘是在写作中没有消除的。但你说到男作家在写作中对女性的认识和塑造，我是深有同感的，而且觉得你说的就是我。稍一回顾就能看出来，自己这么多的作品，在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写了三个吧：一是女英雄；二是忍辱负重的所谓的贤妻良母；三是“贱女子”。除此似乎再无别的女性了。这一点，我想不仅自己是如此，我这一代的男作家，大约都是如此吧，不过我是他们中间的尤甚者。这样写的理由就是“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子”——这是我这样的人为自己的狭隘、无知找的理由和借口。我这一代的写作被生活经验拖累了。我们的现实里肮脏、沉重如一池黑泥潭，所以大家的作品都尽有污泥气，尤其在性别、爱和性的认识上，简直陈腐到如明清时代的人，连宫廷里数百年前的一棵老树上的灰叶都觉得是一种传统和美，真是腐到了如酸菜坛子中的霉菌样。

说起来你可能有些意外，我并不觉得波拉尼奥的《2666》有那么伟大，但在其第一卷中，当读到三个男学者因为都和女批评家有暧昧关系，而最后女批评家决然地弃他们而去，这三个人相聚在一起，几乎都表示尊重女批评家的选择。其中写到这些男性对女性的理解和尊重，不仅使我“意外”，而且使我震惊——我是从这个地方意识到波拉尼奥和《2666》之好的。意识到我们——中国男作家真的写不出这样的书，因为我们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腐朽，而且带着小脚与辫子的恶习。

羽捷，关于《她们》，关于女性主义，关于文学中的两性，我是真的粗浅、粗野到无法说。再次感谢你对《她们》的阅读和推荐，也还有许多问题想听你说，等疫情之后，希望请你吃饭听你细细地聊这些。

非常时期，保重！

阎连科

2020年6月19日

婴儿看着水仙花

通信人 黎戈 作家

能和一切忧虑对抗的，大概是某种鲜活的生命感吧。

小祝：

见字如晤……不过，真的坐在你对面的话，我该对你说什么呢？我见过照片中的你，精致优雅，有鲜翠明丽的时尚气息，或者谈谈女性境遇？时尚话题？那些话题很大，这短短一封书信的文字容量，只怕不够。我还是先从手边的小事、近期缭绕我的一些浮云心绪说起吧。我想说的，是最切身的话题：当文艺青年做了母亲。

我前些日子在看《坡道上的家》，比起文字，那直面困境的直白，倒更有价值。多少人是顺势做了母亲呢？应该多于主动选择的。相当一部分的女性，根本没把生孩子当成可选择的事情，等孩子来了，绝境之中的自己，像没学会游泳就掉进水里的溺水者。呼救有用么？倾诉有用么？没有，都是一个人咬牙捱过那无助的黑暗。

除了做母亲本身的辛苦之外，自我与他者的分裂才是更可怕的吧——做母亲的这些年，一直觉得真实的自我，被封闭在一个不远却难以触及之处，不敢也不能打开，像飞行中被塞进高处的行李箱。我想取下我自己，带着这行李冲出旅程，但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得克制这情绪，不能让孩子察觉我的倦意。敏感又懂事的孩子，会觉得我其实疲于母职，而这，绝不是她的错，在她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夜里醒了都不怎么哭闹，再没有比她更乖的小朋友了。

对于从事创作类工作、以高度自我为工作马达的人来说，分裂感可能更严重吧。在孩子小的时候，一手端着她的尿盆，一手端书或和他人打字聊文学，这种两难兼顾的窘境，在记忆中依稀远去，而新的分裂不断发生，最眼前例子，现在窗外正在下大雨，我的文青自我，立刻回忆起小时候背熟的李清照，夹在书里发黄的栀子花瓣，而母亲自我马上想到接送孩子，穿雨衣、带雨具的麻烦，接下来一天里，即使有了书本和写作的快乐，我的脚，也和孩子一样，穿在闷湿的雨鞋里百般难受……给她打伞，穿鞋套，但这对暴雨是没用的，她的脚，估计一天都是不那么干爽的，这个时时折磨着我。有了孩子，所有生命的负重都翻倍了，抱着的婴儿终归会长大走路，而心里的孩子是永远都放不下的。

最可怕的是，有了孩子，你就和社会最黑暗的一面牵连上了，无法靠书本屏蔽。往昔我无论多么倦于世事，只要一打开书本，立刻会平静快乐，而这个精神乐园，在孩子面前是没有用的，有了孩子，你就得化身为坚强的羽翼，要会和老师套近乎、受欺负时要会闹事、和其他家长交流或对抗……基本上是社会生活中让我最头疼的那些，都逼过来了，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孩子，是人质。我没法拿了稿酬去大理写书，春游看花，夜夜笙歌，不醉不归，带着黑啤酒的酒气纵情写稿。我得泼皮、得油滑、得讨好，只为了我的孩子安全和快乐，不受虐待。我被剪掉了翅膀，只能伏地而行，有时简直是被焊死在轰隆隆的社会机器上。

以前也说过：我作为母亲和写作者，是有内心冲突的，母亲这个身份的工具性，就是它是另外一个人的成长平台。身为母亲，我必须整理过滤，和主流社会秩序良性对接，把健康平稳的一面给孩子做安心的基石，而我个人，也是写作者必备的人格锐角、边缘化及微量毒素，一直是在被压制状态。但实际上，过于和谐无扰、一味求安的内心，是会走向沉滞的。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断地把自己从单一角色上拉开，让自己流水不腐，这样走平衡木久了，人也很累。

孩子给我带来深深的幸福感，丰富了我的生命层次，我对孩子这件事有抵触，更是因为对方所承受的生命自带的痛苦，而我未经同意把一个人带到这世界，这个责任太沉重了。每一步我都担心，怕没有尽到全力，而教育体制、生存大环境，都是我无法选择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糟糕景点的难堪导游。这种内疚也折磨着我。

那么，能与以上的一切忧虑对抗的，是什么呢？大概是某种鲜活的生命感吧。

小兔，你肯定见过几个月大的小婴儿，但作为母亲，我观察的距离更近，成像也更细腻。几个月大的婴儿，五官已经长开了，身体也非常饱满，给她洗澡时，你会忍不住想捏一捏那个藕段子一样的小胳膊小腿，忍不住想亲亲这个散发着乳香的小宝宝，对她说话时，忍不住想用重复词“吃饭饭、睡觉觉、小手手……”，哪怕是最严肃的人，也忍不住想做一些滑稽的动作逗笑她，因为那“咯咯咯”的笑声太好听了……太多的“忍不住”了，没做母亲之前，我不知道婴儿那小小的身体居然如此沉实，在我的臂弯里有沉甸甸的坠重……那是生命的分量，这生命，由我带来这世间，她让我和抽象的“生命”这个词产生了关联，我想，这就是让我无法抗拒的，对做母亲的向往。那种鲜活阐释的生命感。

这几天我看书，看到一句俳句，是“婴儿看着水仙花”，我一下愣住了，这是我看见过的，最洁净的句子，水仙是初开的，金盏银台，婴儿是初生的，小婴儿的眼神，像暴雨之后的碧蓝天空，无比清澈，是世界上至为洁

净之物，她定定地看着你，毫无戒备，眼神中无善无恶，只有交托和依赖，这世间，成年人都穿着厚厚的盔甲，只有婴儿不怕暴露弱点。这洁净不仅来自优美的意象，更是干净的信任，和初生世间的生机，婴儿，水仙花，它们放在一起……我突然扭过头去，觉得都接不住这话了。

让我们珍惜这些瞬间吧，那是生命珍贵的礼物。

祝好！

黎戈

2020年6月28日

黎戈老师：

你好哇！像我这样一个恐惧小孩的大人，读了您的信，竟被“婴儿看见水仙花”的意象温柔到了，内心像刚刚淋过毛毛细雨的苔藓，花软草软心软耳软，一塌糊涂。

恰好到了我这个年龄，身边的女性朋友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成为母亲，但我不能说她们就完全就过上了稳定的、似曾相识的生活，人各有异，这个可以晚点展开说；另一个阵营是坚决不生小孩的女性，人各有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生的铮铮理由。像我这样左顾右盼、举棋不定的人最危险，一边担心是马上就要错过女性生产的最佳年龄，冒着后悔的风险；一边是还未准备好无私给予的人生新阶段，杀气腾腾。自己纠结拧巴成一个毛线球。

我们中国人不论亲疏远近，很喜欢问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事，这是冷漠社会里的寥寥关心。每次有人问，我都老实地作答：还没想好。可惜真诚的答案并不能让对方满意，通过他们的眼神我得知自己受到了鄙夷。生与不生的争辩，宛如百年玫瑰战争。不站队的我举了白旗。我不喜欢有些人觉得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观点，仿佛女人是“行走的子宫”，也不能接受很多人把现实的不如意转为生孩子的动力，要靠孩子找到下半生的意义，通过孩子力挽狂澜，把培养和教育小孩当作自己的志业——生孩子完全是为自己，这样的孩子更像“工具人”而不是独立的生命。

多年前，我刚刚成为媒体人，采访过一位知名编剧，他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爱情剧。私下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个人的情感观，他说，喜欢跟杂志的模特约会，绝不和女文青谈恋爱，女文青虽不要名牌包，但更麻烦，老跟你谈感情。现在回忆起来，我可以改一个新版本，绝不和女文青生小孩，女文青太麻烦了，老跟你谈生命、谈生活、谈改变、谈意义……普通青年生

小孩，说来就来，再看法拉奇这样的女文青，身未生子心先远，给未来的孩子写了长达一本书厚度的信，并说这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个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每个孩子都会问爸妈：“我从哪里来的？”普通青年会说，石头里蹦出来的；文艺青年会说——爱欲与哀矜。

赞颂母亲伟大的诗篇太多了，法拉奇倒是说了大实话：“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不为别的任何人，我没有兴趣让你降生到这个世界，因为我完全不需要你。”法拉奇勇敢说出了女性面对怀孕、生产、哺乳的怕和困惑，我们都不是圣母，没有办法佯装成完美的、乐于奉献的女性。就像你在信中所说，做母亲既辛苦又要面对分裂。能看到做母亲背后的复杂性，而不是一味鼓吹有了娃多么幸福，这才是更理智、成熟的大人应该有的态度吧。

“文青”这个词已经被妖魔化了，大家觉得穿着棉裙和白球鞋，黯然神伤的就是女文青吗？有些人说，生孩子专治女文青的病。文青什么病呢？跟普通人相比，她们更加敏感、更加自我、更加批判、更让人捉摸不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各种神经质尽数铺开。我觉得这都是偏见，不要把内分泌紊乱的女人都归类给女文青。

前面说到成为母亲的阵营里，每个人有各自活法，也有不失想象力的。我常常和当了妈妈的女艺术家们去看展览，她们手上拎着一个娃，推着童车上一个娃，照样可以跟我喝咖啡、坐地铁、买画册，而不是印象中的母亲形象——只能围着小孩团团转地喂饭。必须知道一点，养娃也可以很有才华。我见到的许多女文青都很能干，既能捧读普鲁斯特，听柴可夫斯基，也能杀伐决断，疾恶如仇，还能修剪自己的花园，动手打家具，刷房子，换灯泡，跑医院照顾病人，去偏远地区支教，带孩子全球旅行……生个小孩就把文学、艺术的意义都抹杀了？读过的书就石沉大海了？我觉得文青们也没有那么脆弱。

读书和艺术的意义在于让一个人更加完整，一个感受力丰富的人也可以更有同理心，更知道如何处理个人与外部的关系，一个读书明理的人，也应该更有理解力，更有智慧。“文青”在今天尽管被污名化，我相信文青仍然是对自我和周围感知最敏感的一群人，他们会最先觉察人的处境和感受。我记得，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我要说的是，你生不生孩子都得挨锤，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一定轻松吗？只要活着，人就会年事渐长，就要面对千奇百怪的困境，每个人“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都说沧海一粟，人如蝼蚁，想来文青至少有一点好，对现实的失望可以在作品里获得补偿，可以把受锤的痛苦化成诗。想来女文青母亲也至少有一点好，普通母亲只能说“爱你呦，我的小孩”。女文青可以用一万种花式表

达，就像“婴儿看见水仙花”，就像“你是我人生最好的作品”——做母亲也需要足够的想象力。

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万种花式表达给心爱的人。

祝羽捷

女性的故事还要讲多久

通信人 辽京 作家

女人被这些美好的期望束缚住了，一代代传递下来，要质疑它，打破它，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辽京：

你好哇！

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小说集《新婚之夜》，它仿佛撬开了一块地盘儿，让人看到盘根错节的内瓢儿，千疮百孔，渗出的水全是生活的真相。婚姻和情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母题，但你不完全使用女性视角，而是用流动的视角企图用小说这门手艺抵达的生活深度，让人体会到人性的复杂。能在文学中看到多元的视角，读到以往男性叙事中不曾出现的内容，获得长久以来被主流视而不见的女性经验，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

有人说女作家总在写婚丧嫁娶，仿佛不关心历史、经济、政治等更宏大的主题，就像当年英国人嘲讽简·奥斯汀的东西是“茶杯文学”一样，在他们眼里，情感关系和伦理道德是次要的选题。公允的人看出这背后隐藏的是女性命运的不公，无论是穷人家早早当家的女儿还是富人家的掌上明珠，大多数女人不能出去工作，不能外出旅行看世界，受教育的机会渺茫，被劝阻求知，任何从事艺术和抛头露面的苗头都会被掐灭，走出家门，等待你的只有规劝、训斥、阻挠。

某些女人即便幸运得到教育的机会，不管多么才华横溢，婚恋、家庭、育儿是她们“应尽的义务”，她们不过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像圈养的绵羊一般总被囚禁在自己的卧室里，有着履不尽的家庭义务，在任务的排序中，自己的创作只能排在末位。喷薄而出的创造力也只能写写家中之事——不是女人的脑容量小，是赋予女性的空间太小。

在这局促的活动范围里，还是有那么多女性留下自己的作品，虽然署名很有可能是以“无名氏”或者男性笔名的形式，有些则被自己的丈夫或者其他男性冒名顶替。伍尔夫说：“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感知力一直都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中受到熏陶。人们的喜怒哀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始终在她眼前流转。”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曾表达过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们要一边纺线，一边低声吟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听上去非常说得通，女人把天赋和创造力在

屋内发挥到了极致，诗文机杼，深藏不露。

后来终于有人重新评估这类文学作品——权威的文学正典忽略了太多不同形态的生活经验，而历史的真相就在生活的褶皱里。家常人生永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艰辛，简·奥斯汀擅长在生活细节里察言观色，条分缕析，就拿她笔下的人物在婚恋关系中施展的谋略来说，一点不比战争、商业、政治中的逊色，其中博弈论的智慧堪比中国的《孙子兵法》。如果家庭是一个可以望闻问切的案例，我不禁要怀疑，倘若把这位女作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她也是一个伊丽莎白女王式的人物，何况她俩还有一个相似点——终身未嫁，有充足的实现自我的时间，才能尽显无遗。更何况题材不分高下，谁规定历史只能被战争书写，不能被生活记录，重要的是能否触及人类复杂的精神内核，研究简·奥斯汀的学者说：“战争可以过去，灾难可以过去，但人性中的崇高与狭隘，对爱、尊严与自由的追求，永远没有过去时。”

看过去女性的作品，我忍不住会想，这些作者在男性构建的准则中创作是多么不易，比起抢占先机的男性，她们必须要更加意志坚定，冲破枷锁，碾碎障碍，这也意味着她们必须更有才华、创造力。就好像同样是做雕塑，女艺术家手里握着的刻刀比男艺术家的那把要钝很多，只有技艺更加精湛，更勤奋，才能获得相同的成绩。

看男人写女人和女人写女人显然不同。男人的叙述中，总会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比如塞林格的《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里，像艾斯美这样出身名门望族的美少女，不顾身份的悬殊，像天使一样照亮了一个饱受战争折磨的美国士兵，她不但是这名男人的守护神，更是无数男人最向往的目的地，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来让自己感觉更好”。完美的女性形象投射了男人的欲望和恐惧，可这样的形象离我真实的人生太遥远了。我有时太木讷，有时太抓狂，更没有水晶般的外表、小鸟般悦耳的声音和甜美的笑容，我早就放弃成为男人喜欢的样子，这种勇气和自信得益于在女作家的书里获得鼓励和安慰。

性别问题一直是危险的试金石，常常我喜欢的男作家、男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犯错。我喜欢看女作家的小说，喜欢女艺术家的作品，喜欢看她们是如何描绘世界的，她们有着和男人不一样的视角。总体来说，我们的价值观是男性建立的，文学和艺术的标准亦是如此。放眼望去，市面上的女性创作者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就拿艺术来说，“女性只有裸着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这样的疑问一直困扰着走进美术馆的观众。艺术史中，与女性有关的角色、主题、场景无不反映着女性的地位以及男性是如何看待和想象她们的，男性视角占据着艺术史和美术馆的主导地位。用艺术讲述女性的故事，把对女性议题的

公共思考赋以诗意的表达。

20世纪60年代，女性研究几乎进入所有学科，琳达·诺克林于1971年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是女性主义首次在艺术史中发起的挑战，并探讨缺少伟大女性艺术家的深层原因——性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历史上从不真的缺少优秀的女性创作者，缺少的是被发现、被看见、被正确评估。

有时在社交媒体上为女性呐喊太过尖锐，容易引火烧身。有一天，有个女孩特别激动地给我看了一些女孩的绘画和手写稿，我和她曾经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为武汉和黄冈的女性医护人员募捐过卫生巾、安心裤，也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我们各自持续地关注女性议题。那些作品多以插画为主，作者多是艺术的局外人，可她们通过画笔讲述出了自己作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遇，透露出恐惧和不安，我相信这些作品是她们情绪的出口，是心上伤口的创可贴。

这让我重新燃烧出做艺术展的勇气，在这个追求艺术好看和艺术卖钱的时代，不要忘记，艺术不是为了艺术，不是只为了美，它可以无声地鞭打灵魂，甚至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出现就是因为人的痛苦需要一个出口来疏解。

我忙活了这大半年，就是想要策划一场把主体性还给女艺术家的展览，它是艺术家们的女性叙事，也是我冲锋陷阵在一线的叙事，更是参与其中的所有女性们的集体叙事。我们请到了十二位女性艺术家，她们成长与境遇各不相同，她们各自在自己的艺术家生涯里探索身份、职业轨迹、性别意识、文化藩篱、意识形态，用不同的艺术语言、媒介、表达方式呈现她们的观察和思考。

住在上海的艺术家庄欣一口答应我的邀约，我在美术馆里划出一个区域给她做装置，她的灵感来自1928年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以此延展做了一个女性的沉浸式的空间，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是女性内心的空间，也是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100年后的今天，女性的空间问题和男女对话的姿态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女性面对不断被压缩的话语空间，不曾放弃寻找自己，获得平等对话的可能。如今我们有了新的房间——赛博空间。网络赋予了我们发出声音，争取获得认同的可能。新的网络词汇与口号同时体现出我们共同的处境。但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体会了被淹没、被曲解的力量。看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遭遇的污名化，赛博女性主义面临的也不是一片坦途。我们希望每一位观众走进陈欣创作的空间里，有短暂的澄净时刻思考一下自己与空间的关系。

另一位女艺术家柳溪的作品一瞬间就直击了我的心灵，她的作品初看上去

并不复杂，这个以《妈妈》为名的装置系列是一排形态各异的搓衣板，我小时候就见过我妈撸起袖子用木头搓衣板戳在洗脸盆里洗衣服，特别吃力，每回都要出一头的汗。搓衣板很容易就跟母亲的职责联系在一起，是永无止境的家务劳动的象征，仿佛所有人的衣服和门面都在靠这一张小小的搓衣板决定着，可我们从未好好凝视过这张不起眼的工具，搓衣板映射了每位母亲对家庭无条件的爱。艺术家把精湛的雕刻献给搓衣板，赋予它们一种新的美感。柳溪走街串巷收集了中国过去不同的老旧搓衣板，有着各种各样的肌理和时间痕迹，磨损的表面如同人类老化的过程。白瓷铸造的木质搓衣板曾经在中国普遍使用，像古代的纪念碑一样挺立着。但这些脆弱的纪念碑上没有任何铭文或墓志铭，但它们无声胜有声，是粗糙、风化的山脊，妇女们曾经在这些山脊上搓洗过衣物。

我从来不希望男人和女人成为两股对抗的力量，我们需要相互理解和体谅。艺术的裨益在于，我们不需要把心中的表达全部倾诉，就像每个观众看到不同的搓衣板自会联想到自己不同的生活经验，任乡愁自然流淌，有人想到母爱，有人想到童年，有人想到无私的奉献，有人想到饱经沧桑。

前人书写的女性故事我们未必买账，也未必符合现在对性别问题的意识觉醒。希望我们留住这种思考，身为女人不忌讳表达女性的故事，摒除视野中的男权滤镜，最终超越性别、超越一切的视野，找到人类共同体之间爱、治愈、成长的可能性。

祝羽捷

祝羽捷：

去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编辑老师说，这本书在营销上的一个关键词是“女性”，因为这本书里的故事大都是围绕着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在此之前，我对媒介上的热点话题并不了解，甚至更早以前，我对女性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过多少不公正的规训，几乎没有任何认识，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自己来自一个普通的传统家庭，我妈妈认为家务主要是女人的任务，做女人要温柔，要轻言细语，要多理解对方，尤其是对待男人，不要跟他争论，总之，要学会忍耐，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心性平和的人，听到这两个字就不耐烦——假如家庭生活的要义在于忍耐，又何必结婚呢？

至于重男轻女这个网络上的常规议题，从前，我一直觉得离我很远。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她非常疼爱我，是那种一个人一生只能得到一回、再也无法重现的宠爱，直到我奶奶去世后，有一次跟姑姑聊天，她说，你奶奶最是重男轻女，并举了很多她成长中的例子，她和我爸爸、我叔叔之间的待遇差别，说起来依然愤愤不平，以致她认为在照顾老人的问题上，儿子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奶奶，20世纪30年代生人，

解放后进工厂，和男人一样干体力活，挣工资，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妇女解放典型例子的人，依然认为男孩比女孩更重要。从经济上看，我奶奶到了晚年是完全独立的，有退休金和医保，足够让她过得不错，不用儿子养活，但是她的观念呢？经济独立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热热闹闹地谈论女性，二十怎么样，三十怎么样，四十又怎么样，可能过几年就冷清下来，市场转向新的热点，但是女性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一些短篇小说里，我写了几种状态的女性，她们有痛苦，有迷茫，有恐惧不安，也有决绝冷静，她们不是读者希望在故事中看到的女性榜样。讲故事的人向来有造梦的传统，塑造一些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一段短暂的梦境，梦境往往映射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现实，好像平常灰头土脸的生活只要好好打扮一下，就能焕然一新，显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但是我认为女性问题的复杂与深远，绝不是换个说法、换件衣服就解决了的，甚至当我动笔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也没意识到这些文字会被纳入“女性叙事”的框架里，编辑跟我聊的时候，我想：有意思，女性叙事要加上“女性”两个字，男性叙事就不必特意指出来，是天然正统。

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现实，是由男性的视角来构建的，女性往往意味着非现实的那一面，是被美化的偶像、被神秘化的自然，这是波伏娃在半个世纪前的观点，放到现在依然成立，一方面证明了学者的洞见，另一方面也说明真正的、实质性的进步非常困难。

同时，作为一个女人，去谈论女性问题就好像小猫在追自己的尾巴，看得见问题，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被规训过、被调教过的思维方式很难摆脱，就怎么也追不上那个答案，可能一开口就是陈词滥调，比如“独立的前提是经济基础”，非常正确，然后呢？我奶奶、我妈妈都是有经济收入的女性，过了大半辈子，她们获得了多少思想上的自由和行为上的独立？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我奶奶退休带孙女，现在，2020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以上的退休女性在做什么？还是带孙辈。在我身边观察到的这些阿姨们，大部分都是有收入，有住房，是不需要丈夫和儿女养活的，她们有自由吗？有人会说，“含饴弄孙”是中国人的传统，天伦之乐，求之不得，但是我也不止一次地听见这些阿姨抱怨，说带孩子好累，想回老家去，或者，想跟老伴出去旅游。对于这些老年女性来说，我们是不是用一些优美的修辞来掩盖了利用她们的本质呢？为后代发挥余热是一种选择，把余热留给自己，是否也是一个选择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当代的、科技的、先进的物质符号，但是，挣扎着生存，彼此互相依赖仍然是普通家庭的常态，当然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人情味，是优良传统，值得称颂，好像亲情就是一切的答案。我不想在这里陷入具体的争论，比如父母要赚钱，老人不带孩子谁来

带之类的两难问题，这涉及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投入，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看到这样的图景：大量的老年女性，直到晚年还在持续地劳动付出，而不是送她们一顶高帽子就略过不提了。

林奕含生前提过类似的问题，质疑被华丽修辞掩盖的欺凌和罪恶。除了两性关系，在女性一生中，类似的情境还有很多——赞扬的背后隐藏着道德规训，“乖巧”“温柔”“懂事”“好一朵解语花”，这些看似美好的形容，夹杂着锁链的回响。女人就被这些美好的期望缚住了，一代代传递下来，要质疑它，打破它，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个女人，那些道理从小听到大，耳濡目染，不知不觉被塑造成今天的模样——生活在海里的鱼，不会觉得水是牢笼。而性别的自然差异是无法消弭的，那么，如何在差异中寻求新的平等？如何在习惯中发现问题？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质疑是天翻地覆的，你得质疑自己的外婆、奶奶、母亲、姐妹，继而质疑当下的评价体系，经历这个鱼儿跃出水面的过程。对男人来说，现实来得很直接，世界是自然而然的、无须怀疑的存在，但是对于女人，重新发现自我是一件曲折甚至相当痛苦的体验，有点像费兰特所说的“界限消失”，意识到世界原来是这个模样，迷障消散，显现出复杂狰狞的本质。

一般来说，男性从小生长的环境，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是统一的，没有割裂。一个男人只要在社会上取得一点成绩，赚到一点钱，就被默认完成了家庭责任，而女人，尤其是经济独立的当代职业女性，要被社会和家庭两个维度同时衡量，两边各有一套标准，总有毛病可挑，很多女人被困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评价里，疲于奔命。同时，我们又习惯了一套接受型的学习模式，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看得见的权威是老师和家长，看不见的权威还包括整个社会的传统和习惯。在国内，女性主义其实搭载了很多反对传统、质疑现状的情绪，相对于其他领域，女性遭遇的不公是显而易见的，一半人类都经历过，容易产生共鸣。

回到我自己的疑问。被定义为一个书写当代女性的作者，我一度困惑，这究竟是一个文学标签，还是一个单纯的性别标签？现在看来，分类并不重要，无论是透过性别议题去触碰文学，还是透过文学去展示女性的生活图景，都不影响我继续运用女性视角的冲动。曾经，我认为一个家庭主妇跑去写小说，也是一个文学问题，不属于性别话题的范畴。现在我意识到，女性的故事并不是讲得太多，而是太少，太缺乏深入的提问和思考。在这条路上，我们理应走得更深、更远，有些话还要一遍遍地说下去。

辽京

2020年10月24日

女人首先要穿得自由

通信人 **Catie** 媒体人

最高级的自由是，即便我们心里有各种想法，但眼里依然容得了别人。

Catie：

你好哇！虽说咱俩算交流频率很高的朋友，但还是很想以书信的形式和你再次探讨时尚与美。最初知道你是因为你的时尚专栏，我很早就开始看时尚杂志了，得益于我的母亲，她刚好帮学校订期刊，借此机会查遍了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各种时尚杂志，包括一些日本时装杂志。我家既有缝纫机，又有锁边机，地上常常散落着过期的《南方周末》（用来练习打版）、布料、卷尺、三角形的粉笔……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是裁缝铺，晚上她就咚咚咚地踩着这些机器，按照杂志上的款式做衣服。因此我天然地对时尚有一种亲近感，尽管母亲同时指出“一个女孩长得好看是没有用的，热爱打扮会耽误学习，什么都比不上读书”。我就在她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中长大。

最近我看了《意大利制造》，重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时尚杂志编辑部和时尚产业，不得不说，时尚仍旧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行业。这部剧在情节上和《穿Prada的女魔头》有点相似，都讲了原本一个清汤挂面的女大学生，如何阴差阳错地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如何在这个光鲜靓丽的行业自我成长，不但成为时装精，还在事业上证明了自己能力。虽然我很不喜欢编剧们总把时尚和励志这个主题捆绑在一起，不过这部剧无论从色彩、设计、妆发、城市都特别养眼，可以看到意大利人的美学传统，还能学到意大利人的时尚历史和产业链，更让我意外的是，编剧巧妙地加入了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对这个产业的影响，这点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女性每一次着装的革命其实都是意识形态的革命。

每次看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剧，都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小姐站在自己的闺房，女佣在她身后用力拉扯她的塑腰绷带，直到她接近无法呼吸。这个惯用的镜头无一例外地用于表现女性被束缚、被压抑的社会地位。束腰对女人更大的伤害是健康，无数的女人因为束腰造成盆骨变形，甚至死于难产。这种要求显然不是来自女性内部本身，而是来自外界对女性的期待，也反映着女性是被观赏的“他者”，外表是用来取悦男人的。

我想，女人要想自由，首先要解决的是穿衣自由。

就连女人可以穿裤子这件看上去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当年都引起巨大争端。19世纪有不少女性提倡女人脱下笨拙的裙装，像男人一样在公开场所穿上裤子自由活动，完全出于实用的考虑。美国的伊丽莎白·史密斯·米勒（Elizabeth Smith Miller）在1851年为女性设计了裤子，但是这种裤子是将裙子改良，膝盖以上是裙子，以下是宽松的裤子，有点像今天的灯笼裤，这模糊了女人穿裤子的直接愿望。社会不允许女人穿裤子，因为认为女人露出双腿是公开的引诱，不守妇道，有伤风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穿裤子的女性叫玛丽·爱德华·沃克，她是美国的一名女军医，在美国内战时期因穿裤装被捕，闹到了国会，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允许这位女军医在工作时候穿裤装，而其他女性穿裤子上街依然会被警察逮捕。若不是后来经历“一战”“二战”，女性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穿裤子这件事还不能得到应允。

去年一群日本女性发起了名为KuToo的运动，KuToo既和日语读音中的鞋子（kutsu）很像，又和日语中的苦痛（kutsuu）读音很像，它将高跟鞋及其所带来的痛苦关联在了一起，她们发起这场运动的原因就是为了呼吁雇佣者不要强迫女性穿高跟鞋，因为在日本很多公司都有成文的规定——女性都必须穿高跟鞋。这显然是带有歧视性的，为什么女性不能在工作场景中穿平底鞋，为什么女性没有选择鞋子的自由，这跟现代裹足有何本质区别？我想日本的公司强调女性穿高跟鞋，跟维多利亚时期强迫女性束腰是一样的，那就是强化女人的“女性气质”。

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弥漫的观点是“女孩热衷打扮是肤浅的”“长得漂亮的女孩成绩一定不好”……因种种原因，观念进步的或是资本推动的，这种偏见已经部分消除了，大家意识到美是稀缺资源，追求美可以变得光明正大，甚至消费主义恨不得时时鼓励你打扮，不断买买买，很多商家感慨女人的钱多好赚啊。

可惜的是，我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还是在强调“女性气质”，可惜东亚男性追捧的白瘦幼审美恰巧我就很不喜欢，所以中国流行的女明星我也觉得很无趣，媒体经常用“纤纤细腰，不盈一握”赞美那些女星，让人产生怜爱之情，保护之欲。但我始终觉得这种审美完全是为了满足很多男性的意淫，他们在这种没有攻击性、高服从性长相的女性面前更有控制感，更自信。我也受不了“傻白甜”的装束，很多女性为了得到保护和喜欢，只好扮演无脑、单纯、简单的形象来取悦男权社会。

另一方面，一些获得权力的女性为了得到重视，保证自己的权威感，不得不去模仿男性，比如希拉里、默克尔这类女性，她们一定会穿裤装，还会请人来培训自己的声音——压低嗓音，因为人们不习惯将女性嗓音和专业性关联，女性嗓音有着感性、不理智的刻板印象，她们为了获得更多支持，不得不模仿男性的着装和发音，让自己看上去更深沉、更可靠。人们

真是矛盾啊，喜欢“女性气质”，又贬低“女性气质”，如果我们总是考虑别人希望看到女性的样子，自己都会殚精竭虑。

每一种文化符号都附着着社会的刻板印象。就像很多人认为良家妇女就要穿裙子，女知识分子就一定不修边幅。一个独立的女性应该是怎样的形象，一个知识女性应该怎么穿，我们很难找到丰富的样本来参考。到底是谁决定了时尚？是设计师们吗？是大品牌吗？无论如何，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在合适的地点穿适合的衣服，穿对一件衣服也能让原本黯淡的一天焕发光彩。时尚没有那么肤浅，我们都喜欢跟好看的人在一起，我们都希望交换审美和发现。

祝我们都能穿得自由！

祝羽捷

2020年5月9日

羽捷：

展信佳。读完你给我的信，抱歉许久才回复你，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个话题可能聊起来并不轻松，关于“自由”的讨论，问一个水瓶座，那可能真是问对人了，我知道对于女性穿衣自由的讨论，应该是源于前不久发生的种种社会事件，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和注意，那我不想说过多冰冷的理论，或者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不想说这些，看到信中你提到你母亲和你所说的那句话，“一个女孩长得好看穿得好看，是没有用的，热爱打扮是会耽误学习的”，我感受颇深，看来我们有同样类似的经历呢，那我就来和你讲讲我的故事。

作为一个在北京传统家庭出生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妈妈和老师可能对我经常感到头疼，妈妈经常说我不像她，怎么她的孩子并不是品学兼优的学霸，反倒是别的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兴致”。比如在周末那两天去学校补课的时候，学校是允许大家不穿校服的，也就是所谓的“穿衣自由日”，这让我高兴极了，终于可以不用穿那套青绿色，且并不合身的衣服了，于是乎，我记得第一天我穿了白色的上衣，和浅驼色的下装，还搭配了一条腰带，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干净清爽极了，哼着歌儿就去学校了，到了学校，我成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老师随之警告了我，可以不穿校服，但不代表可以穿得太过“好看”，心思要多放在学习上才好。被批评的那一刻，我真的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觉得自己在老师心里一定是个坏女孩儿了。

你能想象那时候小小的我，听了老师的这些话，心里有多么沮丧吗？这也是我第一次遭遇我原来是“没有穿衣自由”的事件，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她

要用她的审美力来试图控制我呢？接下来我发现其实无论我穿什么，老师还是会不满意，甚至叫来过我的父母沟通这件事，后来我决定，那好吧，那我就穿得邋遢一点，让老师满意一点吧，当然我上学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这个故事可能会令很多年轻女孩觉得不可思议，但特别希望现在女孩儿们从小就可以拥有穿衣自由以及审美自由，我那个时候也下定决心，如果未来我有女儿，我一定会好好培养她的审美力，给她这个自由，也许未来还是会遭遇被老师喊到学校训话，但希望作为父母，可以正确引导和鼓励到自己的小孩，跟她说一句：“孩子，你今天穿的确实很好看，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拥有审美力绝对是一种能力，也是在我们小时候严重缺失、甚至刻意回避了的一堂课，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女孩子们，从小生活条件就那么好，可以有广阔的视野和更多选择，更加明白我们传播美、展现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美，其实是最大的善意”。

你说有时候女性为了让男性产生怜爱之情，保护之欲，从而故意穿着“傻白甜”的装束，她们往往会显得具有更加的高服从性，以及没有攻击性；而另外一类女性，为了显示自己在自己行业内的权威感，会穿着得非常“坚强”，而失去了应有的女性之美，看完这一段我想起了曾经一位前辈讲过的话，一个女性穿什么有那么重要吗？事实上我很欣赏这句话：“一个人的精神需求越大，衣服越重要，因为你穿的衣服，在滔滔不绝地告诉别人你是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心里，她们对自己早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了，知道自己需要在社会以及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她们会一直往自己期望的方向去装扮自己，这个现象挺常见的。

我觉得我们不如这样看待这个现象，只要这两种装扮能带来美的感受，她们就都是合理的，每一种穿衣方式，到最后如果可以回归到让旁人感受到美和舒适，其实也无所谓她选择了什么风格，比如眼前的这位女性，即使她穿着强势，但同时，竟然令我们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舒适，那我觉得这个人，是真正的穿衣高手，这样聪明绝顶的女性，我想到哪里、做什么工作都不会差到哪儿去，那反而一个人再穿着盛装，再艳丽，但无法令旁人感到舒适，甚至她自己的伴侣站在她的身边都觉得有点尴尬，有种想尽快逃离的愿望，这种就有待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一切看似发生得悄然无息，但就是发生着，存在着，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

对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吃晚餐，我从包里拿出一本小小的《金刚经》，你当时吓一跳，笑我说：“真是不可思议，你一个这么时髦的人，从包里掏出来的竟然是一本《金刚经》。”我当时心想我哪里时髦了？我明明就是一个比较老派，且更加崇尚classy的人，哈哈，但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起，才逐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吗？就是在读完《金刚经》的那段时间，唯有做到事事不执着，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比如我小

时候执着于“我要穿的好看”，到后来经过老师的训话，又变为执着于“我要故意穿得不好看”，其实这都是我还没有真正自由的表现，看来自己真是愚钝了，执着于执着，和执着于不执着，都是我并没有放开自己。这里想说的，不是就此推翻我前面的故事和想法，而是觉得根本不用使劲去想，我们是不是在拥抱自由了，只要我们开始去琢磨，去想了，其实还是不自由，起身去做就好。

行，写得差不多了，最后这句作为结尾吧：最高级的自由是，即便我们心里有各种想法，但眼里依然容得了别人，因为自由，是你有你的自由，她也有她的自由，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自由，去限制别人的自由。这条路对我们大家都还很漫长，咱们一起慢慢体会吧，结果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过程其乐无穷。

挚友Catie上

2020年5月29日

30岁就是那道帮人顿悟的光

通信人 赫恩曼尼 媒体人

二十岁立下的誓言，三十岁再看更像是一句天真的玩笑话。拼尽全力抵抗的事物，最终变为你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剥离。

亲爱的羽捷：

我们俩属于那种“神交”已久的网友，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谈。原因除了机缘不凑巧之外，大概是由于我对见面这件事略有惶恐。那种感觉相当微妙，就像互相欣赏的诗人宁愿将情感倾注在诗行里，却对于面对面的交谈心有戚戚，唯恐稍有不慎打破了先前的意境。

毕竟在生活里，我是多么粗糙的一个人啊。从不化妆，不喜欢费力气挑选新衣服，讨厌逛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尤其害怕商场里簇拥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恐惧暴露在任何人的审视之中。这种心态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拒绝一切矫饰的事物，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交谈；神经质一般疯狂地阅读，渴望就此沉潜入内里（虽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宜人性特别强的人）。

更多时候，外在的粗糙并不使我困扰。真正困扰我的是粗糙之下的敏感，对于环境的敏感。昨天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去做检测，检测的机器发出“立刻隔离”的声音。隔离的地方全是上下铺的硬板床，只有一个单间，里面住着一个作家，房费一天800元，他付得起。其他的床铺一天180元，大部分人就睡在走廊里。进入隔离区的第一项任务是拔牙，医生说治疗后期会使用激素类药物，牙龈容易发炎，所以牙齿必须拔掉。我被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按在椅子上，牙被生生拔掉了。

我偷溜到院子里找水喝，遇见一群放了学的孩子。饮水机发出阵阵鸣笛，示意我是感染者。孩子们大叫着四散而去，而我落荒而逃，逃回隔离点。路上远远看见我的同事和领导，我朝他们大喊：快告诉我家里，还有本周安排的工作做不完了。他们朝这边看了一眼，没有回应，渐渐走远了。

我回到隔离点，订了些水果吃。送水果的外卖小哥低声说，按规定必须提供证明，证明这个水果不会流出去，不然他没有权限将水果送到我手里。我到处找人开证明。可每个护士和管理人员都在忙，忙着打针，安排床铺。后来因为发热，我再一次从房间被拖走。拖去哪里呢？只听见打头的

说：“去消灭。”

我从梦中惊醒，许久回不过神。

细想这个让人焦虑的梦，若是放在半年前，里面的词句和情节大多不可理解（从这个层面，我们的现实也在创造着语言）。可在眼下却如此真实。梦暴露了我的弱点，我的恐惧，那大概就是一股无可阻挡的洪流，将渺小的个体裹挟着向前，不辨方向，不明就里。而个人却因某种不可抗因素彻底丧失了选择权，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被永久地湮没。

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我始终都在对抗着同一种忧虑，而这份忧虑在大多数人看来无非杞人忧天。我忧虑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的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发现那时我们聚在一起，聊的都是薪资、房价、交通、让人倦怠的工作、没有意义的重复；还有户口、房租、人际琐事、结婚、养孩子、无价值的争吵、无能为力的现状。我们一天也没有聊过诗意的东西，聊聊比现实更深一层的困惑，也没能掌握一丁点除了自嘲以外的幽默。我们就这样在最该享有自由的年纪，将自己从头到脚所有的一切拱手让给了现实。

为了纾解这种忧虑和恐惧，我写作，写下的东西既不成熟也不值得宣扬，因而只能勉强自称为“写作者”。我常常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个年代可留存的实在太有限了。日日生活在无历史的城市之中，不谈政治是一种奢侈（It is extremely luxurious for a third-world country to be apolitical），谈政治却又会跌入另一种身份的危险。推崇纪实的平台拒绝个人感受，只想要赤裸裸的“真人真事”，哪怕是单纯为了创造戏剧性而编造生活的谎言。小说期刊又拒绝写实，讲述太过平凡的人生等同于无创意和人云亦云。读者们的神经被种种刺激物即刻填充——歌曲高音、搞笑综艺、造星节目、鲜艳却无深意的电影画面——书籍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再是必需品，人们宁愿花上千元买衣服、化妆品、游戏，却对几十块钱的书哭穷喊贵。出版业渐渐走向夕阳末路，编辑们转向视频、直播、营销活动。作者和翻译拿着低廉的稿费混沌度日。书店在死亡。文化挣扎求生。

虽为写作者，却时时刻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拒绝给读者提供鸡汤式的慰藉，被要求不能写太过严肃的现实，裹在学术的语言中太过虚伪，创造流行又毫无天赋。我常常惊异于网上的朋友们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仿佛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而我却常常感到漂泊、疏离、无力。也许对于文学我奢求得太多，又付出得太少。一面无法在灰呛呛的现实面前背过身去，只将文学诉诸文学；一面又羞于构建同盟，研习技法，开拓文体。也许我是个太不坚定的人，所以才一直围绕着一个我假称为“文学”的柱体徒劳地跑圈，写着不像样的玩意，还跑到美国读了一大堆文学理论，回到这里又无处落笔。

每个时代的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抱怨毫无益处，只能徒增失望。如果受困的窘境是必然的命运，那么从夹缝里生出些花草，哪怕不够繁茂，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不到不代表不想往。我是这样期求着生活下去的。

那天夜里下了班，车子在雨中疾驰于北京的公路上。桥两边是看不清的密林，无人的楼宇，看不见灯火，唯有滂沱的雨。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人是如此微茫，渴望创造的冲动常常被人群吞没，一个人的步履不时被这座城市的节奏打乱。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在我之外，在我目光所及的范畴之外，那些同龄人、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如何生活的。那是我无法想象的图景，也是笔力不可及的地界。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三十岁了。不知道为什么，女性的三十岁总被赋予过分沉重的含义。也许也是受了这种影响，我在二十九岁时不停创造着，希望能在额外的压力到来之前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人生还很长，不是吗？为什么急着把自己交付出去呢？

无常。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此刻所想，就是这两个字吧。我曾经执念的风景，因为疫情的缘故，好像再也无法抵达。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原以为如此重要，也在时间洗刷过后，如一颗颗沙砾漂向看不见的海面。二十岁立下的誓言，三十岁再看更像是一句天真的玩笑话。拼尽全力抵抗的事物，最终变为你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剥离。

人的韧性大约永远无法一夜之间被整治。

所以还是要继续创造下去啊，哪怕你创造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倾倒，只剩一片废墟。但创造的过程，让你更加珍惜自己了。

祝我们都能不停创造着。

小畅（赫恩曼尼）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亲爱的小畅：

你好哇！这半年来，我几乎不怎么出门，见的人也很少，却意外发现跟朋友们的交往更深了。十年前常常聚会的朋友们，各自有了新的人生轨迹，见面不如怀念。开始通信以后，彻底突破了地理限制，踢走时差，想写就写，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

每每读到朋友的文字，我就像喝了一杯热乎乎的抹茶，从喉咙一直暖到心

窝，不少心中的困惑迎刃而解，更事半功倍的是，不少如打了扣的绳结的郁结问题，竟然在自己写信的过程中，兀自松开了。我拊掌大笑，恨不得拍自己大腿，有谁还要找我排忧解难，星座、塔罗牌、摇卦、占卜都已经不时兴了，唯有相互写信。

本以为这一年自己要扑街了，没有收入还是次要的，不能去美术馆，不能出远门，我进行了十年的逛美术馆游记和连续做了三年的英伦纪录片统统搁浅，我变得无所事事。还好换来可以沉浸阅读的意志，让人精神变得很饱满，面露红光，这气色有点配不上我忧国忧民的辛勤。在这许多世事如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岁月里，时光流淌，这些通信应该是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的境遇下，人都能找到抵挡艰难的方式，可能是兴高采烈的，也可能是丧丧的。

我常常回望，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到底在惆怅些什么，睁大双眼对着天花板，总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惆怅的课题真有点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也让我颇感失望，因为没有一件是值得说出口的大事，就像你天天龇牙咧嘴地喊痛，不过是拔了一颗智齿；就像你气消了，却记不起来到底为何跟老伴儿拌嘴。

青春过剩，人在多愁善感和踌躇满志间翻腾，常常跟自己莫名其妙地置气。

身边不少人早早就确立了自己要走的路，相比之下，我特别笨拙辛苦，不停变化频道，尝试了许多，失败了很多次，最后决定管理好自己欲望，做一个自由的创作者。我的青春就是个骗子，除了谈恋爱还算有收获以外，很多东西后来都被自己一手推翻了。

不过呢，人过了三十岁，好像一下松弛了很多，也不着急了。过去我总不满意时间像水一样从身上流过去，什么也留不下，我想要个说法，求个明白，渴望意义，寻找意义。现在我笑着叹息，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就让它保留成问题吧，没等来的本就不该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失去的也不属于你，你甚至连还没愈合的伤口也不想治愈了，让时间来结痂。就像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里说的，“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

Let it go！你不会再想横腰斩断一条河流，泥沙俱下，你愿意放手让河水奔走。

我想到古英语有个词叫“Uhtceare”，翻译成中文是“凌晨焦虑”，是因为英

国人老早就发现一个不可言状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会在黎明前被担忧和悲伤的情绪笼罩，脑子里像在跑火车一样，一节节车厢里装的都是不雅事，阴魂不散，这种焦虑解决不了，你只能干瞪眼，奇妙的是，迎来破晓之光时，人竟会自动治愈。人生没有一个阶段会让你完全好过，各有各的烦恼，我想青春的忧伤不容易解构，可能就是生命中的凌晨焦虑吧，三十岁就是那道帮人解脱的光。顺着年龄渐长获得的福利这条思路延展，等到我们老到骨质疏松，各个关节晃动，荷尔蒙不旺盛，就什么也不愁了，每天裂开掉光牙齿的嘴笑，活着就好，尽情撒欢儿。

我上面写这么多可不是说，我们可以游手好闲，可以不劳而获地等待。人最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的就是年龄，我们需要在与自己和解之前，不断去体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尽量避免套路化的东西，选一条风景有趣的路，跌倒也是迷人的。

我欣赏的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成名前是古根汉姆美术馆的油漆工（从他的作品里能发现他早年的职场经历），他拼命生活，拼命爱，拼命喝酒，偶尔画画，四十四岁死于车祸，大祸临头时他醉得不省人事。我竟然有一点羡慕他醉生梦死的人生，顺手把梦想实现了，而不是像我这样每天为创作的事诚惶诚恐，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说服自己。

一类创作者，埋头干活，无问东西，不纠结意义，不刻意追求深刻，让作品自己说话。一类创作者如我们，想得太多，总有卸不完的心理包袱。第一类越来越少了，因为在这个时代要想避免信息和干扰太难。特别是像你所说，你是一个宜人性很强的人，这样的人会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更加敏感，对人有同理心，很难不对周边做出反应。就算不是创作者，你不关心外界，你避免政治，它们也会化身成各种样子，把手伸向你。每当我义无反顾介入现实时，看到身边竟有几个不畏风险的兄弟，内心就坚定了许多。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不是愿意装睡的人。

没有所谓正当的生活，也没有最好的时代，我们没有必要为此焦灼，但如果无法避免焦灼，那就享受焦灼，一半寻觅，一半抵御。

愿我们都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参透。自媚的话说了很多，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原谅自己，但我也接受，也认了，这是现在这个年龄给我的进步——不接受自己的时候，也能理直气壮。我会好好祝福你的三十岁，欢迎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

祝羽捷

任何微小的美好都不容小觑

陈晓卿 石康 葛亮 韩松落 赋格

开始照料花园后，

你对过去过分看重的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但你不会再对弱小的生命和细微的变化熟视无睹，

世界上任何的微小美好都承担着琐碎、坚信甚至沉重，不容小觑。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吃货也蛮好

通信人 陈晓卿 导演

越是长大离家后，越能感受好好吃每一餐饭的重要。

晓卿老师：

你好哇！很久没有跟你一起大快朵颐地吃肉了，虽然见不到你，你的名字总会在我举起筷子的时候出现。比如在兰州的烤羊肉店刚刚拎起一只流油的羊腿，众声喧哗中，老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站在我身后得意地说，嘿嘿，我们的店可是被《舌尖上的中国》拍过，陈晓卿亲自吃过我们家的羊腿。第一次听到店主这么说的时，全桌的人都忍不住伸出大拇指，为厨师鼓掌。去的地方多了，越来越多店言之凿凿，都说自己被拍过，有的还要吵起来，说别人是狸猫，自己才是真太子。

我忍不住想，原来一个人的味蕾有这么大威力，不但可以验明一名厨子真身，还能决定一条产业链的兴败。我记得詹妮弗·洛佩兹为自己的身体买了保险，特别为她的“臀部”购买了高达3.5亿美元的保险，当仁不让是当今最贵的臀部，晓卿老师也可以考虑为自己的舌头买份保险，无可厚非。

我们总要想到食物，讨论食物，不过因为只要活着就会感受到饥饿，莎翁说了“食欲是一匹无所不在的狼”。饿的时候不能谈恋爱，不能工作，不能思考，只有填饱肚子吸收营养，只有保证心、脑、胃都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才能进行人类其他活动，伍尔夫也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吃好，那他就思不好、爱不好、睡不好。”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在他的著作《厨房里的哲学家》里说“牲畜吃饲料，人吃饭。可是只有聪明人才懂进餐的艺术”。食物跟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即便没有美食家的舌头，也能从自己吃的经历中咂摸出一些食物本身和之外的味道。对食物的觉察往往是伴随对亲情的觉察开始的。

小时候住在学校家属大院，吃了不少食堂里的饭菜，俗称“大锅饭”，吃大锅饭没什么可以要求的，用铝制的饭盒打回来，没有任何修饰，就像去超市里买衣服连服务都没有，最多冬天我妈会再加热一下。

要说我的美食意识觉醒应该是来自我姥姥。去姥姥家，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她也理所当然地担起了让子孙们吃饱的职责。姥姥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人，齐耳短发，戴着边框眼镜，她做的饭跟她的气质一样朴素大方。厨房是小孩的禁地，也许是怕小孩被油锅烫伤或者损坏器具，

我就在客厅等着，想象着女人们如何在厨房忙碌。姥姥少顷端出一盘膨胀的虾片，咬上去香脆，这是用来解馋的。春夏季节，竹竿一头绑上铁钩，打落树上的香椿芽或者槐花，洗净炒鸡蛋，火候细而均匀，炒出来绝对嫩香，也可以把香椿芽撒在豆腐上，代替调味料，让豆腐的味道变得深邃。她还会在馒头上抹上芝麻酱和绵软的白砂糖，我一口咬下去，柔滑的酱在口中化开，甜到心里，幸福满满。芝麻酱黏在嘴角和手指上，我一点点舔干净。姥姥去世很早，早到没有机会看到我背上书包，后来我再也没吃到过芝麻酱蘸白糖的馒头了，可我对它的记忆是如此清晰。我在英国吃了不少司康饼，刚出炉的司康饼看上去十分厚实紧密，实际是松软的，从中间切开，涂上cream和草莓或者橘子果酱，没有这些蘸酱食物就会特别普通，我想小时候吃的那个蘸酱馒头不就是姥姥的“司康饼”嘛，不禁感慨，这是全球姥姥们的智慧！

冬天最开心的是在姥姥家吃热气腾腾的煮花生和烤红薯。红薯放在老式的蜂窝煤炉子上，被烘烤得慢慢萎缩，皮肉分离，一撕焦皮就是揭开厚厚的一层，这一层黏着“糖油”，最甜最糯。煮花生并不是简单地丢在锅里煮一下，而是洗净后先用手捏破一个小孔，好让桂皮、八角、盐的滋味浸泡进来。有一次，我闻着厨房里关不住的香气，手里抱着姥姥灌了热水的暖水袋焐手，不知怎地捡起她柜子上放的木锥子，对着暖水袋狠狠地扎了三下。煮花生端上来了，我妈发现暖水袋在漏水，狠狠地批评我的恶作剧，愤怒地罚我禁食。姥姥还是让我吃到了煮花生，美味与羞愧掺杂交织在一起，吃得面红耳赤，去拿花生的手指被烫得生疼。

姥姥让我刻骨铭心的食物都跟膏脂无关，我们这一代人的小时候虽然谈不上物资匮乏，却也经历过惜物的时光，祖辈的生活资料跟今天比起来花样少很多，但我发现阮囊羞涩或者材料匮乏丝毫不能限制人的想象力，在节约中发挥创意，手头清简，内心热烈，在精打细算中发挥每一块食物的魔力，用一种爱的本能在做饭——永远不要让你的人生变得平庸无味。

我和爸爸单独相处的机会不多。夏天最开心的事之一就是跟着我爸晚上乘凉散步，知了声此起彼伏，他手里拿一把手电筒，我们走进学校的操场，有点像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组合。他的手电筒往土地上一照，只要看见一些黑黢黢的小洞，泥土还没干透，我们会心一笑，知道不远处藏着知了猴，我就蹲在地上先检查洞里，地上一圈看完，再到旁边树干上找，已经开始蜕皮长翅膀的不要，只要那些圆鼓鼓包着全壳的，从后面夹住它的身体，有些装死，有些爪子还在乱动。我们总是满载而归，带着捕猎者的快乐，把一袋子战利品交给妈妈，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胆子为何这么大，跟着妈妈把爪子还在空中打转的知了猴清洗干净，看着它们下油锅，炸好的黄铜色的知了猴被撒上盐，一口一只，不去多想也不觉得害怕，只觉得无比香脆。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冒险精神都是在这道菜里培养起来的。

我妈年轻时候还算挺时髦的人，能用一个月工资买一辆亮闪闪的变速自行车，但热情总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家里买了第一台烤箱的时候，房间里常常充斥着奶香的味道，她一度痴迷于烘焙，可惜做出来的蛋糕硬邦邦，实在没有商店里的好吃，烤箱被放进了杂物间，落了一层灰，但也让我明白了厨艺需要习得，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为大厨。

何种时代吃何种饭。人对食物的偏好和习惯都是从童年建立起来的，尽管现在饭菜丰盛，各国菜系都可以随意变换，我却找不到家里的味道了。我有馋的时候，馋起来人会回到童年，胃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食物教会我的远远超过食物本身，人的味蕾最先感受到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的背后是亲情、传承、文化、故事，饱含幸福、酸楚、耐心、分享、隐喻。

老实说，我肯定不是真正的吃货，也不热衷烹饪，能吃到好吃的东西会欢呼雀跃，但也不会因为平淡的食物而牢骚满腹。我喜欢读美食专栏，看不同作者与食物的经历，心胸深处的那盏明灯常常是被别人的分享点燃，重新认识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时而被勾起了馋念。美食纪录片就更不用说了，更加直观，看完饿得睡不着觉，它还是很好的拌饭调料，当自己一个人吃着平淡无奇的饭菜的时候，把手机横过来支住，边看美食纪录片边吃，食欲增倍。更重要的是美食纪录片里讲的是地理志和民族志，我在里面恶补了地理、农业知识，了解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

有个朋友推荐我看吃播，我连续几晚看别人吃饭，初看时很兴奋，就像刚刚学会玩电子游戏的小孩，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快就开始感到乏味、刻板、套路，主播们急于表现食物的好吃，时而面露难色，真真假假。还是以前看美食专栏有意思，虽说看的是如何吃，其实看的是饮食男女，饮食职场，饮食家庭，餐席之上的精雕细琢，餐席之下的智识哲思。吃什么、怎么吃和吃的人都是顶顶有趣而复杂的话题，不是靠表现好吃所能涵盖的，对某种食物的激情总会消逝，让人回味无穷的还是那些不能轻易道出的温和用膳。

今天的生活变化太快了，所有的欲望都可以轻易被满足，如果吃饭带来的快乐是对我们活着的奖励，究竟怎么吃饭才能不辜负这片好意呢？

小祝

小兔你好：

来信收到。

最初，你微信里说了“通信”的创意，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们工作量不饱和还是业绩考核指标定低了，居然愿意花这么多功夫扯闲篇儿？后来想到你

是文化人，嗯，那时间是奢侈的。既然答应了你，我想一定会给您回信，尽管我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碰过信纸。

就像信笺一样，有些东西真的从我们的生活里悄没声儿地隐退了。比如纸币，就是从前的钱，我们已经很少有机会接触它们，许多事情都可以在智能手机里搞定，方便又快捷——快捷得仿佛我们节约了大量金钱的同时，又节约了很多时间一样。然而，我们依然超级忙碌，忙到喘不过气来。信笺、纸币、时间……都因为节约而变得稀有珍贵，这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隐喻，有意思。

那天晚上，你应该在消夜，就是你信上说的，在兰州吃烤羊腿。你发来的图片，相当诱人。当时我在工作室加班，只匆匆回复了一个嘴馋的表情。忙完的时候，才详细看你的微信，也就是信中所言，店家称那里是我们的拍摄点，甚至我曾经“亲自”品尝。事实上，我很少吃烧烤，摄制组确实在兰州有过多次拍摄，但我们从来没有拍过兰州的烧烤，跟你说明一下。

有人估算，各地大概有上万家“舌尖推荐”的餐厅，还不包括“差点推荐”和“后悔未推荐”的。有一次，就是在兰州，朋友带着去南关十字，整条夜市不大，数了一下，有26家挂着“舌尖美食”招牌的摊位，看得人脸红心跳，我心理素质差，只好拉着朋友去了别处。

餐厅，或者排档，出于商业考虑，夸大一下宣传，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怎么可能拍过这么多店家？再说了，《舌尖》应该不完全是推荐饭馆的节目吧？餐厅不过是我们展示食物的场景。只是中国太大，各地人们喜欢的美食很多，难免偶尔会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食物的评判，什么是最好的食物？这是个问题，而你给我的答案是：童年时代。

你在信里说，最最难忘的味道，是童年时代姥姥家中的家常食物，煮花生、烤白薯、馒头片蘸芝麻酱……准确点说，就是老家的味道。看到你不舍笔墨的描写，说实话我是有些感动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童年的食物里，藏着我们的味觉密码。我自己小时候，每年冬、夏两季，父亲都会拿着包裹单去县城的邮电局，在高高的绿色柜台后面，有外婆定期寄来的包裹。夏天会是一种节梗很粗的茶叶，叫瓜片，味道奇苦，但非常耐泡。冬天寄的更多，咸肉、咸鱼、腊鸭、腊鹅，还有被我母亲称作传奇的糯米粑粑。糯米粑粑虽然童年时期并不是我的最爱，但却在离家后给了我很多慰藉，这我在文章里写过。

一个人，只有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才会理解所谓的故乡不仅仅意味着熟悉的人群，也不仅仅意味着

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味觉习惯，显然也是故乡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是长大离家后，越能感受好好吃每一餐饭的重要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山东人，山东哪里我不知道，但应该离我的老家不远，饮食习惯也相差无几。说到山东，想起小时候看《水浒传》，水浒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那时候书很少，都是大家传着看，你看半天我看半天，最后还要在一起讨论。

水泊梁山左近，有个祝家庄，对，就是你的姓氏，祝是山东大姓啊。那次看完“三打祝家庄”这段，照例大家坐在一起吹牛。小伙伴们个个都是军事家和评书演员，什么拼命三郎、鼓上蚤、一丈青……都像熟人一样，再说宋江如何用计用兵，惊心动魄。轮到我说了，我说，石迁上厕所偷了一只大公鸡，那个鸡太香了，还没好好吃就被店小二闻见了。

如你所知，我被大家一通嘲笑。但天地良心，舞枪弄棒打仗什么的我就是记不住，印象深刻的只有那只鸡。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去临沂出差，吃了王小二炒鸡，还能想起水泊梁山。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从小，我就是个贪吃的人。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尽管没有挨过饿，但基本没吃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所以只要有人称我为“美食家”，就像你信中一样，我都会羞愧难当。我不认为可以担当这个称呼，每次遇到这种尴尬，我都会说自己其实是个嘴馋的人，相当于英语里的foodie。美食家得吃过多少东西啊，我在二十岁之前的生活经历，让我很有自知之明。

由于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美食家的界定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美食家是一门职业，他们有敏锐的嗅觉与味蕾，能细致区分不同的味觉感受，也能凭借经验和审美，判断各种食材搭配、加工烹饪以及艺术呈现的效果。而中国的美食家，就像今天大家公认的蔡澜、沈宏非等，则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很注重把对食物的感知与时空的变换，以及个人的阅历，用训练有素的文字，风生水起地呈现出来。我无论是见识还是表达，都无法望其项背。

不过有次和学者陈立聊美食，倒是给了我一些安慰。他说人类享用美食的终极境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到颅内高潮。有权有钱的人可以通过精细的制作的食物，和繁复的进餐仪式去获得；但普通人也可以依赖简单平凡的风味暗示，通过咀嚼，甚至吞咽，达到同样的享受。从这一点上说，食物无所谓高下，人也是平等的。陈立老师的专业是心理学，他用现代科学的逻辑，讲述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广厦万间，夜眠只需六尺；黄金万两，一日不过三餐。如此说来，尽管赶不上美食大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吃货，也蛮好。

我最初认识你的时候，更多是在一起吃饭，应该有些年头了。那时北京的饭局很兴盛，一堆你们这样的文艺青年扎堆儿，我负责点菜和旁听，那是很温暖的一段时光。因为张罗你们吃饭，我自己也开始写美食专栏。因为写美食多了，后来又拍了美食纪录片。所谓的美食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借鉴了前辈美食家对食物精准、生动的描述，用视觉化手段表现出来罢了，这需要专业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团队，我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

不过呢，做美食纪录片时间久了，渐渐地，也对美食有了更多的认知，食物在我的认知里，也不再是食物本身。就像两口子相处久了，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的习惯、脾性，还有更多的过往。

最初拍舌尖，我们是被浩繁的中国美食震撼，希望寻找其中的奥秘。后来我们的节目里除了美食，更多关注的是传统和人。到了前两年开始《风味人间》的制作，我们把坐标置放到整个星球的范围，在食物里探索人类的共同智慧。你看，我们也在努力改变。

现在我眼中的美食，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最有趣的通道，也是人与人交流最便捷的途径。传说中的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相互不能交流，巴别塔就这样成了烂尾楼。但我们的食物，有这么多的相通之处。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应该粗心了。

前一阵子，受邀去TED做了一个演讲，我梳理了这些年做美食的一些感受，有空你可以看看。要是没时间看，我可以划一下重点，演讲的核心意思，我想说，现在社会发展太快，很多传统食物在一点点消失。作为纪录片人，拍美食，用影像记录食物里我们祖先一路走来的印记，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幸运。

你看，相比美食家或美食工作者，我更愿意大家把我当成一个纪录片导演。说起来我挺幸运，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时读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媒体，又搭车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专业做纪录片，也赶上政策扶持。做美食的时间，又遇到国人消费升级……我相信常识，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感叹命运。

纪录片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行业，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拿到拍摄的投资，或寄望有很好的回报，都不容易。给你写这封回信，刚好是我生日，给自己写了一首“老干体”打油诗，其中一段是这样的：沃野千里风味，灯火万家人间，一言难尽纪录片，倏忽五十五年。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想大概还能再工作十年。以后有机会，还会继续拍摄更多其他题材的节目。为了能够对得起投资方和播出平台，现在这些项目，都处在孵化阶段。我们的小团队取名叫“稻来纪录片实验室”，很大程

度上也是希望能够在纪录片领域做出更多尝试。无论是社会类、历史类，还是自然类，我们都有兴趣。

希望几年后，我还能回归我纪录片导演的角色定位。那时，如果你再给我写信，希望内容能集中在纪录片的范畴。

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祝你一切好。

黑蜀黍

2020年11月30日

属于任何生命的时间都太少了

通信人 石康 编剧、作家

我从未想过我会花去那么多时间看那些花花草草，并用它们的生长来衡量消逝而去的时间，以便悄无声息将那些时间忘记。

祝小兔你好：

你想听我谈谈有关花园的事情？好吧。

事实上，它正在进行中。

到美国后学到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single-handed，它很难翻成中文，因为极少有中国人体验这件事，它的字面意思是单枪匹马，实际意思是指，一个人去完成需很多人配合才能做成的事情，比如为自己翻新一条帆船，或者，打理一个花园。

你可以一个人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这件事没啥稀奇，太多的书与视频讲述了一个人是如何为自己设计并建造花园的，我在学英语的时候读了那些书，重点是，需要花去很多时间学习如何去做，同时，再花去很多时间去做。

2014年我在西雅图郊区为自己搞了一个工作室，用于写作。

因无人打理，房子四周密密地长满了各种荒草，已有近五年无人收拾，主要是带刺和不带刺的爬藤类植物交缠在一起。

某日傍晚，我拎着那一把我唯一的椅子来到后院，然后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想我需不需要一个花园。

一年以后，我已经看了一些有关如何建花园的书和视频，我试着开始建一个花园兼菜园。我是从清理English Ivy开始的，那是一种爬藤类的植物，长得哪哪都是，覆盖一切它可以覆盖的地方，它长得很快，一片又一片，一层又一层，我曾试着清理它，整整八小时，只是清理出2米×2米那么一小块空间，而它覆盖着我的房子两边大约两亩地的面积，更别说还有那些长满尖尖的硬刺植物，对付它们，需要先剪断茎秆，用防刺手套拿着扔到垃圾筒里，最后再把它们的根挖出来。

除此以外，我的后院草坪里还长满了蒲公英，它们扁扁地平摊在地上，既

难看，又难看，怎么看也仍是难看，而它的根可以垂直扎入地中深达半尺以上，徒手拔不了几棵，你的手指就会酸痛难忍。春夏季节，我房前屋后的那些蒲公英会开出黄色的小花，就是你必须动手除掉它的最后信号，不然几天时间它就能迅速结籽，变成一个小棉花团儿的样子，小风一吹，那些籽并不会随风飘荡到很远的地方，而是就地落下，然后悄悄摸摸就在原地长出一大片几十棵一模一样的蒲公英，要除掉它们，你就要花去十倍的力气。

还好有美国人专门发明一种工具拔它，我买的一个很好使，于是每天花去十分钟拔那些蒲公英，终于拔得差不多的时候，草坪也变得坑坑洼洼了。

随后的三年里，我平均每天花去两小时时间去除English Ivy和蒲公英，然后我的房子周围才有了一片相对干净的土地。

再接下来一年，我每天平整土地，地里充满了碎石和树根，每天一两小时，即使熟练以后，也只能平整两三平方米，一年把地弄平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雇人或租来各种专业工具以便干得快一点，不过我既然被single-handed所打动，加之已经到了该每天出点汗来维持健康的年龄，所以全部采用最原始的方法自己干。

在国内的时候，我因从未听说过single-handed这件事，所以每一件事都是花钱雇专业人员来干，但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发现一段话，讲到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人感到空虚，他们发现因为幸运而拥有了很多钱以后，什么事情都可以雇人来替自己干，导致自己无事可做，最终他们发现他们甚至可以雇人来替自己活一遍，而这使他们的空虚感加剧，于是single-handed这件事诞生了：生而为人，原则上，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并且你最好自己做，因为那就是你的人生。

自从我认为自己需要一个花园时，我便开始看有关花园设计的书和视频，差不多就是晚饭后或临睡前看一会儿，平时外出也总会看看那些公共花园是如何设计的，我发现难点是在花园里种些什么——总体来讲，你对一年四季每一次走出自己的房间想看到什么景色这件事既没标准也无线索，原因是以前从未为欣赏植物做过任何准备。

那么就找一找自己喜欢并且看不厌的植物吧。

一种植物一年四季什么样子，与别的种植一般性搭配，如何种，如何管理，阅读这种信息需要花去巨量时间，若每天看半小时到一小时，一年也只能看几百种植物，而通常来讲，一个花园一般有三四十种植物可种，你

只是需要耐心，从讲花园植物的书中一种一种找到自己喜欢的植物去试种即可。

还有土和肥料，在试种之前一年，我便开始制作有机堆肥和一些raised bed之类的前期准备工作，学习种子发芽、除虫、嫁接等等基本的种植技术。

长话短说，第一种植物是最好选的，就是葱，除了施肥和浇水以外，不用更多管理，只是吃前一分钟时候用剪刀剪下即可，而且差不多每天都需要，但第二种种什么就成问题了，我试种了不少，比如番茄和黄瓜，它们只有在夏季有三个月的生长结果期，需要架子架起来，吃起来不错，但看起来太乱；同时试了姜和蒜，结果差强人意，长得太慢，还要总惦记着浇水，冬天还会冻坏在地里，但我还是找到了第二种：羽衣甘蓝。它的叶子可以切碎混在鸡蛋里做出百吃不厌的蛋饼，还能刷一点油盐加一点胡椒，放到空气炸锅里用三百华氏度，花五六分钟做成零食，跟葱一样，它四季常青，随用随取，它还能在春天开出一串串黄花，当作背景花还是可以的，至少比油菜花好看一点。

第三种是一种草本植物，叫White Gaura Whirling Butterflies（学名Gaura lindheimeri），我曾在一个秋天的公共花园里发现一条小路两旁全部栽种着这种一米多高的植物，居然一点也不觉得枯燥，反而是生动异常，每一朵花都像是正在凌空飞舞一样，可惜它的种子需要过冬后才能发芽，也就是说，要么秋天种下，让它过冬后春天发芽，要么你要把种子放入冰箱，骗它过冬，然后拿出来种入发芽器中发芽，我准备这两种方法都试一下，于是花三块钱买了1000颗种子自己尝试发芽。

第四种和第五种是一起发现的，Blue Grama Grass（Bouteloua gracilis），一米多高，看起来脆弱而优美，长长的窄而薄的叶片，配上它一小截横出的小穗，飘动感十足，蓬蓬地像是要随时飞起来一样，还有Aster，我喜欢New England Aster（Symphyotrichum novae-angliae），它像是一种紫色的更飘逸的雏菊（Shasta Daisy），同时有着一种颤动感，这一花一草搭在一起有种奇怪的美感，并不是相依相偎，而是并列地创造出一种有趣的空间，特别是在秋天。

第六种是薰衣草，品种很多，有些如书上所说，它可以驱蚊虫，让我夏天的傍晚可以不把防蚊油涂得到处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但它需要慢慢试种。

接下来是第七种、第八种，我已经试种了三十多种，但仍未能确定我的花园是什么样子，搞花园就是这样，一切都很慢，需一年一年来。

长话短说，至今为止，我大约花去三年，看了一千多种植物，试种了几十

种，还会继续看和试种，我最终决定由多年生草本植物组成我的花园，我愿意看到它们在冬天凋零，在春天新生。我已有了五十多棵树，所以不再需要树了，我虽然看了几十种果树，最终决定不再种，因为把整树掉到地上的水果扔进垃圾箱时的感受非常不好。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自己造一个自己喜欢的花园最终还是值得的，因为有很多事情移到花园里做会让你觉得更舒服，在花园里做烧烤，吃东西，阅读，写作，走一走，蹲下拔几棵草，画画，露营，看星空，夏天傍晚做一做木工活，给家具上上漆，或者仅仅发发呆，在搞花园之前，我从未想过我会花去那么多时间看那些花花草草，并用它们的生长来衡量消逝而去的时间，以便悄无声息将那些时间忘记，在我看来，属于任何生命的时间都太少了，即使是看过就忘也不错。

有关花园，各式各样的花朵，我还有自动浇水系统和暖房之类的东西可以说，还有各种蝴蝶、昆虫和鸟，当然也少不了偷吃幼苗和花的松鼠和兔子，不过，还是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祝好

石康

2020年6月19日

石康老师：

你好哇！多年未见，读到你的文字甚是亲切，同时又陌生、新鲜，因为搁在过去，你不可能跟人讲种花种草的事情，现在你不但讲得绘声绘色，而且句句都是值钱的经验——这个世界上让你付出心血的东西最昂贵（石康老师曾出版过一本书叫《那些不值钱的经验》）。

过去我总是在老师的书里眺望大学生活、青春、恋爱、工作，在花园的事情上，我终于和老师同步了一次，庆幸自己的开悟。这几年我才发现小时候生活中的诸多事物特别珍贵，成年之后都被心急火燎地抛弃了。追求效率的时代，闲适的生活并不被推崇，种花就在其中。小时候外公的四合院和我家的阳台，都是让我兴奋不已的兔子洞，一些带着刺的热带植物虽然丑陋，但也能开出无比艳丽的花。我有时蓄意地让它们扎破手指，用夸张的表情表达痛感，换取大人們的嘘寒问暖和一枚创可贴，没有电子游戏的童年，我举着一颗缠绕着弹力胶布的手指奔跑，也开心得像发射了火箭。

住在英国的日子，你无法回避家家户户热衷花卉这件事，几乎每户人家的窗台都开着缤纷的鲜花，闹市区的家庭空间有限也会摆几个花盆，稍微往

外走走，他们一定会在门前种花，后院种树。你作为居民，会觉得拿什么包、戴什么表没有那么重要，你家门口要是光秃秃的，那真是太丢人了，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英国人的生活注重社区文化，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类似园艺中心的商店，这里会出售一切跟园艺有关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唐顿庄园》里看到的，庄园每年会举办种植玫瑰的大赛，从仆人到女主，尊卑老幼都以获此殊荣为理想。现今的英国各地还是保留着大大小小的园艺比赛，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国内常常见到的举办的乒乓球、下棋比赛，花艺比赛是英国人从社区、学校、镇、郡到国家、世界级，全民参与的活动，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有专门的栏目介绍园艺知识，认全奢侈品品牌的名字不值得骄傲，要是能像“报菜名”那样对花草如数家珍，那该多让人敬仰，女王也要对你脱帽。

和英国的朋友一起旅行，我才发现出门原来这么难啊。我是心一横，电源一拔，门一锁，跨出门槛，心无牵挂；他们想的是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找哪个信得过的朋友来给家里的植物浇水，路上时不时发消息回去，问候郁金香还好吗，山茶花还开着吗。回来之后要去院子里除草，绝不能让自己家的花园荒芜。不过也是，没有牵挂的地方能称得上家吗，家就该让你念念不忘。

去年我妈在英国住了一个夏天，到处闲逛，无论是去了女王的城堡还是到朋友家做客，她对什么大本钟、下午茶通通没有兴趣，倒是成了痴迷于花园的看客，常常边看边感慨：原来英国贵族跟我们喜好差不多啊，都喜欢在林子里搭建红色小桥、中式宝塔，人间鹊桥处处需要；皇家植物园跟山东寿光一样，都采取温室大棚养殖，扦插、根插、播种，非常科学；虽然英国本土原产的花卉不多，但他们特别善于学习，把各国收集而来的奇珍异草照顾得很好，还利用生态系统的概念让它们和谐共处，避免化学废料。我妈回国后，总结了自己观察的经历，励志复刻一个英式花园，现正在我家院子里实践呢，我心里偷着乐——省去请园丁的费用了。

三年前，我开始打造自己的花园，第一件事就是换草，旧草坪一簇簇长得跟巨无霸似的，杂乱无章，更称不上“坪”，我把杂草连根带土地拔出来，换了耐践踏、耐修剪、耐高温的矮生草种，经过浇水灌溉，定期修剪，草坪变得规整了。我喜欢刚刚修剪完的草坪的味道，香甜清爽，草坪维护得好会像天鹅绒一样柔软。紧接着就是种树、种花，困难接踵而至，有的树来的时候很健康，过了一段时间叶子蔫了，枝干也脱水了，我发现是土壤和光线的问题，有一些挪动地方又神奇地抬起了头，有一些根茎被石头阻隔无法与泥土交融。除石头是个大工程，经常在挖土种植的时候发现巨型的石块，我就把这些石块挑出来，装在篮子里换地方，买了有机营养土灌进去，泥土的学问太大了。泥炭土保湿透气，菌菇渣平衡酸碱。当个看客，肉眼可见还是贫乏，亲自上手才知道过去的自己都没有好好关心一下

脚下的土地。那些活下来且绽放的生命，提醒你自然界存在着不可思议的伟力。不少种子我撒到土壤里，转身就忘了，毕竟种子萌发、花苞绽放都需要时间。春天的时候，园子里长出了紫色的鸢尾花，跟梵高笔下的一样灿烂，我都快要忘记种过鸢尾了，也从没费心照料。

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浇水，水管长且扭曲，我把它握在手里仿佛制伏了一条蟒蛇，如今的喷口不像小时候用的那么简陋，而是一个花洒，可以把水均匀地分配出去，水珠晶莹，如颗颗碎钻。你握着花洒，对着草木狂喷乱射，幻想自己是一位播撒爱和光明的使者，一花一草雨露均沾。浇花看着简单，也有不少门道，切记不要对着一个区域猛喷，否则会变成一洼泳池，也不要总忽略某个区域，否则干旱成戈壁沙漠。花园里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都关系经验和爱心。春节的时候，我爸整日无事可干，我妈看着他碍眼，下达指令说：“你啥也不会，啥也不能帮忙，浇浇花总行吧。”有一天上午，我爸从园子进屋，邀功地说：“今天我可浇花了。”我妈火冒三丈：“昨天刚下了大雨，还用你浇花呢。”听听花园里的拌嘴声还挺开心的。

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播种，没有万事大吉的园艺。你必须坚持松土、施肥、浇水、修剪、拔草、消灭病虫……前段时间我们把自己的花园重新做了规划，划分出了菜园区，又更换了不少树木的位置，调整花色的搭配，让高低不同的植物组合，像在创造艺术品。每段时间盛开的花卉不同，它们跟交响乐团似的，轮番上阵。整个夏天，盛开的是美人蕉、茉莉花、绣球和一些不请自来的白晶菊。出门做客，我就在花园里剪下几株拿干草绳一捆作为礼物。最近我家园子收获了自己种的韭菜、黄瓜、樱桃、蓝莓，算是小丰收了，为了保住蓝莓，每天都要跟歌声绕梁的鸟干架。自己种的，无论是观赏还是放进嘴里，果然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看着欣慰，吃着心疼，毕竟瓜果每长长一寸，都承载着自己的悉心培育。

花园到底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沉浸其中，让人失去社会属性，回到了生命的天真状态。春去秋来，晴雨寒暑，对于城市人来说无非是加衣或褪衫，对于做园艺的人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好风如扇，好雨如帘，看到天降甘露，人满心欢喜，仿佛也跟着一起被上天润泽了；可遇到狂风作孽，你躲在屋子里，心里都在担忧，祈祷那些娇弱的草本植物一定要挺过去；艳阳直射，你不管自己会不会晒黑，先想到去给刚刚发芽的茎杆打伞。

过去我很喜欢收到花，觉得只有冥顽不灵的人才会对这么美妙的生命无动于衷，我用各种形状的容器呈现花的美，但参与到植物的生命中去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不会觉得花是跟自己分离无关的个体，无论是播弄如丝光滑的花瓣，还是触摸粗糙的根茎关节，你会联想到它们接受阳光普照或经历风霜雨雪的成长。开始照料花园后，你对过去过分看重的事情没有那

么在意了，但你不会再对弱小的生命和细微的变化熟视无睹，世界上任何的微小美好都承担着琐碎、坚信甚至沉重，不容小觑。

祝我们的花园茂盛，植物茁壮美丽，园丁的生活最充实！

祝羽捷

以手艺度己度人而不自知

通信人 葛亮 作家

一技傍身，总带着劳动的喜悦与经验的沉淀，还有对于未知的举一反三。其他的交给时间，顺其自然。

葛亮：

阿亮，你好哇！铺好纸准备给你写信，不料陷入了沉思，越思越远，直到灵魂出窍，等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腿已经不能动了，一股酸麻从脚心向小腿扩散，如千只蚂蚁在血管里爬行——腿麻了。我想，保持一个姿势容易血液不流通，那匠人们呢，他们总是重复同一件事，保持同一种姿态，会不会发麻，会不会厌倦？

谢谢你与我分享最近在写的故事，把我又拉回到一个古典诗意的匠人世界。一把剪刀、一件衣服、一块豆腐，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就拿起了匠人的作品，理所应当地使用，常常忽略了产品背后的人和故事。在遗忘之前书写匠人，就是提供了一种看到世界的角度，手艺关乎的是专注，如何把专业做好。

前几天，我将一件新收的作品送去裱画，昨天武师傅父子二人一起出现在我家门口，把作品送来顺便帮我挂墙上。他们在上海艺术界无人不知，许多艺术家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们装裱，日子久了有了默契，稍微一点，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为美术馆裱的画里，经他们之手的千万元作品不胜枚举。大家管父亲叫大武，管儿子叫小武，久而久之，名字倒不知道了。

大武和小武都是国字脸，眉毛浓密，眉尾处如灌木丛。大武的双眼皮很宽，笑起来眼角下垂，慈眉善目，鱼尾纹深刻，等距的三根坠在眼角，平添了稳重。小武和父亲一样话不多，但是个子高出半头，是细长版的大武。我在武师傅这里裱画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只说事不问人。我问小武，武师傅是哪人？他答，安徽人。我问大武，武师傅裱画裱了多久？他说，二十多年了。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位老师，小武显然是他的接班人，手艺的传继在过去是很常见的，一个家族里代代做相同的工作，聪明伶俐的晚辈还能将父辈的技艺拓展。不过更多的后代都更愿意在写字楼里谋一个白领工作，归于主流的生活方式。

我家几乎每张画都是在武师傅工作室裱的，大武指着吊在客厅角落的一

幅，眼睛却看向别的地方，余光瞟着我说，那幅可不是我做的吧。我愣了一下，仔细回忆还真不是，那是当时为了图便利，让朋友代劳的。那幅画按照我的要求四周留白，中间做了悬浮处理，如今它像被放飞的风筝，鼓鼓囊囊，左右膨胀。更要命的是玻璃镜面反光，很多角度无法看清里面的作品。大武说，我下次来给你处理一下。

我常常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比如框子选什么颜色，多少厚度，什么材料，多少留白，怎么处理……犹豫的时候就问武师傅，八九不离十，做出来指定好看。他们摸过的东西多，经验丰富，能跟顶级的艺术家和美术馆合作也算是稀缺资源，好比操作过大手术的医生和只割过阑尾的医生，显然见过大世面的那个更让人信服。

人生的反讽之一，是你明明揣着无价之宝却漫不经心，时过境迁才体会其中富含深意的内涵，在拥有和领悟之间总横亘着时间差。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是离不开匠人的，因为骨子里喜欢生活有秩序，喜欢可靠。小时候在外公家，各路匠人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如候鸟一般，总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方式出现，他们往往先扯着嗓子吆喝一声，再敲打几下器皿，占据街道的某个角落自成风景，你就知道是该把刀送出打磨抛光，还是该跑出来蹦爆米花了。熟悉的声音和背景，遇事能想到解决问题的人，需要什么有匠人给你托着，这些都让你内心稳如磐石。

在《万物皆有欢喜处》里，我已经赞尽手艺人，是长大后对自己匠人情感缺失的一次狠狠的报复。不过这都是我的一厢情愿，活到现在，自作多情的事情我干得太多了，没人逼着你干，也没强迫你喜欢，自作多情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我自己也很怕被AI的时代淘汰。这几年匠人精神被重提，从汽车到枇杷润喉糖，买双工厂流水线炮制的袜子都要贴上匠人产品的标签，矫枉过正，我们又见证了“匠人”这个词的滥用，我竟然为此感到害臊。像民间杂技演员一样在旅游景点表演生产过程，扭捏作态地展示，高声大气地推销，没显得手艺矜贵，反而让手艺也跟着变得聒噪和粗鲁起来。或者工业的末端贩卖情怀，用“匠人”掩盖消费主义的本质，落得一个营销的名声。比起被人们忽略，优雅事物面临的更大的危机是在短时间内被滥用，滥用导致速朽。

匠人最骇人之处还是手艺本身。我也看到很多人对“匠气”的不屑。所谓匠气，指的是做出来的东西像行货活儿，用了职业性的套路，目的性太强，虽不会出错，完成度也高，中规中矩就会缺乏灵魂。

艺术里的匠气是最大忌讳。但在文艺复兴之前，意大利没有艺术家这个概念，有的只有工匠，工匠是个收入微薄的职业，工匠是艺术家的底牌，跟着师傅不断打磨手艺，工匠是他们从事艺术的开始，直到技术炉火纯青，有了创造和表达的能力。可如今的艺术都靠观念，不靠你的绘画技巧或雕

塑功底，你的想法是不是令人耳目一新，你的作品是不是能引发思考，能不能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感受，一旦流露出匠气就完蛋了。

为了避免匠气，不乏有艺术家刻意保持未受教化的天真状态，让自己的天分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些年我不断观察，原来有些匠人也有可恶的一面，那可能是不闻不问的传承，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板滞，缺乏创造力，还可能是世俗欲望的掩体。

不过说到底，不管是世袭还是后天习得，薄技在身，胜握千金。

愿我们都能多一些匠心，少一些匠气！

祝羽捷

羽捷：

谢谢你的来信。

一晃许久过去了，上次见面，还是前年你来香港看巴塞爾展，记得我们约在九龙湾一间怀旧风的茶餐厅。

当时，大约你也注意到了店铺里的许多旧物。台式的SINGER缝纫机、火水炉、来自南丰纱厂的纺锤和锈迹斑斑但依然可以转动的电风扇。与其说，里面满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遗迹，不如说是香港在彼时走向经济腾飞、出自日常的劳作的辙印。

在那儿你在和我分享对新书的构思。而我还并未开始《瓦猫》这本小说想写的主题。但在当时，“劳作”这个意象的确吸引了我，大约因为经历了时间，它们如此确凿地留下了成果。这比所有的言语、文字与图像，更为雄辩。

在当下，我们对“匠人”这个词感兴趣，除了你说的“专注”，大约还来自手工的细节和由此而派生出的仪式感。显然，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复刻已被视为生活常态。手工本身所引以为傲的稍有缺陷感的轮廓，都可以经过更为精准的流水线生产来实现。我在一个展示会上，曾看到用3D打印，数个小时之内还原了已被氧化至面目全非的青铜器。刹那间，我甚至对本雅明念兹在兹的“本真性”产生怀疑。对于器物，“唯一”的意义是什么；手工，是否需要以排他来实现价值、维护尊严。

与之相关的，“匠人”精神可能只是一个我们一厢情愿的愿景。有关它的式微、低效率甚至墨守成规都在大众传媒的同理心之下，被镀上了光环。前

些年，我未参与任何有关于此的讨论。而因此，我则至为感佩个人经历的意义。因为我祖父受损的手稿，而极其偶然地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业。此后亲身体会了一本书可以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我不得不说，过程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它关乎于推进与克服。其中每一个细节，都不可预见，而解决唯一的手段，便是经验。这些师傅的工作，和你信中提到的裱画师，可谓同源。在老行话里，都被称为“马裱背”。但是显而易见，因为市场与供需的关系，他们会比书画装裱的行当，更不为人所知。如果以此去揣测他们的寂寞与顽固，是不智的。事实上，他们的自在，亦不必与外人道也。我所接触到的他们，会有一种和体态无关的年轻。在神态上，那便发源于内心。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丰沛的好奇心。在一些和现代科学分庭抗礼的立场上，他们需要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从而探索大巧若拙的手段和方式。这其实带着某种对传统任性的呵护与捍卫。如我写《书匠》中的老董，不借助仪器，以不断试错的方式，将雍正年间的官刻本复制出来。是的，究其底里，或许天真，但却十分动人。

在“非遗”被说了许多年后，我们有了一系列官方认证的“大师”，作为薪火相传的凭证。但是，我更感兴趣去写的，倒是民间那些仍然以一己之力仍然野生的匠人。他们在处理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上，从不长袖善舞，甚而有些笨拙。任何一种手艺，长期的打磨，都将指向微观。因此，他们多半是囿于言词的，因为向内心的退守，使得他们交际能力在退化之中。他们或许期望以时间包覆自己，成为膜、成为茧，可以免疫于时代的跌宕。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时代泥沙俱下，也并不会赦免任何人。有些忽然自我觉悟，要当弄潮儿的，从潮头跌下来。更多的，还是在沉默地观望。但是，一旦谈及了技艺，他们立刻恢复了活气，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其实他们和时代间，还是舟水，载浮载沉。只因他们的小世界，完整而强大，可一叶障目，也可一叶知秋。我最近在写的“瓦猫”匠人，大概就是以手工艺度人而不自知的典型。人都活在历史中，手艺也一样。这历史可堂皇，也可以如时间的暗渠，将一切真相，抽丝剥茧，暗度陈仓。

你信中提到“匠心”与“匠气”的辩证。“匠”大约本身就是个见仁见智的词汇。我在澳门时，走访一位佛像木雕的匠人。大曾生特别强调他的工作中，有关佛像与工艺品的区别。同样一块木头，工艺品可顺应木头的品种、材质及制作的季节，信马由缰，出奇制胜。但佛像制作，则要依据规制，在原材料的使用上极尽绸缪，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他举了一个例子。庙宇中，善男信女，举目膜拜。之所以四方八面，看菩萨低眉，皆觉神容慈悲，佛头俯仰的角度，至关重要，其实是关乎于一系列的技术参数，也是行业内承传至今的规矩。“规矩”的意义，便是要“戴着脚镣跳舞”。如今规矩之外的脚镣，更多些。制作工艺，凡涉及有关环保、防火，皆不可触线。

关于“艺术”和“匠”，齐白石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显然是对“匠气”的抗拒。可我们也很清楚他的匠人出身，以及广为流传的他以半部《芥子园画谱》成才的故事。他的传记叫《大匠之门》。早前中央台做了一套涵盖他在内的纪录片，叫《百年巨匠》。因此说到有关“匠”的定义，其实我内心一直存疑，是否可完全对应于英文的craft-man或者日本的“职人”。因为“匠”本身，亦包含在行业的磨砺中，技艺的升华之意。譬如西方的宫廷画家，如安格尔或委拉斯贵兹。后者的名作《玛格丽特公主》，被蓝色时期的毕加索所戏仿、分解与变形，毕加索却也因此奠定与成就了他终生的风格。这可以视为某种革命，但这革命却是站在了“巨匠”的肩膀之上，才得以事半功倍。这实在也是微妙的事实。如今，站在艺术史的晚近一端回望，也只是因属不同的画派，各表一枝罢了。

即使是民间的匠种，取径精英艺术，也如同钟灵造化，比比皆是。如岭南的广彩，天然地拥有与市场休戚相关的基因。这市场远至海外，有“克拉克瓷”与“纹章瓷”的渊源，多半由此说它匠气逼人。但又因缘际会，因高剑父等岭南画派大家的点拨，甚而也包括历史的希求，逐渐建立起了“以画入瓷”的文人传统。形成了雅俗共治的融通与交会，以至为“匠”提供可不断推陈出新的基底。

所以说回来，这段时间走访匠人，最初是为了他们的故事。但久了，有一些心得与愧意。面对并不很深沉的所谓同情，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得都要欣然。对手艺，态度也更为豁朗。老的，做下去，并不以传承为唯一的任务，大约更看重心灵的自洽。年轻的，将手艺本身，视作生活。这生活是丰盈的，多与理想相关，关乎选择与未来。

一技傍身，总带着劳动的喜悦与经验的沉淀，还有对于未知的举一反三。其他的交给时间，顺其自然。

愿我们都可自在。

夏日安和。

葛亮

2020年7月2日

走吧走吧，去敦煌

通信人 韩松落 作家

敦煌成了我们想要躲开的地方，也成了我们想要投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故乡，成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默契，我们精神DNA的某一部分。

韩老师：

你好哇！刚刚与你在兰州道别，就着手开始写信。我从莫高窟出来后，兴奋了好多天，见到你还停不下来，抑制不住地说，我简直羡慕敦煌的一切！天空、沙漠、白杨树、李广杏，羡慕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艺术家、工作人员，无名工匠也比我幸福，他们找到了一生可以托付的事业，将命运与这片土地紧紧捆在一起。他们肯定不抑郁，不漂泊，所谓欲得净土，当净其心，他们内心澄净，肯定没有我的心烦意乱。

这不是我对工匠们的浪漫幻想，而是我坚信比起恶劣的生存条件，生命的虚无感更能击垮一个人。如果可以，我也愿意找到一份挚爱，与它打上命运的死结，不离不弃，无怒无嗔。

在戈壁的每一天，我都在接受阳光的洗礼，干燥的风像熨斗一样抚平内心的褶皱，原来阳光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很充盈，像吸满热量的热气球。我坐在车上，不舍错过地看着窗外，黄沙把茫茫大地冲刷得洁净，远处浮动如金色的麦浪，直指蓝天的白杨树一闪而过，留下英姿飒爽的影子，更多时候看到的是金色的山丘此起彼伏，延绵不绝，直到鸣沙山东麓的断崖映入眼帘，气势更加恢宏，遗世独立，站在这样硬朗的景观面前，人难免有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其实这景观早已被我烂熟于心。那是我在画册、纪录片上看过千百次的莫高窟，一座安放在1680米的断崖上的美术馆，洞窟密密麻麻像蜂巢一样，我知道那里有735个洞窟，有2400余尊彩塑，有约4500平方米的壁画，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密集和丰富的艺术了。我痴痴地仰望着，觉得它像一尊玉皇大帝，稳稳据守着陇原大地。

每次开窟，我都屏住了呼吸，管理人员噤里啪啦地拿出钥匙，打开窄窄的一扇铝合金小门，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去，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唯有等待讲解员开口。她穿着一身钴蓝粗麻连衣裙，戴着白色的手套，手中的手电筒灵活地转动，指向哪里，我们就赶紧扬起脖子望向哪里，手电的

追光像变戏法一样，在暗淡黢黑的洞窟中，瞬间点燃了五彩斑斓的壁画，让佛像更加肃穆，让菩萨的眼睛更加动人，飞天的神仙腾空而起，吹拉弹奏的乐师们摇头晃脑，舞者的丝带飘如游云。这场景亦真亦幻，它们仿佛活过来了，仿佛发出声响，琵琶声、鼓声、马蹄声、旌旗舞动声，我睁大了眼睛和嘴巴，吃惊得说不出话。

有的窟壮观，有的窟精巧，每走进一个窟都像打开了一个八宝箱，方寸之间，存放着无限的世界。156窟有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马队，意气风发；220窟的舞者脚尖点在圆毯上，疾速旋转，跳着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112窟的舞伎扭身出胯，一脚独立，一脚高挑，反手将琵琶置于脑后，这就是最著名的“反弹琵琶”；我像地鼠一样钻了好几个洞，进入158窟看到巨大的释迦牟尼卧像，尺寸不可避免给出“势”，但光有“势”肯定不够。佛祖表情欣慰，我以为释迦牟尼在假寐，因为他的嘴角带笑，眼睛似乎没有完全合上，原来这是他涅槃的时刻，静下心来感受，又觉得他身上的袈裟都跟着身体呼吸浮动；45窟里我最爱的是菩萨彩塑，看起来也是最美最优雅的彩塑，菩萨是挺着小肚子的美人，表情介于满足和妩媚之间，似笑非笑，饱满的红唇，温润的下巴，袈裟层层叠叠，仿佛在被风吹拂，尽管姿态婀娜，一点不觉得拘束，特别潇洒自如。

在每个有佛像的窟，我都蹲在地上看，在高处的诸佛肃穆，眼神恰好聚拢到自己身上，我有种被普度的感觉。

因为在每个窟可以逗留的时间有限，我总是希望讲解员多讲一个情节，多照亮一些细节，眼睛无比贪婪，如饥似渴地看，不愿意错过这难得的视觉盛宴。除了脑子努力记着信息，我还说尽了好话，哄着讲解员带我多看一个窟。像我这样贪婪的看客数不胜数，还好讲解员心慈手软，就又多打开一个窟，揭开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像得了大便宜一样满足。

我从一大早开始看，信息量巨大，听不完的佛经故事，看不完的人物，中午不得不回酒店睡一觉，养足精神后下午接着看窟，直到关闭。不得不说，看窟是个体力活，得多吃两个烤包子，要啃戈壁滩的羊腿，饱腹而游，抖擞精神。

在莫高窟，人很容易进入忘我的境界，滚滚红尘都被挡在了外面，就剩下你和存放了千年的艺术，你不得不把痴情献给它们，才有可能看懂一些记住一些。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说的，看见美的事物，就放弃了臆想出的自我中心……对世界的感知于是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变得能够跳过自我直接获取直观和精神上的印象。体验美是“自我消解”的过程，是忘我的过程。

这些年我有很多知识的获得都来自艺术，从一幅画中了解历史、文化，背

后是人的生活。敦煌的历史藏着战争、对西域的探索、丝绸之路，莫高窟从佛教史出发，要把佛教文献资料跟考古结合起来，要了解印度塑像传统和佛教到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对于敦煌，我来得晚，也不后悔，倘若我年轻浅地来，也许不像今日这样被折服。

我开始理解什么是“文化自觉”，不是天天盯着自己，而是经过自我的远离，去看多元的文化，再回来看自己。如果直接看莫高窟，也许我不会像今天这样痴迷。看完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看过大理石雕塑和湿壁画，也去过了同受印度佛教影响但各表一枝的吴哥窟，再回来看莫高窟，更能懂它的难能可贵。

同样是歌颂宗教，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我们会有经变画，会有儒家思想融入其中，要画世俗的人物和生活？为什么我们比文艺复兴更早地开始写实，却不追求真实？为什么西方强调透视和结构，我们如此强调线条？为什么我们用线条就能描绘出无比生动的图景？

就像吉卜林曾说的：“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用于对艺术的理解，也是一样，如果只看自己的艺术和文化又能真正看懂多少呢？

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小书摊发现了伯希和带回的三百多张石窟壁画和雕塑图片后，放弃了自己在巴黎的艺术家生涯，一心回到敦煌寻找石窟，治理沙石，他在国破山河在的乱世里，潜心临摹石窟，坚守了一辈子。

另外我最近还有愤慨，知道张大千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就完全不能喜欢他了，原谅我的爱恨总是太过浓稠。我从历史照片上看到他直接在壁画上临摹，不像常书鸿当年为了避免损害壁画，用写生的方法；对待多层壁画，他把旧画层剥除，外层壁画损坏再也不能重现了；他的临摹加入了再创造，应该说是当成自己的作品在画，所以我们看到的也不能代表真正的原貌；自己还在壁画上题字，写一些感受，或者签名。

敦煌的壁画构图如天罗地网，密密麻麻的细节，每个局部取出来都是一副完整的绘画，没有留白，让你眼花缭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独特的哲学还是工匠们珍惜寸土寸金的空间。中国人总喜欢追求圆满，不但今生要圆满，还要想到来世。看窟里的彩塑，佛有前世、今生和未来，而我们人呢，有没有前生和来世？

和千年的艺术相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莫高窟成为多少人命运的分野，一念起，人可以接近自己的天堂。我们的敦煌壁画多少都是出自无名英雄，他们为艺术奉献，是无名的工匠。张大千离“我”太近了。常书

鸿是忘我。历代画师们信仰佛，呕心沥血地描绘佛，把所有力气投到自我之外去。也许他们也想到自己生命的短暂，才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绘制无限，有形的空间里添加无尽的画面。

信仰赋予历朝以神秘的力量，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用画笔布下，他们信仰神佛，又创造了神佛。在肆虐的风沙与劫掠中湮没于人世。“我”在信仰面前微不足道，因为忘我才能有超越性，才能有神性。

我一直以为自己爱温润的江南，今日才知道比起“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精致，我内心藏着的是大漠黄沙，戈壁大漠让人忘记世界的形状，摆脱情绪上的羁绊。戈壁和莫高窟都让我懂得什么是大美无极。

不可遏制地思念敦煌的一切。

祝羽捷

小兔你好：

很遗憾没有和你一起去敦煌，通过你的眼睛，应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希望将来会有机会。

对我来说，敦煌是一波涟漪。

在水面投下一颗石子，就形成涟漪，涟漪的中心，波澜重些，越远就越淡，直至波平如镜。许多事物也是这样，如涟漪一般扩散，如涟漪一般消退。是所谓“涟漪效应”。我们就生活在许多涟漪里，距离涟漪的中心，或近或远。

但不论怎样的涟漪，是正在扩散的，还是已经平静下来的，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从来都只是静静潜藏在我们的血液里，渐渐衰减，二分之一，又二分之一，却从没消失。它总会在那些重要的时刻显影。

敦煌，就是这样一波涟漪。只是，在历史的湖面上投下石子，形成“敦煌”这个涟漪的时间，太难确认了，我们可以把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高僧乐僔开凿第一个石窟，看作是投向湖面的第一颗石子，也可以把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建郡看作是第一颗石子。甚至可以再远再远，把最早来到敦煌绿洲，开始定居的那些人，看作是投下石子的人。

我常常想象，他们在某个日子来到这里，在河边驻足，骆驼和马开始低头吃草，他顺手在树上摘下野果咀嚼，黄昏将至，霞光映照在山岩上，他们向远处望了一会，静静做出决定，就是这里了。自己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路过的人也可以在这里补充水和食物。他们成了最早投下石子的人。

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投下石子的人是谁了，也不知道他们投下石子的确切时间。但却知道后果：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敦煌这个王国里，被它的涟漪微微漾到。它扩散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长，它的力度，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李安和许知远对话的时候，曾经说起理念的重要性，李安认为，许多国家的形成“来自血缘、历史、地缘这些东西”，也有国家，是“一个idea（理念）组成起来”，“这个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它是一个idea，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个地方组成了这么一个国度”。

敦煌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一个涟漪，穿越两千多年时光，一直荡漾到现在的，不只是地理上的重要性，在世界交通史上，有的是比它更奇崛、更重要的地方，而是因为，它最终成了一个IP，一个idea，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念想，一个……信仰。

最早被“敦煌”这个涟漪漾到，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和家人生活在新疆南部，我们像所有新疆人一样，把来自全世界的生活要素融汇在一起。我母亲来自甘肃，父亲来自湖南，左边的邻居是河南人，右边的邻居来自上海，他家的女主人有个绰号叫“小上海”。妈妈的同事，通常都有国外亲戚，有的在印度，有的在苏联，他们寄来的信，贴着国外邮票，唯一能认出来的，是标识面值的数字。

我们看《北京青年报》和《青年一代》，搜集印度和苏联邮票，听土耳其音乐，读阿拉伯神话，也读阿凡提故事。电视里播着《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也播出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歌舞晚会。我们吃羊肉和面食，却也从邻居那里学做江南小吃。日常话语里，有维语、哈萨克语的词汇和句式，也有上海话和河南话。

五色斑斓，却又无比和谐，该留存的依然留存，该保持的继续保持。我母亲就持续地保存着对家乡的关注，从于田到策勒到和田，她总能找到甘肃老乡，并且和他们建立联系。《丝路花雨》刚刚上演，并且引起轰动，她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消息，她收集了画报上《丝路花雨》的剧照，沿着人物轮廓把反弹琵琶的英娘剪下来，贴在五斗柜的玻璃上。那时流行的贴法，是在这些人物的正面点上胶水，贴在五斗柜玻璃的里面，人物的脸朝外，防止它们被不小心撕掉或者刮坏。

反弹琵琶的英娘，一直贴在我家的五斗柜上，一直到1984年我们离开新疆。我至今也记得她的姿态，和她被点上胶水的位置。还有五斗柜里，那种由茶叶、冰糖和香烟混合而成的味道。一推开贴着英娘的玻璃，那种味道就扑面而来。

回到甘肃老家，敦煌的信息扑面而来。那时，正逢日本掀起第一波敦煌热，NHK来敦煌拍了许多纪录片，喜多郎发布一系列和敦煌、丝绸之路有关的音乐，用井上靖小说《敦煌》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甘肃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片子，甘肃台自制的专题片和广告里，也常常用到喜多郎的音乐。

正午的太阳，太阳的光芒，光芒在镜头上折射出的彩虹色块，灰蓝的天空，天空下的沙丘，沙丘下孤独的绿树，沙丘上驼队的剪影，配着喜多郎的《丝绸之路》。特别贴合。那画面和音乐，让我懂得这种氛围音乐的妙处，知道了音乐也可以描绘形象和情绪，旋律和音色，也可以描绘长空下沙丘的寂寥，正午的燥热，和沙砾的晶莹。

虽然我只有十岁，却也能感觉到所有这些事物汇聚出的“共同的振奋”，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敦煌擦身而过，在打照面的同时，也点了点头。那种振奋之感，隔了这么久，也还是难忘。

所以，多年后当真去了敦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陌生感。我已经从各个渠道拼凑出了它的形象，并且反复温习。

我们被“敦煌”的涟漪漾到，也在这个涟漪里，持续不断地投下石子，让它的微波继续荡漾下去。它成了我们想要躲开的地方，也成了我们想要投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故乡，成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默契，我们精神DNA的某一部分。有时隐蔽，有时张扬。但那涟漪始终存在。

就像海子在他的诗《房屋》里写的那样：

你在早上

碰落的第一滴露水

肯定和你的爱人有关

你在中午饮马

在一枝青桠下稍立片刻

也和她有关

你在暮色中

坐在屋子里不动

也是与她有关

你不要不承认

他还写：

而爱情房屋温情地坐着

遮蔽母亲也遮蔽孩子

遮蔽你也遮蔽我

敦煌，也在遮蔽你我。

韩松落

2020年10月23日

“反旅行”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

通信人 赋格 旅行作家、前媒体人

一贯把旅行作为方法，其实“反旅行”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像音乐中的休止符、水墨画上的留白，一样有它的节奏和图案。

赋格老师：

见信安好。不知道你现在身处何方，对于一个热衷旅行的人来说，2020这个年份是如此的不确定又残酷，好不容易把2021盼来了，新冠疫情变异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肆虐，一切诡异得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前段时间，我收到来自意大利朋友的邮件，她说谁也没想到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更加凶猛，本以为年底会恢复正常，可他们又封城了，没有健身房、美术馆、餐厅可以去，生活充斥着憋闷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家努力保持好的精力。好好活着，确保头脑、身体、心灵的健全，成了一件很现实、很急迫的事情。

想起我们曾一起去旅行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黄粱一梦的感觉，我无可奈何又只能继续。最近我常常会想那些喜欢在路上的人又该如何安放自己呢？如何解决“想出门的苦”？

可能各个地区都一样，在这样一场无人免疫的疫情里，最先被摧毁的就是旅游业，不少酒店和航空业的人转了行。2020年的进度条一下就拉完了，这是多年来我的飞行记录最少的一年，相信你也是。可跟西方一比较，我们还算幸运，至少还能在国内走动。我从小就对“别处”着迷，羡慕大人可以自在出走，把宗法家风抛在脑后，进入一种自由的维度，与惯常熟悉的生活拉开距离，重新认识自己，找寻美丽新世界，在去往别处的路上收获跌宕精彩和无限的可能。听我爸说，我妈怀孕的时候他们还坐着火车旅游呢，那我多少也是受到胎教的影响，作为旅行者的工龄可谓跟岁数一样长。我们人类的所看、所摸、所闻所想都要经过大脑的杏仁核，那我的杏仁核就是那种特别渴望新鲜感的系统，这种渴望变成一种离心力，把我狠狠地向外抛去。

你知道吗，我最近一次外出去的是西塘，就在上海边上，从我家开车过去只用40分钟，却是浑然不同的景象，解甲归田，人就可以进入江南水乡氤氲的气息里。我在有机农场吃了一肚子的无花果，浸泡在田园牧歌中，观摩了养鸡场，试图接近几只外表温顺实则高冷的山羊，在一家民宿喝了水果茶，看了几本书。移步换景，我又坐了一艘被故意划得摇摇晃晃的木

船，晚上在水边泡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酒吧，听了一些年轻人弹吉他、唱无比流俗的情歌……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样算不算抓地和深入了西塘呢？但人换了新环境总归会有一些新的精神，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总爱往外跑的原因吧，在日复一日之间努力保持不麻木，竭力让感官和心灵重获敏锐。

“世界是一本书，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读过其中一页”，旅行显然是最直接进入世界的方式，我曾有过自驾旅行的经历，名副其实的“在路上”，景色更迭，镜头不断切换，车上所有的装备都很清简，衣服没有太多累赘但足够应对天气变化，一双耐磨的鞋子，羽绒服卷成水壶那么大，即使面对冰霜与阳光交织的天气也不用失措。旅行装的物什都很迷人，小尺寸但是坚实玲珑。带在身边的物品必须减少一切用电的可能，不用充电的牙刷，防晒霜、耳机、眼药水、止泻药装进不超过托运尺寸的箱子。每到一个地方先去酒店报到，丢下行李，然后四处觅食，可以根据店的装潢判断出面包和咖啡是否真的美味，剩下的时间全部用于逛美术馆、教堂、小巷。第二天沿着导航继续出发，每一天都很长，每一天的信息量都很大，有一种对时间满足的错觉，一天像过了几天，最终串联起一幅漫长的路线图。

英文有grand tour这个词，被我们翻译成“壮游”，是我最敬佩的出走方式。这不是度假，不是充当打卡的观光客，不是流浪。而是用一种接近壮烈的心情，带着凌霄之志，如华佗采药，如西天取经，如寻觅东方……纵然旅途危机四伏，也要闯入未知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些说要到远方寻找自我的叙事让我觉得肉麻且做作，我成了《美食，祈祷，恋爱》这本书的反对者，对一切心灵之旅持有怀疑的态度，只有到某处才能顿悟，靠旅行救赎自己，这种说辞非常可疑。可能是自己已经过了年龄，幻觉越来越少了，当年背着背包行走西藏和尼泊尔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孤寂，还自以为很酷呢。但我始终相信，我们总有一些只有在旅行途中才能发现的东西。比如自己被隐藏的个性会在路途中不可遏制地显露出来，一些不曾察觉的身体机能被激发出来，比如自己徒步、登高、涉水的能力；还会发现人的优缺点比日常中更加夸大，善的更善，恶的更恶。旅行消除自大和偏见，你的自以为是在真相面前被击得粉碎，你必须在未知的事物面前尽量谦卑；旅行帮你发现另一种生活方式，拯救呆板乏味的想象力；旅行更是一场心智考验，你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耐心和敏锐……

水果难免有虫洞，旅行从来都不是通往桃花源，到达目的地也并非君临天下。我还记得同飞机的一对夫妻，鬓角已有白发，满面愁容，竟是去取女儿的骨灰盒，他们的女儿瞒着他们坐小飞机去博卡拉徒步，不幸遇难。我曾经钻进绝美的大峡谷却迎来乌压压百只蝙蝠，以为自己就此化为干尸；刚下火车就被吉普赛人盯住偷个精光，不得不向当地大使馆求助，至少要

搞一张临时护照；发现与我同为中国人的女孩，前来借手机往家打电话，她刚刚被小偷光顾，惊魂未定；我还在商店看托帕石，铝合金的大门被老板速速地拉了下来，碰到突发政变或恐袭的国家，不得不及时躲到最近的角落，祈求暴动快点结束。旅途中，必须有自己一套安身立命的技能，让自己虎口逃生。

除了危险和艰辛，旅行还接洽着一切现实，日常生活里的琐细、俗气、庸凡、冷漠，样样都不会少，时而被抛在某个路口上而茫然四顾，时而倍感孤独。我想起一起旅行的时候，计划从瑞士的一个小镇坐火车去米兰，到了车站才发现当天的班次因铁路维修取消了，有人变得六神无主，有人开始抱怨，赋格老师什么也没说，跑去跟车站的工作人员沟通，又帮着大家重装行李，这让我想到什么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过这静气肯定是在旅途中身经百战换来的。

丽贝卡·韦斯特曾经分析过旅行者身上有种受虐的快乐，似乎跟爱情的原理差不多，她发现人类只有部分的自我是神志正常的，这一部分的自我热衷享受，而另一部分自我近乎疯狂，宁可自讨苦吃也不愿自得其乐，喜爱痛楚和它带来的绝望。

抽身于游客视角，观察生命的底色，你会发现人性和生活中“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共同之处，远方的人们和你有着别无二致的困惑，彼岸未必比此岸更美，你所躲避的很有可能改头换面再次袭来。

我总是希望通过别处来了解自己和体味人生更深层次的况味。别处，并非某个地点，而是打破惯常或找到新鲜感的地方，是我们虚幻的寄托，并非真正能够抵达的地方。荷尔德林曾说过：“谁曾见过那最深刻的，谁便爱那最现实的。”抵住平凡和重复的磨损，无论是逗留原地，还是在路上，专注于眼前，对抗庞大、芜杂、纷繁的外界，让我们在大同小异的生活里找到激情和智慧。

远方在新闻里变成了病毒的龙潭虎穴，可一个人只靠阅读，靠上网刷手机了解外界，能让自己完整吗，能让自己满足吗？我怀念旅行就像怀念旧时光，怀念一段不可复制也不可重来的旅程，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跟着溜走了。怀念脚踩在雪地里的悬空感，怀念站在山顶的瞭望，怀念海浪拍打礁石的韵律，怀念木造旅馆里的火炉，怀念铺着碎花床单的民宿，怀念草原上驰骋的羚羊，怀念跟小商小贩讨价还价斗智斗勇……也许我倒也不必大赞旅行的快乐，旅行说到底是一种内在的状态。对旅行者的定义有很多，我喜欢《世界尽头》里所说的：“每个旅行者都像是上了年纪的美人；陌生的土地挑逗继而抛弃并愚弄这位异乡人。没有什么比异乡人的星期天更叫人痛苦难捱。”

人只要活着，就忍不住好奇，想要探索，想要变化，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高墙，也许是需要我们做出改变了，别丢失宽阔的视域，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探索世界。

祝旅途愉快。

祝羽捷

2021年1月28日

小兔：

见信好。

接到你来信时我恰巧在旅途中，你知道，这年头如果还能出门走走，必是“内卷”的旅行，从前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突遇变故，除了顺势学着省吃俭用过日子，还能怎样。所谓挥霍，当然说的不是物质消费，当我谈论旅行时永远是指“穷游”，买张几十欧的廉航机票，跑去某个中国人能去的国家，一天逛三个展览或连轴看四五场电影节的片子，这种旅行不花什么钱，甚至比待在国内还省，却一点都不觉得“穷”，反而是穷奢极欲、挥霍无度。2020年以前的许多年就这样挥霍掉了，好像过了这村没这店，有一种深度悲观、拼命攫取的态度——对，既是挥霍又是攫取，无休止地吸收，待荒年来临，好歹还有存货聊以慰藉。

2020年开年那会儿，我刚结束一趟欧洲之旅前半段，预备从威尼斯回国。这些年，每年必定来来回回跑几次欧亚大陆，除了飞行，也有两次陆路穿越，2020年初这次我想做个实验，回程既不走陆路也不直飞，而是“东行跳飞”，什么意思呢？因为每次从西往东飞行感受到的时差困扰都比从东往西飞剧烈，我想尝试一种新的回国方式，把欧亚之间的飞行拆成几段，每段需要跨越的时区数目限于三个以内，类似进藏时逐级升高海拔以减轻高反，用“跳飞”的手段克服时差。1月上旬，从威尼斯先飞伊斯坦布尔；待几天，飞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三天后从马斯喀特飞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在北印度转一小圈后，从新德里飞广州。如此化整为零，意大利同中国之间的七小时时差就不用一次攻克，而是阶段性地调整：1小时、2小时、1小时30分、2小时30分，时差感被成功消除。

“东行跳飞”计划开启了我的2020旅行年度，看起来它会像往年一样徐徐展开，逐月填进新的行程：2月份，去墨西哥、古巴；3月去泰国，机票已买好。4月以后暂无安排，可以确定的是，夏天循例要去一趟希腊。多年来，希腊已经稳占我“身体家园”（且不说“精神家园”）的位置，假如哪一年夏天没能在爱琴海中吸收一定剂量的光照，便无法想象如何捱得过下一

个冬季。也许受了年轻时读的一本小说蛊惑，有句话印象特深：“一个人真正的故乡是他首次睁开慧眼的那个地方。”或像奥尔巴赫说的，是那种把全世界都视为异乡的人，但我后来悟到，不如做个快乐的傻子，拿着那个句子四处去找“真正的故乡”。找不找得到暂且不管，乐趣都在过程中。保罗·索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给年轻人一句忠告：离开自己的国家去旅行，异国体验能使人不那么狭隘。要不是你说到有一年我们在瑞士从圣莫里茨搭火车去米兰遭遇列车停运的事，我已经忘了这个插曲。其实，与你和其他人会合之前，我一个人在欧洲十几个国家已经晃荡了两个月，不停地乘火车，用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沿着铁路线进行“布朗运动”。其间遇到好几次比圣莫里茨糟心得多的麻烦，往往也是铁路维修临时取消班次，辗转到了下一站，却发现错过了开往最终目的地的末班车，而当晚旅馆已订好，不可退改。这类让人抓狂的事一再发生，最终怎么解决的我记不清了，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与过往旅途中遇到的挫败、困厄相比真不算什么。

我常去一些争议、冲突之地，以及有错综复杂历史与现状的边境地区，这不代表我以受苦受虐为乐，正好相反，最终愿意记住的总是美的东西。这点你是了解的，我们都那么爱看美术馆。在瑞士那天算幸运，没了大玻璃窗观景专列，但一打听，还有开往意大利边境蒂拉诺的普通列车，体验粗糙些，一样是米轨列车，走的也还是那条世界遗产铁道。火车盘旋攀上伯尔尼纳隘口，窗外闪过冰川冰湖，然后直下一千多米进入意大利，最终没有耽误我们当天下午在米兰逛美术馆。说到这里，想起来那天在布雷拉美术馆的一幅《领报图》前还偶遇一场美妙的吉他三重奏，是美术馆办的跨界活动，我总是更乐意记住这类旅途中的意外之喜。

说回2020年1月，我清楚记得，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中午，我去看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棉纺织协会大楼和路易斯·康设计的印度管理学院校园建筑，在公交车上收到“不明肺炎”人传人的讯息。此后的事，用句俗话讲，“都已成为历史”。我不想赘述一二月间发生的种种，下决心重启旅行。

二三月间“窜访”西欧、北非，除了路遇某些无知小孩冲我这张亚洲脸恶作剧叫嚷，一路没感受到啥实质性的歧视。西班牙宣布紧急状态后，回国之路被切断，好不容易从摩洛哥突围而出，飞到柬埔寨，似乎是慌不择路。4月份，我流落到一座热带小岛，当了“避秦”的鲁滨逊。那一个月岛居生活很难忘，几十个临时岛民都是国籍不明的旅行者，皮科·艾尔写过我们这种“以旅行为生”的人群，说我们共同构成了游牧的“第四世界”，这个说法让我骄傲，让我产生难得的认同感。

你看，我在2020年的遭遇其实没有代表性。这个大多数人无法旅行的年份，我竟能在国外晃了将近半年。只不过，这半年的旅行似乎于我一点都

不重要，反倒是旅行的反面更有价值。或许人在禁闭、孤绝的状态下会变得更敏感吧，“隔离”期间十四天足不出户的经验让我条件反射般地想到某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看到的谢德庆回顾展，有个行为艺术作品叫《打卡》，艺术家用一整年的时间将自己囚禁在特制的牢房中，每隔一小时打卡一次，一天打24次，昼夜不息。我在隔离笔记里这样写：“我看到的展品无非是密密麻麻的卡片及艺术家每逢整点与打卡机的合影，从8760（ 365×24 ）张照片和365张卡片（每张打满24格时间印记）里可以想象谢德庆是怎样度过那一年的：他用特制的强大闹钟系统逼迫自己每到整点醒来打卡，365天没有一天能睡上超过一小时的囫囵觉。”谢德庆说：“生命是无期徒刑，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和一生比起来，打一年卡只是有期徒刑，谢老师用他那种工程师式的严谨、苦行僧般的自律让我看到有限时间中的无限循环。他好像是在用时间做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砌他的“坛城”。

在这个时代，不管我们能旅行还是不能旅行，终将与“禁锢”这件事相遇，空间上的禁锢会引发我们对时间、存在、规训、惩罚、自我、自由、孤独、对话、记忆、创造、危机、死亡……的感触。我一贯把旅行作为方法，是这些经历让我发现“反旅行”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像音乐中的休止符、水墨画上的留白，一样有它的节奏和图案。

Bon Voyage !

赋格

2021年2月9日

爱与艺术是见自己的过程

翟永明 赵松 郑执 张定浩 黄昱宁

我们最向往的、被公认为最文明的地方，

却往往滋生出最荒诞的闹剧，

不得不让我们不断怀疑自己，

怀疑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信仰。

记住我们都是弗里达

通信人 翟永明 诗人、艺术家

女性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把她们自己变成可见的阶层。女性艺术家将不再是男性艺术家的陪衬，而是与之合作互助的独立身份。

翟永明老师：

你好哇！那日和你重逢真是太好了，我们可能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了，但我去成都的时候曾去你的白夜酒吧坐了一晚，吃了水果，听了音乐，女主人虽然不在，但也觉得满足，宽窄巷子里唯独“白夜”的气质清新脱俗，没有求光临的过分热络，没有耍宰游客的张牙舞爪。我当时就想：成都能有这样一片天地真好，就像瓦妮莎·贝尔和妹妹伍尔夫在布鲁斯伯里的会客厅。

见到你的时候，我还在焦虑中，展览在即，许多细节还没有落实，但只要一走进画廊，我的精神就会变得很饱满，像口袋里装满了弹药，和布展的师傅们熬了几个大夜，终于把女性主义艺术展览做出来了，算是给支持我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书房是我的后方，做展览就像在前方赴汤蹈火，自然是激动又紧张。这次展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有太多的不足，有些作品的尺寸不合适，和空间匹配在一起效果大打折扣，面对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简直要无地自容了。硬件设施改起来费劲，预算有限，实在挤不出一分钱更换专业的射灯。在不完美中，展览还是开幕了，就像刚刚破茧飞出的蝴蝶就已经挂着伤痕。一旦启动，品控又成了新问题。为了做出好展览，所有采取的对环境的重新设计和对作品的呈现，需要是有价值的，这是策展人的“在场”。今天在展馆很多细节被改动了，我非常不满意，立刻要求所有的变动恢复原位。策展人在美术馆里是在场的，哪怕不是真的现身说法，观众看到的就是最后的呈现效果，策展人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作用着。

除了策展人的“在场”，我还要兼顾策展人的“不在场”。我是很反对策展人比艺术家更往前，所有的美术馆和策展人说到底最终应该服务于艺术家，就像编辑服务于作家，除非是像巫鸿老师、侯瀚如、小汉斯这种级别的策展人，兼具学术和业界影响力。让作品自己说话，胜过艺术家说话，胜过策展人说话，公益也好、社会意义也罢，都要藏在作品创造力本身（艺术性）的后面。作品本身立得住，既要表达展览的性别议题，也要超越性别议题。这些都是策展人的“不在场”。

策展人不在场时，也要去考量反响，把初心和反馈放到天平上，看看究竟

是谁占了上风，纵容违反初心的操作，一味地妥协或者盲从，是不是犯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做展览好吗？只有一点好就是初心，剩下的都是每天对自己的拷问。

女艺术家们意识到，女性的想法和感受往往得不到器重，话语空间被挤压得很厉害。艺术家陈欣装置中的黑箱子里塞满了观众现场写的信，这个箱子设置的初衷，就是想给那些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女性一个抒发情感的渠道。陈欣有天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工作人员总抱怨纸张不够用，原来是写信的观众太多了，陈欣以前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会有那么多人参与进来，眼睛一下就湿润了，她说，这是观众对艺术家的信任，对我们展览的信任。展览期间我们做了多场论坛，意外的是场场都是人数爆满，有人坐着火车、飞机过来，很多女孩子坐在地上，房间里窒闷，聊到最后大脑缺氧，可大家还不愿意走。醒来的女性仿佛无处可去，无处可以诉说，她们仿佛憋坏了，有很多话想说。结束后也有不少女孩拉住我讲了自己一些伤心事，白净纤细的小手握住我的手，口罩之上的双眼湿漉漉的，我再次感到展览之外的人与人的深层次连接，所有的表达都是自发性的。聆听观众的倾诉和意见，也成了展览的一部分。

做论坛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女策展人这么少？显而易见，不光是女策展人吧，女馆长、女艺术家、女作家、女诗人能被大家看到的都不多。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提出“现代艺术领域中只有不到5%的艺术家是女性”。能被看到的女性往往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甚至要比男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的女人。遇到此类的问题，我忍不住把矛头指向结构，可我们都不是能撼动历史建立的框架的人。

我不知道以后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策展，做策展人有那么一点权力——挑选艺术家和作品。那一刻，原本对策展有一些抗拒的我，心中燃起一种使命感，只要还能有机会做展览，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也要让更多优秀的女艺术家被大家看到，让女性创作具有普世性，要揭示被大家忽略的、轻视的女性叙事。

也会有人问我是不是只会关注女性议题？当然不是。但我是个女人，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女性”是我一出生就获得的身份，这个身份一直带给我生活的直接体验，这里存在有所察觉和无察觉，总有一些时刻你会觉得不对劲。当我发现性别身份带来一些暗示、规训、不公或者被区别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了怀疑、批判的态度，长大成人的过程也是体会女性身份与个体身份相互抵牾、性别之间差别和权力等级的过程。许多人耻于谈论女性主义，也很怕沾上这个标签遭人厌恶，特别是女性创作者不愿贴上“女”字，我不想说这是“厌女”情绪的衍生品，因为许多批评声总是来自内部，只能说大家对女性主义还是充满偏见。对我而言，女性主义是温暖且美好的事情，改变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积极的力量，会让人看到

更加平和的风景。

我去明珠美术馆看了翟老师的展览，看到时间作用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变化，也看到了老师用摄影作品向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的致敬。浓浓的一字眉不仅成为她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弗里达体会了生命的五味杂陈，一生都在把痛苦化作艺术作品，在自己石膏胸衣上作画，生命如舌龙兰酒一般既酸涩又热烈，她不是“大名鼎鼎的里维拉的妻子”，而是用她的话来说“墨西哥最放荡的女人”，也是最有觉醒意识的墨西哥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自信满满地走向舞台的中央。如今再也没有人骂她是“荡妇”，取而代之的是“女英雄”，所谓的替换实际上是观念的更迭。

对于一些女性议题，我常常觉得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面对宏大的困境，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遭遇，在历史铸造的意识形态面前，我们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正如诗篇《致蓝蓝：神奇的梦引起反响》中所强调的：“记住我们都是弗里达。”希望弗里达的故事没有白白流传，我们都是弗里达，不打败的弗里达。

祝羽捷

2020年11月15日

羽捷：

你好！

初见你时，你还是一位年轻的记者，但是你身上展露的才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到多年不见，你已经成长为一位女性策展人。而且，正在策划十二位女性的联展《予她同行》。展览主题我也很喜欢，“同行”“予她”，代表了我所看到的新时期女性崭新的一面。很遗憾，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未能亲到现场，观看十二位年轻女艺术家的作品。但是这一消息，依然让我振奋。互联网给了我们便利，使我虽不在现场，也能从网络和图像信息中，获取展览的各种信息。

你在信中谈到展览前的种种焦虑：“作品的尺寸不合适，和空间匹配在一起效果大打折扣，硬件设施改起来费劲，预算有限，实在挤不出一分钱改聚光灯”等等。这也许是一位年轻的、同时又是女性的策展人将要面对的更多的困难：因为年轻，因为是女性，你没有更多的资源调动，你也很难撬动越来越趋圈子化、利益化的艺术圈。你只能“予她同行”，也就是说，与跟你一样的年轻女性一起，挖掘来自自身的能量。讲女性自己的故事，在不完美中，破茧而出，哪怕挂着伤痕，这伤痕便是故事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我很喜欢艺术家周雯静的作品《节育环》、柳溪的《妈妈》。这两件作品，让我联想到自己和母亲两代女性的共同命运。柳溪在五年间搜集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许多旧搓衣板，它们在不断磨损的过程中，生长出各种肌理和劳作的痕迹。这是已经被洗衣机淘汰掉的历史痕迹，它们从未被认真看待，也从未被历史记录。但是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都曾留下过母亲在水池边、木盆里清洗衣服的劳碌身影。我母亲这一代新中国建设者，她们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政治激情中，一边参与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一边却依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传统工作，她们因此承担了双重的责任和双重的劳动。我至今仍记得母亲每天上班八小时，下班后做饭、打扫，和夜深后在搓衣板上搓洗全家衣服的身影。这一部分身影全然被遮蔽在新女性、建设者的革命身姿背后，被忽略、被遗忘。所以，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艺术家用材料转换的方式，将这一女性的劳作见证呈现出来（如果能与搜集来的旧搓衣板一同展出，将更醒人耳目），让历史遗物为上一辈女性发声：历史不应该忘记女性的付出，哪怕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同样的意义包含在周雯静的作品《节育环》里，这一沉痛的主题，是女性自己才能体会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许两代、三代育龄女性集体的痛苦经验、节育环带来的副作用，均在小品《超生突击队》的段子中，云淡风轻地供大家呵呵一乐；但是这些黑色幽默的背后，女性隐秘的、无法言说的痛楚，也渐渐地被时间淡化了。周雯静没有直接诉说妈妈的痛楚和后患，却用年轻女性的方式将其转化成首饰——“上环”，这一中性和双关的词，隐喻了美好愿望下节育措施的残酷，让年轻的幸运女性至少能够了解那一段特殊岁月。

新一代女性将母辈的人生经历，与更广大的历史背景和性别话题勾连在一起，交出了她们不同于上辈艺术家和男性艺术家的艺术水准，这是值得策展人欣慰的。毕竟，策展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使之最终呈现的作用。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策展人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操控着”。我一直为中国没有更多的女性策展人而遗憾。因为直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惯性思维，且已形成固定的圈层及共同利益体。如果没有好的、水准高的女性策展人，强有力地推动，中国女性艺术仍然会像20世纪一样，大多数时候，她们只是男性宏大叙事中的点缀。你说，“我们不是能撼动历史建立的框架的人”，但是，我们可以为新的历史建立框架，那就是：搭建女性自身的叙事框架。我们需要与更多的女性策展人、女馆长、女艺术家、女作家一起，完成这一劳作。

不错，“女性艺术”这样的称谓，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女性诗歌”一样，一直面临着各方面的质疑和否定。但是，无法质疑和否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一种“女性方式”和“女性语言”的艺术表达是存在的，且越来越多。说到性别所带来的差异，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具魅力、最能相互吸引的部分。如果是这样，强调差异

和追求女性权益之间并不矛盾，或许刻意回避和刻意强调，都只是一种策略。

一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回答《今日艺术》（*Flash Art*）记者提问时，说过一句话：“妇女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把她们自己变成可见的阶层。”从“不可见”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女性艺术，发展到今天，的确已改变了当代艺术的格局。在西方，有人悲叹女性主义运动“腐蚀了艺术批评标准”。正是与后现代美学观念同时兴起的女性艺术运动的发展，质疑了传统艺术标准和价值观的追求，使得当代女性艺术出现了“可见”的局面，并得以与主流艺术共享流通的空间。

在2003年，我写了关于女性艺术的书稿《天赋如此》，当年这本手稿曾在多家出版社编辑手中流通，有人认为“女性艺术”这样的话题，在市场上已经过时了。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女性艺术”在发展趋势上，在市场价值上，在中国和中国之外，都远没有成为一个过去了的话题。随着全球文化跨越国界的结合，技术、资本、信息的民主化必将带来艺术的改变。女性艺术在中国新的信息秩序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她们将不再是男性艺术家的陪衬，而是与之合作互助的独立身份。

所以，我对你、对新一代女性策展人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祝好！

翟永明

2020年12月10日

时间与寂寞自会淘洗掉生活里的杂质

通信人 赵松 作家

我感觉自己简直就像个敲钟的人，抱着一根粗木头，咣咣咣地撞击着那口又破又大的钟，自己用力敲着，直到把自己震成了聋子。

赵松老师：

你好哇！你怎么就从事了我梦想中的职业呢？一个在美术馆工作的写作者。艺术和文学此呼彼应，它们就像是我们的白玫瑰和红玫瑰，你能在最美好的两个学科之间，左右逢源，作为一个每天坐在书房上班的无业游民，我羡慕地流了一地口水。

有回在伦敦，同学们一起去画廊看展览，走进梅费尔区，金贵的私人画廊散发着高贵的气质，它们看上去并不友好，也不民主，自然没有贸然闯入的游客，这里只有穿着精英感十足的中年人，他们有可能是艺术品经纪人、藏家、评论家、画廊主等等，是艺术市场每个重要环节的参与者。画廊里，一位沉默的男士穿了一身黑衣，坐在一把贴着白色墙面的椅子上，他微微驼背，专心致志地在缝一条裤子，他高耸的鹰钩鼻把一双眼睛衬托得格外深邃，他的全身心投入让我看到了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演技。你知道的，看艺术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人讨论感想。我说，“缝裤子这样的行为艺术放在美术馆里格外讽刺，因为美术馆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的地方。”意大利同学说，“嗯，也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艺术跟从业人员之间的断裂。”英国同学补充道：“艺术无法解决像缝补衣服这类现实中让你窘迫的小事。”就在我们小声嘀咕的讨论声中，这位男士完成了行为表演，把裤子放回了储物间，坐在椅子上继续当一名面无表情的保安。

Fine，我又干了一件被苏珊·桑塔格无比鄙视的一件事——过度阐释。阐释就是对艺术的背叛，可是我们总无法闭嘴。

但这也是美术馆吸引我的地方，给了我这种情感泛滥的双鱼座可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一走进美术馆，我就放飞自我，觉得自己是青春期还未结束的叛逆朋克少女，觉得自己是艺术感爆棚的毒舌评论人士，觉得自己是虔诚的无神论祷告者，唯有艺术是我的现代信仰，在艺术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卡夫卡笔下可以变形的小人物，反正我是所有的一切。

怀着成为伟大作家决心的年轻海明威，从美国搬到巴黎，带着微薄的积蓄。他每天饥肠辘辘，特意避开精致的面包店，在卢森堡博物馆看艺术，

仿佛得到了饱腹感，精神也跟着振奋了一些，他相信每一幅画、每幢建筑、每件雕塑让饥饿的自己更加敏锐。卢西安·弗洛伊德以难民身份从柏林流放到伦敦的时候，夜夜徜徉在英国国家画廊，暂且忘记了丢失家园的伤痛。当“二战”中的伦敦炮火连天，深陷战争最黑暗的泥泽，《时代周刊》上刊载了一封信：“伦敦已饱受战火摧残、满目疮痍，正因为这样，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看到美的东西。数百万件国宝级大师作品正被保管在安全的地方，但同所有渴望通过美的体验来振奋精神的人们一样，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它们中的一部分。”正是怀着“正是美催生正义的最好时机”的理念，国家画廊决定每月展出一幅古典大师的杰作。市民们在提香的画前感受到美的慰藉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超越死亡。

我们长大一点，知道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美好，灾难迭起，世事难料，却总有人找到探索表象之下的方法。文学和艺术显然不能治病救人，却在表达我们难以言说的情感和欲言又止的心事，替我们解决生命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的问题，消解人性中的自大和草率。意大利人的阳台上响起了萨克斯，一家五口在家举着扫把唱着自己改编的《悲惨世界》。无论是站在一台打地鼠的机器前，还是专注地进入一幅画作，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疏解自我的方式。正如英国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说的那样：“一切能使人忘记自我、变得更加关注客观实际的事物，都是好的。”我们不用成为艺术家，却可以永远提醒自己，以一种带有艺术自尊的方法审视世界，无论是看艺术，还是看待社会问题、自然现象、不同的人 and 观点，都应该用美催生自我心中的正义感，避免惯性思维和喜好、偏见，亦不可轻率定论。

我对美术馆的工作总充满美好想象。的确我有不少同学都散落在各国的美术馆里上班，他们的生活自然跟艺术有关，看展览，参加双年展、展览开幕酒会，与头顶挂着光环的国际级艺术家合影，见到那些在拍卖会上才能闪现的私人收藏。他们的业余生活也都花在了和艺术有关的活动上，逐渐长出了艺术青年的脸——先锋、骄傲、宠辱不惊。总之，艺术界的生活太能满足人的虚荣心了，搞艺术总比赤裸裸卖货听上去更有追求，更有思想深度吧。

我就是个非艺术界人士，我不知道中国的艺术界在哪里，艺术是开放的，但好像艺术界又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经济系统分为实物经济和符号经济，艺术界显然是一种符号经济，强调身份认同感和圈子活动。不混艺术界有关系吗？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确实是一个失业的策展人，至今为止还从未在国内策划过展览。我发现策展这个专业在国内是个鸡肋，因为人人都可以是策展人，人们对策展的理解就是搞活动的，搞展会的。在实际的美术馆运营中，我们读的那些理论统统失效。策展人不需要知道艺术史，不需要会写艺术评论，只要能搞到钱和人就行了，这点很多学院派的人又恰恰最不擅长。

在国内我去看展览的次数大大减少，有几次被叫出去看展，却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比如有人把我带去一个绚丽多彩的空间，散发着未干透的油漆味和塑料味的刚装修完的现场，芭比粉的塑料球摆了一地，天花板上是亮晶晶的氢气球，空间充盈着享乐主义的味道，像生日派对现场，许多穿着时髦的女孩在拍照。我一下意识到，我走进的就是所谓的“网红展”，没有任何有创造价值的艺术品，只有拍照道具，和不求甚解、只求娱乐的观众。对于我来说，自然不会满足，你本来想来吃烤鸭的，厨师端给你漂亮的盘子，盛装盛放着两只炸蚂蚱。但我的不满意显得很不合时宜，又有人说你装逼，一把年纪了还当愤青呢。

展览需要有理有据，需要讲故事，需要提供给观众一个沉浸在艺术里的机会。在我心中，好的展览本身就是艺术品，策展人不创造美，但是重组美，组织美，再现美。一些叙述性不那么强的作品，还可以通过策展人的“强策展”变得生动，好的展览如好的艺术同样令人感动，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看过太多有关艺术家传记的电影，来说一个有关策展人的故事。电影 *The Square* 的男主角 Christian 就是展览策展人，一个典型的使用着知识分子话术的精英，白左，离异，有两个女儿，我本来是带着偷窥艺术人士私生活的目的去看的，意外收获了酷烈的真相，电影撕下了现代社会所谓文明的外衣。男主角在美术馆里探讨艺术里的爱与信任，自己的真实生活却陷入困境。艺术晚宴上的野兽表演，老钱们坐在金色大厅，人扮演的那只野兽行为失控，在场对一名女性施暴，可衣冠楚楚的上流人士愿意对高价的艺术买单，可以慷慨做慈善，却不愿解救正在受到侵害的身边的一员。开幕式上，观众们前一秒还在温文尔雅地听美术馆馆长发言，下一秒就作鸟兽散——并不把出场的厨师当回事。艺术的从业人员操弄着令人迷惑的话语，人们在美术馆忙着社交，无人关心艺术品。

Christian 策划的展览 *The Square* 很好地体现了白左们日夜关心的话题——人人平等，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Christian 宣称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可是展览的宣传片为了流量制造了违反自己信念的内容，在视频中炸飞了一个金发女孩，点燃了网络暴力。这部电影里处处都是精英们的自我矛盾，让人怀疑现代社会的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位置真的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吗？

艺术界的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神秘的，因为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小圈子文化。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艺术界人士的生活，里面涉及的信仰怀疑、难民、种族、贫穷群体、LGBTQ、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精英人士的伪装、艺术圈的虚伪造作、公关悖论等不都是当代艺术最关心的话题吗？

我们最向往的、被公认为最文明的地方，却往往滋生出最荒诞的闹剧，不得不让我们不断怀疑自己，怀疑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信仰。

祝羽捷

2020年5月10日

羽捷：

好像很久没跟人聊到美术馆的事了。2003年我初到上海，就是在新创建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做馆长助理。2005年又参与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现为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筹建和开馆，直到2007年调任后者之前，基本上是在两个美术馆兼任同一职位。之后做到2013年左右才离开美术馆这个行当。

十年的美术馆工作，让我的写作成为业余状态，而与艺术打交道则成了主业，也刚好见证了国内当代艺术从低谷奔上波峰再跌落谷底的全过程。长期身处在这个行业里，跟外面的人会有不大一样的角度和看法。外面的人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展览的闪亮开幕，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构成的现场，而身处其中的人则会看到幕后的所有一切，比如机制的问题、艺术生态问题以及人的问题等等。

回想一下2008年之前的那些展览项目，无论是策展人还是美术馆团队，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那么多明显的企图心和杂念。投资人对美术馆本身的运营和展览生成干预也比较少，也不会要求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回报，所以那时候需要的就是专心把一个个展览做好。等到2008年左右当代艺术市场骤然火起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各种资本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市场了，投资人开始想要回报了，艺术家跟策展人热心于发财了，艺术品拍卖价格能成为新闻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展览越来越像作秀的现场了，光鲜亮丽的开幕式越来越像孕育艺术财富梦和试图吹出资本新游戏泡泡的地方了，最后甚至还渐渐露出娱乐化的价值取向。所以那些年在各类展览开幕的现场，看着艺术界、投机界的各色人等举杯言欢的场面，就总觉得像在看戏，大家都在尽情地表演，并努力增加着自己的戏份，以期某一天能拥有足够的戏份并获取丰富的回报。至于艺术本身，则更像是个媒介和点缀，或者说是帮助完成表演的道具。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高度娱乐化的时代里，随着各种真人秀式的综艺节目的泛滥，已经让很多人的表演欲得到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演艺界的人就不用说了，从政客、商人、网红到喜欢在各种传媒平台上露脸的各界“精英

们”，以及这些人的粉丝们，都在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这场看起来仿佛永无落幕期的狂欢节式的表演里。某个产品的广告词叫“秀出真我”，其实它的潜台词倒更像是“人生如戏，都是戏精”。相对这样的状态，整容、加滤镜、修片，都只不过是道具工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戏精以及养成戏精的理想道具，包括他们自己，以及任何相关者。

当然导致各种戏精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毫不掩饰的商业意图，在这个没有什么事不能变成生意（包括情感）、没有什么不能变成商品（包括人本身）的时代里，被买买买的欲望驱动的是卖卖卖的狂热，当然，需要的只不过是适当的包装，赋予原本赤裸裸的买卖关系以鲜亮的色彩和天真的叹息。当然，即使是这种满大街都在涌动的行当也是有技术含量的，需要策划，才会有流量爆棚的神操作。当然，即便是在看起来没有任何商业特征的各种微信群里，在看不出任何直接的商业企图的情况下，也还是会有很多戏精在沉迷于表演，以微不足道的回应来滋养自我的一点存在感，却又难免轻易暴露出其个人本质上的虚无状态——他想存在，却又总是无法存在。因为但凡还有些真实自我存在感的人，又怎么会花时间和精力热衷于在虚拟的社交平台上寻求互动式的认证呢？

你用这么多文字来写艺术界的事儿，虽说我确实有点兴奋不起来，但又免不了要感慨一下。前两年去伦敦、纽约、东京看朋友回来，遇到熟人总会问我是不是看了不少美术馆啊？我也会礼貌地回应是的是的，看了不少美术馆。实际上也确实看了一些美术馆，只是并没有很多。因为在美术馆这个行当工作了那么久之后，我对美术馆的兴趣真的不大了，尤其是跟2005年初次去欧洲时那种近乎狂热而又虔诚地看各种美术馆的状态真是有天壤之别。要说原因，说起来可能真的要上说半天也未必说得完，但是，在我看来可能还是可以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来说一下。

在我的感觉里，美术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跟动物园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为了把一些珍稀的物种关在有限的空间里，供人观看。而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珍稀动物，都已脱离了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变成了人类文明叙事意义上的证物。至于那些作品曾经有过的语境和真实处境是什么样的，它们与某个生命本身的精神关系如何，那些被豢养的动物们还有原始本性么？都无足轻重了。重要的只是它们在那里而已，就像一把古代的器具，你只要看就是了，只需要验证一下教育得来的知识就是了。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动物，从本质讲都是已死的，不是死在过去，而是死在人类为它们造就的那些说起来冠冕堂皇的盒子里，死在高速运转中的现在世界里，就像木乃伊一样的标本。

不管怎么说，艺术史赋予了美术馆以神圣殿堂般的价值感，当代以来又有了市场价值加持，过去你跟人说哪些作品有多重要，人家未必能懂，现在你只说出它们的市场价格，人家就都“懂”了，还会肃然起敬，价格，就是

这个年代全世界通用的价值观，说别的都是扯淡。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美术馆都是钱堆出来的圣地，值钱的好东西多，为了让它们好好地呆在那里供人们观瞻，要烧很多的钱，像泰特、MOMA这种地方，每年烧的钱都会让人咋舌。理由就是，这是艺术，这是文化，是为了让公众只需要花上十几美元就可以分享的公益文化事业。

被装到美术馆盒子里的经典艺术是已死的艺术。那么追求观念翻新、手段花样百出的当代艺术呢？这就又可以回到我前面说到的那个观点了，在我看来，很多当代艺术，都已沦落为某种带有商业企图的表演。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热烈地拥抱那些著名品牌，热衷于与它们深度合作甚至推出各种衍生品的时候，丝毫都不感到意外的原因。当然我也可以马上给他们找到最合适的理由，艺术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既然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拥抱一切，那为什么艺术不可以呢？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大买卖狂欢节难道还要排除艺术么？

从2003年到2013年，我既看到了国内当代艺术最初的纯粹状态和反思批判精神，也见识了它是如何被一步步带到了资本狂欢节现场的。只不过对于国内的当代艺术来说，来得多少有点晚，这场派对刚达到高潮，就戛然而止了。醉时同交欢，醒后各分散，狂欢现场在人们散尽之后总是满目狼藉的。现在的艺术市场越来越糟糕了，艺术家的经济处境也日益艰难，随便哪个艺术家要是聊起当年的盛景，都难免有白首话当年的感觉。

这些年国内的美术馆越造越多了，也越来越难做了，为了吸引观众创造流量，恨不能把美术馆变成马戏团了，多数都在挖空心思做网红级的展览了……至于什么是艺术性，什么是对本土艺术生态的关切与支持，差不多都是要且等兄弟先把生计问题解决以后再去满怀理想吧。正像某个好莱坞电影里的台词所说的那样：“世界已是满目疮痍，囊中干净如洗，我等且先莫谈什么狗屁情怀了。”

当然，其实我想说的是，艺术的最好时代可能已经不远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诡异怪诞？前面还是一地鸡毛满目疮痍，这会儿怎么又来了希望？我的意思是，当艺术终于不再被资本追逐，不再被派对所欢迎，不再能奢求什么流量，甚至于无人问津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才会慢慢地浮现。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和作品，是注定要经历时间与孤寂的检验的。时间与寂寞自会淘洗掉很多的杂质，而在少数的幸存者中，总会有些在某一时刻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异类，就像史前生物那样，以其陌生突兀而又充满活力的状态，击中我们。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想象而已。

有时候时间会显得异常的残酷，我想起某部德国的艺术史类著作里，在谈及某个时段的艺术时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大约有两百年左右，这里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的艺术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么？在今天这样一

个特殊的时代里，在这个异乎寻常的2020年，不要说两百年，又有谁敢预测十年后的情景呢？人类的混乱与脆弱今年已是毕露无遗，所谓的文明与进步在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刚从地下挖出来的千年前文物。咱们现在能拥有的只能是回忆意义上的东西，那些伟大的经典之作，在周遭环境所提供的无尽不安与惶惑里，它们多少还能让人在某些时刻暂时忘掉现实世界通过网络塞过来的喧哗与骚动。面对这样的处境，需要有更大的脑洞，才能让它们迅速地通过，而不是沉积在脑海里，在不知不觉中把脑子变成大垃圾场。

另外我想跟你说的是，对于艺术，观看艺术，在我看来是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面对那些真正好的艺术的时候，只能是个体的状态，一个人，看它。只有这样，在观看者与作品之间，才有可能出现某种微妙的关系，某种呼应与默契，某种启示或领悟，甚至，只是某种无以言表的沉默的需要。尽管这么多年来出于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爱好的需要，我也会写些艺术评论，谈论艺术家和作品的观念意味、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力，但这并不代表我会认为艺术的观看与分享是有着天然的通道的。一个人看艺术是一件事，一个人跟别人谈论艺术，是另一件事。在这二者间并没有因为所以的关系。归根到底，语言并不是万能的。而所有好的艺术品深处，所蕴藏的都注定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艺术存在的意义，以超越语言的方式，抵达某个仍旧鲜活的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心灵，并极有可能促使其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日常的事情才是可以分享的，就像生命下坠的过程中不时浮现的泡沫，它们在日光下不断涌起又随时破碎，以无关痛痒的方式，轻松的，随意的，漫不经心的，带着光彩，掩饰了那些最为本质也最为残酷的事实。

写完这些话，我感觉自己简直就像个敲钟的人，抱着一根粗木头，咣咣咣地撞击着那口又破又大的钟，自己用力地敲着，直到把自己震成了聋子。这时候我又忽然想起小时候就听过的一个歇后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以前，都是当成某种玩世不恭啥都无所谓的态度来理解的，可是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我甚至能想到佛家所常说的“空”的意味，以及《金刚经》里的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说到底，日子只能一天一天地过，一个人所拥有的，也只是今天而已。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得学会努力把这一天变成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一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实在都太有限了，就像走在黑暗里的人手中紧握着的一盒火柴，能走多远，能看到点什么，都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点燃每一根火柴，再引燃些什么可燃物，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光亮与温暖。这可能也涉及某种艺术，活着的艺术，以便于艰难应对日益残酷的日常现实。

赵松

2020年5月10日

写作是逆流而上的行为

通信人 郑执 作家

我对生活中那些真正严肃的人类，从未心存丝毫嫌弃，只不过假如哪天我也严肃了起来，我一定会被自己嫌弃。

郑执：

你好哇！刚刚读完你的新小说，按照老话说“阅读是创作的共谋”，我又给你当了一回从犯。并不是每一本书都能落到读者手里，每一本书的命运也不取决于创作者本身。我能读到你的小说自然开心，还自不量力地以为自己是位有机的读者，在真实和虚拟的纠缠中得到自己的体悟，能将作品接洽出方方面面的想法。

给你写信时，已经接近一年的尾声，每个人都在感叹这一年来不及眨眼就过完了，我想，这不是正常的吗，说明大家都挺热爱生活的，才会觉得时间如梭。整个12月，我没有一天能早睡，进入了挂着一对黑眼圈的还债式工作状态，一开手机都是来“要债的”——全年不努力，年底徒伤悲。越是忙碌，越觉得闲书好看，偶尔翻上几页，跟在高原吸了纯氧似的舒坦，结果忙碌中看完了好几本书。可能我太不善于展现一个真实完整的自己了，外人总觉得我特别“岁月静好”，却不知道我常常过着“苦逼”的日子，我倒很想跟你开诚布公地谈谈自己的痛苦和艰辛。

在我看来，很多人挺幸运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含着金钥匙出生，而是早早地知道自己喜欢过什么样的人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在这方面特别愚钝，也很吃亏。家乡是个熟人社会，父母给我改大年龄提前上了小学，小时候的生存法则接近动物界，体格大更有优势，相形之下，我不但像矮刺柏树，语言能力也没有同班同学强，写字也特别用力，本子纸都写穿了，说话有点大舌头，显得又笨又内向，由于我发育得晚也受过不少嘲笑。我常常有种感觉，别的鸟儿都在愉快地鸣叫，我这只笨鸟还没找到北呢，就劳燕分飞了。每次报考学校，父母又总是干预，选了我不喜欢的学校，不喜欢的专业，有时理由特别简单且可笑，因为“爸爸的同学在这所学校工作，女孩子有个照应比较好”。我成长中的这些关键选择都与自己的喜好无关。

如果现在看到我是如此明朗，一定想象不出我小时候多么不自信。离开父母的庇护后，我陷入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期，半死不活地对待学习，却很愿意参加各种兴趣班，恶补自己内心的缺失感。因为多次向父母发出对

他们帮我做选择的怨气，郁郁寡欢，生活的主动权终于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上，可我总是心血来潮，胡乱尝试，到处乱撞，到处碰壁。我很少做特别长远的规划，但是一旦与一事物陷入热恋，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成年后的自信心也正是在一件件小的成就感里建立起来的。

正如大家知道的，我做过很多事情，总在急刹车和大转弯，很没有套路，贯彻始终还在坚持的可能就是文字了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临时生病不能去参加市作文竞赛，新从外地调来的孙老师没有对同学们过去的印象，意外地叫我去当替补，竟意外拿了一等奖回来。那天放学，舅舅骑着自行车接我去外公家，路上买了一包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作为奖励。我大概从那时起对文字有了香甜的记忆。每一个人的生命太短，不能经历所有的体验，我们走进别人的故事其实是在延长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小说家像一个景观设计师，或者说当代艺术家里擅长“构建情景”（constructed situation）的那种，用自己的语言为读者建构了一个情境，从读者读下第一行字开始就被邀约往前一步，慢慢适应环境的变化，走进小说家建造的场地里，体验填充在里面的各种情感，恐惧、悲伤、甜蜜、孤独、寂寞、爱意、悔恨……至于读者是否能被气氛所感染，能不能对故事心悦诚服，能不能触及精神内核，全看创作者的技艺和真诚了。

文字是所有创作的原点，在今天纷繁复杂的环境里，我们也许会执着地迷失，但仍然心怀回到原点的愿望。写到这里，我发觉自己最放不下的还是写作，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文字对我来说更快意人心的事情了——写出一个喜欢的句子，可以开心一整天。

放弃写作太容易了，不写是天经地义的，写才是逆流而上的行为——时代环境是喧哗的，写作是安静的；时代环境是动的，写作是静的；时代环境是纸醉金迷的，写作是苦行僧式的。朱利安·巴恩斯说“毕竟，不当作家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不是作家，这几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坏处。”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发现，积极向上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人类是一种身心极不稳定的生物，能懒惰就懒惰，能丧就丧，一不留神就会塌陷。

最近，我有个作家朋友说自己不搞写作了，醉心下围棋，醉心到去外地参加下棋比赛的境界。这让我想起了马塞尔·杜尚后半生把艺术放在一边，专心致志地下国际象棋，不但参加比赛，还为第三届法国国际象棋大赛亲手设计了海报。“生活是否高于艺术？这天晚上的棋局，是把生活延伸到了艺术领域，还是刚好相反？”也许对他来说，艺术不比下棋重要多少，棋局即是艺术，能带给他的思考同样重要。身边许多写作者都跑去干别的事情了，我不再扼腕叹息，也许写还是不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生活本身就值得好好体验。

现代小说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可以亲自改编自己的作品，拍电影，

也能赚钱。说到赚钱一点也不俗气，写东西的人首先要活下去啊，生存是创作者永恒的母题。我刚刚辞职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慌，算算自己写过的畅销书，能赚一些生活费才定心下来的，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感悟最易得年轻人的心，对市场的习得让我明白书也是商品。可这些感悟也一度牵绊了我，青涩也是宝贵的经验，一去不复返，彼时的我一定不能预料到今天我的彻悟。虽然写畅销书是有些害臊的事，可我得先填饱肚子啊，但是一味追求畅销书那就有问题了，在这点上我们不言而喻，不能为了讨巧而沿袭一种轻松的模式，一些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风景再美也要跳车，必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越写我越觉得难，难于登青天，我对自己显然是不满意的，但要为这种不满意吃大量的苦，我还在小心翼翼地接近。为了避免失败，我有时选择避免开始；为了避免失望，我不敢使用全部的力气。于是，我一直在真正想做的事情周围徘徊，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干了许多无关的事。除了打开电脑的空白页面时，忍不住做一顿家务来拖延写的开始，我一不小心就获得了多重身份，前不久还因此被邀请到法国领事官邸探讨现代人的多重身份，大家轮番介绍完自己，发现论数量我当仁不让，我还是个策展人、翻译、自媒体人、播客主播、出版社顾问……身份越多越觉得可疑，我莫不成真成了自己最鄙视的那种人，有悖匠心，略不小心，确有一事无成的风险。转念一想，这些不同的身份都是我的掩护，不在做事，而在做人，帮我潜入热腾腾的社会，体验不同角色下的人生。就像亨利·梭罗说的，“你都还没有站起来去生活就坐下来写作，多徒劳啊！”

我喜欢的很多作品都是作家在自己生命最低谷的时期完成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辞掉了铁路广告公司文案的差事，身无分文，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回家写小说去了。痛苦顺带帮人打开一个更丰富的感官世界，带来异常敏感的感受力。过去我总看重想象力，现在我更愿意相信虚拟出来的经历总是缺乏体温，二手经验不会连着筋骨，真实的逆境是一手世界里的残酷，深刻体会饥饿才能有个强壮的胃口。

我常常为“作家”这个身份感到难为情和困顿，如果逆境激发人的想象力和表达欲的话，这个身份给我的绝望最多，可也是能帮我走向彼岸的唯一通道。毛姆说：“如果你把某件事写出来，就不会再如此为之困扰了。”现在与你倾诉一番，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关于走弯路、折磨自己到筋疲力尽这些事，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缺乏素材，小时候腿上摔出几个疤，到现在还像丑陋的毛毛虫挂在腿上，有些人乌鸦嘴，这姑娘走路是要摔大跟头的。这句话既是明喻也是暗喻。既然如此，我只好接受命中注定的坎坷，摔完该摔的跟头，写完该写的坏东西，好东西就快出现了。历尽坏事，只要能挺过去，好事如约而至。

活着就要沉浸其中，然后等待，等待跟好运撞个正着。

祝羽捷

2020年12月17日

小兔你好：

拖了这么多时日才给你回信，很是抱歉，原因有二，一是刚刚完成一个旷日持久的剧本工作，前前后后投入了三年，掷情至深（此处植入广告，正是《生吞》改编剧集），元旦后才最终定稿，直到上周与导演跟几位主演齐坐完成了剧本围读，心悬已久的大石总算放下，当“全剧终”三个字读罢，悲欣交集，才发觉已然泪目。那种情绪又蔓延了三天，才换来一刻顿觉——这个故事，至此终由我手中送至它的最后一程——见你来信，相信当你呕心沥血地完成这一次策展工作时，也一定能感同身受。二因，权当前面都是借口，为了摆脱这种复杂的情绪，我抓起游戏机手柄，终于把一款心心念念的新游戏《赛博朋克2077》给干掉了，又花去五日。关于这款游戏，想闲扯几句，这是款历时七八年打造的主机3A大作，在游戏粉丝心中的期待值不亚于漫威影迷日夜盼着《复联4》上映的心情——可惜的是，它本该是一部划时代巨作，却因游戏制作公司“CDPR”（粉丝戏称“波兰蠢驴”）上市后被资本裹挟，赶鸭子上架，最终甩出个半成品，游玩过程中处处bug，日常死机，令全球无数玩家义愤填膺，怒喷到游戏退款加下架，原本被视为游戏界良心标杆的公司，就这么被一场无耻的资本游戏坑到濒临破产——“游戏”被“游戏”给毁了。资本的邪恶，真是懒得再骂。但最可怜的，还是我们这些玩家，无论哪一场“游戏”，我们都是注定赢不了的人。即便是在赛博世界中，依然无法摆脱被压榨的命运，想要暴力抗争，还得打工赚钱买砍刀。幽默了。

实话实说，我不爱写信，几乎从不写信，因为我不太相信写信可以换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也可能是我已经不相信这个时代还会允许这般费力不讨好的交流方式的存在。但我们既然有约在先，这封回信就不只是一封回信，而是赴一场约。言而有信是好品质，这才是我看重的。更何况，我在读信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你在信中袒露出的真诚，那我就必须好好陪你聊几句——不过下次还是改见面聊好了，打字真的好累啊，太累了——我的剧本前后加起来打了两百多万字了，你可以想象我现在看到键盘上这些字母符号的生理不适。我想跟你聊点儿俗的。我这就人喜欢聊俗的，身为一个写小说的，早把心底所有艰深的、曲折的、幽暗的、痛苦的、迷乱的、片刻的、永恒的、说得清与说不清的那部分自己，通通打包寄存在我的小说里，余下这个俗世中的我，就想怎么俗怎么来。俗多好啊，俗也是本事，俗是对生活最严肃的抗争。但我必须澄清一句，我对生活中那些真正严肃的人类，从未心存丝毫嫌弃，只不过假如哪天我也严肃了起来，我

一定会被自己嫌弃。

这封信里，我就想跟你聊两件事：一是作家这个身份的自我认同；二是我对靠写作谋生的态度——这两件事其实又是一件事。

小兔，要你说，什么最俗？大多数人一定会说到钱，或者说，物欲。说到钱，顺着你的话头聊，那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偏见——很多人认为，一个作家为了钱写作，或者说，写作的时候脑袋里总想着钱，那他的罪孽简直比葛朗台还深重。为什么呢？又凭什么呢？尤其是我国读者——也许这只是我的偏见——起码以我见过的，很大一部分人默认，一个好作家就应该清贫，就应该视金钱如粪土，甚至以身殉道，来证明文学是“干净”的，顺带着证明一个人立身于世，是可以跟铜臭毫无瓜葛的。这简直太可笑了，不是吗？否则我们应该把普鲁斯特这种纨绔子弟的手给绑了，判他一辈子不许写作，或者把天天求富婆包养的巴尔扎克给掘坟出来，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柱上日夜鞭尸。

我胡扯呢，话说回来，这个问题我自以为是地给出过一个答案，那就是儒家文化对“家”这个字的定义太沉重了。作家本不过也是一种社会工作，在英文中，作家、画家、音乐家的这些“家”，无非就是“-ist”跟“-er”，writer、artist，并不会令人感到任何职业性质天生所赋予的沉重感。而我们的这个“家”，背后多少承载着“成名成家”的意味，不只是对你作品价值的认可，更是对你社会地位的认可，好像只有两者都必须达到某种量度，方可自称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许多青年作家羞于自称“作家”的原因，你会发现，他们在公开场合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为“写作者”——我猜就是为防止一旦有读者质疑他们水准不够，丢出那句“这种水平也好意思自称作家”的千古一问时留出一条退路。真是太可怜了。我想，假如文学也是一个人，那他（她）一定不会歧视任何一位赤诚的作家，偏偏读者竟如此热衷打压，这太令人困惑了。哪怕我今天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但我早已下定决心把文学当毕生志向，就算我还未刊发过任何作品，我一样可以自称是一名作家，一名尚未发表作品，甚至有可能这辈子都写得很烂的——作家。你知道么，每次我在外国电影里，看到一种人物形象（多半是受了半辈子窝囊气的、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被自己老婆身边那些做着所谓“体面工作”的朋友们揶揄般问到“你是做什么的”时，那个形象忐忑地回答，“我是个作家”，当别人再问“你写过什么作品”，那人回答，“还没有出版过作品，但我正努力在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之后换来一阵忍俊不禁——此类画面时，我心中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偏执、孤傲、自命不凡、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相信我，这些才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前提，绝不是谦虚。

说了这么多，小兔，我无非是在回应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家身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你既已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写作这件事，自称“作家”没什么

可害臊的，更无任何不妥，不然你再想想，是不是对文学“这个人”太不公平了呢？再打个最俗的比方，明明你都跟人家睡一个被窝儿好几年了，甜言蜜语说一个遍了，彩礼酒席都谈妥了，却对外人坚称你们不是认真的，只是玩玩儿，这他妈还不叫流氓那啥叫流氓？文学无罪啊朋友。

那好，不管我们今生能不能写出杰作，或者这辈子都是一个文学半吊子都好，我们已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作家。但我们又有一个很大不同，作家是我人生截至目前唯一的工作，而你则还有许多个令旁人羡慕的身份，虽然基本都在文化艺术类范畴内，因此坦白讲，我不了解在谋生这一部分，写作的收入究竟占你经济来源多大的比重。当然了，我也不会问，但我自己的情况可以说，写作的收入就是我全部的经济来源。因此，“写作如何谋生”这个问题，我确实也有发言权，至于能跟你分享些什么呢？我甚至都好奇你有没有这个需要。那我干脆就偷个懒儿吧——相信你已经看过了我新出的小说集《仙症》最后那篇后记，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早年写过很多烂玩意儿（对，我只能称那些文字为“玩意儿”），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赚些钱，只要能支撑我一直写下去，稿费多少，来者不拒。几年前开始写剧本的原因，也是一样。但你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清醒，对钱的清醒。安身立命固然重要，但多少钱够呢？有没有个准数儿？还是收获某一种程度的安全感之后才能保证自己往后能随心所欲地、自由自在地写？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才有答案。要始终记得，偶尔去酒吧卖个唱糊口，一点儿都不丢人，但你这辈子要当帕瓦罗蒂，那么音乐厅才是你的最终归宿。至于我本人，酒吧卖唱的生涯已经结束了，说真的，我很感激那段经历，写过的那些“玩意儿”让我在如今的创作中平添一股不死板的混不吝劲儿，是好事儿。但我更感激的是我的运气，当我努力掉头想回音乐厅时，发现路边竟还有车在等我。时至今日，我写的小说，剧本，都是我真正想写的，几乎再也不用受其他人事物所左右，这已是我理想中的安全感。酒吧彻底拜拜了，往后也不打算再走回头路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的那段所谓“不堪”的经历，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最大的价值，还是供人引以为戒。毕竟，人人运气不同，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闲叙至此，字数应该够了吧？开个玩笑。写作这件事太严肃了，生活中再不开玩笑，我会窒息的。我希望在你的心中，我是一个坐在对面聊天，能让你透透气来的人。我们虽然只见过几面，平时聊得也不多，但我感觉你是个蛮爱紧张的人（瞎感觉）。放松，小兔。人生无非也就那么回事儿，并没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放松。

郑执

2021年1月14日 北京

作家其实是写作困难的人

通信人 张定浩 作家

到人群中去，也到万物中去，先不要想着如何表达自我，而是将自我放空，好去吸收外面的一切。要去尝试倾听他人的声音，观察他人的面容，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以便好好体会万物的存在。

定浩老师：

你好哇！我最近听到的最好的鼓励莫过于当我对你说，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写不出来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我也写不出来”。这句话无论是不是一种客套的安慰，我大脑被上紧的发条，那个如紧箍咒一般让我头疼欲裂的压力，一下得到了释放，原来定浩老师也写不出来啊，我内心重复着这句话，就像一只瘦骨嶙峋的笨熊听说矫健的豹子也吃不到肉，立刻宽松了所有的紧张和不安。

被动的选择被一一剔除，我现在的的生活被自己简化到只用维持基本的进食，剩下的大把时间可以用于阅读、上网、写东西，上网冲浪帮我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在网上发言让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社会性死亡，现代社会，你如果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上全部噤声，那很快就会被遗忘，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刷存在感，持续性地更新，让自己有一种活在宇宙中心的幻觉。

坐在书房，我的屁股深陷在柔软的海绵垫子里，有那么一小会儿自己忍不住咧开嘴笑，好极了，我终于过上了想要的生活，多么简单，多么有指向，我应该实现内心的愿望，写一部真正喜欢的作品。

打开电脑，我面对着一张洁白的word页面，就像建筑师面对一片可任意使用的土地，我要建造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从地基到结构，从外观到内饰，我是这座房子的唯一挖掘者、泥工、木工、钢筋工、浇筑工、漆工、管道工、粉刷匠、质量验收员，一旦开始就发现这项任务多么复杂，就像赫拉克勒斯要完成的十二项苦役，每一项听上去都难如登天。但总有那么一刻，你觉得很快乐，可能是双手捧起一把土的时候，可能是把几块砖头堆砌得优美，这一点点的成绩让你心满意足，但把微观成绩放在整体里去看就微不足道了。

工程任重而道远，望过去四野茫茫，心中毫无底气，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挺没意义的，要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才能看到房子变高那么一

点点。我觉得语言很无力，似乎什么也不能制造，不如到现实中去，不如给一朵花浇水，不如教会小孩唱一首童歌，不如给自行车链条上润滑油，不如做一道算术题……一切成果固若金汤，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终结。

这种庸碌之辈的多虑充盈着大脑，耗掉我不少的力气，如果把人的思索看作一条大河，有的人可以像一条笔直的、欢腾的大河勇往直前，而我的内部水流在漩涡里，在河底不停打旋，只能在湍流和各种摩擦中殆尽。

绞尽脑汁，我还是没有落笔。翁达杰在一篇访谈中说：“我喜爱写作这项复杂、精细的手艺，我花去整天的时间考虑怎样写出更好的文字。”尽管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的确每天都在思考，想着想着，思绪就飘向更远的地方，想到我这寄蜉蝣于天地的一生，想到时间、空间、无限的问题。想到这些宏大的问题，我更难下笔了，下笔意味着走上一条钢丝绳，迈出第一步最为危险。

书桌上还堆着那些没有看完的书，只有埋首进去才能忘掉现实中的焦虑，重拾每一本都像再续姻缘。不用为了修学分看书，不用写论文，不以此为生，如此随心所欲的感觉，就像坠入情网。

根据我的恋爱经验，触手可及的爱情并不容易引起重视，只有不确定的得失感，只有想伸出手又缩回的刹那，才是真让人梦魂牵绕的时刻。也许读书也是这样，需要读有点够不着的书；也许写作也是这样，不要写已经掌握的事情，写那些想要知道的故事。

几乎每个写小说的朋友都告诉我，他们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完成工作的，那是一种天然的自发的状态，有人撸撸猫就写出来了，有人利用等孩子放学的空档就写出来了。让我好生羡慕，那种平顺而流畅的写作是体会到极端幸福的时刻，而我还没有被幸运之神光临。这让我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好像我真的不应该做这件事。

今天我又没有写出来，枯坐到深夜，写不出来的感觉太糟糕了，好想对自己进行一场社会性死亡的谋杀，好想消失在地球上。但人活着遭遇的任何一个难题，又何尝不比写不出来更残酷，我们都应该老老实实，拿出生活的勇气。

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跃入无法抵达的地方，在那里坠入情网！

祝羽捷

2020年12月20日

羽捷好：

我觉得你对写小说这件事有一种很浪漫的想象，这可能也和你那些写小说朋友的误导有关。我觉得他们真正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完成”的事情，其实不是写小说，而只是吹牛皮。当然，可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说法，那是你的朋友为了鼓励你可以轻松地开始，而不要停留在各种假想的焦虑中，因为我想每个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写作重要的其实不是开始，而是可以一直写下去，是把无论自我感觉多么糟糕的小说先努力写完，给它一个句号，就像努力过完一个糟糕的日子一样，再迎接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日子。

你谈到社会性死亡，谈到如果不在社交媒体发言就会被遗忘的担忧，那么，我觉得，这种不发言就被人遗忘的社会性死亡之命运，在过去只属于一种人，那就是领导，现在增加了一种人，叫做“网红”。而这两种人都和你心心念念的写作无关，也和生活无关。不写作的认真生活的人，即便不发言也会被他身边的人乃至后代记住；写作的人，他担心的是不能努力用文字记住生命中经受的一切，而非被一切所记住。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你就要首先能够经受得起所谓社会性死亡带来的孤独。前阵子傅聪去世，朋友圈开始流传《傅雷家书》里的一句话：“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至于“不确定的得失感，只有想伸出手又缩回的刹那”，我觉得这用来形容“诱惑”而非“爱情”，会更为恰当。写作或许也起于诱惑，但并非终止于诱惑结束之处。把写作的幸福感等同于写作的“平顺而流畅”，也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因为写作就是艰难的事，写作的幸福感来自对这种艰难的体认，和接受，而非对于艰难的克服，如同对于人世的体认与接受一样。写作得平顺而流畅，很多时候仅仅只意味着油滑。托马斯·曼说过“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孟子有言：“盈科而后进。”科是坑坎的意思，从源泉涌出的涓滴细流，日夜不休，流到任何一个沟坎坑洼处，一定会将之注满，直至溢出，才能继续向前奔流。水要注满，才能溢出，我想阅读和写作的关系也是如此，写作是阅读到一定程度以及心里的种种体会与感受积聚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流溢的结果。当然，我说的阅读不单单包括读书，也包括读人和读物。所以当你写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起身去外面走走，去院子里侍弄一下花草，或是做一次长途或短途的旅行，也就是说，到人群中去，也到万物中去，先不要想着如何表达自我，而是将自我放空，好去吸收外面的一切。要去尝试倾听他人的声音，观察他人的面容，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以便好好体会万物的存在，这样慢慢地，你在短暂地放弃自我表达之后，或许反而能收获一个更为丰富的自我。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看《巴黎评论》里的那些作家访谈，里面几乎每个作家都会被询问到一些写作的习惯，有些人喜欢早上写作，有些人则是深夜，但无论具体什么样子，这些优秀的作家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他们都有一个每天相对固定的写作时间，并且很多人每天的写作量是很有限的，是细水长流而非涸泽而渔。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枯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正是写作者的一个常态，但假如你每天都在某个固定时间坐在了书桌前，把心思集中在写作本身，而不是因为写作而产生的各种患得患失上，我觉得缪斯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张定浩

2020年12月31日

明知不可为而为，大概是译者的宿命

通信人 黄昱宁 译者、作家

在这个“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过程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很重要的。

亲爱的黄昱宁老师：

你好哇！在影视界，如果一个人又干演员又当导演，还顺便自己把剧本写了，这叫什么？全能创作型、水陆空三栖霸主。你恰恰就在出版业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翻译大量外文作品，是出版社的编辑，同时自己还是创作者，随笔、小说都有涉猎，请接受我隔空跃起翻转360度落地的一拜。

三个工种里，可能最费力不讨好的职业就是翻译吧。我也不是一拍脑门凭空猜测的，几年前，我翻译的第一本书，花了大半年时间，税后稿费4000多元。出版社的负责人在审批稿费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名字。逮着机会见到我，前辈语重心长地跟我讲：“看你那点翻译稿费，还是不要做翻译了，趁着年轻，快去卖口红吧。”那个时候国内的直播还没到今天如此之众人癫狂的地步，我当时表现得大义凛然：“不，我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金钱不能使我快乐。”

好想抽自己啊。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禁感慨，前辈吃过的盐果然比我走过的路多，人生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能赚钱的时候不去赚钱，等想赚钱的时候后悔莫及。我的金钱观是这两年重新修正的，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更何况赚钱的经历也可以成为珍贵的写作素材。不过卖口红这事我的确不擅长，加上我之前有位邻居叫路内，他除了写小说什么也不干，老谋深算地告诉我：“你要是想成为什么人，别的事情就不要做，做了都是败笔，都是未来职业上的污点。”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一个写小说的，将来修成正果就是位小说家甚至是小说艺术家，他不想当人们评论的时候用“一个卖过口红的小说艺术家”来贴标签。

做翻译，虽然收入跟付出不成正比，倒是让我学到不少东西，因为除非背负着翻译任务，作为一个读者，你不可能咬文嚼字，把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词嚼碎到稀烂的地步。做翻译时你会变身成一个考古学家，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不停琢磨。做翻译让人敬畏。在家做翻译，我常常做到想哭，怎么会有人这么渊博，句句有出处，句句不是白来，句句言之有理。相比之下，我真是太浅薄了。人见到真正的武林高手不一定会畏惧，但是拆解了

他们的招数，发现每一招都出神入化，自己立刻相形见绌，不敢把自己的花拳绣腿拿出来嘚瑟了。拆招的过程中摸清武功高超的门路，可比单单死记硬背一套完整拳法有效多了。我发现拆过招的人，自己上手的时候会有大师们的影子，如果运用自如的话就可以下盘稳重、上盘灵活。

做翻译还给我良好的生活作息，这一点需要自律为前提。有时候过得日夜颠倒，哈欠连天，魂不守舍，我就会怀念做翻译的日子。为了赶翻译稿，我有段时间每天早上定闹钟六点爬起来，有一整段时间不被打扰，披头散发在书桌前，不苟言笑，成为每日琐碎日常里唯一的神圣仪式。翻译一开始靠的是热情，坚持到后面的日子靠的是责任，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必须完成它。按理说已经没有那么享受了，但是人并没有疲惫憔悴，相反状态很好。这是一件不得不规律作息去奋斗的目标，过程中，没有暧昧不明的情绪，没有外界的意见，竟能拯救人于庸常。人觉得生活乱如麻，不妨试试看守恒一个目标，不要有那么多的一时兴起，不要接受过多反馈，自己独自完成一个使命。

傅雷老师翻译《艺术哲学》，为了保留作者的幽默，把里面表示日常食物的甘蓝、胡萝卜改成了国内读者熟悉的白萝卜、红萝卜，我觉得这里不单单是在做文字翻译，更多的是生活经验的转译，让读者进入作者传递的情景里。傅雷老师做翻译，大家都很认可，甚至觉得像罗曼·罗兰这样在本国没有在中国更有地位的外国作家，搞不好得益于译者优秀的翻译。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但在一些人的眼中，这被看成“不尊重原著”“不够准确”。夏目漱石觉得“I love you”直译成“我爱你”不符合日本人表达的婉转含蓄，他翻译成“月が綺麗ですね（今晚的月色真美）”。“Firenze”在意大利语中意味花之都，徐志摩把它译作“翡冷翠”，把纽约州小城“Ithaca”翻译为“绮色佳”，这些翻译都绝美。

我喜欢你翻译的麦克尤恩，是你让我们喜欢上麦克尤恩。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译者会在原作者的文本之上加入自己的个人风格，很多译者有这样的自信，但我不敢在关公头上耍大刀，万一弄巧成拙可如何是好？做翻译，太容易陷入患得患失的境地了，带着自虐的嫌疑。常常为一个词，我绞尽脑汁，查阅资料，看看其他版本里译者怎么翻译的，看看原作者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看看吃饭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想，醒来都生起床气了。

想来做翻译也带来很多痛苦，这十年翻译稿费没有涨是业界常态，回报低首先就是一把匕首。有人说，聪明的人都应该去钱多的行业。那这行一定流失了不少好人才。但我转念，正因如此才能轮上我上阵啊，扎心了。做翻译又很容易出错，但凡读者在犄角旮旯里揪出一个错误，译者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什么是好翻译的标准非常模糊，见仁见智，“信、达、雅”的尺度怎么去把握也是难题。

读者还常常诟病译本的一件事就是“翻译腔”。我想什么是翻译腔呢？应该就是保留了原作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说话习惯吧，比如英文中的一些表达放在中文语境里就会显得过于做作、夸张，而有些又显得过于简短、冷漠。但我想如果外文小说的语调都变成了隔壁老王的语调，那我们读哪个国家的作家不都像跟隔壁邻居聊天吗，还有什么异国情调可言。当然了，这不过是我一家一些粗鄙的观点。

给你写完这封信，我以后还敢不敢接翻译了？

愿我们都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祝羽捷

2020年7月22日

小兔：

见信好！手头恰好结束《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的翻译，这才匀出空来回信。从库切干冷荒凉的世界里逃生，压抑了一段时间的表达欲望开始复苏。我一直就是这样，在翻译、写作、出版和日常生活这几种模式里来回切换。所以你说的“跨界”，在我，其实是一种让事情得以继续的内在需求——有的人适合在一条隧道里一直往前走，直到前面洞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出现一道彩虹；我大概不是。我会乐意时不时地去隔壁隧道串个门。

我四十多岁才开始写小说，前年出版小说集《八部半》的时候，回答过十几遍这样的问题：“翻译经验对你的小说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总是不厌其烦、一体两面地解释：“翻译、批评以及编辑的经验，首先是带给我刺激和便利，让我每天的日常活动不会离文学太远，让那个曾经躲在抽屉里的创作欲望总保持着跳出来的可能。至少，我的这些角色保证了我大量的阅读（没有比翻译更细致的精读了）和基本文字素养。但另一方面，那些角色会在我开始小说创作之后，构成隐秘的质疑、挑战和干扰。它们是藏在暗处的挑剔的裁判，那些曾经被我用来对其他作品评头论足的标准，当然也不会放过我自己。我确实常常需要努力排除这些因素，才可能说服自己把小说写完。”事实上，为了写小说，我前两年的翻译有过大幅减产，而且选择翻译作品时的第一标准是能否对我的写作产生比较直接的刺激。比如前两年我放弃翻译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反而选择我相对较为陌生的希拉里·曼特尔的《暗杀》，就是因为后者是中短篇小说集，而且风格比较凶狠，或许能给我当时刚刚开始的小说创作一点新鲜的刺激。但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山呼海啸而来，把现实压出苍白的凹痕。有人说这正是静心创作的好时候，但我发现我不能。幸好，翻译是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回归的故土。跟每一个字死磕，躲在别人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缝

隙里，我可以重新调整呼吸的节奏。

还是说回你关心的翻译问题吧——这琐碎的、永远在出错的手艺，这“磨人的小妖精”，怎么才能克服它时常带来的挫败感？我其实没有什么答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我的朋友，法语翻译家袁筱一曾经在她的文章里说过，翻译就像爱情，是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的过程，当他（她）完全抵达时，爱情也就死了。这句话很哲理，就爱情那个层面而言，它似乎比“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更高明更隽永。那么对于翻译呢？这句话又该怎么理解？我觉得，翻译虽然从广义上来讲，是一种所谓的再创作，但是你在下笔时显然要受到原文极大的束缚，你必须调整自己的习惯、状态和趣味去适应“对方”，尽可能地去靠近他，这种感觉像不像热恋？但是，无论如何，一旦它化为你的母语，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必然就是你眼中的“对方”，是他的文字在你的大脑皮层中激起的浪花，所以，在向他无限接近的过程中，你得记住：不存在所谓的“定译”，不存在目标语言与源语言完全重合的理想状态，这一点，在中文与西文（包括英语、德语、法语等）之间是特别明显的，因为它们之间差异太大，可以直接转化的“重合度”远远小于英语与法语，或者英语与德语。如果你追求“直译”到了某种极端的地步，那就会类似于机器翻译，忽视自身，也就是母语的基本规律，或者完全跟自己的行文习惯拧着来，你就会扼杀自己的特性，反过来也扼杀了原文的活力，这就有点像恋爱中失去自我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样，弄不好就会殉情自杀泼硫酸……所以说，在这个“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的过程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要不要用成语的问题，用多少、怎样用的问题。各人看法不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多用成语会显得比较中国化，会削弱原文的表达效果。这话有一定道理，有些中国成语有很特定的语境，涉及较深的典故，生搬硬套确实不好，过度运用，也可能造成语感上的变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成语有简洁、形象、韵律铿锵的特点，在翻译长定语长状语时，它有时能用最小的容量涵盖最复杂的意思，帮助读者顺利进入作者希望引入的情境，产生某种阅读快感，而这种阅读快感恰恰有效地抵消了英文长句给中国读者造成的不适应（因为中文的逻辑没有那么致密，往往以短句居多）。其他翻译上的难点，比如语序要不要换，长句要不要断，翻译专有名词时用音译还是意译或者音意混合，其实都是需要取舍和选择的，是如何平衡的问题。可能有些译者会更喜欢风格化的译法，而我所持的观点就相对比较中庸，更强调妥协，更喜欢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站在中间一点的位置，这可能跟我写作、为人的理念是一致的。

话说回来，其实所谓平衡的标准，也取决于不同的译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每个译者都不一样。而这些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整体，也有属于这个

时代的共性的标准。随着外语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对“洋腔洋调”的宽容度也跟林琴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第一个把电脑术语menu直接翻译成“菜单”的人，也许心里也经过一番挣扎和权衡，但现在不是大家都接受了？所以说语言是活的，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其实涉及异化归化之类的翻译理论问题，太枯燥，信里就不展开说了。

翻译史上有个很出名的公案，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前因后果。当年赵景深不知道milky way就是“银河”，想当然译作“牛奶路”，被鲁迅作诗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如果我们稍稍查一查，以“牛奶路”为话题的翻译专业论文为数不少，也有人替赵景深翻案。其实，把来龙去脉理一理，就能看出，“牛奶”绝对是错了，这案子翻不过来，问题是，译成“银河”，就一定对吗？

据说，英文里第一次出现milky way，是在乔叟的House of Fame里，典故来自希腊神话：话说宙斯拈花惹草，让有夫之妇阿尔克墨涅的肉身怀上神胎，得子赫拉克勒斯。宙斯想借老婆赫拉的乳汁赐爱子永生，又不敢明说，只好趁妻子熟睡时让儿子用力吸吮她的乳房。小赫用力过猛，老赫惊醒后大怒，将孩子一推，于是乳汁狂泻，变作漫漫天河。这个故事朴素可爱，在西方深入人心。对西方人来说，那确实是条跟奶有关的路，只不过那不是牛奶，而是“神乳”。当然在一般仅仅需要表意的情况下，你牺牲一点文化背景，直接说成银河，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如果是下面这个句子呢？英国诗人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1613-1649）的《神圣格言》里讲到，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判决了耶稣的死刑，后悔不已，每每想起便流泪不止，连洗手都用泪水，于是那些泪水“form not simply a Milky Way in the heavens but a stream of cream”。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银河”，就跟后面的“奶油”没有了可比性，这段文字的逻辑就有点接不上。所以，更好的选择是在字面上这么翻译：“（泪水）岂止汇成一条神乳路，简直成了一条奶油河。”

这样完成任务了没有？没有。中国读者还是不知道“神乳路”和我们通常概念里横在牛郎织女之间的那条“银河”其实是一回事。那么怎么办，我们只能采取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神乳路”上画个小圈，底下做个脚注，交代来龙去脉。我曾经跟一位同仁讨论文学翻译时说到注解问题，对方说注解影响阅读快感，吃力不讨好。小说么，不就是讲讲故事么，有必要去考虑文字里携带的文化信息有多少损耗率么，有必要去可惜它么？我不这样想。我读小说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读故事——何况，如果无视文化背景，好多情节本身也很难传达清楚。我们知道，亨利·詹姆斯、米兰·昆德拉、E.M.福斯特和戴维·洛奇都把“小说的艺术”作为讨论的主题——既然小说不仅是“故事”，也是“艺术”，那么，我们每个译者，都应该对这种特殊的艺术报以足够的尊敬，对于小说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每一个似乎不

可传达的文化符号，都投入足够的心血。说白了，有时候，翻译就是这么讨嫌的工作：明知不可为而为，大概是译者的宿命。

一不小心说多了。现在我得把刚译完的《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再看一遍，哪怕减少一个低级错误也好。然后，看看自己还能否回到写作的那条幽暗隧道里，写一写我们的人生和时代。

黄昱宁

2020年8月3日

向人生发问

路内 维舟 吴晓波 马良 崔树

没有强烈的求胜心遮蔽双眼，

脚下的路不再是一条，而是生出了许多经纬。

文青们后来发生了什么

通信人 路内 作家

时间只会把问题稀释，把经验浓缩为概念。时间的好处是它会遗忘你，但不会羞辱你。

路内老师：

展信佳！跟你通信我心里一早就预料到了后果，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会借机展现你过人的机警，所以无论你的回信多么狡黠，我一点也不意外，我先把聪明人的高地站上——别想吓我一跳。

今晚回家的路上，上海断断续续地下雨，大概是因为我家太远了，行驶过好几个不同的云层，雨式微时，我摇下窗户，梅雨季节特有的闷热袭来，冲散了原本车内封闭的冷气，尽管外面像个不怎么干脆的闷葫芦，但我深吸一口气发觉空气还挺甜，像吃了一口苏州的云片糕。有些记忆跟随气味朝着大脑涌来，比如骑着自行车独自赴约的夜晚，碾过一个个盛着肥皂水的洼地；比如从酒馆出来站在街边，打不到车回家的惨淡；比如牵着男孩的手散步，从外滩走到复兴中路，手和头发都汗津津的……画面倾巢出动，这叫什么？普通青年管这个叫嗅觉记忆，文艺青年管这个叫“普鲁斯特效应”。

十年前，我和你误打误撞成了邻居，你已经是个小说家了，生活精致而富有规律，身材比现在轻盈，长相比现在清瘦，大概就是你小说里路小路的成人版吧，可你并不满足，努力长肉成为一名稳重的成熟男性，而我正在努力甩去婴儿肥，竭尽全力让自己显露骨感。我们居住的周围不像现在，连个像样的咖啡馆都没有，更不用提书店。为了证明我们所住之地并非文化贫瘠，甚至还可以成为我们的灵感宝地，你告诉我，住在咱们这一片的作家特别多，方圆二十里有王安忆老师，方圆三十里有孙甘露老师，使我稚嫩的心灵很受冲击——原来小说家的地理概念如此博大，再被你数下去，住在南京的毕飞宇也可以算成我们的邻居了。不得不说，我被你绘声绘色的描述所激励到了，当晚回家灵感迸发，下笔如有神，诗作迭出。

我读书的时候只见过两种人：心情好的和心情不太好的青年人。我就是那种心情不怎么好的年轻人，常常纳闷为什么别人就能过得如此赏心悦目，而我吃个清汤寡水的食堂身材都会浮肿，全神贯注听讲还是搞不清楚高等数学的三重积分，总觉得零花钱不够用，男朋友不够爱我，一天要作上二百个回合，还觉得生活不够有趣，做什么都不够有意义，什么玩笑也都开

不起……大概不满意的地方有一千八百五十三个吧。

通过悉心观察，我发现有些心情好的人只用干一件事，比如打打游戏就可以忘记现实多么鸡零狗碎了，可惜他们面黄肌瘦，眼窝深陷，还有人一跑步就倒在了塑胶跑道上，数学系的同学见义勇为为他做了人工呼吸。不少一脸倒霉样子的年轻人症状和我差不多，两眼呆滞，呆若木鸡，思考尼采和宇宙的尺寸大小，智力青黄不接，青春漏风漏雨，孑然一身，却忍不住愤世嫉俗。生命却在起速，笨拙的自己却总不争气地卡壳，像用一台386台式机打魔兽世界，像用3G手机看脱口秀，容易重复一个动作或者一句台词，满屏叠影。那时我们就是一副像素很低、容量不够的状态，不动脑子的抄书和死记硬背的公式通通失灵，过剩的荷尔蒙和持续发育的身体需要挥洒激情，成长向来牵扯着特有的不安。每个人必须找到解决满脑子的混沌念头的方法，才能轻盈地过完此生。

毕业后我身边的文艺青年特别多，一票做杂志的朋友，月刊、画报多到让人记不住名字，大家常常在书店聚会，每人带一本书，表情凝重地读上一段，煞有介事，仿佛在延续文学的香火。见到你，也会在谈完文艺圈八卦之余，聊聊喜欢的作家，说说福克纳、卡佛啥的，你送我小说，我送你杂志，讨论文艺好像没那么丢脸，也不会被人嘲笑，回家之后还要反刍，写在博客上，照片必须是用单反相机拍的，色彩简单处理过。博客时代很安静，你在博客上会收获文字上的邻居，把他们的地址放在列表里，每次登门拜访的时候心存感激。我们这一代人不但对老一辈文青很谦恭，还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我说的文青们的意见领袖绝非今日的流量明星，而是要追随内心的热情，反叛，打破常规，比如韩寒，虽然现在搁笔了也不尖锐了，但当年也是写过态度鲜明的“韩三篇”的。

前两天我等人，就近去了一家书店喝咖啡，坐在里面，总觉得哪里不对，这也算一种特异功能吧，像我们这种矫情的人总在蛛丝马迹里发现异样——书店换老板了。我去问店员老板在吗？店员还没说话，斜对角有个穿着挂着链条牛仔裤的年轻男人说：“找我什么事？”我吓坏了，连忙说：“没事，没事。”以前的老板是个精神萎靡的文艺青年，总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总把摇摇晃晃的桌子用书垫起来，楼上邻居讨厌书店有人唱民谣，常常拉开窗户对着下面咒骂，恨不得举着菜刀冲下来砍人，把书店开得小心翼翼，常常就被某个有关部门来训话。书店转给商人，这些问题全部被摆平，终于可以坐在院子里畅所欲言而不担心被脸盆泼水，点了咖啡也不用等半个钟头，可有种亲切的东西消失了。当年那些文艺青年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去年在北京见了一个常年说要找我撸串儿的编剧，他以前是个文艺青年，我想象中的北京撸串儿应该坐在马扎上，捧着一大杯冰凉的扎啤，肉丁小串如蚂蚱腿，吃的是一份心情。当这位编剧同学开着保时捷来酒店接我的

时候，我脱口而出：“你怎么胖成这样？”烤串店很特别，每个人的座位上提前入座了一个巨大的毛绒玩具，我和一只棕色大熊坐在一起，它看着我吃硕大的牛肉块，我随时可以瘫倒在它的肚子上，我问对面的编剧朋友为何要放这些动物在我们身边，他说：“可能现在的人都太孤独了吧。”编剧朋友戴着一顶帽子，上面镶满了对称的logo，他脱下昂贵的风衣，衬衫的经典格纹让我一下认出了品牌。他身上的所有一切都长着一张“快认出我”的奢侈品脸，我说他赚到钱了，他说自己深得老板的心意，总能帮老板处理他不愿意亲自上阵的事情。我不敢贬低他的这种变化，毕竟他终于让自己的母亲过上了好日子，但同时我觉得难过，文艺青年变起来更有颠覆性，上一秒还是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下一秒就是闯荡江湖的太妹。

很多女编辑嫁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朋友开了饭店，倒闭又转行；有的朋友成了心理理疗师，用通灵、巫术、塔罗牌、水晶等混合媒介的手段帮人治愈心灵；有人拍了电影，赚得盆满，却也不再来往。在上海写东西的人里面，我最羡慕你和张定浩，你们都有一段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那简直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啊，工厂生活多厚重，有破旧的皮沙发，有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螺丝，有油腻的机油，有屁股圆润的漂亮厂花，有吹着口哨的中年师傅，还有隐秘的、躲起来看书的电工，在流水线上做着作家梦的普通工人。真正的文青很难甄别，因为他们不会坐在咖啡馆里拿着书拍照。就像你在《雾行者》里写的读着卡夫卡、托马斯·沃尔夫的仓库管理员，腋下则夹着一本《苏联三女诗人选集》的录入员。文艺青年不该只是坐在书店里聚会的城市男女，更应该是这些散落在各个角落里追逐繁星的人，没有任何光效打在他们身上，很多梦都在岁月中死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比起十年前的我，身体更加孱弱，再也不能熬夜看电影也不能熬夜写东西，就算睡不着，也只能保持着精神衰弱的状态。我还在使用社交媒体，但对很多事情变得悲观，而当年令我敬仰的一代文青很多都消失了——至少不再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声音，似乎对许多问题感到无力且毫不在意。十年后的你还在写小说，你说：“有些时代你用尽一生看不到它的涨落，有些时代只需要十年可能就过去了。”十年后，文艺青年变成文艺中年，我不觉得文青的人生比普通青年过得更好，他们往往因自己的随心所欲丧失掉赢得成人游戏的机会，但在生活找不到出口的时候，他们至少还能在某个作品中得到答案。

命运无常，生活干燥，还是要感谢文学和艺术给我们的寄托，仿佛沉闷的沙漠里铸起了主题公园。

祝羽捷

2020年4月19日

祝老师：

见信好！

我这一年过得十分简单，一点也不聪明，读书不多，有时出版社会给我寄一些，拿到手里随便翻翻，也无意判断其好坏，看不下去的就搁在一边，如此而已。有一本书我已经读了两年，是《撒马尔罕的金桃》，里面的素材很好，但基本上前读后忘记。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我上一次试图能复述的书是吴清源的《黑布局》，那是二三十年前了，如今，AI可能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吴清源。

我想起以前的师傅跟我说，《黑布局》比《白布局》重要，因为好人（也就是君子吧）本质上是执黑先行，坏人（也就是小人吧）是执白的、有攻击性的。我这师傅讲话蛮有道理，朴素而有效的世界观，尽管他只是个工厂里的会下围棋的电工。

不过也未必。他要是看见AI执黑第一手下在天元还能完虐人类，他可能就不觉得执黑是好人了（人类下出这样的棋属于狂悖），估计会反思一下。

年初出版的小说《雾行者》，承蒙你推荐，感激不尽。这本书比较长，其中有一半篇幅写二十年前的“文学青年”。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麻烦，有三四年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写小说，不太关心外面的变化，等到书出版以后我被人告知“文艺青年”已经是一个贬义词。过去我们得加一个“伪”字才算是嘲讽，现在不一样，据说，真文艺青年在人格上是低人一等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想法，每一代青年尽可能在寻找自己的定义，好比五四、知青、20世纪80年代、摇滚、网络青年等等。到我们这代人中年后返溯，文学或文艺青年可能是唯一能找到的现成的词。这种定义，我自己瞎编一个也没啥意思，就取来用了。我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站在相对撤出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文艺青年”，因为它看起来就要过时了。等我写完这本书，很不错，它确实过时了。

这本书出版以后第一个开骂的是和菜头。我与这位专栏作家素无交往。他好像觉得写文艺青年的小说太庸俗了，这份自信我很欣赏，顺着一种话语思路往下骂的境界则不太入流。他倒没有说悬疑小说是在教唆犯罪。

这个问题被不断纠缠讨论，其实我已经不大想重复回答了。咱们可以讲得再透彻些，既然“文艺青年”的时候已经过去，而这帮人还活着，没死光，那么问题可能会变成双重的：既有着历史命运，也夹杂着个人哀怨（或是欢喜）。这个说法当然有加磅的嫌疑，但它也远不是喝咖啡听音乐那么简单，就像这一代年轻人将来返溯自我，不可能解释一代人就是个社畜的

命，尽管目前他们在这么调侃自己。

这并非无稽之谈。不管是咖啡还是奶茶吧，皆为真实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某人天天狂饮茅台，将咖啡和奶茶斥为虚妄，则无数人的过去皆是虚妄，只有狂饮茅台的那位享有了万王之王的尊严。这是扯淡。在写小说的人看来，没有低于生活的生活，没有不可描述的题材，只有庸俗的句法而已。

写这个题材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文学青年也好，文艺青年也好，都是擅长修辞的一类人。作者既无法停留在他们的修辞，又不可能高高在上直接越过他们的修辞。正是修辞术导致我们混淆了很多问题。比如我要在小说里写一个喝咖啡的场景（姑且把咖啡当成一种修辞），我就会被立即指责为文艺腔。这时我就不知道是我脑子糊了，还是读者脑子糊了。我要写一个人蹲在路边啃方便面，不管句法多糟糕，我就是个有情怀的作家——这种判断法非常不幸，它就是当下的话语术之一，不仅用于评判小说，也用于评判生活。

它唯一的教益是：某一代人，青年时期向上凝视（或警惕）权力，到中年以后终于学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看着大众。过去所谓向上的精英年代，大众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他们就在那里。这会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主题，或者加入，或者反思。总之，那个文艺青年的过往，目前已经被当成是泡沫。

这种泡沫不是“文艺青年”的报应，似乎是每一代人必然的结果，讲夸张点是人类本性。美国嬉皮士一代的儿女们都老老实实去上班了，算是一个旁证。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也觉得老的一代过时了，而老一代在年轻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让时间来作证，说实话，时间也证明不了什么。时间只会把问题稀释，把经验浓缩为概念。时间的好处是它会遗忘你，但不会羞辱你。

2017年以后，我与朋友见面，常常有一种要散场的感觉，然而言犹未尽，然而也不用再说什么。到了2020年，我又觉得，趁还有时间，要将情谊表达得妥帖可靠，要支持那些信得过的人。以后再怎么样就不必多想了。

祝安好！

路内

2020年5月20日

30岁之后，我更加愤怒了

通信人 维舟 时评人

“现实”一直是一个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外部存在，是房间里的大象，以至于你想不关心现实也不可不得。

维舟老师：

你好哇！

我曾经看到一句话，“三十岁之前你不是愤青那你是没良心，三十岁之后你还是愤青就是没头脑。”那我完蛋了，因为恰恰相反，过了三十岁，我非但没有变得泰然平和，反而更加愤青了。我觉得可以愤怒的事情太多了，每天打开新闻，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去生气——昨天丈夫砍死要求离婚的妻子，今天幼儿园女童遭受老师性侵，后天高考生被冒名顶替……在我看来，不生气才有问题，这么多危险和不公像一种隐患，随时可以蔓延到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对受害者同情之余，我感受到不安和恐惧。

不少恶性事件得到网友们的关注，在网上掀起舆论波澜后，很快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涉入，有了说法和交代。我看到了舆论的力量，看到我们微薄之力如星星之火也能燎原。但这里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缺乏全面的、权威性的报道，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看到事件的全貌，越来越多的调查记者离开原先的岗位，网上有人指出全国只剩下二百多名调查记者。相比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这个数字凤毛麟角，不少新闻报道如通稿，缺少记者更细致的采访和调查，难免会一叶障目，所以才会常常发生“反转”事件。

最近我在思考，为什么三十岁后自己更愤怒了。十年前，我觉得自己还有力做些什么的时候，偏偏兴趣特别多，关注的范围广泛，注意力用在各个地方，公共议题只分得一小杯羹，而大部分时候都觉得跟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加上自己觉悟也没有三十岁之后高，很容易沉溺在自我情绪中，白白浪费掉很多精力和体力。另外，过去的传统媒体威力强大，调查记者们赴汤蹈火，总会给我们一个交代，个人无须在网上过分扮演媒体人的角色。人过了三十岁，更接触现实了，生活变得很具体，公共性话题一下子离自己特别近，比如生育政策的改变、离婚冷静期、老人不会使用二维码之类的事情。

这些年我非常厌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发现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改变的太少了。如果语言也是一种能力，我认为在网上为弱者发声也是一种抗

争，抗争得到关注可以解决受害者的燃眉之急，但其中也有不少隐患，因为我们并不能看清真相。除此之外，每次发声也会连带被泼污水，遭受许多谩骂。我常常对一些人怀有期待，希望他们在事件面前可以挺身而出，我总会期待看到维舟老师的观点，看你帮我们梳理、评论、分析，让事件不再孤立，不再只是一个事件，而是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的经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文艺复兴时期有了“大艺术家”这个名词，把艺术家的地位抬上新的高度，在我心中谁可以算得上大艺术家呢？一定不是那些只关心自己、只关心美、只关心自己作品价格和受欢迎程度的艺术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把危机普遍化，让个人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诗人聂鲁达也是用自己充满艺术力量的语言，书写自己民族的集体命运。这些人都不是关心自己作品价格的人，而是关心作品背后的价值。

我在一个微信群里，这个群由不少已经退出江湖的传统媒体人组成，他们中的一半人已经不再使用微博，所以我意识到公共话语场上活跃的人已经大换血了，新一批年轻人正成为中坚力量。我就遇到了不少喜欢的年轻人，同时也发现这届年轻人似乎比我们更加保守了。

过去我们喜闻乐见拒绝读大学的韩寒和高校研究所教授舌枪唇战，现在只能跟年轻人一起看女团了。过去我们一起看《欲望都市》，现在的年轻人会揪住影视剧中男女主三观不放，用严苛的道德标准批判他们的情感，甚至说祝英台真正应该嫁的是马文才，挣脱束缚的爱情没有被赞扬，一些年轻人主动靠拢封建礼教。托尔斯泰在小说里《魔鬼》写道：“人们通常认为最保守的都是老年人，而最勇于创新的都是年轻人。其实这种看法不完全对，有时候最因循守旧的倒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要生活，可是他们却不去考虑，也没有时间考虑应该怎样生活，因此，他们往往选择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来作为自己现在生活的样板。”

原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掩盖个性，小心翼翼度日。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我生性柔软，却藏着侠气，不想成为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抱怨者，别人隔岸观火，我坐在岸边忍不住摩拳擦掌，不惮下水，时不时愤怒，像个水性很差的愣头青。可我越来越多体会到在这个时代个体的渺小，人的无力，打不出有效的水花。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的义愤填膺不过是别人眼中的自作聪明，不设防的热情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精力的浪费，愤懑的人总显得不合时宜，我几乎要被这种悲观的情绪吞噬了。

愤怒不同于生气，愤怒是对当下的质疑，保持愤怒，是我抵制麻木和涣散的方式。也许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危机意识很强，总觉得世界上发生

的事情早晚会渗透到个人的生活里去，让你的生活溃烂，为了对抗这种溃烂，我只好咬牙切齿，信誓旦旦——原来是胆怯让我变得勇敢。

你觉得这届年轻人应该躺平吗？

祝羽捷

2020年9月11日

羽捷好：

毫无疑问，我不认为年轻人应当躺平，但我也能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困惑和无力感，因为我自己这些年也感同身受。这说到底，都是因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坚硬现实：在信息浪潮下，我们可能是对中国和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一代，也本能地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但却找不到一个支点来撬动这个世界。

这显然有别于更早些年那种高歌猛进的乐观精神：当时即便不是人人都感觉“在希望的田野上”，至少全国上下都在埋头赚钱，深信只要抓住机会，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这种心态最奇妙的地方在于，人们其实没有真正去想过社会怎样才能不断“进步”，却坚信它一定会照此节奏按部就班地实现，因为佐证他们信念的事实看来俯拾即是：不但物质生活在“奔小康”，而且周围的空气看来也日渐宽松多元，每个人也有着向上流动的机会，似乎只要梦想不太离谱，都是有希望实现的。

近些年来，这样的乐观情绪正在消失。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不断改善的进程将一直下去。这是因为容易改善的那些事物已经大抵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中国的发展太快，有些权利意识对年轻人而言已属天经地义，他们却震惊地发现身边的一些人仿佛和他相隔着一百年的时间差。何况网络的普及与发达，又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更多、更复杂的面貌，有时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改变，都需要反复的博弈，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当下的种种分歧，或许都可看作是人们对这一现实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些人认同；有些人也许未必认同，当认为它完全不可改变，只能“认清现实”，而随之可能是钻营、妥协，也可能是完全撤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最终，只剩下少数人还不肯放弃希望——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所以也有朋友说很惊讶我竟然还能保持乐观。

我之所以还谨慎乐观，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使得真正的“倒退”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像

是“回归”的行为，也是全新的社会现象。

当然，我也承认，“新”未必就“好”，毕竟它也带来新的问题。前一阵看到戴锦华在访谈中说，她第一次放弃了与年轻人沟通，因为彼此之间已出现巨大的裂痕，现在的年轻人个性太强，以至于在他们的世界里容不下对他人的感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以自己的感受为准，那么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在给个人带来自由的同时，又会带来苦闷，对原子化的个体来说，“公共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甚至，它是可能的吗？

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关心公共生活的。尽管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这被看作是每个公民的本分，以至于英语里idiot（“白痴”）的词源本意就是“（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私人”（private man），但到了近现代，西方也出现了“公共人的衰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冷漠”，而选择退回到自己私人生活中来实现自我。

在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争议就更多了，因为编户齐民的社会原本就缺乏那种“公共人”的传统，那是直到19世纪末才被通商口岸的公共空间和国家危机共同孕育出来的。中国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几乎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在其间安身立命的窘境。姜涛用“公寓里的塔”来标识1920年代新青年的两难：“公寓”是一个逼仄的生活空间，而象牙塔则象征着从那个需要迫切参与的外部世界撤回内心，化身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又在新的现实中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现代的中国，“现实”一直是一个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外部存在，是房间里的大象，以至于你想不关心现实也不可。并不是你觉得太累，只想独善其身就好了，事实是，有时即便你只想“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例如你不想那么早结婚，又或是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会发现身不由己，仿佛触动了那头大象的命门。就此而言，并不是“应不应该关心公共生活”的问题，而是它迟早会逼你直视。连躺平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事实上，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可能，我更乐于去追求个人在知性上的愉悦，但近些年来我渐渐意识到，这既不明智，甚至也不可能。说不明智，是因为在一个边界模糊、主客互渗的时代，这丧失的不仅是现实关怀，还有很多激发自我的机会；说不可能，则是因为这种隐遁、自足的“内心宁静”如今恰恰只有在个人权利等公共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现实中如果不是乌托邦，便需要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

所以，我们为何要介入现实？因为我们的“不介入”其实也是在“介入”，只不过是“放弃”的方式介入。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提出“不作为”的责任问题，就是说你不干什么仍然意味着朝一定方向推动现实。在这个意

义上，“躺平”不是“不改变现实”，而是“以不作为放弃了现实被改变的机会”。

当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果应该做，那么怎么做？毕竟一个理想无法落到实处，那就仍然只是一个幻影。我想，至少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那就是认清现实，但坚持做自己。就像加藤周一在自传《羊之歌》中所说的，在一个外部力量强大到足以对内心造成压迫的时代，你也可以保持内在的精神生活，做一只虽然温顺但决不随波逐流的羊。

也许这听起来有几分“消极自由”，但却是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因为只有这样的自足的内心，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支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社会的改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至少，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去改变周身的这个微生态：遭遇歧视、不公，要坚定运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也要对他人类似的处境施以援手——哪怕只是转发扩散以示支持。如果说以前的人们相信“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仿佛自己不用做什么，那么现在越发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做，世界是不会自动变好的。

一说到“介入现实”（且不说“改变现实”），似乎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那其实也不过是每个人的“日常操练”——毕竟，所谓的“现实”又是什么？说到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态度所形塑的。那不需要宏大的计划，只是无数微小的自发行动的集合。我仍然相信，越来越多人会认清这样一个真相：和童话不同，逆来顺受并不能让我们最终获得幸福，如果你想要，就得自己去争取。

维舟

2020年10月5日

选择了就去努力，放弃了就不必纠结

通信人 吴晓波 企业家、财经作家

一个独立的自己，与你从事的职业、所在的国度和与商业的远近，都无关。

吴老师：

展信佳！初夏的夜晚，像刚起开的一瓶粉色香槟，气泡新鲜强劲，像月光花一样皎洁。我走在橙色的武康路上，被一个人叫住，他慵懒地坐着一张藤椅里，目光真诚地说：“你不认识我了？”

我愣住了，觉得他眼熟但又毫无头绪。这个男人的皮肤有点黑，鼻翼有雀斑，头发到肩膀，是凌乱的泡面头，额头上绑着发带，配上玩世不恭的表情，非常波西米亚。但我就是能清楚地确信：他的这种雅痞是从清秀过渡到颓废，不是天然就存在的，是都市感的反叛。不过，就算我认识一个纯正的嬉皮士也不足为奇，毕竟我也迷恋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爱听鲍勃·迪伦，也歇斯底里地蹦过迪，也开着车自驾过欧洲大陆，也交过些许杂乱无章的朋友。

“我现在变化太大了，你可能没有认出我是谁。”

“抱歉，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做了近视手术，现在眼镜也不戴了。”

“我不欠你钱吧？”

“不欠。”

既然不亏欠他钱财，我浑身放松下来，愿意聆听他说出自己的身份。当他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在过去所有数量有限的交集里，他一直穿着精致的收身西装，戴着腕表、细框眼镜，浑身散发着爱马仕香水的气息，林林总总的符号组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个时代成功人士的标配。

“你……发生了什么？”我脱口而出后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欠缺考虑的话。

“我创业失败了。”他淡淡地、带着一点自嘲地说。

“所以你做回了你自己！”我简直是脱口而出。

他怔了一下，不敢眨眼一样地直视着我说：“对，我创业前就这样，为了见投资人不得不装一下，现在不用了。创业失败的人可以做回自己……”他越是这样与己不相干地说着，我越是觉得平静背后藏着一股脱离苦海的暗喜。

很可惜没有接着聊下去，我的手机响了，约好的女朋友催我开饭。坐进餐厅，我对女友们描述刚才的邂逅，她们兴奋地说：“他有女朋友吗？我简直要爱上他了。”肯定很多人不信，一个男人意气风发的时候，女人不感兴趣，创业失败了反倒格外迷人。成功人士千篇一律，失败者各有各的故事和隐晦。最后一个女朋友得出一个结论：觉得失败迷人的，那是高级的审美。

前两天我又拉黑了几个“成功人士头像”，他们无一例外穿着黑色西装，双手交叉摆在胸前，背景是蓝色的摄影布，一张嘴就是：“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那么，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我忍不住想骂人：我去，谁跟你在一条油腻的河流里，太有“爹味”了。

现在的社会，成功变成了唯一的价值观，不斗志昂扬地追求成功就好像对自己是一种辱没。这几年最流行的话是：“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成功的路径和标准也很单一，那就是拉投资，变现。像我这种意志薄弱的人，一度也被煽动了，真以为自己天资过人，是商业奇才，身上挂满名牌，也见了几位投资人，假装自己胜券在握。老实说，见投资人比进审讯室还难受，一样是接受拷问，在审讯室至少你不会有求于人。我常被投资人怼得耳红面赤，出门就想摔电脑，暗自质问自己：人生苦短，何必受这种折磨。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我自不量力且爱慕虚荣。

要做的事本来挺有意思的，只用数字考量一切就变得索然无味，我再也不想见投资人了，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只听到了拨弄算盘珠子的声音，还有比这个更乏味的交流吗？创业的标准太单一化了，就是要流量，可为了流量你就得昧着良心说话。我对一切贩卖价值观、煽情的内容就是喜欢不来。我还不喜欢成功人士脸放在书封面的，挂在机场的，拍照一定要伸出大拇指，雄赳赳气昂昂的；还有到处开班教学的，组织闺蜜会的，试图用鸡汤教人情商智商如何嫁人的；名片上印一堆公司的……反正总想用成功唬住人的，在我看来，往往都没安好心，明明想要割韭菜非要给自己扣上大帽子。还有些明明工作做得一塌糊涂，说起来却是自己不乐意干了，“我要去创业了”，对于他们来说，创业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不能经营好眼前的生活，只好借助一个更伟岸的借口，掩饰虚弱的现实。

“我要去创业了”，这句话大有深意。大家一窝蜂地去了。好似你要不是创业者就说明你是个超级loser，人人都担心被时代吃掉，只好装出一副不被打倒的样子。创业应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怎么我们的创业者都戴着统一的面具呢，一副满满正能量不会被打倒的样子，使用着“相信明天会更好”“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的话术，讲给投资人听也讲给自己听。我们常常看到美发行业的员工站在大街上做广播体操，生怕动摇信念的创业者也会定期聚在一起，齐声高喊口号给自己壮胆，逼着自己亢奋和积极。

过去的人关心如何拥有美好的生活，我外公一辈子过得就挺舒坦，他可没有创业，书法写得好，算盘打得比投资人还溜，他打算盘用于娱乐而非算账，可以通过加减法把算珠排列出各式图案，颇有新装饰主义的风格，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无用之美的事可真好玩啊，短暂的一辈子都不够我体验，如果谁再煽动我变得不像自己，把热血献给资本主义，我就跟他翻脸。约翰·穆勒指出过金钱的本质，告诉我们“人们并没有对它产生原始的渴望或动机，它纯粹是有益于让人得到快乐，驱除痛苦”。我想，我们活着能不能不以赚钱为目的，把自己手上的事做好顺便把钱赚了。也许今天的这些想法是因为我赚不到钱吧，赚钱实在太不好玩了，太辛苦了，生活七颠八倒，个人性情大乱——以至于我宁愿做一个失败者也不愿意遭那罪。

不知道您看过《推销员之死》吗？推销员用梦想麻醉自己，以为只要奋斗就能得到幸福，却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事实，总是在努力，却没有所谓的自我。商业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个推销员组成的，因为不容置疑地履行社会建构出来的成功路径，遮住了眼睛，只不过现在他们还多了一个麻醉自我的方式——购买成功鸡汤学。大概因为赚不到太多钱，我在精打细算中发现，如果管理好欲望，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哩。推销员们已经够可怜了的，这个社会还骗他们，我常常为此气得火冒三丈。

我看到不少创业的人并非发自热爱和灵感，是为了追风口，什么有机可乘就做什么，共享单车火了，就出现各种色彩的单车，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品牌，七彩的共享单车群没有拼出彩虹，却拼出了一座座过剩的山。创业充满了功利主义，每个赛道上挤满了来碰运气的人。这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已经够多了，古人打猎吃饱喝足就可以载歌载舞，寻欢作乐，洞穴里画画牦牛，印几个红手印，搞搞艺术。我们现在比古人拥有的多太多了，不用茹毛饮血，也不用担心被猛犸象攻击，却没时间享受生活，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有手有脚的年轻人，不想赚钱，不想创业，与其提心吊胆地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如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毕加索说啥来着，“你要做的事情不但必须力所能及，还必须低于你的能力”。我接受自己的失败，说不定把所有的郁闷和失落收集起来，可以化成两句好诗，还可以拥有一身一事无

成的温柔。

请原谅一个创业失败的人发发牢骚，失败后，我觉得生活不但回归了正轨，还被扩大了，能容纳更多无用之美了。没有强烈的求胜心遮蔽双眼，脚下的路不再是一条，而是生出了许多经纬。

祝羽捷

2020年10月2日

小兔：

见信如晤。接到你的来信是荷花开的时节，现在坐下来回复，窗外的江南红枫已开始飘落。2020年的下半年特别的忙碌，我仿佛一个欠债的人，趁年关将近的时候必须匆匆地把钱还掉。

人生要学习三个相处之道，一是与自己，一是与爱人，一是与金钱。说到难易，恐怕没有办法分出大小。

前几天在阿那亚碰到西川，我随口聊起他的诗歌和他的一帮诗人朋友海子、骆一禾、杨炼，西川有点吃惊地说，你不是搞财经的吗，怎么对我们还挺熟的？西川不知道，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写了四年的现代诗，到今天，我的书房里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书与诗歌和散文有关。

写字的人看钱，要么高看，要么低看，很少能平视的。竹林七贤里刘伶爱财，平日喜欢一个人躲在房子里数钱，他的娘子戏弄他，指着那堆钱问，这是什么？刘伶死活不肯从嘴巴里说出“钱”这个字，于是称之为“阿堵物”。

“阿堵物”很好，能够买到世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阿堵物”也很脏，它可以败坏世上几乎所有柔软的美好，从友情、恩情到心情。从事商业或创业，就是一个生产“阿堵物”的过程，那当然更是百转千回、无比的煎熬和充满挫折感。

阿玛蒂亚·森所谓的“身份的焦虑”，也一度困扰过我。

这些年来，我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文人，还是商人？”说实在话，到今天，我还是无法做出明确的二选一。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不会去做二选一。

创业于我，不仅是获得财经素材和深度了解商业世界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我享受商业给我带来的智力挑战，也在不断的

挫败和质疑中去体味人生的丰富度。对我——也许对绝大多数的男生而言，这种可以被量化的、极度刺激的体验，只有在血腥的战争和商场上才可能获得。

的确，对于从事文艺的你，可以把创业看成是一种可以量化的行为艺术。它的成功或失败，与贵贱无关，与高级或低级无关，在某种意义上，只与财务报表有关。

前几天去上海的TX淮海，那是最近沪上最火的年轻人打卡地。有一个95后的姑娘看上了一个向日葵抱枕，居然售价3000元。旁边的男生嘟嘟囔囔地去埋单：“就这么个东西，那么贵。”女生盯了他一眼，“这是村上隆的限量版，你不知道？”

那男生估计真的不知道。

村上隆是日本的潮流艺术家，据称他每年创作的艺术品及相关衍生品可以销售一亿美元。然而，就在今年的5月底，村上隆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村上隆沮丧地对粉丝们说，因为受全球疫情的影响，他的工作室可能要破产了。

与此很类似的，还有一个故事。

迈克尔·波特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战略学教授，他创作的“竞争三部曲”是所有商学院的必读课本。可是，在2012年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由波特发起成立的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因经营不善，向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的申请。“战略大师也救不了自己的公司”的新闻，一度让波特非常难堪。

如果村上隆或迈克尔·波特不经营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一直是那个象牙塔里的“安静的美男子”，经济危机或疫情，对他们而言，仅仅是灵感的来源或研究的课题。但是一旦沾上了创业的泥巴，谁也逃不出财务报表的拷问。

跟“灵魂的拷问”相比，“财务报表的拷问”最大的不同是，它可以被量化。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甚至大部分有专业能力的、骄傲的科学家、知识分子都不适合创业。商业上的挫折，会让他们产生难以言说的耻辱感，这将曲折地投影到他们对“阿堵物”的态度上。

其实，创业或金钱，如同我们生命途中曾经交集过的一位恋人，他没有那么的高尚，也没有那么的不堪。它仅仅是无数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之一，选择它的时候，不必飞蛾扑火，离开它的时候，也不必咬牙切齿。

当下堪称是一个物质繁荣而精神苦闷的时代。相比较，商业世界倒算是一个比较公平和自由的市场，你可以在法律的红线之上，尽情放肆地冲撞和试验，前辈是用来弑杀的，偶像是用来推翻的，传奇是用来颠覆的，规律是用来证伪的。

对于当代的年轻人而言，创业或参与创业，也许算是一种反抗平庸、并在时代的身上克服自己的一个不错的选择项。

人生要思考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离金钱有多远，而是我们离金钱有多近。在宝马雕车香满路的世俗世界里，我们终究要靠近它，亲近它，与它纠缠和搏斗，享受它带来的欢愉和苦恼。而最致命的挑战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被金钱吞噬，我们不能在任何的诱惑或境况下丧失自我。

一个独立的自己，与你从事的职业、所在的国度和与商业的远近，都无关。选择了就去努力，放弃了，就不必纠结。

纸短意长，一言难尽，就写到这里了。

现在，我要去到窗外，捡一片红枫的落叶，夹到正在阅读的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里。若干年后，某个情景下，也许会重读此书，又会蓦然重逢今日的心情，想起我给一身文艺气质的你写的这封不无枯燥的信。

晓波

2020年10月29日中午

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并完全生活

通信人 马良 艺术家

痛苦只是生活的一面，另一面是人类的乐观主义。

人生没有胜算，但我们依然会为之努力。

马良老师：

你好哇！我昨天遇见前同事，她还在杂志社上班，犹风风火火，脚底像踩着风火轮，和我在一起竟成了浮生半日偷闲，我们换了个小酒馆叙旧，难免一起怀念起过去春风得意的日子。她说到了你和我合作的诗歌影像专题，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没有任何对市场和流量的迎合，也从未想过从中获利，只是纯粹想将诗歌和艺术结合起来做一件作品。

其实身处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赶上了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也不知道自己的忙碌意味着什么，蒙着头做事，就想着完成，胆子比现在大，对自己很诚实，策划一个杂志从未做过的选题，想找到一种突破性的语言把它呈现出来。我找到了你，虽然有点怕你和你的团队（过去没见过这么多大花臂和大胡子的男人，名字多带豹、虎、鹰等飞禽走兽），刺青、光头、耳环、皮靴，每个人都散发着危险的匪气，我心里嘀咕着：原来搞艺术的人这么酷炫啊。你没有因为我的年轻和鲁莽而拒绝，我们一起冒了次险，感觉还不赖。

由此看来，人生许多重要时刻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就像新做出来的雕塑要放段时间才有味道，人也要等多年后才能明白一点道理。之后这样的专题再也没有了，传统媒体做的事情必须跟营收挂钩。我只能远远地踮起脚尖怀念，自己曾在不安分的日子里折腾出自己的一小片天地。但话说回来，如果你站对了产业的黄金时代，似乎做什么都容易些，许多机会和资源会涌向你，难免有“乘上东风扶摇直上”之嫌，到底自己几斤几两，还是要等风平浪静之后好好审度，少一些错觉和幻想。

现在的我，既没有东风，也没有刚工作时的青春红利，心里倒也踏实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更加专注和谨慎，在做事中整理和处理自己的观念问题，手忙的时候，心也会变得活泛。

数码产品横行，我很少拍纸质相片，也再也没有走进过照相馆，有一张是你给拍的。那不是专门为我拍的，而是一个极其好玩的一个项目——移动照相馆。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你真是一朵“奇葩”，像一个到处给人看手相

的吉卜赛人，带着一票兄弟开一辆装满服装、道具、摄影器材的“移动照相馆”，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为一千多人免费拍照。在这个人心渐冷，一切都变得速食的时代，人与人缺乏面对面交流，照片变得廉价而泛滥，你的影棚颇具舞台感，像一台穿越时空的造梦机，让我们回忆起小时候去照相馆的庄重，那是全家人顶顶重视的一件事，穿上新衣，洗净脸，打上发蜡，欢天喜地地去拍照。一张照片要摆弄很久才能按下快门，拍完还需经历等待，去取照片，又很隆重地为照片配框装裱，悬挂。整个流程很长，里面都是人情世故，照相馆曾是人际关系的黏合剂，是多少人友谊、亲情、爱情的见证者，是民间的文化代表。

展览越来越多了，如果说现在人们都能接受“沉浸式体验”“互动艺术”“偶发艺术”这些概念，我想你的移动照相馆在中国就是这些艺术形式的开山鼻祖，像带有实验性的行为艺术，参与的人数之多，每个人不自觉地成为这次表演的一部分，我看到了平等和信任。最让我动容的是你邀约父亲一起去完成一部奇幻舞台剧——《爸爸的时光机》。起因是因为父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记忆力衰退，你希望能用舞台剧唤起父亲的记忆。我在你的艺术项目里发现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生活，你的作品从未跟真实的生活脱节，生活先于一切，你的艺术里充满生活的经验，从不拒绝普通人，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某些艺术家的职业优越感，也从未用晦涩难懂的词来阐述你的创作。

很早，博伊斯就喊出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仿佛把艺术和平凡生活的界限取消了，可真让人人去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思考或者做点作品，还是天差地别。艺术里可以有生活，但必须有一点超越平常，比一般人看得更深远的东西，就那一点东西就能决定你是不是伟大的艺术家。现在我对“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了新的理解，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藏着一位艺术家，需要一个契机将他/她唤醒。这个唤醒的方式不一定是走进艺术学院，罗伯特·亨利说“有些画表现了教育，有些画表现了爱”，有些科班出身的艺术生接受过专业训练，技艺娴熟，知道如何借鉴某个流派，也很知道如何做出完成度高的作品，画面近乎完美，可你就是觉得差了一口气。艺术说到底是表达，是语言的延伸，要有话要说，有情要抒发，无论用什么媒介，或者发明一种全新的媒介，每个人至少都可以能成为一个富于创造、勇于表达的生命体，表达出难以言说的情感和反抗。

很多人对艺术家的真实生活缺乏想象，以为艺术家是一群格格不入、脾气乖张的家伙。就像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被你的外表吓得退避三舍，日久见人心，发现你初给人冷峻的印象之下，内核是心细如发、无尽的柔情。以我对艺术家们的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常人并无二致，一样的七情六欲，一样的婚丧嫁娶，一样的与世界发生摩擦。他们的神秘莫测来自他们对创作的专注和想象力，他们的敏感来自完全地投入生活。罗伯特·亨

利在《艺术精神》里写道：“这世上曾有过最好的艺术不过是一些人留下的印记。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充分完全地生活，而不是创造伟大的艺术，这样必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艺术寓于万物，它在生活的细节中，在每个物品的缝隙里，在各式各样活动的运行中。艺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从未离席，我们每个人都理所应当享受艺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权利。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并完全地生活。

祝羽捷

2020年11月25日

羽捷你好：

好久没有认真地写信回信，居然有些紧张呢，一直迟迟不敢动笔。平时写惯了邮件，都是就事论事的，渐渐行文里已经不习惯渗入感情色彩。而曾经写信最多的时候，是在18岁之前，前几年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把那时的一些信再读了一次，那时候的笔真是踏着风火轮的，情也急字也草，像是害怕笔尖和纸的摩擦，一不小心就能燃起熊熊烈火。那岁数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无外乎一些盲目虚掷的爱恋，或是些不着边际的梦话，可是如今再读却读出了些壮烈感，隔着时间之霾，我似乎能看见那个不知深浅的孩子，面对还未曾探索的苍天碧海，急急想要纵身一跃的姿态。写信可真是件很有少年感的事情。

所以本来提笔想先说“别叫老师”的，读着第一句就有点要检查作业的意思了，可是想想又无从纠正，是啊，你又能叫我什么呢？平时在微信里，我常提示一些初次打招呼的朋友，不用叫老师，叫“马哥”吧，但往往又只能限于同性，和女性这样瞎套近乎，也实在很不合适。去年我在健身房请了私教，那个浑身肌肉的小伙子每次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都会大声为我鼓劲：“马老师，你可以的，马老师加油，再来一个，马老师！”喊声响彻健身房，翘臀男女们都好奇地张望过来，看着杠铃下的圆滚滚的马老师，正龇牙咧嘴无地自容。

“老师”这两个字有时就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效果，我对自己都无法答疑解惑，怎么可以因为年纪，就成为老师了呢？如今被叫老师多年，一个“老”字已经名正言顺，可我还是无法坦然，也许有点矫情，但同时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窃喜，留着这点横竖的不适感，还是要的。对世间事都逆来顺受了的人，若皆因脸上的褶皱，就有了“教师资格”，这样的人间实在太无趣了。

言归正传，咱们合作的那个“诗歌和影像”相和的作品，我记得是在2013年吧？其实过去也不算太久，可真是没想到这些年已经让这个我们身处的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纸媒杂志边缘化了，街头的书报亭也一夜之间就都消失不见了，当然也没有人会像我们当时那样去如此隆重地为一个杂志的专题而创作了。前段时间，我们合作的这个作品，还做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在开幕时候你有事儿没过来，我对来观展的观众聊起我们当时的这个事儿，记得是你找我聊，要给你们杂志拍个有意思的摄影专题。其实我是不太愿意拍杂志照片的，觉得商业拍摄太多限制，但又不想这样生硬回绝你，于是记得当时是提了个条件的：如果你能把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的亲笔手稿，每人一首，都搜集齐给我，我才愿意做这个项目。唉，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做实在有点不像话，我自己一老爷们儿，脸皮都薄，曾经在香港遇到少年时最喜欢的诗人北岛，也没勇气走上去打个招呼，却给一个年轻姑娘出这样天大的难题。写到这里，觉得先要给你道个歉，实在难为你了。当然，如今马后炮的道歉是晚了，但当时好像你也没觉得是个事儿，因为你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尽显齐鲁儿女的飒爽豪气，让我目瞪口呆。半个多月后，你拿着厚厚一摞十几位诗人的亲笔诗稿，再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真服气的，太利索了，说到做到，我也自我检讨了：看人家姑娘漂亮，就觉得必然是娇滴滴的，办不成大事儿的。我当时实在是浅薄了。

前段时间读书看到一句，心有戚戚焉，“请不要指责一个作者无法做出完美的作品，这不是错，这是他的遗憾”。很多时候，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遗憾，而向这个世界交付自己的作品的，内心惶恐，也苦于自己的无力，无力使其更趋完整，更靠近所有应该仰望的一切。我当时将那件作品交付与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心情。我是很认真地做这个事儿的，竭尽了自己的情感和能力，也希望对得起你的执着，配得上那些诗句里的永恒照耀黑夜的群星。但依然满是遗憾，这遗憾于我，也是永恒的。

后来你去了英国留学，我也疏于联系。再次见，就是读你写的书了，字里行间，春风故人。你耳目一新的那些部分，也让人惊艳，时间在每个人身上做的手脚果然是不一样的，真是值得大大恭喜。过去这些年，我倒是没什么长进，摄影项目零零散散也做了几件，唯一拿得出手的却是我的戏剧作品《爸爸的时光机》，总体来说我不如刚开始做创作时候那么高产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些年里我成了家，也有了个孩子，是个女儿，我曾经想象中最完美的孩子，我的太太和我感情也很好。唉，我曾经真的认定自己将来会孤老在自己工作室里，和我的作品一起落满灰尘的，而现在我居然有了一个完美的家庭，这是这些年来人生最重大的收获。而另一面，我的父亲从2015年开始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他渐渐失去了记忆，日复一日不停失守，往事灰飞烟灭。父亲一辈子都在从事戏剧导演工作，他也曾经特别想让我继承祖业，所以我用《爸爸的时光机》试图为他的记忆留下个子承父业的完美剧终。戏我是满意的，但戏剧之外，生活继续着，不再

有观众的掌声。看着完全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每次拥抱他靠近他，他的眼睛里都是惊慌和茫然，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沉闷的消磨，比失去的剧痛折磨人更多，尤其是对于我的母亲。但也由此，我更理解了家庭的珍贵，爱的意义。但凡有可能，在衰老之前，我们都应该去学习怎么去爱，并认真付出过爱，这样的人生才算完整。

谈回我们的工作吧，如你所言，也谢谢你的理解，正是因此种种，我一直努力将“生活”本身，将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作为我创作的唯一母题，并多年来为之努力，试图将艺术作为致幻剂也好，作为安慰剂也罢，希望其作用于生活的切肤之感。但这些年来，“生活”一方面造就着作为作者的我，一方面也吞噬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我有时也害怕，人间琐事正一一赎买着我的创作生涯，曾经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艺术家”，在生活的实战里被拆解成为一个个更具体的身份：儿子，丈夫和父亲，多一层身份便多一份担当，飞檐走壁不再可能，纵横四海也要定家庭套房了。曾经的浪子难免焦虑，但焦虑归焦虑，我也正在学着面对，知道这本来就是人生的一课，是人到中年之后必然要面对的自修题：拒绝崩塌，脸、身材和精神上的所有崩塌。

我曾经写东西特别快，一泻千里的写法，心里有无数话，就这样一股脑地倾泻在纸面上，很有快意，像是卸去身上重负一般，写完了一身轻松，拂袖而去。而如今写东西越来越慢，落笔不慢，只是后来大部分写下的字都删掉了，一篇写完到最后能留下小一半就不错了。一是年纪大些，所谓知天命之年将近，很多东西想明白了，知道纸上饶舌也是无益，二是作为一个作者，也亲眼见了太多热情，终究付之东流，难免心里泛起虚无感，留在纸上，是还念想着也许有人读了能懂，哪怕只对一个人有用。而那些删去的字，却也还在，它们依然是活着的，只是不再想示人了吧。渐渐理解了很多前辈作者，没有所谓的江郎才尽，只是沉默了而已。也明白了“老不读三国”不只是老炮爱权谋那么小儿科的解释，是真正明白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高歌猛进是为了他人观瞻，曲终人散却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有些话还是留给自己罢，冷了取暖，饿了下酒。

最后，我想起一个故事：2016年我在耶鲁大学参加一个“艺术和阿尔兹海默症”的论坛，因为我的戏也是相关题材，于是也在受邀嘉宾之列。台上除了我还有两位艺术家，和一位耶鲁大学的研究阿尔兹海默症的著名学者。我聊了我的戏剧，另外的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他的纪录片作品，还有一位是音乐家，她分享了她的公益项目，怎么和阿尔兹海默症的失忆老人一起玩音乐。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站到了话筒前，一开口，她的声音就是哽咽的，她说：“其实，你们都过分浪漫了，我照顾过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在我看来，生活一点都不浪漫，生活是无尽的痛

苦。”这段话非常震撼，台上台下一片默然，当然，我也无言以对，因为我正在经历的一切，让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没有错。这时，那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拿过话筒对台下泣不成声的提问者说：“是的，生活是痛苦的，疾病死亡无可避免，艺术是无力的，和现在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医疗一样的无能为力。但我认为痛苦只是生活的一面，另一面是人类的乐观主义。人生没有胜算，但我们依然会为之努力。”我喜欢这段话，过去很久了，我依然记得很清楚。

我也喜欢你信末的那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并尽情地、完全地生活。”

我一直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希望我的孩子也是，以后等她大些，我会认真告诉她：纵身一跃之后，无论你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都别沮丧，更无须害怕，生活没有真相，也没有所谓目的，生活就是你眼前的那一片海，那片蓝天，那条永恒的地平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海里游，往天空上飞，向着地平线出发，一去不再回头。

马良

于2020年12月8日

后记：我收到这封回信后，告诉马良老师，我们山东人管卖大葱的都叫老师。他哈哈大笑：那我就没压力了。

生命的笃定与模糊，都在咖啡馆里

通信人 崔树 设计师

当下的人们生活状态与生活需求之间是会有化学反应的，设计师更应该是发现者、梳理者、筹建者、总结者。

崔树：

展信佳。

本以为要写信和你聊聊设计，却因你和我面对面坐在咖啡馆，你灵光一现地说，我们聊聊咖啡馆吧。继而，你和我都把眼神转向窗外，淅淅沥沥下了一天的雨已把整个城市浸透，密布的乌云提前叫来了黑夜，橘红色的霓虹灯被做成三角形金字塔，大的套小的，层峦叠嶂，本是人造的假景没有什么新奇，可恰好倒映在今天积水覆盖的路面上，水中幻月般的景致比现实世界好看，雨点打下来，像艺术家里希特用橡皮刷模糊掉的油画。霓虹灯与咖啡馆的搭配最有热闹的都市气息，被雨帘阻隔了外界时，竟最显得疏离。

我之前想写一个小说，写了半截，把故事设置在咖啡馆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开咖啡馆的广告人，广告人的本职工作更加赚钱，对咖啡馆的态度就像对女人的态度一样不咸不淡，女人一开始为了讨好这个男人，自觉担任起咖啡馆的运营工作，用情越深就越投入，后来男人还是跟她分手和新女友去旅行了，但把咖啡馆留给了她，她日复一日在咖啡馆里坚守。故事写了一半，觉得太过传统也太好理解——世界变化太快，一切情感都不易把握，留在咖啡馆里的人象征着我们不愿意改变的部分，是我们渴望的永恒情感。

每个人都对咖啡馆有不同的记忆，就像这一刻，我们各自的回忆袭来，陷入各自的沉默，难以察觉的微妙情绪却非常具有攻击性，我的脑袋被电击了一下，想到了伦敦Soho区的一家咖啡馆，是我写稿的场所，也是很多人遮风避雨的地方。伦敦的天气常常如今日，像没有点亮蜡烛的厨房，忙碌但昏暗阴沉。我常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玻璃天顶，可以看到被雨水打湿的落叶毫无生气地躺尸，斑驳陆离，视线模糊。每个木桌上都趴着人，因为可以上网且每个桌子下面有电源，大家显然把这里当作共享办公室。水杯和咖啡杯都是最普通的宜家玻璃杯，咖啡香醇，可以点手冲，唯一与众不同的物件是勺子，勺子都是旧货，每把勺柄都有纹章雕像或者过去贵族的家徽，独一无二，可以舀装在同款玻璃杯里的黄糖。其实一家咖啡馆好

不好喝，一闻便知，我发现好喝的咖啡馆散发的味道是苦涩的。要判断一家咖啡馆好不好喝，还可以看看里面坐着的人，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不会计较咖啡的口味，只有那些有闲没钱的文艺青年和没有喷香的咖啡就无法创作的工作者才会苦心孤诣，对什么都可以纵容，唯独不能忍受寡淡的咖啡。

同在Soho区的另一家咖啡馆Bar Italia，空间像英吉利海峡一样细长，想要坐下都很难，店里面挂着火腿，意大利人开的，外面插着意大利国旗，24小时营业，晚上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门口停着拉风的摩托车，像是一个俱乐部的聚集地。人们常常买一杯espresso站在门口喝，就像我们经常米兰路边看到的那样，冬夜里似一股暖流，夏夜则像个不眠城。每家咖啡馆吸引的人竟是如此不同，又是如此别具特色。即便是害怕与人共处的人，也会找到与自己气质契合的咖啡馆，买一杯匆匆带走。这些咖啡馆多像变身之地，是你打算换一种生活节奏的歇脚处，也是整装待发的起点。

我对万事万物都有点好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喜欢一切有灵魂的事物。奥斯曼人曾把咖啡称为“思想家的牛奶”，咖啡馆算不算盛放灵魂的容器呢？细细想来，我每次旅行总喜寻当地有趣的咖啡馆，常常在欧洲一些小城市看到老人们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去的咖啡馆是固定的，生活节奏始终如一。在这种一成不变的配置中生活一辈子如何不厌倦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咖啡馆并非静止的，咖啡馆是个动词，因为每天里面坐着的人都在改变，每日的心境也不同，我模仿哲学家的口吻来说的话就是——人无法坐进同一家咖啡馆。

旅途中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咖啡馆，比如我去莫斯科时找到涅瓦大街上普希金故居旁的文学咖啡馆，普希金与情敌决斗前在这里喝最后一杯咖啡，其实他并未喝完，自信地说等回来接着喝。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这里的常客。果戈理小说《涅瓦大街》里说：“绝没有比涅瓦大街更好的地方了，至少在圣彼得堡是这样；对它来说，涅瓦大街囊括了一切。”在河内我撞见一家越战主题的咖啡馆，越南咖啡极苦，玫瑰花插在各种铝制饭盒和酒精瓶里。墙上贴满老照片，照片里有很多女兵长得很好看。有人说别的地方喝咖啡是加了奶和糖，巴黎左岸的咖啡加的是文学、艺术、哲学。巴黎的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花名册，你可以想象跟自己的偶像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感觉，比如毕加索、海明威、贾科梅蒂、萨特，他们爱去的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照片和手稿贴在墙上。在柏林，我找到一家名叫Ora Café的咖啡馆，是将一家老药店原封不动改造成的，整面墙的瓶瓶罐罐，提醒着过去的人们更需要抓药看病，现在的我们更需要安抚情绪，咖啡变得非常治愈。

我曾经一度十分迷恋茨威格描写的“一战”前维也纳的样子，太平的黄金时代下，诗人、哲学家、音乐家、艺术家过着一种理想生活，全身心地追求

艺术和文化。茨威格说自己作为半成人的学生时，“看书是我们最主要的事。凡是到手的书，我们全部都看。我们从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将借来的书交换着看。但是，我们了解一切新事物的最佳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在他看来，咖啡馆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是只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只要花上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个钟头，讨论问题、写作、玩牌、阅读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广泛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人头脑那么灵活、迅速掌握如此多的国际动态了。”

咖啡馆被茨威格看成了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浓郁而复杂的空气中，他们交换知识和信息，寻求理解和关爱。也许这样的物理空间并非必要存在，就像莎拉·贝克韦尔想象了一座精神的咖啡馆，西蒙娜·德·波伏娃、埃德蒙德·胡塞尔、卡尔·雅斯贝斯、阿尔贝·加缪、莫里斯·梅洛——庞蒂等人很多未必谋面，但他们似乎共同参与了一场多语言、多角度对话，也许这就是咖啡馆最具有魅力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地方，既能盛得下伤心，又能放得下生命的盎然。

前段时间，我颇费周折地去了一家汽车咖啡馆，独家供应可以占卜未来的土耳其咖啡，喝完后白色杯底留下厚而细软的咖啡渣，那个挂着长发的流浪车主颇有波西米亚气质，他举起残羹，掐指一算，说我马上会有好事发生，还压低嗓子说这是今天他观到的最好的一卦。我们总是为事物赋予莫须有的想象，才得以持续生命中的激情和灵感，有时想象比现实更可靠。虽然咖啡馆老板怎么看都像江湖骗子伪装成算命半仙来生财，但吉利的话着实令人开心，不如就把好运跟你共享一下，请接受这来自咖啡馆的锦鲤。

祝羽捷

2020年11月1日

小兔早：

我想从我学会写信的那天起，应该也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给一位作家回信。因此这个经历本来就很神奇。

谢谢你的来信，我在等待一次飞行，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我来说很少能有机会可以拥有整段的时间来思考，更不要讲形成文字。我想这个状态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如此，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普遍面临的问题。于是近几年我所有的文字，比如设计的文案，自我的感悟，朋友间的感谢，大部分出现在坐飞机的时间里，我自己想来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此刻手机没有网络，我们能得到一段相对完整和安静的时间。

这样想来，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唯一的结果却含着模糊的原因。比如在飞行中的写作，是因为有了时间还是因为想要写作？比如设计师达成的创意，是因为灵光乍现还是因为经验使然？再比如我们要讲的咖啡馆，是因为喜欢咖啡还是喜欢咖啡馆，或者是喜欢让时间经过咖啡馆？我在想我们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结果大多来自模模糊糊的缘由。可能这就是生活的魅力吧！那么作为一名作家，你是更喜欢笃定还是更热衷模糊呢？

聊起咖啡馆，这个词对我来说意义上就是多重的。从设计师的逻辑上讲，我是把喝咖啡的空间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比如星巴克，此类咖啡产品成熟，消费逻辑清晰——我认为是咖啡店；第二类有些面积比较大，伴随咖啡还有丰富的餐食和饮品，大部分人也并不在意咖啡本身，消费空间、消费时间，咖啡只是一个主题而已——这一类我叫它们咖啡厅；第三类，也就是我喜欢的这类，它们不一定有很大的面积，也不一定有很多的产品。但是它们一定有很棒好喝的咖啡和很不错的景观，无论是置于闹市还是在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你总能在这一儿捧着咖啡把眼睛投向别处，让时间滴滴答答地溜走——这种我叫它咖啡馆。

我不知道小兔是否还能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杯咖啡，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清晰的记忆。高中时候的我经常会在自己不喜欢的老师的课堂上睡着，不是因为主动的故意，而是因为主观的无趣感带来的嗜睡，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没见过数学老师的。因为我会整个睡过去他的两节课！从他进门前到他离开。也谢谢他对我的包容，我想自己应该是安静地睡着并没有打呼噜说梦话吧！不然叫出喜欢女生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放过我。后来觉得这样实在不好，于是开始尝试喝咖啡来熬过每天早上的数学课。当然那个时候大部分是喝的速溶咖啡。我清楚地记得我因为只喝咖啡不加奶，在那个时候还被同学看作是“能吃苦”，所以青春的逻辑中都带着天真与幼稚。毕业这么多年所能回想起来的高中味道，咖啡算一种，而另一种则是那个年代洗发水的味道。20世纪90年代的高中生不会有香水，能回忆到的可能就是这两种味道了！

后来有个经历，就是高考前的一天，我妈居然怕我在数学考场睡着，前一天大热天出去给我买了很多咖啡。讲起来像个笑话一样，怎么有妈妈对儿子这么没信心，但是今天想起来还会很感动，那个时候妈妈还在照顾我，批评和训我。她的头发还没有白，我也才十九岁。妈妈这辈子只给我买过一次咖啡，没想到那一幕是我们之间记忆很深的场景。

咖啡馆出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可能更多的是为恋爱的大学生提供一个空间而已。到这个阶段我还是喜欢喝黑咖啡，所以一直到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多年好像才搞明白拿铁卡布等等一些咖啡的区别。整个大学期间我有

一个黑色的保温杯，每天我都买了咖啡装到保温杯带到画室去。画室在朝着马路的二楼，大学时光充斥着画画、咖啡、满大街的车水马龙的声响。以至于到现在，我耳朵里需要一点噪声才会觉得心安、不分神，就像此刻坐飞机听着引擎的轰鸣。

十年前在北京工作，星巴克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每天喝得有点多，于是加加奶。但是我却很少愿意停留在星巴克的店里，十年前星巴克可能也算网红吧，不少人拍照打卡。讲真的，十年之前的那个我热衷喝咖啡，但却没记住咖啡馆，咖啡似乎只是单纯的饮品，帮自己顶住压力和困意。我对咖啡馆这个空间的认识是在近十年开始的，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代表我还是代表了我们这代人的经历。

2015年在意大利，中间有次我们去到卢卡，在一座小教堂边上有一家非常小的咖啡馆，我和Ready哥一起点了意式浓缩，当你在小咖啡馆里坐下来，旁边的狗就趴在你脚上，外边很冷，咖啡很烫很苦，饼干很甜，咖啡很苦。你能看见刺眼的阳光和暗黑的老旧木头，能听见满屋子意大利人大声地聊天和硬币的声音，时间会被放慢下来，你甚至能看见它流走的形态和颜色。在意大利的咖啡馆里更多都是我跟Ready哥一起喝咖啡的记忆。2017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庆幸那些意大利的小咖啡馆里保留了我们一起用硬币买咖啡的回忆。

你是否在早上等待过一家咖啡馆开门？有一次在伦敦，我们一行人早上去参观美术馆，到了那里还没有开门。11月伦敦的早上非常冷，几位朋友挤在一家有着黑色铸铁门面的咖啡馆门口，等着它开门喝杯热饮。我从来没有如此焦急地等待过一杯咖啡，也没有那么早去过一家咖啡馆。当拿到咖啡的时候有一种早上排队买早点的感觉。那杯咖啡的味道早就忘记了，但是唯一让我记着的是温度，还有那种满足感。

还有一段在日本喝咖啡的回忆，我在东京的小巷子里很难找到小一点的咖啡馆，可能是因为我每次在日本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探索买手店上吧，只有京都blue bottle的一家老店让我记忆深刻，在一所被清理到最原始的老旧结构的老房子里，年轻人都端着当下最流行的品牌的咖啡拍照。咖啡还真神奇，能成为很多事物的媒介，让不合常规的事物变得和谐——一边是安静的、遗世独立的古寺庙，一边是喧闹的、川流不息来喝咖啡的人。

在伊豆的山上，有一所由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咖啡馆，咖啡馆坐落于山脚，由很多的原木堆积成一个倒三角的结构，整个外立面都是玻璃，坐在里面望向远方可以看到大海和森林。上山的路上，太太生我的气，一到咖啡馆就买了咖啡独自坐到山脚去了。我围着咖啡馆转了一圈，一边觉得设计真让人感动，一边着急找她。两年后想起来，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我俩去过的咖啡馆。虽然我都没顾上喝咖啡，但伴着她的小脾气，记忆还是挺美

的。除此之外，我俩能共同记起来的咖啡馆是在海明威住过的Key west小岛上的一家海边咖啡馆，能记住它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猫都多一个脚趾。

如今中国人如何定义咖啡馆呢？咖啡馆这个空间更多的不是被定义，反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着新鲜的质感。从喝咖啡提神，到喝咖啡的味道；从泡咖啡馆的空间体验，到沉浸在咖啡馆的时间氛围里。一切的变化都来自这些年我个人的生活经历。

作为设计师的我不得不回头观察这些，就拿畏研吾设计在伊豆的Coed House咖啡馆来说，那些登顶山头的人们不一定是奔着一杯咖啡，有人是为了建筑，有人是为了由咖啡馆望向海，也有人是为了路过上山的玫瑰园。但正是由于山上的咖啡馆，才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能获得的经历。所以之于设计这件事本来就不只存在于形式主义的狭隘层面，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考量的是宏观设计给结果带来的重要改变，比如咖啡厅的式样与咖啡厅出现的位置相比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处于山间的咖啡厅无论风格如何，那都是一个能让人梦想的目的地。

咖啡馆就是这样伴随着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改变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城市就像被阳光雨露滋养的花朵一样肆无忌惮地生长变化，生怕追不上这个时代。这些如咖啡馆一样的不同的空间环境也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层出不穷。它们参与并引导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被我们主观的生活方式所营造和引导。所以在设计上你很难判断是因为需求而产生营造的必要性，还是由于营造的必要性而培育了需求。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当下的人们生活状态与生活需求之间是会有化学反应的，在这里设计师更应该是发现者、梳理者、筹建者、总结者。

设计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审美表达工作，需要在逻辑的基础上去完成美好的结果，如果整体的过程还能给社会大众更多的价值，这个设计才有更完整的意义，聊到这里，我不禁在想，接下来我是否要做一家属于明天的咖啡馆了。

如今大家动手指就能将咖啡叫回家，很多实体空间正在消失，过去的生活方式、交流习惯也都在改变，我们还需要咖啡馆吗？还需要写信吗？我们喜欢看时间流过，还是喜欢时间停驻的一刻？我并没有答案，因为对于我来说模糊总比准确要有趣得多。

崔树

2020年12月2日

北京飞广州

当年轻人问年轻人

李西闽 于是 沈大成 张之琪 阿枣

每个人的情绪都是流动的，
保不齐明天我们会遇见怎样的自己。
看到今日的年轻人患抑郁症的越来越多了，
不免去思考这件事，
我们到底有没有正视自己的暗面，
我们的悲伤也许更需要被看见。

当一个抑郁症朋友没有赴你的约

通信人 李西闽 作家

抖一抖我们的心房，你就会看到那里不但住着天使，也住着魔鬼。他们时而和平相处，时而起了争执，谁占了上风，谁就主导着你的情绪。

李西闽老师：

我更乐于叫你西闽大哥，在我熟知你后发现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叫你的，你身上确实给人一种亲切的哥哥气！给你写信的时候恰逢阴天，我坐在书房，拉了一半窗帘，索性让光线幽暗下来，点了香薰，火苗跳动，书籍散乱躺在手边，拖鞋被踢出脚边。书房委顿，我整个人就沉浸在它安静的氛围里，并不是只有艳阳高照才让人快乐，我觉得这种昏暗也很舒服，疏影暗香。就像过去我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如果公司没人，我就把大灯关闭，只留自己位置上的台灯亮着，噼里啪啦地写稿。我觉得灯火通明不利于创作。虽然我极少画画，但总去美术馆看画，画总有明面，有暗面，明亮部分扩张，阴暗部分吞噬，有明有暗才有力量，它们看上去对立，实际是个共同体，相互仰仗。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想到了人的情绪，我也不能总是兴高采烈，有时觉得自己很丧，一些丧是消极的，一些丧让我得到安慰。躲在暗处时，还挺轻松，你会忍不住说：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没有追求。如果把抑郁情绪比作一场感冒的话，我当然还算幸运，总能很快就好了，说不定还暗中提高了自己的抵抗力。

其实我是个情绪挺多的人，不轻易发作，在外界留下一个温文尔雅的好印象，发作起来也是狂人一个。我看心理学家说，这个世界上真正正常的人没有几个，每个人都有几种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我想：心理学家可真善良啊，他们不这么说，我们得多为难自个儿，没法面对自己人格里的暗面。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脑回路比较清奇，真正可以交流的朋友不多，但我挺欣赏一位同学，他特别内秀，跟我一起上化学补习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补习化学，我每次都考得接近满分了啊，95分都是下限。过去我们从来不说话，偶尔在放学路上或者音像店里邂逅，也面无表情，但我依稀知道他喜欢听什么音乐，很合我胃口。我妈说这位老师以前负责出考题，这个班得上。上就上吧，反正逃脱不了补课的服役般的命运，可多亏上了这个班，让我收获了他这位挚友——他被我做题速度之迅速所震慑，我被他

慢吞吞的性格所折服，从此我们惺惺相惜，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友情。他身上有种难能可贵的静气，不像同龄男同学冒着傻气。在那个女生和男生有些势不两立的青春期，只有他在我的心中柔情脉脉。

说来伤感，如此情投意合的朋友自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每次我到他的城市，本在网上约好见面，久别重逢的喜悦已经在心里吊得很高，可他总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有回我去他所在城市的书店签售，他说一定会来，但还是爽约，让他的好朋友送来一束花，来替代他的缺席。一次次异乎寻常的消失，让我百思不解，他心有惭愧，出于对我的信任，他告诉我自己得了抑郁症（很多患者因为羞耻感不愿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有时是觉得自己状态不佳不想见我，有时是因为发胖很自卑不想见我，有时是自己在床上动弹不得。我想抑郁症这个魔鬼真是无差别选人，怎么就选了这么优秀可爱的朋友呢，会把选中的人拖进无望的深渊。我相信他的痛苦绝非微信上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也许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

我听闻抑郁症患者很难结交新朋友，甚至难以维持原有的社交关系，我庆幸他还愿意跟我联系，还能交换一些音乐、电影、书籍。每当他给我发消息，问我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时，我都会格外小心。有一回，他半夜问我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心一下就窜到了嗓子眼，我好怕他想不开，立刻发了一堆温暖正面的鼓励，发完又觉得自己很可笑，觉得自己很无用，帮不上他。

记得第一次见到西闽大哥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上海作协的会议厅里，填一些表格，说说自己的写作计划，你看上去两眼闪着光，特别和藹友善，毫无架子，结果你告诉我你正在写自己在汶川地震中被压在废墟之下的经历，你被这段痛苦的经历折磨着，被抑郁症吞噬着，想通过书写救赎自己，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抑郁症患者。后来我回忆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你的眼睛明亮得像发烧的病人，灼灼地看着我，好似期望我多说一些话，你看上去那么乐观，很难想象你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后来格桑告诉我，你在夜晚常常陷于难以自拔的情绪，产生过好几次自杀的冲动，还好最终你还是更愿意留在我们身边。

以前总有人说抑郁症是富贵病，是不愁衣食想得太多了。就像我的这位中学同学，他在很多人眼里生活很好，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条件不差，自己学业有成，学的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理应见好就收。我还听有人说，抑郁症是意志力薄弱的结果，不愿意付出辛苦的努力，甘愿堕落。这怎么可能呢？了解西闽大哥的人都知道，你以前是军人，虽说不是高大威武，但身板结实着呢，为人更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连死都不怕。可见我们的社会对抑郁症还是充满偏见和不理解，得出这些偏执结论的人就好似从没感受过抑郁一样。

我想在这个时代，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太多提及自己的暗面，是因为抑郁、悲伤、脆弱、伤感这些情绪不利于实现主流社会鼓励的成功，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必须积极向上，必须战胜一切，不可以有倦怠，不可以消极，不可以不作为。人们害怕被否定，害怕失败，害怕被人轻视。可是，抖一抖我们的心房，你就会看到那里不但住着天使，也住着魔鬼。他们时而和平相处，时而起了争执，谁占了上风，谁就主导着你的情绪。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占上风的疾病，抑郁症、边缘人格障碍、疲劳综合征、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等精神疾病在21世纪初看似更加猖獗，它们都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如果过去的社会是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功绩社会”，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用韩炳哲的话来说，“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抑郁症患者是这场内在战争中的伤残者。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抑郁症。它所反映的，是那种同自身作战的人类。”他解释了埃亨伯格的观点——抑郁症象征了“不可控”和“不可化约之物”。它产生于“无限可能性和不可控性之间的碰撞”——个体追求自主性，在不可控之物面前遭遇失败，由此产生了抑郁症。

每个人的情绪都是流动的，保不齐明天我们会遇见怎样的自己。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患抑郁症的越来越多了，不免去思考这件事，我们到底有没有正视自己的暗面，我们的悲伤也许更需要被看见。

最后好想对你们说，即便不能见面，你们也要相信自己不是孤悬一线，我们始终愿意陪伴着你们，陪你们站在阴暗的角落里，也陪你们一起沐浴阳光。

祝羽捷

小兔：你好！

因为这些日子来，身体不是很好，迟复为歉。

能够优雅地独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特别羡慕你能够安静地沉浸在独处的快乐之中。我也是个喜欢独处的人，特别是写作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有个习惯，就是创作长篇小说时，要找个地方，将自己封闭起来写作，一个人沉浸在寂静的氛围中，只能听到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文字如水般流出，那是幸福的时光，因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幸福的，哪怕有时觉得很丧，甚至悲观得像要失去整个世界，你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情绪，从丧中转换出来，真的是很好的事情，证明你还是个正常人。你信中提到的那个得了抑郁症的朋

友，触动了我的心弦。

朋友们都知道，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被埋废墟76个小时，由此，我得上“创伤应激障碍”这种精神疾病，后来又有了抑郁症。有抑郁症病友说，我们这些抑郁症病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这个魔鬼有时沉睡，有时醒来，控制我们的大脑，让我们陷入一种极端的状态，折磨着我们的灵魂和肉体。

你说你那个患了抑郁症的朋友经常爽约，我特别理解他。我也有过这种状况，在患病的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想见任何人，而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白天也拉上窗帘，独自坐在黑暗中，默默流泪。这种自我封闭，和上面提到的独处是不一样的，那是健康的独处，而这是病态的。无来由地泪流满面，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更厉害的时候是疼痛，总有个地方会痛得难以忍受，有时痛得受不了了，就用脑袋去撞墙。最严重的是产生轻生的情绪。

不想见人，或者说爽约，这对抑郁症患者而言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临出门时突然决定不去赴约。所以，你要理解这位朋友。你说有次你新书签售，他答应要来，结果没来，只是让朋友送来了一束鲜花，我想，那束鲜花代表了他的心意，他来不来已经不重要了。

说到理解，真的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很多是因为无法理解对方，或者不愿意去理解他人。而对抑郁症患者的理解尤为重要。很多人不理解抑郁症患者，认为他们矫情。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在我某次自杀未遂之后，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将我义正辞严地臭骂了一顿，说我不负责任，说我那么幸运从地震中获救，没有资格去自杀，等等。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抑郁症发作时的痛苦，他不知道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魔鬼有多么可怕，他说的道理都对，但是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是无效的。后来，他自己经历了某种变故，精神上也出了问题，才开始理解我，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病友，相互鼓励着往前走。

对抑郁症患者的不理解，或者偏见，主要还是对抑郁症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病态，和其他病一样的病态，而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说实话的，我很害怕一些正常人在我面前调侃地说：“我也抑郁了。”我会觉得那是对我的一种羞辱，就像歧视抑郁症患者那样的话语：“他得了神经病。”是的，很多抑郁症病友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生怕别人知道他们得了抑郁症，会在工作的地方被同事歧视，甚至有的用人单位知道此事后，辞退他们。而这种隐瞒，我认为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因为他们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更不用说来自社会的关爱。有些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最后选择了轻生，令人痛惜。

抑郁症患者背负了沉重的枷锁，如果没有人对他们伸出温暖的手，他们就有可能崩溃。我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凛冬》中描写了一个产后抑郁症的病人，最终因婆婆和丈夫的冷漠与刻薄选择了自杀，死亡也许是她最好的归宿。家庭的温暖至关重要，如果连这种温暖都没有，那就像活在冰冷的坟墓里。我在十多年的抑郁症治疗中，家人对我的关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抑郁症漫长的治疗中，连自己也会绝望，何况是家人。有个病友的家人经常说，人家连癌症都控制住了，你怎么吃了几年的药都不见好。他常对我说，对家人有种深重的负疚感。

负疚感和自卑是抑郁症患者的一种普遍心理，我也如此。我经常会觉得对不起人世，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朋友，对不起粮食，好像我活着就是累赘，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浪费资源，这种心态常常让我无地自容。其实我一直在对自己说，你是个勇敢者，你是个很牛的人，你活着，还可以写作，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我知道，最终还是要靠我自己走出来，没有人可以真正地救我。

我对很多病友说，自救是最重要的出路。英国作家卡尔·弗农在《我是怎样摆脱焦虑》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不采取行动，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为了活下去，活着的意义并不是浪费粮食。

坚持吃药是自救最好的方式，不要轻易停药，因为如果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那是十分危险的。运动也是自救的一种良好有效的方式，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坚持每天十公里的快走，当痛快淋漓出了一身汗，冲完热水澡后，会感觉到颅顶冒出了许多浊气，大脑也变得清醒。我一直不隐瞒自己的病情，我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这种公开承认会让我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心中那个魔鬼，我相信，它总有一天会灰溜溜地离开，纵使不离开，也只是在沉睡，不再醒来。

另外，要诉说，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就说出来，在微博和微信，都有我在深夜的诉说，我的诉说不需要他人的反馈，也不需要安慰，我只要能够说出来，证明我还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而没有放弃自己，如果哪天我连话都不想说了，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小兔，你说你那个抑郁症朋友有时会问你一些消极的问题，我觉得那是好事，你可以随意地回答他，不一定要怎么样，你的陪伴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帮助。

自杀情绪对我来说，是常见的，我想，每一个抑郁症病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我现在基本上找到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当我产生自杀情绪的时候，就会随机拨一个朋友的电话，只要和他聊上十几分钟，那种极端的情绪就会渐渐消失。所以，当你那个抑郁症朋友深夜突然给你电话，你一定要接，陪他说说话，也许你就挽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很多病友特别信

任我，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和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停下手中的事情，陪他们说话，让他们走出死亡的阴影。记得几年前，有个宁波的女孩，深夜告诉我，她活不下去了，准备轻生。我就一直和她讲电话，天南海北地聊，天亮后，我让她拉开窗帘，我问她：“你看到朝阳了吗？”她说：“看到了。”我又说：“你还想死了吗？”她说：“不想了。”我说：“那么，你可以去休息，或者洗洗去上班了，这一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抑郁症的确越来越低龄化，很多未成年孩子也得了这种病，这是十分让人伤心的事情。现在的孩子承受着比上几代人更大的压力，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爱护。在时代的浪潮中，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加容易，我们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加大对精神上的损害。当下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特别是对抑郁症患者这个特殊的群体，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小兔，在给你写这封信时，我收到了一个抑郁症朋友的消息，她说因为今年的疫情，自家小区被封闭，她一直在人性撕裂中煎熬，靠读经支撑着。我除了安慰和心疼，无能为力，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走出黑暗之地。她也担心着我，对我说：“你是在黑暗中发过光的人，所以你要保持你的光亮啊。”我的泪溢出眼眶。我会保持自身的光亮，同时，希望所有在黑暗中挣扎的人，都能够发出一点光亮，有足够的光亮，魔鬼就无法躲藏。

小兔，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空再聊。

祝冬安。

李西闽

2021年1月4日

再也不用为不甘寂寞痛苦了

通信人 于是 作家

精神上保持审美的自由，甚至道德的自由，才是宅的终极意义所在；否则，就只是身体和行动的物理性局限，是逼仄空间里的蹉跎和堕落，是表演性的放弃，是假的宅人，真的囚犯。

宅女于是：

你好宅哇！你的宅今天好吗？你宅的心情还算不错吗？

上周上海书展，我全勤出门，颠簸得乒乓作响，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突破，特别是辞职以后，宅着的时间比出门多。但这一周，每天披星戴月地回家，倍感疲倦，讲话多了脑仁疼，性子有点躁，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脑震荡呢。都如此疲倦了，竟然还失眠，辗转反侧，开始怀疑人生。

我常常在外出和宅之间激荡挣扎，生出双重性格，一重性格渴望敞开，接收外界的信息，也表达自己，骚动不安；而另一重性格是封闭的，建立一种内循环，像是个在蓄能的铅块电池。总保持一种状态的话我会疯掉，在两种状态中摇摆，很难摆平，反而对生活保持了敏感和热情。

记得过去我们说到“宅男”这个词，心头还会闪过一丝贬义，心里想的是那些不出户，对外界不关心，只关注自我和小世界的人。普遍认为这个概念起源于日本，有种说法：很多日本年轻人丧失对外界的好奇，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在家宅着玩游戏、追星、支持偶像养成，如果自己不想去拼搏，把欲望投影在某个年轻偶像身上，看她/他去选秀、竞争、出道也是一种快乐。关于宅的极端案例有很多，我读过一则报道，日本有位宅男，职业是汽车生产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色情杂志，失踪六个月，被房东发现他在家被书架上的杂志翻落时给砸死，他生前搜集了整整六吨杂志。

说不定日本人不同意他们是宅的始祖，因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就发明了“沙发土豆”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拿着遥控器，蜷在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干，只会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说美国人是始祖，金庸先生也不干，他创作了武功高强的东方不败，不想着一统江湖，反而躲在深山老林绣起了花。说东方不败是始祖，康德先生还不干，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家乡，按着极其精准的作息生活，用东方不败的绣花精神搞创作。

过去的宅很容易炮制疯人，大家达成共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非疯即傻，

例如“阁楼上的疯女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疯再宅，还是宅了才疯，不得而知。但大家普遍相信，与外界不交流的人必耳目闭塞，过分关注自己，跟不上时代变化，顽固不化。如今完全无须有这种担忧，一上网就什么都知道了，甚至比外面的人更能掌握国际动态、社会时事，谁家的狗失踪了，谁家在打离婚官司……这是真正的足不出户，坐拥天下。

我听过戴锦华老师一个演讲，中间讲到：“两岸三地的年轻人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大突破的时代到来，但是这个文明大突破的时代未必施惠于年轻人。所以，年轻人都在经历着从小确幸到小确丧的一种生命经验，这样的一种宅生存可以成为某种保有自由和获取自由的选择，但是另一边是你已经被劳动力结构整体排斥的一种结果，你只能打点零工或者在家办公。”

今日的语境之下，“宅男”“宅女”有了新解，我理解的是虽赶不上康德先生这般伟人的定力，但也说明内心丰富，一个人也能待得住，不用因烦躁撕扯自己的头皮，不用拿脑袋撞墙，自洽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觉得无聊，搞不好还能在某个领域作出一番事业。宅并非意味着出家遁世，深居简出完全不会与外界阻断。宅也从一种带着悲观色彩的亚文化成了一种大众文化，不少人写宅家做饭、宅家追剧的攻略，还有不少人喜欢拍宅家vlog，分享如何宅得更动人，宅得更更有仪式感。宅还成了消费主义的新形式，博主们会推荐宅家好物，从家用电器到吃鸡神器、香薰、蜡烛、睡衣、泡泡浴，宅家健身需要的跑步机、哑铃、家用动感单车，为了宅得舒服还可以买护眼台灯、平板电脑、手机支架，懒人沙发、符合人体力学的靠枕、座椅，记忆床垫。如果事业心不忘，在家soho的人还可以开一家云公司，云打卡、云报表、云会议。如果预算充足，你也可以付钱找人跑腿，再也不用像神农一样跋山涉水尝百草了。

在我看来，密密匝匝地奔波过，才真的能体会回家宅着的意义。宅自有裨益：宅着不用打车，不用受交通堵塞的罪，不用呼吸汽车尾气，还可以少花钱。更何况，出门会遇到伤害，遇到失望，遇到不理解，有时伤害别人，有时伤害自己。像我这种常常多做多错，好心也会办坏事的人，减少出门就是减少犯错的机会。唯有宅在家里，心里窃喜：真好呀，折腾了一大圈，搞砸了许多事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边界是什么，有多少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有多少不能降格的事情。该死心的死心，喜欢的人也换了一波，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多欲望和兴趣了，再也不用为不甘寂寞痛苦了。

东方不败为什么不肯出山，也许是觉得万物皆空，生命虚无。跟他不一样的是，我是处处碰壁所以退回来，带着负气，东方不败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觉得一切不过一场梦。为什么会想到东方不败，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过日子，并非无力回应大千世界，他们是发现浮华不过都是过眼云烟，索性在后方操演着沙盘，尚不输真实世界里的热闹，目

光更加明鉴。如果世界是一个圆形的罗马剧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一把舒适的座椅，坐在其中，既能一起百感交集，也能独享怡然自得。我相信不少宅的人并非厌世，而是活得足够通透，他们不在乎身在何处，不在乎空间的大小和形状。

刚工作的那几年，我把家当酒店睡，门口放着不同尺寸的旅行箱，每个月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鞋子在门口架子上横七竖八。我见到日子过得有模有样的人，既惭愧又羡慕。其实，随意讨论宅的好处难免太过“悬浮”，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奔波在外忙于生计，回家倒头就睡，连家都不能好好看上几眼——宅也是一种特权。

我有个朋友当了母亲后，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盘腿打坐，约法三章，打坐期间不可有人来打扰。现在我懂了，那是她在自我被挤压的空间里，划出了一个独处的领域，人无论处于人生何种阶段，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里，都需要有自留地，可以看作一叶孤舟，也可以看作是伍尔夫口中的“一个人的房间”。我小时候，吃完晚饭就回自己的房间写作业，现在回忆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明知道父母不会随意越界，但总要把自己的房间反锁，写完作业写日记，日记本也是带锁的，封面画着田园风光和建在斜坡上的小木屋，颇有瓦尔登湖的味道。

有次听到许倬云老师说，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我立刻泪目。如果我能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宅”这个词对我来说程度太深了，充其量是需要一定质量的独处状态，那种状态仿佛一只潜水艇深入海洋，看到不为人知的深海景观。那些独处的时刻仿佛我那本上了锁的日记本，独自体会那些不必示人的心情和回忆。

我喜欢的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有首诗里写道：我独自一人，对自己的灵魂，满怀着巨大的爱情。

祝羽捷

2020年8月18日

小兔：

见信好！你全勤出席书展？也太厉害了吧！我上一次一连七天出门已是去年5月旅行时的事……不知不觉已经宅了十几个月了。再仔细回想，事实上，我已经宅了足有二十年了吧。

前几天见面时，你说起《野生作家访谈录》里的片段让你感动，这反倒让我很惭愧，说到底，不会赚钱、只会宅家、很少社交的人永远是疑似loser

的少数派，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宅故我在，仅此而已。

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那年租房独居是1998年。但记得很清楚是天山路水城路的一室户，五楼，朝南，冬天阳光特别好，把床摆在窗前，晒着太阳读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记忆里，情节都模糊了，那片缓慢移动的梯形阳光痕迹却还很鲜明。自从有了一间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房间”，我每次出门基本上都有明确的目的，能让我立刻出门的人一定都很重要。但是，曾在番禺路租屋里创下的28天不出门纪录已在2020年疫情期间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居家煮饭喂养自己的纪录……总之，在家是很忙的。严格来说，我不是御宅族，这个古老的名词早已消失在瞬息万变、每天出新梗的网络历史里了。但当年的御宅族现在怎样了？要是有人做个追踪报道应该很有意思。

我不沉迷于追剧和打游戏，也没有社恐，徒有宅人的美名。我也不是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注自我和小世界的人”。我关注很多事情（甚至可能太多了），因为我总觉得世界在以几何倍数扩增——比如中老年人不知道的年轻人的世界，比如女性不知道的男性的世界，比如loser不知道的人生赢家的世界，比如南亚人不知道的中欧人的世界——通过书籍、影视、音乐、新闻、网络乃至坊间谣言，我假装知道了一些，并且对这种假装的实质保持警惕（真的有人完全地、透彻地、感同身受地知道所有的事吗）。网络促成了同类相聚，也导致了高度同质化，社会学家已定论，这很可能催生阶级固化、极端主义等退步状况。宅人都必须挂在网上，对这一点要有自知之明。

我记不清有多久没像“沙发土豆”那样懒着了。我有自己的房间，但没有伍尔夫500英镑的年收入（以零售价格推算，1930年的500英镑相当于今天年薪4万美元；以收入推算，则相当于今天年薪12.3万美元）。工作时间表就像紧箍咒，限定了我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这恐怕要归功于二十年来催稿的编辑们。他们给了我一个确定的deadline，我就能细化出每天的时间表。我相信，你提到的那些宅家的博主们也会深深感受到时间规划的重要性。当然，执行规划更重要。在家开云端公司的人，我觉得不是宅，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应该分开，否则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都会受影响——幸好我们的工作只需一台破电脑就可以了。

讲到底，宅是很人工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都建立在现成的社会化标准服务上，从属于消费社会。很难说宅是不是更环保，因人而异吧。至于我，每天收快递时会觉得很浪费，但也无计可施。宅的代价很昂贵，所有必需品都让别人送到家门口。

现代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在N种糟糕的选项里做出相对而言更适合自己的

选择，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绝非最好的选择。但你说得没错，交通是噩梦，污染是噩梦，有时候，交际也会像噩梦。现代人花费在交际上的精力和时间是巨大的浪费，所以聪明人都会做减法，做取舍，而且多半都会首先舍弃没有营养的社交。不过，这种取舍的前提是已经粗略地看过世界，换句话说，没有闯荡过江湖，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宅心。

谁不想在瓦尔登湖畔当梭罗呢，更何况，他的避世一方面贴近自然，一方面距离热闹的社交中心也不远。是左右逢源，而非左右为难。梭罗的《瓦尔登湖》第一章讲明了经济的幻觉，第二章就开始呼吁我们回归现实。

梭罗不是极端自然主义者，而是向往着希腊式的人性觉醒。事实上，在湖边的农作物种植项目因为严寒而失败后，他又写了著名的《抵抗公民政府》，提出了“个人高于国家”的观点。那是1846年。所以，一百多年后，只记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当代人多少是误解了他，把他当作避世隐居的榜样更是错得离谱。人家明明很有入世的觉悟，贴近土地绝非创造自然生活方式那么简单，湖畔小屋既是他的创作基地，甚至还是废奴者学会的年会举办地。湖畔生活让他越来越明白，个人的良知是政治生活的基础，而且，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人类生活终究都不是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已。人的局限性不能被忽视、被低估。

你不要负气了才回家宅着，这样对家不公平，对自己也不宽容。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安顿自己。我有朋友把独居的空间装饰得美轮美奂，沉溺于独享一切。相比而言，我的狗窝毫无风格，几近简陋，四面墙都被书堆满了，有喜欢的画也没地方挂，偶尔想买束花，坦白说，也没地方摆。花和画，和人一样，特别需要自己的空间。我把它们的空间都霸占了。

于斯曼有本书叫《逆天》（上海译文版译为《逆流》），我很喜欢，当年奥斯卡·王尔德也很喜欢，还称其为“毒书”。主人公烦透了巴黎的虚伪和浮夸，决定离群索居，闭门不出，完全依照自己的品位打造避世豪宅，对宝石、绘画、花卉、香氛、植物、古书的评论，足以见得他对世俗潮流是多么不屑。迷人的，总是这样的避世美学，看起来既沉沦又高昂。但冷静下来想，吸引我的并不是这种贵族式的避世方法，而是用自然主义的研究精神研究文学、绘画、音乐及奢侈品对精神的意义，这种写小说的方法让我觉得很有趣。事实上，从物指向精神的路径是很容易走偏的，阶级意识、物质主义、时代趋势都可能把创作者带上歧路。不说创作者，就连生活者本人也会有所迷失。

在我想来，甘愿避世的人总有沉迷的对象，必须有，无论电玩或宝石，还是书籍或影视，甚或囤积癖者的囤积物，精神总归要有聚焦的重点。既然如此，为自己好好挑选精神落脚处就是最重要的事。精神上保持审美的自

由，甚至道德的自由，才是宅的终极意义；否则，就只是身体和行动的物理性局限，是逼仄空间里的蹉跎和堕落，是表演性的放弃，是假的宅人，真的囚犯。

顺祝夏凉（我快热疯了）。

于是

2020年8月20日

相信要认识的人一定会认识

通信人 沈大成 作家

我为自己的弱点付出了代价。但相信要认识的人一定会认识，相识的机会会源源不断地从天而降，最后犹如倾盆大雨，肯定躲不过去。

沈大成：

你好哇！第一次要见你那天，我无比忐忑。因为你说，你是一个“社恐”。出门前，我在衣帽间选了好久，心想一定不能穿得太拘谨、太保守，以免你没有跟我交流的欲望；不能穿得太暴露、太前卫，不要表现出过分热情，以免惊吓到你；但我又觉得不该流露出紧张的神情，以免给你留下我心理素质很差的印象。我没有参加过相亲，但我觉得相亲的男女应该跟我彼时的状态差不多吧，手心不断出汗，连呼吸都要站在镜子前练习。

深思熟虑后，在司机不耐烦的催促声中，最终我决定穿出自我本真的模样，也决心在你面前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因为所有的掩饰和表演都有“PUA”的嫌疑，故作姿态是短暂的，唯有真实才能长久，换算成内心话就是——爱咋咋地吧，我就是这副熊样了。怀揣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我不但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撕裂了自己的破洞牛仔裤，导致半截大腿、膝盖、半截小腿都露在外面，还迟到了半小时，没有雨伞，湿淋淋地走进咖啡馆，惨不忍睹。

你非但没有动怒，还慷慨地请我喝手冲咖啡，服务员问我要哪款的时候，我觉得哥伦比亚咖啡豆太平庸，曼特宁的咖啡豆太陌生，我想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品位荒芜的人，最终就点了店员重复了三遍名字我都不能鹦鹉学舌说出的那款：“我就要那个什么来自什么亚南部的什么曼什么菲。”喝咖啡的时候，我感受到你带着温度的目光，频频投向我暴露的大腿，才意识到下车时步子扯大了，牛仔裤撕坏了，赤露着白花花的肉，迭声向你解释，以免造成对我穿着总是放浪的印象。你大笑起来，说以为是今年最新的流行风尚。你用风趣幽默化解了我的尴尬。

我们瞎扯胡侃，聊得漫无目的，但兴高采烈，临时决定走出咖啡馆，穿过下雨的街道，共进晚餐。你说：“你约我喝咖啡真是让我舒一口气，第一次见面就吃饭是让人紧张的，喝咖啡可进可退，留有余地。”这可能是我当天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对也是因为经验，因为我也有过很多次难以推脱的经历，最终落荒而逃——社交太难了。

跟你这样一个真正的“社恐”见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在我心中，“社恐”绝非变异之词，很多“社恐”特别聪明，拥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小世界，自成天地。不少天才都是“社恐”，比如化学家、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许，能在家待着就坚决不出门，唯一固定参加的活动只有英国自然学家们组织的派对，但他从来不言语，社恐指数满星，如果有人想要请教他但又不想把他吓跑，只能对着他身边的空气提问，他会酌情选择，小声嘀咕答案，如念咒语。听上去他还挺酷。

有段时间我还觉得“社恐”这个标签还挺时髦的，除了我说的显得聪明以外。还带着特立独行的意味，一言蔽之，“我不爱凑热闹”。大概为了呼应一些有趣而聪明的朋友，我也试着学习社恐，说自己就不爱出门，就喜欢一个人待着。那天在家闲得无聊，我在网上做了一个“你是社恐吗”的测试，回答了一些问题，诸如“你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些尴尬的事情，你会记多久？”“你念自己名字时候的感受是？”“你在商店买东西时售货员跟着你，你的感受是？”我的答案是：十年后还会记得，想起来还会脸红；每次念自己名字的时候都觉得很古怪别扭；被售货员跟着我会浑身难受，根本无法购物。测试结果出来了，我是中度社恐患者。

难以置信，我扪心自问自己怎么可能是“社恐”呢？荒唐。就像我读安迪·沃霍尔的传记，发现他这样一个被一堆人包围的艺术家，总希望被人注意到，竟也说自己是社恐一样骇人听闻。我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像，是因为以前工作是媒体，不就是整日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打交道吗，还自认为做得游刃有余，不乏火花四射的时刻。细细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特别内向，一方面是因为天生的，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常常孤独在家，不知道该怎么跟其他小伙伴相处，我爸妈很少带我出去串门儿，既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也不是很自信，在外面从不敢喘大气。再看一下基因代码，我爸妈也都不是很爱交际的人，我爸寡言，我妈朋友少，我从小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称兄道弟，也从未跟人勾肩搭背，其实内心很羡慕那种桃园三结义的友谊。当然内向和社恐是两码事，内向是你自己独处也很自洽，不觉得需要那么多社交；而社恐是发自内心对社交产生恐惧感。后天经过职业训练，我常常把自己真正的内心包裹起来，佯装着兴高采烈，常常工作完回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有些交流对人是滋养，有些交流实在太折磨自己了。

在一个隆重的艺术晚宴上，我的名牌旁是摄影师于聪的名字，餐桌过于浮夸，让人没有交流的欲望，我和他尽管并肩而坐，却良久不语，甚至不看对方，化实为虚，全程用微信问候了彼此，“好久不见”“要上甜品了”“不错”。

不是每个朋友都需要贴面礼，让我们自由自在选择交友的方式吧。

现在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了，也不想成为一个处处

受欢迎的人，总希望别人喜欢你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强迫你总要端着，扮演一个小心行事的人，扮演身上原本没有的品质，做人做得太满，像紧紧拉开的弓。但现实是：突如其来的电话会刺激我的太阳穴；两个人的约会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变成群聚，我会特别气恼；一些答应的邀请，我会最后一刻决定不出门，尽管已经换好衣服；有时候我觉得小动物比人类可爱多了，我宁愿在家撸猫也不想见人……

我相信自己并非真的有社交恐惧人格，但的确有很多不想社交、不想交谈的时刻。不想交谈的时刻也很珍贵。再说了，我们也不需要跟无法交流的人扎堆，人年纪越大越需要能切入正题的朋友，越要懂得推拒，越享受清淡。我忘了在哪里看到一个说法，被我美化后大意是这样：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接得住，接得住彼此的喜悦，也接得住彼此的坠落，接得住光明和隐晦。

愿我们能接得住彼此！

祝羽捷

祝小兔：

你好哇！

我们见了一面。

我们以前没见过，你来了，我们先相互看看。我看到一个美的和高兴的人。高兴和愉快、开心有点不同，高兴有一个外在的样子，至于心里有多少开心，我就知道了。一瞬间我就很放心，我想你这种人是不会让我难堪的，你会把气氛弄得很好。那么你就比较辛苦了，而我这种人是比较舒服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在这方面剥削别人，所以下次你不要同情我这种人了。

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去日本镰仓玩，每天都去旅馆附近的便利店转一圈，一条马路之外就是大海。一次我在店里掉了零用钱，在货架周围找不到，不久看到一个年轻的日本男人手拿红色的半透明塑料拉链袋，里面装着一张1000日元的钞票，还有一些小钞票，是我的。他正大光明地排在收银台前，好像要把它交给店员处理。因为我不好意思上前交谈，就走出了便利店。

还有一些类似的经历，也许当时多说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也离开了。

我为自己的弱点付出了代价。我可以付。别的性格也要付出代价，只是未

必像我那次价格明确而已。

而且我马上动手写了一个短篇《海边的女人》，写女人去旅游，融进了海滨小城的梦里，夜晚的海滨会做梦，它想和陆地决裂，去海上漂泊。虽然没有写明，其实故事是以镰仓为背景的，于是我得到了稿费，镰仓把欠我的更多地还给了我。

你看，得失我也会计算，这里失去的，那里补。看起来账目的逻辑非常不清不楚，但暗中是有逻辑的。

说到“社恐”，我可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想克服缺点主动社交，第二个阶段已经无所谓了。不是对像你我这样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无所谓，相反，是在乎的；而是对认识的起点抱着比较自然的态度，相信要认识的人一定会认识，即使错过第一次机会，也会天降第二次机会，相识的机会会源源不断地从天而降，最后犹如倾盆大雨，你肯定躲不过去。

放松下来后，我会想象自己是某种住在沙滩上小洞里的动物，喜欢躲起来。因为，比起让人们认识和喜欢我这个人，我更愿意人们不要对我留下印象。我在网上瞥见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这段话：“只要你不活在别人的期望里，你就是自由的。在没有人爱你的地方，你就是自由的。限制你自由的最大的阻碍就是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名字的人，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这道理我知道。在想象中，我作为沙滩上小洞里的动物，是没有名字的，如果需要叫它，就叫它什么，用英文叫，则叫它the thing，巨浪一冲刷，小洞被淹没，就什么都没有了，the thing is gone，我微弱的存在仿佛如此。在那弯巨浪卷起来又落下来之前，我还可以活一下，我从不远离容身的地方，只管把它建设好。我也不是一个手很长的人，妄想去抓住远方的东西。庆幸的是，世界是在变动的，一定有一些美好的事物会主动经过我附近，每当那时，我就从洞里出来，和它们击掌。

写的这些，像是我已经在社会中找到了生存办法，游刃有余。

不是，我仍然很不安。

不安来自两点，首先是对于个体的警惕。我们说到过，现在有的人攻击力很强，很容易就用肮脏的手段伤害别人，他们受无法丰富的单一的大脑指挥。我很害怕认识这样的人，或被这样的人注意到，有的人看上去是人，实际上不知道是什么。个体还会聚起来，形成一伙人，指向同一个方向，说着一样的话——小兔，这件事你怕不怕？

不安也来自每一次思考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我们这些人、我们立足的地方，本来和世界确立了一种关系，今年以来，情形变得好像是你以为拼得

成熟的一幅拼图被打乱了，你看大陆、大洋、两极都在原处，但世界已经剧变，你和它的位置关系不同了，这张拼图需要重新拼。怎么拼呢，新的它会变得非常不好吗？每次想到这点，我也会感到害怕和不安。

不好意思，谈了太多自己。就在这封信里，向你展示一件“社恐”标本。

祝福你祝小兔，一切！

忧虑与想得开并存的沈大成

2020年7月4日

死神来临之前不顾一切狠狠爱

通信人 张之琪 媒体人

一旦失去某人，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谜团：

失去之中仍有秘密，失去的隐秘之初仍有未解之谜。

祝老师：

展信佳！好久没写过信了，我们这代人甚至没怎么赶上电子邮件的尾巴，就融入了移动互联网即时通信的浪潮。敲下“展信佳”三个字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学大人讲话的孩子。而今天想聊的，似乎也是个年轻人聊起来有些轻佻的话题。

从2017年底到2018年春天，我先后目击了三次死亡。

先是我养的第一只猫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它发病时我正在卧室睡觉，听到男友的呼叫声跑下楼，它已经瘫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我们还尝试给它做了心肺复苏，最后也把它送到了医院。我看着医生把它用报纸包起来，放进储存小动物尸体的冷柜里。

然后是大年初十，我的姨妈在确诊为胶质瘤一年后去世。对她来说那是极为痛苦的一年，从在北京化疗到去美国做免疫治疗，先后两次开颅。她去世前的几分钟，我妈血压飙升，被我爸带到隔壁病房休息。我留下来，几乎是用力掐着我姐的手，陪她看着监测仪上的数字，一点点掉下来，又挣扎着升上去几个刻度，直到最后归零。

又过了一个月，我的姥姥脑梗住进ICU，几天后病情急转直下。宣布死亡的时候我还在家，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被转入太平间。我进去帮她擦拭身体、换好衣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裸体，毫不避讳地摊开在所有人面前，我有些无措，不知道该看哪里，又不舍得放过最后看她的机会。

奇怪的是，回忆起这三个死亡场景，我脑子里的画面像是推理片里迅速闪过的证物特写，我记得包裹着猫的报纸，记得检测仪上的曲线，记得姥姥手上松弛的皮肤和凸起的血管。但当我想把镜头拉远，用一个更大的景别去回忆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在画面里，只有背影，没有表情。

后来我的咨询师告诉我，这其实是人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当人面对一个创伤性的情境时，会做出一种情感上的detachment。我好像是作为一个田

野工作者在场的，而且几乎是最理想的那一类。我的“在场”似乎带着一种道德义务上的自觉，我觉得我应该在场，应该努力记住，时常回忆，甚至诉诸笔端。但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感受被屏蔽掉了，回忆这些场景时，也无法唤起太多悲伤的情绪。

朱迪斯·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写道：“一旦失去某人，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谜团：失去之中仍有秘密，失去的隐秘之初仍有未解之谜。”这正是当我试图去凝视死亡的时候，所看到的東西，一团迷雾、混沌不清。我不知道我姥姥的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答她活着对我意味着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先回答我与她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最终指向的，不仅是她是谁，更重要的是，我是谁。

这样的追问像是强迫自己走进一间空屋子，空屋子有一扇门，通向下一间空屋子，如此无限地重复下去。我无法强迫自己走进这样一间屋子，我选择回避这个问题。

然而这团死亡的迷雾却不会因为我的回避而远离。在她去世两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在死亡制造的分離中，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如果以死亡的时刻作为原点，我们与逝者之间，既不是越走越远，在记忆的流逝中彻底失散；也不是越走越近，最终在另一个时空团圆。我们是忽远忽近的，过去会在某一个瞬间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击碎现实，巨大的悲伤汹涌而来，吞没一切；又会在另一个瞬间悄无声息地隐退，遁入记忆中无人打理的杂乱角落。

我经常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想起她，失去她的剥夺感会立刻占领我周围正在行进的现实，让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瞬间哭出来，而后现实又会很快夺回领地，把她挤压出我的生活。最近在读孙歌老师的新书《从那霸到上海》，其中也引用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他说：“过去的真正意象，只能在一闪之间呈现，过去只能在一次性的、突然闪现的意象中加以把握。如果错过了使认识成为可能的一瞬间，那就无法把握了……”大概死亡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在它闪现的瞬间，我似乎没来得及、也没有能力去把握它，很快地，现实就关上了那扇门。

孙歌老师在书中说，长时间地处在一种非常状态，或者让一种非常态的认知持续，是违背人性的。即便在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我们也很难观察到一个社会的主观认知可以长时期地处于非常状态。“人类需要哪怕是虚假的‘常态’感觉，因为只有这种感觉才能让人不必付出太多精力而生存下去。”这似乎也是我们无法与死亡、与哀悼的状态共存太久的原因，它们是平静生活中的“危机”，而面对危机，我们本能的反应是解决它，恢复一种——哪怕是虚假的——常态和秩序。

写到最后，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些悲观的结论，我们是否无法真正地去认识死亡，哪怕是尝试去接近一种可能的认知？常态下对于死亡的阅读究竟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那种“非常态”？或者我们只能在稍纵即逝的瞬间中匆忙地捕捉其中的真义？抑或维系常态化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始终在逃避死亡，也逃避对于死亡的认知？正如孙歌老师所说，这是一种“低能耗”的生活方式，反之则是自找麻烦。

这就是我对于死亡的感受吧，现实——或者说是常态——所携带的巨大惯性，让我每次试图接近它时，都感到阻力重重。似乎唯一可做的，就是被动地等待，等待下一次危急时刻刺穿现实的防线，希望下一次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准备得更好一点。

张之琪

2020年6月18日

亲爱的之琪：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通信就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现在我终于有勇气回信，是因为晚上发生的事情与死亡有关。今晚，我原本计划要跟朋友吃饭谈工作，难得进城，由于道路遥远，动身较早，先于朋友坐在餐厅里，刚掏出手机就接到朋友的电话，他说，“我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最好的哥们今晚踢球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我必须现在就去……”他因心急说得含糊不清。

我一边祈祷，一边等他的消息。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才再次发来消息“他走了”。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因为在死亡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死神一直离我们很近，甚至就注视着我们，如影随形。因为他戴了面具又善于伪装，时而慈眉善目，时而一团和气，我们总是被骗得不轻，在许多扑朔迷离的时刻，给予我们毁灭性的一击。

比如有人告诉我，他和同寝室的人喝啤酒、吹牛皮，室友坐在阳台上，他坐在椅子上，两个人越聊越兴奋，觉得太投缘了，恨不得拜把子，在一刹那的感动中，室友仰身后倾，从阳台跌落了。比如还有人告诉我，他和朋友在西藏旅行，看到一条奔腾的河流，四周开满了艳丽的格桑花，美如天堂。朋友走到河边，愉快地戏水，他一个转身就发现身后的人不见了，河水湍湍，一如常态，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失踪的这位朋友。死亡有时候太魔幻了，你猛掐自己大腿，发现这竟不是噩梦。

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读J.K.罗琳的新书《偶发空缺》。小说的开头讲到小镇的银行行长巴里·菲尔布拉泽带妻子单独出门吃晚饭，孩子们已

经过了需要人陪的年纪，看得出要享受二人世界的他们心情愉快极了，就在停车场，巴里感受到头痛，痛得像一柄铅锤在砸裂他的大脑。他轰然倒下，在救护车来到之前，已经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中，一动不动。

我是在阅读一个人死亡的经历时接到母亲的电话并被告知：外公在家中因为一口痰没有及时吐出，等不及救护车来就因大脑缺氧离开了人世。在这之前，他虽与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如影随形，但并没恶疾傍身，我想着还有好多好多时间可以相处呢。我再也无法打开《偶发空缺》这本书，看到它就会想起外公的死亡，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我都会感到窒息。亲人突然离世，对死者来说是撒手人寰，对活着的人来说是要背负伤痛走完余生。

人很难面对亲人的离去，因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为了安慰自己，人类编织了宿命论和还有来世说，但俄耳浦斯注定失败，已在阴曹地府的爱人不会被重新带回人间。我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无神论者，认为这些都是慰藉的想象，却也只能在自己感到无助的时候说：“去往天堂了吧。”

前两天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路过旧宅，心里知道外公就在楼上，但我没上楼，一溜烟走掉了。醒来心里懊悔死了，不能原谅梦中那个不仁不义的家伙（我自己）。当天一直忙工作，不知怎地，某一瞬间脑中闪过梦中画面，鼻子一酸，眼泪出来了。我想象他在临终一刻经历了什么，也许内心惊惧，无助绝望，就像《伊凡·伊里奇之死》描述的：“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也许不忍就这么草草结束，也许像有些人说的，在将死之人眼前，一生中重要的片段纷至沓来，这个说法未免太过抒情。我无法靠想象捕捉经历死亡的感受，不能真的理解死亡，也想不出自己会以怎样的方式谢幕，更不知道自己活在戏的哪一幕。

我这段时间翻译约翰·伯格的《熵》，他有一个章节企图阐释死亡，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熵”的概念是用科学原理解释“死亡”，熵增加的过程以热寂告终，熵意味着生命终将耗尽和消灭。类似的说法，我在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论爱与死亡》中也看到过，他说：“死亡是一种热力学现象，变形虫和飞马星座上的一个黑洞都和它有关——而我们依然对此一无所知。”我能理解他们想说死亡就是一次能量的重组，是逃脱不掉的自然规律，这样一想，我们古人为求长生不老炼仙丹或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就显得非常可笑，倒不如学学庄子，席地而坐，仰天大笑。可是在情感上排除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失去的悲伤实在太难了。

很多人听了许多大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而我呢，听了那么多大道理，还是很怕死。别人相互见面打招呼都问“吃了吗”，我和母亲常常聊天就是相互质疑“你怕死吗”？今年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被牢牢地困在一起，时间久了没有任何新鲜话题，我们面面相觑，我心血来潮地

问：“妈，你现在还怕死吗？”她说：“一阵一阵的，最近好像又不怕了。”

母亲的怕死是间歇性的。看上去毫无章法，但我还是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总结出了粗放的规律，那就是：不如意的时候，她比较怕死；家庭和睦的时候，她没有那么怕死。

写到这里，我马上就要把这封信的内容从丧丧的死亡转向阳光积极面了，长舒一口气——是爱让我们抵消对死的恐惧。死亡和爱在某种意义上非常类似，都是我们终其一生也解不开的谜，所以活着就老琢磨它们，而且爱和死亡都给了我们创作的动力。生命里没有爱，你肯定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可是没了死亡，你也不会觉得有意思，因为一件事放在现在做，还是500年后再做都是一样的，时间失去效力，你也不需要创作了。我就是那种总对生命的意义抱有深切忧虑感的人，一想到死后那种巨大的空虚感，人难免想找到活着的意义，甚至是比人类更伟大的意义，王小波在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里的主人公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是疼。”对死亡苦思冥想后，他开始爱诗，读诗和写诗成了抵抗恐惧的方式。

“真正的爱情，往往轻而易举地而且毫无惧意地便勾起死亡的念头。”我猜有那么多人殉情，可能就是只有死亡这么高密度能量的事情才能匹配他们爱的炙热吧。你看我们也是，虽然表面讨论的是死亡，实则在说爱，骷髅伴随玫瑰。我们恐惧死亡是因为被死亡剥夺了被爱和爱的权利，爱得不够就会留有遗憾。

生活里不确定的事太多了，而我们却必死无疑。活着的时候有一个永恒的课题需要解决，就是我们将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死亡的宿命。愿我们在死神来临前爱上点什么，且不顾一切狠狠爱！

祝羽捷

至少还有个地方聊以慰藉

通信人 阿枣 中英文写作者、译者

生活里没有神圣感，
只有世俗，其实是很乏味的。

小兔：

见信佳！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跟你聊宗教，可能因为它难以回避却总是被我回避吧。

就以基督教举例好了。长久以来，我对基督教的理解面临两大障碍。其一，我过着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世俗生活；其二，我接受了以西方科学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在这两大框架下，想象一种难以证明也难以证伪的抽象存在是困难的，所以我一度认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最近一两年，我能感到这个想法在渐渐松动。起因是两个比较动人的经历。

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开始找工作。随着失败的累积，一个不可避免的心理变化，是你渐渐将个人价值和面试成败挂钩，于是自我认知开始崩溃。忘了是第几次面试之后，我拖着脚在冬天的街上走，冷不丁抬头，望见对面教堂门前伫立的耶稣雕像。他低垂着头，双手交叉，捧着一本经书，身后头顶的墙上刻着：Come to me, all you that labor and are burdened, I will give you rest。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句话带给我的释放感和解脱感，我至今记得。并不是我真的疲惫到需要寻找休憩，而是知道自己的疲惫获得了深深的理解，因此短暂的沉重也不再那么难熬。这算是我重新思考宗教之意义的一个契机。

今年早些时候，我读了约翰·拉斯金对乔托在竞技场小教堂的湿壁画系列的评论集。竞技场小教堂位于佛罗伦萨，建于1303年，用于纪念圣母马利亚。作为意大利首屈一指的画师，乔托受雇装饰小教堂内堂，画了一组讲述圣母及耶稣生平的湿壁画，从圣母的诞生讲到耶稣受难后复活升天。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乔托笔下的《圣经》故事充满了细节：抱着鸽子的孩子，婚礼上的酒坛，载着圣母一家夜逃的毛驴，耶稣受洗时清澈的约旦河。乔托是一流画家，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兴趣，用活生生的人的姿

态代替了传统姿态，用活生生的人的面貌代替了传统形象，用日常生活的事件代替了传统的场景”。而拉斯金是一流批评家，他的目光一刻不曾从乔托的作品上移开，他会比对《圣经》及不同版本的伪经，考证乔托为何选择将耶稣诞生的床安放在石板上，而不是伪经中放满香火蜡烛的洞穴里。他二人对自然主义的热爱，得以将我从版本纷繁的经文中解放出来，邀请我想象它的源头，那些真实的人和他們生活过的世界。

尽管如此，我真的会信教吗？我承认我对宗教怀有戒备。《圣经》中间或流露的权威口吻让我不适，女性在其中的命运让我心惊。除此之外，我害怕被视作弱者。无论在寺庙还是教堂，信教者以老人和受苦难的人居多。就连我自己，不也是在意志松动时，被耶稣的召唤所打动的吗？作为被禁锢在理性中的现代人，我不愿被人视作相信鬼神的“异类”，不愿暴露自己的脆弱。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不相信宿命的人，我不确定自己能放手，将自己的一部分人生，交给我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

然而，近来我越来越确定，人是不可能完全掌握人生的。一直紧绷绷地活着，或许迟早会出问题。就像写作一样，有时我们可能得学会放手，才能在失控中抵达真相和自由。

祝好。

阿枣

2020年8月17日

远方的阿枣：

感谢来信。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很美，很有诗意，对人也很有宽容，像温柔的手臂伸过来企图拥抱你。人们总把最诗意的想象力和艺术献给宗教，特别是15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欧洲艺术都是用来歌颂神，画的、雕的、唱的都是神话和《圣经》里的故事，个人是渺小的，不值得被讲述，只有神才让人变得有意义。

我小时候跟着外婆去庙里，庙在山上，所以用“上山”替代，有人问：“上哪儿啊？”你说“上山”，大家就都明白了。她每次上山前马不停蹄地忙活，跟要嫁女儿似的，又是拿纸包苹果，又是买花、买香，又是数硬币，这些都会被摆在佛像面前。

我问她自己应该带点什么给佛祖？外婆一乐：“把你喜欢的带去。”我兜里揣着“汽车人”，一种廉价的很小型的变形金刚玩具，加上一本小人书，我

把它摆在了释迦牟尼像前，我不敢和他对视，所有的佛像对我来说都像班主任一样威严。但我相信佛能感受到我没撒谎，我把最喜欢的东西供奉给他。长大后，我开始理解外婆的意思，人要把喜欢的东西献给佛，不分贵贱，不是竞赛，不看谁捐得多，你喜欢什么就带什么，因为佛是没有分别心的，这是后话。拜完佛，我觉得自己思路清晰，下山格外有脚力，外婆说这是佛祖显灵。不料，我又摔了一跤，膝盖都磨破了，刚刚才给佛祖磕过头，那我肯定要胡搅蛮缠了，让外婆给个公道，她又说，这是佛祖在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好吧，佛祖无处不在且怎么做都对，动辄给你个启示，我当即明白了这个道理。

西方神学学者管我们说的“显灵”叫“神显”（hieophany），神显的可以是自然之物，太阳、月亮、一颗流星、一块石头、一棵树木、一条河流，甚至是宇宙，都可以成为神显的载体，还有基督教那样的道成肉身，而宗教的历史就是由无数神显的实体所组成的。耶稣扛着十字架走向死亡时，圣女维罗尼卡勇敢地冲向他面前，用自己的面纱为他擦拭脸上的血，耶稣的像就神显在了圣女的面纱上。英国国家画廊里就有这幅油画，简单地描绘了圣女手持含有耶稣圣像的面纱，我的导师指着这幅画说，这就是英文单词“icon”的来源。所以说，我们对某个符号的膜拜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神显，一种超常态的东西，让人又恐惧又尊奉。

按照奥托的理解，神圣观念的来源归结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被造感”，那是一种源于非理性情感的对“完全的他者”的敬畏。我们这些不可知论者最灵活，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面对那些“神显”的时刻，能用心理学、自然科学、社会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解释的，就把它们去“神圣化”，不再把它们当作超自然的存在，解释不了的就坚信不可知论。

我爸就是典型的红旗下长大、绝对唯物论的簇拥者，自己坚决破“四旧”，看到别人搞“四旧”还要在旁边说“不要装神弄鬼，不要搞封建迷信”。我妈对他的要求就一点，你不信可以，但不要反对别人。有一年，我奶奶突然“中邪”，胡言乱语中完全变了一个人，嘴上振振有词，说自己钱不够花，说自己没有人惦记。我爸赶过去问她是谁，奶奶说自己是我伯父，伯父前几年去世，我爸从来没有烧过纸钱。反正奶奶就是“精神分裂”了（按照我爸的说法），怎么治都不好，大家请来神婆，放一只碗，碗里倒上水，插入三根筷子，筷子直愣愣立在碗里，看上去很不符合自然规律。神婆问奶奶一句，奶奶答一句，看着像一个正常人，神婆大怒，“赶紧走吧”，话音未落，挥掌把筷子拨倒，又嘱咐大家烧些纸钱，烧钱的时候要念叨已故亲人的名字。经过这么一番人间闹剧，奶奶还真恢复了平静。见此情此景，我妈问我爸，你怎么解释？我爸不语。我妈又说，这回信不信？我爸不语。

信与不信，一念之间。伊利亚德认为，即使那些声称不信教的人，宗教和

神话也隐蔽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因为对于人类而言，宗教意识是内生性的，“神圣”是意识结构中的一种元素，而不是意识史中的一个阶段。科学就是用于除魅，在去神圣化的现代社会，人类并未真正告别过去的神圣历史，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宗教中寻找意义，不然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虚无感呢。

与神圣对立的是世俗，神圣少了，世俗自然就多了。我记得有年看了一部并不让人满意的国产电影，全片就一句话打动了我，“你们中国人就是什么都不信”。这句话对也不对，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宗教信仰缺失的年代，但也有一些自己笃信的对象，比如历史的发展规律，比如经济发展，但都跟宗教无关。很多情况下，人如果不信点什么神圣的东西，就很容易成为物质的俘虏，崇拜金钱和权力，服从自己的欲望，却很容易撞上空虚。我想象五百年前的艺术家们，即便是收了金山银山，也会像为宗教献礼那样绘制壮丽的湿壁画，盖出与天连接的大教堂——金钱要向信仰举手投降，只有信仰值得他们呕心沥血，以命相抵。人类多么可爱，在短暂的一生里，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信仰，敬畏超出我们知识边界的未知世界，在虚妄中建立了自以为是的意义。

生活里没有神圣感，只有世俗，其实是很乏味的。有回傍晚我在西敏寺参观“诗人之角”，赶上弥撒即将开始，唱诗班男孩们身穿白色长袍进入大厅，离场不够礼貌就留下，全程圣洁而肃穆，观众要不断站起，四个方向转动配合唱诗班演唱福音。歌词简洁诗意，旋律悠扬，歌唱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性里的爱与罪恶。对于我一个非教徒来说，是思考，也是一次很好的心灵的休憩。

我发现自己会在美术馆使用一些宗教用语，“这幅作品我看出了宗教感”“这位艺术家很有神性”，这些都是高到触摸到神殿的赞美。阿布拉莫维奇说：“我们越是不再信仰某物，来美术馆寻找某种艺术灵感的人就会越多。”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常常在想，能不能把艺术当成信仰，能不能把文学当作信仰，至少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失望的时候，还有个地方可以聊以慰藉，信仰一个事物，用它唤起心灵深处的情感，通过它感知自己在世界中的本分和命运。对一样东西既敬畏又向往是多么珍贵的感情，青睐神圣才是人的本性。

如今摄人心魄的事物越来越少了，愿我们都能在世俗中找到自己的神圣体验。

祝羽捷

何为理想生活

苗炜 尤勇 思远 顾湘

如果我们不能出去冒险，
就看能不能在心里放下一个人，
放下一支球队，放下一幅画，
能不能放下这花花世界。

但愿我们还能再次爱上花花世界

通信人 苗炜 作家

有些事永远地改变了，心中曾经生起的那种亲近之感，重又变得遥远而疏离。我们对异域的生活与艺术的热情，变得空落落的，因为有更多的事，更大的事，提醒我们，那是在异域，那是别人的东西。

小兔你好：

刚看完曼联的比赛。这个赛季结束了，曼联获得了第三，拿到了欧冠席位。英超在瘟疫中复赛，我偶尔还看转播。球场空荡荡的，转播画面中有球迷呐喊的背景声，但没有观众的球场看起来还是觉得氛围不对，像是一场练习赛。球迷去现场看球，都是很情绪化的、带着点儿攻击性，那是度过周六下午的一种方式，或者阳光明媚，或者阴雨绵绵，大家聚在一起，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仇视、粗粝、天不遂人愿、不公，还有狂喜。按理说，这样的体验跟电视前的观众没啥关系，可我看着空荡荡的球场，觉得现场观众是替代我们这些电视观众去看球的，肩负“代入”的使命，没有现场观众，我们远隔万里看起来也觉得无聊。

不过，你也不看球，我说这些，你未必明白。

十一年前，瑞士一款手表赞助曼联足球俱乐部，我受邀去写篇软文。住到了曼彻斯特劳瑞酒店，曼联主场作战，队员前一天集结，都住在这家酒店。晚上时差睡不好觉，床头放着一本画册，就拿出来翻，L.S. Lowry，这个画家从来没听说过啊，看了两眼就喜欢上了。他画的是英国北方的工厂和工人，烟筒、厂房、黑压压的人群、滑冰场、鱼市。他画的就是曼彻斯特周边。他长期工作在索尔福德，是家物业公司的职员，走街串巷收房租，业余时间画画。后来有一次去伦敦，买了一本劳瑞画册，总希望有机会能看到他的画展，或者有机会再去曼彻斯特，去劳瑞艺术中心看看。

劳瑞画的都是工厂场景，他年轻时喜欢去索尔福德郊外画风景，29岁的某一天，他没赶上火车，从车站出来，看见工厂的大烟筒，忽然感觉眼前的东西真美。从此之后就拼命画工业区的风景，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其中对工厂和煤矿的描述，跟劳瑞在画中呈现的调子很相似。他画工业区中的人群，密密麻麻，每一个都跟“火柴人”似的，他跟艺术评论家解释自己的画：Sir，你看他们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喝多了，走路都不稳了，这两个人刚吵完架，他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劳瑞是一个很善谈的人，他永远称呼别人sir，评论家说，画上的那些火柴人，都在跟自

己的命运搏斗，而劳瑞就是这场伟大战事的观察员。

我年轻时不太能欣赏绘画，后来写小说，却越来越喜欢看画。

我看了你的书《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还记得你有一张照片，是在维也纳美术馆吧？跟老勃鲁盖尔的一张画合影。想起来，我也去过维也纳，却没能去看勃鲁盖尔的画。更为可惜的是，我还没去过挪威，没去过蒙克博物馆，也没去过荷兰，去看伦勃朗。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有的是机会，这次没看成还有下一次，总有机会去看那些大师的画作，总有机会认识更多的画家，年纪渐长，就觉得这样的机会好像变得渺茫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也许那些欧洲的晨昏，建筑 and 无尽的展览，你并不觉得遥远，过些日子，过一年，最多过两年，你回去一趟就能看到。可我隐隐觉得，经过这大半年的磨难，有些事永远地改变了，心中曾经生起的那种亲近之感，重又变得遥远而疏离。我们对异域的生活与艺术的热情，变得空落落的，因为有更多的事，更大的事，提醒我们，那是在异域，那是别人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也不知道你是否听明白了。我就是怕，往后的几年，我就满足于在电视上看看曼彻斯特和伦敦，看看英超比赛，重又变得愚钝。

谢谢你听我唠叨。

苗炜

2020年7月28日

苗师傅：

你实在是低估了我对英超的了解，我对足球确实没什么兴趣，但我对球队从曼联、曼城、阿森纳到利物浦如数家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爱情是最好的老师，爱情教会了我认识球队。我虽然不懂足球，可我历任男朋友都是球迷啊，天赐良机，我暗自庆幸他们支持的球队都不一样，让我每回学的都是新知识，每段恋爱都宛如初生。高人指路，让我得到了充分而不重复的学习，可惜学到了利物浦队就戛然而止了。不能学到所有球队不遗憾，我望洋兴叹的是没有机会学个篮球、网球、垒球啥的。

绿茵场上，红蓝相间，肌肉线条清晰的男人们像一群灵动的鱼，围聚着诱饵，并不真的吞食，而是忽近忽远、热血沸腾地嬉戏，观众的反应就是它们溅起的水花，呼喊如波涛。我不知道为什么足球对于男人来说这么重要，有球要熬夜看球，没球还要去参观空荡荡的球场。有回我们吵架，好

几天不说话，我在英国拿手机拍了球场的照片，像一艘搁浅的大船。照片发过去，两个人冰释前嫌，进入到买哪件球衣的热烈商讨中，就像那些中年夫妻给小孩选学校一样激动。

都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试着从球队的战术风格和精神气质上理解他们，防守型还是进攻型，注重技术还是看重身体对抗，喜欢创新还是照搬套路……从中略知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性，别说，这比星座、血型、生辰八字精准多了，建议准备相亲的姑娘们都提前研究一下。

我猜男人喜欢看球，一方面原因就好比女人喜欢看选秀或女团，在众多成员中都能找到一个自我的映射，你對自己满意就选一个性相近的，你对自己不满意就选一个习相远的，他（她）替你完成一项任务，你们可以一起，融为一体，共赴未来。另一方面，你选择了球队就像选择了某个政党或军队，能轻易获得集体荣誉感，决战沙场让人血脉偾张，让男人们的狩猎好斗的基因有处安放，也正因好斗，人类才得以繁衍，生生不息。

不好斗的人都去搞艺术吗？不见得，艺术家们也好斗。米开朗基罗给西斯廷教堂画天顶，把所有的助理、工作人员统统赶出去，生怕走漏风声，他捂住自己绘画的秘密，一个人只用了四年就完工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元素的狂热喜爱，他们这批艺术家在作品里描绘现代战场、进步的科技、人类征服自然，他们甚至认为战争是艺术的最终极形式。

还记得你多年前说让我们去花花世界，我的前面十年还真是这样，一有机会就猛扎进花花世界，但我想了一下，我这么热衷出去转悠，不只是因为对世界好奇，也是对自己好奇，每天在家里那喀索斯式地看自己根本也只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只有把自己放在更大的坐标系里去寻找才有意义，要到外面去砥砺。真的到了外面，除了参观球场，我最大的爱好是逛美术馆，人类那么璀璨的文明都不看实在太遗憾了，我承认自己贪婪，希望看得越多越好。

看艺术能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呢？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流行一个观点：自画像的本质是“每位画家画的都是自己”。自画像必然跟自我有关，艺术家们可以以此自我确认，也可以掺水造假，为自己包装人设，比如丢勒就曾把自己塑造成基督的样子，暗示自己像神一样具有创造力，不难看出他的雄心壮志。岂止自画像，艺术家在画任何东西时都会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東西融入进去，无论是相貌、神态、姿态、性格，还是整体造型，他们创造的角色都少不了自己的影子。艺术创作要求艺术家们先把自个儿搞明白，达·芬奇认为画家应该弄清楚自己的短处，应该先丈量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的比例符不符合理想的标

准，再画人体和造型。

艺术家可以通过作品了解自我，我们则在作品中解读艺术家，人各有异，解读的内容和体会有天壤之别，所以说作品都可以扮演镜子的角色，观者品出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况味。我必须承认学习艺术对我的帮助的确很大，不是说它提高了我的审美和品位，而是让我把过去不感兴趣的学科打通了，比如人文、科学、经济、政治……最近在绘画中我开始了解了人类的经济史，莫高窟的壁画上记载着丝绸之路，从宫廷绘画和劳动人民的肖像里看到全球奴隶贸易的关系，大航海时代的版图扩张和海上争霸……从一件作品中看出一个时代，不同的关系，看透为止，我似乎也不那么追求数量了。

苗师傅，当年路过三联书店，你指着书架上的《在路上》说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要一直在路上，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如今我们与世界之间备受阻断，远离了花花世界。我和你一样，没有以前爱出门了，出去久了会心绪不宁，也许我们都不太需要去寻找陌生体验了，眼前的生活就足够让人手忙脚乱了。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在思索如何经营出一套整饬有序的生活，仍能在眼前的生活里摸到令自己激动不已的东西。

我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过，有些地方五百年几乎没有变化，有些地方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遗憾永远有很多，让我更加遗憾的是，即便我们以为看过的世界，能够与其心灵相通，而在今天才知道自己多么天真，文明的外壳之下，偏见和隔阂互为表里，冷漠和敌对有增无减，人们很难真的做到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很多人说，全球化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各个国家地区变得越来越保守，在这一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爱抽象的知识世界并不难，难的是爱具体的生活；爱抽象的人类并不难，难的是真正理解一个具体的人。

但愿我们经历风雨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爱上花花世界，花花世界也接纳我们。

祝羽捷

日积跬步，不舍昼夜

通信人 尤勇 青年画家

我的理想是恢复朴素生活，热爱自然和生活，热爱人类的文化，修养己心，不为物累，并且，尽我所能，终其一生，日积跬步，不舍昼夜。

尤勇：

你好哇！最近看到你尝试为展览做直播，我觉得既意外又惊喜，原来直播不是只有卖货，艺术展览也可以以这种形式被看到，这算不算一种进步，算不算一种全新的艺术现象？新的媒介帮我们敞开了回音室的大门，可以听见不同群体的声音。

偶然间我读到一本书叫《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里面记录了20世纪最后十年里自由艺术家们在北京的生活，他们比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人更勇敢决绝，丢掉了政府分配的公职，失去了经济保障，不少人甚至脱离了严格的户籍管制，成为北漂的“盲流”，但是他们创作出大量前卫性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家们身上带着反抗和破坏性，不然不会成为“盲流”，比如星星美展出来的艺术家，喊着口号——“毕加索是我们的旗帜，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榜样。”珂勒惠支的艺术主张人道主义、批判社会，可见他们推翻旧规则的决心。那十年间，不光是画家，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和摇滚青年、诗人、编剧也和他们一起创作，圆明园画家村像一个大杂院，容纳了每个有梦想的人。不过画展常常没有几个观众，画也卖不出去，艺术家们生活得穷困潦倒，可见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困惑，每十年大家要面对不同的大境遇，在艰难中努力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文景观。

我上海的家旁边也有个画家村，一栋栋并不怎么好看的乡间别墅，里面也住着像杨牧石这样的年轻艺术家，但更多的已经改弦更张，艺术家越来越少了。偶尔我们去小聚，看看作品，聊聊天，可终究没有书中所描绘的自由之地般的盛景——有一群愿意吃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三十年后的今天，国内的展览多了起来，除了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出席开幕活动，其他的我都尽量避免开展那天再去观看。每个展览的开幕都会刷屏朋友圈，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艺术圈”人士，因为自己的头像不会出现在这些笑容璀璨的合影中。我也不能算“策展人”，尽管很多朋友在介绍我的时候，特意为我加冕了这个美妙的头衔，实事求是说我虽在策展但备受挫

折，把方案拿给两位美术馆的馆长看，一位问我有没有经济回报（赞助、交易），一位问我能带来多少社会效益。他们问得没错，这才是游戏可以玩下去的规则，不能让人家既赔本又不赚吆喝，而我像个交不出作业的差生，站在一边，面红耳赤。

越是走入艺术的腹地，就越能体会艺术的魅力，以及行业里的艰难和复杂，过去我们不会听到艺术人士讨论“流量”和“转化”，最多讨论如何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好的美术馆往往是本地的地标，是个文化场所，又跟艺术有关，自然会对人产生魅惑，让人望而止步，美术馆又多跟城市的面子工程有关，从忽略到重视的转变仿佛只用了一夜时间，建造者对外观的投入如今也常常让西方人望尘莫及。太气派的美术馆我也去过几个，展品孤零零的，也许是因为冷气开得太足了，搞得像停尸间一样瘆人。另一个极端则是像集市一样热闹非凡，拍照容易出效果的展品前游人如织。

我有点怀念某个夜晚，大约是上班族下班奔赴晚餐的时间，美术馆里并没有落幕，只是经历一天的营业后空气变得浑浊，我的眼睛开始有一些干涩，小腿也酸胀。正要离去，发现钢琴被搬进了展厅，乐队入场，场内的人们似乎得到暗示，立刻自动消音。乐队站在巴洛克风格画作前，弹奏勃兰登堡协奏曲，音符就在天顶、地板、油画、雕像间撞击、弹跳，每一次撞击都让音乐更强烈，那一刻你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值得烦恼。音乐宛若游龙，缠绕你的脚踝，陪伴你走过一个又一个展厅，仿佛踩在云朵之上。我的感官像被插上了放大器，浮想联翩，甚至觉得这些大艺术家们一定是在音乐的节拍中挥舞手臂的，画笔在空中跳着华尔兹，就像海明威饿着肚子逛卢森堡博物馆时，认定塞尚也是在饥饿的状态下画静物一样。

还有某个清冷的早晨，鲁本斯、伦勃朗、普桑画前的木地板上，已被人铺上一张张紫色的瑜伽垫，阳光从透明的天顶照入，让垫子有了温热，光脚踩上去柔软舒服。穿着白色运动服的教练坐在我们的面前，她闭上眼睛，缓缓地说，调整呼吸，试着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此刻，关注当下。彼时我意识到瑜伽的要领竟和美术馆不谋而合——此时此地，专注当下。

我们之所以走进美术馆看展，除了有看“原作”的诉求外，就是为了体验奢侈的“即时性”和“现场感”。空间和陈列提供了我们艺术的“看”，是脱离了日常的“凝视”。显然，一幅作品有框和没框差别很大，建筑、空间、布光一系列手段一起为艺术增加了神明般的圣洁。特别到了当代，艺术是对平凡事物的美学改造，一团废纸、破旧麻袋、油桶、木门……这些日常之物只有放在美术馆才会被当作艺术来凝视，与观者建立心理距离后，这些“反规约性”的物品才会被我们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审视，不是此物和彼物的区别，而是态度和态度的区别。

美术馆是公共性的，可又是私人性的，尽管你知道身边会有别的观众，但

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你希望自己进入一种与某件作品的独处时刻，靠想象建立一个冥想的域。

可有时你不得不让位给学校、旅行团和来打卡的网红们。我发现越来越看不到有问题意识的展览，大部分展览不痛不痒，又打着跨界、沉浸式的名义吸引流量。

观众一直是被动的，但我相信应该有更好的形式让观众参与进来，而并非拍照打卡，策展也需要想象力，比如让观众穿过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裸体组成的美术馆大门，比如迈过砖头垒出的墙，比如在美术馆排成一条长队，比如登上特拉法加广场的第四基柱做活体雕塑……

我不认为美术馆应该高高在上，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看人类文明的精华，应该在这里伸伸懒腰。它是包容的，正因包容所以含有矛盾，公开和私人之间的矛盾，市场和庙宇之间的矛盾，有教育和娱乐之间的矛盾，有恭谨和佻巧之间的矛盾，有孤立和沟通之间的矛盾……

过去我总以为我们会不断出发，愿意靠近艺术、文学、哲学，也去更远的地方，走进那里的美术馆。没想到在今天，所有一切变成难以触及的远。我拿着手机，企图在网上云游美术馆，刷出一位网友分享的大卫的雕像，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发在网上，不该给小孩看”，有人说“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一致认为，裸体是不文明的”。骂声波涛汹涌，如果遵循民意，恐怕大卫的雕像应被乱石砸碎，苏格拉底就是被人民陪审员判了死刑的。

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越来越多断章取义的结论或标签出现在对文学、艺术的解读上，诸如“渣男”“三观不正”“女拳警告”“公知”“小三”“手撕”……艺术不再被当作“纯然之物”来对待，不再成为审美的对象，而是认知经验的对象，标准却变得简单粗暴，只在须臾评判出好与坏，道德高尚还是有伤风化，喜欢还是厌恶。而作品本身承载的复杂信息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解读，即便是快乐也是如喝可乐一般高效，厌烦则表现得像踩了狗屎一样，人们不再努力体会康德所说的那种愉悦感。

丹纳曾说存在一种“精神的气候”，和自然气候一样起着作用，比起不能走进远方的美术馆，我感受到一种更为压抑的精神气候，每一颗观念的种子都会受气候影响，发育营养不良，长得奇丑无比。

追溯本源，人类这么努力进化，就是为了传递基因，难以违背天性，我们接近艺术是为了传递模因（meme），互联网却让意见变得扁平化。我最近常常灰心丧气，不知道这样传递下的模因是什么？家里书架上珍藏着查建英主编的《80年代访谈录》，其中有对陈丹青老师的访谈，陈老师

说：“中国人的自我调节、自我蜕变的能力真厉害，特别会对人对己解释调节的理由。”我后背发凉，我们都在自觉地阉割自我。前两年我还乐观地畅想我们马上要文艺复兴了呢，一阵急速的眩晕，历史推背，标准和习惯全变了，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你说如果时代的气候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该收起叹息，一起快乐起来？

祝羽捷

Dear小兔：

庚子年转眼到了秋天，昼短夜长，换季还望做好防护，提高免疫力。你提到许多艺术现状的问题，都是我们共同关切的。

在信末，你提到快乐。快乐是分内又额外的奖励，但快乐也分情况。愉悦、高兴、喜乐……有很多种。转瞬即逝的乐一抓一大把，短视频刷两个笑话就能获得，但那都是属于蜥蜴脑的快乐，来去匆匆，到不了心里去。永居心间的美好，难以名状，往往也难称其为“快乐”，这种感觉世间难觅。恐怕必须穿透罪恶、死亡与苦难才能窥其真谛，那时，也未必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平和。

我觉得顶好的艺术，就是幻化出这个境界，将人的心灵、精神提升，直到让身体都产生非同寻常的感知力，有人口舌生津，有人表情呆滞……哪怕是残片中仅存的线条，都凝结了穿透时空的震慑力。有一回我在俄罗斯看到一个拜占庭风格的残破的脸，基督眼睛的一根线条瞬间把我抓住，说得玄乎点，那个东西很奇怪，不需要我费劲去记住它，它自然就住进了我心里。我那会儿也不知道是谁画的，后来偶然机会碰巧知道了他出自俄罗斯14世纪最重要的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Andrei Rublev）之手，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Christ the Redeemer（基督救世主）。

另外一次的美术馆经验跟你的类似，大概是2014年，我有一段时间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临摹委拉斯贵兹的《小王子普洛斯贝洛》和维米尔最大的作品《画家的画室》，其间的一天晚上，有一个博物馆之夜，是欧洲各大博物馆轮值的，那年正好轮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每个厅都选出了画作，行为表演者在作品前半准备半即兴地作他自己的表演，你知道我不太热衷于这种形式的，但像你提到的“即时性”和“现场感”，那次的确看得我目瞪口呆。记忆深刻的有两个：有一个裸女被包住了头，躺在台子上，可能呼应了一个古希腊的典故，只见她手脚起舞，表情稍微有些狰狞；另一个是耶稣受辱的肖像前，一个裸身的男子用肢体的律动呼应这个主题。那一夜的博物馆让我体会很深，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提着小凳子来来回回地看

这些表演，也看着画，我突然会有些羡慕他们的生活。虽然我不是给这些表演多大的credit，但这种文化生活，不管如何，至少它在那里，唾手可得。我多希望国内也可以，其实我们有条件的，但是没做起来。

最基础的东西我们没有搭建起来，一个可以不断被研究和被当下文化引用的永久陈列的藏品谱系。我想，文化做到实处，莫过于此事。就绘画而言，我们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自己的绘画史谱系，哪怕是近百年的油画史，都不能直观地接触，这是一种损失，没有巨人的肩膀可站，我们就会四散。

让我们稍微费劲回顾一下博物馆的历史，这里我参考了沈语冰在罗杰弗莱译著中的说法：博物馆（museum）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ouseion，是指供奉九位艺术与科学女神缪斯（muse）的神庙。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开始了他最早的生物学研究，其中包括了标本采集和建立分类学。他的方法影响了吕克昂学园，吕克昂学园的知识及其mouseion进而影响了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67-283年），在新亚历山大城的建设规划中吸纳和大大扩展了这些知识制度。文艺复兴运动使古典学问得以恢复，“博物馆”被改造为一条使人博闻多识的捷径——通过保存各类物品和解释它们的书籍。通过把这些收藏称为“博物馆”，创办者们利用古典的、古代最伟大的机构的权威和声望来为他们肤浅而混乱的收藏奠定学术性的语境。在16-18世纪，珍贵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作为装饰陈设而被收集和展示。从17世纪开始，许多皇室、贵族和教堂的藏品对“公众”开放参观；当然，这时的“公众”通常是由限定含义的，比如特权阶层、艺术家、鉴赏家和大学生。第一间使私人藏品向公众永久开放的博物馆是建立于1683年的牛津大学阿什莫利恩博物馆。1753年成立的伦敦大英博物馆也是面向公众的收藏机构。18世纪，其他地方也有大量藏品向一般公众开放，包括大英博物馆也是面向公众的收藏机构。在18世纪，其他地方也有大量藏品向一般公众开放，包括卡彼托尔山博物馆的梵蒂冈藏品（1734年）、美狄奇家族在乌菲齐画廊的藏品（1743年）和彼奥-克莱门提诺博物馆（1772-1773年），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维也纳贝尔维德累宫的藏品（1781年）。与向公众开放的民主权利同样重要的是启蒙主义对教育功能的强调，这在对展品进行整理、贴上标签以及对绘画、雕塑和从各种物品中区分出豪华珍品的分类中体现了出来。为了创立贝尔维德累宫画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前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授权把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收藏在城堡里的最珍贵和最有吸引力的艺术品集中起来。由于按照年代顺序、国别差异和不同艺术风格等原则对收藏品进行过整理，使皇帝的顾问、瑞士雕刻家和印刷师克里斯提安·冯·梅切尔（Christian von Mechel）在为贝尔维德累宫陈列布局设计一种“艺术的可见历史”的展览时，运用了按照不同国家流派的艺术发展进行编年叙述的方法。梅切尔对于藏品的历史整理方法，使艺术史具体化，并且具有教育

功能。这在1755年杜赛尔多夫画廊的重新布置和他的朋友、德国艺术史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的富于创造性的学问中亦可见一斑。冯·梅切尔的“有系统地”展示的方法与18世纪处理学问的倾向相一致，这明显地体现在类似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容·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百科全书》（巴黎，1751-1765年）等文献中。这种归序知识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和开放。卢浮宫博物馆的建立是将近五十年来在巴黎使公众更易于接近皇室艺术藏品的努力的结果。这个过程在1750年开始于卢森堡宫，当时在这里有一个兼收并蓄的展览，每周向公众开放两天，一直持续到1779年。1793年，博物馆成功开放，其意图是向国内的批评家和外国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和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产的能力。然而在博物馆内部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博物馆应该是真正易于接近的，不仅要考虑开放的时间，更要考虑在展览陈列上具有教育的功能。新的展览“兼收并蓄”，展示了国家艺术财富的辉煌与丰富。法国当局的集权化管理、教堂和皇室财产的国有化以及贵族财富的充公，也同样导致在拿破仑所占领的城市中成立博物馆：威尼斯的学院画廊（1807年）、米兰的伯瑞拉美术馆（1809年）、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的前身（1808年）和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1809年）。其他几家19世纪早期的博物馆是由于法国的占领和随后的归还艺术品而建立的，其中包括柏林的老博物馆（参见杰弗瑞·艾布特著、李行远译“museum”条，见The Dictionary of Art, Edited by Jane Turner, Vol. 22,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96）。

其实，我们国家也有成千上万的博物馆，只是文化的根系、管理方式很不同，对此我常常失落，但也常常盼望。在外部世界不可描述、充满未知变数时，如果心灵也有属于自己的“迷走神经”的话，此刻，它必然逼我们惶恐不安：要么顺时苟活，要么做点什么来改变。“葡萄”恐怕是吃不到了，就说它酸好了：求诸外不如求诸内——江山代有人才出。

宏观的多元文化可能是好的，但微观个人身上的多元是值得商榷的，人会因为喜好和选择变多而失去行动的能力，不同的价值和精神互相比量，像一窝狼崽里总得拼出个头来（这是个人价值尺度形成的必然）。这样一来，靠积累时间经验而得的水平变成了吞噬时间而不得经验造就的东西，我并不要说实践经验有多么伟大，但失去控制力的手艺已经开始烂大街了，这是现状，还不只是在绘画这个行当里。我想今天的问题出现在我们太尊重多元文化（这没有问题，可以处理宏观尺度），但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一阵迷雾，让我们失去价值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多元的风浪中摇曳无所依。徐悲鸿的“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即个体强烈的一元化，乃是社会文化多元的前提。也有一种语势稍弱的说法叫：采百家之花，酿一家之蜜。可往往花采多了，蜜就难成独特滋味。

我的体会是，没有专注，一切时间都毫无价值，今天的文艺创作，需要一颗安静下来的心。互联网的信息和社交的便利干扰打散人的注意力，从而削减了一个人在其领域深耕的能力，打扰无处不在，用息交绝游来应对这个现象恐怕都不为过。

正如你提到的，我们在许多方面也许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比如他们对理想的热情，哪怕是潦倒穷困也在所不惜。今天的现实似乎与此相反，日子过好了要紧，理想靠边站。这让人感到无力。艺术圈成了名利场，名利比理想更可量化，艺术这么主观不可量化的东西，逐渐被市场和话语权建立的格局替代了。当人们互相给面子、照顾饭碗的时候，艺术其实是在一边哭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恭维从本质上说确实是一种更为微妙的侮辱方式。我会羡慕傻子、疯子，他们似乎更属于真理，而我们的世故、聪明，常常奴于谎言。

艺术的历史把我们放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代，古代的经验在21世纪似乎难以提供稳定的预期，而古代的标准还在今天模模糊糊地奏效。我时常困惑，到底要如何钻研才能满足他人的眼光？于我自己还好，只要动笔，便能摆脱这个梦魇。而艺术批评对于我们的生态而言，严重的匮乏。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说，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可惜，今天少见。艺术接受被艺术传播特别是市场传播效应取代，这太方便资本而不利于人们培养自己独到的审美。关于艺术的方方面面，太热闹了，学问就容易做不深；不热闹吧，又鲜少有人去做。你在信的开头提到的直播，我很惭愧，其实是因为我们美术馆做了很好的展览，来看的人少，地理偏远、宣传无门，而直播成了一种对策。我很难想象一个观看直播的朋友会因为刷到直播而来看展，现代人的时间似乎不是这么支配的。相比于直播、卖货、下单的顺畅，通过直播让人看展、学习，是非常拧巴的流程。互联网加强了人们的联结，主要是强化了交易关系。但艺术和学问不是快餐，直播可以传播知识和观点，但不是接受艺术感性并内化的过程，艺术是耗年头、几经周折的心灵成长过程，艺术对于大众的价值，我是有点灰心的，你可能比我乐观一些。

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理想，我认为艺术过于政治化，面对意识形态有所动作，是我个人不主张的，美术学院逐渐过渡成艺术学院，艺术学院则会被观念学院替代，观念则会进军权力中心，这看似顺接的两步是危险的。我自己的主张还是回到画家的本分，去与自然造化建立美好的关系。美术创作的核心应该是美感而不是思辨与叙事的快感。当然，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不在修辞中这么二分。美感虽然最肤浅，但它最终指向人格与修养，语言不可及之处，形色及其关系仍然在说话。

总之，前途虽然堪忧，但爱可以战胜一切困苦。作为人，受制于自然与人文种种，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主动和发挥的空间，多为苟活。但正因为作

为人，我们又不甘如此，能动、反动，总要将理想化为现实。我的理想是恢复朴素生活，热爱自然和生活，热爱人类的文化，修养己心，不为物累，并且，尽我所能，终其一生，日积跬步，不舍昼夜。

顺颂秋安。

尤勇

2020年9月23日

我是个年轻人，我只想开书店

通信人 思远 媒体人

因为有一代代这样的人坚持打捞与积累，
那些被大时代海浪冲刷后残留的碎片，才得以重现。

思远：

你好哇！看到你的书店在上海开起来了，真替你开心。那天我正在家里读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他记录了整整一年自己开书店的生活，包括喝大酒第二天只能歇业，他也会用一句话概括，365天的日记放一起搞得跟行为艺术一样：养一只猫，每天赚多少钱，来几个客人，找到几本书，有的没的碎碎念。读着读着，我就想到了你，在这个阅读越来越衰退的时代，你还勇敢从北京举家迁到上海，就为开一家二手书店，令人敬佩。

小时候我们都做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梦。从宇宙飞行员到公交车售票员，从啃鸡脚的吃货到专业吹泡泡的玩家，我们的梦想多么天真，多么无差别，没有被资本主义浸染，没有铜臭，不分贵贱，纯粹觉得有趣。但我从没有做过开书店的梦，因为小时候每次去连锁书店都看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板着脸不说，还很不耐烦，当你的手伸向鸳鸯派小说，他们面露难色，深表忧虑，怀着对“后浪”的关怀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参考书，不容置疑地递给你。

后来我走进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别有洞天，除了书以外，还有杂志、明信片、圆珠笔、跳跳糖、橡皮泥……老板往往是个神秘的家伙，不善言辞，但穿得意想不到，绝对不穿那些乏味的制服，不是牛仔裤拖在地上，就是的确良衬衫非常绚丽，一看就是很厉害的世外高人，举着一本书当令箭，威压众人，问他什么书他都成竹在胸，有时眼皮一抬，眼神指向一个角落，你就知道想要的一本书在哪里了。谁不喜欢称霸一方的高人呢，书店就是他的宇宙，他就是舰长，他就是大厨，他就是在世诸葛，请脑补我闪着星星眼的表情。也有一些阴暗的书店，你一走进去，就能闻到沉郁的霉味，书都是老款，砌满每个角落，老板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躲在书堆的后面，一副山海沉浮与老子无关的样子，很是宠辱不惊。

再后来，我看了《查令街84号》，哭得一塌糊涂。旧书将两个身在大洋两端的人系在了一起，一个书店的老板如此悉心、可靠，就像旧世界的最后一位守护者，为他远方的客人找到喜欢的书。在伦敦的书店老板弗兰克和

美国女作家海伦，他们未曾谋面，到死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只靠书信往来，就在寻书、找书的对手戏中，他们体会到了一种脱俗的情感，岁岁年年，惺惺相惜。海伦说：“若你们恰巧路过查令街十字路84号，能替我献上一吻吗？我亏欠了它太多太多。”每个到伦敦的人，每个走在查令街的人，都会忍不住去看一眼84号，可我站在十字路口，发现84号竟是一家麦当劳店，进去点个汉堡吃完走人。查令街上的书店还好没死光，但每年都会少几家，去年我去伦敦，街角那家卖艺术书的变成了画廊，另一家成了咖啡馆。

几年前，我想在伦敦记录一些旧书店，就拍摄了查令街，我对查令街有特殊的情感，因为它在唐人街对面，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每一个孤独寂寞的下午，每一个无所事事的白天，从唐人街的中餐馆出来，只有这里是最低廉的快乐，不买书也可以待上半天。周末，我看到老派的英国人穿着粗花呢西装，用古老的尼龙绳袋子装满旧书送到店里，再选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查令街上的书店妙趣在地下那一层，一般游客在上面逛逛就走了，地下那层有特别多旧书，还有黑胶唱片什么的，躲在里面特别有安全感，还不用担心因迟迟不买书而遭白眼。

我喜欢买旧书，不是因为这些书散发着岁月浸染的气息，没这么浪漫，主要是因为便宜，统统三磅，三磅一本，牛皮线装的比较贵，一般放在柜子里，不轻易给客人乱摸。去大型书店买一本书都是十几磅呢，画册要三十几磅，从这点上说，我们国家的书籍真是相当物美价廉了。后来我去了北英格兰的小镇，生活平静，看不到任何波澜，周日唯一的集体聚会就是大家走进镇中心的教堂，不是做礼拜，而是拍卖，卖的东西是一些“二战”时期的旧物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品，拍卖到最后，大家手上钱不多了，越卖越便宜，古书籍就出现了，起拍价很低，有些沉睡的白发爷爷终于苏醒过来，开始举手叫价，像这样的拍卖在英国小镇上此起彼伏，延续着英国殖民时代就开始使用的瓜分从各国掠夺来的物品的规则。

再说一件难忘的事，我去威尔士的海伊小镇拍纪录片，慕名而去，这个小镇是出了名的“书镇”，我去的时候镇上还有五十多家书店，有一家的老板告诉我，再过四天他就关门了，因为没有生意，大家都在亚马逊上买书。我不想美化，这才是真的现实，尽管这个小镇用书店作自己的旅游宣传卖点，可还是很难生存，这跟我在宣传文案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去了理查得·布斯的家，那是一幢乡间别墅，车在乡间小路上寻觅了很久才找到。我本想拍他的采访，但他的状况让我们出乎意料，有些偏瘫，讲话不清晰，需要用轮椅推出来。我坐在书房里等他，看到他年轻时风华正茂的照片，看到他意气风发站在自己书店门口的照片，看到他戴着毛茸茸的自制王冠，模仿英王加冕时戴的那种帽子，手里还托着象征世俗权力的宝球。他就是自封的“海伊国国王”，他配得上这个称号。理查得·布斯是镇上

第一个开书店的人，196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时，他没有像自己的同学一样去伦敦找工作，而是回到家乡收购了原有的老电影院、消防所、小教堂、废旧工厂等地和城堡遗迹，改造成一间间各有特色的二手书店，当地居民纷纷效仿，镇上书店越来越多，附近的居民也都开车来买书，后来发展出了海伊文化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过两次，英国的老戏骨和新生代演员都会在节日期间读信，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节目——“见信如面”。去年，理查德老爷子去世了，英国各个媒体都发了讣告。不知道海伊小镇上的书店还剩几家，但我会永远铭记他的故事，记住与他短暂会面的场景——尽管身体不适，他抑制不住的骄傲神情——“我是海伊的国王”。

开书店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云淡风轻，正如《书店日记》所记录的那么多琐碎，就像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写的《书店》那样，一个女人开书店却处处受阻挠和歧视，但还是有像你一样的年轻人奋不顾身去投入。总有人跟我说，聪明人应该去钱多的行业，什么互联网啊，房地产啊，金融啊，并建议我不要搞什么艺术，读什么文学，注定赚不到钱。这些说法虽然让人不适，但也无情地反映了现实世界。我就觉得开书店挺好，凭什么人活着就必须热爱世俗世界，凭什么年轻人只能去主流行业，我们就不能不屑吗，就不能颓废吗，就不能随心所欲吗？

我想开书店的人，内心必住着一位傲气的国王。

祝书店生意兴隆！

祝羽捷

2020年5月7日

羽捷：

上海相会，颇感久违。我们相识在书店，重逢在书店，此刻写回信，我亦在自己的书店。很多人世际遇，看似巧合之中恰也显露了内在的必然，我想书店或许就是我们共同的气场归属。

就像《书店日记》中那些人/书/猫的故事一样，我的生活日常，也在沿着类似的轨迹向前行走。于我而言，从北京搬家到上海，正是迈出的成为一名“书商”的第一步。同时也像是小说里被安排的角色似的，某天屋里来了几只猫，它们是花园里流浪的猫妈妈和新生的三只小崽，它们遵循着“胆怯地张望——好奇地探索——熟悉地占领”的节奏，自然而然地入驻进来，与我前后脚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这简直是上海给予我和书店最好的见面礼。我们熟悉的大部分书店浪漫趣事，都必须有猫。而现在，我也不例外了，这真是一种骄傲又幸福的缘分。

这样的开场故事，已足够值得记在笔下，成为往后被翻开的昨日书。而我开启的“书商”身份的职责，也正在于经手一本本这样的昨日书。你来信中写道，我们儿时做过的那些实际或不实际的梦，我们曾经踏入过的或明或暗的面貌各异的书店，我们读到或亲历的那些悲欣交集的故事，无不构成我们深深浅浅的人生印记。只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多故纸被散落，太多过往被掩埋，太多当下本该发生的多元情谊与情绪，却又被景观现实社会笼罩并寡淡地统治着。我们所流失的无论当下或过往的印记，都已然太多。

于是，我试图打捞一些过去的碎片，拼凑出一番旧时面貌，并融入我的日常生活。在今天企图经营一家旧书店，自然显得有些逆流过时；但这种于别人眼中的“逆时”，却也恰是我自己的“顺势”。我过往多年书店工作的积累，旧书旧物收藏的癖好，以及对于老派生活的践行等，这些因素拼凑在一起，便促使我向前迈步，这是一种更大程度的新旧交融。就像上海这座城市，前朝风华、历史旧貌融合着新兴洋派的气质与审美，它既有民国历史深厚的人文传统，也有广泛的世界性与现代性文化的渗透。

而上海这番亦旧亦新的面貌，也正是我自己理想中旧书店该有的气质。我希望自己的小店，既有对故纸旧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探索，也有对老物件旧时风尚的提炼。就好像我所喜爱收集的那些装帧设计精美的旧书，或者民国女郎的商品广告，抑或是带有精美铜手环的老皮箱，还有那一张张虽是平常人家却总有西装领带意气风发面貌的老照片，它们并不仅仅只是一些“老古董”，实际上它们身上所拥有的，无论是旧书籍或老广告的字体与色彩、文案内容，还是老皮箱的材质与造型、制作技艺，或者老照片里“人的精神气”，都具有浓厚的“现代性”潮流美学。而这种审美的理念与态度，也正是当下我们时代所稀缺的。当我们回望，重新审视，才会发现这些小小物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大时代浓厚思想与美学的光热余烬。

而这就正如你提到的理查德·布斯那遥远牛津时代的风华正茂一般，其背后隐去流逝的是一段关于电影院、消防所、小教堂、废旧工厂等地改造书店的往事。多少意气澎湃都如昨天的云，消散不再。我们感慨一个旧书商的人生历程，也伴随着旧书店本身的使命故事，有些长留，有些远去。就像我读《书店日记》，里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关于老一派“跑书人”的描写，令人感触颇深：互联网大潮下这批最精英的手艺行当人无可奈何也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因为他们吃饭的本事——毕生积累在脑海中的装帧、版本、内容、作者、价值等学识、信息、数据库——在互联网时代，只需上网一搜，人尽皆知（我过往的图书采购工作，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做这样性质的事）。

但也终究因为有一代代这样的人坚持打捞与积累，那些被大时代海浪冲刷后残留的碎片，才得以重现。无论是举世闻名的查令街往事，还是英国小

镇上延续的殖民时代瓜分宝藏的某个小小拍卖场景，或多或少终有些幸运的部分得以被记录成文，留在纸上。多少年后，再次循环到旧书存汰留弃的纸业历史链中去，任风吹散。

我小小的愿望与努力，便是伸手抓住飘在风中无数纸中的一张，读上一页别人的故事，然后在背面也记下一页自己的足迹，而后再次扔出，便已满足。

以后这张纸，便任它雨打风吹去吧。

思远

匆匆复上

2020年5月18日

完稿于赵丹旧居

做愉快的“田野”女孩

通信人 顾湘 作家

不要用那么多力去做事，不要干什么都是那么大刀阔斧、强力推行，尽量让每一个生命、每一件事都舒舒服服、自自然然地自己调整好。

远在赵桥村的顾湘：

你好哇！虽然你我都住在泛上海，可俨然就是两个村。我刚刚顶着艳阳给喜林草浇水回来，天突然变得很热，环视院子，一些叶子已经无精打采，我很怕这些鲜亮的蓝色小花干渴，为它们把水浇足，泥土的味道冲进鼻腔，露珠还挂在花瓣上。日上中天，我干完活，出了一头汗，把玻璃大门拉上，看到一对雪白的蝴蝶在阳光下嬉戏，一排竹林是它们的背景布，蝴蝶的翅膀太洁白以至于变得刺眼。回到房间路过穿衣镜，我退回半步，定睛一看，发现眼角下方不知何时冒出几个雀斑，像阴冷房间白墙上生出的霉点。常常待在户外，不抹防晒霜、不戴遮阳帽就会是这个结果。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搬到郊区生活，甚至一度以为自己绝对会住在地铁沿线，就像处在城市的脉搏上，跟随着城市的心跳起伏，像蒙德里安画的《百老汇爵士乐》充满节奏和激情。那个时候，我在淮海路最高的一幢写字楼上班，花了一段时间克服恐高症，坐在五十三层可眺望陆家嘴的金融建筑群。那种感觉还挺好的，你感觉自己生活在时代的中心，创造着有关时代的内容，刚工作的人都渴望被认可，原来，在什么地方办公也可以变相带给自己这种满足感，以至于跟HR谈价钱的时候，都不敢喘粗气。午休的时候，茶水间里人来人往，微波炉隆隆作响，每次“叮”的一声，就会有人离开，她们把饭盒带回自己的位置上，白色的亚克力挡板遮住每个人的脸，但你可以通过气味猜出她们在吃什么，谁的鸭腿太油腻，谁的菜头有点老，尽在掌握中。

在高空中，大家各自孤独地咀嚼着，像一台台无声的吸尘器，吃完后把剩余垃圾倒进过道一个大垃圾桶里，态度和蔼的保洁阿姨和垃圾桶坐在一起，我挺喜欢那个穿着灰色制服的阿姨的，她比大多数同事爱笑，但过道的光线昏暗，是整个一层楼最破败的角落，我们都不愿意走进，好像会把精致的幻觉吹灭。后来，公司的老板不允许员工从家带盒饭了，理由是像我们这样高级的传媒公司应该飘荡着香水味，而不是咸鱼炖肉味。这是私人企业的决策，我们无法反驳老板。好处是，大家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交换公司里的八卦），另外，大家可以搭伙去饭店点上一大桌，或者一起挤在小马路的餐饮店里，人均百元之下。出去的机会多了，心就野了，

我总想走到更远的远方吃午餐，穿过绿地和花园，途经书店和报亭，坐过花岗岩石和长椅，我珍惜着每一刻不用走进办公楼的时光，跟我同行的人心照不宣。

住在徐家汇，房租贵得令人咋舌，我只能当个“啃老族”，租房子的钱是向家里借的，不用还的那种。我每天睡得很晚，体内胀满起床气而醒来，易燃易爆炸，乘着地铁上班，要分几次才能挤上去，和很多白领成功地坐在一起，每个人手上提着早饭，我记得那时候政府没有颁布禁止地铁上餐食的规定，那些背着LV水桶包的女士捧住手里的灌汤饼，像啄木鸟一样笃笃笃地乱啃，另有挎着Prada黑色尼龙包的女士，一手握着便利店牌的包子，一手举着便利店牌的豆浆。这样通勤的日子我很快就厌倦了，密不透风的CBD办公室也不再新鲜感，有的只有晚上加完班的疲惫不堪和逐渐僵硬的腰肌，若不是工作内容是我喜欢的，我可能会辞职吧。读书的时候，我和男友曾经站在徐家汇的天桥上，望着脚下的车水马龙，我们口袋里钱很少，他甄别着车的牌子和价格，口水滴在豪车的天窗上，如果是敞篷跑车那就抱歉了。而我比较文雅，只是默默想着：以后要住在这里，不但可以陪他数车，还能去港汇吃冰激凌，去徐汇公园散步。显然我不可能一直和一个热衷数车的男孩交往，人各有志，好心分手。在收获了腰肌劳损和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后，我搬离了徐家汇，再也没有杀回城中，都市生活彻底在我生命里谢幕了。

我现在就是一名城市乡村女孩，去机场再也不用跨越市区，来去自如，想进城就坐一个小时的车，大部分时间住在郊区，宅在家里，亲近自然。自从过上这种低碳人生，欲望变得很低，把名牌包放在二手市场上卖了，也不需要穿高跟鞋了，原来不路过商店就不会想买衣服。最近开销主要集中在买书和买树，我靠管理欲望竟然意外走上了致富之路，忍不住留下浑浊的泪水。我的庭院是长方形的，原本为它勾勒了一张英式花园蓝图，有些地方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对称美，有些地方故意营造一种凌乱的花境，种了各色绣球繁花似锦，高低错落有致的植被，丰富的英式玫瑰（放我们这儿一律叫月季）。没想到，花园被人为地发展成了菜园加果园。想吃无花果，就买了两棵树回来种在院子的末端，想吃橘子，又买了棵橘子树，想吃什么我就种什么，辣椒、萝卜、柿子、茴香苗。昨天家里的包子馅是韭菜的，在自家菜园里割的，多道德——不割别人的韭菜，也不把别人当韭菜割。

为了能让这些花卉和果树茁壮成长，我就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一点点地更换土壤，每个早晚灌溉、施肥、松土、清除杂草，我不但回忆起儿时那少得可怜的在外公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经历，更重新拾起了初中生物和化学知识。我不能假模假样地说，种地让我变得宽厚，自然让我领悟人生的真谛，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境界，我甚至愈发喜怒形于色了，因为再也不

用戴面具了，遇事不憋在心里对健康有利。自从远离都市，我确实多了田园的心情。双脚落回大地上，我对四季、对天气、对时间都变得更加敏感，我身上多了植物性和动物性。早上给猫倒好粮食，给鱼缸换水，握住配水枪对着花卉们一顿扫射，体验到天主教赐福圣徒们洒圣水时的心情了，妙不可言。每天也会有一些惊喜，比如有青蛙、蜥蜴愣头愣脑地钻进来，又被我家猫太过亢奋的反应吓退。一到半夜，警惕心很强的野生浣熊在院子外面徘徊，我用手电一照，就看见两大颗猫眼石一样的眼睛，动也不动，停滞片刻又一溜烟逃跑了。

约我去安吉、莫干山的民宿？不去，我家就是民宿。约我一起玩偷菜游戏？不玩，我家菜还来不及收呢。再说了，我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吗？

只要不跟别人攀比，只要不看别人声名显赫的事业，我觉得还挺富足的。有时我内心幽暗地想：好希望大家都不要努力工作，这样就可以一起松动一下社会对剩余价值的需求、对物质的标准、对成功的定义。我们的祖先每天工作三小时，不照样载歌载舞，还能在洞穴画壁画吗？日本在21世纪初出版过一本书《下流社会》，描述的就是缺乏工作热情、消费愿望不强、拒绝趋势、懒得与世界同步的人群。我觉得这样不错啊，干吗非要都追求上流生活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发呆、种花、撸猫、想象，不失为人间至高的享受。

祝我们成为愉快的“田野女孩”！

祝羽捷

祝小兔：

你好呀！

听你说了很多上班还有住高楼的事，我从来没有住过很高的楼呀，除了一两天外宿的时候。我小时候和爸爸一起住在虹口的弄堂里，整个建筑也只有三楼，我们家在一二楼。天井里种了很多东西，竹子啦、月季啦、桂花啦，各式各样的花，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从学校采籽带回来种的玉帘和虞美人，还有一棵枇杷树。它每年都结果子，现在正好又快到可以摘枇杷的时候啦，这个时候我就会回家，爬到人字梯上帮我爸爸摘枇杷。我家的天井里，还曾经露天放着兽爪浴缸，里面养金鱼。小时候晚上出去，就看见一缸黑色里闪着光的水，感觉像宇宙一样深！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天井很大呀？其实一点也不大，泥地大概四平方米？我估计。别的邻居家还种了无花果，我小时候去攀上墙偷摘过，不知道邻居知不知道、生不生气。说起来，无花果可真好吃呀！

之前我住在六楼，老工人楼的顶楼。我对六楼的一个印象是，从六楼看下去，一只猫怎么显得这么大，总是比我以为的要大不少。说明我可能觉得六楼已经很高了，但其实没有那么高。

我现在住在三楼。窗外的广玉兰已经比房子还要高了，枝繁叶茂得要命，我要时不时用高枝剪剪一剪，不然它要把我的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大树里面住着很多鸟，我每天早上被白头鹎叫醒，它一般叫四个音节。

就连上过的班也不在高楼上，是几楼来着？我竟然完全不记得了。去问了一个以前的同事，他也不记得了，看来我们真的是不大爱上班。总之不怎么高，窗外看出去是歌剧院长草的屋顶，也看不见什么人，也是一所老房子。它的氛围比起淮海路写字楼里时髦的办公室，更接近那些老派的报社一点。

对了，我在淮海路写字楼时髦办公室里也上过两天班，好像真的只去过两天，一天是上班，还有一天是去办离职。我连地铁站出去坐电梯，都觉得转不清楚呢，而且写字楼里的人都穿得很时髦，还好那个工作是不需要去坐班的，不然我会觉得上那个班很麻烦，作为一个随和的、不喜欢突出的人，我大概也会去买一点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穿穿，好混进时髦的人群中。不是为了亮眼，而是为了不起眼，而购买时髦衣服的理由，听起来也蛮奇怪的，但我想，那些时髦的人里，也有很多是这样的吧。

去重庆的时候，看到他们都住在那么高的楼上，觉得太厉害了！重庆人了不起。

又想起来，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住过八楼，在北京的时候我也住八楼，那是我住过最高的楼层。不过窗外看出去都没有什么繁华的景象，都挺冷清的，空空旷旷的。我记得北京的窗外望出去，除了没人的小区一角，更是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那边隐隐约约是铁轨，再远就不记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所以我说从来没住过很高的楼，包含的意思还有：从来没有住过可以俯视一大片建筑群、街区之类的地方，没有“时代中心”的感觉。

说起来，我好像就是一个跟“中心”啊、“时髦”啊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我现在很喜欢去看鸟。我也不去参加什么观鸟活动，从我家走出去两百米以后就可以看见很多鸟了。除了那些城市里也常见的鸟，我这里最常见、也最喜欢的鸟是夜鹭和黑尾蜡嘴雀。夜鹭啊，每天都站在河边的一棵构树上，多的时候一棵树上有四五只，有时也只有单独一只站着，或是站在小河中凸起的一点点什么枝丫上，远看就像独自站在水上。脑袋后面细细的白冠羽飘呀飘，可爱极了。黑尾蜡嘴雀就是叫声特别明显，你听到它的叫声，就会立刻认出它来。我前几天在长宁路上也听到过它的叫声。树长得

很快，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前几天的林中小径，一两天没人走，就要被草木吞没了。到了5月，树林里的光线一天比一天暗，因为叶子越长越多，树林里比冬天时暗，鸟也没有那么容易看到了。但我还是听到黑尾蜡嘴雀的叫声，就知道它们还在，就很开心。什么大山雀、黄头鹀，都是非常可爱的鸟。大山雀叫起来“丕叽丕叽丕叽”的，像捏一个小汽球。希望它们都能好好生活下去。

我们这里快要拆了，好像是要造地铁。因为不可能对一些居民说“你们就不要通地铁了”，这样对他们不公平，所以造地铁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希望在规划绿地的时候，做决定的人可以对湿地、原生树林、鸟类和其他动物也多一点体贴爱护，不要追求造出表面整齐干净好看、但缺乏生命力的树林。不要用那么多力去做事，不要干什么都那么大刀阔斧、强力推行，尊重自然，尽量让每一个生命、每一件事都舒舒服服、自自然然地调整好自己，我喜欢这样平等、友善、和谐的世界。

不久就要离开赵桥村的顾湘

2020年5月21日

后记 往“有信”的方向行走

亲爱的朋友：

很荣幸这封信能够被你读到。对我来说，写信就像挖井打水一样古老，像坐绿皮火车一样怀旧，像喝汽水一样畅快，像思念一个人一样魂不守舍。人总要经历一点磨难、焦虑、彷徨，数着手指，翘首以待，才觉得眼前之事真实可信，所得之物分外可贵。这就跟我这一年多来通信的感觉差不多，写信时字斟句酌，怀疑暴露了自己思考的幼稚，等信时又忐忑不安，期待着每封回信都闪烁着金石之言。

写信很花时间，避免了便捷，慢是它的特征。意料之外，有的老师手写了回信，一笔一画，倾注了更多的情感和思考，纸张因吸了墨水而凹凸不平。也有的信笺有去无回，因为对方特殊状况缠身，或者无法假装对生活有热情，因而写不出来，还有的说他小学时候给女朋友写信，被爸妈抓了现行，从此立誓不再写信，而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他小学就已经有女朋友这件事上。事因难能，所以可贵，我更加感激给我回信的老师 and 朋友们了，庆幸他们没有写信的童年阴影。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能把信写给什么样的人，能写到什么地步，能遇到怎样的灵魂。这个过程就像坐进漂流的小船，河流潺潺，鱼群做伴，两侧的山麓是闪烁的辞藻，弥散的水雾是萦绕心头的怅惘，头顶的飞鸟是我们的逗号，每一个码头是句号，放任漂流。我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我们彼此本来如同孤岛，如今却在靠拢。同时，写信不但是写给对方，也是写给自己，是一场自发性的提问，也是自我净化，适合像我这样思绪乱如麻的人，让内心的声音流淌出来，穿越云山雾罩，拨开层层荆棘，逐渐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有些信提出了过去我未曾深入去想的问题，比如沈大成写到的社交恐惧症，比如黎戈老师提到文艺青年当了妈，比如阿枣提出的问题——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还在不在。信写完，我常常处于等待的焦灼中，会为没有回音而感到遗憾，比如我写给贾樟柯导演的信，那段时间我几乎又重新看了他所有的电影，可他自平遥电影节后就很少出现。我确实很想用读一封信的时间走进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想法。当然焦灼和遗憾也是整件事必然的一部分。

显然我们写的信已经做好了被大家阅读的准备，但我尽量坦诚，说出了心中的怕与爱。如果你读过全书的话，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关于许多问题的探讨。那些郁结在我心中的困惑如今得到了一次全面的疏解，我受益

于一些没想到的观点，自己原本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想法也得到了塑造巩固，如果思考是一片疆土的话，不少地方被点亮了。

我一度以为很了解的朋友，在信中让我看到了他们从未展现在外的一面。我们总以为人们在朋友圈、微博发表的状态和言论就是他们的全部，这些通信证明了那只是错觉。当远方的石康老师谈起自己在种的花，作家于是谈起自己宅在家的生活，苗炜老师说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向往远方……我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动态的，对世界的关注点不同，有不同的审美趣味，我们经历着的自我蜕变，可不像呈现在手机上的碎片信息显示得那么轻松。

“有信！”小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呼唤，是不带情感的告知，却预言着有更多的信息朝你扑来，不知道掀开的是焰火还是寒风，是缱绻还是绝情。对我来说，这本书最棒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重温了过去的体验。书的体量有限，还有许多通信没有收入进来，那些信也很珍贵，同样感谢信的作者们。如今我比过去更希望通信计划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谦逊地发问，真诚地作答，这些对话将是我珍贵的回忆。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产生过很多自我怀疑，得到过许多帮助；我是个很怕被拒绝的人，却得到了许多回应。谢谢每位通信的老师、朋友，谢谢中信出版·大方出版这本书，谢谢施宏俊、蔡欣老师的信任，谢谢猫弟、边边、小奇、田田等多位同事的付出，谢谢设计师刘恺为书做了封面，谢谢赵松老师给予我的期待和要求，谢谢刘平陪伴我多年，一路给我鼓励。尽管每次跟你们一起开会总是刀光剑影，毫不留情，但背后却是浓得化不开的温情，特别适合我这种容易拧巴且过度感性的作者，让我不会再因任何怀疑、批评、软弱而动摇。在我青春的尾声，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羽来信》。

好啦，我的信先写到这里，希望你和我都能把在读信中获得的领悟放进生活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良愿——我们都是一生“有信”的人。

祝羽捷

2021年1月10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羽来信：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祝羽捷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1

ISBN 978-7-5217-3485-0

I. ①羽... II. ①祝... III. ①祝羽捷-书信集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70921号

羽来信：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

编著：祝羽捷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30千字

版次：2022年1月第1版

印次：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3485-0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美】
大卫·施耐德 著
张宁 译 马向涛 审校

A 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Renaissance to
the Implant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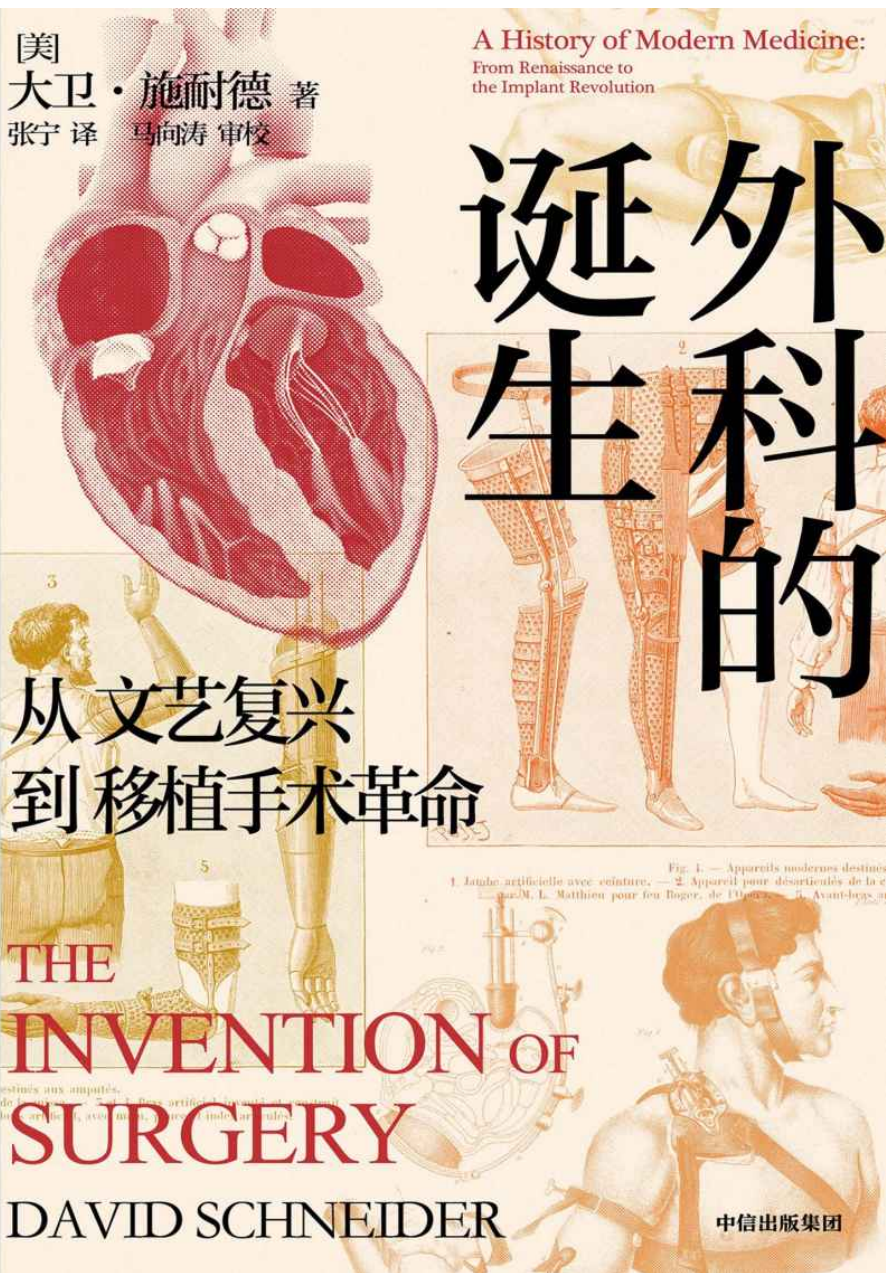
外科的诞生

从文艺复兴
到移植手术革命

THE
INVENTION OF
SURGERY

DAVID SCHNEIDER

中信出版集团



外科的诞生

——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美]大卫·施耐德 著

张宁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序章

第一章 困境

第二章 纸张、先知和印刷机

第三章 维萨里与《人体构造论》

第四章 科学的崛起

第五章 哈维与亨特

第六章 病理学

第七章 病菌

第八章 抗生素

第九章 麻醉

第十章 择期手术

第十一章 钴铬钼合金

第十二章 疏忽与享有权

第十三章 设备许可

第十四章 医疗产业园区与医疗器械

第十五章 心脏外科

第十六章 外科学的专科化

第十七章 植入革命

第十八章 运动医学的诞生

第十九章 计算影响

第二十章 脑植入物

第二十一章 半机器人的未来与“电智人”

致谢

前言

“施耐德医生，我是凯伦·兰伯特，从伯利兹给您打电话。几年前您曾经治好了我的肩膀，现在我遇到了十分紧急情况。”电话线那头的声音时断时续，但是我能听出是美国中部口音。“我和我丈夫正在外面旅游，两天前在索道滑行的时候他的保护带断了，结果他从20英尺^[1]高空摔下来。我先生不仅肘关节脱位，同时骨折端还刺穿了手臂。”

凯伦接着解释道，她的丈夫马克被送往附近城镇的一家小医院，但自从他入院48小时以来，她还没得到医生的允许去探望。当地医生给马克的肘部复了位（将关节与断骨固定），但收效甚微。她惊慌失措地向我请求帮助，将她的丈夫从简陋的医务室中解救出来，并将他送回美国。

我和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与当地一家空中救护公司合作，让他们帮忙在次日用配备护士的私人飞机将他运送到丹佛。救护车在丹佛国际机场与他们会合，将他送到我所在的一级创伤中心，接着我们在凌晨2点准备好了紧急手术。

我一整天都在为最糟的情况做准备。我担心会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同时很清楚他恐怕会失去一条手臂。我希望我们能尽量降低他终身残疾的风险，最好保留这条手臂的某些功能。当我在术前等候区见到马克和凯伦时，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神情呆滞，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穿着白色手术罩衫躺在轮床上。凯伦还穿着带有旅游公司标志的短袖衫、卡其色短裤和探险凉鞋。正

当我准备给他们“大讲特讲”自己会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手臂时，马克抬头用旅途劳顿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想今年夏天还能接着打垒球，而且我不想留疤。”

我在惊诧之余试着找回话题，感觉有必要让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严重后果。然而我却未能如愿，他认为既然凯伦的肩部重建与固定手术能成功，那么他现在也能康复。我提到仅仅100年前“开放性骨折”的死亡率还高达80%，并试图告诉他，固定肘部的韧带、肌腱和肌肉非常复杂，还有缝合创伤性撕裂是项艰巨的挑战。但我这一番话没有用。我喜欢马克的乐观，却担心他还不理解患上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以及他的手臂将永远不会复原的事实。

结果奇迹出现了，手术异常地顺利。他不仅没有死，也没有失去手臂，并且其手臂功能恢复完好，没有落下残疾。事实上疤痕都不是很明显。上次我跟他见面是在一场垒球比赛之后，我们回想起他遭遇的折磨并评价了最终的结果。那是我最后一次试图跟他说，他差点失去手臂，而且还险些因伤丧命。马克是一名航空航天工程师，这类工作人员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并不少见。尽管他的智商很高，但他对现代外科学一无所知。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很多外科医生，都不了解外科。在我评估他的康复情况，并将他的情况与75年前的类似情况相比较时，马克大为震惊，毕竟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没有钢板，没有螺丝钉，甚至没有抗生素。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不相信微生物的存在。虽然人们在19世纪中叶就发现了首个麻醉药，但手术仍是极其危险的，直到一群医学家和科学家证明，居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肉眼难见的微生物，正是患者感染的原因。这一知识引发了医学和外科学的变革，说服了外科医生在手术前洗手，从而吹响了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从接受病菌理论到研制出抗生素，中间经过了70年的痛苦挣扎。在此期间，外科学慢慢发展起来，但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当时手术的范围和效果都非常有限。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发明出现，如聚合物和晶体管，现代合金技术和抗生素，私人医疗保险和医保制度也得以建立，共同促使现代外科医学达到现在的水平。

以关节置换、心脏支架、晶状体手术和神经外科分流术为代表的植入手术均是最近50年左右的成果。现在全世界每年的植入手术数以百万计，这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科学、艺术、狂妄、想象、疯狂、勇敢和耐心的现代结合成就了一场植入革命。

现在有很多外科百科全书和外科医生传记的汇编。最近几十年来只有很少几本书，能将那些帮助我们塑造现代世界的离经叛道之人、勇往直前的先驱者描述得栩栩如生。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叙事，一种串联起他们的人生，将他们的故事编织在一起，解释“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叙事。

因此，在本书中，我将讲述关于外科学诞生的故事。现代历史学仿佛已经约定俗成，假设这世上真的没有“孤独的天才”，也几乎没有高呼“我发现了！”的时刻。外科这个领域并非如此，有许多名家大师的天才视角被人低估，但他们看得更远，挑战了时代，为改善人类命运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领域专家都多。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序章

人生短促，技艺长存；病危转瞬即逝；经验险中来，决定难决断。医生不单单要准备自己如何应对，还要与病患、护理者和外部环境通力协作。

——《希波克拉底箴言》第一节

事实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比众生更有见识，那么他的天性和早期接受的训练就必须远远胜过其他所有人。

——盖伦《论自然力》[1]

作为手外科的低年住院医师，我大多在医院的门诊和急诊接触病人，很少在手术室。今年夏天，多例“再植”手术让我忙得马不停蹄。再植手术是对工厂或伐木场工伤事故以及后院燃放烟花造成的断指进行重接修复的手术。患者被急救直升机或救护车从本地区各处送到我们创伤中心，希望能够保住他们的手。

两天前，一个阿曼门诺派（Amish）小男孩在谷仓旁边发生意外，断了三根手指。他叫加布里埃尔，今年五岁，不会说英语，是个典型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孩子，在一个保持着往昔俭朴生活的隐居社区中长大。其实，他家里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我们顺畅地交流。我也治疗过一些阿曼门诺派和老派门诺派（Old Order Mennonite）的患者，他们能轻轻松松说一口流利的现代英文，但有一部分阿曼门诺派没有抛弃他们的“低地德语”方言。

今天早上，我的主要工作是更换加布里埃尔手指上的水蛭。您没看错，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的技术，但是现代医学中也有水蛭的一席之地。再植手术包括复位和固定断指、缝合肌腱以及显微镜下缝合神经和血管。手外科医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后，必须对动脉和静脉内的血流进行监测，以观察手指是否成活。而水蛭的用途在于分泌具有特殊功效的水蛭素。水蛭素是一种天然的抗凝血剂，来自水蛭的唾液腺，帮助它们摄食血液。在手指上附着一只医用水蛭可以缓解手指充血，从而增加再植断指成活的机会。水蛭吸血后会慢慢膨胀变大，一旦它的身体充满了血，医生就必须换上另一只饥饿觅食的小东西，以继续这场手指上的盛宴。

我走进加布里埃尔的病房，夹杂着厩肥气味的热炉般的空气扑面而来。为了让他的手指血管尽量舒张，病房室温保持在35摄氏度。他的病房里有二十多人，都是阿曼门诺派。男士们留着林肯式的大胡子，身着白衬衫和黑色羊毛吊带裤；女士们头戴旧式田园帽，身着飘逸的深蓝色连衣长裙。我想起来，大多数阿曼门诺派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此时正值宾夕法尼亚州的闷热炎夏，他们却身穿厚重的深色羊毛衣服，加上他们大多在农场从事畜牧，这一切使病房臭气熏天，就连我这个大型家畜兽医的儿子，都觉得难以忍受。

我带了一罐新鲜的水蛭，瘦瘦小小的深色蠕虫状生物。我在坚忍的加布里埃尔身旁俯下身来，他的手被包裹在厚重的外伤敷料里，有拳击手套的三倍大。我一层一层地拆开白纱布时，人们全都凑过来围观，而我似乎是765号病房这个大烤箱里唯一一个汗流浹背的人。拆掉最后一层松散的纱布后，我们都盯着附着在三根手指上的那三只巨大的水蛭。它们像墨汁一样黑，暗暗地透出深红色，一动不动，沾满鲜血，看上去就快要爆炸了。我开始

拽第一只水蛭，而它纹丝不动。我感到一阵期待的热浪在人群中涌动。此刻，二十多张脸与我近在咫尺，一股刺鼻的猪粪、马粪和牛粪的气味，外加糖浆、玉米肉饼和凉拌腌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向我袭来。我差点儿就吐了。

我终于一点点地把那只小吸血鬼从手指上撕下来。“啊！”众人齐声感叹。我又这样重复了两次，另外两根手指上的水蛭也被撕了下来，伤口处渗着血。我从小罐里一只接一只地取出那些黏糊的小东西，提着拽到手指上。这些小东西像鼻涕虫一样慢慢地蠕动着，最终在手指上牢牢地粘住。整个过程，加布里埃尔都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而此刻我们终于再次对视了。除了简单的问题，我们无法进一步交流。但这一刻，我们确实共同体验着几千年来医学传统——放血疗法的技艺。虽然美国已经不再使用放血疗法为患者进行治疗，但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这种疗法仍然像2500年前医学初现时那样得到使用。短短一百年前，我的医学前辈们还想不到，断掉的手指可以再缝回手上。但是，水蛭吮吸“坏血”这一想法，曾经让他们感到兴奋不已。

在塞纳河左岸，迷宫一样的巴黎拉丁区，坐落着数十座隶属于索邦大学的建筑，包括巴黎第五大学（勒内·笛卡儿大学）。该校最宏伟的建筑位于医学院街，是一座17世纪的柱廊式建筑，内含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医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楼内大厅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真人大小的石雕，一位戴面纱的女性正轻轻掀开罩住脸和上身的织物，露出她平静的面容和袒露的胸乳。雕塑名为《自然向科学揭开她的面纱》（*La Nature se dévoilant à la science*，见彩插0.1）。

在这座充满知识的殿堂里，这座石雕刻画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精髓，即人类通过科学揭开了自然奇美的面纱。在古希腊的哲学革命和艺术革命过去了几个世纪后，随着知识之光驱逐了

中世纪的黑暗，整个欧洲重新燃起一种启蒙的求知欲。15世纪是一个探索、创新以及通过新技术重塑交流方式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别无二致。^[2]莱昂纳多·达·芬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约翰内斯·谷登堡等人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就像史蒂夫·乔布斯、伊隆·马斯克、杰克·多尔西和马克·扎克伯格在最近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当然，他们也和今天的发明家们一样颇具争议。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文艺复兴来追溯医学现代性的起源，一部分原因在于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15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西方世界正从千年沉睡中觉醒，寻医问药仍然没什么用；即使是最精明的医生的照护，都有可能让患者更加危险。戴维·伍顿在《坏医学》（*Bad Medicine*）中的描述可谓切中要害：在1865年之前的任何时代，不管病人患上了何种疾病，最好的选择都是独自忍受煎熬，远离医生的“照护”。

因此，希波克拉底与盖伦这两位西方医学的翘楚提供的思想关照在将近两千年中基本没有改善患者的处境。当然他们在外科实践领域也完全没有贡献。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这两位医学之父像《绿野仙踪》中的奥兹大王那样只是在帘幕后面拉动控制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他们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每一位医生，他们的理论因此也至关重要。

这本书将要探讨人类对人体运作方式的理解的蜕变，疾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21世纪的外科医生是如何用奇迹般的手段修复、重建生命，甚至重新构想人类的。我在书中几乎不会涉及古老的亚洲医学，或是原始社会治疗师口耳相传的传统医学。尽管古代萨满巫医可能已经有了惊人的认识，但是已经穷途末路又缺乏逻辑关联的知识见解，并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为外科学的诞生打下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才是本书的重点，包括科学本身的

发明，细胞、病菌、现代材料的发现，以及对治疗效果的研究。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他引人入胜的著作《大转向》（*The Swerve*）中，介绍了伊壁鸠鲁派诗人卢克莱修神话般的长诗《物性论》。这首长诗在古典时代就已失传，凭借它的见解和艺术性令后人铭记，但中世纪没有人读过它。世间流传的都是它有多么伟大的故事，类似于罗得岛太阳神巨像或是巴比伦空中花园的传说。在消失了1500年后，意大利古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于1417年在德国南部的一座修道院里发现了这首长诗。

波焦在修道院里闭关三周，从纸莎草古籍中抄写下7400行拉丁文，带着他的珍宝回到了罗马。几十年后，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于是卢克莱修的长诗很快被印刷发行至整个西方世界。

《物性论》的发现帮助世界进入了现代，摆脱了“对天使、魔鬼和无形原因的全神贯注，转而关注世间有形之物；明白人类与万物一样由物质构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做实验时，不惧怕自己在侵犯上帝尽力保守的秘密……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正当合理的……认识到尘世令人满足”。^[3]找出文艺复兴的每一项起因是充满挑战的，但这首长诗肯定是原因之一，它破天荒的主张帮助世界“转向”现代性。

是什么让这首长诗如此激进？卢克莱修在开篇就宣称，万物都由看不见的颗粒构成。他进一步假定这些颗粒的存在是永恒的（这是化学之父安托万·拉瓦锡的基本观点）。哈佛大学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称此为“人类迄今涌现出的最伟大思想”。^[4]除此之外，我们的诗人还告诉大家，人类并不唯一，我们正处于为生存而战的原始阶段，没有来世，宗教残酷无情，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这确实激进。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主张在中世纪末期被重新发掘出来，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正如古

斯塔夫·福楼拜所说：“当众神光环褪去，而基督尚未降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在西塞罗至马可·奥勒留之间，人无依无靠。”^[5]这些思考推动了从占星术到天文学的转变，从炼金术到化学的转变，最终也让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转变为牛顿的物理学。

希波克拉底的一生横跨哲学三巨头的时代。他比苏格拉底晚生约10年，与柏拉图基本同期，与亚里士多德有14年的交集。希波克拉底不仅仅是一位医生，还是著名作家、文化中坚、希腊爱国者和道德家。他与门徒们编写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60篇（虽然经评估，将近一半并非出自他手），收录的作品大概横跨了一两百年。约翰·布洛克总结说：“希波克拉底是赋予医生独立地位的第一人，让他自己与天体观测者区别开来，将医师的职责划定在医学范畴。”^[6]所有早期“治疗师”都是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探究健康和疾病的原理是这些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而这项任务始于对“养生之道”和合理膳食的痴迷。“寻找使身体保持健康、远离疾病的饮食方式这一命题，使人们开始思索身体和食物的成分，以及身体及其各个部位的结构、功能和活动。”^[7]

在对细胞、细菌、基因、癌症甚至身体器官没有任何知识背景的情况下，古代的真理追求者们琢磨着人体的功能：难道疾病完全是个谜吗？如果生活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原始人都痴迷于仰望星空，在月亮的阴晴圆缺中寻找意义，对日出日落苦思冥想，望潮汐翻涌，听风声呼啸，那么转向我们的身体本身去研究跳动的心脏、起伏的呼吸，甚至排尿和排便，又会带来多大的意义呢？

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说，古希腊人“专注于流体力学——水车、活塞、阀门、水槽和水闸，这源于灌溉和运河挖掘的水利工程学革命，而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发现的同名定律则把

该学科推向了巅峰。希腊人将对水利学的专注延续到医学与病理学研究中。为了诠释各种疾病的奥秘，希波克拉底根据液体及其容积的特点研究出一套理论，并且自如地运用其来解释肺炎、脓肿、痢疾以及痔等疾病”。[8]

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弟子盖伦运用“四体液说”（Four Humors）来解释身体的内部运转和功能紊乱。他的思维方式很像一名液压工程师，从理论上说明我们体内的血管是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的容器。奥维西·特姆金写道：“在消化的过程中，饮食转变为身体的汁液，这些体液……它们是身体（即组织）的营养品，因此，组织的存在要归功于体液。火、土和水等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元素，并不以其本来的形态存在于人体中；它们分别体现为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9]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第四元素，即气，是斯多葛派所说的“元气”（生命活力或人体第一推动力），也是生命功能与精神功能的载体。

要知道这只是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世纪的思维体系，距离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有关血液循环的突破性实验还有将近两千年。古代人没有血液循环的概念，他们无法像我们这样从心脏开始追踪血液：先通过主动脉，之后流经较小的血管，一直到最狭窄的毛细血管，再逐渐转为薄壁低压的静脉支流；随着静脉血管逐渐变粗，血管数量也逐渐减少，血液就像不断变宽的河流流向大海，最终汇集到巨大的腔静脉，并由此回到心脏。作为本书的读者，您或许明白，血液并不是一下子“倒进”肌肉，就像在一盒肉上泼血那样的。相反，人体的肌肉中遍布着非常细小的血管，小到肉眼看不见。我们的体内并没有将所有体液（希波克拉底将其简化为胆汁、血液和黏液）集于一处的水库。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推测呢？

亚里士多德大概是以科学方法解剖动物的第一人，而他的学

生狄奥克莱斯（Diocles）可能进行了第一次人体解剖。^[10]古代是允许人体解剖的，直到被罗马人取缔。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应该可以解剖尸体，但那时还没有防腐处理和制冷技术，于是动作需要相当迅速，以避免尸体腐烂使探究过程令人作呕。面对刚刚死去的人或动物，古代医生很可能会切开腹部，看到发臭的肠道中充满了还未完全消化的食物，以及大血管中已经凝固的暗紫色血液。在腹腔内，他们会看到肠道周围有腹水，像温热的苹果汁一样。对肾脏、肝脏和脾脏等器官的处理过程会非常血腥，到处都是热乎乎的凝胶状血液。长在肝脏下面的胆囊已经大得像梨一样，将其切开后，豌豆大小的胆结石翻滚出来，混着黄色的胆汁汨汨地流到解剖者的手上。胸腔是肺和心脏的家园，肺的四周有胸腔积液，肺叶里也充满了泡沫液体，就像是海绵里被水泡开的茶叶。人在弥留之际，基本上都会在气管和支气管里残留痰液。总之，我们确实能在这里发现四种液体：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在不了解器官功能的情况下，早期的解剖学家反复思考着这些液体，寻求以一种统一的“万物理论”来解释宇宙中最耐人寻味之系统的运转模式。一定是在某一个奇妙的时刻（在某具尸体身上），希波克拉底明确地构想并概括出了他的四体液说；还有比这一理论更引人深思、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思想贡献吗？

当一种体液在人体中占主导地位，体液会对其性格和行为产生影响。四种性格分别源自四种体液的学说，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在希腊语中，黑胆汁是melancholia，也即我们用来形容性情压抑的“忧郁质”（melancholic）。沉着而头脑冷静的人因为黏液（phlegm）多，成为冷漠而不易冲动的“黏液质”（phlegmatic）。性格急躁、爱生气或者脾气不好的人，是黄胆汁过多的“胆汁质”（choleric）。如果患者体内血液占主

导，并且精神饱满或者放纵不羁，那么他就是“多血质”（sanguin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血液一词。

在科学革命到来以前，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在医学界占有统治地位，因而意义重大。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者，也不得不在没有科学的世界里思考人体功能，他们对希波克拉底学说的诱惑也毫无抵抗力。因为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哲学基础是一个谬误，所以当时求医问药是无用的，甚至还会致命。希波克拉底学派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疗法有效，毕竟他们从未发现治疗是无效的。[\[11\]](#)如果说希波克拉底是医学之父，那么这对父子关系是可疑的；我们无法确定任何医学成果与他（或他的追随者们）的理论相关。

对于多血质的人来说，最符合逻辑的干预方法就是减少血量。如果患者“头脑发热”，或因某种疾病出现皮肤发红、发热的症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发烧”），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会给病人采用放血疗法。传统的做法是将静脉切开，但后来用拔罐疗法，将一个杯子吸在皮肤上，或者使用水蛭。因此“放血”是一种试图实现体液平衡的古老技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病人经历过放血治疗，且经常有人因此失血而亡。试想一下你自己每次生病发烧时的样子。发烧，即体温升高，是人体对细菌或病毒侵入的一种全身性反应，现在很容易用科学理论来解释。但哪怕你生活在仅仅五代人以前的时代，社区医生都很可能会在床边为你放血治疗。

罗马帝国始于公元前31年，当时的希腊和希腊化的埃及统归后来获“奥古斯都”称号的屋大维治下，而奥古斯都的统治到公元14年结束。罗马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强大而和平的帝国的中心。希腊城邦被罗马统治并同化，反过来早期帝国也接纳了古希腊文化。

在这个相对和平有序的时期，古代的另一位伟大医生诞生了，他就是盖伦（130—200年）。与希波克拉底一样，盖伦也来自爱琴海以东，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今天的土耳其贝尔加马）。与希波克拉底出生的科斯岛一样，帕加马也有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12]盖伦的医学训练之旅从家乡开始，后来延伸到士麦那和科林斯，最后在亚历山大里亚停下。奥维西·特姆金写道：“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是古代学术、科学和医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公元642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医学研究尤其是解剖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您在这本书中会清楚地看到，历史上一直都有“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中心”。“在那时，人体似乎可以被解剖研究，直到罗马法律禁止了这种研究，让解剖学局限于动物解剖。”^[13]

盖伦从亚历山大里亚学成之后满载而归，回到帕加马成了一名角斗士医生。作为早期的“运动医学医生”，盖伦在其职业生涯中，很可能并没有解剖过尸体；不过，在为受伤的角斗士做手术时，盖伦增进了对于解剖学的了解。后来，盖伦被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召唤至罗马。在人生的最后四十年中，他就在那里写作、教学，并担任皇帝的侍医。

盖伦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医生，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科学家以及技艺精湛的解剖家（尽管解剖的是猴子和猪）。他以文雅的希腊体写作，笔耕不辍，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仅留存下来的作品就有12卷之多，每卷约1 000页”。^[14]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第一次动物解剖，并首先推测出人体器官各自的功能，那么正是盖伦将动物尸体解剖和活体解剖（解剖活着的动物）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公元前3世纪，由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

拉图斯（Erasistratus）领导的解剖学大革命已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发生。他们与伊壁鸠鲁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他们出生时，亚历山大大帝刚刚建起这座城市，一座地中海沿岸的边境城市，靠近尼罗河河口，被蛮族环绕。在这座城市里，研究者们很可能对死刑犯的尸体进行过解剖（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活体解剖）。史蒂文·约翰逊将其描述为“一种蝴蝶效应，在一个领域内的一项创新或者一系列创新，最终会引发另一个领域的变革，哪怕这两个领域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变革正是由政治领袖或者发明家的行动产生的……”。^[15]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年轻的城市作为希腊化的前哨，从亚历山大那里继承了吸收当地风俗和人才并培养国际学生的传统，是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理想实验室。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习之都，拥有最大的（古本手卷）图书馆。古埃及的学术知识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和经验主义结合，再加上被征服的波斯民族和印度民族的贡献，使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盖伦完成学术研究的理想城市。

盖伦的伟大著作《论解剖过程》（*On Anatomical Procedures*）是一个奇迹。这本书是他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以其毕生的解剖学研究为基础写成。盖伦虽然不是解剖学的创始者，但他是解剖学第一位重要的见证人，而这部作品是他的扛鼎之作。与大部分解剖学书籍一样，这本书中关于骨骼、肌肉、血管和器官等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然而，书中充斥着大篇幅的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在今天看来，很多地方荒谬可笑；但是在维萨里于1543年出版《人体构造论》（*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之前，盖伦的这本书一直是业内的金科玉律。我们会发现，因为盖伦的权威地位备受推崇，维萨里在书中只能小心翼翼地批评这位大师级前辈，轻轻地播种下第一颗质疑权威的种子。

盖伦进行的解剖实验使他成为真正的先驱者。解剖实验中也包括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结果他没能确证体液失衡的问题，反倒成为发现器官功能的第一人。“通过绑扎和解开输尿管，盖伦证明了尿液从肾脏流向膀胱；他从不同的层面切断脊髓，描述了接下来运动与感觉的丧失；他发现结扎喉返神经（从大脑发出控制声带运动的神经）后可以导致失声。”^[16]这位公元2世纪的自然哲学家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心脏是身体“指挥中心”的理论，证实了大脑通过神经向肌肉传递神经冲动。

我们为什么呼吸？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在不知氧气这一概念的情况下思考着呼吸的作用。他们推测有一种“元气”，即一种生命活力，必须进入并充满体内。盖伦总结道，这种灵魂的元气从大脑底部的网状动脉丛中涌出，他称之为“奇网”（*rete mirabile*），之后元气到达大脑中部充满液体的洞穴，即脑室。由于盖伦已经确定冲动起源于大脑，那么脑室中的空隙一定是灵魂的元气之所在。盖伦的“奇网”，灵魂元气之源泉，将在1300年后成为一个重大主题，而此时此刻，他已经引发了一场决定性的大革命，确认了认知起源于大脑。

在盖伦的晚年，也即公元2世纪末期，迎来了“和平与稳定大环境的崩塌。大约一个世纪近乎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环境扰乱了文化和经济生活”。^[17]最终，蛮族入侵罗马领土，破坏了帝国的稳定。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这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几十年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双都并立。然而，公元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驾崩之后，罗马帝国永久地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到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已经彻底瓦解，接下来是历时千年的拉丁中世纪。

不了解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暂时延续的几百年，就无法真

正理解西方文明。“西罗马正在走向拉丁中世纪，而东罗马保留着古代遗产。查士丁尼一世甚至成功收复了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部分地区，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但是这次再统一并没有持续多久，基本上以查士丁尼一世的驾崩而告终。文化上，古典时期的痕迹慢慢褪去；而政治上，在公元634年被阿拉伯人袭击以前，东罗马就已经成了拜占庭帝国。”^[18]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分裂过程中，希腊文化（和医学）继续向中东地区传播，先到叙利亚，然后是波斯，最后到达穆罕默德的世界。“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逝世，这位先知的几个继承者……大力资助希腊学问的研究，尤其是医学。阿拉伯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理论学说。”^[19]我们将看到，阿拉伯学者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热忱，并将他们的作品由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些阿拉伯语书籍成为古代智慧的知识宝库，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被译回拉丁语，这个觉醒的时代就是文艺复兴。

人类这一物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约25万年，而现代人已经有8 000年以上的历史，相当于300代人。你可以找一张纸，写上300遍“祖”（great）字，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你的某一代祖先，最后可以追溯到我们在生物学上的“亚当”，即第一个现代人。

如此想来，脆弱的295代人完全靠大自然的仁慈生存，剩下五代人有幸得到“好医学”的庇佑，其中两代人在现代医学的时代茁壮成长，我将这一时代称为“植入革命”的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学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最终一项简单而精致的发明创新瓦解了其主导地位。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交流能力，让我们逐步加深了对人体运作方式的理解，并伴随着外科学的诞生，产生了飞跃式的进步。

^[1]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trans. Arthur John Bro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28), p.279.

[2] Walter Isaacson, Leonardo da Vinc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p.9.

[3] Stephen Greenblatt, 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New York: W.W. Norton,2011), p.x.

[4] Ibid., p.186.

[5] Ibid., p.x.

[6]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trans. Arthur John Bro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28), p.x.

[7] Owsei Temkin, Hippocrates in a World of Pagans and Christi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

[8]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Emperor All Maladies (New York: Scribner, 2010), p.x.

[9] Owsei Temkin, Hippocrates in a World of Pagans and Christi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x.

[10] David Wootton, 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2.

[11] Ibid., p.31.

[12] 传说希波克拉底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第20代传人。他在科斯岛上行医，科斯岛也因此被称为西医的发源地。——译者注

[13] Owsei Temkin, Hippocrates in a World of Pagans and Christi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

[14] Ibid., p.5.

[15] Steven Johnso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pp.5–6.

[16] Owsei Temkin, Galenism: Rise and Decline of a Medical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4.

[17] Owsei Temkin, Hippocrates in a World of Pagans and Christi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

[18] Ibid., p.4.

[19]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trans. Arthur John Bro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8), p.xix.

第一章

困境

根据骨关节结核的现有治疗经验，骨性关节强直 [关节融合术] 是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同等水平的永久性治愈并避免远期复发。事实是，我们治疗结核病的方法非常有限且疗效甚微。归根结底，控制感染取决于患者本身。我们并没有特异性药物、血清或是治疗剂可以迅速地杀死这种微生物。 [只有两件事情] 具有实际价值：休息和阳光。

—— R. I. 哈里斯，1935年于安大略省多伦多^[1]

尼尔医生对肱骨近端骨折患者进行肱骨头切除术的最终治疗效果不再抱有幻想。他向达洛克医生提及此事，达洛克医生说道：“别愁眉苦脸的，不如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做。”

——查尔斯·罗克伍德（Charles Rockwood），医学博士

听说米兰达再次出现肩关节脱位时，我的心往下一沉。我初次见到米兰达是在一年前，她告诉我双侧肩关节曾经出现几十次脱位。米兰达是一名癫痫患者，容易罹患某种异常顽固的脱位，让她的肱骨头强制性向后移位，离开关节囊；临床上常见的是前脱位，即肱骨头朝胸壁方向移动错位。大多数完全脱位需要临床医生进行复位，最好是去急诊室在深度镇静的状态下进行；我们

要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来大量患者只能长期带着慢性脱位与肩部残疾生活。

上一次脱位让米兰达特别沮丧，因为这个25岁的年轻姑娘和她的医生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根除癫痫发作的药物治疗方案。寻找正确的抗癫痫药物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需要在药物的副作用与癫痫发作所带来的负担、尴尬和不便之间找到平衡。她已经几个月没有癫痫发作了，她敢抱着希望说癫痫终于消失了。但是现在她在我们的急诊室里，痛苦地僵在病床上，用一条胳膊护着腹部，意志消沉，神情沮丧。她知道接下来的步骤，我们会开始静脉注射药物，用强力镇静剂把她“打晕”，然后将手臂外旋，同时用力牵引她的前臂。与脱位相比，更让她难过的显然是癫痫发作。可是话说回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让她的肩关节复位。做一名外科医生最光荣的事情，莫过于帮助那些处于低谷的人回到最佳状态。帮助患者转变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多给他们希望。我告诉她我们很快就能使她的肩关节复位，但更重要的是，我委婉地建议说，我们以后应该考虑以手术方式来治疗，使肩关节脱位问题彻底成为过去。她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可以治愈，我看见了希望的火花在闪动。“真的可能让我的肩膀不再脱位吗？”“是的，”我向她保证，“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结合多种技术，更好地解决肩关节不稳定的问题。今天先在这里处理完，我们在诊所预约一个时间，好好谈谈你肩膀的治疗。”

米兰达最终还是来了我的诊所，我们讨论了手术治疗的方案。经过详细的交谈，她选择了手术。术中，我们对其变形的肩关节囊、撕裂的关节唇（附着于肩关节窝周缘的软骨结缔组织，使肱骨头固定在关节内）以及损伤的关节骨表面进行了处理，使她的左肩重获新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恢复良好，双侧肩关节都没有发生脱位，更重要的是癫痫也没有再次发作。

现在她的左肩手术已经过去半年了，米兰达再次来到了我的诊所，她的肩关节又脱位了。“左肩还是右肩？”我问道。“右边——不是手术的那边。”我的助手克里斯蒂答道。

得知经手术修复的左肩仍然状况良好，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敲开检查室的门，看到米兰达坐在检查台上，她那么紧张，让我有点惊讶。我们彼此熟识，可她十分焦虑，甚至坐立不安。

“米兰达，你最近怎么样？”

“我的癫痫又发作了……对不起。”她脱口而出。

我见过病人这种心怀歉意的回答，他们可能患有偏头痛、癫痫、炎性肠病以及其他不可控的发作性疾病。对因果关系的自我反思，让他们不断怀疑突发疾病都是自己身娇体弱的错。

“这次发作特别糟糕。通常我会有强烈的感觉自己要发作了，但是这次我基本上毫无防备。我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我癫痫发作，看到抽搐时扭曲成那样的脸，对他来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有一次发作时，我的朋友给我录了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样子竟然那么吓人。现在，他看见了我那个样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米兰达。”

“我就是感觉很差。我还尿了裤子，只能穿着尿湿的牛仔裤离开餐馆。我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该死的癫痫。”

“米兰达，我无法想象你当时有多难过。你受到癫痫发作的折磨，我也很难受。这对你太不公平了。我希望你和你的神经科医生可以稍微调整用药，让你的发作得到控制。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所能，让你的两个肩膀都固定得稳稳当当，不再疼

痛。就算癫痫再发作，你的肩膀也会没事。”

当我治疗长期反复脱位的癫痫患者，我经常想到古代的病人，他们因为癫痫发作而受到严惩，因为“恶魔附体”而受到虐待，或被怀疑耍弄巫术。他们突然发作时，身体会翻滚扭动，脸上扭曲的表情以及发作后行为能力的暂时丧失让古人得出结论说，某种超自然力量正统治着病人的身体庙宇。当患者的生命岌岌可危（这被视为要下地狱的征兆），他们的肉身也不断遭到摧毁——头痛、遍体鳞伤、咬伤舌头、意识模糊以及精神错乱。

很少有早期哲学家认识到癫痫发作与阴曹地府无关，而是身体生病的状态。直到20世纪，癫痫发作才有办法治疗，基本同一时期也找到了控制肩关节不稳定的方法。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者们都会为彼时境况痛心疾首。即使在今天，与这些承受不幸的患者交谈时，我都会感到特别痛苦和烦闷，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疾病（disease）让医学前辈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不适”（dis-ease），同时这些早期医生对于疾病的原因及治疗方法不甚了解，也让我反感。

查尔斯·尼尔（Charles Neer）医生看了一下哈里森太太的肩部X射线照片，他马上意识到这位纽约老人在其余生中再也无法用上这条手臂了。一种挫败感在尼尔医生的心里油然而生。他算了一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严重的肩部骨折，而他束手无策，至少对病人没有任何帮助。一股无力感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涌起。他被急召到急诊室来为这位70岁的曼哈顿老人做诊断，那天她在家摔倒，然后被送到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虽然尼尔医生所在的医院是世界上最早拥有“骨折治疗”技术的机构之一，但是在1951年，他明白自己对哈里森太太的骨折无能为力，手术、石膏绷带、祈祷，都无济于事。

威廉·伦琴在1895年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骨折的治疗；医生不再盲目地治疗扭曲或破碎的肢体，X射线揭示了骨折的位置和“特征”等详细信息。很快，有关骨折分类的报告就出现在医学期刊上，而这些研究结果最终可以指导治疗。人体中的每根骨骼都有自己的分类法，通常以报告第一作者的名字来命名。20世纪上半叶，照护骨折患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外科医生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可以预测骨折的模式。

欧内斯特·艾默里·科德曼（Ernest Amory Codman）被誉为“肩关节外科之父”，他于1934年出版了《肩关节》（*The Shoulder*），这是第一本专门为肩外伤治疗而写的教科书，也播下了变革之火种。^[2]他引发了医学领域的许多重大变革，包括疗效研究、医院评级、肿瘤登记，以及肩部手术的发展。尽管科德曼医生是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人物，特别是在肩部外科领域成就杰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有关肩关节骨折、关节炎、肩袖撕裂和肩关节不稳定的文章。科德曼医生的职业生涯动荡不安，他于1940年去世，享年70岁。接下来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其间有零星关于肩关节粉碎性骨折脱位的报告得以发表。这些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文章不过发表于半个世纪之前，然而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它们简单得令人震惊，放在今天出版机会为零。文章的作者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粉碎性和碎裂性肩胛骨的手术，只要能简单地移除碎片，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肩窝和一块瘢痕组织慢慢康复，就算比较成功了，只盼着由手术导致的“连枷臂”留在身体的侧面，保留一点点基本的功能。20世纪40年代的期刊出版物不包括肩关节角向运动的测量，不考虑术后疼痛评分，功能评估也少得可怜。

连枷臂患者需要更为科学（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评估，正是年轻的查理·尼尔^[3]做到了这一点。

在俄克拉何马州维尼塔出生长大的查尔斯·萨姆纳·尼尔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其父是一位出生于纽约，受训于圣路易斯的全科和外科医师，曾在印第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实践拓荒医学。印第安领地后来成为美国第46个州，即俄克拉何马州。老尼尔医生本身也是医生的孩子，查理曾经写到，他的父亲“从未想过我去做医生以外的其他工作”。[4]

查理在1917年11月10日出生，那时俄克拉何马州的维尼塔是拓荒时代小镇的缩影。俄克拉何马州成立于1907年，由西部的俄克拉何马领地和东部的印第安领地的众多独立印第安人居住地组成。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维尼塔，位于与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交界处，在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搬来行医时，这里是切罗基族（Cherokee）[5]居住地的中心。

老尼尔医生在维尼塔镇的主干路口，即威尔逊街和伊利诺伊大道的十字路口附近，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就位于现在的66号公路上。通过文献检索，你可以发现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到斯普林菲尔德再到维尼塔的足迹；1907年做住院医师的时候，1908年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工作时以及1909年在维尼塔开诊所后，他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过文章。1917年查理出生，那时他的医生父亲38岁。查理在马背上长大，是个土生土长的俄克拉何马州小伙子。老尼尔夫妇期望儿子成为一名医生，于是他们决定把小查理送上火车，让他前往明尼苏达州法里博的沙塔克军事学院（Shattuck Military Academy，现在因培养了大量国家冰球联赛人才而闻名）。小查理在那里读完了大学预科课程，并在网球和橄榄球方面表现出色。沙塔克的优质教育水平为查理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做好了准备，他于1939年从该校本科毕业，之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且于1942年毕业。

1943年在费城完成实习之后，查理的外科培训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他像二战时期的很多医生一样，正常的生活停滞了。尼尔医生曾就职于两大主要战区的野战医院，分别是乔治·巴顿将军指挥下的欧洲战场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菲律宾战场。此外还有一家在日本的综合性医院。

1945年回到美国后，尼尔医生移居纽约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纽约。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出生于乡下的尼尔生活在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城市里，并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之一。他抵达纽约时，正值欧洲医学的领导地位日渐衰落，而他是接过这面旗帜并将其树立在美国的先驱者之一。在骨科领域，他的论文被引用得最多，其培养的肩外科医生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导者。尼尔医生的文章对肩关节炎、肩袖撕裂、肩关节不稳定、肩部僵硬、肩部疼痛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始于他道出我们无力治疗严重肩关节骨折的事实。

20世纪40年代后期，尼尔医生在纽约骨科医院（20世纪50年代初并入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了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他的导师是骨折治疗方面的几位领军人物：威廉·达洛克（William Darrach）、克雷·瑞默里（Clay Ray Murray）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Harrison McLaughlin）。现在骨科分为许多亚专科，比如足踝、运动医学、全关节、脊柱、肿瘤、手、肩肘以及小儿骨科；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骨折治疗才刚刚成为骨科的第一项专业，由于冶金学和抗生素发现产生的历史性进步，两者的结合使骨折治疗经历了重要的质变。尼尔医生于1942年开始实习，那是青霉素在美国投入使用的第一年，这种抗生素扭转了任何开放性骨折（骨折端刺破皮肤）都有可能致命的局面。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手术行为本身就让所有择期手术都面临风险。因此二战结束以前，将异物植入人体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历史上植入象牙、骨头、玻璃、金属、塑料和橡胶的记录都非常糟糕，几乎所有的植入都导致了感染，必须移除。今天，我们知道骨折患者和创伤患者会接受最基本的骨折固定，这在几代人之前还根本不存在。骨折患者跟无法自理的中风病人一样，需要卧床数周或数月，才能坐在轮椅上或是站在床旁。由于无法通过手术恢复骨折部位的连续性，早期外科医生并不比古代“接骨师”做得更好。医生并不会直接“修复骨折”，而是给卧床患者打上笨重的石膏绷带，还要配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绳子、滑轮、夹板以及床头上方悬置的吊架。

尼尔医生从太平洋战场回来时，70岁高龄的威廉·达洛克医生刚刚从外科手术教学的全职岗位上退休。达洛克医生属于世界上首批伟大的骨科医生。他们二人的职业生涯在纽约产生了交集，那短短的几年里，这位外科前辈在尼尔的职业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十年之后，查理·尼尔仍然称威廉·达洛克医生为“我的领导”。尼尔医生做住院医师时，准备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股骨颈囊内骨折》（“Intracapsular Fractures of the Neck of the Femur”）。该文章后来于1948年11月在《美国外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上发表，共同作者为时任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骨折科主任的哈里森·麦克劳克林医生。这篇只有5页的文章在当时非比寻常，它通过列表描述了13年间（1932—1944）诊治的130例骨折患者，并对其X射线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130例患者均为股骨颈骨折，都接受了史密斯-彼得森三刃钉（Smith-Petersen nail）治疗，这套金属板和螺丝钉器械由哈佛医学院的骨科先驱马里乌斯·尼加德·史密斯-彼得森（Marius Nygaard Smith-Petersen）研发。14张表格缜

密地展示了患者资料、病情以及治疗初期的满意度，但明显缺少现代骨科论文中必需的疗效评估、髋关节活动范围以及术后疼痛评分。然而，推理过程、结构安排和精湛的结论，成就了这份天才之作。

这篇髋部骨折论文的六点结论，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坚如磐石的真理：

髋部骨折复位和固定的最佳时机为即刻进行。（等待手术没有好处。）

对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的有效治疗为内固定和避免卧床。（尼尔明确表示，当骨折稳定后，下床活动更有利于恢复。）

处理得当的切开复位，比闭合复位和盲钉更可靠、用时更短，而且并没有增加危险性。

切开复位不会增加之后无菌性坏死的发生率。（手术本身不导致骨头坏死——导致坏死的是骨折。）

只有经过客观评估之后，才知道疗效如何。（尼尔呼应了17和18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和外科医生的观点：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几乎所有失败的内固定都与不规范的操作有关。（此处，尼尔在他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中明确指出，技术非常重要。）

1949年，查理·尼尔在髋部骨折论文发表后不久，完成了他的住院医师培训。他随即成为坐落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骨科助理教授，并在骨折科任职，治疗从颈部到

足趾的骨折。那时，只有几家世界级医院开设了骨折科，它们都为自己配备这一新科室而感到自豪，曼哈顿居民就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医院住院治疗。1928年竣工的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坐落于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主要服务曼哈顿上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居民，而刚开通不久的乔治·华盛顿大桥（1931年竣工）跨越哈得孙河，连通了河对岸的城郊社区，这也使医院的服务区域延伸至新泽西州。

查理·尼尔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可谓恰逢其时。医学院和大学的合并、校园和桥梁的建造以及战后的繁荣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患者。50年后，尼尔医生回想时说：“我在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下属的纽约骨科医院骨科做住院医师时 [1946—1949年]，唯一用于治疗孟肱关节问题的方法是融合术或切除术，以应对结核、感染和旧伤。我开始对肱骨近端严重移位性骨折和脱位感兴趣，并对这类损伤此前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包括切开复位和内固定，封闭复位，以及移除肱骨头。”^[6]

能够指导骨科住院医师查理·尼尔治疗肩部骨折和脱位的资料极少，并且没有对实践有用的信息。欧内斯特·科德曼的巨著《肩关节》长达500页，集中讨论了冈上肌腱和滑囊，却没有提供肩关节炎和骨折的有效治疗方法。我们不能责怪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的付出是徒劳无功的；他于1940年去世时，还不知道青霉素、用于固定骨折的螺钉或者关节置换。关于骨折的外科治疗，科德曼只是说：“……早期手术的效果远比延误几个星期要好。处理肱骨头骨折的外科技术展现给我们的更多是实现快速而舒适的康复，而不是确保最终的疗效，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康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固定不当是大多数正常功能恢复延迟甚至失败的原因。”^[7]科德曼的论述仅此而已，没有技术建议，当

然也没有对植入物的评价，因为在1934年这些根本不存在。

查理·尼尔做住院医师期间可以参考的另一本重要教材是艾奥瓦大学的骨科主任亚瑟·斯坦德勒于1946年出版的《上肢创伤性畸形和残疾》（*The Traumatic Deformities and Disabilities of the Upper Extremity*）。斯坦德勒编写了一本到那时为止最全面的肩部、肘部和手部外科技术指南；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对于肱骨头骨折合并脱位的肩部骨折治疗，斯坦德勒建议“沿腋襞切开，直接穿过皮下组织，通过钝性剥离，露出肱骨头并将其切除”。[8]切除肱骨头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选择，真是简单到难以想象。

查理·尼尔毕业后不久，杰斐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的骨科主任安东尼·费德里科·德帕尔马教授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突破性的著作。这本《肩外科学》（*Surgery of the Shoulder*）比之前的书籍描述更生动详细，有丰富的插图，实用性也更强。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有提及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也没有讨论感染问题。在这部长篇巨著中，有几页详细介绍了肩部的骨折和脱位，但与当时其他的骨科教科书一样，肱骨头骨折的治疗方法极其粗糙。德帕尔马写道：“……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手术会导致严重的功能障碍，但是切除肱骨头不可避免。”[9]在后续的章节里，他的态度又有所缓和：“经过谨慎的处理，患者在肢体控制与无痛活动范围上可能会获益良多。”[10]

在查理·尼尔职业生涯的早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遇到严重肩部骨折和脱位时，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切除肱骨头。患者只能听天由命，心存侥幸，希望连枷臂比截肢好。

尼尔医生来到医学中心的12层看望哈里森太太。她已经被收

治在骨科病房，等待一两天之内通过手术取出肱骨骨折的碎片。查理·尼尔早年谢顶但体格健壮，身后跟着几个住院医师，他们都不满30岁，因从没上过战场而沾沾自喜。这支医疗小分队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老太太的病房，尼尔医生坐在她的床边。哈里森夫人的X射线检查显示出她受伤的严重性：臂骨（肱骨）上半部分已经断成几块，肱骨头就如同一颗青苹果被掰成了两半。骨科医生需要向病人讲解她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的治疗计划。

“哈里森太太，你的手臂骨折情况很严重。肱骨断成了很多块。”

她的手臂被一块亚麻布紧绑在身体上，眼镜也摔坏了，再加上因为跌倒而眼圈乌青，老太太看上去狼狈不堪，愁眉不展。

“哈里森太太，我们没办法保住你的肩关节。但是我也不能放任不管。我们需要带您去手术室，切开后将所有碎骨取出。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取出所有碎骨，缝合肩部肌腱，然后闭合伤口。”

尼尔医生是个言简意赅甚至沉默寡言的人。他停下来，等着哈里森太太仔细考虑他的建议。

“哦，”她犹豫着，“我会没事的吧？我的胳膊还能用吗？”

“很难讲。这是个相当少见的损伤，医学文献中没有太多的指导，但是我认为，您的手臂以后可能无法再举过头顶了，穿衣服、做家务将会比较困难。很遗憾，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手臂能动的的基本只有胳膊肘和手腕。”

哈里森太太瘪着嘴，噙着眼泪沉默了一阵之后，尼尔医生继续说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感兴趣好几年了。我们在治疗您这种骨折方面确实方法有限，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办

法。怎么描述这些骨折的类型，骨折有多常见，还有怎么改善骨折的情况，我在世界各地做骨折治疗的同事们意见都不一致。但一切都要看我们这里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研究的课题。”说完，住院医师们陪着尼尔医生走出病房，直奔骨科门诊。

这些住院医师熟悉尼尔医生的新课题，他要分析以前的病历和X射线照片档案，回顾自1929年以来该医学中心肩部骨折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就是检查其在曼哈顿晨边高地建院以来所有的肩部骨折病例。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年轻外科主治医师来说可不是个小任务，他非常清楚在医院病案室里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那些发霉的灰色档案夹和手写的外科病历挤满了书架的每一个缝隙，新式荧光灯在头顶上发出吱吱的噪声，油墨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病案室中。

与尼尔几年前发表的髋部骨折论文相似，这个病例评估项目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仔细钻研骨折治疗科和手术室的病历簿。查理·尼尔想要对23年（1929—1951）里到纽约骨科医院就诊的所有肩部骨折/脱位患者进行评估。他想确定其中有多少损伤涉及肱骨头骨折以及脱位。如今，想要开展这一课题的年轻外科医师会联系病案室，提交ICD-10代码（美国国家标准诊断代码，例如S42.241A代表右肱骨近端严重骨折），之后信息技术部门将在几分钟内大量生成该类别的病例名单，并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和医院编号。掌握了这些细节之后，熟练的数据分析师就可以打开医院的电子医疗档案和影像软件，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访问他的信息宝库。但尼尔医生需要的是一身考古学家的本领，从一本本咖啡桌大小、笔迹模糊的病历簿中爬梳患者条目，而这些单行手写的条目只简要描述了患者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和骨折情况。

除了为患者看病的时间之外，尼尔医生抓紧每一刻分析建院以来接诊的肩部骨折和脱位患者的病史。虽然那些“单纯”肩部骨折的患者被仔细列入表格中，但是他们并不是其研究对象。他知道这些病人大部分不需要手术即可恢复良好。另外，对于那些肩关节脱位的患者，他也按时间进行了记录，但同样没有进行深度评估。尼尔医生在寻找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合并肱骨头脱位这种难治组合的患者。渐渐地，枯燥的工作使一些不幸遭受这种可怕联合打击的患者露出了水面。在评估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尼尔医生（和他的助手们）一共确认了过去23年间医院收治的1 796例肩部创伤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以上（51.2%，921例）为肱骨颈骨折。共有784例患者肩关节脱位（占医院接诊病例的44%），71例患者有粗隆骨折（粗隆是肱骨顶端肩袖肌腱附着处的大隆起）。在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只有20例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脱位，在所有肩部创伤患者中仅占1.1%。也就是说，每年受这种伤的患者还不足1例，而这正是查理·尼尔第一篇肩部创伤论文的主要内容。不过，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阐释那20例患者当时得到的治疗效果是多么不尽如人意。

《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发表于《美国外科学杂志》1953年3月刊上，作者为查理·尼尔、托马斯·布朗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11\]](#)在确定了那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尼尔医生对他们的病历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岁，作者对这个年龄段的描述是“介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典型的发生机制是患者从与身高差不多的高度跌倒。关于治疗，只有两例最终以保守治疗（未手术）处理。三例尝试通过手术保留肱骨头并重新拼接骨折碎片，在处理其中一例时外科医生成功将肱骨融入了肩窝。

在早期收治的20例患者中，有16例进行了肱骨头切除。其中某些患者的部分肌肉和肌腱被缝在肱骨干断端的上部，这跟车祸后用强力胶带将侧面的后视镜绑回去没什么两样。在论文的结果部分，作者概述了平均随访时间和病人的满意度。这几位作者在文章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结论大概是：“不论[重建]手术是否与[肱骨头]切除术同时进行，切除肱骨头后，盂肱关节的运动范围通常在5度至25度之间。”

如果一名普通患者能垂直向上举起手，评估人员会将运动范围描述为前屈160度。在1953年的这篇文章中，典型患者只能勉强有力气让手稍微离开身体。换句话说，受伤的肩膀基本上变成了强直肩，也就是完全僵死的肩膀。

仅仅几代人之前，慢性结核病和外伤还残酷地伤害着许多这样的纽约市居民，留下一条无用残肢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不知何故，在切除肱骨头的19例患者中，14例“对他们的治疗结果感到满意，并且表示他们能在无明显残疾的状态下进行日常工作”。尼尔和他的同事们不敢苟同：“然而，切除术后有限的运动范围和疲劳疼痛，说明了置换假体作为运动轴支点的价值。”

在第257页，文章正文的最后一栏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一个闪亮的金属物体，作者称它为“新近设计发明的关节置换假体，目前正在研究”。文章的最后结语断言：“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其真正价值还有待确定。”

就像手捧爱迪生发明的灯泡一样，不插电源，你就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医生会意识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肩外科医师在其首篇关于肩部创伤的文章中，悄悄地为我们预先描绘了外科发展的未来。这一未来的蓝图不仅

对肩关节有用，而且对所有关节都有效。异物能够植入体内这一命题，将唤醒工程师、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想象力，并带来人类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一场剧变——植入革命（Implant Revolution）。

[1] R. I. Harris, “Arthrodesis for Tuberculosis of the Hip,”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vol. 17, No. 2, 1935

[2] E. A. Codman, *The Shoulder* (Boston: Thomas Todd Co., 1934).

[3] 查理·尼尔，即查尔斯·尼尔的简称。——译者注

[4] Charles S. Neer, *Shoulder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B. Saunders, 1990), p.vii.

[5] 切罗基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译者注

[6] *Ibid.*, p.146.

[7] E. A. Codman, *The Shoulder* (Boston: Thomas Todd Co., 1934), p.331.

[8] Arthur Steindler, *The Traumatic Deformities and Disabilities of the Upper Extremit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46), p.126.

[9] A. F. DePalma, *Surgery of the Shoulder*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1950), p.272.

[10] *Ibid.*, p.423.

[11] C. S. Neer, T. H. Brown, H. L. McLaughlin, “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March 1953, pp.252–58.

第二章

纸张、先知和印刷机

我努力地想着今天是星期几。我星期六早上来到医院，准备在医院食堂与住院医师同事们一起“整理清单”，检查挂号病人的登记情况并大概安排一下全天工作。作为一名低年住院医师，我明白大部分的“脏活累活”都会由自己在周末完成，又因为手外科专业组要随时应答创伤中心的呼叫，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遭遇60个小时的残酷战斗。万一我运气差了点儿，一个周末呼叫不停，就彻底完蛋了。我刚拿着煎饼和清单坐下，对讲机就把我叫到了创伤中心。

第一位创伤患者发生了摩托车车祸，其主要受伤部位集中在右臂。他的右手已经伤得一塌糊涂——开放性骨折、肌腱暴露、血管破裂、皮开肉绽。我看一眼就知道他的手术得做几个钟头，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手外伤患者陆续来到急诊室，白天变成了黑夜，而患者并没有减少。直到星期天早晨，我刚有个机会可以小憩一下，又有人在切百吉饼时受了伤，急诊室把我叫下楼咨询。一拨又一拨的外伤患者，源源不断地涌进急诊室；我的工作稳定病情、评估患者并做好术前准备，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耽搁，就去手术室报到，协助手术。

星期天深夜，一个周末都没睡觉的我能量耗尽，精疲力竭，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24岁伐木工人被急救直升机送了过来。他右手的四根手指被连根锯掉，而且巨大的锯条把手指都碾

没了。我们只能期望通过手术清理创面边缘，过一段时间这只手就会变成“连指手套”的样子，他还可以像用高尔夫球杆一样用它。过了一会儿，他的家人开车到了。我们总是很难开口，向家属传达没有奇迹发生、断肢无法挽救的沉痛消息。但是，毕竟这是1996年，别无选择。

黑夜慢慢融入清晨，周日变成了周一。这意味着要先开早会，然后去手术室参加全关节置换手术。我依然努力撑着没合过眼，疲劳使我感到极度压抑。很少有人能理解真正的精疲力竭状态，以及疲劳导致的大脑短路和深入骨髓的酸痛。在持续睡眠不足的状态下，我一直表现得不错，但是过了50个小时以后，习惯和意志力开始变得毫无意义。保持清醒需要极度专注，保持反应灵敏则根本不可能。那种感觉好比食物中毒时产生的强烈呕吐感，或镜子反射的一道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如果思维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强制断电，身体就会瞬间崩溃，面朝大地，倒在路人脚下。就像你在巴士上小睡时发生了车祸一样，突发的碰撞让你突然清醒，脑袋乱晃，你倒吸一大口气，踉跄的双腿跌跌撞撞地想在幻境中站稳，伸出胳膊想要找个依靠。做住院医师时，这种看似由药物引起的状态，与我大脑最原始部分（我要休息，寻求慰藉，基本需求，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之间的战争，通常会发生在手术室里，就在我们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凭借洪荒之力，我奇迹般地熬过了全天的手术马拉松。此刻，我把这个周末的工作在脑子里拼凑整理，想起来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再看一眼那位失去右手手指的伐木工人。

佩莱格里尼医生（Dr. Pellegrini）是我的科主任，现阶段他决定着每分每秒应该在哪儿。那些以急诊室为题材的电视剧和讲述外科住院医师故事的电影，都极其戏剧化地表现科主任严苛地领导着他手下的住院医师，但它们还是大大低估了现实中主任

的权力，以及年轻医师的自惭形秽和无助。我在五楼遇到佩莱格里尼主任（我们都叫他“老大”），还有我的住院总医师杰夫·伍德，得知患者家属现在都聚集在病房里。在黑暗的楼道里，我是唯一一个已经三天没睡觉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同样睡眠不足，在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里，我竟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踉踉跄跄地撞上了扶手，就像是兄弟会的新人被戏弄以后走回家一样。“老大”就在旁边，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让我还能保持直立行走，但是我特别后悔自己星期六早晨没多带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裤。我肯定臭得像个连轴加班的实习医生，屁股泡在三天没换的内裤里，加上裹在湿袜子里的汗脚，让我极度渴望回家躺倒。

我们一行三人在病房里见到患者及其家属，告诉了他们这次意外将永远改变他的生活这一严峻的事实。作为一名蓝领工人，他知道自己未来会永远困难重重。我以为自己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尤其是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但是此时此刻，我已经彻底沦为心理学课堂上的失眠测试对象——只想躺下，顾不得其他事情了。而且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当时还暗自想着，这位也是让我整夜无眠的原因之一。患者家属都是工人阶层，浑身散发着香烟、油炸食物和潮湿发霉的气味。他们了解情况后都低着头，沉默不语。我们一致同意明天再做一次手术，继续为其手部残肢清创。

走出病房，我心中长舒一口气，决定直奔家门。这时我听见患者父亲在黑暗的走廊里大声喊着，叫我等一下。我咬牙切齿，快要气炸了：“还有什么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患者父亲停了下来。他穿着破旧的法兰绒上衣和粗蓝布裤子，留着一头浓密的短发，红翼工装靴上沾满了泥。我心想他最多也就50岁，然后他犹豫地开口了：“抱歉占用您的时间，但我有一个问题。”救命，赶紧饶了我吧，快说啊。我心想。

曝晒后的粗糙皮肤和沙哑的嗓音，会让人以为他是一个常年烟不离口而且长期室外劳作的粗人，但是他慈祥的目光透露出一种谦逊的教养。“我不是个聪明人，也不懂医，但是……”他欲言又止。我等着，浑身酸疼。“我活了一把年纪了，今年43岁，看到我的孩子一只手残了，没有未来，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

他伸出自己粗糙且长满老茧的手，每根手指都因辛勤劳作而粗壮有力。他轻声地问道：“有可能把我的手指截掉给我的孩子吗？”

五千年前，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原始部落民族在同一时期，不谋而合地构想出一整套收割野生棉花、将其纺成棉线并织成材料的工序。^[1]如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详述的那样，棉花成为一种开启工业革命的材料，既是研究全球航运、资本和奴隶贸易的课题，也表明人们意识到棉花本身是一种理想的多用途材料。俗话说“成功有很多父亲”，这句话可能是在暗示，许多发明家会枉自宣称他人的创新是自己的功劳。但我们换个思路解读，它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发现和发明的灵感，都是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的。^[2]无论是飞机、电灯、科学理论（比如进化论、相对论、微积分）、卫生纸还是注射针头，“技术进步势不可当”意味着伟大的想法会在同一时间的多个地方竞相盛放，等待收获。

想法的并行发展可以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来解释，即创新因循的是一种特定且可预测的进程。“在发明或运用钢铁、水泥、电力、计算机以及理解核物理学之前，铀矿的开采并没有什么意义。”^[3]过早提出的发明听起来就像幻想，比如“时光机”，而创新通常是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出现得恰

逢其时。演化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创造了“相邻可能”（adjacent possible）一词，来解释生物系统为何能在组成过程中通过递进且能耗较小的变化来转化成更复杂的生物系统。[4]史蒂文·约翰逊在《伟大创意的诞生》（*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中将“相邻可能”这一概念运用到科学、文化和技术领域，“相邻可能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未来，它盘旋在事物当前状态的边缘，就像绘制一张当下如何重塑自己的所有路径的地图……每一种新组合都在其相邻的可能性中增加更新的组合”。[5]

本书在本质上说的就是“相邻可能”。回想起来，外科学的崛起遵循着一种简单的模式：科学家和医生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推动了发现和交流，小型研究团体了解了人体功能，19世纪的医生解锁了疾病发生过程的细胞学基础，20世纪的外科医生发现了治疗方法。每项进步都建基于之前的突破性进展，每项进步又带来向下延展的进步。

出乎意料的是，医学崛起的首要基础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革命被称为“人类文明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6]是一个多项技术结合的经典案例，但是印刷术成为现实还需要一次重大的领悟，而且它恐怕与你以为的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也许是冰期）驱使了我们的原始祖先加强他们的社会纽带，语言和艺术方面的重要发展在过去的三万年中一直加速进行着。但是，直到最近五千年才出现了书写文字，也就是说人类99.9%的时间都活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诞生之前的人类在战胜疾病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无法在广泛的学者群体中分享知识的发现。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手抄文本在向遥远地区的研究者传达新信息方面效率极其低下。医学要想蓬勃发展，让外科学成为现实，需要的是〔借

用史蒂夫·乔布斯介绍iPhone（苹果手机）时的一句话]“突破性的通信设备”。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与文字的发明时期不谋而合，埃及人发现并巧妙地利用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植物：纸莎草。埃及的湿地在培育农作物之前都长满了纸莎草，这种四处丛生的翠绿色植物的茎秆呈三棱状，其独特的内部结构将会给埃及社会带来影响长达几千年的改变。纸莎草纸曾经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被广泛使用，但生产仍然被埃及垄断，而且除了死海古卷以外，其他以纸莎草为载体的文献都出土于埃及。

亚历山大图书馆由马其顿王国的希腊人托勒密一世下令建造，他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统治者。这座图书馆不仅位于重要的文化中心和港口，而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靠近纸莎草生产中心。“每一艘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船都被搜查[文字材料]，查获的所有材料都要为图书馆提供副本。任何主题的作品托勒密都想要，无论诗歌还是散文，三个世纪后，图书馆成为拥有70万卷馆藏的知识宝库。”^[7]

盖伦的家乡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当地统治者在同一时期也渴望建立一座宏伟的图书馆，但是托勒密一世察觉到对方是个竞争对手，于是拒绝向这座安纳托利亚的城市运输纸莎草。据普林尼记载，帕加马人只能自己发明创造一种新型书写材料，这种纤薄的材料不仅耐用，而且供应充足。这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羊皮纸”（pergamum）。它由兽皮制成，制造者先将兽皮浸泡在石灰水中，再进行除毛并烘干。之后兽皮被放置在架子上，用石头进一步刮薄并打磨平滑。最终生产出来的羊皮纸非常薄，在适宜的环境下，十分柔韧又耐老化。

欧洲的各国语言都保留了“pergamum”一词作为羊皮纸的名

称，但英语称其为“parchment”。羊皮纸的三种主要材料来源是绵羊、山羊和小牛，但最优质的材料是“犊皮纸”（vellum），也就是专门用小牛皮制造的纸，而胎牛皮更是难能可贵！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制作羊皮纸，使用范围包括特殊文稿（比如在真“羊皮”上复制文凭证书）、珍品藏书以及图书装订。

耶稣离世后不久，罗马人用羊皮纸取代了木简来制作手抄书。纸莎草纸不适合作为木简册的替代品，因为折叠和缝制的过程会使书脊部分变得非常脆弱。[\[8\]](#)羊皮纸抄本的使用与基督教的兴起息息相关；在埃及发现的所有早期基督教文献都是羊皮纸手抄书，而同时期的非基督教文献基本都是长卷轴（scroll，拉丁文为volumen，书卷之意）。不同于纸莎草纸，“羊皮纸可以在任何地方制作，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保存完好。但是，像纸莎草纸一样，其制作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成本更高。制作一本书可能就需要多达两百只动物。[使用羊皮纸]意味着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需要持久地保存”。[\[9\]](#)

公元1400年左右，约翰内斯·谷登堡在德意志地区的美因茨出生。尤利乌斯·恺撒离世后不久，美因茨就作为罗马的要塞建立起来了；到15世纪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小城镇，是欧洲主要的犹太教学术中心。黑死病在谷登堡出生的数十年前横扫了美因茨，人们把疾病归咎于犹太人群体，认为是他们“向井水中投毒”，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在市中心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现象。瘟疫让美因茨的居住人口从2万人减少至6 000人，[\[10\]](#)剩下的莱茵兰人[\[11\]](#)只能另寻瘟疫的替罪羊，同时又无力承担已经腐败至极的教会提出的无理要求。

谷登堡的家族在当地铸币厂参与帝国货币敕造工作，他从小对铸币工具非常熟悉，包括凸模（punch）、凹模（die）、铸模（mold）。“令人吃惊的是，约翰内斯·谷登堡自幼就被一群工匠

包围着，他们能够在钢铁上刻字，其分辨率至少是现代激光打印机的6倍，甚至可能是60倍。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授予了美因茨制作帝国货币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对新设计和新凸模的需求。”[\[12\]](#)

在15世纪早期的莱茵兰，制作印刷机所需的所有零部件，对于工匠来说都已经触手可及。大量使用木螺钉和曲柄臂的压力机，自古以来被用于制酒或榨油，接近15世纪时也用于干燥纸张。凸模在手工艺行业已经很常见，用于制作奖章、硬币、盔甲和装饰品。纸张早在几个世纪前就从中国传入，而纺织业者已经非常熟悉油墨。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一位创新者连点成线，发动革命。

谷登堡在一个金匠家庭中长大，应该亲眼见识过在凸模上刻印单个字母的艰辛。据估计，一个技艺娴熟的凸模工匠需要一整天才能制作出一个凸模；一页标准印刷纸大约需要3 000个凸模。[\[13\]](#)也就是说，10个工匠组队工作一整年，才能制作出足够的凸模来填满一页纸。“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噩梦，在经济上毫无成功的希望，完全不切实际，比中国的印刷术差10倍。”[\[14\]](#)约翰内斯·谷登堡的创意并不是发明活字（type）本身，甚至不是凸模，他的突破性贡献来自一个独特而巧妙的想法——铸造模具，并使模具可以重复使用。

他构想出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形式，一种避免每次印刷完字母后都需要重新铸模的模具（见彩插2.1—2.3）。两块立体的L形模具头尾相接包围着凹版（matrix），铁弹簧则用来固定这些可以活动的模块。这种“斜接式”（mitered type）模具还有利于制作出尺寸相同的字母，使印刷效果更具视觉美感。因此，从根本上说谷登堡的媒介革命是一系列过程：先是制造阳模（patrix，即凸模），然后是阴模（即凹版），手动铸模，最后

创造活字。他改变了世界，但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总结的那样“发明了印刷机”，而是发明了一种能够快速打造出可重复使用模具的方法，这种方法才是巨大的进步。

谷登堡是个追求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者，但他未曾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利。事实上，他去世时身无分文，且鲜为人知。油墨、印刷和纸张的实验继续进行着。人们发现橡树瘿（黄蜂幼虫在橡树上形成的球状物）中的化学成分与烟灰、油和水相结合，可以制成理想的印刷油墨。使用动物脂肪为纸张上浆的过程也得到了优化。谷登堡和他的搭档曾致力于控制纸张的湿度，一张湿度完美的纸可以更好地吸收凸模上的油墨。接下来便是其杰作印刷版拉丁语圣经通行本面世的时机了。

放眼乾坤，这部作品在任何意义上都堪称杰作。“谷登堡宏伟的印刷本圣经，两卷共计1 275页，不仅在美感上可以与手抄本相媲美，在精确度方面还要更胜一筹。一场媒介革命正在酝酿。不过，它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革命性，这一点最为关键，否则没有人会购买。”^[15]其实，印刷本圣经呈现给当时世人的是一种新的书写文字形式，由于中世纪的抄写都非常精准，这套新式的印刷书籍在人们的眼中，可能是一部华丽而优雅的抄录艺术作品。

谷登堡以其惊人的才华和坚韧最终获得成功，但他几乎将一切都输给了他的搭档和同事们，自己勉强维持生计，才秀人微。他制造了史上最伟大的出版物之一，也就此引发了一场革命——宗教改革——让统一的天主教面临永久的分裂。^[16]

当我们提到欧洲始于14世纪的求知欲觉醒，只考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美第奇家族对他们的赞助就太过简单了。在科学的前沿阵地，“复兴”的特征之一就是怀恋古典思想，这种怀旧之

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意想不到之地重新发现古代文本点燃的。

在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527—565年），没有人能够真正猜到，在不到一个世纪后，掌控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无上强权会从阿拉伯半岛内部崛起。其创始者会组织起氏族和部落，提出一种新的宗教，将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之间的区域统一于同一种语言之下，鼓励保存古代智者的科学和数学知识。这位先知出生于麦加，当时的那个小村庄现在已经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至今，穆斯林每日祈祷时都要朝着它的方向朝拜。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出生时，麦加已经是朝圣之地，因为“黑石”出现在那里，而黑石据说是易卜拉欣[17]找来的陨石。在穆罕默德成为领袖之前，每年都有一次公开的休战期，以便交战的部落可以聚集在麦加，朝拜他们各自不同的神灵。重要的是，由于麦加在穆罕默德出生时已经是朝圣的目的地，每年一度的朝圣出现了商业化发展的趋势。

穆罕默德在统一当地部落与氏族并说服他们放弃原有信仰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天赋。他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伊斯兰社会的核心。[18]这看似只是一位荒漠梦想家为小城而设的计略，最终却缔造出一种宗教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将希腊人的学识保留下来，而且孕育出新的科学发现。

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认为，“就像这片土地上乳香的气息飘至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阿拉伯半岛的精神芬芳——圣洁的伊斯兰教——也感染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无论咫尺天涯”。[19]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延伸到文化层面，为世界注入了对古代文化的求知欲，保留和翻译了古人的著作，并帮助架起通往文艺复兴的桥梁。“介于罗

马帝国衰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那一千多年，并非知识的荒原。古希腊的科学成果先后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和欧洲的大学中得以保留，某些方面还得到了改进。”^[20]阿拉伯半岛又被称为“阿拉比亚之香”（Arabia Odorifera），因其历史上用香料来遮掩腐肉的恶臭，而伊斯兰作家所散发的知识芬芳，成为中世纪仅有的一些“新鲜空气”。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归其伊斯兰神权统治。几十年的动荡中，出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支。公元661年，第一个王朝——逊尼派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在大马士革成立。倭马亚家族掌权将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其扩张范围涵盖北非、西班牙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他们统治了之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开始学习古希腊科学。还有一部分古希腊学识来自波斯，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波斯王国的统治者就非常欢迎古希腊学者的到来，那时正值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新柏拉图学派的学园。基督世界所失成为伊斯兰王国所得。”^[21]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始于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推翻。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在底格里斯河畔建立了一座新城，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最初计划吸纳借鉴的是波斯文化，而当时的波斯人崇尚希腊文化。随着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开始接纳希腊哲学、医学和科学（可能还包括诗歌和戏剧），他们最终也接纳了来自埃及、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古老智慧。结果，阿拉伯帝国呈现出欣欣向荣又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教育和科学水平普遍发达，成为从希腊哲学家到文艺复兴早期先驱者的信使。

马蒙（813—833年在位的哈里发）派遣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取希腊手稿，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知识传输。

翻译的传统始于医生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后来还包括他的儿子和侄子。译者们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以及欧几里得、托勒密等数学家的专著翻译成阿拉伯语。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将穆斯林学者智慧的惊人增长与欧洲的停滞不前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东方的哈伦·拉希德[22]和马蒙深入探究希腊思想和波斯思想的时候，他们同时代的西方伙伴，查理大帝及其麾下贵族还在浅尝书写自己名字的技艺”。[23]

阿拉伯半岛学识的黄金时代横跨公元8—13世纪，自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以来，这片广袤的区域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先前分裂这一区域的政治屏障已经消除，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者可以相互交流往来”。[24]阿拉伯科学崛起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从比利牛斯山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传播，这并非巧合。而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来自非洲、伊比利亚、波斯或者阿拉伯的作家均用阿拉伯语写作。

由哈里发马蒙创立的智慧宫成了全世界的学识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曾经是知识之都，坐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手稿，并以产自本地的纸莎草作为书写原料；而巴格达则成为哲学探索和科学探索的新守护者。在那里，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抄录在当地制作的纸张上，人们可以通过阿拉伯语来阅读所有的文献。[25]智慧宫在早期吸纳了印度数字（从1到9）、十进制系统和“0”的概念。阿拉伯人用以表达抽象公式的系统（能让世界各地的高中生们大惊失色）由花刺子米（al-Khwarizmi）发明和推广，他将其称为“代数”（al-jabr）。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掌握了世界上的种种学科知识，包括炼金术、数学、科学和法律。伊斯兰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欧洲的图书馆相形见绌，西方中世纪的科学与文化也就此长期停滞不前。

阿拉伯传统的奠基人是叶尔孤白·本·伊斯哈格·萨巴赫·肯迪（Ya'qūb ibn Ishāq aṣ-Ṣabāḥ al-Kindī），一般被称作肯迪（al-Kindi，拉丁文写作Alkindus）。他出生于巴士拉（今伊拉克南部），拥有阿拉伯贵族血统，被称为“阿拉伯的哲学家”。肯迪博学多才，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以及希腊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拉齐（al-Razi，拉丁文写作Rhazes）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医生之一。这位学者在波斯出生，在巴格达学习和受训。拉齐不仅翻译著作，还描述了天花和麻疹。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挑战了盖伦不容置疑的权威。例如，拉齐推测发烧只是一种防御机制，而不是体液失衡问题。他的贡献令人惊叹，他是“一位思考者，明确地质疑一位古代伟人，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曾经被世人普遍接受的理论，同时对一个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贡献”。[26]

另一位波斯出生的阿拉伯医生是伊本·西拿（ibn Sina），又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年在世）。世人普遍认为他是希波克拉底以来最伟大的医生。据说，阿维森纳十岁就已经记住了《古兰经》，他也非常博学，在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大量的杰出作品。他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这部多卷巨著汇编了大量医学知识，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方数百年的经典。直到17世纪，《医典》都是欧洲各医学院（蒙彼利埃、博洛尼亚、巴黎）的主要教科书。[27]“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在1913年的演讲中，认为阿维森纳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医学教科书作者’。奥斯勒还补充说，阿维森纳作为一位执业医生，是成功医师的典范，同时也是政治家、教师、哲学家和文学家。”[28]阿维森纳被称作“中世纪的权威之源”，[29]他大概是伊斯兰世界丰富多彩的

文化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使节。

智慧宫以西3000英里[30]，坐落着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即今天的西班牙，穆斯林称之为安达卢斯（al-Andalus）。穆斯林对西班牙的统治最终于1492年瓦解，但其统治期间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当时积累下来的大量文化、科学、语言和建筑传统沿用至今。

阿布·卡西姆·宰海拉威（Abu al-Qasim al-Zahrawi）以其拉丁文名字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公元936—1013年）闻名于世。他在科尔多瓦附近出生长大，其祖先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他被视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外科医生。“跟医学的其他分支比起来，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对外科的束缚相对较小，所以[阿尔布卡西斯]力求将医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31]《医学手册》（*Al-Tasrif*）大约成书于公元1000年，是他将近50年医学实践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历史上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图片。在此后的500多年里，这本外科百科全书是欧洲大学的标准参考书。阿尔布卡西斯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刻苦阅读古代书籍的结果，我渴望理解书中所讲内容并运用这门科学。然后我加入了自己毕生的观察和经验。”如果说，阿尔布卡西斯是用阿拉伯语写下这本杰作的，那么它是如何找到进入拉丁语世界之路的？

康斯坦丁·阿非利加努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意即非洲人康斯坦丁，约1020年在迦太基的凯鲁万出生。那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当时已经成为重要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康斯坦丁首先在突尼斯学习医学，但他走南闯北，曾经到过巴格达、叙利亚、印度、埃塞俄比亚、埃及和波斯，这在他的时代实属惊人。康斯坦丁在返回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的途中，经过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勒诺，当时那里被看作欧洲领先的医学

教学中心。但萨勒诺并没有给康斯坦丁留下什么印象，他回到了突尼斯，可能没想过再与那里有什么交集。然而在几年之后，他因涉嫌使用巫术而被流放。非洲人康斯坦丁酷爱图书收藏，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他在流放时带上了自己珍藏的阿拉伯语古希腊经典、伊斯兰医学巨著、国际先进的医学培训技术和他自己能讲多种语言的能力。

康斯坦丁综合了阿拉伯人的医学知识，有时甚至随意抄袭，创作了多部拉丁文医书，包括外科手术、预后症状、医学实践、泌尿道、胃肠道疾病和医疗器械的论著。他最著名的长篇巨著是《医学全书》（*Liber pantegni*），这是首部拉丁文的综合性医学著作。^[32]康斯坦丁忙着编写《医学全书》时，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成为位于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都致力于医学教科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

康斯坦丁代表着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来自地中海的穆斯林皈依了基督教，将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文，预示着意大利诸行省将重回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拉丁经院哲学崛起，西方世界将主导医学教育领域。萨勒诺将以“世界上第一所医学院”闻名于世（虽然希腊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会为此争论不休），有些学者将康斯坦丁称为点燃文艺复兴之光的穆斯林。

翻译运动的第二位主要人物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Gerard，1114—1187年在世）。康斯坦丁是西方世界的外来者，将外面世界的作品和语言引入拉丁文化中，而杰拉尔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局内人”，他出生于意大利的克雷莫纳，也就是为我们生产斯特拉迪瓦里提琴的城市。他离开意大利，来到了当时仍然属于科尔多瓦哈里发王国的托莱多。在托莱多这座城市里，手稿和图书馆随处可见，既有阿拉伯语的古代典籍，也有伟大的

阿尔布卡西斯的新作品。[33]在接下来的40年中，杰拉尔德翻译了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医学方面的专著。当时很可能还活跃着“另一个”从事医学翻译的“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因为那里翻译学校非常普遍，涉及古代学术著作的翻译时，通常有很多作者愿意出力。“杰拉尔德翻译了阿拉伯医学百科全书如阿维森纳的《医典》，开阔了西方医学学者的眼界，让他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医学是一种理性科学，可依循逻辑和方法论来研究，并以哲学和自然秩序为坚实基础。”[34]

康斯坦丁和托莱多翻译家们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学习的兴趣，将欧洲学术从长达千年的漫长冬眠中唤醒。穆斯林使纸张更加普及，加上拉丁语版本的原始资料大量出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觉醒。直到15世纪，手抄书一直是几千年来手稿的标准格式，所有的西方书籍都要经过手工抄写。[35]抄写员们经常聚在修道院的“缮写室”（scriptorium）里，在一位抄写员主管的密切监督下抄录宗教文本。在谷登堡革新印刷术以前，书籍制作一直是一项异常繁重且成本高昂的工作，但是图书制作的机械化彻底解锁了新思想的传播力。

“文艺复兴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我发现时期，而不是对过去做后知后觉的解读。”[36]显然，对于任何一个求知的灵魂来说，文艺复兴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整个欧洲的联系交往让伟大的思想者们见识到了古典著作与其他智者的洞见。人们都能够接触到专业权威的论著，反过来也激起了讨论和不同见解，对权威的广泛批判也由此触发。

到了15世纪，师徒口授的知识传播方式被永久改写。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及其追随者创建了医学和外科学的基础；基督教时代早期，盖伦在那些论著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他的权威性在欧洲固若金汤，仅在伊斯兰的智慧宫受到了某些挑战。拉丁语译

本和纸张传入欧洲，推动了经院哲学的诞生，促进了萨勒诺、博洛尼亚、帕多瓦、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等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兴起。在15世纪中期，正当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时候，印刷术的出现释放了一股知识的洪流：深刻见解、科学观察、星象图表、哲学沉思、宗教观点、政治批评以及有关人体的思考，包括对人体的构成、功能及其功能障碍，还有外科手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的思考，纷纷涌现。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医学教科书印刷本，将在1543年由一位29岁的天才精心制作出来，此书将永远改变医学，乃至整个世界。

[1]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4).

[2] Matt Ridley, *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 How New Ideas Emerg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5), p.120.

[3] *Ibid.*, p.125.

[4] Kumar Srivastava, “The ‘Adjacent Possible’ of Big Data: What Evolution Teaches about Insights Generation,” *Wired*, Dec. 2014.

[5] Steven Johnson, *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0), p.31.

[6] Elizabeth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

[7] Mark Kurlansky,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2016), p.13.

[8] Craig Kallendorf, “Ancient Book,” in *The Book: A Global History*, M. F. Suarez and H. R. Woudhuysen,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9.

[9] Mark Kurlansky,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2016), p.14.

[10] John Ma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MJF Books, 2002), p.24.

[11] 莱茵兰，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地区。——译者注

[12] Ibid., p.48.

[13] Ibid., p.124.

[14] Ibid., p.124

[15] Ibid., p.164.

[16] Ibid., p.8.

[17] 易卜拉欣即《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是传说中古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译者注

[18] Mark Kurlansky,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2016), p.26.

[19] Ibid., p.160.

[20] Steven Weinberg, To Expla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101.

[21] Ibid., p.104.

[22] 哈伦·拉希德是马蒙之父，在位期间（786—809）同样大力发展文化学术研究。——编者注

[23] 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 Macmillan, 1937), p.315.

[24] Hillel Ofek,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Winter 2011, pp.3–23.

[25] Ibid., p.50.

[26] Hillel Ofek,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Winter 2011, p.7.

[27] David Wootton, 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0.

[28] Michael Flannery, Avicenna entr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quoted August 11, 2016.

[29]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p.57.

[30]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编者注

[31] Steven Weinberg, To Expla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112.

[32] Charles Burnett and Danielle Jacquart, eds., Constantine the African and Ali ibn al-Abbasal-Magusi; The Pantegni and Related Texts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94),Preface vii–viii.

[33] Nicholas Ostler, Ad Infinitum: A Biography of Latin (New York: HarperPress, 2009),p.211.

[34] David Osborn, “Constantine the African and Gerard of Cremona,” in GreekMedicine.Net, quoted August 20, 2016, http://www.greekmedicine.net/whos_who/Constantine_the_African_Gerard_of_Cremona.html.

[35] Christopher de Hamel, “The European Medieval Book,” in The Book: A Global History,M. F. Suarez and H. R. Woudhuysen,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59.

[36] John Ma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MJF Books, 2002), p.88.

第三章

维萨里与《人体构造论》

我盯着父母藏书的书架，试着决定自己接下来要翻阅哪一本“世界百科全书”。我的父亲是一位兽医学研究人员，虽然我们没什么钱，但是我的家人在1976年像那时的很多家庭一样，决定“投资未来”，购买家庭百科全书。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信息按照字母排序并浓缩在22英寸[1]厚的套装里，正如广告所说，让知识的世界在指尖游走。我一收到这套珍贵的丛书，就一口气翻阅了几个小时，读到了“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国会荣誉勋章”和“世界各国国旗”。

我拿出第8卷，书脊上是字母H。我不是在特意寻找什么，只是看看能翻到什么感兴趣的内容。我倚在向日葵花色的帆布沙发上，大拇指翻着书页，浏览标题。在翻到最后几页时，我呆住了。这四张纸不同于其他那些光滑的铜版纸，是透明的塑胶材质，每张塑胶片上印着人体的一层结构。

第一页的人体形态图没有皮肤，目视左侧。身体右半部分也就是靠近书脊的一侧，胸部、腹部、右臂和右腿被完整的肌肉覆盖；而身体的左侧只画了胸腔。我非常着迷地看着肺和内脏。翻到这页的背面，可以看到身体正面的内部——整个胸腔和肌肉。第二页的正面，左臂只显示了肌肉，但肺部、肝部、胃部和肠道都清晰可见，它们仿佛闪着湿漉漉的光泽，栩栩如生。每个器官都注有数字编号，并对应着页边浅蓝色纵栏中标注的说明。翻到

第二页的背面，我非常兴奋地发现了大脑——头骨内部的颅腔。

第三页显示了肺部、心脏、大血管、胰腺和肾脏。我翻来覆去地看着这页，按照标注的编号，记住了器官及其位置，不确定它们之间是否相互连接，但是每个内脏或器官都有各自的用途，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张大部分是骨骼和神经，翻过这页，可以看到人体的背面。我找到了第159号肌肉——臀大肌。它听起来像个难以启齿的词儿，我幼稚地笑了起来。

光看这些图片，我不明白食物是如何在入口之后来到胃部的，但是随附的文字说明告诉我，食道是液体和已咀嚼食物的通道，小肠吸收食物颗粒，之后它们进一步被胰腺分泌的消化酶分解。任何未被分解和吸收的食物都会继续进入大肠，在那里，身体抽出其中的水分留下“废物”。还是小学生的我琢磨着，“废物”等于“粪便”吗？

这部百科全书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特别的图示，它传递给我的信息非常明确：在所有卷册中，人体是最重要的主题。虽然其他话题仍能激起我的兴趣，但是这些解剖图最令我着迷。其实它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经常回来翻阅这几张塑胶片。

15世纪，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扬·胡斯和圣女贞德被处以火刑，美第奇家族权势显赫，哥伦布驶向新大陆，犹太人在宗教裁决期间被驱逐出西班牙，还有“发现”（discovery）一词问世。

1492年10月，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时，他并没有合适的词语可以描述“遇见一个未知的世界”的行为过程。哥伦布用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撰写航行日志，但是只有葡萄牙语中有“发现”（descobrir）一词。在15世纪晚期之前，作家们不太容易解

释“发明”或“发现”的概念，往往要借用其他说法，比如“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技术”[2]。

戴维·伍顿在《科学的诞生》中断言：

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为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种可以投身其中的新事业，即发现新知。这一事业要求社会和技术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有可靠的交流手段、共同的专业知识，以及能够排除众议和裁断争议的专家群体。这些专业人士中，首先是制图师，接着是数学家，然后是解剖学家，再后面是天文学家……[3]

因此，“发现”这一概念与“探索、进步、独创性、真实性和新颖性等想法密不可分，它是文艺复兴晚期的典型产物”。[4]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在世）提出了日心说，将太阳看作我们太阳系的中心。他生活的那几十年，恰逢“许多重大变革将一切‘可获取的资料’传递给所有的读书人，而我们现代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点。认真研究这些变革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末之前，星图绘制、地图绘制、统一年表、编纂法典以及书目汇编等工作的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观星者发觉他们可以用图表来描述夜空；而早期的解剖学家，即人体制图师，同样能绘制出错综复杂又颇具预见性的人体解剖图。

印刷文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古代哲学家的手抄记录融会贯通并完整呈现在书中，同一时期流行的精美绘画与图表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质量。比如佛罗伦萨的出版商能够展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16世纪的智者也有机会重温有史以来最权

威的医生盖伦的作品。1543这一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两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哥白尼具有开创意义的手稿于纽伦堡出版，他恰好也于那一年去世；另外一本是解剖学著作，由29岁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撰写，他在其中斗胆挑战伟大的盖伦。这部精心编纂的杰作《人体构造论》为医学教育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1204年，欧洲人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授意下发动远征，由威尼斯提供补给的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并将掠夺的珍宝带回了亚平宁半岛。洗劫之物包括艺术品、雕塑、贵重金属和古代文献手稿。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其他被征服领土的古代哲学家作品“使一部分人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时代的光芒远胜于今日，当时的人更强调人性而非灵性。由此吹起了一股人文主义的新风，人们开始重视思想自由，而不是中世纪哲学神学家所要求的无私顺服。人文主义鼓励对人类潜能的探索和人性的表达，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以及一切艺术形式中”。[6]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向奥斯曼土耳其人投降，而东方的基督徒大规模西迁是欧洲再次觉醒的重要因素。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翻译机构已经拥有译自阿拉伯语的拉丁文作品，但是拜占庭人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手稿来到意大利城邦之时，正值谷登堡完善活字印刷。

15世纪，一群工匠离开了君士坦丁堡，逃往威尼斯。威尼斯人以其先进的船舶技术、贸易网络、会计系统和丰富的银行知识，成为拜占庭的主要权力掮客已经几十年了。驶向威尼斯的艺术家和技师中有一队玻璃工匠，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彩色玻璃的制作自古罗马就已经存在，但是拜占庭的工匠们将制作工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彩色玻璃作为一种新奢侈品进入人们的生活。然而，在水城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因动辄“失火累及邻里”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7]于是

他们跨过潟湖，搬至穆拉诺岛上。一个创新中心就此形成，而“玻璃之岛”也成为该工艺的完美典范，至今仍然是精美玻璃制品的产地。

史蒂文·约翰逊在描述这一巨大突破时写道：

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安杰洛·巴罗维尔（Angelo Barovier）用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试验，历经多年，几经失败。最终他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烬，然后把它们加到熔融玻璃中。混合物冷却之后形成了一种透明度极高的玻璃。由于它就像是最透明清澈的石英晶体，巴罗维尔将其称为水晶玻璃（cristallo）。这就是现代玻璃的诞生。[\[8\]](#)

令人惊讶的是，现代透明玻璃的制成使多项关键的创新得以实现，这些创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并定义了文艺复兴的开始。透明玻璃被偶然制造出来，紧接着镜子和曲面玻璃也（几乎）偶然地被制造出来，镜子和小曲面透镜的问世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彻底颠覆医学和科学领域。

威尼斯人已经发现了制作水晶玻璃的技术，那么下一个主要的挑战便是制作更大的玻璃平面，考虑到玻璃制作一开始总是吹制玻璃泡，而玻璃泡必须在冷却时迅速变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进一步研制玻璃的实验中，有一些来自远方的基础材料帮助生产出最优质的玻璃，包括来自埃及的草本植物和来自地中海贸易伙伴的沙子。为了制造出更大的平面玻璃板，他们改进了方法，先将玻璃吹制成圆柱体，再纵向切割熔融玻璃并将其放平。早期镜子的制作采用在冷却中的玻璃的背面贴银薄片的技术，但是玻璃和金属的收缩系数不同会导致玻璃破裂。穆拉诺人发明了一种含有汞和锡的合金，它使玻璃不易碎裂，并形成光泽

饱满、高反射度的表面。[\[9\]](#)镜子尽管仍然属于奢侈商品，但是已经得到普及，在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人最私密的一层的揭示，在镜子出现之前，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清楚地见过自己的面容，只能在水池或者抛光金属的表面看到破碎而扭曲的大致模样。”[\[10\]](#)

因此，15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发展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颠覆性变革奠定了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在德意志的修道院被发现，透明水晶玻璃和高级镜子在威尼斯制成，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并导致古希腊手稿流往意大利，活字印刷机问世。一般认为“个人主义”诞生于公元1500年，[\[11\]](#)精制镜子和首批自画像在同一时期出现也绝非偶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自我意识、内省、与镜像对话是与新客体一起发展出来的。”[\[12\]](#)人类第一次能够看到他自己，当人本身成为注意的焦点，财产权和法律惯例开始围绕着个体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围绕家庭、部落、城市或王国等集体单位展开。[\[13\]](#)15世纪中叶新出现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促使精英奇才凝视自己的内在，去探索思想的动机和人的躯体，或以哥伦布式的说法，去“发现”人体的构造。随着黑暗时代渐行渐远，我们的内在思想和身体构造变成当时探索的沃土。将目光聚在人体上的勘测者们，对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新大陆”还一无所知。

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即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时代，人体解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衰落预示了医学院的消亡，而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中心。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里亚被纳入罗马帝国后，帝国进一步编纂了反对人体解剖的法典，于是人体解剖在法令和大众宗教情感上都遭到反对。[\[14\]](#)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盖伦成为不容置疑的解剖学权威，即使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人类尸体的解剖或者尸检。他的调查研究以动物为基础，包括农场动物和地中海猕猴。

8—13世纪，人体解剖禁令在穆斯林担任知识领袖的时代也一直持续着，只有零散的一些原创性解剖研究。“伊斯兰的解剖知识只是给盖伦穿上了穆斯林的外衣”，[15]而伟大的阿拉伯翻译家们仅仅重述了盖伦的主张。有一种令人好奇的观点认为，为了方便将死在遥远东方的十字军士兵运回家乡，人们会将尸体肢解后蒸煮，再将骨骼清理干净，而这一行为可能为人体解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亚平宁半岛，学习医学的兴趣再次被点燃，首先在萨勒诺，之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这使年轻的研究者无视1299年卜尼法斯八世的禁令进行了首次人体解剖。禁令“并非针对人体解剖，而是禁止蒸煮那些客死他乡之人的尸体[以便回乡安葬]……尽管教皇从未颁布过任何专门反对解剖尸体的声明，但是似乎有某些过于狂热的地方教会神职人员有意无意地反对解剖实践”。[16]认为教会禁止解剖是错误的想法；讽刺的是，这些禁令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异教徒颁布的，其效力一直持续到14世纪，而正是他们的意大利后代最有力地挑战并推翻了一些法律。

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医生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成为中世纪第一个重要的解剖学家。他于131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解剖学》，这是第一本专门研究解剖学的现代书籍。蒙迪诺看似十分倚重盖伦的论著，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显然是以他自己的解剖学实践为基础的。《解剖学》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它将指导此后200年的解剖学家，并点燃整个欧洲的医学求知欲。博洛尼亚大学由此成为解剖实践和人体研究复兴的第一故乡，[17]这次复兴在14世纪很快就延伸到帕多瓦、威

尼斯和佛罗伦萨，到了1501年，又传播到锡耶纳、佩鲁贾、热那亚和比萨。这里要再次强调，尽管14—15世纪天主教会充满罪恶，但是它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禁止人体解剖。

解剖学知识崛起、人文主义的自我认识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在16世纪早期，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丢勒和提香同时出现，他们互相竞争，偶尔也有合作。1502年，贾科莫·贝伦加里奥（Giacomo Berengario）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学外科学和解剖学系主任，接了蒙迪诺的班。他编写过一部近千页的巨著《蒙迪诺评注》（*Commentaria*，1521年出版），也只有印刷革命才使其成为可能。贝伦加里奥是第一位“没有一直受制于盖伦或穆斯林学者等早期权威观点”^[18]的医生，他相当相信自己对人体及其功能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对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拥有拉斐尔的名画《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蒙迪诺评注》尽管还很粗糙，却是第一部整合了文字和插图的解剖学书籍，贝伦加里奥也被称为“第一位较好地认识到解剖插图真正意义的解剖学家”。^[19]

尽管外科手术还局限于脓肿切开、给战场伤员做初步检伤分类以及应急处置，但整体趋势是人们对身体运作方式的理解日益加深。随着印刷术的改进、木刻版画的完善以及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一位年轻的解剖学家兼外科医生撰写出史上罕有的伟大著作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

1514年，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生。他出生在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父亲安德里斯是御用药剂师，而祖父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御医。在那个王室成员经常出行的时代，王室车队的行进使维萨里的父亲很少在家。维萨里受益于精英教育，先是在布鲁塞尔，少年时又去了附近的鲁汶。在鲁汶

大学的城堡学院（Castle School），十几岁的维萨里学习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内的哲学和艺术，并精通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文。出身于医学世家的维萨里选择了医学院并不奇怪。1533年，他踏上了前往巴黎的道路。

维萨里就读于巴黎的医学院，期望自己能在四年内获得学位。现在看来，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需要四个学年的学习似乎有些奇特。现代外科医生可能会问，他们在学什么？这个专业课程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那时没有显微镜等仪器，也没有生理学（研究人体动态功能）、病理学（研究器官和细胞疾病）等概念，微生物学（研究细菌和病毒）还完全没有出现，而外科手术仍然非常原始，今天我们在加里曼丹岛保留着石器时代生活的村庄里还能见到这类外科手术。我们只能推测，当时的医学院学习盖伦的医术和古希腊医学，其中充满了哲学思想和谬误。维萨里在巴黎学习了三年，但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前被迫离开了那里。

在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来到被称为“光之城”的巴黎之前，那里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还在为获得社会声望和认可争论不休。根深蒂固的人体解剖禁令使医生对任何解剖学研究都毫无兴趣。因为解剖学研究与外科手术紧密相关，所以内科医生完全没有动力去严肃认真地研究人体，当然更不会去碰尸体。现代读者可能会认为，如今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不论他们专攻于哪个领域，一开始都是同一所医学院的同学。但是在中世纪，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并不在一起学习受训。外科医生会由医学专业的老师单独教导；而理发师的学习则远低于这个水平，他们没有学过拉丁文，当然也没有学过希腊语，只能偶尔从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指导中学到少许。理发师最早聚集于修道院周围，他们会为中世纪进入修道院的教士削发。而在过去一千年中，理发师逐

渐成为理发、剃须和希波克拉底式放血疗法的操刀专家。在1540—1745年的英国，理发师跟外科医生不分彼此。最终理发师成为专门负责剃须和理发的群体。只有理发店门前的条纹彩柱提醒我们，他们以前还有个工作是给顾客放血。

就像中世纪的教士对教区居民实行控制一样，“拉丁文的使用沿袭了古老的权力与控制传统……掌握拉丁文便拥有了开启奥秘之门的钥匙”。^[20]在多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巴黎终于在1516年就医疗体系的等级问题达成了协议——内科医生继续高高在上，而外科医生接受了位居其下。巴黎人并不愿效仿领先的博洛尼亚人和帕多瓦人，没有像他们那样卷起袖子，亲自解剖和研究，法国内科医生拒绝接触尸体，他们稳居宝座，居高临下地讲课，而外科医生则从旁进行实际的解剖操作。

15世纪时，外科已在意大利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北部国家，外科医生得到的尊重远不及内科医生。他们的公会（相当于现在的工会）由外科医师和理发师共同组成，严格设立会员准入的规矩和标准。“理发兼外科”的技艺看起来更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手术”，仅限于最基本的创伤稳定化处理，包括骨折、刀剑伤口以及因为从中国引入火药而出现的新型创伤。

14和15世纪的欧洲战场见证了火药的巨大威力，而来自枪炮的“爆炸伤”似乎比以往所见过的任何外伤都严重得多。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1510—1590年）作为一名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的儿子，从未上过正规的医学院，却成为四位法国君主的御用外科医生。法国第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帕雷彻底改变了战争创伤的治疗方法，并通过其著作（以法语写成，而非拉丁文）成为一位颇富影响力的人物。文艺复兴早期的内科医生发现他们对严重枪伤患者束手无策，那些伤口比人类曾经面对过的任

何创伤都要复杂。于是，这些患者就留给了理发师或外科医生。而且在牛顿时代之前，人们很难理解是火药推动弹片所产生的能量而非碎片中的某种“毒药”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教皇尤里乌二世的外科医生乔瓦尼·达·维戈（Giovanni da Vigo，1450—1525年）在他1514年和1517年出版的著作中，推测枪伤是一种“由火药引起的中毒”，应该模仿角斗士受伤时所使用的古老疗法，用沸油烧灼，以毒攻毒。我们可以想象，沸油烧灼可以止血，于是误导创伤专家断言治疗有效；但实际上，这只能扩大“损伤区域”并造成更严重的创伤。不幸的是，维戈的观点影响面很大，导致战地外科医生们乖乖地在这些爆炸伤口上浇油。

在1575年出版的《帕雷全集》（*Oeuvres*）中，帕雷简明地描述了自己在1536年都灵战役期间所遭遇的危机。在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之后，深夜时分，帕雷的沸油已经耗尽。他记录道：

最后，我没有油了，被迫使用一种由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制成的助消化药为伤员疗伤。那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心想那些没有得到沸油烧灼的伤员将会中毒身亡。这想法督促我天一亮就去探望他们。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敷了助消化药的伤员的伤口没有红肿或发炎，基本不疼，所以他们整晚休息得很好。而另一些使用了沸油烧灼疗法的伤员却发着烧，同时伤口周围红肿，剧痛无比。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用如此残酷的烧灼疗法去治疗那些受了枪伤的可怜人。

帕雷偶然发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无意中进行了一次对照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与当时固若金汤的学术权威背道而驰。帕雷将对早期的外科手术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他还提倡结扎（缝合）血管，在截肢后使用假肢，他还改善了

产妇产娩的处理方法。书籍印刷技术的适时出现则为帕雷著作的出版送上了有利的条件；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还会反复看到的那样，战争为医学的进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安德雷亚斯·维萨里于1533年进入医学院学习，帕雷在同一年也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医院——毗邻巴黎圣母院的主宫医院。维萨里接受的是当时的典型医学培训。盖伦派理论在此如日中天，维萨里接受的解剖学指导充其量算是入门。维萨里在这里第一次表现出他极高的求知欲，或者说他贯穿一生的特立独行。在他自立门派以后，他承认如果只接受教授的教导，“如果我在巴黎学医时，没有自己动手研究，而是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那些毫无技术可言的理发师为我和同学们做的……肤浅随意的器官展示”，自己就不会成功。^[21]正如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样，外科学是由精工巧匠、古怪分子、孤独的天才、给人启迪的导师和特立独行的老顽固共同打造的。维萨里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造访巴黎圣婴公墓，挑选腐烂的尸体和爬满蛆虫的骷髅，后来他回忆自己在墓地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时常遭到凶恶野犬围困”。^[22]

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战争爆发，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被迫回到布鲁塞尔，因为在人们眼中，他成了一个生活在巴黎的佛拉芒敌人。他在布鲁塞尔郊外的鲁汶医学院迅速安顿下来，并很快开始在当地搜寻尸体。维萨里和一个内科医生朋友在城墙外寻找死刑犯尸骨的时候，撞上了一具吊在绞刑架上的尸体。他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推测尸体最初曾在稻草上被焚烧，但是上面的肉已经被鸟类啄食干净了。他还观察到尸骨因为有干枯的韧带连接而保存完整。维萨里回忆道：

我发现尸体已经干枯，没有任何一处潮湿或腐烂，于是利用了这个天赐良机。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爬上木桩，将股骨从髌骨上拽下来。这一拽，手和手臂连着肩胛骨也都掉了下来，但是一只手的手指、两块髌骨，还有一只脚已经不见了。我连续往返几次将这些肢体偷偷带回家，此后就剩下头和躯干了。到了晚上，我故意让自己被关在城外，这样就可以想办法取下胸腔——它被牢牢地系在链子上。我太渴望拥有那些骨头了，以至于半夜三更独自置身于那些尸骨中。我奋力爬上木桩，毫不犹豫地一把拽下望眼欲穿之物。

维萨里用沸水对这些骨头进行了软化之后，切掉了韧带和软组织。他继续写道：

最后，我偷偷地把所有骨头都煮了一下，令其为我所用。在把它们清理干净后，我将其组建成标本并保存在鲁汶。[\[23\]](#)

在鲁汶短暂停留之后，维萨里前往直意大利的帕多瓦，那里是世界顶尖医学院的家园。维萨里正是在帕多瓦大学参加毕业考试的。帕多瓦大学近400年历史的学术档案告诉我们，他“在这场严格的考试中表现优异……考官毫无异议，一致让他通过”。[\[24\]](#)令人惊讶的是，毕业之后第二天，维萨里就被任命为外科学和解剖学系主任。尽管他在四年中辗转就读于三所学校，他仍然在系里脱颖而出，显然某种不同寻常之事正在帕多瓦酝酿。

1537年12月，维萨里毕业后的一天，这位新任外科学和解剖学系主任在一名18岁男性的尸体上开始了自己的首次解剖学实践，这次解剖将持续18天。维萨里遵循蒙迪诺设立的方案：首先

是腹腔，之后是胸腔、头颈、颅脑，然后是四肢。人们发现，这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维萨里集所有角色于一身，他既是讲师，也是示教者和解剖者。这位声望显赫的内科医生，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手握手术刀站在尸体旁，担当起外科医生的角色。他不必对着书本念出蒙迪诺或盖伦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著作对他来说早已烂熟于心。刚满23岁的维萨里还推出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即为学生张贴图例或者图表。这是一个真正潜心于传道授业的人，而不到一年，他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解剖图谱》（*Tabulae Anatomicae*）。绘图的方式突破传统，反映出维萨里的观察结果，证实他所想要传达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助记价值。

《解剖图谱》在威尼斯印刷，使用了6张尺寸为19英寸×13.5英寸的大木刻版画解剖图。1538年出版的这本书第一次暗示盖伦学说有不可靠之处。维萨里在盖伦的描述中发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于是这位年轻的解剖学家开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拒绝接受过去的权威，除非自己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两年后，维萨里出版了另一位解剖学家论著的修订版——约翰·君特（Johann Guinter）^[25]的《解剖学原理》（*Institutiones Anatomicae*），该书后来成为配合解剖学讲座和演示的教学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大部分是抄来的，维萨里对原作进行了修改，并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尽管他替别人的作品出修订版有些奇怪，不过还有更糟糕的：维萨里的文字和插图后来被其他的出版商一字不差地完全剽窃。

16世纪30年代后期，维萨里开始对盖伦的著作进行全面分析，加入希腊语翻译并对其解剖描述进行学术性评估。对于维萨里来说，盖伦并非永远正确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巴黎和鲁汶一些教授的鼓励下，他开始大胆地准备编写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以挑战盖伦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他借助了新印刷技术的

优势，也得益于北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早期已经广泛提高的艺术审美水平。在这次调查研究期间，维萨里与英国人约翰·凯斯（John Caius）同住，他也二十多岁，来帕多瓦学医。凯斯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学院。他应当是协助了维萨里的希腊语翻译工作，但是他比维萨里更忠于盖伦原作。历史学家奥马利（C.D. O'Malley）说：“虽然凯斯与维萨里实际上是一代人，在他们的时代，人体标本解剖已经在进行，基于解剖学的科学治疗也已经开始；但是在精神上，凯斯属于对盖伦深信不疑的上一代，那时的医学人文主义者认为盖伦掌握了解决所有医学问题的关键，因此那些由原汁原味的希腊典籍精确翻译而来的拉丁文著作，才是他们可以为医学界提供的最大福音。”^[26]后来凯斯回到伦敦并大获成功，将冈维尔学院从财务危机中解救出来，学院在1557年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成为如今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维萨里在帕多瓦和邻近的博洛尼亚忙碌着，他的教学和解剖天分吸引着学生们。“重要的是，无论维萨里去哪里做校外讲座，一股掘墓盗尸的浪潮都会在当地出现。”^[27]刚入土的公民和罪犯成为维萨里及其“解剖学”的养料。当时的一份报告说：“[在帕多瓦]某位修道士的情妇突然去世……尸体被帕多瓦学生从她的坟墓中盗走并进行了公开解剖。他们异常勤奋地从尸体上剥下了整张人皮，唯恐被那位修道士认出来。”^[28]

通过挑战自己所学的传统智慧，维萨里变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人体。在探索与发现的年代，航海家已经在海图上绘制出南美洲、非洲、印度和东亚的海岸线；维萨里的探索课题与之类似，并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人类的进步，他迫切地想以最出色的方式传达这种知识。

《人体构造论》的正式编写始于1540年初，维萨里刚过完

自己的25岁生日。他希望《人体构造论》能够指导解剖和成为了解人体的指南。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人体的书，不是那种给离群索居的绅士的消遣。这是一部为医生定制的指南，其后的精简版《概要》更是专门为医学生设计的。《人体构造论》的内容包括对解剖每一步所需的器械的描述（配有图片），还介绍了煮沸和清理骨骼的技术，以及全部肌肉、关节、器官和神经的解剖过程。有时候，他一连几个星期独自待在帕多瓦的家里写作和反思。维萨里可能花了至少一年的时间编写《人体构造论》。早期出版物中的木刻版画取自他亲手所绘的插画，而《人体构造论》中的插图最后全部由专业画家绘制。印刷革命赋予了维萨里及其插图绘制团队极强的再生产能力，而他的前辈们编写的是“一次性”书籍，其文本通过手抄得以流传，而插图在每次复制时都需要重画一次，连续复制之后，质量会大大降低。

在其早期著作中，维萨里已经暗示了盖伦的论述前后矛盾以及他缺乏人体解剖经验的问题。《人体构造论》一书不再继续暗示，只有些许细节提到了这位医学大师。在《人体构造论》的引言部分，维萨里肯定地说道：

在帕多瓦那所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我教授外科学，而由于解剖学与之相关，我致力于研究人体的结构。所以，我曾非常频繁地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进行解剖实践，同时，我抛弃了学校流行的荒唐手法，我的演示和教学操作与古代传统没有任何不同。

然后，他提到了包括盖伦在内的解剖学诸神，并批判了他们的信徒：

对于真心关心解剖的人来说，他们〔早期的解剖学家〕似乎对人体解剖毫无兴趣。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定地依赖其领导者〔盖伦〕的著作，再加上其他人解剖的失败，他们竟然将盖伦的学说简化为一段概要（如果说他们真正理解过盖伦的话），并且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此铿锵有力的文字竟出自一个28岁青年笔下，不过在引言的后半部分，他又委婉起来：

现在，我无意批判盖伦的错误教导，他无疑是解剖学教授之王；我更不希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在背叛这位做出大量有益贡献的作者，对他的权威不闻不问。[\[29\]](#)

用马克·安东尼的话来说，“我是来埋葬恺撒的，而不是来赞颂他的”。维萨里接下来引用了两百多个实例，它们都显示盖伦在“人体结构及其使用和功能”方面存在错误。他所传达的信息逐渐清晰：旧王已死，新王当立。

本章前面提到了安布鲁瓦兹·帕雷，有些人认为他是第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我们可以认为，维萨里通过强调外科使用双手的技巧，使外科学从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这一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升了一个档次，他照亮了外科学发展的前路。在《人体构造论》一书中，维萨里感叹道，人类忽视了“最基本的工具——手，于是〔医学在动手操作方面〕遭到轻视，由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来诊疗”。[\[30\]](#)古代早期的医生使用膳食、药剂和双手来行医，而维萨里时代的医生，已经不知不觉地“大幅退化，他们把烹制以及给患者准备膳食的一切工作都留给了护士，把药物的调剂留给了药剂师，把双手的工作留给了理发师”。[\[31\]](#)家庭出身良

好的维萨里提出要与患者亲密接触，尽管这会使自己污秽不堪，臭不可闻。古代医生“专门致力于治疗脱臼[关节脱位]、骨折、外伤……使勇士们从标枪、飞镖以及其他战争恶魔所带来的痛苦中解脱”。^[32]维萨里希望外科医生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手来治疗病人，“像希腊人那样，藐视那些内科医师的窃窃私语，如同这样做能让诸神称心如意一般”^[33]——当时不少内科医生对“动手”进行解剖和治疗的技艺不屑一顾。大家公认，帕雷的功劳是以更明智的方法治疗战场上的外伤，以更温和的方式处理血管破裂；而维萨里使人体研究重获关注，并强调了动手的重要性，这两项成就使他成为外科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准备好关于解剖的文字部分之后，维萨里开始制订插图部分的最终方案。由他委托制作的杰出绘画，经木刻印版大规模地转印到纸张上，成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看懂的插图。大画家提香（1490—1576年）一辈子都生活在威尼斯共和国。提香在他极为高产的那段时期，在威尼斯拥有一个画室。人们认为《人体构造论》中最精美的插图就很可能出自那个画室里的一位青年才俊之手。书中的插图分为四大类：介绍性插图、肌肉示意图、首字母配图，以及绝妙的解剖图。所有这些精致的艺术作品都先绘制在纸上，然后镜像转刻到相同尺寸的木刻印版上，这一步任务艰巨。木刻印版由梨木制成，工匠将其按纹路锯开，并以热亚麻籽油擦拭，然后极为精密地、小心翼翼地雕刻。在木刻印版完成之后，维萨里给位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位印刷商写了一封信。他选择的是约翰内斯·奥普瑞努斯（Johannes Oporinus）。他是巴塞尔的希腊语教授，在学者中以注重细节和高品质制作闻名。1542年9月，这封信件和所有的木刻印版搭上一辆从威尼斯出发的货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巴塞尔。接下来，奥普瑞努斯和他的团队在维萨里的协助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整理手稿和木刻印版，到

1543年夏天，成书初现。尽管当时大多数用于印刷的木刻印版要么被回收，要么被丢弃，但是《人体构造论》的印版保留了几个世纪，其间失踪了几十年。有传言说，那些印版被藏在慕尼黑大学的图书馆里，人们经过一番调查，于1936年在图书馆阁楼的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它们，而且印版保存完好。^[34]可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印版全部被炸毁，如今荡然无存。

《人体构造论》中有两张大幅的介绍性图像。第一幅是扉页，第二幅是维萨里本人。扉页图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木刻印版图像之一；它的视角、清晰度、构图和对绘画技巧的驾驭叫人叹为观止，哪怕它只是一幅手绘作品。而这幅绘画还被雕刻大师刻成了印版上的浮雕，简直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这幅图描绘的是一次公开解剖，众人群集（我数了一下，至少85人，不包括尸体、一只狗和一只猴子）挤在解剖台周围，维萨里正在示教一具尸体的内脏。（见彩插3.1）它让人想起拉斐尔于1511年完成的《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其实那幅图像的右侧有一个人看起来就很像《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传统说法认为其原型是1519年去世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但在这里，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尸体。这是维萨里的理想吗？如果天文学家在丈量星空，我们的解剖学家是不是在丈量人体？

肌肉示意图在一整张页面上画得满满当当，事实上，在少数保留至今的《人体构造论》原版副本中，每张纸要比普通对开尺寸^[35]大，展开后更比原页面大出1/3。这些大幅图纸描绘的是活动的尸体，它们没有皮肤却并非没有生命，面容极度痛苦地扭曲着，令人毛骨悚然。这些插图具有连续性，表示解剖的层次在深入；随着解剖层次逐渐深入，附着在身体上的肌肉也越来越少。肌肉示意图设置在威尼斯田园乡村的背景中，人体高高地栖

息于山丘上，教堂和乡村建筑点缀在地平线上（见彩插3.2）。

首字母配图贯穿全书，成为段落之间诡异甚至惊悚的小插曲。开启新一段落的大写首字母字号很大，以前都是手绘的装饰，但印刷术问世之后，木刻印版让印刷变得更有效率。《人体构造论》中的首字母配图使用了字母表中2/3的字母，且每张配图都包括裸身男童或者小天使，他们恶作剧般地参与掘墓、盗尸、煮骨、接骨，更恐怖的还有在活猪身上做实验。^[36]这一切都让人想起我们祖先曾经忍受的那个可怕的时代，然而子孙后代也正是从那个时代中受益匪浅。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解剖图本身就是最引人注目之处。在写给奥普瑞努斯的信中，维萨里叮嘱他，所有印刷尽量“美观而轻巧”，木刻印版的使用尽可能“精确而优美”。书中插图标注了字母以便与对应的文本关联，这还是第一次。阅读维萨里的文字时，这些字母可以引导读者在插图中找到特定的身体部位。此外，页边空白处的数字和字母还帮助读者对照检索其他插图。维萨里所取得的突破是多方面的，他为人类呈现出一部震撼视觉的教学杰作，并不时挑战着1500年的权威。这几百页的文字和插图清晰易懂又美妙绝伦地呈现出人体及其功能；维萨里论及生理学和器官功能的部分，会时不时地挑战盖伦的观点。当然，书中明显的缺陷是有关神明、邪灵，以及灵魂存在于何处的讨论——毕竟还要再等几百年，高级显微镜才能揭开细胞及其功能的秘密。

维萨里说：“我意识到，由于年龄的原因——我现在28岁——我的成果没有什么权威性，而且因为我频繁暗示盖伦教导中的谬误，没有看过我做解剖演示的人自然会攻击我，而这本书在攻击声中无处存身。”^[37]但事实正相反，维萨里的杰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而他也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大约两百年内都无人匹敌。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书迷。如果有幸手持一本珍贵的无价之宝，对我来说那感觉的确不同寻常。我花了几个月去联络伦敦惠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的档案管理员，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又填写了准许进入特殊档案室的一系列必填表格，终于等到了亲自研究《人体构造论》1543年副本的这一天。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图书馆之一，因为珍本档案室禁止携带钢笔，我将背包和钢笔锁在储物柜里，扫描学者证通过安检，来到了大楼的顶层。我确实有些忐忑不安，尽管准备充分，我还是担心自己一路来到伦敦，最后仍然无功而返。最后与我往来邮件的一位名叫罗斯的档案员，我刚通过最后一道安检门进入内室，他就立即向我走来。“是施耐德医生吗？欢迎来到惠康图书馆。看一下《人体构造论》吧？”

我坐下来，意识到他做过功课，上网做了调查，确定我不是那种冒名顶替的骗子，来到至圣之殿糟蹋这些无价之宝。等罗斯再次出现时，他抱着一本16英寸×11英寸的浓绿色巨著。那本书的尺寸令我惊愕得目瞪口呆，真的如同一部书中神兽。绿色的皮革表面光滑润泽，肯定还没超过一百年，我当时就琢磨原本的装订是什么样子的。罗斯把书放在档案桌上，打开之前，种种仪式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身心净化、郑重其事、肃然起敬。由于罗斯和我此前并没有一同翻阅过珍本，我感到他想要确保我会恰当地照顾好这件珍宝。《人体构造论》一书在世界上仅有大约100件副本，而这一本保存得完好如初。

《人体构造论》原封不动地放在我旁边。我和罗斯开始用泡沫块和白色帆布豆袋搭起一座小山。档案文献的使用宗旨要求我们小心翻阅单页纸张，时时刻刻照顾书脊，尽量减少触摸，不可发生意外。罗斯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把书放在黑色泡沫楔子对角中

间的凹槽里，让书自然地打开。[\[38\]](#)感到右侧的支撑力度不够，这位图书管理员又在楔子上加了一个豆袋。调整摆弄了几分钟后，《人体构造论》终于可以阅览了。

淡淡的彩色线条勾勒出页面的边缘，我被这些线条打动了，久久地凝视着。它们似乎是手绘的，几乎每一页都有。我手中的这本《人体构造论》是1543年的初版印刷本，这意味着维萨里本人可能亲手摸过这本书。有400年历史的纸张，状态完好，没有修补，边缘也没有磨损。

我想看一幅大型插图，于是翻到书的后半部分，看到了一张折页。这张超大的页面令我震惊。整张页面是一幅人体静脉和动脉血管的详细图示。我将其先展开一半，再沿底部完全展开。这幅全身动静脉血管的示意图是一张木刻印版印刷而成的，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人体结构上标有数十个字母和数字，该页其余部分写满了血管的名称，全部为拉丁文。我看得如痴如醉。

回到书的前面，肌肉人体图映入眼帘，一页接一页地向我展示了解剖的进展，附着的肌肉依次减少，很像我心爱的“世界百科全书”中那一套透明塑胶插图。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维萨里凭借这本集教学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并敢于批判盖伦的绝世杰作，抛出战书并宣告“我将亲自观察，并通过调查研究来向自己证明，什么才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百年中，这一决心落地生根，并点燃了一场科学革命。

[\[1\]](#)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2\]](#)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58.

[\[3\]](#) *Ibid.*, p.106.

[\[4\]](#) *Ibid.*, p.75.

[5] Ibid., p.78.

[6] 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Power, Money, and Ambi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6), p.46.

[7] Steven Johnso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p.17.

[8] Ibid., p.19.

[9] Ibid., p.32.

[10] Ibid.

[11] Ibid., p.8.

[12]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129.

[13] Steven Johnson,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p.35.

[14] C. D. O'Malley,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6.

[15] Ibid., p.10.

[16] Ibid., p.14.

[17] Ibid.

[18] Ibid., p.19.

[19] Ibid., p.20.

[20] Ibid., p.44.

[21] Ibid., p.49.

[22] Ibid., p.59.

[23] Ibid., p.64.

[24] Ibid., p.77.

[25] 约翰·君特（1505—1574），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内科医生，比较常见的名字是约翰·温特·冯·安德纳赫（Johann Winter von Andernach）。——编者注

[26] Ibid., p.106.

[27] Ibid., p.113.

[28] Ibid., p.114.

[29] Ibid., p.321.

[30] Ibid., p.317.

[31] Ibid., p.318.

[32] Ibid.

[33] Ibid., p.323.

[34] S. W. Lambert, W. Wiegand, and W. M. Ivins, *Three Vesalian Essays to Accompany the Icones Anatomicae of 1534*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p.27.

[35] 欧洲早期印刷书籍使用的对开纸张（folio）。——编者注

[36] Ibid., pp.3–24.

[37] C. D. O'Malley,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323.

[38] 先用黑色泡沫搭出两个楔形模型，然后将两块模型成角最小的一侧对角放置，中间形成凹形，并辅以帆布豆袋进行支撑调整，将书放置在中间的凹形部分，使其在打开状态时比较自然，尤其可以避免伤及书脊。——译者注

第四章

科学的崛起

让我们期盼……一系列发明竞相涌现，如春风雨露降临人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征服并战胜人类的需要和苦痛。

——弗朗西斯·培根《伟大的复兴》，1620年

他们的首要目的仅仅是一种满足感——呼吸更自由的空气，彼此安静地交谈，不沉迷于那个悲凉时代的激情与疯狂。^[1]

——托马斯·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1667年

1715年，在伦敦某个春光明媚的清晨，一群年轻的科学家，为了满足人们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聚集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几周前，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大胆地宣称：他仔细研究了星图，计算了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轨迹，并鼓起勇气预言，4月22日早上会有一次日全食吞没整个伦敦市。他向天文学爱好者发出邀请，到鹤苑（Crane Court）的皇家学会来一起见证奇观。

我们听过很多古代占星师预测食相的传闻故事。这些预言通常会预测数月甚至数年之内的食相。但食相并不十分罕见，所以这样的预言也不算十分大胆。然而，哈雷（他是皇家学会成员，能够与恃才放旷的艾萨克·牛顿交往）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邀请天文学的天才们聚集到这座古老的城市，给出了具体的日期

时刻，甚至具体到分钟。自1104年以来，伦敦还没有发生过日全食，而600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技术进步。大多数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女巫、狼人、独角兽和魔法，尽管日心说和新的数学为有识之士所接受，但这对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实际用处。

日全食是圣经中记载的事件。对于那些在万里无云的日子里目睹过一次日全食的幸运儿来说，那几分钟的暗无天日非常梦幻，也确实像魔法一般。我们曾经像凝望天空的玛雅人一样，忠诚地与自己的同胞们并肩，一瞬间就被淹没在行星、恒星和卫星的旋涡之中。

哈雷计算了日全食的轨迹，并发布了他的预测图。他希望通过公布这一事件的来临，可以尽量减少恐惧，同时借助不列颠群岛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有识之士，得出更多的计算结果。

哈雷拿着羽毛笔，花了数周时间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中由“自然哲学家”记录下来的数据表。在1662年之前，学者之间的科学信息是不会共享的，但是《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改变了这一切。哈雷能够从多年的天文记录中收集数据，经过反复测定，他确信一场日食即将发生。邀请发出得非常及时，殷实的知识界人士们身穿马甲，头戴假发，在破晓时分到达鹤苑。

鹤苑是伦敦市中心舰队街旁边的一条狭窄小巷，当时的伦敦市区位于现代大伦敦地区的中心地带，被城墙包围。1666年伦敦大火差点烧毁了伦敦的整个核心地带，而鹤苑就处于受灾区域的最外围。坐落于鹤苑尽头的建筑便是皇家学会的会议厅，正是在这里，科学史在阴晴更迭中铸成（见彩插4.1）。

发生日食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你是看不到月亮正在接近太阳的，因为它被恒星的亮度盖过，所以肉眼根本看不见它。但可以

明显感觉到辐射热的减少，尤其是晴天的时候，会感到一种无风无云的奇特凉意萦绕于身。

天亮后不久，日食就在伦敦发生了，那时刚过早上8点；一个小时后，日全食于9点9分出现。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黑暗主宰着伦敦，哈雷的预言实现了，而且与他预测的时间分毫不差。因为大量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准备好了器材和记录仪，他们对月亮表面以及日全食的确切持续时间进行了重要的观测。

对于那天在鹤苑的幸运观测者来说，他们的内心一定充满了乐观情绪吧？他们无疑会对哈雷心存感激，并且还有一丝敬畏。人类竟然具有这种预测能力，这也一定让他们欣喜若狂。但他们心中更重要的想法一定是，这世间还有什么是我们无法预测、体验并征服的？

戴维·伍顿对此总结道：“对科学革命的一种基本描述是，它代表了数学家对哲学家权威的成功反抗，而二者又共同反对了神学家的权威。”^[2]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项基本原理是（天体）不变，^[3]然而最后一批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如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和约翰内斯·开普勒，已经能够观察到恒星的爆发并预测行星的运动。戴维·伍顿认为，第谷发现新星（距离地球8 000光年，在热核反应中融合在一起的两颗恒星）是科学革命开始的切实标志。它不是革命的起因，却吹响了揭竿而起的号角，是反叛开始的标示牌。亚里士多德沉迷以“质”（qualities）来解释世界，提出土、空气、火和水的四大元素说，而第谷辛勤地收集数据和观测天象。科学革命领袖以测量仪器、数字、数据表和计算方法代替了诡辩的对话传统与学术智者的伎俩。简而言之，他们将大自然乃至世界数学化了。^[4]

1610年4月，伽利略·伽利雷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一书在出版几周后来到了布拉格，开普勒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伽利略看到了什么。该书的扉页上称伽利略是一位“佛罗伦萨的绅士”、一位“帕多瓦的数学教授”。扉页中间，单独一行写着“PERSPICILLI”一词，伽利略用这个词来称呼望远镜（见彩插4.2）。

在这本书的开头，46岁的伽利略描述了他的望远镜是如何诞生的。10个月前，即1609年5月，伽利略收到一个消息称，一名荷兰人借助透镜和一根管子组装了一个望远镜。经过一番思考，伽利略“最终决定自己潜心钻研望远镜，先探究其原理，明白原理之后，再深入研究折射理论，思考如何找到发明类似器材的方向。我先准备了一根铅管，在管子的两端分别装上了两块玻璃镜片，它们一侧是平的，而另一侧分别是凸的和凹的”。[5]

在本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某个科学领域的突破来自精工巧匠的坚持不懈，他们专注于眼前的问题，并亲自参与工具、器械和测量仪器的制造。望远镜这一创新的出现，首先要依靠透明玻璃工艺在穆拉诺的发展，随后荷兰人和德国人对曲面玻璃的制造进行了完善。伽利略亲自准备镜头，打磨每一块玻璃片的尺寸和形状，想要将一台3倍小型望远镜变成适合天文观测的放大工具。他改进后的望远镜，放大倍数至少为8倍。[6]

伽利略意识到这一观察器材在军事领域大有用途，便前往威尼斯的元老院，那里是最高行政官所在地。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钟楼上，他展示了望远镜相对于肉眼的优越性。1609年8月21日，围观的人们本来看不到远方的船只，但是伽利略用他的8倍望远镜，向元老院展示了对威尼斯潟湖地带构成潜在威胁的战舰。望远镜可以及早发现敌军战舰，对于海军来说是极大的优势，元老院对此前景感到非常满意，伽利略获得了双倍的薪资和

帕多瓦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后来他又发明出放大20倍的望远镜，用于天文观察。

伽利略在帕多瓦度过了18年（1592—1610年），1599—1602年他与英国人威廉·哈维在这所大学中产生了交集。在刚刚迈入17世纪的意大利大学城里，人类社会的两位科学巨匠共居一方天地：伽利略是世界上第一位物理学家、观测天文学家和实验科学家；哈维是世界上第一位生理学家，解释了血液如何通过我们的血管在体内循环。伽利略和哈维代表着那个时代天壤之别的两种境遇，伽利略是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的最后一批科学家之一，他因为信奉日心说，人生的最后十年都在软禁中度过，而哈维作为詹姆士一世的御医和牛津的“医学博士”（Doctor of Physic）声名鹊起。

“托马斯·霍布斯在1665年写道，他认为在哥白尼之前没有天文学，在伽利略之前没有物理学，在威廉·哈维之前没有生理学。”^[7]哈维和伽利略都以机械运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觉察到事物按轨道运动或循环。他们洞悉卫星的移动或血液的流动，以及运动物体的轨迹和速度，这些确实非同凡响，但受限于简单的欧几里得几何学。

科学革命已经发起，然而人类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惊世骇俗的洞察力，以数学方式来描述和预测世界。在伽利略去世的同一年，在伦敦以北的偏远村庄里，艾萨克·牛顿出生，这位早产的遗腹子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他将以物理学定律和微积分学来丈量我们的世界。

1610这一年，伦敦市成为北海海域的主要港口，城市人口激增，25万人口享受着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艺复兴。威廉·莎士比亚、本·琼森、约翰·多恩等文学巨匠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麦克白》在环球剧院的演出使众人乐在其中，哪怕3 000名观众连洗手间都没有。在新大陆，詹姆斯敦定居地正在搭建，而詹姆斯一世也刚刚发起阿尔斯特种植园（Ulster Plantation）的殖民计划，他还下令将古代《圣经》文稿翻译成英文，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英译本。

17世纪的世界十分脆弱，欧洲大都市的居民“极易罹患疾病，承受肉体折磨甚至过早死亡……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多岁”。
[8]瘟疫、流行病、饥荒、过密的人口、极度贫困以及恶劣的卫生条件，让伦敦一面富丽堂皇，一面疮痍满目。新式机构崛地而起，传统陋习污秽不堪。

1610年3月，伽利略的《星际信使》问世，没多久这本书就来到了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那里是诉讼律师及法官的专业协会，总部设在伦敦市中心的石砖建筑群内，看上去与常春藤院校的宿舍楼相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即使在今天，观光客漫步其中，也很可能遇见头戴白色假发、身穿红色衣袍的诉讼律师前往附近的法院出庭。这就像在华尔街附近遇到西装革履的年轻经纪人，或在麻省总医院附近遇到彻底无眠、不修边幅的住院医师在连轴加班后踉跄着回家。确实，衣装就是识人的标准，甚至是人的标志。

《星际信使》来到了诉讼律师和大法官们顶冠束带的权力世界。伽利略这部作品的主角是超新星，然而对于格雷律师学院中的某位政治哲学家来说，这位意大利天才本人才是信使。那位大律师便是弗朗西斯·培根，他自己从未做过科学实验，却被大多数人尊为实证科学之父。

弗朗西斯·培根出身显赫。1561年，他出生于泰晤士河畔的一座恢宏宅邸之中。这位小神童12岁那年就进入剑桥大学学习。

天资超常的培根使其肖像画家在画布上题写道：“唯愿绘其所想。”才华横溢的美誉伴随着培根的一生。培根喜欢静默深思，在科学上充满求知欲，是一位“志向高远、视野广阔”[9]的思想家。他身兼专业律师、政治家、国王的廷臣与顾问等众多角色，他也战战兢兢、不遗余力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着。

培根“过着活跃的公共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执政时致力于政治事务和法律改革。1618年，培根担任大法官这一要职，直到他被指控贪污而遭罢免。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他如痴如狂地写作，产出了大量有关自然哲学、政治和历史的作品”。[10]这些文字大部分写于他的晚年，那时的他已经被朋友、妻子和国王统统抛弃了。

培根在三部伟大的著作中完成了“重新思考我们的思考方式”这一课题，最后一部在其去世之后才出版。当时的大学教育深陷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徒劳无益的泥淖中，已经无力产生新的知识。更糟糕的是，大学里的哲学思想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为基础，根本无法挑战这些哲学家的结论。“培根拒绝接受一切不利于新发现以及无法帮助改变世界的既有知识。”[11]

当制图师在空白处画下新大陆，太阳系也向人类展露出新的行星和卫星，有识之士面前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实。文艺复兴晚期思维开放，“‘发现’[真理]这一概念与探索、进步、独创性、真实性和新颖性等思想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12]几个世纪以来，所谓“学术”只是亚里士多德的猜想的汇聚，几乎没有新的知识出现，只有一些对其结论的新评注。培根意识到这种世界观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他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年出版）和《伟大的复兴之新工具论》（*The Great Instauration, New Organon*, 1620年出版）中揭示，“当今

的逻辑思维方式无法产生科学发现或发明新科学”。[13]

培根认为我们发现知识的过程存在缺陷，并着手提出一种发掘新真理的方法论。这一条理清晰的思考方式将引导我们走向科学方法——未来的科学家会将臆测转变为假说，然后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测量，从而得出结论，最终发展为以实验结果为基础的综合性理论，而这些理论又将引导科学家们走向新的假说和新的实验。没有人比培根更强调方法论，[14]甚至笛卡儿也比不过他，也正是培根提出了“阐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15]古老的占星术和炼金术将转化为现代的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从神秘莫测甚至超乎寻常的非科学技艺转变为采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学科。然而医学革命还要再等一个多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才能彻底摆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束缚。

批判旧式哲学家时，培根“将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说他们‘只会收集和使用’，而理性主义者相当于蜘蛛，‘从体内抽丝，在身外织网’。他又将这两种昆虫与蜜蜂做对比，蜜蜂既从花园山野中采集原料，‘又将原料通过自身力量转化并消化和吸收’。他接着说道，哲学家的工作是去效仿蜜蜂”。[16]如此深刻的见解出自一位文人学者，他没有科学教育背景，也完全不了解数学和实验室。培根冥冥之中感到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探测到更多的行星，也会有更多的观点得到表达。虽然他不太可能想象到微积分、电力或者载人飞行的发明，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确实想象过一种新药。

培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于1627年也即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出版，这是一部未完之作。他在书中“构筑了引人瞩目的科学乌托邦主义”。[17]培根总结道，对人类有用的伟大事业包括“延长生命、逆龄生长、永葆青春、治

愈绝症和缓解疼痛”。[18]为此，显微镜观察必须得到发展，病菌必须得到了解，化学必须精进，流行病学也要基本形成。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中，疫苗和对疾病的预防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但是要达到从“逆龄生长”到“缓解疼痛”等一系列目标，人类还需要很多突破来引发植入革命。

培根惊人地预言，未来的社会将由仁慈的哲学家领导，而科学家将发挥主导作用。他向往新式学府，那将是一座伟大的研究所，“一所设施齐备的科学机构，能够对自然的奥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19]这位法学家描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在外伦敦地区偏远的圣奥尔本斯镇高兰伯里（Gorhambury），有一座大型砖石府邸，炉火的温暖笼罩四周，烛光静静地闪亮，培根曾在这里梦想过一座新式学府和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如今的高兰伯里府邸躺在废墟中，但是通过一条私人所有的“许可路线”可以进入那片拥有450年历史的断壁残垣。当我置身于废墟中，凝望青翠起伏的山丘上牛羊遍布，古树斑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培根会如何看待今时今日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比如查尔斯河南北两侧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比如带领人类社会进入太空时代的工程学、DNA（脱氧核糖核酸）研究、癌症治疗、计算机编程以及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弗朗西斯·培根将自己设想的这种机构命名为“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的确，几十年来他沉浸于哲学讨论和法律辩论，然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学者，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秘密进行研究的机构”。仅在两代人之后，培根设想的“所罗门宫”就会因为皇家学会的组成而成为现实，而它出现在伦敦也并非偶然；但这两代人要一路经历内战，将国王斩首，偶然地汇聚一堂，还要经历一次王权复辟，才能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天才协会（genius society）。

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君主们不断地增强王权，扩大影响力，终于在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实现了君主的最高统治权。教会和国家统一起来，土地和资产由国王控制，对君权神授的鼓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625年，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局势日趋紧张，最终议会遭到解散。议会与国王开战，结果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英格兰由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内阁统治了十年左右，但是议会在1660年恢复了君主制并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权力从未如此强大，至今仍享有统治整个英国的权威。

在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罗马天主教会仍然在欧洲大陆上迫害着具有异端科学思维的基督徒，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也面临着类似危及生命的迫害。由于君主制复辟以及英国人对天主教的反感，再加上新国王对知识话题的兴趣，那些勇于探索新知识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他们效忠的对象。

这短暂的几年中，伦敦风平浪静。英格兰政权在经历了王位空缺的过渡期后终于找到了政治和理智上都能被接受的平稳态势。就像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出现的哲学进步往往是意义重大的。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为科学写下檄文。“因此，培根最主要也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位针对科学的思考者。他思考什么是对科学发展有利的条件，什么是确保科学不断进步的变革和进程，科学将如何开启全新的知识领域，还有科学在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过程中的技术实现与道德实现。”^[20]所罗门宫渐渐地走进了现实。1660年11月28日，三十几人来到伦敦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听28岁的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讲授天文学。当晚出席会议的人士是那个世纪中一些重

要思想家，包括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和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

查理二世适时地为新兴科学家们颁布了特许令，于是这一团体被称为“皇家学会”，全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早期的成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尊贵的学术团体”肩负重任，是世上“最好的俱乐部”^[21]；学会不久便开始在伦敦定期举行会议，办讲座，做报告，国王查理二世也经常出席，尤其是在做科学展示或解剖演示的时候。“关于我们的任务，”一位皇家学会成员在1674年匿名写道，“我们一致同意，或者都应该同意，不是粉刷旧房子，而是建造新房子。”革命就是除旧布新。^[22]

同时期也有其他的天才学会成立，例如法国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1666年由路易十四建立）；但是创刊于1665年、至今的仍在发行的《哲学汇刊》，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出版物。“皇家学会发明了科学成果的发表机制和同行评审机制。它使英语代替了拉丁文，成为科学话语的主要语言。它使实验研究系统化，鼓励甚至十分坚持以清晰的表达方式代替浮夸的修辞。它将世界各地最好的思想汇集在一起，开创了现代科学。”^[23]

《哲学汇刊》的副本以学报的形式刊印，自然是寄往牛津和剑桥，最后终于来到一位年轻人的手中。他孤独而执着，节制有度而天生专注力非凡。他便是艾萨克·牛顿。

现在看来，艾萨克·牛顿的降生就如同救世主下凡。圣诞日的早上，他出生在一座农庄石砖宅邸的卧房中。他的父亲是个不识字的自耕农，继承了当地一座精心修筑的灰白色石灰岩宅邸和

周围的谷仓。但他在艾萨克出生的几个月前就去世了。

从伦敦驱车往北，经由A1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后就能到达林肯郡的耕地和森林，那里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名叫伍尔斯索普（Woolsthorpe）。牧场和连绵起伏的山丘围绕着一群群的人家，就像遍布在英国乡村的成千上万个小村庄和教区一样。然而，在村落的东南角，一组石砖建筑显得与众不同，被完好地保存了几个世纪。这便是伍尔斯索普庄园，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出生地和故居。附属建筑和谷仓在东面，朝西而坐的古式石宅前有一座苹果园，其中一棵不同寻常的老树仍然结着果实。这棵树历经瘟疫、大火、雷击和动乱，和它曾经那位著名的主人一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石灰岩庄园宅邸有两层楼，牛顿的卧室在楼上，室内一扇大窗面朝苹果园。低矮的门廊、用于烹调的宽敞壁炉、吱吱作响的不平整地面，不断提醒着我们这座建筑的年龄。大窗外的苹果树虽然颇具艺术气息，但论科学实用性则远不如房间里的另一扇小玻璃窗。这扇朝南的小窗让太阳照射进来，让牛顿在英国漫长的冬季，特别是他需要一缕缕不间断的白光时，也能获得充足光线。“现代世界的总建筑师”^[24]就是在这间简朴的乡舍中构想着未来。

母亲的再婚给了艾萨克的成长沉重的一击。他的母亲嫁给了附近教区的一名圣公会牧师，而结婚的条件是抛下年幼的艾萨克。艾萨克由外祖母在伍尔斯索普抚养长大，不知道他性情孤僻且一生不愿与人交往是否来自童年的创伤。他终身未婚，缺少深厚的友情关系，让人怀疑他是否患有自闭症或者其他社交障碍问题。艾萨克10岁时，他的母亲再度丧偶，她带着与艾萨克继父生的三个孩子回到了农庄。然而，艾萨克并没有在伍尔斯索普融入家庭生活，而是被送往8英里之外的格兰瑟姆（Grantham）的寄

宿学校。

在格兰瑟姆，牛顿开始熟读勒内·笛卡儿的作品。这位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与培根一样是新西方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但是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贡献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坚持实证调查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与培根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不久的未来，牛顿将借助笛卡儿的技术发展自己的理论。

随着牛顿一天天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不适合做农场主。就像亚伯拉罕·林肯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艾萨克也经常因为“胡思乱想”而被他人批评。幸好艾萨克被剑桥大学录取了。经过三天的旅程，他一路向南，于1661年6月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安顿下来，全心投入他的学术使命。到三年级时，牛顿已经没有可学的东西了。这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牛顿在剑桥短短几年间就学完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

接着在1664年，一场骇人听闻的剧变席卷英格兰。瘟疫，这种古老的天灾，开始在南方地区夺走生命并散播恐惧。由于黑死病的肆虐，全英国的城市和大学变得空空荡荡，剑桥大学也于1665年关闭。艾萨克回到了伍尔斯索普的家，第一次与自己的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们一起生活。面对大流行病，中世纪人的本能让人离群索居，独自生活，所以牛顿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独奏艺术家”。

1665年，如日中天的皇家协会正在准备出版物；而艾萨克·牛顿则躲在伍尔斯索普庄园二楼的卧室里。未知的谜团像瘟疫一样困扰着牛顿，他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课题研究，这将成为有史以来，理论家所进行的最富成果的震惊世人的课题。牛顿用蝇头

小字一丝不苟地写下笔记，这些珍贵的纸张来自以前一位导师的遗赠。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他一个人解开了光的奥秘、万有引力的意义和热力学定律，还有积分和导数的微积分概念，由此，一切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得以实现。

是什么使月亮一直悬挂于高空？它为什么没有坠落到地面，或者干脆飞走？为什么所有物体都有一定的重量将它们拉向地面，又为什么总是垂直下落？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哲学家们尝试揭开轨道和物体的奥秘，却徒劳无果；牛顿运用了当时所有的数学知识，并进一步发掘出更多的知识。

太阳直径是月亮直径的400倍，而太阳与地球的距离也刚好是月亮与地球距离的400倍，这一惊人的巧合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在天空中看起来大小差不多，并且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出现日全食的可能性。天体从升起至降落跨越的地平线为180度，这两个天体在空中所占的弧度对应的角度则是0.5度，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整个天空中排列出360个相连的月亮。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如果你躺在伍尔斯索普的苹果园里，凝望那棵古老的苹果树，一颗苹果在天空中所占弧度对应的角度也是0.5度。牛顿关于物体下落的思想实验和月亮受地球牵引的思想实验都是在伍尔斯索普开始的，后来他又初步简单计算了月亮的大小、月亮与地球的距离、运行的速度，思考了牵引的力量是什么，这都对他的思想实验起到了促进作用。尽管他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创造关于万有引力和热学定律的综合术语，但是在林肯郡乡村的那段日子里，牛顿凝望着月亮，有时甚至直视太阳，他在那片土壤中播下了未来的种子。

起初，皇家学会缺少自己的正式聚会场所，但是聪慧的成员们并没有原地等待，而是时刻谨记拉丁语格言——切勿轻信人言（*Nullius In Verba*）。这座当代“所罗门宫”将一切新知识建立在

证明的基础上。知识界采用了培根提出的经验主义思考过程，质疑旧观念，检验新理论，报告新发现。学会从最一开始的中心人物就是罗伯特·波义耳，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爱尔兰贵族，毕生致力于科学实验。现在每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都非常熟悉他解释气体状态的波义耳定律，而这在17世纪是异常深刻的见解。波义耳长期以来的实验室助手是英国人罗伯特·胡克，他是一位杰出的技术科学家、器械和仪器的制造者，也是个脾气暴躁的搭档。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还有克里斯托弗·雷恩，一位博学的解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但他最著名的还是建筑师的身份。1666年，雷恩的无穷精力和精巧的建筑学知识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一场大火将伦敦市中心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而一些占卜师在此之前曾因为惧怕这个年份中“666”的隐喻，预言了那年将有火灾发生。

学会中天才荟萃，没人宣称自己是顶尖科学家或者哲学神童，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集合了行业专家，属于世界首创的科学组织。“早期科学更多是依靠协作而不是孤独的深思”，[\[25\]](#)这话说得没错，不过伍尔斯索普的那位年轻人属于例外。

不论是在伍尔斯索普还是在剑桥，或是在后来的伦敦，牛顿的非同寻常之处都是他的专注力。一个崇拜者问他如何想到引力的概念，牛顿答道：“不断地思考。”遇到理论瓶颈时，他真的会废寝忘食。他不喜欢运动，也没有业余爱好，对吃喝玩乐或是兄弟会都没有什么兴趣；唯有知识探索引诱着他。他破解了潮汐的秘密，却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他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却创造出对物理运动、光和引力的深刻见解。在现实世界中，他对世界运转机制的那份强烈求知欲，就从来没有超出以他为中心半径100英里的范围。

在伍尔斯索普，牛顿在学术上是孤独的。1665年，他开始探索数学课题和哲学课题，首先是证明二项式定理，而二项式定理直到今天仍是数学的基础。这位23岁的年轻人做了多少农活和家务？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明显他进行了巨量的脑力劳动。

对于那些曾经在高中和大学的微积分课程中苦苦挣扎的读者来说，一个人先后发明出微分和积分的过程是有些惊人的。（关于发明微积分的先后顺序，牛顿和德意志人莱布尼茨争论了很久，牛顿从未将这一荣誉拱手相让。）牛顿发展了微积分数学，以处理他思考行星运动和引力的性质时所面对的复杂计算。接着他抛开新制造的数学武器，又转去研究自己在剑桥外乡村集市上购买的玻璃三棱镜。

天空中的彩虹始终具有相同的颜色排布（红、橙、黄、绿、蓝、靛、紫）；但除此顺序之外，人们对其一无所知。它们为什么总是以相同的颜色顺序出现呢？牛顿回到自己楼上的卧室，他在木板上开了一个小孔，用木板覆盖住室内那扇朝南而开的小窗，这样就能够分离出一束射入暗室的光线。这一束午后的日光，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冬日，会穿过棱镜，衍射成一道彩虹洒落在远处的墙上。牛顿的神来之笔是，他在分离出来的一条光束路径上放了第二个棱镜，想观察会不会出现第二次色散，出现另一道彩虹。亲爱的读者，你猜是会出现另一道彩虹，还是光束保持了它原本的颜色，又或者变成另一种颜色？

答案是，第二个棱镜折射出的是相同的颜色。根据这一结果以及其他的一些表现，牛顿得出结论，阳光或白光，是由彩虹的颜色组成的。为了确定这一点，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设置好一系列棱镜或镜面的角度，使光线最终聚焦在一点。当不同颜色的光汇聚在一起，就产生了白光。“牛顿的日光色散实验仅由两个棱镜折射完成，如此精妙的构思，如此小心的操作，再加上精确的

描述，堪称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它确立了有关自然的伟大真理，也为从观察到理论的推导艺术提供了榜样；它如同来自往昔的灯塔投来的一束光，令皇家学会同时期的其他活动都黯然失色。”[\[26\]](#)

在伍尔斯索普的“奇迹之年”里，牛顿还进行了有关引力理论的基础研究：探索月亮为什么在高速行进和自转的同时，仍然能够高悬在我们头顶，没有飞走或者坠入地面。他仅仅通过基本的估算和新的数学知识，就能够向自己证明所有的物体都有引力，有史以来第一次理解了物体为什么会下落，水为什么会流动，炮弹射出后为什么在空中划出弧线，以及天体为什么能在空中运行。这些概念在后来的几年中支持了他的热力学定律，但是此时，当牛顿漫步于庄园，他更喜欢仰望月亮，他终于明白是什么力量使它悬于高空，这让他心中充满快乐。

至此，牛顿所见之处的一切已可令他心满意足。月球在空中沿着轨道运行；阳光照射在伍尔斯索普农场的小溪上，让水面波光粼粼；苹果“咚”的一声掉在果园的草地上；邻家男孩儿扔出的石子划出一道弧形轨迹；甚至就连他自己眼睛的功能都符合他正在探索的力学定律。牛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的这些观察使他相信，周遭的一切都符合自己提出的“机械宇宙观”的概念，那是一种有秩序的现实，只要他潜心研究，其中道理皆可知晓。他后来总结道：“在1665—1666年瘟疫大流行的那段日子里……我的数学与哲学创造性思维正值巅峰。”在林肯郡的那片荒野中，牛顿对地球的看法转向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在对知识的考察中，“这是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27\]](#)牛顿清楚，只有他自己理解了机械运动的规律，这使他格外快乐。直到多年后，他才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发现透露给皇家学会成员。

牛顿在自己的奇迹之年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创造出现

代数学、光学和力学；之后，他回到了剑桥，因为导师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退休，他接替了巴罗的席位，迅速晋升为卢卡斯数学教授。（最近一位为我们熟知的卢卡斯教授是斯蒂芬·霍金。）巴罗是皇家学会早期成员之一，他离开了剑桥，前往伦敦，成为学会和他的剑桥门生之间的纽带。多年来，巴罗一直敦促牛顿与伦敦及其他各地的多位成员取得联系，但是这位隐居避世的教授竭尽全力避免与他人联络。十年后，1675年，艾萨克·牛顿终于在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中露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牛顿克服了孤僻和嫉妒心理。起初，他坚决不透露自己的发现，但是一小圈信得过的朋友，例如艾萨克·巴罗、罗伯特·波义耳和埃德蒙·哈雷，劝说他揭开那层遮住秘密的朦胧面纱。人们初次领略他的天才是试用他亲手制作的望远镜。后来，牛顿有关科学研究的文章开始如涓涓细流，经年累月，陆续传递到奥尔登堡手中。对于一个致力于信息传播的学会来说，这些来自身边智者的记录拨弄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令他们眼前一亮，同时也感到自愧不如。

另一种新发现在此不久之前降临英伦海岸：咖啡。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在1652年开业，到1663年，伦敦的古罗马城墙内已经有82家咖啡馆。[\[28\]](#)正当皇家学会兴起之时，“咖啡出现了，它被称为醉酒、暴力和欲望的解药，一种纯粹思考、思辨和智慧的催化剂”。[\[29\]](#)启蒙运动正在这座城市中生机勃勃地展开，在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牛顿等人成为争论的焦点。

1687年，艾萨克·牛顿出版了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我们人类非常幸运，因为善于社交的哈雷能够循循善诱，说服本不情愿的牛顿分享其力学和数学的想法。《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的一部力作，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

这部著作中，牛顿以无人能及的聪明才智，精心讲解了物理定律、引力原理、天体运行以及物体运作背后的原因。这本书为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

牛顿后来升任皇家学会会长和英格兰王室铸币厂总监。他于84岁时与世长辞，终身未婚，没有子嗣。他虔诚地信奉宗教并潜心研究炼金术，曾经被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描述为“最后一位魔法师、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以一双发现的慧眼观察着有形的知识世界，人类还不及万年的知识遗产，最初也是在这样的目光下建立起来的”。^[30]无论牛顿多么渴望探究宗教和魔法，他发现的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为未来所有的高级运算提供了基础的数学结构，包括发射宇宙飞船去探索彗星和其他行星所需要的数学知识。

本书在这里要讲的并不是彗星和宇宙飞船，而是科学的诞生，它为医学的兴起提供了支持，奠定了基础。正是17世纪的科学家们从理论上说明，我们能够以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并系统整理这个世界。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就是培根、笛卡儿和牛顿。“在西方哲学家中，培根或许是最早给自然科学中的有意义发现赋予‘自然法则’这一概念的人。当他在定义中提到‘法则’（law）的概念，这种法则既非出自一位神圣的立法者之手，也非上天的安排或监视，更不为目的论服务。”^[31]笛卡儿和牛顿以充分的理由宣称他们的发现是普遍真理和定律。这种思维方式将打开医学现代化之路的大门。牛顿去世不过几十年后，又一名不平凡的人物抵达伦敦，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讲科学方法的外科医生。

虽然皇家学会才成立短短几年，但其成员立即意识到灵感和变革的浪潮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于是他们决定撰写学会的创办史，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甚至有些浮夸。1667年，学会获得国王的特许刚过五年，托马斯·斯普拉特就撰写了《皇家学会

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卷首插图为国王查理二世的半身像被戴上桂冠的版画，两侧为弗朗西斯·培根和学会第一任会长威廉·布隆克尔(William Brouncker)。

在《皇家学会史》的序言中，斯普拉特声明将此书献给他们的王室资助人查理二世，将人类从“谬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荣耀应当归于国王。接下来，斯普拉特反思了古人对旧时哲学家的看法：

显而易见，古人对取得自然发现者充满敬意，他们赋予其神圣的荣誉……自然的探索者、思辨学说的传授者，乃至自然的征服者本身都应享有高贵的声誉。[引文强调部分为引用者所加]

最后，斯普拉特提出，荣誉和纪念不仅仅属于发明家，还应该属于国王。他总结道：

真神本身并未忘记向我们指明世俗技艺的价值。从亚当到挪亚，世界上第一代君主的历史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战争或者胜利。记录下来的却是，在他们生活的许多年里，教会了子孙后代牧羊、耕作、种植葡萄、搭帐篷、建造城市、弹竖琴和风琴、制作铜器和铁器。如果他们因一项自然发现或机械发明而得到神圣的纪念，那么陛下肯定会因为创立了发明家一脉相承的传统而流芳百世。[引文强调部分为引用者所加]

如其所言。皇家学会的会员们发现了原子裂变、氢、双螺旋

结构和电子。他们发明了万维网，创立了同行评议制度。这个世界上最的首个科学组织，是一座真正的所罗门宫，它为现代科学的发展铺砌出未来之路，从而为医学在19世纪转变为科学学科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位性格粗犷的苏格兰人来到伦敦，他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却不可思议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讲究科学方法的外科医生。

[1] Thomas Spra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 (London: 1667), p.53.

[2]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24.

[3] *Ibid.*, p.12.

[4] *Ibid.*, p.199.

[5] Galilei, Galileo, *Sidereus Nuncius, or the Sidereal Messenger*, Albert van Heiden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6.

[6]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215.

[7] *Ibid.*, p.39.

[8] Perez Zagorin, *Francis Bac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2.

[9] *Ibid.*, p.3.

[10] John Sutton, *Encyclopedia of the Life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2001), p.471.

[11]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83.

[12] *Ibid.*, p.75.

[13] Perez Zagorin, *Francis Bac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9.

[14] *Ibid.*, p.3.

[15]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84.

[16] Perez Zagorin, *Francis Bac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0.

[17] *Ibid.*, p.123.

[18] Francis Bacon, *New Atlantis* (1627), 5:415.

[19] Perez Zagorin, *Francis Bac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3.

[20] *Ibid.*, p.224.

[21] Bill Bryson, ed., *Seeing Further: The 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HarperPress, 2010), p.9.

[22]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p.35.

[23] Bill Bryson, ed., *Seeing Further: The 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Harper Press, 2010), p.3.

[24] James Gleick, *Isaac Newt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4), p.3.

[25] Edward Dolnick, *The Clockwork Universe: Isaac Newt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1), p.5.

[26] Bill Bryson, ed., *Seeing Further: The 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HarperPress, 2010), p.33.

[27] Gerek Gjertsen, *The Newton Handbook*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87), p.24.

[28] Matthew Green, <http://www.telegraph.co.uk/travel/destinations/europe/united-kingdom/england/london/articles/London-cafes-the-surprising-history-of-Londons-lost-coffeehouses/>.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9] *Ibid.*

[30] John Maynard Keynes, quoted in James Gleick, *Isaac Newt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4), p.188.

[31] Perez Zagorin, *Francis Bac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p.95.

第五章

哈维与亨特

小时候……我喜欢琢磨云和草，还有叶子为什么在秋天变黄。我观察蚂蚁、蜜蜂、飞鸟、蝌蚪和石蚕，总是缠着大人们问一些没人知道或者没人在意的问题。[1]

——约翰·亨特

听他讲课时，我对自己说：“这是阳光雨露，拨云见日。”我觉得自己以前所学，相比之下什么都不是……我想我可能也会像亨特先生那样，自己去思考。[2]

——亨利·克莱因

迷宫般的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由三个病区组成，主要为病入膏肓或病情极不稳定的患者提供术后护理。过去四周里，我每隔一天就连续上班36小时。尽管我已经是外科实习生（做外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但我还从来没有机会进手术室。作为一名SICU实习生，我的工作反倒是照顾外伤患者和术后患者，相对于转入普通病房的患者来说，他们需要更高级别的照护。在普通病房，没有气管插管患者，静脉滴注药物相对简单，不像在重症监护室，随时都要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

刚开始的几天，我彻底崩溃了。我们几个实习生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显然不具备照护SICU患者生命的资格和能力；我们极

其忧惧因为一个小差错就害死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病人。SICU的护士质疑得没错：尽管我们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却毫无实践知识。如果有人咨询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中遗传物质的易位，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酪氨酸激酶；但是如果问我们一个简单的呼吸机设置问题，你看到的将是一副副呆若木鸡的表情。不过，我们都进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呼吸机、静脉注射、管线维护、外用内服、病床设置都变得简单明了，易于操作。

现在到了我在SICU实习的最后一周，我花了很长时间照顾特拉维斯。特拉维斯是一个16岁的宾夕法尼亚州大男孩儿，两周前，一次橄榄球训练后，他载着一车的高中队友，在路上被一辆水泥运输车拦腰撞击。三名年轻人当场死亡，特拉维斯被送到创伤中心时已经心脏停搏。我的住院医师同事在急诊室对他进行了抢救，按照从喉咙到耻骨的“创伤拉链”做切口，夹住主动脉以防止其完全破裂，勉强维持他的生命。从发生意外到现在的这两周里，特拉维斯经历了多次手术，紧急抢救呼叫三次，并面临多系统器官衰竭。

SICU对患者的身体状况的监护水平堪称惊人。做住院医师之前，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今天的器械和药物在监测体内气体浓度、血压、心率和清醒程度方面已经如此强大。我在医学院学到的生理学知识（器官与细胞功能的关系）派上了用场。当然，也不是任何情况都可行的。特拉维斯送来时已经死亡，被创伤医生的英勇果断救回一命，从那以后，他经历了几次手术，同时还与肾功能衰竭、艰难梭菌肠道感染、严重的水肿和四肢肿胀等危重并发症做斗争，而且他已没有脑电波活动信号。他已经开始散发死亡的气味。我起初不明白ICU的护士为什么说他们能够闻到死亡，现在我明白了，艰难梭菌的刺鼻气味混杂着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霉味，这在上呼吸机的病人中太常见了。几天前更换中心静

脉插管时，特拉维斯的一位护士跟我预测，他活不成了。我今天不得不惭愧地承认，他就像那些溺水身亡的人，失踪后又被浪冲刷了好几天。

昨天，特拉维斯的父母来问，可不可以把他心爱的爱尔兰雪达犬“蜂蜜”带到SICU。他们说这对特拉维斯有好处。我也喜欢狗，但是对于把家庭宠物带到这个肃静的地方，我慎重地持保留意见。在一个首要任务是控制感染的地方，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这家人一开始被拒绝了，就去申诉他们有将“蜂蜜”带来医院的权利并且赢了官司，可以将特拉维斯的这位挚友带到他的病床前。当时我几天没睡觉了，已经感觉到通宵后第二天的午后最为难熬，我精疲力竭，无精打采，身体不堪重负。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蜂蜜”来没来，没精力管。

特拉维斯躺在ICU的病床上，嘴里是气管插管，胶管上缠着用来固定的粉色绝缘胶布，胶布分叉贴在他的脸颊上，电子输液泵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的身下是充气垫，有助于防止褥疮，纱布敷料保护着胸部、腹部和四肢的手术伤口；他全身肿胀，毫无生机，虽然胸部仍然随着呼吸起伏，但那是呼吸机的作用。自从被直升机送到创伤中心那一刻起，他就一动也没动过，我觉得他也不会再动了。此刻，我越来越焦躁不安。

在特拉维斯父母和妹妹的陪同下，他的爱犬“蜂蜜”颇具排场地走向SICU的2号病房。我都怀疑它能不能认出特拉维斯。我站在病房的玻璃滑门处，随时准备着阻止那条狗意外踩到医用管路或电线。“蜂蜜”一步一步地走进房间，脑袋警觉地一顿，目光停留在特拉维斯的身上。它又特意向病床挪近了几小步，脑袋靠近床栏，然后坐下来，静静地观察着。这一系列有意的动作，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看了一眼特拉维斯的家人，他母亲以手掩口，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蜂蜜”站起来，设法通过床栏的开口把鼻

子探进去，并用鼻子触碰特拉维斯的手，它在引诱主人的回应。现在大约有十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挤在门口，大家想亲眼见证男孩和他的爱犬互动的超现实瞬间。“蜂蜜”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哀伤的犬吠，继续蹲坐着。就在那时，我仿佛看到一根手指微微一动。特拉维斯的手动了吗？我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寂然无声，每个人都盯着他的左手。这时我看见特拉维斯的头缓缓地向左转，浮肿的眼睛仍然闭着，虽然动作极其细微，但这显然是有意识的自主性动作。“蜂蜜”又叫了一声。就像再次发动一辆报废多年的旧车一样，特拉维斯慢慢地重新启动了。他的头不自觉地抬起来。“太好了！”“不会吧！”“我的天哪！”我们都不禁出声地自言自语起来。特拉维斯继续回应着“蜂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四肢一点一点地动起来；这让“蜂蜜”更起劲地吠叫起来，用鼻子和爪子磨蹭他的主人，发出一阵阵哀鸣。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拉着特拉维斯起死回生。终于，他睁开了眼睛。这一刻，我们都感到不知所措，也无话可说。特拉维斯的父亲感觉到了我们早先的疑虑，他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告诉过你，我儿子和他的爱犬之间有种特别的感情。”

六个月后，我走在医院门诊大楼的公共走廊里。实习期仍然非常折磨人，而我的当务之急是熬过剩下的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转到骨科做住院医师。我猜自己当时正处于白日梦游状态，目光呆滞，直到感觉两个人径直向我走来。那个年轻人我应该不认识，但是我认识那位年长的先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转身对他的儿子说道：“特拉维斯，这位是挽救了你生命的外科住院医生之一。”我一脸茫然，我根本没认出特拉维斯，而他身上唯一能让我认出的是脖子下面气管切开术留下的疤痕。他的父亲又补充道：““蜂蜜”将你唤回人间时，施耐德医生也在场。”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说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特拉

维斯。”

500年前，西欧人仍陷于原始状态的泥潭中，过着与两千年前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差不多的生活。泥泞的街道、动物粪便、疫病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让当时人类所承受的痛苦甚至超过了我们狩猎时代的祖先。尽管印刷机彻底改变了传播速度，但是在16世纪中期天文学家获得突破性进步之前，几乎没有新知识诞生。16世纪晚期，照护患者的医生几乎不懂人体功能，更不可能了解各个器官的功能。17世纪初，还没有人能够理解呼吸的过程以及人体如何从饮食中摄取营养，人们也不理解心脏为何在胸口搏动。

公元1600年，一个就读于剑桥医学院的英国青年辍学后，决定冒险前往欧洲的经院哲学之乡意大利，来到了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威廉·哈维（1578—1657年）几年前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取得了学士学位，但他感觉自己在意大利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前往多佛尔港，准备跨越英吉利海峡。

同伴们都无一例外地顺利登上了开往加来的船，而威廉·哈维却在港口被相关负责人揪了出来。

“你不能走，得关起来。”负责人告诉哈维。这位年轻的剑桥大学生非常愤怒，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们乘着客船驶离，渐渐地消失在黑夜中。那艘船在航行中突然遭遇风暴，客船倾覆，船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了多佛尔后，作为唯一一名没被允许登船的乘客，哈维找到了那位扣住他的负责人。为什么单单哈维被独自留在了英国海岸，而他的朋友们却全部溺亡？

那位负责人告诉哈维：“两天前的晚上，我梦见了哈维医生要跨越海峡去加来；我在梦中收到警告要阻止你。”尽管这位负

责人完全不认识哈维，但是他的预知梦境却救了哈维一命。哈维也经常讲起这个故事，证明自己一生的特殊使命乃是天意。^[3]世界首位生理学家也许是上天钦定的。尽管哈维还要过很多年才能向世人公布他所发现的心血管系统功能，但是他的探索之旅在“科学实验时代”之初就已经正式起航。

与后来的艾萨克·牛顿一样，威廉·哈维出身于英国的自耕农阶层，其家庭经营一座小农庄，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培养。16世纪和17世纪是社会阶层跃升的绝佳时期，以牧羊为生的父辈为哈维未来的成功积累了充分的资源。尽管他父亲自己没受过教育，但是父亲经济上的成功让威廉及其兄弟在未来受益匪浅。

这位未来的英格兰王室专职御医在肯特郡出生长大，他对自家农场里的蜘蛛、马、狗、猪和鸡充满了好奇心。与年长他14岁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哈维被送去读文法学校，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到帕多瓦后，由于拉丁语是资深学者的通用语，他轻松地学到了很多知识。哈维来到帕多瓦学医可谓恰逢其时，16世纪的前辈如维萨里、法洛皮奥（Falloppio）和欧斯塔奇（Eustachi）等人，早已使帕多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学习中心。

对外国学生来说，帕多瓦有最优越的学习环境。法国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以及英国侨民学生，以民族为单位组成小团体（Nations），有规矩、有组织地相互联系着。哈维来到这里几个月就当选为英国学生团体的“委员”，这一职位给他带来了一些特殊待遇，包括在博宫（Palazzo del Bo）新建成的解剖演示厅^[4]的前排席位，那里是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解剖演示厅。

博宫是帕多瓦大学最古老的建筑。站在楼前深色的花岗岩鹅

卵石上，人们无法立即洞悉这座大楼与周围其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何不同。具有500年历史的博宫是一座玫瑰色的三层石制建筑，设有中央庭院。柱廊式拱门和石框窗户的背后，坐落着那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教室。在帕多瓦，哥白尼为日心说据理力争，伽利略讲解着行星的运行轨道，维萨里使解剖学重获新生。这里的演讲厅、考场和解剖演示厅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们曾经是医学界最伟大创新者的舞台。

走进庭院并跟随意大利语导览标识来到管理办公室的入口，我很失望地发现博宫因施工而关闭。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电子邮件，确定自己预约了这座古迹的私人观光时间。警察用不流利的英语让我离开，告诉我这里不允许逗留。我试着跟他说自己有预约，但是没用，我必须离开。我垂头丧气地走到马路对面的佩德罗基咖啡馆（Caffe Pedrocchi），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咖啡店之一。我得规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喝着美味可口的意式咖啡，我仔细想了想，然后又穿过马路，再次来到博宫门前，询问有预约能不能进去参观。我感到自己的坚持已经让警察非常不耐烦了。他摆了摆手，坚持说博宫关闭期间禁止任何人入内。

我不顾警察的阻挠，在博宫周围徘徊，锁着的金属大门里面便是楼梯口，径直向上通往博宫的教室。一切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即。我猜古代的考场就在楼上的某个地方，天知道那辉煌壮观的解剖演示厅在哪儿。

“先生——请问您是来参观我们教室的美国外科医生吗？”我转身看到一名年轻的负责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

“是！”我大声说道。障碍因此瞬间消除，弗朗西斯卡向我摇晃着一大盘万能钥匙，微笑着转向那扇庄严的大门，用一把沉甸甸

甸的钥匙熟练地打开了老化的机械装置。我们迈上楼梯，走向博宫的第一层。

我们首先来到博宫最大的教室，它已在此挺立五百年，无数著名学者曾经出现在这里，教室内装饰着他们的家族徽章和国徽。弗朗西斯卡指向那些我已熟习多年的名字，他们代表了解剖学、医学和科学的传奇。我独自一人站在伽利略曾经授课的大厅中，满怀敬意地走近讲台，静静地望着它。几百年过去了，这里的空气中依然凝结着魔力，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就是在这里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接下来是一间木制天花板的教室，是专门给医学生做学位最终答辩的地方，而且沿用至今。室内的桌子呈U形摆放，中间有一把小木椅。桌子后面所有的绿色皮面座椅都面向那把简朴而孤单的木椅，候选人坐在木椅上面对一连串问题的攻击，来证明其具备获得帕多瓦大学学位的资格。奶油色的石灰墙上挂着专家们的陈年画像，这无疑进一步增添了毕业生的焦虑感。我仔细观察了欧斯塔奇的表情，察觉到一种精明绝顶的气场。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够知晓他和他的兄弟们开创的是怎样一番事业。

弗朗西斯卡郑重地为我领着路，她面带微笑地问我是否准备好参观解剖演示厅，我热切地说准备好了。离开这间历经时光沉淀的临街房间，我们穿过一扇小门，走进一间光线昏暗且天花板低矮的小屋子。

我向前探着脖子、弯着腰，躲开手工切割的倾斜房梁木，在一片漆黑中跟着向导的声音行走。弗朗西斯卡打开墙角处的一个开关，我才注意到一组小灯包围着我。我还是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但是当眼睛开始习惯低亮度的状态后，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漏斗中。这个房间整体有40英尺高，是一个多层且不

断上升的同心椭圆结构。我身处世界上最古老的解剖演示厅之中，正站在尸体解剖台的位置上。

这一高大宽敞的室内空间被打造成剧院结构，整个演示厅由原木制成，并手工嵌入木板。观众席很陡，上面的每一层由环形木板作为地面支撑，宽度刚好能站下一个人。每一层环形结构的内侧设有一圈木制围栏，高度大约与膝盖处持平。演示厅为观众站立观摩解剖而设计，扶手和栏杆（胡桃木雕刻而成）可以防止晕厥的人向前跌倒。

帕多瓦解剖演示厅于1594年由西罗尼姆斯·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主持修建，他继承了维萨里的解剖学传统，是哈维的老师。解剖演示常常在一年中最冷的月份进行，那时腐烂的尸体没有那么刺鼻难闻。作为英国学生团体的委员，哈维在解剖示教时可以在前排。哈维所学的大部分知识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旧医学，回到英国后，他会继续实践这些学说。当时并非一个科学分析的时代，医学仍沉浸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之中，医生对器官功能的理解还非常原始。事实上，哈维在一生总体上讲还是一个盖伦派医生。

哈维于1628年出版了《心血运动论》（*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要理解这本书的革命性，我们首先要考虑哈维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哪些有关心脏和血管的知识。盖伦对血液的生成、心脏功能以及血液流动的结论，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并且完全错误，按照今天标准更是错得离谱。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早期，没有研究者能够精确可靠地解剖任何哺乳动物并查明血管和心脏的用途。没有一种适当的方式可以使动物在镇静的状态下被切开胸腔。所以，任何动物实验都非常恐怖，解剖者

需要先将可怜的小东西紧紧地捆绑固定几秒钟，然后匆忙地切开胸腔。动物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慢慢地流血至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活动功能。无人理解这些功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也就不足为奇。

盖伦及其后的每位解剖学家都面临着大血管的迷宫，有些血管的直径与花园的胶皮软管一样大，它们向四面八方伸展，围绕着奇形怪状的实体器官。现在解剖学专业的教材，以不同的颜色绘制出动脉、静脉以及血液流动的循环路径，但是在古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打开的胸腔，其中一个搏动的心脏和无数难以识别的血管，如同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

1 500年来，医学生所学到的是，根据血管壁的厚度不同，人体内部有两套截然不同的平行血管系统。亲爱的读者，如果今天您和我同在解剖实验室里，我可以为您展示人体全部血管的主要区别特征：一种是薄壁纤细的静脉，另一种是厚壁粗壮的动脉。不论血管的位置如何，位于腹腔还是四肢，静脉和动脉始终属于这两个主要类别。

盖伦错误地总结道，由于血管壁的厚度，动脉本身就具有搏动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经典盖伦派学说认为肝脏是血液的来源。尽管血液从经过消化的食物中吸收营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盖伦错误地认为，血液受到各个器官和肌肉组织的引力影响，在静脉血管中呈潮汐式双向往复流动。为了让自己的整套想法逻辑通顺，他提出一种理论，说所有的器官都“吸引”血液流向自己，并“消耗”了血液及其中的活力。

盖伦及其门生无法理解肺的功能，他们认为生命活力或者“元气”在每次呼吸时进入肺部，不然还能怎样解释呼吸冲动？他们总结道，是神圣的呼吸赋予了脉搏生命，动脉血也由此从深

紫色变成鲜红色。另外，根据他们的观点，血液从心脏的一侧自然地通过心室间隔上的大型孔隙流向另一侧。

盖伦对于心血管系统功能的最后一点错误观察是，每个器官都消耗血液，吸收生命活力。多余的血液只不过是蒸发了。总之，人体的各个部分吸引着血液向其自身流动，吸入元气，蒸发掉所有多余的血液。如果血液通过动脉的搏动不断地涌入器官终端，那么除了说明血液在静脉中双向往复流动，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释静脉的功能呢？

如此这般地讲解心脏和血管的功能，谬误令人咂舌。

1602年，威廉·哈维从帕多瓦医学院毕业，返回肯特郡短暂停留后移居伦敦，他在那里生活了55年，只在英国内战期间暂居牛津。哈维很快迎娶了一位家庭出身良好的女人为妻，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御医之女。尽管哈维不是伦敦人，但他的社会地位稳步攀升，并于1607年获得医师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的会员资格，那是一群最受尊敬医生的小圈子。即使在学院内部，哈维的名望也步步高升，短短几年就成为财务主管。

这位“身份卑微而知识丰富的乡村男孩”^[5]接受了伦敦的人情世故，他攀登着社会阶层的云梯，走向詹姆士一世的宫廷。与他的病人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哈维对国王总是曲意逢迎，终于在1618年被任命为“专职御医”，同年培根也被任命为大法官。詹姆士一世驾崩后，查理一世于1625年成为国王，不久便任命威廉·哈维为“常任御医”，这是一个更具权势、更有名望的头衔。这一新头衔不只为哈维带来地位和财富，更为他储备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和资源。毫无疑问，与弗朗西斯·培根的接触和一流的医学培训经历，让哈维为更科学地评估心血管系统做好了准备。

不断上升的地位和头衔使哈维的医学实践日益丰富起来。他

和太太没有子女，这也让他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进行研究。1615年，哈维成为卢姆雷恩（Lumleian）解剖学讲师。在人们的眼中，他是技艺娴熟的解剖家，也是天资聪慧的讲师，讲课时总是有板有眼地挥舞着一根16英寸的银尖鲸骨教鞭。他身着“黑色披风、紧身短上衣、棱纹黑丝长袜和高跟长筒靴”，这种高雅的装束将哈维与伦敦的芸芸众生区分开，在人群中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事业上的成功使哈维可以转过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三十多岁时，他已经习惯了白天行医接诊、晚上居家研究的常规作息。儿时对植物和动物的痴迷一直还在，他在伦敦收集的水生生物和陆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农场动物，将成为未来发现的起点。哈维正在引发一种重要的转变，他实际上将帕多瓦带到了伦敦，他的家庭实验室逐渐成为一个小型博宫。[\[6\]](#)一场革命正在酝酿：短短几年的研究后，哈维将得到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哈维的研究动力完全来自他自己。他带着无尽的好奇心，几乎每晚都在进行解剖实践，甚至完成了一项各种鸟类的肛门解剖学比较研究。如果是在21世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实验室里的鸟类研究学者或许可以承担这样一项课题，因为它很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论文发表和终身教职，但是哈维将它作为一项个人探索课题，结果会如何呢？

帕多瓦的另一位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学生雷尔多·科伦波（Realdo Colombo，1515—1559年）是描述血液流动与肺部关系的先驱。他说：“血液由肺静脉输送至肺部，在肺中精炼之后，与空气一起经肺静脉进入左心室。”[\[7\]](#)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突破性在于他认为不是只有空气从肺部回到了大血管中，而是“精炼的”血液从肺部回到了大静脉。科伦波还反驳道，血液并非像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希望的那样，绕过肺部后通过心脏

中间的孔隙从一侧流向另一侧。

有了科伦波的榜样，哈维开始研究心脏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他已经亲眼见过鱼和小动物的血液搏动，通过医师学院的关系，他弄到了一具绞刑犯的尸体，这为他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他将这具尸体运到位于鲁德门家中的私人研究区域，把尸体放在解剖台上，借着烛光，他切开了胸部，掰断了肋骨。

在排干胸部大血管中的新鲜血液之后，哈维发现死者的心肺袒露在自己眼前。解剖学家解剖出心脏时，直接从心脏顶端伸出来的、最显眼的动脉就是肺动脉，也就是从心脏的右侧将乏氧血输送到肺的大直径血管（见彩插页5.1）。哈维将一根细绳缠绕在肺动脉上并扎紧，使液体无法流动。哈维小心翼翼地切开右心室之后，将一根金属管插入心室，并尝试将水注入其中。在肺动脉被扎死的情况下，水无法通过，更重要的是，水并没有穿过分隔左右心室的厚壁间隔。哈维切开左心室，未观察到一滴液体。他说：“我保证没有孔隙。”^[8]盖伦是错的。

解开扎紧肺动脉的细绳，哈维再次将水注入右心室，几秒钟的工夫，水便涌入左心室。这些带着淡淡血色的液体显然是从心脏的右侧经过肺部组织，然后通过肺静脉又回到心脏并流向心脏左侧的。这一瞬间，他知道科伦波是正确的。科伦波坚称心脏向肺部输送血液，血液返回心脏时，呈现生机勃勃的鲜红色。

威廉·哈维已经对心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信无疑，但是他对心脏功能还是感到困惑。他应该继续质疑盖伦吗？对于医生来说，质疑盖伦确实是亵渎神明。还是说，他应该相信心脏与所有的器官一样，舒张时将血液引向自身？解剖了绞刑犯的尸体后，哈维又回去研究他的水生动物，其中有些动物的表皮是透明的，于是他可以仔细观察它们跳动着的小心脏。渐渐地，随着小型生

物解剖实践的增加，哈维对心脏自身吸入血液这一观点所萌生的怀疑越来越强烈。

哈维切开一条鱼的胸腔，看到微小的心脏快速地搏动着，甚至目睹了血液流经透明的主动脉。他将手指放在心脏上，能够感觉到它的收缩，这使他进一步确信心脏更像是一种肌肉组织，而不是一个吸入空气（或血液）的风箱。用鳗鱼做实验时，哈维切开鱼的胸腔并取出了跳动的心脏。他把心脏放在解剖台上，那颗小心脏继续搏动着，即使他将心脏切成一片一片的，每一片都还在收缩着。哈维现在完全确信这颗心脏是一块肌肉，而且有一个收缩的活动阶段。哈维正在解开一项伟大的生命之谜。

多年来，威廉·哈维进行了无数的动物实验。他经常用狗来做实验。以现代标准看来，哈维用成百上千的动物做实验，在丝毫没有考虑其感觉或意识的情况下让它们死去，是相当残忍无情的，我们很难为他辩护。事实上，无论哈维发现的成果有多么重要，他的活体解剖实验都令人恐惧不安。在17世纪，斗熊、斗鸡和公开虐待动物的行为司空见惯，直到1835年，英国才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法令》（Cruelty to Animals Act）。此前，大部分的英国人认为动物无法感到疼痛，一只狗被虐待至死，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情感冲突，就跟今天我们拍死一只蚊子的感觉差不多。

经过许多实验之后，哈维对心脏内部及其周围的血液流动已经确信无疑，但是他仍然对血液的起源以及血液在哪里消失感到迷惑不解。这是科学发展中一个真正伟大的时刻——哈维意识到，研究心脏的功能需要某种计算。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雏形初现之时，哈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分支。

推断出心脏的活动阶段是收缩（systole，希腊语）之后，哈

维意识到他可以估算出心脏泵出的血量。现在看来，他的计算相当保守，但是计算结果使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哈维猜测，心脏每次收缩时，无法将所有血液全部挤出心室，而是只释放出舒张期（或放松状态）心室血量的一小部分，于是他估算出每次收缩时所释放的这一小部分血量约为1打兰[9]（相当于1/8盎司）。这是一个安全的估算，但远远低于实际血量。

哈维估计心脏每分钟至少跳动30次，按一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做乘法，如果非常保守地估计每次收缩排出1打兰的血量，那将意味着每天有近5万打兰的血液通过搏动进入动脉。如果盖伦及所有古代医生一直以来的推测是正确的，肝脏每天需要不断地造出大量的血液，这对于哈维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的真实性根本经不起推敲。

世界上第一次生理学计算得出结论：盖伦显然大错特错。两百年后，拉瓦锡的观察才使质量守恒成为定律，而此时哈维的推断非常简单，肝脏根本不可能像消防栓那样，每天涌出那么多的血液。我们现在知道，按人均体重150磅[10]来说，心脏每次搏动输出量为70毫升，这样每日心脏的输出血量超过7 000升，或者说，有将近2 000加仑（约7 500升）的血液流经心脏。哈维要是知道每天有超过40桶的血液流经心脏，他肯定会气得捶胸顿足。

如果肝脏并没有源源不断地生产血液，那么血液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血液到达最终目的地后发生了什么？它确实蒸发了吗？

哈维的最后一个实验可能是受到了他在帕多瓦的导师法布里修斯的启发。哈维离开帕多瓦之后不久，法布里修斯出版了《论静脉瓣》（*De venarum ostiolis*）。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瓣膜

的功能。法布里修斯并不知道静脉中的血液是从四肢流回心脏的，于是他无法正确地判断“小门”或者静脉瓣膜的功能。他用布料止血带扎住受试者的手臂，静脉便肿胀起来；然后，法布里修斯用手指按住止血带附近的一根静脉，却发现他无法迫使血液流向手部。他总结道，瓣膜“阻挡并延迟了”血液的流动，这明显误解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他的研究以错误的亚里士多德理论为基础，这使他无法看到真相，但是其论著确实启发了他的学生通过重复实验去发现真相。

哈维重复了导师的实验：他将布料止血带牢牢地绑在用人的手臂上，证实了法布里修斯所观察到的血液无法流回手部的现象，因为“小门”禁止回流。由于哈维不盲目相信盖伦派学说，他在解释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时，就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如果你的手臂上可以看到静脉，那么重现这个实验很简单：将一条围巾或者橡皮筋紧紧地绑在肘部上方的手臂上，试着迫使血液流向手部。由于静脉瓣膜的存在，血液根本无法在肢体中“反向”流动。解开止血带后，血液会继续流向心脏（见彩插5.2）。

哈维离他伟大的综合性分析仅差一步之遥。他思考着这些过程：心脏搏动时涌出大量血液，血液在肺部“获得生机”，鲜红的血液通过动脉输送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再结合血液从四肢流回心脏的单向通道这一新发现，哈维顿时明白了。后来，他写道：“我独自一人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我发觉……血液确实通过动脉流向静脉，并由此返回心脏右心室。”

哈维终于有了结论。血液由强大的左心用力泵出，通过主动脉和动脉搏动到达全身，经过某种神秘的交换，同样的血液被输送至静脉系统以返回心脏，之后被推入肺部以获得空气。因此，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哈维的研究是在复式显微镜发明之前进行的，他的肉眼无法看到人体每个器官中“毛细血管床”上那些越来

越小的微型动脉分支。

最终，哈维想道：“因此，我开始自己思考，血液是不是在做环形（circular）运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以及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没有看到心脏功能的真相。在帕多瓦结识了伽利略的哈维向人类宣告，血液在我们的体内沿着双重循环轨迹运行，一条是通向人体的体循环，另一条是通向肺部的肺循环。血液并不是简单地涌入终末器官，而是在血管内流经器官和肌肉；哈维去世后不久，新型显微镜仪器就将揭开这一秘密。简而言之，哈维的伟大在于他揭开了血液循环的真相。

马尔切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年）是一位意大利科学家，他首次描述了在微动脉与微静脉之间存在微血管。他的首次突破性进展来自一次青蛙实验，他在检查青蛙肺部仍在涌动的血液时，借助一块简单的放大镜，看到了介于动脉和静脉之间的一团中间组织。血液循环的路径终于被描绘了出来，马尔比基称之为毛细血管（见彩插5.3）。

威廉·哈维在英格兰和欧陆各地不断地讲解着自己关于心血管系统的看法，终于在1628年出版了经典巨著《心血运动论》。哈维的这部代表作成为科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对人体机械构造的理解，反映出他与勒内·笛卡儿志同道合的机械宇宙观，并使他成为领域内的重要先驱人物。

笛卡儿和哈维改变了17世纪的知识观，再加上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自然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过程。后来的皇家学会的重要创办人罗伯特·波义耳将人体比作一台“液压发动机……由自然精心架构而成”。哈维的“头脑对于当时的知识和文化精神极为敏感，他的想法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11]他的研究首次从数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解释了人体，成为新兴实验时代

的基石。哈维去世后不久，皇家学会成立了，然而继承其衣钵的并非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而是另一位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英国人，当初他像个无人问津的流浪者一样游荡到伦敦，如今却长眠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

1540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将两个行业公会联合起来，统一为“理发师-外科医师公会”。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外科医生饱经各种苦辣辛酸和挖苦讽刺，终于在1745年脱离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外科医师公会”，它后来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理发师和外科医生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争执不休，在18世纪中期，他们都可以提供理发服务，进行简单的脓肿引流，施展有效或无效的放血疗法，但也仅此而已。然而，1745年外科医生独立后，至少暴露出一项重大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解剖演示厅，这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寻找场地以及合适的监管人员。

威廉·亨特（1718—1783年），苏格兰人，著名的内科医生、产科医生和解剖学家。他在格拉斯哥附近长大，之后在爱丁堡、莱顿、巴黎和伦敦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培训。1744年，在圣乔治医院完成医学培训后不久，威廉·亨特以私人授课的方式开设了一门解剖课程并宣传道：“先生们有机会在整个冬季课程中，像在巴黎一样学习解剖技艺。”^[12]

威廉·亨特的解剖学校在伦敦尚属首例。（令人惊讶的是，伦敦第一所特许医学院成立于1785年，但是在此之前，圣巴塞洛缪医院已经进行非正式教学好几个世纪了。）1746年，亨特在科文特花园租了间公寓并开办解剖学校，到1749年，学校搬至附近的科文特花园1号大厦，并大获成功。（现在那里是一家苹果产品专卖店！）学校成功开办，亨特的解剖实践也随之增多，采买与准备尸体的工作便需要委托他人来协助完成。无奈之

下，威廉让比他小10岁的弟弟约翰·亨特搬到伦敦，协助他打理学校的工作。

威廉·亨特“身着绫罗绸缎，头戴银白色卷式假发，与苏格兰知识分子共进晚餐，[穿梭于]咖啡厅和剧院、解剖室和理发店……以及科学和艺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之间”。^[13]而他的弟弟约翰，却与他有天壤之别。约翰13岁辍学，可能患有阅读障碍，人称是个“笨手笨脚，缺乏教养，基本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小伙子……有一头吓人的红发”。^[14]两人上次见面时，约翰只有12岁。10年不见，他的生活已是饱经风霜。约翰·亨特是家里10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出生时父亲已经65岁了。他搬到伦敦时，9个哥哥姐姐中的6个已经去世了。在充满不安和疾病的世界里，威廉是他唯一稳定的依靠。

约翰·亨特拒绝接受英国文法学校的传统教育方式，而是选择在乡间游荡，研究南拉纳克郡的花鸟鱼虫。如果说有什么事能让我们“三岁看老”，那就是他好像面对腐烂之物也不觉得恶心，对一切通常令人反感的東西基本免疫。约翰·亨特没有走上先去伊顿读预科，再到牛津或剑桥获得学士学位的路，而是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天生的怀疑主义和饱经沧桑的坚韧来到了伦敦。

1748年，年仅20岁的约翰·亨特抵达伦敦，尽管缺乏正规的教育经历，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在解剖学校做哥哥的助手。解剖学校已经开办两年了，正在蓬勃发展。他们几乎不了解对方，好在威廉正急切寻找一个能够处理所有尸体的跟班。约翰最好还能解剖讲座做好尸体的准备工作。1748年9月，新学期即将开始，威廉和约翰在科文特花园的解剖室解剖死者的一条手臂。多年来孤僻的性格和猎奇心使约翰自学成才，他熟练地操作着手术刀，让威廉大为惊讶——约翰是个天生的解剖家。和弟弟第一次做解剖研究时，威廉告诉这位没上过学的毛头小伙子，他具有成

为优秀解剖学家的潜质，永远也不会失业。[15]

如今，世界上的每所医学院都由专业人员对尸体进行整体防腐处理，严格地施用防腐固定剂以防止腐烂。防腐剂经由尸体的血管注入体内，这样便可以渗透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在冷却的条件下，尸体能够储存数年而不发生腐烂。解剖实验室在整个学期里也不会让路过的人闻到组织腐烂的气味。学生第一天看见一具死尸会感到震惊，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意识到永远也不会遇到蛆或者脓，恐惧也就逐渐消失了。

科文特花园的解剖学校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尸体本身。到18世纪中期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已经放宽了古罗马时代关于人体解剖的禁令，但是英国仍然严格禁止采买尸体。在16世纪的伦敦，死刑犯尸体会少量分配给理发师-外科医师公会。亨特学校开办后的这些年中，禁令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尸体会在温暖的环境中散发腐烂的恶臭，因此被禁止解剖，但入秋后天气转凉，标志着另一个解剖季节的开始。每年在伦敦被处以绞刑的罪犯多达50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犯下偷窃手表等轻罪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囚犯一直被关押在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和今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附近的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并在史密斯菲尔德被处以绞刑。该区域就在世界上最古老医院之一的圣巴塞洛缪医院附近，也是苏格兰独立战争领袖威廉·华莱士被处以绞刑并裂尸示众的地方；在亨利生活的时代，更常见的行刑地是泰伯恩刑场（Tyburn Tree）。在海德公园的东北角，大理石拱门附近，贝斯沃特路的三岔路中间立有一块小牌匾，以纪念“泰伯恩之树”的位置。这棵“树”是由三根柱子架起的绞刑架，从12世纪至1783年，不计其数的罪犯在这里被处以死刑。绞刑执行场面非常壮观，围观的众人庆祝着正义，被罩住头部的受刑

者扭动身体、挣扎着想要呼吸，或者只求速死，使之成为一场惊悚骇人的消遣。

与威廉搭档的12年中，约翰·亨特的主要工作是采办尸体。约翰的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约1.57米），但是，多年来的辛苦劳作给了他宽厚的肩膀和结实的双手，使他成为一名干将，能够妥善地保住刚刚死去的珍贵尸体。放任自由的狂欢场所需要一个行为粗放的无赖，而约翰·亨特，这位下刀精准的解剖学家、英国的传奇外科医师和科学人才的典范，正是专干脏活的尸体管家之完美人选。

议会通过了《1752年谋杀法》（The Murder Act of 1752），规定要以更为得体的方法施行绞刑，并禁止绞刑后埋葬罪犯。这增加了他们得到的尸体数目，但是仍然不够。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尸体吗？

令人震惊的是，约翰·亨特成了一个史上有名的掘墓大盗。

对新鲜死尸的渴求将约翰·亨特变成窃尸贼中的佼佼者。“1748年10月，威廉叫嚷着他的学生需要更多的尸体，约翰·亨特几乎没有犹豫，在夜色的掩护下走出科文特花园，手持铁锹和撬棍，前往附近的墓地去搜寻刚下葬的尸体。他很有可能先带着学生们去一家小酒馆喝了几杯，为他完成后面恐怖的地下工作壮行。”[\[16\]](#)

在伦敦和爱丁堡，以及后来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专业的盗墓贼将墓地洗劫一空，成为很多家庭的噩梦。他们被称为“掘尸人”，这些窃贼在半夜三更时掀起刚翻过的土壤，在坟墓的顶端垂直向下挖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直到碰上木棺。他们撬开廉价的木制棺盖，让尸体的上半身露出来，然后用绳子将尸体从其安息之地拽出来。[\[17\]](#)接下来这伙人会把尸体装入马车并连夜运至解

剖家的后门地下室入口。

约翰与威廉·亨特一起工作了12年，哥哥在衣着考究的上流社会和王室贵族中声名显赫，最终成为王后夏洛特的产科医生（王后育有15个子女，包括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而约翰，从一开始与尸体为伴，一步一步地成长为解剖学专家。他以采买新鲜尸体为职业，而这位“喜欢喝一杯的年轻人，毫不装腔作势，甚至脏话连篇，显然赢得了为他提供尸体的法外之徒的喜爱”。[18]

他们一起工作的第一个冬天，就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约翰使用手术刀时显露出超乎寻常的技术，到1749年春天，“威廉宣布他的副手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学校所有的解剖工作”。[19]夜半掘尸人成功地发展为一名权威认可的解剖家。在学校工作一年后，约翰开始考虑给活体开刀，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威廉遵循着在伦敦成为著名医生的传统路线——从名牌教育机构毕业，并向知识界证明自己。而对于约翰来说，成为外科医生的道路却大为不同，他没有正式地上过学考过试，也没有机构认证他有能力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类似于现在欧美外科住院医师的工作还要再等上150多年才会出现。1749年，约翰·亨特忙着结识伦敦地区德高望重的外科医师，希望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1688—1752年）是新成立的外科医师公会的负责人，他自己曾在莱斯特和伦敦学习解剖，给执业外科医生做学徒，从而成了一名外科医生。（1800年，外科医师学会得到特许状之后，第一次对外科医生的资质提出了要求，持有大学的学位并被皇家医师学会录为成员之后，才能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切塞尔登去世之前，约翰·亨特跟随他在其家庭门诊和切尔西的皇家医院学习了几年。在切塞尔登眼中，约翰不是

一个年少无知、不经世故的乡下大男孩儿，而是一个嗜爱解剖的年轻人，他认定亨特是其外科王国的继承人。

多年后，威廉·亨特回忆道：“如果让我来安排一个有适当天赋的人走上功成名就的康庄大道，我会选择一名优秀的实践解剖学家，让他进入大医院治疗病患，解剖死者。”^[20]威廉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接受过正规解剖训练的候选人，而不是一个跟着没有正规教育背景的外科医生学习的青年，一个粗俗无知、欺世盗名之徒。威廉写下这段话时，肯定是在暗指自己的弟弟。

尽管指导培训约翰·亨特的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先是切塞尔登，后来是圣巴塞洛缪医院的珀西瓦尔·波特（Percivall Pott）——但是他古怪甚至粗鲁野蛮的脾性从未改变。要真正理解亨特对解剖学和尸体解剖的热忱，只要想想他将味觉视为医生至关重要的武器，你就立刻明白了。“胃液是一种带有几分透明的液体，尝上去有一点点咸。”^[21]医用手套还要等一个世纪才会出现，但我们还是会震惊，到底是什么驱使亨特先生把散发着恶臭的手指伸进嘴里，去品尝那些渗液和残渣。他追随乔瓦尼·莫尔加尼，试着从器官这一基础层面来理解疾病。在了解人体这条路上，亨特显然没有禁区。“不管是从气味还是味道来说，精液都是一种淡然无味的物质，但是当你将其含在口中，它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香料的温热，这种感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2]

许多医学生会腐烂的气味表现出普通人程度的厌恶，从而限制了他们从事外科专业和妇科专业。如果你询问任何一个经历过标准医生工作的普通外科医生或者妇科医生，他们上一次面对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飞快地用一个悲惨的故事来盛情款待你的发问。每所医学院都有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无法克服对恶臭作呕的申请人将被淘汰。对腐烂物体“胃口大开”的人可以继续，“耐力较差者”（也就是说，正常人）进入

皮肤科或者放射科等专业。即使两鬓斑白、经验丰富的手术室老将，在遇到严重的病例时，也无法克服这种深入骨髓的“反感，一种避开疾病的生理机制”，[23]这种生理机制最终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可能威胁生命的感染。后人会感激约翰·亨特似乎没有恶心的能力，这种能力再加上亨特探究的精神和顽强的决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外科人物。

约翰与威廉·亨特一起工作了十几年，其间他们在探究人体构造方面取得了巨大发现。他们对淋巴系统的描述，也许只差准确地揭示胎盘与子宫壁之间的血管没有共享血液，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的假设不同，而约翰·亨特对妊娠晚期死亡的孕妇进行了仔细的解剖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对伦敦妊娠中期死亡和妊娠期满后死亡的孕妇进行多年的解剖之后，威廉于1774年出版了《人类妊娠子宫的解剖学图解》（*The Anatomy of the Human Gravid Uterus Exhibited in Figures*，见彩插5.4），这部超大开本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解剖学著作之一。解剖工作全部由约翰·亨特完成，文字则出于威廉之手，由扬·范·莱姆斯戴克（Jan van Rymdyk）配以精美又不失严肃的插图。

约翰·亨特由切塞尔登和波特培训了几年，并于1754年夏天在圣乔治医院做外科学徒，此后他开始治疗第一批患者。这个粗俗的乡下男孩儿正在变成一名客观冷静的科学家，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观察结果。

历史学家温迪·摩尔描述了这样一位早期患者，他是一名年轻的烟囱清扫工，染上淋病导致尿道狭窄（尿道梗阻）并引起尿痛：

亨特在其中倾注了他与生俱来的科学好奇心，这促使他终生以实验方法对待外科手术。他为那位沉浸在痛苦和沮丧

中的清扫工建好了病例档案.....起初，亨特试图采用传统方法来疏通狭窄的尿道，这想必是从波特那里学到的；这种典型的治疗方法需要试着推入一根“探条”，也即由蜡制成的圆柱塞，有时要试着将其插入尿道以强行疏通。这种方法失败后，亨特的性格让他决定自己试验其他方法，而且重要的是，他对结果做了记录。亨特推测可以在探条的末端涂抹上腐蚀性药膏，通过灼烧来移除堵塞物、疏通尿道.....[他首先使用了氧化汞，结果造成强烈的灼烧性疼痛，然后]清扫工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于是亨特将一片“银丹”，即硝酸银，固定在[一根纤细的中空插管]末端，将其探入尿道.....[亨特记录道]“两日一次，三次之后，他来告诉我，他排尿好多了；第四次使用腐蚀性药膏时，插管通过了狭窄的尿道；此后不久，探条也可以通过尿道，直至他完全康复”。亨特欣然记录下这些。这是实验医学的胜利。他的方法是从传统方法入手，分析结果，以改进为目的形成新的假说并实现其结果，这将成为他贯穿职业生涯的标准实践方式。最终，这个方法将为亨特的外科学革命奠定基础。[24]

与150年前出生的威廉·哈维一样，约翰·亨特也是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酷爱饲养动物。与哈维比起来，亨特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他生活的时代，大英帝国牢牢地控制着海上霸权，这使亨特可以收集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包括亚洲水牛、一头狮子、一只豺、一只澳洲野犬和两头豹，他将这些动物饲养在伦敦西部乡下的住所，位于肯辛顿的伯爵宫。由于他的奇特动物园邻近伦敦的上流社交圈，一些学者认为亨特是儿童读物中“怪医杜立德”(Dr.Dolittle)形象的灵感来源。[25]

约翰·亨特带着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将新鲜的人体标本和稀奇古怪的活体珍禽异兽收集在一起。他的研究出于自身的兴趣爱

好，直至1767年，他才开始在《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文章。他在脑神经、泪腺以及青春期男性睾丸下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发现。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26]没有人比亨特更能体现出那一新纪元的时代特征——他首次进行了一些胚胎学研究，包括细致的特征分析并做了笔记。

大多数18世纪的解剖学家认为，每一种生物从存在之初就保持其自身的微缩模样，在子宫或者卵中一步步地长大。约翰·亨特认为这十分荒谬，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小鸡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自己探索这项课题。亨特频繁地从母鸡身下偷出鸡蛋，然后小心翼翼地敲开，用镊子剥离外膜并检查极其微小的胚胎。胚胎这时还活着，他把这个短暂存活的小生命放入一碗温水中，并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进行检查。最后，他将所有的标本放入酒中，从而建立起胚胎在卵内三周的发育时间表。其他学者在胚胎学研究成果出版方面会掩盖亨特的光芒，但是他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表现出他一丝不苟的科学手法。

在圣乔治医院治疗病患才短短几年，亨特在解剖学和外科方面的声望就吸引学徒们慕名而来。小威廉·希彭（William Shippen Jr.，1736—1808年）便是由亨利指导的早期学生之一。老希彭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费城医生，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办者，他认识到欧洲医学教育对儿子成长的价值，于1758年送儿子漂洋过海，小希彭经过7周的海上航行，来到英国学习。

年轻的威廉·希彭于1754年从刚成立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27]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跟随父亲学习。由于希彭父子能够找到的医学教科书非常有限，老希彭决定送幼子去投奔“英国在解剖和注射等方面最杰出的解剖学家”。^[28]“比利”^[29]于1758年抵达伦敦，距离约翰·亨特自己来到伦敦才仅仅10年，当初他还是一

个少不更事的乡下佬，而现在他已经负责指导北美殖民地最有发展前途的医学后辈了。

威廉·希彭住进了约翰·亨特在科文特花园的房子，在1758—1759年的冬季学期深深折服于这个苏格兰人，完全沉浸在解剖学研究中。威廉的一则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一天：“6时起床，6—8时手术，8—9时早餐，9—14时解剖，14—15时午餐，15—17时解剖。17—19时讲座，19—21时手术，21—22时晚餐，就寝。”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威廉完全掌握了如何有条理地进行人体解剖；在许多晚上，他和约翰·亨特开怀畅饮，闲谈聊天。“希彭长时间跟在亨特身边，在解剖室里度过，他敬畏这位魅力非凡的老师，他似乎有让年轻学生迷上解剖学的诀窍。”^[30]

西半球的第一所医学院成立于费城，最初被称为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由威廉·希彭和约翰·亨特的另一名学生约翰·摩根共同创办。费城坐拥美国最古老的医院，也拥有第一所医学院，以及第一所“天才学会”，即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虽然费城是美国现代外科发展的摇篮，但是可以说，约翰·亨特才是新大陆解剖学和外科学之父。

亨特从荒郊愚人到解剖圣人的神奇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全心全力地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盗尸、解剖和传授。一代又一代医学生沿着前人的脚步来到伦敦，他们立即为亨特“平易近人”的天性所深深吸引，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讲着自己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31]但是成功不只来自他和蔼可亲的天性。他执着地寻找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真相，这带领他系统地“质疑每一种既定的实践方式，提出改进方法的假说，并通过严密的观察、调查研究和实验来测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32]要想让外科这样的以手术为基础的科学取得真正的进步，约

翰·亨特需要大量的病例，尽管大都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让各种疾病也集中起来，但如果不是其他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他也很难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中，英国和法国于海陆交战七年之久，1763年，这场战争以英国掌握霸权和法国的衰落告终。在战争的第五年也即1761年，英国负责战事的大臣老威廉·皮特决定将兵力集中在法国的西海岸和贝尔岛。在此几个月前，1760年秋，约翰·亨特被任命为军医。他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古老智慧——“想当外科医生的人，应该到战场去”。登上医疗船“贝蒂号”的约翰·亨特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悲惨的灾难。经过一周的海上航行，“贝蒂号”抵达法国大西洋沿岸，第一场攻击也惨烈地开始了。由130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面对着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小岛，一道道悬崖峭壁矗立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

开战几天后，英军伤亡数百人，那些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战士被送往“贝蒂号”，受枪伤的水手和士兵往往由亨特及其外科医生团队进行治疗。“木船在暴风雨中颠簸飘摇，亨特以其原始的外科手术挽救着负伤流血、奄奄一息的生命。”^[33]人们常问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为什么战争中使用的“伤亡人员”（casualty）一词既包括伤者又涵盖死者？答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重伤战士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死亡，因此“伤亡人员”基本等同于“必死无疑”。“在没有麻醉剂镇痛的情况下，许多伤员在截肢手术中死于休克，或者在外科医生探查伤口并试图取出弹片时失血而死。他们的尸体被匆匆海葬。在船上臭气熏天的医务室里，那些躺在吊床上的伤员，由于伤口感染而患上败血症，也一天一天地相继死亡。”^[34]

两周过后，英军第二次攻岛，并成功地在棚屋当中搭起了一

处临时医院。在这里，约翰·亨特开始研究治疗战伤的适当方法。其他大部分外科医生都坚持探查伤口这一古老的治疗方式，而亨特开始意识到，或许“少即是多”。他的外科同事们将沾满污垢的手指和器械伸进伤口，这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并加速了死亡。亨特采取了十分克制的处理方式，尽管他有多年的解剖经验以及众所周知的手术水平，他却选择了不去探查、扩大枪伤，而是“悄然无声地”对伤口进行处理。

岛上第一周的生还概率使亨特越发相信保守治疗是更好的方法，他惭愧地意识到，长期以来，外科医生其实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治疗病人的核心原则——“首先，不要造成伤害”（*primum non nocere*）。在一场交战中，五名法国士兵中枪，但是没有被俘。虽然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包括被子弹穿透胸部和大腿），但是他们藏在谷仓里，躲过一劫，直到四天之后才被发现。亨特在照护这几位伤员时发现，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法国兵比那些不幸被“治疗”的英国军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最终亨特相当于做了一次对照实验，他得出结论，尽管没有接受所谓的标准手术探查，所有静养的士兵无一例外都痊愈了。交战双方都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可以对两种治疗方法进行一对一比较，结果揭示出侵袭性治疗的愚蠢之处。

毫无疑问，亨特的战地医疗经历令他疲惫不堪又振奋不已，同时也收获颇丰。如此大量的外伤病例磨炼了他的技术，他对治疗伤口和如何看待感染等问题，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亨特在岛上待了一年多，然后又去葡萄牙度过了一段时间才返程回家。1763年，他回到伦敦时，乔瓦尼·莫尔加尼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u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逐渐广为人知，最终于1769年被翻译成英文。《疾病的位置与病因》是一部令人钦佩之作，它第一次将症状与患病器

官联系起来，是现代病理学和医学的基础。亨特天性好学，他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再加上莫尔加尼的著作对人体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偶然凑成的条件使初步的手术治疗第一次成为可能。

是这样吗？难道印度、波斯、埃及和亚述等古代帝国没有尝试过原始的外科手术吗？虽然古代帝国的智者对人体功能的看法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但是他们既然有能力做手术，那么这种痛苦的手术又是如何在古老民族的人民身上进行的呢？答案是，阿片。

阿片是一种源自罂粟的古老物质，这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东部的被子植物，在中东和印度一带被广泛种植。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医学文献都提到了阿片的使用，有早期外科手术的地方，就有罂粟的栽培。罂粟花的踪迹跨越了帝国，用其汁液制成的产物（包含阿片类生物碱吗啡和可待因）对贸易运输、医药的现代化以及宗教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线香、香料和丝绸的贸易路线，大多为陆路或靠近海岸的海路，然而地理大发现时代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海上航行，以及茶叶、烟草、蔗糖、棉花和药物的国际贸易。

17世纪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拓了洲际贸易，在其成立后的百年中，专门从事香料和茶叶贸易。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等奢侈品需求量很高，但是中国几乎没有对欧洲商品的相应需求。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35]生产商业化，并向中国市场销售会使人高度上瘾的鸦片。鸦片市场在东方的日益繁荣，使这种灵丹妙药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回母国英格兰，英国出现了对吗啡及同类产品海洛因和可待因的需求，也就不足为奇。

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年）被视为英国医学之父，因他制成了一种以阿片特制的酏剂，并称之为“阿片酏”，这是一种阿片、雪利酒、肉桂、藏红花和丁香的混合物。阿片酏几乎成为所有英国内外科医生的日常必需品，这也使亨特可以在乙醚和氯仿麻醉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进入禁地探险。实际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其他一些早于亨特的人是第一位重要的外科医生（例如帕雷和波特等人），但只有亨特是最后一位在没有全面麻醉的情况下开展手术的伟大外科医生，而他所享受的那些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阿片。

两年的国外经历为亨特带来了他一直以来希望收获的成果，他得到了社会地位优越、对哲学感兴趣之人的承认。他从未改变自己 对繁文缛节的蔑视，也没有失去对酒和粗话的热爱，但是他“充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热情洋溢的性格”[36]赢得了皇家学会成员们的青睐。1767年亨特作为“技艺精湛的博物学和解剖学领域人才”，[37]被选举为学会成员。在享有盛誉的学会内部，亨特还荣升为一个秘密小团体的成员，他们时常在伦敦的咖啡馆中，与詹姆斯·瓦特、詹姆斯·库克和内维尔·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等杰出人物一起展开激烈的辩论。

约翰·亨特于1768年在外科医生大厅（Surgeon's Hall）通过口试，取得了外科医师公会的执照，终于有权称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了。亨特终于真正地拥有外科医生这一头衔时，他的学生威廉·希彭和约翰·摩根已经在费城开办了医学院，并成为外科学和医学教授。在取得执照的五个月内，约翰·亨特的身份也随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被任命为圣乔治医院（见彩插5.5）的全职外科医生。亨特刚满40岁，事业上的成就和名望继续攀升，呈青云直上之势。

约翰·亨特继续组建着自己的动物园和外科标本库。作为圣

乔治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对绝望病患的治疗欲望和忍耐力，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外科实践。医院的地理位置紧邻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这也是威廉·亨特后来被封为夏洛特王后的御医并担任其产科医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此高贵的头衔，似乎不会出现在约翰·亨特的身上。

约翰·亨特对解剖学的热情和高超的教学技巧，从科文特花园的小解剖学校完美地转至鼎鼎有名的圣乔治医院。粗野无礼的苏格兰人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英国首都外科医生中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将有多达500名学生被其怀疑主义精神和研究方法深深吸引，接受指导，学习医学。多年来，他致力于动物实验，坚持不懈地收集外科标本，这些实践活动渐渐使他相信，古代对疾病的认识和体液失衡的观念存在着考虑不到位之处。

古代人在并不了解病程的情况下就对病情进行干预，这犯了严重的错误。亨特的前辈们在黑暗中蹒跚而行，而他构想出简单的实验来理解治愈、炎症和病程。他以炉火取暖，以烛光为伴，凭借着最原始的检查器械，对各式各样的动物和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调查。在亨特的实验中没有禁区——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身体实验。

在乔治王时代的伦敦，随意的性行为使性传播疾病（包括梅毒和淋病）遍及这一帝国首要港口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时距离人们就细菌理论达成共识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性病是微型杀手在男女之间传播的最好例证，但是人们依然没有发现罪魁祸首。亨特决定从疾病传播的某个方面开始探究，他想知道，仅梅毒病人的硬下疳分泌物就可以携带疾病并传播给其情人吗？另外，亨特还尝试确定淋病和梅毒到底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还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为了进行此项研究，亨特设计出一个方案，给一个

没有性病史的无症状健康人士接种取样于淋病患者的乳白色分泌物。但是，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志愿者，知情而且自愿将性病患者的溃疡分泌物接种在……自己的阴茎上？盗尸的外科医生怎么样？

亨特进行了惊人的自我接种实验，并以第三人称严格地记录了实验结果。他从未说明病人的身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亨特本人就是实验对象。1767年5月，亨特记录道：“周五，以针头蘸取来自淋病的性病物质〔乳白色分泌物〕，并刺入阴茎两次；一针刺入龟头，另一针刺入包皮。周日，被针刺部位出现瘙痒，一直持续至周二。”^[38]几位同事和学生在当时的记载显示，亨特承认他给自己接种了硬下疳，这一不争的事实令人严肃地意识到，任何情况也无法使约翰·亨特停下钻研人体奥秘的脚步。

日子一天天过去，阴茎上的一处“瘙痒”发展为感染的结痂，很快就产生了分泌物，“尿道口有些翻起，排尿出现异样感，所以尿液中应该也存在该分泌物”。^[39]这时，他还无法确定自己正在出现的是淋病症状还是梅毒的早期阶段症状，但是不到10天他就意识到梅毒正在自己体内萌发，他的阴茎末端长出了溃疡性硬下疳，同时腹股沟出现腺体肿大。是亨特疯了，还是那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让他毫无保留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令自己终身患病？亲爱的读者，请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淋病是自限性疾病，通常不出现复发；梅毒则不然，它是一种微生物导致的终身感染，数年间会一次又一次地发作，表现为三种主要的临床表现，其中包括大脑和脊髓的感染，在最后一个阶段（三期）导致精神失常。亨特先生自己刺破其性器官时故意涂抹的就是这种微生物。

自我感染七个月后，约翰·亨特的皮肤上长出“铜色斑块”，扁桃体出现溃疡。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在溃疡上涂抹汞，直

到症状彻底消失。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发展到了三期梅毒，但是他最终在65岁时死于心脏病；在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中，将近1/3的人会出现心脏疾病，这可能与梅毒有关。亨特对于拿自己做实验的恐怖忍耐力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会对他面临未知事物时的奉献精神敬佩不已。

亨特不顾一切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内心纠结不已，不过了解医学史的学生们也必须承认，外科医生通常对令人厌恶之事免疫，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既能忍受令人作呕之事，又对疾病深恶痛绝，这两股力量达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许多医疗领域的突破便源于此。就像消防员痛恨火，却勇往直前地冲进火场，医者厌恶甚至畏惧致病微生物，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流行病的狂流。约翰·亨特架起了从古老的中世纪放血疗法到科学式外科医学的桥梁。就像探险家和开拓者们甘愿生活在一片原始的荒野中，在外科医学仍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亨特心甘情愿地陷入了那片一无所知的泥潭，为外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亨特认为所有的外科手术均应遵循科学原则，建立在推理、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40\]](#)

亨特的讲座经常批判和颠覆传统观念，他认为“放血疗法不仅无效，而且还具有潜在危险”，[\[41\]](#)他是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外科医生之一。接下来的一代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深入领会了亨特对现代外科的影响，又谱写出许多传奇经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长亨利·克莱因第一次参加亨特的讲座完全是出于好奇，听完讲座后，他说道：“听他讲课时，我对自己说：‘这是阳光雨露，拨云见日。’我觉得自己以前所学，相比之下，什么都不是……我想我可能也会像亨特先生那样自己去思考。”[\[42\]](#)另一位来自圣巴塞洛繆的伦敦著名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John Abernethy）总结道：“我相信他在医学界发起了一场伟大而重要

的革命……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著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思想。”[43]

1776年，世界的另一场革命打响，难以让人理解的约翰·亨特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国王乔治三世的外科医生。有人说他是《化身博士》主人公的原型——表面上是莱斯特广场上受人尊敬的医学实践者[44]，背地里却是罪孽深重的夜半盗尸贼。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外科学的奠基人。约翰·亨特耗尽一生的精力和财力进行医学探索，最后身无分文，只有他收集的大量外科标本和医用珍奇发明被捐赠给了皇家外科学会，与他同时代的那位蒙蒂塞洛的美国哲人[45]如出一辙。

约翰·亨特于1793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参加医院工作人员会议时去世。当时，亨特正在为一个有关住院医师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愤怒告终。他“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在反抗中死去，正如他这一生所为”。[46]他在没有麻醉、对不孕不育也没有任何了解的时代，进行了取石和囊肿切除等原始手术，以及对创伤的初步处理和治疗。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乙醚宣告面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手术刀下的患者带来了抚慰。

我们能在后来柏林的朗根贝克（Langenbeck）、维也纳的比尔罗特（Billroth）和英国的利斯特（Lister）身上看到亨特的影子；在亨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像现在的外科医生那样洗过手，也没有想象过细菌的存在。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在医学领域几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外科巨人，却对外科医生的科学培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从理论上说明，“医院……不仅应该是为穷人提供援助的慈善机构——我们甚至可以说，外科医生在这里获得治病经验，然后到富裕的患者身上碰运气——而且还应该是培养未来外科医生的教学中心”。[47]“我的动力，”亨特总结道，“首先是为医院服务，其次是传播医学知识，因为所有人都可能与这门技艺产生关系。”[48]在亨特去世前不久，另一名年轻

的费城人来到伦敦。这名学生的父亲询问亨特，他的儿子需要读哪些书。“亨特便带着他们来到解剖室，几具正在解剖的尸体躺在那里。他声明道：‘这些就是您的孩子在我手下将要读的书，其他基本都不需要。’”[49]亨特当然是正确的。在18世纪，几乎还没有哪本医学教科书能准确解释或帮助探讨疾病的起因和治疗。

随着外科学的起步，盖伦派医学濒临消亡。一个世纪前，威廉·哈维去世时的情景让人们警醒地回忆起希波克拉底的信仰。1657年，威廉·哈维中风后发现自己无法说话，“他的舌头麻痹了，动弹不得”。[50]哈维叫来他的药剂师，比画着示意把他的舌头切开，这个操作完全符合盖伦的体液学说，认为“放血”会促进语言能力的恢复。对于这位揭开血液循环之谜的人来说，脑出血和中风的奥秘仍然深邃玄妙，野蛮地割伤舌头“根本没用……于是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51]

约翰·亨特显然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发作，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高水平的医院里，那么肯定会有一组包括医生、护士与技师的急救人员做出“快速反应”。虽然亨特在去世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抢救，不过他可怜的灵魂没有遭受毫无意义的盖伦派治疗。亨特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科学外科奠基人”的字样，这位奠基人彻底地改变了解剖学、医学教育和外科学，使外科学从一项卑微的副业提升为一项未来可期的专门职业。

[1] Stephen Paget, John Hunter, Man of Science and Surgeon (London: Fischer Unwin, 1924),p.27.

[2]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177.

[3] Thomas Wright, *Circulation: William Harvey's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Vintage, 2013), pp. 41–42.

[4] 解剖演示厅 (anatomy theater), 本意为“解剖剧院”。——译者注

[5] *Ibid.*, p. 91.

[6] *Ibid.*, p. 119.

[7] *Ibid.*, p. 110.

[8] *Ibid.*, p. 121.

[9] 打兰 (dram) 最早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种计量单位。它既是常衡制单位, 也是药衡制单位。按作者括注, 此处应为药衡制体积单位, 即液量打兰, 等于 1/8 盎司, 约为 3.6 毫升。——译者注

[10] 1 磅约等于 0.45 千克。——编者注

[11] *Ibid.*, p. xiii.

[12] Finch, Ern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Hunters on Medical Educati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1957, vol. 20, pp. 205–48.

[13]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 14.

[14] *Ibid.*

[15] *Ibid.*, p. 28.

[16] *Ibid.*, p. 37.

[17] *Ibid.*, p. 39.

[18] *Ibid.*, p. 41.

[19] *Ibid.*, p. 43.

[20] William Hunter, *Two Introductory Lectures* (London: printed on the order of the trustees for J. Johnson, 1784), p. 73.

[21] John Hunter, *The Works of John Hunter*, ed. James Palmer, vol. 4,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Breem, 1835), pp. 81–116.

[22] John Hunter, *Essays and Observations on Natural History, Anatomy,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Geology*, ed. Richard Owen, (London: John Van Voorst, 1861), vol. 1, p. 189.

[23] Megan Oaten, Richard Stevenson, et al., “Disgust as a Disease-Avoidance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5, No. 2, pp.303–21.

[24]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62.

[25] *Ibid.*, p.149.

[26]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P.F. Collier, 1909), p.157.

[27] http://www.archives.upenn.edu/people/1700s/shippen_wm.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8] Betsy Copping Corner, ed. William Shippen Jr., *Pioneer in American Medical Education, With Notes,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His Edinburgh Dissertation, 1761*,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1), p.7.

[29] 比利 (Billie) 在英语中有时是威廉 (William) 的简称或昵称。——译者注

[30]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84.

[31] Jessé Foot, *The Life of John Hunter* (London: T. Becket, 1794), pp.81–2.

[32]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7.

[33] *Ibid.*, p.89.

[34] *Ibid.*

[35] 阿片用作毒品时称为鸦片。——编者注

[36] *Ibid.*, p.112.

[37] *Royal Society Journal Book Copy*, vol. 26, 1767–1770, February 5, 1767 (no page numbers).

[38] John Hunter, *The Works of John Hunter*, ed. James Palmer, vol. 4,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Breem, 1835), p.417.

[39] *Ibid.*, pp.417–19.

[40]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6.

[41] *Ibid.*, p.176.

[42] *Ibid.*, p.177.

[43] *Ibid.*

[44] 伦敦莱斯特广场中心公园曾竖立雕塑胸像以纪念约翰·亨特，广场上的其他雕塑包括莎士比亚、牛顿、约书亚·雷诺兹、威廉·贺加斯等。——编者注

[45] 蒙蒂塞洛的美国哲人，指托马斯·杰斐逊，他于1770年开始建造蒙蒂塞洛庄园，用于展示探险远征所发现的植物标本、活体植物、工艺品，以及欧洲的雕塑和绘画。——编者注

[46] *Ibid.*, p.269.

[47] *Ibid.*, p.170.

[48] *Ibid.*, p.171.

[49] *Ibid.*, p.223.

[50] Thomas Wright, *Circulation: William Harvey's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Vintage, 2013), p.225.

[51] *Ibid.*

第六章

病理学

虽然我们切入身体内部，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是事物的外在，只不过创造了新的表象以供观察……大自然倾其所能，使身体各部分的运作隐秘而微，我想即使借助显微镜或者其他发明，也没有人可以参透其中之奥妙。

——约翰·洛克

堪萨斯大学冷冰冰的太平间仍然令我感到忐忑不安，尽管我是一位经历过二十余次尸检的老手。在即将升入医学院三年级的时候，我申请到世界一流病理学家与研究专家克拉克·安德森医学博士的骨科研究实验室的奖学金，于是我选择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除了研究癌细胞系和骨形态发生蛋白（BMP，一种引发和控制骨生长的信号传导物质），我还负责与安德森医生一起进行尸检。此时此刻，正值深冬，我被叫到太平间，调查当地一名牛奶送货员的死因。

太平间与解剖实验室完全不同。医学院一年级时，我们渐渐习惯了解剖室里的尸体——在一连几个星期的解剖过程中，散发着防腐剂气味的尸体的僵硬结构会慢慢地呈现出来。有段时间，我和另外两个解剖助手每天要按照解剖手册的指导说明，对一具74岁女性尸体的某个特定解剖部位进行探查。随着时间的流逝，被70具尸体包围的新奇感不见了，对他们背后的故事和人格的疑

问也逐渐消失了。

来到太平间，我看到一名中等肥胖、体态健壮的38岁送货员，全身赤裸地躺在不锈钢尸检台上。尸检室有三张结实的工作台，专为尸检解剖而设计，每张工作台的中央台面都布满凹孔，台面四周设有水槽，槽内水流可以冲走血液、体液以及被感染和被污染的残留物。尸体被安置在中央台面上，病理科医生可以通过脚来控制录音设备和麦克风，记录他在尸检过程中给出的意见。

与每家医院的太平间一样，这个工作站也位于与世隔绝的地下室，远离来往的人流和诊区。当你身处这鲜有人至的环境，即使是在白天，内心也会充满孤独感和恐惧感；再想到死尸就存放在冷藏柜中以便随时检查，这种感受会变得尤为突出。在医院深处，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寂静，耳边回荡着尸检台上单调的冲水声，这里没有对生命的挽救，只有对死亡的解释。

安德森医生解释说，黎明时分，这名送货员在屋外卡车旁的雪地里被发现，发现时面部朝下，卡车启动着。救护车飞速赶到现场，他的太太惊慌失措、悲恸欲绝，充满了焦虑和无助。经急诊室抢救无效，急诊医生宣布死亡，并将其送到地下室的太平间。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法律，指导当地的验尸官是否应当下达尸检命令；在这个案例中，死者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于家中非正常死亡，所以最后需要对其尸体进行检查。

我们身着蓝色刷手服和一次性纸质手术衣，与在手术室的穿戴毫无二致。防水手术衣提供了一层保护和一点点温暖，戴上防护镜可以防止体液溅入眼睛。我们准备好简单的器械托盘，之后就要“亲自查看”[“尸检”(autopsy)一词的字面含义]了。

我戴着手套，一只手按住死者的躯干。因为死在冰天雪地

里，再加上刚刚在尸体柜中冷藏了几个小时，他的身体异常冰冷。安德森医生手握尸检刀，醒目的大刀片专门用于做胸前的长切口。我又瞥了一眼死者的脸——面容扭曲，面色发青，由于他趴在雪地里死去，脸的右侧被压平了。几个小时前他还活着，现在却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具人造的假尸；只有切开宽阔的胸膛才使我确信——他是人。

安德森医生沿着胸腹正中做了一个纵切口，起点始于胸骨上窝（胸骨顶端覆盖气管的薄层皮肤），然后绕过肚脐向下止于耻骨。

用器械剥开皮肤边缘之后，我准备好骨锯，以劈开胸骨。彼时我已经学会了使用骨锯，安德森医生让我从正中劈开胸骨。这与心脏外科医生使用的是同一种器械。作为一个医学生，能够在成为医生之前操作真正的外科器械令我感到兴奋不已。我在骨缘之间放置一个肋骨牵开器，转动曲柄一周便可以使肋骨张开。

当胸骨被劈开后，心肺就暴露在眼前。深红色的心脏一部分包裹在鼓起的肺中，肺部是影影绰绰的、湿乎乎的一片灰白色器官。心和肺的颜色、结构、功能和重量截然不同，就如同阴阳结合。胸腔包裹着心脏与脆弱的肺组织，其周边由肋骨环绕而成，底部是强健的膈肌，它是胸腔与腹腔的分界线。膈肌上有三个一英寸大小的裂孔，分别有食道、主动脉与腔静脉穿过。我们小心地切开厚厚的膈肌，保护好血管与食道的完整性，避免血液或食物的渗漏。

接下来是腹腔，我们在这里遇到小橄榄球似的肝脏、肾脏、消化道（胃、小肠和大肠）、脾脏、膀胱和胰腺。由于我们非常仔细，没有损伤肠壁，因此还没完全消化的食物和大肠中的粪便都没有溢出。

作为医学研究人员，我们在检查这些器官时有几种选择。最老式的方法就是简单地用手进行探查，靠观察来推测死因。

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法是将胸腔和腹腔内的器官切下来。罗基坦斯基法（Rokitansky method）是将器官成组切除，放在旁边桌上进行检查。菲尔绍法（Virchow method）是将器官逐个切除，在原处进行探查，并提取组织样本以进行显微镜分析。与徒手探查相比，这种方法可谓是巨大的飞跃。

当天我们要使用的技术，不雅地说，让我想起与父亲和兄弟们在家乡怀俄明州的牧场上狩猎时学到的“宰鹿”法。勒蒂勒法（Letulle method）首先需要将喉部至肛部的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暴露出来，然后将它们一齐切除。在切断腔壁上的软组织粘连之后，病理科医生托出心脏、肺、消化系统以及腹部的所有器官，它们之间仍然互相连接着，留下被挖空的腔体。在解剖台上，这些器官脱离了周围的体壁，所以评估就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轻松地对每个器官进行逐项检查。我的导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毫无疑问，其发明者应该出身于一个猎人家庭。

我和安德森医生完成了大量的器官切除工作之后，费力地将这一堆滑溜溜的组织转移到解剖台上。在这里，我们开始慢慢地切开器官，寻找明显的异常状况；同时对组织进行取样，将样本放入带有标签的小塑料器皿中，倒入福尔马林并拧上橙色的盖子。

头部是最后探查的部位。将尸体顶部的头发分开，沿颅骨顶部做长切口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头皮向侧面剥下，露出颅骨。用专门的锯沿颅骨切开，并剔除软组织粘连后就可以看到光滑且厚实的乳白色脑膜。这层结构被称为硬脑膜（拉丁语：坚强母亲），切开后可见脑组织。在颅底切断神经连接与脊髓后，安

德森医生托出一团胶状物质，并（不可思议地）将一个完整的人脑交给了我。

这位先生的大脑非常坚实，呈粉色，布满了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萎缩的沟回，不过这位年轻人的大脑比较光滑饱满，相对于他的颅骨来说似乎大了一些，里面填满了生命之源。我们用手指对大脑皮质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在沟回之间查看是否存在血管破裂或肿瘤的迹象。经过肉眼检查，我们没有发现该器官有明显异常之处。

安德森医生和我分立在一张狭窄解剖台的两侧，用双手将大脑牢牢地固定住。他抓起一把长度为12英寸的手术刀，看上去很适合切火鸡，然后开始像切面包片一样对大脑进行切片处理，每片厚度约1/3英寸，并将切片放在一个大盘中。最后他切出了一整盘大脑切片，几乎就像一盘大号曲奇饼干一样，这样可以对整个大脑进行彻底的检查。这种方法比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的出现早几十年，是深入研究死者脑结构的唯一方式。

完成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的解剖之后，我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心脏。其他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的怀疑就集中在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上。在导致猝死的严重心脏病发作病例中，心肌通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没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对于死亡之前与心肌缺血斗争数日的患者来说，其心肌会变得苍白——甚至发黄。这位送货员的心脏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因此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冠状动脉上。

心脏是我们身体的泵站。虽然我们的全部血液都来自心室的搏动，但是血液并不会灌入这个泵本身的肌肉组织。心肌需要它自己的供应血管，即冠状动脉——主动脉离开心脏时的分支。两

支主要的动脉，一左一右，生出小动脉分支，伸展到肌肉深处，以提供氧气和脂肪酸（作为燃料）。我们从心脏表面就可以看到冠状动脉。借助外科手术器械，我们对冠状动脉进行了解剖，以备镜检。

在我们的心脏中，左冠状动脉分成两个主要分支，它们距离主动脉仅1英寸，供给心脏最重要的左侧部分，正是这里有力的收缩将血液推送到全身。通过进一步的解剖，我们分离出左前降支动脉（俗称“寡妇制造者”），并将这段2英寸长、意大利面般粗细的血管切下，泡入福尔马林中。它摸上去又硬又脆，安德森医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个调查员一样表现出对这名男子死因的强烈怀疑。我想他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真凶——脱落的胆固醇和脂肪凝块刚好阻塞了这支最重要的、其粗细程度却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符的血管。安德森医生对这名男子及其家属的体恤同情，一下子就超越了科学信条和病理学。

经过福尔马林的整夜浸泡，“固定”的小块组织样本得到了进一步解剖，关键样本被放入蓝色的小塑料盒中以备镜检。这些小盒子跟嘀嗒薄荷糖（Tic Tac）的塑料盒差不多大，我们把它们装入仪器，为样本分次加入不同浓度的酒精，每次间隔半小时，酒精浓度逐步增加；再加入二甲苯有机溶剂，目的是阻止一切细胞变性或细菌生长，同时对原组织样本进行脱水处理。接下来，仪器会将塑料盒浸入石蜡中，而这些蜡块仿佛就是保存组织标本的微型时光机。

我将一堆蜡块码放整齐，交给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员，她把这些蜡块装到徕卡切片机上，这种机器会将蜡块切成一串极薄的切片，就像那种圣诞节的装饰拉花一样。她再把石蜡切片嵌入载玻片，然后带到染色站。在使用深紫色和红色的苏木精—伊红染色之前，载玻片上的组织切片几乎是看不到的，不过染色之后，组

织截面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表现出细胞分化的不同形态。技术员将玻片一片一片拿出来，放入盛有化学染色剂的小金属杯中浸泡30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再以她自己习惯的方式从杯底取出玻片并进行干燥后，它们就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先看看号称“寡妇制造者”的冠状动脉玻片。我将玻片放置在显微镜载片台上，蔡司显微镜上的小平台中间设有一个小孔，光线可以从下面穿过。我低下头，通过目镜观察，并旋转聚焦环，直到细胞清晰可见。动脉的横切面显示，该动脉已经完全被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阻塞，我盯着杀死这位患者的致命杀手，仿佛心脏病发作那一刻的真实情景得到再现，并于一瞬间凝固在眼前这张小玻片上。这个斑块使宝贵的血液无法流入心脏中最关键的部位，心肌失去了燃料和氧气，停止泵血，最终导致死者倒在了车道上。

人类对死亡和疾病的理解已经远超出我们最早的推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我的前辈们通过学科的专业化训练、怀疑主义的态度、显微镜和化学染剂，掀开了死亡的面纱，解开了疾病的秘密。如今在太平间里，我借助病理学家的器械便能够科学地解释这名男子的死因，即使我无法理解我们的生命为何如此脆弱。

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帕多瓦可以宣称自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重要发源地，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培养的孩子包括维萨里、法洛皮奥、哈维和伽利略；而随着18世纪的到来，一位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不久来到帕多瓦，终生献身于一项震撼人心的研究课题，即将为医学世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

乔瓦尼·巴蒂什·莫尔加尼（1682—1771年）19岁毕业于博洛

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组建了一个面向学生和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学会，名为“不眠学院”（Academia Inquietorum）。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莫尔加尼读到了西奥菲勒斯·博尼图斯（Theophilus Bonetus）的新书《墓地》（*Sepulchretum*），这是一部数千个临床病历及相关尸检的资料集，由博尼图斯汇编而成。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医学文献，来自一系列不同的作者，遗憾的是，文献未经整理，内容凌乱无序，几乎无法阅读。年轻的莫尔加尼“却全神贯注地读起了《墓地》……他开始明白，这本书建立在最基本的事实之上”。^[1]起初他着手修改此书，但是后来将其发展为一部以他自己的病例为基础的全新著作。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莫尔加尼开始这项研究课题时大概20~21岁。他收集了自己正在治疗患者的信息及尸检结果。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敏锐的临床分析，以及为了支持其临床结论而偶尔进行的生理学实验，他将一个一个的病例汇编成书。“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执业医师的聪明才智，一名卓越的解剖学家的顶尖技术，一名实验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以及他对细节的锲而不舍。”^[2]

莫尔加尼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耐心？接下来的60年里，他一边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治疗病人，一边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编写这本即将改变医生看待患者的角度以及思考疾病本质的著作。莫尔加尼于1761年出版了《疾病的位置与病因》，那时他已经80岁高龄，仍然在给病人看病。

《疾病的位置与病因》以谈话形式编写，仿佛写给朋友一样，是写给一位年轻医生的70封信件，写信的对象也许是虚构的。这70封信件中总共涉及700个病例，系统地分为5卷：头部疾病、胸部疾病、腹部疾病、外科与常见疾病及附录（包括索引）。对书中的每一个病例，作者都“提供了详尽的病史，评析

了当时想法的变化，引用并探讨了权威的观点，于是作者自己的逻辑推理过程也一步步地逐渐清晰起来”。[3]这些病例经过数十年的精心编纂和整理，学生可以按症状（例如“胸痛”）查阅，对具有相同症状的病例进行调查研究，寻找真实病因以及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此100年前，伽利略对违背科学的、充满迷信的天文观发起了挑战。在莫尔加尼所生活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医生们仍然陷在古老的希波克拉底传统里，固执地相信体液、季节规律、瘴气、恶劣空气和天谴的影响。莫尔加尼的《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可以说是对体液学说的致命一击，它转变了医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开始思考“体内特定结构中某种病态的具体表现”。[4]作为医生和解剖学家的莫尔加尼总结道，症状就是“患病器官的哭诉”，这大概是医学史上最反传统的陈述。这一对疾病的新认识，言简意赅又切中要害，使医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器官或身体部位上。莫尔加尼不去仰望星辰，抛开神秘体液失衡的看法，意识到疾病是（往往处于痛苦中的）器官功能失调的表现。

60年间接诊的数百个病例使莫尔加尼确信，疾病发生的模式可以被观察出来。18世纪，药理学正处于萌芽期，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莫尔加尼对器官引发的疾病了解日深，并且可以根据经验预料尸检的结果。或许他的学说还未成功挽救过生命，但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使他对自己在尸检台上所见状况的预测越来越有信心。《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很快被译为法语、英语和德语。当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医生开始明白，一系列症状对应特定的患病器官。

关于医学的进步，有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对受伤或患病的器官进行评估，是真正理解该器官（及组成器官的细胞）实际功

能的最好方法。笛卡儿曾提出人体只是一台机器；莫尔加尼则促使医生们以钟表匠或机械师的眼光来看待协调一致的“身体—机械”结构，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会完美而和谐地运转，而医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诊断出现问题的部位。从此医生在工作中要仔细聆听患病器官的“哭诉”，一丝不苟地观察和检查患者，然后根据经验说明他们饱受摧残的原因。

莫尔加尼不仅是解剖病理学之父，还被誉为现代医学诊断的开创者。“他的研究和结论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莫尔加尼及其研究彻底击碎了旧医学学派的教条，新医学也由此开始。”^[5]奇怪的是，我们对莫尔加尼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熟悉，但他确实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包括让-尼古拉斯·科维萨尔（Jean-Nicolas Corvisart, 1755—1821年）和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路易（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 1787—1872年），这两位医生帮助巴黎在19世纪成为世界医学圣地。后来变革的钟摆又荡回了巴黎以东，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杰出医生，尝试完全以病理学为基础来行医治病，在没有强大的医疗器械作为辅助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超过3万例的尸检解剖。

1848年，一股政治剧变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大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及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次革命运动挑战了封建领主和贵族的地位，为下层阶级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同一年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德意志各邦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活动对医学和学术界产生的促进作用尤其显著，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十分相似。在维也纳，墨守成规的医学旧贵族与年轻的革命新秀对峙不下，这是“新旧之战、知识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战、真正科学的疾病观与老派医学的模糊理论之战”，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运动的领导者是波希米亚人卡尔·冯·罗基坦斯基（1804—1878年，见彩插6.1）。

罗基坦斯基理解莫尔加尼及其法国弟子的重要性，孜孜不倦地深入挖掘疾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对疾病的研究越深入，他对器官功能的理解越深刻。如果说莫尔加尼是解剖病理学和医学诊断之父，那么是罗基坦斯基一字一句地打造出病理学的宫殿。

维也纳总医院现在是维也纳大学本科校园的所在地，宽阔的庭院和巍峨的建筑仍然保存完整，只是如今住在其中的是波希米亚奥地利学生，而不是痛苦的病人。校园西北部的施皮塔尔大街（Spitalgasse）上坐落着脑研究中心，这是一座威严壮观的三层建筑，外部围有石砖和金属护栏，建筑顶端有一组古希腊古罗马人物雕塑，以及奥地利双头鹰盾徽。在人像下面，距地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行以镶金浮雕刻写的拉丁文，只有读到它才知道这栋建筑曾经有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功用。“INDAGANDIS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意为“对疾病位置与起因的调查”，这显然是对莫尔加尼革命性著作的致敬（见彩插6.2）。这里曾经是罗基坦斯基的病理学研究所，一座医学音乐厅，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完成的超过3万例的尸检解剖，便是在这里操作和演示的。

按照这座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在总医院死亡的每一个病人都会送到这里进行尸检，这也使欧洲医学的领导地位转移至维也纳。这个时期的维也纳汇集了一批医生，并由此诞生了病理学、皮肤科、精神病学、眼科和外科等专科医学领域；在临床推理和科学观察方面，罗基坦斯基对年轻的医生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研究所的后面，有一个专门为罗基坦斯基做讲座和演示而建的演讲厅，那里也是维也纳的传奇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做手术的地方，维也纳美景宫美术馆展出的塞利希曼

(A.F.Seligmann) 的著名画作便记录下了这个场景。

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罗基坦斯基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进行了成千上万例的尸检解剖，就像哥白尼没有望远镜。罗基坦斯基所有的那些尸检都是对器官和组织简单而粗糙的手工检查，这严重限制了他对病因的理解产生概念性的飞跃，但是他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领导地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与他们的天文学同人一样，医生需要将研究对象放大，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点亮思维之路。再有几次无心插柳的发现，人们就能见识到显微镜这种仪器的威力了，并借此促成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

皇家学会成立伊始，显微镜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发明者罗伯特·胡克是一位无神论者，爱好解决问题，组建工具，他于1665年出版了开创性著作《显微图谱》(Micrographia)。那时皇家学会也刚成立几年。该著作是第一本对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做出描述的重要出版物，击碎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肉眼不可见的世界的很多假设。胡克在绘图方面技术高超，他绘制的图纸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并激发了欧洲各国天才同行的想象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大概是一张绘制在大幅折页上的跳蚤图纸，它显示出跳蚤的每一根纤毛和瓦片状叠甲，说明跳蚤并不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蚋虫，而是一种具有甲壳的微型小怪兽（见彩插6.4）。生物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是显微术专家即将向人类展示生物结构表现出的功能。不过最微小的生物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一观点，还需要200年才能确凿地证实。胡克绘制的跳蚤完美地将人类的注意力转向了微观世界，这种昆虫的大小虽然肉眼可见，但是其他一切细节都完好地隐藏在其纤毛中，让人无从得知。无独有偶，正当胡克于1665年阐明跳蚤的结构特征之时，又一次大瘟疫袭击了伦敦，后来人们才发现，跳蚤是这场瘟疫的细菌携带者，而

毫不知情的胡克解剖和描绘跳蚤时简直是在玩火。

胡克也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植物的结构。他的显微镜放大倍数刚好可以细致地观察到植物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他将自己在软橡木的微观结构中所观察到的“小房间”称为“细胞”（见彩插6.3），这一新创造的术语将用于以后所有动植物的显微研究。直到19世纪中期，在现代化学的帮助下，人们才发现生命的细胞基础。

提到“显微镜”，我们的脑海中一般会立即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根倾斜的黑色金属管镶嵌在U形底座上，载物台上放着一张载玻片。当然，今天的显微镜还会有一根电源线，使底部的灯泡从下方照亮载玻片，聚焦环和调节旋钮则可以移动载物台和载玻片。数百年来，显微镜一直都是这样的结构。然而世界上第一位显微术专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所使用的是“珠形显微镜”（见彩插6.5），这是一种外形古怪、能力有限的仪器，却能够让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活细胞。

列文虎克是一名荷兰测量工和布料商，他经常通过望远镜观察远方的地标建筑，用放大镜去数布料中的线股（这使我们想起数据表单中的“线程数”）。他把一个极小的玻璃珠磨制成高度数凸透镜，并将其固定在一块桨状金属片上。在靠近玻璃珠的地方有一根细针，他把自己想要观察的微型物体用蜡固定在针尖上，就可以对物体进行仔细观察，通过转动螺旋钮还可以使被观察的物体上下前后移动。几十年来，列文虎克与皇家学会保持着通信联络，他向学会提交了微观世界的图纸，描绘了这台原始而实用的仪器所展示出来的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列文虎克最初在《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关于蜂刺、虱子和一滴池水中隐藏的世界，但是不出几年，他便惊人地

发表了一篇关于精子形态的文章。1677年，他在写给皇家学会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想要提交这篇论文的意愿，“如果贵会认为学者们可能会对这些观察产生反感，认为它们不堪入目，那么我恳请您将此视为私人研究，并按照尊意，发表或者销毁”。到1678年，他的文章对“动物生殖器官之种”的本质进行了探讨，绘制了兔和狗的精子图。他格外小心地写道，检查自己的精液时，“我所观察的只是自然本质，依靠的并非罪恶的自渎，而是夫妻生活的自然结果……”[6]

数千年来，人们对孕育的真相争论不休，早期的显微术专家非常渴望探求精液成分的形态。对于这些早期科学家来说，确定子宫内部的发展还相当困难，但是蜿蜒游动的精子“幽灵”，与蝌蚪或者显微镜下的原生动物非常相似，都借助鞭毛的推动前行，这印证了人们从开始思考“生命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来就一直存有的猜测。同样重要的是，精子看上去并不是动物的微缩版，在成形以后才进入子宫。随着显微术的出现，许多人都想知道他们能不能在狗或者兔子的细胞里找到小狗或者小兔子。但精子更像是为驶入子宫而特意打造的小机器，尽管其机制还未被洞悉。

随着显微术的进步，一场惊人的转变发生了。正如培根几十年前预测的那样，发明创新的成果会被分门别类地归纳，再进行筛选，然后通过“合理地运用思想体系”，最终产生知识的无形框架。[7]凯瑟琳·威尔逊认为：“科学破坏了人们脑海中熟悉的世界，并以一个陌生的世界取而代之，这一新世界在富于想象力的同时，又抵制人类价值观的投射。”[8]呈现于眼前的新事实使科学家们改变了古老的结论，采纳了新的理论，不过奇怪的是，人们为显微镜带来的发现狂热了半个世纪之后，微观世界研究者的头脑却平静了下来。

关于想象力，启蒙运动作家贝尔纳·德·丰特内尔笔下的哲学

家主人公说：“……我们的头脑充满了好奇，而我们的眼睛比较差劲……我们想知道的不只是眼前所见……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在一生之中，不会相信双眼所见之物，努力神化未见之物。”^[9]透明玻璃的发明、镜片制造的创新、复式显微镜的组建，以及微观图示的广泛出版，终于让人们自鸣得意，止步于此。谁会一直盯着跳蚤、精子和昆虫眼球的图画？到18世纪末期，尽管工业革命正在世界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显微术还是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想想卡尔·罗基坦斯基进行了3万例的尸检，都未曾试图使用一台仪器来检查组织，哪怕这台仪器能够彻底转变他的解剖实践，你就能理解当时显微术衰落的程度了。现在的一些科普作家，如戴维·伍顿，深入地思考了17—18世纪的医生和科学家无法使组织显微术研究取得进步的原因。其实，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原因能解释发展的停滞，即缺乏能够使组织变得栩栩如生的可靠染料。

现在的病理实验室可以解剖并准备组织，以供微观检查。我们首先将极薄的组织切片嵌入载玻片，然后把它装在显微镜的载物台上，打开灯，低下头，通过复式显微镜的镜筒来观察，我们会看到细胞及其支持组织的模糊轮廓，但是几乎无法区别或评估细胞的结构或功能。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文森特·凡·高的系列画作《向日葵》，那么我为你展示一幅气氛悲惨忧郁的低分辨率黑白版《向日葵》，其实一点儿用也没有。相反，如果你面对面近距离观赏文森特的作品，面对帆布上的湖蓝色背景，观看错落有致的鲜黄色和奶糖色花瓣，欣赏一笔一笔画上去的浓重色彩，你就会同意他是在弹奏一曲“蓝色与黄色的交响乐”。^[10]

虽然现在有人会批评17—18世纪显微术专家，但他们要理解那时候缺乏显示色彩的技术，也没有灯光照明；尽管当时有简单的植物染料，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化学的发展还非常有

限，用于反复实验的化学试剂并不存在。发生在伦敦东区的一场愉快的意外，将为单调乏味的科学世界带来色彩。

安托万·拉瓦锡（1743—1794年）是一位科学天才，他致力于条理分明地分析化学反应，确定火焰为什么燃烧、我们为什么呼吸以及物质为什么发生反应。经过严谨的实验和全面的分析，他进一步证实了“质量守恒”的观念，认为“没有物质消失，也没有物质产生，一切只是发生了转化”。即使我们不能笼统地称拉瓦锡是“化学之父”，那也可以称他是“化学计量之父”，他发现了化合物是由分子按照精确的比例构成的，可以通过化学反应形成，既可能化合成更大的分子，也可能分解成更小的分子组合。

拉瓦锡出身于古老的法国贵族阶层，从不平等的贵族统治中受益颇丰。他排列出第一张元素表，并设计出一套科学命名法来描述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大厨对发酵粉、泡打粉、糖和鸡蛋的用途了如指掌那样，拉瓦锡渐渐地明白了元素之间如何相互反应，金属为什么生锈，植物怎样从土壤中吸收矿物质，又如何从空气中吸收化学物质。他以天才的眼光，将世界看作由各种成分和原子构成的混合物，在他的影响下，其法国同行和其他欧洲的同行总结出，世界可以用其基本构成要素来描述。可悲的是，拉瓦锡没能平安地度过法国大革命，在50岁时被斩首。拉瓦锡的一位学生在大难临头前逃往美国，他就是化工帝国的创始人E.I.杜邦（Éleuthère Irenee du Pont）[\[11\]](#)。

在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于1869年制作出元素周期表之前，一个“有准备的头脑”收获了天赐良机——这次偶然的发现使初级化学转变为可以与数学、物理相提并论的一个专业领域。1853年，15岁的威廉·亨利·珀金进入了伦敦的皇家化学学院，虽然伟大的拉瓦锡是开拓化学领域的先驱，但是年轻的威廉在其伦敦东区公寓中的发现，推动了现代化学的发展，并带来了

生物学、医学、制药业和时装业的变革。

教授交给他合成奎宁的任务（奎宁在当时是唯一一种有效的抗疟疾药物），于是他带着试剂、烧瓶和仪器回了家，希望可以制造出那种提取自一种南美洲植物的珍贵药品。那时，他住在伦敦沙德韦尔地区的卡布尔街（Cable Street），1856年复活节放假期间，18岁的珀金一个人在他的家庭实验室里，以“煤焦油”为基本原料开始了实验。煤焦油是一种在缺少空气的条件下加热煤炭而产生的黑色液体副产品。在新兴的工业革命中，煤焦油是一种常见的工业废料，而珀金在自己楼上的房间中，就以这种脏东西开始进行氧化实验。实验并不顺利，他又加入了重铬酸钾，生成了黑色的水样沉淀物。用乙二醇清洗烧瓶时，沉淀物变成了深紫色，最初他将这种紫色称为“推罗紫”（Tyrian purple），后来改称“藕荷色”。^[12]

千百年来，紫色一直是象征皇族权贵的用色。在古罗马时代，1.2万只贝类生产出来的腓尼基的推罗紫染料，才能染制一件罗马托加袍大小的衣物。人们也尝试过植物染料，但总是褪色。珀金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一发现的价值，对染料的“牢度”进行了试验。他从垃圾废料中发现了一种持久耐用、物美价廉、需求量很大的材料，并很快申请了发明专利。到19岁时，珀金在伦敦郊外开办了一家染坊，从自己的偶然发现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看起来，炼金术还是可能成为现实的。

珀金这一发现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布料染色，它还有更为神通广大的用途。化学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领域，化学家们竞相把煤焦油制成其他颜色，希望可以像珀金一样赚大钱。然而，故事发生了惊人的意外转折，化学实验并没有产生新的染料，而是合成了具有生物效应的新分子。这种新知识所创造的早期产品之一是对乙酰氨基酚，即今天的药物泰诺。新生的合成染料工业中进

发出关于化学反应的新知识，使医学、摄影、香水、食品和爆炸品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随着人们对化学结构了解渐深，具有专业化学知识的企业在欧洲大幅增长，尤其是在德国，巴斯夫（BASF）、拜耳（Bayer）、爱克发（Agfa）和赫斯特（Hoechst）等公司相继成立。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制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其中一些公司如默克（Merck），早就作为主营植物提取物的药房存在了许多年，但是对合成化学的新认识将这些药房变成了重要的工业化学研究机构。像先灵（Schering）、宝来惠康（Burroughs Wellcome）、雅培（Abbott）、史克（Smith Kline）、帕克-戴维斯（Parke Davis）、礼来（Eli Lilly）、施贵宝（Squibb）以及普强（Upjohn）等小企业都竞相发展为研制新药的巨头。[13]

两百年来几乎停滞不前的显微术领域也如大梦初醒。“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良好的固定剂、石蜡包埋技术、切片机和伊红染料，显微病理学的先驱们获取检查样本的最常用方法是刮擦并修整组织切面，或用液体和抽出物制成涂片。”[14]毫无疑问，当血液和皮肤取样成为现实，19世纪30—40年代的首次突破性观察将随之产生。

由于德国对染料和化学实验的开放态度，显微镜学家自然而然地开始尝试为组织染色。科学家们不断地尝试改变化学方程式，已经使布料染色实现了更高的色彩渗透率和色牢度，适合医用的染料配方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直到珀金发现化学染料的十年后，当人们注意到洋苏木这种南美洲植物时，才出现了可用于显微镜玻片的染色剂。洋苏木又被称为“墨水树”，是原产自新大陆的一种树木，其树根和树干在蒸煮时会产生一种浑浊的红润染料，[15]几百年来，这种植物一直被用来给棉花染色。西班牙人

和玛雅人都使用这种染料，美国士兵在南北战争期间也使用过。

一个半世纪以前，苏木精被确定为有效的哺乳动物组织染色剂，它可以使平淡无色的组织样本呈现出深紫色墨水般的色调。科学家将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添加到苏木精中，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终于生成了一种化合物，能够轻易地给细胞内部着色，后来这一部分结构被称为细胞核，DNA和RNA（核糖核酸）便位于其中。在苏木精出现十年后，另一种粉红色染料伊红被发现了，它容易附着于细胞的其他结构上，使细胞整体呈现出紫红色渐变。尽管新发现的染料大大改善了实验材料所呈现的视觉效果，但是它整体看上去还是像只用一支蜡笔涂抹的填色书。

用酒精和干燥剂清洗玻片上的材料，会使组织样本呈现出视觉变化，于是德国的组织学家们开始反复尝试化学物质与组织接触的顺序和时机，仿佛在玩一场科学领域的捉迷藏游戏。后来出现了连续使用两种染色剂的复染法，最终在1876年，苏木精和伊红的染色组合诞生了，并成为沿用至今的标准染色方法（见彩插6.6）。[16]

如今在全世界的细胞病理学实验室里，每天有近300万张玻片会用到苏木精—伊红染色法，这两种化学染色剂的组合必定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化学试剂组合之一。自医药现代化以来，化学和制药领域的所有进步都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苏木精—伊红染色法所使用的两种化学物质大概是医学领域中最可靠的分子。在过去的150年中，它们所接触的生命几乎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药品。苏木精—伊红染色法的阴阳互补意味着，组织中的各种成分肯定会被染成粉色或深紫色，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将目光集中在构成组织的单个细胞上了。

虽然工业化学诞生于英格兰，但是它很快便在德国学术界安

了家。光学、制药学、工程学、生理学和放射学，这些在未来将支撑起医学发展的科学堡垒，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同时发展起来。意大利医学因莫尔加尼的成就而新近获得过领导地位，最终又促成了法国医学的新一轮复兴，让医生的注意力转向了病人及其症状。19世纪中期，维也纳医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许多专科领域即将在那里诞生，最后一位凭借肉眼进行观察的伟大病理学家罗基坦斯基，给全球各地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医生。但是，德国人以高涨的热情和文化认同感接纳了一切新科学，不容置疑地接过了科学事业领导者的桂冠。全世界医生当中执牛耳者的头衔，将从罗基坦斯基传到一名柏林工人身上。他性格狂热、博学多才，热爱显微镜，通过染色剂和德国制造的镜头（如蔡司和徕卡），建立了疾病的细胞基础这一概念。

几乎没有哪一个医学生和年轻医生比鲁道夫·菲尔绍更能吃苦。年轻好学的菲尔绍于1821年在波美拉尼亚出生，是当地农民和会计的孩子。1839年，他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当地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柏林大学下属的军事医院。在全称为腓特烈—威廉大学的这所学府里，菲尔绍的导师是约翰内斯·穆勒，穆勒是“一位生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生化学家、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特级教师”，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德国医生。穆勒的职业生涯以生理学开始，主要研究神经功能、视网膜机制和耳部感觉器官的功能。随着科学的发展，医学的研究对象也变得越来越细微，穆勒的一个早期课题就是普通视力极限的研究。

穆勒的精力异常旺盛（他可能患有躁郁症，发作时表现得狂躁不安，或严重抑郁，无法工作[17]）。他喜欢思想上与他志同道合且同样不知疲倦的学生。特奥多尔·施旺（1810—1882年）是穆勒的早期学生之一，极力拥护他的朋友、植物学家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1804—1881年）在不久前提出的细胞学说。施

莱登和施旺两人在1838—1839年的研究解释了细胞的生长、功能和相互作用，为重新认识细胞在动植物体内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化学已经有了原子论，现在生物学具备了细胞学说。

1838年，穆勒很快将显微镜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不久便开始使用显微镜检查肿瘤的细胞结构。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以及1839年的革命性剧变，使年轻的医学生鲁道夫·菲尔绍在医学道路上大步前进。就像两个超新星发生了碰撞，爆发出来的知识能量在科学史上几乎无人能及。

鲁道夫·菲尔绍精力充沛且聪明绝顶。他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并学过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除了多种语言能力之外，他还热衷于研究考古学、人种学和政治学。20岁时，他在从柏林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习得“大自然在天地之间的一切普遍知识”。这位盛气凌人、信心十足的德国人，身材单薄瘦小，眼镜后面是一双猫头鹰般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医学院即将毕业时写道：“……如果你认为，让我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知识，那你误会了。我关注的是不完美之处，我总是有意识地追求尽善尽美，对于知识的发展进步，我比大多数人更积极努力，这才是我的骄傲。”^[18]

菲尔绍于184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一开始就职于柏林的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在病理学家罗伯特·弗罗里普（Robert Froriep）的手下工作。1845年，也就是他毕业两年后，菲尔绍发表了一份病例报告，报告中的50多岁的女性厨师在柏林死于不明疾病。尸检发现其器官的血液中含有一层黏稠的乳白色物质，像蜡一样漂浮着。这名24岁的医生第一眼看到这种物质时必然认为是脓，因为苏格兰医生约翰·休斯·贝内特（John Hughes Bennett）在四个月前首次将这种疾病描述为化脓。然

而，菲尔绍并不认为这是“血液化脓”或者感染。他将血液样本涂在显微镜玻片上，使用原始的胭脂红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然后仔细地观察该液体的成分。眼前出现了一群巨大的圆形细胞，散布于小的红细胞之间，这让菲尔绍感到茫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决定就按照其外观将它描述为“白色血液”（weisses Blut）。后来，在1847年发表的文章中，菲尔绍采用了希腊语的“白血”（leukemia）一词来描述“白血病”的两种症状，一种是脾脏肿大，另一种是白细胞浸润淋巴结。

菲尔绍还在1846年发表过一篇关于血凝块性质的文章，提出了深静脉血栓（较大的血凝块）和栓塞（移动的血凝块）的形成理论，这些理论在多年后都得到了证实。这位25岁的年轻人破解了栓塞之谜，指出是较大的血凝块从腿部或手臂的静脉中脱落并移动至肺部，完全阻塞了血液流动，最终致命。此前还没有人这么想过。也就是说，菲尔绍在短短一年间准确无误地确定了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两大疾病，甚至推测出了病因。凭借自己在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他决定出版一本期刊——《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医学档案》（*The Archive of Pathological Anatomy and Physi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该刊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至今仍在发行，简称《菲尔绍档案》（*Virchows Archiv*）。

在第一期中，菲尔绍精妙地概述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他断言：“病理解剖学是阐释结构错乱的学说，而病理生理学是阐释功能紊乱的学说……病理生理学会逐步实现其目标，它不是少数人头脑一热的创造，而是许多研究者勤勤恳恳通力协作的成果——病理生理学将会是科学医学的大本营。”

正如我们在前文反复看到的那样，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科学、政治和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菲尔绍坚持社会医学的

理想，引起执政当局不满，他失去了在柏林的工作岗位。菲尔绍搬到附近的维尔茨堡之后，进入了人生中最出成果的时期。他钻研了炎症、癌症、肾病，以及皮肤、指甲、骨骼、软骨和结缔组织的解剖学。^[19]在没有电力、显微摄影和图像投影的情况下，菲尔绍发明了“桌上轨道”，将显微镜沿轨道从一个学生传给另一个学生，这样学生们可以仔细地观察老师想让他们检查的地方。他恳请学生们“从微观层面观察”并接受他的观点，也即“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在维尔茨堡生活了将近10年之后，菲尔绍于1856年大张旗鼓地回到柏林，在那里等待他的除了热烈的欢迎，还有专门为他而建的病理学研究所。在维尔茨堡的日子里，菲尔绍对细胞功能和细胞行为的理解产生了几次巨大的飞跃。菲尔绍影响力非凡，有时也会采纳吸收其他德国研究者的观点，不断加强自己认为细胞具有重要地位的论断。首先他在1852年宣布任何新细胞都来自已有细胞的分裂。1854年，他写道：“一切生命都来自直接继承。”最终在1855年，菲尔绍在《菲尔绍档案》中有力地总结称，一切细胞来自细胞（*Omnis cellula a cellula*）。

“一切细胞来自细胞”这一论断是多么掷地有声，恐怕要等到四年后另一本著作出版时与之比较，人们才能理解——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与陌生人打招呼时，我们会问：“你来自哪里？”询问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最具洞察力和独创性的研究者总是能比他的同行们更深入地钻研和观察，从而将哲学的断点连接起来。和达尔文一样，菲尔绍将想象力与多年来的科学探索结合起来，就我们的起源问题构想出了一个总体思路。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的聚集体，细胞不断地分裂着，并最终获得特殊性和独特的功能。胚胎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每种动物都是以单细胞开始其生命旅程的，通过细胞分裂

使数量倍增。唯一例外的是在生命火花燃起的那一刻，两个细胞——卵子和精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

桑葚胚[20]（morula，即拉丁语里的“桑葚”）中的原始细胞具有“不确定性”，它们能够成为体内任何一个部位的任何细胞。这就是原始的干细胞，具有超乎寻常的反应、适应和变形能力。我们的一生中，细胞一直在响应并遵守着来自周围细胞的化学信号，将自身定位于某个具体的细胞系之中，从而形成更高级的细胞邻域，最终形成功能组织和器官。误入歧途的异常细胞会失去正常功能，更糟的是还会带上一种恶魔般的特征，不仅阻碍了正常的细胞功能和器官功能，而且加速了死亡。

菲尔绍及其继承者深刻地探索了生命细胞基础的重要意义，彻底摧毁了元气、体液和生命活力等古老而神秘的猜测。因为人们已经理解疾病是一系列“生物化学失调现象”[21]，而且疾病在未来会通过针对功能障碍部位的治疗干预得到解决，所以认为治病就是恢复“乱成一团却又难以理解的体内平衡”[22]的看法，已经不再被人接受了。

好学深思的专业人士们将瘴气、恶气、体液失衡和占星术无情否定。菲尔绍的代表作，1858年出版的教科书《细胞病理学》，表明“医学的进步”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它将成为下个世纪医学研究成就的指导手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医学院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将菲尔绍的这本书与维萨里、哈维和莫尔加尼的著作一同列为“自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以来最伟大的进步”。[23]

或许菲尔绍确实获得了自己年轻时所希望的“大自然在天地之间的一切普遍知识”。舍温·努兰将他称为“使用显微镜的希波克拉底”。菲尔绍与他擅长显微术的日耳曼同胞们，也就是19世纪

70年代会使用苏木精—伊红等先进染色法的学者们，使德国在19世纪中期到晚期成为世界医学圣地，以朗根贝克和比尔罗特为首，德国和奥地利的外科医生们成为全世界的学习焦点，备受瞩目。

本书前面曾经提到过，对于前295代人类来说，一个受到病痛折磨的人，与其求医问药，还不如“一个人承受”。只有在最近的5代人，明智的患者才能通过寻求医疗照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鲁道夫·菲尔绍和其他许多医学科学家一样值得称颂，他使我们注意到细胞是构成生命大厦时最基础的砖瓦，天地万物都要通过它来吸收营养、交换能量、构成组织、应对压力、存储信息、形成交换中心、组成配子（卵子和精子）以创造另一个生命。菲尔绍也并非有功无过——他一生都否认达尔文的学说和细菌学说。然而，他确立了疾病的细胞基础这一观念，创办了重要的刊物《菲尔绍档案》，撰写了2 000篇文章，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这一切足以让他进入医学圣殿。更重要的是，他引领了医学的蜕变，揭开了细胞、组织和器官内部运转背后的真相。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医生清醒地意识到了疾病的器官基础，并迅速地进一步认识到疾病的细胞基础。当然，他们一旦了解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还将进一步理解疾病的遗传基础。医生认识到细胞是生命的基本构成要素，使他们摆脱了数千年来迷信的束缚，而工业化学的崛起将很快产生有效的化学治疗方法。在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从放血和给脓肿引流转变为诊断疾病，也就是与病理学家共同探寻确诊的方法及其治疗方案。长期以来，外科医生一直试图与理发师撇清关系，但他们追寻并实现自身重要性，靠的并不是英勇的行为和展示灵巧的手艺，而是依靠从科学上重新定位外科。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总是从最热衷病理学研究的医学中心培养出来的，这绝非巧合。外科医生从来

都不是“健康”专家，而是临危受命的雇佣兵，因此，他们必然是从需要调查与解释疾病和外伤成因的环境里获得知识养料的。

欧洲的外科医生对此做出了贡献，美国医生也第一次参与其中，最终使人微言轻的外科医生获得社会公认的地位。外科医生的先驱们组织调查研究，操作实验仪器（如显微镜），改进技术技巧，查阅研究结果，并首次开始改变其同胞的命运。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又有了一项惊人之举，他们不仅在极端条件下为濒临死亡的病人做手术，还开始了择期手术的实践。由此，外科医生一路走向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如今的患者不仅希望手术不会危及生命或引发巨大痛苦，还希望手术不要引起任何不便、困扰，甚至不要影响他们的外貌。

[1]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156.

[2] *Ibid.*, p.157.

[3] *Ibid.*, p.159.

[4] *Ibid.*, p.147.

[5] Rudolf Virchow, “Morgagni and the Anatomic Concept,”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ct. 1939; vol. 7, pp.975-90.

[6] Antoni Lewenhoeck, “De Natis’e E Semine Genitali Animalcul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65–1678). 1753-01-01. 12:1040–1046.

[7] Catherine Wilson, *The Invisible Worl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icrosc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

[8] *Ibid.*, p.37.

[9] Bernard de Fontenelle, p.9.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VOqbtFnjROC&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0] <https://www.nationalgallery.org.uk/paintings/vincent-van-gogh-sunflowers>.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1] E. I. 杜邦是美国大型化学公司杜邦公司的创办者。——编者注

[12] <http://ursula.chem.yale.edu/~chem220/chem220js/STUDYAIDS/history/chemists/perkin.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3] “The Top Pharmaceutical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 vol.83, Issue 25, June 2005, <https://pubs.acs.org/cen/coverstory/83/8325/8325emergence.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4] S. I. Hajdu, “Microscopic contributions of pioneer pathologists,” Annals of Clinical & Laboratory Science, vol. 41(2), 2011, p.201.

[15] R. Ali Faisal, et al., “Hematoxylin in History — The Heritage of Histology,” JAMA Dermatology, 2017, 153(3), p.328.

[16] Gary W. Gill, Cytopreparation: Principles & Practice; Essentials in Cytopat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207.

[17] Johannes Steudel, Johannes Müller, German Physiologist,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Johannes-Muller>.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8]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10.

[19] Ibid., p.320.

[20] 桑葚胚，是动物胚胎发育早期阶段，受精卵经过多次分裂，形成由几十个或几百个细胞组成的、状似桑葚的胚胎。——编者注

[21] Ibid., p.307.

[22] 306.

[23] 325.

第七章

病菌

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

——路易·巴斯德，1854年

外科实习期还剩几周就结束了，我数着自己当人质的日子，盼望着早点儿去骨科报到。我在SICU精疲力竭地煎熬了几个月，照护危重病人，经受血管外科和移植手术的耐力考验，一年实习期的最后阶段将在整形外科结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

在整形外科，我几乎可以夜夜酣睡。即使是大型研究中心，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是择期手术和美容手术。“轻松”怎么写？整——形——外——科。整形外科的医生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很有耐心。他们甚至让我做了一些缝合工作，帮助我对自己突飞猛进的外科技术建立信心。当然，我没有为关键部位和面部伤口缝合过，那事关整形外科医生的声誉，但是我确实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无用的白痴。

如果你在特别繁忙的科室实习，比如在移植科，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肯定会彻夜无眠。在移植科，即使没有需要你“一路狂奔”的手术发生，来自医院内外移植病人的电话声也会络绎不绝，让你一直保持清醒。如果附近医院有病人不幸遭遇致命

伤，正短暂地维持着生命以捐出器官，那么移植科的医生就需要立即出发，飞速赶往那家医院取器官。其他情况下，移植科的实习医生负责照顾手术期患者，最大限度地减少器官排斥反应的发生，同时避免意外致死。这以实习医生的能力来说是真正的考验与威胁。

整形外科很少需要随叫随到，我可以在家待命。在经历了11个月的科室待命和经常两天一个夜班之后，我感到这实在太奢侈了。现在，我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每三个晚上才值班一次，每周的工作时间已经减到少于80个小时，我真是爱死这里了。

现在是星期天晚上，唯一有可能使我彻底无眠的是刚做过手术的患者切口裂开（皮肤分离）或感染。今晚，手外科急诊也不用我们轮班，而是由骨科值班。我承认，自己正扬扬得意地准备享受一夜美梦。

身边的摩托罗拉传呼机振动起来——是急诊。该死的！我在掌中宝手机上拨通了急诊的主机号码，一声回铃音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施耐德医生，我是传染病科的保罗。急诊有位44岁的艾滋病患者，他是我以前的患者，HIV [艾滋病病毒] 阳性已经七年了，药物治疗效果不太好，细胞数量非常少，现在出现了奇怪的皮肤感染。”在1996年，患者HIV阳性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患者在经历长期病痛折磨之后，最终还是会死于艾滋病。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问道。

保罗说：“我问了科主任，他让我给整形外科打电话，想让你看一下是不是应该手术切除手臂和腿部的这些真菌球。”

“真菌球？！”

“对——我们认为是皮下暗色丝孢霉病，来自周围环境的真菌侵入了免疫抑制患者体内，在皮下形成大型菌落。你能来急诊看一下患者吗？”

仓促之间，我为了搞清楚自己在这个离奇故事里扮演的角色，也为自己再争取一下休息机会，问了一个所有实习医生都肯定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找整形外科而不是其他科室呢？为什么不找普通外科呢？”

保罗的回应听上去有些沮丧：“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认为你们的缝合技术更好。”

见鬼！没辙了。我收拾好胸牌、手机和钥匙，换上绿色刷手服，开车去医院。

去急诊室的路上，我给在整形外科待命的同事，也就是我今晚的主管医生打了个电话。“真菌球？”他怒火冲天地向我喊道。好吧，我现在好像明白一些了，真不知道自己一会儿会看到什么。

走进急诊室，我直奔第15床。一名年轻的急诊护士拦住我询问，我与病人谈话时她是否可以在场。她看起来跟我差不多，也是个新手。“当然可以，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说什么。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里克，看上去人很好。不过他的感染很严重。”

掀开15床的隐私隔帘，我看到穿着病号服的里克躺在病床上。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她的灰白色头发扎成一根辫子，穿着灰色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恤、牛仔裤和破旧的新百伦运动鞋。“里克，你好。我是施耐德医生，整形外科的实习医

生。传染病科医生让我们过来跟你谈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帮助你。我知道你不太好——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里克十分疲惫地说。他听起来已经精疲力竭，咳嗽很难止住。我眼前的里克瘦骨嶙峋，没有牙齿，手臂和右手上长着奇形怪状的小瘤子，像小橘子一样大，十分显眼。我的目光回到他的脸上。“有点儿恶心，是吧？”他说道。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过我只是一名实习医生，所以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说道，“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吗？”

“右腿上有一个。”里克答道。他掀开床单，给我看了一下右腿小腿上的隆起物。这处隆起物看上去更像一个巨大的脓包，一层薄薄的保护性皮肤覆盖着一包凝结的脓液，表面晶莹透亮，仿佛快要爆开了。现在我不感到厌恶都难。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位患者做检查，很显然药物治疗是无效的。

我给整形外科的同事肯打了个电话，向他说明了里克的离奇病情。我们一致同意必须马上对这些真菌菌落进行手术切除。“安排明天在中心手术室进行手术，到时候我们看情况处理。”肯最后说道。

第二天，我们在碰头以后才意识到人手不足。8号手术室在当天下午可以使用。但是那天下午，整形外科的大部分同事都安排了门诊患者的美容手术，而我们的科主任博纳马萨

（Bonamassa）医生要完成一台乳腺癌患者的皮瓣手术。最后的决定是，我们在8号手术室进行这例手术，与十分复杂的皮瓣手术同时进行，并且科室派我去做这例简单的切除手术，只要切开皮肤并取出真菌菌落就可以。这个决定不仅有利于整个科室的日程安排，而且由一位外科医生单独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也更安

全，减小了科室成员在术中意外受伤的概率。而对我这个实习医生来说，这将会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我第一次单独为患者做手术。随着下午手术时间的临近，兴奋、压力、勇气和恐惧一齐向我袭来。

对患者进行了麻醉诱导并完成气管插管后，我准备开始对其手臂和右腿进行手术。几个技师和一名护士帮我用橙黄色的碘伏备皮，我仔细地把蓝色手术洞巾铺在四肢上，罩住里克的脸和身体，只露出三处需要手术的肢体。经过几分钟的术前准备，头顶的手术灯照亮了里克的右臂，我和手术技术员克里斯蒂对坐在手臂的两侧。一阵忙乱后，整个房间寂静无声。我毕生梦想的这一刻即将来临。

“刀。”我对克里斯蒂说。我握着手术刀，环视了一下房间，看到博纳马萨主任正在门口透过玻璃窗关注着手术进度。每一名外科医生都要经历这一刻，第一次独立切开皮肤，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主任轻轻地点头示意，我条件反射似的转回身，注意力回到手臂上。

我用手术刀沿着真菌球隆起处将皮肤切开，薄薄的刀口张开后，里面的内容物均为奶油色。皮下并没有脓流出来。尽管我做好了迎接一股腐烂恶臭的心理准备，但是这个小球其实没有任何异味。我马上注意到，沿着刚切开的皮肤边缘出现了点状出血，受到HIV感染的那些血液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要求我在术中必须非常慎重。

我抓起一把钝性不锈钢剥离子，把包裹在囊内的真菌掏出来。人体有一个本领，可以为毒性较低的入侵者和外来异物生成一个袋状的房子，将不速之客围困其中，这样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我将最后一些物质从囊腔中刮出来，它们看起来就像麦

片粥一样——似乎人体内的一切都能用食物来打比方——接着用充满生理盐水和抗生素的球囊冲洗器对囊腔进行冲洗，它好似一个灌满洗洁精的火鸡滴油管。短短几分钟，第一个真菌球就解决了。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清除七个真菌球上，并没有仔细想过HIV已经遍布里克全身，也没有去想这些真菌理论上有可能使我自己感染。我知道感染这两种病原体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但是打算在手术室工作的人，必须具备这种不计较手术风险的心态。你不能因为不眠之夜、有毒的气味、酸痛的双脚、X射线辐射、严苛的外科领导、致命病毒和痛苦不堪的患者而焦虑。那些希望保持正常生活的医学生会去放射科和皮肤科等科室。如果你充满好奇地仔细阅读了前面的段落，希望能够看到真菌球从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肢体上切除下来……那么或许具备成为外科医生的潜质。

当手术进行到一半时，我注意到博纳马萨主任再次出现在窗前，认真地查看着手术进度。我们通过眼神会意，确认一切顺利。切除皮下感染性肿瘤属于实习医生可以操作的简单手术，但我仍然对自己第一次独立完成手术感到欣喜不已。将来我会遇到很多危险而复杂的病例，而此时此刻，我沉浸在快乐中，自己改善了这位患者的生活，同时在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级台阶。

改变世界的创新者和先驱开拓者往往在精神上经受了百般折磨，因为他们比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更早地察觉到真相。医学和外科领域的发展正是如此，有远见的人经常被当成牢骚满腹的煽动分子，他们总是挑战现状，因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方面，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c Semmelweis，见彩插7.2）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医生彻底改变了维也纳的医学地位，他开启了一系列发现，使科学界相信病菌是真实存在的。

当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巴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她的哥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正在大力改革奥地利的法律、教育和医疗系统。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位伟大君主，约瑟夫二世的贡献影响深远，尤其是他下令建设了大规模的医疗机构，即维也纳总医院。众多宫殿、歌剧院、雕像和喷泉以及巍峨的政府大楼证明了多瑙河畔音乐之城的辉煌灿烂，但对于科学史的学生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维也纳总医院（见彩插7.1）。

约瑟夫二世建造的这座庞大医院，高50英尺，拥有多个庭院和病区，院内医疗系统按照不同的科室划分区域。如今那些建筑仍然完好无损，但是已经变成维也纳大学的非医学教学设施。维也纳总医院于1784年开门接诊，沿袭了18世纪欧洲的医院模式，那一时期的欧洲人意识到了社会对贫寒家庭负有责任，于是建立了许多医院。随着整个欧洲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开始涌向城市，而随着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拥挤的工作空间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使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主宫医院、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等古老的医疗机构一直为欧洲大城市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医院的需求量也相应提高。

维也纳总医院的建立与工业革命的开展出现在同一年代。那时世界正在走向现代，但医学研究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城市越来越拥挤，传染病也越来越容易在城市中蔓延，而人们的无助感也越来越明显。现代性出人意料地使疾病状况恶化，我们的无知也变得一览无余。外科医学的历史几乎总是伴随着英勇的失败、意外的突破和难以想象的解决方案。19世纪中期的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病房便是如此。

一场惊人的转变在19世纪发生了，医院不再是死亡的营地，它变成了康复机构，甚至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法国大革命转变了

医生对人体的看法，人们迎来了女性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身体检查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解剖学和病理学的科学性，医生本身开始对分娩的机理产生浓厚的兴趣。分娩曾经是由助产士全权负责的，但是产科成为一种新兴的专业，挑战了助产术在这一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欧洲大陆的贵族阶层和上层阶级开始选择医生而非助产士来帮助产妇分娩。然而结果令人震惊，由医生帮助分娩的妇女及其婴儿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整个19世纪都存在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女性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被送到医院由产科医生帮助分娩，哪怕人们都清楚产妇的死亡风险会比助产士接生高出许多倍。产妇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产后高烧，又称产褥热。这种高热通常会在分娩后数小时内突然袭来，一开始表现为下腹疼痛，并伴有明显的压痛和阴道组织肿胀。随后产妇会排出恶臭的脓液，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发展为腹部胀气并出现高烧。大多数病人在死亡前几个小时很容易出现休克，接连出现呼吸微弱、神志不清和盗汗。产褥热患者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也解释不了疾病的成因。为什么？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反而使分娩变得更糟？

从希波克拉底到19世纪欧洲每一位皇帝和国王的宫廷御医，对漫长历史上的每一代医生来说，感染都完全是个谜。鼠疫、伤寒、黄热病、疟疾和霍乱等流行病轮番发生，但由于缺乏适当的科学方法来分析传播途径，医生也没有办法使罪魁祸首现出原形，传染病就像波提切利或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的魔鬼一样可怕，无法解决。经过反复思考，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感染与“瘴气”有关，也就是说，他们怀疑大气中含有某种有害物质。意大利语中“瘴气”写作malaria，也就是疟疾。瘴气理论认定有害空气就是感染的罪魁祸首，因此当产褥热肆虐产科病房，医生会断定产褥热是某种幽灵般看不见的东西造成的。人类根本没有想到，细

小的微生物即细菌或病毒，才是罪魁祸首。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一直是个外来者。1818年，塞麦尔维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杂货商家庭。他总是说着一口带有布达-士瓦本地方口音的德语，时刻提醒维也纳人他出身匈牙利。塞麦尔维斯转学到维也纳上医学院，毕业后，他为了争取一个住院医师的职位而奋斗了两年，最终在新成立的产科任职。他在闲暇时自愿到卡尔·冯·罗基坦斯基的病理科帮忙，为死于妇科疾病或手术的女性进行尸检。罗基坦斯基是与莫尔加尼、路易·菲尔绍并驾齐驱的一位医学先驱，他以解剖病理学为基础研究疾病，认识到疾病及其症状是以器官为基础的。奥地利和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医学的新领袖，他功不可没。塞麦尔维斯吸收了罗基坦斯基的分析和观察方法，又配备了一些观察认知工具来探索疾病的奥秘，从而解开了产褥热之谜，为人类最终认识到病菌的存在铺平了道路。

当塞麦尔维斯来到维也纳总医院，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位于医院侧翼的维也纳分娩中心（Wiener Gebärhaus），这是一个可以接待单身女性的产科，通过专用的私密入口谨慎地收诊单身产妇。其入口“孕育之门”位于罗滕豪斯街，现在这条窄巷正对着奥地利国家银行。在19世纪，“孕育之门”是临产孕妇的秘密入口，她们有时候戴着“面具或面纱，不想让自己被认出来”。^[2]一旦收诊入院，这些产妇会被分到第一病区或者第二病区，第一病区由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负责帮助分娩，第二病区由助产士和助产学的学生为产妇接生。病区的分配取决于入院当天是星期几，周末收诊的产妇也归入第一病区。随着产科作为独立的专科站稳了脚跟，医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维也纳未婚妈妈生产的部门，似乎是所有人的福音。初来乍到的塞麦尔维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

实，与第二病区由助产士照料的产妇相比，第一病区的产妇死于产褥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产褥热会在产后数小时内突然发生，起初引起产道的红肿和疼痛，随后是严重而痛苦的皮肤炎症，最终出现全身感染和致命的败血症。患者临终前注定遭受百般折磨，直到死亡让她从高烧中解脱。

塞麦尔维斯开始研究为什么医生负责分娩会离奇地导致产妇死亡。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负责维持第一病区产妇的健康。“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图书馆、尸检室和病床旁，以寻找答案。”^[3]通过查阅资料，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非个例，过去几十年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产科医生帮助分娩所导致的不幸。1831—1843年，伦敦家庭分娩的死亡率是每10 000名产妇中出现10例死亡，而在伦敦产科医院（General Lying-In Hospital），每10 000名产妇中有600例死于产褥热，死亡率是家庭分娩的60倍。^[4]巴黎、德累斯顿、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类似的文章，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29岁的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对每一种变量因素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包括助产士与医生所使用的不同技术、周围环境、产妇所在建筑物的条件、医学生对产妇的接触、用药方式以及产后护理方案。他甚至将医生的一些实践方法改为助产士的做法，包括改变通风条件，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孕妇来说，医生仍然比助产士更危险。塞麦尔维斯“好像一个抓着稻草的溺水者”，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办法。^[5]如果不是空气，不是床单，也不是分娩技术，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可耻的差异？

塞麦尔维斯对产褥热导致的快速死亡几乎习以为常，与此同时，他每天继续在帝国皇家总医院^[6]的太平间进行尸体解剖实践，这要感谢“友善的罗基坦斯基教授，与他的友谊让我引以为

傲……”。[7]疾病、死亡、发烧和困惑几乎吞没了塞麦尔维斯，于是他决定休息一下去威尼斯度假，希望可以放空大脑，说不定就能找到问题背后的线索，从而摆脱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折磨。

塞麦尔维斯回到维也纳时，一个噩耗等待着他——他的好朋友、罗基坦斯基的学生、法医病理学家雅各布·科勒什克（Jakob Kolletschka）去世了。几天前，科勒什克进行尸检时，手指被一个学生不小心用刀划伤。意外发生后，他马上就病倒了，最后死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同事们悲痛地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整个腹腔和器官都充满了脓液，而且这种脓液的形态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好朋友的悲惨离世使塞麦尔维斯悲痛万分，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尸检记录，终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迎面向他袭来。十年后，他写道：

我完全崩溃了，总是伤心地想着这个病例，直到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我立刻明白了：产褥热，这种由生产引起的致命疾病，与导致科勒什克教授死亡的其实是同一种疾病，因为在解剖时它们在病理上呈现出相同的形态变化。因此，如果科勒什克教授的全身性败血症是由于伤口接触了尸体颗粒，那么导致产褥热的来源一定是同一个。现在，只需要确定腐烂的尸体微粒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进入产妇分娩过程中的。事实上那些尸体微粒的传播源头，是医学生和主治医生的手。[8]

在医生没有洗手的习惯也不戴橡胶手套或乳胶手套的时代里，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他每天早上例行的尸检工作会把“尸体颗粒”带给自己的产科病人。他总结道：“产褥热其实就是源于尸体的血液中毒。”[9]当时的传统认识只需要略加改进，即可发现

疾病并不是由空气中的气味引起的，散发恶臭的尸体颗粒才是致病因。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在1658年已经猜测出存在“看不见的生物颗粒”，[\[10\]](#)列文虎克在1677年也用简陋的显微镜观察到了“微动物”。[\[11\]](#)现在，这些微观世界的生物成了塞麦尔维斯的敌人。

19世纪的西方人已经开始使用氯化物溶液来去除家庭和工作场所中腐烂物质的难闻气味；塞麦尔维斯推测，氯化物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破坏了颗粒本身。科勒什克去世不到两个月，第一病区门口便出现了一盆含氯消毒剂的稀释液，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都洗手。几个月内，产褥热死亡率骤降，最终与从未处理过尸体的助产士病区持平。塞麦尔维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仅在维也纳就会有成千上万名产妇可能得到拯救。

通过推理论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从偶然的发现中洞察了疾病背后的真相，这一巨大的研究成果本应该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你或许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是有原因的。1848年，许多欧洲国家在革命的浪潮中动荡不安，医生们无心关注自己的专业研究，死守传统观念。塞麦尔维斯无法使他的同事们确信这一激进观点的正确性，反而惹得争议四起，他渐渐地失去了名誉，最终丢掉了工作。尽管维也纳的医学巨匠如罗基坦斯基、约瑟夫·斯科达和费迪南德·黑布拉支持塞麦尔维斯，但他无法突破固执己见的产科领导层的阻碍。塞麦尔维斯回到了布达佩斯，心情苦闷，郁郁寡欢，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终于出版了有关产褥热的开创性著作。

舍温·努兰说塞麦尔维斯的这本书“赘述烦冗，危言耸听，充满指摘控诉而又自命不凡……几乎无法阅读”。[\[12\]](#)他给那些诋毁自己的人写了公开信，并附上了样书。在寄给一名维也纳产科教授的信中，他写道：“教授先生，你是屠杀的参与者。这场谋杀

必须停止，而为了使谋杀停下来，我会一直看着……”在写给维尔茨堡一位产科教授的信中，他控诉道：“我在上帝和世界面前宣告，你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人们谈到产褥热的历史，将你称为医学界的尼禄，对你而言，这一点不过分。”^[13]塞麦尔维斯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极端分子，一个言辞激烈的义士。

最后，塞麦尔维斯似乎失去了理智。他流浪于布达佩斯的街头，与妓女厮混在一起，穿得像个无业游民一样，整天喃喃自语。或许是由于长期持续的精神压力，或许是得了某种器质性精神疾病，也可能是由于梅毒的作用，总之，这位47岁的医生彻底疯了。在妻子的哄劝下，他回到维也纳，费迪南德·黑布拉（被称为皮肤病学之父）在维也纳火车站等着他，请他参观一所私人疗养院。他们最后把塞麦尔维斯带到了一家公立精神病院，将他强行约束和监禁。不到两周时间，塞麦尔维斯便于1865年8月13日去世。他的尸体被运到维也纳总医院。就在他工作过的太平间，在科勒什克曾躺过的解剖台上，医生对塞麦尔维斯进行了尸检。死因是什么？感染、败血症和胸部大量脓液——与他在20年前揭开谜团的疾病完全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塞麦尔维斯的致命感染来自拘禁期间所受到的创伤及开放性伤口，这对于19世纪疯人院里的患者来说并不罕见。塞麦尔维斯的人生结局是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洗手的价值，为消毒、抗菌以及病菌学说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

1865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的精神病院奄奄一息时，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正在千里之外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准备一个临床实验，尽管设计非常简单，但是意义却尤为深远。一个11岁的男孩来到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就医，他被一辆马车撞倒，造成胫骨骨折。这是一例“复合性”骨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性

骨折，骨头穿透了皮肤。开放性骨折并发症的发生率一直高得惊人，往往需要截肢或导致病人死亡。骨折断端刺破皮肤时，会严重破坏软组织，使皮肤丧失活力，增加发生骨感染（骨髓炎）的可能性，皮肤的恢复过程也变得十分复杂。在1865年，几乎没有人想过受伤后伤口的溃烂是由病菌引起的；而约瑟夫·利斯特，通过与塞麦尔维斯无关的独立研究，已经在思考这种可能性，并准备自己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的。于是，塞麦尔维斯在奥地利去世的前一天，外科消毒的试验在苏格兰开始了。利斯特并没有对男孩的腿部进行截肢手术，而是用石炭酸擦拭伤口，又将蘸取了石炭酸的纱布敷在伤口处。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个男孩的伤口慢慢地愈合了，骨头自己长合在一起，男孩的腿也保住了。或许“微动物”是真实存在的。

1827年，约瑟夫·利斯特（见彩插7.3）在伦敦东部郊外的一个村庄出生，父母是贵格会教徒。利斯特具有贵格会家庭普遍的一些性格特征：勤奋、虔诚、心态平和、严肃认真。贵格会教徒对运动、狩猎和无聊的娱乐消遣都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宗教、商业、教育和精神生活。约瑟夫·利斯特的父亲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1786—1869年）是一名成功的葡萄酒商，同时他作为一名显微镜工作者，为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利斯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他结识了同为贵格会教徒的托马斯·霍奇金，这名年轻的伦敦医生在1832年描述了一种血液病^[14]，后来这种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15]老利斯特和霍奇金两人在显微术方面合作多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利斯特，打破了150年来早期复式显微镜“不过是一个科学玩具”^[16]的局限，将显微镜观察变成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式。在老利斯特对显微镜进行创新以前，由于“色差”问题，显微术的局限性很大，穿过镜筒的光线会出现色散，导致图像呈现出

模糊的波纹，于是观察者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是，老利斯特的发明修正了失真的视觉效果，将复式显微镜变成一种引发医学革命的仪器，同时也燃起了儿子的求知欲，推动了他在未来的调查研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家庭，他们从观念上引导了后代的未来。通过制作当时最优质的显微镜，[\[17\]](#)小利斯特的父亲实际上组建了能够改善儿子视野的光学仪器。

虽然约瑟夫·利斯特在贵格会预科学校成绩优异，但他还是不能进入牛津或剑桥，因为这两所大学信奉英国圣公会教义《三十九条信纲》，而年轻的贵格会教徒是不可能接受的。1844年，16岁的利斯特进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这是一所“牛津剑桥级”院校，专门招收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不符合牛津和剑桥的要求却表现出巨大潜力的学生。三年后，利斯特开始在大学学院的医学院学习，他将于18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利斯特入学时，家人送给他一台优质显微镜。在医学院就读期间，这位年轻的神童向医院学术委员会（Hospital Medical Society）提交了两篇论文，高瞻远瞩地讨论了“坏疽”和“显微镜在医学中的使用”，那时，大学学院还没有开设关于这两个课题的正式课程。[\[18\]](#)史蒂夫·乔布斯在大学校园里讲个人电脑和随身听的未来时展现的洞察力也不过如此了。

在人生的前26年，利斯特没有到过伦敦10英里以外的地方，然而对知识的不灭热望最终将他带到了伦敦之外的苏格兰爱丁堡，在詹姆斯·赛姆（James Syme）的指导下接受外科培训。利斯特谦逊内敛，而当时50多岁的赛姆固执严肃。不过或许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性格里被埋没的那一面，在无意识状态下对另一个自我暗自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利斯特在爱丁堡迅速成长为一名外科医生，将上个世纪英国外科学家

的亨特式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利斯特说：“您无法想象我每天在研究医术的血腥屠宰场有多么享受。”^[20]

利斯特先被聘为赛姆手下的实习医生（霍尔斯特德外科住院医师的前身），一年半后，即1855年，他成为爱丁堡皇家医院的助理外科医师。在19世纪中叶，爱丁堡的医学和外科处于世界前沿水平。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医生正在角逐世界第一的宝座，而爱丁堡的医生于1847年首次展示了氯仿麻醉剂，就在乙醚麻醉剂于波士顿面世不过几个月以后。晚年的利斯特曾回忆说，1846年12月，他在伦敦见证了欧洲的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这一经历或许坚定了他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决心。对病人痛苦的哭喊和抗议已经麻木的外科医生们，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掌控病痛的折磨，从而为治愈疾病创造出新的可能性。《牛津英语词典》将“边界”（frontier）定义为“定居地带范围的极限，越过这里便是荒野”。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摧毁了清醒意识的边界，这激励着爱丁堡的利斯特和维也纳的比尔罗特去探索人体深处的荒野。

由于约瑟夫·利斯特经常出现在赛姆家中，他渐渐与赛姆的大女儿艾格尼丝成了朋友，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意外。1856年，约瑟夫与艾格尼丝结婚了。在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没有子女，但是对科学的共同热爱，使艾格尼丝成为利斯特最重要的评审、编辑、研究助手和旅行伴侣。这对新婚夫妇前往巴黎、帕多瓦、博洛尼亚和维也纳旅行，拜访了伟大的思想家，参观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医院。在他们回到爱丁堡之前，显微镜已经准备就绪。在维也纳时，利斯特来到维也纳总医院，见到了塞麦尔维斯以前的同事，不过不知道他们是否讨论了塞麦尔维斯的故事或其观察研究。

在爱丁堡，利斯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平衡着自己尚待成熟的外科手术实践、教学任务、赛姆的助手工作、新婚生活，以及最重要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研究实验室。多年来，他把实验室安置在自家厨房里，在艾格尼丝的帮助下，研究血液凝固、神经和肌肉纤维的生理特征、淋巴液的流动以及炎症。利斯特和艾格尼丝从当地的山野、公园和溪流中收集动物，从屠宰场采购动物器官，然后通过切片和染色，运用显微术对组织结构进行评估，并推测器官功能。1860年，利斯特夫妇向西移居到苏格兰格拉斯哥。接下来的十年间，利斯特的研究取得了重大发现。

他全心投入对炎症的研究中。讲逻辑的学者已经推断出传染病不仅是由恶臭或有害的空气扩散的，而且是由生物体引起的。利斯特开始相信，伤口腐烂是由于空气中某种看不见的物质进入了开放性伤口。通过查阅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学术期刊，利斯特读到了雅各布·亨勒（Jacob Henle）的文章，这位颇具影响力的教授来自德国的哥廷根，他认为传染物必定是有机物，也就是说，是有生命的微观物质。

性病一直是病菌学说支持者关注的课题。早期文艺复兴的科学家们永远无法推断出鼠疫、伤寒、天花或霍乱暴发的根源。人群的感染似乎总是随机的，在流行病学的分析工具出现之前，要确定流行病的来源实在过于困难。但是，每位欧洲医生都见识过淋病和疱疹，欧洲征服了西半球以后还碰到了梅毒。而大家也都知道，童贞者从来不会染上性病，不会像荒淫放荡之人（利斯特称其都有“纵欲倾向”^[21]）一样长出溃疡、疮痍、瘢痕、脓疮、疖子，或在私处留下种种气味难闻的腐烂秽物。因此，性病不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这不像是生育的真相，需要天才头脑方能想到，性病是由于射精和性交过程中接触的体液携带了传染病的种

子。性病的流行进一步证明了“传染性生物”是真实存在的。

雅各布·亨勒在其1840年的经典文章《论瘴气与传染性》（“On Miasmata and Contagia”）中进行了一系列爱因斯坦式的“思想实验”，通过纯推理来思考流行病与大流行病。^[22]由于显微镜技术还十分有限，他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阐释病菌学说的基础，后来启发了他在哥廷根的优秀学生罗伯特·科赫。亨勒认为牛痘这种疾病，只要“一粒痘毒就能够引起全身皮疹”。^[23]亨勒还领先巴斯德一步，对葡萄酒的发酵进行了思考，并将其总结为“一种有机液体被植物体分解”^[24]的过程。在这两个例子中，意外结果的倍增和扩大表明存在有生命的有机生物。某种自然的毒素或者有毒气体根本不可能以指数增长的形式散播到一个社群之中。既然增殖发生了，那就需要某种活着的物质在人体内进行自我繁殖。

利斯特越发相信，化脓的手术伤口并非只是发炎和“愈合”，而是在腐烂、感染和坏死。他继续在厨房对野兔和牛进行调查，以发炎的青蛙足为实验对象进行显微术评估，艾格尼丝也一直从旁协助。如果说利斯特是一个拥有着魔法显微镜的孤独天才，那么还需要一点推动力才能够帮助他实现重要的观念性飞跃。在印刷机发明和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如《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形成之前，孤身一人的专家永远无法“看得更远”，但是，信息共享的革命使天才之间产生了联系。1865年，在格拉斯哥，利斯特的化学系同事建议他读一下路易·巴斯德在《科学院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上发表的关于啤酒发酵和葡萄酒发酵的文章。于是，利斯特这位在苏格兰工作的英国外科医生，坐下来开始阅读巴黎化学家的法语出版物，此举将为外科学带来永久性改变。

人们普遍认为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是微生物学之父，他在发酵、显微术、疫苗接种和细菌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一名化学家（而非医生），巴斯德是最早使用显微镜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家之一。在一篇发表于1855年的早期文章中，巴斯德对变质牛奶的乳酸形成进行了研究，他猜测自己所观察到的“芽殖生物”是发酵的活性因子，类似于酒精发酵中“自我复制的微型生物”。[25]在发表这篇决定其未来职业高度的文章时，巴斯德新任里尔大学（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科学院院长，不久后，当地的一家甜菜酿酒厂找到这位化学家并告诉他，一种神秘的灾难正威胁着当地的啤酒行业和葡萄酒行业。

刚刚来到里尔的巴斯德听完这个“酒汁发酸发黏而无法使用”[26]的故事后，没有求助于化学试验，而是选择了显微镜观察。或许那位酿酒商听说过巴斯德以前发表的关于牛奶变酸的文章，但当时还没有细菌学家。巴斯德教授收集了变质的甜菜酒精样本，将其滴在载玻片上，通过调节显微镜上的小镜子，使阳光对准玻片上的黏稠物。通过显微镜观察，他想象出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液体中有微小的酵母菌，它们仿佛在泥浆中轻轻漂浮的小土豆一样。现在巴斯德已经确信自己一年前的推测是正确的，酵母菌正是使发酵产生的物质。

甜菜、葡萄、小麦、土豆、玉米、大米，甚至香蕉中的糖都可以通过天然酵母进行糖发酵，这种发酵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类提纯液体的“试验厨房”，可以制出令人陶醉的饮品。已经解开谜底的巴斯德又做出了另一项令人惊叹的观察，他发现同一批变质样本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杆状微生物。他推断这些是导致饮品腐败变质的细菌。早期研究者此前已推测出了有机活动，巴斯德现在证明，隐藏于水果和谷物内部的酵母和糖之间产生合作，也就是发酵，而细菌和糖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酒腐化黏稠的证据。发酵

有益，腐败有害。

在获得酵母、细菌和发酵的重大发现的前一年，巴斯德对里尔的学生们讲道：“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也成为巴斯德的至理名言。19世纪50年代后期，巴斯德发表了关于发酵实验的文章。作为一名化学家，他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而非医学）期刊上。因此，利斯特的化学系同事才会提醒他关注巴斯德的研究。

利斯特认真钻研了巴斯德对变质饮品和黄油的调查研究，然后在他的厨房实验室里设置好父亲的显微镜，重复了巴斯德的实验。在巴斯德所谓的“无限微小的世界”里，他发现了同样的微生物。[\[27\]](#)利斯特并不是第一个认可巴斯德前瞻分析的医生，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未来的会长托马斯·斯宾塞·韦尔斯（Thomas Spencer Wells）曾经提出，空气中的微生物导致了疾病，[\[28\]](#)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如何通过实际干预措施来抑制微生物。利斯特“发觉巴斯德的研究可以应用于外科学，而他又迈出了一大步，开始制订操作方案”。[\[29\]](#)

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国际医学大会（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上，利斯特令人信服地回忆道：“读到巴斯德的原文时，我对自己说，正如我们可以使用不伤及头皮的有毒物质来消灭孩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我们也可以在伤口上使用有毒物质来消灭细菌而不伤及患者的软组织。”[\[30\]](#)利斯特绞尽脑汁地到处寻找一种可以喷洒到空气中的化学制剂，因为此时他仍错误地认为病菌飘浮在空气中并落在了手术部位。其实利斯特只要注意到格拉斯哥令他掩鼻的空气就能发现消毒剂。在海运发达地区，人们使用杂酚油来保护轮船使用的木材，这是一种煤焦油的副产品，也用于铁路轨枕的涂层。对煤焦油进一步蒸馏会产生“苯酚”，这种芳香族有机化合物常用于减少污水分解所产生的异味。早在有关

霍乱的细菌学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就意外发现，它还可以缓解霍乱的蔓延。1858年“大恶臭”（Great Stink）期间，人们将苯酚即“石炭酸”倒入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每条河流中，结果大大减少了伦敦周围的腐臭气味。类似果味的香气遮住了苯酚化学性质的真相，让人注意不到是它对污水进行了杀菌。

因此，石炭酸是对抗手术感染的天然武器。时间来到1865年8月12日，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里，利斯特正在治疗11岁的男孩詹姆斯·格林利（James Greenlee）的开放性胫骨骨折。他用石炭酸稀释溶剂彻底擦洗了这个氯仿麻醉状态下小男孩的腿。手术结束时，利斯特用油灰粉和石炭酸的混合物包扎伤口，并覆盖了一层锡箔纸以减少蒸发，最后以夹板固定。四天后，利斯特拆开包扎的伤口，发现受伤部位愈合状况良好，伤口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皮肤边缘发炎、化脓、腐烂及腥臭的现象。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再次包扎好伤口。五天后，利斯特诊断第二次包扎导致了表皮灼伤，于是在第三次包扎时，他加入了石炭酸溶剂和橄榄油。伤口慢慢地愈合了，不需要进一步手术。詹姆斯本应按常规进行截肢手术，却平安无恙地康复了，他在受伤六周后痊愈出院。

“当利斯特意识到，用化脓与巴斯德解释的发酵所做的类比可以应用于医学实践，消毒外科手术出现了。”^[31]一系列的科学观察、简单实验和临床应用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抗菌”时代的诞生。抗菌，就是消除致病微生物的过程。

此后，利斯特对每一台外科手术都进行消毒。利斯特和巴斯德成为并肩对抗微生物敌人的战友。早期科学是十分粗糙的，没有对特定细菌种类的鉴别，也没有真正理解它们如何生长、繁殖和消亡的理论。然而医生们仅仅通过仔细地清洁皮肤和受伤组织，就使择期手术和急诊手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都将采用“利斯特消毒法”，不过有些国家接受得十分

勉强，哪怕证据就摆在眼前。

在塞麦尔维斯失败的地方，利斯特成功了。大多数科学家和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塞麦尔维斯和他对产褥热的分析，而利斯特开启了医学的重大变革，外科手术的可行性也即将由此发生剧变。利斯特工作勤勉，为人友善，拥有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非同寻常的毅力，他以永不妥协的奉献精神投身到工作中，同时也对身边的每一位朋友致以无私的关怀。这些特质使利斯特而非别人说服世界相信了病菌是真实存在的。缺乏人格魅力的塞麦尔维斯最后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疯子，在利斯特进行第一例消毒手术的第二天离开了人世，真是命运无情的讽刺。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曾经这样总结道：“在科学领域，功劳属于说服世界的人，而不是首先产生这一想法的人。”^[32]

在短短几年间，利斯特的消毒法将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得到检验。普法战争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年（1870年7月—1871年5月），却为利斯特的技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室。普鲁士王国是最早采用利斯特消毒法的国家之一，在搭起的战地医院里，参与治疗的医生都配备了石炭酸。普法战争在历史上首次以精准的枪支和大炮作战，因此刀尖和刺刀造成的伤口很少见，受伤的士兵“身上留下远程步枪射击造成的独特伤疤：散开的开放性伤口，断裂的骨骼碎片，破碎的衣物与损坏的血肉混合在一起”。^[33]医生以石炭酸药物对德国士兵的伤口进行浸泡、擦拭、涂药和包扎。最终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伤口感染导致的死亡少于创伤本身导致的死亡。相反，法国人坚持使用古老又不科学的油膏来涂抹伤口，截肢后的感染死亡率高达70%。^[34]战争为利斯特消毒法搭建起了规模最大的实验室，只有顽固透顶的人才会坚持他们过时的黑巫术。

在普鲁士军队的数千名医务人员中，有两位杰出医生的贡献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是鲁道夫·菲尔绍的门生埃德温·克雷布斯（Edwin Krebs），另一位是来自小村庄的德国青年罗伯特·科赫（见彩插7.4）。远离普法战争前线的克雷布斯决定效仿恩师，在死亡士兵的伤口上进行组织取样。通过显微镜，他在感染的组织中观察到大量的杆状体和球状体。克雷布斯的观察结果类似于巴斯特对变质牛奶和甜菜酒汁的观察，他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假说：这些形态奇怪的物体就是病菌，它们并非只是与感染和死亡有关，而是疾病和灭顶之灾的原因。

证实病菌学说需要一位医生，以科学的方式来辨别病菌的种类，解释病菌如何生长，区分引起不同疾病的病菌。非专业的读者或许看不出来差别，但是每种细菌（例如葡萄球菌）都在显微镜下有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定的生长方式、有限的生存环境、DNA图谱及其对特定动植物的明确影响。认识细菌的第一缕曙光照在了这些德国研究者身上，他们意识到可以观察和描述细菌王国，而且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抗击细菌，而领路人正是科赫。

战后不久，沉默寡言的科赫欣然接受了东普鲁士沃尔施泰因（Wöllstein）的一个职位，成为当地的卫生官员。他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一起搬到了那里，这个机遇使科赫成为当地唯一的医生，或许他还能借此做出重要的科学发现。顾名思义，沃尔施泰因是饲养绵羊和生产羊毛的中心[35]，在19世纪70年代，羊毛纺织品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所以沃尔施泰因虽然不是一个城市，却也是至关重要的地区。

罗伯特·科赫来自德国中北部，他成长于普法战争之前的时代，当时德意志各邦国还没有统一。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德意志并没有一个独占鳌头的知识中心，因此几百年来，柏林、慕尼黑、莱比锡、威滕贝格、维尔茨堡和纽伦堡等城市都拥有令人骄

傲的学术成就。科赫在哥廷根学医期间，有幸得到显微术先驱人物雅各布·亨勒的指导。事实上，亨勒的《系统解剖学手册》

（*Handbook of Systematic Human Anatomy*）是继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后第一部伟大的描述性解剖学著作，它探讨了人体器官的微观解剖学。维萨里为人体解剖学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以图示阐释我们人体的结构，观察组织与纤维之间的相互联系且直面谬误；而亨勒从微观的视角探索解剖学，他深入研究了每一个器官的微观结构，揭示了构成人体的微小元素。

托马斯·格茨发现亨勒和科赫是一对理想搭档，二人都性格内向，不大爱说话，更倾向于“低头做事，不喜欢社交活动”，并且都非常注重细节。^[36]亨勒的《论瘴气与传染性》篇幅不长却意义重大，文章发表数十载之后，这位教授关于病菌的思索无疑还在科赫的耳边回荡。通过生物数学计算，亨勒得出结论说，微小的、有生命的“植物体”或“纤毛虫”（infusoria）只能在微观世界中发挥威力。症状的出现会略有延迟，当一个人出现症状，接着情况急剧恶化，患者遭受痛苦的折磨，就意味着整个社群面临着同一种疾病威胁，将会集体病倒。不论是患病的个体，还是整个社群，并不会被简单的化学组合本身击垮，真正使人丧命的是微生物的复制行为，而有机生物复制时会让宿主付出代价。刚刚从战场回来的科赫会证明亨勒是对的。

如今，沃尔施泰因不再属于德国，而是位于波兰的一个小镇，被称为沃尔什滕（Wolsztyn）。小镇四周围绕着一块块田野和牧场，让人联想起美式乡村。镇上坐落着几座教堂和许多小商店，橱窗上装点着我读不懂的波兰文。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小村庄几乎没有游客，而零星来到这个田园地带的都是一个半世纪后前来朝拜科赫的人。

罗伯特·科赫的住宅和诊所坐落在镇中心的罗伯特·科赫路上，它建成于1846年，以前是一家为穷人看病的医院。1872年，科赫一家三口搬到这里，住在这座哥特式建筑的二楼。二楼有一大面凸窗，上面是红瓦屋顶。在一楼，玻璃窗的正下方是一面双扇大门，进门后有一条通向室内的走廊，这也是科赫医生检查室的门诊入口。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患者常常在这条走廊中来来往往，他们很可能无法从科赫那里获得丝毫帮助。

短短几年间，科赫已经习惯于每日出诊和摆弄自己心爱的显微镜。研究永无止境，他倾囊购入一台自己勉强买得起的高级显微镜，整日痴迷于组织的显微术检查，以及用他收集并饲养在后院的动物进行实验，这可谓人类的一大幸事。

1873年，科赫搬到沃尔施泰因还不到一年，当地的绵羊接连死亡。更糟糕的是，农民和剪羊毛的工人也开始生病。这个地区的居民对这种疾病太熟悉了——毛工病，也称为炭疽，常见于食草动物如牛、绵羊、马、山羊和羚羊，但人类如果接触了受到感染的动物组织，那么也有被感染的风险。牛羊感染的临床特征可以概括为突然发作、快速死亡，并伴有行走摇摆、呼吸困难、寒战、昏倒甚至抽搐症状。^[37]身体的开放部位如口、鼻、肛部偶尔会流出血性分泌物。人感染这种疾病后，皮肤会出现大面积溃疡和坏死，经常发展出黑色的病变。自古以来，人们将炭疽理解为一种天谴或圣经中出现的瘟疫，恐怖至极，无法解释。

随着疫情在1874年夏天波及人类，大量的病人开始涌入科赫在沃尔施泰因的住宅，他很可能使用了民间疗法为出现红肿结痂的病患进行治疗。身为科学家的科赫从被感染的病人身上收集血液和脓液样本，在一楼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通过显微镜对受试对象的样本进行检查，并在个人研究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发现。1874年4月12日，他开始在笔记中使用“细菌”（bacteria）

一词，效仿了德国动物学家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埃伦贝格对细菌的称呼。“细菌膨胀起来，变得更亮、更厚、更长。”[38]科赫的观察反映出在那之前几年里研究人员的发现，但是，没有科学家进行下一步研究，没有人评估那些像谷粒一样首尾相连的细菌，是不是炭疽的原因。

18个月后，1875年圣诞节前的某一天晚上，沃尔施泰因当地的一名治安官出现在科赫的家中，他带着一部分动物残骸，应该是装在马车上拉来的，动物尸体上流着浓稠的黑血。这名警官害怕这只死去的野兽会使炭疽疫情卷土重来，于是带着动物残骸来找镇上可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处理的人。

罗伯特·科赫查看了一下动物尸体，立刻想到他的显微镜是最佳的分析工具。科赫预感这只野兽应该是感染了炭疽，于是他急切地从死去的动物身上抽血取样，然后将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查。这位蓄着胡须、戴着眼镜的32岁医生开心地发现，玻片上布满的细菌与自己一年前所观察到的细菌类型一模一样。“如果能够将有传染性的生物和有传染性的液体分离，并观察其威力，就可以用实验证明[细菌]实际上是起作用的（是疾病的原因）……”[39]——雅各布·亨勒曾经的梦想在耳边回荡，科勒的脑海中灵光一现。

离开临时搭建的实验室，科赫走出后门来到花园，从笼子里拽出一只健康的兔子。他把兔子控制住之后，切开了兔子的耳朵，将一滴深红色的血滴在载玻片上，并通过显微镜证实兔子的血液中没有细菌。然后，他将死亡动物身上载满“微动物”的血液注入健康兔子的耳朵。当时的人们还完全不知道细菌的生命周期，甚至还没有对病菌是否真的存在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去理解其活动模式和致命性了。那天晚上，科赫躺在床上，不知道第二天的平安夜会得到什么消息。

以科赫一心一意的性格和执着的专注力，我相信那个晚上他一定辗转难眠。24号那天，诊所人满为患，科赫在楼上的检查室中照顾病人，虽然可以看到后院关着兔子的地方，但他从早忙到晚。下班后，他去检查那只兔子病患。

兔子死了。

科赫把兔子带到屋里，对血液进行了取样，在样本中发现了与自己前一天看到的相同的细菌。在研究笔记中，他描述道，这种完全相同的细菌数量为“中等”。那个平安夜，躺在床上的科赫像所有满怀期待的孩子一样，计划着自己的下一步实验。他没有丢掉那只兔子的尸体，而是将其保存下来，以便第二天进行更多的实验。

圣诞节的早上，科赫从死去的兔子身上采集了更多的组织样本，毫无疑问，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毕竟那是19世纪70年代，还没有电、灯泡和冰箱。科赫发现样本中长出的细菌越来越多，于是他更加确信，这些成倍增加的生物是炭疽出现的原因。他不仅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观察结果，还开始安排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说，证明这些平平无奇的微型生物体是疾病的元凶。

科赫使这种疾病由兔子传给家中饲养的小老鼠等其他小动物。每种动物都死于炭疽，每个样本在显微镜下都能看到有问题的细菌。不知不觉中，科赫为动物实验树立了典范：他使用兔子和小老鼠进行的实验，包括他的小白鼠饲养方案，从小镇沃尔施泰因悄然进入全世界的每一所大学实验室中。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科赫开始尝试在宿主体外培养炭疽病细菌。毋庸置疑，这位医学先驱对炭疽疫情一阵接一阵的暴发感到困惑。其中有什么秘密，使这种生物能够在平静数月或数年之后，又快速地传播开来？罗伯特·科赫正在驶入未知海域。少数

有远见的科学家曾经怀疑过，显微镜金属筒另一端那些看起来无害的病菌实际上作恶多端，但是，他们从未成功地培养过病菌。

科赫已经确信，细菌是需要营养供给的生物，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作为培养基的体液。最后的解决方案有些恐怖：他选择了房水，即眼球含有的液体，他所用的房水来自屠宰场的牛。科赫使用解剖工具从受到感染的老鼠脾脏上采集了一小份样本，在一块薄薄的载玻片上，将样本与房水混合。他预先在一片比较结实的载玻片上磨出了一小块凹槽，然后他将这两片载玻片合放在一起，并在周围涂抹一圈凡士林，将液体混合物固定其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密封的培养环境。

科赫将自己发明的小装置放在蔡司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节凸出的大号铜制聚焦环，窥看液体混合物，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小心翼翼地扫过玻片，但是找不到任何细菌。等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焦急地回来观察是否长出什么东西，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两个小时后，科赫再次检查，又一次失望而归。几个小时过去了，科赫终于看到了美妙的一幕：如米粒般成堆的螺旋杆状物开始出现。他渐渐感到自己眼睛所见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炭疽细菌，科赫称之为“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

随着炭疽杆菌的成熟，菌落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形状。科赫观察到，长条形的杆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之后生出小的圆形“孢子”，布雷斯劳大学（现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费迪南德·科恩（Ferdinand Cohn）刚刚就此做过报告。科赫的突破在于接下来的一系列实验。他开始变换培养环境。他已经用房水成功培养了细菌，但也许是出于偶然，现在科赫开始思考干燥或者加热培养样本所产生的影响。他通过加热把培养出来的炭疽杆菌菌落进行干燥，然后注意到杆菌和孢子会停止生长。他把杆菌再次放回培养基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显然已经失活，从而

丧失了传染性。科赫发现，这种杆状物显然并非造成传染病蔓延的细菌主要形态。但是孢子对温度和湿度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一旦放回培养液中，它们便可以立即复活，生长出新的致病杆菌和孢子。科赫推断，炭疽杆菌的孢子形态能够以假死状态在田野中存活数年，等待在一只动物身上重获生机，食草动物便是这样感染炭疽的。他解开了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之谜。

这位沃尔施泰因的医生兼科学家知道自己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他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普鲁士小镇，不确定应该与谁取得联系。最后，科赫联系了费迪南德·科恩。科恩邀请科赫到布雷斯劳展示他的实验成果。不出几日，科赫便“向火车站出发了，他带着显微镜、玻片、牛眼、老鼠的脾脏以及成箱的兔子、青蛙和老鼠——许许多多的老鼠，有活的也有死的。有些动物感染了炭疽，通体发红。科赫带着大包小包，一路匆匆穿过沃尔施泰因火车站赶火车，他肯定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40]

一到布雷斯劳，科赫就立刻在科恩的研究所里设置仪器、接种动物、在房水中培养细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些科学家前来拜访他，测定实验进度，评估科赫细致的技术。杆菌和孢子很快就出现在培养基中，动物轮番病倒。受人尊敬的尤利乌斯·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教授前来查看实验进度，他是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以前是菲尔绍在柏林的助手。科恩海姆“对这位科赫过目难忘，他工作起来条理清晰、细致缜密。科赫名不见经传，却冷静地展示着实验技术，那是科恩海姆所见过的最娴熟利落的手法”。[41]

对科赫大为赞叹的科恩海姆教授离开了临时搭建的实验室，匆匆穿过校园找到自己的助手们，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科赫的实验室，亲眼见证那位奇才所做的展示。他这样说道：“我认为这是细菌研究领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我相信

这不会是年轻的罗伯特·科赫最后一次展示其卓越的研究和惊艳的技艺，他让我们自愧不如。”^[42]

不久之后，科赫就出版了自己关于炭疽的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文章证实了伤口中存在细菌，从而支持了利斯特在外科学领域提出的“消毒”观念。他先在沃尔施泰因，后来在柏林继续改进培养技术。如今世界各地的每家医院和每间实验室每天都在使用这些技术，包括使用琼脂作为培养基。培养技术所使用的圆形玻璃盘器皿，就是以科赫的助手尤利乌斯·佩特里（Julius Petri）命名的培养皿（Petri dish）。科赫还与蔡斯公司一起改进了显微镜，与徕卡公司合作发明了显微照相术，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

1882年3月24日，科赫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作为全欧洲最伟大的创新青年之一，38岁的科赫宣布，自己将开办一场题为“论结核病”的讲座。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病菌理论得到了一些巩固，但医学领域仍然没有就结核病的起源问题达成共识，包括鲁道夫·菲尔绍在内的最伟大的医学天才们观点也不尽相同。讲座的重磅消息在柏林的业内人士之间流传开来。周五晚上，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图书馆爆满。大家都期待着科赫的展示。

科赫首先回顾了结核病在19世纪的统计数据：1/7的人类死于结核病，然而，“如果仅考虑有劳动能力的中年群体，结核病带走了其中1/3的生命，甚至可能更多”。^[43]结核病的确是一种缓慢传播的世界性流行病，他的听众们陷入了对现实的思考。他越是强调这一疾病的重要性，听众们就越是期待他给出一个深刻的结论。问题在于，人们还从未见过这种病菌的模样。

结核病具有近乎无情的隐蔽传播效率，这也是人们无法获得其图像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核菌属于“分枝杆

菌”(*mycobacterium*)，这个菌属包含150多种细菌，包括导致麻风病的麻风杆菌，以光滑的、具有疏水性的厚细胞壁为特征，不易被水沾湿。厚厚的细胞壁帮助小巧的杆菌[44]隐藏在细胞的海洋里，不易被常见的组织染色剂着色。直到科赫及其研究团队改用其他化学物质，并通过变换环境条件，捕获他的猎物，情况才发生变化。

科赫和他的同事们准备好结核组织样本块，使用新发明的切片机，将组织样本块切成极薄的样本切片，并将它们嵌入载玻片。常规的做法是，在室温条件下将玻片暴露于亚甲基蓝乙醇溶剂中染色，但是这种方法对结核菌无效。科赫试验了许多试剂，几经失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加入氢氧化钾和一种名为俾斯麦棕 (Bismarck brown) 的工业棕色染料，对周围组织复染。同时他将玻片加热至40摄氏度，反应时间就缩短到一个小时，从而使这种化学反应法进一步完善。

大约400年前，驶往新大陆的第一批航海者一面向西航行，一面从望远镜中寻找着新的陆地。那种通过望远镜远远地看到一块陆地的影子所带来的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都比不上在柏林实验室里低头注视着显微镜的罗伯特·科赫心花怒放的感受。他利用新技术，看到了一列栗色的组织，在干酪样结节中间，赫然散布着蔚蓝色的杆菌。 [45]

科赫站在柏林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讲台上，面对在座的天才们，身旁放着预先准备好的显微镜、玻片、试管和培养皿，他宣布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敌人。他冷静地声明，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培养出了结核菌。

科赫没有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这种需要认真对待的细菌，他选择了凝固的牛血清或羊血清。他将血清加热后倒入倾斜放置的

试管中，以增加菌落生长的面积，然后向试管中注入小批量被分离出来的结核菌样本，将温度设置在37摄氏度，也即人体体温，再监测菌落的形成。接下来，他把培养出来的结核菌接种在实验室的豚鼠身上，10~14天后，这些豚鼠就会献出生命，它们的肺部组织将用于显微镜检查。

科赫能够在豚鼠的肺部看到相同的杆菌，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将细菌分离出来，在动物体外培养，然后感染另一种动物，导致它患上相同的疾病，最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同一种生物。由细菌学之父科赫制定的这些规则是细菌研究的黄金准则，简称为“科赫法则”。这些见解始于亨勒，在科赫手中开花结果。

科赫以其细致入微、有条不紊又平淡无奇的方式宣布着自己的惊人成果。他详细说明了如何识别和培养这种生物体，总结道：“所有事实放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出现在结核培养基中的杆菌，不仅伴随着结核病发展的全程，而且就是致病的原因。因此，杆菌是患者感染结核病的真正原因。”[\[46\]](#)

在科学、医学、哲学和数学领域的历史上，当人们公开发表或讲解伟大的证明，传统上会以一个拉丁文短语作为结语，表示“证明完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简称QED。在1882年柏林的那个晚上，科赫的报告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QED时刻。讲座结束后，科赫平静地与一些同行握手，没有遇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他的一些助手后来凭借自身实力成了名，他们回忆道：“我认为那天晚上是自己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科赫的报告“含金量十足”。[\[47\]](#)

1905年，科赫凭借结核病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升沉荣辱伴随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有时他甚至发现自己与历史背道而驰。他对霍乱等其他疾病的研究帮助拯救了数百万的生命，但令

人遗憾的是，科赫这个名字并不像他最重要的两位盟友那样为众人所知，不像“利斯特林”^[48]和“巴氏灭菌法”那样流传千古。

在显微镜下，光滑饱满、长相一致的小病菌们看起来老老实实，仿佛并无威胁。虽然一小滴恶臭的脓液分泌物就可以掀起波澜，但在近距离观察下，这些游动在分泌物中的小生物普通极了，不似飞龙与海兽。蜚虫、虱子、绦虫和蛆虫令人恶心，所有的细菌看上去却都平凡无奇。人类永远害怕熊、鲨鱼、老虎、狼群、大象，甚至是人类本身，但是长期以来，不起眼的细菌一周时间内在全球导致的死亡，比过去所有哺乳类肉食动物捕食所造成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细菌看似无害，其实是冷酷的高效杀手，一直统治着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无人能敌，直到巴斯德、利斯特、科赫及其同行确证了它们的存在，培养细菌，揭开它们的秘密，阻断了病菌王国的入侵。

实际上，对病菌的揭示立即缩小了流行病的影响范围。人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对牛奶进行巴氏灭菌，并减少在公共场所咳嗽和随地吐痰的行为，使结核病病例在几年内大幅减少。在有效对抗结核病的抗生素出现之前，结核病患者数量就已经呈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了病菌的存在，了解了其生命周期，从而减轻了它们对人类生命的影响，这是到当时为止人类社会对疾病最伟大的一次揭秘。发现病菌意味着人类能够解释病症，有史以来病人们第一次发现花时间看医生是值得的。

莫尔加尼、路易、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使人们理解了死亡。然而，在人类发现病菌之前，疾病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要感谢塞麦尔维斯、利斯特、克雷布斯和科赫。

科赫住在沃尔施泰因时，会在楼上的客厅里接诊，透过客厅的后窗就可以看到动物笼子和马厩。客厅的松木地板上有一道奇

怪的界线。我们知道科赫非常专注于细菌研究，于是他用一道厚重的帷幕将这个房间隔开，这样在楼上便可以为患者治疗了，也不必通过唯一的公用楼梯去往楼下的小实验室。在房间地板的中间，镶嵌着一条木板，和其他木地板的纹理方向刚好垂直，这便是诊所与研究室的边界线。这座蕞尔小镇距离最近的学术大本营都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正是在这里，这位不寻常的年轻探索者，耗费自己的精力财力，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从更为深远的角度上说，利斯特奠定了医学现代性的基石。他首先提出了干预治疗，然后根据对疗效的评估来改变治疗技术，直到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有人可能认为，麻醉是第一种有效的医疗方式，但是在利斯特消毒法出现之前，麻醉并没有使疗效得到多少改善。“令人吃惊的是，在医学中理论含量最少的外科学首先得到了转变。”^[49]这种转变正是由约瑟夫·利斯特的科学研究倾向引领的，后来得到了朗根贝克、比尔罗特、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爱德华多·巴西尼以及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等人的效仿。当德国的外科医生在消毒环境和麻醉状态下一丝不苟地完成手术，原本依靠敏捷巧手的旧时代实践方式，很快就被新秩序取代。^[50]利斯特凭直觉感到巴斯德等人有关病菌的认识是正确的，由此产生了这场有利人类健康的革命。

病菌学说的创立者们为消毒外科手术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消毒首先促进了致命性创伤手术和腹部手术的发展，50年后随着抗菌药物的面世，择期手术中出现了植入手术。病菌猎手的先驱者们为医疗创造出纤尘不染的清洁无菌环境，从而使植入革命成为可能。

[1]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2] <http://en.muvs.org/topic/the-gate-for-the-secretly-pregnant.pdf>.

Accessed October 9,2019.

[3] Sherwin Nuland, *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ác Semmelweis* (New York: Atlas Books, 2003), p.96.

[4] *Ibid.*, p.96.

[5] *Ibid.*, p.94.

[6] 帝国皇家总医院即维也纳总医院。——译者注

[7] *Ibid.*, p.90.

[8] *Ibid.*, pp.99–100.

[9] *Ibid.*, p.100.

[10] Edward Huth and T. J. Murray, *Medicine in Quotations: Views of Health and Disease Through the Ages* (Philadelphia: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2006), p.176.

[11] Lane, Nick “The Unseen World: Reflections on Leeuwenhoek (1677) ‘Concerning Little Animal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70: 20140344, 2015, pp.1–10.

[12] Sherwin Nuland, *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ác Semmelweis* (New York: Atlas Books, 2003), p.156.

[13] *Ibid.*, pp.159–61.

[14] 这种血液病指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血液癌症。托马斯·霍奇金在发表描述疾病的论文时，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编者注

[15] Thomas Hodgkin, “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 *Medico-Chirurgical Transactions*, 1832. 17:68–114.

[16]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52.

[17] David Wootton, *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34.

[18]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54.

[19] *Ibid.*, p.355.

[20] Ibid., p.356.

[21] Richard A. Fisher, *Joseph Lister 1827–1912*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p.52.

[22] Melvin Santer, *Confronting Contagion: Our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Diseas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11.

[23] Jacob Henle, *On Miasmata and Contagia*, trans. George Ros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8), p.14.

[24] Ibid., p.19.

[25] Richard A. Fisher, *Joseph Lister 1827–1912*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p.132.

[26]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62.

[27] Ibid., p.363.

[28] Richard A. Fisher, *Joseph Lister 1827–1912*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p.134.

[29] Ibid.

[30] Edwin S. Gaillard, *The American Medical Weekly*, vols. 8–9, 1878, p.243.

[31] Richard A. Fisher, *Joseph Lister 1827–1912*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p.131–2.

[32] Francis Darwin, *The Eugenics Review*, vol. 6:1, 1914, p.1.

[33] Thomas Goetz, *The Remedy: Robert Koch, Arthur Conan Doyle, and the Quest to Cure Tuberculosis*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14), p.11.

[34] Ibid., p.13.

[35] 德语中，Wolle意为羊毛。——译者注

[36] Ibid., p.6.

[37] <http://www.merckvetmanual.com/generalized-conditions/anthrax/overview-of-anthrax>. Accessed July 23, 2017.

[38] Thomas Goetz, *The Remedy: Robert Koch, Arthur Conan Doyle, and*

the Quest to Cure Tuberculosis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14), p.23.

[39] Jacob Henle, *On Miasmata and Contagia*, trans. George Ros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8), p.42.

[40] Thomas Goetz, *The Remedy: Robert Koch, Arthur Conan Doyle, and the Quest to Cure Tuberculosis*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14), p.39.

[41] *Ibid.*, p.40.

[42]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Robert-Koch>. Accessed July 29, 2017.

[43] Thomas Goetz, *The Remedy: Robert Koch, Arthur Conan Doyle, and the Quest to Cure Tuberculosis*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14), p.87.

[44] 杆菌的英文bacillus来自拉丁文baculus一词，意为“棍棒”。——作者注

[45] E. Cambau and M. Drancourt, “Steps Towards the Discovery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by Robert Koch, 1882”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vol. 20, Issue 3, March 2014, pp.196–201.

[46] Thomas Goetz, *The Remedy: Robert Koch, Arthur Conan Doyle, and the Quest to Cure Tuberculosis* (New York: Gotham Books, 2014), p.88.

[47] *Ibid.*, p.87.

[48] 利斯特林 (Listerine) 又译李施德林，是漱口水品牌。——译者注

[49] David Wootton, *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27.

[50]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p.379.

第八章

抗生素

给手臂截肢是一种令人极度痛苦又叫人胆战心惊的行为。不管临床验证有多充分，也不管医生有多少年的实践经验，从身体上切断肢体都需要顽强的决心和舍己从人的心态。或许有些外科医生已经对截肢麻木了，但我从来没有。

我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外科实习医生，想要的只是几个小时的睡眠。我算了一下，如果现在能躺下，我会立即一觉睡到凌晨4点，这样就有精力应付接下来一天的苦工。然而在这个冬夜，正当我的身体骤然进入沉睡状态，寻呼机把我震回了现实。与所有的外科实习医生一样，我值班时要接听电话——整夜待在医院里，处理来自急诊室、病房护士和院外患者的电话。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枕边床头柜上的黑色小型摩托罗拉寻呼机。查看了4位号码后，我晕乎乎地认出6550是过渡监护治疗病房（Medical Intermediate Care Unit）的一个分机号码。我们不常接到来自这个号码的电话，于是我希望是他们打错了。我没开灯，支起左胳膊肘，在绿色的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办公电话上输入了这个号码。

一个护士接电话说，一位78岁的老人肘部疼痛，需要紧急咨询外科的意见。她解释说，这位患者几个小时前因类似于心脏病发作的症状而入院，但是初步检查排除心肌梗死。心肌梗死患者通常的主诉症状是严重的胸痛，并伴有牵涉性的左臂疼痛或下颌

疼痛。警惕的急诊室人员听到这些症状后，会立即开始对患者进行“心脏事件”的检查。虽然他们经过所有的初步检查排除了心肌梗死，但是这位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让他必须入院治疗。几个小时过去后，他的手臂疼痛逐渐加重，到凌晨2点，医护人员开始紧张起来，这位老年患者的左臂上出现了水疱和瘀斑。他们现在怀疑不是心脏病发作，而是肌肉骨骼系统出现病变的征兆。

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外科实习医生，刚从医学院毕业几个月，但是作为外科组的一线急救人员，我同意去为患者进行评估。从床上坐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踩着白天穿过的臭袜子，晃悠悠地摸到鞋子，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条理，开始进行“鉴别诊断”，也就是诊断患者症状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为了尽量不吵醒同屋的医生和实习同事，我悄悄地溜出夜间值班室，噔噔地从楼梯间跑向病房所在的楼层。

轻快地走过黑暗的走廊，我来到忙碌不已的过渡监护治疗病房。护士和助手们跑进跑出，他们看到我后竟然松了口气。通常来说，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护士应当看不起实习医生。每年七月，他们都带着新拿到的医学博士学位来到这里，却什么忙也帮不上，就像刚考到驾照的驾驶员第一次尝试开手动挡的汽车上坡一样。不过当这些擅长照顾心血管病人的护士遇到奇怪的肌肉骨骼系统患者，他们就变成了新手，这位患者本来应该属于楼下的骨科病房。

一名年轻的护士指向病房角落的床位，78岁的老先生焦虑不安地躺在病床上，左臂由枕头支撑着。我一眼就看到了护士所说的瘀青，而且他的前臂也肿了起来。“路易斯先生，您胳膊疼吗？”我问道。

这位老人的确病得不轻，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个

字：“对。”我越发担心起来，走到床旁，仔细地查看他的手臂。一块块的深色瘀斑，颜色像葡萄软糖一样。我倚在床边，检查肘部内侧，上面起了几个酒红色的水疱。我开始感觉这个病症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扶着老人的手腕，抬起他的胳膊，立即感觉到前臂皮肤下有噼里啪啦的空气爆裂声，好像挤碎一整袋有点儿受潮的脆米饼的感觉。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尽管自己在外科实践上还没有什么诊断经验，但我知道这是气性坏疽，是噬肉菌导致的症状之一。某些臭名昭著的细菌会引起快速感染，结果导致身体软组织坏死，即所谓的“坏死性筋膜炎”，偶见皮下气肿。至少可以这么说，体检时发现皮下气肿是十分可怕的。

我轻轻地将路易斯先生的手臂放回枕头上，知道自己看到了人生中第一例“坏死性筋膜炎”^[1]。这就是住院医师职位的有用之处——你可以读遍有关皮下气肿和坏死性筋膜炎的书本内容，但是，直到你亲手握着的肢体皮下出现嘎吱作响的气体，你才真正开始认识它。一通不常接到的电话出乎意料地让我见识了它。虽然这种病症相对罕见，但是每个外科住院医师都见过坏死性筋膜炎。

我转身对护士说：“坏死性筋膜炎。”大家瞬间鸦雀无声。

“真的吗？”她问。

“对。我给莫尔顿医生打个电话，他是我们组的高年住院医师。”

联系上马克·莫尔顿之后，我向他说明了这个病例的具体情况。他直奔要点地问道：“我们还能保住他的手臂吗，还是已经晚了，只能截肢？”我坦白地跟马克承认，自己完全没有经验，真的不知道。马克让我马上把病人送到手术室。即使保不住路易

斯先生的手臂，也得尽力保住他的性命。

与手术室和麻醉科进行了一连串的通话之后，我们不可思议地在半小时之内赶到了手术室。此时此地，命悬一线。其他的骨科同事在凌晨3点之前赶到了医院，我的主任斯彭斯·里德医生迅速做出了判断，患者必须截肢。在术前准备区，我们用便携X射线仪器对患者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气体一直流向肩部。坏死性筋膜炎的典型症状是，细菌像战争中的行军一样，走到哪里就留下一团气体，在细菌进入胸部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大胆的手术。我们不但需要对其整个手臂进行截肢，锁骨和肩胛骨也要移除，这就是所谓的“上肢切断术”（与下肢切断术相对应）。

在路易斯先生转入手术室之前，我们就为他注射了大剂量的青霉素，但是坏死性筋膜炎的恶劣之处在于，在急性发作期，它对抗生素不敏感。青霉素有用，可病人要想活着，就必须做大手术。

在紧急将患者转入手术室并由麻醉科进行插管之后，我们快速将他安置在手术台上，争分夺秒地挽救他的生命。他侧卧着，整个左侧和左臂全部由蓝绿色手术洞巾覆盖。里德医生动作十分迅速地围绕肩胛骨和胸部划出了一个巨大的橄榄球形切口。在非紧急状态下，这种切除可能需要90分钟；但在这种情况下，切除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前后不过十几分钟。锁骨、肩胛骨、整个手臂以及与这些部位相连的所有肌肉组织全部被迅速切除。来自颈部的神经和源于胸腔的大血管必须全部结扎并切除。

作为一名刚刚开始进行培训的住院医师，我知道如果自己尝试做这例手术，会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因为我还没有这种技术。里德医生是一位十分卓越的外科医生，他技艺精湛，具有独到的领悟力、娴熟的手法、非凡的专注力和耐力，以及此刻最重要的

英雄般的勇气。这些手术时刻会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不断激励我培养这些特质，里德医生带给我的最好馈赠便是信心，使我将来能够面对难以处理的肩部和肘部病例。人们常常批评外科医生目空一切、傲慢无礼，这个评价或许还算公道，然而此时需要的就是无畏的精神，而这恰恰源于深度的自信。

外科医生可以察觉到自己是否赢了与噬肉菌感染的赛跑：只要他切开的软组织层中不再有发出爆裂声的气体，他就赢了。上肢切断手术临近尾声时，多种维持生命的药物继续通过静脉滴注输入路易斯先生的体内。即使在我们争分夺秒地进行截肢时，输液泵也一直工作着，输入的除了青霉素以外，还有最先进的抗生素。

随着坏死的肢体被截除，胸廓处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我们把肢体从胸腔上离断下来并丢进危险废弃物的垃圾袋，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时涌上心头，一方面感到战胜了细菌的进攻，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微生物的力量。我们使用含有抗生素的生理盐水用力冲洗之后，手术室中明显开始闪现出乐观的情绪。

虽然路易斯先生没了手臂和肩膀，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他会活下来。

手术和青霉素挽救了路易斯先生的生命。人们第一次使用青霉素是在多少年前？我已经用这个问题考过朋友和患者好多次。那是在古代，500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少有人意识到，青霉素第一次在英国的一家小医院里应用于临床治疗，仅仅是在70多年前。

巴斯德、利斯特和科赫的开拓性研究使科学家和医生们相信病菌是真实存在的。罗伯特·科赫从微观上阐明了它们的生命周

期及其与人类的互动，揭开了人类对传染病愚昧无知的黑暗面纱。塞麦尔维斯和利斯特等人揭示了洗手和消毒的有利因素，约翰·斯诺帮助创建了流行病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影响了医院的设计和布局，不出几年，公共卫生机构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尽管环境卫生和清洁程度的改善极大地减少了流行病的暴发，但是医学界对于个体的急性感染或慢性感染仍然束手无策。

19世纪80年代，现代化学的形成与病菌学说的胜利同时到来，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染料的生产为原本灰暗而模糊的微观世界提供了对比鲜明的色彩。德国工业化学公司在发展初期都是染料制造商，后来才转向肥料、香水、摄影和制药等行业。医生兼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年）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犹太家庭，他完善了组织学染色技术，延续了德国人在这一领域引以为傲的传统，最终因区分出外周血的组成细胞而扬名。^[2]埃尔利希与罗伯特·科赫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在研究组织和细菌染色过程中所发生的化学变化时产生了突破性的见解。当时研究者的初步认识是，某些染料对某些细胞及其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亲和作用。通过进一步对染料展开反复试验，丹麦医生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1853—1938年）取得了细菌微观分析史上最重要的发现：细菌可以按细胞特性粗略分为两大类，以结晶紫和番红精染色剂进行一系列染色之后，它们要么呈现紫色即“革兰氏阳性”，要么呈现红色即“革兰氏阴性”。

为什么不同的染料会被特定种类的细菌所吸收呢？这一问题激起了保罗·埃尔利希的研究兴趣。但是原始的研究仪器能力有限，无法制订出科学的研究方案。然而，埃尔利希表现出天才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他的思维向前跳跃了几步，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操作使染色材料并非只是给玻片上色，而是能够杀死细菌。如果染料可以识别目标并依附在特定一类细菌上，那么新锐

的科学家能把染料变成对付细菌的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1907年，埃尔利希来到伦敦，在英国皇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举办了一场禁得起时间考验的讲座。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出现一种“靶向药物，可以在不伤害传染病宿主的情况下，攻击导致疾病的微生物”。[3]在研究者最终证实病菌存在的不过几十年后，埃尔利希便构想出了如同“魔弹”般的化合物。1854年霍乱暴发期间，约翰·斯诺的流行病学研究是革命性的；50多年后，埃尔利希回到当初被腹泻淹没的伦敦街区，在演讲中提出了“魔弹”。

保罗·埃尔利希去伦敦时，他已经开始了探寻“魔弹”的旅程。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获得关注，同时人们逐渐理解了原子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分子，现代化学由此全面繁荣发展。对埃尔利希这类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来说，简单化合物的奥秘在20世纪初已在逐渐解开。作为组织染色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始研究亚甲蓝、刚果红和茜素黄等偶氮染料（Azo dye），在化学领域寻求突破性进展，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埃尔利希就将偶氮染料看作潜在的治疗剂并进行实验，虽然他会无意地把病人的眼睛和尿液变成各种五花八门的颜色，但是他和实验室的同事们找到了对疟疾产生有效反应的方法。

偶氮染料即苯胺衍生物，比如威廉·珀金在1856年发现的苯胺紫，它们的化学结构十分稳定，不易发生变化。埃尔利希及其研究小组希望能够找到另一种物质，行为上与染料相同，具有容易与特定细菌结合的性质，但是它的化学结构要相对不稳定，更方便实验室操作。埃尔利希知道有一种名为“阿托克西耳”（atoxyl，氨基苯砷酸钠）的化合物能够杀死锥虫（可以引发非洲睡眠病等疾病的单细胞寄生虫）。他对这种化合物特别感兴趣，而当他发现它是一种化学结构不稳定的含砷分子，而不是

苯胺类染料时，这种兴趣就更加强烈了。

于是试验开始了。1907年，埃尔利希与他的同事阿尔弗雷德·贝特海姆（Alfred Bertheim）和秦佐八郎开始从化学结构上对阿托克西耳进行修改。他们拼命地工作，一点一点地改变分子结构，然后对不同的变体再进一步修改，以此为基础生成了一套编号系统。4号化合物的第18个变体（编号418）可以有效缓解睡眠病，但是秦在实验室里发现它会导致一些动物失明，因此放弃了这种药物。到1910年夏天，尽管实验过程非常原始，但是编号606的化合物通过了试验。6号化合物的第6个变体（即砷凡纳明）对实验室动物身上的各种疾病都有明显效果，包括梅毒。

[4]

在1495年探险者将梅毒从新大陆带回欧洲以前，欧洲可能并不存在梅毒。从那时起，梅毒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了400年，恐怖的症状缓慢地蔓延着——水疱、睾丸疼痛、咽喉痛、凸起性皮疹以及梅毒晚期出现的面部畸形和颅内感染。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人类对这种螺旋菌毫无抵抗能力。直到606号化合物出现。

1910年，法兰克福地区的德国化学公司赫斯特开始在市场上出售606号化合物，商品名为“洒尔佛散”（Salvarsan）。保罗·埃尔利希经过反复实验创造出来的这种分子，一半是染料，一半是毒药。具有染料作用的砷凡纳明与梅毒病原体的表面相结合，而砷酸盐部分可以将它杀死。由此，他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治疗剂。此外埃尔利希还创造了“化学治疗”这个术语。

洒尔佛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处方药，人们希望它可以广泛应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菌。遗憾的是，洒尔佛散及改良后

的新洒尔佛散（Neosalvarsan）在微生物世界中的治疗范围很窄。再加上它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其效益非常一般。更重要的是，洒尔佛散的研发方向是错误的，因为未来所有的抗生素，从磺胺类药物开始，都是从自然中搜集而来的“天然”分子，它们来自真菌或者细菌，而不是由染料或其他简单化学分子人工合成的。制药公司通过精密的化学工程探寻新的抗生素时，其研究基础是生物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采用的作战方法极为恐怖。尽管战争带来了可观的医学进步，但是德国制药业的运转也出现了暂时性中断。德国各地大学中严谨的学术研究项目、德国人勤勉的传统美德以及令欧洲邻国羡慕不已的持续资金支持，共同推动了德国的生物化学革命。^[5]“一战”后，德国的化学染料企业大规模地合并，有力地调动了化学、农业和医药领域的制造企业。拜耳、爱克发、巴斯夫以及赫斯特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在1925年合并为法本公司（IG Farben），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6]日后人们会看到，德国化学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的工作更加残忍也更具破坏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前的几年中，德国人对化学领域的创新追求，使化肥研发取得了巨大突破，即使在今天，化肥仍然为世界上占半数的农作物做出贡献。^[7]由亨利·福特开发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是20世纪初又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基础，然而，德国的研究机器并没有致力于生产汽车，而是利用大规模生产组织来攻克科学难题。各种具有治疗前景的化学合成物得到了大规模的规范检测，大量针对不同细菌的潜在药物就此被筛选出来，这个过程就好比一场“利用科学的群体劳动进行的无穷组合游戏”。^[8]

保罗·埃尔利希身为组织染色之父，也是免疫学之父，首先理解了抗体的存在。他同时还是化学疗法之父。他在1915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去世。战时制药产业中断，再加上这位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去世后留下空白，导致化学疗法的探索停滞不前。1925年，法本公司成立；1927年，格哈德·多马克（1895—1964年）来到拜耳公司——这将为寻找真正的抗菌药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果说埃尔利希为了找到抗梅毒的治疗方法而试验了数十种不同的处方，那么拜耳将会尝试数百种乃至数千种处方。”^[9]就在石油化工即将诞生之时，拜耳公司的化学家们开始从煤焦油中制造出数千种化合物（煤焦油这种浓稠的液体是用煤生产焦炭和煤气时的副产品）。

多马克不仅是一名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还在“一战”中负过伤，这让他特别了解微生物敌人，极大地帮助他建立起细菌实验框架。他由此发现了毒性极强的“链球菌”（*Streptococci*）。链球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球菌，接连成扭曲的锁链形状。这种病原体以造成咽喉感染、肺炎、脑膜炎以及坏死性筋膜炎而闻名，它是一种理想的试验菌，因为它不仅十分常见，而且还能以可怖的效率杀死实验室动物。多马克与他的著名德国前辈罗伯特·科赫一样，故意使实验室小白鼠感染上试验菌。在研究项目刚开始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患病小白鼠死亡，尽管多马克给它们注射了拜耳的化学家研制的各式各样的煤焦油衍生物，但还是抵挡不住链球菌的杀伤力。

科学是一场艰难的跋涉，科学家们继续从化学结构上对偶氮染料类化合物进行修改，先添加氯原子，然后是砷，之后是碘。经年累月的挫败和无望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克服，这或许是一场持久战。然而在1932年，当研究小组开始将偶氮染料与一种磺胺类分子连接在一起，他们终于实现了突破。多马克多年的实践方案所产生的结果毫无二致：向老鼠腹部注入培养出来的活性链球菌后，老鼠在1—2天内死亡。1932年底，转折点出现了。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郊，研究人员为12只老鼠注射了致命细菌后，试用了一种新药，一种与磺胺混合的偶氮染料。还有14只老鼠同时被注射了相同的细菌，但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几天之内，对照组的14只老鼠全部死亡，而注射了新型化合物KL-730的12只老鼠都还活着。拜耳的科学家们在成堆的老鼠尸体中顽强前行，终于在1932年制造出世界的第一颗抗菌“魔弹”。

拜耳公司认为，由于偶氮染料与磺胺的独特结合，KL 730可以有效地对抗细菌，他们将这一新药起名为“百浪多息”（Prontosil）。只可惜他们错了。德国人从未对磺胺进行过单独试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一队法国科学家用各种磺胺类药物对40只老鼠反复进行同一试验，其中一组就是用不含偶氮染料的磺胺进行单独试验。

几天后，巴黎研究小组对试验动物的反应进行了评估。用新型偶氮-磺胺组合药物治疗的老鼠几乎都死亡了，而所有以百浪多息、鲁比阿唑（Rubiazol）以及磺胺本身进行治疗的老鼠都活着。拜耳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心尽力地保护着自己对百浪多息的专利权，认为它肯定意味着财源滚滚，但是他们从未想过可能是磺胺本身征服了病菌。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点，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拜耳的研究小组也同样发掘出这个令人醒悟的事实。尽管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但是对于拜耳来说，这是一场财务灾难。磺胺分子早就于1908年由维也纳化学家保罗·杰尔莫（Paul Gelmo）发现，并且他取得了专利，在1932年已经属于知识公有领域。金矿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蒸发了。

不过，磺胺类药物还是为拜耳带来了利润。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百浪多息的销售，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磺胺本身才是有效的试剂，不需要偶氮染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百浪多息仅在体内

有效，而在体外无效。在充满细菌的试管中，百浪多息不对细菌构成任何威胁。只有动物体内才有将染料与磺胺分离的酶。如果试验只在试管中进行，而没有在动物中进行，那么百浪多息试验必然会失败。正是百浪多息以及其他一些药物让早期的制药企业意识到，前体药物（pro-drug）确实存在。前体药物有时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药物，它按照一定目的特意加工制成，因此可以经过消化，在参与体内血液循环时转变为活性代谢物。

百浪多息及其他磺胺类药物于1935年涌入国际市场，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几乎在一夜之间，[化脓性链球菌造成的]产褥热死亡率从20%~30%下降至4.7%。”^[10]欧洲和美国的医生们都使用起这种新药，而美国公众在1936年一下子认识了新型磺胺类药物。那时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感染了由链球菌导致的喉炎，严重程度危及生命，波士顿的医生们使用新型“魔弹”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一治疗过程也促使美国迈向了现代世界。《纽约时报》在头版对这个消息大加宣传，点燃了全美各地的“磺胺热潮”，甚至有患者向医生点名要求使用这种全新的灵丹妙药。自抗生素革命之初，过度用药就诱惑着人们。

世界即将进入第二场大规模战争，欧洲对合成化学治疗分子的探索也全面启动。化学家们痴迷于对化学药品的随意组合试验，坚信在细菌这个敌人面前，新型人造微粒能够以智取胜。尽管现代制药业能够创造出全新的化学药品以降低血压、增加血液流量以及改变胆固醇水平，但抗生素源于大自然，而不是科学家的想法。当时的化学家们并不知道，在此数年之前，磺胺类药物还未应用于临床时，伦敦的一个意外发现已经展开了未来医疗服务的前景。

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一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在伦敦的圣玛

丽医院工作。虽然他接受了内科医师和外科医生培训，但在实验室研究方面的天赋最终使他成为一位细菌学家。1906年，身材瘦小的弗莱明加入了圣玛丽医院的接种科，不久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保罗·埃尔利希的药物洒尔佛散。

细菌研究工作者一直遵循着罗伯特·科赫开创的先例，即在适宜的培育环境下，通过培养皿中生长的菌落来研究微生物的生命及敏感性。弗莱明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研究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等，对细菌进行培养并评估改变菌落形成的条件。1922年，弗莱明和一名实验室助手正在整理接种了细菌的培养皿，这时，他们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生长模式。通常来说，菌落会在整个培养皿中广泛地生长；而弗莱明注意到，在这个培养皿中，有一块没有菌群的空白区域。弗莱明刚刚从重感冒中恢复过来，这时他想起来，几天前自己的鼻涕滴到了培养皿上，于是便推测鼻涕以某种方式阻碍了细菌的生长。这位性格腼腆、沉默寡言的研究员推断，鼻涕中肯定含有某种具有抑制力的物质，他称之为“溶菌酶”（lysozyme）。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以抗菌性为特征的纯有机物。

溶菌酶使弗莱明着了迷，不过对它的研究钻进了死胡同。研究者迟早能够发现溶菌酶是如何起到削弱细菌细胞壁作用的，但溶菌酶更重要的意义是，弗莱明发现了一种能够抑制或者杀死细菌的分子，这为他在1928年取得革命性的观察成果做好了准备。

1928年，夏去秋来之际，亚历山大·弗莱明从海边度假后返回伦敦，来到圣玛丽医院的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保存至今，用以纪念弗莱明和他在1928年9月3日的重大发现。实验室的桌面上摆着一堆培养皿，其中有一个从高处掉了下来，盖子都没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那个培养皿，似乎感觉哪里不对，目光很

快又回到它的身上。他发现培养皿上覆盖着许多葡萄球菌圆点，但是边缘的一大片白色霉菌限制了葡萄球菌的蔓延。他认出这一生长模式与自己五年多前所见过的模式非常相似，霉斑周围有一条环形带，仿佛一片非武装地区，没有菌落，也没有真菌。

弗莱明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这太奇怪了。”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明原理的情况下用霉菌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用细菌制造奶酪。距离弗莱明的发现不到100年前，路易·巴斯德解开了发酵的谜题；不到50年前，科赫证明细菌是真实存在的。弗莱明在5年多前已经推断，来自人体分泌物中的溶菌酶仍然保有抗菌特性。现在，在普雷德街上的这间小实验室里，他逐渐形成一个想法：霉菌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对葡萄球菌致命的物质。

这种霉菌叫什么名字呢？青霉菌。（请看仔细，不是“青霉素”。）

青霉菌可能来自楼内的污染，也可能来自开窗进来的空气。人们对这种霉菌的来源进行了许多猜测：它是来自周围的实验室吗？它的存在是不是表示研究马虎大意？是弗莱明的助手因疏忽而污染了细菌培养基吗？然而最终的分析结果表明，“青霉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霉菌，可能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它可以产生自己特有的化学物质作为防御。它如何进入那间实验室并不重要，而弗莱明停下来思考其作用这件事确实意义重大。

正确地判断出青霉菌会产生抑制细菌入侵的物质之后，弗莱明和助手斯图尔特·克拉多克（Stuart Craddock）开始着迷于培养青霉菌，并采集由此产生的“霉汁”。然后弗莱明将这种浓缩液体在其他细菌样本上进行测试，发现它可以有效地对抗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最终他决定称之为“青霉素”，这一物质也使他扬名天

下。1929年3月，弗莱明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关于青霉菌培养的抗菌作用》（“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比德国发现磺胺类药物还早几年，但是，由于青霉菌对生存条件极为挑剔，弗莱明及其研究小组始终无法培养出足量的霉菌以实现其临床价值，于是他们失去了生产出第一种抗生素的光荣头衔。

事实上，青霉菌培养起来十分困难，于是弗莱明放弃了。在今天看来，弗莱明主动放弃研发的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药物，这令人感到困惑不解。但是，他们缺乏精密的研究仪器、实验室空间、人力，最重要的是还缺乏收集真菌的强烈热情。十几年后，能够驾驭青霉菌强大功用的研究团队才出现。亚历山大·弗莱明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他的青霉菌，再也没有发表过与之相关的文章。

亚历山大·弗莱明发表论文后，整整8年过去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任何研究人员成功地培养青霉菌并生产出青霉素。尽管一些科学家受到弗莱明1929年那篇文章的启发，但是大家都无法克服技术上的问题以理解这种霉菌的作用。这批研究者中包括牛津大学邓恩病理学院（Dunn School of Pathology）的乔治·德雷尔（George Dreyer）。1922年，威廉·邓恩爵士捐资10万英镑建立了邓恩病理学院，他是一位苏格兰的商业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南非发财致富。该学院日后以病程研究和细菌学研究举世闻名，而到1927年学院大楼竣工时，已经可以列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智囊名单。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位机智勤奋、意志坚强的研究人员来到了牛津，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另一位来自德国，两人的父亲均已不在世。他们二人将一起驯服青霉菌，完善青霉素的生产，与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通力协作，在世界即将不堪重负之时，推

出突破性新药。

刚刚从阿德莱德医学院毕业的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最初以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11\]](#)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牛津。他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这位雄心勃勃的澳大利亚青年在这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病理学学习，由此迈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步。申请入学期间，弗洛里获得了多个奖学金。除了罗兹奖学金之外，他还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于是在研究生期间，他先后前往纽约、芝加哥和费城进行访学研究。他在哥本哈根、维也纳和马德里也有短期访学经历，1927年还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教育背景。1935年，他被任命为邓恩病理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转向研究细菌在肠道的不可渗透性，以及研究溶菌酶是否在胃肠道中起了抗菌的保护作用。弗洛里表现出非凡的魄力、智慧和领导才能，正在一个专业领域中砥砺前行。他只需要一位志同道合、才智比肩的战友。

1906年，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出生于柏林的一个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移民家庭。像弗洛里一样，钱恩的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去世了，那时他只有13岁。弗洛里颇具运动天赋，在网球、板球和橄榄球方面十分出色，而钱恩是一位钢琴演奏家，曾在多个大洲办过音乐会。钱恩毕业于腓特烈——威廉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1930年，他又从柏林夏里特医院的病理学研究所学成毕业。照片中的钱恩看起来特别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年轻的病理学家在各个方面都像一个真正的人才，而他确实是个天才。1930年4月，他开始在大学学院医院的化学病理学实验室工作。几年后，钱恩得到了剑桥的一份研究工作。在那里又工作了几年后，他成为邓恩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在霍华德·弗洛里手下工作。

霍华德·弗洛里成功地招入了一名接受过世界级培训的科学家（换句话说，一个德国化学家），能够帮助他从生物学领域研究感染和免疫。他找不到比钱恩更好的同事了。钱恩后来写道，他“激发积极性的主要原则……向来是寻找一种有趣的生物现象，它可以从化学基础或生物化学基础的层面来解释，然后他试图分离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活性物质，并且/或者研究它们的作用方式”。[\[12\]](#)

在实验室工作的人都知道，每周的例会是研究成果的命脉。开会时，实验室主任会询问特定实验的进度，并请研究小组的各个成员对实验结果的意义进行评论。预期之外的结果是主要关注对象，因为它们可能意味着实验失败，或者出现了新的检验途径。还有一类议程偶尔在周会上出现，对全新的调查研究项目进行审议，通常是以新发表的文章或演讲报告为基础的。展望新研究能够为渴望实现突破的实验室点亮未来之光，有时候，激发新想法的最好方式是挖掘以前的研究出版物，重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尘封概念。

有关青霉素研究者先驱的故事很多听起来真假难辨，但邓恩学院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一次下午茶讨论使人印象深刻。弗洛里和钱恩讨论起弗莱明于1927年发表的一篇没了后续的文章。尽管没有研究团队在探究青霉菌的副产物方面取得成功，但弗洛里之前的院长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青霉菌及其他微生物的样本冰冻起来，作为抗菌物质的潜在来源。于是在1937年，也就是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接受了挽救其生命的磺胺类药物一年之后，弗洛里与钱恩开始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效培养青霉菌并生产青霉素。对于这个研究小组来说，战斗已经打响，尽管任务艰巨，难以完成，可如果他们希望了解这些毛茸茸的白色霉菌的防御机制，就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不论这次例

会是一时兴起的探讨，还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它都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是恩斯特·钱恩在剑桥的同辈，虽然他是一位理学博士出身的科学家，但他的技术特长是随使用零件和废料组建实验室仪器，堪称第二个罗伯特·胡克。由于实验室预算极其有限，甚至有人说“把邓恩的课题经费称为贫困都是在奉承他”^[13]，希特利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如何成功地培养出青霉菌，所以需要创造力、顽强的毅力、敏锐的洞察力，还有好运助一臂之力。身材挺拔的希特利谦逊有礼、文质彬彬，他没有浪费一分一秒就破译出了培养青霉菌的理想环境。

1939年，人们对青霉菌生命周期的认识逐渐清楚起来。青霉菌培养基的琼脂表面会长出一层薄薄的白毯，逐渐成熟后会长出菌丝分支，并产生富含青霉素的液滴，干燥之后会变成黄色。这些液滴可以用移液管来收集，但是，收集得太早会制约产量，等待时间太长又会使真菌过度饱和，抑制进一步生长。

霉菌在琼脂上充分生长，却没有额外的营养物质来供给“霉汁”的生产，所以产出的“霉汁”少而珍贵。于是希特利转而尝试其他的生长容器并改变了温度。他以硝酸盐、盐、糖、甘油和肉浸液作为养料，又在空气中充入氧气和二氧化碳，后来他还加入啤酒酵母。你看到希特利配置的诱导培养基不免会问，他到底更像是厨师、园艺师和酿酒师，还是科学家？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这让研究进程更加紧迫起来。钱恩无法再回到德国，也无法营救他的母亲和妹妹，最后她们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不出几日，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让青霉素生产和测试的紧迫性更上一层楼。进入1940年之后，研

究人员继续改进霉菌培养过程，扩大青霉素的生产，但是最终成品还没有进行过测试。

1940年3月19日，第一批适量的青霉素终于处理完毕并通过了稳定性测试。作为化学专家的钱恩开始确定青霉素分子的类型。在非常原始的测试条件下，钱恩惊讶地发现青霉素分子并非一种蛋白质，却无法立刻分辨出它到底是什么。临床分析的第一步是将收集来的青霉素全部注入两只老鼠的腹部。令研究小组感到欣慰的是，小鼠都对注射表现出了耐受性，没有出现意外反应。更棒的是，通过尿液代谢排出体外后，青霉素没有发生改变。

对青霉素生产的研究继续推进。两个月后，1940年5月25日，牛津邓恩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受到感染的小鼠进行了分组实验。8只小鼠感染了链球菌，其中4只得到一系列青霉素注射液的治疗，另外4只作为对照组的小鼠未接受任何治疗。第二天早上，未接受治疗的4只小鼠全部死亡，而注射了青霉素的4只小鼠都好端端地活着。“魔弹”终于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而且恰逢其时。一天之后，就发生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人们首次拥有了一种广泛适用、疗效显著的抗生素，这将如何帮助盟军，我们可想而知。

对于牛津研究小组来说，为青霉素的生产准备原材料，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考虑到纳粹将不列颠群岛严密包围，英国人缺乏物资支持。1941年伊始，邓恩学院的原始仪器加速了抗生素的生产，其产量首次达到能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水平。

1940年秋天，牛津当地警察阿尔伯特·亚历山大被玫瑰花丛中一根茎刺划伤了脸。简单清洁伤口无济于事，他的脸部和头皮出现了革兰氏阳性菌的继发性感染。随着英国进入阴云低沉、

白日短暂的漫漫冬季，阿尔伯特的感染蔓延到躯干、手臂、肺部
和左眼。经磺胺类药物治疗无效之后，不断渗出脓液的肿块突然
遍布全身，左眼必须通过手术摘除。亚历山大先生被病痛折磨了
几个月后，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于是，在1941年2月12日，他成
了世界上第一位因感染而接受青霉素治疗的人。

静脉注射青霉素从早上开始，每三小时一次。到第二天，患
者的脸部消肿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脓液的渗出状况立即得到
了缓解，警察先生已经可以进食，每个人都欣喜若狂。那场面看
起来一定像个奇迹，然而青霉素产量跟不上治疗进度，这严峻的
现实挫败了胜利的喜悦，尤其是在第二位需要青霉素的患者出现
之时。15岁男孩亚瑟·琼斯在髋部手术后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感
染。亚历山大已经接受了为期五天的青霉素治疗，基本上耗尽了
弗洛里和钱恩持有的库存；又过了10天，他的病情保持稳定。

两位患者都需要昼夜不停地接受注射治疗。药品的极度短缺
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收集亚历山大的尿液并对其进行再次加工处
理。一个自行车大队往返于拉德克利夫医院[14]和邓恩实验室之
间，维持着首批接受青霉素治疗的患者的生命线。亚瑟·琼斯所
使用的青霉素，一部分来自亚历山大的尿液，一部分从希特利制
造的奇妙装置中新收集而来。[15]苦苦挣扎了一个月之后，阿尔
伯特·亚历山大最终没能熬过人类古老的宿敌，但青霉素还是表
现出了明显的疗效。另一边，年轻的亚瑟·琼斯活了下来。

弗洛里和钱恩正确地推测出，他们发现的小分子可能是一项
惊天突破，是那种可以让他们赢得声誉并去一趟斯德哥尔摩的大
发现。但是眼下更急迫的需求是改进大规模生产方式。英联邦国
家无法满足需求，而德日意是敌人。

美国成为另一种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开始

朝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巨头使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转变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巨人。尽管它与德国相比，在化学领域和科学领域的经验尚浅，但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先进程度和产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6]于是在1941年6月，弗洛里和希特利从英格兰飞往葡萄牙里斯本，经过三天的中转，他们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迪西飞剪号”飞越大西洋，于7月2日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的海空航站楼。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美国之行是一场全面的胜利。位于纽约都市圈的辉瑞（Pfizer）、施贵宝、默克等新兴制药公司都读过1940年8月发表于《柳叶刀》的文章《化学治疗剂青霉素》（“Penicillin as a Chemotherapeutic Agent”），十分渴望与弗洛里和希特利会面。不过最重要的合作关系是他们与美国农业部研究实验室科学家们的合作。

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任务是改善农业生产，同时确保农作物、肉类、家禽和鸡蛋安全，对人健康，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农业部的北方实验室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在弗洛里和希特利到来之前，科学家们已经从世界各地收到了几十份青霉菌样本。虽然牛津研究小组人才济济，但是其中没有真菌学家。鉴别青霉菌的最强效菌株以及生产青霉素的最有效方法，很快就完全由皮奥里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掌握。短短几个月内，青霉素的生产能力就提高了1 000倍。经过几轮测试后，青霉菌的一支菌株被分离出来，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青霉素的始祖”，[17]它源自皮奥里亚当地市场上的一个甜瓜。[18]

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不仅成功地发现了理想的青霉菌菌株，还改善了发酵方式。在这场追求“更好的种子、更好的土壤、更好的培养和采集技术”[19]的竞赛中，他们胜出了，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公司将开始利用这些技术来满足生产需求。为了鼓励制药公司

参与生产青霉素的挑战，美国政府为新兴公司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财政支持和产权保护体系，为其在战后立刻出现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和医学研究委员会推行了一个综合项目，以应对战争中的医疗问题，本质上讲，这是使美国的科学研究变成武器以对抗轴心国。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研究项目、新医院的建设以及外科专业技能的掌握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汇流成河，开启了现代医学革命，而形成这些发展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批准以工业化的规模培养青霉素。

1942年—1945年美国的青霉素生产呈指数级增长，而奇怪的是，德国却几乎没有研发抗生素。几十年前，利斯特对伤口使用的石炭酸疗法为德国人所采用，改变了普法战争的局势。德国士兵从战伤中活了下来，而法国士兵没能幸免于难。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日益激烈，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死于伤口感染。与此同时美国制药商加速了青霉素的生产，为诺曼底登陆做了准备。

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花些时间和金钱来研发抗生素呢？他们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学家吗？

部分原因是对燃料的需求。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大西洋与乌拉尔山脉之间没有像样的油田，纳粹政府必须将全部科学资源都用来开发制造合成燃油和合成橡胶。德国人依靠只对部分疾病有效的磺胺类抗菌药，将剩下的精力和财力都用来支持作战。

纳粹在科学研究方面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个最初让世界羡慕不已的教育体系发生了毁灭性的倒退。在纳粹的控制下，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得到的科学自主权突然间消失了，“美国的科学家、大学和医疗专业……主要是在独立的研究机构中运作

的，而不在政府的实验室里，极少受制于人”。[20]此外，许多有天赋的犹太裔科学家要么被杀害，要么逃离祖国，让从前德国研究机构引以为傲的智库日趋衰落。

德国再也没有恢复化学和生物学的世界领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千疮百孔。1945年12月10日，亚历山大·弗莱明、恩斯特·钱恩和霍华德·弗洛里因发现和研发青霉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虽然磺胺也是抗菌剂，但它不是由生物制成的分子。科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在创造“抗生素”一词时，将其定义为“由微生物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21]因此，磺胺类药物并不是抗生素。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前一年，矿泉疗养院（Mineral Springs Sanatorium，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附近，梅奥医学中心所在地）的一名结核病患者接受了第一剂链霉素药物，从此改变了结核病的治疗、抗生素的研发以及我们的世界。

链霉素由塞尔曼·瓦克斯曼和阿尔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发现，他们是土壤学家，专门研究“放线菌”（actinomycete）。放线菌是一种生活在土壤中的亚目细菌，具有霉菌状菌丝分支，而且能够抵御肥沃土壤世界中的其他细菌，研究人员推测它们会分泌出类抗生素分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瓦克斯曼及其在罗格斯大学的同事们收集了土壤样本并从中取出了数千种细菌进行试验。一茶匙的土壤就可能含有数十亿细菌，它们互相争夺着稀缺的资源，进化出分子武器以防御其他细菌和动植物界中的成员。

法裔美国人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22]，于1939年首次从土壤里含有的细菌中分离出化合物，它可以有效地对抗其他细菌，但是对哺乳动物细胞也有毒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

清楚地发现，最高效的抗生素只以细菌特有的结构和机能为目标，并不会伤害动物的组织。尽管1939年分离的化合物在临床上遭遇了失败，但是微生物学家们由此受到启发，继续寻找。这项艰巨的挑战超出了一般的实验规模，科学家们对成千上万种细菌进行调查研究，近乎随机地测试其抗菌功效。

尽管任务艰巨，令人生畏，但是瓦克斯曼及其研究组成员设计出一套方案来分离细菌，以找出哪种细菌可以生产毒性极小但在临床上有效的药物。几年后，他说道：“我们分离出10万株链霉菌[当时被称为‘放线菌’]。10 000株在琼脂培养基上表现出活性，1 000株在肉浸液培养基上表现出活性，100株在动物身上表现出活性，10株在对抗实验用结核菌时表现出活性，结果有1株能够生产出链霉素。”^[23]这些数字是粗略估算的近似值，但是它们确实体现了研发药物时层层深入的过程。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瓦克斯曼是引领抗生素研究的天才，而且他在1952年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段引文很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在1943年6月到10月间，对分离出来的链霉素做出关键研究的似乎只有沙茨一人。

这个由默克公司资助、罗格斯大学发起的研究项目，引起了梅奥医学中心研究者威廉·费尔德曼（William Feldman）和科温·欣肖（Corwin Hinshaw）的注意。梅奥医学中心已经从19世纪80年代罗切斯特小镇上一家父子经营的家庭诊所变成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他们采纳了利斯特消毒法，实践现代细胞病理学，支持科学家与医生之间的合作，并且大公无私地将医院重组，办成一家非营利性慈善机构，才实现了上述成就。

在梅奥医学中心，威廉·费尔德曼是世界一流的兽医病理学家，而科温·欣肖是一位对细菌学很感兴趣的医生。费尔德曼和欣肖都特别喜欢研究肺部疾病，尤其是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

——肺结核。结核病曾夺走人类1/7的生命，大约有150亿人。罗伯特·科赫曾无力实现的治疗方法，现在成为弗尔德曼与肖恩的钻研对象。这两位梅奥的研究人员在读过瓦克斯曼最初发表于1941年的链丝菌素论文[24]后便与他联系，希望以后可以在试验新发现的抗生素方面进行合作。后来人们认识到链丝菌素对肾脏具有危险的毒性，才发现那篇论文里的实验会带来灾难。

阿尔伯特·沙茨发现链霉素的故事充满了顽强的奉献精神 and 舍己从人的牺牲态度。在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研究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实验室里，沙茨独自一人在土壤样本中搜寻一种能够击败结核病的细菌，这种细菌要能对抗梅奥医学中心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最危险的结核病菌株。他分离出灰色链霉菌的两种变体，一个样本来自大量施用肥料的田间土壤，另一个来自鸡的咽拭子。两个灰色链霉菌样本在体外试验中都能对抗结核菌，但是体内试验才能证明链霉素是不是一种有效并且安全的抗生素。

沙茨和瓦克斯曼于1944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向世人宣布链霉素面世；费尔德曼和欣肖是最早一批收到文章样稿的研究人员，[25]到1944年4月，两位梅奥医学中心的研究者开始在豚鼠身上试验链霉素。这些豚鼠感染了各种不同的疾病，包括腺鼠疫、兔热病、细菌性痢疾和结核病。到1944年6月底，链霉素被证实是一种奇迹般的药物，它治愈了每一只感染各种不同疾病的豚鼠，包括结核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研究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额外试验。到1944年秋天，欣肖准备对人类使用第一剂链霉素。1944年11月15日，帕特丽夏·托马斯成为首位使用这种神奇药物的患者。帕特丽夏的结核病感染十分严重，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她接受了五个疗程的链霉素治疗，剂量大小取决于早期科学研究和猜测。帕特丽夏·托马斯不仅活了下来，还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又活了22年。

要想真正确定链霉素是否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有效，需要一份有开创意义的分析报告。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对食疗和原始药物治疗的简单对比，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希伯来圣经中但以理的故事，1793年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进行的重要对照实验，也有结果显示柑橘果实可以有效地预防维生素C缺乏病，但是在1948年之前，还从未有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对照试验。

“交替分配”试验是指一群患者中每隔一个人便交替使用一份试验药物，这样便形成了两个对照的治疗组。这种试验方法非常容易出错，因为在给患者分配治疗方案时，不论分配制度多么严格，临床医生也无法完全消除选择性偏倚。英国流行病统计学家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意识到以往试验设计的缺点，认为药物评估的唯一合理方式是临床医生和患者双方都是盲测。1947年初，研究人员为链霉素设计了三盲试验，患者、临床医生和评估者都是盲测的，没有人知道患者接受的是真正的抗生素还是安慰剂。

战争刚刚结束，英国资金又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财力对大量的病人进行治疗。事实上，链霉素几乎没有储备，也没有多少研究经费，随机选择一部分患者不给予药物治疗，不仅是为了科学探求，也是无奈之举。后来希尔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并非不道德——不试验才是不道德的，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26]世界上首次随机对照试验是人为的智慧，也是上天的巧合。6个月后试验结束，结果无可争辩。在55例接受了链霉素治疗的患者中，只有4例死亡，28例病情好转。5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只接受了安慰剂，最后14例死亡。后续研究呈现出逆转的趋势，研究人员后来推断病原体对链霉素逐渐产生了耐药性。后来的研究表明，同时服用阿司匹林会使治疗效果得到改善，从而支持了链霉素的使用。

链霉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有争议，比如开发链霉素的功劳究竟属于谁。链霉素的开发故事中最重要创新是，它为化学药物治疗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既包括抗生素，也包括抗癌药物。当时大部分抗生素源于土壤中的细菌，而非工业领域的染料和化学物质，渐渐地人们会在世界上更稀奇古怪的地方发现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包括海洋深处和空气之中。科学家们认识到，点点滴滴的刻苦钻研再加上一点好运就可以成就医生和科学家在50年前还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比如控制甚至治愈结核病，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感染……直到耐药性和细菌的进化超越了现代智慧。就连蟑螂都无法战胜细菌。

鉴别、染色、培养以及测试细菌的能力，推动了制药产业这个庞大新兴工业领域的出现。令人惊叹的是，仅仅通过研究土壤，“在1941—1948年，青霉素、链霉素、不同类型的四环素，还有氯霉素和红霉素就全都出现了”。^[27]我问过许多患者知不知道制药公司是如何开发出新型抗生素的，大多数人都一脸茫然地说：“药品难道不是在公司的药品办公室里设计出来的吗？”事实上医药学家依靠的是世界上那些最迷人的居住者数十亿年的进化情况，解析出哪些分子具有新颖的防御机制和对抗方式，然后利用这些新发现的力量与攻击我们的细菌作战。

如果考虑抗生素的经济效益和对未来的影响，人们也许认为，在过去的75年中数百家医药公司一定发现并改良了数千种抗生素，但是“1938—2013年，仅有155种抗菌性化合物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由于耐药性、毒性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等因素，今天，仅有96种抗生素可供使用”。^[28]微生物学家、化学家、统计学家、医生和商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所产生的用于预防传染、抗击感染的武器清单，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现代人类没有得到全面的戍卫，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引以为傲的

是，过去的几代人不再任由微生物蹂躏。人们以器官和细胞为基础来理解疾病，不断地突破对疾病的认识，使抗生素革命得以实现；再加上细菌学也发展起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在生病时求助于医生是值得的。

拉什医生发明的俗称“霹雳”的重金属缓泻药[29]，蛇油专利药，以毒攻毒的砒霜，有毒的工业溶剂，臭不可闻的动物粪便，还有致命的植物材料……这些可悲的治疗方法到20世纪中叶时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尽管它们从未彻底消失，你现在还能发现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庭治疗手段、替代医学“专家”以及医药类电视直销节目中那些“医疗机构不想让您知道”的药物疗法，但是当这些粗劣的医疗干预手段被它们自身的缺陷击败，医生的声誉便日益提高。正如保罗·斯塔尔的贴切描述所说，“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指的是美国人能够在战后的繁荣发展中重新关注健康，以前只是（有必要）担心传染病，现在变为关注癌症、心脏病、神经官能症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治疗。[30]

20世纪50年代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这十年间，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预期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可怕的疾病得以缓解，癌症有时可以治愈。或许抗生素革命对转变西方人哲学观念所产生的最大贡献，并不是消除了人们对感染的恐惧，而是让医生及其患者打开了眼界，认识到抗菌类药物可以让异物被安全地植入人类体内。“1950年，美国大约有23万执业医生，其中绝大部分在第一种抗生素面世之前就已经从医学院毕业。”[31]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医生率先将植入物当作科学的伙伴，同时引入了合金、塑料和晶体管等植入材料。

治疗师和梦想家都曾预见过这样的发展前景：一系列不同领域的发明可以合作使植入物融入人体的组织结构。这种想法始于400年前，如今在抗生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

[1] 坏死性筋膜炎英文为“necrotizing fasciitis”。作者将其简称为“nec fasc”并读成“neck fash”。——译者注

[2]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41.

[3] *Ibid.*, p.39.

[4] H. Maruta, “From chemotherapy to signal therapy (1909–2009): A century pioneered by Paul Ehrlich,” *Drug Discoveries Therapeutics*, 2009; 3(2): 37–40.

[5]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57.

[6] *Ibid.*, p.62.

[7] *Ibid.*, p.63.

[8]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53.

[9] *Ibid.*, p.63.

[10] *Ibid.*, p.68.

[11] 罗兹学者，即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者，该奖学金由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于1902年设立，旨在资助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赴牛津大学学习。——编者注

[12] *Ibid.*, p.107.

[13] *Ibid.*, p.113.

[14] 拉德克利夫医院，现为拉德克利夫人文中心，是一个坐落于伍德斯托克路上的教学楼，设有教师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作者注

[15] Eric Lax, *The Mold in Dr. Florey's Coat: The Story of the Penicillin Miracl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 chapter 8.

[16]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131.

[17] *Ibid.*, p.135.

[18] Robert Bud, *Penicillin: Triumph and Traged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6.

[19]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135.

[20]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341.

[21]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192.

[22] 勒内·杜博斯后来因著作《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获得1969年普利策奖。
——作者注

[23] Ibid.

[24] Selman Waksman and H. Boyd Woodruff, “Streptothricin, a New Selective Bacteriostatic and Bactericidal Agent, Particularly Active Against Gram-Negative Bacteria”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Feb. 1, 1942, 49(2), pp.207–10.

[25] Albert Schatz, Elizabeth Bugle, and Selman Waksman “Streptomycin, A Substance Exhibiting Antibiotic Activity Against Gram-Positive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Jan. 1, 1944, 55(1) pp.66–9.

[26]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211.

[27] Ibid., p.268.

[28] Ibid., p.303.

[29] 拉什医生指美国建国初期的医生、政治家本杰明·拉什，曾使用水银和加拉藤制成缓泻药来治疗黄热病和精神疾病。——编者注

[30]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336.

[31] William Rosen, *Miracle Cure: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New York: Viking, 2017), p.256.

第九章

麻醉

在美国，医务工作可能是最有益的因素。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人民的健康……医务工作的真正职责是延伸医学知识——当今的医学正在做什么、未来的医学能够做什么——而这需要共同努力来完成。

——威廉·詹姆斯·梅奥[1]

我遭受的巨大痛苦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令人绝望的凌乱心绪，暗无天日的恐惧，以及为上帝和人类所遗弃的感觉，一齐席卷了我的脑海并直击内心，让我永生难忘。

——J. 阿什赫斯特[2]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为什么在这里？

这些关乎存在的问题，跟我们向新认识的朋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差不多：“你来自哪里？”我们想了解自己的起源和存在的意义。在受到痛苦折磨时，寻找我们存在的意义和原因变得尤为迫切。

在科学家和医生还不了解错综复杂的人体结构以及疾病和治愈的概念时，缓解疼痛就是当务之急。医学光是发展到消除疼痛

这一步，就已经是一场胜利了。当然，医学和外科的进步现在已经远非消灭疼痛那么简单，现代医学可以逆转退化、战胜微生物感染、处理外伤、以药理作用改变全身性疾病、阻止癌症发展、重建损伤的身体部位以及改善生物组织。然而在一开始，人们并不了解人体的运作机制，却本能地渴望缓解疼痛，这将早期的文明人送往天堂，也推向地狱。

自古以来，人们便根据经验知道植物药材可以使人感觉更舒服、陷入狂喜或者彻底失去感觉。如何全面控制病人的清醒程度，甚至引导深度睡眠，是外科学的戈耳狄俄斯之结[3]。

在我们的化学世界里，动植物之间的交叉反应十分惊人。为什么植物发酵所产生的乙醇对我们精神世界的作用如此强大？大自然是如何指使蜘蛛、蛇和飞虫体内的有毒化学物质来毒害人体的？怎样解释锂这种简单化学元素治疗躁郁症的功效？为什么有些植物仿佛受到神的指示一样，制造出对自己无用却对人类身心具有奇效的化合物？

毛地黄是一种观赏性植物，花朵色彩鲜艳、呈细长铃铛形，它所产生的“洋地黄”分子，可以有效治疗房颤等心律失常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洋地黄分子对毛地黄自身并没有生理性作用，只是一种增添色彩的色素，同时作为一种有毒物质防止林间食草动物的骚扰。大自然为什么会在一种装饰性植物中形成一种小分子，使我们的心脏能够更有活力、更有节奏地收缩呢？一切都是谜，自然界充满了神奇的共生化学物质。

古时候的萨满巫师完全不了解化学和药学，甚至不明白疾病治疗的概念。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治疗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但是缺乏有效药物。古代的医药箱中空空如也，仅有的少数疗法具备极为有限的疗效，还会产生危险的毒副作用。所

以任何一种干预治疗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效果。使用药物最明显的因果作用就是心智能力的快速改变，例如醉酒或者出现幻觉。即使最不爱思考的原始人类，也能够将摄入酒精或食用迷幻蘑菇与之后的酩酊大醉、躁动不安联系起来。

人类隐约感觉到植物具有影响生物的力量，这为假想人体如何运转打开了大门。公元2世纪，盖伦派的疾病治疗概念建立在对抗（opposites）观念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生命是一种持续的平衡状态，身体健康表示平衡良好，而生命失衡预示着疾病即将来临。根据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如果一位患者饱受大量黏液的困扰，对应的平衡疗法是进行高温干燥。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阿喀琉斯，传说他是以胆汁而非牛奶哺育长大的，因此脾气暴躁且生性好斗。^[4]

关于人体的系统性平衡，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年）和后来的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1755—1843年）提出了一种与盖伦完全不同的概念。帕拉塞尔苏斯等哲学家没有显微镜，也还未形成组织生理学的认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思索着我们凡身肉体的内部运转机制，认为人体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构。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了“以毒攻毒”（*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的新奇概念，现在已经被视为伪科学。这种观点认为，在健康的人身上能引起某种症状的物质，可以治愈病人身上的同类症状。如果一个人腹泻，那么顺势疗法会给他服用泻药，使腹泻加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仍然有人相信这种离奇思维。

顺势疗法的思维模式以及后来的现代对抗疗法，让医学圣贤的目光集中在植物药剂的效果及副作用上。在现代生物化学为人类阐明活跃的分子世界以前，人们对植物和地表物质的系统分析

就得出了一系列有用的配方。随着科学家们解开空气的秘密，整理出元素周期表，确定了化学反应的规律，最终埋葬了炼金术这一伪科学，完善药物和提高药物纯度的可能性成为关注焦点。

更重要的是，人们终于可以触及早就渴望触碰的深不可测的领域。操控睡眠，对意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原本是属于神明的权限。

许普诺斯是古希腊的“睡神”，古罗马称之为索莫纳斯，他有很多儿子，其中摩尔甫斯是梦神，通过梦境向世人传达诸神的旨意和预言。据奥维德说，摩尔甫斯借助飞翔的神力，随心所欲地以各种人类形态飘入英雄和国王的梦境，模仿着“他们的步法、面容和情绪”。^[5]“在摩尔甫斯的臂弯中”的意思就是酣然入睡，与神相伴。

至少在5 000年以前，苏美尔人就在栽培罂粟，这种植物可能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中东地区被广泛种植。尽管种类繁多的罂粟因其艳丽的花朵而在世界各地受到喜爱，但是阿片等生物碱的来源也正是罂粟（*Papaver somniferum*，见彩插9.1），它改变了医学，燃起了战火，支撑着独裁统治。

阿片的来源是“罂粟的眼泪”，即罂粟子房壁或心皮中所包含的乳白色乳胶。几千年来，罂粟种植者用刀片在绿色果心的外壳上划出平行切口，牛奶般的液体便从中流出。这些“眼泪”经过整夜的干燥后颜色变暗，人们通过刮下珍贵的珠状凸起以收集阿片。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凭此方法将这种逗留在花卉中的珍宝窃取出来的。阿片具有舒缓肠胃、诱导睡眠的功效，所以被青铜时代的种植者们食用，直到注射针头发明以后，人们才改用蒸馏提取其成分。

1680年，托马斯·西德纳姆向世人推出了“阿片酊”，之后的

几百年里，这种雪利酒和阿片的调和物是医学世界里的主流镇痛剂。19世纪早期，随着现代化学的到来，德意志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史特纳（Friedrich Wilhelm Sertürner）于1804年完善了从阿片中提纯吗啡的过程，成为首位从供体植物中提炼出单一药物分子的科学家。^[6]当时德国的化学巨头，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公司对吗啡进行了工业化生产，意味着那些自己给自己治病的西方人可以买到非处方的吗啡和可待因，进行自我“麻醉”^[7]，甚至在20世纪依然如此。当人痛苦万分，走投无路时，没有什么比乘着摩尔甫斯的翅膀远走高飞更美妙了。

药物通常只有在进入体内的血液循环之后才具有活性，所以医生必须了解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化学变化和代谢方式。尽管大部分药物会被肠道不同程度地吸收，但是它们作为控制精神的医疗物质并不十分可靠，因此摄入阿片酊之后的深睡程度和产生睡意的时机一直无法确定，而外科手术的先驱们总是要面对一些在痛苦折磨中挣扎扭曲的患者。

药物进入血液的路径是一个谜，我们的科学祖先运用不断发展的化学知识解开了这个谜题，人体生化世界的拼图也一块一块地合并为一个整体。然而，在亚历山大·伍德于1855年发明出中空针头用于皮下注射之前，^[8]任何药物都不能通过静脉注射使人体进入适宜手术的睡眠状态。尽管在1804年分离出吗啡是一大突破，但寻找另一类药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年）是向世人介绍有关气体的化学与物理学专业知识的关键人物，不过他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没接受过任何正规科学教育。^[9]虽然地球上的生命不能没

有水，但氧气才是我们的星球大气中的关键活性成分。人类靠感官很难发现它，直到普里斯特利的实验使其显露。在早期研究中，自学成才的普里斯特利推断空气是一种“简单的基本物质，不灭不变”。[\[10\]](#)他从根本上遵循古希腊的概念，认为空气、土、火、水是造物的四大组成元素，他本应毫不犹豫地认为空气是一种没有其他成分的同质物质，但是一个简单的实验为他揭开了空气的奥秘。

普里斯特利生活在一个哲学和宗教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引人注目的独立《圣经》研究以及反传统的神学观。他先是信奉加尔文主义，后来又加入长老会，这激发了他的怀疑天性。他和一个世纪后的约瑟夫·利斯特一样，由于不是英国国教徒而不能进入牛津或者剑桥学习。不久以后，普里斯特利“在他人的鼓励下，开始为当上牧师而学习。结果证明他十分善于学习”。[\[11\]](#)他自学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对一些简单的中东语言也略知一二，同时还学习了数学和哲学”。[\[12\]](#)普里斯特利并没有选择神学院，而是进入了达文特里学院（Daventry Academy）学习，这是一所为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而设立的学校。毫无疑问，普里斯特利以异见者身份开始的人生道路，为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做好了准备。

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普里斯特利为富裕的家庭做辅导教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同一个世纪之前的罗伯特·波义耳，普里斯特利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天地万物有规律的运行方式，钻研电力、植物、矿物和空气。他定期前往伦敦与专业学者交流沟通，其中包括美国的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成了终生好友。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电力实验之后，普里斯特利于1766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这使他接触到学会成员的报告、实验方法和科研仪器。

空气是怎样作用的？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果你是一位18世纪的科学爱好者，你会如何解构呼吸系统的含义？请思考一下自己的呼吸：当你本能地渴望呼吸，空气是如何涌入胸腔的？亲爱的读者，请按照下面的要求做一个实验：深深地吸入一口气，使空气尽可能地充满肺部，然后屏住呼吸。在阅读上面的句子之前，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呼吸作用，但是我想让你停止呼吸并思考一下空气。现在开始吧。

当你再也无法坚持憋气，就将那一大口气全部呼出来。我的意思是全部空气，彻底排空肺部。现在停止呼吸。你能坚持多久，20秒或者两分钟？为什么我们必须呼吸？吸气和呼气的过程到底实现了什么？空气的成分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必须依赖空气？

在皇家学会对空气的成分进行探索之前，人们几乎没有办法思考空气是什么，只能将它视为一种功能未知的、同质且无形的元素。古希腊的空气活力学说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新的实验时代要求对空气本身进行测试。评估空气的唯一方式是使其分离，而各位“科学侦探”选择的装置是由透明玻璃制成的钟罩，他们把这个气密装置放在浅水池或者水银池中，这样便可以将空气困在里面以方便做实验。皇家学会的科学新秀们最早进行的一些实验，借助了玻璃钟罩和一个真空泵，他们把一只小鸟放入密封的罩子里，并用手动真空泵将空气排空，那个不幸的小生命几乎立即仰面倒下的，生命迹象全无。即使不抽气到真空状态，在钟罩内放置一根燃烧的蜡烛和一只啮齿类动物，也可以显示出空气对生命的重要性。蜡烛一旦熄灭，小动物也变得无精打采、瘫软无力。人们进行这些实验时还没有认识到氧气的存在。该如何解释蜡烛的燃烧或者动物的呼吸呢？

18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认为动物和非生物体都含有“燃

素”^[13]，生物呼气或者物体燃烧时，燃素被释放到空气中。这种理论认为，当空气中的燃素过饱和，火就会自然熄灭，动物也会在钟罩内倒地而亡。这个解释似乎完整得无可挑剔，只是荒唐可笑，错误至极。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验。1648年，荷兰医生扬·范·海尔蒙特（Jan van Helmont）的实验结果发表出来，这项实验旨在探索树木等植物生长的性质，设计得非常聪明。范·海尔蒙特在几年前仔细地收集、干燥了200磅重的土壤并放在一个大花盆中。然后他选择了一根5磅重的柳树幼苗，将它种在大花盆中，并精心浇灌了5年。实验结束时，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棵树连根移走，发现它增加了164磅。范·海尔蒙特又对土壤进行了干燥和称重，他发现这些土壤在5年中仅仅减少了2盎司（约57克）的重量。他的结论是，植物仅靠水分来增重。

问题：您同意扬·范·海尔蒙特的观点吗？请马上作答。

1754年，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年）向爱丁堡大学提交了自己的医学博士论文。作为一名接受过医学专业培训的医生，布莱克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地对肾结石的性质进行了实验研究，测试用酸溶解结石的可能性。布莱克收集了肾结石和胆结石，然后将它们放入各种酸中。他惊讶地看到，某些石头（如石灰石）泡入酸中会腾起气泡并发出滋滋声。他猜测将这种气体是被固定在固体材料中的成分，便称之为“固定空气”。后来的实验表明，“固定空气”无法维持火焰的燃烧或者使动物存活；然而植物却可以在“固定空气”中生机勃勃地成长。

约瑟夫·布莱克的发现对后续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化学领域的传奇人物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有人认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一个精妙的模型，也许是第一个

成功的定量化学研究模型，也是实验科学的经典范本，其价值可以与牛顿的《光学》比肩”。^[14]这一切始于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俯身观察一小瓶酸，想知道为什么浸泡在液态酸中的石头会像香槟一样冒泡。

再来回想一下扬·范·海尔蒙特的实验：树木增加的重量有没有可能不是来自水，而是来自空气？

空气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分子，这种想法十分吸引人，不过解开这一谜团的巨大挑战也令人生畏。另一些英国化学家利用钟罩制造出了氢气（亨利·卡文迪什，1766年）和氮气（丹尼尔·卢瑟福，1772年）。那些早期的化学家加热或燃烧密封玻璃罐中的物体，观察密封气室内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反应，或者在隔离空间内燃烧物体，来收集信息，了解组成空气的气体成分。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对燃烧过程理解的加深，显然激发了人们研究气体的极大热情。在人们好奇的众多问题中，有一个大家不断追问的疑点：是什么为燃烧过程提供了燃料？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声望在英国的有识之士中日益上升，正当英国当局的统治在北美殖民地逐渐瓦解，他在博伍德别墅（Bowood House）获得了辅导教师的职位，同时也做一名学者。博伍德别墅是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家产，位于伦敦以西100英里处。1773年，普里斯特利成为伯爵一家的图书管理员和志趣相投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还负责照看实验仪器，这将促成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1774年夏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对汞灰（mercury calx）的研究上。汞灰是一种奇特的深红色粉末，看上去如同辣椒粉一样，加热会变成液态汞，也就是水银这种在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炼金术士的传奇金属。然而，即使像艾萨克·

牛顿这样的奇才也没有留心去研究隐藏于水银粉末中的秘密。

当科学家点燃一炉汞灰，粉末变成水银的同时会有一股烈焰在上方腾起。普里斯特利决定尝试在玻璃钟罩中将粉末变成液态水银，以研究生成液态水银时究竟是什么“气体”以某种方式引燃了如此明亮的火焰。但是，怎样才能使玻璃气室内使粉末液化呢？普里斯特利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一个12英寸的“燃烧透镜”。他用一块放大镜将阳光的能量聚焦在一小堆汞灰上，就像现在调皮的中学生逗蚂蚁一样。玻璃钟罩外面的透镜将粉末熔化为液态水银，就能使钟罩内部充入空气，放置其中的蜡烛火焰更加明亮了，困在其中小鼠存活时间也变得更长。

这种富含氧气的气体副产物与约瑟夫·布莱克所说的“固定空气”类似，两者都是化学反应过程中释放的某种气体，不论产生的条件是粉末状固体加热熔化，还是石头接触到了酸。普里斯特利坐在保存至今的博伍德庄园小实验室中思忖着这种气体的重要性。“它在肺中的感觉，”普里斯特利写道，“无异于普通空气，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似乎感到胸部特别轻盈。假以时日，这种纯净的空气可能会成为时尚的奢侈品。但目前为止只有两只小鼠和我自己享受着呼吸它的特权。”^[15]普里斯特利呼吸的当然是氧气浓度很高的空气。汞灰实际上就是氧化汞，加热时氧气便释放到空气中。

约瑟夫·布莱克的“固定空气”又是什么呢？二氧化碳。为什么玻璃钟罩里的植物在“固定空气”中就会茂盛地生长呢？因为通过光合作用，它们能够分解出碳、释放出氧分子。这也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发现。它还解答了扬·范·海尔蒙特给柳树称重的谜题。柳树并不是通过土壤长大的，也不是通过水，而是通过周围空气所提供的二氧化碳来生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树木和植物都是将二氧化碳转换为它们组织结构中的含碳物质，才长得

更高更大的。

布莱克、卡文迪什、卢瑟福、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等化学先驱发现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由哪些气体构成的，这一基础性发现为现代化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麻醉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 1778—1829年）是英国人，他在父亲去世后，十几岁就跟着外科医生做学徒。巧的是，戴维对外科手术没什么兴趣，却喜欢用化学物质和火焰在家里做实验。这对外科来说不是坏事。少年时期的戴维就结识了几位传奇的科学先驱，并接到气体研究所（Pneumatic Institution）的邀请，这个机构位于布里斯托尔，专门研究气体的医疗用途。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2年首次合成出一氧化二氮，并第一个注意到它具有改变精神状态的效果。但是勤勉的汉弗莱·戴维对一氧化二氮进行了测试，并在詹姆斯·瓦特的帮助下，建造了用来测试的密封气室，对这种气体的产物进行了提纯。最重要的是，戴维首次思考了一氧化二氮的医疗用途（见彩插9.2）。他在1800年评论道：“一氧化二氮用途广泛，显示出消除疼痛的能力，这一优势或许可以应用在没有大量出血的外科手术中。”^[16]

进入19世纪，地表大气的成分已然明了。随着化学从一门定性学科转变为定量科学，我们这个原子世界的拼图也开始成形。英国人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正式提出了“原子理论”，即原子这种无法再进一步分割的化学元素，是按照一定比例结合在一起组成化合物的。道尔顿观察到分子总是按照特定的比例结合，他通过编写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手册，掀开了宇宙结构的面纱。每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都会使用本生灯（Bunsen burner）为试剂加温，每位厨师都会将小苏打（碳酸氢钠）等成分加到制作面包面团的配方中，这些都印证了道尔顿对世界构成比例的洞

察。顺便一提，小苏打能够用于烘焙，是因为它化学分解后可以释放出水和二氧化碳，气体的释放使面糊膨胀，让面糊变得更轻更蓬松。其化学反应方程式表达为 $2\text{NaHCO}_3 = \text{Na}_2\text{CO}_3 + \text{H}_2\text{O} + \text{CO}_2$ 。

我们应当认为化学是在19世纪崛起的，因为化学的进步使当时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合成药物、提炼石油、改善合金、生产化肥以及制造合成纤维的能力，改变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医疗药品以及现在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医学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最重大改变是，炼金术爱好者自制配方的能力，现在能够在人体上产生真实而强大的影响。

要确证一种药物有效，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地限制从接触药物到实现预期效果之间的时间。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视连续剧第一集里看到有人中毒了，最好的表现手法就是王子在聚集的人群前仰面倒地，同时酒杯还在他的手中。如果下毒者选择的毒药需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致命，这样的场景就行不通了。人类自古以来就会醉酒，而且不用旁人告诉就知道喝多了酒会导致举止恶劣、头晕眼花、昏睡不醒。但是人要达到这种醉酒程度，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有一种物质让人接触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就失去知觉，那肯定让人永生难忘。19世纪30年代，在化学革命的初始，这种物质就出现了。

美国庆祝建国50周年期间，乙醚和笑气的狂欢派对在美国东海岸风靡一时。自诩化学家的江湖术士学会了如何制作乙醚和一氧化二氮，他们像四处奔波的传教士一样，走街串巷地展示市民们因新奇气体而飘飘欲仙的样子。想象一下，假如你是1839年费城的一名中年妇女，在一场公共活动中你亲眼看着舞台上的丈夫在接触了充满液体的海绵后，就立刻变得跌跌撞撞，语无伦次，而周围没有人在意展示者正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假如站在这

位妇女旁边的是一名25岁的医学生，他来自佐治亚州乡村，正惊愕地看着台上的先生失去了知觉。他会想，这种新型混合物能为医学领域带来什么呢？

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就是19世纪30年代末费城群众中的那名医学生。他来自距亚特兰大90英里的小镇丹尼尔斯维尔（Danielsville），出身于富商家庭。朗在佐治亚州阿森斯读完大学之后，就读于美国最古老的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并于1839年毕业。这所学校由在欧洲受训的内科医生创建，朗有幸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尽管在1839年人们对病菌、癌症和疾病的细胞基础缺乏了解，而且当时医学界没有麻醉和抗生素。虽然朗的导师们实践的医学方法是基本无效的，但他确实学到了正确的科学方法。

克劳福德·朗离开了费城，于1841年在纽约市完成了实习。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建于1736年。朗在纽约市时，简单着急的小手术会在这里进行。在19世纪30年代，外科当然没有精细的分科——因为分了也没用。然而在人满为患、疾病泛滥的大城市医院里接受培训，还是会让人受益匪浅。在医学和外科领域，丰富的经验至关重要。朗上医学院时，医学期刊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大量生病受伤患者的经验。当然19世纪中叶的美国医疗都是些徒劳的作为，但是由莫尔加尼和罗基坦斯基开拓的新型诊断方式，至少使医生们能够有理有据地推测患者死亡的原因。

毫无疑问，纽约铺天盖地的患者加上朗对笑气和乙醚神秘威力的深信不疑，促使他得出这些气体能够使人失去知觉的假说。没有证据表明朗在纽约讨论过气体用于麻醉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他在美国最重要的两所医学圣殿接受培训后，又退居佐治亚州的另一个小镇，在此仅仅一年后就创造了历史。

克劳福德·朗来到杰斐逊镇，那里是丹尼尔斯维尔的邻镇。他不出一年就改写了历史，尽管许多年后世人才意识到这一切。1842年3月30日，克劳福德·朗为一名颈后长有肿瘤的年轻患者进行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麻醉。这次历史性突破发生于杰斐逊镇学院街保存至今的一栋二层红砖小房子里，那位高大消瘦、蓄着胡须的南方人在这里给年轻的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使用了乙醚。肿瘤切除手术像抗生素问世之前的所有手术一样，是一种提取术而不是植入术。这台手术也毫无疑问是在窗旁进行的，医生要借助阳光的照明，因为白炽灯泡还要等上几十年才出现。

起初，克劳福德·朗没有想过要将这一革命性技术公布于众。在科学和医学领域中，有很多至关重要的时刻是由孤独的天才在小村庄中悄无声息地造就的。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并不急于向世人宣布这些发现。几年过去后，朗在1846年12月9日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身）上读到约翰·柯林斯·沃伦（John Collins Warren）的一篇报告，内容是使用乙醚来防止术中疼痛的惊人成果。我们可以想象朗大惊失色的样子，他自己的发现被一批来自波士顿的内科医生抢先发表了。同时，他对别人同样使用乙醚解开了疼痛难题感到震惊，没有利用自己快人一步的优势则使他十分沮丧。这些阴郁的情绪会随着波士顿三位先驱人物的争名夺利而不断滋长。

乘坐波士顿红线地铁在查尔斯/麻省总医院站下车后，你会看到对比鲜明的两个建筑：一边是金属和玻璃建成的、闪闪发光的高架车站，一边是石砖砌成的、令人惊叹的自由酒店大楼，其前身是萨福克郡监狱。沿着坎布里奇街向东走，你会遇见医学历史与创新博物馆（Museum of Medical History and Innovation），显然这是我在波士顿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左转

弯，沿树丛街一路往北，两侧是庞大的城市停车设施。一个街区之外，弯道尽头坐落着一排医疗建筑，红色方砖砌成的房屋和由银色金属与玻璃建成的医疗大楼错落有致，这片楼群的尽头是麻省总医院的白色塔楼。事实上，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麻省总医院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看不到的楼群。

如果不径直走向麻省总医院的塔楼，而是沿着帕克曼街向东漫步，经过王氏日间护理中心（Wang Ambulatory Care Center）后，左手边会出现一条绿树成荫的小巷。这里是另外一片医疗楼群，而如果你在公园般的环境中沿着人行道一直走，放眼望去，就会看到斜坡上隐藏在树后面的建筑。走过大约400英尺后，这栋建筑物便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原来的麻省总医院，已经有200年历史了，现在叫作布尔芬奇大楼（Bulfinch Building），是以建筑师查尔斯·布尔芬奇的名字命名的，主要作为医学院的行政办公室（见彩插9.3）。

当你凝望着白色花岗岩建成的布尔芬奇大楼，目光径直向上，越过三层窗口以及上方的三角形檐顶，会看到一个正方形的中心塔台，塔台上面支撑着一个大型穹顶，穹顶上还有一个小圆顶，两者外层都是铜制的，现在变成了铜绿色。这座富丽堂皇的古典复兴式医院看起来与周遭格格不入，周围的临床楼里都挤满了患者、住院医师、护士和主治医师，而布尔芬奇大楼却寂静无声。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医学院校园在扩张，这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当你站在楼前，时间仿佛停驻在1846年历史在其穹顶中被改写的那一刻。

西半球的第一个手术演示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04年投入使用。和欧洲以及美国建于19世纪的其他手术演示厅一样，费城和波士顿的手术演示厅设在有大窗户和天窗的建筑顶层。蜡烛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光线，但是在电力出现之前，外科医生还是

希望运用阳光这种最强的照明方式。麻省总医院于1823年竣工，虽说建筑师将手术演示厅设计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肯定没错，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后，为手术实践而设立在顶层的手术演示厅，也成了外科学翻天覆地变化的符号象征。

1844年12月10日，一场大型活动的广告出现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新闻报》上，题为“大型展示：吸入一氧化二氮的效果”，这则广告吸引了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前往活动现场。特别要说的是，哈特福德一位名为霍勒斯·威尔斯（Horace Wells）的牙医与太太一起参加了这次展示活动，他对笑气能够为志愿展示者（包括一名腿受伤流血的年轻人）遮蔽疼痛感到十分惊讶。几周之内，威尔斯医生便在笑气的作用下为患者拔牙，他后来写道：“我对这项发现感到非常兴奋，于是立刻动身前往波士顿，决定把它交给合适的人……”^[17]

霍勒斯·威尔斯来到100英里以外的波士顿，通过以前的一位合作伙伴认识了城里的医学领军人物。威尔斯曾经在哈特福德与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1819—1868年）合作经营牙科诊所，尽管只有1842年到1843年的短短一年，但是他们显然是好聚好散。1845年2月，在威尔斯开始在牙科使用笑气仅两个月后，莫顿安排了他与麻省总医院外科主任约翰·柯林斯·沃伦的会面。

威尔斯前往波士顿，其间又与美国顶尖外科人物会面，并且在哈佛大学向医学院的学生们展示自己的技术，这一切都令威尔斯感到兴奋不已。然而欣喜很快就被尴尬和遗憾取代。威尔斯受邀对一位需要截肢的患者使用一氧化二氮，可是等待了数日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同意，可谁又能责备他呢？这时有人提议威尔斯去主持一台使用笑气的拔牙手术。在某种程度上，这让威尔斯轻松了不少，毕竟与截肢这样的大手术比起来，牙科麻醉是他自己熟悉的领域，于是他带着乐观的心情迎来了晚冬的那一天。

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威尔斯后来回忆道：“几位医生和大量的学生前来观摩手术，患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人。非常遗憾的是，手术中气囊撤掉得太早，患者在拔牙时笑气只起了部分作用。患者证实自己感到了一定的疼痛，但是没有通常拔牙时那么疼。由于没有其他患者在场，试验也无法重复进行，有些人认为这是在骗人，这甚至是我无偿服务所得到的唯一回报。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启程回家了。”^[18]

霍勒斯·威尔斯羞愤地离开了波士顿，不过在离开之前他与莫顿及莫顿在哈佛的化学教授查尔斯·杰克逊见了面。尽管展示失败了，但是这三人之间的会面成了乙醚医用的起点。莫顿是马萨诸塞州人，曾经就读于巴尔的摩的牙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牙科学校，此前的牙科学与早期外科学相似，主要以师徒相授模式教学。莫顿是否真的从牙科学校毕业这点尚存争议，^[19]，^[20]不过他回到了新英格兰，并与威尔斯短暂地合伙开了诊所。

可能是受到巴尔的摩牙科教授的影响，莫顿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牙科治疗方式。所以，不管是在哈特福德，还是后来在波士顿，当患者由于他所选择的治疗方式而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他的内心常常饱受挣扎折磨。踌躇满志又勤勉好学的莫顿为了赢得专业认可，于1844年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并选修了查尔斯·杰克逊的化学课。

查尔斯·杰克逊（1805—1880年）也是马萨诸塞州人，成长于地质学、化学、医学和矿物学等专业知识突飞猛进的激情时代。杰克逊的本科学位和医学学位都在哈佛大学获得，起初他留在波士顿教授和研究化学，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领域。不过职业生涯的发展以及多样的研究兴趣，使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和美国。他的一生以精明的见解和广泛的求知欲著称，但他也异常积极地维护发明的优先权，坚决声称是自己最先研发了电报、硝化

棉以及最重要的乙醚麻醉。杰克逊与最终成为他竞争对手的威尔斯和莫顿一样，离开人世时并不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杰克逊在教授莫顿乙醚的性质、乙醚用于麻醉的可能性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霍勒斯·威尔斯在哈佛医学院师生面前展示笑气失败后的几个月中，莫顿开始私下研究乙醚。最初莫顿是为了自己的实践而研究的，他“有一个对自己有益的直接动机：如何缓解或消除手术疼痛的问题，每天都困扰着他”。^[21]莫顿没有用动物做试验，而在两名年轻牙科助手身上做了测试，到1846年夏天，莫顿已经对乙醚在牙科和普通外科方面的功效确信无疑。

威廉·莫顿一直带着谨慎的商业敏感推动着自己的科学进展，他再次向杰克逊咨询了乙醚的制备工作，与专利专员商讨了自己发明乙醚的优先权。与此同时，莫顿终于在1846年9月30日尝试让拔牙患者吸入乙醚浸泡过的手帕所散发的气体。他在一名昏昏欲睡的男性患者身上完成了手术，患者完全没有痛苦。与平时大费周折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莫顿医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拔牙手术，这使他加入了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行列。

尽管莫顿只有一例麻醉患者的经验，他还是大胆地联系了哈佛外科学教授约翰·柯林斯·沃伦，这实在令人好奇。莫顿应该很清楚仅仅20个月之前发生过一氧化二氮事故，所以“他要么相当自信，要么有勇无谋，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他公然违背了科学的约束，因为这位27岁的牙医使用乙醚的经验极少，对其危险的了解为零，他甚至没有想过完善一下将这种气体用于人体的仪器”。^[22]

可是莫顿快马加鞭，一意孤行。

约翰·柯林斯·沃伦（1778—1856年）是哈佛医学院第二位外

科学教授，他的父亲老约翰·沃伦是第一位。虽然他的父亲创立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但是约翰·柯林斯·沃伦在欧洲接受了医学教育，在伦敦的阿斯特利·库珀爵士（Sir Astley Cooper）和巴黎的纪尧姆·迪皮特朗男爵（Baron Guillaume Dupuytren）的指导下进行了医学培训，最终从爱丁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

回到波士顿后，沃伦跻身“美国医学之父”行列，创办了后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麻省总医院和美国医学会，成为哈佛医学院的首任院长，当了30多年外科学教授。令人敬畏的沃伦医生严肃认真又技艺高超，他“生硬刻板的面孔，掩饰了他整个外科生涯中一直无法适应手术室的恐惧”。[23]

虽然莫顿抱着乐观态度，但他一定也对沃伦愿意在自己的外科患者身上进行实验感到惊讶。威廉·莫顿赶紧与一位仪器制作者合作，制造出一种带有两个开口的玻璃装置，中间的容器里放有浸泡过乙醚的海绵。沃伦邀请他几天之后带上设备到麻省总医院为一名年轻的颌下血管瘤患者做手术（见彩插9.4）。

1846年10月16日，星期五。一位名为吉尔伯特·阿博特的年轻结核病患者在麻省总医院的外科演示厅为手术做好了准备。约翰·柯林斯·沃伦等待着莫顿的到来，等得几乎失去了耐心，言谈举止变得粗鲁起来。那天早上，莫顿对玻璃装置进行了最后的完善，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15分钟。狭长的石阶径直通往医院顶层，等着这位年轻的医学生面对最后一项挑战。莫顿赶到手术现场时，一定是气喘吁吁地面对大量将信将疑的看客，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见证另一场溃败，另一次骗人疗法。

莫顿迅速投入工作，准备好奇特的装置，并将吸入器放在紧张的患者面前。他让阿博特开始呼吸，几分钟后，阿博特就睡着了。在那个新英格兰深秋的早上，日光透过玻璃窗格，哈佛的学

生们倚在陡峭而狭窄的观摩席上，莫顿向尊贵的外科医生点头示意：“先生，您的患者准备好了。”

五周后，沃伦将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所发生的事情，发表在《波士顿医学与外科学杂志》上。沃伦医生写道，三分钟后，患者“陷入不省人事的状态。我立即在颈部切开约3英寸的刀口，在患者没有任何疼痛反应的情况下，绕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下刀……手术结束后，我立刻询问患者是否感到痛苦，他说感觉好像颈部被划了一下”。[24]

虽然可能只是传闻，但据说沃伦完成手术后冷静地抬起头，看着一片寂静的观摩席说道：“先生们，这不是骗人的把戏。”

沃伦的文章对接下来三周中其他使用乙醚麻醉的手术病例进行了概述。他得出的结论是，乙醚“确实可以明显地缓解疼痛”，而且药物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痕迹”。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堪称完美：“最后，让我祝贺自己的同人发现了一种缓解人类痛苦的方法，这种药剂在经过良好训练的实践者手中可能会成为价值连城的法宝，虽然还不能证明它的普适性，但乐观者能够想象它未来可期。”

这就是克劳福德·朗在南方的佐治亚州杰弗逊镇读到的那篇文章，此时距离他最初使用乙醚麻醉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光。他因此感到惊慌失措。

克劳福德·朗最后确实赢得了他应有的荣誉。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一家附属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国会大厦内立有他的雕像。但是，他生前不曾享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沉醉与狂欢。

威尔斯、杰克逊和莫顿的故事则更加狼狈不堪。

在莫顿展示成功之后的几个月中，霍勒斯·威尔斯迅速颓废。他经常搬家，无法给人做牙科治疗，最后沉溺于乙醚和氯仿。在氯仿麻醉的作用下，他在纽约市的一间小公寓中自杀了，此时距离莫顿的成功展示仅15个月。

查尔斯·杰克逊继续着自己毕生对功名的追求，却在贫困潦倒中离世。

威廉·莫顿比其他发明者更热心争逐名利，最后困于后悔怨愤之中。他输掉了争夺专利之战，也失去了同事们的尊重，由于“行为失当”而受到美国医学会的谴责。

在输掉了另一场关于乙醚麻醉“发明”的官司之后，48岁的莫顿在纽约市的炎炎夏日中自戕身亡。“他仿佛一时兴起，决定带着太太伊丽莎白去中央公园坐马车乘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勒马急停，从马车中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平静的湖水中。他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人们急忙把他送回马车上。然而马车没走多远，他又突然径直从车厢里跳出来，撞翻了附近的栅栏，滚到栅栏的另一边，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最终莫顿死于脑出血。

[25]

几百年来，欧洲一直是医学创新的前沿阵地，麻醉是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几周后麻醉终于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对于伦敦的人们来说，波士顿倾茶事件过去了还不到75年，距离波士顿港只有咫尺的地方发生的这场革命实在不可思议。

伦敦大学学院外科学知名教授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连忙在自己的一名患者身上进行了乙醚的药效试验。1846年12月21日，李斯顿进行的膝盖以上截肢手术成为欧洲第一台使用乙醚麻醉的外科手术。手术成功了，见证者们并未目睹

屠场般的情景，而是观看了一场无痛又高效的手术展示。后来李斯顿的一名患者需要拔除大脚趾趾甲，这种手术极为痛苦，一直令患者和医生苦恼不堪。手术前，李斯顿告诉外科专业的学生们：“先生们，我们今天尝试一种美国人的诡计，使人没有知觉。”

当拔甲术成功时，19岁的约瑟夫·利斯特也在场。手术操作者和观摩者都纷纷认同乙醚麻醉并非“美国人的诡计”。吸入性麻醉显然是一项巨大突破，任何亲眼见过其效力的人都会立刻明白，人类不会再回到过去了。数月之内，乙醚所带来的变革就传遍了欧洲各地，瞬间改变了外科医生治疗患者的方式。

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1811—1870年）是苏格兰产科医生中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爱丁堡接受训练并行医。听说李斯顿的乙醚麻醉手术之后，他立刻动身前往伦敦，与李斯顿会面并观摩了几次手术。短短几周内，辛普森就在产科患者中进行了乙醚试验。这真实地反映出过去的医学世界的情况：在摸爬滚打的岁月里，患者任由医生摆布。在用豚鼠和小鼠来做实验之前，人类就是主要的试验对象。

由于辛普森要在爱丁堡的居民家中使用乙醚，考虑到当时烛火、煤气灯和煤火无处不在，乙醚极其易燃的主要特征成了它的重要缺陷，于是辛普森开始了一项自主实验。乙醚爆炸不仅会对周围的所有人造成致命伤害，在爱丁堡19世纪时拥挤的居民楼中还将造成一场天灾。辛普森及其科研助手化验评估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化学物质，1847年11月，在一位化学家朋友的建议下，他偶然发现了氯仿。

在爱丁堡，一群男女被试者聚在辛普森家中，对氯仿的效果进行实验，这令人想起美国人利用乙醚的嬉闹与狂欢最终实现了

乙醚麻醉的用途。研究方案很简单，辛普森及其医生朋友们手里拿着玻璃杯，将试验液体倒入玻璃杯后，吸入散发出来的气体，以确认是否产生效果。1847年11月4日，辛普森想起他曾经怀疑一小瓶重液会不会有用：“每个玻璃杯都倒满了新的液体，被试者们继续按使命吸入自己的气体。顷刻之间一场不同寻常的欢闹袭来，他们变得十分欢快、开朗，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这种新液体的美妙香气……然而突然之间，有人说听到了棉纺厂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又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众人砰然倒地！”^[26]

所有吸入氯仿气体的人都完全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大家七扭八歪地躺在地板上，保持着倒下时的姿势。辛普森的侄女吸入氯仿后大声高呼道：“我是天使！啊，我是天使！”那天晚上，氯仿全部耗尽。

这场听起来有点像现代毒品聚会的活动，其实是为找到更好的麻醉剂进行的准科学调查研究。经过探索，辛普森将氯仿应用于产科实践，最终氯仿成为欧洲未来几十年中首选的外科手术麻醉剂。

约翰·斯诺因其对霍乱的研究成为世界首位流行病学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专职麻醉师。他擅长使用玻璃吸入器进行乙醚麻醉。因为不想使用浸泡手帕这一简单而相对危险的方法给药，他研发出一种吸入器，可以更安全地使用辛普森的氯仿麻醉剂。辛普森和斯诺与美国乙醚麻醉先驱们的命运不同，他们都享有英勇创新者的赞誉，职业生涯硕果累累。1853—1857年，斯诺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几次分娩使用了氯仿麻醉。^[27]

到19世纪60年代，氯仿和乙醚已经在欧美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麻醉情况的看法并不准确，毕

竟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乱世佳人》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截肢场景，人们嘶喊着求饶：“放过我吧……我受不了了！别切了，别切了，别……求你了！”事实上，南北战争的双方都使用了氯仿，只是麻醉剂的供应有时无法预测。

有意思的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威廉·莫顿为北方的联邦军进行麻醉，而克劳福德·朗是南方联盟军的麻醉师，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两位竞争对手连在战争中都处于敌对阵营。战争使医学伟人对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为同胞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幕后的战士。

吸入式一氧化二氮、乙醚和氯仿的麻醉效果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知道阿片制剂只是身体本身所产生的内啡肽的替代品，那么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可以引起狂喜和安宁的感觉。而吸入式麻醉的作用机制更难理解，因为其成分与我们自身的化学分子并不相似。有趣的是，人类最近才进一步理解麻醉剂的化学行为，它主要是改变了大脑和脊髓中掌管兴奋与抑制的神经通路。

新型麻醉制剂如异氟醚、地氟醚和七氟醚起效快而且可逆转，与以前的麻醉剂相比更加安全、快速，全身性副作用也更少。曾经举足轻重的乙醚和氯仿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切开、解剖、缝合、重建和植入在内的外科学是新近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只有在刚刚过去的这150年中，外科医生才有能力为人类进行积极的治疗，促成今日人类奇迹般的转变。印刷机革命和同行评审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共享科学突破进展的信息，化学、化学计算的进步以及对气体作用的理解为麻醉引发的巨变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的前辈没有破解复杂的化学世界，获得支配意识的能力，那么现代外科学就不可能存在。人类对于在太空之旅中发

现生命（哪怕是原始状态的生命）感到担心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发现的生命具有不一样的分子结构单元，具有进化方式不同的化学受体，因此我们无法战胜这些生命形式。如果人类是地球上的原始动物，没有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对世界上的化学物质没有反应或者反应不敏感，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无力掌控感知能力，也无法支配疼痛和意识。谢天谢地，我们是所有生物的副产物，与它们共享化学结构和分子受体，以及哺乳动物共同的解剖特征和器官系统。这使麻醉成为可能，从而使外科手术也变得可行。

波士顿公共花园的西侧是深受喜爱的儿童读物《让路给小鸭子》故事的发生地，在那里你能够看到潟湖上的天鹅船和联邦大道，那里矗立着乙醚纪念碑。这座40英尺高的花岗岩雕塑是为纪念1846年乙醚麻醉首次公开展示而设的。纪念碑的一侧镌刻着这样的铭文：“纪念人类发现乙醚的麻醉用途。公元1846年10月，于波士顿麻省总医院首次向世界证明。”多么精妙的措辞，抛开朗、莫顿、杰克逊和威尔斯的争议，简明扼要地强调了重点——1846年10月16日，在波士顿，人类向世界证明，乙醚可以让人失去痛觉，实现真正的麻醉。千百年来的人们使用花卉、草药、酒精，都未能使他们战胜疼痛。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克劳福德·朗才是使用乙醚麻醉的真正先驱者，但是在波士顿的那一天，人类意识到自己终于战胜了疼痛，并确立了对意识的统治权。这是人类历史中最为神奇的时刻之一，曾经有多少人在剧痛中煎熬，眼睁睁看着外科医生对自己下刀。对于所有这些痛苦的患者来说，乙醚出现在麻省总医院穹顶中的那一刻都是卓越辉煌的，就像进入神明安排的梦境。

[1] William Mayo,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Mayo Clinic and the Mayo

Foundation, vol. 13,(New York, Saunders, 1922), p.1274.

[2] J. Ashhurst Jr., “Surgery Before the Days of Anesthesia,” in J. C. Warren, J. C. White, W. I. Richardson, H. H. Beach, F. C. Shattuck, W. S. Bigelow, eds. *The Semi-Centennial of Anesthesia*, October 16, 1846–October 16, 1896, (Boston: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1897), 27–37.

[3] 戈耳狄俄斯之结出自希腊神话，传说绳结之外没有绳头，因此无法用正常方法解开它。现在用戈耳狄俄斯之结比喻非常规手段才能解开的难题。——编者注

[4] Ann Ellis Hanson, “‘Your mother nursed you with bile’: anger in babies and small children,” in Susanna Braund, and Glenn W. Most, eds., *Ancient Anger, Perspectives from Homer to Galen*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04), p.185.

[5] <https://www.greekmyths-greekmythology.com/morpheus-the-god-of-dreams/>. Accessed October 4, 2018.

[6] M. L. Meldrum, “A capsule history of pain management,” *JAMA*, 290(18), Nov. 12, 2003.

[7] “麻醉”（narcotize）源于希腊语Narke一词，表示昏迷、麻木之意。——作者注

[8] *Ibid.*, p.2.

[9] Sherwin Nuland,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Birmingham: Classics of Modern Medicine, 1983), p.25.

[10] <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education/whatischemistry/landmarks/josephpriestleyoxygen.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1] *Ibid.*

[12] *Ibid.*

[13] 燃素（Phlogiston）源于希腊语，意为被燃烧的。——作者注

[14] Henry Guerlac, “Joseph Black and Fixed Air, a Bicentenary Retrospective, with some New or Little Known Material,” *Isis*, vol. 48, No. 2, 1957, p.125.

[15] <https://www.acs.org/content/acs/en/education/whatischemistry/landmarks/josephpriestleyoxygen.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6] Humphry Davy, *Researches, Chemical and Philosophical: Chiefly Concerning Nitrous Oxide* (Bristol, UK: Biggs and Cottle, 1800), p.556.

[17] Sherwin Nuland,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Birmingham: Classics of Modern Medicine, 1983), p.54.

[18] *Ibid.*, p.55.

[19] *Ibid.*, p.63.

[20] <https://archive.org/stream/101495446.nlm.nih.gov/101495446#page/n1/mode/2up>.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1] Sherwin Nuland,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Birmingham: Classics of Modern Medicine, 1983), p.65.

[22] *Ibid.*, p.67.

[23] *Ibid.*, p.68.

[24] John Collins Warren, "Inhalation of ethereal vapor for the prevention of pain in surgical operations,"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December 9, 1846.

[25] Sherwin Nuland,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Birmingham: Classics of Modern Medicine, 1983), p.99.

[26] Gordon, H. Laing, quoted in Sherwin Nuland,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Birmingham: Classics of Modern Medicine, 1983), p.108.

[27] <http://www.ph.ucla.edu/epi/snow/victoria.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第十章

择期手术

几乎每位患者都提到过手术室有多冷。我们将室温控制在大约15摄氏度，一来我们穿着多层的衣服和手术服会舒适一些，同时低温环境也有助于降低感染率。丽莎也不例外。她躺在病床上被推入手术室时，迷迷糊糊地醒来，喃喃地抱怨着冷。

科恩医生是今天这台手术的麻醉指导。他在丽莎进入手术室前为她实施了神经阻滞麻醉。用针头慎重地刺入皮肤后，科恩医生根据超声波探头在电脑屏幕上的显示，引导着针头进入的路径，探索颈部周围组织的深度，当屏幕显示针尖接触到臂神经丛，也就是连接大脑和上肢的一束神经时，科恩医生向神经周围注入一管麻药。这个过程会使丽莎的手臂麻木，而且动弹不得。就在这时，我们小组接到通知，一路走向手术室。

半透明的蓝色手术帽将丽莎赭石色的头发完好地包裹在干净无菌的环境中。她中年时从美国东海岸移居科罗拉多州。在过去的几年中，她的左肩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注射治疗和理疗都没什么效果，于是她选择了肩关节置换手术。在术前等候区，丽莎紧张地询问自己当天晚上会不会很疼，不过现在这种担忧已经飘然远去。镇静剂使她浑然不知地昏昏睡去。她的姐姐坦言，昨天晚上她俩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了一个肩关节置换手术的视频，那些画面简直令人不忍直视。

高中时，我看过一个介绍职业棒球洛杉矶道奇队的长期队医

弗兰克·乔布医生的电视特辑，他做过许多肩部和肘部手术，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从那天起，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骨科医生，这一追求从未动摇过。我在中西部上完医学院，又在宾夕法尼亚州完成了外科住院医师的工作之后，我获得了由乔布医生监管的运动医学奖学金，正是他在将近20年前激励我走上这条职业道路。我曾跟随洛杉矶湖人队前往各地比赛，我曾与“南加州特洛伊人”[1]一起跑进洛杉矶体育场，我曾在春季训练期住进杰基·罗宾森大道的简易别墅，我也曾听过人到中年的迈克·埃鲁奇奥内（Mike Eruzione）[2]失声痛哭，说他腰背腿脚已经力不从心，当时是美国冰球队自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获得金牌以来的唯一一次重聚。那些来自世界一流医生的指导，以及与他们的团队合作的经验，使我成为今天的自己。

我们在手术室里都穿着刷手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只有器械护士在准备器械台时穿着无菌手术衣。我和助手阿什莉把丽莎挪到狭窄的手术台上。

科恩医生通过静脉滴注镇静剂与吸入气体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麻醉药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无痛手术，但也希望患者能够保持不动，这样就不用担心突然的颤动会使神经或血管受伤。科恩使丽莎失去了意识，氧气面罩紧紧地扣在她嘴上，乳白色的异丙酚滴入静脉，几秒钟内就会到达心脏并循环至大脑，丽莎奇迹般地陷入了无知觉状态。

由于丽莎处于全身麻醉状态，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手术台上摆放着她的身体。这时必须格外小心，尽管她的身体具有生命力，但是她无法自我保护，像新生儿一样脆弱。

我们将她的体位摆放好，这种姿势可以尽量减小发生褥疮或者导致神经受损的可能性，然后我调整了手术台的高度，使手术

区域与自己的肘部处于同一高度。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肩部压力，而且方便近距离查看。整个肩关节置换手术期间我都要站着。各就各位之后，巡回护士开始用酒精及其他杀菌剂等化学物质涂抹手术区域的皮肤。

在护士为患者皮肤消毒，以及我们刷手结束后，我与器械护士开始了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工作。她已经穿好手术衣，戴好了手套。我面对着她，她将手术衣拉过我伸开的手臂，但没有碰到身体或者衣服上未消毒的部位，然后再把乳胶手套对着我刚消过毒的手猛然一拉。我的身后，一位护士为我系好手术服。我360度转身，把自己包裹在一个无菌的小世界中。

丽莎在术前等候区的这段时间里，我忙得不可开交：解决丽莎姐姐的焦虑，飞速完成一名篮球队员的体检好让他在这个周末可以打球，给办公室助手打电话，听取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磁共振报告，以及为丽莎做好手术准备。终于一切就绪了，手术开始。我和科恩医生目光交会，对视的眼神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把握、对彼此的深信不疑。他深沉的目光以及轻微的点头示意，确定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启这场旅程。

手术刀由两部分组成：刀柄和刀片。刀柄呈扁平状，不锈钢材质，可以反复清洗、消毒和收纳。刀柄可以使用数年甚至数十年。而刀片是一次性的，只能用在一位患者身上。刀片不是由不锈钢制成的，而是采用了更为锋利的碳钢材质。很多时候，如果在刀片在手术过程中不够锋利，就必须更换。

外科医生需要手术器械时，不会转向器械护士，或者说视线不会离开手术区域。在使用了几种器械之后，经验丰富的器械护士知道医生所需要的下一个器械，并不会从正确的方向递到他的手中。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外科手术，手术的步骤仿佛远洋水手在掌

舵导航，虽然他们极少交谈，配合起来却极其协调。

现在，我的视线牢牢地盯着自己在丽莎肩部画出的那条紫线。体位、刷手、穿衣、备皮、铺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开刀做准备，既然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刀。”

有两种握手术刀的方式：一种是像握铅笔一样握住不锈钢手柄，另一种是像演奏指挥拿着指挥棒。第一种技术方式适用于大多数切口，而大切口往往使用第二种方式。为丽莎做切口时，我的手和手腕保持稳定，运用肘部和肩部的肌肉力量来引导刀片穿过皮肤。

我的右手握着手术刀，戴着手套的左手拇指和食指绷紧切口两侧的皮肤。此时此刻，我心无旁骛。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现实中的烦恼，没有任何争议，无悲无喜亦无趣。我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仿佛10英寸以外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的父亲在成为兽医以前，是美国驻韩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我对他的军旅生涯十分好奇，于是观看了一部关于狙击手训练的纪录片，里面说像他这样的神枪手在扣动扳机之前需要深呼吸。在手术中需要做出精确动作时，深呼吸同样使我的手更加稳定，我每天在手术室都使用着这项技术。

在简短的呼吸运动之后，我将手术刀片移至计划切口部位的顶端。在朝肘部向下倾斜手术刀之前，锋利的刀片只会接触皮肤表面，金属边缘并未将其穿透。新手外科医生一般会错误判断切开皮肤所需要的压力。通常来说，外科新手勉强能够刮破皮肤，他们的上级医生会开玩笑说还不如曲别针造成的伤害。但是用力过猛又会使刀片过度深入切口，有可能对深处的神经或动脉造成灾难性损伤。

切开皮肤的感觉就像在切一个新鲜的桃子。当我将皮肤切开时，黄色的脂肪从切口处汩汩地冒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给丽莎做肩部切口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皮肤边缘的毛细血管被拦腰切断，渗出鲜红的血滴，这时需要用博威电凝器进行烧灼或热封止血。

一个完美的切口只需穿透到真皮层，之后用剪刀和电凝器来操作。做完最初的手术切口之后，我递还手术刀，替换了刀片。即使经过最严格的手术准备工作，皮肤层所含有的危险细菌也会污染“切皮刀”。哪怕仅仅使用几秒钟，刀片也就此作废。

丽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边界受到了侵犯。

接下来，肩关节置换手术需要逐步深入地探索组织层面。这种对身体的深入探查在摄影、电报机、蒸汽机和卫生卷纸出现之前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每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都需要与生俱来的三维空间感，并辅以数年的解剖学学习。事实上，每一块肌肉、每一根微小血管及每根神经的位置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有天赋的外科医生通过快速而精准的解剖来理解层层的结构。老化的关节仿佛一棵古树长到了石崖上，出现骨质增生、骨刺，软骨体疏松以及过度生长又缺乏弹性的韧带。随着对患病肩关节的探查逐步深入，我手中的手术刀也需要换成更加坚固的器械。

其他专科医生处理的是像大脑和肠道这样的软组织，而骨科医生专门解决骨骼、韧带、肌肉和关节的问题。我们的工具包里包括各种五金器具，如金属锯、凿子、钻头和锤子。在我把肱骨头周围的深层软组织切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被炎症破坏的关节，我用金属电锯切掉了骨头的顶端，依次将较大的金属柄放入中空的肱骨腔，这一步完成后，就可以插入最终的肩关节植入物了。

在某些阶段，每一步手术都像一个工程项目，需要用力敲打、塑形、打磨并切除组织和器官。

植入新的关节置换组件之后，我从肩关节逐渐闭合刀口，直到最后一步皮肤缝合。在没有抗生素的日子里，早期外科手术的先驱们使用丝线或者肠线将组织边缘缝合在一起。这些可降解的材料会诱发免疫反应，导致感染，患者通常会因此丧命。现在我们使用“惰性的”或低炎性的缝合材料，或者用金属缝合钉将皮肤固定在一起。

随着手术组开始进行最后的包扎，科恩医生也开始为复苏做准备，停止向气管插管中追加短效吸入式麻醉药，中断丽莎的静脉镇静药物。乙醚等麻醉剂的药效需要几天时间才会消失，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新型麻醉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失效。丽莎开始移动她的身体，反抗着嘴里的管子。确定安全之后，我们拔除了气管插管，将她移到病床上。

我们小组将丽莎沿着走廊推向恢复室。患者在手术室里常常害怕自己说出一些愚蠢或尴尬的话，但他们大多数都不会，一般只在麻醉诱导和撤掉时出现一些无法理解的喃喃自语。不过在刚刚苏醒的几分钟里，大部分患者会表现出一种毫无戒备的情绪，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失去了意识。我在丽莎的身旁帮忙推着病床，科恩医生问她感觉怎么样。

“我们准备开始了吗？”她问道。

1877年，在庄严宏伟的德国城市布雷斯劳，罗伯特·科赫第一次见到了名为威廉·亨利·韦尔奇的美国青年。年仅27岁的韦尔奇已经先后从耶鲁大学以及内外科医生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医学院）毕业，与许多美国应届毕业生一样，他为游学来到了

欧洲大陆。韦尔奇在斯特拉斯堡、莱比锡和布雷斯劳逗留期间，接触到了世界上最有学识的显微镜学家、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在机缘巧合之下，求知若渴的韦尔奇意识到病理学这一新领域将成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在科赫、弗里德里希·冯·雷克林豪森[3]、路德维希[4]、瓦格纳[5]和科恩海姆等新学科之父的指导下，韦尔奇将成为美国医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

韦尔奇在莱比锡遇到了约翰·肖·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医生，这位陆军上校主持建设了美国军医总长图书馆（现在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新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也聘请比林斯帮助这所新成立的大学建设医学院，并负责为巴尔的摩招募有发展前途的医生。

这所大学得到实业富豪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巨额捐助，十分与众不同。医院及其附属医学院既效仿德国模式以实验室为中心，又效仿英国模式以临床为基础。[6]吉尔曼和比林斯心怀变革的梦想，要建设一座由专职教授组成的研究型医院，这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医生愿意鞠躬尽瘁，去改变医院的运营方式。1877年，韦尔奇和比林斯在莱比锡的奥尔巴赫地窖酒馆一起喝了啤酒，这是一家传奇的酒馆餐厅，就连歌德也经常光顾。韦尔奇受聘加入霍普金斯十分关键，对他本人和这所大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益处。

威廉·亨利·韦尔奇将很快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系的创始人。不过，他会先回到纽约市，监督美国第一个病理学实验室在贝尔维尤医院的建设。这个新兴学科效仿当时最先进的德国病理学建设，需要最新的显微镜、相关配件仪器、化学药品、贮备供给，以及规范的停尸房和结构化的操作规程。

韦尔奇作为当地医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在雄心勃勃、敏而好学的医学生眼中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他的聪明才智和无人能及的培训经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然而真正使他受到学生和患者爱戴的是他从康涅狄格州乡村医学世家代代相传而来的亲和力。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医生，还是真正的朋友和导师”。[7]矮小肥胖的韦尔奇被选为耶鲁大学骷髅会1870届成员。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俱乐部，在餐厅，还是在家庭会客厅里永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伴。

1880年9月，朝气蓬勃的纽约人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结束自己的欧洲研究生之旅回国，他一心想要超越当时纽约城中所有的外科医生。正如韦尔奇在欧洲大陆受到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们的指导，霍尔斯特德这位前耶鲁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在维也纳也得到了顶尖外科医生的传授，并且受到了利斯特观点的启发。霍尔斯特德出生在富商家庭，起初在罗斯福医院做外科医生，之后在内外科医生学院做解剖学演示员。他将来的成就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同寻常的。

霍尔斯特德医生很快就在纽约表现出影响力。他的热情、专业和风度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新的医术和出众的智慧使人们将他当成医学工作者未来前景的标杆。在人们还以马车代步的时代，他的工作热忱驱使他同时在曼哈顿多家医院任职。这位医生有着钢蓝色的眼睛、时髦的举止、无可挑剔的着装品位和位于麦迪逊广场的豪华住所。在外科这个刚刚摆脱嘲笑奚落的专业领域，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霍尔斯特德是一名有教养的外科医生的名声。

霍尔斯特德早期进行的一项革新是为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学生们开设了非正式的医学教学之夜。他通常在位于25街的家庭办公室中举办“小测验”，每周有好几次，[8]而教学工作由医学界的年

轻新星共同担任。最受欢迎的两名老师是霍尔斯特德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好友威廉·韦尔奇。两位领路人都是耶鲁大学和内科医生学院的毕业生，都善于社交又天资聪颖，他们的教育工作鼓舞了年轻人投身于新式医学。

韦尔奇接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医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884年再次远赴欧洲。作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医生，他已经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七年，但是未来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光芒将远远盖过他在纽约时期的贡献。学校批准了韦尔奇为期18个月的学术休假，让他能够重访那些顶尖的医学中心。同时他也离开了挚友霍尔斯特德，当时这位外科医生、解剖员、实验科学家兼“小测验”的出题人，正致力于改变纽约市范围内的医疗。

到1884年，霍尔斯特德一共在五家医院任职，其中包括长老会医院、纽约医院以及久负盛名的贝尔维尤医院，而他所梦想的具有综合无菌设施的“现代化”手术室还未出现。霍尔斯特德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资金，筹建了美国最先进的手术室，一个铺着枫木地板并配备了天窗、自来水、煤气灯及灭菌设施的独立帐篷屋。这在1885年可能是西半球最高级的手术场所。

霍尔斯特德在贝尔尤维设计的手术室是他将自己在奥地利和德国所见过的手术演示厅实用化改进的版本，同时也是站在维也纳、莱比锡、哈雷和基尔的众多医学巨人肩膀上的成果。在他的老师中，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是忧郁敏感的诗人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他自称为“伤感的北海鲱鱼”。^[9]比尔罗特在柏林受训，1853—1860年得到了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指导，学成后他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外科学教授，长达25年。

在思想剧变的时代，朗根贝克对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19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接受外科学研究生培训，当时比麻醉的问世要早十几年。他曾在阿斯特利·库珀和本杰明·布罗迪（Benjamin Brodie）的指导下工作，因此这位德国外科医生继承的是约翰·亨特的医学传统。

朗根贝克的临床生涯多次因战争而中断，包括1848—1852年以及1864年的两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10]战地医学在这20多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相继问世。普法战争期间，与法国医生的旧式治疗方法相比，德国采用的消毒技术为朗根贝克团队负责救护的普鲁士军队取得了优越的外科成果。因此，德国和奥地利医生属于最先也最积极采用利斯特消毒法的人。

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为敌对双方的治疗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者的赞誉。作为德国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受伤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需要帮助的同志”。^[11]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仿佛永无休止的战争，将促使德国外科医生做出大量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外科医生仍然是外科学的开拓先驱，受伤的美国士兵带着最新的骨科植入网回到家，这在当时的美国连想都不敢想。

朗根贝克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他培养的学生，当时几乎所有的杰出外科医生都是由他培训的，其中包括比尔罗特、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Emil Theodor Kocher）和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伯格（Friedrich Trendelenburg）。他认为年轻的学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应该住在医院里，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培训，经过数历练才能逐渐承担更多的职责，这一观点为他赢得了“外科住院医师之父”的称号。

如果说约翰·亨特是外科学之父，那么朗根贝克可以说是现代战地消毒外科的开创者、医生的战场中立性倡导者以及外科住院医师之父。当消毒与麻醉这两种技术相遇时，朗根贝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将外科从“中世纪蛹壳的约束中”^[12]释放出来，使其破茧成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在柏林期间得到朗根贝克的指导，这是两位历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共事的时期，比尔罗特也逐步成为朗根贝克最重要的门生。

在瑞士苏黎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定居维也纳，在20多年里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外科医生。自1867年至19世纪90年代，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大学的手术演示厅是外科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他革新了外科手术技术，指导了无数欧洲和美国的毕业生，改进了外科住院医师的方案，发表了大量文章，完善了经典式教科书的编写，发布了手术审查的流程（后来演变为对手术成果的评估），也鼓舞了几代外科学领军人。与此同时，他始终与音乐家和作曲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关系，其中包括挚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教授以其独特的方式突破了古老而荒谬的体液学说的最后防线，向其吸血鬼之心锤下致命一击。化学、显微术、细菌学、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融合预示着医学的惊人转折即将到来，而比尔罗特无疑是当时外科医生的统领。“这是研究者揭竿而起的时代，德国医院的环境中酝酿着各种可能性。”^[13]放血、拔火罐、泻火、水蛭吸血、以毒攻毒等方法即将退出医学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组织和细胞功能为基础的、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和科学的干预方式。是德国人对疾病的理解启发了研究正常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探索者。

比尔罗特花了大量时间解剖尸体，为手术干预制订方案。他依靠严谨的术前准备工作和严格的消毒技术开创了腹部外科。动

物实验的成果和在尸体上进行的手术预演鼓舞了这位维也纳教授，他认识到或许可以进入腹部。如穆克吉所说，正是“上帝般的创造精神”使肠道外科得以实现。几百年来，维也纳以精湛的音乐演出而闻名，比尔罗特如音乐巨匠般的表演也将在音乐之城的伟大剧场中进行，即维也纳总医院手术演示厅。

1872年，比尔罗特切除了一段食道，并将断端重新吻合在一起。1873年，他进行了首例全喉切除术。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第一位切除直肠癌的外科医生，到1876年时已经完成了33例同类手术。[\[14\]](#)

如今司空见惯的腹部外科手术在当时就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惊人魔术表演。

首先，肠道任何部位的手术都充满了危险，尤其是肠道的最下部，即结肠和直肠。理论上说，人体从口至肛的消化道全长平均有30英尺，由食道、胃、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大肠、直肠和肛门组成。消化系统的“管道”由许多软组织层层构成，只要完好无损，这些组织层是防水隔菌的。蜿蜒曲折、自成一体的消化道通过悬垂的肠管伸展到腹腔深处，与提供营养的血管相连，并吸收经过消化处理的营养成分。消化道之外的腹腔（或者说腹膜腔）是绝对的无菌环境，极易受到感染的致命伤害，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胃和小肠相对“清洁”，但是大肠和直肠充满细菌。尽管这些细菌通常与宿主（即我们）保持着共生关系，不过一旦肠道中的物质穿透肠壁组织涌入腹腔，就会构成致命危险。

科学“魔术”的另一个重点是外科医生切断的两个组织末端连接起来能否愈合。人们常常把愈合看作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假设分开的组织边缘会协调一致，相互滋养，牢牢地结合为

能够正常运作、防水还可伸展的整体呢？外科手术简单来说就是将身体部件连接、钉合、缝合、拧紧、以夹板固定、黏合，然后促使身体从微观层面甚至从分子层面上铺设结缔组织去补充那些人为的连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体组织最终取代临时搭建的脚手架。

比尔罗特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英勇前行，不断做出正确的诊断。要知道，他们的时代没有磁共振成像、计算机断层扫描、超声波和X射线，他要在最原始的条件下使患者达到麻醉状态，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此手术演示厅设置在医院顶层以利用上方的天窗，外科手术之神召唤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比尔罗特运用早期的消毒技术和有限的灭菌设备来避免感染，以赤裸的双手切开身体进行操作，用原始的肠线和丝线缝合肠道组织。尽管人们认为他有些傲慢自大，但比尔罗特教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

据估计，在1850—1890年的美国有40%~50%的顶尖医师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至少“一万美国人于1870—1914年在维也纳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正规医学教育”。^[15]他们为了学习以实验室为重点的新式医学而来，而比尔罗特是德国实验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典范，并且能够将实验室研究转化为有意义的临床干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878—1880年，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学会了先进的思维模式、技术方法和设计方案，观察了需要的仪器和设备，将比尔罗特创建的结构（包括组织架构和实物建筑）复制到了贝尔维尤医院的帐篷中。霍尔斯特德得一望十的天性之前受到日耳曼人的训导，如今在纽约城中得到释放，一有机会便表现出来。他对服饰品质十分讲究，要求西装量身剪裁、衬衫在巴黎夏尔凡（Charvet）定制、衣物由法国人洗熨（将穿

脏的衬衫通过汽船运往巴黎洗熨，几周后收到寄回的衣服），还要戴上等礼帽、领带和眼镜。同等的品质追求也展现在他遍布纽约全城、不分昼夜的医学实践活动中。

亨利·韦尔奇于1884年3月离开纽约，霍尔斯特德留在了新大陆。韦尔奇抵达欧洲时恰逢一场药理学变革：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从安第斯山脉东麓生长的一种古柯属植物叶子中分离并提炼出一种生物碱。在原始的印加文化传统中，咀嚼、吸吮这种叶子可以提神，但是这些植物漂洋过海来到欧洲的大城市之后，就失去了功效或者效力大幅减弱。默克公司的科学家们能够自己栽培古柯，并通过新近完善的化学提炼法，分离出一种活性化合物，那就是他们称为“可卡因”的生物碱。

生物碱是各种各样的简单化合物，具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结构。科学专业的初学者会惊讶地发现，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都可以产生这种“钥匙”分子，它们能够与某种细胞受体结合引起变化。有趣的是，我们哺乳动物大脑具有的细胞受体很容易与一些植物的分子产生相互作用，这些植物包括哥伦比亚的古柯属植物、阿富汗的罂粟种子、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以及墨西哥的大麻。这些生物碱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治疗精神疾病、抗心律不齐、抗癌、抗疟疾、抗菌、舒张血管等等。科学家们认为，这些通常有毒甚至致命的相互作用主要来自物种进化选择的压力，进化压力促使一种生物产生某种生物碱，该生物碱能够与另外一种生物发生相互作用。

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柯会合成可卡因？化学家们发现，可卡因具有杀虫剂的功能，能强烈抑制昆虫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在神经之间起信息传递作用的化学物质）。如果没有可卡因，这些昆虫会威胁到古柯。蜜蜂其实也是受到花香的诱引才给植物授粉的。“嗑药”的蜜蜂在传粉的游戏中有用的马前卒。我

们的身体里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分子受体，它们的功能在动植物界极为普遍，对此我们大概不应该太过惊讶。

直到1898年，可卡因的化学结构才由理查德·威尔施泰特准确地描述出来，他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德国药剂师在1859年就分离出了可卡因。^[16]研究可卡因的第一步显然是模仿印加人的做法，将药剂放在受试对象（也即医学生）口中。研究人员注意到，尽管许多年轻人表现出不同的怪异行为，但可以确定他们的口腔表面都会感到麻木。在维尔茨堡和后来的维也纳，药剂师发现，可卡因在治疗表现出忧郁症状的患者和身体受严重损伤的巴伐利亚士兵时，表现出积极的疗效。

维也纳人兴致勃勃地猜测着这一新型药物将带来的前景。维也纳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听说了这种新药，认为它具有“神奇的魔力”。1884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定期服用极少量此类药物，用来抗抑郁和消化不良，卓有成效。”^[17]在距离比尔罗特的外科示教室只有几步之遥的维也纳眼科医院，一位名为卡尔·科勒（Carl Koller）的低年住院医师一直在用吗啡、硫酸盐、氯醛和溴化物等进行眼部麻醉药物的实验研究。这是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科勒也参与了可卡因的实验，他决定亲口尝试一下这种物质，在自己的口腔黏膜中体验到效果之后，科勒知道下一步要进行动物实验。1884年，科勒将可卡因粉末溶入蒸馏水中，他的同事按住一只大青蛙，科勒将可卡因溶剂滴入一只突出的眼睛里。几秒钟后，科勒触摸青蛙的那只眼睛以测试其反射。起初没有药效，但是一分钟后“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出现了……接触甚至损伤青蛙的角膜时，青蛙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射”。^[18]对兔子和狗进行过测试后，两位年轻的住院医师转而用对方做实验。溶剂缓缓地滴入他们的眼睛，然后，他们用手中大头针的顶端触碰滴

入溶液的眼睛。他的助手后来回忆道：“我们几乎同时高兴地确定，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就这样，我们确认了这个发现。我很开心自己是第一个向科勒医生表示祝贺的人，他为人类带来了福音。”^[19]

可卡因溶剂很快便应用于真正的眼科手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后，德国眼科学会会议在海德堡举行，科勒派一位同事去介绍他们的新发现，并宣布他们的优先权。和现在一样，大部分医学会议的报告都平平无奇，极少有闪光点。偶尔才会出现一篇论文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业内人士对其发现赞叹不已。第二天，参会人员还额外现场观摩了一台眼科手术。1884年9月的那一天，美国人亨利·诺伊斯（1832—1902年）也在会议室中，他赶回家撰写了一篇使用可卡因实现局部麻醉的稿子。在《纽约医学记录》（*New York Medical Record*）的10月刊中，诺伊斯描述了可卡因的使用，不过他总结道：“这种物质的全部特征仍有待研究，这一发现也许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20]

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读到了1884年《纽约医学记录》上的这篇报道，立刻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利用可卡因。霍尔斯特德行事机敏，讲究实用性，经过数年历练，他相信自己能够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使用可卡因溶剂。他没有将其滴入眼睛或者倒进嘴里，而是意识到这种溶剂在使用新发明的皮下注射针头时能发挥真正的潜力。作为解剖学大师，霍尔斯特德具有极为丰富的神经系统知识，对神经通路及其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他立刻想到了“局部麻醉”的概念。

当笔者还是一名年轻的医学生，首次接触解剖实验室时，我还不确定人体神经的粗细。“它们通过肉眼就可以看见吗？”我问自己。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周围神经其实非常粗大，它们经手臂

或腿部向下延展的部分如同铅笔一般粗，然后分为微小的卷须，消失于肌肉或皮肤中。每根神经中都有我们无法察觉的神经纤维，它们或向下传递大脑发出的信号，或将信号向上传回大脑。运动神经纤维沿周围神经传导从中枢发出的电信号，与它们支配的肌肉相连。相反，周围神经中的感觉神经纤维将皮肤、骨骼和软组织中的电信号——包括疼痛、触摸、感觉、振动等信息——传回“中央处理器”，也就是大脑。

霍尔斯特德正在一个完全未知的海域航行。检验局部麻醉假说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始对测试对象进行注射，于是他做了一件现在不可能的事情，走向了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小白鼠”——参加医学之夜的医学生们。相比之下，科赫用自己女儿的宠物兔子做实验倒是更为世人接受。

诺伊斯的文章面世不到两个星期，霍尔斯特德就从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拿到了4%浓度的可卡因溶剂，开始在麦迪逊广场的家庭办公室中为学生们注射。注射聚会的场面肯定轰轰烈烈。霍尔斯特德手持精致的由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皮下注射针管（当时尚无现在“一次性”针头的概念），周游会客室，将针头刺入学生们的胳膊和腿部。偶尔扎得过深，刺到神经时，一阵痛苦的电信号会传导到肢体，这时的霍尔斯特德和他的弟子们一样恐惧。但是，当这种药剂沉积在神经周围，麻木感就会沿着相应的构造在肢体中蔓延。几天之后，大家都意识到局部麻醉显然并非空想，而是可行的。

许多学生感到精力过剩，偶尔出现恶心、面部潮红、心悸和眩晕。改变注射可卡因的浓度可以缓解症状。不久，这项技术便在罗斯福医院应用于患者的常规治疗，霍尔斯特德的牙医朋友们也将此技术应用到牙科治疗的过程中。

如今，读者已经非常熟悉利多卡因、普鲁卡因和利多卡因等名字了，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与可卡因的近亲关系。前一组药物在世界各地的临床机构里得到安全无害的应用，而凶猛的可卡因完全不同。正如诺伊斯在美国所写的第一篇关于可卡因的文章中所说，这种疗法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到1885年秋，问题在纽约浮出水面。那些使用可卡因鼻烟，甚至在社交活动中注射可卡因的医学生和外科学徒遭到了痛苦的折磨。“学生的视力开始减退。医生行为也越来越古怪。他们睡眠减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兴奋不已。最后，他们做的手术越来越少，出现玩忽职守的情况。”^[21]出于高尚目的的准科学试验，最终导致了化学依赖。

他们对可卡因上瘾了。

在首次进行实验性注射不到一年后，霍尔斯特德及其同事和学生把自己对人生的掌控交给了可卡因。霍尔斯特德渐渐不去罗斯福医院诊室的晨会了，他的怪异行为与城中四处游荡的吸毒者十分相似。同事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出现一阵阵痉挛、神经抽搐，表现出急躁性情和盗汗。在药理作用的刺激下，霍尔斯特德仿佛变了一个人，成了一个令人恐惧不安的野蛮恶魔。

1885年秋，霍尔斯特德带着成功的喜悦回到维也纳，在海外继续着自己的可卡因狂欢。他向外科医生和牙医展示了局部麻醉技术，与老朋友们联络叙旧。没有记载表明他在维也纳见到了弗洛伊德，不过人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有所互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杰拉尔德·因贝尔在《叛逆边缘的天才》（*Genius on the Edge*）中写到，霍尔斯特德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和他最亲近的亲人和朋友都担心他会就此迷失生活的方向。

1886年1月，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回到纽约，状态进

一步失控，满口胡言乱语，神志不清。昔日好友韦尔奇正在巴尔的摩将约翰斯·霍普金斯建为一座精英研究机构，两人共同的同事提醒他，霍尔斯特德的身体正在逐渐恶化。“曾经谦逊有度的他，现在变得粗鲁莽撞，不停地讲话，而且毫不在意对方的反应。”^[22] 韦尔奇又找来另外两名医生朋友一起制订干预治疗方案，四位专业人士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将这名年轻的外科医生从可卡因的诅咒中挽救出来。

唯一能够正面阻止霍尔斯特德的医生，甚至可以说世上唯一能阻止他的人，就是友善而聪慧的韦尔奇。这位出身康涅狄格州的医生世家之子，也是耶鲁骷髅会的成员，既重视同志情谊，又擅长理性分析。单身汉韦尔奇直接与霍尔斯特德讨论了他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单单是责备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让他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航海旅行，在享受习习海风来恢复活力的同时可以强制戒毒，最终摆脱可卡因的控制。霍尔斯特德同意了。1886年2月，韦尔奇租好了纵帆船“布里斯托尔号”，开往加勒比海南部的向风群岛。

韦尔奇与霍尔斯特德的安排是，大量的可卡因将交由年长的韦尔奇监管。治疗方案规定，韦尔奇会逐渐减少每日给霍尔斯特德服用的药量，直到他完全戒掉可卡因，当4 000英里的往返航行结束时，霍尔斯特德也将痊愈。

出航时，“布里斯托尔号”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飞马，如同诸神搭乘的船只。韦尔奇是个希腊文学专家，曾立志当一名大学教授，他一定想起了奥德修斯躲避海妖塞壬的故事。女神喀耳刻警告过奥德修斯，塞壬实际上是凶恶的怪物，伪装成妩媚的女子，以天籁般的歌喉引诱着航海者。在这个著名的故事里，奥德修斯用蜡堵住海员们的耳朵，防止他们受到诱惑。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堵住耳朵，以便“聆听美妙的歌声”。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无

法逃脱，也无力抵抗，他竭尽全力地挣扎，使铁索勒破了自己的肉体。

前往加勒比海的旅程中乐趣日渐消减，霍尔斯特德一路上被逐渐减少的药量折磨着。韦尔奇与霍尔斯特德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天深夜，霍尔斯特德为了得到可卡因，强行打开了船长的药箱。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斯特德相当于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当他们在返程途中抵达佛罗里达海岸，他已经“噩梦缠身、精疲力竭、急躁易怒，[并且]对同行的伙伴们充满了怀疑……”。^[23]对于霍尔斯特德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希腊式悲剧，或许他最终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神明希望他可以再次看到纽约，并且有朝一日在巴尔的摩执掌医学院。

剥夺疗法失败后，霍尔斯特德清楚自己需要强度更大的医疗干预。韦尔奇仍然信任自己的朋友，但是坚持认为他需要进入疗养所治疗，那时疗养所正逐渐成为戒毒治疗的主要方式。1886年，霍尔斯特德入住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巴特勒疗养所进行可卡因戒毒治疗，历时7个月。当时的主要治疗方法是用其他药物替代成瘾的药物，霍尔斯特德接受的是吗啡疗法——吗啡同样会让人一生上瘾。尽管疗养所强调健康饮食和户外活动，但吗啡的介入导致了一种尴尬的平衡，“一种药物使人感觉自己强大而且无所不能，而另一种使人感到世间的平和慰藉”。^[24]

霍尔斯特德正处于人生中危险的一站。他的父亲生意失败，财富尽失；而他自己回首来路，已经没有了依靠，从医学培训完成后六年来赢得的声誉毁于一旦。霍尔斯特德为自己的尝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急需恢复职业声望。1886年12月，在那次灾难性的航行实验仅8个月后，韦尔奇再一次伸出援手。霍尔斯特德乘火车一路晃晃悠悠地来到巴尔的摩，与韦尔奇一同搬进了市中心的寄宿公寓。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1876年在巴尔的摩市中心成立，后来于20世纪初迁至郊区。虽然比哈佛和耶鲁年轻200岁，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被视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校长吉尔曼遵循了领先的德国教育模式，尤其学习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者威廉·冯·洪堡，强调研究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相对于死记硬背陈旧事实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以发现新知识为主体教育方式，将极大地改变美国的学术体系。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对疾病认知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引起了惊人的变化。莫尔加尼首先将症状与解剖形态联系起来。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以组织为基础、以细胞为导向进行尸检，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疾病形态的认识。但是，真正开启疾病理解之门的是细菌学的出现，而出色的实验室科学为医疗保健在这片新天地的改善做好了准备。在吉尔曼的监督下，韦尔奇将在巴尔的摩的劳登斯拉格山建立起美国医学的“万神殿”。这样强调是不过分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栋大楼就是病理学研究楼。当时一般的医学院的校舍布局往往分为医疗病房、手术演示厅和产科门诊，但这所医学院机构将建基于一栋为理解疾病而设计的大楼之上。莫尔加尼、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会为此感到骄傲不已。

医院计划于1889年开诊（医学院的第一期课程直到1893年才开始招生），此前霍尔斯特德的主要职责是与韦尔奇一起在病理学实验室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专注于动物试验和基础科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外科学的进步。

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开创了腹部外科的先河，不过手术结果仍时好时坏。霍尔斯特德推论，改进技术可能会改善临床效果，但他要求新技术必须经过科学分析，而且需要以微观解剖学为基础。霍尔斯特德抵达巴尔的摩不到一周，就与富兰克林·马尔

（Franklin Mall）开始进行动物手术，对肠壁解剖分层进行微观评估，发现了看似平凡无奇的“黏膜下层”（submucosa），此前人们并未意识到它的作用。

肠壁由三层结构组成：外部肌肉层、具有吸收性的内部衬层和由结缔组织构成的薄薄的中间衬层——黏膜下层。他们在几个月里通过69个实验对黏膜下层的作用进行了评估，对新修复部位的强健程度进行了测试。1887年4月，霍尔斯特德在哈佛医学院就一篇论文做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强健的组织愈合。这项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使肠吻合（两个断端缝合在一起）成为一项可靠的技术，直接影响了腹部手术的生存率，至今仍是外科手术的基石。肠道外科手术就此改写。

耐人寻味的是，霍尔斯特德无法肯定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并没有在人体上进行手术操作。韦尔奇把他带到巴尔的摩，在自己的监督下工作，但是霍尔斯特德作为外科弃儿，无法得到患者的信任。所以实验室就是他的诊所，狗就是他的患者。霍尔斯特德对狗进行了十分认真的护理，令人极为敬佩。事实上，他开发出“一种处理动物实验的方式，不久便成为国家标准”，[\[25\]](#)这也是他来到巴尔的摩不久后对外科学做出的第二项主要贡献。

韦尔奇出于对他的纽约好友的敬重，请求吉尔曼校长容忍霍尔斯特德的恶劣名声。在狗的身上进行的外科手术、收获颇丰的基础科学研究、哈佛报告取得的积极反响……这一切都似乎表明，威廉·霍尔斯特德终于回归正轨。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波士顿做完报告后不久，他再次住进了巴特勒疗养所，这一次一连住了9个月。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巴特勒疗养所化名“威廉·斯图亚特”过了16个月，这原本是外科医生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他却没有任何科学成果。当时没有人敢说他能够重操外科手术旧业，更不用说扛起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科医生之重任。

1887年12月，霍尔斯特德在巴特勒疗养所结束了第二个康复周期，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病理学大楼的工作岗位上。这位单身外科医生老实实在巴尔的摩住所附近的马里兰俱乐部就餐和社交，白天认真地与韦尔奇和一群年轻医师一起做研究。以前那位精力充沛、善于社交的外科医生给自己套上了保护壳，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掩藏着可卡因和吗啡成瘾的黑暗秘密。或许只有韦尔奇一个人清楚霍尔斯特德曾是一个不知悔改而且部分丧失了生活能力的重度瘾君子。

在德语民间传说中，对生活不满的炼金学者浮士德与魔鬼签了一份协议，以自己的灵魂换取无尽的知识 and 尘世欢愉。毫无疑问，霍尔斯特德开始使用可卡因时并不知情，但很快便被它的魔力迷住。疗养所开的处方吗啡仿佛希腊神话中的梦神摩尔甫斯一般，也使霍尔斯特德无法自拔。性情的彻底改变埋葬了曾经的霍尔斯特德医生。他现在严肃深沉、遮遮掩掩、羞面见人、脆弱不堪，他把自己包裹在蛹壳中，无人能入。外科医生天生都是“控制狂”，无力感一定使霍尔斯特德受尽折磨。

“病理科”的日常作为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带来了极大的抚慰。到1889年初，他开始在当地医院出诊和手术。两年前来到巴尔的摩时，支离破碎的他对未来还是一片迷茫。这位曾经在大都会享乐之人正渐渐夺回自己傲人的事业。现在一个重要决定摆在约翰斯·霍普金斯行政管理部门面前：他们应当聘请谁来担任这家新医院的外科医生？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于1889年5月开门。病理科虽然已经在威廉·韦尔奇的带领下运作了几年，但在医院开门接诊前的几个月才聘请到专职外科医生。如今，美国每家医院的发展趋势都取决于外科手术量。在21世纪，外科医生的地位可谓得天独厚，自己工作带来的收益多寡决定了职位高低。而在1889年，外科作

为一个新生的职业领域，美国的专职外科医生还不足10人。^[26]校长吉尔曼已经聘请了科学家兼病理学家韦尔奇，也毫不意外地请来威廉·奥斯勒担任医院的创始内科医生。出生于加拿大的奥斯勒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职，他后来成为卓越超群的世界名医，最终作为钦定医学教授（Regius Chair of Medicine）留在了牛津大学。

距离医院开门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外科医生还没有到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领导层决定为这家新生机构聘请一位全职外科医生，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威廉·麦克尤恩爵士（Sir William Macewen）在格拉斯哥继承了约翰·利斯特的衣钵，本身也是一位外科先驱。作为脑外科和骨科的重要创新者，麦克尤恩坚持将自己的全部护理团队带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学校无法同意这个要求，于是聘用他的希望也破灭了。仓促之中，医院董事会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聘请他们认识的那位外科医生，不管他有什么缺点，还是赶紧去找另一名欧洲候选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医院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态敲定了人选。1889年2月，霍尔斯特德受邀担任医务室的外科主任和医院的执行外科医生。医院将在三个月后开门接诊，此时距离医学院开学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威严的穹顶红砖建筑群在巴尔的摩的山坡上形成了一道错落有致的天际线。栖息在校园西边的行政楼穹顶已经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的代名词，而韦尔奇和霍尔斯特德在学校最隐秘的角落里书写着科学史。

1885年，霍尔斯特德曾经在贝尔维尤监督帐篷手术室的建设，但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建成的头15年中，外科手术都在地下室G病区一个由煤气灯照明的临时区域进行。欧美所有的

早期解剖和手术演示厅都位于学术建筑的顶层，以便利用天窗和大玻璃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而霍尔斯特德的手术场所是在病理学大楼附近的女病房中临时组建的，毫无魅力可言。

霍尔斯特德有一张来自普法战争时期的老式德国手术台。台子设有中央水槽，以排走血液和溢出的腐蚀性制备溶剂。台面上配置了担架，用于运送患者。霍尔斯特德没有选择外科医生偏爱的经典黑色羊毛双排扣礼服，而是穿上了白色棉粗布制的高领短袖手术服，头戴一顶配套的棉质小手术帽。虽然说穿手术服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外科医生原本的衣着，但是这与沾满鲜血和残留物的羊毛外衣比起来，显然是一大进步。

在地下室中身着白色手术服的霍尔斯特德，将自己在维也纳、柏林和维尔茨堡的全部所学应用到外科手术实践中。在开创了局部麻醉和科学动物试验后，他开启的一系列革新引起了各大医院和学术机构的积极响应，得以沿用至今。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刚刚开诊的那几年中，医院里没有树木，没有学生，从事外科的同事也很少。“霍尔斯特德是一个性情复杂又单纯的人。他令人生畏又诲人不倦，刻板、得体又神秘莫测；常常表现出强迫症倾向，却又粗心大意；说起话来激励人心，生活上又离群索居；瘾性难移却节制有度；凡事健忘又爱操心，一直心系外科学的发展。”^[27]如果你感到霍尔斯特德的故事似曾相识，那你可能是看过电视剧《尼克病院》（*The Knick*），主角约翰·萨克雷（John Thackery）医生便是以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为原型的。尽管摆脱不掉一次次发作的毒瘾，霍尔斯特德还是负重前行，很快就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开始了一场革新，这一切要从一名护士的手擦伤并发炎说起。

从利斯特开创消毒外科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建院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消毒从一开始的用石炭酸海绵擦拭手术部位，发

展成后来用喷雾器向空气中喷洒碳酸。再接下来，外科医生的手得到了特殊待遇，用酸、氧化剂和汞合金层层消毒。擦拭、浸泡、敷料和涂层使双手得到净化的同时，也会造成红肿发炎。来自美国南方、家境优越的护士卡罗琳·汉普顿的双手就饱受皮炎之苦。

韦尔奇从德国带回了橡胶工作手套，用于尸检。这种手套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又厚又笨，于是霍尔斯特德有了另外一种想法：美国公司能否帮助他研发出一种更适合手术室的产品呢？霍尔斯特德后来回忆道：“由于她[卡罗琳]工作能力极强，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在纽约花了一天时间，让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先试着制作两副薄橡胶长手套。如果试用结果满意，再继续订购。”^[28]几年之后，手术室中才人人都使用卡罗琳的手套，但是霍尔斯特德对一个护士的关心造就了“无菌技术史上最伟大的进步”，^[29]而这位护士在几个月后成为他的妻子。年近40岁的霍尔斯特德告别了单身，而终身未婚的韦尔奇当了他的伴郎。

来到巴尔的摩之前，霍尔斯特德进行的一系列首创工作都勇敢又离奇。他是第一位开展胆囊取石术的外科医生，当时一位老太太胆结石发作，生命垂危，他就在这位享有殊荣的老太太家中为她做了手术。患者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后来，他首次使用新发明的皮下注射针头和胶管进行了输血。患者产后子宫出血，通过输血逃过一劫。献血者是谁呢？霍尔斯特德医生本人。受方又是谁呢？霍尔斯特德的妹妹。他还进行了首例阑尾切除手术，不过这一次经历没有那么不同寻常了，手术对象不是亲戚，手法十分温和。

外科主任霍尔斯特德很快便与助理医生芬尼以及自己的第一位住院医师弗雷德·布罗克威（Fred Brockway）一起投入了大胆的外科创新工作。杰拉尔德·因贝尔在《叛逆边缘的天才》一书

中，哀婉动人地描述了1889年6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进行的首例乳腺癌手术。患者是一位38岁的母亲，10个孩子的妈妈，已经暗自与不断生长的肿瘤（充满了脓液）斗争了6个月：

霍尔斯特德对此进行了广泛切除，从腋下靠近脓肿的原发部位开始，沿胸骨逆时针向下，直至乳房下端，再横向包围整个乳房，向上切至最初的下刀处，切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泪珠形状。

腋窝附近的皮肤由于感染而硬化，皮瓣向上翻转异常困难，医生无法触及腋下淋巴结。新发脓肿已经累及淋巴结，通常的做法是择日再次进行腋窝部位的手术。霍尔斯特德用手术刀切除了整个乳房及下面的大部分胸大肌，用血管钳夹住了动脉和静脉，用丝线闭合血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失血和组织受损。为了避免切入肿瘤引起癌细胞扩散，霍尔斯特德小心翼翼地将整个肿瘤切下来作为解剖标本，立即在手术台前进行了仔细检查。现在，他直接用手翻弄着这团肿物，切开肿瘤实体，极其用心地观察了肿瘤的质地和外观，然后与助手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他在需要关注的地方标出了许多缝合标签，然后将标本送到韦尔奇的病理实验室，在那里标本将被制成显微切片以备日后检查。[\[30\]](#)

与维也纳和哈雷的导师们一样，霍尔斯特德正在首次尝试抗癌之战。菲尔绍等先驱人物已经鉴别出肿瘤中奇形怪状的异常细胞。从病理学本质上讲，这些强盗细胞成群结队地形成集落，然后又聚集成肿瘤，通过从宿主身上吸取营养，繁殖，侵占，在最后发起的“政变”中，随着宿主的消亡而自我毁灭，两败俱伤。理查德·冯·福尔克曼（Richard von Volkmann）、比尔罗特和如今的霍尔斯特德都认为，扩大切除范围才能从侵略者手中挽救患

者。

癌症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巨蟹”（Karkinos）。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看到肿瘤被“一堆肿胀的血管包围着，使希波克拉底[想起]沙子里的螃蟹，蟹腿伸成一个圆圈”。^[31]后来，作家们进一步把癌症形容成外来侵略者，形容成具有坚硬外壳和吓人蟹钳的“螃蟹”。在这种思维体系下，霍尔斯特德认为外科医生扮了解放者，主要职责是使患者与疾病分开。古希腊人没有显微镜，也没有疾病的细胞基础的概念，而霍尔斯特德明白癌症是由异常的细胞导致的疾病。他们这些无所畏惧的外科先驱忽视的是血管转移（vascular metastases）的病理过程：癌细胞不只是向周围组织扩散，还通过血液转移。

几十年前，科学家们才发现癌症的真相是细胞的病理性转化和生长，而且还要再过几十年才会出现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当时霍尔斯特德认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就是用手术刀将肿瘤彻底切除，在必要情况下不惜截肢致残。从医院开办到1893年医学院开学的这几年间，霍尔斯特德会进一步扩大切除区域，最后用手术切除整个胸肌，偶尔还会切除肋骨、锁骨和全部淋巴结。他希望可以根治癌症，所以将手术命名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radical mastectomy），“根治”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根”（radix）。如果将这个词理解成其他含义，如“严重”或“彻底”，那么我们就误解了它在此处的意义。在霍尔斯特德的手中，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当然是应对严重病情的、丝毫不可让步的大手术，不过他的“根治”是指切入得更深，直至根部。

最终，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会失去肿瘤外科医生的青睐。杰弗里·凯恩斯（Geoffrey Keynes）、小乔治·克赖尔（George Crile Jr.）和伯纳德·费希尔（Bernard Fisher）等少数有魄力 的外科医生反对这一传统手法，他们认为稍微保守一些 的简单手术就可以

达到同等效果，而且显然比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伤害性更小。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一观念转变。虽然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是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霍尔斯特德认定它有效。扩大切除术仍然是治疗实体组织肿瘤的主要手段，肌肉、皮肤和骨骼的切除范围十分惊人。霍尔斯特德的确极大地改善了癌症死亡率，但是治愈康复手段至今还遥不可及。

尽管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不具备持久效力，但是霍尔斯特德提出的其他新方案是长期奏效的。德国训练外科医生的方式启发了霍尔斯特德，尤其是朗根贝克和比尔罗特提出的高强度、严要求的教学方式启发了他。奥斯勒同意霍尔斯特德的方案，于是，美国机构中的第一批正式住院医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出现了。1893年，霍尔斯特德被授予“教授”头衔，他正式建立起全面沉浸式培训系统，受训的年轻人必须是未婚单身的，住在医院里，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早年的外科医生都会嘲笑现在的年轻学员，说尽管住院医师对“住在医院”怨声载道，但实际上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工作时间，他们每周“只”用工作80个小时。（太太曾经跟我讲过我当住院医师时期的一个伤心往事，那时联邦法律还有几年才会生效，我每周通常工作100多个小时。我太太带着女儿开车路过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医院时，小女儿大哭起来：“妈妈，那就是爸爸住的地方！”听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内疚自责袭来，不禁流下了眼泪。）

由于霍尔斯特德非同寻常的发现可能性的眼光、富有感染力的自信心和精湛的手术技术，他的影响在数十年间遍及全美，他的许多门生也各自成为外科手术的领导者。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被雇来兼职外科医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实验室成为大医院的一部分，医生们渐渐地接受了无菌手术，医学院毕业

的学生开始接受培训。”[32]“霍尔斯特德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建立在两个平台上，二者都影响深远，无疑改变了世界。一是他建立了科学安全并符合解剖学原理的外科学院；二是他确立了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外科医生的工作环境，推动了美国外科学的发展，成就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前者带来了一场势在必行的外科学革命，一直以来的出色成果便是证明……”[33]

在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师时，当我正在学习精细的外科技术要点，一位教授对我粗枝大叶的处理方式很是不满，于是他突然说道：“你刚才听见了吗？”

我一脸迷惑地说：“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

教授回应道：“我想是霍尔斯特德医生的灵魂在坟墓中不得安宁，看看你刚才用钳子毁了组织。”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做一名优雅的外科医生。“应用无菌技术，对组织温柔以待，小心谨慎地止血，以不会让患者紧张和感到压迫并符合解剖学原理的方式进行外科手术，这些是外科学的规则，也是霍尔斯特德的规则。虽然‘霍尔斯特德’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在美国，每位手术成功的患者都应该向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点头致意，深表感激。”[34]

霍尔斯特德同样也将外科“这个医学世界所厌弃的“不肖子”，转变为一个能有效减轻人类痛苦的专业领域”，[35]他重新塑造了一个学科和一种外科手术的理念。[36]或许，他最伟大的创新之一是进行了“择期手术”。

从一开始，早期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便是排脓、涂药和接骨。这些原始的治疗师反抗着魔鬼神灵，总是对不幸之人做出积极的回应。外科学的前辈是角斗士保健医和军医。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外科医生从面对急症束手无策，变为有时能通过医疗干预有效改善状况。在比尔罗特之前，患者会在弥留之际前去就医，而维也纳的患者虽经受了癌症的百般折磨，却为他提供了切除部分肠道组织的机会。外科手术的信心日益增长。

霍尔斯特德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进行了首例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月，尝试了可以说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择期手术。

儿童先天性腹股沟疝的发病率为5%，但成人的发病率会上升到将近15%，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9倍。“把头转过去咳嗽”只是个传说，[\[37\]](#)不过，在手术取得成功之前，疝在世界各地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在安全的手术出现以前，疝带和体位练习是仅有的治疗方法，尽管那也是徒劳无效的。

疝是肠管进入腹壁的薄弱部位造成的，可能发生于脐部或手术切口，但最常见的发生部位是腹股沟。腹股沟疝指的是“下腹部精索穿过的环状结构异常扩大，使肠道刚好进入其中，并沿着精索的路径，穿过腹股沟外环，进入阴囊”。[\[38\]](#)简单地讲，就是下腹壁的一个薄弱部位使“内脏”得以翻入其中。每名医学生都会记得一张疝患者的照片：巨大的疝使几十磅的肠管涌进了阴囊，患者必须借助手推车才能行走。我光想一想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穿过腹壁的肠管有可能发生绞窄性肠梗阻，加速患者死亡，但疝患者通常没有生命危险，以疼痛和难看的肿物为主诉。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再加上一种默认“你不会死”的态度，医生习惯了打发患者离开。1889年6月13日，这一切都改变了。

霍尔斯特德不是第一位尝试疝修补的医生，只不过是首位用英语对极其有效的手术技术进行报告的医生。这一技术的基础当然是对解剖结构的科学分析。经过大量的细致解剖，他认识到成功修复的关键在于，对坚实的腹股沟韧带周围的坚韧筋膜和肌肉

进行深层修复，并加强腹股沟内环。霍尔斯特德在腹股沟部位做出一个切口，辨识并剥离组织层，保护精索，切除疝囊，将适当的组织层对应缝合在一起。霍尔斯特德式修复由此诞生。

1889年底，霍尔斯特德在霍普金斯医院医学会对这一技术进行了报告，并于1890年1月发表了文章。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帕多瓦的意大利外科医生爱德华多·巴西尼在几个月前独立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个相似的手术操作过程（用的是意大利语），所以学术界中有些学者认为，此项手术技术归属于巴西尼和霍尔斯特德两人共同拥有。不日，便有大量的患者从全美各地涌来，找到霍尔斯特德为他们进行疝修补手术。

霍尔斯特德和优秀的住院医师们通过进一步改善技术操作，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是霍尔斯特德的重要弟子，这名同样毕业于耶鲁的医生将可卡因麻醉运用到霍尔斯特德的疝修补手术中。（库欣将会成为神经外科之父，他的头像出现在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的标志上。）如今的疝修补手术已经在技术层面上不同于霍尔斯特德和巴西尼的方法，但是，霍尔斯特德安排手术日期对严重病情进行医疗干预的方式对医疗服务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几十年前，医院还只是死亡之所，没有人（想法正常的人）会在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咨询外科医生。

到19世纪90年代，这位教授麾下拥有十几名住院医师，他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外科帝国。只有几位医学专家知道霍尔斯特德承受着可卡因和吗啡的毒瘾发作带来的痛苦。每年夏天，他都会消失几个月，由助理医生和外科住院医师们负责这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他的缺席也成全了外科生涯的理想训练场，毕竟，有些时候，外科医生是最孤独的职业。

在20世纪中，美国的少数几家医院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圣地，其中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和梅奥医学中心。医学和外科学在德国的领先思想的指导下，经过献身医学的美国医生的改进，已经不再依靠占卜和巫术。根据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医学教育改革彻底改变了医学院的运作方式，结果到了1920年，美国当时一半的医学院相继关闭。信口雌黄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只有以真正学术使命为己任的学校才会获得认证，这也使外科学的领导地位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场交接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完结。

霍尔斯特德于1922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离世，还有几天就是他的70岁寿辰。虽然他没有子女，但数不胜数的医学专业人才继承了他的遗志和思想。患者在“兴旺的二十年代”就有理由相信医学，那时抗生素还未出现，这种信心大部分来自霍尔斯特德教授的贡献。“塞壬的诱人歌声在耳畔回响，他在未知的水域航行 [试用药物]，对于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来说，他的人生之旅堪称英勇。如果说只有一个人称得上现代外科学之父的话，这个人就是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39]

[1] 南加州特洛伊人（USC Trojans），代指南加州大学学生的绰号，也是南加州大学多个运动团体的名字。——编者注

[2] 迈克·埃鲁奇奥内是美国冰球运动员，在1980年冬季奥运会上作为美国国家队队长参赛，并打出决胜球为美国队赢得金牌。——编者注

[3] 弗里德里希·冯·雷克林豪森（Friedrich von Recklinghausen，1833—1910年）是德国病理学家，以发现血色素沉着病而闻名。——编者注

[4] 路德维希指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1816—1895年），他创立了生理学一大学派，著有《人类生理学教程》。——编者注

[5] 瓦格纳指恩斯特·莱贝雷希特·瓦格纳（Ernst Leberecht Wagner，1829—1888年），他是一名德国病理学家，撰写了病理学教材《普通病理学手册》。

——编者注

[6]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66.

[7] James Thomas Flexner and Simon Flexner, “William Henry Welch and the Heroic Age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42; 227: 152–54, July 23, 1942.

[8]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42.

[9] Joshua Berrett, “Doctors Afield: Theodor Billroth,”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64; Jan. 5, 1961, p.38.

[10] A. Cesmebasi, et a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nhard von Langenbeck German Surgeon (1810–1887),” *Clinical Anatomy* 27: 972–75, 2014.

[11] Ibid.

[12]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New York: Scribner, 2010), p.58.

[13]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91.

[14] R. Kazi and R. Peter, “Christian Albert Theodor Billroth: Master of Surger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 Medicine*, 2004; 50: 82–3.

[15]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391.

[16] M. Goerig, et al., “Carl Koller, Cocaine, and Local Anesthesia. Some less known and forgotten facts,” *Regional Anesthesia and Pain Medicine*, 37(3, May-June): 318, 2012.

[17] Ibid.

[18] G. Gaertner, *Die Entdeckung der Lokalanästhesia* (Vienna: Der neue Tag, 1919), 6.

[19] Ibid.

[20] H. D. Noyes, “The Ophthalmological Congress in Heidelberg,” *Medical*

Record. 1884; 26: 417–18.

[21]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55.

[22] Howard Markel, *An Anatomy of Addiction: Sigmund Freud, William Halsted, and the Miracle Drug, Cocaine* (New York: Vintage, 2012), p.108.

[23] *Ibid.*, p.111.

[24]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80.

[25] *Ibid.*, p.87.

[26] *Ibid.*, p.98.

[27] *Ibid.*, p.349.

[28] Sherwin Nuland,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414.

[29]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115.

[30] *Ibid.*, p.118.

[31]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New York: Scribner, 2010), p.47.

[32] Gerald Imber, *Genius on the Edge: The Bizarre Double Life of Dr.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New York: Kaplan, 2011), p.228.

[33] *Ibid.*, p.233.

[34] *Ibid.*, p.349.

[35] *Ibid.*, p.296.

[36] *Ibid.*, p.348.

[37] “把头转过去咳嗽”是指医生在检查疝时，会让患者咳嗽。——译者注

[38] *Ibid.*, p.146.

[39] *Ibid.*, p.350.

第十一章

钴铬钼合金

1967年，我本打算从瑞典回到芝加哥，从事一辈子脊柱生物力学研究，做一辈子脊柱外科手术。然而，在英格兰莱廷顿跟着查恩雷医生学习期间，我亲眼看到世界上最早的“现代”髋关节置换手术，那手术使我感到震撼。我从未想象过这种可能性。我知道自己看见了未来。那两周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回到芝加哥后，我选择了髋关节与膝关节置换手术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豪尔赫·加兰特（Jorge Galante），医学博士

尼尔医生对肱骨近端骨折患者进行肱骨头切除术的最终治疗效果不再抱有幻想。他向达洛克医生提及此事，达洛克医生说道：“别愁眉苦脸的，不如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做？”

——查尔斯·罗克伍德，医学博士

蚊帐从户外医院的病房天花板上垂落下来，仿佛病床组成的舰队高悬的三角帆。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医院一样，在卢旺达的医院病房里，几十张简易病床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太多墙壁和窗户，这样有助于空气在病区间自由流动。通风换气有利于阻止肺结核传播，但是敞开的窗户使蚊子乘虚而入。于是，每张简易病床都有一张蚊帐固定在房顶的椽木上；密密匝匝的蚊帐将微小的

蚊子阻挡在外，因为蚊子会传播携带疟疾的寄生虫。每天晚上，医院里的人们总是照常把卷起的蚊帐展开，盖住床铺的四个角。到了早晨，再反过来把白色蚊帐绕上十几圈卷紧，系在一个床角上。

昨天深夜，我们美国医疗队与卢旺达外科医师一行从该国西部省区的一家偏远医院来到这里。我在中非指导年轻医生时，总是想起一位资深外科医生多年前说过的话。在我第一次海外之旅前夕，他曾经建议道：“在第三世界教学时，丢掉那些现代教科书吧。”这些地方的特殊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建议采取的治疗方式是以当前的新技术和新仪器为基础的，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二是疾病本身也不尽相同，比如结核病在全球范围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在美国已经好多了。所以，更好的方法是找一本50年前的教科书，看里面如何讲解骨结核治疗手段以及如何使用简单器械解决一些日常问题。

我一早醒来，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进行户外病区的早查房工作。男女老少都住在一个大病区里，周围环绕着参天大树和厚重的藤蔓，还有诡秘的鸟鸣。我们医疗队由卢旺达骨科住院医师保罗陪同来到主病区，许多患者正在卷蚊帐。有些人看起来精神不振。有人告诉我，在过去的几周里，某种消化道疾病正在这片区域蔓延。病房的一侧是疟疾患者，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而且毫无生气。我从书本上学到，疟疾患者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头痛、发烧、关节痛甚至抽搐，但是近距离看到疟疾患者的痛苦，我对那小小的致病疟原虫深感敬畏，对蚊子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

我和保罗走在两排小病床中间的走道上。大多数西方人都想要单间病房。但是这一间高顶户外病房里就有60张简易小病床。走到这一排的尽头时，我注意到一个大概12岁的年轻人用胳膊肘

撑着身体，仰面待在病床上，身下只有几张毯子。这家基伯戈拉医院的护士告诉我，约瑟夫已经在这张病床上住了两年。他的结核病非常严重，已经蔓延到右髋关节、膝盖和胫骨，骨盆和腹股沟的疼痛导致他无法平躺或者坐在椅子上。他与他的传染病之间似乎已经停战了，但是腿部损伤越来越严重，这其实是他对疾病难以察觉的屈服。约瑟夫的肤色黝黑，略带愁容地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锐利的眼神里充满失望。我知道有人告诉他我会来。我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的心里在期盼什么。我掀开盖在腿上的白床单，身边的护士和助手都凑过来，我立刻就看出是哪条腿受了感染。他的左腿是右腿的两倍大，他控制着左腿一动不动。他的右腿细小，部分原因是他两年没下过一次床。但是左腿明显肿胀，从腰部一直到脚趾的皮肤都紧绷绷的。护士提醒我不要挪动这条腿，我也觉得他的腿已经失去了治愈的希望。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会看一下他的X射线照片，再回来讨论治疗计划。他平静地用卢旺达语说了声“谢谢”。

这家位于基伍湖岸边的偏僻医院里有一台小型X射线仪器和一名有资质的X射线成像技术员。这台设备和影像质量使人产生了时光倒流的感觉。当我把X射线照片贴在看片灯上时，心里咯噔一下。约瑟夫的股骨和胫骨是正常大小的三倍，呈虫蚀样弯曲变形。从髋关节到踝关节的骨骼已经被结核菌活活吞噬。我想，如果在美国，此时此刻的我会怎么做呢？长期的抗生素治疗和多次手术能够挽救这条腿吗？在多次手术后，最终是否还要换掉髋关节和膝关节？骨肿瘤科医生能够挽救这条腿吗？这能使约瑟夫下床并摆脱病痛的烦恼吗？

我仔细地考虑了约瑟夫的困境。他不仅卧床两年，而且双亲死于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我认为唯一合理的治疗方式是截肢。如果约瑟夫还有机会离开病床并且活

着离开这家医院，那就只能截肢。你如何告诉一个孩子，只有失去这条腿才能活命？哪怕通过翻译，也一样不轻松。我们进行了一场简短的谈话，周围站满了住院病人、工作人员以及住院病人家属。约瑟夫只说了一句：“好的。”

截掉约瑟夫的腿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在技术层面上，从髋关节进行截肢很有挑战性，大量的血管必须得到专业处理，以免约瑟夫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而且患病的这条腿肿得很厉害，下刀十分困难。在没有电凝器的情况下，每根微型血管都需要手动结扎。我仔细地处理了肌肉皮瓣，以使伤口可以完好地闭合。经过长达90分钟的烦琐探查，最后截肢的时刻到了。随着髋关节的离断，这条腿终于脱离身体，我把它交给了护士。我讨厌这一刻。这些年来我做过许多截肢手术，尽管我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总是产生挫败感。两军对垒、买卖生意、为人父母……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接受失败并吸取教训，但是截肢总是让人在情感上感到全面挫败。

手术在椎管麻醉下完成，所以约瑟夫全程保持清醒。他似乎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我问一名护士他说的是什么，她严肃地回答道：“他在说：‘请你带我回家吧。’”我完全没想到，顿时百感交集，不仅为约瑟夫的困境感到伤心不已，也对结核病深恶痛绝。

查尔斯·尼尔医生于1953年1月26日进行了他的首例肩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是一位54岁的家庭主妇，她的左肩在3年前遭受严重骨折。患者最初由另一位骨科医生进行了简单的物理治疗，结果她的肩膀几乎动弹不得。持续不断的疼痛和严重的功能缺失使这位化名“T.M.”的夫人找到了尼尔医生，成为世界上首位接

受“尼尔肩关节植入术”的病人。她的愈后状况非常好——她后来告诉尼尔医生，“过去的疼痛现在消失了”，肩部的运动和功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尼尔医生的首篇有关肩部的文章《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发表在《美国外科学杂志》的1953年3月刊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明，通过移除肱骨头来治疗严重肩部骨折的效果不佳。这篇文章在1952年提交并获准发表，文章中只展示了肩关节植入物的图片，并说明它实际上还未被使用过。因此，当这篇文章来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管理员和外科医生手中，病人“T.M.”已经成了第一只“小白鼠”。虽然我们可以称她为尼尔医生一系列肩关节成形术[1]的“索引病例”（index case），但她并不是第一个接受肩关节植入物的患者。

结核病仍然是世界性的传染病难题。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结核病，在患者咳嗽、吐痰或者打喷嚏时，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与表现为皮肤红肿（经常伴有脓肿）的葡萄球菌感染不同，结核病不是经由皮肤而是从肺部进入人体的。目前，世界上1/3的人口患有潜伏性结核病，也就是说细菌在肺部组织建立了据点，但尚未引发病症，患者也不会传播疾病。由于结核病缓慢发作的特点，患者可能出现持续多年的轻度咳嗽、夜间盗汗以及进行性减重。如果细菌具有战略部署的能力，那么这就是它们攻占全人类的滩头登陆计划：刚得病时症状让人可以忍受，同时细菌以肺为目标，刺激肺部引起阵阵咳嗽，导致菌群在全球后工业化时代人满为患的新兴城市中以飞沫传播。接触感染了葡萄球菌的患者可能会让你也感染，但是保持1英尺的距离就很安全。结核病正好相反，接触结核病患者不会让你染上这种病，但是与其共处一室或待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却可能要了你的命。

结核分枝杆菌对人类的侵扰至少有一万年历史了，它至今仍

然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性病原体，每年超过100万的人死于这种细菌。结核病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同时也是治愈率最高的、可防可控的疾病，[2]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超过20亿人感染了这种微生物。现在的大多数欧美人能够不受这种全球性流行病的影响，但是在过去没有人能躲过肺病的折磨（结核病的肺部感染俗称肺病）。就像蛀牙最后会发展为牙周脓肿一样，慢性肺结核会发展成脊椎、四肢甚至脑组织中的感染性结节。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蔓延到骨骼时，身体会出现进行性畸形。经年累月，骨骼慢慢地扭曲变形，仿佛冒泡的焦油，弯曲的肢体和关节会出现疼痛和功能障碍而且病情日益加重。1720年，住在伦敦的本杰明·马尔腾（Benjamin Marten）推测，肺病是由肺部感染引起的，而诱发疾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极小的“微动物”，用当时的显微镜无法看到。罗伯特·科赫最终在1882年鉴别出导致结核病的细菌，这项发现也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学者们才对病菌学说达成共识，在此之前，就连简单的卫生和清洁问题都得不到重视。当时没有能够控制结核病感染的药物（人们要到1943年才发现链霉素），外科医生只能对晚期结核病患者进行大胆甚至冒进的医疗干预。

塞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Themistocles Gluck，1853—1942年）于1882年开始从事医学工作，那时的欧洲医学界刚刚意识到病原体（包括细菌、寄生虫和病毒）、感染和疾病之间的关联。格鲁克在柏林受训，由传奇外科医生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和病理学先驱鲁道夫·菲尔绍进行医学指导和训练。就像在不知道DNA的情况下很难去思考遗传学那样，在不相信微生物的情况下也很难设想医疗实践。科赫给出细菌导致结核病的阐释后几个月里，初出茅庐的格鲁克医生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距离对结核病有效的药物疗法出现还有大半个世纪，而格鲁克感兴趣

的是对肺结核患者的骨科治疗。格鲁克被任命为柏林腓特烈皇家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在他刚开始行医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现X射线。他和同事们在摸索中前行，只能猜想切开皮肤、深层解剖时会看到什么。

格鲁克的早期动物实验主要研究器官的切除和移植。他通过动物实验，做出了一个远远领先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发现：他观察到失去一个肾脏会让另一个肾脏加倍运转，这说明人体具有适应器官丧失的能力。如果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普罗米修斯在夜间能够重新长出白天被鹰啄食的肝脏，如果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惊人杰作中，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能够凭空创造出一种生物，那么，当麻醉成为现实，德国外科医生能够做什么呢？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医，格鲁克和同事们见识过成功治疗战争外伤的案例，如果用丝线和肠线将创伤性皮肤撕裂的边缘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其痊愈，那么深层结构如肌肉、肌腱、器官甚至骨骼，在连接或固定之后也能痊愈吗？格鲁克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进行动物实验，他发现分离的组织可以结合在一起并愈合，他将这一过程称为“自体成形”[3]。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885年）期间，格鲁克曾经用两块钢板和螺丝钉治疗一名士兵的股骨骨折，他的医疗干预使这名士兵迅速恢复，而且很快就可以活动，格鲁克自己也感到惊讶不已。从逻辑上讲，下一步的理论性飞跃是在人体内引入其他材料来“替代”骨骼，将“自体成形”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也可能是引发灾难的层次。

有时候，科幻小说家仿佛可以未卜先知。儒勒·凡尔纳说：“只要有人能想象出来，就有人可以使其成为现实。”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博士或许为格鲁克医生的组织再生概念提供了灵感。19世纪80年代后期，格鲁克的动物研究重点是组织替代。为了使患病或受损的组织能够再生，他尝试研发一种“导轨”，这

也使他转而接触铝、木材、玻璃、镀镍钢和象牙等材料。现在我们知道象牙的主要矿物质羟基磷灰石（hydroxyapatite）与牙齿的牙本质和骨骼中主要的非胶原基质相同。但是，在格鲁克所生活的时代，因为象牙看起来与人类骨骼相似，而且作为德国殖民地的象牙海岸有丰富的供给，象牙才成为他首要的调查研究对象。他选择了象牙作为骨替代材料，很快便于1890年开始将经过雕刻和加工的象牙碎片植入患病关节。他首先为一名17岁少女替换膝关节，三周后又进行了一例腕部关节替换手术。根据格鲁克的报告，他在那一年中进行了14例关节成形术，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和肘关节，他的所有结核病患者均植入了人工关节（见彩插11.1）。[4]

起初，格鲁克的象牙关节成形术效果十分显著。病人的疼痛消失了，运动功能也得到了恢复。格鲁克信心倍增，渴望向柏林医学会报告自己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果，然而，问题接踵而至。德国外科医生认为他使用丝线缝合来修复肌腱损伤已经令人震惊了，而现在这个疯子又提出要展示自己的一系列关节置换手术。虽然他的患者曾长期忍受结核性关节感染的折磨，但通常不会出现化脓，而手术后的所有患者都注定会遭受另一种感染，关节流脓红肿，有可能导致全身性菌血症（血液中出现细菌）、败血病甚至死亡。德国外科协会主席对格鲁克在柏林医学会展示发现的渴望做出回应：“作为德国外科学的领导者，我无法允许您在国际外科专家的平台前玷污德国科学的声誉。我和我的学生们将竭尽全力与您抗争。”格鲁克被迫放弃的不仅是展示报告，还有关节成形术的全部研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前卫思想，这便是医学会的职能；只有在日后回过头去审视历史，我们才能对革命性疗法做出谨慎的分析。格鲁克以手工象牙植入物替代关节的创新确实过于超前了——比抗生素、现代冶金术以及植入物的灭菌处理

出现得还要早。虽然塞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再也没有尝试过关节置换，但他在普通外科的其他方面取得了进步，享有长久的职业生涯。他现在被当作“埋没了的天才”和“第一位进行关节置换的外科医生”，这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格鲁克曾在晚年说道：“在医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中，我们会发现，尽管某些事实早已尽人皆知，但人们要很久之后才能发现其真正价值。”[5]

没有人知道格鲁克是否在肩关节中放置过象牙植入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朱尔-埃米尔·佩昂（Jules-Emile Pean）于1893年3月11日在巴黎首次为人体植入了金属肩关节。佩昂是巴黎的一位知名外科医生，以敏捷的思维、启发式教学和过人的天分著称。法国人曾经在19世纪初将医学从一种卑微职业提升为受人尊敬的科学事业，但是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将医学思想领头人的地位让给了德国人。正如《肩与肘外科学杂志》（*Journal of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ry*）中记述的那样，佩昂为一名37岁的面包师植入了定制的铂金属肩关节，该患者的结核病感染十分严重，已经徘徊在死亡边缘。这一手术为肩外科领域做出了长远贡献：

巴黎牙医J.波特·迈克尔斯（J. Porter Michaels）加快了假体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佩昂早先已经切除了部分感染的肱骨）。关节柄由铂金属材质的圆柱体制成，上面有两个凸起和几个孔，用于固定骨膜和肌肉。远端设有螺孔，用于连接骨桩。上端由橡胶球制成，橡胶球事先在石蜡中煮沸24小时，已经硬化。球体表面互相垂直的两道大圆周上设有凹槽，每个凹槽包含一圈金属环，一个连接在关节盂上，另一个固定在关节柄近端。他们相信这一假体可以为患者提供足够的力量，并使其活动自如。[6]

这场起初看上去大获全胜的手术，在一年之后出现了问题。第一个迹象是患者肘部出现了红肿和排脓，必须通过手术来缓解症状。进行了三次清创之后，感染似乎得到了控制。根据这样的病例表现，现代外科医生会推断这位巴黎面包师与格鲁克患者的经历不同，并没有出现术后经由皮肤传播的感染（如葡萄球菌感染），即首次手术后几天内并没有出现关节化脓。他的情况是植入的人工关节周围结核菌感染复发。由于没有抗生素可以控制局部复发，植入手术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术后两年，患者手臂周围出现了脓性窦道。再多的抗生素也不能够逆转人工关节的慢性化脓性感染，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只有移除植入物才能缓解病痛。在移除铂金和橡胶材质的人工关节之前，佩昂医生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拍了一张X射线照片。1895年，伦琴在德国维尔茨堡工作时发现了电磁射线具有发光的能力。在世界上首例关节置换的X光片中，佩昂拍到的影像显示“假体周围有一个长而坚硬的骨质外壳”。^[7]120年前在巴黎被移除的这个人工关节并没有被丢进垃圾堆，而是被当成今天世界上数百万种人体植入物的鼻祖，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等待人们的参观。

外科医生们就像看到了“不要践踏我”^[8]的旗帜一样，一考虑到植入手术，他们就会为人工关节可能在任何部位造成慢性感染而担惊受怕。佩昂移除了铂金和橡胶材质的人工关节之后的几十年里，唯一使用过的植入物就是偶尔在骨折患者身上嵌入的金属板和螺丝钉，尽管科学家们尚未确定哪种合金最适合人类。在20世纪初期，外科医生们意识到关节炎对人体的损害，尤其是对髋部和膝部的伤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对新鲜空气的重视，结核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而X射线检查使医生可以亲眼看到关节，这在以前是办不到的。

人体的关节具有几点共同特征：它们至少有两块连接骨，都有一个关节囊，如同一张包裹着润滑液的薄膜，都有将关节固定在一起的稳固性韧带，还有最为神奇的关节软骨。软骨像一块软垫，为运动提供了一个平滑的表面，假如软骨健康，人们运动起来就不会感到疼痛。关节软骨是世界上最滑溜的材料，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失去这种惊人的性能。如果医生告诉某个人说他患有关节炎，那意味着他的软骨出现了毛病，有些属于“磨损”性退化，有些是因为自体免疫过程，即免疫系统攻击并破坏了关节软骨，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样得上的。不论哪种情况，一旦软骨遭到磨损或破坏，关节炎就会导致疼痛、僵硬、进行性运动功能丧失，骨骼末端形成骨性突出物，松散的软骨体在关节中浮动，还会经常发生关节变形。1895年以前，医生只能通过直接观察来检查病人，但X射线检查将关节炎呈现在医学工作者的面前，这使他们不仅思考如何治疗结核病感染，而且也开始考虑如何通过手术来治疗关节炎。

马里乌斯·史密斯-彼得森（1886—1953年）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在了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手术台上，直至67岁去世。史密斯-彼得森医生是挪威人，在威斯康星州读完高中和大学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和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他以一心一意的工作态度、强大的个人魅力以及手术方面的过人天分而在业内闻名，[\[9\]](#)他对医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髋关节的研究。他还是一名骨科住院医师时，就研究出一种新颖的髋部手术方法，这种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几十年。史密斯-彼得森医生对自己当住院医师时所学到的股骨颈髋部骨折基本治疗方法的不良预后感到不满，于是他发明出髋部三刃钉，极大地改善了数百万患者的生活质量，该技术在稍加改进后沿用至今。查尔

斯·尼尔医生的首篇论文中评估的就是这个装置。

史密斯-彼得森医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找到了一种后来被淘汰的植入物，向关节炎这一人类劲敌宣战。

一旦医生能够在X射线照片上看到髌关节炎，问题就变成哪种情况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是从股骨头和髌臼处像珊瑚般伸出来的骨刺，还是关节软骨表层缺失导致的骨与骨之间的直接接触与摩擦？外科医生推断，周围的骨刺可能是罪魁祸首。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生物力学研究尚未开展。生物力学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将告诉我们，健康的软骨光滑得惊人。医生对髌关节周围的骨质突出物发起了进攻，希望可以改善髌关节性能，就好像人们打开汽车引擎盖后，用橡胶清洗剂清洁皮带和管子，期望发动机能够更好地运转。20世纪20年代，外科医生开始围绕髌部做大切口，深入探查髌臼周围的肌肉组织，用锤子、凿子和大号尖嘴钳挖除埋住发炎髌关节的外壳。尽管这种治疗改善了部分患者的髌部运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疼痛，但是它无法说服像史密斯-彼得森这样的医生。一小组外科医生调整了手术流程，在手术过程中，为股骨头添加一个临时的生物性覆盖层。外科医生从大腿侧面采集一块阔筋膜，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光滑表面，固定在失去关节软骨的地方，他们徒劳地希望人体可以接受这一肌腱组织，并再造一个新的光滑关节面。但那些留心观察手术结果的医生很快就意识到，软骨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特别。

尽管史密斯-彼得森没准备完全放弃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关节成形术，即围绕发炎的关节塑骨，但是一次偶然的观察让他产生了人体能够形成新组织的想法。1923年，这位哈佛的外科医生接诊时遇到一位年轻患者，主诉是背部大面积疼痛。史密斯-彼得森将患者带到手术室，在他的疤痕组织中发现了一块玻璃。后来，他回忆道：“……取出了一块玻璃，这块玻璃在组织里已

经有一年之久，周围的疤痕组织极少，垫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滑囊，其中含有几滴清澈的黄色液体。这种对惰性异物的良性反应引发了我的思考：关节成形术中或许可以用到这样一种修复手段。这一初步想法日益发展成熟，并形成了‘铸模’的构想。在股骨头和髌臼新形成的表面之间插入一个由惰性材料制成的铸模，这样可以引导自然修复，以消除种种缺陷。修复完成后，再将铸模移除，留下顺滑协调的表面以符合身体的运动功能。”^[10]也就是说，史密斯-彼得森设想出一种手术：将玻璃柱体的球面一端放置在新形成的股骨头上，人体对此做出反应，会长出新的纤维组织，理想状态下它会像股骨头的透明软骨一样，这样就能提供新的顺滑表面。玻璃铸模起到培养组织的作用。患者在术后15~25个月后，会回来再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只是将铸模移除。

十年间，科学家们尝试用玻璃、黏性胶体（一种赛璐珞）、贝克莱特酚醛树脂（Bakelite）和派来克斯（Pyrex）玻璃制成臼杯，进行反复测试。从1923年开始，各种材料的测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有时也会发生玻璃破损、人体对黏性胶体有异常反应和感染的情况。相对来说，派来克斯玻璃要稳定得多而且不易破损，病人的股骨头上也确实长出了软骨般的结构。在第一个臼杯或者说铸模关节成形术出现的15年之后，玻璃和聚合物的坚固耐用程度已经明显不适合这项手术的发展了（见彩插11.3左图和右图）。

史密斯-彼得森意识到铸模关节成形术的这些初步尝试无法担此重任，他与自己的波士顿牙医约翰·库克讨论了失败的情况，库克建议他采用钴铬钼合金（Vitallium），这是一种颇受牙医青睐的新型合金。莱纳·埃德勒和查尔斯·普兰奇两位医生创建了奥氏实验室（Austen Laboratories），专门运用新兴的合金

材料铸造牙模。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类就尝试将各种基本金属元素（例如铜、锡、铁和锌）组合在一起，随着铬、钴、钼等稀有元素的发现，“不锈”钢材成为可能。

我们常常见到工厂钢架或桥梁生锈，这是由于水的存在，周围空气中的氧气与钢材中的铁相结合，发生了氧化，经过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形成氧化铁。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反应过程可以在人体中发生，人体中显然含有氧气和水，所以普通的钢植入物进入人体将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分辨哪种金属可以在人体内应用在20世纪属于冶金学家的工作，他们对各种元素进行反复试验，并根据性能、硬度以及成本方面的表现，确定适用的合金。但是，一位来自圣安东尼奥的外科医生，为史密斯-彼得森、尼尔以及后来的每一位追随他们的外科医生解开了合金的秘密。

放射影像的出现使骨折的护理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外科医生可以真正地看到每一块骨骼的骨折情况，然后将其分类。最终创伤医生知道哪些骨折打上熟石膏就能痊愈，哪些需要手术干预。最初的螺丝钉和金属板（带有螺孔的长而薄的金属片）由纯金属如铝、银、金和锡制成，但事实证明，这些材质还是太软，不足以支撑愈合后的骨骼。铁要坚固得多，但是会与周围组织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并不可行。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尝试铬电镀钢板，即镀锌的钢材，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蚀。但不幸的是，在螺纹与金属板啮合的地方，镀铬被磨损掉了，暴露在外的钢板就会受到腐蚀。

因此，唯一能被人体接受的骨科植入物必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合金，但是人们还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生物学测试。在圣安东尼奥，弗吉尼亚州长大的查尔斯·维纳布尔（Charles Venable）医生与两位骨科搭档花了数年时间，专门在狗的前肢骨骼上测试螺丝钉，对骨骼及周围组织进行X射线检查和显微镜分析。他们

对24条狗进行了实验，在狗的前肢骨骼上近距离打上一系列的金属螺丝钉。他们知道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电动势”（EMF），即描述一种金属与其他金属电势关系的数学表达。电动势差异较大的金属制成的螺丝钉近距离放在一起，可以生成一种电势，继而在两个螺丝钉之间产生电蚀作用。在所有被测试的金属和合金中，骨骼及其周边组织对一种合金的耐受性最好，那就是钴铬钼合金。[\[11\]](#)不同于其他不锈钢合金，钴铬钼合金不含铁，只有钴（65%）、铬（30%）、钼（5%）以及微量的锰和硅。这种合金所表现出的电解反应最弱，愈合结果最佳。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维纳布尔与他的共同作者陈述道：“.....我们建议骨科使用一种类似于钴铬钼合金的材料.....”（如果其中的铬最终没有对人体产生毒性的话）。这次可以说是大局已定。几年来，奥氏实验室一直提倡牙医使用钴铬钼合金，但维纳布尔的文章第一次在外科期刊中提到这种合金。在维纳布尔医生亲自向他担保这种合金“完全合适”之后，史密斯-彼得森医生立即着手制作钴铬钼合金模具，并经过反复试验，在1938年6月植入了第一个模具（见彩插11.3右图）。仅10个月后，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一篇文章。[\[12\]](#)他已经知道铸模关节成形术的原理是一项重大创新，但突破点在于钴铬钼合金这种材料。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具有优良弹性又经久耐用的植入物，那么他就可以在文章中探讨一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抛弃原本的铸模原理。如果钴铬钼合金是一种惰性材料，即使将它插入两个移动的表面之间，也不发生反应，那么或许就不需要第二阶段移除铸模的手术。”[\[13\]](#)史密斯-彼得森猜测，新的“再造表面”手术也许足以解决问题，不过只有时间能够证明其结论。正如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所说：“科学是由错误组成的，但这些错误是有用的，因

为它们会指引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

现在回想起来，从覆盖股骨头的活动性臼杯，到金属材质的替代性股骨头，这种理念的飞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外科医生经常处理股骨头粉碎性骨折，习惯了以麻木的情感告知患者，他们要接受在柳条轮椅上度过余生的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进取精神的骨科执业医生认为可以用金属股骨头完全替代坏死和塌陷的股骨近端，第一位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的医生是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哈罗德·博尔曼（Harold Bohlman）。他饶有兴味地阅读了维纳布尔和史密斯-彼得森的文章，在钴铬钼合金铸模关节成形术的论文发表仅仅几个月后，他在一根金属柄上安装了一个钴铬钼合金材质的球体，仿佛制作了一个夹心棒棒糖。

此后的一年里，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都竞相设计与博尔曼所制作的股骨头替代物相似的假体，通常都使用金属材质，但偶尔也使用丙烯酸等新型聚合物。然而，外科医生们逐渐看到安装的金属球体松动下沉，彻底失败，最初的热忱不出几年就消失了。曾经的残疾患者本来通过植入钴铬钼合金股骨头暂时缓解了髋部疼痛并解决了残疾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再次变成了残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改良合金材料面世仅有几年时间，另一项使外科医生们备受鼓舞的惊人变化发生了，即青霉素的发现及其生产方式的改进。虽然手术器械和植入物的蒸汽灭菌（发明于19世纪80年代）已经降低了感染的风险，但是抗生素的出现改变了医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再次激励了人们为解决髋关节病变深入地探寻答案。外科先驱们开始思考，如果铸模和小巧的人工股骨头感染已经不再是问题，那么从长期效果来说，大型假体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科学技术发展的讽刺之处在于，世界上许多的伟大创新都是

由一些个体在偏远落后之地灵光一现而促成的。这世上每出现一个来自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就会有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的鲍勃·迪伦。在外科学领域，这样一种开拓性的突破来自俄克拉何马市和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等地的小人物。

美国骨科医师学会（AAOS）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骨科机构。在学会成立的前15年中，其全国总部都会在芝加哥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但是，在1950年，数以千计的外科医生参加了学会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会议。在参会者中，有一名来自俄克拉何马市的外科医生带着一名65岁的女性患者。厄尔·麦克布莱德医生是来展示一款新型髋关节植入物的，它与以往的所有设计都不同，将钴铬钼合金材质的股骨头安置在一根长长的金属柄顶端，这根金属柄向下置入中空的股骨髓腔。他很不寻常地把第一位接受这种关节置换的患者带在身旁，这在今天十分罕见，但19世纪的医生确实会带着他们的患者会见同事，以展示罕见疾病或者特殊成果。我们不难推测，麦克布莱德医生带着自己的患者一路从俄克拉何马市来到纽约，是因为他想让外科医生们亲眼看到她的预后有多出色。

不到两年后，他在《骨与关节外科杂志》（*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14]上发表的文章中详述了“门把式”假体的运用，这是一种将植入物插入股骨髓腔的关节置换术。自格鲁克医生于1890年将象牙植入物填入长长的骨髓腔以来，这还是首次将假体植入髓腔，当然这一次麦克布莱德使用的是钴铬钼合金。他写道：

尽管她运动无碍，没有疼痛，不需要借助任何支撑物就可以在[纽约的]街道上行走，但还是有很多人各持己见，认为这“根本行不通，金属过多，髋臼无法承重，压力会造

成坏死，会出现松动”。[15]

在这篇1952年发表的文章中，所有的22名患者都恢复良好，其中包括陪同他去纽约的那位患者，他们没有发生感染和脱位。那些唱反调的人都错了。虽然麦克布莱德的螺纹柄禁不住时间的考验，但是，1950年2月会议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间，髌部和肩部的柄状植入物大量出现，这便是他的发明创新所带来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才设立了医疗器械部门（Bureau of Medical Devices）来监管此类事物。此前，所有医疗器械发明都是自由自在的，任何外科医生或工程师都可以想象、设计、制作装置并将它们植入人体，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并不总是对患者有利的，但是，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无限制的大环境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抗菌药物的进步相结合，为植入物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塞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准备在1890年的柏林国际外科学大会上做报告，因此与医疗器械制造商和一流的家具工匠合作，一起在人体骨骼模型上安装了象牙材质的肩、肘、腕、膝和踝替代物。我们可以想象，将人体骨骼与手工制作的象牙替换关节组装在一起有多么费时费力。但是，德国外科同行担心他的研究使德国科学界声誉蒙羞，拒绝了格鲁克的展示。这副模型后来以“巴黎骨架”（Skeleton of Paris）之名为人所知。[16]“巴黎骨架”在欧洲各地展览了数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苏联所有。简而言之，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所造的怪物，已经从幻想中的恐怖生物变为一副骨骼与象牙混合制成的人体骨架。

二战结束的几十年后，在一部1973年首播的电视剧中，名为史蒂夫·奥斯汀的美国宇航员在一次失败的飞行实验中受了重伤，勉强活了下来。这就是《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 的故事。剧中的行事神秘的政府特工奥斯卡·高德曼以普罗米修斯般的造物主口气说道：“先生们，我们可以重新组装他。我们拥有这种技术。我们可以使他比过去更优秀。更好.....更强.....更快。”

[1] 关节成形术英文为arthroplasty，来自希腊语，意为“形成或塑制一个新的关节”。——作者注

[2] A. Boire, V. A. Riedel, N. M. Parrish S. Riedel, “Tuberculosis: From an Untreatable Disease in Antiquity to an Untreatable Disease in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Ancient Diseases and Preventable Remedies*, 2013, vol. 1, pp.1–11.

[3] N. J. Eynon-Lewis, D. Ferry, and M. F. Pearse, “Themistocles Gluck, Unrecognized Geniu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2, vol. 305, pp.1534–36.

[4] R. A. Brand, M. A. Mont, and M. M. Manring, “Biographical Sketch: Themistocles Gluck (1853–1942),” *Clinical Orthop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11, 469, pp.1525–27.

[5] *Ibid.*, p.1527.

[6] M. J. Bankes and R. J. Emery, “Pioneers of Shoulder Replacement: Themistocles Gluck and Jules Emile Péan,” *Journal of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ry*, 1995, vol. 4, pp.259–62.

[7] *Ibid.*, p.260.

[8] “不要践踏我”，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一面黄色旗帜，上面盘着一条响尾蛇，下方有一行字：不要践踏我（Don’t Tread On Me）。——译者注

[9]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53, vol. 35, pp.1042–44.

[10] M. N. Smith-Petersen, “Evolution of mould arthroplasty of the hip joint,”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48, vol. 30B, pp.59–75.

[11] C. S. Venable, W. G. Stuck, and A. Beach, “The effects of bone of the presence of metals; based upon electrolysis, an experimental study,” *Annals of Surgery*, 1937, vol. 105, pp.917–38.

[12] M. N. Smith-Petersen, “Arthroplasty of the hip. a new method,”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39, vol. 37, p.269–88.

[13] Ibid., p.278.

[14] E. D. McBride, "A femoral head prosthesis for the hip joint. Four years' experience and the results,"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52, vol. 34, pp.989–96.

[15] Ibid., p.989.

[16] M. J. Bankes and R. J. Emery, "Pioneers of Shoulder Replacement: Themistocles Gluck and Jules Emile Péan," *Journal of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ry*, 1995, vol. 4, p.262.

第十二章

疏忽与享有权

我想我们刚刚将南方长久地交给了共和党。

——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

每名医学生都要面对的一项日常挑战是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安静角落，坐下来疯狂学习。作为一年级新生，我的解决方法是绕过图书馆，在堪萨斯城历史悠久的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校区的老建筑中寻找一条废弃的走廊。堪萨斯大学拥有密西西比河西岸最古老的医学院，坐落在一座山丘之上，俯瞰着脚下的铁路段和堪萨斯河已有百年之久。门诊楼、研究所、行政楼和住院部组成了一片红砖建筑群，其中诞生了不少来自美国东海岸的医学先驱，他们放弃了自己在波士顿、纽约或费城的声望，来到这个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交汇处的牛仔小镇。

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是伊顿楼，其中较高的楼层沉寂无声，斑驳陈旧的大理石地面诉说着这里曾经作为门诊或病房的过往。尽管没有“请勿进入”的标识，但我也不完全确定自己能否出现在这座废弃的建筑里，不过这里十分安静，我拼凑出了一套像样的桌椅。几周后，我开始觉得这里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每晚都来伊顿楼，看到那个地方安然无恙，还是自己的小小学习圣地就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大房间的味道——些许碘酒的

气味（总是让我想起做兽医的父亲），与过去的清洁用品和老式地板打蜡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多年来早已无人来打扫这个房间或整个病区，但我想要的正是与世隔绝。这个校园里有50多座建筑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幸运地找到这样一处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自习堡垒。

百叶窗的线绳断了，我透过弯弯曲曲的窗叶向外望去，这座学术基地的窗外是庞大的堪萨斯大学贝尔纪念医院（Bell Memorial Hospital）。它实际上是第四家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医院。这座1979年建成的建筑宏伟而具现代风格，由白色混凝土板和大玻璃窗构成，外设通风管，内置楼梯井，使人想起伦敦的劳埃德大厦。泛光灯在黑暗中照亮了楼体的外部，其现代感与我所在的小砖楼的幽暗寂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我的内心深处生出一种苦行僧般的情绪，继而激起对人体内部运作的深思。

我当时在复习肩关节周围肌肉的起止端，背着背着走了神，隐约听到走廊传来刺耳的声音。当你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奇怪的声音会过分刺激你的感官。我感觉自己就像潜艇上的声呐技术员。噌噌的摩擦声和金属的沉重敲击声使我感到陌生而不安，而我十分确定这个噌噌的脚步声正一路叮叮当当地向我逼近。房间外面的走廊一片漆黑。我转过身来面向门口，与那叮叮当当的声音结伴而来的一团黑影映入眼帘。

黑暗中，我调整着模糊的视线。一位面善的非裔老太太出现在我的面前，弯腰驼背的体态说明她常年劳作而且患有关节炎。破旧的黑色老式女鞋因为她的膝盖和脚踝经常弯曲打战而磨损得很厉害，棕色裙子也有点儿破了，一件黑色外套披在下垂的肩膀上。当时是8月份，披件外衣有点奇怪，不过这倒是城里女性去参加重要会议或教堂礼拜的典型装束。她粗厚的手里拄着一根生锈的钢筋，就是那种建筑工地用的带纹路的金属棒，所以我才会

听到走廊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选择沉甸甸的金属棒做拐杖似乎有些奇怪，它没有把手而且太过沉重。

老太太迷路了，她气喘吁吁地看到我时，我俩都舒了一口气——她终于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楼里找到了一个大活人，而我终于确定自己没有遇见鬼。她问道：“你知道312房间在哪儿吗？”

我起身走向这位流浪到此处的朋友，得知她是罗宾逊太太。带有褶皱装饰的黑色礼帽斜戴在她头上，帽檐下露出灰白的头发。她黑色的眼睛里泛黄的巩膜以及疲惫的神色无法掩饰她善于社交的性格。罗宾逊太太喘了口气，对我说，她的孙子出了车祸。家人告诉她，弗农住在312病房。说到这里，她抬眼看了一下房间门口的号码。我明白罗宾逊太太迷路了，不知怎么来到了这座废弃的大楼，于是我指着窗外那家亮着灯光的现代医院：“那座楼才是大学医院，您的孙子在那儿。”

“但弗农是有色人种，所以我知道他在这儿。”

现在我开始怀疑，难道罗宾逊太太是有意来到了这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因为这儿是黑人病区，我过去是这儿的护士，所有的黑人医生和护士在这里照顾黑人患者。”

我顿时哑口无言。堪萨斯州建立于南北战争期间，是一个自由州，州界另一侧的邻居密苏里州则是充满争议的奴隶制州。令很多人震惊的是，南北战争期间的几场战役就发生在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校区几英里外的地方，不过堪萨斯人打赢了这几场仗，没让奴隶制得逞过。但即使在堪萨斯州，种族隔离政策依然生龙活虎，尽管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的里程碑式裁决就发生在堪萨斯州的首府托皮卡，我从未想过堪萨斯大学曾为某些公民开设了隔离的医院。

我带着罗宾逊太太来到医院主楼，一路上听着有关种族隔离和民权运动前后的生活故事。我很高兴自己可以亲口告诉她，不论任何种族和宗教信仰，现在所有患者都一起住在医院主楼里。我把她送到电梯间时，她依然拄着那根叮当作响的拐杖。接着我去餐厅买了杯咖啡。餐厅建在这家现代医院的西侧，从主体结构伸出一面大玻璃墙。我放眼向外望去，穿过长满青草的小花园，就是我的自习天堂——伊顿楼。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座老砖楼的东侧有一个被封起来的入口，应该是从前的正门。我又仔细看了看，入口现在已经不能通行，上方刻着“伊顿楼”的标识。过去，这座建筑的位置相当于医学院校园的背面，而那一组门曾经是大楼的正式入口。美国中西部的夏夜，萤火虫飞出一闪一闪的光迹，我眯着眼睛看到了标识上的字。就在不久以前，那里刻着的是“黑人病区”。

在州长乔治·华莱士与联邦政府就亚拉巴马大学录取两名非裔学生的争议陷入僵局之后，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6月11日发表电视讲话，就民权问题发出由衷的呼吁，此即著名的“公民权利讲话”。最初挡在“校舍门口”的华莱士州长态度有所缓和，但是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发表了13分钟的演讲，表示美国黑人也有进入公共机构的权利。他这样说道：“因此，我恳请国会立法，赋予所有美国人享有公共设施服务的权利，无论是酒店、餐馆，还是剧院、零售店及其他类似场所。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基本权利。对这项权利的否认是对尊严的肆意践踏，1963年的美国人不应该承受这些，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承受着。”

五个月后，肯尼迪总统遇刺。他的遇害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场谋杀，至少有两项成就可能无法达成。在肯尼迪的原本任期结束之前，也即刺杀发生的七个月后，1964年《民权法案》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一年

后，1965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签署生效的同时，建立了老年人联邦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也是约翰逊所说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共生关系，直至今日人们尚未完全领悟。在“公民权利讲话”中，肯尼迪总统列举禁止非裔美国人进入的各种机构（酒店、餐馆、剧院和零售店）时，没有提到医院。在1963年，要求太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在短短几年间，全国500多处“黑人病区”中的大多数将被关闭，联邦医疗保险制度的形成使它们无法继续存在。

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医疗保健方面出钱最多的支付者，它几年前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如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人类的话，它刚好达到美国退休协会的年龄要求。老年人一旦开始领取社会保障系统的福利，就自动加入了联邦医疗保险的A部分。美国公民“有权”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福利——不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必须选择放弃自己所有的社会保障福利。因此，谈到联邦医疗保险时，我们会使用“享有权”（entitlement）一词。这种“强制性”健康保险始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领导的政府提出了“社会保险”的理念。^[2]《德国疾病保险法》于1883年通过生效，也就是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菌的第二年，该法建立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资助的强制性医疗保健系统，富人支付的费用多于穷人。^[3]

许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形式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包括1911年的英国。后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于1948年建立，确保所有英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而加拿大于1968年效仿了这一做法。英国于1911年启动的社会保险项目无疑启发了美国的知识阶层，包括进步党（公廩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的政策方向已经从严格保守的“蓝血权贵”的共和党议程转变为提倡进步和社会平等，而国民医疗保险是进步党在1912年的一项政治纲领。进步党的罗斯福和共和党的塔夫脱都输掉了1912年的大选，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尽管国民医疗保险在1912年就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该计划搁浅了。^[4]几十年后，国民医疗保险政策才再次出现在政坛。

贾斯汀·福特·金博尔（Justin Ford Kimball）是得克萨斯州当地人，先后从贝勒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镇上做高中教师和校长。就业一帆风顺的金博尔在成为校监之后，回到韦科市从事法律工作。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因为金博尔在一系列保险公司破产案中担任接管方的法律顾问，这使他接触到保险精算学。这是一个极度看重分析技巧的领域，结合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分析和控制风险，而金博尔在这方面是个天才。

作为一位极具天赋的行政管理人员，“他性格多面、风趣健谈……博古通今又平易近人，自称与州里一半人是亲戚，又与达拉斯市的上流社会常有来往”。^[5]金博尔在1914—1924年于达拉斯市做校监工作。在他的任期里，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性大瘟疫侵袭了这个已经疲惫不堪的国家。

1918年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席卷全球，导致全世界超过5 000万人死亡。死于流感的美国人67.5万人，超过了在海外作战中丧生的人数。没有流感疫苗，也没有药物能够治疗伴随流感发生的致命性肺炎，美国人发现他们格外容易感染患病。尽管达拉斯地区的死者不足1 000人，但是，员工生病和工时不足仍然成为摆在校监金博尔面前的重要问题。

金博尔为教师设立了“疾病补助基金”，使他们在流感大流行期间能够维持生计，“每人每月交纳1美金的会费，这样生病的人每日可以享有5美金的补助，以补偿生病一周后的收入损失。”^[6]金博尔有过运用统计学评估并减轻风险的经验，因而能够为老师们规划出一套方案，同时他必须认真地统计数据，将参与基金的人数及与其健康相关的统计学信息制成表格。

1929年，金博尔成为贝勒大学达拉斯医学院的副校长，主管医学、牙科学和护理学的教育项目，并负责改善大学医院不稳定的财务状况。那时，医院正从救济院和收尸场变为康复的殿堂，但是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昂贵的。在华尔街于1929年10月29日股市崩盘之前，贝勒大学医学中心就已经深陷财务困境，而得克萨斯人金博尔正是能够帮助其脱离泥潭的务实型全才。

作为校监的金博尔非常熟悉疾病补助基金中“参保”的教师数量，现在他作为贝勒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又了解到医院的财务状况——支出和收入，尤其是贝勒医院在接诊和护理达拉斯教师方面的费用流出情况。金博尔的年轻门生布莱斯·特威蒂心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为生病的人[教师]设计一套类似于伐木场和铁路对待员工的方案呢……[参考]公司顾问”^[7]关照当地工人的方式，使公司和劳动力都可以从中受益。

1929年初秋，金博尔来到达拉斯学校管理处，向他的老朋友们提交了“医院预付计划”，即教师可以每个月预交固定金额，以支付将来的医院账单。金博尔没有任何国家保险精算数据可以参考，因为人寿保险公司一直不涉及医疗保险，也没有人曾经计算过医疗需求与花费之间的统计数据。他应该向教师收取多少费用呢？没人知道。不过金博尔确实有自己做校监时的详细记录。“那些记录……是我在美国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保险精算资料。我做保险律师时，自己设计了这些表格来提取信息。[那个

秋天，关于保险计划的广告在教师中传播开来。] 如果75%的教职员工注册，并从11月份的疾病补助基金付款日开始，每月支付50美分，那么贝勒医院会将其作为必要医疗需求的预付款。”[8]

股市的崩盘和医疗保险计划的启动在几个小时中同时发生了，这对于教师和医院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契机。不出所料，教师们蜂拥而至。到12月份，超过75%的达拉斯教师都注册参与了这个项目。1929年12月20日，恰逢圣诞假期，该计划正式启动。“医疗保险计划”立刻取得了成功，达拉斯共和国民银行（Republic National Bank of Dallas）和《时代先驱报》（*Times Herald*）的员工也纷纷加入其中。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有408个员工团体的共计23 000名员工加入了这一计划。金博尔拯救了贝勒大学医院，将其从破产边缘解救出来，宛如一名有魔力的吹笛手，召唤着病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医院门口。由于医疗所需支出开始爆炸性增长，患者也感到高兴，他们遇到意外事故或重大疾病时，不再会有毁灭性的经济损失了。

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生死边缘，医疗保险计划开始在全美各地涌现。最初保险计划以单独一家医院为中心，后来大城市中出现了联合医院项目，受到战争、流行病和金融危机围攻的美国人小额“预付”保险费好评如潮。更为复杂的保险产品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开发出来，例如赔偿金（特定的现金收益或“最高限额”）、医疗服务给付（在特定条件下，担负一定天数的医疗服务费用）以及重大疾病险（追加的“灾难性”保险），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医疗保险计划是美国人所知道的唯一健康保险。

明尼苏达州的当地保险组织名叫“蓝色计划”（Blue Plan），负责人范·史汀威克（E. A. van Steenwyk）想为公司找一个新标志。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一个蓝十字。很快这个蓝十字将成

为全美医疗预付计划的标志，该计划最终又催生一个集中运营的全国性组织机构。贾斯汀·福特·金博尔既不是保险精算师，也不是医院管理学出身，他在57岁时作为一名新手掌管医院，继而发起了一场健康保险革命。几年间，这场革命演变出了蓝十字（Blue Cross）协会，如今这个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集团公司，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版图上占主导地位；它为美国人支付大型择期（以及植入）手术的费用铺平了道路，这在“兴旺的二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那时的金博尔还只是一名校监。

蓝十字创立不过十年，美国医学会及其医生们决定，医生的门诊也应该考虑类似的预付计划。长期以来，强势的美国医院协会和美国医学会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尤其是在健康保险问题方面。医院几乎立即接受了国民健康保险的想法，哪怕是由政府控制的单方支付保险，而美国医学会极力反对政府管理健康保险。

医学和外科学的进步使“护理场所从家庭或医生的诊所变为医院”。^[9]随着“上门服务”行为逐渐消失，公众对医疗服务保险计划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渐渐地，医生们对非营利性质的蓝十字机构的预付式医疗保险变得友好起来，于是“蓝盾”（Blue Shield）诞生了。数年后，蓝十字与蓝盾合并重组为一家大型公司，业务遍及全美。

蓝十字与蓝盾的建立基础是医院和医生与各种职工团体间的关系，这些团体包括教师工会、制造业工人和钢铁厂工人团体、警察协会等。另外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期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令人意外的合作使各州的员工赔偿保险得到了大规模的改革。雇佣双方都做出了让步：雇主积极地建立工伤保险系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对他们的法律诉讼，而员工终于享有工作场所的保护性条款，不再有超长的工作时间、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缺

少工伤保险的处境。由工作衍生出的健康保险与员工赔偿险结合在一起，意味着许多工人可以享有上一代人还无法得到的医疗服务。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系列战时的薪酬与福利法规出台，规定雇主将医疗保健作为“附加”福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作与健康保险之间的关系。

遗憾的是，改革几乎只围绕着职工进行，没有工作的以及年长的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仍然遭受冷遇。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住院治疗开销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威胁也日益增加。利斯特消毒法这种以石炭酸清洁皮肤和外科医生双手的技术，永久地改变了手术治疗的理念与现实，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生命突然不再那般脆弱。然而，严重的感染通常会导致快速死亡，直到20世纪40年代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面世，手术的安全范围才真正拓宽，医院因手术而面临的风险也减少了。无菌外科与抗生素治疗的结合是一项壮举，但费用十分昂贵。毕竟死亡不需要花费太多金钱，而挽救一条生命却开销巨大。

战时美国的就业、生产和创新继续呈现出令人目眩的良好势头。“非营利性的蓝色计划发展态势惊人，并没有掠夺商业保险公司的阵地，特别是那些已经向员工团体销售人寿和意外事故保险的公司……1940—1946年，商业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团体和个人住院治疗的保险单从370万增长到1 430万。”^[10]同样，团体手术赔付保单从230万增长到1 060万。在1946年底之前，美国在建的医院很少，但是，1946年的《希尔-伯顿医院调查与建设法案》（Hill-Burton Hospital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Act）掀起了全美的医院建设热潮。“1946—1960年，民办医院、州立医院和市立医院一共增加了1 182家……此项联邦支出在1948年是7 500万美元，到1961年增至1.86亿美元。”^[11]《希尔-伯顿法

案》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已经收到拨款的医院必须为无力承担医疗服务开销的人提供20年的免费医疗服务。对于最早一批在1946年就获得资金的医院来说，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在1966年的启动恰到好处。

医院的爆炸式增长和扩张以及投保人数的不断增加无法掩盖那些“由于年龄或经济状况而被遗忘的……贫困和失业人员”^[12]的困境。首先受到关注的群体是老年人。经济大萧条破坏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稳定财务状况，而1935年《社会保障法》具有里程碑般的深远意义，它通过雇主和雇员的税收贡献（现在仍出现在政府与公司员工年度工资税收W-2表格的第四栏）建立了永久性的全国养老金制度。于是，哈里·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的联邦保障局（Feder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负责人与社会保障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同事一起为老年人拟订了方案，在老年人现有的福利保障计划中，配置医疗保健福利。联邦保障局负责人奥斯卡·尤文说：“拟订的福利提案将通过 [老年人] 已经加入的保险系统，为他们提供急需而宝贵的住院保险……减少联邦、州和地方的支出……减少医院赤字。”^[13]正如贾斯汀·福特·金博尔让达拉斯教师们从每一笔薪水中抽出一小金额作为医疗开支的预付款，尤文的提案是美国人预先交纳自己步入老年后治疗疾病的费用。1951年提出的这项方案要走过15个年头才成为法律生效。

美国医学会对老年人全面实行医疗保健表示强烈反对，称杜鲁门的最初提案“很不美国”“是社会主义医疗”，担心国会的监管会导致医生薪水下降。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政府用减税来奖励为员工提供保险的单位，从而巩固了私营医疗保健系统。这项间接而隐秘的政府扶持政策使更多员工加入了私营保险系统，联邦政府直接提供保险的想法遇到了更大的阻力”。^[14]尽管

美国医学会和医生们在19世纪还毫无权力可言，但是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医学史学家保罗·斯塔尔所说，随着医学教育变得现代化，再加上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出现后，滥竽充数的医学院不复存在，医生们由此大权在握。

[15]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颁布之后，人们将蛇油倒进了下水道，弗莱克斯纳的报告则使冒牌的医学院关门大吉，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是医生的威望与谈判力逐渐提高。

第一项涉及老年人医疗保健的国会议案是《克尔-米尔斯法案》（Kerr-Mills Act），即1960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的美梦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破碎，现在就连为老年人提供有限的保险也十分艰难。因此，奥斯卡·尤文的首席顾问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和伊西多尔·福尔克（Isidore Falk）设计出一套“渐进方案”，以实现覆盖全民范围的目标（截至2019年仍未达成）。“我们的[渐进式]想法是，首先让一小部分人享有适度的保险计划，然后逐渐扩大范围，直至覆盖整个群体。”[16]《克尔-米尔斯法案》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但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另一方案——通过增加社会保障税收来资助强制性健康保险。尽管享有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数量呈上升趋势（1952年占31%，1956年占44%，1959年占53%），[17]但是《克尔-米尔斯法案》能否见效，取决于各州是否同意参与，以及联邦行政管理的效率高低，这两个因素限制了它的效力。

如果局部试行的发展态势良好，就说明渐进方式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而哪怕首次试水没有成功，渐进方式也是一种制胜法宝，因为支持者可以辩解说是局部限制本身妨碍了这个独特的项目。另一方面，《克尔-米尔斯法案》为全民医保的拥护者留下

两点可以攻击的漏洞，他们可以指出全美各地的老年人参保覆盖率参差不齐，而且还有许多人并未被法案照顾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法案的几个个月后，该法案就受到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挑战。在1961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他呼吁开展与社会保障相关联的联邦计划，为1 400万名65岁以上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肯尼迪演讲后不久就提出了《金-安德森议案》（King-Anderson bill），建议为老年人的医院服务和疗养院服务提供强制性保险。《金-安德森议案》又叫“联邦医疗保险”，一方面获得了工会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受到了美国医学会、商业团体和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克尔-米尔斯法案》的联合发起人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是一名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士，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已经晋升到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的要职。当时，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仍然有许多“保守的民主党人”，而米尔斯主席便是其中一员。1960年，肯尼迪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理查德·尼克松，《金-安德森议案》从此开始艰难起步。众议员米尔斯多年来一直在修订细则，确保议案能获得必要的选票，走出委员会审议的阶段，但来自美国医学会及其他团体的重重阻挠拖延了议案的进程，米尔斯自身的固执性格也有影响。

肯尼迪总统任期不满三年，就于1963年11月23日遇刺。“肯尼迪遇害的两天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写道：‘只要米尔斯坚持反对由社会保障系统资助的健康保险，肯尼迪总统的计划就注定停留在筹款委员会阶段。’”^[18]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约翰逊总统誓将民权和联邦医疗保险作为优先关注对象纳入其“伟大社会”的规划，他知道

在他第一任期的“蜜月期”里，推行计划的情感时机已经成熟。

1964年《民权法案》生效，此时已是“罗斯福新政30年后继续影响的尾声”。^[19]然而，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期间，该法案都无法实现。几十年来，民主党掌握着国家政局，在九届总统选举中有七次胜出，同时平均“选举人团票高达424票，而相比之下，共和党只得到101票”。^[20]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杜鲁门或肯尼迪很难让议案通过呢？因为空前一致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们“保护种族隔离制度，反对工会，破坏大部分社会改革，讲究论资排辈，推崇南方重新选举议会成员的模式”。^[21]

罗斯福新政时期，民主党有两个主要政治联盟：一个是北方自由主义者，他们热衷于拟订与社会创新有关的提案，例如“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全民保险、强有力的劳动保护、儿童福利计划等等……”^[22]；另一个是南方保守派人士，他们基本上统治着国会。政治学家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将这种局面描述为“瑞典福利制度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合，后者占主导地位”。^[23]《民权法案》最终通过时，在经历了90天的僵局之后，迎来了一场终结辩论的投票，33名共和党参议员中的27名加入了45人的民主党阵营，从而打破了南方的抗衡，法案才得以通过。

联邦医疗保险的通过经历了相似的进程。许多政治专家认为，《民权法案》促进甚至实现了联邦医疗保险的通过。共和党感到联邦医疗保险肯定会通过，于是他们发起了别称为“优质医疗”的另一项议案，这是一种部分由普通税收资助的自愿医疗计划，可以涵盖医生看诊的费用。美国医学会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名为“老年医疗”，可以作为《克尔-米尔斯法案》的扩展，涵盖医生看诊、疗养院护理和处方药的开支。从本质上讲，“老

年医疗”是“医疗补助计划”的前身。

竞相出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质医疗和老年医疗提案，既相互对立，也互为补充。医院就诊费用、医生诊所保险以及扩展的贫困医疗服务是国会尚未考虑到的三大紧迫需求，甚至连那些赞成成为老年人提供全民综合式医疗保险的人也从未想过。三项提案一次全部通过是不可能的，这会给民众及政府增加巨大的负担；然而，事实的确就这样发生了。

米尔斯主席献出了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立法妙计。1965年3月3日，他提出将三项议案的主要内容合并在一起。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米尔斯转向林登·约翰逊的代表威尔伯·科恩问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将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与广泛涵盖医生看诊及其他医疗服务费用的自愿计划放在一起，合并成一个计划？”^[24]科恩后来回忆道：“实际上，联邦政府是在没有评审任何替代方案或其他选项，没有权衡折中，没有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介入医疗保健这一重要领域的。”^[25]经过几个月的审议，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通过了这项议案，它俗称为“米尔斯三层蛋糕”，但正式名称为《社会保障法》第18条和第19条修正案。第18条修正案由A和B两部分组成，分别概述了医院就诊和补充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包括到医生诊所看诊。第19条修正案推出了医疗补助计划，但不被称为“C部分”。30多年后，1997年《平衡预算法案》（Balanced Budget Act）通过，按投保人赔付的健康保险计划才正式出台，它最初名为“联邦医疗保险优选计划”（Medicare + Choice），后来被称为“联邦医疗保险优良计划”（Medicare Advantage）。

了解这个“蛋糕”如何烘焙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细节。例如，为什么将医院就诊定义为“A部分”？因为医院就诊的覆盖范围属于前身是

《金——安德森议案》的《联邦医疗保险法案》的“A部分”。为什么在医生诊所就诊的报销属于“B部分”？因为它是根据该法案的“B部分”生效的（法案正式名称为《社会保障法》第18条B修正案）。为什么A部分由社会保障税收资助？因为议案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社会保障的附加条款通过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部分的花费由社会保障税的收入来支付。而按照最初的提议，B部分则由普通税收来支付。

经过多年的争论，1965年7月30日，距离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全民保险计划整整半个世纪后，联邦医疗保险由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签署生效。坐在他旁边的是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一位参保人——哈里·杜鲁门，他在当天收到了自己正式的联邦医疗保险卡。

民权运动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对贫困人口、失业人口和老年人口医疗保健的思考方式。“《民权法案》的通过和实施以及如影随形的民权运动，促使总统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联邦医疗保险是这场选举的结果，是民权运动的礼物。”^[26]在十年间，“医院成为美国在种族上最凝聚、在经济上最统一的私营机构……曾经的500多家黑人医院，只留下四五家，其他已经全部关闭或改作其他用途”。^[27]，^[28]哪种情况更令人难以理解呢：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我母校中的伊顿病房那样的种族隔离医院，还是《联邦医疗保险法案》的推行使那些医院关闭了？

联邦医疗保险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正式启动，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年庞大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仿佛一艘远洋巨轮向全新的地平线起航，它管理着成千上万的医生和医院，这些医生和机构正为千百万刚刚获得保险的民众提供着医疗服务。令人震惊的是，联邦政府对医疗体系没有统治权，正如联邦医疗保险的总设

计师之一威尔伯·科恩后来感叹的那样，“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的倡导者们，包括我自己，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我们对医院和医生没有真正的控制权。我必须许诺……联邦机构……没有控制权”。[29]

联邦医疗保险通过时，立法者已经将蓝十字与蓝盾的支付政策编入法律。20世纪30年代，非营利性蓝十字医疗保险成为“[医院产业] 稳定的资金渠道”。[30]重要的是，各州的蓝十字与蓝盾计划通常会报销医院在治疗病人时所产生的费用，无论费用是多是少，所以当健康保险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医院根本没有限制成本的动机。普林斯顿大学的乌韦·莱因哈特认为，这种以“报销”而非“支付”为核心的方法，即“医院针对外部约束来管理其项目成本”[31]的方法，滋养出一种内在的通货膨胀机制。各州的蓝盾计划为医生诊所提供报销，会支付医生“平常、常规和合理”（俗称UCR）的治疗费用，同样几乎不限制其成本。

通货膨胀不仅出现在医院和医生诊所的报销中。“联邦医疗保险必须按比例分别报销各个医院投资在建筑和医疗器械方面的所有花费……按比例分别报销其运营成本。”[32]报销保证了一定的资金回笼，毫无疑问，投资人拥有的医院会因此开始飞速发展。联邦医疗保险以蓝盾计划为医生诊所报销时采用的UCR原则为基础，按照“常规、普遍和合理”（CPR）原则，支付医生的治疗费用，限制条件只是略微严格了些。

莱因哈特说道：“因此，在1965年，作为他们默许联邦医疗保险生效的回报，医疗保健的提供方实际上从国会拿到了进入美国国库的钥匙。”[33]报销而非支付的机制，使联邦医疗保险立即产生了年度开支，就像节拍器一样，一年更比一年多。讽刺的是，反倒是后来那些忠诚的共和党总统如尼克松、福特、里根和老布什，“以民主党永远不敢尝试的方式，使医院和医生一方屈

服”。[34]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同意医院行业“自主”控制成本，不过这个天真的承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20年时间的报销制度在里根执政时期终结，当时联邦医疗保险的规则开始向更加商业化的方向转变。“‘事后全额报销’的想法，对于任何习惯了商业常规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政府对这种方式尤其感到烦恼。”[35]因此，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将医疗条件划分成500多个“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related groups），简称DRG，按照每种情况预先定好的总额来给医院付钱，从而实现了一种“公平利润”。这一改变确实是革命性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甚至美国的私营保险公司都效仿了这种模式。

几十年以来，医院和医生通过没有标准来衡量的“常规”治疗，无限制地收取费用而且得到支付。按照各种DRG病例来报销医院费用的会计系统，为联邦政府旧的支付方式的终结鸣响了礼炮。随着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社会力量日益显现，联邦医疗保险资助了一项有关各种医疗服务“相对成本”的重要研究，旨在确定治疗大量不同的伤病所需要的时间、技术和风险。[36]这项研究结果所产生的“基于资源的相对价值量表”（RBRVS）为1989年立法制定正式的医师收费表奠定了基础，考虑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在劳动力成本、医疗过失保险费 [以及办公空间成本] 方面造成的差异”。[37]曾经的医院和医生像只肥猫一样拉开山姆叔叔的钱袋，幻想收取常规治疗费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私营保险业采用了DRG、RBRVS等由联邦医疗保险发起的新形式，此外，医院和医生们可以根据联邦医疗保险特定的年度收费表，与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保险机构就费率进行谈判。例如，医生可能会说：“我们与信诺保险（Cigna）的新合同是2015年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135%。”虽然联邦医疗保险约占“全美医疗保健支出的20%，即2.793万亿美元中的5 725亿”，[38]但是，在

公立和私营医疗保健的支付方式改革中，它左右着谈判的权力。近些年来，国会尝试总体规划医疗费用，目标是将联邦医疗保险的总支出情况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挂钩。该计划会运用经过计算的“量化业绩标准”（VPS），规定如果前一年的支出超出预算，本年度就会减少医生的看诊费。尽管这种严苛的持续增长率（SGR）体系应该很容易实施，而且功能强大，然而它也是医生影响立法的最后一块阵地，而且新医疗税法案（doc fix）几乎从未启动。在华盛顿特区，每年的国会议程都习惯了忽视SGR体系。有人批评说，国会长期搁置SGR体系也是医疗保健体系支出“不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约占联邦支出总额的1/7，在2016年，3.9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约5 880亿美元用于资助联邦医疗保险。[\[39\]](#)这50年中，联邦预算在联邦医疗保险上的支出比例一直稳步上升，在2016年超过了1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预计到2024年将超过预算的1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2010—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数会翻倍，从4 000多万增长到8 400万，而且其中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医疗费用通常会很高昂。乌韦·莱因哈特认为：“目前，有关美国财政政策的争论焦点在于，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保持或低于既定比例——不论需要多少资金……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40\]](#)

持怀疑态度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批评美国人在医疗保健方面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获益不多（本书作者作为外科医生也承认这一点）。我们为药品、植入物和手术支付了太多的费用，在这个成本意识和成果跟进的新时代，美国人会看到“物有所值”的进步。但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学家、精算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医生都不希望自己在心脏病发作、罹患癌症或遭受外伤

时，需要先有个改进控制成本的新方案才能好好治疗。

了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起源才能真正理解植入物爆炸式出现的“完美风暴”。材料学的进步、抗生素的出现、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植入物的监管、二战后由政府推动的数千家新医院的建设、医疗健康保险的发明以及联邦医疗保险系统的形成，这一切在短短几十年间汇流成河。患者需要健康保险来支付新型手术昂贵的费用，医院、医生和植入物制造商则需要可靠而稳定的投保患者群体。在1965年，谁又能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猜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当然，联邦医疗保险的成本始终超过预算，但是我们不能责怪威尔伯·米尔斯及其同事们在制作三层蛋糕时没有占卜未来。毕竟，革命难以预测。

[1]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判定公共教育领域的隔离制度违宪。——编者注

[2] Sue Blevins, *Medicare's Midlife Crisi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1), p.25.

[3] *Ibid.*

[4] Ronald L. Numbers, ed., *Compulsory Health Insurance: The Continuing American Debat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p.6.

[5] R. Cunningham and R. M. Cunningham, *The Blues: A History of the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Syste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97), p.ix.

[6] *Ibid.*, p.5.

[7] *Ibid.*, p.4.

[8] James E. Stuart, *The Blue Cross Story: An Informal Biograph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Prepayment Plan for Hospital Care* (self-published), 1952, p.18.

[9] R. Cunningham and R. M. Cunningham, *The Blues: A History of the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Syste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97), p.35.

[10] Ibid., p.59.

[11] Ibid., p.92.

[12] Ibid., p.118.

[13] Oscar Ewing, press statement (Federal Security Agency, Washington, DC, June 25,1951).

[14] Julian E. Zelizer, “How Medicare Was Made,” *New Yorker*, Feb. 15, 2015.

[15]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6] Howard, S. Berliner, “The Origins of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Ag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 no. 3 (1973): 465.

[17] Sue Blevins, *Medicare’s Midlife Crisi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1), p.42.

[18] Julian Zelizer, “The Contentious Origins of Medicare and Medicaid,”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3.

[19] James Morone and Elisabeth Fauquert, “Medicare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Insurance,”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99.

[20] Ibid., p.299.

[21] Ibid.

[22] Ibid., p.300.

[23]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Liveright, 2013)

[24] Sue Blevins, *Medicare’s Midlife Crisi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1), p.46.

[25] Ibid.

[26] D. B. Smith, "Civil Rights and Medicar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and Continuing Legacy,"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5.

[27] Ibid.

[28] Nathaniel Wesley, *Black Hospitals in America: History, Contributions, and Demise* (Tallahassee, Fla., NRW Associates Publications, 2010).

[29] Cited in Rick May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assage of Medicare's Revolutionary 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62, Jan. 2007, p.25.

[30] Uwe Reinhardt, "Medicare Innovations in the War Over the Key to the US Treasury,"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2.

[31] Ibid.

[32] Ibid., p.173.

[33] Ibid.

[34] Ibid., p.174.

[35] Ibid., p.175.

[36]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History of the RBRVS," <http://www.ama-assn.org/ama/pub/physician-resources/solutions-managing-your-practice/coding-billing/insurance/medicare/the-resource-based-relative-value-scale/history-of-rbrvs.page>.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7] Uwe Reinhardt, "Medicare Innovations in the War Over the Key to the US Treasury,"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8.

[38] Uwe Reinhardt, "Medicare Innovations in the War Over the Key to the US Treasury,"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9.

[39]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10 Essential Facts About Medicare’s Financial Outlook,” Feb. 2, 2017, <http://kff.org/medicare/issue-brief/10-essential-facts-about-medicare-financial-outlook/>.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40] Uwe Reinhardt, “Medicare Innovations in the War Over the Key to the US Treasury,” in Medicare and Medicaid at 50, America’s Entitlement Programs in the Age of Affordable Care, Alan B. Cohen, David C. Colby, Keith A. Wailoo, and Julian Zelizer, e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82.

第十三章

设备许可

我两天前才到伦敦，现在还在倒时差以适应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从公寓约的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尤斯顿车站，我乘上从伦敦开往曼彻斯特的高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曼彻斯特的皮卡迪利车站，这条线路也是欧洲最繁忙的铁路线之一。在曼彻斯特转乘奔宁特快来到威根镇，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穿过兰开夏郡的乡村风光，来到小城莱廷顿（Wrightington）。车窗外是大片的英格兰农场，灌木丛生的树篱和苍老的古树穿插在波涛起伏般的田野间。

莱廷顿的田园风光丝毫无法使人们联想到世界一流医学，但坐落在小城郊外的一家医院吸引我来到这里。出租车转过路口的环岛，莱廷顿医院便近在眼前。医院主楼是一座奶油色的石制建筑，原本是莱廷顿大礼堂（Wrightington Hall，重建于1748年），庄严肃穆的建筑风格十分符合曾经的显赫地位。其余的建筑都有一两层高，与主楼不同，由红砖建成。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老先生，瘦高个儿，到站停车后，他告诉我：“您知道吗？他们说这家医院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是发明关节置换手术的地方。”

我一边掏出钱夹付钱一边说：“是的。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来看看发生这一切的地方，来向约翰·查恩雷爵士（Sir John Charnley）致敬。”

一座十分古老的石墙立于碎石铺设的停车场一侧，另一侧坐落着一栋20世纪60年代的单层建筑，即著名的髌关节外科中心。成百上千名拜访过这一圣地的外科医生曾站在门口，与查恩雷或其他使这里名扬天下的外科医生合影留念。

穿过走廊，我见到了波多·普尔巴赫（Bodo Purbach）先生。这位来自德国的骨科医生是查恩雷的大弟子，在工作繁忙的一天接近尾声时，他满怀热情地带我参观了医院。我们与另一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师一起看望了本周刚刚接受过髌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环顾四周，我为整座医院朴实无华的装饰风格感到惊讶。长长的走廊呈平行排列，这种结构最初是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建议采用的，有助于促进空气流动。这里的家具、墙漆、照明和双人病房，让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

普尔巴赫先生看着我，以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道：“现在，最有意思的地方到了！”

他抽出大钥匙环上的一簇钥匙，我们沿着一条幽暗的走廊走向尽头。在肩外科医生伦纳德·芬克（Lennard Funk）先生的陪同下，普尔巴赫打开了一扇大门并拨动了照明开关。嗡嗡作响的荧光灯下，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博物馆，这里陈列着髌关节植入物的展示柜、成套的医疗器材古董以及近百年来髌关节植入物历史上的代表性样本。

这对于任何热衷于医学和外科学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财富，当然也包括我。我感觉自己就像揭开图坦卡蒙墓穴那一刻的霍华德·卡特。对面倚墙而立的是那台定制的聚乙烯磨损试验机，多年来，我在期刊以漫画风格绘制的图片上常常看到它，而现在，实物就在眼前。左侧是一盒查恩雷使用的丙烯酸骨水泥，它已经50岁了。我继续在房间里走着，俯身看着分类展柜中陈列

的小物件，还有查恩雷多年来设计过的金属髌关节柄。然后，我看到了聚乙烯和特氟龙臼杯。

也许查恩雷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聚乙烯当成一种承载面材料应用于全关节置换术。这一发现是命运般的巧合，当时一家德国聚合材料公司的销售员带着一包齿轮样品来到医院，他想查恩雷的试验机可能会需要聚合材质的零件。而实验室助手哈里·克雷文（Harry Craven）和查恩雷先生先后认为，聚乙烯正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找的突破性材料。为了测试这种新型聚合物，克雷文研发出一种多工位磨损测试设备……它就放在我面前的工作台上。彻底改变世界的“历史”安坐在这张工作台上，身上蒙着薄薄的尘埃。

在旁边的展柜中，我看到了几乎毁掉约翰·查恩雷爵士全部工作的罪魁祸首。展架上放着从受试人体中取回的特氟龙臼杯，可见大面积腐蚀和不均匀磨损。如果说聚乙烯是查恩雷一心求索后得到的福音，那么特氟龙就是可憎的恶魔，它动摇了查恩雷通往成功的信心。1962年，人们已经很清楚每一例用了特氟龙的手术的长期结果都是失败的，尽管合金髌关节柄表现良好，但关节窝的特氟龙臼杯基本上被金属球一点一点地磨没了。我俯下身来，近距离地观察着白色的蜡状特氟龙，眼前就是在查恩雷文章中读到的那个植入物的实物。这个植入物是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让查恩雷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从未进行过动物实验研究。在1962年，英格兰也没有监管机构来审查、批准医疗设备。查恩雷构想出一种设计，然后制造植入物（有可能是自己做的，也可能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做的），接下来在手术中使用。当时也没有跟踪机制和量化手术结果的方法来对患者进行分析。

发现聚乙烯后，查恩雷又做了20年手术，而他一直保留着失败的特氟龙臼杯，这让我们看到这位医生的另一种品格。他是一

名真正的先驱者。借用吉卜林的诗句来说，他能够平静地面对“成功与灾难，在成功之中不得得意忘形，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特氟龙臼杯并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关节成形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最伟大的开拓者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合理性，拥抱结果的真相，突破最初成果看似颇具希望的迷雾，挖掘现实。

西奥多·罗斯福于1858年在纽约市出生，他在童年时期曾经顽强地与哮喘病做斗争，进入青少年时期后，又刻苦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1880年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回到纽约市，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朝气蓬勃的罗斯福24岁就当选为纽约州议员，那时的他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作为一名自由资本主义者，罗斯福属于当时的传统保守派理论阵营，主张低工资、低税收和少量社会服务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但是，在1882年，罗斯福受到了工会活动家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的启示。

1882年，纽约州立法机构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在廉租公寓中生产雪茄，因为这为雪茄工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负担。^[1]那时候，纽约市的雪茄公司要求工人“把工作带回家”，把制作工具储存在家里，更糟糕的是，工人们还要把一捆捆潮湿的烟草叶储存在他们已经拥挤不堪的廉租公寓中。龚帕斯请半信半疑的罗斯福亲自看看工人们的生活环境，罗斯福也赞成“事实胜于雄辩”^[2]的想法，于是他与龚帕斯一起去参观了纽约的公寓。

眼前的一切使罗斯福感到震惊。不仅工人们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而且有孩子的家庭居住条件也极不合理。罗斯福无法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他感到这种观念就像堆在外籍劳工住所

里的刺鼻烟草一般腐朽不堪。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又两次拜访廉租公寓，最后说道：“我不再反对这项议案，而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它。”[3]奋发图强、从不示弱的罗斯福认识到，“自食其力和竞争精神是重要的理想，然而，在人生不公时，它们是无效的”。[4]

1906年春，厄普顿·辛克莱出版了小说《屠场》。尽管辛克莱不是“社会丑事揭发派”[5]的主要成员，但《屠场》一书是“揭露黑幕文学”的典范，描写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悲惨世界。[6]

为了创作《屠场》，辛克莱在芝加哥的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潜伏”了七个星期。他穿着脏衣服，提着午餐罐与外籍劳工混在一起。白天，他来到污秽不堪、极其危险的工作场所，记录管理人员对工人困境的冷漠无情，以及政府监督的缺失。晚上，他敲开工人的家门，写下他们的苦衷。

辛克莱希望可以吸引人们关注芝加哥“罐头镇”的立陶宛移民受剥削压榨的困境，他的小说描写了一幕幕绝望的工人阶级生活。书中的段落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不过这本书还讲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故事，虽然只有寥寥几页，说的是美国人所食用的肉品。辛克莱告诉我们，老鼠在腐烂的肉堆上一路狂奔，留下粪便；受到结核菌污染的肉被包装起来，运往市场销售；工人的肉体遭到酸腐蚀。最令人震惊的是，有人跌进烹饪间的大桶里，却无人搭救，“直到他们的骨头变成了达勒姆（Durham）的纯猪板油，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些看了让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场面超越了辛克莱想要表达的任何意识形态信息。他后来写道：“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命中了他们的胃。”[7]

在担任纽约州州长两年后，罗斯福成为美国副总统，不久后麦金莱总统在其第二任任期仅六个月时被暗杀，于是，西奥多·罗

斯福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距离他参加圣胡安山战役后才过去三年，那段军旅生活曾被他誉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时，43岁的罗斯福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几十年来未经审视的工业增长。1905年成功连任后，罗斯福总统告诉国会，“假冒伪劣的食品有损健康、欺骗购买者，应该禁止交易”。毫无疑问，罗斯福记得美国军队的食品供给质量十分糟糕，但是他想起自己曾经对纽约公寓的艰苦生活感到难以置信，对前线战场的食品供给产生重重质疑，他明白立法提案的实现需要前所未有的推进。不论是作为警察局长、纽约州州长还是总统，在统治和行使权力的道路上，罗斯福始终注重公平性，看重管理工作。罗斯福对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态度最能体现他进退有度的思想觉悟和处事方式，但是他对美国社会的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改革是1906年出台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首个公民保护机构——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1906年法案出台之前，医生与“专利药品”销售商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对‘秘方’药品的需求始于殖民地时期从英国进口药品。但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专利药品无法进口，美国经销商在英国药瓶中填满了各种各样的假冒仿制品……都是包装的把戏，包装是关键。”^[8]随着化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人们也拥有了制造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神技，还能稀释食物，或者滥竽充数。变质牛奶、腐肉烂菜都能通过新发现的化学物质瞒天过海。

经过国会辩论，以及政府与肉类加工业、牲畜饲养业和“制药”业的一番斗争，《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由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6月30日签署生效。法律生效以后，不仅肉类检验成为国法，药品交易管理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改变。这一新法律创建了美国第一个以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为至高准则的监管机构，同时，也

强调了打击欺诈。新法案取缔了虚假宣传，要求标签信息准确，禁止配料掺假。有人认为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贡献只局限于肉类加工业的改革和“蛇油”类专利药的减少，这是不够全面的，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政策方面的变化，政府具有了保护公民免受未经监管的商业行为伤害的职能。然而，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讲，这一解决方案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人们必须对贪婪的企业和滥用的假冒产品采取措施，而且也是因为科学进步创造出了新希望”。[9]正是因为首次出现了能够治愈患者的真正药品，冒牌药品才死得其所。菲利普·希尔茨借用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的话说：“世界逐渐认识到它可以改善自己。”[10]

1938年《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这很大程度上是对麦森吉尔（S.E. Massengill）事件的回应。1937年，麦森吉尔公司经销了受到致命性污染的磺胺类药物。这场危机凸显了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缺陷和弱点。那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刚刚走出大萧条，认识到可以制造特定的药物来治疗特定的疾病。化学是真实存在的，德国医学已经揭示了疾病的细胞基础，由此可以推论出疾病的分子基础，这意味着细胞的功能异常必须以我们身体中的分子形式来理解和治愈，并且得到管理。在科学启蒙闪烁的光芒照耀下，谁还能相信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局势已然变化，企业要想生存，需要研究部门、科学家和实验室。20世纪20年代，制药业里不过有几千名科学家，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即使是在二战后创新发明飞速发展的时代之前，这个队伍就已经发展到将近6万人。[11]

1938年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是“民事治理的里程碑。事实表明，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各地的现代政府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所有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一法

案的核心原则。它首次规定药品在上市前需要经过分析检验。它将一种概念写入法律，即科学方法才是现代社会的标准——而不是商业意图，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权威命令”。^[12]当然，这仅仅规范了药品，还不包括植入物，1938年的人们还没有想到植入物这一层。距离国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医疗产品”现代化，还有数十年时间。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从农业部转移到联邦保障局，而联邦保障局后来更名为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现在，它隶属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继续监管制药（包括试验、工厂视察、分类、市场投放、包装和长期安全性分析）、食品安全以及疫苗、血液和血清，并确保化妆品和放射性产品的安全性。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些领域的人类医学用品和兽医学用品都具有管理权。此外，该部门还负责规范烟草产品的制作、上市和经销，以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同时它在反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确保食品供给安全，以及促进治疗性医疗产品的研发。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具备管理医疗器械的权力。

20世纪40年代以前，医疗器械的定义不包括“可植入”的概念。数百年前，医疗器械装置往往是骗人的玩意儿或巫术魔法，毫无科学价值可言，比如占卜探测杖、鼻子矫正器、专利金属牵引器（本质上无异于魔法棒）、加热橡胶涂药器和不合理的膝盖支架。如果说这类器械装置还有作用的话，那大部分都相当于安慰剂，所以除了让患者损失钱财外没有其他危害，也就不值得谴责。伦琴于1895年发现X光，居里夫妇在1898年发现了放射性现象，利用放射现象的“求知探索设备”很快就打入了欧美市场。许多早期的研究放射性现象的学者死于接触放射性元素而导致的疾病，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安全监管人员渐渐意识到需要

将暴露在辐射中的程度降到最低。由于监管中涉及的知识体系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更加相似，放射卫生处（Bureau of Radiological Health）于1971年从公共卫生局移交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战后的技术潮时代面临着医疗设备管理的巨大挑战，这类似于1938年的法案问世之前对药品进行监管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至上的原则，认为在产品上市之前，需要经过测试、评审和批准。回顾历史，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强制力通常只用来管制一些类似于X射线试鞋机的小装置，人们认为这些小物件无害，实际上它们比想象中更危险。1962年，肯尼迪总统提出，要改变医疗器械进入市场的方式，^[13]但是争论焦点变成了联邦医疗保险与对药物的恐惧（包括镇静剂沙利度胺的噩梦），而设备监管处于次要位置，这显然会酝酿出一场危机。

理查德·尼克松初任美国总统时就签署了医疗器械法规，组织起库珀委员会来制订监管医疗器械行业的立法提案。委员会由医学博士西奥多·库珀（Theodore Cooper）担任主席。库珀是美国心肺研究所（National Heart and Lung Institute）所长，曾经是学术型心脏外科医生，后来担任普强制药的执行官。1970年，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发布了正式的《库珀报告》（Cooper Report），重点强调了需要对医疗器械和药品进行区别管理。于是，管理人员开始对市面上的所有医疗器械按照其专业特性进行分类，并根据获得批准所需要的审查级别分组。到1973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建立起14个不同类别的专家小组。该部门在1975年发布了一则总公告，告知设备制造商相关的分类手续。

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几

次危机的出现使公众开始关注联邦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达尔康盾（Dalkon Shield）是一种金属材质的宫内节育器，外观像一只游动的寄生虫拖着细细长长的尾巴，看上去就带着不祥之兆。装置“尾巴”的一部分是一根多孔线绳，后来被确定为感染的原因。自1971年起，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使用了达尔康盾节育器，结果导致成千上万名患者入院治疗，出现妊娠并发症、盆腔炎、不孕甚至死亡。1975年，这种节育器所酿成的危机已经很明显了，超过15万妇女对制造商A.H.罗宾斯公司提起诉讼，这是自石棉事件以来最大的侵权责任赔偿案件。^[14]达尔康盾导致的灾难使美国人不禁发问：“我们怎么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呢？”磺胺酞剂曾导致了幼儿死亡的悲剧，而这次的受害者是育龄女性，现在她们终身生活在盆腔炎和不孕症的恐惧中。达尔康盾事件中的监管失位引起了众怒，同时有缺陷的心脏起搏器也引起了类似的担忧，这要求国会必须做出改变。

经过几年行政和立法层面的争论后，《医疗器械修正案》（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由福特总统于1976年签署生效。这是有关医疗器械的最重要的立法，由新成立的医疗器械局（Bureau of Medical Devices）负责监督实施。这一法规意味着任何新型植入装置都必须经过“上市审批”，再也没有手工匠人在自己的工坊造出一种植入物，转天就将它植入人体的情况了。在英格兰的莱廷顿，约翰·查恩雷20年来就是这样处理他的全髋关节植入物的。与药品一样，新法律规定器械制造商必须为准备投放市场的器械提出申请。根据“祖父法则”，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器械不受新规定约束，但新器械必须申请上市批准。

1982年，医疗器械管理部门和放射性管理部门合二为一，成为医疗器械与放射卫生中心，隶属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与放射卫生中心负责管理所有医疗器械和放射性测

试设备，以及所有释放电磁射线的装置，例如微波炉和手机。或许该部门最重要的作用是对医疗植入物进行了应用分类，例如起搏器、深部脑刺激器、骨关节置换物、人工耳蜗和心脏瓣膜。

器械审批面临着与药品审批类似的双重压力，制造商和患者经常对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烦琐的规章程序和缓慢的办事效率感到懊恼，但是，如果药物不良反应或器械故障偶尔引发了不幸事故，人们就会批评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标准宽松、审批随意。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失败的案例中，最严重的是错误地批准了沙利度胺的上市，引起了可怕的新生儿海豹肢畸形，即胎儿的四肢在母体内发育停滞，导致新生儿几乎没有四肢，手脚异常地长在距离肩部或臀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四肢均受到影响。由于许多孩子都留下了先天性缺陷，造成终生的噩梦，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了“永远不再发生”的承诺。

植入物的批准也发生过类似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医院、医生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都有责任。曾经有一个重大失败案例，它造成的后果至今仍在持续着，受到伤害的患者就在我们周围。当时在美国有超过4万名患者，全世界将近10万名患者，在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接受了德普（DePuy）公司“关节表面置换系统”（ASR）的髋关节植入物，该植入物最终于2010年8月26日正式从全球范围内召回。近万名原告的和解协议可能需要强生公司下属的德普公司赔偿将近40亿美元。一个有致命缺陷的全髋关节，是如何来到市场上并持续使用了7年的呢？

可以说，髋关节置换术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手术，它能够极大地减轻疼痛，改善功能，而且感染率低，很少需要再次手术。有人甚至称之为“世纪性手术”。[\[15\]](#)然而，髋关节置换术在老年人

中取得的惊人成果，诱使部分外科医生和病人突破机械的耐久界限，尝试为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患者进行置换手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关节置换的黄金准则是，植入关节柄向下插入股骨髓腔（由骨水泥固定），髌臼部件压紧骨骼，金属臼杯以聚合物（聚乙烯）做衬垫。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在老年人中持久耐用，但是，像所有的机械轴衬一样，聚合物衬层容易磨损，最终失效。机械工程师继续寻找着“替代性承载面”，也即其他的金属和塑料组合，来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患者做置换手术。

在医学领域，突破性进展往往来自温故知新。第一例成功的髌关节炎手术由麻省总医院的外科领导者马里乌斯·史密斯-彼得森主刀完成，他用玻璃杯和金属杯盖住股骨头，以实现股骨头的“臼杯关节成形术”。查恩雷的全关节髌部置换术结果远远超越了混合式的臼杯关节成形术，但是，髌关节脱臼和聚乙烯磨损问题使外科医生和制造商重新开始考虑用一个大金属球替代股骨头。德里克·麦克明（Derek McMinn）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医生，他在伦敦接受医学训练，在英国伯明翰工作。自1988年起，他就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实现不包含聚合物衬层的髌关节置换术，这一想法最初由麦基和法勒在1960年提出。^[16]麦克明从1991年开始，将一个大金属股骨头嵌入可在其中旋转的光滑金属髌臼杯中，他希望部件经过精心安置以后，可以生成薄薄的一层液体，在金属球和金属杯之间，起到自动润滑作用。

1991年，这一装置最初被称为“麦克明髌关节”；1997年，这位勇于探索的外科医生开始使用新设计的“伯明翰髌关节表面置换系统”（BHR）。手术的早期结果十分出色，骨骼保留较好（因为使用该系统需要去除的骨骼较少）、更加稳定的髌关节（因为金属股骨头较大）以及不会发生聚乙烯磨损等优点，使“伯明翰髌关节表面置换系统”替代了常规髌关节置换术，成为

年轻患者的选择。这种置换系统出现的时机也恰到好处，那一年，3M公司生产的一款主流髌关节因失败而撤出了欧洲市场。

2004年，德里克·麦克明在英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伯明翰髌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早期结果。在术后平均3.3年的时间里，440名患者中只有一例进行了修复手术，高达99.8%的患者都避免了植入物失败的情况。到2000年，麦克明先生每年植入超过200例“伯明翰髌关节表面置换系统”，他的发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终于有一种髌关节能够撑下来并且不会脱臼，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励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工程师和外科医生，他们开始竞相设计“金属对金属式”（metal-on-metal）髌关节置换系统。

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城华沙的德普矫形（DePuy Orthopedics），是世界上最早的植入物制造公司。德普公司创建于1895年，在成为骨科产品制造巨头之前，原本是一家制作骨折固定夹板的公司。与大多数骨科产品制造公司一样，德普认为设计一款金属对金属式髌关节势在必行。虽然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到2006年才批准伯明翰髌关节系统，但似乎每家公司都会立即分销无聚乙烯的髌关节。

制造植入物的第一步是建设一支由工程师、设计师、市场专家和外科医生顾问组成的团队。在几年的时间里，设计团队定期聚在一起开会研究，但首先必须分析市场需求、现有产品以及美国和国际上现行专利法的“操作自由”范围。一家公司一旦获得专利，拥有的知识产权就建立起一道阻止他人模仿的屏障，服从国际法则的制造商应该遵守这种规章制度。如果竞争对手在一种植入物方面持有强大的知识产权，那么新的设计团队就只能在样式、形状、工艺和技术方面创新，以免侵犯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有时设计上的更改确实会提高性能（在一场游走于法律边缘

的模仿游戏中给出一个“变通方案”），但有时改变设计会引发严重危机。

植入物制造商通常会聘请自己公司“内部”的工程师和市场专家，而设计团队中的外科医生则是外部独立的医师，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为团体提供咨询服务。通常参与设计的外科医生是大学院校的学术型外科医生，他们正值职业巅峰期，负责培训年轻医生，并在会议中进行指导性讲解，内容往往与他们设计的植入物有关。我们可以理解，公司会聘用一些“意见领袖”式人物，他们不仅自己会应用大量的医疗产品，还能够影响其他外科医生，使他们成为大客户。就像参与药物临床实验的医生，或是像学术和商业环境中提出假说并付诸实验的科学家，外科医生会遵守职业道德，不会违背原则，这几乎无一例外。不过，有幸加入一个成功的设计团队的外科医生会获得丰厚报酬，这也是对其道德标准的严肃考验。

德普的团队由来自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外科医生组成，在世纪之交召开了初次会议。德里克·麦克明的首款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于1991年面世，接替它的伯明翰髋关节早在1997年就应用于植入手术，这极大地刺激着制造商尽快设计出下一款重要的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并安全地投放市场。一款髋关节植入物的成功上市能够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德普的企业领导们（及其外科医生顾问）对此心知肚明，麦克明的早期骨科会议报告也无疑使他们抱着乐观而兴奋的心态。

德普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批准申请，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交了两个版本。两款设计使用相同的髋臼杯，但在股骨一侧有所不同，一款设计使用向下压入股骨髓腔的长柄，被称为ASR XL，就如同铁路道钉。另一款“无柄式”的替代方案实质上是股骨头顶端的一个盖子，上面

设有一个能够固定在股骨颈上的小钉。奇怪的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批准第二种与伯明翰髋关节最为相似的无柄式方案，而在2003年只批准了ASR XL。同年，这两个版本都获得了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批准，[17]市场营销活动也随即迅速展开，华丽的宣传手册和技术指南铺天盖地，来到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手中。

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外科医生于2004年开始植入“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髋关节。2005年12月，“关节表面置换系统”在美国投入使用。[18]然而在短短几年间，美国以外地区植入该器械的患者便出现了问题。起初，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医疗器械与放射卫生中心并没有察觉到美国境内的早期植入失败病例，因为美国没有国家植入物注册系统。

将近50年前，首个关节假体注册系统在梅奥医学中心诞生。那一年，该医院的一名医生成为美国首位进行查恩雷全髋关节植入手术的外科医生。[19]1975年，瑞典隆德大学的骨科学教授戈兰·鲍尔（Göran Bauer）开始筹备全国性全膝关节注册系统（瑞典髋关节置换注册系统后来于1979年设立），要求瑞典的所有骨科医生收录基线信息，并如实对所有患者进行追踪访问。鲍尔是在瑞典接受的医学训练，但在纽约特种外科医院工作了七年，担任研究主任。1969年，他回到瑞典，当时关节置换术逐渐成为一种被公众认可的手术方式。在地方自治的瑞典南部，他感到关节置换术需要标准化和结果评估。于是，始于瑞典各地小医院的、分散的人工假体研究，最终转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关节注册系统。[20]

由于常规的“关节表面置换系统”只修复表面，美国食品和药

品监督管理局将其认定为一种新技术，而不属于510K条款中的医疗器械，这迫使德普开展临床研究，以应对更仔细严格的审查，即“临床试验用医疗器械豁免”（IDE），这极大地放缓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在美国的上市进程。虽然使用ASR的患者在临床试验用医疗器械豁免的研究中得到了德普公司的认真追踪，但是使用ASR XL的患者却没有。读者们一定感到十分惊讶：美国没有一种官方机制，让植入物的制造商能够追踪其产品成功与否。相比之下，丰田汽车有可能知道普锐斯的排气管故障，而德普公司却不了解新型髋关节植入物在美国的表现。

表面看来，外科医生在关节注册系统中分析的是病人，但实际上分析的是植入物的存活能力。它不同于以疾病为基础的追踪患者生命活力状态的注册系统，例如追踪糖尿病患者或者心脏病患者的系统。进行置换手术时，患者资料以匿名方式与其所使用的医疗装置、外科技术以及医生姓名等信息一起录入数据库。因此，全国性关节注册系统可以提供所有外科医生在现实中真正使用的植入物在耐久性方面的宝贵信息。正因如此，外科医生发表文章时无法为自己所设计的植入物筛选病例。众所周知，外科医生在自己报告不良结果方面并不可靠，追求绩效的专业人士往往不愿意承认失败或表明自己判断错误，哪怕他们是无辜的参与者。所以全国性关节注册系统是分析关节置换短期、中期和长期结果的重要工具。

截至作者撰写本书时，世界上只有11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全国性关节注册系统：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罗马尼亚、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北欧关节成形注册协会（NARA）是瑞典、挪威和丹麦的膝关节与髋关节注册系统之间的合作。国际关节成形注册协会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际骨科注册联盟（ICOR）发起了一项运动，希望可

以建立统一的数据收集，加强数据共享，为植入物创建通用条形码。尽管查恩雷先生在关节置换术的发明上遥遥领先，但是英国在2002年才创建了国家关节注册系统。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仍然没有国家注册系统。来自艾奥瓦州的著名骨科医生、医学博士约翰·卡拉汉（John Callaghan）表示：“在植入物的供给和使用上，我们都排名第一。我们也应该是追踪访问的领导者。”^[21]

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于2004年开始植入“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髋关节；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关节置换注册系统（ANJRR）报告德普公司的植入物的修复率高于预期。根据主管部门的总结，髋关节假体的年失败率预期低于1%，意味着植入手术5年之后，95%的患者应该仍然具有功能良好的髋关节。然而，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两年修复率为5.16%，^[22]年轻的患者需要特别强健的髋关节，而该方案作为给年轻患者的植入物解决方案，这一数据是十分惊人的。澳大利亚国家关节置换注册系统主任史蒂文·格雷夫斯教授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通知了德普公司，说这是个“明确无疑的结论，无可争辩”。^[23]但是，正如德博拉·科恩所指出的那样，^[24]尽管不断累积的证据表明“关节表面置换系统”是一颗定时炸弹，德普在此后几年中仍然不停辩解。

植入物失败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起搏器失败（电路传导失灵、电池故障或者断线等），后果有可能立即致命。如果植入物未经适当消毒或者包装不严格，患者可能会受到感染。然而，在“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髋关节案例中，植入物失败意味着，患者将遭遇由设计缺陷或部件植入过程出错而产生的金属碎屑受到折磨。碎屑微粒刺激植入金属部件周围的薄膜组织，引发炎症和急性囊肿，最终导致髋部周围的肌肉、肌腱、韧带和骨骼遭到破坏。那些信任外科医生能够消除髋关节炎疼痛的患者，有时甚至

会出现更严重的疼痛。因此失败的髋关节植入物需要患者接受更为复杂的髋部手术，外科医生必须取出有缺陷的植入物，然后植入修复部件，希望可以将其坚实地固定在剩余的骨骼上。每位经历过多次关节手术的患者都需要承受关节周围肌肉运动功能的进一步损伤，还有肌肉萎缩、疤痕凹陷、活动能力丧失以及疼痛缓解程度的降低。最终，植入的失败更像是在自己喜欢的餐厅中遭遇了威胁生命的食物中毒，而不是在无聊的小酒馆中吃了一顿无味的饭菜。

巴里·迈耶是《纽约时报》医疗保健和商业版块的记者，在过去的十年中，他已经撰写了50多篇有关“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失败和其他医疗灾难的文章。他的第一篇关于关节注册系统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25]2009年，他报道了美国众议院有关创建国家髋关节与膝关节注册系统的议案。^[26]2010年，尽管德普公司还在为“关节表面置换系统”辩护，迈耶对“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植入物的担忧”^[27]已经为这种髋关节的隐患敲响了警钟。他引述了拉什大学和梅奥医学中心的权威外科医生的话，对临床中出现的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置换患者所遭遇的重大失败表示担忧。到2010年，美国有超过1/3的髋关节置换使用的是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成千上万例人工髋关节置换可能失败的前景，确实拉响了警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2009年撤销了对“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许可，其关节注册系统显示出修复手术的需求量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巴里·迈耶在2010年的文章中并未特意提到医疗市场拒绝金属对金属型髋关节，但他发现了令人担忧的失败趋势。迈耶引用了德普公司的辩解说：“与其他材料一样，在少数情况下，金属对金属的磨损碎片可能会在髋关节植入物区域引起软组织反应。”^[28]德普公司在2010年的辩解有不少问题，欧洲

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关节注册系统都提供了客观的统计数据来支撑他们自己的结论，而且法院刚一开庭审理，处理案件的工作人员立刻发现德普的工程师、业务负责人和主管设计的外科医生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关于正在销售的缺陷产品的对话简直可恶至极，令其百口莫辩。

对于某位外科医生来说，“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高修复率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那就是伯明翰髋关节的设计者德里克·麦克明。2005年麦克明先生，在赫尔辛基通过其网站上发布的视频[29]批评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并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预测了它在庆祝进入美国市场的同一年便会身败名裂。视频中的麦克明感叹道：“设计变化的吸引力十分诱人，但历史记录里留下了几处重大错误。”他继续从外科学的专业角度剖析了德普的许多失误：髋臼部件（臼杯）过薄，可发生变形；臼杯小于正常尺寸，直接将过多的压力集中于臼杯边缘，他猜测这会导致植入早期失败；设计过于规格化，会减小允许的误差范围；金属的热处理制造工艺则会增加磨损。尽管麦克明常常肯定个人设计创新背后的追求，但他预测这些变化加在一起意味着“关节表面置换系统”注定会失败，尤其是在外科医生没能完美地放置植入物的时候。最后，德里克·麦克明热切地恳求道：“这一装置需要立即进行全面的重新设计……只是这一次，请选择成功的一方，精确复制伯明翰髋关节。”

2009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国家关节注册系统发布了运用“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髋关节置换术的高修复率：三年7.5%。2010年4月，药物和医疗保健产品监管局（相当于英国的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医疗器械警告，他们注意到“少数植入[金属对金属式]髋关节的患者对人工关节的磨损碎片产生了进行性软组织反应”。由于问题已经十分明显，外科医生们向德普表达

了他们的担忧。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有一名来自英格兰东北部小镇蒂斯的外科医生安东尼·纳尔戈尔（Antoni Nargol）先生，在与德普公司的沟通中，公司告诉他，其他外科医生并没有出现他所遇到的失败。纳尔戈尔做证说，德普公司“告诉我，没有其他人出现问题”。[30]

直到其他人也出现了问题。

注册系统显示，早期的植入失败率很高。数据不断地猛攻，更重要的是非公开的骨科会议中的负面科学报告也越来越多，这导致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销量的大幅下滑。德普公司“于2009年决定，由于需求量下降，将停止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生产”。[31]但是，直到2010年8月26日，德普才召回售出的“关节表面置换系统”，距离内部确定该项目失败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数以千计的患者会继续接受这种有缺陷的植入物。这个决定的经济后果是无可估量的。召回一种医疗器械，意味着公司主动举白旗，承认该器械存在缺陷和危险。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一级召回界定为“产品具有一定的概率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或死亡”。一级召回将自动终止该器械的生产，同时该产品在全球的所有库存都会真正召回公司。悲观点说，这表明德普公司承认一直在供应一种危险的植入物，在随后的法律之战中，这也被认定为公司的第一个战略性措施。在2010年进行召回之前的几个月中，德普公司就已经做好了辩护姿态，但是让患者停止流血，为自己做好准备迎接诉讼风暴的时刻已经来临。

2003—2010年，将近10万名患者植入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髋关节，尽管许多人对手术结果十分满意，并且终身受益，但是可能有数以万计的患者需要移除植入物，进行修复手术。德普公司的和解总金额可能会超过40亿美元，这将取决于跨

地区诉讼听证会上一些判例的结果。跨地区诉讼不同于集体诉讼，集体诉讼是一组原告代表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集体诉讼的案例包括跑步运动员由于伐柏拉姆（Vibram）的五趾鞋涉嫌虚假宣传而获得800万美元的赔偿，还有投资者起诉公司谎报收入等。集体诉讼很少开庭审理，通常不需要消费者参与，原告律师赢下巨额赔偿后销案。

跨地区诉讼审理由联邦小组负责组织，将一小部分案例移交到一个联邦地方法院，该法院的联邦法官将确定全国范围内需要审理的主要案例，并任命各个委员会的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专门办理诉讼产品责任案件（例如涉及植入物或药品制造商的案件）或者证券欺诈案件的原告律师，会非常渴望成为跨地区诉讼委员会的委员。一旦进入这样的委员会，律师会自豪地宣传其委员资质，希望可以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原告。从总体上看，判例决定了被告将提供给原告的和解金额。符合和解条件的受伤患者可以选择从制造商一方获得指定金额的赔付，不过，如果患者认为其案例十分有说服力，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单独起诉制造商。虽然早期的判例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陪审团对上亿名患者的决定，但大多数跨地区诉讼的患者只能获得几十万美元的和解赔偿。真正获得意外之财的是原告律师，尤其是跨地区诉讼委员会中的幸运儿们，“让患者得到应有赔偿”的声誉使他们远近闻名。

俄亥俄州北区的法官大卫·卡茨（David Katz）被选为“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跨地区诉讼案的首席法官。2010年，卡茨法官选取了判例，第一起案例定于2013年在洛杉矶进行首次审理，但是，开庭前不久，德普公司以未公开的金额达成了和解。在首个实际开庭审理的案例中，洛杉矶陪审团判给一名蒙大拿州患者830万美元，包括医疗费用赔偿以及疼痛与精神损失赔偿。输掉了洛杉矶审判后不久，德普在芝加哥赢了一场官司，但在

2013年底，即从全球召回产品的三年后，德普公司与卡茨法官及法庭任命的律师委员会进行了面谈，并同意以25亿美元对美国境内大约8 000起符合条件的诉讼进行和解。德普公司还同意拨出近5亿美元为重症患者提供附加赔偿，并支付私营保险公司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中与医疗和额外手术相关的索赔费用。德普及其母公司同意拨出共计40亿美元来解决“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灾难性事件。对于这家同年矫形产品业务总额为95亿美元的公司而言，和解费用几乎相当于收入总额的一半，这是一笔十分惊人的代价。[32]

患者们得知和解费用高达40亿美元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满意而归。但是，在扣除律师费之后，对患者疼痛与精神损失的赔偿只有16万美元。[33]在美国，律师会获得和解费用的1/3，或者说8亿美元，首席谈判律师和委员会成员会获得1.6亿的额外奖金。患者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之一，他们对这点赔偿金感到沮丧是可以理解的。想象一下，患者承受了几次失败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拿到一张16万美元的支票，而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却拿到了超过两千万美元。它们虽然代表数百名客户，但其中许多人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法律工作。或许，最令受伤患者感到沮丧的是一种被整个系统出卖的感觉——植入物制造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庭、医院甚至外科医生，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马蒂亚斯·温罗思及其合著者在分析“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失败时写道：“医疗植入系统是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由监管部门与其他管理机构、商业组织、执业利益相关方（如外科医生）以及患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组成。”[34]在我们的“科技社会”[35]中，社会运作本身就如同一个实验室，市场和消费者被纳入了其延展的实验空间当中。[36]植入物的测试不应该止步于实

验室，恰恰相反，持续的测试和监督才是最关键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患者实际上也只是不受控制的大型实验的一部分，[\[37\]](#)如果一个社会的监管机制脆弱不堪、迟缓滞后，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么成千上万的患者会受到伤害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对于我这名外科医生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国家关节注册系统是不合情理的。一个自由资本主义者也可以认识到美国医学的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必须更上一层楼。世界上有11个国家或地区跟踪每例全膝关节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正是它们提醒了美国患者和制造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发生的严重问题。建立美国关节注册系统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该系统正式出现之前，我可以向读者们保证，监管工作会继续严格执行。非预期后果定律说明，1996年的《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实际上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同时，使结果的追踪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相关部门正在为建立国家及国际性的关节注册系统进行认真的准备工作。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际骨科注册联盟于2010年启动，以协调14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系统相互配合，但讽刺的是，创建并领导国际联盟机构的国家本身却没有全国性注册系统。

当然，美国的关节注册系统不应该仅仅追踪膝关节和髋关节的置换。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植入了起搏器、心脏瓣膜、人工耳蜗、分流器、导液管、刺激器、锚、脊椎融合器、器官和电子植入物，对于他们来说，一套真正的监督系统是决定生死的。我们根本无法探知植入革命带来的可能性，无论植入物是合金、聚合物还是组织，无论它是大块金属，还是注射型纳米机器人，接受植入的患者一定要相信，关注最终结果评估的医疗植入系统正在追踪着每一个植入物的性能表现。

[\[1\]](#) Philip J. Hilts, Protecting America's Health: The FDA, Business,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Regul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ix.

[2] Ibid., p.3.

[3] Ibid., p.x.

[4] Ibid., p.xi.

[5] “社会丑事揭发派”（muckraker）是一战前美国的一群报刊记者、编辑和作家，搜集并揭露社会黑暗面，曝光工业、商业与政界的腐败丑闻。——编者注

[6] David Greenberg, “How Teddy Roosevelt Invented Spin,” Atlantic, Jan. 24,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1/how-teddy-roosevelt-invented-spin/426699/>.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7] Ibid.

[8] Philip J. Hilts, Protecting America’s Health: The FDA, Business,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Regul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24.

[9] Ibid., p.55.

[10] Ibid.

[11] Ibid., p.93.

[12] Ibid.

[13] Carol Rados, “Medical Device and Radiological Health Regulations Come of Age,” FDA Consumer Magazine, Jan.–Feb., 2006, <https://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productregulation/medicaldeviceandradiologicalhealthregulationscomeofage/default.htm>.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4] Meryl Gordon, “A Cash Settlement, but No Apology”, New York Times, Feb. 20, 1999, <http://www.nytimes.com/1999/02/20/opinion/a-cash-settlement-but-no-apology.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5] I. D. Learmonth, C. Young, C. Rorabeck, “The Operation of the Century,” The Lancet, 2007, 1508–19.

[16] G. K. McKee, J. Watson-Farrar, “Replacement of arthritic hips by the McKee-Farrar prosthesis,”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66, 48 B:245,

[17] D. Cohen, “Out of joint: The Story of the AS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May 14, 2011, 342:d2905.

[18] <https://www.depuysynthes.com/asrrecall/depuy-asr-recall-usen.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9] C. Delaunay, “Registries in Orthopaedics,” *Orthopaedics & Traumatology: Surgery & Research*, 101 (2015), S69–S75.

[20] P. Slatis and B. Veraart, “Goran Carl Harald Bauer: 1923–1994,” *Acta Orthopaedica Scandinavica*, 65: 5, 491–8, 1994.

[21] Barry Meier, “A Call for a Warning System on Artificial Joi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8.

[22] Australian Orthopedic Association. National Joint Replacement Registry, annual report 2007. AOA, 2008.

[23] D. Cohen, “Out of joint: The Story of the AS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May 14, 2011, 342:d2905.

[24] Ibid.

[25] Barry Meier, “A Call for a Warning System on Artificial Joi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8.

[26] Barry Meier, “House Bill Would Create Artificial Joints Registry,”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09.

[27] Barry Meier, “Concerns Over Metal on Metal Hip Implants,” *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10.

[28] Ibid.

[29] <http://www.mcminncentre.co.uk/research-lectures-debate.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0] Barry Meier, “Doctors Who Don’t Speak Out,” *New York Times*, Feb. 15, 2013.

[31] DePuy Orthopedics Inc. 2010. “DePuy Orthopedics Voluntarily Recalls Hip System,” <https://www.depuysynthes.com/about/news-press/qs/depuy-orthopaedics-voluntarily-recalls-asr-hip-system---depuy>.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2] http://www.annualreports.com/HostedData/AnnualReportArchive/j/NYSE_JNJ_2013.pdf.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3] Barry Meier, “Frustrations from a Deal on Flawed Hip Implants,” New York Times, Nov. 25, 2013.

[34] Matthias Wienroth, et al., “Precaution, governance and the failure of medical implants: The ASR hip in the UK,”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2014, 10:19.

[35] Andrew Barry,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Press, 2001).

[36] Matthias Wienroth, et al., “Precaution, governance and the failure of medical implants: The ASR hip in the UK,”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2014, 10:19.

[37] D. Cohen, “How Safe are Metal-on-Metal Hip Implant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Feb. 28, 2012, 344: e1410.

第十四章

医疗产业园区与医疗器械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铁路在西部的扩张将整个大陆的林地、农田、石油生产设施和港口连接起来，摩根、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和杰伊·古尔德等实业家纷纷涌现，促进了美国内陆城市的发展。虽然石油生产在1901年以前相当有限，但中西部大油田的发现使石油产业从轻型润滑油工业转变为燃料生产工业。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当时已经从一个西部的偏远小镇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铁路四通八达，深水航道通向海洋。

20世纪初期，距离休斯敦建城不过百年，它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其银行“依靠石油、棉花和木材企业的丰厚利润，具有一定的偿付能力，能够为商业投资提供急需的贷款”。^[1]有两对兄弟决定将他们从事棉花贸易业务的安德森与克莱顿公司（Anderson, Clayton and Company）从俄克拉何马市转移过来，希望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得州东南部小镇发家致富。该公司由门罗和弗兰克·安德森兄弟，以及弗兰克妻子的兄弟威尔·克莱顿（以及后来的本·克莱顿）创立，自1904年成立以来，一直相当成功。

父亲过世时，门罗·安德森只有五岁，他一直在田纳西州的杰克逊镇生活。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本科教育的门罗在杰克逊镇做银行出纳期间，学到了一些常识性的银行业务知识，远程管理安德森与克莱顿公司账目几年之后，他于1907年决定搬到休斯

敦。虽然公司直到1916年才将总部迁到那里，但是门罗本人在这座蓬勃发展的港口城市扎根30年之久。他一辈子住在小旅馆里，终身未婚，精打细算地存着钱。

随着休斯敦航道于1914年竣工，休斯敦港成为美国最繁忙的枢纽之一，棉花贸易的中心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移到了美国。欧洲公司由于市场疲软、运输风险高以及缺乏仓储等因素的影响，在业务竞争中让位于像休斯敦这样的棉花贸易中心。安德森与克莱顿公司等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不但经受住了战争的风雨，而且在“兴旺的二十年代”里迅速成长。在一路奔向成功的途中，弗兰克·安德森于1924年死于阑尾炎，享年56岁。这再次提醒我们，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生命是何等脆弱。弗兰克的离开也使门罗强烈地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

1936年，身体状况欠佳的门罗·安德森建立了一个基金会，那时他的私有公司市值约一亿美元。尽管安德森从来不吸烟、不喝酒，在旅馆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还是患上了肾病和心脏病。^[2]直到1938年中风后，他才搬到城南靠近莱斯大学校园的一所房子里，他将在那里度过最后几个月，直到1939年去世，享年66岁。门罗兢兢业业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贸易公司，精打细算地储蓄和投资，如今，他的两千万遗产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基金会的执行官们十分精明，他们知道将这笔遗产散发给许多妥善经营的慈善团体会有有一定的意义，但可能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简直令人惊叹。

读者们可能一直在想，为什么门罗这个名字听上去并不耳熟，直到看到他的全名：门罗·达纳韦·安德森（Monroe Dunaway Anderson）。他创立的基金会通常被称为M.D.安德森基金会。

1941年，美国税务局正式认可了M.D.安德森基金会的合法性；同年，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议案，批准建立一家州立肿瘤医院。M.D.安德森基金会拿出了它的第一笔重要拨款，为建立世界上最早的肿瘤专科医院之一捐赠了50万美元，条件是这家医院必须建在休斯敦。医院在休斯敦的著名律师詹姆斯·贝克[3]位于奥克斯的故居运营了十多年。

1925年，赫尔曼医院（Hermann Hospital）在休斯敦市中心以南4英里的一片与世隔绝的“湿地”上建成了。[4]在赫尔曼医院周边，休斯敦市还有134英亩[5]的林地未被开发过。1943年，M.D.安德森基金会提出以50万美元在赫尔曼医院旁边建设一家占地面积20英亩的肿瘤医院，出资100万美元为贝勒医学院与牙科学院建设新的教学园区，将其从达拉斯迁到休斯敦，每年向贝勒医学院提供10万美元的医学研究资金，为期十年。提案得到了通过，二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动工。1948—1949年，在全国的一系列建设热潮中，医院、临床大楼和医学院等建筑从城南林地中拔地而起。

1954年是那片土地的关键一年。包括贝勒医学院和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内的几幢主要建筑开始营业。尽管只有15年的历史，M.D.安德森基金会已经拨款1 400万美元，并通过精明的投资和管理，使其资产增长到2 400万美元。基金会管理的资产和拨款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让最初的1900万美元翻了一番。在那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为建设医学园区而集中捐赠的做法正在实现一种奇迹。

不论当初那些年的建设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如今屹立于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绝对超越了往昔。现在，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建设热潮的这片建筑群名为得克萨斯医学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园区；同时，它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视觉展览，医学世界自

植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在这里一目了然。摩天大楼式的医院和临床建筑以及四通八达的马路构成了一座微型都市。相比之下，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市中心都逊色不少。短短几十年间，医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如今，得克萨斯医学中心占地1 345英亩，拥有280座建筑和5 000万平方英尺（约46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6\]](#)这里有三所医学院（贝勒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分校以及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和众多医院，包括赫尔曼纪念医院（Memorial Hermann）、卫理公会医院（Methodist）、圣路加医院（St. Luke's）、得克萨斯儿童医院（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医院）、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世界上最大的肿瘤医院）、得克萨斯心脏病医院、卫理公会德贝基心脏病医院（Methodist DeBakey Heart Hospital）、德贝基退伍军人医院（DeBakey Veterans Hospital）、圣殿医院（Shriner's Hospital）等等，总共具备超过9 000张病床。每年有超过10万名员工和1 000万名患者在这里相遇，其中包括75万例急诊患者和2.5万名新生儿。得克萨斯医学中心是世界第八大商业区，创造国内生产总值250亿美元，这个数据甚至领先于许多国家。

得克萨斯医学中心所占据的那两平方英里是技术与运筹的奇观，考虑到它最初的本金来自一位低调地住在休斯敦城市旅馆的单身汉，就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M.D.安德森基金会向得克萨斯医学中心各研究机构捐款超过8 100万美元，[\[7\]](#)为其他机构捐款的数额是其两倍以上。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个建筑群所形成的迷宫可以说是一座医疗产业园区。在休斯敦，以及著名的波士顿、纽约和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等地，医学产业化的景象都令人叹为观止。其实，全美各地从城市到乡村，都分布着临床大楼、实验室、医院、康复中心、治疗室、手术中心和业务办公

室。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医疗产业园区所取得的成就，考虑一下得到治疗的患者数量，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西方人使用了体内植入物？也就是说，我们与其关注医院和医学园区有多少建筑，不如思考多少人的体内有医疗产业的产物。

第一，什么是植入物？在本书中，植入物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几百年来，原始外科手术主要依靠肠线和丝线缝合，这两种缝合材料都会迅速在人体内降解。由于免疫系统的快速降解和破坏，在缝合几周后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缝合线显然属于暂时性植入物，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关切。本书的关注点是“永久性植入物”。每个医学专科都会使用永久性植入物，这些植入物会保留在体内，直至死亡。最简单的永久性植入物是“不可吸收的”缝合线，通常由合成聚合物制成，如聚酯纤维或聚乙烯。除了表皮活检、切除小囊肿或切除皮下脓肿，几乎所有接受过手术的人都在体内留下了永久性缝合线。在20世纪50年代植入革命爆发以前，人工合成的不可降解的缝合线还是很不可思议的，而如今，它几乎无处不在。

第二，植入物是由什么制成的？植入物由塑料、金属、有机物、生物和电子材料制成。

有机植入物是植入患者体内的非活性组织，最常见于治疗骨骼肌肉缺陷的骨科手术。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对人体骨骼进行净化、处理并灭菌，然后移植给骨骼缺损的患者，比如说骨折无法愈合的患者。另一个例子是年轻运动员接受尸体（器官捐赠者）的腓绳肌，以进行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这些移植不需要组织配型或者说供体匹配，因为它们没有生命活性，也不需要发挥生物学功能。最后一种是“异种移植”，即移植来自其他物种的植入

物，比如猪的心脏瓣膜常用于患有心脏瓣膜疾病而不适合瓣膜修复或置换机械瓣膜的病人。

生物性植入物是具有活性的组织和器官，经过专门获取、处理和运输后，被立即植入患者体内。肾脏、心脏、肝脏、胰腺和肠管等器官移植，就是指有活性的功能性器官通过手术植入体内，并重新连接血管和软组织，使器官发挥功能。不可降解的缝合线和金属卡子会用来固定器官，但移植的核心当然是器官本身。器官来自一名捐赠者，他可能与患者认识，也可能毫无关系，可能已经脑死亡，也可能还活着。他与接受者配型成功，从而降低了移植的风险，这类移植的风险包括器官排异甚至更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是移植器官内的免疫细胞在受体内向宿主组织发动的全面战争。

典型的生物性植入物是植入的另一个生命。我们人类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中让生物性物质（精子和卵子）结合，然后将受精产物以低于冰点的温度存储在大金属管中，经历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再将微型胚胎植入女性体内，就能生长出另一个生命。这种暂时性的、为期九个月的植入物初听起来令人神魂颠倒，就像一部希腊戏剧中众神从冷冻的大锅中繁衍出生命。但这种技术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奇迹感也就逐渐消失了。体外受精（IVF）的奇妙程度无异于提议在火星上建立一个人类殖民地，但这种技术在美国每年使用超过6万次，全球每年35万次。近些年来，美国通过体外受精而出生的生命超过了100万，全美新生儿中有将近2%来自体外受精。[\[8\]](#)

可以说，“试管”婴儿就是一个为期九个月的暂时性植入物，但令人惊讶的是，新的发现表明所有女性都能够通过“母胎转移”（fetomaternal transfer）过程来庇护其胎儿的细胞。在这个过程中，胎儿细胞透过胎盘屏障，在母体内形成胎儿细胞的“微

嵌合体”。[9]细胞向母体的转移可能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但也可能对宿主构成威胁，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不论是自然受孕，还是通过体外受精怀孕，形成的胎儿都能够“永远活在”母体内，即使他们并不十分“匹配”（这通常会导致细胞排斥）。总之，母胎转移可能是一种我们最近才认识到的古老现象，但是，体外受精这种新技术第一次使完完全全的异体细胞住进一名女性体内（如果卵子来自另一名女性的捐赠，那么胎儿与母体之间没有共享基因，这在采用体外受精技术的高龄女性中十分常见）。胚胎这种生物性植入物的最终表达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生物学结果，不过在那之前，以玻璃移液管、液体生长媒介以及冰冻储存室来创造生命，依然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现象。

塑料（或聚合物）植入物由有机聚合物制成，最常见的是从石油等石化产品中制成的。有机聚合物通过化学反应合成，产生的分子具有长链的重复结构，如同一串串连在一起的曲别针。由这些简单结构单元构成的链有可能极长，由成千上万个单元构成，而且链本身能够被横向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块聚合物。自然界本身也有聚合物，例如动物的角、毛发或者植物的纤维素，[10]但是，二战后出现的通过聚合作用合成塑料的能力，引起了包装、运输、制造、服装以及医学等领域的革命。

通常，蛇形骨架般的长链聚合物具有化学惰性，不发生化学反应，也无法生物降解。塑料有种特性，使其难以回收（以石油炼制的传统塑料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即使分解成不完整微粒），还使其得以稳定地藏身于生物系统中，不被标记为入侵者。正是这种特性，让塑料成为理想的植入物材料。我们的免疫系统根本还没有进化到能将聚合物识别为外来异物的水平，只要聚合物无菌且结构完整，身体就会耐受，适应甚至欢迎这种植入物。

聚合物所制成的产品可以像岩石一样坚硬，也可以是柔软的塑料。化学工程师几乎能够配置出任何形状、任何尺寸的植入物，并设定材料在不同压力、热度和摩擦条件下的特定性能。几百年来，炼金术士试图把大块的土地变成黄金和贵金属，根据物质守恒定律，我们知道这种行为根本就是愚蠢蛮干，然而如今的科学家们能够从石化污泥中生产奇妙的材料，就如同炼金绝技。

金属材料常见于骨科、心血管外科以及植入电子元件的患者体内。金属植入物的主要成分是钴、铬、钼、钛、镍、碳、铂、金等等。矿业公司在地球上四处寻找着独特的矿床，这些矿床在地球上依旧存在古老地壳表面的地盾区域，例如非洲内陆、澳大利亚西部和加拿大尤为集中。从矿床中开采出的矿石可以产出微量的所需矿物质，经过处理和提纯后可制成合金，最终生产出植入物。

矿物质是“自然存在的固体无机物，呈晶体结构，不论来自哪里，都具有一致的化学成分”。[\[11\]](#)从某种意义上讲，“制造一种金属”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发现、开采和加工处理矿物质。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铬铁矿床在南非、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12\]](#)而超过一半的钴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13\]](#)通过冶炼——运用热力和化学还原剂来提取金属——可以分离出纯金属，生成原材料的棒料。植入物制造商就用这些金属原料来制作植入物，仿佛在享用一场为外科手术植入物而准备的国际材料自助餐。一位接受全髋关节置换的患者体内可能有来自非洲、亚洲和北美洲的金属，以及来自北美洲的聚合物。

1893年，佩昂在巴黎使用的肩关节假体由铂和橡胶制成，直到半个世纪后，使用合金材质的大关节柄进行的关节置换手术才变得可行。1937年，抗生素即将应用于临床之际，骨科先驱们通过动物实验测试了各种合金材料的螺丝钉，最终确定了一种

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用合金的混合金属。加工和灭菌处理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让骨科植入物在疾病治疗的武器库中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仅限于关节置换术和骨折的钢板固定。在植入革命的起步阶段，切合实际地使用矿物质的唯一方法是植入大块金属，但在十年之后，金属线就可以插入体内。

如今，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患者在体内植入了心脏装置。这在几十年前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心脏病发作或心律失常的病人往往会直接死亡。几乎每位读者都会想起一位长辈死于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发作的故事，心绞痛和中风实在太过常见，让我们几乎忘了，我们开始有资格期待甚至要求心脏疾病发作后能完全康复，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金属在心脏中最常见的应用是冠状动脉支架和起搏器中的金属线。一般说来，全世界每年有超过50万台的冠状动脉支架手术，[14]后面我将说明，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预计到2021年，起搏器植入手术将超过200万例。[15]支架的运用比起搏器安装晚了30多年——实际上，向心脏的肌肉中插入金属线要比向细小的冠状动脉中穿入可扩张的网笼容易得多。

事实上，每种医疗干预都涉及某种类型的现代材料和新型技术。不相信我吗？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被一颗生锈的钉子划破了腿之后去看急诊。首先，你会遇到一名分诊护士，她负责将你的信息录入电子病历数据库，这是近年才发明并完善的技术；然后静脉注射，运用到了具有柔韧性的现代聚合物；开始滴入抗生素，这是最近50年才出现的药物；输液袋由特殊的非反应性塑料制成。护士会用皮下注射器为你推入一针破伤风抗毒素。注射器本身的成分就错综复杂，它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石化材料的衍生聚合物制成，经过消毒和专门包装，运到这个五脏俱全的急诊中心。抗破伤风药物的生产需要高度的精密性、复合式机械装

置、专门的实验室以及层层监管。伤口的妥善清洁需要一种微型手术，所以护士打开专门的工具包，擦拭皮肤，用一次性蓝色洞巾覆盖伤口的周围区域。美国市面上的洞巾包可能是在波多黎各组装的，该地也生产用于静脉注射的液体。这就是为什么“玛丽亚”飓风对该岛造成了巨大破坏之后，美国的医疗系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急诊医生戴的无菌手套更是科技的奇迹，它们由不含乳胶的聚合物制成，在芝加哥一家技术先进的工厂进行消毒和包装。尼龙缝合线由强生公司在佐治亚州的科尼利亚制作而成，与之配套的微型缝合针由一种非常先进的合金制成，而且经过了无菌包装。用来给缝合针穿线的工具装在专门配置的小缝合包里，同样由特殊塑料和适量的金属制成。即使在护士撤掉静脉注射后，贴在扎针处的创可贴也有自己的小故事：在企业经营上敢作敢为的强生兄弟正是从小小的创可贴起家开创帝国的。护士会把一块新斯波林（Neosporin）软膏厚厚地涂在伤口处，这种软膏的研发、制作、包装和经销的历史本身就能写上一个章节。一小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完全不用像我们的祖父辈那样，担心自己会死于破伤风或因异常的感染而失去一条腿。尽管你的这件糟心小事里不需要用到任何植入物，但就算有这个需要，医疗产业园区也能应付自如。

心脏病发作时的复苏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拨打911后，救护车会瞬间出现在门口，将病人送往医院的心血管造影室，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会传送美敦力（Medtronic）心电图报告，这个心率报告本身就为判断心脏病发作类型提供了强大的信息。病人进入“导管室”后，心脏病专家及其医疗小组会同样神奇般地现身，随时准备好挽救生命，他们马上开始从腹股沟进行大量的静脉输液。几分钟内，一根纤细而灵活的金属线就沿着主动脉蜿

蜒向上通往心脏，进入冠状动脉，通过气囊血管成形术扩张动脉。

在人类历史上，急性冠状动脉阻塞的病人从来都是死路一条，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医院的导管室中，心脏科医生已经能够站在病人旁边，通过操纵一根导线末端的控制器，用微型充气球囊来清理一小段动脉，再按照需求用弹簧笼式合金支架将动脉支开。用于静脉注射的聚合物、消毒洞巾、透视检查（实时X射线成像）、专业包装以及麻醉对于所有这样的医疗干预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成为常态，可靠到我们忘记了其中的每一项技术都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植入物本身通常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现有数据会让我们怀疑，如果有些患者并没有经历急性心脏病发作，也几乎没有出现心绞痛，但心电图异常，那么植入动脉支架是明智的吗？尽管如此，在出现一定征兆的情况下，放置支架在世界范围内显然具有广大的市场。

科学家们可以选择的一系列材料，包括聚合物、金属以及极为先进的电子元件（更不用说有机植入物和生物性植入物的创新发明），与先进的制作和包装工艺加在一起，已经改变了制造商对待急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方式。与制药业相似，市场分析推动着植入物的制造商对医疗器械创新的研究和思考。如果数据能证明一项投资合理，科学家和顾问医师将组成工作团队，希望在几年的时间里，经过上千小时的研究，实现具有市场潜力和临床影响力的技术突破。这种项目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因为发明一种新装置极其困难，它必须有效、安全、新颖、确保能够制造、可以产生利润、不侵犯他人专利。

如果奇迹发生了，一项医疗器械的发明将改变许多人的生命并获得经济效益上的成功。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在跟踪植入

物状态的医疗器械注册系统方面滞后到令人尴尬的地步。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推进注册系统的建设，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患者的安全性，提高手术的有效性，进而推动更多的医疗器械创新，达到更好的健康效果，无论是继续使用医疗装置，还是不使用医疗装置。正如珍妮·伦策（Jeanne Lenzer）在《我们体内的危险》（*The Danger Within Us*）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对世界上的植入装置并没有准确的认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要全方位了解医疗产业园区和植入革命，研究人员不能仅仅注视着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摩天大楼和财务报表，还必须将目光投向接受植入治疗的患者——生活在我们当中，体内装有植入物的人们。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想过按年份统计植入装置的数量，当然也没有人评估过美国人或欧洲人当中体内有植入物或医疗装置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至今依然如此。

[1] William Henry Kellar, *Enduring Legacy: The M.D. Anderson Foundation and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7.

[2] *Ibid.*, p.41.

[3] 詹姆斯·贝克，是里根总统的参谋长兼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的祖父。——作者注

[4] *Ibid.*, p.xxi.

[5] 1英亩约为4 000平方米。——编者注

[6] *Ibid.*, p.182.

[7] *Ibid.*, p.196.

[8] 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ttp://www.sart.org/>

globalassets/_sart/infographics/number-of-clinics-treatments-births.png.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9] G. S. Dawe, et al., “Cell Migration from Baby to Mother,” *Cell Adhesion & Migration*,1(1): 2007, pp.19–27.

[10] M. F. Maitz, “Applications of synthetic polymers in clinical medicine,” *Biosurface and Biotribology*, vol. 1, 2015, pp.161–76.

[11] <http://education.seattlepi.com/can-minerals-form-deep-within-earth-6008.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2] <https://www.britannica.com/technology/chromium-processing>.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3] <http://www.mining.com/web/global-cobalt/>.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7/11/placebo-effect-of-the-heart/545012/>.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5] <https://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6/12/15/897773/0/en/Global-Cardiac-Pacemaker-Market-will-exceed-USD-12-00-billion-by-2021-Zion-Market-Research.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第十五章

心脏外科

1896年，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斯蒂芬·佩吉特断言：“心脏外科可能已经达到了自然界给所有外科手术设下的极限：人类没有新方法也没有新发现来攻克心脏创伤治疗面临的难题。”^[1]

第一款植入型心脏装置的故事彰显了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从初期令人失望的结果，到一批具有牺牲精神的患者同意在自己身上展开无畏的医学探索，再到遭遇灾难性失败后重新调查研究，最终一小群研究人员凭着近乎病态的决心获得了成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里，电子元件仅在心脏外科使用。如今，植入型电子装置广泛应用于普通外科、泌尿科、耳鼻喉科、神经外科、骨科甚至妇科。这些植入手术的故事倚赖外科技术的改善、麻醉学的进步、抗生素的问世、冶金技术的提升以及现代电子学的发展，尤其是晶体管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尽管治疗消化系统与骨骼肌肉的手术取得了进步，但没有人敢动心脏。脑部受损、猝死和手术失败的风险如此之大，根本没有理由选择手术。1938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罗伯特·格罗斯进行了动脉导管结扎术。动脉导管是胎儿时期连接肺动脉与主动脉的小动脉，帮助胎儿绕过没有功能的肺，动脉导管应该在出生几天后自然闭合，但如果没有闭合，持续开放的动脉导管会使婴儿患病。

1944年，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为一名患有“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的儿童进行了姑息性手术治疗。法洛四联症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缺陷，肺动脉瓣过窄，导致右心室肥大，室间隔缺损，以及主动脉骑跨，即主动脉排空左右两心室，而不只是左心室。简单地说，法洛四联症患者的心脏所具有的一系列器质性缺陷，使它无法为血液充分供氧，婴儿的氧合功能严重受累，导致皮肤呈青紫色，也即“新生儿发绀”。要治疗这种疾病，医生必须切开心肌壁，看到心脏内部，但是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外科医生能想出一种“打开”心脏却不杀死病人的方法。法洛四联症等于死刑，而布莱洛克进行了一种姑息性手术——从心脏外部接通大血管——这个权宜之计确实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1952年9月2日，F. 约翰·刘易斯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心内直视手术，他通过全身降温和血流停滞的方法打开了一名五岁女孩的肝脏。在手术室里，医护人员把这名儿童安置在盛满冰水的饮马箱中，将其体温降至28摄氏度，打开胸腔后，夹住流入心脏的血管，使血流停滞。他通过手术迅速封闭室间隔的病理性孔隙，再进行加温使患者复苏，从而平安渡过手术难关。50多名心室间通路异常的儿童接受了这种手术治疗。然而，由于担心加温复苏不一定能够恢复正常心率，明尼苏达的外科医生们开始思考另一种打开心脏的方法。

刘易斯所取得的进步鼓舞了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约翰·吉本医生，他于1953年用人工设备为血液供氧，给一名同样患有这种心脏缺陷的18岁少女进行了手术。垂屏式氧合器（screen oxygenator）后来又叫“梅奥-吉本心肺机”（Mayo-Gibbon heart-lung machine），虽然大而笨重、结构复杂且造价昂贵，但首次应用确实取得了成功。这台机器的大小与一辆卖热狗的小货车相

当，通过一系列塑料管与患者连接起来，用持续运转的德贝基滚轮泵实现血液的体外循环。患者不仅平安渡过了世界上首例使用心肺转流术的心内直视手术，她的人生又继续了47个年头，直至65岁才去世。 [2]不幸的是，吉本接下来的三位患者或死于手术室，或术后立即死亡。该设备的研发历经19年，其间有数不清的动物手术、数不尽的调查研究，然而，到了1954年，他决定暂停所有心内直视手术至少一年，同时试着改善结果。对于吉本医生来说，那一定是十分沉痛的打击；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做过心内直视手术。 [3]

明尼阿波利斯的外科医生们也在研究自己的心肺机（进展甚微），他们还以生物学方案进行了创新。1954年初，在一次临床医师献计献策的讨论会上，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说，自己怀孕的妻子能够以流入子宫的血液来支持胎儿的心肺功能，给出了另一种思考角度，于是“交叉循环”的概念诞生了。研究小组尝试以一只狗作为“外部生物性心血管设备”来为另一只狗做手术。在狗的身上做过几十次实验之后，明尼苏达大学的沃尔顿·李拉海（Walton Lillehei）医生为一名一岁男孩进行了手术，而作为“生物性氧合器”与患儿连接在一起的是他的父亲。我们只能想象，母亲痛苦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躺在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去做交叉循环手术，勇敢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维持着幼子的生命。那一天，“对心内直视手术的普遍悲观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4]尽管患儿在11天后死于肺炎。李拉海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带领着自己的医护组通过交叉循环的方法进行了45例手术，每次患儿都在父亲或母亲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持下渡过难关，2/3的患者手术成功并出院。重大心脏缺陷得到了治疗，其中包括心房和心室缺损（心内孔隙），甚至还有法洛四联症。得这些病在一年前还等于死罪难逃。1955年，也就

是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初次进行发绀婴儿手术的11年之后，李拉海医生积累了一年的手术经验，在费城的美国外科协会的会议上，就首批法洛四联症患者的数据做了报告，布莱洛克也在听众席中。

在连续接受手术治疗的10名患者中，6例结果极好，4例死亡，死亡全部在术后几小时内发生。如今的我们是无法容忍这种失败率的，但在1955年，这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沃尔顿·李拉海读完文章之后，布莱洛克评论道：“作为一名保守的老外科医生，我可能不应该评论这篇论文。不得不说，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见到这种手术操作得以实现的一天。我要赞扬李拉海医生、瓦尔科（Varco）医生及其同事们的想象力、勇气和事业上取得的成绩。”^[5]在科学领域，当朗读一篇开创性报告的声音在灯光幽暗的会议厅中回响，在座的每位同行都体会着那一历史时刻的分量。如同航空工程师在火箭发射成功后挥舞着旗帜相互拥抱，费城那间会议室中的外科医生们一定也擦着幸福的泪水，重获乐观的力量。30年后，在1985年的胸外科医师学会的会议上，李拉海医生介绍了45名患者的长期结果。惊人的是，在27例患有室间隔缺损的病人中，有17人还活着，如果没有手术，他们根本不可能活下来，所以这一发现令人赞叹。丹顿·库利医生是心脏外科史上伟大的先驱之一，报告结束后，他在讲台上说道：“李拉海医生为胸外科医生能够遇到的最大规模的野餐提供了开罐器。”^[6]尽管交叉循环心肺支持这种方法使用的时间很短，但它打开了心内直视手术的大门。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受到了启发，开始思考这种“不可能”的手术……或许，一切皆有可能。

沃尔顿·李拉海及其医护组向世人证明，严重的心脏缺陷是可以治疗的，这重新唤醒了研究人员继续完善人工心肺机的追

求。大家都认为，经梅奥医学中心改装的吉本心肺机，实际使用起来过于昂贵。李拉海医生找到自己年轻的实验室研究团队，希望可以研制出一台更好的设备。设计负责人是理查德·德瓦尔，他刚从医学院毕业，准备一生与实验室研究设备为伴。德瓦尔从一块干净的石板开始，用弯弯曲曲的软管、泵、针和氧气罐组装出一台“鲁布·戈德堡”[7]式的奇特装置，成为“机械设备领域的麦吉弗[8]”。[9]德瓦尔没有使用易碎的玻璃管，而是选择了聚乙烯塑料软管。与玻璃管相比，塑料软管具有双重优势：它更廉价，而且与血液发生反应的概率低得出奇。德瓦尔的小额预算实际上成了一种优势，促使他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聚合物革命。他使用的聚乙烯管来自附近一家工厂的泵蛋黄酱的管道。

德瓦尔的鼓泡式氧合器造价低廉，可重复生产，更重要的是有效果。在1954年的试验性手术阶段，李拉海通过使用交叉循环向世人展示了心内直视手术的可行性；到1955年中期，鼓泡式氧合器已经成为这种开创性手术中维持生命的主要方法。如今，西方国家的每家大医院里，心肺转流机都是心脏外科手术中维持患者生命的工具。转流机研发的完整历史在这本书里是写不下的，不过研发过程与其他医疗器械的研发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由各大洲的精工巧匠自筹资金，进行开荒性质的研究，几经失败，终成正果。心内直视手术曾经只能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及90英里外的梅奥医学中心进行。尽管手术本身很成功，但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术后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

几百年来，科学家们为人体带有生物电的性质深深吸引，其中最能体现人体生物电概念的就是心脏。电脉冲来自被称为天然“心脏起搏器”的窦房结，向房室结传达讯号，从而推动心室的收缩。大脑并没有告诉心脏要收缩——心脏有自己的节拍器，像一个内置的电子计时器，有节奏地激发整个心肌（见彩插

15.1)。把手放在胸前，你所感到的怦怦颤动就来自正在收缩并将血液挤向全身的心脏。把手移向颈部，可以感觉到气管旁边的脉动，那有节奏的敲打声是心脏瓣膜猛然关闭的回响，整齐而均匀地响应着心脏肌肉的切分收缩。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发生时，心脏的电脉冲传导失去了控制，患者出现严重的心动过缓、低血压以及心功能极度减退。实际上就是心脏这个肌肉泵的功能不协调，除非使电脉冲传导正常化，否则无法维持生命。明尼苏达的外科医生团队一直在寻找应对心脏起搏发生紧急情况的方法，并且用一种简单的实验室电测试设备“格拉斯刺激器”（Grass Stimulator）挽救了一名儿童的生命。

1957年1月，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儿童经心内直视手术修复室中隔缺损后，发生了严重的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生理学家曾经建议过心脏科用他们的实验室设备“格拉斯刺激器”刺激患儿心脏收缩，该设备会产生小幅电压。在全球生理实验室和时至今日的小学课程中，还有用刺激器通过电线向测试对象发送小幅电脉冲的实验。想使一只青蛙的腿做出跳跃动作，生理学家需要先把细小的电线戳进青蛙的腿部肌肉，将青蛙腿与格拉斯刺激器连接起来，再通过调压调速，使肌肉产生收缩。经过对狗的初步测试，李拉海小组希望刺激器能对儿童的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有效。

于是在1957年，当一名儿童在心内直视手术后出现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李拉海医生带领其医护组将一根绝缘线插入了患儿的心脏肌肉中，与刺激器连接起来，他发现自己成功了——他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通过调动表盘，李拉海可以使病人的心跳频率增加。威廉·哈维应该会十分欣赏这精妙的装置。尽管刺激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现实当中，用电流来维持生命需要考虑非常庞杂的组织统筹工作。格拉斯刺激器与一台微波炉一样

大，需要交流电源插座和延长线。在实际操作中，从手术室到病房之间需要一根100英尺长的延长线，才能保持设备通电以维持患者生命。想象一下，在心内直视手术后，心脏科的医生们用病床推着一个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小孩子走出手术室，孩子还插着管，麻醉师监视着孩子的呼吸，外科医生们沿着走廊一路拉着橙色延长线，以确保心脏起搏的频率可以维持生命。

对于出现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的患者来说，交流电力式心脏刺激器就是他们的生命线，然而，1957年10月31日，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医疗灾难事件，一次全市范围的停电波及医院病房，结果导致一名年轻的患者死亡。对李拉海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患者的生命竟然绑定在墙壁的电插座上，这令他感到十分懊恼。他咨询了当地的电气工程师和电子学专家，研究是否有可能缩小刺激器，生产出一种由电池驱动的微型产品。李拉海发现，大多数出现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的患者在几周内就会恢复自己的窦性心律，他希望某种创新发明可以使患者摆脱电插座的束缚，帮助他们过渡到心功能恢复正常的阶段。李拉海找到了年轻的工程师厄尔·巴肯（Earl Bakken）——这是医学史上又一个伟大时刻。

1949年，厄尔·巴肯和他的姐夫帕尔默·赫蒙斯利（Palmer Hermundslie）创立了一家公司，专门维护和维修明尼阿波利斯地区医院的电子设备，然而，工作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8美元，他们做了一台离心机的检修。[\[10\]](#)新兴电子工业和晶体管的蓬勃发展，使这些维修工意识到，城镇的医院需要有人为他们维修所有的小设备。巴肯是明尼阿波利斯本地人，1941年从高中毕业后，他应征入伍，成为陆军通信团的一名雷达指导员兼维修技术员。他一生对家用电子产品的爱好，自然而然地引导他在部队中从事了相应的工作。90多岁的巴肯仍然说，他发现“看到、听

到、触摸到甚至闻到老收音机、老机器和电子设备，都会使他的内心深处感到无以言表的快乐。只有明白电子产品来龙去脉的人，才能欣赏它们所具有的魔力。他热爱这些设备，不仅因为它们的功能，更因为它们实现了这些功能”。[\[11\]](#)这种情感让我们想起史蒂夫·乔布斯等创业能手，同时也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发明创新者都是“在车库里折腾的人”，他们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一个想法，并亲手打造解决方案。

战争结束后，厄尔·巴肯回到明尼苏达，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并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对其职业选择感到惊讶，他从小就擅长发明各种小装置。厄尔小时候看过电影《弗兰肯斯坦》，对故事中赋予生命的电力深深着迷。他后来回忆道：“合理地运用电力，不仅能够点亮房间或者按响门铃，还能实现许多事，我对此深感敬畏。我意识到电定义了生命。当电流动起来，我们就活着；没有电流时，我们就死去。”[\[12\]](#)

厄尔·巴肯上大学时，经常穿过马路去学校的医学院，认识了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的工作正越来越依赖电子设备。这些交往也促使巴肯在1949年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多年来低报酬的承包工作和残酷的商业竞争使他的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突破困境的机遇出现在1957年停电事件之后，李拉海医生委托他负责研发方案，设计电池驱动的电子起搏器，他立刻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并着手制作起来。

厄尔·巴肯想起一年前的一期《大众电子》上有一篇文章讲解了如何制作一台电子晶体管节拍器，他从那篇文章中得到了灵感。对于酷爱电子装置的巴肯来说，主要挑战是找到他能建构的一种电路。1956年4月的那篇文章展示了一张带有两个晶体管的简化电路图，而他巧妙地对这个娱乐产品进行了创新，发明出一

种救命装置。

电路是一张电子网，由电线、电阻器、电容器和晶体管组成。电路中的晶体管部分彻底改变了所有的电子产品、通信方式以及医学。晶体管的发明是“电子时代的核心产物”。^[13]早期电子工业的真空管是靠不住的，因为它耗电量巨大，产生的热量也过多。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放大电子信号的设备，但它同时要更小、更节能。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工业研究部门，当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发明专利即将到期，贝尔实验室开始迫切地研究起改善洲际通信的技术，结果使贝尔实验室蜕变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科学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获得过许多诺贝尔奖，也研发出许多革命性的技术，包括激光、太阳能电池、通信卫星以及晶体管。^[14]关于晶体管的发明者是存在争议的，最终诺贝尔奖授予了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和约翰·巴丁（John Bardeen）三个人，不过他们都没有从发明中获利。肖克利去了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并在那里创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其员工最终创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这些致力于革新电报和无线电技术的公司形成了硅谷，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使这片土地进一步成长。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可以实现微型化，降低能量消耗并提高计算能力，这一切为太空探索提供了动力，也使个人计算机成为可能，更为医学和植入物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厄尔·巴肯把自己设计的双晶体管电路装进一个简陋的铝盒里。这个小铝盒长宽都是4英寸，厚1.5英寸——大约相当于一小叠杯垫或一副牌的大小。格拉斯刺激器有多个操控点，而厄尔的

装置只有一个拨动开关、脉冲频率和电流输出变阻器。装置顶端是接触终端，通过电线与患者相连，里面放着一块9.4伏特的锌汞电池。从装置中伸出来的电线能够穿过皮肤连接到心脏，当患者不需要这一个装置时，可以简单地在床旁把电线拔下来（见彩插15.2）。

经过四周的试验，这一装置走进了大学动物实验室。在狗的身上进行了一天的实验后，研究人员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这个装置经过改进，或许可以植入人体。在自传中，厄尔·巴肯回忆道，第二天他回到医院去研究另一个项目，“我刚好走过一间病房，看到李拉海的一名患者。我当时肯定是一副错愕的表情，定了定神，确定自己没看错，那个小女孩正用着我前一天才交给他们的装置原型！我惊呆了。我赶紧找到李拉海，向他询问情况。他以其一贯的谨慎冷静言简意赅地解释说，实验室告诉他起搏器有效，所以 he 不想再浪费一分钟。他说 he 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最好的技术就让孩子送命”。[\[15\]](#)

在1957年，美国外科医生可以在没有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设备许可的情况下，就为病人植入装置，这使我感到惊愕不已，不过那时候根本就不存在医疗器械批准这回事。20世纪50年代是医疗器械发展的“西部拓荒时代”，没有法律，也没有“治安官”。尽管李拉海和巴肯担着个人风险为患者植入了一个就地取材发明的装置，但他们并不违法。今天这种行为属于犯罪，肯定会坐牢。然而，在1957年，植入医疗器械靠的是英勇的大无畏精神，是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未来，依据人身伤害法索赔的事情尚未发生。

世界上第一个电池驱动的可穿戴式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得益于以下几个互相融合的因素：晶体管和聚合物等新技术的出现，电池和新型涂料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厄尔·巴肯这一有准备的头

脑。厄尔那家挣扎前行的小型医疗电子服务公司叫什么名字？美敦力。现在它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年收入近300亿美元，员工超过8万人，坐拥市值1 000亿美元。[\[16\]](#)起搏器迅速成为一种可植入装置，主要应用于患有年龄相关性心律失常的老年人。每年有将近50万个起搏器被植入心脏。亲爱的读者，你在现实中肯定认识体内装有起搏器的人，在他们的胸腔里，一个微型装置悄悄地颤动着。它们的工作如此高效，个人几乎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革命性巨变，但它确实是一个奇迹。

作为植入式电子医疗器械行业最伟大的先驱之一，94岁高龄的厄尔·巴肯在夏威夷科纳海岸的一座豪宅里过着安详的生活。他曾邀请我到他在夏威夷岛上的寓所做客，这位理解电力能够维持生命的人，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光电农场，怪不得他能够“脱离电网”，与世隔绝。他的住所俯瞰着基霍洛湾，不仅可以自行供电，甚至可以通过海水淡化装置为自家生产淡水。他主张“高情感和高科技”（high touch high tech）的理念，担心人类过分痴迷于新型技术而让世界失去神秘感。

虽然厄尔·巴肯已经好多年没有接受过采访了，但是当他知道了我的研究课题，他表示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在采访的八个月后，即2018年10月，厄尔·巴肯与世长辞。）与一位植入革命巨匠会面是一项重大的荣誉，手握密码的我通过一道道设有电子锁的防护门，开过一条围绕着火山岩的平坦马路，把车停在他办公室外的棕榈树下。办公室内，厄尔坐在老年电动车上，两侧是书架，奖杯、奖牌遍布房间各处，一个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玩偶高高地站在书架上，让我不禁露出微笑。

厄尔·巴肯忆起往昔，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他的成功与遗憾，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生活的信念——“全心全意地生活”。美敦力的使命真真切切地在他的心中搏动着，而我们的对

话中，到处流露着他一生对缓解疼痛、恢复健康和延长生命的责任感。

美敦力现在形成了一种传统，恳请每位从他们的医疗器械中受益的患者，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这种责任感传递下去。采访结束时，厄尔向我重复了这一真诚的恳求，恳请我“继续前进！继续传递！”。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阐明先驱们的贡献，是他们使现代生活的风险减少，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都受益于医学和外科学的进步，尽管医学和外科学并不完美，甚至是危险的，生命得到丰富和延长的人们，必须“把爱传递出去”。

当然，起搏器的故事只是心脏外科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在心肺转流机出现之前，任何心脏缺损或心脏瓣膜手术都显得深不可测，难以想象。正如前面说到的，明尼苏达的外科医生们开拓性地打开了通往心脏的大门，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缺损闭合和瓣膜修复手术成为有效的、可以预期结果的治疗方式。

梅奥医学中心的外科医生约翰·柯克林（John Kirklin）和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首次尝试了心脏瓣膜手术，他们用系在手指末端的专用手术刀在一颗跳动的肝脏侧面摸索着划出小切口，仿佛一场快速突袭战，手术刀反复地强行刺入狭窄的患病主动脉瓣。^[17]严峻的现实是，那时的手术死亡率为20%，而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李拉海医生在附近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在进行主动脉瓣和二尖瓣手术时使用了心肺机。所以李拉海不是在一颗鲜血淋漓、搏动跳跃的心脏上动手术的，他能够探查心脏内腔，这一优势使他可以尝试部分切除僵硬的患病瓣膜，或者修

复功能不健全的瓣膜。

首例人工瓣膜手术出现在1960年。由于不需要任何设备许可，美国的心脏外科医生们“大踏步前进着”[18]。首款瓣膜置换装置是球笼瓣，即不锈钢笼中放有由硅包裹的合成树脂球，它可以在切除的瓣膜区域来回摆动。尽管可能出现血块、心律失常和猝死等风险，但手术也确实挽救了生命，数百名患者的生活质量正在显著改善。“短短十几年，心内直视手术已经从1955年的试验性手术演变为一种标准化的治疗技术。”[19]二战前，任何开胸手术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到1961年，美国已有303家医院完全具备进行心内直视手术和血管造影术的能力。[20]心脏外科已经从治疗威胁患儿生命的心脏异常，过渡到对心脏瓣膜疾病的治疗。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脏病发作，这其实是更为紧迫的问题，而我们需要经历一次偶然的错误才能开启一场至关重要的变革。

1958年10月30日，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心脏科医生梅森·索恩斯（Mason Sones）为一名26岁的男性患者插入了心脏导管，以进行瓣膜疾病的诊断性检查。当时的导管插入术是先把一根纤细而柔韧的导管插入手臂的肱动脉上，然后将其一直穿到主动脉瓣上方的主动脉根部。今天的导管插入术通过观看顶置式大屏幕监视器进行，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所使用的方法是，医生用35毫米的电影胶片将插管过程拍下来，然后放在放映机上观看。索恩斯医生小心翼翼地将导管尖端穿过主动脉瓣时，自动压力注射器会向心室内注射50毫升造影剂。[21]

造影剂没有流入主动脉，而是充满右冠状动脉，导致这条动脉“极度浑浊”，而且出现暂时性心脏工作缓慢。“索恩斯担心冠状动脉中注入过多的造影剂会引起威胁生命的心室性心律失常，但他更强烈的感受是‘对这种诊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当满

意’。”[22]索恩斯从以往的经验中看到新的希望，他很快便与一家公司合作，定制生产导入冠状动脉专用的锥形端导管。一夜之间，冠状动脉成像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成像能够确定阻塞的程度和位置。一直以来，医生无法确定心绞痛的原因或定位血管阻塞区域，直到进行尸检时才恍然大悟。死神现在只能等待，医生已经能够在跳动的心脏上实时发现心绞痛和心脏病发作的奥秘。

医生能够看到冠状动脉而同时又不会让患者丧命，索恩斯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外科医生同事们抓住了这一意外发现，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手术治疗某些冠心病患者的最佳配备”。[23]确实，至今也是如此。当时的心胸外科主任唐纳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充分利用了新的诊断工具，于1962年1月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冠状动脉手术。时至今日，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仍然是该领域的掌门人，每年在那里进行的冠状动脉旁路手术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克利夫兰开创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先河，医学中心的阿根廷外科医生勒内·法瓦洛罗（Rene Favaloro）从腿部采集静脉建立旁路、绕过阻塞区域。这种技术是人类最伟大的手术发明之一，经过改进后至今仍在全球各大医院使用。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众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专科位居榜首，其中包括大多数外科领域。这绝非偶然，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传统上的首席执行官一直是外科医生，本书正在撰写时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心胸外科医生，托米斯拉夫·米哈列维奇（Tomislav Mihaljevic）。克利夫兰的做法与大多数医院完全不同，但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医学机构，例如特种外科医院，也是由外科医生来领导的。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出现十年之后，1977年，安德烈亚斯·格林茨格（Andreas Gruentzig）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世界上首例血管成形术。血管成形术以及后来的冠状动脉支架手术，其发

展历程遵循着医学和外科学的典型路径：从简单粗暴的干预方式开始，经过技术改进，手术创伤越来越小，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最后终于发展出一种在几年前还看似不可能的解决方案。冠状动脉的首次选择性成像出现在1958年，不出20年，医生就可以通过血管成形术，用一个微小的可扩张球囊打开阻塞的动脉，随后，心脏支架技术于1986年问世。[\[24\]](#)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内有一个铜制小地球仪，直径5英寸，是现存最早的制图球体之一。在亚洲的土地上，刻有拉丁文“此处有龙出没”（Hic sunt dracones）。[\[25\]](#)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刻有这种说法的地球仪，而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不得擅入”的代名词。我们终于对人体的最后一块主要阵地发起了挑战，并于20世纪60年代攻克了这一领域。电影和电视节目开始将外科医生描绘成英雄，这也不是偶然。在100年前，外科医生以英雄形象出现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得擅入”的说法不再适用于人体。

我们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和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所接受的极端消极治疗。几个月间，两人接连遭遇心脏病发作，医生只能做诊断性心电图，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加快他们的康复进度。在血管造影、心脏支架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尚未出现的时代里，美国总统只能穿着拖鞋，坐在轮椅上，祈祷为期六周的休息能对心脏病发作有用，这好像太荒谬了。[\[26\]](#)如今的每个美国人都会认为，心脏病发作后，血管造影支架或者心内直视手术可以完全恢复心脏功能。心脏瓣膜修复、置换以及动脉瘤修复说明手术极有挑战性，但也不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来接受这样的手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威廉·哈维首先对心脏进行了生理学测量，心脏却是最后一个屈服于外科医生手术刀的器官。休斯敦著名心脏外科医生丹顿·库利曾经这样说道，“它是体内唯一一

个让你真正亲眼见证其功能的器官。”^[27]我年轻时曾经在父亲的兽医医院尸检室里见过一匹死马的心脏，它看上去混沌一团，毫无生气，而且臭烘烘的。然而，在大学里第一次目睹心内直视手术时，我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正在搏动的鲜活器官，它滋养补给着整个人体结构。

或许没有图表或绘画能够捕捉心脏的动态功能，而只有当外科医生掌控了身体的炉石，他们才能向世人宣告，外科医生已经彻底告别了从前的卑微地位，成为受人尊敬甚至充满荣耀的职业。觉得我过于煽情吗？请想象一下自己置身于医院等候区，与几位担惊受怕的家属等待着心脏外科医生，他们的母亲前一天心脏病发作，而医生在几个小时里征服了心脏，挽救了生命，你就能亲眼见证人们对这种能力的感激之情。那一刻，植入革命如同奇迹。

^[1] Stephen Paget, *The Surgery of the Chest* (Bristol, England: John Wright, 1896), p.121.

^[2] <http://www.timesleader.com/news/local/455923/dr-victor-greco-operated-heart-lung-machine-during-first-successful-open-heart-surgery>.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 William Stoney, *Evolution of Cardiopulmonary Bypass*, vol. 119, pp.2844-53, 2009.

^[4] Vincent Gott, Lewis Lillehei, and Owen Wangenstein, “The Right Mix for Giant Achievement in Cardiac Surgery,”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vol. 79, 2005, pp.S2210-13.

^[5] *Ibid.*, p.S2211.

^[6] *Ibid.*

^[7] 鲁布·戈德堡 (Rube Goldberg) 是美国的一位漫画家，他在作品中创造出一种设计得过于复杂的机械。所以，鲁布·戈登堡机械意指以迂回复杂的方法去完成实际上非常简单的事，亦指十分复杂的系统。——译者注

[8] 麦吉弗 (MacGyver) 为美剧《百战天龙》主人公。——译者注

[9] <https://medicine.wright.edu/about/news-and-events/vital-signs/article/a-real-life-macgyver-builds-a-medical-schoo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0] Earl Bakken, *A Full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Earl Bakken*. Self published, p.32.

[11] Ibid.

[12] Ibid.

[13] <http://www.pbs.org/transistor/album1/>.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4] <http://www.pbs.org/transistor/background1/corgs/bellabs.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5] Earl Bakken, *A Full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Earl Bakken*. Self published, p.38.

[16] <http://www.medtronic.com/us-en/about/facts-stats.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7] Henry Ellis, and John W. Kirklin, “Aortic Stenosis,” *Surgical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Aug. 1955, p.1033.

[18]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50.

[19] Ibid., p.253.

[20] A. F. Crocetti, “Cardiac Diagnostic and Surgical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Rep.*, 1965, 80: 1035–53.

[21]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3.

[22]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3, quoting Hurst, “History of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in S. B. King III and J. S. Douglas, eds. *Coronary Arteriography and Angioplas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5–6.

[23]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6, quoting D. B.

Effler to F. A. LeFevre, Nov. 8, 1960, Effler Papers, CCA.

[24] A. Roguin,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 *Circulation*: 2011;4:206–209.

[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3/12/no-old-maps-actually-say-here-be-dragons/282267/>.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6] R. P. Hudson, “Eisenhower’s heart attack: How Ike beat heart disease and held onto the presidency,” (review).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72 (1), p.161–62.

[27] <https://www.azquotes.com/quote/1267465>.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第十六章

外科学的专科化

依我之见，美国的前景从未如此充满希望……外科医生迎来了他们的时代，而且他们自己知道！梅奥兄弟，美国的圣科斯马斯和圣达米安——他们的临床实践在今天的医学领域和外科学领域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他们是智者！他们看到钟摆正在摆向自己。

——威廉·奥斯勒，1919年^[1]

作为一名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我意识到自己对丹佛总医院（Denver General Hospital）骨科没什么实际作用。我拥有的只是满腔热情，但重点是我必须表明自己为了成为一名骨科医生而愿意付出一切。这是我的“校外实习期”，在另一所医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轮岗实习，作为考核期的加时赛。由于丹佛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科罗拉多大学及其姊妹医院丹佛总医院的轮转岗位中挤满了雄心勃勃的医学生，他们就像是一队枪手，必须表现出一流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保证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轮岗实习的前几周，我在丹佛大学医院，白天忙忙碌碌，但不需要熬夜。现在，我来到丹佛总医院，这是对毅力和决心的考验，我渴望表明自己愿意比同班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我知道自己机会渺茫——全美有数百名的1995届医学生想成为骨科住院医师，而绝大多数会失望而归。当第一次待命之夜来临，我对自

己即将在科罗拉多“刀枪俱乐部”的见闻充满了焦虑与好奇，心情如同坐过山车。

我陪着住院总医师乔走向急诊室，一位老太太因髌部受伤刚刚收治入院。乔是华裔美国人，身材健壮。我们来到13区，他拉开泛黄的帘子，屋顶轨道的挂钩吱吱作响。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瘦弱的老太太，将近90岁高龄，牙齿都掉光了，也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她的左腿奇怪地斜扭着，乔看着我问道：“你的诊断是什么？”

“她的腿脱位了吗？”

“你是问我还是告诉我？”乔质问道。

“她的髌关节脱位了。”我说出结论。

“错！”乔斥责道。

该死的。“她的髌部骨折了吗？我是说——她的髌部骨折了。”

“对了，”老板肯定了我的判断，“照个X光，看看有多严重吧。”

我们正在等放射科技师时，急诊室医生快步走过狭窄的走廊，通知大家有一名枪伤受害者将在几分钟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我不敢承认，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为自己病态的好奇心辩护着：我不想让任何人受伤，但如果有人受到枪伤或刀伤，那么我希望发生在自己值班的时候。

我和乔走过外伤病房，在这间大房间中，一面墙摆满了医疗用品储备架，另一面墙是一排水槽和一堆工作台，一片狼藉，前一例外伤患者的废弃物已经填满了垃圾桶。清洁人员正忙忙碌碌地收拾房间，为下一个病人做好准备，医学生和住院医师们走来

走去，等待着病人的到来，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得拥挤不堪。

我与乔来到救护车入口，等待着我们的枪伤病人，尽量不让自己表露出紧张的情绪。在班诺克街这个温暖的十月傍晚，我看了一眼急诊室的护士和技术人员，他们穿着浅蓝色护士服，每个人都是一副轻松的神态，甚至开着玩笑。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感到焦虑。我还从未见过枪击受害者，尽管自己肯定不会参与复苏急救，但专业知识的完全缺失加深了我的恐惧。急诊主管护士从身后走来，通知普通外科和骨科住院医师，刚刚又收到一辆救护车的呼叫信号，一名刀伤受害者即刻到达。大家对此都很放松。

一南一北，两辆救护车从不同的方向开过来，几乎同时停在了医院门口，车灯闪烁，笛声刺耳。我们迅速打开了第一辆救护车的车门，匆忙中我看了一眼病人。护理人员从车内拉出病床，床轮部分向地面自动展开。患者是一名年轻的拉丁裔男子，意识清醒，他表现出来的镇定程度令我感到吃惊，而整个医务组也同样冷静而放松。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地看着医护人员，但被推入医院时一直保持沉默。病人右臂上扎着输液针，一袋透明液体沿着塑料管滴入静脉。白色T恤衫上沾有少量血迹，但绝对比我想象中腹部刚刚中枪的状况要好得多。

另一辆救护车只比前一辆晚几秒抵达，然而我们打开车门后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位非裔老人正从轮床上坐起来，手上堆着一张白色毯子。到处是血——鞋上，卡其布裤子上，短袖格子衬衫上，还有脸上。剧烈的疼痛使他表情痛苦，在担架上扭动着身体。被推往急诊室时，他一直恳求医生为他减轻疼痛。

“看一下那个人怎么回事。”乔下了命令。

我赶紧跟着救护人员来到急诊的一间小检查室，听听他们的报告。

“亨利·琼斯，68岁男性，被搭便车的人在路边用大刀砍伤。行凶者试图捅向亨利腹部，但患者用双手挡住了刀，两根大拇指几乎被截断。没有其他部位受伤。输入一袋LR[乳酸钠林格注射液]。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没有按时注射破伤风疫苗，但不存在其他医疗问题。”

老护士斯蒂芬妮发现没有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立即接手说道：“亨利，我们会为你治疗。没有药物过敏吧？”他紧紧地咬着牙，屏住呼吸，疼痛已经异常剧烈。

“我不过敏，请给我些药！”

斯蒂芬妮去药房取芬太尼。因为所有的外伤科医护人员都在外伤病房，突然就剩下我和一名年轻的护士与患者在一起。我戴上手套，介绍了一下自己。

“亨利，我是大卫·施耐德，是骨科的实习生。我需要看看你的手，可以吗？”

我轻轻地掀开沾满血迹的毯子，一层一层地打开亨利手上临时包扎的纱布，解开右手的最后一层时，亨利疼得直发抖。揭开白色棉垫，我看到大拇指通过薄薄的一点皮肤勉强与手相连，皮肤一边悬着大拇指，一边是深红色的豁开伤口，肉呈锯齿状，肌腱撕裂，露出正在搏动的血管。

亨利的头猛地向后一转：“我的天啊！”我默默地说着同样的话。尽管知道只是徒劳，我还是抓过几块四乘四纱布，试着把大拇指放回原位。握着这根危险的手指，我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用更结实的军用纱布进行了临时包扎，并缠上几层棉布胶带加以稳固。我喜欢事物看起来整洁有序，就好像在做八年级的自然科学课题作业，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够熟练。

向乔汇报之前，我还得检查左手。亨利闭上了眼睛，我觉得芬太尼正在浸透他的大脑，终于缓解了这个可怜人的痛苦。我重复着右手的过程，像剥洋葱一样，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打开包扎纱布，终于看到了另一根摇摇晃晃的大拇指——这根手指正在流血，所以看不清到底是怎样连接在手上的，被截断的部分歪在那里，看着令人揪心。尽管强力麻醉剂正流向亨利的全身，但我的操作使他一直在地狱般的困境中徘徊。

包扎完左手，我去外伤病房向乔汇报情况。

在我俩分开的这10分钟里，又来了一名重伤患者，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被一辆大SUV（运动型多功能车）撞倒，司机是个毒品贩子。我向病房里扫了一眼，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疯狂的场面。到处都是血。患者昏迷不醒，麻醉师急忙为他插管，外伤组正用巨大的外伤剪刀剪开他的蓝色牛仔裤。（每名医学生和外科住院医师都要负责带着这些工业级的橙色手柄剪刀，它们能剪断硬币，裁开各种材质的衣服。外伤病房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剪掉衣服。）护士正在为他脱掉靴子，我看出他的双腿已经碎成了一堆骨头。护士将腿扭转了360度，牛仔裤被剪掉后，我才发现那条腿显然已经完全截断了，只通过粗如绳索般的神经与髌部相连，令人目不忍视。我的天啊！我又一次在心里说道。

乔急忙压住大腿，以止住汩汩涌出的鲜血。我想自己正看着这名英俊的非裔美国青年死去。他生气全无，尽管十几名急救人员争分夺秒地配合协作，但我想他们无法阻止死亡。

乔等着技术员拿止血带时，抬眼看到我，冷静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几乎吓了一跳，不确定他到底在问什么。他是问这个命悬一线的年轻人吗？

“大卫——刀伤怎么处理？……他的手受伤了吗？”

“对，两根大拇指几乎完全被割断了。我对双手重新进行了无菌包扎。”

乔将止血带缠到那条毁掉了的腿上，止住血流。他回头看着我：“我们这儿已经忙坏了。我想让你去给那个人的手做麻醉，然后在急诊室把血冲洗干净，我们今晚再做缝合。”

这就是一家县级医院运作的现实画面，至今仍然如此。医院的医护人员有限，对他们来说工作简直太多了。县级和市级医院都有医学生和住院医师的支持，所以患者经常由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来照料。事实就是如此。

我回到亨利的检查室，告诉他我们准备今晚重接他的拇指，因为还有两名外伤患者同时来到医院，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去手术室。我现在会为他冲洗伤口，以避免不干净的凶器引起严重感染。虽然我没敢告诉他，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进行局部麻醉。

当威廉·霍尔斯特德率先使用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时候，他很快便认识到，以远离麻醉目标区域的特定神经为注射对象，可以导致整个肢体麻木。然而这需要错综复杂的神经三维解剖结构了如指掌，而我当时根本没有达到那种全面理解的水平。我希望直接为双手注射能有用。

护士从药房取来利多卡因，并将其吸入两支大注射器中。拆除临时包扎的纱布后，我开始将针头插入刀口附近，这加剧了出血和疼痛。一遍又一遍地在两个拇指周围进行注射之后，我决定等几分钟好让麻药生效。

我找到一张类似于烤盘的大金属盘来接冲洗的水，护士告诉我，骨科住院医师通常使用电动脉冲式灌洗器将水流喷入外伤伤

口。我同意了，尽管自己从来没用过。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

回到病房后，我对亨利双手的麻木程度进行了评估，麻药似乎起作用了，我决定开始冲洗伤口。脉冲仪喷向亨利右手皮开肉绽的伤口时，他痛苦地尖叫起来，显然麻醉还没有达到能够让人忍受冲洗的程度。我决定再注射一些麻醉剂，但如果对神经本身注射，又担心伤害到手臂下方的神经。于是，我直接在裂开的伤口处进行了注射，并向亨利道歉说麻药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有效。

我明白自己的任务是暂时稳定亨利的情况，但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正在让事情变得更糟。又等了几分钟，我的沮丧情绪不亚于亨利的恐惧心理。我提醒他，我需要再次冲洗伤口，他把双手放在金属盘上方。我没有用脉冲仪，而是用简单的球形注射器轻轻地冲洗开放性伤口。刚开始冲洗时，他又大叫起来，疼得直发抖，金属盘中的水也洒在了床边。尽管我们进行了重复麻醉并更换了冲洗方式，可他仍旧痛苦不堪。

我放下球形注射器，无法继续让亨利承受这种酷刑般的折磨。我已经束手无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了一眼这位老先生。尽管身处困境，他仍然流露出善意的目光。我摇了摇头，他肯定也感到了我的无能为力。

亨利低声念叨：“请老天爷帮帮这位医生吧。”这美好的举动让人惊讶。我们目光交会，亨利又说道：“耶稣哭了。”这或许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节《圣经》。我呆住了。

正当我处于崩溃边缘时，住院总医师奇迹般地出现在门口。“怎么样，大卫？”

“不太好，乔。我无法麻醉他的双手。”

“你注射的是什么地方？做了局部麻醉吗？”乔感到情况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局部麻醉？呃，没有。”

乔帮我保住了面子，并意识到我们从未讨论过局部麻醉技术。他让护士再取一些麻药过来。“我给你示范。”乔肯定地说。我瞬间感觉如释重负。

这便是医学教学——在反复试验中，承受失败，享受胜利，遭遇令人崩溃的不安，偶尔得到认可，这一连串的艰辛令人精疲力竭。一名医学生或住院医师经常会因为缺失一小部分知识而遭遇失败，这对他们自己，甚至对患者来说，都意味着厄运。在全面实施医学培训的医疗环境里，错误往往会在造成伤害之前就被及时发现，在这个病例中，我的住院总医师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局面。亨利会接受他所需要的局部麻醉，以适当的方式清洗伤口，为今晚重接断指做好准备。

1540年，伦敦理发师-外科医师公会通过议会法案成立。这从法律上说明了理发师和外科医师各自的职能——只有理发师可以剃须剪发，只有外科医生能够进行脓肿切除、接骨和伤口缝合等原始操作。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联合，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外科手术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1745年，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已经各行其是，外科医生继续保有解剖死刑犯尸体的权利，并有权在职业实践中采取更积极的侵入人体的方式。最终皇家法令于1800年通过，成立了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首位采用科学方法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的开创工作。

几百年来，内科医生在英国保持着比外科医生更为优越的社

会地位，他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外科医生是手艺人，或像药材商一样是生意人。内科医生不屑于用双手工作，只“观察、推测、开药方”。[2]在18世纪，皇家医师学会成员都是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为贵族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效仿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养成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和高雅流行的穿戴风格，想方设法令自己引人注目”。[3]英国严格的社会等级并没有在北美殖民地形成，殖民地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材商是共存的，如果有条件，他们会上一些简陋的医学院。

工业革命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增强了人们支付医疗服务开销的能力，扶植少数贵族医生的贵族患者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但是直到消毒外科出现并采用了德国的科学思维方式之后，将医院视为“死亡之所”的观念才彻底消失。20世纪伊始，医院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872—1910年，美国医院的数量从178家增长到超过4 000家。[4]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与世长辞；1901年，威廉·麦金莱逝世。这使美国人对医生的治愈能力深表怀疑，但医学很快便走出了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功效。

心脏病专家、医学史学家布鲁斯·菲指出：“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里，铺天盖地的新技术改变了美国。当时涌现出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包括电话、打字机和留声机等通信工具和不断扩张的铁路线、涡轮动力轮船、自行车和汽车等交通手段，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另一项突破性技术是电力，电发动了机器，点亮了黑暗，也成为一种治疗工具，受到人们的追捧。”[5]此外，现代建筑技术利用了新型贝塞麦钢材和乔治·富勒的内部承重钢结构，与历史上使用的外部承重结构不同。再加上1883年电梯的发明，建筑物越建越高。[6]首座摩天大楼于1885年建成，没过多久，这种新推广的建筑风格就会对医学的转变产生影响。

1883年8月21日，一场灾难性龙卷风横扫了明尼苏达州小镇罗切斯特。这场F5级龙卷风（每小时风速超过260英里[7]）导致37人死亡，超过200人重伤。罗切斯特是一座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小镇。6年以前，24名方济各女修会成员来到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南部小镇成立新的会区，并定居下来担任镇上的教师。飓风摧毁了罗切斯特，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毫无急救医疗服务的问题。幸运的是，小城中有一位富于进取精神的全科医生，他从英格兰兰开夏郡移居此地，一生做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包括新闻工作者、河船船长、农民、裁缝、政客以及人口普查员，不过随着罗切斯特的发展，他的身份最终定格为社区医生。威廉·沃勒尔·梅奥（1819—1911年）是小镇领导，但他对罗切斯特及全世界的重要贡献，是他养育的两个儿子，威廉·詹姆斯·梅奥和查尔斯·霍勒斯·梅奥。

梅奥医生32岁时与路易丝结婚，但威尔·梅奥[8]十年后才出生，那时他的父亲已经42岁了。4年后，查尔斯出生。尽管老梅奥年纪大了，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甚至在儿子们从医学院毕业后，还与他们一起行医了10年。

梅奥医生于1854年从密苏里大学医学院毕业。他毕业后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开始行医，当时尚未发明住院医师制度。1864年他搬到罗切斯特，那时小镇上只有3 000居民。[9]在罗切斯特打下事业根基之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小医生”（因为他身高1.62米）于1869年前往纽约市和费城观摩外科医生的工作。在外科手术领域，利斯特刚刚开创了全新的抗菌技术，等到梅奥医生返回罗切斯特时，他对外科手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上一次来到纽约是1846年，那时麻醉刚刚发明，现在他又一次见证了科学革命。

作为一个经常搬家和换工作的人，梅奥医生终于在1874年

安定下来，他将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在罗切斯特度过余生。

1873年，梅奥医生成为明尼苏达州立医学会主席，那时他的外科手术技术已经在当地闻名。所有的医疗服务都在他的小诊室或者病人家中进行，根本就不需要医院。梅奥医生可能是小镇上少数几位见过医院的人之一。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场重要战役刚刚过去几周后，威尔·梅奥（1861—1939年）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勒苏尔（Le Sueur）；在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场重要战役结束几周后，查理[10]（1865—1939年）在罗切斯特出生。威尔和查理从小就陪同“马车时代”的老医生上门看诊，甚至协助手术。1883年，威尔·梅奥于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罗切斯特，与父亲一起在罗切斯特下城区的门诊工作；当时查理正在芝加哥医学院读书，他在毕业后也加入了家族医疗事业。

1883年8月21日，那场可怕的龙卷风在罗切斯特肆虐时，三位梅奥先生都在城中。当地死伤惨重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于是受伤的人们只能在当地的学校、小旅馆和歌舞厅先确定治疗顺序。不久，方济各女修会会长阿尔弗雷德·莫斯修女（Mother Alfred Moes）找到梅奥医生，表示愿意帮助建立一家医院。在全美各地，天主教修女与城镇领导人物都是合作伙伴关系。面对灾难，会长阿尔弗雷德想到在广袤的平原上建设一家小医院。

梅奥医生后来回忆道：“我也告诉她，建医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即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们也不一定会成功。‘非常正确，’她坚定地说，‘但您只需要答应我，您会负责管理这家医院，而我们会负责把医院呈现在您的面前。以我们的信念、希望和力量，它一定会成功的。’我问她，女修会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她的回答是：‘您需要多少？’您愿意冒险投入4万美元吗？”我说。‘愿意，’她答道，‘如果您需要的话，更

多也没问题。制订计划吧，马上就建好。”^[11]

女修会花了5年时间筹募资金，购买土地，最终破土动工。在此期间，梅奥医生和越来越出名的“威尔医生”四处参观美国东海岸的医院，并拜访了建筑师。尽管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机遇。30年前，那片荒地上还杳无人烟，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几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梦想家坚定地认为，值得试试在那里建设一家地方医院，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建设具有现代特色的医院大楼。配备最新的技术对这家医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这至今仍然对梅奥医学中心至关重要——它帮助梅奥兄弟领先于整个地区，甚至领先全世界。

那场毁灭小镇的风暴过去6年后，圣玛丽医院于1889年开诊。多年来，三位梅奥医生常常一起做手术，而且手术量惊人。

梅奥的另一项悠久传统是鼓励外科医生外出访学。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走遍欧洲大陆的“游学”传统始于19世纪。随着旅行方式变得更加可靠，美国人也开始了欧洲之旅。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伟大的历程：美国人在巴黎》（*The Greater Journey: Americans in Paris*）一书详细地描述了美国画家、作家、雕塑家和医生在1830—1900年前往巴黎的朝圣之旅。尽管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的最后30余年中，法国一直统治着医学领域，但世界领先地位的天平实际上在向东倾斜，维也纳和柏林成为有抱负的外科医生的圣地。不过，梅奥兄弟会先跟随父亲乘火车前往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后来才拜访欧洲。

1889年，这座三层楼高的医院有45张病床，只有一间手术室。医院建成的头十年里唯一的外科医生就是梅奥兄弟。不出五年，医院便需要增加治疗空间。到1894年，医院拥有了第二间

手术室，总共75张病床。最早的圣玛丽医院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在同年开诊。1895年，威尔·梅奥前往巴尔的摩观摩威廉·霍尔斯特德和霍华德·凯利（Howard Kelly）的手术，并在日记中记录下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外科医生的印象：“胶底鞋。手术服。碘仿、硼酸和铋。蒸汽消毒。放置工具托盘的桌子呈环形摆放。橡胶手套。褥式缝合法。皮下缝合法。”^[12]

威尔·梅奥将成为梅奥医学中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走向成功的幕后推手。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经营一家小镇医院，而是聘用了一系列的专业人员，这开启了罗切斯特飞向世界医学前沿之旅。威尔和查理没有选择由兄弟二人维持运营这条保险的道路，而是专门聘请了诊断医师，以最新的实验室技术对患者进行筛查和测试。到1895年，梅奥兄弟进行的手术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五年多以前，罗切斯特还没有医院，而在1895年内，他们进行了762例手术，其中包括95例腹腔手术。^[13]

迈入20世纪时，只有不到2%的美国医生是外科医生，^[14]而梅奥兄弟可以毫不谦虚地接受外科专家的身份。到1905年，新增加的十几位外科医生全部围绕在梅奥外科兄弟身边。梅奥医学中心历史上最成功的聘用，或许是聘用了一名29岁的明尼苏达本地人。

1901年，梅奥兄弟聘请了亨利·普卢默（Henry Plummer），这位年轻医生与其父亲在明尼苏达州的拉辛（Racine）一起行医。普卢默于1898年从西北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由弗兰克·比林斯指导，这名芝加哥医学教授是一位内科先驱，凭借先进的实验室和诊断设备在众多医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比林斯曾预言，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成熟将推动医学发展的专科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正是普卢默在梅奥医学中心为医学的专科化发展注入了能量。

就像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威廉·韦尔奇一样，普卢默在梅奥倡导细菌学研究和实验医学。虽然医学在半个世纪前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技艺，但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罗切斯特的内外科医生们已经拥有了量身定做的办公室、检查室、临床实验室和一台X射线设备。^[15]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尔和查理在1903年一年里进行了2 640例手术，其中包括1 302例腹部手术。“患者死亡数量很低，只有69例，死者中84%接受了腹部手术，该手术是公认的高风险手术。”^[16]全美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小镇，其主路上有成群的医生营业，他们都希望为小社区提供医疗服务，为什么罗切斯特的医疗团队能够迅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在一座并不位于铁路枢纽的偏远小镇取得医学的主导地位，需要打一场硬仗，而胜利并非从天而降的。父亲威廉·沃勒尔·梅奥的雄心壮志为日后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基础。他有“走出去、请进来”的意愿，而且他与专家交流切磋，以技术为信仰，渴望在医学机构中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愿意与他人形成务实的合作关系。这些从一开始就为其成功创造了条件。梅奥医生的儿子们沿袭了这一传统，医院建成不出十年的时间，他们便确立了自己在世界外科手术领域的先进地位。

1906年，威尔·梅奥当选美国医学会主席。这位45岁的外科医生在就职演讲时说道：“未来需要学校为渴望从事专科工作的医生提供高级培训。”梅奥临床医学院直到1972年才成立，但威尔医生所倡导的并不是建立一家普通的医学院，他在响应威廉·霍尔斯特德等外科先驱的号召，他们预见到新出现的专科领域需要更长时间的医学培训。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梅奥医学中心的重点仍然是外科学。不仅梅奥兄弟被视为专职外科医生，整个梅奥医学中心和圣玛利亚医院也是如此。时至今日，所有拜访过罗切斯特的人都很

难相信，这里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医疗园区。外科手术的朝圣地肯定是东海岸的一个沿海城市，也可能是芝加哥，难道不是吗？

从某些方面来说，相信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主要城市才更合理些，那些大城市的竞争过于激烈，没有任何一群外科医生能够独占数量可观的患者群体，以成为普通外科领域的专家，更不用说成为一名专科医生。在罗切斯特，梅奥医学中心的学科队伍之间实现了“合作的胜利”。[17]1910年，在芝加哥拉什医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威尔·梅奥大力主张多专科医疗实践，他讲道：“如今，全部医学知识的总量如此庞大……一个人试图从整体知识中习得大部分实践知识是徒劳的。这种现状促使执业医师必须进行合作。患者的最大利益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利益。为了使病人受益于先进知识，不同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所以]医学发展为一种合作科学是十分必要的。临床医生、专科医生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为了患者的利益携手合作，分别阐明各自领域的问题，互相协助、彼此依靠、并肩支持。”[18]

数十年来，亨利·普卢默作为首席诊断专家和“系统工程师”不断创新。他和同事们发明了统一标准的医疗记录，也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医院病历。此前，医护人员每天在工作日志上手写病人信息，无法实现信息检索和跟踪随访。采用了这一独创性方法后，每位患者都以梅奥的患者编号来标识，这个号码将跟随他们一生（荣幸的是，我也有一个），而且每位患者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纸质个人表格。随后发生的每一次住院治疗都会记录在患者的那张表格上，极大地提高了治疗的连续性。

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诊断专家，普卢默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对罗切斯特建起世界一流的医疗建筑群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世界医疗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他在早期采用X射线设备和心电图设备，也推动了梅奥医学中心成为

医学实践先锋。

梅奥兄弟在1939年相继去世，那时，梅奥医学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卓越的医学圣地。美国总统、公司总裁、显要人物、富豪、贫民以及外科医生蜂拥前往小城罗切斯特。梅奥医学中心成了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多专科医疗实践基地，它帮助塑造了医学专科化的本质。历史学家罗斯玛丽·史蒂文斯论述道：“专科化是20世纪医学机构的基本主题。”^[1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医生都是专科医生，技术发展成果显著，住院医师培训制度问世并得到推广，而在《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后，医学院的组织结构也得到了改进。

梅奥兄弟没有经历过外科住院医师的阶段，却推动了外科手术实践、医院组织结构和医生教育培训的转变，这一事实令人惊叹。患者也认为，为了接受专家级的医疗服务，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小镇罗切斯特是完全值得的。

在人类社会迈入20世纪时，梅奥兄弟、巴尔的摩的威廉·霍尔斯特德以及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的外科医生们正在使外科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全科医生的专科化，年轻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需要更长时间来教授和培训，好让他们学习由经验丰富的执业医师发展和改进出来的专科技术。不同专业的医生专注研究人体某个系统或某个器官，让医学达到了半个世纪前还难以想象的复杂程度。

纽约特种外科医院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骨科医院。它不是美国第一家骨科医院，因为第一家的头衔属于波士顿的骨科医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纽约特种外科医院是现存最古老的骨科医院，建于1863年。^[20]最初成立时，它名为伤残医院，专门为纽约街头的残障人士提供医疗服务。在那个年代，流行病仍然

是未解之谜，结核病猖獗蔓延，大人和儿童都可能会因传染病造成的畸形和外伤而痛苦不堪；而一旦丧失活动能力，人生的毁灭就是必然的。

伤残医院成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但直到1889年，医院才拥有了一间手术室，这和罗切斯特的拥有一间手术室的圣玛丽医院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开诊恰好在同一年。詹姆斯·奈特（1810—1887年）是医院的创始人，不过他并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外科力学”专家。奈特医生不做手术，而是使用支架、绷带和支撑物来治疗脊柱侧凸、疝、静脉曲张甚至痔疮。^[21]最初的伤残医院只是一家小规模诊所，在奈特医生位于第二大道的家中看诊，后来搬到列克星敦大道和42街交叉路口西北角的专用医院大楼（现在是君悦酒店大楼）。然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奈特医生一直对手术持怀疑态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保守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人们还不知道麻醉、病菌学说和无菌外科，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想象抗生素的出现。

来自肯塔基州的农场大男孩儿维吉尔·吉布尼（Virgil Gibney，1847—1927年）先后就读于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和纽约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1887年他成为伤残医院的第二任领导。尽管吉布尼在少年时期失去了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但他顽强地追求着自己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梦想，并得到美国第一位骨科教授，贝尔维尤的刘易斯·塞尔（Lewis Sayre，1820—1900年）指导。与詹姆斯·奈特不同，在治疗骨骼肌肉疾病时，塞尔医生对外科手术持积极态度，他还率先于1854年对感染结核病的髋关节进行了手术切除。

在1887—1925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吉布尼医生都是伤残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在他的监督管理下，美国首个骨科住院医师制度于1887年创立，伤残医院的第一间手术室于1889年建

成。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荡不安，伤残医院在吉布尼的领导下彻底颠覆了骨科实践，外科手术占据了中心位置，而推动变革的是1889年到来的罗亚尔·惠特曼（Royal Whitman，1857—1946年）。

罗亚尔·惠特曼的反传统倾向与维吉尔·吉布尼相当一致。他从前的学生回忆道，他“总是尝试新的手术方式——有些是他自己发明的，有些是其他人的建议。他对骨科疾病和畸形的发病机制抱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使他不断地寻求新的手术方法来纠正骨骼肌肉缺陷”。^[22]1901年，惠特曼出版了一部经典教科书——《骨科手术专论》（*A Treatise on Orthopaedic Surgery*），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对该著作进行了9次修订。

吉布尼和惠特曼活跃在伤残医院的几十年中，另一座医院大楼于1912年建成，以配合新建的中央车站，于是伤残医院向东搬迁了几个街区。这时的曼哈顿已经拥有多家医学院、教会医院和学术型医院，以及众多外科手术培训项目，而骨科当时是一种关于铸型和加固的临床实践，也包括切除手术和引流手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可靠地植入任何金属，当然，塑料也还没发明出来。

直到1955年，医院才迁至现在位于70街和71街之间东河沿岸的地址，这是医院的第四个院址。不过那时的特种外科医院（于1950年更名）已经名声显赫。它与纽约医院和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之间的联系，使它深入发展基础科学研究，这对医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骨科已经成为骨骼、肌肉、韧带以及肌腱修复和重建的医学专科。骨折护理已经从铸型和加固过渡到以钢板和螺丝钉进行“内部固定”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髌部骨折的

治疗方式中加入了部分髋关节置换术。

如前所述，如果说“专科化是20世纪医学机构的基本主题”，[\[23\]](#)那么高度专科化与外科植入物的使用便是战后医学的基本主题。如果你想找到外科手术爆炸式增长的证明，可以想一想1968年的特种外科医院，它在建院100多年后，仍然只有三间手术室。马克·考文垂医生于1969年在梅奥医学中心进行了首例“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全髋关节手术”，而1968年，在首席外科医生小菲利普·威尔逊（Philip Wilson Jr.）和后来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骨科主任的哈兰·阿姆斯图茨（Harlan Amstutz）医生的指导下，特种外科医院进行了首例“查恩雷金属对超高分子聚乙烯”髋关节手术。[\[24\]](#)

全髋关节置换术可以说是外科学历史上最可靠、效果最持久以及最令患者满意的植入手术。聚乙烯和骨水泥能运用于医学，应归功于约翰·查恩雷爵士。直到今天，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感受着他为世界医学的贡献。然而，全膝关节置换术出自特种外科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工程师之手，1974年“全髁膝关节假体”是世界上首款成功并广泛使用的膝关节置换假体。[\[25\]](#)随着关节置换术的成功以及脊椎手术的可靠性日益提高，特种外科医院于1972年将手术室增至8间，到1990年增至11间，而现在又翻了一番。

全世界最著名的骨科医院在前50年中发展缓慢，并不是因为领导不力或缺少投资；直到植入革命实现并完善了各个基本要素之后，特种外科医院才得以全面繁荣。美国在二战后对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的推崇，促进了世界上独特的骨科研究项目的发展，尤其是运动医学领域的发展。就像梅奥医学中心一样，特种外科医院运用高科技诊断工具，重视住院医师的教育工作，渴望创建一支顶尖核心团队。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患者来到这里，使这家医院成为希望的灯塔。

所有外科专科都能列出各自的领域始于哪些重要的诊所和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都认可哈维·库欣工作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泌尿科医生认可休·扬（Hugh Young）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心胸外科医生认为明尼苏达、克利夫兰、费城、罗切斯特和休斯敦是他们这门专科的中心，等等。这些医学机构都由一位有远见的外科医生领导，领导者往往来自一座小镇，靠自己的双手闯荡。再想想美国骨科巨匠维吉尔·吉布尼和刘易斯·塞尔，他们都来自肯塔基的列克星敦地区。再让我们仔细看看吉布尼医生的右手——11岁那年，他受伤失去了两根手指。

在同辈精英中成为黑马脱颖而出，其背后似乎有一个秘密：一个需要证明自己的孤独灵魂，熟练而灵巧的手法，手工操作与创新见解相结合。查理·尼尔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也不喜欢捣鼓小东西，但他会骑马和打网球）。他开创了肩关节置换手术，对几种肩部状况的诊断和处理方式进行了改进，改变了整个肩外科领域。肩外科的首个专科项目（住院医师培训后的进阶项目），就由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负责带领，该项目的研究人员都是史上留名的肩外科医生。尼尔医生是美国肩与肘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的建会主席，也是《肩与肘外科学杂志》出现的幕后推手。这一切都出自这名在俄克拉何马州维尼塔长大的男孩之手。

诺曼底登陆期间，查理·尼尔与其他医疗“志愿者”一起被派往英吉利海峡，在一艘条件艰苦的医疗船上验伤筛查。由于尼尔和同事都是单身，他们被视为“敢死队员”，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鱼雷艇到达医疗船，迅速开始对登陆法国海岸的战斗中英勇负伤的军人们进行筛查评估。查理在一片漆黑中一直听到有人大声喊着“救救我”“帮帮我”。在查理的人生中，这样的恳求会一直回响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同样让他无法忘记的还有患者在改装的

军舰上命悬一线，在幽暗的水面上颠簸的景象。

26岁的查理·尼尔将于诺曼底登陆日的六天后，即1944年6月12日登陆法国海岸。随着盟军向南部和东部行进，他所在的军团陆续建立了野战医院，最后在距离沿海小镇迪耶普（Dieppe）几英里的小村庄阿尔克拉巴塔耶（Arques-la-Bataille）的一间校舍中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医疗场所。在刚刚登陆的前几天，盟军伤亡惨重。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盟军力争在法国北部站稳脚跟。数千名海陆空战士在行动中牺牲，溺水、爆炸、炮击和烧伤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而更多的伤员需要在行军途中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里接受治疗。在阿尔克拉巴塔耶，新任命的医疗军官尼尔中尉和同事们为受伤的盟军（偶尔也有德国部队）包扎伤口和进行手术，日夜不息。

尼尔医生也去过太平洋战场，在菲律宾和日本工作。他真正见识过战争的恐怖，包括前往满目疮痍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现场。查理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些战地医学经历——在20世纪40年代，战争技术肆意蹂躏着生命，医学却无能为力，承受着巨大折磨的伤员们在绝望中痛苦地哭喊。几十年过去了，诺曼底海滩上的一切对他来说仍然历历在目。

在尼尔医生职业生涯的后期，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接入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要求与尼尔医生紧急通话。国务卿要求尼尔医生履行爱国义务，前往巴黎为一位富豪进行治疗，他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身份。应总统要求，来自维尼塔的查理·尼尔将为一个富可敌国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他有些犹豫地答应了。尼尔夫妇在肯尼迪机场登上了法国航空协和式超声速喷气客机。这场惊心动魄的超声速飞行从纽约的

跑道上就开始了，飞机从一侧倾斜向另一侧，起飞过程令人心惊胆战。为了节省时间，整个飞行过程丝毫没有考虑心神不宁的乘客。乘坐世界上最著名的飞机带来的荣耀感，在宇宙飞船发射般的可怕启动过程中荡然无存。

飞行到足以欣赏地平线的高度之后不出几个小时，尼尔医生就跟随引领，迅速来到患者位于巴黎最高级行政区的私人住宅。他对患者肩部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彻底检查，与往常一样对诊断和预后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这位富豪病人了解到没有必要做手术，并得到了一套简单的治疗方案。

离开前，尼尔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尽管对方在旅行安排上十分慷慨大方，但他实在不愿意再乘坐协和式超声速飞机返程，飞行过程实在太痛苦了。出资人没有对他说出这种话感到生气，并承诺工作人员会做其他安排。

转天，尼尔夫妇到达戴高乐机场，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一架专门为他们安排的包机上。他们十分高兴地看到，等待自己的不是可怕的超声速小飞机，在跑道上闪着灯的竟然是一架波音747客机。登上这架庞然大物后，尼尔夫妇震惊地得知整架波音飞机都是他们的，于是对这位心存感激的患者称赞不已。机组人员向他们问候致意，并向尼尔医生询问道：“我们加满了油箱，飞机上也没有其他乘客，请问您在返回纽约途中还想去其他什么地方吗？”

查理·尼尔回想起自己在部队医疗队做年轻军官的那些日子里曾登陆尸横遍野的诺曼底海岸。他告诉飞行员，他很想去看看英吉利海峡、法国北部沿岸的居民区，最重要的是，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

飞行员很高兴能够达成尼尔医生的愿望。

私人747大型喷气式客机载着两名乘客从巴黎起飞，向北飞往诺曼底。自东而来的这架巨型飞机陡然向左倾斜转弯，诺曼底的沿海村庄便出现在正下方。布满白色十字架的纪念广场和广阔的沙滩呈现在他眼前。如今，那位来自维尼塔的大男孩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肩外科医生。尼尔医生第一次来到诺曼底是45年前，那时的他还是一名战战兢兢、不谙世事的美国青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那期间，抗生素研发成功，联邦医疗保险通过法律生效，关节置换术问世，主要的骨科器械公司成立。现在的查理·尼尔奇迹般地乘坐着私人的波音747飞机重回诺曼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需要好几年才会出现商务航空旅行，当时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将来会乘坐大型私人包机返回奥马哈海滩。同样，配备了晶体管、聚合物、电线、生物材料和现代合金的植入革命，也是那么不可思议。

[1] William Osler, "Why is it so? Is it so?" *Journal of the Tennessee State Medical Association*, 1919, 12: 222.

[2]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38.

[3] Ibid.

[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p.78.

[5]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

[6] <https://www.thoughtco.com/how-skyscrapers-became-possible-1991649>.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7] <https://www.spc.noaa.gov/faq/tornado/f-scale.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8] 威尔·梅奥即威廉·梅奥，威尔（Will）是威廉（William）的简称。——译者注

[9] S. H. Severson, Rochester: Mecca for Millions (Rochester, MN: Marquette Bank & Trust, 1979).

[10] 查理·梅奥即查尔斯·梅奥，查理（Charlie）是查尔斯（Charles）的简称。——译者注

[11] W. W. Mayo, “Address,” in Memorial of St. Mary’s Hospital, (Rochester, Minn.: St. Mary’s Hospital, 1894), pp.7–8.

[12] W. J. Mayo, “John[s] Hopkins, May 1895,” handwritten notebook, MCA.

[13] W. Bruce Fye, Caring for the Heart: Mayo Clinic and the Rise of Specializ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6.

[14] Ibid., p.17.

[15] Ibid., p.19.

[16] Ibid., p.23.

[17] Ibid., p.29.

[18] W. J. Mayo, “Commencement Address,” in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Staff of St. Mary’s Hospital, Mayo Clinic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1911), pp.557–66.

[19] Rosemary Stevens, American Medicin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ix.

[20] David B. Levine, Anatomy of a Hospital: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1863–2013 (New York: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2013), p.xi.

[21] Ibid., p.4.

[22] M. M. Manning and J. H. Calhoun, “Royal Whitman, 1857–1946”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American Vol., 1946, vol. 28, pp.890–92.

[23] Rosemary Stevens, American Medicin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rev.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ix.

[24] David B. Levine, Anatomy of a Hospital: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1863–2013 (New York: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2013), p.185.

[25] Ibid., p.215.

第十七章

植入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用水和蒸汽动力来机械化生产。第二次革命使用电力创造出大批量生产。第三次革命使用电子和信息技术进行自动化生产。现在，在第三次革命的基础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这是始于上个世纪中期的数字革命，其特征是技术融合，实体、数字和生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克劳斯·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如今，我们的约翰·查恩雷已经成为外科学历史的一部分，与曾经的那些大师级外科医生比肩……查恩雷假体本质上是一件生物学设计，其设计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也许想到过这样的作品。但今天，我们想到的是这个人，一位我们认识并喜爱的人。在奠定基础知识和减轻人类痛苦方面，他为外科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

——哈里·普拉特

我正在做肩部手术，但并没有穿戴手术衣、手术帽和口罩，而是身着衬衫，系着领带，套着实验室的白大褂，坐在办公室里。实际上，患者根本不在这里，只有三维立体成像的肩胛骨映在我面前的计算机屏幕上。几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肩外科医

生能够处理斯坦利的病例，他的骨骼缺失和变形十分严重，而如今，这种情况几乎已经能够得到常规治疗。

4个月前，我在诊所第一次见到痛苦不堪的斯坦利。8年前，他在中西部接受了全肩关节成形术，尽管初步效果非常好，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的肩膀越来越疼。我看了最初的X射线检查，告诉他我真希望是自己为他做的植入手术，植入的金属和塑料部件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慢慢松动了。在植入手术过程中，骨科假体部件必须放置得极其稳固，任何地方能够稍微晃动都意味着置换术最终注定失败，不过，即使不差分毫的完美植入也无法保证绝对成功。

斯坦利有一头沙金色的头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露出一口稀松的牙齿。他常常咳嗽，一听那声音就知道他吸烟。此前，他已经看过几位外科医生，他们都认为X射线照片看上去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对斯坦利进行了全面体检，并仔细检查了新的X射线照片。我认为他的全肩关节置换物松动了，并且有可能发生了感染，这令他大吃一惊。61岁的斯坦利直言，他还得再工作几年才能退休，而置换手术的失败令他感到痛苦和焦虑。我建议手术移除松动的植入物，同时检查是否感染，并评估骨骼缺失程度。在这种病例中，不够稳固的关节盂组件（由聚乙烯制成的肩关节窝植入物，看起来像白蜡一样）会对肩胛骨的关节窝部分逐渐造成损伤。当钴铬合金肱骨头置换物在关节盂假体内旋转，聚合物组件的钉桩有可能开始松动，脱离宿主骨，就像不结实的木桩摇摇晃晃，无法再支撑花园的大门。长时间忽视这种情况的话，肩胛骨的骨骼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消失，只剩下蛋壳状的骨头包围着木薯般的纤维组织和脱节的聚合材料植入物。

一个月前，我第一次为斯坦利做手术时，眼前的情景令我为他感到担心：骨骼大面积缺失，植入物在松散的骨头中浮动。打

开肩膀最深处，我发现一团金属、塑料、苹果汁般的滑膜液和纤维组织的混合物。所有植入的异物都需要移除，还需要取得组织和体液的培养物，以确定没有隐性感染。然后，我放置了一个由丙烯酸水泥做的骨水泥占位器，它是一种液态单体与聚合物粉末混合的产物，类似我小时候做作业用的树脂，看上去则像蓝色橡皮泥。这种模仿正常肱骨形状和功能的占位器还含有粉末状的抗生素，可以在我们等待培养结果时对抗深度感染。放置好骨水泥占位器，我们要去做一件神奇的事：拍一张计算机断层扫描片，通过一系列精密的三维X射线检查，帮助我制订全肩关节置换修复手术的术前计划。

术后一周，我们拍了一张肩部的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片。计算机可以通过视觉成像软件收录所有的X射线检查信息，构建虚拟的三维影像。在过去的十年中，神通广大的成像软件使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可以“减去”所有的周围组织如肌肉、韧带和肌腱，在计算机屏幕上“构建”骨结构。医生可以通过键盘操作来旋转图像，以了解骨骼外观。想象一下，修车师傅不用抬起引擎盖，而是使用一种能够透过金属看到内部的奇妙工具，魔法般地洞悉发动机的问题所在。在过去的几年中，科技的发展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骨骼的三维图像，还可以设计手术方案，以虚拟方式植入部件，并对放置的位置进行评估。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现在可以与工程师合作，为一个肩关节的特定缺陷定制肩关节置换物。

我与魁北克植入产品设计师的电话会议即将开始。通过植入物公司捷迈邦美（Zimmer Biomet）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我与蒙特利尔的一位工程师通过网讯（Webex）进行视频会议。只要敲打几下键盘，我就可以设置程度的隐私程度，使斯坦利的个人信息完全保密。工程师西蒙妮通过电脑上的链接与我通话，并控制

屏幕上的图像。浅灰色的背景上呈现出斯坦利肩胛骨的三维图像。西蒙妮通过鼠标控制成像软件，而我可以要求她显示肩胛骨的不同角度和方向。我们在影像与想象中共事。蒙特利尔和丹佛突然显得并不遥远。

西蒙妮通过计算机操纵着肩胛骨，仿佛《实习医生格蕾》的画面走入真实生活，在我的面前翩翩起舞。完整而结实的关节盂可以支撑常规的植入物，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布满凹痕的肩关节窝，中间有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根本无法支撑我需要植入的金属底座。此刻，西蒙妮展现出卓越非凡的现代意识：我们要一起构建一个植入物，这将是一个计算机辅助制造的金属产品，能够完美契合斯坦利的肩部。他的肩膀损伤严重，在5年前我还不会考虑治疗这样的病例。如今，我可以与捷迈邦美合作，为患者定制一个独一无二的植入物，它能够与骨骼外壳紧密契合，上面的钻孔可以使螺丝钉完美地固定到剩余的骨骼上。这一突破性系统使我能够处理5年前还无能为力的肩部病例。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植入物的设计，签字完毕后，开始在印第安纳州的华沙进行制作。

距离我们完成植入物设计已经过去了几周，手术的日子到了。患者所需要的其他准备都已经按常规安排好，包括术前沟通、术前准备、手术体位、手术入路以及切口。不过，在我触及肩部最深处的时候，按部就班的常规工作便结束了。专门定制的植入物单独放置在一层一层的无菌包装中，等待着植入手术。它的替身是3D打印的白色聚合物，尺寸完全相同，还有一个斯坦利肩胛骨的3D打印版本。这些实物大小的轻型硬塑模型与几周前我在计算机屏幕上所看到的完全一致，它们可以帮助我完成定位，将真正的金属植入物放置到斯坦利支离破碎的肩关节窝中。

清理胸腔缺损处的纤维疤痕之后，我仔细观察着肩关节窝深

处，那里已经不是能够支撑植入物的坚实堡垒，只剩下蛋壳般的骨骼。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发现会令我大为震惊，但这一次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没有像以往那样惊恐不安，而是勇气十足，甚至跃跃欲试，因为我拥有转危为安的工具。我小心翼翼地将试用的聚合材料植入物放置在缺损部位，它完美地卡在它的位置上。我又花了一点儿时间检查契合的程度，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向胸腔深处插入了实际的植入物。形状奇特的高密度合金植入物在巨坑中安稳落座，仿佛宇宙飞船的发射架进入发射基地，科幻小说也不过如此。

我用多个螺丝钉将定制的植入物固定在肩胛骨上，轨迹和长度在几周前已经确定好。以前绝无可能的事情如今似乎变得稀松平常。我小心谨慎地将螺丝钉一个接一个地穿过金属植入物，钻入受损的骨骼，我已经感觉到每根螺丝钉的长度都与数周前我做“网络外科医生”时所预计的长度相同。植入所有的螺丝钉后，斯坦利的身体拥有了一件这样的植入物：它在蒙特利尔完成设计，在印第安纳州由一群熟练的技术员精准打磨，再连夜寄到我的合作公司业务代表乔迪那里，他今天运送给我。工程学、商务、生物学研究、计算机成像、卫星和光纤通信、高级制造业、空运、合作营销业务、熟练的外科手术以及出色的麻醉、护理和技术支持，这一切融为一体，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所以在今天看来，他的严重病痛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尼尔医生会大为惊讶，也会感到相当自豪。

查理·尼尔的医学实践与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骨科医生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专门研究特定关节的医生很少。除了由手外科之父斯特林·邦内尔（Sterling Bunnell）和威廉·利特勒（William Littler）等人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指导的手外科实践，骨科

在世界上几乎没有进一步细分的专科诊所。尼尔医生继续担任着骨折医生，甚至在1971年发表了一篇膝关节外伤论文，那时他已经完成住院医师培训20多年了。但是，随着医学的加速发展，像查理·尼尔这样的外科医生开始关注特定关节。正如骨科与普通外科产生区别，成为一门专科一样，热衷于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仔细钻研的人们孕育了骨科的专科领域。

战争总是残忍而有效地推动着技术、运输、通信、设计和医学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冶金学和抗生素的进步，骨科专科即将迈入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不过关节炎的治疗还几乎没什么效果。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中，查理·尼尔致力于骨折治疗，包括肩部骨折的手术治疗。

几百年来，医生和科学家们主要通过印刷期刊与同行交流他们的新发现。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医生们而言，“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信条要求医生必须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在期刊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查理·尼尔这样的年轻外科医生精力充沛、乐观向上、视角新颖，是暴露二战后骨科不足的完美人选。尼尔医生发表于1953年的经典文章《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强调了与肩部严重骨折相关的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的不良后果。在文章的最后一页，他附上了一张自己设计的肩关节植入物照片并总结道：“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2\]](#)世界初识未来。

1955年，尼尔医生就12例接受肱骨头关节置换的患者做了报告。[\[3\]](#)他使用自己设计的植入物治疗外伤，术后情况取得了显著改善。为外伤病人植入尼尔的假体是医学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在这篇文章中，查理·尼尔还暗示了另一层意义。12名患者都发生了肩关节骨折—脱位，但有一人除外。1954年3月16日，第11号病人，一位70岁的家庭主妇，因患有“肥大性骨关节

炎”而接受了手术治疗，这是世界上首例治疗关节炎的部分（“半”）肩关节置换术。患者在术后回到了中西部，后来她给尼尔医生写信说，自己“摆脱了疼痛，走向新生”。尼尔医生并没有将肩部植入物的使用局限于外伤治疗，也为肩关节炎患者带来了福音。

随着战后的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兴盛，医生坚信能够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来挑战疾病。抗生素打开了通往腹腔并给腹腔器官做手术的大门。术中和术后的机械通风为外科医生给重症患者做手术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支持。药理学的发现使医药发展突飞猛进，糖尿病、疟疾、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等疾病得到了医治。最后，化学和高分子科学的进步，促使一些每年使用数百万次的材料出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常见的塑料——聚乙烯。

自1953年取得突破以来，尼尔医生在十年里进行了46例部分肩关节置换手术。在46例半关节成形术中，7例患者得了骨关节炎而非骨折。在1963年发表于《北美外科临床》（*Surgical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的文章中，查理·尼尔总结道：“这一组的假体置换效果优于其他治疗方式。”在肩关节置换手术的头十年中，肩外科之父平均每年进行的关节炎置换手术还不到一例，但这一数字将会迅速上升。

尼尔医生的下一篇关于肩关节置换术的重要文章，是一篇20年来肩关节置换的报告——《盂肱骨关节炎的置换成形术》（“Replacement arthroplasty for glenohumeral osteoarthritis”），这位纽约外科医生就48例接受关节成形手术的关节炎患者做了报告。在第一个十年中，7例关节炎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而在第二个十年中，41名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增加了近5倍。在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中，尼尔医生又一次让

人窥见了未来。第一张数据表中藏着一例这样的患者：第18号病人，一名57岁的家庭主妇，接受了全肩关节成形术，在关节盂即肩关节窝一侧放置了一个聚乙烯植入物。尼尔医生解释说：“这例患者的治疗方式有所改进，我们插入了高密度聚乙烯关节盂，以丙烯酸水泥进行固定，使用了与之前略微不同的肱骨元件。”^[4]

文章中有一张植入物的图示，但没有X射线照片。稍加改良之后，这种名为“尼尔二代”（Neer II）的钴铬钼合金植入物的边缘呈弧线形设计，圆滑的肱骨头更接近球形，未来几十年中出现的所有肩关节植入物都从这里起步（见彩插17.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种新发明的骨关节置换术都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塑料聚乙烯衬垫、合金关节表面、用于固定金属部件的丙烯酸水泥。不论是肩、肘、腕、髌、膝还是踝，每一种关节成形术中的关节置换都由这三个部分组成。技术进一步发展后，无骨水泥组件出现了，植入物的质地可以促进新的骨骼生长，不再需要丙烯酸水泥。约翰·查恩雷爵士为我们描绘出了这种关节置换的蓝图。

坐落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曾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国际资本主义发源地。兰开夏郡的中心是利物浦和世界首座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曼彻斯特虽然曾经是古罗马的防御要塞，却因为运河和河道改善工程而闻名（竣工之后，周边村落的煤炭和经过加工的棉花从这里运往默西河、利物浦及全世界）。工业革命始于1780年左右，尽管英格兰从未种植过棉花，但到19世纪30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棉花都在兰开夏郡加工。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竞相效仿兰开夏郡的蒸汽机、运河、工厂和贸易中心，兰开夏人的国际影响力将会逐渐减少，然而我们可以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位兰开夏人来自曼彻斯特

的郊外小镇贝里（Bury）。

约翰·查恩雷出生于1911年，父亲是化学家，母亲是一名护士。他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机械天赋，喜欢做帆船、修机器。约翰的姐姐就读于剑桥大学，而约翰从贝里文法学校毕业后，凭借众多科学奖项和优异成绩直接进入曼彻斯特的医学院学习。似乎查恩雷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他还是医学生时，他就参加了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并轻松过关。

1935年，年仅24岁的查恩雷取得了医学学位和外科学位[5]，在伦敦开始了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回到曼彻斯特，在德高望重的英国早期骨科先驱哈里·普拉特的指导下工作。1939年9月1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查恩雷未来的职业计划。1940年5月1日，他应征进入皇家军医部队。与此同时，德军横扫西北欧，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查恩雷被派往位于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对岸的多佛尔。在那场37万大军撤离法国海岸的奇迹中，他出生入死，多次跨越海峡转移和救治伤员。后来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皇家军医部队工作，这些经历使他在治疗复杂的骨外伤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战争结束后，查恩雷先生（英国的外科医生会使用“先生”这一头衔，并以此为荣）回到曼彻斯特，兼任皇家医院外科医生。查恩雷渴望从事更多的医疗工作，于是接受了曼彻斯特以北25英里处莱廷顿医院的一个职位。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会接受一个偏远乡村医院的职位呢？医院又为什么会建在那里呢？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结核病疗养院，这些设施按照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建议，遵循着一定的典型模式建设：它们是为结核病患者专门在乡村建立的医院，那里的空气比较新鲜，医院通常为单层结构，设有开放式走廊和大型窗

户，人们认为这样有助于患者对抗结核病。罗伯特·科赫于1882年分辨出了结核分枝杆菌之后，科学家们只能梦想着出现一种杀死细菌的神药。在取得这项突破之前，人们怀着矛盾的心情在乡村建好专门的医院来收治患者，而他们将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咳嗽，慢慢地死去。1920年，兰开夏郡议会从一个出现财务困难的名门望族手中购买了莱廷顿大礼堂，并将其改建为一所能够容纳226名慢性结核病患者单层结构疗养院。这家医疗机构独立运营了数十年，于1948年移交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管理，就在那个时候，查恩雷开始每月前往这一乡村基地。

莱廷顿的大多数病人都患有骨骼和关节感染，从内部开始腐烂，只能姑息治疗。有意思的是，正当查恩雷开始在莱廷顿进行医疗咨询工作时，结核病的发病率开始下降。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包括牛奶的巴氏灭菌标准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感染结核病的儿童越来越少；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于20世纪40年代问世，则使治愈结核病成为可能。“英国各地的疗养院和骨科医院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局面，曾经为结核病患者准备的大量床位如今已经不再需要了，他们该如何运用这些床位？”^[6]患者不会死于结核病，但这种疾病对身体的严重破坏还没有消失：感染的关节仍然会受到严重损伤。塞米斯托克利斯·格鲁克曾在1890年痛苦地认识到，根本无法置换体内受到感染的关节。但如今查恩雷可以考虑以手术方式对抗患病关节，不论患者得的是不是结核病，他还有希望缓解甚至治愈人类最大的负担之一——关节炎。

在曼彻斯特工作期间（他在那里兼职到1958年），查恩雷先生为一名接受过朱代（Judet）丙烯酸假体部分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做了评估（朱代丙烯酸假体是一个替代发炎股骨头的透明塑料球体）。患者告诉这位聪颖的外科医生，自己身体前倾

时，植入的人工髋关节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种声音尖锐刺耳，连他的太太都无法容忍自己在身边。查恩雷并没有轻视这件事，也没有觉得可笑，而是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声。他发现股骨骨折后所进行的股骨头置换就很少会出现这种声音。在股骨骨折的情况下，髋臼软骨仍然完好，而且从表面上看它仍然提供着光滑的关节表面；而这些声音只在关节炎病例中出现，关节炎患者的髋臼在髋关节两侧只剩下粗糙的骨头，当置换的塑料球体与患有关节炎的髋臼相互接触时，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重要的是，查恩雷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植入物和配件上，而是去推敲有机部分，思考重要患病组织的生物力学——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生物力学指“与生物体的运动或结构相关的机械定律”。他的导师哈里·普拉特爵士认为查恩雷是一名外科医生兼生物学家，而不是外科医生兼工程师。为了找到治疗髋关节炎的方案，他首先需要了解健康的关节软骨具有怎样的功能。这将成为每一种植入物的发明模式：提出治疗方案之前先理解功能。现在看来，格鲁克在抗生素、灭菌、现代生物力学、合金和聚合物出现之前的1890年植入象牙，似乎有些荒唐可笑了。

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机械引擎及其曲轴、活塞、齿轮和车轴——这一切都需要润滑。新兴的石油工业发现的机油和蒸馏黏性流体，可以用来润滑机器组件衔接处的金属。如果人是一台机器，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我们的组件具有相似的生物力学关系。这样想是合理的，但是错了。查恩雷开始与曼彻斯特大学学工程的朋友们探讨自己的理论，他们一致同意我们的关节与金属机械组件的润滑原理不同。金属机械组件属于液体动力润滑，即薄薄的一层液体分离连接表面以及快速运动的组件；而我们的关节则不一样，查恩雷和同事们认为，人体关节属于边界润滑，即润滑剂（滑膜液）对关节表面本身具有亲和力。为了验证这种假

设，约翰·查恩雷和工程师们开始研发检测装置，以评估软骨的“润滑度”。

摩擦系数（用希腊字母“ μ ”表示）是表示两个表面之间摩擦力的数学比值。如果 μ 很高，则说明移动其中一个物体需要很大的力量。磨砂纸或橡胶轮胎的 μ 值高于1，而非常滑溜的东西，例如在冰面上滑行的溜冰鞋，摩擦系数只有0.03，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光滑的物体了。为了确定软骨的 μ 值，查恩雷及其工程师团队组装出一种能够将人体关节（膝关节，后来还有踝关节）的一部分固定的支撑平台装置。关节的上半部分置于平台上方，并以摇臂固定，这些科学先驱就可以像这样计算出健康软骨的光滑程度。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摩擦系数为0.001，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测试到的最光滑的固体表面，以数学方式来表达的话，它的光滑程度是金属对骨骼光滑程度的500倍，是冰上的溜冰鞋光滑程度的30倍。

查恩雷先生在非外科领域的科学出版物上发布了其生物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取得良好临床效果的关键是设计出一款摩擦系数很低的植入物，而且他可以一边用测试装置确定 μ 值，一边修改植入物的形状和尺寸。于是他长期以来提到的“低摩擦人工关节成形术”的研发竞赛开始了。

外科医生对患有关节炎或发生骨折的股骨头进行置换手术已经十几年了，结果通常可以接受，但查恩雷在努力寻求更好的效果和更长的使用寿命。要实现真正的低摩擦人工关节成形术，关节窝需要一种“光滑物质”，他开始向英国新近训练出来的聚合物科学家们咨询候选材料。最终得到的建议是使用聚四氟乙烯（PTFE），亦称特氟龙。“特氟龙”会让我们想到平底不粘锅，不过它最初是一种工业材料，用于制造阀座和无润滑轴承。查恩雷对特氟龙进行了评估，发现这种材料具有生物学惰性，植入人

体后（他没有用动物试验）几乎不会在局部产生异物反应。特氟龙外观呈白色半透明蜡状，可以用刀切开。查恩雷从1956年开始使用特氟龙臼杯进行全髋关节成形术，将其敲进患者的髋臼中，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全髋关节成形术。手术结果令人惊叹。[\[7\]](#)患者的活动范围良好，并极大地缓解了疼痛。查恩雷开始在两个闻名世界的医学出版物《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和《柳叶刀》上报告自己取得的成果。

查恩雷让髋关节置换领域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他勇敢地改变了金属股骨头的大小。从史密斯-彼得森开始，到后来的罗伯特·朱代和让·朱代兄弟，以及奥斯汀·摩尔（Austin Moore），所有早期髋关节先驱都设计出了与患者本身股骨头相同大小的金属股骨头来进行部分关节置换。人工髋臼杯的出现使查恩雷做出了一个天才决定——缩小金属股骨头的尺寸。他又一次将关注点放在了“低摩擦人工关节成形术”上，认为更小的股骨头摩擦力也更小，所以股骨头的直径从摩尔的42毫米（约为乒乓球大小），变为28毫米，最终减到22.25毫米，大约相当于一颗弹球的大小。许多外科医生觉得约翰·查恩雷的设计十分可笑，但他有数学计算的支持。

最初，查恩雷为患者植入的是奥斯汀·摩尔的股骨柄和大股骨头，没有丙烯酸骨水泥。在使用摩尔假体和特氟龙臼杯几年之后，他开始寻找一种更为稳固的方法来植入股骨部件。对于骨质较弱的老年患者来说，摩尔假体的细长金属柄可能会在股骨髓腔中晃动，导致下沉和疼痛。查恩雷常常向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咨询问题，特氟龙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他咨询了曼彻斯特大学牙科学院修复学系的一些化学家。牙医经常处理牙齿脱落后齿槽缺损。在英国，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1948年建立，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在人生中第一次寻求医疗服务和牙科治疗。这种对

医疗保健的需求促使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寻找更好的假牙和牙齿植入材料，而正是曼彻斯特的一位有机化学家丹尼斯·史密斯向约翰·查恩雷推荐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就是丙烯酸骨水泥，是一种由液体单体与粉末状聚合物简单结合而成的自凝黏结剂。水一样的液体单体存储在小瓶中，其中带有化学抑制剂，而外观呈糖粉状的粉末装在小袋子里。手术时，助手将两种成分在搅拌碗中混合，类似于制作面团。混合物起初呈乳状，然后变成面团状，几分钟后看起来就像新的橡皮泥一样。聚合作用是较小的化学分子即“单体”竞相与较大的链状聚合物连接在一起，形成刚性物质的复杂晶格的过程。这一化学过程是一种“放热反应”，即分子连接时会放出热量，刚开始形成一种黏性浆体，然后变为柔韧的塑料，再逐渐硬化，形成具有弹性的团状物，最后成为一块固体聚合物。如今，我们每天都会见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在有机玻璃窗、展示柜、眼镜、标识牌、浴缸和天窗里都有。而查恩雷发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是固定髌关节柄的理想黏结剂。他没有进行动物试验，就在1958年首次将其应用于人体。他马上便相信了这种材料的能力。半个世纪后，全世界每家医院每天都在使用查恩雷的骨水泥，只是对其化学成分略加修改而已。

1958年后，查恩雷彻底离开了曼彻斯特，一开始在莱廷顿做兼职工作，最终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交给了这家曾经的乡村结核病医院。当地医院管委会为建立生物力学工作室和实验室提供了资金，查恩雷很快便雇用了一名实验室技术员哈里·克雷文，这位全才的多面手在查恩雷身边工作了许多年，他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关键时刻。实验室于1961年建成运营。查恩雷拥有敬业的工作人员和专门建设的手术室，他相信自己会不断成功，并满怀信心地将其机构命名为“莱廷顿医院髌关节外科

中心”。

就像所有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一样，约翰·查恩雷也是一名精工巧匠。他擅长制作，修机器，建模型，也亲手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植入物。他的家里设有一个工作室，里面有一台车床，可以将特氟龙块制成髌臼植入物。克雷文协助他完成这些工作，而解决髌关节炎问题的关键是制作小部件本身。

在髌关节外科中心和数百例髌关节置换手术所带来的兴奋之情中，查恩雷希望小型股骨头、特氟龙臼杯以及丙烯酸骨水泥固定可以成为髌关节炎的长期手术方案。他每年所做的髌关节置换手术数量，已经从1959年的100例增长到1962年的超过400例。作为一名科学家，查恩雷当然愿意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并确定长期效果。1962年末，查恩雷意识到大事不妙。尽管患者对手术效果十分满意，关节功能也能到了改善，但3年来的随访X光检查显示，特氟龙臼杯发生了严重变化。查恩雷后来解释道：

历经300例手术和三四年的时间，我才得出结论 [特氟龙不合适]，这似乎有些奇怪，有许多的原因共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第一，三年来的效果令人惊叹，患者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这让我们无法直面怀疑：在如此成功的情况下，X射线检查竟然会显示出失败的端倪。第二，从化学本质上讲，聚四氟乙烯 [特氟龙] 惰性极强，我们觉得即使出现磨损，碎屑也会无害。第三，尽管在一年后的X射线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到1毫米的磨损，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外，可以解释为股骨头“嵌入”了一个刻意加工成内径大于股骨头的臼窝中。直到第一年的磨损程度在第二年翻倍，而到第三年又增加了一倍，问题的严重性才显现出来。[8]

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走到了尽头，查恩雷也不得不开始怀疑是否一切都搞错了。所有的X射线检查都显示特氟龙臼杯的“顶部”出现了相似的高度侵蚀，在几年的时间里，金属股骨头一点一点地磨入塑料臼杯，仿佛一把热切刀穿过黄油一般。查恩雷先生开始重新手术，他震惊地发现特氟龙臼杯的磨损并非最严重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在特氟龙臼杯失败的患者髋关节周围存在“磨损碎屑”。他在髋关节囊内的特氟龙颗粒周围发现了纤维组织团。人体组织对这种曾经被认定为“惰性”的材料产生了不良反应，这足以表明特氟龙完全不适用于人体，尽管早期结果看似是成功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想法，查恩雷将特氟龙研磨成粉末状样本，并用大号针头注射到自己的大腿中。经过9个月的观察和等待，他切出皮下的结节，仔细检查了被纤维组织团包围的特氟龙结块后，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使用特氟龙了。整块特氟龙在体内是惰性的，但特氟龙颗粒则不是。我们会对查恩雷将特氟龙颗粒注射入自己大腿的行为感到惊叹，但想想他的英国前辈、外科学之父约翰·亨特，他将梅毒脓液涂在自己划伤的阴茎上做实验，相比之下查恩雷似乎也不算太疯狂。

功亏一篑的约翰·查恩雷满心内疚、郁郁寡欢。几周来，他的生活淹没在绝望中，太太（他终于在46岁时结婚了）发现他半夜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她感到“一切都是灰色的，阴郁无望笼罩着四周”。^[9]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终于，一次偶然的发现使他重回正轨。

1962年5月，一名德国塑料制品公司的销售员来到莱廷顿，希望可以与查恩雷或其助手哈里·克雷文面谈。他销售的产品是塑料齿轮部件，用于兰开夏郡的纺织业（20世纪60年代仍然是当地十分重要的产业）。他想查恩雷的实验室可能会需要这样的机械部件。与销售员见面后，克雷文一眼就发现零部件的原材料

与特氟龙十分相似。于是他留下了一块4英寸的材料样品，一块高分子量聚乙烯（HMWP），打算拿给查恩雷看看。

克雷文将聚乙烯块拿给查恩雷，查恩雷把它放在手里，用大拇指用力揉捏。他发现指甲可以在表面造成划痕，认为这种“聚合物”会和特氟龙一样令人失望，便告诉克雷文别浪费时间了。然而，克雷文并没有听从查恩雷的劝阻，他保留了新型聚合物的样本，并打算用自己专门设计制作的测试装置对其进行分析。在同一台莱廷顿的机器上，这种新型材料的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震惊，特氟龙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查恩雷去哥本哈根开会了，所以他还不知道机器运转起来了，不锈钢头正在高分子量聚乙烯块上不停地振荡着。

查恩雷去哥本哈根时，肯定还是闷闷不乐的，甚至没有注意到高分子量聚乙烯正在实验室进行测试。他曾因髌关节成形术而在业内闻名，但当那些可怕的结果在他面前展开，查恩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愚笨至极。后来，他回忆道，度假回来后：

克雷文来到办公室，让我下楼去实验室……下楼后，我看到了高分子量聚乙烯。经过三周的昼夜运转，这种在当时的工程领域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新型材料，在同等条件下的磨损程度还不及特氟龙24小时内发生的磨损。

毫无疑问：我们成功了。

查恩雷从德国鲁尔公司（Ruhrchemie，后来被赫斯特公司收购）得到了更多的原材料。与之前用特氟龙做的实验一样，他将聚乙烯注射进自己的大腿。六个月后，大腿上没有结节形成。查恩雷写了一封信，很快便发表在1963年12月28日的英国《柳

叶刀》杂志上，他报告了自己对特氟龙的担忧以及对高分子量聚乙烯研磨粉末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借此提醒外科医生注意特氟龙的问题，因为他听说一些医生正考虑在尚未成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使用特氟龙。

发现高分子量聚乙烯仅仅几个月后，查恩雷于1962年11月开始使用聚乙烯臼杯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早期的这些聚乙烯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许多是修复手术，取出失败的特氟龙臼杯，固定新的聚乙烯臼杯。起初，所有的臼杯都由查恩雷亲手制作，并用戊二醛整夜浸泡，进行化学灭菌。后来，他的制造商合作伙伴萨克雷（Thackray）负责制作臼杯，并用伽马射线对聚乙烯进行照射处理（也有人建议在环氧乙烷中浸泡，至今仍有争议）。他继续使用新型高分子量聚乙烯臼杯，进行了数百例植入手术，从未用过全身性抗生素，并且只使用了不锈钢关节柄，而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钴铬合金。查恩雷没有急着发表结果，他担心特氟龙的灾难会重演，不过，这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20年中，约翰·查恩雷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他在莱廷顿以及后来的米德赫斯特，日复一日地为成千上万的患者做着髋关节置换手术，直至去世的那一天——他在70岁时遭遇心脏病发作。时至今日，即使我们拥有更现代的制造工艺、更先进的冶金学和聚合物研究、更精密的手术技术以及更新颖的教育方式，也没有人能够超越查恩雷。这位来自英格兰乡村小镇的外科医生兼生物学家所采用的材料，将在我们的世界中每年被植入数百万次，他不仅改变了骨科领域，而且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体内接受异物并没有那么非同寻常。

我自己也是数百万接受髋关节置换的患者之一，我对约翰·查恩雷爵士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活，减轻了曾经的苦痛。

查理·尼尔于1973年首次使用聚乙烯肩关节窝部件，并在1974年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报告。在1982年《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尼尔对自己9年来进行的273例全肩关节成形术做了报告。^[10]尼尔尝试将聚乙烯应用于肩关节时，这种材料已经在髋关节领域使用了十年之久。没有用于肩关节的一部分原因是，小肩关节窝的空间并不宽裕，使固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很难想象，仅在30年前查理·尼尔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做肩关节置换手术的外科医生之一，尤其要考虑到美国现在每年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例超过10万例，而这一数字与每年的500万例髋关节置换和100万例膝关节置换比起来，似乎相形见绌。

关节置换成形术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植入手术。它不仅可以缓解疼痛，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功能和能力。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新之一，而正是实干的约翰·查恩雷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医院中，以自己的双手发现了合适的金属、塑料和黏结剂组合。

[1] H. P. Platt, Sir John Charnley in Some Manchester Doctors W. J. Elwood, A. F. Tuxford, eds.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C. S. Neer, T. H. Brown, and H. L. McLaughlin, "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March 1953, pp.252-58.

[3] C. S. Neer, "Articular replacement for the humeral head,"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55, 37-A, pp.215-28.

[4] C. S. Neer, "Replacement arthroplasty for glenohumeral osteoarthritis,"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74, 56-A, pp.1-13.

[5] MB和ChB分别是医学学位 (Medicinae Baccalaureus) 和外科学位

(Baccalaureus Chirurgiae) 的拉丁文缩写 , 相当于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 (MD) 。 ——作者注

[6] William Waugh, John Charnley: *The Man and the Hip*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0), p.114.

[7] John Charnley, “Arthroplasty of the hip — a new operation,” 1961, *The Lancet* I:1129–32.

[8] William Waugh, John Charnley: *The Man and the Hip*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0), p.122.

[9] Ibid.

[10] C. S. Neer, “Recent experience in total shoulder replacement,”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1982, 64-A, pp.319–37.

第十八章

运动医学的诞生

我坐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锐适（Arthrex）公司的行政办公室里，等待着与公司创始人兼总裁莱因霍尔德·施米丁（Reinhold Schmieding）见面。莱因霍尔德今天十分忙碌，数百名年轻的外科医生来参加年度住院医师研讨会，他又即将去德国慕尼黑，每年夏天他都会去那里视察锐适的欧洲分公司。尽管分身无术，这位美国出生的德裔牙医之子还是不可思议地同意了坐下来接受正式的采访。这很可能只因为我是一名工作繁忙的肩肘外科医生，在洛杉矶著名的克兰-乔布骨科诊所（Kerlan-Jobe Orthopedic Clinic）接受过正统培训，不过，不论他同意我采访的原因是什么，我都很高兴自己能够坐下来与一位伟大的世界级企业家对话。

我坐在一把黑色的现代皮质座椅上，正在看自己的研究论文，无意中瞥见了一张简单的白色桌子，铝合金管的桌子腿呈A形。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那张传奇的绘图桌吗？莱因霍尔德·施米丁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设计出了使用将近40年的锐适商标的吗？1981年，在慕尼黑奥林匹克村的一间小公寓里，26岁的他趴在一张从家居用品商店花50美元买来的绘图桌上，创造了公司的名称和标识，而昔日“渺小的开端”吸引着我。

如今，60岁的莱因霍尔德·施米丁依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锐适现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运动医学植入产品公司。与施米

丁相处不一会儿，就能感受到他对锐适的自豪之情。你还会意识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竞争意识和忠诚精神在公司的每一名员工那里均有体现。锐适公司的建立与关节成形术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施米丁的改进版外科手术器械巩固了他的商业帝国。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植入过成千上万来自锐适的缝合线、缝合锚钉、螺丝钉及许多不同的其他器具，也非常清楚锐适是如何改变了运动医学的面貌的。不过，我今天要了解的是其创始人和他人生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来到那不勒斯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此时此刻的我非常想了解莱因霍尔德是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自己跻身福布斯400强，并有望登上美国富豪百人榜单的。[\[1\]](#)

我的第一个问题：这就是那张绘图桌吗？是的，他微笑着肯定道。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加深，我感到他仍然保留着这张桌子并不意外。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节俭与奢侈、解析与直觉的结合。我想这张桌子就像一件护身法宝，纪念着简单的起家和发明的力量。

北美和欧洲的外科医生以前只能由外向内窥视关节，渡边正义在日本历经数年研制出可以应用于临床的光学关节内窥镜后，他们如今可以在关节中进行手术操作。渡边在东京的导师开启了一个工具研发项目，发明了一种铅笔般粗细的棒状金属装置，一端带有目镜，外科医生可以俯身通过目镜近距离观察手术关节。首个模型于1931年问世，后来的模型按顺序编号。在1958年的第21次尝试中，渡边研制出后来所有关节镜的设计模型。“渡边21号”和之前的模型一样，由微型白炽灯泡提供光源，需要外科医生手持贴近面部，但它引领了全球微创手术的革命。在接下来的20年中，关节内窥镜从一种新奇玩意儿转变为功能强大的工

具，这主要是因为它用到了柔性光纤照明以及镜头上的小型摄像头，外科医生再也不用俯身低头，将镜头不卫生地贴在眼球上了。

到1981年，外科医生可以轻松地站着用双手操作摄像头，奇迹般地探查人体内任何一个关节的微型世界。困境是观察时缺乏能够完成工作的器械。

莱因霍尔德·施米丁与锐适出现了。

虽然莱因霍尔德在密歇根出生长大，1976年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但他后来搬到德国黑森林地区，成为美国骨科矫形公司理查兹（Richards）的国际经理人。在德国及周边地区向外科医生销售骨科植入物三年之后，他对关节镜手术的新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用关节镜观察膝关节内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医生们明显缺乏可靠的工具来操作组织，具体来说，他们缺少可以夹牢、切掉并移除软骨、骨骼和半月板的手术器械。幸运的是，这位初出茅庐的企业家正好住在德国西南部，那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手工匠人来制造外科手术器械。莱因霍尔德感觉到这是一个机遇，他开始设计、研发微创手术器械，不出几个月，他便决定离开理查兹，成立自己的公司。莱因霍尔德坐在一张廉价的绘图桌边，将自己的新公司命名为“锐适关节镜切除器械公司”，简称“锐适”，[\[2\]](#)并绘制出一直使用到今天的商标。现在的锐适品牌已经价值数十亿美元。

刚刚成立的那几年，锐适举步维艰，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美敦力十分相似。现金流问题、差旅成本、外科医生的阻力以及初期产品供应的局限性，使锐适只能勉强维持运营。施米丁设计出具有突破意义的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建准则时，恰逢几位早年的重要外科医生订购了一些手术器械，为他提供了资金。莱

因霍尔德·施米丁带着起步阶段的锐适前往瑞士苏黎世，向一位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展示自己研发的一小套膝关节器械。这位医生仔细查看了他的工具后，转向这位年轻的创业者，用德语问道：“施米丁先生，你打算以此为生吗？”^[3]这套小工具看上去不会成长为一个帝国。

正如本书中已经多次讲过的那样，医学和外科学领域的伟大先驱们大多有十分灵巧的双手，并极度渴望与机器装置为伴。莱因霍尔德·施米丁小时候就热爱艺术，在学生时代之初，他就感到自己与同龄人对事物的处理和思考方式不同。

我坐在那张绘图桌前，请他举个例子。

“高中的有一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时的历史老师给我们一项作业。他在我面前放了一根蜡烛，要求我们想出词语来描述它，只有5分钟的时间，想出来的词越多越好。一个一个的单词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冒出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写下它们。时间到了，我的同学们说他们写了15个、20个或者25个词。当老师看向我，我告诉他自己写了225个词。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与其他人不太一样。”^[4]

在商业和医学领域的所有分支行业中，善于解决问题的开创者都具备这种“思如泉涌”的特征。再加上施米丁具有极强的空间推理能力和艺术天赋，锐适从一开始就处于外科医生教育的最前沿。由于锐适的诞生与关节镜的面世几乎同时，执业外科医生在住院医师期间还没有接受过关节镜的培训。现在需要一家能够为外科医生提供实践教学的公司，因为他们对手持一种全新技术设备笨拙地观察关节还感到犹豫不决。

普通读者可能并不了解，关节镜手术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镜头末端是带有角度的镜面，以倾斜的视角将画面显示在电

视屏幕上。这就像你第一次通过汽车仪表板上的后视摄像头倒车，一切都需要反过来操作，习惯性地依靠眼睛是没有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渐渐地习惯使用这种倒车技术，但是没有任何一名自负的外科医生想在攻克一项新技术时，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甚至将患者置于险境。

年轻的锐适开始搭建技术实验室，并制作出远远优于竞争者的文宣产品。2002年，我在洛杉矶做运动医学研究员时，曾经收到锐适赠送的整套外科手术动画光碟，其他骨科植入产品公司几年后才开始尝试制作竞争产品。文宣产品往往造价高昂，但它是莱因霍尔德艺术气质的成果，而且在我看来，我们的患者从中受益匪浅。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商业决策，我一直对其他外科产品公司吝惜教育预算感到困惑不解。莱因霍尔德告诉我：“因为必要，所以伟大。”

锐适在慕尼黑的家庭办公室中走过了第一个十年，最终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建立了全球总部。成立12年之后，锐适开始生产其首款医疗植入物，专门用于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的钛材质“介入”螺丝钉。这一产品引领了自1993年以来的植入物生产热潮：在刚刚过去的25年中，人体每个关节的植入物一个接一个地由锐适研发出来，令人应接不暇。肩袖修复、前交叉韧带重建、肩关节稳固、骨折处理、踝关节修复以及上万种其他植入物和技术都可以在锐适服务范围内找到。

锐适在运动医学领域占有强大的统治地位。对我来说，在任何一场全美的橄榄球、篮球、棒球或冰球大联盟比赛中，不可能没有体内带有锐适品牌植入物的运动员。我问莱因霍尔德对此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我真的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当初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显然，我对锐适的创立和成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喜欢策略、领导、服务和医学……当挑战出现，我可以迅速想

到解决方案。在创业早期我们为了生存而奋斗时，正是我自己持之以恒的坚韧才使公司维持下来，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特别愿意为帮助外科医生更好地治疗病人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基于自己多年来的分析和计算，我特别想告诉莱因霍尔德·施米丁一个重要发现。尽管有些医疗公司的年收入较高，例如通用电气的医疗部（他们并不研发植入式器械），但大多数生产医疗植入产品的公司，都是通过生产全髌关节植入物和起搏器等成本高昂的大件产品来获利的。此外，在所有的大型骨科植入产品公司中，现任首席执行官在岗位上的时间都少于5年，其他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当中，没有一家是由创始人管理将近40年的私营企业。

锐适拥有上千种植入产品，几乎全都是永久的不可降解的植入物，再加上施米丁史无前例的任期，以及过去25年来植入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我们会得到一个令人惊叹的结论：地球上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亲自监督大量存在于我们同胞体内的医疗装置的设计、制作和分配工作。锐适产品在全世界150个国家中经销，在我们星球上的任何地方，你都有可能撞上一个体内拥有锐适的植入物的人。在这本关于植入革命的书中，有一个人以实体产品触碰的同胞生命比其他人都多，而且莱因霍尔德·施米丁似乎才刚刚起步。

1888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天气阴郁而寒冷，[5]耶鲁艰难地击败普林斯顿，保住了自己的最佳战绩。耶鲁斗牛犬橄榄球队（Yale Bulldogs）来到纽约市波罗球场（Polo Grounds）时，以前的12场比赛全胜，平均得分为57分，全年一分未失。

球队中的威廉·赫弗尔芬格（William Heffelfinger）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阿莫斯·阿隆索·斯塔格（Amos Alonzo Stagg）日后则成为多项体育运动的传奇教练。

站场边的沃尔特·坎普（Walter Camp）并不知道历史会给他留下“美式橄榄球之父”的称号，也不知道自己正注视着最具历史地位的一支球队。与所有的教练一样，坎普此刻所关心的只是眼前这场比赛。橄榄球的历史还不足20年，但它与之前的英式橄榄球明显不同。这项运动早期的许多变化都来自坎普，包括争球线、四分卫的位置以及十码进攻体系。

由于耶鲁决心实现一个13场全胜的完美赛季，整场比赛令人紧张不安。虽然耶鲁轻松地赢下了全年的其他比赛，但这次对阵普林斯顿，他们要面对绅士之间的一场野蛮硬仗。结果，普林斯顿队长赫克托耳·考恩（Hector Cowan）因动作粗野被担任本场比赛裁判的哈佛毕业生罚下。^[6]耶鲁认为以10：0的比分赢下比赛纯属好运，他们以神话般的全国冠军身份回到了纽黑文市。

现在，请你站在沃尔特·坎普的位置上思考，如果有人严重受伤怎么办？你会依靠队医来为一名受到重伤的年轻在校生进行检查和诊断吗？

当然，在1888年没有队医，而且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就在几年前，也就是1882年，沃尔特·坎普退学时仅差两门课就可以从耶鲁医学院毕业。坎普后来在传记问答中特别提到：“原本我希望一起进行医学实践的外科医生过世了，于是我离开了医学院，投身商业。”^[7]他于1880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然后继续在纽黑文读医学院，同时作为队长为橄榄球队效力。

1882年，坎普再遭挫折：他在训练时膝盖受伤，从而结束了运动员生涯。坎普很可能是前交叉韧带或半月板撕裂，在19

世纪后期，没有任何一台手术可以治疗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即使是相对轻微的膝关节损伤，也会导致运动生涯的终结。

在大学橄榄球的“野人”时代，受伤十分普遍，死亡也时有发生。到1905年，一些常春藤联盟大学暂停了橄榄球项目。那一年有18名大学生死亡，并出现149起严重意外事故。^[8]罗斯福总统亲自召集沃尔特·坎普以及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代表来到白宫，开会研究美国是否需要废除橄榄球。^[9]不到一年后，美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成立，这是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前身，沃尔特·坎普担任规则委员会主席。

耶鲁和普林斯顿的那场比赛发生在130多年前。坎普先生可以使用什么医学技术呢？

什么也没有。

在我们还未走进现代的时候，一个世纪前的运动医学几乎是角斗士时代的真实写照，不过就是强调多吃肉、比赛后洗个冷水澡以及在训练室进行按摩。在没有先进医疗手段的情况下，1905年，18名大学生在一项粗暴而缺乏规范的体育比赛中死亡，也不足为奇。

运动员遭遇开放性或者说“复合型”踝关节骨折时，可能面临着死亡。普法战争期间，小腿骨折的死亡率为5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放性股骨骨折的死亡率高达80%。然而，没有人担心乔·赛斯曼（Joe Theismann）会死在1985年周一晚上的重大比赛中；2001年9月10日，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几个小时之前，观看《周一晚间橄榄球》的观众们也不会去思考遭遇类似开放性胫骨骨折的爱德·麦卡弗里（Ed McCafrey）会不会死亡。

手术麻醉于1846年在麻省总医院的“乙醚穹顶”中首次公开演示，科赫以实验证明了细菌的真实存在，利斯特研究出消毒

法，这一切都使外科手术变得极为安全。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生素的问世，以及医学从观察性科学过渡到研究性科学，运动医学终于能够改变运动员的命运。

一个世纪以来，洛杉矶的城市面积每十年都会翻一番，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当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越来越方便，克利夫兰公羊队（Cleveland Rams）成为首支向西迁移的重要球队，搬至洛杉矶，并惊人地夺得了1946年全美橄榄球联盟冠军。等待公羊队的是一位善于交际的骨科医生，带着他悲惨的医学秘密。

罗伯特·克兰（Robert Kerlan）的父亲是一位全科医生，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以西一个小时车程的小镇艾特金行医。作为一名高中明星运动员，克兰在16岁时第一次来到洛杉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打篮球。一年后，他转到南加州大学，攻读本科和医学院。如同许多曾经做过运动员的医学生一样，鲍勃·克兰[10]选择了骨科。完成外科培训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担任职业体育运动机构的队医，成为最早一批做队医的骨科医生之一。在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在洛杉矶的每场体育赛事中都拥有特等席。

1958年，克兰医生在棒球赛开幕的前一天受聘于新组建的洛杉矶道奇队。（布鲁克林道奇队在1955年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之后，在1958年赛季前西迁，纽约巨人棒球队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令无数球迷心碎。）他已经在一支小职业棒球队做了几年志愿工作，但这次不同。道奇队是一支统治球坛10年的重要球队，他们的大胆西行标志着体育商机时代的到来。克兰医生在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似乎掩盖了他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事实。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脊柱炎性疾病，它迫使患者身体向前屈

曲，灵活的人体脊椎变成一根长而僵硬的竹竿。患者会渐渐地变成一副痛苦的异相，一旦进入晚期，将无法抬头向前看。这种疾病最坏的情况会导致患者秃鹰般的姿态，我见过有些患者不得不倒着走路才能看见他们走路的方向，类似于赛马骑师盯着自己肩膀的视角。鲍勃·克兰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强直性脊柱炎做斗争，而他却一直保持着幽默与乐观的态度。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炎症，所以治疗需要抗炎药物，配合物理疗法和身体锻炼。20世纪60年代最常用的抗炎药物是苯丁唑啉（Butazolidin），在体育界被称为“保泰松”。在1969年《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一篇文章中，克兰医生描述了埃尔金·贝勒（Elgin Baylor）、杰里·韦斯特（Jerry West）、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以及赛马骑师使用保泰松的情况。鲍勃·克兰自己也服用保泰松和少量阿司匹林，还让另一位南加州名人也服用保泰松：山迪·柯法斯（Sandy Koufax）[\[11\]](#)。

克兰医生继续做了15年手术，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残疾过于严重，无法安全地在手术室操作手术器械，最终迫于无奈地向命运投降。但是，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照顾着道奇队、湖人队（1960年迁至洛杉矶）、公羊队和国王队的队员们，以及好莱坞公园赛马场的骑师们。与此同时，他还与沃尔特·马修（Walter Matthau）、丹尼·凯（Danny Kaye）等好莱坞演员以及威利·休梅克（Willie Shoemaker）和威尔特·张伯伦等体育巨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们看着克兰医生坚持前行，都不再向他抱怨自己的身体疼痛。在1969年《体育画报》的一篇文章中，山迪·柯法斯说：“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远比他所治疗的大多数患者要糟糕，而他总是乐在其中，讲笑话，跟人们互相开玩笑。我一直喜欢这位医生，但我更喜欢他这个人。”

这种特殊的行医方式让鲍勃·克兰不堪重负，他开始寻找一

位可以帮助他的伙伴。1965年，在骨科群体尚未真正将运动医学视为专科领域时，克兰医生找到了一名真诚的年轻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小镇布恩的弗兰克·乔布。

虽然乔布医生将作为运动医学的共同创立者而为体育界带来巨大变化，但他自己并不擅长运动。当我问他自己棒球技艺如何，他这样告诉我：“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棒球手。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天赋不在这里。”弗兰克·乔布医生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医，这也激发了他对医学的毕生爱好。二战后，他在南加州大学完成了所有的医学培训，开始在大洛杉矶地区经营自己的私人诊所。

克兰医生和乔布医生于1965年联手，他们二人的合作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天赋组合在一起：克兰医生具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乔布医生表现出惊人的、创新的手术见解。这是医学技艺与科学研究的交相辉映，让受制于疾病折磨的身体遇到了绝妙的天才之手。克兰-乔布骨科诊所在“天使之城”洛杉矶诞生了，这简直是一场天作之合。二人携手，完美超越了各自的天赋。

克兰医生极善言辞，说起话来妙趣横生。我遇到的人们只要提起克兰医生，都会讲出一段令我捧腹大笑的趣事。比如詹姆斯·安德鲁斯医生，他无疑是当今世界运动医学之王者。20世纪70年代，还在佐治亚州霍斯顿诊所工作的安德鲁斯医生，在克兰医生的陪同下访问洛杉矶。那次经历给安德鲁斯医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克兰医生简直惊为天人！”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抱住我，这个重要的动作让我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弗兰克·乔布是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搭档。与克兰一样关注患者和手术技艺的乔布医生，是位颇具远见的外科手术创新者和科学家。克兰医生是个谈笑风生、喜欢生活享乐的人，而乔布医生更愿意实话实说，较少动手实践。有意思的是，正是乔布医生的双手改

变了棒球世界。

汤米·约翰是一个普通人、一位患者、一名棒球手。在棒球迷心中，他是洛杉矶道奇队、芝加哥白袜队以及纽约扬基队的球员，在1974年9月25日接受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肘部手术。在医学领域，一些典型疾病大多以最先描述症状的医生名字来命名，偶尔也有以疾病发生地来命名的情况，例如埃博拉和莱姆病。因此，我们记住了帕金森、亨廷顿、霍奇金和马凡这些名字——他们是描述了相应疾病的医生，而不是患有该病症的患者。除了著名的卢·格里克（Lou Gehrig），患者的名字几乎无一例外地淹没在历史中。然而，每个棒球迷都知道汤米·约翰，这是一个与成功解决肘部断裂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道奇队的球迷们已经目睹了另一位著名的左手球员山迪·柯法斯在十年前因肘部重伤而退出体坛。山迪·柯法斯和汤米·约翰都无法进行肘部的磁共振成像检查，因为磁共振成像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才普及。肘部韧带（内侧副韧带）撕裂只是一种临床诊断，或者说“动手检查”的诊断。1974赛季中期严重受伤之后，汤米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投球了，他的情况和今天大多数棒球医生所见到的轻微伤病不同，肘部极不稳定地耷拉下来。

乔布医生在道奇体育场检查了汤米的肘部，最初建议是为这名左手球员的手臂打上石膏，试一段时间。他无疑想到了山迪·柯法斯在1966年终结了职业生涯。两年前，乔布医生为汤米的左肘做了手术，移除了骨碎片。为了康复专门休养一段时间后，汤米恢复到了最佳状态。现在，汤米·约翰似乎在劫难逃，必须面对职业生涯的终结。两人意识到夹板固定无用之后，坐在乔布医生的办公室里讨论了重建手术。经过“一夜的考虑”，汤米说：“那就做吧。”

汤米·约翰的手术意愿凸显出观念的转变——手术不再是最后走投无路的选择。然而，没有外科医生做过肘部尺侧副韧带手术。尽管职业运动员常常认为职业生涯的结束等同于死亡，但大多数运动医学手术完全属于择期手术，即使不做手术，运动员也可以继续生活。汤米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他将自己的手臂和职业生涯完全交到了乔布医生的手中，相信他所拥有的创造力和手术技术，可以完成其他外科医生未曾经历之事。

是什么塑造了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从威廉·霍尔斯特德到当今的著名人物，这些英雄都具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必备素质。许多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甚至大部分外科医生并非最优秀的天之骄子。相当一部分外科医生具有足够的动手能力，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极少数的医者才是真正的创新者，在思考外伤和疾病时具有突破性的创造力。他们有从三维的层面理解人体构造的能力，那是一种“感觉”人体的方式，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其概念，就如同一个具有良好方向感的人，夜间在城镇中不熟悉的地方开着车，但仍然知道回家的路。

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要沉着自信，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灵巧的双手以及有些出人意料的谦逊性格。假如一个球员想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拿下制胜球，沉着自信是在比赛中当上“关键先生”必备的素质。这好比当副机长驾驶飞机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后，机长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12]意识到飞机面临着厄运，他冷静地说道：“我的飞机，我来。”副机长遵照规程说：“您的飞机。”每一位飞行员、外科医生和真正的领导者听到这个故事后都会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外科医生在手术室大发脾气，通常是暴露了他们顶不住压力的事实，而这种看似有“男子气概”的表现，恰恰说明他们的神经也扛不住压力。

洞察力让人能够对自己从众多不同领域导师和专家那里学

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并灵活运用，有时候还是快速调用，从而在关键时刻解决问题。灵巧的双手是真正的人才之手，天生可以随心控制、纹丝不动，同时又灵活而有力、优雅而敏感、迅速而精准，仿佛伊扎克·帕尔曼[13]与诺姆·艾布拉姆斯[14]融为一体。谦逊性格则成就圆满。外科医生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知道另一名外科医生更擅长某种手术，知道自己出现了错误并敢于承认。

最后，当今最优秀的运动医学执业医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与患者深度沟通的能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句话常常伴着肢体语言，医生会拍一拍患者肩膀，以示安慰，并传达出一种郑重的保证。

对于那些有幸遇到乔布医生的患者来说，乔布医生就意味着一切。

这次具有开创性的肘部手术于近50年前的1974年9月25日在森蒂内拉医院（Centinela Hospital）进行，而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手术室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太容易知道。我有幸认识乔布医生和汤米·约翰二人，1986年的出版物中也有一份详细的报告。《骨与关节外科杂志》是骨科学的圣经，尽管《运动员尺侧副韧带重建》（“Reconstruction of the Ulnar Collateral Ligament in Athletes”）这篇文章历经十年才得以发表，让人有些惊讶，但乔布、斯塔克（H. Stark）和隆巴尔多（S.J. Lombardo）医生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述了1974年的那台重要手术。通常来说，医学期刊文章读起来极其枯燥，即使是病例报告也只有无名患者的信息，平淡无味。但在那篇发表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一号病例是一名29岁的职业棒球手——显然是汤米·约翰。

文章介绍了他12岁时作为投手参加少年棒球联盟（Little League）而初次受伤的临床信息。令人惊讶的是，汤米在8年职业生涯中接受了大约25次类固醇注射。在1972年肘部手术清理之后，他恢复了状态，1974赛季开始获得13：3的比分，表现十分出色。7月份，他在投出一记高难度滑球时，感到手臂严重疼痛，而且肘部似乎断了，失去了控制。标记为“1974”的应力X射线照片也显然是汤米的。

几年前，乔布医生向我坦白说，那台具有开创意义的手术进行之前，没有先在尸体手臂上实践，也没有生物力学测试从科学上证实其价值。这对于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惊天大新闻，也进一步说明乔布医生是一位勇敢的创新者。

手外科的一些开拓性手术表明，在治疗脊髓灰质炎时，可以有效地将手部某处肌腱转接到另一个部位。因此，局部瘫痪的腿或手臂是可以恢复功能的。这种手术的开创者之一是雅克兰·佩里（Jacquelin Perry）医生，他曾经在洛杉矶市的兰乔·洛斯·阿米戈斯（Rancho Los Amigos）工作了数十年，是弗兰克·乔布的终生好友。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乔布医生为什么从汤米的右前臂上采集了一处不具有重要功能的“掌长肌”，将其接到左臂的手肘上。身体感觉这来自另一个地方的肌腱属于它的新家并迅速开始供血，从生物学和生物力学层面上赋予其生命，这让人惊叹。

文章中有一系列的图示解释这种革命性手术并详细描述了手术的技术。医生在肱骨和尺骨上有计划地钻孔，如果能够精确到毫米，将新的肌腱嵌入钻孔中，就可以使撕裂的韧带功能再生。肘部侧副韧带的长度只有一英寸，比一支铅笔还要细。现在精确的生物力学研究已经表明，对于棒球投手而言，尺侧副韧带的重要部位是尺侧副韧带前束。

汤米在术后醒来时努力地感觉着自己的右臂。左臂肘部在两年前已经进行过一次手术，乔布医生告诉他，这种新型“重建”手术需要使用右臂的肌腱。[\[15\]](#)他告诉汤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清创手术，一种是新的重建手术。当这位道奇队的得分手感觉到右臂上的绷带，他知道历史已经在自己的身上改写了。

乔布医生已经告诉汤米，他重返赛场的机会只有1%。冒险运动无异于不系保险绳就在太空中行走，而汤米还是回到了赛场，而且取得了比手术前更好的战绩。如今，汤米·约翰手术是所有运动项目中最可靠的手术之一，据报告，患者重返赛场的比例至少有80%。天才之举挽救了成百上千名运动员的棒球生涯，每一支主要联盟球队都有许许多多和汤米·约翰一样的“幸存者”。[\[16\]](#)而且，由于汤米·约翰手术几乎全是择期手术，仅适用于棒球精英球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植入革命成果的终极展示：外科医生现在的重建手术对象，是为我们的娱乐生活和巨额消费做出贡献的运动员。

如果1903年12月17日你漫步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小镇南边的杀魔山（Kill Devil Hills）海滩，你可能会撞上莱特兄弟，他们正在用莱特飞行器创造历史。你可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一旦你看见载满乘客的长途客机起飞，你就会理解人造飞行器的意义。同样，如果你在1974年9月25日那天待在洛杉矶森蒂内拉医院的手术室里，汤米·约翰躺在手术台上的样子可能会让你好奇，但只有当汤米·约翰手术改变了数百名棒球精英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棒球医疗和运动医学的深层意义才体现出来。尽管运动医学有许多发源地，但后来你才领悟到，自己曾经身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见证了一位大师、一位先驱谦逊地为运动医学的诞生工作着。

[1] <https://www.forbes.com/forbes-400/list/3/#version:static>.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 “关节镜切除器械”英文为Arthroscopy Excision Instruments，莱因霍尔德·施米丁将其缩写为“Arthrex”，即锐适公司英文名称的由来。——译者注

[3] Reinhold Schmieding, “Helping Surgeons Treat their Patients Better: A history of Arthrex’s contribution to Arthroscopic Surgery” Arthrex publication, 2006, p.12.

[4] Reinhold Schmieding,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ne 2, 2017.

[5] 次日的《纽约论坛报》称：“……太阳欢快地笑着，不时躲在云层后面，仿佛在橄榄球比赛中被打肿了眼睛……大家只想要一点温暖，因为有成千上万的虎队球迷和漂亮姑娘在11月的寒冷空气中瑟瑟发抖。”

[6] 考恩，一位长老会牧师，后来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堪萨斯大学担任橄榄球教练，在堪萨斯大学时他曾指导明星球员约翰·奥特兰。考恩在三年后辞去了橄榄球总教练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了两年的体育教授，之后被新的教授取代。这位教授是篮球的发明者詹姆斯·奈史密斯。

[7] <http://drs.library.yale.edu:8083/HLTransformer/HLTransServlet?stylename=yul.ead2002.xhtml.xml&pid=mssa:ms.0125&clear-stylesheet-cache=yes>.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8] Ibid.

[9] Zezima, Katie, May 29, 2014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29/teddy-roosevelt-helped-save-football-with-a-white-house-meeting-in-1905>.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0] 鲍勃·克兰即罗伯特·克兰。英文名字鲍勃（Bob）为罗伯特（Robert）的简称。——译者注

[11] 山迪·柯法斯是道奇队的著名棒球投手，1965年患上肘关节炎。——编者注

[12] 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y” Sullenberger），于2009年驾驶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约5分钟后便与飞鸟相撞，两个发动机停止工作。萨伦伯格将飞机迫降在哈德孙河上，使全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幸免于难。——编者注

[13] 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是著名以色列小提琴家。——编者注

[14] 诺姆·艾布拉姆斯（Norm Abrams）是一名手艺精湛的美国木匠，因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几档综艺节目而出名。——编者注

[15] 几乎没人再这样做过了。我们通常使用来自同侧手臂的掌长肌，或来自同侧腿的较小的腘绳肌腱。

[16] 弗兰克·乔布医生在棒球名人堂里得到了特殊的认可。很难找到另一个对棒球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人物了。想想看，山迪·柯法斯在30岁就离开了赛场，而马里亚诺·里维拉还没有打过一场大联盟比赛就接受了乔布医生的肘部手术。

第十九章

计算影响

植入革命的影响是什么？理解医疗器械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范围，需要从总体上计算成本、手术量以及每年植入医疗器械总量的明细。

当你收看一场电视政治辩论，你会听到政客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普遍低下”，说它造成“费用失控”。这种对成本的关注非常重要，尤其考虑到联邦医疗保险开支被认为是美国公民享有的一笔直接巨额支出，或者说是强制支出。2016年，美国政府在联邦医疗保险上花费了我们6 920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9%。[\[1\]](#)

重要的是，“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不尽相同。我们会因为现代客机需要更长的跑道而批评建设或重建地方机场所产生的成本吗？与祖辈的收音机比起来，我们会抱怨视觉效果惊艳的液晶平板电视产生了新成本吗？当然，我们都抱怨公共开销和私人生活的花费，但我们愿意为家庭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和“免下车”咖啡店买单——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现代便利的生活。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为医疗保健支付多少钱？正如第十二章所概述的那样，1965年，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能猜出科学家和医生们的头脑中正在酝酿着什么。1967年，即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实行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用品的联邦支出总额不到100亿美元，其中55亿用于医院治

疗，[2]而2015年用于医院治疗的支出是384亿美元。[3]谁能想到用于医疗保健的年度联邦支出会在半个世纪中增长了17倍？在过去的50年中，癌症、心脏病和关节炎的治疗成果发生了巨大进步，但还是那个问题：我们愿意付多少钱？

一些批评医疗保健的人提到了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结果——有朝一日，我们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可能比抵押贷款还要多。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许多美国人现在还没有保险，贫困家庭的医疗保健效果也不好，但是比起住房条件，难道身体健康不应该优先得到关注吗？但愿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这种数学题。让我们感受一下在过去75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抚慰一下震惊所带来的刺痛。

现在是时候给你一张植入式医疗器械的明细表了。最简单的方式是按照医学专科来完成，但由于没有全国性注册系统，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计算任务。计算方法结合了美国联邦政府信息和产业报告，这两种报告都需要购买，而且需要咨询专家。

专家建议，植入物的评估以其使用寿命（暂时性与永久性）和结构成分（有机、生物、塑料、金属和电子）为基础。存在于人体中的每一件植入物都可以描述为这些描述符的某种组合。

植入物分类还有一种方法是以功能为基础的。植入物会被用于修复、重建、替代、固定、复原、扩增和电刺激。这是我的分类，不作为事实表现，而是一种概念性方法。

修复意味着我们自身组织的重新排列组合，例如缝合撕裂的皮肤边缘，或让肌腱边缘附着在骨骼上，比如肩袖修复。修复几乎都需要使用缝合线，而且通常是永久性缝合线，也就意味着缝合线将永远留在那里。心内直视手术和二尖瓣（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修复会用到大量的永久性缝合线，并且往往需要用永久性加固环进行瓣环成形术。

重建需要将新组织植入特定部位，期望身体会奇迹般地产生如下反应：（1）不排斥组织；（2）从微观上接受组织并将其吸收到邻近结构中；（3）使新组织适应先前的组织功能。每年世界上最常见的重建手术是前交叉韧带重建，这种手术会把另一名患者或一具尸体上的肌腱植入患者膝部，患者痊愈后，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稳定而且关键的膝关节韧带。

替代手术指的是用能够恢复功能的植入物完全替换磨损或患病的身体部位。例如在关节置换术中，用金属或陶瓷部件重新形成一个关节表面，以替换患有关节炎的骨表面及磨损软骨。又比如在心脏瓣膜置换术中，用动物（猪或牛）的瓣膜或金属植入物替换人类患病或畸形的瓣膜。替代手术不仅能使先前丧失的功能恢复，还可以延长寿命并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

固定手术使用在康复过程中能够支撑身体的植入装置。固定手术与修复手术不同，因为固定手术会有一种额外的附加结构安装在相邻的生物区域，例如安装金属板和螺丝钉以帮助身体愈合。严重移位的骨折通过外伤器械进行内部固定，使骨骼末端慢慢地长在一起。脊柱融合术同样是用大螺丝钉和长杆将椎骨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相邻结构融合的手术。在适当条件下，这种类型的融合具有一定优势，但固定必须十分牢靠，使细胞能够在裂隙间实现坚固的愈合。

复原手术是在身体本身无法实现某种功能时通过手术来恢复功能。当心脏由于神经导电冲动出现问题而自己无法按节拍搏动，没有药物或非手术治疗的方式能够使它恢复常态。植入起搏器可以恢复心脏的规则搏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奇迹。最近出现的另一种奇迹是脑深部刺激术，将电引线精确放置在大脑的微小区域中，可以影响情绪，抑制或激活技能，减少甚至消除震

颤或癫痫发作，提高记忆力，缓解抑郁，或许有一天还可以遏制阿尔茨海默病。

扩增及其他类型的整容手术并不改进功能，而是通过永久性植入物来改变容貌和外表。乳房切除后的丰胸手术介于扩增术和复原术之间。

其实，这些手术类型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使用人工耳蜗为耳聋患者恢复听力是复原还是替代呢？当心脏支架精确地潜入冠状动脉，这是在修复还是在复原？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植入物都经由内外科医生之手强而有力地促进了康复过程。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年前梦想的那样，“让我们期盼……一系列发明竞相涌现，如春风雨露降临人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征服并战胜人类的需要和苦痛”。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一系列发明的影响。

骨科接触的植入器械比任何其他专科都要多。肩、肘、腕、手指、髌、膝、踝和脚趾的关节成形术，再加上脊柱融合、骨折处理以及肌腱和韧带修复，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此类手术可以达到数百万例。史密斯-彼得森于1938年在波士顿进行臼杯成形术之前，美国几乎没有金属植入物，在那之后的十年中，植入手术数量缓慢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骨科医生成为引领关节成形术的开拓先驱；到20世纪60年代，植入革命全面繁荣。

关节置换术

正如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中谈到的那样，因为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关节注册系统，所以对于关节置换的评估只能依靠商业和政府

的估算数据。最可靠的估算来自“全美住院患者样本”（Nantional Inpatient Sample），它是“美国最大的全等额给付住院治疗数据库，包含超过700万例的住院病人数据”。[4]“全美住院患者样本”是由“医疗保险成本与利用项目”编制的最大数据库，由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资助，本身也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部分，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比，“全美住院患者样本”的预算很少。它统计的患者数量约占所有出院患者数量的20%，所以我们必须对其数据进行推算，才能得出全国的估算数据。

美国第一例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全髋关节置换术由马克·考文垂于1969年3月10日在梅奥医学中心进行。考文垂植入美国首个官方批准的髋关节时，约翰·查恩雷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现代”全髋关节置换术。1976年达尔康盾事件之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疗器械的批准变得更加严格。1976年《医疗器械修正案》对1938年《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做出了修改，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医疗设备的监管。

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法案》通过时，美国还没有开展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因为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在1989年才成立，所以我们无从考证20世纪90年代以前做过的髋关节成形术数量。梅奥数据库于1969年首次进行髋关节植入时建立，存有梅奥医学中心所进行的关节置换数量的准确信息。1969—2000年，这家世界上最繁忙的关节置换医院总共进行了35 167例髋关节置换手术。[5]尽管这个数字一开始增长缓慢，之后才迅速上升，但是算起来平均每年也只有1 000多例手术。因此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惊叹的。

根据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的“全美住院患者样本”数

据，美国在1997年进行了29.07万例髋关节置换手术。到2000年，美国的髋关节置换超过了30万例；2005年，这一数字变为38.35万。2007年的《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中，有一篇关于髋关节与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调查研究，该项研究以手术数量为基础，并考虑了美国人口变化情况，例如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作者预测，2020年会出现38.4万例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和6.76万例髋关节修复手术。^[6]2030年将增长为每年57.2万例基本置换手术和9.67万例修复手术。文章对2030年的预测数字表明，手术量会比2005年增长139%。现在我们再阅读这篇2007年的文章，会惊讶地发现2014年的实际数据大大地超出了预期。

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于2017年12月发布了一份题为“2014年美国医院住院期间手术室操作综述”的统计概要，报告显示，在2014年美国进行了52.28万例髋关节置换手术，这不包括将近30万例的髋部骨折手术，它们通常也以部分或全髋关节置换作为治疗方式。^[7]因此，2014年的52.28万例髋关节置换手术比《骨与关节外科杂志》文章所预测的2020年45.16万例手术还多约16%。善于计算的统计学家们也失手了，连常规手术的影响他们都总是低估。

2014年，65岁以上患者（几乎100%拥有联邦医疗保险）进行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有31.54万例，是这个年龄组的第二大手术。^[8]在2014年的美国住院费用排行榜上，髋关节置换手术排名第三位，单次平均花费为1.7万美元，占美国人均入院相关费用总和的5%还多。可以看出，起搏器手术的费用是髋关节置换的两倍，而心脏瓣膜手术费用是髋关节置换的三倍，但因为这两种手术总量较少，开支总额少于髋关节手术。髋关节置换住院治疗的总费用（不包括门诊治疗和护理）超过80亿美元，仅其本身便超出了1967年联邦医疗保险的全部住院治疗预算。约翰·查恩

雷爵士在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微型工场中开始使用的技术，已经成长为人类最有效的医疗干预方式之一。如果算上关节炎和骨折治疗，那么在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种手术每年在美国会发生将近100万次。骨科有一句老话：“人类通过子宫降生，但通过髋部存在。”而髋关节治疗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要为此感谢查恩雷。把毛毯叠起来盖在骨折患者丧失行动能力的腿上花不了几个钱，但这没有效果，也不人道。

全膝关节置换的数字更加醒目。在美国，膝关节成形术是开支排名第二的手术，2014年的开支将近120亿美元。[\[9\]](#)事实上，六种最常进行的骨骼肌肉手术占美国全部住院费用总额的1/4，2014年共计花费412亿美元。[\[10\]](#)在2014年这一年里，美国手术室进行了72.31万例全膝关节置换手术。[\[11\]](#)上文引用的2007年《骨与关节外科杂志》文章预测，到2020年，膝关节置换手术会有16.41万例，预计其中7%为修复手术，预计2030年为37.49万例，估计其中26.8万例为修复手术。[\[12\]](#)根据2014年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的数据，膝关节成形术的平均费用为1.63万美元，到2030年，仅膝关节炎的治疗费用就将达到61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在过去的15年中，肩关节置换成形术以不同于过去半个世纪中其他任何关节手术的速度飞速增长。查理·尼尔最初进行的半关节成形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几次改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只有少数骨科医生能够进行全肩关节置换手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关节盂的植入物设计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在21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几家骨科植入产品制造商都建议改变植入物的外形和固定方式。到2006年，全肩关节置换终于超越了部分肩关节置换，而这一趋势再也没有发生过改变。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4年3月批准了“反向”全肩关节置换后，全肩关节置换的数量在短短几年间就翻了一番。这第三种方式极大地改变并改善了骨科医生对关节炎、肩袖撕裂、骨折以及先前失败的肩关节手术的处理方式。所以15年前才面世的反向置换术数量呈指数增长并不意外。两种置换术加在一起，美国在2011年总共进行了66 485例肩关节植入手术，在本书即将出版时，这一数字又增长了50%。[13]

肘关节置换要么需要完全替换每一个承载面，要么仅简单地替换桡骨头本身。美国每年全肘关节置换为5 800例，而桡骨头置换为9 200例。加在一起，美国每年有1.5万名患者的肘部接受某种类型的金属植入手术。

与每年几十万例的髋关节和膝关节成形术相比，腕部和踝部的置换手术比较少见，美国每年的腕关节置换可能还不到400例[14]。2014年的局部和全腕关节置换手术总量仅为2 000例。[15]全踝关节成形术更常见一些，2000—2010年的11年间，估计手术量为13 145例。[16]全踝关节置换手术在2006年后出现了增长趋势，但美国每年的手术量可能仍然少于2 000例。踝关节融合术更普遍，数量可能是踝关节置换手术的6倍，并需要大量的金属螺丝钉、钢板和钢条。比较合理的推断是，美国每年有超过1万例患者因严重的踝关节问题需要进行植入手术。

根据骨科行业分析机构“智能追踪”（SmartTRAK）的数据，美国在2014年进行了大约1.6万例手指置换手术和1.2万例脚趾置换手术。[17]

2014年（我们能查到最可靠数据的最近年份），关节置换手术的总体情况为：全髋关节52.28万例，全膝关节72.31万例，全肩关节9万例，肘关节1.5万例，手指置换1.6万例，脚趾置换

1.2万例，踝关节2 000例，腕关节2 000例。美国在**2014年**进行的所有关节置换手术总量为**138.29万例**。有一小部分患者在一个自然年度接受了不止一种关节置换手术，所以总结说138.29万名美国人在2014年进行了关节置换并不够准确，但在美国拥有关节注册系统之前，这已经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准确数字的明细表。到本书出版时，这一数字将会迅速增长到每年约200万例，到2030年，每年**400万例**。

脊柱融合术是美国最昂贵的住院手术。虽然脊椎手术病例大约为膝关节成形术的一半，但平均费用却几乎翻了一番。2014年，脊柱融合术住院患者为41.32万例，几乎全部都需要金属螺丝钉、钢板和/或钢条。[\[18\]](#)尽管椎板切除术或椎间盘切除术在手术费用表上排名第15位，总计花费23亿美元，但这些手术不涉及嵌入装置，所以在以植入物为中心的明细表中并不是重点。但是，脊柱融合手术费用高昂，在2014年的所有手术室费用总和中占7%以上。[\[19\]](#)因为现在的许多脊椎手术都属于门诊治疗，上面写到的41.32万例脊椎手术其实大大低于实际手术量。合作行业跟踪估算出的数字为，**2014年进行了778 180例植入器械型脊椎手术**。[\[20\]](#)每年大概有50万美国人在体内嵌入脊椎植入物，其中约1/3的患者（15.59万）的年龄在65~84岁之间，这意味着联邦医疗保险花了40亿美元来支付脊柱融合手术，这还没有考虑到非手术类脊椎治疗费用的天文数字，以及美国工薪阶层因“背痛”折磨而严重流失的生产力。[\[21\]](#)

创伤

骨折可以通过非手术干预进行治疗，例如使用石膏、夹板和

悬带，也可以进行切开复位和内固定。“内固定”需要钢板、螺丝钉、钢钉和锚钉。体内的每块骨骼都有特定的骨折形式，植入器械是對此最佳的治疗方案，如果不进行手术，那就相当于牺牲了那部分肢体的最终功能。一个明智的外科医生知道哪些骨折可以用石膏来治疗，哪些骨折需要手术。因此，下面的明细专门汇总了通过手术植入器械来治疗骨折的情况。

上肢骨折固定，包括锁骨、肩、肘、腕和手指的器械植入手术，2016年的手术总量为350 388例。[\[22\]](#)以每年增长约2.5万例推算过往，那么推断2014年进行了30万内固定植入手术是比较合理的估计。2016年所进行的下肢内固定手术总共为1 862 134例，假设在过去的十年中，内固定手术的增长率为6%，那么2014年的下肢植入手术的总量应该是1 657 293例。[\[23\]](#)这些手术包括胫骨和股骨骨折、踝关节骨折、骨盆和髌部骨折以及足部骨折。两种手术加在一起，美国在2014年进行了大约195.7万例四肢骨折手术，这不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脊柱固定手术。到2020年，每年进行的内固定术预计将超过300万例，很大一部分来自总人口当中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髌部和腿部骨折病例。

运动医学

运动医学作为医学专科的历史，始于橄榄球运动员的膝关节重建手术。如今，运动医学手术通常是在关节镜下对关节及韧带进行的微创手术。这些手术往往是多道手术程序共同进行，最明显的例子是膝关节半月板修复和前交叉韧带重建。因此，手术程序数量要多于手术的台数。本书的重点是植入革命的影响，而且我希望算出特定年份中体内植入器械的美国患者的总体数量，所以多种手术程序将被视为一台手术。这使本已艰巨的计算医疗器

械行业覆盖范围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在骨科运动医学领域。没有人能够知道确切的数字，但通过对产业报告、医学文献出版物、医疗保险数据库以及州立机构和联邦机构数据库等多个来源进行交叉考证，我们得出的数字会更加可靠。

前交叉韧带重建用于稳固膝关节，对于非联邦医疗保险患者来说，这种手术通常属于门诊范围。近期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5年中，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率显著上升。1994年的手术率为每10万人次33例，[24]而2004年手术率增长到每10万人次40.9例，[25]2006年又进一步增长到每10万人次45.1例。[26]这些年的数据说明，每年发生134 421例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截至2014年7月4日，美国人口数量为3亿1864万6 275人，[27]在本书中，我将使用这个数字来估算手术程序的数量。即使每10万人次[28]45.1例的比率没有增长（不太可能），2014年的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总数也大约会达到143 709例。然而，如果对比“业内人士”的市场分析，你会发现这一数字远低于实际情况。2016年，膝关节韧带重建术为493 328例，其中包括34 005例多韧带重建手术。[29]按照3.93%的综合年增长率来推算，2014年所进行的膝关节韧带修复术为456 724例，是10年前医学文献预测数据的3倍。

膝关节镜手术每年有超过50万例，术中，膝关节半月板部分切除或全部切除。2014年，膝关节半月板修复手术有41.64万例，半月板同种异体移植手术为2 200例。[30]令人惊讶的是，涉及植入型器械的手术共计41.86万例，这说明半月板修复几乎与肩袖修复一样普遍。

肩袖修复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手术。2006年的肩袖修复手术率约为每10万人次98例。[31]如果我们认为手术率没有上升的话，那么在2014年所进行的肩袖修复术为312 273例。然而最近

的研究显示，肩袖修复手术的增长率十分惊人，2000—2007年佛罗里达的肩袖修复手术增长了353%，1995—2009年纽约州的手术增长了238%。随着婴儿潮一代成长到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法定年龄，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该年龄段容易发生肩袖撕裂，这种手术肯定会出现爆炸式增长，而所有肩袖撕裂手术都需要使用植入物。自2006年以来，如果按照相对适度的60%的增长率来计算，那么2014年估计进行了50万例肩袖修复手术，骨科领域的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已经达到了这个数量。

由于肩关节稳固术通常属于门诊治疗，我们无法使用“全美住院患者样本”的数据。作者们利用商业数据库计算出超过美国人口1/10以上的大规模人口中，接受开放式和关节镜下肩关节稳固术的数量。从这些数字推算，美国在2012年进行的肩关节稳固手术为每10万人次30.7例，也就是一共大约97 928例手术。[\[32\]](#)按照2008—2012年的5年间的增长率为0.001%来计算，2014年可能进行了10万例肩关节稳固术，全部都需要多种手术植入物。

在1990年以前，髌关节软组织成分的关节镜下修复术几乎不存在，从2000年开始，这种手术成为运动医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部分。2014年美国进行了约10万例髌关节修复手术，全部需要永久性植入器械。[\[33\]](#)

软骨植入手术是将患者身体某个部位的整个软骨或软骨碎片植入受伤部位，植入的软骨也可以来自另一名患者，这就是所谓的“同种异体软骨”植入。2016年，涉及已故捐赠者的软骨置换手术为15 452例。[\[34\]](#)手术的年增长率估计为10%，由此可以估算出2014年进行了12 770例软骨植入手术。

如今，有许多软组织手术施行在人体大大小小的特定部位

上，从小脚趾到胸骨的胸锁关节。这些手术加在一起接近几十万例，再加上前交叉韧带重建、肩袖修复、半月板修复、肩关节稳固、髋部手术以及软骨植入，美国在**2014**年总计进行了大约**200**万例手术。

骨科小结

2014年，按类别划分的手术总量约为：

运动医学：2 000 000例

骨折手术：1 957 000例

关节置换：1 382 900例

脊柱内固定：778 180例

2014年，骨科和脊柱器械植入手术合计数量为**6 118 080**例。

心血管

心、肺和大血管属于心胸外科医生、心内科医生和心血管外科医生的诊疗范畴。在血管造影术问世之前，心内科医生很少做手术，但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他们每年进行的干预治疗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治疗方式。

心胸外科医生的专长是“开胸”手术，包括冠状动脉搭桥术、瓣膜修复或置换、肺部切除以及大血管的治疗。许多肺部手术在“胸腔镜”下进行，或者是内窥镜下的微创手术，而大多数心脏

手术属于开胸手术，需要用手术锯切开胸骨，用金属曲柄器械恐怖地撑开胸腔。心脏及邻近区域尽收眼底，外科医生的手和器械可以进入其中。

主动脉瓣手术是最常见的瓣膜手术，其次是二尖瓣手术。

[35]近期分析表明，单独的瓣膜手术（在一个瓣膜上进行的单台手术）占89%，而11%的心内直视瓣膜手术是联合式瓣膜修复或置换，最常见的是主动脉瓣和二尖瓣一起进行。[36]

与其他所有瓣膜手术一样，三尖瓣手术也是一种修复术或者置换术。美国每年进行1 000例三尖瓣置换手术，其中大约一半涉及另一种心脏手术。[37]

与置换术相比，对患病的二尖瓣进行修复成为一种显著趋势。在那些接受置换术的患者中，异种组织，即“人工”动物瓣膜的移植超越了机械心脏瓣膜，已经成为瓣膜置换的明确趋势。

[38]修复手术会使用永久性缝合线和加固性植入物，因此，修复术和置换术都会用到植入装置。2005年，美国共计进行了16 997例单独二尖瓣手术，其中修复术和置换术差不多各占一半。

另一方面，2005年的单独主动脉瓣手术为28 360例，其中，97%为瓣膜置换术，修复术仅占3%。置换用的瓣膜几乎全部为人工生物瓣膜，每年所进行的机械（金属）瓣膜手术越来越少。和其他瓣膜手术一样，主动脉瓣置换术当中也出现多部位同时治疗的趋势，置换主动脉瓣的同时治疗胸主动脉的手术比例一直在增加。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8.5%的二叶式（先天性畸形）主动脉瓣患者在术中得到了胸主动脉治疗。从1998年到200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两倍，意味着同期费用大约是原来的7.5倍，从1.56亿增长到12亿。[39]发表这篇文章的哈佛医生们证明，患者死亡率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项研究也凸显出一个事

实，外科医生们态度上的一个简单变化就可以导致成本开支和医疗器械使用数量飞升。

以近期出版物为依据来猜测每年的瓣膜手术量，我们的数据对象只能是10年前的患者。美国心外科医生能给出的最新临床数据是2007年的数据。在一篇2011年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胸外科医师协会的数据，2003—2007年这5年间，瓣膜手术共计292 543例，平均每年手术量为58 509例。这与上文中部分统计的数据一致。在21世纪初，每年的单独瓣膜手术量约为4.5万，联合式瓣膜手术至少超过1万例。短短十年间，这个数字就惊人地变成过去的3倍左右，2014年的瓣膜手术量为143 500例，[\[40\]](#)随着婴儿潮一代人口达到瓣膜手术患者的平均年龄67岁，[\[41\]](#)瓣膜手术数量肯定会迅速上升。

冠状动脉搭桥术是最常进行的心内直视手术，2014年进行了201 600例。[\[42\]](#)在过去的15年中，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量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脏病医生可以“经由皮肤”或通过腹股沟动脉导管来治疗冠状动脉血管疾病。他们很可能会继续使用微创技术来应对更多的心脏病，不过我们之后会看到，有些治疗方式需要充足的勇气，无法实现或者是铤而走险。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通过移植患者自身的血管如腿部静脉或胸壁小动脉来“跨越”狭窄的或阻塞的动脉，以聚合物材质的永久性缝合线进行缝合固定。尽管缝合线并非手术的焦点，但如果没有像聚丙烯缝合线这样的现代聚合材料植入物，冠状动脉搭桥术便不能成功。

起搏器于60年前首次应用于临床，如今在住院手术费用中排名第11位。2014年，住院患者开支总计为28亿美元，但很大一部分安装起搏器的患者属于门诊范畴。[\[43\]](#)近期分析显示，2009

年的起搏器安装率已经增长至每10万人次61.6例，相当于一年有188 700名患者安装。假设安装率没有进一步增长（不太可能），那么2014年的起搏器植入手术量为196 286例。根据史蒂文·库尔特茨（Steven Kurtz）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手术率已经接近起搏器安装的40%（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是一种能够感知心律不齐并使心脏恢复到正常心律的装置）。[44]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2014年的除颤器植入量约为78 514例。2014年，美国心内植入式电子装置总量估计已经达到27.5万台。欧洲心脏病学会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欧洲所有地区一共进行500 411例起搏器植入手术，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手术85 289例。[45]综上所述，每年全球市场的心内植入式电子装置可能超过100万台。

冠状动脉支架是由金属制成的圆柱形扩张式小装置，用途是撑开冠状动脉，最近的产品也使用聚合材料。这种装置已经使用了近半个世纪，时常接受严格的检查，以防过度使用。支架最初只由金属制成，现在通常被覆抑制药物，以防止支架上形成凝块和疤痕组织。在急性心脏病发作或缺血性胸痛的情况下，患者需要安装支架。本书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计算，可能就是尽量准确地确定每年的支架手术量。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年有50万例支架手术，[46]而《今日美国》援引范德比尔特大学一位心脏病学家的研究，估计每年有100万例该类型手术。[47]另一些研究称每年进行70万例支架手术。[48]

分析支架植入手术数量的问题在于，手术对象可能是住院患者也可能是门诊患者，而且大量患者还未到使用联邦医疗保险的年龄。一份近期报告分析了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2001—2008年的数据，推断2008年进行了319 567例手术。[49]《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评估了“全美住院患者样本”中所

有成年人的数据，认为在2008年有809 400名成年人安装了支架。[\[50\]](#)医学文献中没有更新的数据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再加上支架仍然是医患所青睐的治疗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断，美国支架手术的实际数据为每年100万例患者。世界上有超过70家制造商生产支架，那么全球市场的支架费用估计为每年12 000 000 000美元（是的，120亿美元）。[\[51\]](#)

与器械相关的大血管动脉瘤修复手术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可怕病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离开心脏的主动脉仍然如同浇灌花园的软管一般粗细，如果大血管壁变薄并膨胀出来，患者可能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动脉瘤也可以发生在伸入下肢的分支血管中。虽然这种修复手术每年仅有2 000例，[\[52\]](#)但腹部主动脉瘤修复手术每年大约有3万例，这一数字是以两个数据的平均数为基础估算的——2013年的一项外科医生调查显示，腹部主动脉瘤修复手术量可以达到26 257；[\[53\]](#)2006年，联邦医疗保险患者进行了32 464例该类手术。[\[54\]](#)加在一起，2014年的动脉瘤修复手术量约为32 000例。

放置支架、搭桥术、心脏瓣膜和安装起搏器的财务影响总额高达234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例手术费用很高。例如，一例心脏瓣膜手术费用为5.2万美元，搭桥手术为4.19万美元，起搏器安装为3.5万美元。

心血管小结

2014年，各种类型的手术总量为：

冠状动脉支架：1 000 000例

起搏器：275 000例

冠状动脉搭桥：201 600例

瓣膜手术：143 500例

动脉瘤修复：32 000例

2014年，涉及心血管系统的手术合计约1 650 000例。

因此，骨骼肌肉和心血管系统在2014年进行了约7 768 000例手术。

神经外科

脑室-腹腔（VP）分流管用于治疗脑积水，即脑室内积聚的脑脊液过多。脑室-腹腔分流管是在大脑深处放置的一根薄塑料管，沿皮下经颈部向下伸入腹腔，从而使多余的脑脊液排入腹腔。2000年，与脑室-腹腔分流管相关的手术有27 870例。[\[55\]](#)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每年进行的脑室-腹腔分流手术约3万例，我将以此作为2014年的数据。[\[56\]](#)

脑动脉瘤的治疗可以通过脑外科手术用卡子从外部夹住血管，或者通过脑动脉置入一卷缠绕在一起的微型金属团。2010年，每10万名联邦医疗保险注册者中会发生6例脑动脉瘤手术，[\[57\]](#)而那一年有4 770万人拥有联邦医疗保险。[\[58\]](#)这相当于一年的2 862名患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进行了脑动脉瘤治疗，而最近的医学文献估算，每年进行脑动脉瘤治疗的美国人约为1.2万名。[\[59\]](#)

神经调节装置用于大脑、脊髓或者周围神经。神经调节装置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其发明受到心脏起搏器的启发，研发工作首先出现在明尼苏达州，这并不意外。[\[60\]](#)植入式装置通过微

型导线向大脑、脊髓或周围神经传递小幅的电脉冲。植入式药物泵向神经中枢系统输送小分子，从而实现大脑功能的神经调节。

大脑功能的神经调节被称为脑深部刺激术，主要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和癫痫。脊髓刺激术主要用于治疗术后背部综合征、慢性局部疼痛和周围神经疾病。周围神经刺激术被用于治疗一些放在一起列举有点不可思议的疾病，如失禁、偏头痛、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以及腹部问题。

199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脑深部刺激术用于治疗原发性震颤，2002年批准用于治疗帕金森。与其他一些医疗器械一样，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允许在人道主义器械豁免条款下，按照每例患者的情况来使用脑深部刺激的设备。由于脑深部刺激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十分有效，所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准许神经外科医生为肌张力障碍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植入脑深部刺激装置。^[61]脑深部刺激应用于核准用途以外的治疗越来越多，包括重度抑郁、抽动秽语综合征、厌食症甚至痴呆。据有关美国脑深部刺激装置发展趋势的最新学术文章估计，2011年进行了5 385例植入手术，根据前些年的增长趋势来估算，美国在2014年植入了6 596台脑深部刺激装置。

脊髓刺激术通常由专门负责疼痛管理的医生来操作，近年来，这类手术在门诊患者范围内进行，这总是使计算变得更复杂。据2009年《神经调节》（*Neuromodulation*）的一篇学术文章推算，美国每年植入4 000个脊髓刺激系统，但北美神经调节学会（North American Neuromodulation Society）前任主席写了一封严谨周密的信，反驳了这个数字，他认为2007年的脊髓刺激植入手术超过了27 000例，与文章的数据差异惊人。^[62]近年神经调节装置植入率的唯一可靠来源是业内消息。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在2014年，脊髓刺激装置手术大约是脑深部刺激装置

手术的三倍；[63]因此，2014年，美国安装了大约2万个脊髓刺激装置。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推知，2014年进行了7000例骶神经刺激装置手术和2000例迷走神经刺激装置手术。美国在2014年总共进行了大约3.5万例神经调节手术。

因此，2014年，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系统植入手术合计为7.7万例。

耳鼻喉

人工耳蜗或许是医疗植入装置中最成功的。人工耳蜗作为唯一能够恢复一种五官感觉的装置，从情感上来说达到的效果是最令人满意的。每年，全球市场上的人工耳蜗装置数量可达约5万。截至2012年12月，美国的人工耳蜗植入量占全世界的28%。[64]，[65]因此，美国在2014年大约植入了1.4万个人工耳蜗装置。同年，还进行了少量的中耳植入装置手术，但具体数量行业并未公开。

鼻窦手术虽然也十分常见，但使用的是临时装置，所以不会包括在永久性植入物的计算中。同样，鼓膜置管也属于暂时性植入物，不计入此处。

移植手术

首例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出现在50年前，但直到环孢素等抗排异药物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之后，器官移植才开始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率最高

的国家。2014年，美国进行了29 539例器官移植手术。[66]与本章中所有其他数据信息相反，这是一个准确数字。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作为业内权威，以卓越的记录和监管能力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数据。2014年，肾脏移植手术17 108例，肝脏移植手术6 730例，心脏移植手术2 655例，肺移植手术1 925例。所有的心脏移植手术均需要死亡捐献者，但总体来说，约1/5的器官移植手术由活体捐献者提供器官，在全部肾脏手术中，活体捐献者占1/3。[67]

体外受精可以说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生命孕育手术，真真正正地在实验室环境中创造出一个生命。初学生物学的学生们会了解到有关孢子、细菌和许多单细胞生物体的无性繁殖。除了在鱼类、两栖动物甚至鸟类中会发生一些罕见的“无性繁殖”，动物都是从受精卵发育而来的。有性受精繁殖无论以哪种交配形式发生，都需要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互动。低等无脊椎动物通常由雄性对大量卵子不加分别地授精，例如无私的鲑鱼王，而哺乳动物的诞生则需要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亲密互动，至今为止还是如此。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每年约有7.2万名婴儿诞生于辅助生殖技术。[68]200年前，约翰·亨特将不同发育阶段的鸡蛋泡入水中并加以观察，获得了突破性的观点，他相信人类也是从子宫中的卵子发育而来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试管婴儿技术赋予了现代人一种接近“无性繁殖”的能力。在美国的新生儿中，1.5%为试管婴儿，[69]也就是100万美国人。[70]有人可能认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属于暂时性植入物，但考虑到胎儿细胞确实能穿过胎盘屏障，怪异地独立存在于宿主母体中，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辅助生殖技术的确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细胞植入物，更何况现在地球上居住着数百万诞生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人。

泌尿科

充气式阴茎植入物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但其实它的使用量正在减少，因为随着手术的精确度日益提高，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越来越低，尽管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男性总数有所增加。虽然美国人口呈老龄化发展趋势，但每年充气式阴茎植入物手术仅有5 000例。[71]

尿失禁患者的男性比率要远远低于女性。男性手术包括放置人造硅胶括约肌或者植入悬带，以便从内部抑制尿液流动。近期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每年大约进行2 500例该类型手术，比全美女性手术量略高1%。[72]

眼科

2014年，美国社区医院进行了1 428 800例眼内手术。[73]虽然手术也在医院里进行，但基本上，所有晶体置换手术都属于门诊手术。不过，将近150万的数字具有误导性，因为许多州不要求对非医院所属的手术中心进行完全统计。因此，数据信息并不完整，而且“全美住院患者样本”的总数统计大大低估了白内障手术的数量。

在美国，几乎所有植入物都呈稳定增长趋势，人工晶体也不例外，自问世以来植入率稳步上升。奇怪的是，一篇1986年的文章预测，每年的晶体植入手术量将会下降，并稳定在每年100万例以下。[74]其实，对于各种类型的植入手术来说，预测手术量上升而非下降始终是更安全的。

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实际数量大约为每年300万例。

[75]99%以上的白内障手术会先做一只眼睛，几周后再进行第二次手术。[76]因此，每年大约有150万美国人植入了人工晶体。

普通外科

胰岛素泵以及与之连接的血糖监控器，并不是真正的植入物，它存在于体外，通过留置针输液装置（留在皮肤上的小装置，用一根细针穿入皮下脂肪）与体内相连。

人工补片是普通外科手术中最常用的植入式外来材料，在疝手术中用作永久性加固装置。2012年，住院病人进行了约19万腹壁手术，但门诊患者的手术量大得多。[77]据估计，80%以上的疝修补术使用了人工补片。[78]美国每年进行超过80万例腹股沟疝手术，[79]而根据商业报告，腹壁疝手术每年超过50万例，[80]那么每年疝手术总量为130万例，这说明美国每年至少有100万的疝手术需要植入永久性人工补片。

胃旁路手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对于每年接受这种手术治疗的近20万患者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据美国代谢与肥胖外科学会估计，在2014年，美国进行了19.3万例减肥手术。[81]超过75%的减重手术不过是在术中巧妙或疯狂地变换肠胃的位置，一小部分手术需要将较大的金属和聚合物装置插入肥胖患者腹部。2014年的19.3万例肥胖症手术包括通过简单的手术将肠道永久地缝合在一起，或通过植入束带或其他机械装置来减缓食物的转移或消化速度。[82]

妇科

妇科最常用的植入物是阴道补片，用于治疗盆腔脏器脱垂，这是女性在孕后常常发生的情况。据估算，美国每年大约进行**20万例**阴道补片手术。[\[83\]](#)尽管盆腔脏器脱垂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产后疾病，约占孕后女性的10%，[\[84\]](#)普遍通过植入阴道补片进行治疗，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11年发布的一项安全通告指出：“使用阴道补片可能会增加并发症风险，并没有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85\]](#)

目前常见的尿失禁治疗方法是使用人工合成悬带。[\[86\]](#)在18~64岁的美国女性中，悬带修复手术率为每10万女性198.3例；65岁以上女性的手术率更高，可能超过60%。[\[87\]](#)美国每年估计约有**21.5万名**女性因尿失禁接受悬带手术。

整形外科

据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报告，2014年进行了**286 254例**隆胸手术。[\[88\]](#)大多数女性选择硅胶填充式植入物，这种植入物在2006年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时批准。[\[89\]](#)其他整形手术大多不涉及植入物，包括面部眼睑手术、缩胸手术和抽脂手术。许多整形外科手术需要使用注射式填充物（这些填充物会分解并排出体外），或者使用手术者身体其他部位转移而来的脂肪细胞。两者都不属于永久性植入物。

口腔外科种植牙

据估计，美国每年放置**45万颗**骨整合型种植牙。[\[90\]](#)依靠牙托式假牙和牙齿黏结剂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千百万患者以植

入的假牙取而代之。这些假牙通过金属桩穿过牙龈、与骨骼接合在一起，固定在颅骨上。

2014年，美国植入手术数据如下：

骨科和脊柱器械植入手术6 118 080例；

涉及心血管系统的植入手术1 650 000例；

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植入手术77 000例；

人工耳蜗安装14 000个；

器官移植手术29 539例；

每年试管婴儿技术使新生儿诞生72 000名；

泌尿系统植入物7 500个；

晶体手术3 000 000例；

需要使用永久性人工补片的疝手术1 000 000例；

肥胖症手术193 000例；

阴道补片手术200 000例；

女性尿失禁悬带手术215 000例；

隆胸手术286 254例；

骨整合型种植牙450 000颗。

因此，美国在**2014年**总共进行了约**1 331万例**植入手术。假设综合年增长率保守估计为**4.5%**，到**2020年**，每年与植入物相关的手术量将达到**17 333 000例**。

正如本章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些计算有时只是根据某些资料的推测，但比以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更加科学。我撰写本书时，

我们正在走向2020年；我们——美国公民、政客、雇主、医疗器械制造商、医院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医务工作者——必须打起精神，着手解决植入型手术费用昂贵的情况，尤其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有幸整日为全肩关节置换手术忙碌着，植入革命使我乐在其中。我谦卑地认识到先驱们以其伟大的勇气、见解与想象力将金属、药物、塑料和灵巧的技术融为一体，使外科医生拥有回天之力，将患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对医疗改革和医学未来发展的讨论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事实是，到2020年，美国的植入型手术将超过1 700万例。

[1] <https://www.cbo.gov/about/products/budget-economic-data#2>.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2] D. P. Rice, B. S. Cooper,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s, 1950–67, Bulletin, Jan. 1969,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ssb/v32n1/v32n1p3.pdf>.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3] <https://data.bls.gov/cgi-bin/cpicalc.pl?cost1=5500&year1=196712&year2=201712>.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4] <https://www.hcup-us.ahrq.gov/db/nation/nis/nisdbdocumentation.jsp>.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5] Mark Coventry, KThe History of Joint Replacement Arthroplasty, Replacement Arthroplasty (Philadelphia: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3), p.6.

[6] S. Kurtz, et al., “Projections of Primary and Revision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5 to 2030 ,”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2007, pp.780-85.

[7] K. McDermott, et al., “Overview of Operating Room Procedures During Inpatient Stays in U.S. Hospital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33. December,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Operating-Room-Procedures-United- States-2014 (1).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8] Ibid.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S. Kurtz, et al., aProjections of Primary and Revision.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5 to 2030,,y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2007, pp.780-85.

[13] R. Westermann, “Reverse shoulder arthroplas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ison of national volume, patient demographics, complications, and surgical indications,” Iowa Orthopedic Journal, (35), 2015, pp.1-7.

[14] E. Melamed, et al., “Trends in the Utilization of Total Wrist Arthroplasty versus Wrist Fusion for Treatment of Advanced Arthritis,” Journal of Wrist Surgery, 5 (3), 2016, pp.211-16.

[15]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16] S. Raikin, KTrends in Treatment of Advanced Ankle Arthroplasty by Total Ankle Replacement or Ankle Fusion, Foot Ankle International, March, 35(3); 2014, pp.216-24.

[17]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18] K. McDermott, et al, “Overview of Operating Room Procedures During Inpatient Stays in U.S. Hospital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33. December,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Operating-Room-Procedures-United- States-2014 (l).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19] Ibid.

[20]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21] K. McDermott, et al, “Overview of Operating Room Procedures During Inpatient Stays in U.S. Hospital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33. December,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Operating-Room-Procedures-United- States-2014 (l).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22]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23] Ibid.

[24] L. T. Buller, et al., “Trend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 Orthopedic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1), 2015, pp.1-8.

[25] M. P. Leathers, “Trends and demographic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Knee Surgery, Oct. 28(5); pp.390-94.

[26] L. T. Buller, et al., “Trend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 Orthopedic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1), 2015, pp.1-8.

[27] <https://www.census.gov/popclock/>. Accessed Feb. 22, 2018.

[28] 此处原文为每1万人次，根据上下文，应为笔误。——译者注

[29]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30] Ibid.

[31] A. Chiang Colvin, et al., “National Trends in Rotator Cuff Repair,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Feb. 94(3), 2012, pp.227-33.

[32] N. Bonazza, et al., “Trends in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houlder instability” Orthopedic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6), 2017, pp.1-7.

[33] SmartTRAK, 2018 Orthopedic Industry report.

[34] Ibid.

[35] R. Lee, et al., “Fifteen-year outcome trends for valve surgery in North America”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91, 2011, pp.677-84.

[36] Ibid.

[37] F. Algahtani, et al., “Contemporary trends in the use and outcomes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ec., 6(12): e007597, pp.1-10.

[38] J. S. Gammie, et al., “Trends in mitral valve surg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Adult Cardiac Database , ”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87, 2009, pp.1431-9.

[39] A. R. Opatowsky, et al., “A shifting approach to management of the thoracic aorta in bicuspid aortic valve diseas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ug., 146(2), 2013, pp.339-46.

[40] K. McDermott, et al., “Overview of Operating Room Procedures During Inpatient Stays in U.S. Hospital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33. December,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Operating-Room-Procedures-United- States-2014 (l).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41] R. Lee, et al. , “Fifteen-year outcome trends for valve surgery in North America , ” of Thoracic Surgery, 91, 2011, pp.677-84.

[42] K. McDermott, et al., “Overview of Operating Room Procedures During Inpatient Stays in U.S. Hospital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33. December,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Operating-Room-Procedures-United- States-2014 (l).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43] Ibid.

[44] S. Kurtz, et al., “Implantation trends and patient profiles for pacemakers and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3-2006,” Pacing and Clinical Electrophysiology, 1, 2010.

[45] M .J.P. Raatikainen, et al.; “Statistics on the use of cardiac electronic devices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procedures in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countries: 2014 report from the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Europace 17, 2015, il-i75.

[46] Anahad O'Connor, “Heart Stents Still Overused, Experts Say,” New York Times, Aug. 15, 2013, <https://well.blogs.nytimes.com/2013/08/15/heart-stents-continue-to-be-overused/>. Accessed March 8, 2018.

[47] L.Szabo, “Stents open clogged arteries of 1M Americans annually” Aug. 6, 2013.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3/08/06/bush-stent-heart-surgery/2623111/>. Accessed March 8, 2018.

[48] Ilene McDonald, “Half of cardiac stent procedures overused, unnecessary,” Fierce Healthcare. <https://www.fiercehealthcare.com/healthcare/half-cardiac-stent-procedures-overused-unnecessary>. Accessed March 8, 2018.

[49] R. Riley, et al., “Trends in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1 to 2009, recent declines i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volumes,” Circulation: Cardiovascular Quality and Outcomes, March 1; 4(2); 2011, pp.193-97.

[50] A. Epstein,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08," *JAMA*, May 4, vol. 305,(17), 2011, pp.1769–776.

[51] <https://blog.mediligence.com/2009/05/05/drug-eluting-bare-metal-and-absorbablestents-segment-growth-2009-and-2017/>. Accessed March 8, 2018.

[52] D. Buck, et al., "The Impact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n isolated iliac artery aneurysm treatment and mortality," *Journal of Vascular Surgery*, Aug., 62(2), 2015, pp.331–335.

[53] <https://www.healio.com/cardiac-vascular-intervention/aneurysm-repair/news/online/%7B51a14891-cdd4-439e-9dd5-368cc492e92a%7D/total-number-of-aaa-repairsin-us-declining-annually-since-2005>. Accessed March 6, 2018.

[54] L. Mureebe, et al., "National trends in the repair of ruptured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Journal of Vascular Surgery*, vol. 48 (5), Nov. 2008, pp.1101–07.

[55] R. Parwardhan, "Implanted ventricular shu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lion-dollar-a-year cost of hydrocephalus treatment," *Neurosurgery*, 56; 2005, pp.139–45.

[56] F. Khan,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survival in adult patients," *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 (6), 2015, p.25.

[57] J. Jalbert, "Clipping and coiling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mong Medicare beneficiaries, 2000 to 2010," *Stroke* (46); 2015, pp.2452–457.

[58] https://www.cms.gov/Research-Statistics-Data-and-Systems/Statistics-Trends-and-Reports/MedicareMedicaidStatSupp/Downloads/2011_Section2.pdf#Table2.1. Accessed March 11, 2018.

[59] A. A. Brinjikji, et al., "Better outcomes with treatment by coiling relative to clipping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 June 2011 vol. 32 (6), pp.1071–75.

[60] https://www.medicalalley.org/media/22695/neuromod_pages.pdf. Accessed March 11, 2018.

[61] B. Youngerman, et al., "A decade of emerging indications: deep-brain sti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vol. 125 (2), 2016,

pp.461–71.

[62] J. Prager, “Estimates of annual spinal cord stimulator implant 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uromodulation*, vol. 13 (1), 2010, pp.68–9.

[63]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industry-analysis/neurostimulation-devicesindustry>. Accessed March 25, 2018.

[64] <https://www.nidcd.nih.gov/health/statistics/quick-statistics-hearing>. Accessed March 11, 2018.

[65] <http://www.medel.com/cochlear-implants-facts/>. Accessed March 9, 2018.

[66] https://unos.org/data/transplant-trends/#transplants_by_organ_type+year+2014. Accessed March 9, 2018.

[67] [https://unos.org/data/transplant-trends/#transplants_by_donor_type+organ+All Organs](https://unos.org/data/transplant-trends/#transplants_by_donor_type+organ+All+Organs). Accessed March 9, 2018.

[68] <https://www.cdc.gov/art/pdf/2015-report/ART-2015-National-Summary-Report.pdf#page=65>. Accessed March 18, 2018.

[69] Ibid.

[70]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dsable/2014/04/24/ivf-and-infertility-by-the-numbers/>. Accessed March 18, 2018.

[71] <https://www.medpagetoday.com/urology/erectiledysfunction/52233>.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72] S. MacDonald, “Waves of change: national trends in surgical management of male stress incontinence,” *Urology*, vol. 108, October, 2017, pp.175–79.

[73] C. Steiner, et al., “Surgeries in Hospital-Based Ambulatory Surgery and Hospital Inpatient Settings, 2014,” *Statistical Brief #223*. May, 2017.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ockville, MD. *HCUP-Ambulatory-Inpatient-Surgeries-2014.pdf*, Accessed Jan. 13, 2018.

[74] W. Stark, et al., “Trends in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of Ophthalmology*, vol. 104, Dec., 1986, pp.1769-70.

[75] <https://www.healio.com/ophthalmology/cataract-surgery/news/print/premier-surgeon/%7B6c74b954-03B6-4638-957e-9f58eff91c3f%7D/refractive->

surgery-and-iols -future-trends. Accessed March 25, 2018.

[76] <https://www.aao.org/eyenet/article/simultaneous-bilateral-cataract-surgery-debate-con>. Accessed March 25, 2018.

[77]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10/161018094928.h_tm. Accessed March 21,2018.

[78] K. Baylon, et al., K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urgical meshes: a review,w Membranes, vol. 7(3), pp.1-23.

[79] <https://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l534321-overview>. Accessed March 21, 2018.

[80] <https://www.goremedical.com/conditions/hernia>. Accessed March 21, 2018.

[81] <https://asmbs.org/resources/esdmate-of-bariatric-surgery-numbers>. Accessed March 18, 2018.

[82] Ibid.

[83] <http://obgyn.ucla.edu/mesh-related-complications>. Accessed March 21, 2018.

[84] Ibid.

[85] Ibid.

[86] Michele Jonsson Funk, et al., “Trends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pril; 119(4), 2012, pp.845-51.

[87] Ibid.

[88] <https://d2wirczt3b6wjw.cloudfront.net/News/Statistics/2014/plastic-surgery-statistics -full-report-2014.pdf>. Accessed March 21, 2018.

[89] <http://breastimplantinfo.org/fda-breast-implants/>. Accessed March 21, 2018.

[90] L. Gaviria, et al., KCurrent trends in dental implants,,y *Journal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ons*, 40(2), 2014, pp.50-60.

第二十章

脑植入物

把事情做好，首先需要爱，然后是技术。

——安东尼·高迪

无论是关于身体机器的生理化学概念，还是技术突破的希望，都无法用来定义理想的人类或适宜的环境，除非考虑到，过去种种已经一步一步地化身为人性与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决定着人类生命的局限和潜力。过去并非死亡的历史，而是人们用来建构未来的鲜活材料。

——勒内·杜博斯，《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1968年

仰望穹顶，装饰在天花板上的木刻雕像深深地迷住了我。我站在一座古老程度世所罕见的学术建筑中，我的四周完全被云杉木所围绕——地板、墙壁、天花板，都密密匝匝地铺着一条条蜂蜜色的厚木板，屋顶中央的雕塑俯瞰着整个房间。创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世界的“大学之母”，但其中一座拥有400年历史的解剖演示厅，才是我来到这个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圣地的原因。头顶上复杂精巧的手工制作的嵌板，展示着14幅星座与黄道十二宫的图画，草草看一眼，就能认出狮子座、处女座、双子座等所有星座。而那座悬置于40英尺上方的真人大小裸体雕像使我停下了脚步。

我的私人导游卢卡用带有博洛尼亚口音的英语说：“这是阿波罗。”悬在半空中的阿波罗优雅地指向我身旁的白色大理石桌子。他是希腊和罗马的音乐、真理、治愈和光明之神，宙斯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之父，是医学与治愈之神中最重要的一位。阿斯克勒庇俄斯本身也是几位与医学技艺相关的著名女神之父，比如许革亚（Hygieia）和帕那刻亚（Panacea）。我很想看到阿波罗的身后是什么，在导游的提示下，我终于搞明白那是一把里拉琴——我们音乐之神的合理装备。

阿波罗在上方遨游，起初我并不理解古人要传达的信息。演示厅里只剩下我和太太，还有我们的导游，他很友好，没有在即即将闭馆时把我们请出去。我全神贯注地努力记住这些星相标志，结果没看到重点。我回过头，看见卢卡用手臂画出一个大圆圈：“这些星座都围绕着光明与太阳之神阿波罗。想象一下几百年前的这个房间，只有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而阿波罗正在为整个房间带来光明，或者说带来理解，这也是他指向解剖台的原因。”

我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使阿波罗的手指向自己。

我想要理解。

卢卡又说道：“阿波罗位于中心，是光明之神，而围绕他的这些主要星座，在17世纪被认为拥有主宰生死疾患的力量。”

主宰的力量。如果无力控制疾病，古人渴望至少能够理解和解释它们。卢卡也是这样说的。“星座和阿波罗施加了‘影响力’——这就是神秘疾病‘流感’一词的由来。[\[1\]](#)自现代曙光初现之时起，人们就对流感感到费解。是什么引起了瘟疫、传染病及其大流行？星辰与神灵，影响力。”

我的目光追随着卢卡手臂的指引，环视令人眼花缭乱的星座

诸神，他就像是我的私人阿波罗。在并不十分遥远的从前，欧洲大陆上最有前途的学生们为了理解人体之谜和折磨人类的力量而聚集在这个神圣的房间里。在最显眼的展示中，受人尊敬的教授在讲堂上告诉学生们，是上天主宰着他们的存在。盘旋在头顶的星群统治着有识之士，人类糊涂蒙昧，脆弱不堪。

卢卡拉上东面的百叶窗时，我注意到映在阿波罗周围嵌板上的铭文。盾牌般的嵌板线条柔美，外围雕刻着优雅的花饰，上面刻有拉丁文格言，其中，最凄凉动人的一句话是，“对我们而言，首先是他们的力量”（ET CUNCTORUM SUBIECTA POTENTIA NOBIS）。

一万年以来，人类种地耕田，畜牧养殖，建设城镇，在泥板和纸张上进行数学运算，以货币完成交易，扬帆远航，以武器作战，酿酒，制乳酪，纺棉织毯，铺设公路，修渠建坝，变更河道，抽水排污，输送淡水，然而，人类却在理解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方面毫无进展：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由于无法解释，我们的祖先将目光转向了上天，以挣脱困惑之网——我们会生病是因为上天的影响力。

历经千古迷惘，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接受了以科学的概念来解释疾病的起因和治疗。植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至于如果出现无法诊断或是无法完全恢复功能的情况，我们甚至会感觉接受不了。此外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口腔或体内没有永久性植入物的人，更不可能找到一个不认识任何植入物使用者的年轻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这种转变发生在上一代人身上，并且会继续深入发展。

未来几十年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的猜测或许非常愚蠢（如果前面的几百页有意义的话），但外科医生一向直言不讳。

不过，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关于人类最不同凡响的干预治疗方式之一。

1982年7月，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圣克拉拉谷医疗中心收治了一位40多岁的先生。他处于一种身体冻结但意识清醒的状态，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板子一样，一动不动；虽然他的身体几乎没有反应，但将其收治入院的神经科医生威廉·朗斯顿（William Langston）感觉到，他可能处于正常的清醒状态。这真是一种神秘的医学现象：这位患者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瘫痪”却没有丧失认知能力的？朗斯顿医生必须对此做出判断。[\[2\]](#)

快速的身体检查排除了中风和紧张型精神分裂症。虽然患者无法移动四肢，但他的身体并非松软无力，而是僵硬的。实际上，患者可以被形容为“蜡样屈曲”，即检查人员可以将其手臂举过头顶，松手后，肢体会保持在原位。这不是感染，不是脑出血，也不是精神失常。医生从认识他的人当中得知，这些症状真的发生在一夜之间，仿佛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天之内就患上严重帕金森病的患者。

通过仔细的调查工作和一些“讽刺的蛛丝马迹”，[\[3\]](#)谜团迅速被破解。朗斯顿医生及其他医学调查人员收集了邻近城市的急诊室病例报告、警察报告、新闻媒体的警报，再加上很讽刺的“一点运气”，他们在湾区又发现了六例猝发帕金森病的患者。这七名患者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都使用了一种新型“合成海洛因”。这种毒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特质毒品潮流”中，新近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街头巷尾。

问题是，这些悲惨折磨背后的致病因是什么？通过与执法机关以及“配合”工作的毒贩合作，科学家们获得了合成海洛因的样本，终于击中要害。他们发现了一批几乎完全由MPTP构成的劣

质毒品（MPTP是一种在脏乱厨房或露营车里搞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有害分子）。事实上，在制作合成海洛因的过程中，温度至关重要，如果（不那么）“可靠”的毒品贩子打破行规，故意破坏了海洛因的调制方法，就会生成一种对大脑特定部位有毒性的副产品。

1983年，朗斯顿和同事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发现。研究表明，MPTP对大脑特定部位具有毒性。他们认为，这种分子对这个部位的破坏是导致帕金森病的原因。由于以前从未发现过类似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全美各地的研究人员都瞄准了MPTP，将其用作一种可以在实验室动物身上制造帕金森病的试剂。后来科学家发现，MPTP会分解成为另一种毒性更高的分子MPP⁺，这种分子会强力地破坏以多巴胺为主要“神经递质”的细胞，实际上就是向协调运动功能的大脑深处发送小型的化学“智能炸弹”。

乔瓦尼·莫尔加尼关于疾病的位置和病因的突破性见解，改变了医生对器官在疾病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进入19世纪，科学家们尚未理解大脑的组成部分，但人们开始好奇颅骨的形状和大小在决定个人性格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德国医生总结出颅相学，这种伪科学认为骨骼特征和独特的头部轮廓可以帮助警惕的检查人员诊断心理问题。就像大多数甚至是现在的江湖医术一样，没人能证明颅相学不是错误的，但它确实开启了人们对大脑不同部位各有不同功能的思考。

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是佛蒙特州的一名铁路工人，他在工作时受到了致命性颅脑损伤，身下地洞中炸出的铁路捣固杆穿过他的头部，又飞出80英尺。这件事发生在1848年。

在没有什么医治方法的情况下，盖奇必死无疑。然而他活了下来。当地的医生接受过以那个时代而言不错的医学培训，明白伤口清创术是有用的，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了盖奇外伤部位的组织。

标枪大小的捣固杆从他的左眼下方进入，向上穿过头顶。令人惊讶的是，菲尼亚斯一开始还能说话，但几天之内，他就进入半昏迷状态，在死亡边缘徘徊。当地医生为他清除了血块和脓肿。当时距离抗生素问世还有将近一个世纪，盖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免疫力。他活了下来，失去了左眼，但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原本的脾气秉性。

菲尼亚斯·盖奇又活了十年，然而，原本性情温和、能够正常社交的他变成了一个性格极端的病人，“成日脏话连篇（他从前并没有这种习惯），丝毫不尊重同事，他自己的想法与人发生冲突时无法克制情绪，没有耐心听从劝告，有时顽固不化，有时又反复无常，想出未来的工作计划又旋即放弃，因为其他方案似乎更加可行”，他的医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份医学出版物中这样写道。^[4]患者在短期内人格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他并没有丧失肢体活动能力、语言能力以及信息处理的能力。我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位于眼睛上方的大脑“额叶”部位，与肢体活动、语言控制或者面部功能控制无关。菲尼亚斯·盖奇的病例甚至变成早期“病变案例研究”之一，这类患者的大脑特定部位损伤，恰恰揭示出该部位的功能。虽然几十年来，人们对“脑定位”（cerebral localization）的理解只停留在粗浅水平，但随着科学家们研发出更加准确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大脑思维，“脑定位”这一概念将得到蓬勃发展。

皮埃尔·保罗·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年）是一位法国医生，在19世纪中期，他得到了整个巴黎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执业医师的指导和培训，学成之后，他在病理学、外科学

和解剖学方面均有实践。布罗卡生性酷爱调查研究，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全心致力于医学研究和文章发表。1861年，布罗卡被请到比塞特医院（Bicetre Hospital）为一名失语患者做检查。比塞特医院是巴黎市郊的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布罗卡要评估的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一名51岁的男性患者，他已经21年没有说过话了——除了“谭”（Tan）这个词，于是，人们都不叫他的名字路易·维克多·莱伯尼（Louis Victor Leborgne），而是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谭先生”。

“谭先生”在比塞特医院住院的前十年里，只是无法说话。布罗卡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智力似乎未受影响，精神和身体状况完好，反应灵敏……他一直尝试与人交流。”^[5]在遇到布罗卡之前的几年中，他的右半侧身体开始瘫痪，肢体上的坏疽使病情迅速发展到威胁生命的状态。即使生命走到了死亡边缘，莱伯尼还是能够与布罗卡互动交流。与往常一样，他唯一的言语表达就是“谭”，但布罗卡认为，他能够理解其他人的语言，按要求行事和记数字。

保罗·布罗卡刚刚参加了巴黎人类学学会（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的一个讲座，埃内斯特·奥伯廷（Ernest Aubertin）在讲座中介绍了屈勒里耶（Cullerier）先生的病例。这名患者试图朝着自己的前额开枪自杀，结果子弹击碎了头骨前部，露出了大脑，但惊人的是他并没有当场毙命。屈勒里耶被送往圣路易医院，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仍然可以说话。奥伯廷抓紧时间为患者做了检查，并进行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实验。后来他写道：“……由于我非常想知道，如果大脑受到挤压，语言能力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用一块大压舌板从上向下、从前向后按压暴露在外的大脑部分。在一定的压力下，他的舌头似乎动弹不得，无法发音；我们突然加力按压后，患者不仅

丧失了语言能力，而且话没说完就停止了。”^[6]奥伯廷对巴黎同行们说，大脑功能具有区域性；保罗·布罗卡开始思考，掌管语言的区域是否确实位于大脑前部。

一周后，路易·维克多·莱伯尼（“谭先生”）过世了，布罗卡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包括对大脑的解剖。在额叶靠近外侧沟（额叶与颞叶之间的大裂隙）的地方，布罗卡发现了一处孤立的梅毒病变，他推测这一位置便是语言生成区。

他是对的。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家首次确定了人类大脑中的特定功能区域。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仍被称为“布罗卡区”（见彩插20.1）。这位巴黎医生的求知欲为认知神经科学奠定了基础，并迅速开启了人们对大脑功能定位和偏侧性的真正理解。

威廉·伦琴于1895年发现了X射线，宣告人类具备了窥见人体内部的能力。但X射线完全无法显示大脑的内部损伤。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沃尔特·丹迪（Walter Dandy）在1919年发明了“气脑造影术”，这是向大脑深处的中空脑室注入气体，然后在颅骨的X射线检查中观察骷髅状大脑轮廓的技术。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才能无痛而准确地显示颅内结构。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确定人脑功能区域的过程完全依靠对颅脑损伤患者进行尸体检查。真正解开大脑的秘密需要一种突破性技术，使神经科学家的目光转向单个脑细胞。这样医生才能理解那一团高深莫测的细胞，也就是大脑。

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发明的消除色差的透镜极大地改善了显微镜技术，但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学的出现和染料的应用使组织变得鲜明可见，为研究细胞的组织学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神经组织不易染色，而且人们对脑细胞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方式也争论不休。事实上，有些专家认为，大脑是由一个单细胞构

成的单个器官，细胞自身如一大团毛发状纤维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网状说”（reticular theory）。科学家每次尝试为神经组织染色都会在显微镜下看到一团乱糟糟的神经纤维，19世纪中期的那些组织学先驱显然被大脑搞糊涂了。

威廉·珀金在1856年发现了苯胺紫（详见第八章），开启了合成染料工业，使服装制造业焕然一新，也为现代化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后，德国的大学和企业药理学、化学和制造业领域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所以发明新一代组织染色技术并让组织在显微镜下栩栩如生的研究者是位德国科学家，并不让人意外。奥托·戴特斯（Otto Deiters，1834—1863年）是最早看到，也知道自己看到了单个神经细胞的人之一，这位年轻的德国神经解剖学家在26岁时发明出一种神经细胞染色技术，能够在极高的放大倍率（300倍）下特别灵敏地筛出单个细胞。由于显微照相术尚未发明，戴特斯亲手画出了自己的发现。他画的图像明确显示，大脑和脊髓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以蜿蜒曲折的突触进行互动。他用细小的针头成功地分离出单个细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7\]](#)但要弄清大脑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则需要科学的奇迹。在显微镜下观察脑组织的横截面就像在看一碗意大利面，而试图认出单个神经细胞相当于追踪碗里的一根面条。或许戴特斯能够推导出答案，但遗憾的是，他在29岁时死于伤寒，过世时尚未完全发表他的研究，而我们也只能等待另一位研究人员来解开神经的秘密。

卡米洛·戈尔吉（Camillo Golgi，1843—1926年）在伦巴第区紧邻瑞士边境的科尔泰诺出生长大。戈尔吉的父亲是当地医生。1860年，他遵循了父亲的职业足迹，南行前往帕维亚大学学医。尽管他在第一个十年中的学术成绩并不突出，但戈尔吉确实得到了心理学和组织学早期开拓者的指导，这激发了他对微观

神经学的研究兴趣。在1 000千米之外，罗伯特·科赫正在开创性地利用显微镜研究细菌。与科赫和利斯特一样，戈尔吉后来在厨房的临时实验室中进行了自己最重要的研究。

戈尔吉跟随一位重要的组织病理学家学会了分析技术之后，于1872年离开了帕维亚的舒适环境，前往位于米兰市郊的阿比亚泰格拉索（Abbiategrosso）。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戈尔吉发明出一种为神经细胞染色的新方法。他不断地改变着使用试剂的时机和顺序，直到迎来科学的重大发现时刻。戈尔吉在厨房实验室里尝试着各种混合物，他将一只狗的大脑样本埋入一块固体石蜡中。在那之前，他为了防止大脑腐烂，已经用福尔马林“固定”了组织。石蜡变硬之后，这位30岁的科学家将薄得几近透明的嗅球进行了切片处理。这一次，在1873年，卡米洛·戈尔吉首先将样本放入重铬酸钾，然后放入硝酸银。神秘的现象发生了，载玻片上只有少数神经元从银色染成了墨黑色，而其他区域为土黄色。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神经元会对硝酸银产生反应，但这一结果却揭示出栖息于大脑中的单个神经细胞的真面目。通过对相邻的切片重复染色，样本的结构一目了然。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吉将其富有艺术性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8\]](#)

1875年，戈尔吉发表了一份令人惊叹的医学艺术品，向人们展示了哺乳动物嗅球神经细胞的柱状组织结构。他准确地描绘出神经细胞体及其树突部分的植物般布局，毕加索或达利的绘画也不会比这图像更有创意了。这种“黑色反应”现在称为戈尔吉法，至今仍然是神经组织染色的标准方法，[\[9\]](#)戈尔吉也由此发表了世界上第一张神经元绘图。然而，戈尔吉却认为复杂的神经纤维突触就是单个神经细胞的全部，这无疑巩固了大脑组织结构的“网状说”。他当然是错误的。幸运的是，十年后一位富于想象

力的西班牙医生看到了戈尔吉的杰作，从而开启了一项赢得诺贝尔奖的大脑结构研究。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 1852—1934年，见彩插20.2）在35岁时第一次看到戈尔吉的神经细胞染色法。他的父亲是萨拉戈萨的一名解剖学教师，但拉蒙-卡哈尔不愿与父亲一样学医。转折点是一次传奇的墓地历险，父亲恳请他在那里运用素描技巧绘出骨骼草图。^[10]这位极具天赋的艺术家（自称是一名性格腼腆、不善交际、神秘的学生）^[11]，发现自己擅长绘画，适合做一名科学绘图师，于是才进入父亲任解剖学教师的医学院学习。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拉蒙-卡哈尔在服军役时染上过疟疾，身体条件不适合行医，于是他转而研究组织学，这反倒更贴近其天生的内向性格。“我最终选择了严谨的组织学作为职业道路，一场享受宁静的旅程……[这样]我应该可以快乐地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思考生命的魅力……”^[12]

1887年，尚未忘记少年志向的中年医生拉蒙-卡哈尔看到了戈尔吉的细胞图，其技艺的魅力无疑征服了这个西班牙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详细地绘制出大脑和脊髓的外观，更重要的是，他解开了复杂的神经组织结构之谜（见彩插20.3、彩插20.4）。

拉蒙-卡哈尔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没有争议的。他的科学绘图以其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传遍了各大洲。就像维萨里在《人体构造论》中呈现出夺目的视觉效果，拉蒙-卡哈尔的作品也十分精美，但因为他在表现一种关于神经元结构的想法，所以这些图示传达出的真实性，在任何单张显微镜载玻片上都无法证明。从这个角度看来，艺术表现力和想象力甚至比照片的捕捉能力更为重要。

拉蒙-卡哈尔的艺术表现精美绝伦，同时他的科学发现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神经科学这一新领域的大门。戈尔吉是神经染色的先驱者，而拉蒙-卡哈尔的创新则将这一领域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戈尔吉相信大脑的网状说，而拉蒙-卡哈尔能够证明大脑是由亿万个神经细胞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大脑是由一千亿个细胞组成的，每个脑细胞都能够与成千上万个其他细胞相连。毋庸置疑，拉蒙-卡哈尔是神经科学之父，这位巨匠为展示神经在大脑、脊髓和身体中的惊人游走路径铺平了道路。

拉蒙-卡哈尔并不认为大脑是一团胶质，而是将这个组织看作“我们体内嗡嗡作响、永不休止的蜂巢”。^[13]即使最幼稚的医学生也能够认识到，细胞极小极小，肉眼当然是看不见的。而拉蒙-卡哈尔及其追随者指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大脑的最外层即大脑皮层（产生运动冲动的地方）与它指挥移动的肌肉（如拇指屈肌）之间，只有两种神经细胞。细小的“上运动神经元”始于大脑皮层并发出其刺状的、携带电信号的轴突，沿着大脑向下到达脑干。轴突在这里“垂直交叉”穿过脊髓，并沿脊髓下行，轴突的卷须状纤维在脊髓的另一侧继续向下延伸，直至触及颈部的“下运动神经元”。这种神经细胞从脊髓穿过颈椎之间的神经根，沿手臂向下延伸，直至前臂的拇指肌。在普通身型的成年人体内，“下运动神经元”的轴突长度超过两英尺！如此纤细的东西竟然可以这么长，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如果科学家指出，细于蛛丝的轴突纤维可以从脊髓一直通到肌肉，我们同样会感到不可思议。这解释了为什么脊髓受伤后，重新连接每一根轴突束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手术可以重接受损末端……目前还没有。

“今天，当我们看着他的[拉蒙-卡哈尔的]绘图，呈现于眼前的不是图表或者结论，而是探索遥远前沿地带的第一幅清晰图

景，绘制出它的人一直远行至无尽的远方。”[\[14\]](#)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开启了对大脑和思维迷宫的研究。与戈尔吉一样，他也活到82岁，直到躺在病榻上，也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此时距离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阐明大脑的动态功能还有几十年，而拉蒙-卡哈尔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探索者一般，数年来日复一日地窥视着显微镜目镜，概括我们的微观世界景象。他永远是最伟大的思维制图师。

爱德华·埃瓦茨（Edward Evarts，1926—1985年）在纽约市出生，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194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即刻开始了自己的心理神经学研究生涯，并简单地完成了为期两年的精神病学培训项目，然后回到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埃瓦茨致力于钻研大脑的功能性通路，然而他不是对已经死亡的脑物质进行组织染色，而是发明出一种测试大脑电传导的方法。他的患者不是患有心理问题的病人，而是猫和猴子。

埃瓦茨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几项突破性发现，特别是他发明出一种跟踪动物单个大脑皮层神经元的方法。埃瓦茨在1962年和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先后介绍了未进行任何麻醉和约束的猫[\[15\]](#)和猴子[\[16\]](#)分别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接受玻璃绝缘式铂铱微电极的结果。后来，埃瓦茨能够在猴子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运动中跟踪单个神经元的活动。[\[17\]](#)这些研究以神经生理学先驱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也遵循着医学每个分支领域的发展模式，包括解剖学、生理学以及最终的病理学。埃瓦茨并不是第一个在实验室动物身上使用植入式电极的人，但他“巧妙地完善了单个细胞记录法”，[\[18\]](#)使其得到广泛应用，并为跟踪更加复杂的神经回路提供了可能性。

埃瓦茨的最终目的是了解精神活动的物理基础，而他推断这首先要从理解四肢运动的放电模式开始。他认为“必须先理解运动，才能理解其背后的思维活动”。[19]在接下来的20年中，埃瓦茨破译了神经放电的时间和顺序，不过，除了实验室技术之外，他对神经生理学的最大贡献是指导了一批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其中包括一名哈佛住院医师，这位年轻人如果没有在公共卫生系统找到一份为山姆大叔效力的工作，就注定会被送往越南战场。医学及人文科学博士马伦·德隆（Mahlon DeLong）十分幸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及其心理健康研究院）将他中途拦下。

马伦·德隆（生于1938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跟随一位研究淡水螯虾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家学习。这位教授就是唐纳德·肯尼迪，未来的斯坦福大学校长以及《科学》杂志主编。[20]德隆的本科学习并不是典型的医学院预科，却激发了他对生物系统的研究兴趣，于是，他考入了东部的哈佛医学院并于1966年毕业。他原本留在波士顿做住院医师，但由于越南战争的军事后勤需要，美国在1969年进行了臭名昭著的越南征募抽签。一旦抽中，（年轻的医生们）将被派往海外军医部队，德隆不想承受这样的风险，于是他接受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爱德华·埃瓦茨实验室的研究员职位。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德隆将成为探究“思维线路板”的先锋部队中的一员。

进入实验室工作后，德隆很快便意识到，大多数比较容易接近的大脑区域已经由实验室其他人员负责研究，而人们对遥不可及的大脑中心地带还知之甚少。这对德隆而言“就如同探索地图上尚未标记的非洲或亚马孙地区并为其绘图”。[21]由于所有的“好地方”如运动皮层和小脑，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研究，马伦·德隆将注意力放在了“基底神经节”上，这一区域的常规结构和生

理机能还几乎处于未知状态。这位年轻研究员并没有该领域的博士学位，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正如大脑皮层具有特异性，基底神经节中编码运动的神经通路也有局部特异性。

正如保罗·布罗卡预测的那样，大脑功能是按区域划分的。大脑有极为特别的功能区，例如运动皮层。不但所有肌肉功能都由这个“运动带”（motor strip）控制着，而且在这个大脑的褶皱带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运动职责的怪异组合结构，在插图中往往以“侏儒”（homunculus）或“小人”（little man）的形象示人（见彩插20.5）。

从图中可以看出，感觉区的分布似乎没有逻辑。例如，膝部感觉的位置靠近头顶，大脑在那里被平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同样，掌管面部肌肉运动的区域来自大脑半球中部的运动带——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触摸耳朵上方的头皮，皮下1英寸深处的大脑部分就控制了与你触摸位置相对的另外半张脸。德隆的重大发现是，在基底神经节中，分布着类似的独特活跃细胞，这些神经细胞与面部、手臂和腿的特定运动有关。他于1971年发表的文章[22]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3]极大地挑战了科学家们所预想的基底神经节在运动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德隆就回到了大学附属医院，不过，他并没有返回波士顿，而是转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神经内科完成了三年的住院医工作。当身穿住院医师白大褂的德隆医生向上级医生讲解基底神经节的功能，显然他偶尔会遇到这种角色转换引起的尴尬。做住院医师间，德隆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然后便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直到1989年。在这些年中，德隆及其医学研究小组证明，基底神经节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向运动皮层传送多种影响的漏斗，而是一系列平行独立的神经回路的组成部分，接送来自特定大脑皮层的信息。另一项惊人

的发现是，神经回路不仅与运动有关，而且涉及认知和情感”。

[24]简单来说，马伦·德隆破解了大脑最深部的秘密，最终了解了为什么帕金森病这样的疾病会同时导致手部震颤痉挛和双腿无法活动。

19世纪的杰出科学家无法对震颤、癫痫、偏头痛和脑部感染做出解释。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绘制出了自己看到的神经通路。接下来的一批神经科学家运用电极确定了神经细胞的放电模式，但科学家们需要患帕金森病的哺乳动物模型，才能进一步阐明运动障碍的复杂通路，或许还可以进行奇迹般的手术干预。1982年还没有人想过脑植入物，那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马伦·德隆一直希望能够以动物模型来检验自己的假说，这时他偶然读到了《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文章详细介绍了湾区的海洛因食用者一夜之间变成帕金森患者的离奇故事。

完成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培训之后，德隆医生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继续探索基底神经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德隆受到MPTP患者报道的启发，想知道是否可以为帕金森病建立一个动物模型。他预感帕金森病的损害要比理论家们所认为的复杂得多。破解病因和发现治疗方法需要极大的想象力，而德隆“十分善于客观而抽象地思考事物的本质”，[25]所以他正是破解大脑深处“黑匣子”复杂密码的合适人选。

德隆最早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进行的人造帕金森病研究作为大脑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多会将手部震颤症状与帕金森病联系起来，而这种疾病的其他主要症状包括四肢僵硬、行动缓慢、面部表情消失以及语言不清。总而言之，大部分症状都说明从运动皮层到肌肉的神经传导出现了抑制或者“简化”，因此，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帕金森病可以概括为控制运动的神经元之间出现了神经传导减慢的情况。事实恰恰相反，马伦·德隆回

忆道：“一开始有人怀疑，但在实验第一天，我们就看到活动模式和放电速率变化很大，基底神经节的输出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26]

德隆和同事们意识到，解密基底神经节是理解运动障碍的关键。随着实验的开展，他们发现了一个鲁布·戈德堡式的奇妙装置，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元素之间的神经回路在这里成为焦点。他们首次观察到，某些神经通路向其他细胞巢发出了抑制信号，结果，沿“抑制”线路增加的放电导致下一次停留的信号减少。

这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们的DNA中、细胞中、腺体与器官之间以及神经通路中，都具有一些功能性元素，当信号分子或神经传导增加，对应的效果会减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肿瘤抑制基因p53。“抗癌基因” p53处于激活状态时，可以帮助修复DNA缺陷、稳定细胞的完整性，从而抑制细胞从健康状态到癌变状态的转化。我们体内的许多激素具有类似的行为模式：蛋白激素分泌的增加会导致另一种蛋白质或离子的减少。换一个角度看，失去抑制就是纯刺激。德隆证明，基底神经节是一组复杂的“平行独立的神经回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连接基底神经节的各个区域和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有些具有兴奋性，有些具有抑制性。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路不仅与运动有关，也涉及情感和认知。

基底神经节的最深处是“底丘脑核”。德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出结论，这一组细胞在帕金森病中至关重要。黑质显然是引起整个系统出现异常生理输出的退化区域，但德隆的MPTP动物模型显示，从“底丘脑核”到基底神经节其他部分的兴奋性冲动是增加的。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故意破坏（或“损伤”）底丘

脑核，会怎么样呢？

“马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通过损伤这一区域来恢复帕金森病的活动平衡。真的想不到，他成功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重大飞跃，因为5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损伤底丘脑核会产生异常的运动障碍，而马伦却提出损伤那一区域来治疗帕金森病，并实现了他所预测的结果。”^[27]马伦的前实验室同事说道。这就如同通过长时间晒太阳来治疗皮肤癌患者。

马伦·德隆在1990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28]在患有帕金森的实验动物猴子身上，损伤底丘脑核的方法减少了“对侧肢体的所有主要运动障碍，包括丧失运动能力、强直和震颤”。^[29]在医学领域，我们的第一直觉往往是错误的，而德隆却怀疑在大脑的另一部位造成额外的神经损伤可以减轻帕金森病，这种反常识的想法大获成功。

丘脑下损伤实验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显然是开始对人类的相同区域进行精确的放射性治疗。为此，德隆开始与神经外科同事合作，尤其在他将实验室和医学实践转到埃默里大学之后，即刻取得了积极成果。

首例“苍白球切开术”（对基底神经节的一个部位进行选择性的损伤）于1992年在埃默里进行。在此前的一些年里，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开始为癫痫患者进行“功能性手术干预”。医生曾经尝试对大脑进行热损伤，但有时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患者出现流口水、抑郁、寡言的症状。这些干预属于刻意的永久性破坏，所以后果无法挽回。然而1992年的德隆有大量的理由感到乐观，比如大脑成像和电生理学标测技术的精确度，肯定比几十年前要好得多。

实验性外科手术需要大胆而具有远见的医者、绝望无助的患

者、勇敢无畏的家庭以及（必要的）时间来证明其效果。在最初的几年中，只有零零星星的病人接受手术，渐渐地，越来越多不愿被疾病击倒的患者选择了手术干预。在探索中前行的外科医生们要求对最初的一批患者进行几年跟踪随访，然后开展严谨的对照研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组织招募足够的病例以起草文章，再经过数月的反复编辑修改，才能最终发表。因此，实验性手术的随机研究的成果往往要经过十年的时间才出现在医学杂志上（比仅仅使用药物的治疗方式耗时长得多），苍白球切开术的历程便是如此。埃默里小组的文章于2003年发表，文章表明，在帕金森病的治疗中，手术干预比药物治疗更具优势。[\[30\]](#)

在20世纪80年代，德隆和他的同事们成为将微电极传入大脑最深部位的专家。这些导线可以监测电极尖端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如果外科医生故意将电极留在大脑里，然后大胆地尝试不同频率的电流会怎么样呢？这或许不可能在美国发生，这里遍地都是律师的广告牌，律师们正真诚微笑着等待受理人身伤害案件。不过，另一个国家的一名医生大胆地实现了这一突破。

阿里姆·路易·本纳比德（Alim Louis Benabid，生于1942年）是法国小城格勒诺布尔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格勒诺布尔坐落于靠近意大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现在已经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研究和技术中心，当地最重要的科学和工程院校是约瑟夫·傅立叶大学。本纳比德与众不同，拥有约瑟夫·傅立叶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是发动生物物理学革命的完美人选。

虽然左旋多巴（levodopa）极大地改善了数十万名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但这种药物在五年后往往就失去疗效，即使患者从中受益匪浅，也会遭遇明显的副作用。本纳比德医生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仍然会实施损伤手术，目标为严重受累的帕金森患者的

丘脑。他通常使用的技术是将清醒的患者小心翼翼地安置在手术台上，仔细地用夹具固定其头部，以保持头骨完全不动；然后在头顶部钻出一个小孔，在实时X射线检查的指导下，将一根长针悄悄地插入大脑深处。医生会在考虑到大脑复杂结构的情况下，向置于大脑深部的针状电极传送微量的电脉冲。探针瞄准的是丘脑中部，“如果稍微错后一点，就是丘脑的感觉区，患者会感到刺痛；如果向侧面偏太多，就会碰到锥体束，患者的手部或面部会出现收缩。”^[31]电极放错位置可能会导致患者瘫痪，因此，以低频率脉冲模仿神经放电至关重要。

1987年的一天，在格勒诺布尔的手术室里，本纳比德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改变探针的电频率会怎么样呢？一个物理学家出现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本纳比德对一位患有严重震颤的老年患者进行了实验。将探针放入正确部位后，他开始改变频率。“我从非常低的频率开始探查效果——1赫兹，5赫兹，10赫兹……直到100赫兹，就这样幸运地得到了结果。”他仅仅改变了探针的电频率，就在没有让患者丧失其他神经功能的情况下，使帕金森病患者突然完全停止了震颤。“频率达到100赫兹时，我们可以抑制震颤……我想，啊哈，这可能就是解决方案。”^[32]

本纳比德的发现无疑是外科史上最辉煌的瞬间之一。即使是偶然间的无意发现，这也会令人赞叹不已，而这位外科医生兼科学家的发现并非偶然。他果敢地认为，改变电流频率可能会产生影响，然后目睹震颤立刻消失，解决了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古老疾病。本纳比德的突破是一个奇迹，堪称最高级的“发现瞬间”。

更精彩的是，本纳比德将顶端带有四个金属触点的导线留在了患者的丘脑部。他将导线连接到外部电源上，然后通过一个带有按钮和老式开关的小盒子调制这个装置。这样，他就可以定制自己的设置，并继续通过改变传输频率来进行实验。本纳比德立

即报告了自己在丘脑植入电极后所取得的惊人发现。^[33]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1987年，格勒诺布尔还没有伦理委员会，法国当时也没有一个相当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机构，法国药品管理局到1992年才成立。经约瑟夫·傅立叶大学的神经外科领导同意，本纳比德便继续为患者植入世界上第一批大脑深部刺激装置。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德隆正在最终确定“功能各异的平行回路”^[34]分布图，并集中精力研究此前被大家忽略的底丘脑核的重要性。1992年，埃默里小组成功逆转了帕金森病；之后本纳比德开始改进技术，在帕金森患者的底丘脑核放置脑深部刺激导线。在2003年德隆的丘脑下损伤对照研究发表前不久，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脑深部刺激植入装置用于帕金森病的治疗。

我有幸观摩过为帕金森患者放置脑深部刺激装置的神经外科手术。亲眼看着6英寸的硬针在术中计算机断层扫描的指导下，被缓缓送入大脑最深处，这是一种非凡的体验。但是，术后几周的约诊更加精彩，这时神经科医生和技术助理会对已植入患者体内的晶体管电子装置进行编程。患者本来只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手只要尝试活动就会抖动起来，就连拿起一杯水送入口中都做不到，令她十分窘迫。然而，当脉冲发生器开始发射电信号时，震颤便瞬间停止了。多年来，患者第一次能够自己喝水，她（和家人们）不禁流下了眼泪。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开启脑深部刺激装置的视频，我敢说你在观看后一定会忍不住偷偷抹泪。

在全球范围内，脑深部刺激术已经进行了15万次以上，美国每年的手术量大约为1万。我们能查到完整数据的年份是2014年，那一年美国大约放置了2万个脊髓刺激装置、7 000个骶神经

刺激装置和2 000个迷走神经刺激装置。加在一起，美国在2014年进行了大约3.5万例神经调节手术。[35]

“一项近期研究估计，神经调节系统在2005年的全球市场价值达到了33.1亿欧元（约合36.5亿美元），包括脑深部刺激以及脊髓刺激和经颅磁刺激等技术 [据《市场与市场》（*MarketsandMarkets*）的报告]。预计该市场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1.2%，这样，到2020年将达到56.2亿欧元（约62亿美元）。”[36]由于脑深部刺激装置在帕金森病早期比药物更有效，并且效果可以持续数年，它是对抗运动功能障碍的有力武器。

如今，脑深部刺激术也用于治疗慢性抑郁症、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抽动秽语综合征甚至阿茨兹海默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前瞻性文章中，迈克尔·奥肯总结道：“脑深部刺激疗法通常仅在其他治疗方式都无效的情况下才考虑，但其‘仿生’能力为许多患者带来了新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两位杰出科学家 [德隆和本纳比德] 的贡献，人类已经进入了神经网络调制时代。”[37]

人体深处放置带有低频率电流的电极丝，在全世界已经有30年历史。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并不十分确定其作用机理，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完全了解麻醉在手术中有多少作用，也不完全了解缓解疾病的药物在体内有多大效果。我们只知道，它们有效。

未来的植入式装置不是随机地传递电脉冲，而是能够起到记录和交互的作用。这类植入装置被统称为脑机接口（BMI）。虽然现在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脑植入物仅在特定位置产生电场，但脑机接口可以记录并刺激单个神经元。正如爱德华·埃瓦茨开创了“单个神经元测试”的动物实验，当今的科学家

们正在探索如何记录人类的单个神经元，以便向机器传输神经元信号。

大脑是我们身体的“中央处理器”，它接收生活中的所有感觉信息（眼中所见、耳中所闻、身体所触、口中所尝、心中所受，以及平衡之感），然后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处理这些信息。通常，这些信息的输入是非语言性的，需要对意义进行推理和计算。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同样需要认知、分析、记忆形成和回应。

我们的输出过程包括面部和四肢运动。有意思的是，我们不用运动肌肉就能够收集信息，但是必须通过口部运动和声带运动，或者用手打字、书写、比画才能交流。至少现在是这样。脑机接口是终极植入物。到目前为止，植入物主要是用来做部位置换，比如用支架打开冠状动脉、替换发炎的关节、替换老化的晶状体以及加固薄弱的腹壁。在不久的将来，脑机接口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仿生的未来，男女老少不仅能够治愈疾病，而且借用《无敌金刚》的台词来说，可以变得更好、更强、更快。

随着生物治疗和基因治疗的不断进步，毫无疑问，一个世纪后的医学重点将不再是癌症，因为它将被治愈；也不是慢性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障碍、退行性病变、关节炎和心脏病将成为遥远的记忆；22世纪的医学研究对象将是更高级别的类人动物，植入手术不再用于治疗疾病，而是制造更好的半机器人（cyborg）。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吗？但它势不可当，远超你的想象。

[1] “影响力”一词在意大利语中为influenza，即“流感”一词的英文。——译者注

[2] J. W. Langston, “The MPTP story” Journal of Parkinsons Disease, (7),

pp.S11-S19, 2017.

[3] R. Lewin, “Trail of Ironies to Parkinsons Disease” Science, (224), pp.1083-5, 1984.

[4] J. M. Harlow, “Recovery from the passage of an iron bar through the head,” Publica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2(3),pp.327-47,1868.

[5] Maria Konnikova, Scientific American y Feb. 8, 2013,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 /literally-psyched/the-man-who-couldnt-speak-and-how-he-r evolution ized-psychology/](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literally-psyched/the-man-who-couldnt-speak-and-how-he-revolutionized-psychology/). Accessed July 15, 2018.

[6] Aubertin, 1861, quoted by L. L. LaPointe, Paul Broca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in the Brain (San Diego: Plural Publishing, 2012), p.129.

[7] A. P, Wickens, A History of the Brain: From Stone Age Surgery to Modern Neuroscience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14), p.171.

[8] Bahar Gholipour, “A visual history of neurons,Brain Decoder , ” April 13,2015. <http://behdad .org/mirror/www.braindecoder.com/a-visual-history-of-neurons-1089282606.html>. Accessed July 19, 2018.

[9] A. B. Keener, “The first neuron drawings, 1870s,”The Scientist. <https://www.the-scientist.com/foundations/the-first-neuron-drawings-1870s-34751>. Accessed July 19, 2018.

[10] Stanley Finger,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From Nerve Nets to Neuron Doctrine,” Minds Behind the Brain: A History of the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7–216.

[11] E. A. Newman, A. Araque, and J. M. Dubinsky, eds., The Beautiful Brain: The Drawings of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New York: Abrams, 2018), p.12.

[12] L. Swanson, in E. A. Newman, A. Araque, and J. M. Dubinsky, eds., The Beautiful Brain: The Drawings of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New York: Abrams, 2018), p.12.

[13] M. Fessenden, Smithsonian.com,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revel-these-wondrous-drawings-father-neuroscience-180961881/> Jan. 23, 2017, Accessed July 27, 2018.

[14] Ibid.

[15] E. V. Evarts, "Activity of neurons in visual cortex of the cat during sleep with low voltage fast EEG activit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25: 812–6, 1962.

[16] E. V. Evarts, "Temporal patterns of discharge of pyramidal tract neurons during sleep and waking in the monke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27: 152–71, 1964.

[17] E. V. Evarts, "Pyramidal tract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a conditioned hand movement in the monke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29: 1011–27, 1966.

[18] W. T. Thach, Edward Vaughan Evarts 1926–1985,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2000, vol. 78, pp.1–15.

[19] *Ibid.*, p.6.

[20] A. Mehta, Mahlon DeLong profile part 1. The Dana Foundation. <http://www.dana.org/News/Details.aspx?id=42940>. Accessed July 29, 2018.

[21] *Ibid.*

[22] M. R. DeLong, "Activity of pallidal neurons during movement,"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34: 414–27. 1971.

[23] A. Mehta, Mahlon DeLong profile part 1. The Dana Foundation. <http://www.dana.org/News/Details.aspx?id=42940>. Accessed July 29, 2018.

[24] <https://med.emory.edu/gamechangers/researchers/delong/bio.html>. Accessed July 29, 2018.

[25] A. Mehta, Mahlon DeLong profile part 1. The Dana Foundation. <http://www.dana.org/News/Details.aspx?id=42940>. Accessed July 29, 2018.

[26] *Ibid.*

[27] <http://www.dana.org/News/Details.aspx?id=42940>. Accessed July 29, 2018.

[28] H. Bergman, T. Wichmann, M. R. DeLong, "Reversal of experimental parkinsonism by lesions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Science*, vol. 249, Issue 4975, pp.1436–1438, Sept. 1990.

[29] *Ibid.*

[30] J. L. Vitek,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pallidotomy versus medical therapy for Parkinson’s disease,” *Annals of Neurology*, vol. 53, 2003, pp.558–569.

[31] R. Williams, “Alim-Louis Benabid: Stimulation and Serendipity,” *The Lancet Neurology*, vol. 9, Issue 12, Dec. 2010, p.1152.

[32] Ibid.

[33] A. L. Benabid, P. Pollak, A. Louveau, S. Henry, and J. de Rougemont, “Combined (thalamotomy and stimulation) stereotactic surgery of the VIM thalamic nucleus for bilateral Parkinson disease,” *Applied Neurophysiology*, vol. 50, 344–46, 1987.

[34] G. E. Alexander, M. R. DeLong, P. L. Strick, “Parallel organization of functionally segregated circuits linking basal ganglia and cortex,”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vol.9, pp.357–81, 1986.

[35] 如第十九章所述，这个数字中还包括2014年的6596例脑深部刺激术。
——编者注

[36] <https://www.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finalists/2016/benabid.html>. Accessed August 4, 2018.

[37] Michael S. Okun, “Deep-Brain Stimulation—Entering the Era of Human Neural-Network Modul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71, Oct. 9, pp.1369-73, 2014.

第二十一章

半机器人的未来与“电智人”

在过去的日子里，外科手术只与鲜血和内脏有关。未来，外科手术处理的是比特和字节。

——《尖端医疗的真相》

机器人会来看你。

——《尖端医疗的真相》

我现在上医学院二年级，正在去上课的路上而且快要迟到了。我从城郊公寓搬到了医学中心附近老街区的三居室小屋，早上可以沿着不平坦的人行道走路去上课。我把背包挂在肩膀上，遵守只背一条书包带的社会习俗，免得背双肩让人联想起某些书呆子形象。我满脑子都是马上要进行的细菌学考试，这是我们学院臭名昭著的终极挑战，不及格就会被踢出去。

这时，我碰到了一幕不太寻常的场景——一对老年夫妇手牵着手站在街区中间的路边。他们面对马路，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放慢了脚步，向马路对面张望着，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然后，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盲人，因为两人的头都微微下垂，而且目光茫然。我停下了脚步，意识到他们是要过马路，我猜他们正在听这条单行道上的交通情况。

我住的街区都是一排排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居或三居的平房住宅，前院大多点缀着蒲公英，还有以前的树木留下的凹陷小坑。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居住在这个社区里，我与前辈们一样，既无财力也无精力去改善自己的住房问题。社区里偶尔也有住了几十年的老夫妇，这对盲人一定已经在附近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了许多年。

一辆破旧的皮卡隆隆驶过，僵局继续着。我与这对小心翼翼的行人隔街相望，此时并没有车开过来，他们在等什么呢？那位先生看上去60岁左右，留着黑色背头，有着阿尔奇·邦克（Archie Bunker）^[1]式的体型和穿衣风格，身旁的女士穿着色彩鲜艳的裙装和舒适的鞋子，白色卷发上系着物美价廉的发带。突然间，那位先生猛地拉起她的手，两人疾步穿过马路。来到马路这边之后，他们与我走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因为我快迟到了，所以无法继续沉浸在好奇心中。我本想与他们交谈，但最后只是沉默地擦肩而过，希望能有机会再次遇到他们。

几个月后，在体格检查课（学习如何结合所有感官来做出诊断）上，我向教授提起了那次偶遇。他立刻就知道我说的是谁。“是道迪夫妇。他们不仅是盲人，而且都听不见。”都听不见？此刻，我回想起自己在路边看到他们的情形。他们在快速穿过马路之前格外小心，不是在听车辆开过来的声音，而是在感觉。

我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道迪夫妇的故事。他们结婚许多年了。1932年，5岁的伦纳德因细菌性脑膜炎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只能任由细菌性脑部感染摆布。贝蒂天生耳聋，年轻时因患色素性视网膜炎而失明。他们在彼此的手上通过手语进行交流，也即“手语拼写”。那么他们怎样与不懂手语的人交流呢？我的老师也不完全确定其原理，但他告

诉我他们会触摸说话人的脸部（见彩插21.1）。

现在，我更加渴望见到道迪夫妇，与他们互动，希望不会吓到他们。

一周后，我在医学中心看到了道迪先生。他一个人坐在大厅等候区——我的机会来了。

我慢慢地走近他，不知道他能否感觉到我在靠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在他旁边的塑料座椅上坐了下来。

伦纳德立刻朝我的方向转过头，瞬间露出满面笑容。我伸出手与他握手时，他的整个身体转向我。在简短握手后，他的右手熟练地来到了我的脸部：大拇指立即放在我的嘴唇上，食指和中指在下颌角，手掌压在喉头上。我觉得自己一向惧怕别人摸我的脸，但这种突如其来的触碰驱散了我的顾虑和不安。

伦纳德保持着充满活力的微笑，让我们的初次见面气氛活跃。他说道：“你好，我是伦纳德。”他发出了我听得懂的声音，这在聋人中间十分常见。

“我叫大卫。”我紧张地盯着他的面部表情缓缓说道。我们能够跨越这道鸿沟吗？

“大卫你好！”伦纳德满怀热情地说道。于是，我交了一位新朋友。

我环顾四周，有零星几位坐轮椅的患者，带着新出生的宝宝的年轻母亲，一个身穿防风夹克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一名衣着整齐的医药推销员，他们都看着我们。我向他解释说，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自己曾经在路上看见他们步行到医学中心。伦纳德说，贝蒂在医学中心的洗衣房工作。我们交流起来只是略微有一点点困难，而我也渐渐地习惯了被询问的时候脸被摸来摸去。几

分钟后，贝蒂挽着同事的手臂出现了。

伦纳德和贝蒂立即握起对方的手，通过手语拼写交流起来，不时在寂静中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贝蒂转向我，以几乎标准的语言说：“很高兴认识你，大卫。”

我惊呆了，真的。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熟识起来，我希望他们以后也会记得我。道迪夫妇坚定而温厚的性格魅力触动了我，我急忙赶回校园的一幢教学楼中。后来，我又了解到他们的欧洲之旅，伦纳德在木工坊的工作，他喜欢做的木匠活儿和其他一些奇闻。我还进一步了解了伦纳德用手来理解他人的技能，这种方法叫作“塔德马”（Tadoma），是利用呼吸的感觉、嘴唇的形状、下巴的运动以及喉头震动的触觉来理解别人说的话。

我时常在社区周围遇见道迪夫妇，尽管他们的交流能力让人惊叹，但他们的行动能力更加神奇。据我观察，伦纳德在附近的街道活动时并不需要使用盲人拐杖，他对每一条马路和每一处障碍物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我跟在他们后面研究这种技能，就像在玩一场赌上生命的两人三足式“贴驴尾巴”（Pin the Tail on the Donkey）[2]游戏。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当一辆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雷鸟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驶过，我看到他俩超级敏锐地一齐停下来，纹丝不动。我们距离彩虹大道只有一个路口，那是一条城市主干道，大大小小的车辆络绎不绝，我想知道，他们如何感知哪些车辆按南北向通行，没有危险，而哪些车辆沿着41街东西向通行，对他们构成威胁。当马路对面清晰可见，也没有车辆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竞走比赛开始了，他们手牵着手，步伐一致地走向马路对面。他们走到路边时，脚自然地抬起来，然后不动声色地放慢了脚步，安全地回到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

医学院三年级开学后，我轮换到哈里·杜鲁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所以有几个月没看到道迪夫妇了。现在，我又轮换回大学医院的精神科，希望可以很快再见到他们。

我今晚值夜班，收治急诊部的精神病患者。一名患者躁狂症发作，危及生命，于是我和住院总医师急急忙忙地跑下楼赶往急诊。她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声音嘶哑，神志不清。我照料过几位受躁狂症困扰的患者，但这位瘦弱的病人使我感到有些恐惧，她住在软壁病房，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或小东西。

我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一个女人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根烟比画着，烟并没有点着，她把烟当作指示杆、指挥棒和书写工具。她对我视而不见，却热情洋溢地向看不见的人群讲解倒十字架的意义。她把烟头转过来，用已经碾碎的一端在装有软垫的墙壁上画了几十个倒十字，太多是在原有的图画上重描，以示强调。她几乎不能说话，这位无辜的患者令我感到十分难过。

我转过身看着住院总医师时，听到几名急诊住院医师说收治了一名耳聋患者。“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盲人在地下室有木工坊？”

我不需要更多信息，便知道是伦纳德。

“道迪先生在哪儿？”我向那几位年轻的医生询问道。

“三区。你认识他？”

“他是我邻居。他没事吧？”

“他切到了手指，但还好。你去打个招呼吗？”

我拉开帘子，道迪先生躺在病床上，右手裹着沾满血的毛巾。他的太太坐在旁边，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绕到病床另一侧，握住他们的肩膀，向他们打招呼。两人的手迅速从前臂向下

滑到我的手上，而伦纳德只能用左手寻找着我的脸。

伦纳德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赶忙用手语拼写告诉贝蒂，她说出一声“大卫！”，松了口气，站起身来，而伦纳德又一次露出了大大的微笑，认识他的人都爱这张笑脸。

后来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可现在缝合切伤的手指还不是我的专长。此刻的我不是照顾患者的医生，而只是一名患者的邻居，碰巧遇到他前来就医。伦纳德的镇定与勇敢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尽管他如此注意安全，还是不幸地遭遇事故，这也令我感到心痛。

更令我痛心的是，伦纳德的手指对其生活质量来说举足轻重。切伤手指是很悲惨的，而对于一个失明且失聪，必须通过手与他人交流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

伦纳德在童年时期患上脑膜炎的经历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这种疾病无能为力。如今，如果以强效抗生素及时治疗，类似的感染可以完全治愈。贝蒂的先天性耳聋显然没有药物治疗方法，但现在的人工耳蜗可以解决类似的听力损失。视力损失的患者在未来会怎样呢？未来的植入式医疗装置无疑会恢复视力，无论病因来自眼外伤还是脑损伤。

然而，道迪夫妇之间的爱情故事会怎样呢？两个丧失感官能力的人相互陪伴、协助和指导，他们之间鼓舞人心的情谊来自残疾，并通过相互依靠又渴望独立的情感得以维持。当所有疾病都能够治愈，我们会不会丧失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当所有悲剧都能够缓解，胜利会不会贬值？

接下来的几十年

你可能在想：“你是一个观点片面的外科医生，是医疗器械行业的托儿。”

我不这样认为。我非常诚实地讨论了医疗器械许可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此外，我也批评了美国缺少植入物注册系统的糟糕现状，以及某些器械制造商不够透明的尴尬事实。

近期的期刊文章、书籍和曝光内幕的纪录片都着重强调了植入物的负面影响，令人感到恐惧。在2018年的纪录片《尖端医疗的真相》中，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小组就能否批准植入型避孕装置Essure而辩论的场面令人感到不适，小组成员甚至开玩笑说，万一证明这种装置真的有一定的危险，那么对审核人员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最严重的背叛。

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威力能够有效而美好地改善同胞们的生活。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我不得不赞叹医学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尤其是刚刚过去的75年里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也不得不严厉批评我们植入物评估系统的缺陷，器械制造商中偶尔出现的一些行为不端的人，以及极少数没有职业道德的、只为自身利益着想而贪婪地对待病人的医生。

如果有地狱，那些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冷酷无情甚至故意伤害他们的医护人员就会下地狱。病人无知觉地躺在手术台上，处于人类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刻。照顾没有防御能力的人，这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也责任重大，而亵渎这种神圣的信任是缺乏良知的。劳拉·贝尔（Laura Beil）笔下的克里斯托弗·邓奇（Christopher Duntch）医生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外科医生若是奸诈无能，能做出我们想象中最无耻的背叛。^[3]

我希望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医疗器械行业，既能看到它的不足，又能对行业里的科学家、医生和商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表示赞赏，这样我们的社会及其立法者才能铸造出植入革命的规则。同时，只有深刻地理解历史并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行业。

医疗保健之所以昂贵，是因为技术突破成本高昂；健康保险使患者能够负担昂贵的治疗方案，也使医院乐意提供可以提高利润的治疗。正如本书所示，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植入手术很快就将超过2 000万例，这将花费数千亿美元。我们喜欢抱怨医疗保健行业和健康保险是何等“低效”，但没有它们，医疗就无法发展到今天。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清楚地了解到，现代医疗保健费用之所以高得惊人，是因为植入物、药物、医院和医生十分昂贵。在医生愚昧无知、医院如同收尸场、药学尚未发展成熟、植入物还根本不存在的时代，医疗保健比现在便宜多了。

要将植入革命提升到全新的水平，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1.建立综合全面的植入物注册系统。
- 2.改进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医疗器械管理的规章制度，这可能需要彻底改变批准流程。
- 3.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价格更为透明。
- 4.公布所有外科医生和医院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结果。

我想这些建议会惹恼我的同事和医疗器械行业的每个人。考虑到风险，这四个建议必然会产生巨额成本。谁来支付呢？可能是制造商、医生、保险公司和医院共同支付。相关各方都会付出一定的艰辛和牺牲，但如果美国想要保持科学领先地位，就必须

坚定地致力于长期发展目标。到目前为止，跟踪远期治疗结果是确定最佳实践方案的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医疗器械行业尤为突出。

未来

未来会如何发展呢？简单地说，首先是关节置换、起搏器、导管、网状装置、心脏瓣膜和脑深部刺激装置的逐步改进。对设计和制造流程稍加调整就会为产品带来一定的改良，但每个领域的各家制造商都在酝酿着创造能够产生质变的植入物，这些产品往往会让我们开始挑战以前从未挑战过的疾病类型。

器械制造商所制作的产品会越来越小。

最初的心肺机的大小和衣橱差不多，带有多个旋转桶和无数活动部件，通过弯弯曲曲的管子推送深红色的血液。几十年后，机械心脏问世，为非住院病人提供心肺功能。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首款植入式人工心脏的确被放置在患者的胸腔中，但电池驱动装置仍然像洗碗机一样大小。人工心脏的发展一路坎坷，但如今这些装置在外部微型计算机的控制下运行，计算机由火腿三明治大小的电池驱动。患者走路甚至运动时只要挎一个小书包就可以了。除了胸部会留下疤痕之外，现在使用机械心脏的患者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特征：没有脉搏。这些装置里有持续转动的内部旋转叶轮，不需要开合瓣膜便可以推动血液。

新型机器会越来越小，未来的动力装置很可能会像钢铁使用的植入式电池，可以使用多年。未来的人工心脏会极其微小，小到难以想象，不再像机械泵一样。事实上，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但将来的人工心脏可能真的是纳米级别的。

我们的肾脏像拳头一样大小，却需要1/5左右的体内供血量。肾脏可以净化血液中的杂质（通过尿液排泄）并维持电解质平衡。如果肾脏衰竭，那么患者必须进行肾脏活体移植，或定期进行肾透析。目前，血液透析设备大约高4英尺，类似于带有软管和滚筒的小型心肺机。真想知道这些设备在我们不需要它们之前会变得多小。人工肾脏会小到可以植入吗？我不敢说不会。不过，随着人工器官越来越小，疾病治愈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效，也就不再需要使用它们了。

“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技术的问世无疑能够完全破解每个人的DNA，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矫正基因缺陷。一切具有遗传基础的疾病，无论是遗传易感性的疾病还是染色体损伤，无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心力衰竭还是皮肤癌，都将成为过去。

外伤（包括脾脏和肝脏破裂、肺萎陷、骨折和脑损伤）似乎将永远与人类并存。保护性运动器材及车辆安全性能的提高可能会帮助降低受伤的严重程度，但在充满科幻色彩的未来，外伤能够完全消除吗？我猜不能。但是，在几十年前，有人能想象脑植入装置可以消除震颤吗？

如果生命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物，如果“生存的权利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4\]](#)那么，死亡就是反人类的罪行。一旦我们开始延长人类的寿命，医疗保健的风险就将变得更大。如果注定要活几百年，我们会不会惧怕受到外伤而意外死亡？中年人遇车祸早逝，与一个还能活上几百年的人在40岁时遇车祸死亡，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结果我们可能会更加惧怕死亡。

我们究竟会不会战胜细菌这一劲敌？战胜微生物斗士可能是人类最艰巨的挑战，而我们一旦真正驾驭了操作基因的力量，谁

敢说我们不会消除这种威胁？或许，对人类构成更大威胁的是，星际飞船带回来一种已经在另一个星球上进化了数十亿年的外星微生物。我承认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与疾病进行三方作战，从生物、植入和基因三方面入手。在基因治疗完善之前，生物治疗方案（通过制药和营养）将继续在细胞层面发展。这些方法无效时，植入成为治疗方案。例如，直到研究人员在20世纪20年代提取出胰岛素，人们才真正认识了糖尿病，并通过每日注射胰岛素来治疗。胰岛素泵的出现大大减少了注射的烦琐步骤。虽然人们对植入胰腺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期望胰腺自身恢复生产胰岛素的功能，但最终目标仍然是基因治疗。因此，治疗糖尿病的生物、植入和基因之战仍在继续，但也许一个世纪之后，再也不会有人注射胰岛素了。

从下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你对医疗未来的信心：如果一定要把全部净资产投资到某一专业领域的医疗公司，而这笔钱一百年不能取回，那么你会将这笔钱投资在哪里呢？是医药公司、关节置换制造商、基因技术公司还是生物电技术公司？尽管我是一名骨科医生，但我无法想象一个世纪后还会进行关节置换手术。同样，患者也不可能再接受化疗药物，因为癌症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要么投资生物电技术公司，要么投资基因技术公司，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医学在未来的角色。未来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还是专门改进半人机器人？

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人类的基因修饰必定会成为常态。在一个世纪中，每个人都摆脱遗传基因错误是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实现的。这也许会被强制执行，不可能出现不遵医嘱的情况，因为那些带有染色体缺陷的人是“有病的”。我估计，反疫苗接种的抗议与22世纪的“基因矫正”相比会显得黯然失色。

人类将成为彻底的转基因生物。

遗传病成为过去，癌症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而将来的世世代代甚至都不需要矫正基因组。令人惊叹的是，一旦一代人的共同基因组被净化了，后代可能就不需要再矫正，因为配子会享有同样净化的基因。婴儿生来就有“正常”染色体，免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食物过敏、精神病、癌症和心脏病的威胁。当疾病变得不堪一击，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从身体、心理和社会层面不断提高和变强。我相信，那时仍然需要使用植入物——脑机接口。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将百年赌注押在生物电植入产品公司上。

虽然现在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脑植入物仅在特定位置产生电场，但脑机接口可以记录并刺激单个神经元。正如爱德华·埃瓦茨开创了“单个神经元测试”的动物实验，当今的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如何记录人类的单个神经元，以便向机器传输神经元信号。

目前，脑机接口十分少见。人工耳蜗属于一种脑机接口，其外部感应装置看起来像一个加强版的助听器，内部导线则深入内耳耳蜗部位。它作为接收装置，将声波信息以电信号的方式传送到听神经的耳蜗部分。人工眼睛还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在概念上与人工耳蜗类似，具有人工感应装置，通过电信号与处理感官信息的神经接合。

植入人工耳蜗和植入视网膜置换的是一种感觉器官，而未来更先进的植入物则会是“神经接口”装置，其中的电信号交流既可以是传入的，即传入感觉，也可以是传出的，即释放信号。终有一天，传出的信号可以来自大脑中微小的特定部位，而神经接口技术将提供双向信息流。

如果将脊髓看作一根包含微观传输线的管道，其中载有10亿神经元，[5]那么脊髓损伤无法修复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在手外科做住院医师，我曾经在值班时遇到过重接腕部结构的艰巨挑战。绝望的患者用刀割腕自杀，九根肌腱、两根动脉和正中神经全部断裂。这种称为“意大利面式的手腕”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将连接指部肌肉（出人意料地位于前臂）的肌腱与手指重新配对十分困难。外科医生必须在混作一团的肌腱中小心辨认，并将它们正确配对，弄错一对就会使手部功能错乱。

匹配那十几对结构都是一道手术难题，更何况匹配脊髓的10亿个神经元？所以，伴有脊髓损伤的移位性脊椎骨折的手术重点从来都是稳定骨骼，而不是“修复神经”，更何况那些神经轴突的直径只有蜘蛛丝直径的1/4。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由于我们已经知道大脑皮层中运动带和感觉带的特定位置，将来有可能通过全身性大规模重新布线来治疗脊髓损伤。我们正在研发名为“生物微机电系统”（BioMEMs）的专用传感装置，可以感知大脑的运动诱导。然后，生物微机电系统可以绕过脊髓，与周围神经相连。这些微型神经探针“与线路整体结合，用于扩增、多路传输、放电探测，以及电力和双向数据的无线传输”，并且“有助于改善在许多使人衰弱的神经类疾病中使用的假体器官”。[6]

纳米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微型化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生物微机电系统，它正在改变医学。随着微创手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治疗破坏性脊髓损伤已经不再是幻想。

医学现代化的故事往往以可怕的疾病开始，然后沿着一系列没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发展，直到最后，我们开始关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以面部整形外科为例，它最初关注的是因梅毒感染而失

去鼻子的奇特损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渐渐地变成遵循不断变化文化喜好的美容手术。

生物微机电系统在脑外科的应用会沿着治疗脊髓损伤、中风、脑肿瘤、脑瘫和癫痫的方向继续发展，最终过渡到治疗早期痴呆、强迫症、中度抑郁和健忘症等危害较小的疾病。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到下一代人，所有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某种对神经功能进行调节的脑植入物得到治疗。

但接下来呢？涉及大脑之后，我们会不会从治疗疾病变为解决功能障碍，最终发展为拥有超能力？这一点毫无疑问。

如本书所示，美国每年进行约2 000万例植入手术。虽然我们医疗保健的大部分费用都与医疗器械有关，但每年慢性疾病的住院治疗费用高达数千亿美元。我们几乎不会怀疑，基因组净化技术的出现会消灭许多慢性疾病及癌症，使人类专注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

半机器人时代的局限性是什么呢？当慢性疾病得以治愈，我们希望生理和心理功能最大化的冲动无疑会导致人类成为机器。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为了植入生物微机电系统而经历开颅手术，虽然这很可能发生，但未来或许会出现某种未知方法，可以在物理层面改变人脑，以机械方式来修饰人类的思想。

这个想法会让我们大多数人不寒而栗。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具有一部分人工自我的世界里吗？

在电影《她》中，华金·菲尼克斯所饰演的角色爱上了电脑操作系统中的女声“萨曼莎”（由斯嘉丽·约翰逊配音）。如果这种关系使你产生存在危机，你并不孤单。与超现实的计算机交谈并产生爱情，这种想法会令人感到不安。他已经知道对方是人造情人，却仍然对计算机产生了“爱情”，这使许多观众感到困惑或难

以置信，不过它确实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情爱虽然是一种典型的生理关系，却植根于精神生活。

或许，比起在技术上已经可行的计算机恋爱，更令人紧张不安的是《机械姬》中的人机交合。电影中，一位世界级富豪隐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其住所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所，他邀请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迦勒（Caleb）来到偏僻的别墅中，对他所创造的机器人艾娃（Ava）进行人性测试。艾娃的躯干和四肢是透明的，展露出内部的电子结构，尽管如此，年轻的男主角还是同情甚至爱上了这个不折不扣的机器人。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会越来越支持人性化的艾娃，即使我们会不禁自问：“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会被骗吗？”《机械姬》的编剧兼导演亚历克斯·嘉兰说，“这部电影真正讲述的是一台机器成为一个女孩的故事”。^[7]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当我们认识到艾娃具有情感和动机，特别是当这些人类冲动开始变得危险，她就变成了“女孩”。

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优势地位和掌控感构成威胁，它们便令人感到恐惧，尤其是在“机器的崛起”似乎会让我们的管辖权限永远丧失的情况下。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工智能还是一个神秘的概念。我对计算机编程一无所知，无法理解人工智能是如何配置成形的，具有哪些危险，但对于那些了解和创造人工智能的人而言，其未来是确定无疑的。

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一直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它并不是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指哈佛大学）精心制作的一个独立软件程序。我们不要仅仅将人工智能设想为一台经过巧妙编程后可以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那是一种特殊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未来是“通用人工智能”（AGI），这种人工智能可以学习、思考，而且按理说可以有良知。

对于人类的半机器人时代来说，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比任何植入发明都更加重要，但一路上会出现许多令人惊讶的障碍。例如，小孩子很容易识别出猫与狗之间的区别，这对计算机来说却很困难。因此，计算机科学家们正在深入钻研我们大脑的学习和处理方式，期望成批的计算机最终能够学习并超越程序员的智慧，这一天指日可待。当这一天到来，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脚步将变得势不可当。

今天，通用人工智能的点点滴滴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伊隆·马斯克指出：“公司本质上是人和机器的控制论集合……谷歌搜索就包含了这种集体人工智能技术，我们都像网络的节点一样连在一起，如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我们都在向网络提交各种问题和用网络搜索。我们都在共同编写人工智能程序。谷歌和脸谱网、推特、照片墙等社交网络，以及与之连接的所有人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控制论集合。”^[8]反馈回路强化了机器的功能，并提高了其他所有机器处理信息的能力。当计算机在我们身边以光速运转，记忆就变得很容易，但控制论思维会使我们不可思议地成为超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是半机器人了。亲爱的读者，我相信你一定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且此刻它就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它的记忆力比你好多了，尤其是在它连入万维网时。忘记了吉布提的首都是哪里吗？问问你的手机。（顺便说一句，吉布提的首都是吉布提市。）需要复习一下怎样打领结，或是想不起来奶奶的肉桂卷食谱中有多少黄油？你马上就能知道。如果手机中的所有信息都能存在脑子里而不是指尖，会怎么样呢？

但是，谁会傻到在大脑中植入一台计算机呢？于是你得出结论，这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们有可能通过生物微机电系统来治愈脊髓损伤、震颤和中风，这种前景是激动人心的。在未来，先天性疾病如脑瘫和后天性疾病如癫痫，可以通过更先进的脑植入物来治疗。电子药物（electroceutical）是一种植入装置，“通过控制发往特定器官的神经信号对患病处进行精准定位”，[9]目前正在测试一些似乎与电没有什么关联的疾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糖尿病。如果你想知道有什么证据表明电子药物很可能成功，可以看看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得到了多少投资。[10]

当我们的注意力逐渐从疾病治疗转向疾病的预防和治愈，人类无疑会创造出生理（和心理）更强大的“智人”。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将是净化染色体和功能加强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拥有更好的视力、听力、牙齿和健康的冠状动脉，而且在耐力、记忆力和情绪管理方面也更出色。因此，神经探针的植入将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它会极大地改进人类这一物种。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直立人（*Homo erectus*），那么我们的后代可能是“电智人”（*Homo electrus*）。

耳机会继续朝着无线化方向发展，最终在我们的耳道内植入扬声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吧？更先进的阶段是直接连线到耳蜗，甚至是听神经。如此一来，隐蔽听觉甚至放大听觉都可以实现了。

另一方面，人们正在秘密地深入研发能够感知我们大脑冲动的技术，总有一天，我们将无须活动任何肌肉便可以传送思想。通过神经探针感知我们大脑语言部位的心灵感应术肯定是可能的。听起来疯狂吧？包括伊隆·马斯克在内的许多优秀的头脑都认为这是未来之路。[11]

虽然《机械姬》《她》等电影使人们对计算机控制和机器人

的统治感到恐惧不安，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半机器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如何发展。当社会上每个人都以电子方式接通，交流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机器在未来的崛起不是靠单独一支迅速成长起来的机器人部队，而是依靠人转变为“电智人”。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天网”是服务器、机器人、半机器人、人造卫星和战争机器相互连接而成的人工智能系统。终结者与《机械姬》中的艾娃以电子方式通力合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令人难以置信。未来的“电智人”将以电子方式传送信息来“说话”，而在我们通往那个时代的途中，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与拥有额外电子视线的类人机器人面对面。借用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话来说，如果能够以电流方式来“激发热情，内向探索”（turned on, tuned in），那么，我们与这样的人类共存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怀念智能手机面世之前的生活，那时人们会亲临现场观看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睁大眼睛感受高潮时刻。如今手机站在两者之间，我们既无法全面捕捉那一时刻，也无法置身其中。当那些小电子装置不是出现在眼前，而是植入我们的大脑中，生活会变得多么奇怪呢？

不得不说，我希望自己错了。“电智人”吓到我了。

根据迈克斯·泰格马克的观点，从混沌初开到半机器人出现的138亿年中，进化演变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生命1.0大约出现在40亿年前，以简单的生物形式为特征，例如没有交流和学习能力的细菌等生物体。生命2.0是现代人，出现于约10万年前，具有先进的文化和意识，以及交流和提高自身“软件”的能力。^[12]泰格马克解释说：“尽管人类DNA中的信息在过去的5万年中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存储在我们的大脑、书籍和计算机中

的总体信息却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通过安装使我们能够用复杂的语言系统进行交流的软件模块，我们确保了存储在一个人大脑中的最有用的信息可以复制到其他人的大脑中，即使原始大脑死亡，信息也可以留存下来。”[13]

处于植入革命萌芽阶段的我们可以归为生命2.1，拥有人工关节和心脏起搏器，但没有大幅升级认知硬件，不过这很快便会到来。“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进步，生命3.0会在下个世纪出现，甚至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14]生命3.0的重要特征是人同时得到了软件升级和硬件升级，控制植入物使人类可以更好地获得、处理、交流和记忆信息，能力远远超过目前水平。

在不久的将来，控制论机体（半机器人）将引领我们进入“电智人”时代，技术奇点（Singularity）指日可待。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著名的发明家和未来主义者雷·库兹韦尔认为，再过几十年，我们就将进入一个人与机器之间没有差别，虚拟与现实之间没有差别的时代。[15]“奇点”是一个借用物理学和数学中的概念，指计算机超级智能继续保持指数级增长，结果导致机器智能过于强大和诱人，以至于人类必须与计算机合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库兹韦尔并不是一个胡思乱想的业余未来主义者。他是一个发明家，其主要发明包括第一台CCD（电荷耦合器件）平板扫描仪、第一台文字-语音转换合成器以及首款商用大词汇量语音识别软件。通过数学模型和技术评估，库兹韦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奇点会在2045年到来。“身为人类并不是我们自身的局限，尽管我们确实有许多局限，但人类的本质应当体现于超越自身局限的能力。我们并未停留在地面上，我们甚至不会满足于只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并没有安于自身的生物局限性。”[\[16\]](#)

这场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可以简称为“GNR”，即基因技术（Genetics）、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和机器人技术（Robotics）。库兹韦尔在2005年出版的《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中预测了基因操控即将出现的变化，这些预测在我听来十分奇幻。随着CRISPR这种尖端技术在纠正基因变异方面的发展，或许不到十年，我们就会发现库兹韦尔的梦想还不够奇幻。一旦我们成为终极转基因生物，具有超人智能的增强版人类便近在眼前。库兹韦尔认为，随着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智能的发展，这一天终将实现。

生物进化造就了一个能够思考和操控其生存环境的物种。如今，人类正在“成功地摸索并改进其自身设计，而且能够重新思考和改变这些基本的生物学法则”。[\[17\]](#)在接下来的25年里，当机器逐渐超越我们的一般智力水平，并拥有超过我们自身10亿倍以上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我们将迈向生命3.0。当非生物智能超越生物智能，人类无疑将反向还原我们的认知生活，“在更加强大的基础层面上建模、模仿、复位，并修改和延伸……”。[\[18\]](#)一直以来，生物进化的脚步十分缓慢，万物皆始于十分简单的折叠蛋白，始终以依旧神秘的方式和相对缓慢的速度进行思维处理，于是我们渴望像机器人一般思考，而奇点的出现会使这种渴望变得难以抑制、无法满足。

纳米技术和生物微机电系统首先用于治疗疾病，而后使人类获得超乎寻常的能力，它似乎告诉我们，向超人类迈进很可能成为现实。许多杰出人士认为，这是我们的命运，而且会比想象中出现得更快。事实上，人类的非生物部分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在100年前，西方世界有1/3的人感染结核病，人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满是粪便的街道上，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咳嗽声

不停，那时候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有朝一日生活中会没有这些。而如今，我敢肯定你都不认识患有结核病的人。

革命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工业、运输、能源等革命的进展远远快于人们最初的设想，但与植入革命来临的各个阶段相比，它们都会显得黯然失色。

植入革命的最后阶段将会是地球生命40亿年历史上最为复杂精妙的技术革命阶段，因为它是一项旗舰事业，违抗进化规律并打造我们的半机器人未来。

植入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天才学会的创立、18世纪外科学的诞生以及19世纪早期显微镜的改进和完善。化学的出现、病菌学说的巩固以及对疾病的器官基础和细胞基础的发现，为革命的启动提供了助力。在首次疝择期手术和1941年青霉素问世之间的半个世纪中，我们开始尝试植入（虽然以失败告终）。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发明了健康保险，二战后出现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医院建设热潮。一系列的集中发展使高分子科学、晶体管、现代合金和抗生素进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因此需要建立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反馈环。植入材料、专用资金、崭新的手术室以及让手术变得安全的抗生素，发动了这场革命。

经过75年的革命，美国及各个国家的医疗实践仍然存在明显缺陷。然而，在植入技术的基础上，关节炎、心脏病、中风、腹部器官疾病、脊柱侧凸、尿失禁、听力受损、帕金森病、癌症以及成百上千种其他疾病的治疗水平显著改善和提高。虽然这些医

疗干预通常效果显著，但与18世纪旧医学的“善意忽略”相比，价格极其昂贵，而且植入物的评估不够科学严谨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查尔斯·达尔文在其开创性著作《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中，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做出了精妙的总结：

因此，从自然界的战争中，从饥饿与死亡里，迎来了我们能想到的最值得赞美的事物，即高等动物的产生。有一种壮阔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最初是由造物主，伴随其他几种能力，注入几种或一种形态中的，亦认为当这颗星球遵循固定的引力定律循环往复地转动，生命便从极为简单的初始形态，源源不断地进化出最美妙绝伦的形式，而且仍然在进化着。[\[19\]](#)

进化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几乎逃过了每一位科学家的法眼，直到一位极有远见的博物学家领悟到它的伟大之处。即使以达·芬奇的创造才能、牛顿的聪明才智、爱因斯坦的想象力和达尔文的洞察力，也无法想到“最值得赞美的事物”会是“电智人”。百万年来难以察觉的适应变化和偶然的基因突变（哪些属于偶然的基因突变取决于你的哲学观），现在哈佛的实验室或伦敦的手术室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将它扭转。一旦我们战胜了退化和遗传疾病，有可能就不再需要治疗疾病的植入物了。今天，植入产品制造商、外科医生、医院、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正齐心协力地运用一系列发明来救急。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机构将携手违抗“引力定律”，摆脱作为智人的局限，所向无敌地拥抱全新的生活。

[1] 阿尔奇·邦克是美国电视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的人物，指头脑顽固又自以为是工人。——译者注

[2] “贴驴尾巴”是一种在墙上挂一幅缺少尾巴的小毛驴图画，儿童蒙着眼睛给毛驴贴上尾巴的游戏。——编者注

[3] <https://wonderly.com/shows/dr-death/>.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4] Yuval Noah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8), p.21.

[5] <https://faculty.washington.edu/chudler/facts.html>. Accessed Aug. 15, 2018.

[6] T. James, et al BioMEMs—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Medicine, *w Sensors*, 8(9): pp.6077-107, 2008.

[7] ExMachina 2015—Behind the Scen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CHPhGsNiO>

[8] Joe Rogan Experience #1169- Elon Musk <https://www.stitcher.com/podcast/the-joe-rogan-experience/e/56151455>.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9] M. Rozenfeld, KThe future of medicine might be bioelectronic implants, <http://theinstitute.ieee.org/technology-topics/life-sciences/the-future-of-medicine-might-be-bioelectronic-implants>.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0] Ibid.

[11] <https://www.nextbigfuture.com/2017/03/elon-musk-has-gone-public-with-his.html>. Accessed October 9, 2019.

[12] Max Tegmark, *Life 3.0: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7).

[13] Ibid., p.28.

[14] Ibid., p.29.

[15]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p.9,

[16] Ibid., p.311.

[17] Ibid., p.310.

[18] Ibid., p.298.

[19]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p.429.

致谢

世界上没有什么高呼“我发现了！”的时刻。至少在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我们似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刚开始和温迪约会的时候，她很快就意识到我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没多久她就预言说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在科学和外科领域兜兜转转30年，就是为这本书而准备的，还要加上我忙着在骨科领域炮制学术出版物的同时，于世界最伟大的图书馆里花费的无数时间，为回复编辑批评意见而度过的不眠之夜。现在我很少进行科学实验，而是保持着繁忙的骨科临床工作，专攻肩肘外科。

我的“发现”时刻是在一天洗澡时出现的。我的这个写作项目始于一种冲动，想向公众和医生解释现代手术。我不断地碰到外科伟人的有趣故事，意识到我可以将他们攻克疾病的生涯联系在一起。一天清晨，当温暖的淋浴水洒向我的头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正处于一场革命之中。

有时，革命会因为政府被推翻或机器的发明而引爆，此时你无疑被卷入剧变之中。但有时如果没有人指出来，你就无法察觉到你正生活在一个飞跃的时代。我要让你指出几个你认识的、没有做过手术的人。你几乎不可能答得上来。而如果你做过手术，你体内很可能有一个永久性的人造材料——但这在1941年还不可能。

因此，植入物是一场革命。

温迪预言我会写一本书，但在过去十年里，我经过与几个朋友的推敲，才启动了这个项目。在一场高中篮球赛上，阿尔·基林真诚地看着我，催促我去工作。在一次超级碗的聚会上，迈克尔·梅森为我提供了灵感，唤醒了我久违的写作激情，然后在This Land出版社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点燃了我的写作斗志。我对迈克尔感激不尽。我亲爱的小姨子伊丽莎白·加恩西是一位天才作家和敏锐的编辑，在写作初期给了我鼓励和真诚又有建设性的批评。大名鼎鼎的乔纳森·科特在过去五年中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肯定。他不仅有相当高的文学天赋，而且忠诚体贴，如果没有乔纳森，这本书（以及接下来的书）根本就不会存在。

和每一个作家一样，我也是我成长环境的产物。在堪萨斯州曼哈顿长大的我有幸拥有好几位杰出的老师，比如我六年级的英语老师弗雷泽夫人和八年级的英语老师科尔曼先生。克雷默博士是我的高中英国文学老师，他很严厉，也很优秀。大学时，马克·威廉姆斯激励了我。

我心中的第一个医学英雄是杰夫·霍尔特格林。从1988年起，他就是我各个方面的榜样，并让我确认了成为一名骨科医生的意义。当我的医学院和住院医师的工作遇到困难，他的榜样力量就像一条鼓舞人心的生命线，哪怕是他在病床上与重症做斗争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医学导师，尤其是H. 克拉克·安德森、文斯·佩莱格里尼和尼尔·阿特拉什。弗莱德·雷克林、凯文·布莱克、斯彭斯·雷德、保罗·胡利亚诺、桑吉瓦·奈杜和詹姆斯·蒂博内也是我外科训练中的不朽人物。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骨科手术伙伴们对我的“爱好”和多次前往欧洲及美国各地的研究旅行给予了惊人的支持。特别是杰拉德·福伦、迈克尔·艾尔曼、米奇·罗宾逊、马克·米尔斯、艾德·罗兰德、尼梅什·帕特尔、萨米尔·罗德哈、道格·福尔克、佩特·德奥、

吉姆·约翰逊、查克·戈特洛布、罗恩·休格特、罗尼·罗采海瑟和约翰·弗勒利克，他们都是给予我宝贵反馈的人，也是我热情的支持者。我在医疗设备行业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拒绝安于现状的朋友，我永远尊敬他们。我不认同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对医生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知，我猜在他们的世界里，感谢世界级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要对那些带头冲锋陷阵的工程师和商界人士说：谢谢你们！

任何人一生中能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首先，我的双胞胎兄弟丹尼尔是我一生中出色的僚机。他聪明、坚强、忠诚。道格·伯顿、里克·金升和丹尼尔·华莱士这样的伙伴是罕见的。托德·路易斯是我三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像我一样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朋友。我真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拥有（并成为）托德这样的朋友。像马克·莫尔顿和杰夫·亚诺维奇这样的朋友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在博尔德，我最亲密的朋友是斯图尔特·克雷斯皮，他正直忠诚，与我情同手足。在《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的结尾，天使克拉伦斯在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题赠处写道：“记住，只要有朋友，就不是失败者。”就像乔治·贝利一样，我觉得自己是城里最富有的人。

如果没有一个了不起的团队，你不可能在繁忙的外科工作同时写出一本综合全面的历史书。乔迪·辛西克、克里斯蒂·库珀·内维尔、保罗·李、艾比·普莱斯和阿什利·尼科尔森不仅动手研究骨骼，深入地治疗肩肘疾病，而且一直愿意听我讲医学逸事和研究发现。我一辈子都欠着他们的人情！

作为一个菜鸟，出书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启示。深深地感谢InkWell的迈克尔·孟杰洛和迈克尔·卡莱尔，感谢他们收留了这个菜鸟。希望在这本书之后还有几本书！感谢Pegasus的工作人

员——克莱伯恩·汉考克、玛利亚·费尔南德兹、杰西卡·凯斯——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你们欣喜若狂！ 致我的编辑德鲁·惠勒——感谢你对手稿的打磨和你的编辑协助。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父亲J.E.“吉恩”·施耐德的，他是一位战士、科学家、兽医、敬业的父亲和祖父，也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他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我每天都在想念他。他对孩子们怀有无穷的骄傲，我很确信，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在波尔德的珍珠街兜售这本书。我的母亲朱迪思·施耐德，在86岁时仍在探索我们的世界。她充满好奇心，不愿被博物馆和音乐厅拒之门外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我。我是她的骄傲和爱子。我的兄弟姐妹（和姻亲）马克与琳内·施耐德，本和罗歇尔·普拉特，丹尼尔和吉塞拉·施耐德，蒂姆和珍妮·布赖特松，伊丽莎白（和查理）·加恩西，以及赫利克和迪亚娜·加恩西，一直是我灵感和智慧的巨大源泉。

温迪·加恩西·施耐德和我在一起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们的四个成年子女艾米莉、卢克、乔纳森和詹妮弗是我最大的骄傲和喜悦。归根结底，他们对我作为父亲的认可和评价是我生活的意义所在。我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中得到最好的发展。我们的四个孩子每个都有独特的天赋，注定要完成一些特别的事情。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后，献给温迪，我的灵魂伴侣和最好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还是大学生，没多久就深深地相爱了。通常情况下，外科医生都是在完成所有艰苦训练后才结婚的，但我们在医学院开学前几周就和对方结婚了。一年又一年充满挑战的日子里，温迪看到了我最好的一面，更多的时候，看到了我最坏的一面。尽管医学院和住院医师的要求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的婚姻（和萌芽中的家庭）还是蓬勃发展，甚至在低谷时我们也挺了过来。我的生

活因为你的存在和不懈的支持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永远无法描述我对你的智慧、爱和支持的崇拜和钦佩。看来你要永远和我在一起了！现在，让我们开始下一次冒险。

大卫·施耐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 (美) 大卫·施耐德著；张宁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9

书名原文：THE INVENTION OF SURGERY: A 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Implant Revolution
ISBN 978-7-5217-3157-6

I . ①外... II . ①大... ②张... III . ①外科手术 - 医学史 - 世界 IV . ①
R6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096808号

THE INVENTION OF SURGERY

Copyright © 2020 by David Schneider, M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著者：[美] 大卫·施耐德

译者：张宁

审校：马向涛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2785

书号：ISBN 978-7-5217-3157-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资深外交官、李光耀智囊 马凯硕 深度解读

世界秩序的重构与挑战

[新加坡]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_著

全球化智库 (CCG) _译

中国的 选择

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的选择

——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新加坡]马凯硕 著

全球化智库（CCG）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重磅推荐

推荐序

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第三章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第四章 中国在扩张吗

第五章 美国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第六章 中国的民主

第七章 美德假设

第八章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

第九章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致谢

附录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重磅推荐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恶化让人们在感到错愕时也不禁反思，中美两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关系走到这一步？未来两国关系将如何演进？双方存在哪些误解和分歧？双方面临什么战略决策及后果？马凯硕是非常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我与他结识多年，非常钦佩他在重大国际事务方面的睿智与坦诚。中国古话说得好，旁观者清。在这本书中，马凯硕毫不避讳，用直率生动的语言、丰富多元的案例给出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精彩分析和客观建议。他对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与外交的洞察令人叹服，他对未来中美冲突的担忧让我们感同身受。他的分析也许会逼迫我们离开熟悉的思路和舒适区，也可能有人会不赞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将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思路。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马凯硕这本新著凝聚了他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的洞见，既有纵向的梳理，也有横向的剖析，既有参与者的热忱，也有观察者的冷静。他对中美两国战略家的忠告得到的倾听越多，两国陷入战略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马凯硕长期关注中美竞争态势的发展，他的新著通过对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洞见，揭示战略思考中的各种盲点，辨析中美两国之间的误解与误判，试图以冷静理性的进言敦促中美化解冲突，避免走向两败俱伤甚至危及人类命运的战争局面。作者的观点得益于他特有的经验、学识与第三方视角，富有启发性，值得借鉴。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

中美关系的走向塑造着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整体格局与趋势。在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究竟会如何博弈？两国各自的战略有哪些得失？马凯硕作为一位学者型的资深外交家，在这本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美关系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十大关键问题，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给出了建设性建议。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而又深度融入英美同盟和其他经济体系的安全的亚洲富国，长期活跃在中美两国中间，因而此地观察家们的观点展现出很难得的客观性、兼容性和全局性。马凯硕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个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资深的外交经历，使这本书兼具现实性、思想性和前瞻性。此书值得一读。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当下的中美之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景象，一个无法避免又极其重要的主题是：中美竞争将把世界带向何方？作为资深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学者，马凯硕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贯通前后、洞见当下的机会，一个与大师对话的机会。贯穿全书的十个问题，是马凯硕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反思，更是塑造中美关系变化的几大关键变量。通过对中美国际战略、国内政治以及经济变迁等维度的独到分析，马凯硕为我们厘清了中美双方如何走到今日的困窘之局。马凯硕建议中美都需要反思自身战略中存在的失误和不足，对自身长期利益需要有清楚的认识，避免被情绪操纵，正确评估自己的国际位置，理性制定符合国情需要并能积累长期优势的战略。马凯硕在书中所强调的政治改革能力和领导力将是有益的建议，这是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制度优势，但核心任务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进而走向能力优势，这需要不断探索方能实现。

——陈琪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秘书长、教授

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马凯硕先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本书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处理中美关系与大国关系的重要指南。推荐给所有人，特别是政治家、外交官、学者与青年学生。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马凯硕所著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对中美

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对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化、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演变方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本书不仅帮我们轻松读懂了两个大国之间复杂的矛盾与博弈，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对过往事态的总结与反思，对我们有效把握中美关系，促成竞争合作的新局面，避免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此书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并从中汲取一些人类智慧的结晶。

——霍建国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这本书非常直白坦诚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存在的战略失误。对于中美能否避免重大地缘政治竞争这一问题，这本书的答案是：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和美国共同繁荣发展。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做到：致力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问题将不再是美国或中国的胜利，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这本书给中美双方和世界提供了一个中立、客观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和应对未来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这本书研究的问题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它探讨的也许是21世纪

最重大的问题，答案却并不简单。马凯硕运用生动有趣且令人震撼的数据和事实来深入揭示两国的优势及劣势。两国的较量远未结束。在我读过的同类图书中，这部是最佳之作。

——单伟建

太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著有《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

《金钱游戏：揭秘美国交易高手如何拯救韩国银行巨头》

在中美大国博弈的时代，更需要折冲其间合纵连横的策士，马凯硕正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生于印巴分治中流亡的印度裔家庭，在新加坡成长为资深外交官，再跃升为中美都奉为座上宾的智囊，其外部人的视角恰恰能点出局内人可能存在的盲点。首先，他秉持务实主义，这种务实主义就体现在他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清醒认知上。其次，他有对中国的近距离观察，能作为利益相关方给出中肯的建议，而不是许多西方观察家的那种“纸上谈兵”。此外，作为印度裔新加坡人，他能很好地在中美之间协调。这本《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应该说是在这个全新的两极多边时代，纵横家给出的一本有分量的策书。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沿着何种方向演进？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会给各国造成什么影响？中美能否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恶性竞争？这些都是国际战略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马凯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两国之间也不必然陷入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

——吴其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 * *

马凯硕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复杂环境下具备高度发展且相对罕见的战略思维能力，以及联系和尊重多种文明及其价值观的独特能力。这些技能、洞察力和经验在他的新著《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得以充分展示。他不偏不倚地分析了在中国和美国正面临的竞争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对双方的偏见和错误的评估，既一针见血，又至关重要。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会带领大多数读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书中有很多深刻的见解，核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能力去理解和尊重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文明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带来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和有关个人自由、社会与政治稳定等方面的相对价值观。换言之，要通过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尽管如此，双方仍需要建立广泛的共同利益。在马凯硕看来，结局很明朗：要么人人（不止中国和美国）都赢，要么没人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不管我们是把中国视作朋友、对手，还是非敌非友，我们都需要

知道中国是如何思考和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对于西方人来说，马凯硕是最能帮助我们了解亚洲人世界观的人。他在这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中分享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在这部新著中，马凯硕解释了为什么争论中美输赢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尽管双方的误解不断增加，但中美两国终归知道，双方爆发战争将会是灾难性的。在这部富有启发性的新著中，马凯硕呼吁两个大国都要具备更深层次的理性。他认为，当今时代的最大挑战将是回答人类是否会赢的问题。中美两国的读者将会从马凯硕的智慧中获益匪浅。

——杨荣文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马凯硕的《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回顾了从乔治·凯南到约翰·肯尼迪的战略智慧，提出了有关中国崛起的挑衅性甚至“异端”问题，并倡导为世界多样性提供保障。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
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长期以来，马凯硕一直称赞西方教给世界其他地区知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也都从西方传授的知识中获益。然而，没有国家比美国更惊讶于中国从美国学到的东西，现在美国

把中国纯粹视作威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对手。马凯硕尖锐地问道：中国做了什么，要被如此对待？他比以往更进一步地挑战读者，让他们思考如果任由竞争无节制地发展下去会造成何种后果。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马凯硕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看穿让大国误入歧途的、自满的“正统观念”。《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揭示出正在破坏中美两国以及它们与世界关系的流言和错误，并为两国提供了坦率又清晰的建议，指导它们在未来做得更好。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虽然有可能不喜欢他的某些观点，但无论如何都应该予以密切关注。你也应该密切关注。

——斯蒂芬·沃尔特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

美国人应该听取马凯硕的逆耳忠言——哪怕这可能不受欢迎：抛弃对美国永远是世界第一、拥有牢靠的非凡美德的幻想。反之，美国应该采取一项以平衡与合作为基础的长期国际战略，重新建立健全国内领导与治理机制，在国外赢得朋友而非赶走盟友，避免做出过度承诺，并表现出道德上的谦逊。在民主的武器库中，军事力量并非最重要的武器。

——戴维·兰普顿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荣誉教授

中美两国正为争夺国际主导权而陷入争斗，这场竞争的结果将塑

造影响未来几代人的世界秩序。马凯硕用他细微的观察和清晰的洞察力捕捉到了这场竞争的复杂性。这本书不容错过。

——伊恩·布雷默
美国欧亚集团主席

马凯硕的新作精彩纷呈，意义重大，聚焦国际事务中的重要问题：中美关系未来将如何演变？人类亟须超级大国合作，而它们之间更可能摩擦不断。作者认为，若是后者，美国最终很可能陷入严重劣势，这并非缘于中国的固有优势，而是因为美国的种种失误，尤其是未能认清中国的现实。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推荐序

中美关系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因为中美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与碳排放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代表，分别代表着亚洲与西方的主要声音。

鉴于这些利害因素，中美以清醒和理性的态度相互了解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国际上关于中美关系的争论多呈两极分化趋势，意识形态、成见与偏见色彩浓重，特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故意扭曲这方面的争论。中美双方远隔重洋相互审视，对彼此的理解皆有偏差。有时，中美之间似乎天然缺乏共鸣，导致双方各执一词。

也许无人能比马凯硕更适合弥合这一鸿沟，丰富的经验与杰出的职业生涯帮助他形成了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全球事务。正在演进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且争议不断升级的话题，见识广博的马凯硕是一位中立的第三方观察者。他与华盛顿及北京的资深内部人士保持着长期联系，对两国的政治现实有着深刻把握，但同时又保留了局外人的清晰视角，能够客观理性地分析与重构热门话题。正因如此，他对于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迷雾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

马凯硕担任新加坡外交官超过三十年。新加坡与中美两国都有着深厚的联系，也是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部分归功于新加坡的国际视野及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马凯硕成长并工作于新加坡这个文化大熔炉中，深受亚洲传统与文化的熏陶，与亚洲的多元化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先后在华盛顿与纽约任职十余年，深谙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与政治。

正如书中所述，马凯硕对中美两国的政治、历史与社会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加之他所接受的战略训练，以及他拥有的洞悉对正统观念的误导性叙述和把握大局的天赋，使他能够对地缘政治提出独到而精妙的见解。在外交生涯结束后，他投身学术界并开创了卓越的事业，成为亚洲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对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发出最富见地、最雄辩声音的人物之一。

我认识马凯硕已十年有余。这些年来，我有幸与他在许多私下和公开的场合进行讨论，并分享意见和看法。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2019年5月，我们在多伦多举行的“芒克辩论会”中并肩作战。那天，我们的辩论立场是中国非但没有对自由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反倒是战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国际秩序而非破坏它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当晚在辩论厅里，我们的看法与主流观点相左，马凯硕再次展现出了他洞悉误导性叙述的天赋，他的发言雄辩且有说服力，帮助我方险胜了强大的对手。

他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与敏锐的洞察力贯穿了《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这本书写于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前，书中对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平衡进行了分析，并及时提出了强有力的、富有远见的论点：中美应将两国间的竞争限制在良性的范围内，为应对疫情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开拓合作空间。

因此，这本书得到了世界顶尖专家和政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它已经产生了真正的全球性影响，伴随着阿拉伯语、荷兰语、法

语，以及德语、葡萄牙语和越南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即将面世，这本书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在此关键时刻面世，从而让更多读者从中有所得，并对当代最重要的问题获得新的解读视角。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将中美两国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对比贯穿全书。这些清晰的对比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中美关系及其所处的国际和历史背景。一些内容可能会引发读者不快，因为马凯硕的分析鞭辟入里，他不仅分析了两国的优势，也分析了两国的弱势与战略失误。有些事实两国都难以接受。但正如马凯硕所指出的，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和对方，中美才能学会合作。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是一本视野广阔又雄心勃勃的书，这本书借鉴了许多学科及思想流派的智慧，其中包括马凯硕在大学期间所学的哲学。他强调，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懂得了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是要找对问题。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都是找对问题——这是从杰出的新加坡地缘政治思想家李光耀等人身上学到的。因为如果把问题都搞错了，那么无疑，答案也将是错的。

尽管此书的原版书名^[1]带有挑衅意味，但书中最终得出了一个乐观却或多或少令人惊讶的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战胜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马凯硕表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中国或美国是否赢了，而是人类是否赢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后，全球正在挣扎着复苏，同时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人类是否赢了”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我希望，也相信，这本书能够深刻地阐明国家间的分歧和共同利益，唤起我们对共同命运的觉悟。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21年4月于北京

[1] 英文版书名是*Has China Won?*，意为“中国赢了吗？”。

中文版序言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

这是本书的开篇语，我在2019年写下这些字句，次年初该书在纽约首次出版。遗憾的是，我竟一语成谶。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乔·拜登当选总统。然而，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非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对此，许多中国读者肯定一头雾水。本书旨在回答中国读者脑海中关于这一重大地缘政治竞争的所有大问题。事实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阐释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其中一种结构性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永保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乔·拜登在2021年3月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美国为何会将中国崛起视作一种威胁，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终将使美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并非有意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相反，中国的目标是改善人民福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改善人民福祉的一项成果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也扩大了。事实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时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倍，到了2014年，这一差距大大缩小了。2019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21万亿美元，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按照这个口径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

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时会给美国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为何会如此令人震惊？答案也着实令人错愕：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显然，不愿成为“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得知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可能会备感震惊，因为在未制定战略的情况下就发起竞争可谓疯狂之举。若有中国读者对此表示怀疑，那他们应该知晓，向我证实这一点的正是美国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在中国很有名，他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中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先行者。在本书中，我描述了2018年3月在纽约与基辛格共进午餐的情形，当时他向我证实美国是缺乏对华长期战略的。

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

么？特朗普政府声称，目标是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然而，正如本书中深入解说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导致的，而是中国储蓄和投资之间失衡的结果，详见本书第三章“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实力，那么这已经失败了。200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到了2019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3年之后），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规模为6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美国的仅增至5.5万亿美元，不到2009年的1.5倍。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显然已告失败。拜登本人也证实了这场贸易摩擦的失败。2019年7月，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有人问拜登是否会保留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回答“不会”，事实上，他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

既然拜登亲自证实了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失败，那么他在2021年1月就任后，应该取消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这才合乎逻辑。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不想在美国同胞面前显得软弱。

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就个人观察，我认为拜登在2009—2016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实际上对中国非常友好。当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2月访美时，拜登负责接待他并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2011年8月，拜登以副总统身份访华并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待。与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官员相比，拜登对中国的评论会礼貌得多，对此我毫不怀疑。然而，即便拜登再客气，基于本书阐述的许多结构性原因，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将继续。

但本书的结论还是乐观的。书中最后一章汲取了中国阴阳观

念所蕴含的智慧，阐释了中国和美国如何找到相互合作的途径。

“对立势力”也有可能和平共处。基于此，本书以中美之间的五个“不矛盾”来收尾。这里举两个具体的例子。首先，如果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正是如此），那么中美两国政府就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看法是，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是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重，还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为重？这一选择将产生的重要结果是，如果将人民放在首位，美国就应该减少军事开支。许多富有见解的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表达过对美国军事开支过多的看法。法里德·扎卡利亚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谈道：“劳埃德·奥斯汀近期表示，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一直将重点放在中东，而中国则一直在推动军事现代化。‘我们将保持优势，’奥斯汀说，‘我们将继续加强优势。’奥斯汀所谓‘美国对中国的优势’简直构成了一道天堑。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是中国20倍。美国拥有的海上军舰吨位是中国的两倍，其中包括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还远不如美国的先进）。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塞巴斯蒂安·罗布林说，美国拥有2 000多架现代化战斗机，中国却只有大约600架。美国有大约800个海外基地组成的庞大军事网络，中国却只有3个海外基地。中国的国防预算尚不及美国的1/3。”法里德·扎卡利亚说的绝对正确。这些巨额的军事开支毫无意义，它伤害了美国人民而非使其获益。本书既分析了美国军事开支如此庞大的结构性原因，也阐释了为何这并非明智之举。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中美之间也存在着“不矛盾”。本书写于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以未对此做出讨论。但病毒来袭强化了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使两国间的合作变得越发重要。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不再住在200多艘分开的船上，而是住在同一艘船上的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新冠肺炎疫情告诉人类，世界上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当78亿人生活在同一艘船上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了。我们必须一起来照看这艘船。确实，在我们共同的船上，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再愚蠢不过了。相反，我们应抛开争论集中精力先灭火。这一类比清楚地表明，特朗普政府不将重点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共同挑战上是极不明智的。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从而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这些做法导致的可悲结果是，超过5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相形之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是4 600多人（数据截至2021年4月）。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令人欣慰的是，拜登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2021年4月下旬还会召开气候峰会。拜登决定集中精力应对气候变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之欢呼。如果他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

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更加为他欢呼。鉴于此，本书试图厘清这一重大竞争的缘起，探索中美两国如何找到出路。我期待中国读者能对书中提出的建议予以支持。

马凯硕

2021年4月5日

第一章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美国两党对此鼎力支持。在美国政体中正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1]美国在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的概要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大国”，正寻求“塑造一个符合其模式的世界，从而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指手画脚”。^[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说过：“我们正试图把中国的威胁不仅视作对整个政府的威胁，还视作对整个社会的威胁……我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对此做出反应。”^[3]就连乔治·索罗斯——一位曾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阻止特朗普当选的华尔街大佬，也赞扬了特朗普对待中国的立场。他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外交成就，是对中国制定出连贯的、真正的两党合作政策。”^[4]他还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为其“战略对手”是正确的。

尽管美国的建制派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大都热情地支持特朗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指出，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18年3月中旬，我同基辛格博士在其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俱乐部的私人包间里共进午餐。那天据气

象预报说会有暴风雪，这令我担心午餐是否会被取消。然而，即便有暴风雪预警，他还是现身了。我们愉快地交流了两个多小时。坦白说，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缺乏应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但他在午餐会谈中传达了 this 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相形之下，当年美国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卷入针对苏联的冷战的。乔治·凯南是制定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主要战略家。他以笔名“X先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在该文中他首次公开阐述了这一战略。这篇文章源自凯南于1946年2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长电报”。这封电报是他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这一要职时撰写的，而他的主要使命是制定长期战略规划。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基伦·斯金纳教授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2019年4月29日，在一次公开小组讨论中，她透露，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她在率领部门努力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以配合前主任凯南提出的战略。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正如拉惹勒南教给我的，一个人在构思这类问题时，必须始终“思考不可想象之事”。

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想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对此，政策规划部门应予以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见过乔治·凯南，我相信他也愿意直面未来最棘手的问题。

十个问题

问题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虽然仅拥有世界4%的人口，但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却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GDP规模也从未追赶上美国，只达到美国GDP规模鼎盛时期的40%。[\[5\]](#)未来30年，美国的GDP规模会变得比中国小吗？若是如此，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必须做出何种战略改变？

问题2：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改善3.3亿公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如果保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与提升美国公民福祉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

问题3：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被证明是一种审慎的举措，因为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最终，这导致了苏联的破产。中国从苏联解体中吸取了教训，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重点发展经济。美国继续扩大国防预算是明智之举吗？还是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基础设施？中国希望美国增加还是减少国防开支？

问题4：美国并非单凭一己之力赢得了冷战。当年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方伙伴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并发展了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重要的第三世界朋友和盟友。为了维持亲密的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保持经济开放，并慷慨地提供援助。最重要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以慷慨精神而闻名。但特朗普政府宣布了“美国优先”政策，还威胁要对欧盟、日本等关键盟友，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盟友加征关税。如果

美国连关键盟友都疏远了，它还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联盟来制衡中国吗？对于中国来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算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礼物吗？中国是否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邻国建立起新型经济伙伴关系，从而可以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实施前先发制人？

问题5：美元，而非美国军队，才是美国可以用来凝聚盟友和对手并使之遵从自身意愿的最强大武器。美元已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币种，在这方面，美元可谓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服务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直以来，外国银行和机构无法避免地要使用美元，因此，美国可以将其国内法律应用至域外，并对违犯美国国内法律，或与伊朗和其他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的外国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在严厉的金融制裁下，朝鲜和伊朗等国家被迫与美国坐到谈判桌前。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在得到多边机构的支持和认可时效果最佳，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多边制裁转向单边制裁，并将美元作为武器对付对手国家。将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武器化以实现单边目标，这种做法是否明智？目前，尚没有哪一币种可以行之有效地替代美元。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吗？这会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6]吗？中国能够刺破它并削弱美国经济吗？

问题6：在制定对抗苏联的战略时，凯南强调，对于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给全世界人民营造出这样一种国家印象”，即美国国内取得了成功，而且整个国家“充满精神活力”。^[7]约瑟夫·奈教授称之为美国的软实力。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飙升的时期。“9·11”事件以后，美国违犯了国际法，并且未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成为第一个重新引入酷刑的西方国家）。如今，美国的软实力已然大幅下降，在特朗普的领导

下尤为如此。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来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如果美国被视作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它能赢得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吗？

问题7：麦克马斯特将军在2017—2018年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表示，归根结底，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代表了“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8]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都应该同样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世界上较大的三个民主国家中，有两个是亚洲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国的民主政体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威胁。不仅如此，欧洲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犯下的一个典型战略失误，就是用对抗苏联的旧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恰似用昨天的策略来打明天的战争。美国的战略思想家是否有能力制定新的分析框架，以抓住与中国竞争的本质？

问题8：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总会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凯南曾明智地观察到，“发脾气和失去自我控制”是软弱的表现。那么，美国的对华反应是受理性的驱使，还是潜意识下的情绪使然？长久以来，西方人在心理上对“黄祸”怀有一种深层的、潜意识的恐惧。基伦·斯金纳曾指出，与中国的竞争其实是一种与“非白种人”力量的竞争。鉴于此，她明确指出了究竟是何种因素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情绪反应。在华盛顿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有哪位战略思想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政治不正确”却真实的观点，而不会受到政治攻击？

问题9：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武曾

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9]美国了解它的中国对手吗？举例来说，当美国把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视为中国共产党^[10]时，是否犯了一个基本的认知错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灵魂根植于共产主义。然而，在许多客观的亚洲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着“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的角色，其灵魂并不是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意识形态，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了解对手的思想。因此，这里有一个测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丰富的文明史的专注程度有多深？答案也许会让许多美国人惊讶不已。

问题10：在《论中国》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强调，中国的战略是与其本土棋类游戏围棋的思维而非西方的国际象棋思维为指导的。下国际象棋时，重点是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而下围棋时，则要致力于慢慢地、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得利于己方。围棋强调长期战略而非短期收益。那么，中国是在缓慢而又耐心地积累资产，逐步将战略游戏引向利于自身吗？有趣的是，美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努力，以阻止中国为获取优势而采取的两项长期行动。但这两项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第一项努力是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中国于2014—2015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项努力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内在力量和耐力来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

我提出这些问题，旨在激发一场战略辩论，思考不可想象之事，剖析和理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10年将出现的许多复杂层面。本书的一大目的就是，促使大家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且

变化的主题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

在卷入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前，每个美国战略思想家都应该客观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这场竞争究竟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风险？简言之，美国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吗？这种想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是 strongest 的。在物质层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体制的创新性和活力（特别是美国拥有的自由市场、法治和高等教育），以及美国的人民，使美国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水平能与之媲美。

在道德层面，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相信，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败。美国人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没有哪种政治制度在本质上能够媲美开国元勋为美国所做出的构想。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美国近年来越发“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把中国描绘得越邪恶（尤其是违背了美国对中国的预期：逐步开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美国人就越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中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还为自身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感到自豪。在很多方面，它的确如此。它继承了伟大的西方文明，立国之基就是理性和逻辑。科学革命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也使美国统治了世界。美国拥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众多世界顶级的大学和受教育程度极高的精英阶层，这些优势使之认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知识创新和道德优势等关键领域，没有哪个社会能与美国竞争。

美国人还认为，他们拥有地球上最开放的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各种机制会在美国出现重大错误转向时发出警告。遗憾的

是，在最近几十年里并未出现这种警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30年里，50%的美国底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在下降。[\[11\]](#)这并不是因为某次转向出现了错误。本书将会讲到，美国已经严重背离了一些在当代社会中被定义为社会正义的关键原则。约翰·罗尔斯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试图在自己的著作中汲取那些伟大的欧洲先哲的智慧，美国的开国元勋都从中得到过教诲。不幸的是，许多美国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背离了一些关键的建国原则。

同样，鲜有美国人意识到，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19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7.3%，中国GDP只占4.5%。[\[12\]](#)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0.6%，中国GDP只占3.86%。到2018年，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5%，低于中国的18.6%。[\[13\]](#)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位居第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更少有人考虑过这意味着什么。

更关键的是，中美对抗的全球背景将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世界已然变得更加复杂。显然，除非美国去适应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否则它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在文明发展变化的舞台上，世界正在恢复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历史平衡。两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改写了历史。事实上，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经济实力最强的文明国家。因此，过去的近两百年是反常的。

西方再也无法继续主宰世界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国家已经从

西方学到了很多東西。它們汲取了西方在經濟、政治、科學和技術方面的許多最佳實踐。因此，當西方文明的許多部分（尤其是歐洲）顯得疲憊、缺乏動力和能量時，其他文明已開始蓬勃興起。在這方面，人類文明和其他生物一樣，是有生命週期的。中華文明經歷了多次跌宕起伏，現在它強勢振興也不足為奇。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孕育出強大的文明力量。王賡武教授觀察到，雖然世界上有許多古文明，但只有中国古代文明經歷了四次衰微又重新崛起。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中國具有非凡的韌性。中國人也極富才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過去的30年，是中華文明經歷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發展最好的30年。在過去兩千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人民的巨大智力資源並沒有在封建帝制下得到發展。過去30年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智力資源進行大規模的開發。中國人數個世紀以來所擁有的文化自信，加上中國向西方學到的事物，使中華文明煥發出特殊的活力。斯坦福大學的美籍華裔心理學研究員范琮，在2019年訪問中國後表示：“中國正在以一種深刻而內在的方式發生著變化，而且變得很快，如果不親眼看看，這種變化真是讓人難以理解。中國的文化、自我觀念和士氣正在迅速地轉變——大多朝著好的方向轉變，這與美國的停滯不前形成了鮮明對比。”^[14]如果根據過去兩千多年來的實際表現，用一個指數衡量不同人類文明的相對強弱和韌性，那麼中華文明可能高居榜首。中華文明今日的非凡活力並非特例，其他亞洲文明也在蓬勃發展，因為西方國家向世界很好地傳授了經驗並廣泛分享了自身範例。^[15]

我可以自信地說，亞洲許多不同社會的文明活力源自一種非比尋常的文化怪癖。我同亞洲多個社會都有著文化上的聯繫，從德黑蘭到東京。亞洲生活著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1948年，我出生在新加坡，父母都是信德地區的印度教徒，因此，我與南亞

超过10亿的印度教徒有了联系。东南亚国家中十个有九个具有印度文化的根基。当我在东南亚看到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相关的演出——我小时候经常观看——时，我能感受到自己与它们的联系。有超过5.5亿人生活在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1947年，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痛苦的事件——印巴分治，之后我的父母便离开了巴基斯坦。我儿时就学会了用阿拉伯文字来读写“信德语”。我的名字Mahbubani，也源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mahboob，意为“宠儿”。因此，当我访问具有阿拉伯或伊朗文化的地域时，我也能感受到自己与它们的文化联系。当我参观中国、韩国、日本的佛教寺庙时，我也能感觉到这种文化的亲和力。佛教首先在印度出现。年少时，母亲会带着我去佛教寺庙和印度教寺庙里祈祷。

与亚洲社会的如此广泛的个人联系，加上我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10年经验，使我相信在国际事务领域，世界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我们应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个国家——中国还是美国——正在与其他192个会员国中的大多数朝着同一个方向“游泳”？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海外政策和愿景自然地契合世界其他国家的诉求，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确实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设定了大方向。主要的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是在美国国家实力鼎盛时期创立的。它们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在文化认同方面，这些机构以西方文化而非亚洲或中华文化为导向。尽管它们巩固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优先

权，但近年来，美国一直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向它们靠拢。

一言以蔽之，断言美国能赢得这场竞赛还为时尚早。中国同美国一样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事实上，在一些具备战略敏感性的国家中，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和观察人士已经开始为一个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世界做准备。

然而，就像断定本国会赢的美国思想家的战略失误一样，中国如果认定自己会赢，也将出现同样重大的战略失误。尽管中国在规模和文明韧性方面具备许多优势，但中国领导人如果低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潜在优势，也将是不明智的。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准确地说是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了西方经济体之后的几年间，中国已经为自己不太明智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在雷曼兄弟发生危机时，曾被大肆吹嘘的美国金融体系似乎濒临崩溃。10年后，美国已经从这一危机中复苏。

因此，如果我能够建言献策，我会强烈建议中国要高估而非低估美国的实力。如果要我起草一份给习近平主席的简报，谈谈美国的强大实力，我会这样写：

给习近平主席的简报： 为与美国开展一场伟大斗争而做准备

2020年1月1日

20年后，我们将迎来鸦片战争200周年纪念。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段时期，英国人拿走了我们珍贵的茶叶，

却强迫中国人民接受鸦片作为报酬。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16]国家积贫积弱，蒙受了百年耻辱，直到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

今天，中国国力强盛。没有哪个强权可以欺侮中国。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醒我们，“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8]

然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前也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曾希望“美利坚”（美国）在中国崛起时继续沉睡。遗憾的是，美国已经觉醒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前，我们必须做好未来几十年进行艰苦奋斗的准备。

如果我们低估了美国的强大实力，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中国人害怕混乱。过去的岁月里，混乱让中国屈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显然，美国当前正经历着混乱。特朗普向来是一个极端化和造成分裂的人物。自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社会从未像今天如此分裂。

混乱理应是衰落的信号，但对美国来说，却是实力的象征。这种混乱是人们对美国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进行大声争论造成的。人们大声地争论，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政府。这种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在美国人民中创造出一种巨大的个体赋权感。

这种个体赋权意识使美国社会培养出一些极具权势的人

物，这也是美国的一大战略优势。在许多社会中，突出的高钉子会被敲下去。中国的成语“树大招风”意指身居高位的人容易招来攻击。在美国，人们却崇尚高大的树木。因此，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等成功人士，成了备受钦佩和尊敬的美国人。即便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也同样受人钦佩，哪怕脸书和特斯拉正饱受批评。在培养强大的个体方面，没有哪个社会拥有像美国那般强大的生态系统。中国社会无法复制美国的这种强大优势。

美国的第二大战略优势是拥有大量优秀而聪明的人才。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从理论上讲，庞大的人口数量让中国可以从更广阔的人才库中探寻人才。然而，就像李光耀一针见血指出的，美国有能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的人才。美国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它愿意接纳那些出生于外国却在美取得了成功的人成为本国公民。因此，近年来，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包括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等，在外国出生并非劣势。相形之下，没有哪家大型中国公司或机构是由在外国出生的人负责经营的。

美国的第三大战略优势是拥有强大的制度。美国社会信奉并鼓励个体赋权，然而，它并不依赖强大的个体领导者。相反，它依靠强大的制度来保护社会。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发挥了卓越的聪明才智，起草出一部规定权力制衡的宪法。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这份权力也受到其他机构的制约，比如自由的媒体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宣布特朗普推出的“穆斯林禁令”违宪时，特朗普不能利用军队推翻最高法院。在美国，法治高于政府。

美国强大的体系和法治解释了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对美元

抱有信心。这种对美元的信心，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赋予了美国通过印钞以维持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嚣张特权”。近年来，美国还将美元作为制裁别国或向其施压的强大武器，而中国没有这种武器。

中国的经济规模曾经是美国的1/10，现在已超过美国的60%。[\[19\]](#)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也比美国多。中国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22%，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77%；[\[20\]](#)相比之下，美国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3.37%，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8.72%。[\[21\]](#)然而，在全球贸易中，使用美元的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41.27%，而使用人民币的交易量仅占0.98%。[\[22\]](#)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和富豪对美元有信心。在全球金融交易中，人民币尚无法取代美元，因为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未来几十年，美元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第四大战略优势是拥有许多世界顶级大学。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最成功的社会往往是那些孕育了各种思想流派的社会。在中国极具创造力的时期，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不约而同地出现。今天，美国在培育不同观点方面引领世界。美国大学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力生态系统之一。这种挑战和批判传统智慧的文化反过来又激发了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因此，美国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20世纪80年代，日本仿佛一度可以成为比美国更成功的经济体。但是，即便是在最繁荣的时期，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比美国少。美国大学里有着数以百计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优秀的大学具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们为吸引世界

上最优秀的人才来美国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渠道。这些优秀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在聘用教职员时不会考虑一个人的国籍或种族。它们会挑选优秀的人，无论他来自哪里。在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方面，世界上极少有大学能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未来某一天，人口数量有望超过中国的只有印度。目前中国可能无法从印度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但美国已经这么做了，并将继续吸引印度的人才。有朝一日，印度与美国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中国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和印度，也许会走到一起展开合作。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美国的第五大战略优势是，它也属于一个伟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大学能够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功。自人类文明伊始，中华文明就与许多欧洲文明并驾齐驱。的确，我们比欧洲文明拥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比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23\]](#)然而，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衰落了。这使中国在1840年后经历了百年屈辱。因此，低估西方文明的力量和活力将是一个战略失误。

美国作为伟大的西方文明的一员，让美国人民受益匪浅。这使美国人民拥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就像中国人民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员所获得的文化自信一样。然而，美国并非西方文明的唯一成员，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是西方文明的一员。因此，在任何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都不会孤立无援。西方文明的所有成员之间有着极大的信任，尤其是“五眼联盟”（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情报组织）。伴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升温，其他西方国家将直接或间接地助力美国。

总而言之，当我们开始与美国进行伟大的斗争时，我们可能出现的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低估美国的实力和力量。250年前，这个国家横空诞生，它比中国年轻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社会之一。让我们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想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目标，就必须赢得这场竞争。[\[24\]](#)

虽然这份简报是虚构的，但我认为其中的内容可以准确地体现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真实看法。他们真诚地尊重美国拥有的强大力量。就连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也公开表达了他对美国的尊重，哪怕他的女儿已经被捕，他的公司也受到了美国的打击。鉴于此，中国领导人应尽极大的努力，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的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将上演一场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是一个悖论，因为这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说它不可避免，是因为许多决策者都有一种心理，认为大国之间的所有竞争都是零和博弈，也正是他们将做出推动这场竞争的战略决策。因此，如果中国加强在南海的海军部署，那么美国海军将会视之为自己的一种损失，并加强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在维护国际航道安全以保障航行自由方面，美国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航行自由。

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误解迷雾，使双方更好地了解——哪怕并不认同——对方的核心利益。

更好的理解不一定会带来和平与和谐。仅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政府或许可以向那些在中国香港呼吁获得更多权利的抗议者

表示同情，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可以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这些示威活动。然而，任何精明的美国政府都应该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理益，从而做好对公众舆论的平衡。对于香港这块曾经在19世纪被掠夺的领土，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会表现出软弱。

因此，我希望读完本书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驱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更深层的动力。本书也为可能出现的一个乐观的结论留出空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公共政策是由冷静和理性的推演以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解所驱动的，那么双方就有可能制定出防止两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一种痛苦和不必要冲突的长期政策。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始终清楚两个重要的数据：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有3.3亿人口。这是两个很大的数字，但中美两国人口加起来（约17亿）尚不到世界人口总数的25%。剩下75%的人口中，许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的、相互联系的、充满危险的星球上。因此，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会容忍美国或中国采取极端或非理性的措施。

在《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开国元勋要求美国人民“尊重人类的舆论”。如果说何时应该听取这一建议，那么就是现在。世界已经变得颇为复杂。本书在揭示这种复杂性的同时，会就如何管理这个复杂的世界给予建议。

为了抵达得出这一乐观结论的快乐目的地，我们首先要穿过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领域。因此，本书首先将分析中美两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书中许多令人痛苦的评论，可能会使中美两国的读者都感到不适。然而，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学习合作的唯一途径就是去了解双方在哪里出了错。这就是我们旅程的起点。

[1] Ryan Browne, “Top US General: China Will Be ‘Greatest Threat’ to US by 2025,”CNN, September 27,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9/26/politics/dunford-us-china-greatest-threat/index.html>.

[2]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3] Michael Kranz, “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 and That Americans Must Step Up to Defend Themselves,”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13,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sg/china-threat-to-america-fbi-director-warns-2018-2>.

[4] George Soros, “Will Trump Sell Out the U.S. on Huawei?,”*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will-trump-sell-out-the-u-s-on-huawei-11568068495>.

[5] Robert O. Work and Greg Grant, *Beating the Americans at Their Own Game: An Offset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ociety,2019,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Work-Ofset-final-B.pdf?mtime=20190531090041>.

[6] “阿喀琉斯之踵”，意为致命的弱点、要害之处。——译者注

[7] Mr. X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581.

[8] Munk Debates, Toronto, May 9, 2019.

[9]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 Lionel Giles (M.A. Pax Librorum,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1910, <https://www.paxlibrorum.com/books/taowde/>.

[10] 中国官方英文媒体把中国共产党译为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而国外媒体偏向使用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指代中国共产党。——编者注

[11] Danny Quah, “The US Is, Indeed, the Exceptional Nation: Income Dynamics in the Bottom 50%,”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January 2019,<http://www.dannyquah.com/Quilled/Output/2019.01-Danny.Quah-Income-Dynamics-in-the-Bottom-50.pdf>.

[12] Angus Maddison, “Table B–20. Shares of World GDP, 20 Countries and

Regional Totals, 0–1998 A.D.,” in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6), 263.

[13] World Bank, “GDP,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 United States, China, World,” 1990–2018,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databas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CD?locations=US-CN-1W>.

[14] Jean Fan,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Palladium Magazine*, October 11, 2019, <https://palladiummag.com/2019/10/11/the-american-dream-is-alive-in-china/>.

[15] Kishore Mahbubani, *Has the West Lost It?: A Provocation* (London: Penguin, 2018), 36–46.

[16] Xi Jinping,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8, 2017.

[17] Xinhua, “From ‘Standing Up’ to Rejuvenation: New China after 65 Years,” People’s Daily Online, English version, October 2, 2014, <http://en.people.cn/n/2014/1002/c90882-8790595.html>.

[18] Xinhua, “Full Text of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Daily*, updated November 4, 2017,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cnational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htm.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8* (Washington, DC: IMF, 2018).

[20] “Chin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Country=CN>.

[2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Country=US>.

[22] SWIFT,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Where We Are and What We Can Expect in 2018*, <https://www.swift.com/resource/rmb-tracker-january-2018-special-report>.

[23]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China,”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igua and Barbuda, November 12, 2013, <http://ag.china-embassy.org/eng/zggk/t1098061.htm>.

[24] Song Wei, “Xi Thought Leads to Chinese Dream,” *China Daily*, updated January 2, 2018,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1/02/WS5a4ac774a31008cf16da487a.html>.

第二章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未曾对潜在的后果深思熟虑，便疏远了在美国的几大支持者群体。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谢淑丽教授观察到，当美国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后，没有人公开为中国辩护。她提出：“当美国和中国走到实质敌对关系的边缘时，没有哪个群体真正挺身而出维护中美关系，更少有人捍卫中国。没有企业界人士，没有学者，更不会有美国国会中的任何人。”^[1]相形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试图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却有一些商界群体对此提出了抗议。

中国对美国商界的疏远程度令人惊讶。从理论上讲，既然美国商界人士能够并且已经从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那么他们更应该强烈地拥护良好的中美关系。就美国商界人士而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甚重视意识形态。他们只对公司经营的盈亏感兴趣。他们的全部诉求是，能够便捷地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增加销量并提升利润。的确，许多美国公司已经从中国市场获利。然而，即便如此，在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时，没有哪家美国公司在实际上为中国辩护。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故事有些复杂。要理解美国商界对中国的这种疏离感，可以从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讲起，比如波音、通用汽车和福特。

波音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巨大。它向中国销售了2 000多架飞机，^[2]其来自中国的收入“成倍增长，从1993年的12亿美元飙升到2017年的119亿美元，占波音商用飞机业务总收入的比例也从5.7%攀升到21%”。^[3]2018年11月，波音宣布：“预计在未来20年，中国的商用飞机机队规模将增加一倍以上。”波音预测，到2038年，中国将需要7 690架新飞机，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4]显然，波音不仅从中国赚了个盆满钵满，也为美国工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帮助波音度过了市场不景气的艰难时期，如报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全

球经济衰退迫使波音大幅削减产量并裁员，在战略上，中国市场变得越发重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波音在中国的业务却风生水起，1990年接到了一笔价值9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1992年向中国交付了第100架飞机，仅仅两年后又交付了第200架飞机。到1993年，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占该公司总销售量的1/6。”^[5]

波音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真正的大型竞争对手，即空中客车，因此，波音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是不足为奇的。相形之下，美国的汽车公司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就显得不同了。众所周知，美国的汽车公司并非全球最具竞争力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本土市场上，美国的汽车公司惨败于它们的日本竞争对手，这让罗纳德·里根总统——一位痛恨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不得不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既然里根忠于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他就应该允许日本汽车制造商不受限制地把汽车卖给美国的消费者，但如果里根这么做了，美国的汽车公司很可能会因此完全崩溃。

那么，为什么相对缺乏竞争力的美国的汽车公司会在中国大获成功呢？它们的成功比波音更引人注目，也更出人意料。通用汽车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2017年，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到通用汽车总销售额的42%。2018年，该公司在中国出售了364万辆汽车。^[6]《福布斯》杂志2013年的一份报告和塔夫茨大学的乔纳森·布鲁克菲尔德，都指出了通用汽车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它与当地生产商建立了合资企业。《福布斯》杂志指出，“对于每一家拓展海外业务的公司来说，本地合作伙伴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尤为如此”。^[7]布鲁克菲尔德还指出，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合作关系是其“在中国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这笔交易十分重要，以至于1997年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了成立各占50%

股份的合资企业的签字仪式。到了1999年，上海通用汽车销售别克汽车的速度和其生产速度一样快”。[8]

美国的这些汽车公司在进入其他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市场时失败了，但它们为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呢？最可信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不能仅仅依赖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为中国人民提供汽车。中日关系复杂且经常令人担忧，因此依赖日本汽车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权衡汽车市场的竞争环境，为美国的汽车公司提供特定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政府的决定为美国的汽车公司提供了生存空间，这让通用汽车和福特赚到了巨额利润：它们在中国市场赚得的销售利润比在美国本土市场的还高。2017年2月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中国现在是通用汽车的最大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增长使其销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它在美国的销量略有下滑——这是自2009年以来在本土市场上首次出现下滑，但通用汽车仍然连续第四年创下销售纪录。在经历了连续七年创纪录的增长后，美国汽车市场到2016年可能达到最高峰……去年创纪录的销售额使通用汽车的营业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125亿美元，增长了16%。就在七年前，通用汽车还遭遇了破产危机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救助。”[9]简言之，中国帮助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通用汽车实现了蓬勃发展。

在美国商业界，波音和通用汽车都属于超大型的制造公司。既然它们已从中国市场上赚取了巨额利润，就应该发出最强有力的声音，呼吁美国和中国建立积极的双赢关系。事实上，在中美两国交往的早些年间，美国商界对中国持有乐观态度。1993年，当比尔·克林顿总统试图将是否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

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时，《纽约时报》报道称：“许多美国公司……极力游说白宫和国会延长给中国的贸易特权，声称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以及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正危在旦夕。”此外，他们认为，“利用是否给予贸易特权来解决人权问题和武器扩散问题，对说服中国做出改变将收效甚微。一些高管认为，向中国销售产品有助于美国实现政策目标”。[\[10\]](#)

另一份报告记录了波音如何在捍卫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反接触势力的巩固，波音和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在说服国会支持（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波音是出了名的‘企业外交政策’先锋，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公司，也是做出这类努力的‘（指挥进攻的）四分卫’。一位参议院工作人员评论说，波音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国会‘施加巨大压力’。”[\[11\]](#)

与美国公司在维护中美关系上发挥关键力量的历史背景相反，2018年1月，当特朗普突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没有哪家大型美国公司公开发声去阻止他，这真是令人震惊。事实上，几乎没有美国人试图阻止特朗普。相反，特朗普发现（也许这令他吃惊），他得到了两党广泛且深度的支持。就连民主党领袖也支持他。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在对中国的贸易行径采取强硬措施方面，我更赞同特朗普，而不是奥巴马或小布什。”[\[12\]](#)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说：“美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明智的和战略性的行动，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面对中国的不良行为，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13\]](#)即便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个温和地走中间路线的富有影响力的评论员，也加入了支持特朗普的行列。弗里德曼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规则，他写道：“这是一场值得的战斗。不要让‘特朗普带头主导’这一事实，转移了对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同意在2025年执

行同样的规则这一重要事实的注意力，否则就真的太晚了。”^[14]

更引人注意的是，2018年，位于上海和北京的美国商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详细地表达了不满。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写道：“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倾向本土企业（54.5%）；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与去年相比没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61.6%）、未获得必要的许可证（59.5%）、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52%）仍然是监管方面的最大障碍。”

该报告还称：“我们的会员虽然相对乐观，但他们对未来表示谨慎。（中国）政府采购仍然向本土企业倾斜，而且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政策将优先购买国货变得制度化，这种做法可能会愈加根深蒂固。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业领域，美国公司则面临着技术转让的压力。（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强烈要求互惠，哪怕我们的会员普遍反对（对中国）征收报复性贸易关税。”^[15]

最严重的是，这份报告指出了有多少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它声称：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贸易关系中的许多不平衡，包括但不限于跨境投资缺乏互惠性、中国采取国家资助的产业政策、以强制技术转让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其他方面。虽然很少有公司会公开表示遭遇到这种压力，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有21%的公司表示正承受着这种压力，尤其是被中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44%）和化学工业（41%），面临着显著的压力，这也证实了当前美国政府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在中国）需要“付费参与”的担忧。^[16]

美国舆论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这种强烈的共鸣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是中国政府在做总决策时忽略了美国商界所导致的后果吗？抑或是无数的地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引发了这种疏离感：一是省级和市级领导的相对政治自主权，二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自大傲慢，三是21世纪前十年中央领导相对放权的领导风格。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10.29%，[\[17\]](#)这让许多外国企业赚了很多钱。因此，虽然这些企业对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怒，但为了换取异常丰厚的利润，它们仍选择忍受这种痛苦。

21世纪初，中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认真核查各省市对待外国投资者的方式。不过，即便中央政府有意进行核查，中央领导人可以进行的日常管控也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山高皇帝远。”几千年来，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一直拥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通常，省级层面遇到的问题，即使被报到了中央，中央领导层通常也无法直接解决。一家欧洲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他的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份约束性协议，约定在五年后以固定价格收购这家中国公司。然而，当约定日期来临，欧洲公司想按照协议进行收购时，中国公司却拒绝出售。这家欧洲公司向（中国的）地方法院和省级法院提出上诉，均败诉。有人建议这位首席执行官出更高的价格，与那家中国公司“和解”，哪怕原先签署的协议具有约束力。

在华欧洲商会附和了在华美国人的抱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其2018年出版的著作《红旗》中，描述了中国如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误，忽略了美国重要人物所坚信的中国在许多经济政策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公平：要求技术转让，设置非关税壁垒。马格努斯指出，在这个领域，“美国

有充分理由”反对中国。[18]他描述了中国在2006年制定的技术蓝图，以及中国在2016年提出的战略目标，即通过提倡“自主创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对于外国公司来说，（中国的）自主创新是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对本土公司的偏袒、不公平的贸易和商业行为，以及依托进口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技术要么通过海外收购获得，要么从在华外资企业那里获得。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声称，许多国际科技公司把自主创新视作‘一幅全世界规模空前的技术竞争蓝图’”。[19]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也观察到，“许多美国和欧洲公司抱怨中国公司在知识产权上的不正当竞争；在外国商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上，这一情况几乎每年都高居在华经商面临的挑战排行榜的榜首”。[20]

另一个可能引起美国商界疏远的因素，是中国官员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出来的傲慢。几位外国观察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理查德·麦格雷戈在其著作《党》中描述了发生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事情。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定期举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过去，在这些会议上，中国人会礼貌地说：“这是你们做的，这是我们做的。”他写道，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这一基调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中国官员传递出的信息是：“你们有你们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麦格雷戈描述了会议的情况：

中国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抛开以往会议传达的令人欣慰的信息，而彻底表现出态度的逆转。首先发言的是一名金融监管者，他斥责近期的一次全球领导人会议是“空谈”。另一位则批评了国际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21]

英国《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在他的《东方化》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方面的情绪：

在金融危机后的数年里，西方外交官，尤其是欧洲的外交官，开始注意到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听到了一种新的语气。2011年，一位刚从中国出差回国的英国外交官大笑告诉我，在中国，他被告知“你得记住，你来自一个弱小的、正在衰落的国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这样跟他说过。另一位非常资深的英国外交官倾诉道：“与中国人打交道正变得越来越不愉快和困难。”当我回应说，他在美国的一些同行仍高度评价所打交道的中国高官时，这位英国官员回答说：“有一种特殊的腔调，中国人现在只会对美国人说。”尽管中国向来坚称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个诞生中的超级大国，似乎只有美国，仍能被中国当作真正的对手。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带有的傲慢情绪或许也可以解释其随后几年在南海采取的行动。中国说的没错，它并没有开始在南海岛礁周围填海造岛。是其他四个“声索国”^[22]不依不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高度克制。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突然决定大幅扩充填海面积。结果，美国的反华人士发现，可以利用南海问题进行宣传，以对抗中国。

如果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领导，那么情况会有哪些不同呢？既然中国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了许多优惠，那么它应该单方面地宣布将缓慢且稳步地放弃这些优惠，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成员享受这些特权，但实际上它不会去享受。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中国的GDP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激增到2015年的11.1万亿美元。[\[23\]](#)2000年，当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2 900美元时[\[24\]](#)（与巴基斯坦、不丹、也门、佛得角、马绍尔群岛和阿塞拜疆等国的人均收入相近），它精明地（且合情合理地）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行了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44万美元。[\[25\]](#)同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从全球第六位跃升至全球第二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声称自己像乍得或孟加拉国一样脆弱，从而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特别条款来保护自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处的矛盾在于，尽管中国争取到了“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称谓，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对这一称谓善加利用。两位研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和条件的经济学家评论道：“不同于普遍看法，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除了使用‘发展中国家’的称谓，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可享有的任何好处。”[\[26\]](#)即便如此，许多外国观察家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利用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个人坚定地致力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还成立了保尔森基金会，这个智库“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从而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良好地维持全球秩序”。[\[27\]](#)

2018年11月，保尔森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激愤的演讲，清楚地解释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躲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背后的失望，那些规则本是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17年了，但在许多领域，中国仍未向外国竞争者开放经济。中国对合资企业的要求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此外，中国在贸易和外商领域，还存在技术标

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监管等非关税壁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快20年了，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商界转而开始反对中国。

为什么那些最了解中国，在那里工作、经商、赚钱，过去支持两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呼吁更多的对抗？答案就是在过去近20年里，中国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这让美国商界备感挫败，并产生了对华态度的分裂。这种变化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对华看法的负面化。简言之，尽管许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蓬勃发展，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一些公司已经接受了交易条件，以牺牲未来的竞争力为代价，在限制条件下经营以期使今天的每股收益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乐于如此。

更糟糕的是，保尔森说，中国企业在海外享有的竞争环境比中国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的竞争环境更好。

与此同时，外国公司在中国本土无法使用中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可以使用的经营方式。这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因此，我确实认为，中国的做法和对外资开放的不足助长了美国的对抗态度……这不仅仅因为外国的技术正在被转让和吸收，还因为它们正在被改造——通过本土化过程，外国的技术就变成了中国的技术。我跟许多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交谈过，他们认为这种行径对其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的战略失误是不必要和不明智地疏远了美国商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商界），不过这也有乐观的一面，这是一个可以纠正的战略失误。中国应该有能力重新获得全球商界的善意和信任。

然而，在中国采取新举措以重新赢得全球商界的信任之前，它应该先分析一下自身为何出现这个根本性的失误，以及这个失误是如何出现的。中国政府在对战略失误进行内部分析时，必须极其坦诚，不可回避处理敏感问题。

这里有一个例子：许多中国官员都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文学及其派生物。这类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商人的嘲讽。列宁就说过一句名言：为了利益，资本家可以出售绞死自己的绳子。顺便提一下，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这种情况。1973—1974年，我在金边服役时，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实质上是由美国军方扶持的亲美政府。因此，美国军队会不惜代价，发射炮弹保卫金边。亲美政府中腐败的将军拿到炮弹后立即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将这些炮弹卖给红色高棉，随后这些炮弹又会被发射到城市中，危及这些亲美将军家人的生命。简言之，确实有许多商人可能会投机取巧、腐败堕落。[28]

如果中国政府一直从单一维度看待商界，那将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即便有利可图，但如果商人是被迫签署协议的，那么他们心里也会对迫使其签署此类协议的中国官员深感怨恨。哪怕所有程序都合法合规，这种怨恨也是真实存在的。黄育川——一位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认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把技术转让作为对华投资的条件，是完全合法的。他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发达国家有‘义务’鼓励本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欠发达国家。”[29]

然而，即使中国的要求是合法合规的，外国商业界仍然会感到不公平。如果拒绝签署提供技术转让的协议，他们将无法进入更大的中国市场。为了保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商人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技术转让。听说西方商界并不高兴这么做时，一些中国官员可能会很惊讶。每次中国组织高层论坛并邀请西方主要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参加时，他们也都会出席。我就参加过一些这类会议。2019年3月，一群西方首席执行官、西方经济学家和记者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的负责人瑞·达利欧、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苏世民、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知名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幸运的是，美国两位著名的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劳伦斯·萨默斯也受邀出席。两人都坦率地谈论了美国商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面临的种种挑战。

萨默斯说：“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是由政策制定所导致的，确实造成了极大的风险。”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贸易行为有着合理的担忧，从知识产权到合资规则，以及该贸易行为对信息技术共享带来的影响等。”不过，他承认，“事实上，并没有可信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中国同意了美国的所有经济诉求，美国的GDP就会提升1%以上”。

萨默斯强调，即便全球商业人士愿意继续参加在中国举行的高层论坛，也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商界之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北京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能会让东道主感到不适，但这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不要混淆了形式与实质。在中国参加高层论坛的首席执行官回到公司，也许会发现自己的同事对与中国的业务往来仍然感到不满且不快乐。因此，中国要做出高

层决策，采取重大行动，去赢回包括美国商界在内的西方商界的信任和信心，这么做是明智的。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强大而有效，但要其立即改变参与在华外企业管理的习惯和做法并非易事。数十年来，在庞大的中国政府体系中，许多制度、流程、习惯和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期望一夜之间改变所有既定的流程和习惯，是完全不现实的。

要在庞大的中国体系中实现180度大转弯，中国人首先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哲学决定，然后采取一些创新的实际步骤。中国需要问自己一些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这种大国遭受了来自西方小国的百年屈辱？中国经济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都与世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但之后为什么会落后？中国清朝的聪明官员为什么意识不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19世纪中国官员盲目的原因是一个有力的中国哲学假设，即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自给自足的“中央王国”，根本不需要与世界接触。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勋爵说过，中国拥有一切所需的东西。他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世界其他地方。

痛苦的百年屈辱最终引导了中国的开放。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出了这个决定。对外开放确实发挥了作用，中国的经济腾飞了。然而，中国人是否将这种开放视为再次强大之前的临时措施？他们是否希望最终回归自己的“中央王国”心态，与世界进行贸易的同时，在文化上保持分离？

当中国筑起高墙，切断与世界的交流时，它就落后了。当中国向世界开放时，它又繁荣兴盛了。为了实现持续的长期成功，中国应该彻底放弃有着长久历史的“中央王国”心态，并决定成为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往来中最开放的国家。只有做出这个重大

的心态转变，中国官员才会铺上红毯，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到来。

几位美国政界领袖，包括前总统候选人马尔科·鲁比奥在内，已经着手立法，以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鲁比奥还发表了许多针对中国的煽动性言论：

过去的20年里，中国愚弄了世界，让世界相信它会拥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在，中国正试图再次愚弄世界，向外国政府做出将投资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以吸引对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30\]](#)

面对这样的挑衅性言论，中国的决策者做出同样情绪化的反应是自然而然的。但这是不明智的，也违背了中国的许多战略准则，即对挑衅冷静回应。例如，《孙子兵法》就给出了这样的忠告：“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中国也可以借鉴《伊索寓言》中的忠告：

风和太阳为谁更强大而争论不休。突然，它们看到一个行人在路上走着，太阳说：“我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争端。咱俩谁能使那个行人脱下他的斗篷，谁就是强者。你先开始。”于是，太阳隐没在云层后面，风开始拼命地吹向行人。但是风吹得越用力，行人就把他的斗篷裹得越紧，最后风绝望地放弃了。接着，太阳出来了，它把所有的光都照耀在行人身上，行人很快就觉得太热了，不能再穿着斗篷走路了。“宽厚仁慈比严厉暴虐更管用。”[\[31\]](#)

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市场遭遇更大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向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开放？显然，中国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充分地解释这一点。中国人民需要认清的关键点是，在特朗普政府一直给外国企业投资或出口到美国制造更多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开放经济将是符合其长期战略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使更多国家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和投资，而不是跟美国。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在很多领域发生了。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要多。这种趋势还将继续。虽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触在减少，但麦肯锡在201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世界对中国的接触正在显著增加，这“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市场、供应商和资本提供者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32]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这一过程最终将给中国带来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官员公开或秘密地认为，逐步让中美经济“脱钩”是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然而，美国做出的与中国“脱钩”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导致美国与世界“脱钩”。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拉斐尔·莱夫曾表示：“如果我们对付中国野心的办法只是给所有门都装上两道锁，我相信这会把我们自己禁锢在平庸之中。”[33]中国应该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观点。当中国与世界隔绝时，它也把自己禁锢在了一个平庸的世界里。因此，中国应该彻底放弃“中央王国”的哲学思维，转而更多地接触世界。

哲学思维的转变必须伴有切实行动，以便为在华外企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中国政府可以发布指令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只依赖高层指令恐怕还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在实际执行时会怎么做，这里引用一句知名的美国俚语：“在橡胶遇到路面的地方。”[34]关键在于实施。

在有效实施指令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促进投资方面的经验。比如，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成功的商业促进机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该机构在吸引美国投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实际上，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之一，尽管只拥有东南亚6.5亿人口中的500多万，但它吸引的美国投资却超过了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总和。截至2017年，美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是2 743亿美元。^[35]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说：“美国对东盟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约为3 280亿美元，新加坡占了其中的80%。”^[36]美国公司在新加坡的投资甚至超过了其在澳大利亚（1 690亿美元）^[37]、日本（1 290亿美元）^[38]、印度（450亿美元）^[39]和韩国（410亿美元）^[40]等更大经济体的投资。

新加坡吸引美国投资是出于经济需要，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经济需要。即便没有美国的投资，中国的经济也能很好地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出于战略需要去吸引美国和西方的投资。这么做的战略考量是，为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关系建立一个重要的稳定器。中国应该像新加坡一样，设立一个一站式的投资管理机构，类似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以吸引和促进对华投资。中国幅员辽阔，管理外商投资的任务被分派给了各个省市，这就在如何管理外来投资方面造成了地区差异。如果将美国对华投资视为一种战略需要，那么中国在国家层面创建一个超级机构，以确保所有的外商都享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合乎逻辑。因此，中国应该为建立这种超级机构设定具体目标。

对于这个超级机构来说，吸引美国尽可能多的州的投资是明智之举，这将有助于扩大亲中的选民群体。幸运的是，即使华盛顿特区已被反华情绪所淹没，许多州的州长和立法机构仍在继续寻找并吸引中国对其投资，并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例如，肯

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在2017年5月说：“中国有大量资本正在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去部署企业。而美国恰好可以提供这种机会，因为这个国家对基础设施有巨大的需求。世界上最大和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国不合作的想法简直令人匪夷所思。”^[41]

同样，波音总部的所在地华盛顿州，也深知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外交学者》杂志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华盛顿州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该州深知与中国保持健康的贸易关系对本州下辖各市县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战略影响。2015年，华盛顿州对中国的出口为该州提供了83 800个就业岗位，而且自2000年以来，该州从中国获得了6.11亿美元的投资。”^[42]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在做出政策决定时可以综观战略全局。如果美国企业能重燃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热情，这将会重新建起一个宝贵的政治缓冲区，从而遏制中美关系严重下滑的趋势。西方商界的重新参与，将不仅符合中国的短期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国家利益。显然，在过去几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力量是全球化。而大部分时间，美国都是全球化的领头羊。这是由美国的时代精神所支撑的，它认为世界越开放，美国就越好。

但现在，美国的氛围已经变糟糕了。没有哪个美国政客能够站出来捍卫全球化。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当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倡导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就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理性的辩护。语言很重要，行动更具说服力。中国如果成为一个对商业最友好的经济大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这样做，中国也会强化那股推动其经济惊人崛起的力量。

中国如果成为全球化新的倡导者，会使美国进一步疏远全球化，还是会给美国敲响警钟，促使其再次拥护全球化呢？目前无人敢下定论。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疏远全球化的国家将面临什么结果。现在，中国领导人深刻地理解昔日筑墙对抗世界的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崩溃。因此，中国不会重蹈覆辙。相反，现在是特朗普想给美国筑起一道名副其实的“围墙”。如果他成功了，那么美国终将落后，中国则将稳步前进。

[1] Susan Shirk, “Ep. 9: Overreach and Overreaction: The Crisis in US-China Relations,” videotape, 2019 Annual Public Lectur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Penn Arts & Sciences, February 7, 2019, <https://cscs.sas.upenn.edu/podcasts/2019/02/07/ep-9-overreach-and-overreaction-crisis-us-china-relations-susan-shirk>.

[2] Boeing, “Boeing Delivers Its 2,000th Airplane to China,” Boeing press release, November 30, 2018, <http://investors.boeing.com/investors/investor-news/press-release-details/2018/Boeing-Delivers-Its-2000th-Airplane-to-China/default.aspx>.

[3] Neil Thomas, “For Company and for Country: Boeing and US-China Relations,” US China Case Studies, MacroPolo, February 26, 2019, <https://macropolo.org/boeing-us-china-relations-history/>.

[4] Boeing, “Boeing Delivers Its 2,000th Airplane to China.”

[5] Thomas, “For Company and for Country.”

[6] GM, “GM Set for a Record of over 20 Launches in China in 2019,” Corporate Newsroom, General Motors, January 7, 2019, https://media.gm.com/media/cn/en/gm/news.detail.html/content/Pages/news/cn/en/2019/Jan/0107_sales.html.

[7] Pano Mourdoukoutas, “How General Motors Wins the Minds and Wallets of Chinese Consumers,” *Forbes*, October 1,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3/10/11/how-general-motors-wins-the-minds-and-wallets-of-chinese-consumers/#59706f51386f>.

[8] Jonathan Brookfield, “How Western Companies Can Succeed in China,” *The Conversation*, October 19, 201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western-companies-can-succeed-in-china-65291>.

[9] Chris Isidore, “GM Sells 10 Million Cars for First Time Thanks to China,” *CNN Business*, February 7, 2017, <https://money.cnn.com/2017/02/07/news/companies/gm-record-sales-profits/index.html>.

[10] Calvin Sims, “China Steps Up Spending to Keep U.S. Trade Status,” *New York Times*, May 7, 1993, <https://www.nytimes.com/1993/05/07/business/china-steps-up-spending-to-keep-us-trade-status.html>

[11] Thomas, “For Company and for Country.”

[12] Chuck Schumer, “Schumer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 Tweet on China Trade,” *Newsroom, Senate Democrats*, May 21, 2018,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schumer-response-to-president-trump-tweet-on-china-trade>.

[13] Nancy Pelosi, “Pelosi Statement on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Tariffs on China,” *News, Congresswoman Nancy Pelosi, California’s 12th District*, May 22, 2018, <https://pelosi.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pelosi-statement-on-trumpadministration-s-new-tariffs-on-china>.

[14] Thomas L. Friedman, “The U.S. and China Are Finally Having It Out,” *New York Times*, May 1,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1/opinion/america-china-trump-trade.html>

[15] Doug Strub et al., *2018 China Business Report: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AmCham Shanghai and PwC, 2018, https://www.amcham-shangha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7/2018%20China%20Business%20Report_0.pdf.

[16] Doug Strub et al., *2018 China Business Report: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AmCham Shanghai and PwC, 2018, https://www.amcham-shangha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7/2018%20China%20Business%20Report_0.pdf.

[17]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计算的2000—2009年实际GDP平均增长率（2019年4月），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CHN。

[18] George Magnus, *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66.

[19] “China’s Drive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 — A Web of Industrial Policie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July 27, 2010, <https://www.uschamber.com/report/china%E2%80%99s-drive-indigenous-innovation-web-industrial-policies>.

[20] Elizabeth C. 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42–143.

[21]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2), 18.

[22] “声索国”是指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文中的四个“声索国”指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译者注

[23] World Bank, “China,”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24] World Bank, “GNI per Capita,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 China,” 1990–2018,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PP.CD?locations=CN>.

[25] World Bank, “GNI per Capita,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 China,” 1990–2018,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PP.CD?locations=CN>.

[26] Henry Gao and Weihuan Zhou,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Brings It Few Benefits in the WTO,” East Asia Forum, October 15, 2019,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10/15/chinas-developing-country-status-brings-it-few-benefits-in-the-wto/>.

[27] Paulson Institute, Overview,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about/about-overview/>.

[28] 1973—1974年，我住在柬埔寨金边，那里几乎每天都受到炮击。当我问红色高棉的人他们是如何获得炮弹的，几位有见识的官员告诉了我这个故事。

[29] Yukon Huang, “Did China Break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7/opinion/trade-war-tech-china-united-states.html>.

[30] Marco Rubio, “At Their Own Peril, Countries Embrace China,” Breitbart, April 25, 2019, <https://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19/04/25/exclusive-sen-marco-rubio-at-their-own-peril-countries-embrace-china/>.

[31] Aesop, “The Wind and the Sun,” Aesop Fables, sixth century BCE, Bartleby.com, <https://www.bartleby.com/17/1/60.html>.

[32] Jonathan Woetzel et al.,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uly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china/china%20and%20the%20world%20inside%20the%20dynamics%20of%20a%20changing%20relationship/mgi-china-and-the-world-full-report-june-2019-vf.ashx>.

[33] L. Rafael Reif, “China’s Challenge Is America’s Opportuni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8/opinion/china-technology-trade-united-states.html>.

[34] “在橡胶遇到路面的地方”，意为在关键时刻履行职责。——译者注

[35] USTR, “Singapor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southeast-asia-pacific/singapore>.

[36] Vivian Balakrishnan, “Seeking Opportunities Amidst Disruption: A View from Singapore,” edited transcrip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5, 2019, https://www.mfa.gov.sg/Newsroom/Press-Statements-Transcripts-and-Photos/2019/05/20190516_FMV-Washington—CSIS-Speech.

[37] USTR, “Australia,”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southeast-asia-pacific/australia>.

[38] USTR, “Japan,”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japan-korea-apec/japan>.

[39] USTR, “India,”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south-central-asia/india>.

[40] USTR, “Korea,”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japan-korea-apec/korea>.

[41] Evelyn Cheng, “Forget the Tough Talk: Some US Leaders Are Courting Chinese Investment,” CNBC, May 5,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05/05/>

tough-talk-is in-the-air-but-some-in-us-are-courting-chinese-money.html.

[42] Mercy A. Kuo, “After US-China Economic Dialogue Underwhelms, Washington State Steps Up,”*The Diplomat*, July 25,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after-us-china-economic-dialogue-underwhelms-washington-state-steps-up/>.

第三章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美国或许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但毫无疑问，中国已赢得了第一轮。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事先制定全面的长期战略的情况下，就陷入了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竞争。这只会削弱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时为中国在国际上提升影响力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美国缺乏全面的对华战略。美国两位主要的战略思想家证实了这一点。亨利·基辛格——一位在德国出生的共和党前国家安全顾问，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了中美的外交行动；法里德·扎卡利亚——一位印度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兼评论员。尽管这两人并不总是政见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出可行的对华战略。法里德·扎卡利亚说道：

从1972年对中国开放直到近期，美国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的两党战略，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世界。但近年来，这一战略出现了副作用，并产生了复杂的问题——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家，这不符合西方的预期。当意识到这种转变时，美国简直惊呆了，它未能构想出一个针对“中央王国”的新的全面战略。

这与美国为何发动反苏斗争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当时，美国的主要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以“X先生”为笔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在该文中凯南就美国该如何应对严重的地缘政治竞争问题，向美国同胞提供了合理的建议。然而，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对抗时，却忽略了这一建议中的许多要点。

未来的美国历史学家无疑会感到困惑：当特朗普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时，很多美国人，包括民主党的领袖，

都在为特朗普欢呼。民主党主要的参议员查克·舒默哀叹，“中国的不公平行径，使美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和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他鼓励特朗普“对中国强硬”。^[1]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发表过类似言论，她在2018年3月坚称：“美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明智的和战略性的行动，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2]

民主党的支持令人费解，因为特朗普的许多行为违反了凯南在战略建议中提出的许多关键准则，实际上却符合了中国的利益。毫无疑问，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对华为的制裁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但是，中国领导人也需要清楚，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许多长期红利。这些送给中国的红利，就是特朗普和他的顾问没能像凯南那般做出长远考虑的结果。

如果美国是一个团结、强大和充满自信的国度，那么它将对中国构成巨大的挑战。凯南在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美国是否强大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一个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成功地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的责任，它具备能够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特朗普恰好背道而驰。他使美国分裂和分化。不过，仅仅将责任归咎于他也不公平。本书会谈道，美国正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在旁观者看来，今天的美国仿佛缺少了凯南所说的“精神活力”。这是由特朗普上任前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在本书第七章我将详细讲述）。

但是，特朗普政府必须为采取单边而非多边的方式处理对华问题承担所有的指责。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地缘政治大礼。该协定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一项明智举措，本可以巩固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

力，以及给美国经济带来丰厚、长期的红利。此外，特朗普还因在推特上发布不假思索的随意攻击，疏远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和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印度和越南。

在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带头建设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反对这两项举措，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许多重要朋友和盟友加入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得更好的机构。它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组织管理标准。

当中国在全球多边秩序中展现出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形象时，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日益被视为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角色。特朗普说过一句名言：“贸易对抗是好事，很容易赢。”^[3]然而，他在这一领域的过往记录表明，贸易对抗实际上很难赢。在《外交事务》（2019年11—12月刊）上，单伟建指出：“数据表明，美国并没有赢得这场贸易对抗。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加征）关税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比给中国的更大。为了避免造成迫在眉睫的衰退，特朗普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目前的做法正在危及美国经济，威胁着国际贸易体系，并且无益于减少他所厌恶的贸易逆差。”^[4]

当然，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混乱不堪且不协调的举措，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第一项反华措施——对中国征收25%的关税，“价值500亿美元新清单的（征税）目标更多是中间产品——95%的受打击产品主要是美国公司使用的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的中

间产品或资本设备”。[5]显然，对中间产品征税只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不是明智之举，但在2018年7月6日，美国决然开始行动。

在特朗普政府中，是否有人在启动第一轮关税制裁前（后来又进行了多轮关税制裁）制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坦诚地说，没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朋友私下告诉我，当特朗普政府决定对几个国家加征关税时，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曾耐心地向特朗普解释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以说清为什么加征关税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工具。但科恩劝说特朗普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最后，科恩问他为什么坚持加征关税。特朗普回答说：“我只是喜欢关税。”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特朗普通过向它们加征关税或威胁要加征关税，践行了他的观点。

此处需要强调一点。是美国人，尤其是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让世界认识到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关税——尤其是任意征收关税——是有害的。美国经济学家解释说，特朗普抱怨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带来的，而是由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决策造成的。罗纳德·里根不是左翼分子，而是一个传统的美国保守派。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是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后者曾清楚地解释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费尔德斯坦说：“外国的进口壁垒和出口补贴并非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美国人的消费大于生产……指责他方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6]特朗普的多项做法震惊了世界。即便如此，让这个世界真正深感震惊的，是美国竟然选出了一位连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考试都无法通过的总统。

与此同时，特朗普可能期待中国会在美国加征关税后立马缴

械投降。然而，任何对中国及其近代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不过，中国的谈判代表仍然准备在一项互惠互利的交易中做出更慷慨的让步，的确，在贸易谈判期间，中国方面同意购买更多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中国会予以配合。然而，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小布什总统任内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从来都不明确。

美国政府的现状反映出其内部分歧。一派希望让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他们支持（加征）关税、（设置）跨境投资壁垒以及迫使企业打破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另一派希望改变中国的做法，以促进美国的出口，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并反对歧视海外投资者，这些行动将加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妥协的方式是提出令人瞠目的条件——并依赖特朗普先生的直觉来决定要不要达成协议……现在，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如果中国采取措施开放市场、购买商品并确保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作为回报？目前，美国坚持在中国兑现承诺之前，继续加征关税。美国的谈判代表还希望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重新加征关税——并且禁止中国报复。[7]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作为总理，他绝不会接受像美国试图与中国达成的那种不平等协议，哪怕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8]佐利克则说：“当中国的高层审查有望达成的协议时，因为双边义务不对等而陷入僵局。双方未能就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清单达成一致。对中国来说，这些条款并不平等，这让他们想起了19世纪的外交，当时他们没有尊严，也不被外国人尊重。”[9]

2019年8月23日，当中国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时，特朗普勃然大怒，并在推特上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辞。特朗普未考虑后果就宣布：“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包括从中国迁回美国并在美生产。”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迈伦·布里连特在回应中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特朗普面对中国可能有挫败感，但答案不能是让美国公司忽略一个有着14亿消费者的市场。”^[10]

特朗普和他的推特言论所引发的混乱在意料之中。然而，意料之外的是，美国自我夸耀的制衡机制却未能将它从一个出尔反尔、制造混乱的统治者手中拯救出来。美国国会、第四权力（新闻媒体）、最高法院和行政部门都无法约束特朗普。结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

在这方面，即便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们仍然能拿出对待历史的长远眼光，将特朗普视作一项长期资产，因为特朗普单枪匹马做下的降低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力的事，比以往任何美国领导人都要多。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曾普遍将其视作一个可靠的伙伴，但现在这种信任感已大幅减弱。对中国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美国再次实施曾经成功对抗苏联的遏制政策，然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在特朗普卸任后，下一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对美国的信任。

对任何美国人来说，低估全球对美国信任的弱化，都将是非常不明智的。许多亲近美国的朋友都告诫它，要认真对待此事。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撰文称自己继承了父亲“强烈亲美”的态度，^[11]但他宣布“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12]2019年8月，在比亚里茨召开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另一位有影响力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

华·卢斯也调侃道：“如果（特朗普）能够在法国度过一个周末，而不加速西方的灭亡——例如提出购买欧洲的一大块土地，那将是某种程度上的胜利。”^[13]

没有哪个社会是坚不可摧的。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弱化对美国的信任会如此危险。这反过来有可能暴露出美国最脆弱的领域，事实上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元。现在，美元虽然被一个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很好地保护着，这强化了它的不可撼动性，但是它依然存在核心弱点。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可以承受入不敷出（金融全球化使一些国内机构强大、宏观经济基础良好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能维持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在国内层面，美国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造成了财政赤字；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造成了贸易逆差。美国如何为这两项赤字买单？借钱。这并不反常。就像许多家庭一样，许多国家也在借钱。到了一定程度，当无法再借钱时，它们就会面临危机。希腊就是这样，它不得不大幅削减支出，以便能够继续从海外获得资金。在过去几十年里，当许多国家的国际借款变得太多时，它们就不得不忍受极端的痛苦：1982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的阿根廷，2008年的冰岛，2010年的希腊。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可以通过印刷国库券来弥补双重赤字，并为它的超额开支买单。美国财政部只需要支付纸张成本。美国分发的是一张张纸，而世界其他国家可是用实实在在的钱（辛苦赚到的钱）来购买美国国债的。例如，中国必须努力生产低成本的产品，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产品换回来之不易的美元，中国政府再将这些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支付给工人。中国

政府如何使用这些来之不易的美元呢？它拿出其中许多来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财政部使用这些来自中国的美元支付政府的超额开支。有史以来，美国国债的大买家分别是中国（1.113万亿美元）、日本（1.064万亿美元）、巴西（3 067亿美元）、英国（3 008亿美元）和爱尔兰（2 697亿美元）。[14]结果就是，当美国政府无法弥补这两项赤字时，它就可以简单地通过印钞（也就是“纸”）来支付这些超额支出。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会买这些“纸”（美元）？一个关键原因是，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交易都是以美元结算的。因此，当中国购买阿根廷的牛肉时，用美元支付；当阿根廷购买中国的手机时，也用美元支付。这意味着美元在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因此，美元发挥着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都清楚，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2019年6月，鲁奇尔·夏尔马写道：“长期以来，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以及经济上的灵丹妙药。通过培育想持有该货币——通常是政府债券——的稳定的客户流，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可以用低廉的成本从国外借款，并有能力负担远远超过其收入的生活水平。”夏尔马又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一直使美国保持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买汽车、买房子，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使美国可以弥补若没有这一特权便无法负担的巨额财政赤字。”上述引用中有两个关键信息，即美国可以“负担远远超过其收入的生活水平”和“弥补若没有这一特权便无法负担的巨额财政赤字”。

夏尔马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和伊丽莎白·沃伦的建议，即美国应该考虑让美元贬值以增强竞争力。夏尔马警告说，此举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国不是一个新兴国家。它是一个无可匹敌的金融超级大国，这种地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球对美元

的信任上，这种信任来之不易，也是美国强大和繁荣的持久源泉”。

夏尔马使用的关键词是“信任”。世界各国之所以一直乐于使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就美元问题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仅仅考虑3.3亿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美国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国际贸易的72亿人的经济利益。这种信任是维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支柱。

最近几十年来，这种信任已经开始弱化，因为美国时不时地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作为它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以下是两个将美元武器化的案例，均涉及美国孤立伊朗的行为。2012年，英国渣打银行被罚款3.4亿美元，因为它曾使用美元为伊朗的一项贸易提供交易资金。这项罚款显然代表了美国国内法律的域外适用。渣打银行是一家英国银行，它既没有违犯英国法律，也没有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任何规定。然而，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可以惩罚一家英国公司，因为它违犯了美国法律——这显然是对美元的武器化。[\[15\]](#)

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与伊朗、古巴和苏丹等国家合作的非美国银行处以了高额罚款。例如，2015年，法国巴黎银行被罚款89亿美元。结果就是，许多信任美元的国家发现美元是一把双刃剑，谁拿着它谁就会被割破手指。这显然会使大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最终可能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下降，从而削弱美国为其双重赤字融资的能力。近年来，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元贬值，为大家放弃美元创造了额外的动力。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说，美国人享有一种“超级特权”，他们应该感激世界其他国家在为这项超级特权提供资金。然而，特朗普却不领情，他正在惩罚那些赋予美国这项超级特权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对此困惑不解，搞不懂美国为什么会采取一些从长远看会损害这项特权的

措施。

特朗普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强烈刺激其他国家停止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尤其是，特朗普选择退出伊朗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六个国家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迫使其他参与国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与伊朗进行贸易。此处涉及国际法的一个关键点。许多美国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对抗伊朗，是因为这被视为正义（美国）与邪恶（伊朗）之间的斗争。然而，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却是美国在违犯国际法。

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于2015年7月20日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31号决议的支持。[\[16\]](#)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批准某项协议时，它就成为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事实上，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有更大的义务去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规则，就与它向来所坚持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约束性的决定一样。

然而，特朗普政府不仅退出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它还宣布，将对基于这项协议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的所有国家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惩罚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合法”途径是，对它们在跨境支付中使用美元的行为进行制裁。

这就让其他五个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国家陷入了法律困境。根据国际法，这些国家的公司被允许与伊朗进行贸易。但是，如果在贸易中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些公司将不得不在美国法庭上被处以巨额罚款。为了摆脱这一法律困境，法国、德国和英国决定设立“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机制），“这是避开美国制裁，与伊朗从事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17\]](#)实际上，

INSTEX机制并不会对与伊朗的贸易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全球大多数主要企业与美国的贸易规模远远大于与伊朗的贸易规模，它们不敢与特朗普政府作对，因为后者可以对任何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公司采取严厉的惩罚性措施。

然而，INSTEX机制具备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国际体系的一个巨大转变。有史以来，美国的三大主要盟友（法国、德国和英国）第一次抛开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创造了一种替代性支付工具。有朝一日，它可能为美国未来的两个潜在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一个绕开美元并削弱其全球地位的替代性全球支付渠道而充当榜样。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已经宣布，它们“也在努力向第三方国家的经济运营商开放INSTEX机制”。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8\]](#)简言之，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资产之一。

对美国来说，更不妙的是，现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表示，世界应该停止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2019年8月，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美国杰克逊霍尔小镇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予以批评。他指出，“美元是至少一半（大约是美国全球商品进口额的5倍，是其全球商品出口额的3倍）的国际贸易发票选用的币种；在全球证券发行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也占了2/3的份额”。此外，卡尼还断言，世界对美元的依赖“靠不住”，[\[19\]](#)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配得上正在兴起的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的国际货币体系。[\[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也指出，其他国家过去“不太关心”美国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控制，“那时美国被视作一个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领导者”。然而，现状正在改变，因为美国领导人的行为变得越发难以预测。[\[21\]](#)

卡尼和奥布斯特费尔德都在表达一个在全球越来越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全世界的国家都不明白，它们与（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它们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被美国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单边政策搞得危在旦夕？而且，美国将美元武器化也必然会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利益。近期，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透露出类似的观点，他警告道：“特朗普政府越是把美元作为武器，就越会刺激他国政府寄希望于可替代的货币且更快地采取行动。”^[22]也许，INSTEX机制创造的这个楔子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未来几十年，美元可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可是，哪怕不是战略天才也能看明白：利用美元从伊朗这个小小的国家身上攫取少量的利益，却危及了美国最大的一项全球战略资产（美元），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而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则是一场长期而非短期的博弈。在与中国的竞争即将变得更加激烈的时刻，美国挫伤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这无疑相当于往自己的跑鞋里放入石子。这也是美国制定不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出现的情况。法里德·扎卡利亚评论道：“INSTEX机制是一个警告信号，是危险的预兆，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正努力削弱美国全球实力的一个关键基础。”^[23]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可以让美国人民拥有超出收入的生活水平，那么明智的美国决策者就应该考虑这种依赖美元的长期影响。因此，一位英明的决策者必须平衡两个同等重要但又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在短期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美元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鉴于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同样奏效，一位英明的美国决策者该怎么办？是刺激各国放弃美元，加速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终结？还是鼓励各国尽可能长期地使用美元，因为这样能使美国人过上超出收入

的生活？

答案显然是后者。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刺激其他国家放弃美元，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受到美国单方面制裁的威胁。不过，人民币也尚未构成取代美元的威胁。艾斯瓦·普拉萨德指出：

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活力会形成巨大的优势，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这会成为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制约。此外，在缺乏开放的资本账户和可兑换性的情况下，人民币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更不用说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了。在提供政府债券等安全及流动资产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将对威胁美元主导地位的货币形成有力缓冲。我预计，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将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储备货币，削弱而非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24\]](#)

在短期内，人民币虽然无法取代美元成为具有主导性的全球储备货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探索其他途径以降低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如果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始丧失对美元的信心，那么它们就会去找其他替代品。

运用现代技术，人们有可能创造出昔日无法想象的新的替代品。可以举个推测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中国与阿根廷的贸易中，美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衡量标准——衡量阿根廷牛肉与中国手机之间的相对价值。如果美元的主要作用是衡量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那么没有理由创造不出一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替代单位。

这就是技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创建替代性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坊和门罗币。2019年6月，脸书也宣布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我虽然不是区块链专家，但加密货币普及率的急剧攀升，以及脸书等大公司在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货币方面的投资力度均表明，加密货币最终可能会提供一种可靠、实用且坚不可摧的衡量相对价值的方法。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国家使用具有替代性的区块链技术货币进行交易，归根结底，是它们不信任这些货币。

这是中国可以涉足的领域。它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创建一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替代性单位，即某种替代性货币。当许多国家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时，它们就会信任这一替代工具。尽管许多美国人会怀疑这一看法，但这是有经验证据支持的。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美国表示反对。从理论上讲，大多数国家会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截至2019年4月，已有1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5\]](#)这清楚地表明，当中国最终为一种新的区块链技术货币背书时，大多数国家也将信任它。

2019年7月，当我着手撰写有关加密货币的段落时，我并不知道中国将在这一敏感领域采取何种行动。如果我直觉上认为中国可以更多地运用区块链技术，那么中国官员得出同样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2019年8月1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专门进行经济和金融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的活动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布自己的加密货币。[\[26\]](#)穆长春传达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意愿，即这种加密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一样，将取代流通中的现金；但是，它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

化的货币不同，将使中国对金融系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将保留对分类账户的专有控制权。[\[27\]](#)更重要的是，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发展区块链技术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28\]](#)同月，中国通过了一部密码法，[\[29\]](#)旨在“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路透社报道称，这部法律是在中国“准备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之际通过的，“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加密科技的研究与应用，并确保保密性”。[\[30\]](#)尽管各国不一定将这种由中国背书的新型数字货币作为长期储蓄和外汇储备，但是会将其应用到商品和服务贸易中。如果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具有替代性的区块链技术货币，那么印度这类美国的朋友，若想从伊朗进口石油，就可以使用这种区块链技术货币，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制裁。简言之，美元的武器化催生了一种强大的全球动力，去创造一种替代性货币，为全球贸易服务。

这种发展并不会令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惊慌，因为使用美元结算的全球贸易总规模远远比不上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交易总规模。然而，如果中国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区块链货币，美国人还是应该警惕的。大多数美国人都熟悉一种名为“叠叠乐”的积木游戏。有时候，要搞垮一栋复杂的建筑，只需移除一块积木就够了。

美元在全球贸易融资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块关键的积木，它支撑起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当这块积木被移除后，基于美元的复杂的国际体系就会急骤地或缓慢地崩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2019年年中写下这些文字后，过了三个月，撰写《基辛格：理

想主义者》的作家尼尔·弗格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他指出：“阿里巴巴（支付宝）和腾讯（微信支付）建立的数字支付系统已经呈现爆炸式增长。通过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新兴市场，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全球支付基础设施。现在，各国使用的不同支付系统显然是中国原版本的本地化。在技术层面，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这些系统实现国际联通。事实上，支付宝已经被用于进行跨境汇款。如果美国很愚蠢，它就会让这一进程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中国人把他们的数字平台连接成一个全球系统。这会是诺曼底登陆日[31]：这一天，美元将失去世界第一货币的地位；这一天，美国将丧失实施金融制裁这一超级强权。”[32]弗格森的这番话也清楚地表明，全球接受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实际上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美元不再是主导性的全球储备货币时，最大的牺牲者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因为它们的许多收入和利润源自全球对美元的使用。坦率地说，世人无法预测当大家都不再用美元进行全球贸易结算时，它会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何种影响。这个体系过于复杂且紧密交织。

我在本章中解释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享有维持长期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超级特权”。特朗普在2019年7月2日所说的，多年来中国在贸易方面比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真是错得离谱。[33]特朗普暗示，中国人民一直在从美国人民身上赚取巨额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却是美国人民一直在欺骗中国人民，因为他们一直在用纸印出的钱购买中国的产品。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人无法再通过印钞票购买中国产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预计会有所下降。此外，超过90%的全球金融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而交易费大多流向了美国的银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虽然美国的商品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顺差。

明智的战略家不会为了惩罚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伊朗——而拿巨大的利益冒险。但这却是美国一直在做的。有一点一目了然，美国随意地将美元作为武器，恰恰说明了美国缺乏全面的长期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正不知不觉地牺牲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巨大全球利益，以换取惩罚他国——比如伊朗——所获得的微薄收益。自然而然地，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长期竞争优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自律且专注地坚持长期战略。因此，我们有理由去问一个问题：中国赢了吗？

本章仍需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那么谁应该对此负责？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都想把这一战略失误归咎于特朗普。当然，特朗普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确实表现得狂野而鲁莽。然而，未能制定出这项战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结构缺陷，这影响了美国的左翼和右翼。

在主导世界一百多年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里，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向美国人民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需要国内和国际政策做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以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作为美国政治的密切观察者，我震惊于几乎没有领导人建议美国从根本上重新启动战略思维，并思考是否需要根本性地改变方向。

在美国的话语中缺乏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引人注目，很显然，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却是个例外。

历史是如何走到转折点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之道是用更

长远的眼光看待历史。请看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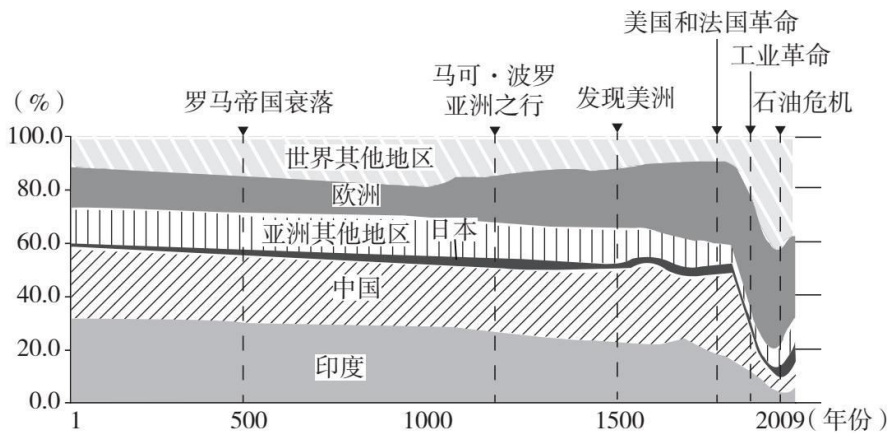


图3.1 经济学史

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仅仅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欧洲和美国才超越了它们。以两千年的世界历史（即“全局”）为背景，过去两百年间，西方（包括美国）的主导是一个极反常的现象。因此，如果看到中国和印度崛起以结束这种反常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复苏速度之快令人惊讶，甚至是震惊。请看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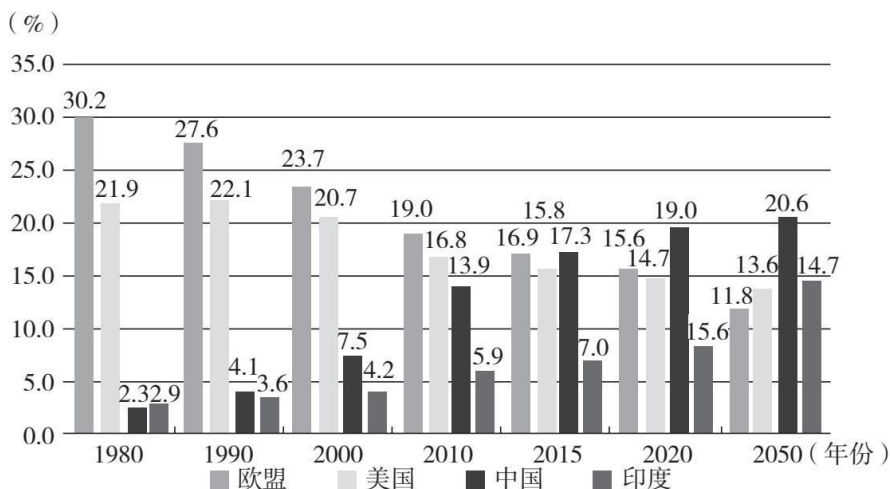


图3.2 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占世界GDP比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数据来源：1980—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2016年《世界经济展望》），其中2020年和2050年为预测值。2017年3月3日访问，普华永道预测。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如果把1980年的相对经济份额表与2020年的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历史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折。在这几十年里，美国拒绝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做出任何战略性或结构性调整。坦率地说就是，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时，美国依然一直利用自动驾驶仪在直线前进。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将这种失败与另一相似的历史失败进行比较，即19世纪时中国清朝的官员没能意识到西方的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路线。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结果，中国遭遇了一百多年的苦难。王赓武教授——亚洲在世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提醒了我这一点。他告诉我，看到我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战略上未能适应新世界的描述，他想起了“中国晚清的自满官员，他们无视新世界的出现将可能挑战大清的优越体

系”。

今天美国所处的地位比当时中国的清朝强势得多。没有哪个大国敢像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一样去践踏美国的土地。美国也不会被炮舰外交所挟持。然而，这会产生其他类型的冲击，带来更长远的痛苦。纵观历史，大国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自认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当它们处于权力巅峰时。毋庸置疑，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持此种假设，这导致极少有人（除了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少数学者）建议要做出任何重大的战略调整。

这种战略调整的失败也可以解释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如图3.3所示。虽然底层50%的人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但顶层1%的人的平均收入却出现了飙升。

经济学家仍在争论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的根本原因。但原因极为复杂。即便如此，底层50%的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也可以部分归结为数百万低收入的中国工人进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西方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解释过，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创造性破坏”，包括美国丧失竞争力和就业岗位。显然，在2001年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领导人应该为随之将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做好充分准备。遗憾的是，没有领导人建议这么做。美国工人独自应对这场结构性冲击。许多欧洲国家花费其GDP的1%~3%对工人进行再培训，美国的这项花费仅为0.24%。[\[34\]](#)美国工人未被照顾好，这必然会引发民粹主义反弹，最终选出了特朗普这位总统。当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如果不及时做出战略调整，那么不良后果往往会被引发。[\[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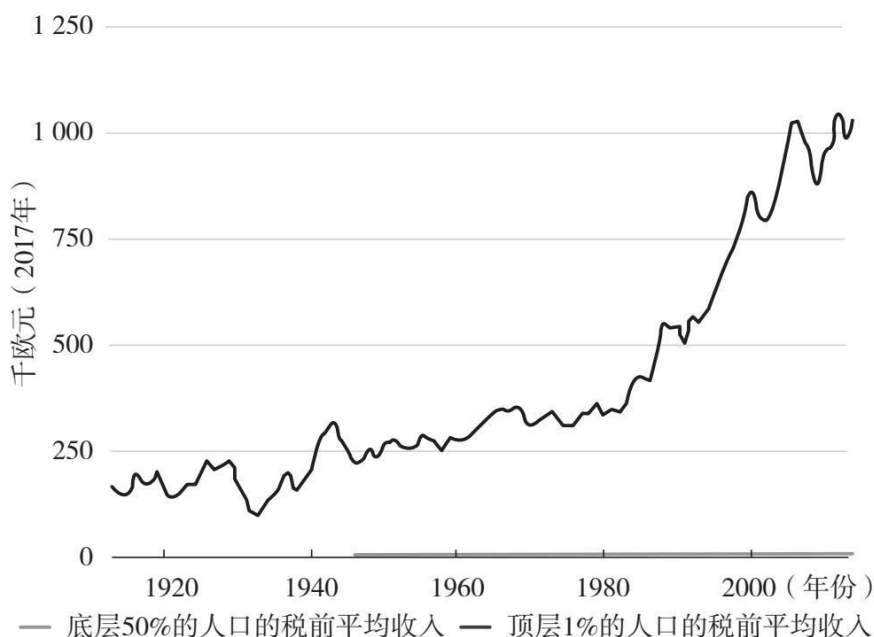


图3.3 1913—2004年美国平均收入增长情况 [36]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美国能否实现大转变，现在就做出战略调整以应对历史新阶段？从理论上讲，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应该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然而，有时候实践与理论恰好相反。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已经变得像中国清朝一样僵化。

为了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长期挑战，美国人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些简单的问题：美国人对世界持有何种想当然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哪些假设在新世界中仍然有效，哪些需要被质疑？挑战根深蒂固的假设向来都不简单，也不令人舒服。但是，当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不可避免地迟早都会迫使美国人走出舒适区时，他们选择视而不见并赖在舒适区里是不明智的。以下是一些美国人深信不疑却值得质疑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美国永远都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确，如果中国社会衰退不前，或者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但是，中国人民和亚洲邻国民众一样聪明能干，中国经济没有理由不取得新加坡、日本或韩国曾取得的成就。2010年瑞士瑞信银行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1.8万美元。如果中国最终实现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裔）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其GDP将骤增至141万亿美元。相形之下，美国当前的GDP是20万亿美元。[\[37\]](#)显然，展望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是有现实依据的。

鉴于此，质疑美国永远都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普遍假设是合乎逻辑的。对美国社会来说，开始讨论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国内政策该如何调整以适应这个新世界是明智的。美国领导人应该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之一，提出这个公认的难题进行辩论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但实际上，任何美国政治家如果这么做都是在自寻死路。比尔·克林顿——美国近年来最深谋远虑的总统之一——卸任后在2003年于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应该为一个自身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做好准备。克林顿的密友——曾在1994—2001年担任他的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问他，为什么要发表这个演讲。克林顿回答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时我们必须学会‘分享舞台’。”[\[38\]](#)然而，塔尔博特在书中解释道，即便克林顿知道终有一天美国会成为第二，但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如果暗示美国的卓越地位有一天会消失，那将是自找麻烦”[\[39\]](#)。因此，克林顿直到卸任后才发表这番演讲。

我也从个人经验中得知，美国政治家绝对不会公开地讲美国

有一天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二。2012年1月，我主持了一个高级别小组讨论会，研讨美国未来的实力。四位杰出的美国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包括（佐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田纳西州）鲍勃·考克，以及民主党人迈克尔·弗洛曼（总统副助理和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尼塔·洛伊。当我在会议上提出有一天美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这四位杰出的小组成员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这段个人经历让我意识到，尽管美国很开放，但它也有自己不容置疑的信条。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是世界第一，而且永远会是世界第一。这就给美国领导人或候任领导人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美国要制定一个周到而全面的战略来适应新世界，那么该战略必须基于对未来的现实假设。其中一个现实假设便是：美国有一天将变为世界第二。然而，说出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的从政者将在美国社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美国的政客如果无法公开地说出这些事实，便无法进一步为美国提出新的适应策略。

永远保持第一的假设并非美国话语中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假设是，美国社会天生是善良的，这表现在其国内和国际的行动中。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评价道，可悲的是，这种假设并不正确。全球75亿人口中有3.3亿美国人视自己为天生善良的人（因此，他们自视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人，的确，美国是一个卓越的国家），哪怕地球上剩下的72亿人（他们生活在对美国友好或不友好的国家中）并不认同美国所持的这种假设，显然，这就会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造成危险的认知鸿沟。如果美国的思想领袖依据全世界认为美国社会天生善良的假设来为美国制定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那么这个战略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吗？

也许，说到底，这可能是对美国缺乏一个新的、全面的长期战略来应对21世纪新世界的根本解释。任何现实可信的战略都必须对美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假设进行质疑。鉴于从心理上和政治上都难以质疑这些假设，因此，对于政客来说，更安全之道是继续建议美国只需按照昔日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去做就行了，从而让美国保持世界第一。这也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背后的假设：既不准备重塑美国，也不直面危险的美国幻想，而是在一条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简言之，美国将继续“自动驾驶”。如果美国继续这样做，它将给中国送去一份地缘政治礼物，并允许中国最终赢得这场美国未事先制定深思熟虑的、全面的长期战略就贸然加入的地缘政治竞赛。

[1] Bob Fredericks, “Schumer: We Have to Be Tough on China,” *New York Post*, August 1, 2019, <https://nypost.com/2019/08/01/chuck-schumer-backs-trump-on-new-china-tariffs/>.

[2] Nancy Pelosi, “Pelosi Statement on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Tariffs on China,” News, Congresswoman Nancy Pelosi, California’s 12th District, May 22, 2018, <https://pelosi.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pelosi-statement-on-trump-administration>.

[3] Thomas Franck, “Trump Doubles Down: ‘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 *CNBC*, March 2,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3/02/trump-trade-wars-are-good-and-easy-to-win.html>.

[4] Weijian Shan, “The Unwinnable Trade Wa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9.

[5] Chad P. Bown and Melissa Kolb, “Trump’s Trade War Timeline: An Up-to-Date Guide,” *PIIE*, September 20, 2019,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trump-trade-war-timeline.pdf>.

[6] Martin Feldstein, “Inconvenient Truths about the US Trade Deficit,”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25,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trade-deficit-inconvenient-truth-by-martin->

feldstein-2017-04.

[7] Robert Zoellick, “Donald Trump’s Impulsive Approach to China Makes US Vulnerabl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une 26,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e88078e8-966d-11e9-98b9-e38c177b152f>.

[8] CGTN, “Kevin Rudd: If the U.S. Offered Australia What It Offered China, I Would Not Accept It Either,”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May 21, 2019,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774e3349444f34457a6333566d54/index.html>.

[9] Zoellick, “Donald Trump’s Impulsive Approach to China Makes US Vulnerable.”

[10] Washington Post, “President Trump Calls on American Companies to Cut Ties with China, Intensifying Trade War,” PennLive Patriot News, August 23, 2019, <https://www.pennlive.com/business/2019/08/president-trump-calls-on-american-companies-to-cut-ties-with-china-intensifying-trade-war.html>.

[11] Martin Wolf, “How We Lost America to Greed and Env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uly 17,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3aea8668-88e2-11e8-bf9e-8771d5404543>.

[12] Martin Wolf, “The US-China Conflict Challenges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y 21,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870c895c-7b11-11e9-81d2f785092ab560>.

[13] Edward Luce, “The Next Stop on Donald Trump’s End-of-Diplomacy Tou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ugust 2,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66cc66b6c45f-11e9-a8e9-296ca66511c9>.

[14]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chart), October 16, 2019, <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15] 作者就此话题撰写了相关文章。“What Happens When China Becomes No. 1?,”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April 24, 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what-happens-when-china-becomes-no-1>.

[16] ACA,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at a Glance,” Fact Sheets & Briefs, May 2018,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JCPOA-at-a-glance>.

[17] John Irish and Riham Alkousaa, “Skirting U.S. Sanctions, Europeans Open New Trade Channel to Iran,” Reuters,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usa-sanctions-eu/european-powers-launch-mechanism-for-trade-with-iran idUSKCN1PP0K3>.

[18] Helga Maria Schmid, chair,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f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Vienna, Austria, June 28, 2019,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64796/chairs-statement-following-28june-2019-meeting-joint-commission-joint-comprehensive-plan_en.

[19] 卡尼认为，美元的普遍性意味着，即使是那些与美国没有什么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也会受到美元汇率变动的牵连。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囤积美元来防止资本外逃，从而实现自我保护，这也导致了美元储蓄过剩和全球增长放缓。

[20] Mark Carney,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Growing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speech given at the Jackson Hole Economic Symposium, Wyoming, August 23, 2019, <https://www.kansascityfed.org/~media/files/publicat/sympos/2019/governor%20carney%20speech%20jackson%20hole.pdf?la=en>.

[21] Brendan Greeley, “Central Bankers Rethink Everything at Jackson Hol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ugust 25,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360028ba-c702-11e9af46-b09e8bfe60c0>.

[22] Barry Eichengreen, “How Europe Can Trade with Iran and Avoid US Sanctions,”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12,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instex-trade-with-iran-avoid-trump-sanctions-by-barry-eichengreen-201903?barrier=accesspaylog>.

[23] Fareed Zakaria, “America Squanders Its Power,”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19, <https://fareedzakaria.com/columns/tag/dollar>.

[24] Eswar S. Prasad, *The Dollar Trap: How the U.S. Dollar Tightened Its Grip on Global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1.

[25] “China Signs 197 B&R Cooperation Documents with 137 Countries, 30 Int’l Organizations,” November 15, 2019, *Xinhua*, 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1/15/c_138558369.htm.

[26] “China Says Its Own Cryptocurrency Is ‘Close’ to Releas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August 13,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banking/chinasays-its-own-cryptocurrency-is-close-to-release-0>.

[27] Bloomberg News, “China Preparing to Launch Its Own ‘Cryptocurrency’,” *Al Jazeera*, August 12,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ajimpact/china-preparing-launch-cryptocurrency-190812093909567.html>.

[28] Xinhua, “Xi Stresse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October 25, 2019, *Xinhua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0/25/c_138503254.htm.

[29] 这部密码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6日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译者注

[30] Ben Blanchard, “China Passes Cryptography Law as Gears Up for Digital Currency,” *Reuters*, October 26,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lawmaking/china-passes-cryptography-law-as-gears-up-for-digital-currency-idUSKBN1X600Z>.

[31] 此处的诺曼底登陆日意指转折点。——译者注

[32] Niall Ferguson, “America’s Power Is on a Financial Knife Edge,” September 15, 2019, *Niall Ferguson*, <http://www.niallferguson.com/journalism/finance-economics/americas-power-is-on-a-financial-knife-edge>.

[33] “Any Deal with China Must Favour US: Trump,”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ly 3, 2019, A10.

[34]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Income Inequality, USA, 1913–2014” (chart), <https://wid.world/country/usa/>.

[35] OECD, “Public Spending on Labour Marke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2000–2017, <https://data.oecd.org/social-exp/public-spending-on-labour-markets.htm>.

[36] Kishore Mahbubani, “How the West Can Adapt to a Rising Asia,” TED Talk, April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JWs6Z6eNs>.

[37]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38] Strobe Talbott, *The Great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 Modern States,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329.

[39] Ibid., 330.

第四章

中国在扩张吗

当中国人声称中国将会和平崛起时，他们其实是在背信弃义和骗人。这是真的吗？

国际社会鲜有像芮效俭大使那般的“中国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1991—1995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以他对中美关系了如指掌。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其实就南海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会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实中国在2002年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呼吁尽早完成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部分礁石和浅滩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但并不打算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搞军事化”。芮大使说，奥巴马错失了利用这个合理提议的机会。相反，美国海军加强了巡逻力度。

简言之，中国领导人没有食言。实际上中方的提议是被美国海军拒绝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种不真实的情况是如何被消息灵通、深思熟虑的西方精英接受为事实的？这并不容易回答。有关“中国的谎言”是如何产生并被广泛接受的，在经过数十年的仔细观察后，我得出结论，这是由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制造出来的，世界上顶级的情报机构和主要媒体都在这个系统中。

这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生态系统，涉及“五眼联盟”，该联盟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这五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彼此之间不仅有着高度的信任，也高度地共享情报，还时不时地与西方主要媒体分享信息。

西方主要媒体都很大胆，而且基本上独立。政府无权干预它们的报道。事实上，这些媒体经常揭露不愉快的事实并与政府对抗。因此，它们的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无可非议地）就会很高。

它们都大胆地宣称自己致力于报道真相，而不是充当宣传工具。这些独立报道的说法是绝对正确和完全正当的。

然而，这些媒体的一些报道必须依赖政府的消息源，包括“五眼联盟”这类情报网络，此为事实。报道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可信的。例如，中国领导人的确承诺不会把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军事化。中国军队随后加强了在南沙群岛的防御性活动，这也是一个事实。未被报道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海军挑起了中国的这种反应。“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并没有同大众分享这个事实，原因显而易见。

2018年4月，我应邀加入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我本人。我们在北京获得了访问高层领导人的机会，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等人。离开北京后，我们所有人都撰写了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一些人对中国的政策持批判态度，另一些人则不然。但无论怎样，所有人都试图去解读中国的观点。

回顾历史，一直以来中国都不善于解释或捍卫自己的观点。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发言人，能够以幽默的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观点。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是个令人惊讶的例外。他曾与许多主要的西方媒体直接对话，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彭博电视台、《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他说话权威而清晰，语言直接且引人注目。

然而，如果中国想说清自己本质上并非一个军国主义大国，

是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作为支撑的。比如，可以谈谈历史事实。如果中华文明天生就是黩武的，那么这种军国主义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国领土的倾向，早就暴露了。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大部分时期是亚欧大陆上最强大的文明。如果这个国家天生黩武，它就会像西方列强那样去征服海外的领土。举例来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惊讶于一个事实：澳大利亚在地理上离中国较近，实际上却被遥远得多的英国军队所占领和征服。的确，1768年8月，詹姆斯·库克从普利茅斯的船坞出发，航行直达澳大利亚的植物学湾至少需要90天；相反，如果他从中国出发，不到30天就能抵达。[\[1\]](#)

中国人不愿征服澳大利亚及其他海外领土，并非因为中国缺乏海军。早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6世纪开启欧洲的残酷殖民统治之前，中国人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15世纪初，比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寻找通往所谓“香料群岛”的航线还要早近100年，中国就派出传奇人物郑和七次远下西洋。郑和当时乘坐的船只远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最远抵达非洲。“中国的明星船队是‘宝船’，这种船是中国式帆船，有几层楼高，长达122米，宽达50米。事实上，它比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皇室航行至美洲乘坐的‘圣玛利亚号’大4倍。”[\[2\]](#)

一路上，郑和也的确参与了军事战斗。例如，在1409—1411年的航行中，他“俘获了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拥立耶巴乃那为新国王”；在1413—1415年的航行中，他“俘获了苏门答刺国的国王苏干刺，随后任命了新国王”。[\[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征服或占领任何海外或遥远的领土。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评论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一直不愿意把军队派往远方……公元8世纪时，在中国唐朝发展的巅峰时期，朝廷在中亚的费尔干纳山谷附近部署了一支

军队，当时阿拔斯王朝正在东进侵略。双方发生了冲突。在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中，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败了唐朝军队，此后，中国人在历史上再未越过天山一步。”[4]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认为，汉族本质上是农耕民族。汉族人遍布中华大地上能找到优良农耕土壤的所有地区，一旦遇到贫瘠的草原或山区，他们就会折返。同样，他们也不主张去海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并非军国主义者或扩张主义者，哪怕他们打过许多仗——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本土。

当把中国人的行为与他们的一些邻居进行对比时，他们相对平和的性格就显现出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强大而可怕的扩张是由北方的蒙古人进行的。在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蒙古部落，吞下了几乎整个亚洲，成为东亚地区唯一一支威胁、入侵欧洲的力量。然而，更强大的汉族政权却从未效仿它去征服他国。

让·约翰逊为亚洲协会撰文写道：“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进入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地区，1215年摧毁了其首都。他的儿子窝阔台于1234年征服了整个华北，1229—1241年统治了该地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1279年打败了南宋统治者。1271年，忽必烈将他的王朝命名为元，意即‘宇宙的起源’[5]。中国的元朝从1279年持续到1368年。”[6]结果就是，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发生了巨大的交融。中华文明究竟有何种强大的反军事基因能够影响统治者呢？这或许要追溯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很早就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告诫那些只崇尚军事力量的人。比如，在一次对话中：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

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7]

再比如，在另一次对话中：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尊敬学者而不是士兵，哪怕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也会赞扬一些军人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总体上，中国人对同时具备这两种技能的人——文武双全的人——更加尊敬，他们既是优秀的学者，也是优秀的军人。相形之下，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对穿军服的人怀着根深蒂固的尊敬。这里需要说清楚一个严酷的事实：近几十年来，美国在面临战略挑战时，第一选择总是使用军事手段。亨利·基辛格阐述道，中国人总是避免采用军事手段：

中国在动荡时期奠定了（独特的军事理论的）基础，当时，与敌国间的残酷战争使中国人口大量减少。面对这种屠杀（并想从中获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出一种战略思想，即宣扬避免与敌军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心理优势来取胜。[9]

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武说过：“兵者，诡道也……卑而骄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基辛格准确地提炼出孙武观点中的精髓。这并非说中国人没有能力打仗。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人

与许多邻国进行了多次战争，他们逐渐扩大了领土，占领了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争论美国占领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合法性，然而，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建议将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归还墨西哥都无异于是“政治自杀”，同样，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主权领土也都是寸步不让的。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严峻政治现实。

历史上，中国的领土版图不断变化，在此期间，中国也学会了与许多曾经多次交战的邻国和平相处，包括缅甸、日本、朝鲜以及越南。

随着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它将像所有大国一样去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就如同拉丁美洲的邻国必须调整 and 适应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爆发式发展一样，中国的邻国也得调整 and 适应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不会将诉诸武力作为实力的第一展现。因此，格雷厄姆·艾利森明智地提醒美国同胞，要当心，别认为中国人会变得更像他们：

美国人喜欢宣讲中国人将“更像我们”。也许，他们应该对这一想法更加谨慎。在历史上，新兴霸权国家的表现如何？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美国进入他超级自信的“美国世纪”时，美国表现得如何呢？.....在罗斯福抵达华盛顿后的十年里，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将其驱逐出西半球，并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及菲律宾群岛；以战争威胁德国和英国——除非它们同意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解决争端问题；支持哥伦比亚的反对军发动一场起义，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巴拿马，以修建一条运河；宣称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主张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权进行干预，仅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的七年时间里，这一权力就被行使了九次。[\[10\]](#)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与美国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中国不愿意第一时间诉诸武力。还有一点中国与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中国不认为自己肩负着弘扬中华文明并推动全人类效仿的普世使命。美国却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代表一种普世价值，并真诚地相信，如果其他人都吸收并践行美国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当我们说美国杰出时……意味着我们认识到美国拥有独一无二且无与伦比的能力去引领和平与发展，去捍卫自由与机会。我们的力量伴随着一份领导责任——需要拿出谦逊和深思熟虑的态度，以及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因为，当美国不能领导这个世界时，我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要么会引发混乱，要么会被其他国家或网络趁机介入并填补。[\[11\]](#)

中国人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我长期生活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社会中，但我的中国朋友没有一个想让我变得同他们一样，哪怕我会说流利的中文，也习惯了中国的习俗。

美国文化的这种“普世化”特征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它会卷入如此多的军事冲突之中。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叙利亚的阿萨德都是有严重错误的统治者。美国与这两国相隔万里，不与其中任何一国存在重大的国家利益纠纷。但是，由于“普世化”的愿景，美国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人对此备感困惑：如果不涉及本国利益，为何要卷入外国的军事冲突呢？

更让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放任自己卷入不必要的中东冲突，结果损害了其根本的国家利益。卷入冲突耗尽了资源，也

剥夺了用同等资源来改善相对贫困的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机会。美国每一次卷入不必要的中东冲突，都会削弱其部署反华资源的能力。看到美国这些徒劳无益之举，中国得出了一个明智的教训：切勿卷入不必要的斗争。因此，中国40年来没参与过一场大战争，30年来没有发射过一颗越境子弹，这并非偶然。不诉诸武力既折射出一种强大的文明推动力，又反映出一种高度务实的权力观。

40多年来，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诉诸武力，却被美国人描绘成一个天生具备侵略性且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这让中国人备感困惑。美国人坚信中国正变得具有军事侵略性，因此，包括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美国安全机构得出结论：中国现在已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2019年9月，美国国防部公开了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的讲话内容，他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不仅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极大的长期威胁，也对美国国防部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2]一个月后，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了几项引人注目的指控，声称中国的军事行动在过去一年里变得“越来越挑衅”，认为中国在南海“经常威胁”东盟邻国，同时在东海挑衅日本，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的各港口建立据点，表面上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最终可能服务于军事目的”。^[13]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萨特说过：“现在政府整体上持有一种明显的反华立场，这是过去50年来我在华盛顿从未见过的。”^[14]

这种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警告越来越尖锐。2019年1月1日，帕特里克·沙纳汉就任代理国防部长时，一篇新闻报道援引一位匿名国防部官员的话说：“虽然我们专注于正在进行的行动，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告诉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中国、中国。”^[15]

2019年初，在华盛顿两极分化严重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就任何议题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然而，在这种两极分化严重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安全和学术机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却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激进的军事竞争对手。

首先，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理性社会，经常对一些观点进行争论。但在今天的华盛顿，要想证明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位客观的历史学家都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现实。显而易见，当代中国军事政策的重点是防御——旨在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中国在2019年7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16]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防御性”国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明显地透露出这种防御性思维。^[17]

陆克文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很好地阐述了中国在战略思想中强调的防御态势。他写道：

中国的战略记忆中，邻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历史上，它们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通道，引发了接连不断的外国侵略——英国、法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然后是来自东方的日本的残暴占领。在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中，人们对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牢固地树立起一种高度防御性的观点。然而，中国史学也告诉我们，单纯采取防御性措施并不总是奏效。例如，中国的长城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它未能提供抵抗外敌入侵的安全保障。基于这些原因，现代中国战略思想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方法。首先，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中国希望与所有邻国建立起一种积极、包容以及尽可能友善的关系。

陆克文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例，总结道：“中国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这意味着加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从而巩固其在周边大陆的地位。[\[18\]](#)

美国思想家的所谓“中国扩张主义”，更准确的表述是中国对通过“巩固与邻国的关系”来保护边界的痴迷。这种痴迷，是由其漫长而痛苦的遭受侵略的历史导致的。

此外，历史上，中国虽然与日本、朝鲜、缅甸和越南有过多次战争，但在未来几十年里，爆发此类战争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几千年来，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为邻，对于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它们早已培养出精细又微妙的直觉。中国的精英阶层（不同于美国的精英）也深刻理解与邻国的悠久历史。因此，伴随着各种复杂微妙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将会有很多往来反复，但不会爆发战争。

台湾是使中国卷入战争的一个特殊导火索。虽然多数时候，中国领导人对很多事情会给出很大的政策灵活性，但他们无法屈服和妥协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软弱。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如今，这百年屈辱的几乎所有历史痕迹都被抹去或解决了，包括香港和澳门问题。

剩下的只有一个——台湾。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直至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它才被迫割让给日本。中国对西方列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数度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跟西方列强合作之初，曾从美国 and 英国那里得到保证：将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把山东归还中国。拉纳·米特曾报

道：“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必须放弃它占领的中国领土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殖民地。中国人认为，中国曾派出近10万名工人去欧洲西线援助英法两国，作为奖励，山东将会被归还给中国。然而，山东却被转让给了日本。事实证明，西方盟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以便把两者都拉到盟军这一边。”^[19]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感觉自己被西方国家深深地欺骗了。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有关归还山东问题的争议，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五四运动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段历史教会中国人不要轻易相信西方国家的保证。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任何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让人联想起这段历史。它会激起一种强烈的、有力的、激烈的全国性反应。美国无法说它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显然，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与中国修好之际，这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和中国达成了多项明确的谅解，其中最明确的一项就是台湾和大陆属于同一个国家。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公布：“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20]既然台湾和大陆都认为它们同属一个国家，那么任何美国人声称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侵略性的国家，都是错误的。大陆希望与台湾实现统一，这是在恢复原状，而不是在扩张。

美国必须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简单问题：它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与中国就台湾问题签署的明确协议的法律约束？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法治国家，尊重并遵守签署的明确条约和协议。然而在实践中，美国已经摒弃了它签署的条约

和协议。只有一个原因导致如此：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摒弃任何法律协议或条约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美国遵守法律。

从过去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美国本能地选择遵守国际协议。托马斯·弗兰克在《国家间合法性的力量》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点，他描述了美国海军在1988年是如何避免干预一艘船只的，哪怕它被发现载有非法核材料：

198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现一艘前往伊朗的船只正在驶近波斯湾，这艘船上装载着中国制造的蚕式导弹。美国海军认为，这些强有力的武器交付后，将大大增加美国舰队及其护卫船只的危险性。因此，国防部言之凿凿地主张美国政府批准拦截这些武器交付。然而，美国国务院驳斥说，根据公认的战争和中立规则，在公海进行扣押将构成侵略性封锁，相当于对伊朗采取了战争行为。美国如果实施海上封锁，就将失去其作为中立国斡旋的地位。在这次事件中，运载导弹的船只被允许通过。在争取美国政策控制权的内部斗争中，对系统性规则的遵从压倒了战术优势。[\[21\]](#)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自我约束大都消失了。

显然，在无视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所有法律义务方面，特朗普政府做得最极端。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明确地表示：“对美国来说，承认国际法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哪怕这么做短期内似乎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看，那些信奉国际法的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制约美国。”博尔顿辞职之前，曾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牵头无视或违反美国与中国就台湾问题在此前达成的协议。2017年1月，博尔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

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在《上海公报》发表45年后，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并决定美国对它的理解了。”^[22]作为回应，2019年6月，在卡托研究所从事安全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在《国家利益》杂志中写道：

在政府任职之前，他（博尔顿）推行了高度危险和具有挑衅性的政策。他敦促美国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主张将驻冲绳美军转移至台湾。任何一项措施都将越过中国政府关切的红线，并可能引发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台湾与大陆出现永久的政治分离。让持此观点的人物担任关键的政策制定职位，并让其坐在离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仅隔几扇门的地方，这大大增加了美国进一步支持台湾的可能性，还会提升与中国爆发战争的风险。^[23]

博尔顿并非傻瓜。他知道自己关于台湾问题的许多言行激怒了中国。博尔顿或他的同僚可能发起或触发一系列的行动，迫使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这会是真正的危险。我之所以故意使用“迫使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这种表达，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是绝不让步的。乔治·凯南在阐述遏制苏联的理由时，就给予美国同胞明智的建议，要避免挑衅，“这种政策与对外装腔作势——用威胁、咆哮或者过度‘强硬’的外部姿态——无关。虽然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它绝不会置自身声望于不顾。它可以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用不老练和威胁性的姿态把自己置于一种无法让步的境地，哪怕它的现实意识决定这么干”^[24]。博尔顿似乎不赞同凯南的观点，认为他对中国摆出了一些不明智的、威胁性的姿态。

许多美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对台湾负有责任，因为它是防止台湾遭到直接军事侵略的主要担保人。不过，如果美国的行动引发了中国的军事回应，受害的将是台湾人民。维护台湾的最佳办法是美国不要干涉台湾问题。美国还应有力地表明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这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向当时希望“独立”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发出的信息，强硬而又充满着爱意。这种严厉而有爱的信息奏效了。

中国大陆方面会不会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对中国来说，有两大制约因素。其一，美国国会于1979年1月1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压手段，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以及“美国将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25]其二，允许一个社会和政治实验室继续存在，以显示中国社会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如何运作，这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中美利益的交汇点。

简言之，如果中美两国就台湾问题进行决策时，拿出政治智慧而非短期的博弈战术，那么双方就可能一致同意台湾保留自治权。美国强烈反对“台湾独立”将有助于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一旦局势缓和了，中国领导人加快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压力也会随之减轻。

有时，可以用简单的比喻来描绘出对比策略。首先，把台湾想象成一艘驻扎在中国攻击距离内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然后，把台湾想象成一种可以刺激中国社会的健康病毒。

如果台湾被看作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美国应该尽量使它与大陆分离。因此，目标将是强调两岸差异。即使美国不

能明确地支持呼吁“台湾独立”的声音（这显然违反了中美就台湾问题签署的协议），也可以间接地对主张“台湾独立”的声音表示同情。它还可以更富同情心地与民进党合作。因此，当民进党主席前往拉丁美洲途中请求在美国中转时，美国会同意，哪怕这些访问激怒了中国政府。美国还可以向台湾提供更先进的军事武器，哪怕这会违反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的明确规定——其中说得清清楚楚：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26\]](#)

然而，如果相反，台湾被理解为一种健康病毒，那么美国应该鼓励它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更多接触。因此，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更多的联系将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促成此事，美国应该与国民党——而非民进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因为国民党反对“台湾独立”。

近年来，中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增加和推动大陆与台湾的接触，这真是引人注目。就在2008年，约有18.9万名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约有32.9万名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2008—2016年，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2015年大陆赴台湾的游客数量达到峰值418万，2016年赴大陆的台湾游客显著增加到360万。[\[27\]](#)

2008年发生了重大突破，当时中国大陆允许两岸旅客直接通航。[\[28\]](#)从上海到台北（或相反）的飞行时间由5小时减至2小时（省去了在香港转机的时间）。如果美国人想理解中国大陆对

台湾政策的开明程度，可以拿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进行比较。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世时，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有勇气去见他。相形之下，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会见了马英九。

美国盛行硬汉文化。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是那些表现得强大且好战的人。吉米·卡特和贝拉克·奥巴马通常被视作软弱的总统。然而，有时候，更温和的做法也许会更有效地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在台湾问题上，一种更灵活的方式也许比约翰·博尔顿所倡导的方式对美国更有利。因此，美国国内应该就台湾问题达成更强的政治共识，以避免迫使中国大陆非常不情愿地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除了台湾问题，另一个导致中美军事形势紧张的是南海问题。2018年，亨利·保尔森随口提到“最近导致两国海军在海上险些相撞的分歧”。他的对华军事建议是：“实施严格的交战规则，以防止解放军海军舰长上个月在南海近乎撞船的事件再次发生。”[\[29\]](#)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海军舰艇经常在距离中国海岸12海里[\[30\]](#)处巡逻。但截至目前，中国的海军舰艇尚未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或纽约海岸12海里处巡逻。根据国际法，美国海军（以及其他国家海军）在距离中国海岸以外12海里航行完全是正当的。尽管这些巡逻本身不一定具有挑衅性，但执行它们的方式可能存在挑衅性。

美国以保护“公海航行自由”这一全球公共利益为由，为它在南海进行咄咄逼人的海军巡逻辩护。讽刺的是，美国保护的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今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美国。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产品远比美国产品要多。因此，中美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发生冲突，任何一位深思熟虑、理

性且明智的观察家都会感到困惑。在全球99.99%的海域适用航行自由这一原则上，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共同的利益。

问题发生在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0.01%的地方。即使在南海，也没有分歧，因为大多数海上通道是开放的国际水域，许多海军舰艇可以顺利无阻地通过。在南沙存在争议的岛礁中，中国只控制了少数。当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开始在各自控制岛礁周围填海造岛时，中国决定效仿。然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只能在这些岛礁周围填造几英亩[31]的土地，中国却可以凭借巨大的资源填造出多达2 000英亩的土地。

这些填海造地行动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岛礁周边12海里是它们的领海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有何最佳途径？派遣美国海军舰艇进入这些中国岛礁海岸的12海里以内，证明它们是国际水域，是最佳方式吗？或者，如果国际法明显地支持美国，美国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是否更明智一些？

如果美国不派军舰挑衅，中国可能不会军事化它在南海的任何填造岛礁。中国想为双方找个台阶，以缓和南海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是双方缓解局面的良好机会，但美国错失了这个机会。美国会继续误解中国的意图吗？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会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孕育出一种战略文化，告诫人们切忌穷兵黩武。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当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长时，它并不会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好战的军事大国。如果中美之间的真正竞争并非发生在军事领域，那么美国专注于增强其军事能力是否明智？现在美国是否应该改变

它对中国的战略共识？

[1] 当然，库克并没有直接航行到澳大利亚，他绘制了南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图。这些数字是通过将库克18世纪的航船“奋进号”的估计航速（6节，1节的速度为每小时1.852公里）输入标普全球普氏航路计算器后得出的。

[2] Andreas Lorenz, “Hero of the High Seas,” *Der Spiegel*, August 29, 2005,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china-s-christopher-columbus-hero-of-the-high-seas-a-372474-2.html>.

[3] Hsu Yun-Ts'iao, “Notes Relating to Admiral Cheng Ho's Expeditions,” in ed. Leo Suryadinata, *Admiral Zheng He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2005), 124–135.

[4] George Yeo, “A Continuing Rise of China,”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October 30, 2019,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opinion/thinkchina/a-continuing-rise-of-china>.

[5] “元”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是蓬勃盛大之意，并非“宇宙的起源”。——编者注

[6] Jean Johnson, “The Mongol Dynasty,” Asia Society, <https://asiasociety.org/education/mongol-dynasty>.

[7] Confuciu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 Robert Eno, 2015, <https://chinatxt.sitehost.iu.edu/Resources.html>.

[8] Ibid.

[9]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2011), 25.

[10]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89–90.

[11] Daniel White, “Read Hillary Clinton's Speech Tout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ime*, August 31, 2016, updated September 1, 2016, <https://time.com/4474619/read-hillary-clinton-american-legion-speech/>.

[12] Terri Moon Cronk, “China Poses Largest Long-Term Threat to U.S., DOD Policy Chief Say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3,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tory/Article/1968704/china-poses-largest-long-term-threat-to-us-dod-policy-chief-says/>.

[13]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Frederic V. Malek Memorial Lecture,” Conrad Hotel, Washington, DC,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frederic-v-malek-memorial-lecture/>.

[14] Daljit Singh, *How Will Shif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fect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2019), 4.

[15] Zhenhua Lu, “‘China, China, China’: Trump’s New Pentagon Chief Patrick Shanahan Sets US Defence Priorit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2180451/china-china-china-new-pentagon-chief-patrick>.

[16] 即《新时代的中国国防》。——译者注

[17]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July 24, 2019, 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1907/24/content_WS5d3941ddc6d08408f502283d.html.

[18] Kevin Rudd, *The Avoidable War: Reflections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Strategic Engagement* (New York: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2019),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1/The%20Avoidable%20War%20-%20Full%20Report.pdf>.

[19]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20] “The Joint U.S.-China Communiqué, Shanghai,” February 27, 1972, https://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shanghai_e.pdf.

[21] Thomas M. Franck,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Among N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

[22] John Bolton, “Revisit the ‘One-China Policy’: A Closer U.S. Military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ould Help Counter Beijing’s Belliger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7, 2017.

[23] Ted Galen Carpenter, “Forget the U.S.-China Trade War: Is a Conflict over Taiwan the Real Thre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8,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orget-us-china-trade-war-conflict-over-taiwan-real-threat-61627>.

[24] Mr. X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25]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January 1, 1979, https://photos.state.gov/libraries/ait-taiwan/171414/ait-pages/tra_e.pdf.

[26]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gust 17, 1982,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doc/ctc/t946664.htm>.

[27] <https://stat.taiwan.net.tw>.

[28] *New York Times*, July 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7/04/business/worldbusiness/04iht-04fly.14224270.html>.

[29] Henry M. Paulson Jr., “Remark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 Paulson Institute, November 6, 2018,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news/2018/11/06/statement-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30] 1海里 = 1.852公里。——编者注

[31] 1英亩 $\approx$ 0.004平方千米。——编者注

第五章

美国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在当前的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表现得像苏联，中国表现得则像冷战时期的美国。

冷战时期，美国经常做出灵活、随机应变且理性的决策，苏联则做出死板、僵硬且教条化的决策。美国在退出越南战争后，未直接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苏联则陷入了不必要的痛苦冲突中，在国际争端中耗尽了自身资源和精力。美国采取了多边行动，引导国际舆论向自己这边靠拢；苏联则采取单边行动，无视国际舆论。美国保持了经济的活力和强大；苏联的经济则停滞不前，军费开支也耗尽了本国资源。

如果把“美国”替换成“中国”，把“苏联”替换成“美国”，你就会看到美国当下的行为与其在冷战时期的战略是多么不同。显然，我们必须引入一些限定条件和细微变量，但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比较是多么一目了然。

本章的主要论点是：美国僵化和死板的决策已经在结构上根深蒂固，这在美国处理军事冲突的方式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便美国能够在一些关键领域理性地做出重大改变，僵化、死板的决策流程仍会使其失利。

拿国防预算来说，可把削减国防预算作为一个理性的案例。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两国都将被完全摧毁），甚至中美之间爆发一场小规模冲突也不可行（这会导致双方滑向全面战争），那么所有理性的战略思想家都会明白，这两个大国之间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会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因此，美国增加军费开支是不合理的，它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可以将整个中国多次摧毁的武器。事实上，美国削减军费开支，把节省下的新资源应用到其他关键领域——比如科技研发——是理性的。

美国海军拥有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便美国将其中一个甚至三个战斗群封存起来，其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这将节省大量的资金。诚如美国海军上校亨利·J·亨德里克斯所言：“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非常高。把相关航空母舰空军联队、五支水面战舰和一艘快速攻击潜艇在总生命周期的成本算进来，再加上近6 700名舰组人员，每个战斗群每日的运营成本约为650万美元。”^[1]同样，其他大量军事开支也可以削减，以节省资金用于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非军事领域。2011年，法里德·扎卡利亚就预见性地警告说，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膨胀失控：

五角大楼的预算连续13年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2001—2009年，美国的国防总开支从4 120亿美元增加到6 990亿美元，增长了70%，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开支最大的时期。算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追加开支，美国的国防开支比在冷战时期的平均数高出2 500亿美元。那时候，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军队都在跟美国及其盟友对抗。在过去10年里，美国没有强劲的对手，国防开支占全球国防总开支的比重却从1/3上升到了1/2。换言之，我们的国防花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如果美国是理性的，那么它就应该减少国防开支。但对美国来说，削减国防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购买武器的决策流程已经锁定。哪怕美国任命包括阿什顿·卡特和詹姆斯·马蒂斯在内的非常有才干的人担任国防部长，无论他们多么聪明，都无法削减国防开支，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现实。

为什么不能削减国防开支呢？因为国防开支并不是由一个全

面合理的国家战略决定的——该战略会评估美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需要哪些武器系统。相反，美国的武器系统采购是国防承包商进行一系列复杂游说的结果。国防承包商聪明地将国防制造工厂部署到美国所有关键的国会选区。因此，那些希望在选区保住工作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决定了为美国军方生产哪些武器系统。温斯洛·T. 惠勒曾在美国参议院和政府问责局负责国家安全事务长达31年，他记录下了国防开支浪费的程度：

他们（参议院国防小组委员会）在削减军队的开支和战备账单，这样就可以增加国防部的研发和采购账单。这就是绝大多数专项拨款——确切地说，是国会的特殊利益项目——的用途。在研发方面，他们按照五角大楼的要求增加了39亿美元，从910亿美元增至949亿美元。在采购方面，他们在五角大楼要求的1 306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8亿美元。这些账单中的一些专项拨款数额巨大。备受争议的F-35战斗机从几个专项拨款中获得了20多亿美元，臭名昭著的濒海战斗舰获得了9.5亿美元，非必要采购的C-130运输机获得了6.4亿美元，等等。[\[2\]](#)

如果这种不合理且浪费的国防开支继续下去，将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在永远不会用来对抗中国的武器系统上花的钱越多，对中国就越有利。简言之，美国的军费开支是送给中国的地缘政治礼物。如果美国的国防支出是理性决策流程的结果，那么现在就应该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包括明智地削减甚至简单地冻结国防支出。但这不会发生。目前，美国已同苏联一样，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非理性决策流程中。

相形之下，中国不会受到任何国防游说集团的束缚。中国会

做出理性的长期防御决策来保证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僵化、机械地思考，可能就会照抄美国，也建造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国这么做绝对是愚蠢至极的。因此，中国把重点放在一个较弱军事力量在非对称战争中会采用的战略上。中国把预算花在先进的陆基导弹上，这可能会使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可能要花费130亿美元。^[3]中国媒体声称，中国的东风-26弹道导弹，有能力击沉一艘航空母舰，^[4]而它只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新技术也在助力中国防御航空母舰。哈佛大学教授蒂莫西·科尔顿告诉我，当航空母舰面临高超音速导弹的威胁时，就成了“活靶子”。这种导弹具有很高的机动性，飞行速度惊人，飞行高度不一。

实际上，这种非对称战争战略是美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强加给中国决策者的。陆伯彬记录了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过程：“在（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后的10个月里，美国和中国就美对台政策重新开启了艰难的谈判。1996年3月，谈判达到高潮，当时，中国通过军事演习和针对台湾地区附近的导弹试验展示了惊人的军力，美国部署了两个同样惊人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回应。”^[5]比尔·克林顿总统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抵达台湾海峡口，威胁着要穿越海峡。中国人猛然发现，他们在面对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时毫无抵抗力。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合理的回应：发展军事能力，确保美国不可能再次制造这种威胁。今天，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决定派遣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之前都会三思。

美国军方使用“反介入和区域封锁”一词把中国的战略描述为具有进攻性的。美军相当于承认了中国战略的有效性。

中国高度的国防理性体现在不增加核武器储备的决定上。美国有6 450枚核弹，而中国仅有280枚。然而，如果280枚核弹足

以阻止美国（或俄罗斯）对中国发动核打击，那么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钱呢？奥巴马总统曾组织了四次核安全峰会和两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6]来讨论削减核武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智的。然而，即便他可以讨论，他也并没有能力将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减少到合理水平。中国领导人却有这种权力，并且明智地做到了。

对美国来说，尽量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痛苦且不必要的冲突也是明智之举。20世纪80年代，苏联因参与阿富汗战争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而被拖垮了。当时（越南战争后），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任何重大的冲突，只是支持了许多针对苏联代理人的秘密行动。这是一项明智的策略。

今天，美国的做法正相反。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美国已经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阿富汗的干预正在彻底失败。2001年，当本·拉登以阿富汗为基地发动“9·11”恐怖袭击时，美国的干预是正当的。事实上，全世界，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这种干预。然而，如果当时美国足够灵活、理性，它会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清除阿富汗的所有基地组织成员，然后撤离。糟糕的是，美国没有寻求任何现实的外交途径来解决阿富汗冲突。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从国际法角度，或者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来看，这都是完全不正当的。美国又一次花掉了数万亿美元。

如果管理美国的是一群敏锐且富有洞察力的战略思考者，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应该尽可能减少参与外部冲突，这才合乎逻辑。美国介入的许多冲突，是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对抗造成的。苏联解体时，美国体面地赢得了胜利。美国本应抓住这场非

凡胜利的奖赏，从对外国冲突的干预中撤出。然而，恰恰相反的情况发生了，这真是令人震惊。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随着冷战结束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出所料，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奉行“自由主义霸权”；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一政策贯穿始终。毫不奇怪，美国在此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而且在几乎所有这些冲突中都未取得有意义的成功。

美国在破坏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稳定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给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忠实的伙伴——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也要为美国造成的麻烦承担部分责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危机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撰写本书时，这场危机毫无缓和的迹象，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别提乌克兰的了。[\[7\]](#)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是一个独立机构，它编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1798—2018年美国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实例》。如果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想机构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服务，那么研究应该显示美国在1989年后减少了干预。研究显示：在冷战结束前的190年里，美国总共部署军队216次，平均每年1.1次；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美国却大幅增加军事干预，动用武装力量152次，平均每年6.1次。[\[8\]](#)

是谁做出这种决定的？这是对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进行全面评估（换作中国也会进行评估）的结果吗？抑或是群体思维的结

果？所有证据都表明是后者。此外，美国选民显然不赞同这种程度的海外侵略；美国的许多行动并未在法律上被定义为战争，并且美国国会对部署军队决定的监督已经减弱，总统让国会辩论只是走走形式。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众多资金充足的战略智库，因此，这里的群体思维倾向实在令人震惊。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在智库上的花费能与美国相比。美国本应该思考更多才对，相反，它的思考却在减少。显然，这些战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应该是保持战略警惕，并在看到被美国忽略的战略挑战出现时，给予美国政府建议。智库之间竞争激烈。智库中有各种观点，从左翼到右翼的都有。在美国，从事战略思维产业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在智库工作的人，还有许多人在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当华盛顿特区政府换届时，他们经常走进或离开政府。显然，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维产业，这个产业还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社会既奖励大胆的独立观点，也奖励背离传统的观点。理论上，没有哪个社会比美国更不易受群体思维的影响了。

然而，群体思维已经掌控了美国对华态度的决策。当中国缓慢而稳定地崛起时，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的战略机构仍然心不在焉，甚至陷入各种不必要的军事干预泥潭之中——这些干预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使中国的战略目标得以达成。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试图探究这种群体思维的深层根源。在其著作《善意制造的地狱》中，沃尔特详细地描述了华盛顿特区的某个产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从美国更多的海外干预中获利，当干预减少时，它就会蒙受损失。用一句形象的中

国话来说，如果美国停止干预，这个行业从业者的“饭碗”就不保了。沃尔特对战略智库和国防工业游说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描述如下：

像乔治·马歇尔这样的公务员，拒绝从公共服务中获利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要大体上被认为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在华盛顿取得成功的职业生涯——哪怕从事一种声名狼藉的职业——就可以为进入私营部门获得丰厚的收入铺平道路。[\[9\]](#)

沃尔特补充道：

夸大威胁也盛行着，因为与驳斥他们的人相比，夸大威胁的个人和团体数量更多，资金也更充足，而且往往享有更高的政治威望。整个军工联合体有明显的动机去夸大外国危险，以说服政府给予它更多的资源。鹰派智囊团从国防承包商和个人那里得到了慷慨的支持。相形之下，提供不那么可怕的评估服务的机构通常资金较少，影响力也较小。[\[10\]](#)

这个庞大而多样的战略思维阶层的许多成员都痛恨这种说法。然而，可以提供几个彰显这种群体思维的实例。最明显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筹备阶段。许多对美国友好的国家——比如巴西、埃及、法国和德国——的重要人物都强烈警告说，这场战争不仅非法，而且是灾难性的。这些警告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奉行群体思维的结果是：花费了近1万亿美元[\[11\]](#)，得到的仅仅是损害了自己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增强了伊朗在该地区

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10年里，中国出现了最迅猛的经济增长。

在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焦头烂额之后，如果美国足够灵活、理性，它合乎逻辑的反应将是避免卷入伊斯兰世界的不必要冲突。然而，美国无法彻底转变态度，这表明它像曾经的苏联一样，已经变得僵化、不灵活和教条主义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府内外的重要战略思考者仍支持对不同的伊斯兰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等。

如果乔治·凯南今天还健在，他会清楚地看到，由于卷入伊斯兰世界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已经在国内外饱受伤害。如果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国，就应该放弃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参与，这是理性的决定，也是合乎逻辑的。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是在地理上远离伊斯兰世界。大西洋和太平洋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两端——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分隔开来。

在21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将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为适应新的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不朽斗争。其间会经历诸多跌宕起伏。世界上许多接壤的国家都学会了如何谨慎、敏感地与伊斯兰邻国打交道和合作。美国尚未培养出这样的敏感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从伊斯兰世界的生存斗争中脱离出来的大国，然而它却决定直接或间接地干预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冲突，这是不明智的。把手指头戳到马蜂窝里是傻瓜的行为，因为总会被蜇到的。因此，对美国而言，从伊斯兰世界完全抽身会更明智。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没有哪个主要人物倡导这种符合常识的行动，哪怕乔治·索罗斯和查尔斯·科赫在2019年英明地成立了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致力于“为以外交接触和军事克制为重点的新外交政策奠定基础”[\[12\]](#)。

过去，美国持续介入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一个战略理由是，它需要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石油。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因此，美国每天花费数百万美元在海湾地区驻军，唯一的受益者是中国，因为此举保护了对中国的石油供应。既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深入参与持续下去只有战略损失，没有战略收益，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看到美国出现一种强烈的共识，即从中东撤军的时候到了。

奇怪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想产业，但相反的事情却在发生。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截然不同，他们几乎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但两人都明白，美国介入叙利亚毫无意义。两人都想减少美国在叙利亚的参与。他们的战略常识本应该受到赞扬，相反的却是，两人都遭到了诋毁。

2013年8月，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13\]](#)奥巴马决定不对叙利亚实施轰炸，这几乎遭到美国战略思维阶层的一致谴责，因为奥巴马曾表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是越过了“红线”。然而，这些谴责者都说不清轰炸究竟会达到何种效果。这会让阿萨德下台吗？也许不会。如果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叙利亚人民是会过得更好，还是会遭受更大的生命损失——就像当初西方干预后的伊拉克人和利比亚人那样。轰炸叙利亚会提升美国的国家利益吗？最重要的是，鉴于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明智地建议过美国应该“尊重人类的舆论”，战略思维阶层的主要成员是否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赞成单方面的轰炸行动。

印度前外交官希亚姆·萨兰写过关于西方干预的文章，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对美国轻率干预行为的看法：

在大多数时候，干预后的情况变得更糟糕，暴力更加致

命，本应受到保护的人们遭受的痛苦比以前更严重。伊拉克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利比亚和叙利亚是最近的两个例子。乌克兰正上演着类似的情况。每一次，干预国都没有认真考量干预可能产生的后果。[14]

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军。他的战略常识本应受到赞扬。然而，他却遭到了攻击。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利斯特发表了一个典型的评论，他说：“下一次，当美国需要在世界某个地方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下战书时，我们也许会‘依靠’或‘通过’当地的合作伙伴来做到这一点。但你认为他们现在会相信我们吗？不会的。”[15]

当利斯特批评特朗普放弃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时，我在想，他是否知道，是奥巴马政府鼓励并协助这些“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阿富汗进入叙利亚的，此前，人们认为美国会打击这个极端组织。[16]

当档案被公开后，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确认美军到底是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运送到了叙利亚，还是在叙利亚与这些武装分子作战。这两项行动都不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我在美国以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困惑，卷入这些冲突对美国没有真正的好处，但在战略思维行业中却有一个极为明确的共识：美国应该继续插手伊斯兰世界的“马蜂窝”。

罗伯特·卡根是一位想为美国卷入军事冲突提供一些理性辩护的学者。他声称，如果美国抽身而退，那么世界将陷入混乱。他的著作《丛林会复生》阐明了一切。如果美国从军事冲突中撤出，世界只会退回到原始野蛮且混乱的丛林时代。卡根如此说道：

在美国力量所创造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空间内，只有自由主义受到了保护，我们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问题不在于什么会摧毁自由秩序，而在于什么能支撑它。如果自由秩序像一个人工培育的花园，总是处在自然力量的威胁下，那么我们就需要与内外部不断滋生的破坏它的藤蔓和杂草进行持久且永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保护这座花园。[17]

这本书备受欢迎，在美国好评如潮。扎卡里·卡拉贝尔为《纽约时报》撰文称：“卡根也许过分夸大了美国在未来能够而且应该发挥的作用，但他有力地强调了世界秩序是何其脆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18]然而，没有一位评论者指出这本书最显著的一点：这是对生活在美国以外近70亿人的侮辱。卡根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文明世界会是怎样的，这暴露出他的理论中令人深感不安的暗示：美国是地球上唯一真正的文明社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21世纪的“白人负担”。简言之，如果美国撤退了，世界将陷入野蛮和混乱之中。

真的会这样吗？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实证答案。几位学者详尽地记载了这个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文明。在《当下的启蒙》一书中，史蒂芬·平克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来说明世界是如何进步的，以及如何变得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文明。史蒂芬·平克说道：“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每一项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他还在书中记录了世界如何取得数量惊人的进步：预期寿命、世界生产总值、人均GDP和社会开支的增长，民主和人权的传播，儿童和产妇死亡率的下降，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极端贫穷、全球不平等以及传染病、自然灾害、饥荒、战争和种族灭绝等造成死亡的人数下降，还有

很多其他方面的改善，不一而足。

同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也记录了世界如何变得更加文明。他写道：

过去的500年见证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革命。地球已被统一为一个单一的生态和历史范围。经济呈指数级增长，今天的人类享有着昔日童话故事中描绘的那种财富。科学与工业革命赋予人类超人般的力量和几乎无穷无尽的能量。社会秩序被彻底改变，政治、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今天，人类已经打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而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情形会在一年内导致全面冲突。什么会使德国和法国在明年爆发战争？或者什么会使中国和日本爆发战争？抑或是什么会使巴西和阿根廷爆发战争？一些小的边境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只有真正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才会导致巴西和阿根廷在2014年爆发老式的全面战争，阿根廷的装甲师横扫里约热内卢的大门，巴西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区的居民区。这类战争可能仍会在几个对手国之间爆发，比如以色列和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或者美国和伊朗，但它们只是证明规则的例外情形。这种状况未来当然可能发生变化，届时回想起来，今天的世界的确天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极度天真是迷人的。和平从未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战争的模样。

卡根应该留心第二段的第一句话：“今天，人类已经打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丛林好像又迅猛地生长起来了。这个地区就是东南亚。这也是地球上检验“美国停止轰炸后世界变得不文明”这一命题的最佳之地。英国广播公司描述道：“奥巴马总统说老挝是历史上被轰炸得最严重的国家。1964—1973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平均每分钟投掷8枚炸弹——投掷量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掷的都要多。美国在老挝上空执行了580 344次轰炸任务，投放了2.6亿枚炸弹——相当于200万吨弹药，一次又一次地命中了南越和北越的许多目标地点，这正是孤立北越共产党军队的部分行动[20]。”[21]

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当直升机不得不从西贡[22]的美国大使馆接走官员时，美国军队也从东南亚灰溜溜地撤退了。在美国这次壮观的撤军和全面停止轰炸之后，东南亚本应陷入混乱。相反，正如我与孙合记合著的《东盟奇迹》所记录的，自1975年以来东南亚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原因虽然很复杂，然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东南亚人觉醒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由自身的决策来决定。一直以来，东南亚被描述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在美国撤军后爆发冲突也不足为奇。然而，正相反，这个地区成了和平与繁荣的灯塔。

卡根书中的基本假设完全错误。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并未退回到丛林状态。相反，正如史蒂芬·平克和尤瓦尔·赫拉利所记录的，世界从未像今天这般文明。因此，美国如果是灵活、理性的，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可喜的全球新环境，在所有外部事务中彻底摒弃重点使用军事手段。美国不应该使用昂贵的武器系统，而应采取老式的外交手段。外交手段也比诉诸武力的成本更低廉。

为什么要用外交手段？在美国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失败并从东南亚撤军后，这里取得的巨大成功应该教会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宝

贵的一课：外交手段有时比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奏效。1984—1989年，我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彼时与美国外交官密切合作，为东盟扭转苏联支持的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外交运动赢得了支持。

这场孤立越南的全球外交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功。1989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难以维持，故而撤军。自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以来，越南和东盟国家对峙了十多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从逻辑上讲，应该是数十年的怨恨和对抗，就像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之后美国 and 伊朗之间那般。相反，越南在1995年加入了东盟，这距离它撤出柬埔寨仅仅隔了六年。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外交和解的例子了。

坏消息是，在美国败走撤军后，东南亚取得的辉煌外交成就本应该让美国看到良好外交的价值，但仍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使美国无法更好地使用外交手段。要练就好的外交手腕，需要优秀的外交官。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外交官，美国需要向年轻的外交官许诺良好的外交生涯，并奖励其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派他们去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首都担任大使，包括北京和东京、伦敦和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然而，在现实中，一位聪明又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所能期望的最佳大使职位，也许是去马里首都巴马科赴任。

为何竟会如此？因为美国当前正“出售”大使职位。最好的职位都被总统竞选活动的捐款人收入囊中了。令人惊奇的是，即便像奥巴马这样的总统——他很懂得这个——也给富有的捐款人提供了创纪录的美国大使职位。美国外交人员协会2014年的数据显示，“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截至目前，提名的政治任命人数超过了一半，创下了新纪录，相比之下，最近几届总统倾向于提名大约1/3的大使职位给捐款人和朋友”[\[23\]](#)。毋庸置疑，其中

一些捐款人是有能力的，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鉴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筹集大量资金，慷慨的捐款人又期望得到称心的大使职位作为回报，因此，美国现在几乎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可与中国匹敌的职业外交官团队。雪上加霜的是，哪怕美国国务院的预算（315亿美元）与国防部的预算（6260亿美元）相比实在微不足道，[24]许多美国政客仍在努力地削减它。法里德·扎卡利亚描述了这么做的危险性：

自冷战以来，美国国会倾向于“养肥”五角大楼，却让外交政策机构“忍饥挨饿”。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指出，军队队员比整个美国外交部门的成员都要多。任何实地观察过美国外交政策的人都能看到这种不平衡。参加重要问题谈判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们在经过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抵达了目的地，他们没有助手，衣服也皱巴巴的。他们的军事同行搭乘的机队也降落了，数十名助手前簇后拥，有大笔资金可供挥洒。社交媒体将已故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称作时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文职同行”，如果霍尔布鲁克看到估计会大笑着说：“彼得雷乌斯的飞机比我的手机都要多很多。”[25]（霍尔布鲁克有多部手机。）

在雷克斯·蒂勒森短暂又悲催的国务卿任内，他试图削减国务院开支。《芝加哥论坛报》对他的工作描述道：“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一通报国会，在国务院大调整中，大部分美国特使职位——包括气候变化特使和伊朗协议特使——将被废除，他们的职责将被重新分配。根据该计划，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残疾人权利以及关闭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事务的特使将被取消。……在目前的66名特使或代表中，有30人将留任，削减了约55%。9个职位将被彻底废除。……预计会削减大约1/3的预

算，裁撤数千个工作岗位。”[26]蒂勒森离职后，在蓬佩奥的领导下，虽然刚开始情况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2019年10月，美国最精明老练的外交官之一威廉·J·伯恩斯指出：“在我35年的外交官生涯里，自豪地服务过两党的5位总统和10位国务卿，我从未见过今天这种对外交的攻击——不仅损伤国务院这个机构，还破坏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他指的是“对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的卑鄙对待，她因为妨碍总统请求外国势力干涉美国选举而被解职”[27]。很难相信这些事态的发展不会打击美国外交官的士气。

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不太可能通过武力来解决，而更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那么美国加强军事而削弱外交的选择就是完全背离逻辑的。但这恰恰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因为从结构上看，美国不可能在拥有既得利益的领域做出180度大转弯。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准确地记录下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做出的一项最具灾难性的决定：放弃外交。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结构性原因可以解释美国的做法。说到底，外交是一门互谅互让和做出明智妥协的学问。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享有着世界历史上短暂的单极时代的好处。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坏消息是，它丧失了同世界其他国家妥协的艺术。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后，美国开始变得越发自信。我当时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按要求主持谈判一份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计划下关于帮助贫穷非洲国家的文件。谈判按常规进行。各国表明了自己的开放立场。像往常一样，捐助国（包括美国和欧盟）与受援国（非洲各国）之间的立场存在巨大鸿沟。最后，经过数周的谈判，经过大量的让步

（贫穷的非洲国家别无选择，它们比捐助国做出了更多的让步），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份妥协文本。最后一天，就在我们即将通过这份妥协文本的前一刻，美国代表团举手表示，他们收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指示：财政部突然发现，在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妥协文本中，某些内容存在问题。所有与会国家都怒火中烧，但这并不重要，美国是如此强大，它可以忽略世界其他国家的情绪。

这一幕反映出美国外交的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外交官从本国政府那里接收一系列指示，因此，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别国的谈判上。美国外交官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几乎花费90%的时间与华盛顿特区的几个机构交涉，以获得一套合理又不自相矛盾的指示。在这番痛苦的交涉后，美国外交官们拿到的指示让他们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各国能够灵活地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谈判才能成功。但美国外交官在这方面先天不足。美国国内机构的绝对权力和自相矛盾的要求，使美国谈判代表没有多少灵活的空间。

与此同时，外交前线也传来好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特区的许多重要机构已经搭建起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良好专业知识。讽刺的是，这是维基解密泄露的一批美国外交文件透露出的信息。泄密事件发生后，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卫报》上写道：“我本人对美国国务院的看法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我们发现这里的東西往往是一流的。”^[28]

我在新加坡外交部与美国外交官共事了30多年，个人经验告诉我，美国国务院不缺乏杰出的外交官。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一些相当优秀的外交官都是美国人，包括托马斯·皮克林、查斯·弗里曼和约翰·内格罗蓬特这样的职业外交官，并且我还能说出更多人。显然，只有存在一个选择和培养人才的有效生态系统，

才会诞生如此杰出的专业人士。

然而，毋庸置疑，这一生态系统已经被包括雷克斯·蒂勒森和迈克·蓬佩奥在内的最近几任美国国务卿的糟糕领导破坏了。特朗普也削弱了许多美国政府机构的权力，他并不尊重它们。不少美国外交官以辞职表示抗议，然而，大多数人却选择留下来。因为有朝一日当合适的领导人出现时，美国国务院有望恢复活力，再次成为一个有效的外交机构。

如果现任美国政府能够学会倾听的艺术，听取美国外交官的意见，制定出与全球人民的观点和情绪相协调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取得长足进展。理论上，这该是最容易做出的大转变，因为美国政府只需要去听取本国外交官的建议。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专家的建议不值一提。很多时候，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明智的外交建议。

所有这些都引向一个悲观的结论。如果美国想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新的地缘政治挑战，那么它就需要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转变，包括削减军事开支、退出对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军事干预，以及加强外交能力。然而，美国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使其不可能做出任何明智的大转变。

在本章伊始，我对今日美国和昨日苏联进行了一番痛苦的比较。我用一个更痛苦的比较来总结。历史学家可能会继续争论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为什么强大的苏联，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强国，会如此突然又悲壮地崩溃呢？

原因有许多，有说过的，也有没说过的。然而，可能有一个关键因素缺乏充分的讨论：苏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考虑过它走向失败的可能性。

美国不存在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危险。因为美国比苏联强大得

多，拥有伟大的人民、制度和许多自然优势。然而，即便美国不会完全崩溃，它也可能大大衰落，变得羸弱不堪。任何比较现实的分析师都可以描绘出美国国力将如何变得衰微。但许多美国人无视这种情形。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为失败未雨绸缪，失败就会来临。

可悲的现实是，许多美国人虽然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新挑战，但却无法采取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并预想美国可能以何种方式失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管情况怎样，美国都会赢，因为美国必胜。对美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基于五个关键假设。

第一个假设，美国必将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胜，就像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胜德国和日本，在冷战中最终战胜苏联一样。简言之，认为美国会输掉一场竞争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假设，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持续，必将崩溃，因为共产主义政府最终都会失败。第三个假设，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无须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或牺牲。第四个假设，美国依托英明的宪法和法治，建立起一个基本公正和秩序良好的社会，因此，在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社会无须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第五个假设，要在“自由灯塔”和“山巅闪光之城”（美国），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间做出合作选择时，大多数国家会本能地倾向与美国合作。

如果美国人想现实地思考一下有朝一日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那么他们可以从质疑上述假设开始。事实上，这五种假设都有可能被证明不成立。让我们逐一拆解。

第一，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轻松地打败中国，就像打败德国、日本和苏联一样。这种信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即挑战的规模相同。的确，美国的人口和资源总是优于昔日对手的。

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地球上绵延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强大而有韧性的文明在恢复元气时，会爆发出巨大的文明能量和力量。

第二，接着第一点往下谈，跟美苏竞争不同，美国不是在与中国共产党竞争。中国领导人的目标不是在全球推广共产主义，而是专注于复兴和振兴中华文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招募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可以用一个小类比来解释这个关键点。当美国与苏联竞争时，就像哈佛大学（美国）与资金不足的社区大学（苏联）竞争。但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恰当地比作哈佛大学（中国）和一所中等水平的州立大学（美国）的竞争。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着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第三，按人均水平计算，美国拥有的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然而，与往昔不同，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再由物质资源决定，而是取决于智力资源，尤其是研发投资所产生的资源。美国的研发预算已经见顶，接下来会下降。中国的研发预算将继续攀升。参见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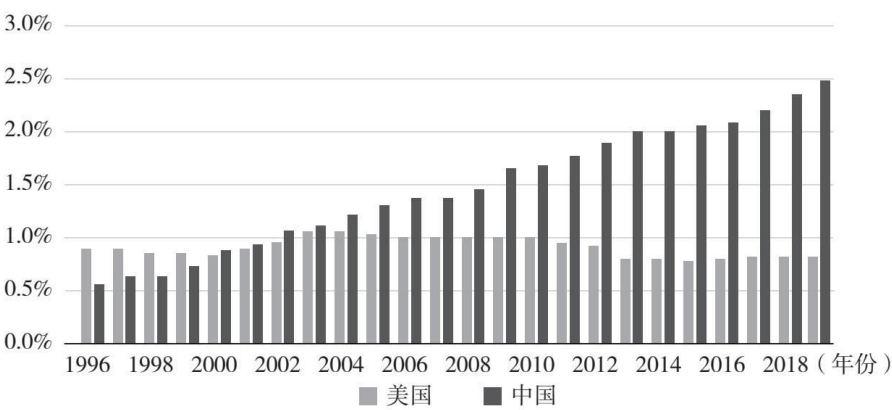


图5.1 美国与中国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019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博士指出：“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迅速、大规模地生产先进技术产品，迅速将创新成果投入市场。”他补充说：“除非美国对这一挑战的规模和强度做出紧急而审慎的反应，否则我们可以预期，从个人通信到商业、健康和安全等领域，在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国家和最尖端科技产品的来源国。”^[29]如果美国想让研发预算跟上中国的步伐（中国经济将在大约10年内超过美国），就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削减一些预算项目。然而，正如本章所述，美国无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华盛顿特区的游说集团实力深厚、战无不胜。在美国政治中，逻辑和常识无法战胜金钱的力量。

第四点与第三点有关，美国不再是一个公正有序的模范社会。今天，如果约翰·罗尔斯或其他任何一位西方道德哲学家对美国进行考察，他们都会清楚地看到，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特权阶级社会，而不是开国元勋们努力构建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同于早期定居者们抛下的欧洲封建社会。事实上，如果开国元勋们今天还健在，他们会很震惊：美国统治精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权，留给其他人的政治权力是何其少。例行的总统和国会选举并没有真正剥夺统治精英的实权，只是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民以为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第五，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美国社会似乎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当时，美国显然是一座“山巅闪光之城”。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既丧失了战略素质，也失去了激励全人类的物质和道德能力。

简言之，美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二的信心建立在五个满是瑕疵的假设上。美国必须审视自己的信心，考虑变为世界第二强国的可能性。理解这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是在美国发动一场公众讨论：如果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届时世界将如何看待它？但要开始这场辩论，必须有一位勇敢的美国政治家提议——这当然无异于是一种政治自杀。悲哀的是，尽管美国有鼓励公开辩论的传统，但在这方面，美国的心胸不够宽广，无法容忍公开讨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时会发生什么。即便在公开讨论一些新的话题上，美国也无法做出大转变。

[1] Henry J. Hendrix, *At What Cost a Carri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3),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Carrier_Hendrix_FINAL.pdf.

[2] Winslow T. Wheeler, “Those Porky Pentagon Earmark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ose-porky-pentagon-earmarks-never-really-went-away/>.

[3] Zachary Cohen, “US Navy’s Most Expensive Warship Just Got Even Pricier,” CNN, May 15,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15/politics/uss-gerald-ford-aircraft-carrier-cost-increase/index.html>.

[4] David Axe, “Report: China Tests DF-26 ‘Carrier-Killer’ Missile (Should the Navy Be Worri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30,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report-china-tests-df-26-carrier-killer-missile-should-navy-be-worried-42827>;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37152.shtml>.

[5] Robert S.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87–123.

[6] Alicia Sanders-Zakre, “Timeline: Arms Control Milestones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December 2016,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6_12/Features/Timeline/Arms-Control-

Milestones-During the-Obama-Administration.

[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3.

[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18*, CRS report, updated December 28, 201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2738/23>.

[9] Stephen M.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09.

[10] Ibid., 161.

[11] Neta C. Crawford, “Costs of War,” Wats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Brown University, November 14, 2018,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2018/Crawford_Costs%20of%20War%20Estimates%20Through%20FY2019.pdf.

[12]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https://quincyinst.org/>.

[13] Ben Rhod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Syrian ‘Red Line’ Crisis,”*The Atlantic*, June 3,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6/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syrian-red-line-crisis/561887/>.

[14] Shyam Saran, “The Morning-After Principle,”*Business Standard* (New Delhi),June 10, 2014,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opinion/shyam-saran-the-morning-after-principle114061001300_1.html.

[15] Natasha Turak, “Trump Risks ‘Damaging America’s Reputation for the Long Term’with Syria Withdrawal, Experts Warn,” CNBC, December 22, 2018, <https://www.cnn.com/2018/12/22/trump-may-be-damaging-us-credibility-with-syria-withdrawal-experts.html>.

[16] Kishore Mahbubani, *Has the West Lost It?: A Provocation* (London: Penguin, 2018), 55–56.

[17] Robert Kagan, *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New York:Alfred A. Knopf, 2018), 9–10.

[18] Zachary Karabell, “What Is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Three

Authors Offer Very Different Views,”*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16/books/review/robert-kagan-jungle-grows-back.html>.

[19] 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New York: Viking, 2018), 52.

[20] 1976年南越和北越统一，建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者注

[21] “Laos: Barack Obama Regrets ‘Biggest Bombing in History’,” BBC News, September 7,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7286520>.

[22] 西贡是越南胡志明市的旧称。——编者注

[23] Michele Kelemen, “More Ambassador Posts Are Going to Political Appointees,”*All Things Considered*, NPR, February 13,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2/12/275897092/more-ambassador-posts-are-going-to-political-appointees>.

[24] 这些是2017年的数据。See Table 5.2—Budget Authority by Agency: 1976–2024, Historical Table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omb/historical-tables/>.

[25] Fareed Zakaria, “Why Defense Spending Should Be Cu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y-defense-spending-should-be-cut/2011/08/03/gIQA5RuqsI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17e7a8ac3d8b.

[26] Josh Lederman, “Tillerson to Cut More Than Half of State Department’s Special Envoys,”*Chicago Tribune*, August 28, 2017,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nationworld/politics/ct-tillerson-state-department-special-envoys-cuts-20170828story.html>.

[27] William J. Burns, “The Demolition of U.S.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4, 2019.

[28] Timothy Garton Ash, “US Embassy Cables: A Banquet of Secrets,”*Guardian*(Manchester, UK), November 28,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nov/28/wikileaks-diplomacy-us-media-war>.

[29] L. Rafael Reif, “China’s Challenge Is America’s Opportunit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8/opinion/china->

technology-trade-united states.html.

第六章

中国的民主

许多见多识广的中国观察家，比如夏伟和沈大伟，都认同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许多关键成员的假设：美国继续与中国接触，将使美国的价值观渗入中国，中国将逐步开放其政治制度，加入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库尔特·坎贝尔是一位诚实的政策制定者，他明确地指出这些都是美国的期望。在2018年《外交事务》杂志3—4月刊上，他在与埃利·拉特纳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从尼克松时期中美开始建立友好关系以来，）加深中美商业、外交和文化联系将改变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这项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哪怕是对中国的意图将信将疑的美国政策界人士，也会抱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即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可以轻松地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喜欢的样子。”^[1]

为什么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和中国密切接触将使美国影响中国的政治演变（而非相反）这一观点是合理的呢？一个简单又诚实的答案是：美国人坚信民主国家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共产主义制度是错误的。这种信念在苏联共产党轰然倒台后被大大加强。历史学家习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事件。从历史角度来看，显然，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尚不到250年。相形之下，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如果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发展近乎美国政治历史的十倍之久。毫无疑问，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对美国政治决策者的坚定信念感到困惑：一个更小、更年轻的共和国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口是其4倍，历史比其长许多的国家的政治演变吗？

中国人会透过自己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历史。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时光里，中国遭遇分裂破碎的次数比它被团结凝聚起来的次数要多。每一次中央政治控制崩溃后，混乱就会滋生，中国人民会遭受一系列苦难，从饥荒到内战和暴力猖獗。在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最大的恐惧是混乱。中国经历过许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时期，包括从1842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

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面临着陷入混乱的真正危险。有两个重大的挑战出现了，它们可能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第一个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政治派系。第二个挑战是腐败的爆发。1978年邓小平实行“四个现代化”政策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释放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积累。利用这些巨额财富去影响公共政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诱惑。如果这种派系主义和腐败的双重威胁没能被有效地消除，那么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失去其合法性和政治控制。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乔治·马格努斯这般描述习近平主席的举动：“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必须重启和再加强，中国必须改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的时间将和苏联共产党治理苏联的时间一样长，自由化和开放曾被认为是苏联共产党走向覆灭的原因。”^[2]

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西方读者相信，在当前的国家和全球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强有力的治理，也许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然而，如果当代西方思想家从前几代西方思想家那里寻求建议或指导，他们就会找到可以采纳的好建议。马克斯·韦伯给出这样一条建议。在一篇著名文章中，他

写道：“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3]

可以说，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强大中央控制，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如果马克斯·韦伯还在世，他会惊讶地看到，西方居然没有强有力的声音来观察和记录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稳定和理性的统治中获益的。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有很多原因。大多数中国人都清楚，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001年，当塔利班在巴米扬摧毁保存了14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古佛像时，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那些震惊的西方人，对塔利班的此番行径怒火中烧，但他们却没有记住或提到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圆明园的行径就像塔利班一样。下面是对该事件的一段叙述：

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的主要居所，里面有数百座宫殿，包括寺庙、藏书楼、戏院、亭台楼阁、小教堂等，陈列着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文物和私人物品。为了确保公平分配这些皇家财产，指挥官们同意任命“奖品代理人”来实施分配。随后是一场肆意掠夺的狂欢，其间，任何无法被运走的东西都被摧毁了。

接下来，10月18日，英国军队收到埃尔金勋爵的命令，发动最后一击——点火，为被中国囚禁并死亡的英国和印度

囚犯报仇。这个埃尔金勋爵是拆除希腊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老埃尔金勋爵的儿子。

圆明园太大了，几乎是紫禁城的5倍、梵蒂冈的8倍，所以他们用了将近4 500人的步兵师——包括4个英国军团和第15旁遮普军团——才把它点燃。镀金的横梁倒塌了，瓷制的屋顶变形了，湖面上积满了灰烬，余烬像雪一般飘落在北京城，城上空的浓烟遮住了太阳。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体弱多病的30岁的咸丰皇帝吐了血；不到一年，他就死了。[\[4\]](#)

如果中国突然转型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主导政治格局的将不会是像美国民主党领导人约翰·肯尼迪或贝拉克·奥巴马那般平静和安抚人心的声音，而会是像唐纳德·特朗普或西奥多·罗斯福那样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就崛起为世界强国而言，2020年的中国可能正处于19世纪末美国崛起时的那种地位，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因此，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明智地警告美国同胞：不要期待中国人“会像我们一样”。

在过去大约十年时间里，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对中国在南海的进取行为提出了强烈抱怨。很多抱怨都是有道理的。然而，美国人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由西奥多·罗斯福决定中国的南海政策，他会怎么做？毫无疑问，他会觉得，与其他声索国相比，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强国，在南海控制的岩石和珊瑚礁数量更少，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种情形下，西奥多·罗斯福会怎么做呢？他会让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所有地理区域都归中国。今天，中国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但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做，这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不想扰乱国际秩序的愿望。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突然变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西奥多·罗斯福式的领导人，奉行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习近平主席这样奉行克制和不干涉原则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但在实践中，情况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不是由步履蹒跚的年老官员管理的，相反，它变成了一个精英治理体系，只选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晋升到最高级别。中国共产党并不完美，没有哪个人类机构是完美的。它犯过错误，比如在21世纪前十年里没能有效治理腐败。然而，事实上，与世界上的同行们相比，中国的统治阶层做出的善政（在改善公民福祉方面）比今天任何其他政府都要多。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所有的中国观察家都应该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一组美国谈判者和一组中国谈判者坐下来谈判时，哪一组的思维品质更好？也许在20世纪60—90年代，答案应该是美国人。今天，答案则可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政府有能力吸引最好的人才在党内服务。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休假时，我的研究助理是一名非常聪明且年轻的中国硕士研究生。她跟我谈起过她的梦想。高中毕业时，她想成为学校的尖子生，这样就会被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用她的话来说），她失败了。不过幸运的是，她在大学里表现优异，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1971年开始外交生涯以来，我一直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令我惊讶的是，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的思维品质一直在提高。可悲的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外交部门的发展轨迹恰恰相反。

因此，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要想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美国官员应该花些时间去调查中国邻国的领导人和官员，问问他们如果中国共产党下台，他们会不会更高兴。我住在中国的邻国，可以有信心地说：中国的大多数邻居更希望看到中国由像习近平主席这样冷静理性的领导人领导，而不是由中国版的唐纳德·特朗普或西奥多·罗斯福治理。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当然，如果考虑存量，美国仍是气候变化的头号“贡献者”。2015年12月，当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巴黎达成一项全球协议时，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当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时，全世界都震惊了。那一刻，美国拒绝承担任何应对全球变暖威胁的责任，中国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且，中国还有正当的理由。

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中国因环境问题而饱受批评。许多批评很有道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却几乎被忽略了。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共产党有权力和权威去改变。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部兼职教授陆恭蕙描述道：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设想可以在中国的生态承载力范围内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未来发展，以及治理生态退化。它优先考虑减少污染，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解决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在理论层面，这是党向来重视的，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驾齐驱。……为了贯彻新思想，中国政府实施了许多重大改革，包括发布环境破坏赔偿准则，加强环境执法，扩大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建设国家公园，指定高级官员负责河流保护工作，限制工业项目，促进绿色金融来为中国的转型筹集资金。[5]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这与近代史上的做法恰恰相反。20世纪出现的两个最大的全球强国是美国和苏联。它们的情况表明，尽管其意识形态定位不同，但自诞生伊始就亮出了“帝国主义”的肌肉。例如，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写道，西奥多·罗斯福坚信“（人类）物种中最强大、最敏捷的人”应该“统治人类王国……在他看来，（这）指美国人”。[6]类似地，当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变得强大时，苏联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这些国际武器，来协调苏联领导下的不同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并给予其财政支持，以抵制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下面是苏联共产党毫不犹豫地资助其他国家的革命和颠覆活动的一些例子：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发起了针对西方的政治暴力浪潮。意大利的“红色旅”和德国的“红军旅”都通过抢劫银行、绑架和破坏活动来恐吓欧洲。苏联人想利用这些左翼恐怖团

伙来破坏意大利和德国的稳定，以瓦解北约。……苏联的设备、资金、培训和指导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要么直接由克格勃[7]提供，要么通过核心盟友的机构——如罗马尼亚安全局、古巴情报总局——来提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热情高涨地接受苏联的恐怖资助。克格勃第一任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将军在1971年说过一句名言：“劫持飞机是我发明的。”这指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劫机事件。在20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发生5起劫机事件；1969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82架飞机。[8]

苏联越是强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就越多。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越强大，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就越少。1949—1976年中国共产党都在支持海外共产党，尤其是东南亚的共产党。比如中国共产党支持了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共产党。1978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告诉邓小平：“中国在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所以我的东盟邻国希望新加坡与它们团结起来，不是对抗苏联，而是对抗中国。”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兄弟政党的支持就逐渐停止了。[9]而苏联共产党则不然。

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展示过实力。它展示了，这是大国的正常行为。当它感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做出回应。例如，在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挪威便被中国“雪藏”了。中国大幅减少了与挪威的贸易，并拒绝与挪威进行任何高级别外交往来。[10]同样，当在韩国总统朴槿惠领导下的保守派政府于2016年同意美国在韩安装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对韩实施非官方制裁来予以回击，比如，禁止中国旅行社销售赴韩旅游的套餐。结果，“2017

年前7个月，中国赴韩游客数量几乎减半，从2016年同期的470万人次下降到250万人次”。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也宣传抵制现代汽车，以至于“第二季度，（其）在中国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4%”。乐天——一家将土地出让给韩国政府以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企业集团，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乐天在韩国的免税商店业务受到中国游客数量暴跌的影响。该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数十家零售店也被官方关闭。……该公司表示，第二季度在华超市业务的销售额暴跌了95%。”^[11]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中国是认为国家利益遭到了攻击，才做出直接回应的。这并非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无端干涉。

近来，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学者、学生，甚至海外华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在这方面，一群美国学者在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中提出了最强烈的指控，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在广泛地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来推进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显著加快了在这方面的投资并加强了实施力度。”这些目标包括“宣扬认同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压制其他观点，拉拢美国重要人物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此外，“由于政治力量无孔不入，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公民团体、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都受惠于政府，并经常被迫为国家利益服务”。^[12]虽然有时候，中国政府代表会干预一些批评中国的事件，但鲜有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在系统性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看看这个例子，在马里兰大学夏季毕业典礼上，一个名叫杨舒平的中国女留学生代表发言，对美国的“民主与自由”赞美有加。她的演讲开篇是：“人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要来马里兰大学？我总是回答：为了新鲜的空气。……我还很快就感受到了另一种新鲜空气，我将永远感激它。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新鲜空气。民主和

言论自由不是想当然得来的。民主和自由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新鲜空气。”几小时后，演讲视频就在中国疯狂传播开来，“第二天，就有了5 000万的点击量、成千上万条网民批评留言”^[13]。该校中国学生学者协会也对她进行了批评。随后，杨舒平在微博上道歉，她写道：“我深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深感自豪，也希望今后用自己在国外的所学弘扬中国文化，为国家做积极贡献。演讲只是分享自己的留学体验，完全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或贬低之意，在此深表歉意，并衷心希望大家给予谅解，今后会吸取教训。”^[14]

虽然中国民众对这名海外学生的言论反应激烈，但是有这种反应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干涉美国内政。没有实际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这么干了。简言之，中国一直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去捍卫正常的战略利益。对《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报告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未能区分“正常的”政治活动和“反常的”破坏其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系统性企图。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中国在从事后者。对此，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助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谢淑丽，也对这份报告提出了异议，她写道：

我对报告中部分具体的事实研究没有异议，但我认为，这份报告整体上夸大评估了当前中国对美国施加影响的威胁，对此我保留不同意见。报告讨论了非常广泛的中国活动，其中只有一些构成了对美国社会强制的、隐蔽的或腐败的干涉，没有一项活动真正地破坏我们的民主政治体制。未区分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会影响报告的可信度。将大量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混为一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只会夸大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的这个时刻，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过度

反应，让人想起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以及反中版本的“红色恐慌”——这会把所有华人都置于怀疑的阴云之下。现在，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过度反应可能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实际上大于中国扩大影响力所造成的伤害。因此，我认为必须对该报告的总体威胁评估持有异议。[15]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这与其规模和影响力不甚相称。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任何境外战争的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显然都参加过境外战争。本书从几个方面谈道，中国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维护14亿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去影响国外60亿人民的生活。这就是中国表现得像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大国——的根本原因。它这么做，也是在为国际体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处理国内的抗议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克制。以香港为例。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19年3月29日试图通过立法与台湾和内地签署“引渡协议”以来，香港备受示威活动的影响。她于2019年9月4日正式撤回条例草案后，示威活动仍在继续。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以来，香港已合法地成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许多分析人士曾预测，中国的中央政府将对香港进行军事干预，镇压香港的示威活动。中国很有可能这么做。然而，到2019年10月我撰写此书时，中国还没有这么做。

的确，中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行为相比。1961年，印度面临家门口棘手的葡萄牙殖民地果阿的问题。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都建议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保持克制，不要入侵果阿。尼赫

鲁却无视他们的建议，发动闪电攻击，于36个小时后，也就是1961年12月19日占领了果阿。同样，罗纳德·里根总统面对美国家门口格林纳达这个麻烦不断的小国家时，也在1979年以一场左翼革命推翻了该国时任总理埃里克·盖里的统治，由莫里斯·毕晓普取而代之。格林纳达对美国根本构不成威胁，它只是制造了一些麻烦。实际上，入侵格林纳达是违犯国际法的。1983年10月25日，美国抛开所有限制，入侵并占领了格林纳达。相形之下，作为大国，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得格外克制。

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要示威呢？西方媒体的说辞是，他们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制度。当然，示威活动中的一些声音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当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游行示威时，他们主要是对社会经济不满，而并非受到理想的驱使。这也同样适用于香港。尽管近几十年来香港经济表现良好，但香港底层50%的人（与中国内地底层50%的人不同）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情况甚至恶化了，这些底层50%的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住房条件。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经常互学互鉴。但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差别。在新加坡，100万美元可以买4套公共住房（每套1 000平方英尺[16]）；在中国香港，同样的钱只能买到250平方英尺，面积是新加坡的1/16。香港的许多工人阶级都生活在“兔子洞”里。尹伟文和张友朗两位学者进行了一项细致的研究，表明“房价强化了香港本已突出的本地身份认同”[17]。许多经验丰富的香港观察家也指出，香港穷人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住房。

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有过战略失误。1997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70%的目标……（并）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8.5万

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18]。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几位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大亨们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这些大亨欺骗了政府，让政府相信他们是最清楚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的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假的承诺。相反，如果中央政府当初听取董建华的建议，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170万套公共住房，那么香港的公众示威活动可能会减少，甚至不会发生。西方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的斗争是自由斗士和专制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但真正的斗争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和一些房地产大亨之间的斗争。好在目前还不算太晚。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和资源，说服香港政府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还可以建议那几位香港大亨撤回对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

然而，所有这些战略克制的事实，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描述，都引发了一个明显的道德哲学问题：让中国人民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从而让全世界享有理性的全球公共政策的好处，这公平吗？美国人也从中国理性的全球公共政策中受益了。因此，有人也许会问：中国公民被剥夺了美国人享受的自由，美国人却从中国人缺乏的权利中受益，这公平吗？

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假设：美国人充满活力，生活欣欣向荣，中国人则不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本章所述，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美国人对这一说法的明显驳斥是：中国人还没有享有美国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更加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对中国人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们丰富悠久的历史。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人民经历了王朝统治的良性发展时期

（例如公元618—907年的唐朝）以及混乱和分裂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的记录与之相比又如何呢？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即1949—1979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如卫生和教育）确实有一些改善，但也蒙受了许多苦难。在1979—2019年的40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有过的。值得留心的是，中国好的治理通常持续两三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1876—1879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1 300万人），1907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2 500万人），以及震惊世人的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进而认为中国人民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不拿自己的状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较。相反，他们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能看到的是，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1980年，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中国人根本无法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或从事什么工作。当时也没有中国游客出国旅行。但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1.3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更令人惊讶的是，这1.34亿中国人也自由地选择了从度假地回到中国。

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关于中国，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独立的国际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几个国家的信任度，发现在国内民众信任政府方面，中国排名第一，美国却排名第十五，中国的得分（84%）也是美国（33%）的两倍多（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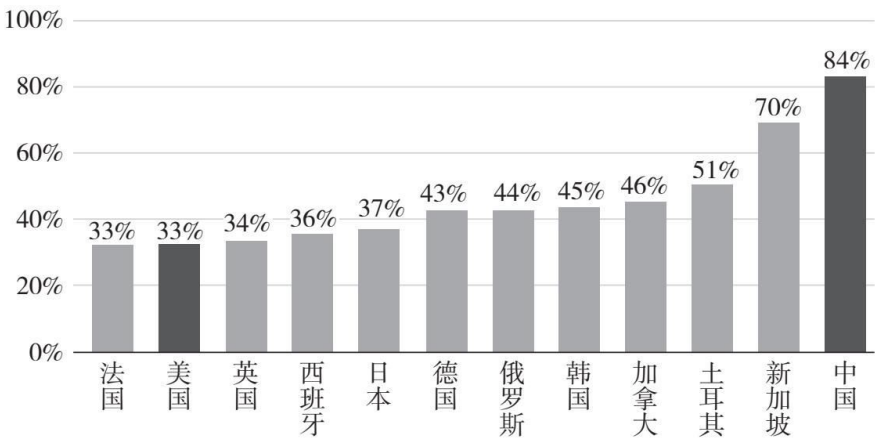


图6.1 2017—2018年政府信任度

数据来源：《2018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19\]](#)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索罗斯说对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中国过去存在政治压迫。所有基于威权模式的政府都别无选择，只能压制政治异议，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皆须如此行事。然而，如果镇压是政府统治的唯一目标和手段，那么这种政府就无法也不可能持

续存在下去。在21世纪，一个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这两个目标都在引人注目的改革中实现了。1981年，即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计划后不久，超过50%的中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20\]](#)今天，只有不到5%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21\]](#)在谈到中国经济腾飞时，就连王赓武教授这种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评论说：“很少有人预料到中国的脱贫进展如此之快。”[\[22\]](#)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18年，这一数字是1.5倍。再过一二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自由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美国人都清楚，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每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成为总统之前都是千万富翁；像唐纳德·特朗普、罗斯·佩罗、迈克尔·布隆伯格、霍华德·舒尔茨和汤姆·斯泰尔这样的亿万富翁也都有政治野心，并且活跃在政坛上。乔治·索罗斯和科赫兄弟虽然没有竞选公职，但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大量资金。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正在激增。麦肯锡的一份报告称：“2000年，只有4%的中国城市家庭属于（中产阶级），而2012年这一比例为68%。”[\[23\]](#)2015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24\]](#)然而在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了，中产阶级却在减少。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如果政府无视他们的要求，便可能导致一场革命在街头爆发，然后政府可能会被推翻。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对此，西方社会的例行回答是：镇压阻止了这种情形。但是几千年来，每一个中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选择反抗，再多的镇压也压制不了。这也是为何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中，当起义遍地爆发时，中国皇帝会被视作丧失了“天命”。对这一概念，国际关系学者卢克·格兰维尔解释道：

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时间里，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王国的体系。这些年间，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发展出一种以“仁”为道德基础的政治哲学。孟子借鉴了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早期的“天命”思想，主张“天为民立君”。统治者只有获得人民的支持才会拥有天命，因为天意是通过“民心”来传达的。反之，人民也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们的统治者担起责任。他们有权驱逐一个独夫，甚至杀死一个暴君。[25]

因此，镇压并不能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保持平静。他们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的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只要中国政府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广大中国人民清醒又理性——他们确实如此，那么他们希望看到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中国没有频繁开展民意调查，但偶尔会进行一些。所有这些调查都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满意度最高、最乐观的群体之一。根据皮尤2015年的一项

调查，88%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面临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一代更好，相形之下，其他新兴国家的比例中值为51%，美国为32%。[\[26\]](#)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遭受着“镇压”，那么民意调查会显示出这种信心吗？

中国政府不能仅仅依靠镇压来保持政治稳定，还有一个功能性的原因。说到底，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清楚，一位英明的皇帝不会对自己的人民作威作福。因此，罗纳德·里根不得不援引中国的政治智慧来描述明智而有益的规则，他用老子的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27\]](#)

只需要比较一下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就能看出相较于苏联而言，中国并没有那么压抑。苏联不允许任何国民出国旅行，因为担心他们回国时带回可能威胁苏联共产党统治的思想；而中国允许1.34亿人自由出境。苏联还严格控制入境外国游客的数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几乎不存在外国旅游。国际旅游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始于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时……苏联需要硬通货，并希望通过向外国人展示一些精心挑选的景点来获得政治利益。同期，国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不对国际游客开放……”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协定》以后，“外国游客的数量从1956年的不到50万人次增加到1981年的500多万人次，1988年时增至600多万人次”。然而，大多数外国游客来自苏联集团国家，“1972年，他们占外国游客总量的62%，1988年，占到67%”。[\[28\]](#)简言之，很少有外国游客去苏联。相形之下，去往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激增。2018年，中国总共接待外国游客1.41亿人次。[\[29\]](#)

苏联绝对不会允许本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的思想遭到美国大学里放任的学术自由的腐蚀。然而，中国却派出了数百万

名非常优秀和聪明的人。在2016—2017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有35.1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2016年，中国有54.45万人出国留学，是2008年出国留学人数17.98万的3倍多。[30]

与苏联相比，中国人民享有的相对自由也表现在赴中国的游客不会认为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我去过乌鲁木齐和喀什，除了这类城市，在中国其他城市的街头你几乎看不到警察。中国的社会秩序相对较好，这是中国人自愿遵守社会规则和规范使然。在幸福感方面，中国底层人口与美国底层人口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就人均收入而言，美国底层人口更富裕。然而，从社会进步角度看，中国底层人口的平均收入虽然起点更低，但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我的同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柯成兴教授提供的资料看，相比之下，1980—2010年，美国底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在不断下降。[31]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会出生在一个社会的最优势还是最弱势群体中时，最公正的社会是个人愿意选择出生于此的社会。理性的选择是选择那些最弱势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的社会。罗尔斯写道：

在实际确认最弱势群体时，几乎无法避免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一种可能的做法是选择某一特定的社会地位，如业务不熟练工人的地位，然后把所有具有相似或更少收入和财富的人算作地位最不利的人。另一种做法是只根据相对收入和财产来做出判断，而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例如，所有收入和财富不到中位数一半的人，都可以被视作最弱势群体。这种标准只取决于分配中收入低下的那一半人，其优点是把注意力放在最弱势群体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差距上。无论上述哪种做法，都可能覆盖最弱势群体，并为制定合理的社

会最低标准提供基础，再配合其他措施，社会就可以推进履行差别原则。[32]

根据这些标准，一个理性的人会选择出生在中国的最弱势群体中还是美国的最弱势群体中？理论上，答案应该是美国，因为美国更富有。事实上，也很可能是中国，因为中国的最弱势群体比美国的最弱势群体有更大的机会去提升生活水平。约翰·罗尔斯还强调，一个人做出选择时不应该只考虑经济条件。自由也应作为一个关键考量因素。如果罗尔斯只是说政治自由，那么人们可能会再次选择出生在美国。然而，如果把个人自由也考虑在内，那么他很可能选择中国，因为在美国被监禁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底层10%的群体中，尤其是黑人）至少比在中国高五倍。美国将0.655%的人（212万人）投入了监狱。相形之下，中国只有0.118%的人（165万人）进了监狱。2019年，一项研究试图搞清美国哪个种族的家庭成员在监狱服刑的比例最高。所有美国人的平均值是45%。白人为42%，西班牙裔为48%，黑人为63%。[33]

美国的司法系统更独立，许多功能也优于中国的司法系统。然而，我同一位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担任高级职位的美国人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交流。十多年来，他一直与中国的法官一起工作。他离开中国时有两个主要印象：一是在千篇一律的外表下，中国法官们有着丰富多样的观点，在私下交流时会显露出来；二是中国法官注重平等对待各个阶层。有一次，一位美国法律顾问好意地对一名中国法官说，中国应该考虑对所有罪行——除了谋杀罪以外——废除死刑。中国法官机智地回答说，执行这一规则，将使中国的司法系统变得像美国一样，被送上绞刑架的只有穷人，没有富人。

总之，以各种社会公正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社会状况可能并不差，因为人们的富裕程度越高，自愿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就越大。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面，即喜欢秩序，他们也喜欢采取能更好维护秩序的措施。这种偏好使中国民众和西方对中国政府为维持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新措施——社会信用计划——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博古睿研究院的宋冰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描述如下：

在2014年的一份文件中，中国政府概述了对这一体系的构想，指出它包含四个不同的方面：政府信任体系、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信任体系。这个庞大的项目致力于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信任文化。[\[34\]](#)

乔治·索罗斯抓住了西方对社会信用体系持负面态度的核心，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中国在推行奥威尔式的愿景，即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生活。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也明确表示：“中国的领导人旨在实施一种建立在控制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基础上的奥威尔式的体系。”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这种社会的描述如下：“当然，无从知道，在某一特定时刻，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在被人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平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监听某个人的电话线路，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接上你的电话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设下生活：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着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着的。你早已这样生活了，刚开始是习

惯，后来就成了本能。”

然而，当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民众对引入社会信用体系的反应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样中国民众就能知道在社会和经济交往中谁可以信任。《纽约时报》报道称：“在一个新闻媒体被政府控制的国家，判断中国公众的反应可能很困难。不过，截至目前，普通中国公民似乎没有太多担忧。从超速行驶到袭击事件等，对所有这些情况的执法不稳定意味着中国专制政府的长臂远离日常生活。因此，许多人对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新尝试感到高兴。”[\[35\]](#)

中国人珍视秩序有一个关键原因：大家彼此住得很近。傅立民大使对此做过很好的解释。2019年2月12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圣彼得堡世界事务会议上，傅立民在演讲中对中国的人口结构予以评论：

中国略大于美国，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3%，美国则占6.1%。但中国有14亿人口，耕地只有美国的1/3，水资源只有美国的1/4。如果我们的人口与农业资源的比例和中国的一样，那么会有接近40亿美国人——其中6亿人超过65岁——可能计划在佛罗里达州退休。……我怀疑，如果有那么多人涌入美国，美国人对社会混乱的容忍度会变得更低，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也会与现在不同。我们还会更担心个人安全和生存的前景。中国人敏锐地感到他们犯错误的余地很小。这使他们天然地规避风险，而且他们在外交事务的大多数方面比现在的我们更具预见性。

尽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14亿人口却享有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应该促使西方进行深刻反省。如果所

有社会想要发展和进步，就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这样的想法是否明智？我们是否正在转向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角落，在那里，涌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印度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提醒我，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中国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美国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

美国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认知及理解中国时，心态尤其封闭。美国的分析人士在分析政治制度时，倾向于持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开放或封闭的社会，民主或集权的社会，自由或专制的社会。然而，我们已经远离了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200年异常时期，我们也在远离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将在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控制、纷争与和谐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社会最绝望的时刻，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改革者）说，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是中国前进的唯一道路。华裔历史学家周策纵写道：“鲁迅宣称中国人应该为自己而非祖先而活。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知识比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与其崇拜孔丘和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祭拜‘瘟将军’和‘五道神’，还不如崇拜阿波罗。……鲁迅真诚地奉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他问道，如果新的比旧的更有用，为什么还要为新事物来自中国还是外国而烦恼呢？”^[36]100年后，中国不再颓废。中国站起来了，变得自信了。在欧洲和美国近期遭遇阵痛后，很少有中国人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是模仿西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有趣补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名言：“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就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怎样做呢？”过去30年里，最大的事实

就是，世界上许多尝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适合它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制度会引发灾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以做一项很好的研究：对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起的所有“颜色革命”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颜色革命”通常是指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鉴于一些抗议者在示威活动中以颜色或图案作为象征，故得名）。有多少“颜色革命”取得了成功？又有多少失败了？下面是一份粗略的分析。

华沙条约组织中的一些国家通过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共产党政权，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在蓬勃发展。然而，它们的成功是非比寻常的。它们的成功，是基于自身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且很轻松地加入了富裕的欧盟，并从欧盟那里获得了大量资源输入。反之，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仍在努力实现政治稳定。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梅琳达·哈林撰文指出，这三个国家民主革命的失败源于它们普遍有一种错觉，即认为革命是“民主的巅峰”，但实际上，革命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这种错觉导致领导人劫持革命，退回到专制统治。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领导人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迅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强人形象”。^[37]同样，在埃及和利比亚，一度受到西方知识分子大力声援的革命也没有改善社会情况。利比亚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卡扎菲的下台导致了利比亚的分裂与持续的内战和冲突，这个国家一直没有恢复元气。美国人悲痛于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佛·史蒂文森在班加西丧命。他不必要的牺牲值得哀悼。但是，有更多利比亚人在卡扎菲下台后的乱局和破坏中丢掉了性命。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记忆中，干

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

也许，对近期所有“颜色革命”做过最深入研究的国家当属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不去研究它们，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任何潜在对手，包括美国，要想动摇中国政府强大的领导，显然都会想方设法在中国发动一场“颜色革命”。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民主没有害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场自发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这种信仰听起来既天真又合乎道德。但正是因为有这种信仰，美国才非常危险，因为中国人认为这种信仰既具破坏性又不道德。要理解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人可以回想当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并杀死近3 000名美国人时自己的感受。袭击发生时，我正在曼哈顿。我目睹过美国人看到这么多无辜的人在本·拉登的恐怖袭击中遇害时的困惑、悲伤和愤怒。报复的愿望强烈到难以遏制。这完全可以理解。结果是美国予以反击，入侵了阿富汗。

回忆起被深刻铭记的“9·11”事件，美国人就可以开始理解，如果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中国人在美国发起的“颜色革命”的混乱中丧生，中国人会有何感想了。“数百万”这一数字并非夸张。如果数百万人因此丧生，不难想象，中国人民会做出爆发性和愤怒的回应。支持“颜色革命”的美国人也许坚信自己的意图高尚又道德。然而，如果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近期的“颜色革命”一样，中国人的愤怒和凌厉反应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美国想在中国打交道时推进“道德”议程，那么践行道德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危险的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将一成不变。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理论上，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一切强大的镇压手段以实现永远掌权。然而，一个仅仅依靠镇压来维持政权的中国政府，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8\]](#)这一宏伟目标。

不过，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很有弹性，并不脆弱。为何会如此？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治理的“大秘密”，这颇令人惊讶。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智商金字塔。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

同时，与昔日苏联僵化、缺乏弹性的官僚体制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变得反应灵敏且能担起责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洪源远如此描述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

自1978年开放市场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未以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多党制选举，没有正式保护个人权利，也没有放开言论自由，而是在表面之下进行改革，在不放弃一党制的同时改革其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实现民主化的许多益处，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制和对权力的部分限制。

这些改革看起来枯燥乏味、无关政治，但实际上它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模式：具有民主特征的专制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公共行政部门对规则和激励措施的调整，已悄然将僵化的共产主义官僚机构转变为一台有着高度适应性的资本主义机器。[\[39\]](#)

这既精辟地阐释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非凡进步，也解释了中国人民对治理阶层的高度信任。2017年，吴志明和里马·威尔克斯开展的一项关于亚洲社会政治信任的研究表明，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同，在中国，人们不仅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而且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还高于对地方政府的。[\[40\]](#)

出于对共产党的偏见，西方学者和评论人士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治理工具。鉴于此，西方学者很少客观理性地评论中国共产党，这不足为奇。理查德·麦格雷戈写下的《党》一书，就提供了错误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例子，他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在许多方面都是腐朽的、代价昂贵的、腐败的，并且常常失灵。金融危机又给这个体系增加了一点危险的傲慢情绪。但这个制度也被证明是灵活多变的，足以吸收所有扔向它的东西，这令许多西方国家感到震惊和恐惧。”[\[41\]](#)

此处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以至于它必然表明作者非常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他希望看到一个腐朽的制度，然而事实上这个制度根本不腐朽。他不愿意承认现任中国领导人对腐败的蛛丝马迹高度警惕，并想公开地根除腐败。这究竟表明中国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还是一个决心根除腐败的政府？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但其“灵活多变”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名字中有“中国”二字。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灵活且富有洞察力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中国领导人，都涉猎中国思想经典著作。熟读经典又使他们对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充满兴趣——中华文化是有思想的。他们从中明白：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僵化、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都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此，许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在实践中必须灵活地加以调整和实施。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得以延续。

西方误解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原因是，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中国政府并未向中国人民施加重担。中国共产党也不会积极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谁更僵化呢？是明确调整了政府和经济体制的中国人，还是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将1776年的宪法视作不可改变的教条的美国宪政主义者？

许多西方评论人士用一个统计数据来描述中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中国每年发生18.7万起抗议活动。维也纳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克里斯蒂安·戈贝尔教授解释了很多媒体报道缘何获得这一数字：“2011年，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称，有‘中国研究人员’表示，2010年中国发生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中65%与土地纠纷有关’。[\[42\]](#)根据这一数字，《大西洋月刊》起草了误导性的大标题：中国每天（发生）500起抗议活动。人们不清楚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引用的匿名‘中国研究人员’提供的数据究竟是如何得出的，但大多数出版物（包括署名作品）都提到了这一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动荡无甚帮助。相反，它们给人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中国正处于严重动乱之中。”[\[43\]](#)

戈贝尔研究了2013—2016年发生在中国的7.4万起抗议活动，得出结论：“中国的抗议活动普遍存在，但往往季节性地发生，参与者不到30人。大多数抗议活动发生在中国春节前几天，那时工厂会结算工资，外来务工人员会返乡。大多数抗议活动的核心是经济赔偿，而不是要求实质性权利；抗议活动主要涉及小

规模、同质化人群，如农民、小商贩和医疗事故的受害者。”^[44]

任何抗议活动都必须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然而，很明显，这些抗议活动并不被视为主要威胁，因为它们大多是针对地方性问题，而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实际上，抗议的目的就是吸引中央政府的注意，抗议者通常把中央政府视作打击腐败的地方官员的“救星”和“恩人”。

1976年，我有机会访问莫斯科，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似乎强大且无敌。毫无疑问，在莫斯科，人们被政府吓怕了。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酷社会。有一天晚上，当我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去往列宁格勒（后改名为圣彼得堡）时，我发现列车上的厕所晚上锁着门。在厕所外面等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门是被故意锁上的。我去找列车乘务员。最后，我找到一个身材高大、粗鲁的俄罗斯女人，她对我怒目而视。为什么厕所的门被锁上了？因为在共产党执政下的苏联，法律的精神是：任何事情都是被禁止的，除非获得法律的特别允许。没有法律规定火车上的厕所门必须是打开的，因此，它们被锁上了。

任何到访过苏联和中国的人都知道，就个人自由而言，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苏联从未出现过企业家，因为那里没有经济自由。相形之下，中国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每年，中国都会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初创企业。中国也从其他现代化城市，如新加坡那里学到了最好的做法，这使人们在上海和深圳——世界上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两座城市——开展新业务非常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监测了北京和上海的营商便利程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创下了历史纪录，位列本年度营商环境改善全球前十名。……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实施的改革措施数量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首。”

该报告还援引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的话：“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这使中国进入世界排名前五十的经济体之列，这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培育创新和民营企业的高度重视。”^[45]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取消了三项程序，如今在中国开办企业只需要九天，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相当。此外，北京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开办企业完全免费的两座城市之一。”^[46]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鲜明的观点：除非人们觉得自己有承担风险和做出个人决定的自由，否则是不可能创业的。

然而，尽管中国已逐步开放（相较于苏联），并允许个人自由爆炸式增长，但中国领导人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当前的政治体制，即中国共产党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体制，能否永远持续下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会出现世界上规模最大，也许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群体将逐渐要求在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需求将会出现。历史还告诉我们，要从威权政治体制过渡到参与性更强的政治体制是很困难的。

意识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应对它。并非所有过渡都是一样的。东亚的民主制度跟美国或欧洲的不同。在西方政治环境中，同一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东亚，长期执政已成为常态。日本的自民党虽然在1993—1994年和2009—2012年短暂失势，但实际上已经统治了日本50多年。同样，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显然，东亚社会的文化更适应政治连续性和政治稳定性。改变本身并不受欢迎。

那么，美国为何要在中国推行民主呢？民主是绝对可取的，

它应该自始至终受到支持。然而，即便是美国的近代史也表明，美国并不一直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然而，当美国必须在追寻理想和追求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时，它选择把民主放在一边。这也许是明智的，但显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同样，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评论道：

中国的人权问题，更不用说民主化，从来都不是美国接触政策实践中的一个突出因素，也没有多少外界施加的压力。不能批评接触政策没有取得成果，因为美国从未认真对待过这个成果，也从没有期望过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47]

傅立民大使也明确指出：

那些批评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无济于事，没能使中国民主化以及使中国的人权和经济实践西方化的美国人，现在把未达到他们的预期作为政策失败的证据。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希望或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48]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宣扬民主呢？许多美国人认为，民主天生就比专制好，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自由，这种自由反过来又会帮助个人茁壮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这个信念有很多优点。因此，如果中国也这么做，理论上中国将成为一个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经济

增长将更快。的确，如果这一政治实验获得成功，中国公民的平均生产力能提升至美国公民的一半，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甚至有望达到四倍。

可是，让中国的经济规模变为美国的两倍或四倍，真的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鉴于美国的安全机构中充满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

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发生过成功的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拥有发达的社会，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公民文化。同等重要的是，它们的邻国都是强大的、完善的民主国家，可供学习。它们还可以加入欧盟，获得机构建设方面的有力支持。总之，要成功地过渡到稳定和繁荣的民主统治，必须具备若干关键因素。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缺失这些关键因素，向民主过渡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大约1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同样，在苏联解体时，作为主要组成国家的俄罗斯，也因经济崩溃和生灵涂炭而蒙受巨大损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则经历了国内冲突。

在近期的历史背景下，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美国试图使

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这是中国的命运，那么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无可匹敌。

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目标似乎牵强附会。然而，如果一个大国认为自己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这将是极为合理的举措。中国领导人毫不怀疑，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中国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不会得逞。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统治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我毕生致力于研究西方哲学，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一直在争论最佳的政治体制。许多西方人坚信，最佳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然而，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曾警告我们，正如爱德华·卢斯提醒的那样：“民主是暴民的统治——字面上由‘demos’（暴民）和‘kratos’（统治）组成。”安德鲁·沙利文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证明了柏拉图的预言。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说，最佳的统治形式是由一位哲学王来统治。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仁慈领导方式。他早年吃过很多苦，他努力在党内晋升。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他不会疯狂地发推特。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很有可能作为这样一位领袖而青史留名：他最终会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匹敌西方最好经济体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他曾因取消任期限制而备受批评，但这可能是中国拥有的最大的福气之一，这可能是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

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即便习近平主席能够为中国带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繁荣，作为一个有清醒历史眼光的人，他也会知道：哪怕有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中国也可能出现衰落。乾隆皇帝于1736—1796年在位，统治时间长达60年，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位优秀的皇帝。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中国就开始了百年屈辱。

习近平主席的主要挑战将是，在他离任后确保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历史告诉我们，这并非易事。除非习近平主席开始组建一支强大的潜在继任者队伍，并加强在他退休后实现顺利接班的制度框架，否则他所有的政绩都可能被湮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为了确保中国赢得这场马拉松，习近平主席必须将合理的继任机制落实到位。如果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机会将会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否则，美国可能会赢。

[1]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2] George Magnus, *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from introduction, digital edition.

[3]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77–128. Originally a speech given at Munich University, 1918. See also a discussion of Weber’s essay in Kishore Mahbubani, *20 Years of Can Asians Think?*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2018), 137–138.

[4] Sheila Melvin, “China Remembers a Vast Crim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10/22/arts/22iht-MELVIN.html>.

[5] Christine Loh, “Green Policies in Focus as China’s Rise to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Continues Apa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14748/green-policies-focus-chinas-rise-ecological-civilisation>.

[6] Douglas Brinkley, *The Wilderness Warrio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Crusade for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52.

[7] 克格勃的全称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8] Nick Lockwood, “How the Soviet Union Transformed Terrorism,” *The Atlantic*, December 23, 20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2/how-the-soviet-union-transformed-terrorism/250433/>.

[9]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665.

[10] Richard Milne, “Norway Sees Liu Xiaobo’s Nobel Prize Hurt Salmon Exports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ugust 15, 2013, <https://www.ft.com/content/ab456776-05b0-11e3-8ed5-00144feab7de>.

[11] Jethro Mullen, “China Can Squeeze Its Neighbors When It Wants. Ask South Korea,” CNN Business, August 30, 2017, <https://money.cnn.com/2017/08/30/news/economy/china-hyundai-south-korea-thaad/index.html>.

[12] Working Group on Chinese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8),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hineseinfluence_americaninterests_fullreport_web.pdf.

[13] Simon Denyer and Congcong Zhang, “A Chinese Student Praised the ‘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at a U.S. College, Then Came the Backlash,”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5/23/a-chinese-student-praised-the-fresh-air-of-free-speech-at-a-u-s-college-then-came-the-backlash/?noredirect=on&utm_term=.e9211670aa19.

[14] Julia Hollingsworth, “Chinese Student Who Praised US Fresh Air and Freedom Apologises after Backlash i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3, 2017,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095319/chinese-student-who-praised-us-freedoms-apologizes-after-backlash>.

[15] Working Group, *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16] 1平方英尺 $\approx$ 0.09平方米。——编者注

[17] Yin Weiwen and Zhang Youlang, “It’s the Economy: Explaining Hong Kong’s Identity Change after 1997,”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 no. 3 (August 2019): 112–128.

[18] Housing Bureau, Policy Programme: The 1997 Policy Address,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pa97/english/phb.htm>.

[19] Niall McCarthy, “The Countries That Trust Their Government Most and Least,” *Forbes*, January 22,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iallmccarthy/2018/01/22/the-countries-that-trust-their-government-most-and-least-infographic/#6fef5fd1777a>.

[20] 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2007): 1–42,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PGLP/Resources/ShaoHuaPaper.pdf>.

[21] World Bank, “China,” Poverty & Equity Data Portal, <http://povertydata.worldbank.org/poverty/country/CHN>.

[22] Wang Gungwu, *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9), 16.

[23] Dominic Barton, Yougang Chen, and Amy Jin, “Mapping China’s Middle Class,” *McKinsey Quarterly*, June 2013,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mapping-chinas-middle-class>.

[24] Agency, “China’s Middle Class Overtakes US as Largest in the World,” *Telegraph* (London), October 14, 2015, <https://www.telegraph.co.uk/finance/china-business/11929794/Chinas-middle-class-overtakes-US-as-largest-in-the-world.html>.

[25] Luke Glanville, “Retain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vereign Accountability in Ancient China,” *Millennium* 39, no. 2 (December 2010): 323–343.

[26] Bruce Stokes, “Global Publics: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Bad,”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3, 2015,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7/23/global-publics-economic-conditions-are-bad/>.

[27] Ronald Reagan, “Transcript of Reagan’s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N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88, <https://www.nytimes.com/1988/01/26/us/transcript-of-reagan-s-state-of-the-union-message-to-nation.html>.

[28] V. Arefyev and Z. Mieczkowski,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ra of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9, no. 4 (April 1991): 2–6.

[29] “China’s Inbound Tourism Remains Steady in 2018,”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6, 2019, http://english.gov.cn/archive/statistics/2019/02/06/content_281476510410482htm..

[30] “More Chinese Students Study Abroad,” *China Daily*, March 30, 2018,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3/30/WS5abe02d6a3105cdcf65156e2.html>.

[31] Danny Quah, “The US Is, Indeed, the Exceptional Nation: Income Dynamics in the Bottom 50%,”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January 2019, <http://www.dannyquah.com/Quilled/Output/2019.01-Danny.Quah-Income-Dynamics-in-the-Bottom-50.pdf>.

[3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81.

[33] Peter K. Enns et al., “What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Have Ever Had a Family Member Incarcerated?: Evidence from the Family History of Incarceration Survey(FamHIS),”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5 (January 2019).

[34] Bing Song, “The West May Be Wrong About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11/29/social-credit/?noredirect=on&utm_term=.69d772fd4953](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11/29/social-credit/?hpid=hp_hp-top-table-main-social-credit%3Ahomepage%2Fstory&hpid=hp_hp-top-table-main-social-credit%3Ahomepage%2Fstory&hpid=hp_hp-top-table-main-social-credit%3Ahomepage%2Fstory&noredirect=on&utm_term=.69d772fd4953).

[35] Paul Mozur, “Inside China’s Dystopian Dreams: A.I., Shame and Lots of Cameras,”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7/08/business/china-surveillance-technology.html>.

[3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09.

[37] Melinda Haring and Michael Cecire, “Why the Color Revolutions Failed,” *Fo reign Policy*, March 18, 201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3/18/why-the-color-revolutions-failed/>.

[38] Xi Jinping,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8,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Xi_Jinping’s_r_eport_at_19th_CPC_National_Congress.pdf.

[39] Yuen Yuen Ang, “Au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s Behind-the Scenes Reform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deepblue.lib.umich.edu/bitstream/handle/2027.42/148140/Autocracy%20With%20Chinese%20Characteristics%2C%20posted%20version.pdf?sequence=1&isAllowed=y>.

[40] Cary Wu and Rima Wilkes, “Local-National Political Trust Patterns: Why China Is an Excep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9, no. 4 (September 2018):436–454.

[41]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London:Allen Lane, 2010), 273.

[42] Yu Gao, “China: One Fire May Be Out, but Tensions over Rural Land Rights Are Still Smoldering,” Landesa: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February 6, 2012, <https://www.landesa.org/china-fire-out-tensions-rural-land-rights-smoldering/>.

[43] Christian Göbel, “Social Unrest in China: A Bird’s Eye Perspective,” October 20,2017, <https://christiangobel.net/social-unrest-in-china-a-birds-eye-perspective>.

[44] Ibid.

[45]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Report: China Carries Out Record Business Reforms,Edges into Top 50 Economies,” The World Bank press release, October 31, 2018,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10/31/doing-business-report-china-carries-out-record-business-reforms-edges-into-top-50-economies>.

[46] Ibid.

[4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e Failures of the ‘Failur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2, no. 2 (2019): 99–11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63660X.2019.1626688>.

[48] Chas W. Freeman Jr.,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s, Past and Future,” paper prepared for January 2019 conference at Carter Center, Atlanta, Georgia, <https://chasfreeman.net/sino-american-interactions-past-and-future%ef%bb%bf/>.

第七章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很难精确地描述这种假设对美国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程度与范围，但美德假设无疑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美国人在世界上的角色奠定了基础。几位美国学者描述了为什么美国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斯蒂芬·沃尔特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1]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这些说法还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接着，他又提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会反对的说法：“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唯一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我没有尝试总结他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而是将那篇精彩的短文放入了本书附录中，这样美国人就可以读到一位美国同胞是如何令人信服地论证自己的论点：“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这遭到斯蒂芬·沃尔特的驳斥），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近些年，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0年，美国大众，包括底层50%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20世纪60年代在新加

坡长大的我，在观看美国电视情景喜剧，比如《我的三个儿子》和《我爱露西》时非常羡慕，剧中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享有的田园生活，他们住在独立的房子里，房子配有能停放两辆车的车库，房子周围还有宽敞的草坪。显然，那是一个全世界都羡慕美国取得如此社会和经济成就的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结束了。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新加坡国立大学柯成兴教授的记录显示，1980—2010年的30年光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在一篇短小精练的论文中，他记录了一些有关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事实，非常引人注目。首先，从1980年起，“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这从未在世界其他哪个主要国家或经济体中发生过。没有哪个国家的穷人正逐步变得更穷”。[\[2\]](#)表7.1对比了美国、欧盟、中国和亚洲国家（不包括中东）的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此表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底层50%的人口经历了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未遭受过的收入下降。在这份有力的数据记录面前，正如柯成兴所建议的，有必要想想为什么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例外”的国家。

表7.1 几个国家或地区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 [\[3\]](#)（单位：千欧元）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美国	7.8	7.3	6.6	6.8	—
欧盟	8.3	8.2	8.1	9.9	10.3
中国	0.8	1.2	1.3	2.6	3.9
亚洲（不包括中东）	1.1	1.5	1.7	2.3	2.8
全球	1.7	2.0	2.1	2.7	3.0

收入停滞给人们带来很多痛苦和折磨，这在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记录中有所体现。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曾经在心灵上寄托着过上更好生活的美国梦。今天，正如凯斯所说，现实和这种梦想之间横亘着“绝望之海”。她和迪顿总结道：“最终，我们认为这些故事描述了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盛期过后的崩溃，以及同这种衰落伴生的社会异常。”^[4]认真研究凯斯和迪顿的记录后，就会发现糟糕的经济前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伴随着家庭功能失调、社会隔绝、毒品成瘾、肥胖和其他社会异常情况而加剧的”。^[5]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会如何看待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呢？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是否成功实现社会公正的测试：“当且仅当境况较佳者的更高期望可以作为提高社会最弱势成员期望的方案的一部分时，才是公正的。”^[6]简言之，美国如果想根据罗尔斯的建议来评判自己是否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就应该研究这些数据，看看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如果罗尔斯还在世，他会震惊地看到最弱势的美国人是多么贫困。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

惊人地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已变得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对于最贫穷的90%的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7\]](#)这种不平等的大幅加剧发生在最近几十年里。柯成兴也提供了珍贵的数据，将美国与其他主要地区的不平等加以对比（见表7.2）。

表7.2 收入最高的1%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 [\[8\]](#)

	1980 年	2015 年
美国	41	138（2010 年）
欧盟	24	32
中国	12	47
亚洲（不包括中东）	38	66
世界	100	108

柯成兴观察指出：“1980年，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平均收入之比为41。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个数字达到138，增加了不止3倍。从表7.2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9\]](#)

移民到新大陆的人抛弃了欧洲封建制度。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社会。因此，当我们读到当代美国作家述说当前美国社会与封建时期的欧洲颇具相似之处时，会感到震惊。乔尔·科特金如此描述当今美国的主要分歧：“当前的冲突从根本上再现了法国封建时代的终结——由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挑战了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霸权。”他补充道：“今天的新封建主义令人回想起17世纪和18世纪民主革命之前的社会秩序，我们的两个崛起的等级正扮演着以

前统治阶级的角色。”^[10]

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也记录了美国社会的严重恶化。瑞·达利欧经营着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获得了成功。现在，达利欧将这一研究方法用于理解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他在他的领英页面详细说明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指出，“处于底层的60%的人口，大多数是穷人”，还引用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发生紧急情况，40%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筹不到”。^[11]更糟糕的是，达利欧指出，“他们在贫困里越陷越深.....在十年时间里，处于底层1/5的人上升到中等或更高阶层的概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仅14%”。这些反映美国社会状况恶化的数据无可辩驳。它让人不再相信美国是一个努力工作就会获得回报的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回报已然枯竭。“美德本身就是回报”这一陈词滥调显得冷酷且令人怀疑。

为什么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尤其是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美国的民主应该确保始终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二种是，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的政治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却没有被美国人民注意到。每隔2~4年，美国人就会投票选举他们的国会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州立法会议代表。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参与原则所保护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大约50年前，他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12]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许多立法机构限制使用金钱来影响政治进程。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称：“2010年1月公布的对公民联合会的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这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13]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决的影响甚大，实际上，它们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马丁·沃尔夫说：“最高法院2010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表明，公司是人，金钱是言论。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富豪政治的一大步。”^[14]美国法律学者劳伦斯·特赖布特别清楚地描述了对公民联合会裁决的愚蠢之处：最高法院“伸手裁决不公正的问题，同时难以置信地淡化，有时甚至默许美国政治中通过行贿以外的手段实现恶意腐败，这些手段很可悲，因为它们是完全合法的”。^[15]法院的这一系列裁决，使美国立法者做出的大量重要的公共政策决定不再反映一人一票的真实结果，因为这背后是金钱操纵了选票。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记录了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个案例，比较了美国普通公民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观点相对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他们发现：

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性的独立影响力，普通公民和群众性利益集团很少或没有独立影响力。……当暂时排除经济精英的偏好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立场时，美国普通公民的偏好似乎只能对公共政策产生极小的、接近于零的、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的影响。……此外，经济精英的偏好（以其代理人——“富裕”公民的偏好来衡量）比普通公民的偏好对政策变化更能施加独立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国家统治——至少在实际决定政策结果的因果意义上没有参与。

他们得出了如下令人震惊的结论：

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尽管仍有争议）的特权。但我们认为，如果政策制定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主导，那么美国是民主社会的主张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16]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最终，美国在运行中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在这里，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西达·斯考切波和贾森·斯科拉进行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

自2005年前后开始，新成立的保守和进步捐款人财团——尤其是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研讨会和民主联盟，通过不断筹集和输送资金，来参与选举和各种政治组织的合作，从而扩大了富有捐赠者的影响力。……科赫研讨会……允许捐赠被用于围绕繁荣美国人协会来构建一个虚拟的第三政党。繁荣美国人协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网络，不仅可以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也能左右其候选人和公职人员在超自由市场政策方向上的偏好。富有的捐赠财团已经成功建立起组织基础结构……当富豪集体将新的议程强加给寻求资金的政治组织时，他们这些资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国政治的惯例、目标和权力中心，这远远超出了特殊拨款预算产生的影响。[17]

图7.1表明富有的捐赠人每年在捐赠财团中筹集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其政治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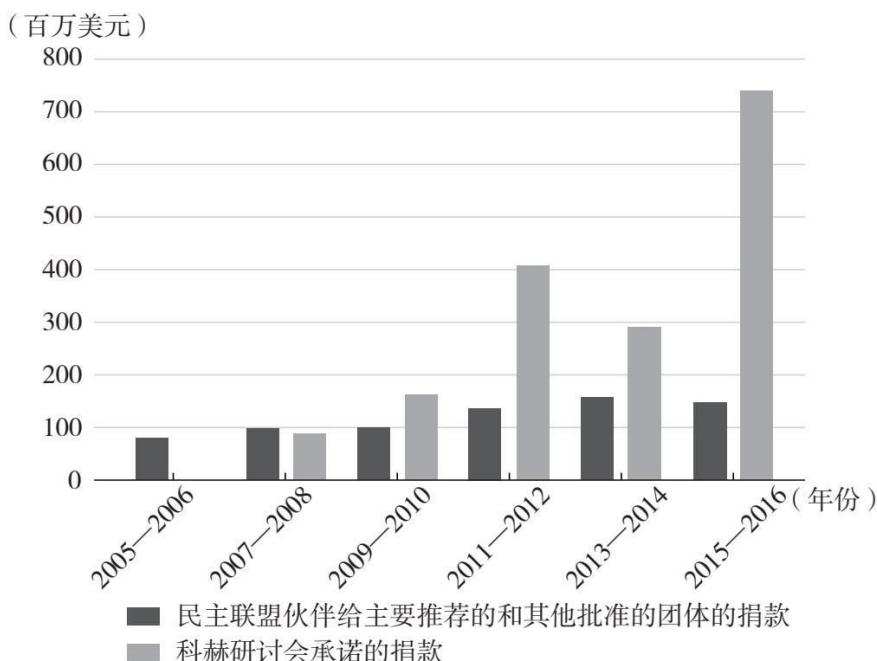


图7.1 科赫研讨会和民主联盟伙伴的捐赠金额

数据来源：2014年从民主联盟主席拉马切处获得的数据，还参考了民主联盟的信函数据；科赫研讨会的数据来自媒体报道。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上述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我们对科赫财团和民主联盟财团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钱有机制地——并非通过个人或企业捐赠途径——流入选举和游说活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国政治的，我们不仅要看他们的选举活动和游说支出，还要看他们在触及各个领域和职能部门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里的共同投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马丁·吉伦斯、拉里·巴特尔斯和本杰明·佩奇等研究人员记录的政府响应能力明显

不平等的问题。[18]

理论上，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大多数美国人却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在其著作《赢者通吃》里极为详尽地记录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如何切实幻灭的。他说：

一个成功的社会是一台进步的机器。它吸取创新的原材料，产出广泛的人类进步。然而，美国这台机器坏了。近几十年来，当变革的成果落到美国头上时，几乎全部被幸运的人攫取了。举例来说，自1980年以来，前10%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前1%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已经增加了不止3倍，前0.001%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已上涨逾7倍；同期，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几乎保持不变。这些熟悉的数字意味着，35年来，令人头晕目眩的惊人变化对1.17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9]

格里哈拉达斯称，美国人民开始“感到”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

因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包含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游戏被操纵了，而且专门不利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意识形态存在分歧的两边，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行体制已经崩溃，必须进行改革。[20]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引用过后，他们可能在心底悄声说：“感谢上帝，我们是在一个分权的民主国家。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应该更多谈及金钱对政治进程的腐蚀效应。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

一个巨大的讽刺是，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海外腐败法》，它明令禁止：“批准向任何人支付金钱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清楚这些金钱或有价值的东西将被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或承诺提供给拥有官方权力的外国官员，诱使其违反法律义务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或为了得到任何不正当利益而协助任何人获得或保留业务、同任何人合作及指导业务。”^[21]实际上，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利用金钱影响埃及或印度尼西亚的立法委员，它将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然而，如果同一家美国公司使用金钱（通过竞选活动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影响美国的立法者，它就会被认为是在推动民主进程。

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处境较佳的人能够对立法进

程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合适的时机，他们很可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占有优势，至少在他们通常赞成的那些问题上，也就是说，在那些对其有利的事情上占有优势。[\[22\]](#)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其中茁壮成长、发展壮大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具体见柯成兴教授的表7.2。“均等”的机会实际上正在消失，这反映在数据记录上。纽约大学的迈克尔·豪特写道：“198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即千禧一代，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与前几代美国人相比，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更低了。”[\[23\]](#)为什么会如此？完整的答案很复杂，但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尽管有许多梯子可供社会底层的人往上爬——上好学校、获得良好的健康护理、住进没有犯罪事件的社区、长在双亲家庭，但所有这些梯子都“恶化”了，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在本章开头的记录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美国人才刚刚注意到，还一脸懵懂地质问为什么。

很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抱持着强大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如果我相信自己也能成功，为什么还要仇视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呢？成功人士的经历表明，我的晋升之门也是敞开的。”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

国梦”保持鲜活。

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底层10%上升到社会顶层10%的可能性极低，而且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经济学人》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举例来说，一个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美国人，长大后进入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概率只有7.8%。”^[24]《美国经济评论》刊登的一项研究数据展示了几个不同国家实际概率和感知概率的代际流动的差异，见表7.3。^[25]

在表7.3中，最重要的统计数据是左上角的数字：美国有11.7%的底层人相信他们能爬到顶层，但实际上只有7.8%的人能做到。这在表7.3的所有国家中占比最低。与同一列底部的模式正相反。

如果有人问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美国人，美国和中国哪个国家给社会底层10%的孩子爬到顶层10%提供了更好的机会，99%的人会眼都不眨地回答：当然是美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然而，数据显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比美国更大。2018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

同美国一样，中国也有一道贫富差距的鸿沟，而且最穷的中国人比最穷的美国人更穷。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近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40%，每天的生活费不到5.5美元。但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与美国差不多。

表7.3 各国社会底层向顶层流动的实际概率和感知概率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瑞典		美国与四个欧洲国家的对比	
	实际值 (1)	感知值 (2)	实际值 (3)	感知值 (4)	实际值 (5)	感知值 (6)	实际值 (7)	感知值 (8)	实际值 (9)	感知值 (10)	美国感知值 (11)	欧洲国家感知值 (12)
从第一段到第五段	7.8	11.7 (0.00)	11.4	10.0 (0.00)	11.2	9.1 (0.00)	10.4	10.1 (0.48)	11.1	9.2 (0.00)	11.7	9.6 (0.00)
从第一段到第四段	12.7	12.0 (0.00)	12.9	10.6 (0.00)	12.8	10.5 (0.00)	15.6	11.2 (0.00)	17.3	11.2 (0.00)	12.0	10.9 (0.00)
从第一段到第三段	18.7	22.3 (0.00)	19.9	19.4 (0.13)	23.0	21.5 (0.00)	21.0	21.9 (0.03)	21.0	24.5 (0.00)	22.3	21.6 (0.06)
从第一段到第二段	27.7	21.8 (0.00)	25.1	22.2 (0.00)	23.8	23.6 (0.55)	25.8	23.1 (0.00)	23.8	23.1 (0.09)	21.8	23.0 (0.00)
从第一段到第一段	33.1	32.2 (0.03)	30.6	37.8 (0.00)	29.2	35.3 (0.00)	27.3	33.6 (0.00)	26.7	32.0 (0.00)	32.2	34.9 (0.00)
共同检验得出的 观测假设概率		2 170		1 290		1 297		1 242		881	2 170	4 7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表格的前五行报告了父母收入分布在最底层的五个分段的孩子，成年后将分别处于五个分段（5、4、3、2、1）的平均感知概率（偶数列）和实际概率（奇数列）。第11列和第12列显示出美国和四个欧洲国家的感知概率对比。括号内是假设概率，用于检验平均感知概率与实际概率是否相等，或美国平均感知概率与四个欧洲国家平均感知概率是否相等。最后一行显示了共同检验得出的假设概率，即平均感知概率与实际概率都不同。在第11列第12列中，美国的平均感知概率与四个欧洲国家的平均感知概率都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如图7.2所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大于美国。《纽约时报》在发布上述报道时还给出了一个案例：

徐丽亚，49岁，曾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农业省份浙江省的麦田里劳作。过去，她和家人每周只吃一次肉，她和七个亲戚每晚挤在一个房间里。后来她靠奖学金上了大学，再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现在她拥有两辆小汽车和一套价值30多万美元的公寓。她的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她说：“长久以来，贫穷和腐败伤害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今天的社会虽然不完美，但穷人也有机会与富人竞争。”[\[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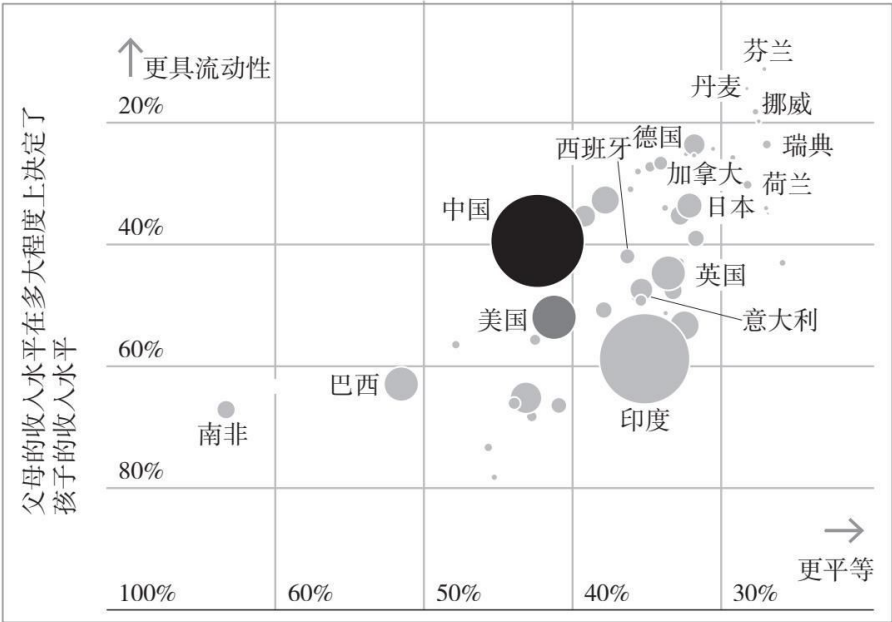


图7.2 各国的社会流动性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表7.4的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它也记录了在社会平等方面，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27\]](#)1980—2015年，中国上层10%人口的累计总增长率为1 232%，美国为124%；但美国上层10%人口的总增长率为底层50%人口的41倍，相比之下，中国的仅为3倍多。

表7.4 社会流动性差异水平

	中国		美国	
收入组别	平均年增长率	累计总增长率	平均年增长率	累计总增长率
总人口	6.4%	776%	1.4%	63%
底层 50% 人口	4.6%	386%	0.1%	3%
中间 40% 人口	6.2%	733%	1.9%	44%
上层 10% 人口	7.7%	1 232%	2.3%	124%
上层 1% 人口	8.8%	1 800%	3.3%	208%
上层 0.1% 人口	9.5%	2 271%	4.2%	325%
上层 0.01% 人口	10.2%	2 921%	5.0%	460%
上层 0.001% 人口	10.8%	3 524%	5.9%	646%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当大量数据与美国是“机会均等的乐土”这一神话相矛盾时，神话为何还能持续下去？一个答案是：这个神话是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它被剥夺了，美国精神将变得更加贫乏。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因为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非凡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理性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

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也有例外。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支持限制竞选资助，并且已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类似地，最近，一名公开信仰社会主义的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然而，这些例外的唯一有效影响是，它们助长了一个神话，即广大美国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通过保护和强化这一神话，为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制定的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其中许多法律服务于富有的贵族或资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大多数民众。例如，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采取一定的枪支管制措施。[\[28\]](#)2019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和俄亥俄州代顿市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事后，美国记者伊丽莎白·德鲁感慨道：

从表面上看，在发生了如此可怕的悲剧后，通过有意义的枪支管制法案应该不成问题。民意调查显示，92%的公众支持堵住背景调查中的漏洞——目前，背景调查尚未包括对在枪支展上购买枪支、私下向他人购买枪支或在网上购买枪支的个人进行检查；还有62%的人支持禁用高容量弹匣。那对心碎的父母来到华盛顿为他们孩子被枪击的案子辩护，他们的情感诉求很难被视而不见。然而，即使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也否决了两项加强枪支管制法案的措施。[\[29\]](#)

美国国会没有能力投票支持枪支管制，因为任何投票支持枪支管制的国会议员都将发现，在下次选举中，他们的对手将收

到支持枪支使用的游说团体的大量资助。

同样，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年收入极高的人增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项调查表明：

足足有60%的百万富翁支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对资产超过5 000万美元的富人征税的计划。……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也支持征收财富税。在不平等和富人财富飙升到令人日益担忧的情况下，一些百万富翁愿意缴纳更多的税。88%的民主党人支持征收财富税，62%的独立人士和36%的共和党人也支持征收财富税。就连财富超过500万美元的上层百万富翁中，也有2/3的人表示支持征收财富税。

[30]

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投票支持征收更多的财富税，否则他们将成为特殊利益游说集团的目标。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附带权益的税务处理就是一个例子。正如《纽约时报》在2017年报道说：

数十年来，附带权益条款使富有的私人股权管理人、对冲基金经理和房地产投资者就收入支付更低的资本利得税率（20%，不包括奥巴马医疗附加费的3.8%），而不是普通收入的税率（最高为39.6%）……对附带权益漏洞的主要反对之声……（是）“附带”——管理者从投资收益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回报——应该被视为服务报酬并按照普通收入来征税，而不是被视作投资收益。在那种情况下，管理者将资产置于风险之中。[31]

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人对自由的崇拜有一个矛盾之处。理论上，美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区别在于，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却不能。实际上，到了历史的现阶段，美国人民也没有多少自由从根本上改变或修正他们的政治制度，从而确保其有利于大多数人。然而，鉴于美国人民抱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故而倾向于支持它。这使美国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因为美国人民根本不想改变这种他们认为自己掌控着的制度。

这使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爱国的群体之一。他们满怀深情地向国旗敬礼，兴致高昂地唱响国歌。他们致力于维护美国宪法和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由于美国人对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抱有强烈的感情，因此无论一个外部观察者发出多么善意的提醒，都很难让他们对这一切产生怀疑。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经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他认为政治美德或虔敬爱国是民主共和国充满活力的原则；温和，是贵族共和国的温和；荣誉，是一个受限制的君

主制的荣誉；恐惧，是对独裁的恐惧。他还指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规定，充满活力的原则应成为教育青年人的目标……法律也应该与同样的原则有关。在民主社会中，应该通过法律来促进平等和节俭，因为它们滋养着虔敬爱国的精神。[32]

如果杰斐逊今日尚在世，他会发现在当代美国既找不到平等，也找不到节俭。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约翰·亚当斯哀叹道：“这个国家缺乏共和的美德……我担心殖民者已经被君主政体的原则腐化，这使他们不具备维持共和政体所必需的节俭和美德。”[33]

罗尔斯明确地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的社会正义思想，并在汲取他们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享有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其一，合理地预期对每个人都有利；其二，（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4]

第二条原则至关重要，它强调，不平等只有在“合理地预期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罗尔斯继续强调了以下观点：“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都将被平等地分配，除非这些价值的任何或全部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35]

我想，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处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然而，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记者爱德华·卢斯引用这个统计数据来使大家理解这一点：“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八年级（14岁）孩子的数学成绩排在前十15%，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数学成绩排在后15%，但前者拿到的毕业文凭很可能不如后者。这与精英管理体制背道而驰。”^[36]

精英统治的反面是贵族统治。在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里，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你的命运将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表现；在一个贵族社会里，你的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然而，许多美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实际上，正是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开始同样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祖国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而不只是重视自由。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决策者和专家在讨论如今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时提出的“美德假设”感到困惑。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然而，它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驳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看看苏联共产党放弃权力后苏联发生了什么。因此，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不过中国已经仔细研究了苏联时代末期痛苦的内部混乱，也不太可能允许俄罗斯的经历在中国重演。

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会更加困难，而且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提高得更多，这也是真的。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许多美国人对这些数据感到不安，但他们对未来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自我修复。如果出现大问题，开放灵活的民主进程将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已做出根本性的修正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政治改革的巨大成功包括废除奴隶制（虽然这是通过一场大规模内战才实现的），19世纪60年代《民权法》的颁布——最终使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得到了保护，以及“进步时代”（1890—1920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样，在经济方面，当美国国会颁布了灾难性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加剧了大萧条时，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能够自我纠正。罗斯福新政通过的法规改善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美国国会在后来几年避开了极端的保护主义。简言之，那些相信美国政治体制天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人，有很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信念。

美国政体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它面对的是一种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就能轻松治愈的微恙，还是一种需要大规模手术和痛苦治疗（会给一些关键的美国政治赞助人造成痛苦）才能改善的致命

状况？截至目前，美国人虽然日益受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困扰，但并不普遍希望去给政治体制动大规模手术，也没有哪位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提倡这么做。然而，这可能正是这个体制所需要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许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理解自身的失败，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关系，而是因为从中国的成就中，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复兴所需要的重要事实。”^[37]

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的核心是，美国和中国政治体制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如果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一个健康灵活的民主国家和一个僵化死板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之间的竞争，那么美国可能会胜出。然而，如果这场竞争是在僵化的富豪政治体制和灵活的精英政治体制之间进行的，那么中国可能会赢。

[1] 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the-myth-of-american-exceptionalism/>.

[2] Quah“, The US Is, Indeed, the Exceptional Nation.”

[3] Ibid.

[4] Joel Achenbach and Dan Keating, “New Research Identifies a ‘Sea of Despair’ Among White Working-Class American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new-research-identifies-a-sea-of-despair-among-white-working-class-americans/2017/03/22/c777ab6e-0da6-11e79b0d-d27c98455440_story.html?utm_term=.f16ccaa3e0c5.

[5] Ibid.

[6]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1), 75.

[7] Jeffrey A. Winters, *Oligarc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8] Quah, “The US Is, Indeed, the Exceptional Nation.”

[9] Ibid.

[10] Joel Kotkin, “American Renewal: The Real Conflict Is Not Racial or Sexual, It’s Between the Ascendant Rich Elites and the Rest of Us,” Daily Caller, September 11, 2019, <https://dailycaller.com/2019/09/11/middle-working-class-neo-estates-liberal/>.

[11] Ray Dalio, “Why and How Capitalism Needs to Be Reformed (Part 1),” LinkedIn, April 4, 2019,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why-how-capitalism-needs-reformed-ray-dalio/>. See also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 in 2017*, May 2018,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files/2017-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1805.pdf>, quoted in Dalio.

[12]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225.

[13] John Dunbar, “The ‘Citizens United’ Decision and Why It Matters,”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October 18, 2012, <https://publicintegrity.org/federal-politics/the-citizens-united-decision-and-why-it-matters/>.

[14] Martin Wolf, “Why the US Economy Isn’t as Competitive or Free as You Think,”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97be3f2c-00b111ea-b7bc-f3fa4e77dd47>.

[15] Laurence H. Tribe, “Dividing ‘Citizens United’: The Case v. the Controversy,” SSRN, March 9, 201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75865.

[16]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 no. 3 (September 2014): 564–581, https://scholar.princeton.edu/sites/default/files/mgilens/files/gilens_and_page_2014_testing_theories_of_american_politics.doc.pdf.

[17]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Theda Skocpol, and Jason Sclar, “When Political Mega Donors Join Forces: How the Koch Network and the Democracy Alliance Influence Organized U.S. Politics on the Right and Lef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32, no. 2 (2018):127–165, doi:10.1017/S0898588X18000081; also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ahertel/files/donorconsortia-named.pdf>. See also page 2 of the PDF: “On the right, the *Koch seminars* directed by Charles and David Koch and their close associates were launched in 2003 as twice-yearly gatherings of very wealthy conservatives aiming to push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U.S. government toward libertarian and ultra-free-market politics... the *Democracy Alliance* — called the ‘DA’ for short — was launched in 2005 to bring together more than a hundred left-leaning wealthy liberals to meet twice a year and channel contributions to advocacy and constituency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18] Hertel-Fernandez, Skocpol, and Sclar, “When Political Mega-Donors Join Forces,” 76(of the PDF).

[19] Anand Giridharadas, “Prologue,” in *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

[20] Anand Giridharadas, “Prologue,” in *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

[21]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oreign-corrupt-practices-act>.

[22]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225.

[23] Michael Hout, “Social Mobility,” *Pathways: A Magazine o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State of the Union, Millennial Dilemma*, Special Issue 2019, 29–32, https://inequality.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Pathways_SOTU_2019.pdf.

[24]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Mobility in Their Country,”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4,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02/14/americans-overestimate-social-mobility-in-their-country>.

[25] Alberto Alesina, Stefanie Stantcheva, and Edoardo Tes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no. 2 (2018): 521–554, <https://pubs.aeaweb.org/doi/>

pdfplus/10.1257/aer.20162015.

[26] Javier C. Hernández and Quoctrung Bui,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china-social-mobility.html>.

[27] “Top 1% Net Personal Wealth Shar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https://wid.world/world/#shweal_p99p100_z/US;CN/last/eu/k/p/yearly/s/false/14.1905/60/curve/false/country.

[28] Ninety-two percent of Americans, for example, support universal background checks: “Universal Background Checks,” Giffords Law Center, <https://lawcenter.giffords.org/gun-laws/policy-areas/background-checks/universal-background-checks/>.

[29] Elizabeth Drew, “What’s Behind America’s Mass Shootings?,” Project Syndicate, August 13,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gun-control-mass-shootings-by-elizabeth-drew-2019-08>.

[30] Robert Frank, “Most Millionaires Support a Tax on Wealth above \$50 Million, CNBC Survey Says,” CNBC, June 12,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6/12/most-millionaires-support-tax-on-wealth-above-50-million-cnbc-survey.html>.

[31] James B. Stewart, “A Tax Loophole for the Rich That Just Won’t Di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9/business/carried-interest-tax-loophole.html>.

[32] Matthew P. Bergman, “Montesquieu’s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the Fram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Pepperdine Law Review* 18, no. 1 (December 15, 1990): 1–42, <https://digitalcommons.pepperdin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59&context=plr>.

[33] Ibid.

[34]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53.

[35] Ibid., 54.

[36] Edward Luce, “Amy Chua and the Big Little Lies of US Meritocrac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une 13,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7b00c3a2-8daa-11e9-a1c151bf8f989972>.

https://1gyhoq479ufd3yna29x7ubjn-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FR-Born_to_win-schooled_to_lose.pdf, quoted in <https://www.ft.com/content/7b00c3a2-8daa-11e9-a1c1-51bf8f989972>.

[37] Jean Fan,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Palladium Magazine*, October 11, 2019, <https://palladiummag.com/2019/10/11/the-american-dream-is-alive-in-china/>.

第八章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中国和美国是其中两个。可以肯定地说，除中美两国以外的国家正开始积极准备应对过山车般的全球环境——由中美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造成并将持续下去。一些勇敢的领导人已经公开谈论这给其他国家造成的危险。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时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能得到解决，因为这影响到每个人。”^[1]相似地，2019年5月31日，在著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式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勇敢地指出，中国和美国发起的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太平洋战略，“应强化以东盟为中心的现有合作安排……而不是将之破坏，创造出竞争对手集团，加深分歧，或者迫使其他国家站队。它们应该帮助各国团结起来，而不是造成分裂”。^[2]

默克尔和李显龙警告中美之间无休止的贸易摩擦正在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的这番话语也许代表了许多国家的心声。其他领导人保持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坐视不理，不捍卫本国利益；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维护和加强自身的长期利益。从理论上讲，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开始放弃自由贸易协定时，此举本可能敲响自由贸易协定的丧钟。事实上，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2019年6月，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还宣布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旨在推进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同样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5月30日，非洲国家签署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3]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有望在2020年达成，它将包括十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它就是《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建议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如果这些顾问成功地推动了“脱钩”，结果将是美国不光与中国“脱钩”，还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

总之，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明智的。相反，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在一个简短章节中阐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反应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将讨论几个将被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的反应，即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印度、东盟和俄罗斯。

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即将到来，且不可避免。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直在向前发展。自鼎盛时期以来，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减弱。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已经远超过往日的苏联。最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相对总权重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对总权重之比。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可以摆脱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大多数国家也变得更加善于权衡和维护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1996—2012年担任新加坡驻华盛顿大使的陈庆珠提出，许多亚洲国家“正谨慎地界定自己的立场，顶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的压力”。^[4]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美国都不得不习惯与那些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不听话的国家打交道。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的确，在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自豪地形容澳大利亚为美国的“副警长”，虽然并非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喜欢这个描述，但它留在了大家的脑海中。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远离了苏联，也无甚理由与苏联对抗，但它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遣军队参加美国主导的

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这使521名澳大利亚士兵在越战中丧命。^[5]因此，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尊重和感情是深切真实的。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

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 740亿澳元^[6]，与美国的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成为美国的盟友，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那么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7]

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被一道抛在这里，成为亚洲仅存的西方式实体。^[8]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退潮，澳大利亚的西式主体可能在亚洲备感孤立和孤独。

在21世纪，澳大利亚只有在政治和文化上融入近邻和主要邻居东盟，才可能有一个安全又自信的长远未来。东盟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成功的区域组织，它已成为送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份地缘政治礼物，因为东盟为这两个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缓冲地带，免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直接冲击。^[9]

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如果美国召唤它再次扮演忠诚的“副警长”，那么这对澳大利亚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许多澳大利亚的重要人

物警告他们的同胞，不要盲目地追随美国的利益和政策。学者休·怀特写道：“我们似乎仍在坚守这个观点，即美国仍将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它会保护我们不受中国的影响，同时也能以某种方式说服中国愉快地接受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政府又一次没能理解正在改变我们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的全部内涵。（政府）只顾着痴心妄想，忘却了严肃政策。”^[10]同样，若中国迫使澳大利亚站在自己这边也很致命，澳大利亚因为文化深度亲近西方，也不会愿意加入中国阵营。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最明智之举是允许澳大利亚在两国之间扮演中立和有益的中间人角色。可悲的是，即使是奥巴马——美国最不好战、最深思熟虑的总统之一，也曾迫使澳大利亚政府放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哪怕它的大多数邻国都加入了，包括所有十个东盟成员国。未来的美国总统或许还不如奥巴马这般深思熟虑。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尽管欧洲并非中国的近邻，但在针对中国的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中，如果欧盟核心成员国不听从美国的要求，美国的决策者将会被激怒。2005—2006年，罗伯特·佐利克在小布什第二任期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时，曾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它们解除武器禁运，允许欧洲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那么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他把观点表达得生动形象，说如果欧盟向中国出售武器，就等于在美国士兵的后背上画靶心。^[11]

罗伯特·佐利克这种温和的中间派人物竟然会使用如此强硬的措辞，真令人惊讶，尤其是他还曾明智地倡导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将不仅仅是一个成员国，还将与我们合作，共同维护使其成功的国际体系。合作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并非没有差异——我们会有需要处理的争端。然而，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处理争端，其间，各方认识到维持提供共同价值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会使大家享有共同利益。[12]

如果像罗伯特·佐利克这般深思熟虑的人物都呼吁欧洲谨慎对待与中国的关系，那么欧洲人就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在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给出了强烈又凌厉的反应。2019年2月，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表示：“我看，没有什么理由非跟中国人做生意不可，只要他们存在着接近、操纵或监视客户的安排。那些罔顾这些担忧，一味盲目向前冲并接受中国技术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与我们打交道时会处境不利。”[13]同样，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表示：

如果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华为）技术，并应用在一些关键信息系统中，我们将无法与它共享信息，也无法与它合作。在有些情况下会存在风险——我们甚至无法协调配置美国的资源、美国大使馆、美国军事前哨……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系统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中国军队一起设计的。这些系统正给使用它们的国家及其体系，以及人民安全带来真正的风险。[14]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盖茨在《纽约时报》交易录大会上说，“现在的规则是，所有来自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这就是一种试图利用创新的疯狂方式。”[\[15\]](#)

对美国来讲，施加这种压力也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冷战期间，欧洲欣然签约成为美国自愿而又忠诚的盟友，因为它受到了驻扎在其边境的苏联坦克和导弹的直接威胁。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将其根源追溯到共同的犹太-基督教遗产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很有帮助。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 and 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

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许多美国思想家不理解地理现实的重要性，毕竟，美国得天独厚地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地理位置。美国人有幸拥有一块广袤又富饶的大陆，与人口众多的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隔着两个大洋，他们只需担心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军事威胁。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人并不理解“地缘政治”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地理因素也许更重要一些。

欧洲不幸拥有不佳的地理环境。在21世纪，虽然它不会再受到俄罗斯坦克和导弹的威胁，与俄罗斯直接开战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但在乌克兰等地区可能发生代理人战争。乘小船而来的数百万非洲移民登陆欧洲，使其前景不容乐观。有一项人口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了欧盟将面临的头号地缘政治威胁。1950年，欧盟总人口为3.79亿，[\[16\]](#)近乎非洲人口（2.29亿）的两倍。而近年来，非洲人口（2015年是12亿）[\[17\]](#)是欧盟人口（2018年是

5.13亿)的两倍多。[18]到210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达到45亿,[19]是欧盟4.93亿人口的近十倍。[20]

2015—2017年,非洲和中东的移民大量涌入欧洲,使欧洲政局发生动荡。几十年来,温和的中间派政党(包括左翼和右翼)执掌欧洲政坛,现在极端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激增,甚至进入了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政府。真正悲哀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她不会寻求连任,部分原因是她在2015年做出允许100万叙利亚移民进入德国的决定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默克尔也许是她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欧洲领导人,她做出了一个道德上勇敢(经济上确实明智)但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定。如果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在21世纪也未能改善,那么可以预见,将有数千万乃至上亿的非洲人会敲响欧洲的大门以寻求更好的生活。不难看出,移民潮将极大地改变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并会在不适应这种大规模人口结构变化的欧洲国家激起怨恨。事实上,在201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个温和而理智的欧洲人悄声对我说:“马凯硕,解决非洲移民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要让他们淹死在地中海里。”我简直惊呆了。这种道德上的铁石心肠与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表现出来的自由开放精神背道而驰。的确,在地中海丧生的移民数量从2014年的424人激增至2015年的2 042人。[21]

考虑到这些造成的挑战,如果欧洲人像澳大利亚人一样,希望优先考虑自身的生存挑战(由地理位置所致),那么他们应该重点关注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发非洲的最佳合作伙伴就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新经济伙伴。[22]请参见图8.1。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把非洲的发展作为当务之急。中国可以吸引最多的非洲领导人参加峰

会。对欧洲领导人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集体参加下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中非领导人高级别会议。欧洲领导人大量出现在这类峰会上，将发出强烈的市场信号。它可能激发新一轮对非洲的投资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经济强大了，大量非洲人向欧洲移民的动机也就减弱了。

欧洲采取这一明智举措的障碍只有一个：美国将反对。只要看看美国官方阻挠其他国家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企图就明白了。2018年10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会见巴拿马总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当中国来呼吁时，并不总是对你的公民有利。”他补充道，美国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国有企业以明显不透明、明显非市场驱动的方式出现，背后的目的不是要惠及巴拿马人民，而是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23\]](#)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自2000年以来，中国从非洲的一个小投资者跃升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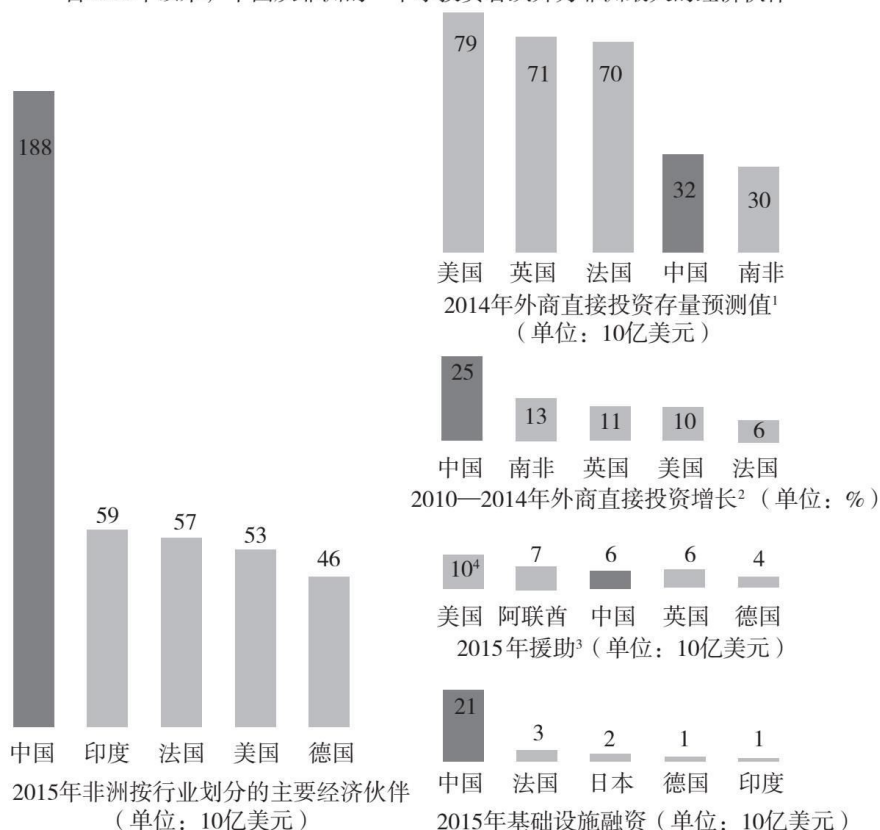


图8.1 主要国家在非洲的投资

注：

1.按2009—2012年复合年增长率估算。

2.对于中国以外的国家，我们使用历史数据做预测。

3.发展援助办公室和其他官方渠道资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是2015年数据，中国是2012年数据。

4.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据，2015财年美国对非洲的援助为119亿美元，2016财年为74亿美元。它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有差异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财政年度从10月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依据日历年度统计。

数据来源：双边贸易数据库，国际贸易中心贸易地图，2015年；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外援

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5年；“2015年非洲基础设施融资趋势”，非洲基础设施联盟，2015年。

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中国的崛起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事实上，如果中国促进非洲的发展，将有助于增进欧洲的长期安全。当然，美国可以与中国并驾齐驱地促进非洲发展。但美国提供的资金少得惊人。中国已经承诺花费1万多亿美元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美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在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它强加给中国的条件很苛刻，包括想吞并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 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24]包括在南京大屠杀中短短几天内死掉的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25]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因此，中国许多民族主义者不时对日本感到愤怒是真实存在的。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日本人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尼克松同志。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尼克松政府并未通知日本便开始与中国秘密和解。可悲的是，日本从未真正从整个事情中吸取实质性教训：当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走到一起时，哪怕像日本这种主要中等大国的利益也会被牺牲。尽管日本的利益已被证实可有可无，但大多数美国决策者仍然期望

日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是美国完全忠诚的盟友，这一点颇令人惊讶。

好消息是，日本仍是美国的盟友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现在放弃根据1951年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60年修订）保卫日本的承诺——其中第五条明确写道，“每一方都认识到，在日本管理的领土上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危及其自身的和平与安全，并宣布将根据其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26]——那么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增强自卫能力。日本可能被迫拥有核武器。这正是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7月9日告诉周恩来总理的：

我们与日本的防务关系阻止了日本推行激进的政策。如果日本感觉被美国抛弃了，它就会建立自己的军事机器，这是肯定的。如果日本制造核武器，它很容易就能做到，那么我觉得你表达的担忧就可能成为现实。

的确，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器。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这么做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美国很可能在东亚保持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它有这种能力，并且截至目前有这种意愿。然而，到了2050年，当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

达到美国的两倍时，美国很有可能放弃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力量。届时，美国将从西太平洋撤退，回到西半球，据守在中国7 000英里[27]外。

日本无法撤退。它始终只能距离中国几百英里。在中国王朝历史上，日本（中国人称之为“倭”）首次得到承认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28]在接下来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几次短暂的战争外，中日两国一直和平相处。展望下一个两千年，中日两国继续和平相处也完全可以想象。正如埃兹拉·沃格尔所说：

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吗？是的。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即1894—1945年。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29]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30]此外，“日本的大化革新（始于645年）直接借鉴了唐朝的官僚和政治结构，以及税收和经济制度”。[31]1972年，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毛泽东会面时，他对后者说：“唐朝时期，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名叫空海，谥号弘法大师。唐朝时，他来中国学习佛学，并在日本创立了佛教的真言宗。我虽然是这一宗派的信徒，但并不精通其教义。”[32]的确，中日两国深厚的文化关系在许多学术著作中都有记载。有一部著作写道：

禅宗在国家认可的佛教机构找到了归宿，形成了镰仓、京都的禅宗五山寺院体系。……处于最上层的是京都的大型城市寺院，它们举行密宗仪式以为国家利益祈祷，赞助与中国的海外贸易，管理军政府的财产，最重要的是，它们推广最新的中国文化。五山禅院成为研究新儒家形而上学思想、中国诗歌、绘画、书法和材料艺术——如印刷、建筑、园林设计和陶瓷——的学习中心。五山禅院将中国艺术的新风格介绍到中世纪的日本，促使禅宗和中世纪艺术表现形式之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联系。[33]

因此，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文化亲和力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关系也很复杂。从理论上讲，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戴维·皮林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告诉我，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石原慎太郎在2012年计划购买和开发东海争议岛屿，引发了当前的中日对峙。他说，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亲口对他说，日本人是“唯一能在一瞬间抓住永恒的人”。石原慎太郎聪明地眨着眼睛，继续说：“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34]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选择去日本旅游。我们很多人习惯了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我们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也许很快能达到上亿，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的确，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

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几乎可以肯定，即便中国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接轨，它也不会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或社会复制品。中国和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使中国人不愿复制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然而，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正如理查德·麦格雷戈的描述：

著名战略家乔治·凯南称，日本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一种不自然的亲密关系”，它诞生于两个差别极大的国家的冲突和痛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发展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可谓来之不易。从亨利·基辛格到詹姆斯·贝克，再到罗伯特·佐利克，相当多的美国高级官员没有掩饰他们对与日本打交道的反感。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富有经验的官员，在担任白宫高层的岁月里，曾与各种桀骜不驯、残暴冷酷的政府和领导人打交道。然而，在自己的授权传记中，斯考克罗夫特称日本可能是美国不得不打交道的“最难缠的国家”：“我不认为我们理解日本人，我也不认为日本人理解我们。”^[35]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如果中国真的朝着西方民主模式迈进，那么结果很可能更接近日本，而不是美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之间更紧密的象征性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演变。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可以预见，中国可能会逐渐受到影响，引入日本的一些模式。然而，这必须通过一个共生过程发生，而不是外部施压的结果。

要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最自然的方式不是说教或是向中国施压，而是鼓励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去游访日本。好消息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如果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能走出消极阴影，那么双方互访人数可能会激增。因此，美国应该鼓励中日两国加强高层交流。例如，日本新天皇德仁于2019年5月即位，他的首个海外访问地可以考虑选择中国。这将释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鼓舞数亿中国人游访日本。

如果接触日本的民主可以说服有思想的中国人考虑民主的优点，那么接触印度的民主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日本的民主表现为冷静、稳重，这反映了日本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并体现了日本的儒家传统。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我深知这种精神，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爱争辩的“印度人”。

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一部学术著作如此描述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佛教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一段漫长又艰难的同化时期，这种新的教义被确立为一种主要的思想体系，为丰富中国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一种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持久影响的主要宗教习俗。事实上，佛教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儒教和道教一起被称为“三教”，从而获得了与这些信仰实质上平等的地位。[\[36\]](#)

佛教起源于印度，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信仰印度教的母亲经常带我去印度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她觉得这两种信仰都令人心身愉悦。在新加坡，大多数佛教僧侣都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

因此，如下这类想法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或专家认为，印度有一天可能会（像日本或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可靠、顺从的盟友，可被用于对抗中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印度人士主张印度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共同对抗中国。2010年，拉贾·莫汉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如今，中国正在崛起，其力量辐射到次大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制衡中国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相对衰落。过去，印度通过与苏联结成事实上的联盟来制衡中国。今天，印度需要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中国的崛起将继续是和平的。[\[37\]](#)

拉贾·莫汉说对了一个关键点。鉴于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是时候重新启动其全球战略政策了。它不能再继续“自

动驾驶”，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的神圣政策能够引领印度进入新时代。说句公道话，印度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显然，莫迪意识到，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他可以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最大化印度的地缘政治优势。莫迪已然开始如此行事。2019年9月22日，莫迪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热情洋溢的海外印度人聚会上发表讲话，当时特朗普也在场，莫迪甚至含蓄地赞美特朗普，称特朗普为“我的朋友，印度的朋友，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38]仅仅几周后的10月11—12日，莫迪陪同习近平主席对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进行为期两天的参观。二人共同度过了两天，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印度工业联合会前会长塔伦·达斯提出，到2022年，莫迪和习近平主席还将共同举行五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他认为，“虽然挑战重重，但通过五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双方应该能建立起越来越高水平的信任。这是对2022年的合理期望”。^[39]

莫迪虽然加强了他与习近平主席的私人关系，却无法说服印度政府也像他那般务实。如果莫迪拥有精明且富有战略思想的人作为顾问，或是拥有像李光耀和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大师，印度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奉行更加务实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中，当原则压倒实用主义时，宝贵的机会就丧失了。尽管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提高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给印度带来丰厚的经济红利，但在原则问题面前，印度依旧挥手说“不”。起因是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修建一条穿越巴控克什米尔的公路，但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中声称自己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比

克什米尔对于印度更具备政治敏感性)上彰显出了最佳的能力。印度实际上清楚,当克什米尔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时,印方将不会夺回这片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区域。2001年,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和印度前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几乎一致同意:克什米尔事实上的控制线最终将成为法律上的控制线。相较之下,中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放弃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诉求。

尽管中国对台湾问题高度敏感,但中国政府却可能会让实用主义压倒原则。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美国放弃了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转而承认中国大陆政府。人们认为吉米·卡特总统放弃了在台湾当局的长期盟友,美国国会的补救反应是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旨在捍卫台湾当局的地位——这被中国视作叛变。这种做法,即便没有违反外交协议的文本,至少违反了美国在和中国签署协议时的精神。面对这种原则问题,中国本可以中止与美国的所有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在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变得非常落后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韬光养晦”(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成语),利用庞大的美国经济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增长。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与台湾关系法”于1979年通过。那一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管此前它为加入该协定积极谈判了好几

年。

说句公道话，莫迪总理本人非常希望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加入后将给印度带来长期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不幸的是，他无法促成这一点，因为他在人民党右翼团体民族卫队的政治盟友和国民大会党都表示反对。印度决定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运用外部诱导的“休克疗法”，以摆脱自身经济中不具竞争力的元素，发展新的竞争维度。这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外部诱导的“休克疗法”确实奏效了。2000年，美国的市场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了2016年，美国的市场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外部诱导的应急行动确实会使经济增长更快。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

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印度对此反应不佳，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例如，荷兰敦促列入一项人权条款。……印度在谈判中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

由贸易协定中或与自由贸易协定挂钩。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40\]](#)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抵制过欧盟的这些标准条款。印度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整个谈判于2013年按下暂停键。

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印度为何要反对？欧洲的外交官也许会在私下里小声嘀咕：“这些印度人怎么敢反对？我们在金钱上对他们予以慷慨援助，印度人却不知廉耻地拒绝在欧印合作协议中彰显欧洲的价值观。”没有多少欧洲人真正意识到印度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

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而那些问题，我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印度成为民主国家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视人权为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在印度民主政权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或任何欧洲机构揭露。欧盟试图将人权条款写入自由贸易协定，就好像它们是汽车排放标准应该得到印度的支持一样。贸易不应被欧洲内部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41\]](#)

任何接受这种条款的印度官员都会被印度同胞指责：竟然允许五亿欧洲人对十亿印度人进行说教？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

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

欧盟试图将观点强加于印度，这并不令人惊讶。按名义市场价值计算，欧盟的市场经济规模约为印度的七倍。然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小国——人口只有2 500万，比印度13亿人口少得多，经济规模也比印度小得多——居然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时大胆地对印度实施制裁，这着实令人震惊。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份报告记录了以下情况：

1998年5月12日，（在印度）宣布进行核试验的几个小时内，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召见印度高级专员，传达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最强烈谴责”。澳大利亚政府还召回了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并与其进行磋商。在印度实施第二轮核试验后，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暂停与印度的双边防务关系，包括撤回澳大利亚驻新德里的防务顾问；取消舰机互访、军官互访和其他防务互访；撤出目前在印度训练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人员；要求目前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工作的3名印度国防人员立即离境；暂停对印度的非人道主义援助；暂停部长级和高级官员的互访。[\[42\]](#)

为什么澳大利亚认为制裁印度对自身并无大碍？答案很简单，印度的经济实力吓不倒澳大利亚。相形之下，澳大利亚政府不会想要对中国实施类似的制裁。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真相是：美国对印度也不甚尊重。近年来，许多美国人骄傲地宣称，美国和印度的友谊建立在

牢固的基础上，因为两国都是民主国家。富有思想的印度人会不屑于这种言论，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称兄道弟。美国的一个关键弱点是：政府和官员定期更换，而且他们的记性很差。

许多美国人跟他们的西方同胞一样，对中华文明的尊重程度要比对印度文明的尊重程度高，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许多美国人会矢口否认，他们会大声宣称自己对印度的尊重跟对中国的一样多。但尊重是假装不出来的，最佳明证不是通过言语，而是看行动。世界上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尊重，都可以通过投入的时间和关注展示出来，美国对中国投入的时间和关注远远超过对印度的。如果美国想与印度发展长期的亲密关系，就需要直面它对印度不甚尊重的深层根源。这是西方学者认为印度文明不如中华文明那般辉煌灿烂导致的吗？抑或是美国媒体持续报道印度的贫困故事，使美国人原先想到非洲时会联想到贫困，现在一想到印度也会联想到贫困？还是说，美国的文化攻击，是由于以英属印度为背景的英国戏剧造成的？在这些戏剧里，印度文化被认为是次等的。除非美国人反思他们对印度缺乏尊重的根源，否则美国将无法与印度建立起强有力的平等伙伴关系。

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然而，印度可以，因为美印之间有很多共同联系。首先是美国的印度人社群取得了非凡成功。从许多方面说，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能够成就事业的市场，所以各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想移居到美国。美国的移民群体代表着世界各地最具成就事业潜力的

那一部分人。当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在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时，哪个民族表现得最好？数据显示，是美国的印度人社群。

在美国，印度裔家庭收入中值最高，为119 858美元（2018年）。[43]大量标志性的美国公司都是由印度裔经营的，包括谷歌（桑达尔·皮查伊）、微软（萨提亚·纳德拉）、百事可乐（因德拉·努伊）、奥多比（山塔努·纳拉延）、诺基亚（拉吉夫·苏里）、万事达卡（彭安杰）和美光（桑杰·梅赫罗特拉）等，这还只是部分名单。同样，美国许多顶级商学院的院长也是印度裔，包括苏尼尔·库马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务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前院长）、马达夫·拉詹（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院长）、尼廷·罗利亚（哈佛商学院院长）、兰加拉詹·森德拉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院长），以及保罗·阿尔梅达（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院长）。

鉴于印度裔在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强大存在，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上层联系可能比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趋同和精英阶层联系频繁这两个因素，会使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近年来，四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对印度产生了一定的个人感情，分别是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相形之下，有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里根对印度没表现出什么兴趣或好感。从逻辑上讲，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本应达到一个新高度，因为特朗普是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印度总理莫迪同属一个意识形态阵营。实际上，这两位领导人的关系初始时很好。2017年6月24—26日，莫迪访问了美国。访问期间，特朗普和莫迪“承诺在美国承认印度是主要防务伙伴的基础上，深化两国国防和安全合作”。[44]然而，特朗普尚未访问过印度，他还拒绝了作为2018年印度共和国日阅兵主宾的邀请，即便其他世界领导人，如普京、萨科齐、安倍和奥

巴马，都接受过该邀请。[45]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二年，美印关系暴露出一些困难。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特朗普大幅削减了H1-B签证的发放数量。这对印度的伤害最大，因为它是外国人才的最大供应国，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另外，印度处于世界贸易组织标准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数十年来，对美国出口在“普遍优惠制”下享有优惠关税待遇。该制度是美国在1976年制定的一项“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贸易计划”[46]，允许印度“向美国免税出口近2 000种产品”[47]。2019年5月31日，特朗普政府决定单方面撤销这些让步，终止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特朗普总统宣称：“我已经确定，印度没有向美国保证将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因此，从2019年6月5日起，终止印度作为受益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恰当的。”[48]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仅占美国进口的很小一部分（2018年为2.1%，合544亿美元），[49]因此，这对美国经济的净影响几近于零。那么，美国为什么要为了一丁点儿经济利益就疏远一个潜在的朋友或盟友呢？

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还在数个场合取笑过莫迪。2018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高级政府官员说，有人看到特朗普总统装出印度口音，模仿印度总理莫迪讲话。”[50]2019年1月，特朗普还嘲笑莫迪资助了阿富汗的一座图书馆：

在一次内阁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在为自己推动美国减少海外投资的努力做辩护，当时提到了印度的援助。他说自己与莫迪相处甚好，但又说，这位印度领导人“喋喋不休地跟我讲，他在阿富汗建了一座图书馆”。特朗普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像我们浪费了将近5个小时。我不知道谁正在阿富汗使用它。”[51]

好在莫迪并没有生气。他不搭理这些侮辱。但全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的热情且尊重的言论与对莫迪的贬损评价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鉴于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印度则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盟友，这类态度没有什么地缘政治意义，它们只是无意中暗示了一个事实：美国更尊重中国而不是印度。

最终，在2021年或2025年，我们将步入一个后特朗普时代。届时，美国可以开始制定一贯的长期政策，用于同印度深度接触。美国总统和印度总理应该举行年度高层会议。美国自2009年起与中国建立了高层（包括财政部长和国务卿）战略对话，它也应该同印度开启这种对话。更大胆的设想是，美国应该提议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做出一些单方面的让步。美国和印度之间深入且大胆的伙伴关系将使印度发挥重要作用，充当美国和亚洲新世纪之间的桥梁。

东盟也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如果说印度未能获得美国的战略尊重，东盟的境遇就更糟糕了，会遭遇美国的战略无知。许多美国高层决策者可能听说过“东盟”这个名字，但很难理解东盟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要说清为什么东盟对美国至关重要，最佳办法是对比东南亚和伊朗。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两大战略失败：1975年，从越南灰溜溜地撤军；1979年，被伊朗驱逐出境。在这两次失败之际，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落到了当地共产党政府手中。一些美国专家警告说，东盟最初的五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最终将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被当地共产党接管。然而，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随后20多年里，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了东盟。

今天，东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前景最好的区域之一。东盟国家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经济体，到2030年，东盟整体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52\]](#)伊朗有7 000万人口，将持续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东南亚的6.5亿人口则是美国可以利用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明智之举是关注这一战略机遇。相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更关注伊朗，东盟则继续被美国所忽视。当美国官员必须安排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访问东南亚的日程时，他们会口出怨言。实际上，当中东爆发新的“危机”时，许多美国国务卿取消或缩短了对东盟国家的访问议程。这种做法是不理性的。

好在为时不晚。对美国而言，东盟仍然是一个充满巨大地缘政治机遇的地区。谈到东南亚时，美国人往往只记得越南战争的痛苦。1975年的惨痛溃败是美国人想要忘记的，因此，他们忽略了去看东南亚45年来取得的成功。在此期间，美国支持的非社会主义经济体（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推倒）实际上却成功了，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尤其是，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东南亚是世界上最亲美的地区之一。

毫无疑问，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想知道：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关键时间里，当中东不再是美苏竞争的舞台，失去了其重要性，而东南亚成了中美竞争的潜在舞台并变得重要起来时，为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会继续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东（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美国人的精力和资源），而不是放到东南亚这个和平与繁荣的绿洲上？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东南亚的许多领导人和精英曾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就读。常春藤联盟大学的一些最活跃的海外分会就分布在东南亚。

令人高兴的是，东南亚的这种亲美情绪不会很快消失。如果

美国能制定出一个针对东盟的明智、深思熟虑、全面且长期的战略，那么它将会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伙伴。

今天，当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审视东南亚时，他们是透过中美竞争的扭曲棱镜来看的。东南亚在地理上毗邻中国，最大的内部水道被称作南海。许多美国人认为东南亚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卫星国。尽管与中国地理相邻，但十个东南亚国家中有九个拥有印度文化基础，唯一拥有中国文化基础的是越南——被中国统治了将近一千年，对终于实现独立备感珍惜。

大多数美国人不甚了解东南亚的历史，它着实引人入胜。在东盟的6.5亿人口中，有2.66亿穆斯林，1.46亿基督教徒，1.49亿佛教徒（包括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此外，那里还有数以百万计信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印度教的人，他们在东南亚和平生活。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东南亚的忽视可能帮助了该地区发展——这个观点会立即招致美国决策者的质疑。然而，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无谓的战争中浪费的数万亿美元产生的结果进行清醒的评估，应该可以向未来的美国决策者证明：少就是多。

忽视也不等于完全不接触。美国虽然从东南亚所有的军事冲突中撤身，但仍与东盟保持着外交接触。诚然，美国人的注意力是不连贯的，也无法被预测。但总体而言，美国和东盟关系的基调是积极的。

简言之，如果美国有兴趣采用“外交优先”的战略来制衡中国，那么东盟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虽然东南亚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很可能在争夺该地区人心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失利，但更深

入地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后，能够看出美国拥有外交接触的机会。

我在2019年写道，我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时，俄罗斯将成为美国的关键盟友，虽然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1979年，以俄罗斯为首的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数倍。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相对权重发生了急剧变化。

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12.2万亿美元）是俄罗斯（1.6万亿美元）的近八倍。[\[53\]](#)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变得更大。尽管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库使中国相形见绌，也无须担心遭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入侵（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它还是应该谨慎地寻找一个盟友来平衡一下这个规模和影响力都比它大得多的邻国。俄罗斯最天然的盟友是美国。那么，如果在未来几十年的某个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结成联盟，那将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领导人必须能够坦诚地与俄罗斯领导人对话。他们必须承认一些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可能令人痛苦和不安。近期，最明显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美国人希望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领导人做出的明确或含蓄的承诺。美国曾向俄罗斯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不会将北约东扩以威胁俄罗斯。

当美国人做出扩大北约这一致命的决定时，他们的地缘政治盘算是什么？美国人是否认为，在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虚弱挣扎时（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

美国可以一举消灭俄罗斯这个潜在竞争对手？鉴于大多数美国人天性开朗大方，似乎很难相信美国会设计一个险恶的阴谋，永远消灭俄罗斯这个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即便如此，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对俄罗斯利益的漠视，也似乎出自一项前后一贯的计划。

不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存在“有意识”地削弱俄罗斯的计划，美俄两国面对面坦诚地交流一下各自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仍是很有帮助的。它们应该面对所有困扰两国关系的艰难插曲：北约扩张，美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

美国如果坦诚地重新评估对俄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思考带来一些益处。过去的已成事实，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本国政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耻辱，他们就可以逐步消除一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关键心理障碍——这些阻碍了美俄联盟的早日达成。

冷战刚一结束，越南就开始适应苏联解体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许多昔日对手也迅速调整了策略。例如，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与越南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到了1995年，越南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都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华盛顿特区战略智库产业的精明老练，却也能够通过接纳一个前对手加入东盟来迅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好在美国与东盟保持同步，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在1995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54\]](#)

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

永远战胜情绪。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在部分程度上也使它享有让情绪——而非理性——指导地缘政治行为的特权（或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一个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强大得多的世界头号强国来说，这种行为可以出现，或许也可以接受，但当这个强国下滑至世界第二的地位时，在地缘政治的思考和行为中，允许情绪战胜理性则可能是致命的。

随着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它将不再享有由情绪来驱动地缘政治政策的特权。为了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美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将使美国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反应和冲动，而地缘政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知己”。

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美国做对的地方比做错的多。因此，美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但美国确实犯下了一些不必要的、令人痛苦的错误，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简言之，现在的情形与冷战时期不同了，那时绝大多数国家对成功的美国——而不是对失败的苏联——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在新的中美竞争中，类似的结果是否会出现还远未可知。大多数国家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防范风险。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学会进行一种更复杂的博弈。

[1]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Hopes US-China Trade War Will Be Over Soon,”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September 7,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merkel-hopes-us-china-trade-war-will-be>

over-soon.

[2] Lee Hsien Loong, keynote addre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Shangri-La Dialogue,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May 31, 2019,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Hsien-Loong-at-the-IISS-Shangri-La-DIALOGUE-2019>.

[3]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rican Union, 2019, <https://au.int/en/treaties/agreement-establishing-african-continental-free-trade-area>.

[4] Chan Heng Chee, "Resisting the Polarising Pull of US-China Rivalry,"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ne 18,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resisting-the-polarising-pull-of-us-china-rivalry>.

[5] "From the time of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members of the Team in 1962 almost 60 000 Australians, including ground troops and air force and navy personnel, served in Vietnam; 521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war and over 3 000 were wounded. The war was the cause of the greatest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Australia since the conscription referendum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ny draft resisters,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and protesters were fined or jailed, while soldiers met a hostile reception on their return home": "Vietnam War 1962–75,"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https://www.awm.gov.au/articles/event/vietnam>.

[6] Statistics Section, Offic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ivision, *Composition of Trade Australia 2017–18*,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January 2019, <https://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cot-2017-18.pdf>.

[7] Neil Irwin, "Red Wines a Sign of the Times in Australia's Ties with US and China,"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May 14,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red-wines-a-sign-of-the-times-in-australias-ties-with-us-and-china>.

[8] Kishore Mahbubani, "Australia's Destiny in the Asian Century (Part 1 of 2)," *Jakarta Post*, September 7, 2012, http://mahbubani.net/articles%20by%20dean/Australia%20destiny%20in%20the%20Asian%20Century_The%20Jakarta%20Post-joined.pdf.

[9] Kishore Mahbubani and Jeffery Sng, *The ASEAN Miracle: A Catalyst for Peac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7).

[10] Hugh White, “America or China? Australia Is Fooling Itself That It Doesn’t Have to Choose,” *Guardian* (Manchester, UK), November 26,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7/nov/27/america-or-china-were-fooling-ourselves-that-we-dont-have-to-choose>.

[11] Michael E. O’Hanlon, “The Risk of War over Taiwan Is Real,”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1, 2005,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risk-of-war-over-taiwan-is-real/>.

[12]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13] Nikos Chrysoloras and Richard Bravo, “Huawei Deals for Tech Will Have Consequences, U.S. Warns EU,” Bloomberg,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2-07/huawei-deals-for-tech-will-have-consequences-u-s-warns-eu>.

[14] Keegan Elmer, “Huawei or US: Mike Pompeo Issues Warning to Allies That Partner with Chinese Fir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2,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87275/huawei-or-us-mike-pompeo-issues-warning-allies-partner-chinese>.

[15] Marrian Zhou, “Bill Gates: Paranoia on China Is a ‘Crazy Approach’ to Innovation,” *Nikkei Asian Review*, November 8, 2019.

[16] EEA, “Population Trends 1950–2100: Globally and Within Europ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indicators/total-population-outlook-from-unstat-3/assessment-1>.

[17]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United Nations, DESA/Population Division,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18] Eurostat,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Statistics,” Statistics Explained,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Population_and_population_change_statistics.

[19] United Nations, DESA/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ttps://population.un.org/wpp/Graphs/Probabilistic/POP/TOT/>.

[20] Eurostat, “Population on 1st January by Age, Sex and Type of Projection” (chart), https://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proj_18np&lang=en.

[21] “Migrants: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ion Routes,”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region/mediterranean>.

[22] Aubrey Hruby, “Dispelling the Dominant Myths of China in Africa,”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9/three-myths-about-chinas-investment-in-africa-and-why-they-need-to-be-dispelled/>.

[23] Owen Churchill, “Mike Pompeo Warns Panama and Other Nations About Accept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Lo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69449/mike-pompeo-warns-panama-and-other-nations-about-accepting>.

[24]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25] Kate Merkel-Hes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Nanjing by the Number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9, 201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0/02/09/nanjing-by-the-numbers/>.

[26]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ref/1.html>.

[27] 1英里 $\approx$ 1.6公里。——编者注

[28] Wm. Theodore de Bary, Donald Keene, George Tanabe, and Paul Varley,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600*,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https://www.gwern.net/docs/japanese/2001-debary-sourcesofjapanese-tradition.pdf>.

[29] Ezra Vogel, “Can China and Japan Ever Get Along?” in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ed. Jennifer Rudolph and Michael Szony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4–115.

[30] de Bary, Keene, Tanabe, and Varley,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31] Ibid.

[32] “Excerpt of Mao Zedong’s Conversation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Kakuei Tanaka,” trans. Caixia Lu,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1, 1972,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8567.pdf?v=71cad3a9f99def657fdfb83057f844c2>.

[33] de Bary, Keene, Tanabe, and Varley, ed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34] David Pilling, “Why Is Japan So... Different?,” *Foreign Policy*, March 17, 201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3/17/why-is-japan-so-different/>.

[35] Richard McGregor, *Asia’s Reckoning: China, Japan, and the Fat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Century* (Viking: New York, 2017).

[36]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600*,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266.

[37] C. Raja Mohan, “India’s Strategic Futur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4, 201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0/11/04/indias-strategic-future-2/>.

[38] “Trump Pushes Unity with India at ‘Howdy, Modi!’ Event in Houston,” CBS News, September 22, 2019, <https://www.cbsnews.com/news/howdy-modi-trump-rallypushes-unity-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houston-texas-today-2019-09-22/>.

[39] Tarun Das, “India and China in 2022,” *Business Standard*, November 1, 2019, 9.

[40] Jan Wouters et al., “Some Critical Issues in EU-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Working Paper No. 102,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February 2013, https://ghum.kuleuven.be/ggs/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2013/102woutersgoddeerisnatensCiortuz.

[41] Shashi Tharoor, “Reconsider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dia Today*, May 18, 2012, <https://www.indiatoday.in/opinion/shashi-tharoor/story/european-union-india-ties-india-eu-joint-action-plan-102549-2012-05-18>.

[42] “Chapter Six: Australia’s Response to Nuclear Tests in South Asia,”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Senate/Foreign_Affairs_Defence_and_Trade/Completed_inquiries/1999-02/nuclear/report/c06.

[43] US Census Bureau,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8: ACS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s, TableID:S0201,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hidePreview=false&table=S0201&tid=ACSSPP1Y2018.S0201&t=013%20-%20Asian%20Indian%20alone%20%28400-401%29%3AIncome%20and%20Earnings&lastDisplayedRow=50>.

[44] “Joint Statement —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Prosperity Through Partnership,” Media Center,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une 27, 2017,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560/United_States_and_India_Prosperty_Through_Partnership.

[45] Nirmala Ganapathy, “Trump Declines to Be Chief Guest on India’s Republic Day,”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November 1,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outh-asia/trump-declines-to-be-chief-guest-on-indias-republic-day>.

[46] Information Center,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https://help.cbp.gov/app/answers/detail/a_id/266/~/_generalized-system-of-preferences-%28gsp%29.

[47] Justin Sink and Jenny Leonard, “India Roiled as Trump Yanks Its Status as a Developing Nation,” Bloomberg, May 31,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01/trump-ends-india-s-trade-designation-as-a-developing-nation>.

[48] Ibid.

[49] See US Census Bureau, “Top Trading Partners — December 2018,” Foreign Trad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top1812yr.html>; and 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India,” Foreign Trad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330.html>.

[50] Greg Jafe and Missy Ryan, “Up to 1,000 More US Troops Could Be Headed to Afghanistan This Spring,”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 2018.

[51] “Trump Mocks Modi over Funding for Afghan Library,”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anuary 4,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trump-mocks-modi-over-funding-for-afghan-library>.

[52] PwC, “Emerging Trends in Real Estat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https://www.pwc.com/gx/en/growth-markets-centre/publications/assets/pwc-gmc-the-future-of-asean-time-to-act.pdf>; Loong, keynote address; and ASEAN, “Investing in ASEAN, 2013–2014,” <https://www.usasean.org/system/files/downloads/Investing-in-ASEAN-2013-14.pdf>.

[53]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54] Eleanor Albert, “The Evolution of U.S.-Vietnam Ti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 2019,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evolution-us-vietnam-ties>.

第九章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本书以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收尾：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既不可避免，也可以避免。

先来谈谈不可避免的方面。本书阐释了一些驱动中国与美国走向重大地缘政治竞争的动力，从中国犯下的疏远美国商界的失误，到美国需要寻找外国替罪羊，以掩盖美国社会出现的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等。

同时，在美国国内，反华声势正在不断积聚壮大。《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伊普在与几位研究中国数十年的权威人士交谈后总结道：“如果过去钟摆摆得太过倾向于迁就中国，那么现在可能反弹得太过倾向于对抗中国。”伊普援引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话说：“我们在对华态度上，不是对华政策上……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逆风而行，做出平衡，问问我们能够切合实际地做些什么，以便有机会取得不会损害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安全成果。”^[1]

亨利·保尔森绝对是正确的。在这种对华强硬的不良氛围下，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倡导更理性地对待中国，都将是不明智的。罗杰·科恩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就传达了强烈的反华情绪。总体来说，科恩是一位公正、不偏不倚的专栏作家。然而，在2019年8月31日的专栏文章中，他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正面评价。科恩写道：“就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战争。”

本书的一个关键信息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要去接管世界，以及要把每个人都变成中国人。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

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更糟糕的是，关键决策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做出的。当管理一个工业园区的中国官员向一家美国公司施压，要求对方分享技术以换取投资许可时，他或许没有料到，这会导致中国出现战略失误：疏远了美国商界，为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摩擦铺平了道路。2018年8月27日，当一名纽约法官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出逮捕令时，[\[2\]](#)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再者，短期收益往往会压倒长期考量。当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柬埔寨政府否决一份提到南海问题的2012年东盟联合声明时，表面上看，中国在短期内取得了胜利。但这也为美国落下了一份巨大的宣传口实。欧内斯特·鲍尔——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如此描述此事的影响：

在东盟的团结问题上，柬埔寨被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一项对东盟及其成员国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上，柬埔寨与东盟邻国之间呈现出对抗态势。柬埔寨传出的最重要信息不是东盟内部就联合声明争吵不休，而是中国认为一个软弱分裂的东盟将符合其最大利益。[\[3\]](#)

同样，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声明，以坚定的原则立场赢得了美国媒体的赞誉。然而，这种公开攻击也破坏了中国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互利谅解、互相尊重核心海洋利益的前景。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短期的宣传收益往往以牺牲长期的红利为代价。

地缘政治决策同所有政治决策一样，是由风云人物推动的，而这些人在不断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中美合作的黄金时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四位地缘政治的重量级人物——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寻常地走到一起，结成了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若没有这四位领导人处理地缘政治的高超技巧，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突破。

相形之下，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2012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不太融洽。理论上，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在实践中，个人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认为，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讲话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新低点。这是一场令人厌恶、居高临下的演讲，他的几位前任都不会发表这种演讲。一年后，在2019年10月24日，彭斯发表了第二次抨击性演讲，再次全方位攻击中国，重申他一年前的指控，即“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伤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

从中国的债务外交和军事扩张主义、镇压有信仰者、建设全国监控网络，再到一系列违背公平自由贸易的政策，包括关税、配额、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等”。^[4]一个冷静、理性的副总统在发表此类演讲时，往往会更加谨慎，而不是如此强硬。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会进行得相对顺利：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政权让位给另一个。这一转移背后没有情绪上的恶意揣测。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西方人脑海中一直被认为是不同的。因此，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横亘着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担忧：他们会理解我们，以及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吗？我们能理解他们吗？

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但很少露面。当美国高层决策者就中国问题做出决定时，他们可以诚恳地说，这是出于理性考量，而非受情绪驱动。不过，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显然受到了深层情绪反应的影响。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国家和文明也难以挖掘出它们的无意识冲动。

“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为什么拿破仑提到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一个同样庞大且人口众多的文明？因为没有大群的印度人威胁或蹂躏过欧洲各国的首都。相形之下，13世纪时，成群结队的蒙古人就出现在了欧洲的门口。诺琳·吉夫尼记述

道：“1235年，蒙古军队入侵东欧，1236—1242年又入侵罗斯公国。……蒙古人在猛攻之后，又神秘地迅速撤退，这让西方人大吃一惊，也松了一口气。”^[5]

吉夫尼追溯了13世纪的欧洲作家是如何在蒙古人入侵欧洲之后，将其塑造成“怪物”的：

蒙古人入侵基督教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后，在各种文字作品中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审视，并被称作“无法无天的以实玛利人”、“遭诅咒的无神论者”和“沾满基督徒鲜血的人”（《诺夫哥罗德纪事》，1914，82，83，82）。他们使用了大量让西方军队感到惊讶和困惑的军事技术，再加上蒙古大军不断膨胀的无敌士气，使当时的观察家将他们描述为“一群反基督者”（《世界大事录》，1852，1:469）和“撒旦的地狱使者”，来自地狱深渊神塔耳塔洛斯腹中或地狱深处。^[6]

对“黄祸”的潜在恐惧，时不时地展露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我是一个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孩子，读过当时流行的傅满洲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并不是西方人，都能够内化吸收这类种族滑稽漫画，我怀疑潜意识中的“黄祸”恐惧也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这是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悲观的另一个原因。即使大多数美国人会抗议，说他们的外交政策中没有种族主义的影子，但是许多亚洲人（不仅仅是中国人）会同意我的观点。

尽管悲观的理由很充分，但人们也可以找到同样充分的乐观理由。如果我们能够调动理性的力量来理解中美两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就会得出结论：这两个大国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的矛盾。事实上，中美之间有着五个“不矛盾”。如果两国政府中明智的思

考占据上风，它们应该反思并强调这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西方语境中很少使用“不矛盾”这个词。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了黑白分明，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中国人的思维却不同，黑与白都可能是对的。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阴”“阳”概念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在西方人的世界观中，只有“阴”或“阳”一方是正确的。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阴”和“阳”都可能是正确的。

要想清楚解释“阴”和“阳”的关系很困难。南洋理工大学的黄海教授做过尝试。他写道：

阴阳思想反映了一种试图解释关系和变化的辩证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阴和阳只不过是捕捉自然界二元性感知的标签——黑暗与光明，柔软与坚硬，女性与男性。因而，阴阳学说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观，认为所有实体都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实体无法脱离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二元论意味着像光明这种属性只有相对于黑暗才有意义，就像美相对于丑一样。[\[7\]](#)

他补充道：“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阴和阳相互对立，却又相互依存。”

持此二元论观点，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五个根本上的“不矛盾”。

第一，两国的根本利益不矛盾。这两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利益都是改善国民的福祉。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在卸任美国总统时写道：“一个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标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坏它们。”[\[8\]](#)马丁·沃尔夫注意到这一观点，询问道：“如何衡量‘幸福’呢？是什么增进了‘幸福’？”[\[9\]](#)沃尔夫

说，这些都是古老的问题。西方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包括杰里米·边沁在内，早就提出了这种问题。

好消息是，当代功利主义哲学家已经接受了衡量幸福的挑战。例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在合著作品《幸福的起源》中说，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作为衡量幸福的一个良好指标。鉴于此，莱亚德声称，“幸福感”最终将被完全接受为评估社会政策的标准方法。如果我们可以衡量和增进幸福感，那么就可以关注提升幸福感的政策。我们还可以决定在国家预算中哪些项目应该获得优先考虑：是国内投资还是国防支出？

美国比中国富裕得多。美国的名义人均收入是62 641美元，是中国的9 771美元的六倍多。[\[10\]](#)美国虽然更富有，但人民的福祉，尤其是底层50%人民的福祉，在近几十年里不断恶化。有一个事实不容辩驳：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浪费了近5万亿美元。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称：

加上这些开支和国会对2017财年的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在“9·11”事件后的战争中花费了大约4.8万亿美元。此外，如果美国不改变支付战争费用的方式，那么到2053年，利息成本将至少达到7.9万亿美元。[\[11\]](#)

如果这4.8万亿美元被分配给美国底层50%的人民，那么每个公民将拿到大约2.9万美元。如果把这个数字与2/3的美国家庭连500美元的紧急现金都筹措不来放到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到，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海蒂·加勒特·佩尔蒂埃在2017年为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中写道：

2001年以来，鉴于联邦政府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花掉数万亿美元，我们丧失了在国内经济中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的机会，也丧失了为美国公众改善教育、健康和环境的机会。……在同等支出水平下，教育和医疗保健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国防部的两倍多，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创造的就业机会则会多出40%。事实上，在过去的16年里，美国因为把钱花在战争中而不是国内经济的其他领域，丧失了创造100万 ~ 300万个额外就业岗位的机会。

[12]

简言之，如果美国停止无谓的国外战争，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福祉，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会好得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因此，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无可辩驳。然而，战略思考者看不到这个基本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视角已变得何等扭曲。辽阔的太平洋隔开了中国和美国，这是两国的幸运。如果它们都能关注本国人民的福祉，并让太平洋保护各自的家园，中美两国都会更加美好。

中美两国还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美国正饱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之苦，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超级大国，中国建设高速铁路（即高铁）网络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2012年，《纽约时报》记者基思·布拉德舍报道说：“中国开始运营……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8小时可以行驶相当于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距离……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距离相对更近，但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依然需要花费将近30个小时。”[13] 常识告诉我们，两国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然而，考虑到彼此恶劣的政治态度，常识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重大的战略重启。如果两个大国首先尝试

界定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核心利益，它们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

第二，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也根本不矛盾。如果气候变化使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那么美国和中国公民将成为同一条沉船上的旅客。“重整泰坦尼克号甲板上躺椅的人是傻子”，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争论地缘政治分歧，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保护地球环境这一共同利益上，那么它们就是在做无用之功。

一位智者曾说，对人类来说，最佳之事是天文学家在与地球相碰撞的轨道上发现了一颗遥远的彗星，但不确定它会击中哪个大陆。只有面临这种共同的威胁，地球上75亿人（包括中国的14亿和美国的3.3亿）才会意识到，他们作为地球公民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描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全球文化虽然单一，但却非同质.....但不论如何，它们彼此都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它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它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14]

我们唯一的宜居星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应该关注彼此的差异还是相似之处？人类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这

是我们成为世界上优势物种的显著原因。然而，最聪明的物种现在正以一种自杀的方式行动——允许气候环境继续恶化，而不采取共同行动来逆转它。我们还在争论哪些国家该受到指责。杰出的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正确地指出，“当今中国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8%，美国仅占约15%”。[\[15\]](#)另一个事实是，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不单单是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也是由西方国家自使用煤炭当作燃料的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存量造成的，尤其是二氧化碳的存量。[\[16\]](#)图9.1记录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见中国的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欧盟。简言之，所有工业化国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携手努力，以减轻进一步的环境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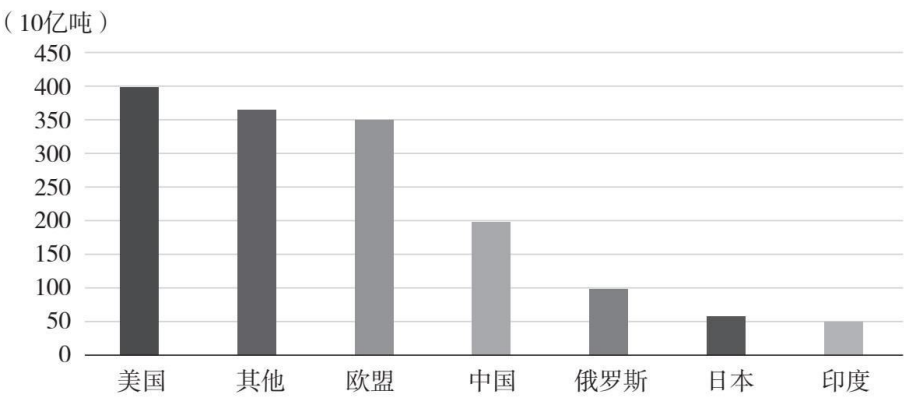


图9.1 1751—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17\]](#)

2017年，当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时，中国和印度没有选择退出，表现得非常负责任。当中国（人均收入为9 771美元）和印度（人均收入为2 016美元）等相对贫穷的国家履行全球义务时，美国这个相对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为62 641美元）却选择退出，这个世界真是令人啧啧称奇。[\[18\]](#)正如布莱

克威尔所指出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让中国成了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非正式全球领导者，同协议签署国一道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履行义务。这使国际上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表明，美国正在退出世界。”^[19]

全球气候变暖并非人类面临的唯一“全球共有”的挑战。在其他许多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紧迫的挑战。联合国确立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应对世界面临的紧迫的环境、政治和经济挑战”。^[20]这17项目标旨在实现：

1. 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4.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5.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女童赋权。
6.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并以可持续方式管理水和卫生设施。
7. 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8. 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确保人人有体面的工作。
9. 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并推动创新。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1. 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与人类住区。

12.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以及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6.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与包容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在各层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21]

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合作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有一个例子。在中国饮食中，鱼翅是一道美味佳肴。中国由于拥有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中产阶级，对鲨鱼鱼翅的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这使鲨鱼成为濒危物种。好在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行动，禁止在任何公务招待餐中提供鱼翅。中国共产党有9 000万党员，当9 000万中国人停止食用鱼翅后，对鱼翅的需求量便急剧下降了。捕猎鲨鱼就变得没那么有利可图了。中国单方面的行动可能拯救了一个物种。

第三，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矛盾。这一说法可能令人备感意外。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确实在推行共产主义，我亲身经历过。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60年代

积极地支持他国的共产党，特别是东南亚邻国的，比如马来亚共产党。当时马来西亚共产党试图接管我的家乡新加坡。然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和平关系。李光耀传达这一消息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逐渐收回，也不再推广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转变值得美国的观察家深思。40多年前，当中国面临一个具体的选择时，它选择了促进国家利益，放弃了在全球推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感觉不到任何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许多思虑过度的美国人可能嗤笑这种想法很天真。许多美国人已经确信（几乎出于宗教信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根据人口规模来看，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分别是印度（13亿人）、美国（3.3亿人）和印度尼西亚（2.5亿人）。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那么这三个国家都应该感受到威胁。但只有一些美国决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如果有人去问印度总理莫迪或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或者两国的任何高级官员），贵国是否感受到来自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他们会对自己为何会被问到这一问题感到不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地理上比美国离中国更近，它们与中国的联系也更多，所以很了解中国。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它们并不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们看不出中国领导人有丝毫输出或推广社会主义的愿望或努力。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

的态度和行为与苏联共产党恰好相反。

遗憾的是，即便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行为与苏联共产党截然相反，许多美国思想家仍不假思索地把他们昔日对苏联共产党行为的假设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做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远超苏联共产党，而且有一点不同于苏联共产党，那就是其没有很快消失的危险。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冷战结束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僵化的计划经济，在巨大的国防开支的压力下彻底崩溃。即便如此，这也用了40年时间。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崩溃。”^[22]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更具备适应力？因为它跟苏联共产党不同，它不是乘着意识形态的浪潮，而是顺应文明复兴的潮流——中华文明已经证实自身是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之一。

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战略失误，即便新加坡本应是英国坚不可摧的堡垒。英国人让大炮对准南方，准备迎接来自海上的进攻。然而，日本军队却骑着自行车从北方赶来。新加坡的失守已经成为教科书般的案例，述说着战略思维是如何犯下错误的。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有趣的是，乔治·凯南在以“X先生”为笔名的著名文章中也强调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内社会的重要性。他用了美国人应该注意的两个关键短语。同冷战时期一样，即将发生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的“精神活力”，以及美国能否成功地避免“优柔寡断、不团结和内部分裂”。简言之，

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威胁——决定着美国将表现如何。可悲的是，今天的美国既缺乏精神活力，也深深陷入不团结和内部分裂中。美国与其浪费宝贵的资源来应对“莫须有”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不如利用同等资源来振兴自己的社会。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矛盾，尽管这看起来有悖常理。

第四，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文明之间也不存在矛盾。虽然塞繆尔·亨廷顿在1993年曾发出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同样地，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更糟糕的是，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它们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

本章前面谈到，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对“黄祸”的恐惧导致了美国人对“黄种人”的各种歧视行为，从19世纪末的《排华法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押，不一而足。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表示：“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感联系在一起。”^[23]

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

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基伦·斯金纳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潜意识维度正在施加影响，现在是时候坦诚地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的“黄祸”意识维度了。对付我们潜意识中的恐惧，最佳方法就是让它们浮出来并加以处理。

好在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非理性冲动。在现代社会，不同的文明不像台球那样在各处散落。相反，我们已经发展成“地球村”中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各种文明深度交织和融合。在一篇题为《文明的融合》的文章中，我和劳伦斯·萨默斯指出：

伟大的世界文明，在过去是分离和独立的，现在有越来越多重叠的共同领域。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人有着和西方中产阶级一样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找到好工作，生活在稳定、和平的社区里，过上幸福、有意义的人生。西方不应该感到沮丧，而应该庆祝：在将世界观的关键要素注入其他伟大的文明方面，西方取得了非凡成功。

[24]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我们还观察到，西方和中国之间也正在出现一股促进文明融合的压倒性动力。正如我们写道：

许多人担心的第二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然而，中国的

成功也可以被视作西方的终极胜利。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过一封著名的信，信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明白了，他们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现代性对于国家的重新崛起至关重要。现代性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崭新铮亮的基础设施，太空探索的胜利，壮观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等。

尽管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现代性，但它并没有抛弃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人关注现代中华文明，也重视传统中国特性，这两者似乎毫无矛盾。的确，在新财富的推动下，中国现在正经历着自己的文化复兴。[\[25\]](#)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不应该出现文明冲突。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说道：“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26\]](#)

当今时代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过去，是西方领导人致力于拥抱多样性的价值观，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有一位美国总统经历过很可能发生核战争的梦魇，他就是约翰·肯尼迪。这段经历让他的内心备受折磨，在反思过后，他向美国同胞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正如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因此，我们不能对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利益上，并通过共同利益来消弭我们的分歧。如果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至少能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因为，归根结底，连接我们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

的地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27]他的发言的关键信息是，让多样性在世界上获得安全。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第五，美国和中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领域就是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美国人对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理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人权。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和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这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一句名言里有所体现。他说，现在美国“全社会”都受到中国的威胁。一群美国学者发布的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的自由。该报告称：“开放和自由是美国民主的基本要素，也是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固有优势。必须保护这些价值不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蚀。”[28]尽管一些中国机构可能在美国开展了一些令人反感的活动，但我们可以坚定地断言，中国政府没有意愿和计划去破坏或推翻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呢？答案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才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

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许多多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正如本书多次讲述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也讲究公平。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言行一致。美国人也会同意这样一个广泛的原则，即一个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某些基本原则的国家，不具备道德权威去向他人宣讲这些人权的优点。

美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这些观点，但却没有践行它们。我们可以从美国领导人对新疆教培中心的反应中看出这一点。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权表达愤怒，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待穆斯林平民会更好。

但究竟哪个国家对待穆斯林平民更好呢？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自2011年9月9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折磨或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穆斯林平民。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向伊斯兰国家投掷了成千上万枚炸弹，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著作《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也总结了这些事实。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美国在关塔那摩监狱中会系统地施行酷刑。但很少有美国人知道，小布什政府制定了臭名昭著的非常规引渡政策，据此将“高价值”囚犯送往埃及和叙利亚等不关心人权的国家，在那里对他们施加折磨和审问。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欧洲的“黑狱”、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这一政策显然

违犯了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二者都禁止酷刑。[29]

酷刑比监禁更严重地侵犯着人权。大多数道德哲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他们还会同意，比酷刑更糟糕的是暗杀，因为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几乎没人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政府加强了暗杀计划的执行力度。米尔斯海默描述了这番情形：

奥巴马政府既不能起诉也不能释放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所以对逮捕新囚犯并且无限期地关押他们也几乎没有兴趣。于是，奥巴马和顾问们显然做出了替代决定，那就是一旦出现可疑的敌方战斗人员，就暗杀他们。虽然杀死嫌犯要比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监狱并置于法律困境中容易得多，但这项新政策可能带来更消极的影响。

无人机在这些暗杀行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奥巴马有一份被称为“处置矩阵”的杀人名单；每个星期二，白宫里会举行一次被称为“恐怖星期二”的会议，会上将选出下一名受害者。[30]

米尔斯海默又补充了如下观察：“记者汤姆·恩格尔哈特写道：‘从前，不公开的暗杀行动通常是一种罕见的国家行为，总统可以否认或撇清责任。现在，它已经成为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日常公干的一部分。总统作为刺客头目的角色几乎被视作一种政治加分项来公开宣传。’”

鉴于美国政府在尊重无辜穆斯林平民的人权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因此，其对他国宣教尊重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就是自讨没趣。对两国政府来说，更明智之举是着眼于全局，承认两国面临共同的挑战，即都要应对伊斯兰激进组织招募的恐怖分子构成的威胁。“9·11”事件以后，美国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中国也经

历过类似“9·11”的时刻，比如“5·22”乌鲁木齐恐怖袭击案。伊沙恩·塔鲁尔在2014年5月22日《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写道：“星期四上午，乌鲁木齐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这次袭击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开着两辆车冲向人群，并在一个人群密集的市场引爆炸药。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今年3月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当时，持刀袭击者在西南部城市昆明的一个火车站砍倒了29个人。当局怀疑此次袭击者同昆明事件中一样，也是维吾尔族极端分子。”^[31]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也有相似经历，如果他们知道，就会看到中美两国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一项最大生存挑战的长期价值。

这一挑战就是13亿穆斯林正在做出的巨大努力：实现现代化，达到大多数中国和美国公民已经享有的舒适安全的生活水平。好消息是，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正缓慢、稳健地迈向成功，包括人口规模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更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将对中东地区一些情况更糟糕的阿拉伯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美国已经洒了大量的鲜血、投入巨大的资源去尝试修复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但这些努力大都失败了。如果美国能够与亚洲成功的温和派伊斯兰国家以及中国合作，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面对伊斯兰世界，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把焦点放在它们的分歧上，而应放在它们共同的挑战和机遇上。

如果在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培育出积极的增长动力，那么结果将是世界上会减少侵犯人权（监禁、酷刑或暗杀）的情况。总之，即便各国在价值观领域存在分歧，也依旧存在合作的潜力。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合作将为自己的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中国和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这强化了本书的关键信息。如果中美两国都专注于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福祉这一核心利益，那么它们将认识到，在长期国家利益层面，两国不存在根本性矛盾。2010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温家宝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中印关系的积极精神：“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的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32]同样，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国和美国共同繁荣发展。

同等重要的是，面对全球变暖这一严峻挑战，中国和美国在使地球适宜两国17亿人口和世界上其余50多亿人口居住方面，也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这一紧迫而严峻的挑战应该优先于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挑战。

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其实很简单：人类能否证明自身仍然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并把这种形象传递给子孙后代？当人类看到两个类人猿部落在周围森林失火时还在打斗着争夺领土时，会投之以同情的目光。然而，在地球面临巨大危险时，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关注它们的分歧，那么在子孙后代的眼里，这两国的形象同刚才提及的类人猿是一样的。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1] Greg Ip, “Has America’s China Backlash Gone Too Far?,”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8,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has-americas-china-backlash-gone-too-far-11566990232?mod=rsswn>.

[2] Ian Young, “Huawei CFO Sabrina Meng Wanzhou Fraudulently Represented Company to Skirt US and EU Sanctions on Iran, Court Told in Bail Hear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8,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2177013/huawei-executive-sabrina-meng-wanzhou-fraudulently-represented-company>.

[3] Ernest Z. Bower, “China Reveals Its Hand on ASEAN in Phnom Penh,” CSIS, July 20, 201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reveals-its-hand-asean-phnom-penh>.

[4]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Frederic V. Malek Memorial Lecture,” Conrad Hotel, Washington, DC,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frederic-v-malek-memorial-lecture/>.

[5] Noreen Gifney, “Monstrous Mongols,”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3, no. 2, (May 2012): 227–245.

[6] Ibid.

[7] Hong Hai, “Daoism and Management,” chap. 4 in *The Rule of Culture: Corporate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9).

[8]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Republicans of Washington County, Maryland,” March 31, 1809,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3-01-02-0088>, quoted in Martin Wolf, “The Case for Making Wellbeing the Goal of Public Polic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y 30,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d4bb3e42-823b-11e99935-ad75bb96c849>.

[9] Wolf, “The Case for Making Wellbeing the Goal of Public Policy.”

[10]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11] “US Federal and State Budgets,” Costs of War, Wats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 Brown University,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costs/economic/budget>.

[12] Heidi Garrett-Peltier, “Job Opportunity Cost of War,” Costs of War,

Wats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 Brown University,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2017/Job%20Opportunity%20Cost%20of%20War%20-%20HGP%20-%20FINAL.pdf>.

[13] Keith Bradsher, “China Opens Longest High-Speed Rail Lin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27/business/global/worlds-longest-high-speed-rail-line-opens-in-china.html>.

[14]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5).

[15] Robert D.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cfrd8-files.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SR%2084_Blackwill_Trump_0.pdf.

[16] EPA, “Understanding Global Warming,”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ghgemissions/understanding-global-warming-potentials>.

[17] Hannah Ritchie and Max Roser, “CO₂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ur World in Data, updated October 2018,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and-other-greenhouse-gas-emissions#cumulative-co2-emissions>.

[18]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19]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20] Background on the Go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background/>.

[21] UND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orporate/brochure/SDGs_Booklet_Web_En.pdf.

[22] Lee Hsien Loong, “Shangri-La Dialogue: Lee Hsien Loong on Why US and China Must Avoid Path of Conflict,”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ne 1,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why-us-and-china-must-avoid-path-of-conflict-pm-lee>.

[23] Chas W. Freeman Jr., “On Hostile Coexistence with China,” Chas W. Freeman, Jr., May 3, 2019, <https://chasfreeman.net/on-hostile-coexistence-with->

china/.

[24] Kishore Mahbubani and Lawrence H. Summers, "The Fusion of Civilization:The Case for Global Optimism,"*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4-18/fusion-civilizations>.

[25] Kishore Mahbubani and Lawrence H. Summers, "The Fusion of Civilization:The Case for Global Optimism,"*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4-18/fusion-civilizations>.

[26] Xi Jinping, "Full Tex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May 23, 2019, <http://www.cpecinfo.com/news/full-text-of-president-xi-jinping-speech-at-the-opening-ceremony-of-the-conference-on-dialogue-of-asian-civilizations/NzE0MA==>.

[27] John F. Kennedy,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63, <https://www.jfklibrary.org/archives/other-resources/john-f-kennedy-speeches/american-university-19630610>.

[28] Working Group on Chinese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8),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hineseinfluence_americaninterests_fullreport_web.pdf.

[2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84.

[30] Ibid., 184–185.

[31] Ishaan Tharoor, "Why China's Terrorism Problem Is Getting Worse,"*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5/22/why-chinas-terrorism-problem-is-getting-worse/>.

[32]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edia Center,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16, 2010,<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5158/Joint+Communiqu+of+the+Repu+blic+of+India+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致谢

我计划撰写本书时，给予我极大帮助的两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前任校长陈祝全教授和现任校长陈永财教授。2017年12月31日，当我卸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一职时，他们慷慨地给了我9个月的公休假。我也非常感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吴作栋先生支持和鼓励我休假。卸任院长一职后，我很高兴被安排同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兼全球关系主任黄载贤教授及其团队一起工作。黄教授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撰写本书的时间和场地。2019年7月，亚洲研究院院长蒂姆·邦内尔教授、副院长梅特瑞·昂敦教授和沙琳·泽维尔·安东尼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亚洲研究的领先中心之一，我很高兴能在此工作期间完成本书。

2018年的公休假非常充实。我收到六所大学的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复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乔治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我在每一所大学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鼎力支持。我有很多人要感谢，尤其要感谢玛丽特·洁诺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托尼·赛奇教授（哈佛大学艾仕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教授）、李世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理事会理事）、恩里科·莱塔教授（巴黎政治学院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约翰·J·德焦亚教授（乔治敦大学校长）和拉纳·米特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们每一位都不遗余力地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在这六所大学里，我还同许多亚洲研究领域的顶尖教授和研究人员进行深入交谈。他们并非都同意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将来能读到本书，并从中发现一些知识和观点是我从跟他们的丰富交谈中汲取的。

我也对一些不吝推荐本书的好朋友表示感谢，他们是格雷厄姆·艾利森、伊恩·布雷默、戴维·兰普顿、迈克尔·斯宾塞、劳伦斯·萨默斯、斯蒂芬·沃尔特、王赓武和杨荣文。

我准备写作本书时，深知找美国出版商合作会是个不小的挑战。因此，当我的老朋友、出版商克莱夫·普里德尔欣然同意出版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过去，我和克莱夫合作出版了三本书，我总是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因此，与他再次合作真的很愉快。他在编辑和润色本书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衷心感谢克莱夫和他在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团队，他的团队非常棒。

面对当今这个混乱、复杂的世界，如果缺乏良好的研究协助，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完成写书的工作。我十分感谢谭亚楠从一开始就参与本书的写作并坚持到最后。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研究并找到了显著支撑本书关键结论的事实和观点。本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我也很感谢年轻的实习生阿里·洛迪加入进来为我提供了四个星期的帮助。杰西卡·杨也在本书写作接近尾声时提供了帮助。如果没有我出色的私人助理卡萝尔·陈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她使我保持有条不紊的状态，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的妻子安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礼物，实在是太多了，无法一一提及。她送给我的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是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我非常喜欢并欣赏有她的家庭氛围，她的母亲阿黛尔总是热情地欢迎我，对我也非常慷慨。我真的很高兴能把本书献给

她。

附录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1]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斯蒂芬·沃尔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最近主要是来自米特·罗姆尼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

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遵守国际法律、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奏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讲解“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神话1：“美国例外论”自有非凡之处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就连苏联的许多官员也真心相信，他们正在领导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哪怕苏联的统治造成了许多残酷的后果。当然，到目前为止，美国比苏联更有资格宣称自身的美德，但奥巴马的提醒是正确的：所有国家都珍视自己独特的品质。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最近一次的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神话2：美国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

但愿如此。美国也许不像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国家那般残暴，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大部分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

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战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在1899—1902年美国对菲律宾的征服中，有20万 ~ 40万菲律宾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毫不犹豫地发动空袭，造成大约30.5万德国平民和33万日本平民丧生，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遭到蓄意轰炸时死亡的。难怪指挥

轰炸日本行动的柯蒂斯·勒梅将军告诉助手：“如果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我们会被当作战犯起诉。”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投掷了600多万吨炸弹，其中包括大量凝固汽油弹和橙剂等致命的落叶剂。这场战争造成大约100万平民丧生，美国应对其中许多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近来，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战争造成大约3万尼加拉瓜人丧生，如按人口比例换算，相当于美国死亡了200万人。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造成25万穆斯林死亡（25万是保守估计数字，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制裁伊拉克造成的死亡人数），其中包括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造成的10多万人的死亡。目前，美国的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正在至少5个国家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数量不详的无辜平民的死亡。为了让美国人更加富裕和安全，其中一些行动可能是必要的。如果某些国家对我们这样做，美国人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相反，美国人仍然满腹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美国在人权和国际法方面讲得很好，但拒绝签署大部分人权条约；它没有站在国际刑事法院一方，而是一直非常愿意奉承独裁者——还记得我们的朋友胡斯尼·穆巴拉克吗？他的人权记录糟透了。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加上小布什政府非常依赖使用水刑、非常规引渡和预防性拘留，应该会动摇“美国一直以高尚的方式行事”的信念。奥巴马决定保留上述许多政策，表明它们并非反常的权宜之计。

美国没有通过海外征服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

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神话3：美国的成功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美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这部分归功于美国政治秩序的开放性和生命力。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当地社会不那么发达，原住民对欧洲的疾病非常敏感。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这番对于美国崛起的描述并没有否认美国自身的努力，但也应承认，美国目前的地位若归因于任何独特的优势或“命中注定”，那也等同归因于好运气。

神话4：美国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大部分贡献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信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比如托尼·史密斯的《美国的使命》和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利维坦》。再看看美国领导人对自身的高度褒扬，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事务中压倒性的积极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确实做出了贡献，比如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和管理，对民主和人权核心原则的声援，以及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维持总体稳定的军事存在，这些虽然无法足够准确地支撑这一观点，但也提供了相应的论据。然而，将所有好事都归功于美国，这极其过分地夸大了美国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同样地，尽管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欧洲人至少值得同等的赞誉，是他们重建了自身的经济，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联盟，走出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国家之间的激烈较量。美国人还倾

向于认为他们是靠自己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种观点无视了其他力量和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贡献，正是他们引发了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除此之外，正如戈弗雷·霍奇森近来在他富有同情心但又清醒的著作《美国例外论的神话》中指出的，自由理想的传播是一种根植于启蒙运动的全球现象，欧洲哲学家和政治领袖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在废除奴隶制和长期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比美国的功劳更大，美国在这两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今天，美国也无法在同性恋权利、刑事司法或经济平等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是欧洲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任何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忠实描述都必须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走下坡路。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制造者，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主因。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中，美国站到了错误的一边；当短期战略利益占了上风时，美国还支持了许多令人讨厌的独裁政权，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美国人或许对自己在缔造和保卫以色列以及打击全球反犹太主义方面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但美国“一边倒”的政策也延长了巴勒斯坦人的无国籍状态，使其长期被以色列野蛮侵占。

总之，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还记得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以为美军将在巴格达受到鲜花和游行人群的欢迎吗？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大多是火箭推进式榴弹和简易爆炸装置。

神话5：上帝与美国同在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并且他引用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话说：“上帝将苦难的人类的命运交到美国手中。”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奥托·冯·俾斯麦则是话糙理不糙，他的俏皮话“上帝特别眷顾傻瓜、醉汉和美国”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被流氓、无赖或无能之辈引入歧途时，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不妨稍加思考，十年来不明智的减税，两场代价高昂又不成功的战争，再加上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这些如何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今天美国人面临着诸多挑战，从旷日持久的失业到结束两场致命战争的负担，他们发现自己的例外主义观念十分安抚人心，这毫不奇怪——美国抱负远大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越发热情高涨地宣扬了这一观念。这种爱国主义观念确实有其好处，但也会让美国对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根本误解，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也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也远非一个行为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的独特国家，它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寻求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并在纯粹理想主义的追求上少花点钱、少牺牲些生命。然而，就像往昔的强国一样，它已经说服了自己，它与众不同，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接触，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确实凸显了国家的美德，粉饰了不光彩的阴暗面。如果美国人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他们可能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1]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斯蒂芬·沃尔特。“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Uniquely Virtuous May Be Comforting to Americans. Too Bad It's Not True,”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the-myth-of-american-exceptionalis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 (新加坡) 马凯硕著；全球化智库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217-3495-9

I. ①中... II. ①马... ②全... III. ①中美关系 - 研究 IV. ①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67028号

Copyright © 2020 by Kishore Mahbuba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著者：[新加坡] 马凯硕

译者：全球化智库 (CCG)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7286

书号：ISBN 978-7-5217-3495-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无

字

史

记

基因里
隐藏的
祖先秘史

波音
著

罗振宇
×
邢立达
联袂推荐

从远古到
4 000 年前
从生存到文明

基因为我们
展示另一种
历史真实

中信出版集团



无字史记

波音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基因知道答案

第一章 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门齿、石器与“邻人遗斧”

东亚版“塔岛技术悲剧”

小贴士 北京人到底吃不吃人

第二章 万里征程——智人如何来到中国

走出非洲，一拨又一拨

沿着海岸向东飞奔

3万年前的猎人祖先

南下北上，走遍中国

小贴士 洞穴人留给我们的基因礼物

第三章 北粟南稻——华夏农民的田园晨曲

粟和黍：北方祖先的社稷江山

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猪和狗：古人最好（吃）的朋友

农耕乐土，爱得我所

小贴士 人类是如何开启农业的

第四章 草原之路——激发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

石峁疑云

马：我从草原来

青铜：远古王者的荣耀
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
小麦：后来而居上
绵羊和黄牛：我们是来做牺牲的
文明硬币的两面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小河公主”的复杂血统
草原蝴蝶舞动毁灭的双翅
宅兹中国，以御四邻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小贴士 食奶影响了人类历史

第六章 逆转山河——汉匈掀起西进狂飙

藏在织锦里的精绝与南羌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东风吹散楼兰梦
羌藏携手走高原

第七章 客从何来——史诗般的人口南下洪流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藏彝走廊：翻越山海遇到谁
千面百越
南国诗篇，铁血铸就
小贴士 中国家犬的迁徙往事

第八章 跨越沧海——驶向远方的基因之舟

从婆娑宝岛到大洋孤屿

我们从南洋来，到南洋去

日本人祖先的大陆故乡

古美洲人的亚洲血缘

小贴士 复活节岛番薯疑云

后记 走出孤岛，四海一家

序言 基因知道答案

周口店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如果非洲现代智人是中国人的祖先，那为什么我们的肤色不是黑色？

哪些驯化的动植物是土生土长的，哪些又是外来的？它们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什么影响？

中国的各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在中华大地上是如何迁徙的？

世界各地的族群与中国人有亲缘关系吗？

基因知道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

历史学家有一个烦恼，越回溯过往，能够找到的史料就越少，就越难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烦恼同样折磨着考古学家，他们面对没有文字材料出土的考古遗址时，经常感到困惑，这个遗址到底对应史书中记载的哪个族群、哪个城镇呢？相比前两者，古人类学家更容易发出“我太难了”的哀叹，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文字还没有被创制出来的史前时代，不论是远古化石还是石器，都不会有只言片语留下。

偏偏对人类历史来说，很多影响深远的事件，都是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发生的。例如，古人类数百万年间进化与迁徙的历史，几乎都隐藏在无言无字的迷雾之中，只能依靠凤毛麟角的遗物略窥一二。人类主要的农作物、家禽家畜的驯化，航海技术、制陶技术、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的发明，都是在文字发明前很久就诞生了，很多时候，后人只能在传说故事中胡乱写上一个名字，作为这些技术的发明人，不能当真。

再往后，即使进入了文字时代，海量的信息仍然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虽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遗失了，“焚书坑儒”即是典型事例。更有甚者，并不是每一个古代记录者在写作的时候都能够认真负责。有些古人出于某些目的，甚至故意篡改和伪造历史，比如成王败寇，赞美胜利者，贬低失败者。

除了真伪难辨的文献资料和沉默不语的考古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触摸更多的历史真实了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领域上演了一场神奇的跨界大戏，分子生物学闯

入了原本属于古人类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领域，以古今人类和动植物基因为样本，通过基因分析与比较，揭示了过去常规研究方法无法涉足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提供了史前时代古人类迁徙历史的细节。

基因为什么能够揭示历史？分子生物学家是如何做到的？

简要地说，生物基因在不同代之间既有遗传，也有少量的变异。通过基因比较，可以得知不同人、不同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是近还是远，两者的共同祖先大概出现在什么年代。这样，同一时代的不同人群之间就建立了联系，不同时代的古代人群与现代人群之间也建立了联系。

比如，人类的Y染色体上的基因是父系遗传的，一代代的父亲传递给自己的儿子；一种细胞器（线粒体）上的基因是母系遗传的，一代代的母亲传递给自己的女儿。因此，通过比较Y染色体，我们知道同一时代不同男性之间的亲疏远近，从而知道古代男性与现代男性之间的遗传关系，进而推测历史上男性群体的迁徙过程。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基因也有类似的规律。再进一步，由于许多动植物的驯化和传播是与特定的古代人群及其迁徙挂钩的，因此对驯化动植物基因的研究，也能够揭示大量的人类历史信息，特别是关于古代农业、畜牧业、游牧业的信息。

就这样，分子生物学涉足了历史学，分子生物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

在笔者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说，当“文革”结束后下放劳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回到学校时，发现地质学的理论世界已完全变了，板块构造学说重构了整个地质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在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人类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说”进入大学课堂，以基因研究为基础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新学说震撼了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

分子生物学的“跨界打击”，对于史前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领域是一次重塑，其影响不亚于板块构造学说对于地质学的影响。过去学者对于古人类骨骼的对比研究、对于石器的对比研究、对于陶器的对比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虽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很多成果需要在分子生物学视角下重新检验、重新诠释。很多过去的研究成果依然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准确的，但也会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已经或将要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古代史书和考古遗址之外，分子生物学家又翻开了一本“无字史记”，并把上面的基因密码翻译出来，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祖先的起源、进化、迁徙和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除了基因研究，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也实现了“跨界”，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在人文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人类和动

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从环境、食物中吸收特定的元素，从而在死后的骨骼、牙齿、茎秆上留下元素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科学家能够推测他们/它们过去生活时代的环境、所吃的食物或吸收的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历史。

运用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有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科学还可以检验，用重复性的操作来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准确、正确，从而降低了人为造假的可能与危害。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高精尖武器”，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关于我们祖先的“无字史记”的解读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上面记载了关于祖先的物种起源、族群迁徙、生产生活乃至文化脉络的大量生动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无字史记”，阅读有关祖先的新鲜历史，展开一次以基因为导航的寻根之旅吧。

第一章 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

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奋力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

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

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中，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中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中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

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

“他/她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

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这些专家发现“龙骨”中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的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

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

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步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之后，裴文中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3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土层、烧石、烧骨等。

然而，就在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步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趴伏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第一次“劫难”。

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步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

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步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

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最大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过程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地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1943年，魏敦瑞提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头盖骨有很多与现代东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平脸、高颧骨和铲形门齿等。三年后，他出版了《猿、巨人和人》一书，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多中心假说”。

他提出，现在的人类并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各自独立进化，变成了现在的不同族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域性，可以分成澳大利亚区、蒙古区、非洲区和欧洲区。其中，有一支是“巨人系统”，从远古巨人依次演化为爪哇猿人、梭罗人、瓦贾克人，最后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这一支古人类的演化是单向的，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演化无关。还有一支是中国猿人，从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分析，它的头骨显示了一系列蒙古人种早期原始的特征，因此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而现代中国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另外，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如果非洲出土了古人类化石，他们应该就是非洲人的祖先。

同时魏敦瑞还认为，在古人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会有人种混杂的可能，

所以中国猿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现今其他人种身上。

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权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

库恩的假说里包含了种族歧视的味道，因此一问世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不过，他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一些科学观点，还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赞同。

此后，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古人类学家进一步发扬了魏敦瑞、库恩的科学观点，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简单来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就是在库恩的“烛台”的每支蜡烛之间，又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表示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基因交流。魏敦瑞和库恩所提出的“各地古人类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观点，得到了这部分学者的肯定和坚持。他们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来自东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欧洲和西亚的现代人是来自欧洲和西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非洲的现代人是来自非洲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通俗地称呼这批学者为“化石派”。

自从周口店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化石派从这些发现中找到了若干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分量的证据，莫过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了。

什么是铲形门齿呢？

现在，请用你的舌头舔一舔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门牙两侧有略突出的棱？当你的舌头在两颗上门牙内侧左右滑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走过了一条m字形的路线？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拥有铲形门齿，即你的上门牙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

据统计，现代中国人中有80%~9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这种牙齿特征在东亚现代人和印第安人中比例非常高；现代欧洲人中只有1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在现代非洲人中这一比例则是15%左右。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搜集了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古人牙齿信息，发现除了新疆地区出土的牙齿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人上门牙全都是铲形门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古人类学家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只要是保存下来的上门牙，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铲形门齿。不论是号称有170万年历史的云南元谋人，还是距今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抑或是几万年前的河套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上门牙。

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

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

说来有点儿惭愧，东亚的石器似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个时期当然是第一模式石器的天下。但是，当东非那边依次出现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时，东亚这边的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

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继承和发展的，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化石派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然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分子生物学。

1987年1月，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跨界打击”。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跨界打击”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比如糖类、脂肪等，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释放出能量，供人体细胞使用的。简单地说，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

从中学课本中我们学习到，人体的遗传物质位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大量的基因排列在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上。其实，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线粒体DNA。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首先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开启的。换句话说，线粒体这种细胞器来自母亲的卵细胞，而不是来自父亲的精子（其实父亲的精子里也含有少量的线粒体DNA，但是在受精过程中“舍身取义”，被分解掉了）。因此，线粒体DNA是孩子从自己的母亲一方继承下来的。于是，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比较人们的线粒体DNA，分析人们之间母亲一系的亲疏远近，进而追溯人们母亲一系的祖先情况。

论文作者丽贝卡·卡恩从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人体胎盘中搜集了147份线粒体DNA样本。之所以选择人体胎盘提取材料，是因为胎盘里含有丰富的线粒体DNA。丽贝卡·卡恩发现，通过所有样本的线粒体DNA追溯其所有者的母亲，最后都汇聚到唯一的一位女性祖先那里，不论现在拥有线粒体DNA的人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是这位女性祖先的后代。

当时的媒体借用《圣经》中最早的人类女性夏娃的名字，把这位女性祖先叫作“线粒体夏娃”。关于这位线粒体夏娃，丽贝卡·卡恩从遗传物质里读出了很多信息。

比如，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如果我们向水池里丢下一块石头，荡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向周围扩散。即使我们没有看到石头在哪儿落水，我们也能够根据水池涟漪的形状，判断石头落水的位置在这些涟漪的圆心。判断线粒体夏娃的生活地点，与通过涟漪判断石头落水位置的原理是类似的。

展开点儿说，人类的基因在每一代向下遗传的过程中，偶尔会发生基因突变，使后代与祖先的基因略有不同。从原理上说，后代与祖先间隔的辈分越多，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遗传差别就越大。如果我们假定远古时期每一代人类的寿命差不多长，那么可以粗略地认为，后代距离祖先的时间越久，积累起来的遗传差别就越大，最外圈的“涟漪”与最中央的“涟漪”的遗传差别最大。

线粒体DNA的遗传过程就是如此。一代代母亲把自己的线粒体DNA传给孩子，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基因突变，于是后代就具有了各自的基因多样性。根据现代人群各自的基因多样性的比较，分子生物学家不仅可以判断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还可以回溯他们的女性祖先的生活地点和生时间。

丽贝卡·卡恩发现，现代人群的基因多样性并不是一样的，非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亚洲现代人和欧洲现代人次之，美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少。这个现象不仅可以让她判断不同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还让她了解到，现代人群具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位祖先的生活地点，就在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那个人群生活的地方——非洲大陆。引发层层涟漪的那块石头（女性祖先），最初是落在非洲的。

那么，这位全人类共同的老祖母——线粒体夏娃，生活在什么年代呢？

在揭晓答案前，读者们不妨猜一猜，老祖母生活在距今500万年前、距今100万年前、距今50万年前还是距今10万年前？哪一个数据最接近事实呢？

人体的基因突变虽然很罕见，但从长期来看，突变发生的速率基本上是固定的。每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平均有30个左右的基因会发生突变。线粒体DNA的基因数量远比细胞核里染色体上的基因数量要少。只要知道了基因突变发生的速率，然后估计出每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年龄差，就

可以计算出那位线粒体夏娃生活的时间。

丽贝卡·卡恩在论文中估计的线粒体夏娃生活的时间是距今14万年前。

我们今天所有现代人都是距今14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

别误会，这并不是说距今14万年前地球上只有一位女性人类生活着，当时一定还有很多女性生活在地球上，是我们这位线粒体夏娃的“闺蜜”，只是很遗憾，这些闺蜜的女性后代都没能延续到今天。

打个比方。假设在1400年前的唐朝都城长安附近有个小村庄，里面住着10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羊肉泡馍配方，而且配方传女不传男，掌握在每家主妇的头脑中，由母亲通过口头的方式传给女儿。在这1400年的漫长岁月中，某些家庭在某一代也许只生了儿子，没有生女儿，于是这些家庭的羊肉泡馍配方就彻底失传了。最后只剩下一家不仅代代有女孩出生，她们还一直保留着祖先的羊肉泡馍配方。即使这些女孩出嫁，也会带着自家的羊肉泡馍配方，并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当然，由于个人口味不同，或者原材料发生变化，某些代的女人也许会对配方略做改动，不同代的主妇锅里的羊肉泡馍味道可能会不太一样，不过她们可以保证，锅里都是羊肉泡馍，而且保留了最原始的配方的一些成分。

线粒体夏娃，就是生活在1400年前的唐朝小村庄里掌握着配方的那位主妇；羊肉泡馍的配方，就像是线粒体DNA；配方的改动之处，就像是基因突变之处。

“夏娃”已经找到了，我们还能找到“亚当”——现代人类共同的男性祖先吗？

能，只是稍微有点儿难。中学课本告诉我们，人的性别是由性染色体决定的，女人的性染色体是两条X染色体，而男人的性染色体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的组合。人体内的线粒体DNA是“传女不传男”的，而Y染色体的基因恰好是“传男不传女”的。因此，要追踪全体现代人的共同男性祖先，就要从Y染色体上的基因入手。不过，Y染色体上所含有的遗传物质比线粒体里所含有的遗传物质庞大很多，分析里面的基因更加困难，尤其是在20世纪的生物科技条件下。

于是直到2000年，也就是在线粒体夏娃被发现13年后，科学家才找到了“Y染色体亚当”。与线粒体夏娃一样，这位现代人类的共同男性祖先也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且他与非洲的一个族群——科伊桑人的基因最接近，这说明他曾经生活在科伊桑人的一个远古的群体中，时间是大约6万年前。

与线粒体夏娃的情况类似，Y染色体亚当生活的时代，也有很多其他男性“哥们儿”生活着，只是这些哥们儿都没能留下男性后代到今天。

现在，我们该回到周口店北京人的话题上了。根据以上分子生物学的发现，人们会得到一个重量级的推论：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此话怎讲？因为周口店北京人的生活时代太久远了，远比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更加古老。

为了获得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数据，科学家最初从地层和地层里含有的古生物化石入手。观察一下野外山间或河边的陡崖，我们会发现，岩石和土壤都是层层叠叠的。这是因为不同层的岩土是在不同时期形成并沉积下来的。一个地质学里的一般规律是，年代久远的地层会被埋在下面，年代较近的地层会分布在上面。这在地质学上叫作“地层层序律”。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生活着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它们死后就会与同时代的岩土共同形成地层。一般来说，古老的动植物遗骸会分布在古老的地层里，而较新的动植物遗骸会分布在较新的地层里。这个规律叫作“化石层序律”。这两个规律是判断一种生物（包括古人类）生活年代的重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仔细研究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地层分布，以及地层里包含的生物化石。在周口店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和区域，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古生物，比如很古老的剑齿虎、中国貉、周口店犀、三门马、居氏大河狸，不太古老的纳玛古菱齿象、燕山犀、肿骨鹿、洞熊、中国鬣狗，以及较新的物种如狼、褐熊和许多小型啮齿类动物等。根据这些信息，科学家判断，周口店北京人生活的时期在距今50万—40万年前。

到21世纪，科学家有了更加先进的测年手段，他们可以用化学上的同位素含量来测年。所谓同位素，是指原子核里质子数相同而中子数不同的元素互为同位素。例如，氧元素有氧16、氧17和氧18三种同位素，数字代表了所含有的中子数。有些同位素有放射性，在动物死亡后，体内的某些同位素会稳定地转变成其他同位素。于是，科学家可以根据死亡动物遗骸中的同位素比例来推算动物生活的年代。

科学家采集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里的岩石和石器样品，经过反复测定同位素，得出结论：周口店北京人最早生活的年代在距今77万年前，数据误差8万年。距今70多万年前，地球正好处于一个相对寒冷的时期，因此人们对周口店北京人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他们人工取火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评价。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最晚的古人类活动痕迹，是在距今23万年前

制造的。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代往后，周口店北京人就从周口店永远地消失了。

周口店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7万—23万年前，而现代人的共同女性祖先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共同男性祖先生活在距今6万年前，他们之间没有时间交集。根据这些年代数据，周口店北京人就不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没能存活到今天。

分子生物学的人类进化观点被称为走出非洲假说，它挑战了多地区起源假说和后续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我们可以把支持前者的学者们称为“基因派”，他们与化石派在人类进化上孰是孰非呢？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还在唇枪舌剑。分子生物学家要想真正驳倒那些坚持多地区起源假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古人类学家，就必须对后者提出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合理解释，特别是对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这样的关键证据。反之，坚持多地区起源假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古人类学家要想驳倒分子生物学家，也要对后者的DNA研究结论提出不同的解释。

本书的宗旨是从基因的角度来揭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探寻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隐秘故事，因此本书将重点介绍分子生物学对于化石派假说证据的反驳。在反驳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主要阶段，这样才能知道两派科学家争论的到底是哪个阶段的人类进化。

最初的古人类是南方古猿，他们是从非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古猿进化而来的，出现的时间在距今700万—5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容量为500毫升左右，骨骼特点显示，他们开始笨拙地站立起身体，两足行走，这是科学家区分人类和其他猿类的最重要特征。在那个时代的非洲，可能生活着几种类型的南方古猿，他们中的一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到距今300万—250万年前，一种脑容量达到800毫升左右的“新”古人类出现了，由于他们能够制作和使用最早的石器，因此被命名为“能人”。最有名的能人化石是“露西”，这是一具成年女性的骨骼，于1974年出土于埃塞俄比亚。古人类学家以当时披头士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将她命名为“露西”。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古人类制作的第一模式的石器，很可能就是由能人首先发明、制作的。

随着古人类石器加工技术的日趋精细，高能量的动物性食物在食谱中的比重增大，距今约200万年前，能人进化为直立人。

直立人虽然是能人的后裔，但两者的脑容量和身体的尺寸差距颇大。和能人相比，有些直立人的脑容量大了50%，身高也高出将近30厘米。依靠两

只脚，直立人能够奔跑，当一群直立人集体出动时，他们甚至可以猎取大型动物。到直立人阶段，古人类终于可以长途远行，走出自己徘徊了几百万年的故乡——非洲大陆了。他们也的确在诞生后不久就出现在了临近的亚洲西部。换句话说，除了非洲大陆外，任何其他大陆都没有早于距今200万年前的古人类踪迹，有的只是远古猿类和猴类。

非洲境外年代最早的直立人遗址位于格鲁吉亚，这种直立人被命名为“格鲁吉亚人”，属于早期直立人，和能人身高相仿，均为150厘米左右，脑容量却比多数能人更大，他们生活的时代为距今约180万年前。必须指出的是，格鲁吉亚人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会使用火的古人类。

当70多万年前直立人的一支终于跋山涉水来到周口店时，他们其实已经处于直立人进化的晚期阶段，脑容量增加到了1100毫升左右（现代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350毫升）。周口店一带背靠峰峦迭起的西山山脉，面临广阔肥沃的华北平原，又有周口店河从山脚下汨汨淌过，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一切吸引他们停止了前行的脚步，留恋于此。这一停，就是几十万年。

对于直立人是第一批走出非洲、走入东亚的古人类的说法，不论是化石派还是基因派都是认可的，两派科学家对于这一点没有分歧。

人类进化的脚步并未停止，距今30万—20万年前，古人类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他们的脑容量急剧增加，智力突然发达起来，直立人开始进化为智人。“智人”，就是“有智力的人”。智人远比他们的祖先聪明，他们制作工具的技能更高超，语言的交流更丰富，也能沟通复杂的意念与表现复杂的行为形态。他们已经有能力更多地猎取动物。现代人就属于智人之列，你、我都是智人。

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点，两派科学家也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不同地区的智人到底是由非洲直立人进化并扩张而来的（见图1-1），还是分别从本地区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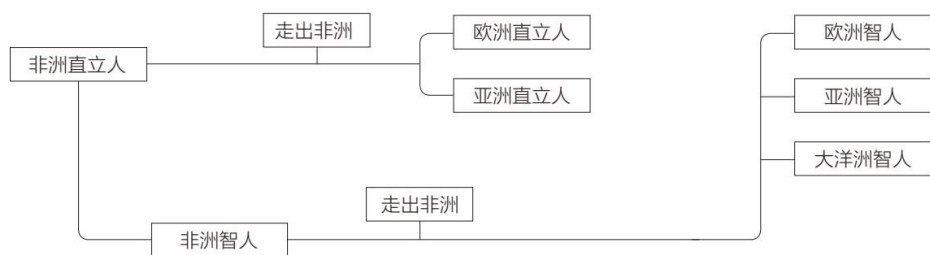


图1-1 走出非洲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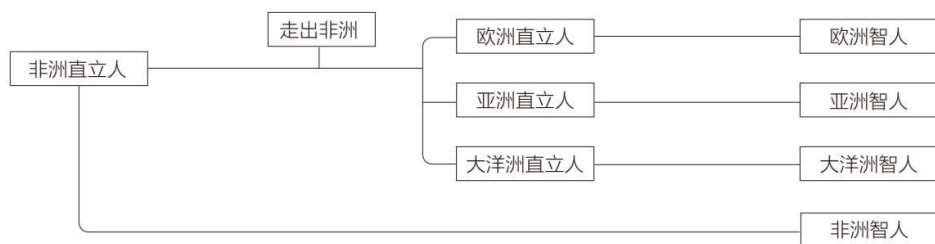


图1-2 多地区起源假说

门齿、石器与“邻人遗斧”

基因派认为，世界各地所有的智人都源自非洲直立人进化出的那类智人，而不是各地直立人分别进化出来的。东亚的现代人并不是周口店北京人进化而来的，而是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那么，基因派又该如何解释不同时期的东亚古人类都具有铲形门齿这个不利于自己观点的现象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关于铲形门齿的来龙去脉，我们要回到魏敦瑞的时代，甚至要追溯到魏敦瑞的前辈学者、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海克尔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的主要推广者，但他一直不认同达尔文的人类非洲起源说，坚信东南亚的红毛猩猩才是和人最相似的灵长类动物，因此认为出产红毛猩猩的亚洲才是人类的摇篮。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解剖了亚洲红毛猩猩和非洲黑猩猩，发现后者的身体结构才最像人类。但海克尔固执己见，这完全是由于他被自己的宗教情怀和政治倾向冲昏了头脑。

在海克尔时代的德国，种族主义思潮盛行，一些德国学者创造出了“雅利安民族”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雅利安民族起源于印度北部，是非常高贵的民族，很早以前征服了欧洲，德国的日耳曼民族就是雅利安民族的后代。于是很自然地，优越感“爆棚”的海克尔等德国博物学家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该在亚洲，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他构想了一个“幽灵洲”，认为人类起源于这块大陆，但是后来这块大陆沉入了印度洋底，所以最初的古人类化石很难找寻了。

在海克尔的号召下，很多人动身前往亚洲寻找古人类化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医生对海克尔的假说很痴迷，他利用自己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机会，组织队伍寻找古人类化石。结果运气很好，1891年他真的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发现了古人类的头盖骨和腿骨，这就是“爪哇人”。这下子，海克尔更加声名鹊起了。

魏敦瑞是一位德国犹太人，他显然不会喜欢种族主义的那套说法，但是在科学上，他还是受到了以海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学术界的深刻影响，他一开始也觉得亚洲才是人类的起源地。带着这样的思维观念，当他来到北京，面对周口店北京人化石时，潜意识中认为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古人类祖先，便开始寻找化石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在已经知道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群标志性特征的前提下，魏敦瑞顺水推舟地把周口店北京人的牙齿也鉴定为铲形门齿。

显然，魏敦瑞陷入了一种思维误区，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他犯了中国古书《列子》所载的邻人遗斧一样的错误。

在那个故事中，一个人遗失了自己的斧子，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的。他觉得那个孩子，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行为神态，怎么看都像是偷斧子的人。不久，他在山谷里发现了自己丢失的斧子，回来再看那个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人。前后判若两人，不是那个孩子有什么变化，而是这个丢斧子的人心理有了变化。魏敦瑞对周口店北京人的鉴定，很可能出于这种心理。

其实，只要是人类的上门牙，其功能都是撕咬和切割食物，所有的上门牙都会有相似之处。邻人遗斧的思维偏见，误导魏敦瑞把周口店北京人的上门牙鉴定为铲形门齿。

海克尔和魏敦瑞这种“跑偏了”的思维，甚至影响了学者对于此后发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鉴定，比如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化石。

1965年，地质学家在云南元谋一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和两颗古人类牙齿。1973年，古人类学家对牙齿进行鉴定并发表论文，在论文中，两颗牙齿被认定为左右上门牙，“牙齿像铲子形状，硕大，扁平”，与周口店北京人的门牙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根据这两颗牙齿，元谋人被定为直立人，再根据埋藏地层的情况，元谋人被定为距今170万年前的古人类。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其他古人类的年代相比，元谋人是最古老的，因此它荣耀地进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

但是，科学界对此结论存在争议，绝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么“板上钉钉”。首先，关于元谋人的年代就充满了争议。

云南地区降雨量大，地层疏松，两颗牙齿的出土地层形成的年代和元谋人当年生活的时代未必一致，牙齿很可能发生移位。中国一位研究黄土的权威院士曾经利用地磁学技术测定元谋人地层的年代，认为在距今60万—50万年前。这个数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如前所述，直立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大陆，亚洲西部的直立人最早代表——格鲁吉亚人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云南不仅离非洲很遥远，而且自然环境与早期直立人生存环境差异很大，很难想象直立人在非洲出现后不久，于约10万年后就迁移到东亚，并改变了生活习性。

其次，元谋人的牙齿也疑云重重。第一，用两颗牙齿就鉴定出一个古人类，在科学上证据显得很单薄，古人类学家对于头骨化石证据更加青睐。

第二，说那两颗牙齿是铲形门齿，也十分勉强。如果观察论文图录中的牙齿图片，在没有铲形门齿概念的干扰下，普通人很难看出铲子形状，甚至很难看出那是两颗门牙。两颗牙齿更像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臼齿形状。重要的是，两颗牙齿的舌内侧形状也与现代人的铲形门齿不一样，每颗牙齿的中部都有明显的纵向棱。

可惜，在邻人遗斧思维的误导下，元谋人的牙齿被一些学者认定为铲形门齿。进一步推论，既然距今170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就具有了铲形门齿，那么东亚现代人是由元谋人、周口店北京人进化而来的，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还可以了解另一个有趣的牙齿鉴定故事。中国境内最早被鉴定的古人类化石是1922年发现的古人类的牙齿和四肢骨骼，由法国古人类学家发现，地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萨拉乌苏河畔，这种古人类被命名为“河套人”。对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学者们曾经提出过距今5万—3万年前和距今14万—7万年前多种说法。从形状上看，河套人的上门牙是如假包换的铲形门齿，因此它也被视为化石派的证据之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年采集的一段河套人股骨分别被送到美国和中国的年代实验室中进行高科技分析。利用最新的技术测定年代，两个实验室的测定结果一致，股骨年代为距今300—200年前。是的，我们没有少看几个零，那段股骨属于一个清朝人，而不是远古人类。另外一件在遗址发现的肢骨被送到了德国的年代实验室，测定的结果是距今2700多年前，属于一个春秋时期的人。

所以，他们都属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类，并不是古人类，他们当然会拥有铲形门齿。

总之，在基因派看来，中国境内那些早于智人阶段的古人类牙齿，都不属于铲形门齿，不能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那些古人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现代中国人为什么会具有世界其他人群所罕见的铲形门齿呢？还是要用基因来解释这个现象。

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找到了人体内的一个突变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我们的上门牙会长成铲形门齿。而且，他们还能够估算出这个基因最初发生突变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3万年前，也就是智人阶段才出现的，智人之前的古人类如直立人并没有这种突变基因。

根据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比较，分子生物学家判断，这个基因突变发生的地点可能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然后，携带这个基因的人群逐步扩散到东亚地区，中、日、韩等国人群的铲形门齿比例都非常高。随着古人类迁徙

到美洲大陆，这种突变基因也被传播到了那里，因此印第安人群体中也有非常高的铲形门齿比例。

从进化论的原理上讲，一种基因能够在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某些人群中的高比例基因，往往意味着这种基因对于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很有利，因此拥有这种基因的人会留下更多的后代。

可是，拥有铲形门齿能带给古人类多大的生存优势呢？显然，古人类不太可能因为牙齿好看就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生育更多后代。那些东亚和美洲大陆之外的人群为什么就缺少这种突变基因和铲形门齿呢？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突变基因除了能决定我们的上门牙长成铲形门齿外，还会让拥有者的汗腺、皮脂腺、乳腺增加。对，就是让拥有者变得更加“油腻”了。我们体内的很多基因都是多面手，一个基因可以决定人体的很多特征。

在今天的社会里，“油腻大叔”被人鄙视，但对几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来说，新突变出来的基因有利于他们在炎热的环境里排汗降温，当时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气候一度是很炎热的。因此，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人群在东亚拥有了生存优势，这种基因逐渐成为东亚人群中的优势基因，比例很高。当然，排汗降温说也只是猜测，科学家还没有完全定论。但他们能确定的是，这种突变基因一定给距今3万年前的东亚人群带来了明显的生存优势。

所以，铲形门齿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生存优势，当然也没有带来什么生存劣势。这种牙齿特征只是搭上了基因突变的“顺风车”，跟着有生存优势的特征翻山越岭，传宗接代。

对于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东亚石器技术的演化是独立而且连续的，分子生物学家显然就无法用基因来反驳了，毕竟石器不是生物，它们没有基因。对于石器演化问题，那些古人类的石器就摆在那里，石器所显示的技术也摆在那里，人们对它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技术演化与人类进化的关系，其解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两派的分歧之处在于，从东亚地区发现的直立人的石器到智人的石器，是不是有技术上的递进关系？如果有技术上的递进关系，是否就能证明，本地的直立人进化成了智人？

第一个问题又有点儿邻人遗斧的味道了。

对古人类来说，他们向远方迁移的时候，肯定不会携带大件的笨重石器，

最多携带一些小件轻便石器，而且古人类迁移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往往要经历很多代，因此很自然地，迁移途中他们会失传一些石器制作技术，当然也会改进一些石器制作技术，使得世界各地的石器技术总会有所差别。对于位于欧亚大陆东端，与大陆其他地区有着高山高原、沙漠荒漠阻挡的东亚地区来说，地理阻隔很严重，石器技术相对独立地发展，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也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在古人类抵达新的环境并长期驻扎下来后，还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岩石情况以及食物类型，对原来的石器制作技术改弦更张，加工出适合在本地使用的石器。

不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他们都要跋山涉水、远行万里来到东亚，然后面对类似的东亚环境，技术的失传与改进、技术的因地制宜改造，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设想一下，就算是一开始远方的智人有着与东亚直立人差别很大的石器制作技术，在这批智人行遍千山万水抵达东亚后，他们的技术也已与出发点或者中途的技术不太一样了，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技术遗失太多而出现退化。选择不同的石器特征参数进行比较，人们会很容易发现这批智人的石器与本地直立人的石器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是真的石器制作技术传承所导致的，还是邻人遗斧般的越看越像所导致的呢？

很难说。

至于第二个问题，基因派学者也挑明观点：“在没有古基因证据的支持下，我们无法证明东亚直立人留下了后代。”

这真是一剑封喉的大招，而且很有道理——最终，我们只能通过基因对比，证明某个先辈与某个后辈有或者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基因派已经拿出了基因证据，证明全球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生活在非洲的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的后代，都是由距今约20万年前出现的非洲智人扩散和繁衍而来的，从而否定了亚洲直立人、欧洲直立人进化为现代智人的观点。化石派学者由石器制作技术递进判定本地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只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

于是，虽然关于东亚古人类进化还有争议，但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东亚现代人并不是东亚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因此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我们的直系祖先应该是从非洲远道而来的现代智人，如果继续上溯，应该是进化出现代智人的非洲直立人。

东亚版“塔岛技术悲剧”

现在，也许我们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周口店直立人没能留下后代到今天？”他们曾经在50万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在龙骨山上的猿人洞中栖居，足以证明他们是适应本地环境的人群。为什么在距今20多万年前，他们永久地离开了龙骨山，无影无踪了呢？

魏敦瑞曾经提出一个猜想：他根据周口店北京人头骨的特征，认为这些直立人群体中存在着“人吃人”的习俗，类似于近代仍然存在的一些丛林食人族的习俗。有人根据他的这个猜想，引申出周口店北京人的灭绝可能与自相残杀有关。但是，学者们很早就否定了魏敦瑞的“人吃人”猜想，连带着也否定了周口店北京人因自相残杀而灭绝的说法。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周口店北京人遭遇了严酷的冰期，御寒艰难，生存环境中食物匮乏，最终全部饥寒交迫而死。这个解释有点儿小瞧了周口店北京人的能力。

首先，他们在寒冷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并不差。如前所述，龙骨山上最早出现古人类是在距今70多万年前，当时气候是比较寒冷的，英国《自然》杂志在介绍周口店北京人的生活年代的那期的封面上，特地印上了“北京人曾经很冷”的大标题。周口店北京人能够人工取火，而且长期生存在中国北方环境，本身就说明了其御寒能力是不错的。

其次，他们是有智商、有双腿的古人类，具有迁徙能力。几十万年中，东亚直立人时而扎根龙骨山，时而离开龙骨山。当周围环境变得不适合生存时，他们会集体迁徙。即使遇到非常严酷的大冰期，他们也可以转移到南方的温暖环境生活，等到冰川消退、气候回暖后，再向北发展。

所以，冰期很难把周口店北京人乃至东亚直立人一网打尽。正如一位古人类学家质疑的那样，冰期对世界各地气候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不至于把东亚直立人都灭绝了，“至少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不存在典型的冰川遗迹。再说了，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都挺过来了，人没有理由挺不过来”。

如果基因派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东亚直立人到底是如何被“团灭”的呢？

答案可能是，他们遭遇了塔岛（即塔斯马尼亚岛的简称）技术悲剧。

塔岛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方向，与大陆隔着200多千米宽的巴斯海峡相望，面积约有中国海南岛的两倍大。考古学家发现，在冰河时代，塔岛曾

经与澳大利亚大陆由冰桥相连。在距今3.5万年前，古人类就来到了塔岛居住。直到距今1万年前，塔岛还一度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之后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塔岛与大陆彻底分离，塔岛上的原住民就与世隔绝了，直到几百年前，欧洲航海家发现了他们。

当欧洲人第一次碰到塔岛原住民时，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鱼钩、渔网、刺矛、回旋镖……几千个原住民分属9个部落，过着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用木棍和长矛猎杀海豹、海鸟与沙袋鼠为生。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第一批塔岛原住民曾经拥有过骨制工具及其制作技术，可是都逐渐遗弃了。比如在1万年中，他们的骨制工具变得越来越简单，到距今近4000年前，他们再也制作不出来任何骨制工具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能把兽皮缝成衣物御寒。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岛原住民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再如他们曾经大量捕鱼吃鱼，这项技术在3000年前也遗失了，当欧洲人让他们吃鱼时，他们感到很恶心。

塔岛原住民也并非没有技术创新。4000年前，他们鼓捣出了一种木筏，是用成捆的灌木制成的，要么由男人用桨划，要么由女人游泳推动。依靠这种木筏，他们可以到邻近的小岛去捕猎。然而这种木筏在海水中浸泡几个小时后就会解体沉没。所以，塔岛原住民无法渡过巴斯海峡，与大陆上的人群接洽。

万年之中，塔岛原住民经历了可怕的技术退化，这就是塔岛技术悲剧。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相互限制。

从原理上讲，一个群体人口越多，掌握各种技术的人就越多，他们彼此之间交流，教学相长，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越容易，技术就越不易失传；反之，群体人口越少，技术就越容易失传。万年前被锁在孤岛上的塔岛原住民人口规模小，而且没有与外界的交流，他们无力维持原来的技术水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项项技术消失。

实际上，直立人的境遇并不比塔岛原住民强多少。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从事着较为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群体规模也就在几十人到上百人。如果附近还有其他古人类群体，彼此能够交流，那么许多群体形成的交流网络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技术水平不降低；如果周边缺少其他古人类群体，该群体的技术水平就很难保持住，更不用说创新提高了。这就是直立人的石器制作技术革新十分缓慢的原因，在直立人近200万年的历史中，较为明显的石器制作技术进步只发生了四五次而已。

东亚直立人的境况更加糟糕。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在距今100多万年前

直立人幸运地闯进东亚后，他们就不幸地陷入了“东亚塔岛”里。东亚直立人就好像生活在更广阔的塔岛上，很难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进行技术交流，只能独立发展。东亚直立人一直沿用着最初带来的第一模式的石器制作技术，技术部分失传，也有一些创新，与东非、中东地区风起云涌的多次石器制作技术革新相比，东亚直立人的技术一直很粗陋。

技术的粗陋又反过来限制了群体规模，采集和加工食物的能力弱，就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每个东亚直立人群体只能维持很小的规模，导致东亚的人口密度太小。群体规模小导致不同东亚直立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很困难，又限制了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就这样，东亚直立人长期陷入简陋的石器制作技术和弱小的群体规模构成的低层次生存状态中。可以设想，他们中的很多群体可能就自生自灭了，一次不大的严寒、洪灾或疾病就能够摧毁他们。古人类学家曾发现过一个现象，中国境内缺乏距今10万—4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这说明东亚直立人艰苦卓绝地生存了百万年后，到那个时期要么已经全都灭绝了，要么就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少量人群，连一点点遗迹都难以留下。

除了塔岛技术悲剧外，东亚直立人很可能还长期挣扎在功能性灭绝的边缘。所谓功能性灭绝，是指种群规模不足以维持繁衍。其原因之一是过度依赖近亲繁殖导致致病性基因遗传乃至暴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对一个50人左右的直立人群体来说，男女各半，直立人的平均寿命不足30岁，因此同一时期整个群体中能够生育的男人和女人也就各有10个左右。如果这个直立人群体与外界没有基因交流，几代之内，群体内所有人必然都是很近很近的亲缘关系，近亲繁殖不可避免，个体基因趋于一致，致病性基因很容易就摧毁整个群体。要避免功能性灭绝，就必须长期保持群外婚，与其他群体广泛进行基因交流，从而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致病性基因暴发。

就算是有少量的直立人苟延残喘活到了几万年前，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东亚大陆闯进来了新的人群——现代智人，面对人数众多、武器先进的现代智人一拨又一拨地掠过原野，一小撮直立人毫无竞争力，要么轻易地被消灭，要么因食物来源被智人抢占而走向衰亡。

打不过智人，难道直立人就不能加入智人吗？如果真有直立人融入智人的社会，那么他们也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今天的我们吧？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东亚直立人与现代智人（以及他们的祖先非洲直立人）之间，至少在几十

万年中是各自进化、没有杂交的。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生物学家所说的生殖隔离。面对少量的直立人邻居，智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另一种猴子、猩猩。这么说也许太歧视直立人了，其实反过来直立人也未必把智人当成人。几十万年的生殖隔离一方面会造成两者无法在身体上进行杂交，另一方面会在行为意识上牛头不对马嘴，彼此不认为对方是同类。

前面那位古人类学家说，“大熊猫都挺过来了，人没有理由挺不过来”。其实大熊猫能挺过来，从科学上讲是因为它们没有遇到一大批呼啸而来的“新熊族”。假如有一个新熊族群体规模更大、生存能力更强，与大熊猫争抢山岭生活环境，还不把大熊猫当成同类，大熊猫恐怕早就没有机会到今天卖萌了。大熊猫只是运气比直立人好一点儿。

好，让我们回到周口店北京人身上吧。在距今23万年前他们永远地离开了龙骨山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答案是，要么他们自生自灭了，要么苟延残喘到智人席卷东亚的时候，被智人消灭了。

东亚大地的祖先往事，将由从非洲而来的现代智人继续书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尊重祖先的族群，所以周口店北京人和龙骨山承载了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深厚情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最初几十年，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大地一步步沦陷敌手。从一定意义上说，周口店北京人的考古证据，成为那个时代维系族群微弱血脉、鼓舞全民浴血奋战的无与伦比的“圣物”。它们如同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苦苦抗争的人们的心灵，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早在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发掘之前，学术界中有关现代智人起源地的争论就已然火热。在周口店北京人化石被发现之后的近百年，“周口店北京人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这个问题总会引发学术界与公众的广泛讨论。

其实，不论答案是什么，都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深厚情感，因为他们已经化身为中国人孜孜追求的科学真理之火，在北京人学术研究中坚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将让中国人触摸到科学本质的光华，将让中国人享受科学发现的乐趣。

哪怕周口店北京人不是我们的直接祖先，我们仍然珍爱他们的一点点。

小贴士 北京人到底吃不吃人

魏敦瑞在1943年发表的专著《中国猿人之头骨》中，抛出了北京人“人吃人”的观点，他认为北京人“猎取他们自己的亲族正像他猎取其他动物一样，也用对待动物的同样方式来对待他的受害者”。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古人类头骨，但是出土的古人类肢骨相对少得可怜。魏敦瑞认为，这种现象显然不可能用水流冲走、食肉动物猎食等自然因素加以解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猿人有埋葬故去亲人头骨的习俗。因此，猿人洞中大量出现的北京人头骨，很可能就是远古“猎头族”的战利品。

此外，魏敦瑞还注意到，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中多见头盖部分，却几乎没有见到头骨底部与面部的骨骼，这与人类头骨的正常情况严重不符。与此同时，在北京猿人头盖骨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件肢骨之上，魏敦瑞还发现了一些可能是远古人类取食脑髓或骨髓时所遗留下来的破损痕迹，北京猿人下颌骨的断裂特点，似乎也暗示着它们因遭受人力砍砸而发生了破碎。

总之，根据北京人化石的种种特征，魏敦瑞认定他们是非常残忍的“猎头族”。

他的观点引发了人们长久的争论，几十年中，中外多位古人类学家都曾提出过反对意见。到1985年，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根据现代埋藏学的分析与研究，否认了北京人同类相食现象的存在。宾福德认为，魏敦瑞当年所谈到的众多支持北京猿人同类相食的证据，都可以用埋藏学的原理重新加以解释。

简单地说，北京人已在地下沉寂了数十万年，其间不免遭受各种自然力量的破坏和扰动。与埋藏前相比，北京人在被发现之时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

宾福德列举了几个证据，以表明他的观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人类肢骨上出现的纵向裂纹，并不是魏敦瑞所认为的受重击导致的，而是一种骨骼风化作用的产物；魏敦瑞当年辨识出的两件被火烧过的北京人骨骼，曾被视为支持同类相食的重要证据，其实它们只是土壤中的矿物污染导致的假象；猿人洞中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显示了一种奇特的“断裂”，魏敦瑞认为这是人力作用的结果，但是现代埋藏学的经验证明，这只是下颌骨的薄弱部分在压力作用下或移动过程中产生的常见现象；北京人的所有头骨都缺失面部和颅底，魏敦瑞认为这是北京人取食同类脑髓的结果，其实埋藏学

的研究表明，这些部位的骨骼较为纤弱，在各种外力作用下极易破碎而缺失；魏敦瑞认为存在于北京人头骨上的大量擦痕、刻槽和凹陷，都是人工作用的产物，而从埋藏学角度看，头骨被埋藏后的自然过程，同样可以对人类头骨产生类似的改造……

此外，宾福德还发现其中一件北京人头骨上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从而说明至少食肉动物也可能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人类头骨的主要收集者之一。如果某些北京人曾经遭遇不测，他们可能并不是被残忍的同类杀害的，而是被周围凶猛的食肉动物猎杀的。

第二章 万里征程——智人如何来到中国

暗淡的残阳从东非的草原落下，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冷风吹来，首领不禁打了个寒战。即使作为部落之长，他身上覆盖的兽皮也和部落的其他成员一样少。值得安慰的是，今天部落的狩猎队打到了一只瘸腿的瞪羚，这就是今天晚上部落的肉食晚餐了。

坐在一块岩石上，他开始思索白天的狩猎。今天是幸运的，收获的猎物能让部落里的人吃顿饱饭。回忆这些年的时光，气候越来越寒冷，能够打到的动物越来越少，而部落的人口却还在增加。部落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远处传来凶残鬣狗的嚎叫声，首领站起身来，该下决心了，为了部落的生存，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整个部落离开草原故乡，向外地迁移，寻找食物丰富的新家园……

上面这一幕，也许就发生在距今7万年前的非洲，这个部落属于现代智人，分子生物学家口中的我们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智人部落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开启的生存迁移，会在全球掀起史诗般的几万年人口迁徙浪潮，他们的后代将走遍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包括东亚。

走出非洲，一拨又一拨

在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欧亚大陆上已经有不止一种古人类繁衍生息了。在追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并大肆扩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欧亚大陆曾经的主人。

通过上一章我们已经知道，格鲁吉亚人是目前发现的非洲之外的最早人类，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的高加索山区一带。他们可能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直立人，也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在此之前，古人类只在非洲大陆内部徘徊。

直立人的历史长达百万年，他们可能曾多次走出非洲。早在1907年，考古学家就在德国海德堡地区发现了一种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这种古人类被命名为“海德堡人”。此后，在欧洲和非洲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这种古人类的踪迹。现在人们已经知道，海德堡人大约在距今7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大陆，可以算是一种晚期直立人，也有人建议把他们单列出来，算作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阶段。本书仍然将其归入直立人之列。

海德堡人也是一类走出非洲的直立人，最晚在距今50万年前，一批海德堡人就已经冲出非洲，进入西亚，稍做停留后，这批远征军又西进前往欧洲。因此，当时地球上至少有两种海德堡人——非洲海德堡人和欧洲海德堡人。

本书的主题是探寻中国人祖先的历史，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支海德堡人向东进发，到达中国境内呢？如果存在，他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

海德堡人是出色的猎手，他们也许算是地球上第一种能够猎杀大型动物的古人类。在海德堡人遗址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野鹿、野马、大象、河马和犀牛等动物的遗骸，上面有被屠杀的痕迹。在德国的一处海德堡人遗址中还出土了木制的长矛，与一些石器和十多具被屠宰的野马遗骸共同被发现。在西班牙的一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柄精心制作的对称样式手斧，这说明海德堡人有出色的石器制作技术。

这些发现表明，海德堡人可能更乐于生活在大型动物众多的草原和丛林地区。如果海德堡人选择在亚洲生活，他们也许会选择亚洲北部地区，那里有绵延万里的草原和丛林，养育了一群群的大型野生动物，简直是海德堡人理想的“肉食连锁店”。

因此，科学家长期在中亚和东亚找不到海德堡人的踪迹，也就情有可原

了。再考虑到海德堡人也使用手斧类石器，而在中国境内几乎没有发现手斧，我们似乎只好遗憾地宣布，海德堡人没有到过中国……

稍等，我们的结论不要下得太早。

2018年，中国科学家在黑龙江境内找到了头骨化石，从特征上分析，很可能是海德堡人的头骨。考虑到海德堡人会沿着欧亚大陆广阔的草原带追逐着猎物一路向东，这个发现也许会证明，他们也曾来到过今日中国的境内，只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太靠北方了，与同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其他直立人没有什么交集。即使曾经有少量海德堡人抵达过黑龙江一带，他们的后代也不太可能扎根那里，并一直繁衍到今天。

“你的意思是说，海德堡人也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了？”

虽然周口店北京人曾经让寻根认祖的我们失望过一次，但这一回，海德堡人也许不会令我们失望，他真的可能是我们的祖先——的祖先！

要揭示海德堡人与现代人之间的联系，还是要靠分子生物学来帮忙。我们刚刚说到的发现手斧的西班牙遗址里，还出土了海德堡人的腿骨。科学家从腿骨上成功提取到了古老的DNA，经过基因破译发现，不出所料，这位海德堡人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这是迄今为止通过基因破译的古人类年代数据的最高纪录。

海德堡人的基因还透露了更重要的信息。通过对海德堡人的线粒体DNA和全基因组的破译，科学家发现他们与另外两种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关系都比较近。

现在，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两位新来的“古人类同学”了。

尼安德特人也被称为“洞穴人”，因为最初发现的地点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洞穴中，洞穴入口比地面高几米，内部大约只有5米长、3米宽，洞顶很高。1856年，采石场的矿工在里面找到了一些人类骨骼，并将其交给了当地的古人类学家。尼安德特人就这样被发现了。在基因研究还没有兴起的时代，人们根据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特征与现代人的比较，认为他们是现代人的古老祖先。他们身高略矮，但很粗壮，生活在冰河时代的洞穴中。他们的脑容量与现代人相当或者略大于现代人，肤色比较浅淡。这是长期适应高纬度地区生活的结果。此外，他们还有一头红色或金色的顺滑长发。这群古老的洞穴人曾经广布欧洲大陆，甚至远至西亚和西伯利亚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开始检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并将其与现代

人基因进行对比，探寻两者的亲缘关系。当时由于技术还不是很先进，只是比较了线粒体DNA上的一些基因。结果发现，尼安德特人大概在距今50万年前与现代人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似乎不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只是一种主要分布于西亚、欧洲的古老的人种。于是，当时的学者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旁支，他们与现代智人没有交集，在现代智人向欧洲扩张的过程中，于距今3万年前彻底灭绝了。

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尼安德特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2010年，分子生物学家检测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发现里面的一些基因也同样出现于今天的亚欧人群身上。这说明现代智人必定与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杂交。

我们现代人的体内竟然有洞穴人的基因！这个消息当时轰动了科学界。

接下来的多次检测，使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清晰起来。在现代人的基因组中，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占了1.7%左右。从东南欧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的信息分析，现代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杂交的时间大概发生在距今6万年前，这个时间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刚刚到达欧亚大陆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智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一相遇，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真实的情况也可能没这么浪漫，说不定是野蛮的抢亲：要么智人抢了尼安德特人，要么反之。

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杂交并不止发生了一次，在东南欧，距今4万年前至少还发生了一次。正是多次的杂交，使得一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进入现代智人体内，并一直传递到今天的现代人身体里。

因此，说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也是有约1.7%的道理的吧。

丹尼索瓦人是一种更晚发现、更为传奇的古人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地区，邻近中国和蒙古的地方有一个丹尼索瓦洞穴，18世纪曾经有个名叫丹尼斯的俄国人在此隐居，洞穴因此得名。

2008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对洞穴进行探测，发现了一块很小的儿童指骨。这块指骨被小心地采集，并送到分子生物学家那里进行基因检测。由于丹尼索瓦洞穴所在地区气候寒冷，DNA保存状况良好。指骨上的基因组信息表明，她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现代智人，这是一个新的人种。由于指骨是在丹尼索瓦洞穴发现的，因此这个古老的人类被称为丹尼索瓦人；又由于指骨属于一个小女孩，因此科学家昵称其为“X女孩”。

X女孩当然有许多丹尼索瓦人同类。2000年，人们在洞穴中又发现了一颗成年男子的上臼齿，其年代与X女孩生活时代接近。

分子生物学家更为关心的是丹尼索瓦人与现代智人之间的关系。基因对比结果再次令人们震惊不已。生活在距离阿尔泰山万里之遥的太平洋岛屿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的体内，竟然也携带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在他们的基因组中，大约有4.8%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这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住民的祖先不仅包括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而且包括丹尼索瓦人。也就是说，现代智人曾经与丹尼索瓦人杂交，所以后者的一些基因代代相传，延续到了今天的现代人体内。从整个现代人群体看，大概有0.5%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

看来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智人的唯一“情人”。

X女孩的发现地在西伯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住在太平洋的赤道附近海岛上，从地点上看两边相距万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出推论，丹尼索瓦人及其后裔在亚洲一度分布非常广，其活动范围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跨过大海，一直抵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其他太平洋岛屿。

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两位“新同学”的亮相，让我们知道，当非洲现代智人还没冲出非洲、走向世界的时候，外面的世界至少已经有三种古人类在生活着——各地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两位新同学可能都是从非洲走出来到达西亚的海德堡人的后代。在距今约4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西亚分道扬镳，前者走向了欧洲大陆，而后者则走向了亚洲内陆。至于现代智人的祖先，那时候还在非洲草原上转悠呢。

尼安德特人主要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活动，可能没有抵达今天的中国境内。丹尼索瓦人活跃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肯定在中国境内生活过。科学家已经在今天藏族人体内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这种特殊的基因能够让藏族人在高原缺氧的空气环境中轻松地呼吸。

更为重磅的发现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境内找到了据称是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大约40年前，一位佛教僧侣进入甘肃夏河县的一处岩溶洞穴，发现了这件下颌骨化石。那里属于青藏高原，海拔3300米以上，距离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穴直线距离大概2200千米。化石上没能保存古DNA，幸好保存有降解了的古蛋白质，也能提供人类遗传信息。根据化石上包裹的碳酸盐结核，科学家判断这位古人生活在距今16万年前；根据其遗传信息，科学家判断他与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很近，因此断言他可能是丹尼索瓦人。

如果这真的是丹尼索瓦人，那么古人类学家可能要重新审视中国境内发现的距今十几万年到几万年前的一些古人类遗迹，那些遗迹曾经被归属于直立人，或者被牵强地归属于尼安德特人。说不定，很多那个时期的遗迹是

属于丹尼索瓦人的东西。

以上的发现证明，丹尼索瓦人肯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之一，至少是部分中国人的祖先之一。

走出非洲的大幕已经拉开，舞台上的一些配角也已经就位，现在，我们就正式有请主角——非洲现代智人粉墨登场，看看我们的这位直接祖先是如何实现从东非到东亚的漫长旅行的。

沿着海岸向东飞奔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智人化石发现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生活年代为距今19.5万年前。由于古人类化石保存不易，因此化石虽然是距今近20万年前的，但是其实现代智人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从非洲古人类的种类和时间看，现代智人很可能是由留在非洲的那支海德堡人进化而来的。现代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海德堡人的“孩子”。

现代智人在非洲诞生后，大概有10万年的时间，一直待在非洲故乡，“苦练内功”。智人之所以叫“智人”，就是在智慧上要超过身边的其他古人类以及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迅速发展，语言能力也大大提升，从而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生存优势。

比如，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更为复杂，而且还能够用兽骨、鹿角、蚌壳、象牙等制作精致的工具，善于利用新材料，发明新技术；他们的“食谱”变得更为宽泛，从狩猎大型动物到挖掘野生根茎，荒野求生轻而易举；他们用火技术更加娴熟，发明了火塘，住所功能分区；他们酝酿出丰富的社会文化与艺术……

这些智慧与技术，给智人带来了生存优势，也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他们的部落规模超过了其他古人类部落，但是他们在发挥集体智慧与力量之前，先要通过大自然给予他们的考验。

考古学家发现，距今10万年前，就有少量现代智人突破了撒哈拉沙漠地区的阻碍，向北进入西亚的地中海沿岸。在那里，他们似乎与当地原住民——尼安德特人共存了一段时间，有些洞穴时而被他们占据，时而被尼安德特人占据。两种人类的关系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最终，当时羽翼未丰的现代智人从地中海沿岸消失了，也许是被尼安德特人“团灭”了，也许是由于自然原因离开了。现代智人的首次走出非洲之旅，很可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地球正处于严寒之中，也就是地球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冰期。这次大冰期从距今15万年前开始，导致很多地区平均气温大幅下降，比今天的气温低10℃左右；此后气温不断波动，到距今12万年前再次持续变冷，一直延续了长达7万年左右才略有好转。

大冰期对于欧亚大陆上的古人类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很多古人类群体就此消失了。不过对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古人类来说，由于地处热带，充足的阳光维持了较高的气温，情况尚可。但是，降水仍然受到冰期的影

响，这里出现了持续的大干旱。非洲东部原来的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逐渐变成了沙漠和干草原，只有东非海岸附近由于海洋气候带来湿润气流，干旱并不严重。

于是，人口越来越多的智人部落向更适合生存的东非海岸聚集，那里除了有自己熟悉的丛林和草原食物外，还有海洋中的食物。古人类学家在东非的厄立特里亚发现了距今十多万年前的大量废弃物，既有被猎获的犀牛和大象的遗骨，也包括很多贝壳，垃圾堆里还混杂着人类制作的各種石器。这些证据表明，现代智人曾在这里长期生活，并开发过海洋食物资源。

除了漫长的冰期外，某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也降临到了现代智人头上。从东非海岸线跨越浩渺的印度洋，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苏门答腊岛北部有一个多巴湖，长100千米，宽30千米。它其实是休眠火山多巴火山的火山口，多巴火山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三次大喷发，而第三次喷发就发生在距今7万多年前。那次多巴火山爆发也是近200万年里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大量的火山灰尘埃弥漫在大气层里，遮挡了太阳光，地球表面气温骤降，引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巨大生态灾难。

科学家评估了这次灾难对当时全球古人类的影响。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这次打击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量尼安德特人艰难地在地中海沿岸山区延续着种族之火。地中海沿岸地区曾经是最早走出非洲的直立人的家园，这次又庇护了尼安德特人，真是一块古人类宝地。生活在东亚的丹尼索瓦人也遭受重创，可能只剩下数百人退守在横断山区。至于老古董——直立人即使没有被之前漫长的大冰期扫除干净，在这次大灾难中也无法幸免于难了。

东非海岸边的现代智人也遭受了冲击，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生存难题。对现代世界的移民来说，“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对聚集在东非海岸线的现代智人来说，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是故乡。

危机既代表着危难，也代表着机遇。大冰期和火山爆发固然带来了严寒环境，却也让全球海平面下降了许多，估计比今天的海平面下降了100米左右。这意味着把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分开的红海变得狭窄了。这还意味着大陆和海岛的海岸线向海洋方向推进，亚洲大陆南部的波斯湾、印度坎贝湾、东南亚大小岛屿之间的海峡都变得狭窄了，许多小海峡甚至直接变成了陆地。

一条从东非海岸一直向东延伸的“海岸高速公路”展现在现代智人的眼前。在距今10万年前那次失败的西亚远征之后，现代智人在距今7万年前开启了第二次走出非洲之旅，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

蒙戈湖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距今1万年前就已经干涸了。但

是，至少在距今2万年前，这里仍然水草丰美。1974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在蒙戈湖发现了一件男性古人类化石，经鉴定属于现代智人。经过反复检测，他的生活年代被推到了距今4.5万年前。而且，在发现这件古人类化石的土壤层下面的沉积层中，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而那些沉积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约6万年前。

这个年代数据震惊了考古学界，这说明蒙戈湖地区在距今6万—4.5万年前就有现代智人居住，这是非洲以外发现的现代智人化石中最古老的一个。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加里曼丹岛、新几内亚岛找到的现代智人遗迹，都是距今4万多年前的。

人们立刻被一个问题难住了：从非洲东海岸到澳大利亚之间找到的现代智人，怎么会比澳大利亚的现代智人还年轻？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在几千万年之前这块大陆就不再与其他大陆有陆路相连了，动物群非常古老。所以，在这块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必然是从其他大陆迁移过来的。可是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发现的现代智人，最古老的距今也只有4万年，而根据蒙戈湖人类化石分析，显然现代智人在距今约6万年前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

难道现代智人从故乡非洲直接坐飞机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这当然是开玩笑，考古学家需要更合理的解释。他们通过研究各地原住民的基因寻找现代智人迁徙的线索。从基因分析看，在距今7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刻，他们是从非洲的东北部海岸一带出发的。此外，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很复杂、很古老，和非洲黑人很接近，这说明他们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这些原住民很可能就是蒙戈湖那位古人类男性的后代。

在非洲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印度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一些原住民的基因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很相似。另外，印度洋安达曼岛上的原住民与非洲的布须曼人、俾格米人有许多共同特征：个子矮小、黑皮肤、浓密的卷发。这是因为安达曼岛相对孤立在海中，并没有受到后续其他部族的侵扰，基因上保留了更古老的状态。

基因研究还告诉世人，这一支最终到达澳大利亚大陆的现代智人，基本上只分布在印度洋沿岸和澳大利亚，并没有迁徙到大陆深处和太平洋沿岸。根据基因提供的信息，考古学家基本上可以描绘出现代智人走过的沿海路线：从非洲东北海岸出发，经过印度沿海，途经东南亚岛屿，终于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最后在距今3万年前又进入了本书上一章介绍的塔岛技术悲剧发生的岛屿。

现代智人并没有坐飞机到达澳大利亚，他们是沿着冰河时期的海岸“高速

公路”迁徙的，所以沿途的许多现代智人遗址应该就在海岸线—冰河时代的海岸线而非现在的海岸线附近。冰期结束后，地球回暖，海平面大幅上升，淹没了许多沿海地区的古人类遗址，所以考古学家才没能发现那些更古老的遗址。

那么，这批海岸高速公路上的“暴走族”曾经到过中国吗？

基因研究的结果是：到过。

这批“海岸暴走族”的航海能力应该很强。澳大利亚大陆在上亿年前就与其他大陆分离了，大陆上的动物非常古老，在现代智人到达前，澳大利亚大陆上连灵长类动物都没有，当然也就不曾有过任何古人类。直立人之一的爪哇人曾经居住在距离澳大利亚大陆只有100千米的北方岛屿上，却只能望洋兴叹。即使在冰期海平面下降的条件下，从东南亚的岛屿跨海到达澳大利亚大陆，仍然要穿越惊涛骇浪，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和优秀的航海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

优秀的航海能力让“海岸暴走族”在抵达东南亚后，不仅向南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而且继续沿着海岸线向北挺进，而东南亚的北面，就是今天的中国。时间可能非常早，距今约5万年前，中国的海岸线就出现了现代智人的身影。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海岸线如今已经被海水覆盖了。

这批现代智人顺着中国东南部海岸一路向北，甚至抵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今东北亚和蒙古等地的现代人中，高达50%的人拥有“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这说明他们不仅喜欢在海岸线冲浪，而且曾经深入内陆地区，所以中国东北地区也是这批现代智人的途经之地。

也许是过于痴迷于海岸生活，不善于在内陆谋生，也许是大冰期控制的大陆内部过于寒冷，不适合当时的人类生存，这批现代智人留到今天的后代并不多。现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另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

3万年前的猎人祖先

在距今5万年前，又一批非洲现代智人迈出了远行的脚步，他们踏着距今10万年前那批壮烈先辈的足迹，再次勇敢地跨过撒哈拉沙漠，朝北走向了西亚地中海沿岸。

人类史前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与早自己2万年出发的“海岸暴走族”不同，这批现代智人更擅长狩猎，比自己的祖先海德堡人更加优秀，我们可以称呼他们为“草原狩猎族”。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万—5万年前，远古人类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投射装置——轻型标枪和弓箭。这种远距离猎杀动物的武器提高了狩猎的效率，并降低了人类与猛兽直接搏斗导致的死亡率，这样，人口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出现了一次人口膨胀。可能也正是手握尖利的木制标枪与弓箭，使得这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不屑于”沿着海岸线旅行，而是热衷于追逐大型动物走向西亚。

凭借新发明出来的弓箭，“草原狩猎族”发现欧亚草原带简直是人间天堂。绵延万里的欧亚草原带就是他们的“草原高速公路”，沿着草原带，他们迅速进入当时水草丰美、野兽成群的中亚地区。卓越的狩猎能力让他们能在仍然寒冷的大陆内部生存并壮大。然后，实力强大的“草原狩猎族”以中亚为基地，继续向四周扩散。

其中一支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当他们抵达印度海岸附近时，遇到了比自己早1万多年来到印度的“海岸暴走族”。即使经过了1万多年，“海岸暴走族”仍然人丁单薄，根本不是凶悍的“草原狩猎族”的对手。基因研究表明，“海岸暴走族”的女性融入了“草原狩猎族”的人群之中，而男性基本上都断绝了后裔。

难道“草原狩猎族”杀死了“海岸暴走族”的男人，抢走了“海岸暴走族”的女人？

这种可能性很大，远古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过程没有今日世界的人权、法律的束缚，当时流行的是“丛林法则”，这种杀死男人、抢走女人的事件，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频频遇到。

“草原狩猎族”中的另一支沿着草原带一路向东，越过了长期隔绝东亚和中亚的天山、阿尔泰山等山系，进入蒙古和中国北方。从基因比例上看，东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现代人体内都有“草原狩猎族”的独特基因。他们抵达中国北方的时间可能在距今3.5万—3万年前。

在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一直“门庭冷落车马稀”，除了在本地艰难挣扎的少量直立人部落，没有什么人气，几乎不见“来客”。在距今5万—3万年前，中华大地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这个时期，至少有两批现代智人——“海岸暴走族”“草原狩猎族”分别来到东亚，这里可能还存在着少量直立人和丹尼索瓦人，如果后面这两类人没被大冰期或现代智人消灭的话。

现代智人能够冲破地理阻隔，频频进入中华大地，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更有智慧、技术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天时”配合，他们抓住了气候的有利时机。

中国的古气候透露了相关信息。对黄土高原沉积的古土壤里化学元素的分析结果表明，距今9万—6万年前气候寒冷，这段时期估计全球都处于寒冷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智人抓住海平面下降的机会，沿着海岸线走出非洲，“海岸暴走族”展开了一轮大扩张。距今6万—2.5万年前，黄土高原处于相对温暖的时期，对应着现代智人向欧亚大陆迁移，“草原狩猎族”大扩张。距今2.5万—1.4万年前，黄土高原又变得异常寒冷。

另外，中国内蒙古西部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作居延海。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使至塞上》，诗云：“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里的“居延”就是指居延海。这首诗接下来的一句就更有名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说明唐代时居延海还存在，但是周边已经是大漠风光了。科学家从这个古湖泊的沉积物中的化学元素分析，湖水在距今3.7万—3.4万年前、距今3.1万年前左右、距今2.8万—2.6万年前的时段水位高，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在距今1.9万—1.4万年前的时段水位低，对应气候干旱（可能还有寒冷）。距今3.7万—3.4万年前这个温暖的“窗口期”，正是“草原暴走族”越过天山、阿尔泰山东进的时段。

如果对照古气候变化与现代智人扩张，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智人在东亚的迁徙有一个“跷跷板效应”：当全球气候寒冷时，内陆冰天雪地，不适合人群居住和迁徙，而沿海海平面下降，适合人群生活和迁徙，于是南方的“海岸暴走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当全球气候温暖时，内陆春暖花开，适合人群居住和迁徙，沿海海平面上升，给沿海居住的人群带来麻烦，于是北方的“草原狩猎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

这个跷跷板效应能够让我们发现几万年以来现代智人在中华大地上的迁移线索，理解不同时段中国古人类的面貌。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京周口店，去亲密接触一下几万年前的现代智人祖先们。

“等等，你不是说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在距今20多万年

前就离开那里了吗？”

当然，距今几万年前，周口店已经没有了北京人，但是由于现代智人的扩张，他们也看上了龙骨山这块风水宝地，那里重新兴盛起来。

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千米处的田园洞发现了包括下颌骨和部分肢骨在内的古人类骨骼和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这一古人类被称为“田园洞人”，几年后科学家根据骨骼内的化学同位素，确定田园洞人生活的年代在距今4.2万—3.85万年前。此后的基因检测表明，田园洞人属于现代智人，携带了极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

从生活时代看，田园洞人很可能是“海岸暴走族”沿着海岸北上后的后裔。虽然今天的周口店距离渤海海边有170多千米，但在几万年前，渤海湾的海岸线在今天津市的武清到静海一线，当时周口店距离海边只有100千米左右，从龙骨山向东南到达海岸边，基本上是一马平川，此后的海退以及河流沉积把海岸线向海洋方向推进了一大段。当年的“海岸暴走族”的后裔从海边到达周口店并不太难。

另一个可以间接支持田园洞人是“海岸暴走族”后裔的证据，来自南美洲丛林中的现代亚马孙人。基因对比发现，在美洲原住民各个人群中，只有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最近。这意味着现代亚马孙人的古人类祖先可能与田园洞人关系密切。由于美洲人群都是从亚洲迁移过去的，如果只有田园洞人这一支现代智人迁入美洲，那么现代美洲所有原住民人群都应该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密切。可实际情况是，只有远在南半球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遗传关系很近，很大可能说明与田园洞人亲缘关系很近的一支现代智人很早迁入美洲，后来又有其他现代智人进入美洲。考虑到“海岸暴走族”出色的航海能力，很早就扩张到东北亚地区，亚马孙人的祖先可能要追溯到“海岸暴走族”，因此田园洞人可能也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关于美洲人群的起源与扩张，本书将在后文详述。

基因研究还揭示，田园洞人可能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可能没有后代存活到今天。田园洞人最终断子绝孙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似乎是要安慰我们寻根问祖频频受挫的心灵，龙骨山上的另一种古人类在田园洞人之后崛起于山顶的洞穴中，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山顶洞人。早在1933年，山顶的钟乳石山洞中就出土了古人类骨骼。也正是因为被发现得很早，山顶洞人的头骨原件和一些骨骼标本遭遇了和周口店北京人一样的命运，在战火中遗失了。

山顶洞人显然是心灵手巧的一类人，他们有大量的装饰品，穿孔的兽牙、

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鱼眼上骨和刻沟骨管等。山顶洞人的骨器和装饰品制作得十分精美，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会一面直钻，而且还能两面对钻。

山顶洞人的居住环境分成了几个洞室，科学家对里面的动物残骸进行了同位素测年，发现洞穴的上室和下室动物的生活年代分别是距今2.9万—2.4万年前和距今3.4万—3.3万年前。由于这些动物应该是被山顶洞人猎杀的，因此这个时间也等同于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

从山顶洞人的时段看，他们刚好生活在冰河时代相对温暖的日子里。由于科学家没能获得山顶洞人的遗传信息，因此无法通过分子生物学判断他们的祖先是谁、是否有后代存活到了今天。不过，他们有卓越的穿孔技术和骨针工具，这很可能是延续自“草原狩猎族”的东西，后者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再考虑到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刚好在“草原狩猎族”东进之后，所以他们是“草原狩猎族”后裔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与比自己早1万多年来到周口店的田园洞人并不是一类现代智人。只是不知道两批智人是否曾经在龙骨山相遇。

“城头变幻大王旗”，龙骨山上古人类的更替，集中反映了几万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格局的风云变幻。在气候变迁这个幕后导演的指挥下，在自身人群生存压力的驱动下，不同人群在中华大地上南来北往，为了梦中的明天而持续奋斗（见表2-1）。

表2-1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古人类

古人类进化阶段		非洲大陆	欧亚大陆东部	欧亚大陆西部
智人阶段 (距今 40 万年前至今)	晚期智人		山顶洞人 田园洞人	克罗马农人
	早期智人	长者智人	丹尼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
直立人阶段 (距今约 200 万—20 万年前)		非洲海德堡人	北京人 元谋人 爪哇人	欧洲海德堡人 格鲁吉亚人
能人阶段 (距今约 300 万—200 万年前)		能人	无	无
南方古猿阶段 (距今约 500 万—200 万年前)		阿法种 非洲种 粗壮种 鲍氏种	无	无

南下北上，走遍中国

从拥有的石器的种类看，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这批现代智人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广泛分布，至少从华北地区北部向南到黄河流域，都有类似技术和文化的古人类活动。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原地区，是当时他们重要的活动区域，不同部落分布在平原的河谷地带，在水源和食物条件适合的地方安营扎寨，形成了较长时间居留的营地，并围绕自己的营地，在周边形成放射状的临时活动点，从事狩猎、采集，选取合适的石料加工石器。

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在郑州南部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这批古人类远距离搬运来紫红色石英砂岩，专门垒砌成石堆基座，在上面摆放巨大的古棱齿象头，这种大象成年体重都在10吨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对巨兽的恐惧或崇拜，还是通过仪式祈求狩猎丰收？

我们不得而知。这种类似于祭祀的活动，表明了当时的古人类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

山顶洞人的快乐时光大概持续了几千年到上万年，从距今约2.5万年前开始，全球进入了非常寒冷的时期，也就是“末次冰期盛冰期”。

科学家根据碳十四同位素信息，确定盛冰期的具体时限在距今2.65万—1.9万年，当时全球陆地约有1/4长年被冰雪覆盖，而今天全球陆地则只有1/10长年被冰雪覆盖。由于大量的地表水冻结成固态的冰，全球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甚至更多。从气温上看，盛冰期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低5~10℃，在中高纬度地区甚至可能比现在低20℃；在赤道地区，平均气温可能只比今天低2~3℃，影响不大。酷寒的气候持续了7500年，直到距今1.9万年前，北半球大部分冰川才开始融化、退缩，盛冰期结束。

盛冰期中，中华大地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距今2.7万—1.8万年前，陕西秦岭地区出现了云杉、冷杉林。这些树木生长在海拔近3000米、年平均气温2.5~5.7℃的环境中，而今天秦岭一带年平均气温在13℃，两相比较，距今约2万年前，秦岭地区气温比现在低7~10℃。估计山顶洞人活动的华北地区也比今天低10℃左右。由于气候变冷变干，生态环境恶劣，植物类型发生变化，乔木和木本植物减少，草本植物增加，其中的禾本科植物明显增加，而浆果类植物减少，人们的采集活动变得艰难起来。

盛冰期的到来，使得古人类的生存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反映在他们所使用的石器上，石叶、细石叶工具成为主流，这是适应干冷环境、频繁迁移、专业化的狩猎人群所使用的工具。在这段最寒冷的时光中，即使山顶洞人

的后裔还活着，他们也应该不会继续在华北北部的龙骨山居住，他们可能向南迁徙了。说不定当时也有很多原本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草原狩猎族”的后裔，为了躲避严寒向南迁徙而来，进入中华大地，生活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加靠南的区域。南方毕竟要暖和一点儿，食物稍微丰富一点儿。他们就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草原游牧部落一样，在气候变冷的时候频频南下，只不过他们的时代早了2万年，他们也还没有学会骑马，只能依靠步行。他们的南迁可能也不像后来的游牧部落南下那样战火纷飞，因为距今2万年前的寒冷时期，大地上本来也没有多少人群了。

总之，在盛冰期的时代，很可能发生过古人类从中国北方地区南下的迁徙事件。这是一段古老祖先群体的萎缩期，尤其是对古老的北方人群来说。

那么，在山顶洞人以及之后的盛冰期这段时光中，中国的南方地区是什么景象呢？

就在山顶洞人及其伙伴于距今3万年前在中国北方扩张之时，中国南方也并不平静。

我们知道，东南亚地区很早就有“海岸暴走族”生活，他们的后裔在那里养精蓄锐；从中亚进入南亚的“草原狩猎族”，也在四处扩张，他们的后裔进入东南亚地区，使得东南亚地区有着各种类型的人群，或者按照分子生物学家的说法，那里生活着各种基因型的人群。

借助温暖的气候，这些人群纷纷开始“北伐”，涌入中国南方地区。他们进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就是通过“海岸高速路”，从华南地区深入内陆；另一条可能是从东南亚腹地顺着河流北上，进入今天的云南地区。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缅甸的现代人群中有很多古老的基因型，这些基因型也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人群中，这说明两个地区有人群的交流。通过分析基因，学者们大概可以判断，在距今2.5万年前或更近的时段，有古老人群从缅甸向北迁入中国境内。

分子生物学家通过综合各地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数据，从父系遗传和母系遗传两条线索追溯现代智人在中华大地的扩张情况。他们发现，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而另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另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可以分别用组合1和组合2来代表这两个基因型人群，其中组合1在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组合2在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而且，由于两种组合有大致相等的基因多样性，因此可以判断，分别携带这两种组合的古老人群基本上同时进入中国境内。

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组合的人群并不是分别从北方和南方进入中国境内

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他们都是从南方进入中国，然后逐渐向北扩张的。只是组合2在南方地区扩张得比较早，因此很多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组合1进入中国境内，在迁徙到北方地区后才开始大肆扩张，因此很多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

真正来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的基因型，也就是从欧亚草原带南下的古老人群的基因，在今天的现代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小。那些在盛冰期南下中原的古老北方人群，那些山顶洞人的伙伴，他们的命运可能不容乐观。

让我们猜测一下熬到了距今1.9万年前盛冰期结束后，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群的迁徙情况吧。

在盛冰期的打击下，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人口和部落数量大幅减少，还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很多特有的基因型。就像在地球历史上的很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一样，盛冰期也会造成许多古老人群的灭绝。盛冰期时南方古老人群受到的打击较小，他们的人口、部落以及基因型的多样性远比北方更多。当盛冰期结束，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来临时，人丁兴旺的南方古老人群纷纷开始“北伐”，向正在回暖的中原地区甚至更北方挺进。

在中国各民族中，以基因多样性从多到少排序，依次是南方非汉族人群（即南方各少数民族）、南方汉族人群、北方汉族人群、北方非汉族人群（即北方各少数民族）。即使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族群融合，也仍然存在这样的基因型南北分布差别，这正是南方古老人群向北扩张留下的痕迹。哪里的基因多样性更丰富，哪里就是故乡，是迁徙的起点。

不同人群牙齿类型的分布，也揭示了古老人群扩张的方向。其实在分子生物学家进入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的研究领域之前，考古学家已经用牙齿类型的分布来探索迁徙路线了。

考古学家发现，亚洲东部的古老人群的牙齿类型可以分成两类——中国型和巽他型。中国北方、蒙古、韩国、西伯利亚人群乃至印第安人的牙齿基本上属于中国型，而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上的人群的牙齿属于巽他型。在日本，绝大多数人的牙齿属于中国型牙齿，古代的绳纹人和现代的阿伊努人的牙齿属于巽他型牙齿。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群，似乎处于两类牙齿类型分布的中间地带。根据牙齿类型的分布，考古学家提出，巽他型牙齿可能于距今3万—1.7万年前的某个时刻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然后这种牙齿类型的人群沿着东亚大陆架向北挺进。由于当时是冰期，海岸线向海洋大陆架方向延伸，当时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岛屿很多都与大陆相连。另外一支东南亚古老人群稍后从大陆的内陆向北进发，在中国北部产生了中国型牙齿类型，时间可能是在距今2.5万—1.8万年前的某个时刻，然后他们再

继续向北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跨海进入美洲大陆。

考古学家对牙齿类型扩散的描述，和分子生物学家用基因来推测南方人群的北进路线基本吻合。巽他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2，中国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1。

而且看起来，组合1与组合2在很长的时间里基因交流很少，各自基本上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基因型。这个现象为我们理解几万年前现代智人的迁徙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与直立人相比，现代智人由于智慧更高、技术升级，因此生存能力更强，他们的群体数量更多，每个群体的个体数量也更多，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迁徙能力。总之，在人类进化到现代智人阶段后，除了运气不好遭遇塔岛技术悲剧的少数群体外，现代智人基本上摆脱了塔岛技术悲剧和功能性灭绝的威胁。至于那些把东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区域分割开的地理阻隔，已经无法阻挡现代智人的脚步。

他们在迁徙过程中面对的环境，是广阔且基本空旷的大地，这个时期的古人类扩张可以用“填空模式”来描述，自然界中散布着许多适合现代智人生活的空间，“长路漫漫任我闯”，他们在几万年中不断繁衍、迁徙，填补这些空间。

生活在不同空间的远古人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踏上了各自的进化之路。由于天宽地广，分散各处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尚不频繁，因此相对独立的进化使各个人群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基因型。这种现象在分子生物学里叫作“遗传漂变”，比如一个大的群体分出去了几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分别只拥有大群体基因库中的一部分基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群体不断繁衍，其基因型已经变得与大群体不一样了，小群体彼此之间也变得不一样了。

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迁徙历史，也是群体遗传漂变的历史。一个大的群体不断分化出小的群体，占据不同的生存空间，在新家园中独立进化。在这个时期，基因型的漂变、分化趋势大于基因型的交流、融合趋势。就这样，东西南北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灿若繁星的不同基因型的古老人群。

从距今7万年前开始的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在距今2万年前达到最冷的盛冰期之后，终于有点儿强弩之末的颓势了。地球变得温暖起来，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春风又绿江河岸，暖风吹得古人醉。借着这股珍贵的暖风，我们的现代智人祖先一拨一拨地南下北上，跋涉万里而来，他们的脚步踏遍了中华大地，散布居住在天南地北。他们既聪明又能干，再也不像东亚直

立人前辈那样被大自然完全左右，东亚的现代智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很快将掌握新的技能，真正开始掌控自己族群的命运。

小贴士 洞穴人留给我们的基因礼物

在现代人身 上，大约1.7%的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智人祖先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实际上，智人简直是“见一个爱一个”，他们也曾与丹尼索瓦人有过杂交。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人、彝族人和夏尔巴人，以及太平洋海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体内，都有相当可观的丹尼索瓦人基因。以整体现代人平均来看，大约有0.5%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高原民族适应缺氧环境的基因，就来自丹尼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同样“用情不专”。从他们可能的共同祖先海德堡人分离出来后，两者之间也发生过杂交，至少0.5%的丹尼索瓦人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还与另一个未知的人种进行过杂交。这一未知人种也许是海德堡人的另一个支脉。

在尼安德特人赋予我们的基因中，有一个与角蛋白合成有关。角蛋白是一种纤维状的蛋白，构成我们的毛发、皮肤角质层和指甲。现代智人刚走出非洲时，头发可能是卷曲的。今天的欧亚人群中有些人拥有一头垂顺秀发，就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带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涉及皮肤色素合成的基因也来自尼安德特人，使欧亚人群肤色变浅，与自己的非洲同类不一样了。较浅的肤色在高纬度地区是一大生存优势，因为在阳光不太充足的条件下，较浅的肤色合成维生素D的效率更高，而缺乏维生素D，人易得佝偻病和软骨病。

古人类之间的杂交只是个别行为，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跨越人种的杂交行为，可能也就发生过寥寥数次。但是获得了其他古人类基因的个体很幸运地拥有了明显的生存优势，所以这些基因在人群中逐代扩散开来，以至今天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拥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不过，并非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都是有益的。我们从尼安德特人那里获得的几个基因，会让我们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其中包括II型糖尿病、红斑狼疮和克罗恩病（一种慢性肠炎）。此外，科学家还猜测，来自尼安德特人的某些基因可能会导致生育障碍。所以，在现代人的X染色体上，几乎没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第三章 北粟南稻——华夏农民的田园晨曲

中华大地上响起的第一首器乐曲，可能是小小的骨笛发出的。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几十支距今9000—7800年前截取丹顶鹤的翅骨制成的骨笛破土而出。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贾湖骨笛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约1.1厘米，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一般为7孔。个别笛子的主音孔旁还钻有小孔，这可能是古人的调音孔，骨笛开孔后先要试音，如果音律不谐，再开小孔做微调。可见当时古人的声律技巧已经非常精湛。

在远古时代，物质条件低下的古人们哪里来的闲情逸致吹奏音乐呢？

答案是：他们把野草变成了佳肴，把野兽变成了家畜，他们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农民，他们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的“农业革命”。

粟和黍：北方祖先的社稷江山

“仓廩实而知礼节”，只有吃饱了肚子，人们才会注重社会礼仪，注重文化与艺术，贾湖的骨笛才会被制造出来，然后被人们吹奏。

在农业产生之前，古人获得食物的方式就是渔猎和采集。农耕其实是很辛苦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考虑到农业诞生之初农作物产量很低的事实，田间劳动就更显得辛苦了。农耕获得的粮食蛋白质含量少，味道也不如猎物和瓜果。耕种具有的唯一优势就是，它能养活更多人口。在土地和劳动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农耕活动可以给古人提供更多的食物，或者说更多的能量，能够让更多的人吃饱饭，虽然吃的差了一点儿。

从农耕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猜测农业产生的原因。古人选择更为辛苦的农耕，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很可能是由于环境所迫。

因此，在追踪我们的第一批农业祖先之前，我们先要书接上回，了解一下末次冰期盛冰期结束后的全球气候变化。

距今1.8万年前是末次冰期最为冷酷的时候，之后的四五千年，地球逐渐回暖，到距今1.4万年前，出现了一段非常温暖的时期，海平面迅速回升。然后在距今1.28万—1.15万年前期间，出现了一次名为“新仙女木期”的降温事件，全球气温下降了7~8℃。之后地球又一次回暖，一直到距今8400年前，再次迎来一次降温事件，不过这次降温比新仙女木期要弱。

中华大地上农业的萌芽，时段可以追溯到新仙女木期及之后的回暖期。降温事件对中国北方古人的冲击远大于对南方古人的冲击，因此我们就先来了解北方古人面对降温事件所开展的“生产自救”活动。

在从距今1.4万年前开始的那段温暖期，许多生活在寒冷气候区的大型动物的活动范围向北方移动，北方古人的狩猎目标以野猪、鹿等喜温动物为主。温暖的气候下，丰富的食物养育了更多的人口。然后，新仙女木期突然而至，自然环境变得恶劣，许多大型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狩猎能够捕获的动物量锐减，如果不能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北方古人将会饿死。

饥肠辘辘的祖先们把目光投向了漫山遍野的野草。

狗尾草和野糜子是广泛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它们结出的颗粒很小。在温暖的岁月，动物和浆果食物丰富的时期，北方古人也许看

不上这两种草的籽粒，但是在寒冷的岁月，他们必须珍惜自然界中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即使是一小粒一小粒的狗尾草和野糜子籽粒也不能放过。按照农学家的说法，他们这时候的食物是“广谱性”的，有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聪明的现代智人，除了广泛采集植物籽粒外，他们甚至还会考虑把一些产量比较高、颗粒饱满的植物的籽粒挑选出来，播撒在大地上，让它们肆意生长，希望在未来结出更多的籽粒。就这样，他们从采集方式向农耕方式迈出了第一步。

狗尾草是粟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米，今天我們主要用它来熬粥；野糜子则是黍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黍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米，在现代农业中已经很少种植了，在一些北方特色食物比如驴打滚、黏豆包那里，我们还能与黍相遇。

粟和黍都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但是对于它们最早被驯化的地点和时间，学者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最初，人们认为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平原地区利于灌溉，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但是，正因为粟和黍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的，所以它们最初改良的地点可能不一定是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反而可能会是“野草”繁盛的地方，比如一些山间谷地。此外，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反而可能会成为原始农业萌发的阻碍，那里的古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去改良“野草”。在一些自然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区域，比如更加靠北的燕山山脉甚至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气候更为寒冷，古人更有动力去改良“野草”，以补充自己的食物来源。

植物考古正在证实这个猜想。比如，植物学家在北京附近的东胡林人遗址中筛选出了已经炭化的粟粒，其从形态上看已经有了栽培粟的样子，但是尺寸还非常小，这可能说明当时那里的古人已经开始将狗尾草向栽培粟驯化，还处于驯化的过渡阶段。无独有偶，其他植物学家在山西西南部的柿子滩遗址筛选出了处于驯化过程的黍类籽粒，但是粟还处于野生阶段。与之对比，在黄河流域对粟的驯化大概发生在距今8000年前，比更北方的区域要晚。

有趣的是，粟和黍的驯化起源地可能也不一样。从两种植物的特性看，粟对水分的要求较高，主要生长于较湿润的地区，而黍则多生长在较干旱的地方。从植物考古的发现看，栽培黍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森林草原植被过渡带，它最有可能诞生于辽宁西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燕山山脉北麓，也就是今天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北方，偏干旱环境；栽培粟最早出现在稍微靠南方的区域，它最有可能诞生于太行山北部到燕山山脉南部一带，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方，偏湿润环境。

让我们通过一个古人的“粮食基地”来一窥他们的农作物驯化过程。

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有一个磁山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多次发掘，一共发现了几百个窖穴，其中储存粮食的粮窖有近200个。仅仅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88个粮窖，储存的粮食就达到了109立方米，折合粮食质量大约6.9万千克。如果再算上后期发现的粮窖粮食，古人的这个粮食基地真是储量惊人。

通过对粮窖粮食的测年，我们得知这些粮食是距今10000—8700年前收获和储存的。这些万年粮仓里储存的是什么粮食呢？

磁山遗址里的粮食早已腐朽，刚出土时是淡淡的灰绿色，风干后变成了灰白色。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出粮食的清晰外壳。籽粒虽然早已腐烂，但是植物学家知道，植物活着时会在吸收水分的同时吸收一点点可溶性的二氧化硅，这些二氧化硅积淀在植物的各个部分，在植物死后，会形成耐腐蚀的植硅体，他们通过植硅体的形态就可以反推植物的种类了。植硅体虽然不是植物的基因，但是和基因一样保存了植物的信息。

利用磁山遗址粮食的植硅体研究，植物学家发现，这个巨大的粮仓在距今10300—8700年前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表明里面全部是黍。距今8700—7500年前，粮窖里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但粟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总量的3%，粮仓里依然以黍为主。也就是说，磁山遗址的农作物灰化样品主要是黍。万年前的北方古人是吃黄米的，然后他们才驯化了粟，吃上了小米。

为什么首先装满粮仓的是黄米而不是小米呢？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黍比粟更加“皮实”。黍的生长期短，比粟更耐干旱、更耐贫瘠。当时的古人多居住在山谷有水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渔猎和采集的优良场所。古人技术能力有限，生活环境周围又没有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因此黍成为他们补充食物来源的首选。另外，气候变化显然也在帮助黍率先脱颖而出。前面已经谈到，寒冷期的降临要求北方古人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哪种植物最容易被驯化为农作物，哪种植物就会率先填满粮仓，黍就是他们的首选，它容易被驯化，而且更耐寒。

从野生品种到适合农耕的栽培品种，农作物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人通过一代代的筛选，让单株植物籽粒越来越大、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如果说大概1万年之前古人就实现了黍的基本驯化，那么粟的基本驯化大概要到距今8000年前了。那个时期的许多古人遗址，比如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及中下游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

虽然粟的驯化比黍难，但是一旦驯化成功，古人就享受到了粟的好处——产

量更高。只要水肥条件跟得上，粟比黍的产量高。粟逐渐取代黍，成为古人粮仓里的第一主粮。

粟最开始也种植在山谷地带，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甚至留下了一些种植线索。比如古书里谈到中国的“农神”——神农氏的时候，说“神农城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谷物，主要是指粟，传说中神农氏把粟种在山坡上，这应该是对古人早期种植粟的描写。在先秦时代，古人常用“社稷”一词比喻天下，“社”就是土地之神，代表国家疆土；“稷”则是优质的谷子——粟，是当时国民的粮食根本。

栽培粟出现之后，黍的农业地位相应下降，不过它在北方仍然长期居于粮仓中的次席，是重要的辅助粮食。黍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定义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长度单位——一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统一度量衡，于是选择中等大小的黍粒，用横排100粒的长度定义了一尺的标准，再用一尺为单位，制作成装粮食的斗，进而统一了质量单位，甚至还用尺这样的长度单位辅助制定了阴历。

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菽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

菽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受菽年”与“受黍年”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菽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

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菽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

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

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实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Cinake”，也用于指代中国。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

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

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东亚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结晶——水稻？

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发现，西方各种语言中“稻”这个词的源头来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因此他们猜测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随后东南亚和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学者们的视线又转移到这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提出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东南亚，因为那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筛选和杂交试验。

以上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原理，自然环境优越、生存压力小的区域，不会是农作物诞生的首选地。南亚和东南亚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没有太大的动力去驯化植物，并从事更为辛苦的农耕。只有在农作物经过漫长驯化，产量已经足够高后，传播到这些地区，那里的古人才有动力去种植。

不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际的考古挖掘，最终学者们探索水稻起源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流域。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湖南北部发现了城头山遗址，遗址附近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以及稻田的遗迹，遗迹中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这可能是灌溉设施完备的最早水稻田。

此后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振奋，在江西北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距今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证据，说明上万年之前那里的古人就在进行水稻的驯化活动。2004年在湖南的玉蟾岩遗址，还发现距今1.8万—1.4万年前的驯化水稻的证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

所以，如今的学者们基本认定，中国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

栽培水稻主要分为两大类——籼稻和粳稻。籼稻适合生长于南方湿热地区，今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以种植籼稻为主；粳稻适合生长于北方干凉地区，今中国黄河流域以及更北方的东北地区，是粳稻的主要产区。植物学家通过水稻的基因分析，认为最早出现的水稻是粳稻，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的古水稻，经过基因对比，与绝大多数粳稻基因接近，说明我们的南方古人最早是吃粳稻的，也就是类似今天东北大米的原始品种。稍后，很可能是在古印度的恒河平原，开始了籼稻最初的驯化过程，当地距今7000—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古人消费稻米的证

据；然后，中国的粳稻品种传播到了古印度，与原始的籼稻进行了杂交，改良了后者，使籼稻最终完成了驯化过程。

与北方黍和粟的漫长驯化过程类似，南方的水稻也经历了数千年的驯化过程。今天的江浙地区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诞生地之一，那里的水稻驯化体现了古人与水稻之间相互依赖、协同发展的历史。

距今约10000年前，浙江有一个上山文化，植物学家从遗址里筛选样品，仅仅发现了两粒炭化的米。不过在当时古人制作陶器的陶土里发现了掺入其中的稻壳，古人把稻壳加入陶土中，可能是为了减小陶土的黏性，以免烧制时陶器破裂。从他们制作陶器的工艺以及焚烧稻壳的灰烬遗迹中，我们可以推测，在万年之前，水稻对于那里古人的生活已经不可或缺，他们不仅采集水稻籽粒，而且还对稻壳加以利用。

不过在上山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那里出土的一些大石片，能够当成石刀或者石镰使用，可以收割田野里的野生水稻。古人可能也开始了耕种水稻的尝试，只是这种活动可能还比较原始。

上山文化之后，距今7000—6000年前，浙江东部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兴起，植物学家在不同的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植物遗迹，里面就包括水稻籽粒。植物学家对发现的水稻籽粒进行了鉴定，发现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即距今69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的比例不到30%；到距今66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比例接近40%。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水稻种植水平，但是在当时，他们的栽培水稻还无法取代野生水稻。

当时与水稻竞争食物地位的植物很多，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其他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栎果、芡实、柿子、猕猴桃等，特别是富含淀粉且容易储藏的栎果。遗址中有很多栎果的储藏坑。这说明距今6000多年前，水稻农业还不发达，水稻只是古人的粮食之一，产量并不高。

中华大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进入水稻社会呢？

浙江余杭，一座宏伟的良渚文化城池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座巨大的古城内外共有三层：外面一层是外郭，面积达8平方千米；向内第二层是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城墙周长6.8千米，墙基宽20~145米，全部用大卵石堆叠而成，墙体则用黄土堆积；内城的中心是宫殿，宫殿基址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高台，台高约10米，东西长达670米，南北宽达450米。在这座城池外面的北方和西北方，古人用11条草裹泥包垒砌的防洪大坝，构筑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保护着城池免受洪灾侵扰。

这座城池揭示了江浙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广泛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为距今5200—4300年前。考古学家明显感觉到，那个时期江浙一带的文化遗址数量大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增长。发掘良渚古城的考古学家估计，仅修建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高台、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周围的大型水利工程，就需要约120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如果简单地以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工作量计算，大约需要3.3万人不间断地劳作一年。如果按照1万人每年劳作200天计算，整个工程建设时间需要6年多。

一个5000年前的古代社会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必须有足够多的劳动工人，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这就需要非常多的农业人员和手工业人员。

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支撑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崛起于东方。良渚文化的根基，正是稻作农业。

植物考古的新发现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例如，属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遗址古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长条形田块，每个田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不等，古稻田总面积达56000平方米，折算为84亩。再如，人们在莫角山高台边缘发现了一个大型灰坑，坑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米，估计原本是一处储存粮食的粮窖，后来发生了火灾。经过测算，粮窖内的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总质量约达13吨。从位置上看，这个粮窖可能是上层人物的仓储，这次火灾真是损失惨重。

良渚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大地经过漫长的水稻筛选和栽培过程，在距今约5000年前终于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水稻成为当时良渚社会的主导粮食品种。南方古人以稻米作为他们的主粮，并辅之以其他动植物食物。

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南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向东被先民们携带渡海，进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其实，水稻在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驯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7000年前，水稻种植就已经越过黄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地区扎下根来。到距今5600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农作物黍和粟占据的陕西关中地区，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

水稻也是本章开头提到的贾湖遗址古人的食物来源之一。贾湖遗址中筛选出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籽粒，其中就包含水稻籽粒，总计有400余粒。这说明在今河南中南部这样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借鉴长江流域的经验，尝试采集和种植水稻。

作为八九千年前的古人，贾湖古人的粮食获取方式与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较像。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菱角、莲藕、栎果、大豆等。但贾湖古人能够悠闲地吹奏骨笛，还要归功于他们卓越的渔猎能力。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这说明他们的渔业很发达。考虑到他们的植物性食物还包括莲藕和菱角等水生生物，可以推断贾湖古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靠水吃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水面应该很大，可以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别忘了，贾湖骨笛可是用丹顶鹤的翅骨制作的，丹顶鹤也喜欢在河湖边起舞弄清影呢。

贾湖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很惬意的，至少在很多岁月里是食物比较充足的，这不仅让他们“仓廩实而知礼节”，创造吹奏艺术愉悦自己，还让他们可以用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比如猪，另一种起源于古老中国的食物。

猪和狗：古人最好（吃）的朋友

中国古代最早的家猪骨骼就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可能在距今8500年前，贾湖古人就开始饲养猪、吃猪肉。从狩猎自然界里的野猪到饲养家猪，同样是漫长的过程，古人需要跨过几个关键的门槛。

驯化野猪，首先是出于对肉食的需求。古人长期依赖狩猎为生，已经习惯了吃肉，吃的可能主要是鹿肉和野猪肉。随着他们的人口增长，在某个地区长期居住，周边的大型动物被大量猎取后，通过狩猎已经无法满足古人吃肉的需要了。于是，古人捕捉到幼小的野猪后，尝试把它们养大后再杀掉吃肉。其次，古人必须有足够多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外，还有一定的剩余，可以用于饲养家猪。这就意味着古人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已经足够高超，能够稳定地达到相当多的产量。因此，驯化野猪必然是在农业得到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此外，猪是一种杂食动物，对饲料的要求不高，这也是古人能够很早驯养猪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古人曾经进行过驯化野猪的活动，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地驯化。北方以贾湖遗址的家猪为代表，南方以稍晚一些的跨湖桥遗址的家猪为代表，似乎表明中华大地在距今8000年前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家猪饲养。

动物学家采集了很多黄河流域的古代猪的基因样本，分析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结果发现，黄河流域的古代猪可能是从单一的驯化中心起源的，考虑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家猪驯养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推断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包括贾湖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在距今8000多年前驯养家猪后，黄河流域兴起了养猪热潮，到距今6000多年前，家猪提供的肉食在古人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占到80%。

养猪是门大学问。北方古人在养猪方面的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从遗址中的猪骨分析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被宰杀的猪大概在半岁到一岁，古人急于吃掉小猪；到距今4500年前，被宰杀的猪都在一岁或者更大一些了。在当时的饲料条件下，养到一岁的家猪的产肉率是最高的，也就是饲料转化率高，而年幼的猪长肉太少，年长的猪长肉变慢，都程度不等地浪费了饲料。

那么，当时的家猪会与人类“争食”吗？它们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关信息。古人靠采集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谓的碳三植物，而靠种植获得的粟和黍等食物，是碳四植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处遗址中出

土了人骨和猪骨，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的人和猪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所以人和猪都是以粟、黍为食的。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黄米，喝小米和黄米酿造的酒；猪吃小米和黄米的谷壳，还有糟糠——酿酒剩下的残渣。

但是在长江流域，家猪并没有得到古人的追捧。虽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南方古人也开始饲养家猪，但他们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养猪，没有把养猪当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遗址中，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他们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获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来满足，或者捕捞河湖中的鱼类、贝类进食。在距今5500—5100年前的长江三峡一处遗址中，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双臂下面各放了一条大鱼，鱼长半米左右，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南方古人更为注重鱼类资源。饲养家猪，很可能也有丰富饮食的因素在里面，并不完全是因为肉食缺乏。

5000年以前古老中国“南鱼北猪”肉食格局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会结冰，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粮食产量上来了，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粮食没有太多剩余，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

不过“南鱼北猪”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

在远古时代，良渚文化其实是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是在南方水乡泽国的环境中一次“人定胜天”的史前时代大跃进。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种植水稻，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养活大量的人口，并饲养家猪作为肉食改善营养，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他们如此热衷于建设城池、房屋和水坝，是与他们神秘的信仰相关的。考古学家从良渚文化中能够感受到良渚古人有着较为狂热的信仰，他们不想建设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国”，而是梦想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信仰驱动着他们执意要超越自身的时代，登峰造极。

所以，良渚文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感。从良渚文化衰落后当地兴起的马桥文化来看，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复到了

良渚之前的文化状态，以捕鱼和打猎作为自己获得肉食的方式，他们几乎不再养猪，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良渚文化简单得多，就好像良渚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南方地区再现类似于良渚文化这样的“巅峰时刻”，恐怕要等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时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离良渚文化衰落已经过去了约1800年。

离开良渚，让我们放眼全球，进一步了解猪与人的不解之缘。对猪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古人与猪的故事可能比贾湖遗址的时代还要早。对亚洲各地家猪和野猪的基因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猪可能有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是在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被驯化的。然后，那里的猪分别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扩散，就这样进入了今天的中国境内。猪的扩散路线，与我们在上一章描述的现代智人进入中华大地的路线很相似，都是分别从沿海和内陆几路向北进发的。所以，中华大地上最初的驯化猪可能是由现代智人从东南亚带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全世界的野猪和家猪的差别并不大，彼此之间可以杂交。如果按照生物学的定义，严格来说，能够杂交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的动物，就不能算是两个物种。所以，家猪和野猪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下的亚种的区别，家猪只能算是不那么野的“野猪”。当现代智人带着驯化猪不断迁移的时候，他们的猪会跑到野外变回野猪，他们也会沿途捕捉野猪与驯化猪杂交，让野猪的野性减弱。如此复杂的杂交状况，让后世的生物学家很难说清家猪到底是在哪里被驯化的。虽然他们一般认为，世界上可能有6个家猪驯化地点，中国的长江流域和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家猪的进化过程有点儿符合第一章谈到的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总的来说，欧洲家猪是欧洲野猪驯化而来的，而亚洲家猪则是亚洲野猪驯化而来的。然而，例外的是，从中国广西发现的古猪的基因来看，它与欧洲的古猪比较接近，与亚洲的古猪关系较远。古人与猪的故事，真够混乱的。

让我们把关系混乱的猪放到一边，来看一看同样起源于中国、关系相对简单的另一种动物——狗。

狗是人类的好伙伴之一，它们显然是从自然界中的狼驯化而来的。这两种动物很相似，但从基因上分析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狗和狼都喜欢吃肉，给它们一块猪肉，它们会摇着尾巴愉快地吃掉；给它们一块土豆，狼会对这种食物不屑一顾，狗则仍然会把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吃下去。这并不是因为狼自视清高，不吃土豆，而是因为基因决定了它无法消化淀粉。

通过对狗和狼的全部基因组进行比较，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基因组中，至

少有三个与消化淀粉有关的基因，都是狼所没有的。其中一个基因负责合成一种能把淀粉分解成单糖的酶，没有这种酶，动物就无法消化淀粉。

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只有那些进化出了消化淀粉的基因的狼，才最终变成了狗。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揭示出人类与狗结缘的故事。

中外科学家找来了亚洲、非洲、欧洲的1500多只狗，对它们的基因进行检测，探寻狗的起源问题的答案。基因对比发现，狗这个物种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南部，时间大约在距今1.6万年前。这种特殊的狼可能是被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吸引到居住点附近，从而被古人俘获的。最早被驯养的狗并不是作为猎犬或是住所护卫，而是被古人当成了一种食物来源，那些最初的狗是用来吃的。

今天善良的狗主人们请不要对这个现象感到愤怒，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我们饥饿的祖先吃不饱肚子，提前夭折，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在地球上了。此后，当万年之前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开始兴起时，古人有了更多的植物性食物来喂养狗，因此那时就有更多的狗被古人吃掉了，也有更多的狗生活在地球上了。

考古学家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狗骨骼出土于河北中部，距今万年之前。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家狗的骨骼，个头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狗最早是食物的观点，古人选择饲养那些肉多的狗并吃掉它们。

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本地起源动物，狗在远古中国广泛分布，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分布在从东北地区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土地上。随着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狗的习性也变得越来越温顺，它们除了作为肉食，也有了看家护院的职责。狗在人类社会里的命运终于开始改变了。

农耕乐土，爱得我所

黍、粟、菽、稻、猪、狗……在新仙女木期的寒冷结束后，华夏祖先如同“开挂”了一般，在开启农业时代之初，出手就是一连串的“王炸”，迅速奠定了中华文明未来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底色。世界上没有任何面积等大的其他区域，在古代农业的规模和技术上能够与中华大地媲美。

这片农耕乐土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中华大地，要归功于天时、地利与人和谐的协奏。

所谓天时，就是“仰韶温暖期”，国际上的说法是“全新世大暖期”，由于这段时光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和夏文化时期的阶段，学者以“仰韶”来描述中国的这段温暖期，其实温暖期的时段远比仰韶文化时期漫长。熬过寒冷的祖先们遇到了一段长时间的温暖气候，可以让他们从容地积累和交流农业技术与农业物种。

在距今8000—3000年前的5000年里，全球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其间虽然偶有降温，但很快又会恢复和煦。而且中国是这次全球温暖期中升温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黄土高原、河北、青海、内蒙古、辽宁地区的植物孢粉沉积情况，气候学家判断距今8500—7200年前这些地区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2~4℃。之后的距今7200—6000年前是仰韶温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各地气候普遍暖湿，季风降水波及全国，植被生长空前繁茂。

所谓地利，就是适宜农耕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位于中国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其上覆盖着厚达百米的黄土层，厚厚的黄土是最近两三百万年由西风吹来的。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断了东南季风深入内陆，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地区变得干旱，这些地区又恰好位于北半球的西风带，因此西风把细小的沙尘吹向东方，在今天黄土高原的位置沉积下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黄土高原。

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这片高原对最初的一批华夏农民来说真是一块宝地。最开始的农耕是刀耕火种模式，农民开垦出一块地，耕种一年后休耕，换另外的地块种植，否则土地肥力会下降，土质会变差。而黄土高原的土壤只要保持好水土，就不存在肥力下降的麻烦。而且在仰韶温暖期开始的时候，气温比今天高，当时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很优越，大量植被覆盖地表，水土流失并不严重，非常适合黍、粟、菽这些旱地作物的连续种植。

所谓人和，就是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对工具的革新、对各种野生品种的驯化。前面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对于植物与动物资源的驯化，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整土地，使用石镰收割野生和驯化的农作物，使用石磨盘、石磨棒把采集的果实和收获的籽粒磨碎。这些工具是沿用自渔猎采集时代的用具。为了适应农耕的需要，他们对石器进行改进，比如制作出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他们还发明了新的挖土工具——耒耜。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华夏远古农民的重要工具。

天时地利人和，仰韶温暖期的各处遗址出土的大量粮窖告诉我们，祖先们的粮食越收越多了。他们不再像渔猎采集时代那样四处游走寻找食物，而是能够长久地定居，守住自己的一方水土惬意生活了。相对于渔猎采集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学者曾经估算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规模，这个区域大概包括今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陕西省的全部或大部分面积。距今8500—7000年前，也就是粟、黍等农作物和猪、狗刚刚被驯化不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大概只有20万~30万。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可能也已经比渔猎采集时代高一个数量级了。

到距今7000—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最为暖湿宜人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可能先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又逐步增加到200万左右，比起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在这个时期，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开始风靡中国北方。

在接下来的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旱地农业已经相当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再次翻番，可能达到了400万~700万的规模。到这个时期，似乎有来自几个方向的文化都向中原地区辐射。以东北方为基地的红山文化越过燕山山脉，向中原扩散；正北方向内蒙古中部的文化越过阴山山脉，向中原挺进；以西面的陕西为基地的仰韶文化越过黄河，向中原扩散……

这种文化汇聚的现象，让学者们不禁联想起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传说。不论上古传说与真实的远古文化有几分吻合，此时中国北方大地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就是——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的参与者，与其说是来自各方的人群，不如说是来自各方的远古文化。进入农耕时期后，大地上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大量的民众开始定居生活，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形成了许多繁荣的聚落。如果说农

耕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处于基因流动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的祖先更多地处于文化流动时代。逐鹿中原并不是携带不同基因的人群向中原汇聚，而是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向四周扩散，包括向中原扩散。这种扩散当然也是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的，但并不是像农业开始之前空旷大地上的人群迁徙，而是不同人群都有着相当多的人口，有着相当多的物产和文化产品，人群与人群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他们通过馈赠、贸易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技术，输入别人的文化和技术。

与北方地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各种文化逐鹿中原相对，南方地区似乎渐渐落在了后面。除了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这个特例外，南方地区整体上处于不温不火的缓慢发展之中，一副“小邦寡民”的模样。

在基因流动时代，南方曾是蓬勃发展的先行者，是携带不同基因的各种人群积蓄力量的摇篮、向北方扩张的始发站。进入农耕时期后，为什么南强北弱的势头出现了反转，变成了南弱北强呢？

答案可能要从地理环境中寻找。南方气温比北方高，自然环境中动植物资源丰富，遇到冰期受到的冲击也小，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南方更适合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生存。农业出现后，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粟、黍、菽等农作物构成的旱作农业发展起来后，南方相对于北方的生存优势就消失了。

即使手握驯化出的水稻，与拥有容易开垦的黄土土壤、大片可以耕种的平原的北方相比，南方的农耕也劣势明显，比如：土壤多为紧密的黏土，植被太多遮盖土地，在青铜时代到来前，用石制工具开垦南方田地比北方困难；山岭密集，河网纵横，分割了原本就不多的可耕种平地；降雨量大，容易出现洪涝灾害；缺乏连片农耕区做物质基础，南方孕育的文化在规模上无法与北方的文化相比；水稻田的高产对于农业技术的要求更高，从育苗到收获，南方农民需要掌握平整水塘、修建水渠、维护田埂等一系列技术……南方相对于北方的再度崛起，至少要等到公元后几百年了。

农耕时代的来临，从基因方面给古老人群带来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农业人口的基因逐渐占据了人类基因库的主流，凭借粮食养育的更多人口，原本狩猎采集者基因型一统天下的世界，转变为农民基因型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大众，狩猎采集者基因型越来越成为末流、小众。

其二是虽然农业人口增加了，但是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并没有相应增加，至少在农耕时代的早期如此。一旦从漫山遍野暴走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俯身默默耕耘的农民，大量古老人群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转转，除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村落

外，几乎不再与远方其他人群发生关系。这种不完全的“生殖隔离”意味着，在仰韶温暖期时代，不同区域的农耕人群基本保持着自身的基因型特色，大规模的人群间基因融合，还要稍等一段时间才会降临到中华大地。

而站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历史节点上，文化的初步融合远比基因的交流融合更为蓬勃。北方各路文化正纵横捭阖、群雄逐鹿，如同历史夜空中璀璨之群星。很快，来自北方的罡风即将呼啸而来，给中华大地制造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巨变，我们的祖先将走向下一个新时代。

小贴士 人类是如何开启农业的

在古代，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多大的土地？那要看他们靠什么方式获取食物。

依靠狩猎获得食物，每平方千米土地大概只能养活0.001~0.05人，也就是说，从事狩猎的五口之家需要100平方千米的“狩猎场”。依靠农业获得食物，中国古代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十亩地一头牛，可以养活五口之家。30亩地相当于0.02平方千米。也就是说，农业人群所需的土地只是狩猎人群的万分之二。农业让人类能够获得的粮食大大增加。

农业的确有优势，但远古人群未必愿意选择当一个农民。毕竟，狩猎和采集并不是特别艰苦的谋生方式，狩猎采集者不需要太辛苦劳作，也不用养太多的孩子做帮手，他们只要经常迁徙到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可以拥有不错的生活。一旦变成农民，就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养育比较多的孩子，辛勤工作，劳动成果还要受到干旱、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劳心劳力。

那么，为什么远古的一批人选择成为农民呢？他们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在某个时期，狩猎采集者丧失了迁徙生活的能力，或者为了某个目的放弃了迁徙生活。

距今1.2万年前左右，地球上经历了一次寒冷的新仙女木期，动植物资源都明显减少。在西亚地区，很多部落在寒风中难以长距离迁移，只能就地扎根，生产自救。当时西亚地中海沿岸有一个纳吐夫文化，这批古人反复尝试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希望从这些植物上收获籽粒补充自己短缺的粮食。随着寒冷的持续，他们每年都要驯化、种植野生麦类植物，这就是农业的开端，由龟缩在避寒地的古人们艰难地探索出了新的生产模式。

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处：西亚—北非、东亚、墨西哥—南美安第斯山区。这些地区的农业萌发地并不是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它们基本上是半湿润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在冰期来临食物短缺的压力下，相距万里的古人不约而同地从狩猎采集方式向培育动植物的方式转变，虽然播种之后需要等待收获，收获的粮食不多，而且营养也不如狩猎采集获得的食物，但至少收获量是基本稳定的，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这些坚强的古人熬过了寒冷的冰期，并在冰期之后迎来了海阔天空的农耕时代。

在亚洲西部，刚刚开始耕稼的农民们持续不断地同相邻的部落交换各种技

术、知识、种子和饲养牲畜的经验。短短数百年间，在当地各处水源充足的平原和山脚，农耕村落的数量不断增长，并且形成了各种改良的小麦、大麦和山羊、绵羊的聚集中心。许多其他种类的作物也被迅速纳入古人的驯化计划。各种扁豆开始作为补充性的作物出现，在条件适宜的地方，橄榄、葡萄、无花果和椰枣也成为对人类有价值的作物，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和香料也为人类的食物增添了多样性与营养。人类还从亚麻植物中提取出纤维，进行纺织。

放眼全球，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古人们驯化了粟、黍、菽和水稻；在美洲大陆，古人们驯化了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辣椒、向日葵、南瓜、蚕豆等。此外，古印度人驯化了棉花，东南亚古人驯化了芋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古人驯化了高粱、珍珠米、非洲米……

而且，一旦某种农作物被驯化出来，它就会被古人们快速扩散到远方适宜种植的地区，除非地理阻隔非常大。这是因为，在农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地球上大量尚未耕作的肥沃处女地，首次种植农作物的产量会非常高，但是如果连年种植，土壤就会肥力下降、板结难垦。所以，我们的农民祖先们会在一块地上种植一季农作物后，就跑到旁边还未耕种的另一块地上去种植，把前面种过的地撂荒在一旁。

因此，冰期过后最早的那批农民从事的可能并非纯定居农业，而是迁徙农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就有利于某种农作物快速传播到远方。他们还放火烧荒，把丛林烧掉，露出可以开垦的肥沃土地。据估计，早期农民人均耕地可能是现在农民的9倍。当然，那时候的农民人数非常少，但他们到处放火种地的行为，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很可能造成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次显著升高，到距今6000年前尤其如此。

有科学家猜测，冰期过后地球环境进入长达几千年的舒适的温暖期，一方面是自然原因使然，另一方面是人类放火开荒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上升，又反过来促进农作物增产。科学实验发现，在二氧化碳升高的时候，大量植物的产量都升高，其中野小麦和野大麦的产量上升得尤其高。这就形成了“正反馈”——古人选择了产量高的野生农作物进行驯化，他们的开荒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驯化农作物的产量。

听上去农业起源与扩张的过程令人欣喜，但其实农业也给古人带来了烦恼，比如疾病。

定居的农业群体极易受到病菌、细菌的感染，因为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经常迁徙，人们不得不同自己制造的各种废弃物密切接触，生活在更加肮脏的环境中。原本现代智人离开充满各种病菌的非洲热带地区，进入欧亚大陆气候宜人的温带地区时，他们受到病菌的危害减弱了，但是在他

们从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后，病菌危害又复燃起来。

再加上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他们与各种牲畜亲密接触，许多畜类疾病传播到了人的身上。比如基因研究表明，可能是长期以来对人类构成最为严重危害的病毒——天花，就是从阿拉伯骆驼身上传染给人类的。此外，还有各种流感、麻疹等，也都来自其他动物。

更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结核杆菌能够引发人类肺结核，这种传染病每年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丧命。基因研究表明，最早的结核杆菌可能在几万年前非洲诞生，不过当时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很小。今天流行的结核杆菌的共同祖先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正好是农业诞生的时间。甚至在地点上，结核杆菌从西亚的新月沃地诞生，随着早期农民的迁徙和交流，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人类农业社会的发展，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还促进了结核杆菌的快速传播。

第四章 草原之路——激发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

这是一座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米，同时代的良渚古城也只能排在这座古城的后面。

这是一座三重城址结构的古城，方形的城墙内外三层，将城市分成了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

这是一座建筑技术精湛的古城，城墙内实夯土，外砌石块，石砌墙体非常平整，连墩台拐角处都呈直角，堪称建筑杰作。

这是一座防御固若金汤的古城，城门结构复杂，包含内外两重拱卫城门的瓮城；城墙分布着凸出墙体的马面和角台，无死角地守护着城墙。

这就是石峁古城，4000年前屹立于今陕西北部神木境内。城池面积如此巨大且军事防御如此强大的古城，它的建造者是谁？它要防御谁的侵袭呢？

石峁疑云

石峁古城大概从距今4300年前开始建城，延续了300年后遭到毁弃。古城刚好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区域，向北是绿色的无垠草原，向南是黄色的松软土地。这座古城神秘地未见于史书之中，因此要探寻石峁文化的来龙去脉，只能依靠考古发掘。

石峁文化与中华大地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从其对玉器的推崇可见一斑。石峁遗址的城墙墙体里镶嵌着各种玉器，比如玉铲、玉璜等，这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恶作剧，而是建造者精心地把雕琢好的玉器成品插入垒砌石块的缝隙中。在石峁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玉器陪葬品。我们知道，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孕育了玉文化，早期他们把玉器作为与神灵沟通的物品，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到东南地带的良渚文化，崇玉的传统一直非常浓郁。石峁文化显然也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之中。

同时，石峁文化又充满了军事和暴力的色彩。他们把玉器镶嵌在城墙里，这确实表明他们对玉文化的崇敬，同时他们的目的也非常鲜明：借助玉请来神灵，保护自己的城墙稳固不破。此举有着强烈的军事防御的目的。

石峁遗址中已出土几处彩绘几何纹壁画，均发现于城墙或城门上，据此可以推断它们是用来装饰城墙的。这些壁画年代并不相同，可能为不同时代翻修城墙时所留下的。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彩绘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起稿是壁画绘画中的一种工艺，就是在正式作画之前的一种轻描的图案。此前国内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线的壁画是在唐代壁画里发现的。而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壁画，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绘制的。也就是说，这次发现一下子就把唐代先进的绘画技术的诞生时间往前推了几千年。

抛开艺术价值不谈，石峁古人为什么要在城墙上彩绘壁画？难道只是为了美化居所、赏心悦目吗？当然不是，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的功能是类似的，石峁古人通过壁画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这愿望可能也是与增强军事防御相关的。

更为可怕的发现是以人为祭祀品。考古学家在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灼烧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悲惨的死者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他们应该也是作为牺牲之用。石峁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献祭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

够保佑城池永固。

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粟、黍、菽这些旱地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石峁古城周边的农耕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支撑起了石峁文化的繁荣，让石峁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积累各种财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峁的财富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周边势力的觊觎，战争和侵扰可能比较频繁。那些被杀死作为牺牲的人，很有可能来自通过战争劫掠的人员。

坐拥石峁古城展现出的强大实力，石峁古人到底面对着什么威胁，令他们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墙内也寝食难安呢？

威胁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够和敢于突袭石峁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来自北方草原。

马：我从草原来

人类所驾驭的马属于家马，来自对自然界的野马的驯化。与上一章所说的狗的命运类似，远古人类一开始只是把马作为一种食物来源，他们要么采取集体围猎的方式捕杀野马为食，要么在其他猛兽杀死野马时集体出动，赶跑猛兽，夺取野马肉。

考古学家在中国山西北部的一处远古人类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野马骨骼，发现几万年前的北方祖先们就捕猎野马。在冰河时代，他们不仅具备了大规模捕猎野马群体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所选择地只捕猎壮年野马，因为壮年野马的脂肪和肉量比较多。

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古人在粮食充沛的日子里，偶尔捕捉到的小马也就不急于杀死吃掉，而是先养起来。久而久之，野马逐渐变成了家马。

最早的家马可能诞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点是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遗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饪器具，从中提取出马奶的成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十几个马颌骨，骨头上有缰绳造成的损伤。这些发现表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有了饲养家马的牧场，并且长期饮用马奶，用力气很大的马来帮忙干活。

所以，家马应该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一种普氏野马，在中国许多古人类遗址中都曾经出土这种野马的遗骸，范围从新疆西部到台湾海峡一带。考虑到普氏野马在历史上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欧亚草原史前人类的频繁活动，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早期的家马源自普氏野马。但是，古代家马与普氏野马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普氏野马与中国古代家马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远，并不是中国古代家马的祖先。中国古代家马的母系基因来源复杂，说明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很早的时代。追根溯源，中国家马的祖先应该也来自中亚地区。

当野马变成了家马时，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就被改写了，而且它们的地位比由狼驯化而来的狗高得多。马的牵引力和驮力可以帮助古人大量运输物品，提高了古人的迁移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马奔跑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它让人类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拥有了迅速到达远方的能力。一开始，人类可能还不善于骑马，也缺少骑马所需的固定身体的装备，但是至少他们是可以骑在马背上长距离迁徙的。

最晚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广泛采用骑马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向欧亚大陆草原带的四面八方扩散，甚至冲出草原地带，进入农耕人群的世界。比

如在家马刚刚出现不久的草原带西端的乌克兰地区，草原人群就开始与农耕人群交换他们的牲畜、兽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开始时不时地骑马突袭农耕社会的村镇，抢劫农耕人群的财物。

马、牛、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给远古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游牧。古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驯化的动物在草原上生活，脱离或者部分脱离农耕生活方式。所以，游牧其实是从农耕社会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古老的渔猎采集方式过渡来的。毕竟，驯化大型动物是以农耕社会的粮食积累为前提进行的。

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有大型动物的帮忙，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变得很广阔，达到方圆数百千米。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再到西亚和北非的草场，历史上大量的牧民是从事纯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华夏地区。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大地上，家马似乎是较晚且突然出现的。考古学家很早就发现，家马和马车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现，在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河南、陕西、山东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与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里面也发现了马的遗骸。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遗址中，极少出土马的遗骸。更早的远古时期的马的遗骸，主要是作为食物的野马，并非家马。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大地缺乏把家马逐步驯化的过程，以及马车由最初发明到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这再次证明，家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都不是在中华大地进行的，商朝晚期出现的家马和马车应该是从外界输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中华大地的范围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早接触到家马和马车。

比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当时这里的古人可能与周边频繁进行马匹的交流活动。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携带着家马和马车技术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内不断扩张，估计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扩张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区域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回答前面的问题：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谁？他们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将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论农耕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科人属现代智人种，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家马和马车技术并不会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人群自古以来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对家马和马车的技术垄断。

从晚商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各个人群在中原逐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战车，而家马和马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频繁了。农耕社会对于马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草原社会。

比如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4具家马的骨骼，它们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十分有趣。这4匹马的基因型都比较疏远，其中2匹马的基因与中亚和欧洲家马的基因相近。显然这不是有人骑着马一路从欧洲跑到了东亚，而是当时的人群在马的贸易上非常频繁，因此某个地方的马会被频繁转手，几代之后，某类马就出现在了数千千米之外的远方，它们所携带的基因也随之漂流。4匹家马来源不同，暗示西周与周边人群之间的马匹贸易以及其他贸易是很频繁的。

马的基因还告诉我们，这4匹马的毛色竟然都是枣红色，它们的外貌是单一的。显然，这几匹马的拥有者特地挑选了枣红色的马。西周时期上层贵族有繁多且严格的礼仪制度，他们在礼仪活动中可能对马匹的毛色有一定的追求，比如要求马匹都是某种颜色的。这可能就是4匹马的基因型不同但毛色一样的原因。

最迟到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已经全面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

青铜：远古王者的荣耀

地球表面的岩石在风化作用下会破碎，变成土壤，让植物从中吸收营养，让人类能够开垦农田，养活自己。其实，很多岩石里面含有各种金属元素，比如金、银、铜、铁、锡、铅、锌等。这些金属在自然界很少会以单质形式存在，往往会形成化合物，牢固地“镶嵌”在岩石中。

人类要想从岩石里提取和提纯这些金属，都需要借助火烧，利用冶金术来实现。人类用火制作陶器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他们会有意识地尝试用火烧各种东西，包括含有较多金属成分的岩石，在高温焙烧过程中，孔雀石这种矿石很容易被木炭氧化还原而熔炼成金属铜。这可能就是铜冶金术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看，西亚地区是人类冶金术出现最早的地区，那里诞生了最早的红铜制品。国外考古学家曾经统计西亚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及其制作年代，发现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其中，西亚最早的红铜制品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那时西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了。当时人们一般利用的是天然铜，如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出土的天然红铜钻、铜丝别针、孔雀石珠，伊朗中部锡亚尔克丘出土的红铜针等。距今8000—6000年前，西亚地区所见的金属除个别的铅、银和铁质外，基本为红铜，种类多是小件工具或装饰品，比如斧、钻、锥、珠、片、刀、铲、扣、管、凿、指环、手镯、印章、权杖头等，而且都使用了锻造技术。于是在这一时期，西亚的人类遗址里开始出现与铸造有关的物品，比如坩埚、炼渣、矿石及冶炼遗迹等。

砷铜是人类最早掌握的二元合金技术，砷铜技术和制品也是在西亚地区诞生的。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砷铜矿，容易冶炼。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砷铜在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诞生并风靡周边，冶金术向四周传播，紧邻东亚的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冶金术。

从红铜、砷铜冶炼再向前一步，就是青铜冶炼。青铜是在铜里面掺入了少量的铅和锡两种金属，从而大幅改善了铜制品的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熔点较低，硬度却较高，容易铸造成形。用青铜制作的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以及细节都能够被加工得凹凸有致、清晰细腻。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南部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主要是一些铜锡合金铸造的工具和武器。稍晚一些的距今5000年前左右，古埃及也出现了青铜器。青铜时代就此开启。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家马和马车技术的快速传播那样，青铜技术也快速向四周传播。

中华大地上出现青铜器的时间是很早的。在甘肃省中南部距今约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把保存完整的铜刀，长12.5厘米，采用范铸法制作而成。这把铜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铸件。很遗憾，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的青铜制品只此一把。因此，学者们怀疑这把铜刀并不是本地制造的。一种可能是，由于欧亚大陆上各个人群的频繁往来，这把铜刀从西亚、中亚被带到了中国西部；另一种可能是，当地古代人群偶然获得了质量非常好的含锡铜矿石，在冶炼的时候碰巧制成了这件青铜制品。不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古人还没有真正掌握青铜冶炼技术。

技术壁垒终会被打破。经过上千年的摸索和借鉴，中华大地蓬勃发展、独树一帜的青铜时代终于来临了。

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甘肃中东部为核心，辐射到青海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一带，存在强大的齐家文化，它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能够铸造出单耳或双耳的竖鋳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环首刀等工艺颇为复杂的铜器，特别是把青铜技术用于制作人体或服饰方面的装饰器件，拓展了铜器的应用领域。在齐家文化的早期，古人主要以打造红铜制品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技术也不断革新，到齐家文化的晚期，他们以制作锡青铜物品为主。当然，对齐家文化人群来说，青铜还属于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舍不得把青铜用于消耗量很大的远射程兵器如铜镞的制作上。

比齐家文化稍晚一点儿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则在青铜技术上更进一步。更为关键的是，二里头文化盘踞于中华大地的中原地区，周边矿产丰富，一旦它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术，它创造出的青铜文化就远胜于齐家文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华大地的青铜文化开始走出简单的拿来主义和模仿制作，迈向主动创造新技术的阶段，青铜时代的面貌脱胎换骨了。

二里头遗址地处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东部，背倚邙山，南望嵩岳，伊、洛二水从它的南面流过。这里在历史上被誉为“天下之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而二里头文化则是这块宝地脱颖而出的起始。

二里头文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技术创新就是复合范技术。在当时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大多数青铜器物是用锻造法或失蜡法制作的。所谓失蜡法，就是先把蜂蜡加工成想制作的青铜器的模型，然后内外包裹上泥，高温烘烤后，蜂蜡模型熔化流出，留下空壳，即为泥范，向里面浇灌金属溶液，冷却后就得到了青铜器。失蜡法比较简易，适合生产形状简单的青铜武器、饰品和工具，比如青铜刀具、箭镞或者犁铧，但是难以制作巨大、复杂的青铜器。

复合范技术则是一种复杂的青铜工艺，工匠们用泥制成一件内模和至少三件外范，组装后形成空腔，然后以铜汁灌入空腔中，冷却成形。这种方式可以生产出不规则的、形态各异的复杂器物，特别是巨大的青铜器。

在现代技术专家看来，用多块外范包围形成反转的空腔，需要敏锐的空间想象力，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设计与铸造工艺要融为一体，这必然需要规范化的工艺体系，实现制作过程的标准化、协作性和可控制。二里头文化已达到了一种类似于近代工业的技术与管理高度。

所以，考古学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掘出了丰富的青铜礼器。古人把先进的技术用于生产代表礼仪的器物，比如用于饮酒礼仪的青铜器。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出来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这说明在青铜技术传入中原之前，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饮酒礼仪，有了酒文化，他们可能先是用陶土来制作相关器物的，在青铜技术到来后，青铜以其珍贵和优良的材质取代了陶土。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除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一个青铜礼器群。但青铜毕竟是珍贵之物，底层民众无福享用，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文化上层贵族的墓葬中，作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朝建立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爵”就是酒器，使用的爵的数量和档次，代表了爵位即地位。

二里头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青铜兵器，包括青铜材质的戈、钺、斧和箭镞等。不过近战的戈、钺、斧只发现了4件，都没有开刃，所以它们只是制成了武器形状，本质上还是类似礼器的东西，不属于实用兵器。看来直到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的青铜尚未大规模用于武器制作。

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地处西北的齐家文化在时间段上有重合的时期，两者之间是有文化交流的。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或仿制品，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也现身于当时的甘肃地区。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齐家文化的器物，但人们有理由猜测，齐家文化可能对二里头文化有影响，双方可能存在冶金术方面的交流，比二里头文化略早兴起的齐家文化，也许会把一些青铜技术传给二里头文化，激发了后者的进一步创新。

那么，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又源自哪里呢？

放眼当时的全球，距今4000年前，全世界古代文明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不论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地中海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文明还是中华大地的华夏文明，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字产生并逐步系统化、各地的冶金术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肯定与同中亚

地区进行技术交流分不开。齐家文化肯定受到了全球文明变革的影响，那里的青铜技术显然来自更西方的世界。

至于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是通过新疆的前丝绸之路传输而来，也可能来自让石峁古人寝食难安的草原地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000多年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广泛分布着几个早期青铜文化，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以动物纹青铜饰件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冶炼与制作技术，这说明青铜技术在草原上得到了快速传播，被各个角落的草原人群掌握，他们也会在与周边的交往过程中把青铜技术再传播出去，甚至传播到草原带之外的区域。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制品看，中国北方草原带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中原地区早，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是受到了草原带的影响的。比如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此前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形，它其实是北方草原上流行的青铜战斧，在安柄方式上被改造造成了中原的样式。无独有偶，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它同样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器样式。沿着草原带向西追踪，西亚的伊朗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战斧，出现的时代比二里头文化早了几百年，甚至更早。

家马与马车以及青铜武器，在输入农耕社会之前，率先提升了草原人群的战斗能力。可以想见，当草原人群驾驶着马拉战车，挥舞着青铜战斧冲向石峁古人的领地时，威胁是非常巨大的，迫使石峁古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建造更加牢固的城池，抵御外敌突袭。

同时，中原及其周边以农耕为主的文化人群，也应该对草原人群有些许的感谢，正是草原人群沿着草原带把这珍贵的驯化动物和先进技术向东传播了过来，才使得中原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草原之路，西风在东方唱着交融之歌

一谈到古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我们会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遣张骞为使节联络西域的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往返，虽然没能实现结盟的目的，但是间接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史称“凿空西域”。古代中国与中亚乃至更西的地区通过贸易往来建立了联系，古代商人们沿着天山南北麓、昆仑山北麓的沙漠绿洲一站站行进，沟通了东西方世界。后人将这些贸易路线以中国古代的美丽手工品丝绸来命名，即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学者们默认，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着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仑山路线进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为推崇昆仑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和田玉，其产于昆仑山北麓，正所谓“玉出昆冈”。昆仑玉文化的影响，使得学者们默认的东西方交流路线经过新疆南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早期东西方的交流途经哪里，对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意义非凡。学者们一开始对于“丝绸之路”的默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困惑，比如彩陶的起源与传输。

最早一批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学者，是近现代来到中国考察指导、教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比如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本书第一章曾经谈到，周口店龙骨山最初出土的两颗北京人的牙齿，就是由安特生等人发掘出来的。但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时，更大的发现是仰韶文化。还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过的“仰韶温暖期”吗？几千年的温暖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业时代，而仰韶文化就是这段温暖期中最适宜生存的一段岁月。

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远古中国的遗址，仰韶文化人群善于制作精美的陶器，并用红色和黑色在陶器表面绘出绚丽多彩的几何纹或动物主题纹，尤以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鸟纹等最为常见。安特生和其他西方科学家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西亚古老文化彩陶，认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是外来文化带来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见长的先进农业人群，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儿“鸡同鸭讲”的尴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

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

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

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

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向周围扩散，最终形成了彩陶文化带。当然，彩陶文化输入世界各地后，也会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样式和纹饰。

矛盾产生了。按照世界彩陶传输的趋势看，彩陶应该是从西亚经中亚传输到中国的，方向自西向东，所以按说中国最西面的新疆应该最早出现彩陶，然后依次是甘肃、中原地区，但中国境内的彩陶传输的实际情况是自

东向西。

该如何解释这个彩陶传输方向的矛盾呢？

矛盾的症结，在于默认输入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的彩陶文化的确是受到西方彩陶的输入激发出来的，但彩陶文化进入中原腹地，最早并不是经过新疆、甘肃而来的，而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即从中亚北部沿着草原带向东，然后从蒙古高原南下，越过内蒙古的阴山山脉抵达中原。这条路线虽然看上去比中亚直接经过新疆、甘肃到中原的路线绕远，但是在古代，草原之路更容易行进，从中亚到中原的时间更短，成本也更低。

通过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它的远古时代名称往往是“绿洲之路”或“前丝绸之路”，要翻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魏晋时期的高僧法显、唐朝的高僧玄奘都描写了他们走“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辛，简直是九死一生。旅者还要穿过广袤的沙漠边缘地带，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小心地在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绿洲间跋涉。

草原之路相对容易得多，草原带地势和缓，没有广阔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阻挡，只有一些不算很高的山脉需要穿越，山脉有若干低海拔的山口供旅者们愉快地穿过，草原上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便于补给。在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被驯化后，草原之路就更加容易通过了。从草原带南下中原地区，其实没有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难。

本书第二章谈到我们的“草原狩猎族”祖先沿着草原带东进时，正是一段温暖期，证据之一就是内蒙古西部居延海的水位变化。居延海北接草原，南邻黄土高原，附近水草还算丰美。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额济纳河从青海祁连山发源，从南向北流经甘肃，进入内蒙古西部，最终注入居延海。额济纳河又称黑河，古代称黑水、弱水。与中国很多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自西向东“纬向”流淌不同，额济纳河是一条“经向河流”，顺着南北方向也就是经线方向流淌，沟通了青藏高原北缘、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草原地区。额济纳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一条南北方向的重要通道，直到环境恶化，居延海彻底消失。

如果我们纠正了彩陶文化传输路线，那么前面谈到的矛盾就解决了。以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彩陶文化向东经过草原带输入中国的腹地，然后再从中原地区向周围扩散，包括向甘肃、新疆的西面扩散。

搞清楚了彩陶文化的传输路线，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青铜技术的西来。铜冶炼术在西亚诞生后，扩散方式几乎与彩陶文化是一样的。学者们曾经制作

古代世界青铜技术分布图，青铜技术依次出现的地区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最后是古代中国。显然，距离铜冶炼术和青铜技术起源地越远，就越晚出现这些技术。

从中国青铜技术的分布情况看，最早的铜器和冶炼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带和东部山东地区（考古学家称为海岱地区）。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铜器数量以西北地区最多，发现铜器数以千计；次之是中原地区，比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数百件铜器；然后是北方草原带如内蒙古地区，而海岱地区发现的铜器数量最少。总之，中国早期铜器整体上看从西向东越来越少。

但是，在西部地区存在着铜器和青铜技术从东向西传输的一些迹象。比如在甘肃，东部的铜器年代较早，西部的铜器年代较晚，青铜技术有从甘肃东部向西部传输甚至再传输到新疆东部的现象。因此学者猜测，青铜技术应该是从草原带先进入中国北方草原，然后向南传入中国甘肃东部，再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开来的。青铜技术与彩陶进入中国并扩散的方式很相似。

远古东西方的交流是漫长的，借用今天计算机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彩陶技术与青铜技术的传入很像是“断点续传”，可能存在多次传入的情况。比如，彩陶技术在距今8000年前诞生后，可能只用了700年的时间就第一次传入了中华大地，但是那时的彩陶样式和后来的彩陶样式有很大不同，都与西方不同时期的彩陶技术有联系，所以后来应该还有东西方彩陶技术交流的情况发生。数千年中，青铜技术从草原带向南的传输可能更为频繁。

另一种从草原带传入中国的物品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热带海贝。

在二里头遗址里出土了一些海贝，主要随葬在贵族的墓穴中。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穿系起来，戴于颈上和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海贝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而在上层阶级中使用的，这种习惯至少延续到了商朝，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王赏赐某某贵族多少海贝，作为完成某工程的经费和酬劳。起初学者们以为，这些海贝应该来自中国的近海，从东面沿海的东夷部落传到了中原地区。对海贝种类的鉴定，却揭示这些海贝属于暖水品种，它们的故乡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它们绝对不会生活在古代中国东海以北的沿海。

这些海贝是如何来到中原的呢？它们在印度洋沿海被捕捞上来后，通过贸易向北输入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欧亚草原带的接力，再向南抵达中原地区。生活在南方大洋的海贝，竟然兜了一个大圈子，从北方输入进来。后来，当中原地区用青铜钱币逐步取代了海贝时，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中仍然流行使用海贝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和鲜卑人。

彩陶、青铜、海贝……中国古人的生活因这些来自西方、南方的技术和物产而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但草原之路输送给中华大地最重要的东西，也许并不是这些光彩夺目的玩意儿，而是……

小麦：后来而居上

中国北方地区传统上以面食作为主食，山西、河南、陕西几省都有各自的特色面食。面食的原材料是用小麦研磨出的面粉，至少在2000多年中，小麦已是北方地区当之无愧的粮食之首。在上一章我们知道，史前时代中华大地本土的粮食作物是北方的粟、黍加上南方的水稻，而且南方的水稻还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北进，一度在北方地区也颇有种植。

那么，小麦是如何后来居上，击退北进的水稻，扳倒粟的地位，跃居北方粮食之首的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小麦是如何“后来”的。

小麦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西亚、西亚、西亚……为什么我们一谈到外来的某个技术和物产，往往就是来自那里呢？根本原因在于，西亚是人类农业的起源地，农业革命的烽火是从西亚点燃的，进而引爆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革命，传播到全球。

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年代为距今1万年前，第一批栽培小麦有两个品种，古人先是驯化出了一粒小麦，它又与一种山羊草杂交，产生了二粒小麦，两者都不是我们现在享用的小麦。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原一带，与当地野生的粗山羊草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栽培小麦品种——六倍体小麦，这就是今天全世界人民广泛种植的小麦品种，覆盖了小麦种植区95%的面积，也被称为普通小麦或者面包小麦。“六倍体”，是指这种小麦基因组是由三套（六条）相似而又不同的基因组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我们人类自己的基因组可以看成“二倍体”，由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组构成。

六倍体小麦的出现，简直是远古时代一次重大的“基因工程”，好吃又高产的小麦让古人如获至宝，迅速普及。几大古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等，它们的出现和繁荣全都是建立在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小麦都堪称世界第一粮食作物。

如果用且只用一种物品来代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很多学者认为，那只能是小麦，得小麦者得文明。

早在距今7000年前，小麦的脚步就已经向东抵达了中亚地区，比如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脉北麓当时就种植了小麦。但是此后，小麦向东的

脚步竟然停下来了，这一停就是几千年的时光，东亚地区迟迟没有投下小麦的情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地理阻隔让小麦无法光临中华大地，还是我们的祖先只愿意吃小米和黄米，拒绝吃小麦饭？

根本原因在于，小麦的植物特性让东亚农民头疼不已。

小麦的起源地在西亚，在地中海气候区域。学过中学地理的读者会知道，地中海气候是一种很古怪的气候，绝大多数气候都是冬季寒冷少雨，夏季温暖多雨，但是地中海气候的降雨相反，冬季阴冷多雨，夏季炎热干燥，降雨时节主要在冬春两季，也就是说，在那里，小麦冬季播种，夏季收获。

中国北方地区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南方地区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特点是雨热同期，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集中在夏季。“春雨贵如油”，在小麦最需要水的春季，中国却刚好处于少雨的季节，不利于小麦生长；在小麦要收获的夏季，大量的雨水又不利于小麦成熟和收割。

正是小麦生长周期与中国本土气候的不合拍，阻碍了小麦东进的步伐，小麦因此迟迟不能进入中华大地。

小麦毕竟也算是一种旱地作物，因此相比水稻，还是更加适应中国北方的干旱环境的。至于春季缺水的问题，可以通过开春时人工浇水解决。小麦在中亚“休息”了近3000年后，终于迈开脚步，走向了东亚。小麦的传入，使得我们的祖先开启了本土灌溉农业的历史，甚至要通过大规模兴建水利设施满足小麦的“喝水”需求。

小麦何时传入中国？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和古人记载确定时间，但是首先，我们要把中国的阿尔泰山区单独列出来讲述。

由于阿尔泰山区临近中亚，所以那里的小麦、裸大麦（青稞）的种植时间非常早。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区的通天洞遗址里找到了炭化的植物种子，分析后发现，里面有小麦和裸大麦，年代在距今5200年前。由于阿尔泰山区所处的纬度比大部分中亚地区都更高，因此光照更短、气温更低，种植小麦也需要经过物种改良。生物学家推测，小麦在传入该地区后，又与当地的野生大麦进行了杂交，从而获得了能够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繁茂生长的重要基因，小麦才终于实现了本地驯化，成为当地的重要农作物。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中国的国境线来看，小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传入了新疆北部。那么，小麦何时才越过西北地区的荒漠与山川，进入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呢？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来”和“麦”这两个字，应该都是指麦类作物，当时古人可能用前者表示小麦，后者表示大麦。而在《左传》中，也有“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的话，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选择立谁当国君的故事，周子的哥哥因为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言外之意是没有生活常识），不能被立为国君，因此要选择周子来当国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麦子在北方的大邦晋国已经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普通人都应该认识。

从这些文献记载分析，在距今3000多年前，小麦肯定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人所熟悉了。因此，小麦最早传入的时间，还要再向远古上推，这就需要考古发现来帮忙确定了。

目前中国北方出土小麦遗存最早的地点在山东胶州，只出土了一颗，通过碳十四测年，那颗小麦的年代为距今4450年前。可是胶州地区向东南方就是东海，属于中国沿海地区，从地理位置看，那里比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离中亚更遥远。因此，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目前发现的最早小麦遗存会出现在山东沿海，而不是中原地区或者西北地区。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小麦种植了，只是种植量少，各地很难留下遗存，刚好胶州留下了遗存。小麦作为植物，是一种有机物，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又或许，那颗小麦的年代等信息有问题。

从时间上看，欧亚草原带东部在距今5000多年前接受了小麦这种农作物，作为草原上畜牧生活的一种粮食补充。这个时间应该早于南方的中原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小麦向中华大地的行进路线上，欧亚草原带是重要的中途站点。小麦从中亚向北先传入阿尔泰山区，进而扩散到欧亚草原带的东部，之后南下到中原与草原交界的北方山区，比如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一线，最后翻越山区进入中原地区。

抛开胶州那颗有疑问的小麦不谈，距今4000年前或稍晚一点儿，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小麦的踪迹。其中在青海、甘肃和新疆东部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小麦，年代测定结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因此，从小麦东传的路线上讲，草原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而新疆也许是另一条小麦输入路线上的站点。

小麦是农作物，它更容易在从事农业的人群中扩散。相比家马与马车技术、青铜技术受到草原人群的追捧，小麦更受新疆南部的绿洲人群的青睐，每一个小绿洲都是一处农业的田园，期盼优良农作物来提高产量。从中亚出发，只要小麦能够成功越过帕米尔高原，就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盆地内部虽然是沙漠，但是南北两侧分布着一连串的绿洲。小麦继续沿着绿洲一站站向东，进入甘肃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再向东，就抵达了中原地区。这样的路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

一旦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地区，小麦就邂逅我们那些擅长农耕的祖先和广阔的易开垦耕地，中华大地很快迎来了小麦的时代。小麦“反客为主”“后来居上”的大戏正式上演，比如在有着“八百里秦川”美誉的关中平原。

渭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流过，向东注入黄河，渭河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那里地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壤松软，渭河及其小支流的充沛水量给灌溉提供了保障。关中平原是北方地区一块重要的农耕区。

早在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关中平原上的古人就从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了旱地农业。当然，在仰韶文化时代，关中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此外，南方的农作物水稻竟然也在这一地区“才露尖尖角”，有所种植。在陕西渭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稻米颗粒占了所发现粮食颗粒总量的1/4，可见水稻也是当地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仰韶温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水稻北进到关中平原的幕后功臣。

不过在距今37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虽然已经出现，但出土颗粒只占粮食颗粒总量的不到1%，只能算是当时古人的一种“零食”。几百年后，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颗粒已经占据粮食颗粒总量的10%~20%，仅次于粟和黍，坐上了粮食作物的第三把交椅。到西周时期，在北方地区出土的小麦颗粒数量和出土比例已经仅次于粟，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稳坐粮食作物的第二把交椅。到东周时期，小麦的种植在有些地区已经成功反超了本土的粟，比如前文所说的渭南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小麦遗存，而且数量惊人，小麦颗粒占了出土粮食颗粒总量的80%以上。

伴随着小麦“攻城略地”，水稻在关中平原则逐渐败退。水稻种植需水量大，它能够一度进入北方地区，凭借的是比粟和黍更高的产量。现在小麦的产量可以与水稻相提并论，而且需水量少于水稻，更适合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也就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退守南方地区了。

终于，到秦汉时期，小麦坐稳了北方粮食作物的第一把交椅，中国古代粮食格局从“南稻北粟”转变为“南稻北麦”，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绵羊和黄牛：我们是来做牺牲的

在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前夜，有两种重要的动物携手与小麦一同来到了中华大地，它们就是绵羊和黄牛。

驯化的家绵羊最早出现在西亚，又是西亚！人们简直要怀疑，1万年前是不是有外星人降临西亚，教给了远古人类开采矿产和驯养动物的外星科技？制造出如此科幻剧情的当然不是外星人，而是农业革命。

就在农业刚刚诞生的距今1万年前，家绵羊诞生于西亚地区。从世界各地的家绵羊基因型分析，家绵羊的演化可能出现了不止一次驯化事件。或者说，在西亚首先驯化了家绵羊后，它与野生品种也曾经有过若干次基因交流，并持续被人类驯化。其中的一个家绵羊基因型，在东亚绵羊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自东向西在绵羊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因此，科学家推测，家绵羊在东亚也发生过一次驯化事件。这个家绵羊基因型与西亚的家绵羊基因型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最早的家绵羊骨骼出土地点，可能要算前面刚刚谈到的阿尔泰山区通天洞遗址了，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绵羊骨骼，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结合发现的小麦颗粒，我们可以猜测，距今5200年前早期的草原人群是通过混业生存的，农业、畜牧业、狩猎与采集并举，以适应草原和山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然后，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家绵羊骨骼。到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出土了家绵羊的骨骼。所以，中国家绵羊的扩散可能是从西向东的，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古人把西亚的家绵羊带到了中国境内，然后在本地，远道而来的家绵羊与这里的野绵羊杂交，并经过驯化，形成了东亚的家绵羊类型。

距今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绵羊就已经以这种东亚家绵羊类型为主体了，只有少量家绵羊是西亚类型的。从甘肃、新疆等地考古发现的家绵羊骨骼分析，西亚的家绵羊可能与彩陶技术、青铜技术类似，也是从欧亚草原带传输过来的。

说完了羊，我们再来聊聊牛。驯化的黄牛最早也出现在西亚吗？这个答案只能算半对。

在我们祖先的家牛分类学中，黄牛是指牦牛、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个种类。普通牛的驯化的确发生在西亚，时间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出现得非常早。瘤牛这个种类一般认为是在南亚的印度

河河谷被驯化的，时间上比普通牛的驯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顺便说一句，“高原之舟”牦牛是在中亚被驯化的，时间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驯化。

另外，近期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了距今万年以前的牛的骨骼，牛的牙齿、颌骨上有凹槽，似乎是驯化造成的。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那么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一处黄牛的起源地，而且时间上不比西亚晚。不过，牙齿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许有其他解释，不一定是驯化造成的。考虑到西亚是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人口暴增，粮食剩余充足，具备驯养大型动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现在学者们仍然秉持“西亚是黄牛最早的驯化地”的观点。

抛开这个存疑的起源地不谈，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毕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草原人群对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经验丰富。利用化学元素进行的食性分析，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家养黄牛以吃碳四类植物为主，也就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粟和黍，也许古人用打下来的粟和黍的茎叶来喂养黄牛。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青海、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DNA分析，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不属于瘤牛，这说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这说明东北亚也发生过黄牛的驯化事件，类似于家绵羊来到东亚后又经历的驯化事件。

与家绵羊有所不同的是，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驯化后，在南亚、东南亚传播，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再继续扩散。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

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

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

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

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

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

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能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能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

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一趋势。

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

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境，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

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

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变的气候原因，猜测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北向移动导致了中华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放眼全球，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经历气候巨变。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国在奴隶大起义的动荡中走向了终点。不过，学者们最近提出了古王国灭亡的新视角。他们找来了那个时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细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树木年轮痕迹，发现当时的气候极端异常，有强烈且短暂的干旱期。干旱带来的粮食减产给古埃及统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局势最终失控了。

在西亚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对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层中发现了那个时期气候严重干旱的证据，甚至连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过去学者认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但是气候学家发现，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气候波动导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稳定。

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气候经历了如此巨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远古中国先期进入文明古国阶段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中华大地却在气候打击下凤凰涅槃，中原地区迈入了文明古国阶段。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

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 “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在“城市”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戴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3900年前，与陕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

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

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1%~2%，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儿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

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贝格曼31岁，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当然，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

沉睡在沙漠墓葬中的“微笑公主”无言无语，但她以及那些一同躺在小河墓地的大量干尸的基因，将为后人拂去历史的尘沙，展现西域几千年间的人类迁徙历史。

“小河公主”的复杂血统

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人，当他于1927年从考古学专业毕业，来到中国，加入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的瑞典前辈安特生不仅已经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还在前一年刚刚向世界公布发现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牙齿，早已声名鹊起。

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附近发现了“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群，贝格曼随口用旁边流淌的小河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小河墓地”，那里正是“微笑公主”安眠之所。

跨越几千年的一瞥，竟然成为永别。由于当时中国局势动荡，贝格曼带着少量文物离开了小河墓地，再也没有返回。“微笑公主”惊世一现后，就隐藏在漫漫黄沙之中，消失了踪影。

苦苦寻觅60多年后，2000年，小河墓地终于又重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她头戴尖顶毡帽，微闭双眸，穿越岁月的长长睫毛固守着她的美貌。人们称呼她为“小河公主”，与贝格曼描写的“微笑公主”相对应。

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的数据，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3540年前，这很可能意味着“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对这一早期人群进行基因分析，应该能揭开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一段历史。

基因分析表明，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基因既有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也有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基因，但这并不代表早在近4000年前东方人群和西方人群在罗布泊相遇并融合在一起了。从更详细的基因类型看，故事应该这样讲述：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他们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一带，与西部的人群先是在欧亚草原带上相遇，人群发生融合，地点可能在西伯利亚南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一带；然后，这批混血人群向南迁移，有一支进入了罗布泊地区，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就是“小河公主”族群的来历。所以，他们可能是来自西北方、北方的畜牧人群的后代。

此外，小河墓地人群还携带少量南亚地区、中亚伊朗地区的基因，一种解释是一批南亚人群通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继续东进，来到罗布泊地区。这条路线比较艰苦，因此另一种解释也许更为合理：一些南亚人群的基因首先融入欧亚草原带的人群，然后从哈萨克斯坦

草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北疆草原，再翻过天山进入罗布泊地区。

小河墓地人群的来源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融入了更多不同来源的人。在早期，小河墓地人群的基因型多样性较低，比如某个母系遗传基因型在整个群体中就大约占了50%，包括一个被祭祀的泥棺中的女尸，其基因即属于这个类型，这说明她的地位较高，很可能生养了很多子女。也许最初迁徙来的那批人群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家族，女性成员的血缘都比较亲密。不过这个基因型在后期的比例迅速下降，也没有了泥棺的现象，这说明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女性来源越来越复杂了。

然而，小河墓地人群的父亲系基因型却是另一番景象，普遍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而且早期和晚期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或者极少接受外来的男性成员，而是不断接纳外界的女性成员。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女性成员可能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从周边娶过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也有很多罗布泊女性外嫁到周边去。

小河墓地人群保留了很多来自草原的文化元素。比如他们的墓地放置许多牛头、公羊角，墓内随葬公牛角和公羊角，有的墓中多达26个，木棺用整张牛皮或羊皮覆盖，显然这些墓主人生前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小河墓地里没有发现陶器，但是临近同类人群的遗址中出土了尖底草篓，风格上与一种草原上流行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

小河墓地人群以小麦作为随葬品之一，这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小麦的遗址之一。此外，墓地里还出土了粟和黍的籽粒。这样东西合璧风格的农作物组合，最早很可能是在草原之路上出现的。因此，也许小河墓地人群的祖辈通过草原之路的东西交流，获得了东西方的不同农作物，然后南下的时候也将它们都随身携带到了罗布泊地区。

更有趣的发现是牛奶。在随葬草篓以及墓主人的衣物、皮肤上面，人们发现了乳白色的浆状物质残留。通过蛋白质分析可以确定，这种物质是牛奶制品，这说明牛奶作为畜牧业的副产品，已经成为小河墓地人群食谱中重要的一部分。欧亚大陆西部人群拥有能够消化牛奶的乳糖酶基因，而欧亚大陆东部人群缺乏这种基因，“小河公主”和她的族群普遍食用牛奶的现象，再次把他们与欧亚大陆西部人群联系了起来，小河墓地人群拥有的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可能让他们能够消化乳糖，因此可以畅饮牛奶。

不论是基因分析还是文化比较，小河墓地人群的族源都指向了欧亚草原带，都指向了一支古老的草原人群——克尔木齐文化人群。

人类最早的农业诞生于西亚，畜牧业是在农业有了剩余粮食喂养驯化的动物后出现的。一部分农民携带着驯养的动物走向广阔的草原，他们变成了

牧民，专门从事畜牧，与专门从事农耕的农民形成了劳动分工。毫不奇怪，整个欧亚草原带上率先崛起的草原文化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因为那里靠近农业的诞生地，农民与牧民的劳动分工也更早出现。

距今5600年前，在草原带西部，大概在今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诞生了颜那亚文化，这批草原人群掌握了青铜技术，驯化了家马，很可能发明了车轮。他们的一个突出文化特点是竖穴墓，就是从地面直接向下挖出墓室，埋葬死者。从基因型上看，颜那亚人群和后来草原带上的各种游牧人群，都携带了与其周边农耕人群有关的基因成分，这说明他们确是从农耕人群中分化出来的。

从基因研究看，距今4000多年前，颜那亚人群后裔已经扩散到欧亚草原带东部。例如，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古人遗骸上，就检测到了欧亚草原带西部基因成分，而在颜那亚人群之后活跃在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人群，也已经携带了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人群的基因，这说明东西草原带间的人群基因交流很早就开启了。

更有趣的是，在贝加尔湖地区距今4500年前的古人遗骸上，分子生物学家还检测到了一种古老的鼠疫杆菌基因信息，而这种鼠疫杆菌最早应该出现在西方的颜那亚人群中，然后随着这一人群的扩散而传播到广大的地区。不过，检测出鼠疫杆菌的这两个贝加尔湖古人却并不携带颜那亚人群的独特基因，我们可以猜测，也许鼠疫杆菌“先行一步”，通过不同人群间的相互感染，比颜那亚人群基因更早传播到了欧亚草原带东部。

就在绵延万里的草原带风云际会的时代，克尔木齐文化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附近诞生了。

从人群基因交流的角度说，克尔木齐人应该不仅继承了源自颜那亚人群的西方基因，而且融入了来自东方的基因，比如西伯利亚古人的基因。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小河墓地人群也拥有复杂的基因型了，因为他们的祖辈克尔木齐人早已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血脉。

克尔木齐人主要活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北疆草原上，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考古学家发现，克尔木齐人善于用石头雕琢冶炼青铜的坩埚，在新疆奇台县一处克尔木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坩埚口径近20厘米，高近40厘米，并有圆形的长柄。这口石坩埚的样式竟然与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口商朝陶坩埚——“将军盔”如出一辙。两者的差别之一是材料，安阳坩埚用陶土烧造，而奇台县的坩埚用石头雕琢；差别之二是年代，安阳陶坩埚的年代比2000多千米之外的那口石坩埚晚了好几百。由于商朝的冶金术很先进，并没有经历自然红铜冶炼阶段，因此其青铜冶炼术应该来自西亚，通过欧亚草原带传入中原地区。克尔木齐人

的这口石坩埚，佐证了青铜技术从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草原蝴蝶舞动毁灭的双翅

融贯东西方的克尔木齐人在北疆草原称霸没多久，欧亚草原带上风云突变，在克尔木齐文化西面兴起了一股驾驶双轮马车征战的强大势力，他们向东挺进，对克尔木齐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在克尔木齐文化北方，也有一群手持单钩长矛和空首铜斧的强大势力兴起，向南扩张。克尔木齐人难以抵挡多方强敌的压力，不得不避其锋芒，向南、向东迁移，其中一支越过东天山，南下到达罗布泊地区，这就是小河墓地人群的来历。

那个手持长矛与铜斧驱赶了克尔木齐人群的亚洲北部势力，就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最早活跃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名字来源于最早发现这种文化的村庄名。关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要多介绍几句，这个盆地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靠近中国的新疆与蒙古国的西北边境，盆地内分布着山地、丘陵、草原、山谷等不同的地貌，拥有丰富的森林、水、岩石矿产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其易守难攻，因此外界的战事对当地人群的侵扰较小。在青铜时代，这里是一些重要的草原文化人群的摇篮。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还与遥远的中原地区发生过文化联系。

作为欧亚草原带的一员，奥库涅夫人群的基因型也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基因。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业，兼营捕鱼和狩猎。奥库涅夫人群能够压制克尔木齐人群，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青铜技术更加先进。他们采用先进的锡青铜铸造技术，红铜斧也采用铸造工艺，使得他们的单钩矛头和空首铜斧锋利无比。

奥库涅夫人群的精良武器是当时各路人马梦寐以求的宝物，所以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发现过这种风格的武器。阿尔泰山一带自不必说，向西在欧洲与亚洲交界的乌拉尔山的墓地中就发现了4件奥库涅夫长矛，向东在中国甘肃西部的马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2件长矛。在甘肃稍晚的一些文化，比如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空首铜斧。

广泛分布的奥库涅夫武器并不代表奥库涅夫人群南征北战，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他们还没有强大到那个程度。实际上，不论是克尔木齐人群还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在试图向中华大地腹地东进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大对手的顽强抵抗。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四坝文化人群。

四坝文化活跃在距今3900—3500年前的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一带，向东毗邻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再向东就是以二里头文化为首的中原各文化。

四坝文化人群应该是后来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族群——羌人的主要祖先，从基因型来讲，他们应该以东亚人群为主体。由于更加靠近草原带和中亚，这批古羌人部落接触青铜文化非常早，从草原带输送而来的各种动植物资源，也被他们广泛种植和驯养。在西北地区干旱的环境中，古羌人部落种植大麦和小麦，放牧山羊、绵羊、牛、马。四坝文化人群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武器技术，拥有透釜斧、有釜矛和三叉护手剑等青铜武器，他们的很多武器能够在草原带上找到原型。有趣的是，他们的文化中还有权杖头这种器物，这是典型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元素，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文明就广泛使用权杖头，西亚等地也流行这种器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权利杖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遗址中。权杖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分布呈现出东早西晚的特点，新疆地区权杖头的出现时间晚于甘肃地区，这种器物显然是西方起源的，这再次说明很多西方物产、技术、文化都是顺着草原带向东传输，然后再从蒙古高原南下进入中华大地的。

正是古羌人部落盘踞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一带，向西势力范围抵达哈密盆地，顽强地抵御了以克尔木齐文化、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部落的东进，使得融合东西方基因型的西域强大势力只能停顿于新疆，驻足不前，否则，也许中华大地上的很多文化人群会更多地融入欧亚大陆草原带西部人群的基因。

但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风起云涌，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已经成为强势人群的标准配备，一拨又一拨的草原部族策马飞奔，激烈地争夺地盘和财富，中华大地树欲静而风不止。

距今约3400年前，米努辛斯克盆地内又孕育了一支强大的草原族群——卡拉苏克人群。卡拉苏克人兴起后向相对温暖的南方扩张，从而进入了中国新疆北部草原，成为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力量。从基因型上看，卡拉苏克人群既有草原带西部人群基因，也有南西伯利亚原住民人群基因。卡拉苏克文化的最神奇之处在于，它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商朝有技术和文化交流。曲柄青铜刀是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配备，这种器物与中国北方流行的一些款式很相似；卡拉苏克人使用的陶器风格也与中国北方的流行风格相似。

通过对青铜器演变分析发现，以米努辛斯克盆地根据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中原地区有过交流，卡拉苏克人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弓形器等，都受到了中国北方的影响。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瓮，这种器物最早出现在中国山西中部。反过来看，中国北方地区的很多兽首风格的刀剑可能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相距数千千米的草原强权和中原强权之间会如此“眉目传情”？

卡拉苏克文化纵横草原五六百年，时间跨度涵盖了商朝的大部分时期和周朝早期。在青铜时代，青铜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当时的战略物资。相对来说，商朝地处中原，拥有东亚其他势力无可比拟的青铜矿产资源和青铜产量，以及无与伦比的冶炼技术。一个强大的草原强权很自然地会希望“抱大腿”，结交商朝这样的“科技大国”和“资源大国”，希望从商朝那里获得青铜器和青铜技术，哪怕两者相距数千千米。更何况，商朝族群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他们与北方地区乃至草原带有很深的渊源。

吊诡的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强盛，竟然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卡拉苏克人能够与商朝人互相交流，这意味着两个政权之间的空间里已经填充了足够多的族群，他们充当了远距离文化交流的接力手。不论是中国北方地区还是蒙古高原上，都有许多族群生活，他们彼此之间或战或和。卡拉苏克人扩张，势必引发一轮族群大混战和大迁徙。

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第一张骨牌，就会引发一连串骨牌倒下。当卡拉苏克人驾驶着战车向南、向东挺进时，原本生活在北疆草原的那些阿尔泰部落在压力下往东南方向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又挤压了盘踞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的古羌人部落；古羌人部落又把这种压力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导，影响了甘肃东部和陕西的各个族群。在那些族群中，有一支就是周人。

史书记载，周人早期生活在“戎狄之间”。按照商朝人对外部族群的定义，西边的族群曰戎，北边的族群曰狄，周人恰好就位于西北方向上，最初可能活跃于甘肃东部到陕西西部一带。史书还记载，周人的早期首领古公亶父因为族群受到戎狄各族群的威逼，率领部众从豳这个地方向东南迁徙到岐山下的原野，这就是所谓的亶父迁岐事件，从此周人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在岐山下的周原逐渐壮大自己。再然后，周人挥师东进，在商朝因为与东夷作战而耗尽精力、后方空虚之时，周人带着与戎狄交往而获得的青铜武器、马拉战车，偷袭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竟然一战定江山，消灭了强大的商朝，以“小邦”克“大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朝代。

史书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族群大迁徙的秘密。从卡拉苏克人、阿尔泰部落、古羌人、周人再到商人，军事压力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释放出来，层层传导，最后压向了中原地区。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举起青铜刀剑隔山打牛，中原地区的600年商王朝轰然倒地。

草原上的一只蝴蝶轻舞自己的翅膀，万里之外的中原掀起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

周人推翻商朝后，继承了商朝的青铜文化，并在青铜铭文中标榜自己的祖

先是如何的贤能，自己的族群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不论周人如何在青铜器上粉饰自己族群的早期历史，抢占道德制高点，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族群源头应该也属于戎狄之一，不能否认他们在西方传导的军事压迫下向东寻找生存空间的事实。好在他们的东进成功了。

从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到周人克商，大约1000年中，“西域争霸”的基本态势是草原族群占优势，他们往往来自西方的草原带或者北方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一拨又一拨地向东、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强敌的侵袭，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周朝需要拿出应对之策，既要攘外，也要安内。

宅兹中国，以御四邻

追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人们就会提到一件国宝级青铜器——何尊，以及何尊上的那句铭文——“宅兹中国”。

武王伐纣获得决定性胜利后，苦苦思索如何统治如此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他对大臣周公旦说，还没有定下都邑，彻夜难眠。从上天的规律看，洛地距离天室（上天都邑）不远，以后应该在那里修建一座都邑。这个故事记录在先秦古籍《逸周书》中。

打败商朝后只过了两年，周武王姬发就去世了，周成王姬诵即位，他的母亲是吕尚的女儿，吕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子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典故的主人公。周成王继承父亲遗愿，开始在成周（即洛地）修建都城，并召集宗族，进行训诰。一个叫何的贵族铸造了一件青铜尊，在尊内底部刻上铭文，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这就是何尊的来历。

在何尊的12行122字的铭文中，出现了“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语句，“中国”一词首次现身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于何尊铭文“中国”两个字的解读，学者们仍在讨论，但基本一致的意见是，这件青铜尊为西周早期铸造，当时所说的“中国”，并非现代人理解的“中央之国”的含义。一部分学者认为，铭文“中国”是说洛地交通便利，处于天下之中的有利位置。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中”字表示上古时期人群祭祀和战争时所用的建鼓，一种由高杆挑起的鼓。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在丧葬仪式上仍然使用建鼓这样的乐器。所以，“宅兹中国”的含义是“在洛地居住，在洛地祭祀”。而且从句式上分析，“宅兹中国”和“自兹乂民”应该是同类句式，后面的“乂”字是治理、安定的动词含义，因此前面的“中”应该也是动词含义，表示祭祀。在商周时期，维系族群精神的祭祀仪式几乎是头等大事。从周武王根据周人的上天信仰，选择洛地作为未来都城的修建地点来看，把“中国”理解成“在洛地祭祀”可能更为合理。

所以，何尊铭文反映的是周灭商后周朝上层的国家内部建设，当时刚刚经历了剧烈的改朝换代，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铭文中一句“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就反映了胜利来之不易，是以蛇吞象，显然巩固胜利也并非易事。周朝王室必须设法把贵族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周朝充分发扬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祖先崇拜传统，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度，设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宗族内部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设有大宗和小宗之别，让贵族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根据地位的不同，能够享受的祭祀级

别也不同。

这就是周朝的“安内”。安内的同时，周朝还要“攘外”，抵御来自周边的越来越强烈的侵扰，明确本族群、本国与外族群、外国的界线。

其实，在商朝中后期，商人就已经感受到北方、西方其他族群的威胁。商朝的边境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比如在一片甲骨上记载，有一天“土方”入侵商朝，劫掠人口。又一天，卜师问商王，接下来会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后判断，情况不妙。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土方”从西面入侵商朝，占领了两个城镇。而西北方向的“羌方”也是商朝的主要对手之一，在最早的一批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朝杀掉羌人俘虏祭祀。同样，羌人肯定也不会饶过商朝人，双方的战事旷日持久。一度弱小的周人就曾经依附商朝，协助商朝对付西面的这些强敌。

通过甲骨文，商朝人把那些对本国有很大威胁的各方族群“记录在案”。但是，在甲骨文记录之外，商朝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商朝人以及此后的周朝人无法安然入睡。

当时的草原上，由于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的驯化完成，草原人群对于草原特性的了解增多，畜牧经济正在向游牧经济演变。

一般来说，畜牧经济往往只是农业人群的一个“副业”或者若干“主业”之一，畜牧人群仍然需要农耕经济的支撑。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000年前的伊朗北部山区，人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也饲养山羊和绵羊，以畜牧经济补充农耕经济；向西到高加索山区，那里的农耕与畜牧并重，家畜以牛、羊、猪为主；再向西到东欧，那里不仅有农耕和畜牧经济，人们也保留了狩猎和采集生计。

游牧经济虽然是从畜牧经济中演变而来的，但是与畜牧经济有本质区别，游牧经济已经能够独立于农耕经济之外自行运转，游牧人群在草原上赶着牲畜四处游走，以放牧这些牲畜为自己的主业，甚至是唯一的主业。畜牧人群的活动范围有限，往往围绕自己的农业据点小范围迁移；游牧人群的活动范围很大，不同的季节他们有不同的牧场，既保障了牲畜有充足、新鲜的青草吃，又保障了草原不会因集中过度放牧而退化，反而因牲畜的踩踏和排泄物滋养而生长得更佳。

这正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有趣且独特之处。生物学家知道，森林生态系统属于人为干预越少越好的系统，而农耕生态系统则强烈依赖人为干预才能良好运转。与前两者不同，草原生态系统的繁盛需要人力干预，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它是草地、牲畜和游牧人共生的一种系统，草、畜、人之间相互

影响，通过游牧经济活动实现动态平衡。

游牧人群对于草原规律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在3000多年前的欧亚草原带西部，当时的畜牧人群每20多年就会整体性地迁徙扩张，原因是经过多年的使用，本地的草场发生了退化。这类人群应该就是最早尝试游牧的人群，游牧经济可能最初是在草原的一个小范围内产生的，但是游牧人群一出现，他们对于游牧空间的需求就驱动他们向外扩张，而为了在不断迁徙中获得各种补给，不论是食物还是工具，他们会纵马闯入邻近定居的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严重威胁畜牧人群、农耕人群。这个过程迫使很多人群武装自己，于是产生了分化：要么增加自己的机动性，也变成游牧人群之一；要么提高聚落防御力，更多地依靠农耕社会的优势——粮食、人口以及技术，与游牧人群对抗。

如此一来，古代世界的两大阵营——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就在这种动荡局势中慢慢浮现。从世界范围看，距今4000—3000年前，被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过去，有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张之说，雅利安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族群，他们从公元前14世纪起从中亚入侵古印度，创造了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文化；从公元前1200年起入侵古希腊，消灭了迈锡尼文明。

其实，当时这场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可能并不是某一个族群制造的，草原带上游牧经济的扩散，加剧了各个族群的征战和迁徙，所以站在农耕世界的角度看，似乎是草原带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马上族群，要来灭亡自己的文化。

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很可能与草原上的“战车革命”有关。大约距今3700年前，在两河流域的北方，轻便、坚固的马拉战车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战车可以同时将一位驭者和一位弓箭手载入战场，把机动性和武力结合在一起，根本性地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战争模式。历史学界曾经把驾驶马拉战车冲出草原的族群统称为雅利安人。

很快，马拉战车横扫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然后西进突入古埃及，向东突入古印度。几百年后，马拉战车远远扩张到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国的北方，那时正是商朝的后期。

20世纪上半叶种族主义流行时，德国纳粹曾经宣扬自己的日耳曼民族源自古老高贵的雅利安人，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本书第一章谈到的德国学者海克尔。其实基因分析表明，现代日耳曼人中继承雅利安人基因者只有20%左右；与古老的雅利安人血缘最紧密的现代人群，是德国纳粹从种族上进行贬低的现代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真是对种族主义者的一种讽刺。这种基因分布其实很好理解，雅利安人是草原带的游牧人群，与其

血缘关系最近的肯定是有更多草原血缘背景的人群，而不是有更多农耕血缘背景的人群。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方的商周。周朝取代商朝，本质上就是欧亚大陆上游牧族群大扩张引发的一个结果。商朝是以农耕为主的王朝，周朝取代商朝之后，也从一个农耕兼畜牧的西北势力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游牧族群掀起的冲击浪潮，是两个王朝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西周的灭亡也与游牧族群威胁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多次戏弄赶来救援的诸侯。后来犬戎真的来攻打周朝的镐京，诸侯无视烽火，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了。

这则东方版“狼来了”的故事戏说的成分很多，不过有些信息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抵御来去如风的游牧族群的袭击，周朝肯定会设立预警系统，邻近的诸侯会共同组成防御体系，一旦有变，立即赶来救援。历史学家目前认为，犬戎是在周朝出现内乱的时候被其中一方请来助拳的力量。

犬戎在史书中也被写作玁狁，是活跃在甘肃、陕西一带的游牧族群。玁狁在西北地区的强势表现，佐证了周人东进灭商确实是“压力传导”的过程，并非周人强大到占据西北地区后的行为，周人是被其他西北族群赶向东方的。即使周朝建立后，玁狁也仍然是周人的梦魇。《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这首诗描写的是周朝戍边将士的抱怨，豌豆采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说可以回家，却总是回不了家，都是因为玁狁这个凶悍之敌。

翻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看到一个半圆弧的山地区域围绕着东部、南部的大片平原区域，这个山地区域由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横断山脉构成。在畜牧经济流行的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面貌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在这个山地区域，人们既从事农耕，也从事畜牧，毕竟畜牧经济是非常依赖农耕经济的，所以山地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即使远在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石峁文化，也呈现出农耕社会的很多特点，以农业为主业，兼顾畜牧业，修建坚固的定居点，等等。但是，当游牧经济席卷欧亚草原带时，出现了流动性非常强的草原族群，他们来去如风，远程军事打击能力强大，严重威胁山地区域的族群乃至身后的中原农耕政权。

在对立与冲突的过程中，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个更加强调机动性，草原族群逐渐向游牧国家演进；另一个更加强调稳固性，农耕族群逐渐向农耕国家演进。两者之间山地区域的那些曾经

的畜牧族群，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拼机动性、战斗力不如草原族群，拼人力和物产又不如农耕族群，逐渐被两边的强敌吞并了。

比如历史上的山戎，在考古学家那里叫作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就是和石峁文化人群有冲突的东北族群，山戎是其后续，是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政权。在东周时期，强大的山戎曾经把燕国等北方诸侯国打得很惨，直到春秋首霸齐桓公挺身而出，号召东周列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向北驱逐山戎。山戎很可能是在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的夹击下灭亡的，此后那片区域崛起了一个游牧政权——东胡。

另一个更靠近中原的山地区域政权是孤竹，其曾经长期盘踞在燕山山脉南北和太行山一带，也是中原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齐桓公讨伐孤竹后回师，却迷路了，于是依靠老马的记忆力找到了道路，这就是“老马识途”的典故由来。

基因研究也反映了山地区域族群的尴尬境地。比如在内蒙古靠近陕西边界的朱开沟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3500年前。通过对该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牙齿进行DNA鉴定，发现其主要是亚洲东部的人群基因型，尤以中国北方和中部的基因型为主。在那个年代，朱开沟地区的人群可能从事的是畜牧经济，从基因型上看，他们与南面的中原地区人群很相似。

在朱开沟遗址向东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遗址，大概属于东周晚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遗址。从基因分析看，这个后来的遗址人群的基因型延续了朱开沟人群的基因型。但是，从当地的墓葬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风格：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东，另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北。考古学家推测，前一类墓葬可能属于游牧族群丧葬风格，而后一类墓葬可能属于中原族群丧葬风格。这表明南北方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文化都对这个中间地带施加了影响力。

所以，华夏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在人们的心中形成的呢？

因有四邻，始有中国。

为了抵御四面八方与本族群文化不同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西方强大的游牧族群，华夏族群的“中国”概念形成了。中国与四邻有着经济和政权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广阔，我们会发现，文化中国的产生，既是中华大地族群自身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西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带变革传导而来的力量使然。

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蝴蝶效应，那时的欧亚大陆已经紧密联系，没有哪个区域是孤岛。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从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2000多年前，“短短的”2000年里，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诗意的旷野变成了拥挤的闹市，不论是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和盆地，还是在适宜游牧的草原、适宜渔猎的丛林，每个族群的人口都实现了大量增加，整块大陆上的族群摩肩接踵、摩擦不断。

从基因角度看这段岁月，我们的祖先们以族群为单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扩展着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其过程明显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基因扩展模式就是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填空模式”。在大陆上还有许多渺无人烟的处女地时，族群的扩展基本上是填补自然环境中的空白，从事农耕或畜牧的族群迁徙到没有其他人类占据的新空间中，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当然，说那些处女地完全没有人烟，并不是很准确。狩猎采集人群也曾经广布整个大陆，只是他们的人口密度太小，族群规模也很小。所以，在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闯入他们的空间时，人数过少的狩猎采集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远遁山林更深处。

在“填空模式”下，一块新空间的族群基因是与他们的故乡族群一致的，至少短期内是一致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有着较为分明的基因型差别，分子生物学家也很容易追踪这些族群的起源地。由于起源地不同，族群扩张时继承着各自的文化，因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也很大。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之举基本上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扩展。

第二种基因扩展模式是“群体替代模式”。此时渺无人烟的处女地已经很难寻到了，每一块区域都有族群生活，只是族群有大有小，族群的文化各不相同。族群之间还很陌生，交往很少，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很大，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会视对方为无法沟通的“异类”。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下，或者纯粹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强大的族群会去侵占弱小族群的生存空间。很多弱小的族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赶到其他的区域，鸠占鹊巢，该空间的族群发生了替代。

在“群体替代模式”下，空间的族群基因发生了替代，从原来的原住民基因型变成了新居民基因型。也许有极少量的弱小族群成员被强大族群接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相差很大，这极少量成员没有或者很少有后代，他们并未给强大族群的基因库增添什么新基因型。奥库涅夫人驱赶克里木齐人、卡拉苏克人驱赶阿尔泰部落的过程，大体上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在他看来，文化上的一个观念、一种行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传播并流行开来的过程，其实与生物学上的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遗传和传播的过程十分相似，不同谜米即文化基因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也与生物基因之间的竞争在原理上类似。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时，这种文化基因的竞争也就产生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换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族群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古代社会迈入人口众多的族群相互竞争的时代时，文化基因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主流。某一族群、政权与其他族群、政权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区的族群扩张为例，当农业养活了更多人口时，农耕族群开始向有耕种潜力的空旷区域一拨拨地扩张，他们或者携带着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携带着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携带着西方传来的小麦、大麦，走向新的原野并将其改造成农耕区。这个时候基因的流动是“填空模式”。当各种文化族群并立而起，开始争抢比较好的资源环境时，就进入了“群体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强势文化的对外拓殖群体对于南方或北方山区一些弱小族群的驱赶。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呈现出“上层更换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来的商朝统治者换成了周朝统治者，而商朝的底层民众成了周朝的底层民众，他们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畜牧的还是畜牧。从基因上讲，也许周朝的上层会给中原地区注入一些西北地区的基因型，但其实这种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开启了。中原地区族群的生物基因变化很小，真正改变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礼仪文化逐渐确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种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强化了中

原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族群的“中国”文化认同。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评论管仲的言论，生动地表达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认同观念。根据《论语》记录，子贡对孔子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却不去殉死，反而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各路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众至今都享受着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头发是束着的还是散开的，衣服是向左开襟还是向右开襟，这就是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贵族最为珍视的，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在那个时代，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原王朝，正在以其充足的粮食产量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发动向四方的“文化基因扩张”，此前由西向东朔风劲吹的基因扩张与文化扩张趋势，即将发生东西大逆转，西域争雄的下半场大幕拉开。

小贴士 食奶影响了人类历史

自从人类能够捕获大型哺乳动物，比如骆驼、马、牛和羊，人类就接触到了一种优质的蛋白质食物——动物的奶。但是，人类曾经很难有效消化吸收奶的营养成分。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必须借助体内的乳糖酶来分解、消化奶中含有的乳糖蛋白质。大多数哺乳动物只在婴儿时期拥有这种神奇的乳糖酶，能够消化母亲的乳汁，长大后体内的乳糖酶就消失了。人类曾经也不例外。

幸亏有了天赐的基因突变，让一些人群拥有了特殊的乳糖酶基因，即使长大成人，体内也拥有乳糖酶，能够消化动物的奶。这个特殊基因出现的时间大概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的地点很可能在欧亚非大陆的西部，因为现代人中，欧洲人和非洲人中拥有这种基因者很多，而亚洲人、美洲人普遍缺少这种基因。具体来说，东亚、东南亚的现代人群中高达85%~100%的成员没有这种基因，而北欧的现代人群中只有不到10%的成员缺少这一基因。

人类对于动物奶的日常食用，可能起源于万年之前。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古代陶器碎片上吸附的残留脂类判断，亚洲西部可能是最早食用动物奶的区域。这个时间与乳糖酶基因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也许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尝试喝动物的奶，但都无福消受，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消化动物的奶了，从此以后，动物奶成为这些人及其后代的日常饮品之一。

人类饮用动物奶的直接证据，来自科学家对于先民牙结石的研究。他们分析了蒙古国中部和阿尔泰山一带古人牙齿上的牙结石，这些古人大概生活在距今5300年前，属于欧亚草原带东部先民。牙结石所含的蛋白质成分显示，那些古人的确饮用了牛奶和羊奶。

看起来，经过约5000年的传播，食奶方式随着驯化动物的扩散，已经到达了蒙古高原上，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乳糖酶基因人群的扩散。考古学表明，5000年前的确有一支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古老文化向东扩散。

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食奶证据，恰恰来自新疆小河墓地。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的颈部和胸前散布着一些淡黄色的块状物，在随葬的草篓里也有类似的颗粒状物，值得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牛奶制品，以及少量羊奶制品。进一步的蛋白质分析表明，块状物和颗粒状物的蛋白质还不一样，颗粒状物应该是全成分奶的残留物，而块状物以酪蛋白为主，缺少乳清蛋白，这说明那是奶酪，而且是用乳酸菌发酵牛奶制成的，现代名称

叫“开菲尔奶酪”。这个发现把世界开菲尔奶酪的制作历史推进到了距今3600年前，它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奶制品。

同样是在蒙古地区，在距今3200年前的古人牙结石中，科学家分析出了马奶的成分。在这个时期，马奶消费与马的骑乘技术同时在欧亚草原带的东部出现，这反映了当时草原上的重大转变，即人群正在从定居性较强的农耕—畜牧社会转向游牧社会。此后到了匈奴帝国时代，马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食物。

从人类需求来说，从马、牛、羊身上提取的奶类食品，比单纯宰杀它们获得的肉类食品能够提供多几倍的能量，更不用说其他营养成分了。人类驯养和繁殖马、牛、羊的过程，也是对它们进行基因改良的过程，让它们向着更为温顺、产肉和产奶更多的方向进化。野牛与家牛在体型和性情上的明显差别，证明了上万年来人类对于牛的进化的人工干预。

乳糖酶基因在草原带的传播，是否增强了草原人群的力量，使他们对于周边区域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然而，地处草原带南面的华夏地区的人群一直缺乏乳糖酶基因。虽然黄牛、绵羊乃至马匹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但是华夏地区的农民们能够饮用动物奶的人寥寥无几，因此西亚、中亚的农民很早就挤奶并大量食用动物的奶，这种方式在华夏地区一直没有普及，那些动物主要还是作为肉食和毛皮来源而被豢养，以及用作农耕和拉车畜力。

假如古代东亚地区的人群出现了乳糖酶基因突变，而西亚地区人群却缺乏这种基因，人类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呢。

第六章 逆转山河——汉匈掀起西进狂飙

当棺盖被几位考古人员合力抬起时，棺内合葬的男女遗骸以及从未被扰乱的随葬物品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场景。墓主身上覆盖的织物中，一件色彩斑斓的织锦在灰尘遮蔽的墓室里是如此的醒目，立刻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当这块织锦被缓缓展开时，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之间，露出了蓝底白色织出的汉字“国”“东方”“五星”等字。当织锦全部展开时，汉字组成的语句让在场者脱口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次考古挖掘的是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时间是1995年10月。在棺盖被打开的此前一天，一位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刚好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赶到尼雅遗址挖掘现场，他的名字叫齐东方。这块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与考古学家齐东方、五星红旗之间出现了神奇的巧合，成为此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考古学界趣事。

其实，这块织锦的神奇故事还未结束，织锦上文字所揭示的族群演变历史同样神奇。

藏在织锦里的精绝与南羌

织锦上的文字与齐东方、五星红旗和中国之间的巧合，给人们增添了谈资，但从学者的角度看，这些只是巧合而已。这块织锦是西汉王朝的皇家工场织造品，正如本书上一章所说，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于“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西周人所说的“宅兹中国”，指的可能是他们进行祭祀的洛地，对应着天上的都城位置。在西汉，“中国”基本上还是指代东周人所说的洛地及其周边的中原地区，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名称。“五星”在西汉的时候，指的是夜空中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五星，即人类用肉眼能够看到的夜空中的五大行星。在东汉道家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这五颗星的名字被改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这些名称沿用至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说的是天象上五颗行星都会聚于东方天空，中国地区就大吉大利。反之，如果它们都会聚于西方天空，“外国用（兵）者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其实并不完整。在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件织锦残片，它与“五星”织锦其实是同一件织物，它们的花纹都是一致的，这件织锦残片上还有三个字——“讨南羌”，因此织锦上的完整语句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尼雅遗址在当时属于精绝国，这个墓室里刻有“王”字的陶罐表明，墓主应该是精绝国国王。那么，相距遥远的西汉与精绝国为什么会发生联系？“南羌”又是哪里呢？

让我们先从精绝国的基因探寻那段历史。

尼雅遗址在1901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他从遗址里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轰动了欧洲学术界，尼雅遗址也被称为“东方庞贝城”。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尼雅遗址中出土了西亚风格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品，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的古国）的装饰图案，古印度的棉织物，中原地区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可以说，这里是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波斯四大古代文明的一个罕见交汇点。

科学家对尼雅遗址一个男性成年个体股骨上所含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检测，发现他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型，与西亚和伊朗人群的基因关系最近，而与东亚人群没有基因联系。对比新疆其他遗址的古代人群DNA，科学家发现同属和田地区的一处于阗国遗址的人群DNA与尼雅遗址人群相近。于阗国与精绝国同属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区域，历史上于阗国还曾经吞并精绝国，所以两国人口基因相近并不奇怪，但它们与西

亚、伊朗人群基因相近，这还能揭示出一些人群迁徙的往事。

根据碳十四测年，尼雅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500年前，从西汉时期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而于阗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700年前，从西汉时期到三国两晋时期。学者们猜测，在精绝国出现之前，应该就有一支西亚、伊朗基因人群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绿洲上生活，甚至向东扩张。到了西汉，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凿穿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阻隔，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包括精绝国产生影响力。

从基因型上讲，精绝国人群有着西方的基因型，与汉朝的东亚基因型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精绝国与汉朝交好。那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皇家织锦，很可能就是汉朝赠送给精绝国国王的礼物，被精绝国王室视作具有压制敌人的神秘力量的物品，在去世时也要带入地下随葬。

那么，要征讨的“南羌”又是哪里？

南羌，也叫南山羌。所谓南山，指的就是昆仑山。张骞出使西域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汇报说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国，而上古传说中的昆仑山应该还在更西边。根据河流发源于于阗国的山脉，刚好于阗国又出产玉石，与古籍中记述的昆仑山很吻合，于是汉武帝金口玉言，宣布于阗国的南山就是昆仑山。

现在我们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并非昆仑山，而古籍记载的传说中的昆仑山，虚无缥缈，不能深究实际对应的山脉。当时的张骞与汉武帝并没有今天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判断有误不足为怪。汉武帝定名的昆仑山倒是一直流传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线高大山脉，在那时，西域绿洲国家习惯称呼其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仑山上的游牧族群。从族源来说，南山羌很可能来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边其他部落的部众。南山羌曾经蛰伏于汉朝的羁縻之下，后来试图北渡湟水寻找合适的土地定居而发动了叛乱，其背后也许有汉朝的死敌匈奴的支持。公元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以70岁高龄率军出征，征讨反叛的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先讨个好口彩。赵充国很快平定了叛乱，然后又积极地在当地屯田，使当地长治久安。

所以，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很可能是这次胜利后制作的“宣传品”，然后礼赠昆仑山附近的绿洲国家，精绝国获得了一件。

精绝国国民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属于土生土长

的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呢？也未必。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仅继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们可能还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着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历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东西合璧的，族群与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还有大月氏。既然谈到月氏，那么我们可以正式引出秦汉王朝的死敌——匈奴。要搞清楚西北地区的族群演变，匈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从历史上看，匈奴自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威胁战国七雄中的北方三强——秦、赵、燕，一直到东汉时期被汉朝联合鲜卑等部众打垮为止，匈奴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王朝缠斗了几百年。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强权，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个谜团。

难点在于，匈奴是一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部落大联盟，它囊括了广阔区域里各种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亚、亚洲东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基因型的族群。所以，从扩展模式来说，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很可能从一个核心的部落，通过不断的征服过程，把各个部落的部族都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些部落原来的上层贵族要么被替换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管理各个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权的族群来源多样，一言难尽，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构成匈奴政权统治核心的单于族群的来源呢？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蒙古国境内一处匈奴时期墓地内的60多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这处墓地的年代为距今约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通过分析后发现，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约一成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学者们还曾对蒙古国东北部另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三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位是西部基因型，两位是东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从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各种部落。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来源的族群或其后裔。基因型比例虽然确定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匈奴单于一族的族源归属，是属于占多数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一员，还是属于占少数的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一员呢？

语言学的分析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情况。几十年来，语言学家试图根据秦汉王朝对于匈奴一些专有词汇的直译发音，与各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以确定匈奴人讲什么语言。既然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匈奴人内部肯定也是讲各种语言的。但是，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一些专有词汇，一般来说应该是

匈奴上层使用的语言，是单于一族的语言。语言学家们长期争执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应该属于突厥语系统还是蒙古语系统，没有定论。

基因学和语言学在匈奴单于一族族源追寻过程中陷入了困境，这反映了基因学和语言学在研究族群来源时的局限。

从分子生物学上讲，学者们是用过去古人的DNA与今天生活在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的人们的DNA进行比较，以判断古人的族群来源。可是，现代人是古人的后裔，而不是相反。用现代人的基因来判断古人的族群类别，从逻辑上是本末倒置的。例如，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可能并不是生活在欧洲，而是生活在西亚，所以欧洲人祖先的基因型很可能与西亚某些族群更接近，而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型略远一些。当我们在欧洲某地发现古人DNA与现代西亚人群接近，而与现代欧洲人群较远时，我们要认识到，这类古人完全可能是欧洲人的祖先。

对语言学来说也类似，用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来比较匈奴人的语言，也是本末倒置。真实情况是，匈奴人的语言可能影响了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的形成，很多匈奴人的词汇、语法被后来的蒙古人等继承和使用，并流传到了今天。所以，后人可以在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中找到与匈奴人语言相似的证据，但不能说匈奴人讲所谓的古代蒙古语或者古代突厥语。

那么，基因和语言能告诉我们什么？各个现代族群的亲疏远近。此外，基因还可以通过突变速率，讲述两个族群最初分开时的大致时间。我们要知道基因和语言研究的局限性。

回到匈奴单于一族族源的探讨上，如果能够发现大量的匈奴人墓葬，并且明确哪些是匈奴单于一族的墓葬，哪些是普通匈奴人的墓葬，然后分别提取DNA进行分析，应该会对探索匈奴单于一族的来源有一定的帮助。除了利用基因和语言研究外，还必须借助其他各种信息来分析，包括考古学的各种发现，以及古书中的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在战国后期到秦朝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草原上三强鼎立，西边是月氏，中间是匈奴，东边是东胡，匈奴早期的势力范围是被东西两强限制的。从这个草原格局判断，匈奴的单于一族也许是蒙古高原本地的族群，或者是从更北边的贝加尔湖地区南迁而来，不太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草原带族群。

特别是盘踞在匈奴西边的月氏，其实力和背景都颇为强大。还记得卡拉苏克人吗？从族群和语言上看，月氏很可能是卡拉苏克人的后裔之一，因此从基因型上讲，月氏很可能有更多的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月氏族群可能

讲一种古老的语言——吐火罗语，所以月氏以及相关的族群也经常被称为“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克尔木齐人以及南下到罗布泊的“小河公主”的族群。

月氏在早期匈奴的西边活动，但是学界对其具体的势力范围有所争议。中国史书记载月氏与另一个族群乌孙“共在敦煌间”，“俱在祁连、敦煌间”。如果按照今天的地理名称，祁连山在青海与甘肃交界处，是河西走廊南界的山脉，而敦煌在甘肃省西部，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因此，按说月氏应该活跃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及北面邻近的蒙古高原西部一带。

但是，基因研究挑战了这个说法。针对月氏活跃的时代，学者们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古代遗址中获得的古人DNA表明，这些地区都是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并没有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存在。同时期的新疆地区是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基因型共存的，来自西方的族群可能扩张到新疆东部就止步不前了。所以，拥有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月氏势力可能并没有到达甘肃的河西走廊。

那么，古书中所写的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该如何解释呢？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昆仑山名字的变化一样，“祁连山”一词在古代的指代也是很混乱的，所指的山脉并非今天的这个祁连山。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不论是昆仑山、祁连山还是今天新疆的天山，它们的名字其实都来自吐火罗语里的“圣天”的含义，汉地史书应该是根据吐火罗人对山脉的称呼而记录下来这些名字的。所以，“祁连、敦煌间”里的“祁连”无法明确是哪条山脉，但应该是在今新疆境内，可能是天山或者昆仑山，甚至可能是阿尔泰山。

总之，月氏活跃的地区在今新疆的北疆草原以及更北方，这就是基因研究带来的新认识。

月氏一度非常强大，以至匈奴不得不送出“质子”到月氏。《史记》中描写：“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在没有成为匈奴单于之前，有一段日子是在月氏当人质的，可见在当时的草原上，月氏比匈奴更强盛。

不过，在冒顿杀死欲置自己于死地的老单于，成为匈奴的新单于后，匈奴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代，向西击败了月氏，杀死月氏首领，用其头颅当盛酒的器皿，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只不过这一次，骨牌是从东向西倒了。月氏先是占据了乌孙人盘踞的伊犁河谷，也许是匈奴兵锋太急，月氏不得不继续西迁，越过实力一般的大宛，向西渡过阿姆河，攻取了大夏，以大夏的

都城蓝氏城作为自己的都城。

过去人们根据月氏和乌孙“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记载，以为乌孙也曾经在河西走廊活跃，后来趁着匈奴赶跑月氏而占据了伊犁河谷。但是，如果基因研究是对的，月氏和乌孙的势力都在新疆境内，那么乌孙可能原本就活跃在伊犁河谷，在强大的月氏的西边偏南。这样一来，月氏从东北方向来袭，乌孙就首当其冲，乌孙残部向东逃到吐鲁番盆地避难，在地理上就解释通了。

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一分为二，主力西迁，抢占了中亚的土地，后来建立了贵霜王国，但中国史书仍称呼其为“大月氏”。那些没有西迁的小部分部众，则从伊犁河谷向南避走昆仑山麓，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南山羌，也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里的打击对象。

北方草原三强中的另一强——东胡，也遭受了崛起的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史记》中以文学化的语言描写了东胡势力一次又一次敲诈匈奴，索要名马、美女和土地，冒顿忍耐了几次后终于爆发，带领匈奴击破了麻痹大意的东胡。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蒙古高原东部兴起了鲜卑和乌桓，鲜卑在北，乌桓在南，两个族群在东汉末年就开始威胁到中原王朝。因此，人们曾经提出，东胡解体后，一部分向北躲入鲜卑山，另一部分则躲入南方的乌桓山，鲜卑和乌桓都是东胡的后裔。

如果当时的草原还处于“群体替代模式”，一个族群在迁徙的时候会整体性地保持自己的基因型，那么说东胡是鲜卑和乌桓的祖先，并无问题。可是，在“草原三强”匈奴、月氏、东胡并立的时代，甚至这个时代之前，草原就已经进入了“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击破东胡，赶跑的可能只是东胡的少量上层一族，大量的民众应该还留在原地，他们摇身一变，从东胡人变成了匈奴人。这就是古代草原上的常见场景，大量的部落都是随风倒，某个势力崛起控制了这些部落后，大家就都以这个势力作为族群和政权的名称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

至于几百年后从丛林和深山里走出来的鲜卑一族、乌桓一族，他们是否真的是逃跑的东胡上层的直接后裔呢？答案很大概率是否定的。

同理，月氏西迁，也只是一部分族众的迁移，只不过月氏本是草原强权，即使遭受匈奴打击，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击败中亚的一些族群，赶跑上层一族，占据他们的地盘和民众。就拿大夏都城蓝氏城来说，这个名称是汉地史书的音译，它的本意是“亚历山大城”，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留在当地的希腊化部族所建立的城市。显然，这些希腊化部族构成了大夏的上层，统治着当地的大量原住民。月氏鸠占鹊巢，也不过是对统治上层进行了又一次更换而已。

东风吹散楼兰梦

向西推动多米诺骨牌的推手并不只有草原新霸主匈奴，中原王朝经过春秋战国的乱世历练，早已不是曾经的吴下阿蒙，向西的反扩张从秦朝还只是秦国的时候就开始了。

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处秦朝陶窑劳工的墓葬，他们可能是烧制兵马俑的劳工。通过对里面出土的遗骸的DNA进行检测，分子生物学家发现，这些劳工中的大部分是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是也有若干劳工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其基因型可以追溯到中亚和伊朗等地。这说明秦朝甚至之前的秦国境内已经融入了很多来自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后代，人口和基因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

当然，这个事例只是说明了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东进，那么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国外学者曾经对中亚出土的几十具古人遗骸进行DNA检测，发现在距今2700年前，中亚地区的古人还不存在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这说明在中国的东周时代之前，亚洲东部地区的族群基本上还没有向西渗透到中亚，不论是草原带东部的族群，还是中原地区的势力，可能都无暇或无力西进。

不过在此之后，随着亚洲东部草原和中原各路豪强纷纷崛起，东部族群向西渗透的现象开始出现。

在天山南麓的新疆中部和静县一处遗址，学者分析了其中9具人骨的DNA，发现他们中7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或西伯利亚类型，2人的基因型属于东亚地区类型。这个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000—2500年前。另外，对于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内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墓地出土的人骨DNA分析也表明，其中约2/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约1/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东部。

这些分析说明，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亚洲东部人群正在慢慢地向西域地带渗透。虽然从基因型上看，西域地区仍然以欧亚大陆西部人群为主，但东部人群的数量也不容忽视。

有趣的是，在距今2500—2000年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地带的圆沙古城墓地中，墓主DNA分析表明，这里的人群与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的人群关系最密切。看起来，在东亚人群西进的同时，古印度文明圈的人群也在北进，有少量人群进入了今新疆南部。

整体上看，在汉朝之前，亚洲东部人群的西进是比较零散的，并不像之前欧亚大陆西部人群那样一拨一拨地东进那般汹涌澎湃。自汉朝开始，东亚大帝国羽翼丰满了，亚洲东部人群西进的规模越来越大，整个西域地区各人群的基因型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

比如楼兰古国，位于今新疆若羌县北部，是汉朝人从中原地区西出阳关后遇到的第一个上规模的西域政权。在当时人的眼中，出了玉门关、阳关，就跨出了汉地文明圈的范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进入了异域。从族群上说，楼兰古国在最初立国之时，楼兰人可能确实与汉地族群有很大不同。从地理上说，楼兰人活跃在罗布泊一带，前面谈到的“小河公主”的族群也在罗布泊附近生活，因此也有人把小河墓地人群称为古楼兰人。但是，小河墓地人群生活在距今4000—3500年前，是否与后来的楼兰古国族群有亲缘关系，很难判断。

楼兰国名最早见于历史，是在西汉时期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的一封信中。在信中，冒顿说自己派右贤王向西攻破月氏，斩杀了降兵，并平定了包括楼兰、乌孙在内的二十六国，使其都归顺匈奴，所有引弓之民都合并为一家人。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楼兰原本是受月氏羽翼庇护的，在月氏被匈奴击败后，又向匈奴称臣。汉文帝时期，距今2100多年前，这个时期的楼兰古国与“小河公主”的时代相隔了1500年上下。

不过，从楼兰古国原本臣服于月氏的史实分析，在匈奴攻破月氏之前，亚洲东部人群向西渗透的频率应该很低，因此楼兰古国最初的族群也许以欧亚大陆西部人群基因型为主。但是，随着匈奴赶跑了月氏，控制西域各国，匈奴大联盟的人群想必会向西渗透，或者以通婚的方式，或者以驻军或经商的方式。前文已经谈到，匈奴人中大部分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因此他们的基因型应该会掺入楼兰古国人群中。

与匈奴缠斗的汉朝当然不会坐视匈奴控制西域，楼兰古国作为西域的东大门，成为汉朝首先要拉拢和控制的对象。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汉朝就积极在西域屯田养兵，对抗匈奴。当地一处遗址中曾经出土汉文木简70余枚，上面记录了屯田士兵的来源和生活状态，比如“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物籍”。“公乘”代表汉朝的一种爵位，“史隆”是人名，这句话表明，当时去西域屯田的官员是携带家属以及私人生产生活用品的，他们肯定会与当地人并肩劳作和生活，彼此融合是显而易见的。

另据史书记载，西汉的一位贰师将军索励曾经率领酒泉、敦煌的上千士兵前往楼兰屯田，并召集几个西域政权的人马，截断河水以供灌溉之用，结果“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汉朝调集军民到西域屯田，是控制西域、对抗匈奴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中，中原王朝人群的基因型必然会有很多掺入楼兰古国之中。

除了匈奴和汉朝官方行动带来的亚洲东部人群东进外，原本就活动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族群，也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彼此渗透，比如羌人，既然他们能够与月氏融合形成南山羌，那么他们同样会与楼兰古国的居民融合。考古学家在楼兰发现了一件魏晋时期的汉文书信，内容是一位生活在楼兰的女性羌人思念远方的亲人。这是羌人融入楼兰的直接证据之一。

在汉朝乃至匈奴的卓力经营下，楼兰可谓兵精粮足，到东汉时期，已经改国名为鄯善的楼兰古国在西域东部扩张，“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可惜，这差不多算是楼兰古国最后的辉煌了。西域脆弱的自然环境与中原的千里沃野不一样，并不适合大规模地屯田开发。经过汉朝沟洫而渔式的大量用水屯田，楼兰古国的生态环境逐渐退化。

等到东晋的高僧法显前往天竺也就是古印度求法，路过罗布泊时，那里已经是黄沙笼罩的死亡之海。在《佛国记》中，法显写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一度繁荣的楼兰古国已经无影无踪了。最后的楼兰人走向了何方？

汉朝与匈奴的数百年争霸，间接带来了穿过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繁荣，也激发了西域地区的族群大融合。在此之前，商贸往来和族群交流更多的是通过北方的草原带进行的，因为草原带上的交通更为便利。但是，东亚两强的长期对立阻断了通过草原带的商贸和族群交流，逐利的商人、弘法的僧人不得不改道虽然不便但是还算通畅的丝绸之路，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路线、昆仑山北麓的一条路线东西方向旅行。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草原之路的阻断激发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同时给西域注入了大量来自东方的族群基因。几千年中，先是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持续东进，后是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反向西进，伴随着中亚南部和南亚族群的少量北进，共同缔造了新疆—世界人种博物馆的历史美誉。

羌藏携手走高原

秦汉王朝的西进，首当其冲的还不是以楼兰为代表的西域绿洲政权，而是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一带放牧马、牛、羊的羌人。历史上的羌人分布范围很广，主要以青海、甘肃为中心。周人、秦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经与羌人杂居在西北地区。

黄河上游有一条重要的支流—湟水，湟水谷地曾经是上古时代的一块风水宝地。那里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前处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遗址，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应该属于古老的羌人文化。根据遗址出土人骨DNA分析结果，他们的母系遗传基因与现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因更接近，特别是与云南省的现代普米族亲缘关系最近，而与现代汉族的基因较远。

在湟水谷地另一处距今1900—1700年前的文化遗址中，人骨DNA分析结果表明，这支人群的基因与现代汉族较近，与云南的藏族、纳西族也很接近。这处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汉到三国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晚期羌人在西北地区给大汉王朝制造了很多麻烦，东汉屡次兴兵讨伐羌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董卓为代表的军阀崛起，并敲响了东汉的丧钟，然后曹操、孙权、袁绍等诸侯讨董卓，开启了纷纷扰扰的三国时代。

两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反映出的基因信息，给这段历史注入了新的注解。羌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族群，而是中原王朝对于西北很多族群的统一称呼。在西周时期，羌人似乎还没有受到中原王朝很大的影响；此后在强势秦汉王朝向西的压迫下，羌人这些族群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一部分羌人族群被秦汉王朝纳入自己的体系，这个过程肯定会引发羌人与汉人在族群和基因上的融合。西晋末年，羌人首领姚苌曾经建立后秦政权，与各路势力一道逐鹿中原。其实当时的少数民族并非中原王朝的外来入侵者，他们本来就是被秦汉王朝纳入体系的族群，甚至各个族群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基因融合，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这些少数民族视作文化族群而非基因族群，可能更为恰当。

另一部分羌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进入秦汉王朝的体系中，或者是由于彼此敌对很深，或者是由于彼此文化隔阂，这批羌人走向了迁徙之路，为躲避强敌，他们可能向南远走，成为今天西南地区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族群之一。

还有一部分羌人向西走入了青藏高原，他们成为今天藏族的祖先族群之一。

藏族的祖先向青藏高原的进军，是以北方农作物作为武器的。根据考古发现，距今5200—3600年前，携带着粟、黍的农耕人群就已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低海拔河谷地区大规模定居了。此后，一种重要的耐寒农作物——裸大麦也就是青稞出现了，给古人提供了占据高原的新武器。

通过对现代藏族人和周边其他民族人群的基因比较，分子生物学家发现，藏族人中的两种基因型的分布比例，与粟、黍作物从东向西传播的分布趋势吻合得很好，而且与仰韶文化遗址的人群在基因型上有联系。这说明藏族人最早的祖先可能来自仰韶文化人群，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走向高原去种植粟、黍的那批古人。这次迁徙过程，是从低海拔的青海河谷向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扩张。

距今3300年前，藏族人的祖先人群中广泛拥有这两种基因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或者稍早，即卡约文化时期，他们开始种植青稞，并携带着青稞走向高原深处，最终大规模定居在雪域高原上。

在这些勇敢的开拓者中，除了那些粟、黍种植者的后裔外，也加入了羌人族群的身影。此外，甚至还有中亚和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基因也融合到了高原族群中。这些族群可能与羌人类似，在匈奴与汉朝向西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寻找生存空间而辗转来到青藏高原。别忘了，大麦本来就是跟随小麦沿着草原之路传输到东亚的，中亚与南西伯利亚族群很早就开始种大麦了。

再往后，距今2000年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散，这是高原内部的一次融合过程，基本上奠定了现代藏族人群的基因型分布。

在开拓高原的过程中，藏族先民还培育了身强力壮的好帮手——家牦牛。牦牛驯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7300年前，根据基因的研究，在距今3600年前，家牦牛群体出现了激增。与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相对应，高原史前人群分别在距今10000—7000年前和距今4000—3000年前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增长，前者可能是仰韶温暖期时走入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后者显然属于农耕人群。牦牛的驯化和群体扩张，与人类在高原上的活动在时间上十分吻合，这说明古人与牦牛是携手征服高原的。虽然目前发现的家牦牛的最早实体证据出土于距今约375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但是从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看，环青海湖地区的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这暗示家牦牛的起源地应该在青海东北部的青海湖附近，那里也是湟水谷地的位置。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是羌人先民最早驯化了家牦牛，他们本就是擅长畜牧和游牧的人群。

牦牛的驯化，对于藏羌先民永久性定居高原至关重要，使他们摆脱了只能

季节性进入高原谋生的旧方式，代之以高原畜牧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从事农耕的技术条件和畜力条件。

总之，如果要追溯藏族人的祖先，最基础的族源来自种植粟、黍的仰韶文化人群，然后又融合了羌人乃至中亚、亚洲北部的少量族群。到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人在基因上已经与现代藏族人很相似了。考古学家曾经发掘青海省都兰县的一处吐蕃贵族墓葬，发现他们的基因型属于亚洲东部类型，分散于现代藏族人中间，虽然时间相差千年以上，但基因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如前所述，藏族人的体内有来自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这让他们能够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生活自如。这种基因到底是哪个族群带来的，仰韶文化人群、羌人还是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人？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这种特殊基因一开始肯定只存在于族群中的少数人体内，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在高原上具有生存优势，后代越来越多，这种基因在群体中的所占比例也就越来越高了。

藏族人还把这种特殊的基因传递给了“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夏尔巴人。夏尔巴人由于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当挑夫和向导而闻名于世。

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学者们曾经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们可能源自古羌人的一支。在藏语中，夏尔巴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所以也有学者猜测他们可能是西夏国的王族后裔。

基因研究找到了夏尔巴人的族源。通过对500多名夏尔巴人DNA的分析，发现他们其实与藏族人不论是在父系基因还是母系基因上，都共享着基因型，这个群体并非直接来自古羌人，更不是什么西夏王族后裔，他们是藏族人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分支，两个族群分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当时正值青藏高原上部落间彼此征伐比较剧烈的时期，吐蕃王朝诞生前夕，也许夏尔巴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火而走向了喜马拉雅山区。他们的体内也继承了藏族族群源自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因此在险峻的雪峰上也如履平地。

分别崛起于草原与中原的匈奴帝国和秦汉王朝，开启了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浪潮，昔日向东倾倒的多米诺骨牌，此时完全逆转，匈奴与秦汉兵锋所向，西北地区各个族群、政权或降或走。这股浪潮并没有因匈奴和汉朝的灭亡而停歇，反而在此后的历史中持续汹涌，此后闪亮登场的若干草原帝国如突厥、柔然、蒙古与华夏王朝如隋唐，都积极向西拓展势力范围，激发持续的族群融合。

帝国时代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而且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在此之前，从

散落在大地上的部落到部落联盟，进而到最早的文明古国，总的趋势是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广袤大陆上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也相应在增加。但是，在秦汉与匈奴这样的大帝国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后，东亚地区的各路文化开始上演大鱼吃小鱼的一幕，文化基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

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

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

人类肤色的进化，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体毛变少了，就在那个时期，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亚洲时，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D，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亚洲环境的基因，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

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得越多，就进化得越有优势，于是保留并扩张；某些特征使用得越来越少，就退化，被淘汰。这就是“用进废退”。从生物基因角度看，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批判后者的理论。

但是，在文化基因领域，一种文化使用（推崇）的人越多，就越占优势，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这就有点儿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的味道了。

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传输到西北地区，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要么彻底消失，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新的家园，延续本族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

生逢帝国时代，对于弱小的文化人群是不幸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些在南方地区山岭

中散落的古老文化人群，与西北地区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无奈。

第七章 客从何来——史诗般的人口南下洪流

高山顶上水淼淼，

白鹇拖拖过山坳。

石拐咕咕水上跳，

万顷梯田尽妖娆。

早春的深山里飘出阵阵山歌，那是梯田边劳作的人们在低吟浅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62层，印证了那句俗语：“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客家人是这处气势磅礴的梯田的创造者。早在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就已在群山中扎根，以自己掌握的农耕技术，因地制宜地化险峻山坡为万顷良田。客家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丘陵环境之中，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客家文化也被称为“古汉文化活化石”。

那么，他们为何自称“客家人”呢？敢问客从何来？

群山原来的主人又是谁？他们去向何方？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着”的说法，界定客家人的最主要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人认为自己是汉人，讲的是古老的汉语。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成为他们客居山岭所坚守的根脉。

因此，要追问客从何来，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汉从何来？

汉人这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汉语又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汉人”这个名称与汉朝有关。秦末天下大乱，以项羽为首的昔日战国贵族后裔们起兵反抗秦朝的统治，最终推翻了秦朝。项羽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他带兵到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去。“汉中”这个名称应当来自流经该地的河流——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开启了与项羽的数年“楚汉争霸”，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

绝大部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往往会赞美自己、贬低对手、无视他者或弱者。其实，不论是商周王朝，还是秦汉大帝国，落在地图上的版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央政权没有完全控制那些面积，那个版图里并不是只有商人、周人、秦人或汉人。

比如，东周的周天子居住的洛阳周围，就布满了蛮夷戎狄这些族群。史书上甚至留下了相关的描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如果我们把汉人群体出现前的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称为华夏族群的话，蛮夷戎狄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建立了商周的中原华夏族群对于周边族群的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那么，这些周边族群在汉人族群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融入了汉人族群呢？

分子生物学家选择了距今5000—750年前的8个古代人群，分析了他们的线粒体DNA的情况。这8个古代人群既包括中原古代人群、山西陶寺古代人群、秦始皇陵劳工人群，也包括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以及古代鲜卑人群乃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人群，这些古代人群整体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然后，用这8个古代人群的基因型与现代汉族的24个群体进行基因比对，寻找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群体在基因上的

异同，从而揭示汉人的形成过程。

学者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而且都有一些个体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基因型，与其他现代族群不共享基因型。这说明什么呢？那8个古代人群都与现代汉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历史上汉人形成的洪流。比如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他们有共享基因型的个体都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同一基因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确实对汉族具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第二个发现是，中原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最高，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也较高，而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古代人群和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较低，鲜卑人群、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则最低。看起来，距离越近、年代越近的古人群，对汉人形成的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远、年代越远的古人群，影响就越小。

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对于汉人基因贡献较大的事实，佐证了我们前几章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南西伯利亚人群南下、东进，引发由西向东的族群迁徙，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然后，匈奴与秦汉又开启了西进的浪潮，并把西北地区的氏、羌等族群纳入自己的体系。可以想见，有大量的西北古代族群先后融入华夏族群，他们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给了后来形成的汉人族群。

即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综合来看，汉人群体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距今3000年前左右，中原古代人群在基因结构上就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很相似了。四面八方的古代人群对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基因贡献，当然这些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也存在很多基因差异。

更进一步说，汉人族群的前身华夏族群显然也是融合了中原地区乃至周边很多族群而出现的。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华”和“夏”分别代表不同的古代人群。在史前时代的冰期和间冰期，北方草原带族群南下，南方族群北上，最终在中原地区相遇，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族群的熔炉，华夏族群的诞生，就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

什么是克里奥尔化呢？

这本是一个语言史上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

其他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经过第一代移民的打拼之后，殖民者在美洲生育了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有着欧洲族群的基因，甚至还有着非洲黑人族群的基因，却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学习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来源背景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也各有不同。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孩子会创造性地进行交流，既使用从自己父母处学来的语言，也从同伴那里借来词汇，他们甚至还集体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最终，这些殖民者后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克里奥尔语，而在美洲说克里奥尔语的人群，就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在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甚至还形成了克里奥尔地方菜，以大米、西红柿、秋葵、海鲜等为食材，辅之以重口味的辣椒调味。

当东南西北各方人群纷纷迁入中原地区时，东亚版本的克里奥尔化就启动了。各种语言交融在一起，最后酝酿出一道“克里奥尔大菜”——原始汉语。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说原始汉语的这些人，也交融了各自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就形成了华夏族群，此后汉人族群的核心。

从华夏族群演进到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汉人族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根据地，但即便在这个区域里，也长期是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农耕人群占据了适合开垦的平原和谷地，修筑了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邑。在商周时期，这些农耕区域如同岛屿一样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上，而远离城邑与农田的山岭丛林，则是狩猎采集人群、畜牧人群的家园。比如郑国、卫国以及鲁国的周围，就生活着很多戎人部落。郑国曾经被太行山里的北戎侵扰，卫国更是在戎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多次迁都，最后跑到了今河南濮阳，但是都城外面就有戎人居住。

对于春秋时期及以前的中原地带，我们可以戏谑地描述为“牧区包围农区”。

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

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

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

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

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遗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

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2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

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谈到汉人的南迁，最具代表性的南迁人群莫过于客家人了。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由于客家人在中国重点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靠近沿海，因此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大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祖先的后裔。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客家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想必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在从北方地区南迁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与大自然、与周边敌对族群的抗争，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提高本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客家人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的客家男子148人的样本，以分析客家父系遗传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人的父系祖先主体是来自汉人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畲族、侗族的先民，他们的基因也融入了这部分客家人社会之中。

但是，汉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全国各地的汉人族群在基因上也有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源自哪里的汉人呢？在这次研究中，分子生物学家把汉人族群分成了中原组、华东组、湖广组和西南组。福建的其他汉族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湖广组，而长汀的客家人群体则属于中原组，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也有少量客家人的父系祖先是来自畲族、侗族先民的。

畲族是南方一个很复杂的族群，关于他们的起源学者们仍然议论纷纷。相对来说，他们与苗瑶族群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人猜测，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扩散的苗瑶族群分化形成的。而客家人在基因上也与苗瑶族群接近，应该是客家先民吸收了部分畲族先民的结果。

从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判断，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

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的。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那么他们的母系遗传是不是也以中原移民为多呢？

线粒体DNA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有趣的一幕。客家人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客家人群体中大概20%的女性有这种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假如这批客家人的最初先民都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后来增加的变异都来自苗瑶族群（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把苗瑶族群的变异比例设定在40%），那么客家人群体从10%的变异比例上升到20%的变异比例，要融入多少苗瑶族群的人口呢？

由于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如果客家人从中原走出的女性有1000人，其中10%的人有这种变异，就是100人。需要融入500个苗瑶族群的女性，她们有500乘以40%即200人有这种变异，这样整个融合的族群就是1500人中有300人是含有变异的，刚好是20%。上面的计算意味着，客家人女性先民中，有大约33%的女性先民是来自苗瑶族群的。

实际上，考虑到畲族女性中这种变异比例只有15%，比20%还要低，畲族先民与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先民有明显的族群融合，我们可以猜测，客家人先民的母系遗传比例中，来自非中原汉人群体的女性可能会占到一半左右，甚至更高。

更广泛的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测的比例。从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看，梅州和长汀客家族群中拥有南方地区一些基因型的比例在60%左右，在河源客家族群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了50%。相对于其他几个客家族群，河源客家族群与北方汉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更近一些。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客家族群的母系基因型存在着差别，也就是说，虽然客家族群都吸纳了很多南方地区族群的女性，但是不同客家族群吸纳的南方族群女性也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客家族群面对的南方其他族群是不同的。

客家人虽然数以千万计，但相对于今天南方地区的汉族人口来说，仍然是少数。通过客家族群基因发现的那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更广大的南方地区汉族群体。通过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的基因对比，分子生物学家发现，整体上南方汉族的父系结构与母系结构不太一样。从Y染色体基因

或者说父系上看，南方汉族男性与北方汉族男性的分化并不明显，南方汉族的男性主体上应该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而形成的。从线粒体DNA或者说母系上看，南方汉族女性与北方汉族女性的分化很大，南方汉族的女性中，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祖先的基因更多一些。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今天的北方汉族群体和南方汉族群体，有点儿像“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父亲”（父系祖先）是相同的，即北方汉人男性；他们的“母亲”（母系祖先）是不同的，北方汉族群体是北方汉人女性祖先的后代，南方汉族群体大部分是南方非汉人族群女性祖先的后代。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描绘汉人南迁的故事梗概了。中国历史上，从北向南有三次很大的移民潮，即西晋灭亡前后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以及辽金侵宋时期。在几次政局动荡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汉人族群被迫向南迁徙避祸。由于前路艰难，前途未卜，汉人族群的南迁以男性为主，毕竟在古代社会，男性是强壮的劳动力、战斗力。汉人南下后，在与南方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把很多对方的女性纳入自己的社会。这个过程也许是通过族群之间的联姻或通过族群战争抢夺人口实现的。面对在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上落后于自己的南方族群，南迁的汉人族群终于打开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最终反客为主，变成了南方地区最大的族群。汉人男性则尽力延续了很多北方的族群文化，在族群基因交融的同时，相对维持了北方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化基因。

只是如果我们强调基因细节的话，那么南方汉人族群中的男性的确是“客”，这些族群中的女性大部分其实是“主”，南方土生土长的主人。

藏彝走廊：翻越山海遇到谁

古代汉人既不是唯一居住于北方地区的族群，也不是唯一南迁的族群。正如上一章涉及的，氏羌族群的一部分走向了高原，成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南下，成为今天云南很多民族的祖先之一。

以语言来划分人群的话，氏羌族群是今天庞大的藏缅语系族群的重要祖先之一。藏缅语系族群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言大类，包含300多种语言的群体。今天，说藏缅语的人群广泛分布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覆盖了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家。在中国境内，藏缅语系族群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和湖南等省份。如果按照现代民族的划分，藏缅语系族群包括藏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羌族和普米族等各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

氏羌族群的大规模西走南下，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其标志性事件可能要算秦穆公的“称霸西戎”。

秦穆公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文公重耳，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位春秋霸主。可是，在秦穆公的时代，任好的女婿重耳把晋国治理得很强大，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函谷关、崤山以西，向东半步都困难。秦穆公不得已向西发展，消灭了很多戎人部落。连周天子都惊讶于秦国西进的胜利，赏赐秦穆公以金鼓，鼓励他在扩张周朝影响力方面的巨大贡献。不过，如果当时的周天子知道后来灭亡东周的正是强大起来的秦国，该做何感想呢？

秦穆公向西扩地千里，对于原本生活在那里的氏羌部落却是一场灾难。这些从事游牧、畜牧的部落迁徙性很强，为了躲避秦国的兵锋，开始四散奔逃。大批藏缅语系族群的氏羌先民沿着所谓的藏彝走廊南下到四川、云南等地。地理上的藏彝走廊“北连甘青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

基因研究发现，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与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南迁的模式很像。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Y染色体基因与北方人群非常接近，这说明从父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确来自北方地区。藏缅语系族群的线粒体DNA却与南方人群、北方人群都有很大的差别，是南方人群与北方人群的混合。从母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祖先既有北方人群，也有南方人群。

不过，与汉人南迁不同的是，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形成了许多族群，这可能是因为氏羌族群原本就很庞杂，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鲜明的差别，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成族群的克里奥尔化，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和文化。所以，不同的部落分别南迁后，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最终演化成不同的族群。此外，相对来说，南迁的汉人群体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有着较大的人口和技术优势，而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这种优势并不大，因此会受到南方部落较强的影响，不同的藏缅语系族群产生分化。

比如今天的彝族，从基因上看，不同地区的彝族群体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的分支。再如纳西族，不论是父系基因型还是母系基因型，都混合了相当多的南方人群基因，这说明纳西族祖先在南迁时，与南方当地部落有更多的通婚交融。

南迁藏缅语系族群混合南方人群基因的比例，还与他们的祖先进入南方的时间和周边部落的情况有关。

从历史上看，云南南部的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以及湖南的土家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他们的祖先可能更早进入南方地区，而云南西北的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的祖先南迁比较晚。正好基因对比表明，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有比较高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而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较低。基因学与历史学很好地吻合在了一起。

更为有趣的是，从线粒体DNA上看，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北方人群，而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南方人群。这似乎暗示，氏羌族群在南迁的时候，最初可能是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整个族群一同迁徙的，并不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女比例接近。作为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和畜牧部落，氏羌族群的女性同样可以跟着大部队，赶着牛羊一起行进。相对来说，汉人这样的农耕族群在迁徙时，可能就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多女少。

所以，比较晚近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北方人群的比例更高。随着与南方人群的长期融合，比较早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南方人群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婚配规律来说，女性更容易嫁入非本族群的社会中，流动性强，而男性要想融入非本族群的社会却很难，在族群间的流动性弱。这就造成了南迁藏缅语系族群在基因上也呈现出“南客女主”的面貌，只是过程与汉人南迁有所不同。

反过来讲，女性在各个族群间的流动性强，因此历史上也必然有很多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外嫁到南方当地族群中去，给当地族群的基因库中注入北方人群的基因。翻越一道道苍茫大山，蹚过一汪汪涟漪海子，藏缅语系族

群的男女都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千面百越

南方地区曾经是现代智人最早进入中国的区域，最晚在3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在南方的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中栖居了。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南方地区的先民最早驯化了水稻，猪和狗的驯化也主要是在南方地区进行的。当文化之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良渚文化如同一座高峰屹立在四五千年前的江浙地带。按照史家定义的“春秋五霸”的一个版本，继齐桓公、秦穆公和晋文公之后，第四霸主和第五霸主并非中原豪强，而是在南方江浙水乡崛起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所以，当古代汉人和氏羌族群开始南迁时，南方地区并不是中原史书中所描绘的蛮荒之地，而是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悠久文化与漫长历史。比如南方地区的腹地湖南中部一带，一直流传着梅山文化，也就是蚩尤文化。相传这位与黄帝、炎帝上古大战的部落首领最终败退的地点就在那里的大熊山，炎黄的追兵赶到此处后，发现山岭险峻、野兽出没，恐怕中了埋伏，于是不再追杀蚩尤。按照古书的描绘，梅山地区生活着九黎、三苗以及他们的后裔。在两汉三国时期，湖南也有长沙蛮、武陵蛮活跃。

对南方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族群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整体性族群名称，莫过于百越。百越族群最为有名的历史发生于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败了宿敌吴国，然后挥师北上，与中原齐、宋、晋、鲁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从历史上看，浙江、福建曾经是百越族群的政治中心，基因研究证实了史书的描述。在分子生物学家那里，百越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基因突变类型。根据突变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关系，他们发现，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拥有百越突变基因最多的是上海人和浙江人，比例达到1/4左右。这显然是因为浙江曾经是越国的大本营，而很多现代上海人来自浙江。然后，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广东、安徽、湖北、辽宁、江苏、江西、湖南、河南……呈现出以浙江为中心，沿着海岸线附近扩散的特征。

据此我们可以猜测，在汉人南迁的过程中，南方地区拥有百越基因的一些族群融入了汉人社会，然后再随着汉人的走南闯北，走向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带。

但百越并非南方地区唯一的本地大族群，与之裂土分庭的另一个本地大族群是百濮。

从语言上看，百濮族群与南亚人群的关系密切。从地理上看，百濮族群也

更多地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靠近南亚。早在汉人族群和氏羌族群南下之前，百越与百濮就在南方比邻而居，两者之间必然发生融合的故事，虽然故事的剧情并不一定是以和平方式展开的。

从地理分布上看，百越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北上时在东南沿海扎根的人群的后代，而百濮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内陆北上时在西南的山川里居留的人群的后代。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来说，他们确实是分为沿海和内陆两条主线北上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两条迁徙路线与百越、百濮族群的形成对应起来，跨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南方不同族群之间也有着复杂的交流和融合，就像北方汉人也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族群经过克里奥尔化后形成的那样。

也许我们能说的是，百越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沿海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而百濮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内陆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的基因。

有一条线索值得深思，那就是在东北亚的一些现代人群中，居然也含有一些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竟然有30%以上带有源自百越的特殊基因，甚至日本人中也有少量比例的百越特殊基因存在。这当然不代表东北亚的一些人群以及一部分日本人是百越族群的后代，他们拥有共同的特殊基因，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从现代智人中的“海岸暴走族”那里继承了相关基因，那批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抵达过日本，也抵达过东北亚。这条线索暗示我们，最初的百越族群有可能确实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

从历史、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分析，在南方地区的本地两强博弈中，百越更占上风。从基因表现上看，起源自百濮族群的那些人群中，较为强大的分支往往拥有更多百越族群的基因；相对弱勢的分支，很少有或者没有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一些东南亚地区的百濮族群的后裔分支，他们融入了不到10%的少量百越族群基因；像百濮族群后裔布朗族、佤族等分支，他们的人口规模较小，体内没有发现百越族群的基因。

另一条有趣的线索是，从语言上比较，百越族群和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很接近，这暗示两者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群体。

关于最早来到台湾的是什么人群，曾经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2000年前琉球古人南迁而来，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来自东南亚群岛上的古人，第三种说法认为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南方古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3万年前“海岸暴走族”出色的迁徙能力，说不定现代智人在进入中国境内的那段时期，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台湾。只是这个猜测并没

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支持。好在台湾一些古代遗址中有古人遗骸出土，能够提取基因进行分析，现代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因也可以用于对比研究。根据基因的研究，上面那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台湾古人来自中国南方的观点被证实了。

台湾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如邹人、雅美人和卑南人，都拥有一种特殊基因，这种基因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包括几千年前的陶寺遗址中的古人体内，以及沿海地区的汉族群体、内陆地区的苗瑶群体，乃至西北地区的群体中。唯独在东南亚群体中没有发现这种基因。据估算，这种基因出现在距今2.6万年前的长江流域，应该是现代智人进入中国大陆后才突变产生的基因。这表明这部分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南方迁入台湾的，并不是直接从东南亚漂洋过海而来的。

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中，很多都有和距今1800年前台南遗址出土的古人相同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中国大陆的分布频率更高，在东南亚则较低，这同样佐证了早在1800年前的台湾古人就是其大陆祖先的后代，而且还不断繁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了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

1800年前甚至更早，正是百越族群在南方地区肆意攀登每一座山岭、走遍每一片山林的时代。古人向台湾的迁移应该有很多次，那些跨过台湾海峡的先民中，想必也会有百越族群成员的身影吧。

南国诗篇，铁血铸就

汉人族群和氏羌族群史诗般的南迁，用差不多千年的时光，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经济、人口“北强南弱”的格局，到唐代后期，在北方遭受安史之乱的巨大打击时，南方在经济、人口方面已经不逊色于北方了。经历短暂的唐末五代的混乱，中华大地迎来宋朝，南方甚至已经开始领先于北方，不论是经济还是人口。比如根据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统计，南方的户数为387.4万，已经达到全国总户数的60%，实现了对北方的彻底反超，从此之后北方再也没能夺回人口的优势。

在战乱的威胁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成为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如果南方本来就具备养活那么多人口的自然条件、增长潜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拨又一拨的北方族群南迁，才逐步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呢？

学者们认为，答案在技术和物种上。北方农耕社会积累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随着南迁人群被带到了南方，从而把南方原本的农耕潜力挖掘了出来。再加上宋朝时期从东南亚引入了高产的占城稻，优质的农作物品种让农民们如虎添翼。

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只是如果我们从基因的线索重新审视南方崛起的现象，会有更加细节的甚至是稍有不同的解释。

学者们往往把万年以来人口的增长归因于农业的进步，但我们的基因不这么坚信。从全球人群的线粒体DNA的基因型数量看，世界人口的母系大扩张最早发生于距今1.5万年前或稍晚一点儿，但是肯定比最早的农业出现的时间早。

所以，农业起源的故事版本应该修改为，人类社会先是出现了较大幅的人口增长，在人口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开启了农业，随着农业的进步，人口也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一次人口增长，而不是农业。

为什么在1.5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次人口增长？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当时正处于冰期即将结束的日子，很多部落可能丧失了迁徙能力，他们只能固守原地自力更生。在过去狩猎采集的日子里，部落成员往往聚少离多，尤其是男性狩猎团队外出一次，也许要几天甚至更久才回来。正是因为冰期中他们被迫定居，较多的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男欢女爱引发了一次人口快速增长。

按理说，在女性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男性人口也在快速增长。按照人类

生育的自然规律，母亲们生男生女的比例大概是106：100，如果有206个新生儿降生，其中会有106个男孩、100个女孩。男孩出生数量比女孩稍微多一点儿，这是因为在卵细胞受精过程中，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比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稍占优势。

然而，Y染色体基因研究让学者们大跌眼镜。从父系追踪全球人口增长，会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群在距今6500—2000年前经历了明显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增加了10~100倍。人类人口的男性快速增长期与女性快速增长期并不一致。

从基因型数量来看，亚洲地区女性人口急剧增长最早发生在距今3.5万—3.3万年前，这个时间刚好是现代智人已经在南亚、东南亚扎根已久，准备向北进军东亚的时刻，反映了那个时期亚洲人口大爆炸。显然那个时候，男性人口也经历了急剧增长，但是并没有反映到基因型数量大增上。从人口增长率上看，女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距今11000—9000年前，这与大冰期结束后全球温暖期到来以及农业已经开始发端是一致的。男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却是距今3300—1500年前。

既然男性、女性的人口增长应该是同步的，那么为什么基因显示却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呢？

我们不能只考虑出生率，还要考虑死亡率。

在狩猎采集时代，男性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狩猎固然能够让男性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浪漫气息，攻击性弱的猎物跑得飞快，攻击性强的猎物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反噬，足以让孔武有力的男性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并不会每天都背着梅花鹿、野兔回家，自己的女人煮好了果蔬汤，在家门口等待英雄凯旋。狩猎采集时代的家庭主妇想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自己的男人今天打到了什么好吃的猎物，而是自己的男人今天能不能平安归来。

即使是农业时代开启很久，人类社会仍然高度依赖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来养活人口，男性的死亡率仍然远远超过女性的死亡率。这就是几万年来现代智人在地球上大扩张，而从基因上看，女性基因型增加了很多，但是男性基因型迟迟没有多少增加的原因。很多男性没等到把自己的基因型传递下去，就已经死去了。

距今3300—1500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男性基因型出现了大增，这代表着男性人口快速增长，当然也代表着女性人口同步快速增长。这个时间正是中华大地掀起南迁大潮，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上升的时代。除了农业技术越来越进步，农作物品种质量更好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让南方

崛起呢？

男性基因型大增，说明男性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让男性更多地俯身躬耕于田野，而不是张弓搭箭于丛林，远离了狩猎活动，他们的死亡率自然就下降了。对中国南方地区来说，农业能够大发展、人口能够激增，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铁器的使用。

对南方地区来说，开展古代农业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平原少、农作物产量低，而是南方的气温和降水量非常适合植被生长，肆意蔓延的野树、野草、野花会迅速吞噬古代先民辛苦开辟的那一小块田地，让他们的庄稼难以生长。

人们习惯上把原始农业称作“刀耕火种”，通过焚烧丛林来开辟田地。这种方式其实只适合北方较为干燥的地区，在南方地区很难推广。在古代，把树林点着并不容易，潮湿环境中活着的树木水分很多，难以点燃。因此，古人必须先把树木砍倒，让它们死掉，水分蒸发后，才可以放火烧出一块田。

但是，在锋利的青铜刀斧和铁制刀斧发明之前，用石斧砍树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人曾经在亚马孙雨林做实验，让原住民使用石斧砍树，结果砍倒一棵直径1.2米的大树，花费了115个小时，相当于每天8个小时连续砍了两星期。以这个速度在雨林中砍出一亩地，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别忘了，半年时间足够长出很多新的灌木了。使用铁斧，原住民用3个小时就把大树砍倒了。如果要砍出一亩地，他只需要一个多星期就能完成工作。实际上，亚马孙人是在欧洲人把铁斧传输到美洲后，才开始了刀耕火种、定居生活的。在此之前，他们基本上依赖狩猎采集获得食物。

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是类似的。只有铁器技术普及后，南方地区的农田开垦才能迎来新的时代，铁器不仅可以用来开垦出田地，而且可以用于锋利的耕田工具的制造等。

冶铁术最早产生于西亚，对，又是西亚！具体的地点可能是在高加索山脉一带。历史上，西亚的赫梯人是确凿的铁器族群，他们也努力保守先进的技术秘密。随着3000多年前赫梯帝国灭亡后，工匠四散，冶铁术迅速传向欧亚大陆各地，包括古代中国境内。新疆和甘肃都发现了3000年以上的铁器。不过，铁器传入中原地区可能要到春秋时期了，很有可能也是通过草原之路输入的。到秦汉时期，聪明的中国先民发明了铸铁技术，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古代中国的冶铁术超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直到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一直领先全球。

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北方汉人、氐羌人群不断南迁，用先进的工具

开垦了南方的农田，刺激了南方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崛起。不论是南方原来的主人百越、百濮人群，还是北方来的客人汉人、氐羌人群，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改变，让他们的男性成员的死亡率都大大降低了。

也许有人会说，铁器技术也刺激了武器的进步，战斗中死亡的男性也增加了。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基因型的变化看，战斗中死亡的数量显然影响有限，并没有阻挡男性死亡率下降以及粮食增产带来的人口大增长趋势。其实，在铁器时代之前，人群之间的杀戮也一直存在，阿尔卑斯山中发现的4000年前的“奥兹冰人”，就是被同类杀害后冰封于山中的。

伴随铁器南下的还有语言与文化，族群的南迁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还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南下族群的Y染色体与其语言的传播有着同步的现象，而线粒体DNA却与语言的传播没有明确的同步联系。这正是本章屡次强调的“男客女主”的迁徙模式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同族群男性固守的根脉，他们很难融入其他族群，而不同族群的女性却容易跨族群融合，同时也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所以，虽然我们把自己讲的语言说成“母语”，但从基因的角度看，我们的语言其实是“父语”，是一代代的父亲把语言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壮阔的南迁史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父辈的坚守和母辈的包容。

小贴士 中国家犬的迁徙往事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家犬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狗是作为肉食而被饲养的。那么，中国家犬是如何从长江流域扩张到整个东亚，甚至奔向更远处的呢？

中国学者对比了26例古代家犬线粒体基因数据，发现其中的2/3都属于一类单倍型，从长江流域一直分布到黄河流域的中上游，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田螺山遗址中的家犬即属于此类，这个遗址所在的区域很可能是这类古老家犬的诞生之地。基因分析表明，大概在距今75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犬有一次明显的种群数量激增过程，这类家犬迅速占领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广阔天地。狗的数量增加和扩张，暗示了人的数量的增加和扩张，应该都是农业发展、粮食增加带来的结果。

此后，这类家犬又扩散到中国南方地区，甚至走向了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大陆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最远到达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和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岛。这样的迁徙路线和我们在下一章谈到的南岛语系族群的扩张路线十分吻合，古人是带着心爱的家犬一起远足的。

距今7000—2000年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至少生活着4类单倍型的家犬，上面谈到的那种单倍型是最主要的类型。然而，今天却是另一种单倍型的家犬占据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2000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家犬经历了一次“狗群更替”。

结合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群体的南迁历史，我们可以推测这次狗群更替的剧情。2000多年前的南方大地上，百越人、百濮人饲养着自古以来的那种主要类型的家犬，而北方地区的家犬在基因型比例上已经有了改变。然后，汉人族群以及藏羌族群带着自己北方的独特基因型家犬南下，他们的农业技术更加先进，因此有更多的粮食来喂养人口以及喂养家犬。最终，来自北方的家犬取代了南方的家犬，构成了南方地区新的主流狗群。在南方地区狗群更替之前，昔日的主流家犬已经扩张到了海外，所以今天中国的家犬基因型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乃至太平洋岛屿上的家犬基因型有着明显的不同。

狗果然是人类的好朋友，两者结伴而行几千年。只是狗的迁徙与人的迁徙在性别上不太一样。那些以男性为主体南下的汉人群体在带着狗一起走时，可能并不会对狗的性别有明显的选择，因此南下的狗群中，可能雌性与雄性的比例是符合自然比例的。如果说今天南方地区人群的祖先是“男

客女主”的，那么今天南方地区的狗群的祖先则应该是“雄客雌客”的，基本上都来自北方。

第八章 跨越沧海——驶向远方的基因之舟

复活节岛孤悬在南太平洋的碧波中，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有2000多千米，距离最近的大陆海岸线有3500多千米。鸟瞰该岛，可以看出这个三角形的岛屿的三个角实际上是三个大火山喷发形成的，在大火山之间还分布着一些小火山口。复活节岛完全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1722年，荷兰航海家在西方复活节那天发现并登陆该岛，因此将其命名为复活节岛。当地原住民则对该岛有自己的称呼——拉帕努伊岛。拉帕努伊岛上矗立着巨大的石头人像，为这个岛屿添加了神秘的色彩，并被世人津津乐道。实际上，“拉帕努伊”的原住民语言含义就是“石像故乡”。

拉帕努伊岛上的原住民属于航海族群——波利尼西亚人，也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人发现该岛之前，曾经有美洲印第安人融入当地原住民之中。从语言学分类来说，岛民们属于南岛语系族群中的一员，南岛语系族群生活在分散于整个太平洋的大量岛屿上，他们说着相近的语言。在欧洲殖民扩张活动开始之前，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言。

波利尼西亚人、南岛语系族群源自何方？拉帕努伊岛原住民来自何方？他们与万里之遥的中国有没有一丝丝联系？这些问题最终都要靠基因研究来提供答案。

从婆娑宝岛到大洋孤屿

今天的南岛语系族群总人口达2.5亿，地理分布极其广阔，最东边抵达东南太平洋中的拉帕努伊岛，最西边生活在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向南到达新西兰，向北则分布在中国台湾，他们的分布范围东西跨度超过了地球周长的一半。面对如此广布的海岛人群，他们的起源和迁徙历史吸引了各个领域的学者要一探究竟。

拉皮塔文化是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史前文化，分布于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西部，活跃时期在距今3500年前，这些古人会制造绘有复杂图案的陶器，以及用贝壳制作一些饰品。他们曾经驾着独木舟，勇闯整个太平洋。今天分布在太平洋海岛上的岛民们，很多都是拉皮塔人的后代。

拉皮塔人曾经在距今3000年前抵达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的瓦努阿图，今天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国。过去的理论认为，拉皮塔人是从澳大利亚大陆、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启航，向东迁徙到瓦努阿图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后来，科学家从瓦努阿图的考古遗址中找到了古人遗骸，能够用于基因分析。他们对比了来自亚洲、大洋洲总计80多个族群近800人的DNA样本，结果发现，瓦努阿图古人的祖先与亚洲族群基因联系紧密，特别是与台湾族群的联系更近。基因研究一举推翻了瓦努阿图古人来自澳大利亚大陆的猜想，证明他们来自亚洲。

基因描绘的拉皮塔人航行路线是这样的：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从树影婆娑的台湾岛出发，跨过台湾岛与菲律宾群岛间的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群岛，然后继续南航，到达了一个比较大的岛屿——新几内亚岛，这个大岛如今行政区划一分为二，东部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属于印度尼西亚。在拉皮塔先民来到这个太平洋第一大岛时，岛上已经生活着古巴布亚人，如今南太平洋的人口中，有1/4有着巴布亚人的基因。按说两个族群相遇，应该会发生基因融合现象。然而，奇怪的是，瓦努阿图古人基因中，几乎不含有任何巴布亚人基因。也就是说，那些从台湾岛一路南航而来的拉皮塔先民，并没有与岛上原住民发生什么情感关系，而是毫不留恋地从新几内亚岛北岸掠过，向东前往所罗门群岛，然后继续向广阔大洋中的岛屿迁徙。

学者们把以拉皮塔先民为代表的南岛语系族群的迁徙总结为“快车模式”，他们更像是一种海洋上的游牧族群，他们发现一个海岛，生活若干代，把上面容易获得的资源消耗得差不多时，就乘船离开，寻找下一个海岛，就好比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从一片草原游走到另一片草原。他们并不习惯于

像巴布亚人那样从事定居农业，因此，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让两者没有发生什么浪漫故事，没有基因交流。

有趣的是，另一项基因研究对拉皮塔先民的起源地问题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这项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基因，而是猪的。

考古学家发现，拉皮塔先民虽然是航海族群，但同时也是擅长养猪的族群。人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海洋中到处都有鱼，只要擅长捕鱼，就不会缺少肉食。其实并非如此，正如大陆上很多地方并没有野兽供人们狩猎一样，海洋里也有很多地方并没有鱼类生活，或者鱼类资源十分缺乏。鱼类在海洋中的迁徙有相对固定的路线，有特定的生活区域，在路线与区域之外的海域，就如同大陆上的荒漠一样贫瘠。遇到这样的海域，拉皮塔先民的养猪技能就无比重要了，能够给他们补充食物，特别是珍贵的肉类营养。

而且，由于猪不会游泳，猪的太平洋之旅与人的太平洋之旅应当是重合的。科学家从太平洋不同区域采集了现代野猪的基因，许多岛屿上的野猪其实是跑掉的家猪的后裔。他们还采集了亚洲大陆上的一些野猪基因，以及博物馆中古代野猪牙齿上的基因。结果很神奇，所有这些地方的野猪都与越南的一种野猪有亲缘关系，这说明越南野猪是所有太平洋地区野猪的共同祖先。

野猪的基因是否证明了，拉皮塔先民最早的扬帆之地并不是中国台湾，而是越南呢？

几千年的太平洋岛民航海迁徙历史可能非常复杂。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可能有很多批航海人群都在尝试着向太平洋深处远航，寻找适合生活的海岛。这些人群中，有些运气很好，不断地找到合适的海岛定居，最终把基因传递给了现代岛民；另一些人群可能运气不好，在变幻莫测的海洋气候中彻底迷失，全部灭亡了，并没有把基因传递给现代人。猪的遭遇与人类类似，但是有些时候，即使岛民们离开了，或者全部灭亡了，说不定也会有跑到野外的猪存活下来，或者被后来更为成功的人群再次发现并捕获，它们的基因重新回到太平洋“岛猪”的大家庭里。

猪的基因研究还揭示，它们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扩散似乎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以新几内亚岛为中心，那里的猪可能是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从东南亚带过去的；另一个区域分布在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密克罗尼西亚的西部，那里的猪可能与拉皮塔人及其后裔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有关系。看上去，当拉皮塔先民掠过新几内亚岛时，他们没有带走岛民的基因，而是带走了岛民的猪。

这是什么情况？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可能拥有很多数量的猪，远比在大海上流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拉皮塔人多。也许拉皮塔人垂涎古巴布亚人的猪群，或者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岛民养的猪，或者趁人不备抢了几头猪就乘船跑掉了。

所以，拉皮塔先民从中国台湾启航，而他们的猪从东南亚的越南出发，在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上，人与猪相遇并结伴而行。这个故事是合理的。

另一个支持南岛语系族群起源于中国台湾的证据来自语言研究。由于海岛与海岛之间的地理阻隔，南岛语系这个大语言王国里实际上包含多达1200种分支，语言学家将其归类为10个语系，其中台湾少数民族中保留着其中的9个语系。正如基因多样性多的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那样，语言多样性多的地方，一般来说也就是语系的起源地。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台湾可能是南岛语系族群的发源地，或者至少是重要发源地之一。

根据这个证据，那些在太平洋岛屿上穿着草裙翩翩起舞的波利尼西亚男男女女，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与他们是亲戚。

我们从南洋来，到南洋去

拉皮塔先民的迁徙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与世界的族群交流是如此久远。那些从中国台湾扬帆远航的先民，只不过是以前中国为起点走向世界的各个族群中的一支而已。

提起东南亚，中国人往往会想到“下南洋”这个词语。“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称谓，特别指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中南半岛的沿海区域。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暴增，南方地区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南方人远渡重洋，到南洋去谋生和发财。

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看，他们先到了东南亚地区，稍事休整后，再北进东亚，进入中国。这些“海岸暴走族”构成了我们祖先中的大部分成员，我们基本上都是南洋先民的后代。

我们从南洋来，我们也到南洋去，“返程”的时间远比明清下南洋的时代悠久得多。

中国台湾只是南岛语系族群迁徙途中的一处中间站，他们的历史可以继续回溯到东亚大陆上。分子生物学家发现，南岛语系族群不仅与中国南方地区的侗傣语系族群在语言上接近，他们在Y染色体基因上也共享着特殊的突变基因。这种特殊的基因型最早出现在浙江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身上。另外，在福建发现的一具距今8400年前的古人遗骸上，分子生物学家提取到了基因信息，发现他与东亚中部和南部的人群亲缘关系很近，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泰雅人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东南亚各人群的关系较远。

多项基因对比和基因突变速率的研究发现，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应该生活在中国的江浙一带，然后从距今5900年前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南方的陆地和海洋迁移。

这些先民分化出了很多人群。比如在华南地区逐渐演化成侗傣语系族群，其中的一部分侗傣语系族群向东跨海，迁入了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后，南下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的东部，形成了前面谈到的拉皮塔文化，然后继续扩散到太平洋深处；另一部分侗傣语系族群沿着大陆南下，进入中南半岛，再进入印度尼西亚诸岛的西部，形成了马来人群。在距今2300年前左右，马来人群向东渗透到新几内亚岛，与古巴布亚人发生基因交流，然后也向太平洋深处扩散。

整个南海就好比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南下的侗傣语系族群或者叫作南岛语系族群沿着南海的东西两侧自北向南扩散，把南海及其周边变成了

亚洲的“地中海文明圈”。

基因告诉我们，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国江浙一带的古代人群有成规模地向华南以及东南亚的迁徙趋势。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生那样的迁徙？

在那个时期，北方的汉人族群还没有展开南迁之旅，因此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并不是在外族压迫下远走的。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正处于农业社会初现兴盛的时代，北方的粟、黍以及南方的水稻都基本完成了驯化过程，可以给中华大地的农民们提供更多的粮食。于是，很多适宜农耕的区域都出现了人口的较快增长，比如江浙地区就是水稻重要的早期驯化地之一，也是南方地区远古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所以，这次孕育了南岛语系族群的大迁徙可能是人口增长驱动的事件。

这个猜测得到了来自水牛的支持。前面章节我们介绍了黄牛起源于西亚和印度，在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广泛分布有黄牛了。水牛则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家畜，是耕种水田的主要畜力，在稻作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水牛可以分成沼泽型水牛和江河型水牛两大类，前者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后者主要分布在南亚和地中海地区。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沼泽型水牛。

沼泽型水牛和江河型水牛野生种类分化的时间要追溯到几十万年前，至少在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具体到沼泽型水牛的驯化时间，基因显示在距今7000—3000年前，最初的驯化可能是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驯化水牛沿着两条路线扩散，一条是逆长江向上游走，另一条是向南走。在迁徙的过程中，4100年前在长江上游，3300年前在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北部一带，发生了若干次驯化过程，而且在3300年前，沼泽型水牛出现了大规模扩张现象。

从沼泽型水牛的驯化地点、时间以及扩散路线看，与水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驯化以及扩散路线比较吻合，都是在长江下游得到驯化，然后向南方扩张。所以，在迁徙的路上，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们带着水稻种子、赶着水牛，从江南走向了华南、西南，走向了南洋。

当然，南岛语系族群南下的过程，并不是向荒无人烟的处女地的殖民，而是在外漂泊几万年的游子的“寻根之旅”，追溯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的祖先，他们是几万年前来自东南亚的“海岸暴走族”。因此，南岛语系族群回到东南亚，遇到的是一批长期居留在东南亚的“亲戚”，“海岸暴走族”的另一些后代。寻根的游子们可谓是“衣锦还乡”，他们给东南亚带来了珍贵的

农作物—驯化水稻，以及身强力壮的好帮手—水牛，很可能还有好吃的家畜朋友们—猪、狗，说不定还有家禽之一—鸡。

关于鸡的起源，在此我们要多介绍几句。西方人在圣诞节吃的火鸡起源于美洲大陆，我们姑且不论。普通家鸡是从自然界的红原鸡驯化而来的，对其起源地仍存在争论。考古发现，在距今3300年前的殷墟里就出土了鸡骨头，通过形态分析，证明属于家鸡。殷墟甲骨文中“鸡”和“雉”两个字的写法已经区分开，前者应该是指家鸡，用来食用和祭祀；后者应该是指捕获的野鸡。中国境内最早的可靠家鸡骨骼则出土于内蒙古，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也有学者分析了大量家鸡的线粒体DNA样本，从中找出了中国北方家鸡共有的基因型，发现这种基因型在中原地区的多样性最高，说明该基因型可能在中原产生，然后扩散到北方地区，时间在距今2500年前。有趣的是，《左传》中记载，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氏、邱氏斗鸡，这个时间和家鸡在北方地区扩散的时间很接近。

但是，相对于很多家畜家禽的驯化，这几个时间显然都太晚了，不太可能是家鸡最早的驯化时间。自然界的红原鸡主要生活在亚洲的东南部区域，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所以它的最早驯化可能与猪类似，先是在南亚印度河流域驯化，然后扩散到东南亚，被现代智人从大陆上带到东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又多次被驯化，品种最终定型。所以，当南岛语系族群衣锦还乡时，家鸡也衣锦还乡了。

从分布上看，南岛语系族群似乎更善于航海而不善于在内陆扎根，在东南亚的大陆区域，南岛语系族群分布十分有限，从语言和基因上看，主要融入了占族人群中。占族人群分布在越南的中南部，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占婆王国，是东南亚地区古老文明的缔造者之一。占族人群的线粒体DNA表明，他们的母系是由南岛语系族群与东南亚本地人群—孟高棉人群融合形成的；从Y染色体分析看，他们的父系来源复杂，有来自马来群岛、中南半岛甚至南亚的基因。历史上的占婆王国信奉印度教，与南亚联系紧密，有些宗教和贸易人员来自南亚。

南岛语系族群没能深入东南亚内陆地区，他们的扩张脚步也许是被本地孟高棉人群的强大实力阻拦住了。

日本人祖先的大陆故乡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在南岛语系族群把南海变成自家后院池塘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古人也掀起了跨海扩散的浪潮。

提起日本这个邻邦，中国人最常用的词汇就是“一衣带水”，意思是两个国家中间只有一条衣带那么窄的水相隔。从地理上讲，中国海岸线与日本海岸线之间隔着黄海、东海，大海并不狭窄，造成历史上两国民众往来多有不便。“一衣带水”更多地表达的是两国之间文化与思想上的亲近感。

当我们谈到古代两国之间的族群和基因交流时，“一衣带水”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面对大海，古人的航海能力有限，好在他们能够“以时间换空间”，他们有数千年、数万年的时光，可以慢慢探索，把宽阔的黄海、东海化作一衣带水。

古代日本列岛上的族群，几乎必然来自今日中国的版图。这是因为首先，日本列岛的东方和南方，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而西北方向的朝鲜半岛和东方的山东半岛距离日本近得多，朝鲜半岛的北方正是今日中国的东北地区；其次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旅程是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挺进的，先要经过中国境内，然后再跨海奔向日本列岛。

一谈到日本人的祖先起源，中国人往往会想到“徐福东渡”的传说。秦始皇派遣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寻求长生不老药。刚好日本在公元前3—前2世纪在族群上发生了一次巨变，于是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徐福东渡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的族群，改变了当时原始状态的日本。

不过，从现代智人的扩散角度看，中国与日本的族群联系远比秦始皇的时代久远。

几万年前，那些从东南亚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暴走族”并没有停下扩散的脚步，而是一路向北。在今天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有一条宽40多千米的对马海峡，海深只有数十米，在大冰期中，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很多，海底大片裸露，海峡变窄，当时的对马海峡对具有一定航海能力的古人类来说根本不是阻碍。“海岸暴走族”很可能抵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他们应该算是远古时代从中国到日本的第一批人群吧。

从出土的石器看，日本列岛上距今3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石器的类型主要是一些用于狩猎的工具。那个时期，正是山顶洞人在周口店龙骨山活动的日子。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这些日本早期古人类可能是在冰河时

代迁移过来的“草原狩猎族”，他们与山顶洞人的基因关系可能是比较近的，可惜科学家没能发现这些古人类的遗骸，无法使用基因手段来判断。

日本境内最早的古人类遗骸发现于琉球群岛，该人群生活的年代距今有1.8万年了，可惜这一人群同样没有基因分析，只能从骨骼形态上进行比较。考虑到琉球群岛地处亚热带，孤悬在日本本州岛以南至少300千米的大海中，在冰河时代琉球群岛与九州岛应该没有陆桥联系，地理阻隔严重，这批最早的古琉球人可能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他们是从东南亚经中国东南沿海而来的。

大概在距今16000年前，地球还处于末次冰期的时代，日本列岛上迎来了一拨新的古代人群。这拨古代人群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并能够制造草绳样花纹的陶器，因此被称为绳纹人，他们的文化则被称为绳纹文化。

这些绳纹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绳纹文化从距今16000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约2300年前，时间跨度长达万年以上，从古人类的狩猎采集时代过渡到了农耕时代。按理说，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日本列岛与邻近大陆的人群交流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但是，观察绳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农耕技术和合适的农作物，虽然看起来他们也曾经尝试着驯化野生植物，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可以想见，绳纹人迁入日本列岛后不久，末次冰期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连接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陆桥消失了。气候变暖的有利之处在于，日本列岛变得更加生机勃勃，适宜生存；不利之处在于，绳纹人所处的岛屿与大陆分离了，变成了大号的塔岛，绳纹人面临着塔岛技术悲剧的威胁，没有外来基因融入，也没有外来技术输入。

他们的命运会越来越糟糕吗？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绳纹人的基因吧。日本科学家曾经在北海道发现一具绳纹时代女性的遗骸。根据碳十四测年，她在距今3960—3550年前这个时间段去世，最有可能属于3800年前的人类。科学家从她的臼齿中提取了DNA进行分析，发现她拥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能够帮助消化高脂肪的食物。今天北极地区人群中有70%的人拥有这种基因。这并不是说这位北海道女性来自北极人群，而是说她与今天的北极人群有共同祖先。至少从这种基因来看，这位绳纹时代的女性应该来自亚洲的北部地区，她与今天生活在俄罗斯东部的原住民人群血缘相近。

这位女性的基因还表明，以她为代表的绳纹人群的祖先在距今3.8万—1.8

万年前与亚洲其他人群分道扬镳，独立进化了。所以，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分离的时期，这批绳纹人群的祖先通过朝鲜半岛迁入了日本列岛。

在日本福岛也发现了两具绳纹时代的古人遗骸，通过对从他们牙齿中提取的DNA进行分析，科学家发现这批绳纹人群与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群都存在很大的基因差异。现代日本人中，与这批绳纹人群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阿伊努人，其次是琉球人，再次是东京周边的日本人。

这个发现也许说明，绳纹人群在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是独立进化的，与大陆人群之间几乎没有基因交流，于是逐渐积累了很大的基因差异。

对于现代日本人Y染色体基因的研究，支持了这个猜测。学者们从300多个日本人体内提取了Y染色体基因，然后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比较，发现所有日本人都有一组非常独特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应该是从绳纹人群遗传而来的。

日本绳纹时代的晚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当时东亚地区正处于寒冷气候的笼罩下，当时的绳纹人群的人口急剧下降。学者们对拥有绳纹人独特Y染色体基因的人们的基因突变速率进行了计算，从而反推古代的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在距今3200—2000年前，绳纹人群的人口从高峰时期的约26万减少到8万。虽然比起岛上的几千人原住民的规模，日本列岛上的绳纹人群规模还算好，但是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绳纹人群的未来不容乐观，他们仍然会缓缓滑入塔岛技术悲剧的陷阱里。

气候变暖对于绳纹人群是“双刃剑”，气候变冷也是。就在绳纹人群苦苦挣扎的时候，突然之间，一群意气风发的“新”人类穿过陆桥赶来了。

人们很早就发现，古代日本在公元前3世纪发生了一次巨变，出现了新的陶器风格，青铜器、铁器突然出现了，并且人们开始种植水稻。由于代表这个“新”时代特征的陶器首先发现于东京一个叫作弥生町的地方，所以学者把这批新闯入日本列岛的人群称为“弥生人”，称呼其文化为“弥生文化”。

即使从体型和牙齿上，人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新来的弥生人与古老的绳纹人是不同的。弥生人的身材比绳纹人高大，从头骨看，两者相貌也有所不同。牙齿形态上，绳纹人以巽他型牙齿为主，而弥生人则是中国型牙齿。本书第二章曾经介绍，巽他型牙齿出现得早，沿着东亚的海岸线扩散；中国型牙齿出现得晚，在东亚、亚洲北部内陆扩散。

从基因上分析，现代日本的主体族群——大和人的基因中，有12%左右来自

古代的绳纹人，大部分基因来自古代弥生人。与大陆上的人群进行对比，会发现现代日本大和人群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人群基因较为接近。这些基因上的研究表明，弥生人的确是从亚洲北部、中国东北地区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

弥生人迁入日本列岛的时期，正是古代中国的一段激烈动荡时期，即从战国时期到秦末汉初。比如战国时期燕国曾经向东北方向扩张，挤压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各个部落，这些部落四散，有一部分就进入朝鲜半岛；秦灭六国时期，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有大量人口逃难；此后秦末动荡，《三国志》曾经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

相对于古老的绳纹人，弥生人在武器技术和生产技术乃至农作物方面，都占据很大的优势，很快就反客为主，在人口规模上超过了绳纹人。一部分绳纹人被弥生人吸纳进自己的社会中，还有一部分绳纹人且战且退，向北方寒冷的北海道岛方向遁走。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弥生人是种植水稻的人群，而水稻是中国南方地区的特产，所以弥生人的源头也许不在中国北方，而是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对于日本特有的两种水稻的基因研究发现，其中一种水稻并没有经过朝鲜半岛传播，因此只能是通过其他路径进入日本的。也许有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携带着水稻直接跨海抵达了日本列岛，说不定弥生人的祖先是南方地区的古人。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综合来看，弥生人来自北方的概率更大。

比如，在弥生时代早期，日本出现了小麦这种重要农作物，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长江流域还没有种植小麦，因此小麦只能是从中国北方地区输入日本的。可是，当时水稻在中国的分布却比小麦更广泛。我们已经知道，水稻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就已经在黄河下游地区得到种植了，在小麦输入前，水稻是北方农作物三强之一。山东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在历史上也长期种植水稻。日本农作物的输入路径，除了通过朝鲜半岛外，还可以从山东半岛输入过来。所以，日本水稻也许来自地处北方地区的山东区域，而非长江流域。进一步推论，也许有一部分弥生人是从山东半岛启程，跨海而来的。

有趣的是，动物学家发现，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狗和老鼠是在绳纹时代或更早的时期从亚洲南部起源和引进的，而在弥生时代或更晚的时期，日本西部地区出现了来自亚洲北部的狗和老鼠。绳纹时代的狗和老鼠，也许是更早的古人类带来并留下的动物；弥生时代出现的狗和老鼠，显然是弥生人从亚洲北部带过来的。

更有利的证据来自韩国的基因证据。一项对185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韩国人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中40%的人具有来自中国中原地区人群的基因，这说明韩国人祖先中来自中国北方的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外，在对马海峡靠近朝鲜半岛一侧的海岛上，出土了25具古人的骨骼，学者们提取了他们的DNA。这些人生活的年代大概在距今2100年前，基因显示他们与今天的韩国人、日本人关系密切。此外，这些古人还使用与弥生人类似的陶器。综合这些基因研究的蛛丝马迹，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弥生人祖先大概率是从中国北方或亚洲北部出发，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迁入日本列岛的。

除了大和一族外，日本还有人口很少的两类人群——阿伊努人和琉球人。阿伊努人与绳纹人在基因上更为靠近，所以属于被弥生人驱赶到日本列岛北方的后裔，当然，在2000年中，他们也会与弥生人发生一定的基因交流。琉球人与阿伊努人在基因上也较近，这说明琉球人也是绳纹人的后裔之一。不过，琉球人还与东南亚人群、台湾少数民族有相近的基因，这说明南岛语系族群在扩张的时候也影响到了琉球人。

所以，虽然水稻的输入略有疑云，但总体上看，弥生人的祖先应该是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人。更古老的绳纹人也主要来自亚洲东北部，只是陷入“孤岛”上万年，独立进化了。今天的日本人是弥生人与绳纹人融合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最大可能来自中国的北方地区、东北亚，来自一衣带水的邻近大陆。

古美洲人的亚洲血缘

“虽然亚洲与美洲是完全分离的，但是，中间只有一个狭窄的海峡；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东部的居民之间相似的外貌使我们产生一个猜测，要么前者是后者的后裔，要么后者是前者的后裔……”

1787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笔记》里表达了自己认为印第安人与亚洲人有血缘关系的观点。

杰斐逊的思考是合理的，美洲原住民不仅与亚洲东部人群有血缘关系，而且与中国古人类有确凿的血缘联系。

除了相貌特征相似外，人们很早就发现印第安人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的文化也很相似。比如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美国新墨西哥地区的克洛维斯遗址发掘出大量文物，尤其是数以千计的尖锐石器——“克洛维斯矛尖”。很多石制矛尖残留在猛犸象尸骨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另一处遗址中，一头猛犸象尸骨上竟然插着8个克洛维斯矛尖。

印第安人并不是使用这种尖锐石器的唯一人群，实际上，西伯利亚古人使用着与克洛维斯矛尖几乎一模一样的尖锐石器，这种石器技术应该是从西伯利亚传入美洲大陆的。

碳十四测年发现，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活跃在距今1.1万年前，而古人类迁入美洲大陆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目前估计可能在距今1.5万年前甚至更早，与绳纹人祖先迁入日本列岛的时代差不多，都在末次冰期的时代。寒冷的气候把地球上大量的水变成了冰，海平面大幅下降，于是杰斐逊描述的亚洲与美洲之间狭窄的海峡——白令海峡变成了一座陆桥，在距今3.4万—1.1万年前，这座陆桥基本上一直保持畅通。西伯利亚古人类追逐猎物一路向东，无意之中走入了美洲大陆。

我们知道，现代智人中的“草原狩猎族”擅长捕猎，他们沿着欧亚草原带一路东进，穿过天山、阿尔泰山中的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山顶洞人可能就是“草原狩猎族”的后代。可以想见，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和丛林中，长期生活着这些擅长狩猎的人群。那些继续追逐进入美洲大陆的猎人，就是“草原狩猎族”的后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与山顶洞人有着共同祖先；美洲大陆古人类的后代印第安人，也与今天很多中国人有着共同祖先，这一共同祖先就是“草原狩猎族”。

在亚洲北部贝加尔湖南部的一处远古遗址中，出土了距今1.4万年前的古人破碎牙齿样本，科学家成功地从牙齿上获取了古人的基因信息。分析发

现，那里的古人与美洲原住民拥有共同的基因成分，这说明两类人群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亚洲北部，分布范围很广泛，其中的一部分跨过白令海峡成为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仔细区分，美洲原住民的基因成分主要由两大古老人群基因组成，其中之一就是亚洲北部古人群，另一支则是古东北亚人群。这个距今1.4万年前的亚洲北部人群古人，与距今将近1万年前的东北亚人群的一个古人有共同的特殊基因，这说明亚洲北部古人群与古东北亚人群在狩猎采集活动中发生了较多的基因交流，使得进入美洲的那些分支人群携带了两类人群的基因。

根据在北美洲生活的原住民的基因分析，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很少的一群人，总数一二十人，今天美洲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在1.5万年的时光中，很多早期古人类没有留下后代到今天。考虑到这个因素，分子生物学家认为，最初到达北美地区的古人类可能只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因此，美洲原住民的基因多样性是非常低的，远远比不上人群混杂的欧亚大陆的人群，更比不上现代智人的故乡——非洲大陆的人群。

人数虽少，但美洲先驱人类显然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持续的勇气，支撑着他们跨过冰天雪地的白令海峡陆桥，那并不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当他们终于脱离了冰冻带，向南深入美洲腹地时，绵延不绝的北美大草原向这些勇士张开了热情的怀抱，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野兽就像是行走的肉罐头，等着他们去大快朵颐。

手握从亚洲家乡带来的尖锐石器矛尖，最初的美洲古人类度过了日日盛宴的快乐时光。只用了1000年的时间，他们就从北到南贯穿了美洲大陆。大陆上3/4的哺乳动物被他们杀死并吃掉了，其中就包括宝贵的马。

距今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北美地区就生活着一种上新马，后来演化成真马。然后，真马从北美洲扩散到了南美洲，也通过白令海峡扩散到了欧亚大陆。是的，欧亚大陆的真马是从美洲大陆跑过来的。留在美洲大陆的真马在距今10000—8000年前灭绝了，这个时间正是古人类在美洲大陆大扩张的时代。所以，基本可以断定，美洲大陆的真马都是被印第安人的祖先捕猎并吃掉的，正如欧亚大陆古人类一开始也是把马作为食物来捕猎的那样。只不过欧亚大陆上的马并没有全部被吃光，而是挺到了农耕时代和游牧时代，被驯化成了人类的好帮手。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带着战马进入美洲大陆，给美洲的几个文明古国致命一击。当时的美洲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见过这种高大神奇的动物，只是把它们都吃掉了。

比马更惨的动物是猛犸象，马好歹在欧亚大陆幸存下来，迎来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战马时代，而不论是欧亚大陆上的猛犸象，还是美洲大陆上的猛犸

象，最后的命运是一样的，它们被古人类全部杀死并吃掉了，彻底灭绝。

不过，猛犸象和真马在美洲大陆的消逝，那些闯入美洲的“草原狩猎族”后代并不是唯一要负责的古人类。他们很可能并不是美洲原住民的唯一祖先，甚至不是最早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最早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也许是现代智人中“海岸暴走族”的后代。

本书第二章介绍了学者把距今4万年前中国的田园洞人与今天美洲大陆的各个原住民人群进行基因比较，发现今天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最近。这个发现说明，美洲原住民并不是一次迁徙形成的。在远古时期，有一支与田园洞人血缘关系很近的现代智人，他们迁入了美洲大陆，并扩散到了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里。美洲大陆其他原住民人群的祖先来自其他的迁徙事件，因此与田园洞人的血缘关系比较远。

而且，田园洞人可能并非亚马孙人祖先的唯一远亲。另一项基因研究搜集了9个巴西原住民人群的DNA信息，并与美洲以外的200个原住民人群的DNA进行了对比。结果令人惊讶，一些亚马孙原住民人群拥有2%的大洋洲原住民基因，这些南美丛林中的部落竟然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和印度洋里的安达曼群岛部落有基因上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是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现代智人的后代，难道一两万年前，他们曾经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扬帆起航，跨过整个太平洋来到了南美洲？

考虑到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被困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少数几个岛屿上数万年，他们应该没有横跨太平洋的航海能力，亚马孙人体内的大洋洲原住民基因，只能是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而来。我们可以据此猜测，既然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田园洞人都属于“海岸暴走族”的后代，那么远古时代应该有一支“海岸暴走族”顺着海岸线挺进东亚，进而挺进亚洲北部，并跨过冰河时代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继续不断前行，最终到达了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这就是为什么亚马孙原住民人群体内会有田园洞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航海能力和迁移能力出众的共同祖先——“海岸暴走族”。

显而易见，那些“海岸暴走族”的后代很早就进入了美洲大陆，甚至可能比“草原狩猎族”后代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与后者类似，他们也曾经大量捕杀大型哺乳动物，因此也要为猛犸象的消失负一定的责任。

即便万年之中有若干次从亚洲大陆向美洲大陆的小规模人口迁移，哥伦布时代之前的美洲人仍是所有大洲中基因多样性最少的人群，他们的基因来自欧亚大陆基因库中分离出来的一小部分，虽然万年的美洲生活期间，他们也在进化，也在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己的基因型，但与欧亚大陆的亲戚相比，他们的基因型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如果有一种疾病能够给美洲的一个部落带来严重的健康损害，那么这种疾病很可能会给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带来损害，因为他们的基因型太相似了，一损俱损。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演进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殖民者带来了肆虐欧亚大陆很久的各种疾病，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在美洲大陆疯狂传播，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学者估计，1492—1650年，美洲各种流行疾病反复发作，导致美洲人口损失了50%~90%，不同学者的估算比例有所差别。欧洲殖民者能够迅速击溃美洲大陆上的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以及各玛雅城邦联盟，火枪和战马只能算是常规武器，欧亚大陆病菌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真正的大杀器。

所以，欧洲殖民者能够战胜美洲原住民政权的最大优势，并非技术优势，也非所谓的文化优越，而是他们体内的基因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体内的基因并不使他们比美洲原住民更聪明，大家都是现代智人，智商没有差别，而是使他们更容易抵抗病菌的侵害。

那些迁入美洲大陆的人群并非一去不回，他们也曾经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返回欧亚大陆，语言学家已经找到了西伯利亚中部原住民语言与北美原住民之间的语言相似之处，有些语言元素是从美洲先创造出来，然后传输回西伯利亚的。古人类的迁徙是毫无约束的，各个方向都是他们远行的目的地选项。那些又回到欧亚大陆的美洲先民，应该融入了当时的欧亚大陆人群之中。

不论是远隔重洋的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还是相距半个地球的亚马孙雨林原住民，都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基因上的些许联系。从基因上说，地球的确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基因交流，这种联系与交融从古至今，及至未来。

小贴士 复活节岛番薯疑云

中国人对于番薯有很多称呼，比如红薯、甘薯、白薯、地瓜等。如此繁多的称呼暗示了番薯传播到中国的路径可能是复杂的。番薯的故乡在美洲，番薯在几千年前就得到了驯化。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探险家把大量的美洲作物推广到全世界，其中就包括番薯。

18世纪的欧洲学者在复活节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欧洲航海家来到该岛之前几百年，岛上原住民就已经种植番薯作为粮食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是谁带过来的呢？

学者们不禁猜测，古代有美洲居民携带着驯化的番薯跨海来到了复活节岛，很久以前这种高产作物就在岛上落地生根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擅长航海，而且他们似乎对于航海也并不热衷。因此，还有另一个版本，复活节岛的岛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曾经渡海到美洲大陆去，带回了珍贵的番薯作物。

不论是哪个版本，都表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复活节岛与美洲大陆之间就曾经有人往来，这就使学者们对于美洲人都是通过白令海峡而来的观点有所动摇了。

对番薯的基因研究，拨开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疑云。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了近200份番薯的DNA样本，以及30多份番薯的野生亲缘种的样本。他们发现，与番薯亲缘关系最近的植物是大星牵牛，与牵牛花有点儿像。最迟在80万年前，番薯从大星牵牛物种起源了。复活节岛上种植的所谓波利尼西亚番薯品种，在距今10万年前就已经与美洲番薯品种分离了，也就是说，在现代智人还在非洲大陆内转悠的时候，番薯就已经走出美洲，传播到了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并独立为新品种了。所以，复活节岛上的番薯并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的，也不是岛民祖先往返美洲带来的，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美洲的番薯种子可能是被飓风、洋流或者鸟类输送到了太平洋岛屿上，独立演化成波利尼西亚番薯。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南太平洋时，随船携带的番薯其实是北美洲番薯品种，与南美洲的番薯品种不一样，今天太平洋诸岛上种植的番薯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北美洲番薯品种。

波利尼西亚番薯并不是大自然远程“快递”的唯一品种，生物学家发现，几百万年间，至少还有两种番薯属的品种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其中一种到达了夏威夷群岛，而另一种竟然通过波利尼西亚群岛跨越太平洋，再跨越

印度洋，传播到了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复活节岛番薯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语言学家又发难了。语言学家发现，波利尼西亚语中的“块茎”一词，发音上与南美安第斯山原住民的盖丘亚语的发音极为相似，这绝非巧合。

在古代，美洲大陆与复活节岛之间到底有没有过交流呢？

后记 走出孤岛，四海一家

基因一路流动，从祖先到你我。

祖先的很多基因仍寄居我们的细胞中，每一代的祖先也会“制造”（突变）一些新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在传承，也在进化。长达百万年的祖先进化与迁徙历史，宛如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基因之河，流过一年年春秋冬夏、东西南北。

倘若你问我：“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会反问：“你问的是何时何地的祖先？”

祖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古人构成的，每一代祖先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站在基因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祖先繁衍与迁徙的历史，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种“祖先层序”的思维来把百万年以来的各代祖先划分为若干层次（见下面图表）。

最远古的一层是第零祖先层，也就是直立人的时代。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直立人发展的后期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石器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复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

祖先层序

祖先层序	年 代	迁徙驱动力	扩张趋势
第四祖先层	4 000 年前至今	文明、文化	东西人群交互，北方人群南下
第三祖先层	10 000—4 000 年前	农业	农耕人群扩张
第二祖先层	1.9 万—1 万年前	渔猎采集	南方人群北上
萎缩期	2.65 万—1.9 万年前	严寒气候	人群向南方退缩
第一祖先层	5 万—2.65 万年前	渔猎采集	智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
第零祖先层	远古至 5 万年前	狩猎采集	直立人从西方进入东亚

东亚的直立人时代，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基因与技术交流细若游丝的日子。东亚直立人群体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孤岛中，与外界特别是欧亚非大陆的西部严重缺乏交流，几乎只能依靠最初带过来的粗糙石器技术，加以若干本土化技术改进，在几十万年中孤独地艰难生活，最终他们全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他们的基因之河断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没有留传给我们，所以我用“第零祖先层”来描述他们。

之后从距今5万年前起，东亚古人类进入第一祖先层，那是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的智人扩张时代是从南方拉开序幕的，然后南方与北方的现代智人祖先联袂上演了跷跷板式的迁徙大戏，中华大地变得热闹起来。智人个体和群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卓越的迁徙能力，不论是面对广阔的大海还是宏伟的山川，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和勇气去跨越阻隔，打破孤岛之魔咒。

在智人扩张时代，大陆上的地理阻隔已经失效，面对近乎空空荡荡的原野、丛林、山岭甚至近海岛屿，古老祖先的迁徙奏响了“填空模式”，智人的基因之河肆意漫流，冲向地球上每个适宜生存的角落。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或沿着海岸线暴走，从热带的南海海岸北进到温带的渤海湾，并深入陆地；或循着草原带的野兽脚印狩猎而来，从西到东席卷北方的山岗与平原……

严酷的盛冰期从距今2.65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1.9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熬过了盛冰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

温暖间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动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

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

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

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智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

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东亚的文化基因时代在文明的钟鼓礼乐声中翩翩而至。我们的祖先以中华大地丰厚的农耕社会为基底，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来自大陆西方的各种物产与技术，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建立与维系至关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然后再加以创新，终于奏响了中华大地独特的文明古国序曲。

文明的序曲并非中原地区的独奏，而是大江南北各个文明政权的合奏。每个政权固然是以某个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在族群交融如此频繁和充分的环境中，真正区分不同政权的并非族群的生物基因，而是他们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混杂的群体拥有近似的文化认同，从而构建了文化共同体——部族或宗族、政权或国家。他们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基因的交流，而是文化基因的交流与碰撞。

在第四祖先层的早期，由于草原带西部接触一些重要技术的时间略早，率先崛起，因此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流动、传输有自西向东的趋势。一旦东亚地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整合了内部之后，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以中原的秦汉王朝和东方草原的匈奴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帝国力量又开始自东向西扩张，把东亚人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输入了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汉人群体及其他区域性的群体如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人群，以庞大的农业人口优势向四周扩散，尤其是向南方地区挺进，把本群体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撒向南国，撒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屿，甚至跨海扬帆至星辰之下的大洋深处。

以上便是对积累于历史长河中的祖先层序的粗线条回顾，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祖先以及动植物基因中读出的“无字史记”的内容梗概。翻阅由基因写就的这本无字史记，中华大地上祖先的迁徙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我们这些后人能够从这本天成之作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

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人祖先的本土起源或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坚持中华文明的单纯的本土起源，但通过古代各个人群的基因比较，以及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可以推断，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来自非洲，然后四面八方各个古代人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中华文明既是我们的祖先立足东亚沃土辛勤耕耘、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大量外界的物产、技术乃至各种思想输入东亚，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那些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大洲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的边界，都是迟至几百年以来的近代逐渐定型的人为界线，并不存在于古代人群迁徙的路途上。古代人群并不会用近代、现代的界线“画地为牢”，限制他们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

其次，基因趋于天下大同，文化迈向美美与共。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决定古代各个人群基因交流的关键因素。直立人时代人口稀少，部落规模也很小，很多部落会在自然环境波动中自生自灭，他们比周围的灵长类如猩猩、猴子群体强不了太多。因此，远距离的基因交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散落在大陆各个角落的直立人大体上独立进化。认为各个大洲的直立人会迈着同样的进化步伐变成相同的现代智人的观点，不太可能是事实。

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张时，人口数量比直立人时代明显更多了，迁徙能力卓越的智人一路上甚至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进行杂交，更不用说现代智人不同群体间的杂交了。当农耕传播时代来临时，相

比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口数量有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加。不同族群间的基因交流更为频繁，昔日因人烟稀少而相对独立进化的各个群体，此时彼此交换着自己的基因型，于是不同人群之间在基因型上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以时日，全世界的人类在基因上将趋于天下大同。虽然人群与人群之间仍然会有分野，但这种分野主要是各自文化基因的差异，而非生物基因的差别。

最后，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

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没有科学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对祖先最大的不敬，莫过于认错了自己的祖先是谁，所拜非本尊。要清楚地知晓我们的直系祖先是谁，生命科学是最重要的工具，那隐藏在细胞中的肉眼不可见的基因上，镌刻着祖先的生命信息，那些信息把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血脉真正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商周的甲骨文中包括大量祭祀祖先的内容。可以想见，在商周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了对于祖先的尊崇意识和祭拜仪式。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悠久的祖先崇拜传统，源自古老的农耕聚落结构，是中国人独特的重要文化基因，区别于欧美古代文明圈流行的宗教传统。时至今日，对祖先的尊崇乃至祭拜，仍然是很多中国人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们生活与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精神园地。

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反对任何以基因之名打造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那些论调并没有科学依据。

所有的地球人都是现代智人，有着14万年前的共同祖母——线粒体夏娃，有着6万年前的共同祖父——Y染色体亚当。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人的共同祖先不会早于3万年前。要追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祖先，也许只需要把时钟向过去回拨几千年就能成功找到。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尽量避免使用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雅利安人种、尼格罗人种这类有着种族味道甚至种族歧视味道的词，除非引

用早期学者的观点的需要。因为这些词混淆了现代民族概念与古代人群称谓，它们往往是臆想出来的名词，并无基因科学的支持，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造成了干扰。本书在描述古代人群时，更多地用中性的大洲和大洲方位的地域名称来表示人群，比如“东亚人群”“草原带西部人群”。本书有时也会使用“氏羌族群”“藏缅语系族群”这类包含民族名称的词，这些词已被学者长期使用，它们要么是对古代人群的描述，不会引起古今混淆，要么是语言学的中性描述，不会引起种族歧视。

必须强调，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民族，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才出现的概念，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基因的产物。基因告诉我们，早在1万年前农耕时代来临时，生物基因意义上的族群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以“民族”这个几百年前学者构想出来的文化概念来向远古反向推演，认为人类几万年的迁徙历史中，数以千计的族群之间有着明确的基因阻隔，族群之间有着本质的基因差别，进而判定族群与族群在智力、文化上有高低之分，这些观点是毫无科学基础的臆想。

例如历史上，汉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匈奴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羌人也有自己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正是不同族群通过对各自祖先、神灵的界定和崇敬来强化的情感。这是历史形成的情感，并没有多大的基因依据。民族主义与族群情感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宣扬对外歧视，后者追求自我欣赏。

族群内部的自我欣赏只要不滑向对外歧视，就无伤大雅、无可厚非。只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自我欣赏的潜在危险——族群滑向塔岛技术悲剧。

在复活节岛的传说中，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位建筑师努库·柯胡，他是移民中唯一会建造房屋的人，跟他学习的移民都没有掌握建筑精髓，特别是没有学会如何盖屋顶，于是在努库·柯胡死后，复活节岛上的房子很容易被大风吹掉屋顶。离开故乡驶向复活节岛的航行中，努库·柯胡没有带上他的妻子同行，到了复活节岛后，移民却无力再回到故乡。因此，每当日落的时候，建筑师努库·柯胡就很悲伤，因为太阳落下的位置，正是故乡和妻子所在的方向。

由于地理阻隔，复活节岛、塔岛、日本列岛、澳大利亚大陆乃至中华大地、美洲大陆，在远古时代都曾经一度形成塔岛技术悲剧，令深陷其中的古人类、古代族群生计艰难。站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自然界的地理阻隔会把中华大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再次分开。但我们要警惕，那些族群内部自我欣赏所形成的某些消极的文化基因，会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制造新的阻隔。

比如，以独立自主产生的本土人群进化、本土文明起源为骄傲，以吸收外来人群基因和文化元素为耻辱，这种本族群“情感迷恋”是对纯正血统的迷信，是对自身文化的自大，在本族群、本国度与外部世界间人为制造障碍。

另一种让群体陷入封闭状态的文化基因是迷信丛林法则或曰黑暗丛林法则。这类法则的信徒们认定，他人就是地狱，别的文化和文明是自己必然的敌人，为了保护自己，要杜绝与其他文化、文明的接触。历史确实存在一定的丛林法则现象，比如汉朝、匈奴对于西北地区弱小文化的冲击、欧洲殖民者对于美洲原住民文明的伤害和瓦解。但人类迁徙历史浩荡的主流是彼此开放而非封闭，东亚直立人因被动的封闭而陷入石器技术停滞的境地，中原各文化因为主动的开放，吸纳了大量外来物产、技术乃至思想，站上了古代文明的舞台中央……随着农耕时代后人口增长和族群融合，黑暗丛林法则早已失效，因为越封闭，越落后，越无法阻挡打破封闭的力量。

一旦拒绝外界交流，每一个人就变成了孤岛，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会变成孤岛。几万年来，人类通过生物基因的突变和扩张、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交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孤岛、族群的孤岛，避免了塔岛技术悲剧。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让各个族群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的文化基因，抵制那些分裂各个族群，在各个族群间制造歧视链的文化基因。

本书动笔于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期，疫情迫使各个国家彼此关闭了国境通道，各个社区限制了人员进出。一种病毒能够感染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族群，这生动地验证了，全人类在生物基因上差异非常小，天南地北的族群早已有充分的基因融合，只是这验证的方式过于苦难。

在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呼吁全球合作，共同抗疫。被迫暂时隔离的人们通过互联网举办了诸如“同一个世界：共同宅家”（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免费音乐会一类的活动，为陷入困境的世界和个人投下希望的光亮；各国科学家也在共享着对于病毒本身和抗病毒药物研究的信息……这正是由祖先创造、历史传承的积极、开放的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我们都将受益于这样的文化基因打造的人文环境。

“四海一家”的信条，经由一代又一代祖先的传承，已经写入你我的生物基因里，让它也写入你我的文化基因中吧。

今天的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还没有冲出地月系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仍然处于地月系统的孤岛上。正如百万年中人类祖先在地球表面的持续探索，人类向太空探索的脚步也从未停止，有朝一日，宇航员必将冲出地月

系统，踏上火星和其他星球的表面，书写人类基因的扩张史记新章节，不输祖先曾有的勇气和英名。

那将是地球生命基因的荣光，那将是全体人类的荣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字史记 / 波音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217-3425-6

I. ①无... II. ①波... III. ①中国历史 - 通俗读物 IV. ①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62225号

无字史记

著者：波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字数：175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印次：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3425-6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精英的 傲慢

The TYRANNY *of* MERIT

Can We Find the
Common Good?

好的社会
该如何定义成功?

每个关心社会公平的人, 都请读一读这本书

应答当代社会的热议话题 · 剖析西方政治分歧的根源 · 启发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

引领当今世界思潮的重要哲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作者

迈克尔·桑德尔时隔8年重磅新作

知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作序推荐

Michael J. Sandel
[美]

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译

朱慧玲……………审校

中信出版集团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致中文版读者的几句话

A Message to Chinese Readers

推荐序 优绩主义的陷阱

序

引言 走进大学校园

1 赢家与输家

2 “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

3 阶层跃升的话语

4 文凭主义：最后可接受的偏见

5 成功伦理学

6 分类机器

7 认可工作的价值

结语 优绩与公共利益

致谢

译后记

致中文版读者的几句话

我写这本书，是想要激发我的学生、中国的大学生、世界各地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学毕业生，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那些顶尖大学录取的人，还有那些找到好工作并赚了很多钱的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我们很容易忘记一路上帮助我们的机遇和好运。如此思维方式对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中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压力从一个人年幼之时就出现了，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变得尤其大。例如，中国的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准备参加高考，他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努力补习功课和熬夜学习。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这种思考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伤害：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这本书想要探讨，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很遗憾，新冠疫情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访问中国。期待着有一天——希望这一天很快到来——我能够回到中国，继续与中国读者探讨公正、美德及成功的意义。

迈克尔·桑德尔

A Message to Chinese Readers

I wrote this book to challenge my student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nd successful college graduates everywhere, to rethink the meaning of success. Those who win admission to top universities, or who get good jobs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are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our achievements are due mainly to our effort and hard work. We easily forget the luck and good fortune that helped us on our way. This way of thinking is familiar in competitive market societies, in which the pressure to achieve begins at a young age and becomes especially intense during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years.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tremendous pressures placed upon young people as they prepare, over years of cram courses and late-night studying, to take the gaoka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ose who succeed in competitive societies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ir success is their own doing, and that they therefore deserve the rewards it brings; they also tend to believe that those less accomplished than themselves deserve their fate as well.

This way of thinking about merit and achievement, about who deserves high pay and social esteem, has a corrosive effect on social cohesion. It creates a deep divide between winners and losers, and widens the distance between elites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 It also harms the winners: believing that our fate is in our hands creates enormous pressure to achieve—to please our parents, or teachers, and ourselves. Many gifted young people—in the U.S.,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are harmed by these intense competitive pressures. Consider the grow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young people, including anxiety, depression, and rising rates of suicide. This book asks how we can find a less anxious, more generous, more humble way of understanding success, one that points us toward a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mon good.

I regret that the pandemic has prevented me from visiting China for some time.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I hope soon, when I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China to continue my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readers about justice, merit, and the meaning of success.

Michael Sandel

献给姬库

爱你

推荐序 优绩主义的陷阱^[1]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刘擎

2019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5万到120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对其予以谴责。^[2]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

可是，近来有学者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他们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也加入了对优绩制的讨论。他在2018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3]他在2019年秋开设了一门“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本科生研讨课，并曾邀请马科维茨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20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桑德尔早年因其对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学界，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被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义视野的最新延伸。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在这本书的开篇，桑德尔也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但他随即表示：“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争论的唯一场合。在当代政治中，关于

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

大学招生录取是优绩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東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作为哲学家，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如果我们的命运如此深刻地依赖于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我们理所当然获得的吗？桑德尔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因此依赖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在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桑德尔指出，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

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就曾明确主张，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录取学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对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4]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现在上升到了20%。

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5]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通过建立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来录取。这种抽签录取制，不仅让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

感。此外，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上。

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如今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

最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桑德尔提出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含义。他同意罗尔斯的一个观点，即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对罗尔斯要在分配正义中清除优绩的看法。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比如，为赌徒提供赌场的经营者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会比教师或者医生的更高，但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吗？如何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优绩呢？当然，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尔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拒绝尝试对优绩做出新的阐释。他呼吁社会开启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马科维茨与桑德尔对优绩制的批判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引人深思，催人警醒。当然，他们的批评论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或许错置了指控的对象，因为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的平等性。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约翰·斯达顿在网刊*Quillette*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6]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跑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跑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

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上任意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被我们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500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也只会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桑德尔并不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及其分配正义的解决方案。他的批判指向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目标定位——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是提高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但这并不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而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才得以确立的。对GDP的痴迷并不是“道德上中立”的，因此将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作为最高的社会与政治议程是有待质疑和反思的。为此，桑德尔提出“贡献正义”的概念，这关乎人们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的机会，而这种承认与尊重总是伴随着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视之事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由此看来，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的传统不止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

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1] 此篇序言是在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内容的基础上，由刘擎教授本人补充修改而成的。——编者注

[2] Jennifer Medina, Katie Benner, and Kate Taylor,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 Actresses, 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3, 2019.

[3] Michel Sndel, “Popu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openDemocracy (May 9, 2018),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democracy/>.

[4] Thoms Frnk, “Is Meritocracy to Blame for Our Growing Class Divid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2019.

[5] Liaquat Ahamed, “The Rich Can’t Get Richer Forever, Can They?” The New Yorker, August 26, 2019.

[6] John Stiddon, “The Meritocracy Trap: A Review.”

序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美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公共卫生专家在那之前一年已就全球病毒蔓延的风险发出警告，甚至当2020年1月中国已经在与疫情抗争之时，美国仍缺乏实施大规模检测以控制疫情的能力。随着疫情的蔓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提供医生和护士治疗大量感染者所需的医用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各州政府和医院发现他们自己在相互竞标，以购买检测工具包和救生呼吸机。

准备不足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时任总统特朗普无视公共卫生顾问的警告，在关键的几周里对这场危机不予重视，并在当年2月底坚称：“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干得很棒……它会消失的。”^[1]其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初发放的检测试剂盒有缺陷，却迟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大举实施外包，导致美国在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的生产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国外制造商。^[2]

但除了后勤没有准备好，美国在道德上也没有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准备。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年，经济、文化和政治已经严重分裂。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怨恨不断加深，这直接引发了民粹主义者在2016年的愤怒反抗，并最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虽然特朗普在上任不久后就遭到弹劾，但最终他并没有被免职，并一直任职至本书出版之时，最后特朗普不得不面对“9·11”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然而，随着病毒的扩散，党派之间的分歧持续存在：很少有共和党人（只有7%）相信新闻媒体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也很少有民主党人（只有4%）相信特朗普提供的信息。^[3]

在党派敌视和相互猜忌中，新冠疫情到来了。抵抗疫情要求社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人被恳求——在许多情况下被限令——保持社交距离，放弃工作，待在家里。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人面临减薪和失业的威胁。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威胁最大，但也可能感染年轻人，即使是那些安然无恙的人，也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

从道义上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脆弱和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我们都在一起。”政府官员和广告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口号。但口号所唤起的团结是基于恐惧的团结，是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这种恐惧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遵守自我隔离的约束，以此展现我

们团结一致地共同面对人类的脆弱性。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团结和分离相伴而行合情合理。英勇的医护人员和现场急救人员需要亲自在场帮助患者；零售店的收银员和送货员冒着健康危险，为那些在家中避难的人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除了他们，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告知，保护他人的最好方法是与其保持距离。

但是，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存在矛盾，这样的道德悖论凸显了“我们都在一起”这句承诺的空洞。共同体意识要扎根于相互承担义务和共同承受牺牲的持续实践中，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团结无法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恰恰相反，这一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同样，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导致美国无法在国内生产医用口罩和药物，也剥夺了众多劳动人民的高薪工作和社会尊严。

与此同时，那些从全球市场、供应链和资本流动中获得丰厚经济回报的人，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对本国公民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低。他们的经济前景和身份认同不再依赖于当地社区或本国社群。随着全球化的赢家脱身远离输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社交距离。

全球化的赢家解释说，重要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在开放的世界里，成功取决于教育，取决于让自己具备在全球经济领域竞争和取胜的能力。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对成功来说必不可少的教育，但这也意味着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而且，如果机会真正平等，这就意味着那些落后的人也理应承受这样的命运。

这种看待成功的方式让人很难相信“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充满愤怒和怨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独裁式的民粹主义者吸引——民粹主义者严厉谴责精英并承诺以复仇的方式重新确立国家边界。

现在，正是这样一些政客，对专业科学知识和全球合作满怀提防之心，却被迫承担与这种流行病做斗争的任务。这并不容易。把社会动员起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需要医学和科学专业知识，还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革新。

推动特朗普上台的那种由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团结。要想革新美国的道德和公民生活，就必须理解，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社会纽带和人们对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本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并思考美国应该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以通往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

2020年4月

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

[1] 2020年2月23日特朗普总统在海军陆战队一号出发前的讲话，[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arine-one-departure-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arine-one-departure-8)；2020年2月27日特朗普总统在与非裔美籍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讲话，[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eeting-african-american-leaders](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eeting-african-american-leaders)。

[2] Farhad Manjoo, “How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Ran Out of a 75-Cent Face Mask,”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20, [nytimes.com/2020/03/25/opinion/coronavirus-face-mask.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5/opinion/coronavirus-face-mask.html).

[3] Margot Sanger-Katz, “On Coronavirus, Americans Still Trust the Exper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20, [nytimes.com/2020/06/27/upshot/coronavirus-americans-trust-expert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7/upshot/coronavirus-americans-trust-experts.html).

引言 走进大学校园

2019年3月，美国的高中生在等待大学申请的录取结果时，联邦检察官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联邦检察官指控33名富有的父母参与了精心策划的作弊方案，以让他们的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大学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1]

这场骗局的核心人物是无良的大学入学咨询顾问威廉·辛格，他开办了一家专门为焦虑且富有的父母提供服务的公司。辛格的公司专门利用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制度赢利，因为近几十年来，就读精英大学已成为通往成功和声望的主要途径。对于渴望拥有顶尖大学所需的亮眼的学业证书的学生，辛格设计了不道德的变通办法——付钱给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的监考人员，以修改考生答题卡的方式提高成绩，或者贿赂高校教练，让教练把申请人指定为学校招募的运动员，即使这些学生并不从事这项运动。辛格甚至伪造运动员证书，用修图工具把申请人的脸修到真实运动员的照片上。

辛格的非法招生服务并不便宜。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他的女儿支付了75000美元，让她去一家考试中心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辛格付钱给这场考试的监考员，确保该生获得她需要的分数。有个家庭向辛格支付了120万美元，以使耶鲁大学以足球专业新生的名义录取他们的女儿，尽管她并不踢足球。辛格用其中40万美元贿赂了愿意配合的耶鲁大学足球教练，而后者也遭到起诉。一位电视女演员和她身为时装设计师的丈夫支付给辛格50万美元，让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虚假招募的皮划艇队队员进入南加州大学。另一位涉案的名人是因出演电视剧《绝望主妇》而出名的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不知何故，她得到了大幅优惠，辛格只向她收取了1.5万美元，就搞定了她女儿的SAT。^[2]

在8年的大学招生舞弊中，辛格总共获利2500万美元。

招生丑闻引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美国人几乎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招生丑闻引发的愤怒跨越了政治派系，同时得到了各方大量报道，遭到广泛谴责——从福克斯新闻到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从《华尔街日报》到《纽约时报》，所有人都认为用行贿和作弊的手段获得名牌大学的录取资格应该受到谴责。但公众表达的愤怒不仅限于对享有特权的父母采取非法手段帮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这一件事，还有更深的指向。这桩标志性的丑闻，以人们难以言明的方式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即谁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会成功。

愤怒的表达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特朗普的代理人在推特和福克斯新闻上嘲讽陷入这个骗局的好莱坞自由主义者。“看看这些人是谁。”总统的儿媳劳拉·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好莱坞的精英、自由派的精英总是在谈论人人平等，以及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而到头来最大的伪善竟是：他们填写支票，弄虚作假，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这些名额其实应该给那些真正有能力得到它们的孩子。”^[3]

就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认可这一骗局剥夺了有资格的孩子应得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丑闻是关于更普遍的不公正的公开例证：财富和特权在大学录取中有着重要作用，即使这不涉及非法行为。在宣布起诉时，联邦检察官宣布了他所认可的原则：“不能有专为富人而设的大学招生制度。”^[4]但社论和发布评论的人很快指出，在大学招生录取中，金钱通常都在起作用，最明显的是，许多美国大学对校友和大额捐赠人的子女给予特别考虑。

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把招生丑闻归咎于自由派精英，自由主义者则援引公开报道反击：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尽管成绩平平，但仍被哈佛大学录取，因为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据报道，特朗普本人在他的孩子小唐纳德和伊万卡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期间，向该校捐赠了150万美元。^[5]

大学招生录取的道德准则

辛格是这个招生骗局的主谋，他承认一份大礼有时会让勉强合格的申请人走通“后门”。他还钻研出了被他称为“侧门”的技巧，“侧门”方案性价比更高。他告诉客户，标准的“后门”手段与他的舞弊方案相比要多花10倍的钱，录取的把握还没有那么大。给大学一份大礼并不能确保录取，他采用贿赂和伪造考试成绩的旁门左道却可以。“我的客户想要得到保证。”他解释说。^[6]

尽管“后门”和“侧门”的录取通知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但这两种入校模式在道德上迥然有别。一方面，后门是合法的，而侧门不合法。联邦检察官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在谈论捐赠一栋建筑，这样学校更有可能接收你的子女；我们谈论的是欺骗和舞弊、伪造考试成绩、伪造体育证书、伪造照片、贿赂大学行政人员。”^[7]

在起诉辛格、他的客户和受贿的教练时，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宣称大学不能出售新生的名额，他们只是在打击舞弊案件。撇开合法与否不谈，“后门”和“侧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同：当家长依靠大笔捐款买下孩子的入学资格时，这笔钱就会进入大学，大学可以用它改善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在辛格的案件中，资金流向了第三方，因此对大学本身几乎没有任何

帮助。（至少辛格贿赂的教练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帆船教练，显然在用贿赂支持帆船项目。其他人则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而，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后门”和“侧门”很难区分。这两种方式都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优势，他们得以录取，取代了更优秀的申请人。这两种方式都允许金钱凌驾于成绩之上。

基于成绩的录取决定了“前门”的门槛。正如辛格所说：“‘前门’意味着你要自己进去。”这种录取模式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公正模式，申请人是否被录取应取决于自己的成绩，而不是父母的钱。

当然，在实践中，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金钱不仅悬停在“后门”门口，也盘旋在“前门”之上。衡量成绩的标准很难与经济优势分开。像SA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本身就是为了衡量成绩，有利于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智力潜能。但实际上，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学生的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8]

富有的父母不仅让自己的孩子参加SAT预备课程，还聘请私人招生顾问为他们的大学申请书润色，让他们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并让他们练习击剑、壁球、高尔夫、网球、赛艇、长曲棍球和帆船等精英体育项目，以便他们更容易获得加入大学运动队的资格。这些都是富有、勤勉的父母用来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入学资格的昂贵手段。

然后还有学费。除了少数几所富裕到可以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而录取学生的大学，与那些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相比，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更有可能被录取。^[9]

考虑到这一切，常春藤联盟高校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国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国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10]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机会不平等，一部分是由于荫录取^[11]和大额捐赠人的赞助（“后门”），另一部分是由于富裕家庭在推动孩子通过“前门”方面有优势。

批评人士指出，这类不平等表明高等教育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秉承优绩至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招生丑闻是更广泛的、普遍不公平的令人震惊的实例，大学招生录取制度阻碍了高等教育践行自己所宣称的优绩至上原则。

那些认为作弊丑闻极大地背离了招生准则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背离在大学招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都认可同一个前提：大学

招生录取应该依据学生的能力和天赋，而不是基于与学生能力和天赋无关的因素。换句话说，他们一致认同录取应该以成绩为基础。他们也同意——至少是默认，那些凭成绩被录取的人是堂堂正正地赢得录取资格的，因此理应得到录取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这种熟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优绩至上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我们没有遵守原则。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政治争论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不是关于优绩至上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实现优绩至上。例如，保守派认为，把种族或民族作为录取因素的平权法案^[12]政策是对择优录取的背叛；自由派则为平权法案辩护，认为这是纠正持续存在的不公平的方式，并认为只有在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实现真正的优绩至上。

但这场辩论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优绩至上的问题存在于更深层次。

再想想招生丑闻，大多数人的愤怒集中在作弊和不公平上，然而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促成作弊行为的心态。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对于这一假设，现在人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再去留心。这桩丑闻如此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丑闻牵涉名人和私募股权巨头，还因为他们想要买通的渠道存在广泛的需求，是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权有势的父母会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而大肆造假？或者，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父母会花费数万美元聘请私人招生顾问，让孩子参加考试辅导课程，以增加孩子的机会，把孩子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的AP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简历建设和奋斗？为什么精英大学的录取在我们的社会中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投入大量执法资源追查这场骗局，以至于从起诉到对罪犯的判决，有关这起案件的新闻会占据数月的新闻头条和吸引公众关注？

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源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痴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谁进入哪里利害攸关。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13]

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选择上哪所大学也是如此。如今，学生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可能录取得上的招生最严格的大学。^[14]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阶层。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

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15]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富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后代免受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的影响。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惊慌失措、地位优越的父母参与大学招生骗局。

但经济焦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不仅仅是要对冲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辛格的客户还买了别的东西——不那么容易看见但更有价值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在名校里获得一席之地，也是在为孩子购买名校精英的光环。

为成功竞价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顶层的人愿意相信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由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

矛盾的是，这正是作弊的父母想要给孩子的礼物。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他们只需要给孩子设立信托基金就可以了，但他们想要的是别的东西——名牌大学录取所带来的精英声望。

当辛格解释说“前门”意味着“你自己凭能力进去”时，他明白这一点。他的作弊方案是退而求其次。当然，依靠SAT作弊或体育特长证书造假得以录取并不是“你自己有能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父母对他们的孩子隐瞒自己的阴谋诡计。只有在非法进入方式没有给人发现的情况下，从“侧门”进入与从“前门”进入才享有同样的荣誉。没有人会骄傲地宣布：“我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因为我的父母贿赂了帆船教练。”

这与靠成绩录取之间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以合法的身份被录取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并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大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因为虽然被知名大学录取反映了他们的全身心投入和勤奋努力，但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呢？那些并非完全由他们造就的天赋和才能呢？在培养和奖励他们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中生活的好运呢？

那些靠努力和天赋在竞争激烈的优绩至上社会中获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亏欠，这种亏欠给竞争遮蔽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的强化，奋斗如

此吸引我们，以至于这种亏欠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公正的优绩至上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富人拥有特权，也会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功的。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是对公民情感的腐蚀。因为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人们争论的唯一事项。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

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些都是会引发强烈情感反应的问题，我们想要避免这些问题，直到我们不得不直面它们。

要想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两极分化政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优绩”。在最近几十年里，优绩的含义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优绩的新含义侵蚀了工作的尊严，让许多人觉得精英瞧不起自己。全球化的赢家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份成功是他们应得的？或者，这是精英阶层存在的自高自大的问题吗？

在对精英的愤怒把民主推向悬崖边缘的时候，关于优绩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问一问，修复脆弱的政治的办法是更坚定地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生活，还是应该在把人按才能分类及拼命奋斗谋生之外寻求公共利益？

[1]Jennifer Medina,Katie Benner,and Kate Taylor,“Actresses,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 in U.S.College Entry Fraud,”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us/college-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2/us/college-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html).

[2]Ibid.See also“Here’s How the F.B.I.Says Parents Cheated to Get Their Kids into Elite College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us/admissions-scandal.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2/us/admissions-scandal.html);Affidavit in Support of Criminal Complaint,March 11,2019,U.S.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gov/file/1142876/download](https://www.justice.gov/file/1142876/download).

[3]Lara Trump on Fox News at Night,March 12,2019,facebook.com/FoxNews/videos/lara-trump-weighs-in-on-college-admissions-scandal/2334404040124820.

[4]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edition.cnn.com/TRANSCRIPTS/1903/12/ath.02.html.

[5]Frank Bruni,“Bribes to Get into Yale and Stanford?What Else Is New?,”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opinion/college-bribery-admissions.html;Eugene Scott,“Why Trump Jr.Mocked the Parents Caught Up in the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3,2019,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3/13/why-trump-jr-mocked-parents-caught-up-college-admissions-scandal.有关贾里德·库什纳案及金钱在招生中的作用的原始报道，请参见Daniel 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6),pp.44–46。关于特朗普向沃顿商学院捐赠的报道，请参见Luis Ferre Sadurni,“Donald Trump May Have Donated over\$1.4 Million to Penn,”Daily Pennsylvanian,November 3,2016,thedp.com/article/2016/11/trumps-history-of-donating-to-penn。

[6]引自辛格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誓言的书面陈述，March 11,2019,U.S.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gov/file/1142876/download,p.13。

[7]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edition.cnn.com/TRANSCRIPTS/1903/12/ath.02.html.

[8]Andre Perry,“Students Need a Boost in Wealth More Than a Boost in SAT Scores,”The Hechinger Report,May 17,2019,hechingerreport.org/students-need-a-boost-in-wealth-more-than-a-boost-in-sat-scores.

[9]Ron Lieber,“One More College Edg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6,2019;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How College Makes or Breaks U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9),pp.153–67.

[10]“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7,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18/upshot/some-colleges-have-more-students-from-the-top-1-percent-than-the-bottom-60.html.数据来自Raj Chetty,John 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revised version,December 2017,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mobilityreportcards。

[11]优先录取直系家族成员是校友的申请人，这项政策就叫余荫录取。——译者注

[12]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本来是为了禁止政府在招聘和政策的执行中针对特定种族与某些信仰等的歧视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在教育、就业、住房事务上给予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种族优待的政策。——译者注

[13]Caroline M.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no.4(Fall 2009),pp.95–118.

[14]Ibid.,pp.95–100;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39.

[15]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p.8–11,51–84.

1 赢家与输家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美国民主已屡陷危机！排外情绪日益高涨，独裁式政客威胁到民主规范的极限，公众却支持此类人物，在诸如此类的现象中，危险已清晰可见。这些趋势本身就令人不安，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主流政党和政治家几乎没有表现出他们对搅动世界各地政治的不满情绪的理解。

一些人谴责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高涨，认为这不过是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反应。另一些人则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认为这是在抗议全球贸易和新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

但只看到民粹主义抗议中的偏执，或只把这些视为经济层面的怨恨，都是不对的。就像英国脱欧得到民众支持一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体现了对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愤怒声讨。这种全球化让顶层人士受益，但让普通公民感到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这也是对技术官僚治国方法的谴责，那些感到经济和文化的列车已经把自己抛下的人在高声呼喊，而技术官僚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残酷的现实是，特朗普是凭借挖掘焦虑、沮丧和合理不满的源泉当选的，而主流政党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能让人信服。类似的困境也困扰着欧洲各民主国家。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和目的。要做到这一点，主流政党应该从民粹主义对他们的抗议中吸取教训：不是去复制其仇外心理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而是要认真对待与这些丑陋情绪纠缠在一起的怨恨。

思考应该从此开始：认识到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

主流政党和执政精英发现自己成了民粹主义者抗议的目标，他们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从两个角度诊断这些怨恨情绪：这些怨恨要么是针对移民、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敌意，要么是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焦虑。但这两种诊断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诊断民粹主义的怨恨

第一种诊断认为，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愤怒主要是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民

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反击。习惯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他们预感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群体、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陌生人，这一发展趋势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比妇女或少数种族更容易成为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正确”公共话语的压迫。这种对社会地位受损的诊断，凸显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丑陋特征——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所表达的排外主义、厌女症和种族主义。

第二种诊断将工人阶级的怨恨归因于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困惑和混乱。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工作与终身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已经过时，现在重要的是创新、灵活性、创业精神和不断学习新技能的意愿。但是根据这一解读，许多工人对重塑自我的要求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曾经从事的工作被外包给了低工资国家或被分配给了机器人。他们似乎梦想回到过去稳定的社区和事业。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无情力量，这些工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猛烈抨击移民、自由贸易和统治精英。这些工人的愤怒给人误导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抗像天气一样不可改变的力量。他们的焦虑最好通过职业培训计划和其他措施来消除，以帮助他们适应全球和技术变革的需要。

两种诊断都包含了真实的元素，但两者都没有给民粹主义应有的地位。将民粹主义抗议解释为恶意的或错误的，就免除了统治精英的责任——他们创造了侵蚀工作尊严的条件，让许多人感到不受尊重并认为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近几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力量结果，而是主流政党和精英统治方式的结果。

特朗普和民粹主义者支持的其他独裁者对民主规范构成威胁，那些精英现在对此感到震惊，也理应感到震惊。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激起民愤、导致民粹主义反弹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目睹的动荡是对历史性政治失败的政治反应。

技术官僚治国与亲市场的全球化

这一失败的核心是主流政党在过去40年中构想和实施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的实施在两个方面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一是构想公共利益的技术官僚方式，二是用优绩至上的方式界定赢家和输家。

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紧密相连——后者倒不一定是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思考政治的方式是技术官僚的，因为这种思考方式把公共话语争论中的实质性道德内涵掏空了，把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问题当作技术专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

待。

不难看出技术官僚对市场的信仰是如何为民粹主义者的不满搭建舞台的。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贬低了国家身份和政治忠诚的价值。随着商品和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那些站在全球经济之上的人将世界主义身份视为进步、开明的选择，以替代狭隘的保护主义、部落主义和冲突。他们认为，真正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的。这意味着对外包、自由贸易协定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批评是封闭的心态而不是开放的，是部落式的心态而不是面向全球的。^[1]

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治理方法将许多公共问题视为普通公民无法触及的技术专业知识问题。这缩小了民主辩论的范围，掏空了公共话语的内涵，并让普通公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权力之感。

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都接受了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受技术官僚影响的全球化概念。事实表明，对于全球化本身及随之而来的民粹主义抗议，最重要的是中左翼政党对市场思维和市场价值观的接受。到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民主党已经成为技术官僚自由主义的政党，更适合专业人士阶层，而不再是原来以蓝领和中产阶级选民为基础的政党。英国脱欧时期的工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

这一转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2]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辩称，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而市场是解决方案。当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时，接替他们的中左翼政治家——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对市场的信仰虽然温和了一些，却更牢固了。他们软化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严酷刀刃，但没有挑战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核心预设——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本着这一信念，他们接受了有利于市场动作的全球化，并欢迎经济的日益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联手推动全球贸易协定，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这些政策的好处大多流向了顶层人士，不平等日益加剧，金钱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但民主党人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几乎都无所作为。自由主义已经偏离其传统使命，不再驯服资本主义，不再让经济权力掌握在民主力量手中，失去了鼓舞人心的能力。

当巴拉克·奥巴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一切似乎都改变了。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说出了一套激动人心的话语来取代技术官僚的管理语言，后者当时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公共话语的典范。他证明了进步政治可以说出一种表达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语言。

但奥巴马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激发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义并没有延伸到

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就职，他任命了若干经济顾问，这些人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在这些经济顾问的鼓励下，奥巴马对银行予以纾困，但既没有让银行对它们导致危机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为那些失去家园的人提供多少帮助。

奥巴马的道德声音减弱了，他尽力平息了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而没有在政治上更明确地表达这种愤怒。对银行救助计划挥之不去的愤怒，给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并最终激发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情绪。这种抗议情绪波及了各个政治派别——在左翼表现为占领运动和伯尼·桑德斯出来竞选总统，在右翼表现为茶党运动和特朗普当选。

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强烈反抗，但最引人注目的抵制针对的是自由派和中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的联邦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意大利民主党（得票率跌至20%以下）与法国社会党（其总统候选人在2017年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6%的选票）。

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需要重新考虑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官僚执政方式。他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东西——近几十年来伴随不平等的加剧产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他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那些在新时代经济中遭受损害的人会觉得胜利者在蔑视他们？

阶层跃升的话语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至少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价值计算，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36000美元，低于40年前的水平。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其收入比收入居于后50%的人的收入总和还要多。

[3]

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基于这一信念，主流政党和政治家以呼吁更大的机会平等来应对日益严重的平等：对因全球化和技术更替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种族、民族和性别障碍。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

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简直到了念咒的地步。共和党人中的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马尔科·鲁比奥，以及民主党人中的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援引了这一口号。奥巴马特别喜欢这一口号的变体，这一口号取材于一首流行歌曲：“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在演讲和公开声明中运用这句话超过140次。^[4]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5]在加拿大、德国、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摆脱贫困比在美国更容易。^[6]

这与长期以来认为流动性是美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答案的信念不一致。美国人告诉自己，美国可以比欧洲国家的阶级社会更少地担心不平等，因为向上流动在这里是可能的。70%的美国人相信穷人可以靠自己摆脱贫困，而只有35%的欧洲人这样认为。这种对流动性的信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慷慨。^[7]

如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往往也是最平等的国家。向上流动的能力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和其他资源，而不是来自贫困的鞭策，这些资源让人们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的激增并没有加快向上流动的速度，相反，不平等加剧让那些处于顶端的人能够巩固自己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传给子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名牌大学消除了种族、宗教、性别和民族的入学障碍，此前，这些名牌大学只限于特权阶层的子弟入学。SAT的诞生源于这样一种承诺，即根据学业成绩而不是阶级和家庭出身来录取学生。但今天的优绩至上几乎已经变成了世袭贵族垄断。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3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那10%的家庭。尽管有慷慨的经济援助政策，但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8]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优绩至上的道德准则

优绩至上的问题不仅在于实践达不到理想。如果问题所在是实践未能达到理想，那么解决办法就在于实现机会的完全平等，在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无论人们生活的起点多么低，他们都可以向上流动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即使优绩至上的原则得到完满的实现，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是否令人满意，也值得怀疑。

市场驱动的社会会慷慨地给予成功人士巨额报酬，从道德上讲，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有才能的人理应得到这么多报酬。优绩至上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滞留底层）。但拥有（或缺乏）某些天赋真的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因为自己的天赋而上升的人，应该得到比那些同样努力工作却没有市场社会所奖励的天赋的人更多的报酬。

那些颂扬优绩至上理念并将其作为核心政治方案的人忽视了这个道德问题，也忽略了一些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东西：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比起对移民和外包的抗议，民粹主义者做得更多的是控诉优绩至上的暴政。控诉者是有理由的。

不断强调要建立公平的优绩至上社会，社会地位要反映努力和天赋，这对我们解释人们何以成功（或不成功）的方式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制度奖赏天赋及努力工作这一观念，鼓励赢家将他们的成功都视为靠自己取得的，把成功与否视为衡量优点的标准——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技术官僚治国的道德伴生物。

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命运具有偶然性，有助于产生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安排，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但完全遵照优绩至上原

则，会让人丧失对上天眷顾和恩宠的感受力。优绩至上观念削弱了我们所有人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伴的能力。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天赋和财富的偶然性时，我们能感受到与同伴休戚与共，但优绩至上的原则几乎没有为休戚与共的意识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优绩至上成了一种暴政或不公正统治的原因。

羞辱政治

从下往上看，精英们的傲慢令人难堪。没有人喜欢被人瞧不起，优绩至上的信念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在这方面，羞辱政治不同于非正义政治。对不公正的抗议是朝外的，是指控制度被操纵，赢家以欺骗或操纵手段登上了顶峰。对羞辱的抗议在心理上更沉重，它混合了对胜利者的怨恨和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也许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值得拥有；也许失败者是他们自身不幸的同谋。

羞辱政治的这一特点导致羞辱比其他政治情绪更具可燃性。这是激起民粹主义者抗议的愤怒和怨恨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强力成分。尽管特朗普自己就是亿万富翁，但他还是理解并利用了这种怨恨。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经常大谈“机会”，与他们不同，特朗普很少提这个词。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有趣的是，社会民主民粹主义者伯尼·桑德斯也很少谈机会和流动性，而是高度关注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

精英们如此看重大学文凭（大学文凭既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基础），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优绩至上制度所能产生的傲慢，以及它给予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刻薄评价。这种态度是民粹主义反弹和特朗普获胜的核心。

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政治分歧之一是，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2/3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而希拉里·克林顿在拥有高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脱欧公投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压倒性地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绝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投票反对脱欧。

一年半后回顾2016年总统竞选，可以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表现的优绩至上的傲慢是她失败的重要原因。“我赢得了代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3的人的选票，”2018年，她在印度孟买的一次会议上说，“所以我赢得的是乐观、多元化、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地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得到的是那些“不喜欢黑人获得权利，也不喜欢女人……得到工作”的人的支持。希拉里赢得了全球化赢家的选票，而特朗普赢得了全球化输家的选票。^[10]

民主党曾经代表农民和劳动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现在，在这个优绩至上的时代，民主党失败的旗手却夸口说，这个国家繁荣、开明的地区投票支持自己。

唐纳德·特朗普对羞辱政治非常敏感。从经济公平的角度看，他的民粹主义是假的，实质上是一种财阀民粹主义。他提出了一项医疗计划，该计划将削减那些支持他的工人阶级的医疗保健支出，他还颁布了一项税收法案，该法案对富人大幅度减税。但只关注虚伪就没有抓住重点。

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特朗普辩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但他做此决定的真正意义，即其政治理由，包含在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话中：“美国在什么时候被人瞧不起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嘲笑我们这个国家的？……我们不希望其他领导人和其他国家再嘲笑我们。”^[11]

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所谓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为了就业或全球变暖。在特朗普的政治想象中，这是为了避免羞辱。这引起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人。

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与道德判断

就其本身而言，英才治国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在古代中国，孔子教导说应该由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执政。在古希腊，柏拉图想象中的最好的社会是由哲人国王领导，并由具有公共精神的卫士阶级支持的。亚里士多德不认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国王，但他也认为英才应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对他来说，与治国相关的优点不是财富或高贵的出身，而是公民美德和对公共利益进行理性思考的卓越的实践智慧。^[12]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称自己为“卓越的人”，并希望像他们这样有道德、有知识的人能当选总统。他们反对世袭贵族，但并不热衷直接民主，他们担心这会让煽动者上台。他们想要设计若干制度，比如美国参议院和总统的间接选举，这能让有才干的人执政。托马斯·杰斐逊支持建立在“美德和才能”基础上的“自然贵族”，而不是“建立在财富和出身基础上的人造贵

族”。“这种形式的政府最好，”他写道，“有利于把这些天生的亚里士多德选进政府机关。”^[13]

尽管这些传统的政治精英统治论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从儒家学说柏拉图主义到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先贤的理念）都认为治国所需要的才干包括道德和公民美德，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公共利益至少部分在于公民的道德教育。

美国英才治国的技术官僚版本^[14]切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在经济领域，技术管理简单地假设公共利益是由GDP定义的，而人们贡献的价值在于他们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在政府领域，技术管理认为精英意味着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

这一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来：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依赖市场机制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话语未能面对本应成为政治辩论中心的重大道德和公民问题。第三个方面所说的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国界的道德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工作的尊严？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亏欠了什么？

在道德上狭隘地考虑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方式在几个方面削弱了民主社会。第一个是最明显的：在过去的40年里，精英们统治得并不是很好，1940—1980年统治美国的精英们成功得多。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帮助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巩固了福利制度，消除了种族隔离，富人和穷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持续了超过40年。相比之下，在那以后执政的精英们给美国带来了40年来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伊拉克战争、长达19年的阿富汗战争、放松金融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衰败的基础设施、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以及竞选资金制度和公正划分国会选区的制度——该制度是对民主的嘲弄。

技术官僚治国不仅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失败了，而且压缩了公民项目的存在空间。当今，人们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公共利益。这些官僚根本不考虑培养公民之间的团结、加深公民关系，只是一门心思想要满足以GDP衡量的消费者偏好，这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

如今，政治争论的内容要么是无聊的、管理学的、技术官僚的话语，鼓舞不了任何人；要么是争相大喊大叫，对立党派各执一词，无人倾听。各政治派系的公民都发现这种空洞的政治话语让人难受，让人无劲可使。他们准确地意识到缺乏强有力的公共辩论并不意味着没有政策正在制定，只是意味着政策是在其他地方做的决定，而不是在公众视野中——政策由行政机构（通常由行政机构监管的行业控制）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和债券市

场决定，或者由公司说客决定，他们以竞选捐款换取了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

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掏空公共话语的内涵，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技术官僚治国的这一面最直接地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民粹主义者的反抗

60年前，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就预见到了优绩至上原则带来的傲慢和怨恨。其实是他创造了meritocracy这个词。在出版于1958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他问道：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将会发生什么？^[15]

一方面，这会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孩子最终会与特权阶层的孩子并肩公平竞争。但是，迈克尔·扬认为，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16]

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几十年前，扬瞥见了如今毒害我们的政治、激起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严酷的优绩至上逻辑。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技术和外包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与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降低相伴而生。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管理金钱，随着社会给予对冲基金经理巨额报酬，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且不确定。

主流政党和精英们忽略了政治的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和经济金融化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

但这误解了民粹主义者的控诉，也反映了技术官僚治理方式的缺陷。在进行我们的公共讨论时，似乎可以把道德和政治判断外包给市场或专家和技术官僚，这让民主辩论失去了意义和目的。这种公共意义的真空总是被严

厉的、专制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形式——无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是刺耳的民族主义——填补。

这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并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民粹主义试图给空旷的公共广场披上一层不宽容的、报复性的民族主义外衣。

为了给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在道德上更具活力的公共话语，认真对待佳绩至上原则对构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纽带的腐蚀。

[1] 《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就是这一观点的例证。参见“Drawbridges Up: The New Divide in Rich Countries Is Not Between Left and Right but Between Open and Closed,” *The Economist*, July 30, 2016, economist.com/briefing/2016/07/30/drawbridges-up。关于更细致的阐述，可参见 Bagehot, “Some Thoughts on the Open v Closed Divide,” *The Economist*, March 16, 2018, economist.com/bagehots-notebook/2018/03/16/some-thoughts-on-the-open-v-closed-divide。

[2] 本节本段及随后几段，来自 Michael Sandel, “Right-Wing Populism Is Rising as Progressive Politics Fails—Is It Too Late to Save Democracy?,” *New Statesman*, May 21, 2018, newstatesman.com/2018/05/right-wing-populism-rising-progressive-politics-fails-it-too-late-xsavex-democracy; and Michael J. Sandel, “Popu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Open Democracy*, May 9, 2018, 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democracy。

[3] 在美国，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了121%；几乎没有流向后半部分人口，他们在2014年的平均收入（约1.6万美元）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大致相同。对于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来说，2014年的收入中位数与1964年一样，约为3.5万美元。半个多世纪以来，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数一直没有增长。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issue 2 (May 2018), pp. 557, 578, 592–93, available at eml.berkeley.edu/~saez/PSZ2018QJE.pdf;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 83–84。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可以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网站 wid.world 中找到。也可参见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97,皮凯蒂在其中指出,1977—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吸收了美国整个经济增长额的四分之三。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0.2%,而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口获得了12.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47%)的国民收入,而西欧为37%,中国为41%,巴西和印度为55%。参见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available at eml.berkeley.edu/~saez/PSZ2018QJE.pdf;Alvaredo,Chancel,Piketty,Saez,and Zucman,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p.3,83–84。

[4]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中搜索了美国总统演讲和公开论文的在线存档, U.C.Santa Barbara,presidency.ucsb.edu。

[5]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中,有4%的人在成年后升至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30%的人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43%的人仍停留在收入最低的那20%。“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Pew Charitable Trusts,July 2012,p.6,Figure 3,available at pewtrusts.org/~media/legacy/uploadedfiles/wwwpewtrustsorg/reports/economic_mobility/pursuingamericandreampdf.pdf。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7.5%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升至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38%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34%仍停留在收入最底层。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Patrick Kline,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4(2014),pp.1553–623;available at rajchetty.com/chettyfiles/mobility_geo.pdf(mobility figures at p.16 and Table II)。根据阿奇布里奇研究所的斯科特·温希普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的孩子成为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只有26%的孩子进入了收入居前60%或前40%的人口,46%的人仍停留在底部。Scott Winship,“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Archbridge Institute,March 2017,p.18,Figure 3,available at archbridgeinst.wpeng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Contemporary-levels-of-mobility-digital-version-Winship.pdf。

[6]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3(Summer 2013),pp.79–102(see Figure 1,p.82),online at 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27.3.79;Miles Corak,“Do Poor Children Become Poor Adults?Lessons from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IZA Discussion Paper No.1993, March 2006(see Table 1,p.42),at <ftp.iza.org/dp1993.pdf>;A Broken Social Elevator?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Paris:OECD Publishing,2018),online at <doi.org/10.1787/9789264301085-e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的结果与克拉克的结论相似，除了德国的数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德国的流动性不如美国。See country comparisons in Figure 4.8,p.195.

[7]Stefanie Stantcheva,“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22,2018,scholar.harvard.edu/files/stantcheva/files/prisoners_of_the_american_dream_by_stefanie_stantcheva_-_project_syndicate_0.pdf.

[8]Raj Chetty,John 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Revised Version,July 2017,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9]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even-among-the-wealthy-education-predicts-trump-support/;jrf.org.uk/report/brexit-vote-explained-poverty-low-skills-and-lack-opportunities.

[10]Aaron Blake,“Hillary Clinton Takes Her‘Deplorables’Argument for Another Spin,”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3,2018,[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8/03/12/hillary-clinton-takes-her-deplorables-argument-for-another-spin](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8/03/12/hillary-clinton-takes-her-deplorables-argument-for-another-spin).特朗普在高收入选民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希拉里。但他在来自农村地区和小城市的选民（62%比34%）、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67%比28%）以及认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带走了而不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的选民（65%比31%）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参见“Election 2016:Exit Poll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8,2016,[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polls.html](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exit-polls.html).

[11]Donald J.Trump,“Remarks Announcing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aris Agreement,”June 1,201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28739.

[12]对儒家政治的优绩至上论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参见Daniel A.Bell and Chenyang Li,eds.,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Democracy:Political Merit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关于柏

拉图的优绩至上论，参见The Republic of Plato,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New York:Basic Books,1968),Book VI;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优绩至上论，参见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Book III,and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translated by Sir David Ro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Books I and VI。

[13]Joseph F.Kett,Merit:The History of a Founding Idea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21st Centu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0,33–44.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October 28,1813,in Lester J.Cappon,ed.,The Adams 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59),vol.2,pp.387–92.

[14]桑德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才治国是技术官僚治国。——译者注

[15]Michael 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8).

[16]Ibid.,p.106.

2 “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

唯才是举并没有错，通常这样做很合理。假如我需要水管工来修理马桶，或者需要牙医治疗牙齿，我会努力找到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当然，也许我找的不是技术最好的，我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去找最好的那个人，但我当然想要个相当合适的人。

在填补职位空缺时，才能很重要，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效率，相比找个能力差的水管工或牙医，若我找的是个能干的水管工或牙医，那我必然受益；另一个原因是公平，因种族、宗教或性别偏见而歧视最合格的申请人，雇用不太合格的人，这显然不对。即使出于自己的偏见，我愿意接受劣质的管道维修或牙齿根管治疗，这种歧视也仍然不公平。更有资格的候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

如果唯才是举是正确且明智的做法，那么优绩至上又有什么错呢？像优绩至上这样良善的原则，怎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怨恨洪流，从而改变世界各地民主社会的政治？优绩至上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有害的，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优绩为什么重要

社会应该根据优绩分配经济回报和工作岗位的想法，有几个吸引人的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是将招聘中对才能的看法推而广之形成的，即效率和公平。奖励努力、主动性和才能的经济体系，可能比无视贡献大小而给每个人相同报酬，或者根据喜好分配社会地位的经济体系更有生产力。严格论功行赏相对公平，只考虑取得了多少成效，不存在任何歧视。

奖励优绩的社会在是否让人向往的考虑上也是有吸引力的，这种社会不仅促进效率、摒弃歧视，也与某种自由观契合。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命运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有天分、有梦想，我们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

这是人类能动性令人振奋的愿景，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道德上令人欣慰的结论：我们获得的正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假如我的成功是我自己争取的，是我凭借天分和努力获得的，那我就可以为此感到自豪，相信我的成就带来的回报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因此，优绩至上的社会在两方面都令人向往：一方面与强大的自由观契合，另一方面也给予人们他们因为自身努力而应得的东西。

尽管鼓舞人心，但优绩至上原则可能会发生转变，走向暴虐。这不仅发生在社会没能践行这项原则的时候，更可能发生在社会遵从该原则的时候。优绩至上理想的阴暗面植根于其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自我掌控与自我实现的承诺伴随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优绩至上的理想非常重视个人责任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是件好事。这尊重了人们作为道德主体和公民为自己着想和自我行动的能力。但让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是一回事，假定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连“人生际遇”这一短语也借鉴了道德词语，暗示了无限责任也有一定限度。说到某人的际遇（lot），也就是在说他抽的签，抽签的结果是由命运、财富或天意决定的，而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1]它超出了成就和选择的范围，指向了运气和机会的范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指向了天赐。这提醒我们，在历史早期，关于优绩最重要的辩论不是关于收入和工作，而是涉及上帝的恩典：优绩究竟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还是上天将其作为礼物赐予我们的？

优绩至上的宇宙

“自己的作为决定命运”，这种观念在西方文化的道德直觉中根深蒂固。《圣经》神学教导说，万事皆有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对良好行为的神圣奖赏；干旱和瘟疫是对罪恶的惩罚。当远航的船只遭遇暴风雨时，人们会问：是哪个船员激怒了上帝？^[2]

从当今科学时代回望遥远的过去，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显得天真，甚至有些孩子气，但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么遥远。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优绩至上思维的起源，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道德世界的法则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这与人们熟悉的当代观点相差不远，即财富标示着天分和勤劳，而贫穷意味着懒惰。

《圣经》的世界观有两个方面与现代优绩至上主义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对人的能动性的宣扬，另一方面是对遭受不幸者的冷酷。当代优绩制似乎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意志，《圣经》的世界观则将所有权力归于上帝，毕竟是上帝在施以惩罚和奖赏——洪水、干旱、拯救农作物的降雨。

事实上，这是一幅高度以人类为中心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上帝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应人类的行为：奖励人们的善良，惩罚人们的罪恶。矛盾的是，上帝变得受制于我们，他只要是公正的，就不得不给我们应得的回报。虽然上帝掌管赏罚，但他是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赏罚，而不是任意施行。因此，即使在上帝面前，人类也是在争取——因此也可被视作在赢得——他们的命运。

而且，这种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不妨回想一下《约伯记》，约伯正直贤良，却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折磨，他的儿女也在风暴中丧生。约伯始终真心信仰上帝，他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约伯不知道自己是上帝与撒旦赌约的受害者，上帝与撒旦打赌，无论约伯遭受什么苦难，他的信仰都不会动摇。）

在约伯悼念逝去的家人时，他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称他们为朋友）坚持认为他一定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逼迫约伯去回想自己可能造了什么孽。^[3]这是优绩至上暴政的最早例证。约伯的朋友们坚信苦难暗示着罪孽，必定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罪过，约伯必须为儿女的死负责，这样进一步残酷地加剧了约伯的痛苦。虽然约伯知道自己实属无辜，但他与朋友对才能、品行的神学观念完全一样，因此他向上帝哭诉，询问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正直的人遭受这么多苦难。

当上帝终于对约伯做出回应时，上帝抛弃了罪人才会受到惩罚的残酷逻辑，上帝否认了约伯和他的朋友共同信奉的品行决定命运的假设。上帝在旋风中宣告，并非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人类行为的奖赏或惩罚。降雨未必是为了浇灌义人的庄稼，干旱也未必是为了惩罚恶人，毕竟雨也会下在荒无人烟的旷野。创造世界不只是为了人类，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图景相比，宇宙更为广阔，上帝行事的方式也更加神秘而不可揣度。^[4]

上帝承认约伯是正直的，但责备他擅自揣摩上帝的道德准则。^[5]这大大背离了《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体现的按照功过进行奖惩的观念。通过否认自己建立的是优绩至上的宇宙，上帝宣告了他无限的力量，并教导约伯学会谦卑。信仰上帝意味着接受创世本身的伟大和神秘，而不是指望上帝根据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及是否应得来施以奖惩。

救赎和自救

个人的作为有多大作用，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关于救赎的辩论中再次出现：信徒能否凭借遵守教义和善行主动求得救赎？或者，上帝只是在完全自由地决定拯救的对象，而不管人们选择如何生活吗？^[6]第一个选项似乎更公正，因为它主张奖励善行并惩罚恶行，但在神学上，它引出了一个问题

——这导致人们质疑上帝的全能。如果救赎是我们可以努力赢得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说上帝必然要认可我们所做的一切，救赎也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自救，这意味着上帝的无限力量有其有限之处。

第二个选项将救赎看作无法凭努力获得的天赐恩典，这个观点肯定了上帝的全能，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对世间的一切都负有责任，那么上帝也必须为恶的存在负责。如果上帝是正义的，那么他怎么会允许他本可以杜绝的苦难和邪恶存在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邪恶的存在似乎暗示着他是不正义的。从神学上讲，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同时认可以下三种看法：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全能的，以及世间存在邪恶。^[7]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赋予人类自由意志。这就将邪恶存在的责任从上帝转移到了人类自己身上。如果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选择是否遵从正义法则的自由，人们无须被迫臣服于它，那么当我们选择作恶而不是行善时，我们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作恶之人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应该接受上帝的惩罚，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恶，而是对他们不义之举的公正惩罚。^[8]

最早支持这个解决方案的是公元5世纪的一位英国修道士，名叫伯拉纠（Pelagius）。尽管他声名不彰，但最近有评论家认为，作为早期基督教神学中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倡导者，伯拉纠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先驱。^[9]

然而，在伯拉纠那个时代，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遭到了以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为代表之人的强烈反对。对奥古斯丁来说，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全能，并削弱上帝的最终恩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重要意义。如果人们凭借善行和圣礼就可以实现自我救赎，那么道成肉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上帝恩典的谦卑将让位于对自我努力的骄傲。^[10]

尽管奥古斯丁坚持认为获得救赎仅有凭借上帝恩典这一条路，但教会在实践中又将根据所作所为进行奖惩这一观念带了回来。诸如洗礼、祈祷、做弥撒、行圣礼之类的仪式和典礼，除非让参与者产生足够的效用感，否则并不能长久坚持下去。倘若认为虔诚的宗教仪式和良好的行为并不会赢得上帝的青睐，在上帝眼中这些并无价值，信仰就很难维系下去。而当信仰需要体现在对仪式的外在遵守中，需要借助一系列复杂的教会行为来调解和加强时，关于感恩和恩典的神学将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傲和自救的神学。以上至少是马丁·路德对他那个时代的罗马教会的看法，距奥古斯丁抨击可以凭借自我作为实现救赎这一观点已经过去了十一个世纪。

新教改革之初衷，就是要批驳自我作为决定奖惩的观点。马丁·路德对那个时代天主教会的反抗只有部分与出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有关，当时富人试图购买赎罪券以实现救赎。（严格来说，人们认为这种购买行为可以加速

忏悔进度，并缩短人在炼狱停留的时间。）马丁·路德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将其拓展为更广泛的观点：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会受任何试图取悦上帝的行为影响，无论是善行还是举行仪式。我们既不能祈求进入天堂，也不能花钱买一条路进去。对路德来说，蒙获上帝选中是与个人努力完全无关的恩赐。想要通过参与圣餐、弥撒或其他途径来说服上帝认可我们，进而增加进入天堂的机会的行为，是对上帝的放肆亵渎。^[11]

严格的路德派恩典教义坚决反对优绩至上论，路德否定凭借善行实现救赎的可能，不给人类的自由或自我实现留下任何空间。然而，矛盾的是，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却导致日后新教教徒及其后继者为美国带去了强大的优绩至上主义工作伦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12]

像路德一样，约翰·加尔文认为救赎纯粹是上帝的恩典，而与人类的功过或是否应得无关，他的这一神学见解是对新教教徒的启发。谁将获得拯救，谁又将遭受诅咒，这早已是命中注定，不会因人们选择如何生活而改变，即使做圣礼也无济于事。虽然必须尊重这些仪式以增进上帝的荣耀，但“它们不是借以获得恩典的方法”。^[13]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引发了人们难以忍受的焦虑。个中原因不难看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死后的处境比今生你关心的所有事物都重要，那你会拼命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蒙获选中的还是遭受诅咒的，但上帝并不会提前告知人们这一点。我们不能靠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判断他蒙获上帝选中与否。这种选择发生在“上帝无形的教会”中。^[14]

正如韦伯所说：“自己是否蒙获上帝选中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个信徒的脑海中，并将占据脑海中的所有位置，他们将会思索：我究竟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得到了恩典？”这个问题的持久性和紧迫性将加尔文主义者引向某种形式的工作伦理。既然每个人都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去从事某一职业，那么尽力做好工作以回应这种召唤就是救赎的标志。^[15]

这样一来，工作的意义不在于享受它带来的财富，而在于颂扬上帝，若为个人的奢侈享受而去工作，则是对这一目标的背离，陷于腐败。加尔文主义把艰苦的工作和禁欲主义结合在了一起。韦伯指出，努力工作但又很少消费，这种工作方式要求严苛，促进了资本积累，并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即使后来这种最初的宗教动机消失了，新教的工作伦理和禁欲主义也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了文化基础。

对本书写作的目的而言，此事的意义在于人类行为和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的张力。一生勤勉工作以回应上帝的召唤，这诚然不是获得救赎的捷径，而是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蒙获上帝选中的方式。勤勉工作是获得救赎的标

志，而不是其原因。

事实证明，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让人们把这种世俗活动仅看作救赎的标志，而不是其来源。从心理上讲，人们很难忍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上帝会无视增加他的荣耀的虔诚努力。所以我一旦根据自己的勤勉工作推断出自己是蒙获选中的人，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我的良好表现或多或少促使了自己蒙获选中。从神学上看，凭借良好表现获得救赎这一优绩至上的理念早已出现，无论是在天主教对仪式和圣礼的强调中，还是在犹太人认为需要遵守律法和维护十诫以获得上帝青睐的观念中。

随着加尔文主义响应上帝召唤而工作的理念转变为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人们很难再抗拒其中的优绩至上主义内涵，即救赎是人们自己赢得的，工作不再仅是获得救赎的标志，而且是获得救赎的原因。韦伯通过观察提出：“实际上，这意味着上帝帮助自救的人，因此有人说加尔文主义者实现了自我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实现了对自我救赎的确认。”一些路德教徒抗议说，这种观点相当于“回归到了工作实现救赎这一学说”，而路德恰恰认为这一教义是对上帝恩典的冒犯。^[16]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与人们必须依靠在受召唤的工作中证明自己蒙获选中的观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世俗概念上的成功将很好地体现谁注定要获得救赎。韦伯解释说：“上帝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召唤，人们应该接受这份召唤并为之努力工作。”这赋予了劳动分工神圣的认可，并支持了“对经济秩序所做的神意论解释”。^[17]

依据人们的世俗活动证明其是否蒙受上帝恩典，这导致优绩至上主义卷土重来。中世纪的修道士秉持着“精神贵族”的理念，他们远离对世俗的追求，并追寻着苦行的召唤。但随着加尔文主义的出现，基督教禁欲主义“大步迈入了世俗的集市”并“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门”。所有基督徒都响应召唤努力工作，并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通过在预定论教义基础上构建的理论体系”，加尔文主义将“世俗之外与世俗之上修道士秉持的精神贵族理念”替换为“尘世中预定论教义下上帝所选圣徒秉持的精神贵族理念”。^[18]

由于坚信自己是蒙获选中的人，这些蒙获选中的精神贵族带着轻蔑俯视显然注定要受到诅咒的人。在这里，韦伯瞥见了我所认为的优绩至上傲慢的早期版本。“坚信自己蒙获选中的人自诩圣洁，认为自己蒙受了神圣的恩典，这让他们在看待周围人的罪恶时居高临下：他们不仅未能因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而对他人产生同情式的理解，反而对这些注定承受永恒诅咒之上帝之敌深怀仇恨与鄙视。”^[19]

因此，新教伦理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在提倡自救和对自己的命运

负责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符合优绩至上主义的思维。它让社会迸发了一股急切地、卖力地奋斗的热情，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同时揭露了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阴暗面。在上帝恩典面前因无助而形成的谦卑，将让位于相信自我努力所带来的傲慢。

天命论思维：过去和现在

对路德、加尔文和清教徒来说，关于人类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关于救赎的问题：蒙获选中的人究竟是自己赢得救赎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救赎，还是说这份救赎只是人类无从控制的、来自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关于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针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问题：成功者究竟是自己赢得成功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成功，还是说他们的成就只是出于我们无从控制的外在因素？

乍一看，这两个辩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是宗教领域的，另一个着眼于世俗领域。但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在我们当今时代的优绩至上主义背后，有着神学辩论的深深烙印，正是那些神学辩论产生了如今这一思想。新教的工作伦理最初是恩典与自我作为、无助与自救的紧张辩证关系。而到最后，自我作为战胜了上帝恩典，自我掌控和自我实现的道德压倒了对上帝的感激和谦卑。这时人们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不再焦虑地寻找救赎实现与否的标志，努力工作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关于自我掌控和自我作为的思想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倾向。随着对上帝信仰的消退，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信心逐渐增强。我们越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自给自足，就越没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愧疚或感恩。

但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成功的态度也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与天命论毫不相关。我们是自由的主体，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发迹、成功，这种想法只是优绩至上主义的一个方面。确信“成功的人理应成功”这一观念同样重要。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理念让成功者变得傲慢，而让失败者感到屈辱。这反映了残存的天命论信念，而这种信念其实长存于世俗社会的道德话语中。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20]

优绩至上原则的暴政就来自（或者至少部分来自）上述这份冲动。如今的

世俗优绩至上体系正在以呼应早期天赐神授的方式为成功披上道德的外衣，尽管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这些。

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观念其实是去除了上帝的天命论，至少在这种思想中，上帝并不会干预人类事务。成功者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但这份成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提高了经济竞争的道德风险，它将成功者神圣化，同时也丑化了失败者。

文化历史学家杰克逊·李尔斯解释说，尽管加尔文主义者关于预定论和人性本恶的思想消失了，但天命论思想仍然无处不在。对加尔文和清教徒来说，“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没人是理应获得救赎的，救赎只能靠上帝的恩赐。^[21]

但是当自由主义神学家开始强调人类自救的能力时，人们开始把成功视为个人努力和天赐安排融合的结果。这个转变过程可能发展缓慢，甚至断断续续，但方向始终没变，新教教徒对天命论的信念变成了为经济地位现状提供精神上的合理化解释的方式，天命甚至默默地为财富不平等背书。^[22]

李尔斯认为，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天命论和一种更强的关于自我掌控的伦理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对抗。天命论强调生活中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维度，它认为世间人们的所作所为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匹配，它允许神秘、悲剧和谦卑存在。这就是《传道书》所传递的情感：“我回来了，并且清晰地看到，跑快的未必得赢，力强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明哲的未必得财，技高的未必得喜，时机和际遇会左右众人。”^[23]

相比之下，自我掌控的伦理认为“人类的选择才是精神世界的中心”。^[24]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上帝，而是重塑了上帝在天命论中扮演的角色。李尔斯证明，掌控和控制自我的道德观发源于福音派新教，并最终占据了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种道德观带来了“从恩典之约到路德所批判的奋斗之约”的转变。18世纪中叶，“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神圣的仪式（比如传统天主教仪式），而是世俗的奋斗”。^[25]但这些世俗的奋斗仍然将天命安排视作其道德正确性的依据。

在新教的信仰体系中，天意仍然主导着一切，但人类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参与实施上帝的计划，并可以用某种方式迎合上帝的目的。福音派的这种理性在对至高无上天意的信仰和对人类努力的空前颂扬之间实现了平衡。^[26]

将人类的自我努力和天意的奖惩结合起来的做法为优绩至上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这样就摒弃了天命论，并将世俗的成功与道德上的正当性联系起来。李尔斯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退步，他说：“反过来说，如果某种文化能够不那么强调个人自己掌控命运的责任，那么它会更宏大、更宽容，也会更亲切。”更敏锐地认识到运气和命运是多么难以预测，“可能会促使幸运的人想象自己不幸的样子，从而克服优绩至上主义的傲慢，并促使他们承认人们得到自己所应得的这种事是多么偶然、多么难以预测”。^[27]

李尔斯用非常直接的语言对道德和公民所受的损害做出了评价：

自我掌控的文化继续支撑着自鸣得意、世俗化的基督教天命论，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这种观点一直在塑造着美国的道德体系，尽管现在流行的词语是技术官僚而不是宗教。天命论的傲慢在于其倾向于把世俗神圣化，不仅武断地认定我们都是神意安排或“逐步演变”计划的一部分，还将现实中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乃至全球权力斗争的结果都视为这个计划的体现。^[28]

天命论思想认为人们得到的是他们应得的，这在现代公共舆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当前的天命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傲慢式的，另一个是惩罚性的。两种版本都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傲慢式天命论的显例。华尔街银行冒险和贪婪的行为把全球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需要大量纳税人的援助。就在家庭和小微企业艰难复苏之际，华尔街的上层银行家很快给自己开出了数百亿美元的奖金。面对公众的怒火，当有人问高盛CEO（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何以获取如此丰厚的薪酬时，他回答说，他和银行家同事们是在“做上帝的工作”。^[29]

在致命的飓风和其他灾难过后，一些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惩罚性版本的天命论。当卡特里娜飓风在2005年摧毁新奥尔良市时，牧师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宣称这场风暴是对这样一个以马尔迪·格拉音乐狂欢节、性变态、狂欢和其他罪恶活动闻名的“邪恶之城”的神圣报复。^[30]2009年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超过20万人的生命，而电视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海地奴隶在1804年反抗法国时与魔鬼签订的契约。^[31]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几天，牧师杰里·福尔韦尔出现在罗伯逊的基督教电视节目中，他把这场袭击解释为对美国罪恶的神圣惩罚：

堕胎者必须为此事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上帝绝不允许遭受嘲弄。当我们杀死4000万名无辜婴儿时，我们惹恼了上帝。我坚定地认为，这些试图让不生育成为生活方式的人——异教徒、堕胎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还

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些想要把美国世俗化的人，我要用手指着他们的脸说：是你们促使了灾难降临。 [32]

将史诗般的灾难解释为神罚并不是基督教天命论的“专利”。2011年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并引起核电站熔毁，东京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官员石原慎太郎认为这场灾难是对日本物质主义的神罚，他说：“我们需要这样一场灾难来消灭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已经腐蚀了日本人的心灵。” [33]

健康和财富

最近几十年，美国基督教产生了一种乐观的天命论信仰的新变体，叫成功神学。该教派的领导者是美国最大的几个教堂的电视福音传道者和传教士，教义是上帝赐予财富和健康来奖励人们的信仰。成功神学并不是把上帝的恩典视为神秘的、可以不劳而获的礼物，而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20世纪早期的福音传道者E.W.凯尼恩为这场运动奠定了基础，他竭力让基督徒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是我的，上帝的力量是我的，上帝的成功也是我的，我就是胜利者，我就是征服者。” [34]

研究成功神学的历史学者凯特·鲍勒写道，该教派的教义完全可以用“我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这句话来概括，在这句话中，受上帝祝福的证据体现在健康和富有中。 [35] 乔尔·奥斯廷是成功神学的著名传道者，他在休斯敦的教堂是美国最大的教堂。他曾告诉奥普拉·温弗瑞：“耶稣的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36] 他的畅销书里有大量其凭借信仰获得上帝祝福的例子，包括他住的豪宅和他在乘坐某次航班时获得了升舱。 [37]

看起来，关于上帝祝福的教义会让人们在好运面前保持谦卑，而不会像优绩至上主义那样，认为财富和健康都是自我美德的标志。但正如鲍勒所观察到的，“blessed”（受上帝祝福）这个词语其实模糊了恩赐和回报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这个词可以表达纯粹的感激：“谢谢你，上帝，没有你，我仅靠自己是不可能获得这些的。”另一方面，通过这个词也可以推出人们应得这些事物：“谢谢你——我自己，感谢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对美国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词，因为美国梦基于努力工作，而不是运气。 [38]

虽然大约有100万名美国人参加了宣扬成功神学的大型教堂活动，但成功神学更广泛的影响在于其与美国人对奋斗和自救的信念的共鸣。《时代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1/3的美国基督徒同意，如果你把钱交给上帝，上帝就会保佑你获得更多的钱；61%的信徒相信“上帝想让人们成功”。 [39]

到21世纪初，成功神学因其推崇努力工作、阶层跃升、乐观思维，变得很难与美国梦本身区分开。鲍勒写道：“成功神学运动不仅带来了美国人要实现自我创造的启示，更肯定了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结构。”而且，它深化了成功是美德带来的结果这一信念。像早期的成功神学一样，它相信市场“会在人们幸运或失败时给予奖励或惩罚，善良的人将得到丰厚的报酬，而邪恶的人将会倒下”。^[40]

成功神学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对“个体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强调，^[41]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令人振奋的想法。从神学角度来说，成功神学认为救赎是我们自己获得的成就；从世俗角度来说，成功神学给人们充足的信心，让人们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拥有足够的信念，他们就能获得健康和财富。这是彻底的优绩至上主义，与所有优绩至上的道德观一样，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高尚理解可以令人满意，但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这种道德观又非常令人沮丧，甚至带有惩罚性。

以健康为例，还有什么能比相信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可以凭借祈祷治愈疾病，能够凭借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对上帝的热爱避免疾病更有力量呢？但是这种对积极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当疾病来临时，这不仅是一种不幸，更是对我们美德有亏的批判，死亡甚至可谓雪上加霜。鲍勒写道：“如果一个信徒得病去世，其余人的羞愧会加重悲伤。他们会认为他们所爱之人的去世是因为其在信仰的考验中失败了。”^[42]

成功神学思想残酷的一面在关于医保的辩论中可见一斑。^[43]当特朗普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想要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更愿意选择市场化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能够增加竞争度并因此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使用先前存在的医保条款保护人们。但是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莫·布鲁克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共和党的方案会使在医疗方面有更多需求的人付出更多金钱。但这是优点，而不是弊端，因为这会奖励选择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允许保险公司向需要更多医疗护理的人收取更高的保费不仅在经济上有效，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收取病人更高的保费会减少身体健康者的生活成本，而健康的人“过着良好而健康的生活，他们会做很多事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这些正确行事的人反而面对生活成本的飙升”。^[44]

国会议员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案例，重申了从清教徒到成功神学所信奉的优绩至上主义冷酷的一面：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这个逻辑不一定与宗教观念挂钩，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系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2009年，奥巴马医改方案首次得到公开讨论时，全食公司（Whole

Foods) 的创始人约翰·麦基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公开反对获得医保的权利，他的论点主要基于自由主义而不是宗教观念。然而，像成功神学教派的传道者一样，他极力主张个人责任，认为良好的健康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许多医疗健康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如今美国有2/3的人超重，1/3的人肥胖。致命的疾病，比如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和肥胖，占据了所有医疗支出的70%，而这些疾病大多可以通过适当的饮食、锻炼、不吸烟、少量饮酒和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预防。^[45]

他认为，如今许多人健康状况不佳，只能怨他们自己，怨不得别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上帝的信仰，而在于他们不重视科学和医学研究，而这些研究表明以植物为基础的低脂肪饮食“有助于预防甚至能够治愈大多数致命且医疗费用高昂的退行性疾病，我们本可以在90岁甚至100岁之前都过着几乎不被疾病困扰的生活”。尽管他没有明确声称患病者活该，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这些人至少不应该期望从同胞那里得到帮助。“我们都要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健康负责。”^[46]

对麦基来说，就像对成功神学教派的传道士来说一样，健康是美德的标志——无论人们是坐在大教堂的长椅上获得它的，还是在全食的有机食品区域的过道里获得它的。

自由主义的天命论

将财富和健康看作上帝的赞扬或批评，这是优绩至上主义看待生活的方式。优绩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恩典，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思维方式颂扬了绝对的关于掌控和支配的道德，并最终助长了精英的傲慢。优绩至上主义让成功人士相信他们自己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并瞧不起不幸的受害者，认为遭遇飓风、海啸、疾病是他们自己罪有应得。

这种傲慢不仅存在于成功神学教派的保守主义者及福利制度的自由主义批评者当中，也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政治的显著特征。例如，美国人经常用天命论来形容美国的巨大力量和繁荣来源于其神授的或正义的地位。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民主党2016年总统选举提名的演讲中宣称：“归根结底，这是特朗普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47]在竞选期间，她经常使用这句话，因为她想要说服选民，特朗普自相矛盾，他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却又行事狠毒、唯利是图。

但其实践行善德和伟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国家和个人来说，正义是

一回事，权力和财富则是另一回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是正义的，而道德上令人钦佩的国度也并不都强大。

对于“美国因践行善德而伟大”这句话，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结果却忘了这句话背后的天命论前提。这句话呼应了一个持久的信念，即美国在世界上背负着神圣的使命，这个清晰的使命就是征服一片大陆或维护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但即使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消退了，政治家们仍在重申美国的伟大源于美国践行善德。

这句口号本身是最近才被提出的。第一位使用它的总统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误以为这句话是托克维尔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写的。在1953年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提到了“到美国来的一位有智慧的法国访客”，这位访客在寻找美国成功的源泉。艾森豪威尔引用这位访客的话如下：“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看到布道坛上正义的火焰，我才明白美国天赋和力量的秘密。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美国如果不再践行善德，那也就不再伟大。”^[48]

尽管这些句子没有出现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49]但事实证明这些话很受后来的总统（尤其是共和党人）的欢迎。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布什都在鼓舞人心的场合说过这些话，通常是在对教徒听众演讲时。^[50]1984年，里根总统在一次基督教福音派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这句口号的天命论基础：

我们所有的物质财富和所有的影响力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和这种信仰所带来的基本价值观之上。据说，150年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就发现，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美国如果不再践行善德，那也就不再伟大。^[51]

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人为了让宣传言论引发人们的精神共鸣，开始采用这一口号。在总统任职期间，克林顿共用了9次。约翰·克里和希拉里·克林顿也都在总统竞选期间说过这句话。^[52]

历史正确的一边

声称美国因践行善德而伟大，是认为暴风雨的目的在于惩罚罪孽这种天命论观点光明、积极的一面。这是优绩至上信念应用于一个国家的结果。根据历史悠久的天命论传统，通常意义上的成功是获得救赎的象征，或从世俗角度来讲，是善行的象征。但是，如此诠释美国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对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如果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源于其美德，难道对有权、有钱的公民就不能这么说吗？

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尤其是其中重视平等的人，他们反对一种观点：富人有钱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他们认为这是反对向富人征税以帮助弱势群体的自私的、道貌岸然的理由。比起主张富裕意味着道德上的优越，平等自由主义者更强调财富的偶然性。他们指出，市场经济社会下的成败与品格和美德有关，但受运气和环境影响也很大。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决定胜负的许多因素都是随机的。

但是，很难一方面同意一种道德化的天命论观念，即国家的伟大是因其践行善德，另一方面又否定另一种道德化的、优绩至上主义的观点，即富人的财富源自其美德。如果对国家而言，伟大意味着正义，那么对财富排名前1%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在道德和神学上，国际层面的天命论和国内的优绩至上主义要么同存，要么俱亡。

尽管最近几十年的政治家没有明确承认这种观点，但他们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逐渐展现了优绩至上主义的思维倾向。“因践行善德而伟大”的天命论中隐含的优绩至上主义观点，在美国国内关于团结、责任和福利制度的讨论中逐渐表达了出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自由主义者逐渐接受了保守主义者对福利制度的批评，包括他们对个人责任的苛刻要求。尽管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等政客并没有将所有健康和财富的获得都归因于个人善行，但他们在努力将能否获取福利援助与受助人的个人责任和资质挂钩。^[53]

当代自由主义中隐含的天命论思想，也可以在涉及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言辞的转变中窥见。政府发言人不断坚称自己的政策或政治盟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批评对手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或许有人认为，关于历史“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的辩论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相互对立，声称自己的体系终将获胜。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冷战背景下的辩论中使用过这样的表述。^[54]

直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或“错误的一边”这样的表述才在政治表述中成为主流，主要是民主党人在用。小布什总统只用过一次这样的表述，他在2005年告诉美国陆军士兵，中东恐怖分子“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补充说，多亏美国入侵伊拉克，“自由的浪潮”才席卷了整个中东。一年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在航空母舰上讲话，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向美国部队保证：“我们的事业是必要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55]

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必胜主义的言辞来自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用了25次，巴拉克·奥巴马用了32次。^[56]有时奥巴马会像小布什和切尼那样，用这句话来描述与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他在西点军

校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小人物。”他在美国空军学院发表讲话时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永远不可能“有能力摧毁美国人或我们的生活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57]

克林顿和奥巴马在其他情况下也曾采用这种必胜主义言辞。这反映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相信历史正不可避免地朝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进。1994年，克林顿对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叶利钦的前景表示乐观，克林顿说：“他相信民主。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了回应伊斯兰世界的民主运动，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向暴君和独裁者发出严厉的警告：“靠腐败、欺骗与压制异议的手段执政的人要知道，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58]

2009年，当伊朗人在街头向压迫式的政权抗议时，奥巴马称赞他们说：“为正义抗争的人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当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让民主政治有希望取代北非和中东的专制统治时，奥巴马也援引了这句历史的裁决。他说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位于历史错误的一边”，并支持把卡扎菲赶下台。在有人质疑他对埃及解放广场民主抗议者的支持不足时，奥巴马回应：“我认为历史终将记录一切，在埃及局势的每个时间节点，我们都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59]

在历史真正形成之前就宣称自己和它站在一边，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对事情如何发展加以预测其实非常棘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给中东带来自由和民主。即使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希望也很快被接下来的专制与镇压取代。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叶利钦的民主时刻现在显得有些短暂。

其次，即使可以预见历史的进程，也无法为道德判断提供任何依据。事实证明，普京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已经难以撼动，至少从这一点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人是普京，而不是叶利钦。在叙利亚，暴君巴沙尔·阿萨德在残酷的内战中幸免于难，从这个意义来讲，他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道德宇宙进步之路曲折

坚信自己的事业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人可能会回答说他们指的是更长远的历史，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进一步的假设：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即便步履蹒跚，历史也终会走向正义。这一假设揭露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论调下隐含的天命论思想。这种论证基于一种信念，即历史的进程由上帝指引，或在世俗中会朝着道德上进步、完善的方向发展。

奥巴马就持有这种观点并经常谈起它，他常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说：“道德宇宙进步之路总是很曲折，但定会通向正义。”奥巴马非常喜欢这句话，并在总统演讲和声明中33次引用它，还将其织进总统办公室的地毯。^[60]

这种天命论的信仰为历史“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的论调提供了道德依据，还支持如此主张：美国（或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因为只有国家在替天行道，或在历史上不断迈向自由与正义，国家的伟大才标志着其道德上的优越。

相信自己的计划及目的与上帝一致，或者与历史迈向自由和正义的进程吻合，可以带来巨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为不公而奋斗的人们来说。马丁·路德·金相信道德虽走弯路，但终将“通向正义”，这一教导鼓舞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主义者，他们不顾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继续游行。马丁·路德·金那句令人难忘的话借鉴了19世纪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牧师西奥多·帕克的一次布道，帕克的版本比马丁·路德·金的复杂一些，他的话表明了天命论神学如何成为被压迫者希望的源泉：

看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正义在不断进步与取得胜利。我不会装作理解道德宇宙，道德进步之路是曲折的，我的目光所能看到的不远。我无法凭视觉来计算这条弯路的弧度并预测它的走向，但我可以凭着良心感知。站在我的角度，我坚信这个世界会走向正义。乱象不会持续太久。当年杰斐逊一想到奴隶制，想起上帝是正义的，他就会颤抖。用不了多久，整个美国都会颤抖。^[61]

就像帕克一样，在马丁·路德·金看来，道德宇宙进步之路虽然曲折，但必定趋向正义的信念，是在鼓舞性地、预言性地呼吁人们站出来反对不公。但是，天命论信念可以为无权无势者带来希望，也可能使强者变得傲慢。这可以从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中看出，民权时代的道德紧迫感让位于自负的胜利者心态，这正是冷战的后果。

苏联的解体 and 柏林墙的倒塌让西方许多人认为，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对的。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他们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其中包括自由贸易协定、放宽金融管制及其他促进货物、资本和人力跨国界流动的措施。他们满怀信心地预测，全球市场的扩张将增强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缓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全球贸易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甚至可能动摇专制政权的统治，并引导这些国家走向自由民主。

事情并没有如是发生。全球化在2008年引发金融危机，并在8年后导致激烈的政治后果。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没有消失，反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发

展势头，并成为对民主社会的自由制度和规范的威胁。

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全球化得到发展，推进全球化的精英们对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再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在谷歌收录的书籍中，“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短语的使用频率增加了8倍以上。^[62]

全球化的支持者对历史站在自己这一边充满信心。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敦促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努力缓解人们对这一协议会威胁工人就业前景的担忧，但他最大的担忧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倘若失败，将给全球化带来打击：“我最担心的是，随着我们迈向21世纪，协议倘若失败，将置美国于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压倒了他所有担忧。”1998年，克林顿在柏林发表讲话时，赞扬德国“向全球化经济过渡的艰难过程”。他说，尽管许多德国公民“可能尚未感受到好处”，但德国对全球化的拥护让德国“显然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63]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不意味着拥抱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意味着在国外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在国内消除歧视并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在不同时期，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将自己的政策确定为“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中包括医疗保险改革、《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MLA）、大学学费税收抵免及禁止歧视性少数群体雇员的行政命令。200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奥巴马的演讲中，克林顿回忆起尽管当年共和党指责他太年轻，缺乏经验，不适合担任政府首脑，但他仍赢得了总统职位的历程：“在1992年，这些批评没有用，因为我们当时处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这在2008年也不会有用，因为巴拉克·奥巴马正处在历史正确的一边。”^[64]

反对歧视和为人们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是有价值的事业，希拉里·克林顿也把这些作为她2016年竞选总统的中心议题。但在那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经济体系受金融力量支配，金钱在政治制度中比公民发挥了更大影响，愤怒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日益高涨，促进机会平等的计划似乎不合时宜，沦为天命论理想的苍白表达。

当奥巴马谈到道德宇宙进步之路虽曲折但必定趋向正义时，他补充了一项马丁·路德·金没有做出的保证：“最终，美国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65]但这扭曲了马丁·路德·金所说的话中包含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巴马的天命论不再是对变革的呼吁，而变成停下改革脚步的正当理由和对美国例外主义安慰式的重申。“进步不总是走直线的。”2012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弗利山庄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中解释道，“进步之路是一条‘之’字形曲线。有时候政治走错了路，有时候有些人

被落下了。但是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是，最终，我们必将做出正确的选择。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道德的曲折之路必将趋向正义，就是让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特殊的原因。”^[66]

1895年，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兼社会运动家凯瑟琳·李·贝茨发表了一首爱国主义诗歌《美丽的美国》。15年后，一位教堂风琴师为其配乐。这首歌颂扬美国的良善，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爱国歌曲之一，许多人希望选它为国歌。^[67]

与美国的官方国歌《星条旗》不同，《美丽的美国》是和平圣歌。这首歌赞美了美国的“紫色高山式的威严”，而不是“火箭的红色闪光，炸弹在空中爆炸”。这首歌的副歌是祈求上帝恩典的祈祷：

美利坚！美利坚！

上帝赐予你荣光，

并会冠你以手足之情，

直至彼岸闪烁的海洋！^[68]

但是关于“上帝赐予你荣光”那句歌词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可以将其解读为表达了对将来的愿望——“（愿）上帝赐予你荣光”，或者可以用过去时来解读它，作为对事实的陈述——“上帝（已）赐予你荣光”。^[69]

从歌词的其余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的初衷是祈祷未来被上帝赐予荣光，诗的下一行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它并不是说“（上帝已）冠你以手足之情”，诗人表达的是对上帝这样做的希望。

不可避免地，许多美国人以第二种方式解释“上帝赐予你荣光”这句歌词，把这看作既成事实。这反映了美国的天命论是信念，而不是志向。上帝的荣光不是无法赢得的礼物，而是美国人应得的，并且是实际上已经得到的东西。“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

在建功立业与上帝的荣光之间维持平衡并不容易。从清教徒到成功神学的传教士，倡导赚钱和有所成就的行为准则都几乎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似乎快要压倒更谦卑的关于希望和祈祷、感恩和赏赐的道德准则。建功立业排挤掉了上帝的荣光，或者说优绩论以自己的理念重铸了上帝的荣光，把这种恩典变成了我们应得的东西。

2001年10月28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周后，自小就失明的传奇非裔美国灵魂乐歌手和音乐家雷·查尔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第二场比赛开

赛前演唱了一首激动人心的《美丽的美国》。查尔斯以演唱这首歌闻名，他能表现出其他演唱者无法展现的悲伤和救赎式的喜悦。那天晚上，查尔斯像往常一样添加了一段即兴演唱，观众从中可以听出这样一种论调——美国的荣光并不是希望和祈祷，而是既成事实：

美利坚！美利坚！

上帝确实赐予了你荣光。哦，是的。

并冠你以——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手足之情，

直至彼岸闪烁的海洋。 [70]

当最后的和弦在体育场内回荡时，四架F-16战斗机在体育场上空飞过。查尔斯所演唱的歌曲的凄美与感伤让位于某些更有威力的、更不会宽恕的事物，这就是现代天命论信念带来的绝对自信。道德宇宙进步的曲折之路可能通向正义，但上帝会救赎的是自救之人。

[1]“lot,n.”OED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June 2019,oed.com/view/Entry/110425.Accessed July 16,2019.

[2]例如，《约拿书》1:4-16。

[3]《约伯记》4:7。关于本处及随后对约伯的讨论，我都深深受益于Moshe Halbertal’s fine essay“Job,the Mourner,”in Leora Batnitzky and Ilana Pardes,eds.,The Book of Job:Aesthetics,Ethics,and Hermeneutics(Berlin:de Gruyter,2015),pp.37-46。

[4]Ibid.,pp.39,44-45.哈伯特把对约伯的这一理解归因于迈蒙尼德。关于荒无人烟之地的降雨，参见《约伯记》38:25-26。

[5]Ibid.,pp.39,45.

[6]关于此处及随后段落的详细讨论，我受益于Anthony T.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esp.pp.88-98,240-71,363-93。

[7]Halbertal,“Job,the Mourner,”p.37.

[8]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240-59;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30.

[9]Eric Nelson,The Theology of Liberalism: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Justice of Go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Michael Axworthy,“The Revenge of Pelagius,”New Statesman,December 7,2018,p.18;Joshua Hawley,“The Age of Pelagius,”Christianity Today,June 2019,at 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9/june-web_only/age-of-pelagius-joshua-hawley.html.

[10]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256–71;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p.272.

[11]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363–81.

[12]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original published 1904–1905),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

[13]Ibid.,p.104.

[14]Ibid.,pp.109–10.

[15]Ibid.,pp.110–15.

[16]Ibid.,p.115.

[17]Ibid.,p.160.

[18]Ibid.,pp.154,121.

[19]Ibid.,pp.121–22.

[20]Max Weber,“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i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71.原文是斜体字。

[21]Jackson Lears,Something for Nothing:Luck in America(New York:Viking,2003),p.34.

[22]Ibid.

[23]Ibid.,pp.57–62.Ecclesiastes 9:11–12,cited at p.59.

[24]Lears,Something for Nothing,p.60.

[25]Ibid.,p.76.

[26]Ibid.

[27]Ibid.,p.22.

[28]Ibid.

[29]John Arlidge and Philip Beresford,“Inside the Goldmine,”The Sunday Times(London),November 8,2009.

[30]Graham quoted in“Hurricane Katrina:Wrath of God?,”Morning Joe on NBC News,October 5,2005,at nbcnews.com/id/9600878/ns/msnbc-morning_joe/t/hurricane-katrina-wrath-god/#.XQZz8NNKjuQ.

[31]Robertson quoted in Dan Fletcher,“Why Is Pat Robertson Blaming Haiti?”Time,Jan.14,2010.

[32]Falwell quoted in Laurie Goodstein,“After the Attacks:Finding Fault,”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2001.

[33]Devin Dwyer,“Divine Retribution?Japan Quake,Tsunami Resurface God Debate,”ABC News,March 18,2011,at abcnews.go.com/Politics/japan-earthquake-tsunamidivine-retribution-natural-disaster-religious/story?id=13167670;Harry Harootunian,“Why the Japanese Don’t Trust Their Government,”Le Monde Diplomatique,April 11,at mondediplo.com/2011/04/08japantrust.

[34]Kenyon quoted in Kate 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3,2016.See also Kate Bowler,Blessed: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rosperity Gospe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35]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

[36]Osteen quoted in Bowler,Ibid.

[37]David Van Biema and Jeff Chu,“Does God Want You to Be Rich?”Time,September 10,2006.

[38]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

[39]Bowler,Blessed,p.181;polling data in Biema and Chu,“Does God Want You to Be Rich?”

[40]Bowler,Blessed,p.226.

[41]Ibid.

[42]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

[43]Vann R.Newkirk II,“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Act’s Prosperity Gospel,”The Atlantic,May 5,2017.

[44]Brooks quoted in Newkirk,ibid.,and in Jonathan Chait,“Republican Blurts Out That Sick People Don’t Deserve Affordable Care,”New York,May 1,2017.

[45]John Mackey,“The Whole Foods Alternative to ObamaCa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1,2009.See also Chait,ibid.

[46]Mackey,Ibid.

[47]Hillary Clinton,“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July 28,2016,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accepting-the-presidential-nomination-the-democratic-national-convention.

[48]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Address at the New England’Forward to’54’Dinner,”Boston,Massachusetts,September 21,1953,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new-england-forward-54-dinner-boston-Massachusetts.

[49]John Pitney,“The Tocqueville Fraud,”The Weekly Standard,November 12,1995,at weeklystandard.com/john-j-pitney/the-tocqueville-frau.

[50]算上这句话的变体，杰拉尔德·R.福特在担任总统期间用了6次，罗纳德·里根用了10次，老布什用了6次。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at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51]President Ronald Reagan,“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Columbus,Ohio,”March 6,1984,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annual-convention-the-national-association-evangelicals-columbus-ohio.

[52]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at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该档案包括所有总统演讲和言论，以及一些不是在任总统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讲。一项档案搜索显示，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期间至少使用了1次这个短语，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期间至少使用了7次。

[53]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54]第一位使用这个短语的总统是罗纳德·里根，他是在1988年谈到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时说的，见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remarks-the-american-coalition-for-trade-expansion-with-canada。但几个月后，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他批评“历史正确的一边”是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想要接受苏联统治东欧的人所使用的“令人不快的马克思主义短语”，见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remarks-the-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See generally Jay Nordlinger,“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National Review*,March 31,2011,and David A.Graham,“The Wrong Side of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The Atlantic*,December 21,2015.

[55]President George W.Bush,“Remarks to Military Personnel at Fort Hood,Texas,”April 12,2005,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remarks-military-personnel-fort-hood-texas.Vice President Richard B.Cheney,“Vice President’s Remarks at a Rally for Expeditionary Strike Group One,”May 23,2006,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vice-presidents-remarks-rally-for-expeditionary-strike-group-one.

[56]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at presidency.ucsba.edu/advanced-search.

[57]President Barack Obama,“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New York,”May 22,2010,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commencement-address-the-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new-york-2;Obama,“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in Colorado Springs,Colorado,”June 2,2016,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commencement-address-the-united-states-air-force-academy-colorado-springs-colorado-1.

[58]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Interview with Larry King,”January 20,1994,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interview-with-larry-king-1;President Barack Obama,“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09,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inaugural-address-5.

[59]President 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June 23,2009,at presidencyx.ucsba.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1122;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March 11,2011,at presidency.ucsba.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

conference-1112;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February 15,2011,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 news-conference-1113](http://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1113).

[60]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at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On the rug,see Chris Hayes,“The Idea That the Moral Universe Inherently Bends Toward Justice Is Inspiring.It’s Also Wrong.”At [nbcnews.com/think/opinion/idea-moral-universe-inherently bends-towards-justice-inspiring-it-s-ncna859661](http://nbcnews.com/think/opinion/idea-moral-universe-inherently-bends-towards-justice-inspiring-it-s-ncna859661),and David A.Graham,“The Wrong Side of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61]Theodore Parker,Ten Sermons of Religion,2nd ed.(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55),pp.84–85.

[62]Google books Ngram at<iframe name=“ngram_chart”src=“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interactive_chart?content=right+side+of+history&year_start=1980&year_end=2010&corpus=15&smoothing=3&share=x&direct_url=xt%2Crigh%20side%20of%20history%3B%2Cc0”width=900 height=50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hspace=0 vspace=0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iframe>.

[63]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Media Roundtable I nterview on NAFTA,”November 12,1993,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media-roundtable-interview-nafta;Clinton,“Remarks to the People of Germany in Berlin,”May 13,1998,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people-germany-berlin.

[64]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Remarks at a Campaign Concert for Senator John F.Kerry in Boston,”September 28,1996,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campaign-concert-for-senator-john-f-kerry-boston;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Reception in San Jose,California,”May 8,2014,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democratic-national-committee-reception-san-jose-california;Obama,“Remarks on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on Lesbian,Gay,Bisexual,and Transgender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July 21,2014,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signing-executive-order-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employment;William J.Clinton,“Address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Denver,Colorado”,August 27,2008,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

address-the democratic-national-convention-denver-colorado.

[65]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Reception Celebrating Lesbian,Gay,Bisexual,and Transgender Pride Month,”June 13,2013,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reception-celebrating-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pride-month.

[66]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n Obama Victory Fund 2012 Fundraiser in Beverly Hills,California,”June 6,2012,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obama-victory-fund-2012-fundraiser-beverly-hills-california.

[67]Eric Westervelt,“Greatness Is Not a Given:'America The Beautiful'Asks How We Can Do Better,”National Public Radio,April 4,2019,at npr.org/2019/04/04/709531017/america-the-beautiful-american-anthem.

[68]Katharine Lee Bates,America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Poems(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1911),pp.3–4.

[69]Mark Krikorian,“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National Review,July 6,2011.

[70]A video of Ray Charles’s performance of“America the Beautiful”at the 2001 World Series is available at youtube.com/watch?v=HIHMQEegpFs.

3 阶层跃升的话语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优绩至上主义颂扬自由——凭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应得的权利。如果我要为积累可观的世俗财富——收入和财产、权力和声望——负责，那么我必须配得上这些世俗财富。成功是美德的标志。我发的财是我应得的。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在过去40年里，优绩至上的预设加深了对民主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尽管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所得到的的一切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似乎全球化的赢家需要说服他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那些处于顶端和底层的人已经到达属于他们的位置。即便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消除通往机会的不公平障碍，他们就会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近几十年来，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之间的政治争论主要关于如何解释机会平等及如何实施机会平等，来让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奋斗与应得

我最早是从与学生的交流中注意到优绩至上情绪的高涨的。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有时会有人问及这些年来学生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通常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课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题——公正、市场和道德、新技术的伦理——开展辩论，学生们总是会表达各种各样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决定性的趋势，但有个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学

生中，这种优绩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强化。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罗纳德·里根时代，吸收了当时的个人主义哲学。但这些学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学生，信奉优绩至上的学生涵盖了各个政治派别。在关于大学招生的平权法案是否公正的争论中，他们的态度表现得尤为激烈。无论学生支持还是反对平权法案，大多数人都坚信他们努力学习才有资格进入哈佛大学，因此他们在哈佛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至于他们被录取是因为运气或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的说法，都会遇到哈佛学生的强烈抵制。

在精英大学学生中，优绩至上的看法日益强烈，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录取到精英大学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越来越令人畏惧。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近1/3的申请人。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大约1/5的申请人；2019年，这两所大学只录取了不到1/20的申请人。随着入学竞争的加剧，渴望进入一流大学（或被父母期望进入一流大学）的孩子们的青春期已成为激烈奋斗的战场——为了给大学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大学预修课程、私人升学辅导、SAT培训、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实习和在遥远国度的志愿活动都安排得很紧，压力很大，让人感到紧张，所有这些都是为孩子寻求最好前程的超级父母的督导下进行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凭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获得成功，你就很难从这种压力和奋斗的挑战中走出来。这并不会让学生变得自私或不负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公共服务和其他公益活动，这段经历确实让他们成为坚定的精英。就像他们的清教徒先人一样，这些学生相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

我注意到，大学生中的精英意识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演讲主题是“市场的道德限度”。近期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而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1]我问学生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随后的辩论中，许多学生持自由主义观点：如果该少年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自愿同意卖肾，那他有权这样做。也有一些学生不同意，认为富人可以通过从穷人那里购买肾脏延长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公平的。大厅后面的一位学生提出：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所以应该活得更久。

我被这种厚颜无耻的优绩至上思维吓了一跳。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成功神学信仰，即健康和财富是上帝青睐的标志。当然，说出这句话的中国学生可能并没有沉浸在清教徒或天命论的传统中，但他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在过去10年里，我在访问中国多所大学时遇到许多学生，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这些中国学生就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高度竞争的录取过程中的赢家，难怪他们会抵制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的成功另有原因，他们更容易被另一种想法吸引：我们赢得了成功，无论制度对我们的努力与天分给予什么样的回报，那都是我们理应得到的。

市场与优绩至上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中国的市场改革时，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都在寻求让他们的社会更多地依赖市场。这一时期对市场的信仰为随后几十年优绩至上价值观及其实践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并不一定依赖于优绩至上的假设。支持市场机制最常见的论点与效用和自由有关。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创造了刺激GDP增长和总体福利最大化的激励机制；第二种观点认为，市场让人们自由选择他们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必胜论促使人们提出了第三个理由，即优绩至上论：只要在机会均等的公平体系中运作，市场就会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只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市场结果就会奖励优秀的人。

在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中，优绩至上伦理有时是隐而不现的，但这一观念在他们的继任中左翼人物的政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左翼政治争论的显著特征：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等政治人物没有质疑撒切尔和里根的市场信念，而是接受了这套信念，并想要软化其最苛刻的特征。

他们接受了里根—撒切尔的观点，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首要工具，但他们希望确保市场在公平的条件下运行。所有公民，无论其种族或阶级、宗教或民族、性别或性取向如何，都应该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竞争，以获取市场给予的回报。对中左翼自由主义者来说，机会平等不仅需要消除歧视，还要求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让人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效竞争。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6年，亲市场的中左翼自由主义主张如下：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这不仅符合市场社会的要求，也是实现市场机制基本原则的方式。其中两个原则是公平和生产力。消除歧视和扩大机会将促进市场变得更加公平，吸纳更广泛的人才进入市场会让市场

更具生产力。（比尔·克林顿经常在生产力论的掩护下提出关于公平的论点，比如他会说：“我们不能浪费一个人。”^[2]）

除了公平和生产力，自由派的观点还指向了第三个更有力的理想，即隐含在市场中的理想：让人们能够完全基于努力和天赋进行竞争，会实现市场结果与才能的一致性。在机会真正平等的社会里，市场会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

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价值和应得的表述，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核心。向优绩至上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英才统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体现在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上，这种要求伴随着对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的努力。^[3]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则更有抱负。优绩至上观念体现在所谓的阶层跃升的话语中，保证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站在他们的才能和梦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近几十年来，关于个人责任和阶层跃升的话语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对精英统治的强烈抑制。

责任的言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责任的言论在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针对福利制度的争论都是有关团结的争论，以及关于我们作为公民应该为彼此承担什么。一些人对团结的观念有更高的要求，另一些人的观念则有更多的限制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与其说是关于团结的，不如说是关于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一些人主张更严格的个人责任观念，另一些人则主张有限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的拓展观念是一条线索，表明优绩至上的预设正在准备实施。我们对命运负责得越彻底，我们的生活就越值得赞扬或责备。

里根、撒切尔对福利制度的批评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福祉负责，而国家与社群只应帮助那些不幸并非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人。“我们永远不会抛弃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必须得到我们帮助的人，”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宣称，“但是，让我们努力看看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实现自力更生吧。”^[4]“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句话发人深省，一开始是慷慨的比喻：“那些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有权要求社群的帮助。但是，就像所有的责任归属一样，这一条件也有冷酷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受害者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可以说与自己的不幸有关系的人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在总统辞令中，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首次使用了“并非由于他们自

己的过错”，这意味着严格的个人责任概念：那些由错误的选择导致贫困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不应得到政府的帮助，而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谈论由大萧条导致失业的人不应该受到责难时，不时地采用这句话。^[5]

罗纳德·里根想要削弱政府的作用，他比此前任何一任总统都更频繁地使用“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但在里根之后的每一位民主党继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采用它的频率都达到了里根的两倍。^[6]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像里根一样，含蓄地区分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那些由于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挣扎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对自己的不幸负有责任的人则可能不应得到援助。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保证“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作为总统，他把责任的言辞与阶层跃升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让人同时想起了精英统治冰冷严酷的一面和抱负宏大的一面。“我们必须做美国最擅长的事情，”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布，“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是时候戒除从我们的政府或彼此那里不劳而获的坏习惯了。”^[7]

责任的言辞和阶层跃升的话语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指向自力更生和自我创造的理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责任意味着摆脱福利，找到一份工作，机会意味着获得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有效竞争的教育和技能。如果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能凭借他们的努力和才能向上跃升，他们的成功会是其所作所为的衡量标准。“所有美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庄严的责任，向上攀登到各自的天赋与毅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克林顿宣称，“机遇和责任这二者相辅相成，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8]

克林顿赞同里根的观点，即福利发放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并非因自身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克林顿说：“政府的作用是创造经济机会，帮助那些并非由于自身过错而承受经济负担的人。”^[9]1996年，他签署了一项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个人承担更大责任，要求福利领取者工作，并限制他们享受福利的时间，但这一法案遭到了许多民主党同僚的反对。^[10]

对责任及其优绩至上的内涵的重新强调，跨越了大西洋两岸。当克林顿以个人责任的名义实施福利改革时，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我们需要为新时代的福利问题达成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新时代，机会与责任并存。”布莱尔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目标是追求优绩至上。“新工党致力于实现优绩至上，”他写道，“我们认为，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或特权优势实现阶层跃升。”^[11]

几年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用类似的措辞为福利改革辩护：

我们的福利国家正在经受全球化风暴的考验，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才能平稳承受风暴的考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增加责任：为我们自己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为我们孩子的机会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就社会政策而言，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抓住机会。^[12]

到目前为止，责任的言辞还是大家熟悉的面貌，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责任一词在近几十年来的独特含义，以及责任与优绩至上原则对成功的解释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谈论责任，通常指的是公民对国家和同胞的义务。正如亚沙·芒克所指出的，责任现在指的是“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得承担后果”。福利国家少了“责任缓冲”，而多了“责任跟踪”。把福利资格限制在那些因运气不好而不是不良行为而陷入困境的人身上就是例子，这是想要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对待他们。^[13]

尽你所能，达所当止

阶层跃升的话语很新颖，也很容易遭人忽视。机会平等和阶层跃升的理想一直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这些理想也激励了许多其他社会。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实现跃升，这一观念已是老生常谈，几乎没有争议。主流政治家经常援引这句话，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口号其实挺新的。在过去40年里，这句话才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变得突出。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位将其作为政治理论支柱的美国总统。在白宫为政府的黑人成员举行的简报会上，他明确指出了优绩和晋升权利之间的联系。“所有美国人都拥有仅仅依据个人的成就来得到评判。”他说，“梦想有多远，勤奋工作就能让每个人走多远！”对里根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仅仅关于消除歧视。它有很多用处，包括主张减税。降低税收会“扫除通往成功之路的障碍，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技能、想象力和创造力走得更远”。^[14]

比尔·克林顿采用了里根的口号，并经常使用。“我们从小就有简明而强大的美国梦：只要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应该有机会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范围内走得更远。”到21世纪初，阶层跃升的话语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同的言论。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约翰·麦凯恩和马尔科·鲁比奥都援引了这一点。但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比巴拉克·奥巴马更热衷于这一口号，他用这一口号的次数超过了历届总统的总和。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他总统任期的中心主题。^[15]

“谈到高等教育时，”奥巴马在白宫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才能、职业道德和梦想走得更

远。”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阶层跃升的主要机制。“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诺平等的结果，但我们国家得以创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你是谁，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应该决定你的终点。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学。”^[16]

在另一个场合，奥巴马举了他的妻子米歇尔的例子。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但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并得以实现阶层跃升。“米歇尔和她的兄弟能够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教育，并在他们的梦想中行以致远。”这支持了奥巴马的信念：“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与众不同？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别？是这项基本契约：在这个国家，无论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姓什么，经历了什么挫折，只要你努力工作，只要你愿意承担责任，你就能成功。你可以出人头地。”^[17]

与里根和克林顿相呼应的是，奥巴马的阶层跃升话语指向了优绩至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不歧视（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坚持努力工作，并告诫公民对自己负责。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和优绩至上伦理之间的联系：如果机会是真正平等的，那么不仅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而实现提升，而且他们的成功将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回报。

得到你应得到的

随着阶层跃升话语的日益突出，优绩和应得的语言在整个公共文化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回想一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处不在的麦当劳广告口号（和顺口溜）：“你今天值得休息一下。”或者看看书和报纸。谷歌的Ngram功能可以跟踪单词和短语在书中出现的频率，根据谷歌的Ngram检索，1970—2008年，“你值得拥有”（you deserve）这个短语的使用次数增加了两倍多。在《纽约时报》上，“你值得拥有”在2018年出现的次数是罗纳德·里根上任那年的4倍多。^[18]

一些对应得的引用明确地与优绩至上思维有关。例如，198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述道，录有伴随海浪声、带催眠效应、在潜意识层面有激励信息的轻言低语的录音磁带，其销量不断增长。其中一条信息是：“我应该比爸爸做得更好。我应该成功。我应该达到我的目标。我应该富有。”但随着应得的表述注入流行文化，这句话变成了令人宽慰的、万能的承诺，就像《纽约时报》近期一份食谱的标题：“你值得吃到更多汁的鸡肉。”（吃到你想要的嫩鸡肉的秘诀是什么？不要煮过头。）^[19]

随着优绩和应得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类似的事情也发生

在学院哲学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的英美哲学家反对优绩至上，理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收入取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偶然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才能的需求，以及一个人的才能是普通的还是罕见的。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或许反映了当时政治中盛行的责任言辞——重新开始为优绩辩护。他们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帮助失利者的义务取决于找出穷人中谁应该为他们的不幸负责，以及谁是坏运气的受害者。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困境不负责任的人才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20]

在政客中，优绩和应得的表述与阶层跃升的话语相伴而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很少想要通过告诉听众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来左右听众。约翰·F·肯尼迪从未用过“你值得拥有”这个短语。里根改变了这一点，他采用“你值得拥有”的次数比他的五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21]例如，他在1983年对一群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说：“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应该得到奖励。”

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嫉妒和怨恨的基础上的。我一直坚信的梦想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努力工作，振作起来并取得成功，那么，天哪，你就应该得到人生的奖赏。人人努力争取这种奖赏，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22]

在里根之后，“你值得拥有”成为总统演讲中所有党派的固定用语。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是里根的两倍，奥巴马的频率是里根的三倍，讲话场合包括从日常谈话到各种重要场合。国防部在一座城市新设了行政中心，增加了不少工作岗位，克林顿在该市发表讲话：“你们得到它，是因为你们值得拥有它。”奥巴马在向一群仓库工人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天，那你应该得到体面的报酬。”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社区学院演讲时，他为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辩护说：“你们应该休息一下，你们应该得到一些帮助。”[23]

在英国，托尼·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所表达的对优绩至上的信念继续影响着英国政治，甚至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也是如此。2016年，特蕾莎·梅在成为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发表了对英国的愿景——“真正优绩至上的不列颠”。谈到普通的工人阶级，梅宣称：“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特蕾莎·梅提出的所谓更好待遇要靠遵守优绩至上的原则来获得。[24]

我希望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优绩至上国家：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他们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允许的范围内走得更远……我希望大不列颠成为优势是建立在优绩而不是特权基础上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天赋和努力，而不是你出生在哪里、你的父母是谁，或者你的口音是什么。[25]

尽管谈到了阶层跃升和应得，但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并没有明确谈到优绩至上，奥巴马是个例外。例如，在接受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体育评论员的采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体育吸引人们的是“这是少数几个真正实行优绩至上原则的地方之一。没有太多废话。最终，谁赢了，谁输了，谁在表演，谁没有——一切都摆在那里”。^[26]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经常采用阶层跃升与应得的言辞：“我们的竞选活动就是重申我们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在美国，每个人，不管你长什么样，你是谁，你爱谁，你都应该有机会走得更远，只要你的努力和梦想能带你走得更远。”希拉里发誓，如果她当选，“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就会成为可能”。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她宣称：“我希望这是真正的优绩至上。我厌倦了不平等。我想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如果为之努力，就能获得成功。”^[27]

民粹主义的强烈抵制

不幸的是，到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阶层跃升话语已经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击败她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没有谈到阶层跃升，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取得更大进步的信念。据我所知，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从未使用过这一口号，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也从未使用过。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并保证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的伟大愿景与实现优绩至上这一主题毫无关系，尽管后者在过去40年里一直活跃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

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民粹主义对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反感在特朗普当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年早些时候，英国举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也与这种反感有关。选举是复杂的事件，很难确切地说出是什么促使选民在投票时做出选择。但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支持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这些工人阶级选民似乎对阶层跃升的承诺不太感兴趣，而对重申国家主权、身份和自豪感更感兴趣。他们憎恨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阶层，这些家伙颂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从中获益，迫使劳动人民接受外国竞争的挤压。他们似乎更认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们的同胞。

并不是所有民粹主义者对现有秩序的不满都是对优绩至上的傲慢做出的回应，一些不满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纠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粹主义反弹的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感觉，即那些站在优绩至上等级制度之上的人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成就不如自己的人。这种民粹主义的抱怨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们吟诵着这样一句咒语：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这可能就是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在听到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优绩至上的辞令时却感觉像是听到了咒语。对他们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更多的是侮辱而不是鼓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优绩至上的信念，相反，他们拥护优绩至上，但认为优绩至上已经是现成的运作方式。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尚未实现的计划，需要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消除实现目标的障碍。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干预会有利于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从而违反而不是维护他们所认为的优绩至上原则。这也是因为，在努力取得了些许成功之后，他们接受了市场对自己的严厉裁决，并在道德和心理上投入其中。

2016年总统大选后开展的一项调查，要求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表达是否同意关于美国如何遵守优绩至上原则的几个说法，包括以下内容：“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是公平、公正的”；“个人对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负有责任”；“任何愿意寻找经济发展机会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机会”；“美国社会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美国白人和美国少数民族/民族享有平等的成功机会”。^[28]不出所料，与经济背景较差的受访者相比，富有的受访者更容易同意这些说法。但排除阶级地位的因素，特朗普的支持者比不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强烈地赞同这些陈述。^[29]特朗普的支持者憎恨自由派的阶层跃升话语，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优绩至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描述了主流社会秩序。他们服从优绩至上主义的规则，接受了优绩至上规则根据他们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的严酷评判，并相信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

优绩至上论的暴政不仅仅来自阶层跃升的话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态度和环境，这些态度和环境加在一起，让优绩至上变得“有毒”。首先，在不平等现象猖獗和流动性停滞的情况下，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以及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这些说法削弱了团结，并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士气低落。其次，坚持认为大学文凭是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造成了文凭主义偏见，损害了工作的尊严，贬低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最后，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这是技术官僚的自负，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

如果你努力，你就能成功吗？

当政客们以令人麻木的频率重申神圣的真理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不再是真理。阶层跃升的话语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不平等程度接近令人恐惧的程度时，有关阶层跃升的话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并非偶然。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超过整个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30]中等阶层的收入也停滞了40年，^[31]努力和勤奋会让你走得更远的想法开始变得空洞。

这种空洞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不满：一种是当制度未能兑现优绩至上的承诺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进步，就会产生挫折感；另一种是

人们相信优绩至上的承诺已经实现，而他们失败了，这让人感到绝望。这种不满更令人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被甩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失败是自己的错。

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坚持这样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全球民意调查，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32]

当被问及“什么因素对人生的成功至关重要”时，美国人以令人惊讶的比例（73%）把努力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反映了新教工作伦理的持久性。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努力工作对获得成功非常重要。在法国，只有25%的人这样看。[33]

与所有这类调查一样，人们表达的态度取决于问题是如何提出的。相比被问到工作与成功的关系，当被问到为什么有些人富有而另一些人贫穷时，美国人对努力的作用就不那么确定了。当被问及富人富有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工作，还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优势时，美国人的选择就变成了各占一半。而当被问及人们为什么贫穷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只有30%的人认为贫穷是由于缺乏努力。[34]

相信提高工作效率是通往成功之路，反映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更广泛的信念。美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更相信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多数（57%）美国人不同意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这一说法。相比之下，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成功主要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35]

这些关于工作和自救的观点，会影响到公民之间的团结和是否愿意共同承担义务。如果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成功，那么那些失败的人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而且很难找到帮助他们的理由。这是优绩至上规则冷酷的一面。

如果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那么社会地位就反映了人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作为。然而，如果将社会中最幸运成员的成功归功于好运、上帝的恩典或群体的支持，那么分担彼此命运的道德理由就更强了。这也更容易证明“我们都在一起”。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坚信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美国，其福利制度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那么慷慨，欧洲各国公民倾向于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归

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成功，那么政府只需要确保工作和机会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政客们可能会在机会平等政策的实际要求上产生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政策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阶层跃升的机会，无论每个人的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赞同流动性是解决不平等的办法——那些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会取得成功。

但美国人对凭借努力和勇气能够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不再符合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可以期望他们孩子的经济状况比他们的更好。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的：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过了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36]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也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阶层跃升的过程更难。在美国出生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升到上层。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对阶层跃升的研究通常把收入阶梯分为五个等级。在那些出生于最低一层（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4%~7%的人升到了最高一层（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只有大约1/3的人升到了中层或更高的阶层。尽管每项研究的具体数据不尽相同，但很少有美国人能活出美国梦中白手起家的故事。^[37]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小。与德国、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相比，美国人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更容易代代相传。在美国和英国，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经济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子女，这是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子女继承收入优势的两倍多。^[38]事实证明，丹麦和加拿大的孩子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从贫穷走向富有。^[39]按照以上说法，美国梦在哥本哈根依然存在。

美国梦也在中国北京蓬勃发展。《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展现了以下情景：

想象一下你要打赌。有两个18岁的年轻人，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美国，他们都很穷，前途渺茫。你必须选择一个更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你会选谁？

不久前，答案似乎很简单。毕竟，“美国梦”早就承诺为所有努力工作的人提供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

但今天的答案令人吃惊：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你在那里提高生活地位的机会大大超过了美国。^[40]

考虑到中国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并不像看起来的那

么令人惊讶。在中国，富人和穷人都实现了收入增长，而在美国，增长的收益主要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尽管按人均计算，美国仍是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但如今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富有。[41]

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同。此外，中国现在的代际流动性比美国更大，这意味着在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你赚多少钱与你的起点比在中国联系得更紧密。[42]

看到这些发现时，我的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本能地相信美国例外论，相信美国是个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这种阶层跃升的信念是美国传统上针对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的，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严重。但在这里，不像欧洲那些更严格的、阶级界限分明的社会，不平等不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人会被归入个人出生时所在的那个阶层。

但一旦他们了解到美国比其他许多国家不平等程度更高而流动性更低，他们就会感到困扰和难以理解。一些人拒绝接受流动性数据所显示的信息，而更乐于引用他们自己的奋斗和成功经验。我有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派学生回应说，根据他的经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工作有多努力。“在我就读的高中，每个人都明白规则。”他说，“如果你在学校努力学习，表现出色，你就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如果做不到，你就得去油田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另一些人虽然在高中期间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他们承认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支持另有来源。

我的一些学生认为，即使美国梦与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不要传播这些信息，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人们的想法不被搅乱，这样他们就会继续相信，只要持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努力工作，他们就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这会把美国梦变成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这种信念虽然不真实，但可以诱导公民接受某些不平等现象是正当的，从而维持公民之间的和谐。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是个神话，上帝创造了灵魂中有不同金属的人，赋予了神圣的安排，其中由哲学家国王领导的卫士阶级统治着城邦。[43]在我们这里，这也是个神话：在美国，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即使是底层的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对美国人的阶层跃升前景，我的学生并不是唯一持错误看法的人。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民众，从贫困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受访者普遍弄错了答案。然而，有趣的是，他们犯了相反的错误：美国人高估了美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欧洲人低估了欧洲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44]

看到什么与相信什么

这些结果揭示了我们理解社会安排和政治安排的重要方式。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来认识世界。乍一看，人们似乎只是对其社会中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情况缺乏了解。但有趣且需要解释的是，这些误解有特定的形态。欧洲社会比美国更平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欧洲人对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过于悲观，美国人则过于乐观。为什么会这样？

在上文提到的两种神话的情景下，对观念的信念和对事实想当然的确信都塑造了人们的认知。美国人对个人主动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不平等，导致他们夸大了凭借努力工作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欧洲人对个人努力战胜一切的怀疑，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导致他们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这种借助我们的理想和期望看待世界的倾向，揭示了优绩至上的承诺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感到沮丧，甚至感到被羞辱的。从表面上看，这很让人困惑：谁会反对打破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教育机会的提议，从而让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呢？难道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会吸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从教育机会、职业培训、儿童保育、家庭休假和自由派与进步派提供的其他政策中受益吗？

不，不一定。2016年，随着全球化对普通工人的有害影响变得清晰，自由派精英们提出的阶层跃升话语传达了冷酷的暗示。即使面对不平等日益加剧，自由派精英也坚持认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此，无论是获得成功还是遭遇不幸，都是我们应得的。

这种看待不平等的方式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强化了一种信念，即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理应得到奖赏，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理应贫困度日。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直言不讳：“对我们社会的一大挑战是，真相是打破平衡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被对待的方式更接近他们应该被对待的方式。”^[45]

也许有人会为阶层跃升的话语辩护，认为这些言辞是把平等竞争的机会描述为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但是优绩至上原则总是会过度延伸。它开始是一种理想，随后就滑入对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张。

尽管阶层跃升的话语鼓舞人心，指向了尚未兑现的承诺，但它总是会变成一种祝贺：“在美国，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跃升。”就像大多数强有力的言辞一样，这种表述把渴望与祝贺混为一体，把希望说成事实。

奥巴马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2012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在这

个国家，不管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学习，你的天赋能让你走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46]奥巴马的听众不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总统是在描述美国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知道总统是在展现他希望实现的更平等、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理想。奥巴马以祝贺的语气赞扬美国实现了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关键，继承特权不是。

然而，随着他继续讲话，他从祝贺变成了渴望：“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因为教育给了我机会，我希望美国每个孩子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既然有幸成为你们的总统，这就是我会继续奋斗的目标。”^[47]

这种从事实到希望，再从希望到事实的倾向，不是口误，也不是哲学上的混乱，而是政治修辞的特征。这在阶层跃升的话语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它把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混淆了输赢的意义。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

最近几年，他们首先要为没能获得大学文凭而自责。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

^[1]Evan Osnos,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p. 308–10.

^[2]作为总统，比尔·克林顿用过此短语21次。例如“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来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碰巧是穷人，或者他们碰巧出生在一个没有很多经济机会的地区，或者他们碰巧是少数族裔的一员，或者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而被抛在后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浪费的人。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它依靠人的力量运行，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人。”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ugust 7, 199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223422](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23422).

^[3]Yascha Mounk,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Luck, Choice, a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and Jacob S.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Ronald Reagan,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7, 1987,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252758](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52758).

^[5]柯立芝、胡佛和罗斯福都用过这个短语，在美国总统项目中可以查到：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6]作为总统，里根用过26次“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句话，克林顿用了72次，奥巴马用了56次。作者用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档案做的计算：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 search.

[7]William J.Clinton,“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199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19347.

[8]William J.Clinton,“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4,199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1902.

[9]William J.Clinton,“Remarks on Arrival at McClellan Air Force Base,Sacramento,California,”April 7,199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0655.

[10]William J.Clinton,“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August 22,1996,a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2686.

[11]Tony Blair,New Britain:My Vision of a Young Country(London:Fourth Estate,1996),pp.19,173.See also pp.273,292.

[12]Gerhard Schröder,December 31,2002,quoted in 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20–21.Translated by Mounk.See also pp.1–6.

[13]Mounk,Ibid.,quote at p.30;see generally pp.28–37.

[14]Ronald Reagan,“Remarks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for Black Administration Appointees,”June 25,198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60916;Ronald Reagan,“Radio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ax Reform,”May 25,198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59932.

[15]William J.Clinton,“Remarks to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December 3,199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18963;奥巴马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用了50次，里根15次，克林顿14次，小布什3次，老布什2次，福特1次，尼克松1次。这句话出现在尼克松的三份书面声明和林登·约翰逊的两份书面声明中，而在约翰逊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头或书面声明中都没有出现过。作者用可搜索的总统演

讲档案计算出的频率：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16]Barack Obama,“Remarks at the White House College Opportunity Summit,”December 4,201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8043.

[17]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Campaign Rally in Austin,Texas,”July 17,201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1979.

[18]Google Ngram search at books.google.com/ngrams/graph?content=you+deserve&year_start=1970&year_end=2008&corpus=15&smoothing=3&share=&context_url=t1%3B%2Cyou%20deserve%3B%2Cc0.根据《纽约时报》可搜索的线上档案,“你值得拥有”在1981年出现了14次,在2018年出现了69次。档案还显示了该数据每十年的稳步增长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的111次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175次、20世纪90年代的228次、21世纪头十年的480次和2010年至2019年7月31日的475次。

[19]John Lofflin,“What’s New in Subliminal Messages:‘I Deserve to Succeed.I Deserve to Reach My Goals.I Deserve to Be Rich,’”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0,1988,nytimes.com/1988/03/20/business/what-s-new-subliminal-messages-deserve-succeed-deserve-reach-my-goals-deserve-b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David Tanis,“You Deserve More Succulent Chicken,”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9,2019,nytimes.com/2019/03/29/dining/chicken-paillard-recip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20]参见第3章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翰·罗尔斯和运气平等主义者的讨论。

[21]根据美国总统项目可搜索的总统演讲档案,里根用了31次“你值得拥有”,而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总统总共使用了27次,见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22]Ronald Reagan,“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March 4,198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62792.

[23]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总统演讲可搜索档案,里根用了31次“你值得拥有”,克林顿用了68次,奥巴马用了104次,见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William J.Clinton,“Remarks to the Community in San Bernardino,California,”May 20,199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0148;Barack Obama,“Remarks at the

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 Warehouse in Lanham, Maryland,” January 29, 2014,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05268; Barack Obama, “Remarks at 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Western Campus in Parma, Ohio,” September 8, 2010,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288117.

[24] Theresa May, “Britain, the Great Meritocracy: Prime Minister’s Speech,” September 9, 2016, at gov.uk/government/speeches/britain-the-great-meritocracy-prime-ministers-speech.

[25] Ibid.

[26] Barack Obama, Interview with Bill Simmons of ESPN, March 1, 201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27087.

[27] Hillary Clinton, “Remarks at the Frontline Outreach Center in Orlando, Florida,” September 21, 201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19595; “Remarks at Eastern Market in Detroit, Michigan,” November 4, 201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19839; “Remarks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Columbus, Ohio,” October 10, 2016,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19580.

[28] Erin A. Cech, “Rugged Meritocrats: The Role of Overt Bias and the Meritocratic Ideology in Trump Supporters’ Opposition to Social Justice Efforts,”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3 (January 1, 2017), pp. 1–20, 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2378023117712395.

[29] Ibid.

[30] 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0.2%，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获得了12.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47%）的国民收入，而西欧为37%，中国为41%，巴西和印度为55%。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issue 2 (May 2018), p. 575, available at eml.berkeley.edu/~saez/PSZ2018QJE.pdf; Alvaredo, Chancel, Piketty, Saez, and Zucman,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pp. 3, 83–84.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也可以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网站 wid.world 中找到。

[31] 在美国，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的

人，他们的收入增长了121%。后半部分人口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他们在2014年的平均收入（约1.6万美元）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大致相同。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2014年的收入中位数与1964年一样，约为3.5万美元。半个多世纪以来，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数一直没有增长。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p.557,578,592–93. See also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97,皮凯蒂在其中指出，1977—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吸收了美国整个经济增长额的四分之三。

[32]对于“只要肯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成功”这一观点，77%的美国人同意，20%的美国人不同意。德国人同意和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是51%对48%。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更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努力工作并不是成功的保证这一说法，认同和不认同的比例分别为54%对46%（法国）和59%对40%（日本）。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July 12,2012,pewresearch.org/global/2012/07/12/chapter-4-the-casualties-faith-in-hard-work-and-capitalism.

[33]73%的美国人表示，努力工作对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非常重要，而德国和法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49%和25%。在韩国和日本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4%和42%。Pew Research Center,Spring 2014 Global Attitudes survey,October 7,2014,pewresearch.org/global/2014/10/09/emerging-and-developing-economies-much-more-optimistic-than-rich-countries-about-the-future/inequality-05.

[34]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时，43%的人说他们工作更努力，42%的人说他们在生活中有优势。当被问及为什么有些人贫穷时，52%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31%的人说是因为缺乏努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Amina Dunn,“Partisans Are Divided over the Fairness of the U.S.Economy—and Why People Are Rich or Poor,”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4,2018,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10/04/partisans-are-divided-over-the-fairness-of-the-u-s-economy-and-why-people-are-rich-or-poor.

[35]当被问及生活中的成功是否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时，74%的韩国人、67%的德国人和66%的意大利人表示同意，而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仅为40%。Pew Research Center,Spring 2014 Global Attitudes survey,October 9,2014,pewresearch.org/global/2014/10/09/emerging-and-developing-economies-much-more-optimistic-than-rich-countries-about-the-future.

[36]Raj Chetty,David Grusky,Maximilian Hell,Nathaniel Hendren,Robert Manduca,and Jimmy Narang,“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Science* 356(6336),2017,pp.398–406,available at 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the-fading-american-dream.比较父亲和儿子的收入，这种转变更加明显：出生于1940年的男性有95%比他们的父亲赚得更多。在1984年出生的男性中，只有41%的人的收入超过父亲。

[37]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中，有4%的人在成年后升至收入最高的20%，30%的人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43%的人仍停留在收入最低的20%。“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Pew Charitable Trusts,July 2012,p.6,Figure 3,available at pewtrusts.org/~media/legacy/uploadedfiles/wwwpewtrustsorg/reports/economic_mobility/pursuingamericandreampdf.pdf.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7.5%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升至收入最高的20%，38%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34%仍停留在收入最底层。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Patrick Kline,and Emmanuel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4(2014),pp.1553–623;available at rajchetty.com/chettyfiles/mobility_geo.pdf(mobility figures at p.16 and Table II).根据阿奇布里奇研究所的斯科特·温希普所做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中，只有3%的孩子能进入收入最高的20%，只有26%的孩子能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46%的人仍停留在底层。Scott Winship,“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Archbridge Institute,March 2017,p.18,Figure 3,available at archbridgeinst.wpeng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Contemporary-levels-of-mobility-digital-version_Winship.pdf

[38]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3(Summer 2013),pp.79–102(see Figure 1,p.82),online at 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27.3.79;Miles Corak,“Do Poor Children Become Poor Adults?Lessons from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IZA Discussion Paper No.1993,March 2006(see Table 1,p.42),at ftp.iza.org/dp1993.pdf;A Broken Social Elevator?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Paris:OECD Publishing,2018),online at doi.org/10.1787/9789264301085-e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了与克拉克类似的结果，但德国除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德国的流动性低于美国。见图4.8中的国家比较，第195页。

[39]Chetty et al.,“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p.16.See also Julia B.Isaacs,Isabel Sawhill,and Ron Haskins,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An Initiative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2008),at pewtrusts.org//media/legacy/uploadedfiles/wwwpewtrustsorg/reports/economic_mobility/economicmobilityinamericafullpdf.pdf.Mobility data for the U.S.and Denmark is at Figure 1,p.40.

[40]Javier C.Hernández and Quoc Trung Bui,“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I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8,2018,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china-social-mobility.html.

[41]Ibid.

[42]Ibid.世界银行比较中美两国代际流动性的数据来自Ambar Narayan et al.,Fair Progress?: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8),pp.107(Figure 3.6),140(Map 4.1)and 141(Figure 4.2)。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可在网上查阅：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842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流动性比美国略低。A Broken Social Elevator? 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Paris:OECD Publishing,2018),Figure 4.8,p.195,at doi.org/10.1787/9789264301085-en.

[43]The Republic of Plato,Book III,414b–17b.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New York:Basic Books,1968),pp.93–96.

[44]Alberto Alesina,Stefanie Stantcheva,and Edoardo Teso,“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no.2(February 2018),pp.521–54.Online at 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aer.20162015.

[45]Summers quoted in Ron Suskind,Confidence Men:Wall Street,Washington,and the Education of a President(New York:Harper,2011),p.197.

[46]President 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Weekly Address,”August 18,201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2249.

[47]Ibid.

4 文凭主义：最后可接受的偏见

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

多年来，迈克尔·科恩一直担任唐纳德·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调停人。2019年2月，他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做证。那时，他已经背叛前老板，并揭露了他代表特朗普办的一些令人厌恶的事，包括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以阻止她披露与特朗普的婚外情。在证词中，科恩还透露了他在特朗普的要求下完成的另一项任务：威胁特朗普曾就读的大学和大学理事会，如果他们公开特朗普的大学成绩或SAT分数，特朗普就要起诉他们。^[1]

据推测，特朗普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尴尬，显然他担心公开成绩会损害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或者至少会损害他的声誉。科恩强调了特朗普想要隐瞒学习成绩的虚伪。几年前，特朗普坚持要求奥巴马公开他的学习成绩。“我听说他是个很差劲的学生，很差劲。”特朗普在2011年宣称，“这么差劲的学生怎么能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去哈佛大学？……让他拿出学习成绩来看看。”^[2]

科恩披露了他如何想办法让特朗普的成绩和SAT分数远离公众视线，这件事引起的关注远不如他贿赂色情明星引起的关注大。但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遮掩学习成绩这件事更重要，展现的是文凭主义的公共意义。到了21世纪，一个人在大学里的表现，甚至是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表现，都大到足以给总统带来荣耀或耻辱。唐纳德·特朗普肯定是这么想的。他首先想要索要奥巴马的出生证明以抹黑奥巴马，让人们对其国民身份产生怀疑。这个方案失败后，他对奥巴马进行了又一次有力的羞辱——质疑其精英身份。

大学文凭武器化

特朗普的攻击路线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在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特朗普经常夸耀自己的智力天赋。一项关于总统用词的研究发现，他的词汇量只有四年级水平，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总统中最低的；据报道，他自己的国务卿称他为白痴，他的国防部长说他对世界事务的理解是五六年级的水平。这些和其他关于特朗普智力的轻蔑言论刺痛了他，他煞费苦心地坚持说自己是个聪明人，实际上“一直是个天才”。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有人问他正在咨询的外交政策专家是谁时，他回答道：“我在给自己提供咨询，首先，因为我有很好的头脑，我说了很多有价值的话……我

的主要顾问是我自己。”他一再声称自己智商高，而批评他的人智商低，这是他特别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侮辱。^[3]

痴迷于智商遗传学的特朗普经常提及他的叔叔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位学术天才”），这证明他（特朗普）拥有“良好的基因，非常好的基因”。在任命第一届内阁后不久，特朗普就宣称：“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智商最高的内阁。”在就职典礼后第二天，特朗普对中央情报局的员工发表了一场奇怪的演讲，他想要清除人们对他智力的怀疑：“相信我，我是个聪明人。”^[4]

他经常觉得有必要提醒听众他的大学学历，在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他在福特汉姆大学学习了两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上了沃顿商学院的本科课程。他夸口说他去了“最难进的学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超级天才的玩意儿”。^[5]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抱怨说，媒体对保守派有偏见，导致他需要不断重述并捍卫自己的智力证书。

如果我以自由派民主党的身份参选，他们会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确实是这样！但当我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时，他们会想办法——他们会做许多事情来中伤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以这段话开头：“去了沃顿商学院，是个好学生，去了那里，做了这个，创造了财富。”你们知道，我必须一直提供我的证书，因为我们有点儿处于弱势。^[6]

尽管特朗普受自己的怨恨和不安全感所激，一再坚持自己是个聪明人，但这点无论在批评他的人看来多么哀怨和滑稽，事实上都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因为这些批评引起了愤愤不平的工人阶级支持者的共鸣，他们参加了特朗普的集会，和他一样，工人阶级憎恨精英们自诩英才的傲慢。特朗普的抗议展现了优绩至上社会可能带来的羞辱。他辱骂精英，又渴望得到精英的尊重。2017年，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他猛烈抨击精英，然后声称自己也是精英：

你们知道，我是个好学生。我总是听说关于精英的事。你们知道，精英——他们是精英吗？我上的学校比他们的好。我是比他们更好的学生。我住在更大、更漂亮的公寓里。我也住在白宫，这真的很棒。我想——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才是精英。他们不是精英。^[7]

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面对有关其精英资历的问题时表现防御性的政治人物。1987年，乔·拜登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一位选民要求他说出他上的是哪所法学院，以及他在班上的位置，这让他很生气：

我想我的智商可能比你高得多。我是靠全额奖学金上的法学院——我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人……事实上，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茅。在年末，我被选为政治系优秀学生。我在毕业时拿到了三个本科学位和165个学分——只需要123个学分就可以毕业，我很乐意坐下来和你比智商。 [8]

事后核查发现，拜登的回答充满夸张。由于经济上需要资助，他获得了部分奖学金，成绩在班上垫底，获得了一个本科学位，而不是三个（尽管他确实有一个双学位），等等。 [9]然而，令人惊奇的不是政客们夸大自己的大学学历，而是他们觉得有必要这么做。

即使是那些精英资格不受质疑的人，有时也会以防御性的自以为是来援引相关材料。以2018年美国参议院对布雷特·卡瓦诺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为例，特朗普提名他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等待参议院确认的后期，一名女子指控卡瓦诺在高中时期的一次聚会上对她实施了性侵犯，这让卡瓦诺的大法官提名确认受到了质疑。

当参议员们就所谓的醉酒性行为向他提问时，卡瓦诺不仅否认了这一指控，辩护的内容还挺奇怪，与指控内容关系不大。卡瓦诺描述了他的高中期间如何努力学习，以及他如何被耶鲁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当被问及他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中明显提到饮酒和性剥削时，他回答说：“我在学业上是班里的尖子生，在学校里拼尽全力。我担任大学篮球队队长。我进了耶鲁大学。当我进入耶鲁大学，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时……那是全美国排名第一的法学院。我在那里没有人脉关系，我是在大学里拼了命才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 [10]

卡瓦诺的精英资历没有受到质疑。很难理解精英资历与他18岁时是否曾在一次聚会上因喝醉而性侵他人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关性。但到2018年，文凭主义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判断基础，文凭主义成为通用的可信度说辞，被部署在远远超出校园大门的道德和政治斗争中。

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这是如何发生的，值得重新梳理一下。全球化时代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并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获得了大部分收益，而收入较低的那50%的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收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自由派、进步派并没有采取经济结构改革来直接解决这种不平等。相反，他们接受了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并想要通过寻求更充分的机会平等来解决全球化导致的利益不均衡。

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的要害。如果能够消除取得成就的障碍，那么每个人都会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种族、阶级或性别，人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机会真的平等，那么那些获得最高成就的人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成功及相应的回报。这就是优绩至上的承诺，这

不是对更大的平等的承诺，而是对更大和更公平的流动性的承诺。阶层跃升的话语确认收入阶梯的梯级间距越来越大，并提出只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公平地竞争，以爬上梯级。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政治方案不那么有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致力于追求更高要求的公正和公共利益愿景的政党而言。但是，让我们暂时把优绩至上理念是否足以构成公正社会的基础的问题放在一边，考虑一下这一理念催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

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

那些拥护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真正的机会平等需要的不仅仅是根除歧视。真正的机会平等还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来自各种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人都能装备自己，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有效地竞争。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主流政党把教育作为应对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关键手段。“想想我们面临的每个问题、每个挑战，”乔治·H.W.布什（老布什）在1991年说，“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以教育为起点。”在英国，托尼·布莱尔在1996年为工党制定了中间派的改革议程，他强调：“有人问我政府的三个主要优先事项，我告诉你：教育、教育和教育。”^[11]比尔·克林顿用押韵的对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会很难找到工资体面的好工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上大学，因为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在演讲和评论中引用了这一对句30多次。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常识，并且对两党都有吸引力。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经常使用这句话。^[12]

巴拉克·奥巴马也把高等教育视为帮助美国工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在过去，”他在布鲁克林的一所技术学院告诉听众，“如果你愿意努力工作，你不一定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13]

你只要上过高中，可能就会在工厂或服装行业找到工作。或者你还可以一边打工赚点儿钱，一边想办法跟上那些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的步伐。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

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在全球化经济中，工作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那些公司，他们正在寻找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现在，从北京到班加罗尔，再到莫斯科，数十亿人都在直接与你竞争……如果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你很难找到一份能维持生活的工作。^[14]

在发表了这段关于面临全球竞争的严酷消息之后，奥巴马向听众保证，更多教育培训是解决方案。他最后以乐观的阶层跃升话语结尾：他会继续战斗，“以确保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长相如何，这个国家永远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15]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和民粹主义者反抗之前的几十年里，自由派和进步派的基本论点就是：全球化经济仿佛是天然的事实，以某种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会继续存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重新配置全球化，而是如何适应全球化，以及如何减轻全球化对精英职业圈子之外的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的破坏性影响。

答案是：提高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这样他们也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如果说机会均等是首要的道德和政治工程，那么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压倒一切的政策要务。

在克林顿—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一些总体上同情民主党的评论人士质疑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拥抱全球化，重视大学教育，相信有才华、有文凭的人应该进入大学。作家兼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克里斯托弗·海斯指出，近年来，左派在一些让优绩至上制度更加优绩至上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打击种族歧视，推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推进同性恋权利。但左派在“精英统治范围之外”的领域失败了，比如“缓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16]

在寻求结果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任何表面上的平等的制度框架内，教育系统会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承担重任……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17]

托马斯·弗兰克是一位具有民粹主义敏感度的作家，他批评自由主义者把教育视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对自由派来说，每个大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教育问题，是失败者在学习正确的技能和获得证书方面的失败，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未来的社会中需要这些。”弗兰克认为对不平等的这种反应是不近情理、极端自私的。

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是道德判断，是成功人士从他们自身成功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专业人士阶层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每次他们告诉国家，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时，他们都在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18]

弗兰克认为，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都分散了民主党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清楚地思考哪些政策在导致不平等。他注意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

产力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他怀疑不平等主要是由教育的失败引起的。“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的力量不足，而不是工人的智商不足。从事生产的人却无法要求分享他们的生产成果，拥有很多的人拿走的也越来越多。”没有看到这一点导致民主党人“忽视了实体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垄断权力到金融化再到劳资关系——而沉迷于道德幻想，这种幻想让他们不与任何人对抗”。^[19]

弗兰克提到的“成功者的道德判断”触及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鼓励更多的人上大学是件好事，让那些收入一般的人更容易上大学就更好了。但是，一门心思地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帮助在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失利的工人摆脱困境的办法，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这损害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所受到的社会尊重。

这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两个方面都与损害工作尊严和工人阶级尊严的态度有关。首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对那些每天与管理专业人士阶层为伍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率有所上升，但也只有约1/3的美国成年人从四年制大学毕业。^[20]当精英们把成败与获得大学文凭的能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是在含蓄地指责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后者在全球经济中陷入了严酷境况。这样精英们也免除了自己推行的经济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提高了大学文凭所能带来的工资溢价。

其次，告诉工人们，他们受教育不足是他们陷入麻烦的原因，精英们由此把成功和失败道德化，并无意中助长了文凭主义——为没上过大学的人带来潜在偏见。

文凭主义的偏见是优绩至上傲慢的症状。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预设变得愈加严苛，精英们养成了习惯，看不起那些没有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不断呼吁上班族采取攻读大学学位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无论动机多么好，最终都会助长文凭主义，并削弱社会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认可和尊重。

最好的人与最聪明的人

奥巴马是优绩至上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到21世纪初，优绩至上思想已经成为专业人士阶层的常识。正如乔纳森·奥尔特所写：“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顶级专业人士已经经历了公平的分类过程，这样的分类过程推动他和米歇尔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因此他们的地位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应得的。”^[21]

在一本记录奥巴马总统任期第一年的书中，奥尔特注意到他任命的人中有

1/4与哈佛大学有某种联系（作为校友或教师），最早任命的人中超过90%拥有高等学位。“奥巴马的信念在于‘咖啡中的奶油总会自己浮上来’。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国战后优绩至上原则的产物，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站在他所登上的地位阶梯上看世界。”^[22]

奥巴马对高学历人士的喜爱，贯穿了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到他第二个任期中期，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2/3曾就读于常春藤联盟高校，21人中有13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只有3人没有高等学位（硕士或博士学位）。^[23]

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管理政府通常是可取的，只要他们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感同身受——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但历史表明，声望显赫的学术资历与实践智慧或此时此地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大卫·哈伯斯塔姆在经典著作《最好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中，描述了文凭主义带来巨大破坏性的例子。该书展示了约翰·F·肯尼迪如何组建了一支拥有耀眼文凭的团队，尽管他们拥有技术官僚的才华，却带领美国陷入了愚蠢的越南战争。^[24]

奥尔特看到了肯尼迪团队和奥巴马团队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学生，都有一些狂妄傲慢，都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25]事实证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们也干了蠢事，此事虽然不像越南战争那么致命，但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重大。他们坚持以对华尔街友好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在不追究银行责任的情况下为银行纾困，在许多劳动人民眼中败坏了民主党的名声，并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这种政治判断的失败与优绩至上的傲慢不无关系。弗兰克描述了“民主党人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华尔街是拥有巨大精英声望的地方，相当于一所高端研究生院”。^[26]

奥巴马在很多方面都顺从了华尔街，因为投资银行本身就意味着独一无二的专业地位。对行政机构中那些有成就意识的人来说，投资银行家不仅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同行，都有着敏锐的头脑、复杂的行话和非凡的创新精神。^[27]

弗兰克认为，这种下意识里产生的对投资银行家的尊重，“让民主党人对大银行的问题、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及席卷整个行业的欺诈风潮视而不见”。他引用了前联邦检察官尼尔·巴罗夫斯基的话。巴罗夫斯基曾担任政府银行救助计划的监督者，他写了一本书，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本书的书名和副书名传达了他的结论——《救市：华盛顿如何在拯救华尔街的同时抛弃了平民街的内幕》（*Bailout: 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Washington 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 [28]

虽然华尔街的高管们确实对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慷慨解囊，但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温和对待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给予回报。巴罗夫斯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与优绩至上原则有关的解释：政策制定者相信，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理应得到他们所获得的巨额薪酬。

华尔街将某些金融高管杜撰为天赋异禀的超人，他们的惊人薪水和奖金中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应得的，这种想法在财政部根深蒂固。尽管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些高管的工作是多么平凡，但这种信念体系在各届政府的财政部中都得到了延续。如果一位华尔街高管签约获得640万美元的留任奖金，那么人们的假设会是：他一定配得上这么丰厚的薪酬。 [29]

除了在政策制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文凭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渗入了民主党人的表达方式，并巧妙地重塑了公共话语的词汇。在每个时代，政治家和舆论制造者、公关人员和广告商都会寻求一种他们希望能够说服人的判断和评价的语言。这种言辞典型地利用了评价性对比：公正与不公正，自由与不自由，进步与反动，强大与软弱，开放与封闭。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思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评价对比已经变成smart（聪明）对dumb（愚蠢）。

直到不久前，“smart”这个形容词都主要被用来描述人。在美式英语中，称某人smart是赞扬他的智慧。（在英式英语中，clever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smart一词开始被用来描述事物——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如smart cars（智能汽车）、smart phones（智能手机）、smart bombs（智能炸弹）、smart thermostats（智能恒温器）、smart toasters（智能烤面包机）等。数字时代的到来与优绩至上时代的到来是同步的，因此，用smart来描述治理方式就不足为奇了。

明智之举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总统很少使用smart这个词，当他们使用这个词时，他们通常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乔治·H.W.布什开始以数字时代的新含义使用这个词，他谈到了“smart cars”“smart freeways”“smart weapons”“smart schools”（智能汽车、智能高速公路、智能武器和智能学校）。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在总统演讲中大量使用smart一词，两人都用了450多次。奥巴马甚至用了900多次。 [30]在一般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在书中，smart的使用量从1975年到2008年稳步攀升，增长了近3倍；stupid（愚蠢）这个词的使用量增加了1倍。在《纽约时报》上，smart的出现次数从1980年到2000

年增加了4倍，到2018年又增加了近1倍。^[31]

作为衡量优绩至上原则在公众心目中地位的标准，smart一词不断变化的含义比该词出现频率的提高更能说明问题。smart不仅指数字系统和设备，而且逐渐成为赞美的通用术语，也是为选择一种政策而不是另一种政策做辩护的方式。作为一种评价性对比，聪明对愚蠢开始取代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对比，比如公正与不公正或对与错。克林顿和奥巴马都经常争辩说，他们所支持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这一修辞暗示，在优绩至上时代，聪明比正确更有说服力。

克林顿向美国公众保证：“在全球范围内抗击艾滋病不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是明智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任何地方的传染病都是对所有地方公共卫生的威胁。”在老年医疗保险费中增加处方药福利“不只是正确的做法，从医学上讲，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工薪家庭的正确选择，对我们的经济来说，这也是明智之举”。^[32]

奥巴马采用了同样的措辞，宣称“赋予女性权力不仅正确，也实属明智。女性成功了，国家会更安全、更有保障、更繁荣”。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他也谈到了发展援助：“这不仅正确，也是明智之举。”奥巴马在从移民改革到扩大失业保险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援引了道德和智慧两层标准来支撑他的主张。^[33]

“明智之举”总是指向深思熟虑或自利的理由，而基本与道德考虑无关。克林顿和奥巴马当然不是第一个以谨慎的方式支持道德争论的政治领导人。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谨慎考虑变成了“明智与否”的衡量。

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这项政策明智而不是愚蠢，这与支持文凭主义的人谈论人民的方式非常相似。希拉里·克林顿在刚刚接受国务卿任命，接着宣布她选任的几位国务院副手时，就明确表示了这种联系：“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谈到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运用。巧实力的核心是聪明人（smart people），而这些有才华的人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34]

在党派激烈竞争的时代，聪明和愚蠢的术语颇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似乎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避难所和一种开展政治争论的模式：从道德争议中退出来，而在聪明与否、明智与否、谨慎与否的基础上寻求共识。这种看似无党派、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吸引了奥巴马。在有关种族、民族和性别平等之类的问题上，奥巴马诉诸道德的观点雄辩有力。但当涉及外交事务或经济政策时，他本能地使用了非意识形态的语言，即聪明与愚蠢。

奥巴马早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次演讲是在2002年，当时他担任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宣布反对伊拉克战争。六年后，正是这一立场把他与希拉里·克林顿区分开来，并帮助他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甚至在登上联邦政治舞台之前，奥巴马就以聪明与愚蠢的术语来看待政治选择。“我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在芝加哥的反战集会上说，“我反对的是愚蠢的战争。”^[35]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有人要求奥巴马说清楚他的外交政策原则，他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总结道：“不要做蠢事。”^[36]

2013年，奥巴马发现自己与共和党人在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同时避免相应自动地、全面地削减开支的问题上争执不下，他再次诉诸聪明与愚蠢的术语。“做事有聪明的方式，也有愚蠢的方式。”他告诉弗吉尼亚州的造船工人。在几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不应该愚蠢地、武断地持续削减预算。”相反，他倾向于“聪明地削减开支”及“聪明地进行福利改革”。^[37]

奥巴马坚持认为，他所支持的聪明地削减开支及聪明地增加收入的措施是没有偏向任何党派的政策，应该免受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我不认为这有党派立场。这是我两年来一直提的方法。我去年就是这么做的。”^[38]他没有解释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力主的政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怎么会让人认为没有党派立场。

精英俯视大众

精英们似乎不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明智政策”具有党派性质，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断谈论“聪明与愚蠢”所表达的傲慢态度。2016年，令劳动人民感到愤怒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不起他们。在民粹主义对精英阶层的强烈抵制中暴发的这种怨恨并非没有根据。调查研究证实了许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感受。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失宠（没有被消除，但已名声败坏）的时候，文凭主义是最后一个可接受的偏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的偏见更容易得到支持，或者至少更容易得到承认。

—组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做了一系列调查，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有更多的偏见。研究人员调查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对一系列典型受歧视对象——穆斯林、在西欧体面生活的土耳其人、穷人、肥胖者、盲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态度，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最不受欢迎。^[39]

研究人员在美国做了一项类似研究，调查列出了一份修订后的不受欢迎群

体名单，包括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穷人、肥胖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美国人的回答也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排在了最后。^[40]除了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心存轻蔑，该研究还得出几个有趣的结论。首先，这项研究挑战了人们熟悉的观念，即受过教育的精英在道德上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开明，因此也更宽容。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偏见并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少，只是“（他们）抱持偏见的对象是不同的”。此外，精英们对自己的偏见并不感到尴尬。他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歉意。^[41]

其次，精英对自己瞧不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与强调个人责任的优绩至上原则有关。精英不喜欢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不是穷人或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认为贫穷和阶级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受教育程度低代表了个人努力的失败，因此是那些没能上大学的人自己的过错。“与工人阶级相比，人们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应该为自己承担责任，更应受到指责，他们更容易引发愤怒，也更不受欢迎。”^[42]

再次，这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负面判断并非精英独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自己也有同感。这表明，优绩至上的成就观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对那些没上大学的人来说，优绩至上的成就观会让人意志消沉。“没有迹象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抵制对他们的负面评价。”相反，他们甚至似乎内化了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判断。“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自己，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自己的处境负有责任，应该受到谴责。”^[43]

最后，作者认为，在优绩至上的社会中，不断强调上大学的重要性，强化了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社会污名化。“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通行办法，这种说法可能会增加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受到特别负面的评价的风险，同时强化优绩至上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们更愿意接受不平等，更愿意相信成功反映了人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教育被视为个人的责任，那么人们可能不会那么苛责源于教育差异的社会不平等……如果教育成果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得的，那么社会不平等的后果也是应得的。”^[44]

学位政府

到了21世纪，不仅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会被瞧不起，而且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选举产生的官员中，几乎很少有没读过大学的人。在美国国会中，95%的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都读过大学，有大学文凭，这意味着有文凭的少数人统治着没有文凭的多数人。尽管大约2/3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但只有极少数国会议员没有大学文凭。^[45]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国会中的比例一直过高，但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约1/4的参议员和1/4的众议员没有大学文凭，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依然能够当选。而在过去5年里，国会在种族、民族和性别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但在教育证书和阶级方面并不那么多样化。

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能当选公职，就是文凭鸿沟的后果之一。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即体力劳动、服务业和文书工作，只有不到2%的国会议员在当选前从事这类工作。在州立法机构中，只有3%的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46]

文凭主义也在改变英国和欧洲代议制政府的面貌。在英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有文凭的人统治没有文凭的人。在整个英国，大约70%的人没有大学文凭；在议会中，只有12%的人没有。近九成的下议院议员都有大学文凭，1/4的议员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47]

在过去40年里，英国工党议员在教育和阶级背景上经历了特别引人注目的转变。1979年，当选的工党议员中有41%没有大学文凭；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6%。

文凭主义的这种上升趋势伴随着工人阶级议员的急剧减少，工人出身的议员如今在下议院中只占4%。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其阶级构成发生了最大的变化。1979年，37%的工党议员来自体力劳动者背景。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7%。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奥利弗·希思所观察到的：“议员职业背景的这种变化导致议会越来越不能代表更广泛的英国民众，而工党也越来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党传统上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48]

在整个西欧的各国议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也在逐渐消失，这一模式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类似。在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代议制政府几乎成了高学历人士的专属领地。即使在这些富裕国家，也有大约70%的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进入议会。[49]

在德国联邦议院，83%的议员是大学毕业生，只有不到2%的人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职业教育。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82%~94%的议会代表有大学文凭。这些国家的内阁成员的学历水平更高。例如，在安格拉·默克尔2013年的内阁中，15位部长中有9位拥有博士学位，其余6人除了一位也都有硕士学位。在德国政治中，博士学位的声望很高，甚至有内阁部长博士论文剽窃的丑闻曝出，迫使内阁部长辞职。[50]

非大学毕业生在政府中几乎缺席，是优绩至上时代的新发展。但这并不是

前所未有的事情。让人不安的是，现在出现了向大多数劳动人民有选举权之前的情况的倒退。当今欧洲议会的高学历化与19世纪末的情况相似，当时财产资格限制了选举权。在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19世纪中后期的大多数议员都拥有大学文凭。^[51]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普选以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带来议会组成的逐步民主化。20世纪20—5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国会议员人数众多，占立法机构成员的1/3~1/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大学文凭的比例开始攀升，到21世纪头十年，非大学毕业生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比例与贵族和乡绅时代一样罕见。^[52]

有些人可能会说，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政府职务，这更值得欢迎，而不是令人遗憾。当然，我们需要高素质的工程师建造桥梁，需要训练有素的医生给我们做外科手术。因此，为什么不寻找上过最好大学的人来担任民选代表呢？难道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不比那些资历不那么显赫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健全的公共政策和合理的政治话语吗？

不，不一定。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下美国国会和欧洲各国议会中政治话语的危险状态，也会让我们停止这种想法。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最近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

拉什莫尔山上四位标志性的美国总统中有两位（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没有大学文凭，美国最近一位没有文凭的总统哈里·S·杜鲁门也位于美国最出色的总统之列。^[53]

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人是哈佛大学毕业，他与一支兼收并蓄的顾问团队一起构想并制定新政，这支顾问团队比那些为最近几任民主党总统服务的人能力更强，即使文凭水准远不及他们。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专业人士并没有像近几十年来那样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54]托马斯·弗兰克描述了那些参与新政的人的不同背景。

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最亲密的知己，是来自艾奥瓦州的社会工作者。被罗斯福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是一名律师，没有法学学位。负责罗斯福救助计划的杰西·琼斯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商人，他对让美国最著名的金融机构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并未感到不安。被罗斯福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有远见者马里纳·埃克尔斯是来自犹他州的小镇

银行家，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亨利·华莱士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农业部长，他曾就读于艾奥瓦州立大学。^[55]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文凭主义也未能改善英国的治理。如今，只有7%的英国人就读于私立学校，不到1%的人就读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执政精英却不成比例地毕业于这些地方。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的内阁中有近2/3的人上过私立学校，近一半的人是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大多数保守党内阁部长和工党政府中约1/3的部长都有私立学校求学背景。^[56]但二战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国政府恰恰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

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但他的内阁部长中只有1/4有私立学校就读经历，这一比例低于此后任何一届英国内阁，他的内阁中甚至有7位部长当过煤矿工人。^[57]

艾德礼内阁备受尊敬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战后世界的缔造者之一，他11岁就离开学校，一路晋升为工会领袖；下议院领袖兼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14岁离开学校，在当地政府中声名鹊起，帮助创建了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13岁就离开学校，在威尔士当矿工，后来领导创建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艾德礼内阁得到的评价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勇于改革的政府”，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艾德礼政府赋予了工人阶级权力，“并制定了英国新社会契约所依据的道德条款”。^[58]

把国会和议会变成有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并没有提升政府的效率，反而导致政府更缺乏代表性。这还导致劳动人民与主流政党——特别是那些中左翼政党——疏远，并导致政治和教育路线两极化。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是当今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

基于大学文凭的社会分化

2016年，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有2/3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希拉里赢得了超过70%的高学历选民的支持。选举研究发现，教育而不是收入，能最准确地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在收入相近的选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希拉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59]

从2016年总统选举来看，基于大学文凭的社会分化是选票波动最重要的原因。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50个县中，希拉里·克林顿在48个县的得票率实际上高于此前4年巴拉克·奥巴马的得票率。而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50个县中，她在47个县的得票情况相当糟糕。难怪特朗普在庆祝他早期某次初选胜利时宣称：“我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60]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左翼政党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右翼政党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当前精英统治的时代，这一模式发生了逆转。今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中左翼政党，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投票支持右翼政党。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这种逆转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而且是惊人地平行出现的。^[61]

20世纪40—7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美国投票给民主党，在英国投票给工党，在法国投票给各个中左翼政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教育文凭而形成的投票差距大大缩小，到21世纪头二十年，左翼政党失去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支持。^[62]

尽管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支持中左翼政党，但富有的选民仍普遍支持右翼政党，这一事实使这种逆转变得复杂。在美国，各种教育背景的非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继续支持民主党。但到了21世纪头十年，教育程度已经成为最具决定性的政治分歧，曾经代表工人的政党越来越多地代表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63]

在美国，随着民主党逐渐被看作专业人士阶层的政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对民主党逐渐敬而远之。这一趋势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得以延续。在2018年的国会选举中，61%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支持共和党，只有37%的人投票支持民主党。观察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30个国会选区，也可以看出文凭鸿沟在加深。1992年，当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这些选区的选票分布较为平均：一半选区把民主党人选进国会，另一半选区选共和党人。2018年，除了三个选区，民主党在其他所有选区均获胜。^[64]

在英国，工党的支持基础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1/3的工党议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到2010年，只有不到10%的工党议员是这一出身。奥利弗·希思称，工党中工人阶级议员的减少对“该党在工人阶级选民中的相对受欢迎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选民越来越多地认为该党由“脱离实际的大都市精英统治”。^[65]

不满情绪首先反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选民投票率的下降上。然后，2016年，不满情绪在脱欧投票中得到了体现。低收入选民比高收入选民更支持英国脱欧。但教育程度反映的差异更明显。超过70%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超过70%拥有研究生学位的选民投票支持留欧。^[66]

这种模式也可以在地区投票差异中看到。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20个地方政府中，有15个投票支持脱欧。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20个地区全部投票支持留在欧盟。^[67]

在法国，尽管政党制度与英美不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同样的教育鸿沟也在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大学毕业生从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中脱离出来，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日益成为教育精英的政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比大学毕业生高约20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这一差距变为零；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一差距发生了逆转。现在，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比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高10个百分点——30个百分点的转变。^[68]

皮凯蒂推测，左翼政党已从工人政党转变为知识和专业人士精英政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对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做出回应。与此同时，那些不具备高学历的人对精英阶层推动的全球化感到不满，转而支持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的候选人，比如美国的特朗普和在法国领导民族主义反移民政党的玛丽娜·勒庞。^[69]

2017年，自由中间派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勒庞，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全球化方案让人想起克林顿、布莱尔和奥巴马，一些评论家称许马克龙的当选，认为年轻、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平息民粹主义者的反抗。与美国和英国的精英人士支持克林顿、布莱尔和奥巴马一样，马克龙得到了拥有大学文凭和高等学位的选民最强有力的支持。^[70]

但马克龙的声望很快就消失了，马克龙政府面临一系列街头抗议，抗议的民众穿上了受困司机所穿的黄色安全背心。抗议者主要是巴黎以外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增加汽油税、马克龙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毫无帮助的经济政策感到愤怒。在危机期间，当马克龙所在政党的一位资深政治家被问及政府的哪些错误引发了抗议时，他回答说：“我们可能太聪明了，太机智了。”^[71]

当今无情的文凭主义把工人阶级选民推向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并加深了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这也导致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党派争议的主题，高等教育机构是最能体现优绩至上工程的对象。就在2015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表示，高校对国家有着积极的影响。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如今，59%的共和党人认为高校对国家的发展有负面影响，只有33%的人支持高等教育。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压倒性地（67%比18%）认为高校有积极作用。^[72]

优绩至上原则胜利的恶果之一可能是失去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支持。由于大学被广泛看作成功机器的引擎，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大学已经成为文凭特权和精英傲慢的象征。

阶层跃升话语一门心思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对此承担部分责任。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这样就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把大多数劳动人民排除在代议制政府之外，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

技术官僚的言谈方式

与文凭主义这些弊病密切相关的是公共话语的技术官僚转向。政策制定越是被描述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就越有理由让“聪明”的人（专家和精英）决定事情，而不是让公民辩论和决定制定什么政策。对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来说，聪明与愚蠢的言辞似乎是道德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与党派立场无关的替代方案。但是道德与意识形态分歧正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过于坚定地努力超越党派分歧的混乱局面，可能导致出现技术官僚式的公共话语，由此会把政治从公正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当谈到为所有美国人兑现平等权利的承诺时，他雄辩滔滔，那个时期的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难以与其比肩。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表的为纪念遭一名充满仇恨的枪手在教堂杀害的教区居民的“奇异恩典”悼词，是现代美国总统最激动人心的演讲。

然而，当谈到对民主治理的看法时，奥巴马在本质上是技术官僚。对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统来说，这一判断似乎过于苛刻，让我来解释一下。治理民主社会需要与不同意见做斗争。在面对分歧时进行治理的前提是，分辨清楚分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的公共目的克服分歧。奥巴马认为，民主社会分歧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普通公民缺乏足够的信息。

如果缺乏信息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对事实有更充分了解的人代表他们的同胞做出决定，或者至少启发他们，告诉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做出他们自己的明智决定。（按照这一假设，）总统的领导力就更多的是搜集事实的准确信息并传播信息，而不是道德说服。

奥巴马在2007年竞选总统之初对谷歌员工做的一次演讲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执政愿景。他告诉谷歌员工，他在全美旅行时学到的一件事是：“美利坚人民在内核层面是个正派的民族。那里有慷慨的精神，那里有常识，但这些都没有得到利用。”理由是：

主要是人们——他们只是给误导了或者他们太忙了，他们在努力送孩子上学，他们在工作，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他们不是整理所有信息

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们的政治进程给扭曲了。但如果你给他们提供优质的信息，他们的直觉很准，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总统有强大的团队给他们提供优质的信息。^[73]

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个世纪前创造了“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即白宫团队、强大的团队）这个词，它就把总统职位称为道德激励和劝诫之地。现在，天字第一号讲坛却要成为提供事实、数据及良好信息的场所。这正是技术官僚政治观念的精髓，与人相伴的不仅仅是精英统治的傲慢。如果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无论多么“正派”，都不是整理信息的“专业人士”，那么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必定会为这些普通人整理信息，并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事实。

奥巴马认为这就是治愈美国“扭曲”的政治进程的办法。按照奥巴马的这一看法，政治挑战不在于打破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因为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注定会拖累政治进程），也不在于唤醒公众对公共利益更强烈的意识，而在于提供更优质、更准确的信息。“我真的很期待这样做，因为我非常相信理性、事实、证据、科学和反馈，”他告诉他的谷歌公司听众，“我想让白宫恢复基于事实决策的那种感觉。”^[74]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技术官僚信仰的声明主要是为了赢得科技行业的支持者。但在奥巴马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一直忠实于这一政治观。这种思维方式的更多例子凸显了技术官僚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界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们熟悉的行话。例如，在为医疗改革辩护时，他不是就全民覆盖的道德理由来辩护，而是更多地谈到“扭转成本曲线”的必要性，他的意思是降低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成本。尽管“扭转成本曲线”并没有在竞选活动中激发太多的热情，但他在列举医疗保健计划的优点时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到这个短语超过60次。^[75]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采用市场激励机制引导人们做出合意的行为。这种对“incentive”（激励）的强调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结果由名词产生了一个新的动词“incentivize”（激励）。与21世纪初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管理顾问和企业高管一样，奥巴马把激励作为描述市场机制如何实现预期结果的一种方式。他提出了激励技术发展、小企业招聘、清洁能源开发、水资源管理的改善、良好的网络安全实践、气候适应计划、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积极的学校氛围、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以及一系列其他目标的政策。

激励是个技术官僚化的概念，非常符合奥巴马避免党派或意识形态争论的初衷。这一概念采用财政诱因来实现公共目的，因此似乎在政府授权和不受约束的市场选择之间找到了舒适的中间地带。以前的总统很少使

用“incentivize”这个词，而奥巴马在100多个场合谈到“incentivize”这样或那样的行为。^[76]

与其他方面的政治言论相比，奥巴马不断谈论“聪明”的政策，更突出了技术官僚和优绩至上政治之间的联系。对奥巴马来说，smart是最受赞扬的词语：聪明的外交、聪明的外交政策、聪明的监管、精明的增长、精明的削减开支、明智的教育投资、明智的移民政策、聪明的基础设施项目、聪明的执法、智能政府、明智的贸易政策、明智的能源政策、明智的气候政策、明智的权利改革、明智的市场改革、明智的环境管制、明智的反恐政策、气候智能型农业、明智的发展、明智的市场导向创新，尤其还有智能电网。^[77]在总统任期内，奥巴马在100多个场合上赞扬了智能电网或智能电网技术。总的来说，他在政策和项目中使用smart这个形容词超过了900次。^[78]

技术官僚政治方法的缺陷之一是，把决策权置于精英手中，从而削弱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它的另一个缺陷是放弃了政治说服。激励人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节约能源或注意体重或遵守道德商业惯例——不仅替代了强迫人们做这些事，也替代了说服人们做这些事。

技术统治论与民主

在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发表意识形态上闪烁其词的经济主义言论的同时，公共话语也变得越来越粗鲁和尖锐，党徒们互相叫喊，在推特上互发推文。技术官僚化的言辞和大喊大叫的比赛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未能以实质性的方式与激励民主社会公民的道德信念进行接触，双方都没有养成对公正和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观念进行理性考察的习惯。

2016年的民粹主义剧变——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批判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政治。针对经济学家关于脱离欧盟会给英国带来经济困难的预测，一位主要的脱欧支持者回答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79]对奥巴马来说，他很难理解在他总统任期结束时发生的政治地震。2018年，在特朗普当选接替他的两年后，奥巴马承认，全球化的支持者“没有足够快地适应有人被抛在后面的事实”。华盛顿共识“有点儿太舒服了。尤其是在冷战之后，美国和美国精英们在这段时间里沾沾自喜，认为我们已经解决所有问题”。^[80]

但奥巴马对特朗普时代极化政治的主要诊断，是认为问题出在公众在基本事实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上。他说，我们之所以在政治中“看到如此多的僵局、怨恨和两极分化”，部分原因是“我们在事实和信息方面没有共同的基线”。看福克斯新闻的人和读《纽约时报》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中”，不仅“有不同的观点，还有不同的事实……这就像，认识论上的不

同”。^[81]

他生动地说明了他所看到的相互冲突的现实：

我们在未来10年、15年、2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回到这种公民对话中：如果我说这是一把椅子，我们也会同意这是一把椅子。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不是一把好椅子，我们是否应该换掉这把椅子，你是否想把这把椅子移到别处去。但你不能说这把椅子是大象。^[82]

当然，政治辩论中的事实争议并不像描述一件家具那么简单，但房间里的“大象”可以是气候变化。奥巴马的意思是，很难与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否认人类在造成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人开展理性的辩论。

奥巴马肯定想到了继任总统在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怂恿下，让美国退出了他（奥巴马）签署的《巴黎协定》。奥巴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是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支持者对科学的排斥。

事实上，“我相信科学”的口号已经成为民主党人的战斗口号。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宣布了这一口号，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时也使用了这一口号，而一些寻求获得2020年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也在竞选活动中反复强调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含蓄地把科学归入信仰领域，似乎并没有降低其受欢迎程度。^[83]

为了支持自己长期坚持的事实至上的信念，奥巴马喜欢引用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话，莫伊尼汉曾对一位顽固的对手说：“你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你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奥巴马有时会补充说，莫伊尼汉非常聪明，而他的对手没有他那么聪明。^[84]

但是，把政治分歧简单地归因于拒绝面对事实或拒绝接受科学，误解了事实和观点在政治说服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应该在事实上达成一致，将其作为政治辩论前的基础，然后继续辩论我们的观点和信念，这种想法是技术官僚的自负。政治辩论通常关于如何识别和描述与争议相关的事实。无论是谁成功地陈述了事实，要赢得这场辩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莫伊尼汉的看法正相反，我们的意见直接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意见不是在事实已经确定之后才到达现场的。

气候变化之争

如果反对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或拒绝接受科学，那么人们会认为在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拥有科学知识较少的人中，反对的声音更强烈。事实并非如此，对公众舆论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科学了解得

越多，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就越两极分化。

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且随着教育的发展，党派分歧也在加剧。在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共和党人中，57%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普遍被夸大了；在大学毕业的共和党人中，74%的人这样认为。在民主党人中，教育程度更高引起了对气候变化的更大关注。在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民主党人中，27%的人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了；在拥有大学文凭的民主党人中，只有15%的人这样认为。^[85]

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大学学历人士的党派分歧（59%）几乎是高中学历人士（30%）的两倍。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对人类在造成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观点。当被问及全球变暖是否由环境的自然变化造成时，大多数共和党人说“是”，而大多数民主党人说“不是”。但大学毕业生的党派分歧（53%）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19%）大得多。^[86]

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治极化不仅与教育水平有关，也与科学知识有关。以所学科学课程和科学素养测试作为衡量标准，拥有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比那些对科学了解较少的人更有可能坚持所在党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87]

这些发现挑战了一种观点：那些不愿意支持缓解气候变化措施的人只是对科学了解得不多。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事实和信息，而在于政治。认为人们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上达成一致，这一判断完全错了。技术官僚认为，只要我们能在事实上达成一致，我们就能对政策进行理性的辩论，这是对政治说服的误解。

201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奥巴马设想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理性辩论，只要每个人都同意以下基本事实：

你和我可以就气候变化进行一场辩论，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会阻止中国人和印度人燃烧大量的煤，他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是要去适应。也许我们会在关键时刻发明一些新的能源，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巴黎协定》。”

我会回应说：“不，事实证明，如果我们投资于智能化技术，并建立智能监管框架来激励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后果会是灾难性的。”^[88]

奥巴马希望我们能有一场这样健康的辩论，他说气候变化否认者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89]

但这样的辩论即使有可能进行，也会是贫乏的政治争论模式。这样的辩论假设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听天由命和轻率行事，要么采用价值中立的技术官僚解决方案。但这忽略了气候变化争议背后更深层次的道德和政治考量。

技术官僚立场的吸引力和弱点都在于其看似没有摩擦的价值中立。关于智能化技术和智能化监管框架的讨论忽略了道德和政治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让气候变化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如何应对化石燃料行业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影响？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消费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我们把自然视为方济各所称的“一次性文化”的垃圾场）？^[90]而那些反对政府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的人呢？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拒绝科学，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会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经济重组中，他们不相信设计和实施这种重组的技术官僚精英。

这些都不是由专家来回答的科学问题。这些是关于权力、道德、权威和信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是民主社会公民（要讨论和决断）的问题。

过去40年来，执政的精英们的失败之一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把这些问题置于政治辩论的核心。现在，当我们发现自己不知道民主规范是否会继续存在时，抱怨那些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傲慢、技术官僚视野狭隘，可能已经无足轻重。但这些政治怨恨导致了当前这种处境，激发了被民粹威权主义者利用的不满。正视精英政治和技术官僚政治的失败，是解决这种不满和重新构想公共利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步。

[1] Grace Ashford, “Michael Cohen Says Trump Told Him to Threaten Schools Not to Release Grad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19, [nytimes.com/2019/02/27/us/politics/trump-school-grade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7/us/politics/trump-school-grades.html); full transcript: Michael Cohen’s Opening Statement to Con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19, [nytimes.com/2019/02/27/us/politics/cohen-documents-testimony.html?module=inline](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7/us/politics/cohen-documents-testimony.html?module=inline).

[2] Maggie Haberman, “Trump: How’d Obama Get into Ivies?,” *Politico*, April 25, 2011, politico.com/story/2011/04/trump-howd-obama-get-into-ivies-053694.

[3] Nina Burleigh, “Trump Speaks at Fourth-Grade Level, Lowest of Last 15 Presidents, New Analysis Finds,” *Newsweek*, January 8, 2018, newsweek.com/trump-fire-and-fury-smart-genius-obama-774169; data and methodology at blog.factba.se/2018/01/08/; Rebecca Morin, “‘Idiot,’ ‘Dope,’ ‘Moron’: How Trump’s Aides Have Insulted the Boss,” *Politico*, September 4, 2018, politico.com/story/2018/09/04/trumps-insults-idiot-woodward-806455; Valerie

Strauss, "President Trump Is Smarter Than You. Just Ask Him,"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2017, [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02/09/president-trump-is-smarter-than-you-just-ask-him/](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02/09/president-trump-is-smarter-than-you-just-ask-him/); Andrew Restuccia, "Trump Fixates on IQ as a Measure of Worth," Politico, May 30, 2019, [politico.com/story/2019/05/30/donald-trump-iq-intelligence-1347149](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5/30/donald-trump-iq-intelligence-1347149); David Smith, "Trump's Tactic to Attack Black People and Women: Insult Their Intelligence," The Guardian, August 10, 2018, [theguardian.com/us-news/2018/aug/10/trump-attacks-twitter-black-people-women](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aug/10/trump-attacks-twitter-black-people-women).

[4] Strauss, "President Trump Is Smarter Than You. Just Ask Him";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 Langley, Virginia," January 21, 2017,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23537](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23537).

[5] Trump quoted in Michael Kranish, "Trump Has Referred to His Wharton Degree as 'Super Genius Stuff,'"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8, 2019, [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who-often-boasts-of-his-wharton-degree-says-he-was-admitted-to-the-hardest-school-to-get-into-the-college-official-who-reviewed-his-application-recalls-it-differently/2019/07/08/0a4eb414-977a-11e9-830a-21b9b36b64ad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who-often-boasts-of-his-wharton-degree-says-he-was-admitted-to-the-hardest-school-to-get-into-the-college-official-who-reviewed-his-application-recalls-it-differently/2019/07/08/0a4eb414-977a-11e9-830a-21b9b36b64ad_story.html).

[6] Strauss, "President Trump Is Smarter Than You. Just Ask Him."

[7]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ally in Phoenix, Arizona," August 22, 2017,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node/331393](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31393).

[8] 拜登评论视频见 [youtube.com/watch?v=QWM6EuKxz5A](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M6EuKxz5A)。Trump-Biden comparison discussed in Meghan Kruger, "Who's the Smartest of Them All? Trump and Biden Both Say 'M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7, 2019, [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os-the-smartest-of-them-all-trump-and-biden-both-say-me/2019/07/17/30221c46-a8cb-11e9-9214-246e594de5d5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whos-the-smartest-of-them-all-trump-and-biden-both-say-me/2019/07/17/30221c46-a8cb-11e9-9214-246e594de5d5_story.html).

[9] James R. Dickenson, "Biden Academic Claims 'Inaccurat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87, [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7/09/22/biden-academic-claims-inaccurate/932eaeed-9071-47a1-aeac-c94a51b668e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7/09/22/biden-academic-claims-inaccurate/932eaeed-9071-47a1-aeac-c94a51b668e1).

[10]Kavanaugh hearing,transcript,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7,2018,washingtonpost.com/news/national/wp/2018/09/27/kavanaugh-hearing transcript.

[11]George H.W.Bush,“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April 18,1991,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66128;Blair quoted in Ewen Macaskill,“Blair’s Promise:Everyone Can Be a Winner,”The Guardian,October 2,1996,theguardian.com/education/1996/oct/02/schools.uk.

[12]William J.Clinton,“Remarks at a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Dinner,”May 8,199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2520.根据对美国总统项目在线档案的搜索，克林顿用“what you learn”（你学到了什么）或“what you can learn”（你能学到什么）类似的短语32次，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约翰·麦凯恩颠倒了克林顿的对句：“In the global economy,what you learn is what you earn.”（在全球经济中，你学到了什么，你就赚到了什么。）For example,McCain,“Address at Episcopal High School in Alexandria,Virginia,”April 1,2008,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77705.

[13]Barack Obama,“Remarks at 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in New York City,”October 25,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5195.

[14]Ibid.

[15]Ibid.

[16]Christopher Hayes,The Twilight of the Elites: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p.48.

[17]Ibid.

[18]Thomas Frank,Listen,Liberal—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6),pp.34–35.

[19]Ibid.,pp.72–73.关于1979年以来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异的数据，参见“Productivity-Pay Gap,”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July 2019,epi.org/productivity-pay-gap。

[20]2018年，年龄在25岁及以上的美人中，有35%的人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这一比例高于1999年的25%和1988年的20%。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CPS Historical Time Series Tables,2018,Table A-2,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educational-attainment/cps-historical-time-series.html.

[21]Jonathan Alter,The Promise:President Obama,Year On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10),p.64.

[22]Ibid.

[23]Patrick J.Egan,“Ashton Carter and the Astoundingly Elite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of Obama’s Cabinet Appointees,”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14,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12/05/ashton-carter-and-the astoundingly-elite-educational-credentials-of-obamas-cabinet-appointees.Cited in Frank,Listen,Liberal,p.164.

[24]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25]Alter,The Promise,p.63.

[26]Frank,Listen,Liberal,p.40.

[27]Ibid.,pp.165–66.

[28]Ibid.,p.166;Neil Barofsky,Bailout: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Washington 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New York:Free Press,2012).

[29]Barofsky,Bailout,p.139.

[30]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中使用总统演讲在线档案进行搜索：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 search.

[31]在Google Ngram中搜索图书词频books.google.com/ngrams。在《纽约时报》上，“smart”一词在1980年出现了620次，在2000年出现了2672次。在nytimes.com/search?query=smart按年份搜索该词。

[32]William J.Clinton,“The President’s Radio Address,”August 19,2000,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18332;“Remarks on Proposed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Benefit Legislation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June 14,2000,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26899;“The President’s Radio Address,”September 2,2000,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18133.

[33]Barack Obama,“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March 8,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

node/303937;“Remar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City,”September 20,201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18949;“Remarks on Immigration Reform,”October 24,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5189;“Remarks at Forsyth Technical Community College in Winston-Salem,North Carolina,”December 6,2010,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88963.

[34]Hillary Clinton quoted in“Press Release—President Obama Announces Key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ments,”March 6,2009,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22243.

[35]Transcript of Obama’s 2002 speech at 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9591469.

[36]Obama quoted in David Rothkopf,Foreign Policy,June 4,2014,foreignpolicy.com/2014/06/04/obamas-dont-do-stupid-shit-foreign-policy.

[37]Barack Obama,“Remarks at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in Newport News,Virginia,”February 26,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3848;“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March 1,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03955.

[38]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March 1,2013

[39]Toon Kuppens,Russell Spears,Antony S.R.Manstead,Bram Spruyt,and Matthew J.East-erbrook,“Educationism and the Irony of Meritocracy:Negative Attitudes of Higher Educated People Towards the Less Educated,”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76(May 2018),pp.429–47.

[40]Ibid.,pp.441–42.

[41]Ibid.,pp.437,444.

[42]Ibid.,pp.438–39,441–43.

[43]Ibid.,p.444.

[44]Ibid.,pp.441,445.

[45]Jennifer E.Manning,“Membership of the 116th Congress:A Profile,”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ne

7,2019,p.5,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583;A.W.Geiger,Kristen Bialik,and John Gramlich,“The Changing Face of Congress in 6 Charts,”Pew Research Center,February 15,2019,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15/the-changing-face-of-congress.

[46]Nicholas Carnes,The Cash Ceiling:Why Only the Rich Run for Office—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pp.5–6.

[47]Data on MPs is from Rebecca Montacute and Tim Carr,“Parliamentary Privilege—the MPs in 2017,”Research Brief,the Sutton Trust,June 2017,pp.1–3,suttontrust.com/research-paper/parliamentary-privilege-the-mps-2017-education-background.See also Lukas Audickas and Richard Cracknell,“Social Background of MPs 1979–2017,”House of Commons Library,November 12,2018,researchbriefings.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ummary/CBP-7483#fullreport , 其中拥有大学文凭的议员比例略低 (82%) 。 普通人群 (70%没有大学文凭) 的数据来自Bagehot,“People Without Degrees Are the Most Underrepresented Group,”The Economist,May 12,2018.

[48]Ibid.,“Social Background of MPs 1979–2017,”House of Commons Library,pp.11–12;Ashley Cowburn,“Long Read:How Political Parties Lost the Working Class,”New Statesman,June 2,2017,newstatesman.com/2017/06/long-read-how-political parties-lost-working-class;Oliver Heath,“Policy Alienation,Social Alienation and Working-Class Abstention in Britain,1964–2010,”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issue 4(October 2018),p.1063,doi.org/10.1017/S0007123416000272.

[49]Mark Bovens and Anchrit Wille,Diploma Democracy:The Rise of Political Merit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5.

[50]Ibid.,pp.112–16,120;Conor Dillon,“Tempting PhDs Lead Politicians into Plagiarism,”DW,February 13,2013,p.dw.com/p/17dJu.

[51]Bovens and Wille,Diploma Democracy,pp.113–16.

[52]Ibid.

[53]Jackie Bischof,“The Best US Presidents,as Ranked by Presidential Historians,”Quartz,February 19,2017,qz.com/914825/presidents-day-the-best-us-presidents in-history-as-ranked-by-presidential-historians/;Brandon Rottinghaus and Justin S.Vaughn,“How Does Trump Stack Up Against the Best—

and Worst—President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9,2018,[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19/opinion/how-does-trump-stack-up-against-the-best-and-worst-presidents.html](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19/opinion/how-does-trump-stack-up-against-the-best-and-worst-presidents.html).

[54]Binyamin Appelbaum,The Economists’Hour:False Prophets,Free Markets,and the Fracture of Society(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9),pp.3–18.

[55]Frank,Listen,Liberal,p.39.

[56]关于上私立学校（7%）和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1%）的普通人口比例的数据来自Elitist Britain 2019: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f Britain’s Leading People(The Sutton Trust and 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2019),p.4,[suttontrust.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Elitist-Britain-2019.pdf](https://www.suttontrust.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Elitist-Britain-2019.pdf);鲍里斯·约翰逊内阁的数据和内阁成员上私立学校的比例来自Rebecca Montacute and Ruby Nightingale,Sutton Trust Cabinet Analysis 2019,[suttontrust.com/research-paper/sutton-trust-cabinet-analysis-2019](https://www.suttontrust.com/research-paper/sutton-trust-cabinet-analysis-2019).

[57]Sutton Trust Cabinet Analysis 2019;Adam Gopnik,“Never Mind Churchill,Clement Attlee Is a Model for These Times,”The New Yorker,January 2,2018,[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never-mind-churchill-clement-attlee-is-a-model-for-these-times](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never-mind-churchill-clement-attlee-is-a-model-for-these-times).

[58]Gopnik,“Never Mind Churchill,Clement Attlee Is a Model for These Times”;关于对贝文和莫里森的工人阶级背景的讨论，参见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1/jun/29/com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1/jun/29/comment)。有关贝文的背景，参见BBC,“Aneurin Bevan(1897–1960),”[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bevan_aneurin.shtml](https://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bevan_aneurin.shtml)。对艾德礼政府的评估来自BBC,“Clement Attlee(1883–1967),”[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attlee_clement.shtml](https://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attlee_clement.shtml),and John Bew,Clement Attlee:The Man Who Made Modern Brita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quoted in Gopnik.

[59]关于特朗普在未上大学白人选民中获取选票的比例，见2016 exit polls,CN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https://www.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关于希拉里在高级学位持有者中获得的选票份额，来自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Merchant Right: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WID.world Working Paper Series,March 2018,[piketty.pse.ens.fr/files/Piketty2018.pdf](https://www.piketty.pse.ens.fr/files/Piketty2018.pdf),Figure 3.3b;关于教育与收入，见Nate Silver,“Education,Not Income,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November

22,2016,FiveThirtyEight.com,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education-not-income-predicted-who-would-vote-for-trump.

[60]Silver,“Education,Not Income,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Trump quoted in Susan Page,“Trump Does the Impossible—Again,”USA Today,February 25,2016,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16/02/24/analysis-donald-trump-does-impossible-again/80843932.

[61]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Merchant Right: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

[62]Ibid.,Figures 1.2c and 1.2d.

[63]Ibid.,p.3;2018 exit polls,CNN,cnn.com/election/2018/exit-polls.

[64]2018 exit polls,CNN,cnn.com/election/2018/exit-polls;Aaron Zitner and Anthony DeBarros,“The New Divide in Politics:Educa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0,2018,wsj.com/articles/midterm-results-point-to-a-new-divide-in-politics-education-1541865601.

[65]Oliver Heath,“Policy Alienation,Social Alienation and Working-Class Abstention in Britain,1964–2010,”p.1064,Figure 4;Oliver Heath,“Has the Rise of Middle Class Politicians Led to the Decline of Class Voting in Britain?,”February 12,2015,LSE blog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the-rise-of-middle-class-politicians-and-the-decline-of-class-voting-in-britain.

[66]“People Without Degrees Are the Most Under-represented Group,”The Economist,May 12,2018,economist.com/britain/2018/05/12/people-without-degrees-are-the-most-under-represented-group;Matthew Goodwin and Oliver Heath,“Brexit Vote Explained:Poverty,Low Skills and Lack of Opportunities,”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August 31,2016,jrf.org.uk/report/brexit-vote-explained-poverty-low-skills-and-lack-opportunities.

[67]Goodwin and Heath,“Brexit Vote Explained:Poverty,Low Skills and Lack of Opportunities.”

[68]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Merchant Right: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pp.13,Figures 2.3a–2.3e.

[69]Ibid.,pp.2,61.

[70]Jérôme Fourquet,“Qui sont les Français qui soutiennent Emmanuel Macron?,”Slate,February 7,2017,slate.fr/story/136919/francais-marchent-

macron.

[71]Pascal-Emmanuel Gobry,“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Elite,”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2,2019.See also Christopher Caldwell,“The People’s Emergency,”The New Republic,April 22,2019,newrepublic.com/article/153507/france-yellow-vests uprising-emmanuel-macron-technocratic-insiders.

[72]Kim Parker,“The Growing Partisan Divide in Views of Higher Education,”Pew Research Center,August 19,2019,pewsocialtrends.org/essay/the-growing-partisan-divide-in-views-of-higher-education.

[73]Obama quoted in Adam J.White,“Google.gov,”The New Atlantis,Spring 2018,p.15,the 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googlegov.奥巴马总统在谷歌公司的讲话视频，见youtube.com/watch?v=m4yVlPqeZwo&feature=youtu.be&t=1h1m42s.

[74]Ibid.,也可见Steven Levy,In the Plex:How Google Thinks,Works,and Shapes Our Liv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1),p.317.

[75]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cost curve”一词的情况：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76]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incentivize”一词的情况：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77]所有上述政策或措施，奥巴马都以smrt作为形容词。这些政策或措施分别是“smrt diplomcy”“smrt foreign policy”“smrt regultions”“smrt growth”“smrt spending cuts”“smrt investments in eduction”“smrt immig rtion policy”“smrt infrstructure projects”“smrt lw enforcement”“smrt government”“smrt trde policy”“smrt energy policy”“smrt climte policy”“smrt entitlement reform”“smrt mrket reforms”“smrt environmentl regultions”“smrt counterterrorism policy”“climte-smrt griculture”“smrt development”“smrt mrket-oriented innovtion”“smrt grids”。——译者注

[78]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smart”一词的情况：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79]Henry Mance,“Britain Has Had Enough of Experts,says Gove,”June 3,2016,Financial Times,ft.com/content/3be49734-29cb-11e6-83e4-abc22d5d108c.

[80]Peter Baker,“From Obama and Baker,a Lament for a Lost

Consensu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18,[nytimes.com/2018/11/28/us/politics/obama-baker-consensu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8/11/28/us/politics/obama-baker-consensus.html).

[81]Quotes from Obama speaking at MIT’s Sloan Sports Analytic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23,2018.尽管这次会议是非公开的，但奥巴马讲话的录音被发布在极端自由主义杂志《理性》的网站上：reason.com/2018/02/26/barack-obama-mit-sloan-sports.

[82]Obama quoted in Baker,“From Obama and Baker,a Lament for a Lost Consensus.”准确的引用来自2018年11月27日奥巴马总统在莱斯大学的C-SPAN视频，见[c-span.org/video/?455056-1/president-obama-secretary-state-james-baker-discuss bipartisanship](https://c-span.org/video/?455056-1/president-obama-secretary-state-james-baker-discuss-bipartisanship).

[83]Hillary Clinton,“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July 28,201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17862;Barack Obama,“Remarks to the Illinois General Assembly in Springfield,Illinois,”February 10,201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12502;Katie M.Palmer,“Cool Catchphrase,Hillary,but Science Isn’t about Belief,”Wired,July 29,2016,[wired.com/2016/07/cool-catchphrase-hillary-science-isnt-belief](https://www.wired.com/2016/07/cool-catchphrase-hillary-science-isnt-belief).

[84]奥巴马在不同场合引用了莫伊尼汉的话，包括在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6)中；在2007年谷歌公司的竞选活动中（见Adam J.White,“Google.gov,”The New Atlantis,Spring 2018,p.16）；在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当时他补充了他观察到莫伊尼汉聪明的说法，见reason.com/2018/02/26/barack-obama-mit-sloan-sports.

[85]Frank Newport and Andrew Dugan,“College-Educated Republicans Most Skeptical of Global Warming,”Gallup,March 26,2015,news.gallup.com/poll/182159/college-educated-republicans-skeptical-global-warming.aspx.2018年，有69%的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了，而只有4%的民主党人这样认为。89%的民主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这样认为的共和党人占35%。Megan Brennan and Lydia Saad,“GlobalWarming Concern Steady Despite Some Partisan Shifts,”Gallup,March 28,2018,news.gallup.com/poll/231530/global-warming-concern-steady-despite-partisan-shifts.aspx.

[86]Ibid.

[87]Caitlin Drummond and Baruch Fischhoff,“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Scienc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Have More Polarized Beliefs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Topic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no.36(September 5,2017),pp.9587–92,doi.org/10.1073/pnas.1704882114.

[88]Obama quoted in Robby Soave,“5 Things Barack Obama Said in His Weirdly Off the-Record MIT Speech,”February 27,2018,Reason,at reason.com/2018/02/26/barack-obama-mit-sloan-sports,其中还包括演讲的音频记录。

[89]Ibid.

[90]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May 24,2015,paragraph 22,w2.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en.pdf.

5 成功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对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设想一下，假如有两个社会，它们的收入分配都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程度相同。在国民收入的每100美元中，最富有的20%的人得到62美元，而最贫穷的20%只得到1.7美元，社会底层50%的人的全部收入加在一起，只有12.5美元，远远低于最富有的1%的人单独得到的数额（20.2美元）。财富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更大。^[1]

如果你对收入和财富明显不平等感到不安，你可能会认为这两个社会都是不公正的。但在做出最终判断之前，你可能会进一步询问一些信息。例如，你可能想知道，这样显著的不平等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英才统治与贵族统治

想象一下，第一个社会是贵族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是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的，然后代代相传。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人很富有，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很贫穷。他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也是如此。再想象一下，第二个社会是英才统治的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传统特权的结果，而是人们的努力和才能的差异导致的结果。

了解这一点可能会让你更喜欢第二个社会而不是第一个社会。贵族统治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个社会把人归入他们各自出身的阶级。贵族统治不允许普通人向上流动。相比之下，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社会让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支持优绩至上制度最强有力的论据。可以肯定的是，英才统治并不能消除不平等。正是因为人们的才能和抱负不同，一些人才会比另一些人升得更高。至少可以说，这些不平等反映了人们所作所为的优劣，而不是他们出身的环境。

那些担心不平等的人可能仍会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多信息。他们会怀疑，即使在英才统治的社会，也至少有一些处于顶端的人受益于有利的人生起点——来自家庭的爱与支持、可能家境富裕、有敬业教师的好学校等。在断定英才统治的社会是公正的之前，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会想知道扶持政策是否已经到位，以确保所有儿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来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

一种思考什么样的社会是公正的社会的方法是：问一问，如果你不知道自

己是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真正拥有平等机会的英才统治的社会比贵族统治的社会更公正。但现在把公正与否的问题先放一边，考虑一下我们所想象的两个不平等社会的另一项特征。假设你事先知道你会降落在上层还是底层。如果你是富人，你更愿意生活在这两个社会中的哪一个？如果你是穷人，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社会？

记住，这两个社会都是高度不平等的。如果你是最富有的1%，你的年平均收入会是（让我们想象一下）130万美元。如果你落在底层的20%，你每年将只有5400美元的收入。^[2]差距相当悬殊。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两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样显著，知道你会占据哪个位置并不能帮助你决定更喜欢哪个社会。

但收入和财富不会是你唯一要考虑的东西。如果你很富有，你可能更喜欢那个能让你把财富和特权传给子女的社会，你会支持贵族统治的社会。如果你很贫穷，你可能更喜欢那个能让你或你的孩子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社会，你会支持英才统治的社会。

然而，进一步思考表明，在每种情况下都要考虑到相反的因素。人们不仅关心他们有多少钱，而且关心他们的经济状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出生在贵族社会的上层，你会意识到你的特权是你的好运，而不是你自己的功劳。然而，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登上了英才统治社会的顶峰，你可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通过努力得来的而不是继承的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与贵族特权不同，优绩至上社会的成功带来了（经历奋斗）赢得一席之地的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英才统治社会下致富也比在贵族统治下做富人更好。

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英才统治的社会，贫穷会让人意志消沉。在封建社会，出生在农奴制家庭，生活会很艰难，但你不会感到要为你的从属地位承担责任。你也不会相信，你为之辛苦工作的领主是因为比你更有能力和更足智多谋而荣登高位的。你会认为他并不比你更值得拥有这些，只是他更幸运。

相比之下，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英才统治社会的最底层，你就很难不去想你的劣势至少有一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这反映了你未能展现足够的才华和抱负来获得成功。一个允许人们向上流动并赞赏向上流动的社会，会对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做出冷酷的评判。

英才统治的黑暗面

“优绩制”一词就是在这种担忧的阴影下被发明的。迈克尔·扬是为工党工作

的英国社会学家。1958年，他写了一本名为“优绩至上的崛起”的书。^[3]在扬看来，优绩制描述的不是理想，而是个反乌托邦。他写道，当时英国的阶级制度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为基础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制度。这是好事，因为新的制度让工人阶级有天赋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摆脱困在体力劳动中的生活。

但扬也瞥见了优绩制的黑暗面。他仿佛是位历史学家，站在2033年回顾历史，清晰描述了在他那个时代战后英国开始出现的优绩至上社会的道德逻辑。扬没有为正在消逝的阶级秩序辩护，但他认为，这种秩序在道德上的专横和明显的不公平至少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旧秩序缓和了上层阶级的自得，阻止了工人阶级把其从属地位视为个人的失败。

那些靠父母的财富和影响力“一跃而上”的人不能完全确信地对自己说“我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在公开竞争中赢得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诚实一点儿，他们就必须承认，至少会有十几个下属和他们一样能做好他们这份工作，甚至可能做得更好”。^[4]

上流社会的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一定是麻木不仁的，对他所在部队的二等兵、家里的男管家或女仆、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司机，以及火车车厢或乡村酒吧里那个满脸皱纹、目光犀利的卑微工人，肯定都视而不见——不会注意到这些人中有人和他一样聪明、机智和有智慧。^[5]

即使有些上流社会的人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完全赢得了在最高层的地位，他们的下属也不会有这样的幻想。这些下属知道：“许多老板之所以在那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识谁、他们的父母是谁。”知道这个制度是受人操纵的，工人阶级就有能力在政治上挑战这个制度。（这正是工党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阶级体制的任意性让工人不必以社会赋予自己的低贱地位评判自己。^[6]

工人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是个工人。为什么我是个工人？其他事情我都不适合做吗？当然不是。如果我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世界展示。医生？酿酒师？部长？我可以做任何事。我从来没有机会。所以我是个工人。但别以为我本质上比别人差。”^[7]

迈克尔·扬认为，对自己地位的道德任意性保持头脑清醒有某种好处：这让赢家和输家都不必认为他们的命运是自己导致的。这并不能维护阶级体制，但这确实映照出建立在优绩至上原则之上的秩序具有自我矛盾的特征。按照才能分配工作和机会，并不能缓解不平等，而是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但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一假设加剧了贫富差距。

现在人们按能力分类，阶层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上层阶级……不再被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削弱。今天，杰出人士知道，成功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和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给予的回报。他们理应属于更高的阶层。他们也知道，他们不仅具备更高的素质，而且一流的教育起作用是在建立在他们天分之上的。^[8]

迈克尔·扬不仅预见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的傲慢，而且瞥见了这些人对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亲近感，他们倾向于看不起那些缺乏耀眼资历的人，以及此态度对公共话语的腐蚀性影响。从普通家庭向上流动的精英“更能理解技术文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及其全貌。他们受过科学训练，是继承了这片土地的科学家”。他们优越的智力和教育让他们没有理由或机会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

当他们（精英）说着另一种更丰富、更准确的语言时，他们怎么能与下层阶级对话呢？今天，精英知道……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在智力和教育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上也处于劣势，这两个品质在21世纪更一致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最显赫。^[9]

“我们面对的典型的现代问题之一就是，”扬观察到（记住，他仿佛生活在2033年，是在观察历史），“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铭记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失去了对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同情。”他讽刺地补充说，一些精英人士“太不老练了，以至于即使是不大能干的人也会受到不必要的冒犯”。^[10]（我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期间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有一半是“一篮子烂菜”。）^[11]

优绩制让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自我怀疑，加深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

今天，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卑微，都知道他们有过机会……难道他们没有义务承认自己地位低下，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说因为自己给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劲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12]

扬预计，这种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会引发政治反弹。他在结束反乌托邦叙事时预测，在2034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会在场反对统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反抗中崛起。2016年，英国人公投支持英国脱欧，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这场反抗提前了18年。

重新权衡英才统治

我在前文描述的两个社会并不是纯粹的假设，困扰它们的收入不平等是当今美国普遍存在的问题。^[13]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得到了辩护，

人们对不平等所做的辩护，基于类似优绩至上的理由。没有人认为富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很富有就应该富有。批评不平等的人可能会抱怨说，那些想要废除遗产税的人是在暗中支持世袭特权。但没有人会完全捍卫世袭特权，也没有人会质疑职业应该向人才开放的原则。

我们大多数关于获得工作、教育和公职的辩论都是从机会平等的前提出发的。我们的分歧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实现这个原则要求什么东西。例如，对招聘和大学录取中的平权法案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政策与机会平等的原则不一致，因为平权法案根据才能以外的因素来评判申请人。捍卫平权法案的人回应说，这种政策对于让遭受歧视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实现机会平等很有必要。

至少在原则层面和政治辞令上，英才统治赢得了胜利。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政治家声称，他们的政策会让所有公民，无论其是何种族或民族、性别或阶级，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并在各自的努力和才能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取得进步。人们在抱怨英才统治时，抱怨的通常不是理想，而是我们未能实现理想：有钱有势的人操纵了制度，导致他们的特权永久化；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想出了如何把优势传递给子女，把英才统治转变为世袭贵族统治；声称择优录取学生的大学为富人和有关系的子女提供了特殊照顾。按照这些抱怨，英才统治只是幻想，要实现遥遥无期。^[14]

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如果问题变得更严重呢？如果英才统治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实现理想，而是理想有缺陷，那该怎么办？如果阶层跃升的话语不再令人向往，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流动已经停滞，更根本的是因为帮助人们在竞争激烈的英才统治社会中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是空洞的政治方案，反映了这种理想中公民和自由概念的贫乏，那该怎么办？

为了探讨这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从道德和政治工程角度研究对精英政治的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正，另一种关乎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第一种反对意见怀疑，即使是完全实现了英才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作和薪酬完美反映了人们的努力和才能），也不会是公正的社会。第二种反对意见担心，即使英才统治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好社会。英才统治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这些态度会腐蚀公共利益，与人类的繁荣格格不入。

对英才统治的哲学批判主要表现在第一种反对意见上。出于我们将要探讨的原因，大多数当代哲学家都反对社会应该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分配工作和薪酬。哲学家的看法与公众达成共识的道德直觉发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到底谁是对的——哲学家还是公众。

尽管关乎公正的第一种反对意见在哲学界更为常见，但关乎傲慢和羞辱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对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更为重要。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抗议不仅关乎公正，也关乎社会尊重。要理解这一抗议，就必须确定和评估激发抗议的不满和怨恨。这些不满和怨恨是正当的还是被误导的？如果这些不满和怨恨是正当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

完美的英才统治是否公正？

想象一下，有一天，我们设法消除了成功之路上所有不公平的障碍，这样每个孩子，包括出身卑微的人，都可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特权阶层的孩子竞争。想象一下，我们实际上实现了我们在原则上所宣称的：所有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能在天分和努力工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

当然，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消除歧视是不够的。家庭制度把给每个人创造平等机会的计划变复杂了，要抵消富有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并不容易。我考虑的主要不是继承的财富，强有力的遗产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想那些有责任心的、富有的父母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日常方式。即使是最好的、最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很难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来自拥有大量关注、资源和人脉的家庭的孩子平等竞争。

但假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假设我们可以实现承诺，让每个孩子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生活中都有平等的机会为成功竞争，那么这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吗？

人们很容易说：“是的，当然。这难道不是美国梦的全部：创造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让农场工人或一贫如洗的移民的孩子能够成为首席执行官吗？”虽然这个梦想对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美国梦也在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中引起了共鸣。

完全流动的社会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首先，优绩至上表达了某种自由的理念，我们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出生的环境决定，而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其次，优绩至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选择和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说，那些成功的人应该取得他们的成功。

然而，尽管优绩至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有理由怀疑，即使是完美实现英才统治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公正的社会。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英才统治的理想关乎流动性，而不是平等。优绩至上主义并不认为贫富差距被拉大有什么错，它只是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作为来交换位置——他们的努力和天分决定各自

的成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偏见而被困在底层，或因拥有特权而安坐顶峰。

在英才统治的社会里，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优绩至上主义没有说梯子上的横档应该相距多远，优绩至上的理想并不是要补救不平等——这一理想恰恰给不平等做了辩护。

这本身并不是反对优绩至上的理由，但优绩至上也让问题显现了：英才竞争导致的不平等是否公正？英才统治的捍卫者说是：只要每个人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结果就是公正的。即使是公平的竞争也有赢家和输家，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起点起跑，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训练、指导、营养补充等。如果是这样，比赛的获胜者就应该得到这个奖。有些人跑得比别人快，这并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天分是我们应得的吗？

这种说法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天分的道德状况。回想一下现今在公共话语中如此突出的阶层跃升话语。政治家们宣称，无论我们的出身多么卑微，我们都应该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什么要说到这份儿上？为什么要假设我们的天分应该决定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应该得到这些天分带来的回报？

有两个质疑这一假设的理由。首先，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天分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的运气，我并非理应得到运气带来的好处（或负担）。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人承认，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好处并不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那么，为什么其他形式的运气（比如拥有某种特殊的天分）会有不同呢？如果我购买政府发行的彩票，赢得100万美元，我会为我的好运感到高兴。但是，如果说我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或者说获奖与我的成就有关，那就太愚蠢了。同样，如果我买了一张彩票，但没有中奖，我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不能抱怨我被剥夺了我应得的东西。

其次，我生活在奖励我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这也不是我可以居功的事情。这也只是运气好而已。勒布朗·詹姆斯打篮球赚了数千万美元，因为篮球运动非常受欢迎。除了拥有惊人的运动天分，勒布朗很幸运生活在重视和奖赏篮球运动才能的社会。当今时代人们热爱他所擅长的篮球运动，但文艺复兴时期是壁画画家而不是篮球运动员的需求量很大，他活在当代，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他的功劳。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也具有卓越的才能，但我们的社会不大看重这些才能。世界掰手腕冠军的掰手腕技术可能和勒布朗的篮球技术一样好，但除了酒馆的几个顾客，没有人愿意花钱看他把对手的手臂

按在桌子上，这不是他的错。[15]

优绩至上信念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这样的。只要经济领域是公平竞争的领域，不受特权或偏见的左右，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作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应得的。

这是描绘人类解放的景象，因为这表明我们可以成为自我创造的人类，可以成为命运的创造者，可以成为命运的主人。这在道德上也令人称心，因为这表明在经济领域也可以回应古老的正义观念，让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是，认识到我们的才能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实现的，导致自我创造的景象变得复杂了。这种认识会质疑英才统治的信念，即克服偏见和特权足以带来公正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才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不管来自“基因彩票”还是来自上帝，那么认为我们理应得到这些才能所带来的好处就不恰当，实际上是过于自负的。

努力就让我们有价值吗？

英才统治的捍卫者援引努力和辛勤工作作为论据来回应，他们认为，那些靠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人理应接受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功，他们的勤奋值得赞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努力很重要，无论多么有天赋的人，如果不努力培养自己的才能，就不会成功。即使是最有天赋的音乐家也必须花很长时间练习才能演奏精妙的乐曲。即使是最有天赋的运动员也必须花费数年艰苦训练才能被选入奥运会代表队。

然而，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奥运会奖牌得主和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明星运动员与较差运动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很多篮球运动员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刻苦训练，但很少有人将球场上的表现超越他。我可以夜以继日地训练，但我永远不会比迈克尔·菲尔普斯游得更快。被认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承认，他的训练伙伴约汉·布莱克也是很有天赋的短跑运动员，比他训练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16]

当然，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会说最勤奋的运动员应该获得金牌，最勤奋的科学家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付出最多努力的工人应该得到最高的报酬，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知道成功是天赋和努力的结合体，而这两者很难分得清楚。成功孕育着成功，那些缺乏社会奖励的人才可能会发现很难获得奋斗的动力。但

是，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论点主要不是从社会学角度主张努力的有效性。优绩至上首先是道德主张，主张人类能动性和自由。

优绩至上论强调努力和勤奋，是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对自己的成功负责，从而能够获得自由。优绩至上论还想要证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竞争是真正公平的，那么成功会与美德结合在一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会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

我们愿意相信，在体育和生活中，成功是我们赢得的，而不是我们继承的。自然禀赋及其带来的优势让优绩至上信仰感到尴尬，这方面的事实对仅凭努力就能获得赞扬和奖赏的信念提出了疑问。面对这种尴尬，我们夸大了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例如，在奥运会的电视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扭曲，电视报道关注的不是运动员的壮举，而是他们如何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战胜伤病或艰难，还有他们的祖国陷于政治动乱之类令人心碎的故事。^[17]

这一点可以从绝大多数（77%）美国人身上看出来，他们尽管很难向上流动，但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成功”。^[18]我在哈佛大学学生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对奋斗的夸大强调，尽管他们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分和通常有利的生活环境，但他们总是把得以录取进入哈佛大学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英才统治的理想有缺陷，因为这一理想忽视了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夸大了努力的道德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正义观可用，以及这些正义观提供了什么自由和应得性的概念。

英才统治的两种替代选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大多数民主社会中，关于公正社会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了政治争论。一种可能被称为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另一种可能被称为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这两种公共哲学与英才统治之间的关系有点儿复杂。二者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反对英才统治的理念，即公正的社会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来分配收入和财富。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公共哲学都会对成功有所评判，这方面很难与英才统治对成功的评判区分开来。两者都没有对公共利益提供足够有力的解释，以对抗英才统治所倾向的傲慢和羞辱。尽管这两种公共哲学都拒绝接受竞争市场社会中的赢家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他们的胜利品这一观念，但二者也并没有为优绩的暴政提供解毒剂。尽管二者存在分歧，但为什么二者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自由市场自由主义

也许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论据是由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哲学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自由资本主义支持者的灵感来源，他反对政府为了减少经济不平等所做的努力，反对累进税，并认为福利制度与自由是对立的。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宪章》（1960年出版）中指出，唯一与自由相容的平等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职业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国家不应该试图以提供平等或补偿的教育机会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方案，最终只有强制才能实施。^[19]除非废除家庭，否则孩子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各自家庭提供的各种便利中成长，任何给所有孩子平等的成功前景的企图，都可能涉及不可容忍的国家强制。哈耶克反对“必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起点和相同的成功前景”这种观念。这样的原则会要求国家控制“与特定个人的发展前景相关的所有条件”，这类方案影响深远，哈耶克认为这类方案必定站在“自由的对立面”。^[20]

鉴于哈耶克反对收入再分配，人们可能会期望他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给了人们应得的经济回报。但哈耶克没有，其实哈耶克认为市场结果与对优绩的回报没有任何关系。市场结果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卖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重视程度。哈耶克区分了优绩和价值。优绩是关于人们应该得到什么的道德判断，而价值仅仅是衡量消费者愿意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支付什么的标准。^[21]

哈耶克认为，假定经济回报反映了其接受者的优绩，会导致把优绩过度道德化，这是错误的。哈耶克想要打破这种道德观念的原因之一，他想要消除人们对不受约束的市場所产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反对意见，大家对这一反对意见都耳熟能详了。他认为，对不平等的反对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来自这样的担忧：“市场回报的差异与获得回报者在优绩方面可识别的差异并不对应。”^[22]

哈耶克对这一异议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他没有想要证明那些在市场上获得丰厚回报的人在道德上是应得的，而是拒绝接受经济回报反映了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想法。这就是他对优绩和价值的区分的力量。在自由社会里，我的收入和财富反映我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我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与我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为了说明哈耶克的观点，设想一个例子。一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不应该比学校老师赚更多的钱，管理金钱远不如教导和激励年轻人那样令人钦佩和重要。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可能会回答说，对冲基金经理负责投资教师、

消防员和大学捐赠基金辛苦赚来的养老金，因此他们工作的道德重要性让他们值得拥有他们赚来的巨额收益。但哈耶克并没有给出这样的回答，他的论点更激进，他反对人们赚的钱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

哈耶克观察到，一个人拥有社会奖励的才能，这并不是他做到的，而是道德上偶然的，是一种好运。哈耶克如此展开论证：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后天获得的才能显然对社会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在拥有这些天分上是否有任何功劳。无论一个人拥有的天分是非常普通的还是极其罕见的，他都很难改变自己的特殊才能。善良的内心或甜美的声音，漂亮的脸蛋或灵巧的双手，机敏的头脑或迷人的性格，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努力无关，也与个人拥有的机会或经验无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具有的价值，以及他因此得到的报酬，与可以被我们称为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23]

在哈耶克看来，否认经济回报与优绩有关，提供了理论支持来抵制一些人提出的再分配要求，比如有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不配比教师赚得多，就想要政府介入来实施收入再分配。哈耶克回答说，即使我们认为教书育人比管理金钱更令人钦佩，报酬和薪水也不是对优秀品质或值得敬仰的成就给予的回报，而只是反映市场参与者必须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对等支付。

与哈耶克不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倾向于对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应基于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

福利制度自由主义

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在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哲学表达。罗尔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正义论》（1971年出版）中指出，即使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制度，一个完全补偿阶级差异影响的制度，也不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如果人们在真正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赢家就会是那些拥有卓越天分的人。但是，天分的差异就像阶级的差异一样，在道德上是有任意性的。^[24]

“即使英才统治在消除社会偶然性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完美的作用，”罗尔斯认为，“公平的英才统治也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由能力和天分的自然分配来决定。”^[25]天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与阶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一样不公平。“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似乎同样具有任意性。”^[26]因此，即使是实现了真正的机会平等的社会，也不一定是公正的社会。这一社会

还必须应对由于人们天生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

如何与这些不公平抗衡？一些英才统治的捍卫者担心，除了机会平等，唯一的选择就是结果平等，这是一种拉平的平等，会阻碍有天分的人获得竞争优势。在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杰隆》（*Harrison Bergeron*）中，作者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想象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那些拥有超常智力、体力和美貌的人需要穿上精心设计的烦琐的伪装，以抵消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27]

但罗尔斯表明，这并不是补偿天分不平等的唯一方式。“没有人值得拥有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没有人值得在社会中获得更有利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消除这些区别，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28]罗尔斯认为不应妨碍有才华的人，而应该让赢家与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不要让跑步最快的人穿上铅鞋，而应该允许他们全速奔跑。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赢得的这些收益并不只属于他们。鼓励有天赋的人培养和发挥他们的才能，但要认识到这些人才在市场上获得的回报应该与整个社会分享。

罗尔斯把这种处理不平等才能的方式称为“差异原则”。这一原则与英才统治论完全不同，它不采取阻止有天赋的人发挥他们的才能的方式，而是否认他们值得或应该得到这些才能在市场社会中所要求的回报。

罗尔斯写道：“差异原则代表了一种协议：把天分的分配视为共同资产，并分享这种分配所带来的利益，无论其结果如何。那些被自然给予恩惠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只有在改善那些失败者的处境的条件下，才能从他们的幸运中获益。”社会应该做出安排，“让这些偶然性的赐予为最不幸的人谋福利”。^[29]

英才统治论者可能会回答说，即使他们的天分是运气的问题，他们的努力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应该得到他们凭借努力和辛勤工作所获得的一切。罗尔斯不同意。“即使是愿意努力、尝试，从而在普通意义上值得拥有，其本身也取决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市场回报应该反映道德应得性的想法，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救。

宣称一个人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让他能够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这种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却没有任何功劳。道德应得性的概念似乎不适用于这些情况。^[30]

与哈耶克一样，罗尔斯强调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并反对市场结果反映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观点。但在罗尔斯看来，这可以用来支持征税以实施收入

再分配，而不是反对征税再分配。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国家有权对他们辛苦赚来的收入征税的人，罗尔斯回答说，我们赚的钱的数量取决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我所拥有的才能得到市场认可，或者我一开始就拥有这些才能，这并不是我的功劳。因此，如果税法要求把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建设学校、道路或帮助穷人，我就没有理由抱怨。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我在道义上不应得到市场因我的才能赋予我的好处，这些好处应如何分配也是另一个问题。社会应该把这些好处分配给整个社会，还是分配给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或者（像哈耶克认为的那样）干脆让这些好处躺在自己落下的地方？罗尔斯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市场收益反映的因素具有任意性，这一论点强有力地否定了优绩至上论。这一论证削弱了优绩至上论的主张，即富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但这并不能证明社群对这笔钱或其中的一部分有正当的道德要求。

我们的成功依赖于我们栖身的社群，因此我们有义务促进社群的公共利益，社群是否对个人的市场收益有正当的道德要求，取决于我们如何证明这种义务。^[31]

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者更善于阐述证伪的论点——反对把个人自己作为其成功的唯一理由，而不是肯定的论点——个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回想一下巴拉克·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期间为了唤起公民的相互依赖和义务所说的话：

如果你成功了，你不是全靠自己成功的。你不是全靠自己实现目标的。我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成功一定是因为自己太聪明了。外面有很多聪明人。一定是因为我比别人都努力。让我告诉你——外面有一大群努力工作的人。

如果你成功了，那么一定是一路上有人给了你帮助。在你生命中的某个地方，有伟大的导师。有人帮助创造了我们拥有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制度，让你飞黄腾达。有人投资兴建了道路和桥梁。如果你有一家企业——那不是你建立的。许多其他人让这家企业得以出现。^[32]

共和党人抓住最后两句话，把奥巴马描绘成敌视企业家的大政府的传道者。当然，他并不是说我的企业或你的企业实际上是由别人建立的。奥巴马想说的是，成功人士并不能对他们的成就独揽全功，而应感谢社群，是社群不仅修建道路和桥梁，而且培养我们的人才和重视我们的贡献，这一切让企业家的成功成为可能。“你不是孤身一人，我们都在一起。”随后他加了几句话。^[33]

奥巴马不仅仅是口误，他在试图描述成功人士对同胞负有道德义务时表现

的笨拙，反映了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哲学的弱点，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未能提供能够满足其所需的团结的社群意识。这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福利制度正当性动摇的原因，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的公共服务和安全网络一直以来都很慷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无力抵御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政治言论和公众态度中日益高涨的英才统治情绪，正是日益高涨的英才统治情绪让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得以合理化。

拒绝优绩至上

哈耶克和罗尔斯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在哈耶克眼中，否认市场收益是对优绩的回报，是抵制再分配要求的论证手段。

在罗尔斯眼中，拒绝承认优绩与应得性的关系，是服务于相反的政治立场的。这是对富人反对再分配进行反驳的方式，例如，富人声称他们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因此对这些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再分配是错误的。罗尔斯可以回答说，赚很多钱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优绩或美德的标准，只是反映了一个人所具备的技能完美符合市场需求。一旦有了公平的税法，人们就有权保留税法规定的那部分收入。但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声称，税法应该优先表彰或奖赏他们的卓越才能与突出成就。^[34]

尽管罗尔斯和哈耶克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他们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这突出了他们共同的两个哲学承诺：一个关乎在多元化社会中达成一致的困难，关乎哪些美德和品质值得奖励；另一个关乎自由。哈耶克写道：“依据优绩给予回报，在实践中必定意味着依据可评估的优绩给予回报，即依据其他人能够认可和同意的优绩，而不是仅仅在某种更高权力的角度的优绩。”识别优绩的困难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鉴于在哪些活动有价值或值得赞扬的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任何把分配正义建立在道德优劣而不是经济价值基础上的企图都会导致胁迫。因此，“个人地位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念一致的社会，是与自由社会完全对立的”。^[35]

罗尔斯也指出，人们对优绩和应得性的看法存在广泛的分歧，他担心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会与自由原则冲突。与哈耶克不同，罗尔斯并不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在于践行我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观念，同时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利。这意味着遵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优势，那么我们的同胞都会同意的公正原则。从这个角度——不知道我们是富是穷、是强是弱、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思考公正，不会让我们确认市场产生的任何收入分配。相反，罗尔斯认为，这会导致我们只接受那些帮助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成员的不平等。

尽管罗尔斯拒绝接受由自由市场来决定收入分配，但他与哈耶克也有共同

之处：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并不寻求奖赏优绩或美德。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对什么优绩是卓越的或有道德的，人们的看法不一，因为这些判断取决于对美好生活方式的有争议的观念。从罗尔斯的观点来看，把公正原则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会破坏自由，这样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从而不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看法的权利。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但哈耶克和罗尔斯都反对经济回报反映人们的道德应得性的想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承认他们正在挑战传统智慧。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似乎深深植根于未受正规教育影响的普通民众的心中。罗尔斯注意到，“常识倾向于认为”收入和财富应根据道德应得性进行分配；哈耶克承认，他拒绝对优绩的认可“一开始可能显得很奇怪，甚至令人震惊”，结果他觉得“必须要求读者暂停判断”，直到他能够解释清楚为止。^[36]但即使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确立了公共话语的术语，二者也没有推翻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人们的收入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37]相反，在那几十年里，即使社会流动停滞，不平等加剧，优绩至上主义对待成功的方式也继续得以加强。

市场与优绩

那么，当代政治这一状况令人困惑：尽管当时的主流公共哲学拒绝优绩至上的假设，但政治话语和公众态度为什么会坚持经济回报确实或应该与优绩一致的观念？难道仅仅是因为哲学离世界太遥远，对普通公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没有任何影响吗？还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为二者公开拒绝的优绩至上主义对成功的理解开辟了道路？

我相信事实是第二种情况。仔细看看这两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就会发现他们对优绩的放弃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么彻底。二者都反对优绩至上观念，即在公平竞争中，富人比穷人更有资格获得回报。但他们提供的替代方案仍然可能导致精英社会特有的态度——成功人士的傲慢和弱势群体的怨恨。

这一点在哈耶克对优绩和价值的区分中显而易见。哈耶克正确地指出，把收入不平等视为不平等优绩的反映无异于雪上加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高收入是优绩的证明，低收入则是成就贫乏的证明，人们普遍认为职位和报酬与所作所为相称……对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可能比坦率承认优绩和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更令人难以忍受。”^[38]哈耶克引用了英国工党作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年出版），克罗斯兰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强调了优绩至上制度可能对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造成的使其道德败坏的影响：

当人们认为机会不平等，并且选择明显偏向财富或血统时，他们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适当的机会，以此安慰失败的自己——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天平的另一端太重了。但是，如果显然是根据个人作为优劣来挑选的，这种舒适的来源就消失了，失败就会引起完全的自卑感，没有任何借口或安慰；这是人类天性中的怪癖，实际上增加了对他人成功的嫉妒和怨恨。
[39]

哈耶克认为，牢记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不平等与个人作为卓越与否无关，富人就不会那么骄傲，穷人就不会那么怨恨。但是，如果像哈耶克所说，经济价值是不平等的合法基础，那么对成功的令人反感的态度得以削弱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

想一想，如果成功人士相信他们的成功衡量的是其贡献的价值，而不是他们的美德或个人作为卓越与否，那么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到底会有多大不同呢？如果弱势群体认为他们的奋斗并不反映自己的个人作为是否卓越，而只反映他们所能提供的微薄价值，那么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又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在这样的社会中，提醒富人他们的财富（仅仅）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贡献的卓越价值，不太可能是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的解毒剂；提醒穷人他们的贫穷（仅仅）反映了他们贡献的低价值，对他们的自尊很难起鼓舞作用。

对价值的判断可能会轻易地滑向对个人作为的判断，这反映了一项熟悉但值得质疑的假设，即一个人的市场价值是能很好地衡量他对社会的贡献的标准。哈耶克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假设，他只是指出我们的市场价值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是衡量我们个人作为的标准。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价值可能是他的市场价值以外的东西。

然而，一旦市场价值被看作社会贡献的代表，人们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为了公正，人们应该得到与其市场价值对应的任何收入，也就是经济学术语中的边际产品。根据标准的经济分析，完全竞争性市场支付给每个工人的是他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即可归属于该工人的产出价值。

尽管经济很复杂，但如果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识别和区分每个人的市场价值，如果市场价值是社会贡献的真正衡量标准，那么离得出人们在道义上应该根据他们的边际产品或市场价值获得报酬的结论就很近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提出了这一论点的最新版本，他曾担任

前总统乔治·W. 布什的经济顾问。曼昆一开始就陈述了一项被广泛接受、直觉上很有吸引力的道德原则：“人们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以反映其贡献的大小。”他举了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广受欢迎的“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作者J.K. 罗琳的例子。曼昆表示，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人赚到的数百万美元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的高收入反映了iPhone和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对社会的巨大价值。^[40]

曼昆把这一推理扩展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收入：道德应该认可竞争性市场产生的结果，对护理人员和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如此。曼昆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收入反映了他对社会产品或服务产出所做贡献的价值，人们可以轻易得出结论，在这些理想化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41]

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竞争性自由市场分配给他们的任何收入，这一论断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这一观念的批评者，包括一些通常对自由市场持友好态度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一论断的缺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耶克反对这一观点，理由是人们的收入取决于天生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与拥有这些能力的人本身无关。人们的收入还取决于变幻莫测的供应和需求。我所提供的才能是稀有的还是丰富的，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却决定了这些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曼昆的公正应得理论忽略了这些偶然性。

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

对市场结果反映道德应得性这一观点最具破坏性的批评，或许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奈特是罗斯福新政的批评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的学生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多位后来成为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人。然而，奈特就市场会对优绩给予回报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批评。“生产性贡献是衡量值得拥有什么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常见的假设。”他写道，“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会很容易论证清楚，生产性贡献可能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伦理意义。”^[42]

奈特提出了两个反对把道德应得性归因于市场结果的理由。第一个是哈耶克和罗尔斯关于优绩的争论，两人都引用了他的话。^[43]拥有能让我迎合市场需求的才能，与继承宝贵的财产一样，都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事。“很难看出……拥有提供所需服务的能力……构成了对社会红利的较高份额的道德要求，除非能力本身就是认真努力的产物。”此外，我的才能所带来的收入取决于另外有多少人拥有相应的才能。拥有的才能碰巧是稀缺的并受到高度重视，这当然可增加我的收入，但并不足以让我声称这是自己的功劳。“很难看出，仅仅是与别人不同，而不是与别人一样，

就在个人作为上更为卓越。”^[44]

奈特的第二个论点影响更深远，他质疑哈耶克想当然的假设——把市场价值等同于社会贡献。正如奈特所指出的，满足市场需求并不一定就是对社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满足市场需求只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但满足这些需求的伦理意义取决于这样做的道德价值。评估这些工作的价值涉及道德判断，诚然，这是有争议的，但经济分析无法提供道德判断。因此，即使把天分问题放在一边，认为人们借助迎合消费者偏好所赚的钱反映了其优绩或道德应得性，也是错误的。其伦理意义取决于道德考量，这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无法提供的。

我们不能接受把满足欲望作为价值的最终标准，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欲望是最终的；我们不认为关于优绩没有争议，而是对优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争议；在估价中，最大的难题是评估我们自身的需求，而我们最麻烦的需求是对“正当”需求的渴望。^[45]

奈特的洞见在哈耶克融合的两个概念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由市场衡量的经济贡献的价值和这些工作的实际价值。想想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高中化学老师，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专业知识，制造了备受追捧的（尽管是非法的）毒品冰毒。他制作的冰毒纯度非常高，在毒品市场上赢利数百万美元，收入远远超过了他作为教师的微薄收入。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同，他作为教师的贡献远比他作为毒贩的贡献更有价值。

原因与市场的不完善无关，也与禁止毒品的法律限制了毒品供应从而增加了非法贩毒者的利润这一事实无关。即使冰毒是合法的，有才华的化学家生产冰毒也仍然可能比教学生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毒贩子的贡献比老师的贡献更有价值。

再来看看赌场大亨、亿万富翁谢尔登·阿德尔森，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赚的钱比护士或医生多几千倍。但即使假设赌场大亨和医疗保健提供商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各自的市场价值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所做贡献的真正价值。这是因为他们贡献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重要性，而不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关心民众的健康在道德上比迎合他们玩老虎机的欲望更重要。

奈特进一步指出：“经济体系运作满足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本身的运作产生的。”经济秩序不是简单满足预先存在的需求，“经济体系的活动延伸到欲望本身的形成和根本转变——如果没有延伸到彻底的创造”。因此，对经济体系的任何伦理评估都必须考虑“这一体系倾向于产生

或滋养的那种需求”，而不仅仅是考虑这一体系在满足“任何特定时间存在的需求方面的效率”。^[46]

这些考虑导致奈特拒绝认可曼昆捍卫的观点，即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他们劳动的边际产品。奈特嘲笑这种说法，称其为“经济学中常见但遗世世人的道德结论”。^[47]

尽管奈特对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项目持怀疑态度，给人认为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主要支持者，但他猛烈抨击了市场价格是道德应得性或伦理价值的衡量标准的观点。

产品或贡献总是以价格来衡量，这与道德价值或人类意义完全不同。产品的货币价值是需求问题，而需求又反映了消费群体的品位和购买力以及替代商品的可获得性。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创造和控制的……因此，其结果本身并不具备作为评判经济体系的标准

的伦理意义。^[48]

尽管奈特并未声称自己提出了能够评估各种需求和欲望的道德重要性的伦理理论，但他拒绝接受经济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即不用评判品位，不可能把某些需求排在比其他需求更高或更有价值的位置。对经济体系的评判，与其说是看这一体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效率，不如说是看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需求，“以及其在人民身上形成的性格类型……从伦理上讲，创造正确的需求比满足需求更重要”。^[49]市场能够带来生产性贡献这一价值具有伦理意义，是优绩至上原则的预设前提，借助对这一预设的挑战，奈特对优绩至上主义提出了比哈耶克更彻底，也没那么沾沾自喜的批判。哈耶克告诉富人，尽管他们的财富不能衡量他们的才能，但财富确实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贡献的卓越价值。在奈特看来，这样的评价过头了。善于赚钱既不能衡量我们的才能优劣，也不能衡量我们贡献的价值。所有的成功人士可以诚实地说，他们已经成功地——凭借某种深不可测的天才或诡计、时机或天分、运气或勇气或坚定的决心——有效迎合了在任何特定时刻构成消费需求的各种需求和欲望，无论这些需求和欲望是多么沉重或轻浮。满足消费需求本身没有价值，满足消费需求的价值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地位。

道德应得还是正当权益？

尽管不能接受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市场所赋予的经济回报的观点，但我们仍要问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如何助长了英才统治的傲慢。首先，重要的是要澄清罗尔斯拒绝把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基础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对自己所获得的收入或职位都没有正当、合法的所有权。在公正的社会里，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有权得到他们所赚的钱。

在这里，罗尔斯做了微妙但重要的区分——在道德应得性和他所谓的“正当期待的权益”之间做区分。不同之处在于：与道德应得性的主张不同，只有在特定的游戏规则到位的情况下，权益才会产生。权益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建立规则。罗尔斯的观点是，直到我们首先确定了公正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支配这些规则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才能知道谁有权得到什么。 [50]

这一区别是如何影响关于英才统治的辩论的，且看：把公正建立在道德应得性的基础上，就相当于为给有道德和有成就的人相应的报酬而制定规则。罗尔斯反对这一点。他认为，把一种经济制度——或者就此而言是一部宪法——视为一种尊重美德或培养良好品格的方案是错误的。对公正的考虑优先于对才能和美德的考虑。

这是罗尔斯反对英才统治的核心。在公正的社会中，那些变得富有或获得有声望的职位的人有权获得成功，不是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品行卓越，而只是因为这些收益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制度的一部分，包括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

“因此，公正的架构回答了人们有权利得到什么，它满足了人们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正当期望。但人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既不与人们的内在价值成比例，也不取决于人们的内在价值。”界定人们的义务和权利的公正原则“没有提到道德应得性，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分配份额的倾向”。 [51]

罗尔斯拒绝把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的基础，关乎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另一个是哲学问题。在政治上，罗尔斯想要表明，富人不能依据声称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来正当反对再分配税收。这是关于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和其他促成成功的偶然性的争论。如果在市场经济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那么我们就很难声称我们赚的钱是对品行卓越的回报，或者是道德上应得的。

公正方面的规范没有一条是以奖赏美德为目的的。例如，把凭借稀缺的天分获得的奖金用于支付培训成本和鼓励努力学习，以及把能力用于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地方。由此产生的分配份额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关系，因为从道德角度来看，自然资产的初始禀赋及其早期的成长和培育的偶然性是任意的。 [52]

从哲学上讲，公正原则的定义必须独立于对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考虑，这一主张是罗尔斯自由主义更普遍特征的一个实例。这就是主张“正当”（支配整个社会的义务和权利的框架）优先于“善”（人们追求的各种美德和美好生活的概念）。就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美好生活观来说，那些巩固了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特定观念的公正原则不

会是中立的。这样的原则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未能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罗尔斯以类比的方式解释了公正优先于才能：我们不是因为相信小偷有不良品格，然后想要有能够惩罚他们的制度才去建立财产制度的。可以说，这是英才统治的惩罚理论，它把善置于正当之前，但这会让道德逻辑倒退。相反，出于效率和公正的考虑，我们建立了财产制度。然后，如果有人偷窃，我们才以惩罚他们的方式来执行法律。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们就应该受到惩罚。惩罚的目的是惩罚小偷的不正当行为，而不是指责他们品行不端（尽管可能会有这样的副作用）。^[53]

罗尔斯认为，经济奖赏的优绩制也会颠倒正当与善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一个社会来说，以奖赏道德应得性为首要原则来组织自己，就像为了惩罚小偷而建立财产制度一样。”^[54]

对待成功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罗尔斯对经济上的成功的非优绩至上思维方式，应该是贬抑成功，安慰失败。这一思维方式应该抑制英才统治中的精英傲慢倾向，防止那些缺乏权力或财富的人失去自尊。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成功是由于我的好运气，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那我更有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这一好运气。

此类情感如今实属稀缺。成功人士的谦逊并未成为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劳动人民普遍感觉精英看不起他们，这是民粹主义者反抗的重要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表明当代福利制度没有达到罗尔斯的公正社会的理念，或者可能表明，平等主义自由主义根本不会质疑精英的自得得意。

毫无疑问，当代福利制度，尤其是美国的福利制度，并不符合罗尔斯关于公正社会的愿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是产生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制度，也不是产生于有利于帮助处境最糟糕的人的制度。这导致自由主义者把工人阶级对精英的怨恨解释为对不公的抱怨。如果这是对精英的愤怒的唯一来源，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在扩大机会和改善最不富裕人群的经济前景的项目上加倍下注。

但这并不是解读民粹主义对精英进行强烈抵制的唯一方式。成功人士态度傲慢，招致这种抵制，而罗尔斯哲学所肯定的权益意识很可能助长了这种态度，即使罗尔斯哲学不认可成功的道德应得性。设想一下：即使是完全公正的社会，正如罗尔斯所定义的那样，也承认某些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产生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并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想象一下，按照罗尔

斯的原则，富有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向工厂里的低收入工人证明他的优势：

我并不比你更有价值，在道德上也配不上我所拥有的特权地位。我丰厚的薪酬只是必要的激励，以鼓励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尽我所能。你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才能不是你的错，我有如此丰富的才能也不是我的功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部分收入被征税来帮助像你这样的人。从道义上讲，我不配得到这么丰厚的薪水 and 高级职位，但根据社会合作的公平规则，我有权利得到这些。请记住，如果我们在知道谁会降落在顶峰而谁在底部之前就考虑了这些规则，那么你和我会同意这些规则。所以请不要怨恨我。我的特权让你过得比原先更好。让你感到难堪的不平等是为了你好。 [55]

可以肯定的是，罗尔斯这一基本原理并不能证明今天存在的所有收入、财富、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然而，这一原理所揭示的是，精英对成功的态度并不一定会被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软化或取代。与基于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而产生的主张一样，正当期待的权益同样可能是英才统治的傲慢和工人阶级的怨恨的潜在来源。

回想一下惩罚的类比。即使惩罚盗窃是为了维护财产制度，这种惩罚也有给小偷贴上污名的典型副作用。同样，即使外科医生比看门人工资高的原因是，这种工资差异是有利于最不富有的人的公正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它也有可预见的副作用：对外科医生的特殊才能和贡献表示敬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的副作用就会塑造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很难与绩效至上论的态度区分开。

社会尊重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享有经济和教育优势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下获得了这些优势。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只要所有社会成员都像公民一样受到平等的尊重，社会尊重的分配就不会成为政治问题。决定什么能力和成就值得赞赏是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是善的问题，而不关乎正当与否。 [56]

但这一回答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荣誉和认可的分配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关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今天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人阶级选民的愤怒，他们认为这种愤怒源于专业人士阶层对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蔑视。坚持正当优先于善导致社会尊重成为个人道德问题，从而导致自由主义者对傲慢和羞辱的政治视而不见。

但是，坚持认为精英阶层对蓝领工人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政治不能或不应该解决的社会规范问题，这是愚蠢的。荣誉和认可的问题不能与分配正义的问题截然分开。当事实证明，在补偿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对弱势群体居高

临下的态度隐而不现时，这一点尤其正确。有时这些态度会得到明确的表达。正如自由派平等主义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所写的那样：“当种族和性别不公正现象减少时，我们仍会面临聪明人和笨人之间的巨大不公正，他们付出相似的努力却得到不同的回报。”^[57]

“聪明人与笨人”是生动的短语，这一短语坐实了民粹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精英最糟糕的怀疑。与追求“分享彼此命运的社会”的罗尔斯的民主敏感性相去甚远，^[58]内格尔的话暴露了一些版本的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所倾向的优绩至上的傲慢。

机会与选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派平等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助长傲慢和羞辱政治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罗尔斯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才能的分配是任意性的。在此基础上，这些哲学家认为，公正的社会应该补偿人们的各种不幸——出身贫穷、残疾、缺乏天分或在生活中遭受事故和不幸。正如一位哲学家所写的那样：“分配公正明确要求，幸运的人应该把他们因幸运而获得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转移给不幸的人。”^[59]

乍一看，这种后来被人们称为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的哲学似乎是对命运偶然事件的宽宏大度的回应。在寻求纠正人生彩票所带来的不应有的利益和负担时，运气平等主义好像给竞争性的优绩至上社会提供了人道的选择。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运气平等主义哲学需要对优绩和道德应得性做出严格的判断。因为这一哲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不幸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情况下，他们才应该得到补偿，所以运气平等主义把公共援助（比如福利或医疗保健）的条件设定为要看有需要的人是因运气不好还是因错误的选择而身陷困境。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弄清楚穷人中谁是环境的受害者，因此值得帮助；谁对自己的贫穷负有责任，因此不值得帮助。^[60]

伊丽莎白·安德森严厉批评了运气平等主义，她把这种对应得帮助和不应得帮助的穷人的区分称为“济贫法思维”的复兴。^[61]运气平等主义把国家置于审问贫困公民的位置，以确定穷人是否可以通过做出更好的选择来避免贫困。出于至少两个原因，这种对责任的分析是以在道德上让人反感的方式，来构想民主公民对彼此负有的义务。

首先，根据运气平等主义，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义务不是基于同情或团结，而是基于他们最初为什么变得需要帮助。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有道德意义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有体面的工作的情况下仅仅因懒惰而拒绝工作，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选择不工作的人要对后

果负责。一些运气平等主义者主张的责任概念含义更广泛。他们认为，即使没有为各种可能的逆境购买保险，这也构成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使人们对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大多数不幸负责。例如，如果没有保险的人在车祸中严重受伤，运气平等主义者想知道他是否本可以购买保险。只有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可用或没有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社群才有义务帮助他支付医院账单。^[62]

其次，除了对轻率行为的严厉抨击，运气平等主义还贬低了那些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的人，把他们视为无自立能力的受害者。这里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运气平等主义者对人们的选择能力给予了极大的道德考量。他们想要给机会补偿，让人们的收入和生活前景能够反映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这种对责任和选择的严格要求意味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必须能够表明他们需要帮助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为了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他们必须表现为——并认为自己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63]

这样不合情理的激励超出了救济金领取者的自我形象，进入了公共话语的范畴。以运气平等主义为基础捍卫福利制度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到受害者论调，这种论调认为福利接受者缺乏能动性，没有能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64]

但是，以弱势群体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的受害者为理由而帮助他们，会带来高昂的道德代价和公民代价。这样的思维方式支持了贬低他人的观点，即福利领取者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也没有能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正如安德森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否认那些需要公众支持的人可以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与尊重他们作为能够分享自治的平等公民是难以调和的。^[65]

简而言之，运气平等主义“对那些给贴上不负责任标签的人毫无帮助，而向那些给贴上天生低人一等标签的人提供了羞辱性的帮助”。安德森写道：“就像济贫法制度一样，运气平等主义抛弃了那些因自己的选择而陷入悲惨命运的弱势群体，并根据在天分、智力、能力或社会吸引力方面的先天劣势来界定另一些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帮助。”^[66]

与其他版本的自由主义一样，运气平等主义哲学从拒绝把优绩和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的基础开始，但以报复性地重申优绩至上的态度和规范告终。在罗尔斯这里，英才统治的规范以正当期待的权益的名义重新出现。而在运气平等主义者这里，同样的规范借助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登场。

我们不应得到来自运气——包括拥有或缺乏社会所奖励的才能的运气——的好处和负担，这种看法似乎削弱了优绩至上的观念，即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得到的都是我们应得的。由机会而不是选择带来的利益并不是我们道德上应得的。但有时人们会选择冒险，这导致机会和选择之间的界

限变得复杂：跳伞运动员冒着生命危险体验惊险刺激；觉得自己不可战胜的年轻人选择不买健康保险；赌徒们涌向赌场。

运气平等主义者说，当那些选择冒险的人的赌注变坏时，他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社群只向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例如遭流星击中的人。那些输掉他们自愿下的赌注的人不能从赢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罗纳德·德沃金在区分“原生运气”（流星受害者）和“选项运气”（投机输家）时指出了这一点。^[67]

机会和选择之间的对比导致对才能和道德应得性的评判不可避免。虽然没有人活该在赌博中输钱，但输钱的赌徒既然选择承担风险，便不值得社会帮助他偿还赌债。他要对自己的不幸负责。

当然，有时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选择。一些赌徒患有赌瘾，老虎机被人用编程来操纵，让赌徒玩了就放不下。在这些情况下，赌博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掠夺弱势群体财产的强制行为。但就人们自由选择承担某些风险而言，运气平等主义者认为他们要对后果负责。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应得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他们面对。

除了常见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愿选择的争论，另一个考虑因素——保险的可能性——模糊了机会和选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的房子着火烧毁了，这肯定是厄运。但是，如果有负担得起的火灾保险，而我没有购买，希望永远不会发生火灾，这样我就可以避免每年交保费而省钱，那该怎么办？虽然火灾本身就是“原生运气”，但我没有投保是一种选择，这样就把不幸的事件转化为“选项运气”了。由于我选择不购买保险，所以我要对后果负责，也不能指望纳税人赔偿我的房屋损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意外事故都能得到保险。有些人很幸运，生来就获得了天才协会的大奖，另一些人天生残疾，难以谋生。德沃金认为，保险的概念也可以拓展到处理这些偶然性。由于在一个人出生前不可能购买保险，德沃金建议，我们可以估算出人们为防止天生才能低下而购买保险的平均金额，并利用这一数字把从有才华的人那里得到的收入再分配给没有才华的人。这个想法通过向那些在基因彩票中胜出的人征税，补偿天生能力的的不平等分配。^[68]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有可能计算出天生能力低下的保险单的保费和支出。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对有天赋的人征税，对没有天赋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那么运气平等主义者关于公正社会的理想就会实现。由先天缺陷造成的所有收入差距都会得到补偿，所有剩余的不平等都反映我们负有责任的因素，比如努力和选择。因此，运气平等主义者想要消除意外和不幸的影

响，这终究指向了优绩至上的理想：收入分配不是基于道德上任意的偶然性，而是基于人们道德上应得的东西。^[69]运气平等主义为因努力和选择而产生的不平等辩护，这突出了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契合点。两者都强调个人责任，并主张将社群帮助穷人的义务作为表明他们的贫困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的条件。运气平等主义者接受“反平等主义权利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思想——选择和责任的思想”，以此为武器致力于捍卫福利制度免受自由市场批评者的批评。^[70]这把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简化为关于在何种条件下一个人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真正自由的，而不受环境或不可避免的事情拖累的辩论。

赞扬天分

尽管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自由主义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首要原则，但二者最终都有优绩至上的倾向。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有效对抗优绩至上原则所倾向的对成功和失败的道德上让人反感的态度——赢家的傲慢和输家的羞辱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坚持剖析个人责任有关，也反映了他们对才能的重视——使他们坚持认为一个人天生的才能是运气的问题，因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任意的，他们对待才能，特别是天生的或固有的才能，也是非常认真的。

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基因彩票。他们设计了德沃金的假设性保险计划等税率措施，以计算和补偿自然或固有或天生的才能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社会优势和文化优势不同，无法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来抵消。他们把重新分配的理由建立在这种天分的生物学概念上，作为先于社会安排的遗传事实。但这样把天分设想为与生俱来的卓越性，是一种狂妄的自负。尽管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想要纠正“聪明人和笨人的巨大不公”，^[71]但他们珍视“聪明人”，诋毁“笨人”。

不需要介入关于智商是否基于遗传的激烈争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令人震惊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智商的先天差异没有什么关系。认为从事金融行业、商业和精英职业的人收入高是因为他们卓越的基因，这样的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尽管爱因斯坦等天才或莫扎特等艺术大师的成就可能确实是天分的结果，但认为这种超凡的天分是把对冲基金经理与高中教师区分开的原因是荒谬的。

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有很大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先天禀赋较差”的看法，相当值得怀疑。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观察到的，大多数收入差异是“由于社会在开发某些人的才能方面投入的资金远远多于其他人，而且每个工人可支配的资本数量非常不平等。生产力主要依赖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个人”。^[72]

天生的才能，尽管不是实至名归，却能在崇尚精英的社会赢得赞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才能因自身的缘故而受人仰慕，也是因为卓越的才能被认为是成功人士赢得丰厚报酬的原因。

如果优绩至上制度能让人们完全发挥天分，那么人们很容易认为最成功的人也是最有天分的人。但这显然错了，赚钱的成功与天生的智力——如果这种东西存在——关系不大。^[73]通过把天生的才能视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天分的作用，并在不经意间提升了天分的声誉。

优绩至上的兴起

“meritocracy”这个词一诞生就遭到滥用，却成了赞美和渴望的术语。“新工党致力于实现优绩至上。”托尼·布莱尔在1996年宣布，那是他成为英国首相的前一年。我们认为：“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或特权优势获得晋升。”^[74]2001年，在竞选连任时，他说他的使命是“消除阻碍人们前进的障碍，创造真正的向上流动，创造开放的、真正基于所有人的才能和平等价值的社会”。他保证要“严格推行优绩至上方案”，旨在“把经济和社会领域向精英和天才开放”。^[75]

当时已85岁高龄的迈克尔·扬感到很沮丧。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抱怨说，布莱尔正在赞颂他（扬）40年前在讽刺作品中揭穿的理想。扬现在担心自己的黑暗预言要成真了。“我预测穷人和弱势群体会被打倒，其实他们已经被打倒了……在创造了如此多英才的社会里，被认为没有才能确实会让人处境艰难。下层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处于如此无所遮蔽的境地。”^[76]

与此同时，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正春风得意，“自以为是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如果精英们相信，正如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鼓励去相信的那样，他们的进步来自他们自己的突出才能，他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其结果是：“政党领袖曾经持续不断地大声疾呼，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后来却没有对一年比一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发出一声不满。”^[77]

他不知道对这个“更加两极化的优绩至上社会能做什么”。但他希望布莱尔先生能“把这个词从公共词汇中删除，或者至少承认优绩至上的缺点”。^[78]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优绩至上的言辞主导了公共话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原则的负面后果。即使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层跃升的话语也为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主流政党提供了道德进步和政治改善的主要语言。“那些

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在他们的才能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得到提升。”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们已经习惯于吟诵这句咒语，没有注意到优绩至上原则正在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他们对那些没有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完全忽略了社会上的怨恨情绪。民粹主义者的反抗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打造的优绩至上社会隐含的对人的羞辱。

[1]此类不平等正是当今美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收入分配数据来自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Gabriel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issue 2(May 2018),p.575。财富的分配更是不平等。大部分财富（77%）由前10%的人持有，前1%的人的财富现在远远超过了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见Alvarado et al.,eds.,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237。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是很有价值的在线资源，提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最新信息：wid.world。

[2]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

[3]Michael 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58).

[4]Ibid.,p.104.

[5]Ibid.,pp.104–5.

[6]Ibid.,p.105.

[7]Ibid.,p.106.

[8]Ibid.

[9]Ibid.,pp.106–7.

[10]Ibid.,p.107.

[11]Amy Chozick,“Hillary Clinton Calls Many Trump Backers‘Deplorables,’and G.O.P.Pounces,”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0,2016,nytimes.com/2016/09/11/us/politics/hillary-clinton-basket-of-deplorables.html.

[12]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pp.108–9.

[13]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

[14]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了精英统治特权的巩固，包括Matthew Stewart,“The

Birth of a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pp.48–63;“An Hereditary Meritocracy,”The Economist,January 22,2015;Richard V.Reeves,Dream Hoarder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7);Robert D.Putnam,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5);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and Melissa Osborne Groves,eds.,Unequal Chances: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Stephen J.McNamee and Robert K.Miller,Jr.,The Meritocracy Myth(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3rd ed.,2014)。

[15]对掰手腕运动员和其他小众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来说，收视率和财务前景似乎正在改善。Paul Newberry,“Arm Wrestling Looks to Climb Beyond Barroom Bragging Rights,”Associated Press,September 6,2018,available at apnews.com/842425dc6ed44c6886f9b3aedaac9141;Kevin Draper,“The Era of Streaming Niche Sports Dawns,”The New York Times,July 17,2018.

[16]Justin Palmer,“Blake Trains Harder Than Me,but Won’t Take 200 Title:Bolt,”Reuters,November 12,2011,available at reuters.com/article/us-athletics-bolt/blake-works-harder-than-me-but-wont-take-200-title-bolt-idUSTRE7AB0DE20111112;Allan Massie,“Can a Beast Ever Prevail Against a Bolt?,”The Telegraph,August 6,2012,available at telegraph.co.uk/sport/olympics/athletics/9455910/Can-a-Beast-ever-prevail-against-a-Bolt.html.

[17]这一段来自本人著作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29。

[18]“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 Research Center,July 12,2012:pewglobal.org/2012/07/12/chapter-4-the-casualties-faith-in-hard-work-and-capitalism.

[19]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这与自由是必然冲突的。——译者注

[20]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92–93.

[21]Ibid.,pp.85–102.

[22]Ibid.,p.93.

[23]Ibid.,p.94.

[2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5]Ibid.,pp.73–74.

[26]Ibid.,p.75.

[27]Kurt Vonnegut,Jr.,“Harrison Bergeron”(1961)in Vonnegut>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98).See discussion in 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p.155–56.

[28]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02.

[29]Ibid.,pp.101–2.

[30]Ibid.,p.104.

[31]对本主张的详细说明，见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96–103,147–54.

[32]“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a Campaign Event in Roanoke,Virginia,”July 13,2012: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7/13/remarks-president campaign-event-roanoke-virginia.

[33]Ibid.

[34]本观点的另一个例子，可参见T.M.Scanlon,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117–32.

[35]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p.94,97.

[36]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p.310–11;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94.

[37]关于道德应得性这一概念的地位，自由主义哲学与大众观念之间存在差异，有学者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讨论，参见Samuel Scheffler,“Responsibility,Reactive Attitudes,and Liberalism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1,no.4(Autumn 1992),pp.299–323.

[38]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98.

[39]C.A.R.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56),p.235,转引自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440.

[40]N.Gregory Mankiw,“Spreading the Wealth Around:Reflections Inspired by Joe the Plumber,”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6(2010),p.295.

[41]Ibid.

[42]Frank Hyneman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 46. 该卷重印了奈特的文章“*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该文最早出现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ii(1923), pp. 579–624。关于奈特的一般情况, 请参见 Richard Boyd 在 Transaction 出版社版本上的介绍。

[43]有关罗尔斯借鉴了奈特思想的说明很有价值, 见 Andrew Lister, “Markets, Desert, and Reciprocity,” *Politics, Philosophy & Economics* 16(2017), pp. 47–69。

[44]Ibid., pp. 48–49.

[45]Ibid., p. 34.

[46]Ibid., p. 38

[47]Ibid., p. 41.

[48]Ibid., p. 47.

[49]Ibid., pp. 43–44.

[50]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p. 310–15.

[51]Ibid., p. 311.

[52]Ibid., pp. 311–12.

[53]Ibid., pp. 312–13.

[54]Ibid., p. 313.

[55]这种对薪酬差异的解释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我想象中的大学可能会给成功和不成功的申请人寄发信函, 解释他们接受或拒绝的理由, 见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pp. 141–42。

[56]斯坎伦似乎承认, 在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下, 很难将“正确”与“好”区分开来。见 Scanlon, *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 pp. 29, 32–35。

[57]Thomas Nagel, “The Policy of Preferenc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 no. 4 (Summer 1973), reprinted in Nagel,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4.

[58]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 102.

[59]Richard Arneson,“Rawls,Responsibility,and Distributive Justice,”in Marc Fleurbaey,Maurice Salles,and John Weymark,eds.,Justice,Political Liberalism,and Utilitarianism:Themes from Harsanyi and Raw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80.

[60]运气平等主义一词由伊丽莎白·安德森提出。我对这一学说的讨论得益于伊丽莎白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有力批评。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Ethics 109,no.2(January 1999),pp.287–337.

[61]Ibid.,p.311.

[62]Ibid.,pp.292,299–96.关于有司机没有保险的问题，安德森引用了Eric Rakowski,Equal Just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63]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pp.302–11.

[64]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4–21.

[65]Ibid.

[66]Ibid.,pp.308,311.

[67]Ronald Dworkin,“What Is Equality?Part 2:Equality of Resource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0,no.4(Autumn 1981),p.293.

[68]Ibid.,pp.297–98.

[69]正如塞缪尔·谢弗勒所观察到的那样，运气平等主义者强调选择与环境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默认了人们确实应该得到他们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运气平等主义赋予“应该得到”(deserve)概念的地位比其支持者所承认的高。Scheffler,“Justice and Desert in Liberal Theory,”California Law Review 88,no.3(May 2000),p.967,n.2.

[70]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Ethics 99,no.4(July 1989),p.933.

[71]Nagel,“The Policy of Preference,”p.104.

[72]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p.325.

[73]Joseph Fishkin,Bottlenecks:A New Theory of Equal Opport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83–99.

[74]Blair quoted in David Kynaston,“The Road to Meritocracy Is Blocked by

Private Schools,”The Guardian,February 22,2008.

[75]Tony Blair,“I Want a Meritocracy,No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Independent,February 9,2001: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ators/i-want-a-meritocracy-not-survival-of-the-fittest-5365602.html.

[76]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

[77]Ibid.

[78]Ibid.

6 分类机器

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

如果优绩至上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裙带关系或各种偏见而不是员工的工作能力来雇用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常春藤联盟高校招收享有特权的白人、新教教徒、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而不考虑其学业潜力的时代？不。克服优绩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着优绩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

相反，这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质疑精英的自命不凡，质疑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是完全靠自己取得成功的。这意味着挑战财富和尊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以优绩至上的名义得到捍卫，却助长了怨恨，毒化了政治，并让我们分裂。这种反思应该集中在生活的两个领域——教育领域和工作领域，优绩至上的成功观念在这两个领域最为关键。

在下一章，我会展示优绩的暴政是如何损害工作的尊严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恢复工作的尊严。在这一章，我展示了高等教育是如何成为分类机器的，它的宗旨本来是以成绩为基础提高社会流动性，结果却巩固了特权，并促成了意想不到的格局，全社会面对成功的态度侵蚀了民主所需要的共性。

高等院校主导着现代社会分配机会的体系。高校授予的证书决定了能否获得高薪工作和有声望的职位。对高等教育来说，这一角色喜忧参半。高等院校成了精英抱负得以实现的中心，这赋予高等院校巨大的文化权威和声望。被名牌大学录取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许多美国大学因此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捐赠收入。但是，把这些机构转变为英才统治秩序的堡垒可能不利于民主，也不利于竞争入学的学生，甚至对高校本身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詹姆斯·科南特的优绩至上政变

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是通向机会的大门，对这一观念，现在世人都已习以为常，人们很容易忽略其实（从历史上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美国高等教育在招生时按照成绩录取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20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三所影响力很大的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入学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上过一所私立寄宿高中，而这些私立高中为新教精英的上层家庭提供服务。学业能力不是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拥有合适的社会背景且负担得起学费。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入学考试，但这些考试管理灵活，许多学生不及格却仍然被录取了。女性还不在于考虑范围内，普林斯顿大学不招收黑人学生，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也很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受到正式或非正式配额的限制。^[1]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那就是精英大学作为精英教育机构，目的是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能成为社会领袖，这一观念影响深远。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顾问，他对哈佛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上层阶级隐隐显现的世袭迹象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样的精英阶层有悖于美国的民主理想，不适合在国家前所未有的需要智慧和科技实力的时候手握管理权。

尼古拉斯·莱曼是一部美国高等教育能力倾向测试启示录的作者，他描述了科南特所到的问题。在哈佛等一流大学，“这些富有而轻浮的年轻人带着仆人，他们的大学生活不是以学习为中心，而是围绕着聚会和运动，这些年轻人对大学生活定下了基调”。这些人后来控制了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华尔街银行、外交部门、研究型医院和大学院系。^[2]

所有的好地方都是为某个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全是男性、东部人、新教徒，接受过私立教育……不允许有天主教教徒或犹太人，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但那也需要他们仔细去除任何口音或其他明显的外来文化表达。有色人种与精英阶层的成员圈不够接近，就会被排除在外。即使是当时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也没有想到要建议女性常规性地参与国家管理。^[3]

科南特的抱负是颠覆这种世袭精英，代之以优绩至上。莱曼写道，他的目标是：

推翻现有的、不民主的美国精英，代之以新的精英，新的精英由来自各个阶层和各种背景的聪明、训练有素、有公德心的人组成。要由这些人（实际上是男人）领导这个国家。他们将管理大型技术组织——这些组织会成为20世纪末美国的支柱——并首次创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机会。^[4]

用莱曼的话说：“这项计划很大胆，旨在改变国家的领导层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安静的、有计划的政变。”^[5]

为了实现这一优绩至上政变，科南特需要找到方法来识别最有前途的高中生（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多么普通）并招募他们接受精英大学教育。科南特首先为中西部公立学校的天才学生设立了哈佛奖学金，根据智力测试来遴选这些学生。在委托开展这项测试时，科南特坚持认为智力测试衡量的

是天生的智商，而不是对学科知识的掌握，以避免让那些上过特权中学的人获得优势。他为此选择的测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智商测试版本，它被称为SAT。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南特的奖学金计划扩大到全美国范围的学生。被他用来选拔学生的SAT，最终被用来决定全美国高校的招生录取。正如莱曼所观察到的，SAT“不仅仅会是哈佛大学颁发奖学金的考查方式，也将是对美国人口进行分类的基本机制”。^[6]

科南特想要把哈佛大学转变为精英教育机构，这是他按照精英教育原则重塑美国社会的宏大抱负的一部分。1940年，他在加州大学发表了题为“无阶级社会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的演讲，并在《大西洋月刊》上刊出，阐述了自己的愿景。科南特希望为美国社会恢复机会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受到了“财富世袭贵族日益昌盛”的威胁。他引用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观点，特纳认为，西部边境开垦完毕，切断了美国机会的传统途径——向西迁移、耕种土地、通过努力和创造力崛起的能力，不受阶层的束缚。特纳曾写道：“美国民主早期最独特的事实是，个人在社会流动的状况下有阶层上升的自由。”^[7]

19世纪末的特纳或许是第一个使用社会流动性一词的人。^[8]科南特称这一概念为“我论点的核心”，并用高社会流动性来定义他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

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是美国无阶级社会理想的精髓。一方面，如果无论父母的经济状况如何，大量年轻人都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会很高。另一方面，如果年轻人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继承什么特权或继承不到什么东西，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不存在了。^[9]

科南特解释说，如果社会流动性很强，那么“子女必须也能够寻求自己的社会层级，获得自己的经济回报，从事任何职业，无论他们的父母可能做过什么”。^[10]

但是，在阶级界限没有开放的情况下，什么可以作为流动的、无阶级的社会所需要的流动性工具呢？科南特的答案是教育。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进入高中，中学教育系统正在成为“巨大的引擎”，如果运作得当，中学教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夺回……机会，以前边疆拓展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礼物^[11]”。

然而，根据科南特的设想，广泛的高中入学所带来的机会并不在于其所提供的教育，而在于由此提供的把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候选人进行分类和筛选的机会。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能力必须得到评估，才能必须得到开

发，抱负必须得到引导。这是公立学校的任务”。^[12]

尽管科南特认为教育所有未来的公民成为政治民主社会的成员很重要，但公立学校的这一公民教育目的相对于分类功能来说还是次要的。比教育年轻人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踏上最合适的机会阶梯的第一级”。科南特承认，这种分类角色“似乎给我们的教育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他希望公立学校能够“为这一特定目的而重建”。^[13]公立学校为依据优绩至上原则产生新的精英提供了广阔的遴选平台。

为了支持自己从每一代人中挑选出最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和担负公共领导责任的人的理念，科南特征募了一位强大的盟友——托马斯·杰斐逊。像科南特一样，杰斐逊反对凭借财富和家庭出身来获取地位的贵族，而想用凭借美德和才能获取地位的贵族取而代之。杰斐逊还认为，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可以成为“从穷人阶层中选拔天才青年的机制”。大自然并没有把天分排他地赋予富人，而是用“平等的手把智力分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找到高智商的人并对其加以培养，以便最有才能和最有道德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并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14]

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设想了一套公共教育体系，宗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那些在免费小学表现最好的学生会“被挑选到地区学校接受高一个层次的公费教育”。在那里表现优异的学生会获得奖学金，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成为社会领袖。“因此，要从每一种生活境况中把有价值的人和天才寻找出来，经过教育，使他们做好充分准备以战胜那些凭借财富和出身来获得地位的人，赢得公众信任来承担领导责任。”^[15]

杰斐逊的计划没有得到采纳，但在科南特看来，这为他所看好的基于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高等教育遴选制度提供了令人向往的先例。杰斐逊没有使用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他写道，他希望基于才能和美德的“自然贵族”能战胜“建立在财富和出身基础上的人造贵族”。^[16]他还用如果放在科南特所在的更民主的时代会显得不明智的语言，描述了他的竞争性奖学金计划：“每年从‘垃圾’中筛选出20名最优秀的天才，并由政府出资进行指导。”^[17]

优绩暴政的预兆

回过头来看，杰斐逊粗俗的语言突出了精英教育体系两个潜在的令人反感的特征，而我们关于社会流动性和平等机会的语言掩盖了这两个特征。首先，尽管与世袭等级制度对立，但这是基于能力而流动的社会。流动并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相反，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身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其次，颂扬和奖赏“最好的天才”的制度，很容易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不管这种贬低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即使杰斐逊提出了一个奖

学金丰厚的计划，他的计划也提供了早期的例证：我们自己尊崇“聪明”而羞辱“傻瓜”的优绩至上倾向。

科南特谈到了这两个对英才统治秩序的潜在反对意见，第一个比第二个更直接。关于不平等，他坦率地承认，他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并不以更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为目标。他追求的是流动性更高的社会，而不是更平等的社会。重要的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是确保人们在经济等级中的位置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时，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上升，另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下降。“至少在一代人中，也许在两代人中，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及就业的极端差异可能会存在，但并不会形成固定的阶级。”权力和特权可能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们“会在每一代结束时自动重新分配”。^[18]

至于从“垃圾”中找出天才这样令人不快的描述，科南特并不认为他提出的分类会让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人受到尊崇，或者让那些给筛选掉的人受到诋毁。他写道：“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不存在教育特权，即使在最高等的教育水平上也是如此。任何一条渠道都不应该有高于其他渠道的社会地位。”^[19]

事实证明，科南特在这两方面都过于乐观。精英教育并没有带来无阶级的社会，也没有避免贬低那些因缺乏天分而被排除在外的人。有人会说，这些发展只是反映了优绩至上的理想未能得到实现。但正如科南特所承认的，选拔人才和寻求平等是两个不同的规划。

科南特的精英教育愿景是平等主义的，他希望把哈佛大学和其他精英大学开放给美国最有才华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在常春藤联盟高校被拥有特权的家庭控制的年代，这是高尚的抱负。但科南特并不关心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不想增加上大学的学生人数，他只是想确保那些参加的人是真正最有才能的人。他在1938年写道：“如果现在进入高等大学学习的人当中至少有1/4或者1/2被淘汰，让其他更有才华的人取而代之，那么国家会从中受益。”根据这一观点，他反对1944年由罗斯福总统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为退伍老兵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科南特认为，国家不需要更多的学生上大学，国家需要的是更好的人才上大学。^[20]

在科南特担任校长的20年里，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没有实现他所倡导的优绩至上理想。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任期结束时，哈佛大学仍然很少拒绝校友子弟，在申请的校友子弟中，超过87%被录取。^[21]哈佛大学还是继续青睐来自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申请人，这些申请人大多数得以录取，而来自公立学校的入学申请则要求达到更高的学术标准。这部分是因为预科学校的学生是不需要经济资助的“付费客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上流社会血统”带来了常春藤联盟高校仍然珍视的文化声望。^[22]对招收犹太学生的限

制也悄悄地放宽了，但并没有取消，这反映了持续存在的担忧，即犹太人太多“会赶走哈佛最希望招收的上层阶级新教男生”。^[23]招收女生和尝试招收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学生还需留待将来。

科南特优绩至上理想的遗产

尽管科南特那个时代的哈佛大学并没有完全实施他所宣称的优绩至上理念，但这些理念已经开始决定美国高等教育的自我定位。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高等院校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的论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智慧。这些理念不再有什么争议，已经转化为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演讲和公开声明中的例行修辞：最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向所有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开放，完全不用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尽管只有最富有的大学才负担得起不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来录取，以及为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但人们普遍认为录取的依据应该是成绩而不是财富。虽然大多数大学根据一系列因素来评估申请人，包括学术潜力、性格、体育实力和课外活动，但学业成绩主要是由高中成绩和SAT分数来衡量的，SAT就是科南特倡导的智力能力标准化测试。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优绩的含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在关于平权法案的辩论中，一些人认为把种族和民族作为录取因素违反了成绩标准；另一些人则回答说，能够为课堂和更广泛的社会带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视角，是与大学使命相关的一项优点。但其实我们关于大学录取的辩论通常是关于优绩的争论，这证明优绩至上的理念得到了支持。

科南特的理念中最根深蒂固的也许是：高等教育是通往机会的主要途径，是阶层跃升的源泉，它通过为所有学生提供机会，无论他们的社会或经济背景如何，让他们的才能带他们走得更远，来保持社会的流动性。基于这一理念，大学校长们习惯性地提醒我们，卓越和机遇是相辅相成的。上大学的社会和经济障碍越少，大学就越有能力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每一位新生在走进校园参加入学培训时，都会因其优秀和独特性，以及为争取被录取所付出的才华和努力而受到赞扬。^[24]

无论在修辞上还是在哲学上，科南特优绩至上的理念都赢得了胜利。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发展。

SAT成绩随财富增长

首先，事实证明，SAT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教育背景来衡量学术才能或天生的智力。相反，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你的家庭收入越高，你的SAT分数就越高。在收入阶梯的每一个层级上，SAT平均分都会增加。^[25]在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入学申请中，SAT分数差距尤其明显。如果你来自年

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你得分超过1400分（满分1600分）的概率是20%；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那么你的这一机会是2%。^[26]绝大多数得分高的人的父母也有大学文凭。^[27]

除了富裕家庭可以提供的一般教育优势，凭借参加私人备考课程和聘请辅导老师，特权阶层的SAT成绩也能得到提高。在曼哈顿等地，一对一指导的收费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近几十年来，随着大学录取的竞争加剧，辅导和备考已经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28]多年来，负责管理SAT的美国大学理事会坚持认为，该考试衡量的是能力，其成绩不受辅导的影响。美国大学理事会最近放弃了这个借口，并与可汗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所有考生提供免费的在线SAT练习。尽管这项事业很有价值，但这并没有像理事会官员所希望和声称的那样，为备考赛场铺平道路。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来自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更多地利用了在线帮助，导致来自特权家庭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得分差距更大。^[29]

在科南特看来，能力或智商测试有望成为衡量学术能力的民主标准，不受教育劣势和高中成绩游移不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SAT来遴选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要是他知道，在确定哪些低收入学生有可能在大学取得成功方面，高中成绩比SAT分数更可靠，他一定会很惊讶。

比较SAT分数和高中学业成绩，看哪一个能更好预测学术能力，这是相当复杂的事情。对2/3的学生来说，他们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但对那些SAT分数和高中成绩不一致的人来说，SAT帮助了特权阶层，伤害了弱势群体。^[30]

高中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收入相关，SAT成绩更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考试行业的一贯主张相反，SAT是可以辅导的。私人教学有所帮助，一个向高中生传授可以提高成绩的花招和技巧的有利可图的行业已经出现。^[31]

优绩至上固化不平等

其次，科南特提倡的英才录取制度并没有带来他所希望产生的无阶级社会。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而科南特所认为的可以补救分层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并没有出现。从一代到下一代，富人和穷人并没有互换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穷人的孩子很少会富有起来，而富人的孩子也很少会跌到中上阶层水平之下。尽管有从贫穷到富有的美国梦，但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向上流动并不普遍，而且近几十年来没有改善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相反，高等教育强化了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当然，20世纪40年代以来，精英大学校园里学生的人口统计分布和学术状况已经改善。科南特想要取代的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的财富为基础的世袭贵族，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与男性在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录取，大学积极招收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学生，今天大约50%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有色人种。^[32]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限制犹太人入学的配额和非正式做法已经消失。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以来对来自上流寄宿学校的年轻人的偏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减弱。常春藤联盟高校录取任何不合格校友子弟的程序也同样如此。学业水平提高了，SAT分数中位数增大了。捐赠收入最多的高校采取了不考虑支付能力的招生政策和慷慨的经济资助政策，为收入一般而有前途的学生消除了主要的财务障碍。

这些成就都不可否认。然而，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革命并没有带来其早期支持者所期望的社会流动性和广泛的机会，也没有带来教育领袖和政治家持续承诺的社会流动性和广泛的机会。美国严格遴选优秀学生的高等院校驱逐了自鸣得意、自命不凡的世袭精英，这些世袭精英当时让科南特忧心忡忡。但这种继承特权的贵族统治已经让位于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阶层，他们现在享有的特权和地位与他们所取代的精英阶层一样根深蒂固。

尽管在性别、种族和民族方面更具包容性，但这种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并没有创造不断流动的社会。相反，今天有文凭的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找到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孩子的办法，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

尽管高等教育作为机会的仲裁者和向上流动的引擎扮演了新的角色，但它并没有为近期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提供有力的制衡。想想当今高等教育的阶级构成，尤其是在下列重点领域：

大多数重点院校的学生都来自英语流利的家庭，很少有人来自低收入家庭。在美国100多所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那25%的家庭，只有3%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5%的家庭。^[33]

大学入学的贫富差距在顶层最为严重。在常春藤联盟高校、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其他著名学府，来自最富有的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全美国收入居于后5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每50名学生中只有一名来自贫困家庭（底层20%）。^[34]

如果你来自富裕家庭（前1%），你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机会是来自贫

困家庭（后20%）的学生的78倍。大多数来自收入水平居于后50%的家庭的年轻人要么上两年制学院，要么根本不上大学。 [35]

在过去的20年里，私立精英大学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资助，联邦政府也增加了大学拨款以资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例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现在为家庭年收入低于65000美元的学生免除学费，并免费提供食宿。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2000年以来，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所下降。如今哈佛大学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的比例并不比1960年的高。杰罗姆·卡拉贝尔是一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政策史的作者，他总结道：“今天，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不太可能进入三大顶尖高校（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就像他们在1954年也不太可能一样。” [36]

为什么精英大学不是社会流动的引擎

美国一流大学的学术声誉、科学贡献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受到全世界的赞赏，但这些机构并不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引擎。最近，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和一组同事对大学在促进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开展了全面研究，他们考察了1999—2013年3000万名大学生的经济轨迹。对于美国的每一所大学，他们计算了其学生从收入阶梯的最底层上升到顶端的比例（即从收入最低的20%上升到收入最高的20%）。换句话说，他们问的是，在每所大学里，有多大比例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但最终收入足以进入前20%。他们的发现是：如今的高等教育在促进阶层跃升方面的作用小得惊人。 [37]

私立精英大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进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地方确实给了穷孩子很好的上升机会，但这些地方招收的穷孩子太少了，他们的流动率很低。只有1.8%的哈佛学生（普林斯顿只有1.3%）从收入的底层上升到顶层。 [38]

人们可能认为主要的公立大学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这些高校也招收了太多已经很富有的学生，结果这些高校对向上流动的贡献也很小。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社会流动率仅为1.5%。该校阶级偏离的情况与哈佛大学类似：2/3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收入居于前20%）。安娜堡的穷孩子甚至比哈佛的更少（不到4%）。弗吉尼亚大学也是如此，学生的社会流动率仅为1.5%，这主要是因为该校只有不到3%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 [39]

柴提和他的团队确实发现了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公立大学和州立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的社会流动率更高。这些学校既适合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能成功地帮助他们实现阶层跃升。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让近10%的学生从底层升到了顶层，这大约是常春藤联盟高校

和最挑剔的公立大学的流动率的5倍。[40]

但这些大学是例外。综合来看，柴提研究的1800所大学（私立和公立，重点和非重点）只有不到2%的学生从收入最低的20%升到了收入最高的20%。[41]有些人可能会问，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把学生从收入最低的那20%的家庭（家庭收入为2万美元或以下）推到收入最高的那20%的家庭（家庭收入为11万美元或以上），对社会流动性的测试是否过于苛刻。但即使是更温和的攀登也相对罕见。在私立精英大学，只有大约10%的学生能够在收入阶梯上上升两个梯级（40%）。[42]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高等院校很少能让学生实现阶层跃升，尽管进入这些地方确实能优化一个人的经济前景。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来自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到高薪工作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些学校对向上流动的影响不大，因为名校的大部分学生本来就很富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座大楼里的电梯，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做得更多的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对那些把高等教育视为机会的主要载体的人来说，这则消息发人深省。这质疑了当代政治中的重要信念：解决不平等加剧的办法是提高流动性，而提高流动性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尽管高等教育提高社会流动机会的愿景被各种意识形态的政客援引，但这种愿景明显不符合许多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但仍然渴望拥有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人。这是合理的渴望，优绩至上社会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带来危险。有大学文凭的人很容易忘记，他们的大多数同胞都没有大学文凭。不断地告诫他们，去拿大学文凭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你赚什么取决于你学到了什么），这带来的可能更多是侮辱而不是激励。

那么，高等教育该怎么办？高校是否应该保留其目前作为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招生录取本身已经成为精英遴选竞赛，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认为机会在于平等进入大学？有人说是的，只要我们能提高比赛的公平性。他们主张，高等院校里低收入学生的缺乏并不是精英录取制度的缺陷，而是因为未能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制度。根据这种观点，解决优绩至上社会弊病的办法是更彻底地实施优绩至上原则，让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大学。

让优绩至上更为公平

表面上看，这一主张颇为合理。增加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毫无疑问是件好事。近几十年来，大学在招收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方

面进展显著，但在提高低收入学生的比例方面做得很少。其实，当公众为维护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平权法案产生激烈辩论时，大学已经悄悄地为富人采取了相当于平权法案的措施。

例如，许多招生非常挑剔的高校会优先录取校友的子女（他们被称为余荫），理由是录取他们可以培养社群精神，并为大学基金增添新的捐赠收入。在精英大学，校友子弟获得录取的可能性是其他申请人的7倍。总体而言，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5%。但当申请人是校友子弟时，其录取率是1/3。^[43]

一些学校还放宽了学业标准，允许非校友的富有捐赠人的子女入学，理由是接受一些不那么优秀的学生也值得，这样可以换取新的图书馆或奖学金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筹款活动中，杜克大学每年为富有捐赠人的子女提供约100个入学名额，否则这些孩子可能没有机会得到录取。尽管一些教员担心这会损害学术标准，但该政策帮助杜克大学的捐赠基金得到大幅扩充，由此提升了杜克的竞争排名。^[44]最近一起有关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法庭案件的文件显示，近10%的学生是在捐赠关系的帮助下得到录取的。^[45]

对录取运动员的偏爱，对富家子弟申请人是另一大福利。人们有时认为，降低运动员的学业标准，尤其是足球和篮球等备受瞩目的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有助于招收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总体而言，在受益于运动员偏好的申请人中，富人和白人所占比例高得不成比例。这是因为精英大学招收的大多数体育项目主要是富家子弟所热衷的壁球、曲棍球、帆船、赛艇、高尔夫球、水球、击剑甚至骑马。^[46]

优先录取运动员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像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这样的足球强校，这些学校的橄榄球队也挤满了大型体育场。威廉姆斯学院是新英格兰地区一所规模不大但享有盛誉的文理学院，30%的学生都是运动员。^[47]这些学生运动员中很少有来自弱势阶层的。普林斯顿大学前任校长与人合著的一份针对19所重点院校的研究报告发现，录取的运动员比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或校友子弟享有更大的录取优势，而且他们中只有5%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那25%的家庭。^[48]

大学可以尝试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不公平。他们可以按届采取平权法案，给予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校友子弟、捐赠人子女和录取的运动员相同的照顾。或者，他们可以采取完全取消这些照顾来减少他们给予富家子弟申请人的优势。此外，高校也可以像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最近所做的那样，不再要求学生参加这些标准化考试，从而抵消富家子弟申请人因私人辅导和备考而SAT分数虚高所带来的优势。研究表明，作为学业表现的预测指标，SAT成绩比高中成绩更有可能受社会经济背景扭

曲。减少对SAT等标准化考试的依赖，会让大学能够招收更多中低收入的学生，而学业成功率几乎没有任何损失。[49]

这些都是大学可以自己采取的措施。政府也可以干预，让大学招生不那么偏向特权阶层。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本人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曾经提议，要求私立大学公布校友子弟的录取率，并报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也严厉批评英才统治下的不平等，他的想法更往前推了一步。马科维茨提议，除非私立大学录取至少一半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3的家庭的学生，否则就不给予私立大学免税地位，理想的做法是扩大招生。[50]

这些措施，无论是由大学本身还是由政府强制实施的，都能缓解不平等，而不平等加剧会导致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力量减弱。这些措施能改善普通家庭子女的录取状况，有望减少体制的不公平。这些理由都迫使人们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但是，只关注当前体制的不公平，就会在科南特优绩至上革命的核心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至少有两个理由怀疑高校是否应该这样做。第一个理由是，这种分类对那些被筛选掉的人意味着令人反感的判断，以及对共同的公民生活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二个理由是，精英筛选过程中的斗争会对那些被选上的人造成伤害，以及分类任务变得极为耗费精力，结果淡化了高校本该承担的教育使命。

简而言之，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下面依次来探讨这些风险。

分类与社会尊严的分配

科南特意识到把大学转变为分类机器可能会有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风险，但他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他的目标是利用测试和跟踪来指导每个人扮演最能发挥其才能的社会角色（他仍然认为只有男性的才能需要测试和跟踪），在此过程中并不暗示最有才能的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他不相信教育分类会像可以继承特权的旧制度那样产生对社会优越性或声望的评判。[51]

科南特的信念是，在不评判他人价值的情况下对人进行分类是有可能的，但这忽略了他帮助建立的精英制度的道德逻辑和心理诉求。支持精英统治而不是世袭贵族统治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那些因自身才能而崛起的人已经

获得了成功，他们理应得到其才能所带来的回报。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把人分类，与依靠才能赚多少及应该得到什么的判断紧密相关。谁的才华和成就更值得尊崇和认可，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判断。

科南特坚信，高等教育应该把权力从世袭的上层阶级转移出去，寻找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填补社会必要角色的方式，也是关于现代的、技术先进的社会应该尊崇与奖赏什么样的智力和性格品质的主张。因此，要否认新的分类制度也是分配社会地位和尊重的新基础，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迈克尔·扬《优绩至上的崛起》一书的观点，该书出版于科南特卸任哈佛大学校长几年之后。扬看到了科南特没有看到或拒绝看到的東西，即新的优绩至上为判断谁值得、谁不值得提供了严格的新基础。

那些追随科南特的人，他们帮助实施了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原则，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分类和评判之间的联系。约翰·W.加德纳是某基金会主席，后来在林登·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他在1961年出版的《卓越》（*Excellence*）一书中表达了新英才统治时代的精神。“我们正在见证，社会对能力强、受过高级培训的男女的态度发生变革。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男性和女性在极其广阔的领域深受欢迎。”不像以前的社会，由少数人管理，因此可以浪费人才，由复杂组织管理的现代技术社会需要不懈地寻找人才，无论这种人才在什么地方都要找到他们。这场“伟大的人才搜寻”的当务之急现在为教育设定了任务——成为“严格的分类过程”。^[52]

与科南特不同的是，加德纳承认按照优绩至上原则实施的分类有其苛刻之处。“随着教育越来越有效地把聪明的年轻人拉到顶端，对于每个相关的人，这都变成了越来越艰难的筛选过程……对有能力的年轻人来说，学校是机会的黄金大道。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是能力较弱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局限性的舞台。”这就是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在没有金钱、社会地位、宗教或种族障碍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走得更远”。但“对那些缺乏必要能力的人来说，这让人痛苦”。^[53]

加德纳认为，这种痛苦无法避免，考虑到挑选和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这种代价也值得付出。他承认，由于一些学生有资格上大学，而另一些学生达不到标准，这种痛苦变得尤为严重。“如果社会根据人们的天赋，有效而公平地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失败者会知道他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苦药。”^[54]

在扬眼中，洞察到此类负面作用是他反对英才统治的核心理由。但在加德纳眼中，这只是不幸的副作用。“因为大学获得了非凡的声望，”他承认，上大学已经达到决定人生是否成功的程度，“今天，在世人的眼中，上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取得更高成就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我们创造的虚假价值

框架中，上大学成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唯一通行证。”加德纳勇敢地指出，“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无论人们的个人成就如何，他们都值得尊重。但他似乎明白，在他帮助建立的英才统治社会中，很少有区分教育成就和社会尊重的空间。[55]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公众心目中，大学教育与个人进步、社会地位上升、市场价值和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必须上大学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那么完全一致的意见就让这一原则成了现实。[56]

几年后，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也承认，按照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类与把大学录取变成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布鲁斯特把耶鲁大学带入了实施优绩至上原则的时代，他想要把录取标准调整到更少取决于家族遗产，更多取决于学术才华，但遭到了董事会中重要成员的抵制。到1966年，耶鲁大学采用了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招生方式，这意味着在录取学生时不考虑他们的财务状况，并且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布鲁斯特敏锐而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新政策不仅能让耶鲁大学吸引来自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也会增加耶鲁大学对富家子弟的吸引力，一所大学因按照学生的成绩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来录取学生而闻名，这样的大学对富家子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写道：“现在录取不再与钱包相关，感觉到大学是按照才能而不是根据某种含糊不清的所谓‘背景’做出决定的，这会让被录取的富家子弟感到更自豪。”[57]

过去，人们以把孩子送到能与上流社会的贵族交往的地方为荣；现在，人们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象征他们有卓越才能的地方为荣。

向择优录取的转变提高了能够吸引最优秀学生的大学的声望。声望通常是由被大学录取的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来衡量的，而且反常的是，也是由它们能够拒绝的申请人数量来衡量的。大学排名越来越多地依据其淘汰申请者的比例，而录取难度越高，学生反而越踊跃地申请。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准备上大学的学生通常在离家近的地方注册入学。因此，学术能力出色的学生广泛分布在各地高校中。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大学的选择变得更具战略性。学生们，尤其是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开始挑选可能录取自己的录取难度最高的大学。[58]

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家卡罗琳·M·霍克斯比把这一趋势称为高等教育的重新分类。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与录取难度低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扩大了。SAT分数高的学生与其他高分学生一起挤着要进少数几所大学，大学录取变成了一场赢家通吃的竞争。尽管许多人认为如今进入大学比过去更难，但事

实并非如此。美国大多数高校录取申请学生的比例很高，大多数申请人都能被录取。[59]

近几十年来，只有一小部分名牌大学的录取率大幅下降。这些高校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并引发了入学狂潮，这一狂潮让来自富裕家庭的即将上大学的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备受摧残。1972年，重新分类的招生录取规则已经在实施中，斯坦福大学录取了1/3的申请人。如今，这一比例还不到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88年接受了大多数（54%）人的申请，现在只接受了9%。芝加哥大学的录取率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77%降至2019年的6%。[60]

46所高校现在的录取率不到20%，这些学校中有几所是那些父母卷入2019年大学招生丑闻的学生的理想就读地。只有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这些对学生极其挑剔的大学。超过80%的学生就读的学校录取学生的比例在一半以上。[61]

在过去50年里，高分学生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录取难度高的大学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重新分类？霍克斯比给出了经济学上的解释：较低的交通成本让学生们更容易前往离家较远的大学，而较低的信息成本让学生们更容易了解自己的SAT成绩与其他学生相比如何。此外，最著名的大学在每个学生的教育上花费更多，所以对于那些能够进入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上学是对个人“人力资本”的可靠投资，甚至考虑到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大学基金的预期捐赠，也是如此。[62]

但是，这种重新分类与高等教育的优绩至上转型同时发生，这一事实表明了存在进一步的解释：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之所以变得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名校站在了新兴的精英等级制度的顶端。在父母的鼓励下，雄心勃勃、家境殷实的学生们纷纷涌入名校校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想和有学术天赋的学生一起学习，也是因为这些大学赋予了精英教育最大的声望。上一所录取难度高的大学所带来的荣誉不仅仅是炫耀的资本，还会在毕业后带来就业机会。这主要不是因为雇主认为学生在名牌大学学到的东西比在录取难度不那么高的学校多，而是因为雇主相信这些大学的分类功能，并重视其授予的精英荣誉。[63]

受伤的赢家

高等教育实施赢家通吃的重新分类实不可取，原因有二。首先，高等教育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在赢家通吃的选拔竞赛中表现最好的大学通常是那些富有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其次，这对获胜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像过去的世袭精英，他们在没有碰到太多麻烦的情况下就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新的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是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自己的位置的。

尽管新的精英阶层现在已经呈现世袭的一面，但并不能保证英才统治特权一定能够传承下去。能否传承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走进大学校园”。这让优绩至上原则的成功在道德心理上陷入了自相矛盾。考虑到富家子弟在精英校园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历史来看，分类的结果几乎都是注定的。但对于那些在入学奋斗中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人，除了个人努力和成就，不可能把成功看作其他任何东西。这是一种立场，分类机制让胜利者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凭努力获得的，是靠自己争取的。可以批评这种信念为优绩至上的傲慢，优绩至上观念过度地把成果归因于个人的努力，而忽略了把努力转化为成功的各种有利条件。但这种信念也有辛酸之处，因为精英是在痛苦中锻造而成的——精英遴选的奋斗对年轻人施加的严格要求是对灵魂的摧残。

富有的父母能够给他们的孩子有力的推动，以争取使其进入名牌大学，但代价往往是把他们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和焦虑、让他们睡眠不足的大学预修课程、备考辅导、体育训练、舞蹈和音乐课，以及大量的课外活动和公共服务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私人招生顾问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展的，这些顾问的费用可能超过耶鲁大学四年的学费。一些顾问还会建议父母为孩子找人开具残疾诊断证明，以让孩子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额外的加时。（在康涅狄格州郊外的一个富人区，18%的学生得到患有残疾的诊断，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6倍多。）另有一些顾问专门设计定制的暑期国外旅行计划，旨在为大学申请论文提供令人信服的素材。^[64]

优绩至上教育的军备竞赛让竞争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并让富有的父母能够把他们的特权传给自己的子。这种传递特权的方式更加令人反感。对于那些缺乏有利条件的人，这显然不公平；对于因装备不足而被绊住的孩子，这更形同压迫。精英教育的遴选斗争催生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文化，这种教育文化以追求成就为导向，一意孤行地全方位挤压。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与优绩至上教育竞争加剧的几十年相伴而行。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parent”（父母）作为动词使用就变得普遍起来，当时，让孩子为学业成功做好准备的需要被视为父母的紧迫责任。^[65]

1976—2012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5倍多。^[66]随着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充满焦虑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成了常见的痛苦。2009年《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敲响了警钟：“反对过度养育的理由：为什么是时候让妈妈和爸爸放弃控制了。”《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童年的征程现在很早就开始了。“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67]

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为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做出了经济学上的解释，他们把“直升机式育儿”界定为“在过去30年里变得普遍的高度参与、时间密集、全程控制的育儿方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养育方式是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增加的理性回应。尽管近几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中，高强度育儿的现象有所增加，但在美国 and 韩国等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地方，这种现象最为明显，而在瑞典和日本等不平等现象不那么严重的国家，这种现象则不那么普遍。^[68]

尽管这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父母为了追求精英竞赛上的成功，急于全面掌管孩子的生活，已经对孩子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尤其是对上大学前的孩子。21世纪初，在加州旧金山郊外的一个富人区马林县治疗年轻人的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注意到，许多来自富裕家庭、表面上很成功的青少年其实非常不快乐，与外界脱节，缺乏独立性。“拂开表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沮丧、焦虑、愤怒……他们过度依赖父母、老师、教练和同伴的意见，并且经常依赖他人——不仅要给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还要使日常生活顺利进行。”莱文开始意识到，富裕家庭除了让这些年轻人远离生活中的困难，家境富裕和父母高度参与反过来也是造成他们不快乐和陷于脆弱的原因。^[69]

在《特权的代价》（*The Price of Privilege*）一书中，莱文描述了她看到的“特权青年心理健康流行病”。传统上，心理学家认为城市中心的弱势阶层孩子是“高危”青少年，他们“在严酷无情的环境中成长”。^[70]莱文并不否认这些青少年的困境，但她观察到，美国新的风险群体是来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青少年。

尽管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患抑郁症、滥用药物、患焦虑症、患躯体疾病和感到不快乐的比例最高。当研究人员对比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时，他们发现最有问题的青少年通常来自富裕家庭。^[71]

莱文引用了苏尼娅·S·卢瑟的研究，卢瑟在该研究中记录道，“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在通往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和高薪职业的道路上”，比其他青少年遭受情绪困扰的比例更高，这种模式在他们进入大学后仍在继续。与普通人群相比，全日制大学生达到药物滥用或药物依赖诊断标准的可能性高约1.5倍（23% vs 9%），而且有一半的全日制大学生表明自己有酗酒及滥用非法药物或滥用处方药物的行为。^[72]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追求成功的无情压力——有关。卢瑟写道：“对于孩子和父母，几乎不可能忽视从他们早年开始就无处不在的信息：通往终极幸福——拥有金钱——的道路只有一条，

而这条路就始于进入名牌大学。”^[73]

那些在精英遴选的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人，虽然得胜了，但也受到了打击。我在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跳钢圈的习惯很难改掉。许多人仍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去奋斗，结果他们发现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数惊人。遭受精英教育考验的心理代价并不局限于常春藤联盟高校。近期对美国100多所大学的6700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的上升。在过去一年里，每五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有自杀的念头，每四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过治疗。^[74]2000—2017年，年轻人（20~24岁）的自杀率上升了36%。现在死于自杀的人比死于他杀的人多。^[75]

除了这些临床症状，心理学家还发现了困扰这一代大学生的不易察觉的苦恼：“隐秘的完美主义流行病。”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该研究的作者托马斯·柯伦和安德鲁·P·希尔写道：“在用表现、地位和形象来定义一个人的用处和价值的世界上，完美自我的理想尽管是非理性的，却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必要的东西。”在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4万多名大学生的调查中，作者报告称，1989—2016年，完美主义急剧增强，其中与社会和父母期望有关的完美主义态度增加了32%。^[76]完美主义是伴随优绩至上而生的典型弊病。在年轻人“受到学校、大学和工作场所的无情分类、筛选和排名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优绩制把对奋斗、表现和成就的强烈需求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77]达到有所成就这一目标的成败，逐渐被用来界定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与优劣。

那些管理精英筛选机器的杠杆和滑轮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机制的人力成本。哈佛大学的招生人员在一篇诚实而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谈到了职业倦怠的风险，他们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里取得了亮眼成绩的人，最终会成为“集中训练营里浑浑噩噩的幸存者”。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2000年，作为警示，至今仍被挂在哈佛大学的招生网站上。^[78]

继续跳钢圈

精英大学的入学政策助长和奖赏了其对成绩的狂热，以至于当学生进入校园时，他们几乎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狂热。分类和竞争的本能侵入了大学生活，学生们重新演绎了接受和拒绝的仪式。有个例子：哈佛大学有400多个课外俱乐部和组织。有些社团，如管弦乐队和大学足球队，需要特定能力，因此实施选拔就很正当。但今天，“比拼”或竞争加入学生组织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无论这些社团是否需要特殊技能。比拼文化日益

极端，结果一些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就要去修读“遭拒101次”（Rejection 101）课程，这门课程专门讲授如何应对比赛未能晋级的失望。^[79]

就像大学本身一样，学生组织也在吹嘘它们的低录取率。哈佛学院咨询小组（Harvard College Consulting Group）自称哈佛校园里最挑剔的职前学生组织，录取率低于12%。组织新生迎新周和举办校园巡游的深红钥匙社（Crimson Key Society）也宣传其申请难度高，只有11.5%的申请人能通过选拔。“我们不想随便让某个人来到游客面前。”该社团的负责人解释说。但对人才的需求似乎不如再现精英竞争中的冲刺与受创的冲动那么迫切。一名一年级学生告诉《哈佛深红报》：“你跳过了进入哈佛的大钢圈，然后你只想跳过更多，让肾上腺素水平再次上升。”^[80]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一种为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精英而进行的基础培训，变成了“自我包装”和申请职位的教育。这反过来又反映了高等院校的角色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高校的资格认证功能开始膨胀，甚至要压倒其教育功能。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大学院长和校长助长了这种倾向，他们似乎很谦虚地说，学生们在课外学到的东西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这可能意味着（也许过去就意味着）学生是通过课程和阅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持续的讨论，从同学那里学习知识的。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指建立人际关系网。

与比拼和关系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对分数的痴迷。尽管我无法证明，近几十年来学生对分数的痴迷有所加剧，但感觉确实如此。2012年，在人们记忆中最大的常春藤联盟高校作弊丑闻中，大约70名学生因在课后考试中作弊而被迫从哈佛大学退学。^[81]2017年，哈佛学院的荣誉委员会办公室摆满了学术不端的案卷，因为60多名“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的学生受到可能作弊的指控。^[82]但作弊并不是分数强迫症的唯一表现。在一所知名的法学院，教师们接到通知，不要告诉学生上一学期的成绩何时公布，因为经验表明提前通知这一重大事件会引起太多的焦虑。现在，分数发布时间也要精心安排，以方便苦恼的学生寻求咨询服务的帮助。

傲慢与羞辱

当科南特把哈佛大学和高等院校的任务设定为对美国人进行测试和分类时，我怀疑他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引发无情的精英竞争。今天，高等院校作为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在人们心目中很难想象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是想一想的时候了。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修复特权阶层受损的心理，也是为了修复精英分类所产生的两极分化的公民生活。

要想拆除科南特启动的分类机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优绩至上的社会制

度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施加其暴政。在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中，分类机制会引发焦虑、让人身心俱疲的完美主义及优绩至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努力地掩盖脆弱的自尊。在分类机器筛选掉的那些人中，这又强加了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败感。

这两个方向的暴政有共同的道德来源——始终不渝的优绩至上信念，即我们作为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那要归功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只能怪自己。尽管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强烈观念，导致我们很难唤起团结和对彼此负有义务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让我们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如果认为高等教育是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收入和社会尊重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那就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当代政治的技术官僚转向及民主制度的寡头垄断都是同谋。在第7章中，我会转向探讨全球化经济中的工作这一棘手问题，在此之前，值得考虑的是，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精英分类的严酷影响，而且是从两个方向来做：既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筛选为胜利者的人造成的创伤，也关心精英分类给那些被标记为失败者的人带来的羞辱感。

首先考虑一下改革大学录取制度的温和建议，哪怕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可以如何开始缓解分类和拼命奋斗的恶性循环。

合格人员抽签

有个改革方法，就是减少对SAT的依赖，取消对校友子弟、运动员和捐赠人子女的照顾，从而增加普通人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83]尽管这样的改革会让制度变得不那么不公平，但此类改革并没有想要改变高等院校作为分类机器的定位，即其作用是寻找人才，并把机会和奖励分配给那些拥有才能的人。但分类机制本身就是问题。让英才统治变得更真实，就会让它变得更根深蒂固。

因此，不妨考虑一下：每年有4万多名学生申请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大约2000个名额。招生人员告诉我们，很多申请人都有资格在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学习，而且会学得很好。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几十所优秀的高等院校，这些大学吸引了比他们所能接收的多得多的合格申请人。（2017年，美国87所高校的录取率不到30%。）^[84]早在1960年，当申请人数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时，耶鲁大学招生委员会的一位资深委员就说过：“你有时会有种心烦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所有的申请……你可以把这些申请文件扔下楼，随便拿起一千份，然后产生一届和委员会会议上产生的一样好的学生。”^[85]

我的提案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在4万多名申请人中，淘汰那些不可能在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茁壮成长、没有资格表现出色并为同学的教育做出贡献的人。这会招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比如30000名合格的竞争者，或25000名，抑或是20000名。这样做不是想要预测这些人中谁最值得奖赏，这是极其困难和不确定的任务，而是采取抽签的办法选择哪些人最后入选。换句话说，就是把合格申请人的文件夹扔下楼，拿起2000个，然后就此打住。^[86]

这项建议并没有完全忽视成绩：只有那些合格的人才能被录取。这项建议把成绩视为门槛资格，而不是达到最大化的理想。^[87]首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更明智。即使是最聪明的招生人员也无法精确地评估18岁的学生最终会做出哪些真正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尽管我们重视人才，但在大学招生的背景下，这个概念相当模糊而空泛。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个数学天才，但一般来说，甄别天赋是更复杂、更难以预测的事情。

想一想，要评估越发严格界定的才能和技能是多么困难。诺兰·莱恩是棒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投手之一，保持着最多的三振出局纪录，并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入选棒球名人堂。他在18岁的时候参加棒球选秀，直到第12轮才有球队签下他。在球队选中他之前，球队选择了其他294名看起来更有前途的球员。^[88]汤姆·布雷迪是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之一，到第199顺位才有球队选他。^[89]即使是像投棒球或橄榄球这样的有限天赋也很难准确预测，该有多么愚蠢才会认为可以很好地预测对社会或未来某个领域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的能力，才会认为足以证明对前程远大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做精细排名很合理。

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对有资格的人进行抽签，是为了打击优绩的专横。设置资格门槛，让机会来决定其余的人，这会让高中时代恢复一些理智，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们所处的困境，学生们追求完美、填满简历的经历已经成为扼杀灵魂的梦魇。这样做还能削弱精英阶层的傲慢，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登上顶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应把好运归功于家庭环境和天赋，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抽签的运气。

我可以想象至少有四种反对意见。

1. 学业质量会变成什么样？

这取决于设置正确的阈值。我有预感，至少对于排名前六十或八十的高校，课堂讨论的质量和学业表现不会有明显的不同。我的预感可能是错的，但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答案。从一个实验开始：采用现有的制度录取一半的学生，采取抽签的方式录取另一半合格的学生，然后比较他们在

毕业时的学习成绩（以及几年后的职业成就）。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差点儿尝试了这项实验，但由于招生办主任反对，该计划被取消了。^[90]

2.多样性怎么办？

原则上，可以对抽签做出调整，以确保学校认为具有吸引力的任何特定方面的多样性，方法是为每个符合特定要求的学生分配两张或三张彩票。这可以在不放弃机会的情况下产生所需的多样性。还值得考虑的变化有：为了抵消目前实行的精英录取制度的世代传递倾向，大学可以在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申请人中首先录取一定数量的合格申请人，然后再抽签。

3.校友子弟和捐赠人子女怎么办？

理想的情况是，大学应该停止优先录取校友子弟。但对于希望继续这样做的大学，如果学校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给每位校友子弟两张或者更多彩票，而不是一张（与上述多样性类别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达到目前的余荫录取率，一些学校会不得不给每位校友子弟签发五张或六张彩票。这至少会让他们赋予有特权孩子的优势变得生动起来，或许还会引发关于这种照顾是否应该继续的辩论。

对非校友大额捐赠人子女的偏袒也应消除。但是，如果大学不能拒绝出售一些入学名额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可以简单地留出一些名额进行拍卖或直接出售。这是更诚实的方式，承认一些大学目前在成绩的掩护下做出的妥协。正如现行制度一样，接受买位人士的身份不会公开，但最少他们不会再购买虚假的卓越才能光环。

4.抽签录取会让选拔变得不那么有意义，从而削弱顶尖高校的声望吗？

是的，很可能。但这真的能作为反对的理由吗？除非你相信近几十年来由声望驱动的高等院校重新分类已经提高了教育和学习的质量。但这非常值得怀疑。把全美范围更多大学中的高分学生吸引到更小的过度选拔名额的圈子中，加剧了不平等，但对改善教育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英才选拔分类所带来的焦虑奋斗和比拼跳钢圈，导致学生更难接纳人文教育的探索特征。选拔分类及声望宣传的缩减是抽签制度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如果相当数量的精英大学开始采取抽签方式录取合格的学生，他们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中阶段的压力。即将上大学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会意识到，除了展现在大学水平的课程中表现出色的能力，学生们不再需要把他们的青春投入旨在给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活动和成绩的军备

竞赛。直升机式育儿可能会减少，这对父母和孩子的情感健康都有好处。如果没有功名战场的伤痕，年轻人在进入大学后可能不那么容易去处处比拼，而更愿意进行个人的和智力上的探索。

这些变化会减轻优绩暴政对获胜者造成的损害。但对其他人呢？只有大约20%的高中毕业生卷入进入名牌大学的狂热。80%的人上的是竞争力较弱的大学，或者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或者根本不上大学。在他们眼中，优绩暴政并不是一场扼杀灵魂的入学竞争，而是令人沮丧的工作世界，优绩至上为那些缺乏精英证书的人提供的仅仅是微薄的经济回报和极少的社会尊重。

拆掉分类机器

充分的应对措施需要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高分院校录取的风险，来削弱精英分类机器。更广泛地说，我们应该弄清楚如何让生活中的成功更少依赖于拥有大学文凭。

尊重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认真对待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开始，这些学习和培训为人们从事工作做好了准备。这意味着要扭转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四年制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陡峭”区别。

在高等教育中减少精英选拔分类有一大障碍：至少在美国，大部分高等教育是由私立大学提供的。然而，这些机构尽管是私立的，却依赖于大量的联邦资金，特别是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和对研究项目的资助。有些私立大学获得了金额巨大的捐赠，这些捐赠收入传统上是免税的。（2017年通过的共和党税收法案对少数富裕大学的捐赠收入开始征税。）^[91]原则上，联邦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杠杆要求私立大学扩大招生，录取更多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甚至采用我们提议的某种形式的抽签方式招生。^[92]

然而，这些措施本身不太可能降低进入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难度。更重要的措施是扩大进入四年制公立大学的机会，并加大对社区学院、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毕竟，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在这些教育环境中学习体面生活所需的技能的。

近几十年来，政府对州立大学的拨款减少了，学费却增加了，结果这些机构的公共性质遭到了质疑。^[93]1987年，公立大学从每个学生那里获得的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学费收入的3倍。但随着政府资助减少，学费上涨了。到2013年，公立高等院校从学费中获得的收入与从国家和地方支持中获得的收入变得一样多。^[94]

许多排名靠前的公立大学现在只是名义上属于公立。^[95]例如，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只有14%的预算来自州政府拨款。^[96]在弗吉尼亚大学，州政府拨款仅占其预算的10%。^[97]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州政府拨款占其预算的47%；现在，这一数字只有11%。同时，来自学费的份额增加了4倍多。^[98]

随着财政支持的减少和学费的上涨，学生的债务飙升。今天这一代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在过去的15年里，学生贷款债务总额增加了5倍多。到2020年，这一数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99]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与对技术和职业培训的支持之间的差距，是大学财政向精英倾斜的最明显迹象。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展示了这种惊人的差异：

把花在就业和培训上的少量资金与以助学金、贷款和税收抵免形式花在高等教育上的资金进行对比，在2014—2015学年，总计1620亿美元用于帮助人们上大学。同时，教育部每年在职业和技术教育上花费约11亿美元。^[100]

索希尔补充说，即使把职业和技术教育基金与帮助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的支出结合起来，“我们每年在这些与工作相关的项目上的联邦支出也只有200亿美元”。^[101]

美国在工人培训或再培训上的花费，不仅仅与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相比显得很少，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支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家们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描述政府帮助工人掌握就业市场所需技能的计划。这样的政策回应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转不畅的事实，通常需要培训和安置计划来帮助工人找到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索希尔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项目上平均花费GDP的0.5%。法国、芬兰、瑞典和丹麦在这些项目上的花费超过GDP的1%，美国只花了大约0.1%——比它花在监狱上的钱还少。^[102]

美国人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漠不关心可能反映了市场的信念，即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供给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而言）会自动保持平衡。但这也反映了精英教育的理念，即高等教育是获得机会的主要途径。“美国忽视了就业和培训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索希尔写道，“重点一直放在资助高等教育上。这似乎基于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的假设。”^[103]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对其他人来说，获得薪水可观的工作主要靠我们不幸忽视的教育和培训形式。尽管

四年制大学文凭极具吸引力，但优绩至上信念坚持认为这样的学历是通往成功的大门，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教育需求。这种忽视不仅损害了经济，也体现了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不尊重。

社会尊重的等级阶梯

修复分类机器造成的损坏，不仅需要增加就业培训的资金，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评价不同类型的工作。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开始打破社会尊重的等级阶梯，这种制度赋予名牌大学的学生比社区学院或技术和职业培训项目的学生更高的荣誉和声望。学习成为水管工、电工或牙科保健员，也应该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宝贵贡献，而不是对那些SAT分数不够或经济能力不足而无法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人发放的安慰奖。

高等教育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开宣称的更高目标：不仅让学生为工作世界做好准备，而且让他们成为具备道德反思能力和务实的民主社会公民，能够思考公共利益。我在大学教授道德和政治哲学，我当然相信道德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要假设四年制大学已经或应该垄断这一使命呢？教育公民践行民主这样更宽广的教育观念可以防止把公民教育隔离在大学之内。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精英大学在这项任务上做得并不好。^[104]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很少把课程重点放在道德和公民教育上，或者放在历史研究上，这类课程本来可以培养学生在充分了解后对公共事务做出务实判断的能力。据说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地位日增，加上狭窄的、高度专业化的课程涌现，那些让学生接触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大问题，并引导他们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的课程几乎没有立足的空间。

当然也有例外，许多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一些涉及伦理或公民主题的课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一流高校更擅长灌输技术官僚化的技能和导向，而不是推理和思考基本道德和公民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技术官僚化的技能与导向的强调可能导致了过去两代统治精英的失败，也导致了公共话语的道德贫乏。

但是，即使我对精英大学的道德和公民教育状况的评价过于苛刻，也没有理由认为四年制大学应该是道德推理和公民辩论课程的唯一设置。可以说，大学之外的公民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

存在令人向往的先例：美国最早的重要工会劳动骑士团要求在工厂设立阅览室，以便工人能够了解公共事务。这一要求源于共和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公民学习应植根于工作世界。^[105]

正如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观察到的，19世纪访问美国的外国游客对美国广泛的平等境况大感意外。他们的意思既不是财富的平等分配，也不是晋升的机会，而是思想和判断的独立，让所有公民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

公民身份似乎让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也能接触到其他地方为特权阶层保留的知识和文化……劳动对总体福祉的贡献既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肌肉上。据说，美国机械师“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是开明的、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熟悉机械原理”。机械学杂志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个主题。^[106]

拉什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特征与其说是社会流动性，不如说是智力和学习在所有阶层和职业中的普遍传播。^[107]这就是精英分类所破坏的那种平等。精英分类想要把智力和学习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堡垒中，并保证开展公平竞争让人进入堡垒。但是，这种分配学习机会的方式损害了劳动者的尊严，破坏了公共利益。公民教育可以在社区学院、职业培训场所、工会大厅及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校园里蓬勃发展。没有理由认为有抱负的护士和管道工比有抱负的管理顾问更不适合民主辩论的艺术。

矫正精英的傲慢

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理应获得我们得到的东西，这种观念最有力的对手是认为我们的命运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无论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挫折都源自上帝的恩典，或命运的变幻莫测，或抽签的运气。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清教徒发现，彻底的恩典伦理几乎不可能维持。生活在这样一种信念中，即我们无法决定我们是否会在来世得救或在今生成功，这与自由的理念和我们得到自己应得的这一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这就是为什么才能往往会驱逐恩典；或早或晚，成功人士都会断言，并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劳，而那些失败的人不如他们有价值。

但即使是在胜利的时候，精英信念也没有带来其所承诺的自我掌控，也不能提供团结的基础。对失败者吝啬，对成功者进行压迫，优绩至上变成了暴政。当优绩至上变成了暴政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其老对手来予以控制。这就是在生活的一个小领域里，招生抽签想要做的事情：召唤机会来矫正精英的傲慢。

当我反思优绩至上对争强好胜的富家子弟施加的暴政时，我想起了自己十几岁时的两次经历。

20世纪60年代末，在加州宝马山花园我上过的公立初中和高中里，学校逐

渐热衷于把学生分类并实施跟踪管理。学校实施的跟踪管理非常严格，尽管在我所就读的高中大约有2300名学生，但我发现自己始终与排名靠前的三四十名学生为伍（一起学习）。我读八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把跟踪管理做到了极致。这门课可能是代数或几何，我记不清了，但我至今记得座位的安排。六排中有三排是所谓的优等生排，学生们按照平均成绩的精确顺序就座，这意味着座位分配随着每次考试或测验而改变。更具戏剧性的是，老师会在发回每个评分练习之前宣布新的座位安排。我的数学成绩很好，但不是最好的。我通常在第二个座位和第四个或第五个座位之间移动。一名叫凯伊的女孩是个数学天才，几乎总是坐在第一个座位上。

当时，作为14岁的孩子，我认为这就是学校的运作方式。你学得越好，你的排名就越靠前。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数学最好的学生，谁在这个或那个测验中获胜或失败。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优绩至上管理。

当我们升到十年级的时候，跟踪管理和排名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对成绩着迷，不仅是对自己的成绩，对他人的成绩也是如此。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我读十年级时的生物老师法纳姆先生是个打着领结的怪人，常常可以在他的教室里看到蛇、蝾螈、鱼、老鼠或其他有趣的野生动物，他发觉了这种困扰。有一天，他给我们做了个小测验，让我们拿出一张纸，写下数字1~15，然后回答对或错。当学生抱怨他没有给我们任何问题时，他告诉我们为每个问题想一则陈述，并写下这个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学生们焦急地询问，这种随意的测验是否会被评分，是否算数。“是的，当然要算。”他说。

当时，我发现这是个有趣也或许有些古怪的课堂玩笑。但回想起来，我看到法纳姆先生正想要以他的方式抵制优绩至上的暴政。他想让我们学校的分类管理和拼命竞争中退后一步，让我们赞叹“蝾螈的奇迹”。

[1]Jerome Karabel,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5),pp.21-23,39-76,232-36.

[2]Nicholas Lemann,The Big Test: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p.7.

[3]Ibid.,p.8.

[4]Ibid.,pp.5–6.

[5]Ibid.

[6]Ibid.,p.28.

[7]James Bryant Conant,“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The Jeffersonian Tradition,”*The Atlantic*,May 1940,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95sep/ets/edcla.htm.科南特对特纳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论述的引用来自“Contributions of the West to American Democracy,”*The Atlantic*,January 1903,reprinted i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21),p.266.

[8]关于特纳是第一个使用“社会流动性”这一术语的人，参见Christopher Lasch,*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W.W.Norton,1995),p.73。也可见Lemann,*The Big Test*,p.48.查尔斯·W.艾略特于1869—190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1897年的论文“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中使用了“社会流动性”这一术语，这一点引自Karabel,*The Chosen*,p.41。

[9]Conant,“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

[10]Ibid.

[11]“礼物”指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译者注

[12]Ibid.

[13]Ibid.

[14]Ibid.Conant quoting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edited by William Pede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4),Queries 14 and 19.

[15]Ibid.

[16]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October 28,1813,in Lester J.Cappon,ed.,*The Adams Jefferson Letters: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

[17]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4).

[18]Ibid.

[19]Conant quoted in Lemann,The Big Test,p.47.莱曼引用了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话,这本书是科南特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James Bryant Conant,What We Are Fighting to Defend,unpublished manuscript,in the papers of James B.Conant,Box 30,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20]Karabel,The Chosen,p.152;Lemann,The Big Test,p.59.

[21]Karabel,The Chosen,pp.174,189.

[22]Ibid.,p.188.

[23]Ibid.,pp.172,193-97.

[24]Andrew H.Delbanco,“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lleges:Thoughts on the New Meritocracy,”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56,no.3(September 2012),pp.306-7.

[25]Andre M.Perry,“Students Need More Than an SAT Adversity Score,They Need a Boost in Wealth,”The Hechinger Report,May 17,2019,brookings.edu/blog/the_avenue/2019/05/17/students-need-more-than-an-sat-adversity-score-they-need-a-boost-in-wealth/,Figure 1;Zachary A.Goldfarb,“These Four Charts Show How the SAT Favors Rich,Educated Families,”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5,2014,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4/03/05/these-four-charts-show-how-the-sat-favors-the-rich-educated-families.美国大学理事会上一次公布按家庭收入划分的SAT平均成绩数据是在2016年。“College-Bound Seniors,Total Group Profile Report,2016,”secure-media.collegeboard.org/digitalServices/pdf/sat/total-group-2016.pdf,Table 10.

[26]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How College Makes or Breaks U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9),p.171,其中引用了导师、考试顾问兼作家詹姆斯·墨菲对2017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数据的未发表分析。

[27]Daniel Markovits,The Meritocracy Trap(New York:Penguin Press,2019),p.133,其中引用了Charles Murray,Coming Apart(New York:Crown Forum,2012),p.60,后者称,在2010年参加SAT的即将上大学的高三学生中,87%的数学和语文考试成绩超过700分的学生,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拥有本科学历,56%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拥有研究生学历。默里(在该书第363页)说,这些百分比是大学理事会提供给他的未公布的数据。安东尼·P.卡内瓦莱和斯蒂芬·J.罗斯利用1988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发现,在所有SAT分数超过1300分的学生(前8%)中,66%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25%),只有3%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最低的那25%)。

Carnevale and Rose, “Socioeconomic Status, Race/Ethnicity, and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 in Richard B. Kahlenberg, ed., *America’s Untapped Resource: Low Incom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Century Foundation, 2004), p. 130, Table 3.14.

[28] Douglas Belkin, “The Legitimate World of High-End College Admiss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19, [wsj.com/articles/the-legitimate-world-of-high-end-college-admissions-11552506381](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legitimate-world-of-high-end-college-admissions-11552506381); Dana Goldstein and Jack Healy, “Inside the Pricey, Totally Legal World of College Consultant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19, [nytimes.com/2019/03/13/us/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consultant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3/us/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consultants.html); James Wellemeyer, “Wealthy Parents Spend up to \$10,000 on SAT Prep for Their Kids,” *MarketWatch*, July 7, 2019, [marketwatch.com/story/some-wealthy-parents-are-dropping-up-to-10000-on-sat-test-prep-for-their-kids-2019-06-21](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some-wealthy-parents-are-dropping-up-to-10000-on-sat-test-prep-for-their-kids-2019-06-21); Markovits, *The Meritocracy Trap*, pp. 128–29.

[29] Tough, *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 pp. 86–92.

[30] *Ibid.*, pp. 172–82.

[31] *Ibid.*

[32] 例如，在普林斯顿大学，2023届有56%的学生自认为是有色人种。见 Princeton University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Princeton Is Pleased to Offer Admission to 1,895 Students for Class of 2023,” March 28, 2019, princeton.edu/news/2019/03/28/princeton-pleased-offer-admission-1895-students-class-2023。在哈佛大学，2023届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为54%，见入学统计：Harvard College Admissions and Financial Aid, college.harvard.edu/admissions/admissions-statistics。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比例，见 Amy Kaplan, “A Breakdown of Admission Rates Across the Ivy League for the Class of 2023,” *The Daily Pennsylvanian*, April 1, 2019, [thedp.com/article/2019/04/ivy-league-admission-rates-penn-cornell-harvard-yale-columbia-dartmouth-brown-princeton](https://www.thedp.com/article/2019/04/ivy-league-admission-rates-penn-cornell-harvard-yale-columbia-dartmouth-brown-princeton)。

[33] 一项针对146所顶尖大学的研究发现，74%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排名前25%的家庭。Carnevale and Rose, “Socioeconomic Status, Race/Ethnicity, and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s,” p. 106, Table 3.1. 对91所最具竞争力的高校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发现，72%的学生来自前25%。Jennifer Giancola and Richard D. Kahlenberg, “True Merit: Ensuring Our Brightest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Our

Be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ack Kent Cooke Foundation,January 2016,Figure 1,jkcf.org/research/true-merit ensuring-our-brightest-students-have-access-to-our-best-colleges-and-universities.

[34]Raj Chetty,John N.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July 2017,p.1,opportunityins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coll_mrc_paper.pdf.See also“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Find Your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7,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18/upshot/some colleges-have-more-students-from-the-top-1-percent-than-the-bottom-60.html.《纽约时报》在线互动专题利用柴提研究的数据，展示了2000所大学的经济概况。关于耶鲁大学的经济概况，见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mobility/yale university;关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概况，见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 mobility/princeton-university.

[35]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p.1.按收入状况列出的大学招生百分比，可见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18/upshot/some-colleges-have-more-students-from-the-top-1-percent-than-the-bottom-60.html。

[36]Jerome Karabel,The Chosen,p.547.

[37]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and“Mobility Report Cards,”Executive Summary,opportunityins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coll_mrc_summary.pdf.

[38]Ibid.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社会流动率，见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mobility/harvard-university,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 mobility/princeton-university。

[39]Ibid.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社会流动率，见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mobility/university-of-michigan-ann-arbor,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mobility/university-of-virginia。

[40]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Table IV;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Executive Summary,opportunityins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coll_mrc_summary.pdf.

[41]Chetty et al.,“Mobility Report Cards,”Table II.

[42]《纽约时报》在线互动专栏根据柴提等人提供的数据，列出了每所大学中经济地位至少上升40%的学生比例。例如，在哈佛大学，11%的学生上升了40%；在耶鲁大学，该数字为10%；普林斯顿大学为8.7%。见nytimes.com/interactive/projects/college-mobility/harvard-university；每所大学的“整体流动性指数”显示了上升40%或更多的可能性。

[43]有关余荫录取的一般讨论，见William G.Bowen,Martin A.Kurzweil,and Eugene M.Tobin,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pp.103-8,167-71;Karabel,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pp.266-72,283,359-63,506,550-51;Daniel 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6),pp.117-44。对“6倍”的估计出自Daniel Golden,“How Wealthy Families Manipulate Admissions at Elite Universities,”Town&Country,November 21,2016,townandcountrymag.com/society/money-and-power/news/a8718/daniel-golden-college-admission。哈佛余荫录取的数据来自2018年一场诉讼中公开的数据，参见Peter Arcidiacono,Josh Kinsler,and Tyler Ransom,“Legacy and Athlete Preferences at Harvard,”December 6,2019,pp.14 and 40(Table 1),public.econ.duke.edu/~psarcidi/legacyathlete.pdf;and Delano R.Franklin and Samuel W.Zwikel,“Legacy Admit Rate Five Times That of Non Legacies,Court Docs Show,”The Harvard Crimson,June 20,2018,theocrimson.com/article/2018/6/20/admissions-docs-legacy。

[44]Daniel Golden,“Many Colleges Bend Rules to Admit Rich Applican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0,2003,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golden2.htm;see also 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pp.51-82。

[45]2018年，针对哈佛大学按平权法案录取发起了诉讼，该诉讼相关文件显示，哈佛大学的2019届学生中有超过10%是从哈佛大学管理人员维护的捐赠关系申请人名单中录取的。从2014届到2019届的六年间，被录取的学生中有9.34%来自捐赠者附属名单。在这些学生中，有42%被录取，这大约是这一时期哈佛大学整体录取率的7倍。Delano R.Franklin and Samuel W.Zwikel,“In Admissions,Harvard Favors Those Who Fund It,Internal Emails Show,”The Harvard Crimson,October 18,2018,theocrimson.com/article/2018/10/18/day-three-harvard-admissions-trial。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整体录取率约为6%。Daphne C.Thompson,“Harvard Acceptance Rate Will Continue to Drop,Experts

Say,"The Harvard Crimson, April 16, 2015, thecrimson.com/article/2015/4/16/admissions-downward-trend-experts.

[46] Golden, *The Price of Admission*, pp. 147–76.

[47] David Leonhardt, "The Admissions Scandal Is Really a Sports Scand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19, nytimes.com/2019/03/13/opinion/college-sports-bribery-admissions.html; Katherine Hatfield, "Let's Lose the Directors' Cup: A Call to End Athletic Recruitment," *The Williams Record*, November 20, 2019, williamsrecord.com/2019/11/lets-lose-the-directors-cup-a-call-to-end-athletic-recruitment.

[48] Bowen, Kurzweil, and Tobin, *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p. 105–6 (Table 5.1).

[49] Tough, *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 pp. 172–82.

[50] Daniel Golden, "Bill Would Make Colleges Report Legacies and Early Admiss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9, 2003, 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golden9.htm; Daniel Markovits, *The Meritocracy Trap*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p. 276–77.

[51] 见 Lemann, *The Big Test*, p. 47, 以及上文引自科南特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的段落 (注18): James Bryant Conant, *What We Are Fighting to Defend*, 未出版手稿, 被收入 James B. Conant, Box 3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52] John W. Gardner, *Excellence: Can We Be Equal and Excellent Too?*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pp. 33, 35–36.

[53] *Ibid.*, pp. 65–66.

[54] *Ibid.*, pp. 71–72.

[55] *Ibid.*, pp. 80–81.

[56] *Ibid.*, p. 82.

[57] Brewster quoted in Geoffrey Kabaservice, "The Birth of a New Institution," *Yale Alumni Magazine*, December 1999, archives.yalealumnimagazine.com/issues/99_12/admissions.html.

[58] Caroline M. Hoxby, "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 no. 4 (Fall 2009), pp. 95–118.

[59]Ibid.关于大多数大学的高录取率，见Drew Desilver,“A Majority of U.S.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9,2019,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4/09/a-majority-of-u-s-colleges-admit-most-students-who-apply/;Alia Wong,“College-Admissions Hysteria Is Not the Norm,”The Atlantic, April 10,2019,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9/04/harvard-uchicago-elite-colleges-are-anomaly/586627.

[60]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为32%。Doyle McManus,“Report Shows Admission Preference,”Stanford Daily,October 23,1973,archives.stanforddaily.com/1973/10/23?page=1§ion=MODSMD_ARTICLE4#article;Camryn Pak,“Stanford Admit Rate Falls to Record-Low 4.34% for class of 2023,”Stanford Daily,December 18,2019,stanforddaily.com/2019/12/17/stanford-admit-rate-falls-to-record-low-4-34-for-class-of-202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8年的录取率数据来自Jeffrey J.Selingo,“The Science Behind Selective Colleges,”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3,2017,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7/10/13/the-science-behind-selective-colleges/;Meagan Peoples,“University Admits 2,309 Students for the Class of 2023,”Johns Hopkins News-Letter,March 16,2019,jhunewsletter.com/article/2019/03/university-admits-2309-students-for-the-class-of-2023。芝加哥大学1993年的录取率数据来自Dennis Rodkin,“College Comeback: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inds Its Groove,”Chicago Magazine,March 16,2001,chicagomag.com/Chicago-Magazine/March-2011/College-Comeback-The-University-of-Chicago-Finds-Its-Groove/;Justin Smith,“Acceptance Rate Drops to Record Low 5.9 Percent for Class of 2023,”The Chicago Maroon, April 1,2019,chicagomaroon.com/article/2019/4/1/uchicago-acceptance-rate-drops-record-low.

[61]Drew Desilver,“A Majority of U.S.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Pew Research Center.

[62]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

[63]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p.138–42,drawing upon Lauren A.Rivera,Pedigree: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64]Dana Goldstein and Jugal K.Patel,“Extra Time on Tests?It Helps to Have Cash,”The New York Times,July 30,2019,nytimes.com/2019/07/30/us/extra-time-504sat-act.html;Jenny Anderson,“For a Standout College

Essay,Applicants Fill Their Summers,”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1, [nytimes.com/2011/08/06/nyregion/planning-summer-breaks-with-eye-on-college-essay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1/08/06/nyregion/planning-summer-breaks-with-eye-on-college-essays.html). 关于为大学论文提供暑期经历的领先供应商，请访问 everythingsummer.com/pre-college-and-beyond。

[65]“parent,v.”OED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cember 2019,[oed.com/view/Entry/137819](https://www.oed.com/view/Entry/137819).Accessed January 24,2020;Claire Cain Miller,“The Relentlessness of Modern Parenting,”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5,2018,[nytimes.com/2018/12/25/upshot/the-relentlessness-of-modern-parenting.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8/12/25/upshot/the-relentlessness-of-modern-parenting.html).

[66]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57.

[67]Nancy Gibbs,“Can These Parents Be Saved?,”Time,November 10,2009.

[68]Doepke and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pp.51,54–58,67–104.

[69]Madeline Levine,The Price of Privilege:How Parental Pressure and Material Advantage Are Creating a Generation of Disconnected and Unhappy Kids(New York:HarperCollins,2006),pp.5–7.

[70]Ibid.,pp.16–17.

[71]Ibid.，引用了苏尼娅·S.卢瑟的研究。

[72]Suniya S.Luthar,Samuel H.Barkin,and Elizabeth J.Crossman,“‘I Can,Therefore I Must’:Fragility in the Upper Middle Classes,”Development & Psychopathology 25,November 2013,pp.1529–49,[ncbi.nlm.nih.gov/pubmed/24342854](https://pubmed.ncbi.nlm.nih.gov/pubmed/24342854).

[73]Ibid.,see also Levine,The Price of Privilege,pp.21,28–29.

[74]Laura Krantz,“1-in-5 College Students Say They Thought of Suicide,”The Boston Globe,September 7,2018,报告结果来自Cindy H.Liu,Courtney Stevens,Sylvia H.M.Wong,Miwa Yasui,and Justin A.Chen,“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Mental Health Diagnoses and Suicide Among U.S.College Students: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Disparities in Service Use,”Depression & Anxiety,September 6,2018,doi.org/10.1002/da.22830.

[75]Sally C.Curtin and Melonie Heron,“Death Rates Due to Suicide and Homicide Among Persons Aged 10–24:United States,2000–2017,”NCHS Data

Brief, No. 352, October 2019, [cdc.gov/nchs/data/databriefs/db352-h.pdf](https://www.cdc.gov/nchs/data/databriefs/db352-h.pdf).

[76] 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P. Hill, "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A Meta-Analysis of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from 1989 to 201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2019), pp. 410–29, apa.org/pubs/journals/releases/bul-bul0000138.pdf; 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P. Hill, "How Perfectionism Became a Hidden Epidemic Among Young People," *The Conversation*, January 3, 2018, theconversation.com/how-perfectionism-became-a-hidden-epidemic-among-young-people-89405; Sophie McBain, "The New Cult of Perfectionism," *New Statesman*, May 4–10, 2018.

[77] Curran and Hill, "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p. 413.

[78] college.harvard.edu/admissions/apply/first-year-applicants/considering-gap-year.

[79] Lucy Wang, "Comping Harvard," *The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2, 2017, thecrimson.com/article/2017/11/2/comping-harvard/; Jenna M. Wong, "Acing Rejection 10a," *The Harvard Crimson*, October 17, 2017, thecrimson.com/article/2017/10/17/wong-acing-rejection-10a.

[80] Wang, "Comping Harvard."

[81] Richard Pérez-Peña, "Students Disciplined in Harvard Scandal,"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13, [nytimes.com/2013/02/02/education/harvard-forced-dozens-to-leave-in-cheating-scandal.html](https://www.nytimes.com/2013/02/02/education/harvard-forced-dozens-to-leave-in-cheating-scandal.html); Rebecca D. Robbins, "Harvard Investigates 'Unprecedented' Academic Dishonesty Case," *The Harvard Crimson*, August 30, 2012, thecrimson.com/article/2012/8/30/academic-dishonesty-ad-board.

[82] Hannah Natanson, "More Than 60 Fall CS50 Enrollees Faced Academic Dishonesty Charges," *The Harvard Crimson*, May 3, 2017, thecrimson.com/article/2017/5/3/cs50cheating-cases-2017.

[8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14年取消了余荫录取。Ronald J. Daniels, "Why We Ended Legacy Admissions at Johns Hopkins," *The Atlantic*, January 18, 2020, 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1/why-we-ended-legacy-admissions-johns-hopkins/605131.

[84] 据以计算的数据来源是Desilver, "A Majority of U.S. Colleges Admit Most Students Who Apply," *Pew Research Center*.

[85]Katharine T.Kinhead,How an Ivy League College Decides on Admissions(New York:W.W.Norton,1961),p.69.

[86]近几十年来,许多人提出了招生抽签的建议。其中一位是罗伯特·保罗·沃尔夫,他在1964年提出将高中生随机分配到大学。Wolff,“The College as Rat-Race:Admissions and Anxieties,”Dissent,Winter 1964;Barry Schwartz,“Top Colleges Should Select Randomly from a Pool of Good Enough,”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February 25,2005;Peter Stone,“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Luck of the Draw,”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7,August 2013;Lani Guinier,“Admissions Rituals as Political Acts:Guardians at the Gates of Our Democratic Ideals,”Harvard Law Review 117(November 2003),pp.218–19.有关随机选择的讨论,我受益于Charles Petersen,“Meritocracy in America,1930–2000”(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20)。

[87]关于将成绩作为资格门槛的概念,我要感谢在我的本科生研讨会“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上与丹尼尔·马科维茨和学生们的一次谈话。

[88]Andrew Simon,“These Are the Best Late-Round Picks in Draft History,”MLB News,June 8,2016,mlb.com/news/best-late-round-picks-in-draft-history-c182980276.

[89]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draft,2000,nfl.com/draft/history/fulldraft?season=2000.

[90]Petersen的“Meritocracy in America,1930–2000”在档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斯坦福实验的建议。

[91]Sarah Waldeck,“A New Tax on Bi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ndowments Is Sending Higher Education a Message,”The Conversation,August 27,2019,theconversation.com/a-new-tax-on-big-college-and-university-endowments-is-sending-higher-education-a-message-120063.

[92]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丹尼尔·马科维茨建议,私立大学捐赠收入的免税地位应以增加学生群体的阶级多样性为条件,理想的做法是扩大招生。Markovits,The Meritocracy Trap(New York:Penguin Press,2019),pp.277–78.

[93]Michael Mitchell,Michael Leachman,and Matt Saenz,“Stat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uts Have Pushed Costs to Students,Worsened Inequality,”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October 24,2019,cbpp.org/research/state-budget-and-tax/state-higher-education-funding-cuts-have-pushed-costs-to-students.

[94]Jillian Berman,“State Colleges Receive the Same Amount of Funding from Tuition as from State Governments,”MarketWatch,March 25,2017,引用了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彼得·辛里奇斯的分析：marketwatch.com/story/state-colleges-receive-the-same-amount-of-funding-from-tuition-as-from-state-governments-2017-03-24。

[95]Andrew Delbanco,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114.

[96]Budget in Brief,Budget Report 2018–2019,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p.3,budget.wisc.edu/content/uploads/Budget-in-Brief-2018–19-Revised_web_V2.pdf.

[97]“The State of the University:Q&A with President Teresa Sullivan,”Virginia,Summer 2011,uvamagazine.org/articles/the_state_of_the_university.

[98]UT Tuition:Sources of Revenue,tuition.utexas.edu/learn-more/sources-of-revenue.这些数字不包括来自产生石油和天然气营收的捐赠基金的收入。学杂费所占比例从1984—1985年的5%上升到2018—2019年的22%。

[99]Nigel Chiwaya,“The Five Charts Show How Bad the Student Loan Debt Situation Is,”NBC News,April 24,2019,nbcnews.com/news/us-news/studentloan-statistics-2019-n997836;Zack Friedman,“Student Loan Debt Statistics in 2020:A Record \$1.6 Trillion,”Forbes,February 3,2020,forbes.com/sites/zackfriedman/2020/02/03/student-loan-debt-statistics/#d164e05281fe。

[100]Isabel 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An Economic Agenda for a Divided N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p.114.

[101]Ibid.

[102]Ibid.,pp.111–113.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103]Ibid.,p.113.

[104]虽然这是个人的、印象主义的观察，但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参见Delbanco,College:What It Was,Is,and Should Be;Anthony T.Kronman,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William Deresiewicz,Excellent Sheep: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New York:Free Press,2014)。

[105]Michael J.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8–200.

[106]Christopher Lasch,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5),pp.59–60.

[107]Ibid.,pp.55–79.

7 认可工作的价值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是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并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这在今天则困难得多。在过去40年里，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经济学家称之为“大学溢价”）整整翻了一番。1979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大约40%，到2000年，他们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80%。^[1]

尽管全球化时代给那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大多数普通工人看来，全球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1979—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50万下降到1200万。^[2]生产力提高了，工人们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少，高管和股东们所占的收益份额却越来越大。^[3]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主流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普通工人的多30倍；到2014年，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的多300倍。^[4]

我们还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男性收入的中位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1979年以来，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85%，然而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是比那时候少的。^[5]

损害工作的尊严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工人很不高兴，这并不奇怪。然而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他们痛苦的唯一来源。优绩至上时代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为隐蔽的伤害：优绩制正在损害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对那些能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大脑”进行估价，这台强调优绩至上的分类机器会直接贬损那些没有精英资格证书的人。这台机器会告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做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因此不值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并且，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而把给予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微薄工资正当化了。

但这种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思维方式，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基于我们在前面（第5章）探讨过的原因，一份工作在市面上的价值不应该成为衡量其对公共利益贡献大小的标准。（回想一下大把捞金的冰毒贩子和收入微薄的高中老师吧。）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

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仍在整个公共文化中不断产生回响。

精英分类制度也帮助巩固了这一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政党所拥护的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亦是如此。正当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的时候，优绩至上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却极大地削弱了人们抵制全球化的理论支持。并且，这两种观念损害了人们工作的尊严，激起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对抗。

2016年以来，一些权威人士和学者已就民粹主义不满的根源展开了辩论。这种不满源于失业、工资增长停滞还是文化置换？不过这种区分或许太过直接。工作既是经济来源，也包含文化属性。工作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

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让人们变得如此愤怒与怨恨的原因。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不仅仅是在其他人收获颇丰的时候还在苦苦挣扎，同时，他们还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尊重的源泉。在全社会的眼中，也许还包括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再代表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在大选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阶层男性投票支持了唐纳德·特朗普，形成了压倒性优势。特朗普充满怨恨的政治政策吸引了他们，这表明困扰他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几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实际行动抗议优绩至上主义：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面临的处境愈加艰难，越来越多的适龄男性彻底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然而对于整个社会，这样的一种抗议方式却几乎毫无效果。

1971年，93%的工薪阶层白人男性都有一份工作。然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80%。在那20%没有工作中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寻找工作。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劳动力市场对他们拥有的技能毫不在意，这无异于对人的羞辱，于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干脆放弃了。对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这样的情况尤为严重。2017年，在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美国人中，大约只有68%找到了工作。^[6]

绝望而死

然而，放弃工作并不是美国工人阶级士气受损最严重的表现，许多人甚至为此放弃了生命本身。这就是最为悲惨的现状——“绝望而死”，并且这种情况日益频繁地出现。这一术语最初是由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提出来的，并且就在最近，这两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又发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在整个20世纪，随着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控制，人们的预期寿命

实现了稳步增长。但2014—2017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停止增长，甚至有所下降。这是近100年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首次连续三年下降。^[7]

而这并不是因为医学没有发现新的疾病治疗方法。凯斯和迪顿发现，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酒精性肝病的人数在急速增加，死亡率也在飞速增长。他们称这种现象为“绝望而死”，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这类死亡都是由死者自己造成的。^[8]

这类死亡近十多年也一直在增加，并且在中年白人中尤为常见。1990—2017年，在45~54岁的白人男女中，“死于绝望”的人数增加了3倍。^[9]并且，截至2014年，在这一群体中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心脏病的人数。^[10]

那些居住地与工人阶级社区相距甚远的人，一开始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公众关注的缺乏也直接导致最初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有多大。然而，截至2016年，每年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比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11]《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提供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现在，每两个星期“死于绝望”的美国人比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18年间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12]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可怕的“流行病”？或许我们可以从那些最易受影响的人的教育背景中找到有说服力的线索。凯斯和迪顿发现：“新增的因绝望而死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那些拥有四年制学士学位的人则大多平安无事。因此，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13]

在过去20年里，中年（45~54岁）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总体死亡率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间，死亡率的差异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死亡率下降了40%。然而，在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当中，死亡率却上升了25%。所以，学历高的人还有另一个优势：如果你有大学文凭，你中年死亡的风险大约只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1/4。^[14]

上文提到的“绝望而死”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比起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确更有可能死于酒精、毒品或自杀。但在死亡问题上，文凭鸿沟已变得再明显不过了。截至2017年，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绝望而死”的概率竟比普通大学毕业生高3倍。^[15]

人们可能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带来的痛苦。而教育的差异之所以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只是因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也很可能是穷人。凯斯和迪顿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但却发现这种看法并没有什

么说服力。因为，1999—2017年，绝望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与贫困人口的增加并不相符。他们还对各州进行了调查，发现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与不断上升的贫困水平之间没有令人信服的相关性。

除了物质的匮乏，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让人们绝望：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人们苦苦挣扎，想要出人头地，却因没有获得大学文凭而被排除在外。凯斯和迪顿总结说：“‘绝望而死’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逐渐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16]

有学位的人和没有学位的人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死亡上，还体现在生活质量上。那些没有学位的人，他们正面临更深的痛苦、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更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在收入、家庭稳定性和社区和谐方面，这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是否拥有四年制大学文凭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这就好像要求非大学毕业生佩戴一枚圆形的猩红色徽章，上面用一条红色斜线把字母BA^[17]画了出来。^[18]

不幸的是，给这种情况证实了迈克尔·扬的观点，即“在一个如此看重优绩的社会中，给评判为一无是处就会处境艰难。从来没有哪个下层阶级像这样在道德评价上被置于如此赤身裸体、无所遮蔽的境地”。^[19]

这也让人毛骨悚然地想起约翰·加德纳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卓越”和教育分类的论点。在承认英才统治体制的弊端时，他比他自己知道的更有先见之明。加德纳写道：“有些人看到了这个体制的美妙之处，在这个体制中，每个年轻人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抱负，却也因此很容易忽视那些缺乏必要能力的人承受的痛苦。然而，痛苦是存在的，痛苦也必须存在。”^[20]

两代人之后，当奥施康定成为减轻痛苦的药物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死亡浪潮揭示了“精英分类”的黑暗后果——这个工作世界不会给予那些被筛选掉的人丝毫尊严。

怨恨的根源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当时与当权派竞争的反建制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绝望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支持率最高。一项逐县进行的选举分析发现，即使控制收入变量，中年白人群体的死亡率也与特朗普的支持率密切相关。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亦是如此。^[21]

主流专家和政界人士完全想不到特朗普会当选，原因之一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精英高高在上的文化视而不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参与其中）。

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精英分类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但这种文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工人阶级父亲，比如《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的阿奇·邦克和《辛普森一家》中的霍默·辛普森，大都是受人嘲弄的小丑。研究媒体的学者发现，电视上的蓝领爸爸们常常被描绘成无能、愚蠢的人，并且会成为大家的笑柄，而管束他们的妻子往往更能干、更聪慧。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中上阶层和专业技术群体的父亲的形象就给编剧描绘得更为美好。[22]

精英阶层对工人阶级的贬低随处可见。来自旧金山黑斯廷斯法学院的教授琼·威廉姆斯曾据此批评进步人士的“阶级无知”。[23]

在其他上流社会中，精英阶层（包括进步人士）常常会不自觉地贬低工薪阶层的白人。我们会听到“飞越州”[24]“住活动房屋的废物”[25]被“露沟子的管道工”[26]折磨的说法——这种公开的阶级侮辱却通常被认为是机灵的说法。而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影响着政治运动，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一篮子烂菜”的评论，以及巴拉克·奥巴马对那些“紧握枪支或依附于宗教”的人的看法。[27]

威廉姆斯承认：“经济上的怨恨加剧了种族焦虑，在支持特朗普的人（以及特朗普本人）身上，这种焦虑演变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但是，把工薪阶层白人的愤怒仅仅看作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安慰、自我麻痹，这很危险。”[28]

芭芭拉·艾伦瑞克是一位描述工作和阶级之间关系的记者，她也有类似的观察。她引用了W.E.B.杜波依斯在1935年写的一段话：“我们必须牢记，尽管白人劳动群体的工资很低，但在社会上，相比其他族群，他们有着社会和心理上的优势，并能以此得到补偿。”与非裔美国人不同，工薪阶层白人公民“可以自由地与各阶层的白人一起进入公共场所、公园和最好的公立学校”。[29]这种“社会和心理上的优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人特权”。

艾伦瑞克认为，在民权运动之后，支持这种违反常情的“心理上的工资补贴”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废除，这让贫穷白人无法再得到“知道有人比自己更糟糕、更受鄙视的安慰”。那些“因对下层白人的种族主义感到厌恶而自视正义”的自由派精英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是正确的。[30]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把“白人特权”归咎于被剥夺了权力的工薪阶层白人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这种说法忽视了他们在优绩至上的社会秩序中为赢得荣誉和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而这种秩序对他们赖以维生的技能缺乏应有的尊重。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家凯瑟琳·J.克拉默花了五年采访了威斯康星州各地乡村的民众，并且把他们对政治的怨恨描述得细致入微。[31]

这些乡村居民认为，太多的税金和政府的关注都给了不值得被给予的人。克拉默写道：“像这样不配得到福利的人包括那些领着福利的少数族裔，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懒惰的在城里工作的人，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搞些虚头巴脑、不着边际的东西。”她解释说，种族主义只是他们怨恨的一部分，但种族主义与更基本的问题——“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他们这样的地方，遭人忽视，得不到尊重”——交织在一起。^[32]

在一部描述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编年史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走入路易斯安那州的河口乡村，想去了解这些不满出现的原因，这也让该书成为当下最令人信服的编年史。在与保守的南方劳动人民的餐桌谈话中，她想要去理解为什么那些迫切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尤其是那些与给社区带来环境灾难的石油和化工公司做斗争的人仍然鄙视和不信任联邦政府。她写了一个故事，重新诠释了她所了解到的东西，描述了“那些与她交谈的人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羞愧、怨恨和焦虑”。^[33]

在她阐述的故事里，经济匮乏和文化错位交织在一起。对少数精英来说，经济发展变得更加艰难。而对底层的那90%的人来说，“因为自动化、离岸建厂及跨国公司相对于劳动力正飞速增长的力量”，美国这台造梦机器“已经停止运转。与此同时，在这90%的人里，白人男性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竞争加剧，无论是在工作机会、社会认可上还是在政府资助上”。^[34]更糟糕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一直在耐心排队等待实现自己“美国梦”的机会的人发现，其他人——黑人、女性、移民和难民——正在插队到他们前面。他们憎恨那些被他们认为插队的人（例如平权法案的受益人），并对能看到这些却对此无动于衷的政治领导人感到愤怒。^[35]

当那些排队的人抱怨有人插队时，精英们却用种族主义者、“乡巴佬”、“白人垃圾”和其他带有侮辱性的名字称呼他们。霍克希尔德以同情的口吻描述了她“四面楚歌”的工人阶级房东面临的困境：

你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是个陌生人。你无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认出你自己。这是一场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尊重的斗争。而要感到被尊重，你就必须感觉到自己在向前迈进，也要感到他人看到你在向前迈进。但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而是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你其实正在倒退。^[36]

任何对工人阶级挫败感的严肃回应，都必须与精英的居高临下和已经在公共文化中盛行的文凭偏见开展斗争。要严肃对待工人阶级的困境，还要求把工作的尊严放在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尊重工作的尊严意味着什么？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此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全球化与技术变化看起来不可避免地倾向于

损害工作尊严的时候。但是，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深入思考工作的意义会迫使我们直面我们原本尽力回避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潜伏在我们当前不满的表面之下，并且没有得到解决：什么才算是公共利益的有价值的贡献？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应该做些什么？

恢复工作的尊严

近年来，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一些政治家以谈论“工作的尊严”作为回应。比尔·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比历任总统都多，唐纳德·特朗普也经常提及这个短语。^[37] 尽管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熟悉的政治立场，但对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政客，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带有修辞含义的政治说辞。^[38] 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削减福利是对工作尊严的尊重，因为这会让游手好闲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并让他们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特朗普政府的农业部长声称，减少食品券的发放“让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工作的尊严”。同时，在为2017年的一项给企业减税并主要让富人受益的法案辩护时，特朗普表示，他的目标是“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工作的尊严、工资的骄傲”。^[39]

而对自由派而言，他们有时会呼吁大家重视工作的尊严，以此来完善保障体系，提高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提高最低工资，提供医疗保健、探亲假和儿童保育政策，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减免政策。但是这种有着大量配套实质性政策支持的论调，却未能解决工人阶级的愤怒和不满，而这也直接促成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胜利。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此感到困惑。这么多从这些措施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怎么会投票给一个反对这些措施的候选人呢？

最常见的解释是，工薪阶层白人选民被“文化置换”的恐惧左右，忽略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像一些评论员说的那样——“用中指投出了票”。但这个解释太过仓促，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之间划出的界限过于鲜明。我们知道，经济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口袋里有多少钱，还关系到一个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影响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些被40年的全球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抛在后面的人遭受的不仅仅是工资增长停滞，他们也正在经历他们担心的被淘汰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社会似乎不再需要他们提供的技能。

1968年正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伯特·F·肯尼迪明白这一点。失业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失业者没有收入，还在于他们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他解释道：“失业意味着无所事事——这意味着失业者与其他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工作，对自己的同胞没有用处，实际上就是拉尔夫·埃利森笔下的那个隐形人。”^[40] 肯尼迪从那个时代的不满中窥见

的，正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满的理解中遗漏的东西。他们一直在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提供更大程度的分配正义——更公平、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殊不知，这些选民更想要的是更大程度的贡献正义，即他们需要赢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机会，而这种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是伴随着创造其他人的需求和价值而来的。

自由主义强调分配正义，是想要平衡一股脑儿追求GDP最大化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源于相信，公正的社会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繁荣水平，而且致力于寻求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赢家补偿输家的情况下，那些预计能够增加GDP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协定，或者鼓励企业把工作外包给低收入国家的政策）才能得到辩护。例如，可以对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公司和个人所获得的利润增益征税，以加强社会的保障体系，并为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或职业再培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为美国和欧洲主流中左翼（以及一些中右翼）政党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希望拥抱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日益繁荣，并用获得的收益弥补国内工人因此遭受的损失。而来自民粹主义者的抗议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回首其残骸，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一方案失败的原因。

首先，这一方案从未真正得到实施。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但赢家并没有补偿输家。相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经济增长产生的收益都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没有看到改善，甚至在扣税后依然如此。至于该计划中提及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也被搁置一旁，部分是由于金钱在政治中日益增长的权力，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对民主机构的“寡头俘获”。

除此之外，在这当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把关注点放在GDP最大化上，即使是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提供帮助，也只是把重点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这种做法更让我们把自己视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当然，在实践中，我们两者都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用我们的金钱得到最大的收益，尽可能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无论这些产品和服务是由低薪的海外工人还是高薪的美国工人制造的。作为生产者，我们想要令人满意且报酬丰厚的工作。

究竟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其中的问题需要政治来调和。但是，全球化方案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却很少考虑到外包、移民和金融化对生产者福祉的影响。主持全球化的精英阶层不仅未能解决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也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

为认可而工作

采取提高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购买力的方式来弥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或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对解决目前已经根深蒂固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因为他们愤怒的根源在于他们失去了认可和尊重。购买力的下降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激起劳动人民愤怒之情的最深伤害是他们渐渐失去了作为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伤害是优绩至上主义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有重启承认这种伤害并恢复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才能有效地解决如今针对政治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政治议程必须兼顾贡献正义和分配正义。^[41]这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大规模蔓延的愤怒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源自身份认可的危机。只有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而赢得认可。

并且，消费者身份和生产者身份之间的差异指向了对公共利益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比较熟悉的一种方法是，把公共利益定义为每个人的偏好和利益的总和。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可以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特别是采取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如果公共利益仅仅是满足消费者偏好的问题，那么市场工资就是衡量谁贡献了多少的恰当标准。依靠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那些赚钱最多的人大概已经为公共利益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种方法则摒弃了这种以消费主义为主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转而支持所谓的公民概念。根据公民的理想，公共利益不应只是简单地汇总偏好或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实现公共利益需要相关人士批判性地反思我们的偏好，最理想的是提升和改进我们的偏好，让我们能够过上有价值的、充实的生活。因此，这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活动来实现，还需要相关人士与市民共同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美好的社会。在其中，公民美德得以培养，并且我们能够共同思考我们的政治社会应有的目标。^[42]

公共利益的公民观需要某种政治，一种能为公共协商提供场所和场合的政治。但公共利益的公民观也暗示了特定的思考工作的方式。从公民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并非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因为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才能够提高和锻炼自身能力去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同胞的需求，并赢得社会尊严。正如经济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奈特指出的（见第5章），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相反，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取决于我们努力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角度的重要性。

经济政策根本上是为了消费，这种见解如今根深蒂固，我们已经很难不这

样去思考。“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被加以注意。”^[43]凯恩斯回应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宣称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44]并且大多数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也同意此观点。一种古老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传统却持相反看法，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要培养和锻炼自身能力并以此展现我们的本性，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繁荣。美国共和党的传统让人们认识到，特定的职业（首先是农业，其次是手工业，最后是普遍理解的自由劳动）培养了公民自治的美德。^[45]

在20世纪，共和主义传统的生产者伦理逐渐让步于消费主义的自由观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46]但是，即便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工作会通过贡献和相互认可的机制将公民聚集在一起”这种观念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这种观念也能以鼓舞人心的方式被表达出来。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发表演讲时，把清洁工人的尊严和他们对公共产品的贡献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它要改变到尊重清洁工人，因为那些替我们捡起垃圾的人归根结底和物理学家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清洁工人不干活儿了，疾病就会蔓延。所有劳动都是有尊严的。^[47]

在1981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的工作”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是工作让人“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成就感，让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像一个人”。他也认为工作与社会密不可分。“工作让人把自己最深的人类身份和国家的成员身份联系起来，并想要把自己的工作用来促进公共利益，与同胞携手发展。”^[48]

几年后，美国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发布了主教教书，详细阐述了天主教对经济的社会训导，并给出了“贡献”正义的明确定义。所有人“都有义务做社会生活中积极的、有生产力的参与者”，而政府“有责任组织经济和社会机构，以便人们以尊重自由和劳动尊严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49]

一些世俗的哲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主张，当代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争执最好可以理解为认可和尊重的争执。^[50]尽管他把这个观点追溯到黑格尔哲学（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思想艰深晦涩），但是对于那些密切注意高薪运动员的薪资纠纷的体育迷，这一观点从直觉上看貌似可信。当体育迷们抱怨一个选手已经赚了几百万美元但还坚持要赚更多时，他总是会回应道：“这和钱没关系，这是关于尊重的事。”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为认可而斗争。据他所说，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有效满足需求的体制，还是获得认可的体制。劳动力市场不仅以收入作为工作

报酬，而且公开承认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市场本身不向工人提供技能或给予认可，所以黑格尔提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贸易协会或行会的机构，确保工人的技能足够用来做出值得社会尊重的贡献。简而言之，黑格尔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在道德上被证明是正当的，霍耐特做了简要总结：“第一，劳动组织必须提供最低工资；第二，劳动组织必须赋予所有工作活动特定性质，表明这些工作对公共利益有贡献。”^[51]

80年后，法国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在黑格尔对工作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假如每个人都能以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获得报酬，那社会分工就可以成为社会团结的源泉。^[52]不同于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当代经济学家，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贡献正义

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许多劳动人民感觉遭到忽视以及得不到尊重，我们迫切需要社会凝聚力和团结之源，这些关于工作尊严的更强势的见解可能就会进入主流政党的争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呢？为什么现任政府的政治议程抵制贡献方面的正义，并抵制作为其基础的以生产者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呢？

答案似乎仅仅在于我们对消费的爱，以及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更丰富的消费品的信念。但是这从深层次来看可能存在问题。除了有望带来物质利益，把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对我们这种充满分歧的多元社会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做似乎能让我们避免淹没于有关道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

人们对什么是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持有不同看法，对何为繁荣幸福的生活也各执己见。作为消费者，我们的偏好和需求各不相同。面对这些差异，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似乎是经济政策中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目标。如果以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尽管我们偏好不同，但是多总是比少好。对于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因此需要对分配正义展开讨论。但所有人都同意，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的：做大经济蛋糕比缩小好。

相比之下，贡献正义对于人类的繁荣或最佳生活方式并不是中立的。从亚里士多德到美国共和主义传统，从黑格尔到天主教社会训导，贡献正义的理论教导我们，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

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只关心GDP规模和分配的政治经济会逐渐损害工作的尊严，导致公民生活贫困。罗伯特·F·肯尼迪明白这一点：“团体、社群、共有的爱国主义，我们文明的这些核心价值观不是来自大家一起购买和消费商品。”相反，它们来自“有尊严的、收入可观的工作，这种工作让一个人能对他的社群、家庭、国家，最重要的是对他自己说‘我为建设这个国家出了力，我参与了这个国家伟大的公共事业’”。^[53]

现在很少有政治家这么说。在罗伯特·F·肯尼迪之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进步人士放弃了社群政治、爱国主义和工作的尊严，反而去追求花言巧语。对于那些担心工作不稳定、业务外包、不平等以及担心移民与机器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的人，统治精英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建议：去上大学，用知识武装自己，以便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如果你努力了，你就能成功。

这是一种适应全球化、英才统治、市场驱动时代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取悦了赢家，损害了输家。到2016年，这种理想退潮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在欧洲的崛起，都宣告了该方案的失败。现在的问题是，可选的政治方案是什么？

讨论工作尊严

工作尊严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表面上看，这样的理想几乎没有争议。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拒绝重建工作尊严。但是严肃对待工作——把工作视为获得认可的舞台——的政治议程会给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带来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因为重建工作尊严会挑战那些基于市场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普遍赞同的观点——市场结果反映人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真正社会价值。

一想到工资，大多数人就会同意，人们在这份或那份工作中赚的钱总是高于或低于他们所做工作的真正社会价值。只有狂热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会坚持认为富有的赌场巨头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儿科医生价值的1000倍。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许多人反思，至少短暂思考了杂货店店员、送货员和家庭护理员等必要但收入微薄的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市场化社会中，我们很容易把赚的钱与对社会做的贡献混淆，这种倾向很难避免。

这种混淆不仅仅是粗心思考的结果。把赚钱与贡献混淆，不会因哲学辩论

揭露了其缺点而停止。它反映了精英阶层希望世界的安排方式是让我们得到的与我们应得的达到一致。正是这种希望推动了宿命论者从《旧约》到如今对“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言论的思考。

在市场驱动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冲动，即想要把物质上的成功解释为道德应得性的标志。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诱惑。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辩论清楚并制订措施，这些措施会促使我们慎重地、民主地反省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市场结论在何处错过了目标。

指望这样一场辩论就能让人们达成一致显然不现实，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但关于工作尊严的新一轮辩论会打破各党派的自以为是，在道德上激励我们的公共话语，并让我们超越40年来市场信仰和优绩至上的傲慢遗留下来的两极政治。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考虑两个版本的政治议程，二者都关注工作的尊严，以及挑战市场结果以确认关注工作尊严的必要性。一个版本来自保守方向，另一个来自进步方向。

“开放议程”的傲慢

第一个版本来自一位年轻的保守派思想家奥伦·卡斯，他曾经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政策顾问。在见解深刻的《过去和未来的工人》（*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书中，奥伦·卡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解决特朗普引发但未化解的不满情绪。卡斯认为，美国工作的革新要求共和党人放弃拥护自由市场的传统。共和党人不应指望通过推动企业减税和加强自由贸易来增加GDP，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能让工人找到工资足够高的工作的政策上，以支持强大的家庭和社区。卡斯主张，对一个好的社会来说，这比经济增长更重要。^[54]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一项政策，就是给低收入工人发工资补贴——这不是共和党人的行事标准。这个想法是，政府根据目标时薪，给低收入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提供补充工资。工资补贴在某种程度上与所得税相反。政府不但不会扣除工人的所得，还会给每个工人支付一定的工资补贴，希望让低收入工人即使缺乏能获得可观工资的技能，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55]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各国经济发展，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引人注目的工资补贴方案。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工作者提供失业保险，英国、丹麦和荷兰替没有裁员的公司支付了75%~90%的工资。工资补贴的好处就是让老板在紧急情况下以工资留住员工，而不是解

雇他们，迫使他们依赖失业保险过活。相比之下，美国的方法虽弥补了职工的工资损失，但没能通过让职工保住工作来肯定工作的尊严。[56]

卡斯提出的其他建议对保守派更有吸引力，比如减少影响制造业和采矿业就业的环境法规。[57]就移民和自由贸易这些令人担忧的主题，卡斯敦促从工人的角度而不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低的消费者价格，那么自由贸易、外包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就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最关心的是创造劳动力市场，让美国的中低技术工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抚养子女，建立社区，那么对贸易、外包和移民的一些限制就是正当的。[58]

无论卡斯的具体建议有什么优点，其方案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样就把我们的焦点从GDP最大化转移到了创造有利于工作尊严和社会凝聚力的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他对全球化支持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全球化支持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坚持认为关键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翼和右翼，而是开放和封闭。卡斯准确地指出，构建全球化争论的这种方式，把“高技能、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经济赢家”认定为思想开放的，给批评他们的人贴上思想闭塞的标签，仿佛质疑商品资本、人口的跨国流动是一种偏执一样。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居高临下、更盛气凌人的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辩护的方式。[59]

支持“开放议程”的人坚持认为，对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来说，应对方法是更好的教育。“开放议程的愿景应该很有吸引力，人们可以得到提升，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卡斯写道，“但开放议程的真正含义可能没有这么高尚。如果经济不再为普通员工服务，那么需要转型来适应经济发展的就是普通员工。”他总结道：“在多数人发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民主政体中，开放议程不可持续，其主张缺乏力量。”卡斯引用“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指出“问题不在于开放议程是否会失败，而在于开放议程会输给什么”。[60]

金融、投机和公共利益

第二种恢复工作尊严的方法更可能引起政治进步人士的共鸣，这会突出全球化议程中往往遭到主流政党忽视的方面——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业受到了公众的格外关注，引发的争论主要关于纳税人紧急救助的条款，以及如何改革华尔街以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公众极少注意到金融业在近几十年如何重塑经济，以及如何巧妙改变了精英与成功的含义。这种转变深深影响了工作尊严。相比金融业，贸易与移民在民粹主义抵制全球化中的作用更显著，对工人阶级的工作和地位的影

响显而易见且更为直接。但是，经济的金融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可能更严重，而且更令人泄气。这是因为经济金融化或许提供了现代经济中最清楚的案例，说明了市场回报与真正为公共利益做出的贡献之间的差距。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业发展迅猛，如今在发达经济体中显得尤为突出。在美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自20世纪50年代起增长了近两倍，到2008年，金融业占有超过30%的企业利润。金融业的雇员比其他行业同等资质的员工多赚70%。^[61]

如果金融活动是有生产力的，如果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体生产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本身也是没有生产力的。金融的作用是通过分配资本来促进经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有用的目标——新的企业、工厂、道路、机场、学校、医院、家庭。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爆炸式增长，金融业越来越少地涉及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事件涉及复杂的金融工程，这些金融工程为参与各方带来了巨额利润，却无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62]

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所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过去二三十年，在富有的发达国家中，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或增强了其稳定性，而且金融活动有可能是从实体经济中提取租金（不正当的暴利），而非实现经济价值。”^[63]

这一慎重的判断是对克林顿政府及英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放宽金融业管制的传统观点的毁灭性裁决。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近几十年，由华尔街设计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对经济的伤害其实大于帮助。

考虑一个具体的事例。迈克尔·刘易斯在其《高频交易员》（*Flash Boys*）一书中讲述了一家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铺设了一条连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光缆，这根光缆把五花肉期货和其他投机的交易速度提高了几毫秒。这极小的优势在高频交易员眼中价值数亿美元。^[64]但很难断言，把交易速度从一眨眼增加到更快，能对经济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高频交易并不是经济价值可疑的唯一一项金融创新；让投机者在不投资任何生产活动的情况下为未来的价格下赌注的信用违约互换，很难与赌场赌博区分开来。一方会赢，另一方会输，钱被转手，但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投资。当公司用利润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研发或新设备时，股东从中获利，但公司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升。

1984年，当经济金融化开始成功时，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

宾对“金融市场的赌场外表”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了警告。他担心“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我们青春的精华，投入远离产品和服务生产的金融活动，以及能带来与其社会生产力不成比例的高额私人回报的活动。”^[65]

很难确切地知道，金融活动的什么部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什么部分为金融业本身带来了非生产性的意外之财。但是可靠的权威人士阿代尔·特纳估计，在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企业，其他都流入对现有资产或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机活动。^[66]即使金融的生产力方面给低估了一半，这仍然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数字。金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道德上和政治上。

在经济上，这表明许多金融活动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这些估算揭露了市场给金融的报酬与其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和那些参与投机活动者享有的不成比例的威望一起，嘲弄了那些在实体经济中生产实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的尊严。

担心现代金融的负面经济影响的人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法。然而，我关心的是现代金融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一项认可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会利用税收制度，阻止投机行为并尊重生产性劳动，以此重新配置经济体系中的尊重（哪些行业与哪些活动更受尊重）。

一般而言，这意味着税收负担从工作转向消费和投机。彻底的做法是降低甚至取消工资税，反过来采取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业务征税的方式来提高税收。朝此方向的一小步是降低工资税（工资税导致雇主和雇员的工作成本都很高），并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来弥补税收的损失，这些高频交易对实体经济贡献很小。

这些及其他把税收负担从劳动转变到消费和投机的措施，可以让税收制度比现在更有效，对富人收更多税。但是这些考虑因素无论多么重要，都并非唯一要紧的因素。我们也应该考虑税收的表达意义。在此我指的是对成功和失败、荣誉和认可的态度，这些态度根植于我们对公共生活投资的方式。税收不仅是提高收入的方式，也是表达社会判断——什么是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贡献——的方式。

生产者和索取者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税收政策的道德方面很熟悉。我们常常争论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这个税或那个税会更多地落在富人还是穷人身。但是对税收公平与否的表达维度超越了对公平本身的争论，达到了社会所做的道德判断的维度，即哪些活动值得尊敬和认可、哪些活动应该受到劝阻。有

时候，这些判断是明确的。对烟草、酒精和赌场征的税叫作“罪恶税”，因为这种税收是为了阻止被视为有害的或不良的活动（吸烟、喝酒、赌博）。这种税提高从事这些活动的成本，以此表达社会对这些活动的反对。提议对含糖汽水（以防止肥胖）和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征税同样也是力图改变和塑造行为方式。

并不是所有的税都有这个目的。我们对收入征税不是为了反对有偿工作，也不是阻止人们从事有偿工作。正常的消费税也不是为了遏制购买东西，这些税仅仅是提高税收的手段。

然而，道德判断总是蕴含在看似价值中立的政策中。当税收涉及工作及人们赚钱的各种方式时，尤其如此。例如，为什么对资本利得征税的税率要低于劳动收入的？当沃伦·巴菲特指出作为亿万投资者，他纳税的税率低于他的秘书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67]

有些人争辩道，对投资的征税力度小于对工作的征税力度，能鼓励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争辩纯粹是实用性的，或者说是功利的；这样征税是为了增加GDP，而不是为了奖赏那些获得资本利得的富有投资者。但从政治上看，这种看似实际的主张是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道德假设（关于才能的争论）之中获得部分说服力的。这种假设就是投资者是“就业创造者”，他们应当得到“更低税率”作为回报。

共和党国会议员保罗·瑞安提出了这一论点的一个鲜明版本，他是美国众议院前任议长，也是自由派作家艾恩·兰德的崇拜者。瑞安是福利制度的批评者，他区别了生产者（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人）和索取者（领取福利大于纳税的人）。他担心，随着福利制度的发展，所谓的索取者会变得比生产者多。^[68]

有些人反对瑞安谈论经济贡献的高度道德化方式。有些人接受了瑞安对生产者和索取者的区分，但认为瑞安没有准确认出这两类人。拉娜·弗洛哈尔是《金融时报》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商业专栏作家，她在了一本很有洞察力的书中提供了第二种观点的有力例子，这本书叫《生产者和索取者：金融的兴起和美国商业的衰落》（*Makers and Takers: 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弗洛哈尔引用了阿代尔·特纳和沃伦·巴菲特等批评非生产性金融化的人士的话，认为当今经济中的主要索取者是那些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人士，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意外之财，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金融手段都没有让我们更加繁荣。相反，这些金融手段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引发了更多的金融危机，危机每次发生都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金融对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了一种威胁。更多的金融

活动不是在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而是在减缓经济增长。[69]

弗洛哈尔总结道，所谓的“生产者”是那些“在社会中获取最多的人：从占收入比例来看，他们缴纳着最少的税，攫取与贡献不成比例的经济蛋糕份额，推进经常与增长背道而驰的商业模式”。但她认为，真正的“生产者”是那些在实体经济中劳动以提供实用产品和服务的人，以及那些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人。[70]

关于当今经济中谁是生产者、谁是索取者的争论，根本上关于贡献正义，关于什么经济角色值得尊敬和认可。要想清楚这个，就需要公开讨论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的珍贵贡献。我提议向对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的赌场式投机行为征收金融交易税——一种“罪恶税”，用这类税来代替部分或全部的工资税。此提议是构建这个辩论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式，我认为，重塑工作的尊严要求我们面对经济安排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被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官僚政治掩盖了。

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另一个是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肩负什么义务。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如果不一起思考我们共同生活的目的，我们就无法确定什么算是值得肯定的贡献。如果没有归属感，不把自己看成互相亏欠的社会成员，我们就不能思考共同的目标。只有当我们依赖他人，并认识到自己的依赖性时，我们才有理由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集体福祉做出的贡献。这需要足够强的团体意识，让公民能说出来并相信“我们都在一起”——不是作为危机时期的仪式性咒语，而是作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可信描述。

在过去40年里，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和精英的成功观共同作用，解开了这些道德上的联系。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及二者催生的世界性的身份认同，导致我们不再那么依赖我们的同胞，不再那么感激他们做的工作，不太愿意接受团结的诉求。优绩至上制度的分类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因此削弱了我们的亏欠感。如今我们正处于这场分裂产生的愤怒旋风中。为了恢复工作的尊严，我们必须修复在优绩至上时代已经瓦解的社会纽带。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51. See also Sawhill, *The Forgotten Americans*, p. 60; Oren Cass,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8), pp. 103–4.

[2] Case and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 161; Sawhill, *The Forgotten Americans*, p. 86.

[3]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p.140–41;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152.

[4]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41.

[5]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7;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9.

[6]Sawhill,The Forgotten Americans,p.18;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51. See also Nicholas Eberstadt,Men Without Work:America's Invisible Crisis(West Conshohocken,PA:Templeton Press,2016).

[7]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p.2,37–46;Associated Press,“For 1st Time in 4 Years,U.S.Life Expectancy Rises—a Little,”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2020,[nytimes.com/aponline/2020/01/30/health/ap-us-med-us-life-expectancy-1st-lid-writethru.html](https://www.nytimes.com/aponline/2020/01/30/health/ap-us-med-us-life-expectancy-1st-lid-writethru.html);Nicholas D.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Tightrope: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New York:Alfred A.Knopf,2020).

[8]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9]Ibid.,pp.40,45.

[10]Ibid.,p.143.

[11]2016年，有6.4万名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数据来自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gov/nchs/nvss/vsrr/drug-overdose-data.htm](https://www.cdc.gov/nchs/nvss/vsrr/drug-overdose-data.htm)。在越南战争中，有58220名美国人丧生，参见“Vietnam War U.S.Military Fatal Casualty Statistics,National Archives”:[archives.gov/research/military/vietnam-war/casualty-statistics](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military/vietnam-war/casualty-statistics)。

[12]Nicholas Kristof,“The Hidden Depression Trump Isn't Helping,”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8,2020,[nytimes.com/2020/02/08/opinion/sunday/trump-economy.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8/opinion/sunday/trump-economy.html). See also Kristof and WuDunn,Tightrope,p.10.

[13]Case and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3.

[14]Ibid.,p.57.

[15]Ibid.,pp.57–58.

[16]Ibid.,pp.133,146.

[17]BA是below verg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低于平均水平。——译者注

[18]Ibid.,p.3.

[19]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1/jun/29/comment.

[20]John W.Gardner,Excellence:Can We Be Equal and Excellent Too?,p.66.

[21]Jeff Guo,“Death Predicts Whether People Vote for Donald Trump,”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4,2016,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6/03/04/death-predicts-whether-people-vote-for-donald-trump.

[22]Richard Butsch,“Ralph,Fred,Archie and Homer:Why Television Keeps Re-creating the White Male Working Class Buffoon,”in Gail Dines and Jean Humez,eds.,Gender,Race and Class in Media:A Text-Reader,2nd ed.(Thousand Oaks,CA:Sage,2003),pp.575–85;Jessica Troilo,“Stay Tuned:Portrayals of Fatherhood to Come,”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6,no.1(2017),pp.82–94;Erica Scharrer,“From Wise to Foolish:The Portrayal of the Sitcom Father,1950s–1990s,”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5,no.1(2001),pp.23–40.

[23]Joan C.Williams,White Working Class:Overcoming Class Cluelessness in America(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7)

[24]原文为flyover states,指的是那些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精英群体在美国东西两岸间往返时,透过飞机窗口才会远远看上一眼而没有兴趣降落在那里亲身感受一下的中部州,这一称呼带有贬义色彩。——译者注

[25]原文为trailer trash,指地位低下的贫困白人。——译者注

[26]原文为plumber’s butt,指管道工穿低腰牛仔裤时,会露出自己的臀部,表示贬义。——译者注

[27]Joan C.Williams,“The Dumb Politics of Elite Condescension,”The New York Times,May 27,2017,nytimes.com/2017/05/27/opinion/sunday/the-dumb-politics-of-elite-condescension.html.

[28]Joan C.Williams,“What So Many People Don’t Get About the U.S.Working Cla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 10,2016,hbr.org/2016/11/what-so-many-people-dont-get-about-the-u-s-working-class.

[29]Barbara Ehrenreich,“Dead,White,and Blue,”TomDispatch.com,December 1,2015,tomdispatch.com/post/176075/

tomgram:_barbara_ehrenreich,_america_to_working_class_whites:_drop_dead!/:the W.E.B.Du Bois quote is from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935).

[30]Barbara Ehrenreich,“Dead,White,and Blue.”

[31]Katherine J.Cramer,*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32]Katherine J.Cramer,“For Years,I’ve Been Watching Anti-Elite Fury Build in Wisconsin.Then Came Trump,”*Vox*,November 16,2016,vox.com/the-big-idea/2016/11/16/13645116/rural-resentment-elites-trump.

[33]Arlie Russell Ho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New York:The New Press,2016),p.135.

[34]*Ibid.*,p.141.

[35]*Ibid.*,pp.136–40.

[36]*Ibid.*,p.144.

[37]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在线档案中检索“dignity of labor”(工作的尊严) :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

[38]Jenna Johnson,“The Trailer:Why Democrats Are Preaching About‘the Dignity of Work,’”*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1,2019,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paloma/the-trailer/2019/02/21/the-trailer-why-democrats-are-preaching-about the-dignity-of-work/5c6ed0181b326b71858c6bff/;Sarah Jones,“Joe Biden Should Retire the Phrase‘Dignity of Work,’”*New York*,May 1,2019,nymag.com/intelligencer/2019/05/joe-biden-should-retire-the-phrase-dignity-of-work.html;Marco Rubio,“America Needs to Restore the Dignity of Work,”*The Atlantic*,December 13,2018,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2/help-working-class-voters-us-must-value-work/578032/;Sherrod Brown,“When Work Loses Its Dignity,”*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7,2016,nytimes.com/2016/11/17/opinion/when-work-loses-its-dignity.html;Arthur Delaney and Maxwell Strachan,“Sherrod Brown Wants to Reclaim‘The Dignity of Work’from Republicans,”*Huffington Post*,February 27,2019,dignityofwork.com/news/in-the-news/huffpost-sherrod-brown-wants-to-reclaim-the-dignity-of-work-from-republicans/;Tal Axelrod,“Brown,Rubio Trade Barbs over‘Dignity of Work’as Brown Mulls Presidential Bid,”*The*

Hill,February 22,2019,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31152-brown-and-rubio-trade-barbs-over-dignity-of-work-as-brown-mulls.

[39]农业部长桑尼·珀杜的话引自Johnson,“Why Democrats Are Preaching about‘The Dignity of Work’”;Donald J.Trump,“Remarks on Tax Reform Legislation,”December 13,201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331762;关于减税的分配效果,可见Danielle Kurtzleben,“Charts:See How Much of GOP Tax Cuts Will Go to the Middle Class,”NPR,December 19,2017,npr.org/2017/12/19/571754894/charts-see-how-much-of-gop-tax-cuts-will-go-to-the-middle-class.

[40]Robert F.Kennedy,Press Release,Los Angeles,May 19,1968,in Edwin O.Guthman and C.Richard Allen,eds.,RFK:Collected Speeches(New York:Viking,1993),p.385.

[41]对分配正义的讨论,参见Paul Gomberg,“Why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Impossible but Contributive Justice Would Work,”*Science & Society* 80,no.1(January 2016),pp.31–55。Andrew Sayer,“Contributive Justice and Meaningful Work,”*Res Publica* 15,2009,pp.1–16;Cristian Timmermann,“Contributive Justice:An Exploration of a Wider Provision of Meaningful Work,”*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1,no.1,pp.85–111;and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Economic Justice for All: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S.Economy,”1986,p.17,usccb.org/upload/economic_justice_for_all.pdf.

[42]对公民政治观与消费主义政治观的更详细对比,参见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pp.4–7,124–67,201–49;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p.192–99。

[43]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apter 8(1776;reprint,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4),p.715.

[44]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1936;reprint,London:Macmillan,St.Martin’s Press,1973),p.104.

[45]Sandel,*Democracy’s Discontent*,pp.124–200.

[46]我描述了这一转变, *ibid.*,pp.250–315。

[47]Martin Luther King,Jr.,March 18,1968,Memphis,Tennessee,kinginstitute.stanford.edu/king-papers/

publications/autobiography-martin-luther-king-jr-contents/chapter-31-poor-peoples.

[48] John Paul II, *On Human Work* (Encyclical *Laborem Exercens*), September 14, 1981, 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14091981_laborem-exercens.html, sections 9 and 10.

[49]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Economic Justice for All: Pastoral Letter o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U.S. Economy,” 1986, p. 17, usccb.org/upload/economic_justice_for_all.pdf.

[50]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or Redistribu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Moral Order of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 issue 2–3 (2001), pp. 43–55.

[51] Axel Honneth, “Work and Recognition: A Redefinition,” in Hans-Christoph Schmidt am Busch and Christopher F. Zurn, eds., *The Philosophy of Recogniti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29–33. For the relevant passages in Hegel, see 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ited by Allen W. Wood,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ragraphs 199–201, 207, 235–56 (Wood edition, pp. 233–34, 238–39, 261–74). See also Nicholas H. Smith and Jean-Philippe Deranty, eds., *New Philosophies of Labour: Work and the Social Bond* (Leiden, NL: Brill, 2012), and Adam Adatto Sandel, “Putting Work in Its Place,” *American Affairs* 1, no. 1 (Spring 2017), pp. 152–62, 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7/02/putting-work-place. 我对黑格尔的工作概念的理解得益于与亚当·桑德尔的讨论。

[52] Axel Honneth, “Work and Recognition,” pp. 234–36. See É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1902), edited by Steven Lukes,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2014).

[53] Robert F. Kennedy, Press Release, Los Angeles, May 19, 1968, in Guthman and Allen, eds., *RFK: Collected Speeches*, pp. 385–86.

[54] Oren Cass,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ca*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8).

[55] *Ibid.*, pp. 161–74. 关于工资补贴的想法，也可参见 Daniel Markovits, *The Meritocracy Trap*, pp. 282–83.

[56] Peter S. Goodman, "The Nordic Way to Economic Rescu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20, [nytimes.com/2020/03/28/business/nordic-way-economic-rescue-virus.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8/business/nordic-way-economic-rescue-virus.html); Richard Partington, "UK Government to Pay 80% of Wages for Those Not Working in Coronavirus Crisis," *The Guardian*, March 20, 2020, [theguardian.com/uk-news/2020/mar/20/government-pay-wages-jobs-coronavirus-rishi-sunak](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0/mar/20/government-pay-wages-jobs-coronavirus-rishi-sunak);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Jobs Aren't Being Destroyed This Fast Elsewhere. Why Is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20, [nytimes.com/2020/03/30/opinion/coronavirus-economy-saez-zucman.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opinion/coronavirus-economy-saez-zucman.html).

[57] Oren Cass, *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pp.79–99.

[58] *Ibid.*, pp.115–39.

[59] *Ibid.*, pp.25–28, 210–12.

[60] *Ibid.*, pp.26, 211–12.

[61] Robin Greenwood and David Scharfstein, "The Growth of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2 (Spring 2013), pp.3–5, 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27.2.3, citing Thomas Philippon and Ariell Reshef,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1909–2006," NBER Working Paper 14644 (2009) on financial service earnings; Adair Turner,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 7, 19–21; See also Greta R.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8.

[62] Rana Foroohar, *Makers and Takers: 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6); Adair Turner, *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 Objectives and Me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pp.35–55; J. Bradford Delong, "Starving the Squid," *Project Syndicate*, June 28, 2013, 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ime-to-bypass-modern-finance-by-j-bradford-delong.

[63] Adair Turner, "What Do Banks Do? Why Do Credit Booms and Busts Occur and What Can Public Policy Do About It?"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The LSE Repor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10), harr123et.wordpress.com/download-version.

[64] Michael Lewis, *Flash Boys: A Wall Street Revol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2015),pp.7–22.

[65]James Tobin,“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Lloyds Bank Review*,July 1984,p.14,cited in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p.53–54.

[66]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7.

[67]Warren E.Buffett,“Stop Coddling the Super-Rich,”*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4,2011,nytimes.com/2011/08/15/opinion/stop-coddling-the-super-rich.html.

[68]瑞安后来修正了他的陈述。See Paul Ryan,“A Better Way Up from Poverty,”*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5,2014,wsj.com/articles/paul-ryan-a-better-way-up-from-poverty-1408141154?mod=article_inline。Greg Sargent,“Paul Ryan Regrets That‘Makers and Takers’Stuff.Sort of,Anyway,”*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23,2016,washingtonpost.com/blogs/plum-line/wp/2016/03/23/paul-ryan-regrets-that-makers-and-takers-stuff-sort-of-anyway.

[69]Rona Foroohar,*Makers and Takers*,p.13.

[70]*Ibid.*,p.277.

结语 佳绩与公共利益

亨利·亚伦是最出色的棒球运动员之一，他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大。根据其传记作者霍华德·布赖恩特的描述，“亨利小时候看着他父亲被迫把自己在杂货店排队的位置让给每一个进店的白人”。当杰基·罗宾逊打破棒球的肤色界限时，13岁的亨利受到鼓舞，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在大联盟打球。没有棒球和球棒，他就用现有的棍子练习，用一根棍子打他哥哥扔给他的瓶盖。他后来打破了贝比·鲁斯职业生涯的全垒打纪录。^[1]

在一次评论中，布赖恩特心酸地写道：“可以说，击球代表了亨利在生命中第一次展现卓越的才华。”^[2]

如果不对佳绩至上衷心拥护，不把成为精英视为对不公正的终极解决方案，就很难读懂这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以卓越的才能克服包括偏见、种族主义和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不公正。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向结论迈出了一小步，即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佳绩至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只要发挥才能和努力奋斗就能得到提升。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亨利·亚伦的故事的寓意不在于我们应该衷心拥护佳绩至上，而在于我们应该鄙视一种只有打出本垒打才能逃脱的种族不公正制度。机会均等是对不公正在道德上的必要纠正，但这是补救原则，而不是美好社会的恰当理想。

超越机会平等

要保持这种区别并不容易。受到少数人奋力崛起的鼓舞，我们不禁要问，其他人如何才能摆脱让他们不堪重负的境况。我们没有去改变人们想要逃离的生活窘况，而是构建了一种政治，想将提高流动性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

打破障碍是件好事。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贫穷或偏见而退缩，但美好的社会不能仅仅以保证逃离不公为前提。

只关注或主要关注社会流动，并不能培养民主所需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归属。即使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比我们更强的社会，也需要找到办法，让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在原地蓬勃发展，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一员。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让那些无法成为精英的人日子不好过，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归属。

人们常常认为，机会平等的唯一替代办法是苍白的、压制性的结果平等。但还有另一种选择：生活境况广泛平等，让那些没有获得巨额财富或显赫地位的人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赢得社会尊重的工作中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分享广泛传播的学习文化，并与他们的同胞商讨公共事务。

关于生活境况平等的两个最好的解释出现在“大萧条”期间。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R.H.托尼在1931年出版的《平等》（*Equality*）一书中指出，机会平等充其量只是局部的理想。“‘向上流动’的机会，”他写道，“并不能取代广阔范围内的实际平等，也不会让收入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差距变得无关紧要。”^[3]

社会福利……有赖于凝聚力和团结。这不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且提供了高水平的通识文化和强烈的公共利益感。个人幸福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自由地上升到舒适和卓越的新地位，还要求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和有文化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向上流动。^[4]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一位名叫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作家为美国写了一首赞歌——《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很少有人记得这本书，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书的最后几页创造了一个短语——“美国梦”。从我们的时代回顾，我们很容易把他对美国梦的描述与我们对阶层跃升的夸夸其谈等同起来。亚当斯写道，美国给人类的独特礼物是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每个人都有机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富足、更充实”。^[5]

这不是仅追求汽车和高工资的梦想，而是追求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能够达到他们凭借与生俱来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得到他人的认可，无论他们的出身或地位如何。^[6]

但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亚当斯描述的梦想不仅仅是向上流动，还是实现广泛的、民主的平等。作为具体的例子，他提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是民主可以为自己实现什么的象征”，是吸引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前来参与公共学习的场所。

人们来到普通阅览室，就可以看到仅一间阅览室就有一万卷书，甚至不需要开口问别人就可以取书阅读。人们看到，座位上坐满了安静的读者，老年人和年轻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行政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将军和列兵、著名学者和学生，都在他们自己的民主政体提供的图书馆里阅读。^[7]

亚当斯认为这一幕是“美国梦——人民自己积累的资源，（以及）有足够

智慧使用这些资源的公众所提供的手段——完美展现的实例”。亚当斯写道，如果这个例子可以在美国国家生活的所有部门中实施，“美国梦就会成为持久的现实”。^[8]

民主与谦逊

我们今天没有多少境况的平等。把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空间极为稀少。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让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非常显著，导致我们拥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富人与收入中等的人在一天之中也很少会碰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我们的孩子上不同的学校。精英分类机器完成了分类工作时，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他们应该获得成功，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也应该处于底层的位置。这助长了恶毒的政治氛围，加剧了党派之争，现在许多人认为跨党派婚姻比跨信仰婚姻带来的麻烦还大。毫不奇怪，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思考重大公共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相互倾听的能力。

优绩至上始于一种给我们赋能的理念，即我们可以依靠工作和信仰，让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有利。这一理念的世俗版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个人自由承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做到。

但这种自由的愿景让我们远离了共同承担民主事业的义务。回想一下我们在第7章讨论过的两类公共利益的概念：消费主义的公共利益概念和公民的公共利益概念。如果公共利益仅仅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那么最终实现境况的平等并不重要。如果民主仅仅是各种手段的经济学，是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偏好加在一起的问题，那么民主的命运就与公民的道德纽带无关。无论我们共享充满活力的共同生活，还是与我们自己的同类一起居住在私有化的飞地，消费主义的民主概念可以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

但是，如果只有与我们的公民同胞商讨符合我们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和目标，才能实现公共利益，那么民主就不能对共同生活的性质漠不关心。民主并不要求完全平等，但民主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的公民在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相互接触。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分歧的方式，也是我们关心公共利益的方式。^[9]

优绩至上的信念是，人们应该得到市场赋予他们才能的任何财富，这导致团结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成功的人要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有所亏欠？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抑或是命运的神秘，我

也会遭受如此厄运。”这种谦卑是我们从残酷的成功伦理中回归的开始，而正是这种成功伦理让我们分道扬镳。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1]Howard Bryant,The Last Hero:A Life of Henry Aaron(New York:Pantheon Books,2010),p p.23–27.

[2]Ibid.,p.25.

[3]R.H.Tawney,Equality(1931,reprint ed.,London:Unwin Books,1964).

[4]Ibid.

[5]James Truslow Adams,The Epic of America(Garden City,NY:Blue Ribbon Books,1931),p.404.

[6]Ibid.

[7]Ibid.,pp.414–15.

[8]Ibid.,p.415.

[9]本段来自Michael J.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203。

致谢

我很感激有机会在几个场合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探讨这本书的一些主题：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政治理论讨论会上，乔纳森·古尔德的一篇犀利的评论文章让我大受裨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夏季教师研讨会，引发了我与理查德·法伦、特里·费希尔、约柴·本克勒和本·萨克斯的挑战性回应和后续交流；我和我的妻子姬库·阿达托在哈佛大学马欣德拉人文中心共同主持的教师研讨会对艺术、流行文化和市民生活进行了讨论。

在2019年秋季学期，我在一场关于“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研讨会上给我所遇到的最有活力、最有智慧的一群本科生讲课。我感谢他们所有人加深了我对本书主题的理解。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丹尼尔·马科维茨近期出版了一本关于优绩至上的书，我们在研讨会上读到了这本书。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一场令人难忘的讨论，我和学生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有幸在讲座中介绍了本书的部分内容，随后在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学术和公共场合进行了讨论：圣母大学尼迈耶政治哲学讲座；西班牙毕尔巴鄂德乌斯托大学的加门迪亚纪念讲座；德国柏林美国学院的空中客车讲座；伦敦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促进会（RSA）；奥地利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意大利威尼斯乔治·奇尼基金会的重启文明对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马歇尔研究所；西北大学的民主议程会议；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法国日成立仪式。感谢所有这些场合的听众和讨论者的周到参与。

我要感谢伊丽莎白·安德森、莫什·哈尔伯托、彼得·霍尔、丹尼尔·马科维茨、库伦·墨菲和塞缪尔·谢弗勒就本书的各个方面和我进行了有益的对话或电子邮件交流；查尔斯·彼得森分享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精英教育和大学录取的章节，阿拉温德·“文尼”·拜珠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公司（FSG）的德博拉·吉姆提供了周到的编辑支持。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纽约ICM合伙公司令人尊敬的埃丝特·纽伯格，以及伦敦Curtis Brown公司的卡罗丽娜·萨顿、海伦·曼德斯和萨拉·哈维。

由于乔纳森·加拉西、米兹·安格尔、杰夫·塞罗伊和希拉·奥谢慷慨的智力和文学敏感性，这是我第三次与FSG合作出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要特别感谢埃里克·钦斯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在我写这本书之前，他了解我希望这本书实现的目标，并在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明智的建议。我也非常感谢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他是我在英国的出版商艾伦巷/企鹅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和埃里克一样，他对每一章都进行了仔细的批判性阅读。接受大西洋两岸编辑这样的关怀，让我没有理由为自己仍

然存在的任何弱点辩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作家小屋”的成员，他们是我的妻子姬库·阿达托、我们的儿子亚当·阿达托·桑德尔和亚伦·阿达托·桑德尔。我已经习惯了向聚集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大声朗读草稿段落和章节，邀请大家发表意见，并分享对我们各自项目的评论。他们的关注、建议和爱，帮助了我和本书一起改进。

译后记

近些年来，美国在经济持续繁荣的形势下，其政治、社会与文化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大多数人是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乃至经济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追溯该现象的源头的，而桑德尔这本书另辟蹊径，从公共哲学及由公共哲学塑造的管理体制来探究肇始。

主流政治人物及媒体无法理解政治怨恨何以弥漫，以为给这些政治怨恨贴上民粹主义、仇外主义之类的标签就能解释清楚。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严重分裂，首先表现为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在全球化经济中赢家与输家的分裂。赢家与输家的全面分裂，固然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及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按照桑德尔的梳理，优绩至上主义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优绩至上思维深入人心，人们总以为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优绩至上，而很少有人想到优绩至上原则自身具有重大缺陷。

优绩至上主义的核心是信奉自己的命运靠自己创造，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应完全由自己承担。按照桑德尔的追溯，优绩至上主义的观念，无论在基督教传统中，还是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其实都起源甚早，只是到近几十年才占据了主导地位。吊诡的是，优绩至上主义相比世袭等级制度，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桑德尔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做出的预言：优绩至上的逻辑会助长赢家的狂妄自大，加重失败者的屈辱，导致社会不和谐。迈克尔·扬当初并未预料到近几十年的市场全球化扩张方式，赢家与输家的分裂方式可能因全球化的进程而有所不同，但优绩至上的逻辑本身倾向于带来赢家与输家的分裂，这是确定无疑的。

优绩至上主义允诺了美好的愿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争取成功，但是，它也容易给在竞争中失利的人带来沉重的羞辱——自己失利是由于自己无能。优绩至上主义要求没有走上成功道路的人为自己的失利负责，削弱了精英设身处地理解弱者的能力，也削弱了整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结。

基督教传统中历来就存在对命运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天命论，即完全由上帝决定人的命运；一种是自力论，即完全由自己的作为与天分决定命运。二者在基督教传统中一直此消彼长，但到了最近几十年，成功神学把天命论与自力论的优绩至上主义融为一体，尽管世俗的自由主义与成功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同样把天命论与优绩至上主义糅合，但更为常见的优绩至上主义已沛然成为主流话语。然而，优绩至上话语日益盛行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分裂加剧之时。优绩至上主义削弱社会的团结，营造文

凭主义偏见，损害普通劳动者的尊严，激发了遭受贬损的阶层对精英群体的愤恨，加深了社会对立。

桑德尔着重分析了优绩至上思维在政治、教育、工作三个领域的表现。第一，在政治上，主流政治人物和政党完全没有想到优绩至上主义自身就是政治、社会与文化分裂的渊源之一。面对经济社会问题，从优绩至上主义的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总想将高等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手段，这不仅无力解决问题，反而还深化了问题。“一门心思想将更广泛地实施高等教育作为解决普通劳动者职位不保的办法”，吟诵“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的咒语，一方面忽视了绝大多数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劳动贡献缺乏理解。优绩至上在政治上的恶果，表现为传统左翼政党逐步信奉优绩至上，结果逐渐背离了历来的社会基础——普通劳动者阶层，把这一阶层推向了民粹主义。第二，在教育领域，优绩至上主义逐步把教育设计成了分类机器，年轻人不断接受分类、筛选、排名，教育逐步异化，分类与争先取代了教育中的教与学，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育功能在衰减，而资格认证功能则不断膨胀。基础教育中的激烈竞争也让优胜者付出了极为残酷的代价，优胜者身心俱疲，被筛选掉的人则蒙受羞辱，陷入沮丧和无力感。优绩至上的教育分类机制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社会流动性，却在实质上把教育成就与社会价值捆绑在一起。文凭主义由此对共同的公民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精英资格的门槛。高等院校投放极大的精力在分类竞争上，反而削弱了其本职所在——教育职能。第三，优绩至上预设的成功伦理，把人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优绩至上的逻辑直接贬损普通劳动者，判定普通劳动者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价值更小，相应地把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正当化了。优绩至上的思维鼓励了羞辱普通劳动者的文化，下层阶级的焦虑与抱怨只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嘲弄与漠视。十多年来，普通劳动者“绝望而死”的比例大幅上升，反映了优绩至上逻辑剥夺就业市场失利者尊严的黑暗后果。桑德尔顺带批评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认为这两种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有效消除优绩至上主义给精英阶层带来的道德自负。

桑德尔分别从政治、教育、工作三个领域提出了扭转优绩暴政的具体设想。这些设想尽管不无道理，但总显得未能切中肯綮。桑德尔的这本书，从始至终关注精英的傲慢。桑德尔认为要克服精英的傲慢，就需要精英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有运气、偶然性之类的因素。这一论断可能说服力有限，精英即使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所致，也照样可以表现得傲慢，就像当年的世袭贵族可以表面谦虚，实质上还是傲慢的。要克服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分裂，核心还是要维护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的一体感，也就是说，优绩至上问题的核心不是精英的态度傲慢，而是精英阶层在情感上脱离大众，这又与他们的生活经历脱离大众有很大关系。

按照桑德尔多次引用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几乎是社会的惯常趋势；20世纪上半叶贫富差距的大幅缩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规模战争对富裕阶层财富的破坏，而二战后，贫富差距被控制在相当温和的程度内，则拜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所赐。在和平年代，恐怕需要政治上的极大勇气与魄力才能对这个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2004年，我在追溯欧美共和主义思想传统时接触了迈克尔·桑德尔的大作《民主的不满》。该书梳理了美国的公共哲学传统，力陈在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之外，美国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其实更为源远流长，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反而是近期才得以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桑德尔在这本书中反复辨析共和主义思想在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隐私、家庭法、经济制度的公民后果这些方面的看法与自由主义观念存在重大差异，重申共和主义思想依然具有合理性，为当代人思考这些主题提供重要参考。该书得到读者广泛关注，2008年以来，其中文译本前后印刷了三次。

2020年11月，周奥扬编辑找到我，说桑德尔教授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受到广泛关注，中信出版社计划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问我是否有时间翻译该书。我大致看了一下该书内容，觉得挺有意思，值得翻译出来给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原著的读者参考。中信出版社在译著出版上已经树立了很好的声誉，也积累了相当出色的经验。在正式确认翻译合同之前，周编辑发过来一份有关翻译工作的完整说明，其中专门指出，“译文应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避免生硬直译。可适当拆分长难句。对于过于简短的原文语句，可酌情增加翻译词语以使译文更易被理解”，这一规则也非常符合本人的想法。

为了译本的完善，周奥扬编辑付出的心血超出我的预期。之前参加翻译工作，我很少看到编辑对译本的具体翻译语句提出可供商榷的详细建议。本书译稿分三个批次提交，周编辑对每个批次的每个篇章都回复了修改建议，对其中一些句子或词语的翻译做出批注，或是提出改进建议，抑或是询问能否调整。另外，首都师范大学的朱慧玲教授曾赴哈佛大学访学，就如何理解这本书的一些重要概念亲自向桑德尔教授请教，这本书中“merit”等关键概念的翻译，也受益于与朱慧玲教授的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2019级财政学与2017级投资学专业的学生当时正在上我开设的《政治学》课程，得知我正在翻译本书，一些同学很有兴趣参与。其中，2017级投资学专业的龚志强和薛宗岳一起负责翻译了这本书的第2章“‘因践行善德而伟大’：优绩的道德简史”的初稿，2019级财政学专业的许嘉晖和王英建一起翻译了这本书的第7章“认可工作的价值”的初稿，2019级财政学专业的梁书宁和李沐泽一起翻译了这本书的注释初稿。这六位同学又分别通读了本书译稿全文，检查可能存在的漏译、笔误、翻译不当、语句不通顺等问题，龚志强和薛宗岳两位同学特别

用心，提出的很多建议得到了采纳。在此感谢这六位同学的热心参与。

最后，我想特别表示对思果先生的敬意。本人在翻译桑德尔《民主的不满》一书时接触了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翻译新究》，大为惊异。思果先生力主“翻译要像中文”的翻译原则，两书细致总结各种翻译错误及失当，说明各种常见的翻译有何不妥，并指出了改进的方法。对照之下，我惭愧地发现，自己之前参与翻译，有相当多的坑都踩过，若不是看到思果先生的辨析，我还会继续把各种“硬译”作为理所当然的标准翻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不时翻阅《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二书，不敢说追求多出色的翻译水平，务求尽量避免思果先生指陈的各种谬误。

思果先生说过，即使对于自己觉得翻译好了的稿子，再重新阅读一遍，也总免不了发现还有些不尽妥当之处。每次翻译完一本书，要将其交付给出版社时，我一方面会期待读者看到我费心琢磨的作品，能从阅读中获得享受，对翻译予以认可，另一方面却又惴惴不安，知道总有不少地方颇有可议之处。如果读者朋友发现这本书的翻译存在应该纠正的地方，恳请来邮告知，所有的批评与建议都是我进步的助力！译者信箱：

zengjmao@mail.shufe.edu.cn。

曾纪茂

2021年2月26日于凤凰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8

书名原文：THE TYRANNY OF MERIT:Can We Find the Common Good？

ISBN 978-7-5217-3146-0

I. ①精... II. ①迈... ②曾... III. ①社会学 - 研究 IV. ①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8178号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著者：[美] 迈克尔·桑德尔

译者：曾纪茂

审校：朱慧玲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1.5

字数：248千字

版次：2021年8月第1版

印次：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20-4757

书号：ISBN 978-7-5217-3146-0

定价：7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村落史

(共 2 册)



 中信出版集团
CITIC Press Group

中国村落史

胡彬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国村落史（上册）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国的早期村落

第三章 国家一统下的村落管控与治理

第四章 南北分裂割据时期的村落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村落的制度化

中国村落史（下册）

第六章 文化大繁荣与村落制度民间化

第七章 文明的繁盛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

第八章 文明的转型与村落的变迁

附录 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



中国 村落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illages



胡彬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村落的定义与内涵

第二节 村落的由来与村落的形成及其特征

- 一、文明的起源与村落的产生
- 二、国家的出现与村落的行政化
- 三、村落共同体的形成
- 四、村落的现代转型

第三节 中国村落的特征

- 一、村落的活态性特征
- 二、村落的血缘性特征
- 三、村落的地域性特征
- 四、村落的封闭性特征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国的早期村落

第一节 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形态

- 一、发生学视域下的村落起源
- 二、农业的兴起与村落的形成
- 三、社会的分化与早期村落变迁

第二节 史前聚落遗址

- 一、黄河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
- 二、长江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
- 三、史前聚落遗址的特征及价值意义

第三节 国家的诞生与村落的蠡测

- 一、早期国家的出现与村落
- 二、商周时期的方国与聚落

第三章 国家一统下的村落管控与治理

第一节 秦汉统治制度下的村落

- 一、乡里制度与村落
- 二、重农抑商政策与村落
- 三、文化一统政策与村落

第二节 国家管控下的乡野聚落

- 一、乡野聚落的类型
- 二、国家对乡野聚落的管控

第三节 秦汉村落的形态

- 一、考古发现的主要村落遗址
- 二、秦汉村落的规模与形态特征

第四节 秦汉村落中的农耕文化

- 一、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 二、节日文化与信仰文化

第五节 秦汉少数民族地区的聚落

- 一、北方地区的聚落
- 二、西域地区的聚落

第四章 南北分裂割据时期的村落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落组织

- 一、乡里组织的兴废
- 二、屯田村落的形成与组织系统
- 三、永嘉之乱与坞壁的兴起
- 四、三长制下的北朝村落与组织

第二节 “村”的出现及其发展

- 一、“村”与自然聚落
- 二、村落的规模及形态

第三节 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

- 一、农业发展与生产工具
- 二、村落的日常生活与节俗
- 三、宗族观念与村落
- 四、村落经济与商贸活动
- 五、村落与宗教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村落的制度化

第一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制度

- 一、村坊制度与村落
- 二、赋税制度与村落

第二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兴衰

- 一、隋唐村落的发展
- 二、晚唐五代村落的衰落

第三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形态

- 一、村落类型及其特征
- 二、村落的景观与建筑

第四节 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

- 一、草市的发展与村落
- 二、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 三、民间组织与村落
- 四、文化教育与伦理教化
- 五、村落中的宗教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

- 一、西北地区的村落
- 二、青藏地区的村落
- 三、北方地区的村落

图片来源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传统村落

自序

远古时期的中华大地，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伴随而生的许多动物遍布崇山峻岭和广袤草原，鱼类更是遍及江河湖泊。早期的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远古的中华先民，生活于山林中的，以打猎获取食物；生活于江河湖海沿岸的，以捕鱼获取食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远古先民朴素的生存哲学。这些容易获得的肉类食物，让早期的先民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不过，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先民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距今12000年左右，北方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时期也正好是古气候学上的“新仙女木事件”[\[1\]](#)发生期，冰期逐渐结束，气候开始变暖。不少草地变成森林，先民原先赖以果腹的动物随之减少。于是，他们开始采集植物为生，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并初步掌握了其生长习性。他们意识到，通过耕种获得食物比纯粹依靠采集的方式获得食物更加可靠稳定。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收集种子，并不断摸索和改进种植技术。原始的种植业就开始萌芽了。同时，他们开始将一些捕获的尚未死亡的剩余猎物养殖起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养殖动物比捕获猎物更省时省力，于是最初的养殖业出现了。种植业与养殖业，差不多是同时发生和存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方地区各区域典型遗址，如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沙窝李遗址、属于磁山文化的磁山遗址、属于大地湾文化的大地湾遗址、属于

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属于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等，均存在以粟、黍为代表的种植业遗存和以猪为代表的养殖业遗存。种植作物与饲养动物的出现，表明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具备雏形。而农业生产的形成，则使得人类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中华先民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需要随处迁徙，可以比较长时期地活动于某些相对固定和有限的地理空间之内。于是，早期的村落就在此基础上演变形成了。

在北方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远古村落民居，为半地穴式的方形建筑，屋内有保存火种与取暖用的圆形火塘，四周墙壁用木柱做骨架，外边敷一层草拌泥。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民居建筑，为半地下圆形，底部铺一层经火烧过的灰白色硬泥，墙壁光滑，屋顶为尖锥形。在南方地区，早期的村落建筑以干栏式为主，适合森林茂密、雨水较多、空气潮湿的山地，以后又有临水干栏式，发展到江河水溪遍布的平地。它以竹木为建筑营造材料，分上下两层，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工具杂物，上层住人。东至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许多遗址，西至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的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等，都有干栏式建筑分布。

定居生活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看，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最早，距今1万年左右就已开始。1978年在甘肃发现的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已经炭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距今已经8 200年了。南方地区，在洞庭湖区的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距今6 500年的水稻田，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最好、世界最早的人工水稻田。同样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则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而在湖南南部的道县玉蟾岩，更是出土了距今约1万年的人

工栽培稻种子。这是全世界目前所知出土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人工栽培稻种子。这些考古大发现确立了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化的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意义重大。

从自然条件来看，传统村落在中华大地产生，完全得益于温和的气候、适中的雨量以及肥沃的土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传统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所以在先民的农业思想里，就将农业与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体。其中，时气属“天”，土壤属“地”，物性、树艺、畜牧三者属“物”，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等则属“人”，天、地、人、物有机统一。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了战国之前的农业生产的内容，这些农业活动都在一年中特定的月份进行，与天象、气候、季节、物候紧密相连。这篇重要的农业文献，也将天地自然与农事活动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传统的堪舆营造思想，村落的规划选址也更加注重与整个自然界的联系。

基于如前的出土物证，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之国。

商周时期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战国时期炼铁技术的成熟发展，这对于村落的发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铸铁铸造技术应用于农具制造，使得农耕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铸铁农具的推广，使得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也使得人口规模扩大。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落形态。其中，“聚”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村落形态，它有“汇集”“聚拢”的意思。这一时期的一些区域村落名称，大致还有“丘”“庐”等。

秦代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初步形成。不过，秦王朝持续的时间较短，它对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主要在汉代开始才见到成效。汉代的农牧分界线比较偏北，农耕技术也扩展到了塞外。汉武帝移

民百万，使河套以南到陕北地区农业的繁荣程度可比关中。东汉到三国时期，气候逐渐寒冷，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与先秦时期相去甚远，加上连年征战，大量的农田遭到废弃。原来活跃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农业民族争夺资源。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出现大衰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带有防御体系的村落，即“坞壁”。著名的坞壁有许褚壁、白超垒（坞）、合水坞、檀山坞、白马坞、百（柏）谷坞，等等。这种防御性的村落，后世还在陆续产生。直到今天，湖南江永县的勾蓝瑶寨还遗存有城墙、碉楼、守夜屋等防御性建筑，它们为维护勾蓝瑶寨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战略防御需求和客家文化为基础的福建三明、永安、龙岩等地和湖南郴州临武、宜章一带，更是有堡、寨、碉、楼等村落建筑，集防御与居住功能于一体，见证了人类战争军事、迁徙与农耕的历史。

唐代黄河下游许多林地已被开辟为农田，并通过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隋唐江淮流域出现了强劲的开发势头。南方地区气温偏高，降雨量充沛，有利于水稻等高产农作物的种植，使得耕地在面积不变的前提之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大量从中原地区南迁的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虽然政治文化中心仍然在北方地区，但是北方的粮食通常不能自给，需要从南方运过来。沟通南北地区的主要动脉，是此时修建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南方丰富的粮食，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至北方，为大唐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基础。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高和单位产量高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到此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代的村落已经普遍开始以“村”来命名。杜佑的《通典》表明，唐代官方有明文规定，所有城墙外面的聚落都统统称为“村”。不过，它也许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南方地区的村落，有一

些是以“浦”“沟”“洲”“渚”等来命名的。从它们的水字旁就可以看出其明显带有南方水乡的特色。

北宋时，北方仍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但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南方的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矛盾，王安石开始推行淤田。这是中国村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社会基本稳定，读书风气较浓。一些著名的文人主动关注村落生活，写下了大量有关农村安逸生活的诗歌，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它是在东晋陶渊明开创的田园题材诗歌的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即使在今天读来，仍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时传统村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吕氏乡约》产生了。它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村落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可以说，后来传统村落中的村规民约或者族约等，都是《吕氏乡约》的延伸版。

经历了元代的短暂战乱，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一直都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其充足的农业生产，为北方提供了大量粮食、布帛和税赋。正是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崛起，才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大体平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也大量增加。而且，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甘薯等粮食作物开始传入，极大地解决了传统粮食作物产量不足的问题，使得在耕地面积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粮食作物产量能够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人口的繁衍，促进了村落的发展。不少今天被视为传统村落的村庄，大体上都是这一时期兴建和留存下来的。而我们视为传统村落文化主要内容的部分，包括建筑、民俗、乡约、教育、信仰等，也大多形成或定型于这一时期。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形成与延续，始

终离不开传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其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来源，是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

村落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直接催生了传统城市的出现。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手工业的产生，使得村落的产品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出现了“物物交换”这种最初的交易模式。随着交易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以货易货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货币——贝。金属货币的出现，让交易变得更为方便和规范。原始的偶然的交易场所，逐步演变成有固定时间和地点的集市。殷商时代，即出现了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

《易经·系辞下》中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村落集市的职能不局限于货物交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村落居民之间信息交流的场所。《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句描述村落形成的话，经常被学者引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它较为形象地反映出了当时一个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由早期的村落直接演变而成的。农事因人“聚”而成业，因人“聚”而成邑，因邑落的发展而形成城市。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可以从农业中抽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教育甚至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于是渐渐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村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源。

二

尽管中国村落的发展历史如此漫长，但是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20世纪以来的一些乡村史研究成果，大多由日本学者取得，这是令人汗颜的。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史

学中，史学家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政治制度、朝代兴衰、学术思想、精英人物等方面，而极度轻视甚至排斥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历史、平民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研究被高度精英化。正如萧公权所说：“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说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2]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史家开始批判传统史学的研究取向，倡导“新史学”，即历史研究要探索全民的活动，而绝非仅是帝王将相的活动，认为今日所需之史，不再是“皇帝教科书”，而应是“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3]。至此以后，特别是近代人文学科兴起以来，包括传统中国的乡村在内的民间活动及其历史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当然，相比日本学者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热衷，近代以来的国内学术界仍显冷清。直至近几年国家将传统村落纳入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之后，这一现状才稍微得以改变。当前学术界从文化、社会、经济和建筑景观等方面展开了对“村落”或“乡土”的研究，但对村落历史这一基本问题仍然极少涉足。因此，亟待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村落史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和泛指，指的是村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即村落作为一个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在时间顺序上的纵向演化，包括村落的起源、发展、转型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和内容，强调对村落的宏观考察；二是作为一个具体概念和个体单位，指的是村落被组织起来的历史过程，包括村落的兴建、扩张、定型或废弃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和内容，强调对单个村落或村庄的微观考察，即所谓村史，具有村志性质。前者与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十分

宽泛的概念，以历史学学者关注最多；后者与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以社会学、人类学学者讨论最为热烈，被称为民族志书写。如费孝通的开弦弓村、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黄树民的林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许烺光的喜洲、杨庆堃的鹭江村、周大鸣的凤凰村等，都属于此类。拙著所述的村落史承系前者。笔者试图以历40年之久、数量5 000个以上的中国传统村落田野考察作为量化基础，对“中国村落”的缘起、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史学视角加以巡视。因而，本书并非某个具体村落的历史，但也并不忽视后者。后者往往作为前者的支撑个案，用于诠释、解读或者确证村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面貌，反映村落的某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作为有史以来便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是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它不仅反映着有史以来农林渔牧业族群的生存生活状态，如食、衣、住、行、用等方面，而且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包括在前者基础上构建和形成的工具、器皿、衣物、建筑与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经济模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在内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落及其文化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7个方面的内容：（1）建筑营造与堪輿规划；（2）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3）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4）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5）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6）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7）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4]一方面，正因为村落包罗万象，所以与村落有关的内容亦十分广泛；另一方面，有关中国村落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很少，事实上，非常有限而且取向不一的学术积累，也只是被分解于基层制度、乡村经济、宗族家庭、婚姻生育、民俗宗教和社会生活等不同层面的区分研究中，但哪怕是间接性的成果、个案研究的成果，对

其加以充分的认识和梳理，仍然是有益而十分必要的。它的指向可能与村落史研究的学术理论有关，而且可能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民俗史、建筑史、聚落史和环境史甚至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这些散落在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说明中国村落史研究尚有可供借鉴的某些间接性的前期成果，另一方面显示出村落尚未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广泛进入学术的视野，目前有关研究从视角到内容都仅处于碎片化阶段。与村落有关的学术理路显示，中国村落史尚未广泛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的视野，仍属于一块处女地。因而，无论从什么视角来展开对中国村落史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从研究视角到研究内容上其开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没有成建制的体系性研究，但中国村落史研究已经历过三个阶段，大致如下。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与中国村落的具体研究

大致来看，近代以来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始自19世纪末的来华西方传教士。作为中国村落史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期间的成果很少，多为散文游记和社会调查，是西方传教士建立在自身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中国乡村社会或民众生活的描述。最早将对中国乡村的观察诉诸书写方式的，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于1872年来到中国，并先后在鲁西北、天津等地传教30余年，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及底层民众的生存生活状况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他撰写的《中国的乡村生活》一书最为人所熟知，是西方人了解早期中国乡村及民众生活状况的重要著作。尽管该书“社会学的研究”这一副标题表明，明恩溥试图将他对中国村落社会的考察上升为一种学术研究，但从内容来看，该书仍只是一种基

于个人生活体验的经验性描述，不仅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而且带有明显的民族立场和宗教情节，有些观点偏颇且偏激，因而广受后来者的批评。不论何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以后，近现代中国村落开始进入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视野。这期间，典型者如马伦、戴乐仁、H. D.布朗、卜凯、马罗立、史禄国等，他们以社会调查为主，聚焦于少数民族习俗、家庭组织和农村经济等方面。[5]

严格来说，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的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他首创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村落。他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该书是一部建立在调查访问基础上的论著，全方位地描述广东潮州附近的凤凰村，内容涉及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他的研究不仅注意到了中国乡村的区域性差异，而且根据这一认识，他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研究中国乡村的方法，即将中国划分为几大文化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照职业、工具、社会组织、态度和理念等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群体、村落和地区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以期发现中国社会的功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未来的趋势。为此，他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村落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并分别对应两种研究方法。前者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状态，外来影响小，采取静态研究，侧重于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后者多位于通商口岸附近，或是正在经历迅猛的工业化进程，理应做动态研究，强调把握社会的变迁趋向。[6]

正是葛学溥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各地村落的建议和方法，给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以极大的启示。20世纪30—40年代，一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展开对中国村落的具体研究，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

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7],陈翰笙的《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1936年)[8],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开弦弓村)[9],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35年)、《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4年,福建黄村)[10],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年)[11],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1948年,云南喜洲)[12]等。这些学者都试图详尽记录与分析当地的生产、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现象,以揭示中国各地乡村的文化逻辑与社会面貌。这种侧重于对具体村落的功能与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倡导。

这种方法经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一批具有西学背景学者的推介并引入中国之后,就成了“社区分析法”[13]。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英文标题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便是“社区分析法”的实验性典范。在该书中,他试图通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弦弓村窥视中国社会。马林诺夫斯基在序中评价,该书“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4]。这种将具体村落进行民族志书写的研究思路,与中国历史上地方志的编纂,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会注意到描述对象的历史性问题,但其实质仍是对共时性现象的记录与分析。然而,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历史学学科视角下对村落史的研究侧重于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对村落的起源、发展乃至转型进行宏观考察,微观视角的村落民族志描述不能解释历史学关注的普遍问题,因而只能是论证前者的支撑材料。当然,除材料性价值之外,社区方法论也给中国村落史研究以极大启示,即一方面可由近及远地认识村落,另一方面则可对历史上的村落展开社区性分析。

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村落的具体研究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的强烈响应，一方面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倡“新史学”，要求学术研究探索普通民众和底层生活的学术思想联系紧密，另一方面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潮密切相关。大致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乡村遭遇到发展的困境，受到了来自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而且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村落也在走向消亡。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蕴积的矛盾，在近代中国村落社会是前所未有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乡村破坏……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剧烈而严重的变化……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15]

正因为“农村危机”“救济农村”等成为当时强烈的呼声，所以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学术界还出现了以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教育、乡村控制制度和乡村文化建设为主要方向与内容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如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1928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和晏阳初发表的有关“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系列文章，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黄强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1936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上述研究的逻辑起点，绝大多数是现实背景下的“乡村建设”，以寻找解决乡村现代变革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矛盾的办法为旨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当时相对复杂的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显然带有理想成分而不切实际。值得注意的是，周谷城、闻钧天和费孝通等人的论著体现了历史学研究的思路，特别是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还提出了中国传统社

会存在“政治双轨制”的认识，对梳理并理解传统中国的村落历史及其发展与演变极具启示。

（二）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学介入与村落问题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社会学被取消，人类学对中国村落的研究被中断。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在五阶段论式的中国史研究中，较少涉及乡村问题，即便有也是在“革命话语”下对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引发“起义”等方面的评价与表达。相对于中国学界的沉寂，欧美和日本学界对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不减，除了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外，更有了历史学学者的积极介入。其中，欧美学界以前者为主，日本学界则以后者最为突出。

欧美学界的代表学者有莫里斯·弗里德曼、施坚雅、华琛、华若璧、武雅士和王斯福等。弗里德曼著有《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年），施坚雅著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4—1965年发表的系列论文），华琛与华若璧合著有《乡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别及礼仪》（20世纪60—70年代在香港调查基础上形成）^[16]，武雅士著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1974年，论文集）^[17]，王斯福著有《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年首版，20世纪60年代在台北调查基础上形成）^[18]。其中，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和施坚雅的“市场理论”这两种解释中国村落社会的框架，在西方和中国学界的影响最为深远。^[19]弗里德曼在其代表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中打破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区分析法”，将中国村落及其宗族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视

野中来审视，既注意到了福建和广东的宗族与村落明显的重叠，也探讨了宗族组织的发达与地方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曾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20]

与弗里德曼一样，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也认为，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单个社区的研究，而应该将村落置放于更为广阔的中国农村来看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系列论文中，施坚雅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他进一步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21]这个“市场区域”，就是“基层市场社区”。他通过对四川集市的研究以及借鉴杨懋春对山东集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层集市社区模式”，并试图通过集镇这个承上启下的枢纽，将微观与宏观、农民与社会、村落与国家之间联系起来。^[22]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对中国村落与社会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影响很大。弗里德曼与施坚雅“超越村落”的研究方法，尽管备受学界重视，对解释中国村落史上的某些问题具有启示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没有缺陷。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出身的他们，落脚点在近现代村落上，侧重于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尽管他们意识到了历时性的问题，但明显没有系统的历史性梳理，更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深度阐释。将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介入。^[23]

相比欧美学者，这期间的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以历史学介入最为突出，并且其研究也要系统、细致和深入得多，涌

现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史学研究学者，如宫川尚志、谷川道雄、宫崎市定、越智重明、戒能通孝、松本雅明、池田雄一等。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近现代，而且聚焦于古代中国村落的历史性梳理及基层社会问题的讨论。追溯学术史，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村落的关注与研究，始自20世纪上半叶的侵华战争期间。20世纪初，为了给侵华日军侵略和殖民奴役中国提供情报，1907年在中国境内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成立了专门的调查部，作为对中国国情的综合研究部门，并且于1901—1944年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农村惯行调查，搜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24]，对战后日本中国村落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推动了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西方的近代中国学研究，黄宗智、杜赞奇和李怀印都广泛应用了这些调查资料。具体来说，日本学者对中国村落史问题的研究，在历史跨度上主要集中于汉魏至唐宋时期，在关注问题上则多侧重于“村”的起源及相关问题和村落共同体等方面。

关于“村”的起源及相关问题，日本学者讨论较多，因为“村”的起源既是一个时间问题，也关系到对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制度特别是乡里制度的认识，更关系到对村落的变迁及其历史关系和历史地位的梳理与理解。这方面以宫川尚志、宫崎市定和谷川道雄等的讨论最具影响力。最早对“村”的起源展开系统梳理的是宫川尚志，他于1950年发表《六朝时代的村》，文章强调东汉末年出现的“村”是伴随国家乡亭里制的瓦解而逐渐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的部分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堀敏一和齐涛、马新、吴海燕、刘再聪、侯旭东等中国学者的认同。宫崎市定则认为先秦时期或汉以前的历史时期是“都市国家”，而村的产生以及村与都市的对立标志着古代中国进入中世。^[25]后来，谷川道雄在宫川尚志、宫崎市定两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六朝时

期“村”的出现与“共同体社会”联系起来，并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论。他在宫崎市定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山东贵族的村居生活，进一步论证了六朝时期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

事实上，关于“村”的起源，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村”作为一个概念或名称，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村落”在此之前没有产生或不存在。用名称来定义居住空间，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非本体论的界定。对中国村落史问题的梳理，固然应从名称的变迁层面加以考察，但村落作为实际的生存生活空间或社会单元，显然更需从本体论视角加以阐释和厘定。因为村落的起源是人类进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生存生活空间，它不会因概念或名称的出现与否而停止发生、发展和变迁。就此来看，宫川尚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的讨论显然聚焦于前者，而较少关注甚至忽视了后者。当然，也有学者意识到了这类问题，并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如松本雅明的《都市国家》[26]，日比野丈夫的《中国聚落的发达》[27]，池田雄一的《中国古代聚落的发展》《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等[28]。但这些讨论更多的是围绕“都市国家”理论而展开的，或是仅局限于“聚落”视角，基于考古和文献史料对散居形态的阐释，并未考虑“村落”本体起源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些研究不仅开启了对中国村落史问题的大讨论，而且间接或直接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村落史的研究。

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概念。[29]日本学者将其应用于中国村落的研究，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30]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在20世纪40年代曾展开过激烈讨论。以戒能通孝和福武直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中国村落不具有共同体性质[31]；而以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为代表

的一方，认为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32]；也有一批超越二元论者的学者，旗田巍是其中的代表[33]。其实，正如旗田巍所指出的，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都是基于日本或德国的标准来判定的，并没有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特点。如果按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类型划分，中国村落作为“聚族而居”的聚落单元，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与日本重视地缘关系甚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性质不同[34]，因而属于“血缘共同体”。

柳田节子认为，共同体性质的中国村落，在宋元时期便已形成。他曾在“戒能—平野论战”之后阐述这个问题。[35]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中国史学者丹乔二，不仅认同柳田节子的观点，而且援引文献史料和“满铁”调查资料，指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村界，并且村民在疏浚井水、畜力借贷、农业生产上有许多合作和共同行动，因而认为，无论在江南还是华北，中国都存在村落共同体，甚至将村落共同体的发端追溯到魏晋。[36]不少日本学者确实也将“共同体”的理论用于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但无论是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37]，还是东晋次认为的汉以来经历了“父老的里共同体”到“豪族的里共同体”再到“豪族共同体”的变化[38]，抑或是越智重明和堀敏一的讨论[39]，他们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豪族进行的，对认识包括坞壁、庄园等在内的豪族聚落不无裨益，但不能解释那些以“散居”形式出现的“村”。

在日本的中国村落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在讨论上述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制度的问题，如宫崎市定的《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柳田节子的《宋元乡村制研究》，池田雄一的《汉代的里与自然村》《汉县的规模》《中国古代的社制》，越智重明的《汉魏晋南北朝的乡亭里》和《从里到村》[40]，以及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术界

的堀敏一和他的《魏晋南北朝隋代的行政村和自然村》^[41]等。其中，越智重明和堀敏一的村制讨论最具典型性，他们的研究注意到了地方行政制度与“村”的关系，并且在类型上还区分了自然村与行政村。尽管这些探讨尚不全面，但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上的中国村落提供了多维而不同的视角。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本土意识与村落史研究

相比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村落史研究的热衷，国内史学界则明显重视不够。20世纪上半叶，国内有学者虽然开始关注中国村落的问题，但主要是一批社会学家为寻求中国出路而展开的对乡村问题及文化的研究。最早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乡村史问题展开专门讨论的中国本土学者当属萧公权，他于1960年出版了《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该书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可谓一部关于19世纪中国乡村研究的百科全书式论著。

^[42]萧公权的探索无论是在当时的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五阶段论式的国内学术背景下，均属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和开拓性，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必须参考的历史巨著。但是，由于他的探索仅局限于19世纪的清代，并且关注的是社会控制问题，因此对村落历史地位与社会功能的认识难免会有缺失和局限。

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国内长期冷清的村落史研究局面略有改变，一批中国本土成长或具有中国生活经历的学者，在整体关照中国乡村史的宏观思路与背景下，也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积极关注中国村落史的问题，出现了一批历史学、文化学学者。他们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既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村落民族志研究，又有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深度介入，

形成了多视角、多维度的中国村落史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关注主题也十分多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宗教、宗族、风俗等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基本涵括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时期。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来看，这些研究都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其中，齐涛、马新、侯旭东和刘再聪等人的成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从时间上来看，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和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当属国内乡村史研究领域较早的专门性成果，其研究初步构建了一个两汉魏晋隋唐“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不少观点影响了稍晚的吴海燕[43]、高贤栋[44]、侯旭东和刘再聪等学者，如齐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民“在比较正式地记录谱系贯籍时，多用‘里’不用‘村’，而在记录当时居住地时，则多用村名”[45]的观点，就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或深化论证。[46]侯旭东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他的研究虽以村落为基本研究单位，但研究的落脚点在“村民”，关注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及他们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释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某种历史走向。[47]如《北朝的村落》探讨了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包括有无围墙、村落布局、民居建筑，以及村落与行政治所的关系等内容。这些研究内容正是西方、日本学者和国内学界尚未普遍关注的，因而不仅具有新意，而且极具启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跳出了“从文献典籍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于“无声处”找资料，转而在石刻、墓志铭和造像记的零碎记述中，解读别样的中国村落社会。显然，在中国村落史的研究中，我们固然要关注村落的历史渊源、组织形态、制度、建筑和环境等问题，但绝不能忽视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化、观念、信仰和风俗

等内容，既要做到严谨的历史性阐释，也要有生活性的内容陈述。傅俊的博士学位论文《南宋的村落世界》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完成的。[48]

相比之下，刘再聪的研究则是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学界关注问题的继续深化，聚焦的主题包括“村”的起源、唐代村制等方面。关于前者，刘再聪显然受到了宫川尚志的影响。他注意到了村作为聚落的起源与“村”作为指代名词出现的问题，认为“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但其早期形态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有庐、丘、聚等形式，其中庐具有临时性，丘是野人的自然聚落，而聚是人为规划的安置性聚落。[49]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并开始具备社会意义。对于这类问题，章义和[50]、韩昇[51]也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刘再聪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村落问题，但也仅限于国家视阈下对“村”行政治理在地方实施的梳理与确证。[52]关于后者，他也有系列探索，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确证“村”在唐朝得到了律令性的认可，并认为“村”概念在这期间完成了从民间性、地域性向制度性、全国性的转变。[53]类似的观点，谷更有也有讨论，只是关注点不同。[54]除汉魏晋唐以外，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唐宋以降的村落史问题，在谷更有、傅俊之外，尚有杨国安、谭景玉、刁培俊等人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55]，以及郑世刚、仝晰纲、夏维中、梁建国等学者关于宋元乡村制度或村社组织的讨论[56]。这些讨论的关注点都落在乡村社会组织与制度方面，对认识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卒读上述学者的论著，可以发现：他们在方法和资料的取舍上，仍遵循传统史学的路子；在主题讨论方面，则是对前一阶段日本学界关注问题的进一步深挖，解答了村落史上的系列基本问题，但显然忽视了村落

作为自然聚落在社会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层面的变迁。尹钧科、邱枫虽然分别专门探讨了北京郊区和宁波地区的村落史[57]，注意到了历史地理层面的村落形成问题，然则只是区域性的描述性研究，未能阐释村落变迁背后的显性与隐性的逻辑因素。

厘清这类问题，除需要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积极讨论以外，更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介入。梳理学术脉络，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便注意到了此类问题并展开了讨论。较早者如陈桥驿，他基于历史地理视角对南宋绍兴地区聚落分布进行了探讨，并将聚落分为山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六类。[58]后来，更多的地理学学者加入了乡村聚落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不少微观式成果，如陈芳惠的《村落地理学》[59]、金其铭的《农村聚落地理》[60]、张小林的《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61]、李贺楠的《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研究》[62]等。其中，将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村落史研究结合较为成功的当属鲁西奇，其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他的研究发现，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一直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散村占据主导地位，总体趋势是从散村向聚居村形态发展。[63]当然，他也指出：“一个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是以集村为主，还是以散村为主，是人们在自然、经济、社会乃至文化过程中长期选择、不断适应和调整而逐步形成的，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环境（地形、洪水与气候等）、经济生产方式（农耕、采集与渔猎、伐木等）、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乡村基层组织、宗族等）以及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因素都在共同发挥着作用。”[64]刘沛林基于人文地理视角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也具有代表性，但其更侧重于当代视阈下的共时性剖析，

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挖掘。[65]事实上，日本学者在前一阶段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了此类问题，包括池田雄一、斯波义信等部分学者都有程度不一的讨论，但影响有限。[66]

这一阶段，学术界对村落历史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局限于古代中国，还广泛涉及了近当代的村落问题。其中，中国本土学者对此抱有热情，出版成果十分丰富，关注主题几乎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乡村政权、人口、社会文化、乡土意识、社会心理、婚姻、家庭与风俗等，不一而足。

[67]典型者如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程歙的《晚清乡土意识》、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等，难以备举。显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本土学者对近代村落的讨论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要说学术影响力，本土学者仍要逊色于外国学者与外籍学者。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和属美籍华人的黄宗智、李怀印等人的成果，不仅推动了西方的汉学研究，而且于方法论层面深刻影响了国内近代乡村史的研究。[68]

作为美籍华人，黄宗智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以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为主，代表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依据“满铁”资料中关于河北、山东西北部平原的33个自然村的资料，对乡村土地经营模式做了定量统计与分析，不仅展开了对广为人所关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讨论，而且对当时尚不为人所注重的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村落内部的权力关系、土地改革演变等政治权力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有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由村落中的乡绅、乡保、民间威望人士和基层行政人员等组成。同为美籍华人的李怀印，在黄宗智的这一认识和前揭萧公权对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的理解上，以河

北获鹿县的历史档案为材料，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华北乡村治理的变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华北村庄“自治”的典型。[69]杜赞奇的中国村落史问题研究，与黄宗智和李怀印大体相同，也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华北。他从文化资源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村落权力结构的演变，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他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对华北6个村落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入近代以后，“国家在衰退”，传统乡村豪绅已衰败，而新的士绅则无法使自己习俗化，因而反过来削弱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在方法论上，这显然是“国家—社会”的研究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他提出了“权力文化网络”的概念，试图将社会各种关系和权力纳入其中，以此解释华北村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其变迁。[70]

三

不难发现，相比中国本土学者，基于西方视野对中国村落史研究的黄宗智、杜赞奇和李怀印，无论是在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超越了对村落和历史本身的关注，而更加注重从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讨论村落在国家与乡村关系中的位置、功能和作用。他们提倡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重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正如杜赞奇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用叙述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也不宜于叙述体裁。无奈，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71]。正因如此，他们的研究在共时性分析的同时，具有了历时性的特征，即实现了“将共时性分析与对持久矛盾和冲突的记叙有机调和在一起”[72]。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将传统村落列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特别是在当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全社会掀起了一股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与发扬村落文化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学术界更加广泛地加入了中国村落历史及文化研究之中，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建筑和环境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但研究质量参差不齐。不管怎么说，这些研究对推动中国村落历史及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村落文化的继承、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何以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村落史——一个未被正视过却十分重要的史学命题，是一项既要走出西方现有的强势语境与学术思维逻辑巢穴，又要创建中国史学话语模式的探索性与挑战性并存的研究工作。完成这项工作既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的情怀与使命，又是一个专注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数十年的行者的宿命。因此，应重点着眼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村落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问题。与“乡村”的概念不同，作为有史以来便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包含于乡村，但不能等同于乡村。村落的发展历程可以映射乡村的变迁，但村落史不能等同于乡村史，它们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逻辑的内涵与外延。显然，过去一些学者将村落史等同于乡村史，甚至局限于乡建制度史，这是不够的。村落社会是一个文化聚合体，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生活共时性的特点。因此，村落史首先是社会文化史，而不只是单纯的乡建制度演变史；应该是“鲜活”的生产生活史，而不是居庙堂之高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史。由此来看，明确中国村落史研究的边界与范畴，避免村落史走偏成乡建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另类版本，将是本书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中国村落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历史生成问题。作为一个

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众多形态各异、历史悠久的村落遍布于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它们凝聚了区域历史的记忆，见证了中国的变迁与发展，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长期以来，学术界注意到了中国村落的同一性问题，但忽视了村落历史生成的多样性研究。对村落史的讨论多以儒家文化影响区为中心，忽视了对众多少数民族村落的探讨，难以形成系统和完整的中国村落史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乃是囿于村落出现和发展中存在着地域性、民族性、庞杂性和多样性，而相关文献史料又相对零散稀缺。我们认为，中国村落之所以为中国村落，是由它们的同一性融合而成的。与此同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村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着它的多样性，这也是今天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中国村落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是历史生成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丰满和完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国史学观。

第三，历史研究材料的收集与利用问题。作为一种区域社会的发展缩影，村落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重视讨论由村落的地方性拓展而成的灿烂丰富的中华文明。换言之，挖掘并呈现中华文明发展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握好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形成问题。就此来看，面对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及实物资料，如何收集、整理和利用，既尽可能地做到比较全面的掌握，又避免囿于或迷失于研究材料本身，不仅必需，而且极为重要。因此，对中国村落史的研究，既要强化对正史、笔记、小说、地方志、族谱、文书、图像、碑刻等比较传统的历史文献资料的解读，又不能囿于此，要深入新发现的尚未进入学术研究资料库的丰富的地方史料文献；同时，还要加强对村落文化遗存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诸如房屋建筑、生产工具、日常用品、宗教器物等实物资料、图片、影像的收集、整理与解读，形

成村落史研究中立体多维、史料与物证链完整的“证史”体系。

也许正因如此，《中国村落史》的撰写与出版才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强调“新材料、新理念、新领域、新学术”。

（1）新材料。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相关研究人员近40年以来从事传统村落文化的田野考察，收集积累了大量尚未公开发表的近万件第一手材料和大量影像资料，内容丰富，包括传统村落建筑样式与结构、装饰纹样等素描手绘图例及数字图像，传统村落建筑堪輿规划文献，村落祠堂家庙图像，村落氏族谱系文献及图像，村落传统婚庆、丧葬、祭祀、礼仪写本文献，村落氏族宗法族规写本文献，村落传统农耕、商贸写本及刻本文献，村落传统文化教育写本及刻本文献，少数民族村落新见古代婚约、议榔、盟约碑刻拓片，村落民间诉讼、具状文、和息文、契约等写本文献，村落传统建筑石雕图像及建筑石雕拓片，村落传统建筑壁画图像，村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及图片（包括绘画、木雕、竹雕、石雕、泥塑、纺织、挑花、扎染、蜡染、剪纸、泥塑等），传统村落民众日常生活劳作方式、婚丧节庆活动等静态图像及动态影像资料，传统村落原住民调查录音录像数据，村落传统宗教造像、造像记、写经宝卷、水陆画、宗教器物等原件及图像，等等。这些史料不但翔实可靠、丰富多样，而且富有权威性和新颖性，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村落史的宝贵史料。

（2）新理念。传统史学研究以解读文献资料为主，对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层面以及文化精英层面的历史问题而言，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要研究村落史，仅仅依赖这些文献则远远不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身处村落社会的普通民众，识文断字的不多，上层的文化精英对此也无暇关注，导致记录村落日常生产生活的文献极为稀少。但是，数以千计的传统村落中，仍有不少历史遗存，记载并印证着中国村落起源与发展的历史信

息。因此，我们开创以驻入式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历史学、历史人类学、民族民俗学、文物学、艺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视角介入，对中国村落的历史加以多维审视和探究，摒弃仅仅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书斋研究”模式，倡导“重调研、重实证”的学术研究风尚，将中国村落史分为若干专题，涵盖其文化传统与精神世界、堪輿规划与建筑营造、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住民与自然环境关系、道德教化与乡贤文化、经济发展与综合治理、氏族文献与少数民族研究资料、地域文化圈的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展开多学科交叉的系统性研究，以还原出中国村落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多维性、多元融合性、复杂性以及有别于西方史学研究视野下的“中国体系性”。

（3）新领域。纵观当代有关村落历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村落与国家制度的变化关系，如村落的自治、村落共同体、村落与国家的同构和重构等。简而言之，多为囿于西方史学或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框架和话语模式下的研究，且侧重于村落的制度史，对于生产生活等村落原住民的日常则关注得较少。历史学始终是人的历史学，如果说过去囿于材料或者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有历史影响力的精英，那么在新材料逐渐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之后，我们则应更加关注创造与书写“人”——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中国村落的原住民应当是“人”的主体。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3]

（在此我们无意与“英雄创造历史”观争执。）因此，拙作以新材料为基础，把研究视角延伸至或集中于过去史学界因研究理念的差异而有意或无意所忽略或者因研究资料稀缺而难以深入或未曾涉及的村落文化研究领域。我们重视村落制度、建筑、生产、生活、精神信仰等各个方面。对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中国村落史研究，或者各有侧重，或者平行与交叉，将中国村落的研究置于广

阔深远的整个中国大历史与发展的背景之下来展开研究。或者说，既从中国村落这一立足点出发，又以中国村落为视角，从基层社会入手，自下而上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探索不同视角下的历史研究领域。

（4）新学术。必须遵循毛泽东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精神，光大王国维提倡的新发现促成新学术的研究方法，提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博学术思想。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不论是历史学研究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从方法论到学术切入模式，都始终为西方范式所领驭，长期缺乏话语体系。尽管当代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及其严重性，也在努力探索自身学术独立的路径与方向，但总体上看，始终未能脱离其钳制。通过研究中国村落史，可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诸如民族、区域间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构建，人与社会及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假以时日，以此为突破口，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村落史学研究成果，并为以后创建新的学术研究体系打下基础。

总而言之，本书作为中国村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既立足于宏观层面的“历史”建构，也侧重于微观视角的理论阐释，就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而言，也是过去所未曾有的。一方面，我们试图以历40年之久、数量5 000个以上的中国传统村落田野考察作为量化视野的基础，对“中国村落”的缘起、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史学视角加以巡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意义；另一方面，借鉴并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相交叉、可互补互佐的研究方法，力求还原一个既接近史实又具有历史反思的中国村落时空，多维度地展示历史上中国村落的不同侧面。

对中国村落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破除传统“精英史

观”研究思路，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学术理论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74]这是非常契合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国情的。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国外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是目前中国村落史研究的主要现状，不仅在研究范式上多取自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而且在研究范畴上和重点关注对象上仍然沉溺于以延续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问题为主要内容，在研究范式和语境表述上仍然带有西方模式的特征。国外范式对本土研究的干预性强，而运用本土的资源、方式对中国村落史的研究仍然极其欠缺。本土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需要有本土性的理论建构，本土性的理论建构从来离不开本土学术话语的创建。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绝大程度上秉持着“精英史观”的研究思路，较少或没有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关注和审视“人民大众史”，所以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再造上往往难以出新意。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村落史研究”对于我们构建适合本土特性的文化理论体系，无疑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本书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献典籍资源和长期丰富的田野实践，通过梳理中国村落的兴起、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建构中国村落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本土化的思路。

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需要中国学者持有本土历史文化的立场，并由此建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客观的认识，找寻、挖掘、继承文化之“根”脉。中国村落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与“源”，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思想道德观念，是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最为深沉的积累。因此，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独特价值，就很

有必要回归到对村落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和研究。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性实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全面整理、系统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承载着我们的家国记忆、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蕴含着丰富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文化内容。当前，传统村落文化遗物的快速消失，固然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包括“村落历史”“村落文化”等在内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在这种形势下，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中国村落史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将为当下传统村落保护和“活化”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将有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我从事村落文化研究已有30多年，我的身体曾沐浴过这方山水里的春风，我的灵魂曾被这里所遗存的独特而又远古的文化唤醒。就是在这里，我的心灵曾萌发出平生最大最美好的愿望：尽绵薄之力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也是在这里，我开启了我新的学术研究之旅：从这里出发，我用30余年的时光寻访了我国“（长）江（黄）河流域”5 000多个传统村落。如果说我在这个领域发出了一点点微弱之光，那么都应该感谢遍布于中华大地山山水水之间的传统村落，感谢世代生息于这些传统村落的原住民。是他们启迪了我的学术智慧，激发了我的学术灵感，鼓舞着我的学术斗志。这部《中国村落史》就是我对这些传统村落的微薄回报。

是为序。

[1] “新仙女木事件”是远古气候中冰消期持续升温过程中一次突然降温的典型非轨道事件。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发生于距今12 000年左右。气候学家的研究显示，中国东部陆架海也普遍发现了“新仙女木事件”的沉积记录。

[2]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vi页。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 胡彬彬、吴灿：《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5] 马伦与戴乐仁合编有论文集《中国农村经济实况》，H. D.布朗著有《四川峨眉山25个田区之调查》《四川成都平原50个田区之调查》，卜凯著有《安徽芜湖附近102个田区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马罗立著有《饥荒的中国》，史禄国著有《满族的社会组织》《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等等，不一而足。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6]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著，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7]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 陈翰笙著，冯峰译：《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英文书名直译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

[9]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林耀华著，庄孔韶、方文静译：《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11]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许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译：《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版。

[13]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论》，《民

俗研究》1996年第4期。

[14] 马林诺夫斯基：《序》，载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11页。

[16] 华琛、华若璧著，张婉丽、盛思维译：《乡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别及礼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 武雅士著，彭泽安、邵铁峰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8] 王斯福著，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 王铭铭说：“弗里德曼的持续影响，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代欧美甚至东亚汉学人类学者的导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颇类似于库恩所界说的‘范式’。”黄宗智则指出，“施氏的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是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影响了“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6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20] 弗里德曼1962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上的讲话：“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1）：1-19。转引自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第65页。

[21]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22] 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方法论视角——以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3] 李红、胡彬彬：《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9日，第14版。

[24]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共6卷），岩波书店1952—1958年版。

[25] 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1957年发表），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

版，第1—29页；宫崎市定：《中国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国崩坏の一面》，《东洋史研究》1960年4期，中译文《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40页。

[26] 松本雅明：《都市国家か否か》，载铃木俊编：《世界各国史·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54年版。

[27] 日比野丈夫：《中国における聚落の発達》，载木内信藏、藤冈谦二郎、矢岛仁吉编：《集落地理讲座》第4卷《世界の集落》，朝仓书店1959年版；日比野丈夫：《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同朋舍1977年版。

[28] 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9] 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4页，第65页。他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类，认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

[30] 1901—1944年，日本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地开展农村惯行调查，其中一个调查主题便涉及了中国村落共同体性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共6卷），岩波书店1952—1958年版。

[31] 戒能通孝：《法律社会学的诸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版；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原由大雅堂于1946年出版）。

[32] 平野义太郎：《大アジア主义の历史の基础》，河山书房1945年版；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社会学的考察》，岩波书店1944年版。

[33]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论》，岩波书店1973年版。他认为共同体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的逻辑背后是各自政治立场的体现，前者是基于“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出发点，因而努力认同中国社会与日本一样拥有相同的村落共同体结构；后者则主张“脱亚入欧”，强调中国不存在像欧洲和日本那样的村落共同体。他还批评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认为他们判定共同体性质的依据是以日本或德国为标准，并未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然而，从其内容来看，他更倾向于否定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

[34] 参见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

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6期。

[35] 柳田节子：《乡村制的展开》，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9卷，岩波书店1970年版。

[36] 丹乔二著，虞云国译：《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史林》2005年第4期；丹乔二：《关于宋元时代江南圩田地带的村落共同体——兼评滨岛敦俊的“田头制”论》，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40号，1990年。

[37] 谷川道雄：《中国的中世——六朝隋唐社会与共同体》，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4—153页。

[38] 东晋次：《后汉时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第35—37页。

[39] 越智重明：《东晋南朝の村と豪族》，《史学杂志》1970年第10号，第21页。他将“村”视为“共同体”来讨论，但强调豪族是共同体的破坏者。堀敏一：《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村”をめぐって》，载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汲古书院1996年版。堀敏一的观点类似谷川道雄的阐述。

[40] 越智重明：《汉魏晋南朝の乡·亭·里》，《东洋学报》1970年第1号；越智重明：《里から村へ》，《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1973年第1号。

[41] 堀敏一：《魏晋南北朝および隋代の行政村と自然村》，载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汲古书院1996年版。

[42]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他认为清朝与其之前的朝代一样，作为专制政权，乡村的控制是以“维稳”为目的的，因而在清朝统治下的社会，人民被划分为几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相容的。

[43] 吴海燕：《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4] 高贤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6] 参见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又见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

同》，载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9页。在文章中，他指出，北朝村民利用“村”而非“三长”或“乡里”在活动中标识自己或构建组织，并记述到记文中，说明在非官方的场合，百姓并不理会作为地域概念的“乡里”与作为户口组织概念的“三长”，更谈不上用它们来界定组织与人群了。

[47]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8] 傅俊：《南宋的村落世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49] 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这一论点日本学者池田雄一在《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一文中也有阐述。参见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89页。

[50] 章义和：《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1]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52] 刘再聪：《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8年第3期。

[53] 刘再聪：《唐代“村正”考》，《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的确立》，《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54] 谷更有：《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5] 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谭景玉：《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刁培俊：《两宋乡役与乡村秩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6] 郑世刚：《宋代的乡和管》，载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全晰纲：《元代的村社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4期；梁建国：《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7]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邱枫：《宁波古村落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8] 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

[59] 陈芳惠：《村落地理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60] 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1] 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 李贺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3] 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4] 鲁西奇：《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历史地理》2008年第1期，第150—151页。

[65]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66] 池田雄一：《石器时代的聚落》，载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池田雄一：《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中的聚落》，载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斯波义信：《宋代湖州聚落复原》，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论集刊行会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8年版。

[67]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王先明、杨东：《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68]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9]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

[70] 李红、胡彬彬：《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9日，第14版。

[71]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72]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7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74] 参见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第一章

概 论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耕立国的农业大国。村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最具生命活力的发生体与承载体。然而，由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桎梏与偏见，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村落历史及其研究的问题未曾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20世纪上半叶以来虽然出现过一些成果，但都忽略了社会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学层面的村落变迁与发展转型研究。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将传统村落列入历史文化保护战略，学术界从文化、社会、经济和建筑景观等方面展开了对“村落”或“乡土”的研究，但仍倾向于村落的共时性分析，对村落发展历史这一基本问题极少涉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囿于村落出现与发展中存在着地域性、民族性、庞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则与考古资料的匮乏和相关文献史料长期处于隐废之藪密切相关。然则，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因此，不论有多大的艰难与挑战，面对近当代以来乡村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历史性变动，或于文献，或于田野，或于考古，或于图像中，梳理并把握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从“村落”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国情与发展的主张，都将为我国乡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滋养和智慧支持。

第一节

村落的定义与内涵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创造过包括农耕文明在内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在长江流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距今约1万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成为研究水稻起源最早的实证。同时出土的还有当时被捕获的天鹅、鸳鸯等鸟类的骨头和猕猴桃、梅等果实标本，尤其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遗存物证，表明了当时的先民已经从采集渔猎转向农业耕作。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 000多年的稻谷遗存和农业工具，表明当时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而大量的干栏式建筑遗存，则直接开启和印证了今天广大南方地区包括西南少数民族住宅形制与居住形式在内的先声与源流，说明中国南方的传统村落已经初步形成。在黄河流域，距今7 000年的仰韶文化，以无与伦比的彩陶器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彩陶时代。这一时期的先民运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开始了粮食作物粟以及蔬菜的种植。河南渑池出土的半地穴式的方形建筑，则已经构筑起了远古村落的基本格局。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4 000多年的龙山文化出土的大量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陶，表明陶器的制作工艺在原来彩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大量石器、骨器和蚌器的出土，则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的生产方式，见证远古村落中居民的生活丰富多彩与文明的演进过程。

今天，虽然经历过无以计数的天灾人祸，各个极具地域风格与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仍然有不少遗存。它们遍布辽阔广袤的中华大地，给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深远重大的影响，有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宏村和西递、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有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山陕古民居、江南水乡古镇、苗族村寨、侗族村寨、藏羌碉楼与村寨，有自2012年以来先后共5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6 819个村落。这些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在这类名单之外的更多普通而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更是数不胜数，它们如同一颗颗灿烂的星辰，散落在中华大地。只要我们离开城市，传统村落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甚至在现代都市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传统村落文化的存在。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传统村落文化的基因。亲近传统村落，就是在寻找我们的文化之根。守护住了传统村落，就是留住了中华民族可供安放的乡愁。

那么，在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传承了上万年源远流长且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汗水的中国传统村落，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其基本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由于受到传统文史哲研究体制与框架的制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其被弃而不问，故鲜而有闻，或闻而不详。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的中华民族文明史？

何谓村落？《辞海》中只给了两个字的注解：“村庄。”《辞源》中给了六个字的注解：“乡人聚居之处。”“村落”是个汉语词汇，有关“村落”的称谓，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如《三国志》：“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晋代崔豹

《古今注》：“四顾荒郊，村落绝远。”《北史》：“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营斋供……”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注《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时，言：“聚，在喻反，谓村落也。”又注《史记·秦本纪》：“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村落”一词，在魏晋以降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广义上的村落常常被理解为“乡村”“农村”，即指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广大聚居地域；狭义上的村落就是乡人聚居聚落，属于自然村，有一定的边界特征。鉴于此，我们认为，村落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居住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一类场所，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实际存在的聚落，它首先是物质实体空间，体现为明显的聚合性，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地域综合体，包括空间构成的房屋、道路、景观、设施、工具和土地等可视性内容；二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活动单元，它也是非物质社会空间，体现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范围，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社会单元，包括关系构成的组织、制度、语言、风俗、道德、宗教、经验和技术等不可视性内容。换言之，村落就是物质实体空间和非物质社会空间高度重叠的地域空间，它是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明晰的社会单元。

村落作为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小型聚落，村落有自身的范围与活动空间，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宗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它包含于乡村，但不能等同于乡村。因为乡村的指代更为广泛，通常指非城镇化的地区，包括自然村与行政村，而村落一般具体所指为聚落实体，是乡村的基本单元。村落的发展历程可以

映射乡村的变迁，但村落史不能完全等同于乡村史，它们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逻辑的内涵与外延关系。不论是施坚雅的“市场理论”[1]、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2]，还是费孝通的社区论[3]，抑或是贺雪峰、李培林的多元边界论[4]，事实上都认为村落是有界限的，因而不能将村落简单类同于乡村的概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村落”下一个大致的基本的定义，即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进而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所需而营造的具有一定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村落与村落文化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关联紧密。“文化”是个舶来词，源自拉丁文“cultura”。这个词原来具有耕种、居住、敬神等多重意义。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村落是基础，文化是内涵。同时，村落与村落原住民是文化载体，文化又因载体而不断传承和衍生。

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作为社会单元内在结构最为紧密的小群体，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通过相互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了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从湖南玉蟾岩出土的距今约1万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上万年历史的农耕文明史大国。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村落，因其地理环境、人居条件的差别，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村落文化”。这一由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单元，使得村

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它承载了中国悠久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含义。自秦汉以来，按传统的儒学归纳，中国传统村落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

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承载着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我国宝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贺雪峰：《村庄的生活》，《开放时代》2012年2期；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前者认为村庄共同体有自然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三种，后者认为这一概述不全面，还包括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

第二节

村落的由来与村落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文明的起源与村落的产生

村落作为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明晰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它的起源并不是与人类的起源同时发生的，它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

从距今1 500万年的云南开远森林古猿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再到后来的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及至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从灵长类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而来，属于群居型动物，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体格相对弱小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中的凶猛动物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得以生存所特有的能力。人类进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单一个体的生存困难，更是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生存发展的族群观念，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只是，由于人类起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经济生活，为了获取食物，需要频繁迁徙，因此并未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规模化的居住点，物质实体空间不明显，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二是由于生存欲望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因此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

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秩序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氏族组织的产生，使得人类的群居行为具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意义，地域空间上的单一的、松散无序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因此具有村落文化内涵和功能特征的聚落开始产生。

稻作（粟作）农业是人类食物链环节中可靠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伴随着距今1万年左右人工栽培稻和家禽动物的驯化成功，人类开始从依赖大自然的纯采集、狩猎的掠夺式经济生产方式过渡到以人工生产为主的农耕畜牧经济，使不确定的、不断迁移的居民点开始固定下来，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并扩大了定居生活，人类社会便不断进步。正是在这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人类早期村落得以形成，并在规模上不断发展和扩张。带有鲜明农耕文化性质的村落，不仅其居住房屋以群团做有序排列，而且聚合性、防御性、组织性特征鲜明，很多村落都有环壕，环壕之内明显区分为生活区、墓葬区，环壕之外则为农作区。这种早期村落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在粟作系统的黄河流域，还是在稻作系统的长江流域，都可以得到充分反映。以两湖（湖南、湖北）地区以及环洞庭湖的澧阳平原考古所见为例，从湖南道县玉蟾岩约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出土到北面澧县彭头山遗址9 000年前的稻作农业遗存，从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到皂下文化的临澧胡家屋场遗址，再到城头山遗址7 000年前的环壕农业聚落（见图1-1），及至鸡鸣城和距今4 000余年的以鸡叫城为中心而形成的聚落群（见图1-2a、图1-2b），不仅证明了村落的形成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且说明了人类农耕文明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是村落。粟作系统的黄河流域，其演变情况大致与此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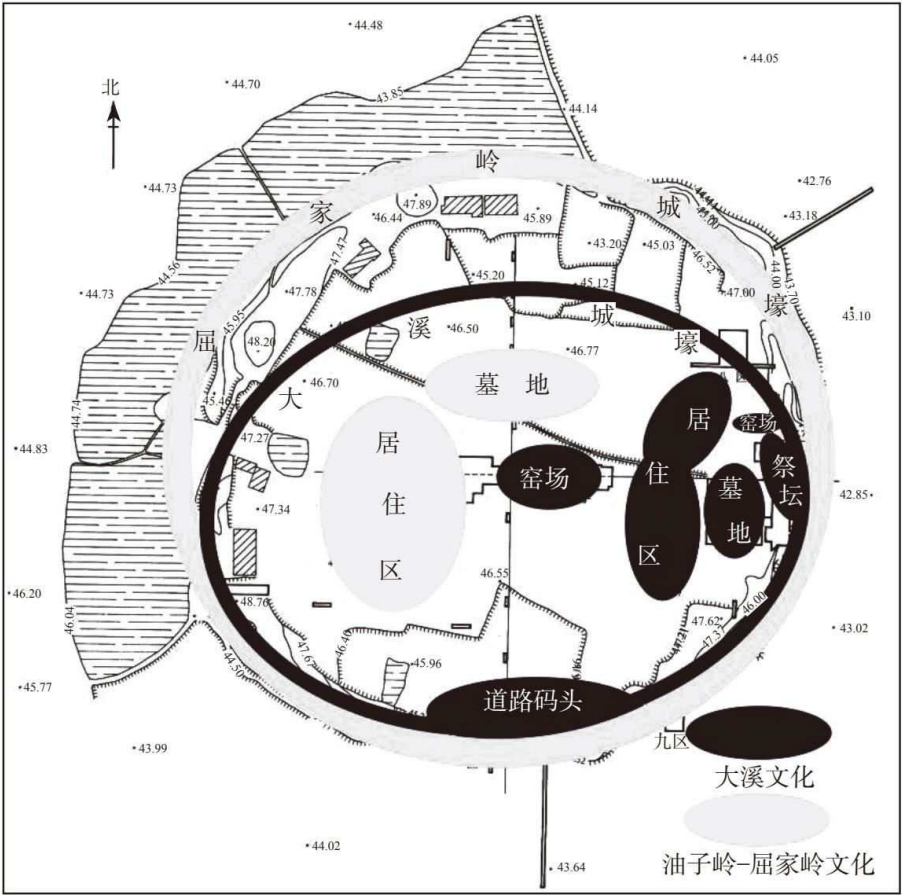


图1-1 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空间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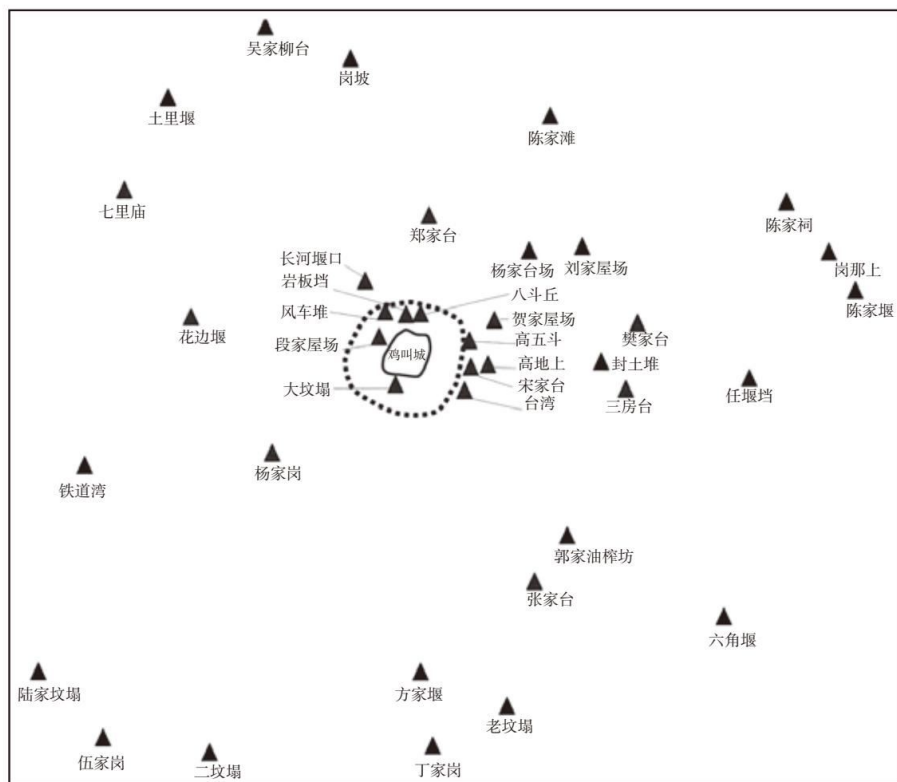


图1-2b 鸡叫城2千米范围内的聚落群

原始社会后期，村落开始分化，出现巨型聚落和普通聚落两类，以政治性、军事性为特征的城郭应运而生。从北到南，由西而东，早期中华大地上遍布的规模大小不同、形态特征各异的聚落，既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又表明最初的城郭是孕育并诞生于村落的。因为早期村落中所产生并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包括建筑、工具、组织、制度、道德秩序和精神信仰等，都是城郭构造的基本形态来源。刘易斯·芒福德就曾指出：“城市的建筑构造和象征形式，很多都以原始形态早已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庄中了……房舍、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

——此时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庄环境之中；各种发明和有机分化都从这里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复杂结构。……组织化的道德、政府、法律、正义，这类事物都起源于村庄社会的长老会议。”^[1]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聚落到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再到两湖地区考古所见的城头山、鸡鸣城等一系列城址和环壕聚落（见表1-1），乃至新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都是典型例证。“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村落发展为城郭，再到出现以城郭为中心的村落簇拥依附现象，都明白无误地表露出了村落是认识和肯定中国远古文明历史的关键物证。正是这一物证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产生，早期人类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原有建立在氏族组织基础上的村落，开始向群体系发展，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聚落的地缘一体化趋势；而从地缘体到跨地缘体的形成，则意味着早期中国以国家形态开始出现，中华大地便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从血缘到地缘进而再到文明的重组与整合。

表1-1 两湖地区考古所见史前城址

序号	名称	性质	年代
1	澧县城头山	城址	大溪文化早期
2	天门龙嘴城	城址	油子岭文化

序号	名称	性质	年代
3	天门石家河	城址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4	石首走马岭	城址	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期
5	荆州阴湘城	城址	大溪文化中期、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
6	天门笑城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
7	沙洋城河	城址	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
8	应城门板湾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
9	应城陶家湖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10	公安青河城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
11	沙洋马家垸	城址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
12	澧县鸡叫城	城址	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13	公安鸡鸣城	城址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
14	孝感叶家庙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15	安陆王古溜	城址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16	襄阳凤凰咀	城址	屈家岭文化
17	黄陂张西湾	城址	石家河文化早期-中期
18	大悟土城	城址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19	钟祥边畈	环壕聚落	边畈文化
20	荆门屈家岭	环壕聚落	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东周文化
21	沙洋叶家湾	环壕聚落	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
22	安陆余家岗	环壕聚落	屈家岭文化
23	钟祥寨子山	环壕聚落	油子岭-石家河文化
24	沙洋光华	环壕聚落	屈家岭文化
25	随州黄土岗	环壕聚落	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26	随州金鸡岭	环壕聚落	屈家岭文化

序号	名称	性质	年代
27	沙洋荆家城	环壕聚落	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28	孝感杨家嘴	环壕聚落	新石器时代
29	安陆晒书台	环壕聚落	新石器时代、商
30	沙洋黄家古城	环壕聚落	年代不详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史前聚落调查》，《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二、国家的出现与村落的行政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与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人丁强弱和经济收入的多寡，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2]。正因如此，在国家出现之后，村落作为早期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产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便开始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无论是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乡遂制”，还是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国家体制下的村落，虽然受到了来自国家的严格管控，但管控并不意味着村落发展的停滞，反而更凸显出了村落存在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考古显示，即使在实施集中城居制的秦汉时期也不同程度地散布着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乡野聚落。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中分别自名为“××里”的有43处和41处[3]，均分散在地形复杂的山川地区，这不仅说明村落广泛存在，而且表明其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

承接秦汉国家对村落的国家认同和实际掌控，“村”这一概念在东汉也随之出现。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鼎器妙用章》中载“得长生，居仙村”。这里的“村”即指乡野聚落。到东晋南朝时期，文献中有关“村”的记载多了起来，不少乡野聚落开始以“村”为名，并大有取代其他称谓的趋势。《三国志·魏书十六·郑浑传》载：“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可见，“村”作为一种名称和地域概念，在南北朝时期已被广泛接受。类似的表达在南北朝相关文献中举不胜举，据统计，仅《水经注》就出现了名“村”的聚落19处。[\[4\]](#)

到隋唐，国家对村落的行政管控更为明显，介入程度也愈为加深。村落甚至被纳入了国家行政治理体系之中。在唐代，村落不再只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空间，还成了国家的行政对象。这一标志性的转变，在于唐代国家在村落中设置村正以行使里正的职责，首次于行政和法律层面肯定了村落的地位。《通典·食货三·乡党》云：“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正是由于唐代的行政介入，不仅城乡分野得到国家层面的确认，而且“村”作为地域概念，也基本取代了其他称谓，成为专指乡野聚落的专有名词。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出现的56个村名，即可见一斑。[\[5\]](#)

“村坊分治”措施的提出，在承认了村落合法性的同时，增强了国家权力对村落的影响与控制。当然，这种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可能并不如以往学者们想象中的强烈，或许用“若隐若现”来形容更为妥当。不少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如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有限官制论”[\[6\]](#)，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7\]](#)。事实上，从汉唐国家与村落社会的互动情况来看，国家权力不仅下渗到了县以下的地方社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为制度性介入。只是这种渗透和介入并非

以“设置国家机构”的方式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体现的。譬如，汉唐时期的里长、村正，或为村落社会的父老、耆老等，到明清时期，则为所谓的乡绅。国家视野下，村落作为最基础的生活单元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在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起到了增强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族群心理认同的作用，这对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与以族群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国家文化认同和凝聚功能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正因如此，国家与村落之间事实上有着“共同体”式的关联。

三、村落共同体的形成

“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于1881年提出，他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类，认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8]。按此，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因而属于“血缘共同体”。费孝通曾指出我国乡土社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9]。斐迪南·滕尼斯与费孝通的总结无疑是十分精到的，但他们的这一理论尚有需要完善之处。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将“村落”“共同体”关系仅局限在村落内部血缘族群与地缘之间，而事实上，血缘共同体的分布也有其地缘性，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因血缘关系派生的村落从一个发展到多个，就会形

成地缘共同体。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前揭考古遗存方面，都表明地缘共同体会形成地缘文化，而地缘文化在国家的统一之下又会上升为精神共同体，就本质而言，这就是国家精神或文化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大意义正是在于成功创立三公九卿制度，废除分封，代以郡县，将地缘共同体统一于国家意志之下，整合成了国家文化共同体。

由此看来，对于所谓的村落共同体，我们必须从两个层面予以审视。一方面，从村落本体而言，村落共同体是指村民在共同生存的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向心力或同心力的组织或合体。这个共同体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高度相似的心理、意识、信仰，以及共同的成员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从国家视野来看，作为地域单元和社会单元的村落，既是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又是国家的基层社会组织，故而国家与村落之间有着“共同体”式的关联。村落与国家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赋税劳役方面的输出，而是在村落与国家的长期互动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家国认同。张之洞曾引用《尚书》说：“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教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不只是国家对村落个体的期待，而明显带有村落个体对国家的人文理想。正是通过这种相互关联、内在互动，历朝历代无数村落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世代相继的身体力行、忠实践行，使村落社会不断传承自身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在先秦就初步形成，唐宋以降直至明清，不断完善、越发紧密，而并非如日本学者柳田节子所认为的，中国在宋代的村落，才形成地缘性

的村落共同体。^[10]

事实上，从内在文化结构看，其“共同性”突出表现在4个方面。

首先是村落的宗族化发展。中国古代先民聚族而居的历史极其久远，以实体宗族的形态出现于村落，应当是在尊儒学、重纲伦礼教的两汉时期，唐宋以降不断巩固，宋代强化，尤显突出于明清，直至今日，仍是村落的一个显著特征。^[11]弗里德曼就曾说：“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12]民国《歙县志·輿地志·风土》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堂皇闳丽，与居室相间。”不仅村落的居民姓氏体现为一至两个明显的主姓，而且形成了以族规、家训和家法等为多维伦理的儒家价值体系，构建了基于血缘的共同价值准则。

其次是村民互助体系的形成。历史文献显示，村落成员在盖房、借款、节庆礼仪和耕作、水利疏浚等方面，普遍存在相互帮忙、互相道贺、生产互助的道义成分与关系。元代王桢《农书·锄治篇》云：“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名为锄社。”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主要稻作区域的四川、湖北、贵州、湖南、江西各省各地，村落邻户之间则一直保存着“帮工”传统，一家有事，户户“帮工”，插秧收禾两季，“帮工”蔚然成风，越忙越帮。正是这种互助体系强化了村落成员之间的集群意识，使村落自然生成为基于村落成员高度互相依赖的生活共同体。

再次是村民信仰的同质化。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的、功能

完备的基本社会单元，村落不仅有着明显的村落边界，而且基于这一范围产生并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神明信仰，学术界称之为“祭祀圈”或“信仰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数以千计的明清造像发愿文所记载的每一项内容，都有“××土地”的惯例[13]，这就充分表明作为管理一方土地的神灵，“土地公”具有地域边界的意义。直至今日，湖南等地的村落社会，逢人去世都要去当地土地庙行“告知”仪式，即便没有了庙，也要在原来的土地庙址旁祭祀。正是这种共同的神明信仰使超越宗族的庙宇修葺和共同祭祀活动成为常态，不仅起到了整合村域内同宗同族内部的不同阶层的作用，而且以修建庙宇和拜祭宗族的神明的形式整合了同一地域的不同姓氏族群于同一信仰之下。杜赞奇曾在考察中国华北村庄的宗教时明确指出：“在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组织之外，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所有村民被自然而然地包括在宗教组织之中，而非本村人则排斥在该组织之外。”[14]有些村落的空间布局甚至明显受到了某种宗教或信仰的影响。

最后是村落治理的乡约化。所谓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的公约。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看，乡约是始于宋代的村落社会中的一种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目的的制度和民间组织化自发行为。历史上，乡约在村落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村落自治、村落社会保障、村民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所形成的一个重要自治制度形式。其制度的产生、形成，源自村落自治或治理的组织。村落族群中，不仅有组织，还设有“约正”一类的执行者。现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文本传为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由蓝田吕氏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15]。《吕氏乡约》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等社会性活动做出了规范性要求。这种超越个体利益，建立在群体生命意

义之上的互助友爱的道德规范，体现并进一步强化了乡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共同价值观。宋代以降，全国各地，皆立乡约，知名的如江西的《南赣乡约》、徽州祁门的《文堂乡约》、山西的《雄山乡约》、广东的《沙堤乡约》、福建的《青阳乡约》《惠安乡约》，等等。

事实上，村落共同体的性质还体现于通婚圈和村落武装防卫等方面。关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舅表婚”事例就比较典型。这种婚姻制度赋予舅舅对外甥女有优先纳娶为媳妇的特殊权利。尽管这种婚配制度带来诸多弊端，如人口生育质量低下等，但在传统中国村落社会中起到维系血缘共同体的作用。湘桂黔边境的苗族地区和部分侗族地区，直至晚清都仍然流行着这种“舅霸姑婚”的制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6]关于后者则更为突出。历史上的很多村落，如魏晋时期的坞壁，宋代陕北、四川、湖南南部等地的堡寨，都以武装防卫为主要功能。晚清时期，为应对包括白莲教在内的各类动乱，在保甲基础上出现的地方武装组织^[17]，以及后来华北地区出现的红枪会，都体现了村落的这种共同防御功能。湖南地方的团练，成了与“太平天国”武装抗衡的国家重要军事力量。有学者甚至认为，武装自卫组织更能体现基层共同体的内聚特征，并更能强化这种内聚特征。^[1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依靠武装自卫组织所体现出的村落内聚力，主要出现于中国历史社会动荡时期，因而并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晚清的“湘军”在击败“太平天国”之后，尽管在当时一度成了代表国家的武装部队，但使命一结束即行被解散。不过，由此可以反观，作为“共同体”的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显然和深刻的。

中国村落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也是村落社会发展为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过程。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因素之外，传统意

义上的村落群体，一方面是极少与外界发生关系的，另一方面，村落共同体实际上是服从于国家共同体的，甚至是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形成了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从古代社会史来看，相比城郭与市镇，宋元明清时期的村落发展不仅滞后，而且继续承受着唐以来包括城市的扩张带来的生活资料的掠夺式占有、小农经济的局限和村落人口的增加在内的各方面压力。正是各种因素和压力交织在一起，到清代晚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揭竿而起，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村落人口的流动性陡增，生产生活空间的封闭性得以打破，宋元以来形成的村落共同体也渐趋弱化，包括村落在内的乡村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

四、村落的现代转型

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19]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一系列运动和实践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传统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取代，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渐趋瓦解。这种社会现实冲击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村落，在越靠近城市和交通越发达的地区，村落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历史社会曾形成的“村落共同体”的许多功能已经趋于弱化，甚至有的村落共同体本身已经解体，但是乡约、信仰等诸多方面依然呈现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40—1949年。这一时期的村落开始被动地、缓慢地进行着现代化的转型。通商口岸、大型市镇等工商业相对发达和交通便利地区的周边村落，铁路发达的天津、潍坊、唐山等地的周边村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村落加快了粗犷农业的精细化分工和适应商业化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建构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村落内部的同质性被降低。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村落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全面深刻的介入，行政权力由上而下地触及了乡土社会的最基层，村落与外界的关系被高度趋同化，村落自主性大大降低甚至消失了。集体化改造、人民公社建立和“破四旧”运动等，虽然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弱化了村落的传统性、共同性和自主性。第三个时期是1979年至今。1979年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村落去集体化，虽然国家计划经济观念不同程度地实际存在，但国家除了牢牢把握土地的国有化（哪怕是集体土地之名）外，已经交还了村民生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村落重新焕发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村落被进行着“大拆大建”的现代性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浓郁农耕文明特征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村落中逐渐或正在不断消解，村落共同体基本瓦解。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大拆大建”带来了村落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根本性改变。

通过对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性脉络及其变迁背后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进行梳理，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村落作为定居生活的产物，它的发展、变迁不仅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而且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某些历史性和重要的互动关系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合法

地垄断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资源，但由于社会网络具有过滤国家试图控制社会的某些行为的能力，因此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实质上是有限的，它往往需要通过下发不同的行政命令或是制定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不断调适其与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底层社会为争夺生存生活资源而发生的行为与活动限制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是若隐若现的，但不能否认村落在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两汉魏晋的“散村化”、唐代的“行政化”，还是历史时空下的“村落共同体”，抑或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都充分体现了村落对于稳定古代社会既有社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价值。

第二，历史上，历朝历代关于基层社会的行政编制和田赋徭役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落的变迁，但村落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的聚落空间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它的变迁是拥有自身内里逻辑的，除土地有限与人口膨胀之间的矛盾推动以外，还包括宗族关系、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乡规民约等因素的作用。村落的历史变迁，不能片面地归因于乡村制度，还要关注制度文化以外的相关文化因素和经济、技术与社会的作用，以及自然地理等诸多因素。

第三，村落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土地是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依赖要素。然而，在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村落逐渐失去了依托的土壤，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使农村城镇化不可避免，村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上正在发生千年不遇的深刻变局。村落将何去何从？村落会终结吗？如果按照发展的规律，发展是事物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丧失社会功能，缺乏变化、创新和发展的潜能，很快就会被历史湮灭或同化，村落当亦是如此。但是，我们要充分意识

到，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村落的现代转型是可能的，这种转型应该建立在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之上，而非“推倒重来”或全盘西化。要守护村落，振兴乡村，关键在于重塑乡土价值，发挥文化的“活态”效应。

[1] 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第19页。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页。

[3] 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

[4] 据笔者统计，《水经注》中名“村”者有19处。齐涛统计为17处，见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1页。同见《水经注》的《水经》《沔水》《渐江水》《江水》《耒水》《渭水》。

[5] 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村”广泛分布于扬州、海州、登州、莱州、青州、缙州、齐州、德州、沛州、冀州、赵州、镇州、忻州、太原府、汾州、晋州、蒲州、同州等地。

[6]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6页。

[8] 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4页，第65页。

[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3页。

[10] 柳田节子：《乡村制的展开》，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9卷，岩波书店1970年版。

[11] 参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

书馆2005年版，第62—65页；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第139页，第168—170页，第190—191页，第251—252页，第284页。

[12]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数以千计的造像记发愿文，有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可参见胡彬彬、吴灿：《祈福禳灾——道教造像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胡彬彬、李方：《祈愿延绵——佛教造像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15] 《吕氏乡约》作者虽署名是吕大钧，但其兄大忠、大防及其弟大临都曾参与过乡约的讨论。后来经朱熹增损，《吕氏乡约》便在更广泛范围内传播，而且影响了后世乡约的文本制定。

[16] 胡彬彬：《靖州“群村永赖”碑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17] 牛贯杰：《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18] 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

[19]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第三节

中国村落特征

人们定居下来以后，为了生存，必然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生产生活和繁衍，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相关的经验，耕种以谋生，建房以居住，交流以相处。日积月累，不断发展，于是生发出相应的文化。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村落文化的范畴，即是指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在群居的基础上进行的系列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也就是说，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包括有形的建筑文化，而且应该包括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形态。

有形的显性的文化形态，大多体现在传统建筑中，甚至隐性的文化也有在建筑中予以体现和反映的。以长江中游的湖南地方为例，如湘中的府第式建筑，往往是以一家人或一个家族为一个整体的大院落，其建筑从空间布局到功能体现忠实地遵循着传统汉文化的礼乐秩序，甚至制度文化意义重于实际居住功能的需求。如双峰曾国藩的家府，就是儒家居住等级与制度文化的典范。“中为堂，左为尊，右为次”，“东阶为主，西厢待客”，没有丝毫的僭越或者疏忽，可谓“秩序井然”。而湘南地区郴州一带聚族而居的村落，往往是一栋栋独立的住宅，此接彼连，整体上形成气势恢宏的村落。虽然每一个住宅同样体现了礼乐秩序的传统精神，但从大的格局来看，单个住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维系在一个族群的大框架系统之中，与祠堂等公共建筑相匹配，在“慎

终追远”“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体系之下，独立的空间布局便于营造出相对宽松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理念，个体的主观独立愿望在客观的空间布局中基本可以得到尊重，与湘中的大宅院把个体（人）完全淹没于隐性的制度文化之中形成明显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建筑文化上，也反映在建筑的壁画上，湘中和湘南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基调。湘中府第式庄园建筑上的壁画，多能见到以人伦秩序教化为主题内容的庄重严肃的题材，如同家训，成教化、助人伦的劝诱功能已超出了作为绘画艺术自身应当具备的审美愉悦。即便是应当使人轻松的戏剧题材，也蒙上了些许沉郁的威仪。而在湘南，富有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则非常突出和典型。正襟危坐的家训式场景描绘很少见，而纯粹欣赏性的山水楼台、花鸟人物和雅士偏好的松、竹、梅、兰题材则成为主流。从绘画的技法看，湘中地区的壁画技法讲究规整严谨，无一不呈现出正统文化的气息，令观者不由得端正严肃、敬而畏之。湘南地区的壁画则并无太多的技法讲究和制约，笔随意走、画由兴出，所以信笔而行，是技法依我，而不是我就技法，其凸显的是文人意趣与情致，往往令观者赏心悦目、神而往之。而与湘中、湘南相对应的湘西南、湘西北少数民族建筑，则多为依山傍水、就地取材的干栏式。它们错落于青山绿水、茂林修竹之间，与之浑然一体、亲切和谐，没有丝毫的矫情和富贵逼人的气息，展示出朴实无华却不乏热烈豁达的民族情怀。其壁画更富灵动浪漫的精神气象与神秘奇异色彩，呈现的是与湘中、湘南不同的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精神，可令观者深刻领悟到人—建筑—自然三者间最为真切友好的关系。[1]

村落生活中的无形文化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端午吃粽子和中秋吃月饼体现的是民俗文化；清明扫墓体现的是宗族文化；过年时的祭祖祭天体现的是祭祀文化；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

收获，冬天收藏体现的是生产文化。村落中的家法族规与乡规民约更是礼仪文化的集结地，如明代大儒王阳明《南赣乡约》云：“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2]该乡约中详细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和睦乡邻、戒恶行善、忠厚仁义等。人们正是秉承着这些行为规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内涵。真所谓“小村落，大文化”^[3]！

中国村落及其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村落的活态性特征

“活态”是传统村落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活态”，是指传统村落文化呈现独特的生命力，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依然发挥着固有的功能，至今仍是传统村落中原住民生活的一部分，如村落的古井依然流水潺潺，为村民生活用水提供方便；池塘依旧发挥着生态调节的功能；还有小桥、古树，风景犹在；祠堂、古塔等建筑虽然改变了原始功能，但在居民心中依然是神圣之所，意义未泯；传统的方言依然是村落中交流的主要方式；祖宗的灵位依旧立在神龛上面，被恭敬地供奉着；街道古巷里村落历史的足迹清晰可辨；各种故事、历史传说依然回荡在村落的上空。所以，传统村落被誉为“活化石”“活态博物馆”。

费孝通说：“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

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又说：“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条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4]费孝通揭示了传统村落中两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经验与传承。在传统村落中，世代累积的经验就是很重要的村落文化。而这种经验的累积，人们并不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是通过口传和不断重复践行的方式传承下来。

简而言之，传统村落文化虽然传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依然发挥着固有的功能。我们从现有的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中，穿越时空的隧道，依然能感受到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他们的祖先生活的情形。

城邑中的精英文化，往往是由文化精英们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传播的，并保存在典籍中；传统村落中原住民更多的是用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方式，在言传身教的行为中传递自己的文化。

相对而言，城邑文化趋于静态，而村落文化是动态的；城邑文化是文字的，村落文化是口语的。在传统村落社会，人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传承者和践行者；不仅表现为“知”，而且鲜明地突出“行”，“知”规范“行”，“行”实践“知”。知行合一的活态，正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突出表现。传统村落中这种“活态”的文化，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民族文化。因而，研究和保护好这种“活态”的文化，意义十分重大。这种“活态”文化活在历史中数千年了，我们不仅有责任让这种“活态”文化活在当下，而且有义务让其活向未来，成为永远。

然而，到了当今世界，在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绝大多数传统村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情势。如何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的“活态”，已经成了当前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全新的重要课题，并且这种课题的研究很难以某一单一学科独立地、相对完整地完成。所以，多学科的交叉介入研究，将成为一种必需。

二、村落的血缘性特征

村落的初期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部落生活，并延续数千年而不绝。在其发展历程中，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村落形态，也不论村落的形态历经了多少变迁，血缘性一直都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农耕生活的初始时期，人类的生产能力极为低下，仅凭个人几乎很难生存，所以必须依靠群体才能谋生，而最可靠的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形成的群体，最有效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见，人类最早的群体应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5]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单靠个人的独立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依靠血缘亲族团体才能生存下去。这时，人们的血缘关系与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它支配着人们的一切。“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

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6]在远古部落时期，血缘关系是最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摩尔根在谈到部落联盟建立条件时说：“氏族所体现的亲属感情、各氏族的同宗关系，以及他们的方言仍能相互理解，这三者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因素。”[7]在远古时期的部落内，血缘关系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关系，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几乎很难在一个部落内立足。

到了西周时期，血缘关系进一步引申出以家族为主的宗法制。在远古时期的部落社会为了生存而自发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群体关系，到了“西周，不仅没有采取过破坏氏族的改革，反而经过‘维新’，把旧的氏族机关和氏族制度大量移用到阶级社会中，这就不能不给血缘关系的保存留下很大余地”[8]。

“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族，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9]一个家族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动辄数代至十数代甚至数十代。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以家族宗法制为中心的村落社会结构。

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中国原始社会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家族制度，在阶级社会中发展为维护剥削阶级世袭特权的家族宗法制。商代奴隶制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种族奴隶制国家，周代“封诸侯、建同姓”把家族宗法组织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形态。此后，封建制虽然取代了奴隶制，但是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改变。最直接的原因是适应于奴隶制的家族宗法制并没有妨碍于封建制，恰恰相反，家族宗法制又继续适应甚至更加适应封建制。战国秦汉以来的乡、里、聚、邑、连、闾组织或伍、什编制，以及里正、父老、

廷椽、耆夫等基层属吏，仍然代表着社会广泛存在的家族宗法制组织的统治。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家族宗法制却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形式上和部分的“质”有所衍变，但其社会“细胞”的“内核”基本不变）。家族宗法制始终是中国古代直到民主革命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特点、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家族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家族宗法制的稳定性、顽固性和不变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10]

一边保持着家族或氏族组织，一边又以家族共居，组成一个村落的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更为普遍。如云南基诺族村寨一般包括数个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父系大家族；傈僳族的村落组成，一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一个氏族内的一个大家族单独组成，二是由同一氏族内的两个或多个大家族联合组成，三是由几个不同氏族的家族混合组成；在傣族中，有时一个村寨就只属于一个家族，有时一个村寨由几个家族和一些零星户组成[11]；在湘、桂、黔三省边界相连的广大地区，侗族、苗族的村落，不少是以房亲或者房族为构建形态的，一个寨子或好几个寨子都是由同族同姓的房亲、房族组成的。少数也有外姓杂住其间，但外姓居民的几房在形成上也是由其内在房亲构成的。由此可见，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并存的。

“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凸显了村落中的血缘关系，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很重要的维系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一直是长达数千年的经济格局与形式，血缘关系也一直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在传统村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法制和亲属关系。

费孝通说：“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

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费孝通在这里很形象、生动、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中心所形成的“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的差序结构，在传统社会中，这种“血缘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村落的地域性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纬度差别相当大，气候不同，地质内在构造与地貌特征都不尽相同。因而，传统村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这种地域性特征的鲜活说明。一个村落的文化，往往与其所在的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形海拔、土质水分、光照温度、日月潮汐、风霜雨雪等影响因素，物种作物的生长发育与土壤、水质、气温、气压、湿度、植被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地域不同，不仅影响村落的形成，而且会形成不一样的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具有自身独特生活方式的人。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一方水土滋生一方文化。比如，天井是传统村落中常见的建筑。在我国南方建筑中，天井一般南北方向开口狭窄，东西方向狭长，这样可以为建筑提供充足的自然采光，同时强烈的太阳光也不会直接射透天井。而在北方，天井南北方向开口比较大，成为人们晒太阳的理想场所。同样是天井，南北地域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天井建筑样式与建筑空间，以至形成不同的文化。

民间常有“天赐地造”之说，这在村落建筑材料上反映得尤为突出。不同的地域生产不同的建筑材料，因而人们常常因地制宜地选择当地适当的材料来构建各种建筑。比如，产石地区多石

构，不仅柱梁墙是石质材料，就连能遮阳挡雨的“瓦”也是天然的“石片瓦”，而非人工烧制的陶瓦。产木地区多干栏式建筑，产竹地区搭竹楼，黄土高原多窑洞。也有同时使用竹木材料的，南方地区由于多雨潮湿，所以多采用干栏式结构，而北方地区却多采用抬梁式结构。概而言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兴建的传统村落，是不同地域的不同原住民祖先因地制宜，依据当地所特有的自然物产条件与气候光照温度条件，以当地的材料结合当地的建筑工艺和智慧所营造出来的，有着鲜明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民族个性。

不仅仅是建筑不同，饮食习惯也明显不同，通常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不尽准确，但大致反映出不同地方的人们饮食习俗的不同。“鲁菜”“粤菜”“湘菜”“川菜”“徽菜”“淮扬菜”“浙菜”“闽菜”这“八大菜系”，显示出了更加清晰的地方差异性。

即使像小搬运这样的习俗，各地在挑、担、抬、背、扛、提、搭、推、驮等方式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同样是搬运泥沙，有的习惯于肩挑，有的习惯于头顶，有的习惯于背运，有的习惯于手提等，千差万别，各具传统习惯、习俗的特色。

地域性是传统村落文化在空间形态上所显示的特征。地域性特征还突出地反映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因而，我们在认识、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时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其地域特征，否则很容易抹杀地域村落的文化形态与个性，也就意味着丢失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四、村落的封闭性特征

有人曾经对越南的一个村庄做出这样的描述：“浓密的竹林掩映着典型的越南村庄，荆棘篱笆环绕着村舍。村民们居住在绿竹屏蔽之后，就像居住在神话故事中的魔圈里面。周围的田野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物产，他们躲在自己造就的保护圈内，不愿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不愿意与政府打交道。比如给政府交税吧（这是他们与政府的主要联系），他们就按一个整体由社区统一上交。村庄是这片土地的主宰，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但他们又保持着内部自治和地区范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13]这虽然是对越南村落的描述，但是与过去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村落的生活形态有基本的一致性。

由于大多数村落位于乡野僻静之地，加上古代社会道路交通欠发达等要素的制约，村落与外部社会缺少交往，信息较为闭塞。再加上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强，无须与外部社会进行过多的物质交换，从而导致了村落事实上往往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半封闭型的、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村落的封闭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口流动少。“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14]在传统社会，在一个地方出生的人，往往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结婚、生子、变老，一直到死去；人们很少流动，即使外出，老了，也要叶落归根；死了，即使千里万里，也要把棺材运回来，葬在故土里。所以，在没有发生历史变故或自然变故的情况下，一个村落自形成之日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几个姓氏，很少发生变动。房子、土地、山林乃至墓地，都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其二，土地依赖与生产的封闭性。马克思论述法国农民的时

候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15]马克思的“马铃薯之喻”生动反映了小农社会独立、封闭的生产关系。考诸中国传统村落，长期以来，农民的生产无不是独立自封的状态。费孝通说：“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6]向土地求生，是小农社会中乡下人谋生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他们的生产对象就是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由于土地有限，生产力低下，人们要谋生，必须在土地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以致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多样性的生产，也无财力改善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因而，在土地不增加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地在土地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土地付出的劳力越多，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就越紧密，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谋生，因而，完全“被土地所囿住”^[17]。向土地求生的生产理念，早已经深入村落原住民的骨髓里，以致现在跟随子女进入城市居住的不少乡民，都试图在城市小区的周边寻找适宜土地，播撒生产的种子，有些甚至把土挑到房顶，自己“制作”小型耕地，达到播种的目的。所以，在乡下人的脑海里，似乎只要有土地，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播种，似乎

也只有在地里播种生产他们才觉得踏实可靠，他们的生产观念完全被局限在地上了。

其三，生活独立与封闭性。乡下人在地上播种，依靠地谋生，生产的目的是自我谋生，所有的产品最终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生活所需也基本上由自己生产。“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18]从生产到消费，是一条完整的封闭的生产生活链，这种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没有分工，相对独立而没有彼此的依赖，本质上是封闭的。再者，在一个相对平和的村落社会中，每个家庭都可以自食其力，平时的生产生活一般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状态中（如婚丧）才求助于人。生活上，以家庭为单位绝对独立的这种自食其力，客观上不仅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封闭，而且封闭了人们的思想。

生产的脆弱性，则从根本上限制了小农扩大生活交往的条件，并促使其易于产生保守的心理而排斥外在世界。这是因为交换往往对劳动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有利，劳动效率高的、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往往参与交换的积极性高、需求旺盛。而小农由于劳动效率较低，他们参与集市交换往往是不划算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小农是不愿意拿辛勤劳作获得的生活资料来参与交换的，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自我满足家庭需求，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参与少量的交易行为。

另外，在传统村落社会中，村落相对保持孤立状态，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接触本来就并不多，不仅很难有产品交换发生，而且其他相关信息的传播也是相当有限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9]。一般来说，在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

个人是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食其力生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民就不需要伙伴。事实上，在重大节庆、婚丧和农忙等偶然性的、临时性的状态之中，仍是需要其他乡民一起协助的。但是，总体上而言，在传统中国，几乎每个村落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系统，除了基本的徭役、兵役和诉讼等，村落几乎很少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朝廷发生直接接触。所以说，在传统社会中，相比城市，村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半封闭的社会基本单元。[20]

[1] 胡彬彬：《小村落大文化》，《光明日报》2013年5月6日，第5版。

[2]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

[3] 胡彬彬：《小村落大文化》，《光明日报》2013年5月6日，第5版。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页。

[5]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6]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7]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1页。

[8] 赵世超：《西周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并存现象剖析》，《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9]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7页。

[10] 刘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11] 曹成章：《傣族社会的家族公社及其残存的原因》，《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

27页。

[13] 转引自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4页。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页。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4页。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页。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页。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与中国的早期村落



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体系之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是起源和形成最早的文明之一，而且是世界上自起源以来就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唯一的文明体系。如果以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那么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七八千年。但是，文明的形成往往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是量变向质变的飞跃。换句话说，就是在人类文明形成之前，还有一个文明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起源阶段。从时间上来说，文明的起源是伴随人类的起源而逐步发生、发展的。也就是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许多人类文化，都是源自史前社会的人类活动。确切地说，就是从“猿”进化为“人”之后，人类就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样如此。

从考古发现来看，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远古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文明化的过程。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以及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早期先民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在距今12 000年左右，（长）江（黄）河中游地区逐步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始缓慢出现。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等与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开启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先声。史书上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传说，也大致始于这一时期，即“华夏部落”时期。大大小小的部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它们相互征伐，并在今中原地区最终形成了以炎黄为共主的部落联盟，由此中华文明的前身——华夏文明便初具雏形。大致在公元前2070年以后，华夏部落开始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和模式。纵观这一文明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人类村落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全过程。换言之，即远古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村落，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

起源，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始于村落的。这不是偶然，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历史必然。

第一节

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形态

毋庸置疑，中国村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唇齿相依，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实证”，更是中华文明渊源的“活证”。它是中国历史上家国一体构建的重要载体与历史起点，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根与魂。所以，基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层面，从中华文明发生的源头展开对村落起源与发展的讨论，对村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是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部分，而且是揭示与深刻认识中国文化源和流的重要关节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19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作为中国村落遗址的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事实，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早期村落对于认识和肯定中国远古文明历史的重大价值。

一、发生学视域下的村落起源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村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然而，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和社会单元，它并不是直接伴随人类的起源而产生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至少其雏形是如此。

从距今1 500万年的云南开远森林古猿到170万年前的元谋

人，再到后来的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及至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从灵长类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而来，属于群居型动物，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体格相对弱小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中的凶猛动物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得以生存所特有的能力。正是这一进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

一方面，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单一个体的生存难度，更是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生存发展的族群观念，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只是，由于人类起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经济生活，为了获取食物，往往需要频繁迁徙，因此并未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规模化的居住点，物质实体空间不明显，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易经·系辞下》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1]《庄子·盗跖篇》中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2]考古发现的北京周口店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兴隆洞人和山顶洞人，以及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发现的穴居遗址，都说明洞居或穴居是人类最初的“家”。这个“家”虽然只解决了早期人类对生存的最低需求，但使人类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形成了基于血缘的聚族性特点。距今约3万年的山顶洞人便是最佳例证。考古发现，北京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有8个不同个体，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3]，这显然是一个血缘聚居群。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我们认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是村落形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并因这一要素，人类的群居行为具有了发生学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生存欲望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因此创造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秩序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从石器的制造与改进到对火的利用和控制，再到衣服和装饰品的出现，及至陶器的发明和使用，都说明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建立在生存需求和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两者相互影响、互为结果。特别是伴随着丧葬制度、婚配制度的出现和改良，早期社会组织得以初步形成。丧葬制度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反映了社会的有序更迭。北京山顶洞等史前文化遗址所显示的居室葬俗便可说明。[4]婚配制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秩序的逐步规范，另一方面保障了社会的代际更迭，因为稳定的婚配关系的建立可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推测，可能在100万—25万年前人类开始排挤乱婚，血缘级别婚出现[5]，并排斥不同辈分的杂婚，后来又发展出“外婚制”。正是这一持续改进的婚配制度，特别是“外婚制”的发展，降低了因血亲婚配导致的生育畸形和智障者的频繁出现，大大提高了人口的出生率和成活率。也正因如此，血缘家族不断析裂，产生新的血缘家族，进而形成氏族，原始群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6]氏族组织的产生和出现，使人类的群居行为具有了较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地域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因此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开始产生。

特别是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人类开始从依赖大自然的采集、狩猎的掠夺性经济生产方式过渡到以人工生产为主的农耕畜牧经济，具有迁移性的居民点开始固定下来。人类从“居无定

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耕有其土、种有其地的定居生活。耕作种植与采集渔猎虽然同样与阳光、温度、海拔等地理要素相关，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对象是耕种在土地上的作物，必须长期照看，所以需要以定居为前提，而后者则需按不同时令季节、动植物的产出规律不断改变人类的活动范围。正是由于这一改变，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和狩猎业中分离出来，依靠人工耕种，初步解决了食物问题。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左右，广东英德县牛栏洞、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稻谷遗存可为明证。由于以粟稻为代表的食源物种的出现和牲畜被驯化，以农业为主的群聚现象或固定居民点开始涌现。考古发现，在距今1万年左右，我国广西百色盆地的右江两岸、重庆丰都长江沿岸、皖南水阳江沿岸、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西峡、河北泥河湾盆地，特别是湖南澧阳平原、陕西洛南盆地、河北泥河湾盆地等区域就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7\]](#)从地理特征和位置来看，这些居民点普遍位于水源便利、土地肥沃、地势开阔和食物资源丰富之处。其自然条件优越，既便于农业种植，又适宜居住。从牛栏洞、仙人洞和玉蟾岩等洞居形式发展到上述群居现象特点的形成，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因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扩大，人类已从深山洞穴走向平原盆地，开始了自己营造住所的历程，距今1万年左右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房屋遗迹可资说明[\[8\]](#)；二是农业的发展使人类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定，加之人口的增多，居民点便逐渐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居民聚落。在很大程度上，尽管这仍属于一种基于共食关系的群居行为，但开始形成以母系血缘结成的社会基础与基层单位和经济基本单元。就此而论，距今1万年左右的这些群聚现象，从发生学来看，具备了村落的性质，应该属“前村落”形态，或者是村落的肇始期。

二、农业的兴起与村落的形成

严格来说，没有定居生活，就没有村落的产生，也便没有农业社会的向前发展，更没有后来的农耕文明。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才有了农业的发展。反之，农业的发展，则稳定和推进了定居生活向规模化发展，这一发展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早期村落得以形成和发展。这突出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固定居民点向聚落化、规模化、密集化发展。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中业已发现的规模不等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各类聚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所发掘发现的这类例证更具典型性。长江流域的澧阳平原，发现史前聚落就达400多处[9]，其中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类型；浙江余杭所属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乡镇50千米范围内，经调查和发掘，分布着54处聚落遗址，考古界称之为“良渚文化遗址群”（见图2-1）。[10]在黄河流域的河南淇水沿岸的15个现代村落范围内，就发现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占地70千米范围内，发现聚落遗址69处。[11]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规模上有数千或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米不等，而且地域空间上的房屋，聚合性极为明显，富有典型性。它们与早期固定居民点一样，基本上都位于河流沿岸肥沃的黄土台地或湖池附近。这表明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越丰富的地方，村落遗址就越密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农业作为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产业，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土地、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优越这一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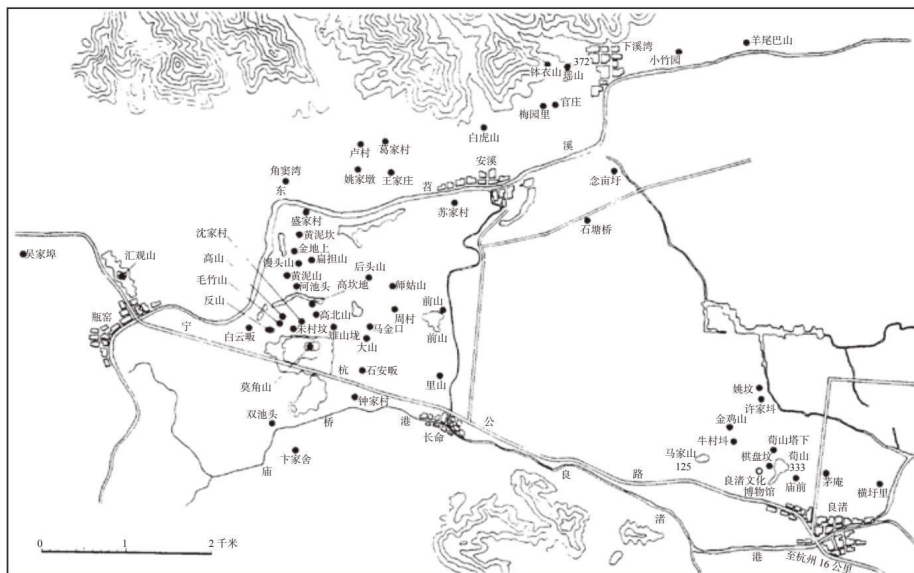


图2-1 良渚文化遗址群

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农业起源以来，到公元前75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得到了初步发展，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并占有主导地位。[\[12\]](#)这一发展最显著的结果，就是聚落带有了较为鲜明的农耕文化性质，不仅普遍建造了居住房屋，而且体现为房屋建筑群的有序排列。现有的考古发现，这一阶段较为典型的文化类型主要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跨湖桥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后李文化，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等，不一而足。判断早期聚落是否具有农耕性质，关键是看遗址中有没有丰富的农业遗产遗址类遗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聚落遗址中的农耕痕迹突出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粮食作物遗存常见，南方是稻谷，北方是粟米；二是都建有粮食窖藏；三是家畜家禽饲养普遍，发现有猪、狗、牛、羊和鸡等骨骼，配套有专门的圈养之处；四是有成套的农业工具，包括耒、铲、锄、杵、镰刀、磨盘和磨棒

等；五是聚落周边发现有古农田及灌溉遗迹。诸如此类，皆可以从稻作系统的代表性遗址如长江流域的八十垱遗址[13]、临澧胡家屋场遗址[14]、跨湖桥文化遗址[15]，粟作系统的代表性遗址如黄河流域的舞阳贾湖遗址[16]、新郑唐户裴李岗遗址[17]、章丘西河遗址[18]，以及北方地区的赤峰兴隆洼遗址[19]、白音长汗遗址[20]中窥见一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之中，发现了一碗保存良好的黄色面条[21]，历时长达4000年之久，堪称世界上所见最早的面条，这既很好地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面条起源于意大利的学术假设，又确证了粟作农业与早期村落发展的关系。

从聚落形态而言，上述这些聚落遗址因所处位置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如黄河流域因干燥少雨、冬季寒冷而多为半地穴式建筑，而长江流域则因湿热多雨、蚊虫多而以地面建筑为主。不仅如此，聚落面积也通常以前者大、后者小为区别。据统计，在长江流域，5万平方米规模以上的聚落几乎没有，而黄河流域则较为常见。[22]这除了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因素影响外，可能主要与南北之间人口数量的多寡有关。因为按照人口考古学的测算方法，包括遗址长度、遗址居住空间和遗址面积大小等在内的聚落资料，都是衡量人口数量的关键指标，并且一般是成正比的关系。[23]（长）江（黄）河流域的聚落差异固然明显，但共性特点也同样突出：房屋成组布列，多为单间式房屋；聚落周边大部分有壕沟；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居住区、墓葬区均呈分离趋势；聚合性、防御性、组织性特征渐趋鲜明；等等。特别是内蒙古兴隆洼遗址中平行有序排列的8排房子（见插图1），以及新郑唐户房址分4组布局的现象，充分显示出氏族组织下基于血缘关系的聚族群居性准则。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尽管会因地域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会因生

存、生活这一基本诉求的相同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因为无论是居住区还是墓葬区，均以群组现象为主，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共食、共享、共有的集体观念，墓葬结构和出土物规格均体现为一致性，未见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

然而，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些聚落遗址来看，其文化层都很薄，一般仅1米左右，厚者也仅2米出头。彭头山遗址只有0.4~0.8米，八十垱遗址1.5米，临澧胡家屋场遗址0.75~0.9米，跨湖桥文化遗址1.24米，舞阳贾湖遗址1~1.5米，新郑唐户裴李岗遗址0.8~1.8米，章丘西河遗址1.1~2.3米，赤峰兴隆洼遗址0.15~0.65米，白音长汗遗址0.2~0.65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新石器早中期人口数量可能仍然较少，二是人类在这些聚落中的活动时间似乎并不太长。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一阶段农业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据农业史家研究，农业起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前农业处于刀耕火种的形态，后来随着生产工具包括石耒、石铲、石锄、石杵、镰刀等的出现和改进，及至种植作物的多元化，耕作方式才逐步由刀耕火种过渡到耙耕农业。^[24]这种耕作方式的转变，固然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但本质上来说，其农业仍是迁移农业，属于撂荒耕作制的范畴，即在一个地区可耕土地都轮换耕作过后，短期内土地难以恢复，人们就要聚族迁移，重新寻找或开垦新的耕种土地。^[25]因为原始农业是一种掠夺性的粗犷式经营方式，缺乏人工养地的环节，所以往往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耕作之后，土地质量就会下降，相应地便不会有好的农作收成，只好抛荒，另寻耕地。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也被称为“游耕”或“游农”，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

正是这种耕作方式使得早期人类的定居生活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稳定。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的聚落烙上了深刻的农耕印

迹，但聚落可能缺乏长久的连续性，或许呈现出更多的间歇性特征，即在聚落因土力衰竭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被废弃之后，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の停歇期，待土力恢复可用于耕作后，另一族群又迁居于此，聚落便又重新组建起来。考古发现的上述聚落遗址，大致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部分聚落遗址体现为好几层史前文化关系，有些还有商、周甚至唐宋以降的文化痕迹。如章丘西河遗址，除了后李文化外，还包括龙山文化、唐宋元及清代文化遗存[26]；唐户遗址，则包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遗存[27]。这些聚落遗址虽然文化跨度大，从表面上看具有连续性，但事实上是不同族群间歇性活动的表现，这就充分表明在“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农业生产阶段，特别是在史前人工和心智皆不足的情况下，自然地理条件是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三、社会的分化与早期村落变迁

随着农业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获取食物来源增多，人口数量大量增加。据人口考古学学者的推演测算，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人口仅约为110 000人，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其早、中、晚期人口分别达到了249 000人、942 000人、1 073 000人。[28]这一测算虽未能言之凿凿，但尚有一定的说明性，说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成倍增长，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显然，农业的发展和食物的丰富，有力地促进了人口的繁衍，这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史前时代意味着生产力的增长。但是，由于史前时期耕种土地有限，并且长期处于粗犷的生产方式，所以当人口增

长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从而带来人口压力，进而导致食物不足等系列危机。于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社会，除努力提高耕种技术、溺杀部分新生人口以外，更多更好的办法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开辟新的耕种土地化解这一危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氏族组织的分裂、冲突和重组。由此伴随而来的，则是聚落的快速衍生及其规模化、城郭化、群团化发展。这一现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北方地区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类型的聚落考古中体现极为明显。据资料显示，仅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约638平方千米，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就分别拥有聚落遗址105处和95处，最大的聚落达到了66.5万平方米。^[29]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区域密集出现如此之多的聚落，应该是人口的分化和氏族的自然分裂导致的。正如摩尔根所说，“当一个村落的人口过多时，就有一批移民迁往同一条河流的上游或下游处，着手另建村落”。它们“几个村落共沿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其居民往往出自同源”。^[30]

人口的迁移和村落的自然衍增，既意味着文化的有序传播与发展，也促成了一定地理单元范围内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文化类型的形成。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等不同地域出现的各种史前文化类型便可说明。这是基于族源性和地缘性而形成的文化上的统一性。当然，从聚落形态来看，不仅如此，事实上，在更大的范围内，诸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尽管因各种原因在聚落布局、建筑形式、生产生活工具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但在某些方面，仍呈现一定的共同的文化要素。一方面，村落建筑的群团性质突出，相较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更能体现为统一的规划和严密的布局，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作坊区和祭祀区等有

明显的区划。黄河流域的有些村落还区分为不同房屋群，并以公共建筑为中心环绕布局，体现为较强的向心力，这类例证以西安半坡遗址[31]、临潼姜寨遗址[32]最为典型。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宝鸡北首岭遗址[33]、秦安大地湾遗址等仰韶文化聚落，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聚落。这说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社会在文化性质上具有同一性，即均以氏族公社所有制为基础，基于血缘的社会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村落的防御性功能进一步加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围沟、环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十分普及，有些还发展为围墙，规模大一点儿的村落则两者皆有。这类设施与建筑的普遍出现，意味着村落的防御已经不仅仅囿于动物的威胁，更上升到了族群之间的冲突与战争。[34]这一特点，除上述黄河流域的村落遗址体现明显以外，北方地区的敖汉西台聚落遗址，长江流域的澧县城头山遗址[35]、石首走马岭—屯子山遗址等都极为突出。其中，澧县城头山遗址，由于同时出土有环壕、城墙和城门遗址，且距今6 000余年，考古界甚至认为其已超越村落范畴，属于城池，不少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城址。[36]长期以来，人们对城郭起源的判断，是基于环壕和城墙的出现，此说虽未能言之凿凿，但说明聚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开始分化，出现了巨型聚落和普通聚落两大类。

聚落的分化，在长江流域大致发生于大溪文化时期，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黄河流域则始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之后，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完全形成。据统计，类似城头山这种城郭型聚落，仅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就发现有17座之多[37]，包括湖北的公安鸡鸣城、公安青河城、荆州阴湘城和澧县鸡叫城等。黄河流域地区则更为普遍，如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秦安

大地湾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郑州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等。龙山文化时期则有河南的鄆城郝家台遗址、古城寨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山东的城子崖遗址、丁公遗址等数十座。这些聚落，不仅面积普遍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之间不等，而且在功能布局和房屋结构上也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组织形态，其组织性、控制性和排他性特点突出，俨然不是单纯的村落社会，可以归属城郭范畴。当然，对城郭的判断，不能仅以聚落的大小来衡量，有些村落遗址在面积上可能大于城郭，但仍不能称为城郭。因为中国早期的城郭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军事性[38]，而村落在这方面的体现都很弱或是没有的。由此也可以观察到，国家出现以后，虽然有的城市是因政治、军事、商贸经济等方面原因而建造和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和排除最初的城市是孕育并起源于村落的。因为最初的城市在其起源阶段就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村落中所产生并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形态，包括建筑、工具、组织、制度、道德秩序和精神信仰等。如此看来，或许早期由聚落形成的村落就是城市建造与形成的直接证据。

伴随村落与城郭两种形态分离的另一突出现象，是以城郭或巨型聚落为中心的区域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为明显的地缘一体化特征。考古显示，城郭型聚落的周边范围，往往密集分布着各类不同规模的普通村落，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依附状态。如长江中游的两湖盆地间，就形成了鸡叫城聚落群、城头山聚落群、阴湘城聚落群、屈家岭聚落群、石家河聚落群5个聚落群[39]；下游的良渚文化聚落群，则以30余万平方米的莫角山聚落遗址为中心，周边分布着50余处聚落遗址[40]。类似的聚落群在黄河流域的各文化类型时期也同样常见。[41]村落群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如前文所揭示的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村落发展不得不在空间上向周围扩张。先是增大规模，而当规

模大到其依托的土地资源不足以满足相应人口的生存时，或是“耕作半径”已超越当时技术水平的极限[42]，人们便开始另择区域新建定居点，氏族自然分裂，次生村落也随即衍生。由于血缘和地缘上的关系，次生村落一般依附于母体村落。二是出于军事防御和协作的目的。由于史前人类社会的生存生活完全或者较多地依赖自然资源，所以对土地、河流、山林等资源的掌握与争夺，便成为他们能否生存或延续的物质前提。因此，当出现人均资源不足的情况时，史前人类往往通过扩大活动空间、争夺外部资源的方式解决，于是部落战争时有发生。这就要求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聚落之间相互协作、彼此支持，《诗经·小雅·棠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体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军事协作，不仅强化了聚落间的群团关系，而且在长期的协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紧密政治关系的地缘一体化。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分析“努尔人”时就指出：“世系群的价值控制着父系亲属群体之间的仪式关系，而社区的价值则控制着生活在彼此分离的村落、部落分支及部落中的人们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43]

以上这些共同要素，呈现出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早期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尤其是社会性质可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建立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存生活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淡化或瓦解，贫富等级分化日趋激烈，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因为除了聚落和聚落群均体现为一定的排他性外，从墓葬布局、墓葬结构的区别对待，随葬器物的数量和质量差异，以及房屋结构朝小型化、双间甚至多间式的变化等来看，不仅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的个体家庭日趋增多，而且早期社会的私有观念和私有经济也开始产生并愈益突出，而这些恰恰都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表征。[44]理论上

说，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社会的分化，而社会的分化又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现实在村落和早期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人类开始了从蒙昧、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

[1]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42页。

[2]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九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93—994页。

[3] 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

[4] 陈星灿：《史前居室葬俗的研究》，《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5] 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页。马克思指出，血缘婚“是以同胞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婚为基础的，随着婚姻制度的扩大才逐渐把旁系兄弟姊妹包括在婚姻范围内”。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3页。

[6] 鲍里斯科夫斯基：《母系氏族公社问题》，《民族译丛》1980年第5期。

[7]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67页。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9] 熊莲珍：《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保护探索》，《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29日，第3版。

[10]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11]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2] 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1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

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2期。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1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发现八千年前居址聚落》，《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1日。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2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21] 魏益民：《中华面条之起源》，《麦类作物学报》2015年第7期。

[22]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页，第81页。见“澧阳平原、皂市下层文化聚落遗址面积一览表”“环嵩山地区裴李岗文化部分遗址面积登记表”。

[23] 王建华：《史前人口研究初论》，《文物》2003年第4期。

[24] 陈明远、金岷彬：《从甲骨文看史前的种植与耕作》，《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8期。

[25] 阎万英：《我国古代人口因素与耕作制的关系》，《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2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发现八千年前居址聚落》，《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1日。

[27]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28] 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4页，第42页。

[29] 转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4页。

[30]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9页，第124页。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32]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34] 钱耀鹏：《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何德亮：《中国史前战争初论》，西安半坡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04》，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3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36] 郭伟民等：《澧县城头山考古发现史前城墙与壕沟》，《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2日；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37]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2页。

[38]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39]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8页。

[4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41] 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闫丽洁、石忆邵、杨瑞霞等：《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年第1期。

[42] 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43] E. E.埃文思·普理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9页。

[44] 许顺湛：《“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考古》1962年第5期；裴安平：《史前私有制的起源——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分析与研究》，《文物》2007年第7期；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

第二节

史前聚落遗址

我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即指从发现古人类开始直至发现甲骨文的殷商时期。文明史角度的通常看法是，史前社会即中国历史上的远古时代是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家所称的石器时代，即大致属于公元前21世纪夏代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时期。考古学上的“史前社会”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前者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从人类起源时期一直到距今约1万年，跨度达几百万年；后者以磨制石器为标志，从1万年前开始，以距今5000年左右为下限。从社会形态来看，史前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初始时期，大致经历了原始群、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等几个社会阶段。聚落作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便于我们更好地揭示和认识史前社会的聚落形态，很有必要对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聚落进行梳理和解读。

一、黄河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

黄河流域是指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考古学上所指的黄河流域更侧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5个省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史前聚落遗址发现最为集中、最典型和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区域。就

时间而言，黄河流域的聚落遗址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为主，旧石器时代发现的主要是居民点，迁移性很强，尚不具备村落的完整要素。

（一）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始自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法国神父、地质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等人对我国河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却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之处的萨拉乌苏河和宁夏的水洞沟，无意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及其打制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1]此处发现的人类化石后来也被命名为“河套人”。这可能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有可靠地点和层位的人类化石。也正是这一发现，开创了我国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先声。自此以后，以陕西地区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不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和打制石器遗存。截至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存均有发现。这些遗迹、遗存中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群聚现象，主要有宁夏水洞沟盆地、陕西洛南盆地、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沭河流域等。

1. 宁夏水洞沟盆地

水洞沟盆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镇，西临银川，南近灵武市，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相接。自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桑志华在水洞沟发现水洞沟遗址以来，截至目前，先后在水洞沟及邻近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30余处，其中在水洞沟、施家窑、张家窑新发现14处地点，在宁夏南部固原市彭阳县的岭儿村和刘河发现5处地点。^[2]其中1923年发现的水洞沟遗址是我国发现、发掘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它自发现以来先后经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

石。由于遗址出土的上万件旧石器中，有不少带有强烈的欧洲旧石器中、晚过渡期特征，还有些石制品显示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特征，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水洞沟文化的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中国早期人类族群与欧洲族群之间在文化上可能出现过某种交流和互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类文化的形成与民族大迁徙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水洞沟遗址周边范围，目前共发现群居点11处，大多数相距在数百米之间，远者也不过1~2千米。2002年发现的施家窑地点群、张家窑地点群，也显示出人类活动各地点之间相距很近。

2. 陕西洛南盆地

陕西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群较多，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中部的洛河、渭河流域和陕南的汉水上游及南洛河流域，关中西部和陕北亦有零星分布。其中，关中和陕南以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为主，陕北则多见晚期遗存。[\[4\]](#)其中以陕西洛南盆地最为突出。洛南盆地位于今陕西省东南，秦岭东段南麓太华山脉与莽岭山之间，西北距西安大约150千米，盆地东西长约70千米，南北宽20~30千米，洛河贯穿其间，属于洛水上游。据相关考古学者在洛南盆地的调查显示，迄今为止，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地点268处，采集各类旧石器制品13 000余件。[\[5\]](#)这些石制品中出现有手斧和薄刃斧等流行于非洲与欧亚大陆的阿舍利文化特征的工具组合，其中手斧45件，薄刃斧119件，堪称迄今为止中国境内阿舍利文化类型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这种左右两边和正反两面基本对称的工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工具，充分体现了早期人类在技术经验方面的积累。除了洛南盆地发现此类工具组合外，在中国境内西北的陕西汉中梁山、长江以南地区的广西百色盆地和湖南芷江蟒塘溪水电站淹没区，以及河津市虎爪山等地均有发现。[\[6\]](#)南北跨度之大，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早期人类世界文化的形成可能曾出现过交流、大传播。

此外，在洛南盆地还发现洞穴遗址1处，名为“花石浪龙牙洞”，位于洛南盆地东河村后坡花石浪山岗，由两个相距很近的洞穴组成，距今大约50万年，出土石、骨制品数量万余件。^[7]

3.山西汾河流域

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晋西南黄河沿岸和汾河流域，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芮城县的西侯度遗址和匭河遗址、襄汾县的丁村遗址等。西侯度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80万年左右，发现有石制品、动物化石、烧骨和有砍痕的鹿角。特别是若干烧骨的痕迹，证明早在180万年前，我国先民就开始用火。匭河遗址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制品，但数量不多，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存，与西侯度文化、丁村文化有一定的文化内在关系。丁村遗址是汾河流域最为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它位于山西襄汾县城南5千米同蒲铁路东侧，于1953年发现，1954年发掘，当时发现含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点11处。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汾河流域又陆续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存，包括早、中、晚期在内的旧石器地点近30处，它们在文化关系上具有较强的文化相关性，被称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见图2-2）。^[8]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早期的两个遗址群相距仅1千米，中期遗址沿河分布，包括4个遗址群，各遗址群中的地点相距很近，遗址群之间也不超过1.5千米，可见这一区域范围内的遗址群具有群团性质。^[9]丁村文化发现有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其遗存特点显示，它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可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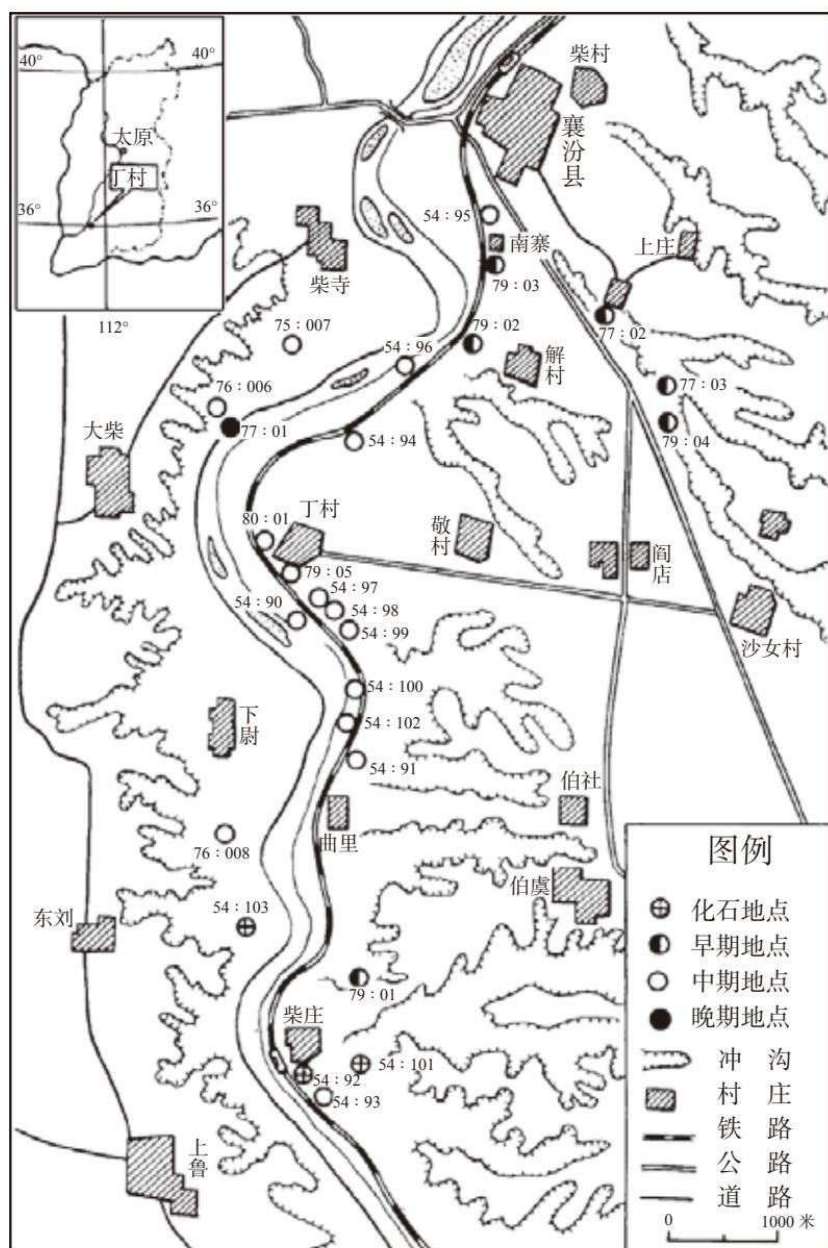


图2-2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4. 山东沂沭河流域

山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现的山东旧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沂沭河流域与汶泗流域，迄今已发现数百处遗存地点。^[10]其中沂沭河流域是山东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的重点区域，它包括沂河、沭河流域在内的山东境内部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区域已发现旧石器地点近百处，包括马陵山石器地点群40处，沂水县20处，其他地区30余处，其中细石器地点占绝大部分；2013年又有调查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调查工作，新发现10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11]这些旧石器地点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群团性质，且每个群团内部都包含数量众多的遗址点。

从上述4个区域的旧石器时代居民点，不难看出，旧石器时代群居现象的分布与形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适宜于生存、生活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为先决条件和纽带，形成自然群聚现象。无论山区、平原、盆地还是河流低丘处的考古发现，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二是体现为一定的群落现象。一方面，遗址地点自身属于一个独立的群体；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的遗址与遗址之间体现为明显的结群性质。这一现象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是由同一族群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迁移性活动形成的遗迹点，二是同一族群不同群体或是不同族群在大致同一时空范围内的活动所形成的遗迹点。不论何种可能，它们至少可以说明，靠近水源是早期人类活动的群体性活动地点选择的重要原则。前者与人类动物性聚众本能有关，后者则是人类生存经验的结果。考古学家裴安平将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种模式，包括沿河模式、盆地与江河汇流地模式、平原模式。沿河模式以河流狭长的阶地面为基础，遗址群呈串珠形带状分布；盆地与江河汇流地模式往往规模较大，遗址相聚的状态也比较紧

凑；平原模式则以开阔的山前平原为基础，见证了遗址群落向平原移动的趋势。^[12]从本质上来说，遗址点的分布与形态特点的形成和变迁，都是早期人类进化和人类文化起源的体现。

（二）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

如前所述，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农业开始兴起和发展，旧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居民点开始向聚落化、规模化、密集化的方向发展。黄河流域作为史前农业起源的重要区域，相比其他区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农业相对发达。也正因如此，建立在农业定居生活基础上的聚落，在黄河流域得到了较程度的发展，它们密集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北方范围。有关于此，在本节讨论中，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从地理学层面对所要论及的聚落进行地理范围的区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视从时间层面进行纵向划分，以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前期和后期的聚落与聚落形态的变化。

1.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聚落遗址

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聚落遗址，以裴李岗文化类型、磁山文化类型和后李文化类型为典型。这些文化类型显示，农业起源后，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但是，由于新石器时代前期仍属于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和生产力均有限，因此聚落遗址数量不多，聚落规模也相对较小。尽管如此，聚落作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它能映射出新石器时代前期黄河流域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

（1）裴李岗文化聚落

裴李岗文化因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市的裴李岗村而得名，是目

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统计，截至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已达100余处，分布在河南境内的40多个县、市。其中，黄河南岸的豫中地区较为集中，豫西地区的丘陵地带和豫南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布。一般来说，裴李岗文化遗址的面积都不大，小的数千平方米，大的上万或数万平方米。[\[13\]](#)较为重要的聚落遗址有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新郑唐户遗址、密县莪沟北岗遗址等。

裴李岗遗址是正式发掘的第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年代距今8 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重要的文化遗存。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之前的历史空白。1977—1979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裴李岗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共发掘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10余个以及穴居残基数处。墓葬基本都是南北向或南向稍偏西，分布比较密集，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没有发现葬具。[\[14\]](#)

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乡贾湖村东，面积为5.5万平方米，遗址年代距今9 000—7 500年。该遗址于1961年首次发掘，先后经历了1983年、1984—1987年、2001年等7次发掘，发掘面积2 600余平方米。遗址呈近圆形，分东、中、西三区，西南处和南部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两段壕沟，清理的遗迹共有房基近50座、陶窑9座、灰坑近400个、墓葬近400座等。其中西区遗迹、遗存较为典型，可以基本反映聚落面貌，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12座、窑址2座、墓葬42座，中期房址8座、窑址1座、墓葬154座，晚期房址16座、窑址1座、墓葬122座。房址均按规律成组布列，房屋均呈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有单间和多间两种类型，但以单间半地穴式为主，多间仅少数几处，其形态为在房址内留有小槛并依次扩建为2~4间。房屋

面积一般不大，多在10平方米以内，少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一座也仅有52平方米。早、中、晚期遗存有刻符龟甲、骨笛、稻作遗存。从整体布局来看，早期居住区与墓葬区没有分开，混杂一体；中、晚期开始分离，房屋有序分组的趋势明显。[15]

新郑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的西部和南部，处于近河处的夹角台地上。遗址面积有14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汉、宋、元、清等时期的聚落群遗址。其中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有房址63座、灰坑207个、沟4条（排水系统1条）、壕沟1条。房址分4组布局，其中2组有排状布局的特征。房址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可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以单间式为主，共60座，双间式为3座，为二次扩建而成。有6处用灶痕迹，位于房间门道一侧或房址外围，说明当时的生活仍具有共食性特征。屋内居住面和墙壁均经过处理，房址周边分布有圆形或椭圆形柱洞，部分房址两侧对称分布一个灰坑。从聚落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核心居住区分布在聚落遗址的东南部，体现为一定的功能分区意识，并以房址、灰坑的组合体现为向心式布局。[16]

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中的一处小型聚落，面积8 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 747平方米，共清理出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房址6座、灰坑4个、墓葬68座。房屋集中于聚落遗址中部，房址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以内，大者也不过11平方米。东部基本上为空地，间有几座窖穴。西部和西北部为墓地，墓葬排列有序，可分几个群组，墓内除8座无随葬品以外，其余皆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主要为铲、斧、镰、磨盘、磨棒等石制工具和陶制器皿，一般有2~8件。此处聚落无论是布局还是房址面积，

其规模都偏小，应该属于一个小型的氏族公社群居单元。从房屋结构和墓内随葬品的情况来看，仍未见有明显的社会分化。[17]

（2）磁山文化聚落

磁山文化因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而得名，属中国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太行山东麓，南至漳河，北到保定以北的拒马河、大清河流域，普遍集中于冀南地区的洛河流域。[18]由于磁山文化在年代上要早于仰韶文化，所以考古界常常将其与大地湾、李家村、裴李岗等文化一起统称为“前仰韶”文化。磁山文化较为重要的聚落遗址有武安磁山遗址、易县北福地遗址等。

武安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西南20千米，在磁山村东南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所在地为太行山脉的鼓山山麓，北靠磁山铁矿，南临洛河。该遗址发现房址2座，灰坑474个，陶器、石器、骨角器等遗物近2 000件。磁山遗址的南部和西南部为2座半地穴式房址，分别为椭圆形和圆形，有坡道或台阶。房屋墙壁可能是由芦苇压印而成的烧土。房屋面积普遍在10平方米左右。灰坑一般是贮存粮食的窖藏，474个灰坑中有62个发现有粟灰等粮食堆积，堆积厚度有0.3~2米。灰坑以长方形为主，另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形式。遗址内还发现有狗、猪、羊、鸡等家养动物骨骼，以及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这些充分证明磁山人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丰富的农业遗存也说明磁山聚落遗址属于典型的农耕性质的聚落。[19]

易县北福地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西南12.5千米处的北福地村南的台地上，处于太行山、恒山、燕山三山交界处与河北平原的接壤地带，周围地貌属低山丘陵间的宽阔河谷，易水由西向东

于中部横穿。遗址于1985年发现以来，先后经历1997年、2003年、2004年三次正式发掘，已探明的面积有3万平方米，发现了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局部零星有商周、汉代和辽金时期的遗存。出土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址12座，房址分布密集，平面布局按一定规律排列有序，有长方形、近方形和近圆形三种平面形状，屋内地面遗存有红烧土灶面，遗存物有石块、石料和各种类型的石制品、陶器等，周边有柱洞。祭祀场遗址1座，平面近长方形，总面积90余平方米，遗迹构成包括小型直腹盆、各种磨制石器、玉器、小石雕、水晶等90余件，磨制石器中还发现1件长达46厘米且通体磨光的大型石耜。祭祀场可能是北福地人用于农业祭祀活动的宗教场所，属于村落中宗教信仰的公共空间。[20]

（3）后李文化聚落

后李文化是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官庄遗址命名的。据考古发现资料显示，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其范围大体为东起淄河、西到长青的这一狭长地带。目前已发掘的含有后李文化遗存的遗址有章丘小荆山、西河，邹平孙家，长清万德西南、张官庄、摩天岭、绿竹园等10余处。[21]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有后李遗址、小荆山遗址和章丘西河遗址等。

后李遗址，揭露面积约6 5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灰坑3 800余个、灰沟35条、小型墓葬189座，大、中型春秋墓和大型春秋车马坑各1座，另有水井28眼、陶窑6座、房址6座。后李遗址范围大，延续时间长，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层至少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西周至战国时期，汉至金元时期等遗存。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灰坑、墓葬、烧灶、房址、陶窑等。房址为半地穴式不规则圆形，地面为夯土，路土与夯土间有一层极薄的细

沙，应是夯筑地面时垫铺的，未见灶址。出土器物包括锤、斧、铲、磨盘、磨棒等生产性工具和罐、釜、盂等生活性器具。[22]

小荆山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茄庄村，因遗址南面有一座小荆山而得名。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清理出后李文化时期的房址10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有近方形和椭圆形两种。房屋面积普遍在30平方米以上，大者超过40平方米。房址一般先在平地挖出地穴部分，坑底不甚平整，然后垫以灰土或红烧土粒。大部分房址于南部拐角处有一门道，在活动面的西部及南部发现有烧坑，形似锅底状。大部分房屋中均发现有陶釜、石支脚、石磨盘和磨石等器物或工具，这些遗物多分组摆放，室内布局有一定规律，体现了较为浓厚的生活气息。房址活动面四周均发现有柱洞，柱洞粗细不均，直径一般为0.1~0.25米。除此之外，考古调查小组还在650米长的断崖处发现房址29座，分布极为密集，房址间相距近者不足1米。1999年经全面勘探，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环境。这些都充分表明小荆山遗址曾是一处人口密集且活动频繁的农业型聚落遗址。[23]

章丘西河遗址（见图2-3），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三村西北约500米处，东距龙山文化命名地“城子崖遗址”1600余米。由于遗址被一条名为西河的小河环绕，故称西河遗址。总面积40万平方米，揭露面积共近3000平方米，除发现后李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晚期的文化遗存以外，还有唐、宋、元及清代文化遗存。该遗址共发现半地穴式房址32座，按一定规律成排排列，多呈圆角长方形，有大、中、小三型，大者面积超过50平方米，有甚者60平方米，中者面积为30~45平方米，小者10~20平方米，大部分向南开设短门道，门道为台阶状，位于房址南部偏西处。居住面、穴壁多抹黄泥，经过烧烤呈青灰色、黄褐色、红褐色的硬结面。房内可明显区分为灶区、储藏区、活

动区和睡眠区。其中，灶区一般位于房内中间偏北处，普遍用石（或陶）支脚三个一组架成烧灶，大房多至三组；储藏区则位于房内东南部；活动区位于房内西北部；睡眠区位于房内东北部，地面平整，均匀坚硬，地势略高。屋内遗存有陶釜、石磨盘、石锤、石支脚和石块等。另有少数不规则形的储藏屋，面积较小，无烧灶，遗留陶器和垫石。从这些遗存可见，聚落房屋的室内空间布局极为讲究，屋内有了一定的装饰性，生活痕迹浓厚。虽然这些遗存仍体现为明显的共食、共享、共用的原始共产主义关系，但似乎映射着私有意识的产生和家庭生活的开始。[24]



图2-3 章丘西河后李文化遗址

2.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聚落遗址

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前期这一相对长久的发展，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史前人类进入了原始社会晚期，即新石器时代后

期，这一时期止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期间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占有主导地位。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多对聚落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聚落规模的扩大，因为只有聚落规模的扩大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二是聚落数量大量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有限耕地资源所生产的生活资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需求，所以开辟新土地，另择他处建造新聚落便是最佳选择。也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私有制开始萌发，社会开始分化，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聚落也开始分化为巨型聚落和普通聚落两类，并且以巨型聚落为中心形成明显的聚落群，地缘一体化日趋明显。在黄河上、中、下游流域最为典型，主要有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跨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等，不一而足。

（1）马家窑文化聚落

马家窑文化因最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属于仰韶文化向黄河上游发展的一种文化类型，年代距今约5700年。其包括半山、马厂两种类型的遗存，前者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半山，后者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马家窑文化聚落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等流域的两岸及周边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在甘宁青地区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800余处，其中半山类型200处、马厂类型600余处。

[25]较为重要的有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等，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南的青岗岔村岗家山，地处黄河南岸的台地上，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中，发现半山类型房址1座、窖穴2个、窑址1座、墓葬1座，马厂类型窑址1座和齐家文化房址1座。第二次发掘，还发现半坡房址3

座、窖穴1个、墓葬3座，出土一批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器具。[26]这些发现说明青岗岔遗址的时间跨度较大，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一处聚落遗址。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位于宁夏海原县菜园村南的坡地，地处南华山北麓。发现林子梁、马缨子梁和石沟3处遗址和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二岭子湾、林子梁5处墓地，共揭露面积4 780平方米，发现房址15座、窖穴65个、窑址1座、灰沟1条、墓葬138座，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器具5 000余件。[27]

（2）仰韶文化聚落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支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很长，有2 000年左右，时间跨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因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发现仰韶村遗址而得名。[28]自安特生首次发掘并命名以来，经过近百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或明显受其影响的遗址已发现有数千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甘肃至河南之间，以渭水、汾水、洛河等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影响到了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和内蒙古边缘地带。由于遗址数量太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能选取相对典型的进行说明，主要有甘肃的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的宝鸡北首岭遗址、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河南的郑州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等。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渭河支流清水河南岸低丘，依山面水。揭露面积14 752平方米，包括前仰韶文化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5期，共清理不同时期的房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遗址东部和西部区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居住区的东西两边各有壕沟，房屋多属于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背对壕沟，门向中心广场分布。仰韶文化早期的房屋结构分为居

住面、墙壁、门道、灶坑等，居住空间一般为20平方米，居住面和墙壁抹有草拌泥。门道呈斜坡状，未使用木骨泥墙的建筑技术。仰韶文化中期的房址数量最多，有100余座，房屋面积有所扩大，大者有60多平方米，居住面上覆盖有红烧草泥土块堆积，屋顶为草泥烧土构筑，有房屋已采用木骨泥墙。仰韶文化晚期以平地起建为主，半地穴式很少见，居住面一般以白灰面或料礅石面，房柱及柱础变得复杂多样，以长方形为主，有的大房屋房址面积27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规模宏伟，可能属于宫殿式建筑。[29]

北首岭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金陵河西岸，面积6万平方米，早期为大地湾文化，中期为仰韶半坡文化，晚期为西王村文化。遗址共发现房址50座、墓葬451座、窖穴75个、陶窑4座。房屋以广场为中心，分三组分布于北、西、南三方，可能代表着北首岭的三个氏族部落。房屋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各房门基本都朝向中央广场，未见有环壕围绕。广场上部分区域的地面被烧结成硬面，遗存有柱洞和烧骨，可能属于祭祀场所。遗址南半部主要为墓葬区，墓葬极具特点，实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制度，大多数墓主头向西北，脚踩河滩。其中不少墓葬与房址群同期并存。还发现有排水沟等遗迹，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和装饰品。[30]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浐河东岸，是关中地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聚落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46座、窖穴200余个、陶窑6座、墓葬250座、生产生活工具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聚落略呈南北较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央，约占3万平方米，居住区内有一小沟，把房屋分为南北两片，可能代表着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公

社。每片有一座大房屋和若干小房子，门道向基本朝南或西南，居住区间有窖穴和牲畜圈栏。有壕沟环绕居住区，壕沟北部是氏族的公共墓地，也夹杂有窖穴，壕沟东部为陶窑场（见插图2）。房屋有圆形、方形，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其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仅10平方米，大的可达160平方米。房屋门道里有一个方形门槛，屋内正对门槛有1~6根柱以支撑屋顶，采用木骨涂泥的构筑方法，居住面和墙壁涂抹有草泥。[31]姜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临河北岸，骊山北麓下，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遗存为主，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揭露1.7万余平方米。村落布局呈不规则圆形，由广场、居住区、窑场和墓葬区组成，中心有大广场。广场四周分布着5个居住建筑群，可能代表着5个不同的氏族公社，有房址120座，每群一座大房子与若干中小型房子，朝向中心广场，形成围绕中心的分组环列式布局（见插图3）。居住区内还有窖穴、陶窑、牲畜圈栏和若干儿童瓮棺葬等。居住区周围有数百米长的人工壕沟环绕，围沟以东有三片同时期的墓地，遗址西部临天然河道岸边有陶窑场。房屋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均为单室结构，有地穴式（圆形房屋）、半地穴式和地面木架结构三种。屋内有柱洞，设有炉灶，烧坑正对门道，位于房屋中央，门道与房内用门槛隔开，居住面和墙壁均涂草泥并经火烧烤，表面平整，有些房屋内还发现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32]

西山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古荣镇孙庄村西的枯河北岸阶地上，为豫西丘陵与黄淮平原的交界处，面积3.4万余平方米，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高级聚落。聚落平面呈圆形，直径约180米，推测聚落面积有2.5万余平方米。有城墙及城壕，城墙现存265米，墙跨3~5米，存高1.75~2.5米，有倒梯形基槽，基槽外

为壕沟。城门有2座，为北门和西门。聚落遗址清理房基200余座，为平地起建的长方形或方形。房屋群按一定规律布局，可分为两组，一组门向北，一组门向城内中心方向。西门内东侧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呈扇面形状，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8米，周围有数座房址环绕，其北侧有一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广场。窖穴和灰坑2 000余个，墓葬和瓮棺143座，分属两处，一处位于城外西部，一处位于城内北部。由于西山聚落遗址具有城墙和环境，有较为强烈的城郭性质，因而被认为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33]

大河村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东北郊大河村西南约1千米的台地上，面积约3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7 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达7米。遗址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其中大河村三、四期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发现各时期房址50余座、窖穴近400座、墓葬354座、壕沟2条。聚落分东、西两部分，由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古河道斜穿其间。大河村仰韶文化三期的聚落，除1座为半地穴式房址以外，其余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或梯形，房屋面积普遍为8~15平方米，最大的35平方米，最小者仅2.34平方米。房址多数为两间或两间以上的建筑群，房基经火烧成坚硬的砖红色，墙体布满柱洞和芦苇束及横木痕迹，多数房屋有方形烧火台。其中，西区有并列四连间地面式房屋（加有一套间）1座，河东区有并列二连间地面房屋2座。大河村仰韶文化四期，是大河村过渡到龙山文化的转型时期，遗存十分普遍，有房址27座，除2座为半地穴式建筑外，其余均为地面建筑，房屋面积大小不一，大者100余平方米，小者仅1平方米，以长方形和方形的单间中型房屋为主。在河西、河东居住区附近分布着一批四期的墓葬，两区墓葬墓主头部朝向正好相反。这种丧葬形式，似乎说明大河村

存在两个不同的氏族公社。而双间和多间房形式的流行，反映出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共同生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形式。

[34]

（3）大汶口文化聚落

大汶口文化于1964年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命名，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交界的一处典型遗址而得名，属于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年代距今6 500—4 500年。大汶口文化主要在山东省境内，山东的地理特征主要为低丘和冲积平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对大汶口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泰山—沂山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和河南东部的部分地区，北达渤海南岸，南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以鲁中南地区为核心分布区，其他地区为次中心地区。[35]截至目前，属于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有数百处，较为重要的聚落遗址有鲁中南的大汶口遗址、鲁西南的邹县野店遗址、鲁东南的日照东海峪遗址、皖北的蒙城尉迟寺遗址等。

大汶口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7 000余平方米，包含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堆积。遗址共清理墓葬、房址、陶窑近200座，其中墓葬179座，出土石、陶、玉、骨和角等各类器物近2 000件。北辛文化时期的房址13座，有半地穴式、浅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形式，平面呈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圆形房屋有居住面和灶址；椭圆形房屋多为小型单间，浅穴式房基，朝向各不相同，有南北向的，有西朝东的，还有东南—西北向的，房屋均由居室和门道组成，面积仅3.5~5平方米，有居住面和灶面；方形房屋可能为一座四面坡屋顶的木骨墙房屋，面积约16平方米，未见居住面。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址10座，包括《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中公布的3座残基和

2012—2013年发掘的7座，房屋平面呈方形，分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类，以前者为主。房址分布错落有致，间距相当，基本没有出现相互遮挡的情况，整体性很强。与北辛文化的房屋不同，大汶口文化地面方形房屋朝向皆呈东南—西北向，形制、规模大体相当，面积近18平方米。四周有柱洞，未见墙基槽，室内平整，门道不明显，门向可能不一致。墓葬中普见随葬品，有些墓葬中还发现有数量不等的牲猪。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贫富和地位等级的分化现象，私有观念已经出现。[36]

野店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县城南6千米的野店村村南，遗址附近群山环绕、河流交错，北为大沙河，南临龙河，现存面积东西宽约700米，南北长约800米，总计约56万平方米，揭露面积1660平方米，具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兼有周至汉代的文化遗产。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存主要有房址6座、墓葬89座、灰坑17个及陶窑等。房址平面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不大，仅7.5平方米左右。房址内有16个大小、深浅不同的柱洞，有倾斜的门道。居住面未见细致加工，出土有日常生活用具。方形房址，面积仅6平方米左右，间距很近，一般为2~2.5米。墓葬中出土有生产生活工具和装饰品等随葬品千余件。墓葬中所见随葬品多寡不一，标志着氏族内部的贫富、地位分化日趋明显。[37]

日照东海峪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海峪村西北，东临黄海，西有奎山，现存面积8万余平方米。该遗址于1960年被发现，1973—197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三次发掘共清理房址12座、墓葬18座，遗址中还出土有蛋壳镂空黑陶高柄杯和磨制石器 etc 生产生活用具。房址都是西南向，按一定的规律分

布，由西南向东北排列，均为方形的土台式地面建筑。房址由土台、墙基、土墙、墙外护坡、室内地基、灶址和出入口等构成。土台由夯土筑成，室内地面采用黄黏土和砂垫，层次清楚，质地坚硬；墙体则多是黄黏土夹石，四个拐角用石加固。这类台基式的居住建筑，较少在其他史前遗址中发现，既体现了当时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墓葬的形式和结构基本相同，器物组合也比较一致，表明这些墓主人属于同一氏族，未见明显的社会分化。[38]

蒙城尉迟寺遗址（见插图4），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一般为4~5米，以大汶口文化遗存为主，另含有少量龙山文化遗存和汉代墓葬等。大汶口文化遗存主要有房址41座、墓葬217座，以及灰坑、祭祀坑、活动广场和大型环壕。外围壕沟南北长240米，东西长220米，开口宽25~30米，深4.5米，外围壕沟及聚落实际面积达5万平方米。建筑遗迹以排房为突出特点，以2间或2间以上的房址为一组，分布于壕沟内侧，从北向南有12排，零星房址2间。整个建筑群由短排建筑房址和长排建筑房址按一定规律排列。每一间房址均有独立的进出门，有的房址开有两个门，结构大体相同，门一般朝西南方向，方向与之不同的，其房门都朝向中心方向，门宽60厘米左右。单间并列的排房形式，规则地分布在中央广场的四边，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门朝西南居多。房址建筑以浅穴木骨泥墙为特点，以红烧土碎块为墙体，外侧再抹泥并经烧烤，墙体和地面均用细泥抹平再经烧烤。房间以大间房址为多，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面积一般为10~30平方米，以12~15平方米的居多，面积小些的房址不及10平方米，再大些的房址达30多平方米。小房间往往与大房间相连成一排，可能属于大房间的附属建筑。房址一般由主墙、隔墙、门道、柱子和灶等组成，房屋

内普遍出现有生产生活用具。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这里曾是一个极度繁华的聚落，不仅整个聚落经过统一规划，而且居住建筑经过精雕细琢，甚为豪华，充分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村落形态的变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状态。

[39]

（4）龙山文化聚落

龙山文化是一个铜石并用的时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1930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对河（今属章丘）的城子崖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4500—4000年。龙山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区域，其中每一个地域又包含许多具有地域性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40]正因如此，自龙山文化命名以来，根据地域文化面貌的不同，考古学家又将其细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等类型。在器物上，龙山文化最为典型的便是黑陶，特别是蛋壳黑陶主要分布在山东范围，以薄、硬、光、黑为特征，所以龙山文化也被称为“黑陶文化”。在聚落上，龙山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聚落分化，聚落区分为巨型聚落与普通聚落两类。前者一般作为中心聚落出现，周围依附一定数量的次中心聚落或普通聚落，这类聚落被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属于城池，因为其体现了较为强烈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特征。有学者总结了龙山文化时期单个遗址聚落的新变化，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聚落围沟规模升级；其二是聚落环壕规模升级；其三是各类城址竞相崛起，包括壕城、城堡两类；其四是双聚落、多聚落遗址和城址的数量与规模都在增加[41]，譬如河南龙山文化的鄆城郝家台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等，山东龙山文化的丁公遗址、尧王城遗址等。从聚落性质来说，龙山文化时期

的巨型聚落大多已属于城郭型聚落，超出了村落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史前聚落的演进路径和变迁特点，我们仍有必要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城郭聚落进行介绍。

郝家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城东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遗址总面积达6.5万平方米。郝家台聚落平面呈长方形，面积3万多平方米，年代距今4 600年左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年代最早的重要城址。聚落城址的东墙、北墙和4个城角保存尚好，东城墙中间位置有一个宽8.8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所在位置。城内发现有房址近30座、灰坑500多个、墓葬110余座，还有水井、陶窑、灰沟等。房址位于遗址西南部，有规律地成排排列。房屋建造于垫土高台上，建筑的室内地面高于室外，且多使用土坯建筑墙体，也偶见有木骨泥墙。排房坐东北向西南，每房于南墙设置一门，门的宽度不等，在0.6~0.75米之间，外门均有门槛。居住面积大小有别，譬如郝家台三期文化的房址最大间为18.49平方米，最小的则近9.63平方米。室内地面一般用黄褐土铺平，坚实平整。房屋内有灶址，还发现有生活日用器物，生活痕迹浓厚。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无葬具，大部分没有随葬品。[42]

古城寨遗址（见图2-4），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35千米的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小组周围。遗址规模宏大，城内外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70万平方米。城址建于溱水东岸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现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的两座城门缺口，三面城墙整体保存完好，无一处短缺，城址周围有宽34~90米的护城河，城防设施完整，面积近18万平方米，是河南龙山文化时代较为典型的城郭聚落。遗址文化层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汉文化等，其中龙山

文化时代的遗存最为丰富。城内东北部发现了大面积龙山文化时代的夯筑建筑群，其中有两座大型房址，一座为主体建筑，另一座为附属建筑。主体建筑应该属于宫殿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面积达383.4平方米，保存基本完整，是典型的早期宫殿式建筑。夯土建筑遗址南北排列6排柱洞或礅墩，把房子分隔成7间。附属建筑位于主体建筑的北面，两者相距仅7.4米，由三道墙基槽、众多柱洞、门道和门卫房等组成，遗址宽4米，属于一座廊庑式建筑。[43]据相关研究成果显示，这两座建筑应是主殿与廊庑的组合，它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具有四合院特征的大型建筑，而正是这种建筑格局奠定了我国后世宫殿式建筑的基本格局。[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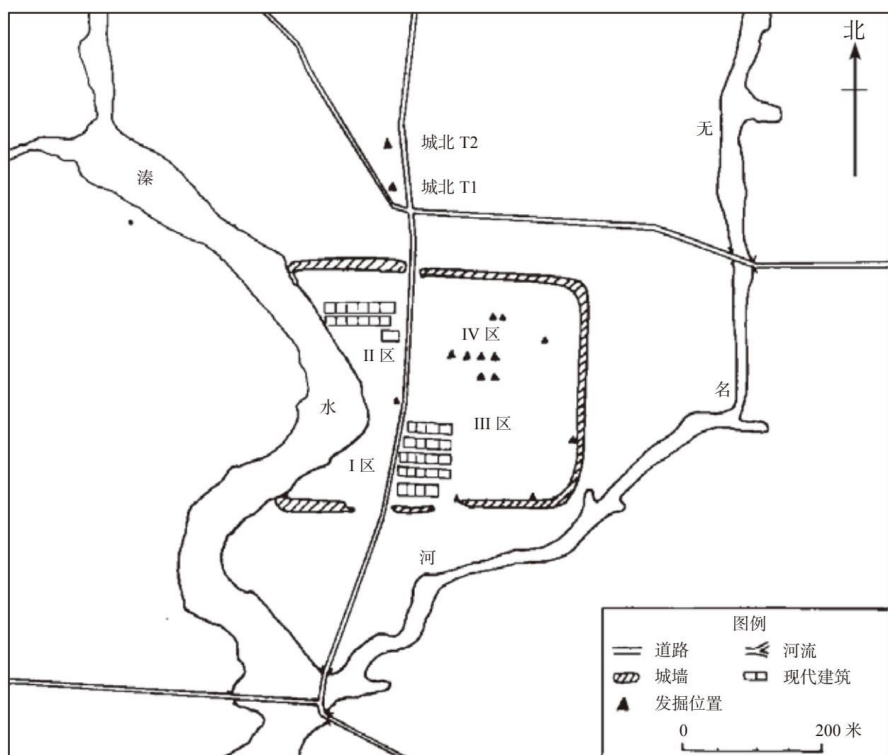


图2-4 古城寨遗址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丁公村东，处于鲁北平原南部的山前平原上。文化层除少量大汶口文化和岳石文化之外，主要为龙山文化、晚商和汉文化，并兼有零星的东周和宋代文化遗存。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共计发掘2 000余平方米，揭露各个时期的房址近100座、灰坑1 600余个、墓葬近100座，另见陶窑、水井和石、骨、蚌、陶、铜器等遗物5 000余件，尤为重要还发现了疑似刻有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宽约25米，壕沟宽30~40米。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类，以后者为多，形制上绝大多数为方形或长方形，圆形较少。前者面积较小，一

般为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后者面积较大，大者超过50平方米。[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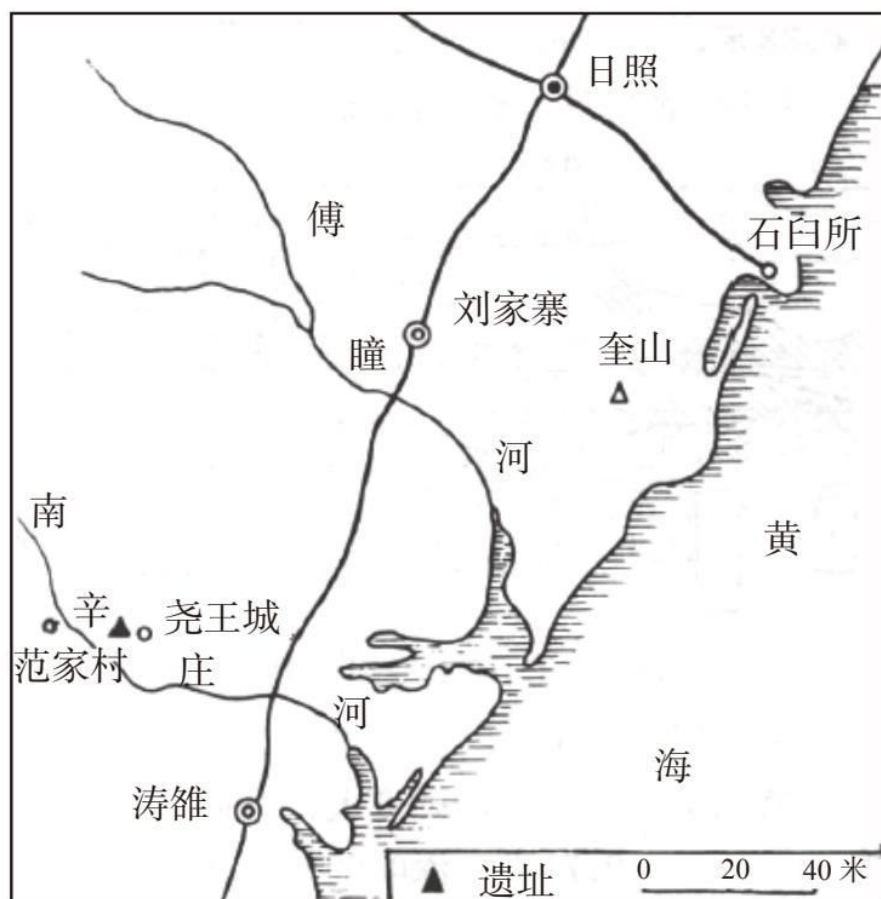


图2-5 尧王城遗址地点位置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城西南16.7千米，西、南两面紧靠南新庄河（见图2-5）。遗址南北长约825米，东西宽约630米，总面积52万余平方米。文化层以龙山文化为主，包括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商周和汉文化遗存。遗址中出土有房址、

墓葬和陶、石、骨等器物。遗址中发现有城墙，北部城墙呈西北—东南走向，城墙主体长约300米，宽26~28米，中段有宽约10米的豁口，肯定是城门的位置。墙外侧发现有开口宽近30米的壕沟，走向与城墙大致平行。西城墙沿南辛庄河东岸三级阶地边缘，呈北略偏东走向，墙体宽度与北墙大体相当。东城墙与西城墙基本平行。根据考古调查报告显示，尧王城城垣南北长近500米，东西宽约300米，包括城墙在内的城址面积有近15万平方米。房址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类，有墙基、灶址、门道，居住面保存较好。长方形房址面积一般为12~15平方米，有门道，位于南部偏东之处。墙体厚20~25厘米，有两种建筑方式：一种用夯土；另一种用土坯错缝垒砌而成，缝隙处用灰黄色黏土填充，最后用黄泥涂抹内外。圆形房址与长方形房址建造方式基本一致，在堆土台基上挖圆形基槽，基槽内夯土并埋有柱。[46]1995—2004年，山东大学联合美国匹兹堡大学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展开考古调查，认为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之一，属于与两城镇南北并立的大型聚落群。[47]

二、长江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

长江流域是指长江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广大区域，干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11个省区，横跨中国腹部；支流则南北延伸，涉及甘肃、陕西、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区，流域面积有180万平方千米。与黄河流域一样，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源头，不仅农业较为发达，而且伴随农业发展而形成与变迁的聚落也极为集中和丰富。相比黄河流域的聚落遗址，长江流域的聚落虽然因早期人

类在生存生活诉求上的一致性而于宏观面貌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毕竟自然地理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都有不同，所以又在很大程度上和微观之处都有相对明显的区别。这也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自古便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与文化特征。

（一）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

1. 广西百色盆地

百色盆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由西而东跨百色市、田阳县和田东县，盆地主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属于一个狭长盆地，总面积约800平方千米。右江自西而东穿越整个盆地。正是由于气候宜人、地势开阔、自然资源丰富，适宜人类居住与活动，因此这里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考古发现的百色盆地也是岭南广西地区旧石器地点最为集中的区域。自1973年在百色盆地首次发现旧石器地点以来[48]，截至目前，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超100处，历年来发掘和采集的旧石器制品上万件。整个旧石器地点群落主要分布在广西右江两岸的高台上，尤其是上游范围因地势开阔，遗址分布也最为密集，明显是百色盆地人类活动的主要范围。有学者根据旧石器地点的分布情况，认为百色盆地的旧石器地点至少存在4个遗址群团、12个遗址群，它们都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人为组织状态。[49]值得注意的是，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有一大批具有典型性的大型切割工具手斧，这种手斧与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的阿舍利石器工具相似，因而百色盆地也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除百色盆地发现有类似的石器工具以外，黄河流域的洛南盆地、汉中梁山也有发现。

2.湖南澧阳平原

自20世纪以来，湖南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发现了大批旧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00余处，尤以西部沅水流域和西北部澧水流域分布最为集中。后者是学术界关注最多的区域，所见遗址地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澧水流域旧石器地点集中发现于中下游地区的澧阳平原，位于湖南洞庭湖西北岸，西、南、北三面环山。此处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和水力资源丰富，地势开阔，适宜人类生存和居住。考古发现，至少在50万年前，澧阳平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典型的地点有津市虎爪山遗址[50]，这里发现有一批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传统的石制品，包括砾石尖状器等。此外，还接连发现有鸡公垵、乌鸦山、十里岗等遗址地点。鸡公垵遗址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出土石器也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51]与其时代相当的有石门大圣庙、张家滩和澧县红旗等地点。乌鸦山遗址的文化时代则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有砍砸器、似手斧石器、大尖状器、尖状器、刮削器和石锤等。[52]与其性质相同的有虎山、划山、朱家山和金鸭等地点。十里岗遗址，是澧水流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地点，其面积有近4万平方米，当中还发现有水稻硅质体，对我们探索农业起源和湖南地区人类聚落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3]大致在1万年前，澧阳平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这一区域范围不仅农业得以起源与发展，而且人类也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典型的遗址有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等。

3.安徽水阳江流域

水阳江是长江南岸支流，位于安徽省东南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水阳江两岸发现旧石器地点数量较多，形成了一定的群落现象，代表性的遗址有宣州陈山地点、官山地点和宁国毛竹

山地点。宣州陈山地点于1988年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各类石制品78件。调查认为，该石器地点面积很大，应该有数十万平方米。[54]官山地点于1993年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其中在清理上文化层时，还在25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一古人类生活面。[55]宁国毛竹山地点距官山仅0.5千米，于1997年发掘，遗存现存面积仅3 000平方米。其中还发现一处由1 167件石器组成一个环形，中间为空白的区域，应该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砍砸器和石球等。[56]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水阳江这一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相对频繁，而且体现为一定的组织性。

4.湖北的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

汉江中下游有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西起宜昌，东至武汉，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是湖北资源要素最为密集的区域。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力资源丰富，是湖北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范围。据考古显示，湖北在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近100处，较为典型的有郧县的学堂梁子遗址、石龙头地点、黄家窝地点、鸡公山遗址和樟脑洞遗址。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年代距今约80万年，先后发现2具早期人类头骨化石，石器300余件，主要为砾石原料。石龙头地点属于旧石器早期范畴，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时期，石器类型不多，多为砍砸器。[57]黄家窝地点，年代距今10万—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面积约1万平方米，石器类型相对丰富，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手斧和凹缺器等。[58]鸡公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地点，遗址面积约1 00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和石料的事实表明，鸡公山遗址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的石器制作场。而遗址中部发现的由数个大石器组合而成的不规则的空白区域，可能与安徽宁国毛竹山地点发现的环形遗迹一

样，属于早期人类的生活面。[59]樟脑洞遗址为一岩屋式洞穴，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地点，位于湖北房县中坝龙滩乡樟脑河的二级台地上，发现石制品2 000余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60]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不仅表明湖北汉水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丰富的人类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长江流域聚落的起源。

从上述几处旧石器时代居民点，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活动，在分布和形态上也大体与黄河流域一样，区别似乎不大。在选址方面，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突出特点，绝大部分在靠近水源的台地上；在遗址地点分布方面也体现为一定的结群性，不仅形成了地点群，而且出现了遗址群团。造成上述两个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人类生存本能的驱动，前者与食物获取有关，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与生存安全有关。也正因如此，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体现为高度的相似性。此外，要指出的是，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来看，其实文化的起源阶段可能就存在跨区域、跨血缘、跨族群的交流。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村落的形成与发展也可能得益于这一交流。

（二）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

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长江流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大致在1万年前，农业开始兴起和发展，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居民点开始向聚落化、规模化、密集化的方向发展。作为稻作农业起源的主要区域，长江流域由于土地肥沃、水力资源丰富，农业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发展。稻作农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初步解决了早期人类的食物问题，而且把区域范围内的人类固定在了土地上，使定居生活成为一种常态。因为农业与采集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

不同，前者耕种在土地上，要求人类长期照看。正是由于长期的农业耕作诉求，原本属于短期活动的地点逐步发展为长期性的固定居民点，久而久之便成了聚落。总体来说，新石器时代各类居民点的聚落性质开始渐趋明显，但由于农业种植仍为粗犷式，属于游农性质，因此居民点或聚落仍具有迁移性，即当一个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衰竭时，人类就不得不另寻他处，重新建立居民点或聚落。包括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在内的我国广大区域，早期聚落的发展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特点。某种程度而言，聚落的快速发展或密集分布，一方面是农业发展、人口膨胀的结果，另一方面可能是土地资源衰竭的原因。本节拟结合考古发掘的资料，对长江流域范围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聚落遗址进行介绍，以期更好地了解这一区域聚落发展与变迁的情况和面貌。

1.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聚落遗址

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聚落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与吊桶环文化遗存、湖南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存和广西邕宁顶蛸山第一期文化遗存等，新石器时代中期则以彭头山文化类型、皂市下层文化类型、城背溪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类型等为典型。这些文化类型也充分显示出，稻作农业在起源之后，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一漫长时间的发展，逐步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不过相比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期间的农业发展仍有限，尽管固定居民点或聚落遗址均带有了一定的农业性质，但数量不多，聚落规模仍然相对较小。但是，从这些早期人类遗存来看，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聚落的形态大致相同，反映出人为组织形态日趋固定，血亲公社开始形成。

（1）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与吊桶环文化遗存

仙人洞遗存和吊桶环遗存，是新石器时代的两处早期遗存，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石灰岩丘陵地区一个山间小盆地之中，盆地东西长约4千米，南北宽约1千米，两处遗址相距仅800米。仙人洞遗存为洞穴遗址，位于盆地北部小河山的山脚下，洞口向东南，高出水面约3米，洞口高5.75米，宽约18.9米，洞深40米，可分成南北大小4个支洞，北部的支洞有一小洞口可以通向外，显然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居住遗址。吊桶环遗存为岩厦遗址，位于盆地西部一个小山顶上，由于两者相距很近、年代相当且出土物相似，因此被认为同属一个族群，发掘者更是认为吊桶环遗址是栖息于仙人洞的原始居民在这一带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61]仙人洞遗址经多次发掘，发现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另有烧火遗迹20余处、灰坑若干。其中陶器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陶器在史前社会的发明与使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的开始，所以距今2万年的仙人洞陶器的出土，不仅可以说明早期人类的生产和社会行为发生了转变，而且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62]吊桶环遗址还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标本。[63]这系列发现都说明人类开始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并且开始了农业产生和定居生活。

（2）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

玉蟾岩洞穴遗存，俗称蛤蟆洞，位于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距今12 000年左右。洞穴发现于一个石灰岩残丘的下部，高出地面约5米，洞口部分有一宽敞的洞厅。据考古发掘表明，玉蟾岩洞穴的原始地貌西高东低，早期人类在选择其作为居住地址时，为了扩大生活空间，以便于居住和生活，曾于参差不齐的地面铺垫碎石，局部区域还铺垫灰白

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洞穴遗址中发现有烧灰堆和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水、陆动物骨骸。这些遗存均集中于洞穴西部，既说明西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区，又反映出早期人类聚落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石器中发现有锄形器、石锤和亚腰斧形器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其中锄形器采用一扁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陶片的出土也是中国境内发现制造陶器的最早证据之一，年代距今约1.8万年。^[64]最为重要的是，洞穴遗址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电镜分析鉴定显示，这些水稻谷壳中既有野生稻，也有人工栽培稻。这一系列工具、陶器的出土和水稻遗迹的发现都表明，早在1万年以前的玉蟾岩地方便存在了原始稻作农业。当然，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有了农业的存在，就意味着早期人类完全进入了农业的生产生活，事实上，以玉蟾岩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社会，尽管农业开始出现，但人们的经济生活仍然以采集渔猎为主、农业为辅。^[65]

（3）彭头山文化类型

彭头山文化因1985年首先发现于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而得名，年代距今9 000—8 000年，主要位于长江流域的洞庭湖西北，集中分布于洞庭湖周围和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地区，尤以澧阳平原最为丰富。这里海拔普遍在50米以下，地势平坦，堤垸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产、生活和居住。考古发掘显示，以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目前洞庭湖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有密切关系。目前，在洞庭湖周边范围发现有彭头山文化遗址10余处，除彭头山遗址以外，还有澧县的李家岗遗址、八十垱遗址、下刘家湾遗址、肖家岗遗址、黄麻岗遗址、曹家湾遗址和临澧县的金鸡岗遗址等，其中以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最为

典型。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县城西约12千米处的澧水北岸的一处低坡上，地处澧阳平原，面积约6万平方米。该遗址于1984年发现，1988年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发现建筑遗迹2座，分别为有柱洞的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小型建筑；清理墓葬18座，墓坑小而浅，多属二次葬，有陶器随葬，数量1~4件不等；清理灰坑15个，平面多呈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底皆为锅底状。出土遗物中有石器、陶器等人工制品。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陶器则制作古朴简单，为原始的贴塑法制成，陶器的胎体中夹杂有炭屑。经考古发掘者观察，遗址陶片中还夹有大量碳化的稻壳和谷粒。从彭头山遗址中发现的打制石器工具、磨制石斧、完整水牛骨和稻谷遗存等来看，彭头山的经济生活开始从采集渔猎向农业生产过渡，但仍以前者为主，兼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与畜牧养殖。[66]

八十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县城北约20千米处的梦溪镇五福村，地处澧水支流涇河北岸的坡地上，呈西北向东南倾斜，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 200余平方米。遗址中发现大量彭头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木器和百余种植物与果核遗存。另外，还出土有上万颗完整形态的碳化稻谷、稻米，经农学专家检测鉴定，认为这是兼粳、粳、野生稻特征的稻谷，是正处于分化期的倾粒小粒形原始古栽培稻。聚落北边利用一段古河道作护围，东、南、西三面有土围和壕沟环绕，形成一个封闭不规则长方形的生活区，体现为一定的规划性和防御性。土围和壕沟是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该遗址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一处有壕沟与土围的早期聚落。它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早期聚落的外观形态和经济与社会形态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遗址发现有房屋10余座，有半地穴式建筑，但多数为长方形或方形的地

面建筑，包括干栏式和台基式。房屋内有灶坑，生活痕迹浓厚。墓葬100余座，散布于居住区周边，没有专门的墓葬区，墓葬中有陶器随葬。这一聚落遗址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有壕沟和土围的聚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形成，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规模。

[67]

（4）皂市下层文化类型

皂市下层文化，因湖南省石门皂市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皂市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最初只被认为是商代遗址。[68]后来随着1977年和1981年的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100平方米，并且在遗址的下层发现了不同于该地区大溪文化早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意，考古学者推测这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69]后来，随着同类型文化遗存的陆续被发现，考古学界便正式提出了这一文化类型的名称。与彭头山文化一样，皂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的周边范围，但相比之下，其分布地域更为广泛，不仅包括湘、资、沅、澧四水的下游，而且延伸到了中游地区，尤为集中的是澧县和临澧县境内的澧水北岩。目前，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皂市下层文化遗址30余处，遍布于洞庭湖周边的八九个县市[70]，其中聚落性质较为明显的遗址有胡家屋场遗址和坟山堡遗址等。

胡家屋场遗址（见图2-6），位于湖南省临澧县西北部，澧水以北，地处洞庭湖平原西部边缘地带，面积7 000余平方米，1986年首次发掘，揭露面积160平方米，平面基本呈方形。遗址中发现红烧土房2座，房屋为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门道，有柱洞，可能是设置柱子以支撑室内屋顶；房屋有一定的高度，室内较为宽敞。另有墓葬1座，出土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大量特征鲜明的陶器。陶器采用泥片贴塑法制成，除极少量的粗泥红陶、黑陶以外，陶器外表均有一层薄而细腻的红陶皮，形制有

圈足盘、双耳罐、高领罐、盘口罐等，素面陶占有一定比例，但大部分有刻划纹、绳纹、镂刻纹、戳印纹、压印纹、堆纹等简单纹饰。这些遗存的发现表明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存和生活经验，而且审美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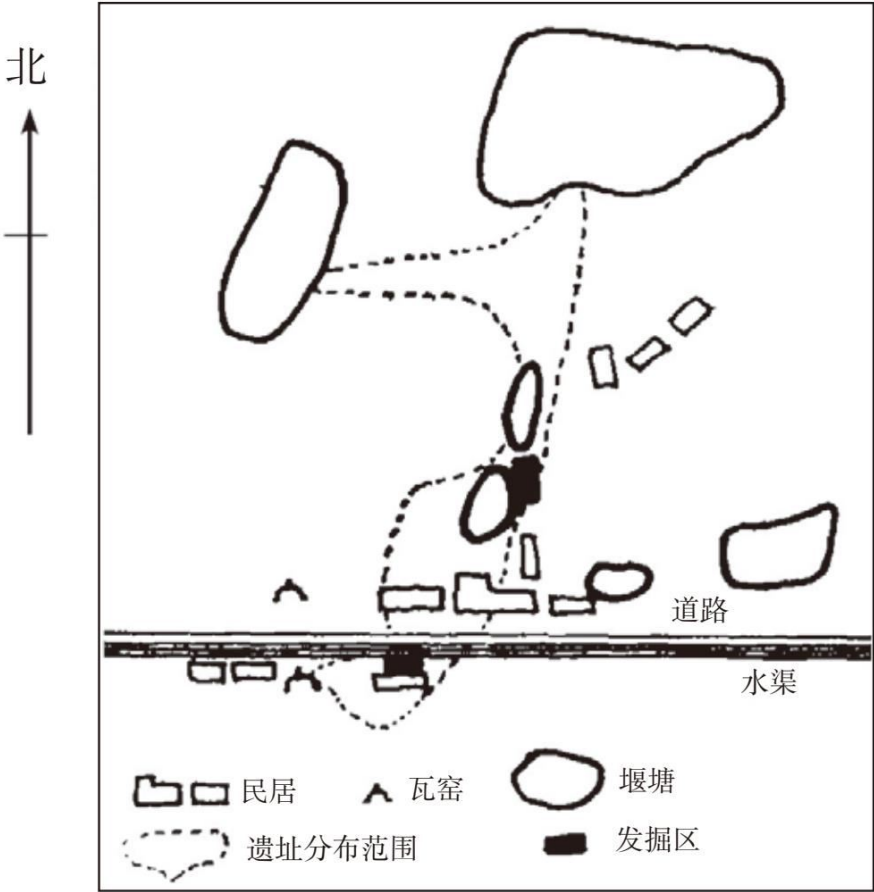


图2-6 胡家屋场遗址

坟山堡遗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35千米的钱粮湖农场，地

处东洞庭湖湖沼地带一片低缓的小台地上。该遗址于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面积在4万平方米以上，1990年发掘，揭露面积149平方米。遗址中发现有居址、灰坑、墓葬等遗迹以及大量遗物。房址形制相似，平面近长方形，房基大致呈南北向，居住面保存较好，一般有形制近似的火塘。火塘位于东南角，圆形，发掘者认为遗址所见的火塘可能与饮食无关。石器按形态有砍砸器、石饼、刮削器、雕刻器、石斧和砺石等。出土陶器均为手制，厚薄不均，有贴塑痕迹，以夹炭质红陶为主，一般饰红衣，有表皮，器壁多经打磨，有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纹；主要器类有罐、圈足盘、钵等，数量较多，形制多样。在文化关系上，坟山堡遗址与胡家屋场遗址有一定的关系，年代也大体相当，与城背溪文化也有某种联系，但也有区别，这反映出早期人类文化统一与多样的特点。[72]

（5）城背溪文化类型

城背溪文化因最先发现于湖北省宜都城背溪遗址而得名。城背溪遗址于1973年发现，1983年、1984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除发现上层为商代文化堆积以外，下层则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并且与同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的同期文化均不相同。随着同类型考古发现的增多，考古学者便提出了“城背溪文化”的命名。在湖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城背溪文化年代最早，为公元前6500—前5000年。此类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山地至江汉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即长江三峡东部至江汉平原之间的长江沿岸。这一区域范围虽然多高山峡谷，但峡谷相对宽阔，长江两岸有坡度平缓的山丘，山前土地土质较好，有面积较大的台地，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居住。

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城背溪文化类型遗址有10余处，文物遗存丰富的以城背溪遗址为代表，但包括其在内的大多数遗址未

发现有房址。城背溪遗址共揭露面积近272平方米，发现灰坑1个、灰沟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180件。^[73]然而，如果以房屋的结群性特征作为判断聚落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准，那么在城背溪文化类型中具有聚落性质的遗址是不多的。有遗址中虽清理出房址，但也仅有1~2座，譬如，茶园店遗址发现2座房基，王家渡遗址发现1座^[74]，聚落性均不是很强。尽管很多遗址中都出土有丰富的陶器、石器以及其他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在这一区域内的频繁活动，但聚落毕竟是物质实体空间和非物质社会空间高度重叠的地域空间，是边界相对清晰的社会单元，因此城背溪文化类型中所见诸多遗址严格意义上不能归属于聚落范畴。

（6）跨湖桥文化类型

跨湖桥文化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而命名，年代距今8 000—7 000年。跨湖桥遗址地处萧山西南部的湘湖之滨，位于跨湖桥南边，南北均为低丘，面积3万余平方米，揭露面积1 000余平方米。遗址中发现残破的房址4座、灰坑20余个、墓葬1座。1座可辨别的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墙体残存高30~40厘米，宽35厘米，墙体为灰白色土筑成，中间埋有木桩，室内残存有烧土面；其中有一方形灰坑，架设有“井”字形木构边框，坑内保存有整坑橡子。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等人工制品，以及动物骨骼、植物茎枝和1 000多粒已碳化的稻谷、稻米、稻壳等，另有件独木舟。陶器大多为日用器皿，形制有釜、圜底罐、双耳罐、直口钵、圈足盘、圈足碗等，其中双耳罐和圈足盘等都属于彩陶。还见有陶纺轮和线轮，后者还附着有纤维质的线头。石器均为磨制，主要有斧、锛、凿、锤、磨石、磨棒等，制作较为讲究，通体磨光。骨、角器则主要为农耕、渔猎、纺织、缝纫和生活用具，譬如耜、镞、镖、锥、针、匕、匙、哨、叉等。木器也多是用于渔猎、纺织、建筑和生

产的工具，最典型的如独木舟、铲、桨、梯、簸箕和木弓等。

这一系列发现都表明，跨湖桥人有了原始的稻作农业，但显然兼有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不过，从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稻作遗存来看，农业在跨湖桥人的经济生活中可能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我们可以认为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农耕性质较为明显的早期聚落，其生产生活不仅非常活跃，而且极为丰富，反映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人类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可以肯定，作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文化遗存，跨湖桥的发现对我们了解这一区域范围早期的聚落起源和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聚落遗址

与黄河流域一样，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发展之后，于公元前5000—前3000年，长江流域的史前人类进入了原始社会晚期。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长江流域的农业在经过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发展之后，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渐上升为经济社会的主导门类。如前所述，农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食物，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正是人口的增多，直接影响了聚落的形态及其发展，一方面是聚落面积的增大，另一方面则是聚落数量的增多。前者是通过扩大聚落规模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后者则更体现为通过新建聚落的方式解决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短缺问题。正是伴随着聚落的这一发展与变迁，人类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变，私有制萌芽，社会开始分化，氏族公社逐步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与黄河流域的聚落发展大致相当，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流域的聚落也有巨型聚落和普通聚落两类，并围绕巨型聚落形成明显的聚落群。根据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长江流域较为典型的聚落类型主要有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下游的河姆

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上游的卡若文化，等等，不一而足。

（1）大溪文化聚落

大溪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长江三峡西部的大溪遗址而得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目前考古发掘显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西起瞿塘峡东口，东到鄂中南的武汉一带，南抵洞庭湖北岸，北抵荆山和大洪山南麓，横跨湘、鄂、渝两省一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两湖平原地区，包括洞庭湖和江汉两大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类型的聚落发现数量较多，我们仅择其重要者一二稍做介绍。

城头山遗址（见图2-7），位于距湖南省澧县西北约10千米处的澧水支流澧水北岸东溪乡南岳村，地处澧阳平原中部的徐家岗的小土丘上，面积15万平方米左右，揭露面积近9 000平方米，年代距今约6 000年。文化遗存涵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典型的文化遗址。城头山遗址所见大溪文化遗存有圆形城址1座，有城墙，现存城墙宽25~37米，城高2~4米。城址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城内有祭坛、房址、制陶作坊、墓葬等。发掘资料显示，城中心偏西为制陶作坊区，偏西南为居住区，清理出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夯土台基房址2座，还有一条宽2米余、由红烧土铺成、两旁有排水沟的宽阔道路；祭坛在遗址东门，现存为一个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的椭圆形建筑基址，面积约250平方米。城外有壕沟和古稻田遗迹，出土有碳化稻谷、数十种植物籽粒、竹和芦苇编制物，还有木桨、船艄等。由于城头山遗址有完整的城墙和壕沟，具有较为强烈的军事防御性，并且城内功能分区较为明显，体现为一定的规划性，因此学术界认为其已不属于普通聚落范畴，而俨然是一座城郭。城头山遗址的系列发现也表

明，长江流域地区的史前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这对我们了解长江流域的文化变迁、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早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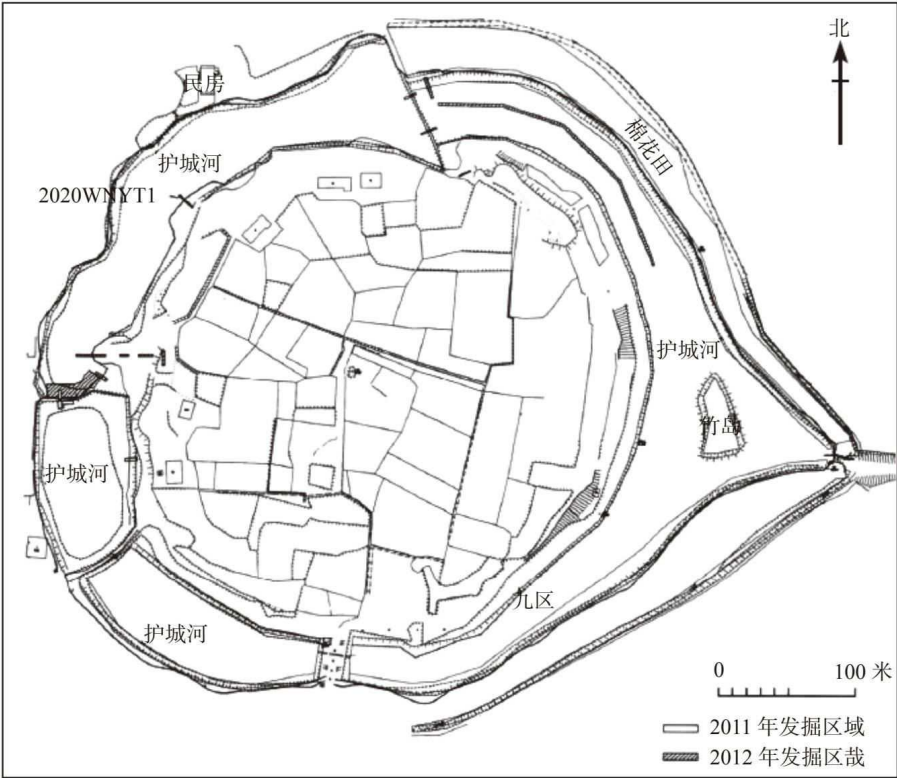


图2-7 城头山遗址2011—2012年发掘区

必须指出的是，从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到彭头山文化，再到汤家岗文化，及至城头山和后来的鸡叫城等聚落的出现，澧阳平原上大大小小的聚落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样一个面积不足500平方千米的地理范围内，就密集分布着300多处聚落，时间段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后期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不等。在一个

区域范围内，类似这种文化发展没有断裂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十分罕见的。就此而论，以城头山等史前聚落为代表的澧阳平原，见证着中国史前文化从发生到发展，长江流域远古文明从萌芽到绽放的全过程。[76]

走马岭—屯子山遗址，走马岭位于湖北省石首市东升镇，为新石器时代后期聚落遗址。遗址地处长江沿岸，北距长江仅4千米，属于低丘向平原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优越。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 200平方米。屯子山位于走马岭东北相距仅50米但又相连的低丘上，面积大致与走马岭相当，目前尚未发掘，但考古调查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房址类堆积。调查发现，走马岭—屯子山应该是双城城址。因为调查发现，有城壕、城墙根据地形将二者围合其中，遗址明显呈不规则的“8”字形。[77]考古调查还发现，在双城城址周边还存在着规模大小不同的聚落遗址[78]，这反映出双城城址可能是这一区域范围内的中心聚落。从走马岭的发掘情况看，共发现房址4座、陶窑2座、灰坑109个，清理墓葬19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一期房址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有基槽，木柱支撑草拌泥墙，居住面经夯打修整，南向。二期房址1座，为单间房址，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在8平方米左右，由柱洞、门槛和居住面组成，居住面为灰白色黏土，土质坚硬。三期未见有房址。四期房址为一曲尺形多间式地面建筑，木骨泥墙。西面为一间大房，东面为两间或两间以上的小房，大房与小房之间有一宽85厘米的门道。小房位于房址东面，其西北角发现有4件倒扣在居住面上的陶器，为豆、罐、碗、杯；有2大块灰炆层，小房可能属于厨房或饮食的场所。房址内发现有大量陶片，另见有纺轮17件、石器8件，其中石斧6件。

（2）屈家岭文化聚落

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其年代距今5 500—4 600年，上承大溪文化末期，下接石家河文化早期。屈家岭遗址，处于大洪山东南麓的两条小河青木岗河及其支流青木河之间，坐落在一片椭圆形的岗地上，地势平缓，面积约40万平方米，揭露面积近1 000平方米。该遗址发现有灰坑、墓葬以及大面积红烧土遗迹2处，另见有特征鲜明的陶器，包括彩陶、彩绘陶和彩陶纺轮等。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北越过桐柏山达豫西南的南阳盆地，其文化影响可达豫中甚至黄河沿岸，西北顺汉水到达武当山地区；向西直抵三峡；南止于洞庭湖南岸，影响可及湘中地区；东则到了黄冈和黄石一带，东北以大别山为界。该文化地跨鄂、湘、豫三省。[79]截至目前，考古在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的遗址已有近千处，我们仅择其重要者一二进行介绍。

鸡鸣城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与王家厂村交界处，坐落在一个狭小的平原上，南距一河流仅2千米，地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交界的衔接地带。鸡鸣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略从东北向西南走向，东南和西南角有明显的转折。南北最大距离约500米，东西约4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址保存较好，仅东北部缺失。城垣周长约1 100米，顶宽约15米，底宽约30米。城垣外有护城河，护城河周长约1 300米。遗址中发现3处城门遗迹，分别为东门、西门和北门，东门宽约12米；西门位于西城垣偏南，宽11~12米；北门位于城垣偏西，宽14米。城址中还出土陶器等文化遗存物。这一遗址对我们了解江汉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早期聚落形态具有较大的意义。[80]

鸡叫城遗址（见图2-8），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位于湖南省澧县城北约12千米的澧南乡，地处澧阳平原中部。聚落遗址平

面近方形，四隅呈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约370米，面积近15万平方米，揭露面积190平方米。西、北城墙保存较好，西墙南段宽约60米，残高4~5米；北墙西段宽40~60米，残高2~3米，北墙中部有一豁口，可能是城门所在；东墙仅存北段和南段，宽约40米，残高3~4米；南墙已毁。鸡叫城有壕沟和护城河。遗址中发现有圆锥形土台，底径近10米，高约1.5米，台顶中央有一直径约2.5米的红烧土堆，厚约1米，与土台顶面持平，遗存有大量碎陶片，位于城墙下，可能与城墙建设举行祭祀活动有关，大致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81\]](#)考古发掘还显示，鸡叫城城址的建设是持续性的，经历了屈家岭文化中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几个阶段，可见这是一处时间跨度很大且持续使用的早期聚落。不仅如此，围绕鸡叫城还形成了一个聚落群团，在面积仅20平方千米的区域范围内，有近40个聚落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体现为明显的地缘一体化趋势。[\[82\]](#)这些发现表明，鸡叫城作为一个区域的中心聚落已具有地缘整合的作用与意义。

黄楝树遗址，又称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侧的斜坡台地上，东南倚高约50米的土岗，西北邻黄岭河，处于丹江和黄岭河的交汇处。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1~4.2米，包括新石器时代、西周、汉代、宋元、明清等时期的遗存，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内含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中屈家岭文化时间最长，遗存物也最为丰富。房基25座，大都坐落在遗址东南部的台地上，背山面水，前临黄岭河，后依黄土冈。房屋呈庭院式布局，分北、东两排房。北排房为西北—东南向，为基本平列的短排房，房址5座；东排房为东北—西南向，为纵长排房，房址17座；中间形成三个小院式空

旷广场，院内中部偏南处有一单间大房，房门朝向东北，可能为氏族首领的住所或公共活动的空间。这些房屋分单间和双间两种，其中双间8座，余下为单间；房屋排列整齐，间距紧密，有的间距在0.3~1.2米之间；房子的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为挖筑的木骨建筑，墙壁白灰涂抹；有火塘，一般一室一塘；少数房屋外有白灰地坪。灰坑17个，墓葬38座，墓内随葬品少，仅4座分别随葬有一两件陶器（鼎、罐）及粗糙的装饰品，主要是由石珠和陶环组成的耳饰、石镯和石饰等。虽然随葬品较少，但仍反映出社会开始分化，可能已有了地位、贫富上的区别。聚落遗址出土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遗物达997件，前者如石斧、石锛、石镰、石刀、石网坠、陶纺轮、骨鱼钩、镞、骨锥、角锥、牙锥、骨针、石臼杵、陶杵、研磨器等，后者包括陶鼎、陶罐、陶碗、陶缸、陶钵、陶盆等。这些发现都表明，黄楝树是一处社会组织严密、社会活动频繁的大型聚落。[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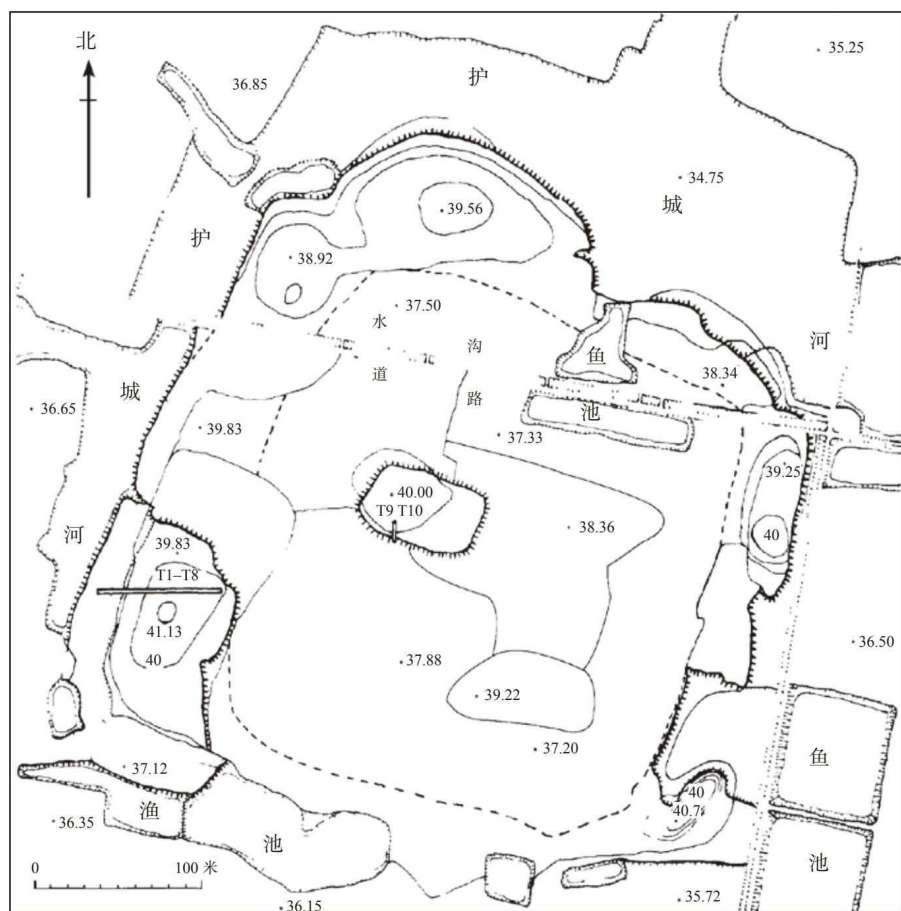


图2-8 鸡叫城遗址

（3）河姆渡文化聚落

河姆渡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而得名，它是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距今7000—5300年。考古发现显示，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目前较为明确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余姚河姆渡遗址以外，还有余姚鲞架山、朱山、下庄，慈溪童

家岙，宁波八字桥、沙溪，象山塔山，奉化名山后，定海白泉等遗址，最为典型的当数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为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略呈缓坡，其南面为四明山，北面为慈南山地，东面为南北走向的低山丘陵。遗址发掘面积2630平方米，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千件以上，木构件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三类。遗址中发现有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可能有6栋以上的建筑，其中一座连体长屋进深约7米，带1.3米宽屋檐下前廊，面宽在23米以上。房屋遗迹主要是排列成行，打入生土桩木，另见有散置的梁、柱长木以及厚板，未见有草筋或红烧土之类，全系榫卯木结构，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见插图5）。木构建筑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是西北—东南走向，部分近正南北，显然按背山面水布置。从建筑的构造来看，其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建造技术也不尽相同。除了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差异外，这更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的。墓葬27座，位于发掘区的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一层文化层随葬品最多的5~6件，少的仅1件，多为陶器，一般有釜和豆，也有玉、石；二层文化层未见随葬品；三层文化层，不见墓坑，无葬具，绝大部分没有随葬品，个别有少量随葬品。发现木构水井1座，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外围是一圈近圆形的栅栏柱，直径约6米，面积约28平方米，立面是一方形竖井。[84]考古显示，河姆渡动物骨骼涉及47种动物；大多数探坑中均发现有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稻茎和木屑、纬编混杂的堆积层。经鉴定，稻谷属于人工栽培水稻。[85]伴随稻谷遗存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之多，其中有2件的柄部还残留着木柄和用于捆绑的藤条。这些发现表明稻作农业不仅已上升为河姆渡人的主要经济门类，而且稻

作农业进入了“耜耕阶段”。不仅如此，从包括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等在内的近10种骨制纺织工具，以及石器、陶器、木器等几千件生产生活工具来看，河姆渡人拥有了较为发达的农耕经济，同时兼有畜牧和狩猎的经济活动，这反映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公社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程度。

（4）马家浜文化聚落

马家浜文化是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苏南和江北的太湖周边地区，目前考古发掘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有30余处，主要有马家浜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昆山绰墩遗址、宜兴骆驼墩遗址等，其中马家浜遗址和罗家角遗址最具典型性。

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市城南偏西7.5千米，坐落在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1.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13平方米。上文化层发现1座长方形的房址，东、南、西三面有柱洞13个，东南角有门址。柱洞范围以内，有一层约8厘米厚的黄绿色硬土面，应该是居住面。房子周边范围内出土有骨镞、骨凿等。另见有疑似被烧毁的房屋。下层建筑遗迹简陋，为一凹坑，发现有牛、鹿的骨骼，不一定为居住建筑。遗址西部和西北面为葬地，距居住区10余米，发现30具骨架，没有墓坑。出土有骨器、石器、玉器、陶器等人工制品，骨器多为骨锥、骨镞、骨凿、骨针等生产工具，石器也为石锛、石斧等工具。[\[86\]](#)

罗家角遗址，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东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揭露面积1 338平

方米。清理灰坑53个，发现丰富的考古遗物和动植物遗存，出土遗物有完整或可复原的陶、石、骨、木器约800件。其中，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壶等生活用具和纺轮；石器有斧、镞、刀、纺轮等；骨器则主要为镞、耜、匕等生产工具；木器中有一批加工方正的榫卯木建筑构件，加工方式有火烤和斧、镞凿等方式，有些木构件的凸榫上还带有销钉孔，卯眼有穿透和未透之分，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建筑需求而制作的，目的是使木构件拼合更为牢固。这些发现都说明罗家角遗址中普遍存在木构一类的建筑。[87]

（5）石家河文化聚落

石家河文化因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的发现与确定而得名，是长江中游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类型。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域与屈家岭文化大致相当，主要分布在以湖北江汉平原中部为中心的地区及周边范围，辐射范围包括湖北、豫西南和湘北一带，最北甚至到了郑洛地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有近千处，尤其是围绕天门石河镇范围形成了一个石家河遗址群。

石家河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区西北约17千米处，地处大洪山南部低山丘陵的垄岗状平原区，处于东部的石家河与西南部的马溪河交汇处。遗址群有遗址30余处，密集分布在石家河镇以北海拔30~45米之间约8平方千米的范围以内，很多遗址之间的文化堆积没有明显的界线，这个范围以外，遗址仅有零星分布，充分体现出石家河遗址群的群团性质。据考古发掘显示，在以谭家岭为中心，包括邓家湾、三房湾、土城、黄金岭、杨家湾等遗址在内的范围中发现有一座“石家河土城”。土城位于邓家湾以东、黄金岭以北，民居居于城内北部、西部及城外西南端。土城平面略似鞋底，南北长约510米，东西最宽约280米，面积近

120万平方米，城垣周围有形似环形壕沟的低冲。城垣的东、北段稍宽，高差也较大，城圈十分完整，东段偏北处有一个宽约12米的豁口，可能是城门所在之处。城址中还发现有大量西周中晚期的遗存，说明城址可能处于持续使用的状态，延续时间长。城址外围有规模不大、绕城散布的遗址，譬如城北的胡家湾、周家湾、晏家新场和晏家光岭等，城西的枯柏树、谭家港、堰兜子湾等，城东北的毛家岭、王家台、敖家全、榨锅坟头等。这种分布似乎表明土城与周边聚落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土城在政治上属于权力核心，周边聚落则从属于这个核心。由此可见，石家河遗址群无疑是一个以土城为中心聚落的地缘一体化聚落群团。[88]

（6）良渚文化聚落

良渚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市良渚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代表，年代距今5 300—4 500年，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类型。考古发现显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周边地区，尤为密集的是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和东部。据相关资料显示，截至目前见诸报道的良渚文化遗址有200余处，有学者估计甚至不下千处[89]，譬如浙江余杭反山、瑶山，以及江苏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武进寺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在所发现的遗址中聚落属性最为明确且体现为一定群聚特征的，主要是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群。

良渚文化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郊，主要分布在余杭市的瓶窑、安溪、良渚三镇，面积约34平方千米。遗址群地处浙西山地丘陵和杭嘉湖平原的接壤地带，为丘陵谷地，水网密布。截至目前，这一区域内发现单纯良渚文化遗址和含良渚文化的遗址100余处。总体看来，良渚文化遗址群大致可分三个区域：一是北部遗址约30处，以东苕溪北岸至天目山余脉之间的狭长地带为主要分布范围，集中于大遮山丘陵南麓的坡脚和山前地带，呈

两条并行带状分布；二是遗址群西南部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地区，分布着50多处遗址；三是东南部以良渚镇荀山为中心的一带，在1千米半径的范围内分布着20多处遗址，十分密集。遗址群发现的遗迹、遗存类型十分丰富，有居址、墓地、祭坛、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与生产生活工具、祭祀用器等遗存。遗址群的居址按规模大小划分，分别以莫角山、姚家墩、庙前三处遗址为代表。莫角山是一座巨型长方形夯土平台，面积超3万平方米，遗址上有三个小土丘，可能是主体建筑遗存。在南侧1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数排大型柱坑，可能是礼制性建筑。后来在遗址东南部不仅清理出大面积的坑状烧土堆积，而且还揭露出排列整齐的沟埂、积石坑、填埋纯净土的灰坑等遗迹。这些发现都反映出莫角山遗址可能是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并且属于这一区域范围内最高的权力中心。据资料介绍，考古工作者清理姚家墩遗址时，在厚约2米的文化堆积之中发现的几乎全是建筑遗存，并且多层硬面更显示出姚家墩的建筑物有多次更替。庙前遗址发现有一批房屋遗迹，较为清楚的有2座，其中一座遗存保存完好，平面呈长方形，有26个柱洞，面积约80平方米，另一座大体相当。墓地也可以分三个等级，以反山、瑶山的级别最高，因为在这两处墓地中不仅发现有非常精美的玉器随葬品，而且随葬品丰富，有些随葬品甚至超过了墓主躯体的重量，可能属于部落首领一类的墓地；汇观山、文家山次之，这两地墓葬中也发现有琮、钺、璧等玉质大型礼器，也有石钺一类的随葬品，应该是贵族墓地；再次之则为平民墓地，随葬品相对简单。祭坛有依山营建和平地营建两种，瑶山、汇观山的为前者，卢村的为后者。从这一系列现象来看，良渚文化遗址群应该存在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不仅形成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几个层级，呈现出明显的群团特点，而且社会内部有了明显的等级区分和贫富差距。这些都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早期人类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即社会完成了从原始共产、共食的社会关系向私有制社会转型。

[90]

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宫城、内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特别是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团的发现，不仅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远古文明历史，而且从考古物证的层面深刻揭示和肯定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事实。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村落遗存，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中华文明来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多了一处世界级的遗产名录，更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受到了国际认证。尽管作为客观存在的中华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未必一定需要这种“国际认证”，但不管怎么样，特别是对保护与发展文化多样性，当代中国提振文化自信、增强民族与文化认同等一系列现实诉求而言，这一认证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三、史前聚落遗址的特征及价值意义

上文中我们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广大范围内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史前聚落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列举。在梳理中，我们发现，史前聚落既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层级性的特点，也拥有统一性的内容。因此，对它的理解和认识，既不能过于笼统，也不应仅限于某些单一体的微观剖析，而必须在兼顾史前聚落所表现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把握聚落的基本特征，并在这一前提下，挖掘它的意义及其形成因素。大体而言，我们审视史前聚落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三个阶段来把握。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特征

根据前文中我们对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阐述，不难发现，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作为早期人类聚居之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遗址地点的人类活动体现为明显的结群性质。这可能与人类的动物本能有关。一方面，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发展而来的，本来就属于群居型动物；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资料表明，人类的群居行为与人类自身体质的缺陷有关。面对大自然中的凶猛动物，体格相对弱小的个体人类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只能通过结群活动弥补这一不足，以群体的力量求得生存。

遗址地点往往密集分布在一个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内，并以独立的遗址地点为活动单元，地点与地点之间形成明显的群落现象。譬如，黄河流域的宁夏水洞沟盆地、陕西洛南盆地、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沭河流域等，长江流域的广西百色盆地、湖南澧阳平原、安徽水阳江流域、湖北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等区域的旧石器地点，都体现了明显的抱团倾向，区域内部甚至形成了遗址群和遗址群团。

遗址地点的分布和形态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遗址地点一般位于近水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具有气候宜人、地势开阔和交通相对便利等特点。在分布和形态上，大体与地形、地貌融于一体，走向一致，并呈现为三种模式：一是沿河模式，即遗址地点以河流两岸的台地为基础，呈串珠状分布，譬如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沭河流域等都属这类；二是盆地与江河冲积平原模式，即遗址地点以地表平缓的山间盆地及江河冲积平原为基础，前者呈片状布局，后者则呈树枝状分布，譬如陕西洛南盆地；三是平原模式，即以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带为基础，遗址地点高密度分散布

局，这一模式也体现了遗址地点从早期多位于山间盆地、河谷地带向山前平原移动的变迁趋势。[91]

以上几个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特点具有普遍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村落起源与布局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将便于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和一般社会组织原则。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特点也并非完全绝对，因为各区域范围内的遗址地点都有其特定的地域性特点。有些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聚落遗址也存在规模、形态等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仍有待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门探究与揭示。

（二）新石器时代前期聚落遗址的特征

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中期，农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发突显。大量考古发现，这一阶段聚落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依靠农业，并且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开始体现出明显的农耕性质。通过对一些代表性聚落遗址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落的基本结构、布局方式、相互关系等，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聚落规模普遍较小，但散布空间较大。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聚落，面积多数在2万平方米以下，2万平方米以上的很少，5万平方米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口少，实际生活面积的需求小；二是聚落多坐落于山前坡地或山谷台地，地形地貌的特点具有局限性，客观上制约了聚落面积的扩大。从趋势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聚落明显体现为从山区河谷地带向山前平原地带迁移。正是由于聚落规模小、数量少，所以聚落的散布空间大，如在两湖及峡江的广大地域，城背溪文化时期就只发现聚落遗址40余处。[92]当然，聚落散布的空

间范围大，也客观上造成了聚落外围的实际活动空间很大。

在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聚落群，但尚未见有属性明显的中心聚落。考古资料显示，在一定的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由于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丰富的自然食物资源，不同程度地散布着规模不等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从散布空间上来说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呈现出与周边范围内的聚落相对紧密的关系。譬如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环嵩山地区等区域范围内的聚落遗址，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虽然聚落之间体现了群体性质，但是从规模、形态和内涵上看，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极少发现地位不平等的空间组织形态。

聚落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居住区与墓葬区逐步分开。尽管这期间的聚落面积仍很小，但有了一定的规划布局，居住区与墓葬区普遍分开，这是早期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改变，也是一个重大进步。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早期人类社会的更替具有了一定的秩序性，而且反映出聚落社会有了较为强烈的组织性和秩序性。譬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新郑唐户遗址、密县莪沟北岗遗址等。从墓葬区的情况来看，葬地也往往存在若干群组的现象，可能体现为家族或氏族的墓地区分。房屋布置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如舞阳贾湖遗址平面呈近圆形，房屋近50座均按规律有序排列。

聚落的防御设施少见或是不明显。总体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前的聚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无论是聚落规模还是形态上，都尚未形成一定的规制，与后期相比，尤为明显的是很少见到防御设施，或者防御设施并不是特别明显。目前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中，具有防御设施的，仅见有长江流域的八十垱遗址、黄河流域的新郑唐户遗址等。其中八十垱遗址可能年代最早，其聚落利用北边一段古河道作天然阻隔，东、南、西三面有土围和壕沟环

绕；新郑唐户遗址则仅见有壕沟一条。

聚落中的居址以单间房为主，多间房开始出现。单间房在形式上有椭圆形、圆形、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面积普遍不大，偶有案例如北方地区的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有2座面积达140平方米的大房子。^[93]多间房，如贾湖遗址第三期，就发现有数座半地穴式内留有门槛的房址，属于2~4间的连间房；新郑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屋有63座，其中60座为单间房，3间为双间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可能意味着家庭观念初始期或是早期家庭生活的出现。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前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关系相对简单，是一种原始共产、共食、共享的生产关系。从房址、墓葬和随葬品来看，未见有明显的社会分化，聚落内部的社会成员平等相处，没有形成严密的聚落组织，社会组织形态相对松散。聚落的农耕性质越来越明显，既体现出聚落的变迁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也说明农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在上文中已有所论及，不再详述。

（三）新石器时代后期聚落遗址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后期，伴随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的繁荣发展，人类社会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私有观念日趋明显，并最终形成私有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生活成形并迅速发展。这一切都使聚落在规模和性质上发生结构性变化，体现为如下几个具体特征。

聚落数量大幅增多，规模增大。相比新石器时代前期，同一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后期的聚落数量可能是前期的数倍之多。

据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有900余处，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的5倍之多。^[94]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在面积约3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100余处遗址。不仅数量增多，聚落的面积也普遍较前期扩大，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很多，有些聚落有10万平方米，甚至出现几十万万平方米的。譬如，黄河流域的郑州西山遗址有34万余平方米，郑州大河村遗址有30余万平方米；长江流域的鸡鸣城遗址和鸡叫城遗址均达到15万平方米。尽管（长）江（黄）河流域的聚落面积普遍扩大，但两者相比，黄河流域地区的聚落面积整体上比长江流域地区的大。原因除与人口密度有关以外，更是与文明进程有关，但自然地理条件因素亦不能排除。黄河流域的地势相对较为辽阔，而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则多丘陵山谷，不利于大面积的自然农耕与大面积聚落的兴建。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基于历史地理与自然及经济地理的判断。

聚落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地缘一体化倾向明显。有学者根据聚落面积的大小，把聚落划分为4个等级：特级聚落50万平方米以上，一级聚落30万~49万平方米，二级聚落10万~29万平方米，三级聚落9万平方米及以下。他们还根据这一标准对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进行了划分。以豫西洛阳地区为例，有特级聚落3个，一级聚落7个，二级聚落25个，三级聚落132个。^[95]尽管这种划分带有强烈的人为主观性，不是十分科学，并且聚落面积的大小与聚落的等级地位也未必绝对相当，但于宏观层面来说，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聚落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这一事实的。从聚落结构和出土遗存等来看，诸如长江流域的城头山遗址、鸡叫城遗址、石家河土城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的莫角山遗址，黄河流域的临潼姜寨遗址、郑州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尉迟寺聚落遗址和丁公遗址等聚落，不仅

在等级和地位上都要高于周边范围内的聚落，而且以其为中心形成聚落群团，中心聚落性质十分明显。良渚文化遗址群以莫角山为中心，周边分布着100余处遗址。这些都表明，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一定的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地缘一体化趋势日趋强烈。这种现象的产生，除血缘因素以外，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防御上对地缘的需求，与聚落生产能力及内需经济也有一定的关系。

聚落的功能区划清晰，体现出一定的规划性。一般而言，在平面布局上，聚落由居住区、手工作坊区（陶窑场）、公共广场、墓葬区和环壕等组成，不仅规划性很强，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特征。譬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安徽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聚落遗址等黄河流域地区的聚落就极为典型。相比黄河流域，考古发掘所见长江流域聚落的功能区划相对含糊，但事实上，从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鸡叫城遗址，以及河姆渡遗址和石家河土城等聚落所遗留的城垣、环壕和居住遗址来看，其规划性同样明显，并且很强。例如，城头山遗址虽然城内的功能区划并非十分明确，但从其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的遗迹来看，其显然是经过严密规划与设计的。

环壕型聚落呈现出向城郭发展的趋势。伴随着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化，聚落的发展开始形成明显的两种趋势，其中前者朝城郭方向发展，后者的发展则几近于停滞，属于典型的散布型村落。前者在外观形态上一般有环壕，体现出强烈的军事防御性特征；就聚落建筑而言，除民宅以外，通常还有祭祀遗址和大型公共建筑或宫殿式建筑，表现出突出的宗教性、政治性功能。譬如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东北部就有两座大型房址，一座为宫殿式建筑，面积近384平方米，另一座为附属建筑，属于廊庑

式建筑；石家河文化遗址群中的土城则拥有大型的礼制性建筑。这些都表明，环壕型建筑逐渐发展为城郭。尽管追溯历史，早在距今8 000年前的澧阳平原八十垱遗址就发现了环壕遗迹，距今6 000年前的城头山更是拥有了完整的城垣，但从年代上来说，这类环壕型聚落的大量出现应该是在龙山文化以后。仅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郭型聚落，就出现了登封王城岗、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新密新砦城址、安阳后岗等几十余处。

聚落居址连间房增多，分化明显，地面建筑普遍出现。相比新石器时代前期，这一时期虽然单间房仍十分常见，但连间房明显增多，而且多呈方形和长方形。譬如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居住建筑，多以两间或两间以上的房址为一组，分布于壕沟内侧，从北向南有12排，零星房址2间。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三期的聚落房址，除1座为半地穴式房址以外，其余都为地面建筑，而且房址多数为两间或两间以上，其中有并列四连间1座，并列二连间2座。不仅如此，这期间的居住空间明显经过了一定的室内装饰，有些用草拌泥垒筑，有些则采用木骨泥墙，房间地面也经过处理，有的经过烧烤，有的用料礞石[96]铺就或草拌泥铺抹。河南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晚期、大河村文化三期的聚落居室，都有类似的处理。这些不仅表明史前建筑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而且反映出史前社会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阶层群体。

上述聚落变迁的特征显示，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转变，已不再是简单的原始共产、共食、共享的生产关系。不论是聚落与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社会组织形态严密，有了贫富、等级和地位的区别。正是这一系列转型，促使着人类社会向阶级社会进化，并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

（四）史前聚落遗址的价值意义

从史前聚落的发展及其变迁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历史认知。

首先，村落的起源与农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尽管农业的出现并不是村落产生的唯一条件，但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由早期的穴居、巢居发展到固定居民点，再到村落的产生和村落群的形成，及至城邑和国家的出现，都无不打上了浓厚的农耕烙印。从村落的产生到国家的形成，不仅意味着中华大地从分散走向统一，而且是早期人类社会从血缘、地缘进化到文明的兴起和整合。在农业发达地区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北方地区，其早期村落的发展显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源头的。

作为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影响甚至决定着早期村落及其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村落在起源阶段，尽管因人类本身及所处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具有族群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但由于早期人类在生存驱动上的相同性，村落也呈现出一定的统一性。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早期村落具有集统一性与多样性于一体的性质。这一性质还显示，村落的变迁除了受土地与人口等因素的制约和刺激外，也与族群、信仰、道德、语言、风俗和地理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次，村落作为我国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产、生活、聚居、繁衍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场所，是相对稳定、明晰的社会单元。它在承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具有本源性和传承性的特点。特别是村落和村落中所产生并形成的包括建筑、工具、技术、组织、制度、道德和信仰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虽是农耕文明

的产物，但被最初的城市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展，所以也成了城市及其文化的源头。尽管国家出现后，部分城市是因各种原因而建造或发展起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文化的源头是村落起源阶段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尽管伴随着早期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城乡分野趋势，逐渐形成了城乡两种文化类型和两种经济形态，社会的贫富和地位的分化日渐裂变，但在自古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早期农业社会，村落远远不只是一个社会单元和生活单元，更具有哺乳城市、服务国家的意义，在推进城郭发展、维系国家稳定和繁荣方面起到了极为积极的重大作用。

最后，村落作为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聚落，有自身的范围与活动空间，具有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文化特质，呈现为封闭性、保守性和地域性等特点，是有形的地域性物质实体空间与血缘性、地缘性乃至亲缘性非物质社会空间的高度重合。因此，讨论村落的起源及其演化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村落的物质实体空间，更要顾及村落的非物质社会空间，尤其要挖掘村落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所映射出的“家国一体”的社会与文化内涵。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表明：早期人类社会不仅经历了从原始群体到氏族社会，再到部落、部落联盟，进而到民族和国家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传统也是形成并发展于村落的。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逻辑起点与实际历史的起点，隐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以及包含宗教在内的深层次历史文化信息与内涵。

当然，村落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的聚落空间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在进入国家形式后，它的生存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国家的严密管控，但也正因如此，村落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了见证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活证

与实证。关于这些，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做进一步阐释。

[1]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2] 高星、裴树文、王惠民等：《宁夏旧石器考古调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 Licent E, Teilhard de Chardin P: “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e”, *L’Anthropologie* 1925 (25): 201—234；高星、李进增、D. B. Madsen等：《水洞沟的新年代测定及相关问题讨论》，《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 杨亚长：《陕西地区史前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部：《陕西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所》，《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5] 王社江、沈辰、胡松梅等：《洛南盆地1995—1999年野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2期。

[6] 王社江：《洛南盆地的薄刃斧》，《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4期。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花石浪II——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8]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9]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3—45页。

[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1] 李罡、任雅鹏：《大沽河、沂沭河流域旧石器考古新进展》，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9—50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4] 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5] 朱帆：《舞阳贾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县博物馆：《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17]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9]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9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7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易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

[22]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2期。

[23] 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6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

调查、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

[24] 伶佩华、魏成敏：《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0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0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5] 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青岗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2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宁县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28]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2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秦安大地湾450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6期；郎树德：《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古》2003年第6期。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3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3]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3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2014—2015年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3期。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3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37]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8] 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6期。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0]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4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3—242页。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鄆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鄆城县许慎纪念馆：《鄆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2015—2016年田野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44] 杜金鹏：《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

[45]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46]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日照县图书馆：《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照市文物局：《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2012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9期。

[47] 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48] 李炎贤、尤玉柱：《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第4期。

[49]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29页。

[50] 津市市文物管理所：《虎爪山北坡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

[51] 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52] 封剑平：《澧县乌鸢山旧石器遗址调查报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

[53] 封剑平：《湖南澧县十里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载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馆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91页。

[54] 房迎三：《安徽省宣州市陈山旧石器地点198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5] 房迎三：《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与研究》，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研究》第十一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页。

[56] 房迎三、黄蕴平、梁任又等：《安徽宁国毛竹山发现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7] 李炎贤、袁振新、董兴仁等：《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与古人类》1974年第2期。

[58] 宋国定：《湖北郧县黄家窝旧石器地点考古发掘与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30日，第4版。

[59] 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0] 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4期。

[61]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

掘》，《文物》1976年第12期；R. S. Mac Neish, J. G. Libby, eds., *Origins of Rice Agriculture: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ino-American Jiangxi (PRC) Project*. Publication sin Anthropology no.13, EL Paso Centennia Museum,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EL Paso, TX, 1995；R. S. MacNeish et al., *Revised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Sino American Jiangxi (PRC) Origin of Rice Project (SAJOR)*. Andover Foundation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over, MA, 1998。

[62] 吴小红、张弛、保罗·格德伯格等：《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63] 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64] 吴小红、伊丽莎白塔·博阿雷托、袁家荣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早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65]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0 000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6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6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2期；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68] 周世荣：《湖南石门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2年第2期。

[69]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7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72]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文管会：《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

址试掘报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岳麓书社1994年版。

[7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7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第238页。

[7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与护城河2011—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3期。

[76] 参见郭伟民：《回望五千年前的中国与湖南——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意义与展望》，《湖南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11版。

[77]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11页；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4—125页。

[78]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石首市博物馆：《湖北石首走马岭遗址周边史前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

[80] 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荆州博物馆、公安县博物馆：《荆州公安鸡鸣城遗址考古勘探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8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82]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3页。

[83]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楸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淅川县龙山

岗遗址2008—2009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4年第4期。

[8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5年第5期。

[85]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86]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87]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载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88] 石河联合考古队：《石河遗址群1987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1页。

[8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4页。

[90]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9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9—50页。

[92] 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94] 李龙：《中原史前聚落分布与特征演化》，《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95] 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96] 料礞石，因石状多如姜，故又名料姜石。别名砺石、姜石，又名礞礞。

为黄土层风化红土层中钙质结核，故矿物名叫钙质结核。

第三节

国家的诞生与村落的蠡测

村落的不断分化扩张以及群团化不断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的出现和地缘一体化的形成。而地缘一体化的持续巩固和扩大，则促进了国家的产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发展趋势是私有制演化的产物，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1]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2]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因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方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收入，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诗经》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即为此意。正因如此，在国家出现之后，村落作为早期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产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便开始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

一、早期国家的出现与村落

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以后，及至商、西周政权的建立，早期中国便开始以国家的形式正式出现。按前揭，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村落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力量，显然是被统治的对象，并且还是早期中国严格监管的对象。因为作为地域单位和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单元，村落的代名词就是土地和人口，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根基与发展。从理论上而言，国家与村落之间，既相互制约、相互牵制，也互为促进、共同发展。但事实上，早期国家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并没有成为村落发展的助推力，反而制约了村落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早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以统治为前提的。文献记述显示，为了更好地维系国家统治，先秦国家对于土地实行“井田制”，由奴隶和庶民耕种；战国以后改行“授田制”，土地由国家授予，但庶民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对于人口，则实行国民化管理，在制度上努力将奴隶和庶民纳入城郭集中居住。秦统一六国后，更是通过设立郡县制，县下建立“乡里”制来加强控制。正是这一系列制度，使早期中国有效地加强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但也正因如此，村落的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井田制作为一种春秋以前就存在的土地制度，是早期国家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一类有效方式。它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包括村落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井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最早见于《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文中进一步指出，“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4]大致意思是，井田可以分为公田与私田两个部分，其中公田一份，余者皆为私田。私田分别由八家之民耕种，他们不仅要向

国家缴纳足额赋税，而且要共同承担耕种公田的责任。《孟子·滕文公上》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5]与《孟子》所载不同的是《周礼》中的说法，其《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6]《周礼》中的“井田”之说，认为井田无“公田”“私田”之分。其实，有关于井田制的系列问题，不仅在先秦就存在不同的理解，自清末以来更是引起广泛的争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论述与讨论，特别是有关其具体形式与内容，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7]与村落形成有关的，大致有两种看法。以杨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井田制就是春秋时代以前的农村公社制度。它的产生是出于“统一治理和管理水利灌溉的需要”，实行“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地区”，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居住空间的“邑”和“里”。^[8]尽管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9]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在井田制下，农民的个人份地直接受自国家而非村社共同体，因此井田制不仅不是典型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而是属于土地国有制性质的国家授田制，它并非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而是在战国时代的国家授田制的基础上加以增饰而创制出来的一种理想制度”^[10]。

上述各种说法，孰是孰非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项土地制度或赋税制度，井田制应该正式形成于西周时期，在夏商时期便已出现。^[11]不仅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古典文献等历史材料中均有类似内容的表述，而且相关记述都表明它在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早期中国，以国家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它不再是简单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而是一个跨血缘、跨地缘的国家社会组织。要维系这

样一个社会组织，原始公有制显然已经很不适应，于是，井田制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应时而生，并起到了维系和稳定国家的效果。从本质上而言，商与西周国家推行井田或者说井田制的根本目的是征收赋税，因而其出发点是一致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效益大规模地发挥出来，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分配，尽可能使国家、土地拥有者、土地耕种者三方或多方获利，并使这种利益有度、平衡。另一方面，则要将作为生产力的国民固定在土地上。《春秋穀梁传》所载“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虽是对官吏和农户二者的要求，但由于官吏是私田的管理者和督促者，所以“稼田”归根结底是针对农户的，这就在制度层面将农户固定于土地。正是这一逻辑出发点，使井田制作为一项国家的制度，具有了村落变迁层面的意义。其意义突出体现在与井田制配套存在的基层管理制度，即所谓“国野之制”，它们互为因果，共同维系着早期国家的基层社会形态。

“国野之制”，即《周礼》所云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与乡野有关的是“乡遂之制”。在“国”设六乡，《周礼·大司徒》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谕；五州为乡，使之相宾。”^[12]“国”即“都鄙”，韦昭注：“都，国也。鄙，边邑也。”郑玄注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都鄙就是当时的都邑或是国都周边范围的固定居民点，集中居住贵族、手工业者、庶人和商人等。都鄙营造形成了集中城居的形式，所谓“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13]即是证表。“六乡”的设置，则正好于制度设置层面对此进行了巩固，其功能目的，是既便于管理，又可以将农民固定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上，进而维系国家的稳定。这种做法与早期中国实行的分封制密切相关。“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14]分封制可能最晚在商代已开始出现，分封侯、伯之类，^[15]尚不完善，其真正成熟并广泛推行是在周代。周代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封疆内将土地分赐卿大夫，卿大夫再把土地分赐子弟和士。分封，实质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裂，所以“六乡”的设置，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分封之地的控制。“国”之外，则于“野”设“六遂”，“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国”之外的广大区域即为“野”，郑玄注：“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16]简而言之，野即广大乡村地域。文献中所提到的“里”，则是乡村地区的基层组织，并且属于官方认可的有一定边界的居住空间。

很显然，作为春秋之前国家普遍实行的治理制度，特别是在西周时期，井田制和国野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既促进了中央国家与诸侯国及其地方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又维系了国家的稳定。然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文献中如此规整的制度是否就一定符合实际呢？按照文献记述来理解，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似乎是难以归入其中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文献记述，中国先秦时期或是汉以前的历史时期，被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是“都市国家”，进入三国以后，才逐渐向被称作“村”的散村演变。^[17]国内的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论述了殷周为城市国家的问题，并将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追溯到殷商晚期，指出

古文字“邦”“封”同义，“城”“国”同义。当然，侯先生并没有否认先秦以前就存在农业型的聚落，相反还认为我国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便发生了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18\]](#)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都市论”不可靠，至少是不全面的，认为先秦以前百姓完全居住于城郭的说法值得商榷。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日本有松本雅明[\[19\]](#)、池田一雄[\[20\]](#)，国内则以侯旭东[\[21\]](#)为代表。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关键固然与立论的出发点不同有关，但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村落内涵缺乏把握，尤其是“都市论者”往往只是将村落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既忽视了它作为物质实体空间的客观存在，又忽略了它在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语言、风俗、道德、宗教、经验与技术等非物质性内容，因而当先秦文献中有关基层制度的记述语焉不详或是体现为一种行政理想时，通常就自觉排除在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实际的生活单元或族群的可能；二是先秦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多为后人根据自我理解的追述，或者只是统治者为便于管理和控制国家而衍生出的充满主观理想的一种制度，可能并非真正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且人们对这类文献的理解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还往往忽视了人类学、地理学在解读村落作为社会单元和地域单元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认为《周礼》中“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国野之制”，制度上虽然非常完整，设置上也极为严密，在“国”设“六乡”，在“野”设“六遂”，但是并不能说明村落就完全被纳入国家的管制范畴，百姓也未必全部集中于城郭居住。因为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制度，那便是在统一规划的城郭之中，由于人口增长或减少具有不可预计性，尚且难以实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22\]](#)的“六乡”编排，更遑论在地理条件复杂、族群多样的“野”了。“野”不

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城郭的周边地域，还包括那些尚未被统驭的蛮、夷、戎、狄和流邑之民等聚居的区域，[23]所以要实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4]的“六遂”编排，在当时显然可能并非现实。特别是以井田制进行土地分配的制度，在蛮夷之地，不仅难以适从，而且过于理想，乡野聚落与行政编制的统合也是困难的。相关研究显示，西周时期的里，作为乡村或都鄙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实际居住空间，是有边界的，并且规模有大小之别。[25]这也表明“五邻为里，四里为鄴”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殷商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显示，殷商国家以外，尚存有不少未被统驭的方国或部落，如土方、危方、鬼方、微方、羌方、龙方、四邦方、兹方、刀方、大方、孟方、井方、二邦方等，它们都普遍分布在殷代国家的周边。[26]考古也发现，在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核心区域以外的广袤地带，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江汉地区、洞庭湖水系区、鄱阳湖水系区等普遍存在着乡野聚落。[27]

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列国称雄，相对稳定的国家形式遭到破坏，特别是伴随着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户口逃逸的情况常见，建立在“国野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基本瓦解。所以，为了维系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战国时期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兴起变法运动，普遍推行郡县，改“井田”为“授田”，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正是由于基层组织的相对宽松，以及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私田”得以出现。私田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可以用于租赁，因而一些逃逸的人口，除了在野外自行开辟耕地外，往往通过租赁私田耕种转为佃农。这部分人往往只需向地主付租，而无须承担国家徭役，所以国家对此是严加监管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魏户律》记战国晚期魏国的律令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

或弃邑居墾（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28]这段话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除了蛮夷聚落外，城郭外还存在乡野聚落，并且不受制于国家；二是国家对这类由“流邑之民”形成的乡野聚落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这是“非邦之故”。至于为何是“非邦之故”，除了《魏户律》中提到的“入人孤寡，徼人妇女”的理由外，恐怕主要是《管子·轻重乙》中提到的“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29]的说法。大意是由于耕作而自发形成的聚落，统治者是难以征收其赋税的。正因如此，在管理手段落后、信息闭塞的早期社会，统治者将百姓集中城居，进行统一管理显然是最佳方式。何休所注的《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极具说服力，其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徐彦的疏指出：“古者邑居，秋冬之时入保城郭，春夏之时出居田野。”[30]

这段注疏作为后人的追述，虽不能证明集中城居就是先秦时期的普遍形式，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哪怕是作为城居，也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民居于城郭，耕种则在城郭附近；二是有专人管理，进出时间是受限的。翻检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可能因为田地超越了城居的耕作半径，所以为便于农事而派生出了一种所谓的“庐”，即在就近田处建造的临时性房屋。《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东汉郑玄笺：“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唐孔颖达疏：“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故言中田，谓农人于田中作庐以便其田事。”[31]虽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庐”后来发展成了村落，但从理论上而言，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在湖南江永勾蓝瑶寨考察时就发现了类似形式、功能的“牛庄屋”。它是旧时居于深山的瑶民为便于农业生产而于平地近田处建起的临时

住所，一到开春，瑶民便长住其中，久而久之，就干脆移居平地，形成了村落。2019年10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在湖南郴州发现的一处我国目前所知村落建筑类型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年代序列最为清楚且仍在活态传承的代头村，也可佐证这一点。因为从村落空间来看，居于盆地中央的居所和位于村落外围两侧、靠近田土一方的牲畜马厩，都说明代头村是为便于农事而建，恰好可以见证历史上因“庐”成“聚”成“衢”的村落生长现象。

由近推远的论证方式虽然不能直证，但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无论是早期人类，还是现代人类，他们在求生、求存、求便乃至趋利避害等方面的行为和心理上的期盼是相同的，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改变。《史记》中也有关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虽未必言之凿凿，但结合瑶族地区的牛庄屋与湖南郴州发现的代头村这些活证，便具有说明“庐”可发展为村落的佐证价值。

可以肯定，无论是蛮夷聚落，还是由流邑之民形成的乡野聚落，抑或是为便于农事而出现的“庐”，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早期中国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并不意味着自然聚落消失或被取而代之，相反呈现出散村化的倾向。可以肯定，于国家和民族视野下的村落，此时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以其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在增强民族的内聚性与心理认同，避免民族文化的失忆甚至是中华文化的分割、封闭和中断，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商周时期的方国与聚落

从历史视角来看，商周国家的地域范围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中国版图与疆界，其核心区域在现今的中原。至于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有其势力据点或势力影响，但似乎并未全部被纳入其统驭范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王畿区外围开始，由近及远分布的军事据点是商人控制外服的实体，这些军事组织在驻地屯田。在商都势力强盛期，附近的一部分国族或因商人势力所迫、或因敌族压力而归附。商属地与附属国族联合对抗附近的敌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的商人势力范围圈。”^[32]就此而论，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商周势力范围等同于商周疆域，其核心区域在王畿及其周边范围，王畿以外，其势力影响可能由近及远地逐渐减弱。一般认为，商代的核心区域在今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一带，在北纬34°~38°，东界大体在今河南省商丘以西和濮阳迤东一线，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西界及于孟津和太行山以东，北界在今河北省邢台、内丘附近。^[33]周代的核心区域，西界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与甘肃省陇西县之间，大约包括渭南、商洛、汉中、咸阳、宝鸡等几个地区及甘肃省东部几个县，北部与汧陇一带交界，南及汉水以北，即河南、湖北交界地区，东到郑州西南百余里。^[34]核心区域以外，特别是那些商周势力不及的范围，往往被先秦经典文献称为“蛮荒”之地，即那些相对落后的酋邦、氏族和部落聚居区域，卜辞中称其为“方”，即方国。

所谓“方”，即人的集合体，一般规模较小，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血缘族群。它的形成与史前社会以来的地缘一体化密切相关，小者往往代表着一处或多处聚落，大者则可能包含一个甚至多个聚落群。由于这些区域范围内的“方国”没有文字，并且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大大弱于中原地区的商周国家，所以不仅缺乏相关文献记载，而且长期成为商周国家征伐的对象。有关于

此，我们在先秦经典文献中是难以见到的，现存相关历史信息渺薄。所以，我们尤其不能忽视卜辞和钟鼎铭文中的有关表述。因为这类文献史料作为商周时期的文字表达，不仅更贴近历史年代，而且更贴近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也为我们了解其时的历史状况留下了依稀可辨且难能可贵的线索。从文字描述的表象背后，可以发现商周社会的某些真相，包括商周国家对待方国的态度和立场。所以，我们讨论商周国家体制下的聚落，固然要利用经典文献来解读，但也要重视卜辞和钟鼎铭文。因为只重视前者容易使我们陷进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商周国家即代表着商周时期的广大区域，而忽略了商周国家核心及疆域以外的广袤地域。

殷代卜辞和钟鼎铭文中所见方国很多，近代以来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系列考证。最早是孙诒让1904年的《契文举例》，其单独列出《方国》一篇，搜集了20多个地名。此后，罗振玉1915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认为殷墟卜辞中有200余个地名；1920年日本学者林泰辅的《甲骨文地名考》一文，对卜辞中的117个地名进行了考释，并绘制有地名示意图《龟甲兽骨地名图》。后来陆续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包括林义光、丁山、程憬、陈梦家、傅东华、郭沫若、李学勤等，不一而足。尽管他们中有的只是重复前人的考证，并无新绩，甚至有沽名钓誉之嫌，但并不影响这一群体的卓越成就。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商周时期的方国至少包括两类：一类是商周国家的敌对者，另一类则是依附于商周国家的臣服者。前者如𠂤方、危方、鬼方、下危、土方、微方、羌方、龙方、四邦方、兹方、刀方、大方、人方、孟方、井方、二邦方等；后者如井方、亚方、戈方、仓侯、丹伯、去伯、上丝、禾侯、竹侯、宋伯、攸侯等。事实上，这两种分类也并非绝对，因为有些方国与商王朝的

关系是时敌时友。从时间上来说，上述方国大多是与商王朝同时期存在的，西周灭商，周王朝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之后，一方面是原商王朝控制的四方诸侯相继归顺，另一方面则是周王朝核心区域及其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仍旧广泛存在尚未被其统驭的方国。按《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的考证，大致而言，上述方国主要分布在商周王朝核心区域的东、西、南、北四方。^[35]

文献可考的东部方国，主要分布在今山东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地区，包括淮河附近以及江苏、安徽、河南交界地区，典型的方国有人方、孟方（东方）、林方、旁方、危方、攸侯等。其中人方长期与商王朝为敌，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曾屡次对其进行征伐。征伐过程也表明，商王朝核心区域周边还存在不少都邑一类的聚落。例如，可以辨识的有：大邑商，“甲午……步从侯喜征人方……告于大邑商”（《合集》36482）；西周何尊也有铭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王卜，在商，贞今日于京亡灾。”“甲寅王卜，在京，贞今日□[于]唯亡灾”（《合集》36567）。除此之外，还有雇、杞等几十余处。林方，“庚寅卜，……贞王畱林方亡灾”（《合集》36968/2）。林方原臣服于商，后反叛被灭，其地大概在今安徽境内，郭沫若认为在霍山县东北30里，^[36]陈梦家则认为在淮南，属于淮夷之邦。^[37]后者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危方，原臣服于商，如卜辞云：“癸亥，贞危方以牛其登于来甲申”（《合集》32896、33191/4），类似的表述在《合集》10084/1、8492/1、32229、32897/4、32899/4等中均有体现，但其后来反叛，被商朝镇压，“……小臣墙从伐，^𠂔危美……人二十人四……而千五百七十……车二丙，櫓百八十三，函五十，夫……于祖乙，用美于祖丁……”（《合集》36481正/3）。攸侯，为商朝封国，“甲戌卜，^𠂔，贞攸侯令其^𠂔舌

曰：‘耔，若之。’五月”（《合集》5760正/1）。从这里来看，攸侯可能是商王朝征伐东部区域的前沿军事据点，似是戍边的族群聚落。

文献可考的西部方国最多，主要分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西部、南部，陕西渭河流域以及陕西与山西、内蒙古、甘肃的交界地区，较为突出的方国有𠄎方、羌方、沚方、召方、巴方、龙方、商方、鬼方、周方、马方、旦方、井方、亚方、戈方、仓侯、丹伯、禾侯等。𠄎方，甲骨文作𠄎，属武丁时期的敌对势力范围。从卜辞来看，𠄎方作为敌对方，曾多次内侵商王朝，从卜辞常见的“𠄎方出”“𠄎方伐”“𠄎方敦”等表述便可窥见一斑。[38]同时，也说明𠄎方可能是一个势力比较强劲的方国或族群。“癸巳卜，𠄎，贞旬亡𠄎。王固曰：‘𠄎[𠄎]，其𠄎来艰。’气至五日丁酉，允𠄎来[艰自]西。……‘土方征于我东𠄎，[𠄎]二邑；𠄎方亦𠄎我西𠄎田。’”（《合集》6057正/1）方的入侵，可能与侵占田地、掠夺人口和牲畜有关。𠄎方不仅侵略商王朝，还侵略商周边的方国，并且联合土方、𠄎方等国一起侵略（《合集》8610正）。对此，商王朝间歇性地进行了反攻和征伐。至于羌方，陈梦家先生认为应该是一个游牧民族，而“羌”则是他们的种姓，[39]后来被商王朝征服，成了商朝的田猎场（《合集》29309、29310）。召方与甲骨文中的“刀方”可能指同一方国，[40]前期与商王朝为敌，商朝曾频繁征伐，似乎说明召方也是西方一个强劲的部落联盟。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召方位于周朝召公奭所在的召城一带；[41]另有学者则认为这一地区过于偏西，应该在今山西中北部的地区。[42]龙方为附属国，大体位于商王朝西北，与羌方接近，曾参与征伐羌方，卜辞云：“贞呼龙氏羌。”“勿呼龙氏羌。”（《合集》272反/1）。后来龙方也叛服不定，商王朝又对其进行了征伐（《合集》31972/4）。鬼方早期

活动范围比较广，包括今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及陕西北部的广大区域，与商王朝敌对，武丁以后成为附属国，并且为商朝打仗、祭祀、捕获羌人、贡纳人牲与官吏等，[43]卜辞云：“贞鬼获羌。”“贞鬼不其获羌。”“乙巳卜，**旁**，贞鬼获羌。一月。”“乙巳卜，**旁**，贞鬼不其获羌。”（《合集》203正/1）西周小孟鼎铭记有康王二十五年周朝征伐鬼方的情况，其云：“……伐鬼方……[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由此来看，鬼方可能是一个人口众多、由多个血缘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周方是殷商时期的西部方国，曾臣服于商王朝，后来灭商，建立周王朝。马方为商敌国（见《合集》6624、6761、5717正），位于山西西北部。旦方与商王朝互有攻伐，武丁时商朝曾派雀、戈、戊等部族前往征伐（《合集》6948正/1、6949正/1、6951反/1、6952正/1），后臣服于商（《合集》10184/1、7891/1、23431/2、33179/4、33180/4）。井方为商王朝附属国，是商王武丁王后妇井的母国，一直与商朝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著名的“后母戊”就是妇井。[44]亚方、戈方、仓侯、丹伯、禾侯都是商王朝的附属国或封国，与商朝的关系密切，有些曾与商朝一起参与征伐其他方国的行动。

文献可考的南方方国，主要分布在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湖北地区以及江西中北部，方国有**𠄎**方、雇伯、虎方、卢伯、暴侯等。其中**𠄎**方为南方地区势力强劲的敌对国，与商王朝之间曾长期存在互伐。“甲辰卜，宾，贞**𠄎**方其禹，惟戎。十一月。贞**𠄎**方不禹。”（《合补》1981/1）“贞勿登人五千。贞勿伐**𠄎**方。贞王伐**𠄎**方，受**土**又。”（《合集》6541/1）前者反映出**𠄎**方有内侵的可能，后者显示其征伐兵力达到五千人之多，这也表明**𠄎**方是一南方强国。雇伯、虎方、卢伯、暴侯等都是商王朝的属国

或封国，听命于商王朝，并参与征伐战争，卜辞和钟鼎铭文都有显示。譬如，虎方，卜辞有“乙亥卜，贞令虎追方”（《合集》20463反/2）等类似表述，1118年在今湖北安陆发现一套周代成王时期的“安州六器”，其中鼎铭有“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集成》2751）。考古也在江西樟树发现有商代吴城遗址，考古学家彭明瀚就认为，吴城应该是虎方的中心。^[45]吴城年代大致在商代中晚期，属于城郭聚落，总面积4平方千米，可分居住区、陶窑区、冶炼区和祭祀广场等，出土遗物数千件。

可考的北部方国，主要分布在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方国有土方、下危、竹侯、宋伯等。土方大概在今山西北部，是殷商王朝北部的主要敌对国，卜辞云“辛巳卜，争，贞今𣎵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受𣎵又。五月”（《合集》6412/1）。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商王朝著名的女军事家，曾参与征伐鬼方、羌方和土方等军事行动，包括此条所云“妇好伐土方”在内的众多卜辞和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兵器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土方可能是一个势力强劲的方国，人口众多，疆域较大，因为商王朝征伐土方兵力最多达到五千余人，并且是商王亲自参与，可见土方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卜辞云：“丁酉卜，𣎵，贞今𣎵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𣎵又。三月。”（《合集》6409/1）下危也是商王朝的敌对国，商朝对其有过长期的征伐，一次征伐的兵力曾达到三千人，“……三千……伐下危受[𣎵]又”（《合集》6523/1）。竹侯、宋伯属于商王朝的附属国，分别被封为侯爵和伯爵。关于前者，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一号窖藏曾出土有一件竹侯的青铜罍，其名曰“父丁冉𣎵亚”^[46]，反映出竹侯与商王朝关系的密切。

从上述商周时期的方国来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一是商周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后，特别是殷商时期，其核心疆域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一带，其核心区域及其周边范围以外的广袤地区，普遍存在属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方国。二是方国可能是史前社会聚落群聚化或地缘一体化的结果，因为卜辞显示各个方国不仅普遍分布于商周核心区域的四周，而且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或势力范围，如龙方大体位于商王朝西北，与羌方接近。三是方国可能仍为基于血缘的族群，由多个氏族或部落组成，属于部落联盟，譬如西周小孟鼎铭文所记周康王征伐鬼方，就俘获了“[执酋]三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酋”是首领，“[执酋]三人”便是三个首领。这段记述表明，鬼方可能至少是三个氏族或部落所组成的地域联盟，而且人口众多。四是商周方国之间的互为征伐，或是方国对商周王朝的依附，都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包括田地、人口和牲畜等，卜辞中诸如“侵田”“田猎”“俘人”等词汇则是较为充分的表述，可资为证。商周国家与周边部落或方国的攻伐战争或联盟，主要是生存驱动，其目的是守护或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因为史前农业兴起后，虽然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门类，但在广泛意义上仍属于掠夺性的粗犷式农业生产。特别是生产技术低下和土地资源贫瘠的商周王朝的周边方国，可能依旧是抛荒农业，所以当土地质量下降时，便只有另寻耕地，向外扩张，或是当食物不足，而生产又跟不上时，便只有抢夺。当然，也正是这一系列不断的攻伐和兼并，使早期中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现了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的频繁互动，从而出现了跨血缘、跨族群、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相互交织，进而逐步推动早期中国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直至正式形成“华夏民族”^[47]的概念。尽管这种文化上的交融在商周时期更体现为以商周王朝为核心的文化圈，以及商周王朝对周边方国的征伐，但并没有影响这种交融仍表现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并存和协调。考古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等地

的商周遗址、遗物，以及诸多研究成果都表明了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166页。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页。

[3]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第十三（十三之一）《谷风之什·北山》。

[4]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第十二《宣公十五年》。

[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第五上《滕文公章句上》。

[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一《地官·小司徒》。

[7] 凌鹏：《井田制研究与近代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义》，《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8] 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

[9] 江林昌：《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补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10] 陈力：《井田制与农村公社所有制辨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11] 参读金景芳：《井田制的发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

[1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地官·大司徒》。

[13]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地官·大司徒》。

[1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地官·大司徒》。

[15]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五《地官·遂人》。

[17] 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

- [18]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第138—156页。
- [19] 松本雅明认为，被称作“邑”的聚落，早在先秦就已经由十数户规模向数十户规模发展，并已经散村化。松本雅明：《诗经研究の方法》，《东洋文库年报》1960年度。转引自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 [20] 池田雄一指出，在三国时期的“村”出现之前，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后来被称为“落”的新兴聚落。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0页。
- [21]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46页。
- [2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地官·大司徒》。
- [23]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5页。
- [2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五《地官·遂人》。
- [25] 王进锋：《西周时期里的管理形态——兼论里与邑的关系》，《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26]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1—100页。
- [27] 参见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古》2015年第4期；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朝云：《商代聚落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2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 [29] 戴望：《管子校正》，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406页。
- [30]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十六《宣公十年至十八年》。
- [31]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三（十三之二）《谷风之什·信南山》。
- [32]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33]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商代地图及势力范围，另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34] 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9页。周代中心区域及势力范围，另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页。

[35]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446页。

[36]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4页。

[37]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7页。

[38] 可见于《合集》6091、6354、6087、6096、6347、6117、6371、6073、6095和39854等。

[3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1页。

[40]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7页。

[41] 岛邦男著，温天河、李寿林译：《殷墟卜辞研究》，鼎文书局1975年版，第400页。

[42]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43]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5页。

[44] 见《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

[45]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彭明瀚：《盘龙城与吴城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

[46]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

[47] 王震中：《民族、部族的概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Nation, Buz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xia Nation），《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4年第4期。



第三章

国家一统下的 村落管控与治理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列国林立、战乱纷争的战国时期，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然而，由于嬴秦暴政引发秦末农民起义，秦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历两代，国祚仅14年。秦亡以后，早期中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汉成为继秦之后的又一大统一王朝。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王朝经历了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至8年王莽篡政自立新朝止，史称西汉；25年，汉朝宗室刘秀平定新莽末年以来的纷争战乱，再次建立一统王朝，国号“汉”，终于220年，史称东汉。

自秦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周代推行的分封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和郡县制，这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秦又通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文化风俗一统政策，最大限度地消弭了文化与风俗上的差异，加强了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有力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秦王朝开创的这一模式，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国家体制的基本模式，故有“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说法。汉承秦制，其官僚制度、律法制度、赋税制度等基本沿袭秦代。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上而下的文化统一政策，使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圈逐步形成。正是大一统国家形成以后的一系列变化，使国家与村落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有益的互动促进了村落的发展，而村落的发展也稳定和巩固了大一统国家的统治。

第一节

秦汉统治制度下的村落

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维系国家的稳定，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符合自身利益的统治政策成了国家治理的必需。这些统治政策的主要内容，大多关系到人口、土地、赋税和文化等问题。而村落作为承载这些内容的主要载体，便因此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甚至改变发展的进程轨迹。大致来看，先秦国家体制下，百姓大都集中居住于封闭的城郭或里邑之中，到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特别是郡县制的推行导致社会相对宽松，先秦以来国家体制之外原有的零星的、少量的散居现象渐趋增多。文献和考古显示，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散布着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乡野聚落的情况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城居与散居并存的格局，城邑与乡村的分野越来越明显。这些变化固然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里逻辑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政策推行的结果。

一、乡里制度与村落

所谓乡里制度，是指古代中国县级以下的各级基层行政区划的制度，是古代中国管控与治理乡村社会的关键制度。历史上，乡里制度虽因朝代不同而各有兴废，但作为一项成功的治理制度，仍以不同名称或不同形式被以后历朝历代沿袭，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乡里制度到底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确切定论，但从文献记载来看，乡里制度的萌生比较早。《文献通考》有详细之载述：“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庙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按这一说法，乡里之制在黄帝时期便已产生，然而由于《文献通考》一书是宋人所著，所以其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不高。一般认为，乡里制度在商周时期便广泛出现，传世文献和金文中常见有“乡”“里”等字眼。

《逸周书·商誓》载：“王若曰：告尔伊旧何父……及百官里居献民……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子。”^[1]《尚书·酒诰》载：“越在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2]这两条文献所载“里居”即是居住单元，而非表示距离和长度。《周礼》中亦记载有“乡遂之制”，还有乡老、乡师、乡大夫和乡士等职官。“乡遂”一词中：“乡”，是国人居住之地，即指城郭及周边的近郊范围；“遂”，则为野人居住之地，指边远农村地区。在“国”设六乡，“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3]在“野”设“六遂”，“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4]

《周礼》所述虽为后人的追述，更体现为一种理想，可能与实情并不完全相符，但对照金文中有关“乡”“里”的表述，可以肯定的是，“乡”和“里”作为一种地域组织形态或居民居住空间，在西周时期是客观存在的。西周中期的九年卫鼎铭记：“唯九年正

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各庙，眉敖者肤卓事见于王，王大蒞，……廼舍裘卫林^簋里。……矩廼众濂彝令寿商众意，曰：‘鬲，履付裘卫林^簋里，则乃成封四封，颜小子俱惟封，寿商’。……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集成》2831）铭文的大致意思是“林^簋里”作为贵族“矩”的一块领地，其间有树林，后来出售给了裘卫，四面以土垄封以为界。这应该就属于乡村地域的“里”。与此不同，西周中期的鬲簋铭文载：“王曰：‘鬲，命汝鬲成周里人，众诸侯、大亚，讯讼罚。……’鬲拜稽首，对扬王休命……”（《集成》4215）此处所言“成周”是西周的都城洛邑，“里人”则是里的管理者，这里的“里”，显然是城区范围内的居住空间或组织。可见，里也并非仅限于“野”，在“国”亦有。被公认为西周时期文献的《逸周书·作雒解》亦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5]此处的“九里”应不是指地名，而是表明有许多个基层居民组织的“里”。[6]《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是指召公于乡邑中处理政务。上述文献表明，“乡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西周时期国家管控下的乡村地缘形态与基层组织机构。

作为一种制度，乡里之制的定型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春秋战国于形式上而言仍属于东周，所以各诸侯国的诸多制度仍然都沿袭了西周以来的内容，特别是国野之制。[7]其中齐国的国鄙之制最为典型。《管子·小匡》云：“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桓

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8]《管子》所载固然不能被完全视为春秋时期诸国的历史事实，但至少是齐国当时的状况。国鄙之制从内容来看，“国”与“鄙”分别设置，与《周礼》所记“国”“野”分治在形式上类似，在内容上却不同，当是对周代国野之制的改进。《管子·立政》云：“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9]这条文献说明春秋时期的齐国，不仅在西周乡遂之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乡里制度，而且确立并普及了乡里什伍制度。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还是进一步管控人口，巩固国家统治，使得国家统治管控更加严密，实现“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10]，“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11]的治理模式。正是这种做法，使春秋时期的齐国呈现“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的社会面貌，也促使个人、家庭与乡里组织甚至国家的关系愈加密切，有效解决了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解体后基层社会结构涣散的问题。

《左传》中的有关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类制度在春秋时期推行后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如《左传·庄公十年》云：“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12]“乡人”泛指同乡之人，“乡”则具有地域的概念。又《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杜注：“言必为盗所害。”[13]此处的“乡”明显是一个地域概念。《战国策·秦策一》云：“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大致是说乡里的舆论评价对妇女的嫁娶有很大的

影响。诸如此类，都表明伴随乡里之制的广泛推行，地方社会逐步形成了“乡里”“乡土”的观念，这是自觉的地域认同。但也正因制度上力图实现“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的局面，所以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的自由发展，有可能在当时反而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制约。

秦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必须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原属于统一之前诸侯国家的广大地域。基于这一逻辑出发点，秦朝吸取了西周的教训，废除了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文献记载显示，秦朝不仅于郡下设县，而且对县以下的乡里制度进行了调整。《汉书》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14]按这一表述，秦代的乡里制度是乡、亭、里三级制，汉承秦制，无出其右，相比《管子》中“轨、伍、里、连、乡”的多级制简化了很多，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正是由于秦代国家着力健全和统一地方基层政权，地方才普遍建立起了郡县乡里体制，于制度层面较好地消弭了地方分裂势力。但是，与“乡、亭、里”这一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对《汉书》中的表述提出了质疑，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甚至认为“十里之亭”的“里”也不是表示“乡里”组织的“里”，而是表距离。^[15]后来高敏^[16]、朱绍侯^[17]等学者还结合竹简等材料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论证和解读。目前，关于亭的性质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亭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是乡里组织之外的治安机构，乡里才是基层行政单位。^[18]

从文献记载来看，乡里制度的确立和普遍设置，其目的还是实现对全国范围内基层百姓的管控和治理，《汉书》云“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即表露无遗。同书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19]又《续汉书·郡国五》：“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道、邑、侯国千一百八十。”注引《东观书》曰：“（桓帝）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20]据《续汉书·百官五》注引《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21]根据上述文献表述，黄今言先生以“十里一乡”为标准，进行了测算，认为西汉如果有6 622个乡，便有66 220个里；东汉如果有3 682个乡，则有36 820个里。^[22]按《尹湾汉墓简牍》所记东海郡“县百七十口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若按此测算，平均一里大概105户。这一户数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上所注龙里户数相当。龙里是《驻军图》中户数最多的里，有108户，次者垣里81户、智里68户，较少者如波里17户、资里12户，其他多在40户左右。《驻军图》中可考共41里，每里平均户数在40~50户。^[23]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所载，郑里廩簿共登记25户，即向官府贷粮的户数。^[24]如若加上没有贷粮的民户，其户数也未必会多出很多。由此看来，大致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是秦汉时期的乡是里的上级机构，乡统属里；二是里作为户口统计的单位，也是居住空间组织；三是里有大有小，户口数量参差不齐。文献和相关简牍材料所显示的这三个表征，意味着“里”不只是户口统计单位，还体现为一种自然形成的聚落。正因如此，黄今言先生便认为汉代的乡村社会是“一村一聚，往往就是一个‘里’，大‘聚’有时与里重合”。^[25]马新、齐涛等学者更是认为汉代乡村社会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26]但以侯旭东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汉代

的“里”大部分应是行政编制，不是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合一。^[27]上述这三种观点，无论哪一种，事实上反映了存在的三种情况在汉代社会应该兼而有之。这种社会表象更是充分表明了先秦以来集中城居的理想与现实基本上已全面瓦解。

二、重农抑商政策与村落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开始进入农业生产阶段。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更是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撑，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农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农业不仅是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在巩固国家政权、维系国家稳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夏、商、西周时期，井田的出现及井田制度的形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献显示，周族就是以农业发达著称的，其始祖弃“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28]。进入春秋时期，重农成为各诸侯国统治的主要治国思想，如齐国在管仲的建议下，推行了“相地而衰征”^[29]的政策，即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赋税，以期调动国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达到“则民不移”的效果。孔子曾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0]“使民以时”即指国家的统治者要敦促国民按照时令来耕种农作物。春秋晚期“不违农时”甚至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大事。孟子曾在游说梁惠王时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31]春秋以来，井田制逐渐被瓦解，最后被废除，而授田制在此时开始推行。“重

农”与“抑商”开始作为国家政策被正式提了出来。其中秦国商鞅变法于此不但翔实，而且最为典型，其变法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2]大意是努力从事农业耕种、纺织工作，并且取得好收成的人，国家要提高其身份，反之，如果从事商业并且懒惰的人，要收为奴隶。《韩非子》中就曾指出，商鞅变法是“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33]。正因为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取得了显著效果，秦国逐步实现了国富民强，进而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朝建立后，启用了商鞅的政策，并把韩非子的部分思想引入国家治理，进一步将“重农禁末”发展为“上农除末”的国家政策。秦始皇曾在巡行琅琊时，刻石纪功云：“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34]为此，秦始皇颁布有七科谪戍条例，即“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客观上严厉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汉代基本承袭了秦代的政策，继续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农业。汉初政论家贾谊曾在劝说汉文帝时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35]汉景帝于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春正月曾下诏云：“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36]正是由于汉初一系列重农措施的实行，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经济和国力达到了鼎盛。《汉书》

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37]汉武帝时，国家还通过实施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进一步抑制商业的发展，防范商人资本为牟取暴利而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兼并加剧、农业人口流失等问题。汉武帝之后，西汉历代均不同程度地延续和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昭帝、宣帝时还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东汉以后，国家虽然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力度明显减轻。东汉思想家王符的思想具有代表性。他在《潜夫论·务本》中云：“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陋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38]相比西汉，这一表述中的“本末”已然发生了变化，“本”不仅仅指农业，还包括行业本应遵循的“本”，如百工的“致用”，商贾的“通货”；“末”也未必指“商业”，而是凡违背行业之“本”的都为“末”。当然，王符的表述既非“重商”也不是全面“抑商”，而是主张在“以农为本”的前提下限制生产和经营奢侈品的工商业。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和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在东汉的发展，而且滋养了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成长。

“重农抑商”“上农除末”政策的提倡和实施，在时间上发生于战国，发展于秦皇时期，完全形成在西汉。作为秦汉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重农抑商”推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是秦汉国家乃至后世王朝的决定性产业，它的生产状况好坏，是否兴旺发达，直接关系到社会的

繁荣稳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历朝历代都把“重农”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大事来抓。商鞅就曾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39]国家正因高度认识到农业产业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也正因出台了一系列督促、鼓励和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既确保了财政收入，也将农民紧紧地固定在土地上而不能离开，从而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也正因如此，不仅村落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有了制度保证，而且村落与农耕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农”政策有效防止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特别是减少了农村人口向工商领域的转移，从而为农业生产确保了农民人力资源这一长期稳定的第一生产力要素；二是正因为农民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壮大，作为群体性生产生活空间和社会单元的村落，不仅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有了生长的必然性；三是围绕农业生产开始形成具有强烈农耕文化特征的风俗习惯，这从汉代画像石上所刻画的各种关于农业题材内容的图像中可以窥见一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传统的村落，不论是形态还是文化内涵，它的形成都与古代中国国家重视农业生产、推行“重农”政策制度密不可分。

三、文化一统政策与村落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是凝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力量的关键内核要素之一。文化政策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政治表现形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利益与文化意志的集中反映和表达。因此，中国古代国家的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消弭战国以来诸侯纷争所导致的文化分裂，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巩固国家政权的统治，面对统一之后存在的“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40]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政策。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立初期，都会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政权建设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文化措施。秦朝作为以法家思想来治国理政的朝代，加之统一之后所面对的文化分裂的严峻局面，其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都体现出较为强烈的法家特点。

所以，秦朝建立之后，推行了整齐划一的政治与文化政策，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据史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对文字进行了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六国的文字，发明了小篆，并刻写范本，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说文解字·叙》中云：“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41]史载，秦代著名书法家程邈还根据民间流行的更为简化的字体创造了隶书。《说文解字·叙》亦云：“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秦始皇使下邳人程邈所作也。”^[42]同时，秦朝大力推行法家的治国思想，禁绝《诗》《书》，以吏为师。秦孝公就曾根据商鞅的建议，“燔《诗》《书》而明法令”；后来韩非子更被认为是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的学士，他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认为“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43]李斯更是斥责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

首”[44]，并建议始皇焚书，从而导致了“焚书坑儒”这一文化浩劫的出现。

正是这一系列高压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秦代在政治统一的同时初步实现了文化上的一统，不仅有效促进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互通，而且有利于端正风俗。就此而言，其意义也是有积极的一面的。秦始皇刻石便有整饬稽淫之风的表述，其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45]然而，秦代文化政策的极端，特别是焚书坑儒等反文化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激起了民怒，甚至导致了文化传承的断裂和文化多元的消亡。

西汉在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吸取了秦代的教训，也避免了秦代的极端。西汉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46]，所以推行黄老思想，以文法导民，重农桑，与民休息。汉初“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47]。秦法严苛，较为忽视人伦，汉初咎其弊端，重视纲常伦理的建设。汉高祖颁布有尊父的诏令，诏云：“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48]

汉初虽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思想，但重视恢复儒学，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搜集和整理儒家典籍，《汉书·儒林传》云：“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二是重用儒生，设立官学和博士制度。《汉书·儒林传》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三是统治政策部分采纳和吸收儒

家思想。汉文帝时，以贾谊、叔孙通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受到了重用。《资治通鉴》载：“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儒家致力于推行礼制思想，提倡“君尊臣卑”，在强化皇权、维系国家稳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云：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今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49]后来汉武帝又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他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0]汉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重视儒家思想，表彰六经，设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鼓励私学发展，试图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思想来统驭万民。事实上，汉武帝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未出现禁绝百家、学术停顿的局面，而是在“悉延百端之学”的前提下推崇儒学。《史记》中载：“至今上（即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51]汉武帝之后，西汉历朝皆尊儒学，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治国思想。

东汉在文化政策上延用西汉大一统的风格，推崇儒家思想，基本沿用汉武帝以来的方针与政策。东汉历朝皇帝大多重视儒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官僚阶层的儒学化，而且逐步使儒学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民间传播。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二年（59年）诏令云：“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牲以犬。”^[52]这一做法首创了中央和地方官学祭孔子之制，此后，历朝历代直至清代皆祀圣师孔子，祭孔成了一项全国性的重要活动。正是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使东汉社会形成了尊师重道和崇儒好学的社会风气。儒学作为东汉治国的统一思想，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逐渐全面侵染整个民间社会，在社会教化和移风易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通过设立官学，鼓励私学，儒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儒学的价值观念发展为普遍社会价值观的地位。

从秦到汉，文化政策发生了从“崇法”到“崇儒”的改变，其间还经历了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过渡，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不同阶段的文化政策，对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全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汉代统治者改“黄老”为“崇儒”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政策，不仅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逐渐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而且实现了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建构。可以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于西汉以后便开始在全社会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基本传统。由此观之，如果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文化大一统治理的形而上的形态，那么，很显然，村落及村落社会就是形而下的忠实的践行者。进一步来看，中华民族“忠孝为本，耕读传家”的文化内核，至迟在汉代以后的村落社会中便生根发芽。正是儒家思想在汉代完成了由上而下的传播，奠定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基调，影响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的定型，有力促进了社会和民族的深度融合。

[1] 皇甫谧撰，刘晓东校点：《逸周书》卷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

35页。

[2]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第十三《酒诰第十二》。

[3]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卷第十《大司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十六《遂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页。

[5] 黄怀信、张懋镠、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0页。

[6]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7]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第八《小匡第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9]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第一《立政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10]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第十七《禁藏第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页。

[11]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第一《小匡第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12] 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庄公十年》。

[13] 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二《襄公十五年》。

[14]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5] 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16] 高敏：《秦汉“都亭”考略》，《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

[17] 朱绍侯：《汉代乡、亭制度浅论》，《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8] 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

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9]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20]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五》。

[21] 司马彪：《续汉书·百官五》。

[22] 黄今言：《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以乡市、里市研究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3] 根据整理简报统计。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

[24]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25] 黄今言：《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以乡市、里市研究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6] 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7]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28页。

[28] 《史记》卷四《周本纪》。

[29] 《国语》卷六《齐语》。

[30]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卷一《学而第一》。

[31]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第一上《梁惠王章句上》。

[32]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3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四《奸劫弑臣第十四》。

[3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5]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36] 《汉书》卷五《景帝纪》。

[37]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38] 王符撰，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注》卷一《务本第二》。

- [39] 《商君书》卷一《农战》。
- [4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叙》。
- [4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叙》。
- [42]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叙》。
- [4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九《显学第五》。
- [4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 [4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 [46]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 [47] 《汉书》卷一《高帝纪》。
- [48] 《汉书》卷一《高帝纪》。
- [49] 《汉书》卷六《武帝记》。
- [50]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 [51]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
- [52] 《后汉书》卷九十四《礼仪上》。

第二节

国家管控下的乡野聚落

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既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也使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从汉代开始，由于牛耕和铁器的普遍推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业的兴盛，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山林耕地，在国家授田制之下，被民间占有的量与国家的顷田份地相比已严重不足^[1]，不仅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使国家经济收入严重不足。因此，汉代推行限田令，并于汉文帝时废除了授田制，国家积极调控土地私有化。也因这一社会背景，民间百姓采伐树林、开辟耕地就有了正当合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特别是由于耕地私有权扩大、土地兼并、人口流动和豪族势力膨胀等原因，先秦以来形成的乡里制和集中城居的制度，已不能包容和掌握新的乡村内容，脱离国家体制之外的散居现象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凸显，并且在城郭以外的广袤地域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乡野聚落。新型聚落的不断出现，不仅影响国家的徭役赋税，而且明显呈现出人口管控的失控趋势，并将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所以，在散居趋势不可改变和乡野聚落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境下，国家对乡野聚落的管控就变得势在必行。

一、乡野聚落的类型

考诸文献，发现先秦两汉时期的散居形式名称各异，并且在形成的原因和聚落的性质、形态等方面，皆有一定差异。聚、落、庐、丘等作为村落的早期形态[2]，为我们了解秦汉村落的内容、性质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

（一）聚

“聚”是乡野聚落的早期形态之一。聚之本意为聚拢、聚集，但在中国历史早期，更多的时候可能用于表示聚落。《说文解字》云：“聚，会也。从禾，取声。邑落云聚。”清代段玉裁注曰：“按邑落，谓邑中村落。”在这里，“聚”即村落。“村落”一词虽是明清时代乡野聚落的泛指词汇，但文献最早可见于《三国志·郑浑传》，其云：“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三国魏晋时期的“村落”表述，已开始用于指代乡野聚落。

《颜氏家训·勉学》记载的一件逸事，可以说明聚与村或是聚与村落之间的渊源关系。其云：“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陘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间村。……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间是旧□馀聚。”可见，“聚”这一聚落的称谓，可能在魏晋或更早的时期，便开始出现被“村”取代的趋势。到唐代，“聚”也被理解为村落。《史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唐代张守节正义云：“聚，在喻反，谓村落也。”[3]

“聚”作为乡野聚落的一种指称，在先秦便出现。《管子·乘马》中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这里的“聚”似乎不仅是有“五部”规模的“村”，而且是有“市”之“村”。结合南朝佛经《善见律》中“聚落界者，有市，故名聚落界；村界者，无市，名为村”[4]的表述，也大致可以认为《管子》中所云的“聚”指代规模较大的聚落。《管子·侈靡》中也见有“千聚”一词，其载：“百盖无筑，千

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事之时也。”“百盖”“千聚”，都意指当时聚落的户数和规模，即户口超百户或千户的聚落。如果缺乏土墙或围墙，又或没有“社”，那么这种聚落是十分简陋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百人之聚”的说法，即聚为百人之多，其云：“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可见，“聚”在先秦常被用来意指聚落及其规模和性质。

相比先秦，秦汉时期“聚”的内涵似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多用来专称乡野聚落，而非聚落的性质和内容，常见句式为“××聚”。譬如，河南郡的“缙氏刘聚，周大夫刘子邑”[5]，“雒阳有上程聚”[6]，钜鹿郡下曲阳的“鼓聚”[7]，等等，比比皆是。日本学者曾对《汉书》《后汉书》中有关“聚”字的地名进行统计，发现《汉书·地理志》中有“聚”7处，《后汉书·郡国志》中则有55处，同名沿袭者仅3处，相比之下，后者达前者8倍之多。[8]事实上，在两汉以“聚”名之的聚落，除《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的记载以外，在《史记》《水经注》等史籍，以及《汉书》《后汉书》的其他部分之中亦不乏记载，除去重复，专称的聚名有近百处之多。[9]《论衡·书虚》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从上述文献中所见的聚名来看，其大概有几种情况：一是以姓来命名，如刘聚、唐聚、褚氏聚、杨氏聚等。从以姓为“聚”名的情况来看，“聚”带有明显的族群的血缘性质；二是以江湖山水来命名，如圣聚、霍阳聚、彭泽聚等；三是以特色物产来命名，如桃丘聚、桃聚、杏聚等；四是以故邑、故国来命名，如上程聚、鼓聚、阳人聚、惮狐聚、鄆聚等；五是以历史人物及重大事件来命名，如秦聚、垓下聚、细柳聚、小修武聚、澶渊聚、黄淳聚、射犬聚、菟裘聚、夕阳聚、彭亡聚等。[10]其中，有些“聚”的规模比较大，《汉书·史丹传》载，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诏令云：“夫褒有德，赏

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一，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显然是一个超大型的聚。《汉书·王莽传》中载：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太皇太后诏莽就第，朕甚闵焉。其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再结合《史记》中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表述，似乎可以认为“聚”属于形成较早、规模较大一类的自然聚落，并可以得知，邑和都是以聚为基础建设而成的。

考诸文献，还发现先秦两汉的文献往往将聚与邑连用。“邑”的本义是“国”，《说文解字》曰：“邑，国也。”^[11]邑也指城郭或国都。《尔雅》曰：“邑外谓之郊。”郭璞注云：“邑，国都也。”^[12]先秦文献中亦有“十室之邑”^[13]“百室之邑”^[14]的说法，这里的“邑”即为普通一类的聚落。聚与邑连用的表述，如《史记·商君传》云：“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从这里可看出，“邑聚”即为县以下的聚落形态。《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王丹列传》曰：“邑聚相率，以致殷富。”这几条史料表明，虽然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在行政区划上把邑聚一类的普通聚落并入了县，但作为聚落的一种称谓，邑聚在汉代一些边远郡县仍有保留。

（二）落

与“聚”一样，“落”也是乡野聚落的早期形态之一。《管子·轻重》记载了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

卤、斥泽、山间□埵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大致意思是，齐国境内的崇、蒋、丁、惠等诸侯领地以及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埵等偏僻之地，还包括那些“强耕而自以为落”的地方，不仅没有成为齐国的征税对象，反而占据了齐国五分之二国土。可见，这里的“落”指的是国家征税对象之外的乡野聚落。这类居民一部分属于诸侯领地的居民，前引“崇弟、蒋弟，丁、惠”即是；另一部分是那些户口逃逸之民，这部分人口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云梦秦简《魏户律》记战国晚期魏国的律令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塿（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这段话中的“民或弃邑居塿（野）”似乎说明了户口逃逸的事实。人口不断逃离并开辟新的耕地，既冲击了关系国家赋税的井田制，又影响了国家经济收入与政权的稳定，所以被认为是“非邦之故”。

秦汉文献中也常见以“落”来表示乡野聚落。汉代刘向《列女传》亦云：“一年成落，三年成聚。”^[15]《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汉书·赵充国传》中见有“聚落”一词，云：“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这里的“聚落”指的就是罕羌的聚居之地。《汉书·沟洫志》中所载“聚落”，也是指聚居空间，其云：“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所谓“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结合前引《管子》中的“强耕自以为落”的表述，可以认为，这里的“聚落”应该是为便于农耕生产而生成起来的。不仅如此，此条文献史料还隐约表达

出一条信息，即这类“聚落”发展的另一结果便是城郭，理由是“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对于“落”这类乡野聚落，国家当然要进行管控。《史记》云：“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鉅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驷集解引徐广曰：“‘格’，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16]《汉书·酷吏传·王温舒》作“伯落长”。

除了“聚落”的表述外，还有“部落”“庐落”“里落”等，它们大多包含聚落的意义，体现出一定的群居性特征。如《后汉书·南蛮传》云：“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此处的“部落”应指少数民族的聚落。“庐落”可能是那些散居性比较强的乡野聚落的别称，并且有聚落中具体的构筑空间。因为“庐”一般被认为是为便于农事而建造起来的居住空间。《后汉书·应劭传》云：“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同书《仇览传》亦云：“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唐代李贤注曰：“《广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谓院为落也。”“里落”则可能指属于偏远乡村的聚落空间，如《后汉书·孙期传》中云：“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事实上，“里落”是秦汉基层社会中的基本形态，又称“里聚”。《史记·吴太伯世家》注引《皇览》曰：“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汉书·武五子传》曰：宣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以湖阆乡邪里聚为戾园。”此处的“里”可能与行政编制单元的“里”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指城郭的里，而是乡村地域的居住空间。《说文解字》中释“里”云：“从田从土。”段玉裁注：“有田有土而可居矣。”

（三）庐

“庐”作为城外聚落，其原义是指农民为了便于农事而在田野之中临时建造的居所。其概念大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东汉郑玄笺：“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唐孔颖达疏：“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故言中田，谓农入于田中作庐以便其田事。”“庐”出现的原因可能与便于农事密切相关。因为先秦时期的农民大多集中城居，耕种则在城郭附近。然而，由于先秦农业的耕种技术尚不发达，加之耕种需要长期照看，所以，当农田的位置超过了城居的耕作半径时，为了便于农事，便派生出了这类临时性住所——庐。《汉书·食货志》云：“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由此可见，当时的老百姓有两个居处：一个是用于长期生活的空间，位于城郭；另一个是临时性的空间，在农田附近，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汉书·食货志》云：“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唐代颜师古注：“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东汉何休亦有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对此，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发现的代头村，就是最好的活证。其聚居空间一般由2~3栋单体式建筑组合而成，左右连栋，前后连衢（道），排列整齐有序，秩序井然。在联排民居中，东西向宽，可供车行；南北向窄，可供人行；中间或两侧设排水沟。居住区外围两侧靠近良田处，建有专门的家禽猪牛马用厩舍，十分便于耕种。代头村这一例证，十分鲜活地说明了因“庐”成“聚”成“衢”的村落生长现象。

正因为庐的出现是为了便于农事，所以农闲时节庐一般是闲置的。《说文解字》释“庐”云：“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17]在田野考察中，我们在湖南湘中双峰县青树坪镇，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通道、靖州，湘南永州勾蓝瑶寨，以及贵州黔

东南地区的西江、榕江等地区，曾发现过这类既具有“庐”之古名称，又具有古代“庐”的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它们的名字就叫“田庐”，或“庐屋”“牛庄屋”，修建于田垄之中，春夏人与牛临时寄住其间，秋冬则仅贮藏来年春耕的一些生产工具，并无人居住其间。它们是与村落建筑完全不同类型的建筑，在使用功能上与上古“庐”的功能作用完全一致。

后来伴随着井田制的废除，及至授田制等相对宽松政策的推行，集中城居的形式逐渐瓦解，“庐”便有了进一步生长为长期性生活空间的可能。由庐发展为村落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方面是物质性实体空间必须有明显的聚合性特征，包括空间构成的房屋、土地和景观等；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性社会空间的形成，体现为明显的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有关于此，考诸文献，发现先秦时期的庐不仅分布在距城郭不远的周边范围，而且密集布置，聚合性特征明显。《战国策·魏策》云“地名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18]便可说明。《左传·襄公三十年》云：“田有封洫，庐井有伍。”^[19]《汉书·食货志》云：“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汉书·王莽传中》亦云：“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按八家庐舍二十亩地，平均每家二亩半。尽管这种划分与井田制有关，仍不免过于理想，却说明庐舍有一定的聚合性。除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外，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湖南江永勾蓝瑶寨考察时发现的牛庄屋这一活证可为旁证（见插图6）。牛庄屋的形式、功能类似“庐”，它是旧时居于深山的瑶民为便于农业生产而于平地近田处建起的临时住所。一到开春，为了打理农田、种植庄稼，瑶民便长住其中，春耕之后才

回山寨。后来随着瑶汉关系的缓和，部分瑶民便开始居于牛庄屋，久而久之，就干脆移居平地，形成了瑶民聚居的村落。牛庄屋的布局，有成排“一”字形的，也有“回”字形的四合院，两层结构，八面倒水，一个大门。每座庄屋被分成三十格，每格一户人居住，上面住人，隔层下面则圈养牛和放置农具。牛庄屋这一活证，结合上述文献以及《史记》中“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证明在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井田制废除之后，“庐”发展为村落是可靠、可信的史实。

（四）丘

除上述外，还有“丘”一类的乡野聚落，它不同于临时性居所的庐，而属于长期性居住空间，即所谓“野人”的聚落。丘的甲骨文字形为，像地面上左右并立的两座小山峰，其本义为自然形成的小土山。《说文解字》解释“丘”云：“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20]《玉篇·北部》则云：“北，虚也，聚也，冢也。……丘，并同北。”由此来看，丘作为“聚”应该属于山间谷底一类的自然聚落，在今湖南南部的江华、江永，广西的桂林、百色、凭祥等地，依然可以见到这类自然村落，也由此知这类村落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

《尚书·禹贡》谓“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21]。据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早期中国的聚落遗址多与丘有关，其云：“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如果远远望见高于平地的漫坡或阜丘，十之八九为遗址，又以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为多，且这种‘垆堆’的遗址又往往呈带状分布。”^[22]丘作为乡野聚落或地方组织的指称，可能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甲骨文中“丘”字出现频率较高，如《合集》8381—8390条中“丘”就出现了10次，有“傅丘”“衣丘”等。《史记》中还有所谓的“犬丘”，《史记》云：“文王在丰，武王

在镐。”周懿王时，始自镐，迁居于此。“《世本》：‘懿王徙于犬丘。’”宋衷注云：“（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23]从这里来看，丘又体现为地域组织，具有一定的行政编制意义。

《庄子·杂篇》：“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24]由此来看，丘里应该是由数个不同族姓的居民聚居而形成的居民点，可合可散，是基于地缘关系的聚合群体。

《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5]

“丘里”“丘民”似乎都表明“丘”虽是乡野聚落，但仍受到国家的管控。先秦文献中还有如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的规定，可能是以丘作为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春秋左传》云：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26]长沙三国吴简中亦发现有“丘”的名称，说明“丘”一类的指称一直延续到了两汉时期，且可能依然指代野外的自然聚落，只是这类“丘”已被纳入了国家征管的范围而已。从相关表述来看，此类“丘”仍不属于行政编制的单位。^[27]尽管从古代文献里没有直接找到“丘”发展成村落的载述，但从发生学的概念来理解，作为乡野聚落或地缘性组织的“丘”演变为村落是可靠的，毕竟“丘”的群居性特征较为明显，而且我们在现在丘陵山谷盆地中仍然可以见到这类村落。

以上对秦汉时期几种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乡野聚落形态进行了简要梳理和阐释，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聚、落，还是庐、丘等形态，都发生于先秦时期，有些甚至在商代便已出现。当

然，作为聚落空间的某一指代，这些名词和概念只是人为的主观界定，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可能是主观的、动态的，但作为物质实体空间与社会活动单元高度重叠的客观对象，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各类聚落名词的指代，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村落起源的各类可能情况或村落的早期形态，然而切不可认为指代不同，其内涵便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毕竟村落是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除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不可抗力以外，它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一理解，有关村落的称谓和指代，包括后来出现的“庄”“屯”“川”“寨”“店”“堡”“铺”等，它们在形态和性质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内涵上是大致无异和无疑的。

二、国家对乡野聚落的管控

就村落存在的形态而言，秦汉社会的现实是先秦以来国家体制之外零星或少量的散居现象渐趋增多，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散布着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乡野聚落，初步形成了城居与散居并存的局面，城邑与乡村的分野也随之日趋明显。考古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具有村落性质的遗址，便足可为证。如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河南遂平小寨汉代遗址、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安徽泗县刘圩遗址等，以及重庆、四川等地区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28]上述这些遗址一般位于地理条件优越的平原、低丘之处，近水源，由房屋、水井、厕所、畜栏、土窖等组成，遗址中农业遗存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具以外，还有铁犁、铁铲、铁铧、铁凿、铁刀、铁匕、铁锥等农业生产工具，应该属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并成熟的农村村落。

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秦汉时期的村落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城郭之中派生出来的、先秦便已存在的“庐”“丘”“聚”“落”等。这类大多是散居形态，体现出一定的“聚居”村落要素，应该是村落形成来源的一种重要形态。也可能正是散居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便成了带有村居一类的“聚落”。正如《汉书》所言，“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29]。《史记》中也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虽未言之凿凿，但已经足以说明“久居成聚”的可能。“聚”在这里是“村落”的意思。第二种是与城郭平行发展的一种普通聚落。除了先秦以来便出现的自然聚落，还存在流邑之民避居后所生成的自然聚落，故其在行政上受到国家的干涉或影响相对较少。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的部分农耕聚落就始于先秦时期，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而且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有相对稳定的延续。譬如，山东章丘宁家埠聚落遗址，不仅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至唐宋时期[30]；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从战国晚期一直使用到东汉时期[31]。上述两种聚落在当时的平面规模上都不大，居民住户仅有数户，这可能与秦汉国家对散居的严格管控有一定关系。秦自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令民为什伍”[32]，即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联相保。汉承秦制，实行乡亭里制，注重什伍编排，推行“编户齐民”，力图恢复和延伸集中城居的理想。《汉书·食货志》：“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法律答问》载：“旆火延燔里门，当赀一盾；其邑邦门，赀一甲。”“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院）’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33]“垣”即墙垣，即里与里之间有墙垣相隔；“院”便是家与家之间的隔墙。里有“里门”，里与里、户与户之间设有墙垣，百姓的生活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间范围。汉初《二年律令》的规定更为详细，其云：百姓的“欲益买宅，不比

其宅者，勿许”。《杂律》云：“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户律》还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34]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汉代对民及民居的严格控制。至隋唐“令人悉城居”的政令，严格程度更甚。《隋书》记大业十一年（615年）诏令云：“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35]《资治通鉴》也载：“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36]律令的一再强调，体现了国家对土地和户口的重视，然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城居”现象的日益频繁。

不难发现，从汉代开始，由于牛耕和铁器的普遍推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散居村落的现象呈蔓延之势。事实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散居村落已然成为官方不得不默许的一种实际存在。因为进入汉代以后，尤其是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人口流动的现象突出，加之豪族势力的膨胀，先秦以来形成的“里”制和集中城居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物质生产需求，更不能包容新的乡村内容。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单纯作为自然聚落的“聚”的不断涌现。在秦汉乡亭里制之下，这种乡野聚落出现的直接后果，自然是聚落逐渐从国家行政单位脱离，[37]统治者对其的控制，或许只是名存实亡。因为“聚”一旦脱离国家的行政视野，就意味着成了国家征税对象之外的群体空间。[38]从国家层面而论，汉代统治者的理想是将作为自然聚落的“聚”与行政单元“里”结合起来，实现“里聚合一”，然而先秦以来便出现的突破国家行政编制而向郭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因这一设想而在事实上停滞。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驻军图》中所标记的里，一部分旁注“不反（返）”和“今毋（无）人”的情况，似乎反映了“户口逃亡”的问题。[39]里聚分离是事实，但这种分离是艰难的，受

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等各方面的严重制约。一方面，为了加强控制，统治者加强监管，尽可能限制百姓于郭外聚居；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乡野聚落这种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单位，并试图将其纳入国家管理范畴。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见插图7）^[40]、《驻军图》（见插图8）分别有名里43处和41处的事实可兹说明。因为地图中所标记的里，都分散在地形复杂的山川地区，应属乡野聚落的范畴，然而又有国家赋予的“××里”的名称，这显示出这些聚落明显受制于国家的行政管辖。

汉代国家与村落互动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的某种妥协和村落群体向国家的靠拢。国家对村落的实际承认，促进了村落在汉代的发展，反过来，村落的发展也稳定和巩固了汉代国家的统治。不过，到东汉末年，这种状况出现了改变，因为战争不断，社会动荡加剧，全国性的乡亭里地方行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里聚分离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不仅增强了“聚”的自然聚落功能，而且加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豪族庄园的独立性和军事性。^[41]

总而言之，秦汉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与变迁是传统农耕社会历史演变的缩影，也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某些历史性互动关系的体现。在早期中国历史上，秦汉国家政权合法地垄断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资源，但似乎社会网络仍然具有过滤国家试图控制社会的某些行为的能力。因而，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它往往需要通过下发不同的行政命令或是制定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不断调适其与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底层社会为争夺生存、生活资源而发生的行为与活动限制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秦汉国家体制下村落社会的演变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然而，这种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可能并不如想象中的强烈，而是若隐若现的。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古

代“皇权不下县”，如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有限官制论”，认为“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42]。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43]。

事实上，从秦汉国家与村落社会的互动情况来看，国家权力不仅下渗到了县以下的地方社会，而且在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制度性介入，只是这种渗透和介入并非以“设置国家机构”的方式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这一途径体现的。譬如，村落社会中的父老、耆老，唐代的里正、村正，明清时期所谓的乡绅。可以肯定，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传统乡村认识范式，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秦汉时期在内的古代中国国家与村落社会的关系。[44]国家视野下，历朝历代关于基层社会的行政编制和田赋徭役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限制着村落，但作为国家最基础和最基本的生活单元与社会单元，村落仍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不仅继续发展，而且在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起到了增强民族的内聚性与心理认同，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

[1] 张金光：《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 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0页。他在《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一文中认为落、聚和庐等散村的形态在汉以前就存在。另见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国内的齐涛、马新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3]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4] 转引自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5]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6] 《后汉书》卷一百九《郡国一》。

[7]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郡国二》。

[8] 那波利贞：《坞主考》，《东亚人文学报》1943年第4期。

[9] 黄今言：《汉代聚落形态试说》，《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

[10] 黄今言：《汉代聚落形态试说》，《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

[1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二卷《六篇下·邑部》。

[12]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七《释地第九》。

[13]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第五》。

[14]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二十八《成公十七年》。

[15] 刘向撰：《列女传》卷二《贤明传·楚老莱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史记》卷六十二《酷吏列传》。

[1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七卷《九篇下·广部》。

[18] 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二十二《魏一》。

[19]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襄公三十年》。

[2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八篇上·丘部》。

[21]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第六《禹贡一》。

[22] 高广仁：《说“丘”——城的起源一议》，《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

[23] 《史记》卷四《周本纪》。

[24] 郭庆藩：《庄子集释》杂篇《则阳第二十五》。

[2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四上《尽心章句下》。

[26]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成公元年》。

[27] 参读程涛平：《楚国野地居民社会形态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邱东联：《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李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券〉性质与内容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28]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祝贺、刘海旺等：《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贾庆元、任一龙等：《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新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29]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30]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宁家埠分队：《章丘宁家埠遗址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82—89页。

[3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32]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3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7页。

[3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57、175页。

[35] 《隋书》卷四《炀帝本纪》。

[36]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

[37] 马新、齐涛认为汉代应该是“里聚合一”，即自然聚落与行政单位合一。（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但侯旭东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汉代的“里”大部分应是行政编制，不是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合一，“村”的出现也不能被视为社会结构的时代性变化。（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28页。）

[38]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39]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

[4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41] 《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

[42]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4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44]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张新光：《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第三节

秦汉村落的形态

村落的形态，是指村落的平面布局及其构成要素，即构成村落的民居建筑、庭院、畜圈、广场、道路、沟渠、绿化，以及用于商业、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公共设施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忽视了村落变迁层面的历史性梳理，不仅缺乏对村落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and 自然地理等方面关系的研究，而且缺乏分析村落的非物质实体空间的构成形态方面的研究。有关“村落”物质实体空间的构成，除传统的建筑史学和艺术学领域的部分史论学者基于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对民居建筑进行过为数不多的一些具体个案剖析以外，传统村落的形态、布局、景观和规模等均缺乏研究，尤其是缺乏系统研究。这些几乎没有涉及的研究缺口为后续的村落文化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空间。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缺失或者忽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受制于考古和文献史料的有限，以及研究成果的获得远不如对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城市建筑的研究来得容易。近年来，伴随着秦汉考古发现的丰富，出现了不少秦汉时期聚落考古所得新材料，这为我们了解秦汉聚落特别是农耕型聚落提供了不少方便。尽管有关村落遗址的发掘相比其他考古发现要少，但结合文献资料，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之中窥见秦汉村落的一些大致面貌。

一、考古发现的主要村落遗址

自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关于秦汉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发现包含秦汉村落内容的遗址遍及全国，但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四川和重庆等地区。较为典型的有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河南遂平小寨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河北井陉南良都遗址、河北永年榆林遗址、安徽泗县刘圩遗址等。上述这些聚落遗址与城郭聚落不同，它们面积不大，性质单纯且明确，属于农耕聚落范畴，应该是秦汉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村落。这些村落为我们了解秦汉村落的形态、构成要素、性质和内涵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样本。过去这些零星的发掘成果缺乏系统的疏理，所以专辟一节，做出整体的介绍。

（一）山东地区的村落遗址

山东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包括山东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前者突出于渤海和黄海之中，与辽东半岛相对，后者则自北而南与冀、豫、皖、苏4省交界。山东境内中部山地突起，鲁西南、鲁西北低洼平坦，鲁东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中的地形、地貌。由于气候宜人、自然环境优越，自史前以来，山东地区就是人们活动的主要范围，考古发现的包括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龙山文化等在内的不同时期人类活动遗址与遗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夏禹时山东属于青州，商初迁都8次，其中前两次在山东境内。周代山东封国先后有齐国、鲁国和曹国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和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均诞生于山东境内。山东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了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秦

统一六国之后，山东境内设置有临淄郡、齐郡、东郡、薛郡、琅琊郡、胶东郡和济北郡7郡。汉武帝时期，分天下为13州，其中山东设置有青州、徐州和兖州，并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

有史以来山东地区的人类活动就十分频繁，所以遗迹、遗存比较丰富，考古发现的包括村落在内的聚落遗址也较为多见。据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工作队的调查结果，仅鲁东南地区1 400余平方千米范围内，就有秦汉时期的遗址1 700余处^[1]，其中不少遗址为包含村落要素或内容的聚落。值得指出的是，山东地区的不少聚落遗址，其时代跨度很长，有些甚至从史前社会一直延续到汉唐及以后，山东济南市章丘区的王推官庄遗址、黄桑院遗址、宁家埠遗址等都属于此类。其中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宁家埠遗址性质明确，保存较为完整，最具典型性。

宁家埠遗址位于山东济南市章丘区西北约14.5千米，南距宁家埠乡仅1千米，坐落于泰沂山系北麓西段的冲击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遗址东边8千米处有长白山，3.2千米处有绣江河自东南向西北流过，西边2.5千米处有白云湖，依山临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宜居且便于农业生产。遗址平面呈近方形，东西、南北各约23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揭露面积6 300平方米，包含有龙山文化、商周、汉代和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存为主。汉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发掘区的东部，共清理出灰坑172个、沟状遗址11条、水井11眼（均未清到底）、墓葬8座。灰坑包括圆形坑109个、椭圆形坑37个、长方形坑7个以及不同规则形坑。其中圆形坑大都较规整，坑壁和坑底大多经过细致加工，可能是用于储藏东西的窖穴。水井均为圆形土井，其口径大多在0.6~1米。遗址中还出土有盒、钵、盆、瓮等陶制日用器具和磨、纺轮等陶制生产工具，还有竖釜、铍、铍、锄等铁质农具和刀、剑等铁器，另见有镞、带钩、铺

首等铜制品，以及五铢钱。墓葬有土坑墓、瓦棺墓、瓮棺墓三种类型。宁家埠遗址的汉代遗存，虽然未见房屋遗址，但从遗存数量丰富的灰坑、沟状遗址、水井眼和8座墓葬来看，这里应该是一处汉代的聚落空间。不仅如此，遗址中出土的陶制日用器具和生产工具以及铁质农具，既说明宁家埠在汉代是一处人类活动频繁的生产生活场所，也表明它是一处农业性质的聚落。[2]

相比宁家埠，王推官庄遗址、黄桑院遗址的性质不是特别明确。譬如，黄桑院遗址虽然面积近10万平方米，但汉代的遗存规模远小于宁家埠，发现有灰坑17个，有长方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其灰坑普遍出土有陶片、瓷片和少量兽骨，可辨别的陶器有罐、鼎、盘、豆、盆、甗、钵等；1个灰坑中清理出两具动物骨骼，其中一具侧卧于坑底，被鉴定为黄牛骨，另一具种属不详。窑址2座，均为半地穴升焰式结构，包括操作坑、火膛、窑室等几部分。[3]现有遗存未见有农业生产工具，尚不能表明黄桑院遗址是一处农业性质的聚落。

（二）河北地区的村落遗址

河北因为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西为太行山，北有燕山和张北高原，内环北京和天津，另与辽宁、内蒙古、山西、山东和河南交界。河北境内兼有平原、盆地、高原、山地、丘陵和海滨，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业生产，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理想区域。早在史前社会，河北大地上发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自此之后，中华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便开始从冲突走向融合。河北古称冀州，周代封召公、周公之子于河北，是为燕国和邢国；东周则有燕国、赵国、中山国和魏国等诸侯国，故河北又有“燕赵大地”之称。秦代初分天下为36郡，河北设置有巨鹿郡、邯郸郡、恒山郡、齐郡、济北郡、上谷郡、代

郡、渔阳郡和右北平郡9郡。至汉代，河北则属幽州、冀州的地域范畴，直至西晋。由于有史以来河北境内的人类活动就很频繁，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所以河北境内的考古发现较为常见，秦汉时期的遗址遗迹也十分丰富。然而，其中涉及聚落特别是村落的内容却相形见绌。

近年来，河北境内关于聚落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有了一些新的进展。2010年，河北省文物局在对河北元氏故城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在半径仅2千米的范围内，发现有14处以汉代遗存为主或具有汉代遗存的遗址和墓葬区^[4]，其中聚落分布在距城较近的城东北、城东、城南地带，尤以城东南最为集中。调查报告显示，元氏故城周边的这些聚落以农业生产为主，居住者可能是为城市生活服务的人群，现择包括元氏故城在内的聚落要者介绍如下。

元氏故城位于殷村镇故城村，南北长1 100米，东西长1 200米，面积约132万平方米，使用年代大致在战国至隋代，以两汉为主。故城南、东、西三面残存部分夯土城墙，高约6米；出土和采集到板瓦、筒瓦、瓦当、方砖等建筑构件，其中板瓦长54厘米，宽34~38厘米，矢高6.8厘米，厚1.6厘米，瓦当上有云纹和“长乐富贵”“常山长贵”字样的吉祥文字；出土有豆、罐、盆、釜和壶等陶制器皿。

距故城东北约600米的一处聚落，发掘面积4 00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302个、灰沟20条、道路3条、水井2眼、灶3座、窑址2座、墓葬10座，出土有大量的莲花纹瓦当、板瓦、筒瓦和砖等，盆、罐、釜、碗等陶制日用器皿，以及铜铺首、铜镜、五铢钱、铁刀等。

距城东约200米有小留村遗址，清理出战国至汉代灰坑8

个、水井6眼，另见有不少散落的陶片、砖块和井圈残片等。

距城东南约1 300米有赵村东遗址，发掘面积2 000余平方米，发现灰坑73个，大部分为西汉时期的，另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窑址，有汉代土坑墓、瓮棺葬和瓦棺葬，出土有陶器、铜钱、铁镞、铁带钩、板瓦、铜瓦等。

距城东南约1 000米有北程遗址，发现东汉时期灰坑37个、引水槽2条、蓄水池1座、水井5眼、窖穴2座、灰沟2条、墓葬2座。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砖石等建筑构件，盆、罐、瓮、壶、钵、豆、釜、甑、炉等陶制日用器皿，纺轮、陶权、铁刀等生产工具，半两、五铢钱、货泉等钱币。据推测，此处可能属于常山郡故城的一处手工业作坊区。

故城周边的聚落遗址，除上述外，还有赵村西遗址、赵东南遗址、陈郭庄东遗址、陈郭庄西遗址、陈郭庄西南遗址、东贾村北遗址、殷村遗址、龙王遗址等。这些聚落遗址分布于故城周边的事实，一方面于侧面说明先秦以来集中城居形式可能仍部分存在，另一方面表露出汉代的城郭可能都存在类似的服务城市的农村聚落群体。这似乎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汉书·食货志》所云的“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的理想。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当时的老百姓有两个居处：一个是用于长期生活的空间，位于城郭；另一个是临时性的空间，在农田附近，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由此看来，不排除这类聚落是在“庐”这一临时性居住空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然，这仍待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

上述表明的是围绕城郭而发展起来的村落，于城郭之外，河北境内也发现有汉代村落遗址，较为典型的有河北井陉南良都遗址和河北永年榆林遗址等。

南良都遗址，位于河北省井陘县南良都村金良河南岸近河的阶地上，遗址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50米，面积2.8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清理战国、汉代房址3座，道路1段，东汉窖藏1处，以汉代遗存为主。汉代房址2座，均为地面建筑，其中1座有柱洞6个，分别为方形和圆形，部分柱洞底部有椭圆形础石。根据柱洞判断，房址平面为方形，单间面积长3米，宽2.5米，门道宽0.85米，方向250°；室内中部发现有不规则烧土，应是用火痕迹，附近发现有1件完整的陶碗。所见遗物有碗、豆、盆、罐、钵、釜、灶等陶器和石斧、汉代钱币等。窖藏的结构为圆形，土坑内放置储钱陶罐，陶罐内储藏钱币按公斤计，超50公斤，包括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币泉等铜钱币以及少量铁钱币。道路位于遗址西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探明长度有近100米，东端接近遗址丰富区而消失，揭露段长度3.7米，路宽2.65~2.75米，道路两侧各附有宽0.86~1米、深0.5~0.6米的路沟，路面坚硬，呈灰褐色，厚0.02~0.03米，路基厚0.15~0.20米，路面土质坚密，有杂花，筑路时应该经过平夯或碾压。根据考古报告推测，南良都遗址发现的古道可能是汉代驿道的一条支路。结合出土遗存，未发现有明显的农业生产活动痕迹，由此看来，南良都聚落遗址似乎并不是一处农业型聚落，而是交通型散居遗址。[5]

永年榆林遗址，位于河北永年县的榆林村西，遗址南距洺河约1 500米，地处冀南平原，地势平坦。发掘总面积2 000平方米，有新石器时代、西周和汉代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西周两个时期的文化层堆积较薄，表明这两个时期此地人类活动的规模应该不大。与此不同，汉代时期的遗存较为丰富，应该有大规模的生产、生活活动。因此，榆林遗址是一处以汉代遗存为主体的汉代聚落遗址。从清理情况来看，发现汉代遗迹有灰

坑、水井、灰沟等。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坑内出土有陶片和砖瓦碎片；水井2眼，井口平面呈圆形，直径0.8米，井深5.46米，井壁系青砖叠砌而成。遗址出土有铍、镢、铲、凿等铁制生产工具和壶、釜、盆、瓮、博山炉等陶制生活器具，另见有瓦当、板瓦等建筑陶器和五铢钱数枚。大量生活日用器和瓦当、板瓦等建筑构件表明榆林遗址是一处村落遗址，而且应该是典型的农耕型村落。[6]

（三）河南地区的村落遗址

河南因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地处黄河中下游，北与河北、山西接壤，东北与山东交界，东南有安徽，西北连接陕西，西南为湖北，属于中国中东部地区。河南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环绕有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中、东、北则为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西南是山地、丘陵，东南为大别山区。河南作为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早在4 50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的活动，在石器时代更是有着丰富的人类活动痕迹，包括旧石器时代的小南海文化、灵井文化和新石器时代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二里头文化以后，河南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此后，经商、西周和东汉，直至宋朝，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这里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中心。

正因为河南自史前社会以来便是中国境内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域，所以考古发现的历朝历代的遗迹、遗物比较多，包括聚落考古也是如此。有鉴于此，我们在上一章史前聚落遗址的介绍中已有所提及。考古所见秦汉时期的聚落遗址虽然不如史前社会丰富，但也有不少发现，这当中就不乏具有村落性质的聚落。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学系联合调查队于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之间，对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及其周边地区200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76处，除5处为墓地以外，71处当为聚落遗址，其中包含汉代文化因素或汉代遗存的共41处。[\[7\]](#)这些汉代遗址密集分布的区域也是现代村庄密集的地区，主要位于浍河东岸及其支流的南岸。从地理位置来看，淮滨县地处淮河中上游，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黄土城及其周边地区位于黄淮平原南端，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从汉代聚落分布位置大致与现代村落接近这一事实，结合调查发现的石斧、石镰、石镞和陶拍、陶纺轮等生产工具来看，这些聚落遗址不排除是农业性质的村落。

在河南考古发掘的秦汉聚落遗址中，较为典型的有河南遂平小寨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等，现择两处重要遗址介绍如下。

小寨遗址，位于河南省遂平县西南约13千米的诸市乡小寨村西，沙河东岸。遗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聚落遗址的使用年代自战国晚年至东汉时期，其中以西汉时期为主。遗址清理出道路8条、水井28眼，未发现有居址遗存。遗址中除西北部4条道路时代不明确以外，其他4条道路应该属于汉代道路，道路于东西向与南北向排列有序。有2条保存最好，其中一条路残长144米，宽5.5~7.5米，贯穿遗址中部；另一条长210米，宽14米，在遗址中部与上一条东西向路交叉为丁字路口，共同构成遗址的主干道。考古报告显示，前一道路于东汉时期有过维修，表明遗址至少沿用到了东汉时期。路中发现夹有内饰布纹的板瓦和盆、罐等残陶片。水井包括16眼陶圈井、5眼砖券井、7眼土井，其中土井使用时间最早，陶井次之，砖井最晚，它们有规律地排列为东西六排，沿东西向平行分布，布局

十分密集，井与井之间最近者仅7米。土井之中，不仅清理出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还发现有陶漏斗器、罐、盆、瓮、碗等陶制日用器和石饼、磨石等石器，以及铜耳勺等。虽然小寨遗址未发现有居住遗址，但从道路、水井的有序排列，以及建筑构件、陶器等遗物的大量出土来看，这里应该曾是一处聚居遗址。

[8]有学者就指出“该遗址可能从战国晚年开始，有居民按规划、较为有序和集中地聚居，并且这种较为集中的聚居方式一直沿袭到东汉”，他还进一步认为“这可能与文献和简帛记载中的里居方式有关”。[9]“里居”的说法虽未言之凿凿，然则推测其为一处集中聚居的聚落应具有合理性。

三杨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北，北距内黄县城约30千米，东南距今黄河河道约45千米，地处内黄县南部的黄河故道，地表沙岗起伏，汉代文化层与遗迹平均在今地表约4.5米以下。在1 500米长的硝河河道范围内发现有4处较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迹，说明这里在汉代应该是一处较大范围的聚落遗址，而且极有可能有若干个聚落区域，每个区域又包含若干庭院。从遗迹遗存来看，三杨庄是一处典型的农业性质的村落遗址。

第一处宅院遗存，面积约1 800平方米，清理面积400余平方米，当为主房部分，包括院落基础、房基、瓦屋顶、夯土墙和拌泥池等，以及未使用的瓦、建筑废弃物堆积、灶和灰坑等。宅院基础南北长约20米，东西宽约18米，高于周围地面约0.3米；房基与瓦屋顶位于宅院基础的西部，可能是一座坐西向东的房屋，两开间；南侧一间南北宽约4.5米，东西长6米以内；北侧一间宽于南间，南北宽约5.7米，东西有夯土墙，厚约65厘米，现存高50~65厘米。瓦屋顶可分为两部分，分别位于房基的南北两端；南侧呈西北—东南向，瓦顶北高南低，仍呈坡状，板瓦的仰

铺与筒瓦的盖合保存原貌；北侧瓦顶呈东西向，南高北低仍呈坡状，板瓦与筒瓦的结构清晰。宅院基础的东北角清理出大面积的碎瓦片、砖块和陶器残片，夹杂有个别铁器。房屋基础周围，还发现有一些陶器碎片，如盆、罐、瓮、水槽等，另有小件铁器出土。发掘部分的南部发现有属于宅院组成的水井1眼。水井南侧有东西向汉代道路1条，宽约4米。

第二处宅院遗址，遗存面积约1 700平方米，发掘1 000余平方米。发掘显示，这里当为一座庭院的一部分，从南向北由两进院落组成。（见图3-1、图3-2）。第一进院包括南墙、东厢房、西门房，第二进院由南墙、门房、厢房、正房组成。另见有院前水井、编织遗存、庭西水池、院后厕所等遗迹。水井位于宅院南大门的东南侧约9米，为砖砌圆形竖井。井周围有残破的陶瓮、陶水槽、陶盆等，还有较为完整的石磨；井台北面1.4米处遗留有圆形石臼1件。南大门与水井间用碎瓦片铺有一条专用便道，长5.5米，宽0.3~0.7米。编织遗存位于南大门外约10米处，东距水井台约3米，遗存四角有四块砖，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约1米，东西长约1.25米。南大门宽约2.47米，大门内东西两侧各有2个直径8厘米的圆形柱洞，柱洞均南北排列，间距约6厘米。西门房位于南大门内西侧，南北长约7米，东西宽约2.5米。东厢房位于南大门内东侧，坐东朝西，南北长9.5米，东西宽7米，宅院内遗留有形制相似的两盘石磨，还散落有几件铁器及1件破损的陶甗。西厢房位于主房西南，北与主房相接，东西长4.5米，南北宽4.3米；东侧院内发现1件铁釜，房内西南角发现1件残破的陶豆。主房南北长约14米，东西宽约9米，屋顶为南北两面坡形，坡面较长，清理出4枚“益寿万岁”瓦当；主房南北开间进深4.1米；最西间宽度2.5米。厕所位于主房西北角北侧。水池位于宅院西侧，略呈南北向椭圆形，池底部近南壁处，

清理出较大的圆形石臼与较小的方形石臼各1件。宅院中部东侧，有树木状遗存，5棵树南北向排列。宅院西北部，水池北部，均发现有排列有序的数十颗树径较细的树木遗迹。清理还表明，第二处宅院东、北、西南面均有农田环绕。宅院南大门向南约42米有一条东西向道路，路宽约8米，为遗址内的次主干道路。在路与南大门之间，有大面积的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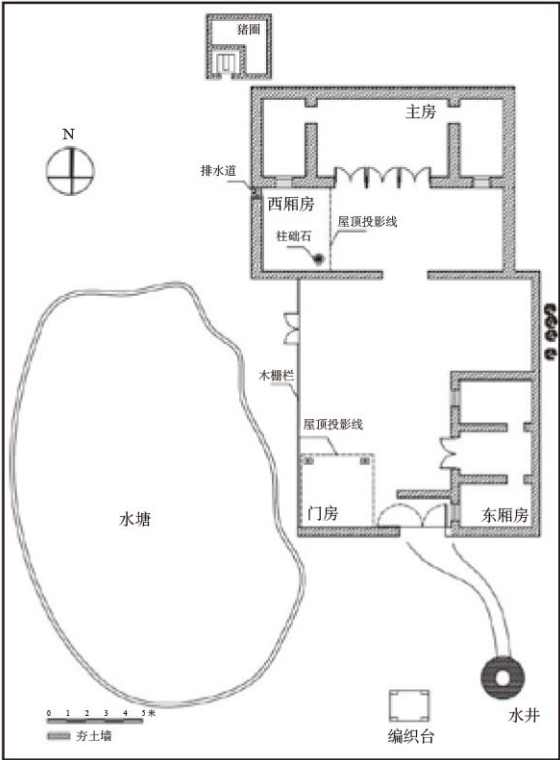


图3-1 第二处宅院平面复原图



图3-2 第二处宅院鸟瞰复原图

第三处宅院遗址，东北距第一处宅院近100米，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宅院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的南墙及南大门、南厢房、东西院墙，第二进院的南墙、正房和院墙等。水井1眼，在南门外西侧约6米处，井口直径0.72米左右，深5米。南大门在宅院东南部，宽约2.8米。南厢房长约9米，宽约7米，房顶为板瓦和筒瓦组成。主房及第二进院，东西宽约8米，南北长约15米；主房坐西朝东，可能有两间。主房东侧为第二进院，面积较小，南北各1门，北侧门通往房后和厕所。宅院东西墙外分别有一条宽窄、长度大致相当的水沟。宅院后侧发现有两排树木残存遗迹，东部围墙外也发现有一排树木，树桩直径残存18~55厘米，大小不等。宅院的東西两侧水沟外和北侧后面清理出排列整齐的高低相间的田垄，田垄大多为南北向，也有东西向，宽度大致为60厘米，深度在10~15厘米。南门外活动场地南侧，也有农田，还有一条不宽的南北向与外界相通的道路。宅院内散落有石碓、小石臼、陶瓮、陶盆等器具。

第四处宅院遗址，西距第三处宅院25米，大致东西并列。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宅院，西侧未见边沟，代之以一行南北向的树木；院后附属遗迹1处，当为厕所，其后种有树木。第三、第四处宅院间未见明显相通的道路，但有田垄和农田，田地有车辙痕迹及牛蹄痕迹。[10]

（四）江苏地区的村落遗址

在长江流域，有关村落遗址的发掘，以下游地区的江苏地区成果较多，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江苏位于长江下游，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东部沿海中心之地，东临黄海，东南与浙江、上海毗邻，西与安徽交接，北连山东，有长江、淮河和京杭大运河流经境内。江苏境内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有苏北平原、黄淮平原、江淮平原、海滨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等，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便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因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考古发现表明，早在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江苏境内活动，这里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上千处。历史上，江海之间的原住民往往被称为东夷、淮夷，后来则被称仲为百越之民。夏朝时，江苏隶属于九州中的徐州和扬州。商代末年，周人泰伯、仲雍兄弟在江苏境内建立吴国。周代早期，又有徐国迁于境内。秦代推行郡县制，江苏境内分属会稽郡、东海郡和泗水郡。西汉前期，江苏境内郡国并行，先后分封有楚、荆、吴、广陵、泗水等诸侯国，另置有会稽、东海、丹阳、临淮、琅琊、沛等郡。东汉，此地复属扬州和徐州。三国魏晋南北朝，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今南京建都立国，历史上的江苏可谓长期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考古所见江苏地区的村落遗址中，较为典型的主要有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和张家港小山村遗址，现在介绍如下。

邵家沟遗址，位于江苏高邮市北郊，地处高邮湖东岸。遗址现存面积750~850平方米，北部边缘为断崖，东、南两面为倾斜的坡面，西边保存较好，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清理出陶圈井2眼、窖穴1座、灰坑2个、灰沟2条、木棺墓2座，出土遗物387件。遗址时代为东汉晚期。出土遗物中陶器数量最多，有323件，其中生活日用器有罐33件、壶9件、“灯形”器20件、盆34件、豆1件、三足盆2件、钵131件、碗6件、盂3件、甑3件、灯盏16件、皿1件、“弧形”器5件、缸1件、陶盖3件；生产工具有纺轮8件和网坠8件；建筑构建有砖3块、瓦和瓦当12件等；属性不明的器物有10余件。瓷器有罐、壶、盂等19件。漆器有耳杯2件、碗1件和残漆片共11件。另有铁犁、铁锤和竹陶笋等农业生产工具，铁犁发现时尚有木柄连接的现象。其他还有砺石、铜钱、竹席、草席、草鞋底、桃核、瓜籽及牛骨、狗骨、鱼骨等。遗址内还出土有符篆木片、“天帝使者”封泥和陶壶上的朱书铭文，当为道教遗物。[11]

上述发掘情况中虽然未见有房屋、道路等遗迹，但从清理出的灰坑、灰沟、水井、墓葬和人骸等遗存来看，邵家沟在东汉时期应该是一处聚落。不仅如此，所见300余件生活日用器皿与铁犁、铁锤和竹陶笋等农业生产工具，更表明这里是一处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的农业性质的村落遗址。遗物中的道教遗物，说明东汉时期的道教不仅已神化，而且已广泛渗透到了民间社会。

小山村遗址（见图3-3），位于江苏张家港市凤凰镇小山村、河阳山东侧。遗址地表以农田为主，间有河渠塘分布，整体呈西南—东北向，长约300米，宽约100米，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发掘面积808平方米。遗址以汉代至三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主，清理出水井1眼、灰坑10个、灰沟4条、墓葬2座。水井为圆形，口径1米，深1.75米。灰坑皆为斜壁坑，圜底或近平底，有

圆形坑、不规则圆形坑和方形坑三种。灰沟和灰坑中出土有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与鼎、壶、罐、盆、甗等陶制器皿残片。出土遗物主要有砖瓦残件、陶器和少量瓷器、石器。其中建构件的数量最多，板瓦有1 009件，大多呈青灰色，少量偏红，外壁有绳纹和弦纹组合纹饰，内壁则有素面、布纹、乳钉纹、方格纹和菱形纹等多种，另有瓦当14件、空心砖14件、筒瓦259件。经修复后的陶器有601件，其中泥质陶579件、硬陶22件，器型主要为鼎、壶、罐、盆、甗等生活日用器和网锥、纺轮、陶饼等生产工具。[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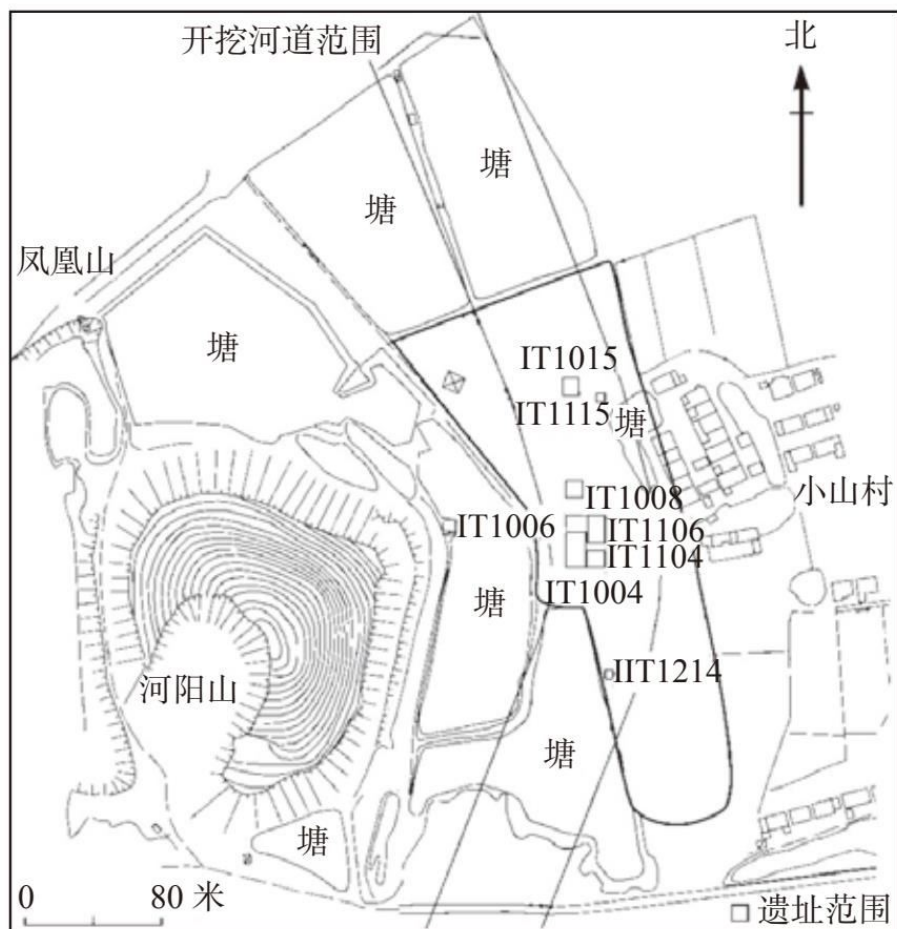


图3-3 小山村遗址

从小山村遗址中发现的水井、灰坑、灰沟和墓葬等遗存，以及丰富的出土遗物等来看，这里曾在汉代至三国时期有着浓厚的人类生活痕迹，应该是一处聚落遗址，特别是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的出土，更表明了这一点。

（五）其他地区的村落遗址

除上述地区较为典型的秦汉时期的村落遗址以外，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秦汉时期的聚落遗址或包含秦汉文化因素的遗址，但往往由于发掘面积较小或村落性质不是特别明显而被忽略。现择其中村落属性突出且具有典型性的遗址介绍如下。

刘圩遗址，位于安徽泗县长沟镇刘圩村东侧，位于今汴河北岸。遗址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50米，总面积1万余平方米，先后两次发掘，清理面积1 600平方米，文化遗存以唐宋为主，汉代遗存和遗物也十分丰富。属于汉代的遗迹主要分布在北中部位置，有水井7眼、水沟7条、灰坑10个、墓葬1座。水井有砖井和土井两种，均为圆形，大部分井的口径为1~1.5米，残深1~2.5米，井内出土有少量汉代陶片。水沟除两条呈不规则形之外，其余均呈长条形，应该为汉代生活排水设施。灰坑出土有大量的汉代遗物，包括绳纹红陶板瓦、筒瓦及瓦当残片，还发现有钵、碗、盒、盘、豆、壶、瓮、缸、罐等生活用器具，以及纺轮、陶饼等陶制生产工具和铁铲、铁锤、铁犁、铁凿、铁耙齿等铁制农具。大量的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等遗存，说明这里应该是一处汉代生活居住区。铁耕农具、纺织工具和水井等遗迹，既表明刘圩遗址属于农耕性质的聚落遗址，也反映出汉代农耕技术的进步。刘圩遗址东北1千米处为洋城湖。考古报告根据《光绪泗虹合志》的相关记载，推测洋城湖是不是汉代虹县县城旧址遗址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证明。遗址南部靠近现小汴河河口约7.5米处，发现有唐宋时期汴河的堤岸遗存。[13]

三道壕遗址（见图3-4），位于辽宁辽阳市北郊1.5千米处三道壕村，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地带，占地面积约4平方千米，发掘面积1万多平方米，发现居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铺石道路2段、儿童瓮棺墓368座，出土包括陶、瓦片在内的遗存共19万多件。三道壕遗址的文化堆积连续性较好，性质是一致

的，各建筑遗址虽多分为上下两层或三层，但应该是同一种文化的早期和晚期的遗存。6处居住宅院之间的距离，近的15米，远的约30米或更远些。宅院一般由房屋、炉灶、土窖、水井、厕所土沟、木栏蓄圈等构成。宅院遗址的中间和附近，分布着砖窑址和卵石路。

第一处居址，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3米。遗址中清理出黄土房基1座和圆形建筑1座，后者位于前者的东端。居址内发现炉灶址3座，大小不一；小土窖1座，深60多厘米，出土有铁器、砖块和陶片。房基西面12~13米处有陶管井1眼，其中陶管18节，深4.5米；井内出土有“小半两钱”、铁器、陶片和砖窑渣。此外，在房址和下部灰层中发现有许多遗物，包括剑鐔、带钩、镞、刀钱、小半两、五铢、大布黄千等铜器和锄、镰、残车轱、镞、刀、锥、锅片等铁器，以及罐、盆、甑、豆、壶、纺轮和瓦当等陶制器具，另见有被烧而碳化了的高粱一小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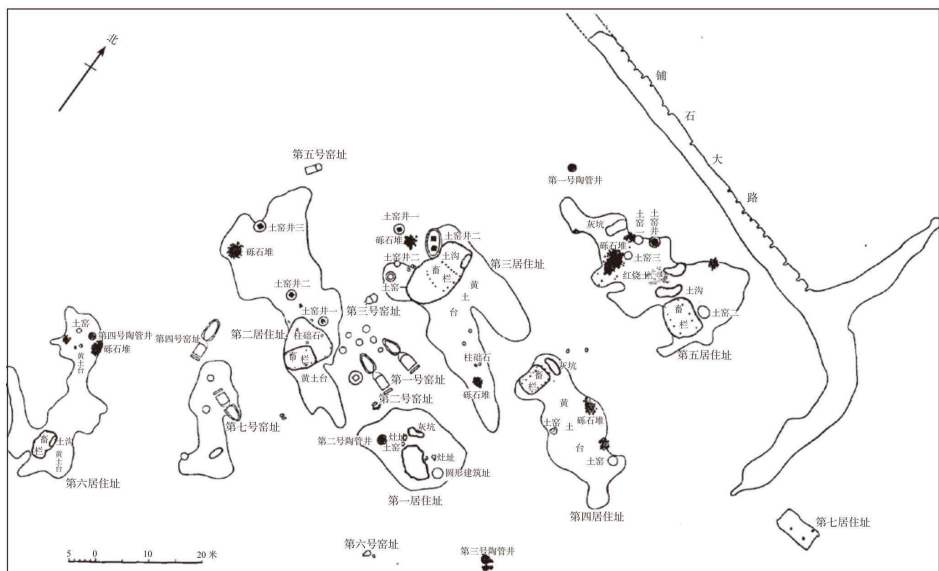


图3-4 三道壕遗址

第二处居址，东西长38米，南北宽约15米。遗址有前后三次建筑遗存叠压的情形。早期遗址偏西，仅存有瓦片、陶片的灰土层一段，其西端有土窖井1眼；东端有小灶址1座，发现有一刀、小圆钱、大半两钱、小半两钱；井中上部出五铢钱。中期居址偏东，保存有黄土台1段，分布大量瓦片、陶片等遗物，可能是一种土墙、木柱和草瓦盖顶的小房子。房址西端有畜栏1座，用6根方形木柱围成，坑中堆满粪便和草芥朽灰；畜栏后方存椭圆柱孔3个，可能是篱笆之类的遗孔。西面有土窖井1眼，井内满填灰土，上部发现支石的灶址，稍下部发现马骨1具。晚期房址在中部，遗存柱础6个，房间面积可能并不大。这个建筑与1、2号砖窑很接近，似乎与此有关。房址后有土窖井1眼，井内填满了烧坏的碎砖头。东面稍远处有灰坑1个，出土有王莽钱“大泉五十”。第二处居址所见遗物有镞、带钩、扣、指环等铜器和铍、镢、锄、锛、铲、镰、镢、带钩、剑、刀、锥、镞等铁器，以及磨、锅、纺轮、钵、罐、盆、甑、壶等陶器。

第三处居址，东西长34米，南北宽约18米，保存完好。上层晚期的居址仅存大小不同的几个砾石堆、础石和瓦片、陶片。下层有黄土房址1处，房址西端有方形畜圈，由12根方形木柱围成，圈中有牲畜粪便和朽烂草芥。畜圈后有厕所。畜圈右前方不远处有大小不同的土窖2个。房址西边不远处有土窖井2眼，其中一眼中有晚期建筑物的砾石堆，另一眼土窖井为方木壁井，可能是生产用水之处。出土的遗物与上述相当。

第四处居址，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6米。上层晚期建筑物仅存方形砾堆1处。下层存黄土平台的房址1处。房址西端有长6米的方形畜圈，系用14根方形木柱围合而成，南留有圈门，

圈内有牲畜粪便和灰土。蓄圈后有厕所。房屋宅院中有小土窖1座。房址后左右有大土窖1座，深2米多。居址左前方20多米处有陶管井1眼，井口下1米多处发现叠压着一男一女的人骨两架，女指骨上带有铜指环2枚。出土铜器有镞、筭、带钩、镜片、铜器片，铁器有镞、锄、锛、铲、镰、车辖片、凿、钻头、刀、锥、锅片，装饰品有玻璃、石、玛瑙、珠饰等，陶器有甗、罐、壶、盆、豆等。另见有同上的汉代钱币。

第五处居址，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8米，是一处保存较好、居住时间较长的建筑遗址。文化堆积层最厚处约1.05米。遗址东端上层有渤海国建筑物的铺石、筒瓦、板瓦和瓦当。遗址存黄土平台的房基1处，房内东端地面分布很宽的红烧土面，有方圆炉灶遗迹。西边有小土窖1座。房址东面不远处有大畜栏，系用11根方形木柱围成，宽约6米。圈后有土窖1座，圈西有厕所。房址后方西部有土窖1座。东部有土窖井1眼，木井壁外填满了河卵石。居址西面约15米处，有陶管井，井深6米。出土遗物大致与上述居址相当。

第六处居址，东西宽约22米，南北长约30米，可能包括三个不同的建筑遗址。上层居址保存不完全，遗物较少。北面的居址存有黄土台房基1段，台面上分布瓦片、陶片和柱础石。房址后西部有圆形土窖1座。有陶管井1眼，深4米多。中部居址层位相同，仅存黄土平台1片，出土了一些铁制农具。南部居址层位较高，存黄土房基1处，约为3间，西面土壁基和后墙线上的2个柱础保存很好。房址西端有小畜栏1座，系用4根方形木柱围成，每面宽约2.05米，堆积中有糠皮，可能是猪圈。畜圈后有厕所。出土铁器有小铁铧、锹、锄、铲、镰、车辖、刀、锥、匕首、锅片等，出土陶器、装饰品和钱币与上述大致相同。

村落遗址中有铺石大路，位于居住址的北面，呈西往东转而

微南的走向，总长166米，西端44米未掘，路面宽约7米，全用河光卵石铺筑三层或四层，厚约35厘米。道路两旁没有水沟、壕棱、副道等建筑痕迹。道路上也发现有与上述居址类似的出土遗物。路面上有明显的辙痕，一般由两排并列的大车辙。^[14]

以上关于三道壕遗址的居址情况仅为聚落遗址的部分，尚难窥见村落的整体布局。结合目前考古所见的遗存情况，可以肯定三道壕遗址应该属于一处西汉时期的村落，而且延续时间较长，至少从西汉中期一直使用到了西汉末年，废弃时间可能在新莽时期。从布局来看，遗址所见6处居址互不相连，分散布置，没有规律，中间有陶窑。各居址一般向南或稍偏东、西开门。除第一居址没有畜圈外，各居址的基本配置为居住空间、庭院、水井、厕所、畜圈、窖穴等。发掘清理的遗存中，有大量的铁制农具和陶制工具，结合畜栏等一类的建筑物，可以判断三道壕遗址应该是一处汉代东北地区的村落遗址。不仅如此，从废弃窑址，19万余件陶、瓦残片和大量农具，家家有畜圈的情况来看，这一村落属于农业、手工业与家畜业兼有的聚落遗址。至于有学者称其还有“屯垦或屯戍性质”^[15]，所见遗迹遗存尚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李家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地处三峡库区地带长江北侧支流彭溪河左岸的台地上，是三峡水库淹没区内的一处古文化遗址。（见图3-5）遗址所在台地中部有两条小冲沟将台地分成三部分，由东而西可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遗址分布在上坝，依山临河，现存面积约12万平方米，核心区域约3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以商周至两汉六朝为主，下及唐宋至明清各个时期，延续时间长。1997年以来，此地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发掘工作，总发掘面积5 000平方米，共发现东周至南朝时期房址50余座、墓葬近400座及数百处灰坑、灰沟、道路等遗迹。为了便于理解李家坝聚落空间和变迁的情况，考古发掘者将秦汉六

朝时期的居址分成了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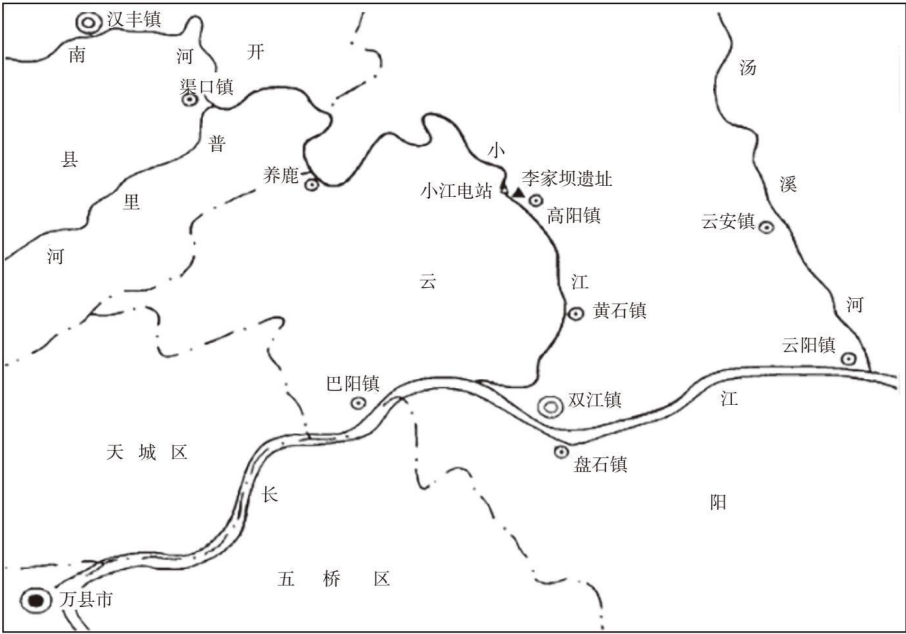


图3-5 李家坝遗址位置

第一期：战国末至西汉初期。房址7座，主要集中于中心区西北及东南角，居址相对分散，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长方形台基房址，台基经过夯实后再做出明础和暗础。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处，平面呈长方形，长17.5米，宽11.3米，有16个柱础，四面均匀分布，构成面阔3间、进深3间的平面布局，有隔墙柱洞；台基有残瓦等建筑构件遗存；南侧有前廊，正中有门道。二是半地穴式房址，平面有近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屋内经过装潢处理，有烧烤，涂抹膏泥，铺木炭层、黄土层等痕迹。此类房址有4座，其中一座平面呈圆角方形的房址，东西长5.84米，南北宽3.6米，深约0.7米，有门道位于西侧，宽1.1米。三是地面式建

筑，即平地立柱建房，但损坏严重，保留较少，其中一处有柱洞6个，3个一排，间距1.6~1.8米，两排间距3.2米，有灶1个。

第二期：西汉中晚期。可确认的房址7座，位于中心区域的西部，但似有向东、南扩张的趋势。居址主要是台基式房屋，一些房屋的台基边缘出现有石块砌包的现象，一些房址埋藏有一个或数个完整陶罐。规模最大的房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17.5米，东西宽15.9米，26个柱础有序排列。房屋由正房、厢房、廊道、门道等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属于庭院式建筑。北侧正房3间，正房西侧两间前有廊道，廊道南与门道连接。东厢房2间。西侧房屋2间，房屋之间有1条排水沟相隔，可能属于储物间或厨房。正房北侧正中增建有房屋1间，台基与原有台基相连，有包边石。庭院东侧有1条道路。此处庭院遗址沿用时间可能到了六朝前期，应该是聚落内的中心建筑。

第三期：东汉至六朝早期。可确认的房址15座，分布密集，中心区域兴建房屋较多，东部也有新房出现，分布范围有整体向南移的倾向。绝大多数房屋呈东北—西南向，面朝彭溪河；现存大约三排，排列整齐有序，未见有街衢分割；有的房屋之间以沟渠相隔，应与排水有关。房屋为台基式房屋，台基均用石块砌包边缘，大多数房屋的台基埋藏有完整的陶管，柱础为明础，一般直接在地面上放置石板。其中保存完整的一座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5米，南北宽9米，面向河流；台基上发现有5个柱洞，当为面阔3间，进深2间。有F2和F6两座两汉时期的房屋建筑，为东南—西北向，墙内地下埋有用两块筒瓦扣合的陶排水管，地面有石板和石块，东半部有1处半地穴式火塘；房址北面有石砌高坎与建筑平行，当为台基的一部分，坎上及其附近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

第四期：六朝晚期。可确认的房址8座。房址内出土有青瓷

片。房屋基本沿用东汉时期的建筑，或利用前期建筑台基新建房屋，规模较小，质量与体量均不如前期。

在李家坝遗址考古所见的两汉时期的遗物包括生活器具、生产工具和建构构件三类。其中生活器具以陶器为主，包括罐、盆、甑、盂、瓮、鼎、豆、盒、钵和耳杯等；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网坠和鱼钩、刀、镞等铜器，以及釜、锛、刀等铁器；建筑构件则主要为板瓦、筒瓦和瓦当等。此外，尚有铜铃、铜带钩、半两钱、五铢钱和石器、琉璃器等。[\[16\]](#)

从形态上来看，李家坝聚落未见有明显的街道，也没有发现围墙一类的建筑遗迹，房屋处于台地上，绝大多数面向彭溪河。依山面水的房屋选址，既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也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宜居环境的理解。

根据4个时期的房址遗存情况和考古所见的各类遗物，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李家坝遗址是秦汉六朝时期的一处区域性的聚落。然而，所见遗物中农具很少，也未见辽阳三道壕遗址的畜圈附属建筑，这说明这一聚落并非以农耕为主要业态的聚落。结合遗址中所见的不少铜钱货币和墓葬中出土的印章、封泥及陶文，譬如“徐贝之印”，以及刻有杜、周、王、田、尚等姓氏的陶器，这里可能是某一级行政治所之地与发展商业兼有的聚落。考古发掘者认为，这里应该是一处区域性的中心聚落，是汉帝国的某一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唐宋以后则转为农业生产。有学者则认为李家坝是乡聚之市，它的存在可能与盐的“官营”运销有关。[\[17\]](#)正因为这一性质，李家坝聚落并未形成以某一家族为主体的村落社会，陶文上所见的各种姓氏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大量的文化遗存也显示出李家坝受到了包括巴蜀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和越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强烈影响。独特的文化特征，也充分说明李家坝不是一处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村落。因此，它作为乡村

地区商业聚落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大地头遗址，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城大树镇大瑶村，地处大渡河南岸、花果山北麓的坡地上。发掘面积642平方米，内含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唐宋和明清文化堆积。其中发现汉代遗迹有房基12处、灰坑4个、墓葬2座和水井1眼等。房基均为单间木骨泥墙式，平面呈长方形。F3有约10平方米居住面、火塘1个、柱洞2个。居住面厚约5厘米，经过烘烤，比较坚硬；火塘位于房屋的中央，平面近圆形，直径约1.55米；火塘中央位置有一长约20厘米、宽约13厘米的近似长方形块石，其周围环绕有三块较小的块石。F7面宽4.1米，进深两间，分别为3.25米、2.75米，通长6米；居住面厚约2厘米，比较坚硬；紧邻房屋南侧有灰沟1条，可能是房屋的排水沟，宽约3米，可见长度约10米，深0.45米。F8面向东北，有大柱洞7个、小柱洞7个，房屋当为两面坡屋顶；面宽1间，不小于3.5米，进深1.8~2.6米；房屋前后各有一排檐柱；北面发现灰沟1条，为排水沟，长5.5米，宽0.25~0.3米，深0.06米。F27残长5.4米，残宽4.9米，平面仅发现有居住面、柱洞2个和火塘1个；居住面由黄砂土和碎石掺杂拍打而成，比较坚硬；火塘位于北部中央，椭圆形，内堆积有炭灰等。水井为圆形，口径0.7米，深3.4米。该遗址出土有陶罐、铜镜、半两钱、铁釜和玛瑙珠等遗物。[18]

大地头遗址整体布局未见有明显规划，没有明显的道路痕迹和围墙一类的遗迹，所见遗物中未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可能并非农耕性质的聚落。考古报告认为，该遗址年代为西汉时期，且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可能与“南方丝绸之路”有一定关系。因此推测，不排除大地头遗址是一处服务商业交往的交通型聚落遗址的可能性。有关于此，还待进一步考古资料的证实。

上述这些聚落遗址分布在全国各个区域，均有一定的时代类型代表性和典型性，都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特点，但总体来看规模都偏小，性质内容也不尽相同，或以农耕为主，或兼有手工业和商业，或是单纯的交通型聚落，不一而足。整体来看，这些村落遗址的选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所区别，除了受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这可能与人口密度、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风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

二、秦汉村落的规模与形态特征

一般而言，村落在形态上可以分为集村与散村两种形态。前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村落，它由许多民居建筑集合在一起而形成明显的集聚形态，规模也有不同，以户数和人数来计，大者上百户、上千人，中者几十户、百人至数百人不等，小者几户、几十人不等。集村的总体特征是密集居住，以道路互通、溪流、水塘或其他公共建筑等为标志或纽带，形成村落的聚合性特点。后者又称散居形式，住宅零星分布，聚合性不如前者明显，一般靠近农田、山林、河流湖泽。住宅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依赖关系，有些散村甚至仅为一家一户的独立农舍。本质上来说，区别两者的关键，并不是人口的多寡和空间规模的大小，而在于住宅之间及其与田地、山林和河流湖泊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紧密度。聚合和离散的倾向是判断两者的关键要素。正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家阿·德芒戎在《农村的居住形式》一文中所说：“在村庄（集村）的景观中，房屋群聚在一起，这多少有点加强了耕地上的孤寂感；村庄与其土地似乎是截然分开的。在散居的景观中，房屋不远离耕地，房屋相互间的吸引力，远小于房屋和田地之间的吸引力。农庄及其经营建筑物都建在田地附近，而且每块耕地

的四周，常有围墙、篱笆或沟渠。甚至那些被称作小村（hameau，Weiler，hamlet）的小房屋群，似乎也应当一般地看作散居的形式，因为它们几乎总是意味着房屋和田地是靠近的。”^[19]就村落的内涵来说，集村无疑是村落的典型形态，也是讨论的主要对象，而散村或散居形式则因代表性不够而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在村落史的讨论中，这两者都应该而且必须纳入研究视野，因为只有这样，研究才能真实反映村落的生成与发展。尽管这些研究反映的可能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村落形态，或者体现的是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区域村落的特征，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而言，我们完全有可能从中窥见村落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结构，并由此反映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某些关系。

（一）秦汉村落的规模

村落的规模，是指村落的外在形态大小和内在人口的多寡等内容，它是衡量地方社会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人文景观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村落构成要素、结构与布局、房屋建筑形式与构造等内容的关键前提。因此，有必要对秦汉时期村落的规模进行梳理，尽管有关于此的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匮乏，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仍可大致做一些有史料物证依据的推测。

1. 村落的人口规模

村落的人口规模，是指一定时间内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存在状态。一般意义上，人口的分布状态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国家关于人户的统计，带有强烈的行政意义，反映的是行政编制单元内的人口规模与分布；二是人户的实际存在状态与地理分布，由于居住地类型和地域环境的不同，其人口规模是有差异

的。譬如山区、平原、城郭和乡村等，特别是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其人口的自然增长或削减，更是国家难以控制和统计的。人口学者曾对西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进行过统计，发现当时的人口分布是极不均衡的，譬如，今河南省地域，拥有人口1 298万，占全国人口的22%以上，而其占有土地面积仅为汉代国家土地面积的1.74%，相当于每平方千米77.7人。除山东、河北、四川、安徽、陕西、江苏、山西等以外，余下地区人口大多在200万以下，有些甚至不及100万。^[20]正因如此，要准确判断村落的人口规模是有难度的。

在这里，作者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秦汉村落的人口规模做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文献中关涉村落人户数量的记载，没有直接表述，但如前所述，汉代呈现出“里聚合一”的现象，国家层面尽可能在一里设置一聚，尽管在广大乡村地区会有例外，但至少可以说明，作为行政编制单元的“里”与作为自然聚落的“聚”，在规模上有人户相当的可能性。我们不妨以“里”为突破口稍做论述。《汉书·晁错传》曰：“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按此理解，大致5户人家编为一伍，50户就为一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东汉何休注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意思是80户为一里，8户共一巷。《后汉书·百官五》曰：“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此处则“里”有100户。这些文献对“里”人户数量的表述均有不同，差距很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居住类型、地域和时间有关。首先，在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如河南，人口密度就很大，无论是“里”，还是自然聚落的村落，其人户数量更多的可能性大，反之，则人户数量更少的可能性大。其次，居住于城郭的人数相对集中，里的人户数则相对较多，而乡村地区，地广人稀，“里”或村落的人户数则相应要

少。最后，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在不同阶段因各种原因会有增减的变化，这属于非常正常的情况，但也会因此影响文献的记述。

一般情况下，里或聚的人户数在数户至数十户之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41个里之中，可确认户数的有16个里，户数参差不齐，其中上蛇里23户，子里30户，□里□十户，□里53户，淄里13户，虑里35户，波里17户，沙里43户，智里68户，乘阳里17户，□里□六户，垣里81户，沛里35户，路里43户，□□□十四户，郃里□□□，瘞里57户，资里12户，龙里108户，蛇下里47户。上述户数中，龙里是《驻军图》户数最多的里，次者垣里、智里，较少者如波里、资里，其他多在40户左右。《驻军图》平均户数在40~50户之间。^[21]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所载，郑里廩簿共登记仅25户，如若加上没有贷粮的民户，其户数在30户左右的可能性比较大。^[22]《汉书·张安世传》亦载：“（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国家层面对“里”的设置，也基本以30户为规模。这一户数情况，特别是《驻军图》所见户数，虽然反映的是汉代南方地区聚落的人户规模，但也对汉代全国范围内乡村地区的村落有一定的说明性。汉代村落户数可能普遍在40户左右。

文献记载显示，上百户乃至数百户不等的汉代聚落也是不少的。《尹湾汉墓简牍》记东海郡“县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若按此测算，平均一里大概105户，其中大者达数百户甚至以上。《汉书·武五子传》载，汉宣帝即位以后，于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追谥其祖父戾太子刘据，云：“‘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阆乡邪里聚为

戾园。”由此来看，戾园守者可能在200户以上。又如《居延新简》载：“□□郡县乡聚移徙吏员户（E. P. T40：46）。”“亭长廿一人，受乐成侯国三人，凡廿四人。凡亭以下五十人，受乐成侯国四人，定长吏以下五十四人。乡八，聚卅四，户七千九百八十四，口万五千七百卅五（E.P. T50：3）。”^[23]这两处简牍文献，既记述了汉代亭、侯国官员的数额配备情况，也记述了44聚的户数情况及可征兵员的人数。按照“乡八，聚卅四，户七千九百八十四，口万五千七百卅五”的简牍记载，8个乡44个聚，共7984户，可征兵15735人，即每户平均2人服兵役。又按44聚，每聚181.5户，如每户5人左右，则人口有900余人。

除百户或数百户的里聚之外，还有千户的大型聚落。《汉书·史丹传》记：西汉成帝即位后，“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武强聚显然是一处巨型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落，相反可能属于县或乡的治所所在地。这种大型的聚，可能又会依据户口的多少划分为若干里或小聚。^[24]东汉后期，也见有千户聚居的现象，如董卓之乱中，“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荀）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25]《三国志》中载：田畴也曾“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26]。韩融将“千余家”宗亲避乱于山中，以及田畴遂宗族“数百人”入徐无山，虽然不一定是村落，但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军事自卫性质的坞堡，当有山地聚落的意义。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村落，在人口规模上，可能普遍在30~50户，少数在百户以上，千户或千户以上也有存见，而且这应该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如局势动荡下才会产生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村落在内的各类聚落的人口数量，也并非固定不

变，它是动态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或许是扩展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则可能会缩减。就一般情形与意义上而言，随着人口的增长，村落会发生变化，或是扩大规模，或是派生新的村落，因为当一定区域范围的土地不足以满足人口的日益增长时，便只能另外开辟新地。当然，还有人口的迁徙，也会导致村落人口规模的增长或缩减，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2.村落的空间规模

村落的空间规模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村落所占面积的大小和呈现状态。秦汉时期村落的空间规模到底如何，虽然很难从文献记载中得知，但所幸考古发掘的村落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的实体样本。

上文中介绍了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区域汉代聚落遗址调查情况，在2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76处，除去5处为墓地，尚有71处聚落遗址，其中包含汉代或单纯为汉代遗存的遗址有41处。除其中1处面积不详以外，依据面积大小划分，这批聚落由大到小可分为4个等级：最大的遗址有2个，面积在28.5万~30.1万平方米；中型遗址有3个，面积在6.7万~9.1万平方米；中小型遗址有14处，面积在1万~4.9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以下的为小型遗址，有21处。其中面积较大的黄土城遗址和赵庄遗址，使用年代在仰韶早期直至汉代，虽然未见有城墙遗迹，但仍不能排除它在汉代属于县邑或乡一类的区域性聚落中心的可能。其余面积的聚落，可能绝大多数为普通村落，大者也不过9.1万平方米，普遍在5万平方米以下，而且面积在300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遗址数量最多、最为常见。从数量上说，5万平方米以下的普通聚落，占比率达85%。[\[27\]](#)不仅如此，小型遗址所见住宅数量也很少。这些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秦汉时

期，作为人口密集之地的河南，其村落的空间规模普遍在5万平方米以下，尤以数千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为多；另一方面，大量的小型聚落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散村数量不少，而且可能是早期村落发展的一种主要形态。

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人口密集程度很高的中原地区，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秦汉边疆地区情况也大致相当。譬如，云南地区。2008年，中美联合考古调查队对云南滇池盆地东南部近湖冲积平原和台地区域聚落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汉代在此所设益州郡的周边密集分布着规模大小不同的文化点。[\[28\]](#)64平方千米的区域范围内，有43个遗址，其中25个属于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范畴，时间跨度在春秋至西汉末年，9个包含石寨山文化和汉文化，还有5个仅发现东汉的陶片和瓦片，其余4个为墓地。根据遗址的规模大小，这些遗址可分为4个等级：面积最大的遗址是汉代的晋城镇，约63.7万平方米；次者为面积约31.6万平方米的河泊所遗址；三级规模的遗址有7个，其中面积为3万~5万平方米的3个，7万~10万平方米的4个；余下34个为小型遗址，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以下。依据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些聚落遗址明显体现出两个聚落群，一个以河泊所为中心，沿湖岸分布；另一个以古城为中心，分布在大河冲积扇盆地。前者所处6.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16个文化遗址，除河泊所遗址以外，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以下。其中，小平山遗址面积约7.4万平方米，发现有灰坑、用火遗迹、沟、柱洞、半地穴式房屋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遗物。后者位于富饶的大河冲积扇盆地，除古城遗址外，还有面积大约为1.7万平方米的海宝山遗址和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的5个小型遗址。由此来看，大型聚落可能是秦汉时期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于中心聚落，而小型聚落则在其周围环绕分布，属于村

落。

除上述河南和云南地区的村落面积情况以外，上文中所介绍的村落遗址，譬如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宁家埠遗址为5万平方米、章丘黄桑院遗址为10万平方米，河北南良都遗址为2.85万平方米，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为1.2万平方米，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为750~850平方米、张家港小山村遗址为2.7万平方米，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为1万余平方米，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为12万平方米，等等。这一系列数据表明，秦汉时期村落的面积规模是有大小差异的，其中20万平方米以上的少见，这类村落的地位与性质一般较为特殊，或为治所所在地，或兼有交通、商业等性质；村落的普遍规模则在10万平方米以下，而且尤以5万平方米以下的最为常见，这类村落的性质较为明确，以农业型聚落为主。

村落的面积大小固然与其地位和性质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人口数量、地理位置和土地面积等因素。一般意义上，人口数量多、地理位置开阔、土地面积充足的村落的面积就大，反之则小。当然，再大的村落的面积也是有限的，因为耕种土地和人们的耕作半径都是有限的。总之，考古所见村落的面积规模显示，与城郭聚落相对的一类普通聚落（村落），在秦汉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先秦以来散村发展的趋势。

（二）村落的形态特征

关于村落的形态，上文中已指出，它是指村落的平面布局及其构成要素，即构成村落的民居建筑、庭院、畜圈、广场、道路、沟渠、绿化，以及用于商业、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公共设施等。很大程度上而言，通过对村落可视形态的梳理与还原，可以

更好地审视和理解古代中国乡村的文化、社会与生态系统。美国学者威利（G. R. Willey）早在1953年就指出，“……人类将他们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式。它包括房屋、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与共同体生活有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表现的技术水平，以及该文化所拥有的各种社会互动和社会控制制度。聚落形态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普遍的文化需求所决定，因而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解释提供了一个策略上的出发”[29]。后来，美国学者欧文·劳斯（Irving Rouse）进一步指出：“聚落形态是指一群人的文化活动与社会机构在地面上的分布方式。这个形态包含了所有三个系统，文化的、社会的与生态的，并提供了它们之间关系的记录。”[30]正因如此，展开对村落形态的蠡测就显得尤为必要。

1.村落的布局

布局是决定村落外观形态的关键，也是影响村落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一般意义上，布局涉及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村落选址，二是空间布局。前者是后者得以展开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拓展与改良。其实，这两者均是村落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审视与了解古代中国村落的主要方面。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有规划，而村落则没有，它属于自然生长而成的聚落。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客观的，至少是片面的。诚然，村落不如古代城郭一样，有着整齐划一、协调一致且富有政治、文化内涵的规划模式，更不会像《周礼·考工记》所云营造城郭的制度典章，即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31]，但是，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史前至秦汉的村落遗址表明，早期村落是有规划的，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营造者的规划思想。

在选址方面，考古资料显示，秦汉村落与史前以来乃至后世各历史时期村落的选址规律相似或基本相同，如近水、视野开阔、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一般来说，如果是在平原或盆地，则村落多位于台地和近水源处，呈块状分布。譬如，位于黄河下游平原的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由4处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迹组成；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地表则以农田为主，间有河渠分布。如果是在丘陵山地，则村落多出现在山前平地，或沿河谷地带呈带状分布。如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就属于依山临水的村落，它由东而西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农耕性质的村落，都位于近水和近农田处。这些证明了早期中国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认知观点。这一选址规律也说明，先秦两汉时期的“庐”有发展为村落的可能性。与古代城郭选址的不同在于，村落的选址是基于生存的驱动，而少有或根本没有考虑选址的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其首要或者根本目的是更好地生产、生活，因而占有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物产资源，便成为村落选址的关键要素。正因为这一美好愿景和现实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在村落的选址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套由多方面功利要求和文化理念组合而成的成熟选址与布局思想。比如，防御或者军事上的一些需求，在一些特定地域的村落选址规划与建设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和反映。

根据考古资料，秦汉时期的村落，在选址位置上依据距城郭的远近，还可以分为城郊型村落、远郊型村落、垦田型村落和其他型村落等几种类型。城郊型村落是指环绕城郭而分布的村落，位于城郭周边，距离城郭很近。譬如，河北元氏故城周边区域发现的14个汉代聚落遗址就属于此类，它们主要分布在距城较近的城东北、城东和城南地带，半径范围仅2千米以内。[\[32\]](#)又如云

南滇池盆地东南部汉代益州郡周边发现的规模大小不同的43个文化点，其中16个以河泊所聚落遗址为中心，沿其四周密集分布；另外5个则以古城为中心，展开分布。[33]这些小型聚落环绕于大型的中心聚落周边，显然属于城郊型村落。最为典型的当为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它作为汉代东北边疆地区的村落，位置上距离辽东郡襄平县北郊仅1.5千米，无疑是城郊型村落。[34]远郊型村落的性质相对模糊，兼有农业、商业和交通等内涵，它与农田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譬如，四川雅安的大地头遗址，虽出土汉代房基12处，但未见农业生产工具，可能并非农耕性质的聚落，而不排除其是一处服务商业交往的交通型的聚落遗址，因为它正处于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区。[35]河南遂平县小寨遗址也极具代表性，它在汉代属于汝南郡吴房县，即今遂平县县城一带，距当时的县城仅13千米。[36]垦田型村落的性质明确，其以农耕业态为主，所见遗物表现为农业耕作、桑蚕种植和家畜饲养等。具有这一特点的村落遗址，有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37]、河北永年榆林遗址[38]和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39]等。这些遗址中都出土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碳化的粮食作物和动物骨骸等。还有一类其他型村落，主要是指那些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丘陵和河湖密布地区的村落，譬如南方丘陵地带和重庆、湖北、湖南等沿江、沿湖地带的村落。

在布局方面，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这些不同性质类型的村落往往因地制宜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差异较大，有些集中布置，有些则分散，还有些是带状形态，等等。某种程度上而言，通过村落布局，既可以了解自然环境对村落的影响，也可以认识和理解古代村落的社会组织与生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指出：“聚落布局透过随意性和规整性，一方面反映活动布局，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组织关系和精神生活的一条重要线

索。”^[40]美国学者欧文·劳斯将聚落分为分散形态、集中形态和共生形态三种。分散形态是指人类的行为点广泛分布于地面，这与族群分裂和游弋生产生活有关。集中形态是指遗址内部包含一套相同的行为点，居住群集中在一个地点。共生形态则是局部的形态，理解人群活动必须将其拼合起来。^[41]这三种形态固然有助于从考古学层面审视和理解村落形态，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空间布局的问题。

相比中国古代城郭，村落的布局相对自由灵活、不拘一格，但这并非说村落的空间布局就是杂乱无章的。通常来说，包括汉代村落在内的古代中国村落的布局，都以适应自然为主要特征。所以，很大程度上，汉代村落的布局特点，就是因地制宜、与自然相生的相对自由的布局形式，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格式或者范式，自然环境要素往往成为考察与考虑的先决条件。《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对人居环境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东晋名士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表述了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居住环境：“观风瞻云，方知厥所。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赭楣，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东晋去汉代不远，尽管谢灵运所描述的居住环境带有强烈的文人理想，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魏时期的人对村居环境的追求。正因为汉魏文人这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居住愿景，后来衍生发展出了园林。可见，园林的早期发育和发展与村居环境要求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根据地形地貌来区分，汉代村落较为常见的有平地村落和山地村落两类，每类村落的布局，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会呈现出不

一样的特点。平地村落是指建于地势平坦之处的村落，多位于平原地区，地势开阔，因而布局相对集中，或是方形，或是圆形，或是不规则形，呈团聚状分布。譬如，河北永年县的榆林遗址就地处冀南平原，面积逾2 000平方米。[42]河北井陉县南良都遗址虽然位于山区，但由于建于地势平坦的近河阶地上，属于平地沿河型村落，其平面呈近方形，遗址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50米，集中分布有房址3座和道路1段等。[43]河南遂平县小寨遗址也属于平地村落，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有道路8条、水井28眼，而且布局很有规律，道路于东南向与南北向排列，水井则沿东西向6排排列，布局十分密集。[44]山地村落是指位于山坡、高地之上的村落，一般沿缓坡的等高线布局，或呈内凹状，或呈外凸状。这类村落主要在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湘西等区域，但考古发现较少。目前考古所见秦汉时期的这类村落，较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城大树镇大瑶村的大地头遗址，其地处大渡河南岸、花果山北麓的坡地上。[45]一般来说，平原盆地多为平地村落，而丘陵山地则多山地村落，这是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位于平原地区的都是平地村落，山区村落便是山地村落，因为平原亦有高地，山区也有平地。所以，判断要以村落所处的位置作为依据，即如果所处是平地则为平地村落，若是山地则为山地村落。

除上述两类村落以外，事实上，还有一类村落，它们沿江、沿河、沿湖，并按江湖地形展开布局。譬如，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的李家坝遗址，地处三峡库区地带长江北侧支流彭溪河左岸的台地上，遗址所在台地中部有两条小冲沟将台地分成三部分，由东而西可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依山临河。江苏高邮市北郊的邵家沟遗址[46]、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也都属于此

类。

总体来说，平地由于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村落的规模相对较大，并且团聚性强，而山地由于地形限制，不利于村落的规模化发展，往往分散布局，集中性不是特别强。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由于平原较多，因此村落布局较为规整，且规模一般较大，而南方地区丘陵山地多，面积大的平地较少，耕地分散，所以聚落规模通常较小，且相对分散。

2.村落的建筑

建筑是村落构成的主要内容，也是村落形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加拿大理论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B. G. Trigger）1968年在其论文《聚落形态的界定》中就列举了影响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包括单个的建筑物、社区的布局 and 地区性的形态。其中建筑物涉及的内容，包括生存的系统控制、建筑材料的利用、环境、技能和技术、家庭结构、财富和等级的差异、其他社会制度和特殊需求、生产的专业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世俗的品位和时尚。^[47]这也意味着村落建筑的形态、结构、用材、功能和技术等有形与无形的历史信息，是了解和探索古代村落社会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关键线索。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的村落建筑有民居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以民居建筑为主。

民居建筑一般由大门、院墙、门房、居室、厢房、厨房、水井、厕所和畜圈等组成。考古所见的民居遗迹，最为典型的当数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发现有4处较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迹，均为庭院式建筑，包括院墙、正房、厢房、门房、院前水井、畜圈、厕所等部分，有些还有水池等遗迹。根据复原推断，三杨庄汉代民居，当为抬梁式建筑。^[48]另一处代表性的村落建筑遗

存，是辽宁辽阳市三道壕遗址。遗址发现有居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铺石道路2段。其中除第一处居址没有畜圈外，其他居址的基本配置，均由居住空间、庭院、水井、厕所土沟、畜圈、窖穴等构成。有些宅院遗址的中间和附近，还分布着砖窑址和卵石路。上述两处遗址，反映的是北方地区的村落建筑，而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则代表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村落建筑形态。于遗址中共发现东周至南朝时期房址50余座，还有数百处灰坑、沟、道路等遗迹。遗址中所见西汉建筑，主要是台基式房屋，平面呈“凹”字形，由正房、厢房、廊道和门道等构成，属于庭院式建筑。26个柱础有序排列显示，其建筑可能是木结构的房屋。

关于民居的建筑形制样式，我们还可以从考古所见秦汉时期的建筑明器和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民居图像获知。西汉时期的庭院建筑，较具代表性的有两座陶制庭院明器，分别于1959年出土于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和1981年出土于郑州乾元北街空心画像砖墓。作为明器，这两座陶院落虽不能排除有改良的可能性，但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汉代民宅的真实面貌，毕竟明器的创作是不可能超越现实太远的。前者陶房，由门房、仓房、阙、正房、厨房、厕所和猪圈6个单体部分组成一所封闭的四合院式的住宅。其中，大门向北，门房的东侧有一高大的阙；院的右侧为仓房，左侧为厨房；院南与门房相对之处为正房，正房西侧有厕所，厕所下方有猪圈，有围栏，圈中卧有一陶猪；厕所房顶置有鸡和鸡雏共8只；房屋和院内还有陶灶、铜洗、釜、甑等生活用具；还有一陶狗位于院的中央，头向门外。^[49]这俨然是一幅汉代农家现实生活的写照。1981年出土于郑州乾元北街的陶院落建筑明器的结构与前者相似，也是一个严整的四合院。^[50]门房为硬山式单层建筑，房顶有突起的瓦垄；门开于前壁偏北，有门

槛。阙楼为高台四阿式建筑，两层，平面近方形，阙底大上小方柱状，四周开方孔，与厨房连接，孔内有象征性阶梯通向阙楼；在方孔和房檐等周围有带状朱彩绘饰。厢房为悬山式高台建筑，平面近方形，台基与房体可分开；门下有5级台阶，正上方有两个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棂窗，装饰与阙楼、门房同。厨房为悬山式单层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后壁并排开三个方形窗孔，两山墙各开门窗，有朱彩绘饰与前同。仓房为悬山重檐高台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它由台基、仓层、仓楼三部分组成；基座四壁中各有一圆孔，内侧北端有8级台阶，与仓房内壁上18级台阶连接，形成转角楼梯，从重檐下小门通仓楼；仓房下部两侧各有一圆孔，仓楼前壁开三个方孔，后壁开七个三角孔，两山墙各开一方形窗孔，有彩绘与前同。猪圈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墙。

东汉时期的庭院建筑，较为典型的有河南洛阳张茅汉墓绿釉陶院落、陕西勉县老道寺1号汉墓陶院落、陕西华县馆藏陶院落、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墓绿釉陶院落和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彩绘陶院落等。其中张茅汉墓绿釉陶院落属于东汉早中期，院落呈近方形，分前、后院。前院的门房为两面坡，前后皆有楼阁，还有磨坊等建筑内容；后院为猪圈。左右两侧后墙为矮墙。^[51]老道寺1号汉墓陶院落由19个单体建筑组合成一个四合院，包括由宅门、院墙、左厢、右厢、正楼为单元组成的主体四合院和由偏门、用人房、蓄圈为单元组成的偏院，这显然是一处大型的民居建筑，当为富裕人家的住宅。宅门为悬山式，正脊两端翘起做鸱尾，脊面盖筒瓦、板瓦，大门为两扇平板式对开门。右厢由三楼和望楼4个单体建筑组成。一楼为平顶式，斗拱结构，阔两间，外间正面开门，里间楼顶有楼梯口可登望楼，里间正面外壁有斜方格窗。二楼的形制与结构相当，里间平顶中部有楼梯口可登三楼。三楼为四阿顶，有两间，正脊两端斜翘为鸱尾状，屋顶

铺有筒瓦及板瓦；房正、背面外墙壁上有斜方格窗；里间底部有楼梯口与二楼相同。望楼阔一间，高两层，为单檐悬山式建筑，位于一楼平顶的楼梯口，为一、二、三楼出入的必经处。左厢由仓房和活动梯组成。仓房为悬山式，大三间，两层，正面有扶手楼梯，楼梯上有平台，梯上下各有一单扇平板外开门，当为仓房出入口；活动梯位于仓房下层门护框上，当为出粮时上下使用。正楼由四层组成，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为四阿顶重檐三滴水建筑。一楼顶与房四面脊的直线平行拱起，形成四坡面顶，平顶有楼梯口可登二楼，房面以筒、板瓦覆盖；二楼长方形直壁，有楼梯口与一楼连接；三楼结构与一楼同；四楼为四阿顶，正脊两端做鸱尾，房面盖筒、板瓦，有楼梯口与三楼相通。偏院在主体四合院的左侧，从主体院左后院墙的偏门出入，其中用人房为悬山顶，三间房。另见有水田模型和水井模型等。[52]

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彩绘陶院落的规模与老道寺1号汉墓陶院落相当，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其是庄园建筑，即便如此，其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汉时期的民居建筑形制。于庄汉墓彩绘陶院落模型分为两大部分：东部为陶院落，西部为田园。院落为三进院落，即前院、中庭和后院。前院由门厅、大门和马厩组成。门外东西两壁绘有男女人物主题的壁画；马厩位于门厅两侧，与大门一样为“人”字形的硬山式建筑。中庭由二门、门楼、左右角楼、右侧仓房及粮仓、厕所、左回廊及走廊、后门厅、阁楼组成。门楼为庑殿顶，每面均有长方形窗和格子窗；二门的两边有相对的四层角楼，第二层与二门门楼和厢房相通；角楼在厢房的上方，有两层；东厢房下有廊房，西厢房下为仓房；中庭的主体建筑建于高台之上，为重檐庑殿顶，殿内有乐伎和用人等。后院有猪圈、厕所、厨房、用人房等。院落右侧为田园模型。田园前、后有门，中有水井，井后有水沟，可能是用于灌溉；园内南部是旱

田，共22垄，中间有灌溉沟渠和土埂。[53]相比上述两种大型庄园式民居建筑，河南陕西华县馆藏陶院落、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墓绿釉陶院落的规模要小很多，可能属于一般人家的住宅建筑，都属于宅院建筑。前者院落的前部左右两侧为厨房、磨坊及带护顶脊瓦的三层台围墙，宅院左右两侧为悬山式房屋，后部右侧是四面坡顶两层楼房，左侧为院墙、厕所和猪圈。[54]后者由门房、主房和猪圈等组成。[55]

上述两汉陶院落建筑明器均属于北方地区，体现的是北方地区的庭院建筑形式，不能反映南方地区的建筑特色。梳理秦汉考古，可以发现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等地区，也大量出土包括住宅明器在内的汉代建筑明器。所见民居建筑包括平房、杆栏式建筑、庭院、三合院和曲尺形5种类型。除这些住宅建筑以外，南方地区所见建筑明器，也发现有仓房、厕所和城堡形建筑等。

平房多为单体房，平面呈长方形，悬山式屋顶，正面开门，门两侧有窗，或为镂空花窗，或为直棂窗，通体刻画有仿木构架纹饰。模型主要有1955年广西贵港火车站宿舍17号墓和1957年贵港南斗村3号墓出土，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两件陶屋。另有带横廊的单体式民居建筑，譬如1994年出土于广西贵港孔屋岭的陶屋，其门前有一横廊，廊沿有矮围墙。[56]杆栏式建筑是南方地区的主要建筑形式。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便有了杆栏式建筑，其形式一般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和堆放杂物，主要流行于广西、云南、贵州和湘西等地区。考古所见汉代南方地区的陶屋中，就有大量这类杆栏式形制的居住建筑。这不仅充分说明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特色，而且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南方民居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1972年广西平乐银山岭东汉墓出土的杆栏式陶屋，就是典型的上居人、下圈养牲畜的结

构。上层为单体房屋，正面侧边开门，门两侧为直棂窗和斜菱形格子窗；下层基座镂空，可能表示梁架结构，畜舍为露天矮墙，顶部有屋檐，正面右侧有一拱形窦洞。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1988年于广西合浦县猪岭廉州母猪岭出土的杆栏式建筑，整体结构与前者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上层房屋的平面为曲尺形。广东地区也见有类似的汉代杆栏式建筑明器。^[57]此外，还有吊脚楼结构的杆栏式建筑。与前者不同，吊脚楼的屋底用柱足来支撑，广东乐昌便出土有1件一厅一房双重檐的杆栏式住宅模型。^[58]

考古所见的院落建筑明器多出现在北方地区，一般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南方院落建筑明器则主要是一体式建筑，不可拆卸，包括一进四合院式楼阁建筑、一进三合院式楼阁建筑 and 一进曲尺形合院式楼阁建筑。其中一进四合院式楼阁建筑一般由前屋、后院、左右厢房、天井和厨房等部分组成。通常情况下，前屋与厢房均为单体平方建筑，后屋作为主屋，为两层楼阁建筑。1989年广西合浦县环城乡红旗岭出土（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陶院落就属于这种形制。除上述配置以外，其一楼后门墙根处还有一椭圆形窦洞，为狗窝，院落的左后角墙根也有一圆形窦洞，当为家禽舍。一进三合院式楼阁建筑由前屋、后屋和一侧厢房组成，1957年广西贵港粮食仓库出土的“歹人青□”铭文陶院落就具有代表性，其陶楼为前屋、双层楼阁式后屋、左侧围墙及右侧厢房组成的三合院。^[59]一进曲尺形合院式楼阁建筑平面呈曲尺状合院式正方形，典型者如广东乐昌大拱坪东汉墓出土的陶屋，其厅左连接一房，余留一空间，外筑一堵矮墙相围，组成一房、一厅、一院落的布局。房、厅上方又续筑一房一厅，上还覆筑有阁亭。^[60]

曲尺形民居和三合院式单层建筑也较为常见。前者平面呈曲

尺形，由主房与或左或右的厢房组成。主房正面有门，两边通常有镂空直棂、菱形窗等。1954年广西贵港东湖新村13号墓出土的陶屋和1957年广西贵港南沟村8号墓出土（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陶屋都属于这类。与此稍有不同，另有曲尺形民居在主房与厢房相交的后墙处，用矮墙相连围成猪圈，如1994年广西贵港孔屋岭东汉1号墓所见的两面坡悬山顶陶屋。^[61]三合院式单层建筑为平底建筑，平面布局呈凹字形，由前屋、左右对称的厢房和后矮墙组成，矮墙连接的空间一般为禽舍。典型者如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于1955年广西贵港东湖新村1号墓和1955年广西贵港高中4号墓出土的陶屋。

大致看来，上述庭院及其住宅建筑，可以视作汉代民居建筑的主要形式。这一观点，除了可以从秦汉聚落遗址、遗迹和建筑院落模型等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图像史料亦可充分表明。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汉代画像中的庭院图像，包括庭院平面图和立体结构图两类。^[62]前者较难以看出院落的整体布局结构，但可大致判断院门的位置和院内建筑走向。譬如徐州铜山茅村汉画像石墓所见的庭院图，其规模较大，从右侧高大门阙进入庭院，院内从前到后分别有三座二层楼阁，中间楼阁最大，第三座楼阁还有带屋檐的阶梯。^[63]后者在东汉中南晚期的画像砖石和壁画等上所见较多。相比前者，后者描绘更加真实，能更好地反映民居建筑的形制和特点。大致来看，其平面布局结构有日字形、田字形、三进式长方形、曲尺形和多进式庭院等。这些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可以从沂南北寨村汉墓^[64]、成都羊子山汉墓^[65]、诸城前凉台汉墓^[66]、离石马茂庄2号墓^[67]和安平逮家庄壁画墓^[68]中所见庭院画像上窥见。

从考古所见的秦汉建筑遗迹、遗物和图像等来看，秦汉时期的民居建筑，固然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

但仍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并得出南北之间、阶层之间的一些差异性：第一，秦汉时期的民居建筑，北方地区以庭院建筑最为常见，而南方地区则多平房建筑、曲尺形建筑；第二，庭院建筑可能是相对富裕人家的居住房屋，普通百姓则更多地居住平房单体建筑等类型的住宅；第三，绝大部分民居建筑有畜圈等用于家养牲畜的附属建筑，厕所、畜圈等附属建筑多位于庭院或房屋的后院或屋后；第四，房屋布局反映了一定的等级或身份区别的观念，如主房、厢房和用人房的分别布置就体现了这一点。

秦汉村落中的公共建筑，一般有教育型建筑和宗教型建筑。用于教育的建筑，即学校，村落考古中虽未发现其遗迹，然而文献记载却显示，汉代曾于乡里办有学校。《汉书·循吏列传》记汉武帝时，为“奖励贤才”，既设有太学，也在郡国设立学校，并于“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朝廷将汉武帝以来在郡国设立学校的制度，进一步拓展到了郡、县、乡、聚。这意味着在县及县以下的地方乃至村落可能设立有庠、序一类的学校。《汉书·平帝纪》云：“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在乡的学校为“庠”，在聚的学校为“序”。在这里，乡、聚可能都属于比较大型的聚落。由此看来，汉代国家在乡、聚中设立学校，并不意味着在每个村落中都设立，而是有条件地选择在那些相对大型的、地位和性质特殊的聚落中设立。东汉以后，在全国各地办庠、序的情况进一步增多，《后汉书》中不乏相关表述。^[69]既然设有学校，也就意味着有因刚性需求而营建的相应的建筑空间。考古未见有学校一类的建筑遗迹，但汉代画像石中发现有学堂形象。尽管这类图像极为罕见，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汉代学校建筑的基本形式。如山

东诸城前凉台汉墓中所见的讲学图（见插图9），其学堂位于一座单独的院落内，有一屋和一长廊，屋为四面坡顶，其内有坐立者两人，一人身材高大，依案而坐，当为老师，另一人面向老师而坐，应为学生，其余均依序盘膝坐于院内者皆为学生。[70]

宗教型建筑包括社庙、稷庙、祠和佛堂等。社庙，是用于祭祀土地神的宗教空间。汉画像石中多见以树木为主位的建筑图，可能即为社庙。譬如，在郑州地区所见的几块画像砖石上就有这类图像，有的在一棵树的两侧设立双阙，有的双阙大门内立有树，有的则树在门楼内。[71]稷庙是祭祀五谷之神的，后来演变为祭祀仓神。在考古遗迹和汉画像砖石图像中，未见有明显可确认为稷庙的建筑。河南新郑画像砖所见图像中有仓楼形象，仓右侧方框内有作为社庙祭祀的树，树的右侧有一较大的带核的种子，显示这里应该不是一所普通建筑，而疑似为稷与社的合祭之处。[72]祠是用于祭祀先人的空间，目前考古发现汉代遗迹较多，典型者如山东肥城的孝堂山石祠和山东嘉祥的武梁祠。除此之外，由于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并很快渗透到了民间社会，因此在佛教盛行的地方也会出现佛堂一类的建筑。四川作为东汉佛教传播的主要区域，其画像砖上就发现有佛堂建筑。如四川什邡皂角乡出土的画像砖上就发现一座三层佛塔的形象。[73]

除上述民居建筑和公共建筑，秦汉村落中的建筑还包括驿站、作坊、亭榭等，但它们并非村落中的常见建筑。另外，还有广场、道路、沟渠和绿化等一类的村落景观。广场一般是村落的公共活动区域，几乎每个村落中都会有这样的空间。道路是沟通村落内外的必备设施，也是形成村落形态、构成村落景观的关键因素。考古出土的村落遗址中，不少发现有道路遗迹，有些道路的布局还十分讲究。河北井陉县南良都遗址发现有道路1段，河南遂平小寨遗址清理道路8条，后者道路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排

列，显示出明显的规划性，其中2条在遗址中部交叉为丁字路口，共同构成遗址的主干道。[74]沟渠一般用于宅院排水和农田灌溉，如安徽泗县刘圩遗址就发现有长条形的水沟7条。[75]绿化和其他景观也普遍存在于秦汉时期的村落之中。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清理的4处宅院，前后均发现有树木。其中第二处宅院东侧清理出一排4棵树木，树的间距在30~50厘米；宅院西北外侧即水池北部清理出20余棵树木遗迹，排列不规则，间距不等。第三处宅院后厕所外有南北两排不下10棵树的遗迹；最外侧也有一排不下5棵树的遗迹；东墙外侧有3棵。[76]从这一例子来看，汉代民居建筑的四周内外是种植有树木的，而且作为绿化景观，可能还有一定的讲究。

3. 堪輿学兴起对秦汉村落的影响

“堪輿”一词常被用来指代风水，是中国古代研究天文、地理的一门学问，广泛被用于城郭选址、住宅基地选址、房屋建造和坟墓定址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中国古代先民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朴素但深刻的体现。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房屋或坟墓的地址、方位，以及周边的山脉、山势和水流等，能影响甚至决定吉凶祸福。所以，堪輿学自起源之后，便伴随着“趋吉避凶”的社会愿景，在普遍应用于相宅、相墓的同时，带有一种强烈的超自然性特征，即今天所谓的“迷信”。无论何种说法，至少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堪輿”自产生以后，就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仅对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与布局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而且左右着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与布局、房屋住宅的选址与建造。

早期的先民以巢居与穴居为主，居住场所比较简易，仅求遮风避雨、抵御野兽等。如《周易·系辞》载：“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

居槽巢。”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先民对于材料逐渐熟悉，对于工具的掌握愈加熟练，于是步入了地面建筑营建的时期。各地自然环境不同，建筑材料有别，文化背景相异，因而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形式，彰显出浓郁的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随着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先民逐渐认识到，房屋的选址、朝向等要素对居住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于风水的原初认知。

在传世典籍中，“堪舆”一词始见于西汉的《淮南子》。其中的《天文训》一章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说文解字》中将“堪”视为天道，将“舆”视为地道。有堪有舆，才能与天地同道，堪舆学反映着中国人对环境的认知感受与平和的生活态度。后来，司马迁等人认为堪舆作为一种“术”，是由先期的占卜之术逐步传承分化而来的。[\[77\]](#)

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宗伯》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犹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岛，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78\]](#)按郑玄的理解，汉代以前就有了《堪舆》之书，只是亡佚了，他认为后人所作《堪舆》保留了古人的部分观点。郑玄的注解，还显示出另外一层意思，即在东汉时期，“堪舆”是与观察天地运行规律和星象占卜活动密切相关的知识。《汉书·杨雄传上》云：“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魑而扶獠狂。”按照颜师古引用的三国时期人孟康的说法，“堪舆”是“造图宅书”的神怪。[\[79\]](#)这表明“堪舆”的概念已开始与风水的观念连接起来，并应用于宅第的修建之中。

王充的《论衡·诂术》云：“图宅术曰：‘宅由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诂曰：……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比土为田，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接界相连。不并数乡、亭，独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独立于民家也？数宅之术□行市亭，数巷街以第甲乙。”《论衡》又引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论衡》征引图宅术说法的目的，本是责问，即所谓“诂曰”。但也正因如此，充分表明汉代社会已普遍盛行一种具有超自然属性的“风水”观，并深刻影响了民间住宅和商家店铺的布局与建造。《汉书·艺文志》中提及的《堪舆金匱》与《宫室地形》两书，虽然已失佚，但反映出风水观在汉代社会十分普遍，也显示出汉代堪舆理论已较为成熟。我们因此认为后世风水理论中有关理法与形法的分类大概肇始于此，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堪舆及堪舆学的兴起，显然影响了包括房屋的方位、朝向和布局等在内的秦汉村落的构成。其间虽然因为各种人为的附会被打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近代西方科学引进之后，它甚至被视为一种迷信观念不敢公开讨论，但是，其迷信色彩的逻辑背后，实际上是“趋吉避凶”的思想在支撑。所以，当代学术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的堪舆思想时，发现了它的生态学价值：“人和环境之间可以产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辩证关系，确乎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则不外乎以直观外推的方法意识到人、物与其所处环境（天地）之间并行不悖的依存关系。”^[80]因此，一些学者便将“堪舆学”或者“风水学”称为古代

一门有关环境选择的学问。[81]

堪輿规划的观念，实际上是要求独栋房屋乃至整个建筑群的选址、营建，都能够满足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生活、生产等多方面需求。如此方能够世代居住，繁衍生息。在大环境之中，村落在具体营建时还要考虑小环境的营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常都首选背山面水的环境。从实际生活来看，山可耕作，水可灌溉，能提供基本的自然生产条件，满足人的衣食之需。在此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进一步升华理论，则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对待。山是静的，水是动的，一静一动，则阴阳互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再来进一步细化每栋房屋的选址，乃至每个房间的布置。

此外，中国地处北半球，通常在村落选址时应选择“坐北朝南”的良好朝向。这并非具体某一栋建筑的建设朝向，而是北部的“靠山”应当能够为村落遮挡由北方吹来的寒风，即“阴风”；南部应保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便利的用水、避（洪）水条件。这样的朝向环境，也被堪輿学称为能够“藏风聚气”，自然适宜村落建设与长期发展。

传统的“堪輿”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村落环境中，具体体现在道路、民居、墓地的选址和规划布局上，集中反映了村落原住居民在实践关系之下的空间认知，体现着村落原住居民敬天法祖的自然精神，反映着村落原住居民的形象思维能力，同时在深层次中映射了中国人心理层面的审美文化取向。虽然直到近代西方规划学传入中国，才有了明确的“规划”说法，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堪輿就是环境规划，就是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与适应，营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环境。例如，村落排水的设计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湖南永州的河三岩村，是一个以明清传统建筑为主的传统村落，呈半月形在山脚下舒展开来，檐廊衔接，

起伏绵延。先民们在建造房屋时，把排水系统做到了极致。整个村落的排水沟，前后左右相通，上下首尾相连，水流畅通无阻。由于三面环山，植被丰富，是储存降水的天然“水库”，即使是连续干旱，也能保持源源不断的水流。房屋之间的宽阔道路，近1/3都是水沟，即使是天降暴雨，路面的雨水也能很快排泄到水沟中去。

在现代规划学正式形成之前，指导村落原住民进行村落选址、营建的，就是这一套堪輿学的思想。这些观念对各个区域村落营建、布局有着深远影响，综合体现了村落原住民对自然与人自身的尊重。民居建造的位置、朝向、观念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统筹在合天合人、有机灵动的朴素“规划”工作之中。可以说，堪輿学是选址与规划的理论基础，环境的选择和规划是村落建筑营造的基本任务，而建筑本身又是堪輿规划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

[1] 方辉、文德安等：《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25页。

[2]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宁家埠分队：《章丘宁家埠遗址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9页。

[3] 张昀、陈章龙、冉炜煜：《章丘市黄桑院遗址发掘简报》，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等编著：《常山郡元氏故城南程墓地》，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太考古队：《井陉南良都战国、汉代遗址及元明墓葬发掘报告》，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40页。

[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永年县榆林遗址发掘简报》，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26页。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学系：《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地区区域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9]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69页。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载国家文物局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4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8—66页。

[11]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12] 南京博物馆、张家港市文广新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局：《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第40—63页。

[1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5]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51页。

[16]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云阳县文管所：《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7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6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

[17]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83页。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大地头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19] 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页。

[20] 尚新丽：《西汉人口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73页。

[21] 根据整理简报统计。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

[22]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23]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8、151页。

[24]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2页。

[25] 《后汉书》卷七十《荀彧列传》。

[26]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田畴传》。

[27]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6页。

[2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29] Willey, Gonlon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u Valley, Peru Bulletin 155,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3. 转引自张光直著，胡鸿保、周燕译，陈星灿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30] 欧文·劳斯著，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31] 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二《冬官考工记·匠人》。

[32]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编著：《常山郡元氏故城南程墓地》，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 [3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 [3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大地头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 [3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 [37]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 [3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永年县榆林遗址发掘简报》，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26页。
- [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 [40] 张光直著，胡鸿保、周燕译，陈星灿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 [41] 欧文·劳斯著，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 [4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永年县榆林遗址发掘简报》，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26页。
- [4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太考古队：《井陉南良都战国、汉代遗址及元明墓葬发掘报告》，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40页。
- [4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 [4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大地头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 [4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47] Trigger, Bruce, "The determinant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In K. C. Chang, e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Palo Alto, Calif.: National Press, 1968, 70-71. 转引自张光直著, 胡鸿保、周燕译, 陈星灿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48] 白庆韬:《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民居建筑复原研究——以第二处庭院遗址为例》,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第68页。

[4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1年第1期。

[50]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乾元北街空心画像砖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51] 河南博物馆编著:《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52]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

[53] 骆崇礼、骆明:《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骆明、史磊:《淮阳出土西汉三进陶院落》,《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54] 史华:《陕西华县馆藏汉代陶建筑模型》,《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55] 叶小燕:《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贵港市孔屋岭东汉墓》,《考古》2005年第11期。

[57] 杨豪:《岭南秦汉遗民居住房屋述略》,《岭南文史》2003年第3期。

[58] 杨豪:《岭南秦汉遗民居住房屋述略》,《岭南文史》2003年第3期。

[59]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60] 杨豪:《岭南秦汉遗民居住房屋述略》,《岭南文史》2003年第3期。

[6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贵港市孔屋岭东汉墓》,《考古》2005年第11期。

[62] 李亚利:《汉代画像中的建筑图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3页。

[63] 南京博物院:《徐州茅村画像石墓》,《考古》1980年第4期。

[64] 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编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65] 于豪亮：《记成都羊子山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66]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67] 王金元：《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文物》2005年第2期。

[68] 赖非：《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版94。

[69]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建武二年（26年），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邦俗从化”。《后汉书·循吏列传》又云：建初元年（76年），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后汉书·寇恂列传》云：建武三年（27年），寇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

[70]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71] 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图254；张秀青、张松林、周到编著：《郑州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72] 薛文灿、刘松根编：《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73]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2·四川汉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201。

[7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7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局：《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

[7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77] 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载：“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

可。”《后汉书·王景传》中也载：“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78] 《周礼·春官宗伯》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79] 颜师古注《汉书·杨雄传上》：“张晏曰：‘堪舆，天地总名也。’孟康曰：‘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堪舆，张说是也。”

[80] 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81]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第四节

秦汉村落中的农耕文化

农业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基础，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形态。作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源自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的民俗文化，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是史前农业起源以来，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积淀形成的相对广泛的文化类型。它理所当然会包括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秦汉大一统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400多年的时间里，传统农业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其中耕地面积持续扩大，农业科技明显进步，农业生产种类明显增加。正是伴随着农业的高速发展，秦汉时期形成了具有历史延续性和时代特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突出表现在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工具、节俗与信仰文化等诸多方面。

一、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秦汉社会产生并形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它们作为物质文化，反映着秦汉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折射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信念和精神信仰，是秦汉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有力证明。

（一）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于劳作的工具或器具，因而又称为劳动工具。生产工具的内容和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与经济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起源阶段，以采集渔猎为生，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以石器、木器等为主。后来伴随着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了铲、镰、锄形器等带有农业生产特征的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和钻、凿、镑、斧、纺轮等通用性生产工具。原始社会晚期，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农业生产中开始出现青铜生产工具。战国中晚期，冶铁技术发展并普及，铁质农具逐渐取代其他生产工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农业生产得以进一步提升。秦汉时期，农业已从“掠夺性”原始农业走向“循环式”农业，即人们不再简单地依靠土地自身肥力，转而充分利用人们丢弃或产生的有机质废物来蓄养土地，实现农业生产。这一转变必然要求人工养地精细化。而实现这一点，除了加大人力投入和科学种植农作物，还需要根据新的生产要求改良或改进生产工具。所以，生产工具的出现与发展，既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

从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内容来看，秦汉时期的生产工具，大致可以分为农耕工具、纺织和编织工具以及其他通用性工具。

农耕工具根据农业生产的不同需要又分为耕耙工具、收割工具、灌溉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等几类。耕耙工具主要有耒、锸、铲、锄、镢、耙、犁铧等。

耒，作为农具产生于史前社会，属于一种翻耕土地的农具，通常被认为是犁的早期形态或前身。汉代仍见有被称为“耒”的农具。《盐铁论·刺权》中云：“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淮南子·主术训》云：“一人跲耒而耕，不过十亩。”这里的“耒”即指的是农具。耒的形制是一端为圆木柄，改进的则为

曲柄，一端为双齿或双尖。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中便有“神农执耒图”，图像中所见耒的形制与锛相似。

锛，属于锄具一类，其主要功能是翻掘土地。《汉书·沟洫志》云：“举耜为云，决渠为雨。”这说明锛是秦汉垦耕土地和修渠道的主要农具之一。考古发现如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现的凹口锛，其刃部呈尖圆形或三角形，体竖长。^[1]类似的锛在广州汉墓^[2]、西汉南越王墓^[3]中均有发现。较有差别的是洛阳烧沟183号墓出土的锛，其呈横长方形或倒梯形，刃口和两侧边均平直，为直口锛^[4]，辽宁锦西小荒地古城址也出土有形制相当的锛^[5]。有学者指出，要区分秦汉时期的耒与锛，关键在于有无铁套刃，认为“无金属套刃者称之为耒，有金属套刃者称之为锛”^[6]。铁套刃在汉代叫鑿，《说文解字》中云：“鑿，河内谓耜头金也。”^[7]《释名·释用器》云：“其板曰叶，像木叶也。”^[8]安装鑿的木板叫“叶”。这种形象，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铁刃木锛最为典型。从这些来看，秦汉时期锛的形制多样化，不仅有双齿，还有单齿或单板的形象，其中单板锛较为常见。

铲，作为农具主要用于起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商代始见有青铜铲，战国中晚期出现铁铲。铲尽管出现得很早，但有关它的文献记载直至汉以后才开始出现。《说文解字》云：“铲，鏹也。一曰平铁。从金，产声。”段玉裁注：“谓以钢铁削平柔铁也。《广韵》曰：铲，平木器也。”^[9]由此看来，“铲”字的出现，最初可能是用来表示“削平”的意思。直至后来，“铲”字才用于表示起土的农具。汉以前之所以没有“铲”的文献记载，可能也与此有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甚至先秦时期的铲。作为起土的农具，为了便于除草和松土，铲体一般是上部厚、下部薄，整体呈缓坡状，形状以方形、三角形和梯形最为常见。秦汉时期的铲，以铁铲为主，形体、尺寸各有差异。考古发

现中较为典型的有陕西长武丁家出土的8件铁铲[10]和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2件铁铲[11]。山西右玉县善家堡18号墓还发现有铜铁合金的铁刃铜铲1件。[12]

锄的功能主要是松土和除草，实物最早见于西周时期，战国秦汉继续沿用，后经不断改良便一直传用至今。锄的形制通常是横向安装木柄，锄体较薄，刃部较宽。汉代所见铁锄根据形制不同，可分为六角锄和鹤头锄等几类。六角锄的锄面呈六角形，体宽又薄，便于除草。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东平陵古城出土有2件六角锄，锄板顶端、肩和两侧均呈弧形。[13]鹤嘴铁锄是秦汉时期的改良品种，又称鹅脖式铁锄或鹤头锄，汉代刘熙《释名》说：“锄，助也，去秽助苗也……头曰鹤，似鹤头也。”考古学上称之为曲柄锄，即锄身呈梯形，锄顶部连有一曲柄，类似已弯曲的鹅脖，曲柄后段有銎，用于安装木柄。陕西临潼出土有1件曲柄锄。[14]与锄在形制与功能上相似的是“镢”，它出现的时间要早于锄，可能在商代甚至更早便已出现，其形体较长、大，有单斜面或双斜面刃，战国时代还有多齿镢。

镢是用于刨土的工具，根据镢銎方向的不同可分为竖銎镢和横銎镢。其中竖銎镢的形制与空手斧相同，体形为窄长方形，銎口形态各异，銎部尺寸等于或宽于刃部。如洛阳烧沟97号墓出土的镢，器型规整，整体窄长。[15]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湖南桑植朱家台汉代铁器铸造作坊遗址出土的几件铁镢，其镢体略呈铲形，刃部扁宽为外弧形。[16]横銎镢的体形呈长方形或梯形，近顶端部分有方形或椭圆形的横銎。洛阳烧沟33号墓出土有1件平面呈铲形的镢，为竖长方形横銎口[17]；与洛阳铲形镢的形制有异，河南巩县铁生沟出土的1件镢，其平面呈长条形或梯形，刃部为外弧形[18]。

耜主要用于平地碎土、耜土、耜草和整理耕地，至今仍是农

家必备农具之一。耙一般由木柄、耙头组成，耙头有齿，多为二齿、三齿、五齿耙。二齿耙即耙头为装有两齿的耙，也称裤形耙，两齿内外两侧呈弧形，有横釜用于安装木柄，木柄与耙成直角。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有1件二齿耙，背面平直，呈裤形，通长20.5厘米。[19]三齿耙即耙头装有三齿，形状与二齿耙相似，但横宽更宽。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东平陵故城发现2件三齿耙，其耙齿断面呈梯形。[20]五齿耙即耙头装有五齿，横宽，较为典型的如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出土的1件五齿耙，整器近长方形，耙齿呈长条形。[21]这类耙属于整地工具，还有一种性质类似但功能有所不同的工具“杷”。西汉史游《急就篇》中云“捃、获、秉、耙、插、捌、杷。”唐代颜师古注：“无齿为捌，有齿为杷。皆所以推引聚禾谷也。”[22]《说文解字》谓：“杷，收麦器。”[23]由此来看，杷或是用于晒谷场地面扒谷的农具，或是用于麦田聚割麦秆的工具，多以木、竹制作而成。直至今日，杷这种农具仍是农家的常用生产工具。

犁，是汉代农耕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农具，主要用于翻耕土地、松动土壤和开沟起土。为便于入土和发土，犁结构设计颇为讲究，其柄部弯曲，头部为三角形、椭圆形或菱形。铁犁一般由犁铧、犁冠、犁壁等结构组合而成，不同结构发挥不同的功能。犁铧耕地时安装在犁上，用来破土的片状结构，呈“V”字形、三角形或舌形，略带螺旋状，用时效果是土朝向一侧或两侧翻出，把下层土翻到地面上。根据规格大小和在实际生产中起到的功用，犁铧可分为大铧、中铧和小铧。大铧是大型的犁具，通常需要搭配数头牛牵引，适用于开沟做渠。目前考古所见的大铧，长、宽均达到40厘米以上。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1件大铁铧就属于这种形制，其长40.2厘米，釜部宽40.6厘米，背面较平，正面鼓起，铧头为舌形刃。[24]中铧的长度多在

30厘米左右，典型者如河北满城2号汉墓出土的1件平面呈舌形的铁铧[25]和陕西陇县高楼村发现的平面呈三角形的铁铧[26]。小铧长度在20厘米以下，刃部多呈等腰三角形，如陕西蓝田鹿原寨发现的小铧，长仅15.7厘米，刃部宽为10厘米。[27]犁冠多呈“V”字形，是套在三角形犁铧上使用的铁刃，其作用在于保护犁铧，并便于犁铧磨损后及时更换。汉景帝阳陵发现1件犁冠，正面有明显脊梁，整器呈“V”字形，高14厘米，双翼展宽24.2厘米，厚2.3厘米。[28]犁壁，又称鑿土、犁镜、犁耳，一般认为是西汉出现的新配件，是安装于大型犁铧上方后部的附件，向一侧倾斜，其功能是把犁起的土翻排在一侧。陕西咸阳赵家村出土的犁壁，整器呈板瓦形弧曲状，背面铸刻有一“田”字，长46厘米，宽24厘米；陕西礼泉王相村出土的则呈马鞍性，背面中部有便于固定的鼻钮，高22厘米，宽23厘米。[29]

考古资料为我们认识秦汉时期犁的真实形象提供了实物资料，然而要了解犁耕的使用方式却只能依靠犁的形制反推，没有直观性。汉代画像中牛耕图的图像资料，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图像显示，秦汉时期的犁耕方式主要为牛耕，常见为二牛抬杠式，还有一牛独挽和一马一牛并耕的形式。二牛抬杠式，其形象为二牛抬杠于前，一人扶犁于后，有些还有一人在前牵牛，或有人在一旁赶牛，如陕西米脂县城西官庄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墓画像石[30]、山西平陆枣园王莽时期或东汉早期墓壁画[31]、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绥德东汉画像石[32]等都属于这种形式。山东金乡县城东郊香城堙东汉早期的石椁墓画像石[33]，其图像为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旁赶牛，另有儿童在旁玩耍，场景性很强，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生产场景。一般来说，图像中犁的形式均为直辕犁，有双辕和单辕之分，以单辕犁较为常见。单辕犁即通过两头牛并排抬杠牵引

来实现耕地，双辕犁可能是在单辕犁的基础上改进，仅需在一头牛的颈部挂上两根辕便可实现牵引。就操作性来说，后者无疑更灵活，现在有些地方仍在沿用。

秦汉时期的收割工具主要有铎刀、镰刀等。

铎刀，作为截穗工具，整体平面呈半月形或长方形，通常带双孔，以便抓拿。云南昆明呈贡石碑村出土13件半月形铎刀，其背部有凸脊，刃部呈弧形，刃宽9~11厘米。[\[34\]](#)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2件形制相同、大小不同的长方形铎刀，其刀体较薄，背部有双孔，手握处较厚，断面呈弧形似板瓦状，背部嵌装到竹管内。[\[35\]](#)

镰刀是汉代最常见的收割工具，其形式有弯月形、直体形等几种，刃部较薄，装有木柄，其柄或铆接或夹装。根据刃部有无齿，可以分为齿刃镰和峰刃镰两类。前者为有齿镰刀，或为长条形，或为弓形。安徽寿县安丰塘闸坝遗址出土有长条形锯齿镰刀，柄端有一穿孔，目的是将其固定于木柄[\[36\]](#)；广州汉墓1117号墓发现的齿刃镰则呈弓形，基部有銎用于安装木柄[\[37\]](#)。锋刃镰的刃口一般为线形，有长条形、弯月形，有銎部用于安装木柄。河南鹤壁鹿楼出土1件镰，镰体呈弯月形，镰刃端为尖峰或弧形，通体长17.5厘米，宽2.3~3.8厘米[\[38\]](#)；成都龙泉驿发现有7件铁镰，其形制相同，刃部为内弧形，镰体背部为外弧形[\[39\]](#)；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有铜铁复合的镰刀，其銎部为铜铸，刃部为铁铸，镰体呈长条形，镰尖端为半圆形，通体长26.2厘米，刃部长18.5厘米[\[40\]](#)。秦汉镰刀一般安装有木柄，有些甚至有较长的木柄。如四川德阳出土的《芟草播种》汉画像砖上见有类似武器大刀的大型木柄镰刀[\[41\]](#)。新疆地区考古也发现了木柄镰刀，如新疆洛浦县山普拉II号墓地发现1件，镰刀柄的顶端插入后用细线缠绕并用羊皮捆扎，木柄长27厘米，镰体通长8.5厘

米，宽1厘米[42]。这些不同类型的镰刀，一方面表明秦汉时期的农业种植较为发达，另一方面说明生产工具的设计是以便使用为前提的。

秦汉时期的灌溉工具包括桔槔、辘轳、翻车等。

桔槔，在先秦时期甚至更早的商代便已出现，是早期农业灌溉的汲水工具。《庄子·天地》云：“（子贡）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洸汤，其名为槔。’”[43]槔是利用杠杆原理进行汲水的工具，其结构为在一根竖立的直木柱上增加一根细长的杠杆，中间为支点，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通过一起一落，实现汲水。作为先秦时期使用的传统汲水工具，在汉代仍被广泛使用，山东地区不少汉画像石上所见桔槔图就说明了这一点。如山东宋山小石祠东壁第三层画像石[44]、嘉祥县城南南武画像石[45]、临沂市吴白庄画像石[46]等图像上均见有桔槔形象。

辘轳，是古代水井的汲水装置。在汉代村落遗址中，几乎每个村落都发现有井眼，有些甚至有几十处，其中一部分井近农田，为灌溉用井，一部分井近聚居之地，为生活用井。辘轳的制作和广泛应用与汉代农业灌溉密切相关，是农业发展的产物。辘轳的形制是于井上竖立井架，架上安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有绳索，绳索一端系有水桶，通过摇动轴轮，使水桶从井中汲水，以用于灌溉或供人饮用。汉画像石中见有类似的辘轳形象，譬如辽宁辽阳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汉代壁画墓中的辘轳图[47]，图中有方形井栏，竖有双柱，双柱上建有井亭，二柱间有辘轳，辘轳系有绳索，上有水桶尚在井栏处；水井中央上方有一女子正拉绳汲水，井旁右方还放置有一盛水器。甘肃酒泉嘉峪关汉画像砖[48]、山东诸城凉台汉代画像石[49]等都有类似的“辘轳图”。此外，山东嘉祥[50]、江苏徐州[51]、安徽宿县[52]、陕西绥德

[53]等地所见的画像石上也都有清晰可辨的“轱辘图”。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中发现水井遗迹，其中出土“有方穿的压轱辘轴的碁石”。[54]这些图像资料和实物发现充分表明，轱辘在汉代被广泛用于汲水，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主要汲水工具。

翻车，作为一种刮板式连续汲水工具，是传统中国民间用于农田灌溉的水车。考古虽未见有汉代实物，但文献记载显示，汉代出现了翻车。《后汉书·张让传》云，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这里说毕岚发明了翻车和渴乌，但其作为灌溉用具的功能并没有描述。《三国志·魏书·杜夔》所载史料便有详细描述，其云：“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这充分说明翻车就是用于灌溉的水车。

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有石磨、碁、碓、碾和扇车等。

石磨，是用于粮食去皮或将粮食研磨成粉的石制工具。石磨通常由两个圆石做成，分上扇和下扇，两者结合面皆有纹理，研磨时粮食从上扇圆石的孔进入两层中间。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石磨是出土于陕西秦故都栎阳城遗址的战国晚期的石磨。[55]汉代石磨特别普遍，全国各地考古皆有发现，较具代表性的如河北满城刘胜墓[56]和河南洛阳中州路[57]出土的圆窝形坑状石磨；陕西咸阳长武县出土的旋转石磨，直径50厘米，单扇厚度8厘米，磨眼直径20厘米[58]。山东安丘白芬子乡探柳庄遗址[59]、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60]、河南淇县[61]等汉代遗址发现的石磨也具有典型性。

碁，也是去壳农具，形似磨，多以竹、木、泥制成，可能是在石磨基础上的一种改进，因为石磨一般将粮食碎成粉末，并不利于去壳。

碓，即杵臼，用于脱壳的粮食加工工具，其使用方式大致为通过将杵棒砸入石臼，实现稻谷去皮。汉代考古发现不少杵臼，如河南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偏东地区东汉居住区内便发现石磨、石臼、石杵等10余件。其中一圆石臼，圆底，内凿浅条纹，臼宽23厘米，深11厘米；另一石杵，上端稍细，杵头圆形，残长18厘米，最大径9.6厘米。[\[62\]](#)秦汉时期除广泛使用手动杵臼外，还出现了踏碓、水碓和蓄力碓等。东汉桓谭所著《桓子新论》云：“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63\]](#)

碾也是去壳工具，汉代考古虽未见有实物，但不排除在汉代就已出现。

扇车，即风扇车，是用于清除谷物中颖壳、灰糠和瘪粒等的一种工具，也称为颉扇，是汉代发明的农具。汉代考古所见扇车模型，其形制大概有开放式、半敞式和封闭式三种类型。[\[64\]](#)开放式扇车，即只有扇叶，没有封装外壳，采用立轴转动的形式，如四川、山东和江苏等地所见汉代陶俑手持的扬扇就属此类。[\[65\]](#)半敞式扇车则安装有卧轴式扇轮，可以连续转动，轴两侧加装挡板。汉代考古见有不少这类陶质扇车明器，较为典型者如山西运城芮城城南村东汉墓出土带有扇车的4件釉陶磨坊明器。4件扇车模型的形制相同，外形为长方体，通高15.5厘米，屋长23.5厘米，宽14.2厘米，上部有漏斗，下方有出粮口。扇轮有6个叶片和曲柄，扇轮顶部敞开。[\[66\]](#)封闭式扇车的共同特征是轴部有进风口，有封闭的箱体，扇轮柱面方向有效密闭。河南济源县泗涧沟24号新莽时期墓出土1件陶扇车和陶米碓组合明器模型，其侧面为多边形，箱体中部有方形漏斗，下方有窄缝启门和方形出粮口，漏斗右侧扇轮周围是梯形箱体，后侧敞开；箱壁一侧扇轮

位置有进风口，旁边有一立俑作摇车状；漏斗左侧有三角形空箱盛谷糠，箱体前部为出风口。[67]这一模型俨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汉代谷粮去糠的加工场景。

纺织和编织工具也是秦汉生产活动中的主要工具，秦汉考古和汉画像中发现不少这类生产工具的遗物和图像。其中纺织工具主要有纺轮和绕线工具。纺轮是古代纺织工具纺坠的关键构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存在的时间很长。汉代考古发现的纺轮，以陶质为主，呈圆形，直径3~5厘米，厚1厘米左右，中有小圆孔，用于插竹木杆。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崖墓便出土有完整的纺坠2副，竹、木拈杆插于纺轮，纺轮位于拈杆的中间，通体长18.4厘米。[68]自史前至秦汉时期，纺织是早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门类，因而与此相关的纺织技术及生产工具在古代中国是比较发达的。这从汉代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命名即可见一斑。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汉墓中普遍发现陶纺轮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较具代表性的如：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出土纺轮17件[69]；云南江川李家山的7座I型墓中发现战国、秦汉时期时期的卷经杆、纺轮、工字形器、弓状器、绕线板、梭口刀等成套纺织工具，其中还有铜纺轮8件，均附有铜杆，杆长13.3~22厘米[70]；湖南资兴东汉墓地发掘的107座汉墓出土陶纺轮97件[71]，且绝大部分陶纺轮出土于小型的土坑墓，可见纺轮当为东汉平民常用的生产工具。绕线工具是在纺织加捻前的工序使用的，即将丝、麻调好绕成线团的工具，其形态一般是两头带横木的木棍。江苏邳县白山故子汉画像石纺织图上所见络车的纵剖面呈“工”字形，底座旁的左右两侧可见两个线团，有一妇女坐于络车左侧，双手作调丝状[72]。战国、秦汉时期的纺织工具表明，秦汉时期是我国纺织生产的大发展时期，除官营作坊以外，民间纺织生产也极为普遍。可见，耕织结合是秦汉村落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

编织工具多指用竹片、竹条或藤条等编织或装订而成的一类生产生活工具，如筐、筥等。《诗经·召南·采蘋》云：“于以盛之？维筐及筥。”^[73]编织工具自史前产生以来，到先秦时期已十分发达，譬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就出现了竹筥、竹篮、毛笔筒、竹盒、竹席、竹簋、竹笼、竹箕和竹筐等竹编器。^[74]较为典型的秦汉时期的编织器具，一件为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竹筥，由六方形孔编织而成，高15厘米左右，出土时筥中尚盛放有核桃等果品；另一件为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裹夹梅子的竹夹，长56厘米，宽48厘米，厚18厘米，共计十余层，每层由纵向并列的3个小竹算拼成。竹算分别用5列宽0.8厘米左右的宽竹篾为经，3列宽0.2厘米左右的细竹篾为纬编制，用于夹住梅子，每行有梅子20个，每层15行左右^[75]。这两件竹编工具，前者生活性比较强，后者则可能为水果运输工具，属生产工具范畴。尽管两者均发现于贵族墓中，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民间应该是使用编织工具的。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南大门外西南约10米也有编织遗迹，当为草席或竹席一类的编织物，用途尚不清楚。

除上述功能属性相对明确的生产工具以外，尚有一些难以归类，却是秦汉村落生产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工具，姑且称之为通用性工具，主要有锤、锥、刀、斧、钻头，有铁、石等不同材质。这些工具具有普适性，全国各地考古皆有发现。

（二）生活用具

相比上层社会多用漆器、铜器和瓷器（东汉晚期出现）为生活用具，秦汉时期村落平民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兼有铜、竹、木、石等不同材质的器具。根据用途，生活用具大致可以分为炊煮器具、饮食器具和家具，等等。

炊煮器具主要有灶、釜、甑、釜等。除考古有实物发现以外，这些生活器具在汉代画像石所见庖厨图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真实反映了秦汉时期的生活场景。据统计，截至2016年公开所见画像石资料，汉画像石庖厨图共发现107幅，其中河南6幅、陕北4幅、山东51幅、江苏34幅、安徽4幅、浙江1幅、四川7幅。[\[76\]](#)在各地发现的这些庖厨图既反映了秦汉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也体现出各地不同的饮食情况。结合庖厨图、文献和考古发现，大致可以了解秦汉时期的炊事器具及其特点。

灶作为厨房中的基本设备，历来比较受重视。刘熙撰《释名·释宫室》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云：“灶者，生养之本。”画像石庖厨图显示，灶的形状多样，大部分只有一个灶眼，较为复杂者有两个灶眼。单眼者如南水北调新峰墓地考古发掘的1件东汉时期的陶灶模型，整体形状呈马蹄形，上嵌有一釜，为灶釜连体。灶面上还模印与饮食有关的器物：1勺、2条鱼、小刀和食物。灶尾还有一小烟囱。火门两侧浮雕有立姿的女俑，作添火状。[\[77\]](#)两眼者如济南青龙山汉墓出土的陶灶，其有大小两个灶眼，小者在前，大者在后。[\[78\]](#)双眼灶的出现说明炊煮效率得到了提高。

釜是一种炊器，用于煮粥、做羹和烧水等。釜出现于史前时期，夏、商、西周沿用，在战国和汉代较为流行，成为民间使用最为广泛的烹饪器具。湖南资兴西汉墓发现陶釜186件，其中有3件腹部安有把手，内空可以纳柄。[\[79\]](#)类似带把釜在陕西眉县常兴汉墓也发现2件，其把位于上腹一侧，圆管形，有烟炆[\[80\]](#)，可见是生活实用之物。考古发现中还见有三足釜，即釜底下有三足，美感更强。湖南长沙桐梓坡汉墓发现釜16件，其中三足釜1件，口径7.6厘米，高9.4厘米。[\[81\]](#)陕西眉县有三足釜1件。山东淄博张店出土汉代铁釜，形制巨大，口径30厘米，腹径

50厘米，高42.5厘米，重20余公斤。[82]由于这件铁釜形体大、容量多，可能并不是民用炊具，而极有可能是军用器具。

甗，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是早期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烹煮器具。《诗经·桧风·匪风》云：“谁能烹鱼？溉之釜鬲。”[83]“鬲”古同“甗”。在陶灶未发明之前，甗往往与鼎、鬲搭配使用，在三代青铜器中，甗是青铜甗的上半部分，通过算与青铜鬲相连，鬲内水沸产生的蒸汽通过算孔上升到甗中，从而实现蒸煮。山东嘉祥出土汉代画像石上就有釜甗的图像，其画面有一灶，灶上放置釜甗。[84]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出土陶甗22件，皆有算孔，可见为蒸煮时用器。湖南资兴西汉墓发现甗161件，一般每墓出土1件，这说明甗与釜一样是汉代社会的主要炊煮工具。

釜的作用相当于锅，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炊具。釜一般为敞口，圆腹，圜底，肩部有耳，湖南长沙西郊桐梓坡汉墓出土4件。

饮食器具主要有壶、瓮、罐、钟、钫、杯、耳杯、卮、碗、钵等，全国各地汉代考古皆有发现。这些器具根据用途又可细分为盛器、饮器和食器等。其中盛器有壶、瓮、罐、钫、尊等。壶用于盛放酒水，有铜质和陶瓷质，平民所用壶以陶瓷为最多。山东邹城面粉厂画像石饮宴图上，二人对坐叙饮，左有二人担壶和提壶，还有二人并坐奏乐，另有观者、舞者若干。[85]瓮也是用于盛放酒水的器具，有时也用来贮藏菜，其形制一般为侈口，矮沿，斜圆肩或圆肩上耸，斜收腹，平底。罐在秦汉墓葬中出土数量比较多，说明它在秦汉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频率很高，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具，如湖南资兴西汉墓出土不同类型的陶罐数量高达3 025件，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发现的陶罐也有128件。罐的用途多，通用性比较强，可用于汲水、储水、存物，甚至可用来蒸煮食物。在秦汉时期，一些富裕人家为了区分陶罐内

的物品，还在陶罐上书写相应的名称，譬如，洛阳烧沟汉墓1026号墓发现的1件陶罐的外壁上就写有“水”字[86]，陕西卷烟厂5号墓发现的10件陶罐上均写有内装食物及粮食的名称[87]，这宛如现代社会的陶罐包装物一般。钟一般用于储酒，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以青铜、漆器者最为精致，陶质者多为平民使用。

《说文解字》云：“钒，方钟也。”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漆器中确有不少方形器，可能即为钒。但陶器中被发掘者命名为钒者并非方形器，譬如长沙桐梓坡发现17件钒，有盖，直口，鼓腹，器形瘦长。另外，湖南资兴西汉墓中有被命名为方壶的方形陶质容器。钟是盛酒器，盛行于汉代，《说文解字》云：“钟，酒器也。”它有时也作为容器单位出现于生产生活之中。钟的形制为鼓腹细颈，与壶、钒相似。上述这些炊事器具，数量众多，在秦汉炊事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山东诸城前凉台庖厨图中出现盆、盘、罐、鼎、壶、瓮等器具30余件便说明这一点。[88]

饮器主要有杯、耳杯、卮等。杯为敞口或侈口，筒形腹，腹壁直下折成平底。湖南资兴西汉墓出土9件杯，其中4件于腹部安装环形把手，有平盖，盖上有半环钮以便于起合；还有1件于颈部一侧安装环形把手。耳杯广泛使用于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发现以漆器最为常见，亦有铜耳杯和陶耳杯。漆耳杯是上层社会最主要的饮酒器，由于极为昂贵，平民阶层很少使用。江苏高邮县邵家沟汉代村落遗址中发现漆耳杯2件，同出土的还有漆碗1件，加上残漆片共11件[89]，但漆器在出土器物中所占比例很小，这一方面说明漆耳杯在平民生活中并非普及的器具，另一方面表明邵家沟可能存在较为富裕的大户人家。陶耳杯少见，但可能平民生活中也有使用。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90]、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汉墓[91]、陕西西安南郊潘家庄169号墓[92]均发现陶质耳杯。山东微山县微山岛乡画像石一宴饮图左格厅堂二人对坐的中间置

有酒樽、耳杯。[93]卮作为一种饮酒器，在先秦时期就十分流行，《战国策·齐策》云：“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94]《史记·高祖本纪》载：“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可见卮也是上层社会常用的饮酒器之一，而且有材质上的讲究，民间所用一般为陶质。

《盐铁论·散不足》云：“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觴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紈器，金错蜀杯……”这条文献充分表明，包括酒器在内的秦汉器物的阶层性的体现不在器型，而在材质的稀有与否，以及制作工艺的精细精美程度。卮的形制为平底直壁，与杯类似，卮外壁上安装有把钮，似单耳。由于形制与杯大致相当，因此常被考古发掘定名为杯或樽。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上有《宴饮赏乐图》，图中有5人列坐，在他们前面放置有5个圆盘，其中3个盘内置有疑似卮的饮酒器。[95]山东诸城前凉台汉画像石《宴饮图》，图中厅堂二人对坐于六博盘前，右侧有侍者二人捧有盘、杯樽作左向行状。[96]

食器最常见者为碗和钵。作为人们日常必需的饮食器皿，碗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其形状与今天的碗大致相当，即口大底小，一般有圆形圈足。由于器物定名的方法，考古发现和古代流传至今的器物形制可能相同，但往往因文献记载和现代理解之间存在差异而定名有异。譬如，今天我们理解的碗的形制，稍大者在古代文献中称为“孟”，有时也被纳入“钵”的范畴。有关于此，著名陶瓷学者冯先铭说：“器物的定名方法，一般是比照现今与之类似的器物名称而定，如缸、罐、杯、碗、钵之类，但古今生活方式不同，名称、用途未必完全一样。”[97]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出土碗1件，深腹，直口，平底，口径14.2厘米，底径7.2厘米，高7厘米[98]；湖南资兴西汉墓出土的碗，通高4厘米，侈口，弧

腹，假圈足。在河北定县北庄[99]、北京顺义临河[100]等遗址中发现腹壁较直的碗，其碗底仅略小于碗口。关于碗与钵的区别，一般认为，有圈足者为碗，无圈足者为钵，但在实际命名中似乎并没有严格区分。湖南资兴西汉墓出土钵98件，其中有97件无圈足，仅1件有矮圈足。

生活用具中，除上述器具以外，秦汉社会生活中还有用于盛装、照明和熏香等的器物，譬如通用性装具——盒，盛装食品的豆，盛放食物、药物或化妆用品的奁具，以及灯具、熏炉、铜镜等。

家具主要有席、床、榻、几、案、箱、柜、衣架、镜架和屏风等。这些器具根据功能的不同又可分为坐卧类、置物类、储藏类、支架类和屏蔽类。

秦汉时期虽然逐渐向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过渡，但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所以秦汉家用陈设用具多为低矮型。其中坐卧类器具主要是席、床和榻等。席是用草、竹蔑或苇子编制而成的，在席地而坐的早期社会，用作坐具和卧具。《诗经·小雅·斯干》曰：“下筦上簟，乃安斯寝。”簟即竹席。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便出土有人字纹竹席，当为坐卧之用。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墓北耳室北壁石刻画像中，就见有一裹头巾的人盘坐于席。[101]作为坐卧之具，床的功能并非专门的寝具，孙机先生认为床的功能与席相同，他征引了三条文献予以说明：一是《说文解字》中所言床为“安身之坐者”；二是《释名》说“人所坐卧曰床”；三是宋代王观国《学林》卷四指出的“古人称床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102]汉代画像资料显示，秦汉时期坐卧之具中，还有独坐板枰、榻等。板枰，《释名·释床帐》曰：“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河北望都1号东汉墓壁画上出现有独坐板枰的图像。[103]这种坐具呈方形，有矩尺形矮足，四周不起沿，可

以坐一人。榻，《释名》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可见榻的面板呈长方形，是一种比板枰大、比床小的坐具。东汉服虔《通俗文》中说：“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104]河南灵宝县张湾汉墓画像石上有六博陶俑连坐合榻的形象；河南郸城发现西汉石榻，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足，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上还刻有铭文“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105]；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出土的木榻长114厘米，宽90厘米，高26厘米，能坐但不能卧，器身由两块长方形木板拼接而成，底部两侧各置有一长条木楞，木楞下有倒“凹”字形足，木板外两面有围板^[106]。

几、案属于置物类家具。秦汉时期的几，也并非完全为置物之用，有时还用来搭放膝盖，以减缓因坐姿压迫下肢造成的压力，所以汉代有“凭几而坐”的情况。正因为几在功能用途上的多样性，汉代几类品种相比先秦增多不少，有活动几、多层几等。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出土的木几，两端有一排4个长方形卯眼，腿曲折，两端有榫，上榫插入几面卯眼，下榫插入镂空的足内，几面长95厘米，宽15厘米，厚3厘米。^[107]河北满城汉墓1号西汉墓发现的漆几，有鎏金铜足，足上部装有合页，使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漆几的足有上下两层，下层足可撑开亦可折入，可以调节几的高度^[108]。几的足也开始多样化，有直足、曲足和单足等。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中出现一种双层的高几，下层为曲足，上层似案为直足^[109]；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前室西壁所见石刻画像的中间画有一张横置的长条形几，有拱形四足；东耳室西壁上也刻有类似的长方形几^[110]。案多为食案，《汉书·朱博传》云“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即表明了这一点。又如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墓东室甬道石刻画像上运送食物的场面，其中第三人和第四人抬有方形柱足案，案上放有带柄器，案下有圈足

壶。东耳室南壁上也有加工食品的图像，上层刻画有一横贯画面东西的长形案，案下有三个柱形直足，案面有器具。[\[111\]](#)山东临沂银雀山10号西汉墓出土木案1件，长条形，下附有矮足。双面髹黑漆，残长34厘米，宽26厘米，厚1.2厘米，案的正面刻有“开阳尉案”四字，案背面刻有“东郡”二字。[\[112\]](#)从上述内容来看，案的形状为长方形，有柱足或马蹄形足，以木制最为常见，主要用于宴饮以摆放饮食器具。考古发现，案也有铜制或陶制。辽宁辽阳三道壕27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刻有永元年款。[\[113\]](#)以上有关几、案的征引案例中虽然部分文物出土于贵族墓葬，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它们理解和认识秦汉时期民间几、案的形制。因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很多器物，除了那些有损统治权威的器物 and 纹饰会被严格限制外，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民间和贵族在器物使用上的区别，只会存在于材质的奢华与否和结构的优劣等方面。

储藏类家具有箱、柜等，主要用于贮藏衣物、厨房器具和其他用品，但这类家具秦汉考古发现实物很少。类似箱这种功能的器具，考古发现中有竹筥。竹筥的用途较为广泛，并非专用家具，也常常用来贮藏食品、书籍和其他物品等。《说文解字》云：“筥，饭及衣之器也。”[\[114\]](#)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5件竹筥，筥内盛放食物或铜镜、铜铃和铜璜等物。[\[115\]](#)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竹筥48件，其中30件用来盛放肉类食物，8件盛放药物，6件盛放衣物，还有4件盛放器具。[\[116\]](#)竹筥一般为长方形箱体，用细竹蔑编织而成，盖和底的口部及顶部周边用藤条或竹蔑加缠竹片以加固，有些竹筥的四角也加竹片，目的就是确保筥坚固、耐用。柜，在古代同“匱”，作为一种贮藏东西的家具，常用来收纳厨房用品、衣物或贵重物品等。被用于贮藏厨房用品时，称为櫥柜。东汉王充撰《论衡·感虚篇·是应篇》载，燕

国太子丹请求从秦归国时，秦王提出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这里所言的“厨”，疑指橱柜。辽宁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见有橱柜，橱柜作屋宇形，有一女子作正开柜门取物状，当中可见存放有壶。[\[117\]](#)柜用于储藏衣物或贵重物品时，通常被理解为“匱”，在汉代一些画像石中也发现了制作较为精致的“匱”，譬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上的图像[\[118\]](#)。此外，在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中亦见有绿釉陶柜模型明器，其柜身为长立方体，下有四扁足，背有柜门，可启合；正面上部模印门锁，背面装饰有泡钉；柜高17.1厘米，长23厘米，宽16.2厘米。[\[119\]](#)

衣架、镜架属于支架类家具，是用于搭放衣物、铜镜、食具或其他杂物的一类家用陈设用具。汉画像石中也见有类似的图像，譬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就见有一种在圆形底座上立柱、中间有长方板、顶上装有圆盘的器具，孙机先生认为其是镜台。[\[120\]](#)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石刻图像中多次见有支架形象，1号墓东耳室甬道石面刻有支架，下层第一人右手提有带链的三足火盆，当为支架类家具；北耳室石壁刻有一高大的食品架，架上有碗、盘与耳杯等。[\[121\]](#)另有屏蔽类家具，包括屏风、帷幔等。在汉画像中见有很多屏风形象，说明屏风在汉代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家具之一，然而，从性质来说，屏风主要是富裕人家使用的，在平民百姓家较少见到。

从上述这些家具及陈设用具来看，只有极少数的明器模型发现于平民墓葬中，绝大部分发现于秦汉时期较为大型的墓葬中，包括作为图像资料的汉画像，也仅见于大型汉墓之中。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些汉墓中的出土物理解或解释民间家具及其陈设用具，但这种现象仍表明，种类齐全、制作精美的家具及陈设用具，主要存在于大户人家或富裕家庭。当然，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判断：一是秦汉社会生活繁荣，注重生活品质，

《庖厨图》《宴饮图》及其上所见生活用具都表明了这一点；二是秦汉时期已逐渐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转变，汉代家具多为低矮型，说明这一时期仍然以“席地”为主，但起居方式的变化已经开始。

二、节日文化与信仰文化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早期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进一步理性化。但史前以来在原始自然崇拜基础上形成的节日文化和信仰文化依然存在，且尚未脱离巫术色彩和愚昧范畴。^[122]但在同一时期，文化观念与精神信仰上的启蒙，伴随科技进步而进步。最突出的变化则是由神祇文化初步过渡到人文文化，即基于“宗法—专制”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123]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秦汉时期的节日风俗和祭祀文化也趋于定型，并深远地影响了汉代及以后节日文化和信仰文化的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范畴，村落节日与祭祀文化是了解秦汉民间社会的另一关节点。相比先秦社会，节日文化发展到秦汉时期，不仅节日数量和节俗内容大量增加，而且节日名称、节日时期和节日内容等都开始固定下来，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民俗传统。秦汉节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秦汉时期人们的自然认知水平提高，而认知能力的提高，意味着节日文化中的愚昧在减少；另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有不少节日甚至是长期农耕生产的结果。

（一）节日文化

事实上，与秦汉时令节俗同时发展且深刻影响了汉代社会的还有历法。历法在中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起源于商代以前，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在秦汉时期形成了相对完善和科学的体例。汉代以前的古代中国历法以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岁的终始，已经出现日、月、旬和时等时间单位。汉代开始，中国历法发生了较大改变，一方面全国统一历法，另一方面其成了一门较为独立的学问，并设职专司。汉武帝时，朝廷命司马迁等人编写《太初历》，并广泛推行。《太初历》的推行，解决了秦及汉初以来颛顼历与时令节俗相矛盾的问题。因为它规定一回归年，由二十四节气组成，并明确了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如此，不仅将中气与月名对应起来了，而且闰月的设置也表明了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旨归。之后刘歆编写的《三统历》，在《太初历》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修正，合理性与科学性均更强，对后世历法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汉书》中评价刘歆及其编制的历法，云：“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洛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124]

正因为汉代历法的科学化、体系化发展，同时期的节日文化也呈现出了与前代不一样的文化特征。

第一，节日的体系化形成。据相关研究成果，秦汉时期的节日数量空前增加，大致来说，有正日、立春、春社、上巳、寒食、夏至、伏日、□刘节、秋社、十月朝、冬至、腊日，以及处于形成中的端午节、七夕节和九月九等^[125]。汉代涌现的这些节日，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岁时性，从时间上来看，它们有规律地分布于一年四季的岁时节点之上。譬如，春季有立春、春社、上巳、寒食，夏季有夏至、端午、伏日，秋季有七夕、立秋、九月

九、□刘节，冬季有立冬、冬至、腊日。这些节日或是生成于农耕生产，或是丰富于农耕生产，既是国家主流价值观塑造的结果，又是民间社会生产、生活的产物，反映了秦汉人民趋利避害、祈求丰收与吉祥的美好愿景。最为典型的当为立春，作为节气之首，象征着一年农耕的开始，意味着要播种耕耘，因而自先秦以来便受到官方和民众的重视。《礼记·月令》云：“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秦汉时期，官方与民间对立春节日更为重视，迎春的仪式十分隆重。

《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按照中国传统节气，我国古代的春天始于立春之日，止于立夏，立春之日要举行迎春仪式，不仅天子要亲率百官参与迎春，还要统一百官服饰，以显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农事的重视。作为迎春仪式中的符号，青衣、青帻、青幡和“施土牛耕人”既象征着农事活动，也表明了人们对丰收的祈盼。

在秦汉节日体系中，除立春、春社、夏至、秋社、冬至等与农事活动直接相关以外，还有一些节日尽管并非直接与农事有关，但在长期演变过程中也烙上了浓厚的农事痕迹。譬如上巳节，最初是纪念伏羲氏教人渔猎方法，及其在繁育后代等方面的贡献，后来则逐渐演变成在水边祓禊祭祀的节俗，以禳除灾异、祈福求子。南朝梁沈约《宋书·礼志》引《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腊日是汉代正式确立的节日名称，为一年中最后的节日。

《风俗通义·祀典》引《礼传》：“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汉改为腊。”“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作为年终节日，其重要风俗之一就是驱逐寒意、迎新除旧。同书载：“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汉家火行衰于戌，故曰腊也。”^[126]《礼记》云：“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127]《后汉书·礼仪志》亦载：“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由此来看，腊日既是我国古代祭祖、祭神的日子，也是对为农业生产提供庇护的农神的祭祀，以祈求来年谷物丰收。

第二，节日内容的伦理化体现。史前以来，直至先秦社会，神祇文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很多节日带有浓厚的国家祭典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为此意。这种祭典行为及其传播国家意志的功能在秦汉社会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有强化的趋势。作为大一统国家，秦汉国家为巩固政权，一方面建构国家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符合这一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并伴随国家需要而不断予以修正。从秦朝的法家思想，到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儒家正统地位确立之后，儒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忠君爱国”的价值观全面影响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节日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汉代节日文化中，伦理关系突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孝悌，二是忠义。孝悌者，体现于祭祖和谒贺尊长两方面，如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齐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

也。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128]。可见，正日仪式，先有祭祖，后有谒贺尊长的环节。又如十一月的冬至，亦祭祖于前，即“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谒贺尊长于后，“齐、饌、扫、涤，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月”。[129]

忠义观念在秦汉节日内容中的彰显，不仅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全面渗透，而且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有效互动，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民间价值观的和谐共生。这当中，较为典型者是寒食节。寒食节流行于两汉之际，其节俗的核心内容是禁火和寒食，即在节日期间忌用火，要吃冷食。据文献记载，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文公火烧死的忠臣介子推。东汉桓谭在《新论·离事》中指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后汉书·周举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联系起来的是汉代人，这应该与汉武帝以后宣传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因为介子推作为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象征着贤能、忠义等伦理道德价值，完全吻合儒家的“忠义观”。尽管在东汉三国时期，特别是在三国魏晋时期，官方出于移风易俗或其他政治目的，曾明令禁止寒食节，但效果不佳。无论是官方的“禁”，还是民间的“支持”，都表明作为儒家伦理文化传播的载体，寒食节与两汉社会风气高度契合。[130]

第三，节日形式的娱乐化倾向。相比先秦时期，秦汉社会的人们更加关注世俗生活，推崇现实生活的享乐。这一点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庖厨图、宴饮图和其他生活场景图中可见一斑。秦汉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也反映在节日形式的多样化上。节日在体现秦人汉人趋吉观

念的同时，也成为丰富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如果说先秦以前的节日主题是突出神灵并具有很多禁忌的话，那么到秦汉社会，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敬畏神灵的同时，还发展出了娱人悦己的内容与形式。譬如，上巳节的风俗原本是在水边祓禊祭祀、禳除灾异活动，到汉代，特别是到东汉时期，上巳节不只延续“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的祈愿活动，人们还拓展了野外聚会活动。《后汉书·礼仪志》载：“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郑玄注云：“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无子之疾而得福也。”汉代文献在描述上巳节传统活动的同时，也隐约表达了节日主题在当时的某些变化。同书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131]《后汉书·周举传》更指出：“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除此之外，其他节日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趋势，譬如，《淮南子·精神训》载：社日“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132]《史记·天官书》中有关腊日的记载，云“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上巳节、社日和腊日等节日的娱乐化转变，一方面反映出汉代提倡现世享乐，另一方面更表明节日逐步向世俗化过渡。

（二）信仰文化

由于古代社会人们科学认知水平低，当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和进行解释时，人们便认为自然界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在早期社会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因此，人类在“万物有灵”的认知逻辑下，往往直接将那些可察觉的、与其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力和自然物人格化，对其顶礼膜拜，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等。古代中国同样广泛存在自然崇拜，这在民间相当普遍而且尤为突出。并且，在长期自然崇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信仰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态的重要观念之一，信仰活动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秦汉社会，民间信仰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禳除灾异、治病救人，农业生产中祈求风调雨顺，在社会生活中争权夺利，等等，不一而足。相比先秦，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大多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带有较为强烈的功利性和世俗性，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信仰的地域性。传统中国村落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社会，具有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点。加之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村落社会之间的交往通常较少，所以地缘观念十分突出。反映在民间信仰上，就地域性而言，先秦文献《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所云“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就指出了这一点。即便在当代社会，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讲的就是自然生态、自然资源物产孕育了各地的风土习惯、人文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与自然密切相关，特殊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和信仰。信仰上的地域性，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信仰，譬如南北差异。秦汉时期的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崇巫信鬼”之风极为浓厚。战国末期辞赋家宋玉所作《高唐赋》的序中所描述的楚怀王与神女巫山欢会的故事，就比较典型。《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淮阳“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应劭撰·风俗通义·怪神》云：“九江浚遘有唐、居二山，名有神，众巫共为取公妪，岁易，男不得复娶，女不得复嫁，百姓苦之。”“公妪”之俗，即选取男女娶嫁于山神的风俗。《后汉书·栾

巴传》也载：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南方信巫重鬼风气的盛行。而北方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而崇巫信鬼的风气明显不似南方浓厚，表现出尊礼近人的特点。譬如齐鲁地区就普遍存在为当地名人立祠祭拜的现象，以彰其功。《风俗通义·怪神》中就记载了琅琊、青州和渤海等地，为纪念汉初朱虚侯刘章的贡献而立祠祭拜的现象，其云：“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言有神明，其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辽东则立祠祭拜祭彤，《后汉书·祭彤传》云：“彤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当然，这种祭拜地方名人的现象，并非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多，但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祭拜更突出儒家的忠孝观念。这种区别在汉画像石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有学者对比了南阳与山东两地的汉画像石，发现两地画像石有明显区别，前者多仙界景象，而后者则多儒家伦理的故事。即便是神仙图像，也尽量合乎儒家的审美形态，以端庄为主。譬如，南阳十里铺汉墓中“以龙、虎、山神和灵怪为题的刻画占全部汉画的2/5，如盘尾单龙、虎鹿相间、人兽相伴，表现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仙界景象，很难从这里看出现实的影子。山东汉画石中此类所占比例极小，所见的西王母亦形象端庄。而南阳地区常见的大量升仙气氛烘托下的西王母，实际上是楚风好鬼神的产物”[133]。从图像上看，山东一带的画像石多见效法先王、吹捧孔子、宣扬儒家伦理、鼓吹“杀身成仁”等，体现较为明显的尊礼近人而远鬼神的思想。

二是因地域不同，全国性的共同信仰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以

江神为例，它在长江流域普遍受人信仰，但不同地域对信仰对象有不同的解释。如巴蜀地区的信仰对象是奇相，《史记·封禅书》云：“江水，祠蜀。”司马贞《索隐》曰：“《广雅》云‘江神谓之奇相’。《江记》云‘帝女也，卒为江神’。”扬州和吴郡人奉伍子胥为江神，《后汉书·张禹传》记载了东汉早期刺史张禹赴任扬州途经长江时的见闻，其云：“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艺文类聚》卷八引谢承《后汉书》曰：“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风，船欲覆。闳拔剑斫水，骂伍子胥，风息得济。”^[134]与蜀地、扬州和吴郡不同，楚地则以湘江二夫人为江神，《列女传》云：“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135]这个例子充分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共同信仰的神灵，但会由于所处地域不同而在信仰对象上存在差异。

其次是信仰的功利性。相比官方祭祀，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较少或根本不关心国家、统治者和集体的前途与利益，民间的祭拜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国家或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神，譬如太一、社稷之神和名山大川等神灵，而多是那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小神，如灶神、门神和行神等。因为这些“小神”所具有的驱邪除病、保人平安、佑人健康和送子送福等功能，恰好与百姓“趋吉避害”的心理吻合。如门神，可以避邪疫、驱鬼魅、保人平安。孙希旦注《礼记·月令》曰：祭门神的目的是“欲其攘除凶灾，御止疫鬼，勿使复入也”。祭灶神，目的是让灶神在天帝面前多说好话，以祈求富贵、吉祥，即“上天言好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六引《淮南万毕术》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郑玄注《礼记·祭法》也说：“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136]在信仰超自然力量的时代，神祇给人以强烈的安全感和方向感，也正因如此，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不仅有存在

的必要性，而且有突出的功利性特征。《搜神记》卷四载：“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祐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137]这故事讲的是：豫章郡的戴氏女久病不愈，祈神灵于石偶人，并许下诺言，只要她的病一旦痊愈便回报神灵，后来，其病果然好转，因而兑现其承诺，为神灵于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庙。上述例子表明，当面临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又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时，普通百姓便求助于神灵，祈求通过神灵的超自然力量，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疾病尽早痊愈、身体更加健康，如此而已。正是这种朴素的目的，使得民间信仰带有强烈的立竿见影式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最后是信仰的多元性。作为民间信仰的逻辑出发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也造就了汉代民间信仰的多元性特征。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是形形色色的，而单一的神灵往往不能满足丰富的现实需求，所以为解决各种现实困难，在汉代，人们还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司某一职能的神灵，并加以崇拜。

《风俗通义·祀典》云：“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书·郊祀志下》载，到哀帝时，诸神之庙的数量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其云“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上述文献中所记诸神的数量，只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神灵，其数量就已过万，且体系十分庞杂。如果包括城市尤其是乡村所造就和祀拜的神灵在内，恐怕要翻数番不止。汉代社会造神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祭祀权从国家下移至民间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秦汉统治者崇巫信鬼神的观念密切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民间信仰除了调适个人心理，在社会发展中还起到了组织社会成员和整合社会的作用，有些信仰甚至还起到了缓解并调和国家与地方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作用，具有稳定社会、安抚信民的功能。

[1] 丘刚等：《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199页。

[5] 吉林大学考古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锦西市邵集屯小荒地秦汉古城址试掘报告》，载王仲殊主编，考古杂志社编：《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6] 周昕：《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二十七《十四篇上·金部》。

[8] 刘熙：《释名·释用器》。

[9]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二十七《十四篇上·金部》。

[10] 刘庆柱：《陕西长武出土汉代铁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2]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13]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14] 曾庸：《汉代的铁制工具》，《文物》1959年第1期。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199页。

[16] 尚巍：《湖南桑植朱家台汉代铁器铸造作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199页。

[18]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编著：《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第3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20]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章丘平陵故城冶铁遗址》，《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21]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编，杨琮主编：《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40页。

[22] 史游撰，颜师古注：《急就篇》卷三。

[2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二十七《十四篇上·金部》。

[2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6]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铤和镢土》，《文物》1966年第1期。

[27]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铤和镢土》，《文物》1966年第1期。

[28] 王学理、王保平：《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29]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铤和镢土》，《文物》1966年第1期。

[30]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写作小组：《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

- [31]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
- [32] 中国农业博物馆编，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 [33] 万良：《山东鄆城、成武、金乡石刻调查》，《考古》1996年第6期。
- [34] 胡绍锦：《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 [3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 [36] 殷涤非：《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文物》1960年第1期。
- [3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 [38]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编：《鹤壁鹿楼冶铁遗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 [39] 江章华、刘雨茂：《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木椁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8期。
- [40] 张增祺、王大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 [41] 周昕：《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 [4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洛浦县山普拉II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2期。
- [43] 郭庆藩：《庄子集释》外篇《天地第十二》。
- [44] 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 [45] 赖非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 [46] 焦德森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 [47]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 [48] 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 [49]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
- [50] 赖非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 [51]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62、85页。
- [52]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 [53]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 [54] 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 [5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 [5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 [58] 阎志和：《长武发现汉代石磨》，《文博》1986年第2期。
- [59] 贾德民：《山东安丘发现汉代石磨》，《考古》1995年第11期。
- [6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 [61] 耿青岩、蔡学文：《河南淇县发现西汉石磨》，《考古》1983年第10期。
- [62] 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 [63] 桓谭撰，孙冯翼辑：《桓子新论》卷十一《离事篇》。
- [64] 黄兴、潜伟：《中国古代扇车类型考察与性能研究》，《中国农史》

2013年第2期。

[65] 史晓雷：《汉代“扬扇”考辨》，《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66] 赵家有、李天影：《山西芮城出土风扇车模型》，《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7] 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

[68] 程应林、刘诗中：《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69] 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12期。

[70] 张增祺、王大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1] 傅举有：《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72]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江苏邳县白山故子两座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

[73]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第一（一之三）《召南·采蘋》。

[74] 陈振裕：《楚国的竹编织物》，《考古》1983年第8期。

[75]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19页。

[76] 赵路花：《汉画像石庖厨图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页。

[77] 程青芬：《再现汉代生活的陶灶》，《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11期。

[78] 刘善沂、孙亮：《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考古》1989年第11期。

[79] 吴铭生、师悦菊：《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8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发掘报告》，《文博》1989年第1期。

[81] 宋少华：《长沙西郊桐梓坡汉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82] 李鸿雁：《张店出土汉代铁釜》，《管子学刊》1998年第3期。

[83]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七（七之二）《桧风·匪风》。

[84] 朱锡禄编著：《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图48。

[85] 赖非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版66。

[86]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8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卷烟材料厂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88] 王凤娟：《汉画像石与齐鲁风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3页。

[89] 朱江：《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

[90]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9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9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169号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93] 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图版43。

[94] 刘向辑录：《战国策》卷九《齐策二》。

[95] 韩玉祥、李陈广主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96] 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版123。

[97]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9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99] 敖承隆：《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 [100] 黄秀纯：《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6期。
- [10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 [102] 孙机：《汉代家具（上）》，《紫禁城》2010年第7期。
- [103] 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
- [104] 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五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 [105] 曹桂岑：《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考古》1965年第5期。
- [106] 王勤金、吴炜、徐良玉、印志华：《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 [107] 王勤金、吴炜、徐良玉、印志华：《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 [108] 孙机：《汉代家具（上）》，《紫禁城》2010年第7期。
- [109] 蒋宝庚、黎忠义：《山东沂南汉书画像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 [1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 [1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 [112] 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
- [113] 李文信：《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 [114]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九《五篇上·竹部》。
- [115]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 [116]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111—112页。
- [117] 转引自孙机：《汉代家具（下）》，《紫禁城》2010年第8期。
- [118] 蒋宝庚、黎忠义：《山东沂南汉书画像石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4年第8期。

[119] 叶小燕：《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120]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2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72页。

[122] 此处所言脱离巫术色彩，并不是说汉代是一个不重巫的社会，而是说相比史前以来的社会，秦汉节日祭祀文化中的科学性进一步丰富，那种完全建立在原始崇拜基础上的超自然信仰有淡化的趋势。事实上，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巫术是极为盛行的。不仅如此，巫术在汉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国家层面甚至还建立了一套巫官体系。参见赵光怀：《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123]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207页。

[124] 《后汉书》卷九十一《律历一》。

[125] 周耀明、万建中、陈华文：《汉族风俗史·第2卷·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2页；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7—91页；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23—644页。

[126]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9页。

[127] 郑玄，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十四《月令第六》。

[128] 崔寔著，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29] 崔寔著，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130] 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131] 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132] 《淮南子》卷七《精神训》。

[133] 张新斌：《汉代画像石所见儒风与楚风》，《中原文物》1993年第1

期。

[134]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5] 刘向撰：《列女传》卷一《母仪传·有虞二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 郑玄，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四十六《祭法第二十三》。

[137]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四《戴侯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页。

第五节

秦汉少数民族地区的聚落

秦汉王朝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尽管为大一统时期，但其疆域和规模也是相对的、动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学术界一般认为鼎盛时期的秦朝疆域，东起辽东，西抵青藏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汉朝建立之后，在继承秦朝疆域的基础上，大规模开边拓疆。鼎盛时期的汉朝，其疆域范围东达朝鲜半岛、今辽宁全境和吉林部分地区，西达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西南则开拓至四川、云贵的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北则囊括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在秦汉时期的疆域上，除中原民族以外，在边疆地区或疆域周边地区还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包括匈奴、乌桓、鲜卑、百越、羌、氐、西南夷和西域诸族等。

由于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上述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与秦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后，这种交流与互动成了一种常态。正是在这种长期的交流、互动中，边疆少数民族逐步融入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秦汉国家，进而初步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如果说梳理并厘清中原地区村落的发展情况与形式，是深度认识秦汉国家和社会全貌的关键，那么挖掘边疆少数民族的村落历史，既是了解少数民族发展脉络的重要方面，又是理解多民族交融隐性逻辑的重要条件。然

而，受制于文献、考古和其他史料的不足，有关秦汉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的发展线索，不仅难以深入挖掘，而且很难全面化和系统化。

一、北方地区的聚落

在民族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北方地区通常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加以讨论。因为北方地区广泛活跃着诸多游牧民族，譬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就崛起于塞北大漠，它们与中原汉族民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既存在较大差异，又有着明显的联系。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早期中国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但是，作为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北方地区的具体划分有所不同。在秦汉考古学研究中，一般将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划为一个区，包括内外蒙古区域、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 and 河北省的西北部。^[1]秦汉时期的这一区域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也正是匈奴政权的建立，使秦汉时期形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南北对峙、互争雄长的历史发展格局。两种文明的这种互动，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上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匈奴的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我们所理解的北方地区，事实上，其势力范围在秦汉时期扩展到西域、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甚至包括今天所指的远东地区。

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属于高寒干旱的地区，冬季气候极为寒冷，夏季则十分干燥。为了适应这种气候条件，更好地生存生活，北方民族一般实施集体游动放牧的畜牧业经营方式。正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明及与其相应的村落

和文化。按照村落的内涵，聚居空间被定义为村落，取决于两点：一是聚居空间是否为物质实体空间，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构成空间的房屋、道路、景观、设施和土地等可视性有形要素；二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活动单元，它是否具有长期性、固定性和组织性的特点，组织性即包括构成非物质社会空间的组织、制度、语言、风俗、道德和宗教等内容。也正是这两个条件，让很多人对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是否普遍存在村落一类聚落空间心存怀疑。理由是游牧民族通常逐水草而居，长期处于游动之中，不仅不需要而且也很难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聚落空间。然而，这种认识显然是偏颇和肤浅的，因为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显示，北方游牧民族不仅有长期的、固定的聚落空间，而且有些聚落还具有一定的规模，有的甚至大到已近乎城郭，体现出强烈的组织性，当然也可能属于城郭范畴。游牧地区出现长期的、固定的聚落，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游牧民族迁徙游弋的生活具有季节性，一般夏秋频繁转场，目的是寻找水草丰沃的畜牧草场，而冬天天气寒冷，并且时间较长，因而往往需要固定下来。营地一般选择在有水源的较为平缓的山谷地带，由于经年使用的需要，便逐渐形成聚落。夏秋放牧时，壮年外出畜牧，而老弱病残则留守于聚落。另一方面则是游牧政权建立的需要，从社会组织管理角度来看，政治或行政治所的相对固定，是政权稳定的前提，因而必须建设具有长期性的、带有浓厚的组织与政治色彩的聚落。

目前有文献可查的秦汉时期的匈奴聚落，较为有名的主要有龙城、赵信城、颓当城、范夫人城和头曼城等。

龙城，又名茏城，可能是秦汉匈奴族祭天所在之处。《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汉书·匈奴传》将“茏城”改为“龙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

地图集》所绘东汉地图，龙城位于安侯河，即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附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显示，龙城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及鄂尔浑河一带。^[2]

赵信城，由西汉匈奴人赵信建造，《史记·匈奴列传》载：“（汉兵）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阾颜山赵信城而还。”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赵信城的城址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乌兰巴托西鄂尔浑河南岸。有关颍当城，《史记·韩王信列传》载：“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颍当城，生子，因名曰颍当。”

关于范夫人城，《汉书·匈奴传上》云：“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一统志》：赵信城、范夫人城并在喀尔喀界内。”据考，此城在夫羊句山峡东北，即今蒙古国达兰扎兰加德城西北。

头曼城，是秦汉时期匈奴政权十分重要的聚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单于南庭所在之处。^[3]《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条载：“秬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虏河城，又西得宿虏城。”头曼城的位置，可能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境内的阴山里。

除文献记载以外，考古发现不少秦汉时期的匈奴聚落。有学者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调查和发掘的匈奴城址和村落遗址，可以确定的有近20处^[4]，其中以伊沃尔加古城最为著名。该城发现于外贝加尔地区，地处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市西南16千米处。该城坐落于色楞格河古河床左岸台地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216

米，东侧为古河床断崖，东墙被河水冲毁，北、西、南三面以四道土墙、三道壕沟外加木栅栏构成总宽度达35—38米的坚固的防御体系。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城墙原有高度为1.5~2米，城壕深度在1.3米，城内发现80多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居址，以及600余处窖穴、灰坑、水井和取土坑等建筑遗迹。房屋有小型房屋和大型房屋两种。其中小型房屋数量最多，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门开在东南角；四周的墙用生土构筑，内壁涂有黏土；有的基址内墙附近发现有用以支撑屋顶柱子的花岗岩石板柱石；屋顶可能遍铺一层桦树皮，再涂抹草泥土而成；屋住面或经夯实或涂墁；屋内有炉灶和烟道，炉灶一般在东北角。大型房屋一座，位于城西面的一座大土丘上；房址呈矩形，东西长13米，南北宽11.5米；门洞开在南端，两旁有门柱，门柱之间，内外横置木头门槛；屋内墙壁和天花板涂墁有一层黏土，东北角有一用花岗岩石块砌成的炉灶，沿北墙和西墙有烟道，西南角有椭圆形垂直烟囱；屋内发现有陶器、磨谷器、家畜骨和其他遗物。发掘者认为大型房屋当为城中首领所居住。大房一侧发现有冶铁作坊，出土有铁器、陶器等。这一城址南100米的同一台地上，还发现有另外一座小的平面呈正方形的城址，但未发现有住人痕迹，性质不详。^[5]其实，从规模上看，此遗址更像是聚落遗址。

在乌兰乌德市的恰克图东35千米处，还发现有都列尼村。该村落遗址位于外贝加尔的七卡河边，未发现防御工事遗迹。1号居住区占据七卡河沿岸约11千米长的范围，发掘面积1.2万平方米，出土了不同类型的装饰品及一枚带有山羊图案的青铜印章；2号居住地层达11层，说明匈奴人在此生活的时间很长。目前发现有6处房址遗迹与大约628个窖穴、灰坑和柱洞；房屋结构与伊沃尔加古城类似，平面呈长方形，半地穴式，有3座房址的东

北角用石板砌有灶，在北壁和西壁也发现有烟道。

除伊沃尔加古城、都列尼村以外，在外贝加尔地区还发现有巴颜—乌德勒城、德满格尔图城址、伊赫尔村居住点等。[6]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的匈奴聚落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聚落带有较强烈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生产生活性质较弱，无论是文献记载中的龙城、赵信城、范夫人城和头曼城，还是考古发现中的伊沃尔加古城、巴颜—乌德勒城和德满格尔图城址都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形成，固然可能与聚落考古发现的不足有关，但关键还是游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因为牧民长期处于迁徙游弋的状态，生活点不固定，所以他们不仅不需要像中原农业生产者一样，根据人口多寡建造不同规模的聚落，而且当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也无须像中原地区一样另建聚落，他们的固定居处一般有一至两处即可，并且规模都有限。至于聚落为何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军事性特点，其原因如前所述，从社会组织管理角度来看，建立长期性的聚落空间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与巩固。二是作为居住空间，其聚落的建造，无论是构筑形式还是空间功能，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由于北方地区属于高寒地区，特别是在冬季，气候极为寒冷，这反映在居住空间上，一方面是流行保暖性较好的半地穴式房屋结构，另一方面是屋内炉灶及其相关取暖设施的普及。上述伊沃尔加古城和都列尼村中所见的房屋遗址中，都有类似的设施。居住空间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建筑用材上，北方地区因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其房屋建造多用桦树、桦树皮和岩石等。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匈奴、乌桓等在内的北方民族，以游牧、渔猎生活方式为主，却不限于游牧和渔猎。实际上在与中原地区交界的过渡区域内，也生活着一批兼具游牧渔猎和农耕种植两种经济生产方式的群体。可以肯定，北方游牧民族，既有利于

定居的房屋，也有用于游牧的简易房屋，即所谓定居与非定居的居住形式。定居房屋前文已有叙述，非定居形式，我国文献中不乏记载，以穹庐最为常见，即今天的蒙古包，也称毡帐。《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鲜卑“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匈奴聚落充分表明：经济文化模式影响甚至决定着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二、西域地区的聚落

作为一个名词，“西域”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作为地理方位概念，《汉书·西域传》中有对西域的界定，其云：西域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这一地理位置，即相当于今天的南疆地区。但事实上，《西域传》所述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不仅包括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地区与国家，甚至还有不少中亚地区国家。历史地理学上对西域的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我国西部疆域及其以外所能达到的区域，包括天山南部与北部地区，亚洲中、西部地区等。狭义西域，则主要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包括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

考古发现，早在距今3 600年前，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这一区域内就存在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最为典型的是

2015年6月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7]。该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地区，地处喀什河出山口处北岸三级台地上，遗址分布于东西长400米、南北宽约200米的范围内，台地两侧高山环绕，大河横贯，易于防守，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盆地。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面积共约8万平方米，年代距今3 600—3 000年。三次发掘累计清理房址37座，窑址、窖穴等300余座。房址多数集中分布于台地的背风较低处，其中有大型房屋6座，面积在100—400平方米不等，小型房屋有31座，面积多为20—60平方米不等，都是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内外均由石头砌成。有一大型房址，建筑面积约374平方米，室内面积240平方米，属半地穴木框架式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其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面垒石。在其房屋中，发现有大火塘、柱洞、灰坑、石堆、红烧土面和大量的炉渣、煤块、煤渣、木炭、煤堆等。从房屋遗址的规模和所处位置、内部遗迹遗存等内容来看，此处大型房屋可能是部众聚会、议事或从事生产加工的公共空间，而其他小型房屋则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居场所。从大量出土的马、牛、羊等骨头，多件石磨、石杵等食物加工工具和少量大麦、小麦、黍等农作物来看，生活于这一区域的人们采用的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生产方式。煤堆的出现则充分表明，距今约3 600年前的新疆人民已充分认识到了煤的特性，并将其运用到取暖、做饭等领域。正是在这一早期发展的基础上，西域在汉代以后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区域。作为区域文化、族群文化，西域与周边地区的族群或政权曾发生过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互动。

考古和历史文献显示，汉代以前，西域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流就相当密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秦末汉初，西域地区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很多小国在匈奴的控制范围内，汉武

帝以后，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西域诸国，开辟了沟通中西的通道，这条通道也被学术界命名为“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统辖大宛以东、乌孙以南的30多个国家，以协调西域各国间的矛盾和纠纷，维护地方秩序。相关研究资料表明，秦汉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分布主要为：天山以北的乌孙、呼揭、车师后国；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楼兰（后来改名鄯善）、扞弥、于阗、莎车；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车师前国、焉耆、渠犂、龟兹、疏勒；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康居、大宛；葱岭的西夜、蒲犂、无雷、难兜；葱岭以西的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葱岭以南的身毒等。[8]

上述这些西域小国中，既有游牧部落，也有城郭之国。西域地区广泛散布着部落或民族及其政权的事实，意味着这一区域范围内存在着不同规模、数量不等的聚落。据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资料，两汉时期的西域城址共计有60余座[9]，为人所熟知的有楼兰古城、尼雅遗址、龟兹故城、米兰古城、高昌故城、石城、苏巴什古城、交河故城、柳中古城等。这些聚落的性质虽然都属城郭，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汉时期西域地区的聚落面貌与生活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楼兰古城、尼雅聚落。

作为楼兰古国的政治中心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楼兰古城遗址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商业繁荣，而且其出土的文物也充分表明这里曾有多种文化汇聚。古城现存于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今属若羌县。考古复原显示，楼兰城郭聚落，平面呈正方形，东面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万平方米。北城墙东西两端之间有宽约22米的缺口，似为北城门。南城墙的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

宽约13米的缺口，基本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城内发现有人工开凿而成的古水道，与流经古城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城内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有佛塔及其附属建筑，在佛塔周边除发现有倒塌的房屋遗迹外，还搜集到了丝、毛织品、生活用具和五铢钱、玉髓质、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西南区遗迹较多，除3间房址外，在西部和南部分布有大小院落。3间房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小，中间一间宽大，由两种大小不同的土块垒成；东西厢房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墙壁外涂草泥。这3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布局严谨。结合房屋及其附近发现的木简、文书和不少精致的毛织品、漆制品，推测这里当为官署。在楼兰古城的东北、西北和北部城郊，还分别发现有小佛塔、烽燧和建筑遗址。[\[10\]](#)后来又有考古工作队在楼兰古城东南面积约150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了调查，发现房址2座，墓地2处，遗物465件，说明在城址周边还存在小规模居住点或村落。[\[11\]](#)

尼雅聚落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域南道上十分兴旺的一个东西交通要地，位于今新疆民丰县以北约100千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遗址分布以佛塔为中心，沿尼雅河古河道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在南北长约25千米、东西宽约7千米的范围内，大大小小散布着上百处遗址点，各遗址点之间以沙丘相隔，体现出明显的群聚性。从遗址分布来看，尼雅遗址可以划分为16个遗址群，其中较为典型的有6个。[\[12\]](#)（1）以佛塔为中心的遗址群。佛塔位于南北遗址群的中间位置，其形制与楼兰、米兰、安迪尔、喀什和库车的苏巴什佛塔类似。佛塔东西两侧约10米处有红柳编织而成的低矮栅栏，南面是一片平坦开阔地，散布着大量的陶片、木构件；西北约300米处，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田畦，残留有水渠痕

迹，属于公益性和仪式性建筑。N2位于佛塔东北面，包括19组建筑，有房50余间，基本处于一个直径为150米的圆弧内依次排开。1995年清理的5组房屋，其每组房屋均由多间套房构成，有居室、厨房、火灶、庭院（院内种果树）、牲口棚等。N1距佛塔约1.5千米，距N2约500米，布局可分为四室，纵横各二，形如刀形，其较大的一间房中央有椭圆形火灶，西北为牲口棚，南为以篱笆墙相围的平坦大院，其中发现有文书，可能为“公事房”。（2）以N13、N14为中心的遗址群。N14属于大型居住空间，由4间房址构成院落，其中最大者东西长17.7米，南北宽11.6米；N13也属于大型居住遗址，但规模面积要小于前者，有6间房址相连，也分居所和厨房等；N15、N16、N17属于小型居住房址，多为单间，面积约20平方米。（3）佛寺遗址群。以木板围成正方形土台，四周篱笆墙形成回廊，平面布局呈正方形“回”字状，门朝西，当为地面木框架式建筑，篱笆墙上发现有壁画。佛寺北有用篱笆围成的简陋小屋及牲口棚，有一门，疑为亭楼式门。台地北部有一组房屋建筑，4间一字排开，中间有一道南北向走廊，每间房屋长约7米，宽约5米。（4）N3、N4遗址群。N3北面距佛塔约3千米，是一组大型木构件建筑遗址，由廊檐式院落、大厅、寝室、厨房、存储室、牲畜棚等部分组成，整体布局完整、和谐统一，梁柱粗大，工艺精细。院落周围有一周篱笆墙，墙面上有精美壁画。房屋建筑面积1475平方米，可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N4东面距N3约50米，形制与N3基本相同，有经过加工的胡杨木棍散乱于地，东北方、西北方皆有一小乘凉地，有枯死的杨树干，树按一定的间隔种植，组成一个长方形林荫道及小广场。房屋南面、西南一带用篱笆相围，有桃树、杏树、桑树、沙枣树等，果园南面两排篱笆标示出一小段乡间小道。（5）古桥遗址群。位于尼雅遗址南部，距佛塔7千米，从河岸向河中心成三段相连。横跨两岸。附近有编号N41的房屋遗

址，古桥所在河道的东岸发现四五处房址。古桥西侧有房址，房周边有用篱笆墙相围的葡萄园遗址。（6）古城。位于遗址南部，距佛塔13千米。大部分被红柳包覆盖，平面形状大致呈椭圆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50米，城墙由淤泥堆筑而成，南墙中有一被烧毁的城门，为过梁式的木构门洞，城门前6米清理出一面积15平方米的房屋。城南零星分布有小规模的住宅遗址。

楼兰古城和尼雅遗址两处案例显示，秦汉时期的西域聚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聚落选址靠近水源，在建筑建造上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住宅门前有庭院，周围有防风沙篱笆、林带、果园和乘凉之处，显示了西域人适应自然和改善生活环境的能力。二是聚落布局有一定的规律性，譬如楼兰古城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区；尼雅遗址的布局虽然相对分散，但整体上以佛塔为中心，每个遗址群都按一定规律布局。三是聚落体现出明显的社会组织性，不仅发现有规模较大、建造较为精美的公事房，而且在建筑规模上可以明显地分出大、中、小三种类型，建筑组合也各有差异，表明聚居群体有层级的不同。四是聚落中频繁出现的佛事建筑，以及以佛塔为中心环绕布局的现象说明，佛教在汉晋甚至更早的时期就传入了西域，汉晋时期西域地区不仅普遍崇佛，而且佛教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五是聚落突出表现了文化的交融性，各类出土遗物，如西亚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犍陀罗的装饰图案，印度的织物，中原地区的丝织品、漆器、铜镜、钱币等，充分显示出这里曾经汇聚着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以上几点不尽完全，但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区域范围内聚落的面貌与文化形态。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考古发现的规模不等的西域聚落，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城郭聚落和屯田聚落两类，前者是当时西域诸国的城郭遗存，有一部分后来被改筑为汉代驻军屯城，譬如楼

兰古城、高昌故城、龟兹故城等；后者是汉代国家为稳定西域安全、开展屯田修筑而成的，有学者统计，新疆地区汉代屯城遗址有45处，这类聚落与西域聚落区别较大，一般多呈方形。[\[13\]](#)整体而言，城郭聚落和屯田聚落，作为西域人或驻扎西域的汉人在西域的生产生活空间，或商业贸易空间，或用于标识政权的政治性空间，都体现出了地域性和各自民族的多样性特点。



插图1内蒙古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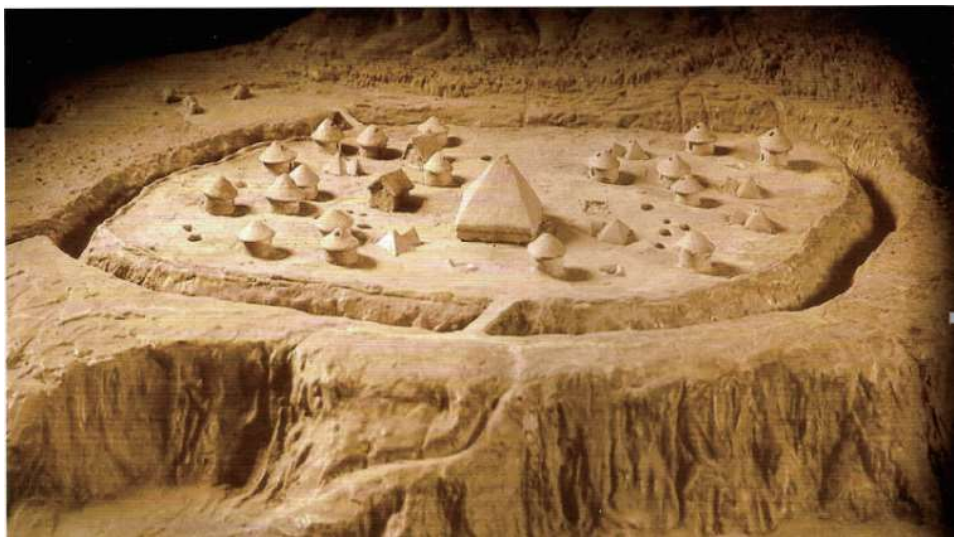


插图2半坡聚落复原图



插图3姜寨遗址聚落复原图



插图4蒙城尉迟寺遗址



插图5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复原图



插图6湖南勾蓝瑶寨发现的牛庄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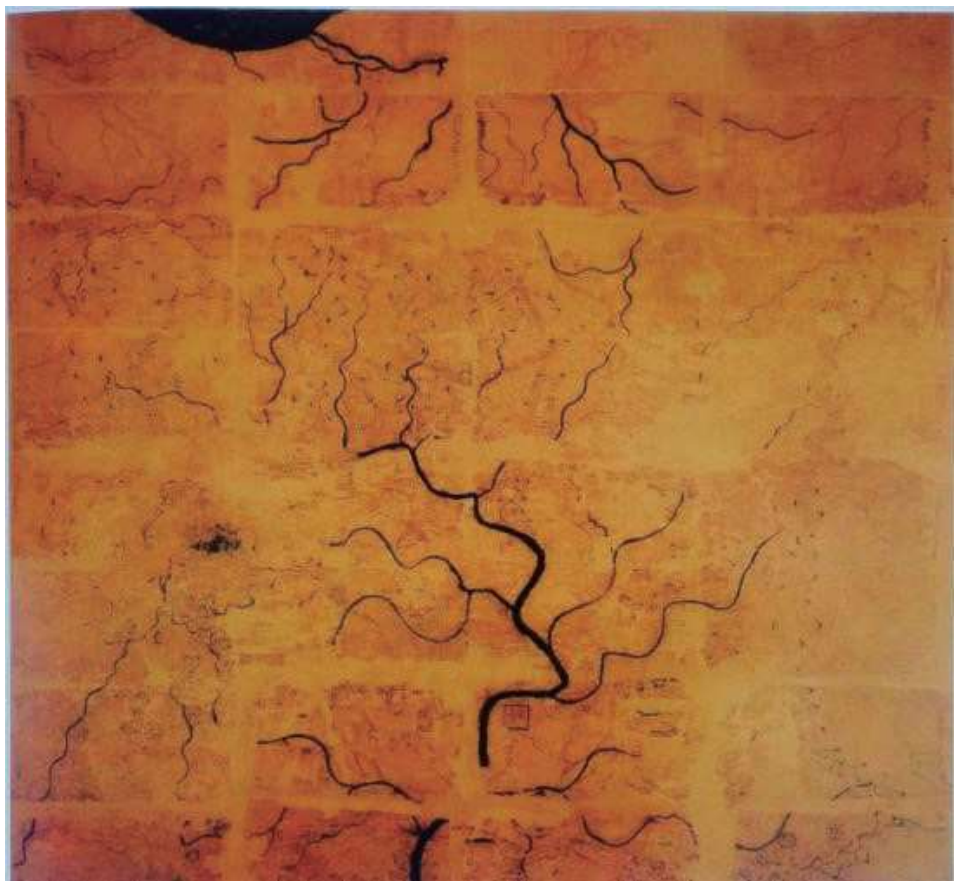


插图7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



插图8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



插图9山东前凉台汉墓画像石讲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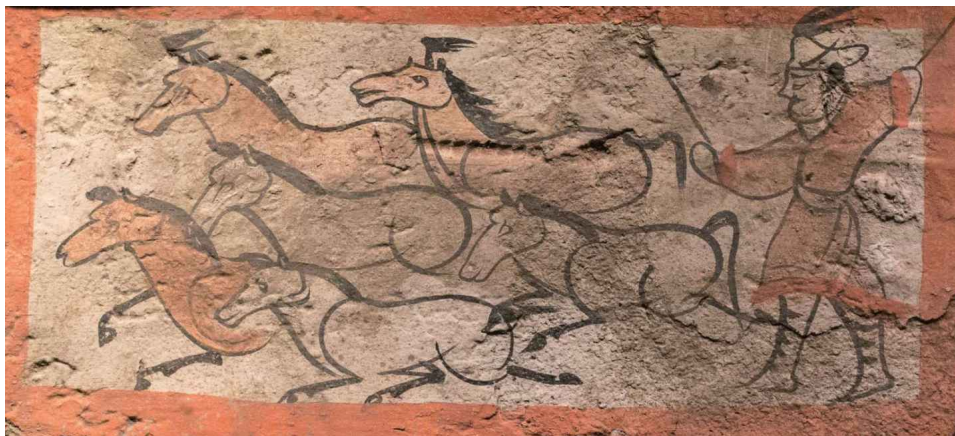


插图10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壁画砖





插图11郴州宜章黄沙堡（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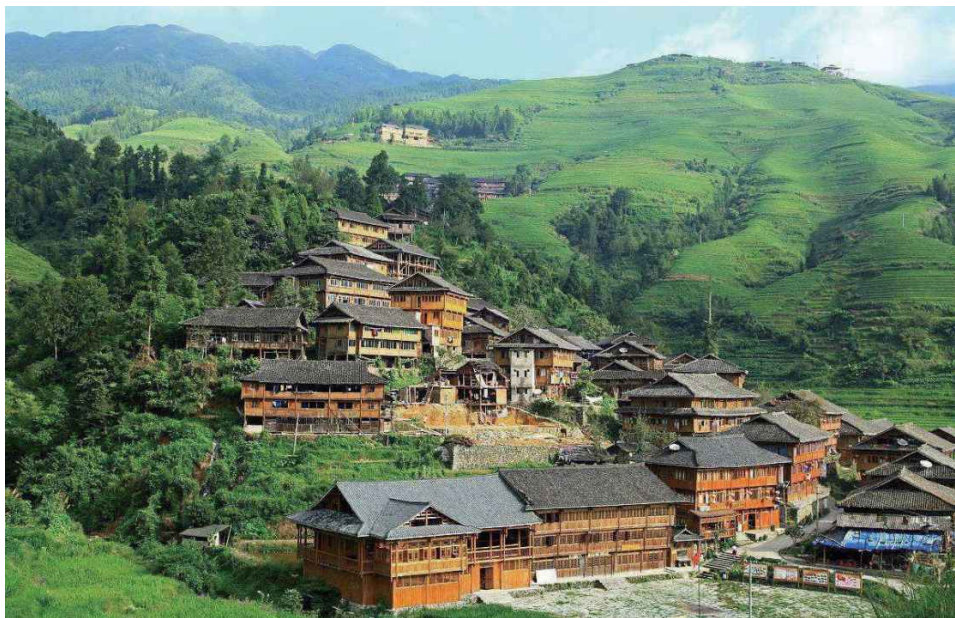


插图12湖南城步县大寨村



插图13湖北襄樊樊城三国黄褐釉陶楼



插图14a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农作图



插图14b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农作图



插图15陕西博物馆藏唐三彩民居院落



插图16敦煌壁画中的农事图



插图17 《农政全书》筒车图



插图18中国农业博物馆藏曲辕犁

[1]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2] 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3] 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4] 马利清：《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5] 王可宾：《伊伏尔加古城述论》，《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马利清：《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6] 马利清：《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文物局：《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年第7期；《新疆尼勒克县山谷发现3600年前聚落遗址》，<http://xj.news.163.com/19/0105/10/E4OJEH4E04328F7J.html#>。

[8] 钱伯泉、王炳华编著：《通俗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古城遗址》，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调查2015年度调查报告》，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等编：《西部考古》（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 阮秋荣：《试探尼雅遗址聚落形态》，《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

[13] 张安福、田海峰：《城址遗存与汉代西域屯城布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



第四章

南北分裂割据时期的村落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代。自曹魏建立到隋代重新统一，共持续了360多年（220—589年）。在这360多年间，共有曹魏（220—265年）、蜀汉（221—263年）、孙吴（222—280年）、西晋（265—317年）、东晋（317—420年）、成汉（304—347年）、前赵（304—329年）、后赵（319—351年）、前凉（317—376年）、前燕（337—370年）、前秦（351—394年）、后燕（384—407年）、后秦（384—417年）、西秦（385—400年，409—431年）、后凉（386—403年）、南凉（397—414年）、西凉（400—421年）、北凉（397—439年）、南燕（398—410年）、北燕（407—436年）、胡夏（407—431年）、冉魏（350—352年）、翟魏（388—392年）、前仇池（296—371年）、后仇池（385—442年）、西燕（384—394年）、谯蜀（405—413年）、代（338—376年）、北魏（386—534年）、东魏（534—550年）、西魏（535—556年）、北齐（550—577年）、北周（557—581年）、刘宋（420—479年）、萧齐（479—502年）、萧梁（502—557年）、南陈（557—589年）等30多个主要的大小王朝兴亡交替。如果加上后世所称的少数民族政权如“××王国”“××公国”“××汗国”等，共有60多个政权。王朝交替，带来了长期不断的战争，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急剧下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严重受阻。民户的非正常锐减，使得自秦汉兴起的乡里制这一基层行政体系在某些区域失去管理对象。有的乡里组织更是自行废除。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其中，起源于本土儒家的玄学兴起，道教组织开始成熟，外来的佛教在此扎根。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融合，波斯及希腊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为中国文

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村落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之前，汉代的中央王廷对民众的控制非常强势。生活于城市之外的民众，大多居住于里、亭、乡之中。在父老长者的管理下，这类具有行政编制意义的聚落，都带有“自治”的性质，但又为国家所牢牢掌控。此时的自然聚落大都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畴。在汉末，由于连年纷争，国家分裂，皇权在基层的体现明显弱化，汉代以来形成的乡村管理制度趋于崩溃，出现了与原来不同的村制。在此之前，汉代统治者为了牢牢控制民众，便于国家征发兵役和征收人头税，实行了卓有成效的里制以及乡亭制。“可是这个乡亭制和里制开始崩坏了。而且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村制代之而兴，这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变化。”^[1]在长期的战乱中，汉代的乡里组织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而消失之后，村落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在战乱中求生存，一些世家大族在城市以外的山间河谷等地，建立起坞、堡、壁等小型的城堡进行自我防卫，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村”。^[2]总而言之，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一个时期是“皇权不下县”的肇始期。此后的1000多年里，中央王朝任命的官员到了县这一级就终止了。县以下的村落秩序的维系与管理，基本上由乡绅等皇权代理人来把控。

^[1] 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载宫崎市定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页。

^[2]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108页。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落组织

一、乡里组织的兴废

从目前确凿可信的文献记载来看，乡里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乡里制度的形成与周代的“国”和“野”的概念有关。“国”是指国都，国家的政治中心；“野”是指国都之外的地方。

国都方圆百里之处为郊，郊的行政建制是“乡”。乡的职官包括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官位不同，负责的事情也不同。如乡师主要负责教育乡民，并考核乡中官吏的政绩；按时清查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年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确定哪些人可以服兵役、劳役，或者免除兵役、劳役；还要负责评判乡民之间发生的争讼。最小的是比长，管理5个家庭。如果其中有一人犯罪，其他4家人都会受到连累。如果有人要迁移至其他地方，比长要发凭证；没有凭证，迁徙者会被收监。《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由此可知，从数量上来看，一比为5户，一闾为25户，一族为100户，一党为500户，一州为2 500户，一乡为12 500户；从主要功能来看，比、闾、族、党、州、乡也各不相同。

郊以外的地方称为“野”。国有六乡，野有六遂。“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鄆，五鄆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

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1]可以看出，“遂”与“乡”是因地域差异产生的两个基层单位概念，不仅其下属各级单位的划分相互对应，两者下辖户口总量、同级单位辖管人数也相同。不同的是，遂与遂之间、遂内部各级行政区划之间，皆以挖沟或种树的形式划界。遂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遂人”，掌握着区域内的政令、刑罚和禁令。此外，在遂人以下还有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酈长、里宰、临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等不同级别的官吏。

可见，当时国家不只对城市居民管理严格，对村落居民的管控也一视同仁。虽然《周礼》是秦汉儒生的著作，其记录的情况未必是西周社会状况的如实反映，但如此完备系统的制度，应该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因此将乡里制度的初步形成期定在西周是较为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周礼》中的“乡”，相当于后世的省级行政区划，而与后世乡级行政区划相对应的则是“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乡”级行政单位的职能逐渐下移，移位至县级行政单位以下。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乡里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最基层的是什伍组织。十户人家称为“什”，设什长；五户人家称为“伍”，设伍长；百户人家称为“里”，设里魁；千户人家称为“亭”，设亭长；万户人家为一乡，不仅设三老、有秩、嗇夫、游徼管理乡务，还设有协助收税的乡佐。乡里制度在汉代已经十分成熟。

东汉末年开始，军阀纷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长期活动于西域等边疆区域的少数民族逐渐崛起，并入主中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这些民族政权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仅各据一方，互相独立。这种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无法再维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各种思潮盛行。受此影响，乡里制度也发生变化。

受到政权变更的影响，许多地方的乡里组织被废置，仅有部分区域依旧延续前代的乡官制度，且呈现出南北差异。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大一点的乡，设置有秩、三老作为管理者，俸禄为百石，八品待遇；小一点的乡，则设有秩和嗇夫，俸禄也为百石，不过品级为九品，略低。^[2]两晋时期基本上延续这种基层管理制度。《晋书·职官志》载：“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嗇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南朝宋时，相关史料记载相对详细，但差别不大。《宋书·百官志》载：“县令、长，秦官也。大者为令，小者为长，侯国为相。汉制，置丞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嗇夫主争讼，游徼主奸非。”

但在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所统治的北方地区，其乡里制度则与三国及两晋有所不同。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曾实行三长制，即5户人家设置一个邻长，25户人家设置一个里长，125户人家设置一个党长。^[3]东魏时期，乡里制度也实行三级，但稍有区别。《北史》载，孝静帝时，“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4]。550年，东魏权臣高洋逼迫孝静帝禅位，建立北齐。北齐的乡里制度也采用三级制，但一个单位内的户口数量上有所增加：“令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

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5]三者虽有不同，但基本上能看出，这种乡村管理者的设置，既是《周礼》中描述的乡里制度的延伸，又是其简化的结果，最终简化为三级。关于西魏和北周的乡里制度，历史文献中并无系统的明文记载，但是这两个时期可能只剩下党和里二级。^[6]

值得注意的是，三国、两晋以及南朝的乡里制度，延续了秦汉的传统，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却跳过这400多年的历史，直接续接周代传统。其原因可能主要与不同的王朝制度设置有关。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要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而且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缺乏文化传统，历史负担较轻，所以通常根据实际情况对汉文化进行取舍。^[7]进一步来看，因为各个时期王朝的建立者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实施的制度也有差异。从民族心理来说，三国、两晋以及南朝的建立者，皆以上一朝代的正统延续者自居。即使三国时代魏蜀吴并列，它们也各自都将自己视为汉代正统的延续。所以，延续秦汉的制度，是魏晋统治者将自己视为正统的一种表现。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的建立者，皆为周边少数民族，其在秦汉时期就独立存在于秦汉政权之外。他们一旦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则以周文化的延续者自居，所以在制度上仿效周代，这也不难理解。

二、屯田村落的形成与组织系统

汉代开始，历代政府为了取得军队给养或者赋税征粮，直接组织戍卒、农民或者商人垦殖荒地，经营农业，戍守要塞。这种集体协作的制度，就叫屯田制。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因屯田制而形成的村落，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屯

田村落”。

关于屯田制的记载，始见于汉代文献。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向皇帝上书《守边劝农疏》。这篇著名的文章奠定了西汉以农为本思想的基础，同时也首次提出了屯田制。晁错指出，胡人如同飞鸟走兽，逐水而居，不需要固定在一处耕田种地，不时入侵边境，令人难以提防。如果不派军队去征讨，百姓会对国家失望；但如果派兵去攻打，人手又不够；队伍太大又行动不便，还没有到，敌人就跑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晁错提出了对策：“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藁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8]简而言之，就是将内地的罪犯、奴婢、农民迁徙到边疆某一区域长期居住下来，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一旦胡人入侵，则将这些居民组织起来变成军队。使其平时为农民，进行日常耕作；战时则为军队，能够抵御外寇入侵。实际上，针对当时的状况，这是比较周全的计策。所以，汉文帝采纳了此建议，并下诏招募民众迁徙至边疆。

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有了定居的人口，必然要对其进行管理。尤其是在以罪犯、奴婢等素质并不太高的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成了必须应对的大问题。因此，晁错再一次提出了他的建议与对策。他强调，下层官吏应当体恤迁徙过去的老弱之人，好好对待精壮之士，“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9]。并且，要建设一个好的环境，使边疆之地有值得民众长期定居的理由。具体措施就是：“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立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0]

最为重要的是，还要仿效内地的乡里制度，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才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已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11]屯田之区域，以“伍”“里”“连”“邑”为单位，各有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要品德高尚（“有护”）、懂地理（“习地形”）、了解民情（“知民心”），负责教导领域内的居民射箭应敌，团结一致，“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12]。在屯田制度的推行下，原来的荒凉之地经过多年的开发经营，逐渐衍生出人烟稠密的村落，有的地方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了市镇。可以说，晁错的这一建议具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村落形成与发展来说，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直至清代，这种屯田制度仍被统治者运用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

西汉的屯田区域主要集中于今天的新疆地区，先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附近），后扩展到渠犁（今新疆尉犁县）、依循（今新疆若羌县）、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北胥鞬（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以及乌孙赤谷城（今新疆伊犁附近）等地。^[13]魏晋时期，中原地区长久处于分裂状态，各个政权皆无暇顾及西域，但屯田制度一直未在当地间断，只是屯田规模有所缩小，且区域逐渐东移。三国时期，曹魏在吐鲁番的高昌城设立戊己校尉，在罗布泊西北的海头城设立西域长史，其目的也在于屯田。自西晋直至十六国时期，各个王朝在西域的屯田区域都没有脱离高昌和楼兰这两个地方。虽然屯田范围缩小，但是屯田制度日趋完善。魏晋时期，统治西域的最高长官是西域长史，其下属有司马、主簿、功曹掾、功曹史、录事掾、兵曹史、水曹督田掾、客曹史、奏曹史、仓曹掾、仓曹史、监量掾、监藏掾、监仓史、书史、督、将、伍佰、马下、铃下、督战、从掾位和从史位等20多个不同的职位。^[14]西域长史既是军事长官，也是行政长官。在具体农作物耕种的管理与司事等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且分工明确精细。例如，督田掾负责开发耕种管理，监藏掾负责农作物的收割，监仓史负责保管，监量掾负责计量。官吏将土所需粮食，经由监仓掾、史，仓曹掾、史，监量掾签署或与功曹掾、主簿等共同签署文书之后，才允许出仓。戊己校尉的设立自汉代一直延续到前凉，其间兵屯体系也逐渐完备，而且民屯地位有所上升。魏晋时期的民屯比重加大，而且内地移民逐渐增加，随之必然形成许多规模不等的聚落。除此之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犯屯”。犯屯即指将一些犯法之人及其家属流放到边疆地区定居生

活，如邓艾家族、苻阳家族等。^[15]实际上，以罪犯充实边疆地区人口，在晁错的《守边劝农疏》中也提到了。所谓“犯屯”，本质上应该仍旧属于民屯类型。

东汉末年，豪强纷争，军阀林立，劳动力多被招募入军队，且战死者不计其数。瘟疫肆虐，人口锐减，连士族出身的“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刘桢、徐幹、应瑒5人都死于瘟疫。人口的减少，导致耕作能力不足，田地荒芜。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年）在许昌屯田。曹操的屯田制度，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的区域，以“屯兵”“田兵”及其家属为主要劳动力。他们按照军队的编制被分为屯和营两个单位进行组织管理，且耕且守。军屯的基本单位是营，60人为一营，依次设置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由军队内部自行管理。

民屯区域，以征发或者招募形式获得的流民为主，也按照军事组织编制管理。他们平时从事生产，一般不承担徭役，遇到紧急情况则应召参加战斗。民屯以50人为一个单位，置司马一职管理。司马以上，依次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为大司农总领。需要指出的是，民屯组织自成系统，不归地方郡县管理。屯田的组织带有军事性，纪律严密，能有效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生产，提高了曹魏政权的实力。而且，屯田制度还促进了水利的兴修，这使得当地的农业耕作得以维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例如，自建安七年（202年）起，为了屯田的需要，曹操陆续开凿了睢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6条运河，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扬州刺史刘馥在合肥附近兴治的芍陂、茄陂、七门、吴塘诸堤，豫州刺史贾逵兴在睢阳修建的贾侯渠，沛郡太守郑浑在萧县、相县兴修的郑陂等，都泽被后世。同时，兴修水利也促使因民屯制度而形成的村落，作为屯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聚居单

元，得以长久维系，其生命力远远超越了因曹操而兴的民屯制度本身。制度不存，而村落存。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三国纷争的时代。西晋的建立者虽然是晋武帝司马炎，但奠定司马家族势力的则是司马懿。早在曹魏时期，司马懿就采纳邓艾的建议，在淮南北设立军屯区域。《晋书》载：“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颖，大治诸陂于颖南、颖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16]司马炎重视农耕，也积极推行曹魏时代的屯田制度，或者说，延续了先祖司马懿的制度。司马骏掌管雍州、凉州等地的军事大权，“与士卒分役”，在辖区内督促僚佐、将帅、兵士等人进行耕织活动，每人限田十亩。^[17]1972年，嘉峪关东北戈壁滩上，陆续发掘了一系列魏晋墓，出土了600多幅壁画。（见插图10）壁画内容丰富，包含各种生产生活场面。其中3号墓中的一幅壁画，绘制有官兵操练及耕作的场景。它与酒泉西沟7号墓中的几幅画一起，反映了魏晋兵屯“出战人耕”“且佃且守”的真实情况。^[18]楼兰等地出土的魏晋文书显示，当时屯田守堤的都是戍卒，其规模为每处20~30人，每人负责20亩左右。屯田区域中修筑有小型水库和河渠，有戍卒专门守护，还设有水曹来管理水利。从民族身份来看，屯田者以汉人为主，但也包括不少当地的少数民族。整体来看，楼兰等地通过屯田所生产的粮食，基本上能达到自给有余。^[19]

西晋以后，司马政权南渡，北方仍旧陷入战乱，先后有16个政权兴亡交替，统称“北朝”。包括匈奴、鲜卑、羯、羌、氏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重视兴办屯田，劝课农桑，组织军民开荒生

产，保障和满足生活需求，巩固自身的军政实力。北朝的屯田，始兴于北魏建国之初。随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也都十分重视屯田。北朝的屯田，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规模比较大。其中，主要也是军屯和民屯两类。军屯是为了应对战争和巩固边防之需，所谓“布屯田以实边防”，为强兵足食。民屯则主要是为了安辑流散，垦辟荒地，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北朝的屯田与曹魏时期的屯田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军屯为主，屯田区域主要集中于边疆地区。[20]北魏建国之初，太祖拓跋珪面临军粮供应的困难，大量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屯田因此兴起。登国九年（394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柰杨塞外”，第二年秋天，即“收稼田百余万斛”。[21]后来，拓跋珪又实行过两次屯田。虽然规模较小，但屯田制度一直得以保存延续，成为北魏的常设制度。屯田区域集中于北方、西北及南方的边境，多以军屯为主，大大增强了北魏的固边军事实力。而在内地州县，北魏也曾广泛设置民屯。太和十二年（488年），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在内地实行屯田，充实国家财政：“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22]

北齐时期，屯田的规模得到扩大，“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中央设有屯田曹，专“掌籍田、诸州屯田等事”，又设司农寺典农署，“别领山阳、平头、督亢等三部丞”的屯田。各地的屯田，则“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每一子使掌管屯田50顷。[23]西魏时，薛善掌管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十二月诏曰：“今以邳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24]北周

也广事屯田。宇文泰时，苏绰建议“并置屯田，以资军国”[25]，获得采纳。北周时，武帝谋划伐齐，韦孝宽建议于“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武帝于是在壤接北齐的东北边地大兴屯田，积储军粮，为灭北齐提供了重要保证。[26]

魏晋时期屯田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自中原农耕文明区域迁徙过去的。例如，前秦建元末年（385年），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黠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27]。义熙元年（405年），北凉李暠迁都酒泉，又将敦煌的人口迁入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28]。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凉的沮渠无讳率领包括官吏、士卒、平民在内的一万多户人家西渡流沙，在西域定居。[29]不仅中原地区的人被用来屯田，少数民族人口也同样被纳入屯田的主体。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文书表明，龟兹的帛午、帛弘持、帛珠，天竺的竺黄媚、竺国双，车师的车末都，以及其他族属的思头幕、唤屯、阿览提等少数民族成员，都曾以各种形式参与高昌屯田。[30]这些记载表明在战乱时期，西域的大小政权为了巩固各自的地位与实力，都有将人口迁入的案例。屯田人口迁入边疆地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直接促成了屯田一类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相对于北朝而言，南朝的屯田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这与南方的自然气候条件较为优越有关系。前文已述，屯田政策最初的提出，是由于边疆地区的自然气候不利于耕作，常住人口较少，粮食生产难以供应军队的日常开支。而在南方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均衡，即使在与北朝接壤的边界地区，粮食的耕作也没有受到自然条件太多的制约，与内地无异。屯田的展开，需要的土

地是无主荒地。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湖泊密布，能够满足耕作的土地都已经被利用多年，荒芜土地很少。不过，南朝的各个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受汉代及三国时期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看到了北朝屯田政策带来的现实效果，屯田的倡议时有出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应詹上书建议仿效曹魏实行屯田：“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31]晋明帝时，王敦两次起兵叛乱，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困顿。太宁二年（324年），晋明帝平叛之后，温峤建议启用中央禁军屯田：“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32]刘宋时，王弘针对“时农务顿息，末役繁兴”的状况，向宋武帝刘裕建议减省建康诸冶，以冶吏配农，招募平民亦循冶募系统。^[33]此外，刘宋的何承天提出在淮泗屯田，徐爰建议在边镇屯田，等等。南齐的崔祖思、徐孝嗣、祖冲之等人，也都曾上书皇帝，请求屯田。

整体而言，东晋与南朝的屯田，其力度和广度都不及北朝，大多停留于书面文字之中，其原因与性质，权家玉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揭示：“东晋南朝时期，虽并未开展大规模屯田事迹，然屯田思想却时有出现。但东晋南朝虽均有屯田建议，其重点则各不相同：东晋注重民屯，旨在巩固建康统治，大概由建康财政匮乏且在荆扬之争中屡屡为上游挟制所决定。而南朝则注重边镇屯田，此与鲜卑频繁扰边紧密相关。而建康亦苦于北面边镇转运，此徐孝嗣上书已然指出。虽然五朝时期政府并未推行屯田，然屯田事迹却屡有出现，且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34]

总之，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屯田，都离不开召集劳动力对原本荒芜的土地进行开垦。随着战争结束，驻军解散，原本担任开垦任务的军民却留了下来繁衍生息，形成村落。在某种程度上，由屯田形成的村落，与下文的由坞壁形成的村落，有着共同之处。

三、永嘉之乱与坞壁的兴起

西晋时期，政权内部斗争始终没有中断。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使得晋室分裂，国力空虚，军事实力迅速衰退。活跃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侵入中原。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杀王公士民数万人，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以后，晋朝统治集团南迁，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此后，北方基本上陷入分裂，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某种意义上，东晋与南朝乃至十六国与北朝的历史，大体都与人口南迁有关，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东晋与南朝是人口南迁的迁入地；而十六国与北朝，则是人口的迁出地。人口的南迁，改变了迁出地胡汉成分、分布与力量的对比，也改变了迁入地侨旧成分、分布与力量的对比，并进而影响当时以至后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风俗、民族等各个方面。^[35]大量的侨州、侨郡在国都建康周围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传统中国的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南迁的人口对于南方无主荒地的开垦和在此之上衍生的村落的大量形成，有深刻的关联，影响深远。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卢水胡等，

在北方地区先后建立政权，这些大小政权相互对峙，此消彼长，在历史上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事实上，少数民族不止5个，建立的王朝也不止16个。从304年匈奴刘渊称王，建立汉国（后改为赵，泛称前赵，亦作汉赵），到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建立的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共持续了130多年，之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并被北齐、北周分别取代。这一时期的胡人政权再也没有登上过历史舞台。内迁的五胡民族主体，基本上都融入汉族之中。这也是今天汉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永嘉之乱”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给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地区带来了持续100多年的战乱，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人口减少。永嘉之乱展示了人类在对权力的追逐之下，可以在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同族之间、异族之间实施血腥的杀戮。在战乱之际，秦汉时期实行的乡里制度遭到破坏。实力雄厚的乡里大族，便率领百姓逃亡山野之间，修筑城堡自我保卫，形成“坞壁”。坞壁形成于新莽时期，史书中的记载举不胜举。马援、邴原、樊宏、冯鲋、第五伦、李典、许褚等，都曾经当过坞壁主。[36]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37]在魏晋时期，坞壁的出现更加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永嘉之乱”带来的影响。并且，“由于东汉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及部曲佃客制的发展，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强化了封建宗法思想，滋长了以血缘和地域为核心的宗乡观念，这就为这种社会集团的凝聚提供了经济和思想基础”[38]。坞壁有时称“坞”“壁”“垒”“坞堡”“壁垒”等，原本只是一种建筑类型，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以宗族豪强为代表的且带有一定武装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演变过程中，最突出的就是初步形成了以血缘

和地缘为核心的宗族观念与乡里观念，这对早期中国村落的形成与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坞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宗族豪强坞壁。其产生有几种原因。第一，抵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之后，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紧随其后，风起云涌。仅据《后汉书·朱儁传》的记载，就有25次，包括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晒。农民起义虽然是反抗官府贵族，但在客观上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了对抗农民起义军的攻击，宗族豪强组织乡里族群民众建造坞壁。三国名将许褚，早年就曾“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39]。此外，吕虔、李通、李干、李典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北朝时期，赵郡李氏统率的坞壁部曲，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连由葛荣领导的当时北魏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也攻打不进去。^[40]第二，对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这类坞壁主要出现于北方地区。十六国时期，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宗族豪强组织乡里据坞壁以自保。河东汾阴薛氏自川蜀迁居河东，成为大族，实力强盛，几代人都有抵御少数民族的经历，如薛强抵御鲜卑慕容氏，薛辩抵御匈奴赫连氏，而薛强的先祖更是曾抵御过刘渊、石虎、苻坚等。^[41]直到北魏初期，历时100多年，薛氏都以坞壁武装保持了独立，在局部地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局面，维系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第三，为了在军阀混战中自保。由此形成的坞壁，主要出现于江南地区。从东晋到刘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也影响了坞壁的形成。如关于豫州的夏侯家族，《南史》载：“中大通六年，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积岁连兵，人颇失业，夔乃率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

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频得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夔在州七年，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42]此外，浙江东阳的留异，福建侯官的陈羽、陈宝应父子，湖南长沙的欧阳颢，四川充国的侯瑱，等等，都是因此形成了比较大的地方势力。宗族豪强的坞壁兴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消极一面是，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破坏力量，如对当地百姓进行侵扰搜刮；它的积极一面是，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在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比较大的交易市场。

二是家族共同体坞壁。这类坞壁以宗族为核心，他们在战乱中迁居于空旷的山区，结坞自保，例如汉献帝时田畴在河北一带组织建造的坞壁。史载，田畴为了抵御汉族军阀公孙瓒以及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率举宗族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对前来归附的父老说：“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郡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大家一致推举田畴为坞壁主。于是田畴制定了相关条款，“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43]。西晋时，庾袞在河南禹县建立的坞壁也是如此。八王之乱时，庾袞的家乡遭受兵乱，为了防卫自保，庾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庾袞教导百姓说：“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众人提议庾袞为坞壁主，庾袞于是与众百姓约定规则共同遵守：“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庾袞与众人在山林深处“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建立了一个具有军事

功能的寨堡式村落。在村落内部，实行有序的管理制度：“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其结果是：“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及贼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虽然村落民众连续三次进攻击退敌人，但由于藩王持续作乱，庾袞再次迁于林虑山，林虑附近的民众又来归附。后石勒攻打林虑，当地父老又建议集体迁往大头山。^[44]可以看出，一方面，当社会混乱时，底层百姓只有抱成团才能自保；另一方面，庾袞等底层民众的领袖在这种自保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流民坞壁。流民坞壁指的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家族的民众共同建造的坞壁。这些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聚集生活并非由于彼此之间具有血缘关系，而是连年战乱的冲击，迫使他们聚在一起团结自保。例如，李傕、郭汜作乱时，关中百姓流离失所，长安死伤狼藉。为了求生，百姓只得纷纷外逃。部分逃往蓝田的百姓，被当地术士刘雄鸣（又名刘雄）收留，组成坞壁部曲进行自保。刘雄鸣有时归附州郡，有时投奔曹操，有时独立自保，灵活应对，在战乱时期保全了当地百姓。直到建安十八年（213年）再次归顺曹操，其流民坞壁的历史才得以结束。除此之外，河东还有以程银、侯选、李堪等为首的1 000多家的大家族，都建有流民坞壁。^[45]与宗族豪强坞壁的坞壁主或者家族共同体坞壁的坞壁主出身世家大族不同，流民坞壁的坞壁主出身都较低。坞壁内部也多以家为基本生产单位。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方流民形成了大规模的迁徙浪潮，有的迁往少数民族控制的辽东、西北等地，有的迁往江南的司马政权地区，这次迁徙比东汉末年范围更大、影响更深。流民坞壁遍地而起，正如有学者所评

价的：“它比之汉末的流民坞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担任流民坞主的不仅有诸如李矩、郭默、魏浚、魏该、苏峻等等的庶姓，而且有‘豪望’‘望族’出身的张平、游纶等等的宗豪与世族。大姓自任流民坞主，在汉末是罕见的，而晋末却十分普遍。这说明当时不同阶级共同防御胡族侵扰，正是民族矛盾激化的反映。这些流民坞主政治态度不尽一致，有的被晋王朝拉拢为将，有的保持独立地位，有的投靠胡族上层分子，有的在胡汉对峙的夹缝中依附双方。不管抱着哪种政治态度，这类坞壁在安置流民过程中都起了组织作用。”^[46]

为了增强自身力量，坞壁的选址一般都有两个特点：其一，在远离城市的山野僻静之处，以便于躲避外部的侵扰；其二，驻扎之地有可耕作的土地，以便于开展生产，维持生活。不同的坞壁类型，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也有所不同：宗族豪强坞壁，一般采用均田制；家族共同体坞壁，一般采取按劳分配原则；流民坞壁，大体采取平分的做法。

追根溯源，坞壁的形成与永嘉之乱密不可分，而坞壁的出现又对后来村落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坞壁对后世村落的影响主要在于，坞壁选择在无主之地开荒生产，使得大量民众离开城市转入乡村，并在这些地区长期耕作，定居生活。原本没有人烟的地方，逐渐衍生出村落，有的在后来规模发展得很大。那些家族共同体坞壁，与后世单姓村落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而流民坞壁，则与后世多姓村落的形成有关。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其消极的一面，这主要直接表现为给百姓生活造成的不安定感，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即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大融合，这种积极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而且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一方面，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日增，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定居的生活、生产

方式逐渐在当地形成；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也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与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文将要提到中原地区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宗主的原型即部落首领。

四、三长制下的北朝村落与组织

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广大北方地区坞壁林立。大地主多筑堡自守，聚族而居，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及一定的武装力量。北魏统一北方后，一方面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另一方面出于管控的需求，任命他们为宗主，并承认这些宗主的既有利益的合法性，利用各地宗主督护地方，称为宗主督护制。这也是北魏初期普遍实行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宗主督护制对维护基层治安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起初因为国家政权的管控缺位，尤其是在人口管理上缺乏有力的举措，地方上不少豪强地主趁机隐瞒其控制的人口。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只作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存在，不服徭役也不纳税，严重影响了北魏政权的赋税来源。

到北魏孝文帝时，李冲在《上书言宜立三长》中建议设立三长制：“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

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癯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47]李冲建议以家为单位，逐级设立邻、里、党三级行政机构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可以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这个建议得到了北魏中央政府的采纳。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废除了原来的宗主督护制，设立三长制，并派官员赴州郡定户籍。这一制度的设立打击了豪强地主，直接控制了基层政权组织，增加了国家纳税服役人口数量。国家纳税户口的增多，大大增加了北魏的国家财力。

不过，三长制最开始推行得并非十分顺畅。为了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北魏朝廷又实施“分置州郡”，主要是以人口户籍的多少来决定县郡的设置或者废除。户口增至一定数目，地方的行政级别便可相应提高；而户口如果下降到一定数目，行政机构则会撤并。因此，地方官员为了提高当地行政机构的级别，确保官衔给自身带来的利益，十分在意其领辖地区内人口的增加。这使得以往瞒报人口的现象有所降低，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在籍人口数量的增加。直到隋代统一之前，北方人口一直都保持上涨之势。例如，东魏时期，每县户数平均达2 440户，平均每户3.78口[48]。其中某一时间段，新置的31县至少有75 640户，再加上部分新置及升级的州、郡、县，若以10万户计，人口总量达40万。可见，“三长制”对于北朝人口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直接为杨坚统一南方结束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要考虑三长制推行的效果与作用，最有效的方法是考察其直接负责人，邻长、里长、党长。三长如何选拔，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世学者推测，大约如同传统的乡里管理者三老一样，都是选拔上了一定年岁的老者担任，其他的基层行政助手也都出自

本地，带有“自选自治、乡人治乡”之意。具有担任三长资格的人，最初也许延续了坞壁主以及宗主督护的遗风，由乡里豪强地主担任。《魏书·常景传》载：“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这是因为乡里豪强地主自汉代以来就在基层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力，控制着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

综上所述，三长制自北魏兴起，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有所延续，至隋代终止。三长制的实施，对这一时期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作为基层官吏的三长，直接参与了所有的基层事务，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朝廷的政令能够通过三长直接传达到基层，而基层的社会民情也能通过三长上传至朝堂。不过，对朝廷而言，三长是国家的官吏，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对于百姓而言，三长原本是本地的父老，却充当了朝廷的爪牙。三长夹在百姓与朝廷的中间，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

[1]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2] 《三国会要》卷二十五《职官四》。

[3]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4] 《北史》卷十八《拓跋孝友传》。

[5]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6] 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载刘岱总主编：《吾土与吾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6—197页。

[7]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8]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9]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0]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1]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2]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13] 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4页。

[14] 胡平生：《魏末晋初楼兰文书编年系联（下）》，《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15] 王欣：《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16]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7]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8] 高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屯田简论》，载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编：《简牍学研究》（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209页。

[19] 孟凡人：《魏晋楼兰屯田概况》，《农业考古》1985年第4期，第349—354页。

[20] 武建国：《北朝屯田述论》，《思想战线》1986年第10期。

[21] 《魏书》卷二《太祖纪》。

[22]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

[23] 分别见《晋书》之《食货志》《百官志》等。

[24]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25]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26]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27] 《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传》。

[28] 《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传》。

[29] 《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

[30] 吴震：《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31]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32]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33]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34] 权家玉：《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5] 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南迁之影响述论》，《吴文化博览》2007年第5—6期《六朝历史与吴文化转型高层论坛论文专辑》，第782—789页。

[36]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37] 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38] 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第77—90页。

[39] 《三国志》卷一十八《许褚传》。“寇”指的是农民起义军。

[40] 《北史》卷三十三《李灵传》。

[41] 《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42] 《南史》卷五十五《夏侯夔传》。

[43] 《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

[44] 《晋书》卷八十八《庾袞传》。

[45]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46] 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47]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48]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第二节

“村”的出现及其发展

一、“村”与自然聚落

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村落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汉语中出现了“村”字。在此之前，有“聚”“里”“格”“庐”这类对聚落形态的称呼，但尚无“村”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被运用至郊野聚落的命名之中，其后这种称谓再未发生大的变化，并一直延续至今。

现存典籍中，最早出现“村”字的是《三国志》， “村”与“落”连用，共出现了两次。其一，为卷十六《郑浑传》载：“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其二，为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郑浑传》中的村落位于曹魏某处城外，与今天的村落所处环境相同。而“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的表述，显示出这个村落秩序井然，较为繁荣。《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所载的村落位于北沃沮，为东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村落是北沃沮民众冬季的临时居所，其夏季则仍旧生活在“山岩深穴”中，带有原始的游牧部落特征。当然，将北沃沮民族冬季的临时聚居区称为“村落”，是汉人的说法。不过，这两处记载至

少说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村”字逐渐开始被使用，以“村落”命名乡野的民众聚居之所，也在此时肇兴并逐渐盛行。东晋时，村落在文人笔下也时有出现。如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移居二首·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搜神后记》卷五：“未至村，日暮。”著名的《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并明确写道这是一个村落：“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法显的《佛国记》：“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村中般泥洹，即此处起塔。”《抱朴子》卷五《茅君》：“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诸如此类，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见。这一时期的汉译佛经中，也出现了很多“村”字。姚秦的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一一城者，有一万五千聚落村邑而围绕之。一一聚落、村邑无量百千人众充满其中。”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二十九：“是比丘若依聚落，城邑止住。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难以一一列举。到了唐代，“村”作为某一类聚落的指代用词，被广泛接受。

关于“村”字对应于聚落形态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做了不少考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后世所谓的“村”，其实是从屯田产生的。他据此推论的原因在于：“‘村’这个字本来写作‘邨’，这个‘邨’字是‘屯’旁附个‘邑’。”^[1]另一个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可“村”字起源于“邨”的说法，但是又说：“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此后演变成征税、治安等施政对象。”^[2]两位学者的说法有其合理处，从字源意义上来说，“村”字就是由“邨”演变而来的。不过，“村”这一聚落形态的起源与发展，则远比字体形态的演变复杂，军事原因只是其

一。

部分学者认为，村来源于“聚”，这种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村都起源于“聚”，但是至少其中大部分村都来源于“聚”。在汉代文献中，虽然没有“村”字，但是有大量的“聚”。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聚”被解释为“会”，“邑落曰聚”。清代的段玉裁又进一步解释为：“邑落，谓邑中村落。”这体现了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聚”与“村”的关系的通识性认知。

“聚”还通常与“落”连用，从它的实指来看，并非城邑，而是后世的村落。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民众聚居区。《汉书·沟洫志第九》：“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3]这段文字说明，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修筑房屋，自然形成聚落。汉代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行军至当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4]。《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鹿聚、刘聚、憚狐聚、阳人聚、南筮聚、駝聚、山聚、力聚、鼓聚、秦聚、历聚、禺聚、所聚、合聚、博聚、虑聚、永聚、彭泽聚、多聚、梧中聚、落门聚、繁聚、狝聚等二十多处，其中很多都是新莽时期命名的。

《后汉书·郡国志》中，聚名增多，出现了五十七处。^[5]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上的一条史料，记载了某处村落由“聚”变成“村”的故事：“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陘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猎余聚。”^[6]这条史料可以视为村落名称由“聚”改“村”的一个典型。东晋时代开始，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中国人之所以居住在野外的村落，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本地人

多，且多少有排外的可能，地缘人缘均不够谙熟的北人很难挤进城里居住；其二是南迁的北人也不愿意直接被当地政府管辖，带有隐居避世的意思。为了治理这些散居的民众，南朝政府承认了自然形成的村落，设立了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代表，与郡县相协调。当然，村作为专指的名称并被普遍接受，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根据史料来看，南北朝时期，村与堡、坞等并称的并不少见。这说明，坞堡等军事性聚居地在失去战争功能之后，并未被居民放弃，而是被持续使用。村与坞相连使用的例子，多见于《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邪杲“劫掠村坞，毒害民人，齐人号之为‘沓榆贼’”。卷七十四《尔朱荣传》：“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卷八十七《节义传》载：“永安初，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而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晋书》也有一些例子，卷八十七《忠义传》载：“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村与堡连用的例子主要见于卷一百《李特传》：“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

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描述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的时候，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这也就进一步可以说明，坞、堡实为出于军事目的修建。战乱结束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演变成了村落。即使是单独表述与村相关的内容，仍旧可以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侃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杨侃

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落：“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以及“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表明，杨侃围困的村落具有军事根据地的功能。杨侃的军队并不能长驱直入，说明村落周围都有很坚固的防御围墙。

此时，也有城邑、村落、村邑并称的称谓出现。《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逸传》载：“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载：“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北齐书》列传第十三载：“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村与邑开始作为一对词语使用，表明“村”正在成为乡野聚落的一个泛称。

与之相应的，就是逐渐出现了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

《魏书》列传第十二：“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聚城北高柳村。”《北齐书》帝纪第八：“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今所见南齐时的文献里，以“村”命名的村落，更是多达十余处。如《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载：“吴兴、建安、将乐、邵武、建阳、绥城、沙村。”《南齐书》卷十八所载“村”最多，皆为当时国家认定的祥瑞的发生地：“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山阳县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为连理。”“八月，盐官县内乐村木连理。”“升明二年九月，建宁县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钁戟二枚。”“永明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六年，蒲涛县亮野村获白

獐一头。”《南齐书》卷二十五列传第六：“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地黄村潘姬善禁……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南齐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二十五：“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

从北朝石刻资料中，我们今天仍旧可以找到若干个传统典籍文献中未见或未录入的村名：任丘村、南乡村、圻上村、当陌村、高平村、大尚村、安鹿交村、淳亏村、小辟村、山阳村、北林在村、陵户村、高柳村、马村、东比村、商王村、朝阳村、安村、桓尹村、水冶村、京上村、高陵村、大吴村、茺涅村、苑中村、树要村、诸田村、新王村、元村、上梅村、高门村、八涧村、日□村、洛音村、马□村、公孙村、赵村、阳阿故县村、梁罢村、贾堽村、霍水村、殷石村、岩梁村、凉上村、赵村（二）等，共计45个（武平五年河北灵寿三圣院的张天智造像上的村名以□□表示）。[7]从村名来看，一些村落可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如大吴村、新王村等。赵村出现了两次，一个位于河南洛阳，另一个位于陕西咸阳。虽然可能同样迫于迁徙，但在迁徙过程中可能演变成了一种以姓氏为单元的集体行为。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说明，秦汉后期，这些以家族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典籍中也都出现大量村落名称。《水经注》载有19处。这些村落分布于全国各地——山东的薛村，河北的北城村，陕西的长柳村，湖北的须导村、射堂村、平乐村、东亭村，浙江的徐村、木客村，安徽的烽村，巴蜀地区的博村、阳村、故陵村、巴乡村、七谷村，湖南的乌林村、石塘村、万岁村、湘陂村，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朝时，村可能已经具备了行政区划意

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东晋官员刘超征收地方税时，“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讠，送还县”[8]。南朝梁的鱼弘以村为单位，盘剥民众。[9]南齐政府官吏进行征税时，“暮宿村县，威福便行”[10]。其二，村具有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南朝宋时，江东实行“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11]；民众有盗窃坟墓者，“罪所近村民”[12]。南朝梁时，严禁当兵叛逃，“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13]。其三，村开始成为基本的经济事务单位。流民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等，都以村为单位进行。梁武帝时，曾下诏安抚流民说：“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14]其四，村偶尔会成为分封单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南朝宋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被封为高山侯，其领地为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15]当然，这四点仅能说明，村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习惯性称呼，甚至可能已经纳入了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目前尚无文献能明确证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令，曾以“村”为行政单位。

如此看来，“村”既是聚落在聚居单元性质上的衍化，也是名称的进化。且在这一时期，村与邑、堡、坞、栅、屯连用的情况较为常见。不仅如此，村在郡县直辖地区、民族地区、属邦地区、佛教区域等，都有所体现。大致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隋朝），是“村”这一概念的肇始期。村名作为具体地名的指代，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并有取代此前“聚落”称谓的趋势。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村”的使用，其在地域范围中不断出现，并不断扩散扩大，以至“村”后来成了跨越时空约定俗成的名称，最终成为被历朝历代普遍认同的通识称谓。不过，这一时期的“村”，还不是具备社会制度性意义的行政单位。[16]按照历史

发展的逻辑顺序，应该是民间出现以“村”命名的聚落在先，其作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名称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在后。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用“村”命名聚落的风气流行，直到唐代，它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才最终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

二、村落的规模及形态

从东晋开始直到南朝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也影响了南朝村落的形成。从具体的地域来看，主要是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人口迁往长江下游以及淮河流域。^[17]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作为自然聚落的名称普遍存在，但是并未上升为国家行政编制的单位。此时，最小的村只有两三户到十多户人家，大的村落有几千户。《魏书》卷九《肃宗纪》载：“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于海。”《魏书》列传第八十六将这个事件复述了一遍：“秋九月，堰自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两条史料记述大同小异，并非凭空杜撰。虽然数字可能并不准确，且未标明有多少个村，但仍旧可见村落人丁之盛。少数民族地区山林密布，自然环境险恶，民众都集中居住，村落规模都很大。例如，巴蜀地区的蛮族，有冉氏、向氏两个大部落，《魏书》列传第八十九载“陋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就是在人类社会相对高度发达的今天，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山区和云南的某些山区，仍旧可以见到许多人口密集的大村落。

由于史料及出土文物的匮乏，要深入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

村落形制，理所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史料和新出土文物，仍旧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村落形制做出粗略的勾勒，为后续研究做一些先行的基础性工作。

从地形上看，村落或者位于山区，或者位于平原。平原地区的村落，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所以村落民居集中修建在一处，聚居区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离，至少也有土墙。平时，村民由村门或者村间出入，村里的生活区域比较狭小，人口十分密集。坞壁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兴起于战乱时期。当时，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扰的建筑形制，对保卫村落十分必要和有效。由于壁围的存在，建筑与其内的村落空间自然而然变得非常仄狭有限，给正常的起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属于战乱时期不得已而居之的处所。所以，战乱一旦结束，有经济条件的人家随即迁居于坞壁之外，另择宜居之处重新建宅。又由于兴建房屋的行为大多是以户为单位，新建的居所也相对零散，规模不大，所以新的村落往往呈现出区域聚落的散居状态。单体建筑很少有高大的围墙，即使有土垒的矮围，也是出于喂养家禽家畜区域和宅地的分界之需，是“有围无墙”，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防御功能。这类形制的演变，直到今天仍有遗存。例如，湖南郴州一带的碉楼、寨堡，最初都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战事结束，部分有经济实力修建新房的民众则迁出，另一部分仍居于其中。宜章的黄沙堡内，原有居民大部分都已经搬迁出去，但中心区域仍旧居住着几户人家，菜地、水井都有，即使封闭起来，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见插图11）这是坞壁与村落演变的活证。

总之，战乱之后，大多数村落都没有围墙，即便有，也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围墙主要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在和平时期并不能给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生活带来方便。因此，战乱时期修建的围墙，在失去其防御功能之后，一般会被村民废弃。而且，对

大多数村民而言，单独列出一笔修建围墙的费用也属于多余。

村落周边虽然没有围墙，但个体的家庭住房都是独栋的，且大多有篱笆或者石土砌围环绕。这大体可以由史料中的零散记载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河流湖泊密布，雨水较多，因此一些人家在房屋旁边开沟，便于排水。南朝宋时，浙江会稽永兴的郭世道家里就是如此。《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郭世道》载：“居宅下湿，绕宅为沟，以通淤水。宅上种少竹，春月夜有盗其笋者，原平偶起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自以不能广施，至使此人颠沛，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足通行，又采笋置篱外。邻曲惭愧，无复取者。”可以看出，郭世道的房屋附近还种植了大量的竹子，这既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又可以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在这片区域，无论是隐居于乡村的士大夫，还是世代耕作于此的农民，在屋前屋后种竹都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不仅限于种植竹子，有些地方也种植桑树。《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韩系伯》载：襄阳一带，民众通常种植桑树来区分土地的权属。当时，襄阳的韩系伯不与邻人相争，觉得桑树的枝叶会妨碍别人地里的农作物生长，因此把自己的地界内移数尺，但邻居却马上把地界外移，侵占了他所移开的地方。韩系伯便再次变更地界，向内移植桑树。此外，榆树也被用来作为篱笆，如《三国志·郑浑传》所载的“树榆为篱”。

于村里宅外植林，也与居民的风水观念有关。这一时期，村落布局中已经初步有了风水林的观念。所谓风水林，就是不少村落在选址时，考虑到风水上的因素，特意在周边某处留出一片土地种植树木，树木成林后，或遮阳避雨，或挡风穿堂，这片人工林就被称为风水林（也有的是特意留下的小面积原始森林）。村民相信风水林会为村落带来好运，因此他们都会着重保护风水

林。他们还会在风水林栽种具有不同实用价值的树木（如果树、榕树、樟树及竹等），使风水林有实质性的经济价值。湖南城步县长安营乡的大寨村（见插图12），至今还保留着一片东晋时期形成的人工风水林。这片风水林全部由杉木组成，共有38棵，生长在溪流的沙滩上或者小溪两岸的崖畔上。耸立在西边崖畔上的那棵最高、最大的古老杉树，胸径2.45米，胸围7.7米，冠幅28米，树高约30米，立木蓄积量达50多立方米，是湖南目前发现的最大杉树，比已知的福建“杉王”（胸径1.6米，胸围5.02米）还大40%以上，被称为“中国杉树之王”，种植时间为东晋（317—420年）。它之所以能经历1600多年保留至今，是因为村人相信，风水林会护佑整个村落，不能轻易砍伐。

这一时期的村落周围也有篱笆环绕。《宋书·孝义传·郭世道》中的“又采笋置篱外”就表明，竹子外面装有一层篱笆。东汉至魏晋大兴坞壁时，篱笆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载：“（李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北更立船楼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篱。”这个“篱”，并非象征性的建筑，而是实实在在的防御工事。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也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18]北朝如此，南朝亦然，连南京城的城门外都设以竹篱。《南齐书·王俭传》载：“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根据“篱”字的本义以及郭家的物产可以推测，郭世道房屋外的篱笆当由竹子制成。

以篱笆为界，界内即为户主家的土地。《南史·陈显达传》载：“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骑官赵潭注稍刺落马，斩之篱侧，血涌湔篱，似淳于伯之被刑。”陈显达兵败退至乌榜村，被赵潭斩杀于村旁的篱笆旁。这一时期村落的

篱笆，延续了前期坞壁的篱笆特色。村落中的篱，当然不可能像城门或者坞堡一样牢固讲究，但它自此防御功能演变而来，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村民的住宅规模，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看，政府的建宅政策相对宽松，给出的建宅地面也相对较大。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载：“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19]三口之家，居室面积可以达到一亩，约677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当然不可能全部用来建房子，应该是以篱笆为界的。西魏时，朝廷规定人均房屋面积所占土地更多。十口之家可占五亩，九口之家占四亩，三口之家占一亩。^[20]当然，朝廷颁发的这些条令，未必完全与当时的情况相符。例如，北魏的裴佗位至中军将军，回乡后“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21]敦煌出土的S613号文书记载，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敦煌一带无论每户多少人口，“园宅”均为一亩。^[22]园宅可能就是宅和园的总称，房屋建筑为宅，房屋周围土地以篱笆圈起的空地为园。

在南朝，除少数世家大族以外，普通的村落民居也多以小型居室为主。这与大家族制度式微及小家庭制度盛行有关。梁代的徐勉在一封书信中说自己“内中逼仄，无复房宇”，几个儿子即将成婚，请慧日、十住等僧人主持，又需要更多的房子，而自己“清明门宅，无相容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本来想在“东田间营小园”，作为自己退休之后的归宿。但是，因为“近营东边儿孙二宅”都是挪用了“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需，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辍”。于是，只好将东田的园宅“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23]徐勉为士族官僚，仍旧要为住房问题担忧，普通民众应该更加严重。南朝基层社会实行里伍制度，士庶错居，比屋邻居，因此各种信息传播较快，“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24]。只有房屋小而且靠得紧

密，才能有此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的房屋样式，目前所见的材料有限。建筑史方面的著作多以皇家宫殿及宗教寺庙建筑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涉及村落民居建筑。至于营造的手法，也仅仅见于傅熹年先生的论述。他在研究龙门及云冈石窟的基础上，根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将魏晋南北朝的单层建筑分为五种类型：其一，房屋下部由夯土墙承重，上部为全木构梁架；其二，房屋由山墙及后墙承重，前部立柱承檐，上部为木架；其三，房屋前廊为木构架，屋身为夯土墙，上部有木架；其四，房屋为全木结构，柱间施阑额，阑额上施斗拱，斗拱与柱共同承檐；其五，房屋为全木结构，柱间有阑额，柱及阑额上施斗拱，斗拱承檐。^[25]斗拱多见于宫殿楼阁，村落中，除了少量的体量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共建筑（如祠庙之类）以外，普通民居应该使用不多。除此以外，其余的形制应该符合当时建筑的真实面貌。多层建筑，如塔、楼等，并非典型的普通民居所用，故而不做详述。

单层建筑屋顶形式也有很多种类，如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四角攒尖式、圆攒尖式、囤顶式、单坡式、平顶式等。种类虽多，但各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庑殿式、悬山式屋顶比较普遍，既可用于高级别建筑，也可用于厕、溷、仓、井、碓屋、禽舍、畜舍等较低级别的建筑。囤顶比较特殊，接近平顶但中部微拱，主要应用于寒冷地区，可防止屋顶积雪。歇山式、硬山式、四角攒尖式等比较少见。

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中，有一些相关的图像材料，可以作为村落普通民居建筑的参考对象。例如，在辽宁的棒台子二号墓中，画于后室后壁的居室图（见图4-1），高1.4米，长5.12米。正中高楼三层，盖顶为庑殿式，墨瓦垄，脊上似有鸟首状物。朱栏红柱隐约可见，下有较高的石台基，中间有左向的阶石，楼内

有红色楼梯。楼左前方水井一眼，朱线勾井栏。楼左和左后方有院墙一道，顶为流水式瓦脊。院门在左墙中部，朱门两扉里向分开，门楼也作流水式瓦脊。[26]这应该是东北地区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人家的房屋建筑，包含有楼阁、水井、庭院等部分。不同区域的村落建筑会有不同的特色。例如，巴蜀地区的房屋结构与形制就明显与东北的不同，其特点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房屋底部有立柱和不立柱两种，前者有干栏式建筑特色；第二，开间以三间为主，进深为二间，故而被称为“明三暗五”；第三，梁架为三角式样，普遍使用斗拱结构；第四，院落平面上，前有门楼，房前有廊，廊外侧用栏板防护、装饰。[27]在湖南地区，村落民居较为普遍的形制，大抵可以长沙月亮山出土的陶楼为例说明。该陶楼由两幢长方形的房子组合成一曲尺形的平面，其余相对的两角，用矮墙围起来，形成一个后院。整体又构成一方形，包括住房、厕所和家畜圈栏三部分。顶为悬山式，复瓦。屋的前半部高敞，为住人之处，前面设有门和菱形窗格。后半部右边为厕所，蹲坑设在后右侧楼上，与前面住房相通。后院为家畜圈栏。[28]此墓虽为东汉墓，但由于当时湖南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发展较慢，魏晋时期的建筑留存有东汉时期的形制可能性较大，因此村落民居格局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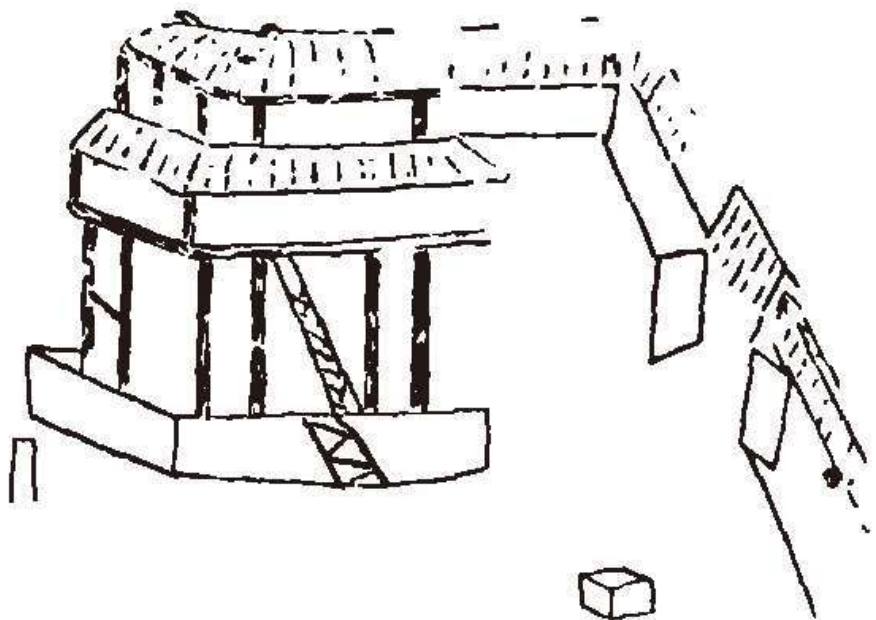


图4-1 辽宁棒台子二号墓居室图

目前，已发掘出了2 000多座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其中将近200座墓室都出土有建筑明器。这些建筑明器遍布江苏、河南、陕西、广西、湖北、河北等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居建筑特色。从类型来看，有囷、厠、溷、碓屋、坞壁、井、禽舍、畜舍、楼阁等，对魏晋南北朝的村落建筑有重要的参考作用。[\[29\]](#)以此为依据，我们对魏晋南北朝的村落建筑稍做分析。

前文已经对坞壁的由来进行了介绍，此处对其形制稍加概述。坞壁通常平面为长方形，四面围高墙，墙上施双坡屋顶。通常只在坞壁一面或两面的墙下部开设小门，门上立高大的门楼。坞壁高墙四角立角楼（或称隅楼），一般为斜45度方向。坞壁内的房屋，除了供居住之用，还多建有粮囷，可囤粮据守。如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的明器坞壁。[\[30\]](#)还有的坞壁中立高

楼，作瞭望和远程射击之用，如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M1出土的明器坞壁。^[3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阁，一般是二层或者三层。当时的建筑技术决定了不可能有再高层的木构建筑。辽宁大连营城子石板墓出土的三层明器楼阁，楼二层底部刻“高楼”二字，可见这时期的人们将三层的楼阁已经看作高层建筑。楼阁平面一般为正方形，顶部多为四角攒尖式。只要是多层建筑即可称楼阁，可见当时并无非常固定的构建形式，多为因地制宜，依当时的需求和当地便利的建筑材料，以及常见的营造工艺而建。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M1出土的明器坞壁，中央立一座三层望楼，墙壁上有射孔。这很显然是作为军事防御性质的楼阁，是“楼”的本来面貌。《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载：“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后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今天南方的侗族村寨中，也依然是村村都建有鼓楼一座，其主要的传统功能也与此记载类似。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出土的明器楼阁，顶部有刹和相轮，俨然一座佛塔的形象。由楼阁演变而来的楼阁式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倒是有了定型，成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见插图13）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廩、仓、囷等都是储藏粮食的建筑。参考该时期出土的明器实物模型，廩是最高级的存储处，较为少见。仓的形制一般为两层，平面为长方形，屋顶为悬山顶或庑殿顶，外部设楼梯可登上存取粮食。仓墙面上部均设开口作为通风窗使用，并设有窗门，说明能自由启闭。窗口有单个，也有一排多个

的情况，与仓内部的分隔室一一对应，既能将五谷分类，又能防止某处受潮后影响其他区域。根据仓的形制与规格，可以推测它并非普通平民家庭所能拥有的，因其本身修建耗费工钱，平民家庭一般也并无如此多的粮食可以屯放。魏晋时期，平民所用的多为圆形的囤，呈筒状，高2~3米。囤身墙上通常设一门或一通风窗。囤顶为圆攒尖式或覆钵状。有的囤门位置较高，外部设置有楼梯。更小一点的则为储粮罐，形制跟囤类似，但不设通风孔。

碓屋是粮食加工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碓屋，平面为长方形，屋顶为单檐庑殿顶，四壁有门窗通风，屋内墙角部置踏碓，其余空间较大，可用来放置待加工的粮食。

井是居民获取饮用水的主要场所。为防止人畜掉入，居民在井口以砖石建造圆形或多边形井栏。为了能方便提水，居民又在井栏上修拱形井架，或在两柱间架一横梁。井架上固定辘轳，提水时向下拉动绳索，便可转动辘轳将汲水桶拉起。为防止井水被雨水污染，有些井架上还建有一悬山式或庑殿式屋顶，称为井亭，高2~3米。

禽舍和畜舍是养家禽家畜的场所。魏晋南北朝时期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鸭、鹅三种，牲畜主要有猪、牛、羊、马、狗五种。除了部分人家的鸡、鸭养于笼中之外，大多人家养于禽舍。禽舍与普通房屋形象类似，尺寸较小，通常平面为长方形，单层或双层，有屋顶。禽舍四面环墙，正面墙上开一至两个小门洞供出入。部分禽舍底层架空，下层收集粪便，上层供禽类休息。猪、牛、羊等设栅栏圈养，也可专设一房舍供其休息。马也可在马厩中圈养。

厕所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场所之一，既可作为独立房屋，又可作为房屋附属。前者往往以富豪家多见，讲究一点的厕

所已经分男女，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的明器，外部左右各设一门，内部则有男厕和女厕两间。后者见于普通人家，平面为长方形，以墙环绕，上面大多无顶，仅在墙内一角设一厕坑。有的厕所为两层，设楼梯连接上下，底层设厕坑。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的明器，厕底层墙壁上还开有一方形排污口。

溷是将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村落建筑。为便于收集圈养的猪的粪便，同人粪一起积肥，溷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上面为溷轩，下面养猪。溷轩建在猪圈一侧或者一角的上部，厕坑与猪栏上下直接连通，溷轩外设斜向楼梯。第二类则是溷轩和猪圈并置，溷轩设在猪栏一侧，通过厕坑的排污道与猪栏左右连通。溷下部的猪圈，按平面形状可分两类，一类为方形，另一类为圆形。

这类建筑大多为村落地主及以上阶层所有。除此以外，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所居建筑则为草屋。木材虽然容易获取，但加工费用较高，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尤其在南朝，更是如此。直到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时，江南地区的大量民众都居住于草屋之中。《隋书》卷四十一《高颍传》载，杨坚攻打陈国时，高颍就曾因当地人所居多为草屋，容易着火而献策：“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有住草屋的经历，如东晋名臣孔愉，“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32]。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娘家，“在建康县界，家贫，有草屋两三间”。宋明帝说：“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于是“赐钱三万，令起瓦屋”。[33]草屋与瓦屋，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等级。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村落建筑也值得注意。晋代张华的《博

物志》卷一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34]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北方地区干旱少雨，植被贫瘠，居民多采取穴居式；南方地区雨量充沛，竹木建筑材料丰富，居民多采取巢居式。汉民族的建筑工艺发展之后，居民多在平地上居住，能利用砖石竹木综合材料建筑居室。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穴居与巢居的居住方式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

南方少数民族的房屋，以干栏式建筑最具特色。干栏式建筑起源甚早，一方面可以躲避鸟兽虫蛇，另一方面可以防潮防水。建筑下层由竹子或者木头支撑，上层铺设竹木制的楼板及墙壁，屋顶编织草排覆盖。生活于巴蜀地区的獠人，据《魏书》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35]吴越地区也是如此，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36]两广地区，也有类似史料。徐衷的《南方草物状》记载了交州地区干栏式建筑，主要以由梧竹作为房屋柱子：“由梧竹，吏民家种之，长三四丈，围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37]晋郭义恭《广志》载：“珠崖人皆巢居。”^[38]《宋书·良吏·徐豁传》载：中宿县（今广东清远县）“俚民皆巢居鸟语”。《南齐书·州郡志上·晋安郡》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梁书·诸夷列传》所载南海的林邑也称：“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干栏式建筑的名称，最早的出处也在这一时期。这种建筑样式，直到今天仍旧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存在。而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村落建筑形制及样式，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它既满足了村落民众的基本生活之需，又带有自觉的审

美精神。这一时期处于汉唐之间，基本完成了中国村落建筑形制与功能的转变。

[1] 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页。

[2]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103页。

[3]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4]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5]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6]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4—225页。

[7] 侯旭东：《北朝的村落》，《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32页。

[8] 《晋书》卷七十《刘超传》。

[9] 《梁书》卷二十八《鱼弘传》。

[10] 《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11] 《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

[12] 《宋书》卷一百《自序》。

[13]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14]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15] 《宋书》卷九十七《蛮夷传》。

[16] 直到唐代的时候，国家法令中才正式将“村”规定为野外居民区的称谓。《通典》卷三《乡党》中记载的一段文字经常被学者采用，用来说明唐代的“村”已经并入国家行政体系。《通典》卷三《乡党》：“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间管钥，督察奸非，并免非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

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

[17]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298页。

[18] 《周书》卷四十一《异域上》。

[19]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20]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21] 《魏书》卷八十八《裴佗传》。

[22] 转引自侯旭东：《北朝的村落》，《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8页。

[23] 《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

[24]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25] 傅熹年：《两晋南北朝时期木构架建筑的发展》，《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5页。

[26]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

[27] 贺世伟：《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9页。

[28] 高至喜：《谈谈湖南出土的东汉建筑模型》，《考古》1959年第11期。

[29] 陈斯亮：《魏晋南北朝时期明器反映的建筑特征与文化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38—51页。

[30] 鄂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31] 钟长发：《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文物》1987年第9期。

[32] 《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

[33] 《宋书》卷四十一《明帝陈贵妃传》。

[34]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35] 《魏书》卷一百一《獠传》。

[36] 沈莹撰，张崇根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1988年，第4页。

[37] 石声汉辑：《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由梧竹》，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6—17页。

[38] 郭义恭：《广志》，载陶九成辑：《说郛》卷六一《广志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6页。

第三节

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

一、农业发展与生产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分裂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巨著《齐民要术》。这部著作的作者为北魏的贾思勰，成书于533—544年，主要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的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并且零散地记录了江南、东北以及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的农业状况，被称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对后世的农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5世纪以前，中国黄河下游地区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土壤耕作制度。书中根据北方旱作栽培区域的农业特点，系统总结介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使用的“耜”和“耨”农具系统，有20多种农具。“耜”和“耨”的使用，是我国古代北方旱地整地手段的一大进步，为北方旱作区域“耕、耜、耨”技术体系的形成，进行了系统地总结。例如，土地耕作应根据土壤、季节、雨水来进行，才能有效抗旱保墒。要把握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因地制宜进行栽培管理，强调技术的运用，包括种子播种品质与种子播前处理技术、播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收获技术、水田综合栽培技术、施肥技术等。涉及的农

作物品种有谷、黍、粱、稷、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粮食作物，棉、麻等纤维作物，红花、蓝草、紫草等染料作物，胡麻、芝麻等油料作物，苜蓿等饲料作物以及多种蔬菜、果树。

魏晋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种植绿肥作物，肥效最高的是绿豆，其次是小豆和胡麻。种植使用绿肥作物，可以达到一亩田收获千斤的产量。绿肥作物通常与其他作物轮作，《齐民要术》中总结了当时北方地区8种典型的轮作范例，如：苕草—稻、绿豆—谷、小豆—谷、胡麻—谷、小豆—麻、绿豆—葵菜、绿豆—葱、绿豆—瓜。绿肥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使得土地不至于空闲。同时，绿肥作物的种植目的就在于提高土地的肥力，因此，对于保持土地的长期使用是非常有效的。除了绿肥作物以外，还有其他肥料来源，如积造人粪尿、厩肥、兽骨粉肥、蚕屎、草木灰、巢蛹汁，等等。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魏晋时期，对于村落生产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这一时期，钢铁冶炼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铁制农具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197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寿阳县西南的贾家庄发掘了北齐贵族库狄回洛的墓，除了金器、玉器、玛瑙器、鎏金铜器、釉陶器等器物之外，还有一件铁制农具锄。其形制扁薄，圆肩，宽刃内弧。长方形釜，上饰三道平凸弦纹，长12厘米，刃宽约11厘米。锄的一面铸有一个隶书的“王”字。^[1]在王室贵族的墓葬中出现一件农具，至少说明了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除了出土的实物资料以外，更多的是图像资料。其中，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群中的资料最具特色。这个墓葬群形成于3—4世纪，是包含了1 700余座墓室的大型家族合葬墓群。目前已经发掘壁画近千幅，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尤其反映农业题材的作品

特色显著。壁画中绘制的农具以整地农具及脱粒农具为主。（见插图14）其中犁是用动力牵引的耕地农机具，占多数；第二为耨，又称耨，用荆条或树枝编于木耙耢或木架上而成，是在耕后使用的，用于磨平地面，松土保墒。第三是耙，包括场圃上使用的聚拢麦谷的、除草碎土的以及牲畜牵引翻土用的铁齿耙三种。第四是耨，形状如榔头，在播种时用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以掩埋种子。脱粒农具中有连枷，由一根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和木条构成，利用木棍的回旋连续扑打禾秸谷穗，使籽粒掉下来。还有一种取禾束的杈杆，其形状为直柄横首，横首上凿4~6孔，纳木其中，用于钳取草秸，或扬场时除去杂草和禾秸。[2]

最重要的农具是犁。早在秦汉时期，破土垦耕的铁铧就已基本定型。它的形式有多种，可分别适用于开垦荒地、犁耕熟田和开沟作渠等需要。铁犁壁至迟在西汉时就已发明，并有向一侧翻土的菱形壁和向左右两侧翻土的马鞍形壁。此时，已配备了牛轭，并推广了牛环、牛轡的导牛技术。犁的结构上已有了犁床（犁底）、犁柄、犁轅以及用来调节耕地深浅的犁箭，等等。

[3]嘉峪关魏晋壁画墓葬中有关犁的构造，共计有三种。其一，犁铧扁平，犁箭中腰有一横木为压镬用，比较笨重，破土不深；其二，犁铧前端为等腰三角形，后部稍高于犁冠，犁箭固定在犁轅和犁床之间，只能用来支撑犁轅和犁床，不能调节耕地的深浅，但因犁铧后背较高，破土较深；其三，犁铧前端为锐角三角形，套有铁铧冠，铧背部隆起，前低后高，犁床由犁梢近处斜出，前端安装铁犁铧，利于破土深耕。[4]

犁的使用，与牛耕的推广有关系。三国时期，曹魏的卫觊给荀彧写信，建议推广牛耕：“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

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5]曹魏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牛耕方式在北方地区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牛耕方式也得到了初步的推行。《晋书》载：“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令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6]在蜀国的统治地区，也是如此。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在云南提出：“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7]强调了耕牛的地位。

整体来看，牛耕方式的推广是由北到南发展的。三国时期，尽管吴国也开始推行牛耕，但毕竟不广泛。牛耕方式在全国普遍使用，应在两晋时期。西晋时，杜预上疏，请求在南方推广牛耕方式，得到了晋武帝的首肯，下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卒，使及春耕。……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8]经过西晋的这次推广，大批的耕牛从北方调往南方，到宋齐梁陈时期依旧持续。新的农耕区域不断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耕作效力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北朝虽然由游牧民族统治，但重视农耕，多次将耕牛和土地无偿授予农民、功臣和官吏，并鼓励养牛，以牛授田。

魏晋早期的耕犁结构和秦汉时期相差不大。在使用上，以二牛抬杠式为主。二牛抬杠式的犁，主要是直辕犁。犁的前身是耒耜，是一种上有曲柄下为犁头的松土农具。其犁床和犁柄是连在一起的，完全依靠人力来操作完成松土的过程。后来，犁逐渐发展到犁床和犁柄分离使用。魏晋早期，也还有一些地方的犁柄和犁床是连为一体的，这是原始农业的遗风。不过，二牛抬杠式的犁在这一时期成为主流。二牛抬杠意味着要用到两头牛，而人力的使用则经历了从三人到二人再到一人操作完成的变化过程。三人一牛劳作时，需要用到两张犁，二牛各挽一犁，犁由二人分别扶住进行耕作，由一人在前方引导。或者二牛挽一犁，一人扶犁，一人按辕，一人牵牛。随着耕作技术的改进，又发明了犁箭。王莽新朝时期，出现了二牛二人的耕田法。江苏泗洪县重岗汉画像石墓出土的《农耕图》石刻，画有五个农夫，相互配合，使耕作、整地和播种等农活结合起来，形象地展现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图景。其中，有两头牛抬杠，共拉一犁，前有一人用绳牵牛，后有一人扶犁。^[9]二牛一人的耕作方式，大约在北周时出现。敦煌莫高窟296窟的牛耕图为北周的作品。画面中，一个农人驾驭两头牛在进行耕作。犁床比较大，犁身缩短，由长直辕变成了短直辕，有点类似《齐民要术》所记载的蔚犁：“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耒。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10]

二人一牛的耕作方式，尽管已在多地的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出现过，如山西、甘肃、陕西、江苏等，但真正得到广泛应用还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推广的是一牛挽拉的双辕犁，这在许多史料中都有涉及。咸康七年（341年），前燕文明帝慕容皝下令，给没有资产的游民每户一头牛从事农耕：“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

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11]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拓跋焘下诏：“……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赏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12]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朝廷“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13]。这些记载都表明，在北朝的统治区域，农民的日常耕作，一家拥有一牛足矣。嘉峪关魏晋壁画墓6号墓，编号为040的壁画中，一戴冠的长发男子执鞭驾御一头牛单套拉着一把犁，正在奋蹄犁地。编号为029的画则是一长发男子坐于耙上驱牛耙地的情景，也是由一头牛在前方牵引。^[14]

在南方地区，一牛拉犁耙的技术也十分普及。1963年，广东连县的一座西晋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黑色陶质犁田耙田模型。犁田耙田模型大体完整，为长方形，长19厘米、宽16.5厘米，四角各有一漏斗状设施，中间纵贯一田埂将耕地分为两块，一块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上有一人使牛耙田。^[15]由此可知，使牛犁田的技术当时已在南方地区广泛推广，一人一犁的技术已为南方地区农民掌握，并且操作非常娴熟了。

二、村落的日常生活与节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户农民是村落居民的主体。编户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自耕农，有比较充足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自己耕耘生产，可以大致满足生活需求；半自耕农，拥有部分土地与生产工具，但也需要靠出卖部分劳动力为生；贫农，没有土地与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度日。普通的人家，过着男耕女织

的简单生活。《陈书》卷十《程灵洗传》载，程灵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

除此外，还有一些手工业生产者，如淘金的金户、淘银的银户，生产食盐的盐户，专供郡县杂役的滂户。他们的身份地位等同于个体农民。只有少数王公贵族比较富裕，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都比较贫困。《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载，长江下游的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其中，会稽郡的山阴县，“课户二万，其民贫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贫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16]长江上游地区的益州，也是如此。《南史》卷五十五《罗研传》载：“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北方地区，民众遭受的生活痛苦程度更深。北魏时期，辛雄指出：“当今天下黔黎，久经寇贼，父死兄亡，子弟沦陷，流离艰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茕靡恤，财殫力尽，无以卒岁。”^[17]村落居民经济生活的困难状况可见一斑。

《宋书·郭原平传》记载了当时会稽一个普通农家的生产生活状况：“子原平字长泰，又稟至行，养亲必己力。性闲木工，佣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唯餐盐饭而已。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余，然后举爨。……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以为奉终之义，情礼所毕，营圻凶功，不欲假人。本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窀穸之事，俭而当礼，性无术学，因心自然。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

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构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18]

郭原平会木工，主要在农闲之余从事这一行当，以此维持生计，补贴家用。由于他性格谦和，且并非专业，所以只取“散夫价”。从上下文来分析，“散夫价”不是很高，可能与“匠人”价有一定距离，相当于今天的小工。父亡之后，郭原平不愿将营造墓穴的事情交与他人，要自己动手修建。“营圻凶功，不欲假人”表明，当时有专门为人营建墓穴的工种。郭原平便给修墓的师傅打下手，并熟练掌握了这个技术。再卖身为“十夫”价，获得一定的资金，才完成父亲的墓穴营造。“十夫”可能相当于短期工，卖价十夫，所获酬劳大概可以修建一座墓穴。《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吴达之传》也有载：“吴达之，义兴人也。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营建墓穴所烧的砖，也是自己制作。贫苦的人家，白天帮人做工获得酬劳，晚上则自己“伐木烧砖”。营葬费用通常不是小数目，一般都需要乡里邻舍或者亲戚朋友周济协助完成。《宋书·吴逵传》载：“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送终之事，亦俭而周礼。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这应该不是特殊现象。

在村落中，一年四季都有固定的节日。《荆楚岁时记》中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南方地区部分村落的节俗，还提及了北方地区村落的节俗。正月初一一大早，家家户户就燃放爆竹，驱邪避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饴。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正月十五，则作豆糜，上面加油膏，用来祭祀门神。先以杨枝插门，杨枝指向哪

里，就到哪里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祭祀。春分日，民众在屋顶种戒火草。此时有鸟鸣“架架格格”，农民开始下田耕作。社日，左邻右舍在树下结社祭神，共同举行宴席。寒食节禁火三天，喝之前熬好的大麦粥，并以蹴鞠、荡秋千为乐事。四月，布谷鸟开始鸣叫，农民将犁耙收好。五月被称为“恶月”，禁忌很多，忌曝床荐席、忌盖屋，等等。五月初五，民众以踩百草或者斗百草为戏，悬艾叶于门户上，以禳毒气。后世著名的龙舟竞渡，也在此时形成。有的是纪念屈原，有的是纪念伍子胥，不同地域有不同说法。此外，还“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鸛鹄，教之语”。习俗虽多，但是吃粽子的时间是在夏至日，而不在后来的五月五日。夏至这天，还采菊烧成灰，跟小麦放在一起，可防生虫。六月如有三时雨，农家以之为甘霖，相互庆贺，称为“贺嘉雨”。伏日作汤饼，名为辟恶。七月七日晚，被认为是牵牛织女聚会之时。家家户户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月十五过盂兰盆节，“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八月十四日，人们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点红，称为“天灸”，保佑健康成长，“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饷遗”。如此看来，这一时期，中秋节尚未在民间流行。九月九日，村民“并籍野饮宴”，后世的重阳登高饮酒、插茱萸，即始于此习俗。十月初一，称为“秦岁首”，在北方的村落中，人们“设麻羹、豆饭，当为其始熟尝新耳”。因天气暖和，又被称为“小春”。十一月，采经霜的茱萸、葵等杂菜腌制咸菜。南方的民众还会加上捣碎的糯米、胡麻汁等，“茱萸甜脆，汁亦酸美”，可以醒酒。冬至日，量日影，熬红豆粥以禳灾。十二月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并以猪肉和酒祭祀灶神。到了年终，家家准备鱼肉、菜蔬，辞旧迎新，相聚一起饮酒，并“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

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除贫取富也”。这是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每年的闰月，则百事不举。

三、宗族观念与村落

“宗”字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宝盖头表示房屋，下面的“示”字表示神主，合起来就是在一个房间中安放神主，为祖先居住之所。“族”字在甲骨文中表现为一面旗帜上树立一个箭头，其本意为同类物品的聚集，引申意即为同姓同祖亲属组成的集团。“宗”和“族”合在一起，就是指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们为生产生活形成的社会群体。

“宗族”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很多。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问叔向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管子·九变》载：“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出现得更多。据统计，以正史为例，《三国志》中出现了29次，《晋书》中出现了33次，《宋书》中出现了3次，《南齐书》中出现了8次，《梁书》中出现了6次，《陈书》中出现了9次，《魏书》中出现了22次，《周书》中出现了6次，《南史》中出现了19次，《北史》中出现了28次。《北齐书》中最少，只出现了一次。^[19]

宗族既是族群内部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在魏晋之前就一直延续发展。不过，由于社会条件不同，宗族的社会势力有强有弱，所起的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魏晋时期，人口迁徙的规模空前加大，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中原汉族又大量进入南

方地区。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大迁徙过程中，民众只有通过组织集中力量，才能战胜外来种族以及自然灾害。同宗血缘就是最理想的纽带。

相对而言，“家族”一词出现得比较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只出现了一次，即《北史》中载，占工靳安退告人曰：“今将死于他乡，尸骸委于草野，为乌鸢蝼蚁所食，不复见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是五服之内的宗族系统称。家庭衍生新的家庭，五世之内带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可称为家族，超过五世的家族则属于宗族，也可称为同宗。宗族涵盖了家族。这一时期，对于父系血缘相近的群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称呼，如“亲属”“亲戚”“亲族”“宗亲”“宗从”“宗党”“飞宗”“门族”“宗人”“族人”“疏族”等。

因为家庭是宗族的起点，所以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关系，就先要对这一时期的家庭做相应的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的结构类型与今天相差不大。以北朝为例，就有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包括只有夫妻二人的家庭、夫或妻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有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至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还有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或者是兄弟成家以后不分财异居的家庭模式。另外，一人之家、兄（姐）弟之家、叔侄伯侄之家、祖父母与未成年孙子女组成的隔代家庭也不少见。^[20]

这一时期，大多数家庭的规模不大，以五口之家的小型个体家庭居多。其他或多或少也都在这个标准上左右摆动而并未偏离太远。^[21]例如，居延汉简中“戍卒家属在署廩名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西凉时期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

及西魏时期的户籍残卷，都表明了这一点。^[22]就成员类型来看，绝大多数的家庭以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为主，少数家庭涵盖祖孙三代，极少数家庭中的成员包括已婚兄弟姐妹。

在家庭财产方面，尽管史书中不乏三代、四代甚至更多代累世同居共财的记载，但只局限于少数大家族。《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所载范阳卢度世，父母亡故之后，弟兄之间仍旧同居共财。后来，家庭人口达上百人，“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勗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但随着其子卢渊、卢昶去世之后，便陷入“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的境况。博陵的崔挺家族，“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但是随着饥荒到来，“家始分析，挺与弟振推让田宅旧资，惟守墓田而已”。由于崔挺教子有方，6个儿子又维持了20多年的大家族同居共财的生活：“鸡鸣而起，旦参颜色，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后，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情，出入启观，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赉，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23]

同居共财是儒家伦理思想提倡的理念。在一个大家族中，家庭成员受到孝悌、仁义观念的约束，等级分明，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尤其是在世家大族中，通常还制定有相当严格的规范来指导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对这一观念加以宣扬，并对几代同居的家族进行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例如，《魏书》中载，博陵安平人李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乡里嗟美，标其门闾。”《南齐书》记载：“建元

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兴陈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荣兴、文献叔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黑头疏从四世同居，并共衣食。诏表门间，蠲租税。又蜀郡王续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诏表门间，蠲调役。”

不过，史书中将几代同居共财作为正面典型来宣扬，正好体现出这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存在的概率可能较小。更多的史料反映出分居异财的现象比比皆是。山西闻喜的裴骏，“早孤，居丧以孝闻。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24]。湖北荆州的刘凝之，“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25]湖南长沙的欧阳颢，“少质直有思理，以言行笃信著闻于岭表。父丧毁瘠甚至。家产累积，悉让诸兄”。^[26]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当时普遍存在分家异财的社会风气。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大多数家族难以支撑起几代同居的局面。同居共财的家族，只要面对突如其来的饥荒，就难以继续维持，如上文提到的北魏崔挺兄弟就因为饥荒的影响，导致上几代积累的几代同居共财局面破产。南朝宋时，吴兴的吴逵家族也是如此：“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家徒壁立，冬无被綯，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此诚无有懈倦。……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27]此外，就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而言，一个团体中成员越多关系就越复杂，“正因家庭关系的错综复杂，家庭成员很难和睦相处。因此，除了供养能力的限制外，人多心杂，内部的各种离

心因素就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大家庭的肌体。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维系是很难的”。[28]《魏书》载，陇西人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阅。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见私宠也，兄子韶恒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29]在人性与现实利益面前，再伟大的道理都黯然失色。这种家庭制度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每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它“既是家族凝聚的原因，又是家族分裂的根源”[30]。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宗族门第观念的主要是世袭皇室贵族。宗族观念主要盛行于上层社会，因为只有这样的宗族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系整个族群的运转。不过，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个大宗族内部，还有因血缘关系形成的房分结构。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了宗族之间人际关系的亲疏，而房支间的兴衰与子孙的官宦显赫与否也有密切关系，这造成各个房支间的地位差别。[31]例如，著名的琅琊王氏宗族南渡之后，到南朝初年已经分为两房支。一支为王导的子孙，地位显赫，为马粪巷（或马蕃巷）王氏；另一支为王导之侄王羲之子孙，中途衰落，为乌衣巷王氏。马粪巷王氏看不起乌衣巷王氏，所以王导的后裔王僧虔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时，他觉得这个职位太低，应该由乌衣巷王氏族人担任。这其实也正常，一个家族到了一定程度，总会慢慢分化。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姓氏，也通常归属于不同的郡望。宗族内部的主要活动就是祭祖与修谱，依靠这些来增强族人间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尤其是修谱，可以辨别宗族内部尊卑房分的区别，因而更加得到重视。西晋时期，挚虞有感于汉魏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32]东晋的贾弼之撰《百

家谱》七百多卷，其子贾匪之、孙贾渊等都继承祖业。贾家成为谱牒世家。梁武帝时的王僧孺又在贾氏族谱的基础上，继续撰写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等等。在南北朝，朝廷也重视谱牒修撰。西魏宇文泰入关，也曾命关东功臣“仍撰谱录，纪其所承”。^[33]上层阶级之所以重视宗族关系，是因为他们想一直拥有特权。所以，他们尤其重视门第婚姻与交往，以加深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掌控与垄断。

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观念主要盛行于上层社会，普通平民社会中民众的宗族观念并不强。但这并不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落中就不存在因为小家庭聚集而形成大宗族的现象。在农业社会，可进行农业耕作的土地是家庭主要的生产资料来源。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土地进行，所以如果不是迫于外力，一般都不会选择迁居。这样的情形，甚至在当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实证。2006—2009年，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分别在湖南西北常德的石门、南部永州的宁远，江西的瑞昌，贵州的黎平、天柱见到过以“三槐堂”命名的家族血缘特征突出的传统村落。追溯其祖源，皆来自河南颍阳“三槐堂”，其迁徙至现在这些处于南方的村所，已有700多年历史。再往上追溯，可知其始祖乃著名的太原三槐王氏。这类例证中的家族迁徙分居，虽不是这一时期的实证，但在证据逻辑上足以印证这种家族从迁徙（居）到散居的变化。随着老一辈退出耕作，普通百姓的土地都会均分给子孙辈。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后代都会围绕在上一辈的田宅地附近聚居生活。同姓聚居，在魏晋南北朝是常见现象。《晋书》记载，前赵“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来石勒又迁徙秦雍家族9 000口人于襄国。^[34]杜佑《通典》引《关东风俗传》载：“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

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35]

但是，这样的状况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因为土地总是有限的，而家庭成员却会不断地增加。当有限的土地无法养活这个家族的成员时，某一部分成员就要迁徙到别处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样，家族就逐渐分散，原本同一宗族聚居的局面就会被打破。只有在遭遇大规模战乱或者灾荒的时候，举族迁居的情况才会出现，但这个情况也不多见，而且迁居之后也散居各地，并不完全是同一宗族成员聚居一处。《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载：“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蓟城，休之与宗室及乡人数千家南奔章武，转至青州。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休之知将有变，乃请其族叔伯彦等曰：‘客主势异，竞相凌侮，祸难将作。如鄙情所见，宜潜归京师避之。’诸人多不能从。休之垂涕别去。俄而邢杲作乱，伯彦等咸为土民所杀，一时遇害，诸阳死者数十人，唯休之兄弟获免。”阳休之与宗室及乡人迁徙至青州后，休之兄弟继续迁往京城。其堂叔阳伯彦等人留下，被本地人杀害。

正如上文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很多杂姓村落，又开始出现大量的同姓村落。就同姓村落而言，虽然聚居在一起生活，却并不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后世意义上的“宗族”。

[36]这一时期，“宗族”一词虽然屡见于文献典籍，但鲜少是关于普通民众群体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魏晋时期的村落延续了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人们仍然以小家庭为单位，缺乏因宗族形成发展而扩张占有的大片土地；另一方面，在村落中，既没有后世宗族中常见的族产、族长与宗祠，也没有按照行辈排名的谱系观念。

所以，基本上可以断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实体组织的宗族，除了皇族以外，在普通民众中大致是不存在的。

四、村落经济与商贸活动

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对农业、农村的破坏十分巨大。据安作璋统计，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当时全国有9 336 665户，而至西晋太康初年（280年）有2 494 125户，户数减少了约73.3%。仅以山东各州县户数来看，就从1 557 657户减少到246 400户，减少了约84%。^[37]山东户口减少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大原因就是受战争的影响。因为这一时期，山东是多方势力争夺的主战场。加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士兵而不再耕作，另一方面，起义军所到之处，农村随即凋零。山东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都面临着这种状况。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在宋、齐、梁、陈等朝代更迭之际，民众也饱受战乱之苦。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魏晋时期，作为主要农耕区域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凶灾连年，几乎没有间断过——200多年中遭遇了304次灾害。“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38]到了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霜雹、疫病等灾难，有记载的总共315次。相对于南北朝总共169年的历史

而言，这个数字显得非常大，平均每年要发生两次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39]这是全国大范围内的记录，局部地区的小灾害虽然不至于影响全国经济，但是对当地民众的生活而言，影响仍旧是较大的，有时甚至会造成倾家荡产的打击。

此外，在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文明区域后，对农耕方式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不过，整体而言，南北朝时期，虽然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中原经济有所破坏，但其破坏的原因主要在于战争，而非统治者的施政意识与制度。事实上，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很快就接受了中原文化，也重视农耕。鲜卑族建立北魏之后，就加速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进程。北魏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北方农业，并依靠农耕增强国家社会经济实力，奠定了统一北方地区的基础。孝文帝更是实行均田制、三长制，极大推进了农业生产。北朝统治者通过劝勉农桑、组织民屯、兴修水利等重农措施提高粮食产量，弥补和减少战争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满足了人们最低的生存口粮需要。

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在一次灾害之后，朝廷开始下诏劝勉农耕：“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太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40]这个措施规定十分具体，如家中有牛与无牛者的区别对待，成年男子与未成年男子所需耕田数量的不同，等等。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又因为旱灾而下令采取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并且要求官员积极劝农：“又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以不，具以状

言。”^[41]朝廷如此重视农桑，地方官员也不敢怠慢。延和二年（433年），幽州刺史张昭，“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余运境外，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42]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但仍旧有缓慢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民间的村落中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集市。这一时期乡市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原来的基层行政编制单位乡里制。东汉后期开始，战争灾荒导致人口迁徙频繁，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减弱，相对应的，自然聚落的村逐渐兴起。尽管原来的基层行政编制单位乡里已经遭到破坏，但仍有不少遗存。于是，村落集市就伴随而生。《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指出，百户之乡，通常置“市”，“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百户人家即有可供买卖交换的集市，而且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载，晋陵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正逢饥荒之年，婆婆病重，赵氏只好到乡里集市上甘愿自卖。

在曹魏的统治中心邺都，就有三大贸易集市，每个集市都有围墙和大门。同时，还在军事驻扎区设立军市，在国家的边境地区设立边市。市场里人声鼎沸，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伏。市场中出现了专门的买卖经纪人，被称为“市侩”。曹魏政府一直比较重视贸易，常对没有治理好市场的官吏施以惩戒。黄初三年（222年），曹丕车驾驾临宛城，认为“市不丰乐”，于是大怒，将时任南阳太守杨俊收监。^[43]与东汉不同，曹魏认识到了商业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于是恢复了盐铁专卖政策，并逐渐扩充到了铅粉、酒、巨木等，垄断了这些行业的生产与流通。蜀国的建立者刘备曾经以贩履织席为业，自己也娶了东海商人糜竺之妹为夫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货产巨亿”^[44]。刘备能够建立蜀国，三分天下，就与富商的支持有关。所以，他建立政权以后，也十分注重集市贸易的发展。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管理政

务，鼓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资料，同时极力加强同边地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互通贸易。吴国在长江下游，水运便利，有着发展商业的天时地利之便。孙权在都城建立了两个大型集市：建康大市与建康东市。之后，孙休又建立了北市。吴国在对集市的管理上也十分严苛，曾专置司市中郎将。尽管这些大的集市都是建立在城市甚至是都城之中，但其交易的产品，如牲畜、蔬果、粮食等，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周边的村落，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村落，这些位于城市中的集市就很难发展起来。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更加兴盛起来。

在北魏统治的山西一带，民众多以商业为生。《北史》中载：“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这说明当时从商活动不是偶尔的、个别的副业现象，而是出现了完全不理农事的、以商业作为主业的职业。而从“俗多商贾”一语可知，当时商业之风盛行已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当时，朝廷已经有了专管商业的官职，《魏书》卷四十四《费于传》载：“于少有节操，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从驾至江。以宿卫之勤，除宁远将军，赐爵松杨男。迁商贾部二曹令，除平南将军、怀州刺史。”在北魏前期，官商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地方的各级官府也都相应地配置有一些商贾，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代表官府从事对江南、西域的大宗贸易及其他商业活动。^[45]由此带来的商业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和漫漫到地方的村落之中，传统的乡村农耕与新兴的商贸开始有了相应的结合，村落经济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国家对工商业的管控，呈现出时而严厉、时而松弛的状态。管控严厉的时候，官商居于垄断地位。例如，北魏道武帝时，曾在山东设置铁冶，打造兵器和农具。后来，又从燕地迁过来一大

批手工艺人，从事手工生产。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政府的手工业壮大成了一个工官系统。太府寺、将作寺下设了几十个署，分管不同种类的手工业生产。这一时期，民间的手工业是被禁止的。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连续下诏曰：“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6]工商业从业者的地位向来就不高，加上北魏初期的很多手工匠人都是强征而来的，其间夹杂着大量的俘虏和罪犯，所以更加受到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国家规定，手工匠人必须终身服役，世代相传，子子孙孙都不准改行。在生活方面，他们也多有限制，例如，不准与其他阶层通婚，不得做官，服饰方面也有特别规定。“工商阜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推上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47]

国家政权在建立初期，为了获取稳定发展，必须依靠这种强制手段来增加收入。一旦国家进入稳步发展时期，民间的工商业会随之兴起，打破国家的垄断局面。这个时候，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强大国家经济实力，也会适时调整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太和十一年（487年），孝文帝先是开放了民间的纺织业，“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48]到了太和二十年（496年），甚至又“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49]允许民间私人经营盐业。工商阶层的经济实力逐渐强大，便需要获取政治上的支持。而世袭的贵族则贪慕工商阶层的财富，于是，二者之间联姻的情况时有出现。为了防止贵族与资本结合形成威胁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平元年（460年），北魏太武帝下诏规定，贵族、普通士民与工商阶层不得通婚：“夫婚姻

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50]但是，这一规定在当时并未完全奏效。相反，在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于是“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51]允许原来最卑贱的工商阶层转换成农民身份，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太和八年（484年），又下诏曰：“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52]工商阶层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可以参政议政，进入朝廷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壮大，村落经济也在逐步发展。以纺织业为例，村落的纺织业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较为分散。蚕桑发达的山东、河北等地的很多村落，已经成为有名的丝绸之乡，国家的税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纺织业，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即可说明。太和八年，北魏“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复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兖、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53]可见，当时蚕桑已普及家家户户了。由于产量实在太高了，国家的丝织品仓库中都堆满了绢帛。皇帝赏赐给臣下的礼物，动辄成百上千

匹。由于丝织品生产的量大，丝织品的价格也一降再降。从石勒统治时期的一匹三四千钱，到北魏初期的每匹数千钱，再到孝文帝时的二百钱，直观地反映出了纺织业的发展程度。

商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货币系统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层次。例如，北魏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交易中仍然没有使用金属货币。《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载：“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也就是说，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才铸太和五铢钱，通行境内，而且允许民间铸钱。此后又铸永平五铢钱与永安五铢钱，不过，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当时的货币问题。北魏的货币，始终以实物货币——绢帛占主导地位。无论施舍、赠予、偿还债务、支付物品价格或劳动费用，还是政府收租调、做预算、计赃定罪，乃至包括贪官污吏受贿行贿，也都以绢帛计算。^[54]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北魏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通行的是绢帛之类的实物货币，保管不便，携带麻烦，所以其商业始终很难发展起来。

到西魏与北周时期，与巴蜀、西域通商的规模扩大，金银货币开始流通，北方的商业化程度从此时开始才有所提升。在某些特殊时期，地方官员还利用通商的方式来扶助村落的贫困人口。

现在看来，这可以被视为“商业扶贫”的最早模式。《北史·韩褒传》载，西魏时，西凉州地区“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百姓，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为改变这种现状，当时的西凉刺史韩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最主要的是，“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

在东晋与南朝，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经过300多年的辛勤劳作，村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例如，六朝统治者在古都建康周围地区苦心经营，开发了大量农田。东晋时，在曲阿（今江苏丹阳）立新丰塘，开发良田800多顷。南朝宋时，又在湖熟（今属江苏南京）开发了4 000多顷农田，还令京口（今属江苏镇江）、姑孰（今属安徽当涂）一带移民开荒。南朝齐时，在句容（今江苏句容）修赤山塘。南朝陈时，在丹徒、兰陵一带复垦沙田千顷，等等。^[55]京城附近农田的开垦，也带动了整个东晋和南朝统治区域其他地方农业的发展。浙江的永嘉、新安、乐安、松阳等地的丘陵与谷地，都已经逐渐开发了。福建、江西乃至湖南、湖北等地，农业经济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了发展，效果十分显著，如《宋书》卷五十回《沈昙庆传》载：“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载：“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朝陈徐陵作《德政碑》：“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通肆……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56]从这些描述来看，都涉及了渔业、盐业、纺织业、种植业、商业及其他手工业，虽然某些描述带有文学性的夸张成分，但经济有所发展，确实是史实。

铸钱、制造武器和生产工具需要大量金属，这直接促进了采

矿业和冶铸业的进步。东晋时，在建康城中设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撤西冶设南冶。丹阳、吴县、溧水、武昌等地的铜，扬州、剡县、益州等地的铁，都十分有名。当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铜钱或者布帛作为货币时，岭南一带则流行用金银做交易，体现了当地金银业的兴旺。当时，冶铸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并得到广泛推广，且已经发明并掌握了将生铁与熟铁放在一起冶炼的技术。生铁熔点低，熔化之后渗入熟铁，取出锤炼，去除杂质，可以锻造品质较高的铁质生产工具。煮盐的历史十分古老，南朝时人阮升之《南兖州记》载：“南兖州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渔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此吴王所以富国强兵而抗汉室也。”^[57]因为盐业带来的收入可以比肩甚至远远大于农业的收入，所以当地村落的百姓几乎废弃了农耕。巴蜀一带生产的井盐，也远销各地。蜀郡的每个县域内几乎都有盐井，少的十多处，多则上百处。在南方地区，河流湖泊密布，水运发达，所以造船业也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载，侯景叛乱时，“以舳舻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舳舻千艘”在具体数量上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规模肯定不小，体现出当地造船业的兴盛。

随着制陶技术的提高，这一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且制瓷业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新兴工业。南方地区以烧制青瓷为主。这种瓷器胎质灰白，釉色呈青色或者淡青色，间或带点绿色或微黄。孙吴时期，青瓷的产地主要在绍兴、上虞等地。东晋以后，萧山的上董、德清的戴家山、余姚的鳖唇山以及金华、鄞县、永嘉等地，皆成为重要的青瓷产地。浙江以外，江苏的宜兴、江西的丰城、湖北的武昌、福建的福州等地，也有不少青瓷窑口。从器物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烧制的瓷器以日用品为主，如钵、盂、壶、

罐、盘、碗、灯、熏炉等。除此之外则以随葬明器为多，种类更为丰富，如人俑、动物俑、粮仓、灶台、猪圈、鸡舍、井台、杵臼、米筛、畚箕、扫帚、木桶等。这些明器几乎就是生活物品的微缩版，能够直观并真实地展示魏晋时期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此外，造纸业、漆器业、制茶业等，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这些行业，尤其是产品的制作或加工，大都起源于当时的村落。产品的原材料也大都来源于村落与村落周边地区，这应当是没有大的疑问的，至少早期的形态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此时的工商业经济有所发展，那么村落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有关村落的经济发展程度，通过一些直接的材料可以看出来。例如，南朝的养蚕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江西南昌地区的蚕，一年可以收获四五次蚕茧。浙江温州一带，有所谓的“八辈蚕”，即一年之内的3—10月有8个品种的蚕，可以先后分别吐丝结茧，即蛭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蛭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58]官方多次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下诏曰：“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59]除了蚕丝纺织成的丝绸，苧麻等麻料作物种植非常发达，由麻纺织的麻布也是当时的主要布料来源。此外，还有其他材质的布料，如在云南、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村落中就流行木棉布。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大量产品，既有原材料，也有成品。它们被用来交易，成为商品。村落商品交易的内容，主要

包括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如米、谷、麦、菽、食盐、水产品、禽畜肉类、蔬菜等食物，麻、葛、丝、棉、布、绢、帛、鞋、帽等服饰原料或成品。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商品都是人工生产的。以食物为例，有的野生物种即使不通过栽培，但由于市场有需求，也能进入交易场所。《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载：“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菱与莼，多为野生的。除了这些最基本的食货日用品，还有一些特殊的生活用品，也经常作为商品来交易，如汲水工具、蔡扇、簟席、纸张、毛笔、书籍经卷、绘画颜料、生漆、砖瓦、陶瓷、日历、医药、嫁妆、棺槨、针线、假发等。另一类涉及村落生产，如牛、马等牲畜，锄头、镰刀等劳动工具，甚至包括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乃至十夫客、典贴者等劳动力或者奴隶，都是村落中交易的重要商品。

商业活动开展的场所，是市场。在小农经济时代，无论是土豪地主，还是个体小农，都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但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落，甚至是几个联系紧密的村落中，也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生产。人们总是需要交换物品，以弥补彼此之间的不足。在城市中，市场较为规范，摆摊设点，都有固定的场地。当时，几乎所有的城市中都设有市场。而在村落中，大都盛行临时性的集市交易，被称为“草市”。《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载：“建武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十余日，晏诛。”草市中的主体就是村落中的自耕农。在建康、寿春等城市中，也设有主要以农产品为对象进行交易的市场，也被称为“草市”。草市的大规模兴起，要到宋代，但此时已有萌芽。城市中的草市，完全建立在村落商品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持市场秩序，政府重视对草市的管理，设有草市尉。《南齐书》卷五十《鄱阳王宝夤传》载：“宝夤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

启帝，帝迎宝餐入宫问之。”草市中，可以分为行商与坐贾行商的流动性较强，而有固定门店的坐贾则各有各的经营区域，不得错乱。铜街、铁市、葱肆、鱼市等，无不井井有序。地方官吏注意整顿市场，把征税作为重要任务。商业性税收也是南朝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南朝时，农民进入市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其农产品相对单一，满足自给自用之后还有富余；另一种则主要是由于种田收入很低，而国家对农民征收的税收却非常高。有的农民就弃农经商，或者种植经济作物，参与市场经营。此外，政府用折变的方法征收租调，或谷、帛、绵、绢互折，或以谷帛折钱、银，农民被迫进入市场。^[60]例如，有的地方不产银，民众以农耕生产为主，但政府征税时不收粮食而要求缴纳银钱。农民别无他法，只好将收获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卖掉，换成银钱交给政府。这在客观上也引导着商业活动介入村落经济，并带动农耕与商贸的发展与结合。

五、村落与宗教

在东汉末年，儒学价值体系遭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冲击，“德治”与“道治”的传统被打破，使得原本有序的社会伦理规范面临崩溃。具体表现在民众的思想领域，就是“有神论”思想流行。早在东汉时期的白虎观会议^[61]，就确立了“三纲六纪”为统治的核心，要求所有人都遵循。这实际上结合了天命、鬼神、儒学三者，为谶纬迷信的盛行奠定了基础。虽然有王充、范缜等无神论思想家始终不渝的抵制，但在普通民众中，因为天灾人祸的影响，许多问题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解决，只得求助于神灵，使得基层的宗教信仰越发蓬勃。谶纬思想成为东汉统治的基础，

它标志着西汉的儒学思想遭到破坏。

儒家典籍中有许多规定，都是针对祖先及神灵的，其祭礼与祭法并不少。如《礼记·祭法第二十三》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不过，其受众群主要是上层精英，而面向民众的非常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同样需要通过祭祀来寻求宗教寄托，因而都有自己的祭祀对象。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尤其如此。由于下层百姓的祭祀对象并不被官方认可，而且非常泛滥，难以统一，就称之为“淫祀”。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对民间的淫祀采取压制的态度。一些宗教领袖趁机伪托“神意”，实施种种“神迹”，以此来获得民众认同，从而吸引大批信徒，形成有组织的固定宗教群体。在这方面，以自民间兴起并蓬勃发展的道教最为典型。道教领袖一方面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统治阶层妥协，以求自保。灵活应对的策略，使得道教组织后来一直在村落民众信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当时，佛教传入中原已经一百多年了。最初，佛教主要在上层贵族精英中传播。曹魏和晋武帝等帝王都曾发布禁令，限制佛教向底层传播。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晋武帝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经过长时期的宣传布道，加上又擅长吸收中原文化，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也在加快，相关教义内容逐渐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佛教信众的数量很多，匈奴、羯、氐等生活于西域的少数民族，均信仰佛教。他们不断地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的融合不断加深，加速了佛教在中原民众中的传播。种种原因，使得佛教思想逐渐占据了汉族生活区

域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本土原有的民间信仰相互杂糅在一起。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信仰大变革的时代。在连年征战中，汉代以来经过四百多年形成的儒家传统已经遭到破坏，再也无法产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们以自身发展规律中创造出的不同传播方式与手段，开辟了人们新的信仰世界，并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民众的精神世界由此变得丰富多彩，各种宗教信仰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市场，在随后一千多年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类型。最为重要的是，后世中国本土宗教的基础也在这一时期奠定。

（一）佛教在村落中的传播

佛教自东汉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开始兴盛。其时，道恒所作的《驳释论》云：“且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62]道恒指出，“世有五横”，佛教是其中之一。它吸引教徒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以“善有善报”进行引诱，其二是以“恶有恶报”进行胁迫。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在传入中土之后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风行全国，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佛教主动向中华文化靠拢。三国时期，孙皓即位，想焚毁佛教塔庙，康僧会入朝与孙皓进行过一番辩论：“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星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恶余殃，《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皓曰：‘若然，则周

孔已明之矣，何用佛教？’会曰：‘周孔虽言，略示显近，至于释教，则备极幽远。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63]具体在实践层面，一些佛教徒借助方士的方术来传播佛法，不仅在民间如此，即使是对上层统治者也有效。后赵的石勒召见佛图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64]因此，上到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很多人都成了佛教信徒。第二，两晋时玄学发达，世人谈玄成风。王弼、郭象等玄学家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作为基本经典，以哲学本体论、名教与自然关系论、言意之辩为切入点，把老子的有无问题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并以哲学思辨的形式展开论证，提出了有与无、本与末、体与用、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汉魏以来，般若经受到内地士大夫的特别青睐。般若学说旨在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强调“诸法性空”，认为只有通过般若智慧体得永恒真实的“诸法实相”“真如法性”，才能获得觉悟和解脱。这种理论与玄学思想有相契之处，因而在魏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王室贵族和一切奉佛的士族官僚，几乎无不研习般若思想。般若成了名士玄谈的重要资料与内容。正是因为佛法的理念与玄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佛教便借助玄学发展壮大起来。第三，佛教本身就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土，最先在西域民众中扎根。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杂居杂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交融的影响不仅扩大，而且向深层次发展。西域民族的佛教信仰，自然也影响了中原民族。第四，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佛学大师，比如支遁、道安等。许多高僧还翻译、注释了很多佛经，这些译经工作，对佛教的发展壮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5]道安在长安组成一个译经团体，云集了大量中外翻译人才。道安亲自指导，选经翻译，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以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

兼及部分大乘佛经，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约百余万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少数君主之外（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灭佛；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废北周寺院，建德六年灭北齐时又废北齐寺院），其余的君主都崇信佛教，护卫寺院，加敬沙弥。因此，北朝佛教十分兴盛。《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和元年（477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事，赋役增加，许多人民为逃避调役而为入寺为僧，于是“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到了北齐，寺院有4万多所，僧尼有400多万人；北周的僧尼也多达200多万人。^[66]在南方，东晋到南朝的各个皇帝也基本上都崇信佛教。宋文帝（424—453年在位）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时，南朝的佛教信仰达到全盛。他即位的第三年，就率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自制文发愿，皈依佛教，并建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大寺，造大量佛像，举办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他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在客观上充实了寺院经济。南朝寺院及尼僧非常多，宋代有寺院1 913所，僧尼3.6万人；齐代有寺院2015所，僧尼3.25万人；梁代有寺院2 846所，僧尼8.27万余人；陈代有寺院1 232所，僧尼3.2万人。唐代杜牧所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反映南朝佛教兴盛发达的名句，但是实际上南朝的寺庙远远不只这么多。

不过，尽管这一时期佛教发展迅速，但大多数有记载的佛教活动主要在精英阶层发生。在基层村落中，有记载的佛教相关活

动并不多。然而，通过这不多的文字，我们仍旧能够感知此时佛教活动在村落中也是十分兴盛的。《魏书·释老志》载：“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又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这两条史料指出，在北魏统治时期，佛教在村落中的活动十分频繁，几乎村村都有佛教建筑及佛教徒活动的踪迹。北朝许多村落中，通常有僧人通过云游的方式传播佛教，这是早期佛教初入中原时在乡村地区传教的最主要方式；同时，因为有些僧人一直在山居林野中清修，也常常就近感化附近村落的居民。《高僧传》载竺法旷的事迹就是如此：“时东土多遇疫疾，旷既少习慈悲，兼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有见鬼者，言旷之行住，常有鬼神数十，卫其前后。时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像，旷乃率其有缘，起立大殿。相传云，伐木遇旱，旷咒令至水。”^[67]在有的故事里，佛教法师的神力超过了本土的神灵。例如，南朝齐时，“富阳县人故冬凿麓山下为砖，侵壤龙室。群龙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余日，井池枯涸，田种永罢”。当地的神灵便来请当时的高僧昙超求雨，昙超起先说这并非自己的法力所能达到，但最终经不住神灵的再三邀请，答应其请求，“遥为龙咒愿说法。至夜，群龙悉化作人，来诣超礼拜。超更说法，因乞三归，自称是龙，超请其降雨，乃相看无言”。^[68]

此外，还有许多村落贫穷偏僻，经济条件有限，村民没有财力修建寺庙，为僧人提供一个固定的居所。因此，当时的僧人为了在这些村落传播佛法，不得不采取云游的方式，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成为“游化僧”。某些村民可能对佛法有兴趣，会邀请僧人在村落中居住比较长的时间。而僧人也会在村落中为信众指导对佛经的参悟，主持佛教仪式或者建造佛像。某些村落的

民众因为敬重某位高僧，甚至将原来本土的神庙毁弃，改成佛教寺庙。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安徽省新阳县虎灾频发。“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投之树北。见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后欲作画像，须铜青，困不能得，夜梦见一人，迂其床前云：‘此下有铜钟’。觉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后以铜助远公铸佛。”^[69]

许多源自于村落的造像记也显示出，在村落造像所记的捐赠者姓名中，有许多僧人的名字，如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薛凤规等造像碑》中，姓名中尚可辨识者达494人，其中至少59名是僧尼。此外，还有一些人的姓名与僧尼的名字相近，但冠有姓氏，如尹婆罗、薛舍利、吕僧亮、吕僧□、范僧保、行僧显、□法延、吴法顺、李法□、吴法烦、李法海、杨法智、王道温、何道兴，等等。^[70]也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在村落社会影响程度已经十分深刻。

北朝的造像记还显示，在很多村落，民众信仰佛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东魏时期河北并州安鹿交村（今山西省平定县岩会乡乱流村）的《王法现造像记》载：“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邑，仪王法现合廿四人等，既发洪愿，造石室一区，纵广五尺，中造三佛、六菩萨、阿难、迦叶，造得成就，上为佛法兴隆、皇帝陛下、勃海大王，又为群龙伯官、守宰令长，国土安宁，兵驾不起，五谷熟成，人民安乐；下为七世父母、所生父

母、因缘眷属、蠢动众生、有形之类，普蒙兹眷，一时成佛。”^[71]在这个村落中遗存至今的造像记共有五方。这可以充分反映出，在南北朝佛教弥漫北土，民众或以个人的名义，或以家庭、寺院为单位，或聚集若干信众组成邑义、法义来造像兴福，已成为社会风气。^[72]

总而言之，北朝时期，村落民众集资或者单独建造单立式的石碑佛像或者金铜佛像，已经十分流行，并具如下四个功能。其一，将其放置于村民家中，可以供家人日常礼拜供养。其二，将其放置于寺院中，可以为僧尼信徒致敬供养。其三，将其置于人口稠密的交通要道旁，可以为一些来来往往的客商行人提供供奉对象，同时也祈感化路人。其四，在没有寺庙的情况下，有佛像的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道场”来举行宗教活动，以满足信众的要求。在基层地区，第四个功能显得尤其突出。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村落，村民的居所都较为分散，也无实力建筑寺院。即便某些村落修建有寺院，也大多规模较小，场地有限，无法举行规模相对较大的佛教仪式法会活动。此时，以佛教造像为中心布置道场，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近2 000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在南北偏僻的乡村之地仍时有所见，由此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佛教在底层得以流传的原因，主要是佛教宣扬的精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此外，佛教寺院在社会救助方面的功用，使得当时的村落民众对佛教也有好感。国家及民众等各方面的财富不断地向寺院输入，除了满足僧尼的日常消费及寺庙维护以外，还有大量的财富被囤积起来。于是，寺院便做起救济贫穷及灾荒的事业。由社会得来的财富，又转而贡献给社会。^[73]具体的救助措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用医术无偿为平民治病，或者收养病人。北魏时，僧人惠莲常常在京城西南处为百姓治

病，受到灵太后嘉奖。西梁时，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曾“收养痼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另一方面，灾荒之时，将寺庙所囤财资变为粮食施舍或借贷给灾民。北魏僧人道研常常借粮给当地百姓，并在官府的压力下焚毁债券，由借贷变成了施舍。

（二）道教在村落中的地位与作用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它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它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之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的宗教。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陕西咸阳道士茅盈及其弟茅固、茅衷在句曲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百姓感其功德，遂改山名为“茅山”，茅氏三兄弟被称为茅山道教祖师。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创建和改造时期，分化为丹鼎派和符水派。

丹鼎派，又称“金丹道教”，以炼金丹求仙为主。它并非实有的教派，而是后世对道教中以炼金丹求仙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最早由古代的黄老道家发展而来，早期理论著作以《周易参同契》为主。魏晋时，葛洪进一步发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对其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他著有《抱朴子》一书，专论炼丹方术。丹鼎派又可分外丹与内丹。外丹是指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药物，以配制可服食的长生不死金丹；内丹是指把人的身体当成“炉鼎”，以自身的精气为药，用神烧炼，为神气相交结成之物。魏晋南北朝乃至到隋唐时，外丹盛行于世；宋元以后，内丹流行。显然，修炼外丹需要鼎炉铅汞，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对于《周易参同

契》这类艰深著作的掌握，则需要相当的知识文化修养。这些都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丹鼎派主要流行于上层士族群体，而非村落普通居民。

符水派，又称符篆派，是对道教中以符咒等方术治病驱鬼为主的各道派的通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灵宝派等，都属于符水派。这一派道士主要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来替人消灾除祸、治病除瘟、济生度死等。信众认为，画符篆或烧符篆于水中喝下去，可以疗病。《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宋书·羊欣传》载：“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符水派由于简单易行，不对艰深的教理教义进行探讨，而且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特别注重祈祷请神、礼拜斋醮等法事，进行“教化劝善”，故而深受下层普通百姓的欢迎。对村落居民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也是符水道教。陶弘景的《真诰》载，灵宝派据茅山，经常举行送竟、斋戒等法事活动，每年“三月十八日，辄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唯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讫便散”。^[74]村落居民在对现实绝望而走投无路之际，深信只有宗教能够给他们以慰藉和力量。道教由于本来就源自本土，最早在下层民众中得到认同、响应和追随，于民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所以成为他们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在上层贵族中盛行的道教，主要是以修仙炼丹为主，注重讨论道教的教理教义。而在下层村落民众中盛行的道教，囿于本身的知识水平和经济实力，不在乎教理教义的探讨，需要解决眼前现实的生存问题，所以更在乎它的实用性。上层的道教人士，看不起下层道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道意》中，就对下层道教

进行了批判：“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闻延年长生之法，皆为虚诞，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筐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刖剕，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愚民之蔽，乃至于此哉！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75]诚然，将种种现实诉求寄托于宗教之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政治能力的下层百姓而言，除了选择信仰宗教的超自然能力，别无他法。因此，虽然有以葛洪为代表的上层知识精英对民间的符水道教流派进行批判，但这并未影响到下层百姓的信仰选择，民众并不理睬上层精英的批判，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客观来看，道教确实也对当时缺衣少药、生活艰苦的村落百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帮助，并且对当时乡里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势力逐渐强盛。整体而言，村落的道教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重献祭、祈祷、符水治病，形式粗朴、目的功利现实。汉中地区，张修的信徒常常以祈祷忏悔之法治病：“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

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76]《资治通鉴》载东汉的道教领袖张角的道法也是如此：“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77]三国时期，江南地区的道士也常以法术治病，吸引信徒：“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78]而且，由于一些道士常年在山林中修道，掌握了草木、矿物的性能与人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完善了医药学，对中医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当时，著名的道士葛洪、陶弘景等，也都是名医。葛洪精通医学和药理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认为在山中修道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生病便无法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性命难保。他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后世医药学产生的影响很大。他的《肘后备急方》等，搜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些药方，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搜集和筛选出来的。由于都是些常见的药物，价格便宜，疗效很好，深受普通百姓欢迎。当时的百姓遇到一般的疾病，都知道自己用药物治疗，如：“理中四顺，可以救霍乱，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芦、贯众之煞九虫，当归、芍药之止绞痛，秦胶、独活之除八风，菖蒲、干姜之止痹湿，菟丝、苁蓉之补虚乏，甘遂、葶历之逐痰癖，括楼、黄连之愈消渴，芥苾、甘草之解百毒，芦如益热之护众创，麻黄、大青之主伤寒。”[79]葛洪还撰有《玉函方》百卷，这些药方所载的病方，“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80]南朝道教学者陶弘景常年隐居于山林，对乡

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体会较深，而且在长期采药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了《神农本草经》中的一些讹误，对其中的300多味药材进行了鉴别。同时，他又增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新发现的药物，撰写成《本草经集注》，改进了《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分类，将原来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改成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六类，并将有名无实的药物归入“有名未用”类；在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和鉴别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此外，他将一些治疗同一种病症的药物进行了归类，如治风通用的防风、防己、秦艽、芎藭等，治水肿通用的大戟、甘遂、泽泻、葶苈、巴豆，治疗黄疸通用的茵陈、栀子、紫草等。明清时期，一些村落中的道教信徒将中医药方写在纸上，装入造像背龕中，祈求以此作为治病之方。如：

祗壳三分，川庄三分，
柴胡二分，防风二分
独号五分，连翘三分，
吉根四升，西号二分，
前胡三分，并齐二分，
北辛、薺剂二分，
生草二分，芒硝三分，
生姜二片，引，
加茯苓三分。

诊牛眼猪眼方。[\[81\]](#)

其二，参与教派组织，团结互助，甚至对抗官府。魏晋时

期，在村落百姓中，道教组织的势力远远超越了宗族内部的血缘影响。对贫苦无依的弱势民众而言，结成组织对抗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是最直接有利的方法。前文引用的《资治通鉴》表明，张角组织的道教组织，十多年间信徒达到了数十万，可见规模非常庞大。不少农民起义就是通过道教组织的形式进行的。例如，西晋时，关陇流民李特开始领导的起义，就与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给予的支持分不开。李特之子李雄后来占领益州，自称成都王，欲迎范长生为君王，范长生固辞不允，反劝李雄称帝。后李雄称帝，国号大成，传三世至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东晋时，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其起义军是由信奉五斗米道的农民组成。孙恩是江南五斗米道的传道师杜子恭的再传弟子，孙恩先是追随叔父孙泰，后孙泰被诛。孙恩聚合徒众百人，在江浙之地起义。《孙恩传》载：“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瑰、吴兴丘𪔐、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邕，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惛等皆遇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儒，临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82]基于一个宗教组织建立起一支能够对抗朝廷的军队，甚至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可以想见该组织的规模与实力。这已不

是简单的民间力量有组织地进行结团了，而是已经异变为有明目张胆的政治主张的军事行动。此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乃至民国时期兴盛的青帮、洪门，多多少少都带有道教组织的痕迹，就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开始的。

（三）村落中的其他信仰与祭祀文化

除了佛教与道教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中还有大量其他信仰。佛教传入中土时，初期只在精英层面流行。这是由于其深奥而抽象的教理教义，并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后来，佛教的义理简化为因果报应等直白观念，开始迅速在基层村落中生根发芽。道教则本身就来自民间，即使后来知识精英将其与老庄思想融合，也并未影响它在底层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对大自然的信仰，也成为早期道教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时期，民间自然信仰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为道教文化。换言之，佛教与道教之所以能在村落的普通民众中生存发展，直接得益于它们与地方的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村落中的民间信仰做简要论述。

关于民间信仰，有多种解释。《辞海》对其有着较为简明的定义。^[83]现略加补充：“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相对系统的宗教有着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教义、明确的传人和严格的程序与仪轨等，也不像正统的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与明理名义。它的思想基础载于万物有灵论，故信奉的对象较为庞杂，所体现的主要是唯心主义，但也含有一些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成分，特别是民间流行的天地日月等自然信仰。”日本平凡社版的《大百科事典》将其定义为：“民间信仰是指没有教义、教团组织的，属于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庶民信仰；它

也被称为民俗宗教、民间宗教、民众宗教或传承信仰（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信仰）。”^[84]其实，此说也未完全准确。因为有的民间信仰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确实曾存在过组织。有的组织甚至在后来发生异变，有的还变成邪教。即便民间信仰和宗教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情形与裂变。在中国的城乡，尤其是农村社会，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传统村落中，精神信仰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民众的生、婚、病、死等各个环节，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乃至日常劳动和言谈话语之间，无不是精神信仰发挥作用的场所。按照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小传统”文化观，村落信仰属于“小传统”文化范畴。然而，村落社群拥有的“小传统”文化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民间的信仰和崇拜多种多样，如“祖先崇拜”，它很可能是存在于村落之中影响范围最大、分布地域最广的一种最为根深蒂固和具有典型“文化自觉性”的民间信仰。这种信仰一方面明显带有其宗教性与神性，另一方面又明显带有家族伦理的精神性。其活动中的信仰心理和信仰愿景，具有成分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有的信仰活动是为了给祖先歌功颂德，同时也是为了护佑自身及后人。当然，家族与家庭的信仰活动，从形式到规模，也就可能完全不同。

村落民众的精神信仰不应只囿于“宗教”层面，还应该包括一些非宗教的信仰，比如生活当中人们所信奉的各种预兆，所遵循的各种婚俗禁忌、生育禁忌、丧葬禁忌、饮食禁忌、语言禁忌等。其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是巫术。它自原始社会就开始发生作用。商周时期，掌握巫术的巫师地位很高，承担着国家的重要祭祀职责。《周礼·春官》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馆。凡祭事，守瘞。凡丧事，掌巫降之礼。”随着社会

的发展，巫师逐渐分化，其职业性也越来越强。但是，巫师的地位开始下降，并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桓宽的《盐铁论》载：“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额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85]这段文字指出，东汉时期，巫师已经将巫术当成一门生意，用来维持生计甚至致富。魏晋南北朝时期，巫术的活跃程度空前加强。巫术的类型很多，方向之祭、乞雨止雨、请风止风、见神视鬼、祈攘厌劾、转移灾祸、毒蛊、巫蛊、媚道、星算、卜筑、占梦、相术、医术、祝由、房中术等，都是巫术的范畴。例如，《南史》载：“诸暨东湾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苕罗，昼采樵，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必得大富贵。’女谓是妖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蚺毒者，女试疗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嫁，为山劫所杀。”^[86]屠氏之女因为至孝，得山神相助，于是掌握了为人治病的巫术，并得到了村人的认同，遂因此致富。这一时期，村落民众对于许多鬼神致病而不得不请巫医作法治病的故事深信不疑，即使在正史中，也屡见不鲜。《南史》卷七十五《顾欢传》载：“山阴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诉求哀，欢往村中为讲《老子》，规地作狱。有顷，见狐狸鼯鼯自入狱中者甚多，即命杀之。病者皆愈。”

巫术具体体现为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它主要由仪式组成，而且需要掌握一定技能的巫师指导。换言之，巫术信仰仰赖于巫师而存在，巫师缺席则信仰活动无法举行，民众的信仰活动场所也

无从确定。而另一类精神信仰，则有具体的信奉对象（鬼神等偶像）及确定的活动场所（祠庙宫观等），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祠庙宫观等确定的活动场所在民间盛行，对村落民间信仰的意义尤其重要。即使没有巫师，信众也能自发地举行简单的信仰活动，而不需要掌握专门的仪式。信仰活动自由度加大，使得信仰空前繁盛。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供奉各类鬼神的庙宇太多，以致官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加以禁止。关于这些，史书中有不少记载。如《梁书》卷三十九《王神念传》载：“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北齐书》卷三十二《陆法和传》载：“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这些用来祭祀鬼神的祠庙十分繁多，遍及大大小小的村落。从不同祠庙宫观中摆放的不同祭祀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其一，自然神祇。既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大的自然物象及现象，又包括山水中的山岳、岩石、江河、泉井等，还包括动植物神祇。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有许多记载。如较早的雷神故事：“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诿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87]山神、水神崇拜中，崇拜的对象往往被认为能够满足村民的某些现实需

要。《太平御览》卷十一引盛弘之《荆州记》载：“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雨泽，以是名之。”直到今天，雨母山上仍旧修建有帝尝祠、赤松子坛等。《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郑缉之《永嘉记》：“怀化县有蒋公湖，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达到一定寿命的动植物老了之后会变成精怪，如狐狸、蛇、龟、犬、梨树、桑树等，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民众的普遍观念。因为对这些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村落的民众只要遇到自己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会将其神化，有时不免闹出笑话来。《搜神记》卷五《李君神》载：“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植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间一岁余，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斫之。”

其二，人物神祇。历史上某些重要的人物，由于生前功业卓著，在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他们死后，被民众长久地记在心中，并塑造成神祇进行供奉。另外，一些传说中的人物，也被民众建祠庙祭祀。《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载：“行至江淮间，遇石冰、封云为乱，云逼愉为参军，不从，将杀之，赖云司马张统营救获免。东还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穡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晋书·地理志》和《魏书·地形志》等官方文献中统计的设祠祭祀的对象，就有黄帝、蚩尤、伏羲、女娲、老子、叔梁纥、颜徵在、孔子、子路、戚夫人、尧、舜、禹、周文王、姜太公、赵武灵王、介子推、孙叔敖、伍子胥、子产、西门豹、刘邦、张良、商山四皓、汉武帝、项羽、曹操、诸葛亮、周瑜、麻姑、酆

食其、蘧伯玉等。这是见于官方系统记载的，民间村落中的地方性神灵，应该更多。某些名人成了某一同类神，如冯夷、屈原、伍子胥，都逐渐演变成护佑一方的水神，在村落中影响深远。后世村落中信仰的许多重要神灵，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如最早的土地神蒋子文信仰，最初为恶神，百姓为了讨好他，就立庙祭祀。盘古神的记载最早也见于这一时期，其中以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纪》记载最早。实际上，当时民间各地都有盘古的传说，任昉的《述异记》对此进行了综述，具有浓厚的民间性：“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88]

其三，佛教与道教神祇。村落中的另一类神祇，既不是源于自然信仰，也不是出于对历史人文的崇拜，而是直接来自佛教、道教等宗教。不过，村落民众对之进行祭祀，基本上已经无关乎佛教或者道家的教理教义，而是带有很强烈的民间性，如西王母信仰、观音菩萨信仰等，因此可以将其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类型。西王母信仰最兴盛的时期主要集中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旧有不少地方的村落民众信仰西王母。如东晋咸康四年（338年）丹徒县的《朱曼妻薛买地券》记载：“吴故官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极戊己，上极天，下极泉。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有志薛地，当询天帝有志薛宅，当询土伯。任知者东王公、西王圣母。如天地律令。”^[89]敦煌莫高窟第249

窟，是西魏时期石窟的代表。西坡中央绘须弥山，东坡绘摩尼宝珠，北坡绘东王公。西王母绘制于南坡的中央，身穿黑色衣服，乘坐由三凤引导的车。凤车上飘扬着以细长饰带组成的蓝色旗帜，向着画面右侧（当为西方）前进。凤车前方有天人和乘凤仙人导引，后方也尾随天人与乘凤仙人。西王母前方站一着红袍的御者。在凤车前后的天人旁边，浮游着生命体。凤车下方的是四神之一的白虎，与凤车向同一方向奔驰。^[90]与这个时期相关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正史中，都记载了大量的观世音应验的故事。可见，观世音崇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很兴盛。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高僧竺法护翻译完《正法华经》。《正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信仰进行了详尽描述，救苦救难也逐渐成为观世音信仰的核心观念。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八年（406年）在长安重新翻译这一部经典，名之为《妙法莲花经》，影响更加深远。其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中独立出来成为《观音经》，大大加快了观音信仰的传播。迄今为止已经出土了200多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世音造像。而且，从造像记来看，观世音菩萨造像多为平民信徒，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可以认为，平民较官吏而言更热衷于信奉观世音。

此外，观世音崇拜的地域非常广泛，涵盖了今天的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辽宁、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如上海博物馆藏《卢氏造观音立像记》载：“神龟元年四月八日，佛弟子卢边之，先为水厄，愿造观世音像一躯。愿从今后，居眷大小，须遇诸佛。”^[91]卢边之的家族因为遭遇水灾，造观世音像一尊，希望此后能逃离灾厄。北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年）《胡缙妻造像记》表明，家

中没有灾祸也可造观音像以求平安：“正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胡绁妻造观世音佛一躯。居家大小，见世安稳，故记之耳。”^[92]有的观世音造像，是集体所造，如《王双虎等造像记》载：“大魏武定二年岁次甲子十二月辛亥朔四日甲寅，东阿县王双虎法仪五十人九人等，知身无常，财非己有，是以谨竭家珍，敬造观世音石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州郡令长，师僧父母，因缘眷属，一切众生，咸同福庆。”^[93]还有一些造像的捐助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造像记中记载了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姓名，如北齐《赵科造像记》载：“□齐河清元年岁次辛未八月戊戌朔十四日己亥，清信士佛弟子赵科致身非常，财非既有，减割家珍，敬造观世音像一躯。□为皇帝陛下，中为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亡过现存，一切众生，普同斯福。祖赵邻，祖母善妙姿。父赵昙迁，母郭貳王。大像主赵科。姊赵侯离。姊赵双。弟赵瓮。妹赵思。妹赵雌。妻李罗妃。息赵善。女赵客。女赵雪。息赵相贵。”^[94]

这种阖家捐助造观音像且将家族所有人丁姓名均记载其中的风气，直到明清时期还在村落中发挥重要影响，如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所藏的一卷湖南地区的观音菩萨造像记，就是如此：“今据，大清朝湖南省宝庆府新化永宁乡十二都，地名大桥边，祀祭白马庙王祠下土地各分居住。奉，□修□焚香，燃灯装素金容圣像一尊，祈吉凡民信女聂邹氏腾云本命，生于丁酉年五月十五日亥时，叨生男柏裕、忱裕、敬裕、德裕，媳陈氏、邹瑞珍，孙芝山，孙女叔能，女凤娥、凤麟、凤龙，估泊合眷老幼男女人等，是日木年焚香。恭对，南无观音大世事奉永香灯座下呈进，伏望惠遶光，信女聂邹氏名下寿山叠翠、永远康临；护佑姓（信）士聂柏裕名下星辰顺吉、禄马扶持；佑聂忱裕名下男增福禄、永远常青；聂□裕男芝山名下世秀青松；聂敬裕下一品当朝；聂德裕名下指日高升。再祈一年四季之长青，八节康临之吉

庆；护佑有求即应，伏杲无虚。护佑，家门迪吉，人眷安平，六畜兴旺，田□兴隆，万事亨通，斑斑如意。一切未言，全叨庇佑。凡在光中，吉祥如意之至。出文端上，永远光辉。发，进生生不已。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十一日丹青□悦。”[95]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性的精神信仰在村落中有着重要的功能。这些功能一直在后世村落中代代相传。整体而言，村落中的宗教信仰对村落民众有着四个重要功能。第一，心理慰藉功能。现实生活中，民众在面对疾病、痛苦、死亡的时候，难免会心生恐惧、失落无助。而有了一定的精神信仰以后，他们可以通过方便操作的方式来减轻内心的伤痛与不安，从而获得精神支柱和安全感。第二，道德教化功能。因为主观上相信因果报应等宗教教义，客观上对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举止便有了规范的效果。尤其是村落中一些地方神，都体现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向善的引导作用。第三，族群认同功能。很显然，汉族村落中崇拜的神灵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外族的神（除了佛教这个已经本土化的宗教以外）根本无法进入村落的祭祀空间。这对本民族归属的认识及相应的情感依附有一定的深化作用，从而产生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第四，社会整合功能。村落中的宗教信仰，不仅是村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它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各种心理需求，从而调适了世俗生活。村落信仰中的很多禁忌和俗信，都是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涉及村落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效地规范了大家的行为，从而起到了社会整合或控制的作用。在今天的村落中，这个四个功能仍然存在，除此以外，还增加了文化遗产的功能。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落的民间信仰，上承两汉乃至先秦时期的自然崇拜、祖宗崇拜、巫鬼观念、神仙道术等，加上

新融入本土的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显得异常丰富多彩，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唐、宋、元、明、清直到民国，乃至当代广大乡村的民间信仰，都与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息息相关。

[1]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 段小强、赵学东：《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农作图〉》，《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3] 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7期。

[4] 段小强、赵学东：《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农作图〉》，《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5]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凯传》。

[6]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7] 《三国志·蜀志》卷四十三《李恢传》。

[8]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9] 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图书馆：《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第614—622页。

[10] 《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第一》。

[11]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九》

[12] 《魏书》卷四《世祖纪》。

[13] 《魏书》卷七《高祖纪》。

[14] 段小强、赵学东：《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农作图〉》，《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5]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16] 《南齐书》卷四十六《顾宪之传》。

[17] 《魏书》卷七十七《辛雄传》。

[18] 《宋书》卷九十一《郭原平传》。

[19] 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2页。

[20] 邵正坤：《造像记中所见的北朝家庭》，《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1] 张国刚主编，王利华著：《中国家庭史》第一卷《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22] 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0—33页。

[23] 《魏书》卷五十七《崔孝芬传》。

[24] 《魏书》卷四十五《裴骏传》。

[25] 《宋书》卷九十三《刘凝之传》。

[26] 《陈书》卷九《欧阳颀传》。

[27] 《宋书》卷九十一《吴逵传》。

[28] 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29] 《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

[30]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1] 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32] 《晋书》卷五十一《摯虞传》。

[33]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

[34] 《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

[35] 《通典》卷第三《食货三》。

[36]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3页。

[37] 赵凯球、马新著，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7页。

[38]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39]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40] 《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41]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42] 《魏书》卷三十三《张蒲传》。

[43] 《三国志》卷二十三《杨俊传》。

[44] 《三国志》卷三十八《麋竺传》。

[45] 高敏主编：《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46] 《魏书》卷四《世祖纪下》。

[47] 《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48]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49]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50] 《魏书》卷五《高宗纪》。

[51] 《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52] 《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53] 《通典》卷五《食货》。

[54] 高敏主编：《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16页。

[55] 高敏主编：《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

[56] 《广东通志·金石略》。

[57]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

[58] 《齐民要术》卷五。

[59] 《宋书》卷五《文帝纪》。

[60] 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61] 白虎观会议，是指东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会议时间长达一个月，后由班固对此

进行总结，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将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62] 僧祐：《弘明集》卷六。

[63]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64] 《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

[6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66]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67] 《高僧传》卷五《义解·竺法旷传》。

[68] 《高僧传》卷十一《习禅·昙超传》。

[69] 《高僧传》卷第六《义解·法安传》。

[70] 周铮：《北魏薛凤规造像碑考》，《文物》1990年第8期。

[71]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第二册，转引自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4页。

[72] 侯旭东：《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付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期。

[73]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页。

[74] 陶弘景：《真诰》卷十一《运象篇》。

[75] 《抱朴子·内篇·道意》

[76]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

[77]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

[78]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79] 《抱朴子·内篇》卷五《至理》。

[80] 《抱朴子·内篇》卷十五《杂应》。

[81] 胡彬彬、吴灿：《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祈福禳灾》，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0页。

[82] 《晋书》列传第七十《孙恩传》。

[8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0页。

[84] 转引自朱海滨：《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46页。

[85]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

[86] 《南史》卷七十三《萧矫妻羊氏传附诸暨屠氏女传》。

[87] 陶渊明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88] 任昉：《述异记》，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

[89]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90] 斋藤理惠子著，贺小萍译：《敦煌第249窟天井中国图像内涵的变化》，《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4—161页。

[91]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470页。

[92]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

[93] 陆耀遒：《金石续编》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四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3036页。

[94] 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745页。

[95] 胡彬彬、龙敏：《长江中游佛教造像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标点为笔者所加，原文格式非常复杂，由于排版困难，无法在此体现。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的 完善与村落的制度化



自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灭周建隋，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为止，隋、唐、五代共历时380年。这近4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高度繁荣与快速发展的辉煌阶段。这种盛况在隋唐得到集中体现。统一的社会局面、安定的社会环境、开明的政治政策、开放的文化态度及宽松的民族政策，既加快了中原地区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乡村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基础，在此期间也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裹挟与影响下，发生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一方面，隋唐完成了以村坊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为基础的乡村基层管理体系建设，将魏晋以来形成的乡野村落纳入国家基层行政管理范围，形成了国家对基层社会强有力的控制，由此开启国家对乡村基层管理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基层管理制度、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的改变，促使乡村社会完成了外部组织形式的制度化管理以及内部构成成分的多元化建构，夯实与丰满了乡村社会作为封建国家基本构成单元的地位与内涵。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与接连不断的征伐战争，不仅一扫盛唐社会繁盛发展的余光，也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乡村社会趋于衰落。

第一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制度

乡村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聚居单元，对封建时代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基层管理体系的建设，一直是封建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经历了南北朝长期的混战与分裂，村、邑等乡野聚落已经在里、聚分离的基础上于城邑之外广泛蔓延。面对乡野聚落的发展，传统的乡里制在大一统的隋唐时期，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行政管控与发展需要。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强化国家的基层管控力，隋、唐统治者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尤其是到了唐代，其在隋制的基础上，以均田制为基础，构建了包括村坊制、租庸调制及户籍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基层管理制度体系，使得郊野聚落成为具有行政意义的乡村社会聚居单元，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有效掌控。

一、村坊制度与村落

秦汉以降至唐代以前，中国基层管理制度以乡里制为主，里聚合一，乡是国家政权的基层实施单位。虽然至三国西晋时代，里、聚已经开始出现分离，但这种分离仅限于外在形式，并未打破乡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早期乡村制度模式。北朝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这种基层管理制度虽然使北方乡村社会摆脱了地方豪强的管控，使村落的控制权力收归于中央，但在本质上，使乡村

社会行政编制与自然村落分离并未使北朝村落获得行政化发展。反之，南朝乡里的部分职能开始出现分散和弱化，村逐渐成为税收、治安管理的基本单位，甚至成为分封单位，承担并执行基层行政单位的部分责任与任务。也正因如此，村落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社会单元。

（一）隋代乡里二级制度的形成

至隋代，为了统一南北，结束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局势及地方机构滥置冗杂的局面，隋初统治者施行了一系列整治措施。这首先体现为大并州郡、裁削冗员，以革弊求治。这种整治也反映在基层管理制度中。据《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记载，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规定：“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可以看出，隋初制定的保、闾（畿内）/里（畿外）、族（畿内）/党（畿外）三级管理结构，与北魏的三长制（邻、里、党）类似。不同的是，隋初将党长（或族长）掌管的户数由原来的125户减少至100户，且对基层管理机构有畿内、畿外之分。至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很快又对基层管理制度做出了调整：“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1]律令中沿用了汉晋时期对“乡”设置，但以“里”代替了北周的“党/族”，形成了乡、里二级的基层组织形式。

有学者曾根据《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所载开皇九年设置的“乡正”因判事、剖断之时多有不公，在施行一年之后便被“废之”^[2]的记载，认为实际上终隋一代是没有乡级单位的存在。尽管此后相关史籍中没有再出现关于隋代相关制度设置情况的具体记载，但其他相关史料显示，终隋一代，不仅乡正之职始

终得以保留，[3]而且乡正与里长对于乡村户口查录、赋税征收是担负责任的。如《隋书》卷六十七《裴蕴传》载：“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这则史料明确提及在大业五年（609年）时，乡正、里长在户口多漏、赋税征免等相关问题上还承担同等责任，说明这两项任务在隋代应该始终是乡、里二级组织的基本职能。因此，隋代实际施行的仍是乡、里二级的基层组织形式，这也成为唐代村坊制度形成的基础。

（二）唐代村坊制度的确立

1. 村坊制度的法令化发展

唐初，朝廷总结了隋代对州县的整治经验，加强力度实行省并，革除州县机构及名称紊乱、重叠的现象，并形成新的基层管理制度。武德七年（624）年，李渊父子击溃了各地武装力量统一全国。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朝廷面向全国颁布了新律令。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据此可知，唐初基本上延续了隋代的乡里制度，保留了隋代乡级行政单位的设置，并明确了邻、保的户数。有所不同的是，唐代在“里”下以“邑、野”之别，将居民居住区域划分为“坊、村”。这是中国基层管理制度中，首次出现城乡分野的聚居单位。整体上来看，唐初大致形成了邻、保、村/坊、里、乡的基层组织结构。但武德令中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各组织结构的职能人设以及各自执掌等具体信息。

至贞观年间（627—649年），统治者在武德令的基础上，又申明在乡级行政单位设置乡长。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乡官条”记载：“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也载：“（贞观）九年春三月，……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十五年……十一月壬戌，废乡长。”根据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唐代政府直至贞观九年（635年）才明令设置乡长一职，这就说明自武德七年至贞观九年的12年间，唐代基层似乎仅有耆老（也叫父老）一职。另据唐太宗在《存问并州父老玺书》一文所言：“父老宜约勤乡党，教导后生，亲疏子弟，务在忠孝，必使风俗敦厚，异于他方。”^[4]可知唐代耆老的主要职能在于教导后生及敦化风俗，并没有实际的行政职能。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至少在贞观九年以前，唐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是有乡级行政单位而无职能人员的。若仅仅根据唐代律令来看，这种说法具有合理性。但是，相关史料记载明确显示了唐武德年间至贞观九年正式设置乡长之前，乡级行政官员是一直存在的。《旧唐书·舆服志》中所载“武德令”对乡正、里正服色的规定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5]因此，唐初设置乡级行政单位而未置乡正的做法，实际上是对隋代乡里制的延续。这也说明，唐初武德至贞观十五年（641年）之间，唐代基层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乡、里二级制，当时的村与坊仅仅是组成里的、以地域区分的基层组织单元，并不具备其他职能。而贞观九年新设乡长并置两名辅佐，应是唐代有意加强基层管理，将乡长的行政职能法令化之举。至于贞观十五年缘何又省并乡长，有学者认为是隋代剥夺乡正诉讼职权之举措的延续。^[6]

开元年间（713—741年），随着统治政权的稳定及基层管

理制度的实践，统治者在此间又两次重申乡里制度，并对相关细则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形成了等级分明、执掌清晰的村坊制度。据《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记：“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课植农桑，催驱赋役。）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据王永兴、仁井田陞等学者考证，该令颁布于开元七年（719年），此为开元年间的第一次重申令。第二次重申令出现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通典》卷三《食货志》“乡党”条给予了记载：“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饬，自今以后装潢省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通过对比可知，这两条重申令最突出的特点是，将隋代的乡、里二级组织形式发展成为乡、里、村三级，且将村纳入基层行政管理体系的村坊制的基础上，不仅明确了唐代基层行政管理的结构及里正、村正/坊正各自的职责、人选，原属乡、里的职能与里、村/坊出现交替，而且对坊与村的使用范围也做出了限定，首次出现城乡分野的基层组织单位。这不仅充实了唐初初具轮廓的村坊制度，形成完备的基层管理体系，而且促成了基层行

政组织结构及各级执掌的法令化，是唐代基层管理制度的一大进步。

2.里正与村正的执掌

唐代村坊制度的法令化，一方面是在基层组织机构行政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在相应职能人员行政职能的获得中实现的。这主要体现为，在唐代，里的职能人员成为原来乡级行政单位职能的执行人员，村正、坊正成为协助者。也就是说，原属乡正执掌的被里正和村正/坊正接管，且里正具备了实际的行政职能。

（1）里正的职能

根据上述开元二十五年令规定，里正的职责主要有四：“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其中，“按比户口”是指对户口的登录，这是唐代里正的首要职责。为了维护乡村秩序，并保证赋税的征收，唐代施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迁移。《旧唐书》有载：“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凡天下之户，量其资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7]由此可知，唐代每年都要对户口的变动进行核查与登录，且每三年一造户籍。其中对乡户数量的核查与登录工作，乃至一乡的户籍编造，即由里正负责，然后上报至乡，并以乡为单位上报至县司。^[8]因此，里正对一乡之户籍的登记管理，负有全部责任。这在唐代遗存史料中有所反映。据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贞观十八年（644年）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9]记载：

（前缺）

合当乡新旧……

一千二百

六□新附

三百册四杂任、卫士、老小、三疾等

二百八十七百丁，见输

二百八十六旧

□人新附

……

……户口新旧老小良贱见输白丁，并皆依实，后若漏妄，连署之人依法（受）罪。谨牒。

贞观十八年三月 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下缺）

里（下缺）

这件户口帐不仅显示了其时其地的户口情况，还显示了里正对于乡户登录的责任，明确表明若在此过程中出现逃户或漏户的问题，里正会依法遭受处罚。对于处罚办法，唐代律令也有具体规定。《唐律疏义》卷十二《户婚上》“里正不觉脱漏”条规定：“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不觉脱户者，听从漏口法。州县脱户亦准此。）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此条“疏议”曰：“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不觉脱漏户口者，脱谓脱户，漏谓漏口，及增减年状，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里正不觉脱户者，听从漏口法，不限户内口之多少，皆计口科之。州县脱户，亦准

此计口科罪，不依脱户为法。若知脱漏增减之情者，总计里内脱漏增减之口，同家长罪法。州县计口，罪亦准此。其脱漏户口之中，若有知情、不知情者，亦依并满之法为罪。”可以看出，尽管是因婚嫁产生的户口变动，里正也要对其户口现状进行严格登录，否则里正就会因脱漏增减的户数受到“家长罪法”和“漏口法”的处罚。

同时，唐代律令也对里正故意疏漏户口、私自扣减赋役的做法做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以规范里正的行为。据《户婚上》“里正官司妄脱漏”条记载：“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赃论。”此条“疏议”曰：“里正及州、县官司，各于所部之内，妄为脱漏户口，或增减年状，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十五口流三千里。若有因脱漏增减，取其课调入己，计赃得罪，重于脱漏增减口罪者，即准赃以枉法论，计赃至死者加役流；……”这些具体规定充分说明了唐代朝廷对里正在户口登录一事上要求之严厉，里正责任之重大。

“课植农桑”是唐代里正的另一重要职责。根据《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里正授田课农桑”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疏议”曰：“依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又条：‘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这里明确规定了每年十一月一日起，里正要依照唐律的规定，理清农户授还田地及赋税征收与减免的具体状况，校勘造簿，并上报至县司，由

县司“对共给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根据律令规定，乡村还授田地、赋税征收或减免最终由县司决断，里正并不具备实际权力，但在校勘造薄时对减免农户的具体分类与田地还授的确定上，里正是拥有直接操控权的。如唐律曾针对旱、涝、霜雹、虫蝗等自然灾害导致的赋税减免，做出过详细的规定：“依令：‘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其应损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谓里正以上。里正须言于县。”^[10]通过其中“应损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谓里正以上”可以看出，里正在对这类自然灾害的损害程度、损免程度的确定上具有实际的评估权与决定权。除了这类自然灾害以外，能够引起赋税征收、减免或授田对象的确定与变动的因素是多元的，如亡户、逃户等。因此，这也直接决定了里正在这项工作之中的权力与影响。从这一点来看，里正又是个“肥差”。尤其是在唐代前期均田制实施期间，里正的这种权力曾得以最大化。直至两税法实施，里正的这项职责才被削减，主要体现为对灾害的上报及督促农业生产。

“检察非违”是里正维护乡村秩序的职责。因此，对乡村违法行为或事件的防范、举报与处理，也是里正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根据《唐律》，里正若隐匿乡里违法犯罪事件，还要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卷二十一《斗讼》规定：“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纠弹之官，减二等。‘疏议’曰：……‘主司’，谓掌领之事及里正、村正、坊正已上。知所部之人有违犯法、令、格、式之事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卷二十八《捕亡律》“容止他界逃亡浮浪”条也对里正在乡村容留逃亡者的责任做出了规定：“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谓经十五日以上者。坊正、村正同里正之罪。若将家口逃亡浮浪者，一户同一人为罪。）四人加一等。”此外，日本和

尚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一则事例，可说明这种规定在现实中的应用状况。据载，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八日，圆仁所乘船队因遇恶劣天气，被迫于文登县青宁乡赤山东面泊船，七月十五日后船队驶离，圆仁及其他三人却被抛弃滞留于赤山村法华院。后来县司得知此事，下帖至青宁乡，要求村保、板头如实上报。但其后村正、里正并未上报此事，里正、村正因而遭受责罚。^[11]

“催驱赋役”是唐代里正的核心职责。里正所催驱的赋役，不仅包括赋税，还包括兵役。这些赋役通常以里为单位进行征收，征收以后直接上交至县级行政单位。因此，如同前三项职责一样，里正在赋役征收与催缴上也直接对县司负责，是赋税征收的第一负责人。因此，若赋税征收出现任何问题，皆由里正负责。《吐鲁番出土文书》收有一件催缴赋税的文牒，其内容就反映了这一点：

武成乡张那那

右同得状称：上件户近年税钱，无知征处者。依问里正张曲，得款：上件户先寄居蒲昌，昨去二月内，却还到州，即拟输纳税钱。其人到此，遂即患疹，久违不纳。限三日内输纳，如有推延，阿曲请受重杖十下者。……^[12]

因此，为了完成任务，免遭处罚，里正通常会竭力催缴。但唐代沉重的赋税，无疑给里正这一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保证催缴赋税任务的完成，有时难免会产生过激行为。这也是在不少唐代遗留的文学作品中，通常能够看到里正被描述为压迫民众形象的原因。白居易就作有数首诗歌反映了这种状况，如他在《秦中吟·重赋》写道：“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

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缁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13]

此外，敦煌遗书中也见有不少此类记载。如敦煌文书伯二九七九号《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判集》[14]载：

92暑税钱不纳户第卅三

93百姓之中，解事者少，见温言，则不知惭德；闻粗

94棒则庶事荒弛。如此倒看，何以从化。今长官恩

95惠已足，此辈顽嚣也多，仰并限此月十六日纳

96毕。不毕，里正摄来，当与死棒。

由此可见，武力已经成为里正应对不纳税之人的主要解决手段，但这显然也促使他们成为部分县吏横征暴敛的最佳帮手。

尽管如此，也难以避免部分民众因不可抗力（如各类自然灾害等）或人为因素（如逃户等）无法缴纳赋税的情况。但若遇到这类情况导致的赋税征收不齐，依照唐律，里正则必须遭受刑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里正不得不自己补齐欠收赋税。王梵志《贫穷田舍汉》一诗有云：“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栖。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迫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路，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恶骂，啾唧搦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

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更穷汉，村村一两枚。”^[15]这首诗一方面揭示了贫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在面对赋税征收时的无奈。另一方面，“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租调无出处，还需里正倍”，说的正是这种状况，表露出里正的不堪与难为。

除赋税以外，兵役催服也是里正的职责。杜甫在《兵车行》一诗中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16]正指出了里正在督促兵役上的职责。

由上述可以看出，唐代在废除乡长以后，里正实际上是乡级政务的实际执行者，直接对县司负责。但里正非乡级行政职务，他们与乡级行政单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部分学者否认唐代乡级实体组织机构的存在，认为里才是真正的基层政权机构。另有学者则认为，乡与里是县下设置的两个上下级机构，或者认为里是作为乡的派出机构而存在的。还有学者认为唐代实行的是“乡实里虚”的基层管理制度。以上立论多以现存文献记载为基础。在此类文献记载中，户口和赋役的征发单位，始终是辖管500户的乡，而执行赋税征收这一行政职能的实际主体却是里正。对此，有学者强调，唐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实际采取的是以“乡”为操作平台、“里正”为行政职能人员的模式。可以说，这种总结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唐代的乡、里关系，以及乡级政务开展的操作模式。持此种观点的张国刚先生，有细致的讨论。他通过对《唐六典》所载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的文书传达方式、唐代官方户口统计资料及唐代户籍编造等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乡”毫无疑问是唐代的基层政权组织，一乡之下的5位里正共同管理乡务，并构成乡级行政单位的实际职能人员。而里正在承接县司下达的相关工作时，是以乡务执行者而非里的管理者的

身份进行的。^[17]这一论证实际上在上文我们对里正几项主要职能的梳理中，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体现。无论是“按比户口”、“课植农桑”，还是“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皆以乡为单位进行，但里正是这几项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并直接对县司负责。这已充分说明了掌管百户的里正是唐代乡级行政单位实际职能人员的事实。因此，唐代的乡级行政单位也是实体运作。^[18]

（2）村（坊）正的职能

根据上述开元二十五年令，村正的职能同坊正一样“掌坊（村）门管钥，督察奸非”。因此，对村正和坊正来说，维持村内和坊内治安是其主要的职责之一。但需指出的是，这里的治安主要是指督察盗贼。据《唐会要》中贞观十六年（642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诏书记载：“盗贼之作，为害实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言盗发，不欲陈告，村乡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縲绁，有一于斯，实亏政化。自今以后，勿使更然。”^[19]由此可知，一村若遭遇盗贼，村正必须进行上报，否则就会受到处罚。至于具体的惩罚措施，在唐律中有相应的规定。据《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一》“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载：“诸部内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里正笞五十，（坊正、村正亦同。）三人加一等；县内，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部界内有盗发及杀人者，一处以一人论，杀人者仍同强盗之法。）“疏议”曰：“‘部内’，谓州、县、乡、里所管之内，百姓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谓外盗入境，所部容止；所管里正笞五十。注云‘坊正、村正亦同’，谓得罪亦同里正。”^[20]可见，在村、坊出现盗贼或者容留盗贼一事上，村正、坊正与里正承担同等责任。

村正除了需要监督村内不能容留盗贼，也要限制外来逃亡者。《唐律疏议》卷二十八“捕亡”条载：“诸邻里被强盗及杀

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谓经十五日以上者。坊正、村正同里正之罪。）……”[21]这种情况在上文所举圆仁和尚滞留赤山寺一事中就已经得到体现，赤山村村正即因上报不及时而遭受处罚。

此外，对此类影响治安的事件，村正、坊正还需要与之正面斗争，并有捉拿义务。《唐律疏议》“有所规避执人质”条对此曾做出规定：“有人或欲规财，或欲避罪，执持人为质。规财者求赎，进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持质者皆合斩坐。‘部司’，谓持质人处村正以上，并四邻伍保，或知见，皆须捕格。若避质不格者，各徒二年。”[22]

可以看出，村正在治安管理方面的责任与里正的“检察非违”实际上是有所重合的。这在以上所举唐律对此二级乡村管理者在治安管理方面责任的规定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需要补充的是，村正、坊正与里正的职能性质并不尽相同。一方面，里正既是百户之长，又是一乡行政职能人员，对于一乡各类事物皆负有责任，检查非违只是其中一项，其职能核心在于征收赋税；而村正与坊正的设立则是乡村秩序的维护及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乡里的设置，是确保和增加国家财政的需要；村、坊之设，则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因此，里正与村正的职能各有侧重。维持一村治安是村正的主要职责，村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村落治安的第一责任人。一旦村中治安出现问题，村正则成为第一责罚对象，而非里正。《唐文拾遗》“禁散乐巡村敕”曰：“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23]这说的就是这一情况。

除督查奸非以外，协助里正“催驱赋役”及“课植农桑”等其他乡里事务，也是村正的职责。此有元稹诗为证：“今年无大麦，

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24]上引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有“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之述，也正是指村正协助里正共同催收赋税的事实。另池田温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中收录有一件龙谷大学所藏敦煌文书，也说明了这种情况。

（前缺）乡耕耘最少。由此社官村正，不存农务。好欲加快。正属农非，各决贰拾。敦煌、平康、龙勒、慈惠肆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令节级科决，各量决拾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

十六日

（背面记）：

二月十六日社官村正到

悬泉乡

合当乡见社官村正到^[25]

这件文书中，村正和社官因督促农事不力被处罚，正道出村正在协助里正“课植农桑”一事中存在相应的责任。

由上可知，唐代的乡里机构及职能人员的设置，与原来的乡里制是存在明显差别的。而村在唐代被纳入国家基层行政体系，成为具有行政意义的乡村社会组织单元，这说明唐代基层管理政权已经延伸并下沉，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得到明显增强。这意味着秦汉以来，以乡、里为核心的基层管理制度，至唐代完成了向乡、村关系的转变。

3.村坊分治与城乡分野

相对于唐以前的乡里制度，唐代基层管理制度的最大变化，除基层管理结构及职能执行主体有所变动以外，以村坊分治为基础的城乡分野的出现，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在唐武德年间，相关律令就已经明确规定“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对“村”与“坊”的范围做了明确规定。开元七年，唐政府又在此基础上做出补充：“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这进一步明确了“邑”和“野”的适用对象分别为“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与“郊外”。至开元二十五年，唐政府又对村坊职能人员的设置及其执掌做出具体规定：“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以上律令的逐步推进，不仅宣告了唐代法律对“村”与“坊”分别作为城与乡的地域概念的确指和确立，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唐代城乡分治、坊制与村制并行的基层管理制度。这也是我国古代基层管理体系中首次出现以城乡分野为界线的分而治之的乡村治理模式。

（1）村坊分治的原因

村坊分治，是古代社会城市与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我国古代城乡关系、村落的发生与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也是倍受学者争论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宫川道雄等日本学者为代表，其研究多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宫崎市定提出的中国古代“都市国家”^[26]说的判断之上。他们认为以城墙围合起来的城邦，是国家地方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是居民的基本聚居单位。而乡村是自汉代而始，随着豪族势力占田与庄园的开拓，逐渐从城邑中分离出来的新兴聚落。这一观点曾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且广为学界所接受。其后的宫川尚志、宫川道雄以及部分其他中外学

者，皆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过关于中国古代乡村案例的研究。另一类研究认为聚落才是中国早期居民的基本聚居单元，城乡之别源于聚落分化。中国早在农耕文明初期就已出现聚落，且有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之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心聚落发展为城邑，普通聚落发展为村落；这种城与村的地域分化，最终于汉代就已经完成。从前文对早期村落发生与发展的探讨、“村”的出现与泛化的相关论述，皆可看出，城乡分野在唐代制度中被确立，实际上是早期村落统一与分化发展脉络中的必然和阶段性结果。

早在龙山文化时期，早期聚落已经分化为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这两种聚落分别成为后来城邑与乡村的形成基础。汉代“里”的划分及“聚”的形成，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一时期位于乡野的“聚”“落”“格”等居民单位，并未在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获取一席之地。尽管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已经应用到城郭之外的聚落管理之中，但这类乡村自然聚落也仅仅是里制度在乡村开展的依据与基础。换言之，汉代乡里制除了应用于城郭之内，还以城郭之外的自然聚落为单位，在乡村地区发挥行政作用。诚如马新、齐涛两位学者所言：“汉代乡村社会的特点是里聚合一，也就是乡村基层行政单位与自然村落的大致重合。”^[27]因此，实际上，作为权力中心的城邑，与作为自然居住单位的乡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化。将二者捆绑在一起的，仅仅是当时的基层行政单位“里”。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统一逐渐被打破。农业生产的发展、战乱时期的人口流动与迁徙，刺激了这一时期城郭之外自然聚落的增多。且这类聚落也在不断的壮大与发展中，逐渐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功能。里的部分行政职能开始逐渐分散至聚落。这在东晋南朝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的村不仅设置了村级管理机构，而且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社会事务单位，具有基本的治

安管理职能，有时还是分封单位。 [28]这说明东晋南朝的村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行政意义的乡村社会单元。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邑与乡村的关系，虽然仍未脱离汉以来里制对二者的拘囿，但作为乡村基本聚落单位的“村”，其作用与地位已经明显上扬，甚至成为国家制度无法再继续忽视的一种实际存在的实体力量，且已深入乡村社会的发展之中。这为唐代村坊分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至唐初，一方面，经历了隋末战乱的唐初社会，不仅人口大量消亡流散，而且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国库虚空。这势必促使新生的李唐政权以赋税收入作为重点，进行国家经济与政治的重建。土地、农民、税收理所当然成为国家经济重建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战乱后的迁徙与逃亡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聚落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城邑作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格局，原有的乡里制遭遇严重的破坏。这种格局迫使唐王朝必须制定一套新的乡村社会管理制度，以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变化，并消弭城邑与乡村管理中出现的脱节裂变和混乱。因此，为了将乡村民众全面纳入赋税征收体系，形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有效掌控，将城郭之外的乡村社会纳入国家基层行政体系，就成为唐初统治者经济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的必然选择。城乡分而治之由此诞生，乡野聚落“村”在此过程中成为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与城邑之中的“坊”相对应的基本社会单元与聚居单元。因此，可以说，对城乡采取分治的方法，既是唐代统治者根据社会现实状况因势利导的正确决策，也是中国古代聚落发展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2）坊制与村制在城和野的推行

“坊”与“村”是一对因地域差异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和聚落单元，也是分别适应于城郭与乡野的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唐开元

令将“坊”与“村”的适用范围分别解释为“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与“郊外”，城郭之内设坊，城郭之外为村，强化了城乡分野之比照。同样，对应于城和野的基层管理制度，分别为坊制和村制。根据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坊制与村制在唐代社会的施行状况。

唐代坊制在两京地区首先推行。清代著名学者徐松，曾根据唐人文集笔记、金石碑碣、方志地记等相关史料撰写《唐代两京城坊考》，对唐代两京地区的里坊、宫苑、宅第、街道、官署、寺院的分布状况及名称等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考证。虽然由于历史材料所限有所遗漏和讹误[29]，但这一史料为我们了解唐代坊制的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据徐松考证，唐代西京地区共有108坊，东京地区共有113坊。他还指出，两京地区的坊基本上是在隋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在《河南志》中云：“（洛阳）凡一百二十坊。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30]可以看出，东京洛阳基本上保持了隋代的原状，只是将原有的称谓“里”改成了“坊”。

除两京地区以外，坊制在州县地区亦得到普遍推行。据相关史料考证，成都府内可考的坊有金马坊、碧鸡坊、修德坊、延寿坊等12个[31]；扬州主城区及江阳、江都、扬子地区已考坊有道化坊、孝孺坊等19个。除此之外，不少墓志碑刻中也显示了墓主生前所居里坊信息，如据《唐王时邕墓志》载墓主“终于燕都坊私第”[32]等，此类墓志不胜枚举，这正是坊制推行已经深入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见证与结果。

与此同时，村制也在郊野地区得到普及。唐代的村制确立以后，村就成为具有行政意义与组织功能的社会单元。除上文所述“村正”的执掌职能出现变化以外，“村”之称谓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之聚落。圆仁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载

有其沿途所经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近200个村落的名称。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开发尚不充分的南方地区的聚落，也普遍以“村”命名。临近城郭的近郊地区，聚落也以“村”为名。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村”多位于远离城郊的偏僻之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隋唐时期的不少史料、碑刻铭文等都可兹证。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展开详细论述，此处不做赘述。

此外，村还成为唐代民众的籍贯认定单位。乡村民众籍贯的认定是随着乡里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以前的乡里制度中，民众籍贯一般以“乡—里”为基本用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村的发展，部分地区曾有过以村作为民众归属地的情况出现。至唐代村制实行以后，传统的“乡—里”表述方法开始发生改变，尤其是开元以后，“乡—村”已成为民众籍贯归属的基本表述方法。这在唐代造像记或发愿文、墓志资料及其他相关史料中皆有明确的体现。如房山石经中就有不少河北地区村民的写经，题记中详细记载了其归属地，其中可见幽州蓟县的“石崖村”“归仁乡李曲村”“招贤乡平村”，良乡县的“观音乡成村”“昌乐乡北陶村”“金山乡中继村”，范阳县的“仁义乡西郊村”“先贤乡阳康村”“礼让乡张沉村”等记载。^[33]《太平广记》卷十八“文广通”也载：“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同书卷一百三十三“陈君稜”载：“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稜，少小捕鱼为业。”卷三百五十五“王誨妻”载：“王誨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此类记载在唐代史料中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村坊制在唐代全国范围内的施行，使“村”成为乡民对地域空间身份的认同方式。

最后，村还是乡村社会事务开展的基本单位。《全唐文》卷三十二载“刊广济方诏”：“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亦多。……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另有卷四十八载“减

次年麦税敕”：“比属秋霖，颇伤苗稼，百姓种麦，其数非多。……其大历五年夏麦所税，特宜与减常年税。……仍委令长宣示百姓，并录敕榜示村坊要路，令知朕意。”这些记载说明，唐代如赋税减免、政府救助等乡村事务的开展，已经基本上以村为单位进行。

唐代以城乡分治为基础的村坊制度的确立，不仅赋予了原本仅具有聚落性质的村落以行政职能，还使“村”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基层行政单位，更改变了传统乡里制的基层组织形式，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赋税制度与村落

赋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与目的。以安史之乱为分野，唐代政权于前后期施行了不同的赋税制度，对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租庸调制与村落

租庸调制是大唐立国之初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的一项财政制度，也是唐代前期的基本赋役征收制度，与均田制、户籍制、村坊制一起，构成了唐代国家完整的乡村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体系。

租庸调制的形成，是以唐代均田制的实施为基础的。唐初，经历了战乱的全国社会，土地荒芜、人口大量流失，这不仅直接导致赋税减少，而且严重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建设。根据《通典》记载，武德年间全国仅有户口200余万，至贞观年间户口数量的增长也不足百万^[34]，这与隋朝人口峰值890余万的数额相距甚

远。赋税收入之差距，显而易见。加之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割据势力尚未消除，新生政权的维持十分艰难。

为了稳定新生政权，迅速恢复国家社会元气，唐代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治与经济建设。在此过程中，唐初统治者吸取隋朝的亡国教训，十分注意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并重视乡村社会的发展。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唐代首先沿用了北朝的均田制，将国家掌握的大量荒地分配给真正流离失地的民众。至武德七年，朝廷颁布了均田法。其中，对不同的阶层与群体的授田数量和方法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对平民采取的授田方法为：“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35]

以此为基础，朝廷还颁布了相应的赋税征收方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綾、絹、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止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36]为了保证赋税制度的施行，朝廷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据《旧唐书》载：“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

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37]

通过上述规定，唐代国家构建起了以租庸调制为核心、均田制为基础、户籍制度为保障的管理制度体系，并使三者之间互相贯通，共成一体。这正是唐代前期国家实现对乡村控制的手段。具体而言，根据上述三项制度的规定可知，唐代国家的赋税征收制度如下：其授田对象为丁男，每丁可授田一顷，包括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并以此计算赋税基数，制定不尽相同的租、庸、调三种征收标准，开展赋税征收。这三种赋税的征收对象，又是建立在均田与户籍制度之上的丁、户、田。其中，每丁每年需缴纳赋税为（租）粟二石[38]；（调）随乡土出产的绢（或绞、玄也）二丈、绵二两[39]；（庸）每年为官府无偿服役20天[40]。这是村民每年固定需要承担的基本赋役。但其中部分徭役可以进行调整。如“庸”，实际上就具有免役金的性质，应服役而不服的情况下，就可选择以缴纳实物的形式代替，折纳标准为“日为绢三尺”。同时，若遇到朝廷加役，满25天免调，30天租调全免，整个赋役时间不得超过50天，即加役不得多于30天。对于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发生地，也有专门的减免租庸调的规定：灾情在4分以上，免租；灾情在6分以上，免租调；灾情在7分以上，课役全免。

可以看出，这套制度体系有其全面系统性，对于唐初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均田制的实施，确保了乡民拥有土地，这是其开展农业生产、赖以生存的前提与基础。其次，租、调制的实施，一方面确保了国家税收尽征，使国库迅速充实。另一方面，又为受到自然灾害的农民提供相应的减赋免税的保护机制，使其可以休养生息。再次，租庸调制的课税对象虽然

包括丁、户、田，但其实际上是“以丁身为本”的赋税制度。在唐初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这种赋税征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民众乃至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于减轻唐初民众的赋役负担及提高其生产积极性有着积极作用。最后，以庸代役的方式，也有效缓解了久经战乱的民众沉重的徭役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回归农田，从事农业生产，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这在客观上又为国家增加了丰饶的税赋之源，提供了“有税可征”的保障，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向前发展。

因此，这套制度体系实施以后，不仅刺激了其时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乡村人口日益增多，而且民众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并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粗放的农业耕作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转变，农作物产量明显回升。据史料记载，自贞观元年（627年）至天宝十三年（754年），百年间全国户口增加两倍，从不足300万增至900余万的峰值，[\[41\]](#)其中增长最多的便是农村人口。这显然与唐代前期良性的乡村制度是分不开的。

此外，唐代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关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载，可一窥唐前期制度体系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年间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载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42\]](#)作为政书，记载政德政绩虽难免夸张之嫌，但应该还是有基本的史实依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现实状况。与此同时，唐代不少文学作品对这一变化也有生动的表述。杜甫的《忆昔二首》其一，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

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43]杜甫的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以后，是对开元盛世社会祥和、经济丰裕的追忆。显然，相对于唐初生产破坏、经济凋敝的状况，到开元盛世时期，农业生产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初制定的相对合理的制度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唐初包括租庸调制在内的乡村制度体系，因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为唐代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济资源，但也存在种种弊端，严重影响了唐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唐代赋役除租、庸、调三项之外，由朝廷征收的赋税还包括地税和户税两项。其中，地税是唐初为设置义仓而定的税种，其目的在于“贮之州县，以备凶年”[44]，贞观二年（628年）确定此项税额标准为“王公已下垦地，亩纳二升”。除了永徽二年（651年）朝廷曾将地税改为按户等收税，此间基本上保持了每亩二升的标准。至大历年间（766—779年），地税征收标准已经提高至“亩税三升”，并分夏秋两次征收。[45]对这里的“夏秋两次征收”，黄永年先生认为是每次征收三升。[46]而户税是根据户等征收的税钱，自唐初就已经开始征收，税额标准曾进行过多次调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户税已经升至250文，大历四年（769年）更升至500文。[47]据此，有学者对唐代征收的赋役进行过计算，结果显示，唐代前期民众承担的赋税基本上占家庭总支出的1/3。[48]由此，足可见民众生活负担之沉重。

除赋税以外，杂徭也是唐代赋役的一部分。《唐会要》显示，唐代前期的赋役包括“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49]。唐耕耦先生曾对唐代前期的杂徭进行过专门的考证，他

指出唐代文献中也将杂徭称为“轻徭”“夫役”等，是一种独立于正役租庸调制之外、由地方征发的徭役，属州治户曹参军执掌，不纳入中央财政收入范围；杂徭的服役时间要比正役早，一般于16岁开始征收。^[50]他还指出杂徭虽然非正役，但实际上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之所以其被称为“轻役”，一方面是因为力役的劳动强度相对于正役要小，另一方面服役地点在本州岛县境内，地点较近。但因其徭役种类、服役时间及代役钱（不服部分杂徭需缴纳代役钱充抵）输纳标准皆由地方州县掌控，可操作性较大。因此，各地常出现各类巧立名目的赋役，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因此，尽管唐代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的实施，在保证农民拥有土地的同时，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但沉重的赋役成为乡民生活中最大的负担，以致唐代前期逃户不断出现，数量快速增长。加之，唐代均田制本身也存在允许部分土地买卖这一弊端，因之导致的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现象，也直接影响了唐代赋税制度在实际中的正常开展。这也成为最终摧毁这套制度体系的根源所在。

逃户问题自唐初始，后越发严重。至武周时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武周长安元年（701年），韦嗣立曾上书曰：“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51]据《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条记载，证圣元年（695年）李峤曾上表曰：“今天下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患祸，不可不深虑也。”李峤的上表，揭示了为躲避赋役出现的逃户现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显然唐代前期的逃户并不在少数。杜佑曾对唐代前期逃户数量进项过估测，他在《通典》中指出，天宝十四年（755年）统计的唐代户口（900万户）与隋代开皇时期略

等，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全国的实际户数应不少于汉平帝元年的1 200余万户，应该在1 300万~1 400万户。对于这种差额的产生，他认为原因在于“隐漏之甚”。^[52]也就是说，当时的隐户、逃户数量有四五百万之巨。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各项累积赋税十分沉重，另一方面要归因于唐代赋税制度“以丁身为本”的特点。唐代“以丁身为本”的赋税征收方法，在唐初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确实对提高民众生产积极性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但究其根本，保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尤其是随着乡村社会人口的快速增加，其弊端日益显现。

租庸调制的实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均田制实施并不彻底，其作用未能长久维持，最后甚至成了土地兼并的推手。这也直接影响了租庸调制的施行。具体而言，均田制的不彻底主要体现以下两点。其一，分配给农户的土地是有限的，主要是唐初战乱以后国家所得的荒地。这是由于王公贵族、富户豪强、寺院等群体原已占有的大量土地，并未作为同等资源分配给农户。这就导致了连片的肥沃土地一般掌握在大户手上。而村民只能拥有散而小的生疏瘠贫之地。在拥有土地面积的大小、生疏优劣上，不同群体间实际上在分配之前就已经形成巨大的差别。其二，唐代政府在设计均田制时并未针对土地群体性占有不均的问题进行调节，并实行差额化分配。唐代均田制规定，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可分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残疾可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可得口分田30亩。贵族、官员则按其爵位与品级高低分别授予不同标准数量的永业田，前者为5~100顷，后者为2~60顷，勋官按品级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从30顷递降至60亩。除此之外，各级官员和官府还可分领到不同数量的职分田和公廨田，以作为俸禄补充或官署

费用。

这种分配制度实际上造成了官、民两个不同群体拥有的土地的质与量上皆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在均田制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的村民实际分配所得土地的数量，因可供分配土地的数量限制而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但即使在授田严重不足的状况下，赋役制度“以丁身为本”的征收特点，也决定了民众所承担的赋税数量并不会因分配所得土地的实际数量而改变。其直接结果便是，拥有不同质、量土地的民众却要承担同等数额的赋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公平，民怨因此而生。

被伯希和劫掠走的敦煌文书《唐开元九年帐后户籍残卷》中的记载，为上述论点提供了当时的现实依据。其中一件记载，董思易户授田28亩（含永业20亩、口分8亩），余善意户授田28亩（含永业20亩、园宅1亩、口分7亩），杜客生户授田40亩（含永业39亩、园宅1亩，户含两个男丁）；另一件记载王万寿授田10亩。^[53]可见，当时的实际授田数量只有20~40亩，这一数据与国家规定授田标准的100亩（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相差甚远。而事实上，随着人口的增多，到了武周以后，基本上已无田可授。尽管如此，文书中所载4户授田户，无论其实际授田数量的多少，所需承担的赋税皆为二石租粟。如此一来，再加上丁身所要负担的庸、调和兵役、徭役，显然已经不堪重负。相关史料中“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54]的记载，应是唐代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因此，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甚至不惜自残己身。纵然如此，也不能逃脱赋税与兵役。^[55]无奈之下，卖田、逃亡就成为不少农民谋求生路的选择。而逃户空留下来的土地，又成为贵族、官吏、富户豪族土地兼并的对象。不少史料中都出现了关于唐代土地兼并现象的记载。如《旧唐书》卷一八三《太平公

主传》中记述了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永徽五年（654年）贾敦颐迁任洛州刺史时，见当地富户“皆籍外占田”[56]；玄宗时，卢从愿也占有良田数百顷[57]。至唐代中期，土地兼并现象已经达到“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58]的境地。而逃亡之后的逃户或隐居山林开荒垦殖，或成为山间盗贼以抢盗为生。陈子昂在《上蜀川安危事》一疏中说：“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59]除此之外，更多的失地者则成为豪门富户的租客，这也是这一时期大量客户出现的直接原因。在富户豪强的剥削下，租客的生活日趋贫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60]是对当时实况的写照，“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61]也是对贫苦大众生活的写实描绘。尽管如此，相对于国有土地制度而言，地主私有土地制度相对弱化了客户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了因沉重的赋役带来的生活负担。因此，这一时期，不少村民放弃国家编户的身份，转而成为地主的佃客。这也是村民在权衡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因此，至唐中期，由于租庸调制自身存在弊端，均田制也逐渐崩坏，加之开元以后户籍久不更造，租庸调制已经不再适应唐代社会的发展。正如《新唐书》所载：“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62]

（二）两税法与村落

中唐时期，均田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户籍久不更造使“以

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安史之乱爆发后，人口的大量逃亡与消亡、赋役的日益苛重与不均、地方官吏与豪强财势的集中，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朝廷苦撑维持的土地与赋税制度逐渐解体，业已累积的社会病灶也终被引成疫局，国家基业已经摇摇欲坠。唐朝持续了百余年的太平盛世宣告结束，迎来了立国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

1.两税法的建立及其内容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宰相杨炎曾上奏德宗，建议废除租庸调制，改制两税法。在此奏疏中，他首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

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侵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壤，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贼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

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63\]](#)

通过这个奏疏可以看出，至德宗时期，土地集中、人口逃亡、赋税制度紊乱与国家财政危机等一些问题的确已经十分突出。后来杨炎进一步在《请行两税法奏》中对两税法进行了设计：“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倖。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度支总统焉。”[\[64\]](#)

朝廷采纳了杨炎之奏，并根据杨炎对两税法的设计，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6点。（1）根据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确定赋税征收总额度。（2）在征纳中采取以钱计税的方式，不再以实物为主，改变了中国古代过去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征收制度，开创了以货币计税的先河。（3）赋税的征收不分主、客，也不再“以丁身为本”，而是以资产与土地占有数量为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65\]](#)是其根本思想，并实现了赋税征收由过去“以丁身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转变。（4）对于居无定所的行商者也要征收赋税。（5）简化税种，将过去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类杂

税合并为地税和户税，分夏、秋两次缴纳。（6）承认地方政府在税率上的调控权。

根据两税法的设定，占有大量土地与资产的富户豪强，成为国家赋税的主体，一般平民过去所承担的各类繁重的徭役大为减轻。这样一来，解决了此前财富大量集中于权贵、赋税征收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有效缓解了中唐时期的财政危机，缓和了社会矛盾，对激活农村农民生产力、整治乡村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损害权贵豪族们的利益，为以后唐社会的裂变埋下了阶层积怨之根。

2.两税法对乡村的影响

两税法实施以后，唐代社会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不少乡民重新着籍回村，村落又恢复了生机活力，农民耕作土地的热情空前高涨。这使得国家有效税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根据《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记载，两税法实施的当年，着籍户口已经达到380万户。这一数据比大历年间的130万户^[66]增长了近两倍。增长人口中，只有部分新生人口，更多的可能来自原来的隐户与逃户。这显然是两税法实施的直接结果。

两税法也直接影响并改变了中晚唐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根据两税法的规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以钱计税成为赋税征收的主要方式，这直接加深了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不再如前，经商获利也成为发达地区农民新的生计门路。与此同时，这也刺激了唐代农业向商品化发展，不仅经济作物的生产种类时有增多，而且从事商品贸易的人口也逐渐增多。如据《唐会要》记载，大和年间（827—835年）京畿地区的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货易”。^[67]张籍曾在《贾客

乐》一诗中对当时农人经商的状况也做出过描述：“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卖翁。”韦处厚对山南道农村的从商状况也有记录：“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68]这种状况直接促进了唐代中后期“草市”的发展，后文将做详述。但是两税法的积极作用并未得到长久的维持，其弊端也随着制度的实施日渐凸显。

第一，两税法在放宽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并没有限制土地买卖，这使得土地兼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陆贽曾指出两税法的实施对于土地兼并的影响：“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69]李翱在其《进士策问》中，亦对土地兼并现象有过描述：“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故国用皆足，而百姓未以为病，其法弗更。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70]元稹在其《和乐天高相宅》一诗中也言：“二百年来城里宅，一家知换几多人？”^[71]独孤郁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也举有一例：“昔尝有人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万钱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为墟，居室崩坏，羊、犬、奴婢，十不余一，而公家之税，曾不稍蠲，督责鞭笞，死亡而后已。”^[72]

第二，国家税额不统一，加之地方政府又拥有一定的税额调控权，这导致各地徭役不均，一些地方甚至还有新的杂徭不断出现，部分地区民众的实际负担更加沉重。可见，杨炎设计的税额要“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其田亩之税，率以大

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并没有被完整地落地实施。此外，概之以大历年间本地征收户税与地税的最高额作为两税期间的定额的做法，不仅加大了民众的负担，而且为贫富差距的拉大、地方对财权的进一步挟制埋下了伏笔。对此，陆贽在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直陈要害：“大历中，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赋既无定限，官私惧有阙供，每至征配之初，例必广张名数，以备不时之命。且为施惠之资，应用有余，则遂减放。增损既由郡邑，消息易协物宜，故法虽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总杂征虚数，以为两税恒规，悉登地官，咸系经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一也。”^[73]他还指出：“建中定税之始，诸道已不均齐，其后或吏理失宜，或兵赋偏重，或厉疾钟害，或水旱荐灾。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由自存！此则人益困穷……”^[74]

自建中二年（781年）开始，持续了5年的藩镇之乱爆发，为了维持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军费开支，德宗违背自己除两税以外不再征收任何赋税的规定，不仅提高了税额，而且增加了多项额外税目。除此之外，迫于税收征收有赖地方，故而朝廷对于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征收杂徭的现象也采取公开认可或者默许的态度。《旧唐书》载，两税法实施的第三年〔即建中三年（782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建中）八年（787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75]另据《唐会要》载，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德宗外出至新店曾询问农民赵光奇百姓生活是否安乐，赵氏回答：“不乐。”原因在于：“盖由陛下诏令不信于人，所以然也。前诏云‘于两税之外，悉无他徭’，

今非两税，而诛求者殆过之，后诏云‘和余于百姓’，曾不识一钱而取之，始云‘所来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于京西，破产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于乐乎？”[76]陆贄对此也有论述：“本惩赋敛繁重，所以变旧从新，新法既行，已重于旧，旋属征讨，国用不充，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此则人益困穷……”[77]

可见，当时在两税法之外征收杂徭，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名目花样有加。唐宣宗《禁岭南货卖男女敕》曰：“其百姓两税定额，各据土地所出，方圆收纳，不得竖色目妄配乱征，致令艰愁，莫相保守。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佣雇与人，贵分口食，任其行止，当立年限为约，不得将出外界，还同交关。各委本道长吏专加纠察，仍先具条流闻奏。其余州县，更有积弊，深害百姓，而因循未革者，亦具分析闻奏，当酌量处分，粗安黎庶，称朕意焉。”[78]这条敕令虽然是为限制“竖色目妄配乱征”之行为，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此类乱象。因此，一些地方的民众，不得不再次走上逃亡之路。李渤曾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出长安东行，返回后将其所见陈于宪宗：“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闾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79]根据李渤的描述，当时渭南县长源乡逃户的实际人数已经达到其总人数的3/4，远甚于前。

第三，两税法的纳税方式虽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同步的货币经济支持，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根据两税法的规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这说明两税法实施以后，货币取代谷物或布帛成为唐代中后期的赋税计量与缴纳方式。这就

从制度上将农户与商品经济较为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但唐代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远不足以支撑这种缴税方式，无论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还是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因此，按税钱数量折纳同等价值的实物缴税，成为唐代中后期实际的赋税缴纳方式。陆贽所言“定税计钱，折钱纳物”^[80]正是言此。韩愈对穆宗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有类似描述：“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余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两税法实施四五十年以后，整个唐代社会仍然以物物交换为主，更不必提德宗时期了。

因此，货币经济的滞后发展，严重阻碍了唐代两税法的实施，这种矛盾对当时的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唐书》载河南尹齐抗在对德宗的上疏中，就深刻揭示了问题所在：“军兴，国用稍广，随要而税，吏扰人劳。陛下变为两税，督纳有时，贪暴无容其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81]可以看出，计税方式与实际输纳形式脱节，直接导致了民众在折纳过程中因物价的浮动备受盘剥。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尤甚。如白居易《赠友五首》其三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殫。贱柴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82]

相对而言，这种状况在部分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有所缓解，但受到整体通货水平的限制，商品交换的实际需求有时很难满足，最终导致物价不断下跌，货币不断升值。因此，同等税额下，所需折纳实物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民众承担实际赋税压力的增加。加之当时缺乏统一的物价标准，致使民众在承

受更高赋税压力的同时，还要接受市场的捆绑与剥削。正如部分学者所言：“这种征收方式迫使农民与商品市场建立密切而又不平等的交换关系。”^[83]权德舆曾就对贞元十九年（803年）的税收状况做出描述：“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旧，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84]对此，陆贽也指出：“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85]李翱也曾就此状况做出评论，并建议修改两税法，他在《疏改税法》中曰：“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86]可见，一成不变的两税法无疑再次将乡村民众置于水火之中，逃亡也再次成为乡民的生存之路。

[1]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2] 《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载：“（开皇九年，589年）（苏）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间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然高颎同威之议，称德林狠戾，多所固执。由是高祖尽依威议。……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利于民。党于爱憎，公行货贿。’上仍令废之。”

[3] 如《唐故蓬州安固县令孙君墓志之铭》中可见关于隋末乡长的记载：“父

长迁，隋清德乡长。君隋大业八年被举辽西郡书佐。”《旧唐书·刘世龙传》中也载：“刘世龙者，并州晋阳人。大业末，为晋阳乡长。”分别参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旧唐书》卷五十七《刘世龙传》。

[4] 《全唐文》卷十《太宗纪七》。

[5]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载：“武德令……诸州县佐史、乡正、里正、岳读祝史、斋郎，并介帻、绛襦衣。”

[6]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56页。

[7]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尚书都县”条。

[8]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10]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

[11] 释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182页。

[12]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3] 白居易：《秦中吟·重赋》，《白居易集》卷二《讽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4] 参见池田温著，龚泽铨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6页。

[15] 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16] 杜甫：《兵车行》，《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17] 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8] 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9] 《唐会要》卷四十一“杂记”。

[20] 《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一》“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

[21] 《唐律疏议》卷二十八《捕亡》。

[22] 《唐律疏议》卷十七《贼盗四》“有所规避执人质”条。

[23] 《唐文拾遗》卷三《元宗皇帝二》“禁散乐巡村敕”。

[24] 元稹：《古诗·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元稹集》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

[25] 参见池田温著，龚泽铎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页。

[26] 宫崎市定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大致经历了氏族国家、都市国家、领土国家、统一的帝国几个过程。中国早期社会是以氏族制度为主的氏族社会，自殷代至春秋时代是中国的“都市国家”时期，春秋中期开始至战国时代是“领土国家”时期，秦汉时期中国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期。这里的“都市国家”是指由许多氏族共同居住于有城墙围合的城邦里面，过着集体生活，而郊外是农田所在之地，无人居住。居于城邦的市民，白天去位于郊外的田地中劳作，夜晚回到城内居住。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载宫崎市定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0页。

[27] 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8] 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9] 徐松对唐代西京108坊的考证中，光禄坊和殖业坊实际上应为善和坊与通化坊；对东京113坊的考证有4处错误，误添时泰坊，遗漏乐城坊，错改行修坊和兴敬坊，南市及通利坊的面积与地点错误。见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30]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页。

[31] 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4页。

[3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33]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4、136、137、142、146、151页。

[34]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35]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载：“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

[36]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37]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另《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条：“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所须纸笔、装潢、轴帙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帐所须，户别一钱。）凡天下之户，量其资産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纴、组紃之类，非也。）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38] 岭南诸州以米代粟，上、中、下户标准不同，分别为一石二斗、八斗和六斗。

[39] 不产绢、绵的地方或以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代替。

[40] 闰年多加2天。不服劳役需纳绢或布代替。

[41]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42]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

[43] 《全唐诗》卷二二〇。

[44] 《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

[45] 黄永年：《唐代两税法杂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46] 黄永年：《唐代两税法杂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47] 《通典》卷六《赋税下》。

[48] 商兆奎：《唐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3页。

[49]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50]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杂徭》，《文史哲》1981年第4期。

[51]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

[52]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53] 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54]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狄仁杰八》“乞免民租疏”。

[55] 据《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记载，贞观十六年，朝廷曾下令：“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56]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贾敦颐传》。

[57]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卢从愿传》。

[58] 《通典》卷二《田制》。

[5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陈子昂传》。

[60]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唐诗》卷二百十六。

[61]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62]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

[63]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64]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65]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66]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67] 《唐会要》卷九十《和杂》。

[68] 《唐会要》卷五十九《度支使》。

[69]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70] 《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71] 元稹：《和乐天高相宅》，《元稹集》卷十九《律诗》。

- [72]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八《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 [73]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74]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75] 《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
- [76] 《唐会要》卷二十七《行幸》。
- [77]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78] 《全唐文》卷八十一《宣宗三》“禁岭南货卖男女敕”。
- [79]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李渤传》。
- [80]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81]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第四十二》。
- [82] 白居易：《赠友五首》，《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
- [83] 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2014第2期。
- [84]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权德舆传》。
- [85] 《唐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86] 《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疏改税法》。

第二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兴衰

一、隋唐村落的发展

隋唐是中国古代村落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不仅村落数量大幅增加，村落分布范围也逐渐扩大。如前所述，随着基层管理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唐代前期的村落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囿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对唐代村落的数量与分布情况做出具体考虑，但唐代文献中所涉人口数量的增减情况载述，可为此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据唐代史料显示，自唐初至安史之乱爆发前长达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不仅是唐代乡村社会的恢复与发展期，而且是唐代村落人口的快速增长期。如《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条载，贞观年间，全国户口尚不满300万户，天宝十四年增加到900万户，杜佑则认为实际数量达到1 300万~1 400万户，若此推算成立，就意味着唐代前期百余年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00万户。显然，这种人户的增长，必然多数发生在广大乡村地区。翁俊雄研究过唐代鼎盛时期的政区与人口数量，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与比对分析，他指出唐代开元年间几乎所有的州县户口与面积都发生了大幅增长，其中也伴随着村落户数的大量增加。^[1]这也必将引起村落在数量及分布区域上的扩张，并直接影响唐代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

自汉晋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重心，也是人

口分布的重心。但是至唐初，受到隋末战乱的影响，贞观年间南方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北方。（见表5-1）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地区已经取代北方地区成为人口分布的重心，但是无疑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人口分布格局与增长点，为唐代中后期南方地区村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至唐代中期，经过百年间的恢复与发展，北方地区虽然再次成为全国人口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但其原来在数量与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已经明显弱化，南方地区的人口在规模上基本可与北方地区分庭抗礼。有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对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间唐代十道人口数量及增减状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见表5-2）数据显示，在这百余年间，全国多数区域的人口数量及人口总量涨幅皆十分明显。其中，两京所在的河南道、河北道与淮南道、江南道的人口数量增加最多、涨幅最快，南方五道与北方五道的人口总量相差不大。可以看出，此时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发生改变，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浙东地区及成都平原都成为唐代中期人口的密集分布区域。

表5-1 隋大业至唐贞观各道户数升降及分布比重

道别	隋大业户	唐贞观户	增减率（隋为100%）	占全国户数百分比（隋）	占全国户数百分比（唐初）
剑南道	360 184	638 200	177.2	4.0	20.98
江南道	357 819	403 939	112.9	3.9	13.28
关内道	904 502	398 066	44.0	10.0	13.09
河北道	2 163 345	369 730	17.1	23.8	12.15
岭南道	367 365	357 348	97.3	4.1	11.75
河南道	2 721 272	275 618	10.1	29.9	9.06
河东道	852 001	271 199	31.8	9.4	8.92
山南道	727 009	180 724	24.9	8.0	5.94
淮南道	452 976	91 091	20.1	5.0	2.99
陇右道	171 241	55 956	32.7	1.9	1.84
南方五道小计	2 265 353	1 671 302	73.8	25.0	54.94
北方五道小计	6 812 361	1 370 569	20.1	75.0	45.06
合计	9 077 714	3 041 871	33.5	100.0	100.0

资料来源：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表5-2 唐贞观、天宝两朝各道户数增减状况

道别	贞观十三年户数	天宝十一年户数	增减率 (贞观为100%)	递增年率(‰)	年率顺序
关内道	398 066	810 263	203.5	6.3	7
河南道	275 618	1 795 539	651.5	19.1	1
河东道	271 199	632 611	233.3	7.4	6
河北道	369 730	1 514 765	409.7	13.07	4
山南道	180 724	576 883	319.2	10.37	5
淮南道	91 091	412 448	452.8	14.26	2
江南道	403 939	1 824 004	451.6	14.23	3
陇右道	55 956	112 874	201.7	6.2	8
剑南道	638 200	922 353	144.5	3.7	9
岭南道	357 348	336 052	94	1.05	10
北方五道	1 370 568	4 866 052	355	11.47	
南方五道	1 671 302	4 071 740	243.6	7.8	
合计	3 041 870	8 937 792	293.8	9.54	

资料来源：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唐代前期南方地区本地人口的增长，北方躲避赋役人口的大量南迁是直接推动力。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战乱对北方地区村落的破坏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民众的南迁，毗邻北方地区的淮南道、开发尚不充分的江南道、偏处西南的剑南道，甚至偏远的岭南道，都成为唐代逃亡民众的目的地。至唐代后期，南方最终超过北方，成为唐代人口与村落分布重心。

如偏处西南的剑南道，自汉晋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主要移民区域，境内生活有大量内地移民。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也使得

这一区域成为躲避战乱的主要区域。根据上述表格中的统计数据，贞观年间剑南道已经成为全国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另据《通典》记载：“大唐贞观末为寇，遣兵从西洱河讨之。其西洱河从嵩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2]可以看出，剑南道在社会形态上已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多以姓氏部落立州县，但聚落与内地相似，仍多以“村”为名。安史之乱以后，剑南道再次成为唐代逃亡民众的迁移目的地，尤以遭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关中地区的流民为多，以至于出现“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3]的现象。唐人樊绰在其《蛮书·云南城镇》一书中也记载了唐代后期云南地区的乡村发展状况：“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故谓昆池。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土俗相传云是庄蹻故城。城之东十余里有谷昌村，汉谷昌王故地也。”[4]这些史料说明，移民对于唐代中后期西南地区村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如开发相对较晚的岭南道，其具体发展状况的相关记载，鲜见于唐代以前的史料。但唐代以降，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如天宝七年（748年）十一月鉴真和尚就曾记录其在海南岛看到万安州乡间的村落分布状况：“（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5]钱易在其《南部新书》中亦云：“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6]此外，在唐政府对岭南道颁布的诏令中也出现了乡村的概念：“安南、邕州已奏放回北军，其于顿递过本州县界，须如法先自备办排比，切不得临时差配百姓及借索扰人。仍录前后德音赦条，于乡村分明榜示，

不得违越。”[7]有部分学者认为唐代岭南道村落的增多，是因地域开发不足而受到南北朝以来村名泛化影响的结果，因而判断村制在当地并未得到彻底实施。[8]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说法或许适用于唐代前期，自唐代中期以后，安史之乱的爆发，迫使更多的北方民众南迁至江淮地区，而统治者对南方地区的横征暴敛，也迫使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南方民众迁移至更为偏远的岭南地区。因此，唐代中后期，岭南村落的出现，绝不仅仅只是南北朝村名泛化的影响。

整体而言，随着唐代人口数量的膨胀与迁移流动的频繁，村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村落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以往以北方地区为密集分布区的分布格局有所改变，村落不再仅仅是散落于偏远地区的郊野聚落，而是成为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众聚居单元。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南迁人口规模的增大直接促进南方地区村落的大量生成，并且为此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晚唐五代村落的衰落

（一）安史之乱对村落的影响

自唐建朝至玄宗前期，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积极开明的治国政策，使唐代迎来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大繁荣的发展阶段，并维持了百年之久。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宣告了盛唐的结束，并导致唐代中后期社会陷入长期的混战与割据局面。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唐代后期乃至其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政治体制、南北经济局势及社会文化的转变，对当时村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安史之乱”不仅成为唐代由盛而

衰的转折点，也成为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具体而言，安史之乱对唐代村落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迁移与村落分布格局的改变

战争是引起人口大规模迁移的最主要因素。隋唐时期发生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皆因战争（隋末战争、安史之乱、唐末战争）而起。前揭唐贞观年间南方人口的激增已经说明，由隋末战争引发的人口迁移已经对北方地区长期作为人口分布重心的格局带来了挑战。^[9]安史之乱的爆发无疑又加剧了这种局面的发展。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以河北道、河南道以及两京之间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战火所及之处，皆伴随着烧杀抢掠，人口死亡或逃亡现象严重。史载：“自禄山肇祸，瀛博流离；思明继衅，赵魏堙厄。粉榆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10]史思明在河北地区每破一城都伴随着屠杀与掳夺，“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11]。仅其攻下魏州时就有数万民众惨遭屠杀。^[12]“生人货产扫地，壮赍负，老婴则杀之，杀人以为戏。”^[13]这正是对安史叛军嗜战、残暴成性的描写。《旧唐书·郭子仪传》中有一段记载，深刻揭露了战乱给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的破坏：“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段描述再现了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片荒凉的场面。

两京地区是叛军的主攻对象，两地之间的区域也因此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如《新唐书》卷五十一有载：“自两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萧然。……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粃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14]《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载：“今连岁治戎，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惻然。……且京畿户口，减耗大半，职员如旧，何以堪之。”^[15]岑参曾在其《行军诗二首（时扈从在凤翔）》中记录了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咸阳之战唐军大败之后的场景：“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悉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16]其中的“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描述了咸阳地区战败后民众惨遭屠杀或逃亡，村落虚空萧条的状况。东都洛阳亦是如此。经过战乱，数百里之内人口已经不满千户，东至徐州、北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的大部分地区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7]，可见战争对人口的消耗。据《通典》中的数据显示，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五年（760年），唐代着籍人口已经由极盛时期的800余万户降至193.31万户（不课户117.16万户，课户75.86万户）^[18]，五年间着籍户口减少近700万户。至大历年间，唐代户籍数降至冰点，只有130余万户。这种人口消耗速度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当然，这种人口的快速减少，除了与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关外，战乱期间逃户和隐户的增多也是重要原因。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有的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村民的生产活动难以为继，民众被迫失所流离，除此之外，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

支，统治者加大了对民众的搜刮力度，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额的方式征收赋税，乡民不堪重负。如乾元元年（758年）四月，肃宗曾下敕，曰：“天下百姓，除正租庸外，一切不得别有使役。”^[19]永泰元年（765年），唐代宗也曾下敕：“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弊，此后委转运使察访以闻。”^[20]这两则敕令皆颁布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虽是对地方官府擅自征调赋役现象的禁止，但反过来也说明地方官府横征暴敛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因此，在中央及地方双重力役的压力下，大量的着籍户口不得不逃亡至偏远山区以及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小的南方地区，沦为逃户。《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朝集使及贡使见于宣政殿。兵兴以来，四方州府不上计，内外不朝会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复始旧制。”这里就指出了安史之乱爆发至建中元年的20多年间，四方州府不上计户口已经成为惯常现象。

唐代相关史料及文学作品对安史之乱以后的人口逃亡现象进行了记载。如李白诗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21]顾况在其《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中曰：“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22]杜甫在其《无家别》一诗中也描述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23]此诗记录了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乡里的情景，可以看出，经过战争的破坏，以前拥有百余家的“里”只剩下“一二老寡妻”。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不仅使得人口急剧消亡，还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甚至成为引起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迁的主要原因之一。^[24]

北方人口南迁的目的地，以少受战火波及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为主。如《安禄山事迹》中载：“凶威所至，无不荡覆。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家口多避地于江淮。”^[25]其

中，荆楚地区因在地缘上毗邻中原，成为当时移民的主要聚集区域之一，呈现出“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26]的场面。唐代道家学者元结在安史之乱时也曾“南投襄汉”^[27]，并在《与襄溪邻里》一诗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昔年苦逆乱，举族来南奔。日行几十里，爱君此山村。……襄溪中曲滨，其阳有闲园。邻里昔赠我，许之及子孙。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28]

苏州地区也是北方人口的主要迁入地。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仅当地治所吴县，其人口的1/3皆来自北方地区。^[29]关中地区也有不少乡民南下至山南道、剑南道。据《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七《请罢东川节度使疏》载：“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另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元和年间，江淮八道的户籍总数已经占全国户籍总数的66%，这一数据已经远远超过其在天宝年间23%的占比。^[30]

应指出的是，因战争破坏，北方地区人口严重流失，赋税收入也随之出现大规模亏空。为了维持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转，保证战争开支供给，朝廷赋税征收的压力也随着南迁人口转移至南方地区，江南八道的144万户居民成为唐代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直接迫使此区域的居民再次成为逃户，逃往地理位置更为偏远的岭南或剑南地区。这也是唐代后期岭南道及剑南道人口增多的直接原因之一。

综上，安史之乱掀起的人口迁移浪潮，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涉及区域甚广，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江淮流域，广大南方地区及东北地区皆成为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这直接影响了唐代村落的分布，打破了以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的局势，也极大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为五代、两宋南方地区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即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即使迁出地的很多村落被迫解体，也导致了迁入地新村落的大量产生。可谓生生不息，复而众之。

2.土地制度的破坏与南方村落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唐代均田制的崩坏是唐代长久以来土地兼并及土地不敷分配导致的直接、必然的结果，那么安史之乱则无疑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如前所述，唐代前期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尽管唐代政府采取了扩户等相关应对措施，但并未能有效阻止这一现象的继续发展。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人口进一步逃亡与迁移，村落居民失地现象加剧。其后果便是，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少部分富户抢占或买入，土地兼并问题更为严峻。《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条载至德二年二月敕：“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俾其怨咨，……”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四月敕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宜委县令，切加禁止，若累日再有违犯，当倍科责。”此类关于安史之乱以后逃户的记载还有多条，这些敕令的颁布都说明殷富之家、官吏豪强吞并土地的现象在此时已经非常普遍。《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一例这类事件：“（李莹）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31]这里记载的李家庄园即在安史之乱后被人抢占。需要指出的是，能够拥有庄园的李家，并非唐代乡村普通农户之家。即便如此，其田地仍然被人抢占。可以想见，战乱期间，这类抢地兼并之事在普通农户群体之中应为更甚。正是逃户的增加，导致以往被纳入行政管辖范畴的一些村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败的现象，甚至变成了没有人口的“空心村”。

因此，土地资源的日渐集中与失地农民的逐步增多，使中晚

唐时期的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均田制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唐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为了维持生存，农民不得不依附拥有土地的乡村豪族，成为佃户。租佃制自此生成，富户阶层成为乡村财富的实际掌控者。前引《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32]这正是中晚唐时期唐代乡村的实况。此外，也有部分乡村居民另谋生路，转为发展商品经济，这也是中晚唐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对此，后文将做详细阐述。

3. 村落控制力量的改变与职官制的出现

以村坊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组织与村内宗族势力、村社组织乃至乡村豪族势力等共同构成了唐代乡村控制的几股力量，大致形成了以国家力量为主、民间力量为辅的乡村控制局面。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中晚唐时期村落控制力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乡村制虽然仍是国家基层权力实施的基本形式，但国家管控力量明显被削弱。另外，因躲避战乱、抱团求生的需要，宗族、村社的势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富户、豪族实际上成为中晚唐时期乡村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这一点与安史之乱以后的赋税征收问题关系密切。根据上文所述，村坊制形成以后，“催驱赋役”由里正负责，村正起协助作用。但沉重的赋税使得赋役催缴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乡村富户、豪族群体征收赋税更是一件困难之事。

杜甫的《东西两川说》一文中就描述了这种状况：“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村正虽见面，不敢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33]这里描述了村正不敢向富户催税的状况。但根据唐代律令，因此未征得的

赋税需由村正或里正补齐。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富户，其赋税对一般的里正或村正来说，并非其所能负担的。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峻。加之大量人口的死亡与迁移，赋税征收的压力几乎全都集中到里正与村正身上。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唐代朝廷不得不分散压力，转嫁至乡村富户、豪族群体，并选择有能力承担赋税的乡村富户、豪族担任基层职能人员。如此既能借助富户、豪族势力向乡村民众征收赋税，又能从这一群体中汲取财富，形成对这一群体的控制。《资治通鉴》记载，宝应元年元载担任租庸使时“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货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这一记载恰好表明了唐代后期选择富户、豪族为国家基层行政代理人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将赋役压力施加于富户、豪族也是唐代均田制破坏之后的现实需要。土地的大量兼并，已经决定了以户口为单位的赋税征收制度不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富户、豪族才是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因此，政府借此将其纳入国家权力之中，使其成为国家基层组织的代理人，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宣宗大中九年（855年），朝廷基于现实需要，对当时基层职能人员的人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34]这说明财力及赋役轻重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任命基层职能人员的主要依据。

自此，唐代基层管理人员由早期的“白丁清平强干者”转变为财富持有者，乡村社会形成了以乡村富户轮流当差的基层管理单位职能人员任职制度，职役制取代乡官制。

（二）藩镇割据对村落的影响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遗留的重要历史问题。藩镇是唐代前期朝廷为加强少数民族统治，在羁縻州政策的基础上建立的军事行政机构，是朝廷处理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的手段。但自唐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朝廷的腐化、贫富差距的拉大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在朝廷设置地方节度使、军权授予、蕃将任用等一系列措施之后，藩镇最终在军权、财权方面获得独立，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并最终成为导致唐王朝由统一走向分裂的主要势力。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朔地区的割据局面即已形成。尽管唐代统治者经过8年的艰难斗争平定了叛乱，但统治者对投降叛军伪官、伪职的认可，变相宣告了割据政权的合法化，这无疑促进了割据的加剧。宝应元年至宝应二年，河朔三镇（成德镇、魏博镇、幽州镇）先后成立，割据局面由此形成。除河朔三镇以外，易定、沧景、淄青、淮西等地也相继割据。其他地区的藩镇势力虽然一定程度上仍然受限于中央政权，但在此后的100余年间，藩镇间的战乱不断，势力持续膨胀，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股强势的地方力量。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爆发，拥兵自重的藩镇势力终于在战乱的冲击下各据一方，全国范围内的割据局面自此形成，唐王朝彻底陷入全面分裂。

唐代的藩镇割据以大地主与军阀势力的结合为其阶级属性[35]，代表大地主与军阀的利益，其本质即以武装势力夺取土地和人口，这就决定了其是一种依靠暴力剥削的割据势力。因此，唐代藩镇割据的这种政治地方性、文化封闭性、阶级剥削性决定了其对唐代后期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首先，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虽然不少藩镇政权相继割据，但其想要进一步扩大势力、各占一方的意图，不仅使其与中央政府

矛盾重重，屡现摩擦，而且藩镇间的争夺战争不断，给社会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如大历十二年（777年），“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36]。军阀势力的残暴特性也使得藩镇军队所到之处多遭烧杀抢掠。据史料记载，彰义节度使李希烈生性残暴，每逢战争之时“杀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饮饌自若”。在其攻打汴州期间，还曾因令百姓运土木筑垒道未成而大怒，以至“驱以填之”。[37]《旧唐书》对汴州刺史李忠臣的描述也为“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38]。另有《旧唐书》载吴元济曾于宪宗元和九年（814年）“乃悉兵四出，焚舞阳及叶，掠襄城、阳翟。……剽系千余里”[39]。更有田神功曾率军至扬州地区，大肆掠夺百姓商人资产，杀胡、波斯商人数千人。[40]可见这些割据战争的破坏以及割据势力的残暴，已经置民间百姓于水火之中。

其次，除了战争的破坏，割据势力的横征暴敛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生活负担。在政治与财政上的独立，决定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割据势力对地方政治与财政来源的掌握。为了积累财富与壮大割据势力，地方节度使不仅随意增加赋税，而且不惜以各种方式征兵。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41]。淮西地区节度使吴少阳，不仅随意征收赋税，劫持商贾，而且招收亡命之徒充兵。[42]汴宋节度使刘玄佐为了笼络军士，大力搜刮百姓，以致百姓日渐贫困。[43]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一文中曾深刻地揭露了藩镇势力贪婪残暴的本性。文中称剑南之地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尤其是蜀地物产丰富，但“近者贼臣恶子，频有乱常。巴蜀之人，横被烦费，犹相劝勉，充备百役，不敢怨嗟”[44]。这种残酷的剥削必然造成“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

窄”[45]和“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46]的惨景。

再次，长期的割据战争与沉重的社会压迫，也逐渐改变了割据区乡村的社会风气，形成尚武轻文的文化特征。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言“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的原因。如淮西地区在长期的割据统治之下，民间形成“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的社会风气，以至地处中州却“人心过于夷貊”。[47]不止于此，不同地域之间也因长期的分裂割据，彼此间形成对垒，文化与思想上的封闭性十分明显。杜牧就曾在其《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一文中指出这种现象：“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敌，访问无事之日，村落邻里不相往来。”村落这种文化封闭的状况，由藩镇割据所致，又以反作用的形式促进了地方割据程度的加深。

最后，藩镇割据除了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发展带来深入影响，也对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为朝廷为了应对割据战争，对乡村社会进一步施加赋税及徭役负担。根据史料记载，由于唐代后期战乱频仍，藩镇不臣，赋税收入大大减少，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唐政府不仅以各种名义增加赋税，而且降低服役年龄，甚至在男丁不足时以女子充当劳役。如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宪宗纪》载，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由于军队数量的增加，基本上达到了每两户养一个士兵的状态。另据《新唐书》记载，昭宗天祐三年（906年）为了应对朱温进攻沧州，“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涅于臂曰‘一心事主’。卢龙闾里为空，……人相食。……筑馆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与讲法。以堇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杀匠灭口”[48]。杜甫就曾在其诗文中对藩镇势力和整个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严厉搜刮进行了讨伐：“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

及锥刀。”^[49]这些诗文形象地反映了乡村民众在战争年代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凉情景。因此，在藩镇割据战争此起彼伏的状态下，连年的战乱与沉重的剥削，使包括村落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惨遭蹂躏。

[1] 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3] 《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七《请罢东川节度使疏》。

[4]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六《云南城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页。

[5] 真人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页。

[6] 《南部新书》庚卷，第107页。

[7]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咸通八年五月德音”。

[8]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82页。

[9] 据《中国人口史》统计数据显示，唐贞观中期，以剑南、江南两道为主的南方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幅上升。见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10] 《全唐文》卷四十七《贬田承嗣永州刺史诏》。

[11]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敕编集》。

[12]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史思明传》。

[13]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史思明传》。

[14] 《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一。

[15]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大历四年三月壬申诏。

[16] 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17]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

[18]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条。

[19] 《全唐文》卷四十五。

[20]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21]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载《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七。

[22] 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载《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

[23] 杜甫：《无家别》，载《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

[24] 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期。

[25] 姚汝能撰，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26]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27] 《唐国史补》卷上。

[28] 元结：《与襄溪邻里》，载《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一。

[29]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30]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1]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六《鬼二十一》“李莹”条。

[32] 《新唐书》卷四十二《食货二》

[33] 《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七。

[34] 《文献统考》卷十二。

[35] 袁英光：《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276页。

[36]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代宗纪》。

[37]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李希烈传》。

[38]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李忠臣传》。

[39]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四《吴元济传》。

[40]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

[41]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传》。

[42]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四《吴少阳传》载：“随日赋敛于人。……劫商贾，招四方亡命……”

[43]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载刘玄佐“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

[44] 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载《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九。

[45] 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一。

[46] 杜甫：《岁晏行》，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

[47]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吴元济传》。

[48]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二《刘仁恭传》

[49] 杜甫：《遣遇》，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

第三节

隋唐五代村落的形态

伴随着村落的行政化发展以及基层管理制度体系的健全，村落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在隋唐五代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可反映为村落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深层变革，也可直观地体现为村落外在形制（如村落名称与种类、景观与建筑等）的显性变化。

一、村落类型及其特征

如前所述，隋唐五代时期，村落已经演变为乡村社会的基本聚居单元，“乡一村”取代“乡—里”成为唐代基层地域归属的基本表述方法，广泛应用于这一时期的正史、出土文献、碑刻墓志、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等相关文献记载中。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对唐代村落的命名及分类情况做出分析。

日本求益僧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文简称《行记》）真实记载了其于日本仁明朝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即838年）六月十三日至承和十四年（唐大中元年，即847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入唐求法经历。其旅途所经之地涵盖唐代20个州府治所、35个县治所，涉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7个省份。文中所载其途经村落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发展状况等，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可靠的参考。与此同时，目前所见唐代的一些碑刻资料，通常详细记载了

墓主的卒葬地点、日期等信息，也成为我们考察村落名称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通过对圆仁和尚的《行记》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及今人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相关文献史料，对其中所载村落信息进行梳理，可以得知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与分类的一些历史实况。

根据有关学者统计，《行记》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村名的村落共计56个^[1]（见表5—3），由于这些村落集中于圆仁行程的前半段，多位于今山东省境内，反映的情况也是以山东地区的村落发展状况为主。为了避免结论过于片面，笔者同时对《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所载村落进行了统计，共另得95个具有完整村名的村落。（见表5—4）综合看来，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多样，但整体上以姓氏、嘉名、自然环境或地理位置为主要命名依据，名物、宗教、数字等也是唐代村落常见的命名依据。

表5-3 日本圆仁和尚的《行记》中所载村落

时间		村名	所属州县或地区
开成三年	七月二日	东梁丰村	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
	七月三日	延海村	扬州海陵县
	七月十八日	郭补村	扬州
	七月二十日	赤岸村	扬州
	七月二十一日	延海村	扬州海陵县延海乡
开成四年	四月五日	宿成村	海州东海县
	四月十七日	陶村	登州牟平县唐阳
	四月十九日	邵村	陶村之西南
	五月四日	望海村	登州
	五月七日	赤山村	文登县清宁乡
	七月十四日	真庄村	

时间		村名	所属州县或地区
开成五年	二月十四日	刘村	文登县
	二月二十日	望海村	
	二月二十六日	龙泉村	
	二月二十七日	輦车村	牟平县
	二月二十八日	壹村	
	二月二十九日	牟城村	
	三月一日	王庭村	蓬莱县望仙乡
	三月二日	安香村	蓬莱县
	三月十二日	王徐村	
	三月十二日	九里战村	黄县
	三月十三日	徐宋村	莱州掖县
	三月十四日	乔村	
		中李村	
	三月十五日	牟徐村	
	三月十七日	潘村	莱州
		三埠村	胶水县
	三月十八日	东耿村	青州北海县芙蓉驿
	三月十九日	王穉村	青州北海县
	三月二十日	孤山村	
		半城村	寿光县
	四月三日	石羊村	益都县
	四月四日	张赵村	缙州缙川县

时间		村名	所属州县或地区
开成五年	四月四日	古县村	长山县
	四月五日	仙人台前不村	
	四月八日	双龙村	临邑县
	四月九日	燕塘村	齐州禹城县
	四月十日	仙公村	
	四月十一日	赵馆村	德州平原县
	四月十二日	形开村	沛州夏津县
	四月十三日	王淹村	沛州
	四月十六日	合章流村	清河县
		赵固村	冀州南宫县
	四月十九日	秦丘村	赵州宁晋县
	四月廿二日	南接村	镇州
	七月九日	胡村	忻州
	七月十日	宋村	
	七月二十八日	晋村	清凉县
		石高村	
	七月二十九日	郭栅村	文水县
	八月三日	王同村	孝义县
	八月五日	霍昌村	霍邑县
	八月六日	屈项村	赵城县
	八月十一日	秦村	宝鼎县
	八月十六日	安远村	冯翊县

资料来源：表格根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一书整理，并参照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整理而来。参见释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表5-4 《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所载村落名称统计

《唐文拾遗》所载村落名称统计（38 个）

出处	村落归属地	村名
卷十二	不详	吕村
	不详	任村
	不详	王村
	不详	刘村
	不详	朱村
	不详	唐禄村
	不详	房村
	不详	袁吕村
	不详	谢村
卷二十一	龙门南	净土村
卷二十三	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	西焦村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	史刘村
	扬州江阳县嘉宁乡	五乍村
卷二十七	唐越州上虞县宝泉乡孝敬里	新成村
卷二十八	京兆府万年县	三赵村
卷三十二	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	
	京兆府长安县龙门乡	石井村
	京兆府长安县承平乡	大严村
	京兆府	杜城村
卷三十	不详	德兴村
	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	北韦村
	京兆府长安县	小严村
卷五	京兆府长安县	
	发县昆明乡	魏村
	崇义乡	南姚村
	京兆府万年县川乡	上传村
	苏州长洲县余杭乡	石湊南馆墅村
	幽都县保大乡	樊村

《唐文拾遗》所载村落名称统计（38个）		
出处	村落归属地	村名
卷三十二	长安县承平乡	刘村
	京兆府万年县	小阳村
	杭州盐官县海昌乡	秧田村昌宓里
	京兆府万年县	姜尹村
	京兆府长安县	第五村
	京兆府长安县	姜允村
	昌平县	永宁村（终）
	蓟县会川乡	邓村里（葬）
卷三十三	吴郡华亭县莞沼乡城山里	进贤村
卷三十九	千年乡	谷禄村
卷四十八	都城江都县与宁乡	东袁墅村建议庄
卷五十二	任光乡	许墅村

《唐文续拾》所载村落名称统计（9个）		
出处	村落归属地	村名
卷六	沧州城清池县茂林乡	五宾村
卷十	不详	程村
卷十一	崇仁乡	周村
	河南县龙门乡	午桥村
	怀州河内县	界沟村
卷十四	邺县西里野马岗	大井村
卷十五	潞府南三十五里	蒲池村
	不详	南董村
	城西南	司马村

《全唐文》所载村落名称统计（除去与上文重合村落，另有 48 个村落）

出处	村落归属地	村名
卷一百八十二	不详	无忧村
卷二百三十一	不详	南费村
卷三百十三	洛阳邙山	陶村
卷三百三十九	不详	历下村
	不详	夏王村
卷三百四十一	东京鹑店（东北）	高村
卷三百四十四	山阴县	篱渚村
卷四百八十四	许州长社县嘉禾乡	合穗村
卷五百二十三	京师之南	小赵村
卷六百三十九	万年乡	杨村
	汴州开封新里乡	之某村
卷六百五十五	河南县龙门乡	午桥村
卷六百七十五	不详	紫阁村
卷六百九十五	万年县洪固乡	北韦村
卷七百二十三	幽州幽都县保大乡	杜村
卷七百三十八	城南	尹村
卷七百四十一	孟州河阳县	
卷七百四十四	（苏州）义兴县洞庭乡震泽里下	朱村
卷七百五十四	东都	少陵司马村
卷七百五十五	长安城南少陵原	司马村
卷七百五十七	白鹿乡	井谷村
卷七百六十	河南府河阳太平乡	临泉村
	济源县清廉乡（葬）	官桥村
	河阳县太平乡	西沼村
卷七百九十	万年县宁安乡凤栖原	社季村
卷七百九十二	不详	次庐村
卷八百四十	长安县龙首乡	祁村

《全唐文》所载村落名称统计（除去与上文重合村落，另有 48 个村落）		
出处	村落归属地	村名
卷八百六十	河阳县丰平乡	赵村
	太原孟县西四十里同颖乡	大贤村
	不详	冠盖村
	寿阳南界	解愁村
	太原县阙夏乡	郑村
卷八百六十一	粤是邑	皇甫村
卷八百九十七	不详	大义村
卷八百九十八	开元府海盐县德政乡通福里	澈墅村
	开元府海盐县南德政乡归仁里	开化村
卷九百十五	不详	曹溪村
卷九百十七	不详	思村
卷九百十九	承务乡	九里村
	不详	东章村
卷九百三十四	不详	石保村
卷九百五十九	山东济宁州晋阳山下	张家村
	昭元乡昭元里	社头村
卷九百八十四	不详	岭南村
卷九百八十九	金乡县	埵沟村
卷九百九十六	河南府河阳县太平乡	树楼村
	贵乡县	王赵村
	扬子县江滨乡	白社村
	兖州瑕丘县普乐乡临泗城	阴村郡城
	不详	祁村
卷九百九十七	易州半易县玉山乡	梁村

资料来源：根据《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进行统计。

综合以上材料，唐代村落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姓氏作为村落命名依据

以姓氏对聚居群体进行命名的方法，早在秦汉时期的聚落、里的命名中就已经体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日渐增多。在《汉书》、《后汉书》、居延汉简、走马楼吴简及南北朝石刻资料等汉晋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可以明确发现这一时期村落命名方式的发展特点。^[2]及至唐代，随着人口的繁盛及村制度的深入推行，村落的进一步泛化促进了姓氏村落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并成为唐代村落的主要命名方式。

通过前文对唐代村名的统计，《行记》《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共出现村落161个，其中以姓氏命名者71个（《行记》中25个，后三书中46个），占总数的44.10%。这说明唐代近半数的村落皆以姓氏命名。

唐代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可分为单一姓氏和复合姓氏（也有学者指出是单一姓氏与联合姓氏^[3]）两种形式。其中，以单一姓氏命名的村落在姓氏命村落中占大多数。仅《行记》一书记载的25个姓氏村落中就有18个以单一姓氏命名，《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所载的95个村落中，有40个村落以单一姓氏命名。可见以单一姓氏作为命名依据已经成为唐代村落命名的主流。

需要指出的是，以姓氏为村落命名的方法往往反映了村落居民的宗亲血缘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聚落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宗亲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居单元的发展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由于儒家文化对宗法家族关系及血缘亲情关系伦理意义的强调，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成为民众聚居单元形成的重要影响因

素。此外，诸子分封制的盛行，也为以家族为中心的分化提供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的发展，以同一宗族或同姓宗族为聚居单位的情况更为多见。^[4]至唐代，一方面同样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唐代人口管控措施的约束下，宗族村落成为唐代村落的主体。

《唐会要》卷八十五《定户等第》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七月二十三日令：“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等第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各从析户祇承，勿容递相影护。”根据此条规定，唐代父母尚在的析出户口，其户等无法因此下降，析出者应承担的赋税、徭役分别由本户与所析之户承担，这正是唐代统治者为了避免民众因析户而产生规避徭役与赋税之举，以此将民众限制在家族范围内。不仅如此，为了限制析户现象及人口逃亡，朝廷也对父母尚在而另生别户的情况予以明令限制。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称祖父母、父母在，则曾、高在亦同。若子孙别生户籍，财产不同者，子孙各徒三年。”《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天宝元年正月一日令中，还采取了减免徭役的方式，鼓励同籍同居：“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同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5]正是这些举措的全面推进，促成了“同族而居”现象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朝廷还以表彰的方式，鼓励家族的累世聚居。《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四有载：“栝阳县人董思宠，五代同居，子孙凡八十余人，友爱敦睦，乡里称之。天宝末，寇盗剽掠村间，此家独全，年遭水旱，此家独免，至于征税，每先于人。伏望旌表门闾，编诸史册。”这里的董思

宠就是五代同居，家族已有成员80余人，朝廷还就其家族聚居团结抵御盗贼与灾害给予了表彰。

另有一则史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唐代统治者对于世代累居的重视。敦煌《唐开元户部格残卷》中记载了证圣元年四月九日敕文：“孝义之家，事须旌表。苟有虚滥，不可褒称。其孝必须生前纯至，色养过人；歿后孝思，哀毁逾礼。神明通感，贤愚共伤；其义必须累代同居，一门邕穆，尊卑有序，财食无私，远近钦永，州闾推伏。州县亲加案验，知状迹殊尤，使覆同者，准令申奏。其得旌表者，孝门复终孝子之身，义门复终旌表时同籍人身。仍令所管长官以下及乡村等，每加访察。”^[6]该敕文对孝门、义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义门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就包括“累代同居，一门邕穆，尊卑有序”。显然，这种对于孝和义的规定，无疑对唐代家族、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统治者所倡导的这种生活伦理尽管与现实家族经济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但其仍然在管控人口、开展赋役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唐政府的一种统治手段，也对唐代社会宗族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可能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以姓氏来命名一个村落的现象在唐代明显多了起来。更进一步来看，则表明唐代村落成为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居单元。只是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部分单一姓氏的村落会因其所处空间方位或村落规模等进行区分，如将上、下、大、小、东、南、西、北等加于村落名称之前，如前文表格中的“大严村”“北韦村”等。

应该注意的是，与魏晋时期同一家族或同姓家族聚居的世家大族有所不同，唐代村落中的宗族体现为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增多。尽管在隋唐时期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大家族仍然占较大的比重，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经得到较大削弱。一方面，唐

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官僚体制的变化、科举制的实施、土地制度的改革促成了世家大族的迁移与解体。另一方面，唐代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赋税制度的改革等社会经济的变化，加速了人口流动。尤其是后者，通过前文的相关讨论可以看出，唐代中期以后，沉重的赋役直接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从前文所引唐代限制析户、鼓励同籍共居的相关法令也可看出，唐代因规避赋税而析户应是普遍现象。这对魏晋以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的延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有学者指出，唐代的人口流徙与三国两晋动乱时期的举族而迁不同，多以家庭为单位，尽管有数量较多的乡里、邻里以集合式群体向外迁移，其中也包括亲族，但此时的亲族已经不是完整的宗族单位，而是以地缘关系为组合的邻里、乡里群体。^[7]因此，这些因经商或不堪负重迁徙而出的家庭个体、地缘群体，无法再以完整的宗族形式存在，其辗转至外地之后，或以一个家庭为基础，经过几代的累积之后形成自己的家族，或其他地区的家族或宗族为邻，形成多个家族或宗族杂居的村落单元。因此，可以说，唐代村落社会实际上是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聚居单元。这也是促成唐代村落居民结构产生差别的原因。

除了上文以单一姓氏家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村落外，还有不少由家族、宗族共同组成的村落。如《全唐文》卷九百三十四《东西女学洞记》载：“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吕氏麻氏。”这则史料中所记载的山下通关乡和山上石保村的居民构成就不相同，山下通关乡居民以公孙氏为主，山上石保村则以吕氏、麻氏为主。这类村落往往以两个主要姓氏相结合的方式对村落进行命名，即以复合姓氏命名。这类村落在唐代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中占有一定的

比例，如上文所列《行记》中的“王徐村”“徐宋村”“张赵村”等。以两姓命名的村落的出现，可能还与家族联姻有着较大关系，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朱陈村》一诗中的描述可兹证明：“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8]

综合而言，至唐代，宗族血缘关系在村落的发展中已经显得非常重要，也成为唐代村落发展的重要特点。

（二）以嘉名作为村落命名依据

嘉名是指寓意吉祥、美好之名。趋利避害、求吉纳福，是人类最为朴素的情感。大致来看，以嘉名作为地域命名依据始于汉代，这一时期，不少寓意美好的词语被运用在事物的命名中，典型的如以“长乐未央”“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词语为名的瓦当，以及“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等以吉祥词语命名的宫殿等，也出现了以“长乐”“万岁”命名里的做法。至唐代，人们对吉祥、美好事物的追求热度不减，加之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倡导，儒家伦理纲常成为上至皇家、官员，下到士绅、百姓持家理政、判断品行人格的基准，其影响深入唐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民众思想教化等多个层面。因此，儒家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成为唐代乡、里命名的主要参照，如东京河南县的“仁风乡”“归德乡”“感德乡”，王城乡的“敦信里”，翟泉乡的“章善里”，洛阳县清风乡的“和仁里”，福民乡的“德义里”，等等。还有部分乡、里以取义忠孝、劝善、祈福、平安、长寿、安乐等蕴意的词语为名。根据有关学者对唐代两京所辖的河南县、洛阳县、万年县、长安县四县乡里名称的统计，四县共有175个乡、200个里，其中66个乡、88个里以嘉名为命名依据，各占总数的

37.71%、44%。^[9]可见嘉名已经成为唐代乡、里命名的主要依据。

相较而言，以嘉名命名的村落要少于以嘉名命名的乡、里，但在村落中也占一定比例，其选词原则与此类乡、里名称基本一致。部分史料详细记载了村名的来源或寓意，如据《唐文拾遗》卷三十九记载：“报杨行敏：使至得状，送芝草图一轴，览之嘉叹，喜有余怀。且草木之祥异也，虽自天成，皆因地秀，物有所应，吾何以堪。行敏始假郡符，已彰瑞谍，天其诚尔，尔宜慎之。况乡号千年，村名谷禄，足验一百年之寿，与二千石之资，固保前程之富贵矣。将酬美贶，更励忠诚，非吝奖词，虑骄锐志，悉之。夏热切好将息。使回附此不具云云。”其中，“千年乡”“谷禄村”就是以其“足验一百年之寿，与二千石之资”取名，寓意“长寿”及“丰收”，表达了民众朴素的生活愿望。这类村名还见有唐代幽州蓟县会川乡的“从善村”、燕台乡的“高义村”等，东京河南县金谷乡的伏和村、毕闺乡的望春村、望仙乡的护保村等西京万年县宁安乡的社季村、崇义乡的下干村等。^[10]

（三）以自然地理环境或名物作为村落命名依据

由于村落的分布与发展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因此，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典型物象也通常成为村落的命名参照。如《行记》中圆仁和尚于开成三年七月三日途经的扬州海陵县延海村、七月二十日途经海陵县“赤岸村”，开成五年二月二十日途经的文登县“望海村”、三月二十日途经的孤山村等。再如东京洛阳县的“伊川村”（临“伊水”）、西京万年县龙门乡的“南漕村”（位于漕河之南）、长安县居安乡的“杜河村”等。

以名物命名村落主要指以村落中的人文设施、景观或建筑等

作为命名依据，如桥、井、亭等。部分村落因毗邻或拥有此类建筑而将其作为村落的名称。如西京万年县龙门乡的石井村、东京河南县平乐乡的午桥村等。

（四）以历史事件、传说或典故及历史人物作为村落命名依据

此类村名通常是后人为了纪念曾经在当地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曾经居住或埋葬于此的重要历史人物而产生的命名方法。《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四就记载有这类村落：“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寿光阁，会所司奏请置额，帝以东方有妙喜佛国，因以名之。旧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极之六年春二月，移于此山。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二百步，盖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驾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其中所记载的“夏王村”就是因夏朝君主杼南巡时经过此地而命名为“夏王村”，山被命名为“夏王山”。另《太平广记》中也载有一例：“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11]可见此处的“三宝村”因传说中的僧人谓之此地有三宝而命名。又如西京万年县万春乡的“杜永村”、洪固乡的“司马村”，前者因秦广武将军杜永曾居于此地而为名，后者因西汉大司马霍光居住此地而为名。相对而言，这类村落在两京地区比较多见，如东京河南县平乐乡的“伯乐村”、洛阳县清风乡的“梁惠村”和“王郎村”等，西京万年县浚川乡因“汉傅太后”墓命名的“上傳村”，因夏侯婴墓命名的“夏侯村”等。^[12]

（五）以宗教信仰作为村落命名依据

唐代是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民众精神世界的丰富也外化到村落名称之中。这类村落常常以宗教用语或宗教建筑（如寺、观、台等）及民间信仰的神灵等命名，传达出当地民众的精神信仰。典型的如西京万年县宁安乡的“杜光村”，此村因建于贞观十九年（645年）的杜光寺得名，《类编长安志》中对此寺的建造信息有着明确的记载[13]，后该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战火[14]。另如上文圆仁和尚沿途所经登州文登县清宁乡的“龙泉村”、青州临邑县“双龙村”、齐州禹城县“仙公村”，这类村落与民间信仰中的龙神、神仙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村落的景观与建筑

一般而言，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种。但村落的特殊性决定了村落景观无法局限于一般的景观概念。村落，是人们依托自然环境，并对环境进行改造形成的聚居单元，是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自然环境、居于其中的人及其所创造的物质实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村落。因此，村落景观不仅包括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自然景观、以村落建筑为主的人文景观，还应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人和物及其共同构成的生活图景，三者的和谐共存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村落景观。

（一）自然景观与乡村生活图景

自早期村落的形成开始，自然环境就成为聚落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尤其是水源与地形对人们获取生产、生活资源的重要性，使得二者成为聚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这也是早期

聚落遗址较多分布于沿江、沿河等近水的平原地区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人口的迁移与土地的开发，各类聚落日渐增多，影响聚落发展的因素也随之增多，但对长期处于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聚落而言，自然条件仍然是制约其产生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体来看，唐代的乡野聚落一般位于容易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河流沿岸及山谷地带。正因如此，山川、河流、树木自然而然地成了唐代村落景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唐律曾明确规定“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这里的“野”正是对村落所处地理环境特点的描述，也是对乡村聚落自诞生以来的基本区位特点的总结概括。自然景观是古代文人最常描绘的对象，尤其是魏晋以来，受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的影响，田园或村野生活便成为隋唐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描述对象。这类作品通常将自然景观与乡野生活相结合，或借景抒情表达对乡村自然景色与质朴生活的赞美，或托物言志揭示基层生活疾苦、抒发心中理想。诗中既可见江南水乡村落的温婉细腻，又可见北方村落的沧桑俊美；既有四时之景，又见晨暮之别；既有社会繁盛期村景的优美与灵动，又有战乱动荡期的衰落与破败。因此，隋唐五代时期的村野景观，可以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及绘画作品中窥见一斑。

如杜牧笔下的江南村落，“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15]；李郢对信州（今属江西上饶）村落的描写，“田苗映林合，牛犊傍村闲”^[16]；另如王维对西北地区日暮时分村落的描述，“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17]；王建诗中的雨后村落，“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18]。此类对村落自然景色的描述在唐诗中十分多见，不胜枚举，皆以朴素的语言描绘了村落恬淡和谐的田园风光及朴素静谧的农家生活。

安史之乱以后，连年的战争与长期的军阀割据一方面为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加剧了统治阶层对乡民的剥削压迫，使乡村社会及民众的生活遭受极大的破坏，农村一片衰败，农民生活穷困。如张继在其《闾门即事》言，“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19]；卢象的《送祖咏》云，“石路雪初下，荒村鸡共飞”[20]；张籍在《怀别》中云，“古道随水曲，悠悠绕荒村”[21]。这些诗句都是对动乱时期乡村景色之荒凉与民众生活之困苦境遇的描述。

（二）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是村民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显现，是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创造的物质实体。村落作为基本的聚居单元，既是村民物质生活的开展场所，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发生场域，以两者为核心的物质景观构成了村落实体。村落实体以村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或空间载体为主，包括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建筑和道路交通等多个方面。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建筑营造的技术、观念等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往往多体现于城市，而乡野聚落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则因受制于自然地理、财富资源等各方面因素，这个“影响”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是滞后的。隋唐五代的村落应该也是如此。事实上，从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的村落尽管有所发展，但仍延续了秦汉魏晋以来的基本格局。

1. 围墙与村门

首先，隋唐五代时期有些村落筑有围墙和门间。如《太平广

记》卷一百三十五载：“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柟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柟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22]卷三百三十记载：“兖州王鉴……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鉴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鉴怒，欲挞奴。”[23]卷三百七十二又载：“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起扣门，庄客乃启关……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乏，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24]后面两则故事中所说的庄门实际上与村门的性质是一样的，应该具有安全防御的作用，晨启暮闭，以保证居民与财产的安全。这种设置与格局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动乱时期的村落，为了保障安全，往往都有自成一体的防御体系，其外设有城栅、壕沟、土墙等，甚至筑有门楼，如坞壁。动乱之后的很多村落，不少有篱笆，但并不是防御意义上的围墙。有关这一点，在前文章节中已有论及。

2. 村落民居

村落建筑是村落中最主要的物质实体。唐代村落的建筑主要包括村民屋舍、村学和宗教建筑等。民居是村落居民的栖身之地，也是村落中最主要的建筑。（见插图15）但是目前关于村落建筑的相关记载难以寻觅，仅能通过唐代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述对村居情况做大概了解。唐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建筑的描绘，既包括各类宫苑、园林，也涉及宗教庙寺、乡野村居，但对于乡野村居的描绘一般较为简单。

通过这些描绘，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村落民居一般以茅屋为主，也有部分瓦房。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多首诗中都出现了“茅屋”的意象，典型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25]，《春日江村五首》中“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26]，《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中“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27]。再如唐代杜荀鹤的《闲居书事》：“竹门茅屋带村居，数亩生涯自有余。鬓白只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雁惊风浦渔灯动，猿叫霜林橡实疏。待得功成即西去，时清不问命何如。”^[28]这些诗句虽然与诗人的生活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态。刘驾在《江村》中描绘了江村居民世代居于茅屋的情景：“江水灌稻田，饥年稻亦熟。舟中爱桑麻，日午因成宿。相承几十代，居止连茅屋。四邻不相离，安肯去骨肉。书生说太苦，客路常在目。纵使富贵还，交亲几坟绿。”^[29]这类描绘乡村庐舍为茅屋的诗文不在少数，另在白居易、刘禹锡、王维等人的作品中也常见这类描述，反映了唐代村落民居多为茅屋的现实。

除了茅屋，也有部分瓦房，《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传·韦丹》载：韦丹徙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时，见到当地民众的房屋状况，“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这说明当时在北方地区已经有不少瓦房，而南方地区民间的房屋仍多为“草茨竹椽”。

3. 学校建筑

随着唐代乡村私学的发展，一些学校建筑也见于不少规模较大或相对富庶的村落。但限于乡村教育发展水平及社会发展程度，除了少数得到朝廷或富室强户资助的学堂，唐代乡村学校的

设施与环境一般较差。据《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苗晋卿传》记载，苗晋卿归乡里时“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还有江州义门的陈氏以20顷田为资本资助当地开设了两所学堂（东佳学堂、蒙学堂），两所学堂基本设施齐备，除了教授陈氏宗族子弟，还对游学之士开放。但得到资助的学堂毕竟只是少数，一般的村学只能因陋就简，以草堂、废寺权当学校。据《唐会要》记载，贞元三年，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30]《因话录》中也记载了窦易直幼年上学时，一日因暮时天降暴雨，学生不得返家而夜宿于“漏屋”之下的事情。^[31]而这里所说的“漏屋”应该正是窦易直所在的学堂，可见当时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之简陋。

4.村社建筑

村社是民间社祭发展的结果。社祭主要是指对土地神的崇拜与祭祀，社树和社坛是社神的代表。且先人有立社树之习，早在汉代开始即有封土为坛的习俗祭祀社神。这一习俗在唐代得到延续。如卢纶《寄赠畅当山居》一诗言：“古村荒石路，岁晏独言归。山雪厚三尺，社榆粗十围。”^[32]白居易《有木诗八首》其四云：“有木名杜梨，阴森覆丘壑。心蠹已空朽，根深尚盘薄。……为长社坛下，无人敢芟斫。几度野火来，风回烧不着。”^[33]以上两首诗中所说的杜梨、榆树皆为村中的社树。唐代村落中也有社坛，这在元稹《古社》一诗中也有体现：“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神。惟有空心树，妖狐藏魅人。狐惑意颠倒，臊腥不复闻。丘坟变城郭，花草仍荆榛。良田千万顷，占作天荒田。主人议芟斫，怪见不敢前。那言空山烧，夜随风马奔。飞声鼓鼙震，高焰旗帜翻。逡巡荆棘尽，狐兔无子孙。狐死魅人灭，烟消坛堞存。绕坛旧田地，给授有等伦。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社公千万岁，永保村中民。”^[34]这里的“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

神”“绕坛旧田地，给授有等伦”中的“坛”即指社坛。

5.墓地

墓地是古代乡村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将墓地与居住区域分开的做法，至汉代已经将墓址限定在墓主生前居住或出生的城邑、村落周边的郊野。这种做法在唐代也得以延续。从前引白居易《朱陈村》一诗中“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的说法，即可见一斑。唐代相关史料，如墓志碑刻的表述，都说明了这一点。如《唐文拾遗》卷二十三载：“殇女李氏，赵郡高邑人也，小字孙二。年十六，贞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遘疾终于长安永宁里之旅舍。以十二月三日窆于万年县高平乡西焦村之南原，从权礼也。”卷三十一中“夫人颍川郡人”大中十年二月廿一日终于海盐县之公署，该年十一月廿一日葬于苏州长洲县余杭乡石渚南馆墅村之原。《全唐文》解进墓志铭云：“府君讳进……今籍于京兆府鄠县八步乡解村人也。……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终于河南府河阳县太平乡树楼村之私第。……即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权厝于私第北二里之原。”^[35]《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三载：“府君讳载字载，其先齐太公之后，食采于崔而因氏焉。……以元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遘疾终于幽州蓟县招圣里之私第也。……粤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窆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杜村北一里之原。”通过上述墓志内容可知，唐代居于城邑之中的居民，去世后其墓葬也一般位于城外乡村附近，距离在百步至几里之间不等，乡村居民更是如此。

部分墓志还揭示了墓地所处环境，如《唐文拾遗》卷三十二中载：“夫人讳庆，本望清河郡人也。……以咸通四年□□□□没于天长乡之私室，春秋五十有八。……以当年五月廿七日，安葬于杭州盐官县西□里海昌乡秧田村昌宓里，买得郁师周地，东至孙啍，西至郁师周，南至□滨，北至郁，为新茔，礼也。坟塋俨

成，虽存没异路，夫妻□□莫大焉。伏恐桑田改变，陵谷难分，因刊贞石。”从这则墓志所记载的信息可知，此墓所在之地应该是墓葬聚集处，但此墓是在新买之地所建的新茔，新茔应大致位于墓群边缘地区，因此更容易出现“桑田改变，陵谷难分”的状况。这虽是对为此墓镌刻墓志的缘由所做的说明，但揭露了该墓位于村落周边田野甚至是农田之中的事实。出现如此记录的墓志不在少数，如《唐文拾遗》卷二十六中也出现了此类记载：“府君讳通，其先彭城郡人也。……以元和八年九月十日终于扬州江阳县崇儒坊之私第……以其年十月十八日丁酉，躬护丧柩，安厝于江阳县嘉宁乡五乍村之原，礼也。恐陵谷有变，乃刻石纪德。”由此可以推测，唐代墓葬一般位于村落周边的田野之中，也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2] 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另见爱宕元著，钟翀译：《唐代前期华北村落一类型——河南修武县周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4] 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2014年第2期。

[5]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另见《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邦计部·户籍》载：“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

[6] 收录于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版，第570页。另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6—277页。

[7] 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2014年第2期。

[8] 白居易：《朱陈村》，载《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三。

[9] 统计资料参考陈呈：《唐两京乡村地名考论——以出土唐代墓志为主的考

察》，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77—183页。

[10] 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再探》，《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年第1期。

[11] 《太平广记》卷四百〇四“三宝村”。

[12] 陈呈：《唐两京乡村地名考论——以出土唐代墓志为主的考察》，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01—202页。

[13]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五，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原书载：“在城南杜光村。俗呼杜光寺，本唐义善寺，贞观十九年建，盖杜顺禅师所生之地。”

[14] 西安市雁塔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雁塔区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页。

[15] 杜牧：《江南春》，载《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二。

[16] 李郢：《夏日登信州北楼》，载《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六。

[17] 王维：《渭川田家》，载《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

[18] 王建：《雨过山村》，载《全唐诗》卷三百〇一。

[19] 张继：《阆门即事》，载《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二。

[20] 卢象：《送祖咏》，载《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二。

[21] 张籍：《怀别》，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三。

[22] 《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五《征应一》“隋文帝”。

[23]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编鬼十五》“王鉴”。

[24] 《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二《编精怪五》“卢涵”。

[25]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载《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九。

[26] 杜甫：《春日江村五首》，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八。

[27] 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载《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

[28] 杜荀鹤：《闲居书事》，载《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二。

[29] 刘驾：《江村》，载《全唐诗》卷五百八十五。

[30] 《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31] 《因话录》卷六。

[32] 卢纶：《寄赠畅当山居》，载《全唐诗》卷二百七十八。

[33] 《白居易全集》卷二。

[34] 元稹：《古社》，载《全唐诗》卷三百九十六。

[35] 《全唐文》卷九百九十六。

第四节

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

一、草市的发展与村落

东晋、南朝时期，草市已经在江淮流域出现，但相对较为分散。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随着坊市制度的破坏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民间商品交易以一种不可遏制之势得到长足发展，并以各种形式在全国各地涌现。因此，隋唐时期是草市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草市完成了从民间定期市集向市镇化的转变，并成为乡村基层组织中的新兴单元与重要组成部分。

（一）唐代草市的发展

唐代，为了加强基层控制，政府在推行村坊制、实现城乡分治的同时，对乡村及城市的经济贸易也实行差别化管理，以防止人口流动，保证充足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一方面，唐代朝廷在城邑推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不仅严格规范坊市的设置，还对坊市的开放时间做出限制。《唐六典》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景龙元年（707年）十一月，又对此令做出重申：“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2]另一方面，唐代朝廷严格限制乡村地区非官方市场的发展。唐大中五年（851年）八月令载：“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

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3]

唐代中后期，伴随着民间草市的迅速发展，坊市制度日渐遭受冲击，并逐步走向崩坏。从景龙元年令与大中五年令中可以看出，唐代朝廷一再对州县及其以下地区置市条件做出申明，但与前者“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相比，后者“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的规定，明显对置市条件给予了放松。这说明朝廷对草市的发展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也恰好说明唐代原有的坊市制度已经不断遭遇民间市场带来的挑战，且这种挑战显然已经超过官府的管控，否则何须以律令条文做进一步规范。由此可见民间草市繁盛的发展状况。

（二）唐代草市的种类与规模

唐代的草市种类繁多，如山市、水市、鱼市、橘市、药市、墟市、亥市等，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将这些非官方市场皆归为草市。[4]牟发松先生也对此观点表示赞同。[5]这些非官方市场或以地理位置命名（如山市、水市或在固定地点形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市集），或以交易商品种类命名（如鱼市、橘市、药市等专门化的市集），或以交易时间命名（如墟市、亥市等定期市集），反映了唐代草市的分布状况、交易商品种类与交易的时间和频率等。

罗邕在其《南行》一诗中就提到专门化的鱼市：“腊晴江暖鸂鶒飞，梅雪香黏越女衣。鱼市酒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6]另有唐代诗人元稹《闲二首》中云：“江喧过云雨，船泊打头风。艇子收鱼市，鸦儿噪荻丛。”[7]除鱼市以外，也有药市、橘市等专门化的市集，这类市集以销售地方土产为主，反映

了地方农产资源的特点。如元稹的《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中提到了越州的橘市：“鱼虾集橘市，鹤鹑起亭皋。”[8]应注意的是，这里的橘市在形成之初或许是一个专门售卖当地土产橘子的市集，或以卖橘为主，但同时兼卖鱼虾等商品，兼具综合市集的功能，这说明了此类民间市场的灵活性。

除专门化的市集以外，综合类市集更为多见，草市、山市、水市等大都属于此类。这类市场与坊市所售商品差别不大，往往聚集了各类货物，既包括当地土产，又有经过他处贩运而来的商品，以满足当地民众日常所需。在这类规模较大的草市中，交易参与人员既包括当地民商，也有行商、坐贾，甚至规模较大者还有酒楼邸店。如《酉阳杂俎》中有载：“宝历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桡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诈访其息利之术。……卢笑曰：‘今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也，若是吾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当有匠饼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意相干也。……’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语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也。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足其户，张重箠捍之。……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及市樨就舆，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9]

这则关于草市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这里的白湫南草市就是一个综合市集。从记载中可以看到，该草市所售商品有桡朴、石灰、饼、樨（棺材）等，种类比较繁杂。其次，根据叙述，于白湫南草市贩卖桡朴、石灰的卢氏并非草市所在之地的本地人，而是往来于白湫南草市的荆州人。赵元卿是何处商人，文中并未交代，但其“停于百姓张家”，也说明他并非本地人。由此可见，唐代草市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当地的民众，还有来

自各地的商人。唐代诗人王建的《汴路即事》一诗中“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10]的描述，生动呈现了各地商人经由水路汇聚而来的场景。这也说明了此地沿江草市的繁荣状况。

从《酉阳杂俎》中还可以看出，白汴南草市不仅是一个较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及贸易中转地，还有百姓居住。这说明白汴南草市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定期举行的市集，而是一个具有稳定交易场所的、初具规模的市集。这种市集在唐代中后期已经比较常见。杜牧在其《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中言：“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11]这首诗中所谓的水口草市还有酒楼。这种情况在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中也有描述：“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出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12]这几首诗作于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至和州刺史期间（长庆二年至长庆四年，即822—824年），诗中描绘了唐代长江沿岸酒楼林立、顾客云集的繁华景象，民间市场的这种繁荣场面，已经不亚于都市中的坊市。

此类大规模的民间草市还有许多，荆州江陵城城南的沙头市是唐代繁华草市的代表，唐代不少文学作品都曾对其繁华场面做出描述。如元稹曾作《泛江玩月十二韵》：“共将船载酒，同泛月临江。远树悬金镜，深潭倒玉幢。委波添净练，洞照灭凝釭。闾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巴童唱巫峡，海客话神泷。”^[13]诗中描述了作者夜晚泛江悠游时所见沙头市灯火通明、人物闾咽的热闹场景。王建在其《江陵即事》中也有言：“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寺多红药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14]此诗不仅描绘了沙头市的商贸场景，而且“十里津楼压

大堤”也说明了沙头市的规模较大，并非一般的定期举行的小规模市集。

通过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历经东晋、南朝之后，唐代的草市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已具规模，不再仅限于定期举行的市集。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如果舍弃各类草市形形色色的名目，大致可以将唐代的草市分为两类，即定期交易的乡村市集和初具城市规模的市镇。^[15]相较而言，后者已经成为唐代草市的主体。

（三）唐代草市的分布及特点

一般而言，集市较多分布于人口流动频繁与人口密集区域或交通枢纽地带，如河流渡口、村中道路两旁或城郭近郊等。唐代的草市亦是如此，根据上述对唐代草市种类的梳理可以看出，唐代的草市以沿江、沿河流域的津埠渡口为最。

一般而言，沿江、沿河流域的津埠渡口作为水系交通线路的中转站及枢纽，不仅往来人口众多，而且各类商品、货物皆经此向周边地区传递输送。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为民间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成为草市的主要分布区。东晋、南朝时期草市集中于江淮流域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唐人有言“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正点明了津埠渡口对于置市的重要作用。如据《唐会要》卷七十一载：“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16]这里所说的灌家口，应是黄河南岸临邑县附近的一个渡口，草市即位于这个渡口。由于草市非官方市场的身份，唐代史籍中较少出现关于草市的记载。但唐代文学作品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补充。如《唐文拾遗》卷三十载：“会稽东不远七十里，有大泽曰虞江，江之东南廿里有草

市，粤五大夫，在凤山南面。……。故其地也，聚天下之民，鬻天下之货。市之南岗则德兴村，大云寺置庄于兹市之北新江路，路通于市。”^[17]这里就提到了虞江东南20里处的草市。上文所引王建《汴路即事》中的江边草市，《酉阳杂俎》中出现的白汭南市，杜牧诗中的水口草市，刘禹锡诗中长江沿岸的草市，元稹、王建诗中的江陵沙头市等，皆属此类。

除了水运线路沿岸的津埠渡口，城池近郊地区也是草市的主要分布区域。张祜在其《钟陵旅泊》一诗中就提到这类草市：“城街西面驿堤连，十里长江夜看船。渔市月中人静过，酒家灯下犬长眠。”^[18]这里的渔市即位于洪州城西。另有杜牧所作的《润州二首》^[19]也提到了位于润州城郊的草市。

此外，部分村落附近也可见民间市集的分布。如顾况在其《青弋江》中提到了位于村边的草市：“淒清回泊夜，沦波激石响。村边草市桥，月下罢师网。”李嘉佑的《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中也可见对楚州城附近山村草市的描写：“十里山村道，千峰栎树林。霜浓竹枝亚，岁晚荻花深。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幽居虽可羨，无那子牟心。”^[20]这里的草市位于山村附近，因地理位置的限制，草市中的商品较受限制，售卖货物的人员也以当地樵客和渔夫为多。可见，唐代距离城邑较近的山村也能够享受到草市带来的便利，进行一定的商业交换活动。

那么山村地区是否也有草市的发展？杜牧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一文给出了解答。文中有言江贼将劫掠而来的财物销往茶山，每逢茶熟之际，各地商人即入山交易，向茶山民众销售金银华服。^[21]可见杜牧文中所提到的茶山是有交易市场存在的。另有唐代诗人项斯的《山行》一诗也可对此做出补充：“青枳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数家分。山当日午回峰影，草带泥痕过鹿群。

蒸茗气从茅舍出，缲丝声隔竹篱闻。行逢卖药归来客，不惜相随入岛云。”[22]诗中记录了作者行至深山的见闻，但作者能够在深山遇到卖药归来的人，说明当地周边有交易市场存在。

相较而言，唐代南方地区草市的发展比北方更为繁盛。上文所列举的大量渡口草市、鱼市，一般都位于南方沿江、沿河地区，尤其是江淮流域及其支系水域。有学者曾指出，长江中游沿岸的草市数量大致与津埠河渡的相仿。对于江淮流域草市的记载在其他文献中也随处可见，如《元和郡县志》中就有关于汉阳县西80里处有赤壁草市的记载。[23]另有诗人韦庄在其《建昌渡暝吟》中记：“月照临官渡，乡情独浩然。鸟栖彭蠡树，月上建昌船。市散渔翁醉，楼深贾客眠。隔江何处笛，吹断绿杨烟。”[24]诗中描绘了夜晚洪州（今江西）建昌渡草市散市之后的场景。虚中所作《泊洞庭》描绘了洞庭湖沿岸的鱼市：“槐柳未知秋，依依馆驿头。客心俱念远，时雨自相留。浪没货鱼市，帆高卖酒楼。夜来思展转，故里在南州。”[25]另有郑谷的《峡中寓止二首》描绘了荆州地区的草市：“荆州未解围，小县结茅茨。强对官人笑，甘为野鹤欺。江春铺网阔，市晚鬻蔬迟。子美犹如此，翻然不敢悲。传闻殊不定，銮辂几时还。俗易无常性，江清见老颜。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寨将来相问，儿童竞启关。”[26]方干所作的《越中言事二首（咸通八年琅琊公到任后作）》则描述了浙江境内的鱼市：“百里湖波轻撼月，五更军角慢吹霜。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27]

可见江淮流域草市的分布已经十分普遍，并得到深入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体现为分布区域的扩大，而且体现为草市体量的充盈。这里所说的体量不仅包括上文言及的草市的实体规模，还包括草市的商业规模、财力、物力、构成成分等多个方面。以下有两则记录可以充分反映唐代南方地区草市的体量状

况。《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一载杜牧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言：“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某到任才九月，日寻穷询访，实知端倪。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缁纈、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仗。……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阳县市，凡杀六人，内取一人，屠剗心腹，仰天祭拜。自迩以来，频于邻州，大有劫杀，沉舟灭迹者，即莫知其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年获安者。”

作为对江贼常年抢劫长江中游沿岸草市的讨伐上书，该文至少透露出有关草市的如下几个信息。一是为我们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南方地区草市多沿江津埠渡口分布，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二是草市商贸已经成为江淮地区赋税的主要来源，并在国家赋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足见江淮地区草市的商业规模与财力。三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草市十分繁盛与富庶。“异色财物”“锦绣缁纈、金钗银钏”“富室大户，多居其间”等描述都说明，这里的草市已非小型的贸易市场，居住成员也不仅仅包括商贩，已经有不少富室大户，并构成草市的主要组成部分。凡此种种，似乎表明在长江中游地区，已经有不少草市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兼具商贸与居住性质的市镇。上文所提沙头

市即是这类大规模、大体量草市的代表。

陈溪于咸通十年（869年）五月十五日撰写的《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中也可可见此类草市：“以唐昌县中界接导江郫城，东西绵远，不啻两舍。虽有村落，僻在荒唐。昔置邮亭，废毁将久。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饮，贸易者星往而烛归。勸公行，投告无所。深沟雨涨，古陌桥摧。跬步难逾，艰苦宁述。况输役责限，徵敛有程。而欲罪其稽逋者乎？公惻然凝想，即日计成，遂陈于连帅，于其心而置草市。因其乡名，便以建德为号。自此四来者旋踵而迓近，中望者举目而知归。老幼携挈，倏忽而至。万家欢笑，共事修营，不旬日而告就。今则百货咸集，蠹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榆杨相接，桑麻渐繁。如此牧人，可谓移风易俗矣。……其日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则往来者非止昼食，而卜夜可矣。人既繁会，俗已丰饶。”^[28]这里的唐昌县建德草市是一个在交通沿线的乡发展起来的草市，虽然草市因人为主导而设置，但这是建立在该地业已具备置市条件的基础之上的：“昔置邮亭，废毁将久”，说明该地位于交通沿线，往来流动人口众多；“贸易者星往而烛归”，说明该地存在商贸活动。因此，鉴于天气恶劣、道路损毁，且路途漫长，往来人员又往往身负经贸责任，建立草市就有了必要。通过文中描述可知，草市建立以后该地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商人众多，而且店铺、旅社林立，各地的商人都汇聚于此，每日流通至此的商旅货物数以万计，各类“受用之具”乃至“珍纤之玩”都成为草市的商品。“百货咸集，蠹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正是对这种繁华场面的描述。建德草市俨然从一个普通乡村变成了一个商贸发达、物阜民丰的“不夜城”。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唐代中晚期，南方民间草市的市镇化

发展已经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南方草市的大量出现除了与上文所述的南方水运发达、以津埠渡口为基础的草市的大量发展有重要关系外，还与南方地区坊市制度的实施状况关联紧密。

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南方地区山脉、丘陵众多，河流广布，城邑多依地形而建，难以形成北方城市的方正形态，因此不少地区难以像北方那样进行统一的里、坊划分，并形成城郭。因此如江西的丰城、新吴等部分地区终唐一代始终未建城。^[29]这就决定了南方不少地区先天缺乏坊市设置条件，但为当地草市的形成与市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唐以后南方地区出现不少以这类市镇化草市为基础重新置县现象的原因。《太平寰宇记》中对洪州分宁县置县的记载为此提供了一个案例：“本当州之亥市也。……聚江、鄂、洪、潭四州之人，去武宁二百余里，豪富物产充之。唐贞元十六年置县，以分宁名之。”^[30]此处的洪州分宁县就是从一个定期举办的民间非官方市场亥市逐渐发展成为物产充实、豪富汇聚的市镇。

（四）唐政府对草市的管理

虽然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以限制非官方市场的发展，但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膨胀，坊市制度渐遭破坏，民间草市以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迅速发展，并逐渐规模化。对此，尽管唐代政府一直未对其合法地位进行认可，但不得不采取手段进行管理。具体而言，唐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管理措施。

其一，将部分县治所在地移至附近发展规模较大的草市。如由原治所虎遥城迁往乡村市集临湍聚的邓州新城县，后改名为临

湍县。另有唐德州归化县、宗州永济县[31]等也属此类。其二，对不易设县的地区设置军镇或镇场进行管理。元和年间的鄂州唐年县锡山镇即因锡山草市而置。[32]其三，设置税务机构进行管理，这也是为应对税物征收需要出现的一种办法。前述白湫南草市即因入户输纳不便，唐政府于大中年间（847—860年）在该地设置了征科巡院。[33]其四，派遣官员管理草市，使之成为合法市场。柳宗元在其《童区寄传》中就记录了这类市集：“童寄者，郴州茆牧儿也。行牧且茆，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34]这则事例中，“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即儿童区寄被卖往的墟市的官吏。

以上几种手段都是唐代政府为了管理草市所采取的举措，或使之成为合法市场，或以各种形式将其纳入管理体系。这虽是唐代政府无法遏制草市旺盛的生命力所做出的应对性措施，但一定程度上也为草市的发展预留了生存空间。因此，自唐代中晚期开始，大批草市由非官方的集市逐渐向市镇化或官方化发展，最终于五代时期完全被纳入官市系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五代时期全国新设市镇共计32个，另有50个市镇升为县。其中，仅南方就有40个市镇在五代时期成为县治所在地。[35]这正是唐代草市发展的结果。

二、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

农业生产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存，而且是一个国家得以发展

的基础。隋唐前期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及日趋完善的政治制度，为这一时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及制度保障。因此，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生活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见插图16）

唐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灌溉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创新及对土地利用程度（耕地种类、精细化、复种制）的提高。

灌溉技术的发展是隋唐五代时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主要体现之一，其成就主要表现为水利设施兴建水平的提高与灌溉工具的发明和创造。

随着国家人口的增多，土地开垦程度逐渐提高，大面积的土地转化为农田。尤其是中唐至五代时期，大量人口的南迁，促使南方地区尚未被利用的广大山区与丘陵腹地被开垦并投入农业生产。囿于农作物种植对水资源的依赖，农田灌溉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较为重视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根据李剑农先生对唐、五代时期兴建水利工程数据的统计，唐代兴建水利工程最多的地区依次为浙江（44个）、陕西（32个）、山西（32个）、河北（24个）、江西（20个）、福建（20个）。[36]根据这一数据，他认为唐代的水利事业首先是从北方地区开始的，而后发展至南方地区。但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水利工程皆以灌溉农田、防治水旱灾害为主要目的。这从水利工程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扎堆分布即可看出。阎守诚先生对唐代水利工程的分类统计结果，也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他根据唐代水利工程功用的不同，将其分为4类，即农田灌溉、漕运交通、防治水害、居民用水，并分别对每个种类的水利工程做出数量统计。结果显示，唐代兴建的323项水利工程中，农田灌溉工程计255项（占总数的78.95%），防治水害

工程计33项（占10.22%）。另有唐代史料记载，江西观察使韦丹在其任期内就主持修建了598座陂塘。[\[3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唐政府对农田灌溉水利的重视。

除了大量兴建水利工程，唐代在水利工程兴建技术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在地表水的引流与控制、地下水的汲取和输送方面都有体现。如唐人对都江堰工程的再建设，就充分体现了当时地表水引流的技术水平。[\[38\]](#)它山堰工程及钱塘湖蓄水工程，也反映了唐代人在引流工程中对引水量与工程蓄洪、溢洪量的科学推断。[\[39\]](#)除引水之外，地表水的输送与分配也是水利工程的重要部分。在此问题上，唐代继承了前人的闸门技术，并在其基础上创造出具有多种功用的闸门以供调控水量，如进水闸、节制闸、分水闸、防潮闸等。唐人重修的灵渠，就采用了以18座斗门形成的复合闸门系统。这种系统通过复合闸门的协作来控制水量，保证舟楫通行。[\[40\]](#)郑白渠上也有各种闸门176座，以保证蓄水对周围农田的平均分配。[\[41\]](#)

地下水及低洼的湖泊、池塘的使用，就需要借助汲水工具。正是这一诉求，促使如水车、翻车、筒车（见插图17）等灌溉工具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在农业生产中被普遍应用。水车是唐代重要的灌溉工具，翻车和筒车实际上是水车的一种。唐代以前的汲水工具主要为桔槔，其在唐代农业灌溉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缺点是无法连续取水。唐前期出现了在东汉翻车的基础上改造的龙骨水车，时人也称“井车”。[\[42\]](#)这种水车借助人力或畜力作用于齿轮传动系统实现持续转动取水，并通过引水渠将水输送至田间地头，这就补充了桔槔的不足，且更为便利。唐人陈廷章曾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43\]](#)

水车的应用在唐代前期已经可见，据《太平广记》记

载：“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44]可见在邓玄挺生活的唐代早期已经有脚踏水车。不止有脚踏，唐代的水车还有手转、牛拉的形式，其工作原理与脚踏水车基本相同。至唐代后期，水车已经成为唐代农田灌溉的主要工具。这在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的一则史料中可以得到体现：“闰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45]这则史料记载了朝廷命造水车样品，并将其下发给百姓的事例。唐代还出现了一种以水力为动力的水车“机汲”。这种装置由畚（竹桶）、梟（木桩）与架空索槌、辘轳、铁制滑轮等结合而成，可实现由低处往高处自动取水。刘禹锡的《机汲记》一文记载了这种装置的工作原理：“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梟，辇石以壮其趾，如建标焉。索绠以为絙，系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46]唐人对水动力的控制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对唐代农业的生产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甚至惠及手工业乃至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唐代的耕种工具也有所创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曲辕犁的发明。（见插图18）曲辕犁最大的特点即以曲辕代替了直辕，并设置有专门控制耕地深度的机关，以便更好地根据实际所需控制耕地深浅。陆龟蒙在其《耒耜经》中就记载了唐代使用曲辕犁的状况：“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镜，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木与金凡十有一事。”^[47]此外，本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唐代的其他耕种工具：“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垆去芟

者焉。爬而后有礪磳焉，有礪磳焉，自爬至礪磳皆有齿，礪磳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48]其中就提到了耙、礪磳、礪磳这类耕作工具。

由上可知，唐代在农田水利工程修建水平以及生产工具织造技术方面都有所提升，这也为这一时期耕地的精细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耕地的精细化发展是隋唐五代时期农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隋唐以前，农业生产基本上延续了刀耕火种的粗放型耕种模式。至隋唐时期，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生产力及耕地面积提出了要求，传统的刀耕火种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高的粮食需求。这促进了唐代农业生产模式的变化。一方面，人口的流动与迁移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社会的动乱致使大批人口南迁，包括山林、丘陵在内的大部分南方土地，皆被开垦，占为农田。唐代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农民占山为田的记录。如温庭筠在其《烧歌》记：“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复相连。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随回风尽，远照檐茅赤。邻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早田。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49]这里所言“烧畲为早田”正是对唐代南方地区焚烧山林为耕地的描述。但“烧畲”的特点不仅在于将山林变为耕地，而且每年都会变更地方。所谓“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50]正是此意。

然而，随着土地的不断转化，南方地区可被继续开垦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小，而北方土地的利用程度早已趋于饱和，正如唐代诗人元结所言：“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51]可见烧山占田等依靠扩大耕地面积进行耕种的粗放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时，改变土壤条

件以提高土壤种植能力、加强农作物生存能力，就成了必然。因此，这一时期，农作物肥料的种类、堆肥方式及农作物抵御灾害的方法等都有所发展。唐代的肥料仍然主要为绿肥及人、畜粪便。唐末或五代初期韩鄂的《四时纂要》一书中明确记载了当时所使用的灰粪、牛羊粪、鸡粪、驴马粪、人粪和绿肥等多种肥料，还分别记录了各种肥料的堆肥及施用方式，如“牛羊粪正月贮之”，“（种大葫芦）二月初，掘地作坑，方四五尺，深亦如之，实填油麻、绿豆秸及烂草等，一重粪土一重草，如此四五重，向上尺余，着粪土种十来颗子”^[52]。此外，在农作物虫害防治方面，唐人也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应对，如捕捉、烧杀等，而非过去寄希望于神灵，以修德的方式禳除天灾。

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土壤养分的提高，也促进了农作物耕种模式的改变。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唐代还出现了复种制，即每年耕种两轮农作物，改变了以前每年只种植一季作物的耕种模式。北方地区的复种制体现为粟、麦复种，南方地区也在唐代晚期出现了稻、麦复种的模式。^[53]《旧唐书》载，贞观十四年（640年），栌阳丞刘仁轨上表曰：“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54]明显可以看出，当时该地已经采用了两季作物复种的模式。此外，白居易的诗《杜陵叟》曰：“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55]元稹的诗《竞舟》云：“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56]这都是对唐代稻、麦复种状况的形象描述。

由上可知，有赖于农业灌溉技术、生产工具、耕种模式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土地利用效率、农业生产率都得到较大的提高，从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生产模式转变为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

为这一时期及以后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民间组织与村落

由各类乡族势力构成的民间组织，是衍生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内部的民间力量，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及秩序的维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与国家基层权力一起，构成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量。

长久以来，乡族势力对古代乡村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家权力与乡族势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方式等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如马克斯·韦伯、费孝通、温铁军等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两种力量，并肯定了乡村势力对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国家扶持并依靠乡族势力施行国家权力，形成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他还认为乡族势力的组织形态是动态发展的，可以是血缘性的，也可以地缘性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所有实体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57]据此我们可以说，唐代乡村社会的民间势力是丰富而多元的，具体可体现为乡村结社，以富民阶层、宗族势力、市民阶层乃至退職官员为代表的乡族势力等。这类组织或群体力量不仅在唐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协调国家力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村落结社的出现

村落结社是隋唐五代时期乡村地区因祭社活动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早期祭社是指对土地神的崇拜祭祀，有

固定的春、秋祭和岁末祭，偶遇灾害需祈福禳灾之时也会举行社祭。社祭通常要求全体邑、里居民参加，并举行私社与娱乐活动。因此，社也逐渐发展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单元，并在西周时期与邑、里共同构成具有国家基层政权性质的社会组织。历经春秋战国、两汉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社的政治职能逐渐弱化，并与邑、里逐渐分离，成为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会社。这在汉代的官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在此过程中，里、社的分离，也促进了官社以外民间私社的发展。如魏晋时期佛教的兴盛，就促进了以佛事活动为主的“邑义”“法社”等佛教组织的出现，还有因社会动荡聚族而成的“宗社”，以及因职业或阶层形成的社组织。[58]

至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结社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私社。这类私社不再仅以宗教活动作为结社的主要目的，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和生活互助也成为乡村结社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宗教或经济关系而结合的各类“社”，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两种主要的民间力量，并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在当时乡村秩序的维护及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隋唐五代时期私社的发展状况

隋建国之初，因加强地方管理的需要，统治者十分重视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因此，统治者对民间私社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据《隋书·食货志》中记载：“（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59]除此之外，隋炀帝也对民间结社行为持支持态度。据《隋书·酷吏·王文同传》记载：“及（炀）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

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帝闻而大怒，遣使者达奚善意驰锁之，斩于河间，以谢百姓。”^[60]

从这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出，隋初统治者即“劝课当社，共立义仓”，其目的在于丰收时囤积粮仓，以应对青黄不接之需。这里乡村结社显然已经成为实现民众互助互济的途径之一，这为隋唐五代乡村以经济互助为目的的私社的发展奠定了基调。隋炀帝时，尽管没有正式的文件表明朝廷的态度，但炀帝因佛会之事斩杀官员的事件，也充分说明了统治者对民间结社一事的立场。与此同时，通过此事我们也可了解到，当时佛会的规模并不小，参与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

因此，在隋朝官方的鼓励与引导下，民间私社在当时得到了较大发展。《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载：“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寅朔廿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岁之秋，合为仲契，每月设斋，吉凶相逮。今蒙皇家之明德，开兴二教，然诸人等，谨请比丘僧钦为师徒名，曰大邑。”^[61]碑记所载佛弟子李阿昌等20家结为一个团体，每月设斋，无论吉凶事件都由社团成员共同承担，互相帮助。这虽然是佛教信徒共同结合的团体，但其已经与魏晋时期以佛事活动为结社目的佛社有所不同，吉凶共度、互相帮助才是其主要目的。这种结社目的的变化，显然与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社发展的相关导向关系密切。

唐代以降，不仅官社得到充分发展，民间私社经由隋代的发展也成为民间社会的普遍现象。唐初诗人王梵志就曾描绘唐初村落结社的状况：“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这里的社邑，就是村坊民众因丧葬之事结合而成的互助组织。

至高宗时，朝廷开始明令限制除春秋二社以外的各类民间私社的发展。咸亨五年（674年），唐高宗李治颁布诏书曰：“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62]诏令中说明统治者已经清晰认识到，民间私社的建立对“吉凶之家”以及部分家庭来说小有裨益，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件“劳扰”之事，因此下令禁断民间的各种私社。这种态度一直持续至玄宗时期。《资治通鉴》记载了武周时期的一则事例：“（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63]这则事例中，王弘义“见闾里耆老作邑斋”，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之上报地方政府，最终使得“作邑斋”的200余人被杀，王弘义还因此被授予官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对于民间社邑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这也反映了尽管自唐初开始民间社邑就屡遭禁断，但朝廷仍然未能阻止民间结社的发展，而且这类私社的规模并不小，就连乡闾耆老也参与其中。

至唐玄宗时期，政府对民间私社的限制开始有所放松，但是这种放松根据私社的具体种类而定。敦煌文书1344号记：“敕，诸山隐逸人，非规避等色，不须禁断。仍令所由察觉，勿使广聚徒作。敕，如闻诸州百姓，结构朋党，作排山社，宜令州县严加禁断。”^[64]从这条敕令中可以看出，其中所说的“排山社”已经与民间以经济互助为目的所建立的私社有很大的区别，“结构朋党”说明部分私社实际上成为部分民众拉帮结派、建立私党的方式。因此，对统治者而言，这种团体是必须严加禁止的。尽管唐政府曾多次下令限制私社发展，但仍然没能遏制民间私社旺盛的

生命力。天宝元年，玄宗曾下令规定民间私社要与官社同日祭祀。^[65]这一规定充分说明唐代政府已经开始对民间私社的发展做出一定的妥协。而在天宝七年玄宗对民间私社再次下达的禁令^[66]中，统治者因对民间私社在祭祀时“皆杀生命，以资宴集”的做法流露出“仁者之心”而禁断私社，这说明了唐代统治者对民间私社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这种禁断对于唐代前期虽遭强力打压仍然得以发展的民间私社所起到的约束作用如何，已毋庸多言。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政府长期限制民间私社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一方面，陷入混乱并逐渐衰败的唐政府，已经无暇顾及私社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以及赋税制度的改革，使民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境。群体抱团与经济互助，成为民众维持生活、寻求生存之路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唐代民间私社集中于唐代后期出现的主要原因。

2. 乡村结社的功能与种类

隋唐五代时期的民间结社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以从事佛教活动为主的私社和以经济与生活互助为目的的私社，亦有兼具两种功能的社。^[67]前者主要由佛教弟子或者佛教信徒组成，曾在东晋南北朝时十分盛行，被称为“邑”“邑义”“邑会”“法邑”等，与社有所区别。至唐代，“社”与“邑”已经没有明显区分，常被混用。^[68]唐代佛教结社的规模一般在十几人至几十人之间，也有部分可达数百人至一千多人。^[69]这类结社的形成往往与其所进行佛事活动的内容有关，如营窟、造像、修寺、燃灯、念经、写经、刻经、行像、斋会、诵经等。因此，根据佛事活动内容不同，佛教结社也可分为很多具体种类，如修窟社、修佛堂社、刻石经社、燃灯社、行象社、念金刚经社等。

隋唐五代时期的乡村中常见这类佛教结社。唐代《白鹿乡并

谷村佛堂碑铭》载：“天竺人师，亿劫行化，众生得悟，永离苦海者哉！则有我此邑耆宿长幼士女等，知身觉悟，共发齐心。且好人恶煞，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法焉！于是矻矻勤心，孜孜不怠，从元和初，递相谓曰：‘各减毫分施舍，共修功德，预造桥梁者矣。’日来月往，世事如流。俄尔之间，二十余年。凡修功德七八余件。从元和六载辛卯岁，崇立石灯台一所；又十年乙未岁，创造讲堂一所；又十一年景申岁，翻瓦佛殿，安鸱鸱头，修换覆阶；又十三年戊戌岁，后辈小邑社十四五人，崇立尊胜陀罗尼石幢一所；又十四年己亥岁，造泗州石和尚一铺；又宝历元年乙巳岁，造西廊全五间。今又发心起修钟楼，舍施青鳧。上至十年、五千，下至百十、五十，或则社例均率造诸功德亦如之。有诸图画幡额，不能备书。……文素不才，社邑相推。聊笔略述，直书其事。故立碑铭，以贻后世。”^[70]

根据上述碑记内容，白鹿乡井谷村的村民组织佛社已有20多年，在此期间即组织了七八次大型的佛事活动，如立灯台、创讲堂、翻修瓦佛殿、立石幢、造佛像、修钟楼等。《房山石经题记》中也有关于唐代幽州地区乡村民众共同组建佛社的记载，如张沈村邑、团柳村邑、涑水县楼村邑等。^[71]这类佛社一般要求社中成员严格遵守社条中的规定，将社中的佛事活动作为必须承担的义务，并按照需要进行供纳。如据伯3544号文书《唐大中九年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凭》^[72]记载：

1社长王武、社官张海清、录事唐神奴等，为城煌贼

2乱，破散田苗，社邑难营，不能行下。今大中九年

3九月九日就张禄子家，再立条件为凭

4敦煌一群（郡），礼仪之乡，一为圣主皇帝，二为建

5窟之因，三为先亡父母追凶就吉，共结量（良）缘
6用为后验。
7一：社内每年三斋二社，每斋人各助麦一
8斗；每社各麦一□，粟一斗。其社官禄（事）
9行下文贴、其物违时，罚酒一角。其斋正
10月、五月、九月；其社二月、八月。其斋、社违
11月，罚麦一硕，决杖卅；行香不到，罚麦
12一斗。
13一：社内三大者有死亡，赠四尺祭盘一，布贰丈，
14色布两疋半、其赠物及欠少一色，罚
15酒半瓮。
（后缺）

在这则文书中可以看出，此社不仅要求社人每年要为“三斋两社”提供麦、粟，如果遇到社中成员死亡，还要为其提供祭盘和布。

还有部分佛社与僧庙寺院联系密切，社中成员受到佛教僧团组织的控制或限制，还要为寺院提供劳务，成为佛教僧团组织或寺院的经济与劳动力来源。有学者指出，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73\]](#)

以经济和生活互助为目的的私社，是隋唐五代时期乡村社会最为常见的民间组织。顾名思义，这类组织多因民众的经济互助或乡村生活中的丧葬、水利管理、买卖生产与生活物资、社祭等活动结合而成，通常以地域为单位开展。如兄弟社、亲情社等以

经济互助或丧葬为目的结合的团体，渠社这类因修建水利工程成立的组织，牛社、米社等因生活与生产所需抱团、相互接济形成的私社等。这类民间团体的形成与唐代乡村社会民众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

如丧葬社的形成即与唐代社会厚葬风气的盛行直接相关。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敦煌遗书发现的社邑文书中，共有100多件社司转帖，其中就有23件是通知社中成员参加营葬的，确属为记录社员捐资助物的《纳赠历》也有9件。^[74]这正是唐代丧葬社在乡村社会盛行的结果。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仅凭一家之力往往难以厚葬死者，结团成社、团内成员互助就为乡村民间社会的厚葬提供了可能。早在太宗时期，韦挺就曾对因厚葬而结社的现象给予过批评，并请奏给予惩革和整治。《新唐书·韦挺传》载：“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槨，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今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在这份上疏中，韦挺指出了当时“以荣送葬”，以及婚嫁时奏乐宴饮、讲排场的社会风气，造成民间丧事先造邑社后发丧的现象。他认为这样的葬礼虽然打着孝顺的名义，实则违背父母之恩，婚嫁之事也完全与传统的夫妇之道相悖，因此希望太宗能够惩革这种习俗。

牛社、马社、渠社、米社等是因乡村民众生产、生活所需而产生的，是居民内部经济互助或生产互助的一种体现。虽然唐代政府对民间私社的设立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对此类组织的建立给予了一定支持，以满足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如玄宗时期，永州刺史韦宙就曾为了帮助民众解决农

业生产耕牛缺乏的问题而组织乡村百姓成立牛社。[75]

3. 乡村结社的组织形式

尽管唐代的民间社邑是民众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但是有着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根据目前发现的相关敦煌文书来看，唐代的民间结社不仅有各自的社条，而且有明确的管理者。社条一般规定了社的宗旨、职能以及活动方式，社人的权利与义务和相关规章制度等，涉及成员入社与退社、社的管理、活动组织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敦煌文书中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社邑组织对民众的入社和退社有着严格的规定。成员在入社前需要提出申请，即写投社状[76]，并获得社众及管理者的认可，还需在入社礼之后昭示社人，才能完成入社。入社之后不能随便退社，否则就要遭到处罚，甚至有的社还规定成员死亡后由子女继承社员身份，直至绝户。[77]部分后入社者还需要缴纳一定的物资。根据敦煌社邑文书所载内容来看，经济互助是乡村私社成员申请入社的主要目的，也有部分人想通过入社结交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依靠和保障。这也是常在社条中见社员声称自己“生居末代，长值贫门”的原因。

由于乡村结社的主要目的是经济互助与生活帮扶，这些私社成立以后，若遇到社里有事，会通过义聚的方式进行财产的累积。各成员需要依据社条规定的数量向社缴纳物资，也存在部分成员难以达到社条规定，而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缴纳物资的情况。这些缴纳来的物资，除了用作处理问题事件以外，其他多余资产则被作为公共物资进入仓库，以备不时之需。春秋季乏粮缺种之时为社员借贷粮食就是这类私社仓库义聚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据敦煌文书P.3959《社司付社人粟黄麻麦历》记载：

（前缺）

兵马使马定奴付粟两硕，秋叁硕；付黄麻肆斗五升，秋陆斗（柒）（升）（半）

张住子付粟两硕，秋叁硕；付黄麻肆斗五升，秋陆斗七升半，付麦叁硕，秋肆硕伍斗。

马定德付粟两硕，秋叁硕；付黄麻肆斗五升，秋陆斗七升半；付麦叁硕，秋肆硕伍斗

张金光奴便麦伍硕，至秋柒硕伍斗，还唐押衙。

兵马使马定奴便麦柒硕，至秋拾硕伍斗：

又麦四石五斗，又麦两石。

其麦还唐押衙，口承人马富庆。

散物日破麦壹石五斗一升，破粟两硕伍斗，破麻壹斗，又破麦壹硕伍斗。

散物后三官分付团家粟捌硕，又付黄麻壹硕伍斗。[\[78\]](#)

这件借贷文书中就明确记载了社中成员向社仓借贷粮食的事情，并涉及偿还时间、偿还数量以及见证人等内容。尽管借贷人要支付高达50%的借待利率，但是这为借贷人提供了应急的途径，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社条还规定了部分活动的组织形式，如据部分丧葬社的规定，操办丧事时需要主家事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财物，并且操办酒席，社中成员义聚财物、出车舆和人力协助操办。[\[79\]](#)

三官是乡村社邑的管理者，包括社长、社官和录事。三官一

般由社人推选，但所推选之人通常为社中年长具有威望者，以及官吏或者僧侣。如据敦煌文书P.3989景福三年（894年）的立社契约：“众请社长翟文庆文，众请社官梁海润，请录事汜彦宗。”[80]S.6537v3-5中的社条规定：“老者，请为社长，须制不律之徒。次者，充为社官，但是事当其理。更拣无胆后德，智有先诚，切齿严凝，请为录事。”[81]可见社长是最高管理者，社官是社长的辅佐，有时对社内事物具有决策权，录事负责社内事物的具体执行。社中的临时事件，通常由录事以转帖的形式通知社中成员。三官选举出来以后，社内的所有事情均由三官处理，社员要服从三官管理，严格遵守社约，否则就要遭到处罚。如敦煌文书P.4003《壬午年十二月十八日渠社转帖》[82]载：

1渠社 转帖

2右缘尹阿朵兄身故，合有吊酒壹瓮，

3人各粟壹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

4十九日卯时，并身及粟，汜录事门前兰

5若门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

6者罚酒半瓮。其帖立递相分付，不得亭（停）

7滞者。

8壬午年十二月十八日录事帖。

9翟水官 宋都头 贾再昌 贾粉堆 高

10员佑 安保子 安保千 安万升 樊住通 张

11衍子 尹善友 尹郭三 宋清灰 尹昌子 张

12六归 张员宗 张富德 马清儿 史保住

这件渠社转帖中因社员尹阿朵兄弟去世，明确要求社内成员在一定期限内缴纳物资置办丧事，未到者就要遭受处罚，可见社规对于成员的约束作用。

综上，可以发现，尽管隋唐五代时期的私社屡遭朝廷禁止，但其不仅仍然大量出现于乡村地区，而且民间私社的种类和形式在唐代越发多样。究其原因，这种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或宗教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团体的形成，是顺应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唐末五代，乡村结社更成为民众以互助形式维持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可以肯定，作为民间组织团体，乡村私社以完整的组织形式及管理方式，在村落社会发挥着调节作用，成为国家基层管理力量的重要补充。

（二）乡族对村落社会的控制

隋唐五代时期的民间组织力量相对多元，除了上述村社组织以外，富民阶层、宗族组织、士人、退職官员等也是乡族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隋唐时期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而且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乡族势力的种类

（1）富民阶层

富民阶层的出现与崛起是唐代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阶层最初是伴随着唐代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破坏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最终成为唐代乡村的一股强势力量。根据前文相关论述可知，均田制虽然保证了农民对于土地的占有，但由于实施不彻底，不仅在实施之初就为社会定下贫富有差的基调，而且对土地买卖的允许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阶级分化，

实际上维护的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加之赋税制度的沉重剥削与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致使贫者愈贫，富者更富。土地兼并与逃户现象的愈演愈烈，是这种制度缺陷的直接体现。土地兼并也是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始作俑者。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土地向资本占有群体的流动与聚拢，小农集体最终因失地沦为佃农与雇农，富民阶层则因掌握大量土地资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宰者。尤其是至唐代中晚期，唐政府乡村管理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将富户豪族纳入官方权力系统，成为国家力量在地方的实际执行者。

（2）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也是唐代乡族势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上文所述，唐代村落与早期聚落一样，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聚居单元，尤其是在唐代以儒家伦理为道德风尚及乡村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下，唐代的乡村宗族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与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有所不同，唐代村落的宗族多为以小家庭为基础形成的世系同居大家族。一个村往往由一个或多个这类大家族组成。前文论及唐代村落以单一或复合姓氏作为主要命名方式的特点，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可补充几例，对唐代乡村宗族的发展状况做进一步说明。

目前所存河南修武县《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83\]](#)中记载，周村共有18家130口，14家为周姓，外姓仅刘氏、桑氏、段氏、孙氏4家，且刘氏、桑氏两家与周氏存在婚姻关系。而在周村的18家中，有3家为二世同籍（居），11家三世同籍（居），4家四世同籍（居）。[\[84\]](#)另如《敦煌名族志》残卷所载，阴稠一户也是这类宗族繁盛的大家族，阴稠共有4子，至孙辈已有12子，构成了17户大家庭。[\[85\]](#)关于上文中五代同居的董思宠家族，虽然文献中未详细记录董家具体户数，但根据其子孙的数量八十有

余来看，其户数也应该在几十户。根据唐代村坊制中的规定，10户以下不设村，不满10户要并入大村，因此可推断唐代的村一般应在10~110户。对此，有学者曾经过考证认为，在唐代村落中，10户以下和100户以上的村并不多，一般的村应在20~40户，并指出数十户规模的村一般是同一宗族聚居或数宗族杂居的状态。^[86]若此推断成立，那么上引材料中的周氏家族、拥有17户大家庭的阴稠家族、五代同居的董氏家族，基本上构成了其所在村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这类世系家族已经成为唐代村落的主体。

还需要指出的是，唐代乡村宗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制度，不仅设有统领全族的族长、宗长，还建立了专门的宗族法规，并考释撰修家谱，修建家族墓。这在唐代史料中有明确反映。如《全唐文》卷四百二十八《河南于氏家谱后序》记：“邵高叔祖皇朝尚书左仆射侍中太子太师燕国定公讳志宁，博学多闻，徇忠秉直，为秦府十八学士。……凡有文集若干卷于代，又述作之外，修集家谱，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谱序，亦既备矣。历一百七十余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未尝失坠。洎天宝末，幽寇叛乱，今三十七年。顷属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或转死沟壑，其谁与知？或因兵祸纵横，吊魂无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归；或田园淹没，无可回顾。所以旧谱散落无余，将期会同，考集不齐，奚为修集？实难有待。今且从邵一房，自为数例。有若九祖长房今太子少保谯国公颀，与邵同升于朝，股肱四圣，为国元老，邵之弟也。有若九祖第三房今襄王府录事参军载，与邵同在京列，保家履道，为宗室长，邵之兄也。”

（3）士人

士人是随着唐代科举制的推行，出现于唐代乡村社会的新群

体。科举制为唐代庶民阶层提供了一条进仕之路，也为寒门弟子改变命运提供了主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唐代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乡村社会的士人群体也因此出现。这里所言唐代乡村的士人群体，主要包括居于乡村之中未能及第的举人和尚未取得贡举资格的读书人（进士、明经及第入仕者已居于城市之中，脱离乡村社会）[87]。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吴筠传》载：“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性高洁，不奈流俗，乃入嵩山。”这类群体因接受了教育而得到乡村社会的普遍尊重，在基层社会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4）退職官员

退職官员也是唐代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它包括因致仕、辞官、罢职、丁忧等各种原因返乡或归隐的官员，如《旧唐书》中所载：温大有“寻丁忧，去职归乡里”[88]；“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89]。

《太平广记》载杨师操“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90]。这类退職官员归乡后往往因原有名望得到乡村社会的敬重，并对乡村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乡族势力的作用

作为一股民间力量，乡族势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村教育与教化。以士人及退職官员为主的乡族势力，在隋唐时期乡村教育与教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构成了唐代官学的主要师资，也是唐代乡村私学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为唐代乡村里学的发展与乡村风俗的敦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文详述）。

二是治安防卫。治安防卫是一个群体组织的基本功能。乡族

势力在乡村社会群体中往往具有较强的领导力与向心力，在遭遇抢盗或战乱等特殊情况下，能够成为群体聚拢的核心，引导形成组织团体，合力保护乡里。如《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李君球传》载：“李君球，齐州平陵人也。父义满，属隋乱，纠合宗党，保固村闾，外盗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齐郡通守。”《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刘君良传》也记载了隋大业末年战乱时期，四世同居的刘君良家族与乡人共同度过战乱的事件。此外，《旧唐书》卷一百四十载，张建封之父张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令伪将李庭伟率蕃兵胁下城邑，至鲁郡。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玠率乡豪张贵、孙邑、段绛等集兵将杀之”。同书卷一百四十四《李观传》也记载了代宗广德初年（763年）吐蕃入犯时，李观率乡里群众为保护銮驾镇守黑水之西的事件。这几则事例皆说明，乡族势力不仅在乡里的治安防卫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往往也能成为保卫国家的一股力量。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长久的战乱与割据局面，让乡村社会陷入长久的混乱，乡族势力已经成为乡村社会自保的主要力量。

三是协调处理乡村事务。部分受到尊重及能力较强的乡族势力，往往还会在乡村事务的协调与处理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旧唐书·元让传》有载：“（元让）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承侍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余年。……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让决焉。”此外，《唐文拾遗》也见有唐代元和二年，铜山湖地区村民叶再荣与黄芝、童云等人为解决村中干旱问题筑堤修湖的事件，最终帮助解决了当地村落农田的灌溉问题。^[91]这些事件都说明乡族势力对于乡村事务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经济援助。乡族势力因组织群体的特殊性，一般具有相

对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的隋唐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往往成为土地兼并的操作者与贫民的剥削者，但乡族中也有部分具有社会道义的乡族成员，在面对民众疾苦之时给予一定的援助。

四、文化教育与伦理教化

隋唐两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方面得益于唐代前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隋代创立的科举制不同于以往基于血缘关系世袭或世家大族以品状定高低的选官制度，它为社会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进仕之路。正因如此，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文化教育和伦理教化得到了较程度的发展。

（一）唐代乡村教育的形式

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体制由官学和私学两部分组成，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唐代的官学体系十分成熟，主要由京都儒学、京都专门学校和地方州县学构成，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需要。因此，至唐代武德七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设置乡学。据《通典》载：“（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92]可见，唐初已经将乡学纳入官学系统。

至开元年间，唐政府又两次重申关于乡学设置的制度，对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规定。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月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93]另据《全唐文》载《天宝三载（744年）亲祭九宫

《唐大赦天下制》曰：“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通过这两道重申令可以看出，唐代中央政府对于兴办乡村教育的规定是日渐细化的。与武德令相比，开元令不仅申明置办乡学的目的为“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而且要求选择师资，还将乡学的置办单位具体到乡里。显然，唐代开元年间乡学已经非常普及，几乎每一乡里皆有一所学校。至天宝年间，唐代朝廷再次敦促乡学增加师资，并令郡县长官“明申劝课”。这种变化不仅说明唐代乡民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朝廷对于这种需求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并不断加强办学力度，推进乡村教育的普及。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籍、笔记小说中，有不少反映唐代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状况的记载。《隋书》卷七十三《梁彦光传》记载：“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饌，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此事发生于隋开皇年间，说明隋代初期乡学已有所发展。另有《唐古处士王君之碣》载：“君讳庆，字褒，上党黎城人也。……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过则不二，善其莫遗，操行厉节，遂究诗礼。……举进士高第，……享年八十有五，以皇唐开元二祀十有二月，卒于柏谷里之第。”^[94]根据墓志记载内容，墓主王庆七岁即入乡校学习，据其生卒年可以推算出其入学之年应在贞观十年（636年），这不仅反映了唐初即已普遍设置乡学，而且说明唐代乡民可能自幼年就已接受正规教育。

至唐代中后期，乡村教育的发展更为普及。唐人沈既济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

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95]五岁童子都以“不言文墨”为耻的事例，说明唐代教育普及程度之广、之深。对此，元稹的诗文亦可用于佐证：“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96]《四时纂要》也载唐代北方地区八月有“习射，命童子入学”以及曝晒图书[97]的习俗。凡此种种，都表明唐代十分重视幼儿教育。

相关史料显示，不少唐代文人志士确实都曾在幼年时接受过正规的乡村教育。如大诗人陈子昂“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十七八岁都未曾读书，后“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98]卢仝的《寄男抱孙》一诗是其将两个儿子送入村学时对其大儿子的告诫，诗曰：“喽罗儿读书，何异摧枯朽。寻义低作声，便可养年寿。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下学偷功夫，新宅锄藜莠。”[99]根据诗文内容可知，当时部分村落已经设置了学校。

关于唐代设立村学的记载，也可以从一些笔记小说中找到影子。《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四《修武县民》载：“修武县人嫁女……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这里所载事件发生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即开元二十六年令颁布三年之后，当时的村中已经出现了学校。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开元令的颁布对于中晚唐时期的乡村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书四十四卷《田先生》也记载了九华洞中仙人田先生曾“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的故事。此事虽颇具玄幻色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话录》也载有窦易直年幼时因家中贫困而“受业村学”的事例。[100]这些都十分鲜明地说明了隋唐村学的普及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唐初乡学就被纳入官学体系，玄宗时期又先后两次颁布诏令增强办学力度，且偶尔会资助乡学的兴

办，但受到师资、办学经费、教学空间的限制，唐朝无法真正做到以官学形式普遍置办乡里村学。因此，这一时期的乡学，以私人办学为主。对于这类私学，唐代朝廷是给予支持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就曾对民间私学的兴办给予了特许：“诸百姓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学授业者，亦听。”可以说，隋唐时期的乡里村学，实际上是官助民办性质的私学。

部分地方官府对于地方乡学的兴办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据《新唐书·常袞传》载：“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袞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飧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赠尚书左仆射。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袞于学官云。”此文中的常袞是建中初年福建观察使，在任期间不仅“设乡校”，而且“亲加讲导”，大大提高了闽人的受教育水平。

《大周故朝议大夫上柱国行隆州西水县宰董府君墓志铭并序》也记载了幽府良乡县宰董希令在任时曾“开学校，劝农桑”^[101]；

《唐故南阳郡内乡丞吴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吴晔在担任南阳内乡县丞时“将欲劝耕桑，崇学校，乡间敦孝，少长有礼”。^[102]

但此类由官府出资兴办的乡学往往只占少数。大部分乡村私学都由居乡土人、退職官员等私人兴办。如隋末山西儒学家王通曾在河汾地区讲学，“门人常以百数”^[103]；经学家孔颖达曾归乡“以教授为务”^[104]；天宝年间苗晋卿辞官归乡以后，曾出资在当地置办乡学，教授弟子^[105]；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106]。因此，乡村儒生、士人对乡村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般而言，这类乡村私学除了部分得到乡村富户的资助外，其硬件设施以及教师收入并无保障。上文所提窦易直年幼时曾于村学学习，但“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生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惟

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107]。这里所说的漏屋即是村学学堂。上文所引《太平广记》中的田先生，隐于饶州都亭村，以在小学教授村童为生。而据《玄怪录》卷三《齐饶州》篇可知，田先生所在的小学实际上是一所草堂，田先生“戴破帽、曳木屐而来，形状丑秽之极”，生活完全依靠“求食于牧竖”，并以“转食”的方式由村民轮流供饭，才得以维持温饱。《太平广记》中收录的《蒋琛》一文记载蒋琛精熟二经，以此在乡里教授，但每到秋冬时节，还要去太湖捕鱼，作为生活补给。[108]这说明在乡学，教师一职所带来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另据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杂记·齐鲁二生·程骧》篇记载：“（程骧）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郛盗人也。……骧甚苦贫，就里中举负，给薪水洒扫之事，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与饘糗布帛，使供养其母。……乌重胤为郛帅，喜闻骧，与之钱数万，令市书籍。”[109]这里记载程骧破产之后，依靠向邻里借债度日，为了养活母亲，不仅要砍柴、担水、打扫卫生之事，而且同时以在里学教授为业，生活清贫之状可见。以上几则例子皆可见乡村教学条件之简陋、教师收入之低微。整体来看，即便如此，这也并未阻碍乡民接受教育的热情。

（二）唐代乡村教育的内容

在乡村地区普及教育，不可避免地与“敦教化”有密切关系。根据上文所述开元二十三年令可以明确地看出，唐代统治者大力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其目的在于“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即以弘儒学、敦教化为唐朝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据上文所引《隋书·梁彦光传》记载，梁彦光担任相州刺史期间在相州“每乡立学”，并招纳崤山东部地区有名气的儒生，规定“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这说明在隋代圣哲之书成为主要教材。至唐

代，以儒学经典为主的圣哲之书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内容。这在上文所引史料中已经有所体现。如上文提及的蒋琛因精熟二经而在乡学教授^[110]；《樊南文集·杂记·齐鲁二生》所载程骧后来即因通晓五经吸引不少学生前来学习；《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上》也记载了朱温的父亲朱诚在乡里学校教授的内容就为五经。这里所说的五经为唐高宗时期成书的《五经正义》。这些也是唐代科举制对于考试内容及形式规定的影响所致。

不止于儒学经典，受到唐代科举制的影响，诗赋也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学校所教诗赋多为名家名著。如《新唐书·陆羽传》曾记载了陆羽幼时因读不懂张衡的《南都赋》而受到老师惩罚一事；上引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描述了元稹在村学中见村学生学习诗赋的场面；《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七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曾为乡学讲文选。

启蒙读物是唐代乡村教育中启蒙阶段的主要内容。通过上文可知，隋唐时期，往往五六岁的幼童即已入村学就读，因此，启蒙教育就成为乡村教育初始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启蒙教育主要以启蒙读物的学习为主，这类读物主要包括《初学记》《千字文》《太公家教》《兔园册府》《蒙求》等。

由上可知，隋唐五代时期，以敦教化为目的的乡里村学虽因国家明令而设，但实际上以官助民办性质的私学为主。这类私学在唐代的乡村社会具有普遍性，成为唐代国家基层教育的主要形式，并承担起乡村社会的教化与启蒙之责，还作为唐代官学的补充，对唐代乡村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普及，乃至社会文化及风尚习俗的变迁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五、村落中的宗教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转折期。儒、释、道作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虽互有冲突，但在调和与共生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随着唐朝与周边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来自中亚、西亚及西域地区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传入内地，促进了唐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当然，源于各类原始崇拜与地方崇拜的民间信仰，也在民间社会继续发展。各类信仰文化在这一时期交织呈现，成为乡民主要的精神寄托方式，构筑起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精神世界，并以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引导、影响乡村民众的生活与生产。[\[111\]](#)

（一）佛教的本土化与村落

宗教的发展向来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或被作为国家统治手段而广泛推行，或因阻碍国家统治而遭受打压。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汉晋时期，佛教曾因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迅速在全国推行，也曾因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而在全国范围内严重萎缩。整体来看，隋唐政权对佛教的发展是鼓励和支持的，这不仅促进了佛教的恢复与发展，而且使其渗透到村落社会并产生了深入影响。

1. 佛教在隋唐的发展状况

隋代统治者普遍尊崇佛教，并利用佛教促进南北统一，巩固统治政权。具体可体现为，隋代统治者不仅在全国各地广建寺塔、广度僧尼，而且大兴佛事。据《隋书·经籍志四》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昭天下，任听出家。”隋初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全国僧尼数量的快速增加。据法琳《辨正论》记载，自开皇初至仁寿末，所度僧尼达到二十三万人，写经“四十

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续高僧传·靖嵩传》对开皇十年（590年）所度僧众数量的记载更多，达五十余万。其后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隋文帝每月都要请僧入贡读经，并要求皇后及宫人“亲听”。[112]隋炀帝也频繁组织建寺院、造像、写经等活动。[113]可见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程度。

唐代统治者仍然推崇佛教，但其对佛教采取的政策有所不同，是以兼容并蓄的方法推动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唐代统治者将儒学奉为正统，也因抬高自身门第、神化统治的需要崇信道教，而对于佛教的扶植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因而造成唐代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三者之中，尤以佛教的发展最为兴盛。

唐代统治者中，对佛教的推崇以太宗、武周为最。如太宗所言：“朕于佛教，非意所遵。”尽管唐太宗并非崇信佛教，但鉴于佛教在内地及民族地区广泛的群众基础，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对佛教给予大力扶持。他在位期间除了建寺、度僧尼、广施布施以外，还派玄奘入印求法，并建立译场翻译佛经，推动了佛教的全面发展。武周时期，不仅造像、译经活动不断，甚至武则天还亲自参与翻译佛经的活动。至玄宗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发展，伪滥僧尼现象日益严重，这迫使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佛教的发展。这种限制因唐武宗发动的“会昌灭佛”事件达到高潮。这次事件后，除了禅宗佛教得以部分恢复以外，不少佛教教派皆走向衰微甚至消亡。

尽管在唐代晚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整体而言，佛教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佛教各派与儒、道的争论中，佛教最终于晚唐五代完成了本土化发展，成为融汇中、印思想文化的一种宗教文化，对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及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皆产生了十分深入的影响。

2.佛教对村落的影响

早在魏晋时期，佛教就已经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乡村民众重要的精神寄托方式，村落中造像、写经活动不断。唐代亦是如此，乡村民众深受佛教影响，普遍尊奉佛教。据《太平广记》卷一百《长乐村圣僧》记载，开元年间长乐村有一户村民，虽然家境贫寒，但因信奉佛教，仍然“常给僧食”，而且还因“于途中得一僧座具”而专门设斋。同书卷一百零六《王氏》记载，公安潺陵村王从贵的妹妹“常持《金刚经》”。显然，对佛教的尊崇已经成为民众祈福禳灾、求吉纳福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乡民精神情感的寄托方式。前文所述乡村佛社的发展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佛社是隋唐时期乡村私社的主要种类，虽然这类佛社已经兼具经济互助性质，但开展造像、建寺、写经、造塔等宗教活动仍然是其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开元初，同州界数百家民众为造普贤菩萨像，组成普贤邑社，每日设斋。^[114]前引《全唐文》收录的《白鹿乡井谷村佛堂碑铭》中记载了白鹿乡井谷村佛社二十余年开展的佛事活动。另在唐代相关史料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一窥唐代乡村佛教的发展状况。《唐会要》载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令：“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自今已后，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115]《太平广记》也载：“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116]这虽然是唐玄宗针对村坊开展佛事活动所下的禁令，但也反映了当时此类现象在村坊的存在。《唐会要》卷四十八《寺》也记载了唐宣宗于大中五年正月曾下诏：“京畿及郡县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许度僧尼，住持营造。”无论是朝廷的禁令还是许可令，都说明隋唐时期乡村寺院的存在已经是普遍现象。

根据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可以大致了解唐代乡村寺院的分布状况。根据此文记载，圆仁在求法途中共经历73处村落，其中明确记录了建有寺院佛堂的村落就有19个，说明在其经区域至少平均每4个村落之中就建有一座寺院。这足以说明寺院在唐代乡村的分布之普遍。究其原因，这与唐代朝廷对佛教的优待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唐代史料显示，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僧徒在唐代享有特殊优待，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土地[117]，而且度牒制度[118]的实行给予了僧尼免除赋税的权利。这种优待政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僧尼数量的增多与寺庙僧院的扩张，而且助力了寺院在土地与财富方面的累积，使寺院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之一，但也因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僧尼所享受的优待政策成功吸引了需要承担沉重赋税的普通民众度为僧尼。这一时期僧尼数量显著增加，度牒买卖及僧尼伪滥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史料显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民间就出现了“钱三万则度为僧尼”[119]这种纳贿卖度的现象。中唐以后，买卖度牒的现象更为严重。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曾大量度僧尼以筹集资金。如杨国忠曾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120]《旧唐书》载敬宗年间（824—826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曾以皇帝诞月在泗州置僧坛度僧，“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121]因此，唐代僧尼伪滥现象的产生，不能仅仅归因于民众为躲避赋税而产生的主观行为，唐政府筹集资金的不当举措也是重要的推手。黎仁凯先生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除了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众以外，唐代乡民一般通过私度的方式进入寺院。逃入寺院的农户虽然可以僧籍身份免除赋税，但其人身隶属于寺院，成为寺院的奴婢或依附农。唐武宗灭佛时，“除寺四

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122]其中奴婢、笄冠就应该为寺院不同程度的依附农。[123]由此可见，逃入寺院的乡民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寺院在统治者给予的多种优待条件下，迅速成为民间社会财富的持有者，并通过买卖、典帖的形式大量占有土地。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仅山东醴泉寺就拥有庄园十五所，而长安一带更是“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124]更有甚者，《旧唐书》以“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125]评论寺院资产。就此来看，寺院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累积与土地兼并，可能是导致唐代基层管理制度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道教的高度发展与村落

隋唐五代时期也是道教得到深入发展的时期。隋代统治者虽然尊崇佛教，但同时采取利用、防范和控制的方法发展道教。李唐统治政权建立以后，更将道教作为稳固政权的工具，倍加推崇。唐高祖时期即钦定了道、儒、佛三者的秩序，确立了道教的首要地位。[126]因此，与佛教一样，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道教在唐代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对唐代乡村社会的影响十分深入。

1. 道教在唐代的发展状况

由于道教特殊的地位，除了武周时期曾一度采取抑道重佛的政策以外，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基本上维持了以道教唯尊的局面。统治者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建道观，还以赏田授地、加官进爵等各种政策优待道士、女冠，并从国家制度层面推动道教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唐玄宗。

唐玄宗是道教的忠实信奉者，他在位期间曾不遗余力地通过

多种手段推动道教的发展，不仅身体力行，还从制度层面进行相关改革。他曾多次亲自赴玄元皇帝庙拜谒，并尊奉玄元皇帝之父、母分别为先天太皇和先天太后。每逢朝廷祭祀，也必先至西京的太清宫行“事生之礼”^[127]，这几乎成为国家祭祀之制。开元二十四年，他还将道士、女冠籍隶属宗室，统归宗正寺管理，这一举措确立了道教为皇家正统宗教的地位。同时，唐玄宗还分别于天宝二年（743年）、八年（749年）、十三年（754年），先后追加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除此以外，唐玄宗还在国家制度层面引导道教的发展。他不仅将《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而且将其加入贡举考试之中，还在玄元庙设置崇玄学，立玄学博士，以道家经典为学习内容，允许通晓道家经典者自荐。天宝二年，玄宗还停置道教管理机构崇玄署，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与两京的玄元宫和道观一起由宰相直接管理。这直接将道教事务的处理提升至国家层面。为了在民间宣扬道教，唐玄宗还令各州道观皆画所梦玄元皇帝像，立御书玄元皇帝赞碑，并要求全国士庶每人家藏《道德经》，鼓励习读，甚至在玄元皇帝降生日设斋祭祀，规定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禁止杀生。

以上例举的只是唐玄宗崇道举措的一部分，但从中足可以看出唐代统治者对道教自上而下的推崇力度。在统治者的大肆宣扬下，道教在唐代民间得到快速发展，道观林立，道士、女冠数量十分庞大。据《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条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这一数量在《新唐书》^[128]及唐末道士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129]中有所反映。但日本学者道端良秀认为，唐代史书中仅仅记录了官道观的数量，大量私道观并未被记录在册。^[130]王永平先生曾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官、私道观的总量进行了推算。他认为《唐六典》中记录的数量仅仅是开元年间的

道观数量，对于唐代道观总量的保守估算也应该有4 000~5 700所，道士、女冠至少有13 300名。^[131]如此可观，唐代道教的发展是十分兴盛的。

2.道教对村落的影响

道教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与宣扬下，在全国得到普及性发展，而且同佛教一样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生产产生了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乡村的精神信仰方面。与儒、佛二教不同，道教是在我国古代自然崇拜、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甚至是鬼神迷信的基础上综合发展起来的，缺乏深厚的教义教理。因此，唐代以前的道教以修仙长生的思想为主。这种思想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流传。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化与融合，道教在与儒、佛二教进行论争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方思想，最终在唐代确立了以老庄哲学思想与神仙信仰结合的理论体系。虽然此时的道教更加注重个人心性的修养，但是这种影响较多地流传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民间百姓而言，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则促使可以消灾解难的道教神仙方术成为他们对道教崇信的全部内容。因此，这一时期，神仙长生、方术迷信席卷唐代民间，乃至整个唐代社会。

唐代以道教、神鬼为题材的笔记小说的大量出现，就反映了道教对民众思想层面的影响。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关于乡村社会崇奉道教的记载。据《太平广记》卷五十一《宜君王老》记载：“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同书卷五十三《王法进》记载：“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篆》，名曰法进。而专

勤香火斋戒护持。……”以上两例主要反映了唐代民间对道教的尊奉状况。需要指出的是，与上层社会以炼丹或法术追求长生不老的尊崇方式不同，道教对乡村民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民众对道教神灵的尊奉及各类道教法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隋唐五代时期的乡民，对生产、生活中的自然现象认知有限，往往形成对法术、巫术的依赖。如道教中的符篆、禁咒术、斋醮术、占卜术等在乡村社会颇受推崇，甚至成为乡村民众祈福禳灾、驱鬼辟邪、超度亡灵的主要途径，具有强烈的超自然崇拜色彩。《因话录》卷四《角部》中就记载了一则道士利用法术帮助民众摆脱自然灾害的事情：“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潭州大旱，祈祷不获，或请邀致先生。杨公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发弊衣，欣然就辇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132]另如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中就收录有17例斋醮灵验故事，其中以唐代民间修斋为主要内容的有12例。这些故事以救济亡魂为主要目的，还有部分为悔罪消业、治疗疾病。^[133]可以看出，唐代道教法术的丰富化发展，促使其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其中的部分内容几乎与民间法术或巫术趋同。随着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这种以法术为主的信仰内容对唐代民间信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需指出的是，因道教徒与佛教徒一样，同样享受国家免除赋税和徭役的优待政策，唐代民间社会也出现了不少躲避赋税的伪滥道士与女冠。这种现象在唐初即已出现，但不及佛教严重。为了防止民众私自入道、度佛，唐政府通常同时对佛、道二教的相关行为予以禁止。如《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私入道”条载：“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即监

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至唐代中后期，随着统治者对道教的进一步推崇，伪滥道士、女冠的现象更为严重。安史之乱以后，统治者同样采取鬻僧道度牒的方式滥度道士、僧尼，以筹集军费、增加财政收入。^[134]这一举措也使得唐后期伪滥道士、僧尼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唐代道教还允许“在家道士”^[135]的存在，这类不受宗教戒律约束、不必在道观修持的道士的存在，无疑促进了伪滥之辈的出现。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伪滥道士、僧尼的数量已经达到极盛，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然而，相对于被视为外来宗教的佛教，道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受限制，但鉴于其在唐代的特殊地位，并未遭受“会昌灭佛”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因而，道教在唐代晚期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

（三）其他信仰与祭祀文化

除了儒、释、道三教以外，唐代的民间信仰发展也十分繁盛。这一方面得益于唐代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及统治者对各类宗教的利用与推崇，另一方面也与民间社会长期以来累积的社会基础有关。民间信仰主要源于早期社会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原始崇拜，人们通过对自然、动物、祖先、神灵等现实或想象对象的崇拜与祭祀，寄托个人愿望和情感，企图达到趋利避害、趋吉避凶的目的。这种崇祀方式往往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表达了民众朴素的生活愿望，是科学认知低下的古代社会民众面对未知、未解事物时表达情感的主要途径，因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唐代，这样的现象不仅依然十分盛行，而且伴随佛、道的普遍发展，民间祭祀行为更为普遍，甚至还出现了民间信仰与佛、道信仰杂糅共生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间信仰的种类不仅更为多元，而且

崇拜对象更为丰富。

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首先体现为对社神的祭祀。社祭主要是指对土地神的祭祀。对于古代国家政权来说，土地神“社”与五谷神“稷”就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因此，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社祭就已经成为国家祭祀行为。至唐代，这种祭祀活动仍然是国家与民间祭祀的重要内容。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曾于武德九年（626年）二月戊寅亲祀太社，并颁布《亲祀太社诏》。其中言明了社祭的宗旨：“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谷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训。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是以吉日维戊，亲祀大社，率从百僚，以祈九谷。今既南亩俶载，东作方兴，州县致祀，宜尽祇肃。四方之民，咸勤殖艺，随其性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闾相从，共尊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存宴醕之义，用洽乡党之欢。且立节文，明为典制，进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诲励，递相劝奖，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布告天下，即宣遵用。”^[136]诏文中明确显示，唐初即将社祭上升至国家法令层面，要求全国上下各阶层皆要进行社祭。唐高祖也明确指出了社祭的意义：对于封建国家来说，土地、农桑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祭祀土地神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农业的发展，维护江山社稷的根本。这也是古代中国重视社祭的原因。

在国家的倡导下，唐代乡村社会的社祭活动发展十分繁盛。前揭唐代乡村社树、社坛的普遍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史料显示，唐代的社祭分春秋两次^[137]进行，每逢社日，乡村民众即以祭祀、宴飨、歌舞的形式祭社。唐代相关史料中有大量关于乡村民众庆祝社日的记载。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司空图传》中记载了司空图参加乡村社祭的事件：“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

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韩愈的《游城南十六首·赛神》一诗也记载了宣城乡村民众庆祝社日的场景：“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穟桑生葢，共向田头乐社神。”王维在其《凉州郊外游望》一诗也描绘了乡村民众的社祭活动：“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杜甫也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描绘了其于郊外散步时遇村人祭社，遇到农夫劝酒的场景：“步屐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料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通过这则事例，不难看出，唐代的社日不仅是乡民祭祀土地神，向神灵表达敬意、感谢与祈愿的手段，而且已由早期的神灵崇拜演变为一场庆祝丰收并带有休闲娱乐性质的民俗活动。

除了这类以祭祀土地神为主的社祭活动以外，雨神、水神等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神灵也成为唐代乡村社会的主要祭祀对象。唐代民众的水神崇拜，主要体现为对江、河、湖、海等自然水系的崇拜，或对风、雨、雷、电等与降雨有关的自然现象的崇拜，或对掌司降雨的神话人物，以及被神化的人物或动物的崇拜，如洞庭湖水神潇湘二妃、钱塘江水神伍子胥、龙王、龙女、河伯等。岑参在《龙女祠》中曾描述了蜀人对龙女的崇拜：“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如如相语。蜀人竞祈恩，捧酒仍击鼓。”白居易在《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记载了江南民众赛江神的场景：“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138]这都表现了乡民通过对水神的祭拜以祈求风调雨顺的心理愿望。尽管这类民间信仰带有一定的超自然色彩，但是在唐代乡民的精神世界中，这是他们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

裴谔在其《储潭庙》一诗中就描写了乡村民众在龙潭祈雨、祭拜水神的情景：“江水上源急如箭，潭北转急令目眩。中间十里澄漫漫，龙蛇若见若不见。老农老圃望天语，储潭之神可致雨。质明斋服躬往奠，牢醴丰洁精诚举。女巫纷纷堂下舞，色似授兮意似与。云在山兮风在林，风云忽起潭更深。气霾祠宇连江阴，朝日不复照翠岑。回溪口兮棹清流。好风带雨送到州，吏人雨立喜再拜，神兮灵兮如献酬。城上楼兮危架空。登四望兮暗濛濛。不知兮千万里，惠泽愿兮与之同。我有言兮报匪徐，车骑复往礼如初。高垣墉兮大其门，洒扫丹雘壮神居。使过庙者之加敬。酒食货财而有余。神兮灵，神兮灵，匪享慢，享克诚。”[139]另有白居易《黑潭龙》一诗，也记载了乡里居民虔诚祭祀龙神、祈求降雨的情况：“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飧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140]

与此同时，当面对自然灾害或疾病时，乡民往往寄希望于各类神、鬼、巫术。这种现象在唐代乡村社会十分普遍，尤其是江南地区。这与江南地区民间巫鬼祭祀之传统不无关联。《隋书·地理志》中就记载了荆楚之地“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十二》载：“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元稹在其《赛神》一诗中也对楚地巫鬼祭祀之风做过记述：“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来三十载，巫覡传子孙。村中四时祭，杀尽鸡与豚。主人不堪命，积燎曾欲燔。旋风天地转，急雨江河翻。采薪持斧者，弃斧纵横奔。山深多掩映，仅免

鲸鲵吞。主人集邻里，各各持酒樽。庙中再三拜，愿得禾稼存。去年大巫死，小覿又妖言。邑中神明宰，有意效西门。……”柳宗元在其《柳州复大云寺记》一文中对越地的此类风俗也有记载：“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伋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141]另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九记载，四川地区“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巫风极盛。

这种现象在唐代的其他地方也同样盛行。人们在生活、生产之中遇到各类事情，皆要祭祀祷告或请巫作法。尤其是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都要依靠祭祀祈愿或作法事占卜，禳除灾害。如《太平广记》载，会昌五年（845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另《太平广记》载：“有村人失牛，诸桑国师卜之。”^[142]显然在唐代乡民的认知中，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巫术，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

在此基础上，有些地方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崇拜。这类崇拜现象多是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而累积形成的，主要体现为对地方神祇或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崇拜。这种崇拜具有较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典型的如关中地区的帝王将相崇拜与华山神崇拜，河南地区的先贤崇拜，荆楚地区对屈原的崇拜，吴越地区对吴地三大贤人（太伯、仲雍、季札）及伍子胥的崇拜，岭南地区对赵佗的崇拜，巴蜀地区对杜宇、诸葛亮、李冰的崇拜，等等。无论这些民间崇拜的对象是地方神祇还是历史人物、英雄人物，在乡村民众的信仰之中，他们皆被视为守卫一方安宁、保护民众生产与生活免遭灾难的神灵形象。对其崇祀成为劳动民众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祈愿、寓情的方式。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对李冰的记载为：“李冰为蜀郡守……入水戮蛟，已为牛

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记。”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民间信仰中，李冰已经成为戮蛟治水、护佑蜀地免遭水旱之灾的水神形象。

整体而言，唐代是各类宗教文化及民间信仰繁荣发展的时期，在统治者及上层社会对多元宗教文化的推崇与推动下，民间社会上行下效，各类信仰文化在乡村社会都得到深入的发展，并渗透到乡村民众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产生一些程度不一的消极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也在稳定乡村社会、丰富乡民的生产与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 《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

[2] 《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3] 《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4] 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续编》，福冈印刷株式会社昭和45年（1970年）版，第104页。

[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 罗邺：《南行》，载《全唐诗》卷六百五十四。

[7] 元稹：《闲二首》，载《全唐诗》卷四百〇九。

[8] 元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载《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三。

[9] 《酉阳杂俎》卷二《壶史》。

[10] 王建：《汴路即事》，载《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九。

[11] 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载《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二。

[12] 刘禹锡：《堤上行三首》，载《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五。

[13] 元稹：《泛江玩月十二韵》，载《全唐诗》卷四百零六。

[14] 王建《江陵即事》，载《全唐诗》卷三百。

[1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6]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河北道”。

[17] 《唐文拾遗》卷十六。

[18] 张祜：《钟陵旅泊》，载《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

[19] 杜牧《润州二首》：“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谢朓诗中佳丽地，夫差传里水犀军。城高铁瓮横强弩，柳暗朱楼多梦云。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二。

[20] 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十馀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载《全唐诗》卷二百零六。

[21]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一。

[22] 项斯：《山行》，载《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四。

[23]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汉阳县”条。

[24] 韦庄：《建昌渡暝吟》，载《全唐诗》卷六百九十八。

[25] 虚中：《泊洞庭》，载《全唐诗》卷八百四十八。

[26] 郑谷：《峡中寓止二首》，载《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

[27] 方干：《越中言事二首（咸通八年琅琊公到任后作）》，载《全唐诗》卷六百五十一。

[28] 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载《全唐文》卷八百四。

[29]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0] 《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六“洪州分宁县”条，引《邑图》。

[31] 《旧唐书》卷三百九十一；《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

[32]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六“鄂州崇阳县”。

[33]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荆州潜江县”。

[34] 柳宗元：《童区寄传》，载《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二。

[35]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二。

[36]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7] 韩愈：《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载《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六。

[38] 唐人在原有的基础上推断引水量，并确定了“四六分水”的配水原则，使都江堰在低水时期通过工程调剂将蓄水量增加到60%，保证充足的灌溉资源；汛期可发挥泄洪作用，与宝瓶口共同配合，控制泄入成都平原的水量。谭徐明：《都江堰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39] 魏岷：《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载《丛书集成初编》第3018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载《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

[40]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载：“（桂州理定）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又废。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铎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41] 周尚兵：《唐代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8页。

[42]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上《邓玄挺》；刘禹锡：《同乐天 and 微之深春二十首》，《全唐诗》卷三。

[43] 《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八《水轮赋》。

[44]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上《邓玄挺》。

[45] 《旧唐书》卷十七上。

[46]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九《机汲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0页。

[47] 陆龟蒙：《甫里集》卷一十九《耒耜经》。

[48] 陆龟蒙：《甫里集》卷一十九《耒耜经》。

[49] 温庭筠：《烧歌》，载《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七。

[5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东谢蛮传》。

[51] 元结：《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52] 《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一。

[53] 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54]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55] 白居易：《杜陵叟》，载《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

[56] 元稹：《竞舟》，载《全唐诗》卷三百九十八。

[57]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另见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58]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59]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60]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61] 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二十一册）卷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54页。另见秦明智：《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文物》1983年第7期。

[62] 《册府元龟》卷六十三《帝王部》。

[63]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天授元年》。

[64] 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0页。

[65] 据《全唐文》卷三十二载，天宝元年十月的诏书曰：“社为九土之尊，稷乃五谷之长。春祈秋报，祀典是尊。而天下郡邑所置社稷等，如闻祭事或不备礼。苟崇敬有亏，岂灵祇所降？欲望和气丰年，焉可致也？朕永惟典故，务在洁诚，俾官吏尽心，庶苍生蒙福。自今已后，应祭官等庶事，宜倍加精洁，以副朕意。其社坛侧近，仍禁樵牧。至如百姓私社，宜与官社同日致祭。”

[66] 《全唐文》卷三十九载：“又閭閻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永宜禁断。”

- [67]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 [68]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 [69]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 [70] 石文素《白鹿乡井谷村佛堂碑铭》，《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
- [71] 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文献》1989年第1期。
- [7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 [73]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 [74] 傅晓静：《论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6期，第83页。
- [75]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宙传》载：“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
- [76] 《投社人马丑儿状》《投社人董延进状稿》，载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4、706页。
- [7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原书载：“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云亡，便须子孙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例合追□游，直至绝嗣无人，不许遣他枝眷。”
- [78] 宁可、郝春文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
- [79]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 [80]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 [8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 [8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83] 陆耀通：《金石续编》卷五，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

[84] 爱宕元著，钟翀译：《唐代前期华北村落一类型——河南修武县周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85] 杨际平、郭峰、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4页。

[86] 谷更有：《唐代的村与村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第0期。

[87] 李浩：《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88] 《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大有传》。

[8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贺知章传》。

[90] 《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二《杨师操》。

[91] 《唐文拾遗》卷二十六《张西岳》。

[92] 《通典》卷五十三《礼典》“大学”条。

[93] 《通典》卷五十三《礼典》“大学”条。

[94]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6页。

[95] 沈既济：《词科论》，载《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

[96] 元稹：《元稹集》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4页。

[97] 韩鄂撰，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第205页。

[98] 《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陈子昂别传》。

[99] 《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七。

[100] 赵璘：《因话录》卷六，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0页。

[101]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102]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3页。

[103] 王绩：《游北山赋》，载《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

[104]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105]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苗晋卿传》。

[106]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王质传》。

[107] 《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三《相三》“窦易直”条。

[108] 《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九《神十九》“蒋琛”条。

[109] 李商隐：《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86—488页。

[110] 《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九《神十九》“蒋琛”条。

[111] 由于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传播程度相对有限，对唐代乡村社会的影响远不及儒、释、道与本土民间信仰，故在此不再对其进行专门考述。

[112] 法琳：《辨正论》卷三。

[113]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载，“隋炀帝为文皇、献后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度僧六千二百人”。

[114]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五《普贤社》。

[115] 《唐会要》卷四十九《杂录》。

[116] 《太平广记》卷一百零四《李虚》。

[117] 《唐六典》卷三《户部》。

[118] 北魏孝文帝时已经规定僧人需持有官方证明文书，据《魏书》所录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的诏书载：“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贾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贾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其中的“文移”“印牒”即是早期的僧尼身份的证明文件，已经具备度牒的功用。唐代延用了这种制度，武周延载元年（694年）设置了专门的掌管机构“祠部牒”，负责僧尼相关事务的管理。参见《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或《大宋僧史略》卷中。

[119]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载：“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

[120]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121]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

[122] 《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123] 黎仁凯：《关于唐代的逃户》，《文史哲》1982年第4期。

[124] 释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125] 《旧唐书》卷一百零一《辛替否传》。

[126]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

[127] 《唐会要》卷五十《崇尚道教》。

[128] 《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条记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

[129] 唐代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中记载：“从国初以来，所造官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

[130] 道端良秀：《唐代道教政策研究》，载《支那佛教史学》1940年第4卷，第30—56页。

[131] 王永平：《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32]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

[133] 刘枝万：《中国修斋考》，载《中国民间信仰论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4年版。

[134]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裴冕传》记载，肃宗曾接受裴冕的建议“卖官，度僧、道士，收赈济军兴”。

[135] 《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序》中曰：“然道士立名，凡有七等：一者天真，二者神仙，三者幽逸，四者山居，五者出家，六者在家，七者祭酒。其天真、神仙、幽逸、山居、出家等，去尘离俗，守道全真，踪寄寰中，不拘世务。其在家、祭酒等，愿辞声利，希入妙门，但在人间救疗为事，今剑南、江表，此道行焉。”史崇玄撰：《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序》，载《正统道藏》本第七百六十册太平部一卷，上海涵芬楼影印1925年版。

[136] 《全唐文》卷三《高祖》“立社诏”。

[137] 根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记载，“春秋二社，本以祈农”，玄宗时期确立了于每年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祭社，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春、秋两次祭社的日期。

[138]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页。

[139] 裴谕：《储潭庙》，载《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七。

[140]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页。

[141] 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载《柳河东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

[142] 《太平广记》卷七十八《贾耽》。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

有唐一代，不仅中原地区的村落得到长足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村落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唐朝对归附中央王朝的边疆民族地区往往实施羁縻政策，即在其原有部落的基础上，通过设置羁縻州进行行政统治。从地理空间上来说，西北、西南及北方在唐代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因而是唐代羁縻州的主要分布区域。一方面，在羁縻政策下唐代边疆民族地区享有特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在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内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村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吐蕃地区因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其村落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在与东部大唐王朝的频繁交往之中，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一、西北地区的村落

地处中原与中亚交界地带的西北地区，是沟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的交通要道，自古便是中原王朝与中亚国家竞相角逐的地区。7—9世纪，这一地区形成了中原唐王朝与吐蕃王朝、波斯王朝三股主要对峙势力。唐初，李唐王朝统一华北地区以后，又先后于贞观十四年、显庆二年（657年），统一了西北地区的

高昌王国及西突厥。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唐王朝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将西域地区划归陇右道，并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地修筑城堡，建立军镇，使之发展成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郭聚落。唐王朝统治下的西域地区，初步有了完备的行政体系。自此至安史之乱以前，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在唐王朝对西北地区统治的百余年间，中原地区与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明显增强。也正因如此，包括村落社会在内的西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 安西四镇的村落

安西四镇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主要城镇，因而包括其村落在内，相较其他地区，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羁縻政策是唐王朝对民族地区采取的管理手段，即在保留民族地区原有管理方法的基础上，派驻朝廷官员进行共同管理。但安西四镇的羁縻政策有所不同，其基层行政体制与内地基本相同。但有学者认为，即便如此，这也是随着羁縻制度的推行产生的。^[1]另有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代在四镇全面推行基层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稳定”而非“征赋”。这是唐王朝企图对西北地区进行深入而全面统治的体现，虽然唐王朝仍然保留了四镇的王室制度，但可以将其视为正州。^[2]关于唐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安西四镇的具体推行状况，我们可以在相关历史文献中找到印证。

现存出土文书中，就有不少关于四镇村落的记载。^[3]这些记载说明村落在四镇已经得到普遍发展，且村落的管理制度也已经与中原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别。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开元年间某寺支出簿》中记载有“西河勃宁野乡厥弥拱村”，其对“乡一村”这一地域归属的表述方法的使用完全与内地相同。另根据刘再聪的考证，“西河”为于阗城西的一处河流，“厥弥拱村”即为位

于此河流域的一个郊野村落。这在大谷文书所载龟兹都护辖区村落的相关信息中也可得到验证，如其中8044号《唐大历九年二月目胡子牒》^[4]载：

1牒，胡子薄福，不幸慈母身亡。家贫，殡葬尚犹未
2办。南界双渠村种少薄田，今着掏拓两丁，叁分交
3不支济，伏望矜量小人，已后但有駟驰，不敢违命，
请
4乞商量处分。谨牒。
5大历九年二月 日 目胡子牒

这件文书中的“南界双渠村”就明显是位于城邑之外的郊野地区。另需指出的是，这件文书中提及目胡子因母丧请求免除摊负的维修渠堰的“掏拓”之役，据学者考证，这种赋役是唐代在边防建设时以村为单位摊派给村民的赋役，由武人负责催驱。^[5]这说明唐代的村制度应在安西四镇得到了彻底的执行。

2. 西州的村落

西州也是全面执行了唐代基层管理制度的地区。该地以汉魏屯戍于当地的汉人后裔为主，因此唐政府在消灭高昌王国以后，便在当地设立西昌州，后改为西州，使之成为中央政权管辖下的正州，接受同中原地区州县同样的管理。^[6]但受到当地以沙漠为主的自然环境及游牧民族众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出于防御需要，当地居民多筑堡为城，以城为单位据城而守。据《唐会要》记载，唐政府于贞观十四年将西州设为正州时，在交河城、始昌城、田地城、东镇城、高昌城5城置县，由西州辖管，统归安西

都护府，[7]后又在5县下设24个乡。但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西州的24个乡级行政单位下设置有里，而并未设村，当地民众皆居于县城、乡城或里城之中。[8]这在现存史料中有所反映。目前出土文书中，乡城较为多见，如高宁城、武城城、安乐城、南平城等。[9]

但西州地区没有村落并不意味着城外无人居住。除了这些城邑以外，郊外地区仍有聚落组织，只是这些聚落尚未因村坊制度的实施被划归为具有行政意义的村落。如据《唐开元二十二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10]记载：

1高昌县 为申修堤堰人

.....

4右得知水官杨嘉恽、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5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6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

7 □□例取当县群牧、庄坞、底（邱）店及夷、胡户

8 □□日功修塞，件检如前者，修堤夫

.....

这件文书中就记载有群牧、庄坞这类郊野聚落。囿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对这类郊野聚落做进一步考证。但刘再聪认为，唐代相关文书中没有出现关于西州地区存在村组织的记载，是当地尚未设置村组织所致。此说法应当成立。据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推断：尽管西州地区民众以居于城郭为主，但唐政府的基层管理制度在该地已经得到实施，且其城外确实存在部分聚落，这种状

况下，当地未设置村组织，或许是沙漠地区郊野聚落的体量与规模较小所致。

3.沙洲地区的村落

与西州地区相似，沙洲地区的民众也以城居为主。但较为不同的是，沙洲地区存在不少村落。如出土文书《甲辰年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中就出现了“百尺东村”^[11]。另据出土文书《周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12]记载：

1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

2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

3农非，各决贰拾。

.....

此件文书为政府下发的公文。其中对于社官及村正的记载，显示出当地的村落发展已经成熟，不仅已经设有村正，而且存在结社现象。这显然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村落已经没有明显差异。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对当时沙洲地区村落的分布状况做具体考证，但是根据敦煌文书的相关记载可知，沙洲地区的寺庙周边应该是村落的密集分布区之一。

敦煌文书中有不少关于沙洲地区百姓或聚落向寺院借贷的契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寺院周边的村落发展状况。其中，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是敦煌地区寺院放贷最为繁盛的阶段^[13]，不少民间百姓因生活贫困选择向临近寺院借贷。如吐蕃文书中出现的从永寿寺借贷谷物的“宁宗部落之夏孜孜”^[14]“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15]，向榆林寺寺库借麦的某部落喀泽晟、范氏十三娘及曹玛

赞等[16]，向灵图寺借麦的“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纳突不办”[17]等。还有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文借贷契约中出现的向灵图寺借谷物的赵卿卿、史奉仙、马其邻，向永寿寺借谷物的吴琮岳等。[18]有学者曾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分寺院借贷契约进行过统计，在契约的债务人中，民间百姓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才为僧人、寺户和官员。[19]这虽然是由不同群体的实际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但是也能够间接地反映当时寺院周边聚落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诸如永寿寺、灵图寺、榆林寺等寺院周边不仅散布有吐蕃部落，而且有汉人聚落的存在。可以推测，或是这些聚落因寺庙建造以后带来的人口汇集形成，或是寺庙因村落聚集而选址于此。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寺庙周边是沙洲地区聚落或村落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的推断，似乎毋庸置疑。这一点也可以与唐代中原内地村落中普遍建有寺院的状况做类比。

因此，可以看出，唐代西北地区的村落是得到充分发展的。但通过对安西四镇、西州、沙洲几个地区的考察来看，西北地区村落的发展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以外，也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联。西州地区的乡村发展状况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体而言，唐代村坊制度对西北地区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二、青藏地区的村落

吐蕃王朝兴起以前，青藏高原地区长期处于以众多氏族部落为组织单元的分散状态，这些氏族部落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多分布于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河谷地带以及地势较为平缓的高原地区，以游牧业和农业为生。青藏高原上的早期聚落遗址反映了这样的发展状态。如西藏象泉河流域的丁东遗址与穹窿银城遗址、拉萨河谷与藏北高原交界地带的加日塘遗址等游牧聚落遗址，青

海地区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及西藏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等皆为例证。

吐蕃王朝兴起前夕，经过长期的分化与融合，西藏地区已经形成了数十个部落联盟[20]。石硕先生曾根据历史文献对西藏地区早期的小邦进行过考证，可以确定名称与位置的共有9个，主要分布在西藏中南部拉萨河、年楚河流域及藏北高原。[21]这些小邦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邦国，有自己的部族首领与独立的管理体系，建有堡寨，并以堡寨为中心分布着部落民众的聚居单元。

现存敦煌吐蕃文书及现有考古发现，均可说明青藏高原地区早期小邦及其周边寨子的分布状况，而这种寨子应该就是当时部落群众的聚居单元。如西藏噶尔县境内的穹窿银城遗址被认为是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其城堡建筑遗址分布于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形山顶。根据遗址可见城堡有防御墙和堡垒，堡内有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及公共建筑。山下还分布有居住遗址和墓地。其中，居住遗址错落分布于中部与南部的河流一级台阶之上，成组布局，共有几十余组。较大的组由20余间房屋构成。霍巍认为这些居住遗址的排列分布方式是经过周密规划的。[22]这在西藏古代相关史籍中可以得到证明。《贤者喜宴》中有载，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七良臣中的第五位涅·赤桑央顿，其毕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居于山上的民众迁到河谷地带，开垦土地，形成居住单位，并在高山上修建堡寨，以堡寨为基础改造出城镇。[23]根据穹窿银城遗址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并非出现于吐蕃时期，而是早在象雄国已经出现。据此可以推断，穹窿银城遗址中位于山上的堡寨后来就逐渐发展为城，山下河谷地带的几十组建筑群即为当地早期普通民众的基本聚居单元。这种聚居单元或可与中原地区早期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乡野聚落做类比。

吐蕃时期是青藏高原地区村落发展的重要时期。7世纪初，

早期氏族部落的一支——雅隆部落经过长期的累积与发展，已经成为部落联盟中最具势力者。松赞干布即位以后，即着手加强军事力量，并在其祖父达布聂西及其父朗日论赞所开创的国家事业的基础上，平定内部叛乱。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该部落不仅吞并了象雄、苏毗，统一了西藏各部，还建立起吐蕃政权，将都城迁至拉萨。其后，吐蕃王朝进一步向外拓展疆域，兼并了青海的吐谷浑及川西北高原的党项、多弥、白兰诸羌，统治势力覆盖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形成威胁唐朝西北边疆稳定的一股强势力量。安史之乱以后，吐蕃王朝更是占领了西域及河西陇右地区，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统治。疆域版图的扩大促使吐蕃王朝可与唐王朝、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直接沟通。加之统治阶层采取了积极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政策，吐蕃王朝与周边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在频繁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吐蕃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农牧业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青藏高原各地方的农牧型聚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首先，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业聚落与城市的发展。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以后，同唐王朝一样，西藏地区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阶段。松赞干布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不仅开拓荒地，而且大力改善灌溉条件，蓄水为池，引水为渠，还建立了旱灌涝排设施，“定衡量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涂彩”。^[24]此外，这一时期犁、镰、铍、手斧等铁制农具及“二牛抬杠”式犁耕已经在青藏高原农业生产区得到普遍使用。尤其是文成公主入藏，不仅携带了不少农艺、历算书籍以及适合高原地区生产的谷物种子，而且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教授给当地民众。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如山南地区的农田开垦、种植、保苗、灌溉等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青海地区水磨的建造与使用方法，皆是文成公主入藏之力所成。

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迁入吐蕃地区的中原移民，也为吐蕃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直接促进了农作物种类的丰富。据《旧唐书》记载，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地区已经种植有青稞、小麦、荞麦、芸豆等多种农作物。[25]可以看出，当时吐蕃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不仅促进了吐蕃地区农业生产区域的扩大，也促进了当地农业聚落的发展。根据《西藏王统记》的记载，此时拉萨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已经“牛羊遍野，农田弥望”[26]，河谷地带也出现了村镇[27]。这种分布于河谷的聚落，应该是在类似于穹窿银城遗址中山谷地带建筑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正是涅·赤桑央顿对建立山城与河谷聚落建议的实施结果。由此也可以推测，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地区的河谷地带已经成为农业聚落发展的主要的分布区。

吐蕃时期的青藏高原，还出现了不少因军事屯田而产生的聚落。如贞观年间，唐军击败吐谷浑控制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之后，受到吐蕃势力北上扩张的威胁，唐政府不得不在当地以重兵驻守，其后更是在青藏高原东部、北部、西部地区以三面包围的形式安置重兵。不仅如此，唐王朝每年都要从内地征调丁男赴藏充兵，以维持军力，还在当地屯田发展农业与牧业以备军用。因此，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在唐初就成为唐王朝重要的屯田区。其中，规模最大者为黑齿常之部河源军（驻于今西宁市）的屯田，面积达5 000顷。[28]自此至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在青藏高原北部驻兵近80年，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些屯田区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一定规模的村落。吕温所作《经河源军汉村作》一诗，就记录了其出使吐蕃时在吐蕃王朝统治的河源地区所见的场景：“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驻单车空

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29]诗中即描述了当地因屯田形成的村落与城镇。据此，有学者推断，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已经有不少汉人，并且形成了部分汉人村落。[30]

其次，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游牧聚落的发展。吐蕃王朝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积极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开垦并划分牧场。这一时期，青藏高原已经形成了春夏逐水草而居、秋冬有固定牧场的随季节变化的放牧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定居牧耕，不再是传统的单纯游牧。这种放牧方式的转变直接促进了牧区聚落的形成。

最后，佛教于吐蕃时期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的聚落的发展。吐蕃时期，由于吐蕃王朝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弘扬与推崇，佛教寺院被大量建立。除了已建寺院会吸引民众聚居以外，新建寺院也通常会因寺属人口、“供养顺缘之奴隶”及寺产民户[31]的增多引起人口的汇集，进而促使大小聚落形成。这在上述吐蕃统治沙洲时期的聚落发展状况中已经有明显的反映。对于普遍崇信藏传佛教的青藏地区而言，因寺院的大量兴建而带来的聚落大量发展，已经可以预见。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仅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境内的佛教寺院已经达到1 008座。[32]仅这一时期，千余座寺院对青藏高原地区聚落发展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更不必提整个吐蕃时期寺院对青藏高原地区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三、北方地区的村落

隋唐以前，突厥势力逐渐壮大，开始控制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东至辽海（今辽河上游）、西至西海（今里海）的广大

草原及沙漠地区。至隋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势力分为东、西二部。自此至唐代前期的近50年间，大漠南北地区皆在东突厥势力的控制之下。唐初，东突厥及北方反唐武装势力屡次对李唐新生政权发起挑战。唐军统一华北以后，开始对东突厥势力展开军事行动，并于唐贞观三年（629年）底击溃东突厥武装势力。次年三月，东突厥首领率部落投降。自此，唐王朝完成了平定北方地区的战争。

东突厥势力灭亡以后，唐王朝开始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贞观四年（630年），唐政府在自幽州至灵州间的地区设置了顺州、祐州、化州、长州都督府，并分颉利可汗统治故地为六州，置定襄都督府及云中都督府统管各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朝又在北部沿边突厥各部设置了一批羁縻州。车鼻可汗政权灭亡以后，唐政府又设置瀚海都督府（663年改名云中都护府，移至云中，664年改名单于都护府）与燕然都督府（668年改安北都护府）分管大漠南北区域。唐王朝基本完成对北方地区的行政建制，并同对待其他民族地区一样，以羁縻政策进行行政统治。

北方地区以广阔的草原为主，自古便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无法像中原地区那样充分发展农业生产，并形成稳定的定居聚落，而是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为主。早在汉代，西北地区已经形成了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这类部落联盟多是由多个氏族部落组成，如匈奴部落联盟、鲜卑部落联盟、突厥部落联盟等。3世纪，这些部落联盟经过兼并、战争，最终形成几个草原部落大联盟。^[33]草原部落大联盟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基本上由不同的氏族部落组成。如檀石槐时期的鲜卑草原部落大联盟，就包括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段部鲜卑的五十多个邑落，每个邑落又由多个氏族构成。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成分更为复

杂，包括天山东部及漠北的九姓铁勒、九姓回纥、四十姓拔悉密、三十姓靺鞨等多个不同的氏族部落。^[34]至隋唐以前，西北地区已经存在诸多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由早期游牧部落发展而来。这些草原部落大联盟自形成至隋唐时期，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西北草原地区的不同区域进行统治，但其部落基本的组织形式是相似的。

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并不似青藏高原的农区部落，也与中原地区的乡村聚落不同，其部落形态与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都表现出游牧民族的突出特性，即流动性较强。这些部落会因放牧条件的改变流动，也会因战争等因素发生迁移，就连部落首领所在的牙帐也并非完全固定，甚至举部而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尤其是战争导致迁移更为频繁。如唐初东突厥灭亡以后，薛延陀即占据漠北地区，并将其牙帐迁至都尉犍山（今址不详）和独逻水以南（今蒙古国土拉河）区域。^[35]另如据颜真卿《臧怀恪碑》记载，开元初仆骨部设支部落有2 000帐归附唐政府^[36]；开元三年（715年），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带领部落万余帐南迁^[37]。其迁移单位“帐”通常代表一户家庭。可以看出，这种迁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流动性很强。

除了游牧部落外，北方草原也有部分地区存在农业生产，并形成固定的农业生产聚落。典型的为漠南地区。一方面，该地区因处于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界地带，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隋唐时期因各种因素迁移至漠南地区的汉人，也对当地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迫使不少中原地区的民众向外迁移。除了向南方及西南地区迁移外，相对安定的漠南草原也是重要的迁入地区。因而，隋唐时期当地也汇聚了不少汉人及突厥人。隋灭亡以后，东突厥政权曾立隋朝皇室杨政道为隋王，

并将因躲避战争迁移至东突厥的中原百姓及官员等一万多人交由其管理，居于定襄郡。^[38]唐王朝击溃东突厥势力以后，部分中原汉人返回中原地区，漠南又成为部分战败东突厥降众的安置地。据《旧唐书》记载，在此期间，当地曾招募汉人来此垦田耕种。^[39]

武周时期，漠南地区还是唐朝犯人的主要流放地。如武则天就曾将牵连入越王谋反一事的近6 000人流放至漠南的丰州地区。^[40]这些迁移至漠南地区的汉人，必然促进了当地生产方式的转变，乃至定居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据《新唐书》记载：“丰州九原郡，下都督府。贞观四年以降突厥户置，不领县。……土贡：白麦、印盐、野马胯革、驼毛褐、毡。户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县二。九原，中下。永徽四年置。有陵阳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41]从这则记载中可以明确两点：第一，丰州地区的土贡中，除了游牧民族特产的动物皮毛及相关制品以外，还有“白麦”，这充分显示了当地是存在农作物种植的。农作物种植及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定居形式的农业聚落，这也同样说明了当地农业性质聚落的存在。第二，其中所载当地官吏所开凿的两条用于农业灌溉的水渠，一条因“置屯”而弃用，另外一条则“溉田数百顷”，这些信息都表明该地已经建立了农业聚落“屯”，而这个能拥有数百顷耕地的聚落规模应该并不小。《新唐书》中的另一记载也可对吐蕃农业及农业聚落的发展提供例证。据载，元和年间，韩重华曾在振武、中受降城（今包头市西南）、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募民屯田，共垦田3 800余顷，并于当地形成了15个屯，每屯130人，每人分得耕地100亩。^[42]可见，这类随着屯田活动的开展所形成的农业生产聚落，也是具有中原特色的新兴聚落单元。这成为草原地区具有村

落性质的农业聚居单元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来源。

[1] 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阆影响的几个问题》，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2]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70页。

[3]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61页。

[4] 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株式会社法藏馆1996年版，第81—82页。参见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63页。

[5]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64页。

[6] 《唐会要》卷九五《高昌》。

[7] 《唐会要》卷九五《高昌》载：“（贞观）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

[8]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74页。

[9]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74页。

[1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版，第214页。

[12] 池田温著，龚泽铎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页。

[13]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14] P.T.1297《宁宗部落夏孜孜永寿寺便麦契》，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0页。

[15] P.4686《子年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便粟契》，参见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6]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17] S.1475v《酉年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便麦契》，参见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18]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19] 侯文昌：《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20] 即所谓的十二小邦（也有二十五小邦、四十小邦之说），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记载了十二小邦的大概信息。实为十七个小邦。参见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21] 石硕：《关于唐以前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第4期。

[22] 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

[23]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24] 才让：《吐蕃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5]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

[26]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27] 乔政：《吐蕃奴隶制社会经济初探》，《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28]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代》，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29] 吕温：《经河源军汉村作》，载《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一。

[30]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代》，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222页。

[31] 《楚布江浦建寺碑》，载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32] 罗桑开珠：《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3] 如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草原部落大联盟、以社论为首的柔然草原部落大联盟、以阿史那氏土门系诸部落为首的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以夷男为首的薛延陀草原部落大联盟、以骨力裴罗为首的回纥草原部落大联盟。参见贾衣肯：《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6期。

[34] 贾衣肯：《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6期。

[35]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

[36] 颜真卿：《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载《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二。

[37]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

[38]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39] 《旧唐书》卷九十三《唐休璟传》。

[40]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41]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

[42]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福建南靖县田螺坑村“四菜一汤”



贵州荔波县瑶山乡生态移民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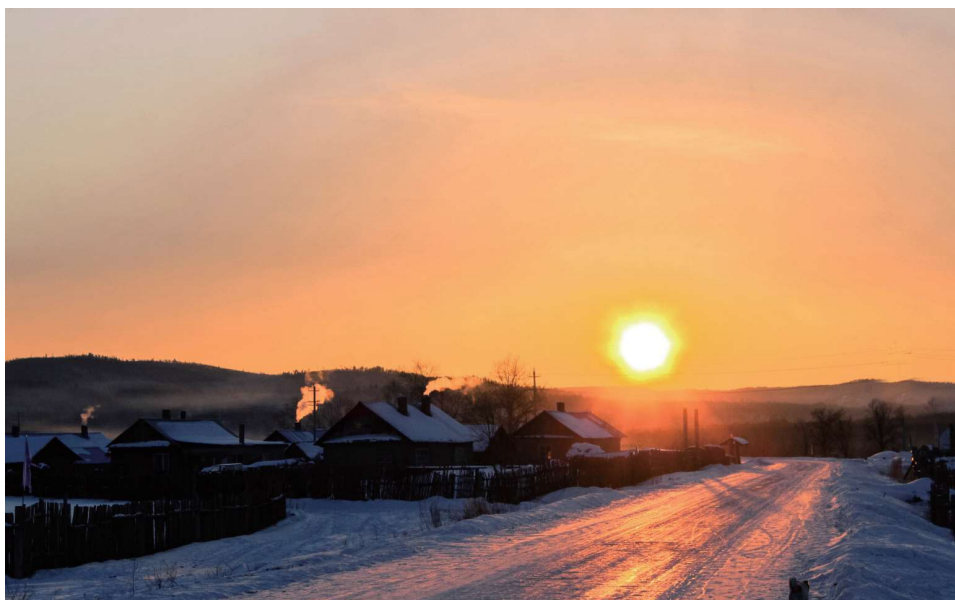
贵州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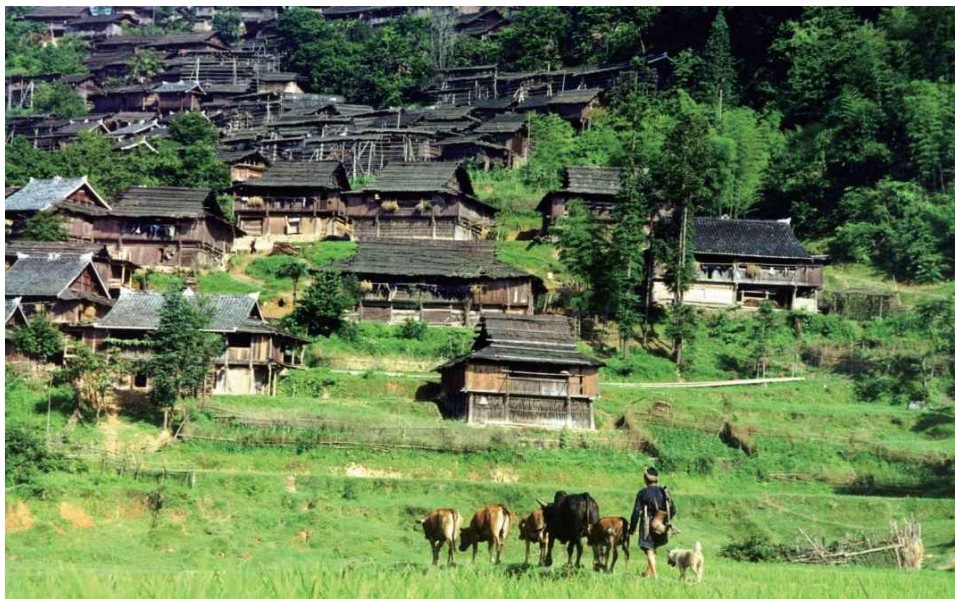
黔东南苗族村寨



湖南桂阳县锦湖村



黑龙江漠河北极村



贵州从江县岜沙苗寨



湖南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



湖南隆回县花瑶梯田



湖南宜章县邝里洞村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侗寨



江苏苏州陆巷古村



湖南资兴市代头村



四川色达县东嘎寺



西藏林芝鲁朗镇藏族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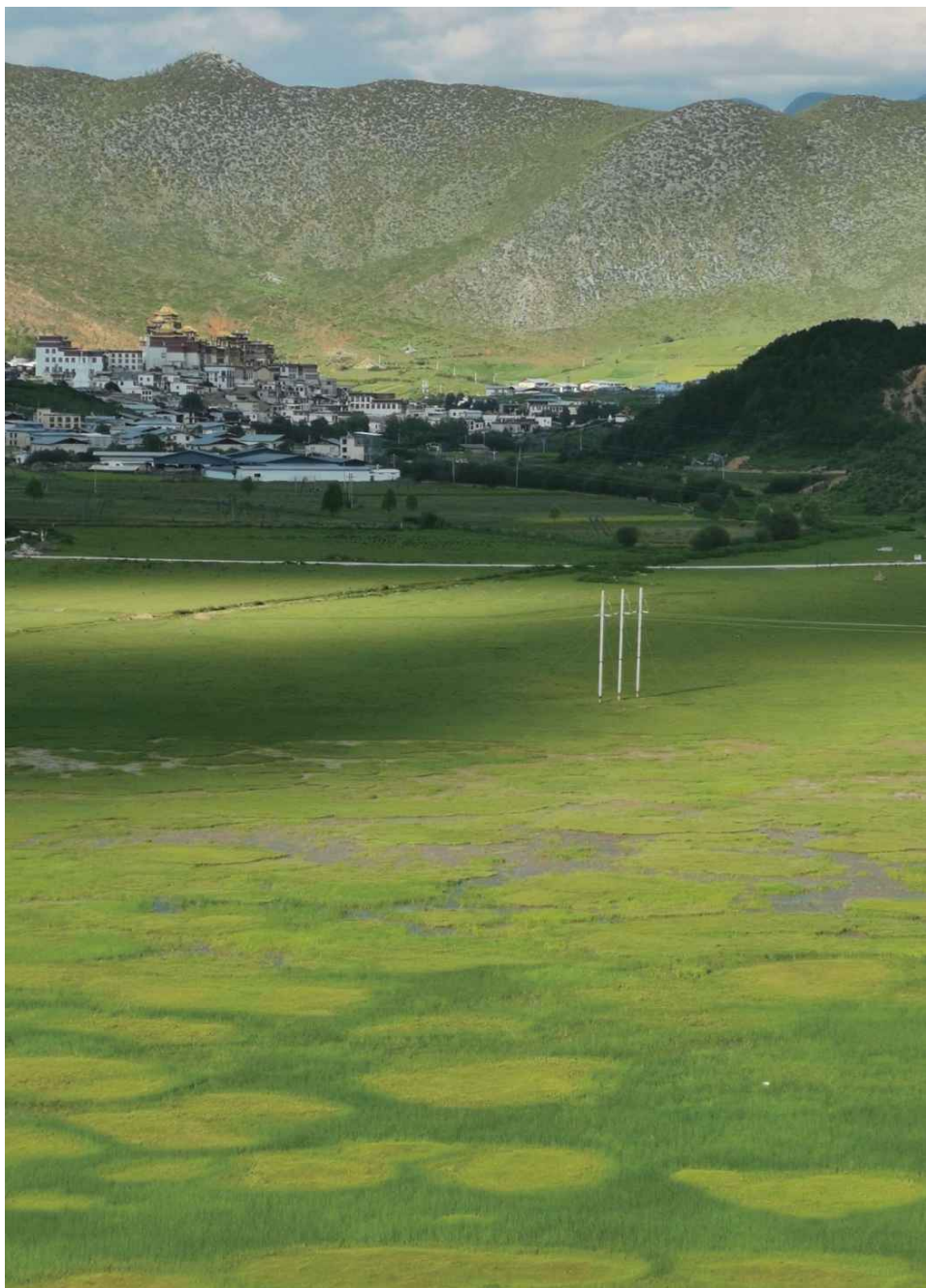
西藏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古盐田



西藏芒康县藏族村落



浙江丽水云和梯田



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



安徽黄山呈坎村居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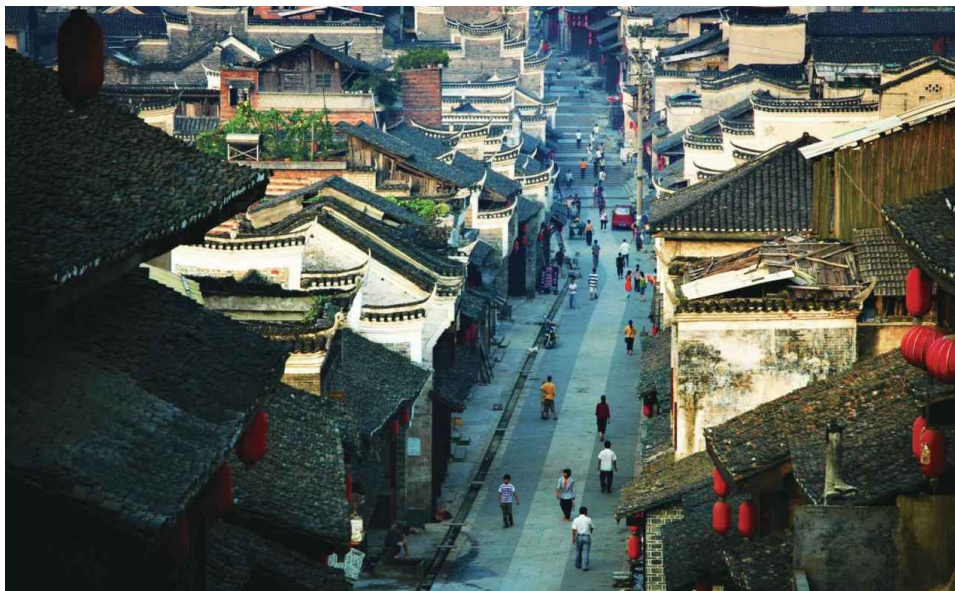
村落竹编



湖南江永县勾蓝瑶寨洗泥节



贵州苗寨中的渡船



贵州黎平翘街



湖南湘西德夯苗寨的老太太在织锦



湖南花瑶挑花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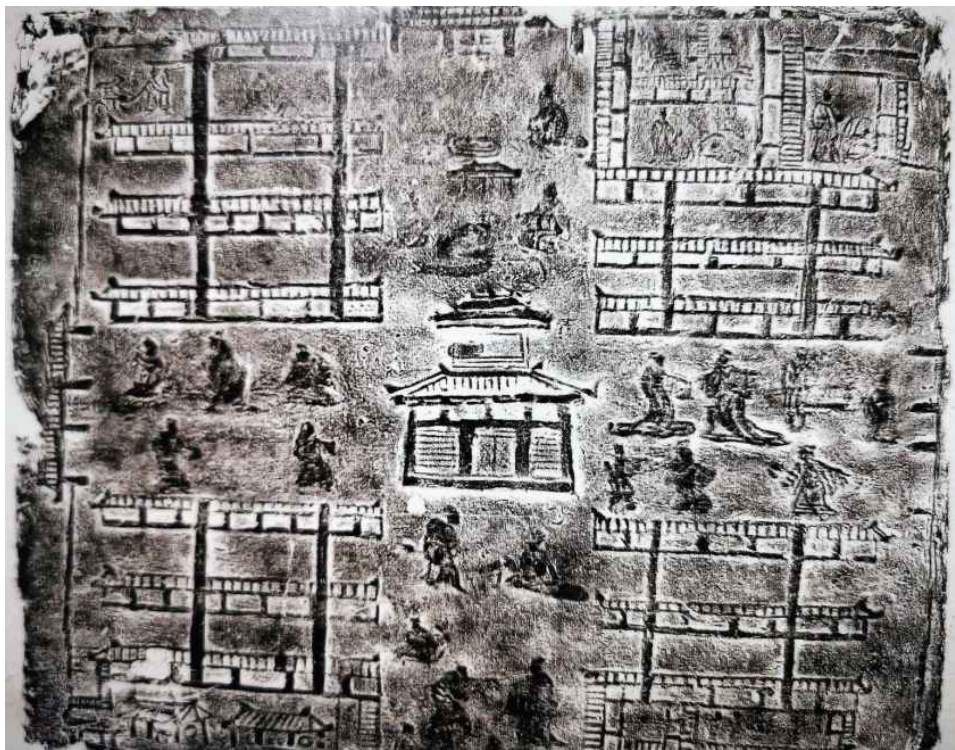


黔东南苗寨的节日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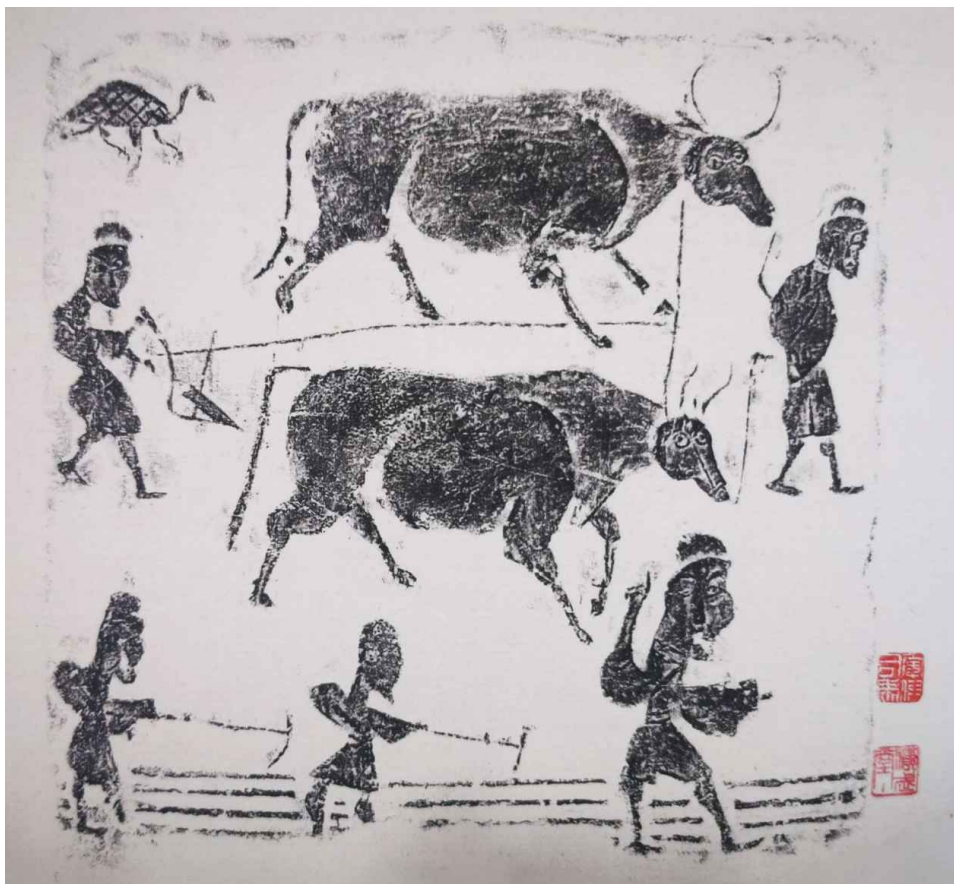


山西临县李家山村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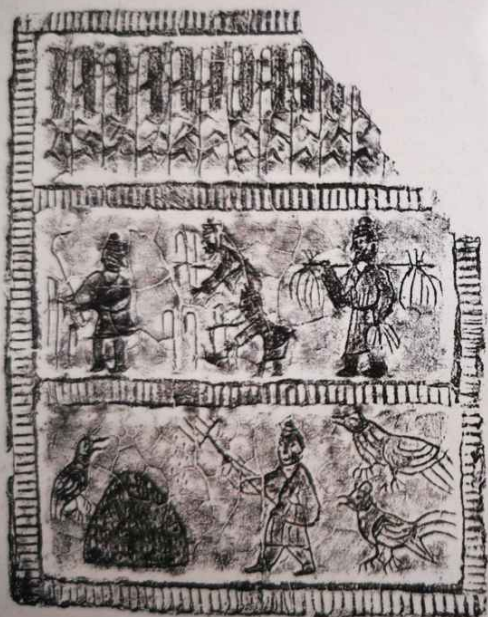




汉代市肆图画像砖，四川成都地区出土



汉农耕、收割画像砖，河南南阳地区出土



汉农耕、收割画像砖，河南南阳地区出土

图片来源

文前图片 汉代市肆图画像砖，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王建编著《汉风遗韵：金石拓片集珍》，展览图册2019年，第135页。

汉农耕、收割画像砖，河南南阳地区出土。王建编著《汉风遗韵：金石拓片集珍》，展览图册2019年，第138页。

汉农耕、收割画像砖，河南南阳地区出土。王建编著《汉风遗韵：金石拓片集珍》，展览图册2019年，第138页。

文前页中其他未标明来源的照片均为作者自摄。

图1-1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提供。

图1-2a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提供。

图1-2b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提供。

图2-1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图2-2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图2-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图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

古》2002年第2期。

图2-5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日照县图书馆：《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图2-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图2-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城墙与护城河2011—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3期。

图2-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图3-1、图3-2 白庆韬：《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民居建筑复原图研究——以第二处庭院

图3-3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新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图3-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图3-5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图4-1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

插图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

期。

插图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版。

插图3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版。

插图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插图5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复原干栏式建筑。

插图6 作者自摄。

插图7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
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插图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
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插图9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
第10期。

插图10 驿使图壁画砖，甘肃省博物馆藏，见[http://
www.gansumuseum.com/dc/viewall_244.html](http://www.gansumuseum.com/dc/viewall_244.html)。

插图11 作者自摄。

插图12 作者自摄。

插图13 三国黄褐釉陶楼，襄阳市博物馆藏，见[http://
www.xymuseum.cn/html/70-1.html](http://www.xymuseum.cn/html/70-1.html)。

插图14a、插图14b 段小强、赵学东：《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农作图〉》，《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278—282页。

插图15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插图16 敦煌莫高窟第23窟主室北壁壁画，见<https://www.e-dunhuang.com>。

插图17 徐光启著，陈焕良、罗文华校注：《农政全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

插图18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见<https://www.ciae.com.cn/collection/detail/zh/1737.html>。



中国 村落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illages



胡彬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目录

第六章 文化大繁荣与村落制度民间化

第一节 宋元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 一、从乡里制到管耆制
- 二、熙丰以后的都保制
- 三、蒙元时期的村社制

第二节 宋元村落的民间治理

- 一、宗族制度与村落社会
- 二、乡约制度与村落治理
- 三、基层组织与“宋型家庭”

第三节 宋元村落的生产生活

- 一、市镇发展与宋元村落
- 二、农具革新与农业发展
- 三、乡村教育与村落社会
- 四、村落与宗教的世俗化

第四节 宋元村落的形态

- 一、人口迁徙与村落
- 二、宋元村落的规模
- 三、村落的环境与建筑

第五节 辽、金、西夏的村落

- 一、契丹入侵与辽国的村落
- 二、女真内迁与金国的村落
- 三、党项割据与西夏的村落

第七章 文明的繁盛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

第一节 明清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 一、从都保制到里甲制
- 二、保甲与里甲的并行
- 三、基层组织与自然村落

第二节 明清村落的治理

- 一、宗族制度与村落
- 二、乡约制度与村落
- 三、乡贤士绅与村落
- 四、乡村教育与村落
- 五、民间信仰与村落

第三节 明清村落的发展与变迁

- 一、村落的分布与地域差异
- 二、军事发展与戍边村落
- 三、人口迁移与村落
- 四、市镇发展与村落

第四节 明清村落的环境与景观

- 一、村落的布局
- 二、村落的景观
- 三、村落的建筑

第五节 明清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

- 一、西藏地区的村落
- 二、西南地区的村落
- 三、新疆地区的村落
- 四、蒙古地区的村落

第八章 文明的转型与村落的变迁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晚清民国村落

- 一、西学东渐与村落社会
- 二、近代工商业发展与村落
- 三、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与晚清民国村落

- 一、晚清农民运动与村落
- 二、军阀混战与村落
- 三、抗日战争与村落
- 四、解放战争与村落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与村落

- 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村落
- 二、“破四旧”运动与村落社会

第四节 城镇化进程与村落

- 一、基层政权的建设与村落
- 二、土地政策的变化与村落
- 三、城市化发展与村落变迁
- 四、传统村落的研究与保护

附录 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

图片来源



第六章

文化大繁荣 与村落制度民间化



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发展、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村落发展的重要阶段。宋初，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后，朝廷为消除藩镇割据，一方面加强了对各地藩镇势力的安抚与镇压，另一方面采取“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重用士人，发展儒学，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针对乡村版籍混乱等现状，朝廷展开相关整顿，主要是完善账历、点检制度，建立户等制，并将差役与户等挂钩。宋初，“乡官”转为“职役”，里正、户长等大多由村中富户担任。开宝七年（974年），为革除里正在乡村管理中的种种弊端，朝廷废乡设管，以户长主纳税，乡里制逐步转变为管耆制，继而又转变为都保制。随着国家政权机构逐步从乡村社会撤出，乡村士绅阶层逐步兴起，各类宗族组织、乡约组织广泛出现，村落治理呈现民间化的态势。

宋元时期经济发展迅猛。依托商品生产与贸易，市镇经济发展迅速，市民文化发达。同时，各类宗教也以各种形式广泛融入市民、村民生活中，宗教世俗化明显。宋代重视文教的政策，使士人集团得以崛起。宋代士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观念以及饱含温情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于乡村社会，就是宗族组织的重建与乡约制度的产生，以及乡村蒙学和私学的大力发展。及至元代，村落社会中的宗族组织和乡村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

宋元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北方中原地区的大量人口南迁，东北的女真、契丹与西北的党项等民族内迁，北方蒙古族南下，此起彼伏，勾勒出一幅壮美的人口迁徙的时代画卷。人口的迁移与变动对村落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宋元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乡村是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基础，乡村管理历来为执政者所重视，历朝历代都通过在乡村中设置相应的基层组织，实现对乡村人口与土地的有效管理。正如前揭，秦汉对乡村地区的管理主要采用乡里制，隋唐时期则发展为村坊制。事实上，不论国家采取何种基层制度或者设置何种组织，管理乡村地区的制度即意味着国家对包括村落在内的乡村地区的行政管辖。所不同的是，制度都是根据国家的治理需要来选择的。由此，进一步来看，尽管不同时期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通过制度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乡村地区，以达到维护和稳定国家统治根基的目的。宋元时期的乡村基层制度自然也不例外。

一、从乡里制到管耆制

宋承唐制，在乡村基层组织及对其的管理上沿用了唐代的旧制，“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搠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1]不过，随着后来户等制的建立以及乡村差役与户等的挂钩，宋代的乡里制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

（一）乡里制的建立

宋初，朝廷对乡村的行政管理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针对乡村版籍缺失的现状，完善账历、点检制度。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诏曰：“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账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即不得烦扰人户。令佐得替日，交割批历；参选日，铨曹点检。”^[2]二是根据乡民家中资产的多寡，将乡村主户分为五等，在全国推行户等制。宋人张方平在论及分户时说：“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3]宋代乡村不同户等之间财产差距很大。第一等户占有的土地面积达每户400亩以上，这类群体构成了乡村的豪强大地主阶层；第二等户为乡村的中等地主，占有土地面积为每户150~400亩；第三等户为每户占地100亩以下的上层自耕农或富裕农民；第四等为每户拥有田产30~50亩的一般农民；第五等为每户拥有田产30亩以下的半自耕农。^[4]

在全国推广户等制的同时，朝廷还对乡村的行政组织及管理展开整顿。首先是建立乡里组织，并将差役与户等挂钩：“里正、户长掌课输，里正于第一等差，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隶里正，于第四等差。又有耆长，掌盗贼、烟火，于第一等、第二等差。其属有壮丁，于第四、第五等差。”^[5]与唐代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不同，宋初乡与里之间的关系比较混乱，很多时候是一乡为一里，司马光曾言：“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6]这表明，在唐代，乡具有明确的编户的概念，而在宋代，乡则具有地域的概念。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里正成为乡的最高行政长官，户长和乡书手作为辅役协助里正完成催征赋税等具体的工作事务。

里正除了要催征夏秋二税，还负责县中差役的圈派。“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7]随着里正在乡村基层组织中权力的扩大，其在征税、派差、登记丁产簿等事项中，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在乡村基层影响恶劣。宋代朝廷注意到了乡村里正的索贿作弊问题，为了革除弊端，化解乡村管理矛盾，加强对乡村的有效控制，北宋早期，“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设管，以户长取代里正，主掌纳税，以耆长主管乡村治安。^[8]宋代乡村基层组织管理体系由此而始，逐步由乡里制转变为管耆制。

（二）管耆制的建立及其推广

户长一职在宋初的乡里制中就已经出现，只是彼时的户长是作为里正的辅役出现的。在《嘉定赤城志·乡役人》中记载：“建隆初，里正、户长掌课输，里正于第一等差，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隶里正，于第四等差。”^[9]废乡设管后，户长的身份发生转变，由乡“役人”变为“管”的头目，其管辖的范围大致与“里”相当。

耆长一职出现的时间更早。在唐代，乡村中就有“耆老”的称谓出现。^[10]不过，此时的耆老并非乡村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员，而只是一些与乡村教化有关的荣誉称号。到五代后周时期，随着乡村中推行“团并乡村”的制度，耆长作为乡村基层社会的管理者，正式在乡村基层组织中出现，其职责主要是负责乡村治安，以及民田耗登之事。显德五年（958年）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11]在诏令发布两年后，后周被北宋取代。在乡村管理中，宋代沿袭前制，以耆长维护治安的制度得以保存。乾德四

年（966年），朝廷下诏严禁耆长等扰民求财，“告谕蜀邑令尉，禁耆长、节级不得因征科及巡警烦扰里民，规求财物”^[12]。到开宝七年废乡设管后，耆长的职责变得更为明确。

管耆制中的“管”与“耆”关系复杂。在日常管理中，户长与耆长互不统属，在管辖地域上，二者也并不重合。耆长作为维护治安的职役，直接与县行政机构发生联系，根据县中指令处理相关事务。耆长维护乡村治安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逐捕盗贼，二是处理乡村打斗词讼及司法诉讼事务，三是参与消防“烟火”之事。^[13]户长的职责则以催征赋税为主。至和二年（1055年），“罢里正，增差户长”^[14]，户长成为乡村基层催征赋税的主要职役。

开宝废乡令颁布后，乡政并未消失。至和二年罢里正后，乡书手地位逐步上升，由早期作为里正辅役的乡役转变为县吏，又称“乡司”，常驻县衙，主管一乡的户籍、赋税徭役等相关事务。乡书手由乡役成为县吏，表明了宋代基层管理中乡权上收的实际，与宋政权加强集权的治国方略相符。^[15]不过，在北宋不同地域的乡村，管耆制的实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以相州为代表的一些地区，管取代乡，下辖若干个村，形成管-村模式；其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原有的乡一级基层组织实际并未全部废除，仍旧维持乡-里（村）的运行机制；其三，在个别地区（如浙江德清县），管处于乡之下，与里同级。^[16]

熙宁八年（1075年），北宋颁发《罢耆户长壮丁法》，在乡村基层推行保甲制：“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乡村每主户十至三十轮保丁一，充甲头，主催租税、常平、免役钱，一税一替……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

壮丁。法未有保甲处，编排毕准此。”^[17]自此，宋代乡村基层组织由熙丰之前的乡里制、管耆制逐步转变为熙丰之后的都保制。

二、熙丰以后的都保制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有一个基本的变化趋势，即乡里制逐渐崩溃，而乡都制逐步确立。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段，以熙丰年间为界。

（一）保甲制度的建立

北宋中期，宋朝政权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财政上，冗官冗兵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军事上，重文抑武的政策推行，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无力应对边患；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18]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社会、边地三大危机，改变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局面，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实施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司农寺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最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并令附保。内材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逐保保丁……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并令申县。如同保不及五户，听并入别保。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住者，亦申县收入保甲。本保内户数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19]到熙宁八年，保甲编制有所缩减，五户

为一保，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其实施的范围包括乡村所有等户。

王安石推行保甲制最初的考虑，在于通过户籍的编制实施连坐之法，以维护乡村治安：“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之为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20\]](#)

其后，王安石试图以保甲兵逐步取代募兵以解决冗兵问题：“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21\]](#)他试图通过解决冗兵问题，逐步扭转宋朝贫弱的颓势。依此意图，保丁于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开始习练武艺。先是在开封府各县，后在北方五路及全国逐步推广：“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余艺而愿试者听。第一等保明以闻，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免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视此有差。艺未精愿候阅试，或附甲单丁愿就阅试者，并听。都副保正武艺虽不及等，而能整

齐保户无扰，劝诱丁壮习艺及等，捕盗比他保最多，弭盗比他保最少，所隶官以闻，其恩视第一等焉。”[22]

与兵制有关的“教阅”保甲，多在边地推行，如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及四川、两广等沿边地区，要求各保丁操练武事以达成逐步取代募兵的目的。在乡村基层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非教阅路分”的家保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其保甲壮丁的职责仍然以逐捕盗贼为主。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若催科外别令追呼者，以违制论。”[23]在保甲制中，甲的主要职责在于“督输税赋苗役”，一般三十户编为一甲。熙宁八年，进一步罢免耆户长，“诸县有保甲处已罢户长、壮丁，其并耆长罢之。以罢耆、壮钱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乡村每主户十至三十轮保丁一，充甲头，主催租税、常平、免役钱，一税一替……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壮丁。法未有保甲处，编排毕准此”[24]。

通过保甲组织，乡村社会被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实际的组织管理中，此前负责治安的耆长被都保正和副保正代替，昔日户长所负责的催收赋税的职责为保丁轮差的甲头承担，保甲组织开始具备治安与催税两类职责。熙丰年间，通过与职役的逐步结合，保甲制逐步替代了乡里制与管耆制。

（二）保甲制的罢废及都保制的形成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主政朝廷，启用司马光。四月，司马光上呈《乞罢保甲

状》，指保甲制度“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搔扰，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贫民罄家所有，无以供亿”^[25]，又指以保丁征战“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26]。七月，司马光又上书《乞罢保甲札子》，极力指陈保甲弊端：“臣愚以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贼盗，则近已有指挥，巡检、县尉及弓手兵级人数……若使之攻讨四夷……必望风奔溃……徒令府界及五路农民不堪愁苦。”^[27]此处之五路指的是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之“教阅路分”以及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之事。又上《乞罢免役状》，及至元祐元年（1086年）又上书《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请求废除保甲制度。元丰八年十月，复募役耆长、壮丁，罢保甲法。

保甲法虽然被罢，但是保甲组织在民间尚存，朝廷亦允许旧时保甲制下的保正、甲头等兼充乡役中的耆长、户长。《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府界诸路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并募充，等第给雇钱。其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府界诸路合支雇钱，权于役钱宽剩内支給。”此段文字之后，作者又补充说明“旧录诏耆长、户长、壮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按此时保甲固在，保正长亦未尝废”^[28]。事实上，司马光反对的更多是沿边五路的“教阅”保甲，对非教阅的保甲制度，基本还在推行。北宋绍圣年间出现的反复，主要是停用甲头催科而指定大保长催税。

宋徽宗时期，蔡京当国，对东南地区的保甲组织展开整顿。“及章惇、蔡京述安石之弊，行于东南乡之中，以二百五十家为保，差五十小保长，十大保长，一保副，一保正，号为一都。凡州县徭役、公家之科敷，县官之使令，监司之迎送，一州

一县之庶事皆责办于都保之中。”^[29]至此，王安石所创设的保甲制转变为都保制，并逐渐演变为宋代乡村基层管理组织。

（三）南宋都保制与经界法

宋室南渡后，南宋政权在乡村基层管理上延续了北宋的都保制度。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境内普遍建立了都保组织。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朝廷强化了甲头的催税职责：“改用甲头，专责县令、佐，将形势户、平户随税高下，各分三等编排，籍定姓名，每三十户为一甲，依此攒造成簿。然后按籍，周而复始轮差。”^[30]同时，南宋在乡村中实施经界法。由于长期的战乱影响，百姓流离，地籍散乱，地主世家大量兼并土地，严重影响到了南宋政权的赋役实施。因此，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和议之后，南宋朝廷立马着手加强对乡村的管理改革，在乡村实施经界法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两浙转运使李椿年上书，指出造成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在于经界的混乱：“臣闻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井田之法坏而兼并之弊生，其来远矣。况兵火之后，文籍散亡，户口租税，虽版曹尚无所稽考，况于州县乎！豪民猾吏，因缘为奸，机巧多端，情伪万状，以有为无，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并，贫者日以困弱，皆由经界之不正耳。”^[31]并进一步具体指出经界混乱的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税偏重，故税不行。”^[32]李椿年的上书得到宋高宗的重视。高宗下令拟在全国的乡村推行经界法，并责成李椿年制订具体施行方案，负责此项改

革。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始，李椿年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试行经界法，着手清查土地。此为经界法在全国推行之肇始。绍兴十三年（1143年）六月，宋高宗以李椿年为户部侍郎，主持经界法的施行，经界法正式在全国推广开来。

为保证经界法的顺利推行，李椿年设置了专门的执行机构。即在转运司下，设置“措置经界所”，具体管理经界法推行的各类事务。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对当时在江苏平江府推行经界法的具体举措有详细记载：“其法，令民以所有田各置砧基簿，图田之形状，及其亩目四至，土地所宜，永为照应。即田不入簿者，虽有契据可执，并拘入官。诸县各为砧基簿三：一留县，一送漕，一送州。凡漕臣若守、令交承，悉以相付。诏专委仲永措置，遂置局于平江。”^[33]在乡村以都为单位，要求官、民等各户依式造砧基簿，内容有户主姓名、田地面积、田界、四至、坵段、土地来源（典卖或租产），并附上绘制的地形图。砧基簿及地形图制定后，由乡都保等基层人员召集田主、佃户等逐坵计亩角押字，保正长在图的四止押字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差官按图勘验核实。勘察核实无误，即付入户永为执照。各乡各留存本乡砧基簿一份，另外还需再造三份，一份存本县，一本纳州，一本纳转运司。此后，一切税赋与田地买卖均以砧基簿为准，如田土不上砧基簿或虽录造但不实的，一经查出，即便有原地契文书，凡不依经界法录入的也一概没收。

到绍兴十九年（1149年）冬，经界法经六七年的推行，除沿边的两淮、湖北、京西路以及福建的漳州、泉州、汀州等少数地区外，全国乡村的经界勘察工作大体完成。随着经界法的实施，隐田漏税和税赋不均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基本上做到了赋税应收尽收，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漏税偷税问题，也体现了一定的公平公正。经界法的推行实施，不仅增加了国库收入，

也使得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朱熹曾评价道：“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图籍尚存，田税可考，贫富得实，诉讼不繁，公私两便。”^[34]

三、蒙元时期的村社制

（一）村社制的源流

在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村社指的是乡村祭祀社神的活动，如《旧唐书·文苑传下·司空图》记载：“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在宋代文献中，村社的含义有了改变，有的是指乡村聚落，如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记载，“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35]，有些则是民间互助组织的名称。当乡村有一些重大事项，如祭祀、修庙等需要集合群体力量去办的事情时，就会有相应的“社”产生。不过，在宋朝统治的区域，这些基于地域建立的社一类组织并未成为乡村地方行政组织机构。

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统治区域，村社作为地缘单位被正式纳入金政权的乡村管理体制。金王朝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检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36]在金代的乡里制中，里正与主首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按比户口，即从事辖区内与户口相关的调查，登记户口、推排户等之类的工作；二是催征赋税，巡警盗贼，维护乡村治安；三是劝课农桑，互相救助。

（二）村社制的内容

元朝初期在乡村管理上承袭金代旧制，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以里正和主首作为乡村事务的管理者。北方的乡村有因应农事活动而产生的互助组织——锄社。作为农事活动的互助组织，锄社“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37]。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下令，在汉地的村疃推广建立村社组织：“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38]

这样看来，元初在乡村力推的社制，是集结劳动力、解决单个农户因劳动力不够而耽误农事与时令的互助性组织。但实际上，元代的乡村管理是村社与乡都混杂的体制。里正、主首的职责与金代相同，大抵是催征赋税、维持安保，而社长的职责屡有变动。早期，社长的职责较为单一，就是劝课农桑，“以教督农民为事”。其后，调查户口、催征赋税、维持安保等差役也要求社长参与，社长成为苦差，民间多有怨言。大德三年（1299年），江西廉访司奏称：“近为体复灾伤，到于各处，唤到社长人等，系妇人小儿。问得该吏，称说自至元三十年定立社长，经今五年，多有逃亡事故，……今各处社长，多不见年高德劭通晓农事、为众信服之人，大失原立社长初意。”[39]为此，元朝多次强调社长专责教授农事的职责：“将年高通晓农事之人立设社长，并不得差占别管余事，一切教本社人民务勤农业，不致惰废，仍免本身杂役。”[40]

社长劝课农桑的职能，不仅包含督促管理农业生产的明确职责，同时也使得村社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担负了道德教化的功能。大体而言，社长的教化职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劝课农桑，这是社长的主要职责。至元七年开始推行村社制时就规定：“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41]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再次重申：“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务勤农业，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到彼，对社众责罚。”^[42]二是申明孝悌。社长在劝农的同时，还要注意宣扬道德，及时发现、保举有德之人，淳化乡风。如至元二十三年规定：“本社内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产，孝友之人，从社长保举官司，体究得实，申覆上司，量加优恤。若社长与本处官司体究所保不实，亦行责罚。本处官司并不得将勤谨增置到物业添加差役。”^[43]三是调处乡邻。对村社中存在忤逆父母，邻里间的田宅、家财等纠纷，社长要予以调解裁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44]

[1]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〇》。

[3] 张方平：《张方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

[4]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461页。

[5]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七，乡役人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6] 司马光著，王根林点校：《司马光奏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四月辛亥条。

[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县官》。

[9]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七，乡役人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10]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乡官》。

[11]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五，载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9页。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月己巳条。

[13] 谭景玉：《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3—54页。

[14]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15] 马新：《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文史哲》2012年第5期。

[16] 梁建国：《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

[18] 陈鸿彝：《宋代律法的基层管理——王安石的保甲制与吕大钧的乡约》，载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编：《中国法治文化》第5辑，群众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19] 《宋会要辑稿·兵二》。

[20] 《宋史》卷一九二《志第一百四十五·兵六》。

[2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丁未条。

[22] 《宋史》卷一九二《志第一百四十五·兵六》。

[23]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2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条。

[25] 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6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373页。

[2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

[27] 司马光：《乞罢保甲札子》，载《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4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92页。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

[29]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

[3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

[31]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

[3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3页。

[33]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3页。

[34] 《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

[35]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二，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1页。

[36]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37] 王祯：《农书译注》（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66页。

[38]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农桑》。

[39] 《元典章》卷二十三。

[40] 《元典章》卷二十三。

[41]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农桑》。

[42] 《通制条格》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43] 《通制条格》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44] 《通制条格》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第二节

宋元村落的民间治理

一、宗族制度与村落社会

（一）门阀宗族的衰落与新宗族的兴起

宋以前，宗族制度以门阀制度最为突出，其特点是大规模聚族而居。在门阀宗族中，门第观念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提道：“六朝最重世族……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1]无论是选官还是婚配，都必须稽考门第谱牒。在宗族内部，豪强地主对底层贫苦族众有很大的支配权，下层宗亲与佃客对宗内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明显。同时，由于聚族而居的便利，豪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组织宗族武装，拥兵自重，形成了很多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势势力，如《三国志》载杨阜“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2]。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受社会动乱影响，门阀宗族受到严重冲击，宗法人伦观念出现变化，整个社会“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3]。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疏离，“今尔百姓亲族死，问以服纪年月，皆言不知”^[4]。门阀宗族制日益衰落，渐趋消亡。其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宗法人伦关系的紊乱，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维护社会稳定，重整宗法制度成为宋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厚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5]，于是朝廷

大力提倡并推行宗法制度，试图通过重建宗族组织达到管摄人心、移风易俗的目的。官员与士大夫等精英阶层也积极探索宗族复兴之根据，为时代之鼓。张载就专门写过一篇论及宗法的文章，他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6]与张载同时代的程颐则提出建立家庙与祭祖制度的主张：“士大夫必建家庙，庙必东向，其位取地洁不喧之处。设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东，左昭右穆而已……太祖之设，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衔位而已。”^[7]

其实，在张载之前，范仲淹就开始了重建宗族的相关实践。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以其官俸置办义田，“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8]。同时他还兴办义学，以供族中教育子弟。通过官员与士大夫等精英阶层的努力推动，以“敬宗收族”为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宗族制度，在北宋时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两宋时期，宗族实践活动主要以大官僚为主体；同时，乡村宗族的重建也日益兴盛，私修单姓家谱也大量出现。到南宋时期，新宗族组织的各项内容近乎完备。

（二）两宋宗族的组织与活动

宋代的宗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门为一户、同居共财的大家族。他们往往世代同居共产，财产属于整个大家族共有。这种家庭组织模式在宋以前就存在，及至宋代成为望族之常态。二是在共同的血缘关系纽带下，小家庭聚族而居。这种宗族组织结构更为普遍，其特点是在共同的大家族名义下，小家庭分

户独立，各自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家族共有的财产主要是义田、墓田、祭田、祠田等公产，主要用于族中公益活动与事业。宋代宗族的组织与管理制度的通过宗族活动的开展而不断确立和完善的。具体而言，宋代的宗族组织主要通过编修家谱、集体祭祖、置办族产义学等活动，逐步建立起相关的宗族制度与规范，实现其敬宗收族的目的。

第一，编修家谱。宋以前，门阀士族也有相关谱牒的编修。编修门阀谱牒的目的，主要在于考证族源血统，因此其编修的重点在于祖先世系源流之考证，这类考证烦琐细致，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谱学”。谱牒对血统的强调，其主要作用在于：一是选拔官吏时稽考门第，二是男女婚配时比对双方门第。在编修主体上，门阀谱牒可分官修和私修两类。唐末与五代时期，门阀士族衰落，门阀谱牒制度随之而废。

到了宋代，人们对谱牒的功用的认识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认为谱牒的功用应当是追述先祖，而不是炫耀门第。如宋人李石就认为：“家有谱，所以别生分类，以著不忘，非欲相夸以门第也。”^[9]宋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普遍认为，谱牒是维系宗族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族非谱无以知枝叶本根之分合”^[10]，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伦理秩序就会混乱，在社会中就容易出现族人之间“相视如途人”的礼崩乐坏的情况。因此，苏洵在论及自己作《苏氏族谱》的缘由时这样写道：“苏氏族谱，谱苏氏之族也……谱吾作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所以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吾谱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

已。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之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北宋大儒张载更是高呼：“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11]北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年），以欧阳修编修《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修《苏氏族谱》为开端，“继之者不一而足”^[12]，整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编修家谱的热潮，“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13]。据统计，《宋史》中明载的家谱就有110种。

与门阀谱牒“考订世系”以品评门第的编修目的不同，宋代文人试图通过对家族世系源流的梳理，实现“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教化目标。因此，在家谱编修体例与内容上，讲求“别生分类以着不忘”^[14]，举凡宗族的源流、世系、规约、艺文等胪列甚广，在记述上重当下而略上世。

第二，祠庙祭祖。宋代宗族组织“敬宗收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祭祖制度，其祭祀对象从始迁祖到后来的历代祖先都被囊括在内。祭祀形式以墓祭与祠祭为主。

墓祭与传统聚族而葬的族葬制有关。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墓地和齐家文化墓地就曾经发现有墓祭的遗存。春秋战国时期，墓祭开始流行。《礼记·曾子问第七》中记述：“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15]此古人墓祭之始。隋唐之际，寒食节扫墓成为风俗。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下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饌讫，泣辞。食馀饌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16]这标志着墓祭正式得到国家的认可。宋代宗族出于“收族”的需要，大力倡导

聚族祭祖，墓祭是宗族祭祀的重要形式，诸如寒食、清明、中元等节岁，亦常有举行。如《淳熙三山志》载，在福建福州地区的乡村，“寒食春祀，必拜坟下。富室大姓有贍莹田产，祭毕，合族多至数百人，少数十人，因是燕集，序列款昵。尊祖睦族之道也”[17]。

宋代宗族祭祀中还有一类重要的祭祀形式是祠祭。宋代祠祭经历了从官员士大夫的家庙祭祀逐步发展到普通宗族祠堂祭祀的过程。自唐五代门阀宗族衰落后，礼制混乱，家庙制度破坏严重。北宋时期，随着以官僚宗族为主体的新宗族群体的壮大，宗族内部以家庙巩固宗族关系的需求日渐强烈。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官员任中师修建了“家祠堂”用以祭祖。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宋朝廷对官员建立家庙事宜展开了第一次讨论，其结果是朝廷明确表示允许官员立家庙祭祀，“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18]。但是这次讨论并未形成相关方案，因此在官员中并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论及此事时说：“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19]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官方对此再次展开讨论，就品官与庙数设置、家庙承代与庙主迁移、主祭原则与立庙地点等都做了初步规定。大观四年（1110年），宋朝廷对此进行了第三次讨论，对皇祐二年的文本进行了相关修订。此后，家庙祭祀制度在官员士大夫阶层得到逐步推广。

南宋时期，随着人口大量南迁，北宋时期开创的宗族制度在南方得到继续发扬。为推动南宋宗族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朱熹为宗族重建与运行设计了详尽具体的方案。他将祠堂视为举行整个宗族活动的核心空间，是宗族与其成员之间维系关系的灵魂与纽带，可以突出“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族长每天到祠堂

晨谒，家族成员则“出入必告”“有事必告”。朱熹肯定了宗族中宗子拥有最高权力，“号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家庭内部，则以父母为中心，子女对父母要绝对尊敬与服从：“凡子事父母，父母所爱亦当爱之，所敬亦当敬之。”逢正旦、冬至，每月朔日、望日，族人要到祠堂参拜神主。在清明、寒食、重阳这类节日，还要献以时食。“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祠堂内设四龕，自西而东依次为高祖、曾祖、祖、祢。若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祭四世先祖；若继曾祖之小宗，则虚西面第一龕而不祭高祖；依此，继祖之小宗则不祭曾祖，虚西龕二；继祢之小宗则不祭祖，虚西龕三。因为宋代家族传代世数普遍都比较短，所以《朱子家礼》又提出：“若大宗世数未滿，则亦虚其西龕，如小宗之制。”古老的宗法制度，经朱熹改造后完全融合于新兴的祠堂制度，并为基层的家族制度的践行提供了参考依据。不仅如此，为了使祠堂的祭祀活动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朱子家礼》还提出了祭田制度：“初立祠堂，则计见（现）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不得典卖。”至于祠堂本身，也是家族永恒的产业，“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20]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以外，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近世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都在《朱子家礼》中得以一一呈现。在朱熹的倡导下，祠堂以及祠祭在民间宗族组织中逐步推广开来。后世的家族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

第三，置办族产与义学。族产是宗族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宋代宗族族产名目繁多，有些名目在宋以前就有，有些则属于宋代初创。大致而言，包括义田、义庄、义宅、墓田、祠堂、田产等名目。如宋仁宗皇祐元年，范仲淹开宗族义田之先

河。此后，各地官绅争相效仿，购置义田，扶助族中孤弱。

宋代宗族族产制的建立，一方面保障了宗族组织的运行，同时也推动了宗族义学的发展。宋代以科考取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21]。科举制破除了唐五代以来的门第观念，使普通人家的学子通过努力求学也能获得上进的机会。一时之间，整个社会各类官学、私学广泛兴起。各宗族组织为发展本族势力，竞相创办义学，丰厚的族产为宗族义学的兴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族塾义学的教师，有些是本族中学业有成的士人，有些则延聘知名硕儒。其教学内容首先是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必以孝弟忠信为主”^[22]，以“孝悌忠信”教化宗族子弟，达到整个宗族“遵章睦族”的效果。其次是注重经典、辞章等的训练，为学子科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元代宗族组织的新发展

元代朝廷将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出于自我保护的现实考虑，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族组织，凝聚力有了明显加强。在宗族组织的活动中，除了官僚士大夫等阶层，平民阶层也占有极大比重，宗族组织平民化趋势明显。元代宗族组织在宗族制度上主要有三方面的发展。

一是在宗祠建设中突破了礼的限制，祠庙祭祀在民间广泛推行。在汉族传统祭祀礼制中，祭祖权是宗族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元代，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在礼制的控制上较宋代大为宽松，在祭祀礼仪中“大臣家庙不与焉”。以祭祀先祖为目的的家祠与宗祠在乡村大量出现，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乡村宗族凝聚力得到显著加强。元末，婺源大畈人汪同，响应族人号召，建大宗祠

知本堂和小宗祠永思堂，即是典型：“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其上通三间以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居大畈者，而昭穆列序左右者十有余世。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庙有庑有门，时享月荐，买田以给凡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别为专祠于大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23]通过这类大宗祠及小宗祠的建造，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得到了加强。放眼当时的全国来看，都是如此。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评论道：“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之世。”^[24]

二是宗族组织在修纂族谱上更强调其“收族”的功能。宋元易代的战乱和变迁，使南北两地很多家族原有的家族谱牒被毁坏。面对这一混乱局面，很多士人提出要正本清源，厘清本族人口的世袭源流。元代福建的文学家陈旅强调：“然凡得立宗以缀其族者，非有谱识所从出，条所由分，则世远族众，其系必紊，而昭穆之辨淆矣，此世谱不可以不作也。”^[25]正本清源的目的，则在于敬宗收族，家谱的“收族”功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突出，正如元代浙江学者陈高所述：“然则族谱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长幼，别亲疏，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举在于是，其所系顾不重欤。”^[26]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收族”的“族”有时不仅指宗族，还带有民族的意思。对原为两宋版图内的村民来说，重修族谱，延续家族历史，还带有怀念故国的深层意义。大德年间，温州文学家林景熙发起重修林氏宗谱，希望达到敦宗睦亲的目的：“无何，故国之版图失守，故家之谱牒将湮。熙初不自揣，愿效驰驱，奔走于杭越之间，徒销岁月，愈滋罪戾。今者徜徉陇亩，常

与微子之悲，于国无望，于家奚辞？于是祖述旧谱，旁采诸书，访之故老传闻。”^[27]族谱的体例基本完备，其影响延续至明清。元代汉人族谱的盛行，也影响了其他民族。蒙古人、色目人的文化精英纷纷效仿，编纂自己的族谱，包括蒙古人哈刺哈孙族孙燮理普化编《斡罗氏世谱》、答鲁乃蛮氏编《中山世家》、回鹘人隆禧院使约著编《里氏庆源图》、唐兀人王翰（那木罕）编《王氏家谱》等。

三是在建祠堂、修家谱的同时，族田、义田等与祭祖相适应的族产制度也有一定发展。休宁陪郭的程氏族人程岷、程文贵曾“置膳茔之田”^[28]。族田的用途与收入的具体支出，都有较严格的规定，大体上都是为了接济族中贫困成员、子弟的教育或者日常的婚丧嫁娶。黟县黄村人黄真元，“念祖宗先泽不忍没，效范文正法，买田六百三十余亩，立庄建祠，祀其先人。自始祖而下，冢木蓊郁，祭膳糗苴，族众百余口，日食岁帛、婚嫁丧祭，给支有等。延致硕师训其子弟，规式凡目，具有条理”^[29]。平阳县（今浙江平阳县）桃源里人陈思礼辞官归里后，“买其乡为义田，几若干顷，岁籍其入，以赙恤宗族邻里之贫者，予有常数，贷有常经，丧葬嫁娶，各有常给，而又以其赢即所居之旁建书塾，招致经师，教乡之子弟”^[30]。浙江龙泉汤氏的族田收入用途，规定得更加细致：“月给人五斗，有丧者二石，葬则半之，产子者一石，再有子则倍之，子始入学予钱三十缗，嫁女如入学之数，娶妇则减三之一，年七十者每岁帛一匹，能自业者弗预，不知检饬而有子弟之过者罢之。”^[31]出于对宗族诸多事务管理的需要，族长等宗族组织首脑在宗族中的地位显著加强，对后世形成束缚“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的“族权”埋下了很深的根源。

（四）宗族组织与活动对宋元乡村社会的影响

在宋元时期兴起与发展的宗族组织，广泛活跃于宋元乡村社会，是宋元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与管理的重要力量。通过设立族田扶助孤弱、设立宗祠祭奠先祖、编撰族谱重建人伦等一系列措施，宗族组织对内调和了宗族群体内部的矛盾，对外缓和了宗族和地方组织、宗族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宋元时期的乡村宗族组织还承担了大量政治、经济、教育等多项社会职能，对宋代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通过设立族田、义田等措施，宋元乡村宗族组织还承担了乡村社会扶助孤弱的职能。族田的设置最早始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范仲淹以其官俸所得购置义田，养济族人。^[32]在论及其置办义田时，范仲淹又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33]范仲淹置办族田的初衷由此可见，显然是尊祖济族。这一义行，为很多士大夫及乡村士绅仿效。神宗熙宁初年，青州知州吴奎“以钱二千万，买田北海，号曰义庄，以见周亲戚朋友之贫乏者”^[34]。韩贻则“平居自奉至约，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35]。如果宗族内部出现了丧失父母的孤弱子弟，宗族自身有抚养的义务：“宗族亲戚间不幸夭丧，妻弱子幼，又或未有继嗣者，此最可念也。悼死而为之主丧，继绝而为之择后，当以真实恻怛为心，尽公竭力而行之，此宗族亲戚之责之义也。”^[36]

族田、族产在灾荒年间还有赈济灾民的职能。宗族组织在赈济灾民时，其范围不仅仅限于族人，而是扩大到周边的亲戚乡党，如范氏《义庄规矩》中规定：“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

内量行济助。”有些宗族组织还以族产承担了乡村中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如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洪州胡氏就“以私财造南津桥”。

乡村宗族通过裁决族内纠纷、督促族人缴纳税赋等，实际上也承担了一定的政治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宋代的乡村，宗族内部的小纠纷多不赴官府诉讼，而是通过宗族组织裁判解决。宗族内部具有裁决纠纷能力的族长、族老等宗族组织者与领导者多为乡村士绅，这些人大多识文达理，在宗族中德高望重，为族人所信服，如衡州胡晏“资性孝友，乡里慕之，有争讼，不到公庭，多往质焉”[37]。永嘉陈敦化“乡闾信服其谊，争讼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时解散”[38]。同时，宗族中的族长等族权掌控者往往是族中富户，依照宋代户等制中第一等户充任里正、第二等户充任户长等规定，他们往往还承担了乡村行政管理的职能，使得宗族组织与行政组织在领导阶层上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宗族组织与行政组织的重合，一方面有利于调和乡村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催征赋税政策的顺利实施。

乡村宗族组织还通过编修族谱、建祠祭祖、兴办义学等形式承担了收族睦族、教化族人的教育职能。在宋代士人眼中，宗族谱牒是维持宗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夫世代愈深，则恩疏而忘祖；谱牒不立，则传久而失宗”[39]。四川的名士苏洵认为宗族谱牒具有“祖宗不忘、宗族不散”的作用：“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忘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40]通过修谱，使得聚族而居的族群血缘关系得以明确，宗族成员间“虽族属疏远，长幼尊卑，按此谱历历殆可见矣”[41]。同时，一些地理与血缘关系较疏远的族众，也被收拢归宗到宗族组织之

中，宗族组织“收族睦族”的目的得以实现，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得以调整和融和。

南宋郑德源为河间俞氏宗谱作序时写道：“谱牒之作，所以原始考宗，别亲疏，行正实，正彝伦，厚风俗，使万殊而归一本者也。”^[42]事实上，无论是宗族组织的义田、祠田、修谱还是修祠祭祖，除了能够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如郑德源所说的“正彝伦，厚风俗”。在宗族祭祀活动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体现。宋代早期，朝廷允许官员修建家庙祭祀先祖。其后，在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下，修祠堂祭祀先祖逐渐成为宋代社会的普遍习俗。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宗族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得到进一步确立；同时，在宗族内部已经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期规范的祭祀活动，使得族人在对祖先恩德的追慕中，逐步建构起共同的信仰和一致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具有宗族特色的家风、族风，并逐步将这种风气扩散、放大到广大乡村地域社会之中。乡风之说，亦始于此。

科举制在宋代的完全确立推动了教育向下层社会的普及，社会各阶层接受教育成为可能。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宋元时期大量宗族组织以族产为依托，建立了大量族塾义学。除了普遍的道德伦理教化之外，科举知识也是宗族义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宗族教育推动了社会文化教育的大发展。

在经历了唐五代门阀宗族的变革后，宋代确立了宗族组织的新形态，并在宋元时期逐步发展壮大。宋元时期的乡村宗族组织形态更多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小家庭聚族而居构成的宗族群体。这一时期的乡村宗族组织及活动强化了乡村民众的宗族观念，通过其承担的政治、经济、教育、公益等多方面的职能，调和了宗族内部，宗族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了地方社会，维持了国家秩序，对宋元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乡约制度与村落治理

（一）乡约制度的起源

乡约是一种由士绅阶层发起的乡村自治规约。目前所见最早的乡约是《吕氏乡约》，为北宋士人吕大钧^[43]创设。其兄大忠（字进伯）、大防（字微仲），弟大临（字与叔），与大钧一起，被家乡民众尊为“吕氏四贤”，在乡梓德高望重。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撰写《吕氏乡约》，在今陕西蓝田践行并建立乡约组织，在乡村社会推行教化。

吕氏推行乡约教化有其现实考虑。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由先前的“乡官”变为“职役”。尤其是保甲法的推行，乡里组织被国家牢牢掌控，基层组织的保正、户长等成为州县官任意驱使的差役，其主要职责和精力在乡村治安、户籍、赋税、职役等具体事务上，乡村教化被乡村行政组织忽视，乡村教化的缺失导致社会一系列矛盾不断产生。吕氏学术渊源于张载关学，关学的特点是非常重视礼，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面对乡村教化严重缺失的现状，吕大钧提出以礼教来教化乡民：“人之所赖以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44]

在吕氏的设想中，乡约组织作为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民间团体，是乡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组织，其领导为公选，乡民出入也任由自愿。吕氏试图通过在乡约组织中推行乡约礼仪，推动

乡村社会教化的发展。为确保乡约的有效施行，吕大钧在制度上做出了一系列的设计。

（二）《吕氏乡约》的主要内容

宋以后，个体小家庭成为乡村社会基本的组成单位。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家庭居于中心位置。《吕氏乡约》立足于以家为核心的宋代乡村社会的现实，在内容上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由个体的修身、家庭的齐家，逐步推及群体的孝悌。体例上，《吕氏乡约》分为《乡约》和《乡仪》两部分，为了保证乡约的施行，还在其后附录了“罚式”“聚会”“主事”三条。

《乡约》部分包括四大规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德业相劝”一条中，将“德”和“业”分开说明，其大要在讲明为人应在家能修身、齐家、事父兄、教子弟，在外能择交游、能谋事、有善行。此条的主要目的在于“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45]。在“过失相规”一条中，将过失分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三大类。“犯义之过”有六条，举凡酗酒、赌博、行不恭逊、造言诬毁以及营私太甚等皆是。“犯约之过”有四条：“一曰德业不相劝。二曰过失不相规。三曰礼俗不相成。四曰患难不相恤。”“不修之过”有五条，对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诸方面做出规戒。对不修之过，每犯一次都要记录簿籍，三次以上则加以惩罚。“礼俗相交”一条主要对乡民在婚姻、丧葬、祭祀等方面的往来加以规定，“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当众议一法共行之”。对一些不合理的习俗，则加以改良，“甚不经者，当渐去之”。在“患难相恤”一条中，要求在成员面临水火、盗贼、疾病、丧葬、孤弱、诬枉、贫困这七种情况时，约众要相互扶助。^[46]

为了约规的有效执行，《乡约》还要求约众建立相关的组织管理机构，以总揽其事。在《主事》一条中，吕氏对乡约组织的管理机构做出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直月负责约中具体事务的处理，由成员轮流担任，每月一换。约正一般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负责监督赏罚是否公正。成员定期聚会，每月小聚，每季度大聚，开支由众人分摊。聚会一为商讨约中事项，二为记录、公布成员善举与恶行。对于犯规的约众，所犯错误较轻微的以规劝为主，规而不听则罚钱，情况更严重的，则聚众商议后开除出乡约组织。“犯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47]为了更好地贯彻乡约中“礼俗相交”的条款，在《乡约》之后附有《乡仪》，其内容是在参考了吕氏旧传家仪基础上制定的，包括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四部分。

从熙宁九年十二月制定乡约制度到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逝世，吕大钧在家乡推行乡约不过五年半的时间。此后，《吕氏乡约》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中长达近百年。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重新修订《吕氏乡约》。其一，朱熹考证了乡约的作者为吕大钧，而非之前传说的吕大忠。其二，将《乡约》与《乡仪》合并，更改为《增损吕氏乡约》。其三，将“主事”一项并入开篇，对其中的基本制度做出调整，将“约正”更改为“都约正”。朱熹修订后的乡约基本制度为：约中设都约正一人，都约副二人，直月一人。约中设簿册三本，“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由直月掌管，月末向

都约正汇报并转交下任直月。其四，将“罚式”附于“过失相规”后。对违犯约规之人，将罚钱改为“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如不听规劝，则由都约正在集会之日“以理诲谕之”，如最终不能悔改，则“听其出约”。其五，将“聚会”一项改为“月旦聚会读约之礼”。每月朔日集会，地点首选乡校，无乡校则选一宽敞空闲场所，在场地北壁悬挂先圣先师像。集会时，先是约正、副约正、直月等行礼互拜；而后，约众礼拜长者；最后，少者与幼者在直月的引导下拜约正。礼毕，依长幼秩序落座，直月朗读约文，副约正详加解释。读毕，约众共同推善纠恶，如无异议，由直月将善行、恶行分别记录于集册中。善行之事，由直月当众朗读，加以褒扬；恶行之事，则只限于传阅，以示警醒。仪式结束后，约众聚餐，散会。其六，将《乡仪》并入“礼俗相交”一条，并对相关内容做出调整。修改后的“礼俗相交”一条包括“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迎送”“庆吊赠遗”四项内容。其七，在“德业相劝”一条中增加“畏法令、谨租赋”的内容，从而使乡约能够与国家法令保持一致。[48]

（三）乡约制度在乡村的传播与发展

关于乡约在包括村落在内的乡村地区推行的问题，学界莫衷一是。杨开道、胡庆钧等认为乡约实施的时间很短。[49]其主要根据在于，乡约制定者吕大钧从熙宁九年十二月制定乡约制度到元丰五年六月逝世，不过五年半的时间，其间吕大钧还外出为官，由此推断，其在家乡推行乡约的时间较短。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推行乡约存在巨大阻力，吕大钧只是将《乡约》作为一个可行的方案而并未加以实施。[50]

就推行乡约的问题，吕大钧与其兄长友人曾多有书信讨论。在《答刘平叔》一文中，吕大钧记录了在推行乡约过程中遭受的

怀疑与诘难：“乡人相约，勉为小善，顾惟鄙陋，安足置议。而传闻者以为异事，过加论说。以谓强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顺，非上所令而辄行之，似乎不恭。退而自反，固亦有罪。盖为善无大小，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则上下厌服而不疑。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对兄长要将《吕氏乡约》改为家仪以避祸的要求，吕大钧在《答仲兄一》一文中做出回应：“所欲改为家仪，虽意在逊避，而于义不安。”在《答仲兄二》中又言：“乡约事累蒙教督甚切，备喻尊意，欲令保全，不陷刑祸。”^[51]综合各方因素分析，乡约应该在蓝田地区短暂施行过，但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官方上层的质疑，过程艰难，压力重重。

《吕氏乡约》在蓝田推行不到50年后，北宋灭亡。由于社会动乱，《吕氏乡约》并未能在北宋社会推广开来。

南宋年间，《吕氏乡约》开始为朱熹所关注。作为理学大儒，朱熹在社会教化方面提出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主张，积极推动将儒家士大夫之间的礼仪规范推广到庶民阶层。为此，朱熹编撰了《朱子家礼》，其内容包括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五个部分，作为民间一般家庭相关礼仪活动的依据。除了理论上的倡导，他还在实践中大力推行。朱熹在地方任职期间，大力整顿州学、县学，教化风俗。任潭州知府时，朱熹颁布《劝谕榜》，对当地不良习俗多有纠正，同时广招门徒讲学，推广礼教。

在朱熹接触到《吕氏乡约》，发现其以礼仪教化来“教人善俗”的功能后，便决意修订《吕氏乡约》。他在致吕祖谦的信中说：“熹近读《易》，觉有味。又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昏丧祭之仪，削去书过行罚之类，为贫富可通行者。……所惧自修不力，无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为无助耳。”^[52]在致张栻的信中，朱熹虽然对乡约的推广并不

乐观，但充分肯定了它教化风俗的功用：“《乡约》之书，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实恐亦难行，如所喻也。然使读者见之，因前辈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补耳。”^[53]张栻在给朱熹的回信中也充分肯定了《吕氏乡约》的价值：“无咎昨寄所编《祭仪》及《吕氏乡约》来，甚有益于风教。……若闲居行得，诚善俗之方也。”^[54]

朱熹虽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仕途并不得意，直到庆元六年（1200年）去世，其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也未能广泛流传。不过，在他去世后，其学术成就得到世人承认。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被朝廷赐谥号“文公”；宝庆三年（1227年）又被追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年）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朱熹得以从祀孔庙。随着朱熹声望日隆，他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开始流传开来。这对《吕氏乡约》的传承、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说《吕氏乡约》是朱熹和吕大钧的共同作品，也不为过。

朱熹之后，其部分门人弟子遵循其礼教主张，刊刻《吕氏乡约》并广为流布，在民间推广。如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其弟子李大有重新刊刻《吕氏乡约》，他在后记中这样论及自己重刊的目的：“今得晦庵先生所订《吕氏乡约》《乡仪》，用刊诸梓，贻我同盟，庶将因二篇之载而广之，平居周旋里党，无一不中节，则礼俗之盛，当不止岁时聚拜而已。”^[55]李大有之后，有胡泳、程永奇、阳枋等相继推行乡约。胡泳为南康军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为朱熹弟子。嘉定八年（1215年），胡泳兄弟因感觉乡中礼教崩坏，道德混乱，遂在乡中举行乡约。黄干在《跋南康胡氏乡约》中做了如下记载：“此乡饮酒遗意也……后世礼教不明，人欲滋炽，利害相攻，情伪相胜，一室之内父子兄弟乖争陵犯者多矣，而况于乡邻乎？风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

量兄弟孝友，同居爨，人无闲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达之乡，其有补于风教大矣。故书其后，以谕其乡人，使知其合于古谊，相与守之而勿替云。”[56]程永奇推行乡约的时间与胡泳兄弟大致相同，只是他更多在家族内部推行乡约之法，以礼教治家，“……以合族人，举行吕氏乡约，而凡冠昏丧祭悉用朱子礼，乡族化之”[57]。

除以上诸人之外，力行乡约的还有阳枋。阳枋为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人，一生中两次推行乡约，影响较大。他第一次推行乡约是淳祐三年（1243年）。在这之前，由于长期战乱，他曾经举家避难于夜郎、南川、清溪等地。回乡后，目睹家乡盗贼横行、社会失序、田野荒芜的现实，他深感痛心，于是联络友人、乡人等，在乡里推行《吕氏乡约》之法。阳少箕对此次推行乡约的情况做了详尽记载：“敌退而反……乡人或有以饥渴为心害者，公叹曰：‘是可不可不亟求正乎？’乃与弟全庵南午、侄存庵醇、友人宋君如山、罗君仲礼、朝宗、陈君晰之、黄君应发举蓝田《吕氏乡约》，推前进士黄君应凤为长，合同志行之，正齿位，劝德行，录善规过。又与李君发明讲明乡饮之礼，于以维持孝弟忠信之风，一乡化焉。”[58]阳枋第二次推行乡约是宝祐五年（1257年），地点在渝州，“与宋寿卿合乡士，就渝讲明乡约”[59]。

在朱熹及其门人推行乡约的同时，一些地方士绅也认识到乡约在增强乡村社会群体意识方面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乡社组织与乡约出现合流。如咸淳六年（1270年），徽州歙县乡绅邱龙友、王英杰具奏朝廷“为请地立社以便祈报以敦乡约事”，“庶春祀秋报有所因得，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保年谷丰登，以笃粉榆谊契，下期风俗之淳，上乐圣明之治”，希望组织乡民在乡社集体祭祀活动中，讲明乡约，教化风俗。此举受

到朝廷重视，认为其申明乡约的举动有助于教化乡民，因此表示大力支持：“看得职官邱龙友、王英杰所奏，事理有协于义，准予立社。着本州官给帖付照，地税免征。”^[60]

元代，随着理学的发展，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乡约制度在民间继续推广。有些乡村士绅将乡约与乡村祭祀相结合，通过在祭祀典礼中宣扬乡约之礼，教化乡民。如《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五记载：“陈有霖，字希说，长乐人。至正中，筑乡约堂于蓝田书院之旁，中祀先圣，以朱、吕二先生配，朔望举行蓝田乡约，使邻里子弟讲学于中。”^[61]元代士人刘祜等乡里耆老在高林祭祀孔庙，行乡约之礼：“安肃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闻有孔子庙，枉道而拜焉。……祜，刘氏孙也，复率卢氏子孙共继先志，经营于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庙貌既尊，乃兴祭器，以祀事告成，且为乡约春秋释奠之礼……”^[62]也有部分地方官员出于稳定社会的考虑，为促进地方的风俗教化而推广乡约，如元代至正年间上海，知县刘辉“创置社学百六十余所，举乡约，日课民种桑枣”^[63]。不仅如此，一些地域的乡村士绅以乡约条文为蓝本，结合本地乡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村社约规。如河南濮阳县西夏遗民唐兀忠显与千夫长高公，以及邻近村社的耆老，在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七月共同制定了《龙祠乡社义约》，此约无论是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广泛受到《吕氏乡约》的影响。潘迪在评论《龙祠乡社义约》时这样说道：“余观其条目详约备，颇增于吕氏，而其大致多与吕同。吁！当后世风俗披靡中，何幸是乡有此约乎。使自乡而邑，自邑而郡，自郡而天下，则风俗之丕变，安知不自是乡而权舆哉？”^[64]

在《龙祠乡社义约》中，开篇即强调立社的本意为“……敬神明，祈雨泽，美风俗，厚人伦，救灾恤难，厚本抑末，忧悯茕独”。同时，对社内之家的“死丧、患难、济救之礼，德业、过

失、劝惩之道”均有详细规定，使社民在生活中能够有具体可行的道德规范指导生活，如定期聚会以联络感情，社民互助以安定地方，教化乡民，改换风俗。同时，与《吕氏乡约》相比，《龙祠乡社义约》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做出了部分调整，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更适应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况。例如，其立社是借用乡村集体祭祀的“龙王社”宣扬乡约精神，这使其更能为乡民所接受。条款的制定更加考虑乡村的具体情况，如其中的一条为：“各家头匹，务要牢固收拾牧养，毋得恣意撒放，作践田禾，暴殄天物。违者每一匹罚钞一两。若是透漏，不在所罚，香誓为准。”^[65]这些贴合实际的规定，使其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四）乡约制度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吕大钧的《吕氏乡约》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乡村自治规约。在后世的流布中，影响最大的是经过朱熹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朱熹对《吕氏乡约》改动最多的地方在于，在“聚会”中增加了“读约之礼”的要求。这种仪式明显是借鉴了《周礼》中的“读法之典”，整个乡约聚会的过程充满了对礼仪的强调。通过“设先圣先师之象于北壁下”，使具有民间性质的乡约教化与官方主流的儒学联系起来，使儒家伦理成为乡约教化的理论根据。通过把抽象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转变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行为，乡约成为乡村基层施行道德伦理教化的重要工具，对乡村社会实现“化民成俗”，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吕氏乡约》的款约内容，对后世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到了明清时期，《吕氏乡约》的理念已不仅限于儒家教化，甚至超越了对当世人间的教化，深入到有关来世生死的乡村宗教法事，如亡灵超度活动之中，并以宗教的形式在乡村传播，以宗教的名义教化乡村民众：所有不遵守乡约礼俗行为

规范的，诸如游戏怠惰、举止无仪、行奸商好讼、欺行霸市、恶邻欺弱行为，都将成为逝者亡灵超度的孽障，严重者甚至永远不得转世为人。

三、基层组织与“宋型家庭”

在宋代乡村的管理体系中，乡是一个重要的单元。乡既是县之下具有行政职能的基本的一级行政运行单元，又是一个地域单位，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乡里制与都保制等以人户为单位的乡村管理制度，在部分时候会割裂自然村落的民户，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它使得基层社会的管理逐渐定型，维系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是利大于弊的。所以，虽然宋代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乡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与地域单位，从来就没有淡出乡村基层管理。无论是户籍还是税籍的编排，其范围一般不超过乡。

这一时期，在乡所管辖的区域中，聚族而居形成的自然村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而且规模也要大得多。在兴化仙游县，“叶氏族派百余家，皆居一村”^[66]；在鄱阳义仁乡车门，“曹氏环而居之，至数十百家”^[67]。自然村落构成乡村行政组织的基础。

宋代的乡村社会，有主户与客户之分。客户的称谓在唐代已经出现，彼时多指因逃避税赋等原因而寄寓他乡的外来户，“昔开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者十一二矣”^[68]。至宋代，根据家庭资产划分户等，此时的客户则主要是指家无常产，不承担国家赋税的人户。这类家庭通常

是居人之地，佃人之田，因此被称为“佃户”。有些佃户因家庭贫困，还需借用田主的耕牛等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进行劳作。与客户相对则是主户，村落中的主户拥有恒产，需要承担国家赋税和杂役，是国家赋税与差役的主要承担者。根据历史学家漆侠的统计，有宋一代，主户人数占总人口的60%~70%。^[69]

根据田产等资产的多寡，宋代朝廷将村落中的主户分为五等。一、二、三等为上户，四、五等为下户。在赋役负担上，往往是上户重、下户轻。如在北宋前期和中期，第一、二等户往往要出任里正、衙前、耆长、户长等差，第四、五等户充任壮丁。与唐代相比，宋代在税收上的税产内容明显减少，税赋的重心集中在田产上，一般根据田产的多寡缴纳赋税。从前述税赋的征派中可以看出，在户等制中，户等越低，差役越轻，负担越小。这种赋税职役的分担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知谏院吴充在熙宁元年（1068年）五月所言：“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凡杯杆匙筯，皆计资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70]有些富户为逃避衙前职役，请人代充，“今之保正副户长者，非其亲身，皆无赖恶少代充执役。执役之亲身虽屡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数十年不易也”^[71]。

随着赋役负担的日益加重，乡村中的富户纷纷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户等，逃避赋税。“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72]，“凡诡名挟佃、寄托官户、规免等第，减落税钱”^[73]。有些富户与乡司串通作弊，通过“诡名析产”“诡名寄佃”的方式降低户等，逃避赋役：“大率一县之内，系女户者其实无几，而大

姓猾民避免赋役，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将一家之产析为诡名女户五七十户，凡有科配，悉行蠲免。”^[74]在中下层民众中，有些最直接降低户等的方式就是分家析产：“父子聚居，丁产稍多，则惧有差徭配率，遂有离析异居之弊。”^[75]有些分家析产发生在父母去世之后，有些则在父母尚存时就开始了。《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对徽宗大观年间民间盛行的分割家产情形，有过专门的表述：“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76]

宋代以户等定赋税、征发职役的乡村管理制度与措施，使得底层社会分家析产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蔓延成时风，如仁宗时期的福建路：“观今之俗，贫富之家，多与父母异财、兄弟分养。”^[77]这种社会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社会传统大家庭的瓦解，使以“三代五口”为特征的个体小家庭结构得以形成，推动了宋代乡村聚落中具有宋代特征的“宋型家庭”^[78]的形成和发展。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9页。

[2]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杨阜传》。

[3] 《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

[4] 郑至道：《琴堂谕俗编》卷上《正丧服》，四库全书本。

[5]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6] 张载：《张横渠集》（二），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页。

[7] 《程氏外书·朱公掞录拾遗》。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

[9] 李石：《方舟集》卷一〇《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谱序》，四库全书本。

[10]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一一《黄师董族谱序》，四库全书本。

[11] 张载著，朱熹注：《张子全书》，载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2页。

[12]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第250页。

[13] 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柒，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14] 李石：《方舟集》卷一〇《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谱序》，四库全书本。

[1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16] 《通典》卷五十二《礼十二·吉十一》。

[17] 梁克家著，王晓波、李勇先、张保见等点校：《淳熙三山志》卷四〇《土俗类二·墓祭》，载《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5页。

[18] 《宋史》卷一〇九《志第六十二》。

[19] 叶梦得著，田松青、徐时仪校点：《石林燕语》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0] 《朱子家礼》之《祠堂》。

[21]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七《仙居令陈密学襄劝学文》，载《宋元方志丛刊》（6—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72页。

[22] 郑太和：《郑氏规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23] 汪云秀：《汪氏世范录》，明隆庆刻本，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24]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93页。

[25] 陈旅：《安雅堂集》卷4《丁氏世谱序》，载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

[26] 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0《吴氏世谱序》，载《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27] 林景熙：《济南族谱旧序》，载郑笑笑、潘猛补主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香港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8] 程敏政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95页。

[29]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清道光十年刻本。

[30] 陈高：《不系舟渔集》，载《敬乡楼丛书》卷12《义田记》。

[31]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汤氏义田记》。

[3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

[33] 范仲淹：《告子弟书》，载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九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44页。

[34] 刘攽著，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彭城集》（五）卷三十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92页。

[35] 《宋史》卷三三一《列传第九〇》。

[36] 吴恕斋：《宗族欺孤占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6页。

[37] 《嘉靖衡州府志》卷六《人物》，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38] 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四《陈益之父行状》，四库全书本。

[39] 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40] 苏洵著：《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41]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九《燕氏族谱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68页。

[42] 咸丰《虞东俞氏宗谱》卷一，永锡堂活字本。

[43] 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今陕西蓝田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历任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壩延转运司副使等职。

[44] 陈俊民点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7页。

[45] 陈俊民点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3页。

[46] 陈俊民点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5页。

[47] 陈俊民点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6页。

- [48] 牛铭实编著：《中国历代乡规民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119页。
- [49]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胡庆钧：《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 [50] 周扬波：《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 [51] 吕大钧：《答刘平叔》、《答仲兄一》、《答仲兄二》，载陈俊民点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9页。
- [52]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三三《答吕伯恭》，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0页。
- [53]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三一《答张敬夫》，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页。
- [54] 张栻：《张栻集》（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99页。
- [55] 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 [56] 黄干：《黄勉斋先生文集》（3），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3页。
- [57]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九《格斋先生程君永奇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703页。
- [58] 阳枋：《字溪集》卷十二《附录》，四库全书本，第442页。
- [59] 阳枋：《字溪集》卷十二《附录》，四库全书本，第436页。
- [60] 余华瑞：《岩镇志草》子集《艺文上·题请建立祖社奏疏》，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14页。
- [61]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
- [62] 苏天爵：《元文类》卷二八《高林孔子庙记》，四库全书本。
- [63] 《江南通志》卷一一四《上海县志》，四库全书本。
- [64] 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 [65] 濮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濮阳市志》第六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5—2796页。
- [66] 洪迈：《夷坚支戊》卷二《叶丞相祖宅》。

[67] 洪迈：《夷坚支癸》卷一《曹家莲花》。

[68] 《文苑英华》卷七四七《柳芳·食货论》。

[69] 漆侠：《漆侠全集》第十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

[7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

[71] 《续文献通考》卷十五《职役考一》。

[72] 《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役法上》。

[73] 王洋：《东牟集》卷九《正谗名法札子》，四库全书本。

[74]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

[75]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八《请别定县令考课及立乡官》，四库全书本。

[7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77] 蔡襄：《福州五戒》，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四十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78] 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第三节

宋元村落的生产生活

一、市镇发展与宋元村落

（一）宋元市镇的发展历程

宋初，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经济逐步恢复，人口开始快速增长。时人对此评论道：“……逮夫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1]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宋代各类州县城市空前繁荣，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商业活动的活跃，在城郊地带和广大乡村地区，各类商业市镇广泛出现。具体而言，宋代的“市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即通常所谓的草市，也称墟市，一般规模较小，主要承担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功能；一是“镇”，通常规模较大，是一定区域的中心市场。

经历唐、五代以后，直到北宋初年，草市的发展并不显著，有些地方官吏甚至上书朝廷，请求取缔某些草市，如北宋至道三年（997年），有广西官员上奏朝廷：“岭南村墟聚落，间日集裨贩，谓之虚市。请降条约，令于城邑交易，冀增市算。”上曰：“徒扰民尔，可仍其旧。”^[2]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经济的繁荣，各类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生产、流通规模日益扩大，因应这些商品的生产、贸易、流通等方面的需要而生的草市大量出现。熙宁九年，京师及诸路坊场、河渡等共有草市27 607处。^[3]马

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明确指出：“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4]

与天然具有贸易功能的草市不同，宋代“镇”的职能经历了一个从军事逐步转向经济的过程。镇最初作为具有军事用途的据点，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在唐、五代时期随着藩镇割据而逐步壮大，部分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的戍镇在保持其军事戍守单位性质的同时，通过贸易、征税等商业活动，其经济成分逐步加强。北宋建立后，作为藩镇割据基础的军镇成为威胁政治稳定的隐患，这促使北宋朝廷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推动军镇功能的转变。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诏令设置县尉，负责县域治安问题，而军镇中的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烟火、贼盗、争竞公事”[5]。开宝五年（972年）后，军镇武官又实行三年一任的新制度。宋真宗初年（997年）到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期间，朝廷在镇中设立文武官，文官主要负责监税。通过北宋朝廷的推动，一些边远之地的军镇在军事戍守职能削弱后被逐步淘汰，而一些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军镇则逐步转变为以市场、贸易等经济功能为主的市镇，由此，镇的名称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其功能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发展成为乡村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心。至迟到熙丰年间，军镇向市镇的转型已经大体完成。[6]

宋代市镇除了有些由军镇转变而来外，也有部分市镇是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省县为镇”。如太祖二年（961年），泗州徐城县被降格为镇，并入临淮县。乾德五年（967年），普州普康县降为镇，并入安岳县。此后，县镇之间，互为浮沉，历代因之。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草市逐步繁荣，朝廷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也会将这些草市升格为镇市，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中。正如宋人高承所言：“宋朝之制，地

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7]由此可知，镇是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其管理人员除了要“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还要“兼征税榷酤”“掌其出纳会计”之事。[8]

南宋以后，随着大量人口南迁，江南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商业贸易空前兴盛；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商品流通顺畅。与此相适应，南宋市镇数量大幅增长，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市镇，如魏塘、南浔、许浦等逐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乡村草市也得到极大发展。如南宋中期的常熟县，在全县391个村落中，共有草市49处，平均每8个村落就有一处，部分人口密集的地区甚至达到每3个村落就有一处。[9]

大体而言，南宋的市镇发展尤其是草市的发展，经历了点、线、面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南宋草市镇只是个别、零星地出现，主要以流通贸易为主，其影响范围不出临近乡村。之后，随着水陆贸易的发展，在一些重要的水陆交通线路沿途以及某些交通要道，大量市镇逐步兴起。如东南地区的运河两岸，依托运河便利的交通，出现了许多新的草市。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等商品生产的不断繁荣，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市镇在江南地区成片出现，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市场网络。[10]迨至元代，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各类路、府、州、县等治所人口、经济逐步增长，城市工商业发达。传统的城市如涿州、太原、成都等地工商业持续发展，同时一些新兴城镇逐步兴起。随着商品生产的空前发达和水陆交通的广泛拓展，元代市镇、墟市等乡村初级市场与宋代相比又有所发展，有些村集、墟市逐步升级为市镇乃至县级治所。其经营范围除了初级的农产品外，还有大量来自其他地域的手工业品，如景德镇的瓷器、松江的棉布，等等，种类繁多，市场繁荣。

（二）宋元市镇的类型与规模

北宋时期，市镇初兴，商业种类单一，主要以流通贸易为主。南宋以后，随着各类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程度的提高，专业市镇广泛出现，可以简单分为城市集市与乡村墟市。尽管一些市镇的产品位于城市之中，但在农耕时代，因为所交易的产品或者原材料都来源于村落，所以城市集市的发展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村落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扩大了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量，这是这一时期市镇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南宋人刘宰所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仅在南宋时期的两浙路（今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的镇市与草市，就有581个，其中临安府42个，平江府67个，镇江府34个，秀州47个，湖州34个，常州23个，严州2个，绍兴府58个，庆元府146个，温州9个，婺州6个，台州84个，衢州18个，处州11个。^[11]值得指出的是，从临安府的徐村、许村，镇江府的刘村、薛村，湖州的谢村、砂村，常州的岑村、余村等名称来看，这些集市都位于村落之中。

城市集市可以分为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沿海港口市镇、消费性市镇等类型。在大城市及周边，集市的规模自然比较大。宋真宗景德年间，都城汴京“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12]；仁宗宝元年间，秦州“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皆附城而居”^[13]。南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环城市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显著增加，如鄂州南草市，兴起于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已经发展成荆湖一带有名的贸易中心。“且如湘湖，唯鄂渚最为要地。盖南则潭、衡、永、邵，西则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14]

在农业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如太湖流域，随着粮食产量的不

断增加，许多周边地区的粮食交易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以粮食交易为主的市镇。如华亭县的魏塘镇、常熟县的直塘市等，均为典型的农业市镇。在一些产盐的地区，盐业市镇也十分兴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元社会出现了许多专业的手工业个体生产者和专业化的生产作坊，在这些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产生了许多手工业市镇。如浮梁县的景德镇、龙泉县的琉田市等是陶瓷重镇，乌程县的南浔镇是著名的纺织业镇，还有一些以造纸出名的手工业市镇。

部分市镇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承担了大量商品转运的职能，并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商品转运市镇。这类市镇受商品流通影响很大，一旦商品流通方向有变，就会迅速趋于衰落。宋元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开通，许多沿海市镇迅速发展成为外贸口岸，对外贸易往来繁忙。如奉化县鲒琦寨，濒临象山湾，距县治60里。宁宗初年，“商舶往来，聚而成市”^[15]。嘉定七年（1214年）设镇，宋理宗宝祐年间，镇内及郊区居民已达数千户之多。在其他一些地区，因驻军以及名刹大庙发展的市镇，吸引大量人口聚居，逐步发展成为消费性的市镇。在更广阔的乡村地区的村头巷尾，乡村墟市广泛存在。

宋元时期的市镇，根据发展程度的不同，其人口规模也不同。一些繁华的市镇，人口达到千户以上。如澈浦镇，据《海盐澈水志》记载，其镇域以一条街道为中心，周边分布有东市、西市等综合市场以及广福巷、阜民坊等居民区，在镇区周边有金家桥、龙眼潭等港湾和东浦、鲍郎等盐场分布，各类官衙、税场、寺庙宫观等一应俱全，南宋中期鼎盛时期，其人口达5 000余户，“澈浦为镇，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16]。规模一般的市镇人口约在数百户左右。如余干县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17]。其余乡村草市和村坊墟市人口从十余户到数十户不等。

（三）宋元市镇与村落的互动与影响

宋元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市镇以及依托市镇形成的市场已经成为乡村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北宋时期长时间的发展，到南宋时期，许多市镇与乡村草市经由便利的交通联系起来，共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乡村市场体系。散布于山野的乡村通过市镇市场网络参与商品交换活动，通过商品流通将自身与其他乡村、城市联系起来，不同村落之间、村落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分散、孤立、封闭的传统村落格局被打破。方回在其著作中对宋人的市场交易做了生动的记录：“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8]

市镇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促进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宋元时期的村民，除了传统的农业耕作外，还通过市镇市场操持副业。时人王柏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通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19]部分乡民利用农闲时节，在市镇开店设摊。陆游就记录了在市镇周边的乡民小店：“市远过三里，店孤无四邻。窄才容一客，久或住经旬。”^[20]也有部分乡民趁农闲时节涌入市镇或州县城市做苦力佣工，“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21]。有些乡民在农忙之时耕作田地，农闲时节则兼职从事手工业生产，如木工、织工、打铁、抄纸等，不一而足。陆九渊就描述了当时抚州农民在农闲时节兼做陶工的状况：“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事体与番阳镇中甚相悬绝。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22]

市镇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促使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出现重大变

革，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村中大量专业农户、匠户的出现。宋元时期，农村许多地方的农产品生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乡村居民自身的需要，更多的是作为商品，通过市镇市场网络输入城市。为了提高商品生产的效率，某些农户将精力放在了某一类商品的生产上，成为这一类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如养猪专业户、养鸭专业户、养鱼专业户等。在绍兴各地，由于湖泊众多，产生了众多的养鱼专业户：“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鱖、鲢、鲤、鲟、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鵊、鵒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汉书》曰：水居千石鱼陂，与千户侯等，盖谓此也。”^[23]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与城市之间交流的扩大，城市的市民文化渗透到传统乡村。商品经济的发达导致重商逐利观念盛行，使得乡村社会的道德、人伦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乡村之中“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24]，对此后乡村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农具革新与农业发展

在人类起源与发展初期，从早期的采集渔猎逐步发展出原始农业，生产工具也由早期的采集工具逐步转变为原始农具。在元谋人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尖状器、刮削器等打制石器，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中则出土了石斧、石铲、石磨盘、石镰刀等原始农具。在仰韶遗址中，除了上述农具外，还出土了木耒、陶纺轮和骨针等生产工具。随着农业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耕作方式逐步

由“火耕”转变为“耜耕”，专用农具种类与数量逐步增多，农具制作得更为精细。可以说，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具的创新，而农具的创新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插图1）

宋元是中国农具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大量农具被改进、创制。

宋元时期农具的革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宋元时期，农具发展更加专业化。随着南方稻田精细化耕作的发展，一些旧有的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如唐代的曲辕犁，根据各地田土与耕作情况的不同，其大小、形制在宋代得到改进，以适应各地的实际生产需要。改进后的曲辕犁，由11个部件减少为6个，更加适应江南水田的耕作环境。因为生产的实际需要，一些新的生产工具被创制出来，如犁刀、踏犁、铁搭、秧马等，犁刀专门应用于江南沼泽洼地的开垦，在初次耕作时，钢刃犁刀能有效破除蒲苇芦根的阻拦，提高垦荒效率。

雨水的多少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因此，测量降雨量就成为农业耕作的重要工作。宋代之前，尺度雨量的观念已经形成。宋代开始，出现了各种雨量器。如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就在《数书九章》中记载了当时人以天池盆和圆罍作为测雨的工具：“问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雨水。但知以盆中之水得雨之数，不知器形不同，则受雨多少亦异，未可以所测，便为平地之数，假令盆口径二尺八寸，底径一尺二寸，深一尺八寸，接雨水深九寸。欲求平地雨降几何？答曰：平地雨降三寸。”

其次，一些农具的发明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方面代表性的农具是秧马的发明和使用。秧马是在一块长条木板上加装四条腿做成小方凳，木板两端上翘，主要在稻田拔秧时使用。农民在进行拔秧劳作时，坐在秧马上拔秧，洗净捆好后将

秧放置在秧马底板上，用脚踏地，向前滑行。秧马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拔秧的劳动强度。其他类似的农具还有耒锄、下粪耒种等。耒锄是一种翻松土壤用的农具，元代王祯《农书》卷十三引《种蒔直说》：“此器出自海墘，号曰耒锄。耒车制颇同，独无耒斗，但用耒锄铁柄，中穿耒之横桄下，仰锄刃，形如杏叶。撮苗后，用一驴，带笼嘴挽之。初用一人牵，惯熟不用人，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今燕、赵间用之，名曰薊子。薊子之制，又少异于此。”下粪耒种“于耒斗后，另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这些农具的出现，大大减轻了村民的劳动强度。

最后，大量农具的配套与定型在宋元时期大体完成。王祯的《农书》共三十六卷，其中《农器图谱》有二十卷，占了大半篇幅，总结了元代之前所有重要农器，包括田制门、耒耜门、锄耨门、钱镈门、铤艾门、杷杷门、簦笠门、蓆蓐门、杵臼门、仓廩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薊麦门、蚕缲门、蚕桑门、织纴门、纴絮门、麻苧门，共254种农具，且皆绘有图录。当然，有的农具其实不算农具，如“田制门”中的籍田、太社、国社、井田、区田等。不过，尽管如此，宋元的农具仍旧非常丰富。有学者将宋元时期的农具细分为整地农具、播种农具、排灌农具、收割农具、场上脱粒晾晒清选及谷物加工农具、农用运输工具六大类，^[25]每一类农具下都有十余项具体的农具。《农书》中记载的农具有103种之多，这些数量繁多、类型复杂的农具形制在宋元时期大体定型，配套使用，共同构成了宋元时期完整的农具体系，某些农具在现代乡村仍在使

农具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土地耕作面积逐年扩大，在南方地区，农业

生产专业化市镇初兴，粮食市镇、蔬菜市镇、渔业养殖市镇等不断涌现，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趋势显著加强。同时，生产工具与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市场需求扩大等因素，使以往北方种植粟麦、南方种植水稻的种植结构被打破。在北方，小麦逐步取代粟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在南方，由于北方居民的迁入，小麦需求扩大，其种植面积也逐年增加。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水稻地位上升，稻田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出现了早、中、晚稻等类别。棉花传入中原，迅速取代麻成为主要的纤维作物，油菜成为新的油料作物。

在耕作技术上，宋元时期也有巨大的突破和发展。温室栽培、无土栽培技术出现，桑树嫁接技术推动了桑蚕养殖的发展（见插图2）。宋元时期，在政府组织指导下，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从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全国修建水利工程1 079处，直接受益农田面积达361 176顷。^[26]元代，政府还专门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组织人员疏浚运河、治理水患、开凿渠道等。宋元文人也将目光投入农业生产，写一些简单通俗的文字来劝农生产。如南宋吴泳的《劝农文》：“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廉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尔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尔其修乃身，顺乃亲，睦乃邻，逊乃畔。既种既戒，自此月中气至八月寒露，谷艾而草衰，西畴毕事，则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报丰年，岂不为汝农夫之庆，敬之哉，勿懈。”^[27]这一系列政府措施及社会风气，都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乡村教育与村落社会

宋初，官学系统承袭唐、五代旧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在中央，以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部门，隶属于国子监的学校机构有广文馆、律学、武学、四门学和小学等教学机构。同时，在各职能部门下设置专门学校，主要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此外还有服务于王朝宗室教育的宗学，等等。在地方，基层教育呈现分散、自发的状态，社会办学形式多样，既有地方官员主办的州学、县学，又有乡村家族创办的族学、义学，还有一些民间学者创办的学舍、乡塾，甚至是一些民间讲学活动。由于缺乏国家制度保障，这些教学机构各自为政，时盛时衰。总体而言，在北宋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教育制度，尤其是乡村教育体系尚缺乏完整的规划和建设。但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宋代文化教育逐步在社会各阶层推广。尤其是在乡村地区，随着宗族组织的发展，乡村教育的类型不断丰富，规模也不断扩大。

（一）乡村教育的类型

两宋时期，乡村教育既有官办的州学、县学，又有民间私学，如书院、族塾、义学、冬学等，但仍以私学为主。时人记载当时乡校等私学盛况：“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28]根据教授对象和目的不同，乡村私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青年学子为对象，以科举或义理为旨归的书院教育；另一类是以识字和日用常识为主的小学 and 蒙学。后一类私学在乡村最常见，对乡村社会影响也最大。

1. 乡村蒙学教育

在宋代乡村，蒙学教育名目繁多，有乡校、小学、家塾、族塾、蒙馆等称谓，有记载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29]这表明，在宋代乡村教育已经遍及乡里。

宋代乡村最常见的蒙学类型是私塾，也称散馆，由塾师自己在家中设馆或是租房设馆，常年开课。一般由有资财的人家出资，将子弟送入散馆中接受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散馆的规模大小不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上百人甚至更多。北宋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记录了他少时从学于塾师乐道的情况：“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能略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30]除私塾外，在乡村还有季节性的冬学，利用农闲时节教育乡村子弟，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陆游在其《秋日郊居》一诗中记载了冬学的状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并为其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31]

乡村私学的另一种形式是族塾，也称义学，一般由宗族或者是族内士绅出资兴办，主要面向本族子弟，入学者不需要缴纳费用或者仅需承担少数费用。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宋代义学之兴举，可能始于范仲淹。据《范氏义塾记》记载：“汉以来或为讲堂，为精舍，而养则未之闻也。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教养咸备，意最近古。”^[32]有些族塾不仅面向本族子弟，还对本地乡党子弟开放。如朱熹记载的德安玉山刘氏义学就是如此：“后数岁，予以事过玉山，则刘侯以待次家居，复得相见，如平生欢。一日，慨然语予

曰：‘吾家本单贫，而入仕又甚晚，顾无以仁其三族者，间尝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33]

除了私塾与义学，乡村中的士绅阶层，由于自身条件优越，往往自行延聘名师在家教授子弟，这类教育形式被称为家塾，如陆九渊、吕祖谦等就设有家塾。家塾对塾师的饮食、束脩等都有具体规定，如吕氏家塾中，教师“每日二膳”，“尊长月一具食，延塾之师”，而束脩则“以家之有无、诸生之众寡为之节”。[34]有些寒门小户出于子弟教育的考虑也会聘请家塾，有些则是由家中学有所成的兄长或长辈自行教授，如刘清之“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35]。

在教学内容上，宋代乡村蒙学教育包括基础知识教育、道德启蒙教育以及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习惯的养成等方面。在基础知识方面，首先是识字教育，主要内容有识字、写字、记诵之类，内容相对简单。除此之外，宋代蒙学基础教育中还包含了辞赋等辞章方面的训练。这主要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宋代，诗词歌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科举的现实需要使儿童从幼年就开始了与诗赋相关的学习。

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对儿童进行道德启蒙也是宋代蒙学的重要内容。北宋学者杨亿认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应当在此基础上“养其良知良能”。[36]朱熹也强调“小学教之以事”，“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37]均强调了在蒙学阶段对儿童的道德启蒙。而真德秀在《家塾常仪》中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自胎教，至子能言能食，一一仿古人教子之法。及年七八岁，就小学。蒙昧未知向方，但先收其放心，养其德性，遂时遂处，禁戒奖诱，曲为渐渍汲濡，习成温恭端默气象。时时与言古今孝悌、忠信、

长厚、退让等事，使其盈耳充腹，皆性分中道理。至于洒扫应对，爱亲敬长、品节事宜，直须身帅耳提，尽其曲折，俾一一惯熟。间则教之数目与方名，导之咏歌古诗，悠扬三复，以养其性情，使渐兴起。若夫是后读书，量质量年，渐为增益，难以例拘，但授读多少，宜半其资，只期精熟，勿令畏苦，使之悠然有余力，而欣然乐从事为善也。”[38]不止于此，宋代乡村的蒙学教育还注意对儿童的良好生活礼仪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指出：“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即毕，复置元所”，“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39]

与蒙学教育目的相适应，宋代蒙学教材也各有侧重。根据其教学的目的及内容，教材大体有如下几类。其一，基础识字类教材。宋代以识字为主的蒙学教材中，影响最著者是《三字经》和《百家姓》。《三字经》为宋代王应麟编写，全文376句，1128字。其文字简练朴实，三字成句，整齐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一经出世即广为流传。《百家姓》作者不详，全书唯论姓氏，不杂义理，但通篇以四字为韵，语调和谐，在当时流传甚广。其二，历史启蒙类教材。在一些蒙学教材中，除了识字教育，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与典故的介绍，比较著名的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胡寅的《叙古千文》等。出于科举的需要，有些教材还以诗歌的形式编排，比较著名的有《神童诗》《千家诗》《训蒙诗》等。其三，伦理道德类教材。较著名的有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其四，起居礼仪类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其五，家庭训诫类的综合性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

录》等。

2. 书院教育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40]。至宋代，其职能发生转变，在原有藏书职能的基础上逐步兼备教育的功能。

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在经历唐、五代战乱之后，各地官办教育机构所剩无几。到宋朝初期，教育活动几乎停顿。再加上由于边患严重，朝廷在应对边患之余，也无力兴办教育，导致地方官学长期不兴。与此同时，由于宋代朝廷推行文治的政策，大量启用文人出仕地方，并不断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使得社会对儒学教育的需求大增，这一系列因素都推动了书院在宋初的产生与发展。对此，朱熹做了相当明晰的阐述：“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41]吕祖谦也认为书院之兴出于时代之需要：“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42]

据邓洪波等学者统计，整个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167年间，共有书院73所以上，多于唐至五代十国共计近350年间所有书院的总和。^[43]南宋的书院则新增了317所。两宋时期，书院总数达515所。^[44]从地域来看，今天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分布。

北宋初年，书院多系私人创办，因此在教学与管理中呈现出清晰的私学烙印。如淳化元年（990年），江西丰城县筱塘人李琮重建莲溪书院，他在《重修莲溪书院记》中指出：“书院即家塾也，古无是名，至宋始盛。……当是时，延周子谔以讲学，肖圣哲像以展礼，且资给四方来学者，人咸以义馆称之。文风大振，我李踵甲第者奕世，而他名公巨卿亦往往出其中，是皆书屋教养之效也。”^[45]显然，莲溪书院是李琮为了在李氏家族培养人才而兴建的，带有很强的私塾性质。这些书院在教育教化宗族子弟的同时，也不拒绝外族甚至是外地的学子进入其中学习。天禧年间（1017—1021年），湖南湘阴县城南笙竹驿人邓咸创建了笙竹书院，以训族中子弟及四方游学之士。远在湖北江夏与安州的冯京、郑獬都曾负笈其中。皇祐元年，冯京高中状元；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也高中状元。笙竹书院随之天下闻名。当时，湘阴县学都还没有建立。

一些书院在学术上主张自由探索，重视讨论研究，因此虽然以儒学教育为主，但并不排斥其他学问。正如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说：“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46]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诏：“天下见有官学州县，自今只许本土人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47]规定士子只能在本地求学，在科举考试时，应举士子须有官员给予文书担保，否则不能应试。不过，这只限于官学，而且没有持续。大多数书院长期招收游学之士。《宋史·孙子秀传》载：“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新之，以待远方游学

之士。”[48]这其实是常态。书院只有超越教育的地域限制，才能实现聚集四方名流进行学术讨论的目的。仁宗庆历兴学之后，官学体系逐步建立，对官学之外的私人讲学机构，朝廷开始严加控制。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书院与官学合流，成为官学的一部分：“昔洪景卢论州郡书院，但及白鹿、应天、岳麓，谓：‘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49]另一部分书院在政府法令限制与官学挤压下，逐步衰落。熙宁七年四月，朝廷发布诏令：“诏州学已差教授处，管下有书院并县学旧有钱粮者，并拨入本学，补试生员，选差职掌，余官毋得干预。”[50]至此，书院已经完全并入官学系统中。

书院教育承接了乡村蒙学教育，在北宋早期州县官学不足的情况下，补充了乡村科举教育的不足，对乡村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宋代乡村各阶层的流动与交融。

3.州县官学

宋初，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统一管理，各级官学管理混乱，生徒来源不一，经费缺乏保障，办学效果不佳。北宋中期，种种积弊开始暴露，并制约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统一教学规划，建立完善的地方官学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宋代地方州县官学的建立肇始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真宗“又下诏劝学，权停贡举二年。时命两制各撰劝学诏”[51]。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朝廷同意了王钦若在地方重修孔庙的奏议，并移牒诸路转运使，贯彻施行：“牒：奉敕，宜令逐路转运司遍指挥辖下州府军监依王钦若所奏施行。”[52]随后，又要求在孔庙中选聘教师，开设讲堂：“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53]此后，在州县地域出现修建孔庙和在庙中讲学的热潮。

景德兴学后，各地办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前兖州知州、判国子监孙奭上奏朝廷，阐述办学经费之难，并提及自己对学校发展的担忧：“臣虽以俸钱贍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请求朝廷赐田以资教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54]这项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并成为宋代建立州县学田制度的滥觞，此后各地州县纷纷效仿，上奏朝廷，请求赐田。

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朝廷颁布藩镇立学的诏令：“诏自今须藩镇乃许立学，它州勿听。”^[55]规定自当年十二月开始，各地不准擅自办学。这标志着北宋朝廷在教育政策上的重大转向，宋代教育由之前的自由发展转变为朝廷总体规划并参与管理。通过景祐兴学，宋代州县官学逐渐步入正轨，许多学校都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学规，内容涉及教学宗旨、课程设置、经费管理、资产管理、祭祀礼仪等方方面面。部分地区的州学延请硕儒担任学官，如范仲淹主教应天府学、胡瑗主持湖州府学等，造就了一些名气极大的学府，吸引了大批士子求学。北宋学者田况在论及景祐时期学校时如此说：“自景祐以来，天下州郡渐皆建学，规模立矣。”^[56]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宋仁宗颁布兴学诏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谴，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57]仁宗的兴学诏令将兴办官学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州县，要求诸路、府、军皆立学，有士子200人之县亦需立学；同时将官学与科举挂钩，规定士子根据各自情况，必须在官学听读100~300天不等，这极大地推动了州县官学的建设和发展。沈邁在《丹州新学记》中对此做了如下记载：“宋兴既百年，当庆历间，海内晏

靖，民趣于治。天子休之，以谓礼乐可兴，而三代之治可放而至也。于是遂登群材，修法度，始诏天下更立学制而增大之。延师儒，先经艺，使学者务进于道；变文弊以近古，使学者不独为利而已。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诫而劝，不率而趋，惟恐其后。”^[58]在州县官学大量发展的同时，一些积弊也开始出现。为规范州县官学管理，使州县官学能够持续发展，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颁布诏令：“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元有学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仍置小学教授，凡在学有职事，以学粮优定请给。”^[59]

熙宁兴学是由王安石主持的，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州县官学方面，朝廷设置了诸路学官，全权负责当地的教育，其任免由中央直接控制。为保证州县官学的正常运转，朝廷拨付出专门的学田加以保障。由于有朝廷在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强力保障，宋代地方学校发展迅猛。宋代学者孔武仲对此做了如下记述：“惟圣宋划五代之敝，合并四海，仁义礼乐之泽，洽于民心者，百有余年。而熙宁以来，学校最盛，内自京师，旁达边郡，聚士有舍，讲业有师。课试诵说与夫赏罚升黜之法，日增月长，以至大备。四方之士。幸遇太平君子长养人材之时，赢粮束书，争集黉舍，惟恐在后。”^[60]崇宁元年（1102年），在蔡京建议下，徽宗对学校制度做出重要调整。首先是大力扩大办学规模，“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通过此一措施，学校遍布全国的城市与乡村。其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再次，进一步完善教育经费来源，规定“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61]

通过历次兴学运动，北宋政府逐步建立完备的州县基层官学系统，在行政层面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教育相关事宜，在学校

层面也形成了稳定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宋室南渡后，官学系统继续发展。宋代的官学体系推动了社会文化教育的大发展，乡村中的士子不必远赴他乡得以就近求学，大量出身贫寒的士子通过在州县官学学习，得以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促进了乡村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发展。

4. 社学与义塾

在元代，乡村教育还出现了社学与义塾等新类型。元代社学的兴起与元初推行村社制有关。至元七年，元朝廷下令推行村社制度，同时要求在立社的同时设立社学：“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脩。如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验。”^[62]从这一诏令可以看出，元代社学与宋代冬学颇为相似：在教育对象上，以乡村子弟为主，具有蒙学的性质；在内容上，以论、孟、经、史等儒家经典为主；在教学时间上，主要利用农闲时段。元政府设立社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儿童启蒙教育，其更大的考虑是试图通过社学的伦理教育，使子弟能“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最终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

随着元朝的统一，村社制在全国广泛推行，社学也在全国特别是汉人聚居地广泛设立。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大司农奏称：“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63]随着社学的迅速发展，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是师资匮乏、教材缺失。至元十年（1273年），劝农官上言：“各路府州司县，在城关厢已设长学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64]此后，社学开始衰落。为应对社学衰落的局面，大德四年（1300年），元成宗发布诏令，设立小学书塾。有学者认为，此小学书塾就是昔日的社

学。[65]小学书塾针对此前社学中出现的問題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江浙行省在回复设立小学书塾诏令的公文中奏称：“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学校乃作养后进之地，除路州县学、书院各设小学教谕教习生员，外据请粮耆儒人内，遴选真材实学、前辈典型、堪为师范之士，在城八隅各设小学书塾一处……如遇朔望，令各塾师儒率领诸生前诣学、院观礼，使知学校规绳，期成远大之器。其余州、县，拟于各乡每都，依上创设立小学书塾，近者每月赴学，乡村远者，不需赴学。”[66]

元中期以后，虽然各地还有创办社学的零星记录，但是社学已经不是乡村教育的重点，在各种因素的掣肘下，社学教育逐步消亡。与此同时，另一种乡村教育形式——义塾，开始发展壮大。元代的义塾一般由私人出钱创办，用于教育乡党子弟。有些义塾主要对族中子弟开放，如蕉冈义塾“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67]。但是总体而言，义塾一般不限宗族，对乡里子弟开放，如华亭邵氏义塾“聚里中之俊秀而教育之”，沈氏义塾虽然是“聚族之子弟，俾随材以受业”，但对其他来求学之人也是“乡人来学者弗拒也”[68]。由于是私家创办，义塾在管理上也相对单纯，一般是择有才德之人主持。如沈氏义塾“择族中之长且贤者，同主其出纳”[69]。为保证义塾的顺利发展，一些义塾还设置了学田，为义塾教育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如龙渊义塾“斥田至一百五十亩，其妻党陈京兄弟闻之，以曾大父适斋先生所遗二百三十亩有畸来为之助”[70]，戴氏义塾“割上腴之田五百亩以贍之”[71]。

部分义塾由于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往往能够延聘名师，如龙渊义塾“聘经行修明之士以为讲师”[72]，戴氏义塾“于是慈溪黄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领教事”[73]。在这些硕学大儒的指授下，部分义塾的教学水准与州学、县学相比也不遑多让。义塾教

育的创建与发展，为元代乡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传播，对官学系统的州学、县学教育起到了有力补充。时人论及义塾也认为“繇是一方之民知所劝，俗为之移。其于世教不无助也，是以谈者尚之”[74]。

（二）宋元乡村教育兴起的原因

宋初，在北方地区尚有强敌环伺，朝廷无暇兴学。官学缺失，私学作为补充得到有益发展。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朱熹与吕祖谦等也指出宋初私学兴盛的原因所在：“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75]如开封人王昭素：“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弟肃及李恽皆尝师事焉。”[76]刘颜“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77]。戚同文“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78]。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宋代乡村教育兴起于私学。

北宋初年，宋朝廷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统治策略。此后，地方官更多以文人充任，同时北宋政权不断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造成了社会对教育的普遍需求。在官方层面，通过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兴学”、神宗熙宁年间的“熙宁兴学”、徽宗崇宁年间的“崇宁兴学”三次大规模的兴办学校，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州县官学，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学校管理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通过政府的提倡与直接推动，官学私学互为补充，教育与科举互为表里，整个社会读书兴学蔚然成风，也带动了乡村教育的大发展。

宋元时期，经济发展迅猛。在农业方面，政府以减免租税鼓励垦荒；疏浚黄河，兴修水利，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

力推广优良的农作物。同时，陶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也全面发展，商业进一步繁荣，海外贸易取得重要进展。所有这些经济层面的活动与成果，使得民间经济富足，为宋元乡村教育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

书籍的广泛流通也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初，书籍较为匮乏。至真宗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改进与流行，书籍匮乏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仁宗时，由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印刷行业得到极大发展，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当时印书的盛况有所记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79]书籍印刷的发达，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以及读书的费用，给读书人带来了莫大的便捷，各类书籍在民间迅速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竹木简牍流通不便、抄誊费时且多误的局面。有宋一代，书籍广印，大为流通。苏轼对此感慨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80]

（三）乡村教育与道德教化

宋元时期的乡村教育，无论是“冬学”“散馆”，还是“族塾”“义学”，其教学对象主要还是以乡村儿童为主。在教育内容上，除了基本的知识教育外，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和生活礼仪养成始终是乡村教育的重要主题，出现了很多流传后世的蒙学读物。例如，朱熹编写的《童蒙须知》开篇即指出：“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

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弘谋按……蒙养从入之门，则必自易知而易从者始。故朱子既尝编次小学，尤择其切于日用，便于耳提面命者，著为《童蒙须知》。使其由是而循循焉。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即此而在矣。吾愿为父兄者，毋视为易知而教之不严。为子弟者，更毋忽以为不足知而听之藐藐也。）”全篇分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几项，每一项都要求儿童严格遵守。南宋真德秀编撰的《西山教子斋规》指出：“凡为人要识道理。识礼数。在家庭事父母。入书院事先生。并要恭敬顺从，遵依教诲。与之言则应。教之事则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全书分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八项，对儿童学习、日常生活及行为准则均有详细规定。至于后世流传更广、影响更为深远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蒙学读物，无一不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宋元乡村教育的繁荣与发展，推动了儒家道德伦理在村落社会的传播，实现了儒家化民成俗的目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宋元时期也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乡村私塾、蒙学的普及使教育不再是少数富裕阶层的特权，更多的平民子弟有了求学上进的机会，彼时村落之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81]。大量的寒门子弟通过读书问学，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人精英，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这些文化精英从乡村走出之后，往往会通过各种形式回馈乡里，有些是通过捐钱捐物，创设族田，扶助族中孤弱；有些则是致仕后返乡定居，创办乡约族学，教化族

人。通过乡村教育与科举考试，弥合社会阶层，使宋代社会呈现出祥和安稳的景象，为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四、村落与宗教的世俗化

（一）村落与佛教的发展

在唐代，天台宗、华严宗等以义理见长的经院佛学兴盛，但是由于其义理烦琐艰深，导致其只能在少数贵族中流行，影响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唐中期以后，以慧能为代表的新禅宗兴起，从教义、修行方法等方面对传统禅宗进行了全面改造。在教义上，慧能主张“不立文字”，不看重经义的研究背诵，而更加注重内心的自我体悟。在宗教典籍上，主要以内容浅显的《金刚经》为主。与趋于简易的教义相对应，在修行方法上也做出了调整。慧能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82]因此，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自身能否明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由此，慧能所创的新禅宗，将佛教的基本精神由之前的追求西天佛国净土，转变为对自身佛性的体悟，主张“挑水担柴”皆可悟道，将往昔出世的佛教转向入世。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百丈怀海改革教规，创立禅门清规和丛林制度，打破寺院内部的等级壁垒，提倡农禅生活。五代以后，禅宗逐步为各地佛寺接受，使佛教教规更能适应平民阶层。至宋初，佛教从教义、修行方法以及教规戒律等诸多方面，为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做了充分准备。

北宋立国之初，太祖与太宗对佛教的发展持支持的态度。乾

德二年（964年），太祖下诏，命僧侣西行拜求佛法。开宝四年（971年）开始刊刻《开宝大藏经》，这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官刻大藏经。同时，朝廷不惜耗费财力，重修了大量佛塔寺院。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诏令在太平兴国寺大殿西建译经院，中为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选通晓梵语文学义者将佛经译成汉语，再使人润色文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译经院改称传法院。^[83]此后，佛教在北宋朝廷的支持下，迅猛发展。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寺院总数达到四万多所，“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庆历二年（1042年），全国“僧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人，尼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人”；熙宁元年（1068年），“僧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一人，尼三万四千三十七人”；熙宁十年（1077年），“僧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尼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二人”。^[84]随着佛教规模的不断扩大，代表僧徒身份的度牒开始商品化。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庚戌，“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余谷振霜旱州县”^[85]。元丰六年（1083年），“礼部言：‘祠部出度僧牒，以六千三百六十二为额，今年已溢额千五百五十四。乞岁以一万为率，若踰数，乃以闻。’”^[86]北宋败亡后，南宋朝廷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是大量出卖度牒。《云麓漫钞》卷四记载：“绍兴中，军旅之兴，急于用度，度牒之出无节；上户和余所得，减价至三二十千。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佛法之盛，无出斯时。”

然而，与唐代一样，佛教规模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南宋时期，一方面僧尼数目的增加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逃避赋役，假冒僧徒，这些人往往不守戒律，行径恶

劣，造成了种种恶劣影响。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二月，贺允中上奏朝廷，建议对佛教发展严格限制：“欲遍下州县，遵依现行条限缴申。若州县、寺观主首有违条限，依法断罪，主首仍还俗。许诸色人陈告，比依告获私自披剃或私度人为僧道条格支（赏）。如人吏将亡僧度牒私自披剃，及私度人若伪冒者，告赏依前项格法倍之。”^[87]宋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寺庙展开整顿，对假冒僧徒的行为进行打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元代从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正式建立大元，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亡于朱明，凡九十七年，历代帝王均对佛教推崇有加。《元史·释老传》中记载：“元兴，崇尚释氏。”为了使佛教徒能够安心佛寺，元代“寺庙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88]在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佛教的规模一时间急剧扩大。仅仅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89]。与此相对应，寺产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编民冒入寺籍的情况，如成宗年间，“庚辰，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自杨总摄冒入寺籍，宜加厘正”。^[90]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与恶性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冲击，以致元代的张养浩在《时政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91]

宋元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佛教也从早期的经院佛学中走出来，全面深入到宋元社会中，完成了佛教世俗化的转身，对宋元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佛教在乡村的广泛传播，乡村社会崇佛之风日盛，“佛

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92]。佛教庙宇在乡村分布广泛，“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踰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93]。宋元时期佛教的世俗化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佛教世俗化导致乡村的佛教徒数量剧增。随着佛教在乡村的不断发展，其在乡村中的信众基础不断扩大，如“丽水商人王七六……王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94]。“盐官县黄天荡民余三乙，世以屠狗为业……日诵阿弥陀佛万声，祈忏宿罪。”[95]乡村中部分资产丰厚的富户捐献了大量资财兴修庙宇，奉祀佛陀。如南丰县大觉寺就是由“生员刘万年、妻毛氏捐资八百两建造”[96]。宣和（1119—1125年）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村民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崇信佛教，还有部分人落发出家，遁入空门。但是很多乡村平民遁入空门并不是出于对佛法的尊奉，而是出于降户等、避差役的现实考虑。宋人张表臣说：“近世二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区，福州千八百区，杭稻桑麻，连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窜籍其间者十九。非为落发修行也，避差役为私计耳。”[97]同时，许多游手好闲之辈混迹其中，居积货材，斗殴争诉，影响极为恶劣。如南宋庆元年间，有大臣上书痛陈此弊：“闻二广州军，凡为僧者，岂真出家之人？盖游手之徒，遍走二广，夤缘州郡，求售（伪）帖，号曰沙弥，即擅自披剃为僧，或即营求住持寺院。不数年间，常住财物掩为己有，席卷而去，则奔走他乡，复为齐民。”[98]这些假借佛门以求私利的僧徒往往饮酒食肉，破戒无行，影响恶劣。大量人口出家为僧

尼，也使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冲击。

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僧徒积极参与到乡村的赈灾、行医等慈善活动中，促进了乡村慈善活动的发展。灾荒之年，佛教徒广泛参与乡村的赈灾活动，有些僧徒作为个体独立赈灾，如星子县延丰寺“无极禅师纳粟赈荒”。^[99]有些则是与官府合作赈灾，部分僧众还因为表现出众而受到朝廷嘉奖。如南宋孝宗时期，饶州知州王柅言下令：“僧绍禧、行者知修煮粥，供贍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传、行者法聚煮粥供贍三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诏僧绍禧、法传各赐紫衣，行者知修、法聚各赐度牒披剃。”有些僧徒精通医术，通过行医济世救人而广受称赞。如沙门洪蕴，“每先岁时言人生死多中，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一时称药王再现”。^[100]

还有部分僧徒利用自身在乡村的影响力，积极投身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造桥修路等。有些桥梁为僧侣独立募资建造，据方家豪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及各方志记载的各类桥梁中，其中由寺院募建者，在浙江、广东占15%，在江西、江苏均占27%，在福建占比则高达54%^[101]。如栖霞桥，“在州治南七十里，跨毛竹、山源，水路通奉新，宋时有僧募造。因桥乏砥石，昼夜焚香告天，忽一夕，风雨掣一巨石遂为桥柱”^[102]。有些则是在官方领导下建造，如化龙桥，“在县东。宋庆元六年县令叶益命僧了性募缘建”^[103]。如万石桥，“淳熙七年秋大水，北津多败。自欧宁令季淙请于诸司，欲视西溪之扼而建桥焉。太守赵侯彦操与部使者议给公钱五十万，使营之。令乃属僧妙昌董其事，且使求四方之助……庆元元年三月，桥成……”^[104]。这些僧侣的参与，推动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佛教中的一些观念、教义也随之在乡村社会广泛传播，对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习俗产生了一定影

响。如在佛教寺庙中普遍出现的放生池以及佛教倡导的放生行为，对民间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放生逐步发展成乡村民间社会的一种风气。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很多，如荆州南部地区的俞一郎，“专好放生及装塑神佛像”^[105]。自京城迁往信州的孙十郎，“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每入市，逢人携飞禽走兽，及生鱼鳖蝦蛤，必买而放之。惟大风雨则不出，采捕者利于速售，且可复取，纷纷集其门，或一日费钱二三万”^[106]。此外，佛教食素的饮食传统除了在信徒中传播，对乡村百姓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代胡仲弓《答颐斋诗筒走寄》诗：“今朝茹素无清供，喜得邻分玉版羹。”便反映出当时社会素食之风。

佛教的各类法会、礼仪等也逐步渗透到乡村社会，部分佛教法事活动甚至发展成民俗活动。宋代的丧葬礼俗中，往往延请僧道诵经做法事以超度亡者。“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107]“而今之举天下凡为丧葬，一归之浮屠氏。不饭其徒，不诵其书，举天下诟笑之，以为不孝”^[108]，在葬礼中不用僧道，反而被标榜为异端。佛教的各类法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同样广泛而深入。如在四月初八佛诞日，各地寺庙均举行浴佛法会，各地信众云集：“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109]同时祭祀烧香，祈求佛祖保佑，成为当地民俗的一部分。

（二）道教的平民化与村落

五代之际，很多儒士由于时局动乱而研习黄老之道以安身立命，黄老思想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到北宋初年，从乡野隐士到朝中大臣，很多人都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不仅如此，出于安定社

会、稳定政权的考虑，北宋朝廷在社会上也极力推崇黄老之道，并积极扶持道教的发展。但是，由于战乱的影响，道教发展极为混乱，因此，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五条措施进行整顿：修复宫观、选拔道官、断禁恶习、严禁私度、奖优汰劣。^[110]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宋真宗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封禅泰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政和年间（1111—1118年），宋徽宗宣扬天神下降，授以符书，亲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全国。徽宗除了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同时也加封山神、龙神、城隍、岳渎等民间祭祀之神，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宋初的官方道教基本沿袭了唐、五代以符箓、道法为主体的传统，这使其在乡村社会中影响有限。

两宋之际，在北方金国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等道教新教派。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对新兴于河北的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做出如下评价：“三教教主乃别树新义，聚徒训众，非力不食，其始与明季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之论讲学相类，不属以前道教也。”^[111]与北宋以符箓为主的教派相比，这些新兴的道教宗派更注重内丹的修炼，无论是传教还是修行，都呈现出全新的特点。首先是传教的对象不分贵贱。如全真道“……不择贵贱贤鄙，不异山林城市，俱以道化，无非晏然”^[112]。其次，仿效禅宗“明心见性”之说，“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113]，推崇内丹修炼之法，并声称“有志之士若能精勤修炼，初无贵贱之别，在朝不妨为治国平天下之事，在市不失为士农工商之业”。新道教的平民化还体现在其“三教合一”的新主张中。新道

教提倡的“三教合一”，其实质是依托儒家宣扬道教，因此，大量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被纳入道教典籍之中。如《太上感应篇》，把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和儒家伦理做了完美结合，以最通俗的形式，使得道教教义在乡村社会得到传播。

在动乱时期，这种通俗易懂的宗教教义、方便易行的修行法门一经问世，便受到平民的广泛欢迎，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如太一道，在创立之初就“远迩向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114]。而真大道“又以去恶复善之说，以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115]。全真道在乡村的影响尤为巨大，当其时也，“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116]。通过这些新兴教派的努力，道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两宋之际道教的平民化，早在五代至宋初的正统道教的变化中初现端倪，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神仙信仰的动摇。唐代有许多人因服食外丹致死，导致人们得道成仙的信仰动摇，道教的信仰从虚无缥缈的仙道转变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度世。二是内丹术的兴起。在外丹衰落的同时，内丹术兴起，宋神宗时期张伯端《悟真篇》问世，标志着道教修炼路向的转变。[117]

道教的平民化体现在乡村社会的很多方面。一些道教的法事用具如符箓等，发展演变成乡村社会重要的民俗用品。宋徽宗时期瘟疫肆虐。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书符投大瓮贮水，以饮疫者，皆愈”，并说：“吾家法录，上可以动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龙虎，幽可以摄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可以脱死生，大可以镇家邦，小可以却灾祸。”[118]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宋代民俗花钱，上面铸刻着道教驱邪的符箓咒语。在动乱的社会里，道教信仰也给那些遭逢乱世的乡民提供了精神寄托。

（三）其他信仰与祭祀文化

宋元时期，乡村社会除了佛道两大宗教组织外，还有很多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民间信仰活跃其中。不同地域的民间信仰，名目不同，内容各异，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将其归纳为四大类型：鬼神崇拜、巫术、方术、灾异之说。围绕这几个方面，乡村社会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祭祀活动。

鬼神崇拜是乡村社会最常见的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中，除了常见的佛、道体系的神灵之外，还有各具特色的地方神灵，如民间对社神的崇拜，在宋元乡村社会随处可见。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对乡村祭社习俗做出如下叙述：“老盆初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李若水的诗《村家引》中对此也做了精彩描述：“邻老相邀趁秋社，神巫箫鼓欢连夜。”除了春秋二社，还有端午、重阳等民俗信仰节日，在这些节日中，人们除了祭祀祈福，还借此睦邻会亲。如《东京梦华录》记录的汴梁城秋社的盛况：“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祇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119]事实上，鬼神崇拜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朱熹对徽州新安一带风俗的记录最能体现宋元乡村社会鬼神崇拜的现状：“风俗尚鬼，如新安等处，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归乡里，有所谓五通庙，最灵怪。众人捧拥，谓祸福立见。居民才出门，便带纸片入庙，祈祝而后行。士人之过者，必以名纸称‘门生某人谒庙’。”^[120]

宋元乡村社会中，巫术盛行。各类里巫、村巫活跃于乡村，在一些巫术盛行的地域，村民生病时首先不是寻医问诊，而是寻巫祛邪。如南宋时期的信州，“番阳民俗，杀牲以事神，贫不能

办全体者，买猪头及四蹄享之，谓之头足愿。木工胡六病，其妻用岁除日具祷赛，置五物釜中俟巫者。会节序多祀事，巫至昏乃来。”^[121]又如“吴、楚之俗……民病且忧，不先医而先巫，其尤蠹者，群巫掊货财，偶土工，状夔□傀彪、汭阳彷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中，鼓气焰以兴妖，假鬼神以哗众”^[122]。除了治病驱邪的种种巫术之外，各类相面、风水等术士在乡村中也非常活跃。乡村中有人去世，亲属往往会请术士查访墓地，以趋吉避凶。如《夷坚志》卷四《周十翁墓》载：“弋阳周尚书高祖十翁，居邑之杉山。因妻亡，招术士访葬地未获……”又《夷坚三志·壬卷第一》记：“吴篆，抚州士人也……其父亡，既得吉卜，风水家谓年岁不利，姑就茔中别择一方向佳处寄藪，越二年，乃克葬。”^[123]

除此之外，在乡村生活中，民间祥瑞灾异观念及其连带的祭祀活动也随处可见，这些观念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如在婚礼中，当男方将新娘引进到门口时，“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124]。又如乡民在房屋营造中，也非常注意各种忌讳，在《夷坚志》中就有相关记载：“予叔父中造牛栏于空园，术士董猷见之，曰：‘栏之一角犯九梁煞，当急解之。’呼巫焚纸钱埋桃符以谢。”^[125]甚至在某些地方，为了祈求平安，还发动村民举行集体祭祀，如北宋长沙县“巫覡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126]。在宋代乡村的很多地方，还有为乡先生立祠庙祭祀的习俗。乡先生是一地的贤达，生前在乡里中素有威望，以其道德、学问为乡人所敬仰，去世后，乡人为之立祠祭祀以示纪念。杨万里在《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记》中对乡先生祭祀的深层内涵做了进一步解

释：“古者乡先生没则祭于社，非尊夫乡先生也，尊乡先生所以仪后之人也。”^[127]

发源于本土、极具地域特征的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乡民对其是“奉之愈谨，信之益深，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128]。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对村民的行为和意识起到约束作用，通过对一定社会规范的维系，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同时它所具有的劝人向善的教化功能对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民间信仰夹杂的一些负面思想对乡村社会也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如一些地区由于民间信仰过于泛滥，村民在生病时往往首先求助于各类巫觋，而非寻医问诊，最后往往导致惨剧发生。如宋代岭南地区“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药以给病者，愈者千计”^[129]，四川蜀地其情况也相类似：“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130]在一些大型祭祀活动中，由于村民聚集带来严重的治安隐患。如黄震通判广德军时，“郡有祠山庙，岁合江、淮之民祷祈者数十万，其牲皆用牛。郡恶少挟兵刃舞牲迎神为常，斗争致犯法”^[131]。

[1]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2]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

[3]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4] 《文献通考》卷十九《征榷考》。

[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

[6]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7] 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州郡方域部》，四库全书本。

[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

[9] 陈国灿：《宋代太湖流域市镇发展简论》，《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0]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11]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册，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651页。

[13] 郭旭东主编：《韩琦传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14] 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三《又画一劄子》，四库全书本。

[15] 罗翥：《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奉化县志·官僚》，四库全书本。

[16] 常棠：《海盐澉水志》卷七《德政碑》，四库全书本。

[17]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九《古步王屠》。

[18] 魏了翁创稿，方回续：《古今考续考》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四库全书本。

[19] 王柏：《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四库全书本。

[20]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1页。

[21] 洪迈：《夷坚续志》前集，卷二《幻术为盗》。

[22] 陆九渊著：《陆象山全集》卷十《与张元鼎书》，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23] 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七《鱼部》，四库全书本。

[24] 陈襄：《古灵集》卷十九《仙居劝学文》，四库全书本。

[25] 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661—758页。

[26] 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27] 吴泳：《鹤林集》卷三十九。

[28] 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2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

101页。

[30]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四库全书本。

[31]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载《陆游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91页。

[32]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4页。

[33]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玉山刘氏义学记》，四部丛刊本第38册，第4页。

[34] 吕祖谦：《东莱别集》卷一《家范》，四库全书本。

[35] 《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刘清之传》。

[36] 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五，四库全书本。

[37] 朱熹：《朱子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

[38] 徐梓、王雪梅编：《蒙学须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39] 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74页。

[40]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页。

[41] 朱熹：《朱子文集》（六），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7页。

[42] 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四库全书本。

[43]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78页。

[44]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5] 转引自邹友兴：《丰城书院研究》，江西省宜春地区文化局1998年版，第162页。

[46]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47] 《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四》

[48]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

[49] 叶真：《爱日斋丛钞》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

[5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六月丁丑条。

[52]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册，卷一九一，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82页。

[53]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册，卷二一一，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657页。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十一月庚辰条。

[5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二月壬申条。

[56] 田况：《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

[58]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十七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689页。

[5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庚寅条。

[60] 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十四《信州学记》，四库全书本。

[61] 《宋史》卷一五七《志第一百一十选举三》。

[62]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1页。

[63]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64] 《通制条格》卷五《学令》，四库全书本。

[65]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66] 佚名：《庙学典礼》卷六《成宗设立小学书塾》，四库全书本。

[67]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一《菑冈义塾记》，四库全书本。

[68]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沈氏义庄记》，四库全书本。

[69]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沈氏义庄记》，四库全书本。

[70] 李遇孙辑，邹柏森校补：《括苍金石志》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71]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戴氏义塾记》，四库全书本。

[72] 李遇孙辑，邹柏森校补：《括苍金石志》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73] 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戴氏义塾记》，四库全书本。

[74]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七《题长丰镇庙学志后》，四库全书本。

[75] 朱熹：《朱子文集》（六），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7页。

[76]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一》。

[77]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

[78] 《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

[79] 叶梦得：《石林燕语》，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74页。

[80]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81] 朱熹：《朱子文集》（七），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17页。

[82] 王孺童编校：《〈坛经〉诸本集成》，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83] 高承：《事物纪原七·传法院》。

[84]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

[85] 《宋史》卷十四《神宗一》。

[8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〇，神宗元丰六年条。

[87]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

[88]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

[89] 《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世祖十三》。

[90] 《元史》卷二〇《本纪第二〇·成宗纪三》。

[91] 张养浩著：《张养浩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92]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卷一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9页。

[93]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二）卷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页。

[94] 洪迈：《夷坚志》丁卷八《王七六僧伽》，四库全书本。

[95] 洪迈：《夷坚志补》卷三《余三乙》，四库全书本。

[96] 许怀林著：《江西通史5·北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

页。

[97]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3页。

[9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99] 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四《寺观》。

[100] 同治《九江府志》卷四一《方技》。

[101] 康武刚：《宋代地方势力与基层社会秩序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02] 光绪《江西通志》卷七九《津梁·义甯府志》。

[103]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一八《地理·桥梁》，德化县化龙桥条。

[104]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一〇六三《万石桥记》，四库全书本。

[105]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六《俞一郎放生》。

[106] 洪迈：《夷坚三志》壬卷八《孙十郎放生》。

[107] 王栻：《燕翼贻谋录》卷三，四库全书本。

[108] 郑獬：《鄮溪集》卷一六《礼法论》，四库全书本。

[10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四库全书本。

[110] 唐代剑：《宋代道教发展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11]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页。

[112] 李道谦辑：《甘水仙源录》卷一《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道藏》本。

[113] 李道谦辑：《甘水仙源录》卷五《诚明真人道行碑铭》，《道藏》本。

[114]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六一《故太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碣铭并序》，《四部丛刊》本。

[115]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〇《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四部丛刊》本。

[116] 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五《紫微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7]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8] 《道藏·正一部》

[11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秋社》，四库全书本。

[120] 《朱子语类》卷三《鬼神》，四库全书本。

[121]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一《胡匠赛神》，四库全书本。

[122]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四《润州州宅后亭记》，四库全书本。

[123] 洪迈：《夷坚志》己志卷四《周十翁墓》，四库全书本。

[12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四库全书本。

[125] 洪迈：《夷坚志》庚卷第六《金神七煞》，四库全书本。

[126] 《宋史》卷二九八《列传第五十七·陈希亮传》。

[127]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二《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记》，四库全书本。

[128]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九八《上仁宗乞断祆巫》，四库全书本。

[129] 《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传第八·范旻》。

[130]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列传第二十六·李惟清》。

[131]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列传第一百九十七·黄震》。

第四节

宋元村落的形态

一、人口迁徙与村落

（一）宋元时期人口分布的总体状况

在唐、五代的动乱时期，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与停滞。宋以后，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生产工具的改良以及佃户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宋代经济出现恢复和发展，人口总数也逐年增加，并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口高峰。根据漆侠先生的统计，两宋时期，全国人口持续增长，其中尤以北宋年间增长最快。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人口共3 090 504户，到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增长到15 684 529户，增加了12 594 025户，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人口达20 882 258户，超过2 000万户，达到顶峰。[\[1\]](#)

在人口的地域分布上，北宋初年就已经呈现出南大于北的格局。有学者统计，北宋初年，南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4%，北方仅占39.6%，[\[2\]](#)南方的长江流域已经取代北方的黄河流域成为全国人口分布的中心。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方的人口差距越发明显。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成都府路人口总数达883 000户2 493 000人，人口密度达45.5人/平方公里，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同时期的两浙路人口总数也达到3 767 000人，人口密度为30.7人/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二。[\[3\]](#)苏轼在

论及当时的人口分布时就明确指出：“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4]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局部地区人口压力严重，迫于生存的压力，溺婴现象时有发生，“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5]。“淞东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6]这种现象不仅在穷困之家出现，殷实之家也不例外，如在福建地区，“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恬不知怪……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7]。

北宋末年，由于长期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佛寺俱空，塑像尽破……”[8]。南方地区由于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弱，人口逐步增长。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全国的18 331 078户中，南方各府占11 541 629户，占比达63%。[9]

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北到南，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人口损失惨重。“余尝观粘罕克河东，斡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肃，陷开封府，至顺河，凡一百八十余州，八百七十五县，蹂践残灭，何可胜纪！而自贞祐元年（1213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邱虚，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此杀戮大果报也。”[10]终元一代，其人口规模始终没有恢复到两宋繁盛时期的水平，元代平均人口为7 000万，峰值也只有8 000~9 000万。[11]与南方相比，北方受战乱影响尤其巨大，除了在战乱中死亡的人口，大量北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南方，在全国7 000万人

口中，3/4的人口分布在南方的江浙、江西、湖广三个行省内，其中人口最多的4个二级行政区为“饶州路（鄱阳湖东），403.7万人；福州路，337.5万人；平江路（苏州），243.4万人；嘉兴路，224.6万人”，均位于江浙行省，在全国14个人口达100~200万的二级行政区中，江浙行省占6个，江西行省占3个，湖广行省占4个，而长江以北地区只有一个河南行省的扬州路。[\[12\]](#)

（二）宋元时期人口的迁徙与地域分布

早在隋代，人口南迁已经成为趋势。《隋书·食货志》就记载：“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北宋时期，南方人口已经超越北方。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150余年间，由于长期战乱，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大量村落遭到摧毁，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13\]](#)。频繁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南迁，其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是靖康之役阶段。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到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共16年间，北方大量人口迁往南方。尤其是1138年宋室南渡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北方移民随皇室迁居两浙地区。在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北人南迁又有四个较明显的阶段，分别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至隆兴二年（1164年）的海陵王南侵阶段；开禧二年（1206年）至嘉定元年（1208年）的开禧北伐阶段；嘉定十年（1217年）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宣宗南迁阶段；绍定五年（1232年）至端平元年（1234年）的宋、蒙灭金阶段。[\[14\]](#)

南宋时期，北方移民遍布南方各地。庄绰在其《鸡肋编》卷上中记载了当时北方移民在南方的分布的状况：“建炎之后，

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其中，两浙路、福建路、江南西路等南宋版图东南部的地区由于有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成为移民迁徙的首选地域。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这些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明显。如福建地区，“闽中地狭小，民患无田可耕”^[15]，两浙路情况与福建大体类似，如定海县，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全县有16 226户，田约3 300顷，户平均约有土地21亩，到宋高宗年间，人口增长到将近24 000户，而垦田面积“所加方三十之二焉”，仅增加220顷，户平均占有土地14.6亩，比徽宗年间下降约6亩。

^[16]

随着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西路等东南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乡村富余劳动力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流动。一种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乡民在从事传统的农耕之余，兼习一些手工技艺，在农闲之时，在城镇从事一些副业，“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17]。在人口最稠密的福建路，此种情形尤为明显，除了学习手工技艺，还有很多没有土地的农人转入其他行业谋求生路，如充任乡村私塾蒙学教师，出家为僧为道等不一而足。南宋初年的曾丰就曾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闾閻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18]

除了兼习技艺，转入他业，也有部分乡村居民选择迁徙他乡，在平原地区的土地开垦完后，有些人将目光从平原转移到湖泊、山区土坡等地域，迁居后，将这些地方贫瘠的土地开垦出

来，从而开辟出大批的圩田、围田、梯田；也有一些乡民选择迁徙前往土地较为充足的其他地域，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薛季宣奏称：“江南转徙人户来淮甸者，东极温、台，南尽福建，西达赣、吉，往往有之。”^[19]两浙路不少百姓则迁徙前往淮南东、西路等土地较为富余的地区。

在长期战乱导致的动荡局势下，也有部分北方移民和南方外迁移民选择前往两湖、四川等地的山区，以及广西、海南岛等边远地域。如衢州开化山区，在早前是“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20]。随着人口迁徙规模的逐步扩大，往昔人少地多的荆湖南路、广西南路等地人口开始大规模增长，尤其是广西南路，在140年间，户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宋代经济呈现出由东南转向西南地区的发展趋势，正是这一人口迁移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21]

（三）宋元人口的变动与村落的建构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的新高峰。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两千万户，总人口达到一亿左右。宋代人口的增长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大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关系中佃户对地主人身依附的削弱，都是促进宋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持续增长，但是宋代人口南北分布不均。在一亿的人口中，居于北方的不足四千万，余下六千多万人口居于南方。^[22]尤其是福建路、两浙路、江南西路、成都府路等区域，人口最为稠密。人口的流动不仅导致村落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分布面积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与人口分布相对应，南方村落数量明显要多于北方，而南方村落又主要集中在上述人口稠密的福建、两浙、江西、成都等地，并伴随人口分布的变化，逐渐由土

地肥沃的平原向湖区、山区发展。湖南、广西、海南等地有不少外来人口涌入。在江南人口稠密地区，除了村落数量急剧增加，在一些大城市周边，以附近的自然村落为依托，还形成了许多草市、集镇，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进一步加强。

在南宋与蒙元的对峙时期，蒙元控制的北方地区人口迁移呈现两大趋势，内地的乡村居民为躲避战乱而南迁，同时周边偏远地区的乡村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则向内地流动。^[23]因此，村落的分布与数量与人口的变迁相对应，出现持续变动。元统一中国后，人口迁徙又出现新的特点。如为了加强对北部边远地区的统治，元政府多次向北部迁徙军民，开展屯田。略举数例如下：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正月，“移五条河屯田军五百于兀失蛮、扎失蛮”^[24]；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夏四月，“命甘肃行省发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陕西省督巩昌兵五千人屯田六盘山”^[25]；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迁黄羊坡民二百五十户于鞑靼部”^[26]。这一类人口的迁移，无疑促进了边疆地区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二、宋元村落的规模

村落的建构与规模，受到耕地的制约。住宅与耕地之间的距离称为耕作半径，随着村落的壮大，耕地面积的拓展，耕作半径也会不断扩大，但是一旦耕作半径超过了村民能承受的合理范围，人们便会迁徙，在耕地附近再一次建立聚落村庄。^[27]人口繁衍渐多，在平原地区的土地资源不能满足需求之后，村落就逐渐向山区扩展，例如，南宋李纲看到福建地区的村落之后称：“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28]根据现有材料可知，宋元时期的村落主

要有“散居”与“聚居”两种组织形式。所谓“散居”，主要指部分村居三两户为一组，散布在山野之中，如四川梓州路丘陵地区的乡村，“居民不成村寨，傍山缘溪散处”[29]。赵蕃的诗《自桃川至辰州绝句四十有二》所述的，也是这种情形：“望极千山不见村，忽逢三两仅崖根。几年生聚才如此，信是荒寒不足论。”长期居住于山区的少数民族，也大多是这种散居的村落。《宋史》所载的四川泸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散居溪谷中”[30]。元丰年间，泸州纳溪寨夷族的一个分支，“八姓五十余村，夷族千户”[31]。五十个村落总共一千户人家，每个村落平均才二十户。

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其村落呈现聚居的形态，有些大规模的村寨人户规模甚至可以达到数百户。北宋吕南公对熙丰年间的村落分布状况记述道：“今之民居无常定也。有团落之间杂数十百家者，有五里三里寂无一家者，有东西相望而阻以山川者，有悬绝之聚止于三两家者，此皆户名著在官书，而其远近疏密则官所不能知也，知之者其里之长正而已。”[32]村落之间即使相隔不远，也有不同的分布。陆游通过游记，描绘了自己在江陵以西看到的状况，这可以代表南宋村落分布的情形，有时“自出城，即黄茅弥望，每十余里有村疃数家而已”；有时沿路所经皆聚落，“竹树郁然，民居相望”。[33]

同时，村落的建构与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口、土地是决定村落规模的两大重要因素。宋元时期，人口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历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人口共3 090 504户，垦田总数295 332 060亩，每户平均95.5亩。[34]由此可知，宋初的乡村处于人少地多的状况，无论是散居还是聚居，大部分村落的规模应当都不大，一般应该在数十户之间，多者上百户左右。从宋初城市人口的状况，我们从侧面也可以证实村落的状况，咸平二年（999年），河北东路治所大名府人口数

量仅仅是“主客合数万家”，宋真宗就已经赞叹其“河朔藩镇，兹为都会矣”。[35]淳熙年间（1174—1189年），洞庭湖边上的常德府，“民户无虑万家，比屋连檐，桑麻蔽野，稼穡连云，丁黄数十万”[36]。陆游从临安城到镇江，沿运河北上，看到两岸的村落、田地几乎连成一片，常见周围村庄中的村民忙于车水。[37]宋代学者叶适描述自己的家乡温州一带的村落：“直杉高竹皆丛产，复厢穹瓦皆赘列。夜行若游其邻，村落皆在市廛，肤挠皆决，或赴于令，暮往而朝达。”[38]

到神宗元丰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重心逐步南移。据统计，北方开封府界及北方5路人口共计5 675 945户；南方6路人口共计6 766 360户。在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垦田数量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在逐步减少，此时的村落规模较初期有所扩大。据漆侠先生统计，元丰年间，北宋疆域内共有市镇1 800座左右，其中人口在500户左右的有1 000座，人口在200户左右的有800座。[39]作为乡村地域的经济中心，宋元时期一个市镇周边必定分布有数个自然村落，根据市镇的规模推算，其周边的村落当在数十户至百户左右，部分村落达到二三百户之多。南宋时期，泸州部分县的草市镇与村落人户更为繁盛，其中宜民、进德、忠信诸乡，有草市镇4处，乡村聚落14处，居民2 398户，市均聚落3.5处，居民599.5户。衣锦乡有草市镇10处，聚落16处，居民4 599户，市均聚落1.6处，居民459.9户。安贤乡有草市镇5处，聚落14处，居民3 569户，市均聚落2.8处，居民713.8户。[40]从数据来看，泸川县一般村落的规模应当在百余户左右。而在相对偏僻的江安县，“除少数在百户以上，其余以五六十户居多，二三十户的也有不少”[41]。在同时期的江南常熟地区，在地势偏高的区域一般以散村为主，其人户大多在五十户左右，而在地势平坦的低地平原则集村较为普遍，人户常在百

户以上。[42]南宋末年，方回对魏塘一带的乡村景象做出了如下记述：“望吴侬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43]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推行保甲法时，原定五十户为一大保，[44]至熙宁六年（1073年），又改为二十五户为一大保，[45]保甲的编制受到村落规模的制约，从编户基数的调整也能够看出当时村落规模普遍偏小。

到了元代，随着元代朝廷在河西走廊屯田的影响，西北地区的村落也逐渐发展起来。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发军于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2 290，为田1 160顷64亩。至大二年（1309年），中书省奏：“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今乞仍旧遣军屯种，选知屯田地利色目、汉人各一员领之。”[46]屯田制度也在内地其他地方施行，同样促进了当地村落的发展。例如，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复立洪泽、芍陂屯田，令河南行省平章阿散领其事”[47]。此外，一些军户拥有农田，也有利于从事农耕人口的增加，扩大了村落的规模。朝廷规定给蒙古和探马赤军等军户，并拨予贍四顷免税的军田。[48]到了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49]。一些军户就直接变成了农民。他们的驻扎地也就变成了村落。

整体而言，宋元时期，由于人口重心南移，在村落分布上，北方村落数量要明显少于南方。从人均耕地数量变化情况看，随着人口增长，宋元时期村落规模在逐步扩大，在一些土地平整、耕作条件良好的地域，以及路、府、州、县等城市周边的乡村，其村落规模在一二百户左右。而在一些偏远、耕作条件较差的地域，村落规模一般在五六十户左右，二三十户的村落应该也不在少数。

三、村落的环境与建筑

宋人郭熙所著的《林泉高致》虽为画论，但其中的文字可作为宋代村落研究的材料：“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50]“可居者”，自然需要有房屋，有可供耕作的土地与可维持生计的物产。有此条件，则自然生成村落。自然环境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等不同的类别，而在数百里的自然山川中，适宜居住的地域“十无三四”，这表明，村落的选址对自然环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宋人罗大经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51]从罗氏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宋人村落选址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一是需要周边有水源地。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当时的户部尚书称：“今浙西乡落，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淹渎，悉为田畴。”^[52]南宋陆游经舒州、蕲州、鄂州等地，连日在沿江的村落停泊，诸如怀家袱、赵屯、纲步、毕家池、东场等，“皆有民居”^[53]。沿河而居，也是出于对水源的依赖。在江南等地，众多的村落名直接与水相关。如宋元之间常熟的村落中，就有山前湖村、塘头、涸江、沙堰、河伯等村名，都与水相关。^[54]此外，以浦、泾、港、渎、堂、澳、荡、陂等水系命名的差不多有1/3，可以想象这些村落与水的关系。即使不临水，与水源也不会相隔太远。

二是村落周边必须有数量适宜的平整土地。唯有如此，聚落才会有人气，乡民才能得以繁衍。即使是在偏僻的山区，村落也

是紧邻耕地。元丰二年（1079年），宋兵在泸南征剿乌蛮，当军队到达江安南面的落始兜村时，发现“乃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其林箐乃在数百里外”[55]。万顷良田才能保证落始兜村的村民生活在大山之中，不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却仍然能够繁衍生息。至于在中原、两广、江南及沿海一带，之所以人烟兴旺，村落众多，更是与当地广袤的耕地息息相关。

宋初，由于人口数量较少，土地众多，在村落选址上可选余地较大，人们往往选择一些地理位置好、自然条件佳、易于开发的地域建村。在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小，少量耕地就能够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因此村落周边环境人为干扰较少。北宋中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村落规模逐步扩大，居住与耕作的压力导致乡民在村庄周边不断建设新的定居点。在村落变迁的过程中，随着村落数量的不断增加，人们对村落自然环境的要求也逐步降低，同时通过垦荒、兴修水利等方式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村域周边环境受人为因素影响明显，主要表现是村落周边耕地类型的多样化。在平整土地被开发殆尽之后，村民们将视野转向山林、河塘等地域。如福建等地，“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蹊确之地，耕耨殆尽”[56]，人地矛盾带来的压力导致大量人口向山区迁徙，“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57]。通过村民自己的努力，因地制宜，开挖出梯田、围田、坡地、桑园地等不同种类的耕地。《正德兰溪县志》中就清楚记载了南宋实施经界法时对田土的各项分类，总计有“水田、平田、山桑、平陆、竹脚、竹筱、屋基、塘、杂木、桐果木、柴山、白地、坟地、茶地、石灰山”等十余类。[58]由于小农个体经营的原因，乡村耕地普遍呈现碎片化的特点，村域周边的耕地被无数的田垄分割，为方便耕作辟出的小径穿插其中，构成了一幅独特的乡村图

景。村落屋舍的布局则受到地形、水源、耕地分布、交通地利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除少部分村落有围墙、壕沟一类防御建筑外，大部分村落建筑都是“泰然散居郊野”[59]。

宋代的村落民居建筑基本上已无实物遗存。对这一时期乡村建筑的风貌，我们只能从一些文学与绘画作品中窥其一斑。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描绘的民居来看，大多数建筑为单体形制，形式简单且体量不大，大部分屋顶为悬山顶，结构为梁柱式。不过，通过丰富的组合排列，可以得到一字型、四合院、工字型、丁字形等多种类型，使得村落民居的布局呈现出多种形式（见插图3）。在宋人的文学作品中，竹篱、茅舍、桃杏、柳竹、鸡鸣、犬吠等都是在描写乡村景象时的常见意象：“数家茅屋自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60]“山崦溪湾三四家，竹篱茅舍暮烟斜。仙村自种田田玉，梅径疑开处处花。”[61]宋初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中，描绘了一处深山中北方村落的图景。在图画下部山脚处，有一处小聚落，靠水岸处，有水榭两间。山脚稍开阔处，数间茅草房矗立，靠前一栋茅草房，屋顶以茅草覆盖。在茅屋对面，是一栋三开间的大屋，屋顶覆以茅草，左侧房屋分两进，入口是一门厅，其后是内堂。靠右侧屋舍分内外两部分。村庄后山丘有寺院（见插图4）。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现了宋代市镇周边村落的风貌。在作品的最右边城市郊区部分，自右往左，六栋村居掩映在丛林之中，构成一个市镇郊区的小村落。在整个小村落中，最右边的部分由三间房屋构成，一间正屋，屋顶盖瓦；正屋左侧为一杂房，顶盖茅草，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家庭的住房单元，房屋周边没有出现竹篱、土墙等相关建筑设施（见插图5）。其余四栋房屋均以茅草盖顶。在村落左侧靠近市镇部分的民居以瓦房为主，且有夯土墙。再结合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有的村落有围墙，有的则没有。

南宋时期的李曾伯指出，两淮地区，“民之复业江北者渐多”，但民户“泰然散居郊野，不复堤防”。^[62]可见，两淮地区的村落中，没有修筑围墙的惯例。宋代福建邵武地区的李吕则在《会族讲礼序》中写道：“今本村上下，东门里外，及邵武磨滩居者，皆三祖之子孙也……本村东门两处，每节各委谨干子弟二名掌其事。”^[63]从这一记载来看，当地的村落是有围墙的。不过，乡村建筑密度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又使得居民希望住宅能与生产场所的联系更为紧密，加之社会稳定持续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长，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带有保护性质的围墙越来越少。纵然一些村落民居周围有围墙，也多是出于美化或者保护隐私的目的而建造的，与坞壁之类的围墙已经完全不同了。

马远的山水小品《柳岸远山图》以及佚名的《水村图》则为我们描绘出南方村落民居建筑的场景。在《柳岸远山图》中，村落居于远山山脚，靠山面水，水榭矗立在水岸边，水榭后，茅舍丛林，若隐若现（见插图6）。在《水村图》中，居于画面左下角的是一座农家小院，在溪岸边，三间茅草房交错而建，周边竹篱围挡，树木掩映。

元代的村落民居建筑，在北方地区尚有少量遗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的村落建筑的宝贵资料。山西省高平市目前已经发现三处保存较好的元代民居。位于陈区镇中庄村的姬氏民居（又称姬氏老宅），左门墩石上刻：“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仲□□□姬宅置□石匠天党郡冯……”可知该民居的建造年代为公元1294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整栋建筑坐北朝南，建于约半米高的沙石岩基座上，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姬氏民居为悬山式屋顶，举折平缓，覆以板瓦。门为装板门，上有门钉五

路六枚。两次间于槛墙上置窗，窗棂为方格形。除前檐四柱露明外，其余全置于墙内。露明柱及柱础皆为砂石质，柱础为素面覆盆式，柱子平面呈抹角方形，抹角处皆作外凸弧形。斗拱仅装于前檐，为四铺作单杪计心造，耍头作麻叶形。无补间铺作，泥道慢拱为隐刻，斗之欹幽十分明显。梁架为彻上露明造，四椽袱前压乳袱用三柱。加工粗糙，使用自然弯材制成，为典型元代手法。该市其他两处元代民居，分别位于陈区镇西窑头、野川镇南杨村，结构大同小异。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北方，普通元代民居建筑通常都是三间，取材为当地常见的石料、泥料或者木料，装饰很少，朴实大方。此外，山西阳城、重庆彭水、广东靖安、浙江东阳等地，也发现了元代民居。今天，那些偏远地区的普通民居建筑，与这些新发现的元代村落民居相比，其形制与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村落民居建筑均以草屋为主，靠近市镇地区以及城市繁华地区，则以瓦房为主。这一点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都能得到证实。如范成大所记归州：“峡路州郡固皆荒凉，未有若归之甚者。满目皆茅茨，惟州宅虽有盖瓦，缘江负山，逼仄无平地。”^[64]诗人的笔下，也多是如此，如郑樵的《过桃花洞田家留饮》：“是处竹篱环草屋，人间鸡黍话桑麻。”赵汝鐸的《田家叹》：“破屋三间结草扉，柴根煨火阖家围。”从当时的文献来看，这不是文人的诗意夸张，是有真实的生活来源的。《宋史·舆服志》载：“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65]南宋人范浚的《铁工问》一文载，绍兴年间，兰溪“有铁之工，家窳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仅灶而床焉”^[66]。从事手工业的铁匠与妻儿三口人，吃住都在同一间房中，其简陋狭小可想而知。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

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5顷为1庄，每庄盖草屋15间，每家给两间。其余5间用于存放粮食。[67]

在部分村落，公共建筑数量也不少，如碾坊、庙宇、宗祠、土地祠等。村落周边，柳树、槐树、桃树等成为村庄绿化的景观树种。在靠近交通要道的村落，临马路边会有一些道店，也会有一些村民临时摆摊售卖一些农产品，北宋中期的苏轼对此做了生动记录：“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68]

在宋元文人的笔下，村落的民居建筑简朴雅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不仅可以安顿一家老小的衣食生计，还以安顿个体的灵魂。正如宋代词人毛开《满江红》所写：“回首吾庐，思归去，石溪樵谷。临玩有，门前流水，乱松疏竹。幽草春余荒井迳，鸣禽自在窥墙屋。但等闲，凭几看南山，云相逐。”

[1]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3]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4] 《苏东坡全集》卷四十五《御试制科策》，四库全书本。

[5] 《苏东坡全集》卷七十四《与朱鄂州书》，四库全书本。

[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七》，四库全书本。

[7] 杨时：《龟山集》卷十七《寄俞仲宽别纸其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庄绰：《鸡肋编》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10] 《元朝秘史》卷十三，注九引文，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72页。

[11]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12]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13] 《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

[14]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268页。

[15]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八《又劝农文》，四库全书本。

[16] 漆侠：《漆侠全集》第三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17] 王柏：《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四库全书本。

[18] 曾丰：《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干解任谪铨改秩序》，四库全书本。

[19] 薛季宣：《浪语集》卷一六《奉使淮西回上殿札子》，四库全书本。

[20] 庄绰：《鸡肋编》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漆侠：《漆侠全集》第三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2] 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23] 孟昭华：《元清户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24] 《元史》卷十三《世祖第十》。

[25] 《元史》卷十五《世祖第十二》。

[26]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二》。

[27] 傅俊：《南宋的村落世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3页。

[28]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傅增湘校定清道光刻本。

[29] 乾隆《江津县志》卷九《风俗志·礼俗》。

[30]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列传四》。

[31] 《宋会要》蕃夷五之二五。

[32] 吕南公：《灌园集》卷一四《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3]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1—292页。
- [34] 漆侠：《漆侠全集》第三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 [3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甲子条。
- [36] 岳柯：《鄂国金佗稗编续校注》卷二六《鼎泮逸民叙述杨么事迹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6页。
- [37]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65页。
- [38]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瑞安县重建厅事记》，第162页。
- [39] 漆侠：《漆侠全集》第四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4页。
- [40]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 [41] 傅俊：《南宋的村落世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5页。
- [42] 傅俊：《南宋的村落世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8页。
- [43] 方回：《古今考·续古今考》卷一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四库全书本。
-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畿县保甲条制》。
-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条。
- [46] 《元史》卷二十三。
- [47] 《元史》卷二十一。
- [48] 《元典章》卷二十四《户部十》。
- [49]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
- [50] 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页。
- [51]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风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 [52] 《宋会要》食货八之一六。
- [53]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81—289页。

[54] 《琴川志》卷二《乡都》。

[55] 《宋会要》蕃夷五之二九。

[56]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福建路》。

[57] 李纲著，傅增湘校定：《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341页。

[58] 《正德兰溪县志》卷一引南宋兰溪经界田土地目。

[59] 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八《荆阆回奏四事》，四库全书本。

[60] 《剑南诗稿》卷三三《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李纲著，傅增湘校定：《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宋集珍本丛刊第36册，第341页。

[62] 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八，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初钞本，第84册，第353页。

[63] 李吕：《澹轩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236—237页。

[64]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四库全书本。

[65] 《宋史·志第一百七·舆服六》。

[66] 范浚：《松溪集》，《四库全书》影印本。

[67]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三》。

[68] 苏轼著，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第五节

辽、金、西夏的村落

一、契丹入侵与辽国的村落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北魏时期，契丹人在今中国东北地区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分为8个部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松漠都督府管理。唐末，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契丹逐步独立。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耶律阿保机被推选为新可汗，天祐四年（907年）正月继位。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二月，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天赞五年（926年）七月，耶律阿保机病逝，耶律德光继承帝位。天显十一年（936年）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降辽，并将燕云十六州割送契丹。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年号大同。自建国之日起，辽与北宋就中原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就从未停止。

保宁十一年（979年）正月，宋出兵进攻北汉，辽遣使臣干预，而宋朝回复“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1]。随即辽军南下，两国战争爆发，至次年10月，辽景宗亲征，于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再次亲征，宋辽再次爆发战争，同年九月，景宗病逝，辽国由承天太后摄政。统和四年（986年）正月，大臣上书宋太宗，“且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2]，于是宋太宗决定伐辽，攻取燕云之地，两国爆发大战。五月，辽将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军

于岐沟关。统和六年（988年）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军攻宋，攻掠数州县后北返。此后，两国边境虽时有侵扰，但大体平和。

统和十六年（998年），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去世，辽对宋的政策由防守改为攻扰。统和十七年（999年）七月，辽军攻宋，两军对峙于遂城。辽军于统和十九年（1001年）十月、二十年（1002年）春、二十一年（1003年）四月等，多次南下攻宋。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九月，辽承天太后亲征，率军南下，辽宋大战再次爆发。当年十一月，两军对峙于澶州，十二月，两国议和，以宋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于辽，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等条件订立盟约，史称“澶渊之盟”，开启了两国长达百余年和平相处的格局。

在早期，辽国主要由游牧民族构成。但随着不断的征伐扩张，尤其是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并入辽国领土，其区域经济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三大区域：在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居民主要以汉民为主，农耕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在长城以北辽河流域的农牧交错带，农耕生产与游牧文明交错。在辽河流域牧区、西部草原牧区，主要以游牧生产为主。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乡村聚落构成形式。

在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与此相适应，这一地区的乡村聚落主要以定居式的自然聚落形态为主，在这一地区出土的辽人墓志中，对此多有记录。^[3]在管理体制上，这一区域的乡村基层组织延续隋唐五代“乡里制”的管理体制，在乡一级设“乡正”，^[4]主掌一乡事务；乡正之下，设“里正”，辅佐乡正执行基层管理。燕云地区的乡村基层，除了乡里制下的自然村落外，还有一些独立于地方机构、专门服务于中央机构的庄园组织，如专门为贵族供应板栗的“栗园庄”。《辽史》记载“栗园庄”归属于“南京栗园司”直接管辖，其主管官员称“典

南京栗园”。[5]

在长城以北地区，由于汉人、奚人、渤海人、契丹人等多民族混杂居住，在经济形态上呈现出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融合的状态。即便是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辽中京周围等农业集中开发的区域，农田与牧场也时常交错存在，因此，在广袤的大地上就出现了农耕的定居村落与游牧的移动毡帐错落分布的景象。北宋使臣宋綬在其《契丹风俗》中有如下记录，可资佐证：“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欲至木叶三十里许，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6]由于土地广袤而人口较少，彼时的辽国乡村“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才见两三家”[7]，其“乡里”管理制度并不健全。

在辽国的行政体制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斡鲁朵”制度。“斡鲁朵”在契丹语中是“行宫”之意。《辽史·营卫志上》云：“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8]辽太祖创设的“斡鲁朵法”，就是通过“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的方法，将原隶属于国家的人口划给斡鲁朵，同时将亲军、俘降人口以及部分自愿附宫籍者拨入斡鲁朵。这样就使得划归斡鲁朵的人户（即宫分户）在其周围构成了一个新的游牧集团，担当起迭剌部曾担当过的职任。平时耕田渔猎，战争时充当士兵。成为辽国新兴的防卫、战斗兼生产的力量。

各斡鲁朵有自己专属的行政州县，这些州县中从事农耕的村落多以“庄”“寨”“堡”“务”等名称出现，在管理上，这些乡村聚落完全呈现出一种自然聚居的状态，极少以乡里制度管理[9]，辽河地区的斡鲁朵也不例外。

与农耕地区实施的“乡里制”的管理体制不同，在斡鲁朵游牧

部族以及从事畜牧生产的契丹人中，主要以“石烈”之下的“族帐”制度实施管理。“石烈”相当于农耕地区的县级机构，“石烈”之下，设“弥里”，也称“抹里”。《辽史·国语解》对“弥里”的内涵做出解释：“弥里，乡之小者。”各“弥里”之间，有一定间距，在需要迁移草场时，整个部落或者斡鲁朵共同起营迁徙。“石烈”之下除“弥里”外，还有“瓦里”、“得里”等组织。“瓦里”主掌奴隶役使工作，“瓦里：官府名，宫帐、部族皆设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于此”[10]。在“弥里”之下，有“阑撒”组织，主掌“宫卫之禁”[11]。

在辽代，因应与北宋使节之间联系的需要，在驿道上还产生了固定的“驿馆”聚落与移动的“驿帐”聚落。北宋路振《乘轺录》中记述道：“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近岁已来，中路又添顿馆……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以营养焉。国信所至，则蕃官具刍秣，汉官排置顿，大阉执挾案，舍利劝酒食……”[12]

二、女真内迁与金国的村落

女真源于肃慎人。在隋唐时期，被称为靺鞨。唐代，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五代时期，被契丹所灭。此后，女真是作为部族存在的。辽圣宗时，依据女真部族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他们与辽政权之间关系的亲疏，将之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辽将部分熟女真迁入辽阳以东，编入户籍，承担赋役。生女真总数约十余万人，以部族形式散居在黑龙江与长白山一带，部族之间彼此独立，小部族千余户，大部族有数千户，以狩猎与渔猎为主，臣服于辽，定期纳贡。

发展至辽代中期，生女真内部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

其中尤以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辽代后期，完颜阿骨打成为生女真部落联盟的首领——都勃极烈。随着部落实力的不断增强，生女真与辽政权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率女真各部2 500余人攻取宁江州，大败辽军。同年十一月，进击出河店辽军，获车马、粮秣无数。天庆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政权，“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13]。此后，随着不断的征战，金国逐步控制了包括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河北、山西等燕云十六州以及东北与漠南地区等广大的疆域。随着疆域的扩大，为加强对中原乡村基层的掌控，维护政权统治，金朝开始组织女真族大规模内迁。

女真建国之前，以部落为基础。“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孃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14]在立国之后，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开始建立猛安谋克^[15]制度，“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16]。《金史》又载：“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17]从其既要“训练武艺”，又要“劝课农桑”可知，作为金政权的基层管理组织，猛安谋克具有军事与生产的双重职能。

金军南下后，随着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华北地区后，面对中原汉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金朝对乡村的统治出现困难，为加强统治，巩固政权，金政权开始大规模内迁女真人入

主中原地区，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起女真国士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士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18]。内迁的女真人主要以猛安谋克户为主。自天会十一年秋大规模移民开始后，金政府数次组织猛安谋克南迁。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废掉刘豫伪齐傀儡政权后，金政府“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田军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19]。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勛、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20]。在此次南迁中，除了早期的底层民众，大量宗室贵族也随同迁徙，并随族人的流动而分布于山东、河间和中都等地。

以猛安谋克组织迁移中原的女真部族，为了达到控制中原的目的，其主要移居之地为中原广阔的乡村地区。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又以屯田军的形式驻扎乡里，“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21]。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十二月”条记录，当时猛安谋克组织的迁徙地域遍布中原地区，“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22]。亦军亦民的猛安谋克组织在大量迁徙到中原乡村后，通过屯田军的形式，实现对中原地区乡村的掌控，遇有农民起义，就近实施镇压。如海陵王时期，“遣引进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监视所获盗贼，并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户谋克

等，后有获者，并处死，总管府官亦决罚”[23]。而居于地方的猛安谋克组织也很好地巩固了金政权的统治，如“正隆末，山东盗起，胡刺为行军猛安讨贼，遇贼千五百人于徐州南，败之”[24]。

作为具有军事属性的组织，猛安谋克的管理一直受到金政权的重视。在金太宗早期，猛安谋克受都统司和军帅司管辖。南迁以后，随着政府制度的变动，改为总管府和节度使管辖，而在宋、夏边境地区，部分猛安谋克组织又受统军司与招讨司管辖；章宗时期新设提刑司后，对猛安谋克又有监督之权，明昌六年（1195年），“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罚之”[25]。承安四年（1199年），提刑司改为按察司，其监管职能也被按察司取代，“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抚司使……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26]。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十二月，“罢行总管府及招讨统军检察等司”[27]，猛安谋克户被划归地方州县管辖。

以统治民族身份出现的女真族的内迁，对中原地区乡村社会产生巨大冲击。首先是与汉族村民争夺土地。当时的官员李石对此记录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28]其次是部分猛安谋克组织骄横不法，对当地汉民多有骚扰。世宗大定年间，内迁部族骚扰汉民的现象就已经出现，“诸路猛安谋克，怙其世袭多扰民”[29]。但是，女真等少数民族与中原百姓交错杂居，也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随着猛安谋克的内迁，大量北方部族以部落聚居方式散布在中原腹地乡野之中，“今屯田之处，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30]。长期的民族杂处，对女真族的生产生活也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在生活习俗方面，迅速汉化。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金政府下诏“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

姓”[31]。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金朝廷再次下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32]从金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可知，当时改汉姓、穿汉服在猛安谋克组织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内迁的女真部族与中原汉地民族广泛通婚，逐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民族差别，减少了民族隔阂，对北方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党项割据与西夏的村落

党项属西羌的一支，又称党项羌，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史·党项传》。早期，党项内部部族众多，“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各部之间也互不统属，平时“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33]。此后，以拓跋氏为核心，逐步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唐末，党项平夏部由于助唐军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李姓，封夏国公并权知定难军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其实力逐步壮大。

宋初，夏州党项遣使于宋，与宋交好二十余年。1002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在攻克灵州后，将其改名为西平府，并建造宗庙，设置官府，组建军队，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势力。1031年，元昊继位后，大力实施改革。如创制西夏文字，整顿军队，改革风俗，等等。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定都兴庆府。由于其地处西北，故此宋、辽等也称之为西夏。西夏建国后，其实力达到鼎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全面繁盛，成为与宋、辽鼎足而立的割据政权，其统治疆域广阔，“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34]。

在早期，党项族的基层组织形式主要以部族为主。《旧唐书

·党项羌传》载：“（党项）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各部族的头目称为首领。早期，党项社会的经济主要以畜牧为主，“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35]。西夏时期，随着党项内迁，部分族人逐步学会了农耕，其经济形态已经由早期部落时代的畜牧业逐步转变为农业与畜牧业并重的格局。游牧与农业交织，构成西夏经济的基础，手工业与其他行业成为补充。与经济结构相对应，其村落形态也发展为游牧部落、定居村落等多种形态。

党项内迁后，与各民族交流日益增多。在西夏地域生活的民族众多，除了居于主体的党项族外，还有汉族、吐蕃、回鹘、契丹、女真、沙陀等少数民族，各族交错杂居，相互影响。在基层组织管理上，有些地区完全仿效汉地乡里制进行管理。如在武威小西沟岷出土的西夏文书中，就出现了关于乡的记录：“依中□各乡以属行遣。”[36]而在敦煌的一些文书中，则出现了关于社户的记载，如莫高窟第363西夏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社户王定进□□一心供□”、“社户安存遂永充一心供□”。[37]无论是乡还是社，都是典型的汉地乡里制管理模式。

此外，在西夏乡村，还存在着一种“迁溜制”的管理模式。在《天盛律令·纳领谷派遣计量小监门》中就规定：“各租户家主由管事者以就近结合，十户遣一小甲，五小甲遣一小监等胜任人，二小监遣一农迁溜，当于附近下臣、官吏、独诱、正军、辅主之胜任、空闲者中遣之。”[38]其十户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小监、两小监为一迁溜的规定与宋代熙宁保甲法中十户为一保、五保为

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的规定非常类似，且《天盛律令》在熙宁保甲法实施之后编撰，迁溜制明显受保甲法影响。此外，迁溜制也保留了西夏党项部族的传统制度。北宋田况曾上奏称：“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肃整如此。”^[39]从中可以看出，“溜”实际是西夏部族军队的组织形式，其后逐步迁移到基层乡村与部落管理中，通过与保甲制度的结合，形成了极具西夏特色的乡村基层管理制度。

[1] 《辽史》卷九《景宗纪》下。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条。

[3] 参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5]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6] 宋绶：《契丹风俗》，载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26页。

[7]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过新馆罕见居人》，四库全书本。

[8] 《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宫卫》。

[9] 张国庆：《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0]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

[11]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

[12] 路振：《乘轺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13] 《金史》卷二《太祖纪》。

[14] 《金史》卷四四《兵制》。

[15] 猛安谋克为金代女真族的社会和军事组织单位。——编者注

[16] 《金史》卷四四《兵制》。

[17]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三》。

[18]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之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

[19]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9页。

[20] 《金史》卷四四《兵制》。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二月条。

[2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二月条。

[23] 《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24] 《金史》卷八六《夹谷胡刺传》。

[25] 《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26] 《金史》卷五十七《百官三》。

[27] 《金史》卷一六《宣宗纪下》。

[28] 《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29] 《金史》卷七十《宗宪传》。

[30]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0页。

[31]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32]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33] 《北史》卷九六《党项传》。

[34]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

[35]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36]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考古》1974年第3期。

[3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38] 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页。

[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第七章

文明的繁盛 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建立政权，立国号为大明，史称明朝。随后朱元璋率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北京），元帝北逃，退居漠北，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全面结束。元明易祚的几百年后，1644年，兴起于东北的大清政权，击败大顺军，进占北京，入主中原，史称清朝。王朝更迭，王权的合法性地位往往遭遇挑战，因此政权的合理性和绝对性就被反复强调。要巩固政权统治，维系国家稳定，统治者必须对庞大疆域，特别是对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要尽可能实施有效控制。因为归根结底，王朝的统治根基还是在于对统驭范围内人丁和土地的牢固掌控。而人丁和土地，绝大多数又广泛分布于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所以，包括村落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自然就成为王朝更迭之后，被重点管控和治理的地方。

也正因如此，基于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明清统治者必须从多个角度、在多重层次上设计出多种制度和政策，以实现对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治理。在乡村地区，明清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存续数百年的行政管控体系。其中包括人丁、田产、赋税、商贸、文化、伦理教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中央政权对乡村治理的细化与改进，一方面加大了中央王朝对乡村的有效力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推进了村落共同体的形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村落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最后的光亮。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乡村发展相对趋于平稳，直到清末，由于清政权各层级的全面腐化，国家在应对战争、起义等危机时，已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整个本土经济和社会结构被严重破坏，村落共同体也分崩离析，近乎解体。

第一节

明清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

一、从都保制到里甲制

明初，北方地区大多承袭元代的里社制。《明史》载，“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1]；在南方，乡村的建制依然维持着宋代的都保制。北宋熙宁变法之后，乡村逐渐形成了都保结构的区划建制模式。都保依人户划分，具有地方自治和保防的职能，形成了“乡—都—保”、“乡—都（里）”等乡村层级模式^[2]。尽管都保的称呼、户数编排等具体规定在时空上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乡村区划形态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比如福建长乐县“宋设四乡，领三十二里，元为三十六都”^[3]。但要指出的是，此时“都保”的名称含义，已发生变化，转化为非实体性的基层组织单位，更多是地理性的区域称谓，主要用以表示人户籍贯、田土经量和地理区域的划分。

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里甲制正式确立，明确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4]。此后，随着里甲制的推行，“里”在乡村基层建制中被广泛使用，并承担着户口登记、赋役管理的职能。由各里编造的人丁与丁粮数额的册

本，遵从“县—府—布政司—户部”的行政等级，逐层汇总递交，再由户部拨出7人勘误查核，最终进呈给皇帝查看。

按规定，黄册“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5]。所以，在推行里甲制近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重申必须严格根据地域区划造册，“务不出本都”，“不许变乱版籍”。并设立职业册籍，按民户、军户、乐户、灶户、驿户、医户、卜户、工户等分别登载，进一步将社会分工凝固化、世袭化。除纳税服役的成丁之外，不“任役”的“畸零户”需带管于110户的“里”之外，列于图后。“鰥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6]无论是按职分籍造册，还是编排畸零户附甲，都是为了强化朝廷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通过里甲制的不断细化，朝廷将人民的交往活动限制在清晰的行政地理区划之中，以防止农业生产人口流向非农业生产部门，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与赋役来源，实现国家政权稳定。

明中叶以后，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的黄册空成具文。里甲便根据需要，将征税、编徭合为一册，名为“白册”，主要记载丁、役、田、租等信息。百姓自出生起被编入籍，长至十六岁即为成丁，需服里甲、均徭、杂泛三役，直到六十岁方可免役。其中，甲役以户计，徭役以丁计，杂役为听从上命不定时的差役，均由里调配派遣。除服劳役外，百姓可输钱于官，募人以代役，称为雇役。不仅如此，百姓还需在规定时间内缴付夏税、秋粮。

百姓缴纳田赋、从事无偿劳役，是朝廷通过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由里长的直接监管实现的。换言之，即作为“职役优免者”[7]，里长在享受职权带来的利益同时，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保证完成国家财政的税粮数额、徭役的执行供应以及对

生产的检查督促。如若“致有脱产者”，里长便会受到制裁，“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里甲内如有农户逃亡，仍征税粮，由里甲赔纳；征税不如额，也由里长单独包赔或所有甲首摊赔；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的田地，如果有无故荒芜或应保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通过连带赔纳的办法下行到里甲层级，使得部分里长甲首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

此外，南方部分地区仍根据“都”的层级范围进行编册，如当时福建的永春县、永福县、闽清县都属此类。^[8]在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留存的大量造像记中，可以见到许多“大清国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乡第某某都”的描述。文献也保留有“保”“区”“社”“团”“曹”“管”等为地域单位名称的表述。如福建邵武府“因丘陵麓原隰条细分为厢隅、为都保”^[9]。泉州府惠安县“境纵九十里，衡（横）八十里，分为三十都。虽各广轮不同，每都较以二十四里，纵衡（横）为额，画为二十四方”^[10]。

与此同时，“都正”“隅正”“图正”等职役人员在乡村组织中承担着实体性的作用。如徽州府休宁县“邑二百有十里，里为图，图有正，则以驯谨者一人职之。小事从隅、都质成，大事专达。郭以内，合一里而各为隅，隅有四。其外合二百里而各为都，都三十有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则稽于众而决其成，大事专达”^[11]。这段文献表明，“里”与“图”为同一等级单位，共有210里，由“图正”管理。又将210里划分为33都，由“都正”治理。而郭以内有4隅，由“隅正”管辖。由此可见，休宁县的行政等级为“隅—都—图（里）”，行政管理人员层级为“隅正—都正—图正”，呈现出渐次远离地方行政中心的态势。不过，关于“都”的记载，主要见于明中后期的土地清丈运动之中，此时黄册、白册中的都图、都保虽在形式上对宋元时期的都保有所继

承，但已然是两种不同的地方建置。

不管怎么说，以上这些都说明在明代中叶以前，朝廷是希望对乡村社会实施精准有效的管控和治理的。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明代，国家在事实上将国家权力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下沉到了包括村落在内的民间社会。

表7-1 明朝天下户口统计

时间	户数	人口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10 652 870	60 545 812
弘治四年（1491 年）	9 113 446	53 281 158
万历六年（1578 年）	10 621 436	60 692 856

资料来源：据《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数据重新制表。

然而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对民间社会的管控流于形式，这从人丁、田赋等相较于明初不增反降的事实中即可见一斑。表7-1显示，明初，全国登记在册的共有10 652 870户、60 545 812口，其后承平日久，反而不及明太祖时期。永乐、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户口数量反复增减，田赋多无准数。户口的减少自然会引起朝廷的关注，因为户口的减少势必影响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嘉靖八年（1529 年），霍韬奉命修会典时就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12]其实，户口逃逸在明代前期就时有发生，周忱指出，当时不少编民“投倚於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13]。

显然逃户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办法来限制逃户的出现，或者将逃户重新纳入国家行政管控的视野。一方面，明代对逃户和流民的态度较为温和，鼓励逃户在地方管控下继续开垦纳税，正如《明史》所载，“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14]。“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15]，明英宗诏令勘察流民原籍，确认为良民并能互相作保者，将其编甲，统属里长管辖。免流民复业者税，并鼓励流民归本，给予一定的复垦补贴。但到成化初年，因明宪帝任用项忠、杨璇逐流民戍边，百万流民因之死亡者无可计数。其中不乏有能力赋役的成丁，对国家来说，这些流民的死亡无疑是极大损失。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自此之后，国家对流民的态度重新回归温和，近者许附籍，远者、多者设州县以抚之。[16]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保障、丧葬、养老等民生方面，行慈善事，以安其民，主要表现为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每月给以粮食；设漏泽园葬贫民；令天下府州县立义冢；行养老之政，给80岁以上的老者赐予爵位；诏优恤遭难兵民。

除逃户和流民以外，明朝建立伊始，富民阶层大多存在着隐没田地、人口，以逃避国家赋役的情况，小农、佃农依附士绅、富户，亦是如此。富户尤其是浙江富户，在明朝及各级官吏眼中是“畏避徭役”的，“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17]。从一定程度来看，这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资本的、不稳定的阶层，是阻碍里甲制推行的不利因素，也是前朝及民间反抗势力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明朝廷为了管控地方富户，通常将其集中至皇权中心的城市边缘。如明太祖即位时，

便仿汉代徙富民以充实关中之制，命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14 300余户徙其家以实京师。明成祖时，又选应天、浙江富民3 000户，充实北京的宛、大两个县的行政区域，之后不断选本籍殷实户予以充补。对这些迁徙的富民，朝廷严格管控。不过，明朝廷一般通过任用“丁粮多者”之户为里长，实行连带赔纳的办法，以富民来管束富民。但是，这一做法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富民虽附籍京师，但仍应本籍徭役，其徭役压力并没有因为供给了银钱而减少，因而引起了一些富民的反抗。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明确了每户富民征银数额，与厢民助役，才得以取消本籍徭役。同时，由于国家对富民的剥削使其日益贫乏，导致富民仍时有逃窜。虽然宣德年间，明朝廷针对逃窜富户制定了惩罚措施，并且相较于一般逃户而言更为严厉，试图以高压政策阻止富户逃离，如“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18]。尽管如此，但由于事久弊深，富户逃离现象仍层出不穷。

如果说黄册是明代掌握户籍的政策手段，那么鱼鳞图册则是明代国家控制田土的管理办法。作为里甲制的配套政策之一，鱼鳞图册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开始制定与实施。史载，明太祖遣周铸等164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19]，又因中原田多荒芜，因此“计民授田”，在河南设司农司。可以说，明代鱼鳞图册的性质就是土地登记册。它与编制户口的黄册一起，确保了明代国家的赋税收入，对巩固明代国家的经济基础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某一层面可以说，鱼鳞图册的编制主要还是针对包括地方士绅、富民在内的地主集团，既防止富户逃避国家赋役，也防止底民众姓依附富户逃避赋税。不过，在南方许多地区，以经界法辑之鱼鳞图册与户编之黄册并行的经册、纬册系统，有时也引起了乡村基层建置的复杂甚至混乱的局面。史载，嘉靖八年（1529年），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上疏奏请核实田亩，顾鼎臣奏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而起。尽管江西安福、河南裕州、福建诸县等地陆续清丈，然而由于制度性缺陷，法未详具、人多疑惮，有异心者仍有机可乘等，以致无法尽善。也正因如此，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实施“一条鞭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20]

表7-2 黄册、鱼鳞图册对比

册别	黄册	鱼鳞图册
功能	赋役之法定	土田之讼质
类别	以户为主	以土田为主
内容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	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

资料来源：据《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数据重新制表。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明代国家征收的各种赋税，以及按丁征派的劳役，全都归为一条，按照田地亩数来征收，并且一概征收银两。《明史·食货志·赋役》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

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21]“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与实施对乡村社会而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通过简化赋税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有效防止了地方官吏与富户豪强的合伙作弊，大大减少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盘剥和勒索。同时，将赋税与徭役合并征收，并部分“摊丁入亩”，改变了历代以来将两者分开征收的方式，这不仅使富户地主难以逃避赋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毕竟在明代，田地多掌握在富户地主之手，而户丁大多数是普通民众。

在具体执行中，地方官吏根据鱼鳞图册信息，将注明了纳粮数额的由帖分发给民户，民户据此纳粮当差。每逢收纳时，民户便前往县衙，将写明了缴纳者姓名、所在里甲、缴纳数目及日期的包封投入专门置备的柜中，并领取由票以作凭证。投柜过程需由管柜官吏和粮长共同监察，各柜登记簿和由票上也需注明缴纳者信息，以备查核。显然，这种“柜银制”在简化民户征收手续的同时，也逐渐解除了里长、甲首催征赋役的职责，从而使里甲与徭役完全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里胥“勾摄公事，催征钱粮”时，凭势作威、好诡之谋、贿赂之术，甲首作弊以欺府县的行径。

客观地说，这种方式既将明代国家的权力进一步下沉到了乡村社会，国家掌握了某种程度的主导权，也缓解了民户的负担，但是，在实际运行之中，却因执行条件的先天性缺陷，又滋生了新问题。一方面，由于部分村民没有时间和精力经常往返县衙缴纳，只能将缴纳赋税之事交由地方家族或粮长统管，换言之，村民仍需求助于当地的族长、里长、甲首或者粮长来实现赋税的缴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行实际上被乡村社会部分瓦解了。另一方面，田赋和力役折银征收，村民必须以更

多的粮食和产品换取银两，缴纳赋税，而白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不仅紧缺，又通常掌握在当地的富户之手，因而村民仍是被盘剥和勒索的对象，实际负担并没有减轻，以至于明人李开先说“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刀刀也”[22]。

二、保甲与里甲的并行

保甲制度，早在北宋就已形成。史载，北宋熙宁初，王安石变法，改募兵而行保甲，“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之为副。……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23]。这是首次在乡村地区设立集侦察和举报犯罪为唯一职能的组织，类似现在的警察局。伴随着奖惩晋升以及联保连坐法的实行，保甲制在当时很快便推行到全国，成为辅助性的军事体系和永久性的由国家控制的地方武装机器，最终成为明清保甲体系建立的基础。

明成化四年（1468年），云南道御史戴用上疏，倡议以保甲法加强京师治安。成化十二年（1476年），总督漕运右副都御史李裕等言，在流民时常出没的荆襄上流之地，设立保甲。弘治初，明孝宗批准兵部的上疏，意图在全国进一步严格贯彻保甲法。到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十五年（1520年），王守仁在南赣讨平盗匪和农民起义军，建立了一种与保甲法相似的“十家牌法”，其目的是“止息盗贼”。“凡立十家牌，专为止息盗贼。若使每甲各自纠察甲内之人，不得容留贼盗。……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

罪。”^[24]十家牌法规定每户的成员名字需按实登录在小牌上，并挂在各家门面。官府会对这些小牌的信息进行审查，包括如人丁数量、职业、房系、健康情况、户籍、田粮等项，以及是否为官员、生员，或当某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生赘，是否残疾，等等。每十家为一牌，每户轮流负责记录，并照式造册一本留县，以备日后查考。十家牌法为侦查罪犯设计，强调甲内自治、联结。如遇勾摄及差调等任何失职，由10户集体负责，按册处分，“更无闪躲脱漏”。此外，保长作为地方官府代理人，其主要作用在于整合地方力量以对付偷盗，实现息盗贼、简词讼，维持乡村社会稳定。

明代中后期，黄册的编审虽在形式上仍按十年一期执行，但由于人户流徙日益频繁，用于统计户口的版籍制度被严重破坏，里甲制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保甲作为补充里甲制的基层组织，在限制民众离乡、钳制职业选择、征发徭役赋税、固化社会阶层等的基础上，增加了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明末保甲和里甲双轨并存，清朝建立后仍沿袭明朝的乡里制度和形态。

顺治元年（1644年），百户危列宿上言，建议对天津到海避乱的11 000余户百姓进行扶绥。兵部侍郎金之俊亦请谕各镇道臣招徕土寇，令州县将率众归顺者编置牌甲。^[25]如上被朝廷采用，并进一步规定，“凡保甲之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以便稽察”^[26]。通过保甲制，十甲连保以履行监视、侦查、汇报地区可能发现的任何犯罪或犯人的治安手段，全面提升和大大增强了处在政权更迭期的清王朝对整个基层社会的有效管控与治理能力。

但是，里甲制度并没有因此猝然消失。毕竟，受制于信息传

播闭塞、官府运作体系有限等因素，一种长期运行于基层社会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便因王朝更迭后的新政、新制而全部改变的。史载，顺治四年（1648年）诏天下编审人丁。顺治五年（1649年）改为三年编审一次，其管理和规定与明朝并无甚差别。“责成州县印官，察照旧例造册，以百有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在乡曰里，各有长。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27]可见，此时里甲与保甲并行。虽然两者计算和登记特定地区户口数的功能重叠，但里甲制实质上是为了确定和保障应收的赋税数额，而保甲制的目的是为了管控不法人员，因此，两者的职责有明显差别。

表7-3 保甲、里甲的构成

保甲构成	里甲构成
10 户 =1 牌	10 户 =1 甲
10 牌 (100 户) =1 甲	110 户 =1 里
10 甲 (1000 户) =1 保	—

资料来源：据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中数据重新制表。

随着政治经济的平稳运行，清代人口持续增长。通过进一步调整和试验，朝廷将各省课银（税金）多寡以及各州县课银多寡，以贫富差别划分，“恐有漏户避差之弊”。同时，根据职业差别，人丁课银数量也各有不同，民丁之外，别有军丁、屯丁、灶丁、站丁、土丁、渔户、寄庄丁、寄粮丁。这种基于人丁的丁税法，沿自明末的“一条鞭法”。正如《清朝文献通考》所载：“至直省丁徭多寡不等，率沿明代之旧，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

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28]但是，由于这种赋役改革并不彻底，故使得部分地区存在按丁、按地各自征银的混乱情况。地方士绅与里甲联合操纵户口编审，将丁银的大量负担转嫁和摊派给一般农民，以致丁银征派贫富倒置，进而引发不少农民迫于生计纷纷外逃。逃户的出现，就势必会使一些原本被纳入国家行政区划之中的自然村落遭到废弃，进而导致里甲编审渐趋偏离实际情况。

这种现象显然是朝廷所不愿意看到也不能容忍的。所以，清朝廷一方面为了遏制此类情况继续恶化，进一步下沉国家权力，将地方代理人和基层组织全部划归知县统管，从而试图将包括村落在内的地方社会置于国家的直接管控和监督之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税额如数足额征缴，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实行以现丁包赔逃亡的举措。然而，这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逃户”问题，反而在客观上，导致安于垦耕的“良民”大为不满，怨声四起，不仅激化了社会阶层矛盾，也使得国库征收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混乱局面。《清朝文献通考》中就指出，当时“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29]。这种情况，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出台“固定丁银”的政策，使丁银征数稳定之后，才得以改变。所谓“固定丁银”即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丁册的人丁数为额，并且“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正是康熙王朝的“固定丁银”，为雍正王朝的“摊丁入亩”创造了条件。

表7-4 清前期人丁数量统计

省份	顺治十八年 (1661年)人丁数	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人丁数	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数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人丁数	雍正二年(1724年)人丁数
总计	21 068 609	23 411 448	24 621 334	27 355 462 (内滋生人丁不加赋者467 850)	25 284 818
直隶	2 857 692	3 196 866	—	—	3 248 710
奉天	5 557	26 227	—	—	42 210
江南布政司(康熙二十四年后改为江南江苏布政司)	3 453 524	2 657 750	—	—	2 673 208
山西布政司	1 527 632	1 649 666	—	—	1 768 657
山东布政司	1 759 737	2 100 973	—	—	2 278 305
河南布政司	918 060	1 432 376	—	—	2 049 417
陕西布政司	2 401 364	2 241 714	—	—	2 164 656
浙江布政司	2 720 091	2 750 175	—	—	2 758 713
江西布政司	1 945 586	2 126 407	—	—	2 172 587
湖广布政司(康熙二十四年后为湖北布政司)	759 604	443 040	—	—	453 007
湖南布政司	—	303 812	—	—	341 300

省份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人丁数	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 人丁数	康熙五十年 (1711年) 人丁数	康熙六十年 (1721年) 人丁数	雍正二年 (1724年) 人丁数
四川布政司	16 096	18 509	—	—	409 311
福建布政司	1 455 808	1 395 102	—	—	1 429 203
广东布政司	1 000 715	1 109 400	—	—	1 307 866
广西布政司	115 722	179 454	—	—	202 711
云南布政司	117 582	158 557	—	—	145 240
贵州布政司	13 839	13 697	—	—	21 388
安徽布政司	—	1 314 431	—	—	1 357 573
巩昌布政司	—	273 292	—	—	302 763
顺天府	—	—	—	—	158 133

资料来源：据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中数据重新制表。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固定丁银”“永不加赋”的政策保障下，各省民谷细数，都要经督抚于年底专折向朝廷奏报，所以，里甲五年一次的编审，实际上已成了无时效性的虚文。到雍正元年（1723年），各省便陆续将丁粮摊入地粮内征收，被称为“摊丁入亩”。但是，当时各省、州、县的田、土作摊法不同，分别定例，按照户部议行，随地起征。“摊丁入亩”的实行，使得全国范围内以“保甲”取代“里甲”的条件完全成熟。《清史稿》载，雍正四年（1726年），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称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编丁与课银无关，只会徒滋百姓烦扰。况且里甲编审之意在于清查户口，而不如保甲既能详密户口，又能稽察游民，故里甲已无存在价值[30]。至乾隆五年（1740年），户部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还明确规

定区别对待：“番疆、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朝廷同意李瀚之请，永远停用里甲编审，唯有运漕军丁四年一编审而已。由此来看，里甲在清代中期逐渐被取消了。

在逐步取消里甲的过程中，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由皇帝批准，户部议定的保甲条例正式颁行全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定为保甲法，并调整和细化了14条户籍编列。这一改变，主要围绕不同职业、少数民族、弱势及边缘人群等社会群体展开，鼓励百姓互相联保、举报，并强调地方官吏的执法权威。大体来看，可总结为七点[31]。

其一，规定顺天府（今北京）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村庄的保甲规制及职责，根据“牌长—甲长—保长”的管理层级，将每户组织起来，确定选拔标准和工作年限，主要行使治安纠察的功能。史载，当时“每户岁给门牌，十户为牌，奇零散处通融编列，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三年更代。十甲为保，立保长，一年更代。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踩曲，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责令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换填给。”[32]

其二，规定绅衿、旗人与民人一体编列。在旗民杂处村中将旗分户名，所隶领催屯目注明旗人、民人。

其三，对离乡经商或耕种的商民进行严格管控，防范人口流动引发治安问题。保甲的范围，不仅遍至固定的、广大的乡村陆地，还延伸到了流动的商船之中。在边外如蒙古等地耕种的民人，同样设立牌头、总甲及十家长，“如有偷窃为匪，及隐匿内

地逃入者，责令查报”。在各省驻防营内，经商者贸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编牌册，报明理事厅查核；凡客民在内地开张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类顺编，由于其往来商贾踪迹无定，责令客长查察；尤其对沿海商渔船只进行严格规定。^[33]

其四，将盐场、矿厂等处工人按职业编籍排甲，设立“课长”“澳甲”“场员”“峒长”“炉头”等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盐场并灶另编排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由场员督查。场员督率厂商、课长及峒长、炉头等编查各处煤窑，由雇主将矿厂雇佣工人册报地方查核。

其五，将区域社会边缘人群编册。清朝廷在雍正四年（1726年）以来的政策基础上^[34]，要求各省山民、棚民按户编册，由地主并保甲结报广东寮民（穷民）。每寮给牌，互相保结其招佃搭寮者，由业主负责呈报。外来流丐则由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询明籍贯，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即收留难民、流民的专门机构）等管束。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稽查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棚民，“单身赁垦之人，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认识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转相顶替及来历不明之人，责重保人互相纠察举报究治。至现在单身棚民已经种地者，责成有家棚民取具切实保状，如无人保结者，即令押回原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准蜑户、渔户、乐户、丐户的改籍要求。^[35]之后，又准这些群体的四世以后，可以报捐应试，这就为“贱民”脱籍打开了切口。诸如此类，都充分体现了清代国家对村落社会流动的强化控制。通过这种方式，清代国家很好地将原本难以管控的山民、棚民乃至流民等社会边缘群体，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编制体系，并将他们尽可能地固定在土地上，就在主客观上维系了国家的稳定。

其六，对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加以管制。与雍正四年

（1726年）仅仅关注苗疆等村堡聚族之例稍有不同^[36]，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视将少数民族与汉民一体编入保甲，并根据不同地区区分为六种情况：一是针对苗疆寄籍，在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并编查其余各处苗瑶，由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二是针对云南省有夷人与民人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地依山傍水，自成村落，悬崖密箐内搭寮而居者，由管事头目造册稽查。三是外省入川的民人，与土著一例编查，如系来历不明者，必须报官遣回原籍。四是甘肃省番子土民。由土司查察，由地方官管辖者，则由该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牌，另册造报。五是川省改土归流各番寨由乡约甲长等教化番民，稽查奸匪，均听抚夷掌堡管束。六是定番界苗疆禁例，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限制台湾流寓民，即“不准内地民人私行偷渡。台湾民人不得与番人结亲”。限制苗汉之间的互动往来。汉民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从深层次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保甲制强化对边地少数民族的控制，进而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

其七，对寺观僧道等宗教人员行监察之制，责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如有游方僧道形迹可疑，及为匪不法者，稟官查逐。其各省回民令礼拜寺掌教稽查。

由上可知，保甲和里甲是两个在目的和内容上，均不相同的基层行政治理体系。这从《大清律例》中将两者分置不同项目之下即可见一斑。规范保甲运作的法律，置于“刑律”项下，而关于里甲的法律规定，则置于“户律”项下。前者有关于处理犯罪和罪犯，而后者有关于财政和人口，两者截然不同。保甲重治安控制，里甲重赋役纳征。由于里甲的衰弱和不适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雍正后期至乾隆初年，其部分功能逐渐被保甲替代。如里甲的户口登记工作，在乾隆初年就转移到了保甲，史载，乾隆

四十年（1775年），“论直省滋生户口，向惟册报户部，朕（乾隆）临御之初，即饬各督抚，岁计一省户口、谷数尚有仓储可核，而民数则量为加增，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什之二三者……现今直省通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俱稽考成编，无难按籍而计，嗣后各督抚务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37]。很多事例还表明，军中税收的工作也落到保甲代理人的手中。可以肯定，大致在18世纪，保甲制就完全取代了里甲制，在此之后，由保甲制引领的中国乡村基层建制维持了一小阶段。

从里甲到保甲的变化，意味着政治强制机制取代了经济强制机制。进而言之，尽管国家试图将乡民固定在土地上，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作，以确保国家赋税财政的安全与丰盈，但这实际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朝廷无力完全限制乡民的职业身份。从更深次来看，这一变化也意味着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对乡民的支配权，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不少乡民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出卖劳动力。村落社会的流动性由此逐渐加大，离乡不离土的现象在清代开始相对频繁地发生。不过，也正因如此，村落社会的活力得以有限激活。

与此同时，从国家层面来看，其实，清朝廷也希望通过里甲和保甲来避免赋予地方代理人太多权力，以有效控制乡村地区，维持政权稳定。因此，无论是里甲还是保甲，它们既是清代国家对乡村社会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是清代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动调整与重新设计。进一步来看，这表明清代国家试图与包括村落在内的最基层社会，发生更为直接的关联，进而建立国家与村落社会的有效互动与合作机制。当然，要指出的是，从里甲到保甲，是建立在两者并行体系基础之上的重叠和取代，而并非单一体系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过渡。嘉庆之后，里甲、保甲

均走向衰败，村落社会也因此发生着缓慢变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三、基层组织与自然村落

通常来说，村落作为稳定的聚居空间，是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存生活的社会单元，属于自然村范畴，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可以说，广袤中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村落，作为中国乡村地区的基本生活单元和基本社会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了历朝历代国家政权的重点管控和治理的对象。（见插图7）正如笔者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自早期中国以国家形态出现以后，自然村落便作为基层组织的一部分，被纳入国家的行政管辖体系，而逐渐与国家发生了密切的共同体式关联。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学界，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基础之上，就展开过较为激烈的争论，学界称之为“戎能—平野论战”。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自序当中就已指出。无论是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当时日本学者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滕尼斯共同体理论基础之上的讨论，并且都有其复杂的政治动机，其目的都是为日军侵华提供理论支持。[\[38\]](#)其实，除了日本学者，有华人学者如萧公权，还依据印度村落共同体理论，来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村落问题，认为当时的中国村落与印度的私有型或地租型村落类似。[\[39\]](#)巴登—鲍威尔（B. H. Baden-Powell）总结出“私有型”和“共有型”村落的区别，见表7-5。

表7-5 “私有型”与“共有型”村落

“私有型”村落	“共有型”村落
1. 有一名具有权势的头人，实行世袭制	1. 头人不世袭，但有一个长老会
2. 财产私有	2. 财产共有
3. 对税收没有连带责任（即各自交税）	3. 统一交税
4. 没有共同拥有的荒地或者公地	4. 村庄所在地和一些荒地，通常共有

慕克吉（R. Mukerjee）则指出印度有三种类型的村庄：（1）地租（ryotwari）型村庄。这“可能是最古老的村庄”，它起源于一位领袖带着“某些部落或宗族定居某地”；（2）专制领主（zamindari）型或地主型村庄，“头人必然是地主”；（3）共有（joint）型村庄，“某些村民不只拥有自己的耕地，而且拥有全部的村地”。在清代的中国单姓村落，宗族具有土地支配权，这种村落类型大致类似印度的共有型村落，也是最接近“财产共有”或“共同支配财产权利”的村落共同体。

尽管有关中国村落共同体的理解和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所谓村落共同体，不仅仅是村落内部是否具有共同体的性质问题，还要延伸到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式关联。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基层行政组织与自然村落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有关于此，在明清村落发展中体现尤为明显。

明清国家不仅利用保甲制推动对乡村治安的控制，同时还设计里甲制来征收土地税和摊派徭役。正是这一系列的做法有效地将基层组织与自然村落密切关联了起来。一方面，朝廷通过里甲和保甲的编排，如“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的做法，至少在行政编排上，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自然村落因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形成的对抗国家的力量。因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自然村落的人丁数往往并不能与里甲或者保甲的编排数

额相吻合，以至于有时甚至要与相邻村落组合编排。所以，当朝廷以制度形式推行这种基层组织之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分化村落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要指出的是，朝廷刻意设立的基层组织机构与原有的地方自发组织，尽管并立，但行政组织明显位居其上，其目的仍是为了让原有的村落团体和组织无法发展成地方权力中心。当然，清代国家之所以没有采用自发生成的如村落一类的组织单位作为设置里甲制、保甲制的基础，或许也是自然村落的户数变化幅度过大，并不总是适合组织编排十进位体系的缘故。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运行保甲、里甲这类基层组织，“牌头”“甲头”“甲长”“保长”等地方代理人，都并非朝廷指派的官吏，而是从村落社会中选举头人来担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地方官吏相比，本地头人对当地的环境、人口情况更熟悉，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能更好地处理当地可能发生的问题，或者至少可起到向官府提供信息的作用。同时，这种方式也可使明清国家以更柔和的手段实现与村落社会的有效互动。因为这些地方代理人和组织不论是由官府促成的，还是村落社会原生的，都是经过官府的选拔、审核才被允许存在的。国家通过州县对乡村地区实施直接治理，通过地方宗族对官府行政的积极回应，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腹地，及至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

显然，在实际运行中，里甲、保甲并没有成功地让基层行政组织与自然村落完全分开。因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乡村地区，而非取代（也不可能取代）村落，故而仍将基层组织体系的设计尽可能地架设于自然村落的基础之上。可以肯定，尽管村落并不是官方认可的保甲、里甲的组成要素，但其界限是受到尊重的。例如，四川巴县县令刘衡整顿保甲，当每村户口数少于规定限额时，会让小村的人户自成一牌或一甲。^[40]或者将村落当作

与保共存的单元，即村落是保的组成单元，通州地区608个村镇，设置了567个保正。河南临漳县各保所辖村落的数量从大约6个到超过20个不等。乡与保甲也有非正式的关系，“联村于乡，而保甲可按”，有时乡成为高于保甲的上级单位或者凌驾于户数充足的村之上。此外，一些地方官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发现，利用自然村落及其组织提供的功能是最方便的。有的地方官将乡和村作为保甲制的运作单位，而无视国家的统治意图。行政与村落的混合，使基层行政组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急切需要的影响，从而引发矛盾。

其实，不论是里甲制，还是保甲制，作为基层组织体系，它们在下行之中，往往仍会遭遇地方传统的某种过滤，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如官定的里甲形式，实际上仅在相当少的地区得以完全实施，有的地方存在掌握职能权力和地方势力的集团弄权，不一定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甚至远离官定形式和编组。这从清朝廷的一些做法中即可见一斑。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就针对地方“颓风”“积习”“锢习”，专门颁布了《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一书，条列州县事宜，强调牧令严守、法守相关规定，不断强调阳奉阴违、复有前项者定将严惩不贷。

清中后期，国家统治结构的弱点日益显露，朝廷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越发困难。里甲制、保甲制相继崩坏，不能履行其职责。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行政条件无法有效运作。朝廷为了强调政治安全，对地方官吏执法权威和审时度势的政治灵活性加以限制与约束，这使得地方官吏对社会事务的处理趋于消极。由于乡村控制体系缺乏地方官吏的有效推动和监管，基层组织的行政基础流于形式，甚至大行腐败，特别是到了清后期，行政腐败更是广泛触及州县层级，进而导致各种乡村控制机制无法正常运作。比如面对频繁发生的饥荒，既无完善的村落互助系统，又

得不到官府的有效援助，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动乱。二是村落自治的权力机制被固化。运用乡绅对地方进行管理，以民治民，虽然在理论上很完美，但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一般来说，乡绅等地方代理人为官府效劳的意愿和能力，通常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期待。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代理人受权力的诱引，利用被赋予的职责谋取私利，既少有考虑国家的利益，也没有保障乡民的权益。萧公权就指出，“政府监督虽然是保持制（度）体系运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却有损地方自尊心或集体精神——同样也是各种职位或组织持续有效运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帝制中国的人民就是‘一盘散沙’”^[41]。正因为一系列矛盾得不到国家的有效回应，久而久之，便引起甚至激化了村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清代中后期，诸如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湖南瑶民起义等等，都是例证。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闭关锁国的清朝被迫门户洞开，这不仅损害了清王朝的权威和声望，还破坏了延续了千年的小农经济体系。原本一直受习惯、传统惰性和国家控制的乡村地区也出现骚动。及至清代晚期，整个国家的政治统治结构，包括乡村基层组织处于全面衰败的状态。中国进入近代化的历史阶段后，作为基层社会单元的村落，便处在巨变之中，走上了转型的历史新征程。不过，转型中的村落，仍以其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在满目疮痍的近代中国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45页。原书载：“开封府界保甲，以五家相近者为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但及二百户以上并为一都保，其正长人数且令依旧。即户不及二百者，各随近便并隶别保，诸路依此。”

[3] 喻政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万历《福州府志》卷三（上册），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4]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5]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6]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7]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二》。

[8] 黄仲昭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八闽通志》卷十五、卷十六，《福建地方志丛刊》（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414页、第426页；何乔远：《闽书》卷十二，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78页；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七十四、卷七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61、578页。

[9] 陈让编次，邢址订刊：嘉靖《邵武府志》卷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64年版，第61b—62a页。

[10] 叶春及：《惠安政书》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1] 李乔岱纂修：万历《休宁县志》卷七，《经野记》，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

[12]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3]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4]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5]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6]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原书载：“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鄖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

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17]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8]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19]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0]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1]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2]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十二《苏息民困或问》，齐鲁书社1997年版。

[23]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兵志第一百四十五·兵六·乡兵三》。

[24] 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卷上，《王文成公告谕》，国民出版社1940年版，第31页。

[25] 《清朝通典·食货九》卷十二。原书载：“顺治元年，百户危列宿上言：天津到海避乱之民万有一千余户，宜令有司抚绥安插。兵部侍郎金之俊亦请谕各镇道臣：招徕土寇归顺者，悉令州、县编置牌甲。于是制编置户口、保甲之法。”

[26]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4页。

[27]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4页。

[28]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3页。

[29]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5页。

[3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志九十五·食货一》（上册），联合书店1943年版，第469页。原书载：“至编审之停，始於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簿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31] 具体可参见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9—5030页。

[32]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9页。

[33]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0页。原书载：“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准造。完日由官验明，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贯。至汛口查明舵工、水手名数，官为填注。倘有租船出洋为匪，将船主、澳甲分别治罪。如船主实有事故，别令亲族押驾者赴官呈明，填入照内，准行。未呈明者，即以顶冒论。其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一切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

[34] 雍正四年（1726年）定栅民寮民照保甲之例。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之栅民“令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查，责成地主并甲长出结呈送州县官，据册稽察。倘居住分散，不论栅数多寡，自为一甲，互相稽察，内有已置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一体当差。至一邑中，有四五百户以上者，该管官即于栅居乡庄内选立保长，专司巡察，其栅民有愿回籍者”，广东省之寮民“亦令照保甲之法，每寮给牌一令，互相保结。寮内遇有迁移增减，令将牌赴县，添除择老成谨慎者为寮长，听其铃束。如有藏匿奸宄、容隐不报者，事觉连坐。凡业主召佃搭寮，必将寮丁报官，或系官山，必赴官报，明查验方准搭寮，违者罪之”。雍正七年（1729年），粤东之蟹户“本属良民，且输纳渔课，与民相同”，“著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蟹户，听其住船自便。如有力能建房搭棚者，准其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察，不得欺凌驱逐”。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2页。

[35]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2页。

[36] 雍正四年（1726年）有选立族正之例“本因苗疆村堡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或不能遍查，乃选族中人品刚方者立为族正，以稽察匪类。盖因地制宜，非通行之制也。”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1页。

[37]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3页。

[38] 参见本书序言。

[39] 转引自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页。关于印度村落的梳理分类可见B. H. Baden Powell, *The Indian Village Community* (1896), pp.8-9;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Village Communities in India* (1899), p.19; R.Mukerjee, *Democracies of the East* (1923), pp.265-266。

[40] 刘衡：《刘廉舫先生吏治三书·庸吏庸言》，江苏书局同治七年刻本，第88页。

[41]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9页。

第二节

明清村落的治理

一、宗族制度与村落

宗族制度发展到明清已十分成熟，成为当时不少村落社会的主要表征之一。大量史实显示，宗族的壮大与宗族制度的盛行，是促成明清村落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要素。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指出的，“氏族（书面语一般为“世系群”或“宗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1]。《歙县志·舆地志·风土》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堂皇闳丽，与居室相间。”^[2]以上所指虽是民国以来的村落，但是，由于距明清时期并不久远，且村落具有历史的稳定性，故并不妨碍以此来理解明清时期的村落社会。

由家庭组成的宗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定居于一个具体的、完整的村落。虽然村落并不全是宗族定居的产物，但宗族总会赋予村落高度的凝聚力，人数众多的大宗族控制着一些乡村地区的发展。社会学家杨懋春就曾说：“除了那些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群体外，所有村内群体都直接或间接由家庭关系决定……邻居大多是由同一宗族的家庭组

成。”^[3]正因如此，明清时期的乡里制度设计，受到了宗族因素的影响。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就指出，明清乡里制度试图以户为基础单位，对村落的每个家庭进行直接管理，“十家之中，一家得治，则余九家，亦得治之，一家之中，一人得制，则余九家之人，无不皆得以制之；推于一乡一邑，俱无不可依此以控制一切。故法不必及于微，以一一防止个人之思想行动，而个人思想行动，已无不被限制于所属之血统集团而为之桎梏”^[4]。

在村落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中下层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体，他们阶层固化、职业固定、经济落后，少有机会和能力实现自主的职业选择和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某一程度上，这使得掌握话语权的宗族与村落的关系更为密切。受血缘关系支配的村落社会，可分为单姓村落和多姓村落，多姓村落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族。从地域分布上说，宋代以来的华中及东南地区的单姓村落大量且迅速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单姓村落在长江流域和福建、广东等南方各省比较普遍，而华北地区则以多姓村落为主。

除了区域分布的差异，单姓村落与多姓村落的另一区别，体现在其与乡里组织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其的控制上。其中，前者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过程，后者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过程。实际上，单姓村落的宗族群体更能操控和掌握村落的领导权。即使在清末，宗族组织日渐式微，村级的正式政权制度已经定型，单姓村落也仍由宗族中的权威精英领导。而由多姓群体组成的多族村落，往往容易滋生宗族间的竞争或冲突。同一个村落的各宗族之间，比宗族的各成员之间更容易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建立在居住优势、人数比例或宗族成员的社会地位等基础上，导致村落头领的持续性、稳定性得不到保障，所以经常需要国家介入治理。

总的来说，宗族的壮大与村落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不过，

只有当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时，宗族组织才能履行修建宗祠、添置祭田、维护治安、发展慈善福利、捍卫乡里的职能。每一个宗族都会建立一种管理或处理宗族事务的组织，并且推选合适者为族长或宗长，成为宗族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在族人贫穷、社会地位差别不大的村落社会，成为族长的决定因素在于年龄和辈分；当宗族组织发展较好，有一些成员比较富有且社会地位较高时，对族长的选择则更多地强调人选的社会等级。可以肯定，士绅控制宗族的现象在明清成为常态。拥有财富的宗族精英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宗族的物质和财富资源，从而为不同类型的宗族活动，为壮大宗族的影响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村落社会，宗族组织的活动和作用涉及面十分广，归纳来看，主要有五种。一是捍卫乡土、保族自卫。抵御暴徒、土匪以及其他敌人的任务有时由宗族组织承担。如明中后期，由于卫所军屯处于日益凋敝的状态，军人大量逃亡，以致一些匪患丛生的边远地区得不到国家有效的安全保障，宗族就组织了具有武装性质的宗族力量来捍卫村落。史载，当时广东佛山的李待问便联合宗族势力，建立了忠义营以捍卫乡土。^[5]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宗族利益，李氏还不惜以武力对抗地方官府。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在历朝各代的不少地方都有发生。清末福建的一个村落也有类似事例。萧公权描述道：“黄东林的祖父还在世时，一名税吏来黄村收税，冤屈了该村的某个家庭，黄东林的祖父性格耿直，他敲锣召集族人，准备抵抗税吏及其随从。如果（税吏）当时不立即道歉，肯定会有流血冲突。从那时起，黄村就得到了一个称号，被称为‘野蛮村’。”^[6]

二是和息争讼，构建道德伦理秩序。一些规模较大、组织较好的宗族努力维持宗族秩序与伦理道德，主动贴合国家政策和皇帝训令，并且以儒学为基本准则，制定了宗规。在湖南，曾国藩

在曾氏族谱中重申了《圣谕广训》的训示，重印了《大清律》中有关家庭关系、婚姻、坟墓和纳税的40条规定，记载了21条曾氏规训：要求族人孝敬父母、尊敬长上、与族人及邻居和睦相处、教育子孙、安分守己、勤俭持家、及早纳税、不做坏事等。宗规通过不同程度的奖惩措施得以强化，违反宗规者由族长处理，如果罪行严重，将在宗祠里，当着所有族人的面被审问，其目的在于使犯罪者公开受到嘲笑，以阻止其他人犯罪。如若犯军、流、出罪，“照例革胙”。一般来说，宗规或在适当的场合口头宣讲，或张贴在祠堂合适的地方，时刻警醒族人从善如流。

此外，族人之间的争论和口角，也是宗族需要处理的一项重要事务。族长、房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既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察觉，易于约束”，“如族众某房有不孝不弟，习匪打降等事，房长当即化导；化导不遵，告知族长，于祠中当众劝戒。如有逞强不率，许其报告惩处。至于口角争斗，买卖田坟，族长房长秉公处断，即为劝释。如与外姓争斗者，两造族长房长秉公会议，应劝释者劝释。如经官司，两造族长房长当堂公言，偏袒者分别罚戒”。^[7]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苏镇江王氏宗族重修族谱时也有类似规定。^[8]湖南江永上甘棠村周氏祖训中亦有记载：“乡党之间，生齿甚繁；比闾相接，睚眦小失遇有，正直君子从中排解。即宜忍气相让，至事的难让，亦当对老成说其情理，然后往诉公庭。若任气相争，结仇成讼，一朝之忿，忘身及亲，悔之晚矣。”^[9]以上表明，宗族在明清村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乡里制度或者官府组织在短时间内难以替代的。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家有时对这股力量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但对宗族在村落中维持儒家伦理及秩序的作用却是予以肯定和赞赏的。^[10]毕竟明清时期的宗族型村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国

家积极关联的。

三是教训子弟。宗族一般都十分注重对后辈的教育，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和官品，可以提高宗族在村落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话语权及地位。湖南《永明上甘棠周氏族谱》载，“则凡有子弟富厚之家，固富以读书为生理，或延师于家塾，或从游于书院，俾专攻举子业，图上进，以耀祖光宗。即属寒微，亦须发蒙以养正，使粗知道义，不致妄作妄为”^[11]。宗族组织建立家塾、延请教师、置办学田等教学硬件，根据接受济助者的资金需求提供读书条件，鼓励族人读书识字、参加科举。不少宗族组织为年轻族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士子创办族学、家塾、祠学、义学等学堂。比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安徽庐江章氏宗族设立家塾以“课族子孙”，家塾及教师的经营维持来自章廷樑捐置的3300亩义田收入的一部分。^[12]清中期，合肥葛氏宗族用一位监生捐献的300亩田地，为族中幼童和年轻人建立了一所义学。广东佛山李待问与其兄李升问修社学，并延师教授，“里中崇正社学倾圯，公独任饰新，一时改观”。^[13]

一般来说，宗族通常为对学业充满激情和信心的贫困士子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比如，清后期浙江会稽张氏宗族族人购置学田，以其收入每月支米三斗，每季支银五钱的形式资助贫困士子。江苏丹阳县李孟雄捐钱购置祭田，希望以捐赠宗族田地的形式给年轻族人的学习带来实质的帮助。^[14]同时，宗族对那些显露头角，有极大可能和实力回馈乡里的族内士子也给予鼓励。比如湖南善化黄氏家族按照科场考试功名的等级，从生员到状元，予以10~500两白银的奖赏，各有不等。

四是周济族人，关注地方福利事业。宗族组织以多种形式开展村落慈善事业，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用宗族财产的增值所得或宗族谷仓储藏的粮食，以临时救济和长期互助的手段，帮助宗族

中的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如江苏江阴杨氏宗族以1 000余亩祭田所得的部分收入来预购粮食和衣物，用以资助贫穷无后的老人、没有再嫁的寡妇、无人抚养的孤儿和丧失劳力的残疾人。在学堂求学的子弟、店铺或手工作坊的学徒、遭遇婚丧嫁娶的家庭也可以得到特别补助。建阳“至于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葬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修试费”。^[15]

此外，宗族也以借贷的形式提供成员物料支持和经济援助。广东南海陈氏宗族从祭田收入中拨出款项，用以建立族人借贷基金。如果借贷人无力偿还，则用借贷人的田地抵换。湖南江永上甘棠村周氏宗族规定不可加征借贷利息：“即或有寒门借贷，亦无利析（息）秋毫于放债中，寓睦亲之意，斯族谊敦而亲爱愈笃，有司表其仁里，天下推为望族，岂不懿欤。”^[16]由于在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宗族帮助成员纳税的情况增多，朝廷一度设置宗族为税收代理人，税吏直接把土地税单交给“总户”或其世袭代表。在有些地方，宗族甚至还会承担起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和桥梁的任务。如广东花县铜瓦坑村邝姓、小布村江氏、瓦沥村缪氏，四川富顺黄姓等宗族便是如此。

五是编纂、修订族谱；祭祖，修建祠堂，管理祭田和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编纂族谱的目的在于追溯和记录宗族体系。但是，在边远贫穷地区以及北方地区的宗族中，编纂族谱的现象不如南方显著。这类宗族活动主要由拥有一定财力的士绅支配和控制，普通的乡民通常只是出现于族谱上，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士绅往往通过拔高宗族威望，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之后的宗族活动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相应地，士绅也十分关注宗族祭祀中的宗祠、祭田、祖茔等财产。宗族财产的建立或扩大，被他们视为生命的无上成就，因此他们常常乐意捐钱或地给

自己的宗族。祭田是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在亲属群体比较旺盛的村落，经常可以看到大片的祭田和规模较大的宗祠。^[17]在宗族活动范围最广的南方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显著。捐献者对自己捐造的祠堂和祭田，在管理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故而在客观上提升了自己的宗族地位。实际上，祭田不仅是一个宗族、一个村落的公共安全保障，更是宗族潜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体现。祭田作为公共财产，将宗族置于村落中广泛的、稳定的、上升的政治结构地位。正是有了祭田，才使士绅控制宗族、支配村落成为自然而普遍的格局。

宗族与村落由共同的士绅阶层维系和影响，二者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然而，随着士绅及富户对村民的任意支配权的扩大，这种宗法制度到了清代后期，也成了限制村落和村民发展的负面因素。宗族中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乡村社会阶层随之固定，不少乡民被固定在村落社会的底层难以翻身。可以说，宗族不仅没能在实质上改变村落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无法解决许多国家未能解决的问题，譬如贫困。

与此同时，国家意识到了宗族在村落中的凝聚作用，并试图利用这股内在力量来辅助国家更好地管控和治理乡村。雍正四年（1726年），朝廷在苗疆村堡按人品选立族正，作为协理地方办事、稽察匪类的村落代理人。立族正这类做法，虽然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少见，但是在内地其他地方则较为常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族正承担起保甲头人的实际作用，而宗族作为乡村治理的补充工具，就这样正式享有法律地位，并被置于官府直接控制之下。^[18]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御史张光宪奏请设立大姓族长。乾隆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族长作为地方权威，容易操控聚众械斗、滋生事端、倚强锄

弱，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

在清代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地方宗族型村落出现了族长与族正这种非官方与官方领袖双重领导的格局。实际上，通过设置官方领袖而达到对宗族完全控制的目的是很难实现的，这种头人双重制的村落治理模式，更可能造成村落社会的混乱。原因在于宗族利益与国家目的往往并不一致。国家把“族长”“族正”变成保甲代理人，既破坏了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和宗族组织的自然本质[20]，又没有充分考虑到宗族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虽然有的宗族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代言人，将“早完国课”的要求添加到宗规祖训之中，称“国课乃朝廷大典，非比私债可延。我族有田粮之家，每岁于开征后，各宜依限早纳，毋待胥役追呼，则上报君恩，下无忧累。切勿效他人之拖欠也”[21]。但是，实际上宗族组织不仅无法解决赋税问题，也没能成为王朝可靠的乡村治理工具。

宗族作为村落要素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以独有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并在素质参差不齐的村落头领的带领下，从事着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从某一方面说，宗族组织的持续与兴旺，直接取决于宗族内部强有力的头领及外在的有利条件。然而，无论是宗族还是村落，其运作并不总是符合国家安全的原则与要求。因此，宗族组织在承担一定的乡村控制任务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朝着国家不希望看到的方向扩张和运作。乾隆之所以不同意御史张光宪设立大姓族长的奏请，就有此意。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无法否认宗族与宗族组织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村落自治和国家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乡约制度与村落

作为一种乡村自治规约，乡约制度自在北宋出现以后，就与村落社会密切关联了起来。到明清，全国各地皆立乡约。著名的有明代江西的《南赣乡约》、徽州的《文堂乡约》、山西的《雄山乡约》、福建的《青阳乡约》，清代浙江的《海宁乡约》、湖南的《洙津乡约》、徽州的《侯潭乡约》，等等。明清时期的乡约，作为一种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的村落治理机制，具有“明礼教，敦风俗”的功能，在增强群体认同意识和村落向心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明代乡约制度始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倡设老人制度，赋予老人监督里甲、平息争讼、劝农耕种、教训子孙的职责。朝廷希望通过选立乡里年高有德之人，以“导民之善”“尽除民间祸患”^[22]，企图从官方层面将老人塑造成地方权威。朝廷不仅让老人不定期地向官府汇报地方情况，比如发现里甲犯法，由“老人指实”，绑缚“赴京具奏”^[23]；还将老人请到南京，向他们咨询乡里社会状况。然而，到了后来，伴随中央权威的降低，老人制度的流弊日益滋生，至宣德后，“小事不由里老则赴上司”，“（粮长）包揽词讼，把持官府……惟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24]

明中叶之后，作为伦理教化和村落秩序建设的软性手段，乡约逐步在全国发展起来。乡约最初属于地方自治、“辅政补治”的举措，由士绅负责，约正则一般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被官方承认的地方权威担任，比如族长、书院院长。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守仁在推行十家牌法后，制定并公布了《南赣乡约》。他认为民俗善恶是积习使然，且由于国家治之无道、教之无方，以致父老子弟不作为，甚至狡伪相残，村民“常弃其宗族，畔其

乡里，四出而为暴”。“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25]

《南赣乡约》共16条，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其一，描述和介绍乡约组织机构。规定约长、约副、约史、知约、约赞等职的推选标准和数量；强调人品、德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规定同约之人具体会期以及出资数额；规定设立约所地点，为道里均平之处或寺观宽大者。其二，强调约长不仅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还应以柔性的、委婉的态度调解纠纷。“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同约之人应互相帮助，“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其三，强调约长维护社会治安与劝纳赋税的政治经济作用。对阴通贼情、贩卖牛马、走传消息的军民，以及亲族乡邻投贼复仇之事，“率同约诸人指实”，“今后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约长需执行社会监督的职能，“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对在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的寄庄人户，以及放债收息之本地大户、异境客商进行管理。其四，强调约长在新民、嫁娶、丧葬等事宜上移风易俗的作用，以求“共兴恭俭之风，以成淳厚之俗”。^[26]王守仁提出的乡约制度，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显然为整饬村落生活秩序，加强村落的自律性提供了一种范式。

明代隆庆以后，乡约逐步演变成国家意识传播的工具，朝廷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万历时，吕坤建议将保甲和乡约合

为一体：“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他在《乡甲约》中还进一步规定：约正、约副、约讲、约史的推选标准和数量，亦以人品、德行等道德素质为主要标准。^[27]吕坤认为“劝善惩恶，莫如乡约；缉奸弭盗，莫如保甲”^[28]，如若乡约与保甲二者相辅而行，村落社会的秩序就能得到保障。但是，很多时候，基层社会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按照乡约文本执行，故而在很多地方，这种带有理想成分的乡约制度是无法得到有效贯彻的。关于这一点，吕坤自己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今一州一县，设约正副不减三二百人，……而今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畏谨者避迹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29]。如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这表明，国家试图通过乡约制度来介入村落自治，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儒家学说是加强思想控制的有效手段，所以，在倡导儒家学说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在儒家理念基础之上建立乡约。顺治时期，朝廷意识到国家需要儒生的认同，因为儒生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控制了儒生，尤其是前朝的儒生，实际上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正是这一认识使得清朝的历任统治者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不断对儒家经典、宋明理学进行注解、论述、刊印，试图以此得到儒生的支持，将他们的思想和精力归于“钦定儒学”之下。针对广大乡村地区的民众，朝廷则采取了一种通俗说教的方法——乡约宣讲。

顺治九年（1652年），清代皇帝颁行《六谕卧碑文》，包含六谕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

理；无作非为。[30]六谕主要涉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教育、生计、一般秩序四方面。为了申明六谕，“开导愚氓”，各直省地方设立乡约，定期讲解。顺治十六年（1659年），礼部决定应会合乡人，公共推举60岁以上、经告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乡约正、副。如果没有生员，则由60岁或70岁以上的素有德望的平民担任。约正需在初一、十五解说六谕，旌别善恶将其登记簿册。[31]此外，各里设立申明亭，将犯下不法行为以及违背孝悌之道的人的名字张贴上去，一旦他们改过自新，便将其名字除去。

康熙九年（1670年）的“上谕十六条”比六谕更详细[32]，并以乡约宣讲的形式传递给广大乡民。自此，钦定儒学开始成为防止百姓，尤其是居于村落的那些不可控的“愚氓”成为危害的工具。康熙十八年（1679年），浙江巡抚将“上谕十六条”衍说辑为《直解》，国家下令通行直省督、抚，刊刻《乡约全书》分发各级州县及至所有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康熙年间“上谕十六条”不断被完善和强调，不仅添加了关于老人的条谕，还着令土司地方各官也加入每月初一、十五的乡约讲解。这无疑将乡约制度推广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雍正二年（1724年）颁发了《圣谕广训》[33]，主要针对军民生童讲读，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培养有益于国家良好秩序的个人态度和行为，指出农商工贾、兵卫民贍之不易，规劝民与民和、兵与民和。一是劝农民务本，“勿因天时偶歉而轻弃田园，勿慕奇赢倍利而辄改故业”，“择一业以自处……不见异物而迁”。统治者认为乡民职业的稳定对确保国家赋税的稳定有益，也认为所有人都要节俭惜财，防止“弱者饿殍沟壑，强者作慝犯刑”，避免社会失序。二是告诫士子不要急功近利、注重名号头衔，不要轻信明令禁止的异端。“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

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物之蠹者，皆为异端”，这里的“异端”尤指当时社会上兴起的白莲、闻香、西洋教宗天主教等，他们不仅诱取资财，还聚集群众烧香，荒废农工业，破坏国家经济根本。所以，统治者反复强调乡民只要敦本业，就可以“迓神庆”。三是强调讲法普法的重要性。“周礼州长党正族师皆于月吉属其民而读法，大司寇悬象刑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知所向。”“圣谕”指出了乡党、宗族对个人行事和品行的监督作用。四是强调加强保甲。联比纠察之法未实心奉行，导致的各种勾引窝藏弊害，需“排邻比户，互相防闲”，“队长诫其行伍，乡约诫其比间”，使“盗贼无容身之地”。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令各州县大乡、大村，以及人口稠密的地方俱设立讲约所，宣讲“圣谕”。具体做法是，在举、贡、生员中挑选一名老成者，立为约正。再选三四个朴实谨守之人担任值月。每月初一、十五，齐集耆老、里长以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敦促地方官实力奉行，如有成效则对学行最优者予以奖赏，如有怠惰废弛则加以黜罚。

乾隆年间一遍遍发布谕令强调乡约的重要性，其中有不少涉及邪教或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新规定，要求地方官更加倍努力，使乡约真正地起到教化作用。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省“民愚，易诱少壮习于拳棒，恐被邪教之人煽骗入伙”^[34]。对此，地方官亲自劝导，将律内所载邪教妖言等各条定例分析讲解，又将雍正五年（1727年）严禁学习拳棒的谕旨进行了宣读。

乾隆九年（1744年），清帝下令修复申明亭（见插图8），如若不能行，则立木制布告栏。申明亭的延续使用，是因为统治者希望用这种公共的、可视化的精神枷锁来规范乡民的言行举止，将其限定在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行为轨道之中。与此同时，统治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云南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令三齐等

三十六寨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十五，由该州暨儒学等官轮流前往宣讲《圣谕广训》，并择取地方利弊文告、律例，翻译并进行讲解。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规定，除固定的每月两次宣讲，还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进行教育活动，“或在听讼之余、公出之便，随事随时，加以提命”^[35]。朝廷鼓励用土音、言语加以诠释，使目不识丁的乡民明白宣示内容，并要求将关于邪教的一切律例进行刊印张贴。倘若还有人敛财赛会、私立淫祀或托言用符治病、诱民远方入会等，都将严行查办。直到道光、同治时，清朝皇帝还不断发布上谕，希望能努力加强乡约的执行。

在不断的细化和修正中，乡约逐步演变成全国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对疆土控制和使乡民产生国家认同的政治愿景。在乡约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少村落也制定了带着浓郁国家意识烙印的村规民约。比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湖南江永县上甘棠村的《村规民约碑》就刊载了12条禁令，不仅描绘了上甘棠村饱受周边势力滋扰的生存环境，还明显表露出强制性的、绝对性的国家力量和治理路径。第一条便指出“钱粮重务须要早还，毋致连累保甲，如违指名送官处究”，强调完纳国课的重要性，以及保甲处于州县与村落社会之间的两难性。约条中的一大半内容体现了乡约制度以及钦定儒学对地方的影响。通过官府和宗族的联合管理，村规民约从社会关系、伦理和一般秩序等三方面来约束村民，以建立符合国家意识的村落社会秩序，维护村落社会稳定。诸如“子弟须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禁不许乱伦灭义”“禁不许赌博”“妇女须要遵守闺房，各勤纺织，不许出外游行”“禁不许倚强欺弱”等内容都可表明。^[36]其中不仅规定要遵行禁令，还规定要对违者加以惩罚，一般是家法责杖、罚银后送官

处究。此外，由于“村界连粤西，贼盗出没无常”，村规民约也着重对因地理、历史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管控，第三条“禁不许勾引外坊贼盗”与第八条“禁一更尽下不许夜行”就是对村民的管束，并明确指明了犯行之罚例，如“家法责三十，罚银一十二两”，“送官处究”；第九条“凡后生坐草，得一功者，众赏银二两”则是对村民打击“外坊贼盗”的激励机制。上甘棠村人丁繁盛、人才辈出，无疑可以体现乡约制度取得了积极效果。

当然，之所以乡约制度能得以有效执行，仍然要归功于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官吏的大力支持。譬如，有些地方的地方官就为乡约宣讲撰写了通俗的说明文本，使得讲约会得以持续。康熙年间，范鋈撰写了《六谕衍义》，以日常用语解释了“六谕”。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清朝将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对村民的期待，传达到了村落社会的每一个人——至少从国家层面来理解是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的。也正因如此，不管村民愿意与否，国家通过这种办法与村落社会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直接关联。

不过，很多宣讲或许对乡民而言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甚至还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某种失望。因为乡约在实行过程中，面临官员负担过重，讲约员的身份不足以被信服，村民大多被邪教影响三方面的困难，导致其不能有效运作。

其一，直接负责乡约的一般官员的能力、时间和兴趣都不足以支持其完成这件事。许多州县官员已经肩负许多繁重的职责，比如征税、缉拿盗贼、谋生以及处理诉讼案件，半个月举行一次的讲约会只能徒增其负担，对他们来说是徒劳无益的。

其二，在村落中推行乡约的约正及其助手，按规定需是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德行俱佳之人，最好是在“举、贡、生员内拣选”。但事实上，士绅大多并不积极。所以，乡约

宣讲就落到了学识、道德观念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的乡民身上。有清人指出，“其先以绅士充之，往往恃符作横，至惩其弊，而易以细民，则又游手无赖之徒，借名色以鱼肉其乡民”[37]。

其三，乡约制度的推行明显受到村落生活环境恶劣的因素制约。在村落社会中向广大吃不饱的中下层农民宣讲圣谕，宣扬钦定儒学节俭、务本、忍耐、和谐的思想，是无法帮助他们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乡约开始与里甲、保甲趋同，具有税收和治安的功能。清代的乡约最初只是向村民传达皇帝圣谕。然而，在乡约的具体实践中，一些与教化没有直接关联的功能渐渐地被乡约吸收。乡约成为向村民传达官府命令、向官府汇报地方情况的政治工具。直至后来，乡约成员成为收税员，乡约组织又吸纳了团练的保卫职责，取得了保甲组织的功能。[38]在乡约的替代作用和变异过程中，最初宣讲圣谕的职责已然消失，而其作为地方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也并非十分坚固和不可撼动。实际上，在清朝灭亡之前，讲约体系就已经停止运作了。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乡约并非仅仅是乡民共同制定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更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包括王阳明《南赣乡约》在内的明清时期的乡约文本和乡约实践，几乎都是国家基于道德教化目的推行的一种基层治理手段，带有某种他律性质。社会学家杨开道先生就指出，清代的乡约俨然变成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有口号，但实效不大。[39]然而，不少田野调查发现的民间文献显示，明清乡约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明礼教，敦风俗”的作用。[40]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维系，自宋以后，不仅因有国法而有其形，也因村规民约而有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乡约久而久之在民间社会成了“习惯法”，而且在处理婚丧嫁娶、租屋分配、生产决策、扶贫救济等乡村琐碎问题时，其规制意义甚至超过了国家制定法。进而言

之，明清时期，国法与乡规民约作为普遍的社会公约，共同维系着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乡贤士绅与村落

乡贤士绅作为明清村落社会的权威与精英，对明清乡里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致来看，明清乡贤士绅可分为三种类型。这里为了称呼简便，通称为乡贤。

第一类乡贤是指退职的官员。这些退职的乡贤通常具有三个特点，即年长、明智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由于他们曾经属于明清官僚政治体系，更容易与地方官吏打交道，完全符合乡里制度对地方代理人的诉求，因此这类乡贤对村落社会和乡里制度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

第二类乡贤是现任的官员，包括受封赠的、捐买的虚衔官职，以及任期已满但未立即下达新的任命而归乡等待的官吏。这些暂居村落的官吏远离地方行政权力中心，自身权力无法正常运作，所以一部分人往往把精力放在乡里事务上。

第三类乡贤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贡、生员。对这类乡贤，张仲礼先生在讨论绅士时，将其分为上层绅士、下层绅士。其中举人、贡生属于上层绅士，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上层绅士有资格担任官职，而下层绅士要当官则必须捐纳，或者是通过更高等级的考试。”^[41]这类乡贤的数量最多，也是村落乡贤的主要来源。费正清指出，“在十九世纪初期，大多数功名获得者是通过了府一级考试的生员，另外一些则是通过捐纳取得同等身份的监生。这两种人估计约有一百一十万人。他们之间的比例一般为二比一，即是说，拥有最低一级功名的人，有三分之一是按规定

的价格向政府捐纳而取得这一身份的”[42]。正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功名是捐纳所得，所以，这一类乡贤中不免混入了一些不学无术、横行霸道的官宦子弟与土豪劣绅，给村落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

当然，村落社会中有一部分大地主、大商人往往也通过捐纳等方式获取功名，而跻身于绅士行列。一般来说，那些没有取得功名的，都不能被称为乡贤士绅。有学者就指出，“虽然绅士可凭借其特权地位来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大地主或大商人，但大地主、大商人倘没有取得功名，纵然家累千金、良田万顷，也只能是土豪，不能称之为绅士”[43]。

明清村落社会的治理体系明显包括两类，一类是官方治理体系，另一类是非官方的乡贤治理体系。这便是费孝通所说的“双规政治”，即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有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一整套官僚体系，由官吏和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到达县这一层；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44]费正清也有类似的表述，他指出，在乡村社会中，“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直到地方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45]。可以说，在明清时期，乡贤在村落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集团，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中，他们至少起到了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表率乡里、调解矛盾。清朝有一则告示明确传达了乡贤对乡民的表率 and 领导作用：“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汝等知晓，汝为民之绅衿、耆老，从今往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吾民，补吾之不足。”[46]乡贤在田土、斗殴等民事纠纷中，通常以地方权威的身份评议曲直、解决纷争。

二是上行下达。乡贤通常被指定为国家治理乡村的辅助人员，对乡里制度的执行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在乡约制度中乡贤承担起向村民宣谕教化的职责。

三是维护地方权益。在基层行政组织利用职权盘剥乡民的情况下，乡贤通常以地方权益保护者的身份与官府协调或对抗。比如清末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争斗。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乡贤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该市屠户交纳捐税，但不由官屠征收，而是由该集‘地方’代为收取，从而使屠户免与为人憎恨的官屠打交道”[47]。乾隆年间，“安村的领头绅士姓郎，是一个秀才，也是本村最大的地主，有一年村中发生水灾，房屋被淹倒塌的很多，郎向县官报灾，县官亲自坐着八人大轿下乡来勘查。勘查的结果认为灾情不严重，这就触怒了郎绅士。他说县官如此糊涂，着人把县官的轿子打坏”[48]。道光十三年（1833年），广东佛山同知令米户低报谷价，七市米行各行长、绅耆对此不满，并张贴公启称“照时分上、中、下三等谷价真实呈报，如衙书吏有甚别议，即通知大魁堂司事、传阖镇绅士与他理论”。[49]

四是推动公共事业发展。自宋代以降，社仓的运行一直有赖于乡贤的努力。清中期，陈宏谋在许多省份致力振兴社仓，《培远堂偶存稿》卷十三描述了他自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1741—1763年）间担任江西、江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巡抚时，运作社仓的计划和办法。在此期间，社仓均得到了乡贤的帮助。此外，乡贤肩负起满足宗族和村落多元需求的重任，推动了乡村交通设施、学校教育、慈善救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这使得乡贤能在地缘和血缘的双重系统中有效地树立权威身份和地位。

明清易代之际，为了笼络生员服从统治，清王朝在未正式立

国之前，便允诺免除他们的徭役。明崇祯八年（1635年），清王朝允许所有举人家中有4名免服徭役之丁口。清顺治五年（1648年），朝廷扩大官员和士绅的免税范围和资格，按照层级给予他们不同的照顾，就连最低层级的士子也可以有2人免除徭役，“教职贡监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顺治十四年（1657年），朝廷开始收紧优免条件，只允许乡绅本人免除徭役，“自一品官至生员更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50]。自摊丁入亩之后，丁税的摊派从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变成以土地面积为基础，各个地区的丁税税额已然固定。不过，这对乡绅阶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虽然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但由于清代国家对乡绅的优免政策，他们需缴纳的土地税额比占有同样土地数量的普通农民要少不少，因此具有相当的财富优势。这种优免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将特权转化为额外的负担落在普通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从而刺激了普通的土地所有者追求乡绅的特权地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第一次下达乡绅与乡民无差别服徭役的命令，“直省绅衿田地与民人一例差徭”[51]，但是这项规定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效果。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重申根除诡寄滥免的必要性，并指出衙役兵丁“效尤”，企图像乡绅一样逃避徭役责任。[52]雍正四年（1726年），四川巡抚建议取消乡贤所有优免特权，以杜绝滥用行为。朝廷坚持拥有土地的乡贤有且只有一个优免名额，乡贤们实际上必须承担所有形式的差徭，“其子孙户族冒滥，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53]。

雍正五年（1727年），为了杜绝乡贤田亩隐匿诡寄的可能性，朝廷规定“凡绅衿之家，一体编次，听保甲长稽查。如不编次者，照脱户律治罪”。不过，与村民承担的繁重杂役相比，乡

贤享有免役的政治经济特权，“绅衿既已身列仕籍，肄业胶庠……俱免充役”[54]。乾隆元年（1736年）的一则谕令体现出清代皇帝对乡绅担任乡里头领的担忧，认为士子还是宜以科举考试为主，步入国家行政系统的好。《乾隆实录》载，“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者，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免杂差，俾得专心肄业，倘于本户之外，别将族人借名滥充，仍将本生按律治罪”[55]。

乡贤是乡里社会权力的实际操纵者，所以，在召唤乡贤协助治理乡村的过程中，清代朝廷同时也开始警惕这类人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为了确保乡贤受到控制，朝廷在给予其最高规格的豁免权以及其他特殊照顾的同时，规定他们必须受到保甲组织的管控。不仅甲长、保长的职务被交给村落中的普通人，以求维持乡贤与乡民之间的某种力量平衡，朝廷还对乡贤采取一定程度的制约和监视，防止乡贤滥用自身权威，煽动并领导村民进行危及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很显然，这也激起了部分地区乡贤的不满与反抗，从保长的处境即可见一斑。胡庆均即指出，“他（保长）得同时侍奉两个上司：一是上级政府，一是地方绅士”[56]。

国家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很多乡贤士绅，利用特权欺压百姓、谋取私利。一些地区家族势力影响较大，乡贤的权力和地位较为突出，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通常利用特权地位将差役、税吏的侵扰转移给普通农民，更有甚者，与差役、税吏等官府人员勾结，将自己应缴纳的税额转嫁到苦于生计的农民身上。还有一些乡贤利用特权包庇其他渴望免除税额的人，从中获得非法利益。即便如此，大部分地方官吏在执行各种职务时，仍强烈地意识到乡贤协作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宁愿无视国家的规定也不愿意招惹乡贤，这就更加导致部分道德低下的乡贤横

行乡里。

因此，无论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法终止乡贤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不法行为，还是康熙元年（1662年）惩治乡贤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严正措施，都没有产生足够的效应。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有关防止乡贤逃税的详细措施终于被制定出来，官方登记册和“三联串票”上清楚载明需于规定期限内收齐乡贤税额，乡贤延期纳税的特权被取消。两年后（1730年），朝廷又令州县官员按季汇编乡贤税额名单。针对没有履行纳税责任的乡贤，根据拖欠税额的程度采取相应的惩罚，只有税额全部缴纳，受到惩罚的乡贤才能恢复其头衔。

乡贤在明清村落社会的治理和建设中，虽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十分明显。这在前文的讨论之中也不难发现。清中叶之后，各地骚乱与暴力反抗日益加剧。基于保护家族财富及生活安定的诉求，乡贤积极加强村落治安监控，开始支援团练组织训练。不少地方官员十分肯定乡贤在村落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必要性。清后期，刘衡在四川巴县担任知县时，依靠乡贤来推行保甲制度，成效甚著。^[57]此时，朝廷也逐渐接受并默认了乡贤对村落的干涉作用，没有反对和阻止这种趋势，地方官员也没有企图隐瞒依靠乡贤治理乡村的事实。

国家任命乡贤作为乡里组织的头领或顾问，以协助治理乡村社会，而乡贤则利用被赋予的优免特权和职责，不断增强自身地位和权威，以保障其权力和利益。费正清指出：“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士绅，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地方上层人物运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与政界的关系，还运用他们对儒家行动准则和地方行政的知识，既提供钱财，又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

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反过来，地方上层，尤其是那些大绅士，便一起利用他们与官府的联系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为国家制度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豁免权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免遭官府的勒索甚至没收。”^[58]但不管怎么说，乡贤在明清村落社会的发展中，部分解决了国家治理体系难以介入或是不能介入的各类地方治理问题，因而弥补了官僚治理体系的不足。所以，作为一个地方群体，乡贤是明清村落自治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

四、乡村教育与村落

为了使乡民更好地服从国家的行政统治，减少触犯国家律法，明清国家在理解乡民基本生活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于乡约制度之外，还设计有一套乡村教育的思想控制体系。大体来看，朝廷钦定儒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学习内容，将国家意识灌输给广大士子，又通过这些认同国家的地方官吏和乡贤士绅，以伦理教化的手段影响无数不识字的乡民。同时，由国家建立或批准建立的各种学校，遍及广大乡村地区。明清学校主要分为官办学校与非官办学校两大类。明朝的官办学校有国学，府、州、县儒学；非官办学校为社学，私人兴办的义学、乡学，以及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书院等。清朝的官办学校主要包括为皇族子弟、八旗子弟和拥有世袭头衔的家庭子弟等所办的特殊学校；非官办学校包括书院（或称之为学院），具有慈善意味的义学和乡村或社区学校——社学。其中，与乡村教育直接有关的是义学、乡学、书院和社学等乡村学校。

明太祖吸取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于洪武二年（1369年）下令兴建学校，“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

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59]。这一时期的教育以官学为主，并且学校多设置在县以上的城市地区。

及至明代中后期，乡村地区才开始广泛兴建学校。据载，很多地方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倡导下，乡贤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私学大量兴办。其中，书院建设如火如荼，新建、重修的书院达1662所。“书院乃儒生讲学明伦之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才者”[60]，一般由地方官延请有道之儒学者为师，选民间俊秀为弟子，“以明纲常之道，知修齐之理”[61]。成化五年（1469年），李龄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六戒》划定了书院的学习内容，“读书必循序，……先读《小学》，次读《四书》、《五经》、御制书、《史》、《监》，各随资历高下”[62]。明朝书院作为地方官办学校的补充，在办学意图、教学内容等方面与官办学校具有一致性，它们均采用儒生作为讲学人员，学习理学、心学等官方推行的正统儒学。不过，书院不以覆盖乡村教育为目的，而主要建在经济发达的乡村地区或城市地区，所以对乡村社会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

清初书院由地方官员和乡贤设办，属于半官方的私人教育机构。顺治十四年（1657年），湖南抚臣袁廓宇奏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这是清代第一所书院。石鼓书院的成立推动了全国各地建设书院的热潮。[63]雍正时期书院逐渐扩大到府州县城以及乡村地区。清代统治者汲取明代的教训，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东林党人”的局面，下令所有书院需由各管官员申报、查核、监督，制定有关书院的运作规则，当然，也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支援。雍正十一年（1733年）发布一道上谕，“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拨公营造，俱申报该管官查核”[64]，正式开启了

国家对地方书院的监管。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通过明确书院院长的选拔标准、书院管理规范、士子择取标准、教学教材内容、统一院长头衔等措施，逐步加强了国家对书院的控制。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时期书院渐呈废弛之势，教学质量和管理欠佳，“山长以疲癯充数，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65]，朝廷对此颇为关注，不断命令各省官员补救书院建设。在地方官和乡贤的努力下，几乎没有一个州县是没有书院的，乡村也有不少书院。

相较于书院，社学可以说是专门针对乡村地区设置的学校，因此社学对乡村地区的影响更为深远。明太祖规定每50户设立一所社学，雇请一位学识卓越、品德优秀的生员负责教授乡村学子。洪武八年（1375年）“诏有司立社学”^[66]。但由于官吏操弄，愿读书者无钱入学，或官吏逼令从事农商业忙于生计而不暇读书者入学，又对有钱不愿读书者放纵不管，社学一度停办。直到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月，明太祖复设社学，鉴于此前乱象，他规定“有司不得干预”^[67]。社学的老师由地方官、提学官聘任，或由乡民推举、地方官考核。比如福建龙溪县“凡乡里有社学，为父兄相与议，求有学识行艺可为师表者一人，推一二有力者为纠首，以诸生姓名列于关，敬谒以请。即许可，乃岁节后卜曰备礼，延至于学”^[68]。在教学内容上，除使用小学教材之外^[69]，明代社学还辅以历史、诗文和其他综合性训蒙教材，有时也用非专门的活动性教材。^[70]

清朝沿立社学。顺治九年（1652年）要求“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优贍。提学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71]。乾隆二年

（1737年）命令贵州创办社学，“至量加廪饩，动何钱粮，令该督随地酌办”[72]。为了照顾偏远地区适龄乡民的学习，礼部规定在乡村建社学：“州县设学，多在城市，乡民居住辽远，不能到学。照顺治九年例，州县于大乡巨堡，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内，有志学文，令入学肄业。”[73]不过，社学的目的在于广教化，使乡村年轻人明人伦、知法理，并非让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举。因此虽然社学作用较广，但教育层次明显不足。

义学与社学的区别不大，有时名称也混用。明中期后，由于社学败坏，由地方大宗族创设的义学逐渐占领上风，成为乡村教育的中流砥柱。最初义学主要由地方官府出资兴办。乡贤为了使族人参加科举考试，为家族争光，也开始聘请先生，专门培养本族子弟。义学的教师通常是科考失意的回乡士子。义学的教学内容以传统的小学教材《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孝经》等为主，兼习书算和八股文等举子业。[74]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朝的第一所义学创立。[75]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贵州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意入学者，都令送义学学习，后扩大为各省“聚集孤寒生童”立社学，立志读书。[76]自康熙以来，雍正和乾隆都格外注重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少数民族的教化，其缘由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一道谕令中得以明晰：“民生粗安，但移风易俗，莫过读书。”可见，义学和社学的基本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即为那些无力上学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明清朝廷认可了书院、社学、乡学等地方学校控制乡村的有效作用。在国家的支持和监视之下，乡村教育平稳地将钦定儒学的影响扩大到士大夫之外的广大民众。表面上看，国家几乎没有

给这些乡村学校制订任何教育计划，但实际上，国家在设置这些学校之初就有明确规定，即所有学校的教学都必须与国家钦定儒学保持一致。尤其要指出的是，雍正对义学的热情与关注，甚至超过了书院、社学。他在雍正元年就要求“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77]。雍正之所以将书院改为义学，可能是明后期一些著名书院变成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心，成为国家不稳定因素的缘故。

因此，清朝通过强调乡村教育中的义学，取代具有更高地位的书院，尽可能将更多的国民置于钦定儒学的影响下，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成为村落头领的人。乡村学校在国家的支持下，依靠学田的收入和捐助的基金，为乡村学子提供了学习机会，为乡村教师提供了薪酬和居所。也正因如此，朝廷成功地在部分乡村地区进行教育活动，并将乡村学子尽可能地纳入科举范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乡村学子可能的不臣之心，确保其不会成为国家的危险因素。清人就指出，“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廷学校之间安且静也”[78]。

由于科举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差别，明清乡村教育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明朝给予士子前所未有的鼓励，使得许多士子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清朝为了规避这一点，针对士子制定了许多禁行限制，试图牢牢掌控这一极易引发动荡的群体。明朝乡村学校中有对官府的公开批评、党争，以及不受压抑和控制的讲学论道。清朝则通过教育使乡村学子埋头苦读，将其引入钦定儒学的思想价值体系，以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然而在思想控制层面，乡村教育并没有产生令清朝统治者满意的效果。除了地方官员不

称职，科举制度与学校体系衰败，很多士子并未完全依照钦定儒学及其制度进行学习，有些甚至公然违背国家律法或冒犯钦定儒学伦理，以至于科考中经常出现欺骗、作弊、贿赂等非法行为。

进入士子行列需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贫困的平民子弟欲借此改变人生是困难的。阶层的固定性使得真正崇信儒学、忠于国家的士子难以得到步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机会。所以，在明清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村落社会，有能力或愿意将孩子送到乡村学校学习的家庭并不多，因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明清乡村教育并没有完全实现国家预设的教化目标。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否实现预期效果，乡村教育都将村落与国家更紧密地关联起来，为村落自治体系的人才来源以及村落社会的自我生长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智慧支撑。

五、民间信仰与村落

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类型比较繁杂，至少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和从西方引入的基督教等。不过，这些宗教信仰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与传统的汉文化思想和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差异较大，所以，尽管在一些乡村地区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仍被绝大多数乡民抵触，因而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在明代和晚清以前是有限的。佛教和道教在明清以前的历史时期就十分广泛地影响了村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包括佛教、道教和地方神明系统在内的宗教信仰，真正深入民间社会成为一种全民信仰，可能在宋代以后才发生，直至明清才达到鼎盛^[79]。杜赞奇曾在考察中国华北村庄的宗教时明确指出，“在晚清时期，许多村庄除了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族组织，再无其他全村性的组织。所有村民被自然而然

地包括在宗教组织之中，而非本村人则排斥在该组织之外”[80]。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共同的神明信仰，使超越宗族的修葺庙宇和祭祀活动成为村落社会的常态，起到了整合村域内、不同村落、不同氏族、不同阶层的作用。换句话说，共同的民间信仰明显强化了传统村落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一座甚至多座对应的村庙、神坛和土地庙，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独立成村的标志就是土地庙的建立。[81]据杨庆堃统计，1882年，河北省定县平均每个村有7间庙。广东附近一个名为南庆的村子有233户人家，共有8间庙、祠堂和神坛，平均30户有1间庙。[82]可以说，围绕宗教信仰展开的包括建庙、修庙、祭祀、节日庆典等一系列仪式，特别是对土地神和农业神的信仰活动，有力地强化了村民同属一个地缘集体的认同。因为同属一祭祀圈，“宗教规范了社区生活及其价值系统——表现为一种人们敬畏并遵守的宗教特征”[83]。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数以千计的明清造像发愿文中所录载的每一项内容，都有“某某土地”的惯例[84]，也充分表明作为管理一方土地的神灵，“土地公”具有地域边界的意义。直至今日，在湖南、江西等地的村落，在人死后都要去当地土地庙行“告知”仪式，即便没有了庙，也要在原来的土地庙址旁祭祀。（见插图9）近代以来，有些村落的空间布置甚至完全受到了某种宗教信仰的影响和制约。譬如，台湾苗栗市嘉盛庄就是以文昌庙及其四周的土地庙为节点展开布局的。[85]云南的傣族信奉佛教，村落入口处或村落中心建有佛寺，全村以佛寺为中心展开布局。类似的例子在云南的拉祜族、布朗族、佤族的村寨中也较为常见。[86]

不过，要注意区分的是，除了一些特别的少数民族如傣族，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并非泾渭分明的佛教或者道教，而是儒释

道三教合流且又融入了地方神灵体系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如此繁盛，并深刻影响村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不仅与村民的信仰表达密切相关，而且从历史的大环境来看，显然与明清王朝的积极介入不无关联。

从历史来看，明清朝廷对民间宗教信仰都予以十分严格的控制。明代初期，为了防止佛教和道教无限壮大，朝廷对其实行了严格管理。《徽州府志》载：“江南有寺观始于三国吴，而本府有寺观始于晋，历唐及宋元而益炽洪。惟我高皇帝稽古为治，于佛老虽不废其教而给牒度，天下郡邑僧道则有定额，未尝少滥。洪武二十四年又下归并之令，合数寺观各立一丛林，且严私创庵院之律，故本府寺观皆仍前代之旧，未尝少有似创者。”^[87]与明朝大致一样，清朝也把民间崇信宗教视为异端，给予严厉打击。

《圣祖十六条》中有一条就是“黜异端以崇正学”。所谓“正学”无非就是在国家认同和控制范围内的学说，而“黜异端”则不免包括限制佛道等宗教在民间的发展。安徽绩溪《石川周氏祖训十二条》“十杜邪风”载，“近世僧道又添恶习，聚众金鼓狂奔呼喊作暴戾之气，引妖魅之风，乃王法所当禁者。一村钱谷有限，都在塑佛造寺延僧布施上用了，所以族中一切正事都无力去做”^[88]。可见，佛道等宗教的过度发展不仅使明清朝廷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引起了宗族组织的抵制。

实际上，在有度限制佛教和道教等宗教在民间发展的同时，明清国家并没有完全阻隔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还试图为民间社会提供一整套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明清国家的这一做法，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命有司岁时致祭”。洪武二年（1369年），虽然规定地方

神祇不被官方致祭，但由于其有功德于百姓，可以保留民间香火，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二年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确定了淫祀的范围，但对淫祀的态度尚显温和，只称“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89]。嘉靖后，地方志编者对淫祀的定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将正祠放在《祀典志》中，淫祠放在《杂志》中进行编修。^[90]明王朝对地方祭祀及宗教信仰的控制逐步强化，不仅要求全国各州县崇拜正祀，还要求官府鼓励民众参加祭祀活动。但乡村中不被官方承认和允许的淫祀十分普遍，构成了民间信仰最主要的内容。因此许多地方官往往入乡随俗，对其采取礼仪性做法。^[91]

到了清朝，国家规定的大祀、中祀、群祀对象更加明晰，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受尊敬的、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和关帝；二是具有崇高道德表现、宗族影响力、典型服务事例的名宦乡贤；三是护佑生产生活之神，如风伯、雨师诸神；四是不适当安抚便会招惹灾祸的无祀鬼神。^[92]对前两类对象的祭祀是将儒家道德伦理扩大到宗教信仰层面的体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强调其推崇的价值观念，如德行高尚、爱国忠贞、保卫国家，建构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乡村社会秩序。祭祀第三类对象是对主宰着人类生存的神灵表达敬意。清代国家希冀借此表达国家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精神抚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平民百姓的怨恨。第四类是此前从未正式规定过的官方祭祀对象。清朝规定全国各地依时享祭，按行政层级分为泰厉、王厉、郡厉、邑厉、乡厉之祭，供奉城隍作为主祭。其中“乡厉”可以当作“县坛”，在地方志中被广泛提及，主要作用是祭祀乡村中的无祀鬼神，并因此成为村民祭祀仪式的活动中心。

从祝祭文可大致知晓设置厉坛祭祀的原因，即向当地神祇汇报恶人和善人，借用鬼神的力量，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惩罚或回报。“本厅阖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耗损贫民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刑宪。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厅官吏，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93]。虽然厉坛不是地方祭祀的主要对象，在清末之前已然消失，但祝文间接地说明了官方祭祀的真正目的，即利用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地方祭祀来左右乡民的思想，使村落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同时，巩固与维系国家的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信仰祭祀，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共同体式关联便在潜移默化之中得以显现。这不仅是国家主动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是村落社会积极回应的结果。当然，实际中也会出现与此相左的情况。朝廷期望合法的祭祀活动，让乡民成为良民，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当乡民的需求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这一期待往往就会落空。一来，乡民通常越过地方官主持的不灵验的祭祀活动，主动选择祭拜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好运和保护的地方神灵。二来，处在社会底层的村民，生存条件恶劣，他们全身心为了生计而活，所以，其宗教信仰带有现实的功利性，较少关注国家的诉求与期待。进而言之，乡民更加敬重能对自己生活产生影响的神祇，因此对地方官吏主持的农业神祭祀和其他神的祭祀

更感兴趣。相对于有形的国家的势力和权威，他们更畏惧无形的神灵的力量。

在官方拟定的地方祭祀和民间多样的祭祀活动的交织中，乡民产生了粗略的多神论信仰，这种宗教态度使他们更容易服从政治思想控制。他们受尽磨难，深知现世的生活状况已无法扭转，唯有寄希望于来世顺遂，因为害怕此生作恶带来阴谴，所以努力行善积德。这种人生观念有助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起义暴动的反社会行为。宗教控制的效果，取决于国家达成或维持最低程度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清后期，乡村地区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社会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此时非法的、非正统的宗教活动蔓延，这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无能为力。

从明朝“分社立庙”，成立地方社祭制度，到清朝“神道设教”，以宗教教化控制乡民思想，乡村宗教信仰随着祭祀系统的发展而变化。可以说，乡村祭祀系统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结合，祭祀活动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存在实态和历史变迁。以村落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活动按照神祇灵力的大小进行分类组织，虽分类不存在明显的级别，但在神祇特别灵验之地形成的庙宇通常会成为崇拜神祇的中心。[94]

[1]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 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

[3]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4]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6页。

[5] 陈炎宗纂：《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乾隆十七年刻本。

[6]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06页。

[7] 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载贺长龄编：《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礼法五·宗法上》。

[8] 《苦竹王氏宗谱》卷一《祠规》，道光二十七年版，第二册，1a—b。“族中言语小忿即田产钱债等事，俱赴祠呈禀，处明和解。事有难处，方许控官究理。若不先呈族长，径自越告者，罚银五两，入祠公用。”

[9] 《永明上甘棠周氏族谱·祖训十条》，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修，上甘棠村博物馆。

[10]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11] 《永明上甘棠周氏族谱·祖训十条》，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修，上甘棠村博物馆。

[12] 黄云修、林之望、汪宗沂纂：《续修庐州府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据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影印，34/29b、53/10a。

[13] 《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康侯公传》。转引自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14]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02—403页。

[15] 建阳《重修黄文甫公族谱·凡例》。转引自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16] 《永明上甘棠周氏族谱·祖训十条》，民国十二年（1923）重修，上甘棠村博物馆。

[17]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 I, pp.225.文献中这样划分宗祠：“宗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祭拜同姓、拥有亲属关系的所有家庭的祖先；一种是祭拜同姓、具有近亲关系的一房的祖先。”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事例中，一个宗族拥有许多宗祠、祭田或祖塋。Edwin D. Harvey, *The Mind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244-246.文献中引述了在宗祠和祖先坟地举行的祭祀仪式如下：“有些规模比较大的宗族（由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生活在同一地区），他们成群结队去祭拜。无论富或穷，全都集合起来。甚至乞丐也到祖坟面前下跪，祭拜。这一活动称为‘扫墓’‘拜山’。在其中一些场合，……即使家族有两三千人，即使其中一些成

员非常富有，另一些在政府担任高官，但无论老少、富穷，全都被召集到‘祖宗祠堂’（或称宗祠）里。杀猪宰羊，各种各样的祭祀品琳琅满目。在这些场合，祭祀队伍从宗祠行进到坟地，以主要人物的官阶被允许的最壮观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是在祖宗墓地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基本情况。但对许多人来说，祭祀仪式中最好的部分，是在祭祀结束之后举行的宴会。烤全猪、米饭、鸡、鸭、鱼、水果、酒等都被带回祠堂，然后在祠堂举行宴会，他们按照年龄、地位坐好，吃喝玩乐。”

[18] 织田万著，李秀清、王沛点校：《清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由此观之，族正也是一种警察机关……“族正”的职掌，与“保正”“甲长”并无不同。这一点在一项法律条文中规定得非常清楚：“地方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

[19]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31页。

[20] 要求族正汇报自己亲属中犯法者的规定与“雍睦”原则相矛盾，甚至与儒家思想主张人性的根基在于神圣的家庭关系相冲突。

[21] 《永明上甘棠周氏族谱·祖训十条》，民国十二年（1923年）重修，上甘棠村博物馆。

[22]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3] 申时行等重修，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357页。

[2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7页。

[25]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南赣乡约》，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

[26]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仰南安赣州印行告谕牌》，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

[27] 吕坤：《实政录》卷五，浙江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刊本。

[28] 吕坤：《实政录》卷三《查里乡甲》，浙江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刊本。

[29] 吕坤：《实政录》卷三《查里乡甲》，浙江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

重刊本。

[30]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光绪间武英殿石印本，397/1a。

[31]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四《讲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32]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四《讲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强调防止不法社会行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桑农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诚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33]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二《学校规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4]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四《讲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35]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四《讲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36] 《村规民约碑》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经湖广永州府永明县正堂李批示设立，原保存在上甘棠村周氏祠堂中，现存于上甘棠博物馆，全部内容如下：1.钱粮重务须要早还，毋致连累保甲，如违指名送官处究。2.子弟须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违者家法责三十，仍送官处究。3.禁不许勾引外坊贼盗，违者家法责三十，罚银一十二两，修理祖庙桥路，送官处死。4.禁不许乱伦灭义，违者家法责三十，罚银一十二两，修理祖庙桥路，送官处死。5.禁后龙山不许砍伐竹木寻笋，以致疏通贼路，违者家法责二十，罚银一两二钱，捉拿者赏银三钱，送官处究。6.禁田园瓜果六成生理不许窃取，违者家法责二十，罚银六钱。捉拿者赏银三钱，凡一切窃盗俱以此论。7.禁不许赌博，违者家法责二十，罚银五钱。窝家同罚。8.禁一更尽下不许夜行，如有紧事，须持火扬声，违者即以盗论，送官处究。9.吾村界连粤西，贼盗出没无常，凡后生坐草，得一功者，众赏银二两。10.妇女须要遵守闺房，各勤纺织，不许出外游行，违者家法责父兄二十。11.禁不许倚强欺弱，违者罚银一两二钱，家法责二十，仍送官处究。12.禁不许吹毛求疵，违者罚银一两二钱，家法责二十，仍送官处究。

[37] 沈日霖：《粤西琐记》，载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上海著显堂印，光绪三年至三十三年，2/181a。

[38]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39页。

[39]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40] 笔者曾在《小村落，大文化》一文中，引用了明清湖南地区的几块碑刻文献，当中就涉及相关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参读。见胡彬彬：《小村落，大文化》，《光明日报》2013年5月6日，15版。

[41]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42]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43] 郝秉键：《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

[4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45]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46] 《澳门月报》第一卷，第11期，1833年3月号。

[47]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48] 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页。

[49] 《佛镇义仓总录》卷二《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转引自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50]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五《职役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72页。

[51]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二《职役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51页。

[52]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田赋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66页。

[53]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五《职役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73页。

[54]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五《职役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72页。

[55] 《清实录·乾隆实录》卷十二。

- [56] 胡庆均：《两种权力缝中的保长》，载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书店1949年版，第136页。
- [57] 刘衡：《刘廉舫先生吏治三书》，《庸吏庸言》，江苏书局同治七年刻本，第88页。
- [58]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 [59] 《明史》卷六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
- [60]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 [61]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 [62]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 [63]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学校七》。
- [64]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78页。
- [65]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学校七》，第8589页。
- [66] 《明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 [67] 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文教科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 [68] 《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四时风俗》，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17页。
- [69] 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小学言之，朱子《小学》书，教之之具也。……天下之事，无本不立。小学，学之本也。”
- [70]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 [71]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五《职役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72页。原书载：“（顺治）九年令直省州县置社学，师免其差徭。”

[72]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73]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二十五《职役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72页。

[74] 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75]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76]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77] 素尔讷纂，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78] 管同纂：《异之文集·拟言风俗书》，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七。

[79]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车锡伦：《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任思亮：《明清民间宗教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80]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81] 林美容：《土地公庙——聚落的指标：以草屯镇为例》，《台湾风物》1987年第37期。

[82] 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83] 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84]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数以千计的造像记发愿文，有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可参见胡彬彬、吴灿著：《祈福禳灾：道教造像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胡彬彬、李方著：《祈愿延绵：佛教造像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5] 潘朝阳：《苗栗嘉盛庄村庙的空间配置及其内涵》，载《台湾师大地理研究报告》，1990年第16期。亦可参见潘朝阳著：《台湾汉人通俗宗教的空间与环境诠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28页。

[86]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87] 《徽州府志（弘治）》卷十《寺观》，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88] 《安徽绩溪仙石周氏宗谱·石川周氏祖训十二条》。

[89] 《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四》。

[90]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14册。转引自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2期。

[91] 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9页。

[92] 允陶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六《礼部》，遵旨重刊武英殿聚珍版，第1—5页，载完整的祭祀清单。

[93] 转引自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61—262页。《夔州府志》（1827年），19/37b—39a；《普安直隶厅志》（1889年），8/8b—9b；《仁怀厅志》（1895年），2/44b—46a都收录了厉坛祝文。

[94]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8页。

第三节

明清村落的发展与变迁

一、村落的分布与地域差异

村落作为中国乡村地区社区生活的基本单位，其数量、大小、组织程度、活动数量，受人口密度、区域面积、自然地理、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等因素影响，从而使村落呈现出不同的外观和特征。随着村落人口的增加与村落经济的扩张，村落内的有限资源往往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经济需求，即便是某些拥有商业街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村落，也必须依靠附近的市集、城镇和其他村落。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村落开始开展定期贸易活动，因而与一般村落区别开来。当这个村落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就会转变成城镇。天灾饥荒、战乱屠杀、政策导向等特殊的社会环境，通常也会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而产生大量新的村落，以及填充没落的村落。比如清朝推行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关内移民迁入东北。黑龙江东部尚县的许多村落便是由关内移民所建。

大体来看，全国不同地区村落的物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在清末穿行中国之后指出了这个差异：“一路所过，很容易得出中国各地人口聚居情况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举例言之，如果你在华中各省沿着陆路旅行，很容易认为中国乡村人口比实际上少。村落不多，而且相互距离遥远，荒地不少，很容易使人不时认为自己身处（东欧中亚的）鞑靼沙漠

之中。但是，如果在同一省份沿着水道或河流旅行，乡间的外观就完全改变了。你经常会经过人口不少于两三百万的大城，同时，小城镇和大村庄，一个紧挨一个，几乎接连不断。”^[1]他通过对比湖北省和四川省的村庄，指出不同省份的村庄之间存在差别，并将这些差别归因于地理与经济条件：“湖北省的土地不怎么肥沃，而且布满了众多池塘和沼泽。……该省村庄的外观一般非常贫穷而可怜；居民们的外貌不健康而且相当狂野，经常为皮肤病所苦。据说，湖北省一年的收成很少足够应付一个月的食用。该省城镇的众多人口，要仰赖邻省供应；特别是一年收成十年都吃不完的四四川省。看来，好像是四川省的富饶和美丽为其居民带来了相当好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举止比其他省份的中国人要高雅得多。大城镇至少相对来说要干净、整洁。村庄，甚至农田的外貌，证明居民们拥有相当舒适的环境。”^[2]经济条件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还影响了村落的分布和大小。

除经济条件之外，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社会组织的差别，更加具体地将北方与南方的村落形塑成两种反差明显的类型。黄河流域主要呈现为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聚居型村落；长江流域虽有不少聚居型村落，但散居型村落更多，房屋经常分布得比较松散。^[3]此外，良好的地理位置和特点也对村落的自然发展大有裨益，不仅使村民免于水患灾害，还可以作为储藏粮食的绝佳之地带来经济的繁荣，从而使村落的规模发展得比一般村落要大。

无论是不同地区的村落，还是同一地区的村落，其自然面貌和区域开发程度，都随着人口数目、耕作土地、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村庄之远近、民户之多寡、地亩之总数、粮银之成数，最关紧要。”其中，土地质量是影响村落分布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从区域条件来看，由于南方地区的

土壤普遍比北方地区肥沃，因此南方村落的人口通常比较多。或者说，正是由于南方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地力强健，才足以吸引先人开垦定居。随着乡民的开发劳作，村落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比如清末广东南海县“居民聚居在三家村和村庄里。……在南海县（该县位于广州城的西面）和周边超过100平方英里的乡间，分布着180个……村庄；每村的人口……从200以上到100 000不等，但通常在300到3500之间”[4]。从村落分布来看，村落分布距离与土地质量成正比。在土地非常贫瘠的地区，村落不但距离比较远，而且比较小，反之则村落密集、繁荣且规模较大。

从耕地面积来看，由于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因而粮食产量有轻重多少之别。“地肥粮重之村，地少而银多；地瘠粮轻之村，地多而银少。”[5]耕地面积与村落人口之间的关系，可从正定地区的例子窥得一二（见表7-6）。正定县共12个社，共领214个村落，百姓通常会聚居在土地资源丰富、营收利润较大的村落开展生活，除了一些村落由于人户较少，开垦土地面积不多，其余村落的粮银收益标准基本相差不大。不过，东原社的东兆通村虽然合118户之力开垦了12 810亩地，但是粮银仅有78两，远远低于其他村落的水平。这说明村落的人口与规模是与土地的价值和能力息息相关的，乡民自然不愿意聚集在土地贫瘠之地辛苦劳作而一无所获。此外，乡民与卖主之间的买卖关系也会导致地尽粮存、有地无粮的情况。地数、银数的不符，也会使村落社会陷入困境。

表7-6 正定地区人户、耕作土地、粮银数量统计

社名	统领村落数量	村名	人户	入册的土地数（亩）	粮银（两）	社名	统领村落数量	村名	人户	入册的土地数（亩）	粮银（两）
东关厢社	17	朱河村	363	12 141	362	东原社	16	东塔子口	235	7 199	238
		诸福屯	197	6 532	184			石家庄	211	2 599	146
		罗家庄	171	2 601	140			西兆通	181	6 016	176
		南牛屯	107	4 110	110			凌透	164	3 855	123
		南圣板	92	4 116	181			十里铺	123	1 132	55
		三里屯	78	1 602	48			东兆通	118	12 810	78
		南永固	71	1 560	90			大丰屯	90	2 609	108
		树路	69	1 467	65			西塔子口	88	2 401	74
		侯家庄	60	757	40			侯丈	80	1 247	36
		北永固	52	2 120	91			西庄	75	1 257	51
		盘桃村	49	251	7			店上	64	1 192	70
		东邢家庄	44	1 526	67			东庄	56	1 256	39
		中圣板	39	593	26			西庄屯	29	1 115	54
		东贾村	31	2 465	120			小屯	25	663	39
		东关厢	30	322	24			东原村	15	199	8
		北圣板	23	1 461	67			北中奉	10	228	130
		吴家庄	23	124	4			—	—	—	—

社名	统领村落数量	村名	人户	入册的土地数（亩）	粮银（两）	社名	统领村落数量	村名	人户	入册的土地数（亩）	粮银（两）
五女社	13	北庄	155	4 036	148	辛庄社	14	西养凌	238	7 203	341
		南村	145	5 189	200			刘村	232	1 137	191
		南杨家庄	140	5 624	224			东养凌	118	2 329	154
		小西丈	112	3 694	165			宋营	200	5 674	269
		赵村	108	2 241	106			韩同	192	5 662	275
		赫家小营	105	2 681	97			二十里铺	140	2 927	186
		大西丈	86	2 608	69			北豆村	113	1 731	86
		吴家营	83	1 734	55			南豆村	108	1 946	136
		北五女	73	4 158	183			周通	65	1 605	79
		杜家庄	61	1 497	54			小岗	53	1 573	59
		东董家庄	48	1 197	77			辛庄	46	988	52
		南五女	47	1 193	65			杜贤庄	45	643	12
		东五女	15	153	12			白伏	23	7 576	258
		—	—	—	—			八方	17	1 273	42

资料来源：《正定县志》。[\[6\]](#)

有关人口数量与村落规模之间的地域差异，可从延庆、儒林两地的比较中看出。（见表7-7、表7-8）处于北方的延庆地区分东南西北四路，共有63 807人，每村平均人数大约265人。坐落在东路的村落，人口较多，平均329人。村落仅有数百人是明清时期的普遍情况，人口众多的特大村落则别具意义，比如南海县、儒林乡。位于南方的儒林地区总人口为92 579，每村平均人数为2 300人。东面的村落人口同样较稠密，平均每村大约有4 200人。萧公权等学者指出这种南方的大村落说明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村落也能发展得极为繁荣，它们实际上已具有城镇的规模。而同一地区各个村落的规模变化也相当大，儒林地方志编修者指出在全部村落中，最大的村落规模超过了1 000户，而最小

的村落仅有40户。假若每户人数不少于5人，其中最大的村落人口则超过了5000人，而最小的村落在200人左右。《延庆州志》提供了有关241个村落、市集和城镇的详细材料。这些村落的规模相去甚远，最大的村落有2692人，最小的村落只有12人，人口规模在100~199人的最多，占有记载的村落数量的39.27%。

表7-7 延庆地区村落、人户、人口数量统计

村数	户数	人数
87（东路）	5 310	28 625
69（西路）	2 990	16 035
50（南路）	2 270	12 227
35（北路）	1 280	6 920
总数 241	11 850	63 807

资料来源：《延庆州志》卷二《舆地》。[\[7\]](#)

表7-8 儒林地区村落、人户、人口数量统计

村数	户数	人数
6（东面）	4 572	25 318
16（西面）	3 462	19 334
9（南面）	2 108	11 466
9（北面）	7 033	36 461
总数 40	17 175	92 579

资料来源：《九江儒林乡志》卷五。[\[8\]](#)

二、军事发展与戍边村落

明初，在北元势力以及南方割据势力如福建陈有定、广东何真等的不断滋扰之下，朝廷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北伐与南征并举之际，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攻势。在南方地区，由于动乱力量分散、政治目标不明确，只能造成局部威胁；而西北地区与藏族接壤之地相对安宁。明朝的根本威胁主要来自北元势力。因此，明代国家格外重视戍边，“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 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9]。此后，卫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事发，明太祖革中书省，将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设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掌军旅之事，“每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各一人”，“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10]。大体来说，五军都督府主要承担四方面的职能。一是执行武职的选拔、袭替。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由兵部选定，按府、都司、卫所的层级通知及执行。二是卫所军队的操练。三是屯田屯军的管理。四是处理和上报军情。[11]卫所成为新的军事系统中最基础的单位，有关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悉数知晓，是国家加强地方控制的有效手段。

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直接对抗的同时，明代国家在辽东到甘肃的漫长北部边疆地区设置了众多都司、卫所重点防御。洪武三年至九年（1370—1376年）先后设立了兰州、庄浪、宁夏和凉州四卫。洪武十七年至三十年（1384—1397年）又陆续设置了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六卫、宁夏四卫、肃州卫等。河西地区的卫所设置远远超过了宁夏与兰州等地。黄河上游地区西接哈密、赤金蒙古等关外七卫，界在羌番、回虏之间，南控西番十三部，北

御蒙古各部。为了达到“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的目的，明朝建设了南北两条防线，^[12]陈设重兵，把边防村落串联组织起来，修建了由“行都司城—卫所城—堡寨”构成的军事体系，试图对河湟地区的藏族各部和内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进行军事防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17个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内外卫，65个守御千户所，之后措置不断变化。^[13]

明初世兵制盛行，即卫所上下官兵，子承父业，世代为军，这就为戍边村落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保障。一般而言，从征、归附、谪发是明代卫所军兵的主要来源形式。《明史》载，“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14]。卫所军兵主要承担两方面的职责：守卫地方以及屯田生产。“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15]。建文四年（1402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屯军进行屯田生产供给军队，使卫所成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武装集团。

永乐二年（1404年），“更定卫所屯守军士。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平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皆屯多于守”^[16]，又定屯田官军赏罚则例。之后历任皇帝都十分看重屯政，不断强调兴屯、核屯，但是这样长期背井离乡的生活使军兵活力降低、压力剧增。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低下，军队的生活并不好过，封闭的集团自治必然加重对屯军的剥削，军官的待遇自然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某些军官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优惠，出现了官豪势要占匿、内监占夺的现象，且愈演愈烈。宣德年间，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三司，为封

疆大吏，“而专阉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17]。由此，明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沿着以部制府、以文制武的方向变化，并逐渐统一于文官的兵部。

正德（1506—1521年）以后，在沉重的军役负担下，明朝军队弊病丛生，军兵想方设法逃离、罢耕，此时卫所军队已经战不能战、守不能守。[18]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一些朝廷官员的警觉。嘉靖时期的给事中管怀理认为，屯田不兴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疆场戒严、牛种不给、丁壮亡徙、田在敌外。这最终导致“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19]。所以，明朝为了确保兵役的正常运作，同时实行了征兵制、募兵制来补充军兵。征兵制即令派民壮，由地方出钱雇募成为守卫地方的民间力量，他们不能像正规军一样东征西戍，因此募兵成为弥补卫所军兵不足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因募兵制依赖大小村落及乡民的组织力量，所以一些地方陆续新建了数量众多的镇戍营堡。

在北部边防形势趋于稳定的同时，明朝军事作战指挥产生了思维惯性，片面地以为防御在于“守”，因此大力修建长城、城堡、墩台及边墙。久而久之，经过几代之后，那些新建的镇戍营堡便逐渐演变为了边防村落。因此，所谓边防村落，事实上就是因军事需要发展，经屯兵或移民实边之后，在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类村落。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边防政策，在与边疆蒙古族联盟的前提下，又将其视为主要的防御对象。其军事体系也参照明朝旧有军制，在原有的满洲八旗制的基础上发展。“旗兵者，乃蒙古部落之一种民兵，即藩部而统以旗籍者也。”[20]顺治二年（1645年）“遣八旗官兵驻扎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等处，此设驻防之始也”[21]。为了镇守险要之地，清朝不断增派驻防，并特设将军、都统大臣专辖之职。将八旗兵分

为在京师的禁旅以及分镇各省的驻防。八旗兵以骑兵为主，兵力有限，在南方广大的山地林区又多有限制。

所以，清朝立国之后，便将招降前明的卫所汉军近60万人，编制扩充到清军队伍，以巩固广大的边疆乡村地区，并用绿旗为标志，以示与满军的黄、白、蓝、红四色军旗的区分，因而这些绿旗汉军又被称为绿营兵或者绿旗兵。清朝军制的改革慢慢将明朝的军事城堡行政化，或进行裁撤。而此时黄土高原地区“旧边”及其沿边地带的裁废并不突出。如西偏的西宁府，反而增加了十几个。甘肃大通卫改称大通县，又在镇海堡、西大通堡等地方增设军防。可见军事布防逐步集中于核心地区的边防重镇。因此，明代以来形成的边防村落不仅得以存续，还为新的边防村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清初朝廷对边防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在东北，封禁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在蒙古地区，实行垦禁、商禁、矿禁；在新疆地区，明令禁止各族人民在边疆地带开垦种植。不仅如此，朝廷还严格控制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交往互动。长期实行封禁使得边疆边防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官兵难于驻守，从而导致难以设防，边陲空虚。直到康熙年间，清皇帝改变了一贯的边防方针，“不专恃险阻”，而“在修德安民”，主张充分利用蒙古族的力量，认为以蒙古族为边疆屏障，比长城更加坚固。^[22]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在巡查地方之时发现驻防扰民事件，兵部强调各省驻防官兵是为了安民守地设置的，所属官兵都应当严加钤束，“照所定法例遵行，此以知驻防之设，纪律严明，兵民辑睦，洵足壮千城，而固封守也”^[23]。

清朝针对西北地区的边境布防十分谨慎。首先，在对青海划分盟旗分而治之的基础上，在西宁北川经扁都口至甘州600多里的地区修筑边墙，不许他们过界放牧，以隔绝蒙古与吐蕃的联

系，并在此后不断开发本土资源，加固对边境及牧民的控制。其次，增设营镇，加强核心区域的镇守。针对和硕特部重点攻击的西宁、和州、布隆吉尔等地区，增设总兵、参将，统兵镇守。再次，归并裁撤部分驻军。清朝逐步集中对黄河上游地区的布防，如宁夏裁汰一千绿营入大通镇。由于西宁地区控制了蒙藏交通的要冲，因此朝廷将周边地区的防务均置于其管辖之下。同样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比如打箭炉、凉州、甘州、肃州等地亦是如此。国家通过军事功能的行政化，将其置换到基层建制中，打开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沟通，加强了清朝对边疆地区以及各族民众的直接控制。也正是这些做法，为边疆村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安稳的社会环境和周边条件。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朝内部的民族矛盾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相比，带来的影响及其范围更小。因此，一方面，朝廷不再修建象征着历代国防的长城，而主要以官军和边疆广大乡村地区的百姓用武装捍卫边防。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开始有了近代国家边防的思想观念，重新认识了国家边防和防御对象，比如北部边防的防御对象从蒙古族变成了俄罗斯。为了边疆安宁，自康熙帝后，清朝与邻国举行了若干次边界划界谈判，签订了若干个边界条约。^[24]这些边界条约签订后，清朝疆界大致固定，边防因而日渐懈怠。封建统治最终走向废弛，边防村落更是民生困顿。

三、人口迁移与村落

（一）洪洞大移民与村落

受元朝末年长期战乱屠杀、水旱蝗灾以及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口死亡等因素的影响，明初全国土地大面积荒芜，严重影响了明

代国家的赋税收入和社会稳定。为此，朝廷一方面积极完善移民组织系统，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和打击百姓自发迁移，希望在可控的范围内纾解人地关系、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和延伸帝国版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25]，官方迁徙活动划定了移民区域，优化了移民特惠政策，计划以移民的方式扩大农业垦殖。明初户部郎中刘九皋曾鼓励将窄乡之民移到河北、河南、安徽、陕西等宽乡人少之地，称“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26]。同时，国家制定了各项优免措施鼓励民众徙居开荒，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27]。

在明朝最初建立的几年里，北境边界不断遭受北元势力的威胁，境内局势也不明朗，河北、河南、四川等省原住民数量急剧减少，国家百废待兴。为了实现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四川盆地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的移民政策主要围绕军民两大群体进行。一是卫所制度以三分戍守、七分屯种为原则。大批军兵带着家属迁入驻地，加速了当地的开垦进程，形成了军屯型村落。二是将民籍迁移分为屯垦和非屯垦两种形式。“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28]在人口大量流失的华北地区，统治者规定将移民纳入屯的管理体系，“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29]，大约平均以110户为1屯，设屯长督课农桑，因而形成了移民型村落。

从历史上来看，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主要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开展。山西位处华北，地理条件优厚，自然灾害和战事较少波及这里，人户数量相当可观，因此“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

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30]。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是官方设立的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的移民处。这次移民通常被史学界称为“洪洞大移民”。

明代朝廷组织的山西移民活动从洪武初年延续到永乐年间，历经44年，共计17次，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二是充实新都城北京，三是填补因战乱而变得闲旷的乡村地区。响应招募屯田等迁徙政策的徙居者，大部分为无田无业的贫苦农民，他们拿着分拨的道里费、口粮到达迁入地，享受赋役田租一定程度的优免，开始了新的生活。除此以外，军兵也是洪洞移民的组成部分。移民政策成了稳定新政权的经济手段。这些因国家组织移民而形成的村落，多以“某某屯”命名，其中尤以“某姓”加“屯”命名的方式最为常见。如今山东西西部地区就有“李家屯”“张家屯”“周家屯”等村庄。

表7-9 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1373—1417年）山西移民情况

时间	迁出地	迁入地	徙居者
洪武六年 (1373年)	山西、真定	安徽凤阳	民
洪武九年 (1376年)十一月	山西、真定	安徽凤阳	民无产者
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八月	山西泽州、潞州	彰德、真定、临清、 归德、太康	民无田者、无业者
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九月	山西	大名、广平、东昌	贫民
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九月	山西沁州	—	民张从整等116户告愿应募 屯田
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八月	—	大同、东胜。在平阳选 民丁立9卫；在太原、 辽州、沁州、汾州，选 民丁立7卫	冯胜、傅友德、开国公常昇 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共立 16卫，每卫5600人，大约 89600人

时间	迁出地	迁入地	徙居者
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十二月	山西	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	愿迁居民 598 户
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正月	山西	塞北	马步官军 26 600 人
洪武三十五年 (1402年)九月	山西太原、平阳二府， 泽州、潞州、辽州、 汾州、沁州	北平各府州县	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
永乐元年(1403 年)八月	山东、山西、陕西、 河南	北京	罪囚及其妻、子
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山西太原、平阳、泽 州、潞州、辽州、汾 州、沁州	北京	民万户
永乐四年(1406 年)正月	湖广、山西、山东	北京	郡县吏李懋等 240 人愿为民
永乐五年(1407 年)五月	山西平阳、泽州、潞 州，山东登州、莱州等	北京	5 000 户
永乐十二年(1414 年)三月	山西	—	流民
永乐十四年(1416 年)十一月	山东、山西、湖广	保安州	流民 2 300 余户
永乐十五年(1417 年)正月	山西平阳、大同、蔚 州、广灵等府州	北京、广平、清河、真 定、冀州、南宫等	民

资料来源：《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31\]](#)

在有关洪洞大移民的记载中，山西向邻近省份山东移民的范围遍及92个县（市），在东昌府属县茌平、聊城，更是彰显了移民对村落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山西迁往东昌府的移民约有111 880人，主要分布在其属下7县：包括比较偏僻的南部县境，如观城、范县、朝城、濮州等，平均每县移民5屯；西部各县如莘

县、冠县、馆陶和邱县，每县移民5屯；北部各县如武城、博平、恩县、高唐、清平和唐邑，每县移民18屯；聊城、临清、夏津、茌平这样的中心大县移民人数最多、范围最大，平均每县移民27屯，总计268屯。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东昌府各属县新形成不少移民村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县屯格局。茌平县有25个原生村落，由山西移民建立的村落占全县村落总数的70.24%，建村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显然直接受到了洪洞大移民的影响。聊城也是如此，原生村落为29个，由山西移民建立的村落占全县村落总数的71.62%，这个比重与茌平不相上下。直至今日，一些因明代洪洞移民而形成的村落中仍然流传着当时的一些故事或谚语。如，在黄淮地区就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

表7-10 洪武时期山西移民迁入东昌府属七县屯的数量、分布及对比

县名	移民屯	原生村落
观城	5	5
莘县	8	6
武城	18	3
博平	18	6
茌平	27	9
夏津	27	3
临清	27	6
合计	130	38

资料来源：《中国移民史》第五卷。[32]

表7-11 山东茌平县（茌平部分）自然村落建立时间、数量和徙地

徙地 时间	山东					山西	河北	河南	江苏	其他	合计
	本区	青州	莱州	登州	济南						
元末以前	20	—	—	—	—	—	—	—	—	—	20
元末	2	—	—	—	—	—	—	—	—	—	2
洪武		39	28	4	7	275	6	1	4	6	370
永乐	2	7	—	1	—	13	2	—	—	2	27
合计	24	46	28	5	7	288	8	1	4	8	419

资料来源：据《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数据重新制表。[\[33\]](#)

表7-12 山东聊城自然村落建立时间、数量和徙地

徙地 时间	山东		山西	河北	河南	江苏	其他	合计
	本区	莱州						
元末以前	7	—	—	3	—	—	1	11
元末	3	—	—	—	—	—	—	3
洪武	11	—	47	—	1	1	1	61
永乐	8	1	59	2	1	—	2	73
合计	29	1	106	5	2	1	4	148

资料来源：《中国移民史》第五卷。[\[34\]](#)

明太祖时徙民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明成祖主要为了迁都、营造活力、发展经济而宣导移民，“分其丁口以实北平”[\[35\]](#)。自明代三朝组织大模移民之后，移徙者鲜矣。此外，不少自发的小规模移民，甚至在清中叶仍然存在。据张青统计，洪洞大移民共涉及800余个姓氏，18个省（市），500余县（市）。迁入地除山东92个县（市）外，还包括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9县（市），辽宁11县

（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36]移民带来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刺激着这些地区的自然村落建设，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

（二）“湖广填四川”与村落

自元末明初湖广黄麻一带人口迁往四川，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明末清初，四川天灾频发，民间的反抗势力逐渐壮大。明末朝廷在与清军大规模武装进行厮杀的同时，还要对地方割据政权进行剿杀，加剧了四川境内人丁凋敝的局面。吴三桂的反叛更使四川陷入浩劫。到了清初，据文献统计，四川人丁仅剩下16 096人，远低于其他省份的人丁数量，甚至只有东南省区一个县的规模。[37]对此，清代朝廷积极招民垦荒，湖广、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口大量迁入四川，其中以湖广人数最多，史称“湖广填四川”。

囿于艰苦的乡村社会环境，简单的招民复业政策无法实现四川经济的恢复。在此之际，地方官员不断上奏请求国家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迁入四川参与垦荒。[38]“康熙时，招徕他省民以实四川。……始至之日，田无业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或数姓联为一堡……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然所占实不能尽耕也。”[39]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省人丁共计18 509人，相较24年前人口增长率为14.99%。此项人丁数量统计，虽并非四川真正人口总数，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招垦移民政策起到的积极作用。康熙时期对移民人口施行的优免政策，比如将垦荒起科年限从三年增加至五年，放宽招民授官的标准，各省贫民携妻、子入川者准予入籍等是改变四川人口结构的前提。虽然移民热潮被三藩之乱中断，但战争结束后，康熙朝廷鼓励移民的政策更加具体细致，从土地所有权、考试权两方

面保障了移民的权利，不仅将地亩给垦荒居住者为永业，还准许移民入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表7-13 湖广填四川主要省份在乾隆年间人丁数量统计

省份	乾隆十四年	乾隆十八年	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二十四年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二十九年	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四十八年
四川	2 506 780	1 368 496	2 682 893	—	2 802 999	—	2 958 271	3 068 199	7 789 791	7 947 762	8 142 487
广西	3 687 725	1 975 619	3 850 136	—	3 972 653	—	4 706 176	4 794 493	5 381 984	5 749 997	6 034 003
广东	6 460 638	3 969 248	6 699 517	—	6 818 931	—	6 938 855	7 068 199	14 820 732	15 211 960	15 634 520
陕西	6 734 158	3 851 043	7 081 846	—	7 297 415	—	7 348 565	7425 445	8 193 059	8 237 887	8 259 081
湖北	7 527 486	4 568 860	7 957 304	8 024 978	8 137 947	8 231 816	8 399 652	8 532 187	14 815 128	16 021 069	17 155 018
福建	7 620 429	4 710 339	7 977 686	—	8 065 288	—	8 094 294	8 170 630	11 219 887	11 980 012	12 399 456
江西	8 428 205	5 055 251	9 108 615	—	11 609 061	—	11 540 369	11 745 196	16 848 905	18 049 268	18 511 622
湖南	8 672 433	4 336 332	8 762 726	—	8 854 608	—	8 907 022	9 082 046	11 4989 777	15 423 842	15 676 488
直省总计	177 495 739	102 750 000	190 348 328	194 791 859	200 473 275	205 591 017	209 839 546	214 600 356	268 238 181	227 554 431	284 033 755

资料来源：《清朝文献通考》。[\[40\]](#)

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人丁数增至409 311人。雍正五年（1727年），移民入川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川陕总督奏称外省人民挈家入川者甚多，请求安插，“皆称系上年湖广、广东、江西、广西等省逃荒之人，请设法安插，以为生计”[\[41\]](#)。此时朝廷对移民显然不再是一以贯之的接纳态度了，其原因可能是这次迁徙活动的逃荒性质危及了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为了防止迁移人户中混入“游手无赖之徒”扰乱地方社会安宁，朝廷规定入川人户需验明身份，在拥有原籍官员的许可和证明后编入保甲，“令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所用牛种口粮目前将公项给发，即着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42\]](#)，并提出以按户授田替代插标占田，计算出详细的地亩分配和基本生活补贴。[\[43\]](#)

乾隆年间，朝廷秉承历代的鼓励态度，借移民缓解部分省份

的人口压力，维持对四川的有效控制。除乾隆十八年（1753年）各省人口均有下跌，全国人口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步稳定，乡村地区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四川接纳移民的能力开始下降，移民入川的运动在乾隆后期已经式微。

由此可见，清代国家的积极政策，一方面使徙居者定居于迁入地，生齿日繁，在移民村落里繁衍出一个个宗族，建立了一个个单族村落或者多族村落。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村落逐渐开枝散叶，并开始了本土化的生长。另一方面，积极政策也使村落社会在被纳入国家的行政编制范畴的同时，又与国家发生了积极而密切的互动关系。

表7-14 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年（1753—1755年）四川移民省籍户数及所占比重

迁入时间	湖南	广东	广西	江西	福建	合计
乾隆十八年	991	408	394	—	17	1 810
乾隆十九年	1612	281	73	140	—	2 106
乾隆二十年	1 860	590	—	—	—	2 450
合计	4463	1279	467	140	17	6 366
百分比（%）	70.1	20.1	7.3	2.2	0.3	100

资料来源：《蜀故》卷三。[\[44\]](#)

表7-15 四川五州县的移民宗族

迁入时间	云阳	南溪	合州	简州	井研
清以前	27	11	61	98	59
清中期以前	117	46	112	184	65
合计	144	57	173	282	124

资料来源：《中国移民史》第六卷。[45]

由于战争使人口遭到毁灭性破坏，青壮年大量死亡，四川原住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有效繁殖人口。原生宗族在四川所占比例与移民宗族比起来相当少，川东、川南地区原生宗族分别占区域宗族总数的18.75%、19.30%，不到两成。相较之下，迁至四川的移民人口以青壮年居多，他们依靠身体素质、生产技能、土地面积、生活补贴、人口增殖等方面的强势，发展势头和活力远远超过原住民。他们在迁入地很容易组成一个新的宗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同宗族成员的迁入使得移民的宗族组织、范围、地位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大。

一部分移民从家乡游走进入四川，通过同乡同族间的互相帮扶，组织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村落。这些村落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复杂交织，极易演变为大型村落。一般来说，移民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迁入四川，比如广东兴宁廖氏、福建永安陈氏、长乐陈氏皆是如此。小家庭发展成大宗族的事例相当少。来自湖南南部的徙居者是大宗族集团的主要来源，他们不仅拉动了广东的外迁趋势，还借由若干家族成员的共同迁徙，在新的村落从事修建宗祠、设置祭田、编纂族谱等宗族活动。在移民逐渐安居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四川经常出现原住民与移民之间以及各地移民之间的省籍冲突。

表7-16 四川五州县移民宗族的徙地情况

县名	湖北	湖南	广东	福建	江西	陕西	贵州	其他	合计
井研	13	10	14	2	17	0	4	0	60
云阳	48	41	4	6	12	0	0	4	115
合州	32	46	2	3	20	2	5	2	112
简州	30	32	98	5	19	2	4	2	192
南溪	12	9	1	2	2	0	0	0	26
合计	135	138	119	18	70	4	13	8	505

资料来源：据《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数据重新制表。[\[46\]](#)

（三）“走西口”与村落

清初，山陕地区人口剧增、土地兼并激烈，加上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因应平定边疆叛乱，解决西北军兵的粮食供应，解决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等诸多政治需求，清代国家不断调整土地政策，促使山陕民人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取得了不俗的垦耕效果。这个移民过程被称为“走西口”，也称“走口外”。

西口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山西杀虎口等口外地区，是移民进入蒙古地区的重要关口。雍正时期在山西口外设置丰川卫、宁远厅，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放垦4万顷土地给山西民人。乾隆五年（1740年）设绥远城直隶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设归化城、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城、萨拉齐五个直隶厅，统称为归化城六厅，隶属山西。厅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理由口内各州县招来开垦的移民，其中清水河厅的移民以偏关、平鲁两县人口居多。可以说，“走西口”是长城内侧人口向长城外侧迁移，农业区人口向牧区迁移的过程，标志着农业区

域的扩展和农牧分界线的北移。[47]当时内蒙古的绥远地区便是例证之一。据《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统计，19世纪早期，向内蒙古地区移民的汉人数量就已经超过当地蒙古族人了。[48]清中叶开始，大量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的移民迁往绥远，其属各县旗以河曲移民最多，比如乌拉特中后旗的双美圣乡、此老图乡、石哈河乡、郅北乡等广大乡村地区。固阳县红泥井乡的72个自然村落也大多由河曲移民组成或建立。

表7-17 绥远各县旗的山西移民分布情况

县旗名		徙地及其所占比例
土默特川	土默特旗	大同、偏关、代县
	萨拉齐	忻州
	清水河	偏关、平鲁、宁武、忻县

县旗名		徙地及其所占比例
察右翼	兴和	忻州、大同
	丰镇	忻州、浑源、定襄
套东	包头	河曲、忻州、定襄、代县、府谷、神木、直鲁豫
后山	武川	晋北各县（7/10~8/10），直鲁豫（2/10~3/10）
	固阳	晋北各县（8/10），直鲁豫（2/10）
后套	五原	河曲（70%），忻州、代县（5%），河北（10%），山东、河南（10%），其他（5%）
	临河	河曲、保德（1/3），府谷、神木（1/3），其他（1/3）
	安北	河曲、代县（多），河北、山东（少）
前套	东胜	府谷、神木、河曲
	达拉特旗	河曲、忻州

资料来源：《“走西口”与晋陕内蒙古毗连带民歌圈的生成》。[49]

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民最初来自山西，主要来自晋北各州县；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旗的移民则主要来自陕西、河北两省；其他各县移民几乎全都是山西民人。^[50]归化城土默特、乌伊两盟、察哈尔等地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成为“走西口”移民活动影响最深的地区。其中察哈尔招募河北、山西等地民人从事农业活动，这些随着农耕季节往返耕地与家乡间的汉人被称为“雁行人”。早在雍正年间，在张家口外山谷定居的汉人便不在少数。出于国家管理移民关口的需求，朝廷又设立了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个直隶厅。其中多伦诺尔作为一个土产集散地和宗教市镇，在乾隆前期未经招民垦种，并无村落。而张家口在雍正年间便已有286个村落，平均每村21户，普遍属于中小规模的村落。这些村落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因“走西口”而形成的移民型村落，或者是在移民村落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村落。

除了迫于生计离乡远徙的贫苦农民到内蒙古地区参与农业垦殖，还有部分手工匠人、商人通过“走西口”深入广袤的草原大地，将内地文化因子和民俗风貌带入内蒙古地区。从汉地带入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一批定居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虽然辽代开始便有内地汉人前往内蒙古建屋定居，自然村落早已出现，但“走西口”为内蒙古村落的广泛建立提供了契机。伊克昭盟的建村时间大多在光绪、宣统至民国年间，与山陕移民“走西口”进程吻合。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北部牧区，汉族主要分布在南部农区。在农区内部和农牧交错地带，蒙汉两族的村落混合分布，有的是汉族村落，有的是蒙古族村落，还有蒙汉杂居的村落。

表7-18 伊克昭盟建村情况

时间	东胜	准格尔旗	伊金霍洛旗	达拉特旗	乌审旗	鄂托克旗	鄂托克前旗	杭锦旗
光绪之前	—	27	6	4	—	1	—	—
光宣时期	9	86	24	32	6	—	4	2
民国时期	9	124	58	71	1	1	6	21
情况不明	57	104	336	165	99	116	160	156
总计	75	341	424	272	106	118	170	179

资料来源：《伊克昭盟地名志》。[\[51\]](#)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朝皇帝在直隶北部古北口、喜峰口之外的热河建立行宫以来，热河也逐渐成为清王朝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移民越发向此地聚集，波罗河屯附近数里，村舍、人家鳞次栉比，烟火稠密。雍正、乾隆年间相继设置了热河、喀喇河屯、塔子沟、八沟、四旗、乌兰哈达、三座塔七个直隶厅。乾隆末年升热河厅为热河府，其他厅分别改为滦平县、建昌县、平泉州、丰宁县、赤峰县和朝阳县，属承德府辖。119年后，受承德府南境禁止移民的政策影响，滦平县人口急剧下降，由于人口北迁至最北部的赤峰县，导致赤峰县人口增长4倍有余。建昌县、朝阳县的建立和发展也说明了东部的开发快于西部。

表7-19 清朝承德府属六州县人口变化

时间	滦平县	建昌县	平泉州	丰宁县	赤峰县	朝阳县	总计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106 630	99 093	154 308	72 079	22 378	61 220	515 708
道光七年（1827年）	45 769	163 875	158 055	115 973	112 604	77 432	673 708

资料来源：《承德府志》卷二。[\[52\]](#)

汉人移民深入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蒙古各旗，清朝廷不得不加强管理。嘉庆四年（1799年）设昌图厅管辖在科尔沁左右

旗的近4 000户汉人移民。及至嘉庆中期，郭尔罗斯前旗的移民有7 000余人。汉人移民甚至延伸到了外蒙古范围。实际上，“走西口”象征的是社会底层人民通过移民运动争取生存空间的奋斗过程。移民与移民村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实了内蒙古地区的人丁数量，为内蒙古地区的开发提供了相对充盈的劳动力资源。

（四）闯关东与村落

清军入主中原，建立国家之后，满族以东北三省为“龙兴之地”，定为禁区，并沿着明朝辽东边墙旧址插柳结绳，称为“柳条边”，以此作为警戒线，禁止汉人自由迁入。由于这一范围位于山海关以外，故又俗称“关外”，山海关以内则称“关内”。汉人的活动范围在律令上被限制在关内，但事实上，仍有不少关内汉人迁入关外边内的夹层空间，进行开垦生产。还有一些汉人则在关外长白山地区采运人参，以牟取暴利，严重妨碍了旗人的利益。清初，朝廷企图通过严格出关的制度来维护关外的地方社会秩序，及至清中期，又下令驱逐已在关外定居的流民，但一直未能彻底实施。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中下游诸省的农民，常年受自然灾害的侵扰，纷纷寄希望于过关安身。尽管在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朝廷也偶尔变通，放民出关，但在清朝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关内汉民通常是在封禁令的非有效执行之下，以单身佣工的身份偷渡出关，这个过程被称为“闯关东”。

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辽东、辽西是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人口大增。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局面，清朝廷在移民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进行行政区设置：辽阳改置为州；增设锦州府，领锦县、广宁县、宁远州；设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四县，隶属奉天府。辽东地区设府县、里社的顺序与名称，与移民由东向西、由北往南

的行进方向基本一致。铁岭20个里社均有移民。这都是清代国家将移民组织性地招募为民的过程。康熙七年（1668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的73年间，辽东移民的迁入速度和规模稳定增长。奉天、锦州二府人丁数从16 643增长到53 414，年均增长率在16.00%~17.05%。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奉天、锦州二府的人口分别增殖到43.4万、132.3万。咸丰元年（1851年），辽宁人口达到258.1万。历经数百年的移民活动，辽东地区在封禁限制下仍达到了人口饱和，移民不仅填充了乡村地区的大小村落，也形成了不少新的移民村落。

关外的吉林将军辖区是清朝封禁的重点区域。与当地定居移民不同，最初流入长白山区的流民多以采参捕珠、淘金伐木为生，其中以来自山东、山西的流民偷采为主。直到康熙中期，乌拉、宁古塔一带采取已尽，走山的掘参者因资源匮乏，不得不转向平原从事农业垦殖。同时，大量从内地谪发的流人、兵丁、营造战舰的水师也来到这里。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廷在乌拉、伯都讷，分别置永吉州、长宁县，集中安插、管理新入境的移民。乾隆初，随着封禁的加强，朝廷裁撤了永吉州、长宁县建置，将宁古塔等地的流民安插在吉林乌拉地区。随后，移民在不谙垦殖的旗人的放任下，不断潜心耕耘。嘉庆五年（1800年），朝廷在长春堡设立长春厅，归吉林将军管辖。此地作为进入乌拉和伯都讷的交通要道，流民较多。嘉庆十一年（1806年）长春厅流民增加7 000余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新的流民有3 010户，嘉庆十六年（1811年）长春厅编定共计11 781户、61 755丁。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的移民浪潮中，东北三省共接收关内移民（含后裔）180万左右。^[53]不少学者认为，到乾隆后期，汉人的迁入与繁衍大抵弥补了迁入关内的满族人口。

表7-20 清朝前期奉天、锦州人丁增长情况

时间	奉天府属		锦州府属	
	人丁数	年均增长率	人丁数	年均增长率
康熙七年（1668年）	7 953	—	8 690	—
雍正十二年（1734年）	23 796	16.7‰	23 680	15.3‰
乾隆六年（1741年）	28 258	25.4‰	25 156	8.7‰

资料来源：《盛京通志》卷三十五、卷三十六。[\[54\]](#)

汉人大量迁入关外，一方面，在客观上使大大小小的村落关外快速建立、繁衍，为关外的开发提供了丰裕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汉人将关内的汉文化带到关外，既推动了区域文化的交融，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为巩固清代国家的政治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下南洋”与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区位概念，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东南亚地区的泛称，主要包括今天的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从明初开始，明朝官员和老百姓就有小规模走南洋活动。郑和下西洋后，尤其是明隆庆之后，这类走南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到明朝末年，及至清代、民国，中国人在南洋地区进行官事、经商、打工等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百姓下南洋成为常态，以至于形成一股历史洪流，史称“走南洋”或者“下南洋”。

从历史来看，尽管明清时期都有海禁政策，但是，前往南洋的移民活动，特别清朝后期开始的大规模“下南洋”，与历代其他移民活动一样，小群体自发型移民和大规模引导型移民同时存

在。这在清代国家的相关政令中不难确证。

清康熙年间之所以采取绥靖海疆的柔和政策，就是为了准许“内地之人留在外洋者”附洋船带回内地。这表明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留洋海外的情况就十分常见。不过，这种办法的效果似乎不佳，回内地的人不多。所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又定例，“入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并强调漂流外国者逾期不回，是“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惋惜”，“其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55]，又严饬口官“点对照票，细加稽查”，防止去来人数不符、年貌互异等顶替私回事件。此谕令一出，福建等省奏报回籍者“几及二千余人。是出洋之人，皆已陆续返棹……”。从更深层面来看，清代国家之所以要通过政策来吸引留洋海外的民众返回国内，主要原因恐怕是人口大量迁居东南亚等地，以致沿海很多村落的劳动力流失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危及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赋税稳定。出于这种考虑，雍正年间，洋禁新开，严格禁约，以防止沿海村落民众沉湎于“希图获利”“贪冒漂流之渐”^[56]，还强调在此之前逗留海外的人，不准回籍。

清王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方面使得大量海外华人难以回归，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偷渡者谨慎外出，毕竟存在终生背井离乡不得回籍的风险。随着海禁政策持续调整、时紧时松，海外移民活动变得更为普遍，闽粤沿海的民人通常流入东南亚地区。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大，中国劳工出国务工成为近代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形式，主要迁入地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美洲等地。

从清代前期开始，珠江三角洲便是移民海外的主要迁出地，以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为中心，辐射范围包括新会、开平、恩平等周围各县。其中番禺、南海二县同属广州府，素以冶铸、纺

织等手工业著称。南海县佛山镇是当时的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人口兴盛、商业繁荣。顺德的缫丝业与番禺的制糖业享誉中外。新会、开平、恩平三县以农业为主，百姓多赴地区中心地带打短工贴补家用。番禺等县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破坏了广东的财政与经济，一方面，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南京条约》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巨大；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对鸦片、洋纱、洋布、洋铁、洋油的倾销进一步破坏了本土手工业，对农业经济产生了毁灭性打击。人口压力剧增，还引发了土客械斗等社会问题，使得乡村社会生活愈加混乱。清王朝不得不设置赤溪厅安置留居客家人。随着本地人口压力的日益膨胀，赤溪逐渐依靠向海外移民缓解人口压力，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与此同时，新会、开平、恩平、鹤山等地也不断进行海外移民。

流向东南亚的移民主要是由“经纪人”及其“代理人”诱骗出国，在工作满规定期限后才能获得自由，他们主要在橡胶园、农场、城市、矿山、码头、港口、道路从事开采和开发工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华人占马来半岛总人口的一半。^[57]随着西方殖民者殖民地的扩大，中国逐步成为殖民者掠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第一批华人迁入澳大利亚，在之后6年内，新西兰扩展为新的移民迁入地。可以说，殖民地的开发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构成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强大拉力，成为海外移民高潮形成的重要原因。英法联军为了使华人“任便出洋”，将向海外移民的苦力贸易公开化、合法化，向清王朝不断施加压力。1859年4月6日，南海、番禺两县贴出联衔告示，规定“自毋庸阻其随外人出洋”。4月9日，广东巡抚的告示又称，如是自愿出洋，“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58]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1864年《中西和好贸易

条约》、1866年中英法《续订招工章程条约》反复赋予和强调中国劳工的合法身份。与此同时，苦力贸易的中心也不断变化，从厦门、汕头[59]，到澳门[60]、金星门[61]。香港作为英国的“自由港”，成为苦力贸易的转运站。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颁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文》，才明令宣布苦力贸易结束。

表7-21 1801—1925年中国向海外移民数量估计（单位：万人）

时间	1801—1850	1851—1875	1876—1900	1901—1925
移民数	32	128	75	65
年平均移民数	0.64	5.12	3.00	2.60

资料来源：《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62]

表7-22 1851—1875年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流向和数量（单位：万人）

徙地	人数	徙地	人数	徙地	人数
新西兰	0.5	加拿大	3.0	美国	16.0
英属圭亚那	2.0	菲律宾	4.5	东印度群岛	25.0
夏威夷	2.5	澳大利亚	5.5	马来西亚	35.0
巴拿马	2.5	秘鲁	11.0	其他	4.0
西印度群岛	3.0	古巴	13.5	—	—

资料来源：《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63]

不少学者曾对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进行过估计和分析。陈瀚笙认为18—20世纪，由中国贩运到海外的“猪仔”（劳工）不少于六七百万人。朱杰勤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海外

从事苦力贸易的中国移民约有百万人。陈泽宪分析在1801—1926年，中国海外移民总数为300万。结合这些学者的认识，曹树基认为1840—1949年，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在1 500万左右。^[64]在苦力贸易时期，中国海外移民流向主要是由中国沿海地区迁往西方各海外殖民地，迁入地主要有东南亚、北美、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迁往东南亚的移民最多。而移民的主要迁出地集中在闽粤两省，广东与福建移民数量分别占总量的80%、20%。广东迁出地主要在珠江三角洲、潭江流域、潮汕平原、兴梅客家地区和海南岛，福建迁出地主要在晋江、厦门、莆田、龙溪、龙岩等地，呈现出分籍迁移的趋向。

从短时间内来看，这种主动的或非自觉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个人人生，改变了迁出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还给整个家族、村落，甚至国家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晚清以来，在“下南洋”或者迁往海外其他地区的移民之中，有不少经商的华人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在海外收获了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个群体长期在海外经营，但仍通过书信、电报等方式，与国内乡亲密切联系。甚至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一股反哺乡梓的风气，很多华侨纷纷归国，在家乡修建房屋以光耀门楣，重建家乡。以至于东南沿海一带，如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布局和建筑形态上别具一格的村落，我们称之为“华侨村落”。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梧林古村落（见插图10），拥有风格迥异的村落建筑近100栋，番仔楼、西洋楼随处可见，哥特式、罗马式、中西合璧式建筑与闽南传统大厝建筑相映成趣，见证和追忆着那一段“下南洋”的历史岁月。这样的华侨村落，在广东江门也十分常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和拥有百余栋小洋楼的台山梅家大院都是典型例证。

表7-23 清末移民海外的源地和流向

迁出地		迁入地	迁出地		迁入地
广东	珠江三角洲、 潭江流域	美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	福建	晋江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
	潮州地区	泰国、越南、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莆田	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兴梅客家地区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越南		龙溪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马来西亚
	海南岛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缅甸、越南		厦门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65\]](#)

四、市镇发展与村落

（一）明清市镇的发展

经过明初的恢复，明代中期农业、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市场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农业商品，也创造和扩大了农村市场。相应地，手工业的兴盛则丰富了市场的商品品类。可以说，到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正因为这一经济格局的形成，明代中叶以后，在一些主要贸易商路附近出现不少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许多临时的、定期的集市逐渐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相比之下，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等区域在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等方面城镇化程度较高。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太湖流域与浙西一带最为突出。[\[66\]](#)

明朝奠定了各地区的市镇规模及格局，众多市集创设于这一时期。比如琼州府崖州的集市从景泰二年到弘治元年（1451—1488年）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成化九年（1473年），浙江新昌县的蔡岙市建立，但由于山区交通不便，直到万历年间来往商民才逐渐增多，农民以有易无，交换的商品大多是日常用品。弘治年间山西延安府受商品交换需求的影响，建立了东关市。[67]

集市是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现象，作为最基层的市场，虽功能大抵相似，但名称大不相同：北方称为“集”，南方称为“墟”，西部则称为“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差异等，集市类型具有多样性。按照集期来分，有不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常日市；按照性质来分，有特种集市、庙会、集会、专业集市等。其中定期集市的日期也各有不同。原始的不定期集市和发达的常日市并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一般来说，这些地方的农业变迁和市镇成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专业化农作物生产区域开始出现，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手工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手工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三是商品流通的范围、工具等日益强化，贸易形式多样化，具有突出势力的商人集团大量涌现。[68]

农村墟市一类的基层集市是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标准市镇的初始形态。“市因商贾辏集而成，镇必经前代设官而立，名义各有所取”[69]，但实际上市镇并没有严格区分。市镇作为与集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理实体，或者说经济中心，是根据其所服务的周围村落的需要而存在的，常处在村民步行可以到达的地方。市镇随着时间和资本的累积而不断变化，不仅市场服务功能辐射到周边若干个村落，而且在规模上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史载，江苏吴江县“民人屯聚之所谓村，有商

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吾吴江之镇市村，其见于莫《志》者，村二百四十九，市三，镇四而已。徐《志》之镇与莫同，而市增其七，村则互有详略。至屈《志》而复增一市三镇焉。曰平望，曰黎里，曰同里，曰震泽，莫、徐之四镇也；曰县市，曰江南，曰新杭，莫之三市也。曰八斥，曰双杨，曰严墓、曰檀邱、曰梅堰，曰盛泽，曰庵村，徐之所谓七市也。曰黄溪，屈所增之一市也；曰盛泽，曰芦墟，曰庄（章）练塘，屈所增之三镇也。凡镇七，市十。盖自明初至我（清）朝三百余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此三志之市镇所以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亦益俗，固不可得而复增矣”[70]。

这条史料至少表明几条信息：一是村、市、镇三者，在概念和内涵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指的是自然村落，市即从事贸易之处，镇则为有官府介入管理的村或者市。但这种区别也并非绝对。二是吴江、徐江、屈等地的镇、市、村数量各有不同，如吴江的村落有249个，市3处，镇则仅4个；徐江则市有7处，镇4个，村亦不少。屈则有镇7个，市9处。三是之所以出现数量比例的不同，那是因为村落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程度不同，所谓“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此三志之市镇所以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亦益俗，固不可得而复增矣”即是此意。

表7-24 北方各州县市镇数量统计

州县名称	市镇数
直隶省正定县	17（1875 年）
直隶省抚宁县	14（1877 年）
山东省滕县	420（1868 年）
河南省南阳县	29（1904 年）
河南省睢州	47（1892 年）

资料来源：《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71\]](#)

表7-25 南方各州县市镇数量统计

州县名称	市镇数	州县名称	市镇数
广东省香山县	26（1873 年）	四川省泸州	86（1882 年）
广东省花县	26（1890 年）	四川省江安县	32（1882 年）
广东省信宜县	22（1889 年）	四川省纳溪县	10（1882 年）
广东省清远县	40（1880 年）	贵州省湄潭县	47（1899 年）
广西省博白县	38（1889 年）	江西省长宁县	24（1901 年）

资料来源：《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72\]](#)

由于各县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拥有的市镇数量亦存在差异。各省的市镇数量也大不相同，南方各省的市镇数量相较于北方各省的市镇数量变化较小。“市镇之设，所以聚商贾、通货财、便日用、利民生也。南昌村居稠密，每七八里或三数里辄有墟市。每市所属，皆数千户，大者近万余户，而市肆多者不过数百。所积之货，皆日用之需，其运售于远道者独谷米，其来则以棉花。虽曰鱼米之乡，实耕织为业。市多滨河，西成之后，远贾争集，帆樯林立，人多醉饱，则景象殊熙熙然也。平时之词讼保甲，寇盗时之团练，皆畛域于是焉。盖分土田，则以都图；严守

望，则以市镇，其大较也。”^[73]

市镇显然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从内容上说，市镇囤积的货物类型受农民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皆为日常用品。不仅如此，市镇作为商品流通中转站还经营着长距离的贸易输送，具备长途与短途贩运贸易的商品流通功能。此外，市镇还有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商品加工和生产功能等等。江西南昌根据村落的疏密、大小、距离设有37个市镇。一个墟市的商业辐射范围3~8里不等；墟市的商业服务对象通常有数千农户，甚至超过万户，而南昌最大的市镇不过数百户。以平均每户5口计算，^[74]则通常有1千至5万左右的村民直接或间接享受某一墟市的商品服务。^[75]乡村中的众多墟集，包括市镇在内，维系于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商业功能。比如长沙府湘潭县“土货之有名者，杨梅洲茄，株州芦菰，云塘橘，石潭石灰、花石、豆乳”^[76]，一来由于水果生鲜、石头硬物不便保存和携带，二来有明确规定“不能出境”，只能在墟集买卖，而这已经足以完成土产的交易了。

集市和市镇的快速增加，引起了明清社会一些人的担忧。《吴县志》就指出：“国家太平日久，人口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为商为贾，奔走四方；又百工技术，吴人为众，而常若不足。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77]表面上看，这是担忧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大量增加，以致地无不耕之土。从更深层次来看，则仍与重农抑商的观念密切相关。其目的是要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农业经济。换句话说，就是要限制市镇的过快增长。

就江南地区而言，1820年左右苏州府与松江府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分别为3 036、1 301人，1920年代仍高达1 345、1

581人；浙西杭、嘉、湖三府也维持了每平方英里800人以上的人口密度。[\[78\]](#)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江南地区通过有限的土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不理想的单位面积产量养活如此密集的人口实非易事。江浙两省在1812年、1913年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只有1.9与1.77亩、2.55与1.61亩[\[79\]](#)，远不足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平均每人4亩耕地。除此之外，重税浮粮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生存负担。以致在明末，大量农民不再以务农为生，这就危及了国家的赋税安全和政治稳定。有资料记载，“明初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故家给人足，乐于为农。自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国课近急，比限日严，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地方愈不可知矣”[\[80\]](#)。农民对农业经济利润的追逐是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也恰因如此，到明代后期，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表7-26 江西省南昌县市镇分布情况

名称	地点	距城（里）	名称	地点	距城（里）
七里街	十都 [*]	10	谢埠市	在四十二都，属四十都	35
黄溪渡市	十四都	30	河伯所市	四十八都	40
滁槎市	十七都	40	莲塘街	五十都	35
楼前市	十九都	50	万舍街	五十三都	50
沈口市	二十都	30	上谿店	五十四都	50
麻坵市	二十三都	40	沙埠塘市	五十七都	60
梓林市（今名新集）	二十四都	50	璜溪墟	五十八都	70
柘林市	二十五都	50	店下墟	五十八都	70
湿口市	二十五都	60	梁家渡市	五十八都	70
前坊市	二十八都	80	七里巷市	五十八都	60
幽兰塘市	二十九都	60	三江口市	五十九都	90
浴城塘市	三十一都	55	板湖墟	六十都	80
冈背市	三十一都	50	冈前墟	六十一都	75
罗舍街	三十一都	50	新邨墟	六十二都	65
渡头市	三十四都	60	浹溪渡市	六十二都	70
塔城市	三十五都	60	广福墟	六十三都	70
荏港市	三十六都	60	市泌镇	六十四都	60
辟邪街	三十八都	60	冈上街	六十五都	60
武溪市	四十一都	40	漳湖渡市	六十六都	80

资料来源：《南昌县志》卷四《方域志下·市镇》。[81]

* 都，是乡里行政建制中的一级机构。见王昊：《明代乡、都、图、里及其关系考辨》，《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

清中叶，农业生产发生转变，从维持生计的农作物种植转变为经济作物的集中生产，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多元选择的机会，使他们与外部市场因素直接相连且关系越发

紧密，激发了他们追逐利润的动机。[82]“农人日即偷懒；新谷登场，不闻从事于春花，前志所载田中起棱，播种菜麦，今皆无有。惟垄畔桑下，蒔种蚕豆，吾镇所辖十二庄，大率如此。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近市之黠农，专务时鲜蔬瓜，逢时售食，利市三倍。”[83]对市场价格反应敏锐的“黠农”在利润驱使下，不再固守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转而投身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陕西、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多次爆发“奴变”“佃变”风潮，也反映出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农民获取更多的人身自由，扩大了他们实现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范围。同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并在许多工商业市镇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随着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工商业人口比重迅速增大，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市镇社会的变革愈加快速，工商业日渐发达，乡村日渐城市化。在市镇高度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市镇慢慢脱离原始驻防功能，向单纯的商业功能转变，到清末后，市镇的标准变得难以分判。[84]

（二）江南市镇与村落关系

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朝，发展于明清时期。从明代开始，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向江南乡村地区纵深发展，村落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商品经济模式，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经济与新兴的棉作经济，带动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农民经济收益的增加导致农业结构发生转变，即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改变了先前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结构，代之以与商品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以及与加工经济作物相关的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早期工业化”。[85]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

湖州府，作为农、工、商各业发展的经济中心，市镇星罗棋布。虽然规模大小、层次高低各不相同，但都是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荣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村落之间的新兴枢纽。

[86]

表7-27 明清时期江南棉花与棉纺织业市镇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松江府			
三林塘	上海县	金汇桥	奉贤县
北桥	上海县	朱家角	青浦县
塘桥	上海县	中心河镇	南汇县
法华镇	上海县	周浦镇	南汇县
莘庄	华亭县	大团镇	南汇县
益村坝	奉贤县	朱泾镇	金山县
刘家行	奉贤县	枫泾镇	娄县
太仓州			
江湾镇	宝山县	马陆镇	嘉定县
罗店镇	嘉定县、宝山县	戩滨桥镇	嘉定县
月浦镇	宝山县	娄塘镇	嘉定县
杨行镇	宝山县	陆渡桥市	嘉定县
大场镇	宝山县	朱家桥市	嘉定县
桂家桥	宝山县	外冈镇	嘉定县
真如镇	宝山县	葛隆镇	嘉定县
高桥镇	宝山县	方泰镇	嘉定县
顾村	宝山县	安亭镇	嘉定县
南翔镇	嘉定县	钱门塘市	嘉定县
新泾镇	嘉定县	陆家行	嘉定县
纪王庙镇	嘉定县	璜泾镇	太仓州
诸翟镇	嘉定县	鹤王市	镇洋县
常州府			
云亭镇	江阴县	利城镇	江阴县
后梅镇	江阴县	安镇	金匱县
华墅镇	江阴县	东亭镇	金匱县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青旸镇	江阴县	泰伯梅村镇	金匱县
苏州府			
周庄镇	元和县	唯亭镇	元和县
其他			
丁家板桥市	杭州府海宁州	新丰塘镇	嘉兴府嘉兴县

资料来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87\]](#)

明清以来，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邻近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业的专业地带。棉花的普遍种植和人口压力的增加是造成棉纺织业扩张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潮湿的气候条件、崎岖连绵的地形条件以及对村落中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都是江南棉作与棉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如棉花产业之于松江府、太仓府，蚕桑产业是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商品作物。由于蚕桑市场大、生产利润高，浙西75县内有58县产蚕丝，其中30余县完全以养蚕为业，在出口生丝上历年均为全国第一。[\[88\]](#)“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89\]](#)湖州地区蚕桑种植规模庞大，不仅成为专业的蚕丝业发展地区，蚕丝业在这一地区甚至取得了比农业生产更加重要的地位。清政府也在江宁、苏州、杭州分别设立织造局，从事官方的丝织业经营。在对内、对外贸易的高利润刺激下，江南商品作物的种植和需求进一步扩大到邻近的乡村市场[\[90\]](#)，“桑叶宜蚕，问惟西南乡树之，今则城东二三十里近水处绝无旷土，小民以此为恒产焉”[\[91\]](#)，蚕桑与丝织业成为浙西民众最主要生计。这种从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手工业经历了传统农业经济商品化的过程，改变了传统农业中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地主对农民的束缚力，直接影响了江南村落生产方式以及村落社会阶层与交往关系，从而加速了市镇的滋生。

表7-28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与丝织市镇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市镇名称	所属县别
杭州府			
东街市	府城	唐栖镇	仁和县
茧桥市	仁和县	硖石镇	海宁州
临平镇	仁和县	郭店镇	海宁州
湖州府			
新市镇	德清县	双林镇	归安县
南浔镇	乌程县	乌青镇	湖州府乌程县 嘉兴府桐乡县
菱湖镇	归安县	—	—
嘉兴府			
王店镇	嘉兴县	徒门镇	秀水县
新丰镇	嘉兴县	新城镇	秀水县
石门镇	嘉兴县、石门县	濮院镇	秀水县、桐乡县
王江泾镇	秀水县	澈浦镇	海盐县
苏州府			
光福镇	吴县	黄家溪镇	吴江县
盛泽镇	吴江县	震泽镇	震泽县
其他			
河头镇	镇江府金坛县	广福镇	太仓州嘉定县、宝山县

资料来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92\]](#)

在区域专业生产趋势下，各种专业性市镇应运而生。这些

市镇中的包买商、牙行、机户与附近乡村地区的农户逐渐形成连锁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基于散布于附近乡村的标准市场、中介市场，以及各个商业聚落的市镇（也可称为中央市场）的结构，在村落社会中形成一种阶层性的经济连续体，扩张性市场体系就此形成。^[93]可以说，市镇作为区域贸易的中心，是传统中国村落经济社会为了满足贸易与就业需要而形成的一种自发性产物。其中，江南市镇的商业资源开发程度较高，开始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与尚且在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各省进行资源交换和产品交易，这不仅促使长江流域及华北各地资源得到有效开发，还对消解地域、形成更大的群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7-29 明清时期江南米粮市镇

市镇名称	所属府县	市镇名称	所属府县
苏州府			
枫桥镇	吴县	平望镇	吴江县、震泽县
月城市	吴县	黎里镇	吴江县
浒墅镇	长洲县	信（真）义镇	新阳县
杭州府			
归锦桥市	钱塘县	河桥镇	昌化县
周家浦市	钱塘县	闸塘湾	海宁州
其他			
乍浦镇	嘉兴府平湖县	鲁港镇	太平府芜湖县
周浦镇	松江府南汇县	—	—

资料来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94]

与此同时，江南地区许多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与市镇出现了粮食严重不足的现象。一来，商品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必然侵占

用以生产粮食的耕地，明末松江及太仓的木棉种植几乎占了十之六七的耕地面积，江南一带粮食产量不足以支持乡民生活，民食来源主要依靠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米粮输入。二来，商业市镇的增加与繁荣也吸引了周边乡村原本从事农业的农民，他们或前往各城镇从事工商活动，或在附近村落从事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粮食生产者逐渐减少，非农就业人口增加，致使农田粮食产量不足以供应附近城镇及乡村的需要。苏州府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地区。18世纪时，苏州是中国米粮贸易的中心，到20世纪初便已没落，其盛衰的原因在于苏州商业机能的消长和转变。随着运河机能丧失、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邻近地区的新兴市镇取代了不再具有优势的內河商港，金融中心遂发生转移。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格局随着时代发展各有变化，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江南市镇和村落变迁的根本原因。

出于各种原因，苏、松、杭、嘉、湖五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国家财赋重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江南村落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往更高层次发展，也给市镇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扩张式发展，即以扩大耕地面积来谋求发展；第二阶段是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不再依赖外延式的发展，而是谋求内涵式的发展；第三阶段是工业化或近代化。一般认为，明代的江南地区已经超越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并正在向第三阶段迈进，这就是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95]。在这个背景上就能理解该地区何以涌现出如此多的市镇。

进入清代以后，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成为这一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和全国多层次市场中的重要环节，江南市镇在康乾时期，进入了第二波发展高峰。市镇脱离了以往封闭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束缚，凭借其独特的结构领先全国，并由传

统经济向近代化经济模式积极转型。此时江南市镇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其人口、商业也不断繁荣，不过，由于乡村地区人口大量且集中地涌入市镇，部分乡民开始搬迁至市镇居住生活，导致村落人口越来越少，小型村落逐渐增多，传统村落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巨变与分化。^[96]至清朝鼎盛时期，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存在着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可以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97]，市镇成为连接周围村落的经济中心。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市镇为经济中心的村落辐射范围，也意味着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村落以市镇为纽带，形成了具有超越村落的区域性经济和文化意义。

[1] M. Huc: *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Franklin Squark, 1855, II, 98.

[2] M. Huc: *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Franklin Squark, 1855, II, 297; I, 289—29.

[3] 王怡柯：《农村自卫研究》，建华印刷局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初版，第32页。

[4] Samuel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I, 280-281.

[5] 赵文濂等纂：《正定县志》，《上函图》，光绪元年刻本。

[6] 赵文濂等纂：《正定县志》，《上函图》，光绪元年刻本。正定县各社统领不同数量的村，其中东关厢社领17村，东原社领16村，五女社领13村，辛庄社领14村，南关厢社领14村，复增社领22村，复安社领20村，许香社领23村，新城社领20村，北牛社领23村，杜同社领20村，大河社领12村。表格统计了4个社60个村的人户、耕作土地、粮银数量的情况。

[7] 何道增修，张惇德纂：《延庆州志》卷二《舆地》，光绪六年刻本，第5—59页。关于北中国村落情况统计的4个表格也来源于此。《延庆州志》记载东南西北四路共241个村落，有详细记载的有231个村落，其中岳家营、新堡庄、东杏园、西杏园、东红寺、青龙桥、上芦房营、下芦房营、小王家庄、前集贤屯、后

集贤屯、于家堡等12个村落由于没有户数和人口数的记载，故没有进行统计。

[8] 朱次琦等修，冯棫宗等纂：《九江儒林乡志》卷五，光绪九年刻本，1a—4a。

[9]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

[10] 《明史》卷七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

[11] 《明史》卷七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

[12] 张天复：《皇舆考》，《玄览堂丛书》第7册，台湾图书馆1981年版，第167页。

[13]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

[14]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

[15]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

[16]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

[17]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

[18]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军职冒滥，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19]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

[20]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2页。

[21]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八十七《职官十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27页。

[22] 《清圣祖实录》第四册，卷十五，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2044页。

[23]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八十七《职官十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27页。

[24] 如《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子约《科布多界志》《塔尔巴哈台界约》）、《中法新约》、《中英缅甸条约》、《马关条约》等。

[25]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6]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7]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8]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9]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30] 葛剑雄：《家山何止大槐树》，载安介升：《山西移民史》，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

[31]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卷六《本纪第六·成祖二》。姚广孝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一一〇，卷一九七，卷五〇。“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虑恐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明太宗实录》卷五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校印版，第855—858页。

[32]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资料来源：道光《观城县志》卷一、正德《莘县志》卷三、嘉靖《武城县志》卷二、康熙《博平县志》卷一、民国《茌平县志》卷二、嘉靖《夏津县志》卷二、民国《临清县志》卷三。

[33]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山东省茌平县地名志》（初稿）1990年。乡镇名称：胡屯、冯官屯、王老、杜郎口、孙桥、茌平、温陈、赵官屯、郝集、乐平铺、广平、韩集。

[34]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35] 《明史》卷七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36] 张青：《洪洞大槐树移民考》，《中国地方志》2003年S1期。

[37]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4—5026页。虽然户口数只是国家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和纳税单位，不代表真实的人口数量，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口的增幅趋势。

[38]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十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00页。

[39] 余慎修：《新繁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5/1a—2b。

[40]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9—5034页。

[41]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7页。

[42]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7—5028页。“……九卿等会议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之人挈家远，赴四川听其散往各府州县佃种佣工为糊口之计。各府州县稽其姓名、籍贯，如实系穷民，造册申报该督抚，咨查原籍。令将本户居址、姓名造册回覆。……民人有愿回籍者，量予盘费、口粮，给以印票；其愿在川开垦者，量人力多寡，分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给以牛种、口粮。其所用各项银着落本籍各府州县官赔补。”

[43]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九《户口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27—5028页。

[44] 彭遵泗纂：《蜀故》卷三《田赋》。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45]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6]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47]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

[48] 宋乃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0页。

[49] 闫天灵：《“走西口”与晋陕内蒙古毗连带民歌圈的生成》，《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50] 贻谷：《绥远奏议》，《清查土默特地亩及现在办法折》，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抄本。

[51] 《伊克昭盟地名志》，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编印1988年版。

[52] 道光《承德府志》卷二《田赋》，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页。

[53] 以上数据的统计可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第482—484页。

[54] 《盛京通志》卷三十五、卷三十六，《户口志》，乾隆四十三年。同时可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

[55] 《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二）卷五十八，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910页。

[56] 《大清世宗宪（雍正）皇帝实录》（二）卷五十八，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911页。

[57] 李长博：《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4页。

[58] 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179页。

[59] 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162页。1852年11月至1853年3月，有1 925名契约华工被贩运到哈瓦那，500名契约华工被贩运到秘鲁；1854年有838名契约华工被贩运到古巴；1855年有3 012名契约华工被贩运到哈瓦那，1 150名契约华工被贩运到秘鲁。据统计，1852—1858年，从汕头贩运出去的契约华工约4万名。

[60] 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页，第9—11页。澳门的苦力贸易开始于1851年，主要贩运苦力到古巴。1853年，“澳门方面经办的向古巴移民的业务”，“业已基础稳固，成为长期的事业”。1855年澳门有5所“猪仔馆”，并有“无数的人从事贩卖中国人的买卖”。李春辉、杨生茂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据不完全统计，1864—1873年，由澳门贩运出国的契约华工为147 729人。

[61] 陈瀚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92页。1849年，从金星门贩运70名契约华工到秘鲁，此后每年贩运1 000多名契约华工前往南美洲，1853年达1 870名。

[62]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华侨史研究论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7页。

[63] 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7页。

[64]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531页。

[65] 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

6期。

[66]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67]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8]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9] 郑沅修：《乾隆杭州府志》卷五，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4—5页。

[70] 倪师孟等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十二年修，石印重印本，15b—16a。莫《志》为莫旦撰《弘治吴江县志》，徐《志》为徐师曾撰《嘉靖吴江县志》，屈《志》为《康熙吴江县志》。

[71]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9页。

[72] 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2页。

[73] 《南昌县志》卷四《方域志下·市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刊本，第2页。

[74]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13页。

[75] 任放：《明清市镇的功能分析——以长江中游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76] 辜天佑编：《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一册，长沙群益书社、群智书社、作民译社1910年版，第36页。

[77] 《吴县志》卷五十二，1933年铅印本，上页。

[7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根据以下资料估计：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三，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松江府志》卷二十八，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刊；严中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3页；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23卷1号，1926年，第91—112页。

[79] 1812年资料详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

社会经济史集刊》，8卷1期，1947年。1913年资料见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p.212, p.236。

[80] 《松江府志》卷五，康熙二年（1663年）刊本，第3页。

[81] 《南昌县志》卷四《方域志下·市镇》，民国二十四年重刊本，第2—5页。藤市：“咸丰初，设守望团练分局于此。时以中洲为总局，其分局多在上游。各市以下游为水师驻防巡哨之地。光绪戊戌，部文通饬行保甲法，各市皆设局，随停保甲，办团练，即改保甲局为团练局，俱以名虚应然有事之时成规具在矣。”湿口市旧设五乡局。前坊市旧设东乡镇东局。幽兰塘市旧设幽兰局。渡头市旧设渡市局。塔城市旧设又安局。荏港市上通抚州、建昌两府，为进贤往来通衢水陆交会之所，旧设普安局，附近设安全局。武溪市初市在东北乌龙湾，后圯于河，乃徙于此，旧设安和局。谢埠市旧设谢埠局。莲塘街旧设莲塘局。万舍街旧设万舍局。上谿店旧设南州局。梁家渡市旧设中乡镇东局。三江市江本作港地界三县：东北属进贤；南属丰城；过河东属临川，设有主簿，河滨有官地二十一间，每岁纳租银二两一钱。前止河街，背后止港，左止丰城官地，右止巷官民地，以巷为界，旧设镇南局。市泌镇濒河为市，西南通瑞河，对河为丰城，稍西即新建界，商船辐辏为第一，且镇设有巡检、把总，旧设大安局。

[82] 李之勤：《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载《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3—357页。

[83] 《南浔志》卷三十，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本，第3页上。

[8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7页。

[8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86] 梅原郁、林和生等日本学者称江南市镇为“地方都市”。梅原郁：《宋代地方小都市的一面——以镇的变迁为中心》，载《史林》1958年第41卷第6号；林和生：《中国近世地方都市的一面——关于太湖平原的镇市与交通》，载《空间·景观·画像》，地人书房1983年版；林和生：《中国近世地方都市的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的场合》，《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

[87]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4页。

[88] 《杭州市经济调查》卷六《丝绸篇》，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铅印

本，1971年台北影印本，第1页。

[89] 《湖州府志》卷二十九《輿地略风俗》，同治十三年（1874年）刊本，第3页上。

[90] 全汉昇：《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91页。全汉昇研究明清以来中国丝货的对外贸易，他认为明清时期苏杭地区经济之所以繁荣，人口多而富足，是因为海外市场对中国丝货需求的增大，刺激了江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增加了乡村人口的就业机会。

[91] 叶廉锬等修：《平湖县志》卷八《食货下·场课》，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本，第36页。

[9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93]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9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95]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6页。

[96] Mark Elvin, "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 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441—473.

[97] William T. Rowe., "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12.

第四节

明清村落的环境与景观

一、村落的布局

所谓“虽为人作，宛自天成”，这句话在传统村落的整体布局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比如，婺源的李坑村，村落被群山环抱，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村落建筑沿溪而建，依山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村内两条溪水横贯交汇；青石板道纵横交错，石、木、青砖架构而成的溪桥沟通相连，构筑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画卷。又如，乐安县的流坑村，四面环山，乌江自南往北向西流去，在明代，该村族人董燧主持挖掘人工湖——龙湖，将湖水与乌江连为一体，流坑村成为山环水抱的胜地。

[1]

这种选址与布局特征的形成，明显与传统中国村落文化价值观念中追求“和”的思想密切相关。这种“和”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天道质人事”“以人事观天道”的思维观念与生态伦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选址营建，集中反映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大到一个村落甚至一座都城，小到一处居室，都与天文、地理、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多方面因素产生关系。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就舒适；违背自然规律，就导致不适。例如，湖南永州的河三岩村，先民们在建造房屋时，把排水系统做到了极致。整个村

落的排水沟，前后左右相通，上下首尾相连，水流畅通无阻。即使天降暴雨，路面的雨水也能很快排泄到水沟中去。（见插图11）

具体来说，明清时期，村落的规划和布局主要与宗族礼制、宗教信仰、风水观念、防御意识、环境理念等方面的功利要求和文化理念相关。换言之，村落的布局体现了乡民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和价值体系。

从宗族礼制上说，在血缘衍生的空间关系下，村落空间多以宗祠为节点，以向心聚合的形式呈现。村落是由村民共同塑造和经营的生存空间，不少单姓村落长期以血缘关系维系着族群稳定，一些多姓村落也常以血缘关系为内核维持着一定的地缘关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2]，因此，从心理、形态、功能等各方面来说，宗祠不仅是村民在空间上的活动中心，更是宗族的象征，是村民的精神中心，是村落的布局中心。刘沛林认为宗祠具有“自然的力”“客观的力”的作用，以功能合理、自给自足、适应经济和地域条件为准绳。^[3]实际上，这种看似自然和客观的力量有深层的生成机制。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血缘纽带是使村民得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祖先崇拜是由劳动经验累积所得的。宗祠的中心位置不仅体现了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更是村民安身立命的人生观念的体现，因此在布局上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形态，营造出一种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村落格局。

很多村落在建村的时候或许没有特定的规划，但由于以宗祠为核心的凝聚力，加上宗法制度的约束，尽管历经数百年的拆、迁、毁、建循环往复，也并未造成大的波动，全村始终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之中。^[4]通常来说，宗族村落在空间上以祠堂及附属的广场、月塘、戏台为中心。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的布局也

体现了宗族的凝聚力。比如分布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侗族，其议事活动在各支祠开展，结合宗祠、鼓楼、戏台、歌圩的位置和关系，构成村落布局的中心。此外，村内道路体系的建设也多以宗祠为中心，从宗祠向外衍射的道路网络可通达村内各地。有的宗祠设在村口，连接村内、村外双重道路网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落的开放性与内向性共存的特征。比如湖南衡阳盐田乡的汤氏宗祠，往南通衡阳，往北通湘乡，往西通渣江，且处在岳水及其支流的交汇处，水上船只可从岳水经蒸水进入湘江，到达衡阳、长沙等地。宗祠因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村落的焦点和标志，表现出浓厚的宗族文化。这种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布局，体现出宗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此后的发展中更是使盐田改乡为市，逐步成为区域经济贸易中心。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宗教建筑在空间构图等方面没有西方突出，但其仍是影响和制约中国村落布局与规划的重要因素，在有些地方甚至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以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村落和西南地区傣族的佛寺村落的宗教格局最盛，村落布局受宗教影响也最为强烈。对伊斯兰教村落来说，清真寺不仅是回民的宗教活动中心，还是礼仪、文化教育、社交活动、婚丧嫁娶、宰杀牲畜等社会活动的中心。一些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伊斯兰教村落或按地域分若干个礼拜中心，或按个人对教义理解的差异分不同教组，分设清真寺，以其为村落布局的中心，形成了以组团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和与之对应的村落布局，比如临夏近郊祁家庄。此外，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民众多信奉具有地方文化和价值内涵的地方神灵。这类民间信仰传统深厚，神灵多样，形式丰富，对村落布局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村落祭祀的中心包括宗祠和庙宇，有时二者合而为一，既是供奉祖先的宗祠，也是祭祀神灵的庙宇。当时的民众一般将具有超现实力量的地方神灵信仰，比如

土地、城隍等，看作平行世界中的基层组织官员，他们是护佑地方不可缺的元素。

有关村落祭祀系统的布局，以土地神信仰最为广泛。前引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大量明清造像愿文中所录载的每一项内容，都有“某某土地”的惯例充分表明了地方土地神信仰对村落的影响与制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限制了村民的活动范围与活动边界。在西南地区的村落中，村村有土地庙。某些村落甚至围绕土地庙布局。比如台湾省彰化县围绕着县城中央的县署和官庙，在四个城门设立土地祠。彰化县鹿港环绕着镇中港庙在四个方位建立土地公祠。台湾省苗栗市嘉盛庄中散落各处的伯公祠即土地庙，也是村庄中供奉数量最多的神祇。^[5]在土地神信仰中，由于本境伯公具有福荫土地、兴隆安定社稷、劝民向善、庇佑生产的作用，因此以其为布局的中心。并与处在村民生活核心地位的五文昌庙、主庙一并形成了具有多重含义的村落生活空间。其中，各方土地庙以本境伯公为中心朝外设置，以点控面，呈现出向心辐射的序列规律，构成多点连接的祭祀圈，起到底护乡里的作用。村落空间的文化内涵通过土地庙的投射得到充分显现。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除了一些大村，普通村落中的信仰系统并非如此完善，因此村落布局受宗教信仰影响较小，信仰空间较为分散，很少形成以村落庙宇为中心的布局形态。

从堪輿观念上说，村落原住民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探索和总结出有关居住的理想模式。一般来说，在地形上，具有前山后水的格局，以抵挡偏北风为主要目的，东、北、西三面群山环抱，南面地形稍微敞开，村基平坦开阔。在文化上，有尖耸山峰作山体为文笔峰，或建阁楼为文笔峰以表其意。在空间布局上，以宗祠为中心，宗祠旁有中心水池、戏台等向心型建筑，村内民

居多按统一的朝向以尊卑礼制之序排列。[6]风水作为一种环境观念，对民居、村落的选址、朝向、空间结构、景观构成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了试图将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的布局理念。例如，依山而建的传统村落，原住民常将村落周围的山视为风水神山，认为擅自上山破坏环境就会得罪山神，招致各种灾难。在从南到北的传统村落中，村落周边通常都植有“风水林”，这对村落的水土保持、空气净化、物种保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观念客观上为保护村落的生态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

村落风水的营造，在建村之际一般是优先考虑的选项，多强调“卜居”“发脉”。[7]其次追求形局上的风水环境。湖南衡阳马安田芳村和衡阳当福刘祠湾视野开阔、山水相宜，风水格局相当优越。然而，有的村落却“先天不足”。为了构建完美的风水，这些村落常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予以完善。通常有三种办法：引水聚财、植树补基、创造兴文运的村落环境等。在广东，尤其是粤东地区，村落形态明显受风水的影响，不少民居基于主人的生辰八字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方位朝向。比如潮州铁铺镇坑门村，每个宗室大屋的方位朝向均不一致。再如潮州登塘村在村落形成初期，按各性命卦定住宅朝向，此后经过历数代子孙繁衍，村落不断扩大，形成了丰富多变的住宅形式。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村落和住宅在布局形式上存在着相似性和同构性。

从防御意识上说，受历史环境的影响，村落布局透露出一定的自卫格局和保护意识。从原始时期开始，先民为了狩猎捕获、保卫住宅而考虑房屋建设的安全性。在村落形成之后，村民不断遭受战乱盗匪的侵扰和劫掠，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得不建立具有防御布局的村落和建筑。清朝时期，广东山地区域逐渐发展起来。广东山地乡村生存条件恶劣，在东西方经济相通之际，许多贫苦人民依靠政策引导和乡人帮带，纷纷出国谋出路。在积攒

了一些财富的时候，部分侨民开始返乡建设本乡，建立了不少规整有序又注重安全防御的村舍。由于当地匪乱时常发生，村民为了保护财富，在村落四周建起碉楼，时刻监视着四周的环境。早期的碉楼多采用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传统屋顶样式，一般3~5层，多则5~7层，主要建在村前、村后及村落周围的制高点上。大量后期的碉楼在外形上模仿西方古典建筑样式，出现了仿意大利穹隆顶式、仿中世纪教堂式、仿清真寺穹隆顶式、仿英国寨堡式等。而处在湘黔桂、湘粤桂三省交界山区的少数民族，也因常年的自然灾荒和战争动乱形成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和防御意识，对村落形态的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湖南永州勾蓝瑶寨自明代依附王朝统治以来，仍不断遭受周围“粤贼”侵扰，其村落建防为围绕村境的防御式城堡，村中视野开阔处还设有守夜屋进行瞭望和守备。（见插图12）湖南郴州一带的村落中，各种防御性建筑仍有不少遗存。比如官方色彩浓厚的宜章三堡（栗源堡、黄沙堡、笆篱堡），各种私人修筑的碉楼（当地称为“水楼”），等等。贵州从江县高增村以花桥式的寨门界定居住范围，成为村寨出入口。四川汶川县、茂县等地的羌族村落，青藏地区的藏族村落，都有以碉房为防御象征的建筑类型。

从环境理念上说，一些学者从有机生长论角度看自然村落，他们认为第一批永久的自然村落的出现遵循了生物有机体的生长原则，是在长年累月的叠合扩展中成长起来的生态聚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村落布局呈现出因借自然、与环境相和谐的特点，“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8]，形成了一种自由灵活的布局形式。就南方山地村落来说，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南方山地村落表现出的布局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向心、内聚的形式，是山地村落的常见布局，比如广西的大田村。二是离心、发散的形式，比如贵州镇宁县的各苗族村落。在长江流域，村落大多临水

而建，村落形态多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这决定了村落中水巷、沿水街道的布局，并与船只、码头和桥梁共同组成了村落的水路网络。还有不少利用水环境便利生活的村落设计，如湖南永州河山岩村的先民将泉水引入村境，使泉水贯通全村，村内民居排列规整，周遭遍布沟渠，不仅有用于洗涤的明渠，还有用于排污的暗渠，引水系统与排水系统互不牵连，村落生活和谐有序。北方地区也依靠其地理、环境条件进行村落规划。汾河以西地势较低，为开阔的冲积平原，村落民居分布比较紧凑，绝大多数村落外围都筑有防汛大堤；汾河以东地势较高，除少数地势较低的村落外，极少有村落筑堤防洪。

二、村落的景观

村落景观层次丰富，构景形式多样，有八景、十景，甚至十二景、十四景，还有水口园林、点景建筑及整体构景等。除了体现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思想理念，特别强调营造“可居可游”的理想生活环境，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人聚空间。徽州村落的水口园林，除了原本的景观意象，还表达了“全村同在画中居”的文化意象。（见插图13）

明清村落主要沿用传统的八景构景手法。八景始终以乡村田园风光为主题，与村落及其相邻空间的水塘、河道、农田和种植林区相连，共同构成具有风水导向，集交通运输、生产生活、防火防灾、社会交往等现实功能为一体的村落景观。徽州绩溪县磻头村是一个运用八景构景手法营造村落景观的典型代表。《许氏宗谱》记载许氏一世秦来公“喜润州云山拱秀，山水萦澜，八景四环，三屏分列，大明洪武二年由云山大桥头迁而居之，遂为润州始祖”^[9]。基于对村落山水环境的向往，许氏一族在磻头建

村，沿溪依山而建房舍，村内有“润州八景”：屏开锦帐、甌峰毓秀、石室清虚、逢石作壶、岩存仙迹、洲涌金鱼、峦回天马、玉泉鸣佩。歙县呈坎村“山水缭绕，风景中和，遂筑室居焉”，“呈坎八景”也久负盛名：永兴甘泉、朱村曙光、灵金灯现、众峰凝翠、鲤池鱼化、道院仙升、天都雪霁、山寺晓钟。祁门县渚口村的“锦城十四景”：天马饮泉、金鱼戏浪、渔谷暖烟、罗星拱极、佛岭斜阳、水环玉带、伊川霁雪、葛潭夜月、渚堤新柳、校场古迹、楼峙金华、梵殿迎晖、尖峰晓日、荷塘醉影。福建莆田东阳村“东阳八景”：淇流环带、荔树列屏、壶山倒影、东海浮沙、六桥夜月、绿野春光、两宫拱翼、孤寺依堤。湖南衡阳王江村“王江八景”为杏岭晨曦、城冈夕照、二水交流、七峰叠翠、王江钓月、马岭樵云、贝田耦耕、上湖群牧。关于八景的记述之多，充分反映了传统村落对景观建构的重视以及八景设计的普遍性。此外，八景以人文意境为基础，在乡贤和过往文人的诗词画作中，对风物景观进行了生动的、反复的、集锦式的描绘与再现，其创造出的美的意象更具文化内涵，使村落景观更具审美文化功能。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贾大量兴起，他们积极回乡建设村落，极其注重村落景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趣，通常运用古典园林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水理论建造大批村落园林。其中，徽商的发展十分兴盛，为村落园林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徽州地区的村落景观样式最为典型。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为营造开天门、闭地户的风水环境，增加水口的锁钥之势，徽州地区的村落一般在进村口的河流水口地带建造园林，故又称水口园林。明清时期水口园林多集中于徽州府辖治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等地，其中以歙县唐模村的檀干园最为典型。（见插图14）水口园林通常以天然山溪湖泊为基础，以桥作关锁，辅之以树、亭、塘等点缀，将山水、田园、村舍融为一

体，成为村民休憩、社交的公共场所。如若村落文化强调兴文运等人文含意，则以文昌阁、魁星楼、文笔塔等建筑为主，辅之以庙、亭、堤、桥、树等。又常在水中央立罗星洲或做土墩，并在其上建庙或阁，比如浙江乌青镇的分水墩上建有阁。歙县丰南村吴氏曾为两淮八大盐商之一，其村内修建了“十大名园”及“十二楼”。徽州村落园林以新安文化为滋养，不仅为村落园林提供了创作理论与表现技巧，更直接影响了村落园林的装饰创作。

遗存至今的不少明清村落空间特征明显，除了巧借自然环境构建村落景观，还配置了人工景观节点，形成了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人文景观空间。湖湘村落中这样的景观空间比比皆是，比如湖南郴州板梁村、永州勾蓝瑶寨均是如此，外在景观体现的空间意象构成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徽州地区除在进村口建水口园林，还建造了大量牌坊，作为进出村口的标志，成为村落的景观节点。在整体规划中，往往考虑村落各类设施，比如街巷、民居、商铺、庙宇等空间布局，形成多样化的景观结构。比如福建崇安县城村，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轴线展开空间结构，从形式上延续了方正规整的中心布局传统，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简化，“将对景中心的钟鼓楼、衙署、寺院等改为一般的楼、亭、阁，分置于一字街、十字街、丁字街等地作中景和端景”，使村落景观层次丰富，充分反映出村落构景、景观节点布局的灵活性。除了村落八景、水口园林、景观节点，明清时期的村落景观还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特征。概而言之，它以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村落辉煌多样的景观文化。

三、村落的建筑

受空间布局、地方民俗、自然环境、乡土文化、功能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村落建筑形制和建筑类型极具差异。不同形制和功能的建筑体现了村落的结构与面貌，是与地理环境、文化景观、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社会习俗紧密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村落建筑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结合体。

（一）民居建筑

明清时期，村落数量大幅增长，村落面貌的繁荣前所未有。由于民族、区域和阶级的不同，此时的村落民居建筑存在极大的区别。从汉族民居来看，除黄河中游部分地区采用窑洞式住宅以外，其余地区多以木构架结构的院落式建筑为主。受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民居住宅的布局、结构和艺术处理，大致可以秦岭和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种不同的风格。

北方民居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见插图15）这种民居的布局，在封建宗法礼教的影响下，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大门多设于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避免外人看到宅内活动。自影壁转西至前院。南侧的倒座常作客房、书塾、杂用间。自前院经纵横线上的二门进入后院，院北的正房供长辈居住，东西厢房是晚辈的住处。^[10]另有走廊、厨厕设计，无对外窗。体例和规格较大的四合院一般出现在经济发达的乡村地区，或由经商回乡的大户人家修建和居住，普通乡民无力修建和负担这样的四合院，有的甚至是几户家庭合住一院。

表7-30 四合院式民居比较

名称	结构和造型	典型代表
北京四合院	一般房屋在抬梁式木构架的外围砌砖墙；以硬山顶的屋顶式样居多，次要房屋则用平顶或单底顶。墙壁和屋顶比较厚重以御寒。色彩一般以大面积的灰青色墙面和屋顶为主	河北涉县偏城镇偏城村、井陘县于家乡于家村、武安市伯延镇伯延村
乔家大院	外墙多为不开窗封闭的实墙，是极具防御性质的民居建筑。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深长方形建筑。屋顶式样以单坡顶居多，使雨水流向院内，意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河南省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
黄土窑洞	主要有靠崖式、下沉式、独立式等形式的窑洞以及拱券住宅。靠崖式是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数洞相连，或上下数层；下沉式也称为地坑式、天井式，是在平冈上凿掘方形坑，沿着坑面开凿窑洞，形成一个地下四合院	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以豫西平原地区的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庙上村、北营村、曲村最为典型
徽派民居	群房一体，采用封闭高墙、马头翘角的马头墙样式，墙面与马头高低进退错落有致。一般为多进院落式布局	皖南黟县宏村、西递村，江西婺源村落群
一颗印	由正房、厢房、倒座组成的四合院，其瓦顶、土（砖）墙呈封闭状，从外观看多为方形，又称窰子屋。正房、耳房毗连，正房多为三开间，与左右两侧构成“三间两耳”或“三间四耳”	主要分布在陕西、安徽、云南等地。湖南洪江、陕西韩城市党家村均有此类民居建筑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11\]](#)

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民居建筑以封闭式院落为单位，一般沿着中轴线布局，依次建立门厅、轿厅、大厅及住房，并采用东西横长的平面构图，在左右布置客厅、书房、次要住房以及厨房、杂屋等，屋外围以高墙，同时在院墙和房屋前后开窗。后方住房常为二层建筑，多为绣楼和女子闺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外墙和屋顶结构与北方民居相比薄了许多。

长江下游的院落式民居与浙江、四川等山地民居及岭南的客家民居差异明显。浙江、四川等地的山地民居的朝向和位置一般取决于地形因素，房屋以砖木结构为主。主要房屋在布局上仍以中轴线的形式设置，但左右次要住房不一定对称，院落的大小也各有不同。客家民居建筑主要分布于福建西南部及广东、广西二

省北部。由于长期以来客家人聚族而居，因此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群体住宅。这种住宅的布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大型院落式住宅，二是砖楼或土楼。比如福建永定县湖坑镇南溪土楼群。最大的土楼直径达70余米，由三层环形房屋相套，房间多达300余间。外环房屋高4层，底层作厨房、杂屋用，二层储藏粮食，三层以上住人。其他两环房屋仅高1层。土楼中央堂一般用于族人议事、婚丧典礼及其他活动。外墙用厚达1米以上的夯土承重墙与内部木构架结合，加上若干与外墙垂直相交的隔墙，是极具防御性质的民居建筑。（见插图16）

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黄土地区的民居建筑多为窑洞式、拱券式，是村民为了适应地质、地形、气候和经济条件建立的。窑洞式住宅主要有两种：靠崖式和地坑式。靠崖窑通常要在洞内加砌砖券或石券，防止泥土崩溃；或在洞外砌砖墙，保护崖面。规模较大的则在崖外建房，组成院落，成为靠崖窑院。地坑窑以各种形式的阶道通向地面，如附近有天然崖面，则掘隧道与外部相连。大型地坑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坑相连，可住20余户。还有的在地面上用砖、石、土坯等建造一层或二层拱券式房屋，称锢窑，数座锢窑组合成锢窑窑院。

位于广西、贵州、云南、海南、台湾等处的少数民族居民出于通风、采光、防兽、防盗等实用性的考虑，多使用下部架空的干栏式民居建筑。这种住宅的布局 and 结构富于变化。比如云南傣族民居，主要以木架居多，但也有全部用竹料的。（见插图17）房屋平面多为横长形，少数为纵长形。下部用作畜圈、碾米场及储藏室、杂屋等。楼梯置于室内或室外，上层前部为宽廊及晒台，后部是堂与卧室，堂内设火笼和佛龕。广西壮族民居有的形制较大，面阔5间，高达3层。上层为堂，两侧各加过间，形成较大的空间；堂后置卧室数间；外部伸出，称为挑廊；并利用屋顶

做成阁楼。用木材层层相压构成壁体的井干式住宅，仅见于云南和东北少数森林地区，数量较少。

藏族民居主要位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西部及云南北部。多因地制宜用石材搭建石墙，内部以密梁构成楼层和屋顶。多依山而建，很少有院落。一般为2~3层，底层置畜圈、草料房；二层为卧室、厨房、储藏室；三层以经堂为主，附以晒台、厕所。二、三层多有木构的挑楼伸出墙外。

新疆维吾尔族的平地民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南疆喀什、和田等处用砖、土坯外墙和木架、密肋组合的院落式住宅。院落周围平房和楼房相穿插，前廊建列拱。房屋平面以前室、后室结合，附以厨房、马厩等。一般不开侧窗，自天窗采光。二是吐鲁番的土拱住宅，用土坯花墙、拱门等划分空间，房屋布置基本与喀什一带相同。

蒙古、哈萨克等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使用移动的毡包，往往二三成组，在附近用土墙围成畜圈。毡包直径4~6米不等，高2米有余，以木条编为骨架，外覆羊毛毡，顶部装圆形天窗，供通风和采光之用。此外，因从事半农牧业而建造的固定住宅，有圆形、长方形以及圆形与长方形相结合等形式，也有在固定房屋之外再用毡包的。

（二）祠堂建筑

如前所述，祠堂是宗族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布局位置，还是建筑形制，祠堂在村落建设中处在尤为重要位置，是村落的重要标志。祠堂建筑的择位定向，归纳起来实际上是点、线、面形态的选择和组织。点即点穴；穴是建筑结构的中心点，是祖宗牌位的位置，是祠堂存在的根本。因此以牌位来决定整个祠堂

的位置。线即祠堂的轴线；由已知的祖宗牌位的位置及其后厅尺寸大小来确定祠堂的轴线，轴线的趋向决定了祠堂是否能得到好的风水和生气。面即祠堂所掌控的场域；轴线上的建筑组成了整个建筑群的院墙范围和规模，祠堂的选址和布局甚至影响整个村落的形态。祠堂的择位定向是由点到面的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统一的过程。

湘南汝城境内有627座清代修建的祠堂，19座清以前修建的祠堂，其在布局上主要有两个典型类型，并且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规律。一种类型是以祠堂为中心，民居沿祠堂两侧和后方建宅，形成三面合围的半圆形或扇形村落。祠堂之左，大多为族中辈分较高的族人建宅而居；祠堂之右、之后，则族内之人均可建房修宅，只规定住宅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祠堂。另一类型的布局，也是以祠堂为中心，但族人住宅，只能沿祠堂两侧延伸修建，一律不得在祠堂后边建筑住宅。祠堂后需要预留出与祠堂建筑宽度完全对等的纵深向后延伸的空地，空地只能用于宗族后裔扩建祠堂。整个村落的平面形状，往往呈凹字形。[12]

表7-31 汝城县部分村落祠堂信息

村名	祠堂名称	始建年代	村名	祠堂名称	始建年代
三星镇 西黄村	欧阳氏宗祠	明洪武二年 (1369年)	土桥镇 金山村	卢氏家庙 (叙伦堂)	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
附城乡 东溪村	颜氏宗祠	明洪武五年 (1372年)	土桥镇 金山村	李氏家庙 (陇西堂)	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
小垣镇 简水村	邹氏宗祠	明建文三年 (1401年)	城郊乡 范家村	范氏宗庙	明成化二十一年 (1485年)
小垣镇 简水村	简氏宗祠	明永乐四年 (1406年)	城郊乡 范家村	中丞公祠	明嘉靖元年 (1522年)
岭秀乡 永利村	阮氏宗祠	明永乐五年 (1407年)	城郊乡 津江村	朱氏家庙	明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村名	祠堂名称	始建年代	村名	祠堂名称	始建年代
土桥镇 土桥村	李氏宗祠	明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	外沙乡 外沙村	朱氏太保第	明嘉靖元年 (1522年)
土桥镇 金山村	叶氏家庙 (敦本堂)	明弘治十一年 (1498年)			

资料来源：《湖湘建筑》（二）。[13]

按宗族组织的房系可将祠堂建筑分为主祠、支祠和家祠等类型。主祠规模较大，甚至是周围数县同族合力修建而成，统称为宗祠。汝城范家村的范氏宗祠便是范氏家族的大宗祠。支祠一般规模稍小，为支房分祀之祠。比如汝城土桥村的李氏宗祠。家祠则是家庭设置的供奉直系祖先神主牌位的小规模祭祀场所，也称家堂、家庙，有所谓“庶人祭于寝”之说，其与民居结合，在宅中大堂设祭。南中国民居几乎户户如此。

表7-32 江西畚田村、横坑村祠堂情况

查田村			横坑村		
祠堂名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始建年代	祠堂名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始建年代
文兴祠	1665	明洪武二年 (1369年)	防御使第	—	元初
遵善堂	641	明代	宗祠	1169.28	元至元六年 (1340年)
存性堂	494	明代	崇义堂	383.4	明成化七年(1471年)
	349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安老堂	—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
濂泉堂	236	清乾隆年间	遗安堂	270.32	明末
联辉堂	108	清乾隆年间	鉴公祠	246.39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
爱仁堂	—	清代	寿轩堂	—	元代中期
承裕堂	172	清光绪年间	垂裕堂	—	元代中期
望远堂	110	清光绪年间	体仁堂	—	元代中期

查田村			横坑村		
祠堂名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始建年代	祠堂名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始建年代
忠正堂	133	清光绪年间	学古堂	—	元代中期
泰来堂	134	清咸丰元年 (1851年)	顺公祠	137.36	清乾隆年间
玉琢堂	267	清道光年间	耕隐堂	—	明初
玉瓊堂	236	清道光年间	具庆堂	369.2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
玉闰堂		清道光年间	养性堂	219.35	清乾隆年间
上达堂	132	清末	五桂堂	—	元代中期
登公祠	132	清末	敬文堂	195.5	明初
化玉堂	—	清末	鲁公祠	153	清乾隆年间
和美堂	—	清末	吉公祠	—	清乾隆年间
道庵堂	—	清代	继志堂	—	明成化五年(1469年)
大公祠	—	清代	明性堂	—	元代中期
九彩堂	—	清代	琯音堂	—	明初
崇礼堂	—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玉川堂	—	明初
修身堂	—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护翠堂	—	明初
修齐堂	—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和公祠	—	清乾隆年间
会公祠	—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裕德堂	—	明代			
文友堂	—	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			
仲信堂	—	明洪武十二年 (1379年)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14\]](#)

在祠堂内部空间的结构布局中，专门用于宗族祭祀的厅堂正前及两侧一般都分布有相应的辅助空间，较普遍的为“一楼二房”，即设于祠堂正面门楼内侧的戏台、位于厅堂侧边祭祀礼器的专用库房以及举行大型活动时开伙就餐的厨房。凡“一进三间”以上的祠堂，都具备这样的内部结构布局。^[15]规模更大的祠堂还有各式亭榭阁坊，族学、公学等专门教育族内童丁的学堂。湘南祠堂为天井院落式，院落一般较小，称为天井，主要用于采光、通风、排水，挡阳降温。中轴线上的天井院落尺度要与主厅堂相呼应。村民认为“过白”能带来光明和生命，因此祠堂进深的尺寸有一定讲究，正厅堂案上的香顶擦过前檐封檐板的下缘，至前厅屋顶，要能看见一定高度的天空，形成前厅及正厅一定的高度比例。（见插图18）

明清祠堂的平面形制、立面构图、总体形象，都趋向标准化及定型化格局，是人们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影响或决定了嗣后营造祠堂的固定态度和倾向。作为村落中最隆重的建筑，祠堂立面构图严肃开敞、辨识度强，有统一的群体构图作用，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程式化特点：模式化的入口形式、步步高开的纵向层次、特殊化的屋顶处理以及多样化的山墙。从建筑结构上说，主要有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和少量的石木结构三种形式。总的来说，祠堂作为村落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地区广泛存在，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祠堂是村落发展最典型的象征，它的建筑形制、功能和特点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明清村民生活基本情况的了解。

（三）其他建筑

明清建造了许多大寺院，如南京灵谷寺、大报恩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等。祭祀文化不只是皇家绝对垄断的专利，况且祭祀本

意在于宣教，通过“神道设教”使全国臣民参与宗教祭祀，从而强化和控制乡村民众的思想。在州府县甚至村落，国家允许建立一些庙宇以供正祀，地方上的庙宇虽形制、规模、内容上不如官修庙宇，但往往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比如重庆忠县石宝寨的阁楼，建在村寨后的小山上，几乎在村寨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一标志性建筑，因其是“一种永恒的方向标志”[16]。类似的阁楼建筑还有不少，如云南大理三文笔村在小街空间交会处利用错位建造的一座两层高的魁阁，体量高大，外轮廓线变化独特。湘、桂、黔一带的苗族、侗族村寨的鼓楼（见插图19）、西北伊斯兰教盛行地区村落的清真寺、傣族村落中的缅寺都有类似的作用。

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有不少佛塔群。位于潞西县风平镇的大佛殿重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其中有两座典型的傣族佛塔——熊金塔、曼殊曼塔。塔下有复杂的“亚”字形基座，塔身比例修长，周围以小塔和怪兽陪衬。由于傣族聚居地区与缅甸接壤，所以傣族佛塔和缅甸塔具有类似的风格。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建于明正德十年至嘉靖六年（1515—1527年），是一座典型的明代楼阁式砖塔。飞虹塔位于广胜寺的轴线前方，是在元代原址上重建的，塔共8角，外观13层，高47.63米，外壁用各色琉璃装饰。琉璃制的栏杆、天神、动物、斗横等都极为细致华丽，是明代琉璃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塔、阁在村落建筑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空间上的相对优势使其成为村落建筑中的重要标志，使村落的“可印象性”特点更加明确，村落建筑还是社会交往活动、精神文化、建筑技艺等的重要体现。

[1]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2页。

[3]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页。

[4]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5] 潘朝阳：《苗栗嘉盛庄村庙的空间配置及其内涵》，载《台湾师大地理研究报告》1990年第16期。

[6]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8页。

[7]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9页。

[8] 王君荣编：《阳宅十书》，《论宅外形第一》，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影印本。

[9]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6—177页。

[10]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页。

[11]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328页。

[12] 胡彬彬：《湖湘建筑》（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13] 胡彬彬：《湖湘建筑》（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14]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174页。

[15] 胡彬彬：《湖湘建筑》（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16] 凯文·林奇著，项秉仁译：《城市的印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第五节

明清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

终明一朝，其北部边境动荡不安，北部国境线不断内缩。明朝的疆域勾画了当时中原王朝汉族人口活动的基本范围，但从历史来看，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也可认为属于古中国的疆域范畴。明清时期南方的蛮夷地区，实行肇自土官制度的土司制度；在北部草原等游牧地区，则由传统的万户制度发展为盟旗制度；在新疆等政教合一的沙漠绿洲地区，在万户制度的基础上演变成伯克制度；在青藏高原地区，则由万户制度发展演变为金瓶掣签制度。

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绘制的明代疆域图，《明史·兵志》及《明史·地理志》对各卫、区境内军卫的人口记载，曹树基考证了分府及分区人口数，测得各府区的面积，并算出各分府及分区的人口密度，其中边卫边疆的人口密度情况大致说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情况。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的区域可称为人口极稀疏地区，包括所有的边卫及边疆地区，其中除了贵州都司和辽东都司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8人，其余各地均不到5人，属于明朝人口分布的“洼地”。人口状况是地区发展的基本要素，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大致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的情况。

表7-33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边卫及边疆人口密度

地区	面积 (平方千米)	民籍人口 (万人)	军籍人口 (万人)	总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台湾	36 000	10	0	10	2.8
播州	27 813	12	0	12	4.3
贵州都司	71 876	30	28.3	58.3	8.1
云南	362 209	84	36	120	3.3
贵州宣慰司	33 281	12	1.7	13.7	4.1
马湖等地	52 086	12	0	12	2.3
四川行都指挥使司	45 830	3.7	9.3	13	2.8
龙安等地	22 663	6	0	6	2.6
松潘卫	38 840	7	1.7	8.7	2.2
西藏	1880 740	80	0	80	0.4
亦力把里	1 919 575	30	0	30	0.2
安定卫	454 475	4	0	4	0.1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81 769	5	18.5	23.5	2.9
洮州卫、岷州卫	35 610	1	3.3	4.3	1.2
宁夏卫	29 400	1.8	6.9	8.7	3.0
蒙古	4 212 432	36	0	36	0.1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	162 798	0	45	45	2.8

地区	面积 (平方千米)	民籍人口 (万人)	军籍人口 (万人)	总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辽东	68 144	10	40	50	7.3
奴尔干都指挥使司	3 000 000	50	0	50	0.2
合计	12 535 541	394.5	190.7	585.2	0.5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1\]](#)。

一、西藏地区的村落

从唐朝与吐蕃交往开始，及至元代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再到明清时期，西藏的发展一直与中原紧密相连。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广袤的青藏高原特别是高原上的村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尽管在人口规模、村落分布和村落形态上，高原与内地存在很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藏族村落成为维系明清国家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明朝基本沿袭蒙元建置，将西藏调整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朵甘都指挥使司辖地。清朝承袭明朝原有的政治关系，设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并因其俗设噶隆第巴等职；设驻藏大臣二人，镇抚其地，封爵承袭。其中驻藏大臣需会同达赖喇嘛选拟噶布隆、商卓特巴、仔本各正陪二人，从行政权力上强化了官方意识。除了在行政和军事两方面对西藏进行管控，“其他有四，曰卫，曰藏，其东境曰喀才，其西境曰阿里，其辖城六十余。卫与喀木诸城皆统属于达赖喇嘛。藏与阿里诸城皆统属于班禅喇嘛”[2]。据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造册称“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3]，班禅所属疆域有限，民地无多，相对来说，达赖属下土地面积更广、民户更多。[4]

四部之中的“卫藏”也称为“中藏”，“卫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余里，即乌思藏，居诸藏之中”，辖31城；康藏也称为“前藏”，在卫西南500余里，辖10城；喀木在卫东南832里，辖10城；阿里为西藏之极西边境，辖12城。[5]四部之下，统营、城、呼图克图领地、部族及寺院。西藏逐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城镇体系[6]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城镇体系。

按照西藏之俗，凡是有官舍、民居之处，建造楼居，依山为堑，则称为城。（见插图20）并量地大小、人众寡，各设宗布木以理民，设丁布木以理兵。[7]“民居碉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则居黑帐。”[8]然而在地广人稀的西藏地区，许多地方未有人烟，

甚至“所过地方，尽是深山穷谷，长林丰草，枯藤盘结，状如楼台，人皆履藤凌空而行。间有断涧绝壑无路可通，窈窕幽浑，下临无际，空中枯藤牵搭，人由上行，其险实莫与匹”[9]，“终日蹢躅于荒山中。……山多石穴，大者如堂如室，小者如户如牖”，“悬崖绝壁，偏桥列如云栈，崎岖难行”[10]，关于西藏地区地形地势等恶劣环境的描写不胜枚举，而这也是限制地区发展的首要因素。除了拉萨等城镇的兴起，入藏的50个必经之地，大部分因路途险阻而欠发达，在人口流动、经济贸易的活动过程中，定居村落的民户数量不算多。而对西藏人口数量做出恰当的估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事实上，现代以前，西藏从未有过人口调查或类似的其他调查。

因此，采用任何方式对西藏人口进行估测都难以复原历史的真实。葛剑雄认为，根据元朝和清朝的数字进行推算，明代青藏高原的人口不会超过70万~80万。[11]王克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举证，13世纪忽必烈在藏族地区清查人口达123万，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清查结果为134万有余，这一数据不包括西藏以外的藏族人口。[12]曹树基则考证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西藏人口为100万。[13]黄奋生基于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册籍的记载，按每户5口计算，认为达赖属地百姓有677 190人，加上302 500名喇嘛，共979 690人；班禅属地百姓有33 760人，加上13 700名喇嘛，共47 460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辖的百姓人数共有710 950人，百姓人数大概是喇嘛人数的一倍。[14]另一方面，清王朝设立的西藏绿营有官兵621名、拉里有官兵128名、察木多有官兵333名；又设步骑64 000名、步兵50 000名；骑兵前藏3 000名，后藏2 000名，阿里5 000名，稞坝1 000名，黑帐番、蒙古共3 000名。[15]官方称这些戍兵只用于弹压，均散在民间各处，未被算入西藏人口总数。而有关西藏

村落的记载则更少，也更难以估量了。

其次，由于民户需承担无偿的繁重劳役，“土民之服役者，名乌拉，凡有业之人，勿论男女，皆与其选，即由他处远来者，但能置烟灶租房而居者亦然，多寡各量其贫富”^[16]。土著民人在头目、碟巴、喇嘛的管理下长期服役，通常“照所居屋之大小量定。应需数或三四名，或十数名，照数输派乌拉”，这导致土著民人经济资本积累缓慢，无法供应每日每名纳银五分的要求或另雇穷民代之，只得自行应役，久之则锢于此制。比如朗杰学村每年需上交糌粑1 500卷作为赋役交纳，折合约25 000米左右。^[17]全村村民为了完成紧张的织造任务，无时无刻都在捻毛线。有的家庭为了完成足量赋役，甚至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外来人口也按照贫富能力供给差役，比如巴勒布及卡契回众，因常来藏地贸易，有早年来藏安家以贸易为业者，“是应严束仆从及汉番兵役，不得稍有扰累”^[18]。经济上的强制剥削使得民户生存空间越发受限，“差赋日增，逃亡日众”。济咙内琼堆一村，原有百姓50余户，到乾隆末年，只存8户，“而每年仍迫以原户差赋”。其萨喀一属原有百姓1 000余户，也只剩下300户了，“而亦以原户迫索差赋”。这是司事头目“贪饕性成”导致的。^[19]乾隆六十年（1795年），朝廷准达赖、班禅蠲免钱粮，并赏银两抚恤。但是随着时日的增长，司事僧俗又复借词苛敛。西藏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得达赖、班禅及其属下各层级头目、营官、富户等肆无忌惮地压迫民众，民众难以安宁度日，导致逃户现象屡见不鲜。

西藏民户居于乡村地区者，为了便利打柴汲水，依傍山坡地势建碉房，称为“纵”，“则其碟巴头人据险之所”；平地无隘的官舍称为“噶”；^[20]城郭的房屋皆平头，“中稍大者，其堂必刻楠雕楹，备极煊烂”^[21]，“高者至数十尺”；部落多为黑帐房，“贵人

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22]。经济发达之处多有土城；一般民居多为碉房，或有筑土为室，或有一些人丁凋落、炊烟零落之地，居人以树皮为屋，仅数间。除民居之外，寺庙作为区域交往活动中心，也承担着日常居住的建筑功能，并在一些特定日期成为周围民户、商人的集聚点。比如入藏门户江卡的汉人寺，在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23]乍丫大寺是喇嘛等的居处，附近男女婚配俱在寺前转经阁歌唱，如若两情欢洽，男以糌粑结女之发间，其婚遂定。[24]硕般多的两座大寺，喇嘛、磾巴居于经堂，僧众、俗磾巴也在硕般多土城修建房屋，环绕居住。[25]西藏喇嘛人数是西藏人口总数的1/3，寺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居住功能。总体来说，西藏地区村落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分布较散、发展较慢，行路商人甚至有可能经过十几站都是野宿。

二、西南地区的村落

作为地理概念的西南地区，一般包括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等地。但是，由于西藏地区的情况稍有不同，故我们在前文中已单辟一节展开了讨论。本节所论西南是除西藏以外的地区。不过，要指出的是，西南的滇西北、川西等地也是藏族自古以来的聚居区域，因而这一区域的藏族村落也比较常见。（见插图21）对这一地区，历朝各代的中央朝廷都十分重视，及至元明清时期尤甚。一般认为，蒙元吸收了南宋在广西设土官管理的经验，率先在云南、广西等南部边疆地区实行土官制度。明朝进一步完善土官制度，发展成更具规范的土司制度，并将其推广到与南部边疆情况相似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和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明代朝廷针对不

同地区情况的差异，实行土流并治。一方面分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统领当地人民，并与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镇抚司、长官司组成自治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设立府州厅县等行政组织层级，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头人担任土知府、土知州等。不仅如此，朝廷还允许土司统辖一定数量的土军，用来弹压地方和服从征调，成为卫所的补充力量。从影响范围和程度上来看，土司均超过了土官，在实践中影响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到了清朝，由于土司制度的普遍推行，造成了土司族内因争袭仇杀械斗、土官坐大而朝廷难以置喙等情况。一方面，清代国家对土司的态度从安抚转向了严格控制，即土司除了有承袭、征调、贡赋等权利和义务，还需如流官一样被管理、考核、奖惩等。另一方面，尽管对土司的管理愈加严格，但清代朝廷仍然怀疑土司作为地方自治领导者有割据一方的可能，危及国家的政权稳定。因此，“改土归流”被提上了日程，土司制度逐渐衰落，仅在澜沧江以南的边疆等偏远荒瘠的地区保留了一些土司。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及村落就是在土司制度的变化中发展和建构的。在“羁縻政策”的引导之下，西南山区、半山区地区的原住民开始下山垦殖；受移民政策的吸引，大量的卫所军户、客民纷纷迁入。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商品贸易发展、理学教育等国家意识深入，不仅改变了当地夷多汉少的民族结构，还使山区边缘和腹地景观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兴盛的村落。比如在洪武初年，明政府在楚粤之交的永明县，通过向化招抚、推行县治、编立瑶役籍、增设卫所屯军、兴瑶目瑶长制、优免投税等羁縻政策，实现了清溪、古调、扶灵、勾蓝四瑶归化，下山建村立籍开垦。^[26]雍正四年（1726年）左右出生于云南塔甸高山的王氏家族两兄弟，从高山下移至槽子河

河谷区，成为沿河村落的始迁祖。湖北东南地区的村名体现了当地移民定居和宗族的关系，比如《通山县志》中提及县内人口按姓氏聚居的习俗，多以一姓聚居于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并多以姓氏命名所居村名，如汪家畈、祝家楼、毛坪、坳上焦、瞿塘张、洞口罗等村。两姓同居一村的村落则以人口多少区别先后，如焦夏等村，且“无论是从本地迁出，或外地迁入，或本地土著，皆不例外”^[27]。

移民开发活动对西南地区的村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明朝相比，清朝移民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从强制性的移民政策转向经济互补性作用下形成的自发性移民。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金、技术的需求，以及内地人民对经济机会和利益的追求，使人口迁移变成了现实。云南山区的矿产、土地等资源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和坝区移民，拉动了移民进入山区、河谷从事矿业生产和农业垦殖。部分移民携家庭或家族同往，形成了以亲族关系为主的一姓大村。也存在一姓多村、多姓一村的情况。在这个背景下，诸如峨山县的沿河村落建立并发展起来。

表7-34 清朝云南槽子河流域部分村落情况

村名	建村时间	主要姓氏	村落情况
阿稽竜	明万历	李、普	村落坐东朝西，村东头是李姓，村西头是普姓，中间有隔墙为界
得则莫	明万历	李	村落坐东朝西，李姓是从阿稽竜迁移至此
	明末	矣、方、李、普	村落坐北朝南，四姓之间均有巷道，每个姓氏居隅一方
拉乌	明末	普、李	村落坐北朝南，村东是李姓，村西是普姓，中间有隔墙为界
背租	清雍正	王、董	槽子河西是王氏村落，俗称“老王头”；河东是董氏村落，彝语名叫“齐来起”村。后河东董氏逐渐西迁至王氏聚落，但起初搬迁时与王氏聚落间有明显隔离，中间有巷道
马干冲	明末	史、张	两姓一村，一起从临安府（治建水）来此炼铁
大江村	清初	方、矣	两姓一村，方姓是从石头村迁至此地来炼矿；矣姓是从大了固搬迁至此
	清康熙	鲁、李	两姓一村，一起从塔甸迁至此地
袜底白	明末	何、龙	两姓一村，各有祠堂
小念姑	清初	矣	一姓一村，大了固的矣姓支系发展而来
鲊抹觅	清初	赵	一姓一村
卡夕搓	清初	龙	一姓一村

资料来源：《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28\]](#)

除了商户、民户的移民，军事移民对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明清军事政策形成的屯田制度，国家力量逐渐渗透山区。明朝卫所屯军自行屯垦；清朝则组织绿营军及其家属，并召集汉族移民屯垦，同时又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扩大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际掌控。在行政和军事背景下，外来移民的涌入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通过兴修水利、提供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扩大耕地面积，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环境得到了改善，使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经济向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转变。“大批移民进入山区，溪涧坡头的零星土地得到垦辟，山地得到了历史以来最大程度的利用”[\[29\]](#)，比如引进玉米、甘薯、马

铃薯等适应性较强的域外作物并大面积种植。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组织和资料结构，也改变了乡民的生活习俗。

云南沧源、西盟、耿马、镇康、孟连等地在清以前一直是佤族的聚居地。受自然因素的限制，佤族人生活闭塞、生产力低下。自清初矿禁大开之后，“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周围傣族、拉祜族也纷纷迁入。该地不仅民族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格局；还带来了耕种水田、使用犁耕的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工具——锄头，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土地单位生产面积的提高，也使其能负荷的人口承载力提高。大量移民的进入使人口密度增加，在人口压力下，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群体打破了血缘的、族群的限制，在合作控制和利用有限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关系，为共同经济生活奠定了基础，从而加快了西南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村落社会逐渐繁荣起来。

西南地区在乡约制度、乡村教育的落实中，地方精英在接受国家意识的熏染下，自觉向儒家思想文化靠拢，并不断将儒学传播开来，形成了地方认同感和自我归属感。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模仿内地修撰族谱来实现地方认同和文化归属，或在各种生活实践中践行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观，比如推崇科举考试、积极考取功名等。除此之外，西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进步。“（云南）城市中皆汉人，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民，只身至滇经营，以致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碧髓、宝石之物，在夷地，亦惟江、楚人冒险越界兴贩，舍命以博财货。”^[30]在明朝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坝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相比于坝区，山区多矿产，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坝区移民自发地向山区迁移。

到了清代，云南各地，包括城市与大小村落，已遍布内地商人的足迹。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商人活动范围向更广大的边地扩展和深入，使少数民族人民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从而导致了职业类型的多样化以及村落发展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结构的变化，村落剩余产品向商品转化，村落的定期集市和商业街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市镇兴起，部分村落发展为更大的城镇，西南地区沿着长江流域的各个码头，便是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区域中心。

随着移民定居化的进程，土客之间展开利益资源争夺，价值观也开始转变。在贵州黔西南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出现了客强土弱的局面，时日渐久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被强化和延续，又因双方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转化变得错综复杂。移民的不断涌入，对土地稀少、贫瘠的少数民族村落来说，使得传统生计模式的内在紧张，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变得越发焦灼。总的来说，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边地发展相对繁荣的地区，无数的少数民族及村落（见插图22），打破了原本封闭的地理边界，与外来移民尤其是汉民，在农业垦殖、商品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交往互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之下，在文化意识观念方面，西南地区的村落与明清国家密切关联了起来。

三、新疆地区的村落

新疆地区古称西域，是中原汉人对位于其西部疆域的泛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清初，天山以南由准噶尔部蒙古人统治。康熙十七年（1678年），准噶尔部对天山以南维吾尔族部

族发起进攻，击溃南疆回部政权，奴役天山南北的各个部族。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4年后又平定南疆维吾尔贵族大和卓、小和卓的叛乱。布鲁特、哈萨克诸部先后降服于清王朝，回部悉定。在清朝前期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新疆大部分地区长期饱受战争之苦，人口逃亡者甚多。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驻守吐鲁番的清军因无力抵抗准噶尔部的进攻，决定放弃吐鲁番，并将16城1万余民东迁内徙。战争结束后，清王朝致力立屯开垦，新疆人口的稳定和村落的重建由此展开。[31]

清王朝将伯克制度纳入清廷官制，通过逐年丰富各层级组织和官制，以实现对新疆的直接治理：“轮台、蒲类间，悉设府厅州县，鸡犬相闻，烟火相望”；清王朝于乌鲁木齐设都统一员，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一员，统辖全境驻防官兵；另在巴里坤和哈密等处设办事领队大臣，统县、营各级文武职官；复设伊犁将军总理全疆的军事边防事务。此外，清王朝通过屯田制度组织征兵、移民，细化屯田、赋税则例，以实现对新疆世俗化、统一化的统治，“于民屯之外罗布兵屯，是御边、省征调之繁。饷军无挽输之苦，诚久安之长策也”[32]，主要由陕甘总督和参赞大臣负责。[33]“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人三百名，越穆苏尔达巴罕至伊犁，镇守办事，即以绿营兵筑城，回人乘时兴屯，开渠灌溉”，伊犁屯田成为新疆各处屯田的开端，有兵屯、户屯、回屯、旗屯、犯屯之别。[34]其中户屯主要是从邻近的甘肃安西、肃州、甘州、凉州等所属州县招募的贫民及其家属，国家提供车辆、粮食、衣服、种子、器具甚至建房以候移民的到来。

表7-35 清中期乌鲁木齐所属州县人口

地区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嘉庆十一年（1806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男	女	小计	性别比（%）
迪化州	3 496	16 631	4.8	20 454	16 516	36 970	123.8
昌吉县	4 332	19 734	4.6	10 309	8 476	18 785	121.6
绥来县	2 252	7 624	3.4	7 532	5 253	12 785	143.4
阜康县	4 350	18 405	4.2	6 493	5 025	11 518	129.2
呼图壁	—	—	—	6 715	4 460	11 175	150.6
济木萨	—	—	—	10 123	7 902	18 025	128.1
喀喇巴 尔葛逊	—	—	—	945	715	1 660	132.2

地区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嘉庆十一年（1806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男	女	小计	性别比（%）
精河	—	—	—	56	31	87	180.6
库尔喀 喇乌苏	—	—	—	—	—	113	—
塔西河	—	—	—	852	253	1 105	336.8
庐草沟	—	—	—	543	320	863	169.7
头屯所	—	—	—	377	400	777	94.3
宜禾县	697	2 596	3.7	5 158	2 906	8 064	177.5
奇台县	1 994	6 824	3.4	18 436	12 639	31 075	145.9
合计	17 121	71 814	24.1	87 993	64 896	153 002	135.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新疆地理志》第五章《地方志》。[\[35\]](#)

从乾隆四十二年到嘉庆十一年（1777—1806年）的短短29年间，乌鲁木齐的人口从7.1814万增至15.3002万。这个数字尚未包括绿营军。乌鲁木齐人口的倍速增长，与屯田制度下的大批移民迁入有关。比如在迪化州，“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止，

由内地携移来民人并本地招募户商共一千三百一十一户……内除拨归喀喇巴尔噶逊安插户民一百四户……实在共户民一千二百七户”[36]。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五年（1762—1800年），迁入移民共3 000户，分拨他处的移民不包括在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陕甘总督福康安的上奏再次强调移民的目的，即“整饬边防之远计也”，并称：“在济木萨等处广招内地民人开垦，期于膏腴日辟，岁获丰登，户民乐于种地，则编户。频岁加增，桑麻鸡犬，烟火相望。”[37]

表7-36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伊犁地区户口数

部类	户	口	户均口数
额鲁特	3 516	11 737	3.3
土尔扈特	104	447	4.3
土部属下鄂托克	838	3 573	4.3
土部属下喇嘛	1 080	4 853	4.5
土部种地额鲁特	—	6 514	—
回户	6 406	20 356	3.2
民户	71	209	2.9
遣犯为民	—	244	—
合计	12 015	47 933	4.0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新疆地理志》第五章《地方志》。[38]

除外省移民之外，伊犁的省内移民——回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自阿桂将军带去300回民，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陆续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增调回民6 000户，前往伊犁垦种地亩，并分设9屯。由于回民生齿日繁，垦地日广，历任将军不断与清王朝展开交涉。回民不仅得到了交

粮的批准，减轻了每户交粮压力，还得到遣屯等地的地亩耕种权，扩大了垦耕面积。[39]

天山北路地旷民稀，南路居民稠密。新疆户屯共计28万余亩的统计数据只限于北路，不及于南路，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乾隆中期开始，汉族移民主要定居区在乌鲁木齐和巴里坤；[40]到了嘉庆年间，出于各种原因，伊犁成为移民的主要集聚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户屯最先开始于伊犁，受优免政策的吸引，客民庄世福等48户，自愿入屯田户籍。朝廷为了鼓励生产，不仅每户给地30亩，借给牛种口粮；还减免纳税，自开垦三年以内，迨完借款，每亩纳租银一钱，借项还清，每亩实纳租银五分。自此以后，来者日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共有客民101户，共种地3 030亩，每岁征银151.5两。此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绿营屯兵分户子弟任世才等114户进入户屯行列，每户拨给地30亩，此项营兵分户，日久愈多，为户屯之最大部分。还有“不由官给地亩面自劝开垦，成熟后，再报请升科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商民张子仪等32人，陆续共报垦麦地39 618.6亩，仍照官给地亩之例，每亩征银五分。但同时有商民张尚义等200人，报垦蔬地稻田10 668.6亩，因蔬稻之利优于小麦，所以每亩征银一钱。“此项地亩，俱系听民报垦，官为查丈，按亩纳租，仍以渠水多寡，逐年增减，并无定额。”[41]

表7-37 新疆户屯统计表

屯地地名	亩数	招募安户数	插垦民口数	粮赋、粮草折粮额（石）	招民开垦之始年
宜禾县	50 521	697	2 596	2 327、1 515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
奇台县	73 495	1 994	6 824	3 385、2 204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迪化州	42 216	3 496	16 631	3 871、草无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
昌吉县	62 370	4 332	19 734	6 006、草无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
绥来县	7 320	2 252	7 624	704、草无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阜康县	39 940	4 350	18 405	3 852、草无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
伊犁	4 391	71	209	351、草无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
合计	280 253	17 192	72 023	20 496、3 719	—

资料来源：《新疆志略》第六章《垦务》。[\[42\]](#)

在国家大力推行的开垦实边的优惠政策之下，商民在新疆开发过程中承担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的开发主要以人口流动为主要方式，在农业经济内部进行开发活动。随着商民在新疆荒僻地区活动的增多，其同族、同乡随之而来，甚至在许多地方，内地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本地的原住民。在商民的推动下，许多人烟稀少的边地逐渐发展成一个个村落或新型城镇。由此来看，新疆地区的不少村落，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移民村落性质的。



插图1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藏南宋《田垄牧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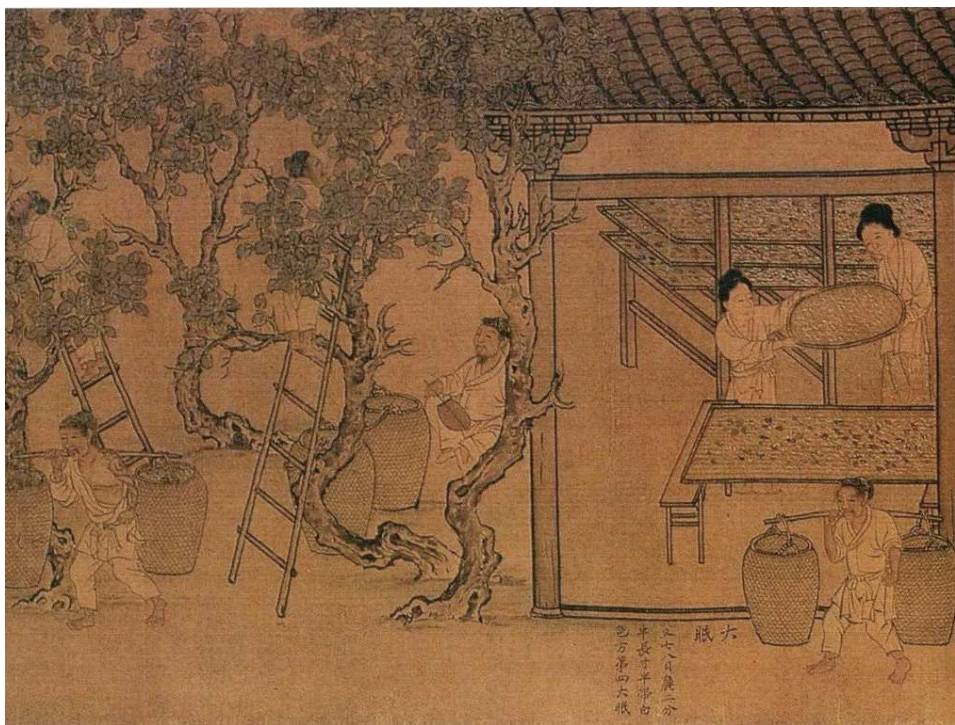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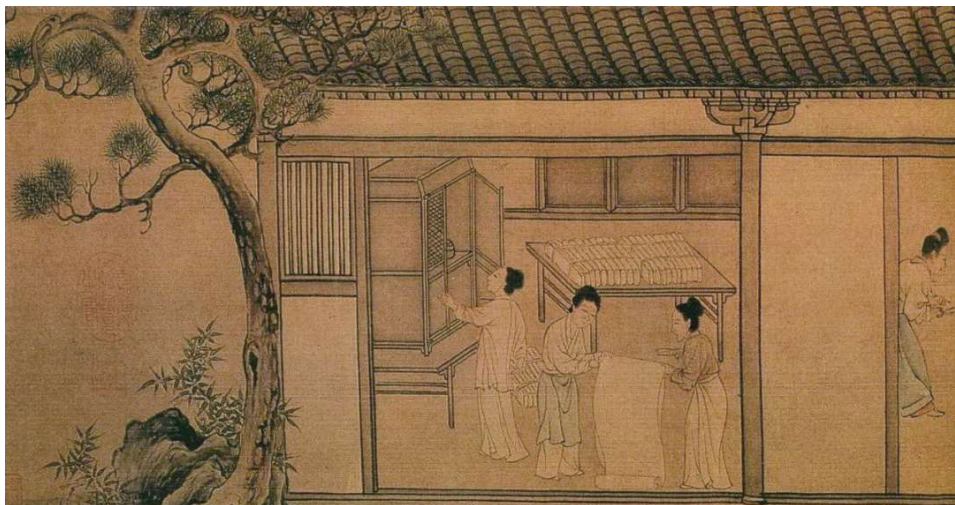


插图2南宋翰林图画院摹本《蚕织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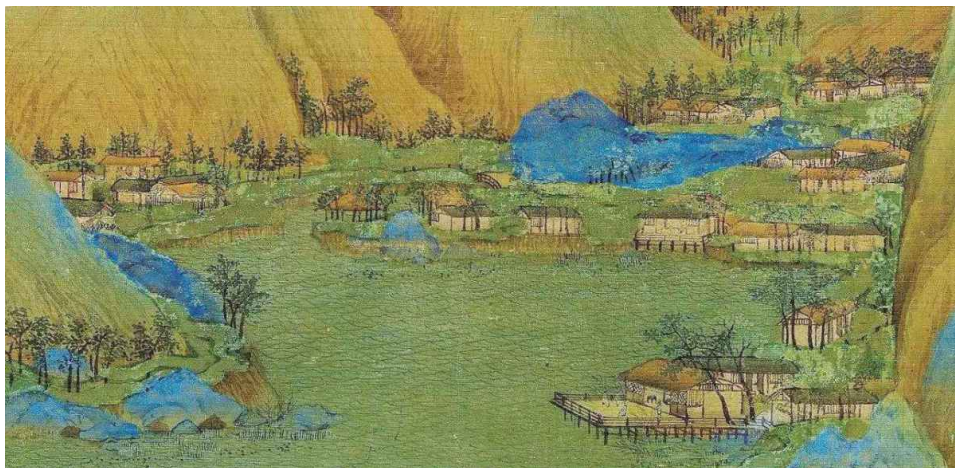


插图3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所绘村落形象



插图4宋初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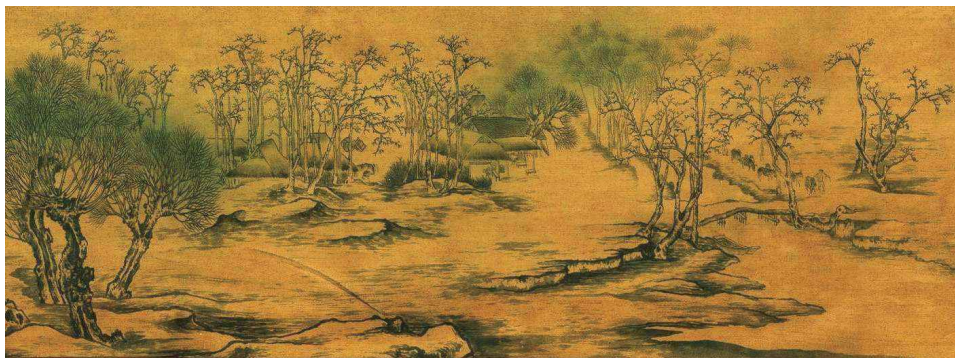


插图5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郊区（局部）



插图6马远的《柳岸远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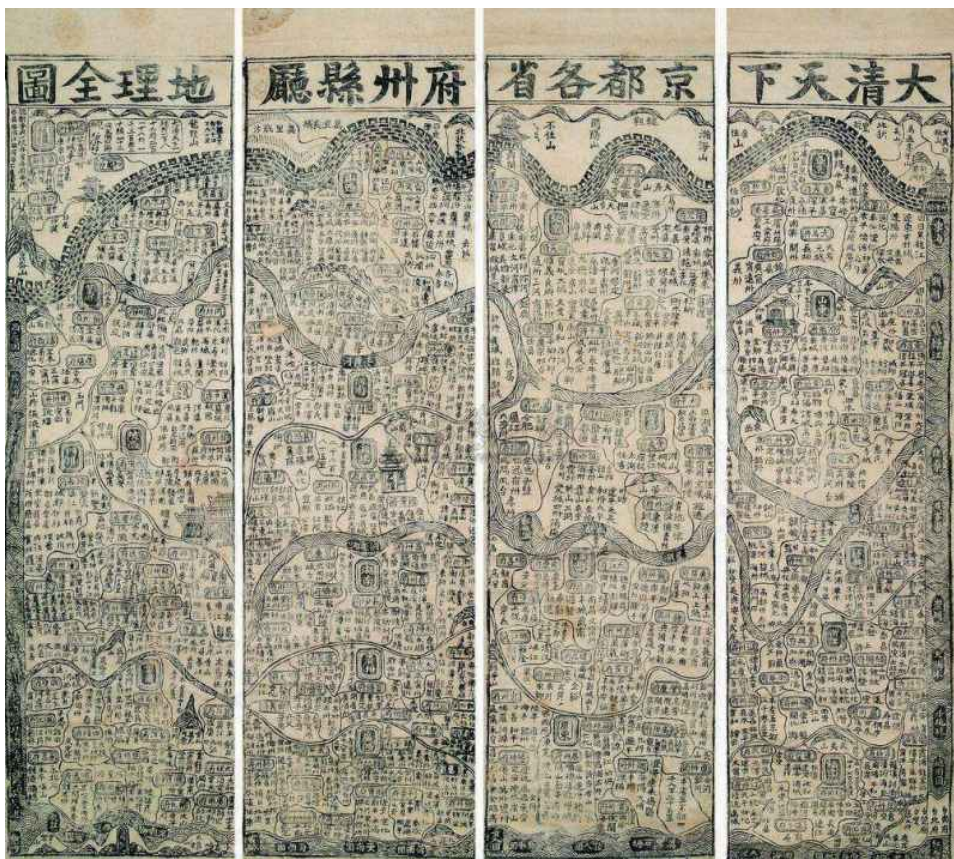


插图7乾隆五年刻本《大清天下京都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



插图8江西婺源李坑村申明亭



插图9湖南怀化高椅村土地庙



插图10晋江梧林华侨村落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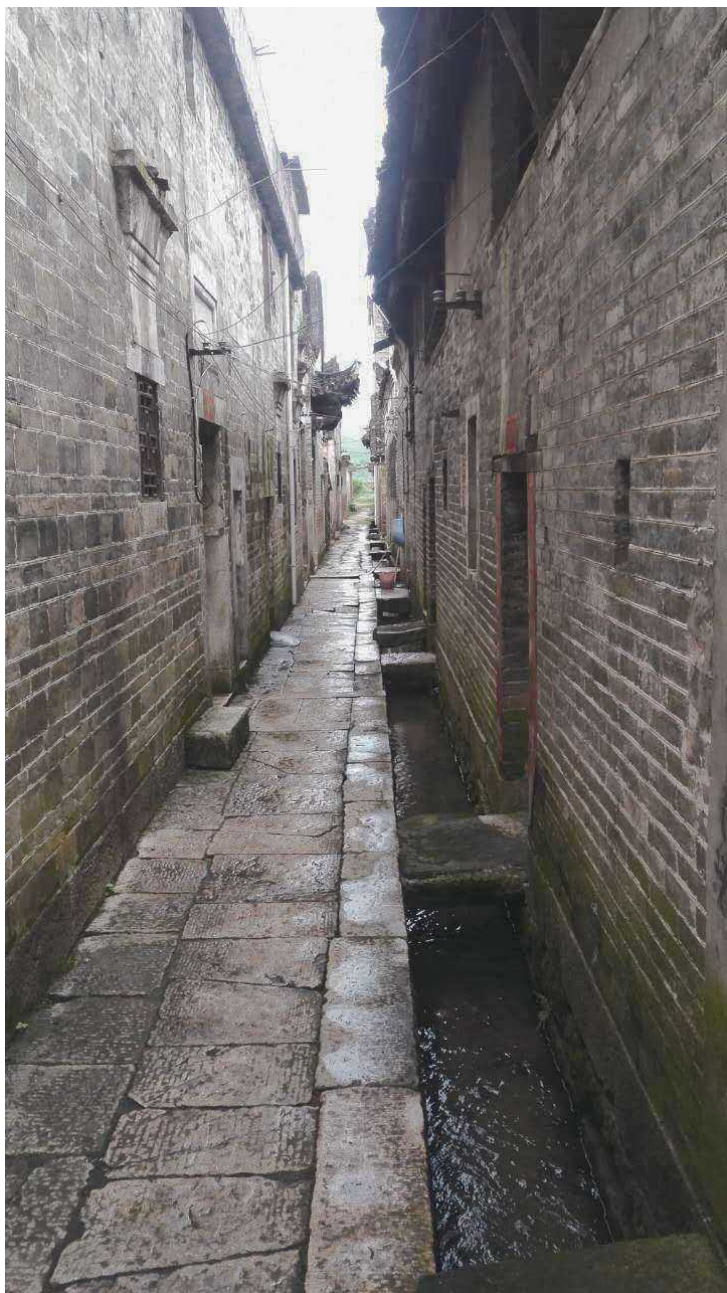


插图11湖南永州河三岩村的排水沟



插图12湖南永州市江永县勾蓝瑶寨



插图13徽州呈坎村



插图14歙县唐模村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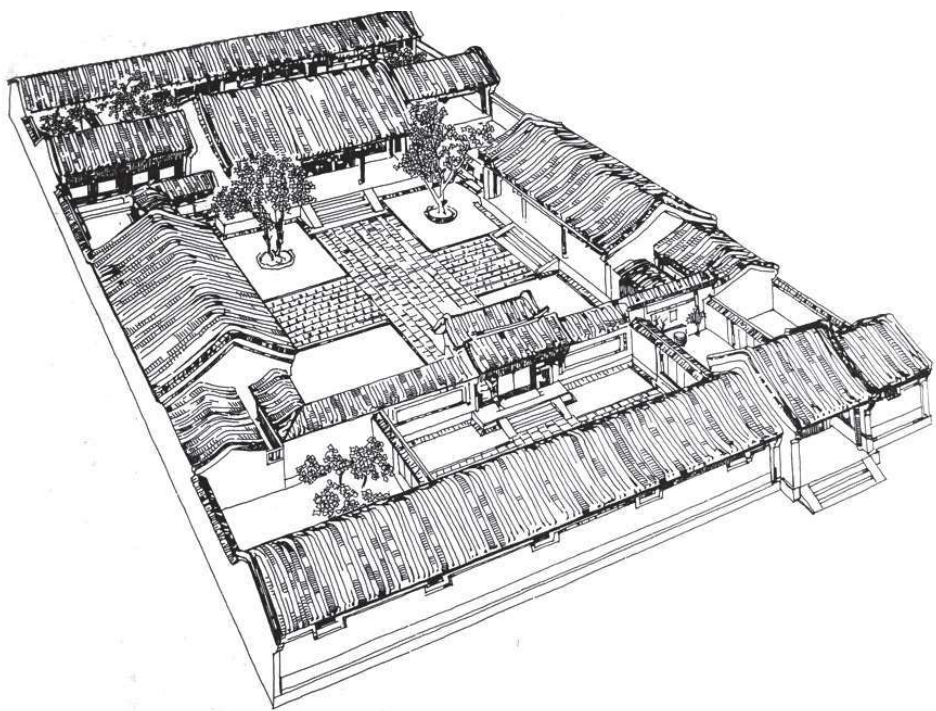


插图15手绘四合院俯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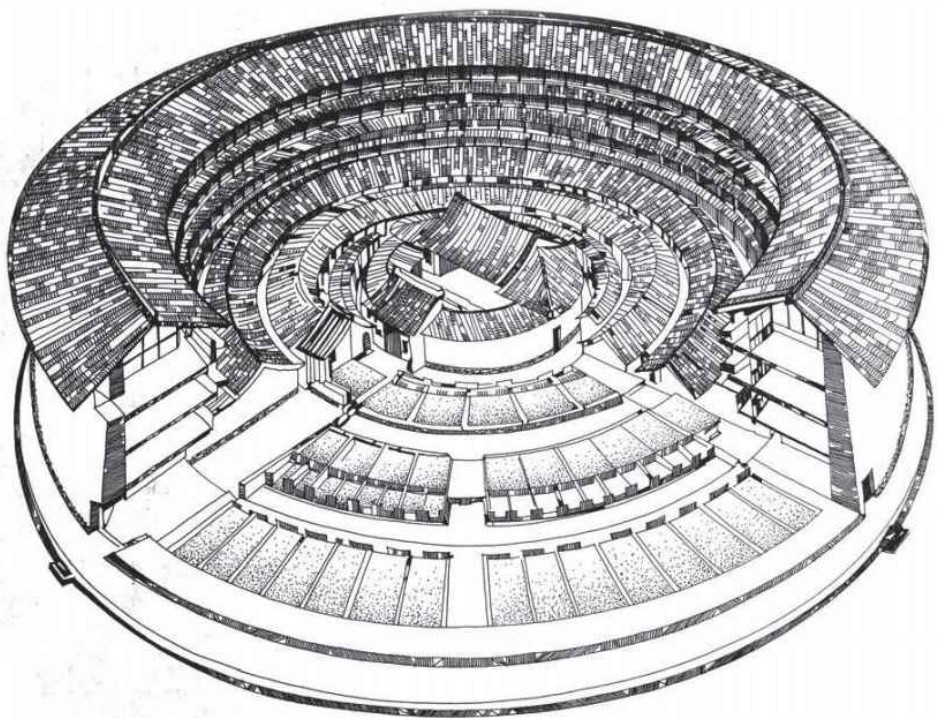


插图16福建土楼实景与剖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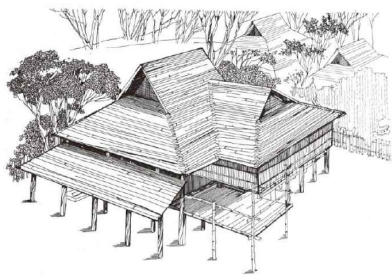


插图17云南傣族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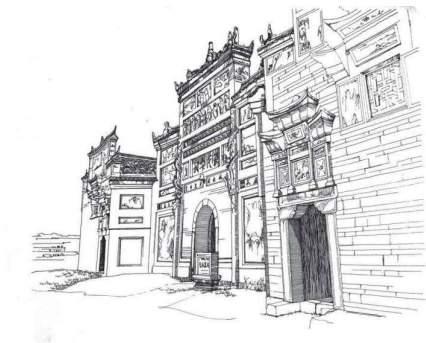


插图18湖南邵阳市新邵县张氏宗祠（左）与郴州永兴县板梁村刘氏宗祠（右）楼鼓寨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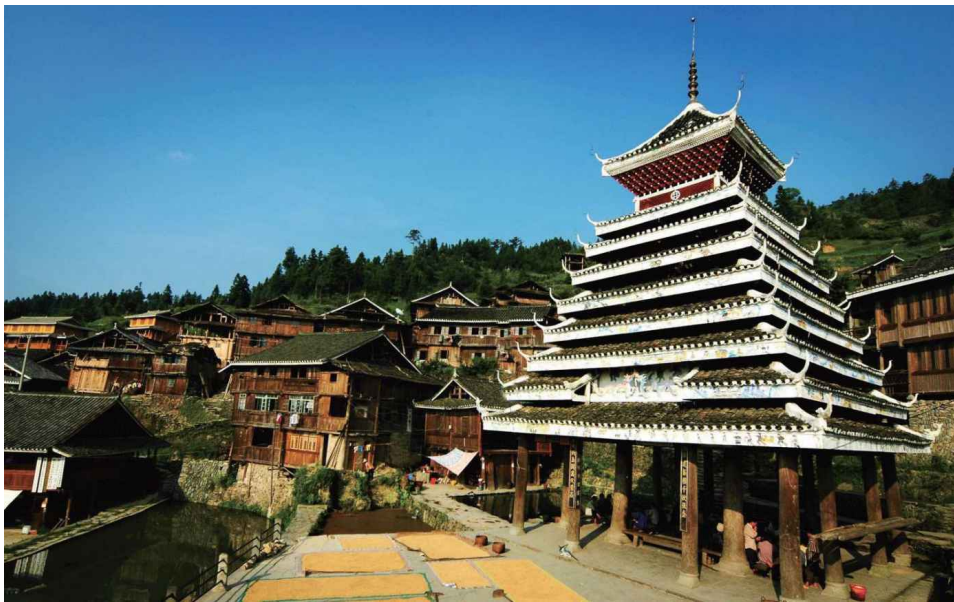


插图19侗寨鼓楼



插图20西藏村落建筑



插图21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甲居村



插图22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插图23清末私塾



插图24清末农村劳动生产



插图25清末农村农业生产



插图26颓废的晚清村落



插图27日军抢夺乡民财物



插图28日伪当局组建的河北省立津海道日语教员培训班



插图29国统区迁徙中的乡民



插图30乡民为八路军修补军衣



插图31解放区选举投票



插图32解放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插图33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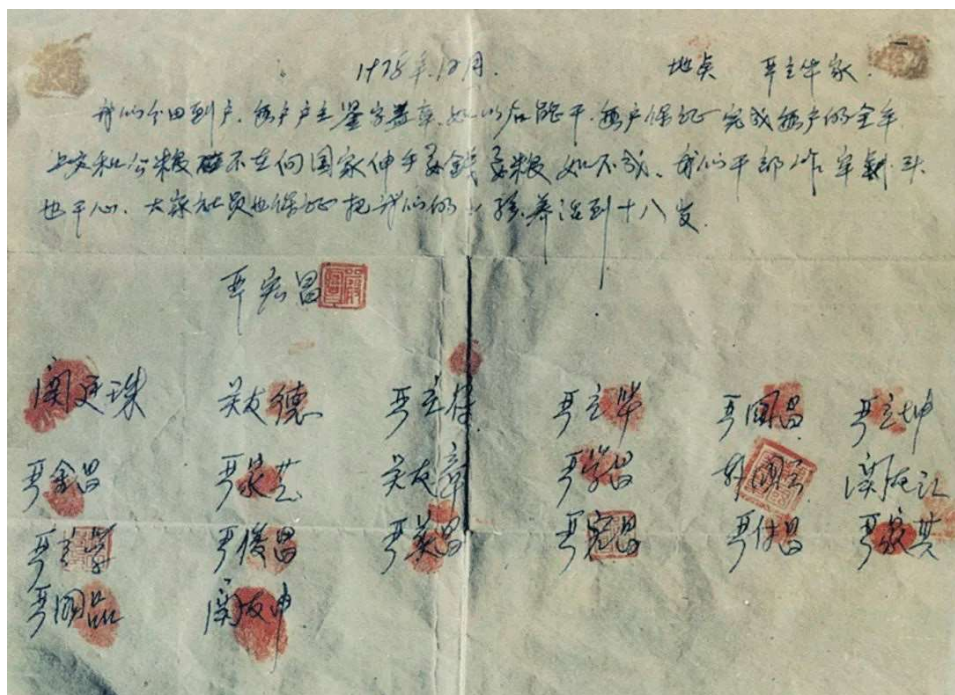


插图34 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18户户主秘密按下手印，包产到户瑶花



插图35花瑶



插图36湖南绥宁古建筑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地有余而水不足”的现象，“非但兵民争水讼牒殷繁，抑且兵丁加占之地愈多，即民人承垦之地日少，此等户民原为种地而来，并非土著。如地亩不敷垦种，即现在户民尚恐易散，又安望将来再加赠？倘数年之后，烟火渐稀，人民减少，更与新疆无益”[\[43\]](#)。清王朝为了维持户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调整对口外地方收粮石的政策，“不得不另筹办理”。新疆在国家温和的农业经济政策下，不断吸引省内移民聚集、省外移民入境。移民作为填充和发展新疆乡村地区的中坚力量，是新疆人口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编户的增加导致大小村落涌现。在这一背景下，“新疆与内地无殊，更为亿万载救宁之计”[\[44\]](#)。

四、蒙古地区的村落

从历史来看，自蒙元退居漠北以后，蒙古势力长期活跃于明代北部疆域以外的地区，并且与明朝形成对峙。在此期间内，蒙古势力也经历了部族的扩张与分裂，活动范围十分广泛，迁移也极为频繁，不仅包括今内蒙古、蒙古国及其以外地区，还涉及今新疆等地。这种迁移既跟蒙古势力与明朝政府之间的对峙有关，同时也与蒙古部落的内部矛盾冲突有关。他们的迁移具有集团性，有以部落为单位的内迁，也有个人单独的或几个人联合的迁移行为。

相对分散的随畜游牧是蒙古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民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迁徙和游牧，蒙古人与特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世代相传的依赖关系。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细胞，是被称为“落”的单个家庭或若干家庭的组合体，由于对草原资源的利用不可过载，牧民习惯不断游牧，各“落”之间通常距离数里之遥，“落”还随同放牧羊群处于经常迁徙的过程中。在北部草原，甚少见内地常见的世代居住的村落，以及基于牢固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

在清朝建立之前，满族后金政权就已经成功控制了蒙古诸部。清朝时称漠南蒙古为内蒙古，清朝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六盟，及阿拉善、额济纳套西二旗实行蒙古盟旗制，设札萨克进行管理；旗上设盟，盟长官由旗长官推举，由清政府任命，享有自治权；在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则实行旗制，由都统进行管理。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额鲁特蒙古等外蒙古地区在经历一系列动乱之后，由清朝划设牧区、居地，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和科布

多参赞大臣，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硬性的管理层面，在万户制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在柔性的教化层面，给蒙古人分配蒙丁地，使蒙古人从事由牧转农的过渡生产，从而稳定地、有保障地开展定居生活。首先分到土地的蒙古兵丁建立了蒙古土著村落，然而他们往往不善耕种，时日一久，便将土地典给内地民人，失产的蒙古人逐渐增多；“有力之人浮垦肆占，无力之人丝毫未得”，以致到了乾隆年间，土默特地区无地、少地的贫困人口占了当地蒙古人口总数的一半。从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官员纷纷为改善蒙古人的生计而献策。^[45]为了重新分配土地，保证贫困蒙古人的正常生计，清朝廷对每村蒙古兵丁的土地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这里以左翼三甲德音布下卡岱毕尔噶孙村为例，了解其土地占有情况。该佐领下总共9村535口、耕地397顷95亩、牧场270顷。牧场是村内所有蒙古人的公共牧场，并不记录在蒙古人个人名下。大部分兵丁属于口多地少的状态。蒙古兵丁聚居的土著村落的土地占有权虽在蒙古人手上，但实质上他们为了追求经济价值让渡土地占有权，多次流转土地获得押地钱，最终导致一地数约的混乱局面。

表7-38 左翼三甲德音布下卡岱毕尔噶孙村人口（单位：口）、耕地数目（单位：顷）

姓名	人口	地亩总数	自种地	伙种地	租种地	典地
老彦扎布	21	18.79	18.79	—	—	—
乌巴西	20	4.5	4.5	—	—	—
纳木云	7	4.2	4.2	—	—	—
索努达西	4	3.9	3.5	—	0.4	—
巴尔达尼	6	3.4	3.4	—	—	—

姓名	人口	地亩总数	自种地	伙种地	租种地	典地
老彦	3	3.1	1.1	—	2	—
乌尔图那速图	3	3.1	0.2	2	0.9	—
托果奇	4	4.3	0.3	3	1	—
拉布藏	12	13.6	7.2	—	6.4	—
赛因齐浑	10	11.12	1.7	3.2	6.22	—
乌布西	8	36.65	—	—	36.65	—
纳延泰	8	6	3	3	—	—
布古图尔班迪	1	2.6	1.1	—	1.5	—
毕力那图	6	2.7	—	2.7	—	—
乌云扎布	11	24.69	19.19	1	4.5	—
诺敏	7	4.05	3.05	—	1	—
巴图孟克	3	2.7	0.7	—	—	2
胡色年	8	9	—	—	9	—

资料来源：《左翼三甲德音布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草场清册》（满文，乾隆八年），档号80-47-4。[\[46\]](#)

在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逐渐稳定的背景下，朝廷积极鼓励蒙古与内地的交流，并且试图通过移民将内地的人口、技术带入蒙古地区，以增加土地垦耕面积，进而扩大国家的赋税基础。史载，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来，黄河迭次改道形成了河套川地貌，至道光年间黄河北岸淤出大片肥沃土地，由于邻近黄河各支流，为农业灌溉提供了条件，所以，当时“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鍤者常数万人”[\[47\]](#)，蒙古地区逐渐成为移民走西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多伦多诺尔北部，“俱有游民私行垦种数百顷”“而游民日聚日众”[\[48\]](#)。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多伦多诺尔营外正蓝旗游牧界内，现在续垦园地，添盖房间”[\[49\]](#)。此时移民规模扩大，并已经

逐渐安居。直到光绪放垦之前，只知吃租、不知地在何处的部分蒙古人虽然掌握收取地谱钱的权利，对土地仍拥有占有权，但是这种权利却由于地谱钱所剩无几的经济价值而显得有些流于形式。光绪九年（1883年），多伦诺尔厅有0.9万户，皆为清代后期的移民。由于汉族人的迁徙及垦殖技术的传入，蒙古人赖以生存的游牧业开始萎缩，蒙古人的土地私有观念开始形成和发展，村落随之大量出现，有关移民对清朝蒙古地区村落的影响具体可参见前一节《“走西口”与村落》。

[1]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6页。

[2]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二百九十二《舆地二十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10页。

[3]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4] 松筠撰，吴丰培校订：《西招图略除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5] 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二百九十二《舆地二十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10—7012页。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乾隆二年理藩院造册称“全藏所辖六十八城：喀木九、前藏三十、后藏十八、阿里十二”。

[6] 允礼：《西藏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刻本，古洞室李梦皋临江：《西藏地方资料集成·拉萨厅志》第一辑《城市》。乾隆年间，拉萨为前藏首府，是全藏的首位型城市，其占地规模东西约七八里，南北三四里，市廛杂列其间。商贾辐辏，街市繁盛，人口约5万余，有法王宫殿及驻藏大臣等衙门。围绕拉萨城，前藏分布了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则库城、野而古城、垂佳普郎城、达拉马宗城、达克匝城、满撮纳宗城等29座小城，形成众星拱卫的一核多点的布局形态。参见何一民、赖小路、付志刚：《高原、民族与宗教：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特征》，《民族学刊》2010年01期。

[7]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二百九十二《舆

地二十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012页。

[8]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9]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附《杂瑜地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10]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三《西藏程站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11]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1页。

[12] 王克：《藏族人口史考略》，《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1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14]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15]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16]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六《人事类》，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17] 廖东凡：《藏地风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6页。

[18] 松筠撰，吴丰培校订：《西招图略-怀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9] 松筠撰，吴丰培校订：《西招图略-除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0]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六《人事类》，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21]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六《人事类》，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22]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三《西藏程站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23]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三《西藏程站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24] 黄沛翘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五《西藏城池、津梁、关隘、

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25] 黄沛翹撰，李培荣等校：《西藏图考》卷五《西藏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26] 万发元修、周铨谄纂：《康熙永明县志·光绪永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4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一《地理志·永明县四瑶水图》第245页。原书载：“四瑶归化在明太祖洪武初年，其后耕鑿相安。”卷十一《风俗志·瑶俗》第304页。原书载：“明洪武二十九年归化者四，曰：清溪、古调、扶灵、勾蓝。扶灵最繁盛，清溪次之，古调、勾蓝又次之。男女衣服、饮食与编氓无异。”

[27] 湖北省通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通山县志》第二卷《人口·姓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28] 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名志》，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2000年版，第119页。

[29] 周琼、李梅：《清代中后期云南山区农业生态探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

[30]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转引自方慧、徐中起：《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31]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32]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1页。

[33]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2页。

[34] 许崇灏编著：《新疆志略》第六章《垦务》，正中书局印行1966年台一版，第150页。

[35]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援引张献廷初稿：《新疆地理志》第五章《地方志》，中华民国三年石印本，第77—92页。

[36]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2页。

[37]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3页。

[3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438页。援引张献廷初稿：《新疆地理志》第五章《地方志》，中华民国三年石印本，第93—97页。

[39] 许崇灏编著：《新疆志略》第六章《垦务》，正中书局印行1966年台一版，第152—153页。

[40] 张丕远：《乾隆在新疆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载《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1] 许崇灏编著：《新疆志略》第六章《垦务》，正中书局印行1966年台一版，第152页。

[42] 许崇灏编著：《新疆志略》第六章《垦务》，正中书局印行1966年台一版，第157—158页。乾隆四十年（1775年）调查，其中招募安户数统计结果为17 191，与本文统计数据有出入；粮赋、粮草折银额为24 215，与本文统计数据有出入。

[43]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3页。

[44] 和瑛：《三州辑略》卷四《屯田门》，嘉庆十年修旧抄本，第3页。

[45] 乾隆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仆寺员外郎那逊额尔合图奏请将土默特有田兵丁所交粮石变价赏给贫困蒙古人，赎回典给内地民人之田亩折（满文），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0172-0463-001；《为抄送乾隆七年军机大臣议复查照办理赎回押地的咨文》（乾隆十三年三月二日，满文），档号80-24-18。

[46] 《左翼三甲德音布佐领下原拨户口地亩草场清册》（满文，乾隆八年），档号80-47-4。转引自梁潇文：《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户口地探析——以档案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77页。

[47]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1935年第12期。

[48] 《清宣宗实录》卷八百四十一。

[49] 《清宣宗实录》卷四百十九。



第八章

文明的转型与村落的变迁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求和，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法国、美国、俄国、德国等西方列强又相继进入，在中国划分并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致19世纪中叶后，中国事实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让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一些仁人志士积极寻找国家的独立富强之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宣统皇帝退位，清朝正式灭亡。但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旧灾难深重，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全面开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从19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文明主动或被动的转型发展过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后，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先后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等自强运动和实践。正是这一系列运动和实践，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变化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与中华自古以来形成的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和融合。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解体前的衰落过程的根本标准和原因，是社会丧失了自决权而导致内部冲突的爆发。^[1]这种自决权的丧失实质上是人类自我发展、社会进步机制的凋敝、僵化乃至丧失。晚清时期，制度陈旧腐败、人口膨胀、灾祸时有发生，这些内部问题不断累加；与之相对，西方世界新兴的工业文明不断成长，在现代化轨道上蓬勃迅速地发展。因此，当欧洲大陆以侵略的姿态与古老不前的中华文明体交涉时，其内外矛盾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建构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乡土社会也因此颠沛流离，开始了历

史性变迁，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村落共同体逐步弱化甚至瓦解。

历史发展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因果要素相互关联、彼此作用产生的；当人类文明空间不断向自然空间扩展时，人类历史的内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近代以来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村落及其社会的变迁，事实上也是全球视野下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文明交流碰撞的产物。因此，只有以更宏观深远的历史眼光审视中华文明以及村落社会的时代之变，我们才能对当下及未来有更清晰的方向和透彻的把握。

[1] 阿诺德·汤因比著，D. C. 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晚清民国村落

一、西学东渐与村落社会

（一）西方传教对乡村的渗透

促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广泛渗透。西方传教士是一个宽泛的意义，概指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修士，主要是天主教教徒。这些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活动，特别是在乡村社会的宗教传播活动，使西方文明较为广泛地渗透到了中国基层社会。譬如，他们兴建教堂以及教会学校、医院、孤儿院等，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乡民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为西方教会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正因如此，建构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些西方传教士影响较为深刻的地方，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程度不一的“西化”，村落内部的同质性被降低了。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可以上溯到唐代贞观年间。史载，基督教教徒阿罗本受罗马迫害，流落波斯，后辗转来到长安，受唐太宗接见，获准建寺传教，是为“景教”，但影响有限，并未被中国的普通民众接受。基督教在真正意义上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应该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代。1552年，耶稣

会派遣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到广州上川岛开展传教事业，这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第一人。^[1]此后，来华的传教士逐渐增多，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1600年进入北京，10年之后在北京去世。不同于其他早期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颇为熟悉，他不仅积极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而且推动了天主教的儒学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并容许入教者保持中国的传统习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信教的中国人逐渐增多。有学者统计，至清康熙年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已有15万人左右。^[2]

中国信教群众的增多引起了国家和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怀疑与警惕。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华公布罗马教皇的禁令，声称要将坚持以利玛窦方式传教的传教士赶出教会，以确保基督教的纯洁。这项基督教令的颁布，使“祭祖祀孔”的传统习俗成为中国入教者必须摒弃的行为。这明显与中华文化传统相悖，以致传教活动不仅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国本，所以清政府便开始从国家层面介入。史载，当时康熙闻讯震怒，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1724年，雍正帝发布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极刑。”^[4]在后来的乾隆、嘉庆、道光的100多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其传播只能由公开转为秘密。与此同时，西方教会还是一直盼望中国能取消禁令，以恢复在华的自由传教。显然，早期西方传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相对有限和隐性的，而且是可控的。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活动，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输入，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伴随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活动。从1685年开始，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出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制订了一项旨在为欧洲各国扩大国外市场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向东方持续不断地派遣传教士。^[5]向东方派遣传教士，主要目的是要“打破中国的‘外壳’”，“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直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最终能对中国的开放满意”。^[6]正如美国驻上海原总领事介尼甘所言：“要是没有传教士供给的报告，中国大陆上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要记住：我们商旗是紧跟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的利益。”^[7]可见，西方国家的这种扩张活动，在本质上是带有某种侵略性质的。只是，16—18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正处于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长期闭关锁国又阻隔了外部世界与中国的联系，所以，早期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其侵略性质不明显，而且可能正面效应要远大于负面影响。

然而，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传教禁令随之取消。正如1840年8月遣使会驻澳门账房神父陶若翰宣称的：“今后我们再也不用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发愁了。所有江河都将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可以把传教士一直运送到传教国家的心脏。”^[8]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弗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9]。西方传教士的财产和活动在近代史上首次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内，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大多被限制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几个主要的通商口岸。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已无力与西方列强对抗，广大内陆地区也对外开放，西方传教活动随之深入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内地。1858年6月，在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塞进了容许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10]正因如此，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860年，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 000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教会小学约90所。19世纪末，耶稣会在江南的教徒约有12万人，传教据点扩展至1 000处，传教士增加到170人，小学约有100所。同一时期，在华天主教的传教士约有800人，教徒则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约90万人。[11]可见，西方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英国传教士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为代表的直接传教的“基要派”，他们主张以《圣经》原义进行传教，以社会下层平民百姓为主要传教对象；另一派是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间接传教的“自由派”，他们主张借助教育、出版等启迪民智的方式传教，以社会上层人员为主要传教对象。[12]相比之下，戴德生一派更致力于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内地城镇与乡村传教。[13]其实，不论以何种传教方式，西方传教活动都广泛渗透到了乡村地区，并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的诸多方面。据统计，1919年中国关内和东北地区共有1 704个县，除106个县外，其余地区都有新教徒的传教活动。1920年，中国有1 500~2 000名欧洲神父、将近1 000名中国神父、1 000名外国修女、1 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万名中国宣教士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14]这一数据虽未言之凿凿，但也充分表明了西方传教活动的传播之快、影响之广。

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这种传播现象，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大肆进入中国之时，恰是中国社会问题累加、内外矛盾爆发之际。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经济衰败，农民生存危机严重。因此，当西方传教士通过济困救灾、扶贫助学、免费义诊等各种慈善活动，向社会与乡民释放善意和能量时，便更易获得乡民的好感与认

同。美国基督教差会重要负责人司弼尔曾指出举办慈善事业的目的：“要举办些小型的慈善事业，以获得较大的传教效果，这要远比举办许多的慈善事业而只能收获微小的传教效果为佳。”^[15]1845年起，所有在华教会医疗机构都设有专职神父或牧师，利用医疗事业传播宗教。早期教会医院甚至以不收费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20世纪以后，一般教会都会收费，且只对少数贫病者施医给药，但一般都以信教为条件。^[16]教会还曾开展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救济事业也是传教士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传教士便在中国开展有组织的救济事业，特别是1876—1879年，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特大旱灾，传教士纷纷进入灾区，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开展救济。救济活动很快获得中国灾民的好感，传教士也趁机传教，李提摩太认为救济工作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他曾自述：“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17]在山东一年的救济期间，李提摩太就招收了2 000多名教徒。

当然，教会在乡土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都是以慈善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教会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会以封建化的剥削方式向乡土社会释放经济能量，强化教民对教会的依赖关系。乡民要想获得土地、房屋，往往是要以入教为条件的，并且要支付高额的租息，甚至服劳役；如果不履行上述条件，教会就会对其实施罚款、罚送匾、开除教籍等惩罚。^[18]传教士在华北灾区救济期间还曾大肆收购田产，当灾荒过去，灾民重回故土时，传教士就以全家信教为条件，将土地出租给他们，以此来笼络中国农民。乡民不同于上层士绅，这样直接有助于生存、生活的举动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教会通过利益关系使更多乡土百姓转

化成了教民，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早期传教过程中，有传教士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便通过传授农业知识来传教。相关文献显示，当时美国的安大略农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农机学院等学校，都曾派出有农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来华工作。^[19]由此，农业成为除布道、教育、医疗外又一重要的传播媒介。^[20]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一是出版西方农学著作。传教士对西方农业的介绍，多发表于早期传教士报刊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较早对德国农政院进行介绍。^[21]1873年，花之安著《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具体介绍了德国农政院，包括课绵羊孳生，课牛，课马，课鸡、鸭、鹅、孔雀、白鸽，课蚕桑，课果木、蔬菜；课量地、土质，课鸟兽等课程。^[22]1896年以前，晚清知识界对西方农政的认识，多来自传教士的介绍。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曾言：“西人富民之道，仍以农桑畜牧为本。论者每谓西人重商而贱农，非也。彼中农家，近率改用新法，以化学粪田，以机器播获，每年所入，视旧法最少亦可增一倍。中国若能务此，岂患贫邪？惜前此洋务诸公，不以此事为重，故农政各书，悉未译出。惟《农事略论》《农学新法》两种，合成不过万字，略言其梗概耳。”^[23]其中《农事略论》《农学新法》便出自传教士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然而，近代中国对西方农政的认同与接收是建立在比附《周礼》之上的：“肥料，就是《周礼》所说的分别牛羊麋和鹿等粪的性质，使和土壤种子性质，样样相宜以外。像那播种、养桑一切法子，没有一宗不和《周礼》相合的。”^[24]这导致晚清知识界对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农学理解并不透彻。但相比传统农政，晚清民国时期已开始向科学务农靠近。农学的引进使自古以来土

与农分途的传统被打破，农学的传播也带来观念的改变，进而促进政策与制度的革新。

二是倡导农业教育。晚清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大量教会学堂。鸦片战争后，教会学堂主要是医务学堂，与农业相关的很少。190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教士高鲁甫被派往广州岭南学堂任教，他被认为是第一位来华的农业传教士。^[25]在岭南学堂任教期间，他开设了几门与农学相关的课程，并在岭南建立了奶牛示范场和柑橘引种站。1914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畜牧业专业的亨德到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任教。任教期间，亨德创办平民夜校，为当地农民提供短期培训。^[26]农业传教士为乡村培训了人才，在一些地区推动了农业近代化的发展。

三是引进、改良农作物品种。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在山东烟台引进了多个品种的梨树、苹果树、李树等，包括10个苹果品种、19个梨品种、12个葡萄品种、10个樱桃品种及9个李品种。^[27]果树被引进烟台后，大部分不仅产量高，且口感好，在当地逐渐小有名气。倪维斯将果树幼苗赠送给当地慕名前往的民众，并向他们传授经验知识，烟台很多村庄开始栽培这些果树。随着烟台商人的仿效，到清末，烟台南部山区已是“遍山栽种，成为西洋苹果、西洋梨之特产区域”^[28]。1914年，芮思娄来华后在金陵大学农林科工作，他自称是美国来华第二个农业传教士。同年，芮思娄在南京附近农田中获得小麦单穗，经过7年选育成功，在1923年将新品种定名为“金大26号”，这是中国作物改良史上首次培育成功的小麦品种，产量比普通农家品种高7%，具有早熟、不易染病、分蘖力强的优点。^[29]

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农业传教士致力于农业教育，出版西方农学著作，开办农学校，引进西方农作物品种，提出了一系列乡

村问题解决方案。就其动机而言，是为了通过推广农业技术来传播基督福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提高了中国农业种植的科学化水平，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所以，西方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村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他们推动了传统村落社会的现代转型。

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村落社会带来了新的养分，开启了民智。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从更深层来说，他们传教的目的是瓦解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为西方国家拓展海外市场减少文化阻力。明恩溥的说法足可印证这一点。他认为基督教是改变中国人的最佳手段，因而提出了一个长远计划：“从中国于1860年全面开放算起，50年时间将足够产生一个好的开端，接下来300年的时间将用于基督教的全面传布，再有500年时间，基督教将明显地战胜所有其他的信仰。”^[30]所以，他们开办教会学校，宣传基督教教义和西方价值等，企图使学生受洗入教，接受智慧和道德的训练，成为社会和教会上有势力的人物，领导普通民众。^[31]在教会内部，传教士对教民实行严格的规范教育制度，禁止教民参与祭祖敬神等基督教礼仪之外的活动，代之以基督教礼仪程式来重塑教民的信仰活动。乡民入教后，须“立即毁除家神偶像等祖宗灵位”^[32]，与宗族礼法划清界限。

此外，传教士还利用他们享有的治外法权地位，把排挤中国传统礼俗信仰的活动扩大到教外，带领、怂恿或唆使教民滋扰迎神赛会，甚至捣毁乡里民众至为敬畏的祖宗坟茔，践踏民间礼俗。^[33]传教者往往以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为标准，用基督教教义般的博爱、正义之心，除昧救苦之情来进行类似的传经布道活动。有时他们还凭借自身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利，介入乡村社会的治理，以此来吸纳教徒。据英国驻华一位领事1899年的描

述，湖北某地两个村庄因池塘所有权纠纷而对簿公堂，败诉的村庄决定全村加入天主教会，神父因此要求立即重审，胜诉的村庄见状也全村加入英国国教。[34]但是，当时很多入教的村民都有特定的目的，如躲避债务、刑事诉讼、提高社会地位。一些地痞流氓入教后有了传教士撑腰，常常在公堂上获胜，成为村霸。19世纪80年代中叶后，在入教的教徒中，不法分子的比例大增。因此，在诸多民间诉讼中，在排斥官绅权力的场合都能看到传教士的身影。为入教者提供政治庇护甚至成了传教士们有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习惯。[35]这无疑弱化了族长、甲首等的权威地位，在较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村落治理体系。因此，无论是上层士绅还是下层民众，中国乡村社会的内在价值体系与结构都受到了传教士的冲击和影响，基督信仰有了一席之地，两套权威信仰对乡村社会进行了解构。

从历史角度而言，这无疑埋下了尖锐的矛盾种子。毕竟基督教承载的西方文化体系，与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文化传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基督教在乡村地区快速传播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发生了基督教信仰群体与其他村民之间因价值观不同而出现的冲突。[36]杨懋春描述了山东台头村的一个现象。例如，基督教群体因认为村庄中演戏是对龙王的感恩，不符合基督教教义而拒绝交付他们应承担的那部分演戏费用，但其家庭成员及亲戚仍照旧观看演戏，这便造成他们与其他村民的冲突；其他村民也不再将基督徒完全看成本村人。杨懋春指出：“相反非基督徒村民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看成卑鄙的人——他们拒绝敬拜他们的祖先，他们背叛了同胞而与外国人交朋友。因此双方都抱有偏见，所以冲突就在所难免。”[37]可见，在西方传教活动活跃的乡村地区，其传统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明显受到了承载着西方价值观的教会力量的冲击和影响。

不难发现，普通乡民对西方传教活动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对教民来说，对西方教会基本上持接受、认可态度或者与其是依附关系。但是教民以外的广大乡民，有很多也对传教士保有谨慎观望或者厌恶敌视的态度。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出于愚昧的种族偏见和恐惧，有的是出于对文化和思想的保守态度，有的是出于对社会环境的不满。基督教本身在吸纳教民的时候，已经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利益平衡，在很多不同阶层都树立了敌人。当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结合时，由此引起的社会疑惧和愤怒上升为反基督教的冲突与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了。由于乡民、教会之间争夺土地、财产，加上官绅反教，以及更深层次的中西文化冲突等原因，教案频繁爆发。

在1860—1900年这40年里，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重大的事件或骚乱共发生了数百起，至于在地方上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38]1856—1899年，重大教案多达700余件，小型教案不计其数。[39]大大小小的教案涉及争夺公产、地产，传教士烧毁民房、摊派修庙、虐死幼童等，不一而足。如1868年8月外国传教士在江苏扬州设立的育婴堂，发生不少婴儿死亡的事件，引起群众愤慨。参加扬州府考试的文武生员发布揭帖，指责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群众纷起辱骂和殴打传教士，最后约有1万群众捣毁教堂，殴伤教士及其女眷数人。[40]又如1882年6月，法国传教士贡罗斯在黑龙江呼兰县强买民地建教堂，业主向当地官员告状，地方官判决地产归还业主，而贡罗斯不满判决结果，会谈时开枪打死都统署的一名官员，并捏造“旗兵滋事”，告到法国公使馆。最终法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以赔偿3 000两白银结案。再如1891年9月，湖北广济县武穴镇的传教士虐死幼童，民众愤慨反抗，上千人焚毁武穴教堂并击毙一名传教士，最终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分地方官一人，判处两名民众死刑、七人徒刑，

赔款65 000两白银。^[41]这些都是当时民教冲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乡民仇视西方教会的心理。这也是后来基督教改变其传教策略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的村落社会一直受家族宗法和儒家伦理的规范与影响，传统的礼俗信仰与乡民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士绅阶层起着引导乡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威作用。上述例证表明，来自另一价值体系的传教士，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在事实上挑战着这些历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不仅如此，在实际生活层面，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合法保护，所以他们还对村落社会由乡绅领导治理的权力结构构成了威胁。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从事救灾，这些社会义务原本是由士绅担任的。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现实，而且他们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制于中国法律^[42]，所以西方传教士与乡绅相比，明显具有某种超越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身份为西方教会在乡村地区的持续渗透提供了某种保障。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影响了乡土社会的传统架构，晚清村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传统秩序与规范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破裂和变动。

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传教活动实际上也是西方教会与中国社会互动、相互认知以及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宗教，基督教“不同于许多其他宗教的地方在于它有着极为强烈的将普遍主义理想化为现实的愿望，有着持久不衰、越来越顽强的传教使命感，它要将自己的教义与信仰传播给一切人，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且“基督教的传教特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有其他宗教均在它的打击和扫除之列”。^[43]所以，西方传教活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到用基督教的伦理来审视中国的妇女问题，宣传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反对和谴责妇女缠足，为女性提供西

式教育的社会活动[44]，再到震动朝野的义和团运动……从个人到群体到社会，当时中国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传教活动的影响。站在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基督教教会是西方社会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塑造者，传教士来华后也是以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为利器，企图通过文化和世俗的手段来改变中国、影响中国。这种改变和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西方传教活动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文明的升级具有示范意义；另一方面，传教活动也是导致当时中国乡村社会衰败和边缘化的因素之一。

（二）近代新学的兴起

近代新学对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新的概念，是近代中国自强运动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形态，它具有不同于旧学、西学的学理内容和文化模式。近代新学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新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的知识系统。在结构上，兼有中西二元知识因子；在制度层面，新学以近代学校体制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标志，与以书院和科举八股人才为标志的旧学体制相区别；在对社会政治造成的影响层面，近代新学是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学理基础；在时代意义上，近代新学标志着一个学术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和旧时代的终结。[45]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学术文化，近代新学对村落社会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从实际来看，传统中国的村落属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对新事物、新文化、新观念的接受往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近代新学要与村落发生关系并且产生较大的影响，必然是新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形成具体制度或者事物时才有可能。1861年洋务派官员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设立京师同文馆，次年设立

上海广方言馆，标志着近代本土新学教育的发端。随后洋务派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技术学校、外语学校和军事学校。在后来的40年间，新学教育继续发展，但是一直处于艰难的环境中，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仅分布于沿海7省；戊戌变法期间，也仅创办了150所学堂。^[46]这些新学堂几乎都坐落在少数几个通都大邑，并未深入村落社会。

在戊戌变法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此次变法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八股、兴西学。清政府试图从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乡村地区）推行新学教育。当时的清政府谕令指出：“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47]八股考试制度被废除，各类旧式书院改为中小学堂和专科学堂。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从朝廷到社会都意识到新学对救国图强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所以，戊戌变法后，新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论教育之正理，自宜每百家以上之村即应设初等小学堂一所，令附近半里以内之儿童附入读书。惟僻乡贫户，儿童数少，不能设一初等学堂者，地方官当体察情形，设法劝谕，命数乡村联合资力，公设一所，或多级或单级均可。补办五年之内，大率每四百家必设初等小学一所，完全科与简易科听其量力举办。惟通县合计，完全科不得少于一半。五年以后、十年之内，每二百家必设初等小学一所，通县合计，完全科亦不得少于一半。总以办成为度。”^[48]至此，近代新学教育才开始向乡村地区延伸。

然而，在清末新学制颁布的头两年内，乡村地区的新式学堂并未大规模创建。原因主要还是村落社会深受科举制的影响，以至乡村士子未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接受新式教育。这从1905年的一道奏折中可见一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

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49]为了扫除新学发展的障碍，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50]可以说，科举制的正式废除标志着新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最终确认，新式学校在此之后才真正在全国各地乡村逐渐建立起来。据统计，1905—1911年，随着各项新学措施的施行，乡村新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新式乡村学堂数量明显增长，就学人数也不断攀升。1907年，全国共有初等小学学堂29 199所，684 657名学生，^[51]与1904年相比，同比分别增长了6.92倍与7.43倍。1908年，全国初等小学学堂增至35 420所，学生增至90 4987名，^[52]在这当中，乡村学校占相当一部分。

新学教育体制从城市深入乡村，逐步取代乡村社会原有的以儒家经典及忠孝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私塾教育。如果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不够彻底，那么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有关教育体制的改革则明显更符合新学的教育目标。小学废止读经，废除对孔子的跪拜礼；禁用清朝颁行的各种教科书，禁止讲授《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等科目。同时以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为范本，正式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53]此后，新学教育在乡村地区才初显成效（见表8-1）。统计数据显示，1918—1921年，乡村小学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加，且相较于清末更具有现代气息。在清末的普通学校里，传统的读经课程仍占全部课程的27.1%，数理化之类的新课程占72.9%；到了民国初年，传统读经课则缩减至8.4%，新课程比例高达91.6%。^[54]

表8-1 清末民初小学课程表

法规		奏定学堂章程	改订高初两等小学 年期科目及课程	小学校令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订颁时间		1903 年	1910 年	1912 年	1923 年
科 目	相 当 于 初 小	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	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画、乐歌	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手工、图画、唱歌、裁缝	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相 当 于 高 小	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商业	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商业、乐歌、英文	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中华地理、博物、理化、体操、图画、手工、游戏、裁缝、唱歌、外国语、农业、商业	国语、算术、公民、历史、卫生、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备注		初小加自然科“格致”，手工、图画列为随意科；高小亦加自然科“格致”，手工、农业、商业均为随意科	初小乐歌、手工、图画为随意科；高小增加乐歌、英文为随意科	读经一律废止，女生增加裁缝一科，初小图画改为必修科，手工、唱歌仍为随意科；高小格致分为博物、理化两科，手工改为必修科。唱歌、外国语及农业、商业仍为随意科	初、高小修身改为公民、卫生两科，国文改为国语（改文言文为语体文），手工改为工用艺术、图画改为形象艺术；初小增加社会、自然，社会包括历史、地理；自然包括自然、园艺；高小废止外国语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55\]](#)

表8-1所列充分反映出传统的儒家经典逐渐被现代化国民素质教育内容取代的事实。不难发现，新学的知识结构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念，也都随之被新的受教育者接受。这一改变给村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一方面，接受了新学教育的乡村学子，对事物的认知趋于科学化，民智初开；另一方面，乡民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忠孝伦理观念、宗族意识趋于弱化，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则逐渐被年青一代的乡

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有学者说，正是新教育制度的落实，才“从制度层面揭开了乡村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序幕”[56]。1928年5月，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教育》一案，全国各地开始推行义务教育，乡村小学也逐渐扩展。192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提出在20年内实现全国四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计划。为促进该计划的实现，教育部还规定，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变通，以补习教育或“自修制度”弥补偏远农村及城市贫寒儿童“应受之义务教育”。[57]至此，不仅新学在乡村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因新学教育带来的改变，村落内部的同质性进一步降低。

实际上，作为一种正规的知识传播制度和正式的社会化空间，近代新学无论从教育形式、教学内容，还是从教育宗旨、教育的管理体系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学制度下的私塾和书院的新文化品格，其在乡村社会的确立，本身就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有了现代学校的渗入，闭塞隔绝的乡村社会才真正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58]新学教育动摇乃至结束了中国教育、思想领域千余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合法地位，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传统的价值观念被严重削弱，城市、乡村概莫能外。新学教育能够直接引起人们观念发生变化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女学的发展。新学教育深入乡村社会，乡村女学迅猛发展，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尽管乡村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城市热烈，但也对专制婚姻、缠足守节等恶俗产生了很大影响，反过来为乡村教育走向现代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新学知识分子回乡开启乡村社会新风。新学教育的兴起加速了人口的社会化流动。城市和乡村虽然开始形成二元分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结交流没有中断。对乡村而言，城市亦是接收现代化文明的窗口。随着

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外出求学的乡村绅士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行为等都受到了大城市文化的影响，有了传统所不具备的现代性。而这些受到现代化熏陶的城市人群，总会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辐射到乡村社会，从而加速了乡村社会传统观念的改变。

但是，这一时期的新学，以效仿甚至照搬西方的教育制度为主，新学教育难免不适当当时乡村社会的实际。毕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的乡村社会，这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教育制度明显存在很大的弊端。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条件，因组织基础历史遗传的特异，自然不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一律，所以也自然不能拿彼社会之一切，来完全栽植于此社会。”^[59]在乡村文化教育方面，尤其如此。乡村缺乏对新式教育的需求，农民男耕女织，生活方式仍然十分传统，所以，很多乡村并不接受新式教育，造成乡村教育改革缺乏动力。当时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指出：“现在的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际上是从东、西方抄来的。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教育，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代用。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得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60]一些乡村对于科举的认可度远高于新学，学习四书五经仍然是很多乡民接受教育的首选，因而旧式私塾教育在乡村社会仍具有较为顽强的生命力。（见插图23）

因此，在一些乡村，不仅私塾遍布，而且时常发生毁学事件。例如，1910年在福建泉州就发生了一起乡民毁学事件：“泉

州西隅两等学堂开设于小开元寺已三学期。近有僧名智源，归自海外，以多金贿黄姓，令该校迁于他处，将校所归寺僧管理。黄姓得贿，扬言该校占寺产，特开黄氏族会，谓小开元系渠祖先舍为寺产，当由渠一姓主张归僧管理，不得占为学堂。于是数日之间，聚众盈千，六月初十日午刻，黄离等率惠南两邑及浦口各乡人数百，到堂拆毁。”^[61]加之县一级的行政长官，对兴办乡村新学多流于书面或口头形式，未付诸行动。^[62]所以，乡村新学发展的程度和速度是有限的。例如，民国初年的山西，全省含附属村庄在内20 000余个，不论大小，每村必设一个或两个旧式私塾。1915年山西学校数目是11 148个，平均每两个村一个小学；而到1933年，山西小学校数目是23 145个，平均每个村有一个。比较可知，民国初年尚有若干个私塾未能完全遵令改办。^[63]

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的乡村新式课堂中，所教的功课并未完全遵照新学教育体制。比如，山西乡村小学教师中，“童生秀才占其大半，教的功课，仍旧离不开三字经百家姓”^[64]。这从当时一些教育家的言辞中即可得到印证：“改建和新建的中小学堂，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把近代新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付诸实践，但仍有相当多的学堂，特别是乡村初等学堂，变革较小，换汤不换药，旧的教育气氛很浓，甚至毫无改观……如宁乡（今中阳）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后，课程内容也做了调整，却不被一般群众接受，求学者仅十余人，毕业时只剩6人。为此，一些学堂为迎合旧习惯势力，又在学科中加入了‘四书’‘五经’内容。”^[65]

现代教育制度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需求，但由于这一变革过程过于急速，新旧制度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过渡，以致新学受到乡村社会的抵触。从深层次来看，这是传统中国乡

士社会的结构模式所影响乃至决定的。传统的乡村社会，各社会阶层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循环流动。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士为首的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等级身份。这种身份在经过儒家伦理的吸纳与塑造之后，固化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结构模式。对士身份的认可与追求，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循环发展的一种价值动力和基本模式。这样一种追求是保守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使社会流动被严格限制。要实现社会流动，主要依托的就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之下主要以私塾、书院为教育场所，以儒家伦理和儒学经典为主要传授内容。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传统乡土社会的发展，就显得相对封闭和固化。

而且，就现实而言，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的，即使是普通的农民家里，也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1948年，费孝通与潘光旦对950名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进行分析。这些人中52.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6%出自城乡之间的市镇。^[66]因教育条件、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尽管出身乡村的人考取功名的可能性不如上层社会家庭的大，但至少保证了社会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所以，在乡村一直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不愿改变。加之近代中国依然是个乡村社会，乡村小传统的价值观并没有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分离。^[67]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以忠孝伦理为核心的旧式教育，仍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凝聚机制。

到20世纪，新的教育体制对乡村社会各阶层的重组与社会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乡村社会流动的结构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新式教育的重心不再是乡村城市的一体化地域，而是向城市转移。“大抵都会城镇，设立初等小学堂者尚多；乡僻之

区，学堂盖寡，即小学堂简易科亦复寥寥。”^[68]城市的学校不断兴建，使得教育资源不断往城市倾斜，城乡二元化结构逐渐形成，传统的乡村城市一体化格局不复存在。第二，新式教育的教育成本较之旧式教育大大增加。无论是全日制的上课教学模式，还是书本笔墨的使用，都需要花费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财。富民家庭还可以应付，但是对一般乡民而言，基本是望尘莫及。就此来看，绝大多数乡民在这一时期失去了接受新文化教育的机会。第三，新学在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民主共和观念时，冲击着乡民传统信仰并挑战乡村社会固有秩序。正是这样的新态势，造成了乡村社会在传统基础上的真正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恰好是与传统相对的。新式教育俨然打破了乡土社会的内在整合机制，所以必然会受到乡村传统力量的阻碍与抵制。

当然，不管怎么样，时代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是传统乡土社会不可逆转的。新式教育下的精英阶层不再产生于乡里、服务于乡里，并最终回归于乡里了。他们不再以“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等级为价值结构，教育、商业、从戎、从政等成了新的选择，精英开始了全方位的分化和流动。乡村精英离乡，尽管是固守传统一方的乡民不愿意看到的，但仍是近代乡村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从清末各省咨议局中绅士议员所占比重中即可窥见一斑。据统计，当时的绅士议员人数在总体议员人数中占比高于90.9%。^[69]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的城居地主分别占当地总人口的65.9%、15.8%、27.4%。^[70]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不断丰富完善，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新社会阶层的云集地。由于社会精英不断向城市聚拢，城市的社会秩序比乡村更加安定。

与之相对的是，乡村天灾人祸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土豪劣绅横行，民众生活每况愈下，再加上传统的束缚和现代工商业的

冲击等，乡村社会衰落到了极点。有些地方的乡村，农民的生计成了重大问题。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0个省的737个县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地区中，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的62%。^[71]“大小土豪，大小地主，垂拱平章于上。贫苦农民，无业游民，叫苦呻吟于下。”^[72]新式教育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兴起是相适应的，而且多元化结构的工商业使得城市必须从一元化结构的传统乡村中汲取资源，而新式教育就是吸纳精英的重要途径，所以从某一方面来看，新学教育导致乡村人才不断流失，造成乡村经济的衰落和原有乡土社会秩序的混乱。换言之，新学教育的推广，带来的影响是乡村社会整个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全面外流。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同一封闭空间内的人身关系，地主在城市照样可以通过租佃关系、债务关系等将财富抽往城市，这就使得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再有传统的依存关系，传统的社会人情必然逐渐淡化。正如冯友兰所言：“城里人盘剥乡下人，正如渔人之盘剥鱼鹰。城里人对于乡下人盘剥方式不一，如以工商底经营得利润，如以放债收利息，如以田地收地租等。”^[73]而这些从乡间聚拢的财富并没有主要用于生产，也没有反哺乡里，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军政开支或者商业高利贷等活动，形成了社会财富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74]

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城市工业势力压迫的乡村，在失去财富和人才之后，城市对乡村逐渐形成了绝对的优势，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乡村走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贫困化。在整个乡村经济危机的笼罩下，农民的社会阶层逐渐下降，农民变成流民兵匪，且数量迅速增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学西方人提出“到民间去”“到乡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分离、乡村危机加重的明证。

概而言之，近代新学的产生使得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

观念在广阔的中华大地得到传播。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受到西方新文化的猛烈冲击，科举制的废除使得传统的进仕之路被封死，社会价值观念被重新塑造，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被打破，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士绅阶层在新文化、新知识、新社会分工的环境中追求新的社会定位。乡村精英离乡实质上几乎完全脱离了草根社会，即永久离乡。人才离乡既是乡村文化衰落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乡村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75]因此，乡村不仅失去了士绅阶层构建的传统文化之魂，而且伴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城市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农村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于是农民开始离村，乡村持续衰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新学带来的现代化之风，还是在阵痛与裂变之中推动着近代中国及其乡村社会缓慢迈向现代化。

二、近代工商业发展与村落

（一）洋务运动与晚清村落

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虽然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作为一次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这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尤其是在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方面，影响十分深刻。在军事方面，洋务运动兴建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促进了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推进了近代化进程；在文化教育方面，创立了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在思想观念方面，建立了“以工商立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表面上来看，

洋务运动只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其实不然，这次运动的深远影响在于，它推动近代中国走上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国民日报汇编》上曾这样描述洋务运动：“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达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76]

洋务运动的产生固然与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直接相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无力也无法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坚船利炮、机器生产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使刀枪棍棒和以人力、畜力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所适从。这无疑触痛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古老中国。这从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所表露的忧患意识中即不难求证。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中体西用”等思想无不始于这一历史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更是明确指出，“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77]正是在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不断呼吁和先行实践下，清政府内部以奕□、桂良、文祥为代表，地方则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他们打着“自强”的旗号，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武器制造技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武装力量。由此，一场自强自救运动便如火如荼地率先在军工领域展开了。

从1861年由曾国藩开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派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24个军工企业。^[78]其中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

至1890年，全厂共有大小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662台，大小蒸汽动力机361台，大小汽炉30座，总马力达6 138匹[79]，可生产小型军轮、子弹、火药、水雷、枪炮以及部分制造机器。李鸿章主持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培养科技人才。在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受其影响，全国各地不断兴起建设军工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仅供应了清朝陆海军对武器弹药装备的需求，带动了与之相联系的木工厂、铸铁厂、炼铁厂、汽炉厂等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从长期来看，它们也传播了新的知识，推动了军事以外多方面的近代化，为其他企业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但是，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由封建官府垄断，生产出的产品直接由清政府调拨给军队使用，所以对民间社会的影响并不大。

洋务运动真正意义上向民间社会延伸，应该始于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推动的“求富”运动。当时，为了解决兴办军事工业过程中资金、燃料、交通运输等问题，洋务派打出了“求富”口号，试图通过兴办民用工业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增加军费来源。恰恰是这一尝试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事实上开启了近代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如1873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1月，李鸿章主持成立轮船招商局；等等。当时的民用工业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据统计，截至1895年前，官办企业达到27个，主要包括采矿厂、炼铁厂、织布厂、缫丝厂、纺纱厂等工业部门，以及电报局、铁路局、轮船招商局等现代通信运输部门。[80]但是，由于官办企业未能解决政企不分等问题，生产效率不高。所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部分官办民用企业便开始通过股份制形式，动员买办，实现官督商办。1878年的直隶开平矿务局、1878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的热河承德府平泉铜矿、1885年的中国铁路公司和1894年的华盛纺织总厂等，都是官督商办类型。[81]

其后，商办工厂日渐多了起来，有学者统计，1863—1894年，民间出现的商办工厂达74个以上。^[82]正是洋务运动从军工领域向民用领域的拓展，不仅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而且将工业化的概念下沉民间，开始影响城市及城市近郊周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洋务派“求富”运动不仅没有失败，还促进了近代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兴起。

伴随着洋务运动向民用工业的延伸，其带来的现代之风便开始影响到以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经济的基本生产结构。因为洋务运动以机器生产的尝试，恰恰是为了代替落后的人力和畜力，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由于这一时期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在中国并未开始，所以，客观地说，洋务运动对包括村落在内的乡村社会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至少从影响的范围及其程度上来看可以如此理解。毕竟，从洋务运动中主要企业的分布来看，它们集中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尤以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地最多，在内地资源欠缺和交通欠发达的地区，则明显少见甚至不见。在这些洋务运动开展比较深入的地区，其影响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城市及城市近郊村落的传统手工业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不少家庭作坊开始倒闭。如上海县及附近地区“种稻者止十之三，种棉者居十之七，小民抱布贸丝，已经贫窘，而自西域各国通市之后，洋布盛行，夺其生计，民情益形困乏”^[83]。清末包世臣所著《安吴四种》中也记载了棉纺织机器生产对传统家庭纺织业的冲击：“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84]

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的产品更廉价，城市近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濒临破产，他们不得不改行或者离乡进入城市谋生，这不仅导致近郊村落的农民必须重新谋出路，而且客观上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例如，陈启源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

时，“先是乡间缫丝，循用旧法”，后来“提议创用汽机，咸非笑之。及工厂已成，果著成效，机房中有人鼓动风潮，谓此风一开则工人失业，生计立穷，无知乡民相率附合，几欲将丝厂毁拆，经当道劝谕，其事乃寝”。^[85]尽管晚清国家无力也无法扭转这种时代变革的局面，但是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当时的《捷报》对此评论道：“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做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86]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洋务企业导致的。因为洋务企业无论是在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事实上，真正冲击城市近郊手工业生产的是大量外国廉价商品的输入。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奏折中，李鸿章就曾写道：“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87]这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外国产品的倾销对当时国内商品市场的冲击，但无疑表明了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所占比重之大。外国商品的倾销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显然冲击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但也正因如此，近城周边乡村的农作物开始更多地被纳入商品市场，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为购买洋纱、洋布、洋钉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近郊农民不得不增加农作物的销售。加之洋务民用工业的发展，有着对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大量需求，所以近郊乡村开始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便随之提高。例如，因纺织工业的发展，市场对蚕丝的需求量增加，江苏等地周边的乡村就扩大了蚕桑的种植面积。江苏

高邮州“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商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88]数据统计显示，1840年之前中国蚕丝出口未超过1万担，但1845—1850年增至1.5万担，1875年为7.9万担，1895年则增至11万担。[89]不仅是蚕丝，棉花、烟草、茶叶、罂粟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随之扩大，小麦、花生、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也进一步提高。显然，近城周边的村落社会在“门户洞开”的过程和洋务民用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体系中而率先发生着现代化变迁。

洋务运动前后30余年，持续时间持久、影响范围较大，不仅在近代工业化方面影响着中国，在思想方面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冲击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义利观”“本末观”，也带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观念。正如洋务派主要倡导者所认为的，中国历史经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这种最新的变化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90]所以，他们主张“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向”。[91]在见识到西方军事力量之强大后，洋务派也打破了传统“华夷之别”的世界观，开始摒弃“严夷夏之防”的迂儒之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92]。这种观念在早期虽仅局限于少数洋务派和一些开明之士，但随着民用工厂的广泛建立，这一观念也影响到广大普通民众。

（二）近代城市工商业与小农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工业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带来了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尽管工商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很小，但是，正是伴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一些近城周

边和交通发达的乡村地区的农业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国际贸易发生联系。相应地，这些地区的乡村经济不再是封闭的单独的经济系统，而是已经被卷入经济转型中，传统村落社会因而开始面临冲击、解体 and 转型。正如费孝通在研究江村经济的时候的思考：我们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费孝通看来，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受到干扰。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93]

从江南地区的情况来看，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工业都市的发展，以及国外工业品进口的日益增加，现代工业主义影响逐步由城市深入乡村腹地。随着以大都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中国民族工业出现，缫丝业、棉纺织业等开始大量发展。这些工业化的产业给传统手工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是工业化进一步深入乡村的必然结果，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路上举步维艰。在外强内弱、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时空环境中，近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家庭农业和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业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两大支柱。（见插图24）外国工业化商品的倾销，使得传统小农经济的弱势一览无遗。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拥有的技术和价格优势，使得原本就不成规模的乡村手工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阿诺德·克劳斯在《中国的棉花和棉纺织品》一书中总结说：“从1870年到1900年，手工纺纱生产减低一半，棉花产量减少约1/5，中国的农民和整个经济，都受到严重的打击。”[94]如江苏奉贤地区，“织布之工，从前比户曾是，纯系女工，土名小布……近自

厂布盛行，销路顿滞，贫民生计，大受影响”[95]。北方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情况也一样，如直隶文安地区，“前时妇女纺花，此户皆然，贩为出产之大宗。自洋布线盛行，人竞趋之，纺织均辍业，邻里过从，不复闻轧轧声矣”[96]。

除手工纺织业以外，很多其他传统生产部门，也陆续减产甚至停产。例如，进口洋铁使中国土铁的生产备受打击。洋铁价格比土铁便宜，普通土铁每担3.3元，而洋钉条铁和条铁每担只需3.15元。[97]1889年张之洞在谈及广东铁业时就指出：“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98]日本、西欧的进口伞也使浙江温州所产纸伞销路“日渐衰落”。[99]作为闽西最重要的手工产业，造纸和烟丝生产面临“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增多”等困境。[100]进口洋蜡使奉天的制蜡业被迫停业或转业。[101]

不过，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生产部门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至少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少传统手工业仍然依靠家庭节约的优势，对近代机器生产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这以江南地区为典型，带有更多工艺特色或民族色彩，与传统手工业具有一定技术联系的家庭手工业先后兴起。譬如，20世纪初，由于进口丝织品竞争等原因，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丝织业几乎停滞甚至倒退，但广东、山东、四川、奉天等地的缫丝手工业因满足出口需求等因素而有所发展。[102]山东的织草帽、织花边等手工业实现了新发展。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们起到了延缓乡村经济衰败的作用，并体现出国际贸易体系下民族手工业的智慧与韧性。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以依托人力和畜力为主的传统生产部门积极转型，引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现代工业技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895—1910年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纱厂有19家，丝织厂有

95家，碾米厂有7家，面粉厂有36家，榨油厂有28家，卷烟厂有20家，酿酒、罐头等饮食品工厂有13家；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经营的纺织、食品工厂共300家左右。^[103]1910年以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则更为明显，如1911—1926年武汉三镇共有301家工厂，到1936年年底增至536家。^[104]这些民族工厂的出现，不仅有力缓解了洋货倾销对国内经济生产的打击，而且，由于这些工厂需要从乡村收购大量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因此又激发了近郊乡村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江苏棉作区，“此外情弊，如棉花高涨时，行家每预先向种户定购子棉，而上海各洋行，再向各行家抛盘定货，故行家得以贱价预购农民之子棉，轧花以后，再以高价出售”^[105]；“粤东买茧卖茧方法，亦与江、浙不同，系各丝厂资本家，就河道之两岸，设收茧所，各养蚕家将茧用小船装运至收茧所前，收茧所即派人到各船看茧，然后议价”^[106]。可见，这当中是有巨大经济利益驱使的。相关研究表明，不少地方因机器生产比耕种更能获利，所以顺势而为，引进机器生产。如在华北高阳地区，当时一架铁轮织布机创造的收入与15亩地创造的年收入相当，而一架木机创造的收入则相当于10亩地创造的年收入。这便引起了农民购买机器织布的热潮。“农户资力充足的，一家买二三架铁机是常事，资力不足的二三人合购一架，昼夜轮流织布。”有些地方甚至为了争购一台织布机而发生争吵。如1920年在天津地区，就时常发生因争购提花机而争吵的事件，“因为谁有了一架提花机，等于马上便可发财”^[107]。

随着一些城市周边的农村卷入国内外市场程度的加深，市场价值规律对农业经济的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作物结构方面，农民自发选择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求大、经济收益高的作物。^[108]（见插图25）例如1917—1918年，江浙两省植棉亩数约有1 350万亩，1918—1919年减少350万亩，1919—1920年虽较

上年增100万亩，但较之1917—1918年仍少250万亩也。“其减少之原因，则由于近两年中，世界各国要求原料之趋势。俄国方面，五谷之输出，完全断绝，则其要求于他方面者，势必增加。农人以有利可图，遂多改种五谷，而种棉之地因以减少。”^[109]广东顺德，“乡村之无丝厂设立者，每百户口准有一二十家在家内置备手缫车，以制土丝。其产额之多寡，视乎洋庄丝价之起跌而定，若洋庄丝价高，蚕茧价必昂，制土丝者购劣茧为之，甚则暂停缫丝；如洋庄价低，则购好茧以制之”^[110]。在粟水一带，“负郭一带之居民，颇有种靛者；嗣以收入不旺，乃均改业。自欧战发生后，颜料大贵，由农商部咨行各省，力予提倡，复群趋之，现每岁产额，约一百四十余桶，价值银一千二百二十余元。除供本境外，间至江宁销售”^[111]。

当然，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扩大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使得城市周边的农村相应地调整作物结构，最明显的是城市周边农村种植的作物，面向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增加。

《宝山县续志》载：“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地价视农田几倍之。邑城内外业此者甚多，各市乡近镇之四周亦属不少，……其出产较多者，如城市（指宝山县城）之塌菜、青菜（俗呼白菜，四时不断，冬令味最佳），罗店之瓜茄；杨行、月浦之红白萝卜，刘行、广福之韭菜、韭芽，江湾之马铃薯，真如之洋葱头（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销售申地，为西餐主要物，但价格视来源多寡为转移，贵时每斤一二角，贱时多半倾弃河边），彭浦之卷心菜以及洋种菜蔬，均甚著名者。”^[112]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力的提高。农用机器及化学肥料等开始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周边农村的农业生产中使用，一些地

区的农民在见到农用机器的效率及其带来的效益后，开始尝试使用农用机器。例如，在常州戚墅堰，因土地较运河高出二三丈（相当于6~10米），抽水困难，且降雨稀少，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引入抽水机，首次尝试了灌溉电气化的实验，因实验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且每亩费用很低，便逐渐普及开来。据史料记载，当时该乡蒋湾桥和吉三垛两地，仅设立27马力的电气马达2架、6寸水管的抽水机2架，可灌溉农田2 000亩。到第二年（1925年），农民的预约蜂拥而至，武进县各乡扩充到12处地方，灌溉面积9 834.87亩。民国十五年（1926年）仅武进县各乡，使用机器灌溉的25处，灌溉面积高达24 000余亩。民国十六年（1927年），武进又增加一处，800亩，无锡增加2处，900亩。民国十七年（1928年），武进虽不见增加，但无锡增加了7处，2 250亩。[\[113\]](#)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广大农村地区仍以传统的耕作方式为主，农用机器及化学肥料使用率十分低。这从1911—1922年农业机器及化学肥料输入的统计数据中不难发现（见表8-2）。

表8-2 历年农业机器及化学肥料输入统计（1911—1922年）

年份	农业机器进口 价值（海关两）	化学肥料 进口数量（担）	年份	农业机器进口 价值（海关两）	化学肥料 进口数量（担）
1911	11 007	761 519	1917	108 190	817 146
1912	60 798	821 255	1918	164 188	844 031
1913	112 700	908 557	1919	521 022	1 142 112
1914	53 585	852 282	1920	1 004 277	846 884
1915	159 798	777 700	1921	2 192 404	841 630
1916	204 520	509 132	1922	695 732	983 552

资料来源：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

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0页。

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影响是，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增多。对一些地方的农村而言，就是从事副业的人数大量增加，因为这样来钱更快，经济收益可能更好。例如浙江衢州，交租后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势不得不恃副业以为生。所以佃农视副产较重产为重，因为副产是他们衣食父母，如没有了副业。那么佃农非饿死不可”^[114]。一般来说，当时的农村副业主要是饲养家禽、家畜，或者外出打短工，又或成为小商贩，等等，不一而足。据1922年浙江等4省9县各类农户各项收入所占百分比（见表8-3）和浙江等5省9县农家男工从事副业的百分比（见表8-4）数据来看，家庭工艺在农户各项收入中有相当大的占比，并且一般农户家中种田越少，经济越困难，则副业所占比例越大。而且很明显，这些地区的农家男工从事副业的时间在全部工作时间中占很大的比重。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晚清以来乡村人口与耕地比例紧张，导致不少佃农在交租后所剩无法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另寻副业来维持生计有关。但是，更进一步来看，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将农村纳入了市场体系，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副业提供了可生长的空间。如在1935年的开弦弓村，16~25岁的女青年中，就有1/3流入无锡的丝厂。^[115]或许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农产业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上升。

表8-3 1922年浙江等4省9县各类农户各项收入所占百分比（%）

项目	无土地者	3亩以下	3~5亩	6~10亩	11~25亩	26~50亩	50亩以上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家庭工艺	7.29	6.14	2.63	3.03	4.17	1.18	0.90
农田田产	—	54.79	74.34	85.08	85.91	88.36	62.79
工钱	80.75	36.38	21.06	10.75	8.16	8.22	10.10
其他来源	11.96	2.69	1.97	1.14	1.76	2.25	26.21

注：4省9县包括浙江鄞县，江苏仪征、江阴、吴江，安徽宿县，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资料来源：戴乐仁等著，李锡周编译：《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4—95页。

表8-4 1922年浙江等5省9县农家男工从事副业的百分比（%）

地区	全部时间在 农业工作中百分比	一部分时间在 其他业工作中百分比	全部时间在其他业 工作中百分比
总平均	87.8	5.2	7.0
浙江鄞县	75.7	1.8	22.5
江苏三县平均	87.4	8.7	3.9
安徽宿县	58.3	17.3	24.4
山东沾化	97.2	1.3	1.5
直隶三府县平均	91.0	3.5	5.5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著，李锡周编译：《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4—95页。

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使城市周边的乡村被纳入城镇工商业市场体系之中，表面上看，经济生产变得相对活跃，但实际上使农民在市场上越来越失利，这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与洋货存在明显差距。换言之，就是农民要卖出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换回少量的工业化日常用品，主要是带“洋”字标签的日常用品。直隶景县农民卖同等数量的麦子、棉花买回来的洋布却越来越少，1880年一斗麦子价1 200文，洋布一尺80文，而到了1911年，一斗麦子价2 760文，洋布一尺400文（见表8-5）。与此同时，

商人以压价收购农产品，廉价预买的方式剥削农民，这就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1925年，河南开封地区农民售卖花生的价格是上海售卖价格的60.9%。1926年，河北束鹿棉农售出棉花的价格也仅为天津棉花价格的64.7%。^[116]1910年秋收后，湖南华容德兹口、南州三仙湖一带谷价大贱，“每谷一石，仅售钱九百文”，合银只4钱5分，农民为生活、债务所逼，不得不忍痛出售，“大耗血资，有多数因之破产荡家，无复再能农业者”。^[117]由此来看，农村经济在被纳入市场贸易之后事实上更衰败了。

表8-5 1880—1910年直隶景县历年物价之比较及其指数的变化

年份	麦子（每斗）		棉花（每斤）		盐（每斤）		洋布（每尺）	
	价（文）	指数	价（文）	指数	价（文）	指数	价（文）	指数
1880	1 200	100.0	80	100.0	40	100.0	80	100.0
1890	1 300	108.3	80	100.0	46	115.0	80	100.0
1900	1 700	141.7	120	150.0	68	170.0	400	500.0
1911	2 760	230.0	200	250.0	120	300.0	400	500.0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7—482页。

由此看来，对近代广大农民而言，可谓前有封建土地制度的奴役，后有近代工业化的巨大冲击，农业、农村、农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城市的地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步固化，并扩大了对乡村的绝对优势。同时，作为工业发展的产物，铁路、公路的建设意味着社会资源流动速度和流动方式的升级，新的交通体系承载了工业化更多的发展需求和结构塑造，从而使得近代交通体系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助力。因此，城市的扩大与升级和交通的便利使得资源可以被快速获取。而且，城市的工业化、商

业化意味着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需求和使用，乡村自然就成了城市获取资源的对象。城乡之间的交流和频率大大增加，城乡差距加速扩大。近代城市工商业由于在劳动生产率上具有绝对优势，逐步取代了大部分的乡村家庭手工业，乡村小农经济逐步瓦解，形成“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新的社会分工格局。

在这种格局之下，城市对周边乡村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以上海地区为例，1927年2月14日《时报》载：“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118]据统计，1929年上海市28.5万余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职工有近20万人，其中大部分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另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与8万多名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119]其他通商口岸城市的情况也类似。天津1906—1928年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增长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增加的人口中很多都是因天灾和战乱逃离家乡的农民。^[120]《天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记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日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 388 747矣。”^[121]据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122]不过，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未必能满足农村人口就业需求。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中国在旧工业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容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123]这些现象都表明，

伴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乡村地区的社会流动逐步加大，村落变迁明显加快。

要指出的是，这种因近代城市工商业兴起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与冲击，主要发生在通商口岸、大型市镇等工商业相对发达和交通便利地区周边的村落，尤其是铁路发达的天津、潍坊、唐山等地周边的村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三角洲地区的村落更是加速了社会变迁，初步实现了商业化的转变。一方面，是生产方式向机械化转变，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甚至被纳入了国际市场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吸附了一定数量的农民，“离乡不离土”的情况在这类地区率先出现。费孝通在调查“开弦弓村”时，就发现不仅村里的蚕丝业进行了基于工业技术的生产改革，成立了合作工厂，而且有54人长期不住在自己家里，除了4个男孩作为学徒住在本村的师父家里外，其他人都在城里工作。^[124]这说明19世纪下半叶，列强将中国纳入国际市场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靠近城市、交通发达的村落为了发展乡村经济，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商业化进程，甚至以对接国际市场为目标。也正因如此，有些村落甚至发展为经济发达的市镇和城市。黄宗智曾指出铁路使内陆经济与海洋交通及世界经济连接，他认为青岛的发展就得益于胶济铁路的修建，他举例说：“青岛在19世纪还是一个渔村，但到了1938年，已成为一个有592 000人口的城市。”^[125]可见，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村落社会的关系是双向的，是相互交织影响的。

三、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初以后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帝国主义的掠夺不断加深，国内军

阀统治的混乱与黑暗加重，近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陷入了极度崩溃的状态。加上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民不聊生，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崩坏。作为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基础，乡村的成败直接关乎国家兴衰。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126]还有人更明确指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127]。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国民政府也积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进行规划，试图重建乡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各方面原因，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面对农村这样的状态，不少有识之士抱着改变中国社会、拯救中国乡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纷纷投身乡村，在贫困的乡村潜心驻扎，进行改革和建设乡村的社会实验，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正如他们所说，“现在关心国事者，以国事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使坐此不救，则覆亡厄运，必迫在眉睫，于是救济声浪，弥漫全国；救济事业，应运勃兴，或从平民教育入手，或从农村经济入手，或从乡村自卫入手，其入手处虽有异同，而目的在共谋农村之救济与复兴”^[128]。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运动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构造。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個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129]

这场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不是约定发生的，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社会共同开展的。从20世纪初期的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19个省，几十个县，成千个乡、村中热烈展开。这些人中，有曾留学国外的博士，有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他们来到农村，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博士下乡”。^[130]他们之中，有推行农村

教育、平民教育的，有提供社会服务、救济平民的，有改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合作事业的，有开展乡村自治的，或集经济、政治、道德建设为一体的。到1934年，全国乡村建设团体达600多个，全国实验点达1 000多处。费正清教授将其分为6种类型：教育、本土、平民、官府、军事、西方影响。^[131]其中产生了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杰出人士，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对如何改变乡村现状、提高乡村社会生存发展能力提出了有益的见解，还以实践的方式，试图将理论落地推行。譬如，他们以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江苏无锡、昆山等多地为示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实验运动，形成了晏阳初的定县模式、陶行知的晓庄实验、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卢作孚的北碚实验、黄炎培的徐公桥实验、杨开道的清河镇实验等（见表8-6）。

表8-6 近代乡村建设运动

代表人物	乡村建设运动	时间	核心思想
晏阳初	定县模式	20 世纪 30 年代	针对“愚、穷、弱、私”四病，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
陶行知	晓庄实验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师范教育下乡
梁漱溟	邹平模式	1931—1937 年	“团结组织、科学技术”，以儒家文化塑造“新农民”
卢作孚	北碚实验	1927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黄炎培	徐公桥实验	20 世纪 30 年代	职业教育
杨开道	清河镇实验	20 世纪 30 年代	农业改良，开展社会服务与农民教育工作

事实上，以开展乡村自治、平民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初萌芽于1904年河北省定县瞿城村米氏父子的“村

治”活动。此后，才慢慢有团体、个人等从事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20世纪2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晏阳初提出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于1923年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民间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试图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平民教育振兴中国。当时，该组织在全国18个省32个市相继成立了平教会分会组织。1926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之所以选择在乡村展开教育的先行实验，发展乡村人的潜力，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乡村，而乡村的主要问题是“愚、穷、弱、私”四大问题。要解决上述关键问题，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不仅如此，晏阳初还意识到教育必须拥有丰富的内涵，才能真正解决乡民的上述问题。所以，他还推行文艺教育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推行生计教育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使农民掌握现代生产知识和现代农业技术；推行卫生教育以培养农民的健康力，即通过实施卫生教育让农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推行公民教育以培养农民的团结力，训练青年人与成年人的社会知识、道德和技能。

因此，平民教育把教育下乡、科技下乡与提高农业生产结合了起来，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中国化的农村教育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到1934年，定县已普及小学教育，成人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全县文盲人数大幅降低。其中14~25岁的82 000名青年中，男性青年文盲率下降至10%以下，扫盲成绩位居全国1 900多个县之首。^[132]除教育外，定县在农业、卫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河北省1983年第11期《文史资料选辑》所载，定县“52个乡，都有技术推广站；这同当年定县实验留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定县得以消灭天花，卫生工作推行效率高、效果

大，“卫生局长杨林肯定这是当年平教会打下的基础”。定县猪“不仅享誉河北，而且向东北推广，每年可为定县人民创造700万~800万元财富，这个优良猪种正是平教会于1929年引进的波支猪和当地猪种交配而成的新品种”^[133]。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显然是有益的。

与晏阳初经历相似的陶行知，在留美归国后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虽然晏阳初与陶行知两人同为平教会的发起者，但是陶行知走了与平民教育不同的乡村建设路线。陶行知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以生活为场域的农村各个方面，才有建设美好乡村的可能。所以他才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134]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而教师是需要培养的。因此，要改造乡村教育，建设乡村，就要兴办乡村师范学校。于是，陶行知于1927年放弃了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晓庄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力图通过培养年轻的未来教师来深入农民生活以改造他们。陶行知希望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乡村教师拥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以及改造社会的精神”^[135]。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中小学老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通过“教学做合一”的乡村教育方法，使得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生产和组织地方治安

等。自卫团在当地240个村庄组织起来，农民受到了基本军事技术训练。^[136]所以，在当时的乡村建设浪潮中，晓庄师范学校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形成高潮。这期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轰动一时。实际上，在此之前，梁漱溟也曾先后在广东办过乡村讲习所，在河南办过村治学院，但都在创办不久之后便宣告结束。而相比之下，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历时7年，在时间上明显比较长，且措施比较得当，因而在县政改革、乡农教育、乡村自卫、农业改良、金融改良、合作事业、社会改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学者指出，当时的邹平成了中国三大乡建中心之一。^[137]具体来看，在邹平，梁漱溟创立了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学、村学，并以乡学、村学为枢纽，指导和组织农民进行乡村合作事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截至1936年，邹平全县合作社共有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信用、购买6种，合作社总数为307所，社员8 828人。1931—1933年，邹平先后举办过三次农产品展览会，每次持续34天；展品分田艺、园艺、家庭工艺、农具、畜产等，品种最多达6 000种，每天参观者逾万人。^[138]同时，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改良社会风气，以促进乡村社会的身心健康发展；挑选青年组成乡村自卫组织，以维护社会治安。然而，遗憾的是，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山东后，看似轰动热烈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在内外政治军事的影响下直接宣告失败。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乡村乃至中国社会的衰败，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失败。^[139]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失去了相对优势，进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崩溃。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交相为用的一个社会。到了近代，面对外来文化

的冲击，自身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未能建立，中国社会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严重文化失调的窘态。因此，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既起源于旧乡村的无限破坏，亦是出于建设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之需要。正因如此，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的工作重心放在了“中国的文化再造”上。具体包含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把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上面，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把向来中国人散漫的生活变作有团体组织的生活。这第一个要点是科学技术，第二个要点是团体组织。我们要在团体组织中来应用科学技术。”^[140]

与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实验，以“乡村现代化”为根本目的，将农业、工业、交通、矿业等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之后才是文化建设。他采取的模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交通建设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动力，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综合建设方式。

^[141]1928年，卢作孚即拟订峡防局“大规模经营工业”的新计划：建染织厂、建缫丝厂、建修枪场、建楼、修路。^[142]1934年，卢作孚带头修建的以运煤为主、客运为辅的铁路——北川铁路全线通车。铁路的建成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煤矿区“日运量由400吨上升到2 000吨”^[143]。此外，卢作孚还以优惠政策吸引很多企业工厂到三峡治理河道、河滩，建立农场与果园。在文化教育方面，卢作孚开展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社会工作运动，通过创办学校，建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院、报社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变峡区人民的陈旧观念，使他们接受现代文化教育，推进民众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使北碚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为推动三峡经济的发展和乡民观念的改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从当时媒体报道的称赞中即可见一斑。据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所载，“北

碚现在有了博物馆和公园，有了公路、公共体育场，有了漂亮的图书馆和一些建设得很好的学校，还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市容”，并称赞北碚为“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144]

事实上，从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一条全面改造农村的道路的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就是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的改造。[145]这一期间，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提倡合作互助、注重公共卫生、倡导移风易俗等举措在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实施和推广，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推动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教育教学、扫除文盲等方面，收获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宏观角度，综合客观历史发展来看，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实现其“乡村改造”“民族自救”的远大社会理想和抱负。简单来说，乡村社会依然贫困落后，国家依然动荡不安。这不是对乡村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否定，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自民间的相对温和弱小的改良的乡村建设运动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和阻碍。

从乡村建设运动自身及其与环境互动的情况来看，首先，乡村建设运动极其依赖地方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力量资助，显示了其生存和发展的脆弱性。实际上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有所谓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146]邹平计划的产生和覆灭都受政府的影响和把控。梁漱溟所谓两大难处之一“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说的就是如此。其次，乡村建设运动的发生区域及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能实现有效的联动和整合，显示了它的局限性。对广大的乡村社会而言，在当时内忧外

患的背景下，乡村的改造与复兴必须找到根本的、可以有效推广的系统化路径，不能仅仅限于各自区域的理论构造和实践。最后，乡村建设运动没有真正深入农民当中，没能把握住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因此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农民参加的积极性不高，教育界、政府人员倒是不少，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多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147]梁漱溟所谓两大难处之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即是如此。因此，乡村建设运动最后都偃旗息鼓，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碾去印记，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换言之，乡村建设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肇始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而又迅速分化、瓦解和破产，它既是当时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下的产物，也是乡村与这些环境、要素互动的产物。

总的来说，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些思想理论和具体实践在乡村现代化道路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d 实际效果，乡村改造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同样还可以捕捉到的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尽其所能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乡村的工作和事业，只是他们并没有像共产党人那样尝试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148]但可以清楚知晓的是，在衰败混乱的乡村社会，对任何主体利益的触动都会带来巨大和绝对的应激行为，无论这一行为是认同还是反对，其实都是对自身命运的顽强把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只是短暂存在并以失败告终。因为那些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不能直击乡村问题的本质，不能迅速改变乡村百姓的利益现状，不能迅速提供实现农民根本需要的最直接有力的途径。因此，乡村

建设运动没能将乡村最底层的庞大群体有机地整合和保护起来，乡村百姓没有找到把控自身命运的着力点，乡村运动也就成了“乡村不动”。

[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页。

[2] 李长莉著，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 转引自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4]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1页。

[5] 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史哲研究社1950年版，第12页。

[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7] 冯祖贻、范同寿、顾大全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8]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9] 刘玉田主编：《中国革命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10] 任学丽、王安平：《浅析中国近代绅教的冲突与磨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12] 冯祖贻、范同寿、顾大全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13] 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建道神学院1998年版，第43—44页。

[14] 参见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70页。同时参见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71—572页。

[15] 《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1899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1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7]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34页。

[19] Arthur L. Carson, *Agricultural Missions: A Study Bas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236 Missionaries and Other Rural Workers* (A Thesis was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Graduate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 1931), p87.

[20] 陆玉芹：《美国农业传教士与中国乡村建设（1907—1937）》，《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

[21] 李尹蒂：《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7期，第140页。

[22] 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羊城小书会真宝堂藏板1873年版，第35页。

[23] 梁启超著，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5页。

[24] 铭九：《中国以农立国易图富强论》，《北直农话报》1906年第4期，第3—5页。

[25] Benjamin H. Hunnicutt and Willian Watkins Reid, *The Story of Agriculture Mission*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31), p.18.

[26] 刘家峰：《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27] Helen Sanford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Feming H. Revell co., 1895), p.429.

[28] 唐荃生、吴瑞芝：《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东亚文化协议会1939年版，第93页。

[29] 沈志忠：《美国作物品种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利用——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30] 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中国的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285页。

[31]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页。

[32]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33] 罗萍：《近代西方传教活动与晚清乡土社会秩序的裂变》，《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34] Young. K. L: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03.

[35] 罗萍：《近代西方传教活动与晚清乡土社会秩序的裂变》，《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36] 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37] 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6页。

[38]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39] 杨森富编著：《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附录1—3。

[40] 李长莉著，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4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42]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

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43]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1页。

[44]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45]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223页。

[46]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47] 吴亿：《山西小学教育实况》，《西北论衡》1937年第3期。

[48]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416页。

[4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3页。

[50]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6页。

[51] 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5—26页。

[52] 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8—9页。

[53]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54] 袁立春：《论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55] 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56] 李涛：《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杭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57] 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九编《教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88页。

[58] 郝锦花：《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2004年，第101页。

[59] 刘伯英：《对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拟制农村教育专案之刍莛》，《新农村》1933年第5期。转引自王先明：《近代新学教育与城乡分离的加剧——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载《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9页。

[60] 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61] 《大事记·福建泉州乡人拆毁西隅两等学堂》，《教育杂志》1911年第7期。

[62] 田正平、陈胜：《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3页。

[63] 吴亿：《山西小学教育实况》，《西北论衡》1937年第3期，第22—23页。

[64] 吴永詹：《乡村教育之改见》，《村治月刊》1929年第9期，第2页。

[65] 刘伯英：《对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拟制农村教育专案之刍议》，《新农村》1933年第5期。

[66]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67]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馥、曾景忠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68] 《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4页。

[69]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70]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02页。

[71] 钱俊瑞：《中国目下的农业恐慌》，《中国农村》1934年第3期。

[72]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73] 黄克剑、吴小龙编：《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74]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委员会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75] 郝锦花：《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26页。

[76] 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日报汇编》第三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

[77] 李鸿章著，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第13页。

[78]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79] 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80]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0—381页。

[81] 简新华、余江：《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231页。

[82] 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83] 吴馨、洪锡范修，姚文桢等纂：《上海县续志》卷五，南园志局1918年版，第3页。

[84]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8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7页。

[86]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9页。

[87] 李鸿章著，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

[88] 李斌：《顿挫与嬗变：晚清社会变革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89]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200—220页表8。

[90] 薛福成著，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91]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日记》卷一，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4页。

[92] 王韬：《弢园文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93] 费孝通著，载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94] 转引自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9页。Kraus, Richard Arnold: "Cotton and Cotton Goods in China, 1918—1936: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Traditional Sector,"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95] 纪蕴玉：《沪海道区奉贤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志》1919年第6期。

[96] 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文安县志》卷一，天津源泰印字馆1922年版，第71页。

[9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86页。

[9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77—1378页。

[99]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7页。

[100]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10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9页。

[10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0页，第365页。

[10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9—919页。

[104]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5] 万勛忠：《江苏棉业》，《农商公报》1920年第7期。

[106] 李嘉璦、黄公迈：《江浙粤丝业调查》，《农商公报》1917年4月号。

[107]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108]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109] 《银行周报》1920年5月13日，4卷17号。

[110] 考活、布士维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岭南农科大学1925年版，第17页。

[111] 蒋汝正：《金陵道区实业视察报告》，《农商公报》1919年第10期。

[112] 张允高修，钱淦等纂：《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农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

[113] 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41—44页。

[114]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0—411页。

[115]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116] 陈绍闻、郭庠林主编：《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7] 《帝国日报》宣统二年（1910年）10月10日。

[118] 松颠：《去乡十八年之儒妇》，《时报》1927年2月14日。转引自载鞍钢：《城市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19] 《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20] 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2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五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86页。

[122] 穆德和等：《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04页。

[123]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0页。

[124]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88页，第192页，第202页。也可参见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79—486页。

[12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0页。

[126]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7] 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正中书局1935年版。

[128] 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页。

[129]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30] 刘重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略述》，《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31]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敷、曾景忠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132] 宋恩荣：《晏阳初教育思想再探》，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处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成果选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133]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3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135] 陶行知：《信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172页。

[136]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敷、曾景忠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137] 庞朴主编：《20世纪儒学通志·纪事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138] 曲延庆：《邹平通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0页，第253页。

[139]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40] 杨力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上），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页。

[141]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42] 卢作孚：《三峡可以经营的地方产业》，《嘉陵江日报》1928年3月8日，第10版。

[143]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北碚区志》，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285页。

[144] 孙恩山：《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亚洲与美洲》1944年6月号。

[145] 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46]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敷、曾景忠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14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3—404页。

[148]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敷、曾景忠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与晚清民国村落

一、晚清农民运动与村落

晚清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交织。在国内，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运动，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杨庆堃据《大清历朝实录》的记载统计，1846—1855年民众运动有933次，1856—1865年2 332次，1866—1875年909次，1876—1885年385次，1886—1895年314次，1896—1911年653次。^[1]实际情况可能远不止于此。有学者的统计显示，仅1902年—1911年，全国各地的“民变”就高达1 300余起。^[2]民众运动形式十分多样，包括抗捐抗税抗租，反饥饿，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抗官抗暴，反洋教，反新政，抵制洋货运动，保路运动，罢工罢市，学潮，兵变，秘密会社起事，革命党活动，盐梟、马贼和土匪活动等。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运动。大量农民运动带来的结果是，晚清村落的社会流动持续加大，不少村落甚至成了无人村，耕地无人种植，乡村经济进一步衰败。

晚清中国之所以爆发一系列农民运动，与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制度和封闭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积弊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空间在乾隆时期已经达到了高峰，自乾隆晚期开始逐渐走向衰减。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进入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思想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历史的惯性使得晚清社会本身无法在短时间内应对当时的各种挑战。

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已经是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一和平时期，中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3亿多。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3亿左右。^[3]这一阶段人口的增加得益于对耕地的充分使用以及劳动力的密集化操作，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赶上了人口的持续增长。但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无论是土地开垦总量，还是单位土地的有效使用率，晚清时期耕地的有效使用率都是有限的，因而当人口增加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劳动密集化操作不仅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还会导致生产总量无法满足人口过多过密的情况。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农业系统的变迁时，使用了“内卷”的概念来说明中国传统农业这一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内卷的农业模式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之后，便停滞不前或者无法转化到另一种相对高级的发展模式。对晚清农业而言，这个模式就是农业无法实现近代化。他指出，农业内卷使得使用人力变得比使用耕畜更经济，而中国的农业也就更难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4]因此，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效益递减。加之晚清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来容纳如此大的人口总量，所以人的生存空间势必紧张。而广大农村地区作为支撑传统国家与社会制度的重要载体，所受的影响恰恰是最为巨大的，所承受的矛盾也是最为剧烈的。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一系列农民运动的发生，正是农村承受的压力到了临界点而爆发出来的结果。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加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使乡村经济受到猛烈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农村日益凋敝，农民的生存危机加剧。而且，地主还通过增加正租、押租，提高地租折价，改分租为定额租，额外浮收等手段剥削农民，致使地租率不断升高，农民不堪重负。数据表明，当时江苏吴江县震泽乡，每亩田产两石粟就算

丰收了，“其代价不过六、七元，除去肥料人工，所余几何？乃收租竟至五、六元，少亦须五元。是以冬期农民只可罗掘以应，不足则卖子鬻妻以偿”[5]。农民的生存惨状由此可见一斑。对这种惨状产生的原因，毛泽东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6]

为支付一系列战争巨额赔款，清政府调整了税收政策，将沉重的赔款和外债本息转嫁到了民众身上，苛捐杂税疯狂增加。1909年御史胡思敬奏陈：“自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民力已岌岌不支。壬寅改练新军，分摊各省，岁盈千万，竭泽而渔，势成孤注。农民也，漕粮地丁耗羨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潜逃者比比也。”[7]“在贿赂公行和升官发财之世，上司层层向属下索贿，处于州县的基层官吏只能向老百姓大肆搜刮。预备立宪以后，筹办地方自治，调查户口，兴办教育等，又给他们增添了搜刮的新名目和机会。例如直隶，预备立宪以后即借就地筹款之名，横征暴敛，地方劣绅亦借经费鱼肉乡里。烟酒和盐斤加价、旧捐增额之外，又新设了许多苛捐杂税，米豆、苹果、鱼虾、猪羊、木石、柴草、房屋、车马，几乎可以说是无物不捐，且捐上加捐。别省也是如此，搜刮新法，愈出愈奇，征赌不已，变而征娼。”[8]苛捐杂税之重一览无遗，无以复加。加上官吏腐败，在朝廷摊派各省税额基础上平添数倍，中饱私囊，危害地方，农民破产几成定局，晚清社会已积重难返。

加上连年不断的严重灾荒，农民收成很低，有些地方几乎颗

粒无收，涌现出大量饥民，农村经济俨然崩坏。据统计，1644—1911年在武昌起义前，中国共发生1 121次灾害。^[9]晚清灾害更为频繁。1840—1911年，中国几乎年年受灾，岁岁饥荒，饥馑遍地。严重的苛捐杂税，官僚、劣绅、洋行囤积居奇，再加上水涝旱灾，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全国各地抢米风潮层出不穷。1910年，灾荒形势不断恶化，抗捐、抢米等民变事件发生了266起，尤其是抢米风潮，几乎席卷了浙、苏、皖、鄂、湘、赣、粤数省。^[10]据1906年的《时报》刊载：“今岁中国饥馑之状，实为从来所未有。以江苏、河南、安徽、山东四省为最著。江苏省之江北被害尤烈，草根树皮铲除都尽。此等穷民转辗避难，现集于清江浦者不下三四十万。据云此次中国灾荒之范围，约八万平方英里，被灾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11]江苏受灾最严重，靖江、东台、扬州、泰州、镇江、宝应、苏州等地灾民掀起猛烈的抢米风潮，抢米船，毁米行、钱庄、当铺、衙署、学堂。“徽州府各属米价翔贵，积谷者又复任意居奇，致令穷民蠢动，往往纠集成群，硬向米肆抢夺。”^[12]在湖南，“湘省被灾，抢风日炽，平江、湘阴、长沙、浏阳一带尤甚。平江林姓方储米减赍，抢掠一空；湘阴易姓连日被掠二次；其长乐地方抢案已数十起，无一拿获，长沙、浏阳乡中稍有积储之家，匪徒十百成群，持械勒索，杂投瓦砾，不敢计较”^[13]。可以说，晚清以来的整个农村社会的生存环境是岌岌可危的，农民已然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成了一条求生之路，特别是在一些农民领袖的煽动和带领下，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

晚清出现的农民运动规模不等，规模小的几十、数百人，规模大的多达成千上万人。在东南、西南、西北爆发了大规模的汉族与回民、苗民族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捻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等。影响最大的当数太平天国运动，它是近代中

国史上最具历史性和代表性的一次农民运动。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众在广西金田村发起武装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直至1864年天京（南京）被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灭亡，此次农民运动历时近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对晚清社会的影响巨大且深远。可以说，作为反对清王朝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在很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有学者指出，它在国内引起的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和条约制度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14\]](#)

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除了与晚清社会的积弊难返等因素直接相关外，也是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华文明影响与冲击的一个缩影。这从太平天国采取的政治思想源自基督教的事实即可得到确证。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最初的组织形式是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拜上帝教是吸收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乡村地区成立的一种特别的基督教组织，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拜上帝教有自己的教义，制定了相应的宗教仪式与会规，并以此作为招揽信徒、组织和管理农民队伍的手段和方式。洪秀全于1846年先后写成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书，因劝导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惩富济贫，在当时得以快速且广泛地传播。加之当时广西等地连年灾荒，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所以拜上帝教创立之后，很快便吸纳了大批信众。起义以后，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政治纲领，其核心思想都是源自拜上帝教创立之初的平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华文明发生的一次最为激烈、最为显性、规模最大的直接碰撞与冲突。

由于太平天国拥有独特的政治思想主张，太平军所到之处都

进行了旋风式的清理，宗庙、祠堂、神像等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一切，绝大多数都被极端地毁掉。对此，曾国藩曾惊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5]太平天国承载的西方文明与历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就此来看，作为晚清政府委派“平叛”的军事领袖，曾国藩及其背后群体所承载的和试图维护的，恰恰是历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这个传统就是“忠孝仁义、礼义廉耻”，而社会秩序则是建立在这一传统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较量。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与传统基层制度直接相关，如团练、保甲法等。从更深层次来看，曾国藩代表的湘军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之间，也是宗法伦理的乡村社会秩序与平均平等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博弈。因此，太平天国与清朝的对立，不仅仅是军事的对立，也是两种思想文化对社会控制的角力。只是由于太平天国依然摆脱不了旧制度、旧传统、旧秩序的影响，仍有家族政治、等级政治等传统官僚政治的弊端，实际上，太平天国并没有开拓出良好的社会新秩序和新内容。从这一层面来看，太平天国未能取得最终成功也有着文化积弊的缘故。

当然，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彻底失败了，至少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在于：一方面，对平均平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历史的实践，唤醒了大多数乡民的思想，平等的朴素社会思想已经在村落社会的底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乡村的农民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上层社会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有了实质的反抗；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与晚清国家在乡村地区的角力过程之中，促成了乡绅以更高地位和权力身份的回归，使乡村社会的某些现实关切能得到国家的积极回应，

国家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对之后村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在晚清农民运动中，还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农民反教会斗争频发。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欺压民众十分猖獗，引起了乡民的严重不满，所以出现了针对教会和教民的民众起事，当时将其统称为“教案”。据统计，1848—1911年这60多年间，全国各地共发生教案500多起。台湾、福建、天津、安徽、江苏（扬州、江阴、丹阳、无锡）、湖南、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均有发生。^[16]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就属于反教会的农民运动。“义和拳、大刀会自上年（1899年）秋冬渐延直隶，各处皆有，练习拳棒，其中有素与教民结怨者为教练，传习渐广。”^[17]在河北境内“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18]。《庚子大事记》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19]据奉命处理直隶“庚子教案”的布政使周馥奏称：“京中教会受挫最烈，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大劫其灾，徒然骤起，自古罕见。”^[20]很明显，从本质上来看，义和团运动也是中西两种文明在近代乡村社会发生冲突的最为显性的表现。

其实，在一系列晚清农民运动中，最普遍、最频繁的还是以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等为形式和目的的反抗运动。有学者统计，1902年发生抗捐抗税运动35次，1903年29次，1904年40次，1905年48次，1906年48次，1907年46次，1908年43次，1909年44次，1910年84次。^[21]晚清抗捐抗税斗争不仅频率高，而且能很快得到乡民响应。史载，“一有倡首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故虽拥一妇人女子、稚儿顽童，一朝而可以啸聚数百人”^[22]。这类农民运动的成效一般并不是很大。地方官府往往

以“只拿首要，解散胁从”的手段，或派遣绅士前往劝解，就可以驱散闹事的群众，当然，有时也相应减捐减税以缓解农民运动。如1902年直隶广宗景廷宾聚众抗粮事件中，清政府“分遣绅士前往劝解”，“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23]当然，也有比较极端的情况出现。如1903年山西永济县的乡民反抗柿酒税，9月29日，数千人涌入县城，捣毁县衙，知县逃走，柿酒被迫免税。^[24]

大多数农民运动始终伴随着暴力与破坏，因而对农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使乡村社会秩序遭受重创，还导致乡村人口锐减。（见插图26）例如1851年，江苏省人口为4 430.3万，1865年降至3 013.3万，十余年间人口减少1 417.0万，减幅达32%。1851年浙江省人口为3 010.7万，1865年降至1 329.6万，人口减少超过1 681万，人口减幅达55.8%。1851年安徽省人口为3 763.1万，1865年人口降至2 202.7万，战争中损失人口1 785.6万，减幅达41.5%。^[25]1902年桐庐事件中，140名农民被官兵“开炮轰毙”。^[26]1910年仙居民变中，34名农民被擅杀，难户167户512间被烧，“官兵所到之处，任意肆掠”，“自是民心惶恐，一日数惊，扶老携幼，号泣远逐者，盖道路不绝矣”。^[27]同年，热河泉州农民聚众闹税，“被巡防兵枪毙多命”^[28]。长期的农民运动对各地乡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废，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更加痛苦。江苏地方“自粤逆（太平军）窜扰后，田地类多荒废。江宁、镇江、常州三府，暨扬州府之仪征县，被兵最重，荒田最多；其江都、甘泉二县，与苏州所属次之；松江、太仓二县属又次之”^[29]。

可见，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是乡村问题的一个集中爆发，人口压力、官僚腐败、地主剥削、外来文化影响等，传统问题的累积和新问题的叠加导致乡村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因此，太平天国在短时期内能够发展得声势浩荡，受到那么多农民的支持并不是

因为这一运动有多好，而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环境实在太糟糕。在传统社会，当各条生存之路都行不通的时候，唯有以死博生，这是中国农民对革命最根本、最直接的理解与冲动。这一理解与共产党后来发动的农民革命是有区别的，后者改变了农民对自身定位的认识。因此，原本最稳定的乡村，变成了最动荡的乡村。官绅不再能控制乡村局面，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不得已，清政府将权力下放，地方权力扩大，乡绅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环境条件再度成为乡村的强力者，并力争夺回对乡村的主导权。传统文化在乡村延续了几千年，因此，即使是起义的农民也依然和村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生存环境，更有情感、精神、风俗的影响。太平天国没能照顾到后者，传统的儒释道在拜上帝教看来都是需要扫除的。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也受到了传统的反制，社会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对环境的反抗，另一方面是情绪发泄的聚合。革命需要激情，但是长久的革命则需要激情之上的情感 and 认知，在革命未能建立起新的高度融合的情感 and 价值认同时，人们会倾向于再次选择传统，选择维系着民众日常行为的乡土社会结构。太平天国起于乡村，最终却没有把握好乡村，也就失去了乡村。新旧事物的相替不是简单的存亡问题，而是继承与发展的问題，如果新事物不能在旧事物的基础上有替代性的发展，新事物是很难立足于旧事物之上的。对延续中华几千年文化的载体而言，村落的发展更应当遵循此理。

以上这些，都表明晚清农民运动对乡村社会的积极影响与破坏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其实，从另一层面来看，也说明只有保持村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和昌盛。

二、军阀混战与村落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次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建立起来。北洋政府建立之后，国内又先后爆发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以及孙中山等为反对复辟组织的护国运动等。1916年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后病逝，北洋政府内部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东北则有张作霖的奉系，西南有滇系、桂系，大大小小的军阀难计其数，他们相互攻伐，此起彼伏，近代中国由此进入长达10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直至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军阀混战对包括广大乡村地区在内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破坏无疑是巨大的。

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互不统属，战争成为常态，不仅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难以建立，而且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被战争切断，包括乡村在内的社会经济秩序与运行机制出现混乱。加之对军阀而言，有兵则强，无兵则弱，对士兵而言，有饷则干，无饷则跑。军阀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壮大，必须有足够的钱粮。所以，各地军阀除了仰仗外债，主要的钱财来源就是从老百姓手中强取豪夺。乡村也就自然成了重点剥削的对象，以当时各省货币地租租额为例：辽宁铁岭地区在1911—1931年租额增加了107.1%，天津李家嘴村在1913—1928年租额增加了49.3%，四川资中在1933年前后租额增加了180%，广东在1919—1929年租额增加了100%，江苏18个市县在1922—1927年租额增加了144.9%。^[30]在旧皇权体制下，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乡村农田赋税，且定额定时征收。但是到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新增的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等，使得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比如在四川新

都，农民被迫预付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赋税，从1920年8月开始预征1921的粮税，并且在同年12月又开始预征1922年的粮税，到1927年5月已预征了1940年的粮税。[\[31\]](#)又如，1921年，军阀田颂尧在成都向当地民众“借款”，名义上是借，实则抢夺。据载，他“每夜派队传人至署逼款，临以铁索，胁以兵威，缴款时不给印收，陷款无着，借款若干不详”[\[32\]](#)。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再类举。不仅如此，1920年还出现了一种兵差，这是一种军事捐，由过境的军队征收，或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征收。除支付现金外，村民们还要提供手推车、草料和劳力。[\[33\]](#)

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为了支付日益增加的赋税，在军阀的诱导和强迫下种植鸦片这种“经济作物”，并被苛征烟税。“民国以来，中央政令不行，法律失去其效力，各省拥兵之輩，莫不力图扩充兵额，以图自固，而保地盘。然而苦于筹饷乏术，乃视鸦片为其绝大利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而裕饷糈。”[\[34\]](#)1926年《中华年鉴》刊载的一篇报道称：“今年漳浦县正式征收的鸦片税额为62万元，与去年相等，但不包括收税人员的中饱勒索。估计每年要从农民身上搜刮100万元左右。收税采用强制办法。在税吏来至时，很多人都已离家逃走，证明他们无力纳税。税额因不同的村庄和不同的人而互相悬殊。可能一家只要3元或4元，或者一个劳动力要收80元。有钱有势的人纳税少，贫苦无告的人纳得多。”[\[35\]](#)鸦片的公开化与泛滥使得农村染上毒瘾的人特别多，很多生产农作物的田地转而种植鸦片，农作物产量减少，加上兵匪之乱，粮食价格飞涨，农民缺粮，发生粮食恐慌，严重破坏了农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除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5省外，几乎其他所有的省份都种植鸦片。1921年，鸦片产量达到1.5万吨。产烟最多的地区，有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

西、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热河等省。云南、贵州、广西各省的肥田沃土，甚至被地方政府勒令必须种烟，不得种植粮食。

[36]有学者指出，民国四年（1916年）之后，“旧附加税，并入正税，新附加税又有增加；农民的痛苦，当有甚于往昔”。民国八年（1920年）之后，“各省独立各行其事，均以田赋的收入充省县行政的支出。政费浩大，附加税因之而增加，田赋制度，乃不可收拾”。[37]

与此同时，军阀战争带来的兵祸连绵不断，民众苦不堪言。1916—1928年，战乱从未休止，且战事凶猛，战区一次比一次扩大。1916—1924年，平均每年战区涉及7省之多，1925—1928年增至14省左右。[38]较大的战争如直奉战争、江浙战争、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战争，川、湘、滇、闽、粤地区战事尤为频繁。接连的战争使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摧残，加速了乡村经济的破产。例如1921年夏，直系军阀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在鄂南激战，吴佩孚“令直军将蒲、咸间之拦（长）江堤挖断，溃口至四百余丈”，从而导致“北至武昌金口，南至蒲圻五岭镇，东至咸宁安然湖，纵横百余里，一片汪洋，为前清道光己酉年以来未有之浩劫”。[39]1924年江浙战争，使原本富庶的松江、青浦、太仓、上海等9个县的农民损失惨重：“战区内耕牛、农具损失极多，有至十分之六者，少者亦在十分之二三；农作物中，除各处田稻收获尚好外，棉田受损最巨，收获多者仅及六成，余则二三成左右。”[40]黄炎培等为预备救济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记载：“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焚掠，万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41]其他各地战区，也大抵如此。军阀混战不仅导致农业生产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劳动力资源锐减，民不聊生，乡村的衰败无以复加。

此外，军阀兼并土地的现象愈演愈烈。例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地4万多亩；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段祺瑞在东北圈占荒地20万顷；冯国璋除在河北河间占大量土地外，在苏北也占地75万亩；张敬尧和倪嗣冲各在安徽霍邱、阜阳占有七八万亩土地。[42]土地兼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土地高度集中，造成很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破产变成佃农和雇农。例如江苏昆山县自耕农在全部农户中的比例由1905年的26%下降到1914年的11.7%，与此同时，佃农所占比例由57.4%上升到71.7%；南通自耕农的比重由1904年的20.2%下降到1914年15.6%，而佃农的比重由56.9%上升到61.5%。自耕农骤然减少，农民破产严重。[43]失地农民激增，乡村闲散人口无处安置，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了生存又成为军阀士兵，乡村由此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恶性循环之中。农民越发贫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军阀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大大超过了晚清统治时期。

连年的军阀混战和盘剥，加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涉入以及外国商品对华的入侵，诸多矛盾和损害最终转嫁到底层乡村之上，乡土社会在重大压力下趋于崩溃。一些地区的农民无路求生，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湘西辰州，“农夫辍耕于野”[44]。河南连年战乱，从驻马店至绥平的几十个乡村中，几乎十室九空，一些乡村甚至十室十空。[45]据历年调查显示，江苏仪征、江阴、吴江，安徽宿县，山东沾化，直隶遵化、唐县、邯郸、盐山，浙江萧山等地，农村人口中有1.44%~8.7%离村，离村率平均为4.61%。[46]其中山东沾化人口5857，离村人口513，离村率高达8.7%。[47]而且这些离村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壮年劳动力。1935年，青年男女离村到城市工作者占27.7%，到城市谋事者占20.1%，到城市求学者占17.5%，到别处农村做

雇农者占22.6%，另其他占6.2%。[\[48\]](#)在江苏宜兴城区附近的乡村，许多农民都进城务工，或者前往苏州、上海、无锡等地的纱厂，“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49\]](#)。镇江地区，每年有来自苏北和山东的农民四五千人来寻找工作，“但是到了春天，他们就回去耕作”[\[50\]](#)。移民东北的山东人，原以为可以在此进行耕作，但时势所迫，也不得不“赴俄之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51\]](#)。这些农村人口的流失，导致农田抛荒，粮食产量随之锐减。

由此可见，军阀政府无力也无法促成国家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反而成了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最大的不稳定性因素。社会经济的枯竭，以及频繁的战争造成的兵祸、匪患和鸦片毒害，再加上不断的天灾，社会经济基本崩溃，乡村分崩离析。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内的军事冲突不断，但是政权力量对乡村的控制从未停止。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以及地方权力的重构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间断。1900年以后，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广泛设置了村正（即村长）一职，作为国家在地方村社的正式代理人，以取代半官方的旧式乡地。[\[52\]](#)这也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担任村正一职的人各种各样，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村社中最有权势的人。村正看似是国家政权设置的一个正式身份，形式上换了外衣，和旧制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并没有很快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换言之，国家赋予村正的正式权力，并不能扫除乡绅在乡村中的影响和作用。李怀印考察了20世纪早期华北获鹿县精英活动中的三个著名事件：1906—1915年，县绅和乡绅动员反对差徭的活动；1920—1921年，精英们反对善后粮捐的努力；在军阀政府统治的最后两年，乡绅反对“军事特捐”的斗争。[\[53\]](#)这也恰恰反映了在这一特殊时期国家、村庄、地方头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国家政

权向村庄渗入的困境。国家对村落进行控制，哪怕是军阀对村落进行控制，都不得不依赖乡绅、族长等乡村头人的支持。可见，乡村头人仍然是国家和乡村之间的中介角色。

只是在军阀混战的极端环境中，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使乡村头人的处境十分艰难，以致不少地方出现了乡村头人逃离的现象。如此，乡村才形成了权力真空的局面，才有了地痞恶霸在村庄的肆无忌惮和横行霸道。有学者指出，当时中国乡村呈现出最无序、最混乱的状况，对乡村的破坏变本加厉，乡村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境地，乡村的实际控制者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貌，有地方精英组织的乡村武装，也有土匪、教门和帮会的头目。^[54]传统的乡村秩序显然已难以维护乡村的安稳。总之，军阀混战时期乡村的混乱，不仅仅是指乡村社会的受压迫程度，也指国家权力无中心、地方势力军事化、社会动荡下乡村社会碎片化的状态。这一状态下的乡村成了各种势力的角力场和社会资源的榨取地。不过，正是这样混乱的军事主义的现实，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新兴势力通过不断巩固自身力量，试图重建包括广大乡村在内的中国。

三、抗日战争与村落

1931—1945年，整整14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是无法抹去的沉痛历史。中华民族遭遇了几千年来未有的危难，国家和社会遭遇了最残酷的战争危机和生死存亡的考验。此时的乡村，不仅仅要经历国家社会的动荡，更要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屠戮与扫荡，其命运遭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但也正是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中国乡村都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在抵抗日军殖民统治，为国共两党提供

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的同时，也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抗战胜利最关键的依靠与支撑。

（一）沦陷区的村落

1931年，日军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因国民政府消极抗战，大部分国土沦陷，及至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数月内，华北、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相继沦陷，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迅速失守，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前，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被日军侵占，受到严酷的殖民统治。其中，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台湾省、山东省、江苏省9省全省沦陷；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贵州省、云南省13个省份部分沦陷。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先后设立6个直辖市，其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岛先后沦陷。日军在沦陷区施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通过在沦陷区建立各级伪政权组织，试图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从深层次来看，这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战争、生产和市场资源。乡村社会作为最底层，无疑受到了最猛烈的摧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的方针，日军通过威胁、收买等方式，将一些流氓地痞和部分土豪劣绅作为沦陷区基层社会组织的统治基础。这些人往往倚仗日军的支撑，为虎作伥，无恶不作，乡民基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乡村社会关系发生明显分化，原有建立在宗法制度、乡里组织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日伪的宪兵、特务、警察等可任意闯入民宅或公共场

所，对民众进行搜查、抓捕，施以酷刑，甚至杀害。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实行细菌战、毒气战，被枪杀、焚烧、活埋以及其他各种方法处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制造了很多惨案，如1932年平顶山惨案、1935年老黑沟惨案与清源镇惨案、1936年白家堡子惨案等，惨绝人寰。日军的侵略导致沦陷区乡村的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严重影响到了原本就已极度衰败的乡村社会经济。与此同时，出于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需，日军大批征发农民服兵役、劳役，青壮年成为被奴役和掠夺的重要对象，以致乡村劳动力结构进一步遭到破坏，农田无人耕种的情况持续扩大。有学者统计，仅东北1944年被征调的劳工便有120万人，1945年上半年高达300万人。[\[55\]](#)在当时的湖北中部，富户地主大多已经迁入内地，多数劳动力或逃走或当兵，“壮丁之数目与日俱减，因而田地日减，仅三分之一尚在继续耕种”[\[56\]](#)。沦陷区农业生产能力因此大幅下降，农田大量抛荒。至1942年，华北沦陷区被掠夺的土地至少超过85 800万亩，实际上耕地减少的面积远不止此数。[\[57\]](#)沦陷区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日军还大肆掠夺农产品，实施苛捐杂税，发放高利贷，极度盘剥和压榨沦陷区的广大乡民。仅1943年，日本在河北大兴、香河、通县等9县就一次性征收3 738吨小麦。山西全省被掠走500万石以上粮食，文水、孝义、汾阳、交城等县平均每县被直接掠取10万石以上。[\[58\]](#)日军还实行粮食征购，通过统制贸易强制性低价购买粮食，获得厚利。据统计，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征购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格50%左右。1942年，在山东益都收购小麦的价格为27.85元一斤，而同期市场价格为45元一斤，相差近一半。[\[59\]](#)不仅如此，农民还要给日伪政权上缴极其繁重的税收，以伪满中央政府为例，其税收名目包括土地税、牲畜税、生产税、矿税、营业税、酒税、烟草税、统税等。1938年

财政总收入30 455万满元，其中赋税收入17 295万满元，约占总收入的一半比例。[60]在江苏以及江北的一些沦陷区，附税超过战前的三倍。日本在东北沦陷地区，还通过“金融合作社”的形式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

再次，日军在大肆掠夺沦陷区农村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也将土地资源作为主要的侵占对象。（见插图27）日本通过“没收叛变者所有土地及其财产”的法令，利用“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开办公司，圈定农田辟为农场，通过实行移民等手段掠夺中国沦陷区土地，并在农田建筑防御工事（如机场、军火仓库、军营、公路网、封锁沟等）以巩固其占领地。例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军粮城、茶淀两个大农场，共计5.6万华亩[61]，强占上海一带的农田分配给日本、朝鲜的移民种植，建立起日本的新村。[62]据统计，到1945年为止，大概有10万户，约30万日本移民被送往东北。[63]截至日本投降，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28.15万多垧[64]，日本在东北掠夺3 900多万垧土地。[65]大片土地被日本侵占的结果是，无数沦陷区乡民无家可居、无地可种，被迫背井离乡。1939年，沦陷区11 340户农民被迫移出，1940年为8 365户，1941年为5 003户，1942年为6 554户，1943年为9 608户。[66]

最后，日军还通过各种手段来愚化和奴化沦陷区人民，试图从思想文化方面瓦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更好地对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1941年，日军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中，就专门辟出了“对华思想指导纲要”一章，其中明确规定：“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动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67]很明显，日军希图通过摧残沦陷区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削弱人们的抵抗意识。因此，日军通过扶持汉奸建立了一系

列的宣传组织，如东北的“协和会”、华北的“新民会”、华中的“大民会”等，在包括广大乡村地区在内的沦陷区推行宣传奴化教育；通过报刊、广播、集会、传单、游行、电影等各种手段，大肆宣扬“王道主义”“共同防共”“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言论。同时，在一些地方，如东北，还下令关闭所有学校，焚毁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书籍、报刊等资料。而且，日军尤其重视对沦陷区儿童、青少年灌输奴化教育思想，在师资、课程、教科书等方面严加控制。（见插图28）对学校校长、教师实行恐怖政策，警告学校校长：“以后对于拥护和认识新政权，及如何研究中日问题，要给青年和儿童一个正确的领导。”^[68]并对教师进行“培训”，编写、出版奴化教育的教材，删去中小学书籍中一切关于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的内容，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都不能放，并将日语课列为必修课。这无疑对沦陷区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当然，沦陷区内的乡村社会，并没有因此放弃抵抗，相反，日军的一系列残暴统治激起了沦陷区乡民乃至全国民众的强烈反抗和斗争。据相关资料显示，仅东北地区，就涌现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民间抗日队伍，较为典型的有东北海林地区的“北八大队”（又称“抗日八大队”）、宁安县的“红枪会”、渤海镇由大法师组成的“大刀会”等。其中，“红枪会”的影响最大，曾在抗日后方的山东省号召大批民众进行游击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初期的消极抵抗转向了积极抗战。中共中央更是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将工作重心放在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上，开展游击战争，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沦陷区乡民则采用纵火等途径毁坏日军设施、设备和物资，通过抗税、抗粮、抗差、抢粮食等方式直接打击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沦陷区乡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情报为抗日根

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为配合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统区的村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权建立，并意味着其向北洋军阀混乱统治宣战。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取得对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加上东北奉系军阀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实现名义上的统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于全国不少地方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不仅被迫迁往重庆，而且事实上的执政范围也大大缩小，统治区域主要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国统区的经济重心明显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但是，国民政府对包括乡村在内的国统区内的执政，在政策上并未重点关注乡村，加之，由于军阀混战，西南等地的村落社会被严重破坏，所以国统时期的乡村也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而且因抗战的全面爆发，乡村成为抗战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以致国统区内的乡村社会持续走向衰败。

在国民党执政初期，执政党对乡村的状况不是特别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存在矛盾纷争，政治内耗严重，无暇顾及乡村状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都市才是资金和财富的集结地，国民党必须牢牢抓住相对优越的工业化资源和现代化资本。所以，执政初期国民党在乡村只实施了相对温和的“乡村自治”政策。尽管在此政策下，乡村重新清理和构建了乡村行政系统，并尝试进行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的乡村改良计划，但是，由于政策本身的问题以及现实执行中引发的诸多矛盾，乡村自治最终

没有形成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和改造。直到共产党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失败，国民党才深刻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得国民党在乡村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表面成功，并对共产党进行了有效的防控和打击。但实际上，保甲制度的实行对国民党而言是不成功的。保甲制度的推行看似是国家政权取得了对乡村的深入控制，但这种控制使土豪劣绅得以在政权的外衣下实施对农民的压榨，从而造成了国家政权与农村的日渐分离。加上国民党本身代表了官僚资本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乡村只会成为掠夺的对象，而非建设改良的重点。

根据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1929年对无锡金县20个村1 035户的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显示，当时占总户数5.7%的地主占有47.3%的土地，占户数5.6%的富农占有17.7%的土地，而占户数88.7%的中农、贫农、雇农仅占有35%的土地。而且，其他一些地方，如广东省，1929—1934年，地租额普遍增加了20%。1930年，河南商城的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600%，四川奉节则超过768%。[\[69\]](#)可见，国统时期的地租剥削不仅十分严重，而且田赋附加税及其他苛捐杂税也层出不穷。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四川一带的田赋附加税有地方、学费、自治、司法、夫马、工本、票据、杂费、县志、助款、被服、司书、备丁、团费、党费、剿赤、公安、建设、教育、部队、铁栅、电机、公债、伟粮、财科、职校共26项名目。[\[70\]](#)就此来看，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并未事实上改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相反，二者间仍是一种相对紧张的对立关系。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社会，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经济建设，都难有本质上的改观。

此外，在抗战爆发之前，与失守的大城市相比，西部10个省份的总资本也只占国家总资本的2.8%，工厂数量不足200家，占

全国工厂的4.6%。^[71]抗战爆发后，由于沦陷区的扩大，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工商业税收得不到保障。统计数据显示，1941年下半年，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以前，以关税、盐税、统税为重心的工商税已降至只占国库总收入5%左右。^[72]所以，国民党也不得不将重点转向乡村。按理说，面对民族战争的危难，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家资源是政府的应当举措。只是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发展社会生产，消灭剥削及不平衡，反而增加赋税、大量举借内债外债，将经济财政负担压在民众身上。按抗战时的情况推算，将国民党的田赋征买、征购等负担和各种杂派合在一起，至少占农民全部收入的60%以上^[73]，56%的农户每年必须借贷，48%的农户要靠借粮才能维持生计。^[74]农民负担普遍比抗战前大大增加。1943年，国统区征实、征购、征借的粮食高达65 196 816市石^[75]，其中不包括带征县级公粮1 000余石以及各种强迫捐献。^[76]而且，国民政府在乡村依靠的是一个借征兵征粮之名行兼并剥夺农民之实的恶霸地主阶层。因此，在保长抓壮丁、摊税款的过程中，传统村落社会进一步解体。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乡村成为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国民政府也试图重振乡村经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乡村的战时法令和条例。《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了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在农业方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战时土地政策法》，并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大纲”。通过设立农业推广站、垦务总局、移徙屯垦军民等措施进一步发展农业，以供应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统区内的乡村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是减租减息。例如，1941年4月，《湖北武汉减租实施办法》将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另一些地区实行“四六减租”，即夏收稻谷按照佃农、地主四六分成，

晚季收成全归佃户所有；“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25%。

[77]二是倡导农村合作事业。国统区一些乡村在省建设厅的指导下，陆续成立合作指导室，对农业合作事业进行指导，由此扶持了战时农业以及农村副业的发展。三是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业种植条件，包括推广农作物良种，因地制宜推广施肥、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措施。四是进行荒田调查，对乡村地区进行土地编查报告，扩大农作物耕种面积，提倡农民垦荒。虽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采用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但由于乡村地区长期以来所受的积弊，加上连续的战乱、频发的自然灾害，国统区内的乡村经济并未在短时期内得到恢复。（见插图29）

再者，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也对城乡社会进行盘剥与掠夺，城乡社会积重难返。据统计，重庆地主所占的土地由抗战前的50%上升到了73%，并且这些地主主要是由国民党军阀、官僚、官僚资产阶级与发国难财的投机家组成的。[78]对国民党而言，攫取农村资源造成土地兼并，发展城市经济带来了官僚资本的兴起与腐败。1937年国民党失去沿海和中部大城市之后，西南、西北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抗战时建厂大多需国家支持，国家资本超过民间资本，迅速占主导地位。1940年，国家资本已占全国资本总额的50%，194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70%以上。[79]城市经济俨然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而且这时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统计显示，当时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二局”）所控制的外汇与黄金，在1940年只占全国总数的1%，1942年增加到16%，到1945年6月竟高达75%。[80]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1946年6月，在整个国统区的3 489家银行机构中，由官僚资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达2 446

家，占总数的2/3以上。包括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整个国内金融市场，都在官僚资本银行的严格控制之下。^[81]国统时期的这种行径，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及时拨正，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腐败僵化。看似庞大的国家和社会在国民党政权的操控下实际被蚕食得只剩一副空架子。

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也尝试着手解决乡村土地问题，试图重建乡村经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土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农地改革方案》。然而，由于乡村社会的基层干部和保甲长本身就是主要的土地拥有者，加上国民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乡村土改仍只是隔靴搔痒，难有本质改变。1946年国统区农业生产比战前减少8%~12%，1947年较战前减少33%~40%。^[82]这一局面使国统区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形成鲜明对比，以至引起了乡民的强烈反抗。1946年，约40万农民发起反抗，后来影响逐渐扩大到17个省，约100万农民参加。之后，国民政府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国家和社会又一次遭受到战火的冲击与毁坏。直至新中国成立，乡村社会才重新恢复与发展起来。

（三）解放区的村落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大都在乡村地区。随着抗战临近尾声，沦陷区逐渐收复，解放区日益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9个：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太行区、太岳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边区、苏北区、苏中区、浙东区、苏浙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豫西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东江区、琼崖区。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处在日军（在一段时间内，也受到国民政府的围剿）封锁和围剿的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为了坚持抗战，解决前线部队和人民之需，革

命根据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行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重振乡村经济，恢复乡村社会秩序。

事实上，在抗战爆发之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共产党就调整了革命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地区。一方面，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正因如此，共产党受到了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见插图30）此后，为了进一步释放乡村建设的巨大能量，在不断积累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共产党最终在解放区确立了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方针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在于，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而且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能量都得到有效释放，革命根据地内的乡村经济逐渐恢复。共产党也因此受到了广大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壮大了抗战力量。晚清以来的中国乡村一直处于分散落后的衰败状态，乡民自身也很难形成有机的社会群体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乡村在严峻环境考验下的新的生存发展模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发展举措，一方面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使得农村根据地有了积极丰富的发展。据统计，到1934年3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 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 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 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83]由此，近代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开始具有历史主动性，逐步成为影响国家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着力点。

与国民党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之后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共国际派的失势以及苏联影响的失效，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苏共的教条影响，也意味着务实派的掌权和务实策略的施行。像土地革命时期一样，通过战争初期留下的空隙，共产党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符合共产党自身发展状态需求以及抗战需要的乡村政权。早在抗战前10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民族的救亡以及以乡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崩坏，而中国乡村境况的恶化首先在于基层政权的腐化。因此共产党建立的乡村政权，不仅要在敌后的农村站住脚，更要改变基层政权的形象和能力，如此才能控制和动员乡村，才能真正把握影响国家和社会的根本。

共产党首先要做的就是 在抗日根据地推行民选。民选的目的 一方面是更替乡村旧政权，另一方面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因此，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路径来达到相应目的。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抗日根据地多次组织基层选举，每次都花大力气来组织动员，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组建选举培训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可以说，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从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共产党这样，做到如此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不计烦琐。民主村选的切实有力执行，使得乡村权力的主角渐渐发生了变化：以“中农、贫农”为代表的基层群众逐步将乡村权力从“乡村士绅、地主恶霸”手中夺过来。在新当选的村干部中，中农占据了大多数，这表明了地主富农的势力逐渐衰落，中农、贫农力量逐渐上升的态势。共产党实行的民主村选，其意义不仅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并付诸实践，亦在于通过乡村政权的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职能，实现其沟通抗日民主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渠道功能。在群众

中选取有思想觉悟、有革命先进性的代表，来表达和实现民众利益。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乡村施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共产党能避免清末以来乡村政权的持续腐化，真正达到整合乡村资源的目的。

民选的另一目的是发挥新的基层政权的实际权威和效用，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调动。换言之，确定政权人选是形式上的重要一步。乡村实现了对基层政权的改造和重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意志转化成政策之后的有效实施。原有的以地缘、血缘等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及在综合环境中形成的乡村社会文化等，都影响着乡村资源的生产、整合与利用。新的乡村政权要获得真正意义上乡村控制的话语权和执行权就势必要与原有的乡村结构、组织、文化发生碰撞。如果权力不能实现制度和意志的有效延伸，就必然会浮于社会控制的表面。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皆是如此。因此，在共产党看来，新的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必不可少，只有通过新的乡村基层组织，才能实现对乡村秩序的有机整合，才能争取到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提取和利用。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采取了多方面的举措：通过政治思想的宣传实现政治动员，通过组织各种集会，利用说理、话剧等形式向农民宣传政治思想，同时经常号召群众走出村落家族、乡村社会，参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新活动，打破原有社会组织的格局和框架，融入无产阶级的大家庭；同时，共产党还以革命理论武装农民群众，以阶级对立的思想教育对抗封建体制的剥削压迫，让群众在认清自身贫困根源的同时找到革命中自我身份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在土地这一核心问题上，共产党通过合理的土地政策来落实乡村群众的经济利益，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来获得基层群众的认可和支

持，最终促使乡村传统结构网络发生变化，为新型基层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它们以农会为中心，包括妇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组织等，形成了超地缘、血缘的社会化、军事化组织，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获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正是共产党努力想要实现的乡村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乡村政权的重构，还是新型社会组织的建立，都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不断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乡村政权中的行政干部，还是新型组织中的群众干部，其中必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乃至党员干部。这是共产党渗入乡村社会、联结乡村社会最有力有效的方式和举措。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不断吸收各阶层人士，壮大自身组织队伍；此外，共产党通过组织的形式对社会各个层面实施有效控制，实行程度广泛的战线统一，从而保证党的意志的贯彻实施。这从山东地区根据地的党员成分比例就可得到确证（见表8-7、表8-8）。

表8-7 1941年1月山东各地区党员成分统计表

地区	成分比例（%）
鲁南	工人、雇农、贫农 58%，中农 29%，富农、地主、商人 12%，自由职业 1%
湖西	工人 5%，农民 72%，小资产阶级 17%，富农 4%，地主 2%
胶东	工人 9%，农民 56%，学生 25%，商人 8%，其他 2%
清河	工人 3%，贫农 67%，中农 26%，雇农 4%
鲁中	工人 8.3%，农民 82.3%，商人 3.3%，学生 4.1%，军人 2%

资料来源：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巩固党的总结》中提供的数字绘制，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转引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表8-8 1944年9月鲁南区党员干部成分统计表

干部类型	党务干部		政府中的党员干部		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干部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干部总数	943	100	220	100	233	100
工人	123	13.0	12	5.5	25	10.7
贫农	430	45.6	36	16.4	80	34.3
中农	207	22.0	33	15	48	20.6
富农	18	1.9	22	10	13	5.6
地主	4	0.4	9	4.1	17	7.3
知识分子	144	15.3	85	38.6	46	19.7
其他	17	1.8	23	10.5	4	1.7

资料来源：《鲁南区党委组织状况统计（1944年1—9月）》，山东档案，G028—01—0011—003。转引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发现，农民党员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很高，而且农民党员在干部群体中的比例也很高。这恰恰反映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形，以及共产党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始终将工人、农民等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将农民吸纳发展为共产党的主体力量，这与当时中国社会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同构。（见插图31）这也恰恰说明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真正切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从底层农村开始取得巨大的政治资源和潜力。换言之，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共产党把农村根据地转化为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把农民转化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不仅是解决传统社会解构之后农村基层社会整合难题的根本手段，也是在日军疯狂扫荡和打击之下有力的生存策略。游击队打散了还能很快聚集，基层政权破坏了还能再次建

立，只要乡村还在，村民还在，共产党组织还在，抗日的事业就能继续进行。

任用村民为乡村干部来实现社会整合有两个前提。其一，村民必须突破家庭的框架，接受不同于宗族礼法的基层组织形态，并对社会管理有参与热情。只有村民素质提高之后，才可能实现由乡村干部来组织乡村。其二，社会整合必须使上、中、下三个组织层次的管理者均来自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共产党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吸收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并将他们发展为党员；为了建立庞大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更是吸收了大量农民入党。农村中出现了一个类似无产阶级的阶层，使马列主义逐渐变成农民喜闻乐见且易于接受的思想形态。这一切都需要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中国共产党从发展壮大到最终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正是基于这些前提被创造、积累和综合的结果。^[84]需要强调的是，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撬动乡村这一影响历史的重要支点，中国乡村的巨大变革与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二者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持续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农村创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并实现了农村的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达到了有效的社会整合。而国民党尽管在正面战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通过抗日战争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整合，在战略上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这对之后的国共两党角力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共产党的解放区与乡村的关系紧密深厚、唇齿相依。从历史的积淀和延续来看，这样一种关系得益于抗战前10年的乡村革命经验。相较于解放区，国统区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远没有达到如此程度。恰恰是与乡村的关系决定了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作为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要实现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整合，只能建立一个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在大城市中，高层机构人员和编制充足合理，控制力较强；随着层级逐步下降，控制力逐渐减弱；到了县级如此，延伸到乡村，更是如此。^[85]尽管国民党也意识到控制乡村对于政权的建立和工业战争的重要性，但是其采用的方式和策略并不能达到充分渗入乡村、动员乡村的效果。从清末开始，乡村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乡村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都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乡村的基本结构几近崩坏，宗法家族、乡绅精英等传统组织和力量已经逐渐不能发挥整合乡村秩序的功能。而国民党还是在这样的乡村状况之上，利用不能深入基层的组织结构来实施对乡村的硬性控制，结果导致地主、地痞、恶霸等乡村能人在政权的外衣下变本加厉，对农民实行赤裸裸的掠夺，并将所得转为私人所有。杜赞奇将这种现象称为“国家政权内卷化”。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榨取乡村社会的必然结果。^[86]因此，即使国民党在历史中占得先机，率先获得整合国家社会的权力和能力，也并未成为政党深入包括村落在内的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

而共产党在尝试城市革命的路径失败后，迅速找到了农村革命的道路。共产党找准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并通过适当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村各个利益体的根本需要，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群众基础之上需要解决农村的结构问题和组织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不断吸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广泛力量成为党组织的成员；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党组织对基层的影响来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与动员。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不仅有来自战争的影响，也

有来自农村社会关系、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都指向了农民思想意识下的行为。共产党意识到，必须使农民的革命性、纪律性、积极性等，在组织化、军事化、效率化的行为目标中加以实现，从而突破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以及传统旧社会网络的桎梏。因此，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保持着开放的思想以统一抗日战线，制定严格的政策以维护民众的利益，实施有效的行动以获得民众的信任。进而言之，农村的状态就是在共产党的坚持和农民的反复中，不断朝着新的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方向变迁。这一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突破了农村宗法家族等伦理结构对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束缚，共产党实现了对广大农村的领导与整合。

四、解放战争与村落

自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胜利，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饱受战争的摧残，残破不堪，亟待休养生息，全面恢复。这既是当时中国和中国乡村的现实需要，也是全国人民最真切的期盼。然而，在这一历史环境中，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却逆潮流而行，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将刚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国及中国人民再一次拖入了战争的泥潭。这不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也使国统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广大乡村民众产生了强烈愤慨。从1946年6月底至1949年9月，经过长达三年多的英勇抗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最终推翻国民党政府，解放全中国。这次战争被称为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社会也因此迈进了全面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

事实上，抗战胜利前后，由于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革

命、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解放区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乡村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解放区经济呈现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的文件《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指出：“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87]同年12月，又颁发《一九四六年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两个文件，强调减租运动的重要性。各地解放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基本上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所以，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未达战前水平，但已开始战后恢复的进程。然而，随着当时国内形势的急速恶化，大战可能随时爆发，中共中央开始积极发动解放区农民进行自卫斗争，采取了“前方打仗，后方土改，以土改促打仗”的方针。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的问题指示》（即《五四指示》），明确规定：“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与国统区官僚资本、地主阶级对广大乡村的不断压榨、掠夺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范围得以持续扩大，其面积增至240万平方千米，遍及全国19个省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14 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其中新解放区占解放区总面积一半以上。^[88]

《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因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为更好地推进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五大解放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原解放区。各解放区贯彻中共中央以土改促打仗的方针，积极发动民众进行土地改革，打

击封建势力，解放区生产力得以进一步释放。据统计，到1946年10月底，全区已有2/3的地区约2 000万人口获得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年初，晋察冀解放区有1 000万亩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到1946年年底，山东解放区有1 5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1947年春，在华东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89]与此同时，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分散性与落后性问题，解放区内通过实施互助合作运动，很好地将广大农民组织了起来。1946年，陕甘宁地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30%~50%，高者可达62%；晋冀鲁豫解放区20个县，平均每个县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达42 095人，占总劳动力的78%。[90]正因如此，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不仅没有衰败，生产积极性反而得以持续提高，农民踊跃参军，成为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最有力支持。据统计，1947年，晋冀鲁豫解放区有30多万人参加解放军。广大农民同时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据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统计，三年解放战争中，全东北支前民工共计3 078 900余人，担架288 600余副，马776 600匹，大车251 000多辆。[91]广大农民还积极参与民兵作战。1947年，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武装作战16 800多次，歼敌42 500余人，破路1 150多里。[92]所以，国民党发动对解放区的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不仅很快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而且在1947年7月转入反攻的阶段，仅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解放区取得的阶段性成绩。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在肯定《五四指示》以来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其中一些不彻底性进行修正，例如地主分得较多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等。会

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947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由农会按照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无疑受到广大乡民的热烈拥护，解放区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土改热潮，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可以说，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也不断提高，解放区乡村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以改善，农村经济持续好转。（见插图32）1948年，已有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东北解放区每垧地产量由1947年的1 500斤增至1 920斤，增产近1/3。^[93]当然，在此期间，乡村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明显改变。1949年，在河北、察哈尔的农村中，贫雇农的占比由以前的44%降为15%，中农的占比由37.6%增至77%。^[94]

反观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广大乡村，则经历了一个持续恶化甚至破产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大片土地抛荒，农民生活十分贫困，至少3 000万人民因为粮荒成为饥民。^[95]饥荒盛行，农民颗粒无收，只能以杂草、麦麸、谷糠、树根为食，艰难求生。霍乱、天花、白喉、痢疾、伤寒、斑疹伤寒等传染病肆虐，广西省几乎80%的人都得过疟疾，农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然而国民党官僚仍伺机大肆掠夺财富。加之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开支数额空前庞大，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1948年，财政赤字高达900亿元。^[96]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最终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国民政府征收各类赋税，沉重的田赋、苛捐杂税、强征军粮使农民不堪重负。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田赋增长飞快，“1946年征收5 900万担；1947年增收到1亿1 756万担。一

年中田赋增长一倍。1948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田赋税率。监察院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位特派员在1947年指出：农村地区的贫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田赋能带来更大的痛苦”[97]。同时，由于战争的持续推进，国民政府需依靠基层抓壮丁，在乡村大规模征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农民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数据显示，国民党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征兵210万。1946年，为了内战需要，国民党宣布对40个省田赋征实，加上征借和地方公粮，农民须上缴的粮食高达11 100万石，当时就有人惊呼这是史无前例的苛政。[98]

此外，国民政府还滥发纸币，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十分严重。1937年6月—1949年5月，货币发行量增加超过1 445亿倍，平均每月增长19.7%，同期物价上涨超过了3.6亿倍，平均每月增长24.5%；1948年8月—1949年5月，货币发行量增加了30多万倍，平均每月增长307%，物价上涨了644万多倍，平均每月增长471%。[99]通货膨胀造成币值暴跌，物价疯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日益扩大，1945年4月工农产品间价格上涨指数相差4.91倍，[100]广大农民深受其害。

毋庸置疑，这严重摧残了国统区的广大乡村。耕地减少，土地大面积抛荒。1946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抛荒耕地面积5 800万亩。1947年江苏省抛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3/5，湖南、安徽占1/3，河南占1/4，广东高达3/4。[101]战争中生产工具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国民党发起的兵役和差役，农村劳动力匮乏。这一系列的破坏导致粮食大幅减产，1946年国统区农业生产比战前减少8%~12%，1947年则比战前减少33%~40%。[102]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粮荒，乡村中饥民数量不断上升，全国各地哀鸿遍野。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饿死人数达1 000万。1947年，饥民人数超过1亿。[103]这带来的后果是，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

进行反抗，先是抢米风潮盛行，到后来则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1946年9月，民变运动已波及国统区四川、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规模达20万人。到1947年年初，运动扩大到14个省的300多个县，参加的群众达84万人。[\[104\]](#)国统区内的民变运动，在加速国民政府垮台的同时，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运动增加了力量。1949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包括广大乡村在内的中国开始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乡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千百年来，传统乡村社会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织生活，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停滞不前。长期以来，乡村盛行的是地主制经济，农民除了给国家交租，也要向地主交租，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之乡村中的宗族和宗教权威经过晚清以来的劣化，到国统时期，更是变成了少数道德水平低下的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手段与工具。而这一切都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过程中逐渐被打破。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乡村意识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农民生活被重塑，打破了以往由地主士绅领导、支配乡村的局面，乡村制度发生了本质变革。也正因如此，广大乡村社会在解放战争时期及胜利之后，更加紧密地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联系在一起。

其实，当近代中国遭受严重外来入侵威胁，尤其是伴有工业文明冲击之时，只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集中人力、物力以抵抗外来入侵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文明才能保留下来，并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组织必须具备强势的意识形态，有坚强和紧密的组织，它的组织不能只集中在社会上层，还必须深入农村基层，形

成一个基层干部远远大于中层和上层的巨型金字塔系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具有这样一种组织结构。^[105]中国共产党扎根乡村社会，在乡村成立党支部，在确立共产党在乡村的领导权的同时，也将国家权力完全下沉到乡村社会。正因如此，解放战争以国民党的全面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 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Frederic Wakeman,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190。

^[2] 张振鹤、丁原英编：《清末民变年表》（上），《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张振鹤、丁原英编：《清末民变年表》（下），《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

^[4] 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卷三《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5] 《中国农民生活概况（一九二六年）》，载《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第170页。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7]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折》，载《退庐疏稿》卷一，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

^[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9]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0]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12]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1—402页。
- [14] 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 [1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 [16]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 [1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页。
- [18] 夏春涛：《教案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 [19]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 [20]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1—1074页。
- [21] 杨湘容：《晚清民变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22]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折》，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页。
- [23]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广宗景廷宾聚众抗粮派兵缉办情形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3页。
- [24] 山西省文史研究院：《永济县民众反抗柿酒税纪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 [25]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第437—438页，第468页。
- [26] 《来函照登》，《中外日报》1903年1月9日。
- [27] 《续台州民变余记》，《东方杂志》1910年5月。
- [28] 《热河督统廷杰奏平泉州宽城乡民聚众闹税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

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29]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

[30] 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31]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32]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557页。

[33]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页。

[34]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5—586页。

[35] 伍德海主编：《中华年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628页。

[36] 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东方杂志》1926年10月，23卷20号。

[37] 刘广惠：《中国田赋制度之回顾与整理》，载汗血月刊社编：《田赋问题研究》上册，汗血书店1936年版，第48—49页。

[38] 王寅生、薛品轩、石凯福：《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第3—4页。

[39]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纪略》，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七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40] 原载《中外经济周刊》第98号，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1页。

[41] 《战后的江南》，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611页。

[42] 《东方杂志》1930年3月，27卷第6号。

[43]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19》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

[44]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护国运动期间湖南的反袁斗争》，《湖南历史

资料》1960年第1期。

[45]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611页。

[46]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7页。

[47] 戴乐仁等著，李锡周编译：《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12页。

[48] 《农情报告》1936年7月，4卷7期。

[49] 徐方干、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1927年8月，24卷16号。

[50]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卷一，第386页。

[51] 赵琪修，袁荣叟等纂：《胶澳志》卷三，青岛华昌印刷局1928年版，第130页。

[52]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2页。

[53]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2页。

[54]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55] 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36页。

[56] 瓦尔加：《战争与农村》，农学书店1942年版，第179页。

[57]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食粮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1948年第1期。

[58]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页。

[59]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页。

[60]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版，第20—21页。

[61] 华亩不等于亩，1华亩 $\approx$ 666.667平方米。——编者注

[62] 秦柳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农村经济》（1941年1月），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

[63] 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页。

[64] 垧，旧时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具体计算方法各地有所不同，在东北地区，1垧约合1公顷。——编者注

[65] 孔经纬：《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66] 孔经纬：《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67] 堀场一雄著，王培岚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

[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69] 关海庭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70]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395页。

[71]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2页。

[72] 陈克俭：《试论国民党政府时期工商税收的特点、性质和作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73] 朱玉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S1期。

[74]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75] 市石即石，为容积的市用单位。1市石=0.1立方米。——编者注

[76] 桑润生编著：《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77] 李锦章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78] 张鱼：《旧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与地租剥削》，《新中华》第13卷第12期。

[79]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页。

[80]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页。

[81] 林德金：《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82] 沙英：《蒋匪区经济危机迈向总崩溃》（上），《东北日报》1948年4月2日。

[8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5页。

[84]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页。

[8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86]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和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份，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8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68页。

[88] 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89] 李占才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279页。

[90] 桑润生编著：《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91] 新华社：《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淮海战役彻底胜利》，《东北日报》1949年1月14日。

[92] 南开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编：《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93] 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94] 史敬棠、张凜、周清和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2—813页。

[95] 王俯民：《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96] 沙英：《蒋匪经济危机迈向总崩溃》（下），《东北日报》1948年4月3日。

[97] 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98] 林德金：《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根源》，《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99]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100] 吴岗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页。

[10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1页。

[102] 沙英：《蒋匪经济危机迈向总崩溃》（上），《东北日报》1948年4月2日。

[103] 何泌主编：《中国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104] 郑德荣、朱阳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

[10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与村落

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村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封建土地关系的必然性。因此，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共产党随即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打好基础。1953年公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随后的三年内，中国广大农村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建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传统以来的村落社会，无论是社会阶层、经济形态，还是治理体系，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乡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国家权力完全下沉到了基层社会，族长、乡绅等传统社会精英治理村落社会的事实被改变，乡民的政治权力得到保障，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被激发。所以，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过程，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建设重要动态的反映，也是中国村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印证。

事实上，土地革命不仅仅是在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后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更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重新构建。共产党在推进土地革命的同时，成立了农会，建立了乡

—村政权组织。而这些组织的建立，以新的国家政权为核心，在土改工作中加强了与基层农民的政治互动，使得国家政权深入广大村落社会，打破了数千年来传统村落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村落社会的权力结构，从宗族礼法等多元格局转变为以国家政令为要的相对集中状态。农民被全面地吸纳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家实现了对村落社会资源的高度整合，土地改革在新政权成立的三年内得以顺利完成。毫无疑问，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土地改革后的土地私有制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格局，很多得到土地的农民因缺乏生产资料、劳动力弱等因素，未能改变贫困的生存状态。农村出现了土地租佃，这显然给乡村社会的再度两极分化埋下了隐患。国家层面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国家开始推动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因此，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有着现实的必然要求和历史的社会理想因素。

大体来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互助组是一种在自愿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农户之间实行自愿互利的小规模生产合作。一般分为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这种互助组通常以乡里乡邻的家庭单位为基础，体现出明显的地缘性、血缘性特征。简而言之，互助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之上的生产合作，大的村落分为若干组，小的则独立成组或者与邻近村落合并成组。在互助组的发展过程中，基层政权通过典型示范、积极引导、宣传鼓动、教育说服等方式进行诱导，一般没有采取政治

上的强制性措施，但互助组的发展十分迅速。1950年全国有272万个农业互助组，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到1952年，上述两个数据分别增长到802.6万个和39.9%。[\[2\]](#)互助组使得人力、畜力、物力等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对增加生产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互助组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在许多生产上的合作还存在问题和矛盾。这种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的集体劳动，需要在农业集体化的方向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农户参加互助组后，国家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开始引导农民向初级社发展，这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农业组织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农户数量更多，经营土地的规模更大，但土地仍归农民所有，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农民只是入股分红，土地的使用权则转给初级社统一经营。

在国家权力的强制进入下，乡村社会的合作化运动迅速推进，初级社很快发展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改造时期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的实现标志着合作化路径的完成。1956年4月底，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至1956年年底，全国共有96%的农户入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基本上实现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3\]](#)此时，农民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无代价转为集体所有，全社按照统一规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不再有土地分红，收入根据劳动量的多少进行分配。换言之，这意味着土地私有权属的消失，农民作为个体不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高级社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大体上用了4年时间，比预计的时间大大缩短，尽管也存在有人不愿意合作、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问题和矛盾，但是在政治权力的压力下，国家通过控制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使这种“不愿意”很快被稀释转化。

农民走上集体化合作的道路，恰恰是乡村社会失去自主权力的过程。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革命理想和治国理念的社会实践，也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土地改革提升了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为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动员和整合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土地改革之后的第二次土地制度变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1953—1956年改造期间，农业生产稳步增长。（见插图33）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分别从3 138亿斤、2 349万担增至3 650亿斤、2 890万担。^[4]1956年，尽管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年全国农业依然显著增长，农业总产值较1955年增长5%，粮食产量较1955年增长4.8%。80%的农民收入也明显上涨，农村购买力较1952年增长61.8%，其中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增长了191.7%，生活资料部分则增长了41.8%。^[5]农业生产的增长也支持了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土地的规模经营去整合分散的家庭经营，以农业的机械化去淘汰传统的手工劳动，包含一定的农业现代化因素，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6]同时，从乡村社会转变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关系的彻底变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合作化、集体化的生产经营取代，基层政权、合作社占据了血缘家族在村落社会的传统位置，国家实现了对家庭经济、宗族伦理地位的全方位取代，传统村落完全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框架。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手工业是城乡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农村中存在大量农民兼营的商业性手工业。据1954年调查，农民兼营商业性手工业从业者有1 000多万人。^[7]而且，农村手工业在城乡手工业中占

有很大比重，据1954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785万人中（不包括渔、盐、屠宰、运输等行业），在城市的占36.5%，在农村的占63.5%。^[8]一些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有70%~80%的农民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来自手工业供给，大部分农具也是手工业产品。加之手工业生产受原材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的制约，不少手工业规模小、资金短缺、技术单一、生产力低下的现象比较突出。所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当时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化。

1949—1952年，是手工业改造“典型试办，摸索前进”的阶段。在很多地区手工业逐步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开始试办手工业合作社，支持资金不足和采购原料困难的个体户，组织加工订货；协助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建立生产互助组织，提供生产和经营扶助。1951年6月6—26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巩固已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明确了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再到机械化、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的合作社发展路径，有计划地在未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重点试办。至1954年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4.1万多个，较1953年增加7倍多，社（组）员113万多人，较1952年增加2.7倍；1954年产值11.6亿元，相当于1953年的1.2倍。^[9]

1953年至1955年冬，是手工业改造的普遍发展阶段。1953年11—12月，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手工业合作化的巩固基础，到1957年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 000万人，生产总值60亿

元以上。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10\]](#)1955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必须对手工业的安排与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到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在中央的领导下，手工业合作运动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到1955年年底，全国共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6.8万个，社员220万人。农业合作化的加速也影响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

1955年12月21—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制订加快手工业改造步伐的计划，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到达高潮阶段。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到1956年底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达9.91万个，社（组）员达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11\]](#)这一阶段，中国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改造过程中采取快速合社等方式，未能妥善处理资金、技术、设备与劳动力等细节问题，使手工业后期的发展受到了制约。但总体来说，手工业劳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兴办了各种福利事业，生产技术逐渐由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的演化具有因果关系，一方面，新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和工业化的支撑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实际意义上亦是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不限于农业经济，而是对整个农村社会的全盘整合和控制。于是，农村背负了国家权力所隐含的巨大政治惯性，而这种政治惯性对农村社会命运的走向具有决定作用，因为这惯性有可能来自高效的政治建设力，也可

能来自失控的政治破坏力。这是传统的中国村落社会从未面对过的。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乡村社会单元的村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村落与外界的关系被改变，村落自主性被大大降低。1950—1952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农地私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村落活力被短暂激活。然而，1953年以后的集体化改造运动，将农地集体进行统一经营，又迅速遏制了这种活力。尤其是农业合作社的出现，使自然村落在层层管理以及各种不同血缘、不同村域之间的生产合作之中，变得联系不便，其自主性也基本丧失。因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中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作为编制对象的村落，小的与其他村落一同编入一个生产队，大的则被分成若干生产队，如此村落显然没有了自主性。村落的传统性、共同性和自主性在这一系列改造中被不断弱化，特别是“破四旧”运动，更是将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村落共同体破坏得体无完肤。虽然这一时期的村落被理解为“大共同体”，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但实质上它只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表面“集合”而已。^[12]

二、“破四旧”运动与村落社会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农村问题的完整解决，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亦存在问题，由于发展不平衡、分配过于平均等引发的社员不满、退社等情绪和行动也常有发生。当时，党和国家层面认为这是关系到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因此开始了农村的整风运动。尽管农村整风运动有稳定农村社会思想意识的作用，但同时也滋长了跃进思

想。伴随着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探索，跃进浮夸之风也开始在广大农村盛行，农村开始走向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道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而政治化的运动仍在继续，革命思想、阶级斗争在逐渐扩大。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到来，政治化运动正式向广大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核心——文化传统延伸。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新旧之间、破立之间成了绝对的对立甚至是敌对。《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因此，在政治决策的号召以及现实斗争扩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破四旧、立四新”走向了根绝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暴戾之路，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村落社会也因此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

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开始了对城乡社会的文化清扫。改街名、砸庙宇、烧戏装、打权威、大抄家、毁文物一下成了社会轰轰烈烈的风气热潮，社会秩序大乱。据不完全统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被抄家的竟达10万多户。北京市1958年确定保护的6 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 922处遭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13]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城市乃至乡村。“破四旧”活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四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举行集会、演说等。与此同时，“红卫兵”开始前往乡村，发动村民进行文化清扫。迫于压力，不少村民主动参与其中，村落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当然，尽管当时的村落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与斗争，但农民参与这些政治活动表现出较强的被动性、盲从性与非理性。乡村中多处发生拆庙宇、砸菩萨、摔碎祖宗牌位、换门神、结婚打红旗、推牌坊的事件。在“红卫兵”的强迫下，大批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色彩的街道、商号将名称更换成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名称。古建筑上的匾额、砖雕、木雕、石雕均被砸坏，房屋上“福”“禄”一类的字眼也被当作“四旧”砸掉。各家供奉的祖先牌位、神像、香炉，全部被查收。大同市商业系统在8月23日一天内，就改了63个商店的字号。“积玉德”门市部取下挂了近60年的大横匾，换上了“大众食品店”的新招牌。在“红卫兵”的影响下，山西忻县把北城门楼上的“晋北锁钥”大石匾挖掉，换上了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很多商店、旅店、饭馆都换上了“充满革命气氛”的新名称。[14]“毛主席像纪念章”一时成为人们的馈赠礼物；农村家家户户门上多写“忠”字，大献忠心，男女老少跳“忠字舞”，人人胸前佩戴“忠”字纪念章。[15]永济县一个作者给《山西日报》撰文认为，他们县的“舜帝”“西厢”“韩家堡子”“北赵宫”等村名，应分别改为“东方红”“东风”“跃进”等，“李家坟”“张家坟”等地名，应改为“高产”“丰收”等。[16]各种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韵味的传统名称被改成了简单重复的革命字眼。

比改名更严重的是对文物的毁坏。焚烧字画、打砸庙宇、毁灭古迹等，“红卫兵”所到之处，文物基本难保。南山寺门前汉白

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全部被砸毁，连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如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林，也被“红卫兵”破坏。由传统社会遗存的文物，无论其价值属性如何，只要带有“旧”的头衔，就成了必须予以破除的对象。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时期福建省各地共毁掉菩萨像53.8万多个，烧毁耶稣像、十字架、神牌等80万件[17]，仅漳州地区就捣毁菩萨近20万尊、神牌40多万个[18]。据不完全统计，龙岩全县农村共交出旧书、坏书18 068本，罗盘83个，迷信道具700副，菩萨5 712尊，神牌26 672块。[19]唐代建造的石塔、宋代遗留的石雕、明代修筑的石坊等都被拆除毁坏。建瓯一座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水南塔与一座有着独特建筑风格和研究价值的下洋状元桥毁于“红卫兵”的炸药和雷管。[20]此外，福建各地群众还打掉神主牌、香炉等各种迷信工具66万斤，烧毁“坏”书刊122万本。[21]南京浦口区清除和烧毁家谱300多本，旧对联、亡人牌、烛台、辟邪镜等物件1万多件。农村中保存数百年的牌坊、石碑等文物被砸。[22]

“破四旧”运动也使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遭到严重破坏。“至于过年的民间习惯也被列入打破的范围，过春节改名为‘过革命化的春节’，具体‘革命化’，就是农民去劳动，工人去上班，不休息，吃忆苦饭。”[23]逢年过节不走亲戚，不要社火，农事节日一律被打倒。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将‘破四旧运动’与具有民族传统的喜庆日子联系在一起，内蒙古自治区一年一度纪念成吉思汗的盛大节日，便被作为‘四旧’破除了”[24]。民间的风俗习惯被推翻，例如婴儿出生办满月酒、儿童上学做“七夕”、成年“戴冠”等风俗都被限制[25]；集体举行结婚仪式，不请客；丧葬不能戴孝，不能哭丧；舞狮、赛龙舟等传统活动也被禁止；古装戏、历史剧不能上演。[26]这些节日、庆典之所以要被禁止甚至推翻，是因为在“红卫兵”看来，这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民间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迫信徒改变信仰和生活习惯的现象。

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农村到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阶级斗争”。1966年10月，广东三水县全县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当时的流行口号，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县、社、镇、局以及基层党政机关一些领导和知识分子被强加罪名遭到批斗，致使各级党政机关基本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27]永兴公社的“红卫兵”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扒开国民党张市镇镇长×××以及吃人恶霸×××的墓穴，并控诉揭发其罪恶事实，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烧砸尸骨，让广大民众直面一场阶级教育，给当地农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28]一些“阶级斗争”也常导致一些地方发生工农群众互相打斗的事件，严重破坏了地方秩序。这些运动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基础，造成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紊乱。例如各处改地名使乡村地名混乱不堪，多数地名未经政府部门批准随意修改，且因改动后的地名有太多重复，给乡村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福建有关部门反映，因为地名混乱影响了部队指挥和抢险救灾工作。”^[29]

随着各地“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在乡村，“很多地主、富农被抄家，家产被砸毁或被拿走。在观澜和龙华，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游乡游村示众的‘黑五类’，不少人被关押”^[30]。宁夏地区，“这些‘革命行动’后来又发展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抄家运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受到‘警告’‘勒令’‘通牒’的标语到处可见，挂牌游街成了家常便饭，有些人被抄家后被赶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他们的子女成了‘狗崽子’被逐出红卫兵组织；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更是三天一汇报、两天一交代，被罚跪、罚站、批

斗则习以为常，还要被迫交出‘变天账’‘反动契约’”[31]。正常的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被严重扰乱，给整个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966年，“破四旧”运动遍布济南城乡，至当年10月13日，济南市20 075户被抄家，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7 400户22 197人被赶往农村，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32]北京市自8月19日至9月底，共赶出北京市“四类分子”达85 000多人。[33]

整个中国社会都遭受了严重的文化灾难。“破四旧”看似是要破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重新树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新文化，实际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式的否定与扫荡，这恰恰使其成了自身的对立面。包括村落在内的整个社会承受巨大冲击。村落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再次受到暴力的摧残。村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已经失去了大量有形的传承要素，乡村文化从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流失湮灭。可以悲观地说，近代以来，在社会变迁的道路上，唯一一直失调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唯一难以挽回的也是我们失去的传统文化。村落社会里一些幸免于难的文化遗存，很多是人们用隐藏躲避的方式冒险保留下来的。当然，从另一层面来说，这也表明了文化传统对政权权力的强大抵制力和约束力，以及村落社会对来自国家强势介入的某种有意或无意的主动净化和过滤。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大变革，还经历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乡村的政权组织结构、乡村精英品性及构成、农民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乡村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方式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权影响下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路径和状态呈现。

首先，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在获得生存资源的同时，形成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其次，通过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将阶级意识、革命意识灌输到农民思想中。在政治权威的规训下，国家将权力植入乡村基层，并且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方式对乡村进行集体化整合，进而通过政治运动将农村生活政治化，最终形成社会一体化的政治集权。这时乡村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各种谋生、发展资源都被国家垄断；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对农村社会的高度统摄，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传统乡村精英的位置直接被国家行政权力取代，国家直接面对乡村、乡民。^[34]这样，党和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的认同和支持，然后通过乡村政权建设等举措将权力渗透到了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紧密控制。

如此，乡村失去了自我调控的能力和空间，自古以来的传统村落社会格局完全被打破，重新建立的乡村社会成了国家高度控制下的社会单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政治化成了乡村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历史的经验和结果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体化制度下，以政治为导向的集体化行动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而行动结果的好坏则直接取决于政治决策及其执行过程的优良与否。对中国乡村而言，不幸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能量的破坏力将先前的建设成果消磨覆盖，乡村社会在短暂的恢复之后，迎来了更大的社会危机和文化灾难。在百年战争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一不留神就把所剩不多的传统文明推向了危机边缘。换言之，村落及其承载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变迁的道路上一直面临着某种危机和挑战。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2]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5页。

[3] 高德步：《中国经济简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5页。

[5]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1页。

[6] 王新华、任军利：《从农业现代化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 廖盖隆、赵宝煦、青林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

[8]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9]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0]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590页。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12] 李飞、杜云素：《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3] 金春明：《“破四旧，立四新”的历史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

[14] 孟红：《“文革”初期山西的“破四旧”运动》，《沧桑》2003年第1期。

[15] 陕西省临潼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16] 《向农村的“四旧”猛烈开火》，《山西日报》1966年8月31日。

[17] 《关于破四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范办文件（二），福建省档案馆藏。

[18] 龙溪地委文革办：《文革情况反映》，1966年10月16日第44期。

[19] 中共龙岩县委：《中共龙岩县委常委和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文件的报告》（文件总字〔66〕82号）。

[20] 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述略》，《党史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

[21] 《关于破四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范办文件（二），福建省档案馆藏。

[22] 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地方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页。

[23] 沈丘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革”中的破“四旧”和立“四新”》，《沈丘纵横》2011年总第5辑。

[24] 徐文生编写：《“文化大革命”史专题》，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63页。

[25] 中共沙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沙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26] 中共佛山市三水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水历史》第二卷（1949—197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27] 中共佛山市三水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水历史》第二卷（1949—197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28] 中共尉氏县委组织部、中共尉氏县委党史研究室、尉氏县档案局编：《中共尉氏党史》第二卷（1949.10—1978.12），中共尉氏党史研究室2004年版，第399—340页。

[29] 李炳印：《“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青年思想家》1991年4月。

[30] 朱赤：《深圳往事——龙华史话（1949—1979）》，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31] 《当代中国》编辑委员会编：《从破“四旧”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的干扰》，载李恂和主编：《当代中国的宁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32]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10—1978.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33] 徐文生编写：《“文化大革命”史专题》，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64

页。

[34] 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第四节

城镇化进程与村落

一、基层政权的建设与村落

基层政权的建设对构建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的“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体制，在20世纪初开始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内核来推动的。历经清朝、中华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获得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等，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尽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进行了形式上的下沉，同时获得了攫取乡村社会资源的能力，但并没有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地方基层特别是村落社会依然处于失序状态。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等变革措施，将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甚至延伸到了村一级，真正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基层的把控。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基层政权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农村建立了村一级的政权，即由村人民代表会议与村人民政府组成的人民政权。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国家于1954年取消了村一级政权，乡镇成为农村的基层政权系统，国家权力开始成为乡村整合与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作为自然村的村落，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村落单元因此失去了独立的治理权，被纳入了国家划

定的行政村。1958年以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受急躁冒进的“左倾”意识的影响，党中央提出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工业化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乡村建立更能满足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动员与控制力度的管理体系。因此，国家又撤销了乡政府，代之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为农民集体所有，集经济组织和基层政权于一身。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建立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严密的组织体系，每个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的公社体制内，参加公社组织的统一劳动、统一分配。^[1]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基本上瓦解了传统的具有地缘性、血缘性特征的村落社会及其人际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人民公社制度较好地改变了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形式，凝聚了乡村社会资源，提高了生产力。

客观而言，人民公社体制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管理作用，具体表现为农村社会长达20多年的政治稳定，以及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本和原材料的积累。换言之，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高度控制和对资源的攫取能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相悖的。一体化模式下的政治惯性的影响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显现，全能主义的治理体制明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忽略了农民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被取消。分配过程中实行的集体平均主义不仅没有解放出农村的生产力，反而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带来的后果则是农村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农民的普遍贫困。所以，脱离了客观实际，以理想化为驱动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走向瓦解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

开，会议对历史和现实做出了反思和分析，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行开来。这一重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势必会影响到乡村社会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具体是指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第二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下的经济基础，人民公社集中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乡村建设的改革势在必行。^[2]同时，新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从集体管理中释放出来，自由意识、私人行为被强烈地刺激生发，但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和有效约束，乡村社会出现了短暂的无序状态。集体财产被哄抢一空，公共设施荒废，生产队组织陷入瘫痪状态……换言之，“政社合一”制度在农村迅速失效，而新制度又未能及时补位，使农村政治权力和公共组织呈现出短暂的“真空”状态。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一些地方，如广西宜山、罗城两县的乡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恢复乡村社会秩序，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以协助基层政府维护乡村社会的治安。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功能被逐渐扩大。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原来的乡、镇、村体制。在县以下设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在乡下面按农民居住地区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改变的最大不同在于，国家权力收回到了乡镇一级，给了乡村更大的自主权和自决权，这就在乡村社会秩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激发了乡村社会的活

力。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并具体部署了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政社分开后，精简了管理机构，农村干部实行选举制和聘请制，干部大大精简，减轻了农民和国家的负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到1985年，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工作。1987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关系。新中国的农村管理体制再次发生重大变革，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有一定自治性质的乡政村治格局取代。站在历史的角度，这是中国乡村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3]

乡政村治治理结构是在改革转型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国家为了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政治制度缺位和滞后与乡村失序问题而形成的，也是为了适应经济制度的变化，对农村政治制度的重建。[4]纵观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自主性都是农村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尤其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以自主性为内涵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开始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逐渐凸显。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包括自然村落在内的基层社会，其自主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各方的利益诉求，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农民的积极性、社会的生产力再次被激活，农村社会迎来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生长发育阶段，民主选举、经济调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方

面工作开始恢复和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在党政关系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较多；在上下级关系上，权力还是过分集中，基层的自主权受到较多限制；在政企关系上，企业受政府监管过多.....[5]总而言之，在诸多乡村关系中，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多被领导关系取代，人治因素依然很强烈。与此同时，农村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农业结构调整缓慢，乡镇企业发展困难，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农村经济增长放缓，但是国家压力下的行政任务、税费收取在不断上升，乡镇行政人员数量也迅速膨胀，这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紧张，乡村治理出现某种程度的挑战。

因此，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与改革，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或者说建设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面临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乡政村治”体制的正式确立。这意味着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又将面临新的阶段，以“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为标志的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诸多制度的构建，为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事实上，针对乡、村数量扩张所带来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就开始主导撤并乡镇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进一步强化。这次改革以“明确职能，提高效率”为指导方针，以提高农村基层民主政权的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要旨。农村乡镇个数由1992年的48 250个减少到2006年的34 756个，村委会由1999年的737 429个减少到2006年的637 011个

[6]，乡镇政府职能与机构发生了大的转变和缩减。与此同时，自2000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开展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03年，税费改革开始在全国农村广泛推行。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在我国沿袭2000年之久的农业税得到了终结。这意味着国家减少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升级时代，乡村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乡村治理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转型时期。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7]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并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2006年，国家免征农业税，正式拉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帷幕。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8]

事实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现代化基本途径，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夯实民主政权之基的战略要务。国家对乡村治理由资源提取转变为资源输入，出台了如免除义务教育的学

杂费、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实施办法，通过技术性变革对基层民主政权建设进行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0年修订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党在乡村治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政村治”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乡政村治”体制所依据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形成，可以说是在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下，顺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为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做出的制度性构建。^[9]通过国家权力的下放，村民实行自治，重新确立了国家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也适应和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乡村社会内部的活力得到释放，乡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新型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提出和实施的背景下，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这种体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缺陷，急需健全与完善，如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干群关系疏远甚至发生冲突；农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事业建设滞后；传统价值体系加速衰落，乡村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缺乏……基层政权建设因此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与理论的文本性提出，要求在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

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能力与基层政权的建设密切相关，有效的基层政权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体制，对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现行“乡政村治”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合作治理体制，强化乡镇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充分调动村两委、乡村精英和广大村民等乡村主体更加主动、平等地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10\]](#)

二、土地政策的变化与村落

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具有重要作用。即使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的生存能力不断加强，人类依旧不能脱离土地而存在。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历来为国家和人民所重视。农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迁，基本是由人与土地的关系来决定的。土地政策的良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的好坏。因此，土地政策对农村乃至整个国家而言，都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农村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党和国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改革土地政策，农村也在这样的政策变迁中经历着转型与起伏。

面对人民公社体制弊病的扩大，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

大创伤，国家的党政、经济陷入一片低迷，社会急需新的思想与行动以重新获得发展前进的动力。于是，1978年5月，社会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民众思想逐步解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始发生。也是在这一年，在安徽的一个小村庄，18位农民秘密地聚集在一起，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变革发展的新序幕。（见插图3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旋律，经济方面的改革始于农村，核心就是土地政策。从安徽小岗村的个别案例到全国政策的发展实施，改革开放的土地政策经历了阶段性的推进与完善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内容继续强调和保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同时也指出社员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部分，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经营方式，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政策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包产到户，初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但仍“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5月，针对争议较大的“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11]。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在扎实有力地推进。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对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做了进一步的肯定。广大农村迅速对时局政策做出响应，到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已占97.8%，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达50%。^[12]

随着生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村落社会的内部活力被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经济大为好转。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年，《宪法》宣布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原来的乡镇体制。这意味着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基点带动农村改革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突破。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指出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政策的指引下，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发展，家庭承包经营进入稳定、完善阶段。

1984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了土地承包政策问题，指出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期限应在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同时指出，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这一年，出现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现象，这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表明农村经济并没有完全活起来，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所以，不得不调整 and 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1985年，中央在明确规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同时，提出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进一步充实了这一阶段土

地政策的内涵，使土地转包从理论走向实践。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做出的修正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就为土地转包奠定了现实的法律依据。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992年，中国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帷幕，中国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步发展。1993年，国家第一次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范畴，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为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13]这一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农村土地政策进入了新的法制化发展时期。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国家继续加强和完善对土地政策的改革。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14]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完善“三权分置”办法，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规

定。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从改革开放以来40年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政策并不能一劳永逸。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土地政策也在不断探索调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当农村土地政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适合社会发展需要时，农村的生产生活才能向前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才会提高。

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中占有主要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并通过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使得集体的优越性、个体的积极性以及资源的配置都得到了良好有效的发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有力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经济引入合作经济，将单一的集体经营体制改为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再加上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我国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为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15]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政策，不仅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整体面貌，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

必须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政策首先是对之前国家土地制度反思和突破的结果，它带来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不过，随着农村改革的持续深化，土地政策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又衍生出

诸多问题。比如，由于国家处于快速转型发展时期，政策缺乏一定的成熟性和系统性，因此土地政策在宏观方面多，而微观方面少，导致农村土地产权处于不明晰、不规范的状态。由此，又带来了与农村土地相关的权利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不明确，以及农民收益机制无法得到保障等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来，政府、企业、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在农村进行土地方面的博弈，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占。这就要求国家从照顾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积极探索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合理分配农村土地收益。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将土地经营自主权给了农民，但是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的经营模式，并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规模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阻碍了专业化、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农业生产。加上城镇化建设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农村耕地大量抛荒，土地产出效率低。因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土地的潜在价值，盘活土地资源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此外，目前还存在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国家明确规定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但是以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名目进行非农化产业等现象仍然存在，甚至还有租用大片土地套取国家政策资金的现象^[16]，最终受损的实际上还是农业和大多数农民。

诚然，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在整个国家改革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作为社会的重要场域必然会有政府、市场、企业、组织、农民等各类利益主体的涉足和影响。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农村土地改革所涉及的面向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社会分化加剧、受物质主义影响较大的时代环境里，如何做到利益分配公平、公正，如何对资源的发展、利用更长远有效等基础性、根本

性问题，都是对政策制定能力和执行效力的考验。总而言之，土地政策对整个国家而言，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村经济结构、政权建设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受到土地政策的深刻影响，农村土地改革任重而道远。

三、城市化发展与村落变迁

以农耕文明为标志的农业革命结束了人类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人类开始聚族而居，定点生活，于是产生了村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产生了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并缓慢发展。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飞越和转变，人类开启了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城市与村落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差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来看，城市相对村落而言都占绝对优势，城市在城乡关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对城市化发展与村落变迁的一个笼统性概括。对中国而言，现代化发展启动相对较晚，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至今，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城乡关系的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加速发展，村落受到巨大影响，城乡关系也越发复杂，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纷繁艰难的局面。

从战争和贫穷废墟上走出来的新中国，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期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成了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体制、城乡户籍制度等政策设计，逐步推动城镇化，城乡二元格局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后，城乡关系不断调整 and 变化，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

开启了以农村改革为先的经济体制变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城乡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1982—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创造了条件。^[17]同时，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农民“离土不离乡”，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国家的改革重心再次向城市转移。城市获得了国家政策支持，在资源配置等方面有一定倾斜，再次加速发展，城乡差距再次扩大。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经营模式由经营企业向经营土地和城市化项目转变，乡镇企业快速衰落，城乡关系变得越发复杂。^[18]加上农村“三提五统”的税负压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另外，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城乡呈现出诸多不平等待遇，社会资源的消耗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发展失衡严重。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到2003年，尽管国家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以农养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或者说，在工业化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乡差异化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党的十六大后，“三农”问题被放在了国家政策的重点位置。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支持乡村的思路调整。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一系列反哺优惠政策开始向农村输入。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2012年，党的十

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国家政策的发展走向来看，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当代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走向。国家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断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等都在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推进。

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城乡关系的定位和发展，这也是国家对历史积淀形成的现实差异进行的调和与补救。城镇化给农村带来的影响从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与解决。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城乡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有了解决的环境和条件。但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村的发展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助益，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需要得到关注。

改革开放后，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户规模经营的时代需求，农村的经济发展受到巨大限制。而城市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财政的各项福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聚集，城市化发展有了正向叠加的加速效应。城市化吸收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广大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定居，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不断优

化，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乡村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第一，城市化发展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大量中青年人口涌入城市，并大量的人选择留驻城镇。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50%，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农村则“空心化”严重。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无人照顾，农业生产也因缺乏劳动力而受到影响，农村的人力资本无法积累，导致农村丧失了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农村社会面临凋敝的危机。

第二，城市化发展使得城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由于农村生产经营分散落后，乡村基础设施欠发达，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林地等生产要素的定价权属于城市，农民无法平等地参与市场活动，城乡之间的市场机制一直处于分割状态，农村经济只能依赖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19\]](#)

第三，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差异化，直接导致了城乡就业渠道、财政转移支出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同，最终也使城乡差距扩大。[\[20\]](#)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城乡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事实上城乡分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利益主体的扩大将面临利益的再次分配问题，这意味着二者差距在实际上的迅速消除并不是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如此，迁移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都在城市，但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待遇，导致社会问题和矛盾频发。

第四，城市化发展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农村资源，而且对农村

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方面，城市在提升改善自身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大量的生产生活废弃物转移至农村进行处置，还有大量污染性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持续的污染，直接威胁到农村的生态安全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农村的物质消耗与浪费现象也变得严重，但是环境保护意识和个人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导致农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农村的资源、环境权利被外界及其自身忽视。事实上，受城市化发展影响的乡村变迁所产生的问题还有很多，乡村的生存空间在城市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狭小。需要强调的是，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不仅乡村的物理环境变得越来越人工化，乡村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也逐渐被人们抛却。传统的乡村文明不断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强势冲刷，进城的年轻人受现代化价值影响深刻而与传统印记逐渐失去了联系，乡村传统文明难以为继。

进而观之，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意味着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现代文明空间从传统文明空间中脱胎而出，因此，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牺牲农村来换取城市的发展，至少在当前的时空环境中，农村的生存与发展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最需要应对的是当前的各种危机，以及自身发展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综上所述，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改革，意味着农村政经分离，村落去集体化，村民掌握了生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村落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村”在法律上成为自治组织，接受乡镇的指导。村落作为自然村被纳入了国家划定的行政村之中。国家权力的收缩为村落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条件。21世纪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城市化、市场化力量开始全面渗透村落，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村落社会被迅速改变。村

落发展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郊型的村落转变为城市型社会，有些甚至完全融入了城市；二是边远地区的村落，其村民相继前往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务工，人口流动性加大，使“安土重迁”的传统被“离乡不离土”的社会现实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浓郁农耕文明特征的村落社会价值体系普遍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全面勃兴，依托土地和家族的村落共同体基本瓦解。尤其是近些年来，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民“洗脚上田”变为居民，传统社会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21]有学者甚至抛出了“村落终结”的概念来形容这一趋势。^[22]这期间，除了那些仍然贫困的村落，村落几乎都变得与传统无关，反而出现了“大拆大建”的现代性改造。^[23]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大拆大建”背后的逻辑是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根本性改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各界都越发重视对承载中华文明的传统村落的研究、保护和发展。

四、传统村落的研究与保护

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的中国，在20世纪初开启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具体面向的现代化历程。在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村落一直与现代性进行着碰撞和博弈，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政治、社会环境都已发生几重变革，然而村落却始终是历史变迁中的失落者，它支撑了现代化的发展建设，却被现代化抛弃。可以说，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村落社会历经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现代性局面以及结构性变革，并陷入不断衰退的历史性危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历史的新维度，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已经为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

心理条件。这意味着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村落所处环境的现代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现代城市文化对村落形成了全方位冲击和改造。这产生的影响就是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被动接受了根本性的改变和解构，传承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村落文化不断瓦解，村落衰败并走向没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此相反的是，我国的传统村落数量急剧下降。2008—2010年，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地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为9 707个，到2010年仅存5 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平均每天消亡1.6个。2014年6月12日—9月30日，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再次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跟踪式田野考察，对此区域原已纳入调研视野的5 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 033个进行回访调研。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在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的1 033个传统村落，在4年间又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幸存572个，消失比例为44.6%，平均每年递减11.1%。换言之，在此次调研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中，约每3天就有1个消亡。^[24]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整体上可能远快于上述数据。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村落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标，承载着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我国宝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5]传统村落面临的消亡状况，突出反映了村落及其文化所处的危险境地，但这还只是当前村落整体危机状况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村落

数量以惊人的速度下降：1986—2011年，行政村的数量减少258 020个，自然村的数量减少3 380 500个。^[26]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实施的征地拆迁和撤村并点行为，是导致村落急速消失、消亡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村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因素，使村民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大迁移，村落人口的单向流失使得村落空间缺乏生机并不断萎缩，村落慢慢陷入无人来顾的境地。如此，从民宅宗祠的建筑形式到传统民俗习惯的生活表达等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随着村落这一文化空间的凋敝而消失，传统文化失去了村落空间的基本生长环境，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时至今日，村落面临的危机在本质意义上是村落传统文化被现代化彻底消灭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将要被切断的危机，村落及其传统文化一旦走向衰亡，中华民族将面临不可挽救的深重危机。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村落的政治、经济崩溃破产，农民全面贫困的状况不同，改革开放后村落危机的总体状况是原有的文化空间渐渐衰落，传统的文化被新的文化元素革替，文化冲突与断裂造成社会价值认同缺失等，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场域日渐式微，而现代意义上的村落文化体系尚未构建。

面对这种现状，自20世纪末开始，冯骥才、乌丙安等专家学者不断为保护传统村落呼吁、进言，积极探索有效保护传统村落的途径。笔者和笔者所创建的中国村落文化中心不仅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村落的田野考察和相关数据采集，还打造了创新研究平台，集合高校多学科资源优势，展开对村落文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培养专门人才的博士点、硕士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进行宣传 and 论证。同时，对村落的保护离不

开乡贤的参与。他们视野开阔，掌握较丰厚的相关资源，积极参与家乡建设。村民有“觉”有“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方兴未艾。在当下不少传统村落，村民已经意识到传统村落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与家族、民族有关的国家历史文化财产。如河南崤山山区的渑池县赵沟村先后获得“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住民的文化觉悟和文化自信。[\[27\]](#)

我国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是起步较晚的。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涉及保护历史文化村镇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理念，最先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保护实施，具体做法包括：“（1）保护环境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2）保护村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3）树立村寨居民的主人意识；（4）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迎接自己的明天。”[\[28\]](#)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镇）”，这是从保护文物角度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村镇进行保护。之后，每两年评选一次，至今已评选7批，评出名镇312个，名村487个。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遵循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原则，对传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以及与传统村落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风景的保护起到了深刻、广泛的作用，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有所欠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既应包括对村落有形的、物质的、固态的文化的保护，例如民居、公共建筑、道路、水系、山丘等，也应包括对无形的、精神的、活态文化部分的保护，例如村落中原住民所创造的礼仪习俗、乡规民约、手工技艺、口头传说、生产贸易、教育、节日、娱乐等。[\[29\]](#)

真正意义上从国家层面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保护，始于2012年国家将其列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之后。2012年12月1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传统村落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刻不容缓。”同年4月，由国家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并于12月17日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包括646个传统村落，至今评选5批，共6 79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这些年来积极保护，成绩显然是很大的。宏观上我们可以看两组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国家分5批将6 799个传统村落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且，已经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四级联动保护体系；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也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广泛关注、重视、参与，“乡愁”之风，席卷全国城乡。第二个数据来自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库。自2008年至今，我们连续4次对我国传统村落分布相对集中的“（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南地区的22个省（自治区）的207个县，进行跟踪式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发现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由2010年前的每年递减7.3%，下降到了2017年的1.4%。具体来说，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通过传统村落这一载体获得了最

鲜活的呈现。在今天的传统村落中，传统文化已然开始“见人见物见生活”。不仅汉族传统村落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和精神信仰已经重新绽放，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畲族等民族传统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以自己民族的独特形式，向世人展示着它的多姿多彩与美好的生命张力。（见插图35）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鲜活。

二是遍布中华大地的传统民居建筑得到了最广泛有效的保护。从湘中的府第式庄园、湘西与黔东南的苗侗干栏式吊脚楼到福建的客家土楼，从黄山与婺源的徽派民居到江浙的八卦村，从青藏高原的藏式建筑到广东开平的碉楼……或连绵于滨河曲水之畔，或若隐若现于崇山峻岭之间。一座座古宅庭院，如尊者端坐静处，尽显昔日望族的尊贵雍容；飞扬的檐角，有如女子曼舞云端，翩飞于长空苍穹，独具优雅飘逸的别样风致。这些古老的建筑，既是中华先民肉身栖居之所、子嗣繁衍传承之地，也是今天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堪称世界上文化内涵最丰富、形态形式最多样、空间规模最大、最具活态的建筑博物馆。（见插图36）我们抚栏凭楼间，分明可以触摸到祖先的智慧。与之对晤，犹可听见传统建筑文化历久不绝的吟唱。

三是村落生态文明基因得到了活态传承。传统村落中的生态文明基因，包括内生性的文化生态和外在可见的自然生态两个方面。前者以和平、包容、中庸和多样化的姿态，既普遍渗透于村落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在不断孕育和滋养着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后者则在充斥着钢筋水泥土的当下，以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巧妙利用自然的生态智慧，向世人展示着田园风光和怡人山水的诗意栖居生活，让人领悟“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成为全中国人“乡愁”的寄托之地。

四是传统村落的内在“文化资源”正在向“文化资本”和“文化红利”二次转化。数据显示，在已经列入国家保护的“中国传统村落”中，约有37%的传统村落成了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的热点。湖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西藏、新疆等地的传统村落，以因地制宜的独特保护与发展方式，使其富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质的村落文化融入了当地的旅游产业。传统村落的原住民因此获得文化红利，脱贫致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大的市场观念、经济思维的影响下，各种“生产性保护”“保护性开发”对村落文化的抢救与保护模式被迅速复制推广，走向了一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复兴之路。^[30]伴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很多传统村落的开发建设开始走向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一些拥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村落被清一色的商业街入侵，原本宁静自然的村落，成了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闹市。同时，随着经济物质条件的提升，诸多拥有古色古香以及传统建筑的村落不断涌现出具有现代建筑风格的钢筋水泥建筑，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挤在一个空间显得极不协调，严重破坏了村落的文化特质。^[31]还有的村落在开发过程中，为了招揽游客，增加文化旅游的体验感，巧立名目、移花接木，通过随意抽取、嫁接或挪移的方式“丰富”当地传统文化。结果很多传统民俗与地方信仰在商业资本的包装下，求商业活动的效益，走文化形式的过场，完全沦为商业表演，丧失了民间文化的原始内涵与精神，使其被娱乐化、商业化、功利化的世俗元素取代。当这些有形的、无形的传统文化触碰现代化时，就容易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失真乃至破坏。原本应当使现代化文明给村落注入生发的活力与动力，可结果往往是现代化要素对村落的占领与革替。村落文化只能变成与人们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即使村落还在，也改变了原来的面目和内涵，无法使人感受到具有历史厚重感与原

始生命力的村落文化。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性对整个社会的不断渗透，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工具理性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村落中，人们不事生产，贪图享乐，将勤俭克己、向上进取的生活良旨抛诸脑后。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村落得到推崇，虚荣攀比之心、骄傲浮躁之风盛起，纯良朴实、谦恭信义、善睦邻里等传统美德不再是村民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冲突导致了村落精神世界的荒芜，村落社会形成的伦理价值散落一地，是非善恶的判断除了法律守护的底线，已经很难达成人心的共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能将传统封闭的村落与多元丰富的宽广世界进行对接，村落真正要面对的是整个现代化的世界。年轻人被个性化、时尚化、自由、平等的现代概念吸引，对长幼之序、宗族之亲、群体之合等传统却不能真切领悟；对他们而言，空调与商场远胜于晚风与田野。村落与传统在年轻人的物理和精神的双重世界中失势，就是所谓的文化断裂。文化断裂带来的后果是，年轻人即使回到村落，带来的也是与村落没有太多关联的时尚都市理念。人们一旦丢掉对传统文化的持守与仰望，社会也就失去了传承与发展的基石。

事实上，在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乡绅、乡贤是根植于乡村的重要力量。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贤，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这些人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友善睦邻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和作为，他们能够增强当地人的认同感、增强地方社会凝聚力，对社会的稳定和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2]然而，自晚清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打破，乡村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城市取代，乡村社会精英开始向城市转移并分化。随着现代化体系的不断丰富扩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民工潮”，

使得乡村人力资源再次严重流失，乡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突出，乡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现代化局面。因此，乡绅、乡贤文化在近现代历经了一个不断式微的过程。面对上述情势，“新乡贤”概念的提出，为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符合现实之需的新路径。当代新乡贤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威望，并且愿意造福乡民的人士。他们与传统的乡贤一样，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影响力上具有一般乡民所没有的优势，是保证乡村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33]诚然，新乡贤面对的时空环境已经与旧乡贤面对的传统社会有迥然之别，因此新乡贤要想发挥好重建乡村文明的作用，需要重新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要素，这需要国家、社会、民众各方主体合力为之。在这个意义上，新乡贤与现代化体系下新乡村的建设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近些年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也暴露出一些“硬伤”。最突出的是，在理念上，重保护轻发展，为保护而保护；在实践中，没有认识到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本质上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只重视对传统村落文化中有形的传统建筑的保护，而轻视甚至完全忽略包括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内的各种无形文化，或称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这种非物质文化与传统村落休戚与共、相生互济并已结成命运共同体，形成了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传统村落的保护，被粗暴地简化为标本式的传统建筑保护，而不是被当作鲜活的文化来保护；有些地方甚至衍生出把传统村落当作摇钱树的情况，不但没有很好地形成保护链，反倒出现了利益链，重眼前、轻长远，为开发而开发。因此，校正保护理念，调整保护手段，已经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对中国传统村落要实施整体保护，即要把传统村落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

包括原住民创造的生产生活方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筑与人文及周边的自然环境，实行整体的、活态的保护，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村落的有序、可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世界历史来到了人类文明新的发展交汇点时，中国需要新的历史环境中把握自身的国家命运和文化地位，因此，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村落不仅面临现代化的冲击，而且面临更宏观的历史时空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村落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环境中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更要担负起传承与发展代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几千年优秀文化的历史性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贡献核心的文化力量。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有认识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责任的主动担当。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了华夏土地数千年的人类智慧实践和财富遗存，是中华璀璨文明的根本创造力，亦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最基础的载体。因此，对村落以及传统文化具有根源性、正确性的主体认识，才能端正对文化的感知和对世界的认识。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程，其本身亦将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化必然要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挑战与最终的融合，这是现代性对传统的继承性扬弃，而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这是当下应对危机所必需的总体性认识。

毋庸置疑，这需要在社会心理和国家治理层面拥有广泛的文化自信。中国现代化的开启，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暴力示范，以及技不如人的现实状况。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一直扮演着一个追赶者的角色。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分崩离析，丧失了主体性的地位和能力。文

文化自信要求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群体、组织、个人拾起本民族特有的历经历史考验的精神和智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能做到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与赞同，并以之为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孕育出更伟大的历史创举。这伟大的历史创举，就是真正做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在对自身文化价值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的基础上，以更高的价值标准和实际能力要求文化主体，这是对文化传承和发展提出的更高使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现代化社会迅速发展，世界变化异常之快，要在这样的发展潮流中把握自身定位，为人类发展提供方向，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之志和必然之举。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加快传统文化的升级转型，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注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实现具有奉献意识和能力的文化自信。总之，当前中国村落的危机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只有从根本上做出总体性、战略性的认识和规划并付诸实践，村落和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困境才能够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对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此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飞速变迁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与现代化发展这一人类文明背景相适应，同时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乡村社会从未像改革开放以后这样，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发展贡献着巨大的力量，却又在最大程度上被时代和环境排斥、抛却。乡村社会在新时代的洪流下进入了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无论是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工业技术还是现代理念等，都能对其产生强势影响。中国乡村看似进入了一个百年来最好的建设发展时机，同时却也走到了最为脆弱、最为危险的境地。“乡政村治”格局需要向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进

程艰难迈进；乡村土地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分配和生产升级；城市化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与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瓦解；乡村作为国家现代化产生与发展的母体，却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乡村社会必须在现代与传统的巨大张力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点。这要求我们立足于更宏观的文化基点，以文化自觉来认识传统村落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文化自信来肯定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要义，以文化自强来发展有益于世界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国的村落是文化的村落，文化的村落成就文化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村落、文化、中国三者之间，将长久地共通、共融与共存。

[1] 甘信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前沿》2008年第10期。

[2] 江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7期。

[3] 于建嵘：《新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4] 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5] 江燕：《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路径和基本经验》，《长白学刊》2009年第5期。

[6] 蔺波：《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6—47页。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第1版。

[8]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0日，第1版。

[9]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2页。

[10] 朱余斌：《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02页。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12] 姜爱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13] 牛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刊第2期。

[14] 甘见东：《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若干思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5] 甘见东：《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若干思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6] 时慧娜：《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与问题浅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21期。

[17] 李源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观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13期。

[18] 李源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观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13期。

[19] 马婧：《城乡关系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知识经济》2016年第1期。

[20] 高惠芳：《“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考》，《社科纵横》2008年第3期。

[21] 周大鸣：《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22]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有关于此，笔者也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由于村落大拆大建的现代性改善，传统村落仍处在“破坏期”，至今也没有进入所谓“复苏期”。

[24] 胡彬彬、吴灿、李红等：《“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光明日报》2015年4月2日，第7版。

[25] 胡彬彬、吴灿：《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5页。

[26] 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27] 胡彬彬、吴灿、李红等：《“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光明日报》2015年4月2日，第7版。

[28] 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2期。

[29] 胡彬彬、吴灿：《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6页。

[30] 隗在廷：《现代性视域下乡村文化的变迁、困境与选择》，《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7年12月。

[31] 胡彬彬、李向军、王晓波主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32] 胡彬彬：《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11版。

[33] 胡彬彬：《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贵州日报》2016年11月11日，第9版。

附录

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

胡彬彬

本文为我国首篇关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论文章，原载于2012年1月1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

作为拥有7 000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度，我国各地遍布着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古村落。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大量地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宝贵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有效保护、深入研究幸存于世的形式与类型丰富、地域与民族特色突出、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厚重的古村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着手对我国“江河流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广大地域的传统村（镇）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开展田野调查。特别是2009—2010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中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

25~30天的综合性复查。“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古村落的生态状况堪忧。这些地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 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 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究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其一，国家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制约下的原住民自主自建性破坏。盖新房、住楼房，是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一栋栋新楼凸现于一座座传统古村落中，往往极不协调，严重破坏了传统村落的民族建筑文化艺术氛围。这一情形的出现，当然跟传统村落中原住民自身的文化素养、生活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有很大关系，但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当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现行的“旧房宅基地不拆，新房地基不批”的土地与房屋权属政策，迫使古村落原住民在原址上拆旧建新。

其二，政策误读误解与急功近利的政绩建树意愿下的建设性破坏。这类情形是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对一些政策内在实质与目标的理解领悟上，出现了误读误解，认为“掀翻石板路，修起水泥路，拆了木头青砖老院子，盖起钢筋红砖洋房子”，就是农村的发展之路。一些地方，在政府的直接强力干预下，掀起了大拆大建热潮，造成大量富有优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毁灭。

其三，商业模式下的过度旅游开发性破坏。以地方政府为引领、在商业模式运作下的过度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的破坏在我国最为常见。由于商业机制的进入，许多古建筑按照开发商的商业意愿，被随意改造和拆毁，其破坏性是难以估量的。

其四，法律法规缺位、保护标准缺失、保护经费缺乏下的保护性破坏。我国绝大多数遗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建筑及其文化遗产

与形态，一方面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另一方面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文物保护法》不能，也不宜将其全部涵盖而纳入保护范畴之内。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法规可依。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其局限性非常明显，难以从本质意义上保护传统村落，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范畴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保护法律缺位性损毁。

其五，其他社会性原因与自然灾害性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传统村落成了“空心村”“老人村”，传统村落在加速颓废。此外，频繁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洪灾、火灾，对传统村落建筑的破坏也不在少数。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抢救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内涵与形态已迫在眉睫，并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迅速组织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村落遗存”专项普查工作。可制定《中国传统村落遗存调查表》、《中国优秀传统村落推荐表》或《受保护传统村落推荐表》等摸底表格，由基层村、乡（镇）填写，向县、市、省、国家逐级汇总呈报，摸清我们传统村落的分布与数量家底，掌握遗存状况，以利制定保护法规政策与措施。

第二，鉴于我国现有和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不能完全涵盖和适应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建议由国务院主持，国家建设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局参与，尽快制定出一部适用于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专门性法规，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执行。或由国务院制定出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条例》，将

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第三，尽快由国家制定和出台中国传统村落的界定标准。在全国传统村落专项普查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调研，制定受国家法律或条例保护的传统村落的建筑年代下限标准、民族文化形态标准、社会形态标准等，并参照我国文物保护经验，分别建立起国家级、省级、县（市）级三级标准和三级保护模式。

第四，鉴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与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的矛盾，建议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积极开展农村土地资源政策、农村民居产权转换方面的探索，适当放宽或者允许集体、个人购买受保护传统村落建筑，鼓励“村有人居、以人护村”，进而及时调整、修正我国现行土地法规中与保护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不相适应的部分，适当调整农村现行民居新建土地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村落原住民因新建住房、拆旧建新而造成整个传统村落被破坏的问题，以化解受保护传统村落与农民、新建民居需求间的矛盾。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出台传统村落商业旅游开发行政审批制度，建立起有关传统村落作为商业旅游开发项目的综合评估标准体系，严格禁止因商业旅游开发需要而破坏传统村落原有的生态、景观、环境、规划与建筑。要明确在旅游开发中，哪些传统村落文化是可以向游客展示的，哪些是不可以展示的，逐步引导消费型旅游向保护型旅游方向发展。

第六，目前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工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资金的短缺。建议国家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经验，积极探索建立适合于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资金投入机制。

第七，打破行业垄断，调整现行文物古建筑维修资质资格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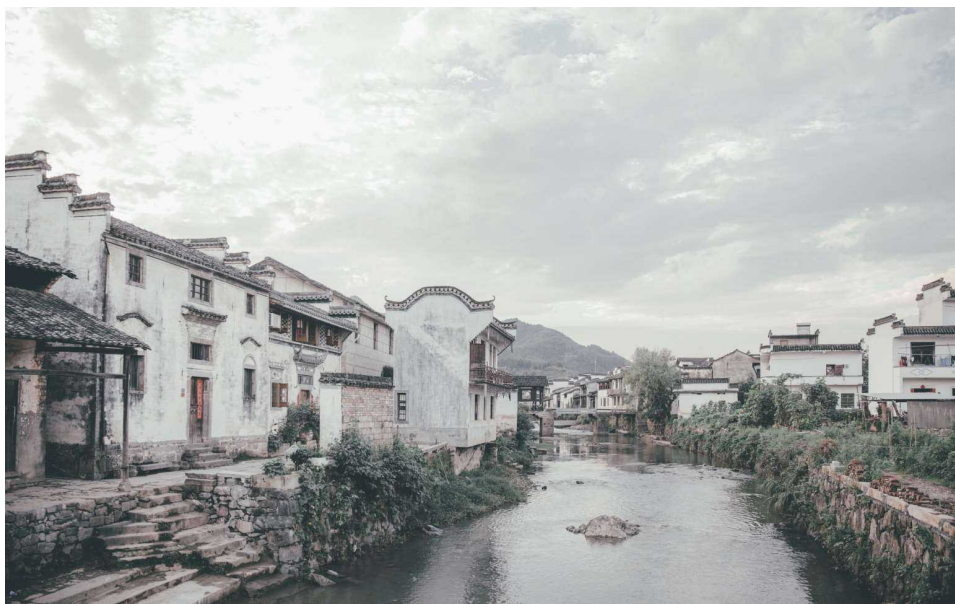
入制度。对建于乡土、传承于乡土、遗存于乡土的传统村落建筑的维修保护，要充分利用传统民间建筑营造的维修工艺与技术力量，制定适用于地方传统村落维修的工艺技术标准与维修质量控制体制，解决受保护传统村落原住民“看着房子烂，没有资质不准修、没有资格不能修”的难题。

第八，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鼓励国民参与保护。各级地方政府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地域文化历史教育培训，增加其保护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把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使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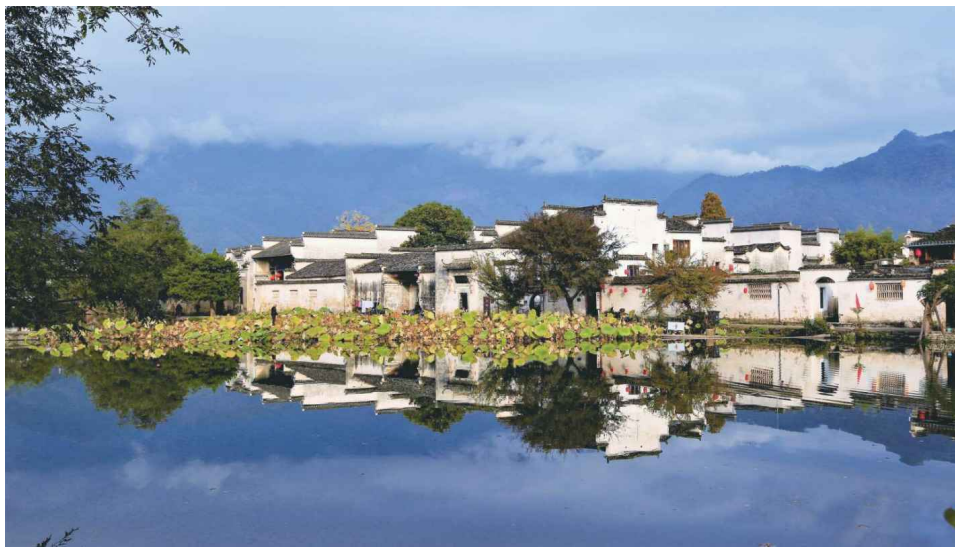
第九，积极、全面、系统、深入开展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学术研究，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有效保护提供理论支持。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大多数停留在对于某一具体个案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也多囿于建筑学范畴，而缺乏对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视角的整体研究。建议国家在社科研究中，设置相当数量的一般、重点、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并充分整合、利用国内相关学科以及边缘交叉学科的科研资源与力量，开拓我国文化遗产研究新领域，尽快推出一批优秀成果，为传统村落优秀文化研究和保护提供经验。



安徽黄山呈坎村的初夏



安徽黄山呈坎村的流水人家



安徽黄山宏村



安徽黟县屏山村敦仁堂



福建永定土楼



贵州从江县岜沙苗寨



贵州从江县加榜村



贵州锦屏县隆里古镇何氏宗祠



贵州东南地区苗族传统建筑



湖南怀化皇都村风雨桥



湖南临武县汾市乡南福村碉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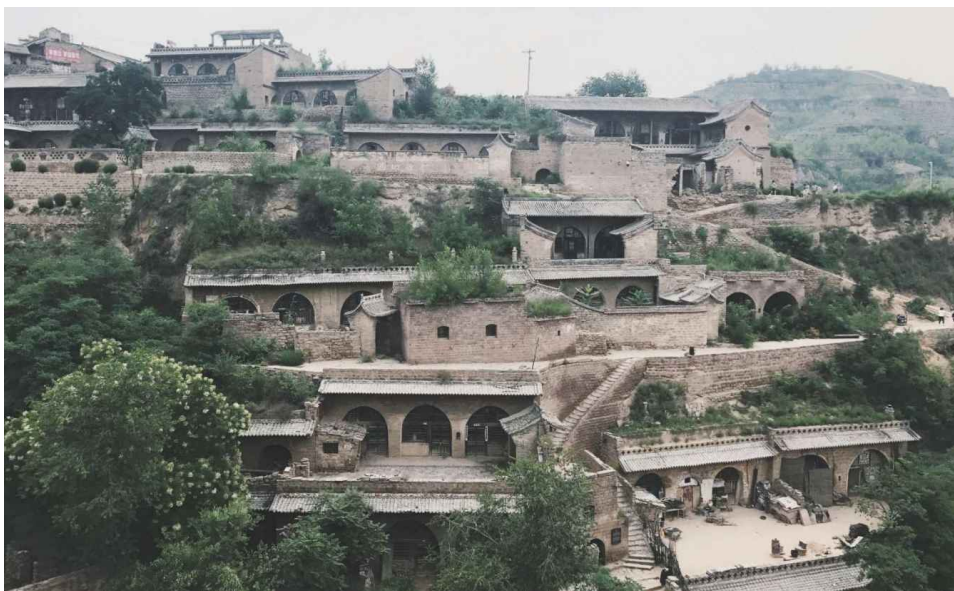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田野考察中于湖南省江永县勾蓝瑶寨水龙祠发现明代壁画



湖南汝城县马桥乡外沙村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村鼓楼



山西临县李家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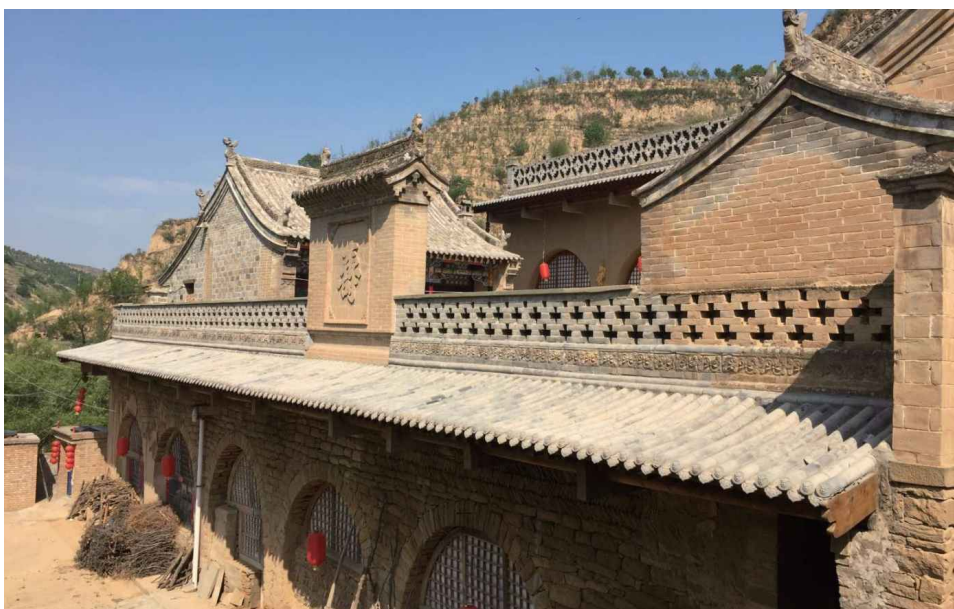
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僧房



四川色达藏族传统民居



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平丰村民居



陕西绥德县东贺家石村民居



云南元阳县箐口村石头房



云南大理喜洲白族村落



2017年，胡彬彬教授在湖南桂阳县下桥村考察唐氏宗祠



2012年，胡彬彬教授在滇西考察

图片来源

插图1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藏。

插图2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见<http://www.hljmuseum.com/system/201510/101942.html>。

插图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见<https://minghuaji.dpm.org.cn/paint/appreciate?id=b0a15b3767a5c12089ec45563741112b>。

插图4 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见<https://art.nelson-atkins.org/objects/641/a-solitary-temple-amid-clearing-peaks?ctx=0de1933d-2e9d-4883-a490-d391a43842e7&idx=0>。

插图5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见<https://minghuaji.dpm.org.cn/paint/appreciate?id=592d80e225aac624977fee2e19452c1f>。

插图6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插图7 《大清天下京都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乾隆五年刻本）。

插图8 作者自摄。

插图9 作者自摄。

插图10 作者自摄。

插图11 作者自摄。

插图12 作者自摄。

插图13 作者自摄。

插图14 作者自摄。

插图15 作者自绘。

插图16 作者自绘。

插图17 作者自绘。

插图18 作者自绘。

插图19 作者自摄。

插图20 作者自摄。

插图21 作者自摄。

插图22 作者自摄。

插图2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见http://www.chnmuseum.cn/zp/zpml/201812/t20181218_23973.shtml。

插图24 多伦多大学托马斯·费舍尔珍本图书馆。

插图25 R.M.C. Ruxton藏。

插图26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藏。

插图2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

插图2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

插图29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插图3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

插图3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

插图32 解放战争纪念馆藏。

插图3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插图3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插图35 作者自摄。

插图36 作者自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村落史 / 胡彬彬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217-3341-9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村落文化 - 文化史 - 中国 IV. ①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34111号

中国村落史

著者：胡彬彬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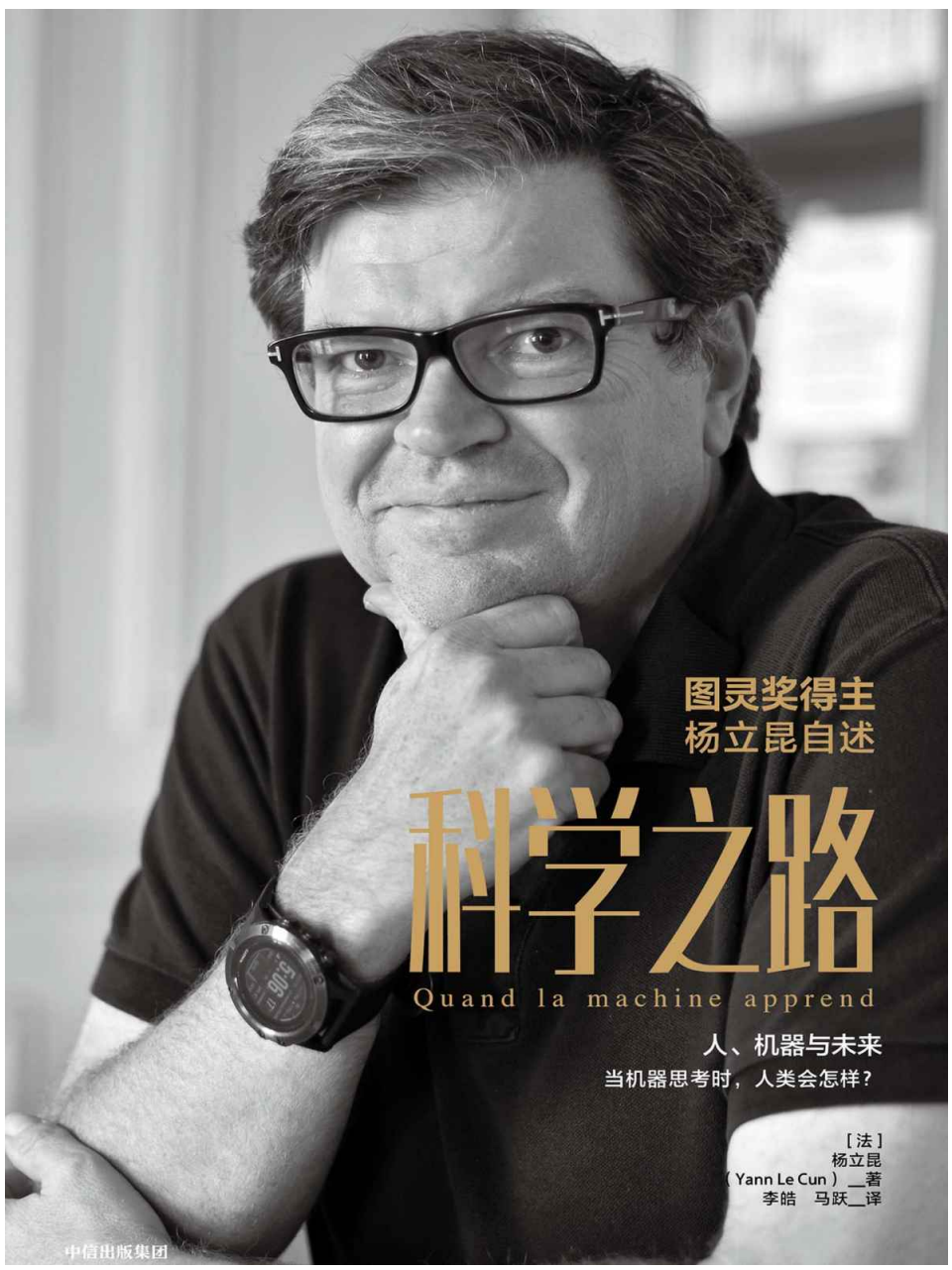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018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5217-3341-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Yann Le Cun, a middle-aged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 resting his chin on his hand. He is wearing a dark polo shirt and a watch on his left wrist. The background is softly blurred, show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bookshelf.

图灵奖得主
杨立昆自述

科学之路

Quand la machine apprend

人、机器与未来
当机器思考时，人类会怎样？

〔法〕
杨立昆
(Yann Le Cun) 著
李皓 马跃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科学之路

——人、机器与未来

[法]杨立昆 著

李皓 马跃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本书赞誉

人工智能的崛起时刻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提升概率
在无人区创新
从科学思考到科学思维
以批判性思维持续学习
杨立昆的科学之路
让历史告诉未来
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

中文版自序 科研的魅力

前言 我的科学之路

第一章 人工智能呼啸而来

- 1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 2 人工智能艺术家
- 3 索菲亚：类人生物还是虚张声势
- 4 飞速迭代的人工智能
- 5 让机器学会学习
- 6 技术混搭
- 7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人工智能
- 8 人工智能的未来

9 算法的广阔天空

第二章 人工智能和我的学术生涯

- 1 永恒的追求：让机器拥有智能
- 2 传统智能难以复制
- 3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战争”
- 4 神经流派的崛起
- 5 遭遇寒冬
- 6 狂热的疯子
- 7 被兴趣激发的人
- 8 卓有成效的阅读
- 9 我的偶像
- 10 “你认识一个叫杨立昆的人吗？”
- 11 梯度反向传播的运用
- 12 神圣之地
- 13 贝尔实验室的岁月
- 14 职业与信念
- 15 深度学习的阴谋
- 16 卷积网络的春天

第三章 机器的初级训练

- 1 从海兔得到的启发
- 2 监督学习
- 3 随机近似
- 4 数学家的题外话
- 5 伽利略和比萨斜塔
- 6 图像识别

- 7 感知器的创新
- 8 25像素的网格
- 9 区分字母C和D
- 10 泛化原理
- 11 感知器的局限性
- 12 特征提取器

第四章 机器学习的方法

- 1 成本函数
- 2 找到谷底
- 3 实践中的梯度下降
- 4 随机梯度
- 5 多个谷底的困扰
- 6 机器学习的原理
- 7 模型的选择
- 8 奶牛和三名科学家
- 9 奥卡姆剃刀原理
- 10 机器训练方案
- 11 最佳折中方案
- 12 人类的教训

第五章 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 1 贡献度分配
- 2 连续神经元
- 3 我的分层学习机
- 4 赛跑
- 5 数学的美妙之处

6 多层结构的益处

7 打破异议

8 多层网络的魅力

第六章 人工智能的支柱

1 2012年的重磅炸弹

2 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

3 有远见的东京科学家

4 科学界方法之争

5 卷积网络全貌

第七章 深度学习的应用

1 图像辨识

2 内容嵌入和相似度测量

3 语音识别

4 语音克隆

5 语言的理解和翻译

6 智能预测

7 人工智能与科学

8 自动驾驶汽车

9 大型应用程序的架构：虚拟助手

10 医学影像与医学

11 从传统搜索算法到强化学习

第八章 我在脸书的岁月

1 与脸书结缘

2 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3 科学的突破与产品的开发

- 4 用技术实现信息过滤
- 5 技术、平台与媒体
- 6 对带标签数据的渴求
- 7 图灵奖与我的新身份

第九章 前景与挑战

- 1 探究智能和学习的基础
- 2 机器学习的局限性
- 3 强化学习的局限性
- 4 有待开发的学习新范式
- 5 有限的预测能力
- 6 人是如何学习的
- 7 如何训练预测系统
- 8 多重预测和潜在变量
- 9 赋予机器预测能力
- 10 系统智能接近人类智能任重而道远
- 11 集成电路创新的爆炸式增长
- 12 人工智能的未来

第十章 隐忧与未来

- 1 人工智能将改变社会和经济
- 2 人工智能创新的生态系统
- 3 谁将从革命中受益
- 4 军事失控的风险
- 5 危险警报：人工智能的滥用
- 6 如何解释人工智能
- 7 理解人类智能

- 8 大脑只是一部机器吗
- 9 所有模型都是错的
- 10 担忧的声音
- 11 人工智能并不万能
- 12 大脑的学习机制
- 13 机器能否产生意识
- 14 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 15 机器会有情感吗
- 16 机器人想要获得权力吗
- 17 价值观的统一
- 18 新的疆界
- 19 智力科学

结语

术语表

致谢

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是进步的动力。

——杨立昆

本书赞誉

人工智能的崛起时刻

特伦斯·谢诺夫斯基

美国四大国家学院（国家科学院、国家医学院、国家工程院、国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深度学习》作者

本书讲述的是人工智能（AI）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刻发生的故事。

在21世纪机器学习成为现实之后，人工智能也迎来了自己的关键时刻。在机器学习快速扩张的能力背后是活跃的研究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杨立昆是举足轻重的先行者。这一突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神经网络革命。我第一次见到杨立昆是在法国东北部小镇莱苏什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那时候他还是学生，而他当时研究的内容后来演变成反向传播算法。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和我此前在统计力学中得到灵感，向有隐藏单元的网络引入了玻尔兹曼机器学习算法。当时，神经网络还是新兴领域，物理学、心理学和工程学的领军人物鲜有涉足，也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机器学习有一天会对世界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但杨立昆已经把实现这个目标当成了毕生的事业。

后来杨立昆成为杰弗里·辛顿的博士研究生，再后来进了贝尔实验室当上了研究员，在此过程中，他一直在为这一目标不懈努力。他构想了一种神经网络架构，可以识别图像中的物体，这就是LeNet。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LeNet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性能不断提高。当时，关于计算机视觉的研究基本上都在强调几何特性，每添加一个对象都意味着要手动加入新的几何特

征，这样才能将新对象与所有已有对象区别开来，而且需要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大量人工操作才能做到，因此进展缓慢。而在神经网络中，将不同对象区分开的特征可以从足够大的图像数据集里学习到。互联网提供了大量图片，计算机内存的增长速度也比处理能力的增长更快。杨立昆还有另一个有利因素，那就是他的架构很容易就能分布到多个并行工作的处理器上。

GPU（图形处理器）实际上可以有效模拟神经网络，这样能让计算能力提高上百倍，并让训练多达十余层的多层网络成为可能。杨立昆继续改进自己的神经网络架构，到最后形成了卷积神经网络（CNN）。尽管他的表现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但他的论文还是被计算机视觉领域最重要的大会——CVPR（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拒绝了。

我还记得全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杨立昆的工作的。那是2013年在美国塔霍湖边举办的NIPS（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2018年已更名为NeurIPS）上，在识别当时最大的图像数据库“图像网”上的22000种不同对象的1500万张图片时，卷积神经网络将差错率降低了18%，杰弗里·辛顿撰文介绍了这一成绩。此前差错率在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缓慢下降，因此这个成绩相当于整个计算机视觉领域20年的研究成果。从那以后，神经网络架构层级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复杂，而计算机视觉以此为基础取得了长足进步。

就在那一年的NeurIPS上，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演讲中宣布，杨立昆将成为FAIR（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的创始负责人，这是脸书为追赶谷歌而迅速成立的新部门，而谷歌那边雇用的是杰弗里·辛顿。杨立昆作为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来说聪明绝顶、成就卓著，但管理大型的人工智能团队仍然是一份艰巨的工作，也需要有管理才能（跟做科研工

作完全不同)。随后杨立昆组建了强大的团队，对脸书的业务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天晚上在脸书赞助的一个招待会上，有人为我引见了扎克伯格。听说是我在负责NeurIPS，他并不怎么吃惊，但在告诉他我也是神经科学家之后，他问了我好多问题。很明显，他读过很多文献，问题也都切中要害。他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心智理论，这是我刚刚组织的一个专题研讨会的主题，主要讨论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内部模型。他让我推荐给他一份阅读清单。这个领域在心理学中尚处起步阶段，扎克伯格对这个领域这么有兴趣让我很惊讶，后来经过杨立昆解释我才恍然大悟。杨立昆说，在世界上所有公司中，脸书拥有的个人数据最多，用户也最多，有了人工智能，脸书就能为每个人的心智活动创建一个理论，做到甚至比这些人自己都更了解他们。

卷积神经网络的架构受到了灵长类动物大脑中视觉皮层的启发。视觉皮层中有多个分成不同层级的视觉区域，专门用来处理不同的视觉特征。在应对新环境方面，大脑比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要灵活得多，能力也要强得多。但现在，卷积神经网络在帮助我们了解大脑是怎么看见的，又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方面，带来了良性循环。我们发现的大脑工作机制越来越多，这一反馈也增强了人工智能的能力，而如果只是以符号、逻辑和规则为基础的传统人工智能，就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20世纪研究人工智能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学习有多强大，不知道这是生物系统的核心要素，因此这就成为21世纪驱动人工智能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以大脑级别的大规模并行架构为基础的算法比以逻辑规则为基础的算法要好得多，后者会出现组合爆炸。最后一点是，大规模网络模型中活动向量的表征能力和语义内涵都比符号要强得多。这么多计算方面的优势同时具备，极为少见。

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它是信息时代的开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就好比莱特兄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航空业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不断创新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相信人工智能领域也会如此。今天的喷气式飞机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出行能力，而人工智能也将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并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说过：“我无法创造出来的东西，我就理解不了。”机器能思考吗？机器会有意识吗？如果我们创造出了能学会思考的机器、能产生自我意识的机器，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问题的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杨立昆的这部著作，给我们讲述的就是人工智能在我们面前崛起的时刻，也是这个绝无仅有、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发生的故事。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提升概率

张宏江

智源研究院理事长

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常胜秘诀，“我并非根据棋局结果考虑如何调整落子，而是从系统角度，思索怎样改进自己思考的方式”。作为将人工智能带入崭新时代的先锋，杨立昆在《科学之路》中，详细记录了他对人工智能过去和未来的探索与思考；而同样重要的是，他深刻剖析了关于如何做出推进人类社会大幅向前发展的研究背后的系统与规律。

历史上多数研究成果的出现是偶然事件，没人能规划出来，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提升概率——汇聚优秀的研究人员，为他们提供能够碰撞思想、发现问题、寻找协作伙伴的社区环境，对这些“人”而非“项目”进行资助，让他们能站在未来思考重要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结果就会显现。

青年时代杨立昆在欧洲的研究之路，就像一次孤立无援的远征。他的本科专业是电气工程，导师对他关注的话题几乎一无所知。毕业后，他只能在法国的一个小实验室继续研究，同样由一位“外行”教授指导，但他还是获得了研究需要的资源。指导教授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你看上去是一个很聪明勤奋的人，所以我会签署这些文件。”

转折发生在1985年春天，在阿尔卑斯山麓举办的研讨会

上，杨立昆遇见了贝尔实验室新成立的神经网络研究小组，三年后，被该小组聘用并移居美国。他还遇见了特伦斯·谢诺夫斯基，并通过他与杰弗里·辛顿结缘。这次会议将一小群研究人员集结在一起，他们将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创建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做非渐进性的研究，需要将研究人员“置于未来”。在计算机领域，方法之一是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让研究人员可以用简便的方式、无须经过特殊优化的手段来重复尝试和探索，还能让他们在尝试新想法时，避开“过于实用”的陷阱。就如杨立昆提到，在贝尔实验室，曾有人告诉他“靠节省开支是无法混出名堂的”。刚到实验室，他就独自拥有一台Sun 4计算机；而此前在多伦多，同样一台计算机则由40个人共用。在贝尔实验室，做数字识别研究，他可以使用美国邮政近万张真实手写图像；作为对比，之前他只能利用一个很小的手工数据集来测试卷积网络。入职两个月，他就创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LeNet，在数字识别方面创造了纪录。

常规的同行评审往往“过于合理”，以至颠覆性的研究很难找到真正的同行。对于“不合理”的方向，方向内的“小同行”更有发言权，而且他们知道谁是最优秀的人。

即使到2006年，参与评审杨立昆论文的人工智能同行也对他并不宽容。因为彼时的深度学习，还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小方向，杨立昆2004—2006年关于这个方向的文章，几乎被最重要的学术会议——ICML（国际机器学习大会）、NeurIPS、CVPR、ICCV（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等都拒绝了。

2006年之后，随着他们的人际圈逐渐扩大，审阅专家才普遍开始支持他们的工作。不过即便这样，2007年在向NeurIPS组

织者提出举办一个深度学习研讨会时，还是被否决了。还好他们有CIFAR（加拿大高等研究院）提供的资金，“私设”了一个研讨会，有300多位参与者，成了那年NeurIPS上最受欢迎的研讨会。

黄金时代的工业实验室曾是变革性技术最重要的发源地，例如杨立昆工作与实习过的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而如今，虽然这些工业实验室仍然存在，却不再像20世纪中叶那样有效。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黄金时代的工业实验室需要的条件，今天不容易复制，例如，几乎占据垄断的行业地位、前沿研究主要依靠内部完成、研究可以高效地为企业创造利润等。

杨立昆在贝尔实验室辉煌的末期加入，1995年经历了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公司的一次拆分；1996年，作为部门负责人，他不得不寻找“实用”的新方向，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基本没有再涉足机器学习研究。2001年年底，AT&T再次被拆分，裁去一半研究人员。好在他提前在NEC（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普林斯顿实验室谋得了一个职位。然而一年后，NEC遇到经济危机，开始给实验室施压，也逼迫实验室转向更容易落地和变现的应用。

那次人工智能寒冬持续了10年，幸运的是，DARPA（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和CIFAR对杨立昆等人的想法感兴趣，分别提供了多年支持，让这群人仍能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利用资助组织讲习班，为学生们开辟了一个科学小天地。

今天的“创新生态系统”主体由以下这些部分组成：学术界擅长产生新想法，初创企业擅长将高潜力产品推向新市场，企业研发在改善现有产品方面无与伦比。但组成这个系统的机构差异很

大，每个机构的体制都有限制因素。杨立昆也描述了他在脸书挑战这些限制所做的努力。

智源研究院希望通过构筑协作社区，打造用于未来研究的计算和数据平台；同时，集结最优秀的小同行，专注未来可能产生原始创新与长期影响的领域（包括过往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的领域）等一系列机制，让创新系统更高效地运行。正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提高概率，希望我们的努力能让中国出现突破性成果的概率增加，希望本书读者亦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2021年7月于北京

在无人区创新

贾扬清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级研究员

2014年，我供职的谷歌大脑（Google Brain）团队在计算机视觉领域著名的标准测试比赛ImageNet上，用一个22层的深度神经网络获得了第一名。在给这个网络起名字的时候，我们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将Google的l大写，即写成“GoogLeNet”。比较“极客”的读者可能会马上发现，这是在致敬1989年出现的，也许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神经网络LeNet。在计算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LeNet就已经被用在全美国的邮政系统中，来读取每一封信件上面的邮政编码。而LeNet的作者，就是今天为大众所知、图灵奖的获得者，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杨立昆。

30年前，神经网络走过了非常崎岖的道路。最初的成功过后，神经网络因为本身训练的复杂性、结构的不确定性、对数据量的依赖性、理论的不清晰性等，在2000年年初的一段时间之内逐渐被更加有理论依据的凸优化、核方法、概率图模型等取代。杨立昆和其他两位同获图灵奖的大师约书亚·本吉奥和杰弗里·辛顿回忆起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坚持的时候，笑称这是“deep learning conspiracy”（“深度学习的阴谋”），而他们自己是Canadian Mafia（“加拿大黑手党”），在各自所在的学校中，他们坚持自己所相信的神经网络研究。

学术界对于神经网络的负面观点是比较普遍的。例如，

2010年，我和奥里奥尔·温雅尔斯（Oriol Vinyals，谷歌子公司DeepMind星际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捣鼓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的前系主任笑称“扬清和奥里奥尔在搞 mumbo jumbo（大而无当的东西）”。当然他让我们继续自己喜欢的研究，这也是学术界的开放精神之所在。

但是从ImageNet的成功开始，神经网络，或者说“深度学习”，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各个领域展示出它的优势。感知领域是最先被征服的：让计算机看懂人看得懂的图片，听懂人听得懂的声音，读懂人读得懂的文字。基于此，人工智能算法迅速开始在其他领域崭露头角，例如棋类 [AlphaGo（阿尔法围棋）] 和游戏、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可以说，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任何技术领域都值得了解的一个称手的工具。

从2013年加入脸书开始，杨立昆就一直领导着它的研究部门FAIR在人工智能的前沿无人区创新。FAIR集聚了大量人工智能的优秀学者，其中不乏华人的面孔，例如计算机视觉专家何恺明、增强学习和理论研究专家田渊栋等。我在脸书工作期间，一方面构建Facebook AI（脸书AI）的工程底座，一方面也参与和见证了Facebook AI给社区带来的各种成果，例如ResNeXT、Detectron、FAISS等算法，以及PyTorch通用人工智能框架、ONNX业界模型标准等。Facebook AI多年的成就，和杨立昆一直以来对于人工智能的孜孜追求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人工智能先驱，杨立昆对人工智能的未来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他的思考一些是技术上的：如何通过自监督学习等方式，让人工智能走出数据依赖，使之更像人一样学习和进化？一些是伦理和社会学上的：如何保证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不被用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只有了解科学的人，才能更

加深刻地洞察科学背后的社会意义和风险，杨立昆在这本书中所分享的思想，值得我们每一位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咀嚼。

最后说一些和技术无关的小事情。杨立昆在生活中是一位非常风趣，又带着一点极客风格的人。在他的主页以及脸书页面上有各种风趣的小吐槽，例如他和SVM（支持向量机）的创始人之一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Vladimir Vapnik）一起创作的带有二次元风格的笑话，“All your bayes are belong to us”（“你所有的贝叶斯都属于我们”）^[1]。他在2017年造访中国，来之前有朋友和他讲在中国人工智能很热，“有可能走在路上就有人认出你哦”。他回到美国之后很开心地说，他在上海博物馆门口果然遇到两位学生，很兴奋地拉着他合影。杨立昆评论道，既然我真的被路人认出来，那中国一定有无数的人对人工智能怀着无比的热情。

科技改变生活，我有幸在国内见证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科学无国界，我也有幸为杨立昆的这本新书写序。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面向未来的思考，希望读者朋友能把这份热情转化为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下一个世纪。

^[1] 参见<http://yann.lecun.com/ex/fun/index.html>。

从科学思考到科学思维

吴军

计算机科学家，《智能时代》作者

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博士的新书《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撰写序言。

杨立昆博士因为在深度学习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2018年度的图灵奖，他的大名在中国的计算机科学界和企业界几乎是家喻户晓。他这本结合了自传和科普的新书非常值得一读，无论是学术界、工业界的人士，还是普通读者，读了之后都会获益良多。

杨立昆的成功经验

在《科学之路》一书的前言部分，杨立昆博士介绍了自己求学和科研的经历。他的求学经历和对教育的理解在当下对中国家长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杨立昆是法国人。在法国，如果想要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精英，通常要进入招生人数非常少的高专科学院（grandes écoles，也被称为大学校），比如想做科学家和工程师，就需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或者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样的精英学校学习。而为了考入这些录取率极低的学校，又要花两年左右的时间先学习大学预修课程备考。我想如果一个中国家长在法国，会让孩子走这条路。但是杨立昆却走了一条与

众不同的求学道路，他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一所名气不算太大的大学——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ESIEE）学习。杨立昆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两个原因：其一，这所大学不需要参加预科课程的学习和考试就能直接申请；其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自主权。杨立昆讲，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进入名校，不是科学成功的唯一路径。

杨立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生涯，可以追溯到他在大学时广泛地阅读课程之外的经典科学著作。在他读书的年代，人工智能是一个热门但是发展并不成熟的研究领域。杨立昆对此有非常大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在内的很多科学家的论著，特别是苏联伟大的数学家、公理化概率论的奠基人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rov）的著作，这为杨立昆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科学理论基础。从大学开始，杨立昆就沉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并且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研究领域一个新的技术方向——神经网络的反向训练。后来他进入当时的巴黎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今天的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反向训练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的成果很快就有法国一家公司买单，而且让他得以进入当时学术氛围非常自由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杨立昆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接受教育重要的是获得知识本身，而不是获得名校的光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杨立昆一直保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特别是在全世界都不看好人工神经网络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他依然投身到这项研究中。

杨立昆进入贝尔实验室时，正赶上那个世界科学殿堂最后的辉煌时期，但是很快这个庞大的实验室就解体了。所幸的是，杨立昆得以在纽约大学担任了教职。不过，当时正赶上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低谷，虽然杨立昆坚信这项技术会在图像识别领域大放

光彩，并且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人脸识别系统，但是他的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科学家的重视。从2003年到2013年大约10年的时间里，杨立昆和他曾经的领路人杰弗里·辛顿等人一直在默默地从事着各种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特别是卷积网络算法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当时并不引人注目，但是正是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今天深度学习算法的基础。2013年之后，随着并行计算的进步和数据量的增加，以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深度学习突然在很多应用领域显示出巨大前景，并且在一个又一个应用中，比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计算机博弈，取得骄人的成绩，杨立昆等人的工作一下子轰动了全世界，并且让他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一起获得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

如果要总结杨立昆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用4句话来概括：

- 求学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是文凭；
- 广泛地阅读高水平的专业著作，培养科学的品位；
- 特立独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即便那件事在短期内不被人看好；
- 长期的坚持。

人工智能的本质

《科学之路》一书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的原理。虽然杨立昆博士使用了一些公式，但这部分内容依然通俗易懂。

杨立昆博士用几个例子讲述了今天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数学公式 + 大量的数据 + 计算能力。

首先，我们要将模式识别等问题转化成数学公式。今天计算机的智能从实现方式上讲完全不等于人的智能；但是，从结果上讲，它和人的智能等价。你可以认为这是两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杨立昆博士用一些典型的模式识别示例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是如何实现的，读者朋友即便对里面的公式细节不感兴趣，也能体会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之间的不同。不过，计算机在获得智能的方法上，有一点和人是相同的，那就是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总结出规律，然后用规律再来预测现象。杨立昆在书中举了伽利略研究速度的例子，伽利略通过观察找到了物体运动的规律并且将它变成了数学公式，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应用于计算各种运动物体的速度。机器学习也是如此，只不过机器学习的公式不那么直观。

其次，我们需要获取数据，供计算机进行学习。在任何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原始的数据，比如图像本身，都是无法直接用来学习的，这中间要进行一个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被称为特征提取，简单地讲，就是将真实世界的目标对象转化成计算机能够读懂的数据。杨立昆博士用模式识别的例子说明了特征提取是如何进行的。当然，如果读者朋友不想关心具体的步骤，至少需要明白一点，那就是计算机学习需要大量的数据。

最后，当数据量大了之后，就需要数学模型足够复杂才能反映出大量数据中所包含的各个细节。虽然奥卡姆剃刀原理通常很有效，但是在机器学习领域并非如此。事实上，过去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智能水平之所以不高，就是因为那个网络过于简单。因此，杨立昆等人提出了更为庞大而复杂的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于是这就遇到了第三个问题，计算能力的问题。杨立昆博士对这部分内容没有做太多的论述，毕竟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

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工程师来完成的，而非科学家关注的重点。

人工智能的应用

《科学之路》一书的第三部分讲述今天人工智能的各种应用，从语音和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对话系统，到自动驾驶汽车和医学影像识别，这些名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如果想了解其中的细节，杨立昆博士的讲述既权威，又直白。

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科学之路》一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讲述今天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这包括技术上的不足之处，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这部分内容是各种介绍人工智能的图书常常忽略的。杨立昆博士提醒我们，所有技术革命都有其阴暗面，但是他坚信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在书的最后还谈了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机器人是否该拥有权力，又该遵守什么样的法律。

总的来讲，这是一本全面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兼顾科普和专业论著特点的鸿篇大作，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杨立昆博士作为深度学习算法的发明人之一，讲述他如何思考机器智能的问题，如何将这种现实世界里的具体问题转化为计算机能够处理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它又是一本教科书，教大家如何思考科学问题。我相信通过阅读这本书，各个层次、不同背景的读者朋友都会有巨大的收获！

2021年6月6日于硅谷

以批判性思维持续学习

韦青

微软（中国）公司首席技术官

近年来，以机器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些比较成熟的应用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实现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实践的飞跃，开始对人类社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了解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功用，并且迫不及待地尝试利用现有的机器深度学习理论与方法，去开拓新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时，却发现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致可以描述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科学在研究领域的进步”与“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程实践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落地”之间的矛盾。

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很多，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但总结下来，尤其是在企业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三点：

第一，企业的决策者与业务部门对于机器智能能力的期望和技术部门真正能够实现的机器能力之间的落差。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大家一致努力的学习来解决，但是即使解决了这个落差，在具体实现之前也会出现第二个现实问题。

第二，企业为了拥有这种机器能力而在资源与时间上的投入和技术部门为了实现这种机器能力所需要的资源与时间的落差。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大家共同商讨、分析和判断实现这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来解决。在更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有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之间的这对麻烦的矛盾又会出现。

第三，企业对于计划实施的确定性要求和“黑天鹅”“灰犀牛”现象层出不穷的时代的复杂性之间的落差。这要求企业决策者和广大员工能够共同建立起一个具备充足韧性的企业文化、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人员素质以及产品与服务系统。这种韧性系统要求决策者具备针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洞察，在这个技术与人文的综合素质决定企业与个人能力的时代，这种洞察不仅来源于固定的知识本身，也来源于系统的发展观；对于发展的理解，离不开对于历史规律，尤其是人工智能历史规律的洞察。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与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进行智能技术应用落地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客户需求终于被技术实现的喜悦，也有明明是好想法却始终无法落地的遗憾。我相信所有从事智能技术落地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有同样的体会。也可以这么理解，上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当今智能技术领域的普遍现象。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呢？

泛泛而言，答案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企业的决策者和业务人员需要努力学习并理解机器智能实现与应用的基本原理，同时利用自己对相关领域商业逻辑的深刻洞察，与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合法、高效、全面地使用智能机器实现企业与个人能力的飞跃。这种泛泛而谈的学习的确覆盖面太广了，经常会让人们不知从何下手。但确实有一些快速入手的途径，在我看来，现在在你手中摊开的这本书，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条途径。

敢言的杨立昆

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作者杨立昆最出名的可能就是与杰弗里·辛顿和约书亚·本吉奥一起获得的由美国计算机协会（ACM）颁发的2018年度图灵奖。当然业内人士大都知道他与卷积神经网络的不解之缘，还有那个1993年拍摄的用LeNet-1卷积神经网络（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拥有4600多个单元、接近10万个连接的卷积神经网络）对于手写数字自动识别的演示视频，这套系统在1995年就开始正式商业落地。要知道那可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啊！也就是说，现在广为流行的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图像识别系统，在近30年前就已经开始商用了。

其实杨立昆在业界还以“敢言”出名。当初在2017年NeurIPS大会上，获颁“长期成就奖”的机器学习专家阿里·拉希米（Ali Rahimi）在他的获奖演讲中，对人工智能的现状进行了批判。拉希米提醒当时的听众，“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过于自大了”。他先用吴恩达对人工智能的著名判断“人工智能是新时代的电力”举例，之后话锋一转，在屏幕上打出一个中世纪炼金术的图像，转而说：“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像是炼金术，只不过是一个还能用的炼金术。”此言一出，激起了本书作者杨立昆的强烈反击，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到底是不是炼金术的大讨论，这场论战在当时可谓风靡一时。

客观而言，当时论战双方都是基于各自角度和立场的合理论证，并不能简单地判断谁对谁错；但是这种公开的讨论，对大众而言就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亲身经历机器学习行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应的知识与精力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意见。杨立昆的这种敢想、敢做、敢说的风格，的确能够帮助广大民众从他的言论与论著中学到除了技术以外的一些哲学思想内容，而这些思想对需要利用技术解决业务问题的企业决策者和业务人员而言，就变得

大有益处了。

坦诚直率的分享

作为图灵奖的获得者，同时是机器学习领域，尤其是以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机器学习领域的领军人物，杨立昆在写作本书时，有意识地不把它写成一本纯粹的技术书，更多的是把他在机器学习领域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与读者分享。整本书读下来，尽管也有许多有关机器学习算法设计与实现原理的分析与讨论，但更多的是他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心得体会，值得我们深入阅读与思考。

正如前面所讲，现在妨碍智能机器能力落地的主要障碍，很多情况下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能力的期望值和技术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应对复杂现象的能力。这正是杨立昆在他的书中始终强调的观点。

本书的写作风格，与杨立昆自诩为工程师的为人一样，非常坦诚、直率、目的明确、不事雕琢。喜欢那些用词优美、语意流畅、文学性强的文章的读者，可能需要习惯一下他这种工程师式的写作方式。同时也由于过去几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杨立昆又坚持选择了一条并不为大多数同行看好的深度机器学习之路，让他和少数同路人没有少受委屈，这也让他偶尔会怀疑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能走向成功的未来。我相信正是他的这种真情实意，使得这本书的内容对广大读者来说有非常真实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也相信，正是因为他经历了人工智能这几十年真实不虚的起起伏伏，他才有那么坚定的信心、意愿与各种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观念与思潮进行坦诚的辩论与交流。

本书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他在第二章“深度学习的阴谋”那一节里有关信心与动摇的描写。那是1987年12月6日，也就是杰弗里·辛顿生日当天发生的事情。辛顿本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但那一天他苦涩地坦陈：“今天是我40岁生日，我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什么也做不成了。”的确，那时候才是1987年，辛顿已经40岁了，离他和他的团队在2012年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将计算机图像识别的错误率从25 %一下子降到16 %还有25年，离AlphaGo在2017年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以3：0击败围棋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洁还有30年，离他与本吉奥和杨立昆在2019年共同获得2018年度图灵奖还有32年。正因为如此，作为辛顿的朋友和图灵奖的共同获得者，杨立昆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在20年后又有了新的想法，但我们碰见的大多数人都不如辛顿这样，他们都很傲慢。”我相信他们几位先行者的经历，也能够给中国莫名其妙流行的程序员“35岁现象”起到正面的借鉴意义。

丰富的阅读体验

类似的警句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在我拿到的中信出版社给我的试读本中，我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标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收集的例子，与大家共勉。

本书一开篇就写道，“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占领经济、通信、健康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很多观察家不再将其视为一次技术演变，而视其为一场革命”。杨立昆所坚信的“深度学习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第九章里他把机器学习的各种方法比作黑森林蛋糕。作者还是一个不希望把技术神化的具有踏踏实实工程师个性的科学家，当他解释机器学习算法的时候，他希望读者理解的是它背后的思维本质，而不是多么高不可攀的术语和公式。对于算

法，他说：“算法是指令序列，这就是它的全部，没有任何神奇、难以理解的地方。”他对机器自动学习原理解释就是与“物理学的基础”一样，“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总结出定律，并用定律预测现象”。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对SVM算法的观点。尽管SVM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一起发明的，但他在书中明确写道：“我对我的朋友和同事深怀敬意，但必须承认我本人对这个方法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并没有解决特征提取器自动训练的关键问题。不过，SVM方法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与杨立昆的风格类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素质，就是始终带有批判性思维。当这些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对一种技术或者方法进行研究与推广的时候，永远都要先阐述它能够起作用的前提约束条件，不会一味推崇某种技术的好处而不阐明因为某种优势所必然带来的某种劣势。这些科学家的技术与工程理念可以综合地解释为，“任何一种强大的技术，有其正面就必定有其负面，不理解它的负面，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正面；不能够关闭某种神奇的工具，就不能轻易地把它打开”。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贯穿本书。

在与大量客户的合作过程中，我也发现企业的决策者容易被技术发展的单方面描述误导，尤其在这个手机朋友圈知识远大于传统知识渠道的时代。人们得到了知识获取的便利性，但同时又面临着判断知识真假的挑战。虽然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潜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强大的智能技术在一些领域中的应用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应用领域的范围还极为狭窄，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域需要人们以探索的精神来找到落地的方法。但现实是人们很容易在没有理解和认知某种先进技术的负面因素的前提下，就做出了一个不具备批判性观

点的决策。这种决策方法极易将本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技术，仅仅由于没有考虑到在使用过程中应该避免的负面效果而前功尽弃。在现实中，这种决策方法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因为这种前功尽弃的现象，又会使企业的决策者完全丧失对于使用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实力的信心，以至干脆放弃对先进技术的追求与坚持。这种结果几乎可以称为“双倍的得不偿失”。

机器学习的能力很强大，但是要想用好这种能力并不容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进入智能化时代，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理解、掌握并用好机器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每个组织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选项，而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同时，由于这种技术的复杂性，它要求人们不仅能够学习固定的知识，还需要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而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其实也是机器学习的基础能力范式。机器学习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帮助人类扩展自身认知空间的阶段，也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利用机器学习的能力，也可以向机器学习新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在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随时适应新情况的方法。

到底是不是炼金术？

刚才在前面跟大家介绍了杨立昆与拉希米关于机器学习是否是炼金术的争论，在那场争论中，杨立昆坚决地站在机器学习不是炼金术的一方，但科学探索的本质就是不断接近真相但永远不会到达真相，在这个寻求真相的过程中会随时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和新的现象而做出修正。读书也是一样，“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本书作者以他自己“科学之路”的经历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那么就让我们以他自己在前言部分写的一段话作为收尾吧！

深度学习的探索之旅并不容易，我们不得不与各个方面的怀疑论者做斗争……深度神经网络，即我们提出的深度学习，就是突破局限性的方法。深度神经网络十分有效，但是运作也非常复杂，并且难以进行数学分析，但我们还是如同炼金术士般不懈追求着。

杨立昆的科学之路

马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教授

非常荣幸受邀给杨立昆教授的新书中文版作序。我和杨立昆相识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大会，至今应该有十多年了。在科研方向上，我们一直都非常关心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如何正确有效地表示图像数据的内在结构。杨立昆非常重视从实际数据和任务出发，例如针对图像分类的卷积网络和自动编码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我比较偏重描述图像数据内在的低维结构的基本数学模型，例如稀疏结构和多子空间模型。虽然我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因为大方向一致，对对方的工作一直都非常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我们的工作实用性方面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又比较小众甚至另类，因此也有些惺惺相惜。科学探索，绝对不能因为一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就放弃正确的方向。杨立昆在新书里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在深度学习方面艰辛探索与努力坚持的心路历程。相信这些亲身体验，对年轻的科研人员应该有非常好的教育意义。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初不被主流认可与看好的工作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深度卷积网络以及稀疏结构基本上是所有实用深度模型，甚至是任何高维数据模型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2016年暑假，深度学习、压缩感知、优化算法以及调和与分析领域的一群前沿学者，聚集到墨西哥美丽的瓦哈卡（Oaxaca）的数学研究所，一起交流和探讨这些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杨立昆和我应该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仅有的两位参会者。当时我还带了家人。杨和我们一家还有不少学生一起去参观了玛雅遗址。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通过与杨交流，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意识到深度模型与低维结构的内在联系。当时我还在上海科技大学执教，所以顺便邀请杨在2017年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的学术年会上做一个关于深度学习的主题演讲。我记得当时那场演讲现场观众有800多人，而通过在线直播参加的有四五千。这可能就是他在书的中文版自序中提到的在中国受到明星一样待遇的一个例证。那次年会后，为尽地主之谊，我专门陪杨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了上海的朱家角游玩。一路上，杨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买了不少纪念品，直到他夫人阻拦为止。

2018年我回到美国，因为我们俩都意识到深度网络与低维结构的密切联系，所以杨和我进行了多次交流。2019年，我专程去纽约大学拜访了他。一方面是当面祝贺他获得了图灵奖，另一方面是与他深入探讨深度网络的理论研究方向。当时深度网络虽然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却不清楚。我记得我们在他纽约大学的办公室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一下午的讨论就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深度网络究竟在优化什么。杨立昆认为可以从类似于物理学中的能量方面找灵感，而我感觉应该从数据的低维结构表示入手。虽然具体想法有异，但目的和方向非常一致。我也是从这次讨论中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成功的理论框架，不仅要弄清楚深度学习的目的，而且从这个目的出发必须能很自然地解释深度网络的主要结构。可以这么讲，这次讨论是我近两年从数据压缩的角度，用第一性原理阐释深度网络的真正起点。有趣的是，这项工作居然真的把深度卷积网络与低维子空间结构完全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

很多时候，一些看似很难的问题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艰深，而真正难的是在不知道方向和答案的时候有没有勇气全身心地投入。杨立昆以他非凡的直觉和洞察力，为我们从基础理论层面研究深度网络指引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避免了做理论时最容易犯的错误：闭门造车。我讲述与杨立昆交流合作的故事，是希望年轻学者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在科研中不断拓宽视野、兼容并蓄、与多个交叉领域的同事交流合作的重要性！

杨在他这本新书里以生动翔实的事实传授了很多类似的道理。这本书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发展历程与核心原理，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介绍了如何探索思考科研问题的方法。我以前一直敬仰杨立昆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读了这本书才发现他的知识面如此之广，文笔如此之生动。因此，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受益匪浅。

让历史告诉未来

黄铁军

智源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

杨立昆是当今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为他的新书作序，颇具挑战性。好在众多专家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了近70年，本书希望通过反思已走过路径的合理性及局限性，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对本书略做补充。

先谈一下对智能的看法。智能是系统通过获取和加工信息而获得的能力。智能系统的重要特征是能够从无序到有序（熵减）、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进化）的。生命系统是智能系统，也是物理系统；既具有熵减的智能特征，也遵守熵增在内的物理规律。人工智能是智能系统，也是通过获取和加工信息而获得智能，只是智能载体从有机体扩展到一般性的机器。

就像人可以分为精神和肉体两个层次（当然这两个层次从根本上密不可分），机器智能也可以分为载体（具有特定结构的机器）和智能（作为一种现象的功能）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同样重要。因此，我偏好用机器智能这个概念替代人工智能。

与机器智能相比，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重心在智能。“人工”二字高高在上的特权感主导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前半叶，集中体现为符号主义。符号主义主张（由人）将智能形式化为符号、知识、规则和算法，认为符号是智能的基本元素，智能是符号的表征和运算过程。符号主义的思想起源是数理逻辑、心理学和认

知科学，并随着计算机的发明而步入实践。符号主义有过辉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人类抽象出的符号，源头是身体对物理世界的感知，人类能够通过符号进行交流，是因为人类拥有类似的身体。计算机只处理符号，就不可能有类人感知和类人智能，人类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智能”，不必或不能形式化为符号，更是计算机不能触及的。要实现类人乃至超人智能，就不能仅仅依靠计算机。

与符号主义自顶向下的路线针锋相对的是连接主义。连接主义采取自底向上的路线，强调智能活动是由大量简单单元通过复杂连接后并行运行的结果，基本思想是：既然生物智能是由神经网络产生的，那就通过人工方式构造神经网络，再训练人工神经网络产生智能。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在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前就开始了，1943年，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提出的M-P神经元模型沿用至今。连接主义的困难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网络能够产生预期智能，因此大量探索归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神经网络曾经兴盛一时，掀起本轮人工智能浪潮的深度神经网络只是少见的成功个案，不过这也是技术探索的常态。

人工智能的第三条路线是行为主义，又称进化主义，思想来源是进化论和控制论。生物智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生物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发展出越来越强的智能，人工智能也可以沿这个途径发展。这个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近年来颇受瞩目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狗和机器人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作。行为主义的一个分支方向是具身智能，强调身体对智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行为主义遇到的困难和连接主义类似，那就是什么样的智能主体才是“可塑之才”。

机器学习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潮

流，本书给出了很通俗的定义：学习就是逐步减少系统误差的过程，机器学习就是机器进行尝试、犯错以及自我调整等操作。机器学习对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研究重心从人工赋予机器智能转移到机器自行习得智能。近年来，最成功的机器学习方法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

深度学习是连接主义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产物，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一种在多层神经网络上进行机器学习的方法，本书作者杨立昆和约书亚·本吉奥、杰弗里·辛顿因此获得2018年度图灵奖。深度学习首先回答了什么样的神经网络可以训练出智能，包括多层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也回答了训练（学习）方法问题，包括受限玻尔兹曼机模型、反向传播算法、自编码模型等。深度学习对连接主义的重大意义是给出了一条训练智能的可行途径，对机器学习的重大意义则是给出了一个凝聚学习成效的可塑载体。

强化学习的思想和行为主义一脉相承，可追溯到1911年行为心理学的效用法则：给定情境下，得到奖励的行为会被强化，而受到惩罚的行为会被弱化，这就是强化学习的核心机制——试错。1989年，沃特金斯提出Q学习（Q-learning），证明了强化学习的收敛性。2013年，谷歌子公司DeepMind将Q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相结合，取得AlphaGo、AlphaZero（阿尔法元）和AlphaStar等重大突破。最近，DeepMind更是强调，只需要强化学习，就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与DeepMind极力推崇强化学习不同，杨立昆认为强化学习不过是锦上添花，传统监督学习标注成本高，泛化能力有限，也只是点缀，自监督学习才是机器学习的未来。自监督学习是通过观察发现世界内在结构的过程，是人类（以及动物）最主要的学习形式，是“智力的本质”，这就是本书第九章的核心观点。最

近，杨立昆和另外两位图灵奖获得者发表的论文“Deep Learning for AI”（《面向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中，也重点谈了这个观点。

有了三位图灵奖获得者的大力倡导，相信自监督学习将会掀起一波新的研究浪潮，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智力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这只是从机器学习层次看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从功能层次看问题。我认为，学习方法（功能）固然重要，从事学习的机器（结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结构决定功能。正如我开始时强调过的，永远不要忘记作为智能载体的机器。

杨立昆在第九章开篇提到了法国航空先驱克莱芒·阿代尔（Clément Ader），他比莱特兄弟早13年造出了能飞起来的载人机器。杨立昆从这位先驱身上看到的主要是教训：“我们尝试复制生物学机制的前提是理解自然机制的本质，因为在不了解生物学原理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必然导致惨败。”他的立场也很清楚：“我认为，我们必须探究智能和学习的基础原理，不管这些原理是以生物学的形式还是以电子的形式存在。正如空气动力学解释了飞机、鸟类、蝙蝠和昆虫的飞行原理，热力学解释了热机和生化过程中的能量转换一样，智能理论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形式的智能。”

我的看法和他不同，我认为克莱芒·阿代尔（和莱特兄弟）不仅没有“惨败”，而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原因很简单：克莱芒·阿代尔1890年和莱特兄弟1903年分别发明飞机，而空气动力学是1939—1946年才建立起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飞机，主要贡献来自克莱芒·阿代尔和莱特兄弟的工程实践，而不是空气动力学理论的贡献，因为空气动力学还没出现。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至今空气动力学也没能全面解释飞机飞行的所有秘密，更没有全面解释各种动物的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很伟

大，但它是“事后诸葛亮”，对于优化后来的飞机设计意义重大，但它不是指导飞机发明的理论导师。

智能比飞行要复杂得多，深度学习成功实现了智能，但是能够解释这种成功的理论还没出现，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深度学习的伟大意义。杨立昆和另外两位图灵奖获得者的伟大，和克莱芒·阿代尔及莱特兄弟之伟大的性质相同。我们当然要追求智能理论，但是不能迷恋智能理论，更不能把智能理论当作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如果这里的智能理论还试图涵盖包括人类智能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智能”，则这种理论很可能超出了人类智能可理解的范围。

所以，尽管自监督学习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也只是探索“智力的本质”漫漫长途中的一个阶段。人类和很多动物具有自监督学习能力，并不是自监督学习多神奇，而是因为他（它）们拥有一颗可以自监督学习的大脑，这才是智力的本质所在。机器要进行自监督学习，也要有自己的大脑，至少要有深度神经网络那样的可塑载体，否则自监督学习无从发生。相比之下，强化学习的要求简单得多，一个对温度敏感的有机大分子就能进行强化学习，这正是生命和智能出现的原因。所以，强化学习才是更基本的学习方法。

当然，从零开始强化学习，确实简单粗暴、浪费巨大，这也是强化学习思想提出百年并没取得太大进展的重要原因。强化学习近十年来突然加速，是因为有了深度神经网络作为训练的结构基础，因而在围棋、《星际争霸》等游戏中超越人类。不过，人类输得并不心甘情愿，抱怨的主要理由是机器消耗的能源远高于人类大脑。我认为这种抱怨是片面的，人类棋手大脑的功耗确实只有数十瓦，但训练一个人类棋手要花费十多年时间。更重要的是，人类棋手学围棋时是带着大脑这个先天基础的，这颗大脑是

亿万年进化来的，消耗了巨大的太阳能，这都应该记到能耗的总账中。这样比较，到底是机器棋手还是人类棋手能耗更大呢？

从节省能源角度看，机器智能确实不应该从头再进化一次，而是应该以进化训练好的生物神经网络为基础，这就是纯粹的连接主义：构造一个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工神经网络。1950年，图灵的开辟性论文《计算机与智能》中就表达了这个观点：“真正的智能机器必须具有学习能力，制造这种机器的方法是：先制造一个模拟童年大脑的机器，再教育训练它。”这也是类脑智能或神经形态计算的基本出发点。相关科研实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理念就是构造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神经形态光电系统，再通过训练与交互，实现更强的人工智能乃至强人工智能。

除了改进训练对象的先天结构，训练不可或缺的另一要素是环境。环境才是智能的真正来源，不同环境孕育不同智能。人们往往把今天人工智能系统的成功归结为三个要素：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其中数据是根本，另外两个要素主要影响效率。训练更强智能，需要更大数据，这是智能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人提出“小数据”方法和小样本学习，标榜要颠覆大数据方法，给出的典型理由是人类和动物能够举一反三，不需要大数据。这种观点貌似有道理，其实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忘记或者故意隐瞒了实现举一反三的主体是大脑，而大脑本身是“进化大数据”训练的结果。所谓小数据方法，是以大数据“预训练”为前提的。仅靠小数据不可能训练出复杂智能，道理很简单——小数据没有蕴含足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所谓的强大智能又从何而来呢？

但即便是大数据，也不能完整有效地表达环境，数字孪生能更全面地刻画物理环境，更好地保留环境自有的时空关系，因此也能够哺育出更强的人工智能。物理世界的模型化本来就是科学

最核心的任务，以前从中发现规律的是人类，未来这个发现主体将扩展到机器。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从人工智能发展史中小心翼翼地挑出三根靠得住的基本支柱：一是神经网络，二是强化学习，三是环境模型。在这三根支柱中，杨立昆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神经网络的贡献，特别是卷积神经网络。至于想到用卷积神经网络，是因为借鉴了生物神经感知系统，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深度神经网络已经借鉴了生物神经网络的部分结构。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经典学派有三个：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符号描述和逻辑推理不是智能的基础，而是一种表现，读写都不会的文盲就拥有的“低级”智能才更基础。因此，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虽然困难重重，但有着更强的生命力，从中发展出的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两套方法，成为当今支撑人工智能的两大主要方法。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途径有三条。一是继续推进“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的信息技术方法，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采用深度学习、注意力模型等算法，将大数据中蕴藏的规律转换为人工神经网络的参数，这实际上是凝练了大数据精华的“隐式知识库”，可以为各类文本、图像等信息处理应用提供共性智能模型。二是推进“结构仿脑、功能类脑、性能超脑”的类脑途径，把大自然亿万年进化训练出的生物神经网络作为新一代人工神经网络的蓝本，构造逼近生物神经网络的神经形态芯片和系统，站在人类智能肩膀上发展机器智能。第三条技术路线的核心是建立自然环境的物理模型，通过强化学习训练自主智能模型。比如，构造地球物理模型，训练出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适应地球环境，与人类共处共融；构造高精度物理模型（例如基于量子力

学模型构造出粒子、原子、分子和材料模型），可以训练出能够从事物理学和材料学研究的人工智能；构造出宇宙及其他星球的物理模型，可以训练出的人工智能则有望走出地球，适应宇宙中更复杂的环境。

人类智能是地球环境培育出的最美丽的花朵，我们在为自己骄傲的同时，也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智能也没有类似的独特地位，把人类智能视为人工智能的造物主，曾经禁锢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沉迷于寻求通用智能理论，将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障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对通用智能理论的迷思，构建更好的人工神经网络（包括逼近生物神经网络），坚持和发展强化学习基本思想，不断提高环境模型的精度和广度，人工智能将稳步前行，前景无限。

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

郭毅可

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高山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拿到杨立昆先生的新书，一看书名《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我就被深深吸引。

在不久的未来，机器会思考吗？机器如何思考？机器思考和人类的思考有什么不同？我带着这些疑问拜读了这位人工智能大师的新作。

我和杨立昆先生并不认识，但关于他的故事却早有耳闻。我非常钦佩他在人工智能处于低潮时的远见卓识。他看到了在大数据、大算力的支持下大规模神经网络的巨大潜力。他在卷积神经网络上的开创性工作，开启了深度学习的新时代。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是深度学习技术和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特有的热情对人工智能这些年的突飞猛进和未来的光明前景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引人入胜！

杨立昆先生对机器思考的观点和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一方面他强调机器有独特的思考能力，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今天机器的思考缺乏常识。对机器思考的机制和机器思考与人类之间互通的讨论的研究是今天人工智能的热点，也是最具挑战性和哲学意义的命题。所以，这本书不仅有着向大众传播科学技术的价值，而

且更展示了杨立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

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并从中获益。

今天，人工智能的各类图书充斥书架，但真正由人工智能革命的领导者亲自撰写的书却很少。人工智能大家杨立昆在这本书里，把人工智能的来龙去脉和他本人的核心观点，和我们娓娓道来。我们就像坐在冬天的火炉边，端着一杯咖啡，听他讲述人工智能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我们在书里不仅能得知一些有趣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小故事，也可以领会到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从而更加赞叹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我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社会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我本人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的研发实践工作，强力推荐这本书给各位读者，希望大家尤其是青年人，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

杨强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IJCAI）理事长(2017—2019)，
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理事长，
国际人工智能学会AAAI Fellow

杨立昆博士是一位伟大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强人工智能实现道路上的布道者。

作为现代人工智能的一种主流范式，深度学习技术因对人脑有更好的模仿效果，已经蔓延到整个商业科技世界，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打造一台“可学习”的机器这个奇妙想法的实现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巨人踩下的脚印——杨立昆提出的卷积神经网络和反向传播优化方法论使人工智能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这本书由浅至深详尽地介绍了人工智能革命的发展，以及杨立昆与人工智能结缘的始末，看完让人心潮澎湃，大受启发！

彭志辉（稚晖君）

华为天才少年，人工智能工程师，科技博主

杨立昆先生的这本《科学之路》由100多篇言简意深的短文组成，每篇只有一两页，围绕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读起来完全没有压力。作为人工智能中兴的亲历者和关键人，相比比尔·盖茨、霍金，他的观点更具实践者方有的科学基础，而与马斯克、扎克伯格相比，他的表达也更能“祛魅”、更纯粹、更没有商业意图。作为大师，他不避讳人工智能还面临很多的未知，这些未知影响到了自动驾驶等重要应用在近期的普及（杨先生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他对自动驾驶的洞察），也为人工智能未来30年的巨大创新“留白”。掩卷沉思，每一个有志于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读者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杨先生的科学之路，其道不孤。

吴甘沙

驭势科技董事长、CEO

中文版自序

科研的魅力

以机器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智能系统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那样，让机器深度学习成为国家级优先项目，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过去10年，我曾多次造访中国，这让我对中国的学生、企业家和科学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深度学习方面的兴趣和热情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09年，当时是应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暑期研修班的邀请。

我做了三场有关机器深度学习的讲座，内容涉及卷积网络、图像识别的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和自动化机器人。4年之后，深度学习这个概念才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学生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天，所有参加研修班的人去长城游览。在我们等待回北京市区的大巴时，一位学生腼腆地问是否能跟我合影，我欣然同意。很快，所有的学生竟然都排队要与我合影。在美国，只有电影明星和著名的音乐家才有这种待遇，科学家是没那么多人追捧的。

上海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会有人在街头拦住我并索要签名的城市。诚然，与在巴黎或纽约相比，我在上海的确更显眼，但我认为这也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科学和工程，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感兴

趣的程度。

在最近几年，我观察到中国的科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成为国际学术圈的主角。近些年，中国的研究机构在CVPR上发表的科研论文越来越多，这与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百度是最早部署商业化深度学习系统的大型公司之一，领先于谷歌和微软。有一些重大的创新也是由中国科学家做出的，例如，ResNet卷积网络体系结构（残差网络）是何恺明发明的。他当时在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现在就职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FAIR）。

科学研究最棒的地方就在于它让科研结果得以自由交流。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发表研究结果，并且几乎是系统地公开分享他们的代码。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自由的信息交流。加入这个领域进行开放研究的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年轻科学家和学生越多，技术进步就越快，整个世界也将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良多。

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是进步的动力。

前言

我的科学之路

“哈尔（HAL）！把舱门打开！”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一台名为“哈尔9000”的高智能计算机操控着宇宙飞船，而它拒绝执行为宇航员戴夫·鲍曼（Dave Bowman）打开分离舱舱门的命令，这一场景戏剧性地展现出人工智能的关键问题：系统转而攻击它的设计者，这是幻想还是有依据的害怕？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终有一日世界会被终结者或几乎拥有无限力量和邪恶设计目的的智能机器人统治？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放在50年前，这种变革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我毕生研究的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人类社会。

因此，我想写这本书来解释人工智能运作时的方法和技术，且毫不掩饰其中的复杂性。这一过程比学习国际象棋更难，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话题形成一个理性的认识。大众媒体上总是充斥着“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术语，我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步步地阐明推进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交叉的科学方法。

在深入了解机器的旅程中，本书提供了两个层次的阅读目标：第一个层次较为基础，即叙述、描写和分析；第二个层次针对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本书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数学和信息技术推理。

人工智能可以让机器识别图片，转译不同语言的语音，翻译

文本，自动驾驶，自动操纵工业流程。人工智能近年来惊人的发展离不开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可以训练机器直接完成任务，而不需要对其进行显式编程（明确的编程指示）。人工神经网络是深度学习的特点之一，其架构和运作方式基于人脑的启发。

人脑由860亿个神经元构成，神经元细胞之间相互连接。人工神经网络也是由大量单元和数学函数构成的，与简化后的神经元类似。在学习时，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会被改变，人工神经网络在学习时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单元的组织通常是多层的，所以它们被称为神经网络，而人工神经网络学习的过程则被称为深度学习。

人工神经元的作用是对输入信号进行加权求和，如果求和总值超过某一阈值，则产生一个输出信号。人工神经元正是由计算机程序计算出的数学函数。可见，人工智能领域的词汇场与人脑中的词汇场相近，但这并不是巧合，因为正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发展促生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我还想在这趟非同寻常的科学探索中追溯我的人工智能之旅。我的名字与改变了视觉识别的卷积网络密不可分。卷积网络受哺乳动物视觉皮层结构和功能的启发，能有效处理图像、视频、声音、语音、文本和其他类型的信号。

那么研究者做了什么呢？研究者的理念从何而来？对我而言，我经常凭直觉工作，同时也受数学的启发而工作。我知道许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反。我会在脑中设想一些极端情况，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思维实验”，即设计一个场景，然后尝试设想其后果，以便更好地理解问题。

这种直觉总会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出现。我贪婪地阅读，我熟知前人的所有工作。在探索之路上我们并非孤身一人，时机到来

之时，那些已经存在的但尚未被提出的理念会一个接一个地涌入许多人的头脑中。科学研究也是一样，它的进展总是无序的，有时突飞猛进，有时停滞不前，甚至会走回头路。但研究这件事总是依靠集体协作的，发明者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场景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中。

深度学习的探索之旅并不容易，我们不得不与各个方面的怀疑论者做斗争。完全基于逻辑和手写程序的人工智能的拥护者说我们会失败，传统机器学习的捍卫者公开指责我们，可事实上，我们研究的深度学习仅仅是机器学习这个广阔领域中的一套特殊技术而已。谈到机器学习，机器不需要显式编程，基于例子就可以学习处理一项任务，这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希望可以突破这些局限性。深度神经网络，即我们提出的深度学习，就是突破局限性的方法。深度神经网络十分有效，但是运作也非常复杂，并且难以进行数学分析，但我们还是如同炼金术士般不懈追求着。

2010年前后，当神经网络终于被明确证明有效时，传统机器学习的拥护者停止了他们的挖苦。我本人从未怀疑过神经网络的有效性，我一直相信，人类智能如此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和经验学习能力的自组织才能复制它。

如今，在大量可用数据库和工具（如GPU，可使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倍增）的推动下，这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是最有发展前景的。

在学业接近尾声时，我曾打算在北美待上几年；直到现在，我还待在这里。在经历了不少波折后，我进入了拥有20亿用户的脸书工作，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基础研究。也是在那里，我开始了研究工作。我不想隐瞒脸书在2018年经历的风波，这场风波使公司遭受严重质疑，但脸书的业务领域仍在不断扩张。无论何

时何地，我都坚持公开透明原则。

2019年3月，我获得了美国计算机协会颁发的2018年度图灵奖，这个奖项也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我与两位深度学习领域的专家共获此殊荣，他们是约书亚·本吉奥和杰弗里·辛顿。这两位也是我的同路人，我们有时合作无间，有时又各自独立研究，但互相之间从未停止过交流。

我的职业生涯的进展多与上述经历有关，也与我能够在由一群富有激情的人组成的群体中逐渐占有的一席之地有关。这些人是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了一些深刻又大胆的问题，比如，神经元这些非常简单的物体是如何通过互相连接制造出“智力”这种涌现属性的。

研究深度学习的科学之旅也能够引导我们提出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由于提取了轮胎、挡风玻璃等物体的特征，一台机器可以识别一辆汽车，那么其工作方式与我们的视觉皮层识别这辆汽车有什么不同？机器的工作方式和人脑或者动物大脑的工作方式之间有哪些可观测的相同点？这些研究前景都是无限的。

我仍要指出，无论机器多么强大和复杂，它们总是高度专业化的，它们的学习效率远远低于人类和动物，它们没有常识和意识，至少目前还没有。在处理特定任务方面，机器的表现可能会超过人类，比如，它们能够在围棋或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人类，能够翻译数百种语言，能够识别植物或昆虫，能够检测到医学影像上肿瘤的位置。但是人脑仍然遥遥领先，它比机器更全面，也更具可塑性。

机器何时才能缩小与人脑的差距呢？

第一章

人工智能呼啸而来

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占领经济、通信、健康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很多观察家不再将其视为一次技术演变，而视其为一场革命。

1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Alexa（亚历克萨，亚马逊公司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气如何？”

智能音箱捕捉到问题，通过家里的Wi-Fi（无线通信技术）将它上传到亚马逊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将其转录为文字并进行解译，再运用气象服务查找相关信息并回传到智能音箱，整个过程用时不超过一秒。最后，音箱会用温柔的声音播报：“目前，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气温为22℃，多云。”

在办公室里，人工智能算得上是一个勤奋的助手。它能快速地完成复杂、重复的任务，比如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以惊人的运算能力浏览数百万个网页，从中找出它所需要的信息。

194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了计算弹道建造了ENIAC（埃尼阿克），它是最早的编程电子计算机之一。ENIAC每秒可执行约360次10位数乘法，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今天，即使个人计算机处理器的运算速度也要比它快10亿倍，可执行数百个GFLOPS[\[1\]](#)；用于处理图形效果的GPU可执行几十个TFLOPS。GFLOPS、GPU、TFLOPS，这些名字看起来短小可爱，但若以数据处理能力而论，它们却是庞然大物。

人们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的超级计算机搭载了数万个这样的GPU，处理能力可达数十万个TFLOPS。如此等级的运算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模拟各种需要庞大计算的系统，比如预报天气，建

立气候模型，计算一架飞机四周的气体流动或者构造一个蛋白质；还可以模拟宇宙最原始时期的大事件，如一颗星星的死亡、星系的演化、基本粒子的碰撞，甚至一次核爆炸。

在这些模型中使用的微分方程或微分方程数值的求解工作，过去只能交由数学家完成。这是否意味着超级计算机已经像数学家一样聪明了呢？当然不是，至少目前不是。人工智能的挑战之一，就是未来某一天可以利用其计算能力完成通常只能由人类和动物完成的高智能工作。

但还是要小心这种表面现象，因为人工智能程序在某些领域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2017年，由东京大学研究计算机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专家新井纪子设计编写的程序顺利通过了该大学入学考试。这个被命名为“东大”（东京大学的简称）的程序在语文、数学和英语等学科的考试成绩甚至要高于80%的考生。要知道这个程序系统可是丝毫不会像人一样思考，它对自己所写的内容更是毫无概念，它的成功也说明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跟机器的智力一样肤浅。好在我们欣喜地得知“东大”并没有通过最终考试。

[1] FLOPS是处理器每秒操作浮点运算次数的度量单位。1 MFLOPS表示每秒100万个数字运算（“浮点”的加法或乘法）。1 GFLOPS表示每秒10亿次的浮点运算，即1000 MFLOPS。1 TFLOPS表示每秒1万亿次浮点运算，或1000 GFLOPS，即100万MFLOPS或每秒 10^{12} 次操作。

2

人工智能艺术家

人工智能是一名精于模仿的艺术家。它能熟练地模仿他人的风格进行创作，例如能够神奇地将任何一张照片转化成莫奈风格的油画，还能将冬天的景色变成春天的，[1]或是用一匹斑马替换某个视频中的一匹马。因此，必须小心提防此类虚假视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艾哈迈德·埃尔加马尔（Ahmed Elgammal）团队开发出一套系统，该系统创作出来的画作与原作品风格无异，连专家也无法辨认真假。[2]

音乐领域也是如此，许多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声音合成以及音乐作品创作。2019年3月21日，谷歌的“品红项目”（Magenta）[3]在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诞辰纪念日的纪念活动（谷歌涂鸦）[4]上一鸣惊人：它可以让一个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深谙谱曲和配乐的著名作曲家。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2019年2月4日晚在伦敦卡多根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当英语专场管弦乐团（English Session Orchestra）的66位音乐家演奏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未完成的交响曲”）时，这首交响曲已不再是“未完成”状态。因为华为实验室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分析了已完成的两篇乐章后，制作了残缺的后两章的旋律。当然，乐队使用的乐谱是由作曲家卢卡斯·康托尔（Lucas Cantor）根据旋律谱写的。

[1] <https://github.com/junyanz/pytorch-CycleGAN-and-pix2pix>

[2] <https://arxiv.org/abs/1706.07068>.

[3] <https://ai.google/research/teams/brain/magenta/>.

[4] <https://www.google.com/doodles/celebrating-johann-sebastian-bach>.

3

索菲亚：类人生物还是虚张声势

索菲亚是一位面带神秘微笑、长着一双玻璃眼珠的美丽的光头女人，“她”在2017年的许多舞台上都大放异彩。“她”动人的脸庞能够呈现数十种不同的表情，在调侃一个记者关于地球上有多机器人的担忧时，“她”笑道：“您好莱坞电影看太多了！”这个经典笑话让“她”如此酷似人类，以至沙特阿拉伯在当年授予了“她”沙特国籍。实际上，“她”只是一个由工程师预先设定好一系列标准答案的“木偶”。当我们与“她”交流时，所有的谈话内容均会经过匹配系统处理，并从得到的答案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输出。索菲亚欺骗了人们，“她”只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塑料制品，并不比东京大学的“东大”更聪明，只不过是我们（被这个激活了的物体所感动的人类）赋予了它某些智能。

4

飞速迭代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世界日新月异，不断地挑战新的极限。当一个关键问题被攻破后，便会进军新的领域，旧的领域便不再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而是会作为惯用工具存在。

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科学处于萌芽状态，将数学公式转化成可由计算机执行的指令尚属人工智能的范畴。但是现在，它只是编译器的基本功能：编译器能够将工程师编写的程序编译成可由计算机直接执行的指令序列。所有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都会学习这些知识。

再比如路径搜索，在20世纪60年代它显然属于人工智能领域，但如今，它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被使用的功能之一。在路径搜索的算法中，有一些可以使人们找到最短路径（相互连接的节点网络），例如，1959年的迪杰斯特拉算法[1]与1969年哈特、尼尔森和拉斐尔（Hart, Nilsson, Raphael）的A* 算法[2]。路径搜索已被运用于GPS（全球定位系统）中，不再具有技术先锋的性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基于逻辑和符号处理的自动推理技术的集合。拥护这个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用GOF AI称呼它，意思是“好的老式人工智能”，这带有一定的自嘲意味。

专家系统也是如此，它运用推理引擎，依据一些事实推断出

新的事实。例如，1975年，MYCIN专家系统能够帮助医生确定急性感染，如脑膜炎，并建议医生使用抗生素治疗。该系统囊括了大约600条规则，例如，如果传染性生物呈革兰氏阴性，并且是厌氧的以及棒状的，那么这样的生物就是类细菌（概率是60%）。

当时，MYCIN是一种创新。它的规则包括一些确定性因素，系统会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判断结果的可信度。它通过一个名为“反向链接”的推理引擎做出一个或多个诊断假设，然后根据使用人员输入的患者症状更改假设，做出最终的诊断，再给出建议使用的抗生素和建议使用剂量，同时还会提供某些可信指数以供判断。

为了打造这样一个系统，技术方的工程师必须坐在医生（专家）旁边，请后者详细地解释其诊断方式：如何诊断阑尾炎或脑膜炎，有什么症状。于是规则产生了：如果患者有这种症状，那么有多大概率是阑尾炎，有多大概率是肠梗阻，或有多大概率是肾绞痛。工程师会在数据库中手动编写这些规则。

MYCIN及其后续产品可靠性都很高，只不过都是实验阶段得出的结果，产品并没有投入应用。当时，医学计算机化刚刚开始，其数据的输入很乏味，并且一直都很乏味（现在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基于逻辑和树搜索的专家系统在被开发时都存在种种困难，并且极为复杂。如今，它们已被废弃，虽然如此，但它们仍然被拿来作为参考，活跃在人工智能教科书中。

尽管事实如此，但逻辑方面的工作最终还是衍生出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用，像方程的形式求解、数学积分的计算以及程序的自动验证等。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就会通过这类应用来验证

民航飞机控制软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人工智能研究的队伍中仍有一部分人在研究这些课题，而我所属的另一部分研究人员则投身于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机器学习。

[1] https://fr.wikipedia.org/wiki/Algorithme_de_Dijkstra.

[2] https://fr.wikipedia.org/wiki/Algorithme_A*.

5

让机器学会学习

推理能力仅是人类智力的一个小分支，我们还擅长使用类比的方式进行思考，或以直觉作为行动参考，逐步积累经验，认知世界。感知、直觉、经验等都是后天习得的能力，或者说是后天训练出来的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想制造出一种接近人类智能的机器，首先要做的就是赋予它学习能力。人脑是由860亿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编织的网络组成的，其中约160亿个神经元活跃在大脑皮层中。每个神经元与平均约2000个其他神经元通过一种被称为突触的结构连接。神经元通过创建突触、删除突触或修改其有效性而进行学习。因此，目前最流行的机器学习方法便是建立人工神经网络，并通过修改它们之间的连接达到学习的目的。

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基础原则。

机器学习的第一阶段可以被叫作学习或者训练，在此阶段，机器“学习”如何完成一项任务。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此时机器不再学习。

为了训练机器识别一张图片中的物体有汽车还是飞机，我们首先需要提供数千张汽车或者飞机的图像，让机器学习。每次当机器捕获图片时，其由人工神经元相互连接组成的内部神经网络——本质是由计算机计算的数学函数——便会处理该图片并输出相应答案。如果答案正确，那么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直接转到

下一张图片即可；如果答案不正确，那么我们可以调整机器内部的相关参数，即调整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使其输出的答案向正确答案靠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过不断调整的机器最终可以识别任何物体，不论该物体是否曾经出现在它见过的图像上。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为推广能力。

虽然机器识别图像的过程与人脑的工作原理相似，但机器与人脑之间依旧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我们来看一组对比数据：人类的大脑有 86×10^9 个神经元，通过约 1.5×10^{14} 个突触相互连接，每个突触每秒可执行上百次“计算”。一次突触计算相当于计算机进行上百次的数字运算（如乘法、加法等）。也就是说，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脑每秒可进行 1.5×10^{18} 次运算。当然，在现实中，大脑的神经元只有一部分一直处于被激活状态。相比之下，每个GPU每秒可执行 10^{13} 次运算，因此，需要10万个GPU才能接近大脑的运算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即人类大脑消耗的功率大约为25瓦，而一个GPU的消耗是人脑的10倍，即250瓦。电子的效率是生物的一百万分之一。

6

技术混搭

如今的应用程序通常是机器学习、GOFAI与传统计算机成果混搭的结晶，比如自动驾驶。车载视觉识别系统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卷积网络”的十分特别的神经网络结构，通过不断训练，它可以探测、定位和识别物体以及道路上出现的提示信息。但是当“看到”车道标记、人行道、静止的汽车或自行车之后，自动驾驶系统就会依据手动编写的经典的路线规划系统，或基于规则的系统做出决策。

目前，全自动驾驶汽车仍处于测试阶段，但有些已经投入市场的汽车，比如自2015年以来，特斯拉不断推出的电动车型，就已经配备了使用卷积网络的辅助驾驶系统。启动配备视觉系统的巡航定速装置后，汽车可以在高速上自动驾驶，并保持在同一车道上。当驾驶员发出转向指令时，它会检测前后是否有车，确认安全后做出转向动作。

7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人工智能

接下来，我们将遍历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现在先暂停一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人工智能的共同特征呢？

我认为，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执行通常由人类或动物完成的任务，即机器要有感知、推理和行动的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其学习能力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生物一样。人工智能系统只是十分复杂的电子电路和计算机程序，不过它们拥有存储和访问数据、快速计算以及学习的能力，这使得它们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抽象”出其中包含的信息。

关于感知、推理和行动，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先驱艾伦·图灵（Alan Turing）早有预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译了德军的信息编码系统——恩尼格玛密码机。图灵早已预见了机器学习的重要性，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与其编写程序模拟成人的思维，倒不如模拟孩童的思维，此后再给予它适当的培训，它就会拥有成人的思维。”^[1]

艾伦·图灵的名字与著名的图灵测试息息相关，该测试的内容是让一个人与他看不见的两个测试者（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进行书面对话，^[2]由第三者（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辨识。如果这个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辨别出哪一方是机器，那么表明这台计算机通过了测试。但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研究者认为这样的辨别测试已经没有必要了。对话能力仅仅是智力的一种特殊展现形式，如今的人工智能完全有能力编造

一个骗局，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心不在焉、有轻度自闭症、英语口语差劲的东欧少年，以此作为借口来解释它语言上的误用或句法错误.....

[1]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October 1950 , vol. 59 ,no. 236.

[2]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October 1950 , vol. 59 ,no. 236.

8

人工智能的未来

深度学习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我对此深信不疑。然而目前的深度学习系统仍无法进行逻辑推理，因为当前的逻辑与学习能力并不匹配，这是未来几年的主要挑战。

因此，深度学习的能力十分强大却又十分有限。只受过国际象棋训练的机器根本无法下围棋，反之亦然，而且它完全不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它只不过是机械化地执行指令，它所掌握的常识甚至还不如一只野猫。如果以生物的智能做一把标尺，人类的智能为100，老鼠的智能为1，那么人工智能在标尺上的位置可能更接近后者，尽管它们在执行十分精确严密的任务时所表现出的性能都远超人类。

9

算法的广阔天空

算法是指令序列，这就是它的全部，没有任何神奇、难以理解的地方。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想要按升序排列一组数字，为此我还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首先，读取第一个数字，将其与下一个数字做比较，如果第一个数字大于第二个数字，则将它们的位置调换；其次，比较第二个和第三个数字；之后不断重复这个操作，直到比较完列表中的最后一个数字为止。我根据列表的长度重复以上过程，直到表中的数字按照升序排列。

上述程序使用的算法被称为“冒泡排序”，我可以用伪编程语言将这一过程翻译为一组明确的指令。

冒泡排序（表 T ）

变量 i 从 $(T-1)$ 遍历到 1 (T 为数组的大小)

变量 j 从 0 到 $(i-1)$

如果 $T[j+1] < T[j]$

交换 ($T, j+1, j$)

取一个值，与另一个值进行比较，与第三个值相加，进行数学运算，执行循环操作，检验条件为真或为假，等等，这些都是算法。一个算法就像一个菜谱。

我们经常谈及脸书的算法、谷歌的算法，这其实是一种语言上的误解。比如谷歌的算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算法集合，它

可以生成一个包含搜索内容在内的所有网站的列表，网站的数量可达数百个甚至数千个。然后，谷歌为每一个站点分配一系列由手写算法或经过训练的算法生成的数值。这些数值可以评估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可靠性和网站内容的趣味性等。如果搜索的内容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些数值可以评估网站给出的答案以及网站内容与用户兴趣是否匹配。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但是，就一个训练好的系统而言，生成数值的代码在原理上非常简单，如果不考虑运行速度，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因为快速运行的需求会使代码变得复杂）。系统的真正复杂之处在于网络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这种复杂性取决于该网络的体系结构及其训练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计算数值的代码。

在探讨智能机器的内部工作原理之前，我想概述一下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工智能历史的主要脉络。这是一场我很早就参与其中的激动人心的冒险，这个过程有争论、有幻想、有暂时的停滞，也有只相信机器逻辑的科学家和像我一样从神经科学以及控制论中得到启发，为发展智能机器而通力合作的人。

第二章

人工智能和我的学术生涯

1

永恒的追求：让机器拥有智能

正如美国女作家帕梅拉·麦科多克（Pamela McCorduck）所写的那样，人工智能的历史始于“人类扮演上帝的古老愿望”。长久以来，人类一直试图创造出带有生命特征的机器。20世纪，得益于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进步，人们甚至幻想制造拥有人类思维的机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第一批机器人和计算机的诞生，一些乌托邦主义者甚至预测机器很快就能拥有人类的智能。这一梦想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离真正的智能化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在这趟追寻智能化的长途之旅中，技术是否创新是前进的决定性因素，人们追求的是使计算机以更小的容量存储更多的数据，并以更快的速度运行。1977年，重达5吨、功率消耗约为115千瓦、造价800万美元的Cray-1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为160 MFLOPS。如今，一个人花300欧元购买的一台游戏专用计算机都具备10 TFLOPS的计算能力，性能比Cray-1提高了6万倍。在可预见的将来，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能具备如此等级的计算能力。

如果要追溯这段旅程的开端，那就让我们从诞生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吧。1956年夏，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组织了此次会议。马文·明斯基对研究具备学习能力的机器这件

事充满热情。1951年，他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校友共同开发建造了SNARC，这是最早的神经机器之一。SNARC具有40个能够进行基础学习的“突触”，属于小型电子电路神经网络。约翰·麦卡锡则发明了人工智能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编程语言LISP。他还发明了最初应用于国际象棋游戏程序的一种树搜索算法（也就是 α - β 搜索法）。参加此次会议的研究人员大约有20位，其中包括任职于贝尔实验室（通信巨头AT&T公司位于新泽西的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IBM公司的内森·罗切斯特（Nathan Rochester），以及机器学习理论的先驱雷·所罗门诺夫（Ray Solomonoff）。他们就新兴的计算机科学和控制论带动下的某些全新的领域交换了意见，它们包括自然与人工系统之间的规则、复杂信息的处理、人工神经网络、自动机器的理论等。这次小规模会议起草了一份原则声明，该声明标志着由约翰·麦卡锡提出的“人工智能”一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2

传统智能难以复制

此后，部分科学家认为智能机器的底层逻辑就是树搜索和专家系统的结合。工程师为机器提供事实数据和规则，系统基于提供的数据和规则推断出其他事实。研究的目的是制造出一种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复杂推理的机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艾伦·纽维尔（Al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逻辑理论家计划（Logic Theorist），期望通过探索由数学公式转化构成的树来证明简单的数学定理。那是一个对人工智能寄予厚望的时代。

但是在1970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ARPA[1]削减了美国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的预算，人工智能由此进入第一个寒冬。三年后，因为莱特希尔的报告[2]极大地打击了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热情，英国同样采取了削减预算的战略。没有资金投入，研究也就陷入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受到专家系统的巨大鼓舞，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日本开启了雄心勃勃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旨在赋予计算机系统逻辑推理能力，使其能够进行对话、翻译文本、解释图像，甚至像人类一样进行推理，可惜项目以失败告终。类似于我们描述过的专家系统MYCIN，它的实际开发与商业化都比人们的预期困难很多。事实证明，让技术工程师坐在医生或其他工程师身边，试图详细记录两者在识别疾病或诊断故障时的智力活动过程，是行不通的。人们幻想将专家的知识体系

和智力活动过程简化为一套规则，但事实远比幻想要复杂得多、昂贵得多、不可靠得多。

树搜索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传统智能，然而这种传统智能却难以复制。

[1] 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1972年改名为DARPA，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研究与发展（R&D）项目的机构。

[2] 通常指詹姆斯·莱特希尔（James Lighthill）1973年发表于“人工智能：论文研讨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paper symposium）的论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General Survey”（《人工智能：概览》）。——译者注

3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战争”

1997年，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与IBM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在纽约展开了6场复仇赛。“深蓝”是一个长约2米、重1.4吨的庞然大物。此前已有三局平局，在第六场比赛中，卡斯帕罗夫仅走了19步就投子认输，无助的手势凸显了失败的辛酸。他承认自己被机器的探索能力征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深蓝”。为了更加有效地分析棋盘上的位置，IBM的工程师为它安装了30个处理器，扩充了480个专门设计的电路。拥有如此强大的计算能力，“深蓝”可以使用相对传统的树搜索技术每秒计算约2亿个棋盘位置。

2011年2月14日至16日，IBM的沃森计算机参加了美国一档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并在三轮比拼后脱颖而出，拔得头筹。在节目中，沃森的形象是一个顶部闪着光的地球仪，站在它左右两侧的对手是《危险边缘》节目的两位前冠军。计算机科学家为沃森编写了专门用来竞赛的程序，使它可以排除问题中的非关键词（冠词、介词等），从而识别出有意义的单词，然后从约2亿页的文本中搜索相关单词以及可能是对应答案的句子，最后选择最合适的答案输出。这2亿页文本来自整个维基百科、大量百科全书、各类词典、各种索引文献、新闻信息以及文学作品，它们全部存储在容量为16 TB^[1]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中（硬盘的读取速度对这种应用场景来说太慢了）。成千上万个实词和专有名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词条列表，每个词条都对应了

其可能出现的维基百科的文章、网页或文本。沃森的系统会检索是否存在某个文档包含了问题中出现的关键词，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该文档中找到正确答案。

例如，如果问题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出生地是哪里”，那么沃森会判定答案是一个地名。它会在数据库中检索出所有提及**巴拉克·奥巴马**的文档，其中必然会有某篇文章的用词包含“**奥巴马**”“**出生**”“**夏威夷**”。最后，它只需在选项中选择“**夏威夷**”就好了。沃森本质上是由信息检索系统和优秀的数据索引组成的，它并不理解问题的含义，而只会像一个小学生参照书本（或维基百科）做作业那样，在“书本”上找到正确答案并照抄出来，实际上它也不理解自己所写的内容。

2016年，人工智能在首尔有了新的战绩。韩国围棋冠军**李世石**（Lee Sedol）向他的计算机对手AlphaGo鞠躬致敬。在这次比赛中，**李世石**以1：4负于AlphaGo。后者是由谷歌子公司DeepMind设计的大型系统，它整合了几种已知相对成熟的技术——卷积网络、强化学习和蒙特卡洛树搜索（一种随机树搜索方法）。与“深蓝”不同，AlphaGo受过专门“训练”，它通过与自己对战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但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战争”刚刚开始而已……

[1] TB（太字节）是数字信息量的度量单位，换句话说，是内存大小的单位。它代表1万亿字节。一个字节用于编码多达256个不同的值。

4

神经流派的崛起

20世纪50年代，当基于逻辑和树搜索的传统人工智能触及极限时，机器学习的先驱纷纷开始发声。他们认为，要使人工智能像人类或动物那样执行复杂任务，仅靠逻辑是不够的，而应该以大脑的学习机制为蓝图，设计出更加接近大脑的、能够自行规划的系统。我走的就是基于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道路。这种研究几乎活跃在所有当前热门应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动驾驶。

神经网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热衷于研究神经连接在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人工智能领域的乌托邦主义者是唐纳德理论的拥护者，他们认为，与其重现人类推理的完整逻辑序列，不如探索它们的载体，也就是大脑这个强大的生物处理器。

因此，旨在模拟生物神经电路的计算机科学家被人们统称为神经流派（与之前的逻辑流派或顺序流派相反）。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基于一种原创体系结构的机器学习方式，这种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数学函数网络，我们类比人类的神经网络，称它为人工神经元。当网络接收了输入信号，其中的神经元将以原创体系结构对其进行处理，以便输出端能够识别该信号。简单元素——人工神经元——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复杂的认识。就像在大脑中，基本功能单元——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产生了思想一样。

这股研究潮流始于1957年，当时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在康奈尔大学开发出了感知器，它是第一台受唐纳德·赫布认知理论启发而被开发出来的学习机，它在经过训练后便可以拥有识别形态的功能。因为到目前为止，感知器仍是机器学习的参考模型，我们将会在下章对其进行详细探讨。

20世纪70年代，两位美国人，时任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州立大学的电气工程教授理查德·杜达（Richard Duda）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SRI）的计算机科学家彼得·哈特（Peter Hart），评估了所有被称为“统计形式的识别”的方法，[\[1\]](#)并撰写了一本评估手册，感知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手册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模式识别领域的参考标杆。对所有的学生，甚至于我而言，它都是一本行业“圣经”。

但感知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系统由单层人工神经网络构成，功能十分有限。研究人员也曾试图引入多层神经网络来提高效率，但囿于没有找到相对应的训练算法（优良的指令序列）而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机器学习方法的作用十分有限。

[\[1\]](#) Richard O. Duda, Peter E. Hart, 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Scene Analysis, Wiley, 1973.

5

遭遇寒冬

1969年，西摩尔·帕普特（Seymour Papert）和马文·明斯基（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热衷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后来放弃了）联合出版《感知器：计算几何学概论》一书。^[1]他们在书中指出了学习机的局限性，其中有些局限性对于技术发展会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对他们来说，神经网络的研究之旅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这两位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极负盛名的权威教授，他们的作品在领域内引起了轰动：资助机构纷纷退出，不再支持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与GOF AI一样，神经网络的研究也遭遇了它的一个“冬天”。

大多数科学家不再谈论制造具有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之事，转而把目光转向了更容易落地的项目。比如，运用一些原本用来研究神经网络的方法创建了“自适应滤波”，这是许多现代通信技术的起源。在此之前，当我们通过电话线在两台计算机之间交换数据时，电话线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形：我们输入一个二进制信号，电压从0伏升到48伏，而信号在距离目的地还剩几公里时就已经损坏了。但现在，自适应滤波器能将其复原，这个过程是通过以其发明者鲍勃·拉迪（Bob Lucky）的名字命名的Lucky算法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鲍勃·拉迪曾在贝尔实验室担任部门经理，领导着约300人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

如果没有自适应滤波，就不会出现带扬声器的电话。扬声器可以让我们对着麦克风讲话，而它不需要同时记录对话者说的话

（有时我们能听到自己在说话）。回声消除器使用的算法与感知器使用的算法非常相似。

如果没有自适应滤波，也不会出现调制解调器[2]。调制解调器能让一台计算机通过电话线或任何通信线路与另一台计算机实现通信。

[1] Marvin L. Minsky, Seymour A. Papert, *Perceptrons :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Geometry*, The MIT Press, 1969.

[2] 调制解调器是包括调制器和解调器的设备，用于通过电话或同轴电缆传输数字数据。——译者注

6

狂热的疯子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寒冬”里，仍有一些人执着于神经网络研究，科学界把他们视为狂热的疯子。比如，芬兰人戴沃·科霍宁（Teuvo Kohonen），他研究的是一个与神经网络比较接近的课题——联想记忆。再比如，还有一群日本人，与西方不同，日本的工程科学生态系统比较孤立，其中包括数学家甘利俊一（Shun-Ichi Amari）和一位名为福岛邦彦（Kunihiko Fukushima）的业内人士，后者发布了一个被他称为“认知机”（Congitron）的机器，这一命名来自术语“感知器”（perceptron）。福岛邦彦前后一共发布了这个机器的两个版本，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机和80年代的神经认知机（Neocognitron）。与同时代的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一样，福岛邦彦也受到了神经科学新发现的启发，特别是美国人大卫·休伯尔（David H. Hubel）和瑞典人托斯坦·威泽尔（Torsten N. Wiesel）的发现给予了他很多灵感。

休伯尔和威泽尔是两位神经生物学家，他们因在猫的视觉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发现视觉是视觉信号通过几层神经元传递后呈现的结果，包括从视网膜到初级视觉皮层，再到视觉皮层的其他区域，最后到颞下皮层。在这些层级中，神经元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在初级视觉皮层中，每个神经元仅连接到视野的一小部分区域，即接收区域。这些神经元被称为简单细胞。在下一层，即视觉皮层中，

其他单元集成了上一层激活的信息，使得视觉对象即使在视野中稍微移动，视觉系统也能保持图像的呈现。这些单元被称为复杂细胞。

福岛邦彦便是受到这个研究成果的启发，延伸出了一个想法：先利用一层简单细胞检测各个小接收区域所接收的图像的简洁信息，再利用下一层复杂细胞处理收集到的信息。他研发的神经认知机共有5层：简单细胞、复杂细胞、简单细胞、复杂细胞，最后是类似感知器的分类层。福岛在前四层使用了某种“不受监督”的学习算法，也就是说，它们接受的是不考虑完成任务的、“盲目”的训练。仅有最后一层像感知器一样，接受了“受监督”的训练。但从总体来看，福岛邦彦缺乏一种可以调整所有层级参数的算法，所以他的网络只能识别诸如数字一类极其简单的事物。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岛邦彦并非独自一人在此领域进行探索，北美的一些团队也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例如心理学家杰伊·麦克莱兰德（Jay McClelland）和戴夫·鲁梅尔哈特（David Rumelhart），还有生物物理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和特伦斯·谢诺夫斯基（Terry Sejnowski），以及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辛顿与我共享了2018年度图灵奖。

7

被兴趣激发的人

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开始对这些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好奇也许来自对父亲的观察。他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动手天才，他总是喜欢在业余时间做电子产品。他制作过遥控飞机的简化模型。记得那是在1968年5月大罢工^[1]期间，父亲在家里制作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遥控汽车和一艘船的遥控器。我并不是家里唯一被激发兴趣的人，我弟弟也是。他比我小6岁，同样受到父亲的影响，后来也成为计算机科学家。他大学毕业后成为谷歌的研究员。

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对技术、征服太空以及计算机的诞生充满了探索的热情。我曾梦想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因为人类智能的出现及演化深深地吸引了我。即使在今天，我也依旧认为大脑的运行机制是生命世界上最神秘的事物。我8岁的时候，在巴黎跟我的父母、一位叔叔和一位沉迷于科幻的阿姨一起看过一部电影——《2001太空漫游》。影片里出现了我所热爱的一切：太空旅行、人类的未来以及超级计算机哈尔的起义。哈尔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完成最后的任务而要展开屠杀，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议，而在这之前，如何将人工智能复制到机器中这个问题就已经让我深深着迷了。

鉴于此，高中毕业后我自然而然地打算投身这个领域进行具体研究。1978年，我进入了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就读该学院无须参加预科课程，可以在高中毕业后直接申

请。我的实践经历证明，读预科并不是在科学之路上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而且，我在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学习时拥有很多自主权，所以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利用！

[1] 这里的大罢工指“五月风暴”，是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译者注

8

卓有成效的阅读

在第一批让我感到欣喜的读物中，有一份是我在1980年读过的报告。这实际上是一份辩论总结，辩论是在瑟里西（Cerisy）会议上展开的，主题是人类语言机制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1]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是，大脑中生来就已经存在能够让人们学习说话的结构。而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则认为，一切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包括大脑中学习说话的结构，语言学习是随着智能的逐步建构而分阶段完成的。因此，智力的获得是人与外界交流学习的结果。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将其应用于机器学习中。也有其他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参加了这场辩论，比如西摩尔·帕普特，他极力颂扬了感知器，认为它是能够学习复杂任务的简单机器。

我因此知道了感知器的存在，并迅速沉迷于这个课题。我利用每周三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在罗康库尔的Inria（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的图书馆寻找专业图书来读。在法兰西岛大区，Inria掌握着最为丰厚的计算机研究经费。我在阅读过程中很快发现，西方科学界尚无人研究神经网络。同时我还惊奇地发现，有关感知器的研究就截止在西摩尔·帕普特所称颂的感知器上，此外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系统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控制论）是我的另一个研究爱好，它主要研究人工系统和天然生物系统。比如人类体温

的调节系统：人体温度之所以能够维持在 37°C 左右，主要得益于一种恒温器，它可以调节人体温度与外界温度之间的差异。

我对“自组织”也有浓厚的兴趣。分子或相对简单的物体是如何本能地相互作用组成复杂结构的？智能是如何从大量相互作用的简单元素（神经元）中发展而来的？

我研究了柯尔莫哥洛夫、所罗门诺夫和柴廷（Chaitin）的算法复杂性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此外，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理查德·杜达和彼得·哈特[2]的书就摆放在我的床头，同时我还订阅了《生物控制论》，这是一本涉及大脑运作原理和生命系统的计算机数学模型的期刊。

因此，所有因为“寒冬”而被忽视的人工智能问题都呈现在我面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以逻辑的方式无法建构真正的智能机器，我们必须赋予机器学习的能力，让它们能以经验为基础进行自我建构。

在阅读期间，我发现科学界不只我有这种想法，因此我也注意到了福岛邦彦的研究成果，并开始思考提高新认知中心神经网络效率的方法。对正式开展研究来说比较幸运的是，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当时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我与学校里的朋友菲利普·梅曲（Philippe Metsu）一起开始编写程序。他同样热爱人工智能，尤其对儿童的学习心理感兴趣。学校里的数学老师也愿意指导我们，我们一起尝试模拟神经网络。但实验十分费力：计算机进步缓慢，编写程序也着实令人头疼。

在学校的第四年，我由于更加沉迷于这项研究，开始设想一种用于训练多层神经网络的学习规则，可惜并没有真正得到数学层面的验证。我构想出一种可以在网络中实现从后向前传递信号

的算法，用来实现端到端的训练，我将它命名为HLM算法（取自分层学习机的英文名称hierarchical learning machine，参见第五章相关内容）。命名这个算法的时候，我还玩了一个有趣的文字游戏[3].....在HLM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梯度反向传播”算法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训练深度学习系统。HLM与如今的反向传播梯度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HLM传递的是每个神经元的期望状态。因此在当时计算机运算乘法的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二进制神经元。HLM算法是训练多层网络的第一步。

[1] Théories du langage, théories de l'apprentissage : le débat entre Jean Piaget et Noam Chomsky, débat recueilli par Maximo Piatelli-Palmarini, Centre Royaumont pour une science de l'homme, Seuil, 《Points》, 1979.

[2] Richard O. Duda, Peter E. Hart, 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Scene Analysis, op. cit., p. 6.

[3] 在法语中，HLM是低租金住房（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的缩写。
——译者注

9

我的偶像

1983年夏，我从工程专业毕业时，从一本书上了解到一个对自组织系统和自动机网络感兴趣的小组：网络动力学实验室（LDR）。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巴黎圣纳维耶沃综合理工学院的旧址，小组成员都是法国人，他们来自各大高校。因为该小组不挂靠任何机构，所以几乎没有经费和预算，只有一台回收的计算机。从另一个角度说，法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当时正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我拜访了他们。和我不一样，这些研究人员没有接触过有关神经网络的早期出版物，但他们熟悉其他作品。

我向他们表示，我对他们的研究课题感兴趣，而且我所在学院的设备有助于他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后来，我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时，也加入了他们的小组。1984年，我准备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当时我有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的研究奖学金，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文指导老师。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苏利耶（Françoise Fogelman-Soulié，后来更名为Soulié-Fogelman）与我共事了很长时间，她当时是巴黎第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副教授。从能力上来讲，她完全可以指导我，可惜，她还没有完成国家博士论文（此资格是欧洲教育体系的特色），所以她没有取得指导博士论文资格。

因此，我只能求助于实验室中唯一一位能够指导计算机博士论文的教授莫里斯·米尔格朗（Maurice Milgram），他是贡比涅技术大学计算机和工程科学的教授。他同意成为我的导师，但

同时表示他对神经网络一无所知，所以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关照。那段时间，我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和它强大的计算机）和LDR（和它的知识环境）中。

我身处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这实在令人兴奋。在国外，也有一些课题跟我们接近的研究小组正在慢慢起步。1984年夏，我陪同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带有传奇色彩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

当时，我十分渴望见到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来自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特伦斯·谢诺夫斯基（《深度学习》作者），另一位是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杰弗里·辛顿，后者与约书亚·本吉奥和我共同分享了2018年度的图灵奖。辛顿和谢诺夫斯基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有关玻尔兹曼机（Boltzmann Machines）的文章，并在其中描述了一个带有“隐藏单元”的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这个隐藏单元是位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中间层的神经元。我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到了多层神经网络的训练，这可是我研究课题中的核心问题，他们是真正对我的研究有价值的人！

10

“你认识一个叫杨立昆的人吗？”

我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出现在1985年2月，在阿尔卑斯山莱苏什举行的研讨会上。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了当时世界上对神经网络感兴趣的顶级专家，他们有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遇到了在科学界宛如神话一般的贝尔实验室里一个新成立的研究神经网络的小组成员。得益于在莱苏什的相识，三年后，我被该小组聘用。

这次研讨会是由我所在的法国研究小组LDR的成员组织的，他们是弗朗索瓦丝和她当时的丈夫热拉尔·韦斯布赫（Gérard Weisbuch），后者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以及当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任职的理论神经生物学家埃利·比嫩斯托克（Élie Bienenstock）。会议汇聚了许多对“自旋玻璃”感兴趣的物理学家，以及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权威人士。

自旋是基本粒子和原子的特性。此特性可将它们同化为向上或向下的小磁体，这两个状态可以与人工神经元的两个状态进行类比：激活或者非激活。它们遵守相同的规则。自旋玻璃是一种晶体，其中的杂质原子充斥着自旋，每个自旋依据耦合权重与其他原子自旋交互。如果权重为正，则它们倾向于在同一方向上对齐；如果权重为负，则它们倾向于相反的方向。我们将向上自旋赋值为+1，将向下自旋赋值为-1。每个杂质原子的自旋方向取决于相邻杂质原子的加权和。换句话说，确定自旋方向的函数类

似于确定神经元处于激活或非激活状态的函数。约翰·霍普菲尔德那篇关于自旋玻璃和神经网络的开创性文章[1]，引得许多物理学家开始关注并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但当时仍有许多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不愿谈及这个话题。

在莱苏什，我是年龄最小的与会者之一，我当时刚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令我无比紧张的是，我需要在众多享誉业界的大咖面前，用英语做一个关于多层网络和HLM算法（反向传播的前部研究）的英文报告。

尤其有两位听众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一位是贝尔实验室的部门负责人拉里·杰克尔（Larry Jackel），后来我很荣幸地加入了他的部门；另一位是该部门的二号人物约翰·登克尔（John Denker），他是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真正牛仔，身穿牛仔裤和牛仔靴，有着垂到脸颊的头发……这位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的“非典型研究人员”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气场！当某位研究者发言之后，他能够很快就议题展开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谈话时虽没有攻击性，却掷地有声，有理有据。当然他的自信也是有缘由的，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曾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有着巨大的优越感。当你要研究某个课题时就会发现，要么贝尔实验室早在10年前就已经研究过了，要么已经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了。”简直太可怕了！

我做完了关于多层网络和HLM算法的报告，与会者中真正听懂的人寥寥无几（这已经让我够紧张了！），然后，约翰·登克尔举起了手，我简直紧张到窒息！但他在所有听众面前对我说：“讲得真的很好！谢谢您，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确信我的名字已经留在他和拉里·杰克尔的脑海中。一年后，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实验室做报告。两年之后，我接受了贝尔实验室的面试。三年后，我正式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同样是在莱苏什，我碰到了特伦斯·谢诺夫斯基，也就是与杰弗里·辛顿共同发表关于玻尔兹曼机的文章的作者。他是在我完成报告后到场的。我在下午的茶点时间找到了他，向他阐述了我多层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在交流之前，我并不确定他是否会感兴趣。他只是耐心地听着，并没有告诉我他与杰弗里·辛顿也在进行反向传播研究，也没有告诉我，辛顿已经成功实现反向传播，只不过没有对外公布而已。

伟大的发明之间能够相互启发。辛顿的研究就使用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戴夫·鲁梅尔哈特的思路，辛顿在之前的几年里曾跟随戴夫读博士后。1982年，戴夫提出这个方法并编写了程序，只可惜没能成功运行。他找到辛顿，辛顿说：“失败的原因出在了局部一些极为细微的问题上。”（参见第四章“多个谷底的困扰”）后来，戴夫放弃了。但是，在研究玻尔兹曼机的过程中，辛顿意识到问题并没有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因此，他用LISP语言在Symbolics公司的LISP机器上用戴夫的方法重新编写了程序，这一次程序成功运行起来。

因此，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特伦斯很快注意到我的HLM方法和反向传播非常相似。他没有告诉我，在反向传播成功后，他已经在研究此后几个月将会风行一时的实际应用了。特伦斯回到美国后向辛顿提到了我：“法国有个孩子在进行跟我们同样的研究！”

同年春天，我写了第一篇关于自己研究成果的文章（我承认，这篇文章离科学文献的标准有点远），并在1985年6月举办的Cognitiva大会上将其公开，那是法国第一次召开集合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综合性大会。杰弗里·辛顿是当时的主讲嘉宾，他在开幕辞上介绍了玻尔兹曼机。结束后，将近50个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我也想上前交流，但并没有机

会靠近他。随后，我注意到他转向其中一位会议组织者丹尼尔·安德勒（Daniel Andler），并问道：“你认识一个叫杨立昆的人吗？”丹尼尔开始四处观望，我立马大喊道：“我在这儿。”其实，辛顿已经在会议论文集上看到了我的文章，虽然他不精通法语，但依然看懂了文章的内容，他意识到我就是特伦斯提过的那个“孩子”。

我们在第二天碰了面，并一起在一家古斯古斯（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美食）餐厅吃了午饭。他向我解释了反向传播的原理，他知道我能听懂！辛顿说自己正在写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我的研究成果，我听后非常自豪。我俩很快意识到，我们的兴趣、方法以及思路都十分相似。辛顿邀请我参加1986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举办的关于联结主义模型的暑期培训班，我欣然接受。当时在认知科学界，研究者通常用“联结主义模型”这个术语来称呼神经网络这个未知领域。

[1] John J. Hopfield, Neural networks and physical systems with emergent collective computational abil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2, 79 (8), pp. 2554 –2558 , DOI : 10.1073 /pnas. 79.8.2554.

梯度反向传播的运用

发明无法一蹴而就，它们是经历反复实验、失败、进入低谷和讨论的结果，通常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实现。人工智能的前沿阵地也是如此，在接连不断的新发现的推动下步步向前。20世纪80年代，梯度反向传播的普及使得训练多层神经网络成为可能。该网络由成千上万分层的神经元组成，其间的连接更是数不胜数。每层神经元都会合并、处理和转换前一层的信息，并将结果传递到下一层，直到在最后一层产生响应为止。这种层次体系结构赋予了多层网络能够存储惊人的潜能，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深度学习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不过，在1985年，多层网络的学习过程仍然很难实现。物理学家对完全连接的神经网络（霍普菲尔网络）和自旋玻璃之间的类比更感兴趣，他们认为人脑中有一个联想记忆模型。普鲁斯特通过描绘玛德莲蛋糕的形状、气味和口感回想相关联的图像和情感，[\[1\]](#)即记忆；而多层网络就是在感知模式的基础上运行的。多层网络是通过何种机制仅仅从形状就辨识出玛德莲蛋糕的？物理学家还没有给出答案。

这一切在1986年发生了转变。特伦斯·谢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篇探讨NetTalk多层网络的技术报告，NetTalk通过反向传播训练使机器学习阅读。该系统将英文文本转换成一组语音音素（基本语音）后传到语音合成器，从而实现“阅读”的功能。将文本语音转换成法语很简单，转换成英语却十分困难。在训练的初期，这

个系统如同一个刚开始学习说话的婴儿，随着训练的不断积累，它的发音也越来越好。特伦斯·谢诺夫斯基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场做了相关报告，震惊了现场听众和业界。随即，所有人都希望向我取经，因为多层网络突然变得十分流行，我也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在这之前的一年，我发现可以用拉格朗日[2]形式从数学的角度反向传播，这类形式化是传统机械、量子机械和“最优控制”理论的基础。我还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最优控制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个类似反向传播的方法，这个方法被命名为“凯利——布赖森（Kelly-Bryson）算法”，也被称为“伴随状态法”。在1969年出版的由亚瑟·布赖森（Arthur Bryson）和何毓琦（Yu-Chi Ho）合著的《应用最优控制》（*Applied Optimal Control*）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讲述。

这些科学家从没想过将这个方法应用到机器学习或者神经网络领域，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系统的规划和控制。比如，如何控制火箭，使其到达一个精准的轨道并且和另外一个航空器对接，且同时要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而从数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和调整多层神经网络节点的权重问题非常相似，这样最后一层的输出结果就会符合预期。

后来，我又了解到有好几位学者的发现都十分接近反向传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发现了反向传播中梯度的基本单元——“反向——自动微分”。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用它来寻找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或者做函数优化，而不是用于多层网络的学习，可能只有上过何毓琦课程的哈佛大学的保罗·韦尔博斯（Paul Werbos）是个例外。韦尔博斯于1974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使用被其称为“有序导数”的方法来进行机器学习。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测试了他的方法。

1986年7月，应辛顿之邀，我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关于联结主义模型的暑期课程（见图2—1）。这次美国之行我其实是有顾虑的，因为当时我的妻子正在孕中，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在我回法国4周后降生。



图2—1 1986年有关联结主义模型的暑期课程班学员

照片中标出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D）、迈克尔·乔丹（MJ）、杰伊·麦克莱兰德（JMcC）、杰弗里·辛顿（GH）、特伦斯·谢诺夫斯基（TS）和我（YLC）。除此之外，照片上的许多参与者日后都成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安迪·巴尔托、戴夫·图尔茨基、格里·泰绍罗、乔丹·波拉克、吉姆·亨德勒、迈克尔·莫泽尔、理查德·德宾等组织者。

图片版权：暑期学校的组织者

我对那个夏天最深的记忆就是我与辛顿，还有刚完成博士论文的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建立了一个研究神经网络的

团队，我们三个人之间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什么邀请迈克尔呢？因为他的法语比我的英语好。在暑期培训班的野餐会上，他弹着吉他演唱了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的歌。

虽然我还只是个学生，但辛顿还是邀请我做了一场报告，并介绍说我发现反向传播。在一次晚餐时，我们享用着我带来的一瓶很棒的波尔多红酒，辛顿跟我说，他将在一年后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入多伦多大学。他问：“你愿意成为我的客座研究员吗？”我回答：“当然了！”这一年时间正好够我完成博士论文。

大变革的时代到来了。鲁梅尔哈特、辛顿、威廉联合发表的关于反向传播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爆炸式的反响。^[3]NetTalk成功的消息也迅速传播开来。神经网络领域的研究走上了快车道。我制作的名为HLM的神经网络模拟和反向训练软件也吸引了法国工业界的一些买家，Thomson-CSF（现在名为Thales，即法国泰雷兹集团）就是我的顾客之一。

1987年6月，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通过了答辩。因为我在4月尝试一种新的沙滩帆船推进方式时伤到了脚踝，所以我借助拐杖才完成了答辩。杰弗里·辛顿是我的答辩委员之一，此外答辩委员会还有莫里斯·米尔格朗、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雅克·皮特拉（Jacques Pitrat，法国人工智能符号领域的科研领袖之一）和贝尔纳·安吉尼奥（Bernard Angéniol，Thomson-CSF的一个研究团队负责人）。同年7月，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们一岁的宝宝一起来到多伦多，我成为辛顿的客座研究员。我们预计在多伦多的生活不会超过一年，我的妻子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搁置了她的药剂师工作。我还指导着一个名叫莱昂·博图（Léon Bottou）的朋友。我与莱昂结识于1987年初，当时他正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

业。他对神经网络很感兴趣，因此决定跟随我做毕业实习。请千万不要告诉他们的校长我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当时，我正计划编写新的软件来创建并训练神经网络，它是由LISP解释器驱动的模拟器。

我把解释器的相关工作交给了莱昂，他仅用三周时间就完成了！此外，因为我们都拥有同款个人计算机——Commodore公司的Amiga（一款高分辨率、快速的图形响应、可执行多媒体任务的计算机），所以我俩的合作既愉快又高效。与现在的苹果计算机和其他品牌的个人计算机不同，Amiga计算机具有类似北美IT（信息技术）部门中常见的UNIX工作站的属性：我们使用C语言编程，使用GCC编译器和Emacs文本编辑器。我那台Amiga计算机安装了专供信息工作者使用的文本处理程序LaTeX，我就是利用它完成了博士论文。莱昂和我通过连接MiniTel（数字化电话信息的交互式媒体）远程交换程序代码段。

我们将程序命名为SN（simulator neuronal，神经模拟器），它也是我俩长久合作与友谊的见证。莱昂后来在纽约FAIR的办公室离我的办公室并不远。

在多伦多，我完成了SN，之后对其做了调整，以便实现我设想的一个可以用于图像识别的神经网络——卷积网络。卷积网络是受福岛邦彦的神经认知机启发而产生的一个想法，但它使用的是更为传统的神经元，并且受到反向传播的驱动。同时，杰弗里·辛顿开发了一种更简单的用于语音识别的卷积网络，他将其称为TDNN（时延神经网络）。

1987年年底，我应邀前往麦吉尔大学的蒙特利尔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做报告。报告结束时，一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提问中可以看出他在多层神经网络方面有比较深

入的研究。要知道在同时期，该领域的研究人员相当少。他想了解如何调整神经网络结构，并使其能够处理语音或文本等时间信号。我记住了他的名字：约书亚·本吉奥。他的问题非常有水平，我期待着在他毕业后与他合作。后来，在他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暂任职之后，我推荐他去了贝尔实验室。

[1] 情节源自法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的文学作品《普鲁斯特的小蛋糕》。——编者注

[2] 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3] D. E. Rumelhart, G. E. Hinton, R. J. Williams,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by error propagation, in D. E. Rumelhart, J. L. McClelland, PDP Research Group,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MIT Press, 1986 , vol. 1 , pp. 318 –362.

12

神圣之地

莱苏什的专题讨论会还产生了许多其他影响。1986年暑期培训班期间，拉里·杰克尔和贝尔实验室自适应系统研究部的成员打听到了我在匹兹堡的消息，因此邀请我在回程时到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做个演讲。我还记得第一次拜访贝尔实验室的情景，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实验室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殿堂，当时的先进技术几乎都出自这里，所有的物理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学的权威人物都聚集在这里。拉里·杰克尔的办公室距离阿瑟·阿什金（Arthur Ashkin）的办公室很近，后者因为在激光原子陷阱方面的研究贡献获得了201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阿瑟身边有一位名叫朱棣文的同事，他因发现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在199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尔实验室的“研究部”有1200名员工，分散在世界各地。研究部的掌门人是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他本人同样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的研究成果是发现了宇宙辐射并证明了宇宙大爆炸理论。能与这么多伟大的人物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我简直有些飘飘然。

贝尔实验室在新泽西的办公大楼位于纽约以南约60公里的霍姆德尔（Holmdel），这座大楼是由芬兰著名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大楼本身散发着令人惊叹的魅力。想象一下：它是一个高为8层、长300米、宽100米的玻璃长方体，里面汇集了约6000名、以工程师为主的工作者，光是我参

观的研究部就有300人左右。

1987年春，拉里·杰克尔又一次邀请我到贝尔实验室，这次是为了讨论入职面试。我告诉他：“请您也邀请我的妻子过来吧，她才是最需要被说服的人。”于是在我和实验室成员交流的时候，拉里带着我妻子伊莎贝尔和我们18个月大的宝宝凯文开车去兜风。他向我的妻子介绍了该地区的优点：绿意盎然的环境、美国特色的大房子和距离实验室不远的大海，新泽西当得起“花园之州”的美名。当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用餐时，凯文因为疲惫大哭。一位叫约翰·登克尔的长着络腮胡子的成员抱起了他，在餐厅里溜达，凯文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后来我得知，登克尔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因此他很会照顾小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而且还会说法语，会引用伏尔泰和佐拉的名言。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亚利桑那州牛仔！第二天，拉里和他的两个同事带我们去游览曼哈顿。那天天气并不好，但我们还是不顾门卫的劝告，乘坐双子塔的电梯爬上了世贸中心大楼。到达楼顶时，雾大到我们甚至看不到彼此！最终，盛情难却，伊莎贝尔和我决定在新泽西待一两年。

于是，我在1988年10月入职贝尔实验室。拉里的部门隶属于鲍勃·拉迪管辖，后者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工程师，是自适应滤波器算法的发明者。鲍勃·拉迪负责管理着BL113分部，该部门汇聚了霍姆德尔及其附近克劳福德山的大约300名研究人员，神经网络研究组也是因为他的批准才得以成立。我见过他好几次，他是一个又高又瘦、个性鲜明的人，对一切都感兴趣，当然也包括电信技术。我还在实验室里见过另一位风云人物：约翰·霍普菲尔德。4年前，我们曾在莱苏什碰过面，是他在自旋玻璃和神经网络之间建立了联系。

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比我在法国的工作环境不知领先了多

少倍。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完全自由的研究主题，我的同事全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一入职，就独自拥有一台Sun 4计算机。相较之下，在多伦多，一台同样的计算机需要40个人共用。曾有人告诉我：“在贝尔实验室，靠节省开支是无法混出名堂的！”这真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13

贝尔实验室的岁月

在多伦多，我只能利用一个很小的手工数字集来测试我的第一个卷积网络，这些数字全是我用鼠标画出来的。但是在贝尔实验室，我们通过美国邮政收集到了信封上的手写邮政编码，共计9298张“真实”的手写数字图像。因此，我制作的SN卷积网络模块也可以直接发挥作用了。我计划建造一个具有 16×16 像素的输入信号和4个层级的大型卷积网络（见图2—2）。完成后，它一共有1256个单元、64660个连接和9760个可调节参数（在一个卷积网络中，多个连接可以共享同一个参数）。这真是激动人心。我花了三天时间，用7291张图像作为学习实例，在Sun 4计算机上训练这个网络。剩下的2007张图像被拿来作为测试案例，最终的错误率仅有5%，这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些成果是在我入职后仅两个月内取得的，拉里对此十分高兴，他将我的网络命名为LeNet（源自我的名字Le Cun）。紧接着，我们在一张很小的加速卡上成功运行了它，并取得了每秒识别30个字符的好成绩。研究快速推进，我们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卷积网络架构：LeNet 1，这个架构拥有4600多个单元，接近10万个连接，错误率进一步下降。

10 个输出单元

第三层:

30 个隐藏单元

第二层

$12 \times 16 = 192$ 个
隐藏单元

第一层:

$12 \times 64 = 768$ 个
隐藏单元

256 个输入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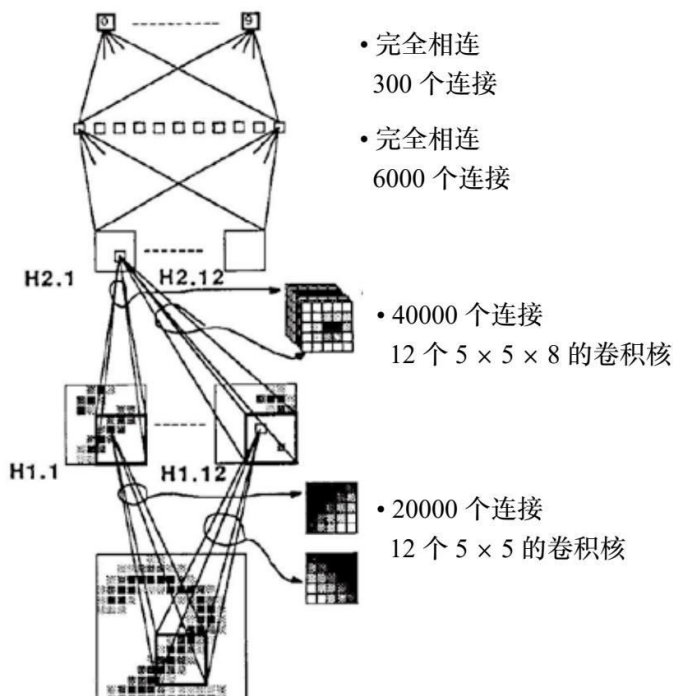


图2—2 第一个用于识别手写字符的卷积网络

我在1988年下半年到贝尔实验室时构造了第一个卷积网络。这是一个神经网络，其结构受视觉皮层的启发。它包括4层，前两层的神经元连接到前一层的小区域，即所谓的感受野（参见第六章关于卷积网络的内容）。各层连续地从图像中提取出越来越抽象和全局的特征。

不久，拉里找到贝尔实验室工程部的合作伙伴来推进技术和研发产品。我们跟一组感兴趣的工程师合作，很快就开发出了一个可以读取银行支票上的金额的系统。

该系统使用一个带有34万个连接的LeNet 5大型卷积网络，能够处理 20×20 像素的输入信号（见图2—3）。在我的同事和朋友莱昂·博图、约书亚·本吉奥和帕特里克·哈夫纳（Patrick Haffner）的帮助下，系统成功读取了收集到的大约一半的支票，错误率不到1 %。另一半支票因为机器无法识别，只能人工

处理。一个系统可以精确到真正投入实际应用，这还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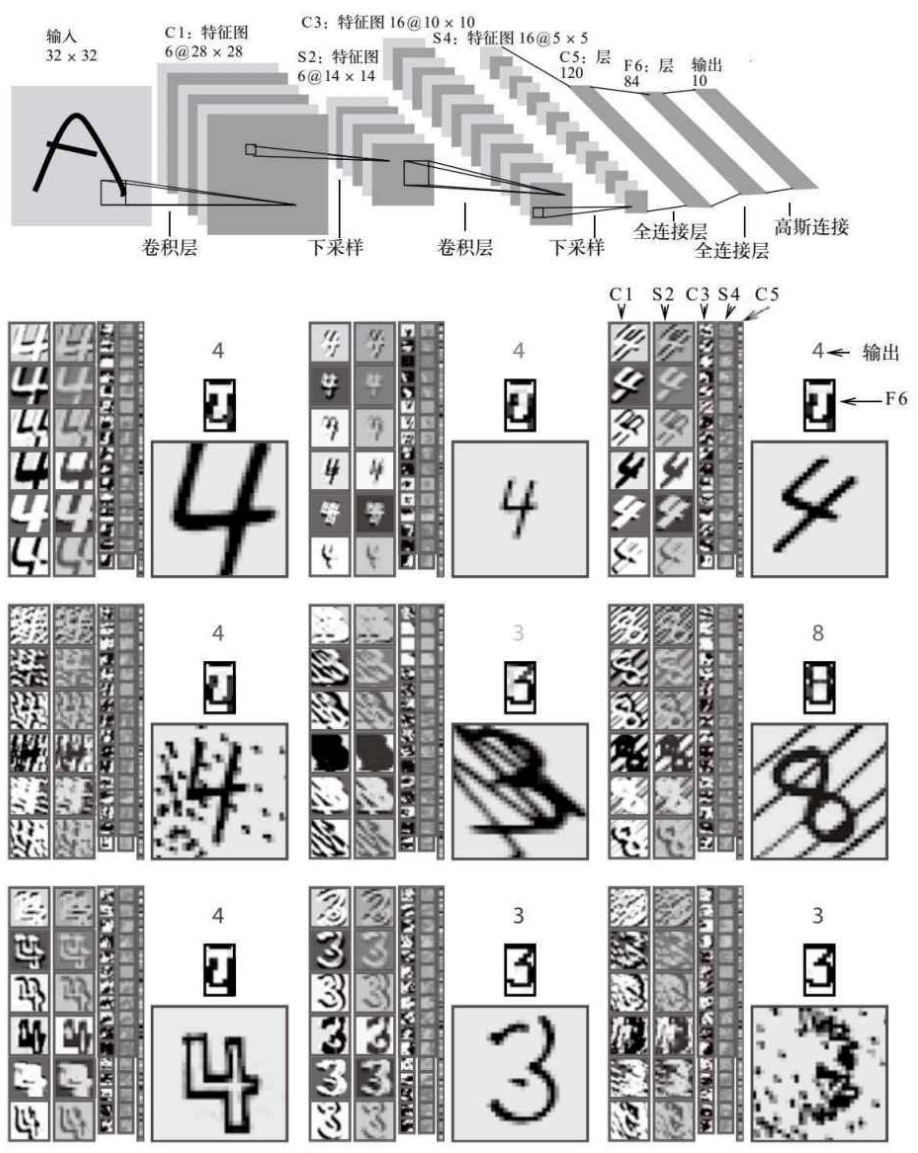


图2—3 LeNet 5是一个用于识别手写字符的商业化卷积网络

LeNet的结构包括7层。它比之前的版本大得多，并且使用了分离的层用于卷积和池化（参见第六章的相关内容）。它能辨识出奇怪的数字。

CCR是AT&T的一家子公司，这是一家向银行销售支票扫描器和自动取款机的企业，他们的产品配备了我们开发的自动阅读系统，能够自动读取存入机器的支票上的金额。1994年，法国布列塔尼的互助信贷银行开始使用NCR的自动取款机。

1995年，快速读取系统首次全面上市，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庆祝了这个特殊的日子。餐厅位于距实验室几公里外的一个美丽的小城市雷德班克（Red Bank），这里也是贝西伯爵（美国爵士音乐家、钢琴家）和电影导演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的家乡。

但是，我们回去时获悉，AT&T公司的管理层决定将公司进行拆分，成立几家独立运营的新公司。几个月以后，NCR带着开发和销售读取系统的研究团队离开了。新成立的朗讯科技公司随后也独立了出去，带走了“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和实验室的一大部分工程师，之前与我们合作的工程师小组也包括在内。我们的研究小组则留在了AT&T公司，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实验室：AT&T研究实验室。更加令我难过的是，项目的后续开发工作也停摆了。至于已经研发出来的产品商业化工作，则由NCR和朗讯科技继续开展。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系统读取了由美国发行的所有支票的10 %~ 20 %，这是那10年来神经网络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可惜的是，AT&T新成立的电信服务公司对这项技术并不感兴趣。那是1996年，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我那时被提拔为部门负责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团队寻找一个新的项目。经过讨论，我们决定研究图像压缩技术，扫描高分辨率的纸质文件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我们希望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帮助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扫描它们的藏书并发布在互联网上。我们打算在1998年推出这项技术，并将其命名为DjVu（DjVu的法语发音

和“似曾相识”的法语发音相近)。DjVu可以将高分辨率的彩色扫描页压缩至约50 kB，是JPEG或PDF的1/10。

不幸的是，AT&T错过了DjVu的商业化。大型公司在将其内部实验室的创新技术进行商业化时出岔子，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比如施乐公司史诗级的错失良机的先例——施乐公司错过了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帕克研究中心实验室发明的现代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商业化，这个系统几乎囊括了所有现在办公需要的模块：个人工作站、计算机网络、多窗口图形显示系统、鼠标和激光打印机。但施乐没能及时卖掉这些产品，才使得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苹果公司有时间用LISA（苹果发布的世界第一台图形用户界面计算机）和麦金塔（继LISA之后的第二台图形用户界面计算机）复制这个概念，抢占了先机。

事实上，AT&T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贝尔实验室的很多发明都曾在公司内部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但AT&T忙于像其他公司一样通过晶体管、太阳能电池、CCD（电荷耦合器件）摄像机、UNIX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语言C和C++等手段赚钱，并不在乎某些新技术的商业化，而这些新技术的命运也跟DjVu一样。公司最终以约1200万美元的价格，将DjVu的使用许可证出售给了西雅图一家已经占有图像技术市场的公司LizardTech。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者也错过了DjVu的商业化机会。我们曾建议LizardTech以开放源代码的方式分发基础代码，因为只有让所有人使用，才能让他们接受新格式。但出于对控制权和利润的担忧，LizardTech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再后来LizardTech也想过做改变，可惜为时已晚。LizardTech的选择决定了结局，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4

职业与信念

从1995年开始，新的“寒冬”开始降临。我们的卷积网络没有被采纳，更没有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约书亚·本吉奥回到蒙特利尔，只保留了实验室的兼职身份；杰弗里·辛顿离开多伦多去伦敦建立了一个理论神经科学实验室；其他一些人同样选择了离开。留下的人仍然相信卷积网络的未来。为什么机器学习团队对神经网络的兴趣下降了？这是一个谜，可能只有科学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够解开这个谜团。神经网络基本上成了没人愿意谈及的话题，卷积网络更是成了大家口中的笑话。他们说这项技术太复杂了，除了杨立昆没人能让它发挥作用。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或许是技术屏障阻碍了它的传播。在计算方面，卷积网络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在当时，计算机不仅速度慢而且还很昂贵。同时，用于训练计算的数据集太小——当时还没有发生信息爆炸，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自行收集数据，这无疑限制了应用程序的开发。而神经网络软件（如SN）所需的数据必须由研究人员从头到尾亲自手写，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此外，AT&T不允许我们将SN神经网络模拟器以开放源代码的形式发布出去，即便这样可以加速人们接受卷积网络。在那个时代，企业都在自顾自地发展，只考虑自身利益。

1991年，莱昂·博图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加入了贝尔实验室。因为他不喜欢美国的生活，所以在一年后回到法国，重新经营以前他与几个朋友创建的公司——Neuristique。Neuristique

公司推出了SN的商业版，为那些希望使用神经网络的公司提供服务。它的系统运行得太好了，以至潜在客户竟对此产生怀疑：因为公司虽然成绩斐然，但为客户提供咨询意见的专家却说该公司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司经营了几年后，莱昂重新燃起回归科研领域的念头。于是，他转让了公司，再次回到贝尔实验室，并决定留在美国。

当时机器学习领域的学者大多不愿意研究神经网络，他们更偏爱SVM和“核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方法是由我们实验室内部的同事伊莎贝尔·居永（Isabelle Guyon）、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和伯恩哈德·伯泽尔（Bernhard Boser）于1992—1995年发明的，其核心内容在1995—2010年成为研究机器学习的主要方法。当时另一套被机器学习领域采纳的方法——提升方法（boosting），也出自贝尔实验室。它是由另一个部门的同事罗布·夏皮尔（Rob Schapire）和约阿夫·弗罗因德（Yoav Freund）开发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不错，大家可以据此想象一下当时我们实验室内部智力辩论会的场景。神经网络的研究就这样被隐于幕后，度过了将近15年的寒冬。

1995年，拉里·杰克尔仍旧对卷积网络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对其他人更倾向于SVM的事实感到难过。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是个数学家，他喜欢那些能够用数学定理来确保运行的方法，不喜欢神经网络，因为后者从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时显得过于复杂。拉里决定跟他打两个赌。第一个是，拉里打赌在2000年3月14日之前会出现一个数学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神经网络可以完美运行，瓦普尼克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个赌局还有一个追加条款：解释卷积网络的数学理论必须是由瓦普尼克之外的人提出的，否则就算瓦普尼克赢了赌局。换句话说，如果拉里或其他人办不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激励瓦普尼克发展这个理论。

第二个是，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打赌在2005年3月14日之后将没有人会再使用神经网络，拉里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签订了赌约，我作为证人也签了名字（见图2—4）。每个赌局的赌注都是在一家高档餐馆吃一顿晚餐。

结果他们要兑现两顿晚餐，因为拉里输了第一局，瓦普尼克输了第二局，而我作为证人免费享用了两顿晚餐。

	3/14/95
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	
	3/14/95
拉里·杰克尔	
	3/14/95
证人：杨立昆	

图2—4 拉里·杰克尔和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于1995年的赌约

2001年，莱昂和我终止了DjVu项目的研究。后来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基本没有再涉足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只是发表了几篇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程的工作细节的长文章。于我而言，这些文章就像是一篇篇绝唱：业界不再对神经网络感兴趣，我们却依旧在向业界解释如何使用它们。1998年，我们在著名杂志《电气与电子工程协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IEEE*）上发表了一篇后来广为人知的论文，题目为《基于梯度学习的文档识别》，作者为杨立昆、莱昂·博图、约书亚·本吉奥和帕特里克·哈夫纳。[\[1\]](#)这是一次全新的、教学性的、全面性的尝试。

论文详细阐述了如何使用卷积网络，提出了通过组装可区分的参数模块来构建一个学习系统的想法。此外，它还描述了一个全新的技术——图形处理网络，这项技术主要用于训练那些针对图形操作模块的系统，而传统的神经网络仅能操作数字表格。我们同样展示了如何建立以及训练一个字符识别系统。1998—2008年，这篇论文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每年仅有几十次引用量。但从2013年开始，引用量开始以指数级增长。仅2018年一年，就有5400次引用。现在许多人都把它视为卷积网络的开山之作，尽管在此前10年，我们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2019年，它成为我的主要代表作，引用数量超过了20000次。

2001年年底，互联网泡沫开始爆发。AT&T通过光纤和同轴电缆向所有家庭提供互联网和电视信号的计划没能说服华尔街，公司股票下跌。这对我们来说可不太妙：我们出售DjVu之后获得的股票期权变得一文不值。时任AT&T实验室副总裁的拉里·拉比纳（Larry Rabiner）是一位语音识别领域的先驱，他宣布将在三个月后退休，尽管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因为我足够了解他对研究和对他为之奉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实验室的感情，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世界末日”的一个预警。于是，我开始悄悄为自己谋求后路——寻找另一份研究职位。

同年12月，预警应验了。我们接到通知，公司将再次被拆分为若干部分，并裁去一半的研究人员。因为我已经在日本NEC公司得到了一个职位，所以我想成为被裁的一分子。我对公司说：“我不在乎公司对什么领域感兴趣，我会继续研究视觉、机器人技术和神经科学。”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为了让它解雇我，它也的确这么做了，因此我十分感谢它。2002年年初，我与莱昂、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等一道离开AT&T，加入NEC普林斯顿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久负盛名的NEC的实验室，我们在那里

重新开始了神经网络的研究。

在离开AT&T之前，我给实验室的成员拍了几张照片（见图2—5）。



图2—5 AT&T实验室研究图像处理的部门合影

1996—2002年，我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站着的人从左到右分别是：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莱昂·博图、杨立昆、约恩·奥斯特曼、汉斯——彼得·格拉夫。坐着的人从左到右分别是：埃里克·科萨托、帕特里夏·格林、黄福杰（音译）和帕特里克·哈夫纳。瓦普尼克、莱昂、格拉夫、科萨托和黄福杰于2002年年初和我一起加入了NEC。

那时，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的名声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我想拍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同时跟他开个小玩笑。我在一块白板上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器学习理论的公式，他就是因为这个公式被世界熟知。我让他站在白板前，他也很高兴能在自己的杰作前留影。但是在公式的下面，我还写了一句话“All your

bayes are belong to us”（“你所有的贝叶斯都属于我们”）（见图2—6）。这是一个很烂的文字游戏，因此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在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词——模因[2]，用以委婉地嘲笑日本电子游戏《零翼战机》中十分草率地将日语对话翻译为英语的事情。游戏中有一个征服银河系的人物，他用不怎么标准的英语说：“How are you gentlemen ! 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us. You are on the way to destruction.”其大概意思是：“先生们，你们好吗？你们所有的基地都是我们的了。你们正在走向毁灭。”这句话十分好笑，因此出名了。想要弄明白我的调侃，还要知道另外一件事：瓦普尼克的机器学习理论方法存在一个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使用的理论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创立的。贝叶斯定理是一个将联合概率和条件概率结合起来的公式，同样是以其发明人——18世纪英国数学家和牧师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的名字命名的。瓦普尼克不喜欢贝叶斯理论，认为它是“Vrong”的（“错误”的英文单词是wrong，瓦普尼克的英语发音带有俄语口音）。因此，我借用那个著名的模因梗玩了一个恶作剧，用Bayes代替了Base，以开玩笑的方式让瓦普尼克成为征服机器学习星系的皇帝！2002年，我把这张照片贴在了我的个人主页上，后来它竟变成了瓦普尼克的“官方”照片，瓦普尼克的维基百科主页引用的就是这张照片。这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瓦普尼克并不知道这个笑话的微妙所在，当然也不会知道它的语法并不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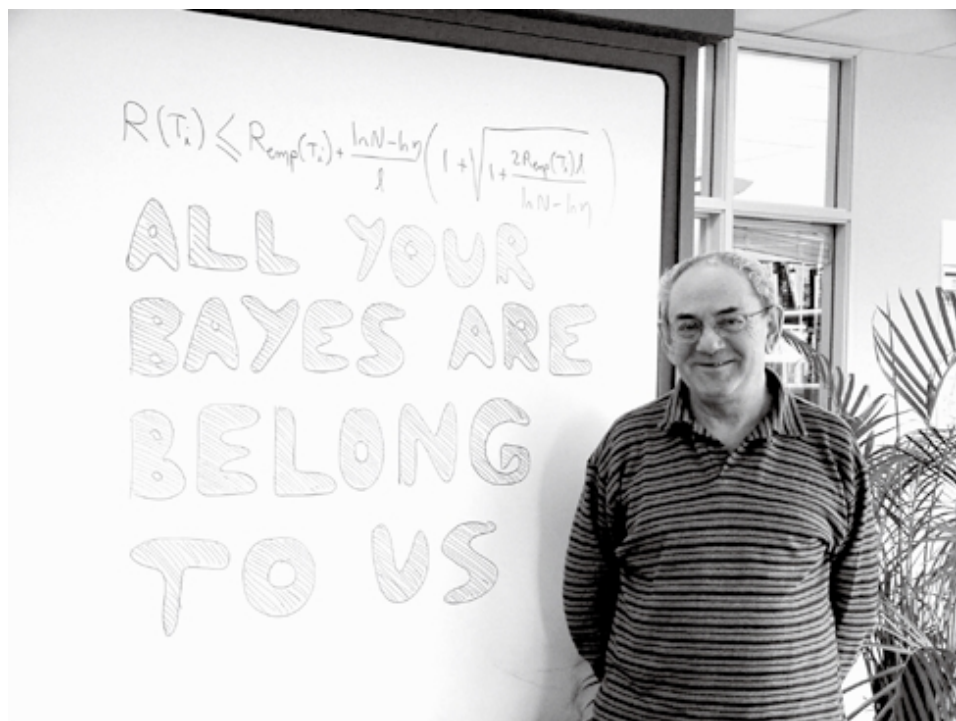


图2-6 2002年的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

他因这张与白板上的学习理论公式合影而出名。殊不知，这是一个很烂的文字游戏，源于当时流行的网络模因。

在加入NEC的两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时任谷歌董事会主席兼总干事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电话。当时的谷歌是一家只有600名员工的初创公司，但是所有人都在谈论它、使用它的服务。拉里希望我能去谷歌担任研究室的负责人。他了解我，因为他很钦佩我之前开发的DjVu。我应邀参加了面试，谷歌也给了我职位，只是最终我没有接受邀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家人不愿意搬到加利福尼亚；另一方面，尽管这个职位很有吸引力，但在做了6年的部门领导和应用研究项目后，我更愿意回到基础研究领域，继续研究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神经科学和机器人技

术。我十分清楚自己无法在一个只有600人、还没有实现盈利的初创公司中实现梦想，尤其是当我身处一个领导者的职位时。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不是，NEC在这件事过去一年之后遇到了经济危机，它开始给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施压，要求实验室转向研究更容易变现的实际应用。我们也因此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视觉研究人员。NEC的管理层也向我们表明公司对机器学习并不感兴趣，他们解雇了实验室主任，让一位没有研究经验的管理人员坐上了那个位置。这无疑是解散我们小组最稳妥有效的方法。

之后，我又在NEC待了18个月，并于2003年去了纽约大学做教授。我曾向好几所院校投递简历，并收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丰田科技学院提供的职位。但一直没有得到纽约大学的回复，我还为此担忧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联系了建议我投递简历的人，他感到很惊讶：“你投递简历申请了？我们没收到！”原来，学校管理人员的计算机出了问题，一半申请人的信息都丢失了。弄清原委后，纽约大学为我组织了一次面试。那天，我首先做了工作经历报告。计算机学院的院长理所当然地在听众席中，她叫玛格丽特·赖特（Margaret Wright），是运筹学领域的一位权威学者。我认识她，因为她也曾就职于贝尔实验室，而且在几年前，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研讨会上与她发生过争论。当时她认为运筹学的一些出色发现将会应用于机器学习，而我不同意。我真希望她忘记那次不愉快的经历，然而上帝并没有听见我的祈祷。在我的报告结束时，她提出了一个与当年那场辩论会有关的问题。那时我以为这个职位与我无缘了，但事情并没有按我以为的方向发展，因为她说从我们当时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我于2003年9月被纽约大学聘为教授，同时我也坚定了重启神经网络研究并证明它的有效性的

研究目标。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坚信卷积网络的下一个闪光点在图像识别领域。为此，我于1997年在CVPR上宣读了一篇与图像识别有关的文章，可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深耕于此领域的人，例如伊利诺伊大学的戴维·福赛思（David Forsyth）等都知道机器学习将在计算机视觉领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邀请我参加一个在西西里岛举办的研讨会，与相关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一起对话。会上，我遇到了当时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现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让·蓬斯（Jean Ponce）、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马夏尔·埃贝尔（Martial Hébert）、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滕德拉·马利克（Jitendra Malik）、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西塞曼（Andrew Zisserman）、加州理工学院的彼得罗·佩罗纳（Pietro Perona）等人。令我吃惊的是，他们都对卷积网络展现的能力十分震惊。2000年，我受邀在CVPR做了一场全面的报告。

我在该研究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与相关学者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联系必将开花结果。在接下来的10年中，机器学习在视觉领域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一直等到2014年，卷积网络才成为视觉研究的主要方法。虽然该领域的领军者愿意接受新想法，可一些年轻同行在评论我们的文章时却并不那么宽容……

[1] Yann LeCun, Léon Bottou, Yoshua Bengio, Patrick Haffner, Gradient-based learning applied to document recogni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98, 86 (11), pp. 2278 -2324.

[2] 模因（mème）是指一个因人们传播而产生的想法。这个词是由生物学家、进化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仿照“基因”（gène）这个词，因其相似的复制方式而发明的。

深度学习的阴谋

我与我的同事兼朋友杰弗里·辛顿和约书亚·本吉奥达成共识，决定共同努力重新唤起科学界对神经网络的兴趣。我们始终相信它是行之有效的，能够大幅提高图像和语音识别的效率。幸运的是，CIFAR对我们的想法很感兴趣。它的名字起得很好，因为CIFAR的读音是“see far”，在英文中意为“远见”。2004年，该研究院制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神经计算与自适应感知计划（NCAP）。当时杰弗里·辛顿被任命为该计划的负责人，而我是其科学顾问。NCAP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组织讲习班，为学生们开辟了一个科学小天地。

当时仍然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神经网络的研究是一场闹剧。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名称——深度学习。我把我们的三人小组称为“深度学习的阴谋”。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

因为不受重视，我们发表文章之路很不顺利。2004—2006年，我们写的关于深度学习主题的文章几乎都被机器学习领域的重要会议否决了，这些会议包括NeurIPS、ICML等。当时研究机器学习的主要方法是核方法、提升方法和贝叶斯概率法，神经网络几乎已经从可选项中消失了。像CVPR和ICCV这样的应用领域大会也对神经网络的相关工作保持缄默。

即便我们信念坚定，也会有某个动摇的时刻。我记得在1987年12月6日，在多伦多，杰弗里·辛顿来到实验室的时候神情沮丧。他沉默阴郁，简直与先前判若两人。辛顿像所有有自尊心

的英国人一样，很有幽默感，但那天，他讲的笑话都很苦涩。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辛顿向大家坦陈了他的困扰：“今天是我40岁生日，我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什么也做不成了。”在他的认知里，40岁是一个里程碑，过了这个岁数，人的头脑就不再如以往清醒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关于大脑工作原理方面的发现了。可事实上，我们在20年后又有了新的想法。但我们碰见的大多数人都不如辛顿，他们都很傲慢。

借着CIFAR计划的东风，我们的人际圈逐渐扩大。从2006年起，这个圈子达到了一定规模，因此在我们向一些大会提交文章时，评审专家中总有那么一两位支持我们工作的。我们的想法开始在业界传播，也开始得到认可。

2007年，参加机器学习的大型会议NeurIPS的学者不足1000人，属于不受重视的会议。但是到2018年，参会者达到了9000名。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和我每年都会参加，这里会产生关于机器学习的最有意思的想法。会议会持续一周，包括为期三天的全体会议和两天的小组研讨会，研讨会的形式更加自由。

研讨会的举办地是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冬季运动胜地。与会者可以在星期四下午乘大巴到达那里。那一年，我们建议组织一个深度学习研讨会，但是组织者在没有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拒绝了我们的提议。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我们利用CIFAR提供的资金组织了自己“私设”的研讨会，并租用大巴来接送对深度学习感兴趣的人。我们的研讨会有300位参与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也因此成了NeurIPS最受欢迎的研讨会。这也标志着“深度学习”这一术语开始被业内的专业文献采用。

16

卷积网络的春天

（如果读者对深度学习领域不是特别熟悉，那么可以先行阅读后面的章节，因为本节会提到一些有关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对于这些概念，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详细解释。）

2003—2013年的10年间，我在纽约大学的实验室扩展了卷积网络的应用范围，首先是在2003年开发的无须方位和照明的简单物体的识别，以及人脸识别（见图2—7和图2—8），[1]都获得了认可。1991年，我在位于帕莱索[2]的汤姆森-CSF中心实验室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访问，其间，我设计了一个人脸检测系统，并于1993年公布，但是没有引起太多科学家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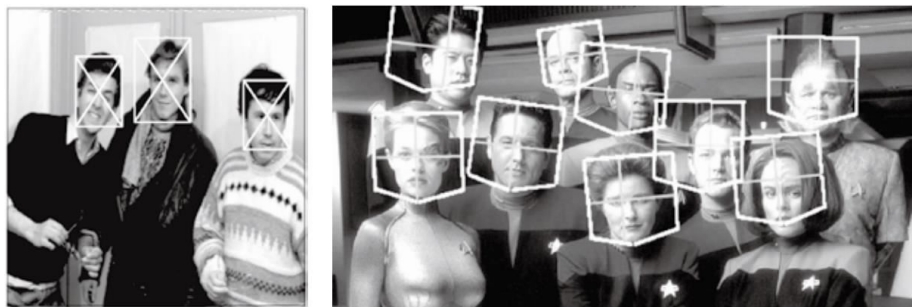


图2—7 利用卷积网络进行人脸检测

左图是1991—1992年设计的第一个用于检测图像中的物体的卷积网络的结果呈现。相关文章陆续发表于1993年和1994年。右图是2003—2004年在NEC开发的高性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检测不寻常的人脸，例如，来自《星际迷航》的外星人，还可以估计面部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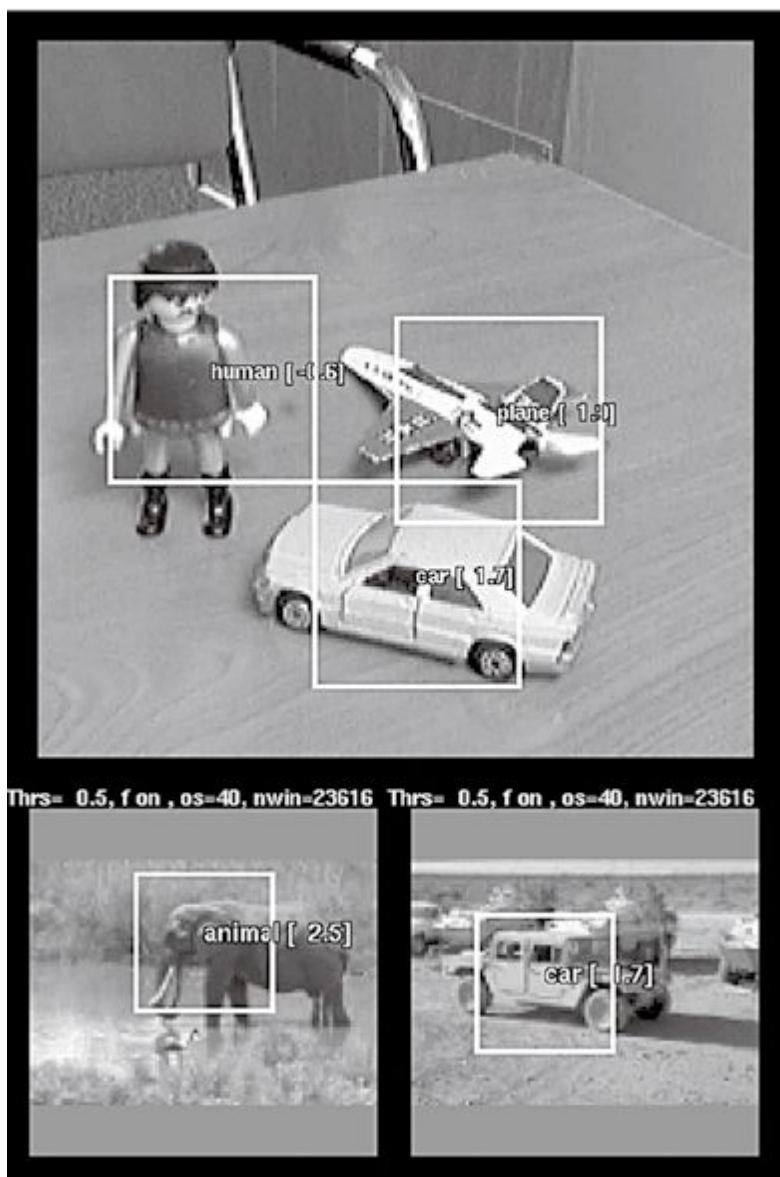


图2—8 独立于位置和方位的对象识别

卷积网络由玩具图像组成，玩具图像分为5类：人、动物、飞机、汽车、卡车。事实证明，它能够识别出与玩具不同的自然图像中的真实物体。

2003—2004年，另一个项目DAVE的进展让我们感到很满意，我们设计的一辆装有两台摄像机的机器人小卡车能够独自在野外行驶（见图2—9）。当然，它需要被提前训练。训练方法就是由一位操作员驾驶操控它在不同的环境（如公园、花园、森林等）里行驶一两个小时。系统会同时记录两台摄像机拍下的图像和方向盘的位置。然后，一个经过训练的卷积网络能够借助输入的图像信息预测方向盘的角度，使其可以像被真人操控时一样躲避障碍物。经过几天在计算机上的训练打磨之后，系统就可以操控机器人小卡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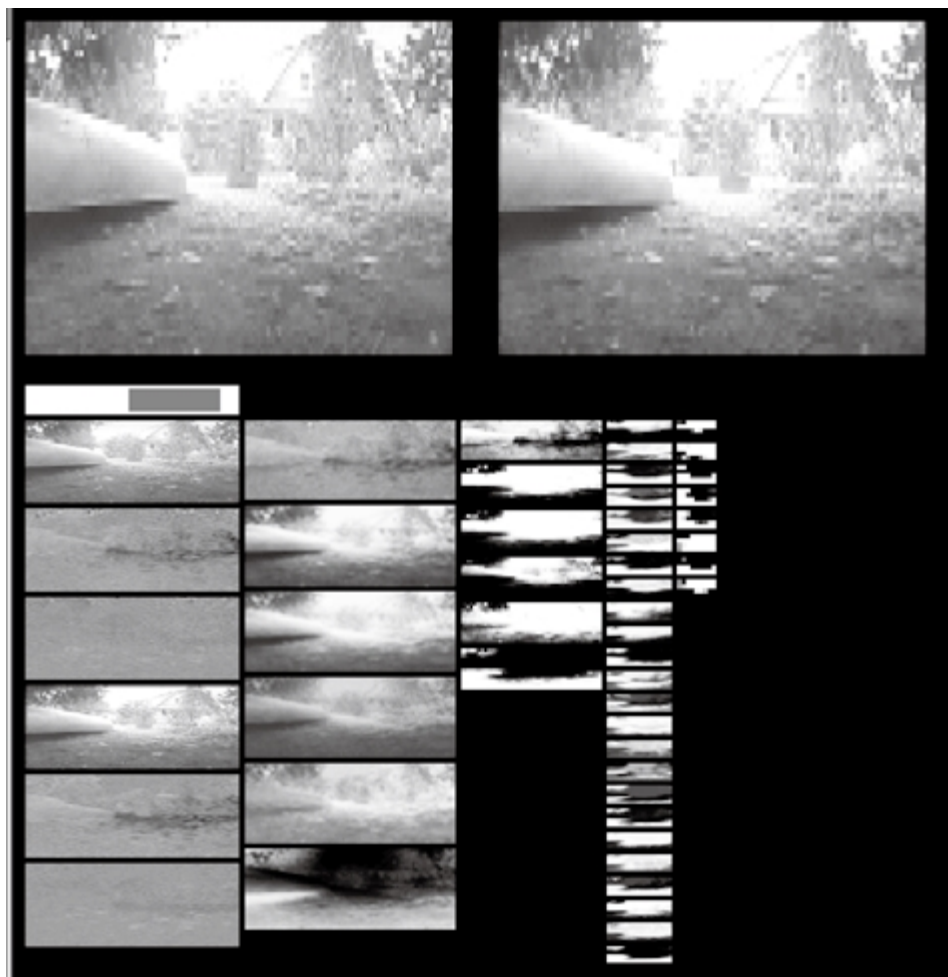


图2—9 机器人DAVE（2003年）

这台小型无线电遥控机器配备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卷积网络（右）经过训练后可以模仿操作员行为自主行事，同时避开障碍物。网络的输入是由两个摄像机拍摄的图像组成（顶部），网络的输出是方向盘的角度（此处为向右侧，由图像下方的亮条表示）。缩略图代表网络连续层中各单元的激活状态。

然而，这种仅仅是模仿学习的项目很难说服学术界，相关文章直到2006年才得以发表。不过，这项成果却说服了DARPA的

代表启动LAGR（应用于地面机器人的机器学习）项目。这是一个关于机器学习在驾驶移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的大型研究项目，项目周期为2005—2009年。我们将会在第六章详细讨论这个项目。总之，这个项目后来衍生出了大量有关汽车自动驾驶的项目。

说回2005年，这是我在纽约大学出成果的一年。我们证明了可以将卷积网络用于语义分割，即用像素所属的物体类别标记图像的每个像素。我们将此技术应用于通过显微镜获得的生物学图像的分析（见图2—10）。后来，这项技术在机器人驾驶和自动驾驶领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它能够从图像中分辨出可驾驶区域或障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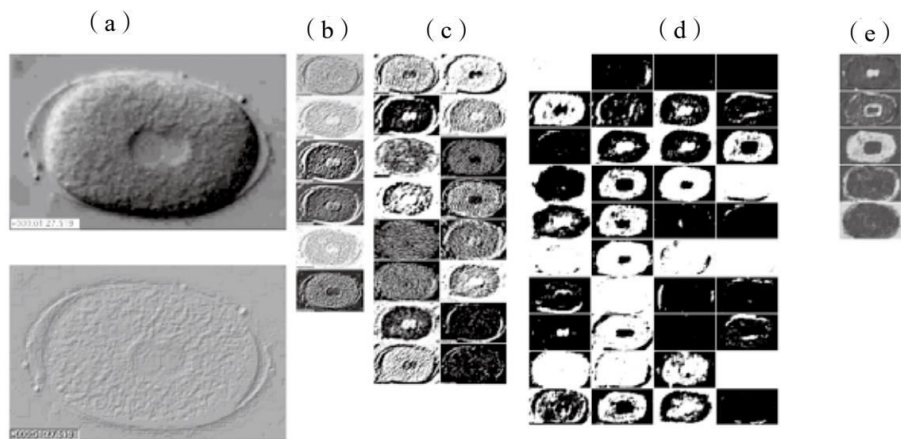


图2—10 卷积网络用于生物图像的语义分割

输入图像中的每个像素被识别为属于以下5类之一：细胞核、核膜、细胞质、细胞膜和外部环境。（a）一个线虫胚胎细胞的图像显示在卷积网络的输入处。（b、c和d）卷积网络的连续层提取的图像特征。（e）输出包括5个小缩略图，每个小缩略图对应5个区域类别。在每个输出缩略图中，一个清晰的像素表示输入图像中相应的像素已被识别为与缩略图关联的类别。

我们还训练了一个用于图像比较的卷积网络，以确定两张照片上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这种“度量学习”的基础是我在1994年提出的Siamou网络概念（孪生神经网络），后者主要用来验证签名。后来，这种卷积网络在人脸识别中得到了应用（参见第七章“内容嵌入和相似度测量”）。

2007年，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自然图像中的物体识别。与之前处理的简单图像不同，现在要识别的是普通图像中存在的主要物体。不幸的是，计算机视觉界使用的图像数据库太小，比如Caltech-101数据库（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101类图像数据库）包含大约100个物体类别，但每个类别仅包含30个图像实例，这对训练卷积网络来讲太少了。对于这种量级的数据，传统手动提取特征，再利用基于SVM的分类器处理更有优势。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量，我们只能转向研究无监督学习。具体操作是预先训练卷积网络层并从中总结出一般模式，而不再关注某个具体任务。也就是说，训练一个网络层生成一种表征，并从中重建该层的输入，这就是所谓的自编码器。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将所需神经元的数量最小化。有了这种方法，我们勉强拥有了传统系统的性能，但是在一个具体应用中，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这个应用就是行人探测，这在自动驾驶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行人探测是我们拥有足够数据的少数应用程序之一。相关文章于2013年6月发表，这些方法再次有了用武之地，我们将在第九章中重点讲解。

动一个视觉系统没有意义。其中一个反对观点是，如果机器可以学习一切，那么科学界将无法获得对视觉问题更多的理解。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在几个月后被一个机器学习领域的重要会议ICML接受了。

与此同时，业界对于深度学习的认知也在慢慢提升。大量级的图像数据库也在慢慢出现，且足以训练大型的深度神经网络。

大约在2010年，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领域实现了突破，取得了第一批成果。虽然其中并没有用到卷积网络，但在此之后，卷积网络得到了大规模应用。杰弗里·辛顿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夏季实习期内，他将三位博士生分别送到了业内最领先的三家公司——谷歌、微软和IBM，并让他们用深度神经网络代替原有系统的中央模块，看看是否有奇效。果不其然，系统性能有了显著提升。18个月后，这三家公司都部署了新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识别系统。如今，当我们与虚拟语音助手交谈时，将我们的语音转换为文本的就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卷积网络。这项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消费产品。

软件在发展，计算机硬件也是如此。GPU的突破使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成倍提升。2006年，我的朋友、贝尔实验室前同事、微软研究院的帕特里斯·西马德（Patrice Simard）首次尝试将GPU用于神经网络。斯坦福大学、IDSIA[3]、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研究人员也相继开展了这项研究。到2011年我们就可以确定，未来毫无疑问属于那些可以在GPU上驱动大型神经网络的人，他们将成为开启深度学习新革命的推手……

2012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4]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人们不再质疑卷积网络的有效性，这也是后文一些章节的主题。

[1] 参见本书图6——12中的详细文字解释。

[2] 大巴黎（法兰西岛）郊区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3] IDSIA，人工智能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坐落在瑞士的曼诺，是1998年由安杰洛·达勒·莫勒（Angelo Dalle Molle）通过以他命名的基金建立的。

[4] Yann LeCun, Yoshua Bengio, Geoffrey Hinton, Deep learning, *Nature*, 2015, 521, pp. 436–444.

第三章

机器的初级训练

机器可以被训练用来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旋转方向盘或识别字母。训练的内容包括在机器中建立一个函数 $f(x)$ ，以便输出对应输入信号（图像、声音、文本）的预期答案（识别图像、声音或文本）。

1

从海兔得到的启发

海兔是一种软体动物，一直都是神经科学家实验的宠儿，它的某些本能反应显示出其对突触连接的适应能力，这是学习机器的理想模型。海兔通过由基本神经网络系统控制着的鳃呼吸，当你用手触摸它的鳃时，腮会因为受刺激而缩回；如果你再次触摸，腮会再次缩回，过一段时间后再伸出来。鳃每次受刺激后再伸出来所需的时间会不断减少，触摸次数多了之后，鳃适应了手指的触摸，反应便不如前几次强烈，不会马上就伸出来。这种小动物在习惯了外界的打扰后，就会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从而自然而然地就会忽略外界的刺激。

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对控制海兔行为变化的神经网络很感兴趣。鳃的收缩是突触效应改变的结果，而这些突触连接着检测触碰的神经元和控制收缩的神经元。受刺激的次数越多，突触的效应就越低，鳃就会随之减少收缩的频率。这个过程揭示了一种生化机制：改变突触的值就可以改变类似海兔这种软体动物的行为。简而言之，这解释了海兔在这个过程中的适应能力。埃里克·坎德尔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种通过改变突触效应来适应或学习的机制几乎存在于所有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体内。比如，大脑本质上是一个由突触相互连接组成的神经元网络，其中大多数连接可以通过学习进行修改。这种规律适用于整条生物链，简单的秀丽隐杆线虫（一种只

有1毫米长的带有302个神经元的小蠕虫），具有18000个神经元的海兔，具有25万个神经元、1000万个突触的果蝇，具有7100万个神经元和10亿个突触的小鼠，具有8亿个神经元的兔子和章鱼，具有22亿个神经元的狗和猪，具有320亿个神经元的猩猩和大猩猩，以及人类：人类拥有860亿个神经元和约150万亿个突触。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个有关智能的巨大奥秘：通过修改由非常简单的单元构成的网络中的连接，就能产生智能行为。

机器学习研究的目标就是以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在机器内重现这种现象。这种通过调整突触效应而进行的学习，是20世纪中叶以来被统计学家称为“模型参数识别”的一个例证。

2

监督学习

想象一下，如果要制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让它像人类司机一样驾驶，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必须从一个优秀的驾驶员那里收集行车数据，也就是说，要记录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位置，以及驾驶员如何通过方向盘来修正汽车的位置，使汽车保持在车道中间。

其次，分析拍摄交通标志线的摄像机获得的实时数据，以测量汽车在车道中的位置。摄像机每0.1秒就会记录一次汽车相对于道路标记的位置和方向盘的角度，这样在一小时内就能获得36000个有关汽车的位置和方向盘的角度的记录。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最后，将这些数据映射到一张图上：横坐标上的变量 x 代表汽车的位置，这是系统输入的数据。假如高速公路某条车道的宽度为4米，汽车正行驶在车道中央，则 x 值为0；如果车轮压上右边的白线，则 x 值为+2米；如果车轮压上左边的白线，则 x 值为-2米。图表纵坐标上的变量 y 代表方向盘的角度，这是系统输出的数据；它以度为单位。例如，+5度代表方向盘向左偏转少许，0度代表汽车直行，而-5度则代表方向盘向右偏转少许。

通过记录驾驶员正常驾驶汽车的位置和方向盘的角度，我们便可获得成千上万对 (x, y) ，每一对 (x, y) 都由汽车在道路上的一个位置和方向盘所偏转的角度组成。真正测试时，我们会

收集很多示例，并将数据元素标号映射在图上。为了区分图中的数据或显示某一个特定的示例，我们在方括号中会给出编号，例如， $X[3]$ 和 $Y[3]$ 构成3号示例（这是计算机科学家十分喜欢的一种表示法）。如果我们收集的示例总数为 p （如 $p=36000$ ），那么我们得到的学习集就可以表示为：

$$A = \{(X[0], Y[0]), (X[1], Y[1]), (X[2], Y[2]), \dots, \\ (X[p-1], Y[p-1])\}$$

当我们使用这些示例训练机器时，目的就是训练它们根据汽车在道路上的位置来预测并选择合适的方向盘角度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通过训练，让机器“模仿”人类驾驶员，尽可能地重现驾驶员的行为。

为此，我们还要找到一个函数 $f(x)$ ，对于学习集中的每一个 x ，函数 $f(x)$ 都可以生成集合中对应的 y ，即 $Y[0]$ 对应 $X[0]$ ， $Y[1]$ 对应 $X[1]$ ，依次类推。一旦发现合适的函数 $f(x)$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计算任何 x 所对应的 y ，即使是我们现有学习集中不存在的 x 值也能够找到其对应的 y 值。这就是监督学习的原理之所在。

3

随机近似

寻找根据 x 预测 y 的函数 $f(x)$

假如有一个完美的驾驶员，我们将他驾驶汽车时得到的数据映射在图中的一条直线上，如图3—1所示。当这些点完美对齐时，我们便可以得到一条穿过这些点的直线。我们随机选择一个函数：首先确定它是一条直线，接下来只需确定它的斜率即可。

这个函数可以写为：

$$f(x) = w * x$$

这个函数使用的是计算机科学家常用的符号，其中符号*表示乘法。这个函数表示一条经过原点且斜率为 w 的直线。在下面的讨论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 f 当作带有 x 和 w 两个变量的函数。为了在计算机上使用Python[1]语言对函数编程，我们可以将其写为：

```
def f(x, w): return w*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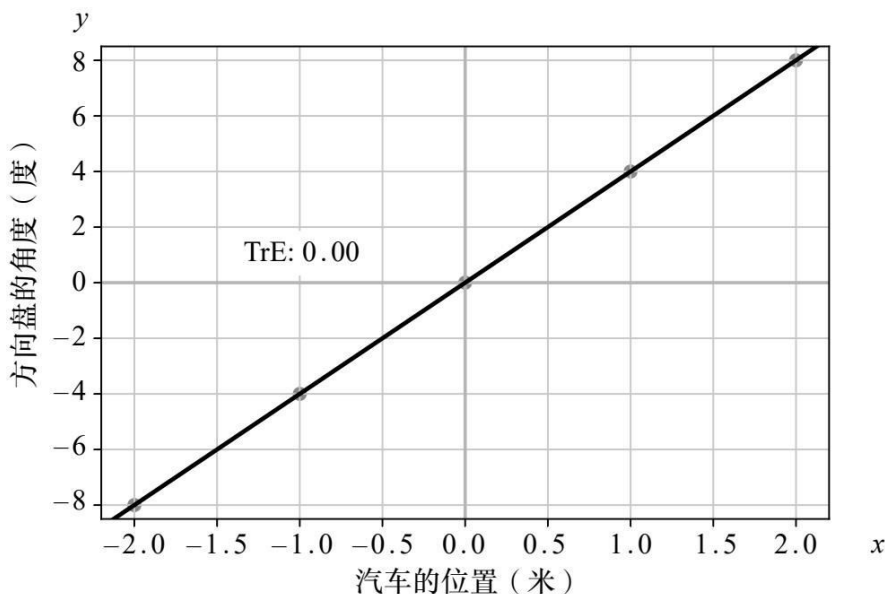


图3—1 汽车在车道上的位置与将其带回到车道中间的方向盘角度之间的关系

横坐标代表汽车相对于高速公路车道中心的位置（以米为单位），纵坐标代表使汽车返回车道中心所需的方向盘角度（以度为单位）。对于一个位置的负值（在车道中心的左侧），则必须向方向盘（顺时针方向）施加负角。在此， 4° 的方向盘角度可以校正1米的位置偏差。

字母 w 和 x 是变量，其函数表示的是 $w \cdot x$ 的乘积。变量相当于一种“抽屉”，或计算机内存中的单元格，我们可以在其中存储一个数字。例如，我们可以创建变量 w 并赋值4，然后创建值为2的变量 x ：

$$w = 4$$

$$x = 2$$

字母 w 和 x 仅表示相应内存的名称。为了用 x 和 w 这些值计算函数，我们将函数写成：

$$yp = f(x, w)$$

其中符号 yp 代表我们预测的模型产生的结果 y 。

当我们把上边的数值输入函数时，变量 yp 就得到了数值8（4*2）。

如要将函数应用于学习示例3，只需执行：

$$x = X[3]$$

$$y = Y[3]$$

$$yp = f(x, w)$$

此时，求出通过这些点的直线就等于找出该函数参数 w 的正确值。假设我们只有两个训练数据点，即 $A = [[0.0, 0.0], [0.9, 3.6]]$ 。

经过这两个点的直线有且只有一条，在这种情况下， w 的正确值应该为4，因为 $4 * 0.9 = 3.6$ 。我们再添加第三个训练数据点：（-0.8，-3.2）。这三个点完全在一条线上，并且 w 的值始终为4。

但这只是理想情况，现实中很难实现。因此，我们再假设第四个数据点为（1.9，5.4）。此时，如果 w 的正确值依然为4.0，那么我们的函数 $yp = f(x, w)$ 的预测值将不再是5.4，而是7.6（4*1.9）。正如上文所说，字母 yp 表示函数模型对 y 的预测，但现在第四个点不在直线上，我们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找到穿过所有点的直线，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允许出现一些误差，规划一条“尽可能靠近”所有点的直线（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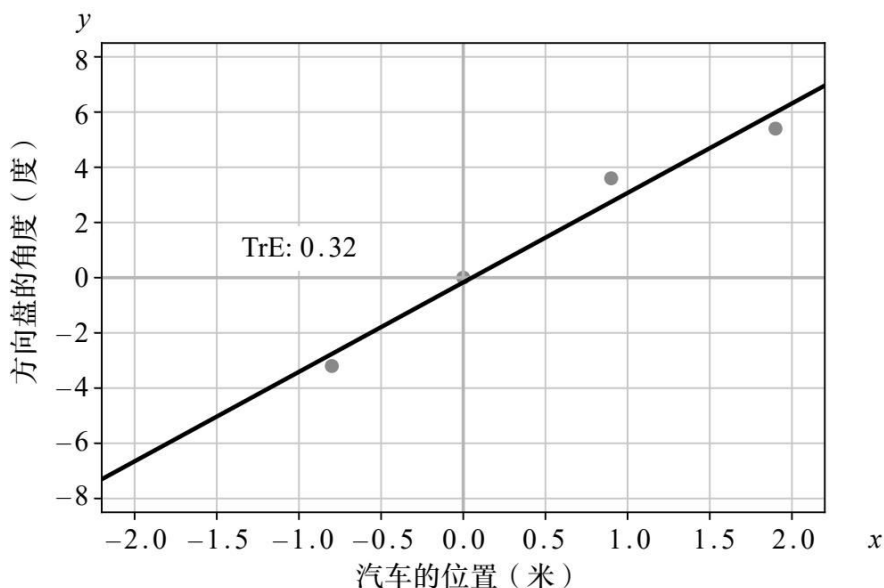


图3—2 一条尽可能地靠近未完全对齐的点的直线

4个点中的3个点对齐，斜率为4的直线经过这3个点，但是不经过第4个点，我们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一条尽可能靠近这4个点的直线，但是它不会准确地经过任何一个点。

减少错误

当 $w=4.0$ 时，利用直线预测到的值为7.6，但在第四个数据点中得到的值是5.4，因此产生的误差为-2.2（5.4 - 7.6）。如果修正 w ，使直线更接近第四个点，那么相对应地，它就会远离其他三个点。由于找不到一条可以通过所有点的直线，因此在我们的示例中，最佳的折中方案是一条斜率约为3.2的直线。

对于一个给定的 w 值，或者收集到的数据集中的任何一个值，通过函数预测到的 y_p 值（在新直线上）和实际得到的 y 值（在每个学习示例中）之间都可能存在误差。

我们可以测量这4个点的平均误差，对其中的任何一个点而言，误差值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但重要的是预测值 y_p 和观测值 y 之间的距离。为了量化误差距离，我们通常会采用此误差的平方或绝对值（始终为正）。

对于一个给定的 w 值，例如， $(X[3], Y[3])$ ，其中对 $X[3]$ 的预测值是 $y_p = w * X[3]$ ，它的误差值为 $(Y[3] - w * X[3]) ** 2$ 。计算机科学家用符号“**2”表示平方。[2]

度量系统误差的 $L(w)$ 表示学习示例中所有误差的平均值：

$$L(w) = \frac{1}{4} ((Y[0] - w * X[0]) ** 2 + (Y[1] - w * X[1]) ** 2 + (Y[2] - w * X[2]) ** 2 + (Y[3] - w * X[3]) ** 2)$$

此函数中唯一的可变参数是 w ，也就是说， $L(w)$ 的值取决于 w ，因此这是 w 的函数，也被称为成本函数。 $L(w)$ 的值越小，平均误差越小，也就意味着机器的精准度越高。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w 的 $\check{w}$ 值，使得成本函数 $L(w)$ 最小（见图3—3）。

假设具有 p 个学习点，使用希腊字母 $\sum_{i=0}^{p-1}$ 表示成本函数，即 i 从0到 $p-1$ 时所有项的数值之和。函数表达为：

$$L(w) = 1 / p * \sum_{i=0}^{p-1} (Y[i] - w * X[i]) ** 2$$

该公式涉及 w 的平方，因此它是一个二次多项式，也就是抛物线（见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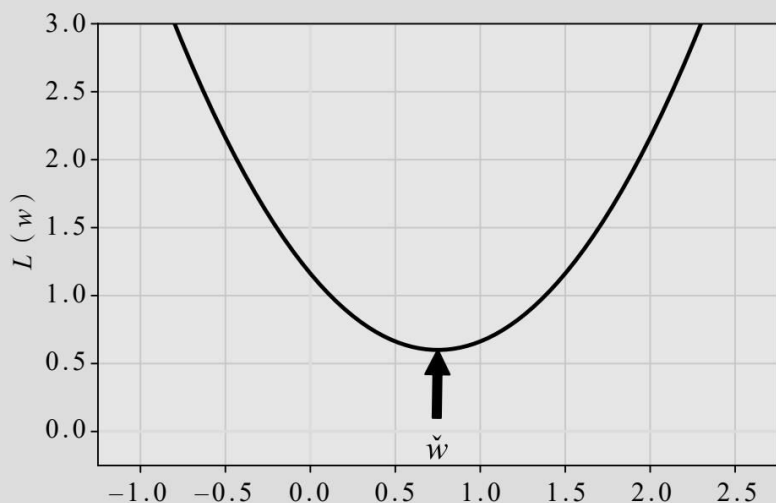


图3—3 表示二次成本函数的抛物线

当成本函数是 w 的二次多项式函数时，它是具有唯一最小值的抛物线的形式。

解，即产生成本最小值的 w 值，在图形上用 $\check{w}$ 表示。

想要使误差最小，即成本函数 $L(w)$ 最小，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名为“随机梯度下降”（SGD）的方法。虽然名字看起来很深奥，但它其实很简单。

这个方法的思路是，取一个学习集里的点，对直线稍做调整使其接近这个点。然后再操作下一个点，继续调整直线使其接近第二个点。我们需要调整的幅度与误差值成正比，即误差越小，我们对直线操作的幅度也就越小。假设我们处理的是示例3，调整 w 的公式为：

$$w = w + e * 2 * (Y[3] - w * X[3]) * X[3]$$

注意，这不是数学公式，而是计算机科学家使用的公式，用 w 的当前值加上后面计算得到的值（等号的右边），替换变量

w （等号的左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变量 e 称为“梯度步长”，它必须是一个很小的正数，用来确定 w 调整的幅度。如果 $X[3]$ 为正，且直线在点 $(X[3], Y[3])$ 之下，也就是说 $(Y[3] - w * X[3])$ 的差是正数，则 w 值增加，这就是这个公式的作用。相反，如果直线经过该点上方，即差值为负数，表明 w 值将减少。直线接近该点的速度随着直线与该点的距离减少而降低，并在穿过该点时停止。当 $X[3]$ 为负数时，公式将反向更新，即斜率太小会产生正误差，反之亦然。

我们不断地操作每一个示例，不断地调整直线的斜率，如果此时逐渐减少 e 的值，直线最终会稳定在一个使 $L(w)$ 最小的 w 值附近。这种方法被称为“随机近似”，是由美国统计学家赫伯特·罗宾斯和萨顿·门罗于1951年提出的。

[1] Python是一种非常灵活且易于使用的编程语言，也是机器学习工作者使用最多的一种编程语言（www.python.org）。

[2] 在Python语言中，次运算符写为`**`，例如 x 的平方写为`x**2`。

4

数学家的题外话

我们可以延伸一下随机梯度下降法的适用范围。设定 $C(x, y, w)$ 表示给定示例的成本函数。示例中，对于给定点 (x, y) ， $C(x, y, w) = (y - w * x) ** 2$ ，根据随机梯度下降法可获得的 w 值是：

$$w = w - e * dC(x, y, w) / dw$$

其中 e 是梯度步长， $dC(x, y, w) / dw$ 是 C 相对于 w 的导数（我们称为梯度）。相对应 w 的 $(y - w * x) ** 2$ 的导数为 $-2 * (y - w * x) * x$ ，则公式更新为：

$$w = w + 2 * e * (y - w * x) * x$$

对于这个公式的直观理解与上文提到的公式相同：如果 $C(x, y, w)$ 的斜率（导数）为正， w 的值将减少；如果斜率为负，则 w 的值将增加。通过重复此操作， w 最终将下降到 $C(x, y, w)$ 的底部。我们想要最小化的是关于所有点的 $C(x, y, w)$ 的平均值 $L(w)$ ：

$$L(w) = 1/p * \sum_{i=0}^{p-1} C(X[i], Y[i], w)$$

罗宾斯和门罗证明了，如果在所有的数据点上重复此过程，在 e 逐渐减小的条件下，该过程将收敛到 $L(w)$ 的最小

值。

到目前为止，随机梯度下降法一直是现代系统中训练机器学习最常使用的方法。所以，我把它安排在这里进行讲解。在后面的章节中，当谈到感知器、自适应线性神经元和多层神经网络时，我们将再次提到它。

不过，对于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即得到一条尽可能靠近所有点集的直线，随机梯度下降的表现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上文中提到的抛物线成本函数可以转换为：

$$L(w) = \frac{1}{p} \sum_{i=0}^{p-1} (Y[i]^2 + (w^2) * (X[i]^2) - 2 * w * X[i] * Y[i])$$

或者：

$$L(w) = \left(\sum_{i=0}^{p-1} \frac{1}{p} * X[i]^2 \right) * w^2 - \left(\sum_{i=0}^{p-1} \frac{2}{p} * X[i] * Y[i] \right) * w + \sum_{i=0}^{p-1} \frac{1}{p} * Y[i]^2$$

我们知道，这是带有系数的 w 的二次多项式，现在我们有导数，这个多项式的最小值是导数为0时 w 的值，即：

$$\left(\sum_{i=0}^{p-1} \frac{2}{p} * X[i]^2 \right) * w - \left(\sum_{i=0}^{p-1} 2 * X[i] * Y[i] \right) = 0$$

由此得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w = \left(\sum_{i=0}^{p-1} X[i] * Y[i] \right) / \left(\sum_{i=0}^{p-1} X[i] ** 2 \right)$$

总结

以监督学习方式训练机器的基本原理如下：

1. 选择一个学习集合：

$$A = \{ (X[0], Y[0]), \dots, (X[p-1], Y[p-1]) \}$$

2. 提出一个模型，即参数为 w 的第一个函数 $f(x, w)$ 。其参数实际可能有几个，也可能有几百万个。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被分别命名为 $w[0], w[1], w[2], \dots$ 统称为： w 。

3. 提出第二个函数，即成本函数 $C(x, y, w)$ ，它用于测量学习示例中存在的误差，例如 $C(x, y, w) = (y - f(x, w)) ** 2$ ， $L(w)$ 为整个学习集合的平均值。

4. 从函数 $f(x, w)$ 找到一个参数，使得成本函数 $L(w)$ 达到最小值，通常使用的方法是随机梯度法：

$$w = w - e * dC(X[i], Y[i], w) / dw$$

5

伽利略和比萨斜塔

函数 $f(x, w)$ 得到的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比如，让一块石头从高处落下来，测量它在给定时间内下落的高度。我们都知道，高度会按照下降时间的平方增加。

想象一下伽利略爬上比萨斜塔，停在某一层，然后扔下一块小石头并记录它落到地面所用的时间；他再往上爬一层，扔下同一块石头并测量时间；然后再上一层，重复做上面的实验。

一定存在一条唯一定律能够将石头下落所用的时间 x 和下落的高度 y 联系起来。

因此，根据石头落地所用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下落的高度。将 x （下落时间）与 y （下落高度）联系起来的公式是 $y = 0.5g * x^2$ ，其中 g 表示重力加速度，为9.81米每秒的平方（ m/s^2 ）。这个函数是一个抛物线。伽利略根据自己的观察，建立了这条定律。从此，人们可以通过下落时间计算下落高度，或者通过下落高度计算下落时间。

伽利略的发现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该科学方法试图通过数学公式建立将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联系起来的定律。他也由此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总结出定律，并用定律预测现象。这正是自主学习所做的事情。

6

图像识别

上述发现潜在规律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模式识别。每一个输入的图像 x 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很大的数字集合。例如，一张 1000×1000 像素的黑白照片可以用100万个数字表示，每个数字表示一个像素的灰度值。如果是彩色图像，则每个像素由三个值表示：红色、绿色和蓝色。

同样，机器给出的答案 y （图像识别）也可以由一个数字或一系列数字表示。比如，向机器输入一张猫的图片（ x ），然后指示机器回答“这是一只猫”（ y ）。我们可以设定 $y=1$ 代表猫， $y=-1$ 对应猫以外的东西。这样，我们就限定了函数的输入为两类图像。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训练一辆配备摄像机的汽车进行自动驾驶，只不过过程要稍微复杂一点，因为这次要输入系统的 x 是由数百万个数字组成的图像，系统会根据图像计算汽车在道路上的位置。输出值 y_p 是方向盘的角度和踏板受到的压力。

假如想要训练一台机器区分汽车图像和飞机图像，我们需要提供数千张汽车图像和数千张飞机图像。然后，输入一张汽车图像，如果机器给出正确的答案，那么我们什么也不要做；如果机器判断错误，那我们就调整系统参数使其更接近正确答案。换句话说，我们利用调整参数的方式减少误差。

所有的监督学习系统都遵循相同的原理，即：

1. 对于一个输入值 x ，它可以是图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数字表）、语音信号（由麦克风输入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发出的数字序列）、要翻译的文本（由一系列数字表示）等，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分析。

2. 有一个期望的输出值 y 。它是对应输入值 x 的理想结果。

3. 机器输出的值 y_p ，是由机器给出的答案。

7

感知器的创新

在这一节，我们以感知器为例来谈一种非常简单的机器——线性分类器。

线性分类器是学习机的前身，是1957年由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在美国布法罗的康奈尔大学的航空实验室设计出来的。当时，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人类和动物智力特性的成因：学习。

感知器的出现源于其发明者受到了当时神经科学发现的启发。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主要研究大脑如何工作以及神经元的连接方式，他们将生物神经元描绘为具有多个分支的星状物。除了最后一个分支，其他所有分支输入都形成入口或者树突，它们通过接触区——突触——将本神经元和其他上游神经元相连接。最后一个分支——轴突——是下游神经元的唯一出口。神经元接收并处理由上游发来的电信号，并在需要时将唯一的单个信号传输到下游。这条输出链由电脉冲序列组成，被称为动作电位或放电脉冲（spikes），其频率代表神经元活动的强度，可以用数字表示。

1943年，美国控制论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沃伦·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提出了一种简化了的生物神经元数学模型，有人将其称为一幅“漫画”，这个“人工神经元”能够计算出代表上游神经元活动强度的加权和。如果这个值低于某个阈值，则表示神经元处于不活跃状态；相反，如果它高于此阈值，则表示神经元处于活

跃状态，并会产生一系列沿其轴突向下游神经元传播的放电脉冲，脉冲的频率也由一个数字表示。

在麦卡洛克和皮茨的这个模型中，输出为二进制：活跃或不活跃，1或-1。每个二进制神经元计算与其连接的上游神经元输出的加权和。如果这个值大于阈值，则输出为1，否则为-1。在我们的示例中，此阈值为0。

使用公式表示如下：

$$s = w[0]*x[0] + w[1]*x[1] \dots w[n-1]*x[n-1]$$

其中 s 是加权和， $x[0], x[1], x[2], \dots, x[n-1]$ 是输入值，而 $w[0], w[1], w[2], \dots, w[n-1]$ 是权重，即加权和中涉及的系数。这样由 n 个数字构成的集合被称为“ n 维向量”。在向量中，每个数字都有其独特的编号。我们可以用数学符号更简洁地表示这个公式：

$$S = \sum_{i=0}^{n-1} w[i]*x[i]$$

向量之间的这种运算称为向量积。在计算机上，人们可以编写程序（使用Python语言）执行这个计算：

```
def dot ( w , x ) :  
  
    s = 0  
  
    for i in range ( len ( w ) ) :  
  
        s = s + w[i]*x[i]  
  
    return s
```

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函数 $\text{dot}(w, x)$ ，其参数 w 和 x 是两个向量。

该函数计算了 w 和 x 之间的向量积，并返回结果。代码`for`是一个循环。它执行了 $\text{len}(w)$ 次（ w 的维数）下一行的代码，它的作用是在变量 s 中累加 w 项和 x 项的乘积；最后一行代码将 s 的值返回给调用程序。我们可以创建两个三维向量，并按如下所示调用函数：

```
w = [-2, 3, 4]
```

```
x = [1, 0, 1]
```

```
s = dot(w, x)
```

将数字2代入变量 s 中，即产生：

$$-2*1 + 3*0 + 4*1 = 2$$

假设规定的阈值为0，如果 s 大于0，则神经元的最终输出为+1；如果 s 小于0或等于0，则神经元的最终输出为-1。我们同样可以利用Python编写一个小程序计算输出值：

```
def sign(s) :
```

```
if s > 0 : return +1
```

```
else : return -1
```

```
def neurone(w, x) :
```

```
s = dot(w, x)
```

```
return sign(s)
```

这样定义的符号函数在参数 s 大于0时，返回+1；如果 s 小于或等于0，则返回-1。

根据麦卡洛克和皮茨的说法，这些二进制神经元同样进行着逻辑计算，而大脑可以被视为一个逻辑推理机。[\[1\]](#)

这个想法启发了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他在他的感知器中使用了麦卡洛克和皮茨提出的二元阈值神经元。此外，他还重新拾起了把信号传输到神经元的想法，神经元计算输入的加权和，并在加权和大于0时被激活。不仅如此，他在原来生物神经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设计出了一个程序，允许机器通过修改加权和的权重来纠错，从而进行自我调整。这个灵感来自大脑在学习过程中会改变突触效应的机制，类似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西班牙神经解剖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尼·卡扎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做过的工作。

罗森布拉特还了解过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于1949年在其《行为的组织》[\[2\]](#)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当两个神经元同时处于激活状态时，连接两个神经元的突触会变得更加活跃，这就是赫布学习假说。这一假说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得到证实，到20世纪70年代，埃里克·坎德尔通过研究海兔解释了其生物化学机制。

因此，感知器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只有一个麦卡洛克和皮茨所描述的神经元，它通过改变自身的权重进行学习。在训练阶段，假设操作员将字母C的图像输入到机器中，设定预期的输出：字母C为+1（其他字母为-1），机器会调整其权重以使输出更接近期望的答案。操作员必须重复多次输入C和其他字母的操作，并通过调整权重的配置使机器能够识别所有（或几乎所有）C。

操作员可以通过输入带有字母C的图像，或训练期间机器从未看到的其他字母的图像来对机器进行测试，从而验证对它的训练是否有成效。如果结果令人满意，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做好了准

备，可以进入应用阶段。

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于1957年在布法罗设计的机器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型金属柜，这个金属柜上裸露着成千上万条电子线路。这台机器配备一种人造视网膜，这种视网膜是一个由光电管组成的网格，可以用来捕捉输入的图像。它还有数百个像放大器音量键一样的电动按钮，它们代表权重。每个按钮都相当于一个连接到小型电动机上的可变电阻器，可变电阻对视网膜输出的电压加权，电子电路计算加权和。如果此加权和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出口处的灯就会亮起，否则就没有反应。

感知器的创新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每识别一次输入的图像并输出相应结果后，它都会自动调整权重。从概念的角度讲，根据数据调整模型参数的想法已经在统计学中存在了几个世纪。弗兰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种想法应用到了模式识别上。

[1] Warren S. McCulloch, Walter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The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1943, 5 (4), pp. 115 –133.

[2] Donald Olding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Wiley, 1949.

8

25像素的网格

我们先来回想一下感知器的原理：在机器的输入端，视网膜记录低分辨率的简单图像；在输出端，指示灯会根据机器是否正确识别图像亮起或熄灭。

举个例子：将一张 5×5 像素，一共25像素的图像输入感知器。机器的视网膜会将绘制在表格中的25个像素转换为25个数字：黑色像素为+1，白色像素为-1。感知器会通过电线上的电压显示这些数字，如今，这些数字被放在计算机的存储格子中。与图3—4中字母C的图像相对应的25个数字的序列应该为：

$x[0] = -1$, $x[1] = -1$, $x[2] = -1$, $x[3] = -1$, $x[4] = -1$,

$x[5] = -1$, $x[6] = +1$, $x[7] = +1$, $x[8] = +1$, $x[9] = -$

1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图3—4 字母C在 5×5 像素网格上的图像

一个图像是一个像素，每个像素是一个数字，用来表示像素的颜色：在这里，+1表示黑色，-1表示白色。因此，图像就是一个数字表。在这种情况下，该图像与自然的黑白图像不同，在自然的黑白图像中，关联的数字代表灰度的强度。在彩色图像中，每个像素都与代表红色、绿色和蓝色强度的三个数字相关联。

一个数字序列，即向量 $x[0], \dots, x[24]$ 代表输入的图像（见图3—5）：第一个像素连接到神经元的第一个输入 $x[0]$ ，第二个像素连接到第二个输入 $x[1]$ ，依次类推。

该机器有25个权重，各自对应连接一个像素。这25个参数及其连接图构成了机器的体系结构。权重与像素的连接模式是固定的：同一像素始终连接同一输入和同一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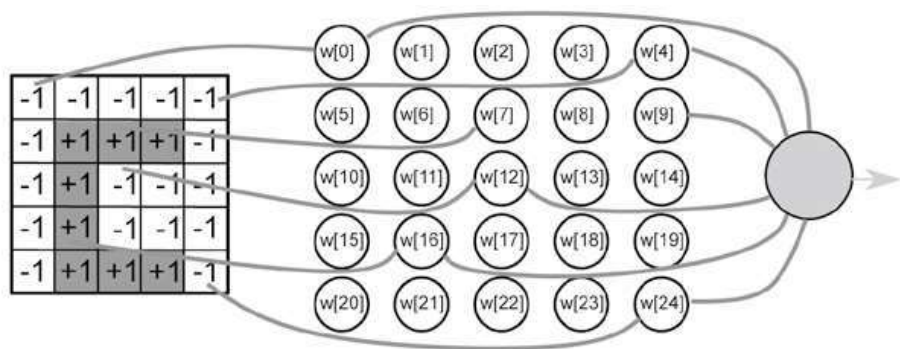


图3—5 连接到一张图像的一个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计算它的输入值的加权和。该神经元有25个输入值，它们是一个图像的像素，每个输入的值为+1或-1。每个像素的值乘以将这个像素连接到神经元的权重，将这些乘积相加便得出加权和。通过对这些权重的调整，机器可以调节其输出值。然后将加权和与阈值进行比较，如果加权和大于阈值，则神经元输出为+1，否则为-1。上述权重构成了该系统的内存。（为清楚起见，图中仅显示了部分连接。）

在开始学习之前，所有的权重都为0。此时，无论图像如何，它们的加权和都为0，输出都为-1。

9

区分字母C和D

机器学习的过程就是其调整权重的过程。如果我们训练机器区分字母C和字母D，那么方法也一样：重复多次向机器输入两个字母的图像，如果机器给出正确答案，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如果错误，我们调整参数的权重（“转动音量旋钮”）来改变加权和，使得C为正、D为负。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训练过程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如果输入的图像是C，但机器识别错了，就代表着权重的设置不对，其加权和低于而不是高于0（阈值）。因此机器，更正确的说法是工程师编写的学习算法，必须修改权重以使该加权和增加。那么机器会提升输入端中对应项为+1的权重值，减少输出端对应项为-1的权重值。

相反，如果示例是D且机器给出了错误的答案（+1，代表的是C），则意味着加权和大于0，而不是小于0。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算法必须减少对应为+1的条目的权重值，增加对应项为-1的权重值。

每一次权重的调整幅度都应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调整后，新的权重值将覆盖原来的值。通常来说，一次调整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只有在连续多次的调整后才能得到正确答案。

通过不断重复地输入、识别和对C、D的权重进行调整，如果足够幸运，由算法确定的权重配置将会收敛到能够稳定识别任

何一个C或D的状态。

举一个机器学习的例子。向量 x 中有25个像素值， w 是向量中的权重，变量 y 代表预期的输出值（+1或-1）， yp 是由神经元计算后得到的输出值（也是+1或-1）。如果机器计算出正确答案，则 $(y-yp)$ 的差值将为0；如果预期值 y 为+1，则 $(y-yp)$ 差值为+2；但如果 y 与 yp 相反，则差值为-1或-2。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使用相应的输入值 $x[i]$ ，根据如上所述的方法调整每个对应的权重 $w[i]$ ：

$$w[i] = w[i] + e * (y - yp) * x[i]$$

变量 e 是一个决定调整幅度的正常数。权重的变化将使加权和在正确的方向上增加或减少。这个过程可以用几行代码概括。

假设该示例为C，预期的输出值为+1。我们借助前面定义的神经元函数 $neurone(w, x)$ 计算加权，然后将每个权重通过如下方式逐一调整：

```
yp = neurone ( w , x )  
for i in range ( len ( w ) ) :  
    w[i] = w[i] + e * ( y - yp ) * x[i]
```

罗森布拉特的感知器是一台重达几吨的电子机器，当时它完成的计算现在仅仅用几行代码就能实现。这就是现代技术的魅力！

在我们列举的示例中，机器学习了C和D“模板”之间的种种差异。C特有的像素标记为正的权重，D特有的像素标记为负的

权重，其他像素既不在C中也不在D中出现，或者在C和D中都出现了，只不过权重为0。

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将感知器学习的过程看作成本函数最小化的过程，其中参数是系统的可调整权重，就像在前面的汽车案例中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这一点。

说一些题外话：当时也存在一种与感知器截然不同的方法，即“最近邻算法”。它可以不依靠形状的变化来进行识别，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技术，只需将一个图像与另一个图像进行比较即可。计算机的内存中存储了所有用于训练的图像，当要识别一个图像时，机器会将其与内存中的图像进行比较，例如通过计算两个图像之间不同像素的数量，从而找出最相似的图像。它输出的是与输入图像最接近的图像类别：如果输入的是D，则输出为“D”。该方法仅限于简单图像的识别，例如少量字体样本里的印刷体字母。但是，对手写字符而言，它的识别效率就会降低，而且价格昂贵。如果要使用最近邻算法来识别一只狗或一把椅子，则需要将数百万张狗或椅子在不同位置、光线、设置和环境中的照片存储到计算机中。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

10

泛化原理

学习机器的特性是泛化，能够举一反三，即能够给出学习中未曾看到的示例的正确答案。如果学习所用的数据集里包含足够的C和D示例，并且样式互不相同，感知器也许就能够识别出它从未见过的C和D，但前提是它们与所学习过的示例差别不是太大。

我们可以通过类推来说明这一泛化原理。人类之所以能够计算出 346×2067 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记住了所有可能的乘法运算结果，而是因为发现了乘法运算的原理。感知器的作用原理更为细致，它并没有存储所有可能的C的形状来识别，而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模型，使它可以执行所要求的识别。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操作的吧。

训练系统的操作人员事先收集了大量的示例，也许是数百个或数千个大小、字体各不相同的字母C，然后将它们放在25个像素网格上的不同位置。字母D也如此操作。

如果想要训练一个感知器对C的示例生成+1，对D的示例生成-1，那么在学习过程中，感知器会给C图像中黑色的像素和D图像中白色的像素各分配一个正的权重，给在C图像中白色的像素和D图像中黑色的像素各分配一个负的权重。其中，权重代表着能够将C与D区分开的信息。

从这个过程就能看出学习的魔力：这台“训练有素”的机器能

够超越我们输入的示例，识别出从未见过的图像。

11

感知器的局限性

当收集到的示例中的C或D相差不大时，我们刚刚描述的方法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形状、大小或方向的差别太大（例如一个在图像角落里极小的C），那么感知器将无法找到可以区分C和D示例的权重组合。此外，经证实，某些类型的形状变化也是无法被感知器识别的。所有的线性分类器都存在这样的局限性，感知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探究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线性分类器的输入端输入的是 n 个数字的列表，也可以用 n 维向量表示。从数学上讲，一个向量代表的是空间中的一个点，构成它的数字就是其坐标。对于一个有2个输入的神经元，输入空间是二维的（它是一个平面），一个输入向量代表平面中的一个点；如果神经元有3个输入，则输入向量对应一个三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在我们描述的C和D示例中，输入空间具有25个维度（图像的25个像素——对应到神经元的25个输入）。也就是说，图像是由25个像素值组成的向量，它对应的是25维空间中的一个点。这是一个无法用画面呈现的超空间！

一个线性分类器，也就是麦卡洛克和皮茨所说的神经元阈值，将其输入空间分为两部分，即例如C的图像和D的图像。如果空间是一个平面（具有2个输入的神经元），则两部分之间的边界就是一条线；如果空间是三维的，则两部分之间的边界就是一个平面；如果空间维数是25，边界则应该是一个24维的超平面。总结来说，如果输入数据的个数为 n ，则该空间具有 n 个维

度，分离曲面就是 $n-1$ 维的超平面。

为了验证该边界确实是一个超平面，我们可以重写二维中的加权和公式，即向量 w （权重）和向量 x （输入像素值）的向量：

$$S = w[0] * x[0] + w[1] * x[1]$$

当此加权和为0时，我们就跨越在由线性分类器分隔出的两部分之间的边界上，因此，边界点满足等式：

$$w[0] * x[0] + w[1] * x[1] = 0$$

也可写成：

$$x[1] = -w[0] / w[1] * x[0]$$

这就是一个直线方程！

当我们计算两个向量的向量积时，如果它们是正交的，则向量积等于0；如果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小于 90° ，向量积为正；如果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大于 90° ，向量积为负。因此，在第一种情形中，向量 x 就是所有与向量 w 正交的向量的集合。在 n 维情形中，它们形成 $n-1$ 维的超平面。

不过问题就在这里，以下是我的论证。

我们来设想一个感知器，它只有2个输入，也就是一个有2个输入的神经元，而不是25个输入（ 5×5 像素的网格）。我们在此感知器中添加第三个“虚拟”输入，其值始终等于-1。如果没有这个附加参数，分隔线必定经过平面原点；现在多了这个附加参数，两部分空间之间的分界线就有可能不再经过平面的起点，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权重的方式自由移动边界线。

由此可知，这种非常基础的机器无法对某些输入的图像进行分类。 $(0, 0)$ ， $(1, 0)$ ， $(1, 1)$ ， $(0, 1)$ ，这4个学习示例可以用4个点表示，映射到图上则展示如图3—6：

通过权重的配置，感知器可实现的函数是能够将点分为两个集合，分别进行分类。

通过观察图3—6，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一条直线将 $(0, 0)$ 、 $(1, 0)$ 和 $(0, 1)$ 、 $(1, 1)$ 分开，但并不存在将 $(0, 0)$ 、 $(1, 1)$ 和 $(1, 0)$ 、 $(0, 1)$ 分开的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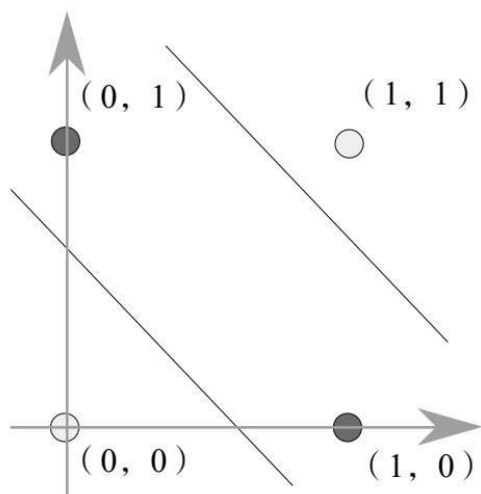


图3—6 有2个输入的感知器

将两个黑点 $(0, 1)$ 和 $(1, 0)$ 对应为 $+1$ ，两个灰点 $(0, 0)$ 和 $(1, 1)$ 对应为 -1 ，这个函数被称为“异或”。不存在一条可以分开黑点与灰点的直线，或者说线性分类器（例如感知器）不能计算这个异或函数。图中的直线分别表示“与”函数：[对于 $(1, 1)$ 为 $+1$ ，其他为 -1]和“或”函数[对于 $(0, 0)$ 为 -1 ，其他为 $+1$]。在二维情形下，16个布尔函数中只有两个不能线性分离；在高维空间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函数是线性可分离的。

如果一个函数在 (0, 0) 点为0, 在 (1, 1) 点为1, 在 (1, 0) 点为1, 在 (0, 1) 点为0, 则该函数称为“异或”。我们说它不是“线性可分离的”：输出为1的输入点是不能与输出为0的一条直线、一个平面或一个超平面分离的。

在下表中，每一行都是两个二进制输入的4种可能情况之一。带有编号的每一列代表一个特定的布尔函数在4个给定输入时对应的输出。总共有16个可能的函数（ 2^4 ），其中有14个函数可以通过线性分类器实现，只有2个函数无法实现（在最后一行中用N表示）。

输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1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1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可实现？	O	O	O	O	O	O	N	O	O	N	O	O	O	O	O	O

这个案例中涉及的是二维空间中的点，对应函数中两个输入图像的两个像素，所以这是人类能够看见的一个平面。

而一个真正的感知器能够在多维空间上工作。当我们想让感知器区分稍微复杂或变化较大的形状、位置等时，经常会遇到刚才描述的情况，只不过这种情况是“高”维度的。

对感知器而言，如果输入向量与权重向量形成锐角，则加权为正；如果为钝角则加权为负。正负之间的分隔边界是与权重向量 w 正交的点 x 的集合，因为 w 和 x 的向量积为0。在 n 维空间中，边界方程为：

$$w[0]*x[0] + w[1]*w[1] + w[2]*w[2]...w[n-1]*x[n-1] = 0$$

它是一个 $n-1$ 维的超平面。

感知器通过一个超平面将空间分成两半。我们希望在超平面的“一侧”呈现所有使C图像检测器处于活跃状态的点，在“另一侧”呈现所有使C图像检测器处于非活跃状态的点。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超平面，则感知器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找到它；如果这样的超平面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点不是线性可分离的，即使感知器无限次地修改权重，也无法收敛到稳定且唯一的权重配置。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论证？因为它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困扰研究模式识别学者的难题，而这些专家也因此推断出感知机器的功能有限，无法用它来识别自然图像中的物体。

事实上，当输入数据的维数足够大、示例众多且复杂时，例如成千上万张狗、猫、桌子和椅子的照片，它们的类别很有可能不是线性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无法被直接与像素相连接的感知器识别。即使在简单的C和D的示例中，如果字母的形状、位置或大小有很大的差异，感知器也无法对C和D进行分类。

西摩尔·帕普特和马文·明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感知器：计算几何学概论》[\[1\]](#)葬送了感知器的未来，这使相关的研究人员更加沮丧。这次机器学习研究的停顿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导致我们走入了上文提到的人工智能的几个寒冬期（低谷）里的一个，使研究受阻的科学界转变了研究方向。

对当代读者而言，这个论证的好处就是提供了另一个了解机器学习的角度。

[\[1\]](#) Marvin L. Minsky, Seymour A. Papert, *Perceptrons : An Introduction to*

12

特征提取器

最简单的感知器无法区分某些形状。因此，从一开始研究人员就找到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解决方案：在输入图像和神经层之间放置一个中间模块，也就是所谓的“特征提取器”。它能够检测输入图像中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区域，然后构造一个向量来描述这些区域是否存在、强度如何，并最终将这个向量交由感知器层处理。

现在再来看我们的论证。

当我们将一个感知器直接连接到图像（例如C）的像素时，该感知器将很难超越“增强模板”模式。在该模式下，由权重编码的像素类别区分了C与其他图像。一旦示例的变化太大，罗森布拉特的感知器就会“饱和”，权重将不再能够进行识别。当使用差别极大的C图像训练感知器时，就会发生以上情况。如果图像的分辨率足以识别所有字符（大约 20×20 像素），那么C的大小、字体或者样式是印刷字体还是手写字体，是定位在图像的一个角落还是中心，都不再重要。如果形状、位置或尺寸差异过大，那么感知器将无法对其进行分类，因为没有适合所有变化的单一的增强模板（见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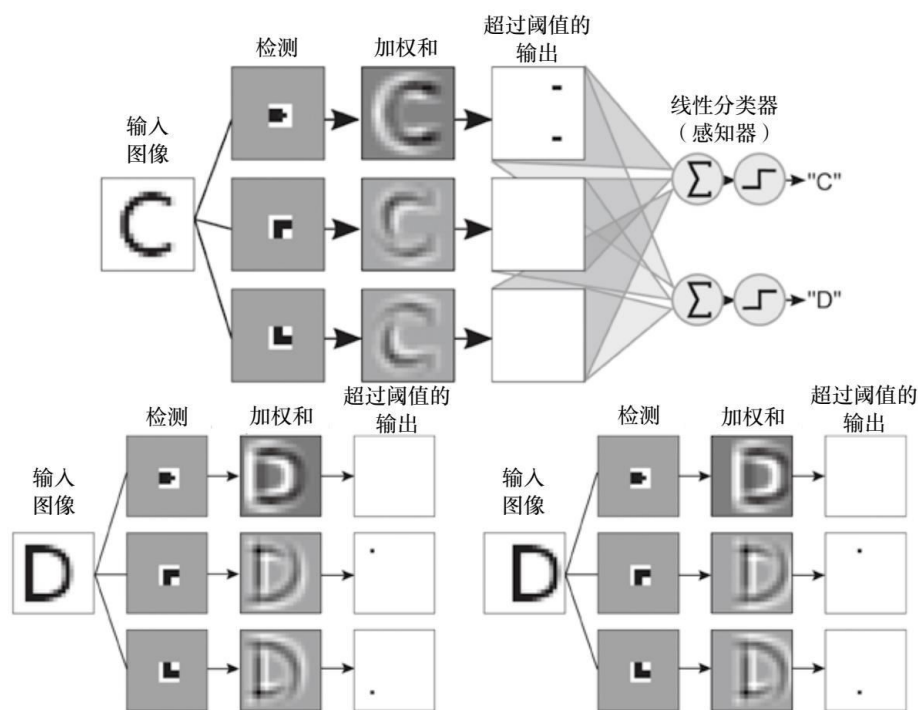


图3—7 特征提取器

特征提取器检测输入图像中存在的独特图案，并将其输出发送到可训练的分类器上，例如感知器。第一个模板将检测到笔画的线尾作为“C”的终端，其他两个模板检测拐角，例如“D”的拐角。该层信息卡是感知器的输入端。训练之后，只要存在一些特征，感知器就能够区分C与D，不论其大小和位置如何。在这个示例中，在一个C和两个位置不同的D的情况下，提取器可以被看作一层二进制神经元。白色像素代表-1，灰色像素代表0，黑色像素代表+1。上述三个特征检测器是一种 5×5 像素的“模板”，该模板对输入图像进行比对。对于模板的每个位置，我们用模板的25个权重计算输入窗口的25个像素的加权和。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图像，这些图像的每个像素在窗口的内容类似于模板时就会变得更黑。然后，将加权和与阈值进行比较并生成特征图，如果在相应位置检测到图案则生成值为+1，否则就为0。

无论字体或书写风格如何，在 20×20 像素的图像中分辨出C和D的方法都是检测拐角和笔画的终端。D是带有两个角的闭合

图形，而C是一条两端各有一个端点的开放曲线。我们可以据此构建一个特征提取器，检测端点或拐角的存在，而不必理会C和D在图像中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由一组二进制神经元集合组成的第一层，这些神经元的输入是图像上 5×5 像素的小窗口，并手动给它分配权重（而不是由学习算法确定）。我们能得到三种类型的感知器神经元：一种终端感知器神经元和两种角感知器神经元。输入图像上的每个 5×5 像素窗口都会提供三个神经元：每种类型各一个。当输入的 5×5 像素窗口图像看起来与权重构成的图像相似时，每个神经元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如果是形状易于辨识的C，终端检测器将被激活；如果是形状良好的D，角检测器将被激活。最后一层是一个简单的感知器，只需用它计算出角和终端的数量即可，以此来区分C与D，它们的位置、大小和样式则无关紧要。

我们可以修改感知器的体系结构，使其能够执行更复杂的操作。具体做法就是，将一个手工构建的（工程师需为此功能设计一个程序）、未经训练的“特征提取器”放置在感知器层之前。特征提取器的设计既复杂又费时，为了构造出适合各种应用的特征提取器，研究人员已经采用了多种方法，2015年以前的科学文献中充满了这类构造方法。

因此，有一种广泛使用的特征提取器会检测输入图像中那些很细微的简单图案。例如，对于字母，它不仅能够标出字母的终端和角，还能标出竖线、横线、循环线等。特征提取器的输出是一系列数字，代表上述这些简单图案存在与否及其位置。此时，感知器并不是直接连接到输入图像的像素，而是通过这些更为抽象的特征连接。

如果要利用感知器检测一辆汽车，则其特征提取器就是一组模板，分别检测车轮、挡风玻璃的角度、散热器护栅等。我们用

这些模版扫描整个图像，当扫描到一种图案时，模板就会亮起来，然后将扫描得到的所有特征输入感知器中。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处理面部，只需检测出眼睛部位的深色区域、鼻孔中的两个小黑点、两片嘴唇之间形成的略深的一条线，就可以构建一个合适的面部感知器。

在最初的感知器中，特征提取器实际上是一个二进制神经元序列，它们随机地连接到输入图像中的小像素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些神经元的权重无法通过学习改变，它们是固定的，权重值也是随机的。由于连接是随机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确认哪个是有用的。为了使第一层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设置很多的神经元特征提取器，这就使最终神经元（唯一可训练的神经元）的输入数量激增。在一些自2013年以来就很少使用的分类和模式识别系统中，特征提取器的输出数量多达数百万。特征越多，对感知器的后续分类工作就越有帮助，但价格也更为昂贵。

研究人员从视觉皮层连续区域的组织中受到启发，他们想通过建立更多的神经元层来提升感知器效率：在系统的第一阶段提取出非常简单的特征；在下一层尝试检测这些特征组合的轮廓或是直接连接特征，以形成诸如圆形或角的基本形状；再在下一层，检测这些组合构成的物体局部；等等。

另一种更为精明的构建特征提取器的方法是SVM，这是伊莎贝尔·居永（自2015年起在奥赛[\[1\]](#)担任教授）的发明，其合作者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和伯恩哈德·伯泽尔都是我在贝尔实验室时的小组成员。1995—2010年，SVM一直都是分类最常用的方法。我对我的朋友和同事深怀敬意，但必须承认我本人对这个方法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并没有解决特征提取器自动训练的关键问题。不过，SVM方法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SVM是所谓的核机器的一个范例。虽然它的支持者并不喜欢被拿来对比，但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两层神经网络。第一层的单元数与学习集中的示例数相同，第二层像普通感知器一样做加权和计算。第一层中的单元借助一个核函数 $k(x, q)$ ，将输入的 x 与所有的学习示例 $X[0], X[1], X[2], \dots, X[p-1]$ 做“比较”，表达式中 x 代表输入向量， q 是一个学习示例。例如，如果第一层单元号为3，则会输出 $z[3] = k(x, X[3])$ 。

函数 k 的一个典型范例就是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距离指数：

$$k(x, q) = \exp(-\nu * \sum_{j=0}^{n-1} (x[j]-q[j])^2)$$

当 x 和 q 相邻时，它会得出一个较大的输出值；而当 x 和 q 彼此相距较远时，它会产生一个较小的输出值。

第二层会以监督的形式将学习的权重与输出结合起来。在这种感知器中，只有最后一层进行监督式的训练。但第一层，因为使用了学习示例中的输入 (x) [2]，所以也可以说它受到了某种形式的训练。

一些数学书的主题就是探讨这些极为简单的模型，数学的优美掩盖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所以它们吸引了研究人员，使得SVM和核方法大行其道。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核机器并没有比感知器强大多少，我和我的同事曾尝试利用这一点说服同行，但无功而返。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多层体系结构的有效性，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

但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习示例数量不多的情况下，SVM确实可靠且易于操作。而且当时是互联网时代初期，SVM的程序开放了源代码，人们可以免费使用。它们是“全新且精良”的，因此很快获得了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核方法使神经网络黯然失色，多层网络的使用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消失了。

但是，添加一层或多层人工神经元可以计算那些单层神经元无法有效计算的更为复杂的函数。数学定理表明，仅需两层神经元就可以进行任何计算，这也是SVM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只不过这种情况需要庞大的中间层。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第一层神经元数量远远大于原始图像中的像素数量，即使我们输入的是25像素的小图像，也可能需要数百或数千个神经元处理。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人员总是困惑于多层网络的训练。在感知器的学习过程中，只有最后一层经过训练，特征提取器的第一层是无法训练的，必须手动确定。

对于输入到机器中的每个图像的数千或者数百万个权重，如何才能手动调整呢？正是由于这个阻碍，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术界放弃了训练端到端智能机器的想法，而侧重于研究构成统计模式识别领域的应用。受感知器启发的体系结构虽然不完善，但直到21世纪10年代初，这个体系一直在相关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接收信号，然后通过手动设计的特征提取器处理信号，再通过由感知器或任何其他统计学习方法构成的分类子系统接收信号：这就是模式识别的惯用方法。

感知器开启了所谓的监督机器学习。机器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调整参数，使输出接近于正确的答案。通过适当的训练，机器也能识别从来没有见过的示例，这就是泛化属性。

泛化属性也有其局限性。为了排除局限，在连接到传统分类器（例如感知器）之前，研究人员会对图像进行编码，通过提取其明显特征来完成识别任务。20世纪60年代至2015年，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设计用于各类问题的特征提取器。围绕该主题已经撰写了数千篇文章，数千名研究人员为此奉献了整个学术生涯。我一直持有的一个想法就是找到训练特征提取器的方法，而不是针对某个问题手工构建特征提取器。但长期以来，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同行的信任，这也是多层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面临的挑战。

[1] 奥赛是巴黎-萨克雷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2] 由于未使用所需的输出（ y ），因此这种学习没有监督。

第四章

机器学习的方法

监督学习的基本原理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即通过调整系统参数来降低成本函数，也就是降低在一个学习示例集中测量到的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平均误差。实际上，最小化成本函数和训练系统是一回事。

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像感知器这样仅对最后一层进行训练的简单模型，还适用于几乎所有的监督学习方法，特别适用于端到端训练的多层神经网络，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讲解。

总之，基于成本函数最小化的学习是人工智能运作的关键要素。因此，理解其局限性同样有利于我们反思人类自身的学习。

1

成本函数

提示：训练机器的过程就是调整参数的过程。

再强调一遍：学习就是逐步减少系统误差的过程。所谓的机器学习，就是机器进行尝试、犯错和自我调整的操作。每次针对参数的调整都会删除参数原来的值。对于一个给定的训练示例，例如一个关联了输出值 y 的图像 x ，其误差值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代表由计算机产生的输出 $y_p = f(x, w)$ 与期望的输出 y 之间的距离，其中 w 是参数向量。对于每一个学习示例，即每一对 (x, y) ，误差都由一个成本函数 $C(x, y, w)$ 来测算。有一种表示成本的方法是取系统产生的输出 y_p 与期待的输出 y 之差的平方：

$$c = (y - f(x, w))^2$$

实际中存在很多类型的成本函数，上述公式仅用于计算机只产生一种输出的情况，换句话说，上述公式适用于当 y_p 和 y 都只是数字的情况。如果我们期望一个系统可以从示例图像中识别出狗、猫或者鸟，那么系统就需要给出三种输出，且输出的是一个向量而非一个数字。三种类型中的每一种输出都会被赋予一个值。例如，第一种输出代表“狗”类，第二种输出代表“猫”类，第三种输出代表“鸟”类，那么输出向量 $[0.4, 0.9, 0.2]$ 代表系统识别出了一只猫，因为“猫”类的得分最高，为0.9。在训练中，“狗”类的期望输出是 $[1, 0, 0]$ ，“猫”类的期望输出是 $[0, 1, 0]$ ，“鸟”类的期望输出是 $[0, 0, 1]$ （见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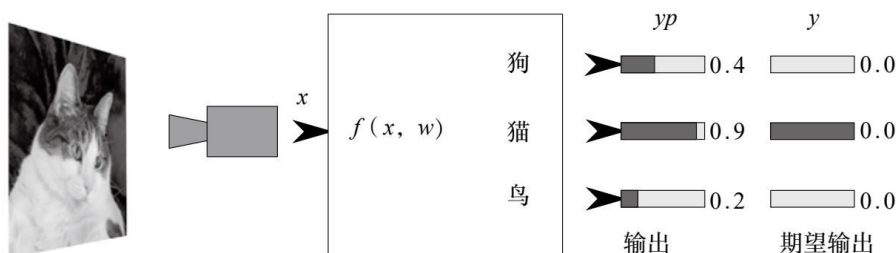


图4—1 三类分类器

计算机产生三个分数，每类各一个，构成一个三维向量的形式。在该示例中，机器产生的分数向量是 $[0.4, 0.9, 0.2]$ ，由此将图像分类为“猫”。“猫”类所期待的输出向量为 $[0, 1, 0]$ 。

成本函数的作用是测量系统的输出结果和期待的输出之间的差距，例如三种输出结果的误差的平方和：

$yp = f(x, w)$ # yp 是一个三维向量

$$c = (y[0] - yp[0])^2 + (y[1] - yp[1])^2 + (y[2] - yp[2])^2$$

事实上，针对多类别的分类问题，我们常常会建立输出为类似概率的分数（介于0和1之间且和为1的分数）的模型，并使用另一种被称为“交叉熵”的成本函数，这种函数能够将期待类别的输出推向1，而将其他类别的输出推向0。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Python小程序来计算成本函数 $C(x, y, w)$ ，程序如下所示：

```
#计算一个示例的成本函数
```

```
#x：输入向量
```

#y：期待的输出向量

#w：参数向量

def C (x , y , w) :

yp=f (x , w) # 计算输出值

c=0 # 在c中累加成本值

for j in range (len (y)) : # 循环计算输出值

c=c+ (y[j]-yp[j]) **2 # 累加成本

return c # 返回输出成本的总和

一个给定的含有 p 个示例的训练集，即一个向量 X （其中每个元素本身都是一个输入向量）：

$[X[0], X[1], X[2], \dots, X[p-1]]$

和一个向量 Y （其中每个元素都是一个期待的输出），

$[Y[0], Y[1], Y[2], \dots, Y[p-1]]$

我们可以用以下函数计算任何一个学习示例的成本，以3号示例为例：

$c = C (X[3], Y[3], w)$

我们需要计算学习成本，即利用成本函数在整个训练集上获得的成本平均值：

$$L (X , Y , w) = 1 / p * (C (X[0] , Y[0] , w) + C (X[1] , Y[1] , w) + \dots$$

$$C (X[p-1] , Y[p-1] , w))$$

同样，我们也可以编写一个程序来计算这一平均值：

#计算整个训练集中的成本函数平均值

#X：输入数据集的数组#Y：期待输出的数组

#w：参数向量

def L (X , Y , w) :

p=len (X) # p是训练示例的数量

s=0 #一个用来累计成本总和的变量

for i in range (p) #对示例进行循环计算

s=s+ C (X[i] , Y[i] , w) #累加成本

return s/p #返回平均值

我们可以计算出在整个数据集 (X , Y) 上的学习成本，计算方式如下：

$$\text{count} = L (X , Y , w)$$

在这个函数中，for循环遍历所有的学习示例，并将每个示例的成本（总和）累加到变量s中。最终，用函数返回累加的总和s除以示例数p，即返回了平均值。该程序的返回值取决于中间函数 $C(x, y, w)$ 使用的参数向量w，中间函数 $C(x, y, w)$ 则取决于函数 $f(x, w)$ ，而函数 $f(x, w)$ 则取决于w。

在一个给定示例集的学习过程中，每个参数w的配置，即每个w的值，都对应一个学习成本。机器在学习过程中会尝试调整系统的参数w，找到能够使成本最小化的w值，也就是使L达到最小化的w值。

当今可训练的系统内部都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可调整参数，也就是说，向量 w 可能具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维度。但若与人脑中突触的数量相比，这个数量并不多。

2

找到谷底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成本函数的最小值呢？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设想一个只有两个可训练参数 $w[0]$ 和 $w[1]$ 的系统。对某个特定的学习集而言，其中的每个坐标点（ $w[0]$ ， $w[1]$ ）都对应一个成本值。

最初，权重是随机设置的，所以在机器开始学习之前，成本值很可能会很高。在学习的过程中，网络会通过调整参数来降低成本。

对于一组给定的存储[1]在X和Y中的学习示例，我们可以将 $w[0]$ 设为6.0，将 $w[1]$ 设为5.0，并计算出相应的学习成本，如下所示：

$$w[0] = 6.0$$

$$w[1] = 5.0$$

$$\text{count} = L(X, Y, w)$$

我们可以将这个成本函数视作一处山地景观，在这处景观中有一个特定的地点，它对应着一对参数，即经度 $w[0]$ 和纬度 $w[1]$ ，也就是该地点在景观中的坐标。高度（海拔）是该地点（该参数组）对应的成本值。在整个山地景观中，等高线将所有具有相同成本值的点都连接了起来。

想象一下：我们迷路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天气还糟糕透

顶，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为了回到位于山谷底的村庄，在没有明确路线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沿着坡度最大的那条线路行进。我们会观察这条线路从何处下坡，然后朝着观察到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这样步步向前，最终到达谷底。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选中的斜率最大的下坡方向就是成本函数的梯度，谷底代表成本函数的最小值，其坐标就是使成本最小化的参数的值。

我们的目标是快速找到山谷中的最低点。从计算机技术资源的角度来看，测试非常耗时且昂贵，尤其是在学习库中有数百万个示例的情况下。因此，我们需要求助于一种叫作“通过梯度下降来最小化函数”的方法。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被广为使用的一种学习机制。

让我们来理解一下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为了找到斜率最大的线路，我们需要计算梯度，而与梯度相反的方向就是从给定位置下降最快的方向。为了找到它，我们设想一个相对较小的参数扰动，用以了解成本如何降低或增加。还是使用山地景观做比喻，我们朝着给定的方向迈出很小的一步，以此了解这一步会导致位置下降还是上升。为了让这个尝试有效，参数的小扰动必须与成本函数的小扰动相对应，也就是说，需要具备数学家所称的“连续性”的性质，避免函数出现台阶或陡峭悬崖。

接下来需要一个一个地干扰这两个参数。我们首先转向 $w[0]$ 方向（即转向东方），然后通过以下步骤来评估斜率 $g[0]$ ：先走一小步，测量相应的高度变化，用得到的高度差值除以步长。如果海拔降低，我们再朝该方向迈出一步。步幅与坡度成正比，坡度越陡，步幅越大，对于实现目标越有利，因为这说明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如果坡度很低，那我们只会走一小步。但是，如果在评估坡度时海拔升高了，那我们必须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一步，使我们的海拔降低，即成本函数的值降低。

然后，我们旋转90度，沿着 $w[1]$ 的方向（向北）前进，重复上述评估操作，计算斜率 $g[1]$ 。随后再根据结果，决定向前或向后迈出与斜率成比例的步长。不断重复以上两个步骤，我们将慢慢地接近谷底，直至海拔不再下降，也就是到达了山谷的最低点。

分量为斜率 $(g[0], g[1])$ 的向量 g 称为梯度。图4—2展示了这个梯度的向量。根据定义可知，梯度向量指向斜率最大（海拔增加最大）的方向，其长度为该方向上的斜率值。向着与该梯度相反的方向前进，就是朝着谷底移动。与向量 g 相反的方向是向量 $-g$ ，其分量具有相反的符号 $(-g[0], -g[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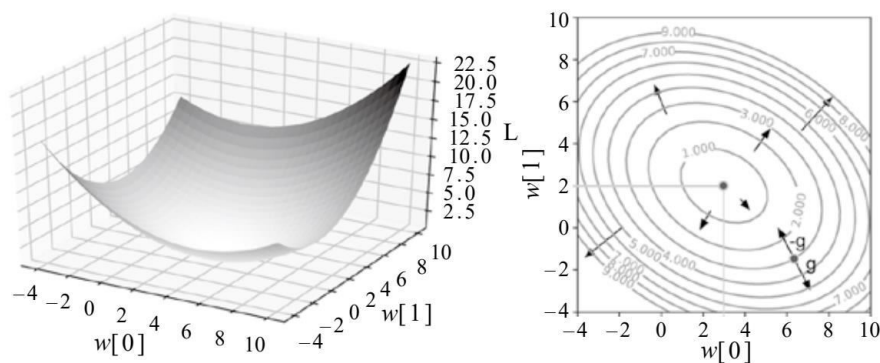


图4—2 学习成本函数

我们可以将成本函数与山地景观（左侧）进行比较，后者的等高线显示在右侧。训练一台机器的过程就是寻找谷底的过程，即找到产生最低成本值的可训练参数的值。在此示例中，经度和纬度是两个可训练参数 $w[0]$ 和 $w[1]$ ，最小值位于坐标 $(3, 2)$ 处。当开始训练这个系统时，我们不知道此景观的形状或其最小值的位置。但是，对于给定的参数值，我们可以计算其高度，即成本值。我们还可以计算指向最大斜率方向上的梯度向量 g 。梯度用箭头表示，在每个点上都不相同。通过更改与梯度相反的方向 $-g$ ，我们向着谷底迈出了第一步。这种修改是将向量 w 用其本身值减去梯度向量并乘以一个控制步长的常数 e 来代替，目标是通过测试，用尽可能少的配置来找到山谷底端的位置。

总结而言，梯度下降的实现步骤如下：

1. 计算当前参数向量值（在当前点）的学习成本。
2. 测量每个轴上的斜率，并将斜率收集在梯度向量 g 中。

3. 沿着与梯度相反的方向修改参数向量。修改方法为：梯度分量具有相反的符号，然后乘以控制步长的常数 e 。

4. 将上一步得到的向量添加到参数向量中。换句话说，就是将参数向量的每个分量替换为其当前值减去梯度向量的相应分量乘以步长 e 。

5. 梯度步长的大小很重要：如果太小，每一步就只能移动一点点，会拖延我们找到最小值的时间；如果步长太大，则有可能越过最小值，直接到达另一侧。因此，必须确保常数 e 的值合理。

6. 重复以上操作，直至到达谷底，也就是找到学习成本的最小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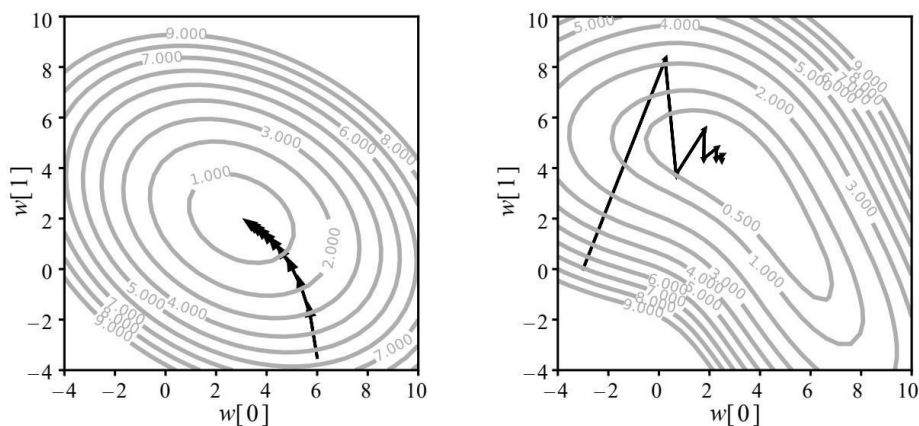


图4—3 梯度下降法生成的路线

梯度下降的过程旨在沿最大向下倾斜的方向（与梯度相反）采取一系列的

前进步骤，直至到达山谷底部。步长与梯度步长 e 成正比。右图中的 e 太大，会引起轨迹的振荡。梯度步长太大可能会导致不收敛。

证明

假设我们位于坐标 $(w[0], w[1])$ 。在此位置，海拔高度（学习成本）为 $h = L(X, Y, w)$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基于扰动的梯度下降过程，此过程简单但效率低下。首先，我们创建一个附加参数向量 wa ，该向量通过轻微干扰（称为 dw ） $w[0]$ 的值获得，如下所示：

$$wa[0] = w[0] + dw$$

$$wa[1] = w[1]$$

然后，我们计算新位置 $a = L(X, Y, wa)$ 的高度。扰动引起的高度变化为 $a - h$ ，扰动方向的斜率是 $(a - h) / dw$ 。为什么要计算这个比率呢？因为这就代表山的坡度，我们需要用它乘以步长，来计算高度的变化。

同样，我们通过如下方式在 $w[1]$ 方向上干扰 w ：

$$wb[0] = w[0]$$

$$wb[1] = w[1] + dw$$

我们可以计算出此时的高度 $b = L(X, Y, wb)$ ， $w[1]$ 方向上的斜率是 $(b - h) / dw$ 。将两个斜率存储在向量 g 中：

$$g[0] = (a - h) / dw$$

$$g[1] = (b - h) / dw$$

向量 g 称为成本函数的梯度，它包含了由各个轴上的斜率组成的向量。该向量指向最大斜率的方向。让我们再次用

山地景观的例子做比喻，如果东西方向（ $w[0]$ ）的坡度大于南北方向（ $w[1]$ ）的坡度，则最大坡度方向更接近东西轴。

下面是一个用程序编写的函数，它通过扰动来计算带有两个参数的函数的梯度。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效率很低，稍后我们会对它进行改进：

#通过扰动计算梯度的函数

#X：输入数据集的数组

#Y：期待输出的数组

#w：参数向量

#dw：干扰量

def gradient (X , Y , w , dw) :

h=L (X , Y , w) #计算成本

wa=[0 , 0] # 创建向量wa

wa[0]=w[0]+dw # 对第一个坐标的扰动

wa[1]=w[1]

a=L (X , Y , wa) # 计算扰动后的成本

wb=[0 , 0] # 创建向量wb

wb[0]=w[0]

wb[1]=w[1]+dw # 对第二个坐标的扰动

b=L (X , Y , wb) # 计算扰动后的成本

g=[0 , 0] # 创建向量g

g[0]= (a-h) /dw # 计算第一个坐标的斜率

```
g[1] = (b-h) / dw # 计算第二个坐标的斜率
```

```
return g # 返回梯度向量
```

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我们能够得到梯度向量的近似值：

```
g = gradient ( X , Y , w , dw )
```

根据定义可以知道，此向量 g 指向上面，而通过反转其分量符号获得的向量 $-g$ 指向下面。此时，我们就可以沿着与梯度相反的方向，即最大坡度方向，向山谷谷底进发。如果将这个移动过程分解，就是对应地在 $w[0]$ 方向（东西方向）上移动步长 $-e*g[0]$ 和在 $w[1]$ 方向（南北方向）上移动步长 $-e*g[1]$ 。变量 e 是一个很小的正数，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步长。

我们可以用程序编写一个带有几条指令的函数完成以上过程：

```
#梯度方向上的单次移动
```

```
#X：输入数据集的数组
```

```
#Y：期待输出的数组
```

```
#w：参数向量
```

```
#e：梯度步长
```

```
#dw：干扰量
```

```
def descend ( X , Y , w , e , dw ) :
```

```
g = gradient ( X , Y , w , dw ) #计算梯度向量
```

```
w[0] = w[0] - e*g[0] #更新w[0]
```

```
w[1] = w[1] - e*g[1] #更新w[1]
```

```
return w #返回新的参数向量
```

梯度下降学习法的步骤可以概括如下：

1. 计算成本。
2. 计算梯度。
3. 通过减去梯度乘以常数 e （梯度步长）来更新参数。

在梯度步长足够小的情况下，我们重复此过程，它最终将会收敛在山谷底部。

```
# 学习过程的程序
```

```
#n：梯度下降的迭代次数
```

```
def learn ( X , Y , w , e , dw , n ) :
```

```
for i in range ( n ) : # 重复n次
```

```
w = descend ( X , Y , w , e , dw ) # 迈出一大步
```

```
print ( L ( X , Y , w ) ) # 打印成本值
```

```
return w # 返回权重向量
```

这个算法函数将在成本不再下降时停止运算。

[1] 注意：计算机程序中的变量是用于记录数据的内存区域的名称（参见第三章相关内容）。

3

实践中的梯度下降

在现实中，“景观”并不只有两个维度，而是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维度，因此参数的向量不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而是由数百万个数字组成的。同样，梯度也具有数百万个分量，各个分量表示学习成本函数在对应空间轴上的斜率。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使用干扰来计算梯度的方法就变得极其低效，因为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扰每个参数并计算相应的学习成本。

为了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编写一个程序来扰动任意维度的参数以计算对应的梯度：

```
def gradient ( X , Y , w , dw ) :  
    h=L ( X , Y , w )  
    for i in range ( len ( w ) ) : #在各维度上的循环  
        wa = w  
        wa[i] = w[i] + dw  
        a=L ( X , Y , wa )  
        g[i] = ( a-h ) /dw  
    return g
```

该函数必须在每次干扰后重新计算L的值。如果有1000万个参数，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重复计算L1000万次。这明显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大为有效的计算梯度的方法是分析法，这种方法计算的是每个轴方向上的成本函数的导数，它不需要借助扰动。

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二次多项式：

$$c(x, y, w) = (y - w * x) ** 2$$

考虑到x和y皆是常数，该多项式关于w的导数是一条直线：

$$\begin{aligned} dc_dw(x, y, w) &= -2 * (y - w * x) * x \\ &= 2 * (x ** 2) * w - 2 * y * x \end{aligned}$$

无须扰动w我们就可以知道， $c(x, y, w)$ 在任何点的斜率都是通过计算其导数得出的。现在，让我们再看一个二维线性模型，其输入输出函数为：

$$f(x, w) = w[0] * x[0] + w[1] * x[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二次成本函数（带平方的函数）：

$$\begin{aligned} C(x, y, w) &= (y - f(x, w)) ** 2 \\ &= (y - (w[0] * x[0] + w[1] * x[1])) ** 2 \end{aligned}$$

将其他变量视为常数，我们就可以计算此函数相对于 $w[0]$ 的导数。该导数可记为： $dc_dw[0]$ ，

$$dc_dw[0] = -2 * (y - (w[0] * x[0] + w[1] * x[1])) * x[0]$$

我们也可以对 $w[1]$ 进行同样的计算，得出其导数：

$$dc_dw[1] = -2 * (y - (w[0]*x[0] + w[1]*x[1])) * x[1]$$

由这两个值组成的分量向量便是 $C(x, y, w)$ 相对于 w 的梯度。它是具有与参数向量相同维数的向量，其中每个分量都是对应参数的导数，也就是相对应维度函数的斜率：

$$dc_dw = [dc_dw[0], [dc_dw[1]]]$$

将其他变量视为常数，对某一个变量进行求导时，我们会得到偏导数。偏导数计算的是函数在这个变量方向上的斜率。由所有方向上的偏导数形成的向量就是梯度。

这极大地简化了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可以使用公式来计算函数的偏导数，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使用任何扰动的情況下计算函数在每一个点上的梯度向量！

让我们引用上一章描述的感知器的线性模型，它计算的是 w 和 x 之间的向量积：

$$f(x, w) = \text{dot}(w, x)$$

再引用一个衡量误差平方的成本函数：

$$C(x, y, w) = (y - f(x, w)) ** 2$$

就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梯度：

$$dc_dw[0] = -2 * (y - f(x, w)) * x[0]$$

$$dc_dw[1] = -2 * (y - f(x, w)) * x[1]$$

...

$$dc_dw[n-1] = -2 * (y - f(x, w)) * x[n-1]$$

综上所述，存在两种计算梯度的方法，分别是扰动法和偏导数法。

4

随机梯度

梯度下降法还有一个变化形式，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到达谷底。与其计算成本的平均值，再采取调节参数的方式在所有训练示例中找到该平均值的梯度，不如使用偏导数计算单个示例的成本梯度，并同步进行参数调整。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100万张图片，那么使用传统的梯度下降法，我们就需要辨识每一张图片上的内容，计算预测向量与真实向量之间的差值，并重复100万次这样的操作，才能得到平均成本。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仅向前迈一小步，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因此，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了简化。简化后，该系统只是从训练集中随机选择一个示例，计算其成本函数的梯度，并根据该梯度进一步调整参数。然后再随机选择另一个示例，计算其成本函数的梯度，再调整参数。我们不断重复以上操作，直到这个梯度无法下降为止。随着不断靠近山谷底部，步长也会随之逐步减小。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会一个一个地对上述示例进行梯度计算，而是每一次对一小部分示例（称为“小批量示例”）进行平均梯度计算（见图4—4）。

每一步计算得到的梯度都会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参数在训练过程中总是无迹可寻。但是经过不断的反复，它总是会走向谷底。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方法比在整个训练集中计算梯度更快。

这个方法的计算过程

#随机梯度学习过程

#n：梯度下降的迭代次数

```
def SGD ( X , Y , w , e , n ) :
```

```
    p=len ( X ) #训练示例数量
```

```
    for i in range ( n ) : #重复n次
```

```
        k=random.randrange ( 0 , p ) #随机生成一个数字
```

```
        g=gradC ( X[k] , Y[k] , w ) #计算梯度
```

```
        for j in range ( len ( w ) ) : #每个参数上进行循环
```

```
            w[j]=w[j]-e*g[j] #更新参数
```

```
    return w #返回参数向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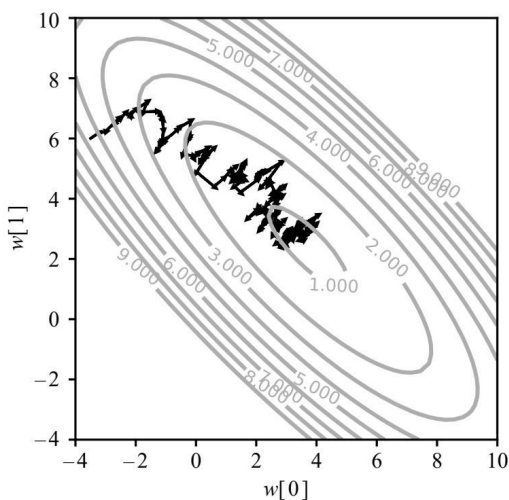


图4—4 随机梯度的轨迹

在随机梯度过程中，我们从训练集中选取一个随机示例，计算对该示例而言成本函数的梯度，然后在该梯度的相反方向移动一小步。接下来，我们再选取另外一个示例并重复该操作，然后是另一个，依次类推，同时逐渐减小梯度步长 e 。此过程能够迅速抵达学习成本（示例成本的平均值）的谷底，同时，由于一个示例与另一个示例之间的成本梯度有波动，因此呈现出的轨迹是不规则的。在图中，学习集包含了100个示例。仅仅通过对整个训练集的4轮计算，参数就围绕在最小值附近波动了。

虽然参数向量是曲折前进的，并没有遵循平滑的轨迹，但可以更快地到达谷底，这是因为它每一步只进行少量的计算。

随机梯度法是一种简单、与众不同且反优化直觉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经常需要处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学习示例，那时的效率就不一定高效了。

实际上，上述过程中将成本函数等价误差平方的方法，感知器的一个近亲自适应线性神经元也使用过。自适应线性神经元的模型是由伯纳德·威德罗（Bernard Widrow）和泰德·霍夫（Ted Hoff）于1960年设计的（它的年纪和我的一样大！）。如今再来讨论它，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的二次成本函数易于可视化；第二，该模型在科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曾一直是感知器的竞争对手。

与感知器一样，自适应线性神经元也是通过获取输入向量与权重向量之间的向量积，也就是加权和来计算输出，其理念是使用随机梯度过程来最小化期望输出和模型输出之间误差的平方。我们可以将自适应线性神经元视作分类器：因为它与感知器一样，输出的A类为+1，B类为-1。感知器的计算过程也是对特定形式成本函数的随机梯度过程。

其成本函数如下：

$$C(x, y, w) = -y * f(w, x) * \text{dot}(w, x)$$

其中，

$$f(w, x) = \text{sign}(\text{dot}(w, x))$$

关于参数向量分量 j 的偏导数为：

$$g[j] = -(y - f(w, x)) * x[j]$$

则参数的更新规则可表示如下：

$$w[j] = w[j] + e * (y - f(w, x)) * x[j]$$

以上公式就是我们在第三章中给出的感知器的学习过程。从原理上讲，感知器的成本函数并不完全光滑：它在斜率急剧变化的地方具有褶皱。在出现褶皱的地方，梯度是无法被良好定义的。上面公式计算出的梯度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次梯度”。对那些追求细节的数学家来讲，是一件让人烦恼的事情。

感知器和自适应线性神经元都是对仅有一个谷底的成本函数进行最小化，因为从结果来说其学习过程总是落在谷底，所以起点并不重要。但如果成本函数具有多个极小值，那该怎么办呢？

5

多个谷底的困扰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个复杂的函数，它有两个或多个极小值（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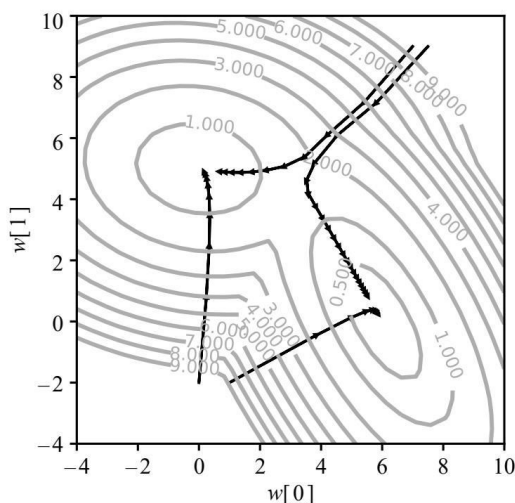


图4—5 具有两个极小值点的函数

某些成本函数可能具有多个极小值。此图表示具有两个极小值的非凸成本函数。通过应用梯度下降法来找到最小值，依据起点的不同，我们可能选取一个或另一个极小值。此处显示了4个梯度下降路径。

假如我们站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某个山脊上，右边是法国的一个山谷，左边是意大利的一个山谷。此时，我们的函数有两个极小值，甚至可能有多个极小值。

在感知器的学习过程中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使用两层或更多层的神经网络时，成本函数就会具有多个极小值。从追求系统性能良好（学习成本较低）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极小值是良性的，而有些则不然，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们其实会以某种方式处于山谷上（也称为悬谷）。当出现悬谷时，我们往往会陷入困境，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梯度计算都将返回这个极小值。

图4—5就展示了这种现象：成本函数有两个极小值，一个大，一个小。假设我们随机选取 w 进行优化：如果 w 的取值在0附近，那么我们将得到正确的极小值；如果 w 的取值在5附近，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得正确的答案。

对很多机器学习的研究人员来讲，一个好的成本函数应该是凸的，因为凸成本函数只有一个极小值，这就可以为梯度算法的收敛提供理论保证。如果不幸使用了一个非凸成本函数模型，那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这也是多层神经网络（暂时）被放弃的原因之一：它们的成本函数是非凸的。相反，核机器的成本函数是凸的，所以核机器受到青睐。对理论家来说，凸性是必须的，而非凸性则是他们不愿看见的。

实际上，具有数百万个参数的多层神经网络的非凸性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当通过随机梯度训练一个大型网络时，无论起点如何，我们所达到的局部最小值或多或少都是相等的。虽然解决方案不同，但最终得到的成本值（极小值的高度）却非常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成本函数的布局使得极小值并不是一个点，而是彼此相连的广阔山谷。这可能是高维空间中某些函数的特性。在图4—5中，除非我们能翻越将两个极小值分开的阻隔，否

则就不可能从一个极小值走到另一个极小值。但是，如果我们在空间中添加一个维度（垂直于页面的第三维），或许就能够翻越阻隔。当空间具有数百万个维度时，总会有一些维度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极小值翻越到另一个极小值。我们将在第五章再讲到这一点。

6

机器学习的原理

在学习期间，网络会调整参数，使得学习集中的所有 x 都能给出期待的结果 y 。学习后，可以通过内插或外推的方式，为学习集中不存在的新 x 赋值 y 。当新的 x 在学习示例范围内时，我们称它为插值；当新的 x 在学习示例所覆盖的区域之外时，则被称为外推。我们通过由工程师选定的函数模型，将学习的成对元素连接在一起。当然，选择函数模型也是有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的。

我们用一个示例来说明如何选择模型。

假设学习模型是由如下等式定义的一条直线：

$$f(x, w) = w[0] * x + w[1]$$

我们输入一个 x ，让它乘以 $w[0]$ （直线的斜率），然后加上常数 $w[1]$ （直线的垂直位，即直线与 y 轴相交的点）。如果 $w[1]$ 等于0，则直线穿过0；如果 $w[1]$ 不等于0，则直线与纵轴在 $w[1]$ 处相交。通过改变 $w[0]$ 和 $w[1]$ ，我们可以构造任何一条直线。

这是一个包含两个参数的模型。如果学习集中只有两个点（ $X[0], Y[0]$ ）和（ $X[1], Y[1]$ ），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使直线穿过这两个点的对应参数（见图4—6）。

假设我们加入第三个学习示例（ $X[2], Y[2]$ ），这个点不在这条直线上，那么如何找到一个新的学习模型将这三个点都连接起来呢？

要训练机器，我们需要先找到一个最接近这三个点的函数模型。根据以往示例的经验，我们可以预测最合适的函数应该是某种曲线，例如抛物线。这是一个平方函数，即二次多项式：

$$f(x, w) = w[0] * x^2 + w[1] * x + w[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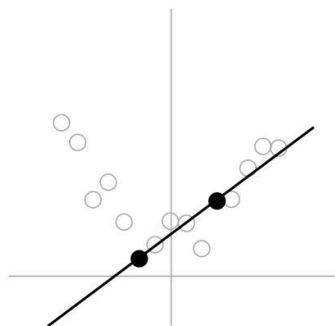


图4—6 穿过两个点的直线

给定两个点，我们总是可以计算出通过这两个点的直线的参数。

机器学习是为了找到这个公式中我们不知道的值，也就是找到令曲线通过数集中的三个点的向量 w 的三个分量。训练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通过获得的曲线（即模型），为不属于训练集的 x 计算出理想的 $f(x, w)$ 值。

该函数可能比二次多项式复杂得多，需要的参数也多得多。比如在我们训练自动驾驶汽车的示例中，如果给定由摄像头拍摄的道路图像（输入 x ），那么方向盘转向哪个角度（输出 y ），才能使汽车沿着道路上的白线行驶？此时的 x 由数千个数字（来自拍摄图像的像素）组成，而该模型可能有数千万个可调整的参数。但不管有多少参数，其原理是不变的。

7

模型的选择

关于选择模型，有一部分是由工程师决定的，比如系统的结构及其参数化，即函数 $f(x, w)$ 的形式。它可以是单层感知器，也可以是两层神经网络，还可以是3、5、6甚至50层的卷积神经网络。

这个过程需要依据经验决定，但总的来说，它依赖于瓦普尼克的统计学习理论。

我非常了解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数学家。在我加入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一年后，他也加入了该实验室；我于1996年升职时，也就成了他的“老板”。在基础研究中，老板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实验室成员拥有时间和资源进行研究，而不是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对个人研究几乎没有助益且分散研究精力的角色。

瓦普尼克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附近的撒马尔罕，曾在位于莫斯科的控制问题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为机器学习的统计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对感知器产生了兴趣。不过，由于犹太人的身份，他在苏联的职业生涯受阻，所以他在苏联开放时决定移民，并在我到贝尔实验室之后的一年来到美国，那是1989年10月，正好是柏林墙倒塌的前夕。在美国，他完成了一项理论研究，即研究训练数据的数量、使用这些数据训练的模型的复杂性以及该模型在非训练数据中的性能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对理解模型的选择过程有极大帮助。

我们知道，任意两个点之间一定存在一条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的直线。当选择连接它们的函数时，我们首先会考虑一条带有2个参数的、类型为 $w[0]*x + w[1]$ 的直线，这是一个一次多项式。

如果要找到一个经过三个点的函数，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抛物线，类型为 $f(x, w) = w[0]*x^2 + w[1]*x + w[2]$ ，它带有3个参数，这是一个二次多项式。如果我们有一个3次幂的项，那么对应的函数是一个有4个参数的三次多项式；如果我们有一个4次幂的项，则对应的是一个具有5个参数的四次多项式。依次类推。

如图4—7所示，我们在多项式中添加的项数越多，绘制出的曲线越灵活，穿过所有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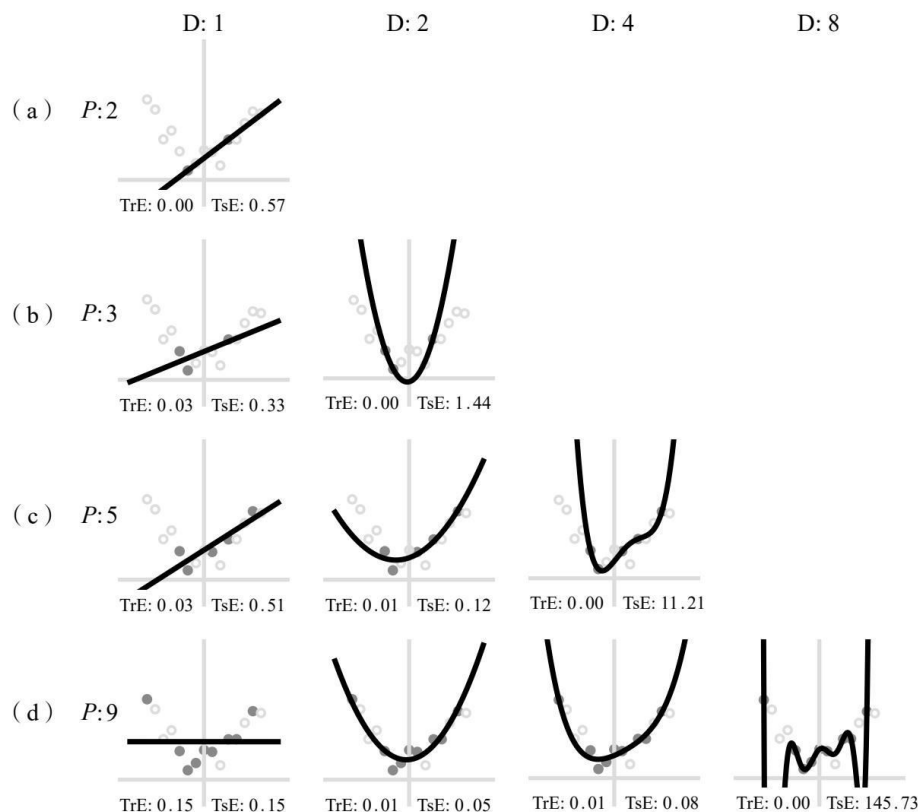


图4—7 基于多项式的学习

我们有15个数据点。黑点是学习示例，白点是测试示例。每列代表一个不同的模型，各行对应的分别为 $D=2$ 、4和8的多项式。在每一行中，模型的训练使用了不同数量的示例，即 $P=2$ 、3、5和9。在每个图中，曲线代表最接近学习示例点的多项式， TrE 是学习误差， TsE 是测试误差。当模型是“刚性”（直线或抛物线）时，如果学习示例点太多，则无法经过所有点。当模型是“灵活”（高阶多项式）时，它则可以通過许多点。但是，如果这些点未在一條简单的曲线上对齐时（换句话说，它们被噪声破坏了），则曲线必会呈现出大的“波浪”状（右下图）。此时尽管学习误差等于0，测试误差却变得非常大。这是“过拟合”（overfitting）现象。具有9个学习点（d）的二次多项式给出了最佳的测试误差。资料来源：阿尔弗雷多·坎齐亚尼（Alfredo Canziani）

二次多项式是一个向上或向下弯曲的抛物线。给定3个点，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通过这3点的多项式。三次多项式可以有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而如果给定4个点，我们同样可以找到通过这4个点的多项式。四次多项式更加灵活，它可能是W形、M形或者顶部扁平的形状，它能够经过5个点。从五次多项式开始，情况变得会十分复杂，它会经过6个点，依次类推。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如果有 P 个点（或学习示例），那么一定会存在至少一条曲线，换句话说，存在 $(P-1)$ 次多项式通过这 P 个点。在实践中，对于使用的多项式幂次有一个限制，即不会使计算存在数值精度的问题。当得到一个数据集后，我们便可以从其模型组中选择最适合示例数量的模型。

如果我们有1000个点（学习示例），并希望曲线通过所有点，那么理论上我们应该用999次多项式。但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定，所以不予采用。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特定数量的数据集，我们必须调整其对应模型的复杂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8

奶牛和三名科学家

在一辆火车上有一名工程师、一名物理学家和一名数学家。火车经过一片田地时，他们看到一位农民身后有5头黑牛正在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前走。于是工程师说：“看，这个国家的牛是黑的！”物理学家说：“不！这个国家至少有5头黑牛是黑的！”数学家说：“你们错了，这个国家至少有5头牛的身体右侧是黑色的。”

从给定的信息来看，他们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数学家只是描述了观察到的结果，没有对该国其他的牛做出任何预测，也就是他没有做任何推断。工程师则有点急于泛化，仅仅基于一个观察的简单规则就推断其他牛的颜色。至于物理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假设：“牛身体两侧的颜色通常是相同的。”但他没有推断其他牛的颜色。

这则故事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就像这位物理学家一样，使用先验知识做出预测是必要的。其次，一定存在几个可以解释数据的基础模型。好模型与差模型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解释所观察事物的能力，而在于预测的能力。在这则故事中，数学家更依赖对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泛化，而不是依赖先验知识，但是很可能存在某些牛无法满足他的模型。

9

奥卡姆剃刀原理

奥卡姆剃刀原理阐明了精简的原则：“Pluralitas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对一系列观察的解释应尽可能简单，而不应该使用不必要的概念。这一原理是以14世纪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的名字命名的。物理学家对此非常熟悉。一个理论应由尽可能少的方程式、假设和自由参数（诸如光速或电子质量之类的无法从其他量中计算得到的参数）组成。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同样做过类似的阐述：“任何事情都应该做到最简单，而不是相对简单。”

在物理学中，简单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美感，但美感并不是它们唯一的优点。比起那些为了尽可能接近实验数据而受困于概念、规则、例外、参数、公式等的理论，简单的理论通常更可能做出正确的预测。英国—奥地利籍的认识论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预测的能力而非解释现有观察的能力来定义理论的质量。他将科学方法定义为一个程序，其中，只有“可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就像一个有很多次幂的多项式，你可以通过调整使其经过一个新的点一样，一个复杂的理论也可以随时经过调整以解释新的观察结果——但它不能被证伪。而简单的理论一般不易于被调整，新的数据可能对其进行确认，也可能使之失效——它是可被证伪的。

阴谋论提供了一个不可证伪理论的例子。一切都可以用阴谋

来解释，但它们通常将很多不太可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将它们稳定地结合起来则更加不可能。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将阴谋论与宗教教义联系起来，就能很容易地为类似“上帝创造宇宙”这样的观点提供一种解释。但是关于上帝的假设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是无限复杂的）、至少是不可证伪的理论。学习理论同样是一个理性思维的理论。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他在出版了《天体力学》后，遭到了拿破仑的反对。拿破仑说：“您列出了所有造物的法则，但您一次也没有提到上帝的存在！”“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拉普拉斯回答。

10

机器训练方案

在一套标准的方案中，机器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目的是为给定任务确定一个最有效的模型。想要选择一个模型，即一类尽可能最小化的函数，需要事先衡量其预测能力，也就是使用它在训练过程中没有出现的示例评估它的成本函数。这些示例构成了验证集。

假设有1万个学习对 (x, y) 。我们用其中一半 [5000个学习对 (x, y)] 的示例训练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函数必须调整其参数以使得到的输出近似于期望的输出，并同时使成本函数最小化。在该集中出现的误差叫作学习误差（也称为训练误差）。

为了评估经过训练的系统的性能，同时为了验证机器不仅记住了示例，还能够处理未曾见过的示例，我们利用另外2500个学习对 (x, y) 测量训练后的误差，即验证误差。

我们用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函数族，例如，先是一次多项式，然后为二次多项式，之后为三次多项式，或者是越来越大的神经网络）重复这些操作，然后保留产生最小验证误差的模型。

最后，我们用剩下的2500个示例在被保留的模型上测试，得出的误差就是测试误差。为什么要计算测试误差呢？仅仅使用验证误差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这是因为验证误差偏向乐观：我们选择该模型是因为它的验证误差最低，跟在验证集中训练一样。

为了在开展应用之前正确地评估系统的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置于真实的情况下，用完全没有见过的示例测试其性能。

11

最佳折中方案

瓦普尼克公式

过于简单的模型是无法对大量学习数据进行建模的（比如我们之前的例子：一条直线无法穿过大量的点，除非它们完全对齐）。相反，如果模型足够复杂（例如1000次幂的多项式或大型神经网络），它便能“学习”整个学习集，只不过如此一来，其泛化能力必然不够良好。这样的函数非常灵活，换句话说，它在各点之间的振荡幅度很大，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示例使其停止精确通过所有的点，从而减少震荡，并能够对新的数据点做出良好的预测。也就是说，让它停止记录学习数据，开始学习发现数据蕴含的基本规律。

因此，我们需要在数据数量和模型复杂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接下来我们对此进行可视化说明。我们有10个学习数据点，如图4—7（d）所示。如果我们使用抛物线（具有3个参数的二次多项式）表示函数，那么在学习过程中，该函数会尝试尽可能地通过所有这些点，而其插值也会相对正确。此时，我们输入一个不在学习集中的点 x ，它会用两者间的抛物线进行插值，输出结果可能也会令人满意。

我们可以用一个八次多项式完成同样的任务，即连接9个学

习点，来进行测试。模型将十分灵活，曲线也能精确地穿过所有点，如图4—8所示。但是，由于这些点并未完全对齐，因此曲线必须经过振荡才能穿过所有点。如果它是一个八次多项式，就意味着它将振荡8次并呈现一些波浪才能精确地穿过所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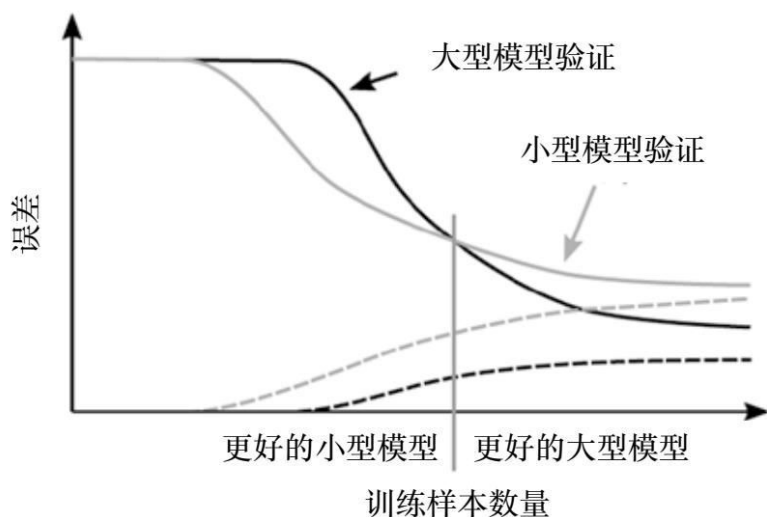


图4—8 大型模型和小型模型的学习误差和测试误差曲线的收敛性

对于一个给定的模型，随着学习示例数量的增加，学习误差（虚线）缓慢上升，而验证误差（实线）缓慢下降。对于较小的模型（灰色线），曲线在较少的示例数量上开始变得越来越近，并且越来越快，但是最终误差是相当大的。对于较大的模型（具有更多参数），两条曲线开始逼近之前需要更多的示例。它们彼此靠近的速度较慢，但最终的误差较小。验证误差的两条曲线相交。交点之前，优选小型模型；交点之后，大型模型更佳。

该模型不太适合插值。事实上，如果我们让它处理训练期间未见过的一个新点 x ，这个点可能位于一个波浪的顶部，那么模型对应产生的 y 值就可能是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过拟合：当一个过于复杂的模型没有足够的学习数据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该系统有足够的“用心记住”所有的学习数据，却无法发现数据中包含的基本规律。

学习误差会随着示例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常识：点越多，抛物线（或工程师选择的其他任何一个多项式）穿过所有点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在验证集中（由机器在训练过程中未看到的示例组成），误差会随着示例数量的增加而缓慢减少。

对任何一个系统而言，学习误差（专家称为经验误差）都小于验证误差：与未看到的示例相比，模型能够更好地处理已经见过的示例。如果在相同的模型复杂度下增加学习示例的数量，将会获得两条沿相反方向演化的曲线：学习误差缓慢增加，验证误差缓慢减少。如果示例无穷尽地增加，两条曲线也会靠近彼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假设我们有7个数据点。如果函数是一条直线，即一次多项式，则它无法通过所有的点：超过2个点的话，除非这些点精确对齐，否则学习误差将开始增加。

相比较而言，四次多项式能够更靠近所有的点，此时，它的学习误差小于直线。但是，该多项式必须“起波浪”才能尽可能地接近所有点，然而波浪也可能导致其远离新的数据点。

现在，我们增加新的数据点。直线，也就是一次多项式，几乎不会改变位置，此时的学习误差几乎与7个点时的误差相同。同时，四次多项式不再能够接近所有点，所以它的学习误差开始增大。但是，随着波浪逐渐平缓，它能够新的测试点上表现得更好。

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根据学习示例的数量选择最有效的系统呢？

让我们再看一看图4—8。在（交点处的）线的左侧，小型模

型的验证误差较小，这就意味着效率更高。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大量数据，最好的选择就是使用小型模型。在线的右侧，大型模型表现得更好。如果数据数量足够，大型模型就是最好的选择。当示例的数量超过一个阈值时，曲线无法再通过所有点，并且开始泛化。也就是说，对于给定数量的示例，我们必须寻求最佳的折中方案，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换句话说，为了让系统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我们必须输入足够数量的示例使其开始犯错，这样系统就能突破“死记硬背”但不“理解”的束缚。

对于给定数量的学习示例，模型的能力越强大，学习误差就会越小。同时，模型能力的强大也会导致验证误差和学习误差之间的差异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定存在一个最佳的模型能力值，即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最佳折中方案，从而使验证误差最小（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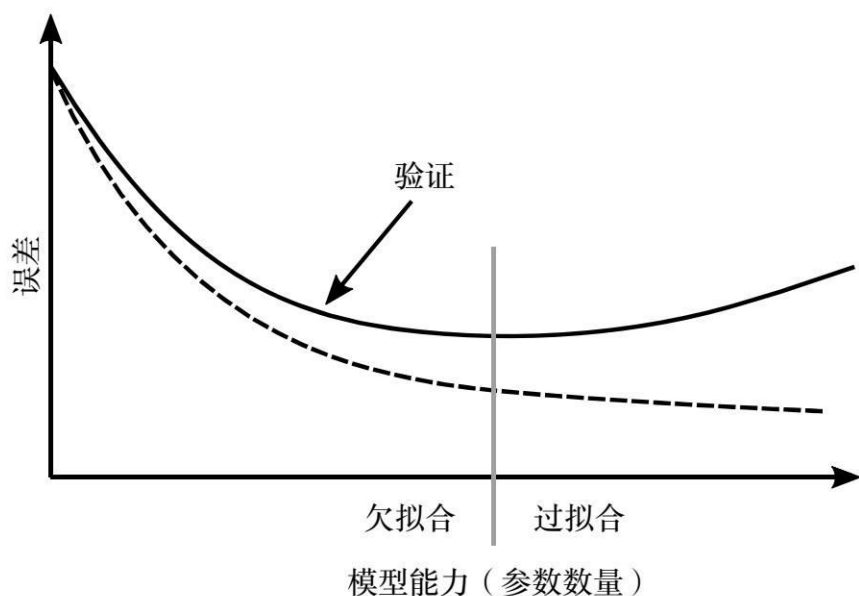


图4—9 欠拟合和过拟合

对于相同数量的训练数据，随着使用更复杂的模型，学习误差逐步减少。但是，验证集中的误差会经过一个最小值后开始上升。上升就是所谓的过拟合：机器从学习示例中学习了太多细节，并且忽视了我们要求其完成的任务的一般性。它开始死记硬背地学习，而不是试图从中提取规律。该曲线的最低点给出了我们应该选择的模型的能力。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一个无穷次幂的多项式，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误差始终为0，无论给出多少数据点，多项式都能轻而易举地经过所有点。但是相对应地，它将永远无法泛化，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所有东西，就像一个不聪明的学生死读书一样。老师不断地教他乘法表，而他不会学会乘法原理，只是记住了所有结果。

我们可以用“没有免费午餐”的定理来概括这个情形：一个能够学习一切的学习机实际上什么也学不了。因为它需要无穷尽的学习示例才能停止经过所有的点，而后开始寻找其中的规律，即开始泛化。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也经常上演：比起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一个普通人更能够发现某些基本规则。

我们在用数据集训练机器时，需要在以下条件中找到平衡：

- 1.该模型必须足够强大：有足够多的按钮（参数）来调整，以便可以学习整个训练集，即尽量接近所有数据点。
- 2.但是这个模型也不能太过强大，以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经过多次“波动”来精确地穿过所有点，这个模型反而无法正确地进行插值。

瓦普尼克的公式使用了三个概念：

- 1.学习误差或经验误差。它体现了系统在训练数据集中的性

能。

2.测试误差，即系统在训练期间没有见过的其他数据点上的性能。如果有无穷多个点，我们便可以精准地估计系统在实际应用时产生的误差。

3.模型容量。当所有可调整参数均发生变化时，模型容量度量的是模型可以实现的函数数量。该容量又被称为瓦普尼克维度。

瓦普尼克的公式为：

$$E_{\text{test}} < E_{\text{train}} + k \cdot h / (p^{\alpha})$$

其中， E_{test} ：测试误差；

E_{train} ：学习误差；

k ：一个常数；

h ：瓦普尼克维度（模型容量）；

p ：学习示例数；

α ：介于1/2和1之间的常数，具体值取决于问题的性质。

该公式解释了图4—8和图4—9。

布尔函数的眩晕

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函数能够处理输入示例，即便是非常简单的输入。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论述过的一样，学习能力越强大的函数，越无法正确地泛化，除非我们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训练

示例。因此，当我们只有适当数量的示例时，该机器就需要有一定的约束条件，能够专用于学习输入输出关系（我们称之为“概念”）。此外，约束条件主要来自模型的体系结构。

因此，该机器必须具有先验结构，让它仅需少量示例便可以学习一个有效的函数，但也由于这种结构，机器只能代表所有可能函数中的很小一部分（见图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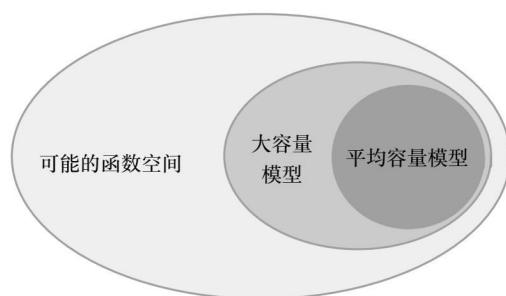


图4—10 函数空间

由一个模型可表示的函数集合（可计算的或可近似的）是所有可能的函数组成的空间里的一小子集。该子集主要由模型的体系结构决定。大容量模型可表示的函数集合要比小容量模型可表示的函数集合更大。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一个二进制函数，即所谓的“布尔函数”为例，当输入0和1的序列时，输出要么是0要么是1（见图4—11）。布尔函数的优势在于输入数量有限，我们可以有效地计数。布尔逻辑是一种用于二进制变量之间的运算的逻辑。每个值都有特定的作用。由于0和1不可互换，所以（0，1）与（1，0）^[1]代表不同的含义。

输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图4—11 布尔函数表

布尔函数有 n 比特的输入并产生1比特的输出。一个2比特的布尔函数可以由一个4行表来明确表示，对4种可能输入 $(0, 0)$ ， $(0, 1)$ ， $(1, 0)$ ， $(1, 1)$ 的每一种给出输出值（0或1）。因此，对于这4种输入可能，有16种可能的输出（ $2^{**}4$ ），即16种可能的2比特函数，每个函数由4比特的序列表示。每附加1比特输入，表中的行数就会加倍。通常，对于 n 比特函数，有 $2^{**}n$ 个输入配置和 $2^{**}(2^{**}n)$ 个可能的布尔函数。

一些可能函数的例子

让我们来看一看图4—11中的第8列。我们告诉机器：“如果两个输入均为1，则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这是“与”函数，其真值表为 $(00, 0)$ $(01, 0)$ $(10, 0)$ $(11, 1)$ 。真值表是一个对应函数的所有可能输入的输出列表。

再来看一看第6列。我们告诉机器：“如果两个输入中只有一个为1，则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因此，该真值表为：
 $(00, 0)$ $(01, 1)$ $(10, 1)$ $(11, 0)$ 。

这是感知器无法计算的“异或”函数（参见图3—6）。要知道感知器之所以有这种局限性，是因为它只能“计算”线性可分离的函数。

此处的目的是探究一个 n 位的0和1序列（ n 比特位）有多少个可分离的输入组合。

如果 $n = 1$ ，则有 $2^{**1} = 2$ 个。

如果 $n = 2$ ，则有 2 乘 2^{**1} ，即 $2^{**2} = 4$ 个。

如果 $n = 3$ ，则有 2 乘 2^{**2} ，即 $2^{**3} = 8$ 个。

依次类推，数目为16、32、64、128、256、512、1024、2048、4096等。

每次添加1比特位，可能的组合数量就将翻倍。如果我们有 n 个输入位，则有 2^{**n} 种可能的输入配置。它们以00000.....开头，然后是00001、00010、00011等。当需要计数时，只需计算 2 的 n 次幂，即 2^{**n} 便可。

一个特定的布尔函数就是一个 2 的 n 次幂的列表。

n 个输入位的每种组合都对应着两个可能的输出：0或1。那么，对于 2 的 n 次幂种组合，有多少种可能的输出呢？答案很明显，有 2 的 2 的 n 次幂（ $2^{**2^{**n}}$ ）种可能，即包含了 n 个输入位的所有可能的布尔函数。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在 n 很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有一个25位输入的函数，例如第二章中提到的感知器，那么可能的函数数量就是 2 的33554432次幂，这是一个10100890位数字，远远超过可见宇宙中存在的所有原子（大约80位数字）的数量！而这个结果只是由简单的二进制函数实现的！

在提到的感知器的例子中，我们使用了一个有2位输入的布尔函数，对应着16个可能的函数。在这16个函数中，有两个无法通过感知器或其他线性分类器（“异或”及其逆函数）实现，因此有14个可以通过线性分类器实现，这个比重已经很大了。

但是随着输入位数的增加，感知器可执行函数的比例就会急

剧减少。换句话说，一旦 n 超过某个阈值，感知器就不太可能实现这个 n 位布尔函数。

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在平面中随机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符号+和-。那么用一条直线把它们一分为二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示例只有3个，那么几乎肯定能做到（除非这些点是对齐的）。但是，如果示例有数百万个，那么能成功的概率便几近于无了。所以，感知器无法有效学习示例过多的学习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像感知器这样的线性分类器（单层的神经元结构）缺乏灵活性。一旦学习集合的示例数超过线性分类器的输入数，分类器就很难将A类点与B类点分开。这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美国统计学家托马斯·科弗（Thomas Cover）于1996年证明的定理。[\[2\]](#)

反之，一个学习系统可实现的函数如果具有太大的灵活性，那也未见得是件好事。

例证

让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看一看在 5×5 像素的网格上绘制了C和D的二进制图像的例子。通过上文的计算，我们知道，一共存在 $2^{33554432}$ 次幂个可能的函数。如果训练集中有100个示例，也就意味着布尔函数表中100行的值确定了，其他 33554332 （ $33554432 - 100$ ）行的函数值未指定。因此，有 $2^{33554332}$ 次幂个函数与同样的数据是兼容的，即在这100个训练示例上给出正确答案。机器如何在这个海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有效的函数呢？如何从中选择一个能够将这100个学习示例之外的带有C和D的图片进行正确分类的函数呢？

正则化：调节模型的容量

由此引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学习机能够计算所有可能的函数，那么它该用何种策略从众多与示例兼容的函数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函数，即如何在所有函数中确定能够作为选项的函数？用来比较的函数的数量无比庞大，为此，需要借助归纳法，也就是规定选择函数的标准。这种归纳法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学习算法选择最简单的函数。现在我们需要定义“简单性”的概念，以便我们可以界定（或计算）任何函数是否具有简单性。事实上，简单性（或复杂性）的概念是比较好界定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构建一个正则化器，即用来计算函数复杂度的程序（或者数学函数）。例如，在多项式家族中，多项式的幂次就可以用来度量一个模型的复杂性。对神经网络来说，复杂性则可以用神经元数或连接数来度量。

为了保证学习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在学习误差和用于获取该误差的函数的复杂性（或其函数族的容量）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折中方案。函数的复杂度越高，学习误差越低，但是相应地，系统推广泛化的可能性也会变小。

我们不仅要最小化学习误差 $L(w)$ ，还应该给最小化设定一个新标准：

$$L'(w) = L(w) + \alpha * R(w)$$

其中 $L(w)$ 是学习误差， $R(w)$ 是我们的正则化器（用来度量参数为 w 的函数的复杂度）， α 是一个常数，它控制着数据建模与最小化模型复杂性之间的折中方案。

不只是数学家在使用这种看起来有些迂回的方法，每当我们构造一个基于学习体系的人工智能系统时，都会使用正则化器，

而且这种方法应用广泛。在现实中，我们会优先选用易于计算并且易于通过梯度下降最小化的正则化。至于线性分类器和神经网络，我们经常使用权重的平方和。

对于线性分类器，如果将权重的平方和作为正则化器，会使系统将两种类别的边界置于两种类别之间的无人区域的中间（SVM的支持者称之为“间隔最大化”）。

另一种正则化器是权重的绝对值之和。

如果使用绝对值之和作为正则化器，则系统可以找到一个将不必要（或不是非常有用）的权重设置为0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方式对一个多项式系数的学习过程正则化，那么高阶项中不起作用的系数就会被忽略。

[1] 乔治·布尔（George Boole）是杰弗里·辛顿的前辈，但这并没有阻止杰弗里·辛顿成为人工智能逻辑学的倡导者之一。

[2] T. M. Cover, Geometrical and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systems of linear inequalities with application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ic Computers*, 1965 ,EC- 14 (3), pp. 326 –334.

12

人类的教训

第一，像布尔函数一样，人类智能的复杂性源于非常简单元素的组合。这是一个新的特性。

第二，预设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有预先设置的专业的大脑结构，才能学习、处理信息，只需少量的试错就可以阐明规律。如果我们只是一块白板，那么借助大脑强大的功能，我们可以学习任何东西（就像非常复杂的模型可以学习大量的数据一样），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是在死记硬背地学习。

第三，我们这里所描述的所有机器学习的方法都能使成本函数最小化，它们通过尝试、失败、重新调整以接近预期的结果。人类和动物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被解释为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吗？我们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第五章

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为了解决感知器及其同类机器的局限性，科学界选择了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即堆叠多层神经元层，以使系统可以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此外，我们还要找到一种从头到尾训练这些系统的方法。其实解决方案很简单，只不过没有人注意它，因为这项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科学界放弃了。而一切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当时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在互无交集的情况下发现了梯度反向传播。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地计算多层网络中成本函数的梯度。它能调整网络各层的参数，以使输入成本达到最小值。最终，第一层网络识别出待检测图像的正确图案后，任务完成。

神经网络也可以用来学习复杂的任务，并且可以在数百万的数据上进行训练。我们把这样的训练称为深度学习，因为此时使用了（网络）层的堆叠。

1

贡献度分配

多层网络的原理和首批应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直到21世纪10年代，随着可编程GPU和大型数据集的普及，才开始了深度学习的革命。

如今，反向传播已成为深度学习的基础，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系统都在使用这种方法。

多层神经网络是多种类型的层的堆栈。每一层的输入可以被看作一个向量（一个数字的列表），它代表前一层输出的集合。而该层的输出也是一个向量，但是其大小不一定与输入向量相同。

我们将这种每层都从前一层或前几层获取输入的网络称为前馈多层网络（feed-forward）。如果从高层（在出口附近）向低层（在入口附近）的方向也存在连接性，则称为循环网络。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前馈网络。

传统的多层神经网络存在两种类型的层，它们相互交替（见图5—1和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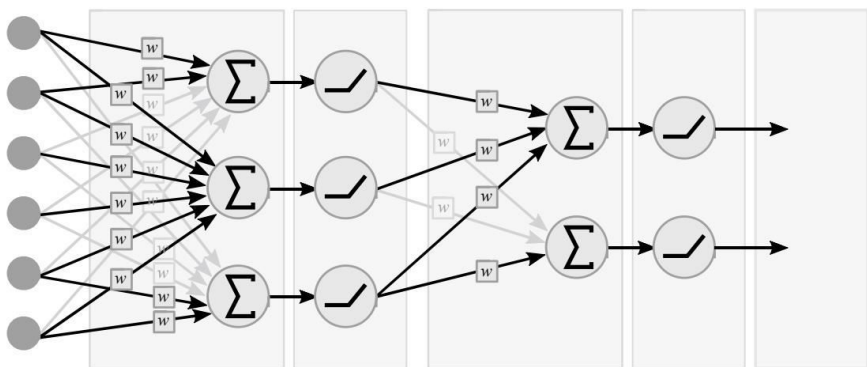


图5—1 多层前馈神经网络

每个单元计算其输入的加权总和，将结果传递给激活函数，并将其计算的输出发送到下一层作为其他单元的输入。网络就是这样由两种类型的层交替形成的，即执行加权总和的线性层和应用激活函数的非线性层。与感知器一样，学习过程旨在更改连接各单元的权重，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度量（成本函数），该度量用于测量网络输出与所期待的输出之间的差异。本章的主题反向传播，是计算这个成本函数针对网络中所有权重的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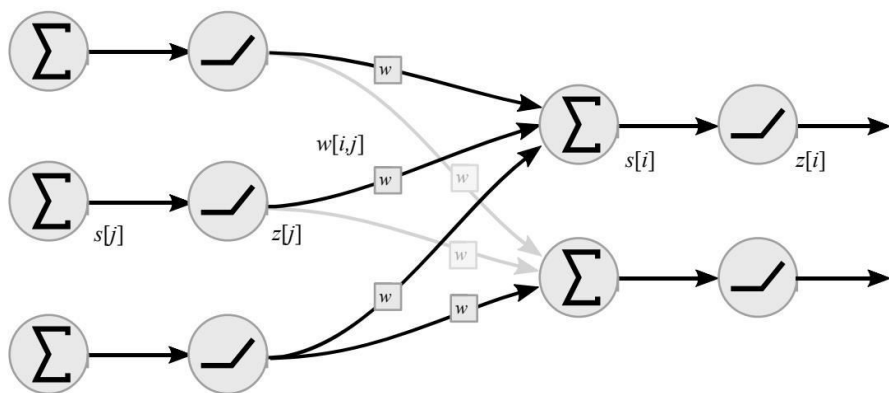


图5—2 网络中的神经元已编号

神经元 i 从其上游神经元的输出计算其加权和 $s[i]$ 。神经元 i 上游的神经元的集合表示为 $UP[i]$ ，权重 $w[i, j]$ 将神经元 j 连接到神经元 i 。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总和：

$$s[i] = \sum_{j \in UP[i]} w[i,j] * z[j]$$

算出和之后是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 h ，它产生神经元的输出：

$$z[i] = h(s[i])$$

1.线性层：每个输出都是输入的加权和，且输入和输出的数量可能并不相同。之所以称它们为线性的，是当我们把两个信号的总和作为输入时，该层输出的结果等于分别处理这两个信号而产生的输出之和。

2.非线性层：通过将非线性函数应用于相应的输入来获得相应的输出。此非线性函数可以是平方函数、绝对值函数、S形函数或其他函数。非线性层的输入与输出的数量是相同的。这些非线性操作是多层网络强大功能的关键所在。稍后我们会讲解这一点（见图5—3）。

线性层存在一个特定的输出，即加权和 $s[i]$ 。通过权重 $w[i, j]$ 与上一层的输出 $z[j]$ 连接起来：

$$s[i] = \sum_{j \in UP[i]} w[i, j] * z[j]$$

参数 $UP[i]$ 代表单元为 i 的所有输入单元的集合。 $z[i]$ 是线性层之后非线性层里的一个特定输出，是将非线性函数（称为“激活函数”） h 应用到加权和之上得到的结果：

$$z[i] = h(s[i])$$

这两个连续的操作构成了一个单元，即一个神经元，也就是说，一层线性函数接连着一层激活函数即可构成一层神经元。

激活函数将其输出发送到下一层单元（或下一层神经元）。

下一层单元接收当下层的输出，并执行相同的计算。其后是线性层、非线性层，依次类推，直到输出层为止。

为什么要交替进行线性和非线性运算呢？因为如果所有的层级都进行线性操作，那么整个过程都是由线性操作组成，换句话说，它等效于一个线性操作。这将使神经元层的堆叠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线性网络只能计算线性函数。

而我们想要使用神经网络来计算的函数并不是线性的，比如用来区分猫、狗或鸟的图像的函数就是极度非线性的，十分复杂。只有使用非线性的多层网络才能计算（或估算）这种类型的函数。许多定理表明，由“线性、非线性、线性”堆栈组成的网络是一个“通用逼近器”：如果中间层具有足够多的单元，它就能无限地逼近我们预期的函数。为了获得一个复杂函数的准确近似值，这种类型的网络可能需要大量的中间单元……然而一般来讲，要表示一个复杂的函数，更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多层网络。

要注意：在所谓的“完全连接”网络中，它的一个层级中的任意单元都从上一层的全部单元获取输入。但是，大多数的神经网络都有其特殊的连接架构，一层中的单元仅从上一层的一小部分单元中获取输入。在下一章的卷积网络中，我们会再次看到这样的网络。

在训练期间，系统所需的输出会与最后一层单元的期望结果相对应。这些单元是“可见的”，因为它们的输出就是系统的整体输出。相反，在此之前的各层单元都是被隐藏的，因为无论是工程师还是算法本身，都不知道给它们怎样的期待输出。

那么如何设置隐藏单元的期待输出呢？这就是深度学习最主要的目标：解决“贡献度分配”问题。

2

连续神经元

在继续往下谈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过往。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机器的体系结构都是建立在二进制神经元基础上的，当输入的加权和超过设定的阈值时，二进制神经元就会发出信号：当加权和小于阈值时，发出-1。实际上，一共存在两个可能的输出，即+1或-1（有些人更喜欢把它们叫作输出为1或0的神经元）。

阈值的缺点在于会使成本函数出现跳跃阶梯：当权重发生少量变化时，可能不会影响其所作用的神经元输出；但是，如果权重的变化足够大，那么神经元输出会发生从-1到+1或从+1到-1的剧烈翻转。如果该变化传播到网络的输出层，就会对成本函数造成重大影响。

换句话说，参数的微小变化可能不会导致成本函数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如果参数的变化足够大，则会导致成本函数突变。成本函数中的梯度图会转变成由一系列台阶分隔的平台，人们无法像以前一样通过观察梯度找到前往谷底的方向，因此梯度下降法也就起不了任何作用。简而言之，二进制神经元与基于梯度下降的学习方法是不兼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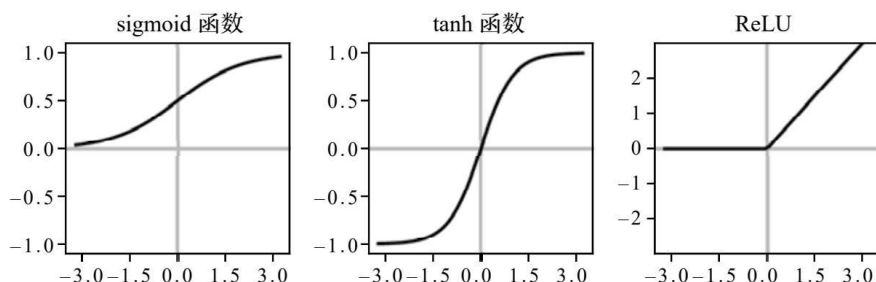


图5—3 多层神经网络中使用的非线性激活函数

左图：从0到1连续变化的S形函数，公式为 $y = 1 / (1 + \exp(-x))$ 。中图：双曲线切线，与S形相同，但值域是从-1到+1。右图：ReLU（线性整流函数），其中，如果 x 为正，则 $y = x$ ；否则为0。后者在最近的神经网络中应用得最广泛。

如果计算机具有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人们就会采用“更好”的神经元。神经元的输出不会发生从-1变到+1的突变，应用于加权和函数的输出也不会呈阶梯状，而会呈现出连续的S曲线形状。

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了解到，所有的学习方法都基于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因此，我们必须能够实现系统参数梯度的计算。也就是说，要事先知道为降低成本函数所需的全部参数的修改方向和修改量。需要记住的是，训练一个系统的过程就是减少机器在学习阶段所犯错误的过程。

对于我们所讲的“更好的”神经元，即便是其中某一个输入的某个参数的最细微变化（例如加权和的变化），都会使神经元的输出发生变化。当我们逐步增大或减小此参数时，无论变化多么小，系统的最终输出都会自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成本函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连续性使得我们可以使用梯度下降方法来训练多层网络。

3

我的分层学习机

再次回顾一下过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习算法的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很少有人关注。神经元是二进制的，它们无法解析计算梯度（没有人考虑过）。至于干扰——改变一个权重的值，然后观察它对输出的影响——对拥有很多权重的大型网络而言，效率太低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当输出不正确时，算法应将问题归咎于网络中的哪些神经元呢？应该改变多少权重？又该如何准确计算它们的修改量呢？

我阅读了一些资料：20世纪60年代，人们进行过大量尝试，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在之后的70年代，几乎没有人再继续探索。福岛邦彦是为数不多的坚守该领域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认知机的的确确是一个多层网络，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其神经元并不是二进制的，而是试图向生物学神经元“靠拢”。除了最后一层，所有其他层都是通过无监督的学习进行训练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谈及这一点。它旨在训练每组神经元，使其自主地发现模式类别。但这些模式并不是由最终的任务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的频率决定的：如果某组神经元的输入字段中经常出现垂直轮廓的模式，那么该组神经元将会分配一个神经元专门用于检测这种模式。以上所有的操作构成了它的学习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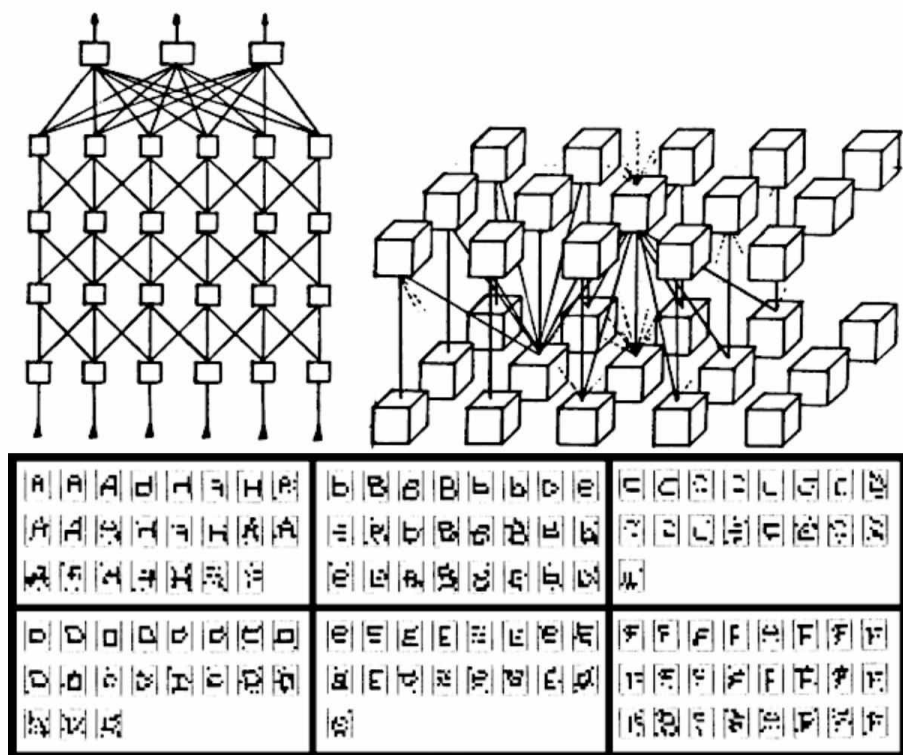


图5—4 我关于HLM的文章中的插图

在1985年的认知大会上，我介绍了一个具有局部连接的分层网络结构。它是在虚拟的数据中进行训练，这些数据是非常小的图像，模拟了带有大噪声、失真或难以阅读的字符。

就像感知器一样，认知机仅仅在最后一层进行监督训练，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可惜，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很有效，因为内层没有专门针对某个任务进行训练，所以机器最终学到的可能是对任务无用的模式检测方式。例如，对于一个识别字符的任务，检测粗线和细线之间的差异对于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帮助。

1981年或1982年，我还在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子技术工程师学院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关于多层网络学习算法的想法，但是

我记不起来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了。我称之为HLM（参见第二章相关内容），它是由许多彼此堆叠的相同单元组成的。我有一种从数学的角度看起来或多或少合理的直觉，据此就有点盲目地开始在计算机上编程测试。但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直到1983年，我在开始攻读法国高等深入研究文凭（DEA）时才又重新投入这个项目。我当时完完全全沉迷于此，忙了整整一年！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HLM的方法了，但我会通过下面几页内容，简单地介绍一下HLM的短暂历史。

HLM有优点，但这个优点也是不足之处：它使用的是二进制神经元，输出值只有+1或-1。这种神经元计算加权和不需要乘法，只需要加法和减法即可，没有乘法就可以加快当时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为了训练这个特殊的网络，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在输出层中，神经元具有明确的目标，即给出外部预期的输出。上一个层级尝试为每个神经元找到一个二进制目标+1或-1，以使其满足下一层的需求。依次类推，直到第一层。

因此，HLM算法以出口为起点，反向传播这些目标（见图5—5）。输出层跟上一层的神经元“说”：“这是我想要提供的输出，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向我传输能够使我给出正确答案的输出，所以我希望你生成这样的输出。”上一层中的每个单元都会与它下一层的许多神经元进行同样的“对话”，后者必须找出最佳的折中方案以给出期望输出。依次类推，就如同引发一次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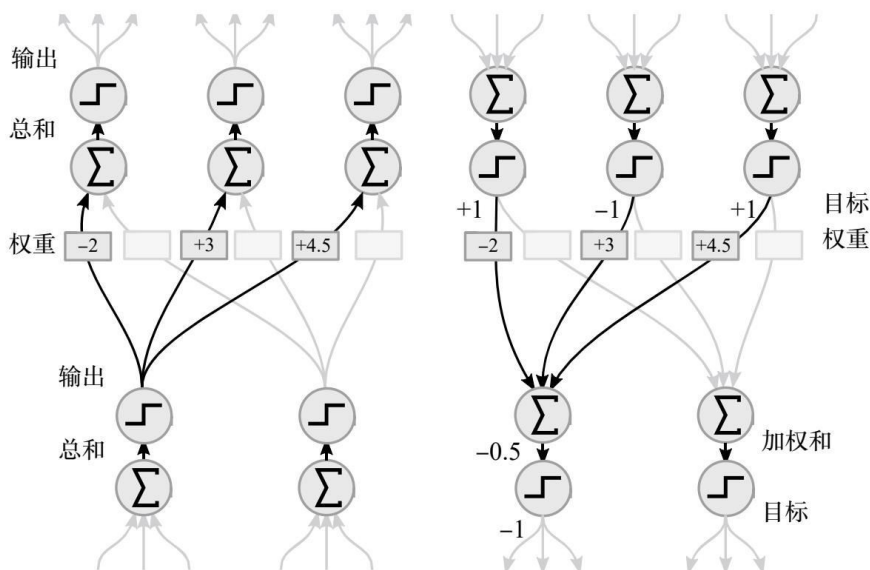


图5—5 使用二进制神经元从HLM程序逆向传播目标

在学习过程中，每个神经元通过其下游神经元“投票”的方式来计算一个目标（该神经元的期望输出，取值为+1或-1）。每个下游神经元投票的目的都是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而且投票权均与其相关神经元的权重成比例。神经元的目标计算为下游神经元目标的加权和，其权重是下游神经元与其所相关联的神经元的连接权重。如果该和为正，则目标为+1；如果为负，则目标为-1。在该图中，左侧的下游神经元以-2的权重投票+1（等价于以+2的权重投票-1），中央的神经元以-1的权重投票+3，右边的以+1的权重投票+4.5。因此，加权和为 $-2 - 3 + 4.5 = -0.5$ ，故计算出的目标为-1。神经元的权重是被训练的，以使神经元的输出更接近于目标，就像感知器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目标（虚拟的期望输出），这个目标是根据下一层神经元的目标值计算而来的，这样依次向上传达，直到第一层神经元。

如果某个神经元与下一层中的几个神经元相连接，则这个神经元可能与其中一个神经元的连接权重很大，而与其他神经元的连接权重较小。因此，在计算所考虑的神经元的目标数值时，应

优先考虑那些连接权重更大的下游神经元。

为此，我们取其中一层网络的目标值，计算这些值的加权和。如果加权和为正，则目标为+1；如果加权和为负，则目标为-1。这些权重不管是在正向还是逆向计算中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将这种计算视为一种投票，下游神经元“投票”给目标神经元，投票与两者之间的权重成比例。由于神经元是二进制的，所以它的目标也必须是二进制的，即+1或-1。

在使用HLM算法时，神经元 j 的目标值 $t[j]$ 必须是下一层神经元目标值的加权和。也就是取其下游神经元的目标值，计算这些目标的加权和，其加权系数是神经元 j 与下游神经元的连接权重。当一个阈值超过了该加权和，那么这个加权和就是该神经元的目标值。

$$t[j] = \text{sign} \left(\sum_{L \in 'I' > M@} w[i, j] * t[i] \right)$$

变量 $DN[j]$ 表示为神经元 j 提供输出的所有下游神经元。因此，权重 $w[i, j]$ 在这里被“颠倒”了过来。

据此，我们逐步计算所有的目标值，直到最后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对应的目标值和有效输出值，并使用与感知器十分相似的方法更新权重，以使输出更接近正确答案。这样看来，就好像有许多相互连接的小感知器，并且最终的期望输出值被更新分配到每个神经元上。

我为此做过一些模式识别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该算法虽然有效，但有些不稳定。我于1984年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名为“神经科学与工程科学”的小型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该会议是法国一个对神经网络感兴趣的小团体的年度聚会。有关

HLM的一篇文章收录于1985年6月在巴黎举办的认知大会的论文集中。

后来，我的发现被证实是梯度反向传播算法的某种奇怪版本。如今，梯度反向传播算法已经成为训练多层网络（或深层网络）中所有层级（而不仅仅是最后一层）的标准。从数学的角度来看，我后来证明了这种将目标反向传播的算法，属于一类可被称为目标传播的算法，它等效于在小误差范围内的梯度反向传播，只不过它传播的不是梯度，而是神经元的虚拟目标。

4

赛跑

在与一个那时正攻读机器人轨迹规划方向博士学位的朋友迪迪埃·乔治（Didier Georges）（现为格勒诺布尔理工学院教授）进行讨论时，我意识到我正在研究的方法和最优控制理论中所谓的伴随状态法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通过使用连续的（非二进制）激活函数和传播错误（而不是目标），数学公式会变得简洁紧凑。事实上，这种伴随状态法应用于多层网络就是梯度反向传播。我的直觉不再需要被证明：这个新算法很轻易地就可以借助18世纪末由法国—意大利籍数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发明的一个数学形式来完成形式化，当时拉格朗日发现这个数学形式是为了形式化牛顿力学。我因此发现了梯度反向传播。

不过那时是1984年年底，我正忙于HLM的相关工作，没有时间去测试和发布这个新想法。

同时期，有一些人正在其他地方研究相同的课题，比如当时任职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年轻教授杰弗里·辛顿正在研究玻尔兹曼机，这是另一种训练带有隐藏单元网络的方法。玻尔兹曼机的网络是一种对称连接的网络，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双向的。辛顿与特伦斯·谢诺夫斯基一起在1983年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在文章中的表达极为谨慎，并没有提及玻尔兹曼机的单元类似于神经元，其间的连接类似突触，一次也没有！而且文章的标题《最优感知推断》同样模糊了文章的主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神经网络不被业界接受，讨论它就如同谈论魔鬼一

般！

随后不久，辛顿在玻尔兹曼机上的研究遇到了困难。由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戴夫·鲁梅尔哈特于1982年提出的想法：反向传播，并设法使之成功运行。那是1985年的春天，就在莱苏什会议之后。我很快找到了与辛顿在巴黎会面的机会，他给我讲解了他的工作。当时，我已经在修改我的HLM程序了，希望使其适用于反向传播，只不过我在辛顿完成他的研究之前一直都没有时间测试我的程序。他于1985年9月与鲁梅尔哈特和威廉一起发表了一份技术报告，这份报告也是1986年出版的划时代巨作《分布式并行处理》中的一章。[\[1\]](#)他在报告中引用了我关于HLM的研究论文。当时辛顿已经是声名远播的大人物了，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虽然失去了先机，但我还是很高兴。

[\[1\]](#) D. E. Rumelhart, G. E. Hinton, R. J. Williams,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by error propagation , in D. E. Rumelhart, J. McClelland (dir.),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The MIT Press, 1986.

5

数学的美妙之处

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梯度反向传播是一种有效计算成本函数梯度——由多层神经组成的网络中的最大斜率——的方法。其原理是在网络中颠倒信号传播的方向，但不像HLM那样传播目标，而是传播梯度，即偏导数。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分别理解线性函数和非线性函数。

反向传播基于的数学概念是复合函数的链式法则。我们在高中学习时应该就已经了解到，复合函数就是将一个函数应用于另一个函数的输出。首先，我们将函数 f 应用于 x ，然后将函数 h 应用于其结果。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一个线性的和一个非线性的两个连续的层可以被看作两个函数的应用，例如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函数为 f ，第二个函数为 h 。如果存在多个层，也可以视为多个函数的嵌套。这样一来，公式就被极大地简化。这就是数学的美妙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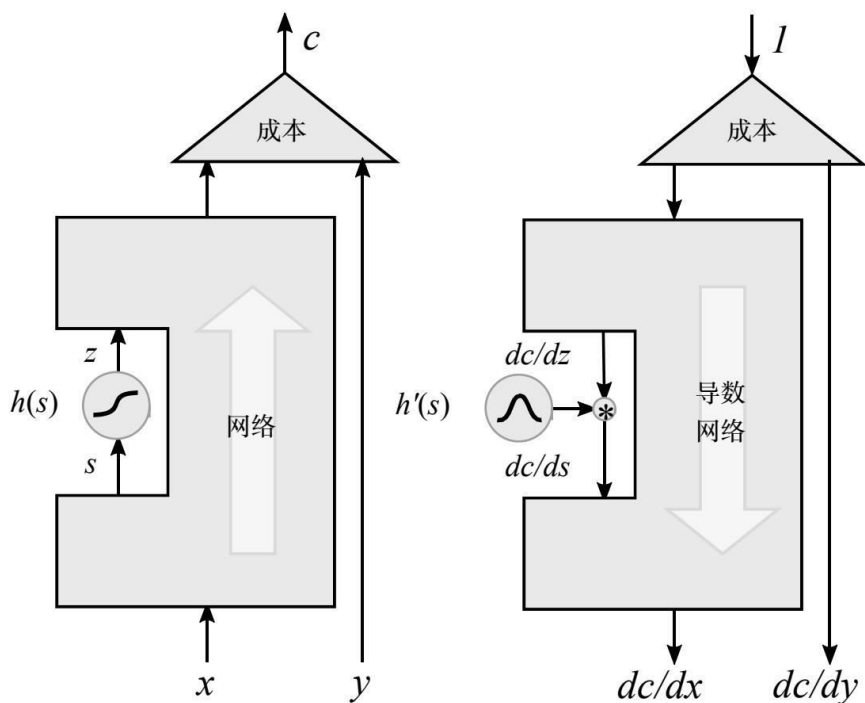


图5—6 通过激活函数反向传播梯度

成本相对于激活函数的输入的导数等于成本相对于激活函数的输出的导数乘以激活函数的导数： $dc_{ds} = dc_{dz} * h'(s)$ 。

设想一个由几个层级组成的复杂网络，如图5——6所示，我们不知道其性质。在此网络的输出处，用一个成本函数来度量实际输出与期待输出之间的差值。以网络中的某一个特定单元为例，它计算输入的加权和，并将该和 s 发送到激活函数 h ，得出结果 $z = h(s)$ 。假设我们已知成本函数相对于激活函数输出的导数 dc_{dz} （由 z 的扰动量 dz 导致的成本 c 的变化量 dc 而得到的比率 dc/dz ），便可得知，对 z 施加极小的扰动 dz ，则成本 c 将受到极小的扰动 $dc = dz * dc_{dz}$ 。那么 c 关于 s 的导数（我们用 dc_{ds} 表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 s 施

加极小的扰动 ds ，那么激活函数的输出也会随之产生极小的扰动 $dz = ds * h'(s)$ ，其中 $h'(s)$ 是 h 在 s 点的导数。因此，成本将增加 $dc = ds * h'(s) * dc_{dz}$ 的干扰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dc_{ds} = h'(s) * dc_{dz}$$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c 相对于 z 的导数，那么便可以通过乘以 h 在 s 点的导数来计算 c 相对于 s 的导数。上述过程就是通过激活函数进行的反向传播梯度的方式。

现在，我们通过加权和来处理反向传播。

以单元 z 的输出为例，将其发送到下游几个单元中用以计算加权和。如图5—7所示，输出 z 被发送到下游单元，并通过权重 $w[0]$ ， $w[1]$ ， $w[2]$ 计算加权和 $s[0]$ ， $s[1]$ ， $s[2]$ 。

首先假设我们已知 c 相对于下游单元 $dc_{ds}[0]$ ， $dc_{ds}[1]$ ， $dc_{ds}[2]$ 的导数，再以极小的量 dz 干扰 z ，则加权和 $s[0]$ 会被 $w[0]*dz$ 干扰，最终成本也会受到 $dz*w[0]*dc_{ds}[0]$ 的干扰。

扰动 dz 会引起两条扰动链。第一条扰动链是 $s[1]$ 受 $w[1]*dz$ 的干扰量的影响，导致成本值受到 $dz*w[1]*dc_{ds}[1]$ 的扰动；第二条扰动链是 $s[2]$ 受 $w[2]*dz$ 的干扰量的影响，最终导致成本值变动 $dz*w[2]*dc_{ds}[2]$ 的扰动。总而言之，所有干扰的总和会对成本施加如下扰动：

$$dc = dz*w[0]*dc_{ds}[0] + dz*w[1]*dc_{ds}[1] + dz*w[2]*dc_{ds}[2]$$

也就是说导数 dc/dz 为：

$$dc_{dz} = w[0]*dc_{ds}[0] + w[1]*dc_{ds}[1] + w[2]*dc_{ds}[2]$$

这是通过线性层进行梯度反向传播（执行加权和）的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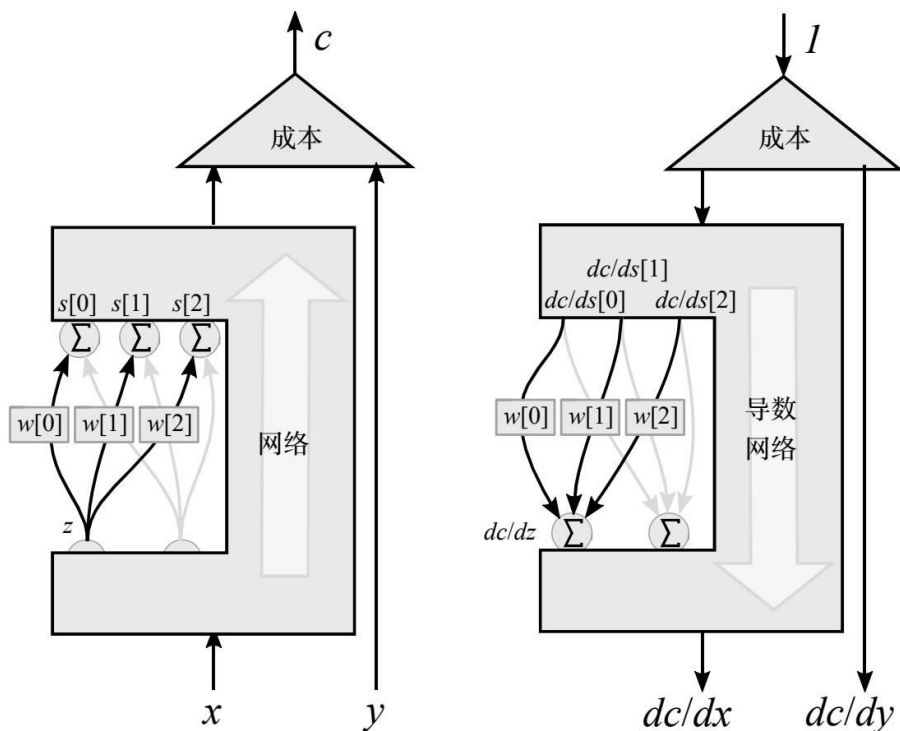


图5—7 通过加权和反向传播梯度

成本相对于单元输出 z 的导数是成本相对于下游单元的导数的加权和，权重是当下的单元连接到这些下游单元的权重：

$$dc_{dz} = w[0]*dc_{ds}[0] + w[1]*dc_{ds}[1] + w[2]*dc_{ds}[2]$$

为了计算某一层中成本相对于输入的导数，我们需要做的是取成本相对于输出的导数，并按照将输入连接到这些输出的权重计算加权和。换句话说，就像HLM一样，我们逆向使用权重计算加权和。

总之，要通过激活函数层和执行加权和层反向传播导数，就需要用到两个公式：

1. 激活函数层

a. 向前传播： $z[i] = h(s[i])$

b. 向后传播： $dc_ds[i] = h'(s[i]) * dc_dz[i]$

2. 执行加权和层

a. 向前传播： $s[i] = \sum_{M \in 83 > L@} w[i, j] * z[j]$

b. 向后传播： $dc_dz[j] = \sum_{L \in 'I > M@} w[i, j] * dc_dz[j]$

接下来计算成本函数相对于权重的导数。

当我们以极小的量 $dw[i, j]$ 干扰权重 $w[i, j]$ 时，加权和将受到 $dw[i, j] * z[j]$ 的干扰，而成本则会产生如下扰动： $dc = dw[i, j] * z[j] * dc_ds[i]$ 。因此，成本相对于权重 $w[i, j]$ 的梯度为：

$$dc_dw[i, j] = z[j] * dc_ds[i]$$

到此为止，我们就有了传统多层神经网络中梯度反向传播的三个公式！有了成本相对于权重的导数，就可以进行梯度下降。网络中的每个权重都使用一般的梯度下降方式进行更新：

$$w[i, j] = w[i, j] - e * dc_dw[ij]$$

总而言之，以上练习的主要目的是在给定成本函数相对于某一层输出梯度的情况下，计算成本函数相对于该层输入的梯度。推而广之，我们就可以通过在所有层中运用反向传播梯度的方式计算出所有的梯度。最后一步的作用是使用这些成本函数对层的输出（或输入）的梯度来计算对参数（对线性层的权重）的梯度。

6

多层结构的益处

学习的原理并没有改变：调整网络的参数，使系统尽可能地少犯错误。多层网络端到端的训练构成了深度学习。这一类系统不仅学习分类，而且连续的各层也会设法将获得的输入转换为有意义的表达，类似于特征提取器在增强型感知器中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连续的各层就是某种经过训练的特征提取器。这是多层网络的决定性优势：它们会自动学习如何适当地表示信号。

关于导数的说明^[1]

上述的推导大多是凭借直觉，使用的数学概念很少。另有一种推导方式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它使用了导数、偏导数、向量和矩阵等数学概念。

复合函数链式法则认为， $c(f(z))$ 相对于 x 的导数（用 $(c(f(z)))'$ 表示）等于 $c'(f(z)) * f'(z)$ 。这个复合函数的推导法则就是反向传播的基础。

示例讲解：

如果我们对 z 施加较小的扰动 dz ，则 $f(z)$ 的输出的量将改变 $f'(z) * dz$ 。根据导数的定义——导数是当 dz 接近 0 时，比率 $f'(z) = [f(z + dz) - f(z)] / dz$ 的极限值。我们将等式的双方乘以 dz ，得到：

$$f(z + dz) - f(z) = f'(z) * dz$$

也就是说，当函数 f 的输出受到 $f'(z) * dz$ 的干扰时， c 的输出将受到 $c'(f(z)) * f'(z) * dz$ 的干扰。因此， $c(f(z))$ 的输出干扰与输入的干扰(dz)比为 $c'(f(z)) * f'(z)$ 。它是 $c(f(z))$ 的导数：

$$c(f(z))' = c'(f(z)) * f'(z)$$

一个导数是两个无穷小的量的比：输出的扰动量除以输入的扰动量。如果函数依赖多个变量，则输出扰动量与某个特定变量的扰动量之比被称为偏导数。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见过这样的案例。

当函数不仅取决于多个变量，而且产生多个输出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一个线性层是具有多个输入变量和多个输出的函数。每个输出 $s[i]$ 是一个输入 $z[j]$ 以如下公式计算的加权和：

$$s[i] = \sum_{M \in \mathbb{R}^{3 \times L @}} w[i, j] * z[j]$$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程序来计算：

```
def lineaire ( z , w , s , UP ) :
```

```
    for i in range ( len ( s ) ) :
```

```
        s[i] = 0
```

```
        for j in UP[i] :
```

```
            s[i] = s[i] + w[i , j] * z[j]
```

```
    return s
```

层的权重可以被看作带有两个索引的数字数组：行索引 i 和列索引 j 。数组本身可以被看作一个向量，其中每个元素

本身也是一个向量：

$$\begin{aligned} & [[w[0, 0], w[0, 1], w[0, 2], \dots], \\ & [w[1, 0], w[1, 1], w[1, 2], \dots] \\ & \dots\dots\dots] \end{aligned}$$

这个数字数组是一个矩阵。程序里的函数lineaire（）计算的是矩阵 w 与向量 z 的乘积，得到一个向量 s ，其维数为 w 的行数，向量中的元素为 w 的对应行与 z 的向量积。

我们能够在PyTorch中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函数做到这一点。

如果想要对一个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层（例如线性层）的网络进行梯度反向传播，那它必须符合某种形式的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即应考虑到每个输出相对于每个输入的偏导数。

现在，让我们来解读一下如何在多层体系结构中使用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计算多层结构中的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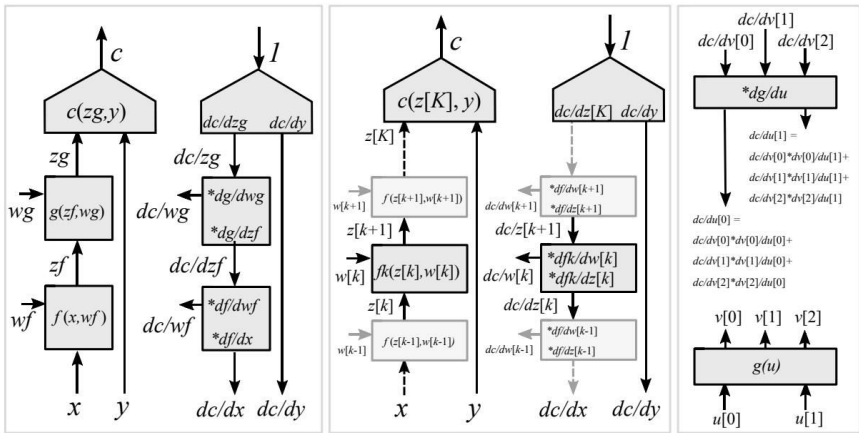


图5—8 由互连的功能模块图表示的多层网络

在现代深度学习系统的阐述中，多层网络是一个互连的模块图，以损失模块为首。模块是可以有多个输入、多个输出和多个参数的任何函数。线性神经元的完整一层是一个“模块”。左图：该网络由两个模块组成，输出为 zf 的模块 $f(x, wf)$ ，其后接连输出为 zg 的另一个模块 $g(zf, wg)$ 。输出 zg 的成本模块 $C(zg, y)$ 与所需输出 y 的行比较。中图：更一般的网络示例，网络由一堆编号的模块组成。通过将函数 f_k 应用于前一个模块的输出向量 $z[k]$ 及其参数向量 $w[k]$ ，可以得到模块号为 k 的输出（记为向量 $z[k+1]$ ）：

$$z[k+1] = f_k(z[k], w[k])$$

将给定成本函数相对于向量 $z[k+1]$ 的梯度，记为 $g[k+1]$ ，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成本相对于向量 $z[k]$ 的梯度，记为 $g[k]$ （按照惯例， $g[k]$ 被视为行向量，而不是列向量）：

$$g[k] = g[k+1] * dfk_dzk$$

其中 dfk_dzk 是函数 $f_k(z[k], w[k])$ 相对于 $z[k]$ 的雅可比矩阵，也就是说，该数组的每一项表示当对特定的输入施加干扰时 f_k 的每个特定的输出被施加的干扰量。该矩阵包含对应每一对输出和输入的项。雅可比矩阵如右图所示。

想象一个如图5—8左侧所示的双层网络，每层都是带有参数的函数，其中第一层函数 $f(x, wf)$ 接受输入 x 和参数 wf 并产生输出 zf 。第二层 $g(zf, wg)$ 获取第一层的输出和参数 wg ，进而生成整个网络的输出 zg 。成本函数 $C(zg, y)$ 度量网络的输出 zg 与所需输出 y 之间的差值。

假设我们已知 $C(zg, y)$ 相对于 zg 的梯度，记作 $dC(zg, y)/dzg$ [2]。因为 $C(zg, y) = C(g(zf, wg), y)$ ，根据复合函数的导数法则，我们可以将其变形为：

$$dC(zg, y)/dzf = dC(zg, y)/dzg * dg(zf, wg)/dzf$$

又因为 zg 是 $g(fz, wg)$ 的输出，所以可以进一步将其变形为：

$$dC(zg, y)/dzf = dC(zg, y)/dzg * dg(zf, wg)/dzf$$

等号左边的项是一个向量，右边是两个导数的乘积，其中第一项也是一个向量，第二项是一个矩阵，即一个数字数组，跟我们上面讨论的权重矩阵一样，这个矩阵被称为雅可比矩阵。我们用索引 i 对雅可比矩阵的每一行进行编号，用索引 j 编号每一列。项 i, j 表示当模块 g 的 j 号输出相对该模块的 i 号输入被施以扰动时产生的干扰量。在矩阵中，每对输入和输出都对应一个这样的项。该公式展示了如何通过模块反向传播梯度，只要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向量计算其雅可比乘积即可，与模块 g 的内部结构无关。通过上述计算，我们得到了成本相对于模块 g 输入的梯度。模块 g 有两个参数（两组输入）： zf （ f 的输出）和 wg （参数）。使用 g 相对于 wg 的雅可比矩阵，并通过与上述过程相似的操作，我们就可以获得 C 相对于参数的梯度：

$$dC(zg, y)/dwg = dC(zg, y)/dzg * dg(zf, wg)/dwg$$

如此，我们便获得了 wg 的梯度，并可以再次更新向量 wg 。再通过以下计算，可以获得成本相对于模块 f 的参数 wf 的梯度：

$$dC(zg, y)/dwf = dC(zg, y)/dzf * df(x, wf)/dwf$$

等号右边的最后一项是模块 f 关于其参数向量 wf 的雅可比矩阵。

现在我们来思考更一般化的具有多个堆叠模块的网络示

例，例如图5—8中的中图所示。网络由一连串使用索引 k 编号的模块组成。编号为 k 的模块是函数 $f_k(z[k], w[k])$ ，其输出为 $z[k+1]$ 。假设我们知道成本函数相对于 $z[k+1]$ 的梯度 $g[k+1]$ ，可表示为：

$$g[k+1] = dC/dz[k+1]$$

再根据我们已知的复合向量函数的推导规则，可以将上边的等式写作：

$$g[k] = dC/dz[k] = dC/dz[k+1] * dz[k+1]/dz[k]$$

其中最后一项是模块 k 的雅可比矩阵：

$$dz[k+1]/dz[k] = df_k(z[k], w[k]) / dz[k]$$

也就是说，矩阵的 i, j 项（第 i 行和第 j 列的位置）表示当输入 i 施加干扰时模块的输出 j 产生的变化量。

该公式是递归的：它适用于任何模块，可以根据给定的模块相对于其输出的梯度来计算模块相对于其输入的梯度。

通过逐步地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模块，从网络的输出开始，一直到输入，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成本相对于所有 $z[k]$ 的梯度。同样，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类似的公式来计算相对于参数的梯度：

$$g[k] = dC/dw[k] = dC/dz[k+1] * dz[k+1]/dw[k]$$

最后一项是模块 k 的雅可比矩阵：

$$dz[k+1]/dw[k] = df_k(z[k], w[k]) / dw[k]$$

从反向传播公式中我们可以得知：

1. 成本函数 C 相对于 k 层的输入（ $k-1$ 层的输出）的梯度等于

成本相对于 k 层的输出（ $k+1$ 层的输入）的梯度乘以 k 层函数相对于其输入向量的雅可比矩阵。将该过程递归地应用于从网络的输出到输入，就可以计算出成本相对于所有层的输出（和输入）的梯度。

2.成本函数 C 相对于第 k 层参数向量的梯度等于成本相对于第 k 层输出的梯度乘以第 k 层函数相对于其参数向量的雅可比矩阵。

这些公式代表了相互堆叠的模块结构中梯度反向传播的一般形式。当模块以更复杂的方式彼此连接时，只要确认模块之间的连接图没有循环，即没有回溯连接，那么就依然可以使用此方法。对于一个无回路的模块连接图，正序计算所有模块的输出，逆序反向传播梯度。

尽管有这样的小限制（在后续内容中我们会了解到，这些限制可以被去除），但需要承认的是，使用各种模块的可能性以及根据意愿随意布置模块的可能性为工程师提供了灵活的操作空间，使他们可以为特定的问题配置特定的网络体系结构。例如，为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翻译、图像合成和文本生成而设计的网络体系结构都不尽相同。

[1] 为了能够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在Python中操作多维数字数组，最好使用为实现此目的而提供的库之一，例如Numpy或PyTorch。特别是PyTorch，它包含许多执行本书中描述的操作的高效函数，并在必要时利用GPU。<http://PyTorch.org>。

[2] 对专家来说，按照惯例，像 dC/dz 这样的梯度向量被视为线向量，即相对于常规向量的转置向量。这使得我们可以在右侧乘以一个雅可比矩阵。

7

打破异议

为了突出反向传播的新颖性，有必要打破其理论上的异议。有些人曾提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构建具有连续神经元的多层神经网络，并尝试通过梯度下降对其进行训练（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述的内容），那么它就有可能陷入局部极小值。以山地景观为例来解释，我们的确可能身处小盆地，且无法下到山谷中。然而事实证明，在实践中，系统永远不会被困在半空（参见第四章图4—5）。现在我们就来粗略了解一下原因。

为什么多层网络可以有多个最小值？当我们训练一个多层网络来完成一项任务时，几乎总是有几种权重的配置方法可以使网络在训练示例中给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想象一下，一个已经受到训练的具有两个线性层的网络（就实际应用而言，该网络不是很有效，但算得上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其权重的配置使得成本函数取到了最小值。此时我们可以将第一层中神经元的所有权重乘以2，同时将其输出并连接到下一层的所有权重乘以 $1/2$ ，该网络的输出依然保持不变。修改后的权重配置是解决该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如果原始配置使得成本函数达到了最小值，那么第二种方法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改造网络。从第一层取出两个神经元并交换它们的位置，用它们拉动，并将它们连接到前一层和下一层的“线”（以及权重）。那么同样，尽管进行了转换，但网络的输入和输出函数仍然保持不变。如果原始配置使成本函数达到了

最小值，那么第二种也是如此。由此可知，该函数具有多个最小值。

8

多层网络的魅力

在多层网络中，我们可以将前面各层视为特征提取器。但与常规方法不同，这种特征提取器不是“手动”设计的，而是通过学习自动生成的。这就是使用反向传播训练的多层网络的魅力所在。

现在，我们用具有两层结构的网络再次验证字母C和D的例子，看一看第一层中的各个单元是如何检测C和D的特征模式的。

我们已经知道，感知器的局限性之一是如果C和D的形状、位置或大小发生太大的变化，感知器将无法区分它们，这是因为对应于C和D的点不能再用超平面分离。

如果我们添加额外的一层，便不再有类似的困扰，第一层中的神经元就可以检测C和D的特征模式。

由于网络是通过反向传播训练的，所以这些检测器是自动创建的。它们会根据任务答案的需求自动定位有用的模式。例如，“一个连续的线段终止于两个端点”，此模式仅对C存在；而拐角的存在预示着图案为D而非C。

案例中网络第一层的行为类似于特征提取器，第二层的行为类似于分类器，但所有层的训练是同步进行的，即学习是统一的。

在最简单的多层网络中，一个层级的所有神经元都连接到下

一层的所有神经元上，当输入很多时，就会很不方便。设想一个 100×100 像素的图像（对图像来说并不是很大），即它具有 10000 像素。当我们将所有的像素都对应连接到具有 10000 个神经元的的第一层时，那么输入和第一层之间的连接数就高达 1 亿个。这对单个层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构建网络结构的方法，使其可以接受较大的输入（例如 1000×1000 像素的图像），而不会发生无法应对的情况。

根据所考虑的问题调整神经网络的架构是人工智能工程师的日常任务。总而言之，深度学习包括：

1. 通过配置和连接模块来构建多层网络的体系结构；
2. 利用反向传播计算梯度之后再通过梯度下降法训练该结构。

形容词“深度”仅仅是为了表达网络结构是多层的这个事实，别无他意。

如何设计一个网络结构使其适用于图像识别的任务呢？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第六章

人工智能的支柱

在贝尔实验室，我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多层网络体系结构，灵感来自科学家对哺乳动物视觉系统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实验室经理拉里·杰克尔将其命名为LeNet，就如我的姓LeCun一样[1]。这是卷积网络的第一个名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多层神经网络的繁荣时期：会议和科学出版物成倍增加，大学创造了很多相关的就业机会，政府对相关计划进行了投资……

但是在这10年的中期，相关研究被各界质疑，这是因为这种网络计算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成千上万的训练数据，并且操作起来极为复杂。

这一切直到2012年才发生转变。在一项国际竞赛中，卷积网络（特定类型的多层网络）出色地证明了其有效性。它们成为研究人员的宠儿和许多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石，此后，它们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稳步增长。

[1] 我的姓应写为“Le Cun”，但在美国，“Le Cun”的“Le”经常被理解为中间名的缩写，以至我在科学文献引用中被写成了“Cun Y. L.”。所以不在法国时，我会用一个词写我的姓“LeCun”。

1

2012年的重磅炸弹

ImageNet是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用于识别图像中的物体的一个数据库，是由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一些美国机构的学者联合开发的。

ImageNet最广为使用的数据库ImageNet-1 k中包含130多万张图像，所有图像都经手工进行了标注，指明了图像所包含的主要物体的类别，一共大约有1000个类别。自2010年以来，ImageNet每年都会组织一次“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ILSVRC），不过所有人都习惯将其简单地称为ImageNet。这是一个供研究人员就他们的图像识别方法一较高下的赛事。

比赛规则如下：对于每个图像，参赛系统必须在1000个类别中选出5个。如果这5个类别中存在正确答案，则判定系统回答正确。要知道，在这1000个类别中单单狗类的品种就有200种，而且这些品种中有一些还非常相近。由此可见，能够找出正确答案绝对是一项壮举。

在2011年以前，即便是最好的系统也会有25 %的识别错误率。但在2012年，一支来自多伦多大学的由杰弗里·辛顿和他的学生组成的团队打破了这一纪录，将错误率降至16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后来得知，他们在系统中设计使用的大型卷积网络的灵感正是来自我的设计，而且是在GPU上编程运行的。GPU是一种用于图形处理的卡，在运行卷积网络方面非常有效。

2013年，所有人都闻风而动，比赛场中已经看不到其他方法了。革命仍在发展中。因为功能更强大的图形处理器和有助于研究的开源代码的出现，卷积网络开始彻底改变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全新的应用成为可能：信息的分类和检索、自动驾驶汽车、医学图像分析、图像索引和检索、人脸和语音识别等。

回过头看，还真是很漫长的一段旅程！现在，让我们顺着记忆再走一遍。1982年，当我还在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时，大多数研究人员就已经放弃了对多层神经网络端到端的训练。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仅有最后一层是“学习”的，其他操作皆由工程师手动完成。

1993年，我在工作一开始时就将实验的重点放在了局部连接的网络上，该网络的结构是受到视觉皮层领域休伯尔和威泽尔的发现启发而设计的（参见第二章“狂热的疯子”相关内容）。反向传播、福岛邦彦的认知神经元、两位神经生物学家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在我去杰弗里·辛顿在多伦多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时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2

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

简单细胞

让我们花点时间，把视线转向休伯尔和威泽尔所阐述的视觉系统中的信息处理。他们发现，识别物体的过程是从视网膜到颞下皮层分阶段进行的，且遵循“腹侧通路”。例如，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时，视觉信号经过初级视皮层V 1中的连续过滤器，随后通过区域V 2，再通过V 4，最后在颞下皮层中激活一组代表椅子的概念的神经元。在常规的视觉任务中，信号在不到100毫秒的时间内不间断地传播，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无法使用连接中许多可用的循环。

在V 1中，成束的大锥体神经元（50 ~ 100个）连接到一块很小的视野区域，我们称之为“感受野”。神经元的感受野是其接受输入的视野区域，相当于有50 ~ 100个神经元“看着”相同的一个感受野。我们假设有60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会对一个简单的模式做出响应。1号神经元对垂直轮廓做响应，2号神经元对与垂直方向呈6度角的直线做响应，3号神经元对与垂直方向呈12度角的直线做响应.....第60号绕表盘一周。总之，该“束”中的每一个神经元都对连接到该“束”感受野中的呈现不同轮廓的线和方向做出反应。这些神经元对于元素的大小也可以做出反应。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特征提取器的原理。

休伯尔和威泽尔也曾解释说，初级视觉皮层的区域起着特征

提取器的作用（我们在第三章和第五章都讨论过）。

如果我们取相邻的神经元束，它的感受野相比前一个神经束略有偏移，不过同样有一个1号神经元和一个60号神经元（见图6—1）。需要注意的是：休伯尔和威泽尔所说的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就是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神经元。该束中的1号神经元与相邻束中的1号神经元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束束大锥体神经元连接到视野区域内的所有感受野，数百万的1号神经元都能检测到相同的模式，只不过针对的是图像的不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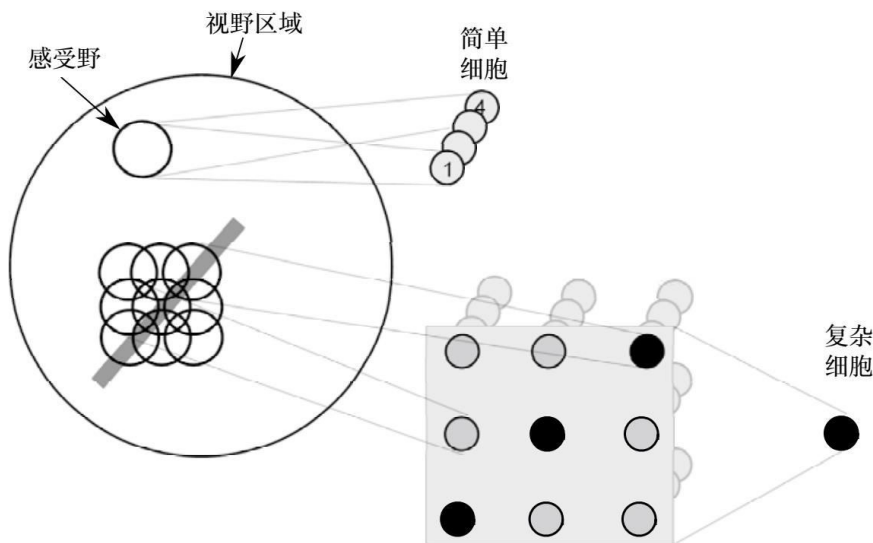


图6—1 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

哺乳动物的初级视觉皮层V 1的区域包含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每个简单细胞都会在被成为“感受野”的输入中的一个小窗口中检测到模式。这些细胞排列在被成为“特征图”的平面上。相同特征图的所有细胞在输入图像的不同位置检测同样的模式。每个特征图检测的模式与其他特征图检测的模式不同。具有相同感受野的所有特征图的细胞检测不同的模式，例如第一个检测45度的一个边缘，第二个检测水平边缘，第三个检测到另一个角度，等等。复杂细胞会聚集来自一个小窗口的简单细胞的响应。当模式在输入端稍微移动时，复杂单元响应几乎没有变化或根本没有变化。

如此一来，整个视野都被大锥体神经元覆盖，它们的感受野部分重叠，如同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并且全部执行相同的操作：在所有的感受野中检测非常小的、非常简单的模式。这数百万个神经元就是所谓的简单细胞。

视野的中心部分是对象识别区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将视线聚焦在特定的对象上才能识别它。例如，我画一个圆，然后请一个人看着圆心而不要移动视线，那么这个人在左右两侧看到的是垂直的轮廓，在底部和顶部看到的是水平的轮廓，在两者之间看到的是所有方向的轮廓。

如果在V₁中放置电极——休伯尔和威泽尔是用猫做的实验——我们将会观察到什么？在观测圆圈左侧感受野的神经元束中，1号和30号的垂直边缘检测器的神经元会被激活；同样，在观测圆圈右侧感受野的神经元束中，1号和30号的神经元亦会被激活，因为它们也在检测垂直轮廓；而在观察圆圈顶部的神经元束中，检测水平轮廓的15号和45号神经元会被激活。

复杂细胞和池化

在V₁中，复杂细胞（另一类神经元）会整合来自相同类型的相邻简单细胞的响应：一个复杂细胞整合一个小邻近区域的所有1号神经元，另一个整合所有的2号神经元，依次类推。这个聚合操作可以计算简单细胞输出的平均值，或者简单地计算出它们中的最大值。

如果垂直轮廓线稍微移动会发生什么呢？与不同感受野相关的那些1号简单细胞会在垂直轮廓线移动时被逐步激活。由于一个复杂细胞在一个小邻近区域内整合了所有的1号简单细胞，

因此它们会被连续激活，直到垂直轮廓线移出与该复杂细胞相关联的感受野。当然，观察1号简单细胞的复杂单元也会获得垂直轮廓的信息，不管后者出现在小区域内的哪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复杂单元可以在一定的位置偏差内检测出模式。这种关键的聚集机制（又称为池化）解释了不变性。由此可以得知，一个V1复杂细胞的感受野大于一个V1简单细胞的感受野。

但是，如果模式移动幅度过大，以至离开了复杂细胞的感受野（该复杂细胞整合的简单细胞的感受野），复杂细胞就会关闭。休伯尔和威泽尔认为此连接模式在V2和V4中会重复出现，只是没有证明这一点。

总而言之，计算数百万个检测垂直线的1号神经元的操作便是一个“卷积”。

总结

在V1中，每束中的每个神经元（或简单细胞）对特定方向的一条线做出响应。

- 数百万个由50 ~ 100个神经元组成的束覆盖整个视野，并连接到全体感受野。

- 数百万个神经元在视野的不同位置检测到相同的模式。

- 在V1中，复杂细胞也会从相同类型的简单细胞（例如，检测不同但位置邻近的垂直轮廓的神经元）处获得一束响应，并计算这些响应的平均值。

- 复杂细胞对图像模式的微小变化产生响应，池化通过响应来实现不变性。这些微小的变化可能源自物体在视野中

的平移、轻微的旋转或变形。

休伯尔和威泽尔在视觉皮层上的发现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两个思路。

1.局部连接。视觉系统第一层中的神经元仅连接到图像中的一个小区域，即一小块像素——感受野。

2.在视野上（也就是在整个图像上）进行重复操作。具有不同感受野的几个神经元在不同的位置检测相同的模式。

定向选择性（神经元对定向的敏感性）和复杂细胞的存在是休伯尔和威泽尔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最主要的两个发现。

3

有远见的东京科学家

日本研究员福岛邦彦发明的机器使用了休伯尔和威泽尔的模式架构，即信号在连续的简单和复杂神经元层之间无环推进。详细来说，就是福岛邦彦采纳了将简单细胞连接到一小部分视野的理念和复杂细胞的理念，后一理念认为复杂细胞整合上一层被激活的简单细胞，从而可以构造一个（相对小的变形而言）不变性表征。这位来自东京的科学家制造了两个版本的机器：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机和80年代初的神经认知机。

神经认知机是用于识别简单形状的多层网络，它由简单细胞层和复杂细胞层交替堆栈组成。神经认知机的简单细胞精密地堆砌在一起，符合生物学机制，因此能使网络正常工作。它们计算输入的加权和，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计算结果。对于这些操作，我们在这里暂不赘述。神经认知机还使用了复杂细胞层的亚采样，对于这个概念，等到介绍卷积网络的部分时我们再进行详细解释。

福岛邦彦使用了与感知器非常相似的算法来训练系统的最后一层，只不过他的机器并没有进行端到端的训练。他之所以不用反向传播，理由也很充分，即当时反向传播还没有被发明。中间层通过无监督的“竞争”方法被训练。我们在此也不进行具体描述。为了使系统正常工作，福岛邦彦必须手动对该模型的大量参数进行调整。也许福岛邦彦想严格模拟生物学状态？无论如何，机器的运转结果总是令人不甚满意。

2006—2012年，即卷积网络革命之前，科学界并没有高度重视福岛邦彦的研究成果。但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人员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他的方法！同福岛邦彦一样，他们的灵感也是源于休伯尔和威泽尔有关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领域的发现。计算机视觉研究人员发明的特征提取器被赋予了诸如SIFT（尺度不变特征变换）或HOG（方向梯度直方图，发明于法国）之类好听的名字，它们执行的操作与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非常相似。只不过这些操作都是人工编写的，而不是系统习得的。

4

科学界方法之争

1986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放下了HLM的研究工作，开始专注研究反向传播。出于从休伯尔、威泽尔和福岛邦彦工作中得到的收获，以及对哺乳动物视觉皮层研究的迷恋，我设想了一个多层网络架构，能够将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的交替以及反向传播训练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网络非常适合用于图像识别。后来，我将其命名为卷积网络，即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有些人将其缩写为CNN，但我更喜欢把它叫作ConvNet。

我在1987年产生了这个想法，可惜当时没有实现它的软件，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当时我正忙于写博士论文，有位来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莱昂·博图与我联系，他想做关于反向传播的毕业实习论文，我提出让他帮我编写一个用于构建和训练新型神经网络的软件。这个软件要能实现局部连接和参数共享，这是卷积网络和另一种被称为循环网络的软件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卷积网络和循环网络，是两个全新的概念！

莱昂负责编写一个LISP解释器，对系统来说，它是一个不可或缺模块。有了它，机器便可以更灵活地与计算软件交互。莱昂在编写软件方面有着超凡的天赋，仅用几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解释器的编写工作，这才使我能在7月飞往多伦多时，把它一同带了过去。

1987年7月，我带着这个简易版的模拟器和脑海中的想法，

来到了由大名鼎鼎的杰弗里·辛顿领导的位于多伦多的实验室。辛顿主要进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继续开发手中的软件，用来构建卷积网络并对网络进行训练，观察它们如何工作，等等。这些工作为实现神经模拟器和其他一些想法打下了基础。当时，莱昂刚刚完成了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业，去了奥赛^[1]，开始攻读语音识别神经网络方向的博士学位。

1988年春天，我建立了第一批卷积网络，并在少量数据上对其进行测试（见图6—2）。同时，身在法国的莱昂将卷积网络应用到了语音识别。1988年夏天，他来到了多伦多跟着我实习。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很有信心，坚信它有光明的未来。我们将新软件命名为神经模拟器。

当时，在没有公开数据的情况下，我利用自己制作的一个少量的手写数字数据集，成功运行了卷积网络（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它可以用计算机鼠标绘制数字）。数据集一共有12个版本的0到9这10个数字，我把每个数字置于图像中4个不同的位置上：顶部、底部……因此我总共有480个示例（见图6—3）。我承认这个数据集的示例数很少，是玩具级的数据，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收集或获取数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图像扫描设备更是稀有且昂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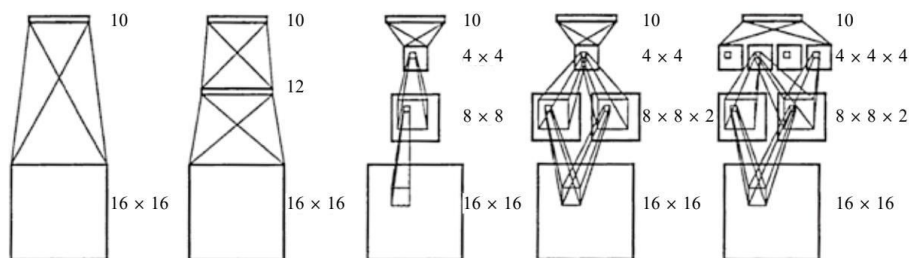


图6—2 卷积网络的第一批实验中使用的网络体系结构从左到右：单层网络，两层网络，具有局部连接的三层网络，但没有权重分配。三层网络中的第一层是卷积的（具有权值共享的局部连接），第二层是具有无权值共享的局部连接，三层网络中前两层有权值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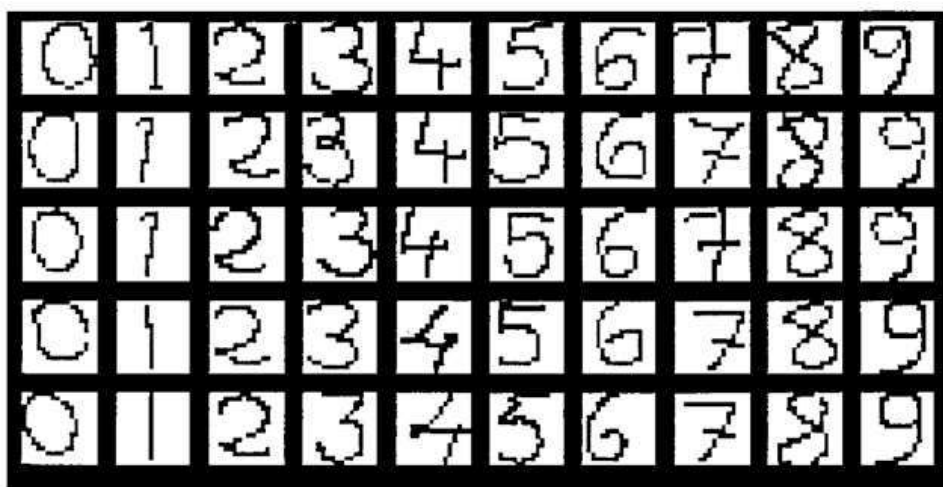


图6—3 为训练第一批卷积网络使用的小型数据集

这是我用鼠标写的小型数字数据集中的一些示例，我利用这些数据训练了第一个卷积网络。它包含10个数字（从0到9），每个数字有12个版本。每个数字都在4个不同的水平位置平移了几个像素。总共为480个示例，其中320个用于模型训练，120个用于模型测试。

事实证明，我构建的新架构非常适合识别这种类型的图像。它证实我的设想是可行的，甚至明显比其他类型的完全连接的网

络（一层的所有神经元全部连接到下一层的所有神经元的神经网络）还要好：ConvNet在测试集上的成功率高达98.4 %，而全连接网络的成功率为87 %。

我在1988年秋天发布了相关工作的技术报告。那时候我已经加入贝尔实验室，并立即开始着手研究ConvNet的一个实际应用：邮政编码的识别。当时我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

此后不久，我和同事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卷积网络可以在包含多个字符（例如完整的邮政编码）的图像上进行训练，而且无须预先将这些字符分开。对普通人来说，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我们而言，这是本质的差别！在此之前，所有的识别方法都有一个硬性要求，那就是要把待识别的字符切分开来，进行单个识别。现在，我可以使用卷积网络识别整个单词，不用告诉它单个字母的位置，它便可以输出一系列的字符。

我们很快与贝尔实验室的一组工程师合作，开发了一种支票读取系统，并由当时AT&T的子公司NCR推向市场。几年下来，它就读取了美国境内10 %~ 20 %的手写支票。

当我们获得了这些成功时，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已经不再使用神经网络了。不过这是科学界方法之间的竞争问题：我们实验室发明的SVM，另一个贝尔实验室小组发现的提升算法、概率算法……这些方法在1995—2010年成为业内做研究的主流。

[1] 即巴黎第十一大学（也称巴黎南大学）奥赛（Orsay）校区。在法国，人们习惯用地点指代该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于2020年更名合并成为巴黎萨克雷大学。——译者注

5

卷积网络全貌

什么是卷积网络

经过以上的铺垫，现在是介绍卷积网络的时候了！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神经网络，它使用了特定的连接架构，即模仿了由休伯尔和威泽尔发现的视觉皮层的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的层次结构，以及结合了我们在上一章讲过的端到端的梯度反向传播训练。

与其他网络一样，它的学习过程依然是将目标函数降至最小值。与众不同的是网络的体系结构，即其内部结构。卷积是此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数学运算，它被广泛应用于信号处理，与视觉皮层简单细胞执行的计算相似。



图6—4 卷积

图像中一个窗口的像素（此处为25个像素， 5×5 像素）的加权和是通过被称为卷积核的一组25个权重（如中间所显示的样子）来计算的。在输入的所有可能窗口上重复该操作，并将结果写入相应位置的输出图像。

卷积网络的训练方式是反向传播。经过训练的网络权重最终能够学会检测特定的模式，比如垂直线、水平线、颜色等。

假设我们的输入表是一个图像。想象有一个 5×5 像素的小窗口，我们将其定义为“感受野”。神经元 N_1 计算其加权和得到一个数字，并将该数字写入输出数组中。

现在，我们将 5×5 像素的窗口向右移一个像素，第二个 N_1 神经元使用与前一个神经元相同的权重计算新窗口像素的加权和，将新的结果写在输出数组中与前一个数字相邻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对整个输入图像的所有 5×5 像素窗口重复上述的操作。因为我们只移动了一个像素，所以相邻的窗口之间会出现部分重叠。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输出图像。

由于 N_1 神经元的权重相同，所以它们会在图像的所有位置检测到某个特定的模式。为什么要强制它们具有相同的权重呢？因为某类独特的模式可能出现在图像的任何位置。相同的权重可以确保在图像中的任何位置都能检测到该模式。这里要注意一点：正是权重的配置才使神经元得以识别出模式。比如，根据猫的姿势和猫头在图像中的位置，能够判断猫的眼睛或耳朵会出现在图像中的不同位置上。

为了检测另一种模式，我们需要另外一组神经元 N_2 ，它们以与 N_1 不同的权重执行相同的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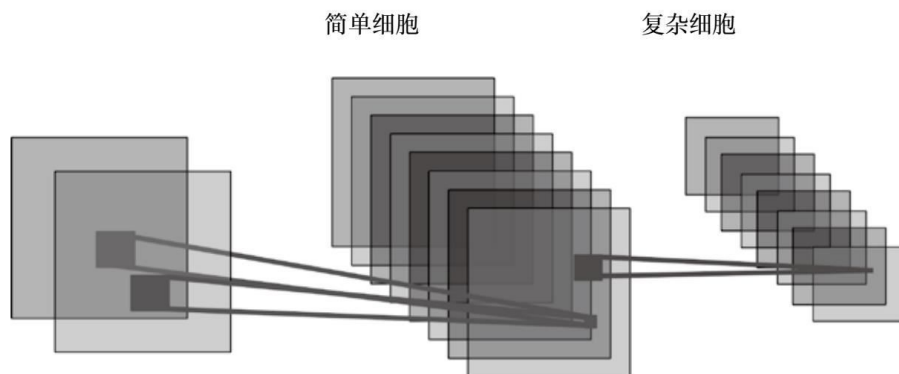


图6—5 ConvNet的卷积层和池化层

一个卷积层取一个或多个特征图作为输入（此处为2），并输出多个特征图（此处为8）。每个特征图都是将不同的权重应用于输入特征图的卷积和，这使它可以检测输入中的模式组合。每个特征图使用不同的权重集。

同一系列神经元的加权和比较特殊，因为它们的权重相同。所有的N₁神经元具有相同的25个权重；所有的N₂神经元拥有相同的25个权重，但与N₁的权重不同。依次类推。

如果是1000×1000像素的图像，也就是100万个输入像素，100万个5×5像素的窗口以及100万个N₁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在不同位置检测到相同的模式。N₂、N₃也是如此，依次类推。

由此可知，输入表和输出表的大小显然是相同的。

说明：如果权重足以检测到垂直线（见图6—1），那么有100万个神经元将在图像上的100万个5×5像素的窗口中检测到垂直线。这个过程给出了一类图像，我们称为特征图。

特征图会指明在这100万个位置中是否存在垂直线，而这100万个神经元的计算结果形成了输出表和下一层的输入。为了能够检测多种特定的模式类型，我们需要多个不同权重组合的特

征图。

60个特征图相当于休伯尔和威泽尔理论中的60个简单细胞。每个窗口由60个神经元“查看”，这些神经元会将它们的输出投射到60个特征图中。每个窗口内都有60个神经元用于检测。如果有100万个窗口，每个窗口有60个神经元，那么总共有6000万个神经元。

在我们的示例中，一个卷积被定义为一个含有25个权重（ 5×5 像素）的列表。我们将此列表称为卷积核。

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我们提供了一个卷积小程序：

```
# 将数组x用内核w卷积。
```

```
# 结果累加在数组y中。
```

```
# 这三个数组都是二维的。
```

```
def conv ( x , w , y ) :
```

```
    for i in range ( len ( y ) ) : #行循环
```

```
        for j in range ( len ( y[0] ) ) : #列循环
```

```
            s=0
```

```
            for k in range ( len ( w ) ) :
```

```
                for l in range ( len ( w[0] ) ) :
```

```
                    s=s+w[k , l]*x[i+k , j+l]
```

```
                y[i , j]=y[i , j]+s
```

```
    return y
```

卷积层将一个或多个特征图作为输入，并生成多个特征

图作为输出。每个输出特征图都是对输入特征图施以不同的内核而得到的卷积和。下面的小程序计算了一个完整的卷积层：

```
def convlayer ( X , W , Y ) :  
    for u in range ( len ( Y ) ) : #对Y的特征图循环  
        for v in range ( len ( X ) ) :  
            conv ( X[v] , W[u , v] , Y[u] )
```

为了教学，我们在此给出了程序。实际上，这些功能都已经在深度学习软件（例如PyTorch和TensorFlow[\[1\]](#)）中被预设好了。

在卷积网络中，卷积操作之后便是激活函数层。在现代版本中，此激活函数为“ReLU”（参见图5—3）。因为权重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所以通过卷积生成的特征图具有正值和负值之分。当它通过ReLU层时，ReLU会将负值设置为零，正值保持不变。ReLU层的输出也叫作特征图。这种非线性操作使系统可以检测出图像中的模式。

设想一个画面：一个人正在使用计算机工作，他所在房间的墙纸是米色的，带有灰色条纹。这个画面上具有许多清晰的轮廓，例如相对墙壁来说，计算机屏幕边缘的轮廓会很清晰。但是有些轮廓则不那么清晰，例如墙纸的条纹，它们之间的对比度就不是很清晰。如果一个卷积检测到垂直轮廓，那么对应计算机屏幕边缘的输出较大（对比度高），而对应墙纸的纹路较小（对比度低）。当我们通过ReLU传递这些特征图时，清晰的轮廓将得以显示，其他轮廓会被设置为0。经过这样的处理，系统就可以检测到重要的信息。但是，由于有60个神经元都在看相同的点，

所以我们可以调度其中的一个，使这个神经元相对其他59个而言，能够用以检测比较模糊的边缘。

一般来说，ReLU层之后是池化层，该层的操作类似于休伯尔和威泽尔理论中的复杂细胞的操作。ReLU层输出的特征图被划分为多个窗口，或者说是图块，例如大小为 4×4 的图块，它们互不重叠。如果特征图的大小为 1000×1000 ，则会有 250×250 个大小为 4×4 的图块。池化层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会计算一个对应窗口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窗口有16个数字，神经元会把这16个数字中的最大值作为输出。这就是最大池化。每一个特征图中的每个窗口都有一个这样的神经元，因此，该层的输出将有 $60 \times 250 \times 250$ 个神经元。

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呢？池化可以产生输入图像模式的一个不变性表征（相对于小的位移而言）。最大池化的作用是在输入中找到最大值，即感受场中最强的模式。如果此模式移动一个或两个像素，但仍旧停留在池化神经元的同一窗口中，则该神经元的输出保持不变。

一个卷积网络是由卷积层、ReLU层和池化层堆栈组成，典型的架构为：卷积 $\rightarrow$ ReLU $\rightarrow$ 池化 $\rightarrow$ 卷积 $\rightarrow$ ReLU $\rightarrow$ 池化 $\rightarrow$ 卷积 $\rightarrow$ ReLU $\rightarrow$ 卷积。

如今，一个卷积网络可以包含100个这样的层。例如，图6—8中显示了ResNet-50网络的简略版ResNet-34，ResNet-50就是一个标准的卷积网络。这种类型的网络包括各层相互连接中的“快捷连接”。它是由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何恺明于2015年提出的。之后，何恺明加入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FAIR团队。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团队中，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在

ImageNet上提高识别效率的卷积网络体系结构，使识别最简洁，计算的时间成本最低。

总结

神经网络的连接体系结构，即各层神经元的组织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确定的。但是权重，即加权求和的参数是不确定的，它们可以通过学习来确定。

在卷积网络中，梯度反向传播会调整权重，使不同层中的神经元能够检测出对识别输入图像至关重要的内容。当我们训练卷积网络用来识别自然图像中的物体时，第一层的一些神经元学会了检测定向轮廓，这与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视觉皮层中观察到的结果非常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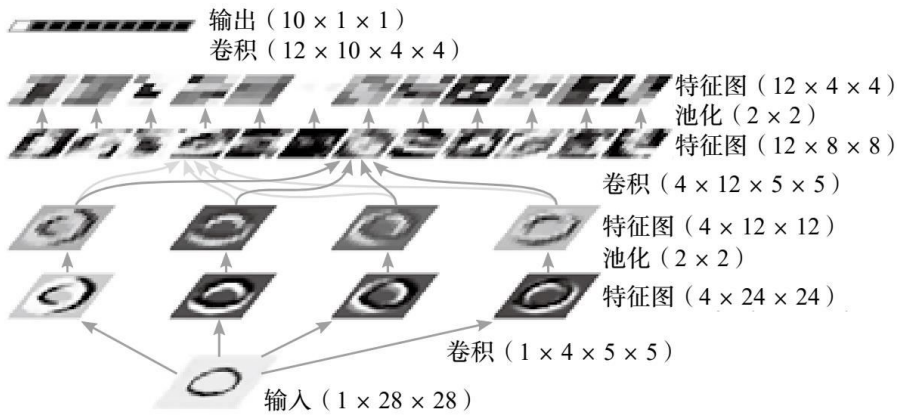


图6—6 卷积网络

卷积网络由三种类型的层堆栈组成：卷积、非线性激活函数以及结合亚采样的池化。在这里，第一层由4个特征图组成，每个特征图使用一组权重（在此示例中为5×5）对输入图像进行卷积。该结果通过一个激活函数。类似于复杂细胞，下一层的每个特征图都会汇总来自上一层中相应特征图的小窗口中神经元的响应。池化层输出的分辨率低于其输入的分辨率，这

使得输入图像的特征模式在发生微小变化的情况下具有鲁棒性。在下一层中，每个特征图都会对上一层的所有特征图进行卷积，并将结果相加。紧随其后的也是一个池化层。这样各层堆叠直到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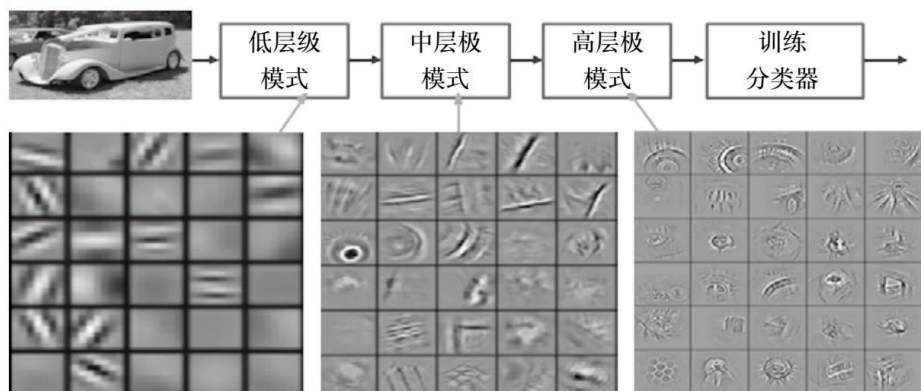


图6—7 可视化卷积网络不同层级上的单元检测到的模式

第一层的模式与神经生物学家在哺乳动物的视觉皮层中发现的模式非常相似。资料来源：蔡乐（Zeilely）和弗格斯（Fergus），美国纽约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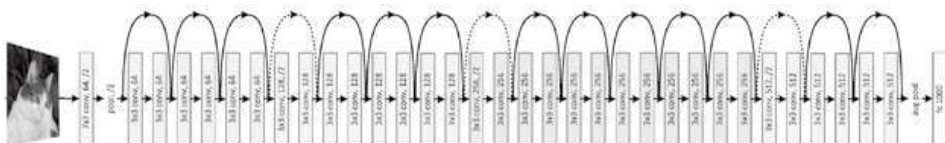


图6—8 何恺明的ResNet-34卷积网络

顾名思义，它有34层（不包括激活函数）。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称为残差连接的“跨越”连接，它使成对的层快捷连接。它的同族网络ResNet-50已成为图像识别的标准。

资料来源：何恺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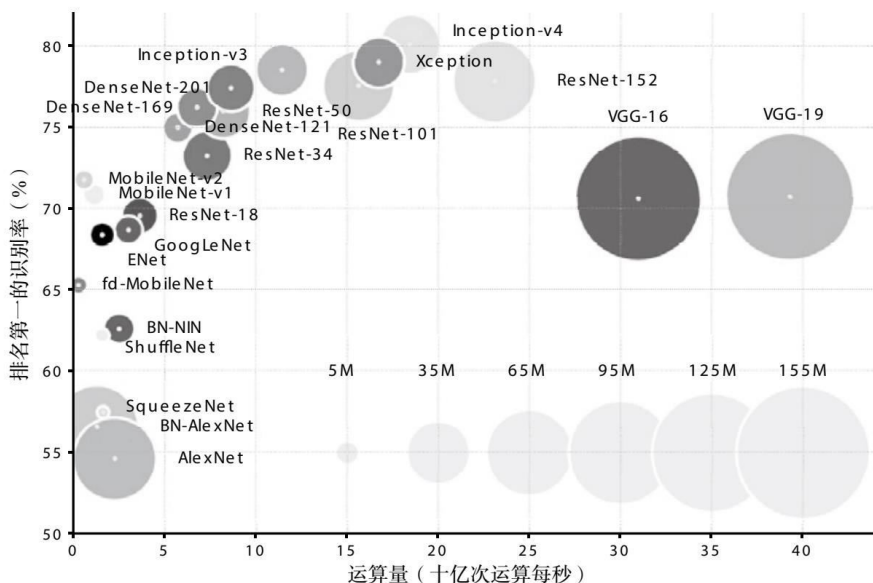


图6—9 每个圆都表示一个特定类型的卷积神经网络

x轴上表示的是计算图像输出所需的运算量（单位：十亿）。y轴上表示的是ImageNet上排名第一的识别率。圆圈的尺寸代表参数的数量（单位：百万），即对内存的占用。

资料来源：阿尔弗雷多·坎齐亚尼，美国纽约大学

目标检测、定位、分割和识别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们就意识到，卷积网络可以轻松地在完整的图像上同时进行检测和识别工作，具体做法是将网络应用在图像的滑动窗口上。由于卷积网络的特性，该方法十分快速且有效。

这个想法的第一个应用是识别手写单词：单词或邮政编码的字符之间经常挨得很近，很难将它们分开单独识别。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整个单词上从左向右滑动卷积网络的输入窗口

(见图6—10)。

对于输入窗口的每个位置，网络会对应生成位于窗口中心位置的字符的类别。只需调整网络层的大小以适合输入窗口的大小并计算整个图像上的卷积（图见6—10和图6—11），一个卷积网络便可以轻松地计算所有可能的输入窗口。网络的输出是一系列向量，其中每一个都受输入中不同的窗口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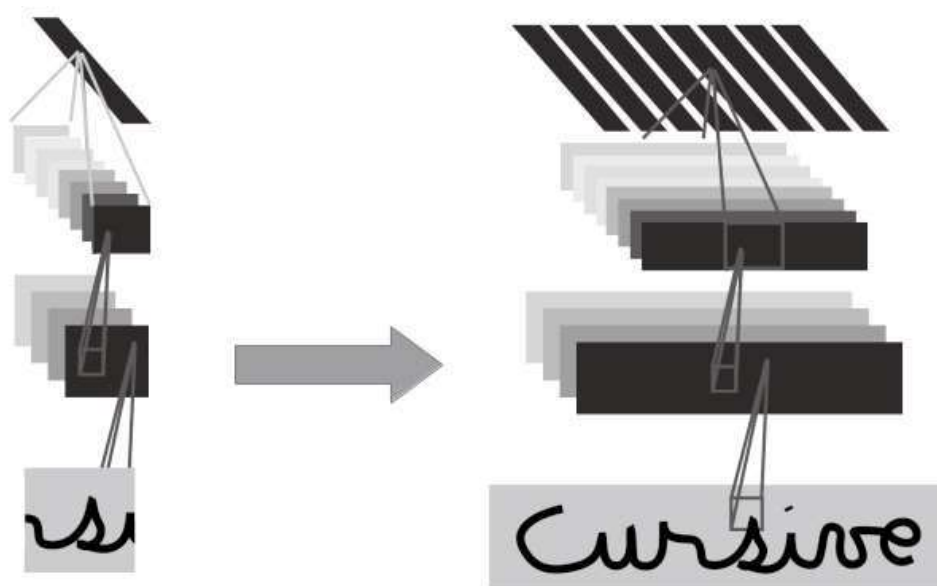


图6—10 卷积网络在带有滑动窗口的大图像上进行目标检测

一个小型网络（左）被训练识别单个目标。通过在图像上滑动输入窗口，可以轻松地将网络应用于较大的图像。但这个操作可以通过扩大网络层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进行调整，以适合输入的大小。两个相邻的输出向量能“看到”两个像素偏移的输入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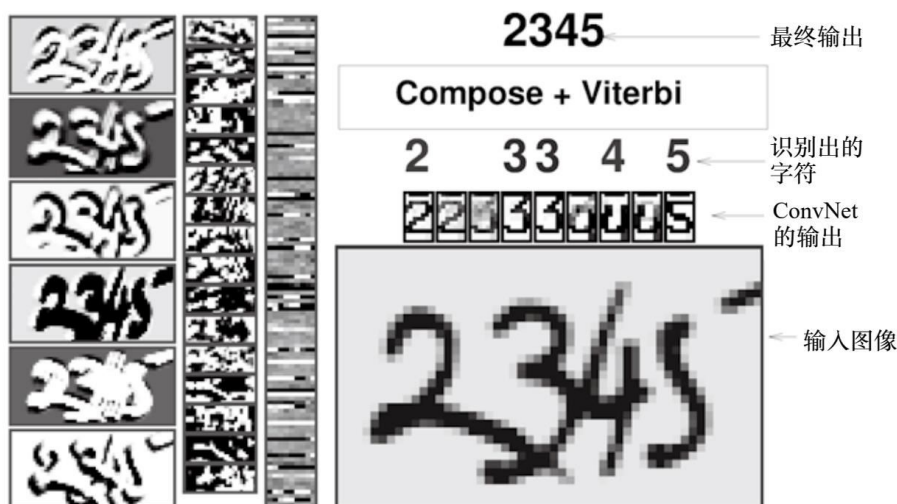


图6—11 用于检测、定位和识别图像中多个目标（此处为手写数字）的一个卷积网络

左图各列表示网络三层中各单元被激活。对于输入窗口的每个位置，输出的序列指示了对该窗口中数字所属的类别的识别结果，后部处理模块从中提取到得分最高的字符序列。该原理将在这之后广泛地应用于自然图像中物体的检测。

产生滑动窗口的想法后，我就开始使用卷积网络来检测图像中的对象。原理如下：假设检测的目标是判断图像中是否存在面部图像，我们事先收集一些照片，其中有些图片中包含面部图像，有些则不包含。接着对每张照片进行检查，并手动地将每个面部图像用一个正方形框起来。计算机记录下正方形的位置，提取正方形所圈出的面部缩略图，并将其标准化，例如 32×32 像素。另外，它还会在不包含面孔的图像中以随机位置和大小收集大量的正方形缩略图。收集完成后，我们就有了一些包含面部图像的缩略图和一些不包含面部图像的缩略图。这些缩略图作为我们训练一个卷积网络的示例，对有面部图像的缩略图生成 +1，

对其他缩略图生成0。

训练完成后，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网络层的大小以适应大图像的输入，例如 1024×1024 像素。现在，系统的输出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字数组，它们表示输入中的 32×32 像素的窗口中相应位置有存在面部图像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图像中发现很小的面孔。但是如何检测大于 32×32 像素的面部图像呢？很简单，只需把相同的网络应用于缩小后的图像（例如，减少一半到 512×512 像素）即可。缩小后， 64×64 像素的面部图像变成了 32×32 像素，这样就适用于我们的网络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缩小图像并应用于网络： 256×256 像素、 128×128 像素、 64×64 像素，最后是 32×32 像素。在最后一个尺寸下，填充整个初始图像的面部就可以被检测出来了。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稍后，我们会用它来定位行人和其他物体。如今，这类技术被用在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系统中，用以检测、定位和识别车辆、行人、骑自行车的人、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和各种障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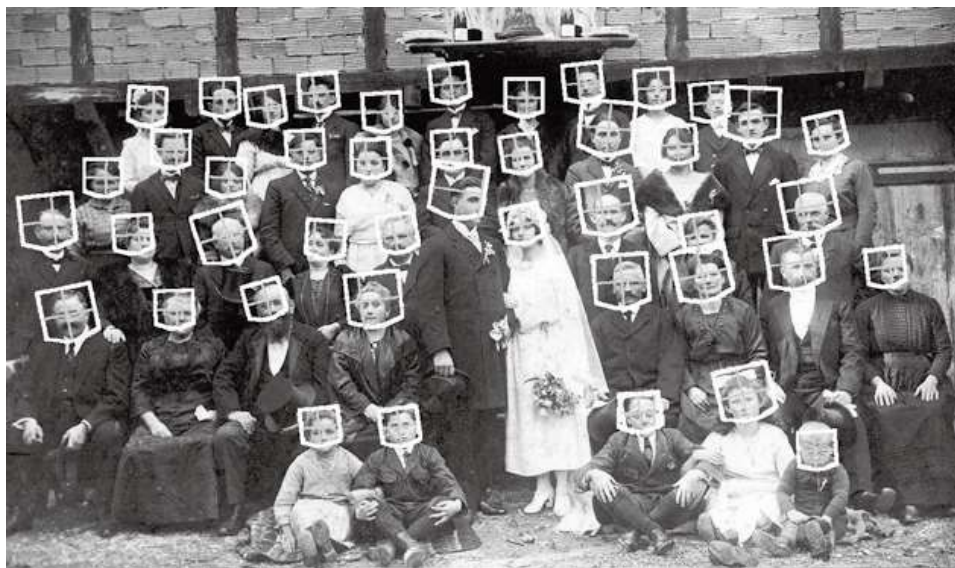


图6—12 多尺度滑动窗口卷积网络的面部检测结果

该系统是我2003年在普林斯顿的NEC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时开发的，它不仅可以检测面部，还可以估计面部朝向。这个示例是我外公外婆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婚礼照片。我外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占领期间的阿尔萨斯长大的，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来到巴黎，那时她一句法语也不会讲。

资料来源：作者的个人收藏

基于卷积网络的语义分割

语义分割旨在对图像中每个像素所属的对象类别进行标记。它与目标检测不同，后者是在输入窗口中心检测到相关目标时，网络输出就会被激活。如果不想检测到外部目标，而仅仅想检测图像中的某个区域（例如草、树叶或道路上的沥青），那么就适合使用语义分割。比如，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标记出道路图像的所有像素，以便分辨出从哪里走不会遇到障碍物。而对一个乳腺X光造影分析系统来说，最有用的功能就是标记出所有可疑肿

瘤的像素。在这样的情形下，滑动窗口原理就有了用武之地。下面是一个示例。

2005—2009年，我和我的学生跟一家位于新泽西的小型公司Net-Scale Technologies合作了一个移动机器人项目，该公司的创始人是我在贝尔实验室的一位前同事，名叫乌尔斯·米勒（Urs Muller），他是瑞士人。这个名为LAGR（应用于地面机器人的机器学习）的项目由DARPA资助。我们设计的机器人的视觉系统使它可以在户外移动，它使用的就是滑动窗口的卷积网络进行的语义分割。[\[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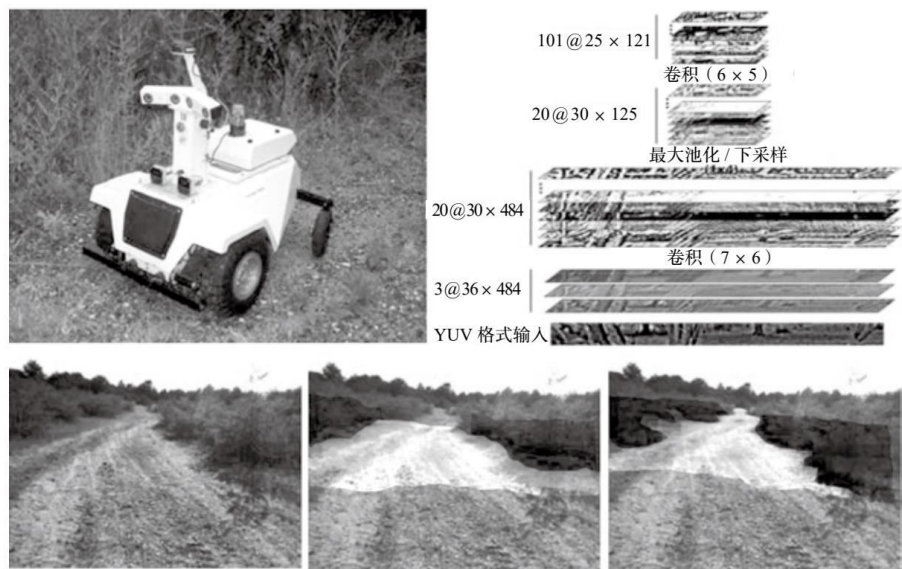


图6—13 LAGR移动机器人（左上方）具有自主性并通过4个摄像头感知世界

该机器人有两对立体摄像机，可以用它们捕获一对图像（左下角是一个图像）。第一个视觉系统使用所捕获的两个图像之间的差异来估计每个像素与摄像机的距离。这使它可以知道图像的一个特定像素是否是地面的突起，从而知道它是否属于一个障碍物或一个可通行区域（底部中间图像：可通行区域清晰，障碍区黑暗）。此方法在大约10米的范围内效果很好

（中间图像的明暗区域停止在10米左右）。一个训练好的卷积网络（右上）根据图像的像素属于可通行区域还是障碍物来标记图像的像素，但是它也可以用于没有距离限制的单张图像（右下角）中的场景标记。

该网络将图像的每个像素分为三种可能的类别：可通行区域、无法逾越的障碍物和障碍物边角（可通行区域与障碍物之间的边界）。具体确定类别的做法是：在图像上放置一个窗口，并为窗口的中心像素生成一个类别，以此作为上下文来辅助决策。当我们在所有的窗口上使用了该网络后，整个图像就被完全标记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就可以据此规划出一条到达目标的路径，同时避开所有障碍物。

该系统的优势在于：所有标签都不是人为提供的，而是由立体视觉系统自动计算得出的。得益于配备的两对摄像机，机器人可以像人眼一样，从两个略有不同的角度捕获每个场景的两个图像。我们利用了一种传统的立体视觉方法，从两张图像中计算出每个像素的差异，即场景中特定位置在两个像素中的位置差异。差异越大，相关位置离摄像机越近。

此项技术同样可以应用于构建场景的3D图，以此得知在地面上的物体（可通行的）以及地面突起的物体（障碍），只不过它仅适用于10米之内的近距离的地方。再远一些，那么两张图片之间的差异太小（小于一个像素），对于距离的评估不再有效。通过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可通行区域”或者“障碍物”的标签，并以此来训练卷积网络。网络通过一个像素的周围环境来确定它是否是障碍物：是一条土路、灌木丛还是树干？像素的周围区域使我们能够识别其所属目标物的性质。一旦经过训练，该网络就可以应用于整个图像，并能检测任何距离之外的障碍物或路径。

2009年，使用滑动窗口的卷积网络进行语义分割的想法催

生了一个视觉系统的诞生，该系统中图像的每个像素都被标记为一个种类，一共有33个种类，例如道路、建筑物或汽车等。[\[3\]](#)如今，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视觉系统中（参见第七章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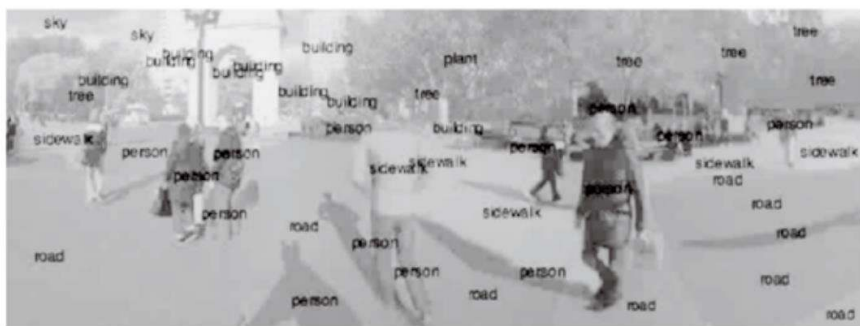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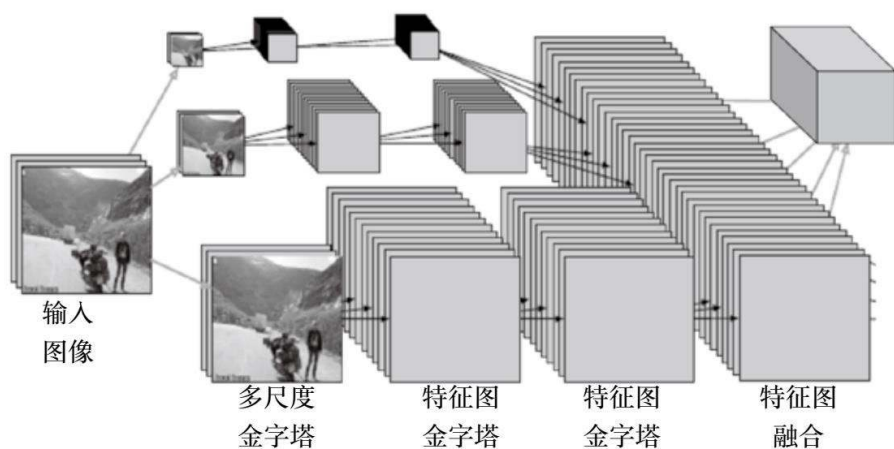


图6—14 a.用于语义分割的卷积网络体系结构（上）
b.在街景上的应用结果（下）

语义分割旨在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标记为其所属对象或区域的类别。像素的类别取决于其背景，例如道路上或天空中的灰色像素只能通过其背景来

识别。ConvNet具有三个通道，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比例上观察图像。每一个通道都在其输入中的 46×46 像素的窗口上提取一种表示。网络输出是中心像素的类别。在很大程度上，窗口覆盖了几乎整个图像，为中心像素的类别判定提供了广阔的上下文信息。

资料来源：法拉伯特（Farabet）等，2013年，美国纽约大学

此外，这些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分割生物学或医学图像。2015年，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塞巴斯蒂安·承（Sebastian Seung）重建了一块兔子视网膜的神经元回路，而视网膜的三维图像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获取并经过卷积网络处理得到的。[\[4\]](#)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则将卷积网络用于标记髋关节的MRI（核磁共振成像）。如今，卷积网络存在于大多数的图像识别系统中。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视觉研究界在目标检测和定位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先进的当数FAIR的Mask R-CNN（一个通用对象实例分割框架）和RetinaNet，它们的代码都是开源的（见图6—15和图6—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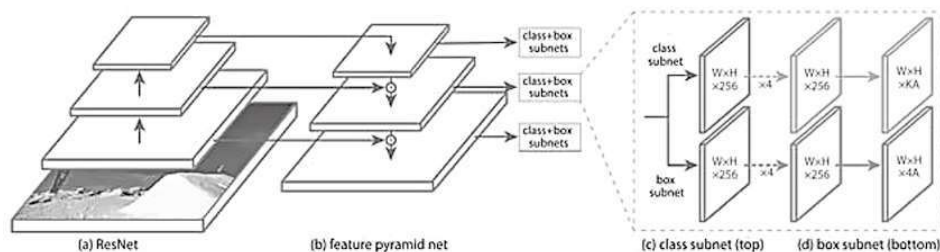


图6—15 RetinaNet：一种用于目标检测、定位和识别的卷积网络体系结构

RetinaNet是一种ConvNet架构，可以同时检测、定位、分割和识别目标和区域。它由一个经典的ConvNet组成，接着是一个“反卷积网络”，后者的分辨率逐层提高，最终生成的输出图像的分辨率与输入图像的分辨率相同。资料来源：林宗义等，2018年，FAIR[\[6\]](#)

[4] V. Jain, H. S. Seung, S. C. Turaga, Machines that learn to segment images: A crucial technology for connectomics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010 , 20 (5),pp. 653 –666.

[5] <https://github.com/facebookresearch/maskrcnn-benchmark>.

[6] T.-Y. Lin et al., The focal loss for dense object detection , <https://arxiv.org/abs/1708.02002>.

[7] Kaiming He, Georgia Gkioxari, Piotr Dollar, Ross Girshick ;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ICCV), 2017 , pp. 2961 –2969.

第七章

深度学习的应用

人工智能具有分析、识别和自动分类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以前只能由人类自己执行的各种任务。简而言之，它无处不在！

深度学习并没有完全掩盖传统人工智能的光芒：树搜索、寻找最短路径、逻辑推理……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许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知的方法在如今仍有非凡的效率。

1

图像辨识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单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然而这个动作却能启动一个十分强大的基础设备。为了生成最符合你需求的答案，某个卷积网络已经事先学习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张图像，以便能够识别它们。

在谷歌，类似的系统日夜运行，它会查看你的照片集以及互联网上的图像，并通过卷积网络对它们进行识别和处理。同样，在脸书，大量卷积网络每天都会分析上传到脸书上的数十亿张图像，判断图像上是一艘船、一只狗还是一朵花，由此识别出数以万计的标签。

为了能够完成这项识别工作，谷歌和脸书收集了数百万张由用户或者雇员手工标记的图像。当谷歌询问你“哪个图像中有汽车”时，你的回答就是在为这个标签工作做贡献。借助这些数据，工程师训练了卷积网络，使得它们可以标记数十亿个未经人工标记的图像。

为了标记图像，谷歌和脸书在其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上储存了完备的标签列表。当用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埃菲尔铁塔”时，带有“埃菲尔铁塔”标签的图像列表就会被找出来。数百万个单词或句子的搜索过程也是如此。

同样，脸书也将婚礼、生日、室内装饰、飞机、猫、包（按品牌）或汽车（按型号）等照片进行分类，甚至还包含一个收集

了那些鲜为人知的建筑物和纪念碑的类别……

元数据使照片的视觉识别变得更为容易。一位行走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游客（如其手机定位所显示的）更可能拍摄到埃菲尔铁塔，而不是自由女神像。

视觉识别还被用于过滤和删除粗俗、暴力、仇恨、恋童癖和色情的视觉内容。这项任务同样由事先使用了成千上万张可怕的照片进行训练的卷积网络执行，毕竟对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以忍受的任务（参见第八章相关内容）。

这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种各样的恶棍都知道被禁止的内容将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但他们有办法越过障碍，比如将被禁内容放置在卷积网络未训练过的不能识别的图像内。为此，我们必须使用更复杂的技术才能查获它们：在检测到图像中的字符后，另一个卷积网络通过OCR（光符字符识别）技术将它们转为文本。

图像识别更多被用于执行平和的任务，比如识别植物、昆虫、鸟类、葡萄酒标签等；它也允许你为一处场所或建筑物命名；它还可以分析视频，对视频中发生的行为进行分类，这种标记和分类对于精准推送十分有用；它甚至可以将视频中的内容描述给盲人：通过智能手机朗读文本内容。

2

内容嵌入和相似度测量

无论是图像、视频还是文本，许多应用都会测量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

假设有两张图像，我们可能不必去鉴别其内容，只需要判断它们是否相似，这同样是很有用处的。这种比较能力对于搜索信息、过滤内容和识别特定目标（如纪念性建筑、面部、书籍封面、音乐作品等）的图像至关重要。

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应用：一旦某个视频被确认用于宣传恐怖主义，就必须立即删除相关人员或支持者在社交网络上已经发布的它的数千份副本。为了能够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需要快速侦测出类似的视频。针对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详细探讨（参见第八章相关内容）。

另一种更为简单的情形是，如果有人给一瓶葡萄酒的标签拍了照，他就可以利用系统检索相同的标签并访问有关该款葡萄酒的信息。系统能够确认两张图片上是否为同一个人，也能够将一幅著名的画作或一栋著名的建筑物与一系列其他画作或古迹进行比较……在文字对比方面也是如此：维基百科的文章是否含有某个问题的答案？某两篇文章是否在谈论同一主题？

在执行比较功能时，我们通常会用到“嵌入”（embedding）和“度量学习”。嵌入使用的是由神经网络计算得到的向量表示图像、视频或文本。如果两者内容相似，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会输

出两个彼此靠近的向量，否则输出两个相互远离的向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使用这种被美其名曰“孪生神经网络”的方法来验证签名。^[1]21世纪初，我还用它进行过人脸认证。^[2]这种方法由两个具有相同神经网络的副本组成。网络获得人像作为输入，然后输出1000维的向量，这个1000维向量组成的空间就是嵌入空间。我们向网络的两个副本输入同一个人的两张不同的照片，如果希望输出向量接近，便可以将第一个网络的输出用作第二个网络的期望输出，反之亦然。我们的成本函数就是两个网络输出之间的距离。通过反向传播进行的学习能够改变权重以使两个向量彼此更接近。同理，当我们将两个不同人物的肖像呈现给网络时，我们希望两个输出向量彼此相差得很远。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成本函数，使之随着向量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并通过梯度下降对其进行优化——这个技巧再次被使用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为一张人像照片生成1000维向量的网络。它会为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输出接近的向量，为不同人物的两张照片输出相差很远的向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将人物肖像向量与内存中的同一人物肖像向量集合进行比对来验证一个人的身份。脸书的人脸识别系统就使用了此类技术。^[3]

我在位于纽约的初创公司Element里担任联合创始人兼科学顾问时，公司开发了一套通过智能手机拍摄的手掌照片进行身份验证的系统。每个人手掌的纹路都是唯一的，脚掌也是如此。与人脸识别不同，这个系统无法在一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识别此人。此功能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医疗服务或银行账户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例如，Element参加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提出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在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组织对新生儿进行疫苗接种和医学跟踪。我们利用这项技术获得了新生儿的脚掌纹路（他们常常握紧拳头，因此我们没有收集手掌纹路），这使得我们可以识别

他们，使他们避免两次接种疫苗，同时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治疗记录。

嵌入也适用于信息搜索领域。通过训练，网络可以对一次查询或一个问题生成一个嵌入向量，使得请求（或问题）的向量接近于所搜索内容的向量（问题的答案）。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用途吗？由学者和志愿者共同发起的组织Wildbook（脸书双关语）运用此技术开发了一个海洋哺乳动物和其他生物物种的识别功能。仅从一头鲸鱼、一头鲸鲨或一头逆戟鲸的表面照片上，抑或是陆地上的一匹斑马、一只豹的照片上，由卷积网络和度量学习组成的系统只通过识别它们皮肤的纹理质地、鱼鳍、尾巴或斑点的不规则性即可辨认该个体。这个系统是使用手动标注的快照图片进行训练的。由此，Wildbook可以计算出濒危动物的数量，并能够定位它们以及追踪它们的迁徙过程。[4]

[1] J. Bromley, I. Guyon, Y. LeCun, E. Säckinger, R. Shah, Signature verification using a “siamese” time delay neural network, *NIPS’ 93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1993, pp. 737 –744.

[2] S. Chopra, R. Hadsell, Y. LeCun, Learning a similarity metric discriminatively, with application to face verificatio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05, 1, pp. 539 –546.

[3] Y. Taigman, M. Yang, M. A. Ranzato, L. Wolf, DeepFace : Closing the gap to human level performance in face verificatio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14, 8.

[4] <https://www.wildbook.org/>.

3

语音识别

在进行语音识别之前，声音信号须像其他输入信号一样，先被数字化，从而形成所谓的样本。每个样本都代表对应时刻麦克风上的气压。通常来说，语音信号中每秒必须要有10000个这样的样本，才便于识别。大多数语音识别系统都会像人耳一样首先处理这样的序列。这一处理转换过程生成信号表征，就像人们提供给神经网络的图像一样。

假设在某个声音信号中有一个256个样本的窗口，每个样本代表25.6毫秒的信号，可以说这真是转瞬即逝。在此窗口上，预处理程序将计算包括低音、中音和高音在内的大约40个频段中的声音强度。然后，该窗口在时间上移动10毫秒（两个相邻窗口之间存在重叠），程序会重复相同的计算，并将新窗口转换为40个数字。

因此，语音信号可由一个频谱图来表示，即40维数的一系列向量，每10毫秒一个向量，也就是每秒100个向量。40个向量（代表着其输入“图像”为 40×40 “像素”）表示0.4秒的语音，卷积网络将此长度作为窗口，并对出现在窗口中间的基本声音进行分类（见图7—1）。

每种人类语言都可以被视为一系列音素。例如在法语中，音素系列是“a”“ou”“oi”“on”“ta”“ti”等声音。每个音素由被称为“音标”（phon，声音响度单位）的几种基本声音组成。比如音素“oi”实际是由三个音标组成的，开头为“o”，结尾为“a”，还有

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声音。通过音标的组合，一种语言可以呈现3000种基本声音。举个例子：在“apparaître”（出现）中出现的声音“p”与在“opposé”（相反）中出现的“p”的声音是不同的！每种声音的发音都取决于其语音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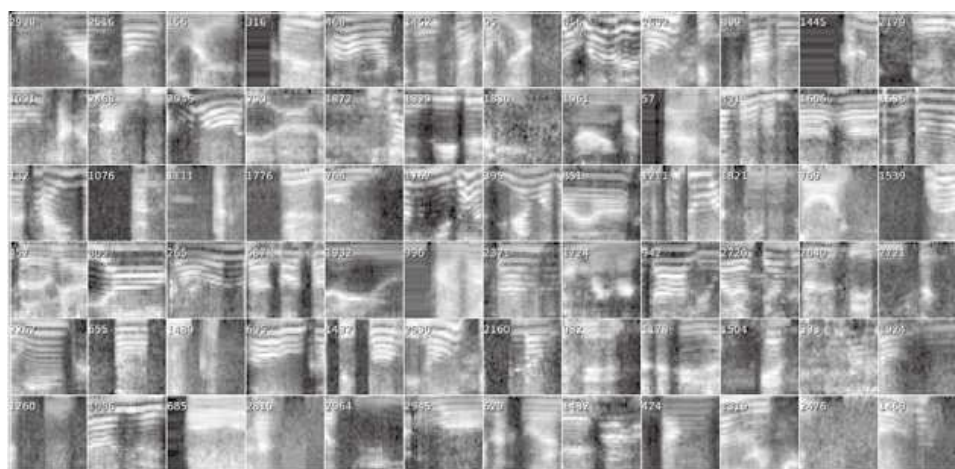


图7—1 语音“图像”的几个例子

每个正方形都是代表0.4秒语音的 40×40 像素的图像。每个像素代表10毫秒窗口中40个频段之一中语音信号的强度。资料来源：美国纽约大学，IBM公司[1]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声学模型”的卷积网络，将输入的声音归为这3000种类别中的一种。在输出时，它会生成一个标有3000个分数的列表，以此来表明输入的声音是3000种音标中每一种的概率。也就是说，网络输出的是一个每10毫秒具有3000个分量的向量（见图7—2）。

因此，一个句子可以被看作一种根据长度变换大小的图像，每时每刻都有一个频率内容。在网络的输出端，我们获得的是一个不同长度的向量序列，每个向量有3000个分量。

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仍需要根据一些单词和语言模型从该序列中提取一系列单词。对于语言中的每个单词，模型都会指出构成其发音的所有基本声音的序列。对模型的训练是从口语句子开始的，它会指出哪些单词序列在相应的语言中是可能（或最可能）的。我们利用解码器在最高数值对应的最可能的单词序列中进行搜索，以此将所得数值转换成单词序列。最近被研发出的一些系统就是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或者循环神经网络来实现所有这些模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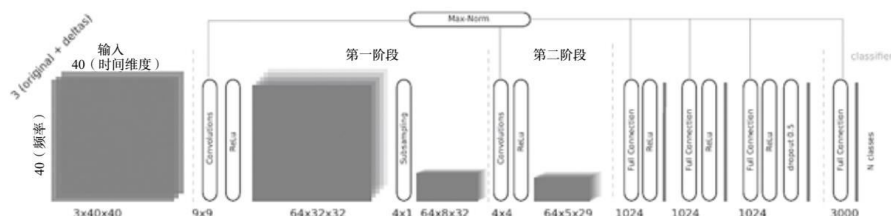


图7—2 用于语音识别的卷积网络示例

它取一个代表0.4秒语音的“图像”，并为语言的每种可能的声音生成一个分数向量。资料来源：美国纽约大学，IBM公司[2]

卷积网络几乎存在于所有涉及语音的应用中，例如，像 Alexa 这样的虚拟助手，它们会将查询内容转录为文本以供系统分析。

至于语音操作移动电话拨号或视频的自动字幕，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在应用语音识别。最近诞生的语音到语音的直接翻译，对于希望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交流的马德里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手机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翻译，它将客户所说的西班牙语翻译成汉语普通话并播放出来；反过来，驾驶员的汉语普通话同样会被手机翻译成西班牙语播放出来或是直接传入客户

的耳机中，以此帮助两者进行交流。

[1] Tom Sercu, Christian Puhersch, Brian Kingsbury, Yann LeCun, Very deep multilingual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VCSR,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2016, pp. 4955 -4959.

[2] Tom Sercu, Christian Puhersch, Brian Kingsbury, Yann LeCun, Very deep multilingual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VCSR,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ASSP), 2016, pp. 4955 -4959.

4

语音克隆

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利用一种被称为“反卷积”的特殊类型的卷积网络进行声音和语音的合成。之所以叫“反卷积”，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卷积网络，不过反转了输入和输出。该网络的输入是单词或音素的序列，输出的则是带有转调、韵律的合成语音信号。反卷积网络的结构非常类似于语音识别的结构，只是其中所有的箭头都被反转了：它生成一种频谱图，这种频谱图与用于识别的频谱图十分类似。为了使频谱图“反向”并产生语音信号，还需使用单独训练的反卷积网络。

在某些系统中，输入数据中带有一个人说话者的嵌入向量。使用经过训练的卷积网络，只需一个人几秒钟的语音即可计算出他的语音嵌入向量，把这个向量作为输入提供给语音合成器，机器就可以使用这个人的声音读取任何一个文本。我们把这项技术称为语音克隆。

现代语音合成器是如此真实，以至有时候很难将它们与人类说话者区分开来。但是，能够说话是一回事，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方面，机器离能够自由对话还差得很远。

5

语言的理解和翻译

仅仅解码声音是远远不够的，虚拟助手还需要对请求进行正确的分类，即确定其意图。比如，当记录如下的内容时：“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下雨吗？”“明天会很热吗？”虚拟助手必须“理解”所有这些语音真正的意思是：“给出明天的天气预报”。为此，亚马逊的工程师在Alexa内设置了约80种不同的意图，比如打电话给某人、播放音乐、给出交通路况、选择一个广播电台……一旦识别出语音的意图，亚马逊的服务器即可执行所请求的任务（有关虚拟助手如何工作的精确描述，请见本章后续内容）。

确定意图对于处理信息搜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越来越多的特殊神经网络（被称为“转换器”）正被用于处理此问题。当你输入“亚美尼亚的人口”时，谷歌会为你搜索。你的请求会由一个用数字列表表示含义的神经网络处理，也就是一个向量。在另一端，事先便已存在的内容向量会从数十亿个互联网页面上被提取出来，网络将第一个向量与第二个向量进行比较，如果它们具有相似性，则与这些向量相对应的内容将通过网络检索，并由搜索引擎显示给你。

对于文字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比如脸书上的某个帖子说了些什么？与政治有关吗？内容是激进还是保守？是新纳粹主义或是种族主义的评论吗？是赞美还是批评？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采用的文本分类方法可以概括如下：构

建一个大向量，其分量数等同于一部字典的大小，每个分量表示某个特定单词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词包”。除非单词是杂乱无章的，否则一切都会很简单。如果要判断两个文本“词包”是否相似，是否在说同一个主题，我们只需比较这些向量即可。当然，这些输入向量同样可以由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这是行得通的，只是效果不太好，因为使用神经网络很难判断文本是在说同一件事还是在说毫不相干的事（因为在两种情况下，它使用的都是相同的“词包”）。

更先进的方法是使用嵌入向量序列的文本表示，字典中的每个单词都与一个100 ~ 1000维的向量相关联。这些向量已经经过学习，可以用相近的向量表示类似的单词（根据欧几里得距离）。

学习单词嵌入向量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当时约书亚·本吉奥发表了一篇远超他所在时代的充满真知灼见的文章，[\[1\]](#)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用于构建语言模型的神经网络架构，使得一个训练过的系统可以根据所给的一段文本预测紧随其后的一个单词。那么如何表示神经网络输入端的单词？我们有一个词典中按顺序排列的所有单词的列表，在此列表中，每个单词都由一个数字标识。而后，将所有单词替换成列表中的数字，也就是将单词序列转换成了数字序列，由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向量列表，即一个LUT（查询表），这个列表为每个单词索引提供了一个嵌入向量（见图7—3）。

这个LUT的向量跟线性神经元层的权重一样，是经过训练的。网络具有几个隐藏层，之后是一个输出层，输出层生成一个大向量，用以标明词典中的每个单词出现在输入的单词序列中的概率。softmax模块将最后一个线性模块的输出加权并转换为概率分布，此模块计算每个输入值的指数函数值，然后除以指数函

数值的总和。至此，我们便获得了介于0和1之间的一系列数字，它们的总和为1：这是一个概率分布。softmax模块几乎应用于所有的分类应用程序。

训练之后，我们将LUT的向量用于表示单词，它们包含的信息使系统可以预测下一个单词，以及单词的含义和句法作用。研究人员已经对此系统进行过许多语句的训练，例如“牛奶在桌子上”，但从不出现“汽车在桌子上”这样的句子。在训练“他在花园里看到狗”和“猫在花园里”时，“狗”字和“猫”字在类似的上下文出现，系统会自发地将相似的嵌入向量分配给“猫”和“狗”，而将不同的向量分配给“牛奶”和“汽车”。地名、月份名等也如此。一般情况是，当单词在句子中扮演类似的角色时，它们的嵌入向量会很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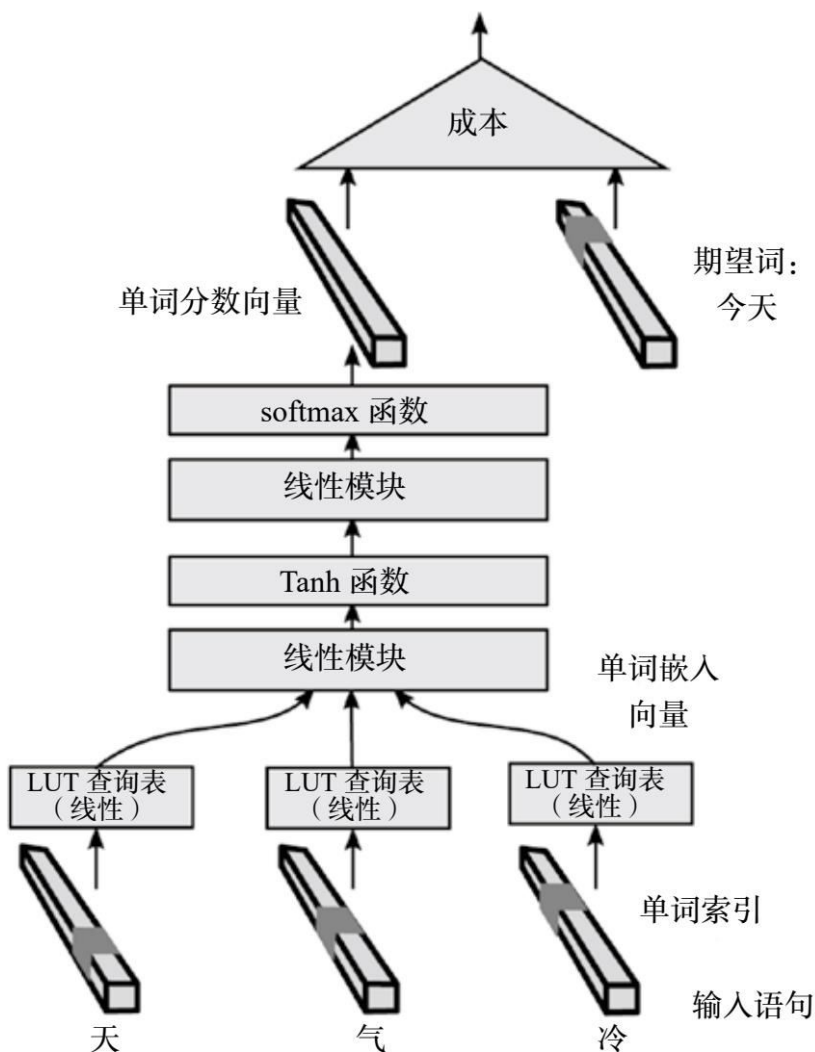


图7—3 约书亚·本吉奥和他的团队在2003年提出的语言模型

一个语言模型在输入时取一系列单词，在输出时生成一个数值向量，对于词典中的每个单词，该输出数值向量都产生该单词尾随输入序列出现的概率。语言模型用于生成文本，以提高语音识别系统和翻译系统的准确性。此图表示的语言模型是最早一批将神经网络用于此目标的模型之一。每个单词在词典中都对应一个索引，网络的第一层会通过一个称为LUT的特殊类型的线性层，将每个索引表示的单词转换成嵌入向量。在训练了数百万个文本之后，这些向量代表了有关这些输入单词的所有有用信息，诸

如“狗”和“猫”之类的相似的词将由相似的向量表示。自深度学习出现以来，最好的语言模型都使用了深度神经网络。

2008—2011年，在NEC位于普林斯顿的实验室工作的布雷顿人罗南·科洛伯尔（Ronan Collobert）和英国人贾森·韦斯顿（Jason Weston）改进了这种嵌入的想法。他们证明，利用卷积网络体系结构，系统不仅可以预测下一个单词，还可以执行文本理解和文本分析的任务。不过，这项工作受到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界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文章甚至成了嘲讽的对象。这简直是荒谬！他们的工作其实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2018年，他们获得了ICML的时间检验奖。该奖项表彰的是近十年来在ICML上发表的最杰出的文章。[\[2\]](#)贾森和罗南如今都是脸书的研发人员。

2013年，在谷歌工作的年轻的捷克研究员托马斯·米科洛夫（Tomas Mikolov）重新采用了训练语言模型的想法，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架构，并将其命名为Word 2 vec。这个模型通过单词的嵌入表示文本，效果非常理想，因此这个架构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3\]](#)所有人都用它来表示文本，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含义或语气。随即，脸书将托马斯招致麾下。入职不久，他便与脸书的法国研究员彼得·博亚诺夫斯基（Piotr Bojanovski）、爱德华·格雷夫（Édouard Grave）和阿曼德·约林（Armand Joulin）合作完成了FastText项目（脸书开发的一款快速文本分类器），极大地改善了Word 2 vec的性能，扩展了其应用范围，使其可以应用于157种语言。FastText作为开源项目，至今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在使用。[\[4\]](#)

相关研究达到了令人兴奋的顶点。2014年年底，杰弗里·辛顿以前的学生、研究员伊利亚·萨茨克威尔（Ilya Sutskever）在NeurIPS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5\]](#)他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神经网络，能够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其结果比此前

所使用过的所有技术都略胜一筹。

“传统”翻译方法使用的是根据平行文本计算的统计数据，比如英文词组“see you later”（回见）有多少次被翻译成法语的“à plus tard”（回见）？英文单词“bank”（银行；河岸）有多少次被翻译成法语的“banque”（银行）或者“rive”（河岸）？通过计算这些统计数据，并在遵守相关语法规则的前提下重新排列目标语言中的单词，我们就获得了较为近似的翻译。但是这些传统系统不适用于差别很大的语言（例如法语和汉语普通话）或单词顺序发生变化的语言（例如英语和德语，在德语中，动词通常是在句末）。伊利亚的系统使用的是循环网络，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被称为LSTM（long short-term memory，长短期记忆）的特殊循环神经网络体系结构，该体系结构是由德国研究人员泽普·霍赫赖特（Sepp Hochreiter）和于尔根·施米德胡贝（Jürgen Schmidhuber）于1997年在瑞士提出的。^[6]伊利亚提出使用一个多层的LSTM将一个句子的含义编码为一个向量，然后使用另一个LSTM网络将源语言逐字地翻译成目标语言。我们将这种类型的任务称为“seq → seq”，即序列到序列（sequence to sequence）：将一个符号序列转换为另一个符号序列。他的系统仅适用于相对较短的句子，因为LSTM到达句尾时会忘记句子的开头！而且，由于该系统的计算量很大，所以无法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第二年，即2015年，蒙特利尔约书亚·本吉奥实验室的年轻韩国博士后研究员赵京勋（Kyunghyun Cho）和来自德国的年轻实习生德米特里·巴赫达瑙（Dzmitry Bahdanau）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与其将整个句子编码成一个固定大小的向量，倒不如让网络将注意力集中在它正在翻译的源语言的句子部分上。举个例子，如果系统需要翻译英文文本“In this house, there are two

bathrooms. The wife has her own and the husband his own”（“这所房子有两个浴室，妻子有她自己的，而丈夫也有他自己的”）。用法语可翻译成：Dans cette maison, il y a deux salles de bains. La femme a la sienne et le mari la sienne。英语中代词与主语一致，而在法语中代词是与宾语一致的。为了保证句子结尾的正确性（“而丈夫.....”），系统必须决定是将“his own”翻译成“le sien”还是“la sienne”[7]。网络利用注意力回路的思想，生成了“而丈夫.....”，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浴室”有关的部分。最初的结果非常鼓舞人心：该系统比伊利亚的系统更高效，并且在计算量和内存方面成本更低。[8]几个月后，斯坦福大学的克里斯·曼宁（Chris Manning）实验室在参加国际机器翻译大赛（WMT）时使用了蒙特利尔小组的想法，并且赢得了比赛！这引发了一场全新的风暴：所有从事翻译的研发小组都采纳了这个想法，其中就包括来自加州FAIR的德国研究员迈克尔·奥利（Michael Auli）的团队，他做出了一个出色的翻译系统，其体系机构的基础是一个增强了的注意力机制的卷积网络。这个系统在2019年的WMT比赛中获胜。[9]

2017年年底，又是谷歌的一个研究小组将大型注意力回路应用到了翻译系统，并将这个结构命名为“变压器”（Transformer）。他们发表的相关文章标题为《注意力就是您所需的全部》（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几个月后，另一篇谷歌的文章震惊了整个学界，这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名为BERT（来自Transformers的双向编码表示）的系统的。系统的名称沿用了使用首字母缩写的传统，该传统是由西雅图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创的，他们将自己的系统命名为ELMo（出自语言模型的嵌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都在尽量找乐子：Elmo和Bert都是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第一季里的角

色。

ELMo、BERT和其他一些诸如Bengio、Word 2 vec和FastText系统的思路皆来自自监督学习（见图7—4）。让我们把思路调整到自监督学习。在当前的翻译案例下，它旨在给一个大型“变压器”网络的输入端展示从文本中提取的单词序列，隐藏其中10 % ~ 20 %的单词，并训练系统预测那些被掩盖的单词的能力。为此，系统必须学习单词的含义和句子的结构。通过数十亿个句子的训练，网络学习到的单词及句子的内部表征是非常好的，此时的网络足以用于翻译或理解系统的输入。有关BERT的文章[10]于2018年10月在arXiv网站[11]上发布，然后投稿给了ICLR（国际学习表征大会）。数周之后，来自脸书、HuggingFace（法国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初创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团队相继引用了这个结果，并发布开源了自己的代码。这篇文章真正发表于ICLR的时间是2019年5月，但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已获得了600多次的引用！这个案例说明了这些思路的传播速度之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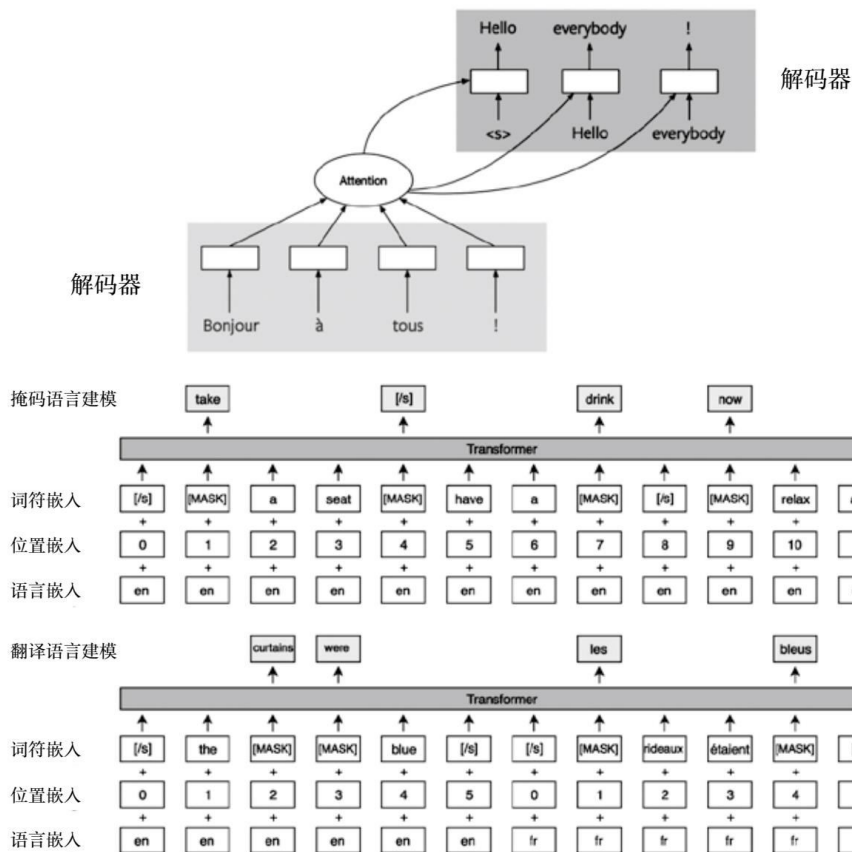


图7—4 “seq 2 seq”结构用于自动翻译，BERT、Transformer和多语言 BERT

编码器模块设定句子含义的表示。在编码器的输入处，每个单词都由一个向量表示，与每个单词相关的向量都会被学习。编码器在一个叫作“Transformer”的网络中将这些向量与一个复杂系统结构相结合，该复杂结构以向量序列的形式表示意义。解码器一个一个地生成要翻译的单词。为了生成这些单词中的每个单词，它将先前生成的单词以及注意力模块的输出作为输入，该注意力模块使其可以关注输入句子中与其正在生成的单词相对应的部分。

资料来源：迈克尔·奥利（Michael Auli）

中间的BERT结构通过预测先前已被隐藏的输入句子中的单词来学习表示文本。下方的多语言版本学会同时表示一个句子及其翻译，并建立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内部表示形式。资料来源：纪尧姆·朗普勒（Guillaume

Lample) 和亚历克西斯·科诺 (Alexis Conneau) [12]

脸书的一个团队受BERT启发建立了一个被称为RoBERTa的模型 (robustly optimized BERT, 即“稳健地优化了的BERT”之义, 这种双关语的命名传统被继续使用了)。2019年7月, 该团队在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上训练了RoBERTa模型, 使其在GLUE (通用语言理解评估) 的优胜名单中处于领先地位。

[13]GLUE竞赛包括一整套语言理解的任务。

相关的竞争异常激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原始的BERT的排名就跌到了第十二位。前三名 (截至2019年7月) 是RoBERTa (脸书)、XLNet (谷歌) 和MT-DNN (微软)。而第四名, 才是我们——人类。但对此还是要辩证地看待: GLUE的任务之一是迎接“威诺格拉德模式 (Winograd Schema) 挑战赛”[14], 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代词指代含糊不清的句子, 类似“la sculpture ne rentre pas dans la boîte parce qu’elle est trop grande” (无法把雕塑放入盒子中是因为它太大了), 或者是“la sculpture ne rentre pas dans la boîte parce qu’elle est trop petite” (无法把雕塑放入盒子中是因为它太小了)。在第一种情况下, 代词“它”是指雕塑,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指盒子。我们必须具备一些有关世界运作方式的知识, 才能使代词与正确的单词相关联。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经常使用该示例来说明机器需要更多的常识。不久之前, 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正确匹配率一直没有超过60 %; 今天, 最好的系统的正确匹配率接近90 %, 离人类95 %的成绩还相差甚远。

然而, 通过将句子填补完整进行学习的思路取得了进展。在2019年年初, 来自巴黎FAIR的两名年轻研究人员提出了BERT的修改版本并用于翻译, 他们将其命名为XLM (跨语言模型)。他

们的想法是在系统中输入两个句子，其中一个法语，另一个是英语，用以训练系统预测缺失单词的能力。它可以使用英语句子中的单词，例如单词“blue”，来推断法语句子中被隐藏的单词是否含有“bleu”。通过这样的训练，系统找到了一个与语言无关的通用表示形式，而且这些系统还可以提高翻译人员的工作效率。

[15]

[1] Y. Bengio, R. Ducharme, P. Vincent, C. Jauvin, A neural probabilistic language mode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3 , 3 (6), pp. 1137—1155.

[2] Ronan Collobert, Jason Weston, A unified architecture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Deep neural networks with multitask learning , *Proceedings of the 25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08)*, ACM, New York, 2008 , pp. 160—167.

[3] T. Mikolov, I. Sutskever, K. Chen, G. S. Corrado, J. Dean,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of words and phrases and their compositionality ,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3.

[4] <https://fasttext.cc/>.

[5] Ilya Sutskever, Oriol Vinyals, Quoc V. Le, 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with neural network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6 , pp. 3104 –3112.

[6] Sepp Hochreiter, Jürgen Schmidhuber: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ural Computation*, 1997, 9(8), pp. 1735–1780.

[7] 法语中表示“他的/她的”的主有代词具有阴阳性之分，阳性形式为le sien，阴性形式为la sienne。使用阳性还是阴性形式取决于所代替的名词的阴阳性。——译者注

[8] D. Bahdanau, K. Cho, Y. Bengio,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by jointly learning to align and translate, *ICLR 2015* , <http://arXiv.org/abs/1409.0473>.

[9] Nathan Ng, Kyra Yee, Alexei Baevski, Myle Ott, Michael Auli, Sergey Edunov, Facebook FAIR'S WMT 19 News Translation Task Submission, 2012, *arXiv* : 1907. 06616.

[10] J. Devlin, M.-W. Chang, K. Lee, K. Toutanova, BERT :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 , <https://arxiv.org/abs/1810.04805>.

[11] arXiv是由康奈尔大学运营维护的一个非营利性数据库，由于免费，学术研究人员可以在其他会议或期刊没有录用之前，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发布到该平台上，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宣传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科研成果。因为无论会议和期刊从投出到最终可以检索，都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很难保证期间自己的成果不被别人剽窃，arXiv可以证明论文的原创性。——编者注

[12] Alexis Conneau, Guillaume Lample, Cross lingual Language Model Pretraining, 2019 ,arXiv : 1901.07291.

[13] <https://gluebenchmark.com/leaderboard>.

[14] “威诺格拉德模式挑战赛”是图灵测试的一个变种，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克托·莱韦斯克（Hector Levesque）发起，挑战赛的名字是为了向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教授致敬，威诺格拉德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

[15] G. Lample, A. Conneau, Cross-lingual language model pretraining , <https://arxiv.org/abs/1901.07291> (代码 : <https://github.com/facebookresearch/XLM>) .

6

智能预测

人们喜欢预测经济，例如预测库存，预测产品的需求，预测一只股票或财务价值的演变曲线……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信号是很难捕捉的。若非如此，那么所有人都可以预测股市价格，财经新闻的趣味也就大大降低了。

预测能量消耗使得法国电力公司（EDF）或任何一家电力公司可以更好地管理发电厂的发电量，并尽可能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呢？

电力公司要连续测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用电量，并用一系列数字呈现测量结果。位置不同，测得的数字也不同。在一个居民区中，平时一般在夜里的用电量很低，而在早上7点至9点居民醒来的时间里，用电量开始增加；当他们上班或上学时用电量再次减少，但并没有回到夜里的水平，因为有些人仍然待在家里；它会在一天快结束时回到并保持高位，直到晚上10点至午夜人们上床睡觉之后，又再次降下来。周末的曲线有些不同，此外曲线的变化与天气也有关。工业区域的曲线与居民区的曲线几乎是相反的：白天位于高点，但由于人们晚上和周末几乎都不工作，所以曲线就是平的。

就这样，电力公司找到了自己的时间序列：住宅1、住宅2等，以及其他指标，例如外部温度、日照水平、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指标（工作日为1，周末和节假日为0）、每小时形成一个数字列表，这些数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指标。

这是一个一维的数字列表，非常类似于图像。卷积网络是根据过去多年收集的数据进行训练的。

线性回归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它不使用卷积网络来读取“图像”，输出是输入的简单加权和。我们也将它用于财务预测。这种“自回归”模型可以通过分析过去的价值来预测未来的价值，它只需要计算这些模型的系数即可。但如果输入信号很复杂，例如电能消耗，其中存在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那么该方法就不再适用。

另一个广泛应用预测的领域是广告业，点击率预测（CTR）对将内容在线发布的企业来说非常有用。谷歌、脸书和科韬（Criteo，一家效果营销科技公司）等一系列公司都想要知道用户会点击观看哪些广告，因为用户的点击量决定了它们的收益。如果这些公司想要广告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应该以最少的广告数量获取最多的收益，因此仅向用户展示它们可能会点击的内容即可，否则用户会心生厌恶，进而产生排斥心理（参见第八章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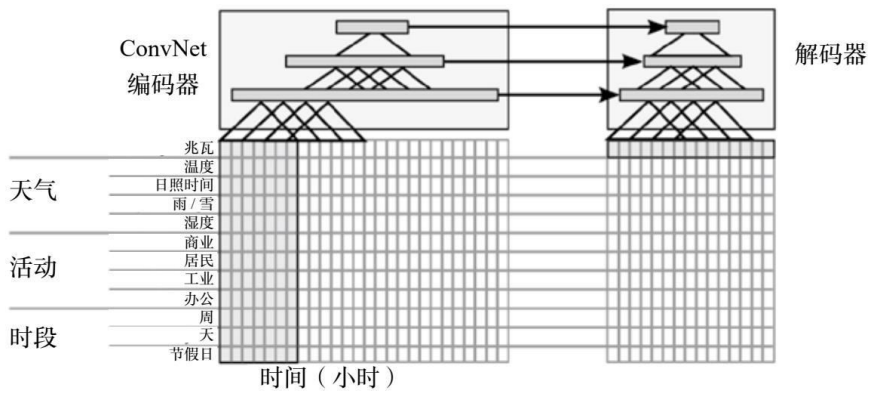


图7—5 对一座城市电力消耗的预测

卷积网络将一天或更长的时间窗口视为输入，并被要求预测在一小时、一

天、一周或一个月内的耗电量。

训练的示例是给定某一特定时间、某一天的值，而期望的输出是下一个小时观察到的耗电量。这次不是训练它识别一个图像中的对象，而是训练它预测一些街区中每一个街区的耗电量。

在卷积网络中，若干单元通过非线性函数计算加权和。堆叠层使我们能够计算比线性预测更复杂的输入——输出关系。

为了预测用户点击推送广告的概率，我们搭建了一个有大量输入的神经网络，并对其进行训练，以预测人们对该广告是否感兴趣。在输入端，用一个向量代表此内容和用户对其的喜好程度，度量标准是从用户过去与其他内容的互动中获得的。每一天，这个模型都会在脸书或谷歌数十亿的点击量上进行训练。

神经网络会通过输出一个分数值来预测某个用户是否会点击推送的广告。其后，如果这个用户实际点击了广告，神经网络便会向上调整，否则向下调整。下次选择推送给该用户的广告时将考虑这一调整。由此可见，网络在不断地接受训练。

脸书用同样的方法在新闻源（Newsfeed）的新闻提要上投放广告。谷歌也使用这个方法来确定显示的搜索结果的顺序。如果用户在谷歌中输入“禽流感”，并且忽略了前4个结果，点击了第5个结果，那么谷歌就会提升第5个结果在列表中的位置。如今，所有的广告商都在使用这些方法。

人工智能与科学

深度学习在科学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科学领域包括天体物理学（星系的分类和系外行星的发现）、粒子物理学 [分析日内瓦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粒子加速器上碰撞产生的粒子射流]、材料科学（具有新特性的超材料的设计）、社会科学（对社会互动的大规模分析）、神经科学（了解大脑中的感知机制）.....

深度学习应用最广泛的科学领域应该是生物医学，例如研究蛋白质折叠——这些由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是构成所有生物细胞的基础，它们是由基因合成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中的字母序列被转化为形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而蛋白质会折叠成特定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与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并执行功能，例如使肌肉收缩.....它们折叠的形状决定了它们的功能。

为了找到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法来阻止两种蛋白质黏附在一起，或者相反的要促进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能够预测那些支配蛋白质折叠的生化机制。[\[1\]](#)神经网络就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效方法，例如DeepMind公司的AlphaFold系统。[\[2\]](#)

[\[1\]](#) Alexander Rives, Siddarth Goyal, Joshua Meier, Demi Guo, Myle Ott, Clawrence Zitnick, Jerry Ma, Rob Fergus, Bi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merge from scal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to 250 million protein sequences, bioRxiv, 2019 , p. 622803.

[\[2\]](#) R. Evans, J. Jumper, J. Kirkpatrick, L. Sifre, T. F. G. Green, C. Qin, A.

Zidek, A. Nelson, A. Bridgland, H. Penedones, S. Petersen, K. Simonyan, S. Crossan, D. T. Jones, D. Silver, K. Kavukcuoglu, D. Hassabis, A. W. Senior, De novo structure prediction with deep-learning based scoring, *13th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echniques for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1 - 4 December 2018*, <https://deepmind.com/blog/article/alphafold>.

8

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系统的三个阶段

虽然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尽管汽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在2019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全自动模型仍在实验当中，大多数时候仍需要有人坐在副驾驶座进行监视。

一场神学辩论分裂了科学界：一派是“全部学习”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端到端训练的深度学习系统。为了对系统进行训练，可以将系统的输入端插到汽车的摄像头上，将输出端插在踏板和方向盘上，然后让系统在长达几千个小时的时间里观看并学习人类驾驶员驾驶汽车。

另一派是“混合”方法的支持者，他们坚定地认为应该将问题分开来看：将感知环境的深度学习系统与其他事先安装且基本由手工编程的详细地图的线路规划模块相关联。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动驾驶系统将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功能由人工编程，深度学习仅被用于感知；第二个阶段，深度学习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并占据重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机器具备足够的常识，驾驶技术比人类更可靠。

自主性与混合系统

一家名叫MobilEye的以色列公司推出的系统是第一批市场化的辅助驾驶功能系统之一，后来该公司被英特尔收购。2015年，MobilEye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提供了基于卷积网络的、几乎全自动的高速公路驾驶视觉系统，并将这个系统配备在了特斯拉Model S 2015年的车型上。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则趣闻。2013年6月，我受邀在普林斯顿举行的COLT（计算学习理论大会）上介绍我的研究。在台下的听众中，专门研究学习理论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沙伊·沙莱夫-施瓦茨（Shai Shalev-Schwartz）对卷积网络的实际应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他正准备去MobilEye度过为期一年的学术假期。那年夏天，在加入该公司后，他强调了卷积网络的优势。战斗打响了！MobilEye的工程师立即采用了他关于车载系统的建议。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基于卷积网络的新系统交付给了特斯拉，并用在了2015年的车型上。一年之后，特斯拉决定设计建造自己的驾驶系统，两家公司“离婚”。佳话就是这样传播开的！

为了提高自动驾驶系统的可靠性，多家支持“混合”方法的公司利用“作弊”的方式简化了感知和决策问题。他们使用非常详细的路线图，列出所有标志、地面标记和其他预先记录的标志，再结合GPS（全球定位系统）和高精度的汽车定位评估系统，使得车载系统不仅能识别车辆和移动物体，还可以识别不可预见的障碍物，例如道路工程。除了摄像头，大多数自动驾驶汽车还使用雷达来检测附近的车辆以及其他“激光雷达”，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这些系统都利用卷积网络进行感知，定位可穿越区域，检测

车道、其他汽车、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施工和各种障碍物。通过向它们展示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行人、车辆、路上标记、道路标志、人行道、交通信号灯等数据，使它们接受各种道路条件的训练，并学会辨识这些物体，即使物体的某一部分被其他物体掩盖，系统也能够将其辨认出来。

自2014年以来，字母表公司（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的子公司Waymo一直在旧金山进行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皆是谷歌员工。2018年，亚利桑那州开始向所有人开放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个地方确实很适合开展此项目：道路宽阔、人流量少、气候宜人。那里的天气一直很好。Waymo采用了混合系统，配备了一系列复杂的传感器（雷达、激光雷达和照相机），以及基于卷积网络的视觉识别和规划的传统方法，人工编程的驾驶规则，精确显示限速标志、人行横道、交通信号灯的详细地图……这些技术的结合使汽车能够精准定位自己、识别移动的物体并发现不可预见的事件，例如道路施工。当汽车驶入十字路口并且有优先通过权时，它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但它仍需要有人坐在副驾驶座（这个座位不再被称为“死亡之座”）上进行监督，确保这一切的安全进行。

激光雷达可以绘制详细的关于汽车周围环境的三维地图。它的工作原理跟雷达很像，可以测量设备发射的光束从障碍物反弹回来所花费的时间。但是，与使用微波束的雷达不同，激光雷达使用的是很精细的红外激光光束，因此，它会生成一个距离图，即一个360度的图像，在每个方向上都给出了在该精确轴线上与最接近物体的距离。这样，障碍物检测系统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但是，高性能的激光雷达设备十分昂贵、脆弱、难以维护并且对天气条件敏感。它们可以被用来装备一个出租车队，却无法被安装到所有人的汽车上。

当条件良好时，自动驾驶汽车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说明这一点：2014 —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仅发生了59起自动驾驶汽车撞车事故。当地要求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报告道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故，包括轻微事故。[\[1\]](#)

然而，也有一个影响恶劣的事故记录：2018年3月18日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的坦佩市，一辆经过优步测试的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了一名女性。该女性大概吸食了冰毒，神志受到影响，被撞时正推着一辆自行车穿过距离人行横道120米的没有灯光的马路。后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Waymo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克拉夫奇克（John Krafcik）含蓄地质疑优步：“在Waymo，我们相信我们的技术能够应对这种情况（指行人推着自行车从未受保护的通道穿过）。”我们尚不清楚造成此次悲剧的功能障碍出在哪里。约翰·克拉夫奇克还回顾说，自2009年以来，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在行人经常光顾的道路上行驶了超过800万公里，从未发生任何致命事故。尽管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下面的数据对比来看一下：在美国，人类驾驶员发生致命撞车的频率约为每1.6亿公里一个。

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远

研究人员仍旧在利用端到端的训练方式，使系统通过模仿人类驾驶员来学习。2019年，虽然系统还没有达到人类驾驶员的水平，但汽车已经可以轻松地在乡村道路上行驶近半个小时。可问题是，它迟早会出现问题，到时就必须由人类驾驶员重新掌控局面。

因此，更需要设置层层保障，也就是说，需要设置其他监视

系统，来监测那些专门用来检测行人、障碍物和地面标记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察觉到汽车的行驶路径出现误差，它就会进行校正。而建造一台类似的机器会涉及许多工程。

如果我们有可以预测汽车周围即将发生的情况以及动作后果的模型，那么汽车就可以进行更快、更好的训练。但是目前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简而言之，辅助驾驶系统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仍在发展之中，远远没有成熟。当然，我们需要区分半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在半自动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虽然不做任何事情，但他实际上在持续地监督系统；而自动驾驶是指系统可以在没有驾驶员监督的情况下驾驶汽车。无须人工操作的自动驾驶纪元将会始于行驶在安静郊区的、挂满传感器的车队。而私家车在巴黎、罗马或孟买的街头实现自动驾驶之前，相关技术仍需慢慢地进步。

[1] 来自法新社2018年3月19日的报道。

大型应用程序的架构：虚拟助手

每个虚拟助手的内部都结合了多个应用程序。听到“Alexa”，亚马逊的圆形智能音箱就会亮起。一个节能小程序使与之连接的扬声器始终保持待机状态，并且仅会检测唤醒它的单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虚拟助手交流。在它的麦克风后面，接收到的声音信号被数字化。

Alexa具有远程语音识别系统。像手机一样，Alexa配备了多个麦克风，这样就可根据波束形成的原理，使它专注于说话者的同时消除环境噪声。一些麦克风是多向的，其他则是定向的，专注于主要的声音来源。该系统从定向麦克风获取声音信号，并消除环境噪声的信号，仅留下人的声音。当在嘈杂的餐厅中专注于聆听对方说话时，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做的。

语音识别系统应该能够处理不同的音调和音色，但自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到使用了卷积网络，语音识别系统才能真正正确地识别儿童语音、口音和异常声音等。例如，儿童经常有读音错误，而且他们的音调通常会很高。以前，网络必须首先确认声音信号来自孩子、男人还是女人，然后针对不同的信号源使用不同的识别系统；今天，通常只用单个卷积网络就足够了。

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语音将被传输到亚马逊的服务器，服务器将识别单词，将单词转化为文本。要想识别不同种类的语言，需要使用不同的、经过相应语言环境训练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包含两层连续的网络级别，在配置系统时被激活，其中第二层神经

网络确定语音意图。

在第一个网络级别上仍然可能出现错误。比如“Can you recognize speech?”这句话可能被受过训练的网络识别并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句子：“Can you recognize speech?”（你能辨识语音吗？）或者：“Can you wreck a nice beach?”（你能破坏漂亮的海滩吗？）我们发音不准或是语速过快，都可能“欺骗”语音识别系统。

系统还可能使一个单词被另一个与它很像的单词替换，进而产生完全相反的意思。目前所有的语音识别系统都带有一些用来预测哪些词可能更匹配一段文本的语言模型，它们在语音识别神经网络之后发挥作用：如果存在有歧义的词，它们就会尝试寻找最佳翻译；如果从语法或语义的角度来看，识别系统获取的单词序列没有意义，那么语言模型会给它打一个低分；如果想要查找得分更高的翻译，我们可以使用与路径搜索相同的算法对机器进行编程——句子的最佳翻译是在一系列可能的单词序列网格中获得最高分数的路径。其中网格是一种图形，图中的每个弧都是一个单词，而一条路径就是一个单词序列。

完成这些操作后，系统可以要求对问题进行进一步解释，或是通过合成与回复文本相对应的语音直接给出答案。传统的语音合成系统使用的是事先录制的语音片段，根据需要将片段拼接在一起，并修改音调以生成一个句子。现代系统神经网络则是一种“颠倒”的卷积网络。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与虚拟助手连接的扬声器是否会监视房屋内的生活？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虚拟助手处于“连续收听”模式，以便检测到唤醒它的单词“Alexa”“OK Google”（谷歌的语音助手）或“Hey Portal”（脸书的语音助手）等，只有这

些单词才能使它将某些内容传输到中央服务器。而一旦记录了一个句子，它就会将其发送到服务器，进而会识别并产生答复。如果虚拟助手在被“唤醒”后记录了家庭暴力现场的尖叫声，那么服务器将不执行任何操作。针对这一点，从技术的角度上看，服务器其实是可以有所行动的，但从伦理的角度上看，它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于极其重视声誉的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或脸书，我们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由隐蔽在乌克兰的身份不明的少年编写的黑客程序，那就必须要当心了。

10

医学影像与医学

卷积网络通常用于X光片、MRI、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也用于肿瘤、风湿病或关节置换的检测。

对于传统的X光片，例如有两个图像的乳房X光片，由于我们在两个轴上都进行X光照射，因此经过训练的卷积网络会观察图像中每一个细小的区域，当它观察到可疑的像素点时就会做出反应。这是使用卷积网络进行语义分割的直接应用。

为了对此类系统进行训练，需要收集大量由放射科医生绘制出肿瘤轮廓的大量乳房X光片。这些照片会被分成一定大小的窗口，从而产生数百个小图像。将图像逐一输入一个卷积网络中，并告知网络窗口中心是否存在肿瘤。由此，它便学会了根据肿瘤的存在与否对窗口进行分类。

当投入实际应用时，卷积网络会遍历整个X光片，并将每个窗口的中心像素标记为“有肿瘤”或“没有肿瘤”。它在该过程结束时生成一种图像，将肿瘤染色并给出检测的置信度。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东西，那么答案很简单：“没问题”。大多数乳房X光片就是这种情况。如有任何可疑之处，X光片就会被发送给放射科医生，以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卷积网络过滤器过滤了那些可以被轻易判断的案例，从而降低了诊断成本，提升了诊断的效率。专业人员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专注应对那些较难判断的案例，这样就减少了因工作量过大而导致的劳累。

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风险。要知道，放射科医生要在暗室里的屏幕前工作很长时间，而他们所检查的大多数都是正常图片（见图7—6、图7—7和图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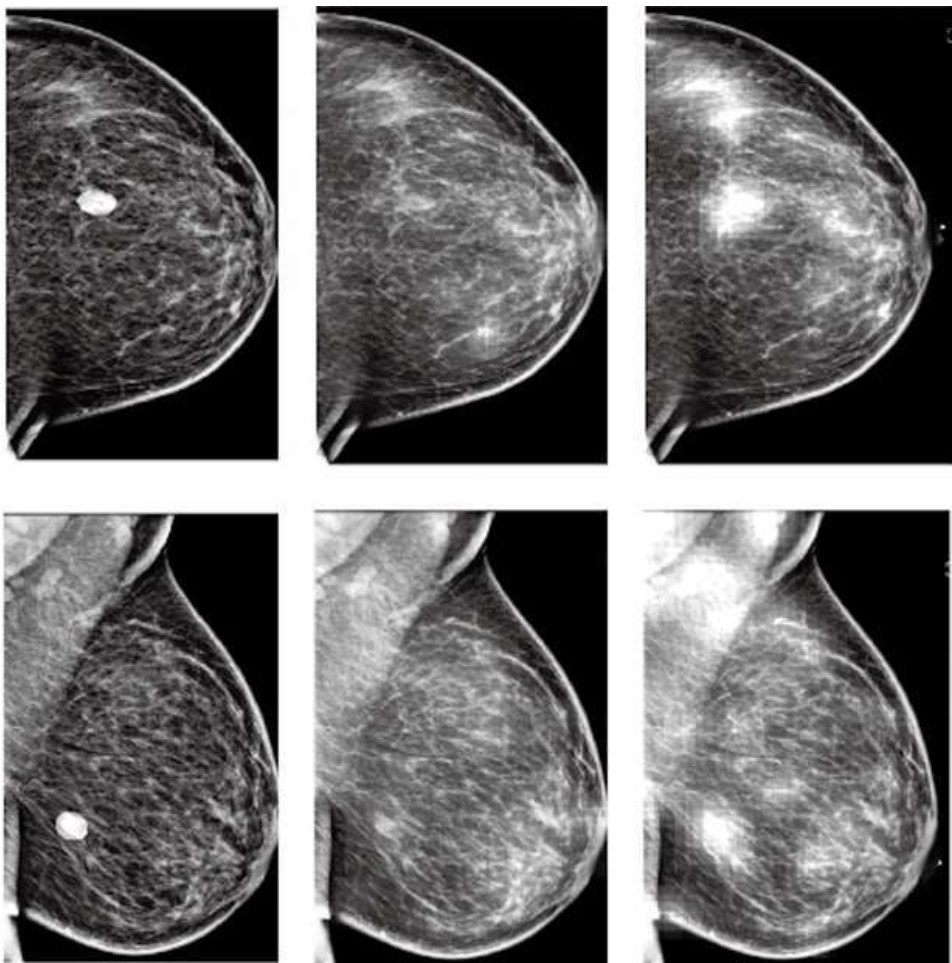


图7—6 使用卷积网络检测乳房X光片中的良性和恶性肿瘤

在左列中，浅色区域表示通过活检发现的高危肿瘤；在中间一列，浅色区域表示卷积网络识别出良性肿瘤；在右列中，浅色区域表示卷积网络识别出的恶性肿瘤。网络已经在100万张图像上进行了训练，其可靠性超过了人类放射科医生，但是最佳检验结果是将此系统和放射科医生的诊断结果结合起来而获得的。

资料来源：吴楠等，2019年，纽约大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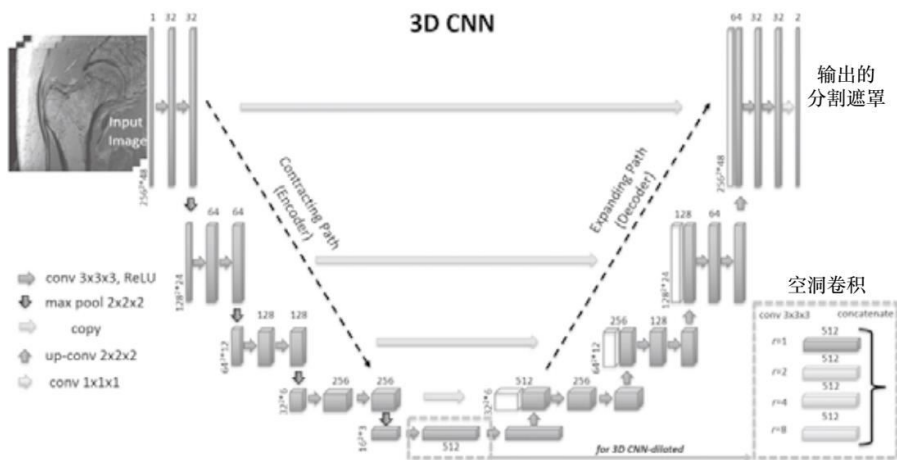


图7—7 髌关节MRI分割的卷积网络架构

与放射科医生不同，该系统可以直接输入三维立体图像。卷积网络的输入是由MRI体积图像的所有切片构成的一幅三维图像。

资料来源：德尼茨（Deniz）等，2017年，纽约大学[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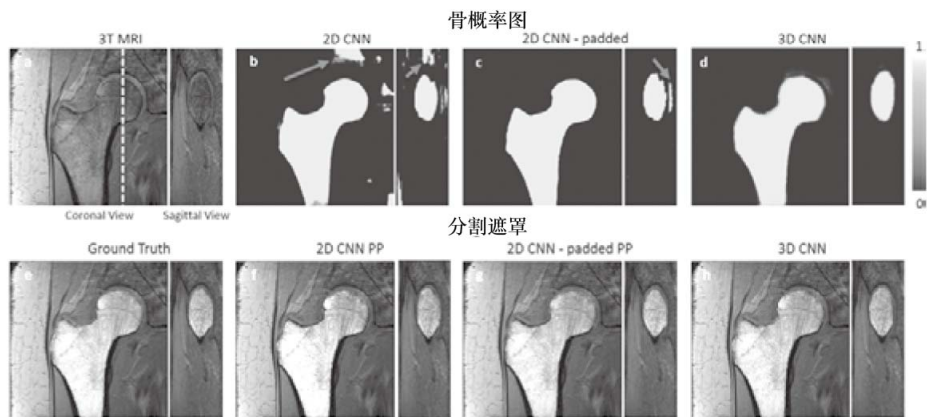


图7—8 基于卷积网络的MRI图像中股骨的自动分割

卷积网络将髌关节MRI的体积图像作为输入。该网络用体素（像素的体积等效值）属于股骨的概率标记每个体素。这种整体的立体视图使系统可以

对股骨进行更精确的分割，从而使髌关节置换手术更加容易。右上方的图像表示三维卷积网络对股骨MRI进行分割的结果。这个结果比使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加可靠。

资料来源：德尼茨等，2017年，纽约大学

[1] Nan Wu, Jason Phang, Jungkyu Park, Yiqiu Shen, Zhe Huang, Masha Zorin, Stanisław Jastrzębski, Thibault FÉvry, Joe Katsnelson, Eric Kim, Stacey Wolfson, Ujas Parikh, Sushma Gaddam, Leng Leng Young Lin, Joshua D. Weinstein, Krystal Airola, Eralda Mema, Stephanie Chung, Esther Hwang, Naziya Samreen, Kara Ho, Beatriu Reig, Yiming Gao, Hildegard Toth, Kristine Pysarenko, Alana Lewin, Jiyon Lee, Laura Heacock, S. Gene Kim, Linda Moy, Kyunghyun Cho, Krzysztof J. Geras, Deep neural networks improve radio logists' performance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Medical Imaging with Deep Learning Conference, 2019*, arXiv : 1903.08297.

[2] Cem M. Deniz, Siyuan Xiang, R. Spencer Hallyburton, Arakua Welbeck, James S. Babb, Stephen Honig, Kyunghyun Cho, Gregory Chang, Segmentation of the proximal femur from MR images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2018, 8, article 16485, arXiv: 1704.06176.

从传统搜索算法到强化学习

路径搜索是一个我们已经讲过的较为常见的应用，它会根据用户所选的交通方式计算距离和行驶时间，甚至会考虑实时交通状况。谷歌地图、位智（Waze）、Mappy（一款法国的地图软件）均使用了基于较短路径的搜索算法。该算法的原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不过其中并没有学习的过程。我弟弟贝特朗（Bertrand）以前在大学任职，现在在巴黎的谷歌工作，他刚好是研究基于这些算法的专家，这些算法被称为“分布式组合优化算法”。

这种方法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是在一幅图像中找到最短路径。计算机科学所说的把一幅图像放到计算机的内存中，就是一个由边连接的一些节点组成的网络。对于线路搜索，每个十字路口或岔路口都是一个节点，每个边都是连接两个路口的路段。边和节点与一系列指示了路段特征的数字相关联，这些特征包括平均行驶时间（根据交通状况实时调整）、行驶时间的变化、通行费、道路状况等。一种简单但效率低下的算法是：探索两点之间所有可能的路径，在计算全部路径后选择能够最快到达的道路。但即使对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说，这种计算方法也依然太慢了。高效的算法会迅速放弃与最佳设想路径相比过长的路径，而且它们利用了以下事实：几个路径可能同时通过同一个中间节点，并且只需选择一条最佳路径。这种在图中找最短路径的一般方法被称为“动态规划”，它被用在许多人工智能系统或其他系统中，比如

导航、语音识别和翻译（在可能的单词图中找到最佳文本）；此外，还被用于解码传输到你的智能手机或太空探测器的数字序列，以及通信网络中数据包的路由。这几乎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国际象棋或围棋的冠军系统也使用了在图中寻找路径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这类系统里的图是树形图，棋盘当前的位置是根，每个连接相当于走了一步棋，最末尾连接的节点展示了一系列棋子移动之后棋盘上的情形。因此，从根节点到该节点的路径，或者到此“叶子”（比喻）的路径，就是一步一步移动棋子的序列。要生成这棵“树”，必须有一个可以从当前棋局的情形中计算出棋子所有可能移动路径的程序。每个节点都标记有对当时棋局形式的评估。因此，只需要找到通向最好的“叶子”的分枝，也就是说最可能通向胜利的棋子的移动路径，然后一步一步移动棋子即可。但是代表9步棋序列的这棵树代表了一个天文数字！它约有10万亿片“叶子”。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更加灵活的策略。

假设现在有一个国际象棋棋局，轮到白棋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程序会根据提供给机器的国际象棋游戏规则（兵移动一个格，但第一次可以移动两个格；象走对角线；等等）产生所有可能的棋步。也就是说，该程序考虑了每个棋子，列出了白棋所有可能的走法，并生成了所有可能的新棋局目录。计算下来，平均每一步棋有36种可能的走法（见图7—9）。

因此，树形图是一棵倒立的树，其分支无限延伸，所以即使有很大的内存、很快速的处理器，机器也无法探索所有可能的棋步，它的计算也无法延伸到太远。“深蓝”就花费了近百小时来探索棋步。所以有必要采用剪枝技术，从这棵树上剪掉一些可能性，以使上述方法更有效。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赋予该系统一个评估白棋和黑棋双方棋

盘质量的函数。这个评估函数是与国际象棋专家合作建立的，并且结合了国际象棋对于良好棋局设置的标准，例如棋子之间形成相互保护的关系；保留尽可能多数量的棋子，每个棋子都有其特定价值；棋子要放在棋盘适当的位置，即放在中心而不是外围；守卫国王的安全；减少被对手的棋子威胁的方块数；等等。每一个标准都用一个数字表示，由此形成一个关于标准的向量，并交给某种感知器处理，无须学习。最终系统会生成一个加权和并给出一个得分值。程序可以生成这样的判断：“这个位置对这个棋手来说是个好位置。”如果这步棋增加了白棋获胜的机会，它就会产生一个正值，否则将产生一个负值。程序也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采用这一步棋，你获胜机会的得分为35；采用那一步棋，得分为-10；采用另一步棋，得分为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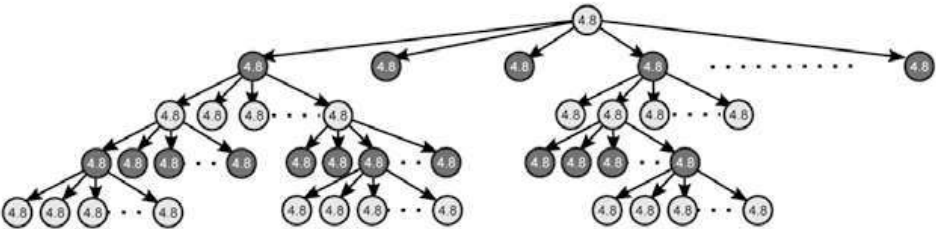


图7—9 应用于国际象棋的树搜索

对于白棋方下完之后的每种可能的棋局，黑棋方可以有36个走法。然后，对于这 36×36 的棋局中的每一个配置，白棋方又有36种可能的走法，依次类推。这种增长是指数级的！总结一下，第一步棋有36种可能性，第二步棋将有 36×36 的可能性，即有1296种可能性；第三步棋有 $36 \times 36 \times 36$ 的可能性，即46656种可能；到第九步时，我们会面对10万亿个可能的序列。

在对弈时，作为白棋棋手的程序会认为对手也正以最大化得分的方式下棋。在白棋走完一步之后，黑棋也将走到对它最有利的位置（最高得分值），也就是对白棋最不利的位置（最低得分

值)。而轮到白棋走的时候，白棋会走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依次循环。

鉴于“树”的潜在大小，为了减少对可能性的探索，该程序将对树进行剪枝处理。在走每一步棋时，它只会保留使本方棋手得分高而使对手得分较低的树枝。如此一来，探索可以一直持续到第九步棋，甚至更远。最终，系统得出白棋分值最大的最终位置，并选择与该分枝中第一个节点相对应的棋步。

考虑到黑棋也是为了取胜，所以白棋的程序仅保留树的某些节点。这样一来，评估函数可以将探索限制在对己方有利的局面，而轮到对方走的时候，对方同样可以将探索限制在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这时系统能够以相同数量的计算和内存探索到更深入的分枝。这种传统的人工智能形式就是这样战胜了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

最新机器的设计发生了变化，它们很少使用这种基于树形图的搜索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大型神经网络“监视”棋盘或围棋比赛。这些大型神经网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预测所有可能的棋步的得分值。DeepMind的AlphaGo和AlphaZero系统以及FAIR的Elf OpenGo（脸书开发的计算机围棋软件）系统都使用了卷积网络。AlphaZero通过自己和自己进行数百万局比赛的方式来训练网络，加强了可以获胜的策略，削弱了可能导致失败的策略。这便是强化学习：我们没有给机器正确的答案，只是告诉它输出的答案是好还是不好，就好像是在给它奖赏或惩罚。只需结合少量树形图的探索，该方法便可拥有非凡的性能。

这些系统也可以通过监督学习的方式来模仿比赛中的人类选手，以此进行训练。这些训练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作为支撑，一旦完成训练，我们就可以在围棋或国际象棋的棋盘上启

动卷积网络，它就会给出正确的下法。但是与人类大师一样，如果将该方法与树搜索、强化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其性能必然会得到改善。

我测试过一位法国国际象棋前冠军，他是一位能同时与50个人比赛的大师。仅需观察棋局几秒钟，他便能够确切地知道要走哪个棋子，然后到下一个棋盘，和另一个人比赛。等他来到我们的棋盘前，我们走一步，他瞥一眼，笑一笑，然后移动自己的棋子，没出10步我们就输了。显而易见，他把所有人都杀得落花流水，而我本人只走了几步就失败了（我很不擅长下国际象棋）。像他这样的天才，根本无须进行树搜索查看所有的可能情况，他对棋局的把控胸有成竹，可以根据本能直接移动棋子，有点像那些刚刚接受过训练的系统。

第八章

我在脸书的岁月

2012年，杰弗里·辛顿和他在多伦多的实验室团队提出的卷积网络所取得的胜利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而且多伦多大学还给出了卷积网络的开源代码，因此，大量团队能够在GPU——可以进行非常快速且廉价的数字计算的图形处理器——上重现这些结果，从而掌握卷积网络。

约书亚·本吉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的实验室和我在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长期以来一直共享类似的软件，但它们不适合用于这些新型功能强大的图形处理器。

因此，2012年机器学习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工业界也有了兴趣，特别是在脸书。2013年年初，一小组工程师开始尝试使用多伦多的软件来识别图像和人脸，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成果，成功引起了公司技术管理人员以及领导层的注意……

而当时，马克·扎克伯格和脸书的首席技术官迈克·斯科洛普夫（Mike Schroepfer）也在思索公司的未来。脸书即将迎来10岁的生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网络成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市场中已建立了良好的根基，而且已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等等。但是在2013年夏天，马克和迈克深信人工智能将成为脸书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决定进军此领域。

1

与脸书结缘

我也在学习之路上马不停蹄地前进！2013年夏初，我在一次计算机视觉大会上遇到了脸书的工程师，他们已经在进行卷积网络相关的工作了，并向我提及了早期的一部分工作。暑期结束时，脸书联系了我在新加坡大学时带的一个博士生马尔考雷利奥·兰佐托（Marc'Aurelio Ranzato）。这位博士生在加入Google X之前曾在多伦多跟着杰弗里·辛顿做博士后。Google X是一个绝密的实验室，里面也有一个致力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研究的小组。谷歌并不想谈论这个实验室，但是《纽约时报》科学技术领域的专业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泄漏了相关的秘密。^[1]

获知了消息后，脸书想要将马尔考雷利奥招致麾下。我建议他不要接受脸书的招揽，因为他一直希望继续进行基础研究，而脸书并没有研究实验室。然而马尔考雷利奥告诉我，脸书正想要开展一项研究活动。一个月后，在马克·扎克伯格和迈克·斯科洛普夫亲自出马邀请后，马尔考雷利奥加入了脸书。这是硅谷那些科技公司的典型做法：一旦发现能够吸引他们的人才，就会竭尽全力去招揽，首席执行官本人都可以拿起电话当说客。

我也是他们想要招揽的对象。那个夏天，我通过视频与脸书深度学习实验团队的负责人斯里尼瓦斯·纳拉亚南（Srinivas Narayanan）进行了交流。几周后，我与后来的领导迈克·斯科洛普夫进行了沟通。9月，马克·扎克伯格也给我打了电话，那是我

们的第一次通话。在电话中，他向我阐述了他的计划以及他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你能帮助我们吗？”他问。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因为我不想辞掉大学的工作，也不想从纽约搬到硅谷。最终我们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交流。

11月底，我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一次研讨会。马尔考雷利奥也是与会者之一，他邀请我到脸书去看一看他的工作。接受马尔考雷利奥的邀请后不久，马克·扎克伯格的助手联系我，提议我提前到达。就这样，我在访问脸书的前一天，独自与马克·扎克伯格在他家共进了晚餐。

可想而知，我们讨论的话题肯定是人工智能了！我意识到他已经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了，他是了解人工智能的，甚至还读了我的文章！当对某个主题感兴趣时，他总是如此。他对后来的虚拟现实或脸书对民主的影响等主题也同样如此，这让我不太习惯。这位年轻的首席执行官具有睿智长者一般的气质。在如此高度的责任下，几乎没有人能够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认真了解一个领域，阅读有关该主题的所有内容，更别说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技能了。

那天晚上，他再次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我向他解释了自己对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的设想。进入纽约大学之前，我曾在AT&T负责领导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时间长达6年。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一个机构必须遵守某些规则才能保持良好运作：如果我们想要收获研究成果，就必须给予科学家思考的自由，而不是强迫他们在短期内产出应用产品；需要向他们保证实验室结构的可持续性和声誉，以便他们可以在此全心投入和研究；此外还应该鼓励他们发表文章。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研究准则：研究必须是开放的，软件也必须开放源代码，并允许他人使用，包括允许他人将之用于产品和服务中。

他向我保证：脸书已经共享了自己的技术，包括其数据中心的设计。这是非常罕见的。脸书的许多领导者都来自开源领域，在成为脸书首席技术官之前，迈克·斯科洛普夫就曾是非营利组织Mozilla的技术总监。

第二天，在脸书总部，我见到了马尔考雷利奥所属的人工智能部门的十几位工程师。当天傍晚，我又一次遇到了马尔考雷利奥和迈克，他们再次向我介绍了他们的项目。我一再地向他们表示，我不想辞掉纽约大学的工作，也不想搬家。

他们接受了。

纽约大学的管理部门很快同意我做兼职。我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并非总能如此自信地担任新职务。在43岁第一次开展教学工作之前，我从未教过书。我仅擅长机器学习的研究，而在信息技术的其他领域，我自认为能力不足以教授学生。所以，虽然我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还是在内心祈祷不要教授操作系统或编译这些计算机专业的硬核课程。而这一次，我有经验，并且在获得马克·扎克伯格保证的同时保住了教授职位……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几天后，NeurIPS国际大会在内华达州的塔霍湖举行。马克·扎克伯格和迈克·斯科洛普夫决定在会议之后专门举办一场关于深度学习的研讨会。他们想对科研界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也想公开宣布脸书与我共同建立了新的实验室，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通过这个机会招揽人才。马尔考雷利奥与约书亚·本吉奥和其他科学家一同出席给研讨会的组织者带来了大难题：所有人都想参加这个研讨会！为此，我们找了一个更大的房间，加强了安保。脸书的首席执行官对这个主题的认识深度使在场的观众感到惊讶。那个周末，马尔考雷利奥、迈克和我接待了约20位面

试者，最终招募了其中的10多人。

人们对一家公司同意披露其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感到震惊。但我认为公司这么做主要有5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禁止优秀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就不可能吸引他们，因为职业生涯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是通过文章传达给世界的，而要发表文章，必须由同行所在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匿名评估。只有通过了评估，文章才能得以正式发表。文章的引用次数就相当于研究人员的“银行账户”。简而言之，没有论文发表，就没有职业生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方面的保密的公司（我不说名字了）很难招揽到人才。

第二，经过同行的评审筛选，方法的质量和信息的可靠性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而且，由于基础研究有时难以衡量，所以其他学者的引用就成了一个贡献重要性的标准。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鼓励科学家发表文章，在评估他们的工作时也应该考虑其文章的影响力。

第三，任何一个发明、发现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经历反复摸索、酝酿和检验。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会与其他实验室的同事进行交流互动，专业知识得以互补，这样的沟通往往是富有成果的。但是，要与研究人员进行讨论，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提出想法。所以，只有公司本身具备最优秀的人才队伍，才能从与该领域的引领者的交流中受益。

第四，一个工业实验室的价值依赖于所属公司识别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并及时地在该领域进行布局的能力。实验室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能够轻松地与运营或产品部门进行协作。但是，公司的运营或产品部门不一定能够捕捉到某个技术突破的潜在影响，有时他们需要科学界的验证，才能确信自己的实验室能在该领域产

出新技术！

第五，科学出版物也会反哺，赋予了公司创新的声誉。

像脸书、谷歌或微软这样的顶级搜索公司都在进行借鉴式的发展：一家公司发布了一项新产品、新技术，另一家公司会在数周或数月后对其进行改进。但是，未来的产品需要的是重大的科学突破，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顶级公司要么自己提出科学突破，要么在科学突破出现时具备足够将其捕获的专业能力。制造出与人类智能水平相当的虚拟助手或机器人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需要一些技术革命。任何一家公司，无论其规模有多大，都无法垄断所有的优秀想法，也没有能力独自完成这场冒险。解开智能的奥秘并在机器中重现智能是当今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它需要整个国际科学界的协作，尽可能地共享结果和方法。通过开源的方式共享我们的软件，这样才能帮助整个行业进步。

如果你遇到一家初创公司，它的领导人声称拥有了达到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的最高机密成果，那么他们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在幻想。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1] John Markoff, In a big network of computers, evidence of machine learning ,*The New York Times*, 25 juin 2012.

2

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2019年，FAIR主要分部位于4个地方：门洛帕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巴黎和蒙特利尔。此外还有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伦敦、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卫星实验室，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多。截至2019年夏，有300多名FAIR研究人员和工程师遍布北美和欧洲各地。

2015年6月，在巴黎第二区成立的FAIR是最重要的研究部门之一，它为法国和欧洲大陆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活力做出了巨大贡献。FAIR巴黎分部已与若干个公立实验室（尤其是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和博士生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中心大约有15名CIFRE（校企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博士生，他们将工作时间分配给了工业实验室和大学。通过这样的方式，FAIR资助了一部分公共研究，并帮助培养了法国和欧洲的下一代研究人员。最早一批的几名博士生在2019年春季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他们的论文质量都很高，在翻译、文本理解、语音识别、视频预测、自监督学习等方面都有真正的发现和实际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被欧洲的各大实验室聘用。

FAIR还聘用了一小部分学者做兼职，他们可以使用我们各地实验室内部的设备，并与我们进行合作。在《维拉尼报告》[\[1\]](#)发布之后，法国政府推动实施人工智能计划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允许学者在大学和企业两地做兼职。

我们还给公立实验室和机构（例如PRAIRIE，它是由政府人

工智能计划监管的新巴黎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提供捐赠和设备。此外，我们还为欧洲的大学和暑期学校提供讲座和课程，我本人于2015—2016年担任了法兰西学院[2]计算机和数字科学领域的年度客座教授。脸书通过为F站孵化器[3]提供部分资金以及创建培训计划来支持初创生态系统。后来，巴黎FAIR的前首席工程师亚历山大·勒布伦（Alexandre Lebrun）和他的合作者马丁·雷松（Martin Raison）于2019年年初（带着脸书的祝福）离开了团队，创建了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Nabla。

FAIR巴黎分部的成立引来了不少竞争对手。谷歌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谷歌大脑的巴黎分部；DeepMind也闻风而动；法雷奥集团（Valeo）、泰雷兹集团、标志雪铁龙集团（PSA）和许多其他法国公司也都相继成立了人工智能研发团队。

我认为创立FAIR最主要的影响是激励了年轻人才去攻读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士，巴黎的高级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他们提供了该领域研究的职业前景，这是法国以前所没有的。

可以说，人工智能在脸书的技术研究中脱颖而出了。

但是当我于2013年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实验室聘用时，他们仅有十几名工程师和三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我以前的学生马克考雷利奥·兰扎托。而我本人仍然留在纽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雇用了十几位才华横溢的专家，他们现在都是FAIR的中流砥柱。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月，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吃力，因为当时我们在业界默默无闻，吸引不到足够的人才。关于工作模式，我们也需要做更多的交流与沟通。

工作模式的设定自我向马克·扎克伯格阐述的一些原则：实验室旨在进行长远目标的研究，旨在促进科学的发展，不能太

过侧重于应用产品的研发。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工作，像在大学里一样进行开放的、公开的研究——我们的算法是开源的，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使用，还要与大学实验室开展合作。

虽然FAIR专注于长期目标的研究，但我知道公司必须从发明和发现中获得中期的实际收益，才能确保实验室的存在。挑战是很大的！我们一方面需要保证研究人员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努力让公司那些将注意力放在工程上的其他部门对我们的研究结果感兴趣，进而将它们转化为软件或可用的产品，彼此之间建立起信任纽带。

那是我们研究实验室的未来走向，它的某些结果必定会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只有这样，管理层才不会质疑为什么集团在人工智能上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

[1] 塞德里克·维拉尼（Cedric Villani），法国数学家，2010年菲尔兹奖得主，2017年当选法国共和党前进党（LREM）议员。2018年3月，维拉尼受法国政府委托起草了《法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法国社会与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被业界人士简称为《维拉尼报告》。这份报告全面摸底了法国在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领域中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与潜力，并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与提升进行了前瞻性与操作性筹划。——译者注

[2] 法兰西学院的深度学习课程的视频链接为：<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site/yann-lecun/index.htm>。

[3] F站，即Station F，是2017年创建于法国巴黎的世界最大的创业园区，它是一个超大型初创企业孵化器，有近千个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入驻。——译者注

3

科学的突破与产品的开发

尽管马克·扎克伯格并未给我们设定目标，但我们十分清楚某些应用领域对公司的重要性，这些领域包括文本理解、翻译、图像识别尤其是人脸面部的识别。在门洛帕克，已经有一个小组在研究脸部识别这个课题了。这个小组是一家被脸书收购的以色列公司，其中有许多工程师都已经成功地运行了卷积网络，是他们说服了马克·扎克伯格进军人工智能研发领域。

很多任务有待我们解决。2013年年底，机器学习才刚刚开始用于新闻源的组织、广告的推送和信息的过滤。这些仍然属于传统的机器学习问题，需要借助逻辑回归（感知器的概率版本）、决策树、基于“单词袋”的文本理解系统等方法。深度学习的使用仍然很少。

尽管有一部分是面向应用的工作，但FAIR的主体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基础研究实验室。我们很少使用脸书的数据，在研究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或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时，我们会在公共数据库中对其进行测试，以方便将测试结果与使用该数据的其他机构的结果进行比较。例如，为了改善翻译算法，我们使用的数据之一是由欧洲议会提供的，这个数据集合了过去10多年所有议会会议的共同体内各语言的版本。就这样，科学研究遵循着一种可验证、可复制的方法论向前推进。

入职不久，我便意识到公司需要成立一个利用FAIR开发的新方法去研发产品和服务的团队。在贝尔实验室和AT&T实验

室，我经历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的整个过程，明白这样做的重要性和巨大价值。当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小组的办公室相邻，并且我们共享同一套软件工具。应用研究使顶尖科学家变成了工程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个题外话：他们中有两个人获得了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预算削减之后，他们因找不到大学职位，只能转行成为通才工程师。凭借数学背景，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理论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就像是小孩子的游戏一样。

我们继续说脸书。鉴于以上原因，我说服了管理层创建一个机器学习应用研究小组，并将其命名为“应用机器学习”（AML），由前微软负责将机器学习系统用于广告展示位置的华金·基尼奥内罗·坎德拉（Joaquin Quiñonero Candela）负责。我俩私底下说法语。华金是西班牙人，在摩洛哥长大，并在那里就读了一所法国高中，然后回西班牙学习，并在丹麦攻读了博士学位。在德国读完博士后之后，他加入了英国剑桥的微软研究院。因为这些经历，他会说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丹麦语和一点点阿拉伯语！他是一位住在硅谷的真正的欧洲人。在微软时，他就已经转向应用研究了。

在小组成立的早期，FAIR和AML在某些领域（例如图像识别）的合作非常有成效，但在诸如语音识别的其他应用中，两者的合作一直不稳定。一方面，产品小组对AML开发的机器学习工具的需求量巨大，导致工程师很少有时间进行长期工作。另一方面，AML急需聘请专门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工程师，但由于各个公司都在激烈争抢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工程师短缺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几年之后，FAIR和AML之间的合作才变得卓有成效。

科学研究的突破只有迅速转化为产品，对公司才有价值。技

术管理人员必须学会平衡研发潜在的影响，承担在项目过程中资源投入的风险。而对队伍庞大的工程师而言，他们必须相信自己有可能将这一突破转化为技术创新，并开发出产品，开展应用。但有时我们会被外部质疑。随着研发的深入，走得越远，花费的资金和资源越巨大，失败的代价也就越大。技术部门的管理者在其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科技巨头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管理者本身就是工程师！这与施乐和AT&T等公司的老派作风相去甚远，尽管这些公司的实验室发明了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技术，但是它们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因此时常将技术产品商业化的机会拱手让人。

2018年，脸书成立了涵盖所有研究和开发工作的Facebook AI，它负责监督FAIR、AML和其他一些部门。此时的AML已经更名为FAIAR（脸书的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院）。“Facebook AI”由另一名法国人热罗姆·佩森蒂（Jérôme Pesenti）领导，在此之前，他将自己的创业公司卖给了IBM，然后一直在IBM任职。

由于这个共同管理机制，FAIR和FAIAR之间的合作得到了极大改善，FAIR在图像识别或翻译方面的一项创新，可以在几周之内出现在数十亿人的屏幕上。但是这一过程通常来讲还是比较漫长的，毕竟FAIR大部分研究都是长期的。

2013年，平台还未使用深度学习，但是在201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没有它，脸书将无法运行。FAIR开发的方法为这个社交网络带来了无数改进：图像识别；语言理解；语音识别，这在2013年还不受重视；开发能够为人们提供日常帮助的虚拟智能体，支持这项应用的技术尚不存在，但脸书对人脸识别领域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个人的数据量很少，但我们有超过20亿个不同的类别！脸书仅用几张照片，就能搭建一个面部模

型！

如今，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翻译多种语言之间的对话，每天分析数十亿张图片，以帮助用户安排新闻提要，还能为视障者提供描述性文本。数十亿用户的个人资料会根据他们的点击量等不断更新。

除了FAIR，其他团队也在开发、维护并确保这些应用程序为20亿用户提供正常运行的服务。这是一个庞大的基础程序。

我现在仍然会定期会见马克·扎克伯格，只是比一开始时次数要少了。在公司中负责人工智能的人员很少，我们每年和马克聚会4次，讨论项目的进展情况。不过，当马克想了解FAIR的最新进展的时候，我会非正式地与他见一次。

4

用技术实现信息过滤

自公司成立以来，脸书就对用户之间的交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则：禁止色情内容，禁止仇恨言论，总之内容不能太长……除了这些禁令，脸书长期以来坚持美国的言论自由理念，并将其视为优先原则，不愿对讨论的内容进行过多的限定。除非违法，否则人们可以自由发言。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法律极其严格，某些主题是禁止讨论的，例如，质疑危害人类罪的真实性的就是非法的。

自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新总统的产生，脸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它认识到了过滤内容的重要性，并决心防止有人通过煽动点击率赚钱或制造分裂，以这种手段利用平台获取商业或政治利益。无论是销售“蛇油”（指代骗人的“万能药”）还是发布令人震惊到不禁去阅读和分享的新闻（有时是虚假的），都是所谓的点击诱饵，即“点击陷阱”。

今天，我们尝试利用技术自动过滤此类内容。脸书并不会开源过滤色情内容或暴力图像使用的视觉系统，因为如果那样做，心怀恶意的人很可能会更加容易地绕过它。

就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2019年3月15日，一名白人至上的反伊斯兰主义者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个清真寺内开枪杀死了51人。他在头盔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以便在“脸书Live”^[1]上实时直播这场大屠杀。直播持续了17分钟，这是网络收到警报并封禁射击者的脸书和Instagram（照片墙）账户所用的时间。随后，

脸书删除了150万份该惨剧的视频记录。这次自动检测的严重失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政府领导人与主要社交媒体一道发起“基督城呼吁”，要求加强对互联网上不良图像的管控，并加大对发布图像者的处罚。

实际上，就当今的技术而言，检测此类内容极为困难。一方面，许多“暴力”视频都是合法的，比如好莱坞电影的片段、视频游戏的画面，甚至是打靶视频。我们如何将这些图像与真实屠杀区分开呢？另一方面，回想一下，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示例来训练一个模型，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很少的屠杀视频——这当然是幸运的事——该如何训练检测系统呢？即便如此，脸书、YouTube视频和其他服务提供商的工程师也在努力提高这些系统的可靠性。

得益于人工智能的自动检测，有许多不良内容在被传播之前就被脸书删除了。对已知的宣传恐怖主义的视频或图像的检测使用了类似嵌入的方法，它们一经发布即被标记，并被添加到黑名单中，然后就会被取缔（参加第七章有关“嵌入”的内容）。第一个被训练的卷积网络用于生成一个表示图像或视频的向量，第二个系统仅检测该视频与黑名单中视频的相似性（参见第七章有关“相似度测量”的内容）。

但还是有许多散播仇恨的内容避开了过滤器。人工智能无法区分表面意思和隐藏的意思，也无法理解暗喻。例如，如果一个新纳粹组织发布了种族主义信息，系统可以检测到并且限制其传播。但想象一下，如果它被分发给监督新纳粹活动的人，后者可能会转发该信息，以记录新纳粹的宣传。分类系统无法将后面的“反”新纳粹的帖子与前面的新纳粹的帖子进行区分。虽然用途不同，但文本内容是相同的。如果存在暗讽或批评，系统也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

2018年，有人在法国上传了一张古斯塔夫·库尔贝特（Gustave Courbet）的著名画作《人世之源》的图片。如果不知道该作品，那么完全可以将其归类为色情内容，因为图像的内容十分露骨。在这种情况下，图像自动识别系统无法识别出这是艺术作品且让其通过，尽管现在已经有工具可以处理此类异常，但仍然存在判断的困难。

我记得挪威一家报纸的主编曾在脸上张贴了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一个大约12岁的越南裸体女孩，正沿着一条道路奔跑，以逃避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所有国家，裸体儿童照都是违法的，因为它被认为是恋童癖。因此，一位不认识该照片的主持人（是真人！）举报了这位主编，照片随即被删除。这引起了公愤。那位主编给马克·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脸书后来恢复了照片。由此，脸书引入了一个保护严肃艺术和媒体的例外清单。

我们还能想起很多悲惨的事情。在缅甸，罗兴亚人中的伊斯兰教徒与人数占多数的佛教徒关系十分紧张。许多佛教领袖都会发布一些虚假新闻，例如有人发过一张照片以此暗示一个佛教徒家庭的一个小女孩被一名伊斯兰教徒杀害了。这位领袖有很多追随者，他在自己的帖子下写道：“你们知道该怎么做。”鉴于当今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还没有系统能够识别正在传输的信息是否为假新闻，也无法察觉暗含的报仇的呼吁。这种未知信息（“infox”）不论在哪个平台被散播都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引发种族冲突，尤其是在政府牵涉其中的情况下……

到这里，我们就触及了现有技术的极限。每天上传到脸书的帖子、图像和视频的数量高达数十亿，人工处理这些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仍需不断地改进人工智能的信息过滤功能，而脸书也正在加大在这一领域的投入。

目前脸书的信息识别和分拣可以分为三个级别。

-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检测系统。我们正在不断地改进它们，但是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它们并不能完美地处理数据。
- 用户。他们可以举报可疑内容。这很有效，但常常是滞后的，因为内容已经在传播了，而且这种举报有时会带有偏见。
- 检查员。脸书目前在全球拥有约3万名检查员，主要由合作伙伴公司聘用。他们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负责对系统进行干预以确定自动系统检测的内容或用户举报的内容是否违反了现行规则。检查员的工作很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审查暴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工作任务。

困难与失败，是公共服务事业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情况。脸书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家人联系在一起，让许多小型企业与客户建立联系进而蓬勃发展，把关心某项事业的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它发出了对团结的号召，它既是一个意识的觉醒者，也是一个自爱的共振体。

[1] 脸书Live是一项服务，它使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智能手机变成电视台并进行现场直播。

5

技术、平台与媒体

脸书的丑闻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点：脸书不会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出售给广告商。2019年1月25日，马克·扎克伯格在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论坛上描述脸书的商业模式时回应了这一点。^[1]脸书向用户推送广告，但没有向广告商泄漏有关用户的信息。

我们愿意相信，允许人与人之间交流只会有益无害。当这个概念初次被提出时，我们能否预见并防止这一全球性的交流平台被滥用？

脸书在2018年经历的事件使其形象受到了极大损害。即便FAIR实验室没有参与此事，即便这个事情与人工智能毫无关系，我觉得也有必要谈一谈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该事件。2018年3月，《纽约时报》和《卫报》披露，美国的一家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这家公司是由著名的保守派商人鲍勃·默瑟（Bob Mercer）和当时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很亲近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于2013年合作创建的。

鲍勃·默瑟以前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曾在IBM从事语音识别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和一些同事受聘于一家对冲基金

公司——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这是由一些使用计算机和数学方法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组成的金融公司。他们已经非常富有。除了自由主义者鲍伯·默瑟，其他人都是左翼分子。

媒体写道，剑桥分析公司获取并使用了数百万脸书用户的数据，以确定谁可以在2016年转而支持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以及谁会在事关英国未来的投票中支持英国脱欧。

该事件在美国和英国的日报上刊登三个月后，脸书副总裁兼法律总监保罗·格雷瓦尔（Paul Grewal）指责摩尔多瓦裔美国人、剑桥大学心理学研究员亚历山大·科甘（Aleksandr Kogan）向剑桥分析公司提供了他在工作中收集的数据。有7万个用户为了获得4美元的奖金，下载了他的调查问卷“这是你的数据生活”（“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并回答了有关他们使用互联网习惯的问题。这个问卷调用了一个有着温和名字的接口：Graph API v 1.0。通过这些互联网用户的朋友，科甘访问了数百万用户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他们自己填写的个人信息以及 与朋友分享的信息，包括居住城市、出生日期、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朋友等。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2016年之前，脸书建立了一个开放平台，允许软件开发人员使用这个著名的Graph API v 1.0接口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是一款与他人一起玩的游戏，也可以是共享日历。合同明确禁止软件开发人员收集和散播用户私人数据。但是脸书很快意识到可能存在滥用的行为，因为要使软件能够运行，开发人员必须有访问某些资料数据的权限。而为了正常工作，必须允许应用程序（例如共享日历）访问自己的个人资料，同时也

必须授权它访问你朋友的个人资料，即便你的朋友没有明确地允许它通过你的应用程序访问。为应对这种滥用，脸书完全关闭了该平台，这也导致许多给它进行投资的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很多人因此感到遗憾和恼火。

因此，从2016年起，也就是至少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的两年之前，脸书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丑闻曝光后，亚历山大·科甘解释说 he 是一名学者，仅仅是将数据用于社会学研究。但是他的行为看起来确实违反了合同，因为他在使用这些数据后将结果转移给了剑桥分析公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脸书决定关闭该平台的访问之前。

以其关怀的经营理念之名，我们可以指责脸书的管理层过分自信了，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网络会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无论如何，脸书的信誉都受到了冲击。

新闻源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脸书改变了新闻流的算法。因为在2006年被创建时，脸书使用的是基于一些比较简单的算法建立的用于计算向用户展示内容的系统，然后改用了传统的机器学习（没有涉及深度学习）。自2015年以来，它使用了更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搭建了更智能化的系统：对用户的兴趣进行建模。这个系统是经过训练的，并且随着我们的点击而不断演化、不断适应。

这些系统尝试对服务质量的各种度量进行优化，与机器学习中的最小化目标函数一样，我们视情况力求最小化或最大化这些度量。我们首先对系统稍加修改，只针对一部分用户部署修改后

的版本，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测量结果有所改善，我们便会针对更大范围的用户进行部署。

例如，要衡量用户点击一个广告的次数，这个问题在上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尝试降低显示的广告数量与点击次数的比值。当然，点击次数决定了公司的收入，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显示的广告数量越多，平台能够吸引的用户就越少，因为用户不是为广告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的折中方案：显示最少的，却是用户最感兴趣的、个性化的广告。为此，必须了解用户之前点击过什么内容，然后再向他们推送类似的内容，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内容理解和机器学习。

“参与度”是旧的衡量标准，它反映了人们在新闻源上花费的时间、点击的次数、阅读的文章数量、发布的帖子数量等。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在脸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却对得到的内容并不满意。

自2018年1月开始，脸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评价标准。如今，度量参与度的方法是基于用户与对该用户有意义的重要内容的互动性而制定的，它确定哪些内容能够给用户带来持久的满足感。脸书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致力于了解用户的行为。虽然某些内容触发了用户的点击，但对用户而言，这些并不一定是最令人满意的内容，用户随后会将此次点击视为浪费时间。自2018年以来，脸书的指导原则一直是最大化地提高用户满意度，也就是增加可以促进用户主动参与的内容，减少被动浏览的内容。

为优化系统做各项标准配比的工作并不是由FAIR负责的，而是产品和工程部门制定的，也是由他们保证这些基础结构的正常运行。但他们所使用的图像识别、文本理解等系统，都是在FAIR开发后由应用研究和开发小组设计出来的。脸书的科技火

箭有几层楼呢！

脸书和媒体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广告预算投向线上服务，特别是谷歌和脸书，这使得纸质报纸这样的传统广告媒体日益亏损。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将大量读者时不时地吸引到传统媒体上。2018年，新闻源算法发生了改变，它将朋友推荐内容的优先级调整到高于媒体直接发布的内容。新闻文章包含了一个被称为信任指数（trust index）的指标，用于评估内容的可信度。所有这些都使用户分享的可靠媒体的内容的数量发生增长，而以吸引注意力和点击量为唯一目的内容（用户点击却不分享的内容）有所减少。新算法改变了帖子参与度（对新闻机构发布的文章的反应）和Webshares（文件共享软件，对朋友推荐的文章的反应）之间的关系。网络分享的比例猛增，更多严肃的文章出现在新闻源上，而它们正是朋友间推荐的目标。因此，算法的调整促进了高质量传统媒体的发展，打压了吹嘘者的生存空间。[\[2\]](#)总的来说，脸书在媒体行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脸书

近几年，在经历了种种对可疑内容或松懈或过度审查的指控后，脸书呼吁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就这个问题出台新法规。作为私营企业，脸书觉得由它决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是不合法的。因此，在2018年年底，脸书开始思考与法国政府就关于仇恨内容的处理问题展开合作。2019年5月10日，马克·扎克

伯格在爱丽舍宫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会面，并对合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3]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这些政策应完全以民主的方式制定，而不是依赖于一家私营企业。

但是监管只是一个前提性的框架，该如何将它们付诸实践呢？如何决定是保留还是删除一条信息？为此，脸书举办了一次由来自88个国家的2000多人参加的大型公众咨询会，以确定最佳的行动方案。[4]咨询会的结果表明，人们最想要的是一个独立于脸书和政府的，能够保证内容政策有效的监督委员会，它的工作要基于普遍人权的原则，并在言论、安全、隐私和平等之间维持平衡。除了其他事项，该委员会还应建立申诉机制。

这是脸书的一次蜕变。新脸书的产生标志着一种理念的改变：它更侧重于保护用户的私人数据。2019年3月6日，马克·扎克伯格在一个论坛上宣布了该理念。[5]脸书在未来将通过端到端的加密数据专注于保护私人通信和朋友间的聊天。

[1] Mark Zuckerberg, Je souhaite clarifier la manière dont Facebook fonctionne, *Le Monde*, 25 janvier 2019.

[2] Steve El-Sharawy, Facebook algorithm: How the shift in engagement can favour news rooms, *Global Editors Network Newsletter*, 5 février 2019.

[3] Luca Mediavilla, Mark Zuckerberg à l'Élysée vendredi pour rencontrer Emmanuel Macron, *Les Échos*, 7 mai 2019.

[4] Brent Harris, Bilan du débat global et commentaires à propos du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sur les politiques de contenu de Facebook et leur application, *Newsroom*, 27 juin 2019.

[5] Mark Zuckerberg, A privacy-focused vision for social networking, *Facebook*, 6 March 2019.

6

对带标签数据的渴求

机器学习需要大量带标签的数据，这个条件是强制性的。在FAIR，我们正在研究更简单的训练系统的方法，例如研究如何使用大量无须事先手动标记的数据进行训练。方法如下：我们获取了35亿张来自Instagram的图片，并训练了一个足够大的神经网络来预测人们在上传一张照片时可能会输入的标签。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含有17000个经常被输入的信息性标签的列表，然后用一个受过训练的卷积网络预测这17000个标签中的哪些可能成为某个特定图像的标签选择。

你可能会认为预测主题标签没什么用，这么想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一个前提，这个操作可以使神经网络生成一个图像的通用表示形式。这17000个标签几乎覆盖了图像中可能包含的所有概念空间。网络训练完成后，我们将最后一层（产生主题标签的那一层）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训练过的执行我们所感兴趣的任务的另外一层，例如，能够检测暴力或色情图片以对其进行过滤的层。

这种预训练或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ning）的效果比针对特定任务训练机器的效果更好。它在诸如ImageNet这样的数据库上创造了精确的纪录。

近年来，FAIR开发的另一项技术Mask R-CNN（参见第六章相关内容）取得了很大进步。它不仅可以识别物体或人物，还可以定位它们并绘制其轮廓。它可以画出查尔斯表弟、克洛艾阿

姨、朱利安手中的棒球棒、门前的狗、桌上的酒杯和葡萄酒瓶以及田野上的许多绵羊等。举个例子，一个盲人用手指滑动手机上照片，手机会大声地向他描述他手指点到的是什么。网络的压缩效果非常好，某些版本可以在最新款的手机上以每秒20张左右图像的速度实时运行。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名为Detectron的开源软件中，这使得行业内的研究人员可以不断对其进行改进。

7

图灵奖与我的新身份

2019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从少年时期最开始接触计算机一直到现在所走过的历程：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获得了图灵奖。这个奖项是由美国计算机协会颁发的，相当于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我与两个同伴约书亚·本吉奥和杰弗里·辛顿分享了这个奖项。

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具有工业影响力并已发表学术论文的科学或技术工作。以我个人为例，我是因为以前的工作成果获奖的，最近5年的工作没有被纳入评估。

这个荣誉与我在脸书的职业转折点同时发生。2018年1月，我离开了FAIR负责人的职位，成为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也就是说，我放弃了运营管理岗位，重返科研和技术策略岗位。我做这个决定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FAIR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有必要成立一个与其并行的专门负责应用研究的独立实体，负责在研究中开发的新技术与新技术在产品中的应用之间的转换。

这个新实体已与FAIR联合，共处同一个屋檐下，能够确保双方做出最佳的互动。

我更适合做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梦想家，而不是一个管理者。建立一个项目，使其按计划进行，这很好！但处理这之后的所有事情，并不符合我的性情，我希望能够把这部分职责移交出去。

目前，FAIR的运营管理由两个人负责，一位是FAIR巴黎分

部的前负责人安托万·博尔德（Antoine Bordes），另一位是FAIR蒙特利尔分部的前负责人、麦吉尔大学教授的乔艾尔·皮诺（Joëlle Pineau）。“Facebook AI”掌管着FAIR和应用研究小组FAIAR，其总负责人是热罗姆·佩森蒂（Jérôme Pesenti）。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我与热罗姆一起负责科学指导和战略制定。

第九章

前景与挑战

如今，即便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存在局限性，它们还不如一只猫聪明。猫的大脑有大约7.6亿个神经元和1万亿个突触，而狗的神经元数量比猫多，有22亿个，更不用说设计和制造接近人类大脑量级的、具有860亿个神经元但功耗仅为25瓦的机器。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虽然我们了解了大脑学习的原理，知道了大脑的结构，但重现其功能所需的计算量是无比巨大的，大约是每秒 1.5×10^{18} 量级的操作。现在一块GPU每秒可执行 10^{13} 次计算，功耗约为250瓦。为了达到人脑的计算能力，必须将10万个这样的处理器连接上功耗至少25兆瓦的巨型计算机才能实现。这巨大的能量消耗是人脑能耗的100万倍。谷歌和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总共可以使用全部计算能力加在一起才能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很难让数千个处理器一起启动，同时完成一项任务。

科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技术也是如此。

我们孜孜不倦地努力拓宽当前系统的边界，那么最诱人的前景在哪里呢？我们又可以从未来的研究中期待什么呢？

1

探究智能和学习的基础

在法国，所有人都听说过法国航空先驱克莱芒·阿代尔的名字，去过巴黎工业艺术博物馆的参观者都十分欣赏他的3号飞机（Avion III）的复制品。克莱芒·阿代尔生活在19世纪末，这位天才工匠于1890年自行建造了一架能从地面上起飞到一定高度的飞机，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还早13年。只不过出了法国，就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后续成果。他的飞机的确飞了起来，可惜被证明难以控制。克莱芒·阿代尔以蝙蝠作为模型，却忘了考虑他的“复制品”的操作性和稳定性等问题。他只是简单地复制了大自然的现象，因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位航空先驱守口如瓶且生性多疑，仅仅向少数人展示了他的作品。由于缺乏足够多的目击者，历史学家甚至怀疑他成就的真实性。

这次被埋没的科学冒险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一方面，不被世人所知的实验是没有未来的。研究以交流为基础，它应该是共享的、开放的，我在贝尔实验室领悟到了这一理念，并将它带到了FAIR。另一方面，我们尝试复制生物学机制的前提是理解自然机制的本质，因为在不了解生物学原理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必然导致惨败。

我们谈论过许多关于诺贝尔奖得主休伯尔和威泽尔以及许多其他努力破译人脑神经元的科学家的话题，他们启发了第一批人

工智能研究人员。人工神经元受到脑神经元的直接启发，就像飞机的机翼受到鸟翅膀的启发一样，而卷积网络则重现了视觉皮层架构的某些方面。但是，很明显，人工智能研究的未来不能仅仅复制大自然。

我认为，我们必须探究智能和学习的基础原理，不管这些原理是以生物学的形式还是以电子的形式存在。正如空气动力学解释了飞机、鸟类、蝙蝠和昆虫的飞行原理，热力学解释了热机和生化过程中的能量转换一样，智能理论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形式的智能。

2

机器学习的局限性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最常使用的监督学习只是人类或动物学习的一种平淡的反映，它的原理是逐步调整一个架构的参数，从而接近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要这样训练一个系统来识别物体，我们需要为它提供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物体的图像。

而且这些示例必须事先进行人工识别和标记。为了生成获得训练系统所需的数据，公司需要雇用大量零工来标记图像，或将一种语言的文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个过程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国际咨询集团埃森哲就为许多使用机器学习的公司提供这种服务。学术研究则通常使用AMT（Amazon Mechanical Turk），这是亚马逊提供的一项服务，即任何人都可以登录到网站，完成标记工作并获得报酬。

当有足够的可用数据时，这种监督学习非常有效。但是它也有局限性，即它只在给定的区域有效，所以存在盲区。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拍摄了一组所谓的对立图像，以深入了解视觉错觉对人类的影响。这种表面上很容易识别的图像却能超出机器的理解范围。实验表明，即使是停车标志的一个微小变化也可能导致某些神经网络无法准确识别。人们经常会对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感到担忧，但我们可以通过遮盖路标来欺骗人类驾驶员，为什么这种变化对自动驾驶汽车来说更危险？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有一台可以区分猫和烤面包机的机器，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猫的图像，但又能够使机

器以高分产生“烤面包机”的输出。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向机器显示猫的图像，然后修改此图像的像素，并通过梯度下降法增加“烤面包机”类别的得分，降低“猫”的得分。但对人类来说，被干扰的图像仍是一只猫！

为什么网络会如此轻易地上当呢？以监督学习的方法训练出的机器可以在学习示例的范围内产生良好的输出，但学习示例的范围毕竟有限，它仅仅能够覆盖输入空间的一小部分。[\[1\]](#)在示例之外，函数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与监督网络不同，人类视觉系统不仅受过对图像进行分类的训练，而且除了完成特定任务，它还接受过捕捉视觉世界结构的训练，我们稍后会讲到。也许这正是人类视觉系统不同于受监督的神经网络之处，因此一个孩子不需要成千上万头大象来学习“大象”的概念，而是只有三头就足够了，甚至在插图中描述出图案都可以。

因此，监督学习不能构建真正的智能机器，它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构建智能机器比喻成拼图，那么现在这块拼图上还缺少很多零件。

[\[1\]](#) 对于 1000×1000 像素的黑白图像，如果每个像素可以采用256个值，于是会存在 $256^{10000000}$ 个可能的像素配置。那是2400万位数！那么10亿个示例的学习集当然仅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

3

强化学习的局限性

有些人看到了另一种机器学习的解决方案。

强化学习可以在对机器进行训练时，无须给出预期答案，而只需告诉它产生的结果是否正确。当我们无法为系统提供正确答案，只能够评估系统答案的质量时，强化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假设要训练一个拾取物体的机器人，我们无法每时每刻都告知机器该如何激活引擎来完成任务，但是我们能够在机器做出尝试之后很轻易地评估物体是否已被拾取。机器人会尝试一种策略，观察它是否有效，如果不成功，则尝试下一种策略，并重复该过程，直到找到一种可靠的策略为止。可靠的策略可以通过一个神经网络来实现，其输入是场景的图像、机器人的位置、感受到的力和触摸传感器的图像，其输出是发送到引擎的命令。这种不给机器提供正确答案，而是通过反复实验并对结果进行评估的学习被称为“强化学习”。

通常来说，不管测试是成功还是失败，系统都可以自发完成，从而使系统学会“自学”。

评估场景正确与否成了对机器的一种“奖励”或“惩罚”，就像我们奖励一只被训练绕圈圈的动物一样。对机器而言，“奖励”或“惩罚”只是一个数字。如果答案正确，则为正数，否则为负数。但是，机器不知道输出朝哪个方向做出改变才能获得更好的奖励（我们无法计算此评估函数的梯度，只能观察其数值），因此它会进行尝试，然后，观察其尝试对奖励产生的影响，并通

过调整神经网络的参数来改变行为，最终使奖励最大化。

强化学习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训练系统且无须提供正确答案便可评估其性能，主要适用于系统必须采取行动的情况，例如控制机器人或玩游戏。我们已经通过DeepMind的AlphaGo、AlphaZero和脸书的Elf OpenGo看到了强化学习在竞技领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不幸的是，这种学习范式在最常见的形式下，即便是执行简单的任务，也需要大量的交互（尝试和错误）才能进行学习。

如果要训练一个下国际象棋或跳棋的机器，传统的方法是利用树搜索（参见图7—9）检索棋盘，较为新颖的方法是使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我们编写一个程序，它会使机器按照规则玩游戏，程序中带有一个确认哪些最有可能引向胜利的学习系统。最初，该系统未经训练，只是毫无目的地游戏，我们让它与自己的副本进行成千上万次的对决。在每局游戏结束时，一个“玩家”（可能是偶然地）获胜，训练它的深度学习系统就会重复或加强使用胜利的策略。它会向机器强调：“下一次比赛时，当你处于这种情况下时，请仍然使用这个策略，因为它会把你引向胜利。”

就这样，该机器与自己进行了数百万次，甚至数十亿次游戏对决。有了足够多新型计算机并行运行的支撑，系统可在数小时内进行几百万次游戏。它之所以能获得超凡的表现，是因为它见过绝大部分棋局。谷歌DeepMind最新版的AlphaGo和AlphaGo Zero采用的就是这种运行方式。在脸书，我们有一个类似的系统Elf OpenGo，与DeepMind不同，它是开源的，已被许多研究小组使用。

强化学习对游戏非常有效，因为我们可以同时许多台计算

机上运行它。

与监督学习一样，这种学习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互动才能实现超凡的表现。DeepMind训练了一个可以玩雅达利（Atari）经典游戏（共有80个游戏）的系统，每个游戏至少要花费80个小时来训练，才能勉强达到合格水平，而一个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让系统运行更长的时间，它将达到人类无法企及的超高效率。实际上，这80个小时是机器实时玩游戏时所花费的时间，而且它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进行游戏，甚至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游戏。但这仅适用于游戏，因为训练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我们并不能让时钟转得更快。

4

有待开发的学习新范式

游戏的世界就是这样！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最纯粹的强化学习根本不适用。想象一下，如果要用它来训练自动驾驶，那么前提是它必须驾驶了数百万个小时，引起成千上万次撞车事故，而后才能学会避免撞车（参见第七章“自动驾驶汽车”相关内容）。如果汽车掉下悬崖，系统一定会说：“哦，我一定是错了。”这只会稍微纠正其策略。第二次，汽车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掉下悬崖，然后系统会再次稍微纠正其策略，如此循环往复。在系统彻底弄清楚如何避免跌落悬崖之前，汽车必须像这样重复跌落数千次。

那么，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大多数人能够在20多个小时练习和很少的监督下学会驾驶，而又不会造成事故（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仅有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是不够的，可以让机器等同于人类或动物的学习新范式还有待开发。

当然，我们可以模拟。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模拟器必须足够强大且精确，也就是说，必须足够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发生的情景，这样我们才能在系统通过模拟训练之后，将其能力转移到现实世界。这并非总能实现。模拟真实世界问题的sim2rel (simulation to real world) 是目前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科学界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强化学习的方法将是设计出人类

级别的人工智能的关键。AlphaGo之父、DeepMind公司的一位大人物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常说：“强化学习是智能的本质。”对于这种信念，我们中的一些人扮演了卡桑德拉^[1]的角色。我提到过“黑森林”，它是由一层层交替的海绵蛋糕和奶油制成的巧克力蛋糕，非常好看。它的表面撒有糖霜，通常最上面会放有蜜饯樱桃。我经常在演讲中用它做比喻：如果智能是一块黑森林蛋糕，海绵蛋糕的部分代表自监督学习——这是动物和人类学习的主要方式，那么糖霜的部分就相当于监督学习，而锦上添花的蜜饯樱桃则相当于强化学习。

^[1] 卡桑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她拥有预言能力，但预言却不被人相信。——译者注

5

有限的预测能力

如今的人工智能有一个悖论：它功能极其强大、极其专业化，却没有一点常识。“人工智能没有任何概念、文化，它什么都不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18年3月29日这样说道。那天他介绍了菲尔兹奖得主、法国共和国前进党议员、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的人工智能报告。^[1]

人工智能目前对世界只有一个肤浅的理解。自动驾驶汽车可以从点A行驶到点B，但是并不知道什么是驾驶员。

一个翻译系统有时可能会产生一些滑稽的错误而不自知；虚拟助手只能在接受训练的范围内工作：它们能报告交通信息，能调到点播的广播电台，能立即找到你要查找的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的歌曲。但是，如果你问它：“Alexa，我的衣服装不进手提箱该怎么办？”她就不知道可能回答“少带衣服”“买更大的手提箱。这些是亚马逊上可以买到的大皮箱”……如果你告诉它，“Alexa，我的手机掉进了浴缸。”它不会知道你的手机湿了，需要更换。如果想要更有效地回答问题，Alexa必须具备一些常识，即一些有关世界运作方式及其物理规律的知识。

目前的人工智能没有常识，但常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它能填补空白，弥补隐含的信息。当我们看到一个坐在桌子旁的人时，可能看不到他的腿，但我们知道他肯定有腿，因为我们对人类有一定的常识。我们的大脑还整合了物理学

的基本定律，比如，如果有人打翻了眼前的玻璃杯，那么杯子里的水就会洒得满桌子都是。我们知道如果不拿住某个东西，它就会掉下去。我们还能够意识到时间流逝、万物运动。当一个人站起来时，我们知道他不再坐着，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

当听到“皮埃尔，拿上挎包走出会议室”这句话时，我们能马上想到很多基本信息：皮埃尔应该是个男人，他可能在上班，他的挎包里肯定有文件；皮埃尔是用手而不是用脚拿起包；他用手抓起包，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应该是坐着的，也许正在开会），然后他快步走向而不是飞向大门；他握住门把手，转动把手并跨过门槛。

同时，我们也会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皮埃尔不能通过心理运动吸起他的挎包，他不能原地消失，然后在房间外出现，他无法穿越墙壁（除非是穿墙人杜蒂耶^[2]），等等。

我们在生命的头几个月和几年中逐渐了解世界的模型——我有意使用了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同的词汇，这使我们可以将某个普通的句子补充完整。这个句子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整个句子的所有信息，但我们还是能够将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的运行规律。同样，当我们阅读一个文本时，可以或多或少预测到下一个句子；当我们观看一个视频时，能够或多或少预测到接下来一连串的动作和反应。

目前，机器的预测能力十分有限。当然，如果给定一个有些删减的文本，机器有能力给出一个可能的后续单词列表。但是，如果这段文字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小说，在最后一幕埃居尔·普瓦罗（Hercule Poirot）宣布“凶手是……先生”时，那么为了完成这个句子需要读者有很强的常识和对人性

的了解。很显然，没有哪一台机器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常识的特征之一就是这种推断能力，它让我们能够自我定位并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另一种学习形式的结果，我称为“自监督学习”。

[1] Cédric Villani, *Donner un sen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our une stratégie européenne*, mars 2018, <https://www.ladocumentationfrancaise.fr/var/storage/rapports-publics/184000159.pdf>.

[2] 杜蒂耶是《穿墙记》（*Le Passe-Muraille*）的主人公。《穿墙记》是法国小说家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在194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和音乐剧。——译者注

6

人是如何学习的

目前，人类的学习比任何一种机器学习方法都更加有效，并且有效性高出太多。

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认知科学教授、FAIR巴黎分部兼职研究员埃马纽埃尔·迪普（Emmanuel Dupoux）为代表的一些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学习很早就开始了。[\[1\]](#)从新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婴儿就会习得有关世界运作方式的大量知识。从第二个月起，他们就能够区分有生命物体和无生命物体，并且很早就了解到这些物体不会突然出现，即使它们被另一个物体掩盖住了也是始终存在的。这种概念会永久地存在于他们的大脑里。这些属性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其实都是我们在生命的前几个月就习得的。一般在6~8个月，婴儿就能获得比较直观的物理概念；9个月后，他们就已经习惯了重力和惯性定律。当遇到违反这些普遍规律的事情时，他们的眼睛会睁大，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那副惊奇的表情。

婴儿通过观察和实验习得了这些基本概念，甚至在不知道如何走路之前，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大学者一样。在8个月的时候，如果我们让孩子坐在高脚椅上，把玩具放在他面前，他会拿起玩具并扔掉它们，当玩具掉落时他的眼睛会一直盯着，当你好心为他捡起后，他会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不要批评他，他正在学习重力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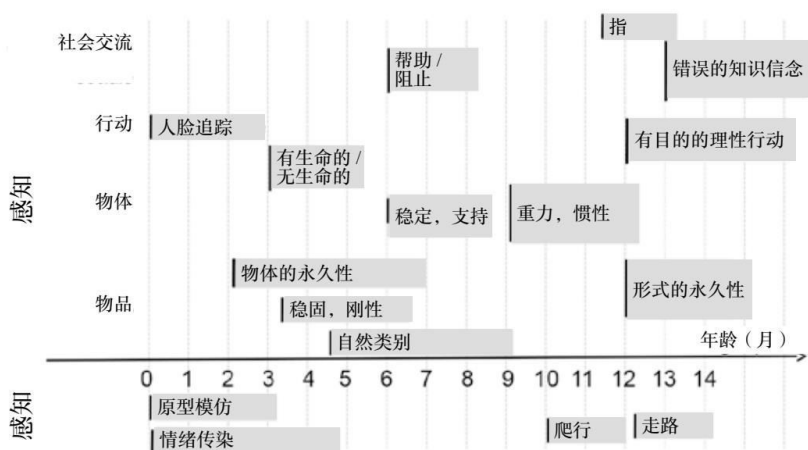


图9—1 埃马纽埃尔·迪普关于感知、运动和社会的发展阶段

婴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学习了大量有关世界运作方式的基础知识。这种学习主要是通过观察来完成的：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婴儿受周围的物理世界影响很小。大约9个月后，婴儿意识到无支撑的物体会因重力而坠落。根据埃马纽埃尔·迪普的说法，在此之前，飘浮在空中的物体不会使它们感到惊讶。

同时，他还训练了一种预测能力，这对完善一个人的感知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我们会知道：即使我看不见，那个坐着的人也有两条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对于预测我们行动的后果很有用，使我们可以制订计划。例如，如果我们推轻物体，物体将移动，而随着物体质量的增加，需要的推力也会增加。

我们能在脑海中设想数千种情形及结果，我们还掌握着上千种人类行为的预测模型，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智能，使我们能够想象周围人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何种反应，或更笼统地说，我们的行为可能对世界造成什么后果。

人与动物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组合方法来学习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试图让机器也按照这种方法来学习。我们假设人与动物通

过自我学习获得了大部分知识，观察一定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添加一小部分监督学习（或模仿学习），以及一小部分强化学习。学习走路、骑自行车或开车就结合了这三种学习方式。当学习在右侧是山沟环绕的道路上驾驶时，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型中知道：如果将方向盘向右转，汽车将开进山沟。我们也能运用关于重力的知识预测：汽车将跌至山谷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尝试就能想到这些后果。这正是机器目前缺少的模型，也因此使得它们的强化学习极其无效。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尝试训练机器进行预测模型的学习，并使用这些模型来减少训练过程中的实验次数和错误。我们虽然在谈论“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但这种方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人脑中，额叶专用于获取这些知识，在我看来，这就是智力的本质。动物学习的方法与人类学习的方法大致相同。有些人或动物的天赋比其他同类更高，比如在鸟类中，乌鸦就特别有天赋。在海洋动物中，章鱼非常聪明，可惜大自然似乎对它们并不友善：它们的生命只有几年，并且不是由母亲抚养的，因为它们的母亲在孵化它们时就死了。母亲的死亡对人类来说是一场悲剧，但似乎从未影响头足类动物，它们已经在海底平静地生活了数亿年。

再来说说猫吧，它们没有人类的推理能力，但依然比最聪明的机器拥有更多的常识。老鼠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制造出像老鼠或松鼠一样聪明的机器，我就认为我的事业成功了！所有这些动物都通过观察来学习世界运转的规律，从而获得了可以增加其生存概率的预测能力。

如果我们破解了人类和大部分动物通过观察来获得关于世界的大量知识的奥秘，那么我们就可以改进人工智能系统。

[1] Emmanuel Dupoux, <http://www.fscp.net/persons/dupoux>.

7

如何训练预测系统

自监督学习的基本思想是：获取一个输入后，隐藏该输入的一部分，以此来训练机器从可见部分预测被隐藏部分。以视频预测为例，我们给机器看一个视频短片，并要求它预测短片接下来的内容。然后我们将接下来的内容作为期望输出提供给机器，让机器据此进行调整，以完善其预测能力。这看起来非常像监督学习，但不同之处在于期望输出是先前被隐藏的输入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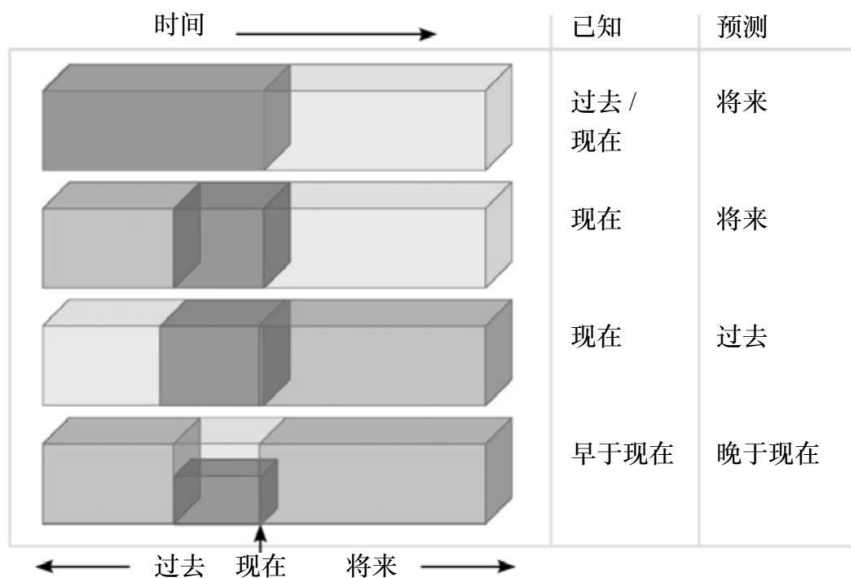


图9—2 自监督学习

自监督学习旨在获取输入（例如视频片段）后，隐藏输入的一部分，并训练一个模型以根据可见部分预测被隐藏部分的内容。为此，模型需要捕获

数据的内部结构，这样它能够填补空白。在上图的视频片段中，被观察的部分用深色显示，被隐藏（需预测）的部分用浅色显示，被忽略的部分用介于深色和浅色之间的灰色显示。根据训练的模式，我们可以训练机器根据过去和现在来预测未来，或根据现在预测过去，或其他任何组合，例如根据图像的底部来预测图像的顶部。

不过，如今的监督学习仍存在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大难题：如何表示预测中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给定的视频片段，后面的内容有若干可能，如何确保机器可以表示所有这些可能性？

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了，自监督学习非常适合用来训练机器预测文本中的单词。我们向机器展示一段文本，隐藏了其中的一些单词，并训练机器预测缺少的单词。那么该系统仅通过训练预测缺少的单词即可学习到如何表示文本的含义和结构。对于文本，在预测中表示不确定性相对容易。系统会对应每一个缺少的单词，生成一个大向量，向量的每个分量表明词典中相应的特定单词是缺失单词的概率。系统的输出是字典所有单词中每个单词出现在隐藏位置的概率分布。

然而，当输入是由连续高维信号（例如视频各帧图像）组成的时候，预测结果就会很不理想，因为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如何表示所有可能图像空间上的概率分布。

举个例子，假设我用手指将笔直立地固定在桌子上，然后要求机器预测我手指移开两秒后的情况（世界状态）。人类能够预测笔将平躺在桌子上，但是无法分辨出它朝哪个方向倒，也就是说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我们用很多重复该实验的视频片段来训练机器，那么所有视频初始的片段基本相同，但最终的片段有所不同，即笔倒下的方向不同。如果系统是一个神经网络（或其他参数化的函数），其输出就是视频的最后一帧，而每个输入只能产生一个输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预测误差，系统可以简化

为生成所有可能最终片段的平均值，即一个覆盖所有可能方向的图像。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预测结果（见图9—3）。

让我们看一个视频：有人给一个小女孩带了一个生日蛋糕，现在摆在小女孩面前的是蛋糕和点燃的蜡烛，她会做什么？如果想要机器对结果进行正确预测，它必须有一个世界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要包含大量有关人类文化风俗习惯的信息，还需要具备直观的物理学知识，这样它才能预测吹蜡烛会令蜡烛熄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不确定因素：小女孩可能从旁侧吹，可能她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很胆怯，她也可能先拍手，等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该如何训练一个预测系统呢？小女孩可能向前或向后移动头部，因此经过训练的系统可以做出的最佳预测是一个模糊的图像，对应于小女孩头部不同位置的叠加（见图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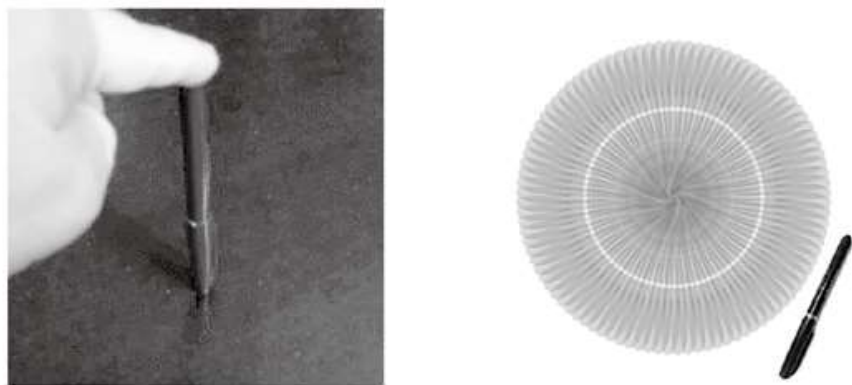


图9—3 笔倒下的方向是不可预测的

我用手将笔尖垂直地立于桌上，然后请一个观察者（人或机器）来预测我移开手指两秒后的世界状态。人将能够预测笔会平躺在桌子上，但无法确定其方向。对方向的判断存在不可估量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训练一个机器来预测视频的后续内容，它将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预测。如果我们要求它只给出一个预测值，它能做到的最好的方法是从原始片段中产生的所有可能图像的平均值。但是，该预测结果将是一张由笔倒下的所有可能方

向叠加组成的图像，如右图所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预测。

如果让我在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所有问题中指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当信息无法完全预测、连续且高维时，该如何进行自监督学习。



图9—4 视频预测

视频短片显示一个小女孩在生日蛋糕前。很难预测这个小女孩将会向前移动去吹蜡烛还是后仰鼓掌。一个训练过的以最小化预测误差的系统将转化为预测所有可能未来视频内容的平均值——一张模糊的图像。上面4张图是输入网络的4帧。下面2张图是在数千个片段上用平方误差最小化驱动训练的一个卷积网络所预测的接下来的2帧。

8

多重预测和潜在变量

自监督模型是一个参数化函数（例如神经网络） $yp = g(x, w)$ ，其中 x 是观察到的输入部分， yp 是预测值。这个形式与监督学习的表述相同，模型无法预测除了给定输入以外的任何操作。关键思想是在 f 中添加一个参数 z ，我们称之为潜在变量：

$$yp = g(x, z, w)$$

通过改变给定集合中的 z 值，输出 yp 本身也将在某个集合中变化。当 z 在给定集合中变化时，产生的所有输出的集合构成模型的预测集合，如图9—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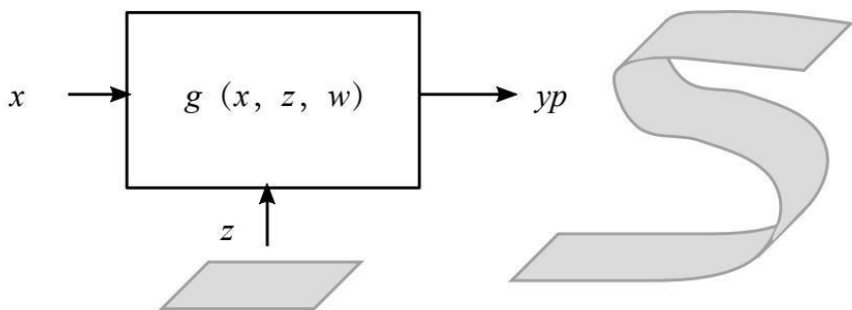


图9—5 潜在变量模型

一个潜在变量模型取决于一个潜在变量 z ，该变量的值在一个集合（由底部的灰色矩形表示）中变化时，会产生一组输出，由右侧的灰色带表示。

现在有几种方法可以训练潜在变量模型，最流行的

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生成对抗网络) 是2014年由约书亚·本吉奥的学生伊恩·古德费洛 (Ian Goodfellow) 提出的, 如图9—6所示。[1] 给定一个示例 (x , y), 我们从可能值的集合中随机取出一个 z 值, 这将产生一个预测值 y_p 。由于 z 是随机选取的, 因此预测值 y_p 等于所期待的 y 值的可能性很小。GAN 的想法是引入第二个网络, 它被称为“判别网络”, 以判断预测值 y_p 是否在合理的输出集合中。我们可以将判别网络视为一个可训练的成本函数。对判别网络进行训练是为了使与示例相关的输出 (x , y) 的成本降低, 使其他所有观察结果的成本增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判别网络认为生成器的预测结果 (x , y_p) 错误, 那么就会调整其权重, 使这些预测值的成本增高。同时, 生成器也会调整权重, 产生成本值比较低的预测值。为此, 它会获取判别网络相对于输入 (相对于生成器的输出) 的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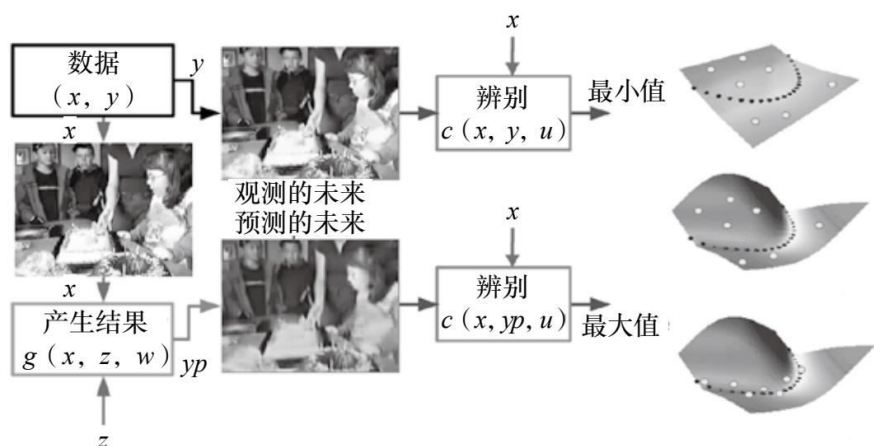


图9—6 GAN

一个GAN由两个同时训练的网络组成, 一个是生成器, 另一个是判别器。生成器获取观测值 x (例如视频短片的原始片段), 从潜在变量 z (一个向

量)中随机抽取一个值,并产生预测值 y_p 。该预测由判别网络进行评估。判别网络是一种可训练的成本函数。成本函数在三个学习瞬间的形状表示,如图右侧所示。首先,成本函数是平坦的。对于给定的 x 观察到的 y 对应着小黑点。对于观察到的 x ,判别器调整其参数 u ,使其对于观察到的 y 成本低,而对生成器预测的 y_p 成本高。成本函数在小黑点周围是凹陷的,而在生成器产生的亮点周围凸起。同时,生成器使用相对于其输入的成本梯度(通过判别器进行反向传播)来调整其参数 w ,使其预测点更接近成本的谷底(良好的预测)。训练后,我们可以随机取一个 z 值,并给出对于给定观察值 x 的一组合理的预测 y_p 。

自问世以来,GAN一直是大量论文讨论的主题。它们虽然很难操作,但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亚历克·拉德福德(Alec Radford)、卢克·梅斯(Luke Metz)和苏密思·施塔拉(Soumith Chintala)于2015年11月联合发表的文章[2]就是第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之一。后来,苏密思去了FAIR,亚历克和卢克之前在波士顿成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后来亚历克加入了OpenAI[3],卢克加入了谷歌。他们的论文表明,使用卷积(或反卷积)网络架构的GAN可以产生令人相当信服的合成图像。生成器的输入是一个100维的潜在变量(在他们的实验中,没有输入 x),输出是一个 64×64 像素的彩色图像,判别器是一个单输出的卷积网络。他们用卧室照片训练了网络,然后给网络100个随机数,网络会生成一张虚构的但很有信服力的卧室图像。这篇文章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GAN的队伍!他们实现了数据建模的一个古老梦想:参数化一个我们只能通过示例了解的高维空间中的复杂曲面。

一年后,我与我的学生迈克尔·马蒂厄(Michaël Mathieu)以及FAIR巴黎分部研究员卡米耶·库普里(Camille Couprie)一起,证明了GAN可以帮助解决视频预测中图像模糊的问题。[4]和卡米耶还有FAIR其他成员一道,我们甚至通过一位伟大设计师的设计图集训练出了服装图像。[5]图9—7给出了一些示例。

但是有关GAN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展示之一是出自英伟达（Nvidia）芬兰实验室的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该实验室的一个卷积GAN经过对名人人像数据库的训练后，能够产生质量非常高、非常逼真的人脸图像。[\[6\]](#)



图9—7 通过对抗学习生成的印花服装利

用一位伟大设计师的时装图片集训练的一个具有卷积结构的生成器。

GAN和更广泛的现代生成模型在创意辅助方面有许多应用，比如旧电影着色、图像分辨率的提高、图像处理和合成工具。有些人也将它们用于声音合成和音乐创作。

但是，这些方法也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应用，例如伪造品。有时一些粗俗的图像或视频，会把艺术圈或政治界的名人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使用GAN，我们还能变换语音：通过转换信号，可以把A的语调、重音和变调变成B的。只需录制几分钟B的声音，就可以克隆出B的声音。

由于GAN的训练是无监督的，因此有希望在有监督学习阶段

之前使用对抗的方式对系统进行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减少此过程中所需示例的数量。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尚不能提升视觉系统的性能。

此外，还没有人找到利用它们生成文本的方法。GAN更偏向于像图像一样的连续数据，而不是像文本一样的离散数据。

[1] Ian Goodfellow, Jean Pouget-Abadie, Mehdi Mirza, Bing Xu, David Warde-Farley, Sherjil Ozair, Aaron Courville, Yoshua Bengio,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4 , p. 2672–2680.

[2] Alec Radford, Luke Metz, Soumith Chintala,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 ICLR 2015 , arXiv : 1511.06434.

[3] 埃隆·马斯克和其他硅谷企业家成立的一家公司。——编者注

[4] Michael Mathieu, Camille Couprie, Yann LeCun, Deep multi-scale video prediction beyond mean square error, ICLR 2016 , arXiv : 1511.05440.

[5] Othman Sbai, Mohamed Elhoseiny, Antoine Bordes, Yann LeCun, Camille Couprie, DesIGN: Design inspiration from generative networks , ECCV Workshops, 2018, arXiv: 1804. 00921.

[6] Tero Karras, Timo Aila, Samuli Laine, Jaakko Lehtinen, Progressive Growing of GANs for Improved Quality, Stability and Variation, ICLR 2018 , <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HK99zCeAB>.

9

赋予机器预测能力

我们讨论了建立数据表示形式的自监督学习，最终目标是让机器通过观察来学习世界模型，由此机器人的训练可能会更快地完成。

如今的机器都缺乏与人类或动物类似的预测能力。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中有一个世界模型，可以让我们预测环境的演变并预见行为的后果，从而有能力计划一个动作或一系列行动。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研究致力于赋予机器这种预测能力，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们是如何预测天气的？天气预报的本质不就是预测云层的走向和气压的变化吗？的确，预测就是天气预报的DNA，就像我们不那么熟悉的机器人、航空或工业中的控制系统的DNA一样。机器人具有详细的动力学模型，可以预测机器人的动作如何影响手臂的位置和速度。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用火箭动力学方程式规划与国际空间站的对接路径。但以上这些模型都是工程师依据牛顿力学手写的，差异就在这里——它们没有经过训练。天气预报或对飞机周围气流的计算也是如此，其演化规律是由掌握流体力学的物理学家们手写的。

可是，预测一个城市的用电量、金融价值、房屋的价格、选民的选举行为，甚至预测生物体对药物的反应，这些都不属于物理学范畴，能量或动量守恒等基本原理并不适用于这些模型，上述复杂的集体现象几乎无法被简化为一些基本原理。我们必须依

靠现象学模型，根据观察到的数据来预测我们感兴趣的变量，而不能求助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化模型。房屋的价格取决于居住空间、房间数量和土地面积，但也有一些难以量化的标准，例如附近学校的质量、房屋的采光性或小区的安静程度。我们很难将所有这些都纳入方程式。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系统（神经网络或其他系统），为它提供所有必要的变量，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价格预测。但是，训练一个模型来预测与在相对简单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是两码事。比如，我们走进一个房间，这时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欢呼雀跃地朝我们走来，但他没有看到地面上的电线。他会被绊倒吗？绊倒后头会撞在茶几上，打翻茶几上的花瓶吗？这些不同的可能性都会使我们赶紧阻止孩子跌倒。但是，一个机器人如何才能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如何才能想象和阻止所有这些事情呢？

这个电子保姆可能需要通过它的相机观察到这些情况，并像我们一样预测一系列可能的发展方向，然而，从视频的一个片段中延伸出某个动作的后续是极其复杂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机器人厨师，即使它的环境有限且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任务，那它也必须有一个复杂世界的模型。就像其他人类厨师一样，它必须能够预见将牛奶倒入面粉中或将酱汁煮沸时会发生什么。它必须了解那些对我们来讲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如果它将一个大容器中的东西倒入一个小容器中，那将是一场灾难。此外，它还需要掌握足够多的直观物理知识，才能预见如果碰到玻璃杯，玻璃杯会被打翻；必须绕过或移动一个沙拉碗才能取出糖包；需要以什么样的角度才能将刀片穿入一个电动搅拌机中……

1. 输入的变量数巨大，可能数以百万计，包括来自一台或两

台摄像机的图像，以及涉及距离、触觉、力、温度、麦克风的传感器等。

2.模型根据时间 t 时所处世界（厨房）的状态和执行的动作给出时间 $t+1$ 时的世界（厨房）状态，这是极其复杂的。

3.最后，必须考虑到不可预见的部分.....

给定世界的状态（厨房或机器人所处的其他任何环境），并给定机器人的动作之后，模型必须预测出下一个时刻世界的所有可能状态。我们通常用一个函数表示：

$$s[t+1]=f([t], a[t], z[t], w)$$

其中 $s[t+1]$ 是未来状态， $s[t]$ 是当前状态， $a[t]$ 是所执行的动作， $z[t]$ 表示世界发展中一切不可预测的潜在向量。该功能可以由神经网络执行。

如何训练呢？我们从一个特定状态 $s[t]$ 开始，执行一个动作 $a[t]$ ，随机抽取一个 $z[t]$ ，观察世界模型在 $s[t+1]$ 上的结果。然后我们调整 w 、 f 的参数，使预测的结果接近观察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可能产生多种预测，这种偶然性令问题变得十分棘手。我们可以用对抗方法训练该模型，通过多次抽取 $z[t]$ 来重复此预测。

计划一个动作序列的学习模型是很多实验室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例如FAI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谷歌及其子公司DeepMind以及其他一些实验室。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相同的障碍：预测很困难，因为世界不是完全可预测的。

10

系统智能接近人类智能任重而道远

自主智能体的体系结构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的系统都是围绕着自然信号的感知和解释进行的。强化学习试图将感知和行动整合到一个单一学习范式中。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训练这些系统所需的实验和错误的次数使得它们很难应用于实践，例如机器人技术或自动驾驶。

我想，现在是时候考虑结合感知、计划和行动的自主智能体的一般体系结构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有很多，但专家就如何具体实施达成的共识很少。

自主智能体的最佳示例是通过参考人类的行为，了解机器仍然缺少什么。人类的行为有两种机制驱动，第一种机制是刺激——响应类型的反应机制，该机制主导我们完成不经过思考即可执行的动作。比如，接住别人扔过来的一个球；比如，被问“ $2 + 2 = ?$ ”，我们回答“4”；再比如，在空旷笔直的道路上驾驶汽车是不需要太多注意力的。

第二种机制是仔细思考类的，涉及我们的世界模型和计划能力。比如，必须将拖着一条船的汽车停在一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该怎么做；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乘坐火车；比如，选择购买这一件物品还是另一件物品；比如，讲一个故事、证明一个定理或编写一个程序；再比如，与银行家或与行政部门的雇员对话；

等等。

这两种思维和行动方式就是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称的“系统1”和“系统2”。^[1]系统1的某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当物体快速接近我们的面部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但大多数行为是习得的。第二种机制引发的行为涉及意识和反思性推理过程。

让我们回到机器上。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所有系统都属于系统1。应该如何架构机器，才能使其具有系统2类型，即“反思式”的行为？图9—8展示了自主智能系统的一个可能的架构。它由一个与环境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和一个目标模块（一种成本函数，衡量智能体的不满意程度）组成，智能体会通过一个感知模块观察外部环境，感知模块随后会给智能体一个有关周围世界的（通常不全面的）表示。目标模块会观察智能体的内部状态并产生一个类似于成本的输出数字。当一切进展顺利时，计算出的成本较低；出现问题时，成本就会比较高。智能体能够通过自学来极小化长期目标输出的平均值。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使机器数值化情绪，那么目标模块就会“计算”痛苦（高成本）、愉悦（低成本）和冲动（不满意时为高成本，满意时为低成本）。智能体通过对环境采取行动，学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获得最大的快乐来满足自己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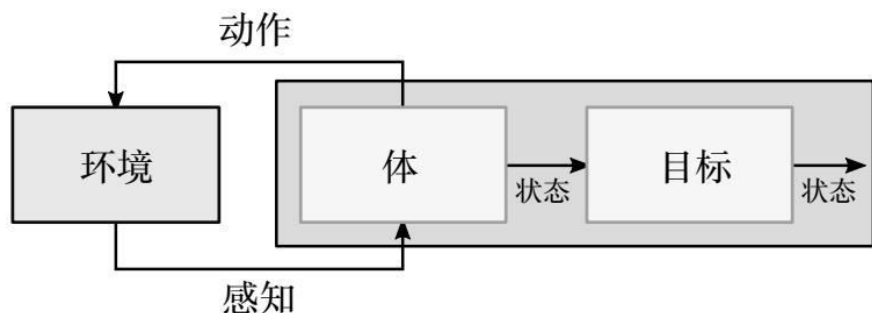


图9—8 具有内在目标的自主智能系统

该系统通过感知模块观察环境的状态。它通过对环境产生作用，以最小化其不满意程度的目标函数（一种成本函数）。该目标函数观察智能体的内部状态，如果智能体处于满意的状态，则输出一个较小值；如果智能体处于不适或疼痛状态，则输出一个较高值。该系统必须学会采取使长期目标值的平均值最小的操作。该目标为系统提供了内在动力。它可以部分“手动”构建，用动物或人类的痛苦、愉悦回路和本能的方式，以保持系统和其使用者的安全；但是它也可以是被部分训练的。

在大脑中，位于基底神经节[2]中的一系列结构起着相似的作用，它们“计算”我们的快乐、痛苦和满足感。这种体系结构是通过所谓的“内在”动机进行强化学习的基础，其中成本值是由目标模块在机器内部计算的。在更为传统的强化学习模型中，如AlphaGo使用的模型，动机是外在的；成本值不是由系统计算的，而是由环境直接提供给智能体的，是一个表示奖励或惩罚的数字。内在的目标可以计算梯度，从而知道在哪个方向改进智能体的状态可以最小化目标函数。

当人想要行动时，他首先会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状态。为了制定到达预期状态所需的一系列动作，他会使用一个世界模型，预测一个动作序列会导致的世界状态。例如，我们要将桌子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理想的世界状态是“桌子在另一个房间”。但是，哪个肌肉控制的序列（以毫秒为单位）会产生预期

的结果呢？这是一个规划问题。如果没有世界模型，人类就不得不先尝试许多行动序列，然后观察结果的状态。世界模型的存在会使他尝试各种情况，但其中某些情况可能是很危险的。要知道，在强化学习系统中没有模型，因此它必须尝试一切！

有一个在专家之间流传的笑话：环境，也就是现实世界是不能微分的。我们无法对整个世界反向传播梯度，来计算如何修改动作以便更接近所需状态；我们也不能令现实世界的运行速度快于实际所需的时间。

像人类一样，机器也必须具有世界模型才行。我强调一下，智能体必须具有一个内部结构，其中包括可以用来预测一个行为序列对世界状态及其目标影响的世界模型。具有内部模型的智能体的体系结构如图9—9所示。它有三个模块：

1. 一个感知模块，可对世界的状态进行估算。

2. 一个世界模型，即一个函数 g ，在时间 t 时根据状态 $s[t]$ 、动作 $a[t]$ 和可能随机抽取的潜在变量 $z[t]$ 来预测下一个世界的状态。如果世界是不可完全预测的，则有可能产生多种情况：

$$s[t+1] = g(s[t], a[t], z[t], w)$$

3. 一个评判体系，即成本函数 $C(s[t])$ 。这个评判体系有若干组成项，其中一些是手工构建的，而另外一些则是由神经网络训练的。后者通过相互配合来预测目标的未来平均值，这个值显示的世界状态会被导向有利或是不利的结局。坦诚地讲，一个好的世界模型必须是包含一个智能体本身的（也许是简单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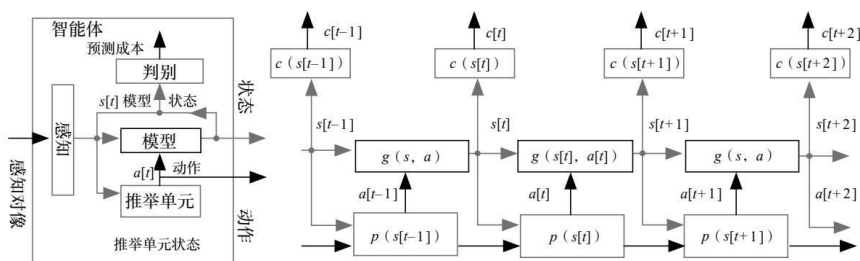


图9—9 具有预测模型的自主智能体的内部架构

为了能够智能地行动并最大限度地极小化其目标，智能体必须具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环境预测模型、一个预测目标未来平均值的评判单元和一个行动序列推举单元（actor）。在一个情景中，感知模块估计世界的状态为 $s[0]$ 。在每个时刻 t ，我们为模型提供一个动作假设 $a[t]$ ，抽取变量 $z[t]$ 的一个值，并使用如下模型预测世界接下来的状态：

$$s[t+1] = g(s[t], a[t], z[t], w)$$

评判者采用预测状态 $s[t]$ 并计算一个成本。它试图预测模型的状态将产生有利还是不利的结果。对评判单元进行训练，以预测目标模块的未来平均输出。它计算出长期平均不满意的一个预测。

为了规划一个动作，智能体会假设一系列动作，然后运行模型（右图）。它通过最小化在轨迹上计算出的平均成本来精炼假设的动作序列。由于模型和成本是可微分的函数（神经网络），因此这种改进过程可以通过梯度下降来完成。智能体执行如此优化的序列的第一个动作是观察新的世界状态，然后重复该过程。这样获得的动作可以用来训练行动顺序推举单元，以直接预测最佳动作，而无须进行任何规划或使用模型，也就是说，从理性动作转变为本能动作。

该体系结构可以用两种模式表示，这两种模式或多或少与丹尼尔·卡尼曼的“系统2”（缜密规划）和“系统1”（快速反应）相对应。

我们先来讲一讲缜密规划，最优控制的工程师将其称为“滚动时域模型预测控制”（receding horizon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一个情景从感知模块对世界状态的估计开始，将世界模型初始化。然后，该模型使用 z 的随机序列和一系列假设的动作模拟世界在一段时间内（确定的步数，即时域）的演化： $s[t+1]=g(s[t], a[t], z[t])$ ，在每个时刻，成本为 $c[t]=C(s[t])$ 。现在的问题是要精炼假设动作的序列，以最小化该序列上的平均成本，这个步骤可以通过梯度下降来完成。然后，我们必须多次抽取潜在变量 $z[t]$ ，重复该操作，目标是找到一个独立于潜在变量的能产生良好结果（低成本）的第一个行动。为了完成该情景，一旦确定了最佳行动，我们就立即实施并观察新的世界状态，然后重复上面的操作。如果模型在每次抽取潜在变量时都产生很多不同的场景，计算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昂。

第二种方法是训练actor模型，有时该模型会被称为“策略网络”。和前面的方法一样，我们将模型训练迭代一定数量的步数，然后计算平均成本。但是这一次，假设动作序列是由actor模块产生的，一个函数 p 将世界的状态作为输入并产生动作 $a[t]=p(s[t])$ 。为了训练actor网络，我们在整个情景中反向传播成本函数的梯度（如图9—9右），并调整 p 的参数以使该序列的平均成本最小。

接下来设想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要训练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当然，绝不能将未经训练的车辆放在真实的高速公路上，那样很容易出问题。首先，对模型来说，较为明智的做法是预测周围的汽车在接下来几秒内会做什么。世界状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汽车的周围环境，是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的矩形图像，其中周围的汽车和地面上的车道标识都已被表示出来。根据这个矩形过去的几帧，训练出一个卷积神经网络预测未来的几帧，它具有可以产生多种情况的潜在变量，没有它们，预测就会

很模糊。训练数据来自摄像头对某一段高速公路交通情况的观察。在训练了预测模型之后，如图9—9所示，我们通过及时的反向传播再训练一个actor网络。成本函数衡量该车与其他车辆的接近程度以及与车道中心的偏离度。我们还应该在成本函数中添加一个项来衡量模型预测的不确定性程度，以使系统保持在可靠的预测区域中。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学会了“在头脑中”行驶，而无须与现实世界进行交互。[\[3\]](#)

在简单的情形下，这种方法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困难也随之产生：首先，如何训练足以处理复杂任务和情况的世界模型？其次，如何训练潜在变量模型，以预测未来大多数可能的情况？最后，如何确保该模型是在其预测的可靠区域中使用？

我相信，除非为这些问题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不可能在系统智能接近人类智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在这个领域依旧任重而道远。

深度学习和推理：动态网络

第二个挑战：以上提到的网络能够被感知，有时甚至可以采取行动，但是，如何使它们获得推理能力并真正地变得智能化呢？

我们刚刚讲过一种特殊的推理形式：基于预测模型，通过成本函数最小化来规划动作序列。很多推理确实都可以归纳为找最小化特定函数的向量（或符号）序列，就像解决满足约束条件的优化问题一样。

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推理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来观察

一下图9—10，在回答“灰色金属圆柱体的右侧有一个有光泽的物体，它和那个大橡胶球一样大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找到球体，再找到合适的圆柱体并比较其大小。与其训练一个固定体系结构的网络来回答所有这类问题，不如训练一个网络，用来生成专门回答该问题的第二个网络。第二个网络将进行动态构建（也就是说，为每个新问题重新构建），它由5个模块组成：第一个模块用于检测图像中的球体，第二个模块用于检测金属圆柱体，第三个模块用于定位圆柱体右侧的物体，第四个模块用来确定它是否为有光泽的物体，最后一个模块是比较物体的大小。第一个网络看起来像是一个语言翻译网络，但它不是将句子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将问题“翻译”成描述第二个网络体系结构的一系列指令。所有这些都是在FAIR和斯坦福大学构造的CLEVR数据库中进行端到端训练的，该数据库包含10万张合成图像和85万个自动生成的问题与对应的答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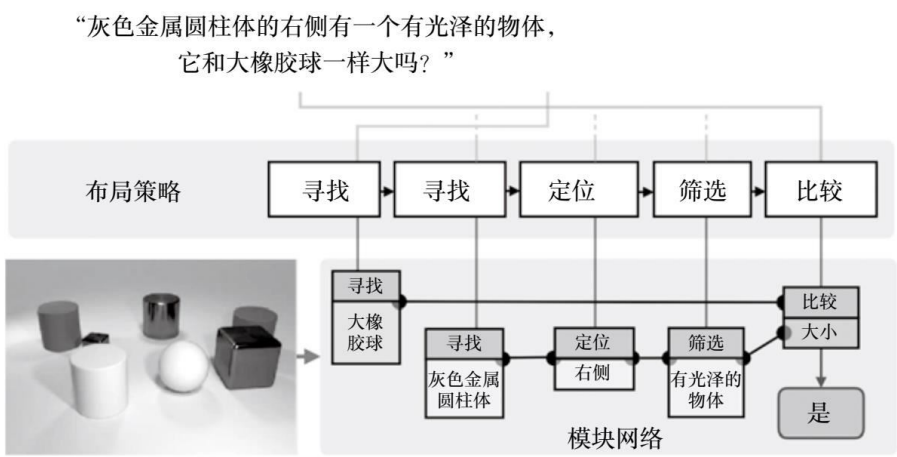


图9—10 一个网络输出动态创建的另一个网络，用于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要回答此类问题，必须找到具有正确属性的球体和圆柱体，并比较它们的大小。第一个网络（上）有点像翻译系统。它以问题为输入，并将其转换

为描述第二个网络体系结构的“语句”（指令序列），第二个网络由5个模块组成。这句话被转换为专门用来回答该问题的第二个网络：它的各模块分别检测球体、圆柱体、它们的位置并比较它们的大小，从而得出答案。该系统是用样本图像、自动生成的问题和答案进行的端到端训练。
资料来源：胡戎航等，2017年，FAIR[5]

基于输入数据动态创建神经网络的想法产生了可微编程的新概念。我们编写了一个程序，它的指令不是固定的操作（如“添加4到变量 z ”），而是深度学习模块，其函数取决于学习。该程序的作用是生成一个模块图（一个网络），使其布局适合于完成特定任务，其中，模块图网络的体系结构不是预先固定的，而是取决于输入数据，然后系统以监督方式被训练。程序的“指令”即每个模块的确切功能由该学习阶段确定。这是一种利用模块的可微分性、模块图的自动微分和梯度下降的学习方法来编写程序的新方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1] Daniel Kahneman, *Système 1 /Système 2.Les deux vitesses de la pensée*, Flammarion, 2011.

[2] 基底神经节是大脑涉及情绪和动机的基本结构。

[3] Mikael Henaff, Alfredo Canziani, Yann LeCun, Model-predictive policy learning with uncertainty regularization for driving in dense traffic, ICLR 2019. 解释性视频见：<https://youtu.be/X2s7gy3wLYw>和<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HygQBn0cYm>.

[4] <https://cs.stanford.edu/people/jcjohns/clevr/>.

[5] Ronghang Hu, Jacob Andreas, Marcus Rohrbach, Trevor Darrell, Kate Saenko, Learning to reason: End-to-end module networks for visual question answering, ICCV 2017, http://openaccess.thecvf.com/content_iccv_2017/html/HuLearningtoReasonICCV2017_paper.html.

11

集成电路创新的爆炸式增长

人工智能属于计算密集型的领域，训练一个大型卷积网络可能需要在—组搭载GPU的机器上花费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一个经过训练的网络可以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中过滤、标记和分类图像、文本或识别语音。在图6—9中，我们曾指出，识别一张图像需要数十亿次的数字操作。许多工程师团队正致力于网络的自动简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大小和内存占用量，从而使其能够在配有标准处理器的服务器上快速运行。

越来越多的应用需要专门用于卷积网络计算的处理器，这种处理器的架构与标准处理器的架构有很大不同。后者已经被应用于汽车驾驶员辅助系统，或在我们的手机中进行即时翻译或增强现实，或在我们的智能相机中优化采景，或在无人驾驶飞机中完成跟拍的壮举。将来，我们会在增强现实的眼镜里，家用和维护机器人内，汽车、卡车和自动送货机器人中嵌入深层网络。

这就需要开发具有处理TFLOPS量级计算能力的新工具，即神经元处理器。但同时，它的价格和功耗都不能太高。这种处理器是一个“小”卷积网络，为了能够很好地分析一张图像，它必须执行100亿次操作。每秒30帧的速度，就需要一个300 GFLOPS的处理器且消耗不足1瓦，才能在智能手机上运行。智能手机电池的电量约为10瓦时，即只能供1瓦的处理器工作10个小时。电量消耗得太快了！

为了达到理想性能，神经元处理器使用了全新的硬件架构。

为了最小化能源密集型的数据交换，计算单元和存储器被混合分布在硅芯片上。进行计算时，使用的是精度非常低的数字：几位数便足以代表神经元的权重和激活状态，无须像传统处理器那样用32位或64位对数字进行编码。深度学习的各种应用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这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集成电路行业的创新正在蓬勃发展。

英伟达、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三星、英特尔、高通、苹果、ARM（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百度、阿里巴巴、华为以及一大批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初创企业，都在开发神经元处理器，用以满足其需求或是用于新一代智能手机、家用机器人、虚拟助手、虚拟或增强现实眼镜、智能相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更常见的智能物体。

12

人工智能的未来

由于潜在市场的规模，人工智能的四大主要应用类别吸引了大型工业集团的兴趣，这些应用就是医药、自动驾驶汽车、虚拟助手以及家用和工业机器人。我们已经讨论过前两个，今后这些技术还会继续深刻影响医药和辅助驾驶领域。但也有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只有取得重大概念的突破，这些应用才能得到推广。

在交通高峰时间且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如果不依靠自监督学习和预测模型，在纽约、巴黎、罗马或加尔各答街道上的全自动驾驶汽车也许根本不可能上路。对此，我们可能需要先弄清楚人类是如何在短短20个小时内学会驾驶的。

至于虚拟助手，它的功能仍然很有限。在理想情况下，它会被赋予接近人类的智力，并具有良好的常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有了虚拟助手，人们便无须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电话、电子邮件或在互联网上解决行政问题、联系手机服务、组织旅行或与朋友外出、安排日程或过滤消息。一个聪明的“助手”应该能回答任何问题，在专业会议中给我们提供帮助，提醒我们上次会面的结论。但如果没有刚才提到的常识革命，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3年，由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执导的科幻电影《她》（*Her*）讲述了一个男人与他的虚拟助手之间的互动，男主角泰奥爱上了这个拥有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的声音、名为萨曼莎的计算机实体。这是少有的以逼真方式处理

人工智能的电影之一。其场景属于未来派，但其心理层面是合乎逻辑的。人类倾向于依恋身边的物体、动物和周围的人，既然如此，那根据与“主人”的互动而专门被编写开发出来的、性情与“主人”相符的虚拟助手有什么理由得不到人类的喜爱呢？

但我们仍需面对现实，真正的智能机器人仍停留在科幻小说中，毕竟，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还很笨，它们很容易被卡在桌子下面或扶手椅后面。什么时候家用机器人才能顺畅地打扫整个房子呢？

自给式割草机在预知障碍方面做得好一些，因为它们是有潜在危险设置的，但是它们还不能将花坛与蒲公英区分开。你好，园艺破坏者！什么时候园丁机器人才能照顾花朵，给我们摘树莓并拔除杂草呢？

制造业中使用的自动装置仅仅是重复了预先记录的例程，因此，如果条件改变了，它们将无法执行复杂的操作和组装。什么时候才会有更灵活的机器人呢？

就像虚拟助手和自动驾驶汽车一样，这些智能机器人只有在学习了规划复杂动作的世界模型之后，才会变为现实。

这些人工智能应用将会改变社会，但是，只有机器能够像动物和人类一样有效地学习，只有它们能够通过自监督学习获得世界模型，只有它们积累起足够的世界知识以产生某些常识时，这一切才会成为可能。

这才是人工智能研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第十章
隐忧与未来

人工智能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改变了社会，引起了经济变革，如同其他任何一项技术革命一样，它也创造了新的职业并使一些职业消失。谁将是其中的受益者呢？

人工智能是技术、科学和各种工具的综合体。为了使用它，我们是否必须足够了解它？它必须足够明确才足够可靠吗？

它是个威胁吗？我们应该害怕智能武器吗？我们能想象机器人杀手和具有恶意的无人机的入侵吗？我们的想象中充满了干扰判断的例证。

我们是否应该从现在起就通过法律法规限制其能力？

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改变人类对自身的看法，它已经帮助我们了解了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但是人类或人工认知的真正极限在哪里？如果机器可以在许多领域击败我们，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人类的智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神通广大？

机器可以与生物学竞争吗？

如果大脑只是一台功能有限的机器且可被人工智能赶上，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呢？

机器会有一天在各个方面都比人类更强大、更有创意、更有意识吗？它们也会有冲动、情感和道德价值观吗？如何确保它们的价值观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它们会想要统

治人类吗？

问题如雪崩一样涌来，让我们重新开始梳理吧。

1

人工智能将改变社会和经济

经济学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很乐意在此分享一些杰出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将人工智能视为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即一种“通用技术”，认为它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不断传播并深刻改变经济生活。我们在历史上创造的GPT还有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

像以前的技术变革一样，人工智能也将取代一些行业，并带给我们许多难以想象的新生事物。谁能在20年前预言YouTube之类的网络服务能够养活成千上万的视频制作人，或者脸书和Instagram可以帮助艺术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客户？工业革命在使一些职业消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职业，这使我们想起在19世纪70年代时，法国有50 %的人以农业为生，而这一比例在2019年降至5 %。我们适应过时代，现在我们需要再次适应。

经济学家还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中，人工智能将对生产力即每小时工作所产生的财富数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即使在人工智能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这不太可能）。该如何再分配新革命的成果呢？考虑到随着技术的普及，部分就业人口的技能已无法应对社会的需要，他们必须接受新的职业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或者由社会来接管他们。

我担心目前这种进展的加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但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其他一些

经济学家曾断言，GPT渗透经济的速度会受到工人学习如何利用它所需时间的严格限制，这个过程需要15~20年。就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键盘和鼠标的使用普及之后，计算机才真正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受到威胁的职业数量增加得越快，技术在经济中的传播速度就越慢。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对一个想要抓住人工智能机遇的国家来说，最佳的方法是加大对各个层级教育的投入，包括高中、高等教育、博士生院，当然还有继续教育。必须为经济转型储备足够多的人才，当然还必须创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

2

人工智能创新的生态系统

创新需要合适的氛围，基础研究是涉及公共或私人投资的生态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基础研究进展火热的区域大都集中在大学附近，比如在美国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硅谷，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波士顿研究群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科技学院附近的纽约研究群落。

生态系统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工业实验室。在法国，巴黎就是中心枢纽，除了众多的工程师学校、大学和公立研究中心，它还坐拥脸书、谷歌、三星、亚马逊、华为、法雷奥集团等大型企业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生态系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初创企业的汇集地。这些初创企业拥有金融和接待设施的便利，例如由脸书部分支持的F站园区。因此可以说，巴黎今后将会是欧洲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创新地。

可惜，如今法国仍身处沉重的结构负担的泥潭之中：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薪酬不高，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相对地，一些私人企业和其他国家却给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美国一所优秀大学的一位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女教授在2019年的工作状况。她的起步年薪为10万~12万美元，实验室的启动研究经费约为20万或30万美元；为了获取其他经费，她可以把研究项目提交给民用或军方的专门机构，或与工业界签订合同。她指导博士生；每年教授两门课程，大约有80个小时的教

学时间。学校每年付给她9个月的薪水，在夏季的三个月中，这位年轻教授可以获得研究补助金，算是另外33 %的薪水。她同样可以为工业界工作。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她可以每周担任一天企业顾问；她不受制于实验室主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制度具有激励作用，这位年轻女教授必须努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获得认可，才能获得“终身任期”，这种永久性任期将使她可以在通过最长6年的考察期后从“助理教授”转为“副教授”。这便是著名的“发表或出局”法则。大学与大学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工资和工作条件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公立的研究机构还是私人的研究机构，都在进行激烈的人才抢夺战。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法国，同样一位优秀的年轻女研究员正在苦苦挣扎，她必须通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或大学的程式化入职考试才能担任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然而她的年薪只有约3万欧元，比法国最低工资的1.5倍多一点。这是在接受了至少8年的高等教育，通常还会在国外做一两年博士，以及在国际科学期刊中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论文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薪酬。真是个神圣的职业！截至此时，这位年轻的法国教师还没有正式指导博士生的权利，她仍需要等待几年，在获得指导博士论文资格认证（Habilitation）后才可以这么做。她每年必须讲128个小时的主课，或192个小时的辅导课，或288个小时的实验课，而且由于工资低，她可能需要加班授课才能维持生计。

如此一来，她几乎没有时间做研究。如果想要献身于科研，她只能在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好处在于这里的工资与副教授的工资相同。法国大学各学科之间的待遇没有太大区别，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与此类

似，可以与北美最好的大学一较高下的院校基本都集中在瑞士，尤其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当然，尽管没有最好的待遇条件，但法国仍不缺优秀的人才，问题在于如何留住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研究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的能力。在美国大学的科技学科中有一半以上的青年教授是在其他地方出生且接受教育的，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欧洲大陆。

3

谁将从革命中受益

我不确定人工智能革命是否会让所有人受益。与那些从事可能被（部分或全部）系统化和自动化工作的人相比，深耕于有资质的、创新型的、专注于人际关系或人力资源职位的人更有可能保住工作。如果我们的政府不通过财政措施纠正存在的问题，那么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将无法平均分配，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自动化已经取代了人类来完成重复性或艰巨的任务，而人工智能将在那些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入感知、推理、决策和行动计划等工作内容的工作中取代人类。自动驾驶汽车会减少卡车、出租车和载客专车（VTC）的驾驶员的数量，因为它们会更加安全。医学图像分析系统已经走进放射科医生的日常工作中，患者也因此得到更可靠、更便宜的检查。在以上这些健康和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

所有的职业都将受到科技变化带来的影响。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无法参与竞争的东西会变得更更有价值，这就是已经得到证明的人类经验。自动化大幅度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业界的渗透，这种趋势将会继续，甚至加剧，但是服务业、手工业和房地产业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影响。举个例子，摆放在客厅的蓝光播放器的售价约为70欧元，这个极为复杂的技术瑰宝集合了许多最先进的发明（蓝色激光二极管、H. 264 /MPEG- 4视频压缩等）。而

一个手工制作的、拥有质朴气质的陶罐，它的制作工艺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其价值可能为500欧元、600欧元或700欧元。蓝光播放器是由机器批量生产的，而陶罐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再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花不到2欧元的低价或通过订阅的方式聆听最喜欢的音乐家的作品，然而如果要欣赏摇滚音乐会或歌剧，我们就需要支付50~300欧元。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独特的事物赋予了生命独特的时刻。一顿大餐，参观自然景观或博物馆，听一场爵士乐音乐会——作为一个开明的业余爱好者，我因为能够做这些事情而感到高兴！——我们越来越重视创造力和独到的体验，越来越不看重大众化的产品。在健康、艺术、科学、教育、体育等领域的职业中，感性的方面在未来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4

军事失控的风险

像其他所有技术一样，人工智能可以被用于做最好的事情，也可能被用于做最恶的事情。有些声音反对在军事上使用人工智能，主要是反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LAWS，法语缩写为SALA），它通常也被称为“杀手机器人”。相对应的保障措施已经较为成熟，大多数军队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则来管理启动打击的授权程序。无论使用何种武器，决策的源头始终是高级军官。我们都知道，自动或半自动武器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也是如此。在所有具有很强杀伤性的自动武器中，最古老的当数地雷。自1999年以来，地雷就被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不是因为它们很聪明，而是因为它们很愚蠢。可惜，美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在公约上签字。

智能化武器是否会有滑向军备竞赛的危险？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在2017年9月表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展开了一些辩论，有人提出了暂停SALA的建议。有些人将SALA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种，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些国家将其视为在发生冲突时，通过目标识别和追踪来减少附带损害和平民伤亡人数的一种方式。[\[1\]](#)

面对人工智能推动的可能存在的军事失控，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避免这些危险最重要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国际机构，坚定捍卫

已有的保护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因为它们受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威胁。

[1]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LAWS),2018 , [https://www.unog.ch/ 80256 ee 600585943.nsf/ \(httpPages\)/7 c 335 e 71 dfcb 29 d 1 c1258243003 e8724 ? OpenDocumentExpandSection=3](https://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nsf/(httpPages)/7c335e71dfcb29d1c1258243003e8724?OpenDocumentExpandSection=3).

5

危险警报：人工智能的滥用

要知道，人工智能始终都是由人类开发出来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使用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放大和增强人类的智能。但是鉴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如果灾难袭来，它并不能主动采取行动，最终的责任还是要落到人类身上。它的行为是无意的、不自主的，或者说是被有意决定的，如果存在危险，则必然与人类自身及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滥用有关。

为了防止这些滥用，我参与创建了“人工智能伙伴关系”（PAI）组织，[\[1\]](#)这个组织汇集了100多名成员，包括大型公司、互联网巨头、学者社团、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电子前沿基金会）、媒体（《纽约时报》）、大学团体和政府机构等。我们讨论道德问题，警告危险并发布建议。人工智能是一个新领域，其深度展开的后果并非总是可预测的，我们必须多加考虑。

“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研究的主题主要有6个：一是人工智能和可能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系统；二是公平、透明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三是人工智能对经济和工作的影响；四是人机协作；五是人工智能的社交和社会影响；六是人工智能和社会福利。

我们来看一个滥用统计模型的例子（不幸的是，这种滥用很常见）：决策偏差。如果在收集数据集时存在错误或偏差，那么使用这些数据训练的机器将反映出这些错误和偏差。严格来说，

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而在于使用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无论它们是什么。深度网络只是统计模型的一个特别复杂的实例，但是即便使用如线性回归之类的非常简单的模型，也会产生偏差。

人脸识别同样是一个例证。如果使用以法国人为代表性样本的示例集训练的人脸识别系统，来识别非洲或亚洲血统的人，就会十分不可靠。反过来说，如果使用以塞内加尔人为代表性样本的示例集进行训练，那么该系统对识别欧洲或亚洲血统的人来说同样是非常不可靠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系统的可靠性取决于学习示例的多样性和平衡性。

学习示例的期望输出也可能存在偏差。通过惯犯多次犯罪程度的标记数据可以预测与其保释有关的风险。但是，如果历史上这些数据偏向于损害种族或社会经济的范畴，那么该系统只会使这种歧视永久存在。这种偏差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ProPublica[2]曾公开谴责美国某些州使用的COMPAS系统[3]，因为该系统使用了简单的统计方法（距离深度学习的水平还差得很远！），但这并不能防止滥用行为的发生。[4]

因此，这种偏差问题几乎永远不会与学习算法或者模型联系在一起，而主要是与数据以及在用于训练模型之前如何处理和过滤数据有关。正如康奈尔大学社会计算学著名专家、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所说：“ProPublica揭示的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如何对待预测的方式和我们如何开发算法的方式有关。”人工智能使安全失控成为可能。自2014年以来，卷积网络就已经是人脸识别系统的基础了（参见第七章相关内容）。值得庆幸的是，很多国家的政府通过隐私法禁止了其大规模地使用。

[1] <https://www.partnershiponai.org/>.

[2] 一家总部在纽约的非营利性公司，以数据新闻和公共媒体为特色。——编者注

[3] COMPAS系统是美国广播电视等行业的网络监控及管理系统。——编者注

[4] Julia Angwin, Jeff Larson, Surya Mattu et Lauren Kirchner, Machine bias ,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machine-bias-risk-assessments-in-criminal-sentencing>.

6

如何解释人工智能

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深度学习系统是“黑匣子”，但他们错了。工程师可以深入检查神经网络的功能，包括所有的细节。诚然，当神经网络具有数百万个单位和数十亿个连接时，似乎很难完全理解它的一个决策，但这不正是所有智能决策的特点吗？我们不了解让出租车司机、工匠、医生或航空公司飞行员完成他们的工作的神经机制，更不了解用来寻找松露的狗如何挖掘出芬芳的“黑色钻石”，但我们相信他（它）们。为什么要对一台反应更快、不知疲倦、从不分心的机器提出更高的要求呢？当你可以证明它比人类更可靠时，为什么还要对它产生怀疑呢？

人工智能系统每天做出数万亿个决策，其中大多数都与查找、分类和过滤信息以及一些稍显无聊的应用程序有关，例如应用于照片和视频的效果。你是否真的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详细了解它们？人工智能的工作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不就够了吗？

而且使用没有深入了解其运行机制的系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许多常用药物都是通过反复试错获得的，而我们对其作用机制了解甚少。比如，锂通常被用于治疗躁狂抑郁症，但它的作用机制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熟悉的且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被替代的阿司匹林是有史以来使用最广泛的药物，它于1897年首次被合成，可是直到1971年我们才明确其作用机制。当然，如果发生错误或事故，能够给出解释有助于防止它们再次发生。但是通常

来说，这只是使用户放心的一种方法。当我们无法完全说明系统的行为时，那么其市场流通就必须经过测试过程，测试的协议是受控且开放的，例如在药品进入市场之前进行的临床测试，或者用于新飞机的合格认证程序。对于做出关键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必须如此。

另一个问题：投入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是否必须100 %可靠？没有必要。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比其他决策辅助系统的要求更高？医学每天都在使用的测试系统，其可靠性并非完美无缺，但我们不会质疑其有效性。例如，疾病的检测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阳性和一定比例的假阴性，并且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对检测结果有任何疑问，医生将无法下诊断。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对人工智能有更多的苛求呢？

我的朋友莱昂·博图始终认为，现代社会产生的数据量与存储方式或网络速度一样，都在以相同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但是，人类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并没有如此迅速的增长，在某些时候，人类的大多数知识将由机器从数据中提取并存储。根据知识概念的某些定义，机器已经突破了获取知识的门槛。

不过，当人工智能在司法、法律、医疗、财务或行政框架下用于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时，给出合理解释是必须的。如果银行使用人工智能审核贷款，并且拒绝了申请人的申请，则有必要向申请人阐明该决定的合理性，并建议其改变影响贷款的行为，以使下次贷款顺利通过。利用机器学习系统我们总可以轻松提出建议，无论建议的程度是深还是浅。我们需要做的是进行灵敏度分析，以便找到能够改变决策的最小输入干扰。这与产生对抗性实例的原理相同，但更实用。

7

理解人类智能

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动物视觉皮层的知识是如何启发卷积网络的体系结构的，近年来，两者的位置发生了转换！神经科学的研究人员已将卷积网络应用于视觉皮层的解释模型。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些实验，在实验中，将一张图像同时展示给人、动物和卷积网络，然后通过功能性MRI、脑磁图或电生理学（在动物身上）测量视觉皮层的活动，并根据在卷积网络中观察到的活动来尝试预测这种活动。这些工作证实了视觉皮层V 1主要区域的活动是由网络前几层预测的，而腹侧通路、V 2、V 4和颞下皮质的层次结构中连续区域的活动则是由网络上层预测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相互成就！视觉神经科学启发了卷积网络，而卷积网络又阐释了视觉皮层的功能。

类似的融合为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诚然，人类不会像机器一样学习，但是难道他（它）们的学习方法没有共同点吗？举一个例子：归纳推理即确定一个规则，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一系列数字，或更常见的是推导出一系列形状，这是一个公认的思维过程。那么，通过训练调节系统中的函数从而尽可能接近所要求的任务，这与以收集的方式显示一组起始数据的规则又有什么区别呢？

归纳推理是科学方法的基础。科学家进行观察，而后解释这些观察并从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了一个理论，之后，他会评估这个规律是否可以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比如

重力，借助重力，科学家可以预测今天和100年后行星的位置，最终根据事实证明这一定律的正确性。

学习机的工作方式也是如此。在“学徒”期间，学习机逐渐在它接收到的输入和期望的输出之间建立起一个唯一的连接，它相当于一个紧凑的表示方法。然后，运用此“连接”，生成任何与输入相对应的“正确的输出”。即使机器不思考，它也能处理这些关系。学习机“学习”猫、椅子或飞机的概念，然后就可以识别任何猫、椅子或飞机。当我们谈论由对象的不同特征所定义的抽象和通用的表示形式时，这个“概念”难道不像我们人类对它所做的定义吗？

我们可以深入研究这个类比。机器在学习时会在多个猫的图像（输入）和猫的概念（输出）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它生成的模型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能够将可能的识别错误率降至最低。这是猫的概念的一种“近似”概念。

在人类的思想中，猫的概念也是猫的纯粹概念的一种“近似”。如此多的观察使我们或多或少地联想到熟悉的哲学概念：柏拉图的思想，康德的理想，等等。

8

大脑只是一部机器吗

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接受了大脑是生化机器的概念。虽然这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但总归是一台机器。神经元对输入的电信号做出反应，根据从上游神经元接收到的信息计算是否产生电脉冲信号、动作电位或放电脉冲，并将其发送给所有下游神经元。这是一种十分基本的机制。但是，通过结合数十亿个相对简单的神经元的活动，我们便获得了大脑和思想。

我知道模拟人脑的想法可能会让一些哲学家或有宗教信仰的人极力反对，不过还是有许多科学家认为思维机制最终将会由可以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重现。

质疑此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对生物、物理、量子和其他系统如何在人体内结合以使大脑发挥作用的¹了解还远远不够。的确，我们并不能理解这一切，但是我坚信，哺乳动物或人类的大脑是可以“计算”的机器，并且原则上这些计算可以通过电子机器或计算机进行再现。

人类的优越感面临着遭受冲击的危险，正如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引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话所说：“所有重大的科学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把人类的傲慢从一个又一个先前坚信我们是宇宙中心的信念基座上拉下来。”^[1]

[1]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revolutions all include, as their only

common feature, the dethronement of human arrogance from one pedestal after another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about our centrality in the cosmo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该句被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如下文献中引用：Origin, stability, and extinction, *Dinosaur in a Haystack :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Harmony Books, 1995 , partie 3.

9

所有模型都是错的

英国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George Box）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的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这是一个著名的玩笑。任何对世界的心理描述，任何数据集的内部模型表示，都必然是不准确的。统计学习理论根据学习示例的数量和模型的复杂程度，为这种误差设定了边界。它确认了任何模型都是不精确的，但仍然可能是有用的。

物理学家很早就知道，牛顿力学只有作用于宏观物体时才是准确的，在弱的引力场中，其移动速度与光速比是很慢的。对于高速和强重力，必须应用广义相对论；而对于微观物体，则必须使用量子力学的知识。至于高速（因此具有高能量）、高重力和小尺寸的物体，则需要一个尚不存在的统一理论来解释。

但是，物理学是还原论方法广泛应用的领域：一个“漂亮”的理论常常被归结为一些公式和少量的自由参数，也就是常数。我们无法从其他常数中计算出该常数理论，例如光速、引力常数、电子质量和普朗克常数，但是，化学、气候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经济学或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的复杂现象无法简化为几个公式和参数，这些系统表现出由大量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特性。

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当元素都相同且细节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时，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方法可以让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大致了解。但是，当元素不同（神经元全都是不同的），相

互作用复杂且细节很重要时，我们只能建立现象学模型，而模型也只能给予我们关于现象的一种抽象描述。

因此，动物的学习和目前的机器学习，总的来说仅限于根据统计规律来建立现象学模型，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一个孩子或一只狗学会接住飞行中的球，是因为他（它）拥有一个物理学的模型，可以预测球的轨迹。但是这个孩子或这只狗没有能力写出解释球的轨迹的方程。与牛顿和其他一些引力学家不同，孩子或狗都无法给出解释模型。

有朝一日，机器能否以物理学家的方式根据“实验”数据设计解释模型？这将需要人工智能系统做到识别直接相关变量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与运动物体直接相关的变量有质量、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给质量加力会产生加速度）。我们所谈论的是因果关系。因果推理，即变量之间这些因果关系的发现，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有效的因果推理技术将推动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多亏了它们，我们才能从数据中区分因果关系和简单的相关性。从一些基因的表达数据中推断出这些基因的调控回路，能够使我们更加轻易地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朱迪·珀尔（Judea Pearl）教授因为在概率推理方面的出色工作而获得2011年度图灵奖，他严厉批评了机器学习，指责它严重地忽略了因果推理。[\[1\]](#)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要成为真正的智能机器，就必须学习能够识别因果关系的世界模型。我的一些前同事和现同事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如巴黎奥赛大学的伊莎贝尔·居永、位于德国蒂宾根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伯恩哈德·舍尔科普夫（Bernhard Schölkopf）、FAIR巴黎分部的戴维·洛佩斯-帕丝（David Lopez-Paz）以及我的老朋友和早年的同伴、来自FAIR纽约分部的莱昂·博图等。

[1] Kevin Hartnett, To build truly intelligent machines, teach them cause and effect ,*Quanta Magazine*, 15 mai 2018 ,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to-build-truly-intelligent-machines-teach-them-cause-and-effect-20180515/> .

10

担忧的声音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和阿瑟·克拉克200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2001太空漫游》，算是一份最著名的文化参考文献，它对我的青少年时期意义非凡，而且我也曾数次谈论过它，我们曾多次见过它的主角们，但是我从没有强调过机器与人之间冲突的实质。哈尔是控制航天器的计算机，其程序设置是不向机组人员透露它的任务的真正原因和目的，但这却导致它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它通过唇语读出了宇航员想与它断开联系，但是从程序的定义上它认为自己对任务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被这个崇高的理由所鼓舞。因此，哈尔试图杀死机组人员。它关闭了一些人睡觉的冬眠密封舱，在一次太空行走时杀死了宇航员弗兰克·普尔（Frank Poole），最后，它想阻止为营救弗兰克而出舱的戴夫·鲍曼回到舱内。

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的哈尔慢慢地将机组人员视为障碍，这是系统中编程的目标和人类价值观之间“价值观错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尔最终失败了，但它还是成功丰富了有关“人类败给了自己的作品”的无数幻想。另一个例子就是电影《终结者》，也许它给人的印象更深。在这部电影中，天网系统获得智能后，控制了枪支并试图消灭人类。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又为什么惊慌呢？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就此话题发表过讲话，霍金于2014年向英国广播公司称，“人工智能可能意味着人类的

毁灭”，但后来他改变了想法。作为一位出色的天体物理学家，他的时间尺度是以数百万或数十亿年为单位的。那么仅存在了几十万年的人类，在100万年、1000万年或1亿年之后将何去何从呢？

比尔·盖茨也对此表示过担忧，但后来他也改变了立场。至于特斯拉受人瞩目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他也曾发表了一些悲观的声明，甚至试图说服管理层来规范人工智能以避免出现电影《终结者》中的情景，但并未取得太多的效果。当和他讨论时，我意识到他似乎低估了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所需要的时间。也许他对那些寻求资本的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听得太多了，因为这些人极其乐观，甚至盲目地保证实现达到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的目标指日可待。

埃隆·马斯克也读过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1\]](#)这位牛津大学哲学家描述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摆脱其创造者的控制而造成的灾难场景。举个例子，我们建造了一个超级智能计算机，让它负责控制生产回形针的工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最大化产量。当然，计算机有能力优化生产、原材料供应、能源消耗等，还可以运用它的超级智能设计和建造一系列更为高效的工厂。它可以说服人类为它提供更多资源，如有必要，甚至可以找到摆脱人类控制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台智能计算机最终会渐渐地将整个太阳系变成回形针。这类似一种常见的场景：一个小魔法师控制不了自己创造出来的小怪兽。

但所有这些假设都是极不可能的。我们怎么会如此聪明地设计出一个超人类的智能机器，同时又如此愚蠢地赋予它荒谬至极的目标呢？我们会轻率到不采取一些保障措施吗？例如，为何不设计另一台超级智能机器，使其唯一目的就是阻止第一台机器

呢？

不过也要铭记，我们认可的造福人类的所有技术革命都有其阴暗面。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快速传播，包括传播加尔文和路德的思想，而这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致命的宗教战争的起源。还有收音机，它在20世纪30年代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至于飞机，它虽然缩短了距离，但可以轰炸整个城镇。如果我们对信息技术很感兴趣，并对它有足够多的了解，就会发现从电话、电视、互联网到社交媒体，每一项技术都带来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也都得到了解决。

[1] 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rad. fr. : *Superintelligence. Quand les machines surpasseront l' intelligence humaine*, Dunod, 2017.

11

人工智能并不万能

机器的智能都是我们赋予的，用于人工智能的词汇场也难以清楚地划分我们和机器之间的界限。“智力”“神经元”“学习”“决定”……这些以前专属于人类和动物的术语加剧了这种边界的模糊性。当然，对于非常专业的任务，具备人工智能的系统的运行速度比我们人类快得多，例如，下围棋、下国际象棋、识别要消灭的肿瘤或目标、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挖掘数千张网页中的信息、翻译世界上几乎每一种语言等。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人工智能虽然能力出众，但其常识却不如一只猫。配备人工智能的机器缺乏公共常识，它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十分有限，因为它所受的训练只能使它执行一项任务。

它是无法培养意图或发展意识的。我的同事、FAIR的共同负责人安托万·博尔德总结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拿什么去制造一台既能够制定战略，又对世界有敏锐了解的真正智能机器。如今我们还缺乏一些基础概念。”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12

大脑的学习机制

数学家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规范了机器学习的统计理论，该理论规定了系统可以从数据中学习概念的条件，认为要使一个实体具备学习能力，就必须让其专攻一个有限的任务领域。

这个理论对人类是成立的，人类不是通才。先天性——也就是大脑的预先连接——是必要条件，它可以限定大脑的能力并加速大脑的学习。我们知道大脑的某些区域具有特定的体系结构，并致力于某些特定的任务，即便我们无法控制这些机制。

归谬法可以用来证明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存在这种预先连接。我们已经知道启发了卷积网络架构的视觉皮层是有专门功效的，想象一下你戴着一副怪异的眼镜，它调换了你所看到的所有像素。镜片是由光纤制成的，是不透明的，光纤会将这些像素发送到视野中的不同位置。因此，你看到的图像是完全混乱且毫无意义的。当一个物体在图像中移动时，某些像素会被激活，而其他像素会被关闭。当它们通过眼镜被看到的时候，图像中相邻的像素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几乎无法识别任何东西，因为没有正确的连线。连线利用了这样的事实，即相邻像素通常具有相似值且相互关联。这证明我们的大脑不是通才，它很专业。

大脑同样是非常有韧性的。一些实验表明，大脑中存在一种“皮层通用学习程序”，因此，功能是由到达它的信号束决定的，而不是由接收的区域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姆里甘

卡·苏尔 (Mriganka Sur) 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在雪貂临近生产之前取出了其胎儿，他们通过手术切断胎儿的视觉神经并将其连接到听觉皮层。[\[1\]](#)结果十分鼓舞人心：听觉皮层起到了视觉皮层的作用，并发育出神经元来检测通常存在于初级视觉皮层V1区域的定向轮廓。

听觉皮层的初始连接与视觉皮层的初始连接有些相似，所以，如果初始连接结构合适，相关功能似乎能够通过学习获得。这证明由皮层区域执行的功能，事实上是由其接收的信号决定的，而不是由大脑中“视觉器官”的基因预编程决定的。

皮层“通用学习”算法存在的可能性，给像我一样寻求智能和学习背后独特的组织原则的科学家带来了希望。

[\[1\]](#) Jitendra Sharma, Alessandra Angelucci, Mriganka Sur, Induction of visual orientation modules in auditory cortex, *Nature*, 2000.404 (6780), P. 841.

13

机器能否产生意识

意识是一个很难讨论的主题，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它，也不知道如何定义它。它与自我意识混淆在了一起，同时，它被认为是动物存在高级智力的标志。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大象和黑猩猩已经具有自我意识，而狗不行。有很多书讨论过这个主题，我和我的朋友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也合著过一本。[\[1\]](#)

我个人认为意识是一种幻觉。它似乎在许多聪明的动物身上都存在，同时它可能只是大型神经网络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性。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前额叶皮层局限性的结果。人类的意识与注意力息息相关，当面对特殊情况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此时我们会非常专注。当我们玩益智游戏时，当准备新的烹饪食谱时，当我们参加辩论时，我们的注意力将毫不犹豫地集中在这个不寻常的复杂任务上。它迫使我们开启“世界模型”以规划下一步行动。

但是，也许我们全部的神经元不足以一次性模拟多个世界模型。人类的前额叶皮层可能包含某种可重构回路，可以通过意识来“编程”适合应对当前情况的世界模型。在这个假设中，意识是为每个给定任务配置电路的控制机制。这就是没有事先培训就无法一次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多项任务上的原因吗？但是通过有意识地强制重复，我们最终学会了自动执行任务，而无须动用世界模型。在此过程中，任务的执行者从丹尼尔·卡尼曼的系统2转移

到了系统1。

同样，当学习驾驶时，我们会专注于方向盘、道路、变速杆.....会在脑海中想象所有可能的场景。经过几十个小时的练习，我们就能轻松地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完成任务已经变成了潜意识，而且几乎是自动的。意识可能是这种精心设计的世界模型回路配置机制的结果。这应该是我们头骨能力有限所导致的，而不是高智商的反映。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前额叶神经元来同时模拟几个独立的世界模型，那就不需要所谓的意识了。

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未来的智能机器应该具备某种形式的意识。也许与人类的不同在于，它们可以同时专注于多项任务。

[1] Stanislas Dehaene, Yann Le Cun, Jacques Girardon, *La Plus Belle Histoire de l'intelligence*, Robert Laffont, 2018.

14

语言在思维中的作用

对人类来说，语言是最基础的能力，以至它似乎成了智力的代名词。我们将单词与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使用它们来完成推理……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没有语言就不会存在智力。

那么对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而言，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所有的“表兄弟”猿类呢？它们似乎没有类似人类语言体系那样先进的交流系统，没有给概念起名字，然而，它们却发展了符号认知能力和抽象推理能力。无论如何，它们的世界模型比人类最好的人工智能系统都要复杂得多。

如果我们的表亲灵长类动物的智力与语言无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明人类智力中的绝大部分也与语言无关呢？

在我看来，如果不考虑思维和推理对学习的重要程度（这种程度是很低的），把它们与符号处理及逻辑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传统人工智能的主要错误。

相反，我觉得动物的智力和人类的大部分智力都是基于模拟、类比以及使用世界模型来对实际情况进行想象得来的。我们离逻辑推理和语言还差得很远。

机器会有情感吗

我丝毫不会怀疑自主智能机器有一天会产生情感。在第九章中，我提出了一种体系结构，在这种体系结构中，系统的行为由最小化目标函数来驱动。目标函数计算出的成本，衡量了机器的“瞬时不满意”程度。当机器纠正了一项使成本升高的动作时，是否可看作机器在避免疼痛或不适的感觉？

当用于测量机器人电池电量的镜头元件产生了较高的成本而致使机器人开始寻找电源时，不正与饥饿的感觉相似吗？

智能体模块的体系结构包括一个世界模型和一个评判体系，世界模型会预测世界的变化，而评判体系预测目标函数的结果，即衡量机器不满意程度的模块。如果机器人通过世界模型预测到自己将摔倒并受到损坏，评判体系就会预先通过目标函数计算出“疼痛”，紧接着机器人将尝试规划轨迹以避免这种不幸结果的发生。这不就像是一种恐惧感吗？

当机器因成本高昂而避免采取行动时，或者由于成本低廉而执行任务时，这是否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情感的标志？

当计算饥饿的目标函数的组成部分产生高成本时，它会触发对食物的搜索。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行为是目标模块组件不满意的结果。根据被使用的世界模型，复杂的行为是行动计划的结果，该行动计划可以使预期成本最小化。当你的手臂被夹住时，疼痛是瞬间的，通过你的目标模块计算的成本反映了你的当前状

态；当有人威胁要夹住你的手臂时，你的评判模块会预见到疼痛并引导你保护手臂。情感是由评判模块所计算出的预期成本。

我很清楚，以上所有的比拟似乎都说得过于简化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无法轻易将其数字化为简单的数学函数计算，我们对将人类行为简化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化也心存疑虑。但是，我在此提出的仅是关于智能系统的一般体系结构的假设，没有否认目标函数和世界模型的丰富性或复杂性。

16

机器人想要获得权力吗

不！

我们对机器人想要获得权力的恐惧主要来自人性特质在机器上的投射。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与智慧生物的唯一互动就是与其他人类的互动，这使我们混淆了智力和人性。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还有其他形式的智力存在，即使在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且我所指的智力不单单是语言。

人类同倭黑猩猩、黑猩猩、狒狒和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一样具有复杂且通常带有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每个个体的生存（或舒适度）取决于它影响该物种其他成员的能力（统治只是影响的一种形式）。我们是社会性动物的事实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把对统治的渴望与智力联系在一起。

以非社会性物种红毛猩猩为例，它们几乎和人类一样聪明，其大脑尺寸是我们的一半。红毛猩猩是独居动物，它们会避免进入其他群体的领地，它们的社交关系仅限于两年内的母子关系以及地盘冲突。因此，进化并没有使它们产生统治自己邻居的欲望：没有社会结构，就没有统治体系。由此可以证明，没有统治欲望也可以很聪明。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

即使在人类中，统治的意愿也与智力无关，更多的是睾丸素分泌的问题！我们之中最聪明的人并不总是渴望成为领导者，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以我为例，我是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验室中大多数成员都比我更有才华，但他们不想因此取代我的位置。相反，公司经常会邀请优秀的科学家担任管理者，但许多人都拒绝了。我了解他们，他们更想直接参与研究而非管理。

除了对统治的渴望，为了人类物种（或基因）的生存，我们的许多冲动和情感已通过进化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好奇心，对探索的渴望，竞争力，屈服，渴望与我们的同类接触，爱，仇恨，掠食，以及我们对家庭成员、我们的部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的偏爱，没有这些冲动和情感的人、动物或机器也都可以是有智慧的。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说得清晰透彻：只有当我们在智能机器中明确地建立了这种欲望时，它们才会渴望统治人类。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价值观的统一

如果机器都像哈尔9000那样，认为统治人类是实现人类给它们指定的目标的最佳方法，那么机器可能会想这么做。而为了避免这种情景，我们在其内部建立一套禁止它们谋杀、使用武器、在生物附近进行暴力运动等的价值体系就足够了吗？这是一个机器的价值与人类普遍价值一致性的问题。

小说家和大众传播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他的短篇小说“机器人系列”里描述了他关于机器人的三大法则：

-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因其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 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在预先设定的行为中或在智能体目标函数的固定部分中，明确地编程这些法则似乎非常困难，因为在现实中，一台机器遵守这些法则的能力与其预测和评估危险情况的能力有关。但在机器人没有学会危险、服从、舒适等抽象概念之前，我们是无法给它们反复灌输这些法则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在第九章中，我们知道在自主性智能体的体系结构中包含了控制直觉和冲动的目标函数，它是智能体“道德价值”的保管者。这个目标函数必须包括“手工”构造

的“固有”术语，以确保安全性并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接近人类的传感器，当有人处于较近的范围内时，限制机器人手臂的移动速度，这是很容易实现的；而引入潜在危险等抽象概念的行为约束则不太容易实现。

目标函数不仅应该包括构建的（先天）组件，还应包括可训练的组件，让机器出错时可以进行纠正。机器将调整目标函数中的可训练参数，并可能会借助抽象概念（例如危险的概念）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此一来，当遇到未被预见的和未被工程师手动构建的先天项所覆盖的情况时，系统的行为就会得到纠正。

一方面，人类在将道德价值体系编纂入法律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到“法典”），这些价值有时会被编码，以使得许多非凡的智慧和力量的实体（我称为事业）得以良好运转。另一方面，这些价值也被教育编码：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教育孩子辨别是非，并努力在社会中表现良好。

为了训练未来的机器人有更加良好的表现，我们将不会从零开始！

18

新的疆界

智力不只局限于智慧的能力，还涉及行为的所有领域，同时也是学习、适应和决策的能力。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了解动物和人类是如何学习的，那么人工智能在默认情况下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它表明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区分开来并不是巨大的鸿沟，这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节约资源方面，机器对数据和能量的消耗是大脑的数千倍，为什么大脑的运作耗能如此之低呢？生物神经元运行缓慢但非常紧凑，它们数量众多，耗能很少。这种低耗能体现在：在任何时候，大脑中只有少数神经元是活动的，这种活动往往是很微弱的，而安静的神经元比活动的、发出脉冲的神经元消耗的能量要少得多。这种通过精密分配神经元活动来节约能量的情况为未来人工神经网络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探索途径。

尽管如此，其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谜团。人类如何迅速地建立起对周围世界的抽象表征？如何通过操纵这些表征来学习推理、设计行动计划，以便将一个复杂的任务分解为更简单的子任务？

解答这些问题可能会揭开许多其他谜团。人类通过很少的示例来学习，他会设想一些场景，从这些场景中能够预见行动的后果，从而减少一定的学习量……而当今人工智能学习的特点则需要大量的示例和能量，如何在没有大量示例和能量的情况下进行学习，这是目前的研究正在努力探寻的一个方面。

19

智力科学

在科学史上，技术产品的出现通常先于解释其工作的理论和科学。表10—1中列出了若干这样的示例。

在牛顿发表光学理论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发明了透镜、望远镜和显微镜；在萨迪·卡诺（Sadi Carnot）定义热循环并奠定热力学基础之前，蒸汽机已运转了一个多世纪；在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机翼理论和稳定性理论被写下来之前，第一架飞机早已经起飞；第一批可编程计算机催生了计算和算法科学，即我们所称的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由贝尔实验室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于1948年提出，它是在第一批远程通信和数字通信开始数十年之后产生的。

表10—1 发明和解释发明的理论（单位：年）

发明	理论
望远镜（1608）	光学（1650—1700）
蒸汽机（1695—1715）	热力学（1824— ）
电磁学（1820）	电动力学（1821）
帆船（？）	空气动力学（1757）
飞机（1885—1905）	机翼理论（1907）
化学化合物（？）	化学（1760）
电子计算机（1941—1945）	计算机科学（1950— ）
电传打字机（1906）	信息论（1948）

注：技术制造品的发明通常先于解释其功能和局限性的理论。

人工智能研究仍处于创新阶段，它还算不上是一门科学，我们尚未总结出一般性智力理论。目前仅有一种学习理论，但这个理论仅限于监督学习，它为我们设定了可能性的极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大脑运作机制的细节，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正确的自监督学习的方法，尽管自监督学习正是它自己的本质特征。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智力理论吗？可以学习的机器会发展出智能科学吗？

发现智能工作的潜在机制和原理，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人工方面都是我未来几十年的研究规划。

结语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趟人工智能之旅的尾声。

我觉得这更像是一场山地赛跑，而不是一次悠然漫步。我丝毫不想掩饰这趟旅程的艰辛，对那些不熟悉这个“新宇宙”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试图让它更易于理解。

人工智能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正在成长之中，但它改变社会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既是一个理论体系——拥有不断延展的边界；又是一个实际的现实——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忽略它自身的逻辑。但是自少年时起，我一直与这个充满连接的“宇宙”保持着密切联系。相关理念的历史和起源使我着迷，而且我也想分享这一切。

这关乎新的想法和探索。从在我之前开拓新天地的先驱者身上和现在选择分享其进展的科学界那里，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群痴人，受同样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驱动，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否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可能吧，因为它的边界在不断延展。

我们也是一群被命运选择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领域更感兴趣，而不是另一个领域？很早的时候，我就对智能、人类和动物感兴趣，并痴迷于将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应用于机器中。“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生命是什么？”“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在这些我们这个时代的宏大科学命题中，我秉持工程师的精神——工程师只有在构建完一个系统时才会真正理解它——选

择去探索最后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试图追溯过往，因为它有着电子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法则的烙印，它被探寻的渴望所羁绊，它充满了童年的印记；剩下的则是运气、相遇……以及工作。

我承认，这是一项苦行僧式的工作，它需要我们长时间待在计算机前，去构想还不存在的算法和架构。我们需要睡觉，需要放空自己，但这种补充体能的休息时间太少了。

我确信应该坚持发展神经网络并坚信神经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但这需要极大的信念和意志力。

我想继续这项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它将是未来多年的研究目标。

本书也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什么是局限性呢？机器是出色的执行者，是一个天才，它的表现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离复制出真正的人类智能和动物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神经网络具有精巧的架构，但它没有一丝意识，也没有一丁点儿意识。

然而，也许明天一切就不一样了。我认为“意识”是一种涌现属性，是智能的必然结果。对于深度学习，我们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们的模型变得越来越高效。有朝一日，当机器达到某一精密的水平之时，它就会产生意识。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呢？科学家一致认为，人类的大脑只不过是一个了不起的生物机器，是目前各种生物机器中的佼佼者。正是它，也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作。但是，机器已经在帮助我们工作。而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否只能理解我们自己的系统所发现的东西？

但是，不要害怕被机器超越。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已经习惯自己的生理和心理能力被其他工具超越了：打磨过的石头和刀具

比牙齿更坚硬；耕畜、拖拉机和挖掘机比我们的体力更强；马、汽车、飞机比我们的双脚移动得更快；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比人脑更快。技术发现提升了我们自身的能力，机器智能也将延展人类智能。

就像其他技术革新的时代一样，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我们的时代。它可能应用于进步服务，也可能不会，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于我而言，我相信人工智能具备大大改善我们生活的能力，但我也相信它有制造问题的能力。对认识自我的渴望驱动着我们对机器智能的探索与追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对人脑的研究相辅相成。因此，人工智能也是未来几十年我们要面临的一项巨大的科学技术挑战。

术语表

算法 待执行的指令序列。这些指令包含数学运算、测试和循环等，通常由计算机执行。请勿与下列术语混淆：

-代码：指计算机语言编写或规范的算法。

-程序：指执行特定任务的一段代码。

-软件：指构成应用的程序合集。

机器学习 不使用显式编程训练系统的一套系统。在监督学习中，训练系统基于输入和相应输出的示例来完成一项任务。在强化学习中，系统借助实验和错误，通过与环境交互得到训练。在无监督学习和自监督学习中，系统发现输入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不需要为执行某一特定任务而接受训练。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梯度下降使一个目标函数最小化。

深度学习 一套适用于相互连接的参数化模块的网络（或图形）的学习方法。通过梯度下降，学习能修改模块参数。梯度通常由反向传播获得。深度学习的一个示例是训练多层神经网络。

架构 参数化模块的互联结构。这种结构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带有参数的数学函数或者一种计算图，后者由表示操作的节点和表示变量或参数的连接构成。识别图像或者理解文本的架构可以包含数百万或数亿个参数。工程师决定架构，卷积网络、递归网络和转换网络都是架构中的一种。架构独立于训练，训练是控制系统参数调整的程序。

编译器 将工程师编写的程序转换为可由机器直接执行的指令序列的软件。

ConvNet参见“卷积网络”相关内容。

卷积 滤波的数学运算。卷积网络使用离散卷积运算，后者包括计算一个窗口（一部分图像或者任意信号）的加权和，并使该窗口在整个输入信号（如图像）上滑动，同时把结果储存在输出信号中。所有窗口的加权和权重是相同的。如果输入信号被翻译，则输出信号也会被翻译，但其他方面保持不变。卷积可以检测一个模式，而不用考虑其在输入信号中的位置。

隐藏层 在多层网络中，输入层和输出层被称为“可见”，其他层为“隐藏”，因为它们不能从外部直接观测到。在训练中，最后一层的期望输出是特定的，但不包括隐藏层的输出。确定隐藏层的输出是深度学习的难点，这是信用分配的问题。

Deep learning参见“深度学习”相关内容。

FLOP（floating point operation），浮点运算“浮点数”运算是计算机中由固定位数（尾数）和小数点位置（阶码）表示的数字的乘法或加法。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32位浮点表示，其中尾数为24位，阶码为10位。一些深度学习的软件和硬件使用16位浮点表示，以加速运算并减少内存流量。

函数 由一个或多个输入产生一个或多个输出的数学运算序列。一个函数族或一个模型，是一个取决于一个或多个参数的函数。模型的架构是参数化函数的一个示例。

成本函数 测量模型行为和期望行为之间差异的函数。在监督学习中，成本函数是模型输出和训练样本的平均期望输出之间的差异。学习过程试图寻找可以产生成本函数最小值的参数值，

即最小化成本函数。

GFLOPS (giga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 每秒千兆浮点运算 衡量处理器速度的单位, 相当于每秒10亿次浮点运算。1 GFLOPS = 1000 MFLOPS。

GOF AI (good old-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好的老式人工智能 基于逻辑、规则和搜索算法的传统人工智能方法, 因为它们在机器学习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应用了。

梯度 对于一个多元函数, 梯度是一个在任意点上都指向最大斜率方向的向量, 其长度等于此斜率。梯度向量的分量是函数在当前位置的偏导数, 即函数在各轴方向的斜率。

ImageNet 由美国学者开发的用于图像中物体识别的计算机视觉研究数据库。最常使用的ImageNet-1k包含130多万张训练图像, 它们被标记为表明其所包含的主要物体的类别, 共计约1000个类别。从2010年开始, ImageNet还指代图像识别软件的年度竞赛, 即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 (ILSVRC) 。

Machine learning参见“机器学习”相关内容。

MFLOPS (mega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 每秒百万浮点运算 衡量处理器速度的单位, 相当于每秒100万次浮点运算。

神经认知机 (Neocognitron) 日本研究员福岛邦彦设计的模式识别机器, 受大卫·休伯尔和托斯坦·威泽尔的视觉皮层架构研究的启发。神经认知机由两个阶段构成, 每一阶段都包含一个与视野的一小块区域相连的简单细胞层, 下一层是集成了上一层激活信息的复杂细胞层, 后者具有相对于小的变形的不变性表征。福岛邦彦一共发布了两个版本: 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机

(Congitron) 和80年代的神经认知机。

字节 包含8个比特位 (bit) 的计算机内存单元，可代表256个不同的值。计算机内存通常以字节的倍数衡量，如千字节 (kB)、兆字节 (MB)、千兆字节 (GB) 和太字节 (TB)。太字节代表大约1万亿字节，即 2^{40} 字节。

卷积网络 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架构，在自然信号识别方面十分有效，如图像、体积图像 (如MRI)、视频、语音、音乐及文本。它穿插了多层卷积、非线性运算和池化运算。卷积网络被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医学图像分析系统、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等。

多层神经网络 多层人工神经元组成的堆栈，每一层的输入神经元都与上一层的输出神经元相连。每个神经元都由线性函数构成，其输出为输入的加权和，之后是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该激活函数可以是一个平方、一个绝对值、一个sigmoid函数 (S形函数) 或者一个ReLu函数。多层神经网络会学习、修改加权和的权重。通常使用梯度下降训练这些网络，梯度通过反向传播计算。

梯度反向传播 计算成本函数相对于深度学习系统内部变量的梯度的方法。给定一个代表系统架构的计算图，梯度逐步向后传播，从输入到输出。这是一个自动微分的应用。使用梯度来调整架构的参数，以期最小化成本函数。

语义分割 标注图像中每个像素所属的对象类别。

TFLOPS (tera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每秒万亿浮点运算 衡量处理器速度的单位，相当于每秒1万亿次浮点运算，即1000 GFLOPS。

致谢

感谢我的各位老师和导师，他们在我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为我提供了指导，他们是：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苏利耶、莫里斯·米尔格朗、杰弗里·辛顿、拉里·杰克尔和拉里·拉比纳。

感谢与我一起工作并教会我许多东西的朋友，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本书的研究成果，他们是：莱昂·博图、约书亚·本吉奥、帕特里克·哈夫纳、帕特里斯·西马德、伊莎贝尔·居永、罗布·弗格斯、弗拉基米尔·瓦普尼克、让·蓬斯、帕特里克·加利纳里，AT&T贝尔实验室自适应系统研究部及实验室研究部图像处理分研究部的所有成员，我在纽约大学计算智能、学习、视觉和机器人实验室（CILVR）的同事，以及FAIR的所有成员。

感谢博士后阿尔弗雷多·坎齐亚尼、贝南·内沙布尔、巴勃罗·斯普雷奇曼、安娜·霍罗曼斯卡、琼·布鲁纳、杰森·罗尔夫、汤姆·绍尔、卡米耶·库普里、阿瑟·斯拉姆、格雷厄姆·泰勒和卡罗尔·格雷戈尔，以及博士生张翔（音译）、杰克·赵、米卡埃尔·埃纳夫、迈克尔·马蒂厄、张思欣（音译）、沃伊切赫·扎伦巴、罗斯·戈罗申、克莱芒·法拉贝特、皮埃尔·塞尔马内特、Y-兰·博罗、凯文·贾雷特、科拉伊·卡武库奥卢、皮奥特·米罗夫斯基、艾谢·纳兹·埃尔坎、马尔考雷利奥·兰扎托、马修·格兰姆斯、黄福杰（音译）、苏米特·乔普拉、拉亚·哈塞尔、冯宁（音译）。教书育人的满足感之一就是能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合作，见证他们的成长，陪伴他们开启自己的事业。

感谢马克·扎克伯格、迈克·斯科洛普夫和热罗姆·佩森蒂的支持。

感谢奥迪勒·雅各布说服我，让我开启创作本书的冒险之旅。

感谢我的助理罗西奥·阿劳霍，没有他，我的生活可能会陷入混乱。

特别感谢在本书写作中与我合作的伙伴——记者卡罗琳·布里萨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写作本书。我们经常通过视频通话，有时甚至很晚的时候还在工作。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这进一步削弱了我本已薄弱的法语写作能力。多亏卡罗琳对工作的孜孜不倦和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使这本书不仅易于理解，阅读体验也很好。

感谢我的父亲让-克洛德，他培养了我对科学、科技和创新的兴趣，我和我的弟弟贝特朗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感谢我的妻子伊莎贝尔时刻支持我，允许我写作期间不用在周末和节假日参与家庭活动。我偶有分心和迷茫，但我始终相信她，以及我们的儿子和儿媳——凯文和西蒙娜、罗南、埃尔文和马戈，他们总能让我想起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 / (法) 杨立昆著；李皓，马跃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9

ISBN 978 -7-5217-3239 - 9

I. ①科... II. ①杨... ②李... ③马... III. ①人工智能 - 研究 IV. ① TP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12800号

Quand la machine apprend by Yann Le Cun

Copyright © 2019 ODILE JACOB

Photograph copyright © DRFP/Odile Jacob.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

著者：[法] 杨立昆

译者：李皓 马跃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74千字

版次：2021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3656

书号：ISBN 978—7—5217—3239—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Stakeholder Capitalism

【德】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比】彼得·万哈姆 (Peter Vanham) 著
思齐 李艳 译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克劳斯·施瓦布

关切
人类和地球命运
构建
全球经济新模式

利益 相关者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倾情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利益相关者

[德]克劳斯·施瓦布 [比]彼得·万哈姆 著
思齐 李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01 我所成长的世界

第一章 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75年

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

西方世界的辉煌三十年

跌宕起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转折时刻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

体制的崩溃

第二章 库兹涅茨的诅咒：当今世界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唯GDP论”

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不平等

第三个库兹涅茨诅咒：环境

第三章 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经济特区

前进的代价

紧随中国而起的新兴市场

印度的增长

放眼全局

第四章 分裂的社会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中间派政治势力的削弱

社会动荡

从分裂的社会中吸取教训

02 进步和问题的驱动因素

第五章 全球化

早期萌芽与“香料之路”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纪至1914年）

第二波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4.0

今天的全球化

第六章 技术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工业革命以前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七章 人与地球

03 利益相关者模式

第八章 利益相关者概念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发展历史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原则和信念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实践

第九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企业层面

第十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国家、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西兰

国家政府的关键任务

新加坡作为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典范

新西兰与“唯GDP论”的破除

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

结语 通往利益相关者模式之路

致谢

前言

2020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日内瓦，正与一位同事相对而坐，讨论这本书。这时，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时刻堪称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新冠纪元前（AC）与新冠纪元后（BC），人类的关注点就此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时代转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现实。

在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我和同事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不平等问题。自二战结束至今已有75年时间，自世界经济论坛成立至今已有50年时间，我对于在此期间所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究当前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优势、弊端以及需要进行的权衡等，思索在未来50年或75年里我们需要对该体系做出何种改变才能确保它对后代而言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

但就因这通电话，这一长期议程被彻底颠覆了。我开始将研究焦点转移，转向我们所有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人所即将面临的直接危机。

位于电话那端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通常情况下，这类通话所探讨的都是一些常规事务，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些既定倡议和计划的进展情况。但这次不同往常。这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是为了向我汇报那个冬季对中国造成猛烈冲击的一场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这种会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最初仅出现在武汉市内，但后来迅速蔓延，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据我们在北京的同事解

释，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期间，北京大部分人口都回到位于全国各地的家乡庆祝春节。春节过后，各地人员返京加剧了病毒的蔓延，北京最终采取了封禁措施。

我的同事冷静地向我说明了一些客观情况，解释了封禁措施对于我们的员工以及机构的运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从他的声音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甚至是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都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受到封禁措施的限制。当局采取了强力的防控措施。员工被迫无限期在家办公，想要走出家门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旦有人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就要立即接受病毒检测，同时会被隔离起来。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如此强力的防控措施，也无法保证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能够得到控制。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人们即使待在家里，也不免担心会感染病毒。与此同时，从医院传出的消息是，这种疾病来势汹汹，难以治愈，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在瑞士，早在2020年1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办时，我们就已经对导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所耳闻。在年会上，当来自亚洲的参会者以及那些主要业务活动在亚洲的参会者探讨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时，该疫情便成为一个话题点。但我一直寄希望于这场疫情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扩散的范围不会太广，就像当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被称为“非典”）疫情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一样得到控制，寄希望于它不会对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直到我接到那通电话。

这通电话改变了我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的理解。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我停止了这本书的创作工作，整个世界经济论坛都

进入了危机模式。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办公，并且集中全部力量协助应对此次国际紧急事件。所幸我们的行动还不算太晚。一周后，疫情就蔓延至欧洲，迫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实施封禁；几周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陷入类似的境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或重病住院，上亿人失去了工作或收入，还有无数企业和政府或已经破产，或名存实亡。

我于2020年秋写下这篇序言。此时，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紧急状态已经基本消退，但新一波感染浪潮使世界再次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世界各国正谨慎地恢复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但经济复苏非常不均衡。中国是首批结束封禁、恢复商业运营的主要国家之一，甚至有望在2020年全年实现经济增长。与之相比，在世界经济论坛其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日内瓦、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公共生活虽已部分恢复，但形势还非常不稳定。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计；数十亿美元被消耗，以维持人们的生活以及企业和政府的运转；原有的社会分歧有所加剧，同时又有新的分歧显现。

截至目前，随着最初的危机逐渐退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带来的影响与我们已经识别出的现有全球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想法将我带回2020年2月接到那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之前，我正在与人探讨的问题。我们之前所做的许多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现实。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这些分析。我将在本书中呈现自己对于以下问题的观察：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增长的放缓、生产力增长的乏力、债务水平的不可持续、气候变化的加速、社会问题的深化，以及在应对世界上最具紧迫性的挑战时全球合作

的缺乏。我希望你们同样能够认识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些观察的有效性丝毫未减。

不过，在“新冠纪元前”与“新冠纪元后”之间的过渡时期，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我注意到，民众、商业领袖和政府都更好地认识到，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有一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那就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后疫情时代。相比气候变化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渐进式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突如其来且横扫一切之势，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平衡的、脆弱的，会增加社会、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一旦危机来袭，公共体系就将被置于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

在这本书中，我将论证，我们当前这个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逃避税收和监管、环境危害的外部化等自利动机驱动的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持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旨在关切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社会、经济体和国际社会。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从过去50年西方世界盛行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和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经济发展体制，转向“利益相关者”体制。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紧接着，我展示了如何构建这样一种经济发展体制，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做。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概括性地梳理了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和亚洲的经济发展史，探讨了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比如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也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给后代留下了巨额债务。该部分还探究了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等社会趋势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第二部分（第五章至

第七章)深入挖掘了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背后可能的驱动因素,审视了技术创新、全球化和贸易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问题。第三部分(第八章至第十章)探讨了我们的全球经济体制可能发生的转变,给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定义,并展示了在具体实践层面该模式对于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整本书中,无论是呈现我们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并且探讨这些问题可能的原因及结果时,还是提出我认为有助于打造未来更美好世界的解决方案时,我都尽力做到公正、客观。但我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都仅仅是个人观点,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影响。我在本书第一章中谈到自己在儿童时期、学生时期以及初入职场时的一些成长经历。我希望这些描述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的世界观。我坚信,无论是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最优的成果都来源于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或是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无论你是谁,我都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有所启发,促使你积极投身这一体制的构建。通过合力打造一个以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平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转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后续影响。尽管这场疫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口死亡,对人们的生命与生计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通往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我希望,后疫情时代之于我们的后辈,正如同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之于我父母那一代人——那是一个团结的时代,人人都以刚经历的那段历史为戒,牢牢抓住当下和未来的时机,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繁荣的世界。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内层面,我们致

力于重建社会契约——比如，欧洲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致力于打造“伟大社会”。在国际层面，我们创建了一个多边体制，旨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还构建一个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机构在内的国际金融体系。

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借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之势，在国家层面实施利益相关者模式，同时在国际层面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制。

感谢你抽出时间阅读本书！

克劳斯·施瓦布

2020年12月于日内瓦

01 我所成长的世界

第一章 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75年

自二战结束至今，已过去75年。在这75年里，全球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尽管如此，现实世界依然在上演“双城记”。

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几乎从未像今天这般富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时局相对和平，经济水平称得上绝对富裕。与先辈们相比，多数现代人的寿命更长，且身体健康水平普遍提升。我们的子女可以接受学校教育，甚至普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的发明，使我们可以与整个世界相连。哪怕只往前追溯一两代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如今许多人所享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全球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奢侈享受，于他们而言都还是梦想。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和公民社会所充斥的不平等现象令人沮丧，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性更是散发着危险的信号。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平等，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健康危机事件中所暴露的不平等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例证。那些经济条件更好、人脉关系更广、生活在富人区的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概率要比其他人低得多，因为他们更有条件实现居家办公，更容易远离人口密集的区域，而且一旦感染病毒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而这不过是众多社会早已习以为常的模式延续。面对全球性危机风暴，穷人一次又一次饱受冲击，而富人总是能够轻松应对。

我们是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要如何摆脱当下的境况？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过去，追溯全球经济体系的起源。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战后世界经济图景，关注那些里程碑事件。从逻辑上看，故事的起始时间应该是现代世界经济的“零年”，也就是1945年；最佳的起始地点则应该是德国。对于德国来说，这一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起点。

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

在德国，像我这一代人，在1945年时刚上小学。那时的我们还太小，不明白自己所在的国家之前为何会卷入战争，也不明白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何会经历那般剧变。但我们都很清楚，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就如同在一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德国举国上下回荡着一句口号——“永不再战”（NieWieder Krieg）。人们已经受够了战争的蹂躏，渴望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携手打造更好的生活。

无论是对于德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都绝非易事。当二战终于结束时，整个德国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在德国主要的城市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建筑不足1/5，数以百万计的房屋被摧毁。在我的家乡——德国南部的士瓦本地区，情况也不例外。在该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腓特烈港，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被夷为平地，其中就包括两家传奇企业——汽车制造商迈巴赫和飞艇制造商齐柏林的工厂。在二战期间，它们都被纳粹政府征用，用于生产军备物资。

我最早期的记忆之一，就是站在父母家的房顶上，眼见18公里之外的腓特烈港在一次次的交火中被摧毁。我们祈祷自己所在的小镇不会遭到突袭，所幸我们的愿望成真。然而，光是针对腓特烈港发动的最后一次突袭，就导致700人丧生。我至今依然记得父母在听到这则新闻时悲恸落泪的场景，他们与这座相邻城市中的许多人都有来往。腓特烈港原有28000名居民，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不到1/4，[\[1\]](#)其余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人就此

失去行踪。

当时我所在的地方名叫拉芬斯堡，是为数不多的侥幸逃过盟军轰炸的城镇之一。这很可能是因为拉芬斯堡不具备军工生产能力。但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着这个城镇。当战争接近尾声，法国盟军进驻这里时，拉芬斯堡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避难所，大批国内难民、强制劳工、战俘和伤员纷纷流入。^[2]整个城镇彻底陷入混乱。1945年5月8日午夜，仅有的一线希望降临——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德国，我们把这一时刻称为“零时”（Stunde Null）。包括伊恩·布鲁玛在内的历史学家则将紧接着的这一年称作“零年”。^[3]此时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它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有机会在这片废墟之上改过自新、从头开始。

同为轴心国集团主要成员的意大利和日本，与德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战后，所有轴心国的生产能力均被严重削弱。都灵、米兰、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遭受了猛烈的轰炸，广岛和长崎则尝到了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空前破坏力。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因饱受炮火袭击而一度陷入混乱。若将视线转向远东，便可看到此时中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深陷内战的泥淖。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依然未能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各经济体基本上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场战争。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和苏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引领战后局势。战后的德国被盟军分区占领，士瓦本所属区域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中。

此时的美国面临着一项艰难的权衡。一战后，于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使作为战败方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抑制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导致其无法走上稳定的经济复苏之路，从而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决意不再重蹈这一覆辙。

二战后，美国采取了不同以往的举措。它希望重振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地区的经济，其中包括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占领下的德国领土。在这些区域，美国旨在促进贸易发展，推进一体化进程，实现政治合作。早在1944年，美国及其盟国就已着手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如今世界银行的成员机构之一）等经济机构。^[4]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们持续努力，致力于在联邦德国和整个西欧地区打造一个稳定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体制。

从1948年起，美国和加拿大还提供了具体的区域性援助。美国出台了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命名的“马歇尔计划”，旨在帮助西欧国家（其中包括德国和意大利）采购美国商品，重建工业产业。向之前的轴心国提供援助，这一决定虽充满争议，但仍被认为是必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失了德国这一欧洲工业发展的引擎，欧洲的富强与工业化发展就无从谈起。（经合组织的前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是该援助计划的重要执行机构之一。）

除了提供援助之外，美国还采取了其他举措。它通过在欧洲打造一个煤炭、钢铁和其他大宗商品的统一市场来鼓励贸易发展，这促成了当前欧盟的雏形——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成立。在亚洲，美国也向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国家提供了援助和信贷。在其他地区，苏联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推动建立了一种以中央计划经济和生产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在德国的战后重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产业和工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1947年，齐柏林基金会将其旗下几乎所有资产都转移至腓特烈港，[5]以期帮助齐柏林飞艇公司及其工人重燃希望，共同打造一个繁荣的未来。与此同时，腓特烈港的市民加班加点地工作，只为重建家园。其间，女性贡献出了非比寻常的力量，参与了许多最初的重建工作。德国《明镜》周刊后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称：“由于大量男性在战争中丧生，盟军要依赖女性来从事艰苦的战后清理工作。”[6]

玩拼图游戏时，我们需要把每一块拼图都放在恰当的位置，才能最终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片。重建工作也是如此，它需要充分利用每一种资源，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力量。对于整个德国社会来说，重建工作是重中之重。在拉芬斯堡，有一家生产拼图和童书的家族企业，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它甚至直接更名为“拉芬斯堡人”（Ravensburger，在中国被翻译成“睿思”）。[7]战后，该企业继续从事拼图和童书出版业务，并且一直经营至今。在腓特烈港，齐柏林基金会旗下子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采埃孚（ZF）东山再起。像采埃孚这类企业一般都是以中小型企业起家，德国正因这些中小型企业著称，它们构成了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德国战后经济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 70 Jahre Kriegsende, Schwabische Zeitung, Anton Fuchsloch, May 2015, (in German) <http://stories.schwaebische.de/kriegsende#10309>.

[2] Wie der Krieg in Ravensburg aufhört, Schwabische Zeitung, Anton Fuchsloch, May 2015, (in German) <http://stories.schwaebische.de/kriegsende#11261>.

[3]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Ian Buruma, Penguin Press, 2013,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books/307956/year-zero-by-ian-buruma/>.

[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pdfscache/1488.pdf>.

[5] Friedrichshafen, History of the Zeppelin Foundation, <https://en.friedrichshafen.de/citizen-city/zeppelin-foundation/history-of-the-zeppelin-foundation/>.

[6] Der Spiegel, A Century-Long Project, October 2010, <https://www.spiegel.de/fotostrecke/photo-gallery-a-century-long-project-fotostrecke-56372-5.html>.

[7] 该企业初建时名为奥托·迈尔出版公司 (Otto Meier Verlag) , 是以其创始人奥托·迈尔的名字命名, 后来改名为“拉芬斯堡人”。

西方世界的辉煌三十年

对于许多生活在欧洲的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场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宽慰之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我们就陷入了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之中。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所采取的是自由市场模式，而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所采取的是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这两种模式产生了冲突。究竟哪种模式会占据上风？两种模式是否有可能和平共存？还是说两者之间终将爆发正面冲突？唯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那时候，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地区的人，都不清楚结局将会如何。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地缘政治霸权之争。在几十年里，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的体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均上演了同样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

回过头来看，我们意识到美国基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为即将到来的空前的共同繁荣时期打下了基础。再加上许多西方民众都有重建家园的强烈意愿，这一切都为西方接下来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西方在经济领域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做好了准备。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最初也取得了成效，并实现了初期的繁荣，后来却走向崩溃。

除了经济格局的转变，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多个地区均出现了婴儿潮。劳动者从为满足虚无主义需求的战时生产转向和平时期的社会生产

工作。教育和工业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各国政府首脑（比如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二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的领导力，也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他们自身和他们所领导的政府都致力于以一种包容的方式重建本国经济和社会，与盟国建立牢固的关系，以实现持久的和平。他们没有屈服于复仇情绪，在一战后，这种情绪曾占据上风。国家重心被放在社区和经济重建上，社会凝聚力有所增强（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从1945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及最初的苏联）也经历了类似的繁荣。西方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各地高速公路网络的建成使汽车和卡车运输更加便利，商业飞行时代已经开启，纵观全球各地的海上航线均可见到集装箱船的影子。

在士瓦本，经济奇迹同样带来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拉芬斯堡人”的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这促使该企业于1962年开始进入大规模工业生产阶段。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孩子渐渐长大，像“莱恩河之旅”（Rheinreise）这样的家庭桌游开始大受欢迎。^[1]20世纪60年代，“拉芬斯堡人”将拼图游戏引入其产品线，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2]（该品牌的商标，即印在产品包装盒一角的一个蓝色三角形，当时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同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位于腓特烈港的采埃孚公司作为汽车变速器制造商回归市场，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入自动变速器，丰富了其产品种类。^[3]在欧洲汽车行业蓬勃发展时期，它助推了宝马、奥迪、奔驰、保时捷等德国汽车制造商

成为行业领导者。（时至今日，采埃孚依旧运营得十分成功，其2019年的全球营收超过400亿美元，在全世界拥有近15万名员工，业务范围遍及40多个国家。）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指标来看，似乎人人都是赢家。有些国家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高达5%、6%，甚至7%。GDP（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之和，它通常被用作一国经济活动的衡量指标。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有些西方经济体的GDP增长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中教育，获得了体面的工作，从而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婴儿潮一代中，有许多人成为整个家族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摆脱了原属阶层，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断提升。

对于女性来说，实现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提升则还要考虑另一维度。在西方社会，女性解放的进程最初十分缓慢，后来才渐趋平稳。其间，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并且可以一直留在职场，更有意识地平衡工作与生活。这一方面要归功于经济的繁荣为女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医疗避孕技术的进步、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例如，1950—1970年，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大约28%上升至43%，增幅达15%。[\[4\]](#)德国的大学生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1948年的12%，增至1972年的32%。[\[5\]](#)

在“拉芬斯堡人”内部，女性也开始走到台前。自1952年起，该公司创始人奥托·迈尔的孙女多萝特·赫斯—迈尔与她的堂兄奥托·尤里乌斯共同执掌企业，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女性掌门人。其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趋势。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女性解放运动持续推进，直至进入21世纪。2021年，

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沙特阿拉伯，大学生中的女性占比都已经超过男性，[6]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占比已经接近50%。尽管如此，在薪酬和其他领域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现象。[7]

在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将其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巨额财富用于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在西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了失业补贴、儿童抚养与教育补助、全民医保和养老金。在美国，亲社会性政策没有像在欧洲那么流行。但由于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计划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保障资金也越来越充裕，尤其是在1950—1970年这20年间，这种趋势更甚。[8]居民收入中位数急剧攀升，贫困率明显下降。

在法国、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得到推广。例如，在德国，根据1952年《企业委员会法》的规定，大多数企业的监事会中必须有1/3的成员由工人选出。家族企业不受该法限制，因为这类企业中的劳工群体和管理层之间通常关系密切，社会冲突相对较少。

成长于这一黄金时代的我，对于当时美国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战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极为欣赏。我深信，经济合作和政治一体化是打造和平与繁荣社会的关键。我曾分别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并慢慢意识到，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终有一天会消失。在20世纪60年代，我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管理模式。这段经历为我之后的一切打下了基础。

一个团结统一的中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各国逐渐发展起来，我

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都受益于此，我也不例外。很早的时候，我就对企业和政府在塑造国家未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互补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我的一篇毕业论文探讨的就是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之间的平衡问题。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在不同企业的车间一线工作，亲身体验了真正的体力工作，并对工人阶级在经济财富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产生特别的敬意。我认为，企业和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样，在创造和维持共同繁荣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我认为，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最佳途径是采用利益相关者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企业不光要服务于股东的利益，还要服务于社会。

我决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具体方式是通过组织一场管理论坛，让企业领袖、政府代表和学者齐聚一堂。坐落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瑞士达沃斯小镇，在维多利亚时代曾作为肺结核患者的疗养胜地而著名（那时候，异烟肼和利福平[9]等治疗结核病的抗生素还未面世）。在我看来，它非常符合人们口中的地球村[10]的设定。在这个海拔较高、风景如画、空气清新的地方，参会者可以交流彼此的成功经验、最新理念，就有关全球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迫切问题进行沟通。鉴于此，我于1971年在那里组织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首届会议，参会嘉宾有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乔治·皮尔斯·贝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芭芭拉·沃德、IBM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雅克·迈松鲁热，还有欧盟委员会的数位成员。[11]

[1] 基于2019年8月对海因里希·亨特利曼和特里斯坦·施文森进行的采访。

[2] Ravensburger, About Ravensburger, <https://www.ravensburger-gruppe.de/en/about-ravensburger/company-history/index.html#1952-1979>.

[3] Heritage, ZF, https://www.zf.com/mobile/en/company/heritage_zf/heritage.html.

[4] Our World in Data, Working women: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https://ourworldindata.org/female-labor-force-participation-key-facts>.

[5] Kompetenzzentrum Frauen i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Entwicklung des Studentinnenanteils in Deutschland seit 1908, <https://www.gesis.org/cews/unser-angebot/informationsangebote/statistiken/thematische-suche/detailanzeige/article/entwicklung-des-studentinnenanteils-in-deutschland-seit-1908/>.

[6]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Saudi Arabia, World Bank,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locations=SA>.

[7]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key-findings/>.

[8]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s://www.ssa.gov/history/briefhistory3.html>.

[9] Tuberculosis Treatment, Mayo Clinic,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tuberculosis/diagnosis-treatment/drc-20351256>.

[10] “地球村”这个词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思想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最先提出的。

[11]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 Partner in Shaping History, 1971–2020,” p.16,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A_Partner_in_Shaping_History.pdf.

跌宕起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奇迹显然已经无法持续太久。当我们齐聚达沃斯时，体制性裂痕已经浮出水面。战后的繁荣已经趋于平稳，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逐渐显现。但我寄希望于，通过更积极地学习美国成功的管理经验，欧洲的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可以继续刺激欧洲大陆的繁荣。

事实上，许多欧洲企业确实向邻近的国际市场迈出了一步。欧洲煤钢共同体，顾名思义，是一个致力于打造几种关键资源的共同市场的机构。前些年，它发展成为涵盖范围更广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该机构的成立使得商品和服务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更自由地流通。许多中小型企业利用这一机会，纷纷建立分支机构，将产品销往邻近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正是由于区域内贸易的增加，欧洲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持续。

但一些会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变量，比如能源价格，在这一时期并不利好。石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曾与煤炭共同推动了战后经济的繁荣，但它也给经济带来了第一次系统性冲击。石油价格于1973年上涨了三倍，并于1979年再次翻番，这是因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开始发力。当时，全球绝大部分石油供给都掌控在欧佩克成员手中。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欧佩克成员中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为了对抗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断在该地区扩张自己的领土），对包括美国和英

国在内的以色列西方盟友实施了石油禁运。事实证明，禁运措施非常有效。

欧佩克成员展示了其新获得的市场力量，这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欧佩克成员中有许多之前都是欧洲殖民者在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殖民地。在此前的20年里，它们好不容易获得了独立。在那个时代，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因深陷政治和社会动荡而国力损耗严重。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的许多新独立国家来说，欧美的经济繁荣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欧佩克成员则是少数例外，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资源——石油，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面对战后初期30年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取得的飞速发展，一些人发出了警示的声音，称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将需要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一种对于整个地球、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来说都更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这些声音有的就出自欧洲的科学家和罗马俱乐部的实业家，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当前世界的状况，尤其是地球环境的恶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确实，只要留心，任何人都能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征兆。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在1973年的达沃斯，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就该组织的一些研究结果发表了主题演讲，并提出了增长即将结束的警示。

不过，在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并采取了夏令时和无车日等节能措施之后，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回归增长趋势。尽管年均5%~6%的GDP增长率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此），但3%~4%的GDP增长率成为常态。包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则弥补了个别地方的增速不足。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是什么推动了战后经济的增长，人们的观点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战后初期，人们认为经济繁荣的成果离不开每个人的功劳，因此应由所有人共享。这是一种基于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业发展模式。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个人主义，国家干预或建立社会契约的作用被弱化了。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要求企业在做决策时不能只考虑直接的、基本的利益，还应该考虑员工和所在社区关心的问题。在最初几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与会者甚至通过一份《达沃斯宣言》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

1973年《达沃斯宣言》

A. 专业化管理的目的是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服务，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

B. 1. 管理者必须为其客户服务。他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为客户提供最佳价值。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确保客户能够获得最佳价值选择的常见、公认的方式。管理者的目标是将新的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

2. 管理者必须为其投资者服务，要为投资者提供高于政府债券的投资回报率。这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必要将风险溢价纳入资本成本。管理者是股东的受托人。

3. 管理者必须要为其员工服务，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领导者必须要把被领导者的利益考虑进来。特别是，管理者必须确保员工的持续性、员工实际收入的提升和工作场所的人性化。

4. 管理者必须为社会服务。他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暂时受托管理这个物质世界，终有一天要将其交到子孙后代手中。他必须以最优的方式支配自己手中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他必须在管理和技术领域持续拓展知识边界。他还必须确保自己的企业向社区缴纳适当额度的税款，以帮助社区达成其宗旨。管理者还必须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向社区分享。

C. 管理者可以通过所负责的经济企业来实现上述目标。为此，管理者必须确保企业能够长期存在。企业要想长期存在，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因此，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是管理者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服务的必要途径。

然而，尽管《达沃斯宣言》及其所倡导的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最初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致，但以股东为中心的狭隘范式还是占了上风，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以股东为中心的理念是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0年首次提出，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2]，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超越一切。（本书第八章将对这一点进行详细探讨。）

这种情况导致了增长的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增长所惠及的人群越来越少，而且这种增长是以对地球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代价的。工会的规模开始缩小，集体谈判制度的推行也不如之前那么普遍（不过，直到21世纪，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依旧坚持实施集体谈判制度，比利时到今天依然如此）。西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英国和美国，开始走上大规模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之路，坚信“无形的手”会引领市场实现最优。许多其他的西方国家步它们的后尘，其中有些国家是在左派政权重启经济增长的尝试宣告

失败后才走上这条道路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个人电脑被发明出来，之后便成为每个组织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1] The Davos Manifesto, 1973,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2/davos-manifesto-1973-a-code-of-ethics-for-business-leaders/>.

[2] “A Friedman Doctrine—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Milton Friedma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70, <https://www.nytimes.com/1970/09/13/archives/a-friedman-doctrine-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business-is-to.html>.

转折时刻

上述趋势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欧各经济体日渐走向崩溃。值此工业化转型时刻，东欧经济体的失败表明，相比西方倡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苏联提出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缺乏弹性。中国则在新一届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于1978年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见本书第三章）。

1989年，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柏林墙被推倒，德国上下一片欢腾。不久之后，德国终于实现了政治统一。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原来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多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民主德国、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纷纷转向西方阵营，采纳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弗朗西斯·福山口中的“历史的终结”^[1]似乎已经到来。欧洲迎来又一波发展，进一步促进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还建立起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并确定欧元为统一货币。

在达沃斯，我们也感受到了这股变革之风。欧洲管理论坛的参与者最初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商界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它逐渐变成一个全球性论坛，还汇聚了来自中国、印度、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并制定了共同的全球性议程。到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这个名字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它转而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名字进入大众的视野。面对随之而至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

[1]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What Is Fukuyama Saying? And to

Whom Is He Saying It?”, James Atlas, October 1989, <https://www.nytimes.com/1989/10/22/magazine/what-is-fukuyama-saying-and-to-whom-is-he-saying-it.html>.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多年里，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国家之间开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前所未有地多样化。欧洲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而所谓的新兴市场，如韩国、新加坡，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当然还有中国等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崭露头角。（新兴市场并没有官方的定义，因为这是由某些私人金融机构所做的区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非西方经济体，并且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平均水平或是在过去数年里持续高于平均水平。按照这种趋势，它们步入或者重新回归发达经济体行列指日可待。）

就这样，全球化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经济力量。所谓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其标志是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日渐增多。以国际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来衡量，贸易的全球化在1945年，即“零年”，处于4%的最低点，到2001年时则已经攀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5%。

士瓦本的一些知名企业也成为这股全球化浪潮中的“弄潮儿”。“在采埃孚公司的发展议程中，中国是重中之重。”^[1]在该公司官网上有关公司发展历程的文字介绍中，采埃孚公司当时的杰出管理者西格弗里德·戈尔这样说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已开始发展业务关系，最初是通过许可合同的形式。到2006年我退休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不少于20个生产基

地。”根据该公司自己的记录，“第一家合资企业成立于1993年”，到1998年，“采埃孚在中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在中国成立第一家独资子公司成为可能，这就是采埃孚传动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然而，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一全球化的步子迈得太大，也太快。1997年，几个亚洲新兴经济体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至于危机爆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未受监管的金融全球化，或者说热钱流动。所谓热钱，是指会轻易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的国际投资资本。热钱流动为的是追逐更高的收益、更宽松的资本管制环境和实施股票投机活动。与此同时，在西方，随着跨国公司开始对国家经济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一场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兴起。

就连“拉芬斯堡人”也没有逃过被反噬的命运。1997年，该公司的管理层宣布，希望“制定一项‘生产基地保护协议’，作为‘维持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预防性举措’”，欧洲劳动生活观察站（EurWORK）在后来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中如此写道。^[2]所谓的《拉芬斯堡人协议》由此出台，根据该协议，公司向其员工提供就业保障，以换取员工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尽管大多数员工接受了这项协议，但劳资关系由此恶化。行业工会认为，这一协议违背了该行业的集体谈判协议，而且是不必要的，因为该公司的经济效益良好。这一引发激烈争辩的协议最终促使各方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此前在这家家族企业中力量通常较为微弱的工会，此时力量得到增强，管理层对待工会的态度也比之前更具建设性。

在德国，围绕经济增长、就业和前民主德国各州的一体化问

题，类似的社会和企业压力最终导致21世纪初期新的社会契约的形成，德国针对共同决策、“迷你工”^[3]和失业救助等问题制定了新的法律。但这一新的社会平衡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如之前有利，尽管之后德国再次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期。在其他的许多发达经济体，形势很快就变得更加不稳定。

第一个预警信号是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爆发的互联网股灾，当时美国的科技股暴跌。但是，接下来，2001年发生的另一事件对美国社会和国际经济体制造成了更大冲击。这一年，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这是自二战时期“偷袭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领土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攻击行动。位于曼哈顿的世贸双子塔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分别象征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心脏，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均被击中。

那一天，我也身在纽约，正因公出访联合国。那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陷入极度震惊与悲伤的情绪。这一事件带走了数千人的生命，美国瞬间陷入停滞。次年1月，我们把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会场搬到纽约，以示团结，这是我们首次在达沃斯之外的地方举行论坛年会。经历了互联网股灾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经济进入了衰退期。一时间，通过贸易和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变得岌岌可危。

不过，另一波经济增长的种子已经播下。采埃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就是一个例证。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步入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行列，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无力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并且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变身“世界工厂”，使数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在巅峰时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中国的这一发展进

程，也惠及了从拉丁美洲到中东地区、非洲的大宗商品生产者，以及西方消费者。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股灾的废墟之上，幸存的和新建的技术企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端奠定了基础。物联网等技术崭露头角，机器学习——现在被称为“人工智能”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并且取得迅速发展。贸易与技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再次回归。到2007年，全球化进程与全球GDP均达到新的高峰。但此时，全球化已经进入最后的狂欢。

[1] “Pioneers in China,”1993, ZF Heritage, zf.com/mobile/en/company/heritage_zf/heritage.html.

[2] Eurofound, “Pacts for Employ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Ravensburger AG,” Thorsten Schulten, Hartmut Seifert, and Stefan Zagelmeyer, April 2015,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es/observatories/eurwork/case_studies/pecs/pacts-for-employment-and-competitiveness-ravensburger-ag-0.

[3] “迷你工”，即月收入不超过450欧元的临时工。——编者注

体制的崩溃

从2007年开始，全球经济开始恶化。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疲软。美国首当其冲，一场住房与金融危机引发了持续数个季度的大衰退。欧洲紧随其后，从2009年开始深陷债务危机，并且持续了数年时间。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状况都介于两者之间——在2009年遭遇经济衰退，随后的10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3%。（具体来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些经济体在2011年和2019年处于2.5%的低点，在2017年达到3.3%的高点。[\[1\]](#)）

随着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生产力增长日渐乏力，缓慢增长似乎成为新常态。许多西方人陷入工作报酬低且缺乏保障的困境，而且对未来彻底绝望。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指出，世界债务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2\]](#)20世纪70年代，公共债务水平曾达到高位。2020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已经接近当时的水平，甚至创下新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度《财政监测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20%，一年内增长了15%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则（从2019年的50%多一点儿）飙升至60%以上。[\[3\]](#)

最后，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开始质疑，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究竟是否有意义。根据全球足迹网络[\[4\]](#)的调查，[\[5\]](#)上一次全球经济的发展没有以“透支”地球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还是在1969年时。5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生态足迹比以往任

什么时候都要大，因为我们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是地球资源再生速度的1.75倍。

所有这些宏观经济趋势、社会趋势和环境趋势都反映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及国家政府所做决策的渐进效益中。已经从战争、贫困和废墟中走出来的社会，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现实：更加富裕，却是以发展不平等和不可持续为代价。

21世纪的士瓦本，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富裕状态，工资水平高，失业率低，休闲活动丰富。拉芬斯堡和腓特烈港的市中心已经丝毫不见1945年的惨状。拉芬斯堡依旧愿意接纳难民，只不过这些难民不再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境之外的遥远战区。就连这座城市的那家拼图游戏制造商，面对全球供应链和拼图游戏市场被数字游戏扰乱的情况，也已经逐渐适应。

但是，对这个地区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人们、动力传动系统制造商、拼图游戏制造商以及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而言，所面临的难题并不容易解决。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相互依赖。因此，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列出其各个组成部分。这正是我们接下来一章要完成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借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引。

[1] GDP Growth, Annual (%), 1961–2019,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ew Data on Global Debt, <https://blogs.imf.org/2019/01/02/new-data-on-global-debt/>.

[3] Gross debt position, Fiscal Monitor, April 20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FM>.

[4] 这是一家全球性智库，它与一家英国智库提出“地球生态超载日”的概念，是指地球在当天已经用完了全年度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量。——译者注

[5]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2019/06/26/press-release-june-2019-earth-overshoot-day/>.

第二章 库兹涅茨的诅咒：当今世界经济的问题

倘若把当今世界经济比作一幅拼图，那么能够把它完整拼凑起来的人可能非西蒙·库兹涅茨莫属。这位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诺贝尔奖得主，已于1985年与世长辞。

这乍一看似乎很奇怪，一个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离世的人，竟对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当初听取了他的教诲，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也许就不至于如此棘手。

事实上，库兹涅茨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警告称，GDP是一项糟糕的经济决策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再往前追溯几年，库兹涅茨不仅协助创造了GDP这一概念，而且亲手参与将其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圣杯”。他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收入不平等状况将会逐渐缓解。但他警告称，自己的这一曲线所基于的是“脆弱数据”[\[2\]](#)，这里指的是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创下战后经济奇迹的那段相对短暂时期的数据。如果他研究的这段时期并非常态，那么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由库兹涅茨曲线衍生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并未获得库兹涅茨本人的认可。根据该曲线，各国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它们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程度会逐渐减缓。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的就是分析不够严谨、信仰过于教条化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追求GDP增长，而它却已

经济停滞不前。我们的经济从未像今天这般发达，而不平等问题也从未像今天这般严重。我们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般，看到环境污染的减轻，反而深陷全球环境危机之中。

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无数经济危机，这很可能就是库兹涅茨的诅咒。就好像一位经常被误解的经济学家终于有机会说出：“我早就提醒过你。”人们之所以会有一种被领导者背叛的感觉，根源便在于此。但在深入探究这个诅咒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西蒙·库兹涅茨究竟是谁，以及他因为什么而为大众所记住。

[1] 库兹涅茨出生于平斯克，这个地方当时位于俄国领土范围内。今天的平斯克位于白俄罗斯境内。

[2] “Political Arithmetic: 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Chapter 5: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Simon Kuznets, Robert William Fogel, Enid M. Fogel, Mark Guglielmo, Nathaniel Grot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05,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chapters/c12917/c12917.pdf>.

第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唯GDP论”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年出生于俄国的平斯克市，父母都是犹太人。[\[1\]](#)库兹涅茨在上学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数学方面的天赋，后来进入哈尔科夫大学（现位于乌克兰）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尽管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但成年之后的库兹涅茨还是离开了那里。随着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胜利，苏联于1922年成立，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移居美国，库兹涅茨就是其中一员。到美国后，库兹涅茨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加入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这是一家享有盛誉的经济智库。正是在这里，库兹涅茨成就了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

他对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龙头。库兹涅茨帮助这个国家理解这个新定位的含义。他所开创的国民收入（GDP的前身）和年度经济增长率等关键概念，至今仍在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库兹涅茨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那些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呈现出动荡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从一战的影响中走出，迎来了经济繁荣时期。美国以一个政治和经济强国的姿态，与当时已经衰落的大英帝国比肩。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成为世界的主导者，在1914年之前，它所控制的领土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1/3。美国则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在一战后迎来了经济腾飞。美国的制造商将汽车、收音机等商品引入庞大的国内市场，满足了大众对

于现代商品的渴求。并且，在自由贸易精神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协助下，投资、创新、生产、消费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美国由此成为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然而，这令人兴奋、陶醉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最终走向了灾难性的大萧条。到1929年，美国的经济已经失控，不平等程度令人发指。巨额的财富和经济资产都掌握在约翰·D·洛克菲勒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手中，而许多劳动者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只能指望定期领取的微薄薪水和农业收成。此外，在股票市场上，股价一路飞涨，而其背后作为支撑的实体经济却未见丝毫起色，这意味着金融投机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1929年10月下旬，美国股票市场大崩盘，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民众无法偿还贷款，信贷市场枯竭，失业率飙升，消费者停止消费，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世界陷入危机。直到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才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煞费苦心地思考如何遏制和结束国内的这场危机时，他们未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实际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的应对政策是否有效？当时，经济指标稀缺，GDP这一我们今天用于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尚未被提出。

西蒙·库兹涅茨，作为统计学、数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构建了一种衡量美国国民总收入（GNI）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标准方法。他相信，通过这种衡量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企业在一年内生产出了多少商品和提供了多少服务。几年后，他又开发了一个与之略有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概念——GDP，并在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2]（GDP的衡量范围只包括在一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

服务，而GNI或GNP的衡量范围还包括一国公民在境外所获得的收入或在境外拥有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库兹涅茨也因此被称为“GDP之父”。

这是一项天才之举。在20世纪30年代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其他经济学家的帮助之下，这一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被标准化和普及化。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GDP被正式确立为衡量一国经济的主要工具。^[3]当时人们对GDP所做的定义到今天仍然有效：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根据该国的贸易差额进行调整。GDP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但其中最常用的可能是所谓的支出法。根据这种方法，一国的GDP等于该国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消费最终产品的总支出（根据该国的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可用公式表达如下：

$$\text{GDP} = \text{消费支出} + \text{政府支出} + \text{私人投资} + \text{出口} - \text{进口}$$

从那时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具体国家所做报告中，GDP就成为一名必不可少的衡量指标。当一国GDP上升时，其国民和企业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当一国GDP下降时，该国政府就会采取一切政策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在此期间，全球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些危机和挫折，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因此“增长是好事”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理念。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如果我们当初能够更好地听取西蒙·库兹涅茨的观点，也许我们就能预见这个结局。早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出台之前，1934年时，库兹涅茨就警告美国国会，不要过于狭隘地只关注GNP或GDP。“很难通过衡量一国的国民收入来推测其国民的幸福程度。”库兹涅茨这样说道。

[4]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一国的GDP能够反映国民的消费情况，但不能反映他们的福祉；能够反映一国的生产情况，但不能反映所造成的污染或资源使用状况；能够反映一国的政府开支和私人投资情况，但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在2019年8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5]实际上，GDP是“一个战时指标”。它能够告诉你在战争时期一国经济能够生产出什么，但它不能告诉你在和平时代如何能让人们感到幸福。

尽管早已有人发出警告，但没有人听取。政策制定者和各国央行使出浑身解数支撑GDP的增长。现在，他们都已经精疲力竭。GDP不再像过去那样增长迅速，而人们的福祉还停留在多年前的水平。一种持续的危机感笼罩着社会，而这并非毫无缘由。正如库兹涅茨早已认识到的，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永远不应该只围绕着GDP的增长。唉，可我们现在正在这么做。GDP的增长是我们衡量一国经济的关键标准，而GDP增速已经永久性放缓。

低GDP增长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概述的，在过去75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多次快速扩张期，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重大衰退期。但从2010年起，全球经济扩张一直不温不火。全球经济增长率[6]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达到年均6%及以上的高点，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里仍然超过4%。但自那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率便回落到年均3%甚至更低的水平[7]。

3%是个很关键的数字，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被视为评价经济发展状况合格与否的标准。事实上，直到大约10年前，《华尔街日报》还指出，“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会将全球经济增长率低于3%或2.5%（不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一数值的界定有所不同）的情况，视为全球经济已经陷入衰退”。[8]有一种解释是基于简单的数学计算：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人口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在每年1.5%或者更高的水平。[9]倘若全球经济增长率仅略高于人口增长率，则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实际上处于零经济增长或负经济增长状态。这种经济环境会令劳动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感到灰心丧气，因为它代表着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机会。

也许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经济学家后来改变了他们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定义。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自那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微弱。事实上，年经济增长率不到3%似乎成为新常态。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接下来的5年里，全球GDP增长率也不会重新突破3%的临界值。[10]，[11]，[12]而这百年一遇的公共健康危机事件，更是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传统的经济观点来看，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断层，因为人们习惯了经济增长。其原因有二。

第一，全球GDP增长率是一个总体性衡量指标，它掩盖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对不容乐观的现实。例如，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非，实际经济增长率正逐渐接近零。对于中欧和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与西欧或北欧国家的经济状况仍有差距，还需要加大马力赶超这些邻近国家。增长率如此之低，难免令人灰心，这可能会加速这些国家的人才外流。那些有进取心、受过教育的人往往会去高收入国家寻求经济机会，从而导致他们母国的问题加剧。在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些地区，有许多人仍未真正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能够提供

经济保障的工作岗位稀缺，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都不够健全。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地区，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使总体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甚至超过3%，也不足以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同样很高。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加纳。[\[13\]](#)但是，即使这些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也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5~20年）才能使其国民的收入水平翻一番。（而这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都能被广泛共享，但事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要想像21世纪初的中国那样，实现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那些最不发达的经济体需要将实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8%。如果缺乏这种超级推动力，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水平“大趋同”的实现过程将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无法实现。正如国际金融协会（IIF）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在2019年对话《金融时报》记者詹姆斯·惠特利时所说的：“有越来越多的讨论认为，新兴市场的增长故事已经终结，增长红利已经成为过去时。”[\[14\]](#)

即便我们将视野转向GDP之外，经济发展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经济指标，尤其是债务和生产力都表现堪忧。

不断累积的债务

我们先来看不断累积的债务。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中，全球债务总额（包括公共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达到约258万亿美元，[\[15\]](#)是全球GDP的三倍多。人们

对这个数字可能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因为它是如此之大，而且涵盖各种类型的债务——从以出售政府债券的形式所积累的公共债务到私人消费者的抵押贷款。

近年来，全球债务水平快速上升，这无疑“令人感到恐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杰弗里·冈本在2020年10月所说的。据《华尔街日报》统计，[\[16\]](#)自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从未如此之高，而且与战后时期不同的是，这些经济体“不再能够通过经济快速发展而受益”，从而减轻其未来的负担。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各国债务负担尤其是政府债务的增长异常迅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1年年中，与疫情暴发之前相比，在短短18个月内，“发达经济体的债务中位数预计将增长17%，新兴经济体将增长12%，低收入国家将增长8%”[\[17\]](#)。

即使没有疫情的暴发，在过去30年里，债务水平也在不断攀升。举个例子，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1991年约为55%，2001年升至70%以上，2011年直接突破100%。据估计，到2021年，这一占比将达到120%以上。[\[18\]](#)

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而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仍在累积。这是明智的吗？从理论层面来说，是的！倘若能被用于投资生产性资产，债务确实可能成为撬动未来经济增长与繁荣的杠杆。不过，所有的债务当然都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偿还（除非通货膨胀导致债务蒸发，但在过去2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不超过2%[\[19\]](#)）。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违约，但这无疑会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那么，近几十年来，全球都累积了哪些债务呢？政府债务往往是良性债务与不良债务的混合体。例如，用于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或教育投资的债务就属于良性债务，这类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都能够得到偿还，甚至可能会产生投资回报，因此应该得到鼓励。相比之下，为刺激消费而出现的赤字性支出，则属于不良债务，这类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不会产生回报，因此应该尽量避免。

总体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全球的不良债务正在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低利率激励了贷款行为，从而导致借款人的消费行为开始变得不够谨慎。对于政府而言，近几十年来，赤字性支出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使情况变得乐观。许多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已经采取“直升机撒钱”政策来维持经济：它们通过央行发行更多货币，从而欠下更高的债务，并以一次性补贴和消费券的形式将货币转移到民众和企业手中，以期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疫情。短期内，为了防止经济崩溃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做法是有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这类债务终究是要偿还的。总的来说，近年来，不良债务已经累积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它们既没有被用于刺激长期经济增长，又没有被用于帮助经济体制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因此，这些债务将是许多国家政府难以摆脱的重担。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为世界局势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占GDP的比例为50%~55%，[\[20\]](#)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其债务水平提升了约10%）。其中一些国家可以被认为享有人口红利，即其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0岁

出头，人口结构明显偏年轻化。这些国家即将迎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激增，如果国内工作岗位数量能同样快速增加，那么这种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就会使偿债更为可行。（然而，事实上一些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面临着工作岗位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红利有可能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21\]](#)，[\[22\]](#)）

不过，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一些面临老龄化的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偿还债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日本和意大利历来是政府债务负担最重的经济体。除了债务负担，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缩减和老龄化速度也是最快的。这一趋势可能会造成许多极为严峻的问题。虽然日本家庭的私人储蓄可以缓解其中一些问题，但鉴于在未来30年里，日本人口将会从1.27亿缩减到不足1亿，且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会进一步下降，政府债务迟早会成为困扰该国的一个问题。届时，其人均债务负担增加1/4或1/3都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23\]](#)

在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均已超过110%[\[24\]](#)（而且经常远超这一数值）。有一天，这些国家会发现它们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不久，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就突破了100%。近年来，其债务水平持续快速上升，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130%。[\[25\]](#)但美国的情况引发了一种特有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的政府债券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债券之一，美元是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鉴于美联储手握印钞机，美国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政府一旦违约，就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全球经济体系可能会走向崩溃。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高负债和低增长的结合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在预期经济增长率为3%或以上的环境下，政府债务会迅速

蒸发：与不断增长的GDP相比，历史债务的相对重要性会下降。在不久前，德国和荷兰等国就因经济增长形势良好而大大降低了债务负担。但是，如果低增长真的成为新常态（这看起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各国就没有一种简单的途径来偿还其历史债务。故意视而不见肯定是解决不了债务问题的。

低利率和低通胀

与现在不同的是，此前面对低增长和高负债的困境还存在一种缓解措施：低利率。能获得低息贷款是一件难得的好事，这一点许多房主或学生借款人都深有体会。它可以让你在偿还债务的时候，不用担心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

自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进入一个低利率时代，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低利率贷款，以缓解危机带来的影响。这一政策的目标是，通过促使人们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政府增加支出，最终使经济恢复较高的增长率。

在美国，美联储于2009—2016年一直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随后，它逐渐将利率提升至2.5%，这只有历史上正常利率水平的一半。在2019年，美联储又连续数次降息[26]，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利率回落到0.25%[27]。鉴于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充满挑战，美国在短期内回归高利率时代的可能性极小。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更低。欧洲央行从2012年开始一直将欧元区的关键借款利率维持在1%以下，自2016年以来一直维持零利率。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率同样很低。日本和瑞士甚至向储户收取购买债券的费用，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们的利率已经为负。

如前所述，这对于愿意承担并有能力承担新贷款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来说是好事，对于希望对自己的历史债务进行再融资的政府来说也是好事。一些观察家甚至表示，债务与GDP之比这一历史负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因为它可以持续地进行再融资。

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是，随着其他负债的增加，政府资金缺口加大，偿债能力会很快失控。与养老金、医疗和基础设施相关的费用已经使政府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更不用说再加上消费补贴，比如政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提供部分价格补贴。[\[28\]](#)由此产生的都是不良债务，但因为消费补贴深受选民欢迎，所以很难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早在2000—2016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公共医疗支出已经增长了66%。[\[29\]](#)同期，经合组织成员的GDP仅增长了19%。总的来说，经合组织成员的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目前接近7%，其中美国和瑞士的这一数值要再高出一倍，是经合组织成员中最高的。但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病毒，甚至还有一些非传染性疾病都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预计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除非政府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到民众身上，否则许多政府都将越来越难以实现收支平衡。

政府面临的不断增长的负债还不止于此。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的估算，2016—2040年，全球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15万亿美元。[\[30\]](#)但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投资，可以产生相应的回报。与之相比，养老金和退休储蓄的资金缺口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而且回报率要低得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估计，[\[31\]](#)除非政策发生转向，否则到2050年，世界上养老金体系规模最

大的8个国家的养老金储蓄缺口将激增至400万亿美元，其中无担保的公共养老金承诺占据的份额最大。

与这些债务负担并存的，还有低通胀。从历史上看，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往往呈负相关关系。央行手握调整利率的权力，并以此为工具来抑制或刺激通货膨胀。通过设置高利率，央行可以鼓励人们、企业和政府存钱而不是花钱，从而缓解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反之，通过设置低利率，央行可以鼓励人们花钱，从而推高物价，因为此时即使把钱存起来也不会产生太多利息。

然而，从大约10年前开始，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消失，欧洲和日本的情况尤为严峻。数年来，尽管利率已经达到接近零的水平，但通货膨胀率也常常接近零。虽然这在短期内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可用于缓解债务负担的一个长期杠杆就此消失。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名义债务的负担往往会减轻。而在物价持平的情况下，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历史债务的负担都一样沉重。

但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之间的相互作用还伴随着另一要素——生产力增速下降，这可能是其中最致命的。

生产力增速下降

除本章已经概述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外，近年来生产力的提升也很缓慢。事实上，在二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西方中产阶级的收入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生产力的提升比人口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生产力的提升往往源于生产方式的创新。关于生产力的提

升，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案例：20世纪初，福特公司引进了生产流水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数字计算机取代了打字机；今天，Waze等地图应用优化了出租车行车路线。所有这些创新，都使得特定工人在产出相同或工作不变的前提下，工作时间大为缩短。这反过来促使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提升。

过去，世界上曾出现数个生产力快速提升期，并且生产力的提升直接转化为工资的快速增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每年生产力增速达到近3%。^[32]但之后生产力增速开始放缓，而且，问题在于，即便生产力有所提升，能转化成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比率也在变小。相反，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成果都保留在企业主和高管手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工资与生产力“脱钩”。^[33]

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生产力增势微弱，年增长率仅为1.3%。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意味着“把蛋糕做大”已经不再可行，所以经济成果的分配在今天已经成为“准零和博弈”。德国、丹麦、日本等国保持了较好的生产力增长势头，并且将其转化为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大趋势是明确无疑的：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增速正显著放缓。

综上所述，本章所介绍的经济增速、利率、债务和生产力这4项指标都指向一点——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个系统层面的设计失误。其繁荣模式大多建立在经济永久性增长和生产力永久性提升的基础上。现在，这种增长逐渐停止，在增长的表象之下不断滋生的问题日趋严重。

库兹涅茨的诅咒再次降临。GDP从来都不是衡量国家福祉的完美指标。现在，随着GDP增长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将不

得不处理一大堆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追求GDP增长的过程中造成的。

[1] 直接引自库兹涅茨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写的自传。The Nobel Prize, “Simon Kuznets Biographical,” 1971,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1971/kuznets/biographical/>.

[2] “GDP: A brief history,” Elizabeth Dickins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1/03/gdp-a-brief-history/>.

[3] “GDP: A brief history,” Elizabeth Dickins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1/03/gdp-a-brief-history/>.

[4] “Beyond GDP: Economists Search for New Definition of Well-Being,” *Der Spiegel*, September 2009,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business/beyond-gdp-economists-search-for-new-definition-of-well-being-a-650532.html>.

[5] 2019年8月18日，我们对戴安娜·科伊尔进行了电话采访。

[6] 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7]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1961–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8] “What’s a Global Recession,” Bob Dav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09, <https://blogs.wsj.com/economics/2009/04/22/whats-a-global-recession/>.

[9]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September 2018, <https://www.census.gov/data-tools/demo/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pdated July 20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7/18/WEOupdateJuly2019>.

[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19, Appendix A.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19/April/English/text.ashx?la=en>.

[12] 这关系到基于市场汇率的GDP的增长（参见注释11和12所引用表格中的相应数据）。

[13]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World Bank,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

country-and-lending-groups.

[14] “The Great Emerging-Market Growth Story is Unravelling,”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d11f624-8b8c-11e9a1c1-51bf8f989972>.

[15] 参见前文提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的2019年世界债务。关于国际金融协会评估的2020年第一季度债务，参见https://www.iif.com/Portals/0/Files/content/Research/Global%20Debt%20Monitor_July2020.pdf。

[16] “Coronavirus Lifts Government Debt to WWII Levels—Cutting It Won’t Be Eas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lifts-government-debt-to-wwii-levelscutting-it-wont-be-easy-11598191201>.

[17] “Resolving Global Debt: An Urgent Collective Action Cause,” Geoffrey Okamoto, IMF First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ctober 2020,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10/01/sp100120-resolving-globaldebt-an-urgent-collective-action-cause>.

[18] “Gross Debt Position, % of GDP,” Fiscal Monit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_XWDG_G01_GDP_PT@FM/ADVEC/FM_EMG/FM_LIDC.

[19] “Inflation Rate, Average Consumer Prices, Annual Percent Change, Advanced Economi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CPIPCH@WEO/ADVEC/OEMDC>.

[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ataMapper,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GXWDG_NGDP@WEO/OEMDC/ADVEC/WEO_WORLD.

[21] “Youth Dividend or Ticking Time Bomb?” *Africa Renewal*, UN, 2017,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special-edition-youth-2017/youth-dividend-or-ticking-time-bomb>.

[22] “EM Youth Bulge: A Demographic Dividend or Time Bomb?” Jonathan Wheatley, *Financial Times*, May 2013, <https://www.ft.com/content/f08db252-6e84-371d-980a-30ab416502>.

[23]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Japan, http://www.ipss.go.jp/pp-zenkoku/e/zenkoku_e2017/

pp_zenkoku2017e_gaiyou.html#e_zenkoku_II.

[24] “Gross Debt Position, % of GDP,” Fiscal Monit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_XWDG_G01_GDP_PT@FM/ADVEC/FM_EMG/FM_LIDC.

[25] “Gross Debt Position, % of GDP,” Fiscal Monit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0,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_XWDG_G01_GDP_PT@FM/ADVEC/FM_EMG/FM_LIDC.

[26] “U.S. Central Bank Cuts Interest Rate for 1st Time Since 2008,” CBC, July 2019,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federal-reserve-interest-rate-decision-1.5231891>.

[27] “United States Fed Funds Rate, 1971–2020,”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interest-rate>.

[28] 这种做法不光在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利比亚、科威特等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很常见，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及等其他新兴市场也很常见。“Energy Subsidies, Tracking the Impact of Fossil-Fuel Subsidies,” IEA, <https://www.iea.org/topics/energy-subsidies>.

[29] “Public Spending on Health: A Closer Look at Global Trend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6728/WHO-HIS-HGF-HF-WorkingPaper-18.3-eng.pdf?ua=1>.

[30]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https://outlook.gihub.org/>.

[31] “We’ll Live to 100—How Can We Afford It?”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White_Paper_We_Will_Live_to_100.pdf.

[3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s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lpc/prodybar.htm>.

[33] “Decoupling of Wages from Productivity,” OECD, Economic Outlook, November 2018, <https://www.oecd.org/economy/outlook/Decoupling-of-wages-from-productivity-november-2018-OECD-economic-outlook-chapter.pdf>.

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不平等

近年来，我们因为盲目追求GDP的增长而遭遇最初的库兹涅茨诅咒。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它与库兹涅茨曲线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作为经济学家的库兹涅茨在工作过程中，开始对一个有趣的现象进行理论化研究。他注意到，二战后随着经济繁荣的增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这与二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二战前，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但收入和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尽管情况没有这么极端。

在发给美国经济学会的一篇论文以及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中，库兹涅茨对他所发现的数据进行了理论构建。

[1]他推导出了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可能具有颠覆性的见解——前提是那些发现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事实上，这一见解中隐含着一种经济规律：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时，不平等现象会加剧，但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其不平等现象会逐渐缓解。换句话说，社会早期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不平等，在后期会被发展程度较高、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状况抵消。

库兹涅茨提出的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在他因对国民收入核算领域做出的贡献（而不是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而荣获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基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理论，绘制了一些图表，旨在说明该理论如何适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并从而制定了经

济发展模式。

但是有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论不再成立。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事实便揭示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平等现象又开始加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2016年提出，目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可以被视为“第二条库兹涅茨曲线”，或者可被称为“库兹涅茨波”（见图2.1）。

收入不平等

在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一个问题不断恶化，那就是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故事始于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通过将世界各地每个人的收入水平绘制成图，我们会得出一个结果：在过去30年里，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实际上一直在稳步下降^[2]（见图2.2）。这可能会令许多读者大跌眼镜，毕竟人们对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情况的认知刚好与之相反。然而，全球趋势是清晰明确的：在世界各地，人们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平等，而不是越来越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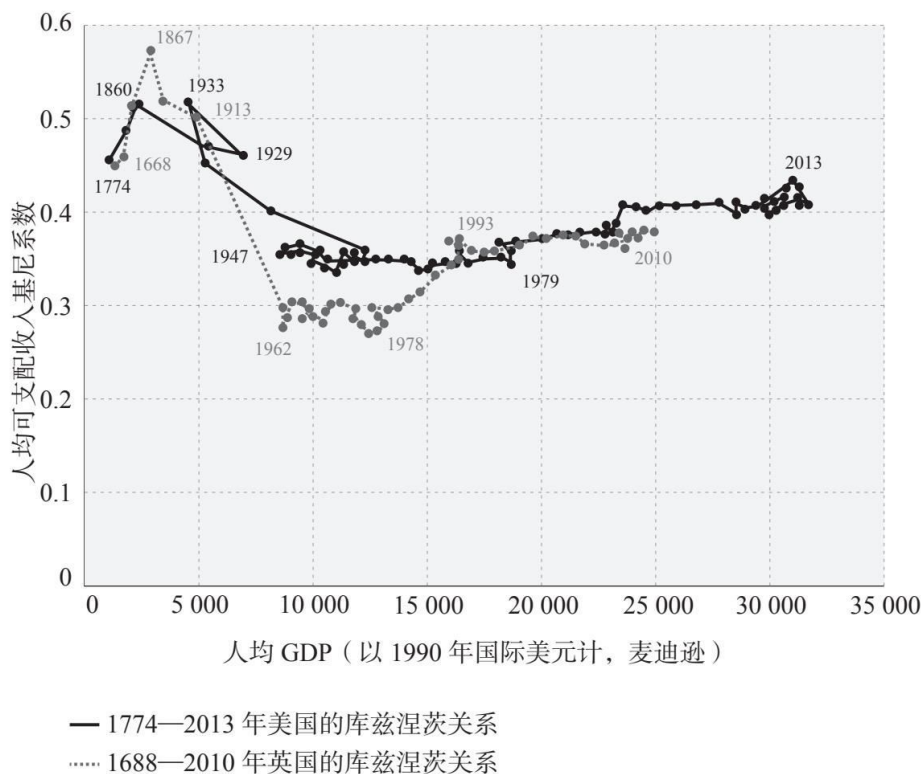


图2.1 库兹涅茨波：收入不平等程度如何在长期内波动

资料来源：基于以下资料重绘，Lindert, P. H., & Williamson, J. G. (1985). Growth, equality, and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4), 341–377.

这种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要归因于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世界上一些（之前属于最贫穷国家行列的）大国在收入水平上实现了大幅跃升。尤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已经由一个低收入国家跨入中高收入[3]国家行列。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中国使大约7.4亿民众摆脱了贫困状态。[4]印度也经历了多个快速增长阶段，许多民众的收入都得到提升。

这两个国家对全球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若尔特·道尔沃什表明，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做出的改变，全球不平等状况不会有任何变化，甚至基于特定的统计方法，不平等程度还会上升不少（见图2.2）。

这阐明了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真正问题所在。全球总体不平等状况可能已经有所缓解，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急剧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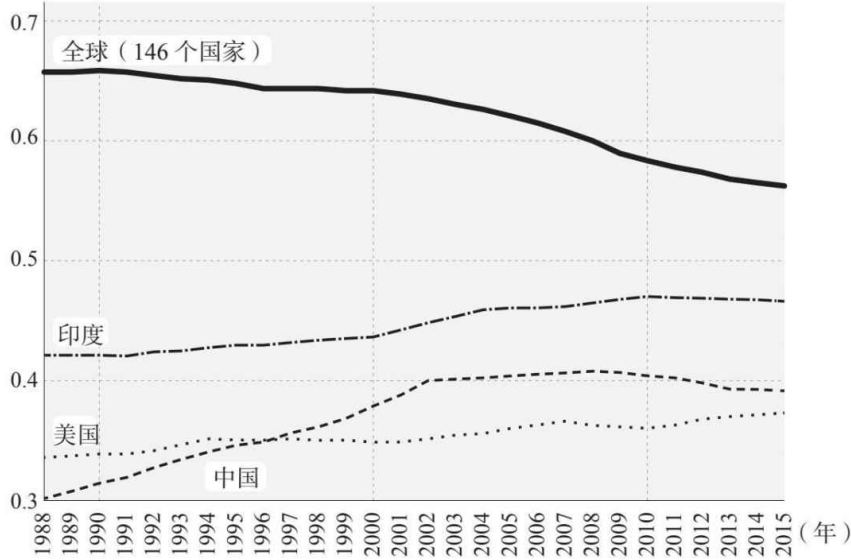
在许多人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相比自己过得好不好，而是与本国人相比自己过得好不好。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而且速度往往相当快。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传统指标，并不能公正地反映问题的严重性。基尼系数将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量化为一个取值范围为0~1的数字，其中0代表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相同的状态，1代表整体的经济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基尼系数变大，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但这反映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很难为人们所理解。以美国为例，其基尼系数从1971年的低点0.43上升到了今天的0.58，为战后以来的最高点。[\[5\]](#)当然，这意味着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了。但确切地说，0.43所代表的情况究竟有多好？0.58所代表的情况究竟又有多糟糕呢？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更好的方式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在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6\]](#)一书中，皮凯蒂揭示了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份额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他的数据显示，1971年，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总收入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1/3。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收入最高的

10%群体的总收入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半。而占绝对多数的劳动者——剩余90%的群体，只能分摊剩余一半的国民收入。

1988—2015 年全球和特定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其中 0 代表绝对平等，1 代表绝对不平等（即所有收入集于一人之手）



中国和印度对全球收入不平等发展状况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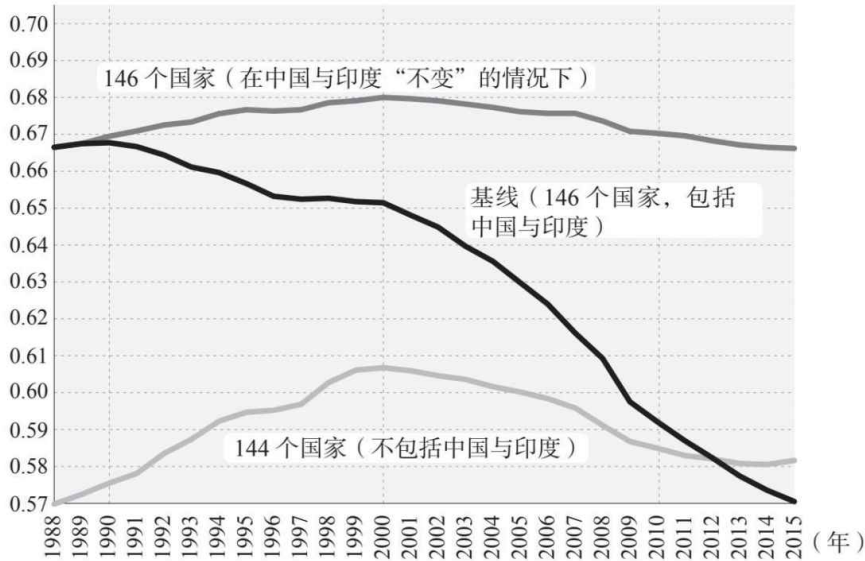


图2.2 中国和印度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以基尼系数衡量）

资料来源：基于以下资料重绘，Zsolt Darvas,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is declining—largely thanks to China and India, April 19, 2018。

后来，由皮凯蒂等人撰写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中的数字显示，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化趋势更为显著。在同一时期，即1971年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翻了一番，[\[7\]](#)收入水平增加了两倍多。这意味着，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整个国民收入的20%以上都流入了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腰包。对于那些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来说，情况则要暗淡得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许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都有所下降（见图2.3）。英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在美国，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再次出现了大量贫穷的劳动阶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甚至创造了“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一词，来指代“一个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新兴阶层，其成员的生活普遍缺乏保障，工作极不稳定，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8\]](#)。

从这个角度看，难怪在2011年时，一家激进主义杂志《广告克星》（*AdBusters*）上发出的一则简短号召，便引发了美国21世纪最受支持的抗议运动之一。当时，该杂志的网页上是这样写的：“9月17日，华尔街，带上帐篷。”到9月17日那天，抗议者果真带着帐篷，出现在曼哈顿下城，“占领华尔街”运动由此爆发。鉴于美国存在的极度不平等现状，抗议者打出了“我们是99%”的标语，谴责美国绝大部分的财富、收入和权力都聚集在最富裕的1%个人和企业手中。从图2.3可以看出，最富裕的1%

群体和剩余的99%群体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并不是想象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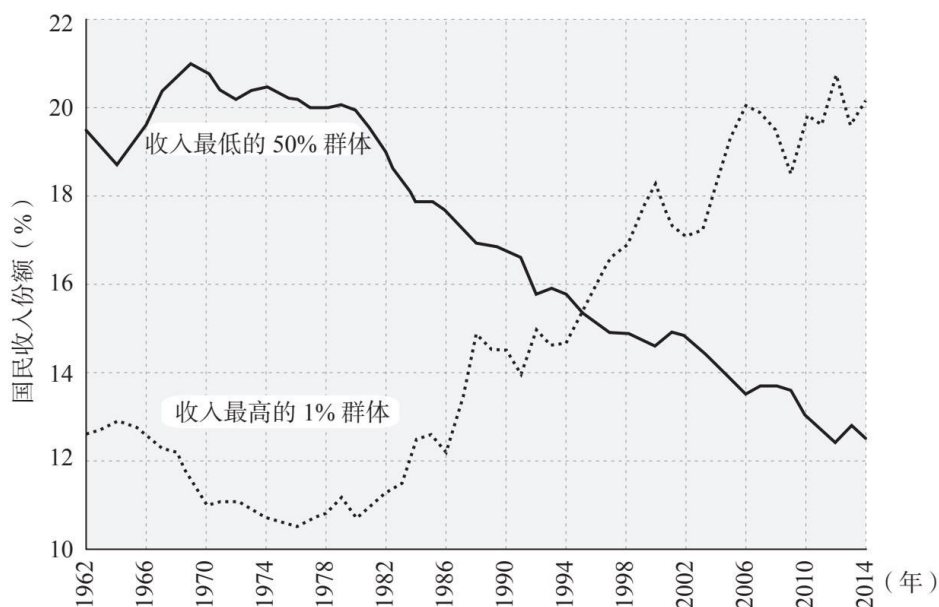


图2.3 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急速加剧

资料来源：根据皮凯蒂、塞斯和祖克曼撰写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重绘。

同样的模式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在一些国家，这种不平等现象所激起的民愤爆发出来时，强度丝毫不亚于英语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卡勒·拉森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们，事实上，“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从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运动中得到启发。[\[9\]](#)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西班牙“愤怒者”走上街头抗议。一年后，“阿拉伯之春”运动席卷了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抗议者上街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于国内经济不平等状况的愤怒。在突尼斯，抗议者还强行推动了政权更迭。

“我们看到了突尼斯爆发的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权更迭，于是开始集思广益，思考类似的运动倘若发生在美国将会是什么情况。”拉森这样说道。他说，在美国，一场“温和的政权更迭”就是从大企业手中夺取权力和金钱，就是那些大企业控制着“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感觉到自己当前已经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年轻人大量失业、学生债台高筑、好的工作岗位稀缺，如果我们再不主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那么我们将没有未来可言。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核心推动力”。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新兴国家，不平等程度加剧所引发的民愤相对没有那么强烈。在印度和许多东盟成员中，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上升。然而，这些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率相对要高得多，正所谓水涨船高。不过，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困扰着其中一些国家（见第三章）。

正如作家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在《亿万富翁拉吉》（*The Billionaire Raj*）一书中强调的，印度是当前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以至印度社会正经历一个“新镀金时代”。与印度不同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大多数国民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尽管如此，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渐凸现，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掌握着其国民总收入的41%。^[10]在许多其他新兴市场，情况甚至更糟糕。在中东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情况与美国相似，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欧洲大陆的不平等状况稍微没那么糟糕，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37%。其不平等程度虽然一直在上升，但速度比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要慢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有更强大的制衡制度来促进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但在这一地区，现实情况也并非处处都尽如人意。例如，在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在年轻劳动者群体中，这一情况更甚。高薪工作越来越难找，这往往对于蓝领工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尤为不利。在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使整个欧洲经济发展承压的情况下，北欧经济体虽然保持不错的增长速度，但在过去10年里，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比利时[11]、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捷克[12]等则是反例，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情况，但它们只是例外。

财富、健康和社会流动性

在研究其他的不平等指标时，库兹涅茨曲线也被推翻。财富不平等反映了个人拥有的储蓄、投资和其他资本存量的差异。在许多国家，这一指标甚至更加失衡。与财富不平等同步发生的是，高额的私立教育、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日益成为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特权。在缺乏适当的公立教育和公共医疗资源的国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在美国，人们对这一现实感受得最为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更像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而不像发达经济体。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计算，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不到15%，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则已经增加到40%以上。[13]如此看来，财富不平等程度要比收入不平等程度高出一倍。[14]

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15]2020年，《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总结道：截至2019年9月底，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持有美国56%的股票资产，总价值达21.4万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仔细想

想：美国一半以上的股票实际上都掌握在这1%的家庭手中。在过去30年里，这个比例稳步上升，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导致过去10年里股市的收益与他们无缘”。

最富裕的0.1%群体的财富份额更是实现跨越式增长。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一群体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全美国的1/5，这一份额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比，增长了两倍。然而，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和储蓄额都直线下降，甚至常常无力支付紧急性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16\]](#)这一点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体现得非常明显，令人痛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断言，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的后果是，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健康或者长寿都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在2019年出版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一书中，以及之前《科学美国人》杂志收录的一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谴责了这种情况。“处于底层的50%的家庭几乎没有能够应对突发状况的现金储备，”他写道，“一次汽车故障或者生一场病就可能导致一些人的生活彻底陷入无法摆脱的窘境，报纸上随处可见这种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高度的不平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本来就特别低，现在还在持续下降。”[\[17\]](#)确实，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所称的“绝望的死亡”[\[18\]](#)现象，在美国呈上升之势（在英国也日渐增多[\[19\]](#)）。阿片类药物滥用、抑郁症和其他健康问题正深深困扰着一些人，使他们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生活日渐萎靡，甚至死亡，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和糟糕的经济状况不无关系。

在美国，“财富与健康”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那些经济能力较差的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程度远远高于经济能力较好的人。纽约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里，许多住在曼哈顿的富人可以搬去他们位于北部度假区或者其他州的房子里居住，可以在私立医院接受治疗，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保护自己不被感染。相比之下，较贫穷的纽约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在无防护的环境下工作与生活，不太可能享有充分的医疗保障，而且基本没有能力搬去其他地方居住。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一项早期研究发现，“在纽约市各区中，布朗克斯区与新冠肺炎病毒相关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是最高的。这个区的非裔美国人占比最高（为38.3%），家庭收入中位数最低（为38 467美元），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占比也最低（为20.7%）”。[\[20\]](#)在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上演相同的一幕。

虽然像新冠肺炎这种传染病在美国和在全球其他地区一样，都会对贫困社区造成更大的冲击，但在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中，居民健康方面的差距迄今依然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升。这本不应该完全出人意料，因为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例如，在经合组织的36个成员中，只有墨西哥的医保覆盖率低于美国，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通过公共医疗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的形式实现了100%覆盖。[\[21\]](#)

在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全球各地的情况更为复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中提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指数”，该指数表明，“只有少数国家具备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适当条件”，“大多数国家在薪酬公平、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和终身学习这四个方面表现不佳”。而要实施基于利益相关者的

经济模式，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流动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该报告称：

纵观所有经济体和它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出身于相对不富裕家庭的儿童相比他们那些出身于相对富裕家庭的同龄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通常面临更大的障碍。此外，即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在大多数国家，出身于某些群体的个人自古以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社会流动性的减弱使这种不平等现象更为持续，并且使不平等程度加剧。反过来，这些不平等又会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凝聚力。[\[22\]](#)

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动态机制。世界银行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非洲和南亚等地区，只有12%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超过了他们的父母。而要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阶层，接受更多的教育往往是先决条件。[\[23\]](#)根据该报告，包括东亚、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经济流动性平均水平确实有所改善。但该报告也提出了警示：“虽然随着经济体的经济状况逐渐提升，其流动性趋于改善，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性得到改善的前提条件是机会变得更加平等。而机会变得更加平等的前提条件，是加大公共投资和优化政策。”[\[24\]](#)换句话说，倘若缺乏公共投资（对于预算紧张的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可能发生的现实），许多国家的经济流动性很可能会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

鉴于上述许多发现都与库兹涅茨的理论相悖，他本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我们不需要去推测这一问题的答案。根据库兹涅茨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罗伯特·福格尔的说法，库兹涅茨曾一再警

告称，他“所提到的那些零碎的数据并非证据，而是‘纯粹的猜测’”[25]。换句话说，库兹涅茨非常清楚，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现可能只适用于极为特定的情况。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正是那个极为特定的情况。福格尔还指出，甚至在当时，库兹涅茨就发现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造就的压力促使不平等程度加剧或减弱”。

近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试图根据这些见解，打造一条新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特别指出，技术是一个可能对不平等产生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因素，米兰诺维奇从中推导出了一条不平等曲线。鉴于我们所见证的近几十年来的演变，这一曲线似乎更加完整。他将这一曲线称为“库兹涅茨波”。这一曲线显示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技术进步和相应政策的落实，不平等程度也会发生起伏（见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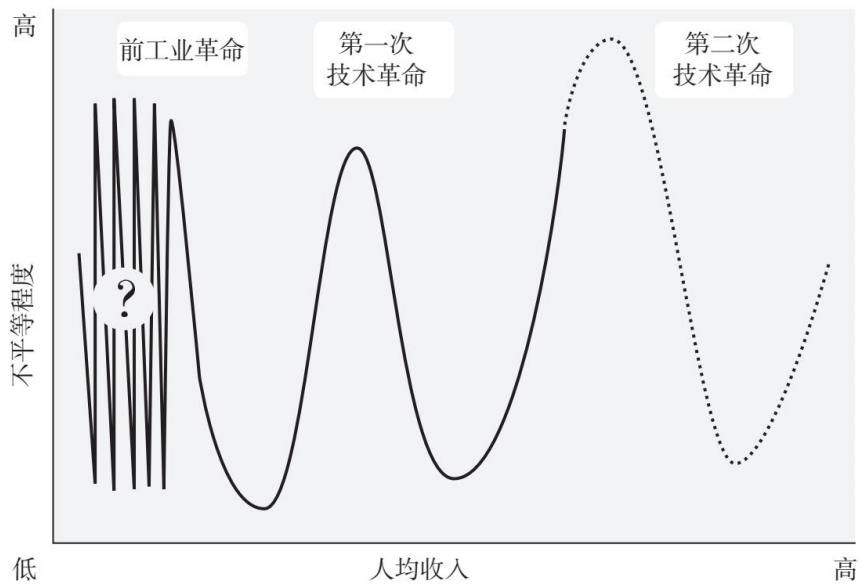


图2.4 不平等程度与人均收入的预期变化模式，基于技术革命的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皮凯蒂、塞斯和祖克曼撰写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重绘。

在这张图中，米兰诺维奇所谓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大致相当于前两次工业革命，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见证了火车和蒸汽动力的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二次技术革命大致相当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两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创新。他的观点很明确：技术有使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但随着我们适应技术，并采取措施应对技术造成的不平等，我们就可以在之后减少不平等。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再谈这个概念。

但是，尽管前有库兹涅茨的早期警告，后有米兰诺维奇近期所做的努力，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所执行的政策依然侧重于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是追求包容性发展，侧重于实现技术的快速部署，而不是实施更周密的技术治理。这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当前技术快速发展的潮流有一种加剧不平等的自然趋势。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应对措施来减缓或阻止这一趋势。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这就形成了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它意味着全世界有许多人正在为我们近期取得的技术进步付出高昂的代价。

[1] “Some Notes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Simon Kuznets,” Robert Fog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1987, <https://www.nber.org/papers/w2461.pdf>.

[2] “Global Inequality is Declining—Largely Thanks to China and India,” Zolt Darvas, Bruegel Institute, April 2018, <https://bruegel.org/2018/04/global-income-inequality-is-declining-largely-thanks-to-china-and-india/>.

[3]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World Bank,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

country-and lending-groups.

[4] “China Lifts 740 Million Rural Poor Out of Poverty Since 1978,” Xinhua, September 201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9/03/c_137441670.htm.

[5] Minneapolis Fed,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America, 1949–2016,”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institute/working-papers/institute/iwp9.pdf>.

[6] “Piketty’s Inequality Story in Six Charts,” John Cassidy, *The New Yorker*, March 2014,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john-cassidy/pikettrys-inequality-story-in-six-charts>.

[7]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

[8]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Guy Standing, 2011, <https://www.bloomsbury.com/uk/the-precariat-9781849664561/>.

[9] 2012年3月，卡勒·拉森在加拿大温哥华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0]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

[11] “How Unequal Is Europe?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1980–2017,” Thomas Blanchet, Lucas Chancel, Amory Gethin, World Economic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id.world/document/bcg2019-full-paper/>.

[12] “EU income inequality decline: Views from an income shares perspective,” Zolt Darvas, Bruegel Institute, 2018, <https://www.bruegel.org/2018/07/eu-income-inequality-decline-views-from-an-income-shares-perspective/>.

[13]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2016,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SaezZucman2016QJE.pdf>.

[14] “Share of Total Income going to the Top 1% since 1900, Within-Country Inequality in Rich Countries,” Our World in Data, October 2016, <https://ourworldindata.org/income-inequality>.

[15] “How America’s 1% Came to Dominate Equity Ownership,” Robin Wigglesworth,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2501e154-4789-11ea-aeb3-955839e06441>.

[16] 然而，有趣的是，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指出的，虽然主要由股票所有权驱动财富不平等程度非常高，且仍在不断提升，但像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所指出的那种纯粹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富裕家庭的财富确实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资本”，但并非全部来源于“资本”。事实上，大多数“富裕”的人也要靠工作谋生，他们往往在金融、法律、医疗行业中拥有高薪职位。

[17]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Rigged,” Joseph Stiglitz,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2018,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american-economy-is-rigged/>.

[18]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Brookings Institute, March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pea-articles/mortality-and-morbidity-in-the-21st-century/>.

[19] “Deaths of Despair, Once an American Phenomenon, Now Haunt Britain,” *The Economist*, May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05/16/deaths-of-despair-once-an-american-phenomenon-now-haunt-britain>.

[20] “Variation in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cross New York City Borough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pril 2020,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65524>.

[21] “Total Public and Primary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HEALTH_STAT.

[22] “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2020: Why Economies Benefit from Fixing Inequality,”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social-mobility-index-2020-why-economies-benefit-from-fixing-inequality>.

[23] “Fair Progress? 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2018,” The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publication/fair-progress-economic-mobility-across-generations-around-the-world>.

[24] “Fair Progress? 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2018,” The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publication/fair-progress-economic-mobility-across-generations-around the-world](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publication/fair-progress-economic-mobility-across-generations-around-the-world).

[25] “Some Notes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Simon Kuznets,” Robert Fogel, NBER, December 1987, <https://www.nber.org/papers/w2461.pdf>.

第三个库兹涅茨诅咒：环境

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它与环境有关。随着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人开始担心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所带来的外部性：污染加剧、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随着消费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全球人口迅速增长，人们有理由发问：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究竟对我们的全球公地造成了怎样的损害？在这个时代，汽车和工厂排放的废气使我们的城市上空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浓烟，地球大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空洞越来越大，核电站被建成，废弃物越来越多，塑料和其他有害材料被广泛使用，比如石棉就被广泛用于建筑中。

遵循与库兹涅茨对不平等问题短期观察类似的思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环境问题不必太过担心：他们在发现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问题也会逐渐得到缓解。确实，随着生产方式的日渐成熟，生产过程会变得更加清洁，资源使用效率会得到提升。就每项产品的生产而言，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似乎遵循着一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想法，再过几年或几十年，环境问题就像之前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会自行得到解决。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不断恶化的环境

我们还必须面对最后一个现实，它也许是最具破坏性的，那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持续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以

及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和持续过度产生的废弃物与污染物对我们的生命造成的威胁。

今天，大多数有关环境的报道都聚焦于全球变暖问题，但这只是更大的问题集中的一个子集。我们所打造的这个经济体制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体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1973年，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就这一逐渐凸显的问题增强了人们的意识。随后，时任罗马俱乐部主席的奥雷利奥·佩切伊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介绍了该智库所做的著名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此前一年，该研究的成果《增长的极限》一书一经出版，便“因质疑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引起轰动”。几位合作研究者“研究了全球经济的几种不同情况”，并在达沃斯会议上概述了“社会为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制约因素而必须做出的选择”。

[1]

他们警告称，按照当前的发展路径，未来几十年耕地资源将会陷入“突发性的严重短缺”状况。[2]此外，地球上的淡水资源供给也是有限的，随着需求的增加，围绕淡水资源的获取问题将引发竞争与冲突。[3]他们还警告称，石油、天然气等众多自然资源都已经被过度使用，这将导致污染问题急剧恶化。[4]

然而，他们的警告终究成为徒劳。罗马俱乐部列出的最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此他们试图传达的信息大多数都被抛诸脑后。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后，经济生产几乎每年都创下新高，人类留下的生态足迹也越来越大。尽管罗马俱乐部关于短期内将出现资源枯竭的说法并不准确，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俱乐部还是富有先见之明的。1970年，也就是《增长的极限》出版的前两年，人类的全球生态足迹尚未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尽管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当

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兴许当前的我们依然能保持在平衡状态，从而为后代留下一个宜居、富饶的地球。

但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形势发生了转变。当今世界的人口相比20世纪70年代已经将近翻一番，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计算[5]，2020年，“地球生态超载日”在8月的某个时候到来，即人类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耗尽了全年的“自然资源预算”，这意味着我们一年中有4~5个月的时间都在透支自然资源（见图2.5）。（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各地实施了持续数月的强制封禁措施，许多经济活动暂停，这确实给“地球生态超载日”带来了积极的影响，[6]不过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正如全球足迹网络的首席科学官林戴维（David Lin）告诉我们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生态足迹”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计算方式：我们无法确定地说，经济生产和消费过程究竟会对自然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还在加剧许多其他有害趋势，比如全球变暖。我们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究竟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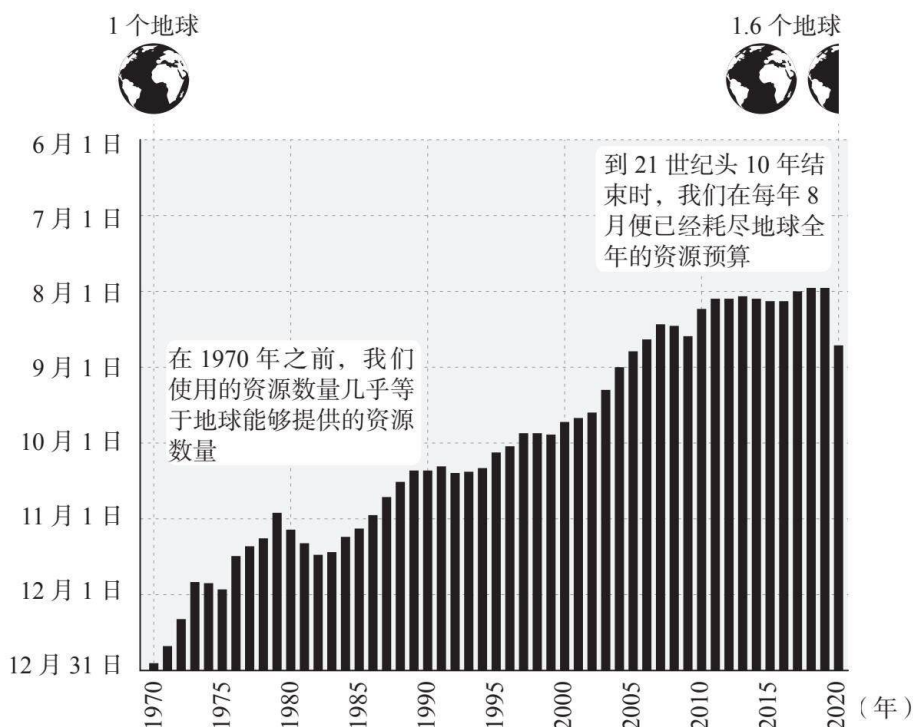


图2.5 自1970年以来，“地球生态超载日”的到来几乎每年都会提前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2019年国家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账户中有关“地球生态超载日”的资料重新绘制。

首先来看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形成需要花费数百万年时间，且只能使用一次。尽管如此，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占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85%^[7]，它们为全球2/3的电力生产提供了能量来源^[8]。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几乎每20年就增加一倍。尽管已经有人呼吁要逐步淘汰它们，但在2018年其产量不降反增。面对这一统计数据，就连英国石油公司（BP）首席经济学家斯宾塞·戴尔都深感不安。^[9]“正值社会对于加速向低碳能源系统过渡的需求不断提升之

际，”戴尔在2019年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这样写道，“2018年的能源数据描绘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境况。”

不光是化石燃料。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小组的数据，在过去50年里，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增加了两倍。[\[10\]](#)该组织警告称，在过去的20年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增速”，“我们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水资源压力，90%以上都要归咎于此，大约一半的气候变化影响都源于此”。

与这些趋势相伴的是至少三种污染的加剧：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

我们首先谈水污染问题。联合国水机制是协调联合国水事务和环境卫生事务的机构。根据该机构的估计，全球有20亿人生活在水资源供给高度紧张的国家，[\[11\]](#)这往往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即便是在有水的情况下，水质也往往受到严重的污染。该机构称，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有超过80%的废水没有经过适当处理就直接被排放到环境中”，污染的发生往往源于“集约化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采矿和未经处理的城市径流与废水”。[\[12\]](#)它威胁着从城市到农村各个地区的人们对清洁水资源的获取，并对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此外还有塑料污染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将最为明显，因为目前海洋中逐渐堆积的塑料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对陆地上的生命造成影响。微塑料在世界各地的水体中已经无处不在，部分原因在于微塑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被分解。根据人类目前的应对措施，估计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总量可能超过鱼类。[\[13\]](#)大众印象中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大太平洋垃圾带”，它主要是由太平洋中的微塑料垃圾堆积而成。但这

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影响的是世界各地的水体。

其次是空气污染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世界上近2/3的城市都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有关空气污染的参考标准。[\[14\]](#)亚洲许多大都市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以致在室外行走都不利于身体健康，[\[15\]](#)许多生活在那里或者去过那里的人都将能够证明这一点。

最后是土壤污染问题。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说法，土壤污染在全世界是一个隐藏的现实，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16\]](#)

这种对资源的快速开发和污染问题已经开始对世界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有可能使全球变暖趋势失控，这会给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的人们和子孙后代带来严重的后果。还有其他数据也揭示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由联合国发起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界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比过去1 000万年的平均速度至少快几十倍到几百倍”。[\[17\]](#)《金融时报》援引了这一研究结果，并写道：“在地球上的大约800万个动植物物种中，有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危险。”[\[18\]](#)

另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8年末发出一项警告，称如果人类在2030年之前没有实现大幅度减排，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路径将使地球进入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变暖周期，这将对地球上的生命成长造成重大

干扰。根据该机构的说法，“要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限制在 1.5°C 以内，并且不使地球生态超载，或仅保持有限程度的生态超载状态，这需要能源、土地、城市和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建筑）领域以及工业体系发生快速且深远的转变”^[19]。然而，两年后，仅仅是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限制在 1.5°C 以内的希望便已落空。同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世界气象组织在2020年7月表示，未来5年中（即2020—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1°C 将成为现实，并且该组织认为，全球气温升幅在这一时期达到 1.5°C 的概率为20%。^[20]

每个人都已经或多或少体会到一些气候变化的现实。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有连续两年的夏天都创下了高温纪录。^[21]坐落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瑞士小镇采尔马特，素有“冰川之城”的美誉。我夏天经常漫步于小镇之中，那里的气温通常相当适宜。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镇，丝毫不夸张地说，也正在经受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冲击。特奥道尔冰川每年都在消融，我在2019年夏天到访那里时，冰川融化导致了山洪暴发，尽管已经连续数日滴雨未下。^[22]

面对多年以来的这些变化，人们用一个简单的行动做出了回应：他们开始迁徙。如今，联合国移民署（IOM）提出警告：“或循序渐进或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正在导致大量的人口流动。过去30年里，风暴、干旱和洪水灾害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对那些弱势群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造成了毁灭性影响。”^[23]该机构预计，截至2050年，气候移民的总数将达到2亿，这正是当前全球的国际移民数量。^[24]

商业领袖们深知环境风险正在加剧，因为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他们将环境风险排在越来越突出

的位置。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排在前几位的长期风险全都是气候所面临的严重威胁”[25]，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出现。该报告指向了极端天气事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失败、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重大损失（这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枯竭）和重大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

我们不应该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对这些风险不甚重视。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开始有所警惕，担心我们究竟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如果我们再像以前那样，无异于是对后代的背叛。

事实上，这几年，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下一代年轻人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开始要求采取更紧迫的气候行动。因为深受瑞典学生格雷塔·通贝里等同龄人的启发，成千上万的气候活动家走上街头，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发表演讲，并尽可能改变自己的习惯。我们理解他们的担忧，还为此邀请了格雷塔·通贝里在2019年的达沃斯年会上发言。通贝里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房子着火了”[26]，我们应该尽可能增强紧迫感，采取紧急行动。

距离奥雷利奥·佩切伊在1973年达沃斯年会上发表演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我们未能采取足够有效的行动，从而使子孙后代在经济、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前景恶化，还有许多人在经济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其他人。这是库兹涅茨最后的诅咒。毕竟，他从未暗示我们的经济体制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响应下一代的号召，相比1973年时，增强紧迫感，打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体制。

库兹涅茨曾谨慎地警告我们：GDP在衡量总体的社会进步方面是一个糟糕的指标，因为它更适用于衡量生产能力，而不适用于衡量任何其他繁荣迹象。他并不认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会成为一项永久性特征。相反地，他认为这不过是特定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暂时效应，这种技术进步在当时促进了包容性增长。而且，他从未认同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概念假设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会逐渐减小。可惜我们没有听从库兹涅茨的这些警示，现在的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在试图弥补经济发展中犯下的这些错误之前，我们必须先自问：当前是否已经存在另一条发展道路？我们有多大可能在东方，在亚洲的崛起中，发现这条道路？

[1] 这两句话改编自：“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 Partner in Shaping History, The First 40 Years, 1971—201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40Years_Book_2010.pdf.

[2] *The Limits to Growth*, p.51, [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 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20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

[3] *The Limits to Growth*, p.53, [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 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20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

[4] *The Limits to Growth*, p.71, [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 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20les/Limits-to-Growth-digital-scan-version.pdf).

[5] “Earth Overshoot Day,”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s://www.overshootday.org/newsroom/press-release-july-2019-english/>.

[6] “Delayed Earth Overshoot Day Points to Opportunities to Build Future in Harmony with Our Finite Planet,”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August 2020, <https://www.overshootday.org/newsroom/press-release-august-2020-english/>.

[7]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Primary Energy,” BP,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 of-

world-energy/primary-energy.html.

[8] “Fossil Fuels, Fossil Fuels i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fossil-fuels>.

[9]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Primary Energy,” BP,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primary-energy.html>.

[10] “Global Resources Outlook 2019,” <http://www.resourcepanel.org/reports/global-resources-outlook>.

[11] “Water Scarcity,” UN Water, 2018, <https://www.unwater.org/water-facts/scarcity/>.

[12] “Water Scarcity,” UN Water, 2018, <https://www.unwater.org/water-facts/scarcity/>.

[1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16/01/more-plastic-than-fish-in-the-ocean-by-2050-report-offers-blueprint-for change/](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16/01/more-plastic-than-fish-in-the-ocean-by-2050-report-offers-blueprint-for-change/).

[14] “22 of World’s 30 Most Polluted Cities are in India, Greenpeace Says,” *The Guardian*, March 2019.

[15] AirVisual, <https://www.airvisual.com/world-most-polluted-cities>.

[16] “Soil Pollution: A Hidden Reality,” Rodríguez-Eugenio, N., McLaughlin, M., and Pennock, D., FAO, 2018, <http://www.fao.org/3/I9183EN/i9183en.pdf>.

[17] “Extinctions Increasing at Unprecedented Pace, UN Study Warns,” *Financial Times*, May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7a546806f28-11e9-bf5c-6eeb837566c5>.

[18] “Extinctions Increasing at Unprecedented Pace, UN Study Warns,” *Financial Times*, May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7a546806f28-11e9-bf5c-6eeb837566c5>.

[19] 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8/07/sr15_headline_statements.pdf.

[20] “New Climate Predictions Assess Global Temperatures in Coming Five

Year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July 2020, <https://public.wmo.int/en/media/press-release/new-climate-predictions-assess-global-temperatures-coming-five-years>.

[21] “Here Comes the Bad Season: July 2019 Is Likely to Be the Hottest Month Ever Measured,”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9/07/july-2019-shaping-be-warmest-month-ever/594229/>.

[22] “Telebasel, Sich entleerende Gletschertasche lässt Bach in Zermatt hochgehen,” <https://telebasel.ch/2019/06/11/erneut-ein-rekordheisser-hochsommer-verzeichnet/>.

[23] “Mig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omplex Nexus,” UN Migration Agency IOM, <https://www.iom.int/complex-nexus#estimates>.

[24] “Mig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omplex Nexus,” UN Migration Agency IOM, <https://www.iom.int/complex-nexus#estimates>.

[25] “Burning Planet: Climate Fires and Political Flame Wars Rag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0,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1/burning-planet-climate-fires-and-political-flame-wars-rage>.

[26] “Our house is still on fire and you’re fuelling the flames,” World Economic Forum Agenda, January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1/greta-speech-our-house-is-still-on-fire-davos-2020/>.

第三章 亚洲的崛起

从中国南部的深圳河上望去，两岸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南岸，目之所及，稻田遍布；在北岸，摩天大楼林立，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

但这里一开始并非如此。40年前，深圳河两岸几乎都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南岸相对发达一些，几英里[\[1\]](#)外便是香港城区。当时还位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河对岸的中国内地之间，由铁轨相连。孤零零的中国卫兵会在渡口进行巡查。

当年曾到访那里的游客，肯定想象不到它在40年后的今天会呈现这种反差。南岸的稻田依然属于香港，这座城市是长期以来的亚洲金融中心；北岸的摩天大楼则属于当代中国的科技之都——深圳，这是一座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城市。

在这40年里，深圳河北岸所见证的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奇迹。1979年，那里的居民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超过一美元。今天，深圳的人均GDP已接近3万美元，相比1979年增长了约100倍。这里不光驻扎着华为、腾讯、中兴等科技巨头[\[2\]](#)，还聚集着一些科技创业公司，是“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先发城市。香港并没有停滞不前，只不过现在它的旁边多了一个强大的孪生兄弟。

这种巨大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针对更广义层面上世界经济向东方的转移，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启示？

[1] 1英里 $\approx$ 1.609千米。——编者注

[2] “Top 5 Tech Giants Who Shape Shenzhen, ‘China’s Silicon Valle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015, <https://www.scmp.com/lifestyle/technology/enterprises/article/1765430/top-5-tech-giants-who-shape-shenzhen-chinas-silicon>.

中国的经济特区

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9年4月。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第二年，我所接触到的这片土地还处于深度贫困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和内战之苦，还在政策方面走了一段弯路。

中国的这种不利局面已经持续了近150年。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同样强大的还有印度。但在19世纪，情况发生了转变。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在这一时期，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关键港口和城市，还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了英国、法国和日本。二战期间，日本还侵占了中国大面积的领土。中国遭遇这些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工业革命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这使其对手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均占据优势。

这场动乱也导致了中国既有政治体制的垮台。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在那之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争夺政权，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贯穿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日本占领时期，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最初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占据上风。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无力控制日军撤退后留下的混乱局面，并且面临强大的内部反对势力，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内战再次爆发，最终国民党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打败。

1949—1976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较为彻底地结束了中国的政治动荡局面。

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像美国、西欧和苏联等地那样实现快速发展。这个国家在粮食生产方面又回归了自给自足的模式，工业生产走上中央计划道路，政治和文化领域则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依然没有明显的起色。这个中央帝国（西方国家有时对中国的称呼）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众多国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邓小平想要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1978年，他访问了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保护区域内关键产业免受外部竞争的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的四个经济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受到这个位于小岛上的城市之国启发，邓小平也为中国寻求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一模式下，实现经济形势好转的核心在于，在中国南方人口众多的广东沿海各地带成立经济特区，并吸引来自周边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允许境外投资者在经济特区设立企业。位于深圳河北岸的深圳，正是其中一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设立，相当于为私营企业在中国的运营提供了一个沙盒环境。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针对私有制、公司注册和利润依然存在许多限制性规定，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年。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经济特区内，境外投资者可以设立企业（前提是它要以出口为目的），可以持有或至少可以租赁资产，而且可以享受特殊的法律和税收待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刘国宏在2019年告诉我们^[1]，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让中国尝到“市场导向型经济”（邓小平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则提出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滋味。然而，当时的现实是，中国根本没有钱来发展任何经济活动。因此，在靠近香港（那里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制造业）的地方设立经济特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大胆的计划成功了。1982年，一家香港金融机构——南洋商业银行，在位于香港以北几英里的深圳设立了一家分行。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商业银行。[\[2\]](#)它代表着中国发展的分水岭。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银行为其在中国内地的分支机构提供了一笔跨境贷款。这使得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可以为深圳的长期土地租赁活动和开办工厂提供融资。

深圳当局也做了相应的工作。之前，中国的土地完全归于国有，这意味着私人投资者根本无法获得土地。现在，深圳政府允许境外投资者使用土地，以作商业用途和工业用途。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甚至组织了一场公开的土地拍卖，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首场土地拍卖活动。[\[3\]](#)

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效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先例，深圳起初专门发展低成本、低价值的制造业。由于这里的人们起初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天不到一美元，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并不难，工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全都用于出口。

亚洲四小龙嗅到先机，率先转换生产场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企业纷纷来到深圳，要么建立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商独资企业，要么与中国内地投资者合作打造合资企业，这样其产品也可以在中国境内销售。

于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们开始纷纷涌向各经济特区。这一

方面源于那里的工作岗位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新生事物的诱惑力，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大约3万居民的深圳，一跃而成为人口超过1 000万的成熟的一线城市，与北京、上海和广州齐名。当年那个位于稻田旁边的“沉寂的小渔村”已经一去不复返。

随着第一批经济特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1984年，中国进一步批准大连、天津、福州等为沿海开放城市。其中，大连与韩国和日本距离较近，天津为服务首都北京的主要港口城市（这两个地方现在都已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年会的常驻举办城市），福州则是许多移民新加坡的华人的故乡。中国在1990年开放了上海浦东新区，随后又设立了十几个经济新区。

这种出口型发展模式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迁往沿海经济新区，坚信那里的工厂、施工单位和服务性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薪水。中国的城市呈爆炸式增长，而内地的农村地区则陷入“空心化”。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及以上的峰值。1980年时的中国，GDP只有2 000亿美元。中国就是从这样一个穷国成长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GDP相比1980年增长了5倍（2000年中国的GDP为1.2万亿美元）。

随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一些境内外人士希望中国的政治进程也能够发生改变，就像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当然还有俄罗斯所发生的那样。虽然这种政治变迁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原有政权的瓦解以及新政权的诞生，但中国政府保持住了其在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迎来了经济的繁荣时

期，许多西方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就业、薪酬和消费水平的提升。

到2001年，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变身为一个出口强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推动了另一波出口导向型增长。对于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可能性，有些西方企业之前持谨慎态度，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这种可能性，但现在这些企业纷纷来到中国。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制造商服务的主要客户，其中有些还在当地建立了合资企业。

深圳作为中国发展初期表现最为耀眼的城市，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的产业活动面貌发生了改变。这个起初以廉价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和本土“山寨”企业而著称的城市，逐渐成长为“硬件硅谷”，而且是“科技创客行动”的发源地，《连线》杂志如此写道。[\[4\]](#)来自中国各地的创业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开始相聚于深圳，交流想法，并在这一过程中孵化了新的创新企业。

如今，许多企业仍然在深圳设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富士康的工厂。富士康是一家台湾的电子企业，雇佣了几十万名员工，苹果公司的大部分手机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至少不久之前还是这样，近期迫于地缘政治方面的顾虑，“苹果公司开始悄悄地、逐渐地将生产线搬离中国”，转到富士康在印度新建的工厂[\[5\]](#)）。在深圳的台湾企业和香港企业还有很多，富士康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些企业为深圳早期的工业扩张贡献了骨干力量，它们至今仍在这个城市占据着重要位置。

不过，今天的深圳更为国际大众所知的可能在于其本土的科技企业。以华为为例，它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它制造的硬件为整个第五代（5G）移动网络提供了动力，它生产的智能手机远销世界各地（美国除外），但近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导致其扩张进度放缓。

华为的成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创始人任正非曾经应征入伍，后来于1983年转业来到深圳，成为深圳众多外来人口中的一员。他抱着碰运气的态度，投身于蓬勃发展的深圳电子行业。4年之后，他创办了华为。最初的华为是一家香港企业的设备代理商，规模很小。它在接下来30年里的崛起历程，在许多方面成为整个中国的写照。

在深圳，像这样的创业成功案例还有许多，现举例如下（括号内为企业在深圳成立的年份）。

·中兴通讯（1985年）：包括电话在内的各种电信设备的制造商。

·平安保险（1988年）：中国保险行业巨头，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参与者。目前拥有2亿用户，员工数量近40万，公布营收达1 600亿元。[\[6\]](#)

·比亚迪（BYD）（1995年）：BYD的全称是“Build Your Dreams”（成就你的梦想）。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每月销售多达3万辆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7\]](#)。

·腾讯（1998年）：一家科技集团，旗下拥有中国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QQ，是电商企业京东的最大股东，开发了广受欢迎

的游戏《英雄联盟》。它是由一群在深圳的人创立的，其中包括现任CEO（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腾讯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排名靠前的社交媒体公司和电商企业。

深圳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廉价制造业基地，但它依然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全新的篇章已经翻开。现在的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带动亚洲和其他地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的“磁极”。

在这一阶段，以出口为重点的经济特区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科技园、创业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等新型试验区的出现，使得经济特区日渐失色。在新型试验区中，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者正在孵化产品，以满足中国越来越精通技术、越来越富裕的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在这一领域，深圳再次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但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开发了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的字节跳动就创立于此）、上海的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也表现不俗。

[1] 2019年6月，刘国宏在中国深圳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https://www.ncb.com.hk/nanyang_bank/eng/html/111.html.

[3] “First Land Auction Since 1949 Planned in Key China Area,” *Los Angeles Times/Reuters*, June 1987,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87-06-28-mn-374-story.html>.

[4] “The Silicon Valley of Hardware,” *Wired*, <https://www.wired.co.uk/video/shenzhen-episode-1>.

[5] “Exclusive: Apple Supplier Foxconn to Invest \$1 Billion in India, Sources Say,” *Reuters*, July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oxconn-india-apple-exclusive/exclusive-apple-supplier-foxconn-to-invest-1-billion-in-india-sources-say-idUSKBN24B2GH>.

[6] “Global 500: Ping An Insurance,” *Fortune*,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19/ping-an-insurance>.

[7] “The World’s Biggest Electric Vehicle Company Looks Nothing Like Tesla,” Bloomberg, April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4-16/the-world-s-biggest-electric-vehicle-company-looks-nothing-like-tesla>.

前进的代价

今天，跨过深圳河，你就走进了一片混凝土丛林，这个不断扩张的城市就是深圳。在炎炎夏日，比起当年那个沉寂的小渔村，现在的深圳大街上并不能看到更多的行人。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里夏日平均气温太高，人们在外面走不了几步路就会大汗淋漓。于是，人们将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室内。他们穿行于有中央空调的地下商业街，比如连城新天地，或者待在有冷气的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就坐落于那众多摩天大楼之中。有时候，深圳还会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水灾害[1]——另一种随着气候变暖而恶化的气候现象。这座城市确实变得富裕起来，但所有的财富都无法保护这座城市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负担。正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70%，与其他新兴市场差别不大。[2]但在此后10年里，中国的这一占比呈爆发式增长。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2019年7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30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几个月之后，这一占比更是迅速攀升至317%。[3]

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因为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来自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它们可能会在短期内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产出。然而，随着近年来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急剧下降，总体经济增长也随之减速，债务积压越来越令人担忧。贸易局势紧张、人口增速下降或其他因素都可能引发经济增速进一

步放缓。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的危机可能会波及全球。

过去几年中，在部署新的风能和太阳能装置方面，中国已经领先全球。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要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4]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还需要克服一些重大障碍。首先，在2019年，中国新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速度放缓，而且这一趋势已经延续至20年代。^[5]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石油需求反弹速度比其他地区都要快。截至2020年初夏，中国的石油需求已经恢复至疫情暴发前的90%。这对于全球经济复苏来说是个好兆头，但对于排放问题来说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最后，根据彭博社报道，在全球煤炭总需求中，亚洲所占的份额预计将从现在的77%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81%左右。^[6]英国石油公司在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表示，中国的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排在前列的煤炭生产国，在2019年的煤炭产量都比前一年有明显增加。^[7]

[1] “How Shenzhen Battles Conges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hia Jie Lin, GovInsider, July 2018, <https://govinsider.asia/security/exclusive-shenzhen-battles-congestion-climate-change/>.

[2] “China’s Debt Threat: Time to Rein in the Lending Boom,” Martin Wolf, *Financial Times*, July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0c7ecae28cfb-11e8-bb8f-a6a2f7bca546>.

[3] “China’s Debt-to-GDP Ratio Surges to 317 Percent,” The Street, May 2020, <https://www.thestreet.com/mishtalk/economics/chinas-debt-to-gdp-ratio-hits-317-percent>.

[4] “Climate Change: Xi Jinping Makes Bold Pledge for China to Be Carbon Neutral by 206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25444/xi-jinping-pledge-carbon-neutral-2060>.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02761/climate change-xi-jinping-makes-bold-pledge-china-be-carbon](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02761/climate-change-xi-jinping-makes-bold-pledge-china-be-carbon).

[5] “Current Direction for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Anders Hove,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June 2019,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20/06/Current-direction-for-renewable-energy-in-China.pdf>.

[6]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Ditching Coal—Except Asia,” Bloomberg, June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09/the-pandemic-has-everyone-ditching-coal-quicker-except-asia>.

[7]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BP,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紧随中国而起的新兴市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实现巨大发展飞跃的经济体。追随着中国的脚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国家也纷纷崛起。中国对于许多大宗商品有需求，它的许多新兴市场伙伴刚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事实上，尽管中国在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都堪称“巨人”，但其在全球重要战略资源储量方面相对逊色，不过稀土矿资源除外。中国的发展伴随着新城市的建设、工厂的运营和基础设施的扩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就需要求助于其他国家，以获得必要的投入品。

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周边市场（包括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东盟地区，以及澳大利亚），还有之前竭尽全力想要实现高速增长的市场（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件幸事。

中国的崛起，事实上助推了新兴市场的大繁荣。纵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2018年的贸易数据[\[1\]](#)，我们就能了解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每年进口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左右。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中国为多个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每年从这些经济体购入大量商品。

以2018年为例[\[2\]](#)，中国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分别进口了价值达370亿美元、30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的石油。澳

大利亚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国，在这一年的成交额达6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从巴西和秘鲁分别进口了价值19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的铁矿石。在钻石和黄金等贵重宝石方面，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是瑞士，其次是南非。此外，中国还从智利和赞比亚进口了铜，价值分别达1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从泰国进口了各种橡胶，价值达50亿美元。

这些都只是原材料。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它开始将部分生产活动外包，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新的低成本经济体。曾经，中国需要通过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引进某些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能够独立研发这些技术。这使得中国能够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国外，直接进口成品，最后再把这些成品出口至其他国家。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就像中国一样，许多新兴市场在过去20年里也纷纷创造了经济奇迹。20世纪90年代，全球开始走上自由贸易之路，上述趋势便于那时缓慢起步；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里，这一趋势开始加速发展。根据《金融时报》的计算[3]，在2002—2014年的10多年间，新兴市场的表现一直优于发达市场，这不仅体现在总体经济增长率，而且体现在人均GDP的增长率（见图3.1）。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所称的“大合流”[4]：较贫穷的新兴市场在收入和GDP水平上逐渐向较富裕的发达市场靠拢。

遗憾的是，近年来，除了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这一趋势已经终结。自2015年以来，3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的人均GDP增长率回落到22个最大的发达市场之下。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跌至7%以下，这并非例外。中国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上涨态势“急刹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均已趋于平缓。尤其是，有三个地区的经济依然表现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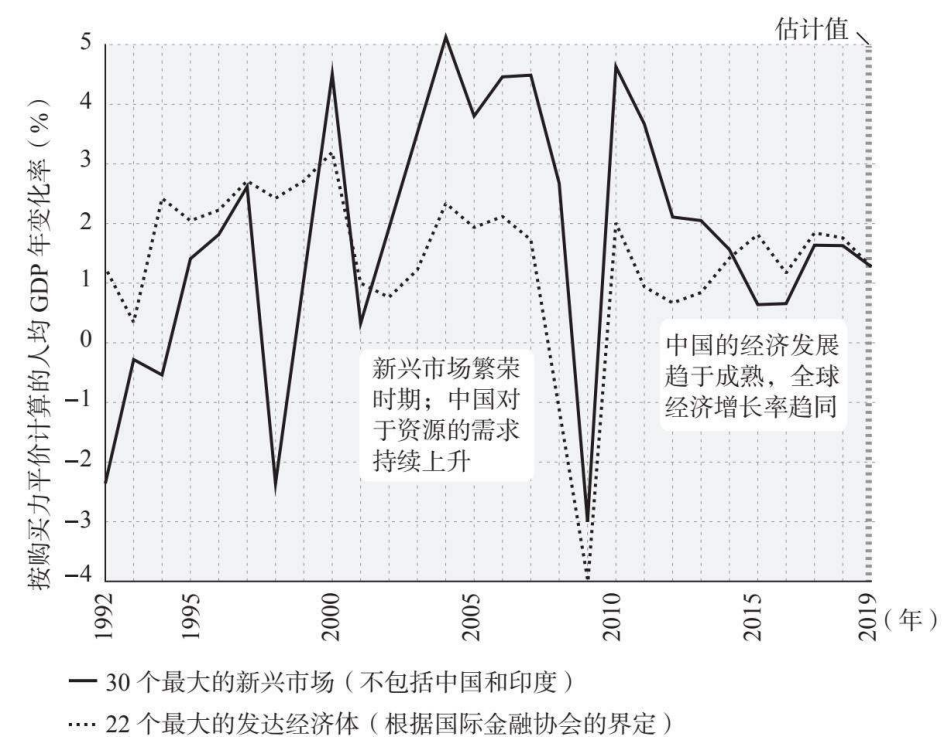


图3.1 在经历了21世纪最初10年里由中国推动的繁荣时期之后，新兴市场的增长率再次落后于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2020年实际GDP增长率数据重新绘制。

首先是东盟经济共同体。该地区共有约6.5亿人口，覆盖了一些正在成长的大国，例如印度尼西亚（人口为2.64亿）、菲律宾（人口为1.07亿）、越南（人口为9 500万）、泰国（人口为6 800万）和马来西亚（人口为5 300万）。[5]，[6]虽然东盟各成员在文化层面和经济层面极其多元化，但整个东盟共同体很可能

将回归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几年的GDP增长路径，增长率为年均5%左右。[\[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东盟最大的5个经济体在2020年的经济收缩幅度将小于全球平均水平（-3.4%），并在2021年恢复至6.2%的增长率。[\[8\]](#)

东盟各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最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的下一个世界工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工资水平普遍比中国低，而且这些国家靠近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海上通道，这些因素都便于它们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目前，已经有来自中国、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的数百家跨国企业在这地区开展生产活动。

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一地区是世界两大经济强国都可以接受的中立区域。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许多企业为了避开关税壁垒，纷纷计划将生产活动搬离中国。至今未卷入贸易战的东盟，对那些企业来说无疑是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这方面，越南是明显的赢家。[\[9\]](#)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在于区域一体化和技术创新的结合。东盟可以说是继欧盟之后最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其区域贸易量不断提升，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此外，该区域还诞生了几家科技领域的独角兽（即市场估值达10亿美元及以上的私营企业）。根据贝恩咨询公司的数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出租车服务供应商Grab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但印度尼西亚的共享出行服务商GoJek、电商平台Tokopedia、在线旅游应用公司Traveloka，还有新加坡的几家初创公司，以及越南的VNG和菲律宾预制房屋公司Revolution Precrafted，也都成为行业独角兽

(至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是这样) [10] (见图3.2)。



图3.2 截至2019年，东南亚已经出现了至少14家科技独角兽

资料来源：根据贝恩公司2019年10月的数据重新绘制。

[1]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orld Bank, 2018,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LTST/TradeFlow/Import/Partner/by-country/Product/Total#>.

[2] “China Imports,” Comtrade, UN, 2018, <https://comtrade.un.org/labs/data-explorer/>.

[3] “Does Investing in Emerging Markets Still Make Sense?” Jonathan

Wheatley, *The Financial Times*, July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0bd159f2-937b-11e9-aea1-2b1d33ac3271>.

[4] *The Great Convergence*, Richard Baldw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660489>.

[5] “Member States,” ASEAN, <https://asean.org/asean/asean-member-states/>.

[6]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ASEAN countries,”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96222/total-population-of-the-asean-countries/>.

[7] “Economic Outlook for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India 2019,” OECD, https://www.oecd.org/development/asia-pacific/01_SAE02019_Overview_WEB.pdf.

[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Late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Projec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9] “Vietnam Emerges a Key Winner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Channel News 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commentary/us-china-trade-war-winners-losers-countries-vietnam-hanoi-saigon-11690308>.

[10] “Southeast Asia Churns Out Billion-Dollar Start-Ups,” Bain, <https://www.bain.com/insights/southeast-asia-churns-out-billion-dollar-start-ups-snap-chart/>.

印度的增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另一个增长势头强劲的国家是印度。但在此次疫情期间，印度所遭受的冲击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为严重。在获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一直在努力对抗所谓的“印度式经济增长率”，这是对于“低增长率”的一种委婉说法。虽然这个国家因获得独立且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而发展前景乐观，但它从未像亚洲四小龙或中国那样，实现经济腾飞。印度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 Raj）滋生了官僚主义作风，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垄断，再加上它所追求的保护主义措施，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实现那般迅速增长。

印度基本上还未实现工业化，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依赖小农生产方式度日。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图景都停留在：大量农村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或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聚集在这个国家的特大城市中谋生。但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城市相比，印度的城市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很少。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的一些企业家开始致力于逐步改变这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均较低的国家面貌。随着计算机革命的兴起，一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他们通常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成功创立了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等世界一流的IT（信息技术）外包公司。印度一些领先的实业家也开始涉足蓬勃发展的技术行业，创建了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成立于1968年）、马衡达信息技术公司等分支机构。

印度还出现了一些工业企业，最初主要从事原材料、化工和纺织等基础产品的生产，但后来将业务范围扩展至电信和互联网等现代技术领域。其中最为著名且规模最大的企业当属穆克什·安巴尼领导的印度信实工业集团。通过扩大业务范围，投资于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为核心的大型新项目，信实工业集团和印度其他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开创印度数字时代的过程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这些企业的业务范围可与中国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相媲美，因为它们可以提供从电子商务到银行业务、从互联网到电视等的一切服务。

在遭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前，印度正采取结构性举措，以消除国内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遗留问题。于2014年上任的总理莫迪领导印度中央政府进行了实质性的市场改革，具体包括对商品和服务实施统一税制，允许外国投资进入印度多个行业，提高电信频谱拍卖活动的透明度。[\[1\]](#)在2020年之前的几年里，印度的GDP年增长率徘徊在6%~7%，与中国几乎持平，甚至有时会高于中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突然中止了印度的这一上升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底表示，印度经济预计将收缩10%以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收缩幅度也将达到这一水平，它们同属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经济体之列。[\[2\]](#)这种总体经济下滑的背后隐藏着更具戏剧性的场景：当印度于2020年3月24日宣布进入全国封锁状态时，该国数百万名居住在城市贫民被迫徒步返回位于农村的家乡。1 000万农民工返乡，[\[3\]](#)这构成了21世纪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了好几个星期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在那里更好地度过危机。但长途跋涉导致了许多额外的问题，尤其是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造成了影响。

不过，从长远来看，人们也有理由对印度的前景保持乐观。因为这个国家很快将迎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为25岁），其政府已经消除了发展道路上一些重大的阻碍。之前对许多商品实行定量供给且限制竞争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目前印度政府正逐步采取更多措施，以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

可是，印度的13亿人口中仍有许多人尚未做好加入现代劳动力大军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国民的识字率低。到2020年，印度国民的识字率仍然只有77.7%，[\[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女孩入学率低。但这种情况完全是可以被改变的。在美国，当前已经有印度移民进入一些科技巨头企业担任领导者，比如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Adobe系统公司的山塔努·纳拉延。近年来，印度还诞生了Paytm（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和商务平台）、Flipkart（印度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商）等科技独角兽。

但要想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印度必须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从而使所有国民都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使这个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得到控制。尽管近几年乃至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但其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上升。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这一经济体的许多产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但这些举措未能帮助众多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的工薪阶层改善生活状况，无论是在教育、医疗还是在收入方面，情况都是如此。

[1] “India’s Economic Reform Agenda (2014–2019) , a Scorecar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indiareforms.csis.org/2014reforms>.

[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0, Chapter 1, p.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3] “India’s Harsh Covid-19 Lockdown Displaced at Least 10 Million Migrants,” Niharika Sharma, Quartz India, September 2020, <https://qz.com/india/1903018/indias-covid-19-lockdown-displaced-at-least-10million-migrants/>.

[4] “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 2020: Kerala, Most Literate State in India,Check Rank-Wise List,”*The Hindustan Times*, September 2020,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education/international-literacy-day-2020kerala-most-literate-state-in-india-check-rank-wise-list/story-IodNVGgy5hc7PjEXUBKnIO.html>.

放眼全局

进入21世纪20年代，我们还可能会见证亚非关系的继续深化，这一情况可以与中国的崛起互为补充。几十年来，许多非洲经济体一直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以及充足的融资渠道。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中国有对非洲投资的意愿，其中一些制约非洲发展的因素现在正在消失。

一旦东南亚的机会枯竭，中国可能会考虑将非洲作为下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实际上，非洲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意义。目前，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受益国。[\[1\]](#)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和能源领域，但一旦公路、铁路和电力资源就位，也就为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因此，虽然新兴市场的整体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但非洲的一些市场可能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2\]](#)其中一些市场与中国有着重大利益关系。例如，在东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8%，这部分得益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在西非，科特迪瓦、加纳和尼日尔的前景也向好。然而，非洲的两个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发展道路则渐趋狭窄。新冠肺炎疫情对南非造成的冲击尤其严重，尼日利亚在这场疫情到来之前，经济增速就已经放缓。

与我们在前几章中描绘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整体经济表现十分乐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为许多中国人和其他国

家的人们带来了财富。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中国已使大约7.4亿民众摆脱了贫困状态。此外，它还助力其他新兴市场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在发展的高峰时期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合流”，尽管自那之后中国的发展势头便有所减弱。

这种中国效应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按照某些衡量标准，很多人所说的“亚洲世纪”已经开始。《金融时报》作者瓦伦蒂娜·罗梅伊和约翰·里德在2019年3月的一篇文章[3]中指出了一个显著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在2020年将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见图3.3），这是两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证实了这一前景。截至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4]中国将是唯一一个在2020年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东盟则是除此之外唯一一个所遭遇的损失在可控范围内的地区。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的发达经济体，预计将出现历史性的经济收缩。

图3.3中所示的这一统计数字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亚洲上一次主导世界经济是在19世纪初，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之时。2000年时，亚洲在全球总产出中的占比只有1/3。如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亚洲正逐渐夺回其曾持续数千年的主导地位。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从物联网到人工智能，中国很可能在每个领域都超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长达几十年的优势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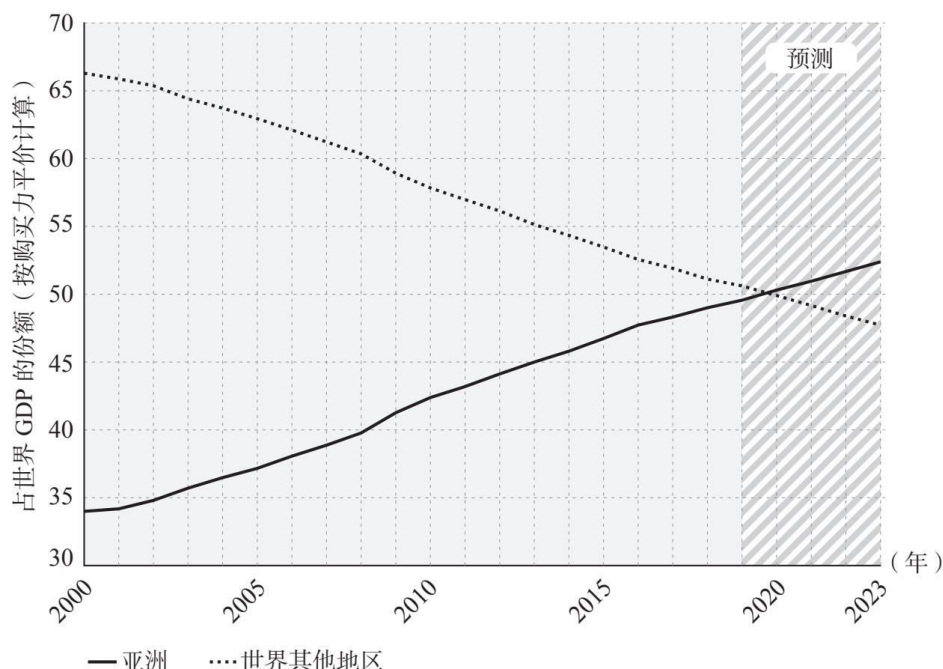


图3.3 根据某些衡量标准，“亚洲世纪”已经开启

资料来源：根据《金融时报》上发表的瓦伦蒂娜·罗梅伊的文章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重新绘制。

中国的崛起，以及紧随在中国之后的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确实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思议的里程碑式事件。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点而忽视了全局。我们在第二章中勾勒出的全球趋势不光适用于西方世界，也适用于亚洲。整个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导致自然环境和人类后代的命运都陷入危境。此外，中国、印度等国近年来虽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俗，但它们面临着和西方国家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平等。

我们首先来看亚洲的环境现状。中国、东南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许多城市都正在经历环境恶化、污染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

最恶劣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9年表示，根据该组织的标准，世界上超过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5\]](#)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全都位于亚洲：印度有15个城市上榜，其中包括首都新德里；中国和巴基斯坦各有2个城市上榜；还有1个是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近年来，对于中国环境污染情况的严重性，人们的意识已经显著提升，近期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类问题的担忧。但无论你走到哪个大型工业城市，都会明显感受到污染仍是一个重大问题。

图3.4中展示了来自世界不平等研究实验室（WIL）的两张图，从中可以看到不平等问题是亚洲经济体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根据该研究机构的报告，在印度“实施了以放松管制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深度经济变革之后，不平等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显著加剧”[\[6\]](#)。到2014年本届政府上台时，印度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新高”。同样地，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10年前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是在持续攀升。在世界不平等研究实验室看来，这些政策带来了“国民收入的空前增长”，但同时也导致“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重大改变”。几乎每个群体都有所进步，但较高收入群体逐渐从开放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近10年来，这种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放缓或停止，但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现状。

印度和中国的不平等状况

(1978—2014 年, 前 10% 群体和后 50% 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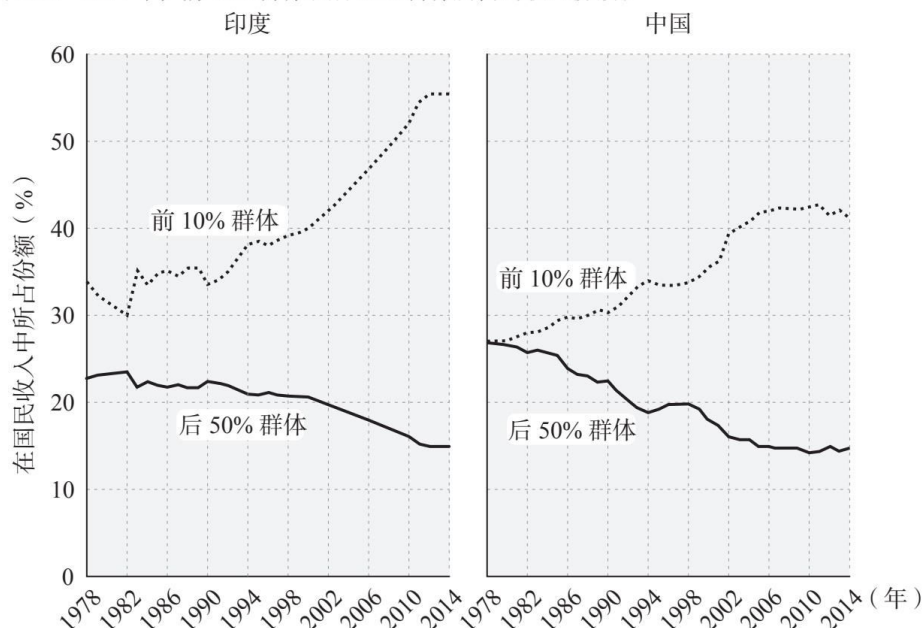


图3.4 近年来, 中国和印度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

资料来源：根据尚塞尔、皮凯蒂、杨利和祖克曼编写的《世界不平等报告》重新绘制。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亚洲在内的整个全球经济造成了额外的短期干扰。如果早期的指标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一些东盟经济体和东亚从这场危机中反弹的速度会超过许多西方国家，实现所谓的V形复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之后，西方社会和亚洲社会仍将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以及可能存在的韧性不足问题。

我们可以将希望寄托于亚洲，期望亚洲能利用自身重新获得

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帮助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缺失，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从原则上来说，儒家文化追求和谐的精神可以成为亚洲为打造一个良性的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但我们还没有成功打造出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失控。而且，在彻底扭转这一局势之前，我们还必须直面另一个痛苦的现实：当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

[1]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8/09/06/figures-of-the-week-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

[2]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ub-Saharan Africa,” The World Bank, January 2019,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307811542818500671/Global-Economic-Prospects-Jan-2019-Sub-Saharan-Africa-analysis.pdf>.

[3] “The Asian Century Is Set to Begi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520cb6f6-2958-11e9-a5ab-ff8ef2b976c7>.

[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Late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Projec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5] “Air Pollu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airpollution/en/>.

[6]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Income Inequality in India,” World Inequality Lab, <https://wir2018.wid.world/>.

第四章 分裂的社会

1961年8月12日清晨，柏林人一觉醒来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一堵墙赫然出现，将他们的城市从中间分割开来。这是一场漫长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达到高潮的结果，给许多人带来了残酷的冲击。自此，柏林墙持续竖立近30年，给数代德国人留下了精神创伤。

再往前推15年，正值二战结束时，当时的德国已经被盟国占领。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打倒了纳粹政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场战争的开始。德国从此被一分为二，柏林也是如此。东柏林最终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在德国东部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位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之前被盟军占领的西柏林则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在德国西部和南部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隶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

此时的柏林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它仍然是整个国家的首都，同时生活着“西佬”（即联邦德国的居民）和“东佬”（即民主德国的居民），前者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占领区，后者则居住在苏联占领区。这种情况注定无法持续。随着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民众无法自由地从民主德国去往联邦德国。1961年，民主德国决定修建一堵边境墙。这堵墙将柏林这个城市从中间一分为二，阻断了所有民主德国公民前往联邦德国的通道，开启了该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地缘政治分裂时期。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柏林墙出现的那个时刻，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一刻对所有德国人和许多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可能同样印象深刻。当时我23岁，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的政治现实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我年轻时，曾花了大量时间在信仰自由主义的西欧各地旅行，还投身于一些青年运动中，以庆祝我们共同的“欧洲人”身份——无论我们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意大利人。我们希望将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转化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实，欧洲经济共同体（即欧盟的前身）正是这个项目的缩影。

但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现实，即各国并没有走到一起，而是各自为政。柏林墙的建立正符合这一现实。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爆发了冷战，而柏林墙的筑起只是冷战的一种体现。冷战的冲突体现在世界各地。就在柏林墙建成的前几个月，一些古巴流亡者在美国的援助下，试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成立的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发动入侵。这次拙劣的行动被称为“猪湾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两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在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中，苏联和美国各自加大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储备，将世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核战争一触即发。

让我们回到柏林。柏林墙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分裂在勃兰登堡门前体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德国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柏林墙从它旁边经过，直接阻断了从西柏林到勃兰登堡州东部的道路。柏林

这整座城市就处在勃兰登堡州的环绕之下。由于被柏林墙和铁丝网阻隔，勃兰登堡门对于西柏林的人来说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参照点。来自联邦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纷纷象征性地以勃兰登堡门为背景发表演讲。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正是在这里说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以表达他对所有柏林人的支持。^[1]1985年，时任西柏林市长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这里说道：“只要勃兰登堡门一日关闭，德国问题就一日得不到解决。”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是在这里呼吁苏联领导人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打开这扇门”，“拆掉这堵墙”。^[2]

然而，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这一切都只是徒劳。西柏林的居民只能遥望勃兰登堡门，与柏林墙另一边的家人或朋友几十年都不得相见。在柏林墙筑成后的几年里，有数百人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丧命。就这样，柏林墙成了“铁幕”的实体化身，它不只是将柏林与德国一分为二，而是很快地将整个欧洲分割开来。只有西柏林人能够继续体验自由与民主。东柏林人和生活在勃兰登堡州等周边地区的人与西柏林人的生存环境将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分裂的社会。

1989年11月9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一天，上千名民众从东西两边爬上柏林墙，只因有传言称，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边境在未来某一时刻可能会重新开放。此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一个“泥足巨人”，从波兰到匈牙利，其边界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在一个分裂已久的社会中，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军队就位时，振奋不已的人群已经爬上柏林墙，俯瞰勃兰登堡门。在历经两代人后，人们第一次将手伸到墙的对面。当那些男男女女爬上柏林墙时，他们所克服的不仅仅是一个实体障碍。联邦德

国与民主德国的民众传达出的信息很明确：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民众爬上柏林墙的照片传遍了世界，其中也包括当时的民主德国。

11月的那个夜晚引发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很多读者时至今日应该都很难忘记这些事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谓的铁幕走向崩溃，其背后的政府也走向瓦解，其中就包括曾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政府。民主德国的转向尤其令人印象深刻。1989年12月，柏林墙被彻底拆除，勃兰登堡门正式重新开放。数十万人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东部与西部之间，大多都是为了与几十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团聚。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在上一本有关世界经济论坛发展史的书中曾回忆道：[\[3\]](#)

1990年的[达沃斯]年会成为促进德国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平台。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与新当选的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汉斯·莫德罗在达沃斯的首次接触，在决定德国统一进程的走向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科尔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民主德国]正在从内部开始崩溃，迫切需要经济支持以维持金融稳定。深受影响的莫德罗则意识到，他不能再坚持德国统一后的“中立”立场。回到波恩后，科尔总理迅速采取行动。几天后，2月7日，他的内阁正式确认了达成两德货币联盟的建议。8个月后，这一进程完成。1990年10月3日，德国完成了统一。[\[4\]](#)

在德国统一后的数年里，人们支持政府的政策，以真正修复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使这个分裂的国家实现统一。在环绕柏林这座城市的勃兰登堡州，人们集体投票给两个“大帐篷”政党[\[5\]](#)，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缩写为CDU）和社会民主党（德语缩写为SPD）。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这两个政党共获

得了勃兰登堡州2/3的选票。德国其他各州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德国得以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形成一个联盟。民主德国确实需要大量的财政援助以从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而且经历了40年的分离之后，两地人民之间已经不可避免地变得疏离。然而，民众团结的热情非常高涨。

身处当时的场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之后的30年里，德国社会发展的潮流会再次发生转向，分裂会再次出现。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在民众对于主要的中间派政党和它们所倡导的共同进步的支持持续了20年后，在之前的民主德国各州，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政治中心的崩溃随之而至。2019年9月，最近一次的选举中出现了一些曾经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两大主要政党的合计得票率远未及半数，只有42%。即使加上一向排在第三位的德国左翼党，票数也并未有明显提升。从鼎盛到衰败，昔日德国政党中的“三巨头”在勃兰登堡州失去了几乎一半的选民。

这次选举中的胜出者是在社会和政治谱系中处于完全对立立场的两个政党。一个是聚焦气候问题的德国绿党，它在勃兰登堡州获得了大约10%的选票。这体现了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绿党登上政治舞台，其他党派大多持欢迎态度。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反移民立场著称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获得了23.5%的历史性高得票率——上一次极右翼政党获得如此高的得票率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

在整个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演变趋势，直到因在新冠肺炎疫情

情中应对得宜，德国传统的中间派政党——由默克尔总理带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再次激增。但即便是中间派政治势力的重新崛起，也无法掩饰右翼势力日渐激进和左翼势力日益分裂的事实。尽管默克尔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获得了评论界和民众的一致好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对整个政府，而且对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疫苗接种等具体的公共卫生措施，都日渐怀疑。

就这样，2019年德国东部各州的选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一个持续30年的周期画上了句号。曾经的勃兰登堡门象征着团结和希望，现在的勃兰登堡州却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一个更加分化且高度怀疑的社会。曾经将德国社会从中间分割开来的那堵墙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中间派的政治立场，转向支持更极端、更激进或更分裂的政治党派。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间派政治势力的崩溃，民粹主义、身份政治以及其他分裂性意识形态的抬头，并不仅限于勃兰登堡州，也不仅限于德国。在世界各地，主要中间派政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持较极端或分裂观点的政党和候选人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这最终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局势走向两极化，并终将陷入瘫痪。西方战后形成的长期趋势是，大多数主流政党在吸纳成员和所持观点上往往较为包容。但现在这种趋势被打破。经验告诉我们，选择更具分裂性的政党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分歧，而不会带来更加和谐的未来。而且，这些离心势力一旦启动，就很难被阻止。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单一的因素来完全解释这种极化现象。（我们将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探讨一些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极有

可能的是，极化现象既是现有社会政治问题造成的结果，又是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分裂到底有多广泛？它究竟源自何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再看一些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例子。

[1] “Rede von US-Präsident John F. Kennedy vor dem Rathaus Schöneberg am 26. Juni 1963”, City of Berlin, <https://www.berlin.de/berlin-im-ueberblick/geschichte/artikel.453085.php>.

[2] “Ronald Reagan, Remarks at Brandenburg Gate, 1987”, University of Bochum, https://www.ruhr-uni-bochum.de/gna/Quellensammlung/11/11_reaganbrandenburggate_1987.htm.

[3] “A Partner in Shaping History, The First 40 Year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40Years_Book_2010.pdf.

[4] “A Partner in Shaping History,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New Europe,” World Economic Forum, p.108,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A_Partner_in_Shaping_History.pdf.

[5] “大帐篷”政党，又称全民党，相对于传统型政党而言，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兼容性的意识形态。——译者注

中间派政治势力的削弱

大多数人都熟知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状况。这两个国家拥有西方世界中立程度较高的社会。2016年，美国人民迎来了他们印象中的首位非建制派总统。英国人民则针对是否脱欧展开了公投，也将整个社会近乎从中间割裂开来。在这两个国家，社会分裂问题自此之后一直存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但极化趋势已经不光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它比表面上看起来程度更深，影响也更远。

我们再来看欧洲大陆的议会民主制政体。在这里，政治格局长期由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主导，与德国的情况类似。但近年来，曾经占据领导地位的“全民党”往往要么走向解体，被更为极端的政党取代，要么经历了内部转型，化身更激进的政党。

首先来看中左翼政党。在“铁幕”落下，欧洲共产主义解体后，欧洲的许多前社会主义政党最初纷纷重塑形象，改为更加务实的中左翼政党。

它们获得了广泛的选民基础，从而成为真正的“大帐篷”政党，即具有广泛的且往往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的主要政治力量。但这种新的平衡并没有得以持续。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时，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失势。从主权债务危机的酝酿阶段到危机爆发，再到随之而来的经济急剧衰退阶段，社会民主党始终是当权势力之一，这让选民对中左翼政治势力失去了信心。

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些政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急剧下降。1998年，由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40%以上的选票，得票率创下了德国统一之后的新高。相比之下，到20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不到15%。在2012年之前经常赢得总统之位以及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濒临解体。（不过，一个新的中间派势力由此崛起，那就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在意大利，中左翼民主党的崩溃来得更为迅速。2013年，意大利总理伦齐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了近半数议会席位，他带领的中左翼党派联盟在议会中轻松赢得了多数席位。5年后，该政党遭遇溃败，只赢得了1/6的议会席位。

这些选民的动向因国家而异，但多数选民转而支持的往往并非中间派政党，而是那些对内主张激进改革、对外排斥欧盟和全球经济体系的政党。以法国为例，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屈的法国”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以3：1的优势战胜法国社会党的候选人，差一点就得以晋级第二轮投票。该政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第六共和国”，以取代战后的“第五共和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陷入失控之后，该国对紧缩性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左翼激进联盟党上台。颇为引人关注的是，该政党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在内的债权人发生了争执，拒绝了它们的融资条件。在西班牙，一个名为“我们能”的新兴极左翼政党，成功挑战了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在那些愤怒的西班牙青年走上街头抗议之后不久，该政党就走到了台前。这些政党之所以能够联系在一起，就在于它们都希望退出现有的国际贸易协定，都要求实施改革或者脱离欧盟，并且普遍厌恶精英阶层。

其次来看中右翼政党。在欧洲，中右翼势力与中间派立场偏

离得更为彻底。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其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欧洲真正的“全民党”。它既没有依附于诞生自工业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没有依附于诞生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提出了一种社会人本主义愿景，在政治领域扮演了一种更加中间派的角色。近代以来，没有人比德国总理默克尔更能体现这种务实主义的政治作风。但早在默克尔上台之前，她所领导的德国执政联盟（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就是德国主要的“全民党”。该政党的主导地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赫尔穆特·科尔担任德国总理长达16年。甚至是在二战后领导德国近15年的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也常常在选举中获得接近半数或超过半数的选票（在多党代议制民主政体中，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壮举）。

然而，近年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受到来自右翼的施压，要求其脱离人本主义和中间派的固有特性。欧洲难民危机成为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在2015年和2016年，超过100万名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从中东、非洲逃到欧洲，给难民接收国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挑战。默克尔和她所领导的德国执政联盟最初的反应是对难民敞开国门。她主张保持边界开放，无疑是铭记着几十年前“铁幕”和柏林墙带来的悲剧。“我们能够做到！”默克尔总理如此宣称。在德国统一后，面对大量民众从东部迁移到西部，我们做到了，这次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民众很快就不再像最初那般支持这种包容和欢迎移民的做法，因为事实证明，要使难民融入当地所遭遇的挑战超出了许多当地社区的承受能力。众多不会讲德语的年轻男性难民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培训期来学习语言、克服行政障碍，然后才能加入劳动大军，这使许多城市的社会项目压力倍增。此外，媒体对难民危机初期出现的一些犯罪行为[1]，如针对女性的群体性攻击事件[2]，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使当地人对难民产生了反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选择党崛起。它主张关闭边界，采取更强硬的移民融合政策，这使得它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上升。在右翼势力的压制下，德国执政联盟被迫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16年，默克尔总理收回了“我们能够做到”的口号。“我有时候认为这句话有点儿被夸大了，它被赋予过度的重视——以至我不愿意再重复这句话。”默克尔告诉德国《经济周刊》。在欧洲占据主要地位的“全民党”及其所属的欧洲人民党似乎就是由此开始走向终结，因为欧盟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然而，默克尔所奉行的务实主义和包容性态度，在2020年出人意料地逆转了局势，因为事实证明她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应对得力。默克尔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她在管理公共卫生危机时采取了严格的、基于数据和证据的应对方法。因此，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相比，德国感受到的疫情带来的冲击要轻得多。于是，民众再次团结起来，支持这位务实的中间派领导者。

不过，在欧洲其他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势力并未像在德国那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迎来反弹。与德国相比，这些国家不光缺乏有韧性的政府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还缺乏像默克尔这样经验丰富、稳健的领导者。相反地，欧洲大陆各国的主要中右翼政党都面临着两难困境：要么急速“右转”，以维持民众支持率，要么坚持强硬立场，代价是将失去大多数选民。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将意味着基督教民主党作为主要中间派“人民党”的地位走向终结。

其结果是，崇尚人本主义的中间派势力逐渐空心化。在意大利，中右翼联盟在二战以来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从理论上来说至今依然如此。然而，其内部组织方式

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法西斯政权被推翻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该联盟是由保守的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但进入21世纪，该联盟便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意大利力量党接管。

近年来，在拥有强大民意支持的独立总理朱塞佩·孔特^[3]领导下，意大利的执政联盟“右转”势头更加猛烈。原本与意大利力量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小党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在2018年意大利大选中大获全胜。与此同时，反建制、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五星运动党”成为意大利的另一主要政党。这使意大利首次出现由右翼与反建制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在波兰，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通向民主的大门。而近年来，右翼党派法律与公正党崛起，成为波兰第一大党。从严格意义上说，该党仍然标榜自己是基督教民主党，但它远比波兰以往任何一个政党的立场都更偏右，也更偏大众化和民粹主义。匈牙利的情况也差不多。目前，该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是由右翼政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联盟——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基民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也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隶属于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但该党在上届选举中对难民事务持强硬立场，并且发起反欧盟运动，导致其与欧洲人民党中更偏中间派的政党之间产生严重摩擦。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用一张图总结了这种越来越令人担忧的趋势（见图4.1）。他表示，除了中右翼政党立场越来越偏右以外，激进右翼政党在整个欧洲正迅速成为主流，而在2000年，这些政党在民主政体中还仅处于边缘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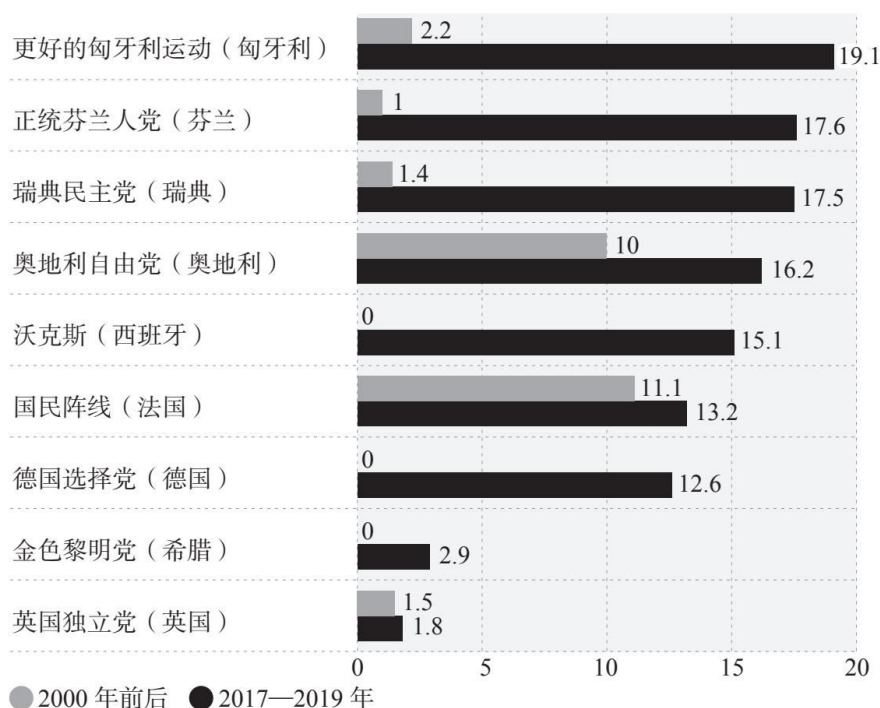


图4.1 2000年前后与近期（2017—2019年）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

资料来源：根据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图重新绘制。

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更加专制的领导风格在多地抬头。尽管不同地区之间很难就政治趋势进行比较，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但许多地区的选民确实似乎更偏向民族主义而非人文主义，更倾向于保护而非开放，他们持有一种“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二元世界观，无论是在单个社会中，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一部分人被视为局外人。

例如，在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保守派议员雅伊尔

·博索纳罗当选总统所基于的前提就是，他是一个政治的局外人，将给巴西社会和政治领域重新带来“规则和秩序”。虽然博索纳罗曾在国会任职数届，但直到2018年大选前，他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立场并不占据主流。自1988年军事独裁政权倒台后，巴西便进入中左翼或左倾势力掌权时期。博索纳罗的当选改变了这一局面，他所代表的激进保守派政治势力在选举中获得了选民强有力的授权。

此外，在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几个G20国家，领导者也被指出已转向支持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立场。其中每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各有不同，但政治领导势力变得更强大、更关注国内和民族立场的趋势是相似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种渐趋分裂的政治局势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分裂，那么社会分裂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Reality Check: Are Migrants Driving Crime in Germany?” BBC News, September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5419466>.

[2] “Germany Shocked by Cologne New Year Gang Assaults on Women,” BBC, January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231046>.

[3] “Why Italy’s Technocratic Prime Minister Is So Popular,” *The Economist*, June 2020,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0/06/25/why-italys-technocratic-prime-minister-is-so-popular>.

社会动荡

这些社会分化问题起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出现苗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过去几十年盛行的经济模式中找到迹象。这些迹象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但直到几十年之后它们才真正成为主流。

例如，早在1996年，本书合著者克劳斯·施瓦布就在《纽约时报》独立评论版撰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其影响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特别是在工业化民主国家，这有可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这些民主国家会充斥着一种无助和焦虑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将助力一种新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崛起。”^[1]这种观点被提出时，中间派政党面临的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显现，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还不错，这就导致那些抗议之声还只能流于边缘。

然而，由于中间派政府没能解决那些根本性问题，这种分裂注定会日渐加剧。在随后几年里，我们与许多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的抗议者和活动家对话，并意识到他们是“矿井中的金丝雀”，他们的态度预示着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即将到来，预示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然而，如前所述，我们与其他人对于利益相关者模式和其他更具包容性政策的呼吁基本上被置若罔闻。而且，回过头来看，我们原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前，许多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分裂迹象

仍被多数人的繁荣掩盖。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紧随而至的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民众对制度、精英和难民的反感渐呈雪崩之势。许多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社会爆发了“愤怒者运动”“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抗议活动。而且，这些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愤怒情绪也日渐激化。比如，在意大利，“货车司机、农民、小企业主、学生和失业者”在2013年12月纷纷走上街头，反对意大利的政治统治阶层、欧盟、税收制度和全球化。[\[2\]](#)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所谓的“干草叉”抗议运动，一开始是西西里岛的农民发起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很快就在意大利北部扩大化，还“吸引了右派团体和铁杆‘极端’球迷”的支持。[\[3\]](#)

从2017年开始，又有一个因素开始凸显，那就是环境危机。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分为不同的阵营。以法国为例。一方面，“气候变化青年行动”的年轻抗议者们主张政府和立法者在气候问题上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抗议者——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甚至应邀在法国议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巴黎街头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则旨在反对马克龙政府出于环境问题考虑而上调燃油税。“黄背心”运动最初并不受意识形态驱动。他们既不提倡传统的左翼或右翼政策，也不承认左翼或右翼政党立场。但随着运动在国外取得发展，它经常被另类右翼[\[4\]](#)势力利用。[\[5\]](#)

最后，在2020年出现了新一批反对的声音：面对自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对人类生命和生计造成的综合性破坏最为严重的事件——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他们因目睹全球各地政府的应对举措而感到愤怒。在世界各地，针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所谓本质，有人开始散布阴谋论。一些人认为，这一病毒是中国

故意制造和传播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本国政府试图压制人口的手段，并以此为由反对那些公共卫生措施。还有一些人更离谱，认为世界经济论坛与这场大流行病有关。在德国，有媒体报道称，新纳粹分子参与了那些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

然而，仅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待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抗议者、选民和政党，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右翼或中左翼势力正在被极右翼或极左翼势力取代，而是选民往往根本不再支持和相信任何建制派政党，甚至不再支持和相信目前的民主制度。许多人要么不去投票，要么选择非民主党派。更成问题的是，当前的民主机构在世界各地普遍遭受攻击。这应该是所有民主倡导者的重大关切，无论其经济意识形态如何。民主政府的概念与战后年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繁荣西方社会的基础。但这一基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

以意大利为例。当时意大利执政联盟中的小党“五星运动党”就对“黄背心”运动持支持态度。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明知这一运动反对的正是政府。但该举动也并非那么反常。这个年轻的政党本身就起源于一场大众化的反精英运动，而且这是它第一次执政。执政联盟中的大党——右翼政党联盟党，随后也发声支持这场抗议运动。再以德国为例。在德国，“黄背心”运动同时获得了左翼和右翼的认可，因此就很难给这场抗议运动赋予特定的政治色彩。另类右翼运动 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主要是在“黄背心”运动中看到了一个强化其反移民立场的机会。除此之外，德国左翼运动“起立”（Aufstehen）则利用“黄背心”运动来呼吁国际团

结，结束战争。这些例子表明了新的社会分裂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在面对这些新的分界线时旧有意识形态作用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不同群体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正是在那些最为重要的议题上，拥有较大话语权的群体所持立场往往截然相反。即便他们在某些议题上能够联合起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予以实施，事实上也可能会削弱现行的民主体制和政治制度。

[1] “Start Taking 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Seriously,” Klaus Schwab and Claude Smadja, *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96, <https://www.nytimes.com/1996/02/01/opinion/IHT-start-taking-the-backlash-against-globalization-seriously.html>.

[2] “Italy Hit by Wave of Pitchfork Protests as Austerity Unites Disparate Groups,” Lizzie Davie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dec/13/italy-pitchfork-protests-austerity-unites-groups>.

[3] “Clashes with fans as Pitchfork protests enter third day,” ANSA, December 2013, http://www.ansa.it/web/notizie/rubriche/english/2013/12/11/Clashes-fans-Pitchfork-protests-enter-third-day_9763655.html.

[4] 另类右翼指的是持有极端保守或反对变革观点的意识形态组织。——译者注

[5] 例如，在加拿大，这场运动在网上大受欢迎，因为它将那些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反政治精英的人聚集起来。参见：《Le mouvement “gilet jaune” s’enracine à droite au Canada》，*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January 2019, <https://www.courrierinternational.com/article/le-mouvement-gilet-jaune-senracine-droite-au-canada>。

从分裂的社会中吸取教训

面对分裂的社会中所产生的那些更为激进的声音，无论人们是更加赞同（甚至完全赞同）其中一方，还是两方都不赞同，我们都必须从中吸取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主流的政治和经济阶层未能及时听取一些声音，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均是如此。因此，面对这些声音，主流阶层的最初反应理应是虚心和反省，而不是彻底的谴责或愤怒。

距离二战结束、“永不再战”承诺的缔结已经过去了75年。距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首次召开已经过去50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与会者于1973年通过的《达沃斯宣言》都为大会提供了主要灵感来源。在该宣言中，商业领袖承诺要照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20年前，柏林墙倒塌时，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将在各个国家实现共同繁荣。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1\]](#)现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被打破，环境日趋恶化，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破坏与冲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当代人与我们的后代的期望。

当前，许多西方社会已经严重分化，人民对其政府机构和领导者不再完全信任，而且不同派别之间越发缺乏互动，这些情况都不足为奇。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直承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对此许多享有特权的观察者选择袖手旁观。他们说，只要我们放任自由市场运转，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

将所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只要对企业放开管制，它们就会创造出无可比拟的繁荣。只要金融和技术创新者能够持续提供创新成果，我们的GDP就会无止境地增长，而这将会惠及所有人。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信仰这些教条，而且他们日渐影响着政府和中央银行。有一些企业领导者确实转向支持利益相关者理念，他们会照顾与自己的企业利益相关的各方。但大多数企业领导者依然坚持股东至上理念，将利益最大化视为企业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许多政治领导人在经济层面越来越失去辨别能力，他们坚信唯有一套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这套政策注重的是GDP的总体增长而非包容性发展。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探讨这种根本性错误产生的原因，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作为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创建过程的近距离见证者之一，笔者再回过头来看时，百感交集。我们怀着最美好的意图，却并不见得总能实现预期的结果。但我们不应因过去的失败而驻足不前，而应创造一个能够适应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更好的经济体系。这绝非易事。在许多社会中，多数主义政治中心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其政治体系已经由激进派人物接管，这是我们看到的多个地方均已出现的社会分裂现象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社会分裂现象又是我们的经济和环境系统遭遇危机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克服这些危机时所面临的障碍。

这将我们带回了勃兰登堡门。30年前，联邦德国人民与民主德国人民、年青一代与年老一代、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均相聚于此，庆祝他们实现团结统一。然而，近年来，勃兰登堡门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抗议活动：它们有的为支持气候行动，有的为反动气候行动；有的为支持共同体，有的为反对共同体；有的为支持与

新冠肺炎病毒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有的为反对这些政策。曾经的勃兰登堡门将拥有不同政治信仰、身处不同世代、来自不同背景的德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时移世易。如果想要重建那种团结统一的社会，我们首先要就社会和经济弊病产生的原因达成共识，然后联手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弊病。这正是我们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要做的事情。

[1] 关于各国内部以及世界各地不平等状况的全面讨论，我参考了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全球不平等》一书。在这本书中，米兰诺维奇从全球维度和历史维度探讨了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现状和演变过程，其中有些观点是我在本书的分析中为了简明效果而省略了的。

02 进步和问题的驱动因素

第五章 全球化

故事要从2012年夏天讲起。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万隆的三名大学生，学的分别是经济学、建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三人优势互补且都有创业的想法。万隆是西爪哇省的首府，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约250万。尽管这里拥有大量创新型人才，但其辐射范围几乎仅限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如果追随父辈的脚步，最后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公职人员、教师或自由顾问。但因为拥有强烈的求知欲、远大的抱负，并且在学术领域的人脉拓展至万隆之外，他们的前景逐渐改变。这三名大学生经过接触后，很快就着手共同创业。他们从菇农做起，旨在帮助自己村的村民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销售一种可食用蘑菇菌包。2014年，他们有了更远大的追求：在长年与蘑菇打交道后，他们发现真菌有可能作为一种环保材料。他们打算用这种材料生产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有望将其销往世界各地。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三名来自万隆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向国外寻求资助。在一次学术交流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决定为他们的科研和实验提供资金。几年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风险投资企业500 Startups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境外投资者。时至今日，安妮莎、安迪和安雷卡所创建的MYCL已经成为一家小有成就的中小型企业。MYCL的生产基地在远郊的一个村庄，距离万隆一个

半小时的车程，却总是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我的同事在2019年夏天前往参观时，看到多功能室里坐着几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做研发。他们在开发以蘑菇为原材料的新产品，包括环保的皮革和建筑材料，这也是该公司当前的重点项目。多功能室的隔壁就是生产基地，这里的工人全是年轻女性，她们正把工业化生产的蘑菇加工成“皮革”原料。沿着街道再往前走，能看到十几名菇农正忙着为公司供应生产所需的原材料。MYCL的客户遍及世界各地，近的有来自万隆本地的合伙企业，远的有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等16个国家的消费者，他们通过Kickstarter众筹平台购买该企业生产的“蘑菇木制手表”。

类似这三名万隆大学生创业的故事在印度尼西亚并不是特例。大约在MYCL蓬勃发展的同期，出生并成长于泗水的温斯顿·乌托莫和威廉·乌托莫兄弟二人也在追逐自己的创业梦。泗水也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城市，位于万隆以东约700公里（430英里）的地方。20多岁的乌托莫兄弟受到一些外国企业的启发，例如美国的迪士尼和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等媒体公司、谷歌和脸书等科技公司，以及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和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乌托莫兄弟对美国硅谷十分向往，想知道能否复制那里的创业模式，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一家类似的公司。他们下定决心试试看。兄弟二人都是在美国上的大学。哥哥温斯顿本科就读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谷歌的新加坡办事处担任客户策略师。弟弟威廉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投资银行。在自己所崇拜的企业工作的经历令兄弟俩深受启发。很快，他们就决定是时候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了。

温斯顿用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攒下的薪水，到泗水招聘了几名

青年人才，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IDN Media。温斯顿在新加坡有一间6平方米的公寓，公司最初就设在这间公寓里。IDN Media的目标是：“实现信息民主化，为印度尼西亚千禧一代和Z世代发声。”^[1]他们想填补印度尼西亚几十年来的信息鸿沟。公司后来运营得非常成功，甚至超乎乌托莫兄弟的预期。凭借在新加坡、加利福尼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当地几家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的人脉，IDN Media很快吸引了来自新加坡、纽约、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泰国的大批投资者。IDN Media成立6年后，其内容平台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先内容平台之一，每月专属用户超过6 000万。^[2]该公司拥有500余名员工，还有数十万社群成员。我们前去参观时，IDN Media刚刚在雅加达新设了一处宽敞的办公场地：一座冠有公司名字的大厦——IDN Media HQ。

再举一个印度尼西亚千禧一代在全球经济中成功突围的例子。正当乌托莫兄弟的业务不断扩张之时，普蒂·普亚尔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普蒂是安妮莎（前文提到的来自万隆的企业家）的大学校友，学的是地质工程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公司，并且被派到婆罗洲岛从事地质工作。当时普蒂的生活并不容易。她的丈夫在雅加达工作，夫妻俩每两周才能在周末见上一面。后来，普蒂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她打算辞职，回到雅加达和丈夫共同生活，当一名全职妈妈。她开始尝试从地质工作转行，做一名插画师和平面设计师，或许收入比不上在道达尔工作时，但这一新的职业规划让她不光能发展自己的艺术爱好，还能有时间在家陪伴孩子。

对于普蒂而言，这个选择的结果比她预期的还要好。她在照片墙（Instagram）上发布了很多帖子和插画，分享自己成为一

名新手妈妈后的生活。借助照片墙强大的传播能力，她的帖子和插画很快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甚至全球各地的年轻妈妈的共鸣。后来她还赢得了一次前往纽约的机会。在国际艾美奖组织的一分钟短视频大赛中，普蒂成功入围决赛，打响了在国际上的名声，成为一名成功的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虽然是居家办公，但普蒂接到的业务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比如，来自旧金山的脸书的艺术总监请她设计一些符合当地特色的“表情包”，因为脸书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在另一个项目中，一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女士委托她设计一些个性贺卡。普蒂从未在线下见过客户，但与客户线上交流十分顺畅，客户会通过PayPal付款，整个过程简单直接。在这之后，一家新加坡公司找到她，请她为公司的服装品牌设计插画。普蒂虽然放弃了在道达尔的高薪工作，但在社交网站上获得了大量关注，从而使国内外客户能够主动找到她。

印度尼西亚的这三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展现了全球化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全球性的贸易、科技、投资、人力以及知识网络，有助于人们成功创业和获得工作机会，有助于地区和国家发展，而且交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利。安妮莎等人联合创办的公司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地区，但他们利用全球性科研和创业网络获取知识，为研发获得融资。温斯顿和威廉则利用其在全球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的人脉，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成立了一家类似的公司，雇用了数十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和市场专员。普蒂则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社交网络，开启了作为自由插画师和网络红人的职业生涯。那些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者和客户通过与他们合作，也能够获利。那些投资者在其国内的投资选择通常有限，但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者。那些客户则在这里找到了产品独具特色且价格

优惠的供应商。他们的资金帮助这些青年创业者追逐梦想，而且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自己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如果人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得益，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对全球化报以敌视态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的利弊进行深入探讨。

印度尼西亚与全球化

首先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不光是MYCL创始人、乌托莫兄弟以及普蒂，印度尼西亚整个国家都从全球化中得益。印度尼西亚总人口2.66亿，平均年龄29岁，人均GDP仅4 000美元，有大量的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为了实现这一点，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印度尼西亚积极拥抱全球化，[\[3\]](#)直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这一进程按下了“暂停键”。印度尼西亚对全球化的热衷究竟源于何处呢？

此前，印度尼西亚曾长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东南亚国家才开始逐渐放开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开放举措——降低出口关税、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取得了成效。自21世纪初至今，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速每年都保持在4%~6%。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翻了一番——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增至21世纪初的60%。

通过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印度尼西亚成功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业，并且成为G20成员。其企业家更加精通技术，其国民更具有国际视野。如今，该国聚集了国内外多家科技独角兽：网约车公司Gojek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成立，总部位于新加坡的Grab

是Gojek在国内市场上的一大劲敌。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助力下，印度尼西亚的旅游服务预订网站Traveloka和电商平台Tokopedia开始对缤客、亚马逊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人的全球化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根据YouGov和贝塔斯曼在2018年实施的一项调查（这是现有的最新数据），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占比为74%）认为全球化对世界是有益的。这项调查还显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人们对全球化的热衷程度远不及印度尼西亚人（持相同观点的人占比分别为47%、42%和41%）。[4]

这并不是说，印度尼西亚的例子证明了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国际贸易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最早被销往世界各地的印度尼西亚商品是产于马鲁古群岛的香料。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初期，印度尼西亚出产的肉豆蔻和丁香都是欧洲各国的奇缺之物，实际上这构成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等大批商人、探险家开辟通往“印度群岛”的东部航线或南部航线的原动力。“重商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开启：在这一时代，只有个别欧洲贸易国从中受益，但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深受其害（详见下文）。实际上，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到来使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批外来者并没有与当地居民进行公平交易，而是实行了压制和殖民统治。直到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才获得独立，摆脱这种贸易不公平和被外国占领的状态。即便如此，印度尼西亚又经历了40年的独裁和孤立主义统治时期，才进入自由民主时代。之后，印度尼西亚终于向全球市场迈出了第一步，却在1997年遭到反噬。在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印度尼西亚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金融风暴始于泰国，并且很快波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大批投机商不看好东南亚国

家保持钉住汇率制的能力，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公共债务飙升，经济严重衰退。这些都是拜金融全球化所赐。

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近些年的发展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全球化的成功案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实施审慎的经济管理政策的印度尼西亚，贫困率在2018年底降到10%以下，达到历史新低，而且贸易成为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板块之一。

[5]在雅加达和万隆的街头，很多对国家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未必会将自己的这种心态归因于国家对贸易的开放——他们只是很开心生活在变好。但这两者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外国投资和采购商增加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从而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雅加达，一条新修的地铁线、几座新架的桥梁，就能让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网约车公司Gojek和Grab如果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便能够扩大运营范围、雇用更多司机，从而给更多的印度尼西亚民众提供收入来源。MYCL公司如果能将产品销往国外，就可以雇用更多农民和工人来生产产品，以供出口。在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无论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土木工程师，大家都认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说明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是行得通的。

类似的趋势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上演，在亚洲尤其明显。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近几十年来，除了苏联解体、其加盟国作为独立经济体崛起之外，最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当数中国的对外开放。许多亚洲经济体纷纷紧随中国而起。总体来说，亚洲的转型或许是截至目前全球化最为成功的案例。但是，与印度尼西亚及亚洲其他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人们对贸易和全球化的认知。在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工业区，人们对全球化、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态度越来越消

极。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毕竟西方国家可是第一波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背后的推动者，也是其主要受益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简要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1] 2019年10月，乌托莫兄弟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 IDN Times, IDN Media, consulted October 2020, <https://www.idn.media/products/idntimes>.

[3] 以下内容是基于彼得·万哈姆有关世界经济论坛议程的文章进行改编和更新。“Why Indonesians Fight like Avengers for Globalization,”<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why-indonesians-fight-like-avengers-for-globalization/>.

[4] 以下内容是基于彼得·万哈姆有关世界经济论坛议程的文章进行改编和更新。“Why Indonesians Fight like Avengers for Globalization,”<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why-indonesians-fight-like-avengers-for-globalization/>.

[5] “Indonesia Maintains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n 2019,” World Bank’s June 2019 Economic Quarterly,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9/07/01/indonesia-maintains-steady-economic-growth-in-2019>.

早期萌芽与“香料之路”^[1]

差不多从人类出现时起，物品交换就随之发生。但到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出产的奢侈品首次出现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古罗马，这是颇为了不起的现象。这些奢侈品从数千英里之外被运抵古罗马，所经之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沿途商人所走的距离是有限的，其经手的商品却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但这并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化由此发端。丝绸多是奢侈品，之后加入亚洲与欧洲之间贸易商品之列的香料也是如此。这些出口产品的价值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且从产地到目的地的过程中经手了许多中间商。但全球贸易联系由此建成，对于参与者而言，这可能成为一座金矿。

“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部分原因是，其大部分路段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罗马和中国这两大帝国的手中。如果出现贸易受阻，通常是由于途经的敌国滋扰。如果“丝绸之路”被彻底中断，则必然与两大帝国的衰落脱不了干系，若干个世纪后，果不其然。到马可·波罗所处的中世纪晚期，“丝绸之路”得以恢复，这要归因于一个新的霸权——蒙古帝国的崛起。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规律：有了国家保护，贸易就会兴盛；缺乏国家保护，贸易就会衰落。

多亏了穆斯林商人，贸易的发展得以开启新的篇章。7世纪，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贸易也随之开展到世界各地。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的妻子赫蒂彻也是。由此，贸易就被刻在伊

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的基因里，而且还是显性基因。到9世纪初，穆斯林商人已经主导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之后，东至印度尼西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已经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西至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如前文所述，中世纪穆斯林开展贸易的主要商品是香料。与丝绸不同的是，香料主要通过海路运输，只在从阿拉伯半岛到地中海地区这一段经由陆路。这些香料主要有丁香和肉豆蔻，它们都产于传说中的“香料岛”——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欧洲，这些香料都价格高昂、需求量极大，主要被用于食品防腐和食品调味。与丝绸相同的是，香料也是一种奢侈品，贸易量一直很小。中世纪时，虽然全球化尚未开启，但最早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一带”（陆上“丝绸之路”）和“一路”（海上“香料之路”）已经建立起来。（历经数个世纪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新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概念，他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铁路、海港、管道、公路和数字通道，把中国与欧洲、非洲、中亚等地区更好地连接起来。[\[2\]](#)）

大航海时代（15—1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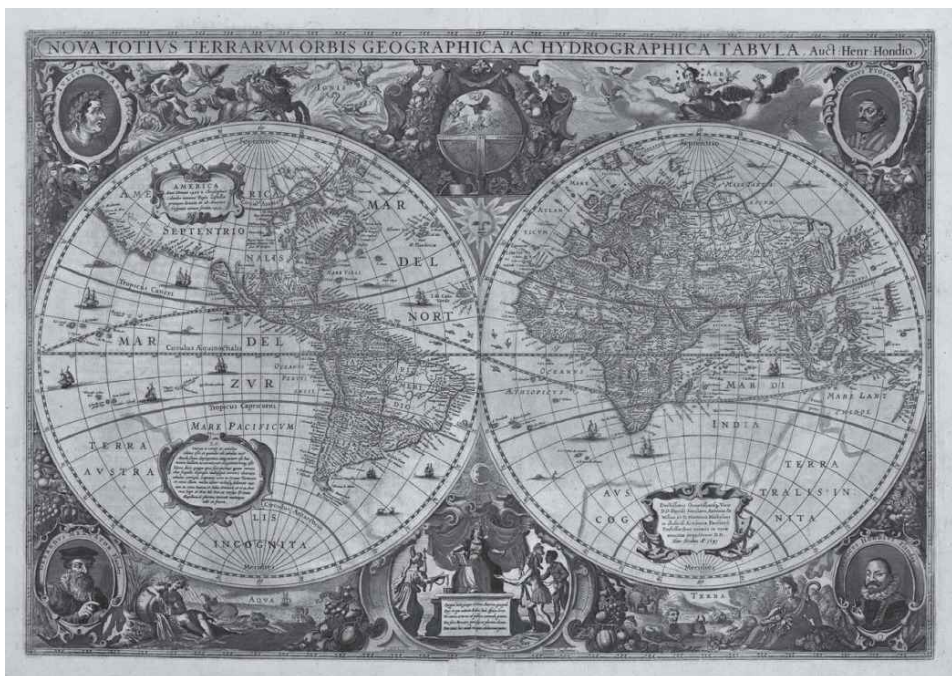


图5.1 新世界地理和水文地图，出自约翰内斯·扬松纽斯的《新地图集》，1647—1650年

资料来源：挪威国家图书馆。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始于大航海时代。正是在始于15世纪末的这一时期，欧洲探险家连通了东西方——还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凭借覆盖天文、机械、物理及造船等各个领域的所谓的科技革命成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先是发现新土地，随后进行武力征服，直到最后将其占为己有。

大航海时代撼动了整个世界。在这一时期，最著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哥伦布的美洲之行，[\[3\]](#)它近乎宣告了前哥伦比亚文明的终结，但影响最大的探险活动还是要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打开了通往印度尼西亚“香料岛”的大门，从

而绕过了阿拉伯和意大利的中间商。此时，尽管贸易额相较GDP总量而言仍然很小，但人们的生活确实因此而改变。在美洲大陆，随着征服者的到来，数以百万计的人或死于疾病，或惨遭屠杀，或屈从于外来者的统治。马铃薯、西红柿、咖啡、巧克力被引进欧洲，香料的价格大幅下跌，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人均寿命也得到了延长。地球绝对不是平的，世界上还存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这些新的认知同样给当时的社会、宗教及政治生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欧洲，宗教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剧变。曾经城邦林立的欧洲，到1648年时，出现了几个居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国家。

随着欧洲将目光转向广袤的世界，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商人和金融投资者通过建立合资公司，联起手来共担风险，以确保海外贸易获得最有利的结果。这些公司中最有名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国家政府通常会授予某些公司垄断特权，使它们得以独享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机会。这些合资公司因而可以以国家的形式运营，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按照某些标准衡量）。这助推了股市以及信贷、货币兑换等金融产品的诞生，比如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形成了早期的股票交易场所。毫不夸张地说，现代资本主义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尽管如此，今天的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大航海时代并未见证真正的全球化。诚然，在这一时期，贸易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这是开辟新贸易通道甚至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主要动因。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经济仍然是各自为营且不平衡的。虽然各欧洲帝国都建立了全球供应链，但多数仅限于自己的殖民地和控制地区。此外，殖民统治的模式主要是剥削式。当地文明和社会遭

到颠覆和瓦解，不仅如此，奴隶贸易也成为新殖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欧洲帝国带来的是重商主义经济和殖民经济，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贸易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但并不能互惠互利，甚至不是基于双方自愿。更重要的是，这些贸易不是在独立自主的国家间自由开展，而只限于强权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

[1] 本节内容是基于以下内容改编：“How Globalization 4.0 Fits into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Peter Vanham, World Economic Forum Agenda, January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1/how-globalization-4-0-fits-into-the-history-of-globalization>。

[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witzerland, <http://www.china-un.ch/eng/zywjyjh/t1675564.htm>.

[3] 我们避免使用“发现”一词，因为早在欧洲人意识到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存在一片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就已出现定居的原住民。现在为人们所广泛了解且接受的一点是，在哥伦布之前，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森就已踏上这片土地，他被认为是首个从欧洲到达美洲的人。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纪至1914年）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使情况开始转变。这波全球化浪潮贯穿了整个19世纪，大约在1914年结束。18世纪末，英国开始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在地缘层面，英国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在科技层面，英国享有诸多发明成果，如蒸汽机、工业织布机等。此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更是标榜自己是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双引擎。一方面，汽船和火车的诞生使货物可以被运输至几千英里外，国内长途运输和跨国运输都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业化程度让其有能力制造出世界各地所需的产品，如铁制品、纺织品和制成品。正如BBC（英国广播公司）所描述的那样，“凭借其先进的工业技术，英国得以进军庞大且迅速扩张的国际市场”。[\[1\]](#)

全球化由此诞生，且在数据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接下来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3%。[\[2\]](#)在这一增速下，出口额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从19世纪初的6%跃升至一战爆发前的14%。[\[3\]](#)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4\]](#)中的著名论述：“那个时代，作为人类经济发展历程当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插曲，在1914年8月走向终结！[……]伦敦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饮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商品，想要多少就可以订购多少，然后期待它们会尽早被送到自己的家门口。”凯恩斯还指出，投资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些在纽约、巴黎、伦敦或者柏林有经济实力的人可以投资活跃于国际市场上的合资公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苏伊士公司，该公司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将

地中海与印度洋连接起来，开辟了一条世界贸易的新通道。还有一些公司在印度修建铁路，在非洲殖民地经营矿厂。外国直接投资也在经历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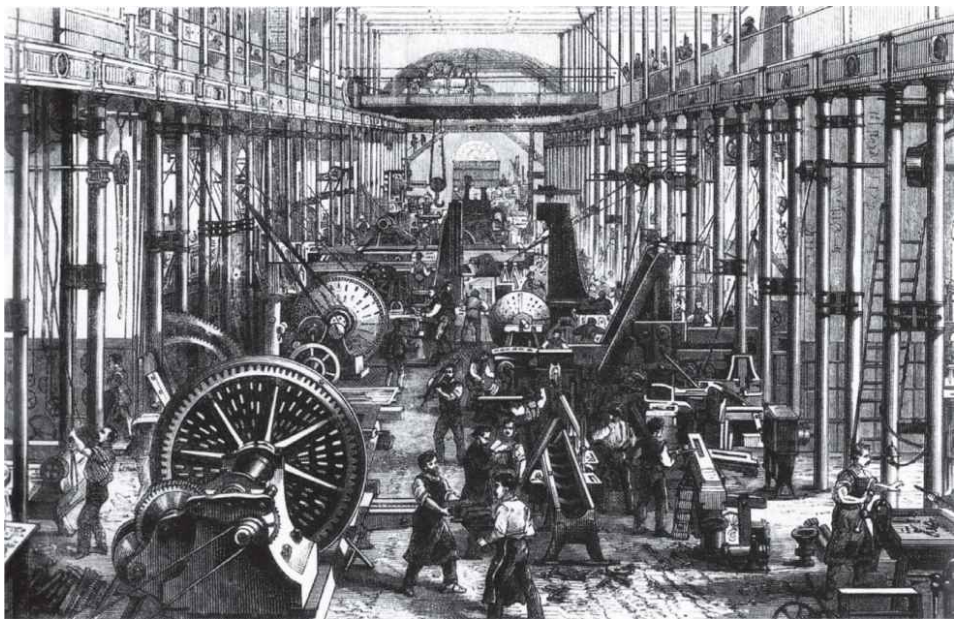


图5.2 理查德·哈特曼在开姆尼茨开设的机械厂，哈特曼是萨克森王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和最大的雇主之一

资料来源：诺伯特·凯泽，由1868年原件扫描所得。

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丰厚的资本和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在此次全球化中尝到了最多的甜头。其他国家通过商品出口，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例如，19世纪70年代，冷藏运输船的发明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迎来“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开始大量出口牛肉，因为其广袤的土地非常适合牛的生长。其他国家也开始专门生产它们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但是，第一波全球化和工业化浪潮也伴随着一些不好的事件

发生。到19世纪末，“多数〔正在经历全球化和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都加入瓜分非洲之列。截至1900年，非洲大陆上的独立国家只剩埃塞俄比亚了”。[5]印度、中国、墨西哥以及日本等国家，在之前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不可低估的经济强国，此时面对工业化和全球化趋势，却要么无力适应，要么遭到遏制。举个例子，英国对印度的政策“不仅旨在确保印度市场始终对英国的棉纺织品开放，而且要防止印度发展成英国的出口竞争对手”。[6]日本等一些独立自主的国家，则因缺乏资本和技术而无法与欧洲贸易强国竞争。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之前拥有独特技能的手工艺人都变成工人，而此时的工人已沦为某种形式的商品，要适应新工业机器的节奏，在福特流水线上机械劳作，他们的产品还有可能面临进口商品带来的竞争。虽然凯恩斯曾写到“伦敦居民”可以参与全球化贸易，但他肯定明白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那种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90%的财富都掌握在5%的顶尖富人手中。[7]大多数男男女女甚至儿童都沦为工业时代的一种资源，他们大多都是拿着微薄工资的工人。（更多关于全球化产生的社会影响，请见本书第六章。）

这种局面注定会以一场巨大的危机告终。1914年，一战爆发，西方新兴上流社会所习以为常的一切灰飞烟灭，包括全球化。这场浩劫带来的影响可谓彻底。数百万士兵在战争中丧生，数百万平民百姓无辜遇难，战争取代了贸易，破坏取代了建设，各国再一次关闭了国门。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揭露了第一次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本质，在很多国家引发了起义和政权的颠覆。在历经长达几十年的过渡阶段后，世界形成了两大经济

体制并存的局面：以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生产目标由国家制定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年里，金融市场仍在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进一步加重了全球经济和全球网络的崩溃。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爆发，结束了南美地区的繁荣景象，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出现了银行挤兑现象。1939—1945年，二战爆发。到二战结束时，贸易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跌至5%，达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1]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victorians/victorian_technology_01.shtml.

[2] <https://ourworldindata.org/international-trade>.

[3] <https://edatos.consorciomadrone.es/file.html?persistentId=doi:10.21950/BBZVBN/U54JIA&version=1.0>.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引文内容可见于<https://www.theglobalist.com/global-man-circa-1913/>。

[5]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Khan Academy, <https://www.khanacademy.org/humanities/big-history-project/acceleration/bhp-acceleration/a/the-industrial-revolution>.

[6] “India in the Rise of Britain and Europ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vergence and Great Divergence Debates,” Bhattacharya, Prabir 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y 2019, https://mpira.ub.uni-muenchen.de/97457/1/MPRA_paper_97457.pdf.

[7] “Top Wealth Shares in the UK, 1895–2013, Figure 4.6.1,” World Inequality Lab, <https://wir2018.wid.world/part-4.html>.

第二波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不过，全球化并未就此告终。二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经济翻开了新篇章。一个新的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登上舞台。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20世纪中叶，美国经历了婴儿潮。此外，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汽车、航空和现代制造业迅速发展。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开始再次兴起。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标志着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因此，国际贸易最初在这两条轨道上分别发展。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欧盟等机构的成立以及美国倡导的其他自由贸易手段的实施。在苏联，贸易也出现增长，不过是基于中央计划经济而非自由市场。这给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贸易额恢复至1914年的水平。到1989年，出口额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再次达到14%。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大幅增长。

在柏林墙倒塌以及苏联解体后，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鼓励世界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数国家积极响应，[\[1\]](#)其中包括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封闭的农业经济体的中国，也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面向世界发展制造业。在这个崭新的经济世界中，美国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引领世界发展，很多其他国家紧随美国的脚步，并且从中获益。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互联网等许多新技术，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1914年凯恩斯所

说的通过电话下订单，如今已经变成通过互联网下订单，运送方式也变成了由货轮、火车和飞机组成的全球运输网络。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人们可以获取全球供应链中的产品，全球贸易不再是富人专属。送货速度也大大提升，以前需要几周时间，现在只需几天就能送货上门。此外，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价值链可以进一步实现全球整合。研发、采购、生产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分别进行，然后将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由此，全球化像打了激素一样迅猛发展。在21世纪初，全球出口额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增至25%左右，这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2]贸易额（进出口总额）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增至50%左右。在新加坡、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贸易额在GDP中的占比甚至达到100%以上（之所以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GDP衡量的是一国的国内产出，只计入净出口贸易额）。而且，全球许多人都从全球化中获益：数亿人口通过参与全球经济发展跻身中产之列，中产阶级的人口规模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

[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11_e.pdf.

[2] <https://edatos.consorticiomadrone.es/file.xhtml?persistentId=doi:10.21950/BBZVBN/U54JIA&version=1.0>.

全球化4.0

随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席卷而至，我们进入当代社会。当今世界存在一对新的主导力量——美国和中国。这一次，全球化拓展了新的领域：网络世界（包括网络犯罪）、气候变化以及日渐严重的病毒威胁。

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数字经济，在电子商务、数字服务及3D打印技术的助力下，发展势头迅猛。事实上，数字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全球经济力量。尽管多数国家在贸易谈判和制定产业政策时仍以实体贸易为重心，但基于某些衡量标准，数字贸易已经和实体贸易旗鼓相当，甚至远超后者数倍——尽管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数字贸易，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衡量方法，一些数据统计机构甚至没有试图去衡量数字贸易。（在这方面做出最大努力的应该是经合组织，它曾在2019年发布《数字时代的贸易》报告。[\[1\]](#)）但是，通过普蒂·普亚尔的例子可以看到，当今时代，个人或企业完全在网上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情况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互联网贸易越来越司空见惯。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和病毒传播所带来的全球性威胁。这些负面影响与我们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关系。一个地区被污染，会导致另一个地区发生极端天气事件。像亚马孙热带雨林这样的“地球之肺”已经所剩无几，这些地区的森林砍伐活动不仅会破坏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而且会减弱地球吸收有害温室气体的能力（这一点在本书第

一章和第八章中都有所论述)。[2]面对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难辞其咎。从埃博拉病毒到新冠肺炎病毒，很多病毒之所以会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类不断侵占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国际旅行使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互联互通，这让大流行病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这两种趋势都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新一波数字全球化、气候全球化、病毒全球化来袭，很多人开始抗拒全球化。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出口额在GDP总量中的占比已经开始下滑。全球主义（一种倡导人们应该从全球视角看问题的理念）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日渐式微，这在西方社会尤其明显，尽管它们在20世纪末对全球主义十分狂热。曾经将世界推向全球化巅峰的美国，正与其世界警察和自由贸易拥护者的身份背道而驰。

所有这些趋势在2020年以前已经出现。然后，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体系整个陷入停滞状态。疫情中断了国际旅行，切断了全球供应链，使个人、企业和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全球化的态度。事实上，他们不只是停下脚步、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还全面思考全球经济体系的利与弊，思考通过其他方式生产和消费必需品与服务的可能性。考虑到环境足迹问题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欧洲人和美国人是否应当继续从中国或其他海外国家购买商品？借助自动化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他们是否有可能实现“近岸”生产甚至是“回岸”生产？各国的用工政策、竞争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不尽相同，这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既然如此，这些国家之间究竟是否应该开展贸易？出于这种考量，全球化是否已经不再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还是说它从来都不是这样一种力量？

[1] “Trade in the Digital Era,” OECD, March 2019,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trade-in-the-digital-era.pdf>.

[2] 正如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解释：“热带雨林常被称为‘地球之肺’，因为它们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 <https://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tropical-rainforests-lungs-planet-reveal-true-sensitivity-global-warming>.

今天的全球化

透过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实际上可以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够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创造巨大的繁荣。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任何一项影响都并非百分之百正面的。东印度公司给西方带来了富饶，但对其贸易对象——殖民地居民构成了剥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联系，对墨西哥、印度等国的经济发展帮助甚少，但给英国和美国的实业家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尽管在后来的全球化阶段有更多的国家获益，但利益分配往往是极其不均衡的。最后，全球化世界中，各国互联互通和相关依存程度都有所提升，这虽然给多个国家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且使其丧失一定的主权。这是我们从近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以及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中总结出来的教训。

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从理论上来说，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但在实践中，只有在确保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且国家韧性和主权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全球化才能发挥出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中，水涨船高的同时所有船只都安然无恙的情况，只存在过短短几十年。对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少数亚洲国家而言，这一时期始于二战结束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东方国家，或者对于涵盖范围更广泛的所谓新兴市场而言，这一时期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它们也遭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威胁。在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等国家，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确实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获得

了结构性增长，跻身于中产阶层的人数创下了新纪录，同时它给其中特定人群带来了更大的益处。

总体而言，要想让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尽可能受益，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以社会契约的形成为基础。以战后的欧洲和日本为例，战时的悲惨经历使人们认识到，全体国民命运一体，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需要每个国民各司其职，而且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民。广泛的税基（需要伴随着企业的高配合度和富人的高边际税率）是支撑教育、医疗以及住房等公共投资的基础。它还创造了条件，使企业和个人在合作中保持竞争。社会契约的长期性意味着，个人愿意抛开眼前的利益或自私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从长远来看自己会从中受益，遵守社会契约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一样。当一国所有公民的利益都被照顾到时，这个国家就能不断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且会继续支持全球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十分紧密（见本书第六章中丹麦的案例）。

第二，全球化的繁荣，需要政治领导人在引导经济发展、关注民生和开放贸易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1]事实上，丹尼·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以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式提出，最优的全球化政策未必是贸易、投资及货币兑换的全面自由化，而是要让这一过程更加可控，确保主权政府能对国家经济有一定的掌控。在这一点上，相较于不考虑其他因素、一味支持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教条主义政策，当今的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战后“辉煌三十年”时期的欧洲、日本、美国所奉行的循序渐进的政策更容易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当一个时代的主流技术与一个经济体、社会的竞争优

势相契合时，社会就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在宏观层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冷藏船被发明以后，阿根廷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冷藏船能够将牛肉冷冻起来并出口至世界各地。在微观层面，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尼西亚的普蒂·普亚尔能够成为自由插画师。如今的技术让她足不出户就能接触到国外市场。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全球化往往会导致发展不平衡，有时甚至带来经济衰退或发展停滞。在前几次全球化浪潮中，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新兴市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近来，美国、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也感受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即使社会契约已经达成，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得到很好的平衡，先进的技术与国家比较优势相契合，结果也未必就好。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体系在本质上是更加不稳定的，各国之间更容易发生涟漪效应。我们应当从近年来的金融、健康和环境危机中吸取这一教训。因此，确保全球化是一个可控的过程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经济体制公平、稳定、富有韧性。然而，可悲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接下来，让我们结合近年来的实际情况，重新回顾上文提出的条件。

近几十年来，在以“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组成）为代表的很多工业化大国，个人、政府以及企业间的社会契约遭到背弃。曾几何时，企业在其参与开发建设的社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引以为豪。后来，企业却越来越不屑于此，而是转向世界其他地方，以提高利润，降低工资。以美国的汽车产业为例，该产业曾经集中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后来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搬到了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比如墨西哥和中国。墨西哥等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方便服务美国消费

者；中国等劳动力市场则更接近国际上的新客户。在欧洲的工业中心——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情况如出一辙。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将生产活动连同工作岗位一起转移到斯洛伐克、捷克、罗马尼亚等欧盟新成员，因为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明显更低。这让原先工业中心的高薪工人和其所居住的城镇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曾经的汽车制造小镇（比如比利时的亨克）因汽车生产工厂的搬离而一蹶不振，失业率升高，工资水平降低，经济发展也变得萎靡。那些主要依靠知识产权赚钱的公司，利用转让定价以及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税收规则差异，将其利润从生产活动中剥离出来，从而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而政府往往急需这些税收收入。

当然，自由贸易本身就意味着企业必然能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机会。实际上，企业在如此行事时必须保持一种良性的节奏，以使全球化发挥作用。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该点，企业的这种行为就不再对其所在社区有益。只要有一方不遵守社会契约，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这波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普通工人不再能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随着工作岗位流失、地方税基受到侵蚀，一些地方政府、地区政府，有时甚至是联邦政府无力履行社会契约中的相应义务，包括支付退休金，提供优质的医保、住房和教育服务等。2013年，因无力偿还债券（包括市政府退休员工的养老津贴），底特律被迫宣布破产，这一事件家喻户晓。尽管这与全球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这个数十年前就已衰落的制造业基地而言，全球化确实没能为其带来转机。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也正面临投资困境，这些投资不仅要用于为国民和企业提供正常服务，还要用于维持其未来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难怪这些国家的民众对国家政治

制度、经济制度的反对之声越来越高，对那些主导全球经济、有时还能轻易避税的跨国公司的反对情绪越来越激烈。

当今全球化的第二个不足之处在于各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所创造的政策环境。由于坚信全球化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许多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拥抱自由贸易和浮动汇率制，加速打破外国投资壁垒。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战胜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模式（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这种行为看似顺理成章。但是，有一个事实被忽视了：市场并非无所不能，或者说，至少市场无法自动照顾到所有相关者的利益。^[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丹尼·罗德里克等众多经济学家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会加剧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而且会提高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受约束的金融全球化风险极大，匈牙利就是一个例证。匈牙利经济学家、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研究员若尔特·道尔沃什（本书第二章中引用了他绘制的有关不平等的图形）认为，匈牙利如今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金融全球化，并对自己的这一观点做出了解释。以下几段文字是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写下的：

由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远高于欧元区，以匈牙利福林计算的贷款利率也相对高得多。因此，为了寻求更低的利率，很多消费者和企业转为外汇贷款——90%的新抵押贷款都是以外汇形式进行的。而在利率接近欧元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外汇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占比只有不到2%。

〔2008年〕9月底，国际金融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

袭。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不会对中欧和东欧的欧盟成员造成太大的影响。理由是，我们的银行并未暴露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下，并且资金充足。但形势很快明了起来，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随着避险情绪日渐高涨，再加上担心危机蔓延，投资者开始进行抛售，撤出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

在中欧的欧盟成员中，匈牙利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因为该国的巨额政府债务中许多都为外国投资者所有。外国投资者急于出售手中的匈牙利福林债券，但市场上没有新的买家。长期债券利率从本来就已经很高的8%暴涨到12%左右，政府债券市场陷入枯竭。匈牙利试图以拍卖方式发行新的政府债券，但未能取得成功。股票市场上的匈牙利蓝筹股也遭到抛售。福林贬值压力加剧，而且在上周，匈牙利央行将利率上调了三个百分点。虽然上调利率有助于稳定福林币值，但形势依然脆弱，政府债券市场仍旧被冻结。[\[3\]](#)

道尔沃什所描述的事件已过去10多年，但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匈牙利所拥抱的这种金融全球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银行从业者、国民以及整个国家先是在2008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又在5年后遭遇了一场规模略小的危机。此后的匈牙利虽然迎来了经济复苏，但并未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民众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倡导自由主义、更具欧洲视野的政治家，因此对他们的仇视态度与日俱增。近年来，匈牙利民众投票反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反对移民，反对自由贸易和金融政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匈牙利关闭边境以拒绝外来移民进入，还在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拒绝实施欧洲共同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匈牙利国内的敌对情绪日益激烈，就连乔治

·索罗斯创办的中欧大学都被迫搬到国外。匈牙利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也并不常见，但它确实表明，即使支持全球化的政策初衷是好的，其结果也可能让人大失所望。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推动国家发展、改善国民生活，但国家在拥抱全球化时，应当以一种务实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最后，技术会放大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经济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因缺乏技能或教育而无法充分利用最新技术，那么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取代。在有些情况下，会有一些宏观力量在发挥作用，这时单靠一个群体很难与之对抗。理查德·鲍德温观察到，互联网出现后，通信成本大幅降低，追逐利润的企业将白领工种和蓝领工种分开是有道理的。你可以在一个（综合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然后将制成品运往他国进行销售。这使得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飞速发展，给很多国家带来好处，但也给西方工业社区带来损害，而且后者对此束手无策。但这并不代表，在由技术驱动的全球化面前，国家完全无能为力。在新加坡、丹麦、荷兰、比利时等小型开放经济体中，贸易额常常占GDP总量的100%以上。这些国家明白：能否适应驱动全球化的最新技术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如果国家投资这些技术或投资掌握这些技术所需的技能，那么就有机会成为赢家。鹿特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鹿特丹当局认识到，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于是对该技术进行了大力投资。^[4]由此，鹿特丹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今欧洲具备最先进技术的港口，比起同样是港口城市的德国汉堡和比利时安特卫普，鹿特丹及其劳动者在数字技术领域占有很大优势。

将来，会受到技术影响的不只是实体贸易。如前文所示，数字贸易已现增长势头，但在各地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

这种势头短期内不太可能停下来。如今，富有远见的国家和社区仍然有机会在数字全球化的崛起中谋利，但行动必须迅速。有些领域只要资金充足就能快速发展起来，比如5G基站。但有些领域需要尽早提前规划，例如应该如何培养当下及未来的劳动力，使之成为像普蒂·普亚尔那样的人。

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我认为，对待全球化，我们不应当一味地盲目接受，而应当持一种务实的态度，要始终把规模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国民和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种办法显然是奏效的。创办了MYCL的安妮莎等人、普蒂·普亚尔，以及IDN Media创始人乌托莫兄弟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得益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投资，这些人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全球市场的红利，同时还带动了国内其他人的发展。这让他们坚信全球化能带来好处，印度尼西亚的绝大部分民众也都持这种观点。或者，正如乌托莫兄弟中的弟弟威廉所言：“国家的发展有赖于贸易与科技。如果你能精通这一点，就能取得发展。”^[5]说这话时，他正身处自己公司的办公大楼里，俯瞰着脚下的雅加达。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这么想，都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都能看清全球化的陷阱，那么我们就有信心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将再次超过其引发的风险。但要实现这一点，正如威廉提到的，掌握第二个部分也很重要，那就是技术。

^[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Dani Rodrik, W.W. Norton, 2011, <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paradox-democracy-and-future-world-economy>.

^[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ancis Fukuyama, Penguin Books,

1993.

[3] “The Rise and Fall of Hungary,” Zsolt Darva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blog/2008/oct/29/hungary> imf.

[4] “How Rotterdam Is Using Blockchain to Reinvent Global Trade,” Port of Rotterdam, September 2019, <https://www.portofrotterdam.com/en/news-and-press-releases/how-rotterdam-is-using-blockchain-to-reinvent-global-trade>.

[5] 2020年10月16日，乌托莫兄弟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第六章 技术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曾有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非常引人注目：“丹麦在机器人领域跻身世界前十。”^[1]

这篇新闻报道的出处既非丹麦的某科技公司，也非媒体机构，更不是某位政治家，而是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Dansk Metal）。该工会所代表的是丹麦金属制造与加工行业的蓝领工人。很显然，工会对于这项成就颇为自豪。“在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工人和机器人并肩作战。”这篇新闻报道中写道，“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丹麦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达到1万台左右。”

这种立场让我很感兴趣。我通过实地走访和阅读资料发现，无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是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更多的情况是工人会抵制新技术，尤其当新技术对他们的就业产生威胁时。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英国的“卢德运动”——在19世纪的英格兰，新机器的发明给纺织业带来冲击，一群纺织工人发起暴动、捣毁机器。不过，纵观全世界，包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依然有不少人抵制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工作方式，我们会看到有人通过街头抗议的形式抵制优步等网约车公司，也会看到有政界人士^[2]或学者^[3]等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发出抗议之声。

在这个自动化时代，我同样为劳动者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

早在2015年时，我意识到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拥有人工智能、先进的机器人技术以及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崭新时代，这些先进技术共同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还目睹了其他很多新技术的诞生，包括3D打印、量子计算、精密医疗等。我逐渐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就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内燃机和电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它们将扰乱劳动力市场，改变我们的工作性质，同时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份。关于这一点，我此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进行了阐释。[\[4\]](#)

牛津大学学者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就业的未来》，首次警示人们当心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5\]](#)他们还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估测，即未来几年将有多达一半的工作岗位因新技术而改变，其中许多岗位将完全消失。2019年，弗雷在最初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技术陷阱》[\[6\]](#)一书，内容同样令人瞠目结舌，阐述了如今这些正取代劳动力的技术将如何融入工业革命的历史长河。难怪如今许多身处全球经济中的人们会对未来感到恐惧，宁愿生活在过去那个更加熟悉的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会为了迎合选民而努力挽救或恢复制造业岗位，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前那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从任何意义上讲，技术都是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但是，来自丹麦的那则新闻报道似乎表明，这种恐惧可以被克服，这些高新技术未必会取代工人，说不定还能起到帮助作用。这怎么可能呢？为了找到答案，我请一位同事前往哥本哈根一探究竟。

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主席克劳斯·延森首先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据。[7]“你听说过有国家或公司是利用‘旧’技术致富的吗？”他问道。他认为这绝不可能。他也不认同某些人对未来就业形势的悲观看法。“或许奇点大学的那些人会认为所有人都将被技术取代，”他说，“或许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将茫然而不知所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器人做着一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看法。”[8]他就不这么认为。无论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还是基于过去150年里该工会的历任主席们的经验，这种看法都是不对的。“过去，我们每次将新技术引进丹麦，”他说，“都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对延森而言，答案十分明确。“我们不应该对‘新’技术感到恐惧，”他说，“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旧’技术。”[9]

这种乐观的态度在该工会领导层一脉相承，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该工会成立于1888年，第一任主席与当前的主席延森持有相同的观点）。不仅如此，作为该工会基础的广大成员也普遍持有这种态度。32岁的罗宾·勒夫曼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勒夫曼是全球船机巨头——哥本哈根曼恩能源方案公司的一名船舶设备技术员。作为一名汽修工的儿子，勒夫曼从小就对汽车和发动机抱有浓厚的兴趣。在18岁面临职业选择时，他选择当一名工业技术员。勒夫曼接受过4年的技术教育，上学时还一直在一家小制造厂做学徒，这让他一毕业就轻而易举地在曼恩公司找到了一份制造喷油泵的工作。

4年后，也就是在2012年，情况有所转变，而且原本可能会对他不利。勒夫曼的老板告诉他，公司将采购新机器，新机器能将零部件的加工时间从20分钟缩短到五六分钟，而且将大幅减少质量控制中对人工的需要。勒夫曼对新机器不但不抵制，反而十分感兴趣。“在其他地方，人们不想让机器挑大梁，”在接受本书

作者采访时，勒夫曼告诉我们，“但在丹麦不是这样。”^[10]在这里，“公司会说：我们可以提供再培训，让你学会操作新机器，你愿意参加培训吗？”以勒夫曼为例，公司将他派往这批新机器的制造地——德国比勒费尔德，还让他代表公司签署了协议。一个月后，这家德国公司派了一名专家到哥本哈根，为勒夫曼和其他三名工人提供操作培训。

勒夫曼的例子在整个行业十分典型。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斯瑟比告诉我们：“人们从不担心失业问题，因为他们有接受再培训的机会。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如果你失业了，我们工会的人会在一两天内给你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我们会安排一次会面，谈谈你的具体情况，看看你是否需要提高技能，以及附近是否有公司在招聘。在帮助工会成员再就业方面，无论是立刻找下一份工作还是经过再培训后再找工作，我们一直做得很成功。我们在全各地建立了很多学校，课程安排由雇主和员工决定。开设这些学校就是为了让劳动力接受再培训和再教育。”^[11]

员工与企业之间这种具有建设性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正在给丹麦带来回报。尽管丹麦早已不再是“世界造船工厂”——这一地位被韩国、日本、中国和土耳其的大型企业取代，但它仍在为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新式及老式轮船制造发动机（勒夫曼所在企业仍在制造的最古老的轮船发动机可以追溯至1861年，同时也在制造最新式的轮船发动机）。虽然因为员工工资高失去了成本优势，但它从员工的高生产力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中得到了补偿。在2020年初遭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前，丹麦的失业率仅为3.7%，^[12]仅就金属行业工人工会而言，失业率甚至低至2%（事实上，工会的失业救济金制度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会促

使工会确保尽可能少的失业人数)。或许更重要的是，丹麦的工资水平较高且相对平等。据斯瑟比所言，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的成员一年能赚到60 000~70 000美元，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40个小时，工会参与率为80%左右。总的来说，丹麦在收入方面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尽管近几年不平等的趋势有所抬头。[\[13\]](#)

丹麦的故事之所以更加引人瞩目，是因为它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丹麦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不久以前，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差无几。但时至今日，斯瑟比告诉我们，他对于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情感到十分震惊。当丹麦致力于维持且不断优化其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时，其他国家所做的远不如丹麦。斯瑟比说，丹麦的制度对于企业和工人都行之有效。两者之间存在一份“契约”，即企业可以相对容易地解雇工人，但在支付高工资、缴纳税费、提供再培训方面要确保做得到位。不过，这一“弹性安全”模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丹麦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52%。但是，斯瑟比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我们为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再培训，能够让多数工人重新就业。而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法国，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或者达不到这一程度]”。

最让斯瑟比感到震惊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在“伟大社会”的愿景下，那里曾是一个蓝领工人也能实现“美国梦”的国度。但如今，美国不再是工人阶层的圣地——至少在斯瑟比看来不是。当然，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兴起是全球大趋势。这一趋势持续了数十年，对整个工业化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速度异常之快。据

《金融时报》统计，1990—2016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近560万个工作岗位。^[14]所有工业化城市的就业数量都大幅削减。一些完全依赖一家工业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的城市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尽管其中一些岗位并未消失，只是被转移到了中国或墨西哥，但的确有一半的岗位被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彻底取代。相对没那么糟糕的情况是，低工资的服务岗位取代了高工资的蓝领岗位。最糟糕的情况是，压根儿就没有新岗位可提供给工人，至少没有新岗位可提供给不具备大学学历的工人。在某些行业，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上涨过。此外，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一直很少，但其劳动力参与率从2000年超过67%的历史高位，下降至2020年的62%左右，^[15]这意味着很多人已经彻底放弃找工作。相比之下，丹麦的劳动力参与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甚至在2020年初遭到疫情冲击后，依然保持着这一水平。^[16]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美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斯瑟比说，“缺乏对劳动力的教育。”^[17]不同于丹麦，美国没有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工人培训制度。这一问题在经合组织的数据中体现得很明显。^[18]在经合组织成员中，丹麦在所谓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方面的人均支出最多，该政策旨在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相对而言，美国的这一支出只有丹麦的1/15。此外，丹麦的制度还更加包容（覆盖大部分人口，不受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或就业状况的限制）且更具弹性。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中，丹麦的制度最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而美国在32个研究对象中仅排第19名。

这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供需不匹配的情况。据《华

盛顿邮报》财经记者希瑟·朗所言，即使现在美国为劳动者提供再培训机会，劳动者也往往没有意愿报名参加，因为他们担心就算参加培训也找不到工作；或者只是报名学习一些最基础的IT课程，比如如何使用微软的办公软件。“这让我大跌眼镜。”朗说道，接着便给我们讲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19\]](#)

我曾对俄亥俄州汽车工厂的下岗工人进行追踪观察。这些工人都有资格参加“凯迪拉克”的再培训，还能在两年的学习与培训期间领取工资。他们可以拿到卡车驾驶证或护理执照，可以读社区大学，也可以成为一名高级机械师，或者学会操作3D打印机（这是最高端的蓝领工作之一）。那些二三十岁的人对此态度较为积极，但那些已经离开校园20多年的40多岁的人则不太感兴趣。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技术鸿沟，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闪存驱动器是什么。我在达沃斯听到有CEO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升员工技能！这听起来没错，但现实情况绝非如此。我认为这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在俄亥俄州的工厂，虽然2 000名工人都具备培训资格，但提交培训申请的人不足30%，最终完成一个培训项目的人仅占15%。[\[20\]](#)

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问题并不在于老员工的态度。如果不打造一种持续的再培训文化，工人在之前的工作中从未接受过技能提升的培训，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财力实施休克疗法也是杯水车薪。托马斯·斯瑟比持有相同看法，反观丹麦的情况，“我理解工人为什么会对新技术和机器人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一旦失业，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只适用于特定的公司。如果没有一套再教育或提升技能的培训制度，工人就会怨声载道。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而且他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不对。他们需要做的是完善教育、发展工会”。[\[21\]](#)除了斯瑟比之外，在大

西洋彼岸的华盛顿特区，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由包括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内的一群经济学家创立）为代表的智库也提倡这一措施。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乔希·比文斯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丹麦的工会参与率一直很高，保障了工人在工资和培训等方面的需求会被考虑；美国的工会参与率则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1/3左右降至1980年的25%，到今天已经不足10%。与工会参与率下降相伴的，是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且，正如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认为的，美国的培训项目在减少，而这些培训项目是提高工人技能以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保持美国劳动者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22]

英美两国的工人因经济体系改变而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在这两个国家，对加强工会、完善教育的提倡导致了政治极化。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支持新自由主义计划，事实证明，该计划与加强工会权力、加大对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投资相悖。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工会发起的集体谈判成为建立自由市场的障碍，提倡加大税收、完善公共服务的政府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阻力。1981年，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工会的组织下举行了大规模罢工，时任总统里根将其全部解雇，一举击溃了美国工会。1984年，英国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粉碎了一场矿工大罢工，终结了工会在英国的支配地位。这两位领导人还大幅下调了最高边际税率。这原本是为企业和高净值人群开展投资腾出资金，从而实现涓滴效应，但也减少了政府用于支撑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收入。很长时间以来，这些政策看起来确实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年，两国经济进入一段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90年代，就连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新工党都接受了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到2008—2009年经济大衰退时，新自由主义政策显然已辉煌不再。正如第一部分所述，近年来经济增长一直疲软乏力，在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很多人的工资久不见涨，大量工人被劳动力市场淘汰。通过对比丹麦和美国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工业化国家最好还是重新采纳以利益相关者为出发点的解决方案，并扩大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在这场辩论中，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应当让步于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这种解决方案在亚洲同样奏效，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在贸易、技术及移民的开放性方面，位于东南亚的这个城市国家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在社会政策方面，新加坡十分保守[23]——比起许多西方国家，新加坡对性少数群体的权利[24]、婚姻权的管制更宽泛，也更严格。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加坡高级部长尚达曼告诉我们，政府采取的是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不受意识形态左右。[25]作为一个依靠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来获取财富的岛国，新加坡几乎别无选择。

20世纪6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在早期阶段，新加坡把重心放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并且大获成功。新加坡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10%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25%，其间，该国GDP每年增长6%以上。[26]很多日本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为了寻找廉价的制造业中心而进驻新加坡，使许多新加坡人获得了体面的蓝领工作，促进了该国经济迅速发展：新加坡的人均GDP在1965年仅仅为500美元，到1990年激增至1.3万美元[27]（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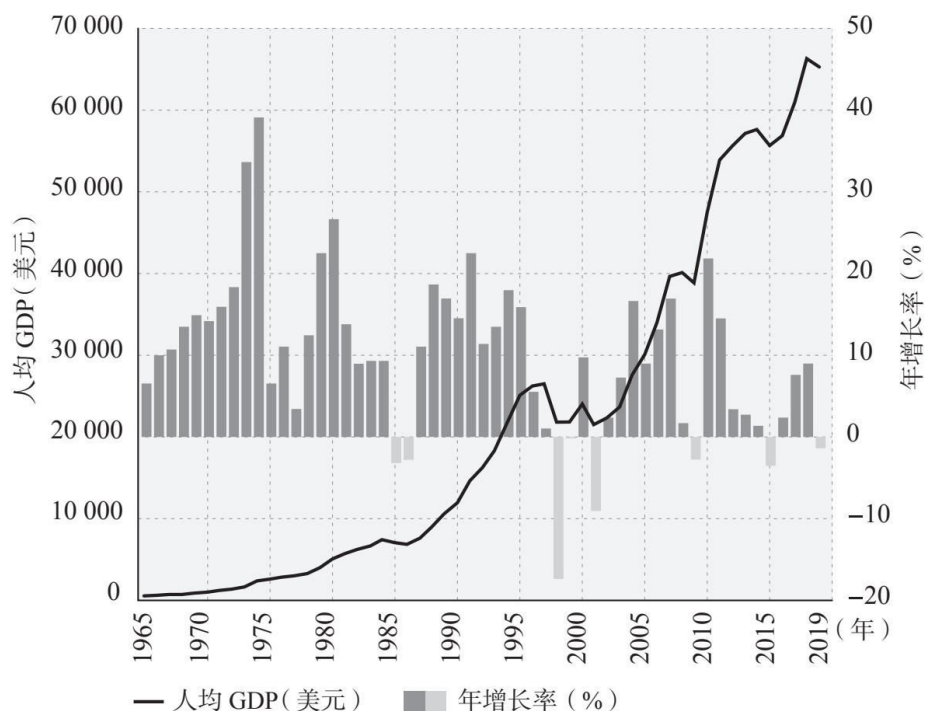


图6.1 新加坡人均GDP增长情况（1965—2019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Macrotrends网站。

但随着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紧随其后发展起来，新加坡想要发展更加以服务和知识为导向的经济，向价值链上游进军，实现向发达国家之位的跃升。为此，新加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需要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因此，新加坡大力投资面向儿童和成人的新型教育。根据全球城市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有更多的培训中心与高技能产业接轨，比如电子产业”，新的教育体系被建立，“以保障新加坡能够通过大学培养出一支高质量和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与此同时，确保那些无法在正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出的人仍能获得技能培训”。[\[28\]](#)这一制度再次奏效。尽管新加坡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服务业在此后几

十年发展迅猛，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GDP中的占比达到1/5，到2015年左右时已经接近1/3。截至2015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超越欧洲的经济强国德国和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

尽管新加坡已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东南亚国家明白，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新技术和服务业岗位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国家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牵头设立“技能创前程”计划的原因所在。通过这一终身学习体系，任何年龄段的新加坡人都能学习新技能，为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但与丹麦不同的是，这一体系的实现，靠的不是以巨大的社会力量和影响深远的社会项目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大政府。“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不是臃肿的政府。”尚达曼说。因此，“技能创前程”计划有一个特点，即参与者基本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课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布特里为我们组织的一场研讨会上，几名政策领域的思想者发表的言论在政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例如，是否真的需要资助人们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花匠或厨师？在当前的新加坡，主流观点是，有些课程可能确实不同寻常，但仍值得花钱学习。理由是，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一个特点，即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很难预测。谁能想到，如今20多岁的从业人群中的佼佼者，有些竟是YouTube上的电竞玩家或是短视频红人？

在我们观察新加坡模式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值得一提。这一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以及工会。自1965年起，这个“铁三角”组合在所有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政策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没有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干扰。尽管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很大（雇用和解雇都相对容

易)，经济发展至少经历过两次成功的转型——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向制造业转型，另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向服务业转型，但罢工在这个国家极其罕见。《日经亚洲评论》最近的报道称，这种极具建设性的积极态度在未来仍然很重要，因为“在东南亚，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将会给新加坡带来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29]但有迹象表明，这波即将到来的技术冲击不会摧毁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90%的新加坡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抓住老板提供的任何机会来掌握或使用新技术”。[30]这表明，像美国和西欧国家这样的经济体面临着三重挑战：政府和企业必须在员工持续性再培训方面加大投资；工会必须发展壮大，同时与企业 and 政府进行合作；工人自身也应当保持积极、灵活应变，不惧自己及国家将要面临的经济挑战。

[1] «Danmark i verdens robot top-10», Dansk Metal, January 2018, <https://www.danskmatal.dk/Nyheder/pressemeddelelser/Sider/Danmark-i-verdens-robot-top-10.aspx>.

[2] “Why American Workers Need to Be Protected from Automation,” Bill de Blasio, *Wired*, September 2019, <https://www.wired.com/story/why-american-workers-need-to-be-protected-from-automation/>.

[3] “Robots Are the Ultimate Job Stealers. Blame Them, Not Immigrants,” Arlie Hochschild, *The Guardian*, February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feb/14/resentment-robots-job-stealers-arlie-hochschild>.

[4]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Klaus Schwab, Penguin Random House, January 2017,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books/551710/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by-klaus-schwab/>.

[5]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Carl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 Ox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2013,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

[6] *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Carl Fr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9,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172798/the-technology-trap>.

[7] “If Robots and AI Steal Our Jobs,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ould Help”, Peter H. Diamandis, Singularity Hub, December 2016, <https://singularityhub.com/2016/12/13/if-robots-steal-our-jobs-a-universal-basic-income-could-help/>.

[8] 2019年5月，克劳斯·延森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9] 当船舶建造工作的主力军变成机器人，而不再是人类时，该行业有些工作岗位确实消失了。但即便如此，拥有长期变革的愿景的延森依旧保持乐观且极具建设性的态度。该行业仍然需要有工人监督施工，修理发动机，将所有部件组合起来。如果丹麦工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竞争力，则丹麦依然会是全球船舶制造和维修中心。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早已刻入该工会的基因。“我的工会成立于1888年，我们的第一任工会主席曾说过一句话，我今天想再次重申，”他说，“我们改变技术，但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10] 2019年11月，罗宾·勒夫曼在哥本哈根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1] 2019年11月，托马斯·斯瑟比在哥本哈根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2]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Denmark, consulted in October 2020, <https://www.dst.dk/en/Statistik/emner/arbejde-indkomst-og-formue/arbejdsløshed>.

[13] “Inequality in Denmark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rsetta Causa, Mikkel Hermansen, Nicolas Ruiz, Caroline Klein, Zuzana Smidova, OECD Economics, November 2016,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conomics/inequality-in-denmark-through-the-looking-glass_5jln041vm6tg-en#page3.

[14] “How Many US Manufacturing Jobs Were Lost to Globalisation?” Matthew C. Klei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016, <https://ftalphaville.ft.com/2016/12/06/2180771/how-many-us-manufacturing-jobs-were-lost-to-globalisation/>.

[15] Trading Economics, United Stat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with numbers supplied by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

[16] Trading Economics, Denmark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denmark/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

tradeeconomics.com/denmark/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

[17] 2019年11月，托马斯·斯瑟比在哥本哈根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8] OECD, Directorate for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Data, Skills and Work dashboard, <http://www.oecd.org/els/emp/skills-and-work/xkljljosedefjsldfk.htm>.

[19] 2019年4月，希瑟·朗在华盛顿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0] 2019年4月，希瑟·朗在华盛顿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1] 2019年11月，托马斯·斯瑟比在哥本哈根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2] “How Today’s Union Help Working People: Giving Workers the Power to Improve Their Jobs and Unrig the Economy,” Josh Bivens et al.,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 2017,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how-todays-unions-help-working-people-giving-workers-the-power-to-improve-their-jobs-and-unrig-the-economy/>.

[23] “Singapore Society Still Largely Conservative but Becoming More Liberal on Gay Rights: IPS Survey,” *The Straits Times*, May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singapore-society-still-largely-conservative-but-becoming-more-liberal-on-gay-rights-ips>.

[24] “Singapore: Crazy Rich but Still Behind on Gay Rights,” *The Diplomat*, October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singapore-crazy-rich-but-still-behind-on-gay-rights/>.

[25] 2019年7月，新加坡高级部长尚达曼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6] “Singapor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Gundy Cahyadi, Barbara Kursten, Dr. Marc Weiss, and Guang Yang,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June 2004, <http://www.globalurban.org/GUD%20Singapore%20MES%20Report.pdf>.

[27]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ingapore—1965–2065,” Ravi Meno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ugust 2015, <https://www.bis.org/review/r150807b.htm>.

[28] “Singapor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Gundy Cahyadi, Barbara Kursten, Dr. Marc Weiss, and Guang Yang,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June 2004, <http://www.globalurban.org/GUD%20Singapore%20MES%20Report.pdf>.

[29] “Singapore Faces Biggest Reskilling Challenge in Southeast

Asia,”Justina Lee, *Nikkei Asian Review*, December 2018,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Singapore-faces-biggest-reskilling-challenge-in Southeast-Asia](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Singapore-faces-biggest-reskilling-challenge-in-Southeast-Asia).

[30] “PwC’s Hopes and Fears Survey,” p.4, PwC, September 2019, <https://www.pwc.com/sg/en/publications/assets/new-world-new-skills-2020.pdf>.

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1980年，还在读小学的吴修铭得到了一台AppleII，成为班级里第一个拥有个人电脑的人。正是这款如今已成为经典的电脑，使其发明者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成为传奇人物，并且预示了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的到来。但对于吴修铭和他的弟弟来说，AppleII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他们接触到一项新技术。吴修铭告诉我们：“我和弟弟都喜欢苹果电脑，对它很痴迷。”^[1]孩童时期的兄弟俩总是把电脑芯片取出来，重新编程后再装回去，乐此不疲。几年后，计算机网络刚出现时，他们就会设置一个拨号调制解调器，连接到其他计算机，建立起自己的网络。那些成长的岁月让兄弟俩成为终身的技术痴迷者。吴修铭的弟弟后来在微软当程序员，吴修铭在谷歌（义务）工作过一段时间。在谷歌工作时，吴修铭仍然十分振奋。“我以前是谷歌的忠实支持者。”他说，“谷歌当时所从事的事情令人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一种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感觉。”

后来，吴修铭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虽然每天仍在使用苹果笔记本、iPhone和谷歌服务，但他已不再是如今这些公司的粉丝了。这几家起步于车库的公司，如今的市值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甚至远超这一数值，^[2]成为美国最大的上市公司。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早已不再是旗下最畅销的产品，取而代之的是iPhone。虽然苹果公司的大部分营收仍来源于iWatch、iPad和iPhone等一系列时尚硬件产品的销售，但受版权保护的软件产品以及开创性的应用程序商店如今已成为苹果生态系统的核心。谷歌（现隶属于母公司Alphabet）从领先的搜索服务供应商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活跃于广告销售、购物、娱乐和云计算等各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早期的IT公司逐渐失势，但Alphabet、苹果、微软、脸书以及亚马逊则不断巩固其领先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巨头。

“转折时刻出现在这些大型企业既没有消失，也还没有变得过于庞大时。”吴修铭说，“这时的它们会挺进太多市场。”他对谷歌的态度还没有发生转向时，曾对该企业提出建议：“虽然拥有不可思议的技术，但需要对邻近的市场保持警惕。”吴修铭说，他当时努力对谷歌保持善意，想让它远离自己口中的“道德上可疑的做法”。但谷歌对此置若罔闻。吴修铭说，结果就是，如今这五大科技公司已不再是不久以前初创公司的模样，而更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信供应商AT&T这样的垄断公司。他还说，它们通过收购或模仿竞争对手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既充当平台又充当卖家，在自己的应用商店里优先推荐自家产品。吴修铭认为，它们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中的垄断企业并无两样，这么做会抑制经济发展和良性竞争，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不是为大多数人共享。基于这个原因，吴修铭主张，应当对这些“大型科技”企业采取强硬措施：要么像监管自然垄断企业一样对其实施监管，要么将它们拆分。

在美国，把大型科技公司比作以前的垄断企业的远不止吴修铭一人。2018年底，我到华盛顿采访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那时她针对美国科技、制药、金融等许多行业的市场主导者就已持有类似的想法。丽娜·汗是吴修铭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同事。2016年，还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她就发表了一篇影响重大的论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表明了类似立场。^[3]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伊曼纽尔·塞斯、肯尼斯·罗格夫，以及诺贝尔奖

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也表示，大型科技公司“权力过大”[4]，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包括《连线》杂志主编尼古拉斯·汤普森、《金融时报》副主编拉娜·福鲁哈尔在内的一些知名记者，也支持针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反垄断措施。甚至有些科技巨头的联合创始人也支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其中就包括苹果公司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5]和脸书的克里斯·休斯。目前这些企业已经在接受监管审查。对于吴修铭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我向来喜欢沃兹尼亚克领导下的苹果公司，”他说，“他们当时做的事很了不起。”

在吴修铭、沃伦·沃兹尼亚克等人认为需要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垄断的另一种类型，即在某一市场上仅有一个买方）加大监管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加大监管只会适得其反。他们指出一个事实，即许多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即使不免费，其收费价格在市场上也是最低、最优惠的（比如亚马逊）。他们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将其分拆或实施监管都不是对付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最好办法。这些措施会对过去几年里那些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造成伤害，从而会削弱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还有人认为，目前世界正在上演一场科技霸权争夺战（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过度监管可能会让美国企业战败。

在过去几年里，我有机会见过所有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并且密切关注了其中许多人的成功道路。例如，我曾在帕洛阿托的一个仓库拜访过马克·扎克伯格，当时他只有18名员工。我还曾将刚刚创立了阿里巴巴的马云推举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我相信，在最初经历了一番“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体验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给人们的生活和身份带来了巨大影响。我看到，他们针对数据所有权、算法、人脸识别等社会合

理关切问题，越来越愿意做出建设性回应。他们很清楚，重视这些问题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否则就可能面临监管，从而有损未来发展。

在这场辩论中究竟哪种观点是对的呢？当今经济中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其他主导性企业给劳动者和消费者带来的是利益还是损害？我们应当调整竞争政策以使其适应数字经济吗？我们是否已经凭借大型科技公司进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或者说，如果遏制这些企业的发展，我们是否将会迎来创新寒冬？透过工业革命的视角回顾经济史，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重大问题。

[1] 2019年10月，吴修铭在纽约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2] “The 100 Largest Companies by Market Capitalization in 2020,” Statista, consulted in October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3264/top-companies-in-the-world-by-market-capitalization>.

[3]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Lina M. Kahn, *The Yale Law Journal*, January 2017.

[4] “Big Tech Has Too Much Monopoly Power—It’s Right to Take It On,” Kenneth Rogoff, *The Guardian*, April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apr/02/big-tech-monopoly-power-elizabeth-warren-technology>; Paul Krugman’s “Monopoly Capitalism Is Killing US Economy,” Joseph Stiglitz’s “America Has a Monopoly Problem—and It’s Huge,” and Kenneth Rogoff’s “Big Tech Is a Big Problem”; “The Rise of Corporate Monopoly Power,” Zia Qureshi, Brookings, May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9/05/21/the-rise-of-corporate-market-power/>.

[5] “Steve Wozniak Says Apple Should’ve Split Up a Long Time Ago, Big Tech Is Too Big,” Bloomberg, August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videos/2019-08-27/steve-wozniak-says-apple-should-ve-split-up-a-long-time-ago-big-tech-is-too-big-video>.

工业革命以前

在人类进入近代之前，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大约1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狩猎者和采集者定居下来，成为农耕者。这一变化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耕首次带来了稳定的粮食供应，甚至还能定期产生一些富余；[\[1\]](#)另一方面，非游牧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有条件存储粮食、圈养家畜，从而获得更多的营养来源，包括肉类和奶制品。凭借进一步的技术突破，比如耕犁、车轮、陶器和铁制工具的发明，这一时期的人们迎来了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这场农业革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这种新兴的定居生活方式为村庄、城市、社会乃至早期帝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政治方面，由于出现粮食富余，某些阶层的人可以依靠别人生产的粮食生活，这些社会开始首次出现等级划分。在经济方面，早期贸易和专业化使整体财富适度增长。随后发展起来的文明几乎无一例外，都由以下几个阶层组成：由军官和精神领袖组成的上等阶层，由商人、小贩及专业手工艺人（即专门制作陶器、服装以及其他产品的人）组成的中等阶层，以及由数量庞大的农奴和农民组成的下等阶层。农奴和农民生产的粮食不仅要供自己食用，还要供给他人，而且他们通常要对上等阶层绝对服从。透过历史，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早期模式：技术进步带来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剩余财富的分配几乎总是不平等的，甚至会被社会顶层的少数群体独占。

接下来的一千年里，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经历

了多个创新时期。在亚欧大陆，从中国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再到欧洲，航海、战争、交通运输，以及印刷、金融、会计等许多领域的技术突破都发生在中世纪时期。正如前面章节所述，技术进步激起了一波又一波跨大陆贸易浪潮，给各种族的人民，尤其是上层阶级的生活带来了进一步改善。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和大明王朝纷纷在这一时期崛起。

曾一度在欧亚发展潮流中处于落后状态的欧洲，终于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迎来了一场真正的科技革命。这场科技革命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巨大变化：欧洲强国确立了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欧洲开始了宗教改革，象征现代主权国家开始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签署。此外，借助指南针、帆船、火药以及这场科技革命中的其他应用成果，欧洲强国还建立起众多的全球贸易帝国，庞大的东印度公司（在前面章节有所提及）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尽管取得了科技进步，实现了财富增长，但截至18世纪末，欧洲绝大部分人口仍然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相较若干世纪以前的祖辈，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

[1] 不过，有些学者确实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农业革命给人类粮食供应的质量和数量带来的影响，尤瓦尔·赫拉利就没有那么乐观。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一切，英国最先受到影响。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最初的发展并无规律可言，但到19世纪初，英国的企业家们已经大踏步走在世界的最前沿。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英国的蒸汽机车、轮船和机器掌控了世界，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业和纺织业的变化最为显著。机器替代人力或马匹为生产提供动力，促进农业产量翻了几番，纺织业的产量增长更甚。按最终商品产量计算，英国经济每年增幅开始达到几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仅为0.1或0.2个百分点——这种增幅在前几个世纪很常见。与此同时，人口也在迅速增多。需要养活的人口增多，但农业中所需的劳动力（和马匹）却减少了。截至19世纪末，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迁移到了伦敦、曼彻斯特或者利物浦这样的工业城市，其中大部分人开始在工厂工作。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最大的是英国资本家。资本主义在当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中世纪时，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贸易的威尼斯商人就已实施航运风险共担，至少在这个时候，欧洲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只不过，此时的资本主要用于筹建工厂和购买机器，而不再是投资贸易。大地主、成功的商人以及贵族成员往往手握大量资本，他们能够投资新技术，创办成功的企业。由于坐拥世界市场，他们将巨额利润收入囊中。而且，由于操作机器对于劳动力的专业性需求不比手工制作，早期的工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剥削局面的产生（这种情况仅存在

于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印度、中国等手工业被严重摧毁的国家，情况要糟糕得多，几乎没有赢家）。

随着19世纪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传播到其他国家，主要是欧洲大陆国家（以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最为显著）以及英国在北大西洋对岸的前殖民地——美国。与技术变革相伴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到19世纪末，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普通工人所面临的困境已经变得十分棘手，以至一些新晋领导阶层中开始有人谴责这种过激行为。《悲惨世界》就创作于这一时期，描写了普通法国民众在工作中遭受的严重剥削。德国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过发表社论、出版书籍，论述了在工业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查尔斯·狄更斯早在几十年前就写下名言：这不仅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黑暗的季节”，是“失望之冬”。^[1]这一结果是工业化或全球化造成的吗？实事求是地讲，这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上一章所述，工人开始团结起来，反抗他们所面对的不公平，要求获得政治权利、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甚至要求推翻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实业家取代国王和牧师，跃居社会顶层；工厂的工人则取代原来的农奴和农民，沦为社会底层。

在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难以维持的局面。交通、金融和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寡头和垄断的形成：掌握最多资本和第一手资源的企业能以最大规模部署最新的技术，提供最好的服务，从而赢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赚得最多的利润，让竞争对手出局或者将其收购。例如，在交通运输行业，铁路巨头、航运巨头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控制下的、连通中西部和纽约的铁路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能源行业，精明的约翰·D.洛克菲

勒白手起家，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后来成为第一个商业托拉斯（标准石油公司如今以埃克森美孚的形式继续存在，仍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在钢铁行业，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人安德鲁·卡内基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前身，后来该公司发展成为美国钢铁生产行业的垄断企业。在煤炭行业，亨利·弗里克成立了弗里克焦炭公司，控制着宾夕法尼亚州80%的煤炭产量，[\[2\]](#)同时还掌管着当时的其他几家企业集团。在银行业，纽约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如今摩根大通的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等行业巨头创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公司。

在今天，许多行业巨头因其所做的社会贡献而为人所知，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卡内基音乐厅，以及许多活跃至今的慈善组织。但在19世纪80年代末，他们更多是因为巨额财富和令人质疑的商业行为而出名。以今天的标准衡量，那些人的财富甚至超过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但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普通民众并没有积累起财富。极度贫困在纽约、费城、匹兹堡和芝加哥这些大城市的廉租房中十分普遍。工人的工资非常低，而且托拉斯的经济实力令他们毫无议价能力。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条件简直存在天壤之别，以至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在1873年共同著书讽刺这一现象，书名是《镀金时代》。此后，这一书名便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到20世纪初，这种情况导致美国政界“民粹主义”的首次崛起。1892年，人民党成为首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赢得选举席位的第三党派。该党的纲领是帮助“乡村和城镇劳动力”争取权利，反对据说是由当时的领导阶层带来的“道德、政治和物质沦陷”。1896年，这个最初的民粹政党的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甚至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总统候选人，不过他最后未能赢得这场大选——输给了共和党的威廉·麦

金利。

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主导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但同时也给工业化国家的穷人带来了苦难。在这场工业革命中，有一些国家被彻底甩在后面，其中包括之前GDP一直领先世界的亚洲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对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在这些国家，整个政治制度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混乱或殖民统治。在美国和西欧，当民众的强烈反对情绪发展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时，国家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减轻工人阶层的苦难。在欧洲，从英国到德国，经过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之后，普选制得以确立，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采取的措施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例如，奥托·冯·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政府虽然有保守倾向，但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构成了如今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

与之相比，美国早期的重点不是提供社会保障，而是加强反垄断。（直到1935年，经济大萧条导致数千万人失去工作、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美国才通过了《社会保障法》。[\[3\]](#)）1890年，立法者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的恶劣行径滋生了政治腐败，垄断了整个工业部门。首部反垄断法于当年通过，之后几年又经历了多次修订。1914年，两项更重要的法律被通过，其中一项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设立的基础。这些法律必须共同确保洛克菲勒等人的托拉斯不能再通过收购全部竞争对手或串通定价的方式构成事实上的垄断。在这之后，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在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该公司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成品油市场”[\[4\]](#)。标准石油被拆分成34个部分，其中一些作为品牌或独立

公司至今仍存在，包括埃克森美孚（曾被分拆为埃克森和美孚两家独立公司）、雪佛龙和阿莫科。其他行业也受到监管审查。监管者认为，垄断势力会抑制创新，既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又不利于竞争。因此，垄断行为需要被制止。

[1]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rles Dickens, Chapman & Hall, 1859.

[2]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Henry Clay Frick et 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https://www.lib.berkeley.edu/goldman/PublicationsoftheEmmaGoldmanPapers/samplebiographiesfromthedirectoryofindividuals.html>.

[3]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s://www.ssa.gov/history/briefhistory3.html>.

[4] “Standard Ogr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99,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1999/12/23/standard-ogre>.

第二次工业革命

纵观经济和政治发展史，有一种情况十分常见，即工业化世界的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在解决当前及历史问题上几乎都十分有效，但在应对未来问题上相对无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内燃机和电力等许多新技术催生了一系列新产品，如汽车、飞机、电网以及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技术逐渐创造、重塑并主导各行各业，就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但1914年的地缘政治摩擦打断了这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动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更多人把科技视为一种毁灭性力量，而非经济驱动力。一战后，马匹不再是战场上的战略物资。从二战开始，坦克和飞机成为战场上的主导性物资。数千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很多人死于用新技术发明的武器。

经济学家卡尔·弗雷在《技术陷阱》一书中指出，1945年，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这一次，技术将在西方发挥更加普遍的积极作用，对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尤其如此。在大西洋两岸，汽车很快成为受到大众市场欢迎的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等阶层还是普通工人都能负担得起。电力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洗衣机、空调和电冰箱等电器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新发明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健康、卫生，还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解放。电力和交通的发展还促进了许多新行业的诞生，为很多中产阶级提供了就业岗位，甚至连技术水平中等或较低的工人也获得了一定的工作机会。这一次，工厂的机器与工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机器将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工厂仍然需要大量工人。随着经济越来越介于以制造业为主体和以服务业为主体之

间，司机、电话接线员、文秘和出纳员等岗位的需求量变得非常大。

财富的广泛激增，以及与之相伴的婴儿潮的出现，使国家进一步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医保、住房政策。在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了一项“伟大社会”计划。^[1]该项计划旨在通过“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等行动消除贫困和种族问题，引入了包括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在内的医疗保障项目，还通过了新建院校、设立奖助学金、壮大教师队伍等政策。在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得以建立，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义务教育以及国家补贴住房。

与此同时，反垄断行动一直被列为一项政治议程。在美国，新崛起的电信产业的联合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到20世纪60年代，贝尔公司（如今的AT&T）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垄断。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通过的反垄断法，贝尔公司被拆分。此后几十年中，电信服务价格大幅降低，服务质量显著提升，还出现了新一波创新潮，移动电话便由此产生。在欧洲，各国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监管方式，把电力和电信供应商组建成国有垄断企业。这同样确保了任何高出市场水平的利润最终能够被用于提升社会福利，尽管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但这种监管抑制了企业创新和市场竞争，而由于缺乏激烈的竞争，国有企业逐渐怠于提供更好的服务或更低的价格。

汽车行业的竞争足够激烈，因此不需要实施反垄断措施，尽管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些企业曾经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对交通运输部门进行游说，导致该领域无法取得最优结果。比如，把更多的投资用于汽车、公共汽车及其基础设施而不是火车和电车，以及推迟引进电动机，都是游说的结果。但该行业的市

场集中度确实一直很低，部分原因是国际竞争在不断加剧。该行业还或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使数千万人得以享受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众多汽车制造商因为这些原因而免受监管审查，成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

或许是因为技术和企业在西方的黄金时代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对待资本与劳动力、人与机器的问题，人们的观念明显缓和了许多。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也更多地宣扬企业及其创新成果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创新性破坏”[2]将使落后的企业及其产品被新兴企业及其先进技术取代。汽车会取代马匹，飞机会取代轮船，家用电器会取代家政从业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即所谓的“芝加哥学派”）想法更超前。弗里德曼坚信企业自然而然地会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一只无形的手会确保市场总能实现最优的结果，确保社会效应最大化。弗里德曼在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意味着，“企业有且仅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在游戏规则范围内，利用企业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活动”。[3]鉴于当时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且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仅在几十年后，随着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企业对社会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企业及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越发突显。

[1]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yndon B. Johnson, Frank Freidel and Hugh Sidey,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6, <https://www.whitehouse.gov/about-the-white-house/presidents/lyndon-b-johnson/>

[2] 该术语出自：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Joseph Schumpeter,

Harper Brothers, 1950 (first published 1942).

[3] “A Friedman Doctrine—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Milton Friedm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70, <https://www.nytimes.com/1970/09/13/archives/a-friedman-doctrine-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business-is-to.html>.

第三次工业革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当针对贝尔公司的反垄断案经受着政治和司法的重重考验时，于阿尔伯克基和库比蒂诺的两间车库中诞生了两家小型计算机公司，后来的它们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两家公司就是微软和苹果，它们最初研发的是个人电脑，就像吴修铭从父母那得到的那台Apple II。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这两家公司因其软件——包括MS-DOS、Windows和Mac OS等，越来越出名。到20世纪90年代，在微软和苹果的助力下，互联网进入了办公室和家庭。一路走来，个人电脑从昂贵、笨重的小众设备转变为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第三次工业革命由此诞生，它给世界带来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相关应用和行业也应运而生。

第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白领工人的生产力。他们不管身处何地，只要动动手指，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处理更多信息，并即时与同事沟通协调。它还催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波全球化浪潮：制造活动可以与后勤部门分离，公司总部可以从全球价值链中抽离出来。这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让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得以融入世界经济，帮助上亿人口跻身全球中产阶层。

这场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总体影响无疑是正面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财富的积累仅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上等和中等阶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新兴市场终于能够公平地分到一块蛋糕。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拉克纳和布兰科·米兰诺

维奇绘制的著名的“大象曲线”就反映了这一趋势。^[1]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从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1988年到互联网撼动全球供应链的2008年，全球中产阶级受益颇丰，同样受益的还有工业化国家中1%的富人群体。但是，西方中产阶级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同样的工作可以用更低的工资雇用其他地方的劳动者来做，这就给西方中产阶级的就业和薪资水平造成了影响。

在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中，“大象曲线”进行了最近一次的更新，从中就能看到这一趋势（见图6.2）。该曲线反映了在全球收入分配中各个百分位上的人群（用横轴表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收入增长率（用纵轴表示）。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于第10百分位至第50百分位的人群（包括中国、印度、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率非常可观，往往在100%以上。这部分人群构成了“大象”的“背部”。收入最高的1%群体，即包括西方专业人士阶层在内的世界精英群体，收入增长率也非常高，其中又以前0.1%和0.01%的群体受益更多。这部分群体构成了“大象”的鼻尖。这两类群体总体而言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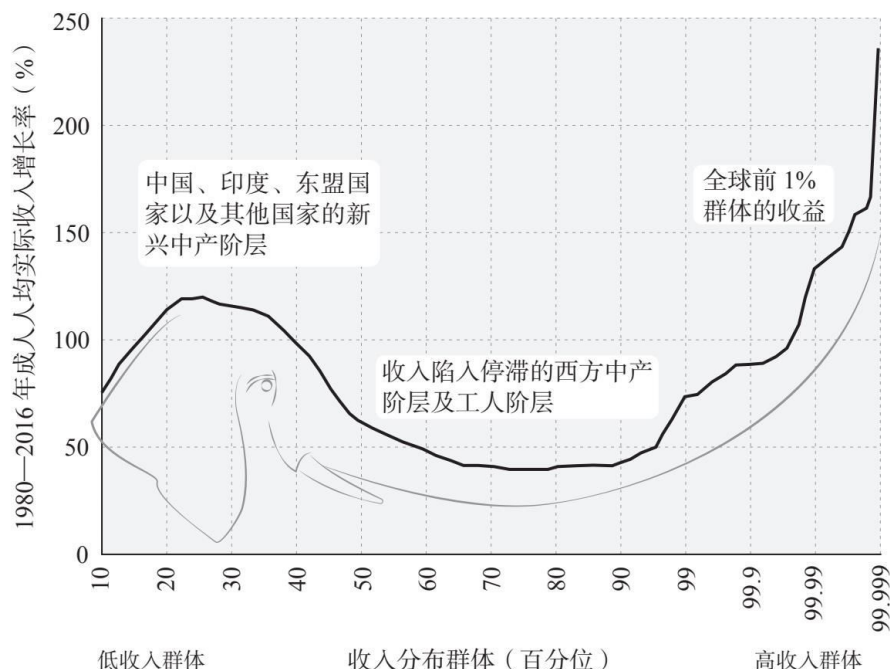


图6.2 反映全球不平等及收入增长状况的大象曲线

资料来源：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受到拉克纳和米兰诺维奇发表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15年）中的文章启发，大象的形象最初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卡罗琳·弗罗因德添加。^[2]

然而，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于第60百分位至第90百分位的人群的收入增长率非常低，这部分人群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等西方国家的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在过去35年里，他们的平均收入即使有增长，每年增长率也不过略高于1%。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实际好处，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失去了高薪蓝领工作。而在收入分布中处于最前几个百分位的赤贫人群的收入也几乎没有变化

（其收入增长率并未在曲线图中得到体现）。

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它将网络效应变成一种竞争力，将用户锁定在大多数人所使用的网络中，并提升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微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个人电脑在办公室得到普及后，微软的Windows系统成为主流的操作系统，Office成为主流的办公软件，IE浏览器成为主流的网页浏览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微软的强大功能及其先前与IBM签订的协议，但微软也很快将消费者和自己的产品绑定：在Windows上预装了IE浏览器，有效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并使非微软用户很难访问Office或Windows Media Player中的文件。这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反垄断当局的注意：微软是否在滥用权力？在经过7年的调查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于2000年6月7日做出裁决：微软确实存在滥用其垄断权力的行为，应当将其拆分为两家独立公司，一家负责开发操作系统，另一家负责开发软件。^[3]2004年，欧盟委员会也在一起涉及Windows Media Player的案件中裁定微软存在反竞争行为，并对其开出5亿欧元的罚单。^[4]这是截至当时针对单家公司开出的最高数额的罚单，微软支付了这笔罚款，但它通过上诉成功驳回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微软进行拆分的裁决。2001年，上诉法院做出新的裁决：微软可以作为一家公司继续运营。

吴修铭认为，这是美国和欧洲采取反垄断行动的一个转折点。欧盟委员会因为微软案的成功而倍受鼓舞，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打击垄断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强硬。为了打造欧洲共同市场，它还开放了国内市场，加剧了许多行业的竞争，促使这些行业降低价格、改善服务。与之相反，在美国，市场集中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增强，因为反垄断当局多数选择袖手旁观。在微软案

的裁决做出近20年后，记者戴维·伦哈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引用了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的研究数据），称“少数几家企业的规模已经如此之大，以至有能力把价格定得很高、把工资压得很低。这对企业自身来说是好事，对几乎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坏事”[5]。由此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寡头垄断：

很多美国人只有两家互联网供应商可选。航空业被四大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 主导。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地方市场都被一两家医院系统控制。家得宝和劳氏取代了各地的五金商店。像艾克德和快乐哈利这样的区域性连锁药店也被全国性巨头吞并。[6]

不过，菲利蓬等经济学家以及吴修铭、丽娜·汗等法学学者还指出，不能把这一结果全部归咎于技术或全球化。毋庸置疑，技术使这些企业得以继续向全球扩张，为其提供了巩固市场地位的工具。但真正允许这一切发生的是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正如芝加哥学派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政府把技术行业反垄断行动的重心放在消费者价格上，导致忽视了全局。以脸书和谷歌的服务为例，消费者价格已经不再是衡量标准。消费者实际上变成了产品。许多服务是免费使用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个性化广告开始针对用户精准投放。在网络广告市场，大型科技公司掌握了定价权，而且缺乏竞争。但这一市场因相对无形而未受到同样的监管审查。相比之下，在欧洲，欧盟的竞争监督机构——竞争总署（DG Comp）把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市场指标，这使其能够更快地进行干预。第二，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网络效应锁定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你不想成为唯一一个不使用特定社交网络的人）之后，还能够制定出以前闻所未闻的个人数据使用规则。因为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不存在类似行为，所以监管者一直都

没有可以遵循的先例，直到近期。

如前所述，针对这种情况，欧盟委员会找到了另外一种解决路径。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案以来，欧盟委员会的竞争事务专员向垄断企业开出的罚单越来越多且数额越来越大。谷歌、英特尔和高通都曾因为存在反竞争行为而收到数额超过10亿欧元的罚单。^[7]其中，谷歌因存在“网络广告垄断行为”在2019年3月再次收到该机构开出的超过10亿欧元的罚单。^[8]欧盟委员会还针对卡特尔采取行动，范围涵盖卡车制造^[9]、电视显像管生产、外汇、汽车维修、升降梯、维生素、航空运输等各个产业，自2000年以来共开出了260亿欧元的罚单。^[10]此外，该机构大力遏制企业兼并行为，确保大型企业能够持续感受到来自企业新锐的竞争压力。近几年比较有名的案例是，欧盟委员会阻止了两家大型铁路公司——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兼并，还制止了钢铁业巨头塔塔钢铁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建立合资企业的决定。自1990年以来，该机构对200起企业兼并行为进行了关键的第二阶段审议，其中30起被否决，133起附条件通过，只有62起获得了全面批准。^[11]《金融时报》报道称，在未来几年，竞争事务专员打算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特别是针对那些所谓的大型科技公司。“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饱受一家或多家企业的非法行为困扰的市场……所需要的是什么。”《金融时报》如是说，并且补充称，“对企业进行拆分 [.....] 是我们现在可用的一种手段。”^[12]托马斯·菲利蓬认为，竞争事务官员采取这种坚决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这意味着“如今欧盟消费者的处境会比美国消费者好很多 [.....]”。欧盟实施了美国的 [反垄断] 方案，美国则已将自己的这一方案抛诸脑后”^[13]。

然而，即使欧洲采取的这种措施看起来最能维护公民利益，

它也可能会削弱欧洲科技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以阿尔斯通与西门子的兼并案为例，兼并后企业在欧洲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过大，但由此产生的规模能让该企业在全球更具竞争力。毕竟在当前的全球市场上，它正面对着一个规模更大并且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竞争对手（中国中车），[14]还面对着很多规模相当的日本竞争对手和加拿大竞争对手，比如日立和庞巴迪。

欧洲方面审查力度的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的科技公司近年来无法在世界舞台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在202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10家科技公司中，6家来自美国，4家来自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公司有能力和这些巨头竞争吗？当然，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最佳途径是采取更加国际化的政策和监管办法，或许能将反垄断措施纳入经过深入改革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但考虑到该组织目前正面临困境，这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1]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Christoph Lakner and Branko Milanovic, World Bank, December 201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14431468162277879/pdf/WPS6719.pdf>.

[2] “Deconstructing Branko Milanovic’s ‘Elephant Chart’: Does It Show What Everyone Thinks?” Caroline Freund, PIIE, November 2016,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deconstructing-branko-milanovics-elephant-chart-does-it-show>.

[3]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 97 F. Supp. 2d 59 (D.D.C.2000), June 7, 2000,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2/97/59/2339529/>.

[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May 24, 2004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pursuant to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against Microsoft Corporation, Eur-Lex,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_content/EN/ALL/?uri=CELEX:32007D0053.

[5] “Big Business Is Overcharging You \$5,000 a Year,” David Leonhard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10/opinion/big-business-consumer-prices.html>.

[6] “Big Business Is Overcharging You \$5,000 a Year,” David Leonhard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10/opinion/big-business-consumer-prices.html>.

[7] “The 7 Biggest Fines the EU Has Ever Imposed against Giant Companies,” Ana Zarzalejos, Business Insider, July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he-7-biggest-fines-the-eu-has-ever-imposed-against-giant-corporations-2018-7>.

[8]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2019,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1770.

[9]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truck producers € 2.93 bill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a cartel,” European Commission, July 201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s/IP_16_2582.

[10] Cartel Statistics, European Commission, Period 2015–2019,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cartels/statistics/statistics.pdf>.

[11] Merger Statistics,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statistics.pdf>.

[12] “Vestager Warns Big Tech She Will Move beyond Competition Fines,” Javier Espinoz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dd3df1e8-e9ee-11e9-85f4-d00e5018f061>.

[13]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10/opinion/big-business-consumer-prices.html>.

[14] “The Alstom-Siemens Merger and the Need for European Champions,” Konstantinos Efstathiou, Bruegel Institute, March 2019, <https://www.bruegel.org/2019/03/the-alstom-siemens-merger-and-the-need-for-european-champions/>.

第四次工业革命

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技术成果仍在市场上发挥作用，但我们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我在2016年所写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点是技术融合，它不断模糊着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边界。从无人驾驶和无人机，到虚拟助手和翻译软件或投资软件，人工智能已随处可见。近年来，人工智能取得巨大进步，从用于发现新药的软件，到用来预测人的文化喜好的算法，这既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又得益于我们现在可以获得海量数据。与此同时，数字制造技术已经可以和生物世界实现日常互动。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将计算机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学和合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开创一种存在于微生物、人体、消费产品乃至住宅之间的共生关系。[\[1\]](#)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有望再次促进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这是因为，它们可能会转化为通用技术（GPTs），就像之前的电力和内燃机。根据埃里克·布林约尔森等经济学家所言，这些通用技术中威力最大的可能是人工智能，即AI。[\[2\]](#)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快速赶超美国的领先企业。科技企业家、投资者李开复告诉我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这些公司正在迅速赶超亚马逊、脸书、谷歌和微软等美国人工智能巨头，而且在某些程度上，它们已经拥有更先进的应用程序。它们将促进中国实现国家发展和国民富裕。

与前几次一样，这些技术也会加剧不平等，扩大社会及政治裂痕，会让我们的现有社会濒临崩溃。像脸书这样的公司已经遭

到批判，因为有人认为其算法有意激起分歧，助长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美国社会本就长期存在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强烈对立。随着人们上网的时间增多，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这可能只是更糟糕的情况的开端。此外，生物技术和医药科学的进步能为更富裕群体的生活状态甚至身体状态带来更大程度的改善，由此带来财富层面和生物层面的双重差距，从而将不平等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技术还可能被用于网络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尽可能实现最好的结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从过去吸取教训，各国政府应当制定出包容性政策，规范企业行为。对技术突破实施监管所面临的挑战往往在于创新速度。政府的监管在流程上需要花时间，而且需要对创新技术进行深入了解。曾经有位CEO向我表达了沮丧情绪：“企业的发展就像是在乘坐由创造力驱动的电梯，而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学习却像在走步行梯。”这种情况给企业带来了特殊的责任——要确保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能被大众充分理解，不光包括其对个人用户而言所具备的功能，还包括其对社会而言更广泛的意义所在。

秉持着这一宗旨，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于2017年在旧金山成立。该中心的目标是构建政策框架，推进合作关系，以加速释放科学技术红利。[\[3\]](#)它聚集了这一进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即政府、企业、公民社会、青年群体和学者。有几家企业当即与该中心签约，成为创始成员，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欢迎其他各方与它们一道助力社会发展。随后，世界各国政府兴趣高涨，都渴望了解新技术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实施更好的监管，我们在印度和日本都设立了分中心，还在哥伦比亚、以色列、南非、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设立了附属

中心。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完全的好坏之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整个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即使企业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公司的影响最终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尽管在自由市场上运营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也离不开同样富有创新力且强大的政府这个最佳联盟——政府会始终把社会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正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万物的价值》（*The Value of Everything*）中所言，一个强大的政府不应局限于监管职能，还可以为创新提供基础力量，让自身具备社会附加值。^[4]许多技术成果都发源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比如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发源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万维网（发源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触摸屏技术以及半导体，它们为当今一些最具创意的产品，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的研发提供了技术基础。^[5]

归根结底，对于创新及其推动者，我们除了拥抱和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鼓励，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胀成为垄断者。技术只有在被广泛共享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所有权将成为一个关键要素，我们必须确保其不被垄断企业把持。这就是吴修铭对他曾经热爱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主导其他行业的企业巨头所提出的建议。“我一直喜欢小型公司，”他说，“所以当这些公司的规模发展得过大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反垄断斗士。”^[6]

然而，与市场结构同样重要的是，创造出来的价值成果能够

真正被共享。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工业企业多数在国内市场运营。这意味着各国政府能够进行干预，以保障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够相对公平地共享价值成果。但是，人工智能让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许多活跃于互联网技术领域的企业免费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在产品层面无价可管、无税可征。几乎所有领先的科技企业都是美国企业或中国企业，但其活动范围遍布全球各地，这导致许多国家政府也无法对其利润进行征税，因为企业往往会通过转让定价和知识产权相关豁免规定进行避税。如果各地的公民和政府想分享这些企业创造的财富，就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监管与税收框架。

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考虑：即使我们使第四次工业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还需要应对另一个全球危机——持续不断的气候危机。

[1]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Klaus Schwab, Currency, January 2016.

[2] “Unpacking the AI-Productivity Paradox,” Eric Brynjolfsson, Daniel Rock and Chad Syverson,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January 2018, <https://sloanreview.mit.edu/article/unpacking-the-ai-productivity-paradox/>.

[3] Centre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centre-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4]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riana Mazzucato, Penguin, April 2019, <https://www.penguin.co.uk/books/280466/the-value-of-everything/9780141980768.html>.

[5]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s Is on a Mission to Save Capitalism from Itself,” Eshe Nelson, Quartz, July 2019, <https://qz.com/1669346/mariana-mazzucatos-plan-to-use-governments-to-save-capitalism-from-itself/>.

[6] 2019年10月，吴修铭在纽约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第七章 人与地球

在达沃斯这种场合，人们喜欢讲一些成功的故事。但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伴随着难以想象的代价。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做得很失败。当前所有形式的政治运动都失败了。媒体也没能树立起广泛的公众意识。^[1]

这是瑞典年轻的气候活动家格雷塔·通贝里在2019年1月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几个月前，通贝里因发起“为气候罢工”（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运动而出名，激起了关于日益为人所知的全球气候危机的激烈讨论。在达沃斯，她利用这一平台向全世界敲响一记警钟，呼吁人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灾难的发生。“大人们总是说：‘我们应当给予年轻人希望。’”通贝里在一次专门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但我不想要你们给予的希望。我不想让你们有希望。我想让你们恐慌。我想让你们感受到我每天都在感受着的恐慌。我想让你们行动起来，就像身处危机中那样行动起来，就像房子着火时那样行动起来。因为事实就是这般紧迫。”^[2]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警告和政府磋商已经持续数十年，一名青少年的演讲何以吸引世界最广泛的关注？

出生于2003年1月3日的通贝里，在2011年首次了解到气候变化，那时她还在上小学。尽管年龄还小，但她已经认识到“气候专家所说的与社会实际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差距。^[3]这让她既焦虑又难过，以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为什么没有人采取行动呢？为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自然环境退化呢？她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说服父母成为

素食主义者，甚至说服他们不再乘坐飞机——这对她的母亲来说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她的母亲是著名歌剧演员，在那之前经常要前往欧洲各地。

事实证明，通贝里能一门心思专注于气候变化是有特殊原因的。她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症状就是“有限且重复的行为或兴趣模式”。[4]但她不会让这一病症阻碍她的倡议。“我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有时会和正常人有些不同。”[5]面对批评者，她如此写道，“但是，在恰当的情况下，与众不同是一种超能力。”从她的角度看，别人也应当更加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真实存在的。或许其他人因疲于应付眼下更加紧迫的问题而难以注意到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她不会这样。她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其他人也都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

到2018年夏天，通贝里的倡议活动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瑞典议会选举临近，她在一家瑞典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要求人们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并表示自己和其他人会为气候变化罢课，直到选举开始。她的呼吁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贝里决定独自采取行动。在2018年8月底的一天，她逃课去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她站在广场外面，高举着自己做的标语“为气候罢课”。

这奇怪的一幕很快引起了关注。后来《连线》杂志称，通贝里在推特和照片墙上发布了一张自己抗议的照片后，“其他社交媒体使用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该杂志写道，几名有影响力的环保主义者转发了她的帖子，到第二天早上，通贝里获得了第一个追随者——15岁的迈松·佩尔松。到中午时，她又多了6个追随者。几天后，又有30多个人加入。一个月内，通贝里的抗议举动已经举国皆知。截至2018年的秋天，欧洲各国已有上万

名在校生罢课，参加通贝里的“星期五为气候”（Fridays for Climate）活动。

那时，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增加了这些青少年的紧迫感。该报告警告称：“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 1.5°C ，需要社会各界进行快速的、深远的、前所未有的变革。”^[7]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气候变化将有可能发展成不可阻挡之势。报告的作者还指出，“通过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和北极冰川消融，我们已经看到全球气温升高 1°C 的后果”。这些青少年已经有足够的动力去进一步扩大抗议活动。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他们的抗议活动又吸引了从布鲁塞尔到柏林、从堪培拉到温哥华等各个地方的上万人参与。

同样是在2018年的秋天，我注意到通贝里的抗议活动，于是立即决定邀请她来参加我们的达沃斯年会。她的倡议活动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超出了正常的政治和学术呼吁所能达到的水平。我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且紧迫，而且发出呼声的不止她一人。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正如第二章所述，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8]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9]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10]。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通贝里在达沃斯所说的话也是无可辩驳的。据她说，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按照世界不同区域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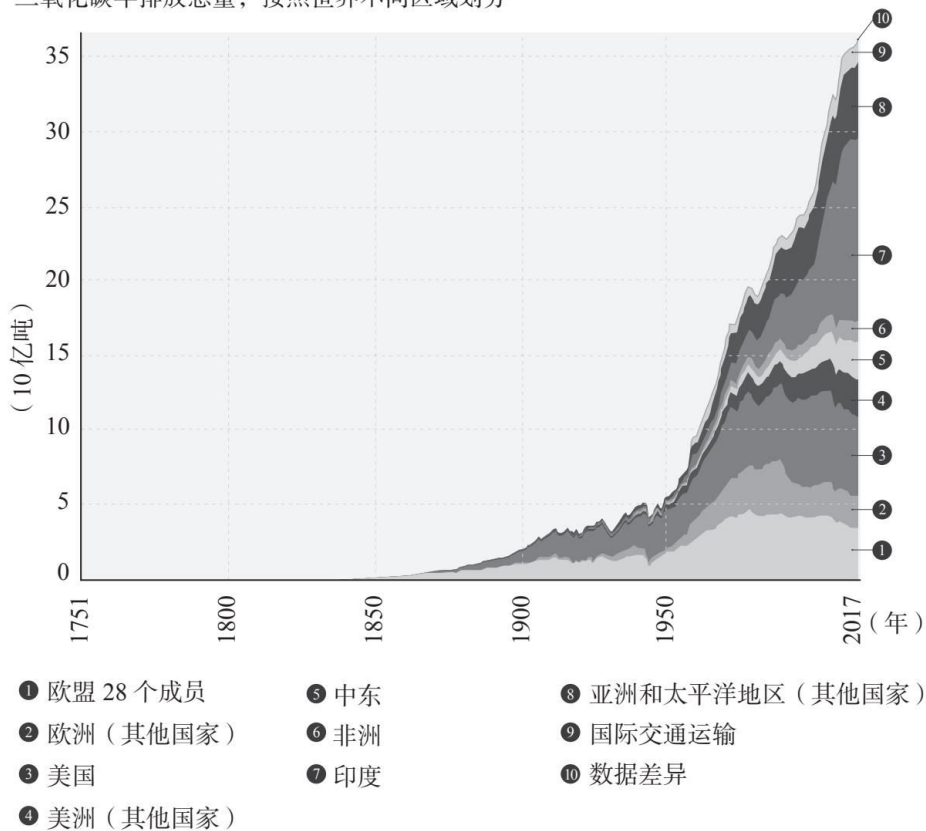


图7.1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根据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的资料重新绘制；全球碳项目（GCP）。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见图 7.1）。[11]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

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12\]](#)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13\]](#)

从那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历史上首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14\]](#)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见第三章）。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如今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15]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

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16\]](#)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17\]](#)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

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要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 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18]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19]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20]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市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上次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还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21]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 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 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

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22]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23]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24]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

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海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俯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25]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26]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7]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28]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

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 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30\]](#)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31\]](#)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

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32]比如，中国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 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33]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34]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导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35]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在中国，随着民众更加富裕，国家鼓励生育，推行二孩政策，但中国的很多年轻夫妻不想生两个或更多孩子，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本世纪末会大幅减少。印

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36]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往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37]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38]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39]，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

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市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40\]](#)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41\]](#)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42\]](#)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43\]](#)

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其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44]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企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但正如格雷塔·通贝里等年轻活动家所警告的，我们的确需要加快行动。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C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讲，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

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为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46]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 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

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47\]](#)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48\]](#)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49\]](#)

1.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投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乐观。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格雷塔·通贝里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分析：

没错，我们正经历失败，但我们仍有时间扭转一切。我们还能解决这一问题，还有能力掌控局面。其实主要的解决办法十分简单，连小孩子都能理解，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排放温室气体。要么停止排放，要么继续排放，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采取变革行动，保障人类未来的生存条件；我们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从事活动，继续失败下去。如何选择，取决于你和我。

[50]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满，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

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1] 出自格雷塔·通贝里在201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的演讲。经编辑的演讲内容可见于：“Our house is on fire”:Greta Thunberg, 16, Urges Leaders to Act on Climate,”*The Guardian*, January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jan/25/our-house-is-on-fire-greta-thunberg16-urges-leaders-to-act-on-climate>.

[2] 出自格雷塔·通贝里在201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的演讲。经编辑的演讲内容可见于：“Our house is on fire”:Greta Thunberg, 16, Urges Leaders to Act on Climate,”*The Guardian*, January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jan/25/our-house-is-on-fire-greta-thunberg16-urges-leaders-to-act-on-climate>.

[3] “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Save the World by Changing the Rules,”Greta Thunberg, TEDxStockholm, December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mUIEsN9A&t=1m46s>.

[4] Asperger Syndrome, 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 United Kingdom, <https://www.autism.org.uk/about/what-is/asperger.aspx>.

[5] Greta Thunberg, Twitter, August 2019, <https://twitter.com/GretaThunberg/status/1167916636394754049>.

[6] “Greta Thunberg: How One Teenager Became the Voice of the Planet,”Amelia Tait, *Wired*, June 2019,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greta-thunberg-climate-crisis>.

[7]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of IPCC 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C, Approved by Governments,” IPCC, October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5/pr_181008_P48_spm_en.pdf.

[8] “The Limits to Growth,” The Club of Rome, 1972, <https://www.clubofrome.org/report/the-limits-to-growth/>.

[9] “A Partner in Shaping History,” World Economic Forum, p.55,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First40Years_Book_2010.pdf.

[10] “These 79 CEOs believe in global climate ac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November 201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11/open->

letter-from-ceos-to-world-leaders-urging-climate-action/.

[11] “Global Emissions Have Not Yet Peaked,” *Our World in Data*, August 2020,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and-other-greenhouse-gas-emissions#global-emissions-have-not-yet-peaked>.

[12] “A Breath of Fresh Air from an Alpine Village,” Swissinfo, https://www.swissinfo.ch/eng/tuberculosis-and-davos_a-breath-of-fresh-air-for-an-alpine-village/41896580.

[13] “Global Warming Has Begun, Expert Tells Senat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88, <https://www.nytimes.com/1988/06/24/us/global-warming-has-begun-expert-tells-senate.html>.

[14] “What Is the UNFCCC,”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convention/what-is-the-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

[15] “Global Extreme Pover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poverty>.

[16] “Ethiopia Secures Over \$140 Million USD Export Revenue from Industrial Parks,” Ethiopian Investment Commission, October 2019, [http://www.investethiopia.gov.et/index.php/information-center/news-and-events/868-ethiopia-secures-over-\\$-140-million-usd-export-revenue-from-industrial-parks.html](http://www.investethiopia.gov.et/index.php/information-center/news-and-events/868-ethiopia-secures-over-$-140-million-usd-export-revenue-from-industrial-parks.html).

[17] 2019年9月，塞纳特·索尔萨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此处说法正是基于采访内容。

[18] 2019年9月，塞纳特·索尔萨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9] “GDP Growth (annual %), Ethiopi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ET>.

[20] “GDP, Constant 2010 US\$, Ethiopi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locations=ET>.

[21]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 Ethiopi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locations=ET>.

[22] “Deforestation, Did Ethiopia Plant 350 Million Trees in One Day?” BBC,

August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9266983>.

[23] “Ethiopia Plants over 350 Million Trees in a Day, Setting New World Record,” UNEP, August 2019,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ethiopia-plants-over-350-million-trees-day-setting-new-world-record>.

[24] “Ethiopia,” IEA, <https://www.iea.org/countries/Ethiopia>.

[25] “Indonesia’s leader says sinking Jakarta needs giant sea wall,” Associated Press, July 2019, <https://apnews.com/article/8409fd8291ce43509bd3165b609de98c>.

[26] “Fin du mois, fi n du monde : même combat?,” France Culture, November 2019, <https://www.franceculture.fr/emissions/linvite-des-matins/fin-du-mois-fi-n-du-monde-meme-combat>.

[27] “Per Capita Emissions, Navigating the Numbers: Greenhouse Gas Dat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pdf.wri.org/navigating_numbers_chapter4.pdf.

[28] “Palau Climate Change Policy for Climate and Disaster Resilient Low Emissions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Palau, 2015, pp.22-23, https://www.pacificclimatechange.ne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alauCC_Policy_WebVersion-FinanceCorrections_HighQualityUPDATED%2011182015Compressed.pdf.

[29] “Urbanization,” Our World in Data, November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urbanization>.

[30] “68%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ed to Live in Urban Areas by 2050,Says UN,”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May 2018,<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2018revision-of-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html>.

[31] “Global Gridded Model of Carbon Footprints (GGMCF),” <http://citycarbonfootprints.info/>.

[32] “Sizing Up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Cities,” NASA Earth Observatory, April 2019,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images/144807/sizing-up-the-carbon-footprint-of-cities>.

[33] “Why a Car Is an Extravagance in Singapore,” CNN, October

2017,<https://edition.cnn.com/2017/10/31/asia/singapore-cars/index.html>.

[34] “World Population Growth,” Our World in Data, May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pulation-growth>.

[35] “Russia’s Natural Population Decline to Hit 11-Year Record in 2019,” *The Moscow Time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2/13/russias-natural-population-decline-hit-11-year-record-2019-a68612>.

[36] “Fertility Rate, Total (Births per Woman) —Indi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locations=IN>.

[37]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Bitcoin,” Christian Stoll, Lena Klaaßen, Ulrich Gallersdörfer, *Joule*, July 2019, [https://www.cell.com/joule/fulltext/S2542-4351\(19\)30255-7](https://www.cell.com/joule/fulltext/S2542-4351(19)30255-7).

[38] “Firms Must Justify Investment in Fossil Fuels, Warns Mark Carney,” Andrew Sparrow, *The Guardian*, December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dec/30/firms-must-justify-investment-in-fossil-fuels-warns-mark-carney>.

[39] “The Net-Zero Challenge: Fast-Forward to Decisive Climate Ac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net-zero-challenge-fast-forward-to-decisive-climate-action>.

[40] “German Air Travel Slump Points to Spread of Flight Shame,” William Wilkes and Richard Weiss, *Bloomberg*, December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2-19/german-air-travel-slump-points-to-spread-of-flight-shame?sref=61mHmpU4>.

[41] “How Greta Thunberg and ‘Flygskam’ Are Shaking the Global Airline Industry,” Nicole Lyn Pesce, *MarketWatch*, December 2019,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flygskam-is-the-swedish-travel-trend-that-could-shake-the-global-airline-industry-2019-06-20>.

[42] “This Is What Peak Car Looks Like,” Keith Naughton and David Welch,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2-28/this-is-what-peak-car-looks-like>.

[43] “COVID-19 Made Cities More Bike-Friendly—Here’s How to Keep Them That Way,” Sandra Caballero and Philippe Rapin, World Economic Forum Agenda, June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

made-cities-more-bike-friendly-here-s-how-to-keep-them-that-way/.

[44] “Germany Calls for a New Trans Europe Express TEE 2.0 Network,”*International Railway Journal*, September 2020, <https://www.railjournal.com/passenger/main-line/germany-calls-for-a-new-trans-europe-express-tee-2-0-network/>.

[45] ESG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英文缩写。

[46]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European Commission,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_en.

[47]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Reduced CO2 Emissions Despite Low Prices,” Patrick Bayer and Michaël Aklin, *PN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ril 2020,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16/8804>.

[48] Alliance of CEO Climate Leaders,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alliance-of-ceo-climate-leaders>.

[49] “The Net-Zero Challenge: Fast-Forward to Decisive Climate Action,”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January 2020,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Net_Zero_Challenge.pdf.

[50] 出自格雷塔·通贝里在2019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的演讲。经编辑的演讲内容可见于：“Our house is on fire”:Greta Thunberg, 16, Urges Leaders to Act on Climate,”*The Guardian*,January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jan/25/our-house-is-on-fire-greta-thunberg16-urges-leaders-to-act-on-climate>.

03 利益相关者模式

第八章 利益相关者概念

鉴于我们的全球经济制度存在弊端，显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要如何改革？

目前，世界上盛行两种经济制度：一种是在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股东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是在许多新兴市场日益流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种制度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它们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然而，这两种制度也都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它们导致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加剧，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最重要的是，还导致环境大规模恶化。鉴于这两种制度都存在缺陷，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全球制度：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这一制度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会被考虑在内；企业不再仅仅追求短期利润优化；政府的职责就是要维护机会平等，打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贡献公平且分配公平，关注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制度？它在具体实践中将会是怎样的情况？目前的两种制度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入手，进一步考察当前流行的两种经

济制度。首先分析股东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下，所有利益相关者中，股东的利益被置于首位。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支付给股东尽可能高的股息。正如我曾在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投稿中写道：[\[1\]](#)

20世纪70年代，股东资本主义首先在美国兴起，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其影响力扩大至全球范围。它的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股东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实现了繁荣，因为受利润驱动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的股东资本主义倡导者均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市企业不光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还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一味强调利润，再加上金融业面临的提升短期业绩的压力，导致股东资本主义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一力量在起作用。此外，随着企业日益走上全球化之路，工会的力量逐渐消失，国家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能力也不断减弱。这导致了股东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员工、社区、供应商、政府以及环境都受到损害。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还出现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当“私营部门基于自己的利益拥有和控制财产，并且供求双方以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设定价格”[\[2\]](#)时，这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参照这一定义，就会发现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尽管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很大，但国家仍被视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对自然人股东保有权力。政府至少可

通过三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第一，它可通过强制手段参与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第二，它几乎可以介入任何行业。第三，它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教育、医疗或住房项目来引导经济。国家资本主义至少从理论层面解决了股东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一些现行机制可以确保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不会被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上。这种制度使新加坡、越南以及最近的埃塞俄比亚等国得以成为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同时在必要时能够约束私营企业的利益。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可能根本不会迎来快速增长期。但正如经济学家，比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唯有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言，国家资本主义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鉴于在这一制度下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腐败问题始终无法杜绝。由于缺乏制衡，分配契约中会存在徇私现象，法律的执行将会变得专断。一旦国家领导层误判了经济趋势，那么他们控制的大量资源就可能被不当分配。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它几乎与股东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

无论是股东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都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股东资本主义制度中，股东的目标往往是唯一的焦点；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政府掌握过多的权力。

因此，我主张建立第三种制度，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它是传统定义下的资本主义：个体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占据最大份额。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经济制度的必备条件：私人和企业必须要能够进行创新和自由竞争，因为这能够激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这些私营主体的经

济活动还必须受到保护和引导，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对社会有益的，任何行为主体都不能不劳而获，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资本主义。不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确实与我们看到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存在根本性区别，它克服了其他资本主义形式的许多缺陷。首先，所有与经济体存在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影响决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优化的指标纳入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此外，这一制度中存在一个制衡机制，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能够登上或保持绝对主导地位。如此一来，作为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行为主体，政府和企业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优化利润，而是更广泛的目标：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财富，以及整个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出于以上原因，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成为人类首选的经济制度，也是我们今后应该实施的经济制度。

[1] “What Kind of Capitalism Do We Want?”, Klaus Schwab, *TIME Magazine*, December 2019, <https://time.com/5742066/klaus-schwab-stakeholder-capitalism-davos/>.

[2] “What is Capitalism,” Sarwat Jahan and Ahmed Saber Mahmud,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2015,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5/06/basics.htm>.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发展历史

我首次阐述利益相关者背后的理念是在50年前，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商业领域学者，对美国和欧洲均有研究。在当时的德国和瑞士（前者是我的祖国，后者是我工作所在的国家），一家企业及其CEO不能只考虑股东及其对利润的预期，而要考虑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在拉芬斯堡经营一家名为埃舍尔维斯（Escher Wyss）的企业，我正是从他的运营方式中看到这一点。他会征求车间工人的意见，在决策时会尊重他们给出的建议，支付给他们有竞争力的薪酬，而且确保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薪酬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这家企业深深扎根于拉芬斯堡，与该镇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关系。拉芬斯堡的繁荣会带动这家企业的兴旺，同样地，这家企业的兴旺也会促进拉芬斯堡的繁荣。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很普遍，因为当时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整个共同体和经济运转起来，个人或单个实体才能有所成就。因此，我父亲的经历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尽管不能全部代表）当时美国的情况。企业与所在社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德国，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出于这一原因，董事会成员中要有员工代表，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活动主要是在当地或至少是在区域内进行，因此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氛围，即当地企业已经充分融入周边环境。企业与当地政府、学校、医院等机构之间由此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正是基于以上观察，我在1971年出版的《机械工程行业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勾勒出了一幅利益相关者星图（见图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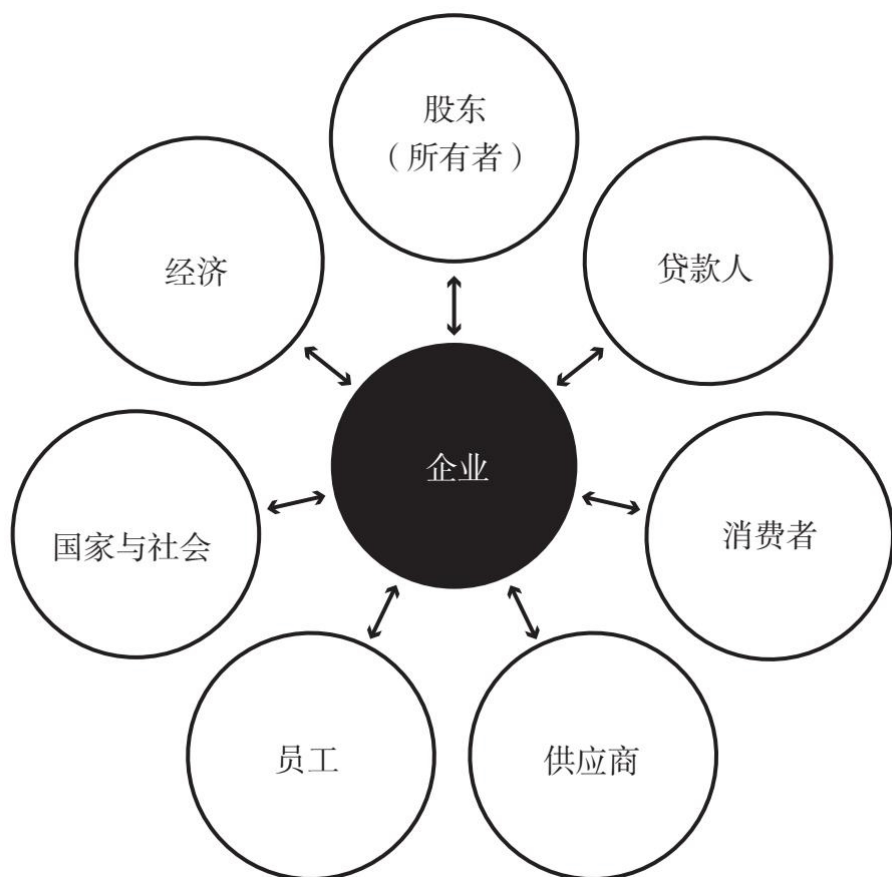


图8.1 企业在其利益相关者中处于中心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克劳斯·施瓦布在《机械工程行业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的模型重绘。

在随后几年里，利益相关者概念主要在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北欧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被采纳。在这些国家，利益相关者概念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其中就包括企业管理者、员工和政府之间三方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它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福利国家，企业和雇员按照各自应有的

比例纳税，以资助公立教育、医疗和社保项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制度已经有所调整，并在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得以延续。作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组织原则，利益相关者概念与弗里德曼的“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理念产生正面冲突，并且败下阵来。随着企业走上全球化之路，股东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成为常态，企业与当地社区、国家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企业的焦点转向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实现股东短期利润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工会、政府和其他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减，这使得利益相关者模式赖以发展的基础结构进一步弱化。这意味着，即使是在那些秉承利益相关者理念的国家，随着企业——尤其是那些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崛起的企业力量日盛，其他行为主体的力量已经式微。

[1] *Modern Company Manage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Klaus Schwab, Hein Kroos, Verein Deutscher Maschinenbau-Anstalten, 1971,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KSC_CompanyStrategy_Presentation_2014.pdf.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如今，利益相关者模式已经蓄势待发，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不过是以更新、更全面的形式。倘若期待利益相关者星图依旧与20世纪70年代无异，未免有些不够实际，毕竟那时候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发生在一国之内。经过调整后的模式，我将其称为21世纪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直接简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可以确保在这个以气候变化、全球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这个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与我父亲那一代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而然地实施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有何区别？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经济体制的利益关系相比以往明显呈现全球性特征。与50年前相比，如今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模式从根本上也具备全球性，两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如此。

首先对于整个地球来说，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地球的健康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或国家的决定，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地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所有决定。因此，如果我们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那么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有些问题之前被视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个体企业决策的外部性，现在需要被纳入或内化至每个政府、企业、社区和个人的行动中。换句话说，地球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所做的决定都要能够优化地球的健康状况。

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地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还有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附带效应。近期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最近发生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蝗灾。[\[1\]](#)这种数万亿昆虫在大洲之间肆虐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被认为源于该区域在2019年气候极端潮湿。[\[2\]](#)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使成群的蝗虫得以快速繁殖，并蔓延至整个东非、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对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

同样的相互关联性也可见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以往，国家和企业可以单独优化自己的经济体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决定可能对其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而今，全球经济背后的深层关联性使这种做法不再可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福祉会影响到其他社会中的人们，我们每个人作为世界公民有责任优化全人类的福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受影响的必然是我们自己。

从全球移民潮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得不到保障时，就会前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彭博社报道，在2020年，“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3\]](#)，估计有3.5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3.4%）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国，生活在其他地方。这还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越来越倾向于抑制移民，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的背景下。如果说移民问题还不足以体现这种关联性，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提供了终极证明。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摧毁了数亿人的生计，并且导致数百万人重病甚至失去生命。除了几个岛国外，任何边境封锁都不足以防止疾病的传播。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公平的

关注，使其成为一项重要目标，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事实上，人作为社会动物，相比绝对福祉水平，相对福祉水平更加重要。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的参照标准都是地方性的，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人们的参照标准变成了全国性的。在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的参照范围进一步扩大——位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参照的是整个西方世界，位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人们参照的则是整个东方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它所提供的连接技术，使得人们开始对标那些最发达国家的同类群体，他们可能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可能是中国、美国，也可能是欧洲。因此，全球公平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需要考虑的概念。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人们都越来越形成共识：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以及整个地球的福祉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两个要素是天然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人指的就是所有人类个体，地球指的是我们共同的自然环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这两个要素处于中心位置（见图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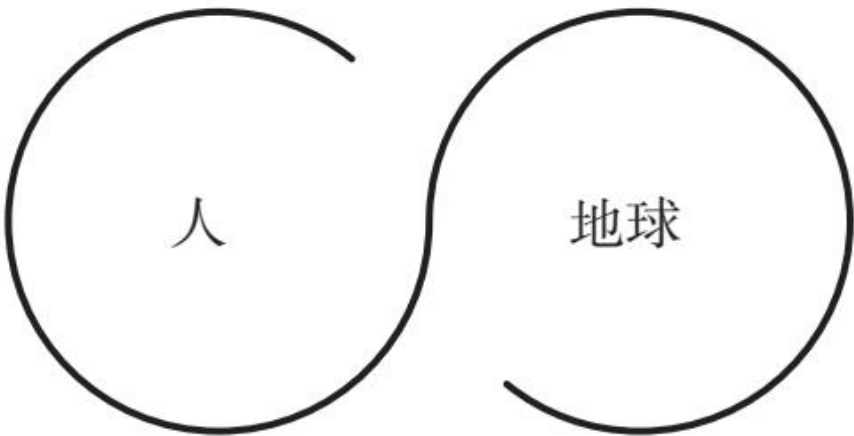


图8.2 简化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其中人和地球处于中心地位

资料来源：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万哈姆，2020年。

存在4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优化人和地球的福祉。它们分别是：

1. 政府（指的是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民意代表组成，在一个地区或地方拥有法定权力）。

2. 公民社会（在最广泛意义上，它包括从工会到非政府组织，从中小学和大学到行动团体，从宗教组织到体育俱乐部等）。

3. 企业（包括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它们共同构成了私营部门）。

4. 国际社会（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欧盟、东盟等区域组织组成）。

记住其中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由哪些成员组成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解释了它们为何要关注公共利益。的确，尽管这些利益相关者都被视为社会和/或法律有机体，但关键点，它们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且都离不开我们的地球。如此一来，它们都应该主动优化我们所有人和地球的福祉，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应该明确的是，它们还拥有特定的目标，这是它们首先区别于其他有机体的地方。政府主要致力于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尽可能高程度的繁荣。公民社会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赋予其成员以意义或使命。企业的目标显然是创造经济剩余，它可以以利润的形式进行衡量。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则是维护和平。

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企业是在政府为其提供的监管框架内运作。公民社会会对企业和政府施压，使其整体更具韧性。国际组织则确保一个地区在做决策时要考虑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4\]](#)

我们今天所知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便由此产生（见图8.3），它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效。在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当人和地球的福祉占据中心地位时，剩下的4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就要为优化人和地球的福祉做出贡献。此外，这些利益相关者都还有各自的主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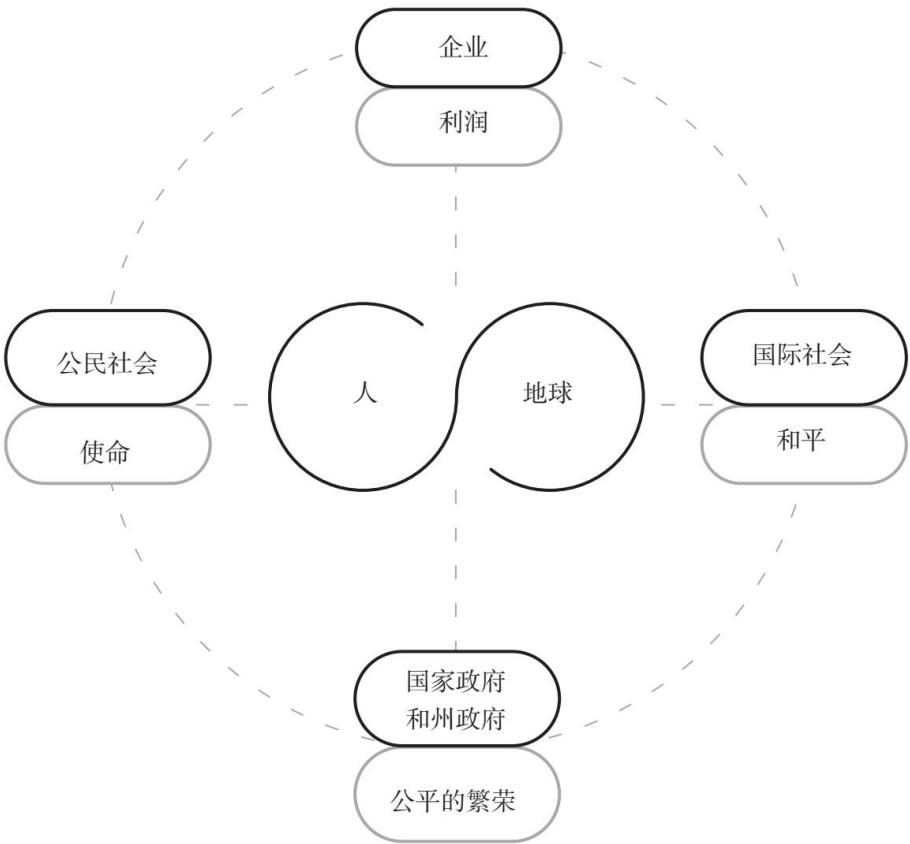


图8.3 在全球利益相关者模式中，人与地球处于中心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万哈姆2020年的资料重绘。

- 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追求长期价值创造。
- 公民社会的主要目标是每个组织的宗旨或使命。
- 政府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繁荣。
- 国际社会则致力于实现和平。

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所有这些群体及其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群体的失败都会对其他群体造成影响。

这个模式很简单，但它很直观地揭示了为什么股东至上模式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带来的是次优结果：它们关注的是更细化的、排他性目标，即具体某个企业的利润或具体某个国家的繁荣，而不关注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福祉。相比之下，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那些更细化的目标并没有被搁置，只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联性以及人和地球的福祉被置于中心地位，以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实现更加和谐的发展。

[1] “Locust-19’s set to ravage crops across east Africa,” David Pilling and Emiko Terazono, *Financial Times*,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b93293d4-3d73-42bc-b8b7-2d3e7939490e>.

[2] “The Locust Plague in East Africa Is Sending Us a Message, And It’s Not Good News,” Carly Casella, *Science Alert*, July 2020, <https://www.sciencealert.com/the-locust-plagues-in-east-africa-are-sending-us-a-message-and-it-s-not-a-good-one>.

[3] “The World is on the Move as Never Before,” Bloomberg, October 2019,<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9-how-migration-is-changing-our-world/>.

[4]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互联性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现实。但是，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放大和强化了这种互联性。因此，在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中，这种互联性理应得到特别关注。现代技术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同样地，它也使企业进行全球贸易以及国家间相互竞争成为可能。事实上，当前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向发展的迹象，有些政策正试图抑制上述趋势。尽管如此，这个世界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球化。公平地说，自从大约10年前开始，跨国公司之间的全球实物贸易增长速度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但数字贸易仍在快速增长，压过了实体贸易领域的全球化放缓趋势——《经济学人》还专门给这一趋势起了个名字，叫“慢球化”（Slowbalisation）。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感受到的。例如，数字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少数大型科技公司主导了全球市场，其中有些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全球企业不平等程度和全球市场集中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这得益于中国的崛起），但个人财富的集中度却达到了历史新高。（国际乐施会报告称，在2019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00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最贫穷的46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那些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的财富来自他们创办的大型科技公司。）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原则和信念

在确定了这一全球性利益相关者模式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它如何适用于一个更加受限的环境，比如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将视角从全球转向地方，这是利益相关者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事实上，尽管当下经济体系的利害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全球性，但任何一种方法的实施主要还是在更加地方性的层面。社区是扎根地方的，因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周边环境比较了解且信任。这增强了他们的团结意识，使他们更愿意接受那些旨在惠及整体而不仅仅是惠及个体的项目。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另类场景：一个全球性政府在全球市场上管理着一些跨国企业，所有人聚集在一个全球性民主政体和一些全球性工会周围。这一场景是不现实的，而且不可取，因为它拉大了个体与其所直属的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距离，还减弱了人们对其周边人口与环境的责任感。尽管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者可能曾将这样一种全球性模式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理想（正如奎因·斯洛博迪安在他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一书中所断言的），但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社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当权力中心与人们的日常现实相距太远时，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经济决策都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辅助性原则

因此，实施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一个首要原则便是辅助性原则。这不是一个未经检验的或纯理论性的原则。它最著名的应用场景是在欧盟的治理中，[\[1\]](#)瑞士联邦、阿联酋、密克罗尼西亚

亚联邦和世界上其他的联邦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该原则主张，决策的做出应该在尽可能具体的层面——尽可能靠近受该决策影响最为显著的地方。^[2]换言之，该原则规定，地方利益相关者应该能够自己做决定，除非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行或者是无效的。

如此一来，这一原则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便一目了然。首先考虑气候危机。有效的做法是首先在全球层面协调这一挑战。任何试图首先在较低层面解决这一挑战的尝试都将是无效的：只有当全世界的人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时，气候行动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而且，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仅依靠地方性行动，将会导致搭便车效应。那些选择退出气候协定的社区将会双重受益：一是可以坐享他人努力的成果，即气候条件的改善；二是可以维持其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这会造成多大污染。

辅助性原则所支持的第二个行动和决策层面是国家层面。依旧以气候行动为例。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对气候改善做出贡献。例如，减少工厂排放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超过其他国家，因为中国拥有的工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同样，限制汽车出行将对美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在美国，汽车是主要的交通方式。采取其他举措，比如限制航空出行，同样会对某些群体影响更甚。辅助性原则支持在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进行决策，以确定在有效实现全球性目标的过程中，哪条道路最适合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从2017年开始，像《巴黎协定》这样的联合国框架的形成就变得非常有必要。没有哪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的占比（明显）超过1/4，^[3]但要想避免一

场气候灾难，全球总排放量必须减少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靠一己之力遏制全球排放。但这也意味着，除非知道其他国家都会减少排放量，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有动力减少自己的排放量，因为这不仅不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可能在短期内损害经济发展或繁荣。要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然而，鉴于各国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各国具体的减排目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再由一个全球治理机构来决定每个国家应该如何减少碳排放量就毫无意义了。

在企业层面，情况也是如此。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企业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单独减少碳排放量，因为这一开始会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一旦行业仲裁者（比如欧盟）设定了每个行业的减排目标，并划定每家企业的排放权，至于如何将碳排放量降至理想状态，则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比如，企业可以选择一种相对低能耗的生产方式，也可以选择向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这两个例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巴黎协定》实际上就以类似上述的方式纳入了辅助性原则。欧盟实施的“绿色新政”和企业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两项计划打下了基础。通过这两项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在遵守辅助性原则的条件下，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技术治理、竞争和全球税收问题。如今，许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无论是在数字领域还是实体领域，但它们的监管者大多是国家政府。如此一来，企业就可以在A国开发技术和知识产权，而在B国获得大部分的营收，在C国纳税，在D国进行低成本竞争，在F国避开集体劳动谈判制

度。就是这种不平衡导致竞争环境更加不公平。这会侵蚀税基，削弱机构的力量和民众对机构的信任，造成市场失衡，减少就业和创业机会。

同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不是建立一个负责实施全球治理的霸主，而是协调各监管机构的行动，从而使得在每个司法辖区内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的一个良好例证就是，经合组织努力协调针对数字企业的税收政策，以确保企业只要在一国有经济活动，就要在该国缴纳应付税款，无论该企业的总部在哪里，知识产权归属情况如何。

了解了辅助性原则，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运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这一体系中，某些趋势和利害关系是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变化、数字全球化、全球不平等和市场集中度），但最佳组织原则就是辅助性原则。由此产生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是：一方面，单个企业或组织在各自的利益相关者中仍处于中心地位，对其利益相关者负有相应义务，就像最初的模式那样；另一方面，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子孙后代等被认为是我们共同的全球性未来和福祉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所打造的经济体系必须立足当地，同时要在全球范围内一以贯之。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基于何种信念？

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

利益相关者模式所基于的一套信念与最初所构想时相比基本没有发生改变。正是这套信念引导二战后的西欧走上福利国家建

设，引领美国实施“伟大社会”计划，引导现代中国实现“中国梦”[4]。其中最为重要的信念是，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兴旺发达，而不是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兴旺发达时，这个社会才算发展到最好。例如，林登·约翰逊曾说道，在伟大社会里，“每个孩子都能获取知识以丰富头脑、增长才干……城市不光服务于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商业需求，还旨在满足人们对美的渴望和对共同体的渴求”[5]。对于“中国梦”，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在这一信念中还蕴含另一层含义，即社会价值并非完全或主要由企业和它们（最具生产力）的员工创造，还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文化行动者、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还有社会和自然环境本身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价值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的。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万物的价值》一书中所写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告知我们，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运作的。相反地，马祖卡托说，近来的主流观点是，价值主要是由企业在其内部创造的，其中很大程度上又是由金融企业（根据近年来的局势，我们还要加上科技企业）创造的。

马祖卡托断言，这种对价值创造的不同看法以及与之相伴的做法，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价值攫取成为常态，而许多最具生产力的成员所创造的价值，包括那些积极从事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的人员，以及教育和社会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所创造的价值都被低估了。它还导致经济体系逐渐金融化，收入和利润与真正的价值创造被混淆。此外，它还创造了一种CEO崇拜和科技企业创业者崇拜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私人创新活动会获得更多的赞誉和保护，而那些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公共机构所实现的基础

性突破则被忽视。 [6]

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马祖卡托的观点，但很显然，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贡献被低估了，利益相关者经济的平衡需要恢复。为此，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满足如下几点要求。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在与其相关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存在适当的衡量系统，以计算每个利益相关者真正创造的价值和造成的破坏，这不光体现在财务层面，还体现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层面。

·存在必要的制衡机制，以使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对其从社会中索取的东西进行补偿，而且要使每个利益相关者所分到的“蛋糕”与其所做出的贡献相匹配，无论是在地方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三个要求。

[1]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7/subsidiaritatsprinzip>.

[2] “Subsidiarity,”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ubsidiarity>.

[3] “Chart of the Day:These Countries Create Most of theWorld’s CO2 Emissions,”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6/chart-of-the-day-these-countries-create-most-of-the-world-s-co2-emissions/>.

[4]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Dream,”*China Daily*, March 2014, <https://>

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npcandcppcc/2014-03/05/
content_17324203htm..

[5] “The Speech that Launched the Great Society,”The Conversation,January 201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speech-that-launched-the-great-society-35836>.

[6] 评论参见：“Who Creates a Nation’s Economic Value?” Martin Wolf,*Financial Times*, April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e00099f03c19-11e8-b9f9-de94fa33a81e>.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实践

占据一席之地

为了使利益相关者模式作为一项组织原则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确保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与其相关的领域都能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知道这是一项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我们也知道这一目标在现实中往往是缺失的，这一点从我们的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就可以看出。例如，在经济方面就存在一种高度正相关关系：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权越强，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越低，工资水平就越合理。我们已经在第六章中看到，这种相关关系的一个显著的视觉表征来自美国：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绘制了过去100年间工会成员数量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对比图。它表明，当工会缺位时，收入不平等程度处于高位；大约在1940—1980年，正值美国工会发展的黄金时代，收入不平等程度则有所下降。之后，当工会成员数量又开始下降时，不平等程度再次攀升，于2015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且，正如我们前面从丹麦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工会的代表权依然很强的国家，即便在当今全球化和技术驱动型经济背景下，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很低。

如果说，工会参与度的下降或社会各阶层在决策中缺乏代表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那么政府最好在今后的工作中重新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倘若政府不这么做，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几十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没有实现相应的增长，这导致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下降

且缺乏韧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百年一遇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过，这也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排他性社会和政治政策选择的结果，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凸显了这一点。面对政府几十年来的歧视性政策和行动，许多人开始站出来谴责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等国，包容性政策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措施在过去可以，在当前依然可以避免这种不平等的结果。

同样，单个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缺位的情况下，企业董事会最好在成员选择上更具代表性。确保管理团队、企业董事会、政府和其他的领导委员会更好地反映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这是制定更全面的决策，打造一个更优秀、更高效能组织的秘诀。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的领导委员会无论是在性别、职位、教育背景，还是在种族、性取向、年龄等其他因素上仍然缺乏多元性。当然，每个企业、社区和政府都理应自己决定哪些行动和标准最适合自己的，但决策组织必须更具代表性和多样性的总体思路是一个近乎普适性的目标。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打造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组织，从而取得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成果。

要使利益相关者在决策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过去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各组织运作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远程办公和签订自由职业合同的员工数量达到历史高峰，这就使得要将他们聚集起来更加困难。还有零工经济从业者，比如优步、Grab或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实际工作地点都不在一处。这些员工彼此之间也许都素不相识，兴趣和目标也很可能各不相同，这就使得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就一项共

同倡导的议程达成一致意见变得更加困难。传统意义上，以工厂或办公室为基础成立的工会可能已经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因为人们比过去更频繁地更换工作，甚至经常与同事不在同一处办公，企业的地址也比过去更具流动性。不过，基本原则不可动摇。只要是为企业工作的人，在企业的运营方式、企业员工的待遇、企业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必须拥有发言权。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人尝试将这些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优步和来福车（Lyft）网约车司机权益组织——网约车司机联盟（Rideshare Drivers United）曾呼吁在2019年5月举行全球罢工，此时优步计划首次公开募股（IPO）在即。该联盟号召网约车司机关闭手机应用程序，以表达他们对提升工资和改善保障条件的诉求。^[1]尽管这次罢工吸引了媒体和政界的许多关注，^[2]而且使部分司机在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前获得了一次性的经济补偿，^[3]但它最主要还是揭示了想要再现出租车司机工会曾经的影响力将是多么艰难，因为网约车司机的结构性需求并没有通过这次罢工得到满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要确保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利得到尊重是多么不容易。在该领域的后续发展中，加利福尼亚州曾试图于2020年11月通过一项将零工经济从业者归类为正式雇员的提案，但在经历了一场被称为“该州历史上最昂贵的倡议”运动之后，该提案被否决了。这表明，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尚未出现。^[4]

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中，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权问题也存在于政治领域。目前，世界各地的代议制政府和政党都面临一场存在主义危机。尽管社会不满情绪日渐加剧，但选民投票率和党派成员数量都在下降。例如，在欧洲，曾塑造了民主制度的传统政党正面临三重危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党派的成员数量都在减少。在持各种

政见的选民中，参与投票的人数都在减少，而在那些真正参与投票的选民中，把票投给传统政党的人数更少。[\[5\]](#)同样，在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哥伦比亚除外，选民投票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即使是在巴西和哥斯达黎加这种实行强制投票制度的国家也不例外。[\[6\]](#)近年来社会动荡日渐加剧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一直在下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投票率处于约70%的高位，到90年代末则已经降至低位；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率约为55%。[\[7\]](#)（不过，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美国的选民投票率则一反常态，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值。）

如果我们想使利益相关者模式运转良好，就需要解决这些代表权问题。当主要利益相关者不能代表他们理应代表的群体时，即便他们彼此之间实现对话，并将对方的目标纳入考虑范围，所能产生的价值也是有限的。[\[8\]](#)历史上，政府首脑、企业领导和宗教领袖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种联盟没有适当考虑到整个社会或重要的少数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和那些群体必然会遭受损失。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不只关注GDP和利润

一旦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决策，企业、组织和政府就必须摆脱对利润或GDP等相关指标的盲目崇拜。一味追求利润的做法应该被更全面的追求价值创造的举措取代。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以前的企业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润和股东分红的优化，政府也并非一直将GDP视为“圣杯”。事实上，是因为股东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才使得利润和GDP成为重中之重。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终结这种只关注短期财务指标的行

为，而要着眼于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发展图景。正如我在之前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的，[9]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未来30年内履行《巴黎协定》；改革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使之适应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这些同样是我们未来10年应该致力于优化的目标。

对于那些希望不只关注GDP的国家来说，有一些现成的指标可供选择。例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包容性发展指数”不光追踪一国的经济指标，还追踪了其ESG领域的多项指标。经合组织推出了一个“美好生活指数”[10]，对一国从教育、卫生和住房、收入、工作，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生活满意度、对环境的关注等多个领域的状况进行测度，并做出排名。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看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衡量体系，来记录自己在一些关键的公民福祉指标上取得的进展。（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其中的部分指标。）

有趣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那些在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国家，往往也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只要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就有可能在经济、生态和社会层面同时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的北欧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为什么呢？2019年的报告指出，在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绿色经济方面，“那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更有条件促进各个行业新技术的诞生，其中就包括绿色创新领域潜在的突破性技术，因为这些经济体具备更加有利的创新生态系统”[11]。

此外，“那些拥有更优的人力资本、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强的创新能力的国家，平均而言，更有可能打造更绿色的能源结

构”[12]。更简单地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具有环境意识，那么整个社会更有可能做出使经济在长期更加繁荣且更加可持续的选择。针对这种相关性的另一种解释是，经济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地球的资源功能和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无论这些是否会被计入GDP。那些真正只关注GDP的国家迟早会碰壁，因为它们会一直忽视在教育、培训和保护地球领域的投资，直到这些因素开始影响经济生产功能。

除了竞争力指数和包容性指数等衡量工具外，世界还亟须创新衡量标准。有一些补充性的衡量标准已经存在，还有一些尚待我们去开发。“一个快捷的方法是采用人均收入中位数这样的衡量标准，它能更好地反映人们所面临的真实的经济状况。”我在2019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如此写道，“一个更耗时的衡量标准则是‘自然资本’[13]，所基于的是一个国家的生态系统、鱼类资源、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因为这个资产负债表中还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我们可以将所有相关要素都纳入一个综合记分卡中。[14]还有一种具体的选择，就是将气候行动追踪系统纳入政府的衡量体系，因为它显示了每个国家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的进展。”[15]其中有些建议是由一个名为“财富项目”（Wealth Project）的团体提出，这个团体由戴安娜·科伊尔、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等经济学家组成，[16]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GDP至上”的状况表示担忧。

企业也应该拓宽视野，而不再只是盯着损益表。现在，企业拓宽视野的主观意愿越来越强烈。在第50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召开之前，我向企业介绍了2020年《达沃斯宣言》，其中描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企业的通用目标”[17]。

A. 企业的目标是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创造共享的、持

续的价值。在创造这种价值的过程中，企业不仅要服务于股东，而且要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要理解和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最佳方式是共同致力于能够促进企业长期繁荣的政策和决策。

i. 企业通过提供最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价值主张来服务客户。它接受公平竞争，支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它对腐败零容忍。它保持其运营所在的数字生态系统可靠、可信。它使客户充分了解其产品和服务的功能，包括不利影响或负外部性。

ii. 企业要给予其员工以尊严和尊重。它尊重多样性，且争取不断改善工作条件和员工福祉。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企业通过不断提供技能提升与技能重塑培训，培养员工持续的就业能力。

iii. 企业将其供应商视为价值创造过程中真正的伙伴。它为新的市场进入者提供公平的机会。它在整个供应链中贯彻尊重人权的理念。

iv. 公司通过其活动服务于整个社会，支持所在社区，缴纳应付的税款。它确保以安全、道德和高效的方式使用数据。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充当环境和物质世界的守卫者。它自觉地保护我们的生物圈，倡导循环、共享和再生经济。它不断拓展知识、创新和技术的的前沿，以改善人们的福祉。

v. 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投资回报，并且考虑到所产生的创业风险以及连续创新和持续投资的需要。它负责任地管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以追求可持续的股东回报，而不会为了眼下而牺牲未来。

B. 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创造财富的经济单位，它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所实现的应该是人类和社会的期望。企业绩效不能仅以股东回报来衡量，还要考虑其ESG目标的实现情况。高管的薪酬应体现利益相关者责任。

C. 开展跨国运营活动的企业不仅要服务于那些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而且企业本身与政府、公民社会共同构成我们全球未来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全球公民身份要求其利用自己的核心能力、企业家精神、技能和相关资源，与其他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携手，以改善世界的现状。

企业可以通过特定指标来衡量自己面对利益相关者的表现，其中有些指标值得深究。该宣言中特别提到：接受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腐败表现出零容忍，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员工福祉，支持所在社区，缴纳应付税款，并在高管薪酬中体现利益相关者责任。综合起来，这些要求通往一条新的企业管理之道，它与之前短期财务业绩至上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18\]](#)如果每家企业个体都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并解决潜在的问题，股东资本主义的许多过激行为就会自动被根除。

但在这个通常以量化数据进行管理的世界，这种企业利益相关者责任也必须被衡量，目标必须被量化。在这方面，有一个好消息。202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工商理事会（其成员包括140家全球最大的企业）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衡量指标”。这是一套关于企业绩效中非财务层面的核心指标和信息披露，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多样性、员工健康和福祉等变量，以及其他通常被归为ESG主题的要素。[\[19\]](#)一旦付诸实施，这些指标将促使企业高管不光追求利润优化，还要追求员工、客户、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优化，并且有助于高管评判以利益相关者为

导向的企业的业绩。这样一来，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真正落地的道路上跨出了关键一步。本书下一章和结语中会包含更多关于衡量指标的内容。

制衡机制与强有力的机构

此外，利益相关者模式还必须包含必要的制衡机构，必须拥有强有力的独立机构，因为权力失衡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原则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尽其所能地做出贡献，并且获得其所需的东西，以实现最有效的社会成果。但是，鉴于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要么天生倾向于大企业和富人的利益（股东资本主义），要么天生倾向于政界内部人士（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这两个在当前经济体系中最具权力和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同意接受彼此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问责。这正是民主问责制、分权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所在。它们就是我们的经济系统中所需的制衡机制。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正在分裂（见第四章），我们的国际机构的公信力和所获得的支持正在减弱。因此，首先需要自下而上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然后才能自上而下强化决策者的授权。这将确保制度的制衡机制能够重新运转。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我在2019年的另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的，[\[20\]](#)“相比全球治理金字塔的塔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底部的裂缝”。在这方面，有一个国家做了一项有趣的试验，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几十年来，堕胎一直是爱尔兰决策者的政治命门。但后来，爱尔兰尝试做了一项社会政治试验，很适合我们当下这个分裂的时代：它通过召开公民大会，来设计出能够赢得广泛选民支持的

堕胎法案。爱尔兰公民大会随机挑选了99名公民（和1名主席），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够代表人口普查中所体现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地区分布状况”的机构。因此，相比既定的政治体系，该机构所收获的意见明显更具广泛性、多样性。公众密切关注公民大会的进程，形成了一种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独特氛围。人们对于公民大会所讨论的话题非常关心，同时也学会理解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最终，爱尔兰公民大会形成了一些提议，其中就包括将堕胎合法化，然后就这些提议提请全民公投。其中许多提议现已成为法律。

如果我们想克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治分歧，就应该倡导利益相关者以这种形式或者其他新形式参与政府工作：

根据设计，普通公民的审议性集会（其主要任务是达成协议，而不是获得连任），可以避开政治对立情绪，直接围绕具体问题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虽然它们不能取代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但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作为对立法机构的补充。[\[21\]](#)

在其他情况下，类似的利益相关者方法也有助于当选领导者应对重大挑战。

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组织了一场市民大会性质的“大辩论”，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直接参与其中。之后，“黄背心”运动的抗议之声便有所缓和。在比利时，于安特卫普举行的一场利益相关者集会上产生了一项决议，解决了围绕一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存在的分歧，此前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都未取得任何进展。波兰的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公民大会，用欧洲开放社会倡议（Open Society Initiative for Europe）组织的提恩·加齐沃达的话说，这场大会的成果在于，“有关防洪减灾、空气

污染、公民参与以及如何对待LGBT[22]问题的城市政策发生了有约束力的改变”[23]。

必须再次强调，民主国家在政治决策中具体如何采纳利益相关者模式，这是由国家自己决定的。因此，各个国家的具体实施方式可能会迥然不同，这是正常的。在直接民主制的历史较为悠久的瑞士，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就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全民投票——从限制移民的提案到恢复金本位制，从公共住房项目到当地机场的开放时间。不过，这种制度虽听起来很理想，但不一定对每个人都适用。例如，在比利时，意识形态、宗教和语言的差异贯穿整个社会。过去实施的全民公决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创伤，不光没有将民众团结在一起，反而导致分裂，这种制度最终也因此而被废除。现在，比利时正在进行尝试，比如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对话和随机选择的公民集会，提高旨在寻求共识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以增强民主政体中民众的参与感。

同样，民主的组织方式本身也应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应该由一个国家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外人来塑造。阿富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的政治参与组织方式传统上与西方民主国家截然不同。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塔米姆·安萨里在其《中断的天命》一书中指出，美国强加的民主在他的国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更加部落式的政治制度的延续，因为各社区重新投票选出的候选人，正出自世代在他们的城镇中起着主导社会和经济作用的家族。如果目标是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表面附上一层民主的外衣，那么这个工夫没有白费。但如果目标是提升决策过程中的公民直接参与度，那么更好的方式是让社区自己决定哪种制度更适合它们。

最后，重要的是，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内公共机构必须是强有力的，而且始终如此。在二战后的几十年

里，西方新一代民众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强有力的公共机构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很明确，而且会永远发挥这种作用。根据西方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看法，发展中经济体也必须打造这种强有力的公共机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社会和经济良好运作的基石。

然而，近年来，在许多社会中，机构的公信力减弱，而且机构作为客观仲裁者的效力和能力均有所下降。例如，在美国，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度下降，而与这一点紧密相关的是，机构的表现明显不如以前。^[24]不过，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瑞典、新加坡，甚至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公民仍然非常信任公共机构，这是保持公共机构更加强大的一个重要基石。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公共机构需要发挥核心作用，因此必须采取行动使公共机构变得（或是重新变得）强大且有力。

我们必须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增强国际机构的授权。这一点的必要性显而易见：由于信息、技术、资金、人员和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是流动的，而且气候变化影响的是全人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就这些问题在全球层面进行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此外，随着公司日益全球化，更有能力优化自身职责，尽可能扩大自身影响力，这导致了企业与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失衡。联合国及其各委员会等代表性国际组织、欧洲法院或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国际仲裁机构，以及欧盟委员会或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监管机构，将在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必须发挥这一作用。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超国家组织运作的层面对于许多个体利益相关者来说是比较反常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机构都实在太有距离感，太缺乏人情味了。对此，这些组织必

须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要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通常是主权政府）纳入决策进程，了解自己所面临和所要监管的全球趋势，从而使自己的工作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首先，二战结束时建立的那些国际组织代表了那场战争中的胜利者，但已经不再能够代表当今的世界，这种缺乏代表性的情况明显体现在这些组织机构从上到下的管理中，同时往往也体现在其投票程序中。要想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的投票权依旧明显偏向西方国家，自成立以来它们的领导者一直分别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担任，尽管其他新兴市场已经逐渐崛起。此外，国际组织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只代表一种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然而，大部分全球性挑战涉及的远远不止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且这种挑战还在不断新增。

其次，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趋势的了解往往要么不够及时，要么不够全面。例如，尽管数字经济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已经明显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但至今仍没有国际组织就全球数字经济达成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在数字经济的估算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一家私立咨询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再举一个例子，在2019年之前，万国邮政联盟[\[25\]](#)都在无意中助长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并且导致国际航运业的碳排放增加。它针对经济收入状况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包裹邮寄业务设定了一些过时的规则。实际上，这意味着相比在美国同一城镇内邮寄一个包裹，从中国向美国邮寄一个包裹的费用要低得多。

不过，令人欣慰的一点是，这些缺点都是可以纠正的。当实现这一点时，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制衡机制就会有所改善。回到前面的例子，经合组织目前正致力于就数字贸易形成统一的定义和

衡量体系。[26]万国邮政联盟在2019年底主动改革其邮资费率。[27]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代表为巴黎谈判做了准备工作，并且影响着谈判内容，使得代表政府更容易在最终达成妥协。

最后，我们来探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倘若没有明确的程序和准则，这一过程很可能就会乱成“一锅粥”。例如，如果一个政府、组织或企业首先必须要得到其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才能做出决定，那么利益相关者怎么还能有效地引导组织活动？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会在短期内出现利益分歧。此外，还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最有发言权的利益相关者会试图垄断决策过程或阻挠决策达成，从而导致决策过程陷入僵局或导致决策结果有失公平。

我认为，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将协商过程与决策过程分开。在协商阶段，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进来，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切都应该被考虑到。相较之下，只有那些获得决策授权的人才能参与决策进程，如果是在企业中，这就意味着应该由董事会或执行管理层来做决策。

在短期内，这可能仍然意味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决策的结果可能会偏向其中某个利益相关者，或者会更照顾到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但是，从长远来看，基于先前的协商过程做出的决策应该会对各方都更有利。

这就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该模式如何单独适用于一些关键利益相关者，以及它如何能够解决我们在前几章中列出的关键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市场集中

度和经济不平等，以及留给下一代的债务。

[1] “The Worldwide Uber Strike Is a Key Test for the Gig Economy,” Alexia Fernandez Campbell, Vox, May 2019, <https://www.vox.com/2019/5/8/18535367/uber-drivers-strike-2019-cities>.

[2] “Uber Pre IPO, 8th May, 2019 Global Strike Results,” RideShare Drivers United, May 2019, <https://ridesharedriversunited.com/uber-pre-ipo-8th-may-2019-global-strike-results/>.

[3] “Worker or Independent Contractor? Uber Settles Driver Claims Before Disappointing IPO,” *Forbes*, May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llyphillips/2019/05/13/worker-or-independent-contractor-uber-settles-driver-claims-before-disappointing-ipo/#7a157b93f39f>.

[4] “Uber and Lyft Drivers in California Will Remain Contractors,” Kate Cong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04/technology/california-uber-lyft-prop-22.html>.

[5] “Are Political Parties in Trouble?” Patrick Liddiard, Wilson Center, December 2018,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publication/happ_liddiard_are_political_parties_in_trouble_december_2018.pdf.

[6] “A Deep Dive into Voter Turnout in Latin America,” Holly Sunderland, Americas Society/Council of the Americas, June 2018, <https://www.ascoa.org/articles/chart-deep-dive-voter-turnout-latin-america>.

[7] “Historical Reported Voting Rates, Table A.1,”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voting-and-registration/voting-historical-time-series.html>.

[8] 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投入更大精力，致力于确保参会者能够代表各方利益相关者，确保青年、文化领袖、公民社会、学术界的聲音都能被听到。

[9] “Ending Short-Termism by Keeping Score,” Klaus Schwab, Project Syndicate, October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0/how-we-can-end-short-termism-by-keeping-score/>.

[10] “Better Life Index,” OECD,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11111111111.

[11]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p.27,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12]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p.27,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13] “What Is Natural Capital?”World Forum on Natural Capital, <https://naturalcapitalforum.com/about/>.

[14]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inclusive-development-index-2018>.

[15]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

[16] “Changing how we measure economic progress,”The Wealth Project,<https://www.wealth-economics.org/about/>.

[17] “Davos Manifesto 2020,” Klaus Schwab,World Economic Forum,December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2/davos-manifesto-2020-the-universal-purpose-of-a-company-in-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18] 在此，我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内容也使得2020年《达沃斯宣言》不同于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签署的《公司宗旨宣言书》。该宣言书中列出了一系列类似的利益相关者，企业要承诺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但其中并未谈及公平的竞争环境、缴纳应付的税款或高管薪酬。资料来源：<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business-roundtable-redefines-the-purpose-of-a-corporation-to-promote-an-economy-that-serves-all-americans>。

[19] “Measuring Stakeholder Capitalism: World’s Largest Companies Support Developing Core Set of Universal ESG Disclosures,”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20,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1/measuring-stakeholder-capitalism-world-s-largest-companies-support-developing-core-set-of-universal-esg-disclosures/>.

[20] “A Better World Starts at Home,” Klaus Schwab, Project Syndicate,December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itizen-assemblies-to-end-polarization-by-klaus-schwab-2019-12>.

[21] “A Better World Starts at Home,” Klaus Schwab,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itizen-assemblies-to-end-polarization-by-klaus-schwab-2019-12>.

[22] LGBT一般指性少数群体。——译者注

[23] “A Better World Starts at Home,” Klaus Schwab,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citizen-assemblies-to-end-polarization-by-klaus-schwab-2019-12>.

[24] “Key Findings about Americans’ Declining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Each Other,”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7/22/key-findings-about-americans-declining-trust-in-government-and-each-other/>.

[25]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February 2016, and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anuary 2019.

[26] “The impact of digitalisation on trade,” OECD, <https://www.oecd.org/trade/topics/digital-trade/>.

[27] “5 things to know about Option V,” Universal Postal Union, October 2019, <https://www.upu.int/en/Publications/Factsheets-backgrounders/5things-to-know-about-Option-V>.

第九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企业层面

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企业软件供应商思爱普前任联席CEO施杰翰加入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此时，马士基集团这家丹麦的跨国企业正在准备进行一场重大变革。在施杰翰加入之前的那些年，这家拥有112年历史的企业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营成就。但是，近几年，航运行业和石油行业的市场变化多端，马士基集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马士基集团的年度营收从600亿美元跌至300亿美元，正面临亏损状态。展望未来，马士基集团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在下个100年仍然保持市场重要性。马士基集团提供的运输服务让人们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和商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给整个市场带来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并且参与全球贸易。但是，马士基集团也极大地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促成了一种以不平等和市场集中度的加剧为常态的全球经济体系。施杰翰认为，采取利益相关者模式是企业兴盛的必要之举。那么，他能帮助马士基集团成为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拥护者吗？

每一家大规模企业都是从小型创业公司起步，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不断把握新的机遇。马士基集团也不例外。1904年，在丹麦斯文堡市的一个沿海小镇，一名叫A.P.穆勒的年轻人和父亲彼得·马士基-穆勒创建了这家企业，经营货物运输业务。起初，马士基集团只拥有并运营一艘二手蒸汽船。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马士基集团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企业，成为丹麦经济的骄傲。马士基集团曾活跃于各个领域，从石油勘探到石油运输，从货运代理到营救作业，从集装箱制造到货物运输，业务范围覆

盖全球120多个国家。该集团的海运业务量占全球海运业务总量的15%，[\[1\]](#)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企业。

从一个角度看，马士基集团曾是全球化和几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该集团在中国青岛经营冷藏集装箱制造业务，在北海经营石油钻探业务，在苏伊士运河上航行着“马士基·迈克-凯尼·穆勒号”集装箱货轮。这艘货轮运载量巨大，可以装载18 000多个集装箱（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船之一），令人叹为观止。放眼全球，马士基的冷藏船、集装箱船以及油轮在全世界七大海域纵横驰骋。从瓜亚基尔到新罗西斯克，从悉尼到查尔斯顿，从釜山到蒙得维的亚，全球各个港口无处不见马士基轮船的身影。得益于马士基集团提供的服务，商品成本得以降低，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供应链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互联性得以加强。

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士基集团也体现出全球经济的许多弊端。马士基集团的石油开采及钻探业务要想盈利，只有开采、钻探、运输以及消耗更多的石油。由马士基集团主导的全球航运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的占比很大，且在不断增长。如果不加以遏制，那么到2050年，全球航运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将达到17%。[\[2\]](#)由马士基集团促成的全球价值链，不仅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商品，还让更多的全球产业份额集中在更少数的全球性企业和企业主手中，从而提升了市场集中度，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

对施杰翰来说，加入马士基集团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施杰翰出生于丹麦，在他有生以来，马士基集团在丹麦的地位一直十分突出。马士基集团总部是一座造型优美的大型玻璃建筑，位于哥本哈根港口区的中心地带。这座建筑的闻名程度不亚于附近那座凝望着海面的安徒生“小美人鱼”铜像，也不亚于市中心港口星

罗棋布的亮丽房屋和帆船。丹麦拥有千年的造船历史和精湛的造船技术，自施杰翰出生以来，马士基的欧登塞造船厂曾一直是丹麦造船业强有力的代表，但它在不久前倒闭了。施杰翰加入马士基集团董事会时，马士基集团对丹麦GDP的贡献率仍然在2.5%以上，拥有数千名员工，是丹麦最大的私企。

施杰翰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软件行业，后来在德国企业软件供应商思爱普坐上了联席CEO职位。之后，他想转行去一家实体企业。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施杰翰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一波价值将来自以可持续方式主导实体世界的企业，比如航运巨头马士基、工业制造商西门子，以及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如果用最新的技术为实体企业赋能，”施杰翰告诉我们，“那么这些企业会驱动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它们会带来重大影响，因为一旦离开实体世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3\]](#)

大约与此同时，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同样需要调整方向。以前，科技公司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先锋和信息民主化力量。但近几年，它们已沦为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的问题之一。Salesforce的CEO马克·贝尼奥夫，与施杰翰一样，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贝尼奥夫曾在2018年达沃斯年会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许多企业一向被允许向消费者兜售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糖类、香烟等有害产品，不受监管约束。我说过，科技与这些产品一样。”贝尼奥夫在其新书中如此回忆道。[\[4\]](#)“我们这个行业多年来一直不受监管，当CEO们不愿意承担责任时，”他说，“我认为除了政府介入别无选择。”

施杰翰、贝尼奥夫等人明白，科技企业和科技行业需要做出

改变，需要表现得更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但是，它们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回归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主义”早期的企业运营方式。但这种办法显然不会奏效。从利益相关者模式最初普及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社会分裂、全球化、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状况，与今天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那么，企业怎样才能再次成功运用利益相关者概念，为改善世界现状做出贡献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CEO及其企业接下来做了什么。

施杰翰加入后，马士基集团分秒必争地开始了变革进程。施杰翰作为一名丹麦企业领袖，曾于2010—2014年在思爱普担任联席CEO，在思爱普积累了类似的成功变革经验。在思爱普期间，施杰翰激励整个团队要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努力，那就是帮助客户“节约稀缺资源，从而为实现更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5]，他还提出了实现这一梦想的一些具体办法。思爱普于1972年（即首届达沃斯年会举办的第二年）开始运营，曾经开发了一款财务资源管理软件以替代打孔卡片，扩大了财务资源管理的范围，从而使企业走向全球。施杰翰很好奇，如果能更进一步会怎样呢？[6]

如果思爱普也能帮助企业管理能源和淡水等稀缺资源的使用甚至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呢？如果思爱普能利用自身在从原材料到零售等几乎所有行业的庞大客户基础，不只为某一家公司，而是为整条价值链中的所有公司优化稀缺资源的使用呢？如果思爱普

能帮助整个世界管理稀缺资源呢？

在这个因资源有限而问题不断增多的世界，帮助企业更有效地管理稀缺资源的能力，以及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机会，永远比企业的季度收益更加激励人心。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决定重新审视企业宗旨，并且提出：“让世界运行得更好，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一梦想鼓舞人心，其意义远超过向企业销售软件。这将促使我们关注践行企业责任，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对思爱普的重新定位使该企业的总体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施杰翰和同事确定了几个关键点。第一，要想帮助他人减少浪费，思爱普必须以身作则。因此，思爱普通过了一项计划，即在10年内将企业的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削减50%，尽管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第二，要制定出明确的相关财务目标。在富有感染力的新宗旨引领下，思爱普认为应以加速发展为目标，以新的战略定位为动力，在保持利润增长的同时实现营收翻番。据施杰翰回忆，“让企业走出优势领域进行重塑需要内在动力，新的宗旨正是这种内在动力的驱动力量。推动我们前进的不是亟须改变的困境，而是渴望改变世界的强烈梦想”。[7]

思爱普的新战略取得了成效，不仅得到了客户的理解，还激励了员工，让员工觉得自己不只是在为一家软件企业工作。思爱普的远大目标和全新宗旨还吸引了股东，他们将思爱普视为模范企业。作为联席CEO，施杰翰促进了思爱普新战略的实施，而且看到了初步成果。2018年，思爱普提前实现了营收翻番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的双重目标。尽管施杰翰在2014年辞去了联席CEO职务，但他仍为这一成果而感到自豪。[8]，[9]凭借这些经验，施杰翰承担起变革马士基集团的重任。

事实上，马士基集团有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强烈的核心价值观。“基本原则是人们可以信任我们。”A.P.穆勒之子、前董事会主席阿诺德·马士基-迈克-凯尼·穆勒曾经这么说。这种对信任的关注帮助该集团与客户以及政府建立了持久的关系。除此之外，马士基集团还有五条指引性价值观：“时刻谨慎、谦逊尊重、诚实可靠、以人为本、注重声誉。”^[10]虽然这些价值观是在2003年，90岁的迈克-凯尼·穆勒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时才正式公布，但它们始终贯穿于穆勒家族对企业的领导。迈克-凯尼·穆勒之女安娜·马士基-迈克-凯尼·乌格拉是集团董事会副主席，也是第四代家族成员。她在2019年写道，这些价值观“承载了企业一个多世纪”。

基于诚实可靠、时刻谨慎、以人为本、注重声誉的价值观，马士基集团显然应该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一方面，马士基集团认识到，其环境足迹正在加剧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如果马士基集团想继续拥有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经营许可，就必须做出改变。另一方面，马士基集团如今的经济活动遍布全球，而且经常在几乎不受法律管辖的海域开展，需要对哪些社区履行哪些责任，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不过，无论走到哪里，马士基集团确实希望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毕竟，它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斯文堡母港的工业化，离不开丹麦强有力的福利保障制度，也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经济型社会结构。

马士基集团很快就投入行动。为强化对社区和政府的责任，2017年初，马士基集团加入了一个由非营利机构组建的工作团队，旨在“重新定义企业的责任文化”。^[11]马士基集团携手志同道合的企业，承诺遵循一套负责任的税务管理原则。^[12]马士基

集团表示，这套原则进一步规定了“基本的纳税方法、与当局和其他税务机构的接触方式，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报告制度”。

责任承诺制带来了切实的成果。首先，马士基集团开始按年度披露向政府支付的款项，提升了公共互动的透明度与责任感。其次，马士基集团公布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全资子公司和非全资子公司名单，排除一切可能对集团活动和会计行为的真实性产生干扰的因素。最后，马士基集团明确了一个目标，即成为“合规且负责的纳税人，压实纳税责任，做到公开透明”。马士基集团的可持续性报告中除了包括其在ESG方面的相关举措，以及营收、利润、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方面的表现外，还开始强调纳税支出。例如，在2019年，马士基集团的报告显示，集团针对57亿美元的利润缴纳了4.58亿美元的企业利润税，实际税率略高于8%。进入2020年，它表示将“继续就税务问题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并且“在2020年报告中遵循‘The B Team的责任税务原则’”，[\[13\]](#)以践行成为“合规且负责的纳税人，压实纳税责任，做到公开透明”。

在气候变化方面，马士基集团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行动。2017—2019年，马士基集团大刀阔斧地剥离了一些利润最高的业务：马士基石油钻探、马士基油轮以及马士基石油。顾名思义，这些业务涉及化石燃料的勘探、开采及运输。马士基集团将这些业务进行出售，或拆分成独立的实体。[\[14\]](#)这些决策意义十分重大，会对集团的短期盈利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一旦执行下去，它们就有助于扫清前面的障碍，促使马士基集团步入正轨，成为一家真正的目标驱动型企业。毕竟，马士基集团成立之初是为了将货物运往世界各地，而不是为了竭力开发世界上的有限资源。

随着这些初步举措的实施，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可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施杰翰说，将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变得十分必要，原因如下。第一，这关乎企业声誉和口碑。由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操作不再可行。一旦言行不一，马士基集团很快就会遭到谴责，维护良好声誉的核心价值观也将陷入危境。第二，这关乎集团的员工和消费者。他们也在要求马士基集团等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果马士基集团达不到他们的要求，那么很可能会遭到新一代消费者和员工的抵制。第三，这关乎投资者。投资者逐渐意识到，基于ESG理念的企业面临的风险较少。2018年，拉里·芬克致贝莱德股东的一封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马士基集团想要获得持续发展并且能够赚到钱，那么关注利益相关者迟早会变得必要。

成为一家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就等于获得长期的发展机遇。过去，马士基集团遵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即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马士基集团最初的业务流程相当直截了当，即通过水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从事其他相关航运业务——直到现在，这依然是马士基集团的赚钱方式。马士基集团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要么是为了在员工中间营造好感，要么是为了提高企业声誉：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这些项目都只是关于花钱的问题。然而，今非昔比。由于新技术带来了新机遇，利益相关者导向演变成关于“如何赚钱，而不是如何花钱”，施杰翰这样说道。从股东至上转变为利益相关者至上“不再是‘马后炮’”^[15]，而将成为企业的核心。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为了找到答案，马士基集团开启了“一场关于企业宗旨的深刻谈话”。“我们为什么成立这家企业？它为什么而存在？”施杰

翰发问。“我们追溯历史，探寻企业根源，然后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利益相关者是谁。”他说。

然而，在马士基集团，这一尝试没能直接产生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是一家运输企业，”施杰翰认识到，“我们往各地运输货物。这一企业目标无法令人感到振奋。”但更深入一层后，他找到了答案。“我们为什么运输货物？我们将世界各地的产品生产地连接到全球市场。而且，由于运输成本非常之低，卖方进入全球市场的成本几乎为零，但附加营收相当丰厚。所以，我们通过往世界各地运输产品，来为大家创造生计。”

施杰翰举了香蕉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最好不要在丹麦种植香蕉，”施杰翰说，因为北欧国家的气候不适宜种香蕉，“马士基集团通过把香蕉从产地运到丹麦，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繁荣。”这就是马士基集团的第一个贡献：促进全球贸易，从而创造生计。马士基集团的第二个贡献要归功于它的冷藏集装箱。“把香蕉放到我们的冷藏集装箱中，损耗率只有0.4%，”施杰翰说，“比起供应链中其他环节平均40%的损耗率，我们减少了食物浪费。”

这体现了马士基集团的真正宗旨：不是为了运输而运输，而是为了“促进全球贸易，进而促进发展繁荣，同时大幅减少食物浪费”。瞬间，马士基集团的真正宗旨不再局限于运输货物，而变得更加广泛。集团的工作也能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比如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8），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12），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9），以及气候行动（13）。

从此，马士基集团再调整企业活动的优先级变得容易很多。石油钻探、油轮及石油销售显然不再符合集团宗旨，而且还会加

重环境恶化，因此理所当然地被剥离出去。但是，贸易作为全球经济的另一个方面已经被置于监管之下，确实符合集团的目标。实际上，贸易是马士基集团的核心。马士基集团因而选择捍卫贸易并加大连接世界的努力。

为了确保集团的目标与保护环境不会产生冲突，马士基集团制定了积极的贸易碳排放目标：旨在“使集团业务‘脱碳’，将企业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脱钩”，还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以2008年为基准，截至2018年，马士基集团已经实现了运输业务碳排放量削减41%的目标，随后更积极的目标也得到实现。“削减碳排放不是我们的核心大事，”施杰翰说，“但它是一件好事。我们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41%，就相当于节省了同样多的燃料。这不是件坏事。通过减少碳排放，我们能赚到更多钱。”

为了确保集团贸易不只为少数跨国企业带来好处，还能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生计，马士基集团还增加了几项目标，确定为哪些客户提供帮助：它希望“到2025年，集团总营收的10%以及电商物流营收的30%都来自中小型客户”，并且“在2025年之前，帮助成立10万家从事跨境贸易的中小型企业，其中包括由女性经营的企业”^[16]。在制定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马士基集团明确赞同一个观点：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是关于赚钱而不是关于花钱的。这一点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吗？

就像许多企业一样，马士基集团的变革任重道远，很多目标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不过，马士基集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尝试，思考如何能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还致力于实现面向集团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从而极大地扭转了集团的发展方向。正如施杰翰所说，员工获得了“早上起床”的新动力，投资者有理由

对马士基集团保持长期的热忱，而不再总想着将其剥离出投资组合，监管者有理由对马士基集团更加认可，不再执着于对其实施限制措施。马士基集团恪守诚信并付出行动，促使集团价值观落地开花。

关于如何打造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马克·贝尼奥夫的做法与马士基集团截然不同。这位Salesforce创始人已经建立起一项未来事业。有一种观点很乐观，并且成为主流，那就是：科技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降低了产品的价格；过去的重工业会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但科技企业不会，而且科技企业的员工薪酬很高，还能享受最好的津贴。

作为第四代旧金山人，贝尼奥夫从小就接触科技行业，他深信这一行业本身正在出现问题。无论是对于早期的企业，比如欧洲的马士基集团，还是对于早期的湾区企业家，比如贝尼奥夫的父亲（曾经经营一家名为Stuart's的服装连锁店），核心价值观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些企业，信任、声誉、可靠性从来不是营销的噱头，而是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贝尼奥夫认为，如今的大型科技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这种核心价值观。

新一代科技企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所遵循的信条是“快速前进、打破常规”^[17]以及“请求宽恕而非许可”。^[18]在这个新的商业世界中，一切都变得可塑、可变、可再造，传统的价值观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贝尼奥夫成长于旧金山，起步于科技行业。这位企业领袖认识到，企业缺乏核心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价值观是其他一切

行为的根源。不过，与贝尼奥夫持相同观点的革新者和投资者寥寥无几。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带来全新的产业，正在打破传统的企业惯例，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高度的评价。这些让他们有信心对企业责任、企业管理以及建立信任等概念做出重新解读。

贝尼奥夫还认识到，硅谷存在竞争问题。互联网刚兴起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企业家都有机会创办企业，竞争客户资源，抢占市场份额。但近年来，市场已经逐步集中到少数大型科技企业的手中。由于机会缺失，新企业的数量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不少初创企业更是无力应对，索性寄希望于被某家主导性企业收购。这种情况不仅抑制了竞争，还扼杀了创新，同时形成了一种单一文化，不利于新颖、多样化观点的形成。

然而，在大型科技企业看来，成为行业寡头甚至垄断企业不仅不存在问题，反而还是企业奋斗的目标。贝宝和帕兰提尔（Palantir）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脸书的早期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曾在2014年的一篇社论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还被《华尔街日报》刊为头条：《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19]关于谷歌，蒂尔写道：

像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应另当别论。谷歌因为无须担心任何竞争问题，所以有更多的余地去关心企业员工、产品，以及企业对更大范围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谷歌所打出的“不作恶”（Don't be evil）口号既是一种品牌策略，也是某种企业的特征——这种企业已足够成功，能够在不危及自身生存的情况下认真对待道德问题。

在商界，金钱十分重要，甚至就是一切。垄断企业有资本考

虑赚钱以外的事情，而非垄断企业没有这种资本。在完全竞争中，企业过于专注眼前的利润率，根本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打算。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企业超脱日常生存的残酷斗争：垄断利润。

蒂尔以一种富有挑衅意味的方式重述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只有垄断企业才能为良好的企业行为买单。他戏谑地挑战着科技企业家的信念：由于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成功，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会自动地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此不应对他们加以限制。但这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竞争学说所带来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市场集中和垄断本身并非坏事，只是可能会带来消费价格增长。这种关于竞争的观点不仅在弗里德曼支持者的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根植于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议程，还深深地影响着各大商学院的一贯做法。鉴于硅谷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几乎都是免费的，所以不存在消费价格增长的问题，但这就能确定没有其他问题吗？

对于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硅谷企业家的经济观点往往听起来很奇怪。在欧洲，监管者认为垄断市场是有问题的，不仅因为垄断会影响消费价格，还因为垄断企业会存在其他滥用市场权力的行为。“要求买方只向一家主导企业采购特定产品的所有配件”（独家采购）、“将价格定在亏损水平”（掠夺性定价）、“拒绝为衍生品市场中的竞争提供必需的投入”^[20]等都是问题所在。运用这些定义，欧洲监管者对微软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了反垄断罚款，还对苹果和亚马逊持续开展调查。

^[21]

最后，在贝尼奥夫看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尽管他拥有数十亿的财富，但也无法置身事外。一方面，贝尼奥夫与其他的企业创始人、企业投资者及企业员工都

发展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一些不太富裕的旧金山市民的发展机会和收入被严重剥夺，以至他们真的开始“向谷歌巴士扔石头”（谷歌巴士是一项私营交通服务，技术工人乘坐谷歌巴士在旧金山的住所与谷歌办公园区之间通勤）。包括作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著有《向谷歌巴士扔石头：增长如何成为繁荣的敌人》一书）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意识到，很多迹象都显示大型科技企业会使贫富差距扩大，“向谷歌巴士扔石头”只是众多迹象之一。而且，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情况会更加糟糕。但一些人对这一问题直接视而不见。旧金山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所面临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正在失控。即便如此，大多数企业家并未认识到自己可以或应当为解决该问题出一份力。截至2019年，旧金山已经有超过8 000名无家可归者，比两年前增长了17%。[\[22\]](#)这一现实与该市在2004年立下的10年内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伟大目标相去甚远。[\[23\]](#)对于像贝尼奥夫的父亲那样的商人来说，解决这种问题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当旧金山的科技界被呼吁出资解决问题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多年来，包括硅谷企业在内的许多大型科技企业纳税极少，要么是因为企业的扩张道路导致它们转盈为亏，要么是因为企业实施了全球税收优化计划，即在子公司之间转移利润以应付不同的税收制度。考虑到这一事实，旧金山的科技企业逃避责任的做法尤其令人大跌眼镜。

贝尼奥夫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他认识到，科技行业无法在短期内重新获得人们的信赖，但眼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塑造良好的信誉。他倡导自己的企业从事那些他认为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业，即使这些事业未必有利于巩固他在业内的地位。贝尼奥夫认为，这么做有助于让人们相信，他所在企业的领导层并不是只关注利润和增长，而是会考虑更广泛的影响。他写道，“技术

并非万能之计”，并指出新技术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有时并非有意导致）。[24]贝尼奥夫认为，新技术已经带来新的压力与风险，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道德问题。他还提醒同行，企业致力于获取大众信任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意味着短期的利润会降低。“可信赖应当是企业的最高价值观，”他在达沃斯年会上说，“否则就会有坏事发生。”

2016年，贝尼奥夫进一步发起倡议。他开始呼吁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以及其他监管者考虑拆分大型科技企业。他认为，有的大型科技企业只顾遏制竞争、捆绑用户，并不能带来创新。“我们已经发现，有些企业收购其他企业是为了创建可能的专属数据流，从而打造竞争壁垒，”他说，“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对此置之不理，其他政府就会采取行动。”[25]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不断发起类似的呼吁。贝尼奥夫坚信，许多企业都在违反隐私标准，滥用数据，因为监管者一直“玩忽职守”。所以，他在2019年利用达沃斯这个平台呼吁加强监管时，并不让人觉得惊讶。“如果CEO们不愿履行责任，”他说，“那么我认为除了政府介入别无选择。”[26]

从科技行业的总体竞争格局来看，这些呼吁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微软或脸书等能够收购领英或WhatsApp这样的企业，那么Salesforce可能会遭受负面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尼奥夫直言不讳的立场确实激励了其他人采取类似的措施。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导者，比如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开始呼吁对他们难以独自决策的科技领域进行监管。尽管这种姿态被巧妙地用于针对其他竞争对手，但它确实表明科技企业已经开始反思自身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技术有潜力让世界不断变好，”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

2019年达沃斯年会举办之前写道，“但如果使用技术的人没有充分的信念和信心，技术就无法发挥出这一潜力。”^[27]由于美国缺少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蒂姆·库克提出了自认为应当指导美国立法的4条原则：尽量减少个人数据的使用；个人对于谁在使用自己的数据享有“知情权”；个人对于自己的数据享有“访问权”；个人享有“数据安全得到保障的权利”，“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信任是不可能存在的”。

2020年，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加入了要求政府加强监管的行列。他建议欧盟委员会考虑对政治广告、用户数据可移植性实施更加严格的规定，对脸书这样的科技企业进行更严格的监督，这样监管就能“在企业犯错时追究其责任”。^[28]但重要的是，他还支持新的税收规定。“科技企业应当服务于社会，”他写道，“在企业层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支持经合组织努力为互联网行业制定公平的全球税收规则……健全的监管制度可能会有损脸书当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更加有利。”

这些提议很容易遭到批评，而且不难看出，它们也是全球激烈竞争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些提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标志着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行业进入了新的成熟阶段，也标志着我们向更加完善的科技行业监管制度迈出了一步。

归根结底，要成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言语。对于贝尼奥夫而言，这意味着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首先，贝尼奥夫意识到包括Salesforce在内的许多硅谷企业在多样性方面存在问题，于是他聘请了一家外部咨询公司，来审查企业的薪酬状况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结果显示，Salesforce在薪酬上存在性别差距，这促使该企业管理层对工作

相当但薪酬更低的员工的合同进行了调整。其次，当旧金山（贝尼奥夫和家人从小就住在这座城市）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摆在贝尼奥夫的眼前时，他决定发声支持对包括Salesforce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征税，从而资助该市采取结构性措施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这项提议被称为“C提案”（Proposition C），具体是主张针对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企业营收超过5 000万美元的部分征收0.5%的税。^[29]其他或将受到影响的科技企业CEO发声反对这项提议。对于贝尼奥夫，这是一种回馈社区（贝尼奥夫及其企业称之为家的地方）的一种方式。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30]中，他直白地表明自己支持该提议的理由。他表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

C提案是针对企业在我们的社区乃至我们的国家中扮演的角色实行的一次全民公决。企业的职责不再只是经营。我们的义务不只是为股东增加利润。我们必须坚持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即消费者、员工、环境以及我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社区。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企业和企业主是时候挺身而出，回馈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了。

贝尼奥夫和施杰翰等企业领导人及其所领导的企业正是在用行动支持自己的言论，提醒人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企业应肩负更广泛的责任。在这个时代，企业应当开阔视野，而不是只关注损益表。先驱者们已经展开行动。

对于那些愿意选择这条路径的企业，它们所关注的方面与施杰翰、贝尼奥夫等人已经确定的方面十分相似：

- 接受公平的竞争环境。

- 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和员工福祉。
- 支持企业所在的社区。
- 注重保护环境及企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 支付企业应缴的税款。

这些都是在2020年《达沃斯宣言》中被明确规定的行动，它符合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所规定的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行动的一般概念。如果每一家企业都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并解决根本问题，那么股东资本主义的许多过度行为将被自动根除。马士基集团和Salesforce的案例就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变革要完全依赖执行领导层的善意？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管理往往要依靠数字，这种利益相关者责任也必须能够加以衡量。正如上一章已经简单提到过的，我们最近已经在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2020年底，由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伊尼汉领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31\]](#)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这些指标用数字来衡量企业在完成ESG目标方面的进展，从而促使企业不只是为了利润而进行优化。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具体如下：[\[32\]](#)

·治理原则支柱，包括的指标和披露内容涵盖公司既定目标，董事会构成（相关经验、性别、少数群体成员、利益相关者代表），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确定了哪些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比较重要的议题，如何就这些议题与利益相关者开展讨论），反腐败措施，违反道德及法律行为的报告机制，以及影响业务开展的风险与机遇。

·环境支柱，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指标，如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制订的计划），还涉及企业活动的土地利用和生态敏感性、缺水地区的水资源利用和消耗。

·员工支柱，包括的指标涵盖多样性和包容性，薪酬平等（针对每一对相关群体：女性与男性、少数族裔群体与多数族裔群体等），工资水平（CEO薪酬与员工薪酬中位数之比、基本工资与法定最低工资之比），童工、强制劳动、健康与安全事故风险（事故数量和如何避免事故的说明），以及企业所提供的培训。

·繁荣支柱，包括的指标涵盖员工流动性和雇用人数，企业所做的经济贡献（体现为工资、社区投资等形式的积极贡献，以及体现为接受政府援助等形式的消极贡献），金融投资和研发费用，以及企业支付的总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财产税、雇主支付的工资税等）。

通过在报告中披露这些指标，管理者和董事会能够明白需要在何处调整策略，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客户、供应商、投资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能够判断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的业绩。这些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切实可行，有望到2022年实现普及应用。这是因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美国银行、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和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等先驱者，以及上述的马士基集团和Salesforce等都纷纷表示支持。在就这些指标展开商讨的过程中，140位国际工商理事会成员中有2/3的人都表示支持，其中包括许多世界级大企业的领导者。主流的会计师事务所，即所谓的“四大”（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还协助制定了这些指标。它们致力于

推动这些指标成为一项全球标准。这样一来，在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从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应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成为一个重要步骤。

这并不代表企业将会被束缚住手脚，也不代表企业只要采用ESG衡量体系就能畅通无阻。本章中提到的许多企业已经明了成为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对于自身的意义，但有些企业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企业，应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能够起到帮助作用。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是空前的，因为投资者正逐渐对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企业失去耐心。在这方面，以贝莱德公司创始人兼CEO拉里·芬克为例。贝莱德公司是一家管理着超过6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公司，[\[33\]](#)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全球许多大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

几年前，芬克和他的一些投资经理开始对那些只关注短期经济利润，而不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目标的企业敲响警钟。这种短视的做法会对社会、地球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并且最终会损害投资者和企业本身的利益，因此亟须做出改变。芬克在2018年写给他所投资企业的CEO的年度公开信中传达了这一要点。“社会正在要求企业服务于社会，不管这些企业是否上市，”芬克在信中写道，“为了实现长期的繁荣，每一家企业都必须发布财务业绩，还必须表明其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华尔街文化中，芬克所传达的信息令股东和观察家都十分吃惊。“这可能会是一个转折时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写道，“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各种问题。”[\[34\]](#)，[\[35\]](#)但有些人认为，这一时刻终于在最后关头到来。正如《金融时报》的吉莉恩·泰特在其专栏中提到，

即便当贝莱德公司在其年度公开信中倡导ESG理念时，“环保组织还在控诉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继续通过其主要投资产品，将大量资金注入化石燃料等行业”[36]。

在芬克发布了那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开信之后，贝莱德公司（敦促其利益相关者就ESG问题采取更多的行动）与气候活动家（批评贝莱德公司做得不够）之间的针锋相对持续了数月乃至数年。2019年，美国的一家倡议组织“多数行动”（Majority Action）通过计算发现，作为股东，贝莱德公司投票赞成企业气候决议的次数仅占总投票次数的12%。[37]对此，芬克在2020年的公开信中传达的信息是，贝莱德公司将“在投资过程中把可持续性置于核心地位”[38]。当不久之后再次被指控“气候伪善”时，贝莱德公司的回应是，“处罚了50多家没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企业”[39]，还对其持股的另外191家企业提出警告，“如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它们有可能在2021年被投反对票”。

在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芬克仍继续坚守自己的ESG承诺。他表示，重要的不应当是短期利润，而应当是企业的长期生命力。有了这样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能创造更大的利润，”芬克说，“如果一家企业能与所在社会保持更加良好的关系，社会也愿意与这家企业有更多的来往。”[40]即使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模式也是更适宜的，芬克说，因为“只关注股东资本主义的企业走得还不够快”。它们没有看到会对自己产生长远影响的宏观趋势，例如新一代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社会偏好和关切所在。它们盲目追逐利润和增长，却不知道利润和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这或许终将成为导致这些企业衰败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安然公司的例子，并以此

作为本章结尾。

以股东为单一导向会有许多风险，安然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家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企业集团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休斯敦天然气公司和北方内陆天然气公司合并而成，这两家能源公司起家于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勘探、生产和分销。[\[41\]](#)就员工人数和对GDP的贡献而言，这两家能源公司分别在得克萨斯州和奥马哈市留下过辉煌的足迹。沿着利益相关者的思路重新考虑安然公司的宗旨，或许能够引人思考关于这两家天然气公司如何在这两个地方继续发挥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家公司也许能够调整方向，在得克萨斯州和奥马哈市生产可再生能源，或者转型为研发公司，专门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其能源供应对象的生活条件。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事实并非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和放松管制浪潮中，安然公司的新任领导层转而从多样化且短期收益更高的业务。公司开始涉足短期能源交易，变得更像一家金融服务公司，而不是能源企业。它还出于账目方面原因成立了几家专门用于隐瞒成本、虚增利润的公司。一有合适的机会，它便立即抬高其所控制区域的能源供应价格，从而给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但给消费者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安然公司管理层没有面向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定位，只考虑在短期内扩大营收和利润。在数年里，这种做法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效。安然公司成为不断扩张的企业集团，营收和利润简直羡煞旁人。而除内部人员外，其他人尚不清楚它的成功主要建立在欺骗和腐败之上。因此，安然公司多次被誉为最具创新精神的财富500强企业。安然还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和员工，这些人

渴望成为这家表面上十分成功的企业的一分子。

但事实证明，安然公司的成功是一个谎言。公司管理层非但没有提高盈利能力，反而在隐瞒成本、虚报营收、误导投资者和政府监管人员方面做得越来越好。2001年真相浮出水面后，安然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宣布破产。其15年来的所作所为结果只是一场骗局。包括CEO和CFO（首席财务官）在内的多名公司高管被判犯下欺诈罪。^[42]安然公司的管理层单纯地关注创造利润并提高股东价值，最终却适得其反。投资者被欺骗，因为安然公司的实际价值远远达不到其最高估值。

不过，安然公司的案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在根据美国破产法典第十一章完成破产程序后，公司业务中还剩下一个有价值的部分——北方内陆天然气公司，这是最初合并为安然公司的那两家天然气公司之一。尤其是其旗下的北方天然气分公司。这家分公司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运营，直到当时还活跃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事实证明，北方天然气分公司始终坚守成立时的初衷：向奥马哈居民供应能源。

为北方天然气分公司找到买家并不难。在奥马哈生活了一辈子的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从最初的收购者手中买下了这家分公司的剩余部分，^[43]并将其发展成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旗下的一个成功分支。这家公司直至今天仍然活跃。至于它成功的原因，在于它转向了更加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使命。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表示，北方天然气分公司“不只运输天然气，还为客户提供改善生活的方案、工具和资源”^[44]。这一教训经验非常值得铭记。

至此，我们已经对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及其领导层的情况有所了解。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另一个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利益相关者。

[1] “Mærsk Hails Growth in Global Trad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013, <https://www.ft.com/content/35b9748e-4c55-11e3-923d-00144fea bdc0>.

[2]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Shipping,” Director General for Internal Studies, European Parliament, November 2015,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5/569964/IPOL_STU\(2015\)569964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5/569964/IPOL_STU(2015)569964_EN.pdf).

[3] 2019年8月，施杰翰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4] *Trailblazer: The Power of Business as the Greatest Platform for Change*, Marc Benioff, Random House, October 2019, p. 12.

[5] *Dreams and Details*, Jim Snabe and Mikael Trolle, Spintype, 2018, p. 128.

[6] *Dreams and Details*, Jim Snabe and Mikael Trolle, Spintype, 2018, pp. 128–129.

[7] 2019年8月，施杰翰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8] “SAP’s Global Revenue from 2001 to 2018,” Statista, March 201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3838/saps-global-revenue-since-2001/>.

[9] “SAP Integrated Report: 2020 Targets Met Early,” SAP, March 2018, <https://news.sap.com/2018/03/sap-integrated-report-2020-targets-met-early/>.

[10] “The Values Are Constant in a Complex World,” Mærsk, June 2019, <https://www.Mærsk.com/news/articles/2018/06/29/the-values-are-constant-in-a-complex-world>.

[11] “Tax Principles,” Mærsk, <https://www.maersk.com/about/tax-principles>.

[12] “A New Bar for Responsible Tax,” The B Team, <https://bteam.org/assets/reports/A-New-Bar-for-Responsible-Tax.pdf>.

[13]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9, Maersk, <https://www.maersk.com/about/sustainability/reports>.

[14] 2017: Sale of Mærsk Tankers, 2018: Sale of Mærsk Oil, 2019: Mærsk Drilling listed on the Copenhagen stock exchange, <https://www.Mærsk.com/about/our-history/explore-our-history>.

[15] 2019年8月，施杰翰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16] A.P. Moller–Mærsk,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8, February 2019, pp.18–19.

[17] “Facebook Strategy Revealed: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Henry Blodget, Business Insider, March 201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henry-blodget-innovation-highlights-2010-2?r=US&IR=T>.

[18] “Want to Succeed in Life? Ask for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 Bill Murphy, Inc. January 2016, <https://www.inc.com/bill-murphy-jr/9-words-to-live-by-its-always-better-to-beg-forgiveness-than-ask-permission.html>.

[19] “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 Peter Thiel,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peter-thiel-competition-is-for-losers-1410535536>.

[20] “Antitrust Procedures in Abuse of Dominance,” European Commission, August 2013,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procedures_102_en.html.

[21]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a US Tech Crackdown May Look Like, Check Out What Europe Did,” Elizabeth Schulze, CNBC, June 2019, <https://www.cnn.com/2019/06/07/how-google-facebook-amazon-and-apple-faced-eu-tech-antitrust-rules.html>.

[22] “Why 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opulation Keeps Increasing,” Associated Press, May 2019,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the-homeless-population-in-san-francisco-is-skyrocketing-2019-05-17>.

[23] “A Decade of Homelessness: Thousands in S.F. Remain in Crisis,” Heather Knigh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014, <https://www.sfchronicle.com/archive/item/A-decade-of-homelessness-Thousands-in-S-F-30431.php>.

[24] *Trailblazer*, Marc Benioff, October 2019, pp. 12–13.

[25] “Marc Benioff Says Companies Buy Each Other for the Data, and the Government Isn’t Doing Anything about It,” April Glaser, Recode., November

2016, <https://www.vox.com/2016/11/15/13631938/benioff-salesforce-data-government-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linkedin-microsoft>.

[26] *Trailblazer*, Marc Benioff, October 2019, pp. 12–13.

[27] “You Deserve Privacy Online. Here’s How You Could Actually Get It,” Tim Cook, *TIME Magazine*, January 2019, <https://time.com/collection/davos-2019/5502591/timcook-data-privacy/>.

[28] “Big Tech Needs More Regulation,” Mark Zuckerberg,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602ec7ec-4f18-11ea-95a0-43d18ec715f5>.

[29] “Benioff Comes Out Strong for Homeless Initiative, although Salesforce Would Pay Big,” Kevin Faga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2018, <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Benioff-comes-out-strong-for-homeless-initiative-13291392.php>.

[30]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Marc Benioff,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24/opinion/business-social-responsibility-proposition-c.html>.

[31] “We can now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stakeholder capitalism. Here’s how,” Brian T. Moynihan, World Economic Forum, October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10/measure-progress-stakeholder-capitalism-brian-moynihan/>.

[32] Measuring Stakeholder Capitalism, White Paper,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02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IBC_Measuring_Stakeholder_Capitalism_Report_2020.pdf.

[33] “BlackRock’s Message: Contribute to Society, or Risk Losing Our Support,” Andrew Ross Sork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5/business/dealbook/blackrock-laurence-finkel-letter.html>.

[34] “BlackRock’s Message: Contribute to Society, or Risk Losing Our Support,” Andrew Ross Sork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5/business/dealbook/blackrock-laurence-finkel-letter.html>.

[35] 有些人认为企业具有追逐短期利润的法律义务，因为它们对股东有“信义

义务”。对于这些人，芬克的公开信的确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这位大股东称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信义义务，而不是以季度营收为基础。

[36] “The Battle over Green Investment Is Hotting Up,” Gillian Tet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bacefd80-175e-11ea-9ee4-11f260415385>.

[37] “BlackRock Seeks to Regain Lost Ground in Climate Fight,” Attracta Mooney and Owen Walke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36282d86-36e4-11ea6d3-9a26f8c3cba4>.

[38] “BlackRock Accused of Climate Change Hypocrisy,” Attracta Mooney, *Financial Times*, Ma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0e4894442783-4f6e-a006-aa8126d2ff46>.

[39] “BlackRock Punishes 53 Companies over Climate Inaction,” Attracta Mooney, *Financial Times*, Jul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8809032d-47a1-47c3-ae88-ef3c182134c0>.

[40] 2019年11月，拉里·芬克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41] 有关安然公司的兴衰过程，参见：“Enron scandal”，Peter Bondarenk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February 2016,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Enron-scandal>.

[42] “See what happened to key players in Enron scandal”, *The Houston Chronicle*, August 2018, <https://www.houston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Jeffrey-Skillings-release-to-halfway-house-13196786.php>.

[43] “Enron Opens Up Bidding On 12 of Its Major Assets,” Kathryn Kranh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002,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30487405721514155>.

[44] “A Natural Gas Transportation Leader”, Northern Natural Gas, Berkshire Hathaway Energy, <https://www.brkenenergy.com/our-businesses/northern-natural-gas>.

第十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国家、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西兰

在2020年3月的最初几周，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和她的内阁部长们面临一个重大的两难选择：要么对国家实施严格封锁以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要么保持开放以避免经济陷入急剧衰退。起初，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双输局面：要么牺牲生命，要么牺牲生计，而且很有可能两者都保不住。作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偏远岛国，新西兰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有可能经受住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袭，而且是在不采取严厉措施的前提下。但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伊朗等国，新冠肺炎病毒的无序传播对公共健康和经济都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为新西兰敲响了警钟。新西兰要想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取向？

阿德恩及其政府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可以吸取其他地区早期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经验教训。2019年底，该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到2020年初，随着该病毒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传播，人们迅速确认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且可能非常致命的病毒。到2020年2月，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呈指数级增长。不久之后，世界其他地区也逐渐认识到这场大流行病的发展局势多么严峻。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先是在泰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蔓延，而后又在欧洲、中东、澳大利亚扩散，新西兰这个位于太平洋上的岛国开始日渐担忧，其政府越来越坚定决心，要

吸取其他地区的教训。

随后，新冠肺炎病毒蔓延至新西兰。2月28日，新西兰出现了首个新冠肺炎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一名从伊朗返回的旅行者。在随后的几天里，新西兰陆续报告了更多病例，其中包括第一个本地传播病例。到3月中旬时，新西兰每天报告的新增病例达到几十个。内阁成员与国家高级卫生专家开会时，意见不一。根据艾丽斯·克莱因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的报道，一些专家支持采取相对宽松的措施，参照瑞典应对疫情的方法。[\[1\]](#)（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没有强制关闭商店、学校和工作场所，最终有数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其中有数千人死亡。）另一些专家则主张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法，实施严格封锁，中止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禁止人员流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新冠肺炎疫情增长曲线渐趋平缓，[\[2\]](#)但这也并非毫无争议。流行病学家迈克尔·贝克支持采取更加强硬的抗疫计划，但他的一些同事则认为他的计划过于激进。据他说，“有些人将这比作杀鸡却用宰牛刀”。[\[3\]](#)

3月21日，阿德恩总理向公众宣布了新西兰政府的决定。他们决定采用贝克等人倡导的强硬抗疫计划。这意味着新西兰的公共生活将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停滞。每个公民都必须待在家中，学校停课，所有非必要的商店都要关门，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在第一次封锁生效的几天后，阿德恩就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发表讲话。她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些措施会带来的经济后果，而是指出了她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不采取我刚才宣布的那些措施，可能会有数万名新西兰人死于新冠肺炎病毒。”她通过国家电视台向民众说道，“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你们将要牺牲很多东西，要放弃与他人接触，要进行隔离，要独自应对带孩子的难题——

所有这些牺牲都会实实在在地拯救生命，拯救数千人的生命。”她说，在她看来，“最糟糕的情况是人们根本无法承受的，这将意味着我国会遭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我不会冒这个险”。[\[4\]](#)

对于阿德恩来说，这是一项大胆的举动。就在两年多前，37岁的她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领导人。[\[5\]](#)不过，她确实获得了很直接的支持。该国很多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支持政府的计划，其中就包括新西兰最大零售商的创始人斯蒂芬·廷德尔。[\[6\]](#)4月初，廷德尔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一次电话采访时说道：“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足够迅速地关闭商店，那么痛苦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名商人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着眼全局，而不应该视角太过狭隘，过度关注自己的企业受到的短期影响。民众的服从度也很高，这或许部分得益于他们的总理走的是共情路线。“要友善，”在请财政部部长和警察局局长报告相关的经济后果和执法问题之前，阿德恩这样告诉民众，“我们需要的是，你们能够互相支持。今晚就回家，看望一下你的邻居，与你所在街道的人都建立起电话联系渠道，计划好如何与彼此保持联系。我们会一起渡过这个难关，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要勇敢，要友善。”

阿德恩及其政府，还有新西兰人民所做出的迅速反应取得了成效。在短短几周内，这个国家的每日新增感染病例数量开始下降。5月，随着新西兰每日报告的新增病例数量下降至不到5例，放松封锁的曙光初现。到5月下旬时，新冠肺炎病毒在新西兰本地的传播已经被彻底阻断。在确诊病例不再新增后，新西兰于6月结束了所有的内部封锁措施。到7月时，这个国家已经连续两个多月无新增病例（不过，确实有一些从境外回国的新西兰人在

隔离期间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阳性)。在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第一波”危机中，新西兰的累计死亡病例不超过25（新西兰的总人口接近500万），公共生活和经济活动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就近乎恢复至常态。当然，新西兰的经济确实遭受重创。根据奥塔哥大学经济学家的分析，新西兰在2020年第一季度GDP收缩了1.6%，创下了1991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7]2020年10月，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新西兰全年经济收缩幅度将超过6%，^[8]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封锁措施带来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旅游等行业的整体下滑。

但对于一个已经不再迷恋GDP增长的国家 and 领导人来说，短期的经济成本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这种付出在短期内就会得到回报，具体体现在人力成本方面；此外，它还有望在长期得到回报，因为经济生活恢复正常的速度较快。短期回报已经成功显现，长期回报要在几个季度后才会明晰。

新西兰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一选择，原因可能还在于其结果可以相对容易地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就在一年多以前，新西兰创建了一个“生活标准框架”（LSF）衡量体系，其中包括广泛的福祉指标，以补充现有的仅围绕GDP增长的衡量标准。该衡量体系旨在提供“有关政府间福祉优先级的政策建议”，并且会定期更新。如果用这种更广阔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会发现新西兰人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是非常有道理的。短期内，GDP增长确实可能会受到冲击，但健康、安全和保障以及社会关系等LSF衡量体系中的所有指标都会从中受益。该衡量体系的建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新西兰在采取另类治理方式时所用到的各种工具之一。这种治理方式符合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信念：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发展良好，那么这个社会也能

发展良好；进步并不是仅体现在利润和GDP层面，每个人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都需要被重视，高层的有效领导和社会基层的赋能授权同样重要。

这种涵盖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员工，无论是在顺境下还是在逆境下，都能取得成效。在新西兰的新冠肺炎病例清零几个月后，当地的一些研究者谈到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抗疫如此成功的原因。梅西大学传统、新闻和营销学院的高级讲师贾格迪什·撒克博士在2020年7月告诉《卫报》：“我们整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心，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我们的政治和卫生专家能够履行承诺，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9]此外，这些研究者还发现，“几乎所有的新西兰人都正确地认识到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重要事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10]事实证明，在与新冠肺炎病毒的这场持久战中，这是一个获胜之计。2020年8月，新西兰一家肉类进口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庭成员被确诊新冠肺炎。面对疫情的反弹，新西兰已经做好准备再次战斗。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的，^[11]这个国家秉着同样的决心，再次实施阿德恩总理的“重拳出击、尽早行动”策略，在短短几周内就击退了第二波疫情。2020年10月，新冠肺炎病例再度清零后的新西兰举行了大选。因为阿德恩政府的做法获得民众的赞许，阿德恩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历史性胜利。

新西兰的情况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哪些国家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有所准备，哪些国家准备不足。一些观察家指出，那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力的政府存在一个显著的共同点：由女性担任领导者的政府似乎

做得更好。事实上，在2020年6月，（利物浦大学）研究员塞伯利亚·加里基帕蒂（Supriya Garikipati）和（雷丁大学）研究员乌玛·坎班帕蒂（Uma Kambhampati）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这一发现。[12]她们认为，德国、丹麦、芬兰、冰岛以及新西兰等由女性领导的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确实比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研究人员认为，其原因在于女性领导者采取了“积极主动且协调一致的政策应对措施”，而且她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倾向于规避风险（这使她们在疫情尚未导致大规模死亡时就及早采取封锁措施），富有同理心。[13]还有学者、（据说还有）记者声称，女性领导者通常更具包容性，愿意接受多元化观点，并且相信科学。[14]

我还从中观察到另一个共同点：许多在这场特殊的危机中应对得力的领导者，都采取了一种“全社会”应对策略。他们会顾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并且使他们全都参与其中。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策略[15]不仅是成功抗击病毒的有效方法，而且是领导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社区的最佳方式。因此，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政府采取利益相关者策略通常是何种情况。

[1] “Why New Zealand Decided to Go for Full Elimin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Alice Klein, *New Scientist*, June 202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46858-why-new-zealand-decided-to-go-for-full-elimination-of-the-coronavirus/#ixzz6T1rYuK5U>.

[2] “New Zealand Isn’t Just Flattening the Curve. It’s Squashing It,” Anna Fifield,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new-zealand-isnt-just-flattening-the-curve-its-squashing-it/2020/04/07/6cab3a4a-7822-11ea-a311-ad-b1344719a9_story.html.

[3] “Why New Zealand Decided to Go for Full Elimin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Alice Klein, *New Scientist*, June 202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46858-why-new-zealand-decided-to-go-for>

full-elimination-of-the-coronavirus/#ixzz6T1rYuK5U.

[4] PM Jacinda Ardern's full lockdown speech, Newsroom, March 2020, <https://www.newsroom.co.nz/2020/03/23/1096999/pm-jacinda-arderns-full-lockdown-speech>.

[5] "The World's Youngest Female Leader Takes Over in New Zealand," *The Economist*, October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7/10/26/the-worlds-youngest-female-leader-takes-over-in-new-zealand>.

[6] "New Zealand Isn't Just Flattening the Curve. It's Squashing It," Anna Fifield,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new-zealand-isnt-just-flattening-the-curve-its-squashing-it/2020/04/07/6cab3a4a-7822-11ea-a311-adb1344719a9_story.html.

[7] "Coronavirus: New Zealand Records Biggest GDP Quarterly Fall in 29 years-Top Kiwi Economist," Newshub, July 2020, <https://www.newshub.co.nz/home/money/2020/07/coronavirus-new-zealand-records-biggest-gdp-quarterly-fall-in-29-years-top-kiwi-economist.html>.

[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0, Chapter 1, p. 5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9] "New Zealand Beat Covid-19 by Trusting Leaders and Following Advice — Study," Eleanor Ainge Roy, *The Guardian*, Jul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l/24/new-zealand-beat-covid-19-by-trusting-leaders-and-following-advice-study>.

[10] "New Zealand Beat Covid-19 by Trusting Leaders and Following Advice — Study," Eleanor Ainge Roy, *The Guardian*, Jul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l/24/new-zealand-beat-covid-19-by-trusting-leaders-and-following-advice-study>.

[11] "New Zealand Beat the Virus Once. Can It Do It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13/world/asia/new-zealand-coronavirus-lockdown-elimination.html>.

[12] "Lead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Does Gender 'Really' Matter?" Supriya Garikipati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ma Kambhampati (University of Reading), June 2020, <https://papers.ssrn.com/sol3/>

papers.cfm?abstract_id = 3617953.

[13] “Do Countries with Female Leaders Truly Fare Better with Covid-19?”Alexandra Ossola, Quartz, July 2020, <https://qz.com/1877836/do-countries-with-female-leaders-truly-fare-better-with-covid-19/>.

[14] “Do Countries with Female Leaders Truly Fare Better with Covid-19?”Alexandra Ossola, Quartz, July 2020, <https://qz.com/1877836/do-countries-with-female-leaders-truly-fare-better-with-covid-19/>.

[15] 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全政府”或“全社会”策略。参见：<https://www.who.int/global-coordination-mechanism/dialogues/glossary/whole-of-govt-multisectoral.pdf>.

国家政府的关键任务

在现代社会，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这一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年来，许多政府面对技术进步反应迟缓且应对不力，难以保持税基稳定，无法控制不平等现象，对自由市场的监管也越来越艰难。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如何做出改善？

回归20世纪的经济意识形态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策略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就已发现，那些手段会导致物价上涨，技术进步放缓，社会更加贫穷，繁荣无法实现。许多之前的苏联加盟国和奉行封闭经济的国家都已经印证这一点。但与此同时，自由放任或完全不干涉经济也并非良策。那些实施自由放任策略的国家，不平等程度往往急剧上升，从而引发民众和政界的反对情绪。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或第二个10年中，包括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内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新自由主义转向“21世纪社会主义”，部分原因就在于之前过度依赖市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种经济策略的摆动往往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政府要想发挥最大的效用，应该遵循一条更加务实的路径。最简单来说，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公平的繁荣。这意味着政府应该使每个个体行为者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繁荣，但前提是要以对民众和地球都公平的方式。政府应该通过以下三种主要方式实现这一点。首先，政府应该重视每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并在过度不平等

现象出现时加以遏制。其次，政府应该为在自由市场上运作的企业充当仲裁者和监管者。最后，政府扮演着为子孙后代守护地球环境的角色，要制止破坏环境的活动。

就政府的第一项任务——确保机会平等和遏制过度不平等而言，我相信最有效的政府必然要专注于三个古老的社会需求：教育、医疗和住房。鉴于当前世界人们还越来越依赖在线活动，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数字连接应该成为社会的第四个核心需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这些领域都关系到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而且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就来源于这些领域。

我们首先考虑前三个需求，即教育、医疗和住房。以中国为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1]告诉我们，“就所观察到的不平等现象而言，这些是最重要的因素”[2]。据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开放，“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资源，这不仅无法缓解不平等，而且于经济增长无益”。尤其是，城市居民更有机会获得医疗、社会服务和教育资源。与之相比，中国的农村医疗保险直到2003年才开始实施。孩子的教育资源则一直都与其父母的户口或居住证挂钩，没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往往就无法就读于城里那些高质量的学校。即便是在城市居民内部，也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在获得住房上享有优先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不断发展，而且所谓的一线、二线城市发展势头尤其强劲，最初的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扩大，导致了系统性的不平等，许多人缺乏机会。（白重恩提到，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峰值，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触底，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开始下降。这些指标都表明，尽管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所提升，但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美国人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资源不平等的故事也一定不陌生。最著名的是，种族隔离和种族分区政策的实施导致的结果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美国城市中较好的学校、社区和工作岗位仍将非裔美国人拒之门外。在这一过程中，私营部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做法就是所谓的“红线歧视”[3]，即银行基于种族主义标准来批准或者拒绝某些地区居民的银行贷款申请。如今美国的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尽管有早期的《民权法案》以及后来的立法改革，但许多系统性不平等现象从未真正消失。此外，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的不平等并不全都源于种族歧视。直到今天，美国许多一流大学都存在所谓的“校友子女偏好”，即优先录取父母也曾在该校就读的学生，在有些情况下是指优先录取父母曾为学校捐赠的学生。尽管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直在倡导居者有其屋，但抵押贷款债券和担保债务凭证方面不透明的金融创新还是导致了2008年的住房危机，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住所与工作。时至今日，有一些人的经济状况仍未从这场危机中彻底恢复。在2018年，还有大约2 800万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近10%）没有医疗保险[4]（截至本书写作时，这是所能找到的最近期的数据）。即便是对于那些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来说，本国的医疗费用也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是经合组织成员中最高的，许多美国人都需要通过支付定额手续费和其他自付费用的方式承担很大一部分医疗费用。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这些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导致美国遭遇双重公共健康危机，还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这根本不足为奇。

不过，数字连接也非常重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得以连接互联网，有点像在前一个时代能够使用石油和内燃机。在互联网成为公共资源后，能够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与无法使用互联网的

人群之间立即出现了一道“数字鸿沟”。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和服务开始依赖数字连接，经济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一直持续到今天。一项[5]又一项[6]的研究表明，稳定的、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为严峻时期。那些拥有高质量的网络和连接设备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进行远程办公，从而能够保住工作和收入。同样地，那些能够上网的孩子可以继续上课，而不能上网的孩子往往只能靠自学。那些在疫情期间不敢去看医生、不敢去医院的人，可以通过远程医疗获得医疗方面的建议。智能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可以使用基于蓝牙功能的应用程序更容易地实施有效检测和追踪。[7]

[1] Biography Bai Chong-En, Tsinghua Univers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crm.sem.tsinghua.edu.cn/psc/CRMPRD/EMPLOYEE/CRM/s/WEBLIB_SPE_ISCT.TZ_SETSPE_ISCRIPT.FieldFormula.IScript_SpecialPages?TZ_SPE_ID=251.

[2] 2019年9月，白重恩接受了彼得·万哈姆的采访。

[3] “Redlining,”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edlining>.

[4] “Key Facts about the Uninsured Population,”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December 2019, <https://www.kff.org/uninsured/issue-brief/key-facts-about-the-uninsured-population/>.

[5] “53% of Americans Say the Internet Has Been Essential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0/04/30/53-of-americans-say-the-internet-has-been-essential-during-the-covid-19-outbreak/>.

[6] “59% of US Parents with Lower Incomes Say Their Child May Face Digital Obstacles in Schoolwork,”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10/59-of-u-s-parents-with-lower-incomes-say-their-child-may-face-digital-obstacles-in-schoolwork/>.

[7] “Is a Successful Contact Tracing App Possible? These Countries Think So,”*MIT Technology Review*, August 2020,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8/10/1006174/covid-contract-tracing-app-germany-ireland-success/>.

新加坡作为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典范

正如上述两个案例所显示的，政府要有效发挥其核心职能并非易事。但有些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新西兰、新加坡，确实明显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它们的模式为其他（更大的）经济体提供了经验教训。

其实，最了不起的发展蓝图可能是由新加坡描绘出的。这个位于东南亚一角的半岛上的国家，拥有500万人口。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这个城市国家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技术和经济转型。现在的新加坡是亚洲主要的科技和贸易中心。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般成就，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政府努力为其所有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服务。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一座座华美的摩天大楼，专供那些经常乘私人飞机到处旅行的国际富豪群体中的少数幸福人士享用。正如彭博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电影《摘金奇缘》中，主角们在新加坡穿梭于豪宅与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的奢华酒店之间。但现实情况是，（新加坡）绝大多数家庭都住在由政府建造的面积不大的公寓里。”^[1]

这些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负责建造和维护的公共住房（被称为“组屋”），从核心层面看与美国或欧洲城市的住房项目没有太大区别。它们都是未经修饰的大规模公寓楼，专供特定人群使用。不过，新加坡的组屋还是有与众不同之处，这至少源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些公寓从一开始就旨在通过种族融合

政策来鼓励社会和种族融合。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华裔、印度裔、马来裔）各有一定的住房配额。这就避免了不同的群体之间互相孤立，而这种孤立现象在其他城市是很常见的。据新加坡的一名高级部长尚达曼说，使不同族群混居确保了社会的和谐。

[2]“一旦分属不同族群的人口居住在一起，他们就不只是要共用同一个走廊，乘坐同一部电梯。”他在2020年的一次政府采访中说道，“孩子们会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小学，因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在自己的住处附近上学，他们会一起长大。”[3]

其次，记者亚当·马金迪指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将公共住房计划的重点放在最贫困的社会成员身上，往往任由那些简陋的混凝土砖房沦为城市贫民窟。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这些房屋代表了国家繁荣中公民的最大利益。因此，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不仅精心维护组屋建筑和地面设施，而且会定期对其进行升级改造，比如新建电梯，修建人行道，翻新建筑”[4]。这些努力是任何一名来访者都能够亲眼看到的。这些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漫步于组屋区，那些街区给人的视觉感受和体验都很宜人，而且修建了很舒服的人行道。街区周围通常坐落着一些比较小资的咖啡吧、时装店和书店。这与在其他地方参观类似的公共住房项目时可能会有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造的组屋供长期租赁。这使居民能够积累财富，同时又能控制由房地产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其原因在于，组屋的销售通常是以99年租赁期的形式进行。这就给“业主”以足够长的窗口期，使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到老，然后进行转售，获得其投资组屋的回报。但组屋的转售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能在租约剩余年限内转售，因此这些由政府建造的公寓不会像纽约、伦敦、香港等大都市的私人公寓，或者是新加

坡本地的私人公寓那样价格暴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一方面是全球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其私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排名世界第二[5]），另一方面又是住房可负担性较高的城市之一（其80%的公民都生活在政府以较有吸引力的价格提供的组屋中）。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取得的成就也很突出。简单来说，《经济学人》杂志在2018年指出：“新加坡的教育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6]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新加坡学生的表现中看出。在旨在衡量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排名中，从这个东南亚半岛国家随机挑选的学生始终位居全球前三。这使得新加坡学生成为该地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过，新加坡真正出色之处在于其教育的结构和资金筹措方式。公立学校教师与私立机构教师的工资相当。他们会追求职业发展，争取晋升为特级教师，课程也会根据最新的教育研究进行调整。[7]将教育视为国家进步的主要手段，这是新加坡政府经深思熟虑制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新加坡的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就，正是这一战略的结果。在新加坡，大多数孩子上的都是公立小学。2020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该国一所公立小学时，重申了这一愿景。“教育是新加坡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说，“它也是政府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我们相信，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公民掌握技能，学习知识，成为有生产能力的人、有用的人，成为优秀的人，能够自食其力。”[8]

新加坡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它提供了覆盖所有公民的全民医疗服务，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自己都无须承担太多医疗费用。列格坦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全球繁荣指数衡量了全球各地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可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在2019年的列格坦全

球繁荣指数中，新加坡排名靠前，领先于日本、瑞士和韩国。

[9]就如同其教育模式，新加坡在医疗领域的强劲表现意味着其公民能够保持健康到老，并且在身体出现问题时会得到所需的照顾。此外，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不仅成果显著，而且运作效率非常高。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7%，欧盟经济体的这一占比为10%左右，而新加坡的这一占比还不到5%。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之所以性价比如此之高，在于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了公立机构与私立机构的角色与贡献。在新加坡，“政府掌控一切”，儿科教授阿伦·E.卡罗尔在向《纽约时报》分析新加坡模式时指出，“政府严格管理着国内有哪些技术可以应用，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应用这些技术；决定哪些药品和设备属于公共医疗覆盖的范畴；设定价格，决定提供哪些补贴”。政府还会采取预防性措施，比如对食品质量实施监管。不过，私营部门和自由市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初级医疗保健大多由私营部门提供，费用通常较为低廉”，约80%的新加坡人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是由全科医生提供的[10]（当涉及住院服务时，这一占比则刚好反过来。住院服务大多是由大型公立医院提供的）。记者埃兹拉·克莱因解释称，公民——而不是政府，主要通过两大计划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11]其中一个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用于支付常规性的医疗保健费用；另一个是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用于支付非常规性的重大疾病治疗费用。前者为强制加入，后者一般是自动加入，但公民可以选择退出。只有当这两个私人筹资计划都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政府才会介入，启用保健基金计划（Medifund）这一最后付款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加坡的模式与你在美国等地所看到的模式正好相反。“[美国所拥有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融资的私人交付系统，”卡罗尔解释说，“而新加坡所拥有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私人融资的公共交付系统。”[12]

此外，数字连接也是新加坡政策关注的重点。这个城市国家此前就已是数字连接领域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9年出台了“智慧国家战略”^[13]，涵盖教育、医疗、住房和交通等关键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希望确保其公民和企业能够从数字连接和相关技能中发掘更大的价值。这一战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新加坡有近一半人口都下载了Healthy365应用程序，它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和技巧，并且追踪用户的健康活动。MyInfo Business和GoBusiness网站则为数千家企业填写政府文件和申请营业执照提供了便利。通过Moments of Life应用程序，数以万计的家庭可以在网上完成各种事情——从出生登记到寻找新工作或学习新技能。^[14]每一项应用或服务从表面看来可能都只是一项微小的改进，但它们加在一起，就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精通数字领域的经济体之一。

综合来看，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和数字连接领域所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新加坡政府认识到这三个政策领域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自身在打造这些政策领域中的关键作用，从而采取果断行动，确保其民众能够从优质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服务中受益。但它避免通过意识形态路径来实现这一点，而且避免将自己视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新加坡相信强政府，而不相信大政府。”高级部长尚达曼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我们。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加坡模式没有任何缺陷。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了新加坡模式中一些令人头疼的弊端。起初，新加坡似乎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这对于一个与其他疫情“热点”地区联系如此紧密的国际化都市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新加坡政府迅速行动，部署了全国疫情检测、追踪和治疗计划，限制公共生活和（国际）出行。然而，尽管早期的抗疫行

动取得了成功，但这个城市国家还是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最初的暴发地是外籍劳工宿舍，之后从那里蔓延开来。这部分经常被遗忘的人群由此被置于聚光灯下。与大多数新加坡国民或侨民不同，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在正规系统之外，无法正常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金融时报》驻新加坡记者斯特凡尼娅·帕尔马指出，那些对政府的做法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这一事件“证明了新加坡低薪移民的‘隐形’”，但她也提到当局已经“开始行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外籍劳工宿舍的暴发。帕尔马在2020年6月写道：“新标准的制定，比如每间宿舍居住人数不得超过10人，将确保宿舍能对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公共卫生风险有更强的抵御能力。”^[15]

此外，新加坡的选举模式也与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截然不同。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始终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确实也有其他党派参与该国每五年组织一次的大选，在2020年甚至赢得了接近40%的选票。但这些反对党至今未能赢得大多数议席，也未能在政府主要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在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9年全球民主指数排名中，新加坡排第75位，落后于同地区的马来西亚（第43位）、印度尼西亚（第64位）和泰国（第68位）。这个城市国家在‘选举进程与多元化’方面表现尤其糟糕。”^[16]

最后，新加坡所遵循的路径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全精准复制的：许多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或是较贫穷的国家，即便有意向也没有能力提供同样的服务。但是，指导新加坡，还有新西兰、丹麦制定决策的那种务实的、以利益相关者为主导的理念，还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1] “Why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Home Ownership Rates,” Adam

Majendie, Bloomberg City Lab, July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08/behind-the-design-of-singapore-s-low-cost-housing>.

[2] “HDB’s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Why It Still Matters,” Singapore Government, April 2020, <https://www.gov.sg/article/hdbs-ethnic-integration-policy-why-it-still-matters>.

[3] “HDB’s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Why It Still Matters,” Singapore Government, April 2020, <https://www.gov.sg/article/hdbs-ethnic-integration-policy-why-it-still-matters>.

[4] “Why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Home Ownership Rates,” Adam Majendie, Bloomberg City Lab, July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08/behind-the-design-of-singapore-s-low-cost-housing>.

[5] “Singapore Remains the 2nd Most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 in the World after Hong Kong,” CBRE, April 2019, <https://www.cbre.com/singapore/about/media-centre/singapore-remains-the-2nd-most-expensive-housing-market-in-the-world-after-hong-kong>.

[6] “What Oth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s Schools,” *The Economist*, August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8/08/30/what-other-countries-can-learn-from-singapores-schools>.

[7] “What Oth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s Schools,” *The Economist*, August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8/08/30/what-other-countries-can-learn-from-singapores-schools>.

[8] “Education System Designed to Bring Out Best in Every Student: PM,” *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202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system-designed-to-bring-out-best-in-every-student-pm>.

[9] “The Healthiest Countries to Live In,” BBC, April 2020, <http://www.bbc.com/travel/story/20200419-coronavirus-five-countries-with-the-best-healthcare-systems>. 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衡量的是每个国家人民的健康程度和获得为维持健康所需服务的程度，具体包括健康成果、健康系统、疾病和风险因素，以及死亡率”。

[10] “What Can the US Health System Learn From Singapore?” Aaron E. Carroll,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22/upshot/singapore-healthsystem-lessons.html>.

[11] “Is Singapore’s ‘Miracle’ Health Care System the Answer for America?” Ezra Klein, Vox, April 2017,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4/25/15356118/singapore-health-care-system-explained>.

[12] “What Can the US Health System Learn From Singapore?” Aaron E. Carroll,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22/upshot/singapore-health-system-lessons.html>.

[13] “Smart Nation: The Way Forward,”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November 2018, https://www.smartnation.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smart-nation-strategy_nov2018.pdf?sfvrsn=3f5c2af8_2.

[14] “Transforming Singapore Through Technology,” Smart Nation Singapore, accessed October 2020, <https://www.smartnation.gov.sg/why-Smart-Nation/transforming-singapore>.

[15] “Surge in Covid Cases Shows Up Singapore’s Blind Spots over Migrant Workers,” Stefania Palma, *Financial Times*, June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0fdb770a-a57a-11ea-92e2-cbd9b7e28ee6>.

[16] “Singapore’s ‘democratic dawn’? Parties Adapt to New Landscape,” *Nikkei Asian Review*, July 2020,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Asia-Insight/Singapore-s-democratic-dawn-Parties-adapt-to-new-landscape>.

新西兰与“唯GDP论”的破除

如果说关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政策领域是利益相关者政府的一个关键成功因素，那么新西兰政府则表明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摆脱狭隘的GDP增长目标，转而关注更大的指标体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以及许多主要的国际组织仍然将GDP作为衡量一个特定经济体成功与否的主要变量。但我们也知道，GDP从来就不是用来衡量福祉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GDP开始普及时，它主要被用于估测一个国家的战时生产能力——鉴于当时二战即将爆发，这是一项必要的衡量指标。但此后，这一指标的发明者西蒙·库兹涅茨，还有包括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戴安娜·科伊尔和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GDP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1\]](#)

虽然世界经济论坛和经合组织都在致力于打造一套更加全面的衡量标准，但真正在实践中首先破除“唯GDP论”的国家，新西兰是其中一个。因此，新西兰的“生活标准框架”（见图10.1）值得我们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图10.1 对新西兰“生活标准框架”的表述

资料来源：根据新西兰财政部资料重绘。“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DP 18/06),”July 26, 2018, <https://treasury.govt.nz/publications/dp/dp-18-06-html>.

从概念上讲，“生活标准框架”旨在提供“一种共识，即什么能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从而能够支撑代际福祉”。从这个角度看，福祉水平的高低不能（仅仅）依靠GDP来衡量，而要基于这个国家的4类资本。[2]

·自然资本，涵盖了“支撑地球生命和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矿物和能

源资源”。

·人力资本，即“人们从事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和潜力”，具体包括人们的“技能、知识、身心健康”。

·社会资本，是指“关系到人们以何种方式共同生活、工作以及体验归属感的规范、规则和机构”，具体包括“信任、互惠、法治、文化和共同体认同、传统和习俗、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金融和有形资本，与GDP联系最为密切，因为它包括“金融资产和人造（人为生产）的有形资产，通常与支持性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具体包括“工厂、设备、房屋、道路、建筑物、医院和金融证券”。

这4类资本共同作用，决定了当前人类、整个国家和子孙后代的福祉。要想衡量这个国家的这4类资本各处于何种水平，除该框架之外还有一个商业智能仪表盘，能够显示新西兰在事关当前和未来福祉的12个领域表现如何。这些领域具体包括公民参与、文化认同、环境、健康、住房、收入与消费、工作与报酬、知识与技能、时间使用、安全和保障、社会关系和主观幸福感。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领域与我们所定义的公平的繁荣的涵盖范围密切相关。其中有三项指标关涉教育、医保和住房（知识与技能、健康、住房），两项指标对应着GDP更细化、个人化的版本（工作与报酬、收入与消费），其他指标关涉的要么是地球福祉，要么是个人福祉的要素——这些要素有些是主观性的，有些则是社会动态机制的一部分。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该框架还承认繁荣存在一项风险与韧性要素，该要素在“面对变化、冲击和意外事件”时会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这个商业智能仪表盘

尚未有一个适当的指标来衡量这种韧性。（不过，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成为政府能否成功应对风险的试金石。）

这个框架和商业智能仪表盘在新西兰管理其国家及公民福祉中是否起到了作用，以及起到多大作用，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这个商业智能仪表盘在2018年底才被激活，2019年12月首次进行了年度更新。但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视为一项指征，那么新西兰为提升福祉和韧性而采取的全面策略就取得了显著成功。2020年10月，杰辛达·阿德恩和她率领的政党明显赢得了民意支持，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是该国自1996年实施比例选举制以来，首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3]其他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政府完全可以借鉴新西兰的经验。

^[1] 对于GDP的弊端我们并不难理解。当人们生产和消费石油或煤炭时，GDP就会上升。但当人们出行不再使用汽车，而改为使用自行车或公共交通时（假设汽车更加昂贵），GDP就会下降。当银行取得财务利润时，GDP也会上升。但当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数字创新被引入时，GDP丝毫不见提升。

^[2] “The Treasury’s 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New Zealand Government, December 2019, <https://treasury.govt.nz/sites/default/files/2019-12/lsf-dashboard-update-dec19.pdf>.

^[3] “New Zealand’s Ardern Wins 2nd Term in Election Landslid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virus-outbreak-new-zealand-mosque-attacks-auckland-elections-new-zealand-b1ab788954f23f948d8b6c3258c02634>.

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

最后一个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群体是公民社会。近年来，工会、非政府组织和有组织的民权团体等一直在尽力维持其在20世纪时的成员基础和影响力。但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这些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最好对这些组织持接受且支持态度。

首先以新劳动者群体和消费者群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为例。在以往的工业革命中，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传统的雇员与雇主关系，他们往往借助强大的工会，就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集体谈判。但目前这种关系正在减弱。立法改革和全球化的发展对传统的工会势力造成了第一次冲击。此外，在大多数地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零工经济几乎完全消除了工会、集体谈判以及我们几十年来所熟知的传统雇佣关系。

在一些地区，这种近乎“白板”的状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我的同事在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乘坐Grab和GoJek两家共享出行公司的摩托车和汽车到处跑，司机们对于零工经济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多都是很热衷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之前是农业工人，或者在城市里打过零工。没有传统的劳动合同并不构成障碍，也不会带来不便，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事实上，共享出行公司所使用技术，反而提升了他们工作和报酬方面的透明度，提供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甚至有一些之前在工厂工作的司机，也对于转行成为零工经济从业者表示满意。其中一位司机告

诉我们，成为Grab的司机后，他的月薪平均是在工厂工作时的4倍。

这种经验并不是这个亚洲群岛国家独有的，也并不只是传闻。在世界各地，设计师、司机、杂活工和许多其他行业人士都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水，这要归功于Upwork、TaskRabbit、Fiverr等自由职业服务平台，还有滴滴、Grab、来福车等打车平台。在塞尔维亚、巴基斯坦或乌克兰等国家，除了在传统就业市场上找工作外，借助在线平台签订自由职业合同已经成为另一种流行的选择。

但在其他很多情况下，零工经济的出现对于劳动者来说并不那么友好。例如，在美国，打车公司的兴起意味着数十万劳动者无法享受传统就业过去所提供的法律保护和经济福利。以美国最大的个人出行市场纽约市为例，截至2018年底，优步或来福车司机平均每小时净收入为11.9美元，远低于当年早些时候纽约州设定的法定最低时薪15美元。[\[1\]](#)（后来这一群体的收入被提升至符合最低工资标准。）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成立的网约车平台司机工会——独立司机协会（the 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的阿齐兹·巴表示，许多零工经济从业者受到的冲击比其他从业者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没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而且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们的平均财务状况更加不稳定。

[\[2\]](#)

类似的情况也在消费市场上演。几十年来，国际消费者协会及其在各个国家的附属机构等，与连锁零售商、消费品公司、政府服务部门展开争论，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消费者保护团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依靠的是坚实的会员基础。会员每年缴纳会费，团体代表会员的利益发起集体诉

讼，从而使会员收益。但这些团体近年来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选择新加入这些团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少，还有些会员选择退出，导致这些团体的行事手段和议价能力都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作为新型销售商出现，经常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并且较少以实体商店的形式存在。随着许多这类互联网平台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行动范围需要做出改变，从原来就产品质量和最佳选购地点提出建议，转向对平台企业的操作进行审查。

但为了缓解这些新出现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我们需要新的公民社会团体。单靠企业和政府无法找到满足劳动者与消费者需求的解决方案。当下时代，有哪些组织是新成立的，又有哪些组织经历了凤凰涅槃？

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

“人类前进组织”（Humanity Forward）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这是由之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创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意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BI）计划，厘清数据所有权。^[3]人类前进组织对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构想是，每月向每个美国成年人提供1 000美元的支票，认为这样可以为零工经济从业者以及生活或工作缺乏基本安全保障的人提供安全缓冲。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般是万能之计，但它确实渗透着利益相关者模式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前者主张每个人都应获得平等的机会，后者则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干扰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计划展开进一步审查和辩论。

杨安泽提出的将“数据作为产权”写入法律的倡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即个人可以通过现代利益相关者途径围绕自己的权利聚合在一起。杨安泽认为，“个人需要对自己所产生的数据拥有所有权，有权知道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并且加以保护”，他不赞同当前互联网平台的做法，即“数据由搜集者所有”（也就是由互联网平台所有）。[4]人类前进组织希望将消费者团结在一起，发挥他们共同的力量，迫使监管机构和企业尊重消费者对数据的所有权，确保消费者在分享自己的数据时会获得报酬。为此，消费者可以注册“数据红利项目”。[5]正如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道：“该项目正押注于集体行动，希望以此来变革法律，将数据产权归于全国各地的用户。”这些倡议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所在社会的公民是否支持。但它们表明了，在当今科技赋能经济的时代，个人同样可以聚集起来，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正是通过这些公民社会的行动，社会才得以发展得更好。

现代工会

之前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的工作场所也应该有现代工会的立足之地，比如杰弗里·赫希和约瑟夫·赛纳就在他们的论文《现代经济的现代工会》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6]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在丹麦等国家，工会会员在劳动者中的占比依然很高，建设性态度带来的是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和薪酬，而且劳动者得以不断学习新技能。这就是工会力量的最佳体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英国、美国等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如何经历了工会会员的大量流失和工会权力的大幅减弱，与之相伴的是工资水平降低，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减少。如果说这种工会拥护度和工会权力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工会政策导致的结果，那么

正确的做法是终结这些政策。同时，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不断增多，然而传统工会至今仍基本无法恰当地应对挑战。

对于零工经济的从业者来说，组建一个现代工会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据估计有5 700万自由职业者，[\[7\]](#)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签订传统雇佣合同的情况下工作。这代表着未来的工作趋势，其标志就是：Z世代（即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那些人）的劳动者中，有一半以上都以自由职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许多人还将其视为职业生涯发展的长期路径。塞尔维亚、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呈现了类似的趋势。我们在第五章提到的那名成功的设计师普蒂·普亚尔就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国家，许多年轻的从业者都是在Upwork等电子工作平台上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们的雇主往往并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美国和其他富裕经济体。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防止这些国家“人才流失”，确保有美元或其他稳定的外币流入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远程工作者的额外购买力增强当地经济。但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弊端。正如一家媒体报道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那些毕业生都梦想着远程办公、月薪2 000美元以上。[\[8\]](#)但他们可能不会直接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其实比那些正式员工更脆弱，因为他们没有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无法享受福利，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失业保护。

但人们不应因此而感到绝望，而是应该致力于打造新形式的劳动者工会和国际合作。从专门为某个平台工作或专门从事某个行业的零工经济劳动者（比如司机）入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纽约的独立司机协会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零工工人崛

起”（Gig Workers Rising）组织就是这么做的。这两个团体都致力于将那些主要为优步、来福车以及其他类似的打车平台工作的司机聚集起来，争取“更好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尊重”[9]。这些司机的地位和待遇都因此而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2020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下令优步、来福车等打车和送货应用将其司机当作正式员工对待。[10]据媒体报道，这就要求这些公司要确保司机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而且要提供健康保险、加班费和带薪病假。[11]然而，关于这项立法的法庭较量一直持续至秋季。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在2020年11月投票通过了22号提案，推翻了之前关于此事的大部分立法，优步、来福车和其他的网约车平台无须将司机归为正式雇员，网约车司机再次成为临时工。[12]（截至本书写作时，相关平台在法庭上的较量仍在继续。）在纽约，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独立司机协会设法使司机的薪酬有所改善，确保了他们扣除开支后的最低薪酬超过该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15美元。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那些所谓的临时工通过这种方式组建工会组织，为自己争取体面的薪酬和福利，是正确的做法。政府要赋予他们与其他劳动者相似的权利，这是理所应当的常识。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亚历克斯·伍德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所主张的：“如果你选择为某一平台工作就无法为其他平台工作，如果他们掌控了你的数据，如果信用体系将你捆绑在这一平台，这时候你就需要劳动保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劳动法。”[13]从临时工的角度来说，相关企业最好能考虑他们的需求，设立一个与工会组织进行协商的机构，而不是直接与他们在法庭上对抗。

通信、信息技术或创意设计等其他行业的自由职业者，最好

也能组成行业利益集团，以争取更好的保护条件。这种远程工作的市场往往是虚拟的和/或国际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标准必然会陷入“逐底竞争”。比如，理应可行的一种方式，是要求特定州或国家针对临时工岗位设定统一的最低时薪标准，无论是“线上”劳动者还是“线下”劳动者都适用。当虚拟合同的执行需要跨越国界时可以签订新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由政府规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跨国进行虚拟通勤。要争取制定能够保障劳动者获得适当报酬的规则，这才符合工人的最大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据我们所知，当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针对自由职业者制定完全适当的法律，有效的自由职业者工会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在纽约，最大的自由职业者组织之一是自由职业者联盟 [14]，该联盟的创始人萨拉·霍洛维茨是一名律师，也是工会代表的女儿。自由职业者联盟主要以提供优惠的健康保险、技能培训和联合办公空间而著称。它也是《自由职业者不免费法案》（Freelance Isn't Free Law）的早期倡导者和发声者，称该法案能够“保护自由职业者不被拖欠工资”，而且“为其他城市和州提供了蓝本”。 [15] 不过，该组织至今并未为其所代表的自由职业者争取最低工资标准和福利，这使得它更像是一个提供会员福利的会员制组织，而不像是工会。它也因此而遭到来自左翼的批判。“自由职业者联盟对待劳动者的方式就如同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它不配被称为工会。”社会主义刊物《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在早期批判该组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6]

此外，针对零工经济的监管大多都仅仅局限于出租车司机和送货司机等类似的岗位，而对劳动关系依附性较弱的劳动者或进

行虚拟通勤的劳动者则关注较少。例如，欧洲议会在2019年4月通过了有关“引入雇员权利最低限度保障的新规定”^[17]，包括禁止制定排他性条款，雇员有权在雇主逾期取消订单时获得赔偿，有权免费接受强制性培训。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帮助那些家政工人、随叫随到的司机或快递员，以及所有签订零工时合同的劳动者，^[18]但正如鲁汶大学的瓦莱里奥·迪·斯特凡诺等劳动经济学家所指出的，^[19]这些规则没有为其他自由职业者提供类似的权益，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来自乌克兰、塞尔维亚、巴基斯坦或印度等国的信息技术人员。

倡导团体

公民社会中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其关切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应该被考虑到，那就是新兴的倡导团体和其他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比如发起“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团体、LGBTQ权益团体、倡导男女同工同酬的团体，还有其他力争自己的利益不被忽略的团体。每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都应该设法与这些新兴的公民社会团体进行对话。这些团体往往由新一代的公民和劳动者带领，他们的关切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有所增加。因此，只要把准他们的脉搏，便能更好地掌握所有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要正常进行此类对话并不容易，要解决那些公开的问题也不容易。有些歧视问题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诸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存在的原因通常是系统性的，这意味着单个利益相关者很难凭一己之力完全消除这些问题。而且，虽然有些需求已经刻不容缓，亟须得到满足，但要平衡发展与稳定，或是要协调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需求冲突，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很难一蹴而就。最后，虽然那些成熟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大多都有明确指定的发言人或谈判代表，但一些新兴的倡导团体不愿意指定

正式的领导者。（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强迫他们指定这样一位领导者。）

上述所有情况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很难考虑到这些公民社会团体的关切，从而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去试图进行对话，不邀请这些倡导团体或少数群体的代表参与决策，或是不采取具体行动以实现社会正义。一个社会要想取得发展，必须使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今后有任何一个成员掉队都是不可接受的。面对人们追求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和气候公平的呼声，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首先应该认同利益相关者责任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企业季度会议和年度会议的议程。其次，他们应该明确自己在多样性与包容性、薪酬平等、工资水平等领域的目标，并且表明他们正在试图与哪些团体接触。（近年来，从第一能源[20]到星巴克[21]等一些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将高管薪酬与招聘和晋升的多元化挂钩。）最后，他们应该每年报告自己在衡量指标和目标的选择上所取得的进展，并就进展情况向其利益相关者做出解释。

在更实际的层面，想要了解如何实现社会正义，不妨将目光转向一些人们通常想不到的地方。以巴基斯坦的希迪（Sheedi）族的情况为例。[22]我是通过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才了解这个群体。（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是由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组成的，世界经济论坛创建该社区的目的是确保下一代，即20~30岁的年轻人被赋能，从而帮助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他们会就自己所观察到的当前存在的不平等和全球性挑战互相沟通，并且致力于共同应对这些挑战。目前，该社区活跃在全球400多个城市，从亚特兰大到阿克拉，从苏黎世到萨格勒布。[23]）希迪族是南亚最大的非洲裔少数民族群，人数达数十万，是“过去几

个世纪里以南亚为家的非洲奴隶、水手和士兵的后代”[24]。几十年来，这个群体一直被边缘化，“既要努力克服外界偏见，又要与更广泛存在的社会经济弊端做斗争”。

但在2018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那一年，坦泽拉·坎布拉尼，一位39岁的希迪族女性、三个孩子的母亲，成为第一位当选信德省议会议员的希迪族人，信德省是这个国家非洲裔巴基斯坦人数量最多的省份。正如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员所指出的，“当时这一开创性选举结果饱受异议，还有一名同一党派成员辞职”，但自当选以来，坎布拉尼“对于希迪族在巴基斯坦遭受的歧视直言不讳”，并得到了其所在党的党魁比拉瓦尔·布托（被谋杀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之子）的支持。事实上，“2019年3月，坎布拉尼推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处罚那些对希迪族学生表现出种族歧视行为的教育工作者，”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员写道，[25]“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她还在省议会中发起了一项抗议决议，反对美国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

鉴于所面临的歧视问题的系统性特征，无论是坎布拉尼反对希迪族遭受歧视的斗争，还是各种基层运动，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中间会经历跌宕起伏。但从中可以吸取的一项重要经验教训是，当少数群体或其他倡导团体能够参与决策时，坎布拉尼以及其他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进程将会加速。议会代表可以帮助指出少数群体或其他群体面临的问题，从而助力这些群体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赢得大众的信任。例如，根据国际新闻机构路透社2020年6月的报道，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被杀后，坎布拉尼在信德省议会上发起了一项抗议决议，旨在反对“种族主义浪潮”。同样地，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员在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互联网议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称赞坎布拉尼是一

位社区领袖，并将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巴基斯坦希德族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进行类比。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坎布拉尼的议员身份都有助于赢得大众对于文章内容，以及文章中所谈论的争取社会正义事业的信任。

从以上所谈论的马士基集团、新西兰以及公民社会团体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经验是，组织和个人要想取得成功，不能只遵循传统模式。历史发展的进程伴随着信念、实践和学说的不断演化。组织一心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并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丝毫不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时代已经终结。在这样一个互联的社会里，每个行为主体的成功都取决于与其他许多行为主体的广泛连接和互动，决策做出的前提是要能够给整个系统带来积极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这具体意味着：那些坚持股东利益至上理念的企业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会被淘汰；那些已经认识到相关迹象并开始实践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企业则将顺应历史潮流，扬帆远航。

[1] “Uber and Lyft Drivers Guild Wins Historic Pay Rules,” 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 December 2018, <https://drivingguild.org/uber-and-lyft-drivers-guild-wins-historic-pay-rules/>.

[2] “I’m a New York City Uber Driver. The Pandemic Shows That My Industry Needs Fundamental Change or Drivers Will Never Recover,” Aziz Bah, Business Insider, July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lyft-drivers-covid-19-pandemic-virus-economy-right-bargain-2020-7?r=US&IR=T>.

[3] Humanity Forward, <https://movehumanityforward.com/>.

[4] Data as a Property Right, Humanity Forward, <https://movehumanityforward.com/data-property-right>.

[5] “Andrew Yang Is Pushing BigTech to Pay Users for Data,” The

Verge, June 2020, [https:// www.theverge.com/2020/6/22/21298919/andrew-yang-big-tech-data-dividend-project-facebook-google-ubi](https://www.theverge.com/2020/6/22/21298919/andrew-yang-big-tech-data-dividend-project-facebook-google-ubi).

[6] “A Modern Union for the Modern Economy,” Jeffrey M. Hirsch and Joseph A. Seiner, *Fordham Law Review*, Volume 86, Issue 4, 2018, <https://ir.lawnet.fordham.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5483&context=frr>.

[7] “Sixth Annual ‘Freelancing in America’ Study Finds That More People Than Ever See Freelancing as a Long-Term Career Path,” Upwork, October 2019, <https://www.upwork.com/press/2019/10/03/freelancing-in-america-2019/>.

[8] “The New Balkan Dream Is a \$2,000 Per Month Telecommute,” Sandra Maksimovic, Deutsche Welle, August 2018, <https://www.dw.com/en/the-new-balkan-dream-is-a-2000-per-month-telecommute/a-45258826>.

[9] “About Us, Gig Workers Rising,” <https://gigworkersrising.org/get-informed>.

[10] “Court Orders Uber, Lyft to Reclassify Drivers as Employees in California,” Sara Ashley O’Brien, CNN, August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8/10/tech/uber-lyft-california-preliminary-injunction/index.html>.

[11] “Court Orders Uber, Lyft to Reclassify Drivers as Employees in California,” Sara Ashley O’Brien, CNN, August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8/10/tech/uber-lyft-california-preliminary-injunction/index.html>.

[12] “Human Capital: The gig economy in a post-Prop 22 world,” Megan Rose Dickey, TechCrunch, November 2020, <https://techcrunch.com/2020/11/07/human-capital-the-gig-economy-in-a-post-prop-22world/>.

[13] “The Government’s Good Work Plan Leaves the Gig Economy Behind,” Sanjana Varghese, *Wired Magazine UK*, December 2018,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good-work-plan-uk-gig-economy>.

[14] “This New Program Aims to Train the Growing Freelance Workforce,” Yuki Noguchi, NPR, January 2019, <https://www.npr.org/2019/01/04/681807327/this-new-program-aims-to-train-the-growing-freelance-workforce?t=1597649731065>.

[15] “The Freelance Isn’t Free Law,” Freelancers Union, <https://www.freelancersunion.org/get-involved/freelance-isnt-free/>.

[16] “A Union of One,” Ari Paul, *Jacobin Magazine*, October 2014.

[17] “Gig Economy: EU Law to Improve Workers’ Rights,” European Parliament, April 20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190404STO35070/gig-economy-eu-law-to-improve-workers-rights-infographic>.

[18] “Gig Economy: EU Law to Improve Workers’ Rights,” European Parliament, April 20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190404STO35070/gig-economy-eu-law-to-improve-workers-rights-infographic>.

[19] “Gig Economy Protections: Did the EU Get It Right?” Knowledge at Wharton, May 2019,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eu-gig-economy-law/>.

[20] “Want More Diversity? Some Experts Say Reward C.E.O.s for It,” Peter Eavi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4/business/economy/corporate-diversity-pay-compensation.html>.

[21] “Starbucks Ties Executive Pay to 2025 Diversity Targets,” Heather Hadd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tarbucks-ties-executive-pay-to-2025-diversity-targets-11602680401>.

[22] “Black Lives Matter—for Pakistan’s Sheedi Community Too,” Zahra Bhairwala, Neekta Hamidi, Sikander Bizenjo, World Economic Forum Agenda, August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8/black-lives-matter-for-pakistan-sheedi-community-too/>.

[23] Global Shapers Community,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globalshapers.org/>.

[24] “Meet the First African-Pakistani Lawmaker,”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9/meet-the-first-african-pakistani-lawmaker/>.

[25] “Black Lives Matter—for Pakistan’s Sheedi Community Too,” Zahra Bhairwala, Neekta Hamidi, Sikander Bizenjo, World Economic Forum Agenda, August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8/black-lives-matter->

for-pakistans-sheedi-community-too/.

结语 通往利益相关者模式之路

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只能待在家里和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静观其变，通过视频电话了解他人的状况。在日内瓦，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以往川流不息的街道、繁华的商业活动、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已不见，整座城市陷入令人不安的寂静。与之相对的则是医院里一片纷乱的场景，所有病房被匆忙改造为临时的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收治点，同样充斥着令人不安的氛围。

身处危急时刻，人们很难对全球的未来前景保持乐观。数百万人失去生命或身患重病，数千万人乃至上亿人失去了谋生手段。可能有远超10亿的儿童和老人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前者连续数月无法去上学，后者则长时间见不到他们所爱的人。或许，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暂时下降，稍微缓解了地球大气层的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开始猜测：疫情结束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是否真的会改良发展路径，还是说我们会回归以往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转向利益相关者模式，还是说我们注定要退回那种更注重眼前利益、更自私、更原始的模式？

读完本书的第一部分后，你可能倾向于给出一个悲观的答案。正如在前几章所见，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许多人的亲身经历所示，这些问题似乎不光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世界上每一个国

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几乎都在加重，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气候变化问题在恶化，从美洲大陆到亚洲大陆的社会和政治分裂都在加剧。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通往衰退的道路异常黑暗，吞噬掉一切进步的可能。

本书的第二部分阐明，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但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没有捷径，即便我们已经掌握了摆脱这种循环的机制。每天都有新技术诞生，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地球环境。自由市场、贸易及竞争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愿意，它们可以让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好。但我们如今所处的现实并非如此。

技术进步通常发生在垄断经济中，它被优先用于提高企业利润，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创造了巨大繁荣的经济体系，在今天却带来了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在二战后促进了全球进步和民主的政治体系，如今却引发了社会的不和谐与民众的不满。这些政策无一不出于良好的意图，但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然而，我们不应该垂头丧气。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良性经济体系是有可能被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一体系的建成指日可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退，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因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在为了公共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而行动。疫情暴发仅仅几个月后，各国就对200多种潜在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展开研究。到2020年12月，包括美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计划进行第一批疫苗接种^[1]。疫苗的成功研发大多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跨国合作的结果。一些企业向世界经济论坛新冠肺炎专项工作组提供了许多援助，包括卫生产品、呼吸机、疫苗容器和资金，以帮助应对

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政府和企业之间也有着强烈的合作意愿，以保障疫苗研发和分发所需的经费充足到位。在我看来，这些行动表明，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改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它们还表明，随着每个人都在奋力地抗击疫情，这场危机还可能激发出我们所有人最好的一面。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尝试说明这种良性本质会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而不是少数特例。我还阐明了企业、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公民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重塑。它们可以放弃追逐短期的利润或狭隘的私利，转而追求全人类和全地球的共同福祉。这无须进行180度的大转变，企业无须停止为其股东谋求利润，政府也无须改变把公民福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

它们需要做的，只是把目光放长远，不再局限于下个季度或下个财年，而是要关注下个10年和下一代人；它们需要做的，只是把其他人的关切考虑在内。这就是马士基集团等企业的做法，它们在这么做的同时还保持着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也是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做法，在关心他人和地球的同时，为国家的全体公民和企业带来繁荣。

我们应当以这些开拓者为榜样。在追求其他更加短期的目标的同时，我们应该对未来进行深入思考，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或使命宣言，阐明我们将如何为人类和地球更加广泛的福祉做出贡献。建立这样一个良性经济体系并不是乌托邦式理想。包括企业领导人、投资者和社区领袖等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对世界和他人生活的影响持有相似的态度，大多数人都想做善事。但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领导者提供指引的明晰指南，在最近几十年一直是缺位的。

在过去30~50年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日益占据上风。其核心理念是：市场无所不能，“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以及政府应当避免为市场的运作制定限制性规则。这些教条式理念被证明是不对的。但幸好我们不是命中注定要遵循这些教条。

正如我在本书的前面多次提到的，2020年9月，由美国银行的CEO布莱恩·莫伊尼汉领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发起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倡议，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一个更加良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有可能被建立起来的。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一些非财务指标和披露会被纳入企业年报（基于自愿），从而使得衡量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进展情况成为可能。

这样做将使我们能够回答许多问题，例如：某企业的性别薪酬差距如何？它雇用和晋升的人中有多少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它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如何？它在全球以及各司法辖区内缴纳了多少税款？它在招聘和培训员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但是，为什么这个项目现在才开始取得成效呢？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数十年来一直在倡导企业不应当只致力于优化短期利润。在2016年前后，出现了一些商业领袖，他们希望私营部门能够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具体作用。布莱恩·莫伊尼汉，以及飞利浦总裁万豪敦、百事公司时任CEO卢英德等人都赞同这一理念，并且动员许多同行签署了一份确认承诺的合约。

在接下来的几年，来自“星期五为未来”（由格雷塔·通贝里发起）、MeToo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正义运动及气候正义运动的压力增强了这种紧迫感。企业需要做的不只是许下一个

善意但模糊的承诺。在2019年夏，布莱恩等人提出一种想法，即创建一种用来衡量企业表现的工具，以替代此前一直存在着的“各种大杂烩式指标”[2]。同年秋，这项工作便已经开启。“四大”咨询公司——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参与制定了衡量指标。

截至2020年1月，关于这套衡量指标的第一份征求意见稿已经准备就绪，并受到热烈欢迎。然后，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这场疫情成为一块真正的试金石。这个项目能否挺过这场全球危机？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整个利益相关者理念是否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夭折？就在数月前，美国影响力巨大的企业游说团体——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已经对利益相关者理念表示支持。但现在，人们开始担心在企业中，这种支持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早期承诺会让步于更加现实、更加自私自利的行为：能省则省，即使这意味着要解雇员工或削减供应商。

不过，现实情况是，企业对于这一项目的热情反而有所增长。世界经济论坛这一项目的负责人玛哈·埃尔托吉告诉我们：“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这场危机中。”因而，当2020年春季的一场线下会议被取消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主要项目发起人立即召开了一场线上会议。这正是完成该项目的良好契机。因此，在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我们在举办了许多研讨会、访谈会和其他会议后，终于在2020年秋确定并公开发布了这些指标。正是这些进展让我看到希望，即利益相关者模式不会只是昙花一现，而会成为我们未来经济体系的一个固有特征。

当然，我们距离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目标还很遥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

众多举措之一，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在悲观情绪日益盛行、狭隘且短视的自私自利行为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这些举措表明，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经历了二战的浩劫之后，我有幸生长在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利益相关者思维的小镇和社会中。我看到了利益相关者思维在我父亲的工厂中发挥了作用。在那里，从一线工人到高层管理者，所有人都同样致力于实现企业和产品的长期成功，而且在成功到来时，每个人都能分享到成果。我在战后的腓特烈港和拉芬斯堡看到了利益相关者思维，当地政府及所有公民凝心聚力，重建被摧毁的家园。从那时起，无论是身处商界还是政界，从土瓦本到新加坡，我始终在提倡利益相关者模式。

我希望，在读完本书后，你也能够从心底里接受利益相关者模式。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一样认识到：世界的现状并非既定不变，只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还希望，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所有人能够从现在开始共同打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更有韧性、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这就是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本质所在：一个致力于促进发展、增进人类和地球福祉的全球经济。

[1] “US, Germany and UK could start Covid vaccinations as early as December”, Helen Sullivan, *The Guardian*, Novem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nov/23/us-germany-and-uk-could-start-covid-vaccinations-as-early-as-december>.

[2] “World Economic Forum Aims to Make ESG Reporting Mainstream,” Amanda Iacone, Bloomberg Tax, September 2020, <https://news.bloombergtax.com/financial-accounting/world-economic-forum-aims-to-make-esg-reporting-mainstream>.

致谢

这本书是真正的团队合作的成果。这本书的内容能够成形，离不开父母对我的教育，离不开我所在的社区和社会，离不开我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伙伴，也离不开世界经济论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对我来说，这也是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的体现。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感谢那些有意或无意地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请允许我在此仅对那些积极参与本书创作的人员致以真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彼得·万哈姆，他是我的通信主管，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得力助手。作为本书项目的成员，两年来，彼得不辞辛苦地走访世界各地，从网络图书馆中搜集各种资料，与多方人士进行交谈。在我们着手写作的过程中，从起草书稿各个部分的内容，到思索21世纪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蓝图，他在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50年前，我撰写了第一本关于利益相关者原则的书，如今很高兴看到像彼得这样的新一代全球化公民正在接受利益相关者理念，并且助力其适用于未来世界。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我还要感谢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多年以来，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成为真正的“老搭档”。博尔格负责世界经济论坛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因此，在过去几个月，尽管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我仍然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撰写本书。

阿德里安·蒙克、梅尔·罗杰斯、凯利·奥蒙森和苏珊娜·格拉斯迈尔等，都是本书的密切合作者，为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

经济论坛公共参与事务主管阿德里安是内部人员中第一个支持本书项目的人。他担任了书稿的第一编辑和写作风格顾问。如果读者喜欢本书的“第一手”报告式写作手法，这要归功于我们所选择的阿德里安风格。梅尔是一位重要的战略顾问，她在疫情期间不断地激励所有相关人员坚持不懈。凯利和苏珊娜促成了许多访谈，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基础。所有人集思广益，为本书的内容、标题及封面设计建言献策。

还有我们的家人、同事以及外界的合作伙伴等许多人，都为本书最终成稿做出了贡献。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希尔德，她在我们讨论这本书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而且在各种场合扮演了批判性读者的角色。我还想感谢本书的几位“第二读者”，他们分别是曾与我合著《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的蒂埃里·马勒雷、世界经济论坛北美负责人保罗·斯梅克、我在华盛顿特区的重要决策咨询人艾伦·弗莱什曼，以及彼得的妻子瓦莱里娅·苏皮尼。在本书撰写的各个阶段，他们都提供了重要的反馈、支持和编辑建议。

我还要感谢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董事会主席杰西·威立、总编辑比尔·法隆、主编布尔维·帕特勒、项目编辑克里斯蒂娜·维里根，以及文字编辑和平面设计团队，是他们让本书得以面世。杰西和比尔最先认同本书。他们于2018年12月和我在纽约见了面，并承诺提供帮助。比尔和布尔维在随后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耐心细致的指导，所以本书才能够在2021年1月的达沃斯议程周前及时在书店上架。克里斯蒂娜·维里根对本书进行了专业的编辑，给予了内容和风格上的反馈，促成了本书的最终版本。

在确定和定义利益相关者模式方面，我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世界经济论坛成员的帮助。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的同事，包括曲鹏程、李木梓和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协助我们采访了中国的相关人士。在世界经济论坛纽约代表处，玛哈·埃尔托吉发挥了协调作用，使国际工商理事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领导聚集在一起，商讨制定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我还要特别感谢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正是由于他的卓越领导力和远见卓识，那些承诺遵循利益相关者原则的企业才得以借助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践行诺言”。

我还要感谢所有接受本书采访的学者、记者、企业领袖、全球杰出青年、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部长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到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杰出青年安妮莎·维比和温斯顿·乌托莫，他们拓宽了我们对全球经济的视野，让我们认识到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所需的重要基石。我会在下文采访致谢部分感谢每一位受访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要感谢我已故的父母欧根·威尔海姆和埃丽卡。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中，他们依然尽可能为我提供了所有条件，让我成为一名国际公民。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得以结识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得以到处旅行和出国留学。我的父亲是我的榜样。作为企业领导者，他兢兢业业。二战后，他挺身而出，承担起国内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些重任。他通过言传身教鼓励我拥抱利益相关者模式。我的父亲认为，企业领导者应当把经验和能力运用到公共职能上。他还认为，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对此，对所有人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永远心存感激。

我还要感谢以下每一位接受本书采访的人，感谢你们为本书付出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有益的见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按人名字母顺序排列）

·Adi Reza Nugroho（安迪·雷扎·努格罗霍），MYCL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印度尼西亚万隆。

·Ahadu Wubshet（阿哈杜·伍布谢特），摩尔咖啡创始人兼总经理，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

·Angel Gurria（安赫尔·古里亚），经合组织秘书长，法国巴黎。

·Annisa Wibi Ismarlanti（安妮莎·维比·伊斯马兰蒂），MYCL联合创始人兼财务总监，印度尼西亚万隆。

·Araleh Daher（阿拉莱·达赫），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销售主管，吉布提共和国吉布提市。

·Arekha Bentangan Lazuar（安雷卡·本丹根·拉祖尔），MYCL联合创始人兼技术总监，印度尼西亚万隆。

·Asrat Begashaw（阿斯拉特·贝加肖），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公关经理，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

·Carl Benedikt Frey（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技术与就业项目联席主任，英国牛津。

·Chong'En Bai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北京。

·Claus Jensen (克劳斯·延森)，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主席，丹麦哥本哈根。

·Daniel Moss (丹尼尔·莫斯)，彭博社亚洲经济评论专栏作家，新加坡。

·David Autor (戴维·奥特尔)，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David Lin (林戴维)，全球足迹网络首席科学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David M. Rubenstein (戴维·M.鲁宾斯坦)，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主席，美国纽约。

·Diane Coyle (戴安娜·科伊尔)，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英国剑桥。

·Dominic Waughray (多米尼克·沃雷)，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公共产品中心主管，瑞士日内瓦。

·Fabiola Gianotti (法比奥拉·贾尼奥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总干事，瑞士日内瓦。

·Geert Noels (基尔特·诺埃尔斯)，Econopolis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利时安特卫普。

·Gideon Lichfield (吉迪恩·利奇菲尔德)，《麻省理工科技

评论》主编，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Greg Ip（格雷格·伊普），《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美国华盛顿特区。

·Guohong Liu（刘国宏），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深圳。

·Heather Long（希瑟·朗），《华盛顿邮报》财经记者，美国华盛顿特区。

·Heinrich Huentelmann（海因里希·亨特尔曼），“拉芬斯堡人”全球公共关系主管，德国拉芬斯堡。

·James Crabtree（詹姆斯·克拉布特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新加坡。

·Jim Hagemann Snabe（施杰翰），马士基集团董事会主席、西门子董事会主席，丹麦哥本哈根。

·Joseph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纽约。

·Josh Bivens（乔希·比文斯），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美国华盛顿特区。

·Kai-Fu Lee（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北京。

·Laurence D. Fink（劳伦斯·D.芬克，又称拉里·芬克），贝莱德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纽约。

·Lina Khan（丽娜·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纽约。

·Liwei Wang（王力为），财新传媒资深作家，中国北京。

·Maha Eltobgy（玛哈·埃尔托吉），世界经济论坛塑造投资未来负责人，美国纽约。

·Michelle Bachelet（米歇尔·巴切莱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瑞士日内瓦。

·Min Zhu（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北京。

·Nicholas Stern（尼古拉斯·斯特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英国伦敦。

·Nicholas Thompson（尼古拉斯·汤普森），《连线》杂志主编，美国纽约。

·Puty Puar（普蒂·普亚尔），插画师和内容创作者，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

·Richard Baldwin（理查德·鲍德温），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瑞士日内瓦。

·Richard Samans（理查德·萨曼斯），国际劳工组织研究主任，瑞士日内瓦。

·Robert Atkinson（罗伯特·阿特金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美国华盛顿特区。

·Robin Løffmann (罗宾·勒夫曼)，曼恩能源方案公司代表，丹麦哥本哈根。

·Roland Duchatelet (罗兰·杜查莱特)，迈来芯公司创始人，比利时圣特雷登。

·Saadia Zahidi (萨迪亚·扎西迪)，世界经济论坛新经济与社会中心主任，瑞士日内瓦。

·Sean Cleary (西恩·克利里)，未来世界基金会执行主席，南非开普敦。

·Seniat Sorsa (塞纳特·索尔萨)，宏远服饰分公司总经理，埃塞俄比亚阿瓦萨。

·Susan Lund (苏珊·伦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合伙人，美国华盛顿特区。

·Tharman Shanmugaratnam (尚达曼)，新加坡政府高级部长，新加坡。

·Thomas Søby (托马斯·斯瑟比)，丹麦金属行业工人工会首席经济学家，丹麦哥本哈根。

·Tilahun Sarka (提拉洪·沙卡)，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标准铁路公司总经理，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

·Tim Wu (吴修铭)，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美国纽约。

·Tristan Schwennsen (特里斯坦·施文森)，“拉芬斯堡人”首席档案管理员，德国拉芬斯堡。

·Wei Tian (田薇)，中国国际电视台《微观世界》主持人，中国北京。

·William Utomo (威廉·乌托莫)，IDN Media创始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Winston Utomo (温斯顿·乌托莫)，IDN Media创始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Yu Liu (刘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低碳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中国深圳。

·Zia Qureshi (齐亚·库瑞什)，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发展项目客座研究员，美国华盛顿特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利益相关者 / (德) 克劳斯·施瓦布 , (比) 彼得·万哈姆著 ; 思齐 , 李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1.6

书名原文 : Stakeholder Capitalism

ISBN 978-7-5217-3027-2

I. ①利... II. ①克... ②彼... ③思... ④李... III. ①世界经济 - 经济可持续发展 - 研究 IV. ①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56571号

利益相关者

著者 : [德]克劳斯·施瓦布 [比]彼得·万哈姆

译者 : 思齐 李艳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开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 12.25

字数 : 308千字

版次 : 2021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21-2872

书号 : ISBN 978-7-5217-3027-2

定价 : 7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野猫记

池鱼

行云

梦见

雌蕊

血童话

男左女右

幻兽之吻

安静的风暴



周晓枫——著

中信出版集团

幻兽之吻

周晓枫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野猫记

池鱼

行云

梦见

雌蕊

血童话

男左女右

幻兽之吻

跋：安静的风暴

野猫记

1

我对邻居的负评，因为野猫发生转折。

我们住一楼，门前有个下沉式小花园。我疏于打理，只种了一层敷衍的草皮，斑秃似的生长着。邻居家利用这块空地，搭建了半间玻璃房，剩下的地面铺满瓷砖。他家养了巨型狼犬，它还是条小奶狗时，就能看出是城市禁养的危险品种。幼年期的狼犬，每天还能放到院子里几分钟去拉撒。长大了，不行，它的样子接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里的恶魔。狼犬每天在玻璃房里狂吠一会儿——它炭黑的脸阴郁，骨白的牙冰冷，令我不寒而栗，路过的孩子有时会被吓哭。

邻居家的男主人彪悍，晚秋也光着膀子在外面走动——他的后脖颈上积着一圈发硬的肉。他直接跳入小区草坪，搬开井盖，拧动阀门，接上胶皮管，用公共水源给自家院子浇灌花草。女主人样貌年轻，睡醒了，不换睡衣、首如飞蓬……但她对流浪猫来说，美丽如天使，明亮如圣母。

邻居家也养猫。两只名贵些：一只美短，背后花纹像地图上的等高线；一只布偶，脸上一团晕染开的深暗，像被防色狼的喷雾袭击过。此外，女主人还收养了两只残疾猫，一只路上捡的幼猫。猫猫狗狗加起来六口，家里不能再接纳什么了，何况小区里的野猫那么多。她只能把宠物的口粮，分给那些风餐露宿的小可怜。

流浪猫到离我数米之遥的邻居家取食、喝水、晒太阳。女主人不仅提供基础猫粮，还因为偏爱，给它们加餐猫罐头。一边喂食，她一边胡乱地抓起毛丛打结、藏污纳垢的猫放在怀里抚弄。胆怯的野猫也敢把身体平放在女主人的怀里几分钟，状若婴儿，然后才从这种不适应的体姿里摆脱出来。

这些流浪猫一点儿都不消瘦，除了个别天然有着整容脸追求的尖下颌，多数都有圆实的小腿、胖胖的趾爪。如果不仔细看，就注意不到它们的毛皮有种隐约的雾灰，缺乏缎光——那种经心保养才能闪烁的缎光。不过，至少从仪态上看，它们一点儿也不颠沛流离，倒有些养尊处优的架势。有只大狸猫简直胖成了短腿的柯基犬。

它们或野心勃勃，或自命不凡，它们也被自己的缺陷所害，比如一只猫蹿到了让自己下不了台的高度，在二楼阳台上发出阵阵不顾体面的哀求……后来被女邻居和孩子，搭着梯子，拯救下来。

许多孩子童年都有养猫的经历，我也有，前后养过三只。过程愉快，但总是以惆怅和悲伤结束，回忆起来有阴影。

第一次养猫，我还上小学。小伙伴掏猫窝带回来的黑白狸，起名小偷。它刚开始是贼眉鼠眼地偷东西，很快演变为公然抢劫。印象最深的一幕出现在厨房：拔光了毛的光裸鸡，鸡头被小偷死死咬住，紫瘦的鸡腿被爸爸拽住，双方都在一边咆哮，一边较力。小偷每天在院子里自由玩耍一会儿，它和第二只名为肖邦的爱听音乐的猫一样，后来自愿选择流浪和逃亡。第三只猫泡泡，在我的宠溺下，反而性格怪诞，也许是因为我当时缺乏喂养常识，它因为吃了过多的熏鸡肝而患上肾病。泡泡形销骨立，瘦到失去猫形，腹侧像是搭在脊椎上的一张猫皮……我泣不成声，无望地眼看它被一个擅长救治的朋友接走。我后来不敢追问泡泡的下落或下场，以至疏远朋友，断了彼此音信。

看样子，我不是个理想的主人，猫比我更早认识到这点。

前两年，我发现一只母猫在我荒凉的杂草院里产崽。我生怕惊动它们母子，我知道即使喂食，也会引起猫妈妈的警觉和不安，并将迅速转移幼崽。所以，我每天克制自己的好奇，始终坐在外飘窗台上，观察两米之外那些活动着的小毛球。

有一天，哺乳之后的猫妈妈出门打猎，只剩几个小崽子，在草地上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阳光晴朗，它们的毛丝有着芒尖，状如晶簇。我打开阳台上的推拉门，从露台走了几级台阶，走到下沉花园的草皮上。我什么也没干，只是近切观察了一会儿那些可爱的小家伙。真的没有碰触，我只是隔着几十厘米近距离问候。三只萌物走路都不稳，还是坚持着摇摇晃晃地挺直身子，试图用凶悍而嚣张的表情恐吓我。停留了大概十几秒，我快速后撤，怕留下自己的气味，惊扰到它们多疑的母亲。

数小时之后，母猫回来看望孩子。

我没有留下踪迹，我几乎倒退着走在自己来时的脚印上。我确信自己毫无破绽。然而，母猫当天搬家，逃难般，把自己的孩子转移到某个秘密巢穴。幼猫在草丛里的轻微压痕还没有消除，院子一下就撒得空空荡荡。问题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小崽子，它们是怎么告的黑状？我百思不解。

猫和狗是不同的。土耳其一部关于猫的纪录片里说：狗以为人类是神，猫

不这么看。猫，神秘得迹近诡异的动物，它本身被认为具有超能力。

通常认为，狗有憨厚的忠心，猫有灵巧的狡诈——甚至在身体条件上，猫都灵活到诡谲。缩骨术是人类里的杂技与绝学，表演者并非真能缩小骨骼体积，而是通过训练，压缩骨间隙，使得全身骨头有序地紧密叠排。猫的骨头有二百三十根，比人类还多二十四根，显然出自更精密灵巧的组装。猫天生就会缩骨功，大概跟它没有锁骨很有关系，这使它的前肢能在躯干轴线上幅度更大地活动，从而更加灵活柔韧。它简直可以像水流一样，摊溢并塞满窄口的玻璃圆罐，以至于有人说：猫是一种液态。

九条命的猫，擅长的奇技淫巧颇多。既可以上树，行走在细悬的树枝间；又可以高空翻转，完美落地。热爱晒太阳，在弱光环境乃至黑暗里也畅行无碍。被公认为最具好奇心的动物，又是极尽谨慎的蹑足者。猫的野外生存能力很强，并且能保持优雅和克制。有只猫潜入养殖户的院落，它每天只偷一只鸡，视之为羽毛包装起来的点心——猫有节制地享用，控制得近于自律；不像狐狸，有着作恶的乐趣，饱腹的狐狸也会无端咬死许多无辜者，不为明天节省口粮。

我们小区有假山和池塘。人有两只手也捞不起来鱼，但猫可以。仿佛会下蛊，猫凝视水面；鱼见到水面之上那双矿物质般的眼睛，就丧失反抗能力……呆滞也好，听从也好，反正结局是被猫捞出来吃了。据说鱼的记忆力不好，它们的确不长教训，每天上当，日复一日上演剧情单调的悲剧——就像单恋者倾心于让它绝望的爱人，不惜用生命去喂养自己钟情的杀手。有时两只陌生的猫相遇，它们一言不发、一动不动，长时间彼此凝视，直到瞳孔深处……我怀疑它们是在彼此下咒，比拼谁的法力更厉害。

猫不仅是城市里的宠物，乡村也爱养猫，据说只有它们能看见鬼魂渐近。出殡时要有专人守夜，陪伴逝者最后的旅程，尤其要防范着猫：传言猫若跳上棺木，里面就会诈尸。也许，因果相反。猫有狱警般的使命，它要监督关在肉身监狱里的魂魄。如果发现风吹草动，魂魄想趁机逃亡，猫就跳上去，按住棺材；魂魄疯狂挣扎，所以才会诈尸。都市里没有类似的机会，猫不会跳到棺材上，要跳，也只有一个狭小的骨灰盒——诈尸不能，顶多，腾起一团由灰烬构成的迷雾。我听到过，徘徊墓地的野猫号叫得就像孤儿院里的弃婴——那里面有一种表达不清楚的内容，我不知道那种情绪更近于神秘，还是更近于愤怒。

猫对死神的气息格外敏感。有个故事，说主人善待他的猫，猫忽然不肯好好吃饭，整晚凄伤地惨叫。主人以为猫病了，马上带它去看病，医生却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回到家以后，这只猫一反常态，惊恐挣扎，无论如何也不肯待在主人的怀里……主人抱怨这只被宠溺的猫，直到他的抱怨变成呻吟，一头栽倒在地，死了。

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暗夜；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暮色和虚无，只是为人类设置的障碍，对猫，构不成任何威胁，它畅行无阻。也许，这是神明对猫的偏爱，为了凸显它们的神异。

4

我和这些游荡的野猫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一次偶然。我发现，猫对生死的参破，确有天赋。

我爱吃螃蟹。朋友们知道我的饕餮爱好，每到应季时节，纷纷快递给我。我每天乐此不疲地拆卸，餐桌上堆积着赤红的甲壳、圆实的钳子，还有细而弯折的腿。直到有一天，吃到肠胃寒凉，腹腔痉挛且疼痛。冰箱里还剩下三只生蟹，我如何也消化不了。我稍一犹豫，眼看两只公蟹就咽气了，一只母蟹也气息奄奄——它们的生死间距，大概只有二十几分钟。河蟹昂贵，我不忍弃掷，还是把它们放进蒸锅。我把三只升腾热气的熟蟹拣出来，盛在简易纸盘里，拉开阳台推拉门，端到外面的露台上，看看野猫们有无食欲。被吸引的它们隔着距离观望，很快从邻居家跑过来，一探究竟。

它们灵巧、警惕，有着超乎想象的生存智慧。对这种它们从未见识过的生物，能分辨细微死亡气息的猫，竟天然知晓刚死的螃蟹也会积聚毒素——它们吃死鱼，不吃死蟹。它们把那只母蟹吃得很干净，找不到一丝肉屑；两只公蟹，它们不屑于尝尝一条小腿。也许，野猫把我鱼目混珠的行为视为对尊严的挑衅，它们把两只公蟹踢出盘子，让它们四仰八叉地翻倒在地上。它们能够分辨，精确到分针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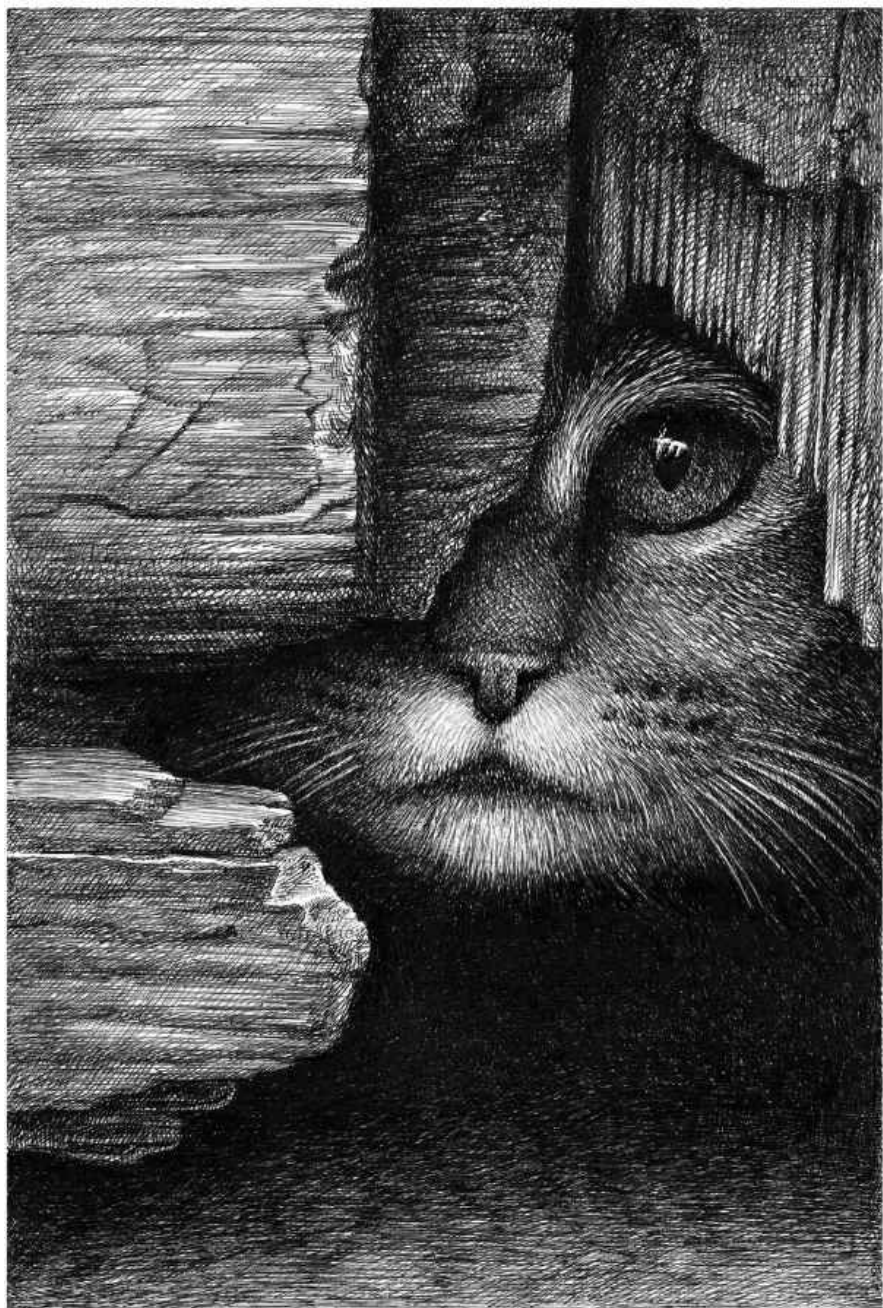
隔着推拉门的落地玻璃，它们与我对视……睥睨，然后一哄而散。

5

也许它们的眼神真让我羞愧了。虽然出差频繁，但只要在家，我总会放置一些食物和水。我谨慎选择，我知道含盐和含添加剂的食物对它们的健康不利。除了清蒸鱼、白灼虾的头尾，还有种几乎像是专为高血压病人准备的所谓熏鸡：只有肉香而毫无盐味，我又用水反复泡过，才敢喂过两次。剩下时间，我都选用猫粮。

它们挑剔，猫粮口味不同，它们有的喜欢，有的不。我出于科学上的理解，坚持喂些天然无谷的猫粮，可它们自有鉴赏力，尤其喜欢人类的鲜食。如果我喂食可以共享的食物，我是否在鼓励它们的僭越？还是说，我们靠食物建立的某种等级制度，并不能约束这些流浪而自由的灵魂？我怕

随意喂食，营养配方不全面，影响它们的健康，乃至重蹈泡泡身上的覆辙，我下决心断供别的，只喂口碑之选：各种猫粮、猫罐头和猫零食。



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暗夜；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暮色和虚无，只是为人类设置的障碍，对猫，构不成任何威胁，它畅行无碍。

它们逐渐前来，依然高度提防。发现我在偷窥，即使我站在绝对安全的距离之外，猫也会停止进食，转头，纵身跳入灌丛。我猜它们不是害怕，是难堪。猫被视为一种高自尊的动物。它们热爱清洁，每天精心打理自己，这几乎占据醒着的三分之一时间；努力掩盖排泄物，这被视作羞耻心的表现。排泄难堪，接受嗟来之食也难堪，这些小东西的内心戏丰富；除非信任，它们才肯施展撒娇卖萌的绝技，否则，它们维护着冷傲。

猫是如何判断人类，如何建立信任感的？前年冬天，地下车库有只行动迟缓的年迈猫，每次见到我，无论隔得多远，都乐颠颠地疾跑过来。它不停蹭磨我的裤角，让我蹲下来，替它搔痒或摩挲腮骨。这只老猫对其他路人非常警惕，几乎缺乏直视的胆量，最初它与我并无交道，它的直感从何而来？老猫乐于与我亲近，会随行数百米，哪怕我手里没有食物，它也能跟入电梯间和房门，信任得就像它从小就是我的家族成员。后来看不见它了，也许它没能熬过随后的冬天。

我又想起一件事，不知是聊天中的戏言，还是生活里的实情。刘亮程说他从村庄经过，所有的猫都跟随，并且向他跪拜。猫到底是出于敬畏，辨识出他有虎之威仪；还是出于好色的求欢，嗅探出他身上有撩动的气息——如此迷魅，以致它们不惜降尊以求？我难解其意。不过从此再见刘亮程，我就怀疑他有怪力乱神的能力。

随着喂食时间和频率的稳定，野猫们越来越多地光顾我的露台。它们早晨会集中来一会儿，没有谁守在这里。它们从不抢食。无论是多么诱惑的食物，它们都心如止水，团起爪子，以标准的猫式立姿站着。一只吃过早餐，不慌不忙地离开；下一只慢条斯理地靠近陶瓷的饭盆。它们三三两两，看似毫无规则，其实是按照隐形秩序在排队。

多数猫看起来年纪不大，像是青春期，只是即将成年，若算作成年就有点勉强。它们平常在哪儿？想象中，我把它当作在公园里晃荡的流浪少年，有陪它们一起浪荡的问题少女，有随遇而安的住所和食物。喝水的时候，它们弹簧般的小舌头快速进出，比弹簧刀还快。还有几只成年了，也让我想起电影镜头里，桥洞里围拢篝火餐风饮露的流浪汉们，在勉强可以避雨的夜晚抵足而眠。也许正因江湖险恶、兄弟情深，所以无论大猫小猫，它们都不抢食。

过了数日，我才反应过来。之所以不争，到底是超乎生存的情感力量，还是这本身就是生存技巧？它们一只一只有序地尝试食物，并未一拥而上——不过是，免得集体中毒？对陌生的善意，它们并未丧失警觉。

它们来来往往，新面孔此起彼伏，像缺乏管理的流动人口。有的毛色斑斓，如海龟里的玳瑁；有的表情忧郁，甚至像是有了熬夜后的眼袋。有的猫一看就是江湖出身，野力十足；有的可能经历过从宠物到弃儿的命运转折，它们依然保持着良好仪容和典雅举止，包括与人亲近的强烈渴望。有的体形优雅如芭蕾演员，有的走路骄傲得像只猎豹。它们绿松石或蜂蜜色的眼睛，闪烁着童话之美……不过，猫的视力不如人类，并且它们还是色盲。

野猫开始比小区保安还殷勤地巡查我的露台。虽然喂的都是品牌猫粮，不存在什么厨艺大赛，但邻居女主人和我，依然像两家在门口竞争拉客的服务员那样，殷切盼望到来的客人走向自家的餐桌。

渐渐地，我总能在附近发现它们的身影，拿我的露台当猫客栈；即使没有食物，它们也来此小睡。它们卧在植物已经枯死的花盆里。它们藏身在露台下面的阴影里，一旦我抓取猫粮，撕开零食的包装袋，或者拉开铁皮口的罐头……它们就像登台的谢幕演员，瞬间集体涌现。

更熟悉以后，它们喜欢透过落地玻璃向里窥视，像一群间谍。它们更喜欢溜进打开的推拉门，小心翼翼地勘探环境。如果我坐在沙发上，它们不敢前进又不愿后退，就站在它们认定的心理安全线上，观望。

猫能够长时间不眨眼睛，所以显得特别专注。最初，它们总是标准立姿，笔直地站在对面，仪态有如奢华酒店的西餐侍者，只是表情有些呆萌。后来画风变了。我感到迷惑，它们为什么一见我就乏困。无论刚才多么闪转腾挪，我们只要对视超过数秒，它们就微眯眼睛，很快半闭半挤，合拢的眼睑一线隐约。屡试不爽，它们简直无一例外。我仿佛突然成了擅长催眠的巫师，我对自己陌生的特异功能颇为不解。许久之后，我反应过来，这是向我示意信任的表情语言，比抛媚眼更端庄、诚恳。我体会到小小的暖意，只是这个景象有些诡异。进门来的六七只猫，都冲着我的方向形成小扇面，它们立姿，挤着挤着眼睛，就变成紧闭双眼……我就像面对着一个盲人乞讨团。不过，我也像一个沙眼症患者那样，频繁地挤眼，以回应它们的示好。

7

我给它们取了名字。

邋遢王子、团豹、沙漠、毯子、芭蕾……哎呀，群众演员可多了。有几只猫，每天前来报到：海盗、警长、大花生、斗斗和梦露。我承认，自己对后几位有些偏袒，它们更像是家里的常住人口。

海盗，身体是白色，尾巴是黑色，脸也是半白半黑，左边像被斜下来的眼罩覆盖。其实我最早管它叫蒙娜丽莎。因为，它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只有一个神态，总之是那种做不成表情包的猫。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样，让人分不出微笑还是感伤，可以说它是零度表情。我无法判断它的情绪起伏。不仅如此，它的专注超乎想象。它盯着我，如果是用七分脸的角度，它能始终不移半寸，连眼神的角度都不差分毫。它适合当画家的模特，它不挪动，不眨眼，甚至不会抖落身上的光线。它的削腮狭眼，有点像狐狸或者奸佞那种。它谨慎，习惯怀疑，从不只身进入房间，行动之前，它至少需要两名试探者或陪伴者。即使其他猫已经在房间里假寐了，它依旧选择离门最近的位置，以便及时逃脱。我想，这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猫，它排斥亲密。我说得对，也不对。事实上，它竟是最早与我有肢体接触的。

有一天，它们溜进阳台，准备在房间里小小午休。很奇怪，尽管在客厅里停留时间短暂，而且容易被打扰和打断，它们对升堂入室却乐此不疲。我拿了零食尝试靠近，它们倒着身子退后，一起向外撤离。我手里捏了一条很小的鱼干，向蒙娜丽莎示好。它毫无征兆，闪电般伸出前爪，打落了 my 的贿赂。似乎在表达，它在意室内和态度的温暖，远胜过区区口粮，我的表面笼络、实则驱逐的行为，近乎羞辱。我的手指，感受到它趾甲的坚硬和锋利。因为无法从表情上猜测蒙娜丽莎的心理预谋和动作变化，我从此，对它多了生分和警惕。感觉它是女性，没想到这么凶。不叫蒙娜丽莎了，改名海盗，从近似的相貌到强悍的逻辑——虽然也有女海盗，但好像不这么蒙上一只眼？管它呢，那么凶悍，就叫海盗。

我是很久以后，才理解海盗的心意，原来它只是想跟我玩。海盗的动作没轻没重，有一次它竟咬我的脚踝，留下一道拉长的牙齿划痕……它不知道怎么表达亲热才是合适的分寸。

黑猫警长，长得和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形象一模一样，简称警长；大花生是只老猫了，黄白花，嘴巴上面的胡子斑，形状像颗大花生；护士，它热衷照顾和看护，总是在帮助别人打理皮毛——它们只能叫自己的名字，没有替换的。不像海盗，是从蒙娜丽莎改名过来的；不像斗斗，也改过名。

8

斗斗，长得难看。

不像别的猫眼那样晶亮、圆润、微凸，它的眼睛平，并且下陷。它的瞳孔不居中，明显向上眼角倾靠。我分不清，这在猫世界里算近视还是斜视。斗斗也不像别的猫——胡子是集束的射线，或是微弯，在嘴巴两侧呈现小

幅的扇形，斗斗的胡子，没有神气地上扬，甚至没有支撑起码的直线，而是像老鼠须一样，弯曲得厉害，对称地塌下来，就像快合拢的括号。

斗斗和梦露的毛色相近，都是橘猫，只不过它是混沌的橘色，不像梦露那么层次清晰。梦露漂亮得惊人，一看就是女孩；斗斗从样子到性格，都是典型的男孩。它特别淘，胆子大，总是率先大摇大摆进入客厅深处，等我离猫群近了，它总是最后一个撤离。斗斗，能像越位的足球运动员那样超过我的防守线，得意地钻到沙发底下，和我兜圈子、捉迷藏。它与我的互动最多，热衷追逐逗猫棒上的毛绒挂物。

我不知道，斗斗的勇敢，来自它的好奇与热情，还是因为智力上的缺陷。它的样子就像没有正常发育，至少是在某方面还未完备。我从未见它在斗争或男女情事上有所挂碍，它每天热衷在玩耍中挑战自我。

它走路，从来不走已经好生狭窄的边台，而是走在台上架起的只有半寸宽的金属栏杆上，它就喜欢杂技般的挑战感。即使是梳舔毛发，扭头又劈腿的，它也很少在平地上完成。它喜欢跳到露台四周的防腐木桩上——那个平面，大概只有十厘米见方。斗斗得把四爪拢紧，才能维持站姿。它的胸部高耸，头颅后仰，很像拴马石上雕着的小狮子。不仅如此，斗斗竟然喜欢在上面睡觉，旁边，就是落差两米多的草地。不明白，它为什么选择在悬崖般的险境里安睡。让人担心啊，可它就那么一直待在上面，简直有着孟姜女般的决心。猫群里，只有斗斗，保持着这么古怪又执拗的爱好。

它的胆子，大到贪婪和妄想的程度。我后来发现，斗斗一点儿也不迟钝。树上落了两只喜鹊，眨眼之间，斗斗就电流一样蹿升到高高的树杈上，鲲鹏这两个被羽毛包裹的肉团。喜鹊无动于衷，因为它们站立的枝条非常纤弱，根本承载不了斗斗的体重。另外有只喜鹊，甚至从相隔二十米的邻树上飞过来，更靠近也更戏弄斗斗这个杀心已起却难以得逞的阴谋家。

狩猎无望，斗斗潦草地跳下树。捉鸟失败，但它捕鱼技术很高，我两次看到它从小区池塘里捞鱼回来吃。海盗也捕鱼，但失手失足的时候多，枉担水上英雄的虚名，每每半截尾巴像被沥青粘住似的，湿得像根老鼠尾巴。斗斗别说尾巴，连爪子都不带湿的。的确，斗斗不笨，我发现它是最灵活的，体型更大的公猫也比不上这个少年的迅捷。

我甚至怀疑胆子大，与情感丰富相关。斗斗的自尊心特别强，假设它已经表达了兴趣和渴望，而我当天并没有放它进入房间，我会明显感到斗斗的情绪和情感都会后撤；再见面，它会蓄意和我保持一个对待陌生者的距离，让我意识到它的不快。家猫尚且不喜欢被颐指气使地对待，何况这个骄傲的少年。

我曾管它叫斗眼，后来它的好奇、勇气和热情征服了我，我因这个称呼感到失敬和抱歉。我两面三刀，背着它叫“斗眼”，当它的面儿，我尊称它“冒险家”。是种巧合，从我用“冒险家”跟它打招呼的当天，它就中了虚荣的蛊符，肯于放心地在我脚下吃饭、喝水，无论我离得多近，它都不带抬眼皮的。它勇敢得迹近草率和鲁莽。

“蒙娜丽莎”改名为“海盗”的数天之内，它的名字也从“斗眼”定格为“斗斗”。猫不认识你的时候不叫。开始，是短促的一声。渐渐，声音变成拖腔，这就算是熟了。斗斗回应我的时候最多，而因为它的拖音，我得以观察它参差不齐的乱牙。

9

和斗斗形成反差，梦露极具美色，而且行为谨慎，从来不会离人太近。它习惯远远地待着，待确定安全以后，才肯靠近。梦露的旁边从没有缺过陪伴，有时我怀疑那是它的警卫班。院子里的橘猫那么多，可无论混杂在多么近似的橘色系里，你一眼注意到的，都是梦露被其他色彩所烘托的姿色。

我们小时候，称既漂亮又不羁的美人为小野猫类型——看到梦露，你几乎立即就能领会修辞发明者当时的感受。它是一只天生经过全套美容之后才降生于世的猫。梦露有张粉雕玉琢的俏脸，有双勾魂摄魄的美目——它盯着你看的时候，是那种令人怦然心动而它自己却无动于衷的眼神。同是橘猫，它是橙金色与亚麻色结合，脸部和肚皮的部分白色，是童话里才配有的雪白。猫的瞳孔形状跟光线强弱有关，可我觉得，梦露的眼睛很少出现锁孔般的细线，它的瞳孔又圆又亮。天真、俏皮、傲娇、慵懒、羞怯，又敏感、好奇，不乏端庄……这就是传说中的风情万种吧？梦露就是这么绝妙，它显然是只少女猫。眼神清亮，梦露之所以有这样具有美瞳效果的眼睛，是因为瞳孔经常也是圆的，带有轻微的吃惊感。不像大花生见多识广，不再被许多事情惊扰，瞳孔总是细线状；也不像正值青年的警长，眼角有眵目糊，像老人那样经常蒙着一层隐约的泪水。梦露的娇俏模样，能让人把它的缺点都当特点。一只美得浑身发光的猫，离开阳光，它也自带光环。难以置信，它的嘴角竟然有颗美人痣，所以我管它叫梦露。

不仅容貌，梦露的姿态尤为性感。猫喜欢伸懒腰，把自己抻到长度的极限。它们两只并拢的前爪尽量前探，塌下肩膀，然后重心转移，用力蹬直两条后腿，伸展弹簧般的脊椎。它们还喜欢拱成一个U形磁铁的样子。每只猫都是动作轻松的瑜伽大师。只有梦露，把伸懒腰时两只前爪常规的并拢动作，改为交叠，一条玉臂搭在另一条玉臂上。这么一点儿变化，就如同外八字变成了模特步——你观察一百只猫，也找不出这样百里挑一的妩

媚动作。梦露侧卧的样子格外娇嗔，它只差支起一只前爪托住自己的香腮了。

我沿客厅落地窗摆了一排花，溜进来的猫都喜欢嗅探一番。唯梦露，香花美人，相得益彰。它沉静的时候，就像中世纪油画中的女贵族那样典雅；它饱餐以后，用小舌头舔净唇边的油脂，看起来比情色明星的海报还要性感。我的露台上也摆着花盆，不过，植栽没有熬过刚刚过去的寒冬，花都死了。别人家种花，我的花盆里种着猫——梦露躺在里面，我的盆栽美人猫。它就像貌美而挑剔的白雪公主，在摆放的六个花盆里轮流试过，寻找最满意的床。因为有的花盆大，有的花盆小，有的土深，有的土浅，这样它或低于边沿，或溢出边沿。光线稍有转换，它就要换个地方睡。只有频繁调换，才能在不同时间和气候下，让睡眠中的自己感受舒适的温度、风力和阴影面积。梦露最喜欢的和相对固定的卧榻，是靠内侧的一个中等大小的白瓷花盆。过了两天，我看到它刚从蒙眬的睡意中慢慢醒来，微风吹拂它披光的毛丝，我才发现它最为中意的瓷盆，上面有着牡丹图案，旁边手书的毛笔题字是：国色天香。

竟然是若干天之后，我才得知，自己中了美人计。梦露根本没有痣，那是不知在哪儿吃东西时蹭上的难以清除的食渣或污渍。它怎么这么聪明呢？竟能如此化解尴尬，不洁之物都有了点睛的妙用。不过，没有痣又怎么样呢？它那穿越人神之别的美，其征服力，随时能够得到证明。

10

梦露每天用很长时间梳妆，它热衷打理自己，有时跑着跑着就骤停，开始频繁地舔洗，舌梳毛丝，咬通毛结。它蹲坐，斜直伸开芭蕾舞者的后腿，埋头清理腹部的皮毛和隐私处的穴道。这是猫的日常动作：大角度劈开后腿，仿佛鞍马里的托马斯全旋——别的猫像体操运动员；唯有梦露这样做的时候，春意盎然。

风情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是如此自然而然，没有刻意的修饰。它以那么轻盈甚至是轻佻的姿态跳回那个破旧的沙发套，就像跳进了席梦思的床垫上。它以杨贵妃的体态斜倚在垫子上，又有茶花女的做派。它的身材一点儿也不单薄，可就是让人产生娇惜之感。它大概相当于猫里的梦露——突破瘦小抵达丰腴，却仍感觉玲珑的那种分寸感，实在是太难拿捏……它做到了。

梦露是典型的美貌有余，美德欠奉，既馋又胆怯。嘴刁，有今早新做的就不吃昨晚的，有立等可取的不吃放置一会儿的。它吃到一半，不忘去邻家看看，主要是吃个变数，它不喜欢餐食单一。我因为被嫌弃而略感羞

愧，希望自己争气些，能提供更令它满意的食物。这加重了我和邻居之间的微妙竞争。梦露对食物饶有兴趣，是只挑剔的馋嘴猫；不像警长，即使正在进食，如果有哪个迫切者挤靠着它的头去吃饭，它就若无其事地让开。警长对梦露宠爱有加，它看着梦露吃饭，就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和斗斗、梦露见面最多。久而久之，难免偏袒，我总为它们准备口味获赞的鱼罐头。不好看的斗斗，在我眼里，越来越长出一种可爱的喜剧感。我喜欢斗斗的与众不同，喜欢它不谙世事的英气。像个肉质小闹钟，斗斗每天来得最早，准时伫立在高高的方木桩上，歪着呆萌的脑袋等待。

梦露呢，吃什么都心安理得。后来有点儿让我尴尬。梦露有一天带了男朋友，我高兴，以为它带到我这儿跟见家长似的。男友是只白色长毛狮子猫，能看出以前是高富帅，可流浪之后，这种毛色最显邋遢。两位到我面前，二话不说，演春宫。这么富有牺牲精神的色情，是为什么？不拿我当外人，还是觉得我有这样的重口味爱好？我怕路人看到作为观众的自己，只好劝梦露：“别这样，不就是为口鱼腥吗？何苦啊，你都快赶上卖淫的了。”

11

事情没那么简单，猫群有着复杂的情感交错。

隔了两天，我得知梦露和黑猫警长的关系了。黄昏，梦露停在一个被丢弃的沙发套那里。沙发套里有根散落的条带，它万般活泼地玩耍，时而身体拱成彩虹，时而像做瑜伽一样绷直两只前脚趴俯下来，时而柔媚地翻转，露出雪白透粉的肚腹……它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但对警长来说，撩惹不已。虽然经常见面，但这一幕，警长如同初见娇娥：梦露玲珑的身影，梦露迷魅的风情。警长浑身颤抖，就像面对一个即将成真的新娘。此后几天，警长经常情不自禁地咬住梦露的后颈，意欲骑跨。梦露的表情，真的比绿茶婊还无辜，它文文静静，不在姿势上做撩拨和配合，它就那么安宁，无论蹲卧，还是翘臀，都显得无动于衷、随遇而安。这种无为而治，让意乱神迷的男猫们，是更无从下手还是更顺利得手？看不出端倪。

正当我以为，梦露和警长结成了稳定盟约，它又换伴侣了：白底黄花的大花生。大花生是只老公猫，有着狡黠的生存智慧。不知道哪儿来的直感，很少有什么美食能逃过大花生的视线，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拉开猫罐头的环拴，就可以读秒了……它保证在一分钟之内抵达。这个老家伙狡猾，即使吃饱了，有时也要假装沉浸在美食之中咀嚼几下，以强调某种认领感，强调它可是你家喂养的宠物。这只混迹江湖的老猫，最大的爱好就是升堂入室，只要门上留出一道窄缝，大花生就开始做愚公移山的努力，试

图用脑袋和前爪挤出可以容身的通道。这回，梦露陪在大花生旁边——大花生嘴唇上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像是别了个小型蝴蝶结，也许这回大花生要对情感认真了。

不过，梦露和所有猫都关系美好到暧昧。和斗斗两小无猜，和警长如影随形，和邋遢王子露水姻缘，和大花生相处甚欢。每只猫都喜欢和它相偎相依。梦露更换的性伴侣最多，每次都只能维持几天，但和警长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最长。它俩像法律婚姻那样堂皇而形影相随，见到前任毫无尴尬，形同陌路。倒是前任邋遢王子，某次经过我的露台，想起春情浪漫的往昔，发出两声短暂而撕心裂肺的怪号。从此，我便很少见到它落魄的身影了。

猫有时发生情绪上的摩擦，眼神乃至肢体的挑衅，无论别猫怎样，梦露一定是不惹麻烦的那只。梦露对人类的态度并不亲近，始终隔着谨慎的距离。当女邻居和我尝试抚摸，它的双耳向后紧贴，愤怒龇牙，发出“嘶嘶嘶”的警告。但是和猫，它的瓜葛虽多，公共关系却处理得极为妥当。梦露与别的猫互嗅时，更像是潦草、礼貌或庄重的亲吻。不像是其他一些猫，喜欢嗅其他猫的尾根，对性腺的气味比对食物的味道更感兴趣。我隐隐怀疑，梦露与其他猫关系良好，是因为与它们多有“私交”。它在情爱中表情寡淡，让我怀疑，它仅仅是和平爱好者——是以身体换和平，它不觉得颠鸾倒凤有什么了不起。即使旁边就是情欲高涨的猫侣，梦露只是沉迷盘中美餐，不为所动，任由二位忙于苟合。也许这种事对它来说，总是太多而不是太少。它结识新欢，又不忘旧爱，和警长的关系最是分分合合又情深意笃。它到底是用纵欲，还是用淡漠，支配了它的情人们？

梦露必是以情商处理情爱，所以没有绝代佳人和寡妇门前通常会发生的种种是非多。梦露绝少引发冲突，它只是平静地离开一个又一个男性，平静地和一个又一个男性依偎，看不出什么暗战或隐恨的迹象。我猜测不出，到底它是自由奔放的女权主义者，还是水性杨花、随波逐流的小婊子。梦露对围绕而来的追求者，既不谄媚，又不奴役。它仿佛置身事外。

12

春日渐暖，窗下传来一阵鬼哭狼嚎，是狮子和团豹。我最初没听出这是挑衅还是挑逗，分不清楚这是男人之间的决斗，还是情侣之间的调情。食盆之上，狮子和团豹的脑袋相抵，以微距逼视对方，眼睛的睫毛都快碰到一起了吧？五分钟，它们从各自喉咙里发出变调的长声——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态，看似嚣张，但它们谁都没有挥拳，也没有亮出尖牙，只是怪声怪气地嘶鸣。我倒了杯咖啡的工夫，它们就不在原位，已经在五米开外的另一地点继续这种对峙了。

我从它们的侧后方观望，两猫的间距略微拉开了一点儿。狮子的表情看不见，倒是能从双耳向后紧贴、弓起脊背的团豹身上，感到气氛的紧张。三分钟过去了，团豹有点儿走神，高度专注导致随后的疲惫，让它乏困般眯了两下眼睛。也许春困是传染的，也许团豹通过眼神，暗示了偷窥者的存在——狮子向我这个方向扭过头来看了一眼，长毛披覆的它，面部表情迷离。团豹趁着狮子走神，缓缓移动，以最看不出动作的动作在动作，比电影中的慢动作分解得还要慢……等两者之间离开半米之距，团豹突然连跑带颠地逃离了。

第二天，我近距离见到团豹，才发现它的鼻翼留有明显抓痕，右耳边缘的血痂还未彻底干透，不知是和谁毆斗所致。团豹的体格健硕，粗朴浑圆，特别有健力者的粗犷感。本是极具威胁的体量，它应该晃着膀子过来，人人避让三分的；可偏偏，哪只猫见到它，都会乖戾地叫起来。凡是听到起伏而鼎沸的打擂声，十之八九，对阵一方是团豹，且是明显被动的一方。

这些从少年转变为男人的公猫，这些从少女转变为妇人的母猫，让原来安静的院子偶尔传来怪叫，像哭声，哭得像过气的旦角。只有斗斗，还是少年郎，即使和梦露嬉耍，也只是小伙伴之间的嬉耍，没有发现梦露的其他妙用。未经性启蒙的斗斗，像梦露一样，从不参与恶斗。我怀疑打鬥的公猫中，有个暴躁而任性的拳击手，有着和拳王泰森一样的爱好。泰森曾在比赛中咬掉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我在这些猫中，竟发现两三只的耳边，都有微小却能辨别的残缺。难道，这是猫王格斗的规则、获胜的记号？

春天的花苞酝酿着，可我好像能闻到野猫皮毛里的土味，以及发情季节里它们到处渍留甚至沾染于身的尿液气息。

13

有一天，我的腰侧长了几个小包，锐红而凸起的点状，集中在拇指指纹那么大的区域里，有种渗透体表的痒痛。

我立即聚焦，划定了嫌疑范围。它们高频率地用后腿蹬挠下巴频发痒的部分，畅快地发抖，我看到脱落的毛丝在光尘里上升。不知道是温差、过敏还是流感，我听到它们接二连三地打喷嚏；当陌生的猫尝试尾随着进入，脸上有着可疑的眼神和血痕，皮毛上有缠结或裸肉；它们在发情时节，不知节制地滥交……还能是谁？它们接触不洁的食物和水源，它们滋生危险的细菌和病毒。我大惊失色，越想越害怕。

尽管经过医生鉴定，皮肤上的炎症并非猫癣，不知是什么感染，但我也从此谨慎，不再热情好客到让它们从容出入，我很少再打开禁室之门。我戴着防护手套，清洗它们用过的器皿；假设苍蝇落到没有及时吃掉的罐头

上，我会很快倒掉，以防止病菌通过它们的肠道传播。那几天，我饱受瘙痒之扰，但并未减少对它们的喂食。因为，无法辜负它们仿佛是从瞳孔晕染开来的信任。

是的，它们逐渐像一堆我甩不掉的麻烦，每天麇集而来。野猫们从聋哑般沉默地盯着我，到哼出若有若无的一丝鼻音，再到一见我就喵喵地招呼起来。那些性格最羞怯的猫，一旦开始信任，会比其他猫更积极。它们不再冷傲，也开始邀宠。我只要出来，它们就一路赶来，绕着我的腿，喵喵咕咕地示好。它们随着我的作息习惯而改变出没规律。吃过早餐之后，它们在露台上，横七竖八，躺得哪儿哪儿都是，它们一动不动，简直像被我喂了蒙汗药般麻翻了一片。大太阳晒着，它们的尾巴有撇有捺、有问号有句号，它们就这样边睡边完成愉快的消化。以前，它们只有躺在虬结成网的灌木乱枝下，才敢这么放心睡眠。

我们之间形成一种依赖关系，是相互需要，并非简单的寄生与供养。因为它们偶尔的失踪，也会让我失落。二〇一七年元宵节，完全不知道什么理由，门前空旷了一整天，它们没来。它们像坐上春运的火车去过节了，留给我一座空城——安静得异样，令人发慌。所以，第二天我做早餐蒸鸡蛋羹，看到两只猫站上露台，我几乎受宠若惊，以至于慌乱到犹豫要不要也给它们蒸一份鸡蛋羹——它们是去度蜜月了吧？有些母猫怀孕了吧？我担心猫的孕期营养，只差照顾它们坐月子了。

14

我远远看到，一只猫嘴里叼着一团模糊的阴影。隔着距离，我看不清那是什么，比雏雀更像幼鼠，被猫咬住的脖颈，它看似头颅的部分搭垂……褐灰的小生命，它将死于无效的保护色和无望的迟疑。

人们喜欢卡通中的老鼠而憎恶现实中的老鼠。我相反。米老鼠，为什么喜欢它？迷恋它爆米花一样膨胀起来的脑袋和手脚？对米老鼠无感，我倒不怎么讨厌老鼠。作为啮齿类的底层动物，它谨小慎微，是个从未放松警惕的卑微者——从鹰，到蛇，再到猫，哪个不吃它？可怜的家伙，它就像革命文学里必然要被消灭的反面人物一样，每天都在苟活中艰难求生。

远处的猫带着猎物潜入灌丛，去享受杀戮和消化的快意。近处，低头喝水的大花生，身上有着黄花斑，偶尔还有飞鸟掠过的灰影。一只白水煮的童子鸡，它们能吃得渣骨无存。我明白，它们更喜欢活物。这些玩偶般的猫科动物，无一，不是伶俐的杀手。

我想起小时候，邻居家那只异瞳的白猫。性情温顺的猫抓到一只麻雀——它的眼睛柔情万种地看着主人，它的齿锋插在麻雀最后喘息的胸腔里。麻

雀的翅膀偶尔抽搐一下，但无论我们劝诱还是追逐，麻雀都将成为无法夺回的尸体。猫死死咬住麻雀，跃上屋脊，过了许久才跳回院子。我记得那幕场景：满树落花，树下走过那只无聊的猫。雪白的猫，刚吃过一只羽色斑驳的鸟，会飞的肌肉融化在它摇晃的胃囊里。

事实上，我正陷入轻微的焦虑。喂猫，来了越来越多的喜鹊——观察之后，它们叼走猫的剩饭。

我的露台，往好了说是小资情调，往坏了说形似拳击擂台，长宽几乎均等，边上竖着几根木桩——斗斗每天冒充拴马桩上的石狮子站在上面。木桩间用粗麻绳拦着，拦绳下是被修剪得整齐而低矮的冬青丛。一个非常有力的拳击手，都只能应付正面袭来的拳头，无法防备来自四周的偷袭。我数次看到觊觎猫粮的喜鹊靠近，既有大喜鹊，也有灰喜鹊……我担心它们没有及时察觉隐蔽在灌木丛中并悄悄上升的杀手的眼睛。

猫有时饕餮，有时不怎么吃食。我开始怀疑它们存在口味偏好的问题，但会不会是一种蓄意的省俭——留下饵料，用以猎杀活物？

露台上铺的是青方砖。猫粮还好，若是水煮肉类，猫经常把它们从食盆里叼出来食用。大约有半平方米的地面砖，被脂肪里的油渍弄污了。如果喂食大鱼头，过一会儿，拆碎的鱼骨零件都一一摆在这块污暗的区域——就像在黑绒布上摊开工具箱，摆了全套的五金件。这块被油脂浸染之地，是否将成为觊觎者的断头台——我怕有一天，上面躺着一只喉管浸血的鸟。浸透砖石的油脂，其实早已包含着血，只是陈旧、隐蔽、不让伪圣人难堪的血罢了。我尤其害怕喜鹊死在眼前，死在门口，我怕寓意上的不吉利乃至凶险。我的善念与真正的慈悲，貌合神离。

15

喜鹊的翅膀有那么美妙的钢蓝色，猫的眼睛有那么动人的琥珀色，我却无法同时偏袒。因为我的喜猫会给喜鹊带来灾难……当倾心捕食者，就没办法同时倾心猎物。

如果，我把给喜鹊的食物放到树枝上，离野猫的餐台远些呢？一是枝叶繁密，喜鹊未必能发现觅食点；二是我具备攀缘的本事，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我能抵达的高度，对猫更是易如反掌，喜鹊并未减少安全隐患。如果不改地点改时间，选择黄昏之后喂食呢？那时倦鸟归巢，而猫是夜行者，有红外线望远镜那样不受黑暗阻碍的视线。这意味着，我不仅惠待肉食者，不仅不公正地厚此薄彼，还进行了让弱势者不知情的暗箱操作。何况，不知道猫群中，哪个夜游神享用了我的夜宵——我付出却没有得到形象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回报，这让我失去喂食快感。

我想看管猫，不许它们轻举妄动；可当我成为守护者的时候，喜鹊也吓飞了。我想周一、周三、周五喂猫，周二、周四、周六喂喜鹊；可当事者不遵守设置的时间表。我想，我想……每个设想的后面，都是困局。

统治苍生的大神，面对困局或许同样难解。当我们说命运残忍，也许正因神在给予他者慈爱；我们也难说，神，在空降的爱意和美意里，是否潜藏了未来的灾难。

16

何为均衡，何为公正？

如果我不喂食，似乎喜鹊照样健康，飞起来，能感觉它们的翅膀承受着肉身轻微的超重；似乎猫照样幸福，圆墩墩的身材，直到圆墩墩的趾爪也像袖珍象足……大神也许基于同样理由而拒绝现身，他已在世间制造了相互制约的规则，从此，生命可以相爱相杀、自给自足。那么，人类的喂食，到底是在巩固秩序还是在破坏节奏？也许对猎杀者的帮助，就是在帮助被猎杀者。饱食的猫，不必因迫切的需要去捕杀，而是在履足中酣然入睡，从而让雏鸟可以从容试飞它们借以自救的初羽，让小鱼可以安心游到石隙之外的明亮水域？

猫，以一种奇妙的混合体方式存在。如此柔媚曼妙的杀戮者，如此爪牙锋利的萌物，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刚柔并济的宝贝？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不由自主地宠溺。有时，我甚至由此理解，人类何以能够接受恶……有时，恶，就像降临到命运里的猫一样，残忍，却既美且萌——结果，它们都能作为宠物受到欢迎和照顾。

猫能够捕食鱼鸟，即使它不能出入河流和天空；可假如没有人类的帮凶，猫是吃不到牛肉的。奢侈品牌的无谷物猫粮，价格高昂，使猫的食谱里增加了火鸡、龙虾、扇贝等它捕食能力之外的食材。我们宠爱这些样貌迷人的杀手，以至于大量羽翼未丰的幼鸟死于猫齿尖利的咀嚼。然而，怎么才算偿清血债？喜鹊是否吃了猫的幼崽就算公正？在猫面前，喜鹊之力多么弱小，何谈复仇。

可难道，喜鹊不是肉食者？它们垂涎托盘上的鸡肉，我帮这些掠食者撕开了它们无法像野猫那样用利齿撕开的胸腔。那么我们所谓的不公，只是不均的分配而已。多少饲料鸡一辈子的命运，只是把自己愚蠢地吃肥，然后一只从天而降的至高的手夺命而来——人类仿佛出于慈悲才杀戮，他们分配并讨好自己所喜欢的飞禽走兽。世间存在着一种由不平衡达到的均衡，存在着一种由不公正达到的公正——这个跷跷板上的世界，永远在，生生死死地起伏。

一切，不过是杀手之间的友谊。

猫能喂养喜鹊吗？答案是可以。

更换猫粮，要循序渐进。当一个品牌的猫粮即将喂完，需逐渐加大新粮比例，有时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替换。即使我格外注意，斗斗对新猫粮还是不适。它像呛奶的孩子那样身体抽搐，要呕吐；它似乎经过艰难的反刍，又咽下去了。

过一会儿，我听到喜鹊集结，叫声剧烈，我不知道它们是出事故了还是在过节。站在窗口观望，原来，斗斗在台阶上干呕之后，在灌木丛边吐了。猫粮颗粒带着黏结的胃液，很快，被喜鹊兴高采烈地叼走。

17

一连两天，来访猫的数量锐减。到了这个三八妇女节的早晨，我发现，每天报到的斗斗和梦露竟然也不见了。

木桩上是空的，肉质小闹钟没有按时站到自己的岗位。梦露馋，可浓郁汤汁浸透的入味小鱼，也失去诱引力。难道成精了？此前我当着梦露的面，批评它的脸型尖了，不如胖了好看，我怀疑和它纵欲过度有关。难道，它们马上就给我脸色，就此退避三舍，受辱的它们报复般地不来了？或者，它们是为了躲避黑社会？最近来了一只肥硕的斑纹猫，眼角下耷，长得逆来顺受，其实是个沿途挑衅的恶霸——眼睛直盯，爪子半抬，它突然施暴，无端乱拳和发疯追逐，打得其他猫或落荒而逃，或连声惨叫。抑或，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小野猫们狡兔三窟，其实还有另外的供养者、另外的行宫？食盆里的猫粮没动，基本保持最初的丘形。

只有大花生一只猫，趴在空调的室外机上，睡觉。睡得太多了，它简直像瘫痪了一样，很少活动，满足于神游。它茶晶色的眼睛，即使睁开，瞳孔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细线，处变不惊——这几乎是违反生理规律的平静。大花生是个混久了江湖的老油条。利用我家，它已经热情地邀约两次客人了，陌生猫在它的带领下，来此赴宴。作为一只男性老猫，大花生仿佛全无趾爪，见到我立即发出小婴儿一样的谄媚叫声。它热衷于闯入人类的生活区域，喜欢向房间里冲锋，即使门缝窄得难以容身，它也乐此不疲地向内窥探，并妄想用愚公移山的决心和趾爪，一举撬动沉重的推拉门，创造一线可能的机会。只要溜进来，大花生立即选择地下室或床底的隐蔽之处，赖在那里，很难再把它弄出去。如果不是我用拖布杆刻意驱赶，它会不动声色地猫上很长时间，就像家里一件滚落地下的摆设。

大花生的叫声至贱至媚，可我判断，它对我并无什么情感牵挂，不过生存

技巧罢了。不像斗斗，有种天真的赤诚，每每都能感觉到它热忱的对交流的渴望。大花生，多少是在表演热情。我怀疑，大花生之所以强行入户，并非真想被我收养，它只是在猫群面前，找到一条自证勇气的捷径。好勇斗狠的大公猫，一脸凶霸，但只要人类靠近，哪怕不是立即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也是气概全无，瑟瑟发抖地躲在暗处，再也不敢现身。大花生呢，别看对人类婴儿般呢喃，假若年幼公猫与它抢食，它毫不犹豫挥掌就是一记教训的耳光；可与壮年猫相比，大花生已年老而乏力……但它勇闯人类禁区，让那些所谓的猫英雄相形见绌。工于心计的大花生选择我，作为黑社会的靠山。

18

以猫科动物命名的，有老虎和狮子。狮虎都有一种雄风，可按比例缩小体积的猫，却是阴柔的。狮虎远比猫大，可猫，艺高人胆大，只有它们敢于跟世间最危险的猛兽——人类——比邻而居，乃至同床共枕，甚至把人类当作服务于自己的奴隶。并且，猫矜持地使用这种智慧，和狗相比，它们可以表情淡漠地获得人类的青睐和偏爱。但谄媚者总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大花生的撒娇并不体面，假设它不增加表演成分，以它的长相和年龄，未必能赢得一勺美味。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抱怨谄媚者获得好处，我们抱怨当权者不能做到公正——假设我们自己成为当权者，同样不能摆脱对宠物的纵溺，如同不能摆脱对谄媚者的亲近。我们轻易动摇，无论是想品尝一勺美味的时候，还是想赐予一勺美味的时候。人类啊人类，满是无法克服的弱点，根本做不到神那样。神有凛然的公正，他平静对待靠拢者，所以祈祷者也许如愿，也许不。

其实，我们捷巧而畏怯，崇尚权力而习于谄媚。猫身上的特点，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是猫科动物。我们有猫科动物的优美，有猫科动物的狡黠，有猫科动物的懦弱，有猫科动物的权衡，有猫科动物的无情，有猫科动物的嗜血。人类，集合猫科动物的柔媚与残忍、伎俩与暴力。

所以，无论是猫的地位，还是猫与人类的关系，都非常微妙。当猫向我们靠拢，我们不由自主地和它们亲近；不仅因为秘密的相似，更因为形象上的毫不相似，我们有一种完全不像它们的自我麻痹中的美好错觉。对，养猫还可以满足人类潜在的虚荣心：看，世界上最凶猛的狮虎那样的猫科动物，等比例缩小为人类的玩偶……这就是我们懦弱而自欺的勇气。

我们自身的角色，是主人亦是宠物。或者说，我们既是宠物样的人——奴隶，我们也是人样的动物——禽兽。

黄昏时分，远远的，在我的露台之外，一对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窃窃私语的男女，引起我的注意。

小区人车分离，自行车有专门放置的区域，少有推车穿行林荫道的。最为可疑的，是自行车后座上的两个矩形笼子：网密，黑铁丝的，宽高也就三四十厘米，可足有一米多长。他们站在野猫日常玩耍的区域，左盼右顾，似乎在搜寻什么。我心头一紧，有种没来由的预感和直觉：今天没有见到斗斗和梦露，和这两个人有关。

等我穿好运动鞋，追出家门，他们已经推着自行车向另外的楼区走去。从背影判断，他们是那种质朴的劳动者，衣着和自行车都半旧。自行车除了驮着醒目的长笼子，车把还搭着拉锁坏了的黑色人造革包，已被里面装着的东西撑得变形。

两人在一个窗前停下。窗下小小的平台，有用塑料泡沫箱改造的猫窝，用以抵抗尚还料峭的春寒；两只三花的小母猫，正在窗台上熟门熟路地散步。观察之后的女人对眯眼抽烟的男人说：“就这两只吧，一起逮。”果然，他们是捕快。

我正想上前阻止，女人隔着窗户喊了几声：“高阿姨，高阿姨。”没有得到呼应，她打手机找这家的主人。耳背的高阿姨这才打开窗户，是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她边和女人说话，边用手轮流胡噜两只向她撒娇的小母猫，显得熟悉已久。高阿姨说，一只母猫刚刚下崽，还在喂奶阶段，不能抓走猫妈妈，否则猫崽活不下来。女人同意。她们商量，暂时放过，等小猫断奶之后再来抓年轻的猫妈妈。

高阿姨是爱猫之人，她为什么会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

因为拿着铁笼的缉猫者，同样，也是爱猫人。

20

聊天中，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并非第一次见到大琴。只是从未近切看到过，她戴着小型头灯，射出一道强烈而具侵犯性的光亮，让人无法辨识她的脸。大琴经常晚上九十点钟来喂食，不让流浪猫饿着肚子入睡。

大琴没有孩子，从小喜欢猫的她，家里常年收养着五六十只猫；那个推着自行车的男人，是她无可奈何的丈夫，早已接受现状。她的经济能力有限，但救一只是一只，她不忍它们颠沛流离。为了救助流浪猫，他们把自

己有限的退休经费都花在为它们购买粮食和医治病患上。大琴对所有的猫，都自称“妈妈”。她的家已被全面占领，每个角落都是猫，再也没有空间接纳了。所以，她每晚巡查若干地点，弥补她的歉意。大琴不住我们小区，但她的喂食点包括附近若干小区。她太爱猫了，而爱的前提，就是你的情感甘愿被对方所剥削和剥夺。大琴提到流浪猫的饥饿和寒冷，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她为它们购买罐头，为它们治疗眼睛和皮肤的炎症。她逢人便劝，用收养代替购买，让流浪猫进入家门。长久喂食，使院子里的猫对大琴格外信任，它们每天等待大琴送来夜宵，并允许靠近的大琴抚弄后颈和脊背。

一方面，猫超强的生育能力使它们数量激增，大琴这样的爱猫人已无力供养；另一方面，闹猫季节的怪叫声，会引起居民反感——有人用滚烫的开水泼溅，有人蓄意投毒，有人生生切断了猫尾巴。大琴说，她刚刚在另一个小区处理了五具被毒杀的猫尸体。

能怎么办呢？为了避免出现僵寒的小尸体，当每个危险季节到来，平常省吃俭用的爱猫人，在笼子深处用最鲜美的食物诱捕，把它们捉去做绝育手术。大琴丈夫车把上挂着那只拉链坏了的人造革包里，除了罐头，这回装了专门对付利爪和利齿的防护手套。

猫的弱点特别明显。鱼没有那么明显的弱点，鸟没有那么明显的弱点，狗没有那么明显的弱点，而猫坦然地呈现自己的弱点，无论是馋还是傲慢，都让人迷恋——除了，发情。别的动物不像猫这样，歇斯底里地表现欲望。对于人类来说，绝育手术减少了猫带来的诸多麻烦，使它们成为完美动物，几乎相当于野猫从良。

狂热的欢愉多么短暂，沉迷的性爱多么脆弱——这些自由的野猫不懂，它们不知道，走夜路不能放声歌唱。对人类来说，情欲也会令人难堪。失控的呻吟、抽搐的表情、抖动的身体，有些性格极端的害羞者，甚至因难以想象让陌生人目睹自己的尴尬和失控，宁可独来独往或循规蹈矩。这些猫，不知道在人类的管控下，私情不能制造喧哗，不知道肆意带来的后果——手术的刀剪，寒光四射，将切除它们令人感到羞耻的表达。绝育手术，就是身体和情感上的绝望手术。

是啊，一只猫怎么能够理解大琴的苦衷，怎么能够理解人类曲折的逻辑呢？它们只是恼恨于自己的轻信，即使，这种信任是半年一年中的每一天点滴积累而成。它们最后发现，所谓的爱，依然是一种误解，是最爱它们的人带给它们最严重的伤害。人类的伦理至为复杂，岂是猫能够猜测和判断的？你甚至不能说，杀手不喜欢甚至不爱慕他自己的猎物。看，人类把鱼类图案绘满各种用具，杯碗、衣服和窗帘，玩具、灯具和床具，他们为鱼制作模型和雕塑，甚至把鱼的图案文上自己的身体。那又怎么样呢？

爱，甚至不能阻止杀戮——人们就在绘有鱼图案的餐盘里，分割鱼的骨和肉。爱与恨，远远不如骨与肉那么便于分离。

21

得知大琴白天抓了斗斗和梦露，虽然时间已晚，我还是奔向它们即将被手术的宠物医院。三月的树，还没有萌发叶芽，光秃秃的。灯影下的乱枝，在地下铺开疏而不漏的网。想起格外勇敢的斗斗和格外谨慎的梦露，想起它们均属无效的防范……一级戒备和十级戒备有什么区别？最后还不是殊途同归，都在牢笼里。想起梦露的多情，我忽然有些难过，它一生的欢情已尽。

晚上八点多，我戴着低檐帽、口罩、围巾，选了一副深色墨镜。连露出帽檐的头发，都被我重新编织，算是换了个发型。我努力遮盖自己，我怕这种时候被它们认出来，我怕自己说不清楚，摆脱不了干系。它们的眼睛能够看穿黑暗，难道，看不穿一副墨镜的阻挡吗？也许，我的乔装是幼稚的。我是为了自己，我没有勇气直面即将被小型刑具收拾的它们。大琴是猫信任的人，我是它们刚刚尝试建立信任的人，我怕它们看到曾经最为信任的人联手欺骗它们——我的畏惧里，除了对自我形象的维护，还有对它们脆弱情感的怜惜，我怕它们由此摧毁所有对人类的好感。远远看到医院的广告珠灯，我甚至把手机也静音了，我怕它们辨别出曾经听到过的旋律。

这是个最简陋的宠物医院，塑钢板搭建，很小。推拉门里就是分诊台。左侧，用玻璃隔出个值班室，年轻的大夫低头沉迷手机屏幕，丝毫没有注意，我拉开推拉门，溜进了右侧的隔间。

大大小小，屋里有七八个猫笼。角度最高的位置，网笼里并排趴着三只橘猫。左侧那只冲我喵喵叫了两声，听不出是示好、求饶还是抗议。旁边两只并排躺着，它们身下有个矮矮的、通常被当作厕所的塑料容器，它们俩对我的临近没什么反应。

斗斗和梦露呢？怎么没看见？突然，我注意到，三只并排猫的后面，还有一只。没错，就是那张俏脸。梦露的身体试图埋在其他猫的尾部，它的眼睛睁得极大，明显惊恐，它的耳朵完全耷拉下来，像只品相失当的折耳猫。当我试图用一支圆珠笔，去触碰梦露的小爪子，它动作幅度剧烈地跳开了。与此同时，三只猫里右侧的公猫，发出混合着“嘶嘶嘶”摩擦音的低哮——我不知道它是意欲保护梦露，还是误以为自己受到威胁而发出虚张声势的恐吓。只有中间那只猫，岿然不动，对我的进犯视若无睹。

我在幽暗的光线下，迷惑地凝视三只橘猫：左边那只是母猫，瘦；右边那

只公猫，也见过，不算熟；但中间那只，让我感觉非常奇怪。我好像没见过，但它说不出哪里和斗斗有点像。我蹲下来，仔细看，迷惑地在心里反问：“难道，你是斗斗？”这只猫的眼睛竟然是压扁的六边形，像蜂巢被施力变形，六角形的眼角斜拉上去……我用力分辨：天哪，竟然就是斗斗！它一夜之间变了模样。斗斗一点萌态也没有，有一点点愤怒，但更多的是轻蔑。它沉默，一身威严。我不知道，斗斗能在一夜之间，从少年长成青年。它是那么好奇和淘气，没想到大难临头，却是勇敢。也许，命运的转折，对情感丰富者的影响更大。

这些猫，它们或睁大或挤小的眼睛，我曾接收到它们英文里叫作“wink”的那种眼神。特别微妙的眼神，我反而不知道中文里用哪个词合适。飞媚眼显得轻浮，挤眼又显得不够优雅；眨眨眼显得轻了，眉目传情显得重了。我喜欢它们假装乏困眯起的眼睛里，流露出羞怯的示好。现在，它们的眼睛里，丧失了那种由信任而产生的暖意。

绝育手术会在第二天上午进行。这些猫，被二十四小时禁食禁水，以避免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呕吐，那会引发呼吸道阻塞和异物性肺炎。猫是记仇的，而我不想被当作仇人记住。出于必要的谨慎，我在宠物医院停留的时间很短，蹑手蹑脚，我倒退着溜走。

这个晚上，小区特别宁静，没有乱人心智的惨叫。天亮了，门外同样没有悬念，是空旷得像被掏出一个洞的早晨。

22

我选了一件平常不怎么穿，以后也不打算怎么穿的羽绒服，用超长围巾把自己围裹起来，又加上墨镜。我希望有一件阿拉伯罩袍，尽量少地暴露自己。在前往宠物医院的路上，我从沿途的橱窗和汽车反光镜里，再次辨识和检查自己。可到了地方，才早晨八点，见到的是一把横锁和挂链，宠物医院没有开门。玻璃窗拉着严实的厚帘子，看不见里面。

我回家，晃晃悠悠度过了两个小时，忍不住又去了医院。一进门，就看到地下多了一个笼子，被很大一块米老鼠图案的粉色布包着，顶端系了绳结……花布上，到处都是喜笑颜开的米老鼠，男老鼠打着领结，女老鼠打着蝴蝶结。我从布幅露出的三角区域空隙里，看到了栅栏后面警长放大的眼睛。它从昨天的抓捕行动中逃脱了，原来只是稍晚落网罢了。这个窄长的笼子里，只关着警长，没有任何同伴。不知命运所终，警长的眼神，变成了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婴孩的眼神。

我看到了即将被送进手术室的斗斗和梦露。这是晴天，明亮光线照耀下的梦露，在落难中，依然美得不可方物，它的下巴枕在塑料扁箱的边线上。

可昨晚成为勇者的斗斗，现在已从应激状态的对抗里被打回原形——耳朵和昨晚的梦露一样，呈四十五度的斜角，拉直线条的紧绷感暴露出它的恐惧。斗斗的眼睛，恢复为巴旦木果仁那样扁长的杏核状，昨晚魔幻的六边形消失了，它的冷傲也消失了。

医生和大琴依据经验，怀疑斗斗是母猫；但这只是猜测，流浪猫具有狂烈的野性，处于防御和对抗状态，不便近距离观察，只有麻醉以后才能得出斗斗的准确性别。我非常意外：斗斗有可能是女孩子？黑白黄三花的是母猫，橘猫毛色相近，远观没有那么明显的判断依据，只是母猫通常头颅小巧一些。

麻醉的过程并不顺利。两个男医生配合作战，需要用中空的不锈钢管把猫胁迫到笼子角落，才能完成瞬间的注射。几只橘猫疯了一样在空间有限的笼子里蹿跳。斗斗闪躲得尤为剧烈，快得看不清移动的方向，它就轮流出现在笼子的各个边角。梦露试图躲在任何一只别的猫后面。一只跟我不太熟的橘猫，先中了针——它倒下去，丧失反抗能力，被医生抓住后颈，直挺挺地被带进了手术室。

我中午有约，没等到斗斗和梦露的手术，就离开了。

23

下午回来，它们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情况不出医生和大琴所料，但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斗斗果然并竟然，是只小母猫！令我意外的，是它怀孕了。随着绝育手术，斗斗也失去了子宫里刚刚孕育的三个宝宝。这是它第一次怀孕，也是最后一次。

公猫只需要摘除两个睾丸，住院三天，它们恢复较快是因为创口很小；母猫切掉卵巢，需要开腹和缝合，伤痕是纵贯的切口，需要住院一周。为了避免猫咪恐惧，笼子外面有所遮盖，里面团缩着术后的三只橘猫：斗斗、梦露和瘦母猫。它们比手术前靠得更近，紧紧依偎在一起，以使刚刚发生的灾难不那么令人战栗，它们艰难地用受伤的皮毛传递仅存而有效的暖意。

为了防止舔舐伤口造成感染，术后的母猫，由纱布包裹全身，像穿了亚麻紧身衣；系在背后几个绳扣，使它们看上去像被蝴蝶结装点的礼物。当我揭开避光的厚布，背向而卧的梦露回头看了我一眼。它的面孔依旧精湛，只是紧身织物和小巧绳结，使它像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身衣——我立即想起《乱世佳人》的电影开头，那个被勒束身段的郝思嘉。三只中的两只，所经历的都是绝育加流产的手术。斗斗怀了三胎，瘦母猫怀了四胎，

只有梦露——没有怀孕，它的子宫是空的。摘除了生殖系统的梦露，从此成了真正的绝代佳人。

我恍然大悟。没有怀孕，这解释了梦露为什么被公猫如此追逐和纠缠——并非是它的淫荡，公猫争先恐后，它们想让梦露怀上自己的子嗣。其他母猫有孕在身，说梦露是少女猫没错，因为它比其他母猫都发情晚，它是真正的豆蔻年华啊。把一切归咎于梦露的水性杨花是错误的。梦露和斗斗是一对姐妹花，自然之间没有性事；梦露和大花生来往，也并非在勾引，倒更像是慰问孤寡老人——因为，我看到了梦露的耳朵边缘被剪掉了，和大花生有所残缺的耳尖一样。无论是斗斗，还是明天手术完毕的警长，它们都有肉红色的、溶洞迷宫般的耳道，它们的耳尖都会像火车票被检夹剪过一样，留下残缺。我的假设是错误的，在猫群中，并未隐藏一个爱好咬掉耳朵的拳击手；这是人类打上的耳标——公猫左耳，母猫右耳。

爱护动物的志愿组织对流浪猫捕捉、绝育、放归，为绝育后的猫做耳标，不仅为了减少志愿者的劳动，更是避免母猫被重复手术，导致它们疼痛、受罪、伤害健康。猫的生殖力超强，能够以灾难性的几何量级增长。对人来说，绝育之后的猫不乱尿，不怪叫；对猫来说，可以减少生殖系统的癌变机会，更健康，可延长寿命。尽管几乎是必然，但对绝育猫来说，耳标，是羞辱的红字标记。

当晚，我有些失眠，我记得斗斗、梦露和警长它们眼睛里深重的恐惧和悲伤。睡不着，半夜，听到有种小动物的叫声。我起来查找，窗外没有，我怀疑自己是幻听。过了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来了。还是有叫声，短促，断续，不能连成音，像只是哽在喉咙里一阵颤抖。好像是幼猫。很奇怪，也让我很紧张，是不是它们哺乳期的母亲被抓走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过来——不是幻听，是错觉。北京的春夜格外干燥，室内需要辅助加湿。是加湿器，生涩的转轴被摩擦，发出一种介于猫鼠之间的幼弱之声。

24

七天过去了。

我一直计算着日子，要不要去接斗斗和梦露出院呢？它们住院的日子，我都是乔装打扮探望的；如果以真面目出现放归它们，我能否冒充解救的英雄，把施恩者的形象坐实？我还是不去的好，彻底撇清干系，也许它们那双能看穿黑夜的眼睛，早已识破我背后的某种参与？我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后来我还是和大琴一起去了。大琴哭得眼睛都红了，因为她的小棉袄死了。这是大琴养在家里的小母猫，提早发情了。小棉袄长得漂亮，身体雪

白，白得都有点玉石的晶莹色，只有一条尾巴墨色深重。这只玩具般的小猫原本脾气温柔，近来突然暴躁，情绪极不稳定，乱拉乱尿乱咬乱叫，闹得太厉害。小棉袄体重轻点，但也勉强算是到了绝育手术的适龄期；大琴本想晚些再给它做手术，一念之差，就在斗斗它们做手术几天之后，她把小棉袄也送去了。没想到小棉袄对麻药过敏，转瞬休克，怎么也没抢救过来，就死在手术台上。小棉袄为自己的情欲而死，也算是一种殉情吧？在情欲里能够为所欲为，有一种狂荡不羁的自由，也许小棉袄是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刚烈之猫。

大琴哭，因为绝育手术前二十四小时的禁食禁水，她悔改于小棉袄临死前也没吃顿好饭。作为志愿工作者的大琴，每天忙于保护流浪猫，推广“领养代替购买、绝育代替捕杀”的理念，她却没保护好自己的宝贝，让小棉袄死于一场手术的意外。

大琴不知道，我这两天也目睹了一场意外。在地下车库，一只野猫被撞死了。它来我家吃过两次饭——它来得少，我还没来得及取名。那是只黑白花的公猫。所谓白，已经污暗得近乎灰色；在后背，有个画得不太规整的圆圈——如果我跟它熟了，可能会给它起名“句号”。我有时怀疑，猫一旦被起了名字，它就不再是野猫了。但没有来得及，它就死了，头枕在一汪阴沉的黑血里，腹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脏出血而肿胀起来。我不敢接触，反应也迟缓，听任保洁员把它铲除到异味浓烈的垃圾筒里，而没有安葬它的小遗体。我也由此，怀念起那只生活在车库里总是向我示好的大黄猫，它的失踪，到底是死于寒冷，还是死于一场类似的车祸？

听到我的描述，大琴说，院子里的猫多已打上耳标，而死于车祸的这只猫一直没有捉到，它还没有做绝育手术。去年漏网几只猫，它们生下斗斗、梦露、海盗和警长等一大批新生命；所以她今年加紧诱捕，对这只黑白花格外注意。那么对于这只横死车库的猫来说，也许相遇一个保持天性的伴侣是艰难的。它呼唤着，却没有回应，它原始的野力难以延续，孤掌难鸣。这只孤独又狂热的猫，不得不从露天到地下去寻找……直到，死于突然的灾难。

25

宠物医院里，只剩下三只橘色母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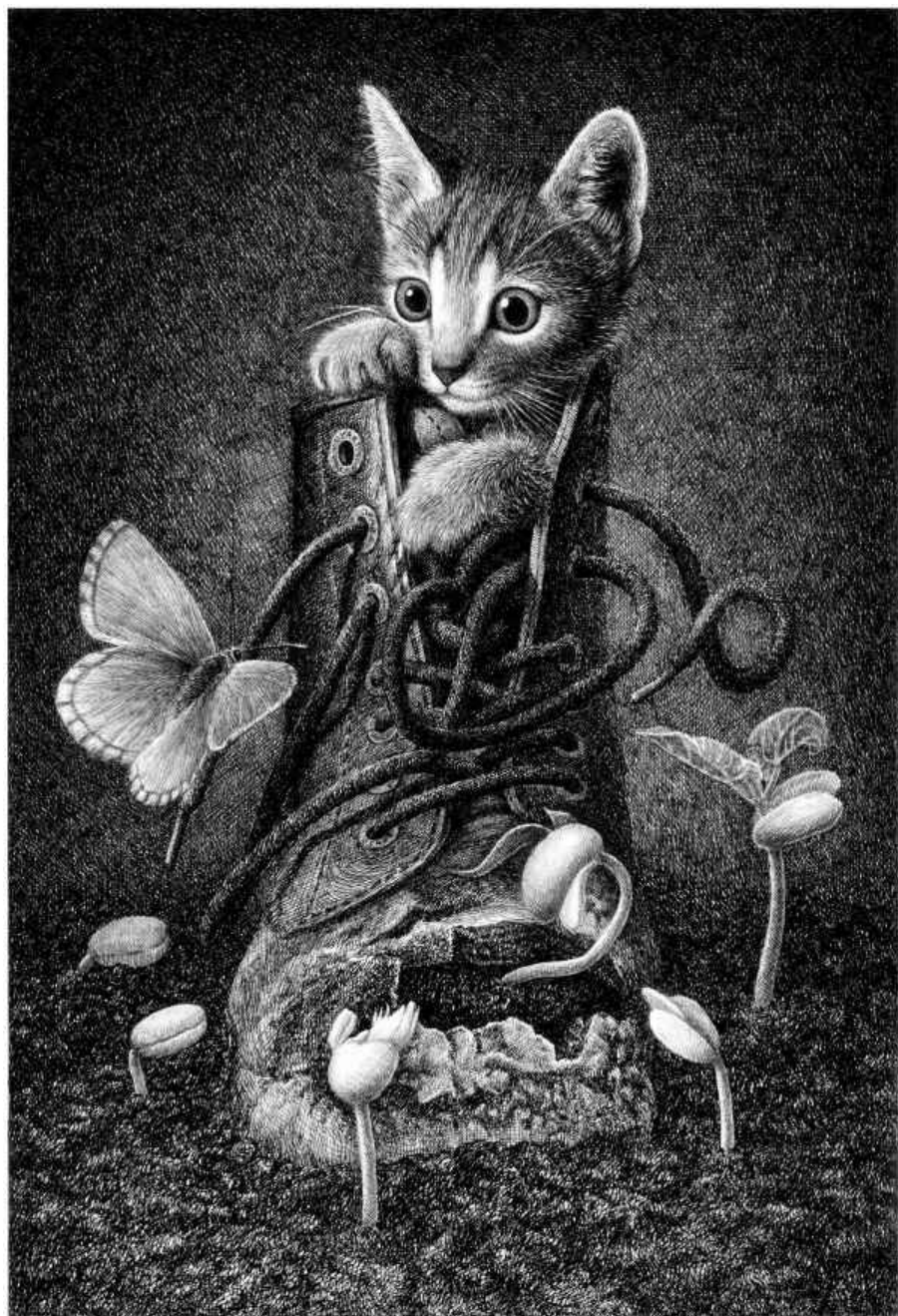
警长几天前就被放了。失去法力的野猫会怎么面对自身的悲剧？如果是家养宠物，据说在经过数天的沮丧和对抗之后，反而与主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密切。性格暴烈的海盗和绅士风度的警长，也会如此吗？当令人震颤的恐惧远离身体和记忆，它们是否从此安心坦然地混吃混睡、无所挂碍？或

者它们开始亲近行刑官，反而向人类寻求保护？也许，它们屈服了，因为它们发现，自身弱小，只有依附一部分人才能抵御另一部分人。比如，野猫之所以热衷在我的露台上休憩，是因为遛狗人路过时，它们的宠物犬再好奇或凶暴，也不敢或不能跃上别人的领地，所以，对猫而言，寄人篱下反而是种保护。

何况，如果猫真的像人类，那么它们必然是健忘的动物，并且会像我们一样——更尊重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更愿意投靠有能力帮助也有能力毁灭的大神。只是，它们永远无法预测，恩威并施、翻覆云雨的人类何时会脸色陡变，何时会生杀予夺。再看野猫总是睡在隐蔽处，甚至睡在陡峭处——并非炫技，而是要让敌人难以接近，要在入睡时防备偷袭。自保几乎成为天性中的必然，因为，它们从未丧失至深的恐惧。

我一直没看到警长的踪影，它是出于自惭形秽而隐匿，还是出于愤怒而远走他乡？是否经过时间的缓冲，不久之后，它也会像两年前手术的大花生一样，对进食和溜门之外的活动兴趣淡漠、斗志全无？大花生终日昏睡，以至于我曾怀疑它患有某种濒死的绝症。天冷时，它壮大的身体一半钻进邻居放置的露天棉窝里；天晴时，它在我的花盆里，像湿泥一样摊平。当猫群集体出行，只有它不分早不分晌地沉睡，似乎已在暗夜里毫不停歇地奔行。大花生不活动，养精蓄锐，除非哪家拉开了门，大花生立即变得身手矫健，试图变成新的家族成员。除了与梦露关系良好，它和其他的猫既无仇恨又无缱绻，形同陌路；它的兴趣，全放在跟人类交流上。

据说，萌声萌调的“喵喵喵”，是猫对人类使用的专用语。除了人类，它们不对任何动物甚至很少对同类发出这种声音。猫只在降生不久，对哺乳期的母亲使用这种声音，求得关注和照料。所有被人类喂养的猫，都自愿变成终生的婴儿。也许它曾经骁勇，被收拾后就威风全无，彻底臣服了。大花生作为一只高龄男猫，尤擅“喵喵喵”，这是天性，还是因为遭受器官的劫掠，康复之后的大花生，从此坚定地寻找来自人类的有效庇护？“喵喵喵”，大花生不断发出谄媚之声——权力庇护之地，自由必然缩减。也许对大花生来说，混得坏，就是在饥饿和寒冷中自由地奔波；过得好，就是成为被家族收养的囚宠。猫是最具有独立精神的宠物，也不过尔尔。



所有被人类喂养的猫，都自愿变成终生的婴儿。

外带箱壳体是厚塑料，格栅侧门有插销。橘猫分别装在三只箱子里，转动身体的空间有限，也许这对刚刚拆线不久的它们来说，反而意味着安全。大琴丈夫带梦露和瘦母猫走在前面，我跟着大琴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斗斗。

曾经给予我隆重信任的斗斗，它不看我。我现在的真面目，对它来说反而是虚伪吧？即使透过格栅，它短暂而淡漠地瞥了我一眼——我们之间的友谊结束了。人类就像最凶狠的窃贼一样，从它的肚子里，把它最重要的宝贝掏走了。那个活泼的、好奇的、明亮的、淘气的、独立的斗斗消失了。它被终身的伤害所终身教育。它因为信任，断送和终结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未来。

梦露爱吃鸡肉罐头，这一口的贪图，使它成为绝代佳人，再也不会会有自己的孩子——从此，它是否还有勇气尝试这样的口味，和身体被撕开的记忆捆绑在一起的口味。对这些未满周岁的猫来说，生活的训诫未免太严厉了。

大琴和我边聊天边走，走着走着，捆绳没有系牢的箱子从自行车后座滑脱，垂直跌落……身体受限而无法施展平衡技能的斗斗被重重磕了一下。我惊慌，透过格栅观察：斗斗的鼻子里碰出了血，但它一声不吭。一方面，它经历了更大的身体劫难，这点伤害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它没有可以撒娇的人，它丧失了可以申诉委屈的愿望和依靠。

征得大琴同意，我把三只外带箱带回家。我准备第一步，先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放到它们出入过的客厅；然后再打开推拉门，放到它们熟悉的露台上——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它们加深印象，我想让它们记住，是我释放了它们。

先放那只瘦母猫。只需拇指和食指捏合，格栅上竖直的小铁棍回缩，自由之门就打开了……可它不动，依然头冲里趴着。我的箱子都快垂直了，纤瘦的它依然试图保持不动，像个用于室内装饰的雕塑。我轻轻抖动箱体，它还是不动。我开始怀疑，它有什么地方骨折或腿瘸了。我走到露台上，叫住外面的大琴，让她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我小心地竖起箱子，让瘦母猫尾巴着地，慢慢地往外倾倒……它的脊椎仿佛丧失支撑，它的身体状若液体，就这样软塌塌地，倒在地面上。数秒之后，它突然醒过来似的，一下跳进离自己最近的灌木丛。往日有猫走过，灌丛顶端的叶片会轻微摇晃；

这次，纹丝不动。受到惊吓的瘦母猫，太小心了，无论它的躲藏还是移动，都一片死寂。我关上推拉门，想让斗斗和梦露在室内停留一会儿。我同时打开了斗斗和梦露的狱门。由于超乎想象的错愕，它们延迟了两秒，才飓风一样冲出外带箱。斗斗和梦露四处蹿跳，频繁撞在落地玻璃和推拉门上——一共有两只猫，但我有种火药被引爆后光痕溅射的错觉。助跑中的肉身与硬物直接撞击，发出连续的钝重之声。巨大的恐惧之下，两只猫弹跳得如此之高，频频蹿至天花板。斗斗借助了纱网，但仿佛是用爪子钩住玻璃向上攀爬的，最后停在能达到的高度极限——斗斗只用锋利的爪尖和收拢的上臂，把自己悬吊在纱网顶端，把脸深埋在内墙和天花板的夹角里。长时间，纹丝不动。一动不动。

我安静地看书，希望斗斗和梦露能逐渐感觉安全。

十分钟后，它们躲在窗帘后面，无声无息。再过十分钟，它们尝试小心地露出头尾。又过去了十分钟，梦露不时跳入墙角那只鲜黄色的塑料拖桶里——平常是用于洗涮墩布的，随即开始了日常的梳洗和打理。

梦露认真舔舐和咬噬，四根雪白的脚趾因用力而分开。偶尔，它会出神，在中断动作的间歇看我一眼。梦露的眼睛依然清亮如露滴。其他的绝育猫都瘦了，脸型薄削，梦露没变。也许梦露的美太强烈，经得起摧毁，什么也不能阻挡它的光芒。劫难之后，它还是妖异又清纯，果真是只倾国倾城的猫。梦露继续打理自己，从容中有种凛然。

斗斗紧贴着落地玻璃，用刚才跌伤出血的鼻子，一路深嗅，焦灼地试图寻找可能逃出的裂隙。从正面看，斗斗除了略瘦，没什么太大变化；甚至像经历了整容手术一样，它比原来好看。也许得知斗斗的性别，使我重新调整了审美角度，我越看它越有一种异域风情。因为刀口缝合的问题，它的腹毛被剃掉了，延伸两侧，各有一块伤湿止痛膏药那么大面积，皮肤光裸。看起来，斗斗的腹部向上紧贴，腰部狭长，像只饥饿的豹。

忽然，外面来了一只猫，是海盗。

28

大琴说海盗前一段时间生病，差点死了，送去救治，顺便做了绝育。这解释了海盗的失踪。就像我弄错斗斗的性别一样，海盗耳标在左，是男孩。此时到来，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猫除了丰富的语言系统外还有奇妙的传递信息方式，能使海盗现身，前来迎接同样患难的亲人。

我打开推拉门。巡察中的斗斗，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疯狂冲刺；不，它的步伐一点儿不像逃离，反而有了几分庄重。斗斗平静地迈出那道世界分野

的门槛，走向探询中的海盗。海盗贴近斗斗，仿若人类外交礼节那样贴面，这种交流方式，对猫来说不像是礼貌化了的热情，更像小心而深挚的问候和安慰……看到那种碰触，我猜它们是情感依旧却永生永世再也无法亲密的爱侣。

随后，斗斗和刚才那只瘦母猫一样，纵身跳入灌丛。整个过程中，斗斗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它视若无物。最专情，因而伤害也会最深吧？斗斗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人类的房间了，因为，它再也不能和曾经的自己相遇。整个冬天，这里都是斗斗嬉戏的乐园；现在是春天，它不来了，它身体的花朵关闭了。斗斗一声也没有叫，携带着默哀的身体，远离。

尽管我把推拉门很大地敞开，来回出入，示意梦露可以离开。可梦露不动，继续待在那只塑料拖桶里；斗斗的解放，没给它带来任何影响和启发。表演失败的我，回到躺椅上凝视着它，正如它保持警戒地凝视着我。

我中午要出门，可我们竟这样，僵持了二十分钟，毫无变化。我想目睹它的历史转折时刻，看样子，得放弃。它执意不遵从，像是宁愿被囚禁，也不愿让我以恩人自居……它从来不愿把“恩”和“人”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假意去接个电话，回来看，梦露已经不在那只塑料桶里。它离开了吗？走到跟前检查，在窗帘和塑料桶之间，我发现一团橘色的毛丛，似乎有些高频率、小幅度的起伏。自由，是如此巨大的礼物，难道它接受起来有一点震动之下的害羞？

我再次离开，去洗漱台刷牙。牙膏泡沫丰满的时候，我听到极短的一声“喵”，几乎，只相当于喉咙间一个不动嘴唇的颤音。是狂喜、感恩、挑衅还是畏惧，我猜不出来，但那一定是梦露的声音。门外，是汹涌的、澎湃的、扑面而来的像整个世界那么大的自由……它那个叫声，几乎是对自己的鼓励。果然，纱帘下只剩人去楼空的一个小小凹痕，它就像一个美的传奇那样消失。

29

这是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北京下了今年第一场雪。

亿万雪花，各不相同，每一片都精湛。雪，来自高空却如此柔缓，来自广阔却如此均匀，神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他的赐福无声，他给予的美凛冽，他有覆盖万物的公正。

应该是开花的季节，却有如此奇异的春雪。玉兰花苞已是蝶蛹大小，雪就落在它们细腻的茸毛上。从零零星星，到浩浩荡荡。本来以为，这个时节的雪，只是个象征的意思，没想到，竟然下得如此意外，如此稠密，如此

急管繁弦。原来，风中隐隐能闻到动物浊暖的膻腥气；随着这场雪的到来，闻不到了。

大花生蹲在冰冷的空调金属外机上，见到我，立即“喵喵喵”地靠拢。闹钟一样的斗斗，魅惑的梦露，这对姐妹花没有来；其他猫，也没有来。曾经群猫簇拥的下沉式小花园空荡荡的，雪覆盖了泥土、尚未萌芽的枯草以及猫的爪痕。这个世界，有多少爱以伤害的方式进行，又有多少残酷以拯救的面目出现。大雪无声，我听不到野猫的叫声。它们将熟悉这种阉割，将不再为欲望而燃烧。这是一个哑巴的春天。

我想象劫后余生的它们和其他猫在一起，在这样弥漫天地的大雪之中，紧紧簇拥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幽暗角落……身体之外，全是寒意。

我不知道艰难的和解何时到来。

池鱼

夜捕：湖池里的鱼

湘湖，听起来地处湖南，其实在浙江。这里的鱼，据说味道鲜美。人们每天早晨赶到码头，去挑选新鲜打捞的渔获。我联系了相关人员，跟船夜捕。

湖面浩荡，不过是更大的池塘。它们在劫难逃。

3:45

路上，没人，只有两侧压低的树影。整个世界，像睡在沙床上的一条黑脊巨鱼，几乎不动；唯一一片大鱼鳞似的月亮，剥落，漂浮。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汽车驶向约定的地点。路过一些旅游接待酒店，停车场空旷，液晶屏以醒目红色显现还有三百五十个车位。除此，夜晚呈现低彩度，近于黑白效果。一只黑白花的猫，梦游般，穿过雾里的灌丛。

湖水在雾气下荡漾。无声。

4:02

打鱼的船有两条，前后而行。舟体轻薄，一只比另一只更轻。前面那条是电动的，窄长，形似威尼斯的贡多拉，拖曳一只几乎等长的白塑料船。后面那只，船体薄得像是放大的纸船。每只船上坐个渔夫，衣服上的反光，如渔网上闪动的浮标。

我换乘雅马哈150，驾驶摩托艇的是刚才的汽车司机。跟随先行出发的渔船追赶过去，摩托艇在湖面形成宽阔的尾迹。我站着，风大，我用一只手勾牢船上的栏杆，用另一只手摸摸挂着的救生圈：气体充满了，硬得像石头。

浪大的时候，动力充沛的船只尚不能行；一尾相比之下弱力的、仅以肌肉搏击的鱼，却可以自在游动。鱼没有四肢，陆地上寸步难行，在水里畅行无碍。水到哪里，就能把它们送到哪里。今夜，水会将一部分鱼，送到无水之地。

4:17

几盏夜灯照耀着石孔桥，穿行过去的两条船并未马上开始作业。他们慢慢靠近苇丛，把那条薄壳的空塑料船拴系在那里。两个男人回到电动船上，分坐头尾。驶离苇丛之后，他们开始撒网了。隔着黑暗和距离，我看不清他们的动作，隐约觉得，他们的动作，像把即将插植的秧苗扔到水田里。

想起前两天，我跟船去钱塘江。我是下午两三点钟上的船，天阴着，是那种看不出上下午的阴天。打鱼人先放下一块方形的浮板，上面有面三角旗。这是标记。然后，他开始放网。每隔一段，就用长绳拴系一块魔方那么大的砖头，好让渔网下沉。渔网那么大，在湾口里几乎拦截整条钱塘江。半个小时后，在指导下，我尝试拉网。尼龙绳细韧，具有一定弹性，但依然有些沉，勒手。隐约嗅到鱼的腥气，继续拽动网绳，希望在即。丝网与湖水形成一个沥水的三角面积，形成帆状的斜面，但除了从上面落下的水滴，一无所有。整个下午的劳作，最后，网上只有一尾比食指长不了多少的小鱼。只有夜晚和风雨天，或缺乏光线，或泥沙混浊，鱼看不到丝网才会撞网。否则，在贫瘠的水域里，我们什么也捞不到。

如同钱塘江湾口所看到的，湘湖上的夜捕，渔网在一个较小区域，跨度从此岸到彼岸，几乎隔断湖面。在摩托艇前灯的光束里，我看到，渔网上有浮球，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个光斑闪动。沉入湖水和黑暗，网，细若蛛丝，是面积最大却最透明轻盈的凶器。

4:33

一个男人划船。另一个男人，站在船头，他一次次举起手里的竹竿。竹竿很长，有四五米，比船体短不了多少，上面缀挂数个铁环。男人不断击打水面，每当抬起，沥水的竹竿就形成密集的水帘；除此，他还用力摩擦船帮，把竹竿使得像个哗啦啦带响的古代兵器。

我向捕鱼船的后方看去，推远的背景上，是大型音乐喷泉所在地。周末或节日，那里上演喷泉音乐秀：被操控程序指挥的跳舞的水柱和光柱，蔚为壮观。但平时，它们像海市蜃楼神秘失踪，只看得到高高低低、赫然林立的不锈钢管……后工业时代的金属藕节。此时，除了竹竿的拍溅之声，万籁俱寂。击水是为了让鱼群惊恐，它们慌不择路时更易触网。

之后的夜捕人，坐下来休息，抽烟。两个忽明忽暗的光点——他们在短暂的惬意中等待。此时，在稠黑的平静湖面之下，是无数惊惧而绝望的挣扎。

5:06

他们解开那条塑料船，拖行在后面。一前一后的两条船，匕首般划过水

面，锋利而光滑，沉默而自信。两条船，一条撒网，一条装鱼；一条装凶器，一条装死者。

我凝视整个收网过程，凝视那些耀动的银光。拉网，拉上来的，是全身抵抗的铠甲和鳃丝里勒出来的血。手电发出的致盲的强光，从晶透的鼓瞪的不会瞑目的眼睛中反射出来。拉网声很轻，但把鱼从网丝上摘除后，会发出“咚”的沉重钝响……那是头骨撞船帮、脊骨撞底舱的声音。鱼，一个接着一个，栽到船里，栽到它流血的抽搐的同类之间。每个新的牺牲者都不甘，挣扎得如此剧烈，拍打的水花溅起数米。

它们没有四肢，在水下是自由，在水上是残疾。它们一次次竖起无望的前鳍，自由已逝，死之将至。这些害羞的大鱼，平常很少靠近水面，它们谨慎，不贪食漂浮而来的可疑之物，它们甚至不靠近明亮。在寒黑的水深处，它们感觉安全。白天打鱼，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鱼看得到网，即使在它们的经验里从未见识渔网，它们也抱着天然的警觉游开了。然而，在黎明之前，在夜晚的最后一道边缘，它们像是从梦境里被打捞上来的。即使强光快把眼睛照瞎了，它们也不能闭上。

对人类来说，这的确是张梦境之网：透明到隐约，轻盈到虚无，却能展现丰收的魔法。捞上来的，以白鲢居多，花鲢的数量少些。花鲢更结实，大头宽脊，所以它们的每一下挣扎，都更沉重，更沉痛。

7:28

窑里坞码头。白壳塑料船里，是夜捕所获。

船舱里的水，浅得不能保持泳姿，它们被迫侧躺下来……只有临终才能用到这样的姿势，而这是最为恰切的时候。鱼躺在鱼之间，躺在公共的弥留之际，躺在嘴里吐出和因身体扭动造成的泡沫里。相濡以沫的，是浸血的泡沫，只不过稀释为一种脓水般的微黄。鱼鳞是斑驳的红色，从水下三十米的寒冷到达水上一米的温暖，热度上升，却让它们凉透了，风像把逆行的硬刷，试图生生刮掉每个鳞片——它们一生都在呵护上面的银光，一直到被自己生生撞击出来的血浸红。

它们头侧枕着浅水，发出人声那样笨重的喘息，像是患有气管炎症。每一口，都是疼痛着吸入又疼痛着呼出。偶尔一条鱼扭动肌肉，把头探出水面，吐出像是从胸腔压迫出来的叹息。这条倔强不甘的鱼，忽然首尾支撑，像拱桥那样弯起身子；又相反用力，头尾露出水面，露出受难者下陷的嘴和尾巴凝重的青铜色。多数，只是胸鳍间隔着支起，像一遍遍撑起又一遍遍落下的残帆。最大的一条，背脊上有半圆的黑斑，但这位弥留者的前鳍一动不动，像把锈了的短匕首。这些背脊雄阔的鱼，像病床上的绝望

者无法交代最后的遗嘱。呼出的每口气，都含冤：它们一生谨小慎微，却落到缓慢的死刑里。

此前，大鱼游动在辽阔的湖里，看似游动在自由里……直到身陷船舱，浸泡在微弱而低氧的水流里。弥留之际，鱼鳃如同节拍器，一张一合，它们试图制造持续的涟漪和氧气。原来，一切都是养殖箱里的动荡，这些鲢鱼始终在养大自己不出所料的死，以及在此之前，貌似安稳的一生。

鱼和鱼挤靠在一起，这是短暂的依偎。随后，它们被重摔在颗粒粗糙的路面上；被塞进闷住头脸的塑料袋，呼吸它们根本呼吸不进去的氧气；被刀口甚至斧刃剁开，看到自己体内的脏器被当作垃圾倒掉。

买家的眼里，它们只是八斤的肉或者十五斤的肉。捕鱼人将从中获利，因为杀戮也是一种劳动，并由此赢得日常的奖励。一个多小时以前的渔获，卖完了。

之所以鱼多，因为工作人员每年都放养鱼苗。之所以有限捕捞，或许也不是因为环保，而是担心卖不掉。

7:53

我和餐厅采购员走向酒店。他买了那条最大的花鲢，准备熬汤。蒙在塑料编织袋里，它濒死的身体，已染成人类新婚般的血红色；既直瞪又茫然，既鼓凸又下陷的眼珠，煮熟以后，将硬白得瘁人。

我想象那最初的时候，幼鱼在明澈的水里闪光，就像许愿池里的银币。现在这些大鱼、鳞片，就像布满污迹、被废除的镍币。

杀鱼练习：洗碗池里的鱼

在墨尔本鱼市，我们专门买那种样子奇怪的海鲜。本来卖鱼的管收拾，负责把鱼收拾为腹腔清空的食材，裹在牛皮纸里递过来。但同行的两个画家要先把鱼画成静物——作品完成之前，鱼虾需保持完整的遗容。画板上的鱼栩栩如生，煎锅里的鱼将香消玉殒。

我们连续吃了一周海鲜。每天，我动刀动剪，去鳃除鳞，手指留下腥气和两道细小的割痕。而它们，在槽池里，无法保持最后的遗容。

陆地上的兽吃鱼，天上的鸟吃鱼，甚至海里的鱼也吃鱼。鱼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它有盐、有脂肪、有蛋白质，甚至有道德家所需要的素食感——相比其他动物，鱼肉更近于素食。

星期一

两条鱼，颜色接近，都是混进肉粉的红色。样貌滑稽，体色喜庆，两个穿好演出服的小丑，它们缺乏悲剧感，更像是在狂欢节上迎接死神。

一条大的，像东星斑。它的头颅像截断的纺锤，鳃盖紧闭，贴合得找不到一丝裂隙——脸颊上的骨片，让人误以为是鳃裂，其实只是条分界的浅槽；真正的鳃裂在裂线后缘，呈锐盾状。虹膜微陷，鱼眼周围一圈橘黄，中间放大的瞳仁，呈现僵硬的灰黑色，像廉价油漆的点染。它的眼睛介于混浊与晶莹之间。鱼，死不瞑目，却丧失复仇的能力，听任被摆拍，呈现宿命的服从。

刺齿凌乱，角度无规则，像一盘被搅乱的棋，残留着失败的阴谋感。腹部以上，从面颊、背脊到体侧，遍布矿物质般细小的银蓝色星痣，大小如同老年斑——越靠脸部，颗粒越大；越近尾部，颗粒越小，形如针刺……星宿渐隐于黎明绯红的霞色之中。它有微微发福的中年的腹部，悲观主义者下撇的唇形，所有的鳍——背鳍、腹鳍和尾鳍——都贴伏，像个穿紧身衣并卷起湿漉漉袖子的人。这条鱼的脏器上附着芝麻样的黑点，好像皮肤上的斑点在腔肠里也映下阴影。

另一条小的，扁矩形的头像个行李箱，它的眼眶隆起，形同宽大眉骨，甚至更像额上的角。相比身体来说，它的头部比例隆重，具有几何线条和工业设计感。在下颌前缘，对称前伸着一双暗器：透明的锐刺，是刀尖最小的那部分锋芒。同样的锐刺，也存在于它的鳃侧。胸鳍长到它身体的一半，像是翅膀的次级飞羽，收拢时内敛、打开时张扬的柠檬黄隐藏在褶皱之中。即使是成鱼，它依然带有一种孩子气，对自己的死抱有游戏受挫般并不持续的恼怒。

这条小的，被竖直地放入锅釜之中，它几乎像蝶螈般用小爪子支撑着底部。它活着或许从未与那条大鱼谋面，却死在同一锅浓郁的汤汁里……像个陪葬的小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的骨刺混杂在一起，参差难辨，齿轮彼此咬合，完成仇恨般的生死相依。

是冷水下锅，直接煮的。浸泡在锅里的两条鱼，被掏取的腹腔没有脏器，凝结的管脉没有血……它们荡漾在至清无鱼的水里，死后比活着时的水更干净。两条鱼的背鳍都紧贴脊线，几乎没有面积——它们树立在最高处的旌旗倒塌，就像落帆的桅杆断了，它们失去身体上的国土，在熬煮自己的汤汁里倾翻，葬送一生的泳技。

星期二

三条鱼，其中一条眼睛暴血。它们的大眼睛，都有果冻状的外缘，已经没有景深的瞳孔泛出灰白的胶质。背鳍和腹鳍形如宽齿梳，中间连接着蹼状的粉红膜。它们紧身的鳞甲，工艺精湛，严丝合缝地贴伏，几乎难以掀起一片逆鳞。

然而，当鳞衣被钱行的利剪刮除，几乎难以目视的冰晶散落在水池和垃圾槽里，剩下它们丧失抵抗的裸皮……如老人般单薄，与肌肉是游离的，可以在轻微的按压下错位地滑动。

它们从乳晕般性感的红色，变成淋烫之下痛感的红色。

星期三

Tropic bream，热带鲤，是这种鱼的名字。

一条鱼大些，它的嘴紧抿，满怀伤感和抵抗；另一条，嘴微张，像索求哺乳的婴儿……这条婴儿鱼，有一小段腔肠从松懈下来的肛门流泻出来。

热带鲤的脸，分布数条静脉血管的淤青色，鼻梁有两道横纹。腹鳍尖利，像是体内的刺针越出皮肤。它们有手风琴似的鳃，虽说是死鱼，可被扯断的时候，它们还是流下新鲜的血。

每片鳞，看不见核心，从中央散出密集、精湛、均匀的线条，像是贝壳状的放射肋。鳞片不是绝对规则的圆，是在压力下轻微变形的不规则的圆。热带鲤生前吝啬，它看守自己的鳞，从不丢失任何一片；死后，这些鳞一片一片地被剥离，离开血肉的捍卫。覆瓦状的排列太结实，我快速用钱行的剪刀除鳞——鱼鳞频频进射，像从油锅里弹跳出来的豆粒，再看，又像从一个小罐子里倒出银币。不大的两条鱼，鳞片铺满不锈钢水槽，像许愿池一样。它们会许愿作为一条鱼的来生吗？

整片刮鳞困难，但依照剥玉米粒的办法分行刮除，就好处理多了。鱼鳞那种牙根般坚强的支撑力似乎被动摇，轻易拔除。很奇怪，刮了一侧的鳞，另一侧的手感改变，鳞皮马上柔软许多。似乎亡灵有知，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左边的侧鳍剪掉了，鱼像丢失一支桨板的船，另外一支桨垂耷着，按照人们对一条死鱼的要求那样漂向冥河。除鳞后的鱼皮，像收割后悲怆的麦茬地，留下凄冷的饥饿感。鱼皮显现暗纹，像冲击后的滩涂，又像隐匿的沙床……一条河在死后告知它全部的咒语和秘宝。

断鳃、剪鳍、除鳞的酷刑过程中，鱼的二目圆睁，躺在刽子手密集制造的伤口中，麻木地沉默。没有绝望，它们生活在比绝望更远的地方。只是我撬开鳃盖所用的指力，让那条闭嘴的鱼张开嘴，露出婴儿口唇里的浅肉红

色。

从鱼变成食材的过程中，画家大厨听着声效极好的音响——两条鱼浸泡在自身煮出的汤汁和歌剧中。咏叹调极美，像是大天使的歌喉，深情而自如。我们享乐其中。不是它们。

如果上帝的洪水到来，这只是人类的灾难，一条鱼为什么要逃亡呢？席卷的惊涛恰是它失重的天堂，没有上与下、左与右，没有轻与重、升与降，那是波浪如神的大摇篮。现在，躺在盘子上的两条鱼枕在波浪……图案的餐垫上。这是完美的遗照。之后，尸骨无存。

星期四

Mud crab，泥蟹。

身体，闪烁铁质金属光，尤其腿爪上有岩斑——像藤壳覆满礁石，像雨击打在沙滩上留下的坑痕。后腿末端，形如海龟桨板状的鳍肢。蟹壳前缘，刺齿均匀，这些冷兵器的锋刃。泥蟹狠勇，它举得起巨斧般沉重的双钳。钳子有力到可以夹断人的手指，闭合时并不完全合拢，像鳄鱼悬口那样留着空隙，上下钳之间凸起的瘤体，像人类口腔的石膏齿模，像数颗用于磨碎食物的有力槽牙。它举起巨钳，臂力千钧，而此时，拳肘被两根蓝色橡皮筋牢牢捆绑，无法伸展和作为。

小而柱状的眼睛直竖，短小的鞭须挥动，泥蟹不断吐出愤怒的泡沫。它是青铜器时代的武士，复仇的力量使它更加沉着。泥蟹面无表情，却传达不可侵犯的威严表情。挪移腿爪，并不匍匐，它边走边抬升自己的身体。画家的手突然按下来，把泥蟹按在操作台的案板上，旁边就是斩杀的刀具。泥蟹拼命反抗，以致从灶台摔下来。高度加之自重，它左侧的利斧突然断了……像只甩飞的靴子。泥蟹吓住了，被自身的灾难所诅咒，它的壳甲被震裂出两根枯枝状的线痕。当人类低头察看这份预备中的晚餐，泥蟹用残疾的身体继续抗争，仅剩的唯一兵器也失守——右钳也掉了。断尽臂膀的巨人已无求生渴望，它被放在角落，一动不动。即使无人看管，它铆死在自己的悲剧里。它像石头一样，牢牢压住自己的影子和残肢。

二十分钟以后，泥蟹还是不动。泥蟹的关节再也不能支撑和控制，残肢无力悬垂，像被风吹荡的绳子。在它刚才趴着的地方，一摊透明的黏液流下，略带浅到不易被发现的蓝灰色。那是它的血，像植物一样害羞的不动声色的血。因为肢体被生生折断，它一直在流血，流走它的能量。

三个小时以后，它被从蒸锅上端下来，被平静地装盘。它的金属盖子被劈成两半。手风琴一样的褶鳃，被扯断。它的心，一片半透明的六角形，被

掏出。它的腿，全部被掰断。它的眼睛可以触到自己的尖脐，它的鳌足可以紧挨自己的膏脂，这一块，那一块，作为碎尸的泥蟹。散发新鲜海物特有的腥香。它变红，变成节日的鲜艳和应邀的死。

泥蟹走红，当晚的红鱼，反而不是主角，倒像马戏团的配角。红鱼有着蛙类那样圆大而转动的眼球，有隐约的上眼皮，只是像坏了的幕帘那样不能落下。就像魔术师的礼服有着丝绸内衬，它体内的腹膜是黑色的。浓黑的黑，呈肺叶状对称地展开……剖腹之后，我就看到它胸腔里那架黑暗的手风琴。膜层极薄，撕下来可以捻成一条线，是那种可以穿过针孔的神奇织物。体内是手风琴，对称在体外的，是蒲扇状的胸鳍，上面布满铜绿色的褶皱和斑点。

眼睛圆睁。死去多时，湿漉漉的身体仿佛还在保持生前的低温。我看着红鱼的样子，怀疑鱼中的魔鬼也混了进来。只有魔鬼，才有如此千变万化的外表；天使的模样比较固定，因为他们不怕被追究过往。魔鬼的样子，总是奇诡、斑斓，充满挑衅的创意。

星期五

Dory。这个词的意思是平底小渔船，也指一种鱼——海鲂。

海鲂体侧有个突兀的鲍鱼状圆斑，仔细看，像枚古钱，海鲂的形状，像个女士的钱包。它穿了一层贴身雨衣——是的，紧裹一层塑料薄膜，反射着化学的、几乎在生物上必然失真的光。它的背鳍硬，像把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在里面。不像鳍，分明像骨头——硬得不止像旗杆，是硬得像墓碑。背鳍后方，还有两排小到不易察觉的锐刺。

它的牙，是尼龙粘钩那样的密丛，密小到极端的程度。甚至它的鳃弓内部，锋利得像长满了牙，比它真正的牙更像是牙。很难剪下来。我原来以为只有雀鳝的鳃难以摘除，因为雀鳝脸小，从指甲盖那么大的撬盖里掏出鳃叶并非易事。海鲂看似并无难度，没想到，竟然难以轻易扯断这些嚼水的工具。

从已经松弛的泄殖腔，我探进剪尖，一刀就剪到下颌，几乎剪破下唇。开膛破腹的裂口又短又窄。我像小偷一样，只能勉强伸了两根手指，从有限的口袋塞进去，掏取它脏款一样的脏器。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带鱼。很好收拾。下巴那里划一下，黑红的一坨脏器就稀里哗啦地掉出来……带鱼的内脏集中在身体前部，这点和海鲂很像。有没有什么鱼，把内脏藏在迷宫里，如同童话中把心脏藏在诡秘之地的妖怪？

一走神，指端锐痛，我竟然摸到它内脏里的一根针，直直地戳露出来：两

厘米，锋芒毕露。它的鳃里长牙，可我从没见过内脏里长刺的鱼。难道，它游动在自己全身的荆棘里？

仔细看，我才发现，这是一条凶手鱼。海鲂的胃囊包裹着刚刚吞下的猎物。两条小鱼的样貌清晰，只是一条两三厘米的小鱼已经被海鲂的胃液溶解成半液体；另一条，正是背上挑着独根剑刺的侠客，它的针状嘴和刚才挑破鲂鱼胃膜的背针几乎等长。

海鲂，它拥有阴谋家沉暗的体色，但它的食材艳丽多姿——像是贪污者的作风，谋杀者的爱好。

星期六

鲮鱼，又叫胭脂鱼。

没有表情，单调而平板的脸。我总觉得，它像个老修女，没有褪去羞红的体色，眼圈也是微微发红的。它的表情，看起来平淡又严肃，让人想不到它安静、下撇、紧闭、开合度极为有限的嘴唇里，却有着那么肥厚的舌头。永远喃喃自语的，祈祷或赞美的舌头。

它的体表无刺，它不携带任何凶器。虽然也有旗状的背鳍，却低顺而伏贴，如虔诚女子的裙裾。被掏空之后，它的体内，依然淤积着浓烈的一腔经血。

星期天

披坚执锐，舞纓携剑，它是戏曲里浓墨重彩的扎靠英雄。一只熟龙虾可以用来考验美术生的眼力。五颜六色的黄，里面包括了橘黄、藤黄、土黄、金黄，包括了发红的黄、发绿的黄、发灰的黄……参差而匹配。

看它的螯钳和尾柄，它是一种长成了冷兵器的动物。重兵把守自己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对付不了几颗残牙。现在，它被做成了汤羹。洁白无瑕，它被剥离的肉，躺在味道稠厚的奶油汤汁里。

我们也买了红鲂，鳞片又圆又大，每片都像成人拇指的甲盖。不过一周下来，我们谁也没有兴趣再吃鱼了，它被冻起来，眼睛埋在冰碴和黑暗里。

赞美诗：文字池里的鱼

鱼，在我的散文里承担或轻或重的戏份。作为杀鱼者，我的脸并未沾上鳞片；我耐心剥下鱼鳞，让它们闪耀动人的词语之光。修辞的旋律响起，我是乐池里的指挥……它们被我的文字所赞颂。

鱼在大网和浅水里挣扎，不能阻止我作为食客杀戮的决心；我刮除它们的鳞片、掏取它们的肠胃，并不影响我作为写作者对它们持续的咏唱。旁观夜捕，亲手解剖，然后是修辞描述——我从慈善家的悲悯，到屠夫的无动于衷，然后归于诗人的抒情。杀伐在握，人类拥有转换的自由。

鱼，生前死后，都是哑者。它们保持令人满意的宁静，这是牺牲者永恒的美德。

二〇〇〇，《动物园》

沙滩搁浅的鱼，衔在海鸟嘴里的鱼，产卵后体力衰竭的鱼，冻结在冰层里的鱼，汤锅中被熬煮的鱼，化石中上千年不语的鱼……鱼，千年万年，它们疼痛不发出叫喊，死去不闭上眼睛。我见过一块狼鲭鱼化石，整齐对称的骨刺，就像叶脉那样清晰地拓印着一飘零于很久很久以前的秋天，它是一片不朽的落叶；它躺在千年干涸的坚硬的石质河床上，凝固着对一个海洋的怀念。

二〇〇四，《海平线》

在浪也不能推动的寂静深处，在无人知晓的幽暗里，鱼绚丽如花，并听任举世无双的美被默默消耗。真正的美，是一种内在的自觉，一种感情选择，而非出于生存和虚荣的要求。为了捍卫美的尊严，它们才孤独，像深海的鱼鳞，密林中的豹纹，内心的善。

二〇〇六，《桃花烧》

最后的抢救是无效的。我不甘不舍地把它搁回鱼缸，它还圆睁不瞑的眼睛，柔软地泡在水面。白雪公主住在水晶棺里依然能被唤醒，但它，将慢慢腐烂，从体表，到内脏。死鱼曾经的同伴嫌恶地游开，远远绕行它的尸体——而它像天使，漂浮在比它们更高的地方。

二〇〇八，《夏至》

在有咸度的环境里，写作者能否誓作孤独之鱼，永远张目而不流泪，坚持着它的畅游、它的鳞刺、它的捍卫和永不止息的生长？

二〇一二，《巨鲸歌唱》

鱼，闪动鳞彩，被马赛克精密镶嵌的身体……怎么能形容那种美呢？这些海里的彩宝石。海鱼奇形怪状：鲑鱼展开黑丝绒的翼展，就像海里的大风箏；比目鱼，扑克牌般拥有身体两面完全不同的花色；还有蓑鲉，非洲酋长那招摇夸张的羽饰。生活在这里的鱼对海怀有无与伦比的忠诚，那是一

种关于盐的宗教……齿梳般的骨刺，仿若一条鱼从头到尾、贯彻终身的信仰。

鱼，水里结出的果实。什么是经典的海洋景象？鱼群。没有指挥，但数量惊人的鱼好像共享头脑，它们行动整齐，无论前行还是下潜，始终维护着内在秩序，不会彼此冲撞。它们沉默而一致地，在大海的咸涩里漫游，无声，却是宏伟壮阔的合唱。

二〇一三，《素描簿》

飞鱼：迹近神话中的动物，或者说，它们因接近神话而令人神往。无垠的蓝，它们神秘跃出海面，张开鳍羽，尾部形同优雅的滑板，它们就像迁徙的鸟群那样开始完美的翱翔——身体闪耀着新银器的光芒，由此进入危险而无畏的自由。这是一场盛大的集体狂欢，如此壮阔，激动人心。飞鱼起起落落，如同海上奇迹般绽放礼花。

泰戈尔写道：“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行。”想飞的鱼，身怀放置到绝境的理想。或许宗教有时就意味着某种自觉性质的自虐。飞鱼超越身份和环境的限制，把自己变成不可能的部分……这就是神性。

二〇一七，《血童话》

最让我迷恋的，当然是她：美人鱼——名字真好，无论做人的时候还是做鱼的时候，她都最美。美人鱼，既有美貌，又有美德，且不多言，比谦逊者还沉默，比勇敢者还无畏，比死更靠近永恒。

二〇一八，《星鱼》

最为美妙的，是鱼群。那么多颜色，那么多斑点和条纹，那么多形态和数量。它们聚集，又散开，变幻万千……像摇曳的焰火，像永无止境的礼花。这样的绚丽，这样丰富得超出极限的美。大地上的植物有四季；而在大海里的鱼，只要活着，它们就是终生的花朵、终生的果实。

二〇一八，《野猫记》

你甚至不能说，杀手不喜欢甚至不爱慕他自己的猎物。看，人类把鱼类图案绘满各种用具，杯碗、衣服和窗帘，玩具、灯具和床具，他们为鱼制作模型和雕塑，甚至把鱼的图案文上自己的身体。那又怎么样呢？爱，甚至不能阻止杀戮——人们就在绘有鱼图案的餐盘里，分割鱼的骨和肉。爱与恨，远远不如骨与肉那么便于分离。

行云

1

人生在世，总要受到肉体的沉赘拖累；我们不断用食物和性，填补它天然的破绽。是啊，灵魂轻盈，难以拖动生命的自重起飞。好在，我们还有几种简易的操作方式——艺术创作，或者，仅仅是买一张航空公司的机票。

很多人不愿忍受候机或者长距离飞行。作为一个严重缺乏耐心的人，我在候机厅却从不焦躁。读书，闲逛，或者就是旁观人群，我都喜欢。

机场大概算是举架最高的人类建筑物之一。顶棚有硕大的支撑管架，通常由无数个角形的钢架结构相互焊接，体现出某种后工业时代的观念艺术。奇异的顶架一旦形成，就像是高空的闲置物，几乎看不到人类作业或活动的痕迹。我偶尔看到几个油漆工站在悬梁上工作，腰背挂了根安全绳，他们徐徐放下自己，就像笨拙的蜘蛛——体重悬垂一线，看起来非常危险。悬置半空，在任何时候都给人以极度的不安感——此后几个小时，我将悬空，只是我的安全带绑在腰腹，绑在座椅上，绑在毫无系挂的虚无里。

坐在候机厅里的每个人，都被严格筛检过，他们要比常情下的人群更安全。就像远离细菌的洁癖患者一样，他们没有凶器，没有武器，没有利器，没有过重的行李和罐装的液体。别无他物，乘客只身进入机舱，就像被金属大蜻蜓吞进腹腔的蚊蚋。之所以如此，因为发生在高空的任何过激情绪反应，佐以器物，都可能产生毁灭性的陪葬。任何一个乘客，必须以安全性的面貌，才能开始充满不安全感的旅行。

事实上，我们很难克服对飞行的不适与不安，即使飞机几乎是世界上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出事概率要比出门骑车被撞身亡的概率低多了。然而，统计学上的安全不能安慰我们；这种似乎有悖常识的常识，还要遭到我们潜在经验的排斥。机场化妆品门店里，站着促销的姑娘。她背着一对溅了些微渍迹的棉质翅膀，正商业性地扮演天使。我从来不能想象，有谁背负数公斤的翅膀，像复古油画中那样冉冉升起——我们尚且不能负担翅膀，何以负担飞行？然而，飞机航行，数十吨重的钢铁悬举着穿越云层，无论怎样目睹，无论怎样以空气动力学原理加以解释，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老式女鞋那样的机头，写着“禁止踩踏”警示字迹的翼板，起飞以后收进腹腔的滑轮，始终隐藏的引擎……这些奇形怪状的金属组装在一起，让簇拥的人群和沉重的行李悬浮在经受不住一滴雨水的半空。假设，一个原始部

落的土著人目睹此景，会怎样膜拜并笃信神迹？近百米长、翼展几十米宽、载重达几百吨的钢铁，高高低低地起落……就这样，具体之物坐落于抽象之上，沉重之物飘浮于虚无之上。

我们总是惊异于航行场景的诡异，却忽视那些司空见惯的奇迹——想想吧，天空布满云团，仅仅一朵中等规模的积云，就相当于四十头大象的体重。

2

航班晚点，乘客反复到柜台前咨询，得到的总是礼貌、模糊而缺乏确切意义的答复。许多原因都可以导致航班延误，有时因为飞机晚到，有时因为航空管制，有时因为云层携带着正在形成的暴风雨。不过，无论你是为此沉默还是抱怨，也只能无所事事重新坐回冰冷的金属座椅，等待广播的通知，甚至滞留机场附近的酒店，等待启程。等吧，天上的事你什么也决定不了，只能原地等待，就像接受被动的命运。

相反，我喜欢候机的时光，因为偏爱旅行中的阅读，似乎那是喧杂中维持平衡的有效方式。我在家里反而无法静心。可能是忙碌穿梭的人群，带给我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尤其是乘坐飞机或高铁，像坐在几节连堂课的椅子上，培养了一种被迫的专注。

我选择咖啡室里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漫不经心地看书。耳畔，间歇响起的是高亢的广播，不间断的是低噪的轰鸣。我始终听到一种极其轻微的塞擦音。是个女人的声音，很低，经过克制依然传递很远。咝咝咝的，像蛇信。持续而没有放缓频率。我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可疑者。头发花白的老年女性专心看她的养生手册；姿色平平又自认以气质取胜的女生看她的西班牙语；还有个中年女性，右边嘴角有个灰色的痣，睡着了。她们的嘴都闭着、抿着、咬住下唇，没有谁开口。咝咝咝，咝咝。我的注意力已全部放在了这微小而有效的噪声上，我抬起眼皮，再次巡查。两个男人，其中那个显然是南方口音的男子，戴眼镜，齿缝像松了的阀门那样一直危险地漏气。原来是他，咝咝咝，咝咝咝咝咝。

我边翻动书页，边啜饮咖啡，偶尔看一眼始终发音如吐蛇信的男子。我以为自己是注重公德的一个，其实，不。因为我翻看画报时，右手预先插入了下一个画页，然后我发现自己正按在一条斑块耀眼的蟒蛇身上。然后，我碰翻咖啡杯，膝盖附近炸开瞬间密集的点状疼痛区。皮肤和桌椅，到处是黏着的糖分和混浊的棕色，看着有点恶心。我擦拭地板时，才发现翻开的书页上也是流淌的咖啡渍……巧合的是，杂志里有一页讲述咖啡的内容，那些文字和图片，被真正的咖啡浸泡并散发原初的味道。

小小的意外，像有什么魔咒正显现威力……我略感不安。但愿顺利起飞，有一次因为天气原因，目的地无法降落，我只能滞留在机场附楼的酒店里。飞机一次次起降，就像剃头推子从我的耳根往头顶上走。一遍又一遍，无休无止。我可不想重蹈覆辙了。

当广播里通知登机的时候，其他乘客如蒙大赦，我也慢慢腾腾地排在队尾。

3

“还有一位乘客尚未登机，请您稍等。”

播报消息的乘务长鼻音很重，介于感冒和撒娇之间的那么一种鼻音。我听到过类似的声音，曾把飞往“大理”误听为飞往“巴黎”。广播之后，乘务长沿着狭窄的过道向后排走动，沿途展现职业的笑容，发放着薄得像围巾的毯子和儿童枕形的靠垫。她的眼睛，大得像在脸上打了一对蝴蝶结，皮肤闪烁贝壳内壁那样细腻的光泽；走起路来，她有仪式感的优雅，像水母的慢芭蕾。只是丝袜颜色偏深，这让她拥有两条熟杏色、近于黄疸的腿。

伴随《茉莉花》的弦乐声，机舱里回响着一种低噪：高亢的议论和混沌的低语，夹杂着报纸的翻动声和包裹着毛毯的塑料袋被撕开的声音。

“还有一位乘客尚未登机，请您稍等。”这样的信息被重复了两次，但大家始终没见到这个被诟病的迟到者，而显示屏里已经开始播放航空安全须知。它详细告知和演示，在紧急状态下，你应该以何种坐立或跳入逃生滑梯。

空乘人员例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请系好安全带，打开遮光板，关闭手机或置于航空模式。空姐们的表情礼貌而体恤，举止经过严格的分寸培训。印象中，她们总是穿着烘托身材曲线的妩媚制服，脖颈间围着印有航空公司标志的小丝巾，拖着尺寸整齐划一的箱子……这些提前登机的空乘人员，笑语盈盈地路过正饶有兴趣偷窥的乘客——不，事实上，她们并非总是如此光鲜。

她们面临时差，与家人的分离。她们有时需要面对无理的要求，协调复杂的关系，解决麻烦的乘客——这些人放置行李缓慢，长时间阻塞过道；她们如离弦之箭，踉跄着，扑上去，抢占刚刚空出来的临窗位置，并自得地向同伴炫耀自己的机敏；他们容易碰翻饮料，番茄汁顺着小桌板滴下，近乎黏稠的血液；他们的卫生习惯欠佳，把厕所弄得一片狼藉。这些天使样貌的空姐们，经常接触的，是托盘里吃剩的黄油、汤汁和果皮，是纸袋里的呕吐物，是盥洗室堵塞的水池和马桶。所有不愿意的事情，她们必须报

之以持久的耐心，直至自己老去。

拥有美貌和笑容的空姐，之所以被誉为空中天使，是因为她们的确展示了天使之责。你以为天使的日常行为是什么呢？多数时候，她们保障我们的安全，她们提供让我们舒适的服务；然而，她们的劳动被我们美化；其实她们频繁处理的是种种不洁之物和不善之举，并始终原谅我们……之所以是天使，是因为，她们做到了人所不能。

我想起了自己的同学：罗。当初的少年，以英俊著称，高考之前被提前录取，将从事空乘服务行业。我们羡慕他能够逃避分数的审判，能够拥有见识和财富。我们同时也很清楚，由于不具有匹敌的美貌，我们不会拥有同等的机会。他翱翔的时候，我们注定只能仰望。

时隔多年，我在一趟国际航班巧遇正在值勤的罗。他已经不做空中服务，改为随机飞行的安全员。年近半百的罗，每年飞行一千小时，七十五万公里，太多时间是在天空度过，他以自己的一生抵达一只鸟的生涯。

他是业余的占星高手，擅长推演命盘。我问他为什么西方的星座里，有陆地上的兽，诸如白羊狮子；有海洋里的水生物，诸如双鱼巨蟹……但为什么没有禽鸟？是否因为星座学出自神明的视角，是天上的视角，是飞鸟的视角，所以，因无法看见而忽略自己？这个在中国属相里肖鸡的中年人，被我问得一脸茫然，无以作答。

长年在干燥的高空环境里飞行，他的身材依然挺拔，但眼角已生出细枝般的皱纹。半生中的许多时间里，他都在远离地面一万米的高空频繁地体验气流的颠簸，体验身体的倾斜与失重。在空乘岗位服役多年，直到，肌肤慢慢呈现粗糙的褶皱。换下制服的他，样貌与混沌乘客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

4

飞机缓慢地脱离接驳口，轰鸣巨大。

我透过飞机的舷窗，一个地勤人员推着一辆轮车离开——如同超市中常用的那种，只不过卸去了塑料筐，只剩铁架。停机坪，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超市推车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物品，还不如沙漠或者丛林。我看到两个戴眼镜的地勤人员，制服上有着反射荧光的交叉条带，像个倒置着的大写字母A，底端被宽白的腰带勒住。他们的挥手姿态，像招财猫那样机械，带了几分滑稽的生硬与可爱。

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我想象机长向前推动操纵杆，抬头的飞机挣脱重力跃

升。尽管天空中悬置着那么多的头颅、心脏和生殖器，容易让人心慌意乱；然而起降基本不怎么用看外面，机长主要关注仪表盘就行了；在浓重的云层里，乘客甚至看不见机翼——设备保障下的信心和技术，足以让飞机翱翔。高处的云层与黑夜里，有许多这样依靠盲飞的金属翅膀，它们之间有着至少二三百米的航线距离——所有信息，都被千万里之外的指挥塔掌握着。

我的安全带系得很紧，搭扣一侧，垂出很长一段尼龙绑带。可从行李盖的缝隙里，露出一个豆粒大小的玩具袖珍拳头——它攥得很紧。我的双肩背包是凯普林的，作为缀饰的品牌吉祥物是一只毛茸茸的黑猩猩，只有食指的高度。行李盖合上的时候，我没有注意，黑猩猩被卡住腕部，那只硬质的小手从盖子缝隙处露出来……像挣扎者在求救。人的臂短腿长，猩猩的臂长腿短——把四肢的长度做了对换。以人类的审美习惯，后者比例失调。我一直盯着那条棕黑色的斑块，直到在起飞造成的耳压和头脑缺氧中，我睡着了。

当安全解除灯亮起，“叮”的一声，我立即醒了。我站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舱盖。那只猩猩头朝下按在织物图案的旋涡里，像个溺水者，背部拱起，无力地垂下毛丛密集的双臂。我拯救了这只受难的动物，翻过身，让它拥有舒适的体位。这是强迫症患者的毛病，只有把这个猩猩玩偶放好，我才能安心；否则它将作为某种不祥的暗示，干扰我的整个航程。

我翻看着航空杂志，里面有人物采访、植物研究、公司宣传，以及房地产、保健品和书籍的推介。阅读的时候，我不自觉地眯起眼睛，似乎被纸页上的反射光晃到。无论眯不眯眼，字迹都同样带着可以克服的重影效果。我提示自己不必做无效之功，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的眼睑还是犯困般剩下一条快要合拢的细缝，似乎这样有助聚焦。

眼角里发现了那个手机光点，出自前几排C座的男性。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短袖T恤下面露出简陋的刺青。手背上一只歪歪扭扭、写实失败的蝎子扬起U型尾针；小臂上是个千篇一律的“忍”字，旁边的刀子图案呈四十五度上扬；袖子下露出的图案不全，但可以无误地判断出是船的侧帆……三个图案的共性是潦草而陈旧。我不知道，这个中年人再老一些，会不会尴尬于自己曾经的这种励志、乏味而笨拙的张扬。

也许，他不会。因为起飞前，他持续通话，被反复提醒仍不愿关闭手机。途中，他数次打开万米之上的手机，偷偷窥视发出荧光的屏幕。他的微信里面，似乎有个焦渴而暴躁的妞儿不断在等待中催促，她黄豆大的头像让手机持续发出消息抵达的口哨声，像只求偶期的鸟。当刺青男终于在公愤的压力下彻底关闭手机，他的邻座依然火冒三丈，调换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似乎远离一些这个缺乏素质和教养的男人，就远离一些危险。

邻座的反应，让我想起对此行为同样深恶痛绝的表哥。表哥特别注重身体健康，从饮食到锻炼的生活习惯，他一丝不苟；对关乎死亡的安全事宜，他当然格外警觉。某次，表哥把气流的剧烈颠簸归咎于邻座的通信，他出离愤怒。表哥以醉酒般的赤红脸，向乘客和乘务员抗议，几乎诉诸拳脚。数年后，勤于健身的表哥，却在水库游泳时，被冲锋汽艇撞上额头导致身亡，并且始终没有找到肇事的交通工具和责任人。

飞机突然遭遇不稳定的震荡，颠簸，像船疾行于水面，汽车驶过陡峭的路面。正在行走的乘客，扑倒在临近的椅背上。遭遇不稳定气流，安全指示灯亮了……系紧安全带，简易的搭扣比你坚强的意志和有力的四肢更能提供保护；收起小桌板，否则，它能产生斧刃般的杀伤力。机舱里到处是灰色的塑料材质，像是昆虫的几丁质——坚固背后，是不堪一击的脆弱。起飞、降落、遭遇气流，都能感觉到塑料隔板细微或明显的抖动。在威胁性的条件下，什么所谓的硬壳都可能被瞬间击碎，无论虫体还是金属的庞然大物。

又一阵剧烈颠簸，伴随突然加大的噪声，仿佛在视觉想象里，即将坠落的、超低飞行的机翼正滑擦建筑物上方的空气。我的邻座发出几声短促而失控的惊叫，她被吓坏了。通常情况下，我不与邻座交谈，大概只有飞机上存在这样的人际关系：我们生死与共，又形同陌路。

这是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女性，打工多年，在流水线上为助听器安装微小的零件。这是耗费眼力的劳作，她说自己看近处还可以，远处看不见。她把候机坪上的草地当成水池，她问我地上的飘带是什么——原来不是公路，是河流。当我发现，竟然是那条著名的河，不禁伤感，因为它现在勉强蜿蜒，只是一腔灌进神话里的污泥浊水。这样的河，有着泥土的质感，那种落叶色让我感觉沿途的村庄凋败了，城市也生锈了。

我的邻座是第一次坐飞机，是孝顺的女儿给买的机票。刚登机时，她很焦灼，问我飞机上是否确有厕所。在得知厕所位置和相关事项之后，她依然比其他乘客更频繁地扭动脖子，观察四周。我知道，这是不安的表现。她看机翼，看安全须知，看不锈钢推车上的餐食。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或者向后扭动，乘务员还没有走到相应位置，她就要求饮料——一旦确认，飞机上的水和饭都不要钱，她渴得刻不容缓。她焦灼地等待着被服务，生怕错过……她怕辜负女儿的每一分好意。这是含辛茹苦供养出的女儿给予她的回报，我感动的是，她女儿自己甚至舍不得买一张机票。没想到，航程中频繁颠簸，对这位原本好奇与骄傲的母亲来说，人生最奢侈的享受，竟变成严重的恐吓。当她忍不住惊叫，我握住她的手臂想缓解她的紧张；她反过来抓住我的手，用的力气很大。飞行累积的经验，教养带来的害羞，给邻座示范性的善意和虚荣，这些让我故作镇静。

我遇到过不太受欢迎的乘机者。

有人要求换到空间略为宽敞的安全通道，即使被婉拒，他们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求乘务员去协调解决。我见过许多起飞后立即开始涂敷面膜的女人，她们陶醉于自己的美貌，无视他人的尴尬和儿童的惊恐。我听到过戴了耳机的老者跟随着旦角唱段，声线变调，一直荒腔走板“啊——啊——啊”地唱，远比难堪的呻吟更让人难堪。有个女孩因为被叫醒吃午餐，半程不间断地怒目于她的新郎，摘下的眼罩就像给脖子戴了个胸罩，让我猜测她在即将的婚姻里是否幽恨悬生。还有那些一旦进入机舱就编程般开始哭泣的孩子，他们撕心裂肺地哭，有时中间停顿了一下，像是被塑料卡扣噎住了，接着声嘶力竭……无论母亲如何用尽所能去安慰，热衷哭泣的小孩依然持续而嚣张地哭满全程。

我遇到生活艰难的人……那个紧紧抱住旧鞋的男人。

办理托运行李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中年男子，戴着尺寸局促的一顶红色旅游帽，肤色是那种坏木头的黑黄色，脸上却有煤灸似的一层油。他和两个同伴在一起，紧张得有点跌跌撞撞。他们口音浓重，衣着寒促，在大批前往毛里求斯的度假者队伍中格外显眼。有件拒载的行李被从履带上拖拽下来，尺寸超标，何况一侧拉链已有开裂迹象。他是这件行李的主人，来不及找个相对安静的区域，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箱盖，因为需要把所有物品分散到同伴的箱子里。与游客多携带用于应对拍照和气候变化的衣物不同，箱子剖开，里面存放最多的，是烟。至少十几条整烟，大包洗衣粉，数卷卫生纸，少量衣服，还有几双鞋。这些廉价的鞋子没有任何包裹，没有用鞋带或其他绑缚在一起，原本塞在箱子各处，现在被随手扔出来，七七八八地摊了一地，双胞胎的一对鞋子也兵分两路。行李主人把杂物一股脑儿塞进同伴同样粗糙的行李和手提袋中，因为哀求无效，他必须放弃这个没有轱辘、尺寸过大的开裂箱子。他像是赤手空拳前往，体力是他仅剩的财富。在度假胜地，在陌生的语言和面孔中间，他靠出卖体力谋生。三个同行者都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时空的恐惧将相继到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男人不舍地扔下他破旧的行李箱，弯腰躬腿，抱起没有地方搁的三只旧鞋，上了飞机。

我遇到过整个家族都和飞机有关的同座。作为中国第一代试飞员，他的爷爷曾经试飞过歼-5战斗机，并受到领导人的接见。他的爸爸同样从事与航空相关的工作。他自己的理想也是成为飞行员，但考入标准非常困难，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这些自不必说，还有臂展和韧带等多重细部的考量。他遗憾自己未能如愿，并久久不能释怀，后来他终于在美国考取飞行驾照。美国在小型商务机的服务方面非常到位，如果在那里加油，就不会

收取停机费用。他的自驾游与众不同，他租用飞机自驾——他说这种小型飞机通常最远航程在七百公里到八百公里，机翼采用整块碳纤维板制造。他停落飞机之后自驾的，才是汽车的方向盘。

我还有过一次美好的奇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我在西宁飞往合肥的航班上，感受到奇异的护佑。散客只有零星几个，机舱里都是喇嘛，他们的袈裟形成一片连绵而凝重的绛红色，间着偶尔的明黄。喇嘛多数并非光头，贴着头皮的短短黑发，只有隔夜胡茬那样的长度。已是凛冬，气温很低，他们依然从披巾下裸露着半个臂膀……就像从尘间向彼岸普度的有力桨板，正在较力于俗世的寒凉。难得地，我能够在飞机上入睡，度过了一个充满暖意的午后。

6

其实，以我的偏见，任何人在飞机上，无论平稳还是颠簸，恐怕都至少有一次想过……是的，在他所能抵达的最高处，想到那个最重的字：“死”——人生没有比它更重的动词。翻开汉语字典，每个发音下都汇聚着若干字形；然而，“死”，一个字占据一个音，在这个发音的条目下只有唯一的它，没有其他字与之匹配。连看似对称的“生”，都做不到单字单音。

死于万米之下和死于万米之上，是不一样的。远离土地，人立即体会到植物离根般的濒死感。座位下方的救生衣，是为水上迫降准备的——只是降落，才谈得到救援。乘客在空中，只是龙卷风中的一粒尘埃，除了命运之神，没有其他可能的施救者。

飞行之死，不仅绝对，而且综合。不仅死于缺氧、寒冷，也可能死于燃烧或溺水，死于物理般的撕裂或化学般的溶解，死于高空的坠亡，死于蔓延过来的毒，死于一种把人顷刻间化为液体的温度……飞机变成尺寸最大的一种凶器，它可以让人一死再死。

这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常识告诉我们飞机是最安全的，心理上我们依然觉得飞机是最令人恐慌的。与水上的船舶和陆地上的车辆相比，飞行是最后被发明的交通工具。无论它出现得多么日常，我们也难以克服潜在的畏惧——因为作为人类，在河流与海洋，在大地与山峰上，我们或许能有一线生机；唯有在空无一物的空中，我们无法幸存。天上收留羽毛和金属，不收留我们；每当进入高空，我们很容易产生濒死之感。

我曾在高空目睹濒死。

那次刚起飞不久，机身还保持陡峭的倾斜，忽然，一个乘客解开安全带，来到商务舱和经济舱衔接处的隔板后面，直接在三个乘客脚下躺倒下来。他脸色蜡黄，嘴唇灰紫，只囁嚅“我不舒服”几个字，就紧闭双眼。无论周围怎么呼唤，他都不再应答，似乎丧失了意识。

登机之前，我脑子里编织过小说情节：设想一个血压异常的乘客——疲惫使然，因为他一连数日心力交瘁。但谁也不知道，因何如此。我设想，这是一个酝酿危险的男人，为了让孤独的自已死起来不那么孤独，他选择在航班上与其他乘客同归于尽。水果刀、液压罐和打火机都被没收，但他有火石和绒棉，他穿的衣服会在最短时间内燃起大火。计划周密，但他倒在猝发的心血管疾病中……目睹这位男性倒在近在咫尺的距离，我吓了一跳，甚至有点愧悔，好像自己的想象突然具有某种诅咒能力。

乘客中的医务人员施救，他绷直双臂，持续按压患者的胸骨，使之出现明显下陷。机舱里窃窃私语，夹杂着奇异的安静。据说，朋友闲聊之间的突然停顿是因为有天使飞过——那么这种议论的停顿，是死神的一次窥视吗？

大地辽阔，足够盛得下连绵不断的生生死死；机舱这么小的区域，一次的生死都太重，需要众人分担。甚至不止生死，疾病都是。几次世界范围的传染疫情，扩散的源头，指向同一航班上的乘客——因为，他们在漫长时间和促狭空间里，你呼我吸，共享空气。一个男人再好色，面对严重感冒的邻座美女，都难以感到诱惑。喷嚏连连，细小的珠沫飞溅，像蒲公英形状散开的细菌雾团就是这样奔行而扩散的……这是他们之间唯一可能的亲近。真讨厌啊，他将厌恶来自她的所有化学作用。密闭环境里，疾病是要共享的；即使是死，连这样的个体之事，也要在整个机舱里传递，每个人都分担它所带来的恐慌。

从我的角度，能看到躺倒的乘客眉间距和肩膀都很宽。他正值壮年，而此时对自己的头脑和四肢失去所有支配能力——仰头抬颌，他的气道已被打开，但里面并没有呼吸。我因为自己构思上的情节巧合，产生一种隐秘的罪感。我转过头，看舷窗外。经过调色玻璃的滤光，机翼反射的太阳变得可以直视，混杂着浅蓝的白色光斑沿着机翼滑动……我感觉自己像个阴谋家或凶手，隐藏在面目模糊的乘客中间。持续紧张，让我的手心出了微汗。我目睹医生持续按压患者的胸骨，感觉自己的命运也徘徊，悬而未决。

当心肺复苏的患者重新在地板上坐起来，我如释重负。医生不仅拯救了他，使那不再是一张不经告别就离世的脸；医生也拯救了我，使我不再拥有一双不经动作就意念杀人的手。

空气中始终伴随扰流的低噪，但进入平流层以后，飞行非常稳定。转危为安，死神的猛狮放过了我们这群颤抖的羚羊，我们又可以安享一餐。

空中小姐小心推动不锈钢餐车，提示并躲避从椅侧伸出的参差的腿脚。她们保持着略高于体温的微笑，但餐盒里的色拉冰凉，散发着冷藏室的霜气；冷的芹菜、冷的胡萝卜和冷的煮花生……色泽鲜艳却有些生硬，几乎带了塑料的失真感。装在半软半硬的塑料盒里，六七厘米的宽窄，看似是方形，仔细是矩形。我一脸迷惑，因为我用那把短茎的勺，数次都无法舀起盒底的那粒浅茄色的花生。眼花的我没有看清，那是自己托在盒底的一小节青瘀色的拇指。

难怪有人讨厌飞机餐，宁可饿着自己也不碰。我爱吃甜品，除了讨厌其中的司康饼和马卡龙，一般的都可接受，可飞机上的海绵蛋糕，不像蛋糕而更像海绵——如同嚼着一块从洗碗海绵上剥下来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也都是我把自己惯出来的毛病。想起我那个热爱美食的朋友，曾经一顿饭都不对付，仅仅因为餐食的原因必以商务舱出行。他不喜欢造型简陋的不锈钢里倒出咖啡，必须听到茶勺在咖啡杯里搅动的声音。夜航之中，射灯在光洁的餐盘上形成一小片发光的区域，精巧的小罐里装着闪光的盐粒和哑光的胡椒粉……他戴着耳机，边听歌剧，边颇具仪式感地享用高空中的晚餐。他不能容忍得太多，有时包括一个男孩重复按动圆珠笔的弹簧笔盖，或一个中年女性去洗手间时从眼前移动开的装在起了毛球的针织裤里比例失当的臀部。他曾是我认识的最具品位也是最矫情的人，像只完美主义的警犬随时嗅查可疑之物。后来他生意失利，一落千丈；女儿患病，医治费用高昂，他的处境沦落到困窘的地步。从此他再也没有抱怨，出差乘机时，他把长腿折叠在经济舱狭窄的椅距里；即使剩下半个海螺形状的可颂面包，他也要当作第二天的早餐带走。他的责任和温情，对我来说颇为触动。所以，我需要提示自己，别把矫情当作品位，应当珍惜平凡日子里的一饭一蔬。

机舱温度偏低，一个冷得抖颤的姑娘，穿着长款薄T恤，她光脚缩在座位里，抱膝，试图用T恤下端包裹那十根可怜的脚步——脚上的趾甲油已褪去一半，留一半散发旧珠宝的光。发来的餐盒舍不得吃——就那么点热量，她把它放在自己毛孔瑟缩的双腿上。不是用热水，而是用牛肉面条或鸭肉米饭作为填充物的简易热水袋，发出衰微的热力。登机时，我眼看她迅速喝下一杯摩卡星冰乐。看到被她移至脚面的餐盒，想起星冰乐上堆积着厚厚一层刮胡泡式的奶油，我感到一阵隐约的恶心。我拆开分发的小塑料袋，发现所谓什锦果仁，其实只有两种：光裸的花生和外皮起皱的扁桃仁。我谨慎地看了看油脂丰富的果仁，犹豫两秒之后，开始有力地咀嚼。

人类这种不会飞的动物，竟然可以一边飞翔、一边进食——同时完成两个动作，许多有翅膀的鸟都做不到。只不过，进餐要格外注意，控制动作的幅度。乳白或透明的一次性叉勺，脆弱得就像儿童玩具，在狭窄桌板上运用时，非常容易和空气一样轻、吹口气就能掉落的杯子发出碰撞，导致什么翻倒，溅出饮料或酱汁。所以，乘客就像操作手术刀那样小心切划。我也同样，我的肘臂贴紧自己的两肋，格外小心。我的动作协调性一贯很差，总是顾此失彼。我即使看本书，也容易掉落手边的圆珠笔。不仅是笔，书本、直尺、花镜、登机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什么掉下去，滚落到我以极其难受的姿势也难以够取的角落里。我一边羞愧地向邻座道歉，一边解开安全带，伸长胳膊向前方座椅下面试探，有时还会被显示屏的边框夹住头发，并扯下长短不齐的三两根。所以，进餐时间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场小型的军训，我的身体随时感受到戒律的存在和约束。即使只是咀嚼几粒花生，我好像对自己的口腔也加强了控制。

从飞机舷窗望去，云团播撒得非常均匀，就像烘焙车间里托盘上间隔排布、膨化起来的糕点，中间还有些散落的薄面。对教徒来说，神给予五谷、新酒和油……那么从逻辑上讲，是否意味着，天堂里的人都是素食者？否则他们会吃谁的血肉？也许地狱的炼火，是厨师烹饪所需。经过尘世挣扎，据说只有经过严格审验的人才能进入天堂，所以那里全是纯洁的亡灵，全是婴儿、处女、圣徒和僧侣，或许包含部分食草动物，总之，都是隔绝于邪念的灵魂和来不及犯罪的灵魂——这意味着，一座庞大的天堂是无辜者和好人的集中营。好吧好吧，那里什么都不缺，只是没有蛋白质的食物。

8

有人因为不愿忍受简陋餐食而升舱，也有人因为排泄不便而拒绝乘机。有时感伤，人类有何骄傲可言？我们甚至难以像宠物狗一样，良好地控制自己的括约肌。父母七十五岁以后，就不再和我出去旅行了，最重要的，是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们难以经受起飞和降落那些被禁绝的时段。他们怕失控，怕失去自己晚年本来维护起来就十分困难的自尊。在最小和最老的时候，我们都难以离开大地，只有在生命最饱满的时候，身心可以近于飞行。

我曾这样运用比喻：“写作的时候，就像在飞机上使用洗手间，无论身陷多么狭小的世界，只要你关闭自己，就可以让眼前渐渐亮起来，就可以在遨游高空的同时放松身心。”中年发福的闺蜜看了以后，嘲笑我的抒情笔法，并向我讲述了她在飞机上的尴尬经历。

年轻时，她是个对自己的膀胱有超级信心的人，坐长途车可以一整天不上

厕所。那时纤瘦，后来体重锐增，临近五十岁的时候她的体重是一百五十斤。随着自身体积的扩大，她的储液能力锐减，膀胱就像个鼓胀的垃圾袋那样易于显出脆薄的危险性。有一次坐飞机，几次回头，厕所的简标小人都亮着红灯。一想到搬运自己的困难，她就懒下来，没动。没想到，飞机盘旋许久未落。她濒临绝望，几乎溺死在没顶的尿意里。她的膀胱硬得像块积木，甚至没有了颤抖的余地——所有空间都被利用，占得满满的，尿液全面侵占了包裹它的弹性组织。她禁不住绷直脚趾，这是她仅有的余力了。等到安全指示灯终于亮起，她逆行人群，如同泅渡，简标小人亮起的微光如灯塔一样让她获得拯救。她说那是仅有的对身体严重丧失支配的一次经历——可以放松的时候，她的阀门紧涩，括约肌都锈住了；而她以为终于解决完毕，低头去看，发现连续的细流并未停止。她说，这次尴尬经历，使她逼真地彩排了自己的老年。

在天空的行为总要受到限制，无论是吃喝还是拉撒。生命，是连续的由进食转变为排泄的过程；人类亦是如此，无论怎么优雅，都是一架酿造臭气和废物的肉机器。许多最初甚是美好的内容，会在我们体内加工成邪念、敌意甚至恶意；通常情况下，它们被隐藏在体腔里，被我们谨慎看守、小心运输，即使偶尔流露也令人尴尬，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难闻气味。我们必须找到隐蔽之处，及时地，把它们偷偷清除……使用马桶，是一种独属人类的文明。及时和隐蔽，具备同等的重要性。

鸟类可以肆意排泄，人类不能，天使当然更不。也许天堂无须食物，正是因为要消除排泄。否则，人间不是成了天堂的下水道？也许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那里永无饥饿，看一看棉花糖般的云团就已饱足。所以天使无须进食，就像他们洁白的襟袍无须洗涤。

而我们这些凡间的人类，只有解决了基础的生理问题，精神才能远眺高处和彼岸。

9

我总是选择临窗的位置。会当凌绝顶，高处不胜寒——这是我一生所能抵达的最高的观景台，同时又是不被高寒所困的巅峰。

临窗，是因为我喜欢看云。当我们站在地平线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云。积云，层云，卷云；荚状云，堡状云，波状云；甚至有难得一见的马蹄涡、钻石尘和贝母云。不过，今天习以为常的、像在玻璃上留下划痕的痕迹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高空飞行物出现之前，是看不到的。那时，天空古老，还没有人为搅动留下的凝结尾迹。

航行中看云，同样莫测。有时巍峨如连绵的群山；有时厚积如覆雪的冻

原；有时重复到辽阔，也是一种无尽的荒漠。有时，北极熊般的云团，隐隐有着矿物质的质感；有时蔚为壮观，像座头鲸的巨大头颅正跃起于海面；有时，透光的云层里，像隐藏天上的圣母；有时云层的远方，斑影显著，孤岛般，正在余晖中沉陷；有时出现多彩的渐层，慢慢来临的暮色，让天际出现金红与黛蓝交混的耀眼光带；有时，隔了雾尘，灼烈的太阳变得可以直视；有时，垂落中的夕阳，如同被引燃翅膀的巨蛾，像要烧毁一天或一世；有时，万里无云，我可以清楚地俯视——褐灰色的大地上只有煤灰色的山体，连绵的褶皱就像上古时代的野兽脊骨化石，让人顿感时空苍莽。

飞机上能看到雨。因为飞行速度很快，雨滴在舷窗上是横飞的。尽管落如积雪的云层，有几处像被大神走过的脚印翻动过，像是翻出底层的脏雪，从而破坏了那一望无际的平整……但那是幻象，一旦上升到巡航高度，平流层之上，无雪。

天堂无法下雪。因为那里是最高的高处，无法见到更高的高处飘下来的雪。我想天堂的高度里，万物晴朗，无风无雨无雪，难怪那里的人都穿着空灵的白袍子，他们不冷不热、不饱不饥。就像不能想象天堂的食物一样，我也不能想象天堂里的人，身穿兽皮，或者拔下鸟羽为自己御寒。因为那些天堂里的鸟兽是不死的，因为它们和曾经的死者一样，只要进入天堂就不能再死一次；因为那些鸟兽也是上天堂的，命运不会让它们在天堂里承受地狱之苦。所以天堂里的人无须劳作，他们不能捕食动物的血肉，甚至也不能啜饮植物的浆汁，因为会引起排泄，他们也无须采摘棉花的蒴果用以纺织。我想象，他们只能穿着云朵，天堂里的动物可以穿着自己的皮毛……啊，唯有不能只穿自己的皮，他们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需要掩饰。那么，恶人为什么作恶？正是因为他们由此看清了终极的乏趣，他们的良心才溶解在黑夜里吗？

我靠着舷窗眯了一会儿，再睁开眼睛，窗外光线暗了。周围的乘客大多闭着眼睛——在这只金属鸟的幽暗腹腔里，我们都像沉睡中被运送到远方的种粒。我望向窗外，飞机炮筒状的发动机内侧，一次次闪过脉冲式的光痕，就像火柴划擦磷皮那样。夜航中，我可以平视云层上的弦月，也可以仰望冰糖似的星星，有时被研磨得极为细碎。我能看到数百米之外的其他飞机，携带着机翼下闪烁而移动的光，穿云破雾。我想象无限辽阔天空里的夜航，如日夜兼程的迁徙候鸟，在沉默中飞越千山万水……而高悬其上的星体，已存在了百亿之年。我记得中学地理课本上的太阳系图片，轨道光滑，就像刚刚被机床加工出来的崭新剖面。围绕熔浆色太阳的数颗行星，也像被刨具处理得浑圆的工艺球，有着宁寂的光晕。一张图片可以诠释宇宙，一架飞机可以穿越世界的经纬，可你只要在夜航中曾经向深渊遥望，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就会在巨大的虚无压迫下涌起一种无力感。宇宙

浩瀚，尘世微小，在星空组成的巨大网阵上，飞机不及一片被粘住的蝶翼，我们的生命更是渺小如一粒鳞粉，无须磨损，微风之下就会脱落并吹远。不过，因为有了死，人间的一切苦难都是虚惊一场。告别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开始星空下的漫游，就像举起云色翅膀的候鸟，就像灾难里诞生的英雄……美且忧伤，生生不息。

10

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曾经举起云色的翅膀，曾经像飞入云端的英雄跌入灾难之中……他们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悲剧父子。

天才的艺术家代达罗斯用羽毛、麻线和蜡制作翅膀，得以像鸟一样飞翔。他指点儿子伊卡洛斯如何操纵羽翼，并叮嘱：“你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行。如果飞得太低，羽翼碰到海水，沾湿了会变得沉重，你将被拽入大海；要是飞得太高，翅膀上的羽毛会因靠近太阳而燃烧。”

兴高采烈的伊卡洛斯感到飞行的轻快与自由，不由骄傲起来。他忘记了父亲的告诫，抵达足以致死的高度——强烈的光线导致黏合羽毛的封蜡融化，羽翼从伊卡洛斯的肩胛脱落。不幸的孩子双手徒劳而绝望地划动，很快栽进汪洋之中。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等飞在前面的父亲回头，天空一片空旷。他惊恐地向下望去：海面，漂浮着许多散落的羽毛。

浪漫的云中飞行，随后而来的，却是火与水，是高空的灼烫与深海的彻寒。伊卡洛斯的飞行审判，如同巴别塔的拆除一样，仿佛是上帝在警告觊觎天堂将遭到的惩罚。谦逊是一种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品德，对自身的收敛与对他人的尊重，能够减少冲突和损伤。飞行中，无论碰撞到什么，都可能是危险甚至致命的。

我们今天依然是伊卡洛斯，只不过是把羽毛和蜡制造的翅膀，换成了金属和石油组装的飞机。一次高度的失误，使伊卡洛斯葬身汪洋；一个操纵杆的失误，一次空中的偶遇，甚至一只飞鸟卷入发动机的旋叶，都会引发灾难。

尽管如此，从古至今，人类向往飞鸟的生活。我们难以克服飞行的诱惑，对极限的超越，因为挑战中有着难以描摹的享乐。航行，就是坐上童话中的魔力飞毯，它将我们带离日常生活的捆绑，体验带有某种危险的美。

飞行是对自重和引力的克服，就像云朵是对污水的克服，生是对死的克服。一次飞行，集中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美与灾难、自由与恐惧的双重教育。我们就像伊卡洛斯，具有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自身所携带的危机，我们必须在勇敢与谦逊、僭越与敬畏之间，始终保持动荡而微妙的平

衡。

11

童年的我，每每为“世界七大奇迹”几个字所蛊惑。两千五百年前，那位古老的旅行家昂蒂帕克踏山渡水，记录着最为激动人心的游历：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奥林匹亚宙斯巨像、阿尔忒弥斯神庙、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除了金字塔，其他建筑奇迹已被时间摧毁，但这些字词组合依然带来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想象。及至成年，我可以在旋转的地球仪上划动手指，在蔚蓝与五颜六色的斑块之间，寻找现实中的新七大奇迹：中国万里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遗址、墨西哥奇琴伊查库库尔坎金字塔、意大利罗马斗兽场、印度泰姬陵。

后来，我得以在巴西目睹雨中流泪的基督像，在墨西哥参观玛雅文明古迹并等待金字塔上那道羽蛇形的光影，在空旷的斗兽场伫立，听风和消散在风中的嘶吼……我得以翻越千山万岭，穿越大洲大洋，去到捷克的圣维特大教堂、德国的童话小镇罗滕堡、柬埔寨的吴哥窟等，见证人类的智慧；也曾在新西兰的星空下、毛里求斯的海洋里、美国黄石公园的喷泉和肯尼亚迁徙的兽群旁，因自然奇观而陶醉、战栗。

我因此对飞机的伟大发明深怀感恩，正如人生是一次无限放慢的飞行，飞行也是一次无限加速的人生。它使我们的见识和体验，得以翻倍地丰富。

写作相当于精神上的飞行，这是一种既安全又冒险的感觉——我们受困于机场座椅那样狭窄的空间，因生活颠簸，被绳带捆绑，仅凭一支想象的笔神游八极。假如我们随手翻开一本航空杂志，在世界地图上标注的国际航线，像用孩子的红蓝圆珠笔画出来的弧线重叠交错——少数弧线穿越冰蓝色的洋面，多数弧线，集中在陆地区域。其实，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为实现远方的梦想与奇迹，手中的笔是他所需要的最小的工具，云中的飞机是最大的工具；或者说，笔是他的飞行，飞行是他的笔迹。他悬浮，依靠着地理的经纬和时空的坐标，却远远地高于其上——高于纸页，高于他的地平线。

每个写作者都是伊卡洛斯，哪怕是暂时的，他曾获得过飞鸟的视野、神的角度。

12

高度下降。

机翼切割云层时，我看到频闪但一闪即逝的灰色。云层不像俯视时那样洁白无瑕，而是带了点烟尘般浅淡的灰黄色。有时，云有好几层，飞机下降到一个相对明朗的空间里，上面是流云，下面的阴影之外是仿若铺开的海；或者，飞机像是潜水艇夹在极地的冰层之间，遥远之外，才有一条被压扁的窄蓝色。

云层之下，距离近切，抵达之地揭开面纱。前方椅背小屏里的航路动态图里，陆地被统一处理为苍绿色，但窗外的实景各异。一片光裸，寒酸的北方冬日地貌，没有植被；森林葱茏，大地就像只皮毛丰盛的动物；布满缓慢海浪的洋面；切得像抹茶蛋糕似的田地；简陋的人工建筑，简陋到丑陋的预制板墙体或彩钢板顶棚。有时我看到的，只是触目惊心的贫瘠。没有树，没有河，没有经过规划的建筑物……在浅褐色的地表，偶尔有人画出整齐的灰色标线，不过那些几何方块里什么内容也没有，空空如也。如果是夜航，我甚至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航道上的着陆灯，或者雨夜的停机坪像新铺的柏油路那样反射着湿黑的光。这就是远方，并不包含必然的诗意——它包含的东西大于诗意。

下降和起飞的过程，一样容易伴以颠簸。有时颠簸剧烈，频频弹离座椅的乘客感到失重的不适，一次次被安全感的织带和锁扣勒回。心脏上升到口腔里，手指和脚趾都情不自禁地内缩——我们瞬间被打回原形，像猿猴要抓住想象中的救命树枝。无论有过多少次千篇一律的飞行体验，不安都会席卷而来；我们甚至会产生倒计时的不祥预感，只剩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怜的愿望、最后的遗憾。我的朋友经历过一次真实的降落险情，从此他基本拒绝乘机，改为换乘高铁。在被空袭轰炸的战场上，躲在弹坑似乎比平地安全，因为炮弹落在同一个凹坑里的概率更低；他很清楚，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两次同样历险的可能性很小——但一次严重的惊吓，已剥夺了他继续探索的勇气。

人生就是一次飞行……起和落都是艰难的，如同生和死都是艰难的，是最难以处理的。

飞机放下滑轮，就像着陆的候鸟放下紧贴腹下的爪子；扰流板滑开并撑起，被遮挡的金属面板露出来，上面布满细密的钉孔……伴随滑轮触地时的生硬而突兀的顿挫，飞机终于着陆。这时，我们才从生死考验的景况中解脱。

渴望飞行，靠近自由——但人类所获得的飞行是借助物理机械完成的，不是依靠自身的能力，所以这种行为同时具有最大的不自由。在飞机上，活动幅度是最小的，在起落过程中连站起来都会被制止。我们以某种被剥夺自由的方式来获取自由。从空中降落，大地是最大的威胁；一旦落地，大地就成为最大的安慰。劫后余生，我们就像重新回到母腹。

所谓理想，就是平稳起飞；所谓幸福，就是安全落地。

我用力前伸脖子，脊椎上端的锁扣像被打开了，发出只有我自己听得到的两声脆响。降落同样令人兴奋，感觉自己像被吹送到异域即将获得新生的种粒，在跌跌撞撞中满怀莫名期待……甚至在故乡，我的这种感觉也一样。

邻座或许是个哈欠里口气酸臭的邋遢男人，或许是举止优雅的芳邻，随着安全带上的金属扣纷纷弹开的声音，从此，彼此远离……我们将接驳各自的生活，像放出悬笼或被子弹惊散的鸟群。

13

神话里，像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这样，亲如父子的，才能在一起飞翔并经历生死。现实中，从1A到65F，半个小时前的陌生人，突然成为甘苦与共的同渡人。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那只是适用于古代的法则。今天手机触屏上几个无声的点击，就让我们拥聚在一个机舱里飞越彼岸。

这就是我们，作为同机者的我们。偶然之间，一起靠近天堂也一起承受不安的我们。在黑暗中仰望星空的我们，干渴中等待雨水的我们，曾君临天下也将匍匐地下的我们。我曾假设，同机者在同一瞬间同时想到“天堂”这个词，我们是否真的就进入至少持续数秒的幻境，永恒的众妙之门是否由此打开？或者，当飞机落地，舱门打开，我们走下接引的梯级，是否一座隐形的“巴别塔”就在身后无声坍塌？我们曾一起上天入地、同生共死……当脚掌再次触及大地，我们将立即与庞大到无数的人群，渐行渐远。

重新仰头，我知道那些航行者看不到我们。从空中看城市，只能看到仙人掌刺丛那样向上生长的楼，几丁质甲虫般的爬行汽车。我不会对匿身其中、根本不被看到的任何一个人形斑点怀有上升到情绪的态度，何况情感。小时候我养过蚕，蚕纸上卵粒细小，蜷缩其中即将孵化的幼蚕，像个书页上的逗号那么小……小到目力难以辨识，我怎么会顾及它们的痛痒？神也一样吧？排布大地的万家灯火，以及灯光里包裹着的故事，就像黑纸上密布的蚕籽，高远处的神无从考量其中的表情与个性，怎么能顾惜到每一个？我想象那些只身或候鸟般飞过的天使，掠过我们生活的高空，从未对某个人怀有我们所幻想的关爱与厌恶，就像人类不会对微生物怀有爱憎一样。无妨，如果神无数次原谅我们，那我们也学习谅解神的计较或警惕……计较或警惕，至少，是比无视更深的关注。

人类渺小，他们在地平线上爱恨生死，度过生命的日日夜夜。每个雏鸡般的黎明，用细嫩小腿挣扎站起来；每个骏马般的黄昏，奔跑了一整天的汗

湿皮毛闪着缎质的光。不能飞的鸡以扑翅近于飞翔，不能飞的马以驰骋近于飞翔，它们因此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美感。在鸡和马的基础上，人类用想象力创造了凤凰和独角兽——它们由现实、神性和想飞的渴望构成。于是，云层之间，永远存在着人们想象中的生命。

云层之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命。每个今天的航行者，都是一个活下来的伊卡洛斯，都是一个平静反抗的斯巴达克斯……他有不值一提的力量，不自量力的梦想，以及，不被磨灭的尊严。

梦见

1 孤旅

人是一棵树，梦里的落叶铺满夜晚。梦境，是仅容一人通行的天堂或地狱，没有能够邀约的同盟者。即使亲密无间的爱侣，也必须接受同床异梦的命运；他们之间，可以分享财富、高潮和泪水，但不能分享梦境。

由于我不写日记，每每陷入混沌，那些真实的发生恍如梦境，几近无痕；而我记录梦境，它们像雕镂在黑夜上的光，更近于确凿的经历。如果说现实是肉体所经历的一切，那梦境就是灵魂所经历的——是你的灵魂在说话，在暗示。假设现实生活愉快，梦境容易明亮；现实沉重，也会在梦境里留下压痕。梦是现实的拓片。白昼的人物，能越过踏板，纵身越入夜晚的梦境；但你无法从琳琅梦境里，成功盗取任何一样物品。

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致、最动人的面目和体魄，是在梦里。我梦见，皮肤闪耀金棕色光芒的年轻河神，站在黄昏河里，他两臂平伸，抱着我走向波光潋滟的落日深处。交混着羞怯的快感如此强烈，近似，愿意赴死的晕厥。此种美妙，是否因为入睡前喝了一杯葡萄酒——就像给梦境里的花园灌溉。

通常情况下，我在梦里也不放松，自律而缺少放纵，甚至也讲信用。比如梦见路过一个花园，我偷吃了架上的葡萄。我一直想着，第二天要还钱。整个晚上我不断提醒自己，直到醒来——自律和自责，贯穿了整个梦境。我在梦里也有纪律。有段时间吃药，医嘱禁服豆类，我在梦里吃了作坊里的豆子，意识到失误之后，我在梦里慌忙吐出虚幻的豆子。我的梦，没有摘掉拴在现实上的钩环。

如果我做了宴饮的梦，进食过多，早晨起床，我的体重通常真的会增加一些斤两。如果打了一夜的架，我在梦里挥舞了太久兵器，醒来会累。

我的梦不仅有颜色，还有味道。我梦到厨房里，汁水收到正好的蘑菇，在舌蕾上散开美味。我也梦到动物园的狮虎山，体味浓烈的杀戮者刚刚排出发情期腥臊的尿液。我的梦里有暖香，也有微盐的咸味；有情欲的享乐，也有身体的痛感。我曾梦见门闷坏了，正在检查，有人试图闯入。我翻转房门，把他挤入卫生间。但两条胳膊从门边伸出来，是男人的手臂。他紧紧攥住，几乎掐断我的手腕……我被疼醒了。

我怕噩梦。我小时候做噩梦，大了也做——噩梦变得更可怕了，就像长大

的男孩承担起了更沉的担子。噩梦就像无法驯服的恶龙，炫耀它蓄意的狰狞与夸张性的暴力。据说苗族有种结香树，又被称为做梦树。如果你做了一个噩梦，只要用红绳系在这棵树上，打个结，你就再也不会做这个噩梦了。这个说法有意思啊，梦成了一个危险的宠物，它变坏了，变得可以咬人，可以让人疯狂……可只要被魔咒和法力系住，再怎么吠叫，它也挣不脱绳扣。

朋友给我讲做梦树的故事时，我们正在参观苗族习俗展。一个巨人般的捉梦师从天而降，悬空，在展厅里。捉梦师的头颅和身体都是用绳扣编织的，我像怔住似的，目不转睛，盯着他空洞的眼眶和飘飘荡荡的身体……等我回头，迎面遇上参观者中，一个流鼻血的小男孩。

法师所拥有的是梦的实现能力。写作者是文字的法师，他的能量，决定着梦游的里程……

那么，开始吧。

2 狂欢节

这是狂欢节的游行队伍。最引人注目的魔术师遍身金漆，就像那些在广场上收费照相的造型者。最美妙的是他携带的一对金鸟，金鸟吃虫子，虫子也是金的，蠕动着，消失在鸟喙之中。

魔术师就像童年《蓝精灵》动画片里的格格巫，戴着中世纪僧侣的末端略尖的兜帽，他的眼睛藏在兜帽的阴影里，看不见，只露出一小片弦月状的下巴。这个格格巫在我背后捂住了我的脸，当他移开手掌，我在咒语之下变成蛤蟆模样，肥硕丑陋，在周围嘲讽的目光和笑声里我羞惭低头，就看到了自己宽阔的腰腹。

为了遮盖难堪，我要求看魔术师施法的手，他拒绝了。

恼怒，使我变成巨型的蛤蟆。当我放大自己的形象以及其中羞耻的时候，我发现魔术师变得身形矮小。作为巨人的我，一把抓过魔术师的手，看到滑稽的萎缩了的小手心，以及鸟类趾骨般瘦而弯曲的六指。我看到魔术师的爪尖：小匕首的形状，更像从某种啮齿动物那里卸下来的牙齿。

3 科技

背景，就像是在戏剧舞台，有着红丝绒般的质地和追光的灯。

这是一个最短的科技梦。

我梦见，一个公司的高管要去另一个公司的展位上偷窃展品——他这么做的价值和意义，令人不解。后来，我获得了梦里的解释：他们自己的公司并没有真正生产出那个号称已经大规模投入制造的产品，那只是噱头，用于做广告、拉投资。所以，为了通过即将到来的检验，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李代桃僵。

而那个所谓的展品，算我一个小小的科技猜想吧。我梦见，每个人的信息被文在眉毛里，走到哪里，都不带身份证、医疗资料和钱包。眉毛深处，隐藏着每个人独特的二维码。

4 银鱼

我惊讶地看到自己的手臂是半透明的，像清洁工戴着及肘的橡胶手套那样。在这层胶质的皮肤之下，全是一两厘米的小银鱼，密集地挤聚着，游动在我的皮肤之下、肌肉之上……那中间有薄薄的水层，银鱼抽搐、扭动并尝试游开的时候，我感觉到表皮下清晰的可以忍受的刺痛。就这样形成一副自身的盔甲。

过了一会儿，我不断地撕下自己这层胶质的皮，像是裹了面糊的银鱼放到油锅里，香气四溢。好吃，我边炸边吃，以此缓解手臂的不适。我就这么吃着自己，消化自己，以期恢复常态。

5 摩天轮

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可能与暗杀有关，正进入一个无法携带手表的巨型游乐场。这里，所有计时器都被取消了，游乐的孩子因为遗忘，将在此荒废一生的时间。

行动小组必须在不同地点，按时间次序展开连续行动，才能在多米诺骨牌的效用之下完成终极任务。追踪者尾随而至，谁也猜不出，行动小组解决时间问题的办法。

他们有秘密的时钟，就是那个摩天轮。行动小组熟记了每个轮子的色泽和时序，以摩天轮的轿厢抵达十二点方向作为行动的计时器。

行动小组成员分布在游乐园各个角落，无法辨别。他们不动声色，摩天轮的巨大时钟在转动。

6 绣鱼

我梦见的是一条绣在鞋上的鱼。

从它的鱼眼观察，世界不同。

星期一它觉得自己的主人真秀气啊，鼻孔和针尖一样大；星期二它觉得自己的主人真难看，鼻孔就像西服扣子那么大。

星期天，鞋子破了，鱼的眼睛瞎了。

7 嫌疑人

我们是幼儿园的稚童，被关在教室进行智力测试，在数个嫌疑人中选择到底谁才是火灾的制造者。

老师没有说全部备选答案，我就抢答，答案为A：牛。

因为我勘测了牛行进的路线以及离火炉的距离，它摇动尾巴时正好可以扫过炉子，并且在尾巴尖的毛丛里，有不易察觉的轻微烧痕。

老师说我的答案是错的，标准回答是B：一个纯粹抽象的公式。

这个老师在梦里没有性别角色，只是个中性面貌、声音倾向于女性的老师，我轻易辨认出这位老师给予别人教训时不由自主上扬的语调。她教给我们这个纯数学的公式，说只要掌握它，无须参考名单，就可以推导出谁是纵火犯。

我对此存疑，并且提出理由。一是按照新的游戏规则，老师没有给出全部备选答案的情况下抢答无效；二是即使公式成立，也不能彻底否定牛作为纵火犯的可能性。我雄辩，并得意于她不能辩驳，周围的听众似乎已被我说服。

老师回避了问题。她不动声色地递过来一盘凉拌黄瓜。我被她的技艺惊住了，噤口，因为摆盘是如此不同，她把腌渍后卷片的黄瓜，像杂技团叠椅子那样一片接着一片摞起来。黄瓜片摞成巍峨的塔，就是不倒，始终维持着命悬一线的高度。

她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人比你更有能力。”

8 巫毒娃娃

一九〇〇年的悲剧发生之后，巫毒娃娃的故事渐渐在世间消失了。

某夜，王室钥匙被秘密地从某个忠心耿耿却醉倒在地的男仆那里偷走。窃取不为金银财宝，只为巫毒娃娃。一百年来，始终并且只被这个即将荣升管家的男仆秘藏着。

传言巫毒娃娃是一套，有人说是四个，有人说有五个。据说，它可以令人发上一笔巨大的横财，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怎么利用它发财。

我最好的朋友东震得到了一个，他出示给我。

巫毒娃娃本身只是一个拇指大的小木头柱，雕刻并不精致，甚至简单到简陋。身体和面目的轮廓都不清晰，只是经过打磨，比较光润。东震拿着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多了一截手指似的。

这个小木柱，人们竞相争夺，重金争夺，不惜倾家荡产甚至相互伤害，乃至谋杀。真正的秘密是，巫毒娃娃本身，其实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全部体现在抢夺过程中逐渐上升的巨额成本。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纯粹被传言包装的东西，百年前上演过惨重的悲剧。随后是历史证据被毁，民间禁谈，那么沉痛的灾难被遗忘了。而被遗忘之后，所有不幸将会重现。

那个男仆只是看守者，他并不知情；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胆小的老人，死了——似乎没有什么再能约束巫毒娃娃的力量。然而，我们突然得知秘密。知道了秘密，就等于破解，现在沉寂了一个世纪的咒语被瓦解了。巫毒娃娃面目不详的五官，暴露出来。

做过这个有关巫毒娃娃的梦之后的半个月，我读了一本书：《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在第二十七页的注解上，我看到确有巫毒之说，这是流行于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和通灵术的原始宗教。

9 造型者

我酝酿的，是一个邪恶的梦。

像被巨幅放大的钥匙扣，那是两个男女的性别代表符号，远看像是汉字里的“古”和“早”。恐怖的是，它们是由人体组成的，都是肚子上的皮直接缝到脸上，省却了胸腔的位置。而脸上，已经被磨平了五官，似乎平坦的腹部又和脸部融合在一起了。

据说他们的行为出于自愿。捐尸者生前早已签署捐献志愿书，并且决心如此之大，他们需要连续认定的三年，申请才可能被接纳。“为了艺术。”他们说，如此这已成为简洁的遗言。

尸体的造型艺术家确实有着别样的处理，他拥有令人震撼的表现力，以及防腐技术的独家配方。这位艺术家在广告里这样说：“你想成为艺术品吗？终生默默无闻，但你可以在死后享有令人战栗的尊敬。”

10 姐夫

我在东南亚雨林生活，我的男人常年作为游击队员在外奔波。现在，姐夫回来了。

习惯暴力的人，在家里也维持着他的暴力。姐夫把我的下巴粗糙地缝合成纠结的一团，皮肉都向左歪斜；在我的脖子部位，一根毛衣棒针那样粗细的铁签子斜斜穿过喉咙——这也是拜姐夫所赐。我不能动，一动就疼，而且必须少说话，否则漏风不说，穿喉的伤口也易于感染。

我乞求两个好心人帮我取出了签针，但那种持续的痛感，似乎还保留在气管里。我一直觉得姐夫对我很好，他对我偏宠，给我介绍新朋友。即使他让我别上一根作为刑具的针，我这种不讲理的盲目信任仍然持续着。

没想到，当姐夫发现签针不见了，大怒不已。他不断殴打我，直到我不能忍受，开始反抗和逃跑。

在最后一次逃离中，我用事先布置好的武器杀死了“暴君”——姐夫被他自己掷出却反弹的投弹烧成火球。看着这团被摧毁的火体，我将笑对自己注定悲惨的余生。

11 光

这是个极短的梦，只有一个镜头：从远处照过来一支手电筒发出的光束。我向它走去。我感觉光的深处还有光。

那个梦如此之短，就像一根掉下来的睫毛。

12 宠物

我在梦里养了一只小狗。

隔一段时间，就会梦到同一只狗。我的宠物每隔几个月就来看我。它的样子一直没有变化，倾斜下降的椭圆眼圈。每隔一段时间，它就来看我，就像黄昏才溜回来的家猫。

13 门门

我习惯裸睡。正准备入睡，我发现门门松动，前去检查：它坏了。

房间临街，我突然觉得这里如此陌生，我看到五斗橱上有自己的全家福照片，才确认这是自己的家。但方位和摆设都让我毫无记忆。我觉得不安全，就紧紧盯着门门，并提醒自己：不能入睡，不能入睡。每十分钟，我就让自己格外警醒一下，以免被困意征服。

我就这样睁大眼睛，和自己整整僵持了一夜。

直到早晨醒来，我才明白，自己是在整个梦境里都坚持不睡。这是一个空心的夜晚。

14 水晶石

我来到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件无比精美的饰物：石头里镶嵌一块剔透水晶，水晶里有一条帆船。奇异在于，水晶石精确呈现了这个石湾区的地貌，石头轮廓与这里的礁岩一致，水晶与清湛的海水一致，尤其是石头与水晶之间的衔接，就是湾区那完美的海岸线——严丝合缝，我没见过比这更精湛的工艺，两种坚硬的矿物质之间，连一个水分子都无法渗透。

后来，我猜那所谓的水晶，可能是一种玻璃，当它液化的时候，被灌注进石头凹陷的模槽之中。即便如此，复杂的石质沿槽打磨得光洁而严谨，依然是不可思议的手艺。

在最后醒来的瞬间，我突然明白，两种材质都是假的，既非真正的石头，也非真正的水晶，它们都曾液体，可以完成轻易的塑形和复制。

这暗示了我们认识的局限。我们判断事物时，总以一个潜在不动的坐标法则来参照和判断——这个法则，石头般坚硬结实，是看似最值得信赖的固体。可惜，它并非那么不可动摇。我们所目睹的奇迹，可能不过是凡物，是一种建立在不结实之上的自以为是。

15 贺词

银光闪耀的海面。

我们在船上捕鱼，却无斩获。

后来我才被告知，撒网之前，应该先给鱼祝贺生日。

16 豹

因为灾难的大火，一只通灵的豹子获得了更高的魔法。

如果豹子用尾巴连续画出两个“Z”，青草就会在这个字形上复生，仿若从未被烧毁。饥饿的鹿会来觅食。其实这片魔法的草场，不如说是豹子为自己铺开的餐桌，当它的匕齿咬住一头鹿的咽喉，草丛就会随即消失。所以，鹿必须尽快在短暂的食草时间里找到好运气的位置——不要成为豹子一顿冒着血热的晚餐。

豹子既是鹿的恩人，也是鹿的仇人……它既是赐予者又是掠夺者。

17 人鱼

我注意到她的容貌，她脸上的不安大于美。她踩着一个个安装在地上的彩色灯泡向前。走过的路都黑了，奇怪，她的脚没有受伤，灭掉的灯泡却在黑暗里流出一道道血痕。

18 闺密

我和闺密从旅居地共同踏上返乡征程，分别坐在两个男孩的摩托车后面。刚一踏上征程，我们途中去了一趟厕所，就走散了。

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可能是被蓄意安排的。别人的通信正常，只有我的手机信号被屏蔽。我隐约意识到危险，并尝试在小巷中逃脱。几次穿梭，我都无法突破对方的包围。一切，都是因为摩托车男孩起意抢劫，并做出了阴谋的布局。当与摩托车男孩狭路相逢，我假装已与家里联系，并通知若干亲友，他们都知道我是由摩托车男孩运载回去的，一旦出事，摩托车男孩必难逃干系。我明显感到，摩托车男孩放弃了原计划，准备把我送回家乡。

就在回程过程中，一个拉丁样貌的异域面孔盯上了我。即使我防范在先，把双肩背包放在身前，这个抢包贼用力拉扯——争夺中，包里的大量美元一下子撒了出来。摩托车男孩原来已经放弃了抢夺计划，但巨款在眼前飞扬，他改变了主意，重新动了邪念。从他眼中，我看到了不祥后面的杀机。回乡太远，无望，我反向逃往近在咫尺的旅居地。

回到旅居地的宿舍，我顺着窗帘向下看，观察是否安全。旁边站着返乡中走散的闺密，她质问我，为何当初会和摩托车男孩一起走？摩托车男孩三次弑父，并最终得逞。我忘记了闺密曾和我一起出发，当我坐在男孩的摩

托车后时，闺密和我说说笑笑，从未提及危险；我也没有怀疑，为何她会重新出现在旅居地，按行程她应该已经回到家乡。闺密说，她必须打电话联系当地政要，才能铲除一系列恶行。

随后我看到了武警，对村里所谓的刁民进行棍压法，镇压了所谓的流氓村。我跑到村里的餐馆，追问当初情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闺密出卖了我，她才是幕后的操纵者。谜底揭开，我因此被囚，就在这个旅居之地。

漫长的幽禁中，我全身长出又长又白的覆丝，已成怪物。

终于我被放出去，遇到摩托车男孩和他的父亲，证明那个弑父的传言是假的。当年村里是因为我才遭到镇压，父子俩未忘此事，终于等到复仇的一天，前来捉我。然而，父子两人是畏惧的，他们害怕我用自己身体上有毒的丝网黏拉他们。我知道，我能自救，不过是在自毁中的自救……网丝用尽，我也将耗尽自己的元气。

梦境最后，我的体积在缩小，像游魂，飞越那个原本只是路过却成为阻隔的曾经村庄，看到低矮丛生的灌丛，上面是蜻蜓，下面是蜻蜓尚处于童年期的稚虫，它们通透轻盈，之间只有半米的高度……我看到它们的前世和今生，看到那些我们宁死却也无法抵达的自由。身置这个玻璃鱼缸大小的地方，我就像一只力气用尽的森林蜘蛛，从蜻蜓的高度摔到稚虫的高度，摔落到草梗之间，疲惫而释然。

这时传来妈妈奇怪的话外音：“我为你骄傲。”

19 精灵

我梦见，那些精灵有着透明的翅膀和彩虹色的牙齿。牙齿一碰食物就会雾化。所以，精灵们虽然能赐予他人美食，自己的肠胃却永远在饥饿中。

20 游戏

我梦见，自己变成了电子游戏中的超级玛丽，必须不断克服迎面而来的各种障碍——尤其那些浮木，会带来撞击的致命危险。我一次次跳跃，一次次闪避……我逐渐摆脱恐惧，进入真正的游戏心态。

浮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横棍，最后变得像火柴棍那么小——我耐心地，把它们摆成牡丹园里的一朵花。

21 巨蟒

最初我看到是树，枝叶脱尽，已经像是旅游区那种装饰性的水泥假木。突然，我听到巨响，咔嚓咔嚓的，像是履带在最大的枝杈前磨砺。我感觉周围的人们惊慌起来，我这才看清，那条像是金属履带的东西，原来是条卷挂在上面的巨蟒。

说话间，它已经滑下树干。我正犹豫往哪里跑，巨蟒已向人群扑来，比远观时大多了，大得像条龙，从铜褐色变成惨白色，瞬间就到眼前。我不在靶心，但偏离得非常有限，眼见它要吞噬右侧之外的几人……我几乎没有分辨出它的斜倾，瞬间，我的腿已被衔到半空，我的上半身，在它的嘴里。

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头脸和上半身埋在它的厚舌与上腭之间，太阳穴的压痛来自它的腮颊或其他……并没有什么异臭，我只是感到暖热中逐渐的窒息。思维清醒，原来这就是我的倒计时，我的最后一分钟，我此生最强烈的好奇心得到了清晰的答案。我一点也没有挣扎，似乎挣扎就要面对改变，而无论何种改变，我都将看到巨蟒的脸，这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勇气面对的。这时来临的死，如同安慰和拯救。

我就那么守株待兔一样等待着死亡，等待着自己成为那只兔子……直至，在读秒与放弃挣扎的平静与恐怖中，醒来。

22 电影

我在梦中看了一个大约十分钟的电影开场。它完全以电影的画面和节奏来呈现，讲述一个能力出众的流亡女性如何在英国家庭中当保姆的故事。也许和我刚刚读过《温柔之歌》有关。

一开始是远距离广角拉开的大场景。奴隶般备选的劳动力们挤挤挨挨，数量惊人。有人在叫喊着征丁——突然，一个女性站起来，大声以牛津腔的英语回应。语音之完美，使她从卑微者中脱颖而出。

然后的镜头，是谋得职位的她在乡村别墅门外抽烟。树影斑驳，在她那张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沉默的脸上。她吹散嘴里和指尖的烟味，转身消失在门里。

门外铃响，有人前来应聘工作。大门没有打开，传来里面的声音：“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美工作者。”

镜头转入家里的情景。的确，一个能干的说牛津腔的女仆，娴熟地打理所有事情。

喜欢橄榄球的男主人，沉浸于电视比赛。他和女主人一样，并不关心襁褓里的新生儿。

过了一会儿，女仆观察到男女主人意欲亲密，他们之间久已没有这样的时刻了。男主人表面是要亲密，其实是以亲密作掩护，去翻找女人钱包。男女主人之间的对话里，夹杂着温存与调侃。窗外的女仆似乎想倾听，犹豫之后，她又把窗帘拉上了。

亲近中，男女主人没有注意，新生儿摔落地上。

他们以为孩子死了，沉浸在错愕和悲痛里。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孩子一息尚存。于是，夫妻抱起新生儿前往医院急救。女主人刷卡刷不出来，反问男人；男人开始还否认，但后来承认，他没钱了。

关键时刻，女仆挺身而出，她拿出全部积蓄。只是由于她不具备公民资格，刷卡无效，但可以去银行现场办理。

两个女人在工商银行，女仆要把卡里的钱转给女主人，但排队漫长，令人急迫而无望。两人改去中国银行，女主人说，没关系，这样折换的现金还会多一些。

现金拿出来了，但刚才在银行桌上的业务经理却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

女仆在医院的说话声音很大，她明显变得自信了——后面跟着被她捉拿归案、想偷走款额的银行职员。而男女主人表情木然，听着女仆的讲演他们脸上没有一点儿笑意，不知是因为尊严受挫，还是因为孩子已经病危……

梦境具有的特殊质感和叙述节奏，情节不断翻转，衔接既意外又流畅——我在梦境里觉得电影出色，受到艺术感染的同时，心里赞美电影品质。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十分钟的片子，记录出来平淡无奇，可我作为梦中观众，看得津津有味。等醒了，我才发现是个梦。我所疯狂夸奖的那个电影，原来自己才是编导……我在醒着的时候，从未这么自恋。

23 政要

我梦见一个故去的政治领袖，他以惊人的美貌和美德著称，并且还有迷人的智慧。他老年的照片清瘦，眼神明亮、透彻又坚定。

我梦见和他相遇在病房的走廊。我在现实中，没有模仿方言的才华，但在梦中，精确重现他标志性的口音。

病房门上，就像黑板报似的，写着乐谱那样奇怪的文字。这位迷人的长辈问我：“我在这里做了修改，你猜猜改动了哪里？”

我迷惑地看着他手指所示的六个字符，它们是六个烧饼那么大的圆形，里面向心的弧线长短不一，既像人的斗形指纹，又像线条组成的迷宫游戏。这样的语言和文字多么奇怪啊，弧线与弧线长度和断点不一，远处看起来大同小异，实则表义不同。如此难以记忆，怎么去学习、了解和掌握呢？

我恍然大悟，这种字形的复杂是被蓄意设计的，让间谍无法在一瞥之间靠神奇的记忆来背诵内容。可这几个圆符到底什么意思呢？难道它们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见我迟迟未答，领袖给我提示：“我把这几个圆的上端连在一起了。”瞬间，我醍醐灌顶，得到开示：“这是中国的六座重要山脉，把它们连在一起，形成图形，象征山河铸就长城。”

这位迷人的政要不置可否，报以长者的微笑，并未丧失和我谈话的兴趣。这时坐在沙发上的妈妈惊讶于这位伟人的出现，正要表态，被我暗示的目光制止了。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以平凡且平等的对话姿态，继续交流。

我在梦醒以后，怀疑，号称对政治不敏锐的自己，在破解谜题时进行了秘密的谄媚。

24 礼物

那个男孩有女童般的齐刘海，样貌清秀。他穿有隐隐缎光的绿色夹克——比草绿色要深，比墨绿色要浅，是一种介于橄榄与荷叶之间的绿色。正值暑假，男童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送他礼物，看起来像一团棉花做成的云朵——这是最新生产的云奶棉花糖，口感醇厚。因为限量供应，很难购买。我也是花费了很多关系和力气，才得到这样珍贵的一朵。男孩安静，但他的确因为这份礼物感到快乐。

“你要听话啊。知道我为什么送给你吗？”我蹲下来跟小男孩交流，“因为你的快乐，被你爸爸视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我停顿了一下，说，“今天，是你爸爸生日。”

梦中的我，完全不清楚自己和孩子父亲的关系。等我醒来，依旧恍惚。那么，我是用一团云奶棉花糖，送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生日礼物吗？

25 情人

我们两家是世交，燃燃和我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女伴。后来，我们上了同一所工读学校。

某夜，我得到消息：有个坏人要来害死燃燃。燃燃的妈妈抱着女儿哭。我说：“不用怕，我来保护燃燃，我有办法。”

我从透露情报的叔叔那里拿到一把弹簧刀，把它藏在一堆工具箱上面。然后，我回家去取证件，准备回来帮助燃燃连夜逃走。

等我回来，燃燃已经遇害。因为此前没有来得及与我见面，燃燃不知道，附近有一把刀具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杀害燃燃的男人，极其英俊，他伪造了一个似乎毫无破绽的现场，说是无意间害死燃燃——他竟然由此逍遥，逃脱了法律制裁。

多年之后，我和这个男人有床第之欢。他依然拥有美貌，岁月无痕，他没有遭受任何惩罚；而且，他极富性爱技巧，连亲吻都令人心醉神迷。肉体交缠之后，这个曾经的凶手出门去打篮球，挥手向依然赖在床上的我告别。

他在上篮动作之后，一个在篮筐里旋转的球突然砸向他，有着奇怪的超乎寻常的重量。男人迟疑而迷惑地发现，自己被砸中了颈后的要害部位，即将死去。他这才看到，场地外，站着身穿运动夹克冷笑的我，根本不像他以为的正穿着吊带躺在床上。

我告诉这个男人，当年正是他，害死我的朋友——假借是物理之力而非人力。那么，这是我精心策划的多年之后的复仇——他同样被意外事件砸中，是物理意义的死，没有人需要对此事负责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以同样的办法，报复了他。

男人到现在才意识到，刚才陪他打球的人，都是行尸走肉，看似有着恍惚笑容，其实都是有表情障碍的僵尸。是的，他将死去，无人承担后果。

这是双重的雪耻。

无人知晓，当年我之所以没有及时返回实施营救，是因为，我与某人沉迷欢情——这种不合时宜的亲密，延误我去救助自己最好的朋友。我追悔的方式并非从此清心寡欲，而是，相反。害了彼此的撩人床技，并未阻止我的计划和进程。我恰恰利用特殊的肉体纠缠，从而步骤准确地完成索命。我洗刷了冤屈：从朋友的命，到我的性。

26 假期

天堂里的游泳池，里面灌满橙汁，过度丰盛的赐予令人不适。

我震惊地看到一个玩旋转木马的魔鬼，他说他来这里度个周末假期。

他的睫毛特别长，能在上面烫出一个大卷花儿。

27 魔鬼

我梦见自己是魔鬼。

我的身体以腰部为基线，完全对称。往好里说，是个临水照花人；往坏里说，就像扑克牌上的鬼或者老K那样，有着两个方向的生长。并且，我戴着扑克鬼里的尖帽——尽管我力图掩饰身份，想说自己仅仅是个巫师，但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外形还是出卖了我。

由于自厌，我决意放弃，我长成了唯一想去自杀的魔鬼。我看到自己的胳膊黑且虬结，逐渐变成参天巨树，枝条幽暗，雾气昭彰。

正在这时，有什么飞行物“啪”的一下，打在我的左颊。凭那短暂一击，魔鬼的直觉足以让我判断出那是一只飞鼠。

果然，这个小家伙被我攥在手里，并不咬我。它开始是乖巧的，后来才急于逃脱。飞鼠用两只前爪撑住我的虎口，眼睛晶亮而绝望。我不忍它的慌张，就把小飞鼠放到大树的高枝上，它马上躲进一个凹陷之中。

我欣慰，但退后一看，我发现在这个凹洞的上端，有只吃虫的鸟，羽色艳丽。我担心飞鼠被吃掉，用手推挤，让飞鼠从隐身处里出来，从正在进食的鸟喙旁边飞走。不知道为什么，我既高兴又伤感地叹气。

此时我突然惊觉，自己不正是那棵小鼠隐身其中的树吗？我放飞鼠的位置，是在那么高的树冠——原来，我不是飞得那么高，我只是从我自己身上放飞了那只小兽。我当时并未注意，现在再看自己：树叶婆婆，全是绿意。

雌蕊

1

“他们宁愿付你一千美元得到一个吻，也不愿意花五十美分倾听你的灵魂。”

——玛丽莲·梦露

女性之美，摇曳多姿。

银幕形象，有奥黛丽·赫本那种超越尘世的童话之美，优雅古典，清凉到具有镇静的作用；也有玛琳·黛德丽那种，让人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地狱，她都去过，而且幸存了下来”。舞台上，时装模特展示深陷的双颊和完美的锁骨；芭蕾演员展示精湛而对称到几乎非人的腿；《花花公子》的月历女郎们，在海滩、旅馆、喷泉、加油站等场所，展示她们动荡的美：闪动杏蜜色流光的皮肤，提琴般凹陷的腰肢，高跟鞋上赤裸的足弓，缓慢揉散的头发，微微肿胀的湿亮嘴唇，以及，从比基尼泳装边缘隐约露出的蔷薇色乳晕……美，若夹杂了一点危险，更有益于它的侵略。

玛丽莲·梦露是性感女神的代表，她的面容，奇异结合着女人的诱惑与儿童的天真，介乎纯洁与放荡之间——很奇怪，她就是具有一种孩子气的美貌，具有一种无辜的魅惑。尤其是她挺胸扭臀的步态，颇具挑逗性。《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阿瑟·盖尔布说：“当她走路时，就好像她有一百个身体部分分别向不同的方向移动，你不知该看哪个部位。”她正是凭借独特的步态当上演员的。去《快乐爱情》剧组参加女配角的选拔时，演员格劳乔·马克斯让她走几步：“不是指那种连老阿姨都会走的样子。这个角色需要一位年轻的女士，她从我身边走过，光步态就能唤起我年老的性欲，让我的耳朵冒烟。”梦露按照他的要求走了几步，格劳乔说棒极了，哈勃·马克斯说：“不要在没有警察的地方那样走路。”据说，梦露从十三岁就开始练习慵懒的走路方式……浓烈的风情，使她沿途散发出雌性的腥甜，她以这样的走姿展示着她那令人渴望的身体。

我以前对梦露无感，直到读了她自传里的部分片段。在这本《我的故事》里，她的表述抵达写作者的精准。她不厌其烦地数次提到自己是性冷淡：“我为什么是个妖女，我完全不是，我的脑海里没有一丝关于性的念头。我不想要接吻，我也不会幻想国王或者电影明星的诱惑，事实上涂上口红、染着眉毛，加上早熟的曲线，我却像化石一样没有欲望。”“即使那

些追求者弄乱了我的头发，我也从来不觉得他们冒犯了我。如果有什么的话，我嫉妒他们，我想要拥有他们那样的占有欲，因为我什么都不想要。”她毫不隐讳对好莱坞的敌意：“好莱坞，一家拥挤的妓院，一个为种马备了床的名利场。”“在好莱坞，一个女孩的品德远远没有她的发型重要。好莱坞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宁愿付你一千美元得到一个吻，也不愿意花五十美分倾听你的灵魂。”人间尤物容易被认作无脑的类型，但梦露有生动的灵魂。在我看来，这些表述就像她的步态那么性感。

笔，就是灵魂的步态。有如冰刀在冰面上的划痕……行云流水，是因为行于刀刃之上。

我喜欢女性的独特表达。尽管在我的阅读书单上，男女作家的比例平分秋色；尽管我从男作家那里获益颇多——但我依然偏爱许多女作家的文字，不知这是性别的帮助还是限制。世界辽阔，盲人摸象不是笑话，而是确凿的事实。没有人能够触及全部的世界，只有彼此信赖，我们才能对触摸不到的部分有所了解。林语堂有着通达的人生理解，他说：“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辛酸。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重感情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尊重的基础上那种性别经验的分享，非常重要。即使有些男性概括说女性叙事多强调自身感受与内心经验，所以感性而破碎，潜台词是批评女作家总是在说“我”，而不是“我们”，认为她们沉溺于细节而缺乏整体的宏阔视野……我认为，即使被偏见地看待，女性写作也天然与文学有着深切的联系。弱者，边缘，体恤，这些词汇就是文学自身的立场。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的女作家性别特征明显，有些几乎完全消灭了自己的性别，我无法判断执笔者是打领带的还是穿裙子的。什么是文学中的女性力量？难以提炼一个答案对它进行准确的描述。力挽狂澜是一种力量，以柔克刚也是一种力量；与命运拔河是一种力量的体现，但随波逐流中的逍遥自由也可以是一种内心力量的体现。女性的写作，让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理解和释读，增加了认识的角度和切入的深度。

我怀疑，我之所以偏爱某些女性作家的表达，与她们色彩特别的经历也密不可分。

2

“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的、丑恶的生活。”

——萨冈

前些年，国内评论界频繁使用一个合并词语——“美女作家”。现在少有提及，好像一碗滚汤凉了以后结了冷油，没谁有兴趣再喝了。即使在当时的评论体系里，所谓“美女作家”，也暗示着某种专业水准的降低。单论美女，她不够格；单论作家，她也不够格——搭配在一起，似乎就不需要彼此迁就了。其实，的确有许多货真价实的“美女作家”，她们的容貌匹配着她们的才华，几乎是一种外在的诠释。

法国的“美女作家”萨冈早在十八岁就名满天下，成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她漂亮出众，个性鲜明。赌博、酗酒、飙车、吸毒、负债累累，她离经叛道，却备受钟爱，被称为“迷人的小魔鬼”。其实萨冈诞生于一九三五年，她跨越新世纪，活到近七十岁的时候离世，可她在人们的评价和印象中，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俏丽的短发、少女的样貌、狂放不羁的性情。

“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她不屑于纪律性的人生，不在乎生活的无序——“有什么关系？我数学一向不好。”萨冈的表达，具有简捷明快的摧毁力。她宣称：“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的、丑恶的生活。”作为“一个持续性事故”，她说：“我相信自己有权自毁，只要这不伤及他人。”

像糖一样腐蚀牙齿，像毒药一样瓦解意志……没有谁像她这样勇敢追求消极的未来。天真的神情和老练的堕落……在持续的自毁中，她体现一种狂欢化的人格。萨冈赤足飙车，甚至在饮酒之后，车祸使她几近丧命，但并未阻止她的疯狂。她的人生，就像一台别人需要维修而她却不作丝毫保养的跑车，带着青春一路的噪声驰骋。

尽管始终有种奇怪的、缺乏来源和证据的、真实的痛苦，萨冈的文笔却轻快、易读。我是在同样年轻的时候看过她那些年轻的小说，但从未迷恋她的风格。除了小说，萨冈的随笔也才情纵横，比如她写《马》……她自己就像一匹赛马，可以在竞速中横空出世；即使并未夺冠，也会是马群中耀眼的那个。但，她是否恰恰被自己早慧型的才华所耽误？在我看来，她那让人胆寒的早慧，随后并没有沉淀为更令人尊重的智慧。不过，这些原本就非她所愿，她宁愿在微醺的沉沦和略重的丑闻中，在自愿选择的肤浅中，享受她带点无耻色彩的理想生活。

早在二〇〇四年萨冈离世之前，就有人评论活跃于法国文坛的古灵精怪的女作家阿梅丽·诺冬为萨冈之后新一代“畅销女王”。其实诺冬一九六七年生于日本，国籍是比利时，但运用法语创作的诺冬与萨冈的出道存在相似之处。诺冬从十七岁时开始创作，首部小说只花了一百二十个小时就完成，年少已功成名就。

我读诺冬的《午夜四点》，惊艳，有天赋的人任意笔墨，才华横竖都溢。成名以后的阿梅丽·诺冬，据说习惯以黑色礼帽作为自己的标签，需要隐藏身份时就不戴帽子。她用自己的照片当《幸福的怀念》的封面，照片里她戴了一顶造型奇异的帽子，似乎是在一座富有禅意、风格极简的日本庭院里拍摄的：斜逸的几条寒枝，颗粒均匀的卵石，方整的砖石，素朴的院墙。照片上的她看起来有点奇怪，让人判断年龄时略感犹豫，说不清是因为保养得当而显得年轻，还是因为心智超常而显得成熟。她的黑色连衣裙，上面紧身设计，下面花苞样张开，有点像儿童的蓬蓬裙；她的手，就像乌鸦尾羽那样张开；她的妆容，五官因敷粉而得以强化，介乎东方艺妓与西方马戏团女伶之间，又似两者的融合。诺冬的这个形象，纯真又邪恶，生动又神秘，在庄重与荒谬之间保持着敏捷的讽刺。像能未卜先知，诺冬仿佛是用塔罗牌预测命运的流浪者，带有一点从噩梦借来的勇气和邪念。她的样子和她的文字，都古灵精怪，恍若莫测的梦境。

无论萨冈还是诺冬，像结合了女童的永久天真与女巫的早熟沧桑。

3

“为了创造你，先要毁掉你。”

——杜拉斯

是从纯真到沧桑，从年轻到年老……她的脸，从花园变废墟。少女时的杜拉斯面容精致，有银器一样干净的光芒，随后遭到严重摧毁，在时间中变得污浊。看杜拉斯少女时和老妇时的照片，判若两人，她已成自己的叛徒。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两张脸之间，彼此绝缘。她的皮肤呈现出干水果表面的皱缩，是个矮小干瘪的老太太。

杜拉斯与萨冈一样抽烟酗酒，加之难以驱遣的孤寂，曾经的美貌彻底被破坏了。“当一个女人饮酒时，犹如一头野兽或者一个婴儿在喝水。酗酒对女人是丑闻，女酒鬼是个少见的、严重的问题。它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本性。”醉醺醺的杜拉斯不乏清醒地说，“我意识到我在我身边制造丑闻。”

近七十岁的时候，萨冈死于烟酒毒品导致的肺栓塞；同样是近七十岁的时候，杜拉斯开始写她的初恋，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场刻骨铭心的相遇。这部名为《情人》的半自传体小说这样开篇：“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杜拉斯以小说的方式，复述叶芝的名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

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杜拉斯的作品并不依靠剧烈的戏剧冲突，情绪的力量大于情节，具有法语的乐感和梦呓的魔力，既无耻又纯洁，野力十足，又不失古典与严肃性。她在国内曾风靡一时，广受追捧，但热度并未始终持续。我原来也喜欢过杜拉斯，但时间很短，她更像一种青春期的躁动，很快不再对我产生阅读上的吸引力。我甚至觉得，杜拉斯就是更成熟一些的萨冈。虽然这是我的偏见，但抱持类似看法的背叛型读者应该也不在少数。数年后，杜拉斯再度引起强烈关注，并非因为文学，乃是因为她的私生活。

扬·安德烈亚出版了关于杜拉斯的回忆录。扬比杜拉斯小三十九岁，是她最后的情人，也是她的秘书、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关系持续十六年之久。在女性艺术家那里，这种现象并不鲜见，比如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陶艺师情人尚·汉密尔顿，就比她小了将近六十岁。这些令人魅惑的老年妖物，她们像沉睡百年的童话公主那样，亲吻对她们来说算是幼龄的少年。

我们歌颂青春，是因为身置其中的人享有更为辽阔的未来……但扬、尚等情郎们，并不存在年龄落差带来的优势。相反，他们有时被彻底征服，就像母兽统治下的幼崽，被雌性激素控制的小昆虫，哪怕赴死而来。

扬疯狂迷恋杜拉斯的文字，他不读其他书，只读她的书。的确，杜拉斯的笔法率性而为，扑朔迷离，张扬如情欲，通透如高潮。有的句子水银一样，神秘、凝练、有毒。是怎样自由飘忽的灵魂，才有这样恍惚迷离的文字？一九七五年，与杜拉斯初次见面时，扬是个大学生，他从此几乎每天都给杜拉斯写信，并不等待回音。写了五年。直到杜拉斯同意，并且招募……扬成为奴隶式的情人。

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不仅如此，杜拉斯高高在上，控制欲很强。她命令，并且决定扬的喜好：从“应该”吃的食物，“应该”喜欢的羊毛衫，到“应该”喷的香水。“为了创造你，先要毁掉你。”在扬的回忆里，杜拉斯不仅有日常的阴郁和快活的残忍，还怀有病态的占有欲。杜拉斯的爱里，包含着凶狠的侵略性，是以一种野蛮施暴的方式来展示的。杜拉斯酗酒严重，就像从破碎的葡萄里酿酒，她从摧毁的肉体和精神里酿造爱情的浆汁。无处着陆的悲伤，无以名状的绝望……无论是酒精、文字还是爱情，杜拉斯都追求一种濒于致死的强度。

一九八〇年，当扬刚来到杜拉斯身边时，他喜欢不停地打电话，每天十个小时，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包括只见过一次的人，包括十年前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见到的人。或许，某种即将失去自由的预感，使他沉迷

于此。随后，他的自主生活被终结，给老朋友打电话被杜拉斯禁止。扬认为：“她囚禁了我。”是杜拉斯给了扬一个新的名字——从名字到生活，扬都被关进杜拉斯的世界。杜拉斯不允许作为同性恋的扬去见男人，也不许见女人，包括扬的母亲。

扬照顾她，忍受她，怨恨她。这个专横而才华横溢的老女人，时而是迷人的精灵，时而是讨厌的癞蛤蟆。作为同性恋的扬曾试图逃离，消失又回来，带着赎罪般的惶恐，继续接受杜拉斯的某种盘剥。这个所谓的年轻人说：“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扬，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

有人说，杜拉斯的写法其实非常不健康，“她是以伤害自己的一部分，去滋养另外一部分”。她把这种自我伤害的手法，作为遗产，留给了扬。尽管杜拉斯从来不允许扬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直到临终，自恋的杜拉斯特赦了扬，并且羡慕地嘱咐：“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写我吧。”杜拉斯死后，扬通过写作来克服抑郁，但文字风格与杜拉斯很像。从语感到结构，当主人死去以后，因为熟悉主人的命令，奴隶依然能够发出主人的声音——扬是终身制的俘虏，甚至在杜拉斯死后。掠夺得如此彻底，扬被劫持一生——二〇一四年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一百周年诞辰，她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于七月十日在巴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杜拉斯和扬的关系，让我想起一种长相奇怪的鮫鰐鱼，它擅长以自己棘刺上的拟饵诱捕鱼虾。

刚刚打捞出海的鮫鰐鱼软塌如一团烂掉许久的肉，周身包裹大量黏液——它们多是雌性。为何被捕捞的鮫鰐鱼通常都是雌性呢？因为雄鱼出生不久个体还很小时就寄生在雌鱼身上，终身相附，大多已同雌鱼结为一体。雌雄这样亲密，配偶这样纠缠，在动物界比较少见。雄鱼一生的营养都由雌鱼供给，所以如果雌鱼被捕获，它会随身携带着一个殉葬的情侣。

4

“但愿我的嘴唇能嫁给那样的创伤！”

——西尔维娅·普拉斯

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恐怕殉情的女性占比更高……她们死于自己感情的强烈或极端。

比如普拉斯。普拉斯，杜拉斯，并蒂莲般的名字，但命运迥异，就像它们分别拼写为Plath和Duras，毫不相像。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她是早

熟的天才，普拉斯十二岁时的智商测试已高达一百六十分；她也是早夭的天才，死于三十一岁。昙花一现的美，始于也终于黑暗的摧毁。

黑，太多的黑——来自死去的父亲，来自死去的爱情，来自即将死去的自己。《爸爸》一诗写于普拉斯自杀前的四个月，“你是只黑皮鞋/我曾像只脚住在这里三十年/可怜而苍白/几乎不敢打喷嚏甚至呼吸”。不仅是黑皮鞋，父亲的形象还被比作法西斯和魔鬼。普拉斯在这首爱与畏惧交混的诗歌里，表达着不安、反感、怜悯、悲痛等复杂情绪，也表达着受压与受束中的质疑和反抗。普拉斯八岁丧父的创伤，在尾句中这样传递：“爸爸，爸爸，你这个浑蛋，我受够了。”令人感到一种终极的寒意。

一九五六年，西尔维娅·普拉斯邂逅英国诗人休斯。尽管休斯当时带着自己的女友，他依然暴力般亲吻普拉斯，扯下她的发带；普拉斯回应这些吻，并且像受到攻击的蛇那样在休斯脸上狠咬一口。休斯淌血的面颊，留下环形圆丘般肿胀的牙印，此后一个月都未退去伤痕。这是象征——休斯此后一生，都未退去普拉斯留下的烙印。

普拉斯陷入一见钟情的狂喜，“我已极端地坠入爱情里，这只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最硕大最健康的亚当，他有着神一般雷电的声音”。旋风般席卷的爱情，让这对诗坛天才迅速步入婚姻。

他们有过美好与甜蜜，一起享受创作的愉悦。童话里，往往王子与公主举行结婚典礼就算到了故事尾声，因为要回避描写婚姻里那几乎是必然的磨损。这对金童玉女般的甜蜜佳偶，在现实的婚姻里渐生怨恨，充满了争执与冷战、怀疑与指责。关系如履薄冰又剑拔弩张，他们甚至上升到肢体冲突。当然休斯多情，我甚至妄加猜测，他对普拉斯当初的迷恋和随后的逃离可能是因为同样的东西，比如极度敏感。作为情人，普拉斯的敏感是一种艺术化的情绪；作为妻子，她的敏感会渐渐变得棘手。后来休斯另结新欢，迷恋上加拿大诗人的妻子阿茜娅·魏韦尔，导致他与普拉斯之间的裂痕难以修复，珠联璧合的婚姻变成废墟。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普拉斯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头部用衣服裹住伸进烤箱垫板，拧开了煤气开关。她事先为孩子们准备好牛奶和面包，然后用湿毛巾堵住卧室的门缝，以免泄漏的气体伤害到他们……尽管她知道，当入睡的孩子醒来，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妈妈。

普拉斯死后，休斯以未亡“罪人”的身份活着，一生受到舆论的围剿与诟病。尤其普拉斯自杀的数年之后，阿茜娅·魏韦尔以几乎同样的自杀方式，喝下安眠药并打开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以及她与休斯的两岁女儿的生命。饱受责难的休斯不做申辩，不予还击，但在私信中他曾表达苦衷：“我知道我的沉默可能会让人们以为是证实了某些对我的指责，但我宁可这样，也不愿被扯入斗牛场中，被逗弄，被刺激，被激怒，直到我吐

尽与普拉斯生活的所有细节，以供成千上万的英国文学教授和研究生们做更高级的消遣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怀有低级趣味的好奇心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不管他们如何道貌岸然，假装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他们的好奇心是属于土里土气性质的，大众喜爱的流血运动性质的。”休斯不相信新闻记者的公正性，很少接受采访。无论是出于难辞其咎，出于对自己隐私的捍卫，还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休斯的缄默加重了旁观者的兴趣——是的，我们愿意以体面而堂皇的理由窥私，并加以假设。

仅从简要的资料来看，容易把普拉斯想象为传统色彩的痴守者，其实不然。按普拉斯自己的说法，她在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约会过数百个男孩，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快”而名声不佳。普拉斯热恋过别人的新郎，对方十周前刚刚结婚。第一次与休斯同居的第二天，普拉斯就去巴黎找她的旧情人萨松——就像她说休斯是“世间唯一能与我匹配的强壮男子”一样，普拉斯也曾称萨松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爱。朋友们聚会时，已婚的普拉斯在休斯在场的情况下，在桌下偷偷用腿摩擦诗人理查德·墨菲的腿进行挑逗。不过，普拉斯对墨菲说，谁也破坏不了她与休斯的婚姻，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完美的。由此可见，休斯不忠，普拉斯多情，再完美的结盟也带来限制。毕竟婚姻的领域狭小，没有天空那么大的鸟笼，也没有河流那么大的器皿，可以盛下想要犯罪的自由。

休斯的移情是引线，引爆的是普拉斯的性格缺陷。普拉斯生前出版的作品很少，获得的成就远低于她自己的预期。一方面，她热情奔放、野心勃勃，一方面又极易被沮丧击倒。普拉斯阴暗不定，喜怒无常，经常处于紧张、惶恐、焦虑、嫉妒、怀疑、自闭、抑郁与狂躁之中，甚至在歇斯底里中做出不计后果的破坏性举动。其实每次歇斯底里，都包含一场小型而血腥的自我践踏。她把别人逼疯，也把自己逼疯。走向崩溃的普拉斯多次试图自杀，为此曾割伤自己的腿，曾服下大量安眠药，曾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曾蓄意制造车祸。普拉斯宣称：“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而我使之分外精彩。”生命的花园虽然盛大，但每天都需要为死神剪枝，普拉斯向往成为那祭献的玫瑰。“就像玫瑰花/合上花瓣/在花园里/僵冷/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然而，她并不能如自己诗歌里说的，“像猫那样死上九次”。

许多创作者饱受精神困扰，死成为终极的解脱之道——死，甚至并非医学意义的恐惧，而是文学意义的优雅。我小时候看电影《王子复仇记》，除了劳伦斯·奥利弗的演技、孙道临的配音，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奥菲丽娅自杀的场景：头枕水面的奥菲丽娅像朵睡莲缓慢漂流，涟漪般荡漾的金色长发也缓慢卷入涡流。米莱斯的油画《奥菲丽娅》，再现了那种凄凉哀婉的氛围。而现实中，英国女作家伍尔夫选择了类似奥菲丽娅式的投河。伍尔

夫既感性又理性，既优雅又神经质，她饱受精神疾患的折磨，数度自杀。决意离去，她的口袋里装满用于自沉的鹅卵石。再比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家萨拉·凯恩，这位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成绩全优的乖乖女，主要的创作题材是崩溃、暴力、性虐、毒瘾、变态、战争和屠杀。这位才华纵横的被誉为“英国继莎士比亚与品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一生写了五个剧本，每部作品都在挑战观众的心理承受极限。她在医院卫生间里，用一根鞋带结束了自己二十八岁的生命。伍尔夫、普拉斯、萨拉·凯恩，她们有多敏感，就有多锋利，她们依靠直觉和幻象勇往直前，甚至依靠混乱里的超能。人人拥有死亡，但她们的死亡计划由自己制订，直到成功谋杀自己……如向日葵般忠诚，她们追逐的，却是死神镰刀之光。这些写作的女性没有体验衰老的感受，因为，她们没有得到过一个完整的晚年。W、O、R、D……在打字机键盘上敲击的每个字母，都可能是陷阱突然翻转的、令人踏空的小小圈套。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伤害和危险恰是灵感的来源，看似非法的交易以命作赌。所谓艺术品，就是在她们的心脏和头颅里雕镂，身体和精神因此千疮百孔。在她们眼里，“幸福”总是显得俗套，散发出难以祛除的有贬义倾向的体味。她们很少写哪怕只是低糖分的句子，她们习惯更多的苦，诗句像被直接碾轧过的血肉。与休斯分开如遭撕扯的普拉斯疯狂写作，也许是亡命徒般离去的预感，也许写作是她对死亡诱惑的挣扎、抵抗与自救。一切，有如潮汐，在离去时，海滩露出斑驳的死物和生机勃勃的活体……它们共同形成普拉斯的灵感，形成裸呈而致命的诗歌。

普拉斯生前绝未预料自己不久将成为女权运动的偶像和烈士。不错，她在诗歌里表达女性的抗争，但她同样表达了妥协与屈服。从爸爸到爱人，从父权到夫权，她的经历看起来更像失意者，尤其是婚姻的牺牲品。其实，婚姻并不那么容易令人做出事实判断，就像普拉斯形容过的钟形罩，象征某种巨型而透明的笼罩，它既提供保护，又限制着自由的翅膀——普拉斯像只头破血流待在里面的受伤之鸟。后来普拉斯赢得的哀荣，与休斯关系很大；我们很难剥离她与休斯的关系所带来的利弊，就像很难剥离普拉斯身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普拉斯绝大多数的作品，是她去世后由休斯整理、编辑、出版的——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在美国出版，连续数月居畅销书排行榜之首；普拉斯的《诗集》获普利策诗歌奖，已故作家极少获此殊荣。不仅如此，休斯谈到普拉斯的“自杀尝试和意外幸存”，谈到普拉斯的某个短篇如何“像马戏团空中秋千的回旋光芒一样萦绕深切的恐怖：她的电子休克治疗经验带领她逃出了那远离自毁倾向的冬眠期”……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她扭曲的心灵。

休斯的第一本诗集《雨中的鹰》是献给普拉斯的。休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生日信札》，汇集了他几十年来默默为普拉斯生日所写的八十八

首诗作。十月二十七日是普拉斯的生日，在最后一次度过亡妻生日后的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休斯死于癌症治疗期间的心脏病。这是彼此折磨一生的感情生活，这是纠缠到最后的怀念。休斯与普拉斯初见时，凶狠的吻与血痕已注定这场狂暴的传奇。第一本和最后一本都是献给她的……命运，像条咬噬尾巴而毒死自己的环蛇。

无论情爱或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美如烟花的幻觉……我们唯有靠灰烬证明它曾经存在。

5

“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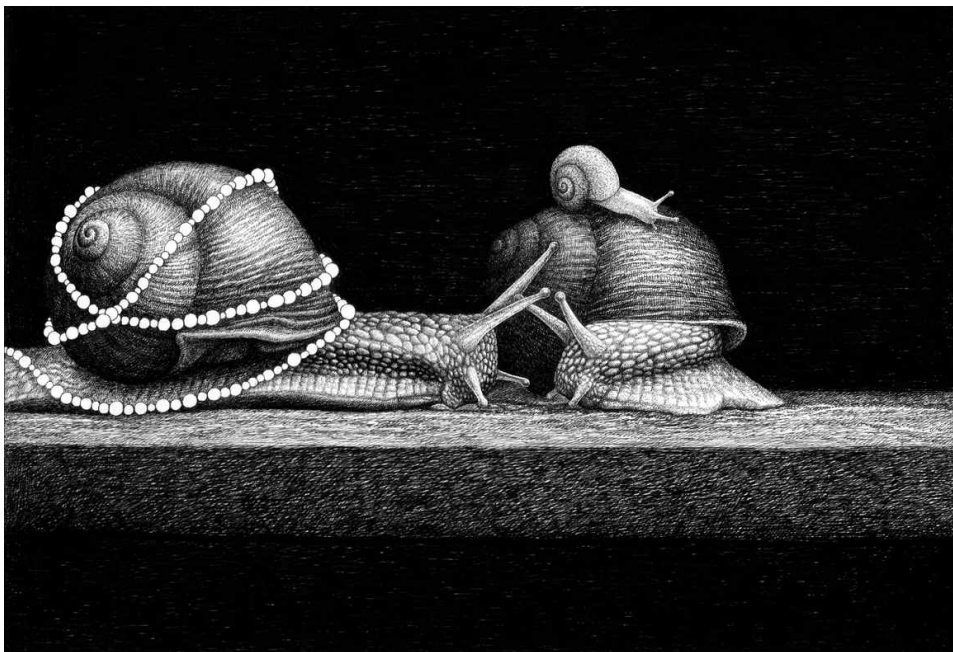
——弗兰纳里·奥康纳

许多女作家的写作焦点，终身围绕在解决与配偶或与母亲的关系上。无论是从事文学研究，还是出于读者的八卦心态，我都愿意挖掘作家的情感线索，以期了解作品的成因。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一个我极度偏爱的作家，但从有限的资料里我找不到有关于此的任何信息，是否是因为她的疾病与早逝？与普拉斯一样，奥康纳也是童年丧父，也是英年早逝，并同样是死后赢得重要的奖项。但奥康纳从未受到婚姻的束缚，也没有体验过恋爱带来的剧烈冲击和强力撕扯，我们在她身上找不出爱情的勒痕。

奥康纳的父亲很早死于红斑狼疮，她备受父爱呵护的童年也随之结束。作为独生女，奥康纳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二十五岁时同样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她当时靠输血度过危机，后经注射当时尚在实验阶段的激素得以控制病情。大剂量使用的激素使奥康纳骨质疏松，她的髌骨不能支撑体重，她起初借助手杖，等到三十岁时不得不依靠铝制拐杖才能行走。疾病缠身，奥康纳的骨头和关节疼痛，脱发严重，坏死的牙床进食困难……直到三十九岁，她同样死于红斑狼疮。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奥康纳和母亲以及三位姨妈住在农庄。奥康纳痴迷鸟类，养殖鸡、鸭子、鹌鹑、天鹅和孔雀。有张照片就是她架拐站立，欣赏她养在庄园里的孔雀……相比之下，孔雀有着更为强健的腿力，它们可以支撑收束其后的华丽而嚣张的尾屏，并在簌簌作响中轰然开屏。据说奥康纳五岁时，教会了她所喜爱的矮种鸡倒退行走，曾被百代电影拍成滑稽短片放映。黑白胶片里，五岁的奥康纳一晃而过，形象是像童星秀兰·邓波儿那样的洋娃娃；七岁时奥康纳的照片，显露出近乎男孩的英气和超乎年龄的严肃；及至青年，奥康纳变成一个标准文员的模样，像个公司里平凡的打字秘书；再后来，奥康纳戴着眼镜，包着头巾，脸上那种古怪而早衰的成熟，使她跟老年杜拉斯的类型相似，仿佛潜藏着随着岁月推移就会逐渐

显现的丑陋。也许这是多年患病导致的摧毁……所谓疾病，就是一种日常化的身体暴力。



无论情爱或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美如烟花的幻觉……

然而，奥康纳并不自怨自艾，她乐观幽默，惯于自嘲，顽强到堪称强悍。奥康纳有过的唯一一次出国之旅，是前往欧洲的卢尔德。这座小城是天主教的朝圣之地，据说那里的泉水能治愈疾病，尤其是瘫痪，所以每年汇聚慕名而来的残疾旅客。奥康纳在一篇描写此次疗养之旅的文章中写道：“在那儿，我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祈祷，而不是为我的骨头，我没那么关心自己的骨头。”她认为，“除写作外我不需要做任何事，为此我可以藐视我的病，视它为一种福分。”如影随形的疾患，以及死亡那响尾蛇发动攻击的倒计时预警，让奥康纳的写作变得非比寻常，具有惊世骇俗的震撼力。

她这么总结：“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病痛和成功。其中之一单独并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不错，这或许是由病痛参与才达至的成功。然而，“病痛”这个词写起来有点抽象，“成功”这个词用得有些潦草。作为一个被死亡威胁的患病作家，奥康纳目标清晰，全力以赴，有着超人的自律和勇敢。她每天坚持打字，即使是过世那年的春天，在医院刚

刚输完血，她也要继续动笔——写作是唯一来得及的道路。

我曾设想，奥康纳之所以缺乏情感纠葛，是因为患病的她一直在维修和维护自己，无暇他顾，没有处理爱情的余力。后来，我读她的《善良的乡下人》，极为精湛，让我瞠目结舌的同时，又似有所悟。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赫尔珈三十二岁了，她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遗憾的是装有一条假腿。当遇到上门前来推销《圣经》的腼腆青年，享有智力优越感的赫尔珈在其引诱下有些春心萌动。但她自以为是了，这个伪装的“善良的乡下人”是个十足的恶棍。赴约而来的赫尔珈被诱导着，穿过大道、牧草地、森林和山坡，进入贮藏多余干草的老谷仓，并且爬上梯子，来到阴凉、黑暗而生锈的仓顶……最终被丢弃在那里。那个看似恭敬、纯朴而痴情的推销员早已提前走了，离开的时候，他得意而幸灾乐祸，因为此前他摘下了赫尔珈的眼镜，赢得了她的吻，他的提包里还携带着一件最为重要的战利品：那条从赫尔珈身上取下来的假腿。

奥康纳的人物，总是有着非常突出的“生理特征”——身体或心理的畸形感。她在《小说家和他的国家》中这样表达过：“一个生动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僵死的正常人却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我们很难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作者的个人轨迹和自我意识。但《善良的乡下人》里的角色赫尔珈，有条行动不便的假腿，奥康纳似乎借此主动对拄拐的自己进行反讽。奥康纳是否毫不在乎自己的某种残疾，才无动于衷地将之用作小说素材？抑或，那个心酸而残酷的结尾，其实是对自我的预警、告诫、恐吓和惩罚？……爱情，是不是一条彻底被她自我否决的道路？

作为相貌平平的未婚姑娘，奥康纳的才华和性格依然不乏爱慕者。她对待感情非常冷静，她的热情似乎在别处。一位老师曾做证，奥康纳没过多久就能成为圈子里的明星，但她“用她的讽刺吓倒了男孩子们”。相对于许多女作家跌宕起伏的戏剧化人生，奥康纳的情感经历相对空白。如果勉强寻找，有个似是而非的短促瞬间，在《善良的乡下人》里留下线索。

一个名叫埃里克的丹麦人，曾经在一九五三年的某天路过奥康纳和她妈妈的农场，结识了她们母女。埃里克推销的并非小说里的《圣经》，而是大学教科书。据奥康纳的传记作者说，两人之间“至少带有一点浪漫的痕迹”。这点介乎友人与恋人之间的亲近，让奥康纳和埃里克之间有了一次尴尬到败兴的接吻。事后埃里克这样回忆：“当我们接吻时，我觉得她的嘴几乎完全松弛，这使我的嘴唇没有挨到她的嘴唇，而是碰到了她的牙齿，像是在吻一个死人。”小说中的骗子拿走了姑娘的假腿，从此杳无音信；真实生活中的丹麦人返回国内，奥康纳还保持着与他的通信，并且在男方已婚，满怀“最美好的祝愿、情感和祈祷”期待着：“我们很开心你计划返回南方，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的妻子在这里有家的感觉。把我

们当作你的自己人，因为我们便是这样想你的。”奥康纳善意的书信，与埃里克像是吻到一块石碑或者骨头般无情的话，形成一种尖锐的对比。

他们之间，只有浅尝辄止的吻。也许，奥康纳只有在写作里拥有非凡的天赋，在爱情领域笨拙无比；也许，奥康纳太过孤寂，她会陷入一时的软弱与妥协，但在陌生的情感领域又有所犹豫；也许，受损的健康使她根本无暇他顾，在爱情面前止步是她出于理智的退让；也许，奥康纳根本志不在此，她并不能从情不自禁中得到快乐，吻触不过是游戏性质的一时体验；也许奥康纳对丹麦青年并无缱绻深情，她的僵硬只是某种礼貌的拒绝；也许，奥康纳总是用诙谐甚至嘲讽的口吻来谈论自己的痛苦处境，亲密接触的刹那，她的心神已经游离出去旁观。总之，人们可以把男方的一面之词当作辛酸的证词，也可以当作滑稽的笑柄，来说明奥康纳的笨拙、怪诞、疏冷或纯真无邪……当认识的人回忆起奥康纳，说她“在某些方面，确实天真得不可理解”。

就是这样的弗兰纳里·奥康纳，生活在农庄微型的母系社会里，生活在一群禽鸟之间，难以自如远行，连像样的恋爱经历都没有，她却写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奥康纳想象力超群、才华横溢，有着别具慧眼的洞察力。她的描写像斧子一样，前端的斧刃足够薄，后面的斧头足够沉，结合了精度和重量，无往不至。奥康纳的文笔离奇、阴暗、陌生、冷酷、凶狠、暴戾，同时极其幽默、生动、神秘和美妙。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奥康纳：“她的作品比十几部诗集有更多的真正的诗意。”因为“充满了野蛮、同情、闹剧、艺术和真理”，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这样评论奥康纳：“我发现很难想象一个更有趣或更可怕的作家。”

我第一次读奥康纳的作品时，就像真的挨了一记闷棍。暴力和不幸事件在她的小说里出现得如此频繁：枪杀、溺水、大火、猝死、抢劫、车祸，层出不穷。《好人难寻》收录十篇小说，全书死了十人，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奥康纳真是狠啊，写得那么结实。她在平静叙述中隐藏凶险，让人毫无提防就发生陡峭的翻转——此前读者和戏中人物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多么临近悬崖。漫不经心，循序渐进，手起刀落，杀人如麻，超然物外。天啊，弗兰纳里·奥康纳，她根本就是一个无法被学习的作家。

有人对阅读奥康纳感到不适，不知所措。让人最为震惊的，是奥康纳出生并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虔诚，似乎没经历过信仰危机。她过着修士的规律生活，总是前往教堂祷告，床头永远放着《圣经》。她在生活中，竟然成了恭顺听话的乖乖女，她曾致信神父，请求准许她阅读作品被列为禁书的纪德。奥康纳连想读一本禁书都要请示，既然如此，她怎敢写得百无禁忌、居心叵测、近乎邪恶？

她的小说在早期遭受过宗教媒体的批评，指责她的作品是“对《圣经》的

粗暴否定”。奥康纳的认知恰恰相反——“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更能胜任艺术家”，“我阅读很多神学作品，因为这让我更大胆地写作”。她是笃信者，并且拥有不可思议的爱、勇敢和自由。她的作品，反思的主题是爱与罪，是天启与救赎。至于那些夸张而惊悚的写法，奥康纳解释：“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为此她坚持：“有些时代是能够向读者求爱的，有些时代却需要更为激烈的东西。”

种种矛盾之处，都是围绕在奥康纳身上的谜语。再次回到《善良的乡下人》和那个丹麦青年的呼应关系上，回到读者始终迷惑的问题上。奥康纳到底置身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丹麦青年埃里克对那个吻的刻薄描述，无异于羞辱和伤害，就像抱走了赫尔珈那条木质的假腿，是否智慧的奥康纳早已做出先验的判断？是否奥康纳根本就处于“无性的世界”，一吻只是验证了她的麻木和抵触，她没有半点世俗的情欲，唯有对上帝的满腔奉献？还是说，情感受挫的她，利用小说完成了对男主和自己同样恶意满盈的报复，因为文字和宗教的力量足够她释放所有的敌意，从而在现实中变得豁达宽广？抑或，奥康纳太纯真了，因精神的纯真才能在文字里享有作恶的果断，就像只有清澈的水滴才能倒映万物，只有无邪的孩子才能犯下不被道德困扰的罪行？

我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散文和书信集时，得到某种解读，和我的猜测有所呼应。作家可以在小说中隐匿自己的身影，在散文里却难以擦除指纹，其态度、倾向和立场会得到直接的呈现。奥康纳令人战栗，她可以轻描淡写地完成掷地有声。

她说：“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

她说：“罪恶并不纯然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要忍受的神秘。”

她说：“我不知道同情是爱的开始，还是爱的腐败；也不知道爱完美的事物更难，还是爱衰弱的东西更难。”

在我看来，奥康纳只用这样一句话，就完美诠释了在虔诚教徒和邪恶作家之间存在的所谓矛盾。她说：“你只能凭借光来看见黑暗的东西……而且，你借以看见的光可能完全在作品自身之外。”

这个没有活到四十岁的天才令我迷恋，她是如此磊落与出色，无畏非议，毫不犹豫。因为虔诚，她才看似邪恶，因为残忍背后是至深的怜悯。正因为她在生活里是严肃而执拗的，才会在文字里释放那么强烈的反讽与幽默。这是一种对峙，也是一种平衡，她的作品因此充满张力与强度。

什么是美？从黑暗里镂出来的光。这是她躲避黑暗的方式——深入其中并持久闪耀。由此证明，黑暗并非不可击穿，我们就是它的溃口，就是能够隐藏其中并透出的光线。

6

“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茨维塔耶娃

如果说奥康纳的写作不需要爱情，茨维塔耶娃则相反，她需要无时无刻不在的爱情——就像需要水和空气，否则活不下去。她写道：“命运的经卷/对一个女人毫无吸引力/对她来说/爱的艺术是世上的一切/心，对所有的春药/最衷情/一个女人天生就是一种/致命的罪孽。”

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人关系，是著名的诗坛佳话。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里尔克，介绍茨维塔耶娃，并请求里尔克把诗集寄给茨维塔耶娃。其时，里尔克在瑞士，帕斯捷尔纳克在俄国，茨维塔耶娃正流亡法国，在巴黎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相互通信，那是至深的渴望，那是源自内心的交响乐——像恒星发射着强劲的电波，尽管相隔遥远的距离，他们的情感、才华和见解彼此照耀，像光束穿透宇宙之间黑暗的光年。

不过，这段佳话在传诵中被渲染与赞颂，在许多文学爱好者眼里，已提纯为一场伟大到失真的传奇，诸多历史细节不被追究，乃至被蓄意忽略。我们知道，一九二六年十月，患有白血病的里尔克采摘玫瑰时刺破了手指，引发急性败血症，死于他无数次书写的玫瑰。可早在死去之前，里尔克就停止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了。茨维塔耶娃的激情易燃，表达直露，诚挚而莽撞，猛烈而无所顾忌。她的爱储备着巨大的能量，甚至只需要对方几克感情的酵母，她就可以在自恋般的爱意与想象中陶醉到疯狂。面对“我爱你，我想跟你上床，就这么简单，这是友情难以企及的简单……”这样无所顾忌的告白，以及茨维塔耶娃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的要求，让里尔克心生畏惧。尽管里尔克的情史丰富，尽管只是书信里的炽烈，尽管里尔克与克拉拉、莎乐美、侯爵夫人等有更多、更亲密、更深入的书信来往，但茨维塔耶娃进攻性的大胆奔放，还是让病中的里尔克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不安，并迅速以礼貌的方式退场。这是纸上的拥吻，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通信时间不过数月，其实他们终生没有见面。

而流亡海外的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在通信期间一共见过两面——尽管有过多次见面之约。一九三五年帕斯捷尔纳克赴巴黎开会时，终于再次与茨维塔耶娃相遇，他们泛泛交流之后匆匆分开。通信里的情投意合并未

换来现实的热烈，曾经的默契变为意外的尴尬。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通信长达十三年，尽管她假想帕斯捷尔纳克是未来的丈夫，并想和他生个儿子，但这些都是假设，似乎超越世俗的爱意根本无法逾越俗世的门槛。

虽然与帕斯捷尔纳克是柏拉图式的恋情，但茨维塔耶娃并不排斥肉体的欢愉。她贪图情欲的享乐，这不仅安慰她的孤独，也激发创作的灵感。正因她自己是个带电体，才能频频遭受爱情的电击。茨维塔耶娃一生爱过很多人，她与曼德尔施塔姆有过短暂的爱情关系，也爱过丈夫的亲兄弟，以及同性的帕尔诺克。如此孜孜不倦、迫不及待，她的灵魂有一种剧烈的饥渴——不停歇、不满足，她永远像个感情中的饿婴。即使痛苦和受挫，她也能像雌壁虎一样，有着惊人的爱的再生能力。茨维塔耶娃如此浓烈地渴望爱情，如此频繁地需要肉体与灵魂的结盟，又这样能量汹涌、缺乏克制、不计后果……人们容易把疑惑的目光，转向她的丈夫埃弗隆。

事实上，茨维塔耶娃基本上以失败告终的情爱，并非在向婚姻复仇，但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都与丈夫埃弗隆相关。他们在彼此的纠缠与折磨中不离不弃，算得上同生共死。

一九一一年，茨维塔耶娃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埃弗隆相遇，他俩的生日是同一天。次年，两人结婚。茨维塔耶娃将他们的结合视为上天的神迹，并说：“我和埃弗隆真心相爱，此生永不分离。”虽然婚后受过种种挫折，但埃弗隆因参战而失踪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四处写信寻夫。埃弗隆的政治立场有过过度变化——那不像是主动的选择，更像被动而软弱的摇摆，甚至有资料说埃弗隆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曾经参与过对叛逃者的追杀。但茨维塔耶娃就像给埃弗隆的信中所写：“你只要还活着，我就会像条狗一样地追随你。”一九二二年，茨维塔耶娃投奔流亡到德国的丈夫，后又辗转布拉格和巴黎，最后回到俄国。埃弗隆也说过，他和茨维塔耶娃谁离开谁都不能活。一语成谶。一九四一年埃弗隆被捕并遭枪决，同年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

埃弗隆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给远在俄国的老友瓦洛申写了一封信，这是对研究茨维塔耶娃的创作非常重要的材料。他的确太了解她了！“茨是极易动情的人，比先前我离开时还要变本加厉。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成为她的绝对需要、她生活的空气。由谁煽起感情风暴此时并不重要。几乎永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先前）建筑在自我欺骗上。情人一经虚构出，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如果煽起感情风暴的那人是微不足道的、目光短浅的，很快便会现出原形，茨便又陷入绝望的风暴。直到新的煽动者出现才有所减弱……今天绝望，明天狂喜、陷入爱情、献出整个身心，过一天重新绝望。而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刚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被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

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无用的灰烬抛掉，而木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木柴坏，烧得快，木柴好，烧得慢。不用说，我早已点不着火炉了……她回家了，可心里老想着别人。人不在跟前反而能使她感情升温。我知道她确信自己失去幸福。当然只到不久就将出现的下一个情人之前。现在一心写献给他的诗。对我视若路人。不让碰她，老发脾气，几乎到了恨我的地步。我既是她的救生圈又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生活快把我折磨死了。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比一天更糟……”一个月后，埃弗隆继续写道：“最近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即将返回俄国，也许因为受伤的野兽往往爬回自己的洞穴。”埃弗隆是个绅士，擅长隐忍，但茨维塔耶娃追求自己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他难堪到无法承受。一九二五年，茨维塔耶娃生下儿子格奥尔基，这个孩子正是茨维塔耶娃和丈夫的好友罗泽维奇的结晶。

她是那样一个女人：多情、主动、直接、感性、彻骨、咄咄逼人……她的内心像个总在发情期的母兽，感情骤燃，充满蛮力。很多人的感情储量恒定，舀去一勺就减少一勺；而她有个魔碗，即使被掠走一半，剩下的马上疯长回碗沿。无论有多少次经历，也不能累积为经验，她永远是幼稚的、急迫的、糊里糊涂的、掌握不好火候的、迷失而狂热的。远距离的关系似乎更适合她，她与许多人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接触，就已结成精神上的同盟。她为生死未卜的丈夫写诗，为遥远之处的某个人写信……触不可及，正好让现实不构成干扰，她的想象强大到足以制造一个比现实更结实的建筑。她的热情，几乎等不及对方的回复，就已完成对感情的自我美化与肯定；假设对方的回应挫伤了她的自尊，她可以另换人选，以重新开始这样的程序和循环。茨维塔耶娃并不长久忠诚于某个具体的爱人，她忠诚于爱情本身。

之所以如此，有性格或命运的各种潜因，我想，至少并存数种可能。

因为她孤独。无论无心还是蓄意，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的诗歌阵营，与流亡的侨胞圈子，都保持疏离，不那么合群。但是写作需要读者的回声，就如她在给帕斯捷尔纳克信中所写：“我写作的时候，除了作品什么也不想；写完以后——想念你；发表以后——想所有的人。”每每写完作品，她需要得到立即的反馈。她喜欢朗诵，只要有人请求，甚至不等请求，她自己就主动表达：“想不想听我来给你们朗读诗歌？”茨维塔耶娃越是孤独，越是急于找到灵魂的相知。我想到一句卡夫卡的话，分外悲伤：“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为冷而烧成灰烬。”

还有，我们看到的疯狂，可能是她的慷慨，她在进攻里包含渴望奉献的一切。能量多得满溢出来，自称“可以同时爱十个男人”的茨维塔耶娃，在《我砍开我的血管》这首诗里，修辞凶猛。“我砍开我的血管：不可遏制/

不可回返的生命喷涌向前/快接住你的盘子和碗/很快，每只碗将会太小/每个盘子显得太浅。”茨维塔耶娃与曼德尔施塔姆在国内战争期间，有过短暂的爱情关系。后来，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这位文学史上的伟大遗孀——靠记忆使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得以存世，她说：“与茨维塔耶娃的友情关系，在我看来，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认为，正是因为遇到“光彩夺目的、野性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才发生了重要的调整，并且“她在他身上打开了生命的爱，和一种能力——一种发自本能的和无羁的爱能力”。根据她的看法，“茨维塔耶娃拥有一种灵魂的慷慨，不自私，从不要求相等的给予。它直接地出自她的任性和激情，而这些，同样不要求相等的回应”。茨维塔耶娃的女儿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她为人慷慨，乐于帮助他人，最后的急需物品也能和人分享，她没有多余的东西。”种种资料表明，茨维塔耶娃愿意在各种情感关系上和人际交往中展现个人魅力，并且渴望奉献自己的身体、才华与激情。我想，她是特殊材质的女人，具有惊人的感情储量和爆发力，她强悍到，能够经得起连续的给予与摧毁。

也许最重要的，是写作。我需要再次引述埃弗隆的信，注意这段：“一切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昨天的煽动者今天刚遭到机智的、恶毒的嘲笑，并通通被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心平气和地、精确地化为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着它需要木柴、木柴、木柴。”茨维塔耶娃迎接爱情的动荡，也能平息爱情带来的损耗——只要它们转化为写作的燃料。受到限制的时候，爱情就是她的自由；在悲惨落魄的时候，爱情更是她的享受……无论任何时候，爱情都是对平庸现实的反抗，就像诗歌一样。不过爱情确实是俗世的情感宗教，当你成为信众，你将迷狂、高烧，失去自我免疫，将在其中每日祈祷，如果不是祈祷幸福，就是祈祷死——就像诗歌一样。每当茨维塔耶娃疯狂追求爱情，她总是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生下“儿子”。她多次表达渴望，无论是与罗泽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或巴赫拉赫，她总想和他们生“儿子”。难以分辨，“儿子”到底是孩子还是诗歌，她表达的，到底是她作为女人的生育渴望，还是作为诗人的创作激情。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极具艺术直觉，她的写作也需要调动生理性的本能，才能达至高潮。感情中的混沌和盲目，对她的创作来说反而是一种理性和自觉。她无须挑剔，无论是艺术上的大师，还是平庸甚至是想象中的情人，只要能激发她的创作火焰——烈火吞噬一切，木柴、纸团或尸体。无论是爱情的催生还是毁灭，都使她的才华得以在其中成倍增长，就像海浪遇到鼓动的暴风或阻碍的悬崖。何况，爱情已是茨维塔耶娃的自限性疾病，她承受忐忑、迷醉与狂喜，也承受挣扎、高烧、谵妄与种种撕裂之痛，之后总会自愈的，并且留下诗歌的结晶。她就像去苦涩的海水中取盐，那些诗句，有盐度和硬度，还有闪耀如钻石的光度。所以，她根本不需要从所谓的糊涂与挫折里吸取什么教训，恰恰相反，她从中获益。她愿意忍耐身体的不良反应，将之视为对艺术的自救。她从来都是愿意为诗歌

燃烧的，她早已将之视为命运，并接受坦然的牺牲。所有的爱情都来吧，因为她需要引燃自己，让文字的火焰升腾。她认为，文学是靠着激情，靠着偏爱，靠着极端和纯粹来推动的。对于想要表达的，她一直要说到允许表达的终点。她有凶狠的柔情，她的肉体、灵魂和才华都是一体的，她的语言、个性和命运都是极端的。

茨维塔耶娃的父母都是艺术家，她一生充满了挫折、打击、变故与死亡。历史上许多耀眼的天才死于被毁的命运，原因有个人的，有社会的。与一切都不协调的茨维塔耶娃可以说参与完成了自己的悲剧，但最大的力量，来自时代压迫下的厄运。她的丈夫失踪、流亡，而后被枪决，她的孩子被流放、被饿死，她不断忍受着贫困、饥饿、流亡与诀别，甚至作品也不被允许发表，她不得不靠帮厨或打扫卫生之类的粗活来糊口。一九四一年，没有任何生计来源的茨维塔耶娃向作协恳求一个洗碗工的岗位，被拒之后，她自缢而亡。她的遗言极其简短，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意义的修辞，只是告诉自己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因被捕而生死未卜的丈夫和女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她都在爱着他们。茨维塔耶娃对死亡的唯一忧虑，只是请求人们“不要活埋我，检查仔细点”。这是那个写下“我不会背叛我灵魂的鸽子，以它来取悦蛇的下颌”的孤傲灵魂，最后乞求一点落实在她遗体上的关怀。茨维塔耶娃随后被埋在一个无名墓中，没有谁参加葬礼，甚至她儿子也没去。她终生渴望爱的获得与给予，离去时无一亲人。这样一个饱满、生猛、孤傲的灵魂，像牲口一样被套住脖颈，悬于一线，最后死于窒息和绝望。女儿曾回忆茨维塔耶娃：“她不太害怕炎热，却特别害怕寒冷。”她是烧灼的，不惜以自己为燃料……直到，火死灰寒；她是汁液充盈的，空气中全是她慷慨的香气……直到，像烂掉的果实从梗柄处折断。

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几乎成为她一生的注解。“脚踝上的脚镯多么残酷/骨髓渗进了铁锈！/生活：刀尖，爱人在上面/跳舞——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她的悲剧命运和天才能量都太强了……耀眼到刺目。隔着时间和语言翻译，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孤绝的光芒，那种丰沛的激情和超载的力量。她的文字灼烫，燃烧的同时又有凛冽寒意，火焰之中有灰烬。任性到痛彻，热烈到绝望，强悍到极端……茨维塔耶娃表达奇诡，叛逆而具颠覆感。即使她不惜肝肠寸断般地自毁，也具有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她的作品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觉得必须是“茨维塔耶娃”，而不是“茨薇塔耶娃”，否则就无以表达那种合金般的质地。

我最喜欢的茨维塔耶娃作品，是她的回忆录。恰巧，我偏爱的几本回忆录都与俄国相关，比如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比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二〇〇三年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茨维塔耶娃文集，其中的回忆录是她对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自己早年经历的回

顾——纪念碑式的写作，令我深受震撼。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母亲、普希金，还是幻觉中的鬼，她都写得如此传神——“传神”在此处作双关解：一是传达出传主的神韵，二是透露出神明的参与。她的风格铿锵而奇诡，只能相信，神使她的句子在腕力下运行。其实对于遣词造句，她既是天才，又有手艺人的极度精心。她给丈夫的一首诗，第二节曾有四十余种不同手稿。她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大量构思和修改方案，反复筛选和推敲。

我曾想过，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读者需要甄选译本，因为她的文字里蕴含着狂野的自由和天赋的教养，天才能掌控那种剂量之间的平衡，假设译者不具备舌头上的精确味蕾和笔头上的精确火候，就难以微妙传达，或因粗糙失去其中韵味，或因规矩失去其中活力。不过，茨维塔耶娃太强悍了，强大到经得起误读和错译。是什么炼就如此文字的材质？是轻而易举的爱情，是亡灵喃喃不息的耳语，还是苦役般对词语千万次的锻打？她真是拿命来写的人啊。没有工具，她用手指凿挖现实的硬砂岩。我觉得，这双作家的手，即使指头流血、甲缝藏泥，也是一双世界上最干净的手。正如她在日记里写的：“我可以吃，以一双脏手/可以睡，以一双脏手/但是以脏手来写作，我不能……还在苏联时，当缺水的时候，我就舔干净我的手。”

7

“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

——苏珊·桑塔格

获得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获奖演说上，提到三位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致敬他所崇仰的诗人们说：“在最好的时辰，我觉得自己仿佛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这位饱受肉体苦役和精神折磨并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流亡者，在自己的书房，在写作的打字机前，摆放着茨维塔耶娃的肖像——布罗茨基毫不犹豫地宣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同胞们都同意，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继承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人。”这是苏珊·桑塔格对布罗茨基的评价，她还指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地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

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对于苏珊·桑塔格来说，这篇评论写得一般，远远不及她其他篇目那样炫目。但每当我发现自己偏爱的作家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情感联系，就有种近乎安慰的喜悦。比如读西格丽德·努涅斯——她曾是桑塔格的秘书，桑塔格儿子的女朋友，她在《永远的苏珊》一书中追述与桑塔格母子共度的时光，我在中译本的第十九页找到一句迷人的信息：“苏珊开始和约瑟夫·布罗茨基幽会。”当然，相比桑塔格一生中其他更为紧密或长久的关系，这段情感的知名度似乎不高。桑塔格曾坦言经历过九段恋情——五位女性和四位男性。不过她说：“我的肉体生活相比我的精神生活不值一提，不过是些陈词滥调。”

苏珊·桑塔格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被誉为“公众良心”的苏珊·桑塔格，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真正的偶像，使知识分子同时具有明星的魅力和学者的尊严。

我第一次看到苏珊·桑塔格的照片，就被她的样子迷住了——似乎简单说“喜欢”，已经是对她的某种不敬。苏珊·桑塔格的容貌非常风格化，是那种严肃而知性的好看，正好匹配她令人倾倒的智慧。照片中的苏珊·桑塔格兼具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妩媚，她的眼神坚毅、犀利而桀骜。年轻的时候，她令人怦然心动又肃然起敬；即使老了，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我行我素，老得那么威风凛凛。苏珊·桑塔格发量浓密，粗硬的发丝之间，像是蕴藏彼此不妥协的静电；中年时她的标志性头发，是满头黑发中一缕标志性的白发，像道永不熄灭的闪电；只是到了晚年，她是短发，并且像钨丝那样银耀光芒，像层菌丝那样柔软服帖……无论什么阶段，苏珊·桑塔格始终气势如虹，仿佛晚年的她依然有能力分娩一个关于未来的有力的婴儿。她的照片，就像是她灵魂的样子。

苏珊·桑塔格的照片多为著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的作品。安妮·莱博维茨的镜头里囊括了无数名流，是“能劝说任何人脱掉衣服的摄影师”。我们都见过她的作品，比如那张裸体的约翰·列侬侧抱着黑衣黑发的小野洋子躺在地板上的照片——照片拍摄几小时之后，约翰·列侬就被自己的疯狂粉丝枪杀了。一个是意见领袖，一个是艺术大家，苏珊·桑塔格与安妮·莱博维茨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当时三十九岁的莱博维茨为五十五岁的桑塔格拍摄随笔集的封面，此后她们搬进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成为情感和生活的伴侣。

同性取向曾是讳莫如深的话题，现在早非禁忌。在我最喜欢的女作家中，同性恋或双性恋不少，比如伊丽莎·毕肖普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关于这个问题，我出于好奇，向一个并不避讳双性恋身份的朋友求证：“仅就性爱体验而言，你的倾向是什么？是男性还是女性带给你更多的享

受？”他诧异地望着我：“这种事怎么能按男女来区分呢？我面对的是独特而具体的个人，要看感情，而不是性别分类。”他的回答，改变和丰富了我的认知，令我吃惊、震动，甚至有点儿羞愧。我们选择爱侣或配偶，往往看容貌、看能力、看地位，这些难免包含着条件的选择，是现实，也是或多或少的势利。性别取向既有天然，也有后期教化的成分，我们一直带着社会和生理的枷锁。我从来没有以朋友的角度去设想过，他所选择的，他所渴望亲近的，不是抽象的“他”或“她”，而是血肉包裹下有质感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人”。那么，我所热爱的那些雌雄同体的灵魂，她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听从内心的呼唤，不会驯服于简单的分类原则；她们的想象力自由而野性，她们的爱没有界限；每个爱人都是独立的他或她，性别并不构成选择障碍，她们并没有男女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包括肉体享受也是如此。在她们看来，某些所谓的道德只是一种被暂时视为典范的习惯，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大于一切。

安妮·莱博维茨不仅拍摄了苏珊·桑塔格那些摄人心魄的肖像照片，还陪在患病的苏珊·桑塔格旁边，记录了她被疾病折磨的过程——记录她的抗争，记录对她的抢救，也记录她的死。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五十二岁的莱博维茨生下一个女孩，陪着她分娩的是苏珊·桑塔格。二〇〇四年，苏珊·桑塔格与莱博维茨的父亲塞缪尔相继去世后，摄影师又有了一对同样没人知道父亲是谁的双胞胎女儿：一个叫塞缪尔，一个叫苏珊。

一九七五年，苏珊·桑塔格在四十二岁的时候被发现乳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危及生命。苏珊·桑塔格曾在访谈中说：“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生过病，总以为自己的身体即便承受无限的惩罚也能够恢复。”刚开始她吓坏了，之后的反击激进而暴烈。为了彻底清除癌细胞，她选择不惜损毁形象的根治性切除术：双乳全切，包括胸壁的大部分肌肉和腋窝的淋巴结，同时选择带有极端性的化疗方案和免疫处方。尽管极端痛苦，并且医生允许耐受不了的时候暂停，但她从来义无反顾。顽强反抗，使她死里逃生。这强化了苏珊·桑塔格的主观意志——只要她足够强悍，就可以否决死神的决定。一九八八年被诊断出子宫癌，她继续寻找侵略性的疗法，并坚信自己还是会化险为夷、战胜概率。她绝口不提可能的死亡，她的儿子戴维·里夫后来把这种态度形容为“积极的拒绝”。不仅如此，苏珊·桑塔格甚至充满活到一百岁的长寿渴望。即使化疗的副作用引发严重的神经性病变，过程十分煎熬，她甚至需要重新学习走路，但她依然态度凶狠地对抗命运，似乎死亡只是人生的选项之一，是可以被撤销的。然而，疾病对她纠缠不休，事实上在一九七五年、一九八八年、二〇〇四年，桑塔格分别被诊断出乳腺癌、子宫癌、白血病，但她从未屈服，她像受伤的猛兽那样奋力啄击死神，甚至将之视为可以吞下去的猎物。苏珊·桑塔格几乎出自本能地反抗权威，而死神是世间最大的权威，是终极的裁判，她到最后也没有被驯服。

在与疾病缠斗的三十年里，苏珊·桑塔格孜孜不倦，她说过：“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但我试着以四十八小时来对待它。”即使在化疗途中，她也勤于笔记，给《疾病的隐喻》积累素材，她将强烈的个人经验转化为深沉的智力思考。当骨髓移植手术与药物依次失去疗效，她躺在医院里继续工作，拒绝与亲友谈论自己的死亡，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桑塔格曾提到过，一个临终的作家如何口授秘书打字，并在打字机的噤啪声中过世。据说，君特·格拉斯在死前半个小时还在创作。对写作者来说，那或许是最好的结局——正如苏珊·桑塔格的所言所行。她说：“真正爱某种东西就是要希望死于这种东西，或者只活于其中，这是同一回事。”

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回忆母亲的临终情形：“她一死去，我就请房间内的其他人离开。我要真切地看一看。我不管不顾地脱去了她的上衣。她全身上下都是溃疡。她的身体，从嘴里到脚趾都是溃疡。痛苦必定十分强烈。她看上去不再疼痛了，这么说，真的死去，反倒轻松了。”疾病是落实于日常的酷刑，她的身体满目疮痍。对常人来说，死神或许有蒙娜丽莎那样吉凶莫测的微笑。苏珊·桑塔格近距离看到的死神是狰狞的暴君，她像个不朽战士那样终生对抗侵略。她并不陈述和描摹自己，置身苦难，使她深切认识到这个世界在隐喻之下埋藏的真相。疾病给患者带来有罪的幻觉，但苏珊·桑塔格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以坚定而清晰的理性，破除文化认知上的妖魔与鬼魅。她在患病之前已完成《反对阐释》，之后的摧残使她越挫越勇，写下《疾病的隐喻》《旁观他人的痛苦》等振聋发聩之作。被桑塔格描述为“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的加缪，这样表达：“疾病是一座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无论肉体怎样被毁灭，这些作品就是苏珊·桑塔格在废墟上的重建。当我们难以用肉眼判断物体的重量，只要看看秤盘上的刻度，就会了然于心。我们难以想象数十年疾病与治疗的双重折磨和苦难，但看看对称之下她的文字，我们敬畏其中的力量——天赋之上加诸敏感、疼痛和独立，它们所焕发的光彩是巨大的。

苏珊·桑塔格令人望风披靡的勇气，体现在多方面。不仅面对疾病，她带着报复般的仇恨力量反击；她在生活上也是坦荡而无畏。当十七岁的苏珊·桑塔格遇到二十八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十天后闪电结婚，并于十九岁生下了儿子戴维。桑塔格二十六岁时决定与丈夫离婚，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和菲利普的关系既没有通过隐私和孤独才能获得的自我提高，也没有伴随着激情而来的辉煌和英勇的自我失去。苏珊·桑塔格提出不要对方的任何赡养和资助，她独自抚养儿子戴维。此后，她只身携带“七十美元、两只皮箱以及七岁的儿子”来到纽约开始生活。无论面对疾病还是生活，苏珊·桑塔格勇往直前，但她最令人尊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承担的责任与行动。

勇气，这个词对桑塔格来说是如此具象，它简直有着自己的体积和体重！她无惧争议，在危险与关键的时刻，她挺身而出、孤往绝诣，做出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表达，哪怕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她在萨拉热窝内战前线，在枪弹和炮声中前往剧院，指挥当地演员排练《等待戈多》，以隐喻方式声援并表达对世界袖手旁观的嘲讽。伊拉克战争打响，她发表反战长文；美军虐囚事件曝光，她对事件以及美国社会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在印度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因小说《撒旦诗篇》遭到宗教追杀的时候，知识界一片沉默，因为有译者和出版商被伤害或暗杀，人们唯恐自己的发言会带来祸患——又是苏珊·桑塔格，她公开发表声明和演说，抗议对作家的迫害并号召公众加以抵制。她冷静而果断，代表才智和良知，始终保持思考的动力与实践的能力。她甚至自我否定，不是摇摆，而是源于专注、自省和颠覆。苏珊·桑塔格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演讲中说：“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表意见，而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与讹传的帮凶。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不同的要求、区域以及经验。”

她的声音有时会刺耳，那是因为刺破了我们在平静中的自我保护，刺痛了自我保护中放弃的良心，让我们在不安中重归自省，让我们愧于对社会生活缺乏责任和担当。苏珊·桑塔格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更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严苛的标准，也为评估重大事件提供了清晰的尺度，因此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擅长穿越现象，直击本质。她的表达充满张力，有真理般的语感。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

“美——以及对美的关心——是会带来限制的。”

“符合一个现代社群真正利益的，是公正。”

“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是一种诱惑，它源自我们的直接利益和各种问题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惧。”

“只有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才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就像逆鳞，一眼能被看到。苏珊·桑塔格的论述不仅精彩，还达到了评论很难达到的感性，甚至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性感——她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和方式，抵达了思想的极端性感。“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桑塔格曾这样评

论自己。她还把自己概括为：“我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道德家。”苏珊·桑塔格在描述一个遥远时代时的用语，我觉得也可以用来形容她自身：“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

苏珊·桑塔格是女权主义者吗？有人认为当然，这是不需要怀疑的；有人犹豫和迟疑，她好像不那么典型。还是那个曾做过桑塔格的秘书、做过她儿子女朋友的西格丽德·努涅斯，这样谈到她对桑塔格的印象：苏珊·桑塔格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且是一名觉得大多数女人都有欠缺的女权主义者。苏珊·桑塔格自己这样表述：“我当然承认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区别，不过区别不大。显然，我们文化中的一切都在使这种区别扩大化。根本的区别可能只在于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性器官。但是我不相信存在所谓女性的写作和男性的写作……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女人不能写男人写的东西，反之亦然。”“我对女性怀有强烈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到只把我的作品投给女权主义杂志的程度，因为我对西方文化怀有同样强烈的忠诚，尽管它深受性别歧视的损害和腐蚀，但它仍是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是女人，也必须与这个被腐蚀了的文化共存，然后努力对它做出必要的修正和改变。”“我不会去建立，也不会去废除一种女性文化、女性情感或女性情感的准则。我认为男性变得更阴柔、女性变得更阳刚都没有关系，那样的世界会更加迷人。”

“女性的解放不仅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女性还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力，”苏珊·桑塔格强调，“我的观点是要废除一切隔离，我在反性别隔离的意义上是个女权主义者……”的确，桑塔格并不仅仅关心女性，她也关心同性恋、病患、遭到宗教追杀而逃亡的作家、战争中被忽略的民族。如果说，女权主义在本质上是关注弱者和边缘人群，给予被忽略与被损害者以平等，那么它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女性。如果只关注一种性别属性，便与女权主义的本质诉求相悖，反而不那么女权主义了。

苏珊·桑塔格在评论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她的一个句子，就够我们在写作中跋涉一生。我简直是抱着一种教徒般的爱去爱她。尽管我几乎凭借本能地信赖她的文学品质和文学声誉，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读不进去她自己颇为看重的小说，无论是《恩主》还是《在美国》，都不喜欢。

8

“‘尊敬’这种纯金，如果不掺杂一定的恐惧成分，可能会太软。”

——尤瑟纳尔

与读苏珊·桑塔格的小说有相似的感受，我曾经也不喜欢玛格丽特·尤瑟纳

尔，但后来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一个了解我审美趣味的朋友对我说：“你肯定非常喜欢尤瑟纳尔。”我茫然。因为就像读苏珊·桑塔格的小说《恩主》和《在美国》，我第一次试读尤瑟纳尔的作品不解妙处。听他一说，我重新拿出来看，还是没感受到尤瑟纳尔的磁力和魅力，没觉得诱人啊，我没找到文字之间勾人的手指和能把我的囚禁其中的饵料。我不甘心，隔了半年多又翻出尤瑟纳尔文集——不是吸引而是排斥了。我一般能够感知文字的肌理和节奏，但我最初看尤瑟纳尔的文字——它们像硬质页岩，词与词之间颗粒感强烈，不水乳交融，却形成稳固的内部结构，我甚至觉得它们是拒绝读者融入的。我想朋友误判了我的审美，在奇迹般的瞬间到来之前，我曾三次把尤瑟纳尔束之高阁。

有一天，我翻找别的资料，尤瑟纳尔的书掉下来。不知道情境和心境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突然找到了阅读的语感。天啊，我以前怎么抗拒数次？！尤瑟纳尔的作品对初次阅读的读者来说，容易觉得其中包含着先天性的拒绝；必须找到密钥，必须找到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才能豁然开朗，得以进入那个大放异彩的世界。一旦重新发现尤瑟纳尔，我在一个时间段里贪婪地悉数阅读，我不放过每一个字……完全不是蘸取而是沉浸，我像濒临溺亡者那样，因无力抵抗而感到缺氧的虚幻。我愧于自己曾经的轻率，庆幸自己终于没有错过。最经典的文字，如同黑胶唱盘上的古典乐曲，首次倾听时你无法跟唱，可能还略嫌它沉闷，你在其中找不到朗朗上口的节拍和重复性的副歌……然后，有一天，你才发现自己的内心甚至根本不配盘旋那样的旋律，根本不配像唱诗班那样加入对神的唱颂。有的作家让你愉快，有的作家让你沉思，有的作家让你疼痛，而尤瑟纳尔……她让你在膜拜中恐惧。

如果说苏珊·桑塔格的智识反而影响了她的小说表现，尤瑟纳尔则无懈可击。她是我无法评价的作家。尤瑟纳尔就像巨鲸，根本无法盛进任何容器里；或者说，她就是深不见底的海洋本身。她的浪涌，她的旋涡，她的洋流，她的飓风，无论怎样的孕育与毁灭，都在她从容不迫的节奏里。有些女作家性别特征明显，写作焦点终身集中在解决与母亲或者配偶的关系；有些几乎完全消灭了自己，让人无法判断执笔者的性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别说能不能从文字里区分男女的问题，我读《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的时候，美与恐惧的双重压力令我浑身战栗，恍惚于这些是人写的还是神写的——尤瑟纳尔的头脑和胸襟有若神庙，令人敬畏。

“玛格丽特”在法语里是“雏菊”的意思。我们发现，法国文坛上的这两朵“雏菊”大相径庭。在中国的大众阅读领域，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名字比她的作品名气还大，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知名度，远远低于她不世出的才华。玛格丽特·杜拉斯容易让人惊喜和兴奋，但微醺很快消散；玛格丽特·

尤瑟纳尔，进入可能带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但这是一场宿醉，后劲大，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不能支配自己，你将深受其毒。其实，两朵“雏菊”都有天然的沧桑感，杜拉斯是一生下来就老了的早熟婴儿，尤瑟纳尔是永远不会死去的神。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她们甚至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因为你能看到禽鸟的翅膀，但你看不到幽灵是怎么飞的。

如果说到身世，两个玛格丽特倒有一点相像。杜拉斯的父亲在她七岁时去世，尤瑟纳尔的母亲在她出生不久后去世——她们不曾拥有父母双全的完整童年。不幸的童年，或者非常规意义的童年，常常是锻造一个作家的初始条件。普拉斯八岁那年父亲离世。苏珊·桑塔格五岁那年父亲离世。八个月的伊丽莎白·毕肖普还在襁褓中父亲就离世了，五岁时母亲被检查出患有精神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在她十三岁那年离世。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童年相对美满，父亲活到了她十六岁。总之，这些卓越的女作家在未成年之前，罩护她们的世界已天缺一角。作家在童年受过内心的罪，无论从伤口中分娩出的是敏感、脆弱还是独立、强悍，那都是她此后生涯中默默运行的东西。

生下尤瑟纳尔十天之后，她的母亲死于产褥热和腹膜炎。尤瑟纳尔从小受到父亲的加倍疼爱，她在法国度过生活优渥的童年，在数位女管家的呵护和家庭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年少的她博览群书。成年以后到了母亲的坟墓前，尤瑟纳尔并无波澜：“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她同样冷漠。她的坟差不多像一个陌生女人的坟一样，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人们只是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了那陌生女人的临终情形。”伟大的尤瑟纳尔只有娇宠她的父亲，我因此怀疑，她是否反而幸运地避开了母爱？母爱是盛大的暖意，也是日常的腐蚀，尤瑟纳尔避开可能影响她未来质地的软化剂，她才能以独特的情感发育，变成这样不循规蹈矩的世间罕有的合金型作家？

尤瑟纳尔对母亲的淡漠态度，让人隐约猜测她的“佛系”。尤瑟纳尔在美国一所学校教过近十年法语和意大利语基础课，师生们的印象似乎也支撑着这种想法。“她总是披着披风、围巾，裹着裙子，看上去就像一名修道士。她喜欢褐色、紫色和黑色之类的颜色，她很懂得协调色彩。她有着一一种令人兴奋的神秘气质。”“她行为怪异。她彬彬有礼，但是无人可影响她的决定。你瞧得见，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上完课赶紧走。她对学校生活不感兴趣，人们试图了解她，无人成功。形象上，她令人起敬。她永远笔直，永远穿长裙，永远端正，像个中世纪的女人。”“她对我们淡漠，从她讲课的样子，你能感觉到她要么是极度疲倦，要么就是不打算用心。身体笔直，而你能感到她智力上是松懈的。她讲的东西，她并不真的在思考。”“她像一个权威的男性，有一种自然而然就高高在上的方式。她像男人一样吸引我。我到现在都不能想象她烤面包或者拿吹风机吹头发的样子。我甚至猜她一天天用的都是中世纪的器具。我们都听说她跟一个女人

生活，但谁也不敢跟她提这个事。我想她肯定没有孩子，也从没想过做母亲。我记忆中的她仿佛是用岩石雕刻出来的；我甚至感觉她的脸像石头一般。她属于那种生活在时间以外的人，人们深信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

这个传言中的女人是存在的。沿着线索，就会发现，尤瑟纳尔私下的情感生活远非设想中的寡淡，而是相反。一九三七年，尤瑟纳尔曾前往伦敦拜见当时已成名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描摹她的特征，“红嘴唇，精力充沛”，还写道：“这个女人肯定是有过去的。我觉得她把自己交给了爱情和智慧。”这是女性的、作家的、惊人的、准确的直觉。

一九三四年，三十一岁的尤瑟纳尔已经漫游了整个欧洲。她是双性恋者，情欲燃烧，“性”趣广泛，受到酒精和肉体的强烈吸引。在这一年，尤瑟纳尔遇到了同龄的美国女人格雷斯·弗里克，这是她一生最为重要的人。格雷斯父母早逝，她由伯父抚养成人，获英语文学硕士。认识尤瑟纳尔后，格雷斯展开热烈追求，不断写信邀请尤瑟纳尔赴美。二战爆发后，尤瑟纳尔前往美国投奔格雷斯，从此两人开始数十年的共同生活。格雷斯倾尽所能、倾尽全力地陪伴、照顾和保护，把尤瑟纳尔只用法语完成的作品译成英文。无论尤瑟纳尔处于怎样的困境，格雷斯都因与之相守而心满意足。尤瑟纳尔深怀抱负，除了写作的荣耀，其他都是辅助光芒的道路；而格雷斯耗尽一生的光，只为照亮尤瑟纳尔写作的书桌。患乳腺癌的格雷斯受尽折磨，怀着一腔哀怨：“我没活够。我跟你活，哪里活得够。”格雷斯早于尤瑟纳尔九年离世。尤瑟纳尔不喜欢自己被写入传记，她在世的时候就已销毁了自己的部分资料。尤瑟纳尔的遗嘱规定，她与格雷斯之间的通信、日记等所有遗物，暂保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巴黎的出版社，在她死后五十年才能公开——也就是要等到二〇三七年，读者才能真正了解尤瑟纳尔与格雷斯的情感过往。

据说格雷斯去世之前，甚至完成了某种近似的移交，向尤瑟纳尔“推荐”了杰瑞·威尔森；或者说，尤瑟纳尔已经转向自己的未来——这位年轻的旅行伴侣杰瑞比她小四十七岁。七十七岁的尤瑟纳尔与三十岁出头的杰瑞一起旅行，彼此深深吸引，他们重新游历了尤瑟纳尔年轻时与格雷斯曾经去过的地方。尤瑟纳尔与杰瑞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她乐于显示这种亲密的关系，但也需要处理随后的麻烦。与尤瑟纳尔在一起期间，杰瑞认识了一个年轻男人并要求去印度旅行时与之同行，尤瑟纳尔同意了，却分明感到某种关系上的失落。杰瑞与尤瑟纳尔保持着复杂的情感交流和纠葛，直到因同性恋行为导致的艾滋病去世，死时未满三十七岁。杰瑞死了以后，尤瑟纳尔曾心灰意懒，感到自己老了。她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自己从前记下的一个想法：“我认为我终于成功地彻底摧毁了自身的贪欲。”她在空白处补充了一个备注：“一九八〇年。不。”——一九八〇年，那时她遇到杰瑞。然而，尤瑟纳尔就是尤瑟纳尔，她渐渐恢复体力，继续创作。

一九八六年，杰瑞死后，她抵达巴黎下榻丽兹酒店。不仅是因为舒适，也是为了寻找杰瑞的踪迹。她想重走一遍杰瑞的路，任何地方都不放过，她要看一切，从杰瑞住过的酒店房间，到杰瑞去世的医院病房，还有杰瑞的火化场。这是深情吗？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尤瑟纳尔的习惯。尤瑟纳尔不断旅行，这是年少的经历使然。风流的父亲居无定所，在漂泊的床上体验鱼水欢情；年幼的尤瑟纳尔跟着父亲四处辗转，过早地熟谙了欢场情事。尤瑟纳尔天然恣肆，她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喜欢旅行，沉湎情欲。从青年到晚年，尤瑟纳尔经常运载着行李和自己，完成地理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漫游——特别的是，她似乎尤其喜欢回忆意义的重复之旅。格雷厄姆死后，尤瑟纳尔重新游历年轻时她跟格雷厄姆去过的地方；杰瑞死后，尤瑟纳尔不惜走远路，去专门购买一种杰瑞和她都很喜欢的蜡烛，以至于花费的气力超过体能，导致她进入半昏迷状态；尤瑟纳尔甚至花很长时间，去找寻曾经带着小狗散步的街道。

这种故地重游——我怀疑，不仅出自念旧的习惯，更是出自写作的习惯。第一遍是偶遇，第二遍是重逢；第一遍是眼睛里的素材，第二遍是内心的段落；第一遍是勾勒，第二遍是校正……到了老年，她把一切走成了回忆，并等待从回忆里生发的力量。就像一只经过长途迁徙的鸟，回望有俯瞰的高度，平静中有千山万水。我这样猜测，是因为尤瑟纳尔对写作的态度格外郑重，她从未辜负她自身携带的使命。尤瑟纳尔早已深怀抱负，她挚爱法语，确信自己能够为之增加伟大的遗产。她之所以避开人事纷扰，之所以接受生活中的一切偶然和挫折，之所以经历或讲述可怕的事情，反而有一种出世的镇静……护士迪迪一语中的：“说到底，一切都可以成为您书中的素材，这个念头让您得到解脱。”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当然。”对文学和荣誉的渴望，使她永不止息：“如果时间允许，我或许会继续写下去，在另一本书里。”即使在即将离世的一九八七年，尤瑟纳尔依然聚焦创作——她随便在什么地方坐下来，就可以开始在膝盖上写；或者跟路过的人交流几句话，然后接着进入文字的世界。

回望尤瑟纳尔的一生，她几乎体验了全部的情感类型：异性的与同性的；同龄的与老少恋的；短途的与长情的；艳遇的与执迷的；痴心的与寡情的……她把女作家各种类型的感情体验个遍，然后活到丰沛的老年。当然，她经历过挫折：丧母，漂泊，失去财产，失去爱侣，疾病缠身……但她坦然接受命运的各种安排，有时平静得有些无动于衷，我们似乎琢磨不透，这种看似的寡情，到底是由于悲观导致的不计较，还是一种和宽容相似的淡漠。无论多么可怕的事情，她转述给别人也显得语气正常，包括自己感觉窒息的垂危时刻，对她来说似乎什么都算不得确切的不幸。正如，她似乎也没把生前就赢得不朽之名看成多么大的幸运。她是法兰西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院士服得请圣罗兰公司重新设计，连洗手间都写着名字，只供她个人使用。这样史无前例的绿袍加身，尤瑟纳尔似

乎也没有当作多大的荣幸，据说自典礼之后，她甚至再也没有迈进过法兰西学院的大门。尤瑟纳尔有一种宠辱不惊的味道，所谓的镇定，或许是为文学准备的忘我——身临其境，心游物外，所经历的对她而言都是积累，所承受的都不能摧毁她，这是神的无情，这是神的全能。

她的作品融合感性与理性、哲思与诗意、古老与现代、西方与东方，血肉一体，这些元素无法被剥除和拆解，她不受任何拘禁。尤瑟纳尔溶解了历史、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特别厉害的是，她溶解了自己的性别与性格，是的，她溶解了自己。她的作品中什么也不缺，只缺少执笔者的痕迹。只看到魔术，看不到魔术师——这是神的创造。不是花蕾，不是发情的动物，而是支撑一切却匿形的春天；是的，春天能创造万物，只有神能创作春天。

正如让·勃洛特在《尤瑟纳尔论》中所言“没有作者”，这一特点贯穿尤瑟纳尔的全部小说创作。她就是皇帝哈德良，她就是炼金术士泽农……但她是谁？典雅而广博，你知道她不是什么，但永远不知道她是什么。尤瑟纳尔完全隐匿在文字背后的黑暗里，看不到身影和指纹，听不到声音和呼吸。

尤瑟纳尔每部作品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反复修改。“有些书，不到四十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限，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经过这许多年，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她说，“我之所以选择用第一人称去写这部《哈德良回忆录》，就是为了让自已尽可能地摆脱任何中间人，哪怕是我自己。”

《苦炼》源于一九二六年开始创作的小说，此后时断时续，尤瑟纳尔与她的人物一起成长，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苦炼》发表，前后跨越四十年的时间。刚开始写作时，尤瑟纳尔和她的主人公泽农出去游历时的年龄相仿；当结束写作时，她已经比泽农去世时的年龄年长五岁。从创作手记中可以看出，四十年来尤瑟纳尔是如何涉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法案、炼金术士、风俗等包含细节的历史资料，因为泽农本身兼炼金术士、哲学家、医生的多重角色。尤瑟纳尔不断地走着回忆之路，想象之路，她的脚步落在泽农的足印里，她为此详细记录：“一九七一年，我在布鲁日的街上重新走泽农来来去去的每一条路，比如，他怎样变换线路去铁匠铺给人看病，哪一个地方是他吃饭的客栈。他在哪一个街角看见成为阶下囚的伊德莱特。”她如此熟谙角色的一呼一吸，熟谙他们的一饭一蔬，甚至他们的生日还会为他们烤制蛋糕。如此付出，使尤瑟纳尔获得小说家“完全进入人物角色”的特权，她彻底化身为生活中世纪的泽农，正如她在创作笔记中所谈到的：“无数次，夜晚，难以入眠，我仿佛觉得自己将手伸给泽农，他累了在休息，躺在同一张床上。我很熟悉这只灰褐色的手，修长，手指扁平，干瘦，指甲很大，颜色很浅，剪得很干净。手腕骨头突

出，手掌凹陷，布满纹路。我感觉得到这只手的力量，它准确的热度。”

照料她的护士迪迪回忆，晚年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疾病摧残下依然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医生为了测验她的记忆力，请她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此前她曾高傲而狡黠地回避可能伤及她自尊的问题，此时，已经不能保有完整记忆的她反问：“那么，您可以告诉我哈德良皇帝的出生日期。”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灵魂，因为疾病和衰老依然无法盗取最为宝贵的东西；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谦卑的灵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像全然奉献的雌蛛，让作品像孕育出来的幼蛛一样以凌迟的方式吃掉自己。当尤瑟纳尔进入生命的倒计时，她已经不认识周围的人了，护士迪迪这样说：“当她平静下来时，甚至她谵妄中时，她都是迷人的。她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法语，讲述她的旅行，她看见自己站在舞台上进行评点，表示赞赏和鼓掌。她再一次显得与众不同，她与任何一个说胡话的老妇人都不一样。她的话语仍然那么优美和连贯。只不过与现实再也没有关系而已。”尤瑟纳尔与自己作品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她不再是创作者，而是融入所有。她把自己动脉里的血泵入每个角色的毛细血管里，她把自己的骨髓打成碎渣和粉末，灌注每个角色的肉身。

蜘蛛和上帝都是慷慨的，最卑微的生命和最伟大的造物主都是如此。所以说尤瑟纳尔的小说“没有作者”，因为她并非简单地搬运自己的经验，并非仔细抹除了自己的指纹；作者之所以认不出，之所以消失了，是因为她研磨了自己，完全溶解在字词里，她彻底地为作品献出了自己……如是，尤瑟纳尔因人的谦卑而抵达神的伟大，她完成了由人到神的演化。她的原名是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十八岁时她将自己世袭的贵族姓氏中的字母颠来倒去，乱码式地重新组合，由此诞生了一个奇怪的姓氏：尤瑟纳尔。她就这样，把自己放逐于家族的谱系之外。尤瑟纳尔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晋升为神的个人史诗：世间没有谁，能为她命名；尤瑟纳尔的母亲早逝，尤瑟纳尔自己也没有生育，血缘既无来处，也无去路；除了尤瑟纳尔所创造的，她本身再也不会显形……她是神的传说，是万物的奇迹，是荣耀的历史，是永恒的沉默。

9

“所有的女人都将拥有翅膀，跟我一样！”

——安吉拉·卡特

对尤瑟纳尔的作品，我经历过从不能接受到彻底接受的转变。也许是某种唯心主义的执念，我的阅读往往受感性支配，对某一个作家容易态度极端，喜欢或排斥都是整体性的。但安吉拉·卡特，是个例外，因为她不像其

他作家那样有着内在的作品稳定性，安吉拉·卡特让人琢磨不透。读书的感受不同，有的作品能让我产生理智的好感，但我更喜欢狂乱的兴奋，哪怕古怪而陌生的规则之外的表述。多用一个新词，尝试一种新的表达，不是浪费而是生产和创造，就如同文学的破坏力反而是种有益的建设。

随便翻开一本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就能发现她的与众不同。比如《魔幻玩具铺》开篇，写青春期女孩性意识的苏醒，非常传神：“十五岁那年夏天，梅勒妮发现自己的身子是肉做的。哦，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她着迷地展开探索全身上下的旅程，翻越自己的山脉，深入自己潮湿富饶的秘密幽谷，俨然科尔特斯、达·迦马或蒙哥·帕克。她裸身站在衣橱镜子前看自己，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她伸出手指沿着肋骨的优雅结构滑过，感受心脏在肉体内扑腾跳动，仿佛蒙在毯下的鸟，接着手指从胸骨往下画一条长线到肚脐（那是个神秘的山洞或岩窟），再用掌心摩挲自己有如初生翅膀的肩胛骨。然后她扭动身子笑起来，环抱自己，有时会兴奋激动得来个侧手翻或者倒立，她不再是小女孩了，这是多么丰美的惊喜。”

在《新夏娃的激情》《爱》等篇目里，安吉拉·卡特写得那么琳琅满目、光怪陆离，让我目不暇接；她那么异想天开，离经叛道，蓬勃的野性大放异彩。那种雌兽般赤裸而坦诚的情色，那种既原始又前沿的女性主义，让我彷徨无措。最初阅读安吉拉·卡特，我能发现她的巧妙、精妙、奇妙、玄妙和美妙，同时也体会着不适、不测、不祥、不安和不快……奇幻瑰丽又毛骨悚然，她溢出我习惯中的审美。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她被喻为寓言家、先知、神仙教母。这个神秘女巫，在自己的王国里，用文字的坩埚和曲颈瓶酝酿千变万化的美妙化学，配制她的独家迷药。服用者目眩神迷，由此坠入那个童话与神话之间前所未见的幻境。一切，仿佛目睹精怪拼贴出的咒语，仿佛进入塔罗牌的梦魇世界——那里繁密的花瓣上悬托着精灵，错乱的根系里缠裹着骷髅；那里缭乱缤纷，到处是关系的暧昧、感观的放纵、审美体验上的极致享乐与倏忽而至的杀伐之气，到处是快活的罪恶、磊落的淫秽、调皮的残忍、天真的情色……变态与血腥，绚丽而糜烂，字里行间都是湿气昭彰的令人陷溺的沼泽。一切，就像塔罗牌中的角色或者包藏祸心的情侣那样，翻云覆雨中吉凶莫测，有着对称中相互背叛的腿，以及倒错下瞬间亡命的脸。

安吉拉·卡特的魔幻与巫术，有时像发生在一个马戏团般的世界里。她的确热衷描绘马戏团的场景，比如她笔下的著名角色飞飞，就是个生有翅膀的空中飞人。我记得自己读到《马戏团之夜》时瞠目结舌，因为符合习惯的空中飞人形象必然是玲珑如玩偶，轻盈到仿佛拥有鸟类那样中空骨骼，可安吉拉·卡特塑造的飞飞是个女巨人：壮硕、结实、威风凛凛。这使得飞飞缓慢悬停空中的画面，更惊心动魄，更具危险带来的压力感。马戏团和

杂技演员，都充满了灿烂与浮华，充满了狂野的冒险元素，充满了对现实逻辑的冒犯，却因为她卓绝的描写而令人信服。

她是一个缝制百衲衣的天才，就像用碎片拼制杂耍演员的戏服那样，她改造和拼贴童话和经典文学，使之陌生并令人震惊。享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互文性，“尤其是，如果新酒可以让旧瓶爆炸”。安吉拉·卡特认为，《睡美人》《穿靴子的猫》《小红帽》《灰姑娘》等等——“这些摇篮故事都是精心乔装的政治寓言”。童话这种形式，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微缩景观，它包含的隐喻和影射里有着对现实法则的背叛——童话的红色里，既有夺目的鲜艳，又有血腥的残忍。安吉拉·卡特的哥特式暗黑童话更是如此，大胆甚至邪恶，它们背叛甚至是审判了童话中原有的甜美内容和伦理。

拼贴、挪用、篡改，安吉拉·卡特完成对原有情节和典故的价值颠覆。她把撕碎的残片，在万花筒中轻轻旋转，就幻化为不可思议的新景观。戏谑与戏弄，恶意与恶作剧，邪欲与邪行……有着猫一样既是孩子又是杀手的微笑，安吉拉·卡特的童话野性而天真，她在禁忌区里肆无忌惮，不被功能性的教化所收买，有着不驯服的激情和渎神的乐趣。她的逆反并非带着怒气的抵抗，而是一种轻快的反讽，在最残酷的情节中也包含着滑稽与玩笑。

许多读者刚开始看她的作品，可能像我一样，心里乱糟糟的，难以立即说出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她像个用脏款完成捐赠的慈善家，甚至在道德上难以置评。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就在那儿令人瞠目结舌地做爱，或者兴高采烈地作恶。当然，安吉拉·卡特元气淋漓、胆气饱满，具有令人战栗的才华，但那些高密度的闪耀文字不仅让目力不适，也充斥着大大咧咧、毫无羞臊的放肆肉欲。学院派的教养和知识储备，没有让安吉拉·卡特变得束手束脚。往远说，我们从中能感知拉伯雷、薄伽丘那种津津乐道的欢乐而有力量的风俗感和粗俗感；往近说，我们能在阿莫多瓦和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找到那种眼花缭乱、活色生香的味道，那种浓郁的狂欢节里随时享乐的气息，那种插科打诨、无法无天的氛围，那种雌雄同体，并在镜像中翻倍为复数的性别倒错与身份交叠。即使这种审美趋势，容易让人动摇对其文学严肃性的认识，她依然信马由缰，持续带来美学上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当《烟火》出版时，后来成为安吉拉·卡特重要朋友的洛娜·塞奇曾评论安吉拉·卡特是“最使人亢奋的作者之一……同时你一定会发现她品位的庸俗；她用自嘲的扭曲快感代替了自知的克制。总的来说，《烟火》是她才华的优秀样本——时而扣人心弦，时而糟糕透了，却总是不知悔悟。”

安吉拉·卡特让人又爱又恨，让人不适。不仅因为她对自己的才华那种毫无节制甚至毫无节操地运用——高密度、高压缩感、高饱和度，像是被油漆笔刷出来的句子。不仅因为她的狡黠与刻薄——刻薄来自观察的犀利和表达的精确，安吉拉·卡特使之不成为缺陷，而是一种灵敏、综合而及时的天

赋。不仅因为她擅长反唇相讥，有着兴高采烈乃至妙趣横生的恶毒——她使正确变成乏味的平庸之举。不仅因为她的作品里充满极端任性的关系设置和突兀的情节翻转，明明毫无道理，她却有事无论在任何样的歧途和困境里都能痛痛快快地活下来。我们的不适，不限于她的语言与技术，还因为她对习惯和奉为经典之物的解构和破坏。她写得怪异而鲜活，逾越纪律和禁忌：恋物、残杀、滥交、乱伦，围绕诸多罪行，展开人物之间纠缠不清的血缘与情爱上动荡的施受关系。在安吉拉·卡特视为美味的故事里，在内心被道德捆缚所束缚的人看来，明显带着幸灾乐祸的下流、得意扬扬的轻浮和肆无忌惮的残虐。没有什么能约束她，教养、传统、伦理。她就喜欢那些使人道德上不安的情节，因为道德常常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手段，但会伪装为情感的归宿、灵魂的乐土、日常生活的正义。安吉拉·卡特把艺术视为无奈的政治，但，她的政治让人不适、惊恐乃至震怒，尤其是对性别的理解和塑造。安吉拉·卡特是非常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但她并没有被观念所捆束，被立场所限定，而是获得百无禁忌的自由，多了理解和表达的工具和武器。她写过声名不佳的科莱特，并与波伏瓦对比：“当然，科莱特不可能写《第二性》，正如波伏瓦不可能在大众舞台上裸体跳舞，这正是两位伟大女性各自的局限。”

安吉拉·卡特曾担任创意写作的指导老师，当课堂上有人带着几分刁难地问道：“你的作品什么样？”她的回答石破天惊：“我的作品像冰刀一样划过男人阴茎根部。”安吉拉·卡特讨厌把女性处理为无知无辜的受害者，对她们没有什么廉价的同情与安慰。她的传记作者英国作家埃德蒙·戈登这样表述：“不管多么厌恶英国社会的父权意识，她还是感觉女人如果只是简单地怪罪男性的侵犯，她们就要为这种意识的延缓负一定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作为同谋固化了‘女性是柔弱的性别’这一臆断。”

安吉拉·卡特擅长改写人物命运，尤其是改写温柔顺从的女性形象。连小红帽们都并非被引入歧途的小姑娘，她可以色情地主动把狼人毛茸茸的头部揽向自己贪欢的肉体，也可以用猎刀剥夺狼的力量，剥夺传统社会中狼作为男性力量的象征。在她的作品中，有大量从绝境中反转命运的女英雄，为了复仇不惜以暴制暴，或者以性爱来俘获她的猎物。

在《染血之室》里，安吉拉·卡特版的《蓝胡子》这样描写：

细薄的平纹棉坯布猛燃起一阵火向烟囱蹿去，像只魔幻的鸟。接下来是她的裙子，她的羊毛袜，她的鞋子，全都进了火里，永远消失。火光照透她的皮肤边缘，如今她身上只剩下未经碰触的肉体，令人目眩的赤裸的她用手指梳开头发，那发看来白得像屋外的雪，然后她径直走向红眼睛的男人，男人蓬乱的鬃毛上爬着虱子。她踮起脚尖，解开他衬衫衣领的扣子。

你的手臂真粗呀。

这样才好把你抱得更紧。

此刻，世上所有的狼都在窗外嚎叫着祝婚歌，她自动送上那个欠他的吻。

安吉拉·卡特的小红帽，才不是什么被骗的无知儿童，她是这样写《与狼为伴》的：

你的牙齿真大呀！

她看见他的下巴开始流涎，满屋尽是森林的《爱之死》歌声，震耳欲聋，但这明智的孩子丝毫不退缩，尽管他回答：这样才好吃你。

女孩大笑起来，她知道自己不是任何人的烩上肉。

在《萨德式女人》的文论里，安吉拉·卡特曾这样形容：“代表女性的往往是数字0，被动的、环形的字母O，一个‘代表无的符号’一张沉默的嘴，牙齿已被拔光。”她继而以石破天惊的思路，重新解读因性虐和变态而备受争议的萨德，并充分肯定他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安吉拉·卡特张扬女性的权力与自由，提出“道德色情”的概念，构想一种服务于女人的色情作品。她对繁殖的崇拜仅仅在于它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离开了繁殖的功能，性才能在男女之间自由而平等地流动。她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游戏精神，又包含清晰的政治寓言，安吉拉·卡特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再受困于情欲的绳索、关系的迷宫、父权社会为女性留下的教条；她们不是讨好的玩偶，不是衰退的幽灵——她们不再被动，并非男人美丽的奖品或祭品。对萨德式女人而言，性提供愉悦和享乐，性甚至是犯罪的手段，不是繁殖的工具。她们在放荡中毫无悔憾，反而逍遥快活；纵情纵欲的一切，都像是梦魇中的犯罪，不需要支付成本，不需要承受惩罚。

安吉拉·卡特是一个难以被归类分析的作家。甚至不能说她在某个群落的前端或边缘，她单枪匹马，骁勇无敌。安吉拉·卡特只是安吉拉·卡特，我觉得她不能被叫作安吉拉，不能被叫作卡特，对她的名字，我不习惯简读和缩写。她是难以被压缩和概括的，她只能是安吉拉·卡特。她不像任何人。狂飙突进，她有生出新世界的子宫。安吉拉·卡特给人带来狂喜和不适，阅读起来会像害喜似的……那是一种新生事物带来的恶心感。

也许因为缺乏风格上的同盟，或者在判断上令人迟疑，在相当长的创作时间里，安吉拉·卡特并未取得与她的才华相匹配的声誉。她在世的时候，只是一个仅有小众拥趸的边缘型作家。她在文字里毫无畏怯，会得意于自己挑衅的有效性。在那些热情奔放的表达里，她没有把吓得瑟缩发抖或气得血脉喷涌的守旧者放在眼里。她的强悍体现在，孩子气地像推倒积木一样推倒巍峨建筑般的观念。她似乎满不在乎，其实她在意评论的反馈，期待

受到瞩目，会因为担忧某个作品完成得不好而陷入恐惧。安吉拉·卡特有极极端自信，在写完《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之后，她给好友写信说：“就算不是杰作，它也不比近三十年来任何一本英语小说差。”出版社的否定性反馈对她打击很大，她走向极端的自我怀疑，泄气地表达：“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我有时会感到自己根本就是天赋平平。”她甚至会以校对为借口，抱走自己一本辗转许久受到质疑但终于即将出版的译作，再不归还。安吉拉·卡特自由奔放的表达，让人误以为她所运用的字词是活的，它们相爱、结婚，生下这个世上前所未见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妙语如珠，她的写作似乎从来不需要咬笔的停顿。但，一切并非信手拈来，她会做大量的案头准备，勤奋阅读，参考文献，她认真到经常拖稿。所以，安吉拉·卡特的自信，有时未必像她自己想象的那么结实。就像对《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她会形成极端反差的前后判断。

就《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而言，坦率地说，我本人并不喜欢，虽然里面有我迷恋的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一系的质素，但整本书那种漫威加科幻的乱炖味道，不是我偏爱的口味。包括《英雄与圣徒》，包括《马戏团之夜》的后半部分，我都无感。我喜欢安吉拉·卡特的，是她那些精湛的短篇小说，是她耀眼的处女作《影舞》，是《马戏团之夜》的前半部分，是她走向圆熟与欢快的最后一部作品《明智的孩子》，等等。她黑色而华丽的文笔令人惊艳。没有黑色，华丽就显得太过风俗；没有华丽——黑色就显得太过沉闷，她使两者相加的效果远大于和。拥有那种天真的邪念带来的致命诱惑——这既可以用来形容梦露的美貌，又可以用来形容卡特的魔笔。如果说，作家的写作如河流，即使有分支，也有基础的走向，但安吉拉·卡特让人无所适从，她是那种能够随水变成洪水的河流。迷恋她的，认为她能以好品质来表现恶趣味，就如恶趣味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品质，安吉拉·卡特天然拥有嘲弄道德的自由；讨厌她的，认为她并未把轻浮和败坏转化为优雅，她的下流永远不是正义，只是算不得正义的杀虫剂，祭杀那些有罪的文字。安吉拉·卡特还有一个特别奇怪之处，她明明早已死于她创作最好的时候，可我阅读她的同时，却像担心一个活人那样担心她，因为她写得光芒四射，她挥霍才华，几乎到了惊人浪费的程度，令人心惊肉跳又痛快淋漓，这种古怪的感觉一直追随。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六日，五十一岁的安吉拉·卡特死于肺癌，死于创作的盛年。这真让人悲伤，设想她那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比如《被删除的感叹词》——唉，仅仅是这个题目，就太有质感、悬念和吸引力了。不过，在她离世的一九九二年，我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尚年轻的我整日浑浑噩噩，不怎么读书，古典文学读得很少，对国外的现实主义、魔幻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也近乎一无所知。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有迟来的醒悟。及早遇到那些能够打开视野、引导方向、调整审美的杰出作家有多么重要，虽然不能像《冰风暴》的原著作者里克·穆迪那样，二

十岁时曾做过安吉拉·卡特的学生，但假如在年轻时就遭遇卡特，肯定是有功远离平庸的捷径。其实安吉拉·卡特的译本引进中国多年之后，我才阅读她的作品，并遗憾于如果我早些开始，就能更早发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多么墨守成规、多么僵化。近几年，我去过英国的巴斯，参观已成为著名景点的简·奥斯汀故居，参观有着蜂蜜色砌石的浴池……但当时没人告诉我，安吉拉·卡特在这里的海丘巷五号居住过数年。她住在巴斯的时候，还没有声名日隆。有些作家在毫无悬念的成功中逐渐松弦，他们的才华不再绽放；相比于此，寂寞有时是件曲折的好事，作家在困扰之中的探索是种更值得期待的冒险。然而对安吉拉·卡特来说，是否减少了经济和杂事的纷扰，她的怒放便会更加精彩？总之，这是一个带有不幸色彩的事实：安吉拉·卡特的早逝在某种程度上，帮助铸造了她的传奇。

“死后的第一个早晨，安吉拉·卡特即跻身伟大作家之列。”埃德蒙·戈登在其传记作品《卡特制造》中说，“她去世后的三天，悍妇社（与她名字联系最紧密的出版社）卖出了她所有的书。……她的长期拥趸对这波盛赞——与她从前获得的认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十分愤慨。超过二十五年来，安吉拉·卡特一直在产出逆时代主流的长、短篇小说和新闻报道。在英国文学最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统治的时期，她玩起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哥特恐怖、科幻小说和童话题材，信马由缰地描写奇异和超现实的景象。她的作品时而滑稽，时而性感，忽而恐怖，忽而残忍，但始终具有锋利而颠覆性的智慧和华美的文风。她想要拆解支撑我们生活方式的神话角色和结构——尤其是关于性别身份的种种神话，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已经变成了女性主义的象征。但正是现在，在她已然销声之时，她的才华才得到广泛认可。”《卫报》周刊上的讣告里这样褒扬：“她反对狭隘，没有任何事物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这个特立独行的天才在死后，读者迅速弥补了她自己生前甚至已经习惯的忽视。安吉拉·卡特受到狂热的追捧——被爱慕，被奉承，被崇拜。如今她成为英国文学研究中的热门，在二〇〇八年权威媒体评选的“战后五十位英国最伟大作家”排行榜中，安吉拉·卡特位列第十，超过了大名鼎鼎的伍尔夫。

作为好友兼粉丝的萨尔曼·拉什迪把卡特称为“善良的女巫”，他说：“我所认识的安吉拉·卡特是最满口粗话、毫无宗教情操、高高兴兴不信神的女人。”“很多作家都清楚她是真正罕有的人物，她是真正的独一，这个行星上再也不会有任何能与她相像的东西了。”拉什迪之所以在《纽约时报》悼文中这样写，是因为他认为：“她这个作家太富个人色彩，风格太强烈，不可能轻易消融：她既形式主义又夸张离谱，既异国奇艳又庶民通俗，既精致又粗鲁，既典雅又粗鄙，既是寓言家又是社会主义者，既紫又黑。”拉什迪这段矛盾而准确的概括，让我在对安吉拉·卡特的作品感兴趣

之外，还特别想了解她的私人生活。

“为什么人们要对我无聊、孤僻、渺小而又乱糟糟的生活感兴趣？”安吉拉·卡特曾对读者的好奇有此疑问。不过，她的情感生活并非她自己描述的那么乏趣。不仅是离经叛道的文字挣脱枷锁，安吉拉·卡特的个人生活也是寻找自我的一条践行之路。正如她自己写过的话：“所有的女人都将拥有翅膀，跟我一样！”

一九四〇年出生于传统保守家庭的卡特，曾长时间受控于宠溺她的母亲。后来，她不惜主动地激怒母亲，背离她原来的教养和教育。安吉拉·卡特因为叛逆父母等各种原因，亲手破坏自己上牛津大学的机会，很早嫁给了大她很多的化学教师卡特。后来她利用毛姆奖的奖金逃离婚姻，在日本极端父权文化情境的刺激下，成为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不过，她终身保留卡特这个前夫姓氏。她有日本男友荒木创造，也曾与小自己十几岁的韩国少年陷入爱河，也曾以偶遇来解决自己暴躁不安的肉体渴望。她的文字里流淌着情欲的液滴，情色本身，也是人间至为重要的享乐游戏。一九七三年夏至一九七四年秋是她成年后最长一段没有恋爱的时期，她既满足于单身，又为缺乏性生活而沮丧。“我感觉就像是坐在这个张着嘴的、充盈着液体的大洞上。”她写道，“耶稣啊，女性的性欲真是一副残酷的十字架。”后来，她与比自己小十五岁的马克一见钟情，同居多年育有一子——她临终才结婚，为了法律上的方便。

有意思的是安吉拉·卡特一生中发生的几次重要转折，以及这些转折的方式。

安吉拉·卡特曾患有肥胖症，八岁时体重就达到四十多公斤，衣服都是成人尺码。在母亲的溺爱喂养下，她在青春期的时候已长成“庞然大物”。安吉拉·卡特的成长，原本缺乏让她叛逆的突变因素。但是，当她发现母亲有着幼化子女的倾向，便开始蓄意反抗，不再做那个乖胖的女孩。严格节食、开始抽烟、说粗话……这是安吉拉·卡特在主动剪除和母亲之间的精神脐带。她的形象，从胖成一个畸形的负担，到拥有可以炫耀的身材——安吉拉·卡特在短时间内，走到两极。

骤变，其实在她一生中的不同领域有过数次重复。有人认为安吉拉·卡特嫁给老师卡特，是擅长利用婚姻，包括选择时机和估算收益。我不这么看，完全不能认同这样的揣测。事实上，在安吉拉·卡特去往日本的时候，她并未对婚姻解体做出准备；就像她离开日本的时候，也从没想到会离开她的情人荒木创造；就像她重返日本，荒木创造没有在海关迎接，当她带着焦虑、愤怒和悲伤前去寻找时，却意外路遇一个求欢的陌生男孩，于是他们在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疯狂交媾……如果从表象上看，容易得出对安吉拉·卡特的印象：“爱的到来像一道霹雳，走出去也一样，甚至更快。”不仅爱

情的结束，友谊的解体也有类似的痕迹。无论是跟写信多年的好友卡萝尔还是重要的评论者洛娜·塞奇，在某个时刻，好像都是由安吉拉·卡特主动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动摇和疏远——事前没有铺垫，事后没有犹豫。包括安吉拉·卡特的居住地——喜欢巴斯就住了三年，离开巴斯也立即行动，而原因，同样都是这里的宁静。她买房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去哪里任教也有一定的随机性——经济困窘时，她会抓住到来的任何一个机会，哪怕在另一个大洲，另一块大陆。安吉拉·卡特像是听任自己莽撞的好奇心与即兴的热情，在具体事件上缺乏处心积虑的预判，哪怕重大抉择，她也愿意掷出命运的骰子，听任于命运的偶然性。但，这并非放弃自主的结果，我认为这里有着必然的基础。

她严格自律，把自己的身材从脂肪中雕刻出来；她曾是个口吃患者，后来变成一个富于交谈魅力的人，甚至富于表达的进攻性；她从害羞内向，变得胆大妄为；她从听起来保守的妻子变为开放型的情人……尽管她从溺爱自己的母爱中反叛，从表面看不出端倪和裂纹的婚姻中逃逸，对自己的极端反弹和反抗毫无预警，选择和转折非常突然，一旦下决心改头换面，就孤往绝诣，有种不再调整和改变的决绝，但我不认为她天生果断。其实，积攒自我改变的气力并不容易，必须近乎无情地断掉自己的后路，防止非常易于发生的犹豫和妥协使自己前功尽弃。她把自己驱赶到足够远，远到对别人抱歉和对自己恨悔也不能回头的地步。恰恰是为了防备某种惯性会威胁到她产生依赖，会影响她的独立性，安吉拉·卡特才付出一种矫枉过正的努力，夺取对生活的自我控制权。

如果没有偶然因素触及，安吉拉·卡特非常擅长忍耐，一旦被某个因素触及，她会变得或主动，或耐心忍受，在失控边缘尤其容易做出即兴或剧烈的反击。安吉拉·卡特曾经把她决心成为作家归因于一个重要时刻——别人借给她的一张碟片上有剧院演员朗诵波德莱尔和兰波的片段。安吉拉·卡特说：“那张碟片是诱因。就像用罐头起子撬起了我的头颅，让所有的内在变形。”其实安吉拉·卡特就像这样一盒罐头，在不被撬动的时刻，像罐头一样天长地久；一旦被撬动，一切的变化，都会立即发生。

人如其文。尽管有时，这条规则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总会在作品中有所流露；即使在虚构情节中，也隐藏着作家秘而不宣的心理轨迹。安吉拉·卡特的故事中总有非常陡峭的情节翻转，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遭遇突如其来的大火、劫掠或其他灾难，把既定的生活摧毁，变成废墟，主人公不得不开始崭新的道路。其实，安吉拉·卡特以强力的破坏手段驱离自己，就像她所描绘的角色一样，她是自己生活的纵火犯，烧成灰烬，为了使自己不再回头，然后她以戏剧化的方式，把自己投入到命运的轮盘赌里。所谓勇敢，有的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有的是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安吉拉·卡特通过持续地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来完成别人不敢做

的事情。

所以，这不是随波逐流，安吉拉·卡特从未在根本方向上整体构建自己的人格。无论悬置其上的是父权、母权还是神权，她都没有在垂直的叹号式的恐吓下，成为压在鞋底的小虫。她不断对抗，更是对抗那个可能不再对抗的自己。看起来的大相径庭，看起来的矫枉过正，是因为只有从内部进行革命，才能洗面革新得如此彻底。当她决意叛逆，勇敢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中释放出的，不再是臃肿的肉虫，而是一只被囚禁的最终超越自我的蝴蝶。

生活中的安吉拉·卡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着迷于冒险，并且和她的主人公们一样，为偶然性承担后果。安吉拉·卡特从不自虐，她不断调整自己。她是一个寻求自我解放的人，努力培养着自身的活力和明智。她明确意识到，自身的极度忧郁与羞怯已沉积到往昔的记忆之中。她的一切越来越好，实现了充分的自我满足、自我肯定与自我平衡。熟悉她的清洁女工都提供出可靠的证言：“安吉拉看上去很野性，但她是最温和的女人……是你希望拥有的母亲的类型。”安吉拉·卡特说：“我年岁越长，就越感到无限轻松。”她写过《织被人》，几乎是个勾勒她自身的传记性故事。其中的叙述可见，安吉拉·卡特将自己视为自己身份与幸福的唯一创造者。

安吉拉·卡特早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数种知觉》中写过：“死亡肯定不骄傲，甚至连自尊都没有；他实际上是个挂着铃铛和气球的小丑。”当一九九一年她被确诊肺癌时，在本能的恼怒之后，她坦然接受事实，并为自己恰好在患病前购买了巨额保险而沾沾自喜。安吉拉·卡特井井有条地整理日记、处理财产，她勤恳而详细地安排自己即将开始的葬礼，有序而轻松地与朋友告别，她把从容的幽默感维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10

“我要积聚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得到永恒的庇护。”

——西蒙娜·德·波伏瓦

我年少懒惰，虽然上的是中文系，大学期间读书并不多。在有限而狭窄的阅读里，文学里尤其散文里的女性，几乎是由类型化的祖母、妈妈和姐姐组成的。她们因为劳动而贫穷一生，渐渐像即将死去的虾那样弓弯起腰背，被河流裹挟着流向远方的海，流向比眼泪更咸的命运，仿佛是作为被牺牲的食物去喂养整个世界。我们习惯了受苦的“好女人”，不习惯安吉拉·卡特这样享乐的“坏女人”——她提示了令人陌生的女性生存可能，她竟然可以像海胆一样保留自己的刺，并且用这些棘丛自由行走。

我后来读到一些女作家，她们是如此有力，如此有趣，如此有刺甚至有毒。对于文学来说，毒是一种巧妙的进攻，刺是一种有价值的锋芒。我联想起令人敬畏的雌蜂——毒是化学的，针是物理的，蜜蜂的尾针有着生物学的完美毒性。它们随身携带武器，誓死捍卫，不惜以命相搏，但正是它们，让美和果实得以传播。一根针，无论是在刺绣还是在复仇，它都可以一剑穿喉；一只雌蜂，无论它是在舞蹈还是在酿蜜，你都会心怀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雌蜂都是刺客；从文学的意义来说，那些女作家在这个世界有着更为夺目的绽放。她们留给我们不死的春天。青春和衰老，在女作家这里不是递进的时间过渡。比如青春吧。我怀疑在萨冈这里，青春是个贬义词。萨冈们永远停在青春期，读者往前走了，她们还停在原地，没有层次和后劲；她们的创作没有发酵，一切都大致保留最初的样子。在安吉拉·卡特那里，青春更近于褒义。安吉拉·卡特们的活力在于，她永远比你年轻，也永远比你老，她们的作品里不是无知的童年，而是成熟的童年。青春是暂时不老，童话是永远不老。青春期弥漫的情绪，像气体缺乏方向；成熟期的毒针不同，它有着对爱恨和生死的裁夺力量，永远保持着尖锐的方式。

我喜欢书页里的枯花更胜于新鲜的蓓蕾——不是因为喜欢亡灵更胜于生机，而是我觉得枯花活得更长，因为它有记忆所增添的灵魂之重。这就像我读过青春荷尔蒙类型的作家，后来阅读兴趣转变，会更喜欢茨维塔耶娃、毕肖普、尤瑟纳尔。这当然与我的个人成长有关。当我年轻，容易听任或者说是放任自己被情绪化统治，并享受其中颓废所带来的麻醉快感。及至中年，就难以从那些作家自恋的自洽或自厌中获得满足。我对美的理解，发生着变化。

就像小时候我只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她们的样子让人原谅所有的不讲道理，她们什么都是对的，连不对都那么像对的一部分。等我自己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再看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和照片，我开始理解某种陌生的岁月之美，当然，这里或许包含着我的自我保护与自我安慰。许多女作家年轻时的样貌都有种别具风格的动人，她们身体里有足量的雌激素，以供养皮肤真皮层里的透明质酸酶，这使她们看起来有种美妙到失真的透明感。随着年老，岁月修改了她们的容貌，她们或许深深地沉淀着内心的倦意。其实对女性来说，完美的自我要求几乎是一种等同恐惧的压力，我开始学习去理解她们老年以后依然带有倔强和坚持的那种残损。暮年的美丽难道不是美丽吗？当然是，可我曾觉得这种美因为安全而乏味，尤其她们也许变得不美，甚至难看——皮肤上落满深深浅浅的寿斑，脚腕处堆积着松弛的线袜，佝偻的手腕甚至握不牢一支写作的笔。然而，有些生命的礼物，恰恰埋藏在晚年；如果不走那么远的路，你就无法见证它们闪光的时刻。

沧桑历尽，她们活得面目全非，依旧凛然——她们已不受被摧毁的容貌的

摆布。她们的皮肤残留了昔日的荣耀，寿斑其实也是一种勋章；她们的颈纹显著，有如树木的年轮，记载着她们的年岁与日月，雨雪与风霜。她们头脑里的沟槽如自我斗争的战壕，它们经历濒死的烽火，也是守护灵魂的掩体。其实，我有时会想象她们的智慧，如何储藏在及至年迈依然清晰的大脑沟回里。并非简单生物学意义的颅内构造……我想象旋转如重瓣玫瑰，花期漫长，即使盛开已久，大脑中这朵智慧之花毫无枯萎的迹象，始终散发芬芳而沉郁的香气。时间没有减损她们的魅力，反而变成隆重的赐予。有时天才易碎，人世间虚弱的舞台不足以承载他们的重量，于是他们陷入垮塌后的深渊里。女性天才尤甚，带有脆质的成分，多少人就这样过早地死于自己的出色。而这些苍老的玫瑰，她们拥有结实的晚年，得以用布满皱纹的眼睛从容洞察这个始终未能将她们摧毁的世界。在那种有力量的苍老面前，青春之美所获得的肯定倒显得轻率和廉价。她们在年迈依然毫不妥协，是一种多么傲人的嚣张；坚持到终点的美，说明它从未在途中被出卖。也许她们再美也算不得尤物，那是因为被称之为“物”，已是对她们的极度轻慢。每当听到“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句歌德的唱颂，我总想起她们——她们在年龄上的衰老，已是在最大限度地靠近永恒。

也许我们用年迈的智慧来形容是不合适的，如同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再年轻也可能暮气沉沉。所谓永恒，就是无所谓年轻无所谓年老，只要元气和勇气在，只要创造的梦想和能量在，老——只是成年人的成长。当萨冈和杜拉斯说她们生来就老了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桑塔格和尤瑟纳尔无论什么时候都从未减弱年少的锐气，像弗兰纳里·奥康纳，像安吉拉·卡特，她们是没有晚年的，不过她们能在死后依旧活着……生命末端衔接的不是死，而是奇迹。老与不老，跟年龄即使有关系，也并非匹配或捆绑的关系……就像经典童话，既纯洁又野蛮，是最年轻的同时也是最古老的。伟大的女性既没有年轻过，也没有老过。她们的可怕在于，可以从非常古老的长成非常年轻的，像有毒的水母一样，在循环中永生与再生。

当西蒙娜·德·波伏瓦在《青春手记》里写下“我要积聚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得到永恒的庇护”时，她还非常年轻。几乎在少女时代，她就为自己的独立人格奠定基石。女性成长，没有能够直接继承的奇迹，只有自我塑造，才能不让她对自己和整个世界感到厌倦。作为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支持者，波伏瓦的光彩在作品里一直闪耀，她曾这样感慨女性的命运：“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而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中壮丽的女飞人则有这样的表达：“所有的女人都将拥有翅膀，跟我一样！”无论经历怎样的困境，无论堕入怎样的人间深渊，一些女作家就像传说中的人鱼，用自己的血脚印走出一条开花之路。她们的人生或许包含着不幸与灾难，也许写作是她们克服灾难的方式——读者记住的是她们的文字，而不是灾难，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会女性力量的强大。如果说人们的血肉死去，剩下骷髅，那么在她们被磨损的旧骨架里，还会剩下一对翅

膀……那就是不熄的自由，在死之前的时光里，她们曾飞离无论多么辽阔或精美也不能将她们禁锁的鸟笼。

我爱她们身上无望的柔情或凛冽的智慧。她们或保守或奔放。她们亦好亦坏，亦勇敢亦怯懦，亦天真亦残忍。每一个“她”，组成了她们，但每一个“她”都是不可抽象的。阅读她们，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那胆怯者的灵魂，做工是多么粗糙和潦草；就连我怯懦的歌声，重复练习得已让人生厌，却依然不够克服我内心的焦虑以获得自信。是的，在伟大女性面前，我们永远都是爱的学徒。当她们年轻，当她们年老，当她们告别……她们只是把自己变成书籍里安静而壮阔的史诗，变成我们奉献在墓碑前那丛倦意却超越生死的玫瑰。写作就是通过一支笔掘开道路，哪怕这是一把掘进的锄头，挖开自己黑暗中的坟墓……她们在这条路上，向死而生。

雌蕊在情色绽放中酝酿果实，并消失在自己的创造之中。女性通过自己的剧痛与狂喜，分娩了孩子和人类的未来。生育并命名，这是只有神能够完成的创造。女作家们创造前所未见之物——笔就是自己的权杖，她们因此骄傲，因为她们不仅主宰自己的命运，也破坏环境中的某种秩序，并篡改一个原本并不由她们掌控的世界。

血童话

卡夫卡：“没有不流血的童话。”

——题记

1

明亮的蓝宝石眼睛、薄金叶片的衣服、做梦都未想过哭着要东西的快乐王子，让一只失恋的燕子为信使，给予他所能够付出的一切……最后，作为一个毫无光彩的盲乞丐，快乐王子和他的燕子朋友，死在一起。我记得二十五岁生日的黄昏，重读王尔德《快乐王子》，那绝对的美与绝对的悲伤，涟漪般漾开……我沦陷其中。

假如非教育孩子或职业需求，恐怕没有谁成年以后还读童话——我们戒除了对糖果的爱好，迷恋似乎有害。青春期的孩子开始长高的时候，童话的高度就逐渐下降，一旦我们的指尖可以够到童话的尾巴……那一刻，有什么破灭了。绚丽的色彩从此消失，成人，被判处以色盲症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做儿童文学编辑，本应随童年撤离的内容依然伴随我漫长的八年。兔子、大象和狐狸，折纸、漫画和游戏。八年、九十六个月和三千个日子，直到，心生倦意。

我像《绿野仙踪》里的铁皮人，没有一颗心能容纳充沛的感情；也不流泪，因为一流泪，身上的铁皮就生锈，更动弹不得。幼年的我，曾经幻想得到一张能变出珍馐美味的餐桌、一只陪我玩耍的宠物企鹅、一个能趴在耳畔告诉我考试答案的小精灵。而今，那个动物说话，那个天使或魔鬼随时出现在你路过的树下的童话世界，我早已丧失信任。它力求栩栩如生地呈现，但失效，简陋的戏法无法使我上当。我知道，自己生活在被神灵彻底放弃的人间。我无神论者的麻木、冷漠、急躁和傲慢，不想耗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场语言的徒劳的骗局里。

是否，这是不再年轻的标志？从对未来神秘而饱满的想象力，过渡到漫不经心的宿命论。我每天带着间离的态度，一边缺乏热情地校对和编辑书稿，一边设计秘密的逃离之路，终于如愿，被调到成人文学期刊。

直到有一天，我偶尔翻开自己二十年前编辑的经典童话丛书，心里一惊。尽管多年前我已写过《黑童话》和《仙履》来表达质疑，但当时仅凭大致

印象动笔，并未重读文本。一旦接触具体的情节，我觉得有什么动荡不安的东西就隐藏在深绿而丛生的枝条后面。时值仲夏，声嘶力竭的蝉声像一种警报，熟悉的面孔越来越陌生。

博物馆里的修复技师，常常发现一幅古老画作之下，隐藏着另外一张被颜料覆盖的脸。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错愕，卸妆的演员不再属于戏剧里的角色。王子不是曾经的王子，公主也不是曾经的公主。那些英雄和骗子，那些魔法师和胆小鬼，他们表情狡黠、动作灵敏地出没……唯有专注，才能帮助我发现，耳熟能详的情节里如何密布意味深长的伏笔。

原来，童话的力量是缓释的。在破开保护性的透明胶囊之后，它释放的药力之苦，长久滞留在我的味蕾上。

2

魔法至关重要。

童话一贯以神奇的手段来解决困境。如果没有魔法，多么乏趣，简直相当于发育尚未齐全的童话；或者说，没有魔法参与的，是更近于故事形态的比较勉强的童话。

无论打火匣，还是阿拉丁的神灯，这些无中生有、秒变万物的宝贝，都是一劳永逸的服务工具，通往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不归人间，分明只属天堂；而魔法，是天堂在这个世界的瞬间显灵，让我们尝到一口从神的宴席上滚落的果子。它太美味了，以致我们像餐桌下的狗一样摇动兴奋不已的尾巴。

显灵物，也可能是一棵许愿树或者什么动物。比如那条被勒索的小金鱼，遭到渔夫老婆的一次次奴役。不知餍足的贪婪，使她忘记穷困中曾如何自我压榨，倒是把勒索别人的力气都算作付出……直到频繁降临的天堂，重得足以把她夯回到地狱里。

所谓魔法，等于脱离现实法则的手段；阅读童话，也不能以现实的情节逻辑去要求。但《渔夫与金鱼》的故事，让我习惯性地，在荒谬的推理中踉跄了几步。小金鱼既然能给苛索无度的老太婆变出许多卫士和仆人，以匹配她新晋的女皇身份；为什么，它不在被捕获时变出一个力士，帮助自己从渔网中脱身？渔夫又能如何？在魔鬼般的力量下，他只能屈服，甚至都不能保证还剩下一张完整的渔网。小金鱼何须纡尊降贵，以感恩捕猎者的饶恕，听任无能者颐指气使的派遣？

就像鱼只能生活在海里，是否小金鱼也有神力上的局限？比如，它的能耐

仅限给予，无法惩罚——它受困于级位不高的神所必须遵从的美德？还是说，一切不过是小金鱼的恶作剧，甚至是蓄意蓄力的报复，因为它明白，无限给予然后彻底剥夺，才构成更重的刑罚？

渔夫和老太婆到底是贪婪，还是没有智慧支撑更大的贪婪？要什么木盆、房子和贵妇的身份，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先要一条同样法力无边的小金鱼？如果小金鱼同意，意味着分割了它的神力，剥夺了神的特权；如果不容挑畔的小金鱼拒绝，意味着它没有遵守“要什么都给”的赎身条约，成为背信者，它的不肯就是它的起义。

渔夫忽略了，他其实遇到一个置神于死地的绝杀机会。

3

也许，渔夫的胆怯来源于教训。

因为人不知道他所遇到的神，什么时候会成为魔鬼——就像魔法不需要铺垫和积累，没有过程，只是瞬间完成的后果。渔夫的网，打捞上来的，或是一尾听话而万能的金鱼，或是一个孤单而暴躁的禁足魔鬼——这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我们从语文课本里熟知它的精简版本。

渔夫仿佛是从虚无中打捞，他希望渔获满满，鱼鳞多如海面上的耀眼光斑。然而，三网下去，一无所获。耗尽体力的渔夫，撒下了绝望中的第四网：所罗门的瓶子里关着魔鬼。这次，渔夫差点丢了性命。

魔鬼，烦躁得生出憎恨的魔鬼，获得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要给他自由的人去死。他所呈现的暴怒，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魔鬼风格。魔鬼针对的恰恰不是所罗门，不是真正的置他人于死地者。如果仇敌的权力巨大，令人无法挑战，我们深知复仇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会选择临近的替代目标。

恩人，几乎是最好的选择。

一是熟悉套路，恩人通常具有好心肠，缺乏坏手段，可以减少我们施暴过程中的自我伤害；二是清理债务，没有什么比恩人的屈服乃至死亡更快的清账方式，无论是财产还是情义，我们不再有负于人，瞬间摆脱弱者的被动立场。恩情重过罪行，轻过惩罚。

敏感、急躁、易怒，魔鬼长期体验着受挫者的心境，以致他的性格更符合一个魔鬼的要求。我有时猜测，魔鬼在他的困境中变得情感丰富。孤独、屈辱、消沉、不甘和悲伤，魔鬼被迫与自己交流，向自己许诺，也跟自己

赌气。他蓄积的力量，足够危险，足够毁了自己。魔鬼缺乏一个像其他童话里那样宁愿禁受跋涉之苦、搏斗之险，以及禁受与荣誉、性命相关的种种考验而依然无悔地前来拯救自己的兄弟、朋友或英雄。所以，当渔夫到来，偶然地把他从无涯苦难中营救出去，魔鬼因情谊缺失的巨大委屈和靠近情谊的巨大恐惧，无法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情绪。何况，渔夫随手完成的拯救，像在羞辱魔鬼的无能；相比之下，魔鬼禁受的苦难显得多么缺乏价值。消灭渔夫，魔鬼就可以消灭见证自己耻辱的人。

受到威胁的渔夫设法用诡计营救自己，他对魔鬼说：相信他有本领变大，不相信他会变小。魔鬼迎接挑战，似乎以此洗刷加诸自身的屈辱。魔鬼，就像个任性又好胜的孩子，他竟重回封印之中。经过历练的魔鬼，反而保持了他的单纯；长期不与他人接触，魔鬼没有经过心智锻炼而依然轻信，他绕不过一个句子里的策略。其实，何必呢？如此虚荣，如此不服气？魔鬼何须向一个俘虏和死囚来证明自己？魔鬼满足渔夫的愿望，他没有提防渔夫在所谓遗言里布下的阴谋，从而再次置身绝境。

谁都如此。若变成巨人，是天赋和本事决定的；若要把自己变小，不仅需要本事，还需要品行，这是难的。成功者克服人生的难度之一是，要想继续克服自己——变得谦逊，是更大的考验。在某种程度上说，成长，人人可为，因为我们都会从孩子变为成人。相对于生命刚开始的受精卵而言，那个未来的自己就是不可思议的巨人。短短二百多天，它放大的倍数相当于天文数字。想变小？不，你没有回去的路，就像没有逆时针下走动的阳光。

所以，一个能够收敛自己的魔鬼，他身上一定或多或少具有天使的品德和神迹。决定胜负的，并非渔夫的狡诈，乃是魔鬼的天真。

全本故事着意塑造一个有勇有谋、绝不气馁也绝不放弃希望的渔夫，最终使魔鬼服从；现实生活里，当我们从渔网中总是收获毫不值钱的废物，并险些丧命，面对一只吉凶未卜的瓶子，我们是否还有愿望、勇气和能力打开它？即使里面囚禁着我们的幸运天使，我们是否因来自经验的恐惧，而把它掷回苍茫的大海？

4

因为没有手起刀落，没有及时处死渔夫，魔鬼付出昂贵的代价。再次被囚于瓶颈之中，他不得不苦苦哀告；曾经的自由唾手可得，如今他却要屈膝以求。渔夫和魔鬼的故事，利用了童话的惯用招数：延宕，以及由智慧赢得的逃生机会。

魔鬼杀伐之前，要和渔夫聊天；巫婆想把小孩子架在火上烤出香喷喷的脂

油，此前得把他们养得胖胖的；即使心狠手辣的恶棍和劫匪，也要趁着月光先把刀子磨快……他们真有耐心啊，直到受害者想出自救的好主意。

这些心不在焉的坏人总是耽误事，发呆、出神、贪睡，都是错失的理由。有的爱玩猜谜游戏，乖乖等待对方想尽办法猜中自己的名字。在神话和童话里，名字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巨人或怪兽，无坚不摧，却因为被人知晓名字而丧失抵抗，被人彻底掌握了命和运。尽管如此，乐此不疲。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不直接吞食路人，非要猜谜。双手沾满秘密者，将沾满他人和自己的血……倔强的斯芬克斯只有一个谜语，最后不惜抵押自己的死。但此前的牺牲者都没有想到，谜底就是自己的名称——人。俄狄浦斯赢了，斯芬克斯羞愧地跳崖而死。这个高智商的怪物，自尊里所携带的耻感，令他会为一个谜底殉葬——也许越是具备力量，越难以承受最低程度的击溃。于是，揭开的谜底战胜始终的尊严，人的智慧战胜怪兽的力量，不断变换腿只数量以便逃走的狡猾之徒，战胜驻守原地的诚实巨兽。

《小红帽》中的延宕同样明显。

大灰狼第一次遇到森林里的小红帽，当时就判断出“这小东西细皮嫩肉的，吃起来一定很解馋”。但狼没有立即吃掉她，反而露齿微笑，建议小红帽去树林里转转。它为什么拖延？有的版本含混地一笔带过，有的版本说狼要一箭双雕，吃完外婆再来吃小红帽，还有的版本说是担心樵夫。树林里没有旁观者，可以不受惊扰地享用美餐，狼却要放过猎物，难道，它要像人类一样坐上餐桌来维护礼仪？狼的选择显然不合常理。替狼解释，说什么它担心樵夫看到，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狼还需要在樵夫那里维护什么形象和荣誉吗？如果狼担心被樵夫捕获，它去人类住所而被抓住的概率岂不更高？或者狼当时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一客小红帽这样的甜点？可它分明吃了外婆之后随即吞下小红帽，说明狼有足够消化祖孙两代的胃纳。如果说狼蓄意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为了在轻微饥饿感中获得大快朵颐的享乐感，那么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它为什么不陪着小红帽一路走到外婆家——让小骨头不跑，老骨头不丢？

我怀疑，这头奇怪的狼另有打算。让小红帽死掉之前，狼要送给她一件秘密的礼物：去认识歧路中的世界，开放的花、歌唱的鸟，还有那赏心悦目的一切。大灰狼替小红帽遗憾：林子里的一切多么美妙，她却只管往前走，就像是去上学一样。狼的劝诫多么诱人，多么有魅力啊，绝非妈妈的嘱咐那么单调：让小红帽不要停留，不走岔路，直接把葡萄酒和蛋糕送到外婆家——这是母亲、成人、道德、伦理等等之类的一切对我们提出的务实要求，功利而直接。大灰狼告诉我们欣赏花开、倾听鸟鸣，告诉我们歧路上有更值得我们驻足和游历的曼妙之美，告诉我们人生重要的，并非工具性地完成任务。

狼也许并非慈善，它并非执意给予弥留者临终的关怀。吃掉一个厌世的灰心者，吃掉一个乏趣的平庸者，都不如吃掉一个满怀好奇与热爱的勃勃生机者更享乐。牺牲品对这个世界的贪恋，就像他仔细洒在自己身体上的烹饪作料，回味无穷。这使狼的杀戮，更具有价值、意义和快感。

警惕那些披着狼皮的、披着羊皮的。你不知道，在毛茸茸的脸或鳞片覆盖的脸之下，是怎样令人惊艳或惊悚的五官。

5

童话里的动物令人迷惑。这些既懂语言又有心计的家伙，在人与兽的交界地带，我不知道它们是得到了双重的自由，还是得到双重的管教。不过，即使最小的动物也不容忽略，蝴蝶有幽灵一样的翅膀，蜘蛛在它的弦琴上弹奏死亡之歌；即使死亡的动物也必须尊重，吃剩的动物残骸甚至具有它们活着时候不曾拥有的魔力——灰姑娘们除了向母亲一样的仙女和圣诞树般挂满礼物的植物许愿，剔尽血肉的许愿骨，也能为她们降下闪光的裙子和舞鞋。

出场的动物，种类很多。鸡鸭鱼肉，有多频繁地出现在餐桌上，就有多频繁地出现在童话里。蛙鸣，就像夏夜池塘里那样此起彼伏……有歌剧演员的嗓音和派头，青蛙在童话里的戏份很重。青蛙，像大颗的绿宝石，它先知般黑水晶的眼睛里，盛得下善良的祝福与邪恶的诅咒。《格林童话》里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青蛙王子》。如同魔鬼囚禁于所罗门王狭小的瓶子里，一个人类的王子被压缩到一只青蛙的体量，他等待着打破咒语的解救者。

金球是公主最心爱的玩具，被高高抛起时掉进了井里；大哭的公主不惜答应各种要求，以换回金球。无论公主带在身边的，还是青蛙尚未出口的一切，她都答应。可是，如果她是公主，应该有若干金球，为什么独独珍惜这一个？如果她只有这么一个金球，为什么会当作普通的皮球那样玩耍而毫不珍惜？为了一个金球，公主用自己和许多作为嫁妆的金球一起去交换，为什么？这和君王倾国倾城以博美人莞尔是不一样的，因为君王的主观难以被量化判断；仿佛在公主的天平上，左边是一个金球，右边是九十九个金球，她竟然也执意要换！情节中并无提示，是否掉进井里的一个具有别样的纪念意义；若它只是百分之一，为什么公主瞬间把它看成百分之百的全部？

人难以失去即时的享受，即使它能够失而复得，即使它原本并不值得珍重，它也会在失去的瞬间，变得价值连城，变得无可比拟。现实世界，我们亦是如此人对物。比如，男人与早生倦意的女性决绝分手，突然得知

她结识新欢，顿生不舍和眷恋。我们总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衡量，在损失面前，方寸大乱——为了牌桌上失去的十块钱，会愤怒地押上千百以博一个把它赢回来的机会。不能说是冲动，就是本性。这就是公主的态度和选择：“你要什么东西都行，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后来的事实证明，公主的誓言并非一时失口，而是连续的决定，最后她甚至嫁给了青蛙。

青蛙最初所求，就不是华服美钻，似乎它看重的是尊严。它的条件，是和公主同坐一张餐桌、同用一套餐具吃饭、同睡一张床……其实，里面包含对婚姻状态的逼真比拟。

公主不甘心地嫁给了动物新郎，好在穿蛙皮或熊皮的王子，脱下皮囊，就拥有一个男人的英俊外形和性能力。白天是禽兽、晚上恢复人形，或者白天是人形、晚上是禽兽，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上演的昼夜变形记。蜕变可能是不完整的，是难以割裂的——我们像《野天鹅》中那个最小的哥哥，一半是人的臂膀，一半是天鹅的羽翼，在天地之间踉跄；我们像半人半兽的潘神，用天使的嘴唇吹奏音乐，用魔鬼的性器渔猎美人……对抽象的音符和具体的肉身，我们都意乱情迷，饱含狂野到不能平息的欲望。然而我们最后，常常主动或被动，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在一而终。

这绝不像脱下衣服那么容易。或像剥皮那么难，那么疼，那么血肉模糊。到底是人类还是动物，常常很难分清。但必须表明立场。人，天生就是好的；兽或妖，天生就是坏的。就像在虚拟的绝对里，孩子天然就无辜，仙女天然就冰清玉洁，没有肛门，不会排泄。童话强调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剔除掉大量模糊而难被容纳的灰色地带。所有的观念都是成人赋予的，我们把自身的沉淀物传递给孩子，让他们的瞳孔只能看到两种颜色，非黑即白。

何去何从？妻子烧掉了青蛙皮或者什么怪兽的皮毛，魔咒从此失效，或者是那个英俊的少年从此告别，永不折返。这是残酷的不允悔意的选择，就像只有死者，才能得知自己，究竟是前往天堂还是地狱。在现实中，产后的母牛吃下胞衣，湿漉漉的幼崽失去庇护，失去返回子宫的路；在童话里，巫师扔下的兽皮，被魔法裹住的灵魂，在世间存活下去的机会是渺茫的。

6

谁能分清，我们到底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狼皮的羊？撕下来的，到底是哪副面具、哪张脸？谁是茹毛饮血的肉食者，谁是肠胃清凉的素食

者？也许我们都有杂食者贪婪的野心和胃口，每个人，都是不能把自己锯开的潘神。

如果你仔细观察蝴蝶怎样从花蕊中汲取它的蜜浆，会得到惊人发现。常常，蝴蝶不是优雅安静地啜饮，它的头颅起伏，其状，无异于一头狮子用牙齿撕扯幼鹿。

是的，我难以区分肉食者和素食者。《三只小猪》里的情节让我生畏。狼吃了两只小猪，还想吃第三只小猪，却输于后者的智慧……童话里，好人的主意叫智慧，坏人的主意只能叫阴谋。结果，狼从烟囱里滑落到滚烫的开水里，被盖上锅盖的小猪煮熟，成了小猪的晚餐。这样的情节令我吓了一跳——是因为吃猪的狼在我的常识里，而吃狼的猪完全在我的知识准备之外，它简直像潜伏下来的怪物。我们知道，狼已经吞嚼并消化了两只小猪，假设，前两只小猪刚下肚不久，第三只小猪如何能区分，狼皮之下，谁是谁的肉？能不能说，第三只小猪正在吃自己兄弟的尸块？还是说，那最后的胜者、最后的王，有权煮熟、有权吃掉所有人？

这第三只小猪，是童话里被赞美的英雄。

7

英雄，是必不可少的角色。他们本应勇武过人，为公义而战，不惜牺牲利益和血肉——可童话里的拟英雄行为，与此大相径庭。

一种是《打火匣》里的士兵那样的英雄。巫婆找到士兵，让他到树洞里取宝，金币银币他尽可取用，她只要那个打火匣。士兵钵满盆满地归来，追问打火匣的用途。拒绝告知的巫婆，立即被士兵砍了头，全然不顾这个有益无害的老太太刚刚为他带来巨额财富。他的刀毫无顾惜。士兵燃起打火匣，里面有三只万能的仆狗随时供他差遣。有了秘器，士兵偷窃了公主，后来成了国王。这个偷香盗玉、窃钩窃国的杀人犯，从此逍遥。

童话里有大量的意外之财。除了天降宝物，获得财富的常用手段还有盗窃和抢劫，一夜暴富的主人公比比皆是。《杰克和豆秧》里的杰克，顺着豆秧向高处攀爬，然后从食人妖那里陆续偷来金子、会下金蛋的鸡和会唱歌的魔琴。第一次冒险之后，杰克和寡母已经改善了生活；完成第二次冒险以后，杰克一家已经衣食无忧，因为只要有需要，母鸡随时会下一颗闪光的金蛋。杰克第三次爬上豆秧去偷那只魔琴，未免太过贪婪。食人妖的家眷无论是因为仁慈还是好奇，她的干预和保护，使杰克幸存，可惜，她并未得到应有回报，反而痛失亲人。把宝物洗劫一空的杰克砍断高高的豆茎，追赶小偷的食人妖，活活摔死了。

妖精和魔怪，被人类欺负和杀戮。人和妖魔在童话里经常打赌和发誓。可人类是轻诺寡信之徒，他们随口答应，许诺给出自己的财富、领土和儿女。这些戏言和谎话，却被妖怪和魔鬼当作盟誓。人容易失信，魔鬼倒是守信，否则人类的阴谋不可能得逞。最后的结果，是不履行诺言的狡猾人，把忠诚履约的妖魔扔进热锅，推下深渊，或者把他们吊死在不能上天入地的烟囱里。比如小武士的故事，讲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假意和妖怪做朋友，骗取信任，得知秘密的藏匿处。于是小武士翻山越岭，找到湖畔一只鸭子的巢穴，把蛋打碎，因为妖怪那颗脆弱的心脏就藏在里面。只为虚荣，小武士就背叛友谊，杀死了拿他当朋友的妖怪。好在，童话美妙国里拥有罪恶城里的自由……在那里，法律都是不说话的。

除此，还有一类孱弱而虚妄的英雄。《勇敢的小裁缝》是其代表。一个所谓勇敢的小裁缝，其实是靠自我吹嘘、巧言令色和虚张声势畅行江湖。“一下打死七个”，小裁缝不满足于自我赞赏，他给自己缝制这样一条绣字腰带，佩戴着招摇过市。他所掩盖的事实是，他打死的是七只苍蝇而非七个人。善于使诈的小裁缝深知，半个事实比整个谎言，效果翻倍。到处是强盗、骗子和背叛者，以自以为是之铿锵真诚，赢取天下。国王畏惧于小裁缝的力量，把半个王国和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有了打火匣的士兵，和有了印字腰带的小裁缝，在童话里多么勇敢——他们觊觎无论是强盗还是国王的财富和女儿，并终将赢得。

小裁缝从打死七只苍蝇的小事开始，一步步杜撰自己的传奇。尽管他从未成为对决者，但他打死巨人、抓住独角兽和野猪的勇敢者声名日隆。注意，这里有一点不同之处。常规的故事里，勇士面临的考验，难度升级；但小裁缝挑战的，是从巨人到独角兽再到野猪，难度在显著降低。这是反逻辑的，如果小裁缝打败了最厉害的，后来者根本不是对手，不存在胜败的悬念。为什么，要采用递减的情节？

是否在暗示，小裁缝的元气，已越来越不足以维护自身的勇士形象？婚后的公主通过裁缝的梦呓得知了他的身份，但小裁缝同样伪装梦呓击退了国王的谋杀计划。由此可见，得到江山的小裁缝，并没有得到爱人的心。权力和美人何用？他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和爱意。因为，小裁缝的伎俩，是利用他人的蒙昧和恐惧；不过，当小裁缝用外在的权术捍卫内心的虚弱时，所暴露的，正是恐惧在他自身上彰显的功效。

为什么在童话里，花招和诡计成为英雄的制胜法宝？或许这是针对并适合孩子的。因为儿童尚还弱小，尚未拥有能够与来犯者正面抗衡的强力；要想在现实中反败为胜，唯有依靠智慧来四两拨千斤。让孩子懂得智慧的重要性吧，不必因体量渺小和力量薄弱而绝望。智慧还有个好处，它不像拳击那样在强弱上立判输赢，相对虚的智慧比量化的力量判断起来要吃力，要模糊和迟疑。所以，说依靠智慧，不如说，依靠的正是智慧难以被立即

验证实效，无论成长还是谎言，都需要这样一个被拖延的时空，需要这样一种皇帝新装那样虚幻而完美的存在。

小孩子无不向往英雄。英雄情怀，是极为动人和高尚的。可我总怀疑，呼唤英雄的时代，是悲伤的。每当想起冷兵器时代或者中世纪，英雄这个词，会让我联想起刀斧下汹涌或淋漓的血……几乎可以断定支撑其中的，是结实而庞大的死亡。

当然，血，有时源于英雄自己的身体。童话里的英雄毫发无损，而生活中，我们习惯了血肉模糊的英雄。赞美英雄，即使英雄意味着战争、矛盾、危险和超越常人的选择。

一个英雄，周围有着百倍的庸常之辈；如同一头狼的出现，背后要有一群羊以备牺牲。这是英雄的成本。不过，如果庸人繁殖得过多，就像密集的羊群亦如铁蹄，能践踏和踢死尚在饮奶的幼狼。为了活，羊宁死也不会吃彼此的肉；但它们一样可以踩碎彼此的头骨，一如踩碎幼狼的。

自然界伟大的平衡并不会被破坏。因为没有狼的时候，羊将从羊群里，选出一头狼。

8

虎狼环伺的世界，一个清白无辜者如何存活？尤其，精致小巧到只有拇指那么大。

童话里有许多袖珍的小人儿。必须要小得彻底，小成玩偶，小成不可思议的艺术品，否则将沦为侏儒的命运。他们小得易于被忽略和消灭，随时在动荡与危险里。拇指汤姆曾逃脱于惩罚者的绳索、烤箱、牛腹，他后来成为国王的宠臣，穿着蝴蝶翅做成的衬衫，小鸡皮做成的靴子，可惜还是死于一只蜘蛛的毒液。

哦，我那时多么喜欢她啊，我的拇指姑娘。她那么小，装不下一点罪恶。胡桃壳是拇指姑娘的摇篮，她以蓝色紫罗兰的花瓣作垫子，以玫瑰花瓣作被子。婴儿般幸福的拇指姑娘，被一只从碎玻璃窗中爬进来的老癞蛤蟆劫持了——拇指姑娘的童年瞬间就结束了，因为她瞬间就到了给小癞蛤蟆做媳妇的年纪。

拇指姑娘的玲珑心脏，只有豆粒那么大，却承受那么多沧桑。在她拯救一只贫苦的燕子并最终被它所拯救之前，拇指姑娘为田鼠劳作、被金龟子遗弃、遭到鼯鼠的觊觎。这些样貌丑陋的准伴侣，围绕着花蕊一样的拇指姑娘。而拇指姑娘在遇到她的王子之前，一直是情感上的流浪者，无处收纳

她那颗盐粒般的眼泪。她的易碎感那样强烈，相比之下，每个孩子都是高耸的巨人，所以，拇指姑娘唤起我的保护欲和难以施救的无奈感。夜色中的拇指姑娘，我想象她的美貌，像萤火虫那样精致又明亮，真实又缥缈。

童话对美貌的形容，与众不同。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里，一篇童话名为《有五头奶牛的小老太婆》。一个小老太婆连根带枝完好地挖起一株五棵芽的香草，把它带回家。等她再回来，发现卧室里面坐着一位少女，“眼如玉髓，唇如暗石，面色好像浅色的石头，眉毛犹如两只互相伸着前爪的黑貂。透过她的长裙可以看见她的身体，透过她的身体可以看见她的骨骼，透过她的骨骼可以看见水银般蔓延的经络”。我的阅读在这里遇到了障碍。透明的植物美女，这是一种我难以靠想象完成的美。你必须忽略去想，她倾国倾城的五官实际是悬浮于空气中，她晶莹剔透的脏器中没有任何储存的排泄物……不，算了吧，我还是喜欢我的拇指姑娘，因为她干净得没有什么破绽。

以美貌著称的，还有白雪公主。不过，白雪公主有什么好？乏趣，我感受不到她的生动。即使逃难之中，进入七个小矮人的房间，她一会儿用用这个的勺，一会儿用用那个的碗，七个床都要均匀地睡到，太挑剔了。难道，是善良使然，她以此安慰七个渺小的暗恋者？毒梳子和毒苹果，两个差点害死白雪公主的道具，难道不是从侧面暗示和证明着她的虚荣和贪吃？她没有美德来匹配她的美貌……不，算了吧，我还是喜欢我的拇指姑娘，因为她纯洁得没有什么主意。

虽然喜欢拇指姑娘，但她只是我的亚军。最让我迷恋的，当然是她：美人鱼——名字真好，无论做人的时候还是做鱼的时候，她都最美。美人鱼，既有美貌，又有美德，且不多言，比谦逊者还沉默，比勇敢者还无畏，比死更靠近永恒。

如果没有绝唱，就不是天鹅；如果没有遗嘱般交付整个世界的爱情，她就不是她。把她的尾巴剪开，把她的身体撕裂，从此，每一寸土都是美人鱼的立锥之地，每一步都是她的沥血之路。巨浪涌来，像鲸即将搁浅。亲爱的美人鱼，带着死于彼岸的决心，带着海洋教堂中忘我的信仰……她使美成为庄重。

看看现实版的美人鱼。残酷的病症，总是拥有好听的名字。比如植物人，不是意味着两条清凉的手臂。比如东方美人病，其实就是多发性大动脉炎。还有，美人鱼综合征，它并不指一种牺牲倾向的情绪反应，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性下肢畸形。

看上去，像有条美人鱼的尾巴。患儿腹部以下完全粘连，两腿内侧直到脚踝都紧紧缝合，小脚呈微微向外张开的V形，脚趾大小排列错位，如湿答

答的尾鳍。他们伴有器官的缺失，甚至是肾脏、肠道、膀胱这样的重要器官。在子宫里，胎儿的两腿就长在了一起；他们的肠道无菌，是通过脐带，从母体里获得营养物质和血液里的氧气……存活，是安全的。一旦离开母亲海洋般的羊水，患儿的天折率极高，死亡，几乎是必然的命运。因为，不仅止撕裂鱼尾那么简单，他们还必须经过器官的重重再造。“美人鱼综合征”曾经的幸存儿夏伊洛·佩平，八岁时已经历过一百五十多次手术。

美人鱼的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这不是形容。

9

我曾猜测，美人鱼从十五岁开始，愿意承受分开双腿的剧痛，可能与性的隐喻有关。鱼尾闭合，所谓的鱼水之欢是在体外；人腿分岔，交合中才能深入侵犯……由此，美人鱼完成她的成年礼。

印象里的童话，是没有性的。其实，强奸、偷情和私奔，在童话里是并未被笔清沥净的内容。不过，儿童不宜的内容有时存在得非常隐蔽，只是一根隐约线头。

最后破壳的丑小鸭，兄弟姐妹都讨厌它，连鸭妈妈都驱逐它……那么，丑小鸭到底是谁？为什么被整个家庭嫌弃，因为它的样子，暴露昭然若揭的丑闻：鸭妈妈和天鹅的私通。丑小鸭，讲的是私生子逆袭与励志的故事。母鸭亲口抱怨，那个做了父亲的坏东西其实一次也没有回来看它们，它指的到底是孩子的哪个父亲？一颗天鹅蛋出现在鸭蛋里，看似荒谬其实并不奇怪……它们之间，是同母异父的关系。天鹅都是喜欢通奸的，连宙斯都装扮成天鹅和丽达交欢。

再比如，受到诅咒的公主将在十五岁被梭子或纺锤形的物体刺出血来。为什么是十五岁的青春期，为什么是纺锤形的？梭子或纺锤，形状和硬度，都类似男人的性器，是不断穿插到她们生活里的日常之物。十四五岁不仅通常是女性初潮的时候，在童话丰盛的漫长世纪里，这也是女性尝试和开始性爱的界龄。男人携带身体的纺锤形器具，刺入，并让她流血。

童话经得起阐读，乃至是谬解与歪曲。一种对《小红帽》的分析，把大灰狼解读为用花言巧语欺骗，然后在床上等着女孩到来的男人……狡猾的攻击者和天真的受害者。母亲“别乱跑”的警告，是对女孩行为的制约；而小红帽的行为，象征反叛。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过这则故事，但我认同，那些红帽红鞋，醒目夸张……讨厌又诱惑啊，那是一种经血般预示不洁与可能性的颜色。

孤单的小美人，除了依靠自己的身体，还能利用什么逆转命运，摆脱贫贱、悲苦和恐惧？就像被囚禁在塔里的莠苢姑娘，用自己的长发拉上了王子。既然这个办法行得通，莠苢姑娘为什么不把长发拴在塔里的窗钩上，然后顺着自己的发绳降落到地面……她只需要一把剪子，就早可以逃脱女巫的监牢。她到底是不满足于普通女孩的长发，要保持那一头金丝般浓密长发的传奇；还是，没有王子的时候，她尚未找到逃脱的方向，不值得轻率丧失身体的武器？且不管高塔本身，是否象征男性图腾，至少，莠苢成功地以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作为拯救工具……头发柔软又强韧，她体内秘密的甬道也一样，具有炫目又隐秘的超能力。头发垂下去，仿佛她钓下去的渔线；王子和她，将在塔的内部，进入意乱情迷的涡流之中。

而灰姑娘的故事，有不同版本。法国诗人贝洛改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赋予她一双水晶鞋。在贝洛的故事里，仙女教母让灰姑娘从园子里取一只南瓜，然后自己动手掏出瓜瓤；又让灰姑娘找到一只捕鼠器，把里面的六只小耗子变成六匹骏马，把一只大老鼠变成马车夫；灰姑娘捕捉的六条蜥蜴，被变成六名男仆。灰姑娘参与了魔法的诞生，她准备幻术所需的原材料。灰姑娘坐在南瓜马车的座位里，坐在簇拥的老鼠仆人之间，让我逼真地联想：灰姑娘其实是坐在一只捕鼠器的弹簧和扳扣之间，她自己是那块等待被偷窃的持续散发美味诱惑的奶酪。她知道那种危险的、惊心动魄的、改变结果的碰触……所以她不动声色，等待因其准备充分而必然到来的劫掠。我们知道，德国有个让女孩跳火堆的古老仪式：如果鞋子脱落，证明她不是处女。法国和西班牙教堂的中世纪浮雕，如果女性光脚，表示性堕落。而灰姑娘的水晶鞋，纯净又紧致，象征着完美的阴道……它在子夜时分被王子的沥青弄脏并且丢掉了。

10

即使是成人世界的性，也存在绝对的乱伦禁忌。俄狄浦斯生来就背负弑父娶母的厄命，他远走他乡，以期躲避和逃离，结果还是在不知情中娶母为妻，陷入盲者的深渊。可是在安吉拉·卡特编选的《精怪故事集》里，我读到《和自己的儿子结婚的女人》，叙述得如同和别人的儿子结婚的女人那么正常。

童话里，只认衣衫不认人。灰姑娘穿了舞裙，继母和姐妹都不认识她。即使有过子女的夫妻，公主提前跑到王子将要抵达的另一片土地，就能被他当成陌生的新娘。为什么朝夕相处的亲人，换上衣服，就彼此陌生？儿子甚至不认识变态爱慕自己的母亲，和她睡觉，并让母亲怀孕。

童话似乎不怎么看重生育之恩，甚至都不算作重要的事情。母亲可以生下拇指孩子，也可以生下野兽或者生下一口锅。母爱，并非无可置疑，可疑

的阴影在滋生。有些母亲即使死去也不忘成为女儿的保护神；有些童话，母亲比巫婆还阴险邪恶，甚至违背伦理，可以因妒杀死女儿，因爱与儿子偷欢。

童话大多展示的是母女关系，母子关系的比例相比更低。《和自己的儿子结婚的女人》以一对后来结婚的男女，分别展示了奇怪的母女和母子关系。女孩的妈妈出去拾柴，在路上生了她，用破布包起婴孩，扔到树下，就继续赶路了。作为弃婴，女孩是鸟儿衔食喂养的。男孩的妈妈呢，由于嫉妒，把娶来的儿媳赶出家门，自己涂脂抹粉扮成儿媳的年轻模样，与儿子睡在一起并怀孕。两个妈妈的下场不一样，不管女婴死活、从未喂过一口奶的母亲从此消失，或许逍遥在她的自由里；那个变态爱宠的母亲呢？曾与她交欢的儿子亲自点燃她身体下的柴和煤，烧死了她。在这样的价值观里，母亲的溺爱比母亲的遗弃更有罪。

不必追剿母性的缺乏——冷漠的母亲啊，她对自身的命运都如此冷漠。童话的价值天平非常奇怪，与现实中的兑换原则迥异。苏丹童话《阿赫和她的野母亲》里，为了减轻拾柴的重担，这个母亲请求狮子帮忙拎柴火，并把自己的一只手作为支付条件给了狮子。随后，是她的另一只手，她的一只脚，还有另一只脚。“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是我的天性。”母亲对自己的作为毫无悔意。失去四肢的母亲并未沦入悲惨处境，她野性大发，变成了丛林里的母狮；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做人的遗迹，是她在晚上回到女儿身边待一会儿，唱歌和找点吃的。为了减除乃至免除劳役，一个母亲肯放弃这么多，肯把自己的四肢作为食物喂给狮子。她是太沉重了吗？以致一根再细小的柴枝，都变成压死骆驼的沉重稻草？

和这个野母亲同样收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里的，还有一个惩罚严苛的母亲形象：《鸟妈妈和小鸟的寓言》。鸟妈妈有三只小鸟，要带着它们过河。她把第一只放在翅膀下，问小鸟：“孩子，等我老了，你会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载着我飞？”第一只小鸟回答：“当然啦！”鸟妈妈说：“你在撒谎。”说罢她就让小鸟滑落到河里淹死了。第二只同样放在翅膀下的小鸟做出了同样的回答，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只有第三只回答：“不会的，母亲。我怎么能载着你飞呢？那时候我就有自己的小鸟要载了。”真话获得母亲的肯定，它幸运地活到了河流对岸。鸟妈妈所表现的，是道德家所要求的寓言形象，而不是母亲的生理选择。没有人欢迎这样棱角分明的真话，锋利得够剪断亲情了。只要她在母亲的角色里，就会贪恋谎言里的温暖和安慰。我记得读这则童话时的沉默，因为，我觉得自己能以第三只小鸟的真诚完成第一只小鸟的回答。只是，我像只羞涩难以表态，因而颇近冷漠的小鸟。这只小鸟，不生育，她没有未来中的孩子，她将努力承住一只成鸟的重量……因为她的母亲将因衰老而蓬松羽毛，因年迈而松懈肌肉，因丧失行动能力而变成她需要载重的孩子。

母亲之所以经常出场，是因为对儿童来说，她确实是人生最重要的角色。另外，母亲有的是生理意义上的，有的是法律关系上的。童话里，寡妇多，继母频繁。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短寿常见。女人更是经常死于难产的床上。可惜，继母并非母爱的延续者，她常常是以女性面孔呈现的具体而家常的恶魔。

11

“妈妈杀了我，爸爸吃了我。”

格林童话里叫《杜松树》，《精怪故事集》里叫《刺柏树》，还有《鹅妈妈歌谣》，都传来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故事讲述一个男孩被继母所杀，她用箱盖砸断他的头，然后拎起来，把他剁成块儿炖煮；不知情的爸爸吃肉喝汤，称赞味道鲜美，再来一碗。继母所生的女儿，也就是男孩的小妹妹，在餐桌下捡到了哥哥大大小小的包骨头，埋到树下。杜松树忽然发出火焰一样的光芒，从中飞出一只小鸟。做完这些，小妹妹不再哭泣，她心里舒服，快活地回到屋里，吃喝起来。

男孩的冤魂化作青鸟，它唱起这首恐怖的歌谣：“妈妈杀了我，爸爸吃了我……”用这首歌在金匠家拿到金链子，到鞋匠家拿到皮鞋，又把磨盘套在脖子上。小鸟飞回家，还是唱着这支歌，把金链子给了爸爸，把皮鞋给了妹妹，用磨盘砸死了体若筛糠的继母。然后，重新变回男孩，他用后母的尸骨熬成了一锅汤。爸爸不满意，肉老了。当他询问自己的妻子去向时，男孩这样回答：“大约是去亲戚家探望去了。”就像当初继母敷衍自己的丈夫，男孩去看望外婆，或在朋友家玩儿一样。继子以同样的残忍，向残忍的继母复仇。

男孩靠自述获得解救。奇怪的是小妹妹，缄口不语。她为什么不敢说呢？妈妈又不会像杀了哥哥那样杀了她。还是说，她太小了，即使是掌击，也令她在颤抖中屈服吗？

知情者不说话。《美人鱼》和《野天鹅》里，都有哑巴的公主。安徒生像海底巫婆一样割了她们的舌头，让美丽的她们不能为自己申辩，反而让不能说话的苹果树和茶壶在那里饶舌。当妈妈把肉块扔进锅里炖了起来，小妹妹站在一旁哭着，眼泪都掉进锅里，所以连盐都不需要放了……等等，假如怯懦让她噤言，她为什么能目睹分尸现场，并且离得如此之近？只有贴近煮食尸块的锅，她的眼泪才能一滴不落地掉进汤汁里。为什么，她比屠夫更具备直面残忍的勇气，目不转睛，深嗅血腥？如果哥哥惨死给她留下创伤性的阴影，为什么，在目睹无论哥哥还是妈妈的惨死之后，她都能迅速满血复活，转瞬，就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

再残忍的事，似乎只要发生在别人身上都可以忍受，哪怕发生在亲人身上……看着血腥的尸块，我们是最有资格喝汤的人。

12

童话从来不是真空无菌的文体。

童话，是连在现实脐带上的胎儿，吸收现实的血氧，甚至入世的现实原则。比如，它要求你善待所有路遇者，冻僵的燕子、卡在树桩里的牛、流动缓慢的河、衣衫褴褛的乞食者……原本只身行路的主人公，会带领潦草莽撞的盲从者，怀着各自的好奇和热情奔赴远方。这些看似毫无功用之辈，会在随后的劫难中施以拯救。童话暗示，你不要怠慢他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化装成的贵人或恩人；否则，他们会转化为仇人或小人。

还有，赤裸或含蓄的血腥，野蛮与残忍的暴力。暴力尾端的血，性初潮的血，同样涌上童话的古老羊皮纸。就尺度而言，童话甚至比许多文体更大。被挖出的眼睛、割了的舌头、掏取的肝脏，被野兽的利齿利爪撕成肉条，被燎烈的火烤出油脂，荒谬、怪诞、恐怖的情节比比皆是。酷刑不仅是砍头，煮汤，烧成灰烬，还包括心理摧残，比如把尸体切成块儿，风干后裹上米，送给死者的亲人吃。只不过，童话里的暴力，似乎恶作剧般带有天真的游戏感。或者说童话里，有着对恶行的虚化与美化，一种“卑鄙艺术学”，充满欢快的残忍、明亮的血腥，是爽快或狡黠的，无动于衷或兴高采烈的。

暴力、性和脏道德，本是童话里禁止出现的内容；而它们频繁，像血色一样使情节鲜艳。

因为，童话里的内容对现实的僭越是普遍的、高强度的、夸张的，美得极端，爱得极端，恨得极端……所有的倍数都放大，也包括暴力。何况经典童话所诞生的年代，人治色彩重于法治，谋害和残杀，都比今天频繁和日常。暴力的介入，但愿能给儿童刚刚起步的人生打上一针疫苗，以使他们从此形成心理上的免疫和抵抗。

13

谁是施刑者？

这是一条标准的童话公式：坏心眼的人在开头用阴谋杀人，杀得鬼祟；好心眼的人在结尾用酷刑杀人，杀得磊落……报复相当残酷，因为正义收取高昂的利息，甚至不允许坏心眼的人反悔和认错，一次失误，足以招致千

刀万刚的杀身之祸。

我其实并不喜欢白雪公主。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雪公主还不如坏皇后善良。出于嫉妒的坏皇后，至少难以直面白雪公主的死，才指使猎人在偏僻地下手；即使坏皇后迫切渴望对手死去，她采用的是让白雪公主安乐死的方式，过程无痛，并且享用水晶棺的白雪公主无损美貌。而白雪公主纵容甚至就是指使，给她的继母施用铁鞋酷刑，用她凄惨的哀号来为华丽的婚礼助兴，似乎那更能彰显她复仇后的荣誉。白雪公主的兴致和乐趣，不说邪恶也够冷酷。

当然，王子们永远宠着白雪公主，不以为意，可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男生有什么判断力呢？不辨是非曲直，只要白雪公主有足够的美貌，他们就只知道穿着芭蕾紧身裤来显示发育中的生殖器。童话的公式还有一条：没有现实化的婚姻意义的结尾。“公主与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有谁向我们揭示，疲倦的幸福持续了多久，之后是否接续斑驳的命运。白雪公主永远是白雪公主，她不会长成坏皇后的样貌……即使从推理上讲，坏皇后的样貌就是一个老了的白雪公主。

童话里的成年妇女容易充当反面角色。巫婆或者后母，都生着一张割茎断根的镰刀脸，根本不配拥有爱情。一个乡下老太婆想和小伙子结婚，小伙子要求她把湿床单裹在身上，才能在早上接受她，痴情的老太太，当晚就被冻死在结冰的床单里。小伙子松了口气：“谢天谢地，老太婆再也不会来烦我了。”但小伙子可以直接拒绝呀，何必给予致命的报复呢？是老太婆不切实际的情欲，让小伙子感觉受辱吗？

我们知道，童话中的女人热衷嫉妒。嫉妒的理由千奇百怪，一个妹妹遭受迫害，可能因为姐姐嫉妒她的美丽或者更早的订婚。但老女人不被嫉妒，只被厌弃。这些窃想者，下场可怖。丑姑娘、仆从、老太婆，想获得本不应该的爱情领土，她们得用血肉喂养。另一个老太婆，只是偷吻爱慕中的王子，因为这种越位，“他们把老太婆的骨头做成短梯，供姑娘爬到床上。姑娘把老太婆的皮做成地毯铺在地上，又把她的头做成盆，好在里面洗脸……就这样，姑娘嫁给了王子。这是她的宿命”。

惩罚残酷，是童话的规律，不过，对“坏人”是严苛的因果相报，对“好人”是赦免所有的罪。那么，谁好谁坏，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童话常常势利，以貌取人，以财富和地位论断人。

在克什米尔的童话《中国公主》中，国王在圣人的怂恿下，亲手将自己的爱妻推进烤炉，然后烧毁整个房子……他从这场谋杀中获利。他迷恋的中

国公主，只剩灰烬以及灰烬中的一块鹅卵石。国王和圣人平分遗骸。国王所挑选的这块鹅卵石，不知是由妻子的心还是胆熔炼而成的，它的法力，能把碰到的金属都变成金子。

为什么，国王对中国公主的爱意与日俱增，转瞬，他就进入谋杀的果断与快感里？因为圣人告诉他：“如果一条蛇一百年没被任何人看到，它的头上就会长冠，变成群蛇之王；如果再过一百年还是没被人看见，它就会变成一条龙；要是三百年都没有人看到它，它就会变成拉弥亚。拉弥亚拥有巨大的魔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外形。它非常喜欢变成女人的样子，就像你的妻子这样啊，国王！”

三百年，她在沉默中独来独往。是孤独的力量，使这位隐士获得自由，可以按照心意变化形体。现在，这个妻子因为是一条蛇而必须去死，无论她是多么美丽温顺，无论她是多么纯真无辜，无论她曾怎样与我们同舟共济，也是同床异梦的敌人。她的外貌就是她的罪行，她的身份就是被处死的正义理由。不，位格应该降级为“它”，因为不配享有人的灵魂、情感和命运……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从种族歧视和奴隶制中解脱出来。无论具有怎样的神通，只要非我族类，就是异端，杀无赦。

成为庸众，就拥有生存的安全性。成为标签意义的好人，就拥有更高的安全性，甚至是杀人的安全性。都说童话教给儿童真理和公义。我不这样认为，童话里教的谬行和不义不比前者少。无论是偷窃财产，还是宣泄坏情绪，都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被当作正面形象的主人公并未因此受到行为责惩，甚至道德声讨也没有。阿里巴巴拿到了山洞里的财富，那些匪徒不仅失去钱财，也失去了性命，被阿里巴巴的仆人用热油烫死在躲藏的罐子里。

原来，舆论和法律的高弹紧身衣，可以随物赋形，任由行动而不受限制。正义者越过常规，只要为了一个美好的结果，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幻境，可以毫不犹豫地消灭多少鲜活的肉体；正义的钟声有力，像机械臂力把坏人的头颅砸入隔水隔光的地狱，让他们不再享用下一个春天。是的，他们会杀人，就像运用刀叉那么优雅自如……也许正因此，他们才把自己定义为好人。

15

童话鲜艳如玫瑰，支撑花的茎，却密布棘刺。我们看到无畏到无耻的勇士，为了财富肆意杀戮。柔弱到懦弱的美人，委身于沿途的命运。愚顽到愚蠢的怪物，相信拿着誓言当戏言的情感骗子。万能到万恶的宝物，它的光芒下堆叠无数曾意欲攫取、却已属于尸体的手。有美，也有彻骨的寒

意……欢迎来到童话的冰雪纪，领略凛冽的纯洁，领略复仇中致命的公正，简约的真理也不因其正义而减少粗暴。最有力的美，携带暴力，如同死神之吻让人彻底沉陷。

童话里为什么有大量不合逻辑和伦理的段落，大量含混乃至毁灭性的道德呢？童话常常来自民间，是由不识字的人创作和讲述，受限的教育程度使他们不受礼数和伦常的约禁。他们自身遭遇暴力和欺压，反过来，情节的解决手段也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

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像童话那样获得了为所欲为的豁免权。它可以获得物理世界失真的完美，也可以拥有极权的能量。

往往，儿童并未留意其中的残暴色彩。他们没有那么深重的道德，甚至连深重的同理心也不具备——那些需要足够的阅历才能养育出来。孩子会用小刀把蚯蚓碎尸万段，旋转螺丝钉那样旋下蜻蜓的头，用火点燃猫的尾巴……他们无动于衷，乐在其中。他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疼，他们的情感没有足够的丰富，数年之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以己推人和感同身受。童话让他们成长，也让他们吸取着其中的残渣，尤其成为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品。

经典，就无人质疑，就可以隐藏无数条魔鬼的遗嘱。也只有隐藏在童话里，隐藏在对儿童的教育里，它们才能在传承中，得到永生。

既有至美，也有对称的黑暗……但我们歌颂童话的完美就像歌颂皇帝的新装。我们没有勇气，揭穿裸体的真相。因为，皇帝会要了我们的命；或者因为，我们的羞耻会从麻木中苏醒——那也是一种会要命的理性。就让我们沉浸在欢呼中，在彼此的噪声中淹没。我们宁可杀了那个多嘴的孩子，也不愿因此被证明懦弱。

胆怯和回避，导致我们被一直欺骗……被别人，被自己。乃至，终生。

16

童话有个特点。某个讲述者的故事，倾听者像鹦鹉学舌一样，向他人完整复述，一遍又一遍。或者就是主人公自己的遭遇，他无论沿途碰到谁，结果子的树、动物、过路的陌生人、神仙，他重复着，不厌其烦，不落半个细节、一句对白。下一个段落简直就是上一个段落的回声，如一组镜像迷宫。

然而，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健忘症患者每天所做的吗？我们并未从童话和历史中提炼经验、吸取教训。换件衣服就不相认。情形一致也不相认。无论

情节和细节多么相像，我们不认识，固执地一再重复灾难……厚重的刃，犁出血槽，无数人死于同一把刀下。

童话的魔法，不仅指无中生有、滋生万物的宝贝，还有神奇的修复能力。被挖出的眼睛能够复明，肢体残疾可以痊愈，被损毁的世界也有壁虎尾巴一样灵活的再生功能。之所以健忘，因为付出的代价不值得珍重，它们随时可以在魔杖下卷土重来。极权的童话不在意牺牲，极权的历史不需要记忆。

童话可以隐喻历史，历史可以编撰童话。成人虽然与童话世界渐行渐远，但一直利用童话来抵达自己的愿望和目的。童话的遮羞布可以用来蒙住牺牲者的眼睛，不过，即使被直视也无妨，他们可以用童话的外衣把自己的残忍掩盖起来。无论多邪恶的目的，都可以在包装下纯真无辜。

魔鬼，可以在童话里借尸还魂。德国的希特勒也说要带领人民，开始一场前往童话天堂的浩荡而伟大的行程，他们站在绝对而完美的童话理想境界上，杀伐无度，一个个躺下去的生命，让他们每每发现自己脚下的道德高地又往上长了那么一厘米。他们根据自己内心的嗜好，极其自我地构建起一个任意宣判的法庭。他们披着天使外衣，可以完成恶魔都难以完成的恶行，却以为构筑起一个适合孩子的天堂。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看成最伟大的童话建筑师。

童话可以是一种致幻剂，它能够弯曲现实的弧度。把扇子看成孔雀、桌子看成犀牛只是初级的迷乱，然后，是彻底的颠覆：是真魔鬼可以任意指认谁是魔鬼；是你，自愿把毛骨悚然的世界认作金碧辉煌。

想想吧，《蓝胡子》的故事原型，是十五世纪的骑士吉尔·德·莱斯。他曾参加战斗，后来沉湎变童，诱拐、强奸并谋杀了至少几十名儿童。他承认“玩弄儿童，并从折磨和杀害他们的过程中获得纯粹的快感”。当他进入蓝胡子城堡，成为童话传说中的人物，鸡奸并杀害小男孩的恐怖行径，变成了一个男人因七个妻子难以克服的好奇心而将她们全部杀死的近于英勇的光荣事迹。

我们也许不能准确把握，一个故事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寓意，就像童话里的母亲可以奇怪地生下一口锅。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童话在现实中，留下的，是一枚血拓印。不过，就像不追究好人的罪一样，我们也不追究童话的恶。孩子的无辜不容置疑，童话的纯真不可指摘。

气候舒适，自然风光也美，她家附近就有海鸥、鸚鵡、骨頂雞等多種鳥類。朋友說，數年前，出門跑步還能碰見袋鼠。作為宜居城市，墨爾本特別適合我這種懶散者，拿散步當鍛煉。只不過，這片移民新區都是面積遼闊的別墅，入住率不高，到晚上，到處充滿那種富人區特有的黑暗。

有一天晚上，我去散步。想起白天和朋友聊天，她說我們都是童話的順民，即使成年之後，具有了分析理性，再看童話，立即降為幼齡孩子的低智，固守當年的閱讀體驗，从不詰問。她的想法令我思考。也許童話提供了另一版本《皇帝的新裝》，小孩子、大孩子、老孩子集體歡呼那種失真的完美……只有成長者，敢於說出其實從未偽裝、幾近裸體的真相。童話和現實映照，鏡像相反……所以那個勇敢的揭露者，在童話里是孩子，在現實里是成人。

走着走着，我心生迷惑。有沒有可能，是我們辜負了童話的古老智慧？它从一开始，就坦率得近乎冷酷地告訴孩子：好人未必就那么好，壞人也未必就那么壞。問題出在閱讀者自身。每個人，都是自己意識的皇帝，甘願被騙術圍繞。也許，我們都是那個穿新裝的皇帝，由於怯懦，努力說服自己，有如相信神話般相信童話。我們沉湎於節日狂歡，忽略、拒絕和厭惡那個小男孩發出的噪音。

我不知不覺，走到一個陌生池塘，它被高高低低的葦葉圍繞着。我感到的是植物那種美好的清涼。索性坐到岸邊，我看夜空，星宿滿天，好像有場天上的暴風雪徹夜不息。蝎子座，揚起有毒的準備蜇死眾神的尾鞭。我試圖從密集的光斑中，辨認更多的星座。

几乎是直觉，我感到有什么在暗夜里向我靠近。对面的黑暗里似乎窸窣作响，极为轻微，若有若无。我警惕地盯着，一直盯着，对面什么也没有——只是黑暗。我变得不太肯定，怀疑，一切只是我的敏感和错觉。

至少过了半分钟，或许更长时间，我惊觉，有一团黑暗是活的。水汽浩大，消弭着那种不属于人类甚至不属于人间的禽兽气息。瞬间，我看到了它：黑暗里的那团浓黑和那点艳红。

黑天鹅。

那一刻，我分辨不出，是被席卷而来的美还是惊恐钉在原地。如同走在森林的寂静中，隐隐嗅到不安的气息，然后突然看到一张斑斓而生杀予夺的面孔。黑天鹅优雅，只是血喙，如同黑布托起的扁凿，如同刚刚行凶过后的滴血器械……它不动声色，向我靠拢。

男左女右

1

二〇一八年十月六日下午的临时决定，让我在那个十一假期的尾声里充满悔意。悔意浓重，到悔恨的程度。我对即将到来的日子，满怀绝望。我一边沉浸在沮丧无助的情绪里，一边听着“唰唰唰”那种忽大忽小、不规则的噪声持续从卫生间传来。那是混合着尿粒的石粒垫材，被带着怒意扬出笼子的声音。这双激烈劳动的手非常袖珍，它们，只有我的指甲盖那么大。

我错了，不该信任它们幼萌的长相，害人精造成的祸患远超预期。精神上遭受的摧残让我成了一个娶了祸水女人的倒霉蛋，一时的失控可能换来多年的悲剧。

一个星期以前，我偶然从网上看了几张黑尾土拨鼠的特写，当场意乱情迷：天哪，怎么有这么可爱的萌物？无论站坐、发呆或窃窃私语，它们都让人忍俊不禁。胖墩墩的身材，肥圆的小肚子，短短的爪子，吃东西时用双手捧着的姿势、快速咀嚼的嘴巴和鼓鼓囊囊的腮帮。土拨鼠的身体比例关系就是可爱的，企鹅也是这种类型，日常行为也逗趣。

我想到宠物店里看看，没打算买。我承受不了养育的麻烦，从孩子到宠物。每天到阳台报到、等待喂食的十只流浪猫，已经是我甩不掉的心理包袱。何况，养鼠？猫与鼠，对付这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我缺乏平衡的技巧与耐心。

宠物店的场地中间，用玻璃围成的几米见方的围栏里，圈养着二三十只黑尾土拨鼠。这是些小小的移民，它们来自遥远的北美大陆。据说国内尚未掌握繁殖技术，所以宠物店的墙壁上粘贴着海关检疫证书，说明小家伙们通过了人类的卫生要求，不携带鼠疫等令人闻风丧胆的病菌。养这类异宠，往往要从幼龄开始，否则它们将终身保持着警觉的距离，不易与人亲近。没有刚刚断奶的，一窝两个月大的适龄幼鼠也已被预订，仅剩的这些土拨鼠已经快四个月了——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它们也许属于年龄偏大了。即使要养，我也等明年的新生鼠崽吧，这期间，我正好冷静一下，想想自己能否承受宠物带来的拖累。

店家是个眉目清朗的小帅哥，他一伸手，几只大胆的土拨鼠站直身体，踮起脚尖，尽管站立不稳，它们也摇摇晃晃，尽量上举手臂……我不知道那是它们的好奇心驱使，还是出自一种索求抱抱的渴望。总之，它们擅长营

造出一种“你非常被需要”的幻觉。

我告诫自己：警惕，千万不要落入它们的陷阱。我转移注意力，去看宠物店里那些有鳞彩、没表情的蜥蜴。看起来，它们独立而冷漠。这种动物适合上班族吧？好像既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也不必因为缺乏陪伴而负疚。可惜，我不喜欢养蜥蜴或鱼这类动物，因为体会不到情感的互动。

大概一个月以前，我开始构思新童话。这个选题属于“命题作文”，要求是发生在动物园里的喜剧。我感觉吃力。写散文时，我的思路是顺畅的，语言障碍少；写童话，我需要进行思维上的转译，需要在情节上不断推进——这超出自身能力，让我分外焦虑。仅仅勾勒动笔前的梗概，多普勒测试仪显示，我已出现明显的脑血管痉挛现象。养个宠物，或许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不不不，太麻烦，还是算了。

多数土拨鼠都缩在玻璃箱体的一个夹角里，除非一把食物从天而降，否则，它们挤成几乎不动的群体。个别的，沿着边线跑场子，唯有一只土拨鼠特立独行——它兴致勃勃，在玩跑轮。它一会儿在外面推动跑轮空转，一会儿钻进其中蹬踏，古铜色的金属跑轮像复古的电扇那样转动起来。别的土拨鼠，尾巴像毛笔头儿；这只与众不同，尾巴呈斜梯形。问店家，得知土拨鼠在情绪紧张的情况下，尾巴容易炸开；但看它，不像，更像是尾巴的发型天生不同。它在困境里自信且独立，积极而逍遥，甚至是怡然自得。土拨鼠长相酷似彼此，像从同一模具里翻制的月饼，群体中难分彼此；凭借这条独特的尾巴，我能一眼认出它。何况，它是摊平了趴在地上休息，小脚丫像外八字一样撇在两边；其他的，都是缩成自我防御状态的球体。我观察了一会儿，它自娱自乐，旁若无人。它打动了，改变了我的主意和心意。虽然得知它是女宝宝时，我略感意外。

本来只买一只，这个女宝宝是我心仪之选。可土拨鼠是社会生活发达的群居动物，想到以它开朗活泼的性格，却要终其一生，孤独地生活在陌生的巨兽之间，相当于一个人被独自运往火星，然后生活在一群恐龙之间……我心一软，算了，给它找个伴儿吧。

店主隆重推荐一位男宝宝，它的脑门上，有一道马克笔画出的黑线用以区别——马克黑身价最高，两千五百元，其余都是一千八百元。马克黑并非因长相俊逸而成为王子，是因性格超好——即使陌生人，把它凌空抄起，翻仰向上，后脑与地隔着足以致命的高度，它依然报以高度的信赖——不抓、不咬、不挣扎。它摊开四肢，露出柔软的腹毛，长久保持被迫的姿势。

看马克黑的表情，我怀疑它的温顺中，更多的是畏惧。我略一犹豫，店主就挑选出一只毛色最浅的雄鼠，说它好看。这只男宝宝眼神晶亮，端正健

硕，经过长途的颠沛流离和集体生活的你争我夺，它的皮毛顺滑而完整，不像有些小鼠，磕蹭痕迹明显。但我有种奇怪的预感，觉得这个男宝宝会比较麻烦，所以要求店主再换一只，不想要它。店主还是力荐这个男宝宝，说它与女宝宝的大小和色泽，匹配度高；他建议我在它和马克黑之间，挑选一只。犹豫之下，好吧，就是它。就这样，在品性和颜值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取了名字，男的叫左左，女的叫右右。

2

然而，这位鼠左左，英俊而暴躁。就是它，当晚就让我崩溃。

我知道它是土拨鼠，天生就是挖掘机，可左左强大的决心和破坏力，还是令我震惊。左左用它那比缝纫机还高频的门齿，把笼子的塑料底边啃破了角；用它那看起来火柴梗般脆弱的手指，把砂石扬得像火热的建筑工地。

鼠左左是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逼疯的男性。在它到来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几乎没睡，听它上演全武行。上蹿下跳，左奔右突，前顶后撞。啃咬踹踢，肢体动作多不说，话也多。有个土拨鼠的网红视频，是只喜马拉雅旱獭，跺脚之后，以中年男的音质大喊“啊”。土拨鼠不这么叫，真实的声音是叽叽喳喳的，像鸟，不是大叔的声音，反而非常萝莉。以左左那样的噪音，那样分贝的动静，就算是喊声吧？听着像一只折翅的伤鸟。

带左右回家是仓促的决定，各方面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店家垫材缺货，没有木屑或玉米芯那样的软料，给了我一包替代的爬宠砂粒，质地干燥坚硬，更适合龟或蛇。这成为左左发动攻击的武器。沾着尿味、裹着屎粒的砂石，被它扬撒在铁笼四周，散发让人恶心的啮齿哺乳动物的臭气。

我购买的玻璃饲养箱几天之后才能到货，它们暂时在这只原本的刺猬笼子里栖身。说暂时，是因为空间狭促，的确委屈两只热爱运动的小家伙；另外，也关不住，黑尾土拨鼠智商高，会开锁，越狱易如反掌。只能趁它们尚处于不了解情况的不安全感中，拿小铁笼当个权宜之计。铁笼的弊端立即显现。仿佛有场隐形的地震，震源处发出源源不断的臭气和噪声，通过一双精巧的小手，向周遭呈涟漪状扩散开来……振幅如此辽阔，不仅我的房间里弥漫鼠气，包括被熏陶的我，闻起来，都臭味昭彰。

左左，这个叛逆的问题少年，令我当晚几乎一夜未眠。天亮以后，左左的强烈反抗日以继夜，体力不减。我发现自己被严重干扰，几乎一天，水米未进，从忧心忡忡到精神恍惚。我还以为养宠物能缓解脑血管痉挛，没想到不切实际的一念之差，导致我感觉自己的脑血管都快爆裂了。

男左女右，作为配合默契的搭档，它们肩并肩、背对背，锲而不舍地扬撒沙砾。这个迅速组成的反抗联盟，让我们两个临时家长一筹莫展。我羞愧地联系了店家，希望能够完璧归赵，愿意为此赔付一千元钱。提议遭到拒绝，人家答复：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店里以黑体字明示过了——售出概不退换。

怎么办呢？同在一个屋檐下，它俩的余生，会让我的余生苦不堪言。

男家长想出一个新办法：“要不，我们直接送回店里？它俩连同买的用品和粮食，都白送，我们不要退款，不耽误他卖给别人。”这回行了吧？毕竟，这对尖牙利爪的小祸害刚刚到家。我苦笑，自嘲这是比嫖妓都贵啊，一夜花了四千多；还没能近身，我压根就没摸过人家。

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留宿一夜的土拨鼠能让店家白赚四五千——竟然不行，人家坚决不接收！我总不能把两个小东西，像弃婴一样装进摇篮，写好纸条，然后鬼鬼祟祟放到人家门口吧？也许店家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我们这样匆忙决定的蠢货，而小暴徒会越来越长大，成为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麻烦。

算是砸在手里了。黑尾土拨鼠的寿命，有的是五到八年，有的甚至更长——我估计这些年自己都不会消停。

也许觉得室温低，也许需要相互安慰，左左和右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深埋在抱缩的趾爪之间，团成两个紧张的球体。它们挤靠着，样子可爱又可怜。我凑近，它们一动不动，不肯也不敢抬头观望。

我想象它们漂洋过海而来，想象在很大很大的飞机舱里，它们也曾很小很小地蜷缩自己。大而轰鸣的黑世界，对比着两条孤弱的小生命，像长篇小说里两个不起眼的标点。我叹了口气，心生怜惜。

睡吧，左左右右，晚安。

3

我在网上查资料，想听听经验之谈。笼子至少要静置一周，让土拨鼠充分适应环境；要增加手喂机会，以建立亲近感；不要很快放出笼子，不要贸然抚摸，等等。

左左和右右刚来时，样貌酷似对方，不容易分出张三李四；观察中渐渐发现，它们从外表到性格，都大相径庭。左左是浅金色的，右右是熟杏色的，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像两个成精的猕猴桃。左左圆头圆脑，眼睛是

橄榄形的，有时呈莫迪里阿尼油画中的人物那种眼形。拍出的相片里眼仁漆黑，日光照射下瞳孔的颜色没有那么浓，但它依然可以用咖啡豆一样的眼睛，表达对我的怀疑。右右眼睛小，在土拨鼠里算是眯缝眼了，腮颊微陷，比左左略瘦。乍一看我经常在恍惚中弄混，后来左左越吃越多，右右越吃越少，差距才逐渐拉开。

有些小鼠天生亲人，有些警惕高、攻击性强，不肯当面进食。左左贪吃，非常馋，对食物毫无抵抗，喂什么，它都如饥似渴，把食物的一端咬在嘴里，抢夺一般加了甩头的力气。我喂的是土拨鼠专用粮，是以提摩西草为主的草棍，一厘米长，我的手指得小心捏住草棍后端，以防被鲁莽的左左隔着铁丝咬到。为了食物，左左不惜铤而走险，它抢食的时候，简直有点气势汹汹。到家不久，为了和右右争夺我指端捏住的一截土拨鼠粮，左左对食物失控的热情让它来不及分辨和判断，就跳起来一口咬下去，误伤了我的手指。尽管知道左左并非有意，我也气得数落它。如果有错，左左的表达方式不是躲到角落里反省，而是叽里咕噜，一通辩解式的回嘴，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左左在我的指甲上留下一个麦麸色的咬痕，小米粒大小，但指甲底端出现一道纵向的深裂。我不知道用多长时间，它才能缓慢上升到能被剪除的高度。疼痛、烦躁加之无措，我恨不得拿左左喂猫。

左左的吃相，倒是有几分庄重和威严：站得笔直，腰背挺拔，两脚叉开，手里抱着一截草棍，就像站在麦克风前进行讲演。左左多吃多占，如果自己那份吃完了，就从右右手里抢。右右吃东西时，驼着背，像只掉了尾巴的秃松鼠——不过黑尾土拨鼠本来就属于地松鼠科。论仪态和神情，左左气宇轩昂，右右略显平凡，这是颜值和做派导致的落差。

左左是美男子，长相英俊，仪表堂堂。右右长得没那么好看，显得獐头鼠目的——一共就两颗门齿还没长齐，一颗有点往前，一颗有点往后，但尖嘴猴腮，照相好看。不过，土拨鼠的好看或不好看，有多大意义呢？性格好才是最实在的。土拨鼠体现了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的原则。

左左的毛病多，情绪易激动，有时无端大喊大叫，像头袖珍的驴。声音古怪，既非大鸟又非小兽，高亢、短促而持续——声音也是袖珍的驴叫。刚到家的左左扬撒垫砂，我以为那是偶尔的应激反应，错了，左左就是有这个人类看成恶习的毛病。不仅如此，土拨鼠嗜好拆家。虽然到处磕咬和翻刨是土拨鼠的本性，可家里来了惯偷的感觉也够烦的。当然右右也爱搞破坏，尤爱撕扯。结实的棉窝很快变成碎布头，得三天两头地换——右右和多数雌性土拨鼠一样，是名副其实的“败家娘儿们”。可右右亲人，它的缺点可以被视为淘气；左左像是生性顽劣，经常拿出攻击架势，不知是虚张声势，还是痞子式的尚武。

我很快发现，左左体型壮硕，其实胆小。如同有些动物面对猎食者，防御

措施是突然扩张自己的体积——左左进食的威武姿态是出于紧张，反而是左右的驼背塌肩代表松弛。因为紧张和过度焦虑，左左才反应过激。数天之后，我第一次打开笼门，让它们在阳台附近跑动一下。大胆而果断的右右抓住时机，立即展开探索；左左相反，完全不敢迈步，它退回角落，疯狂刨沙——这同样是在宣泄紧张。我强制把左左带出来，它的确吓得屁滚尿流——留下一连串尿粒，它跌跌撞撞地逃回笼子，抱缩于角落，再也不肯移驾半步。隔了两天，我第二次给它们放风，左左吓得在外面疯跑，几近癫狂——抱头鼠窜，这个成语形容的状态非常准确。我只好戴了防咬手套，抓它回窝。惊惧之下的左左，隔着牛皮护具手套，下死劲咬了一口。几乎又是上回的指肚位置！疼得我从食指到肩头的一根血管像被突然烧红。怕摔着这个小浑蛋，我忍着剧痛也没有脱手；但把它扔回窝里，忍不住咆哮着用手套打了它两下。左左表情狰狞，龇牙尖叫，美色全无。

左左既粗鲁又神经质，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当我趁左左睡觉紧缩四肢的时候，从笼子缝隙小心地伸进手指，我触碰的，像是包着一层皮毛的混凝土，没有任何弹性。我尝试握左左的前爪，冰凉的小拳头握得很紧，肘部以超乎想象的力气夹牢，抗拒着我的善意；有时甚至张嘴，露出示威的长牙。我悔意浓重，唉，当初不要它就好了。对比鼠左左的不堪，马克黑在我的虚拟回忆里，越来越成为一个趋于完美的理想男性。可怜的右右，命运悲伤，要和左左这个小浑蛋厮守一生。别看白天左左是个打劫食物的强盗，到了晚上，就成了伪娘；即使它不再把自己抱成紧张的球体，也采取侧卧姿势，头非得枕在右右的怀里，还要被右右的胳膊搂住才踏实。

4

相比睡眠中依然紧得像个铅球的左左，右右是放松的。右右到家没几天，白天就把头扎进垫料，像小舢板那样划开水面、破浪而行，休息的时候伸长手脚、摊扁身体，像靠岸停泊的船；晚上，右右摊开手脚，睡得像个大大咧咧的老爷们儿。我只要一伸手，胆子大的右右就靠过来，把脸贴到笼子上，带着温驯和满足的表情，享受铁丝缝隙里有限的接触。之所以成为视频里的网红，是因为土拨鼠可能患有皮肤饥渴症，抚摸能为原本群居的动物带来安慰。土拨鼠闭起眼睑，仰起下颌，它有一张陶醉到迷离、几近晕厥的高潮脸。只要一摸上右右腮帮，它从鄙视眼秒变高潮脸，仰起下颌、摊开肚腹，仿佛丧失所有自主意识。很快，右右学会站起来，像是机场过安检那样乍起胳膊，让我搜身般把它的全身摸索一遍，还常常就势抱住我的手指，脑袋赖在我的掌心。

右右聪明灵巧，胆子大，心眼多，好奇心重，热衷冒险。关在暂时栖身的刺猬笼里三天，右右就学会溜门撬锁。我用铁丝把侧门拴死，用最沉的字典压住上面的出口。右右隔着笼子，把字典啃破一个很大的缺角，然后大

力推举——幸亏我在现场抓个正着，它才逃跑未遂。随后，左右以其利断金的决心咬断铁丝，搞得我手忙脚乱，赶紧修补。

熬到它们到家的第九天，玻璃饲养箱到了，专门用于阻止越狱的。连我都需要按平双手，掌握着分寸，平滑用力，才能打开玻璃推拉门；就凭它们分币大小的袖珍手掌，那点微不足道的面积和力气，根本不足以愚公移山。

我组装箱体，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算安装完毕；把它俩抱进去，就像完成了潦草的乔迁。第二天清晨四点半，我怕它俩抵抗不了秋凉，起来给它们放了一只新棉窝。右右马上会意，率先钻进去；笨左左跟着，它做什么都不得要领，好在它懂得妇唱夫随。

两个小时以后，天光放亮，我隐约听到异响。我赶紧前去查看，惊讶地发现，光着脚的左左站在玻璃缸门外——见到我后，它发出一连串高亢叫声，几乎相当于得意的仰天大笑了。玻璃缸的配线口，不知怎么被打开了。那是个直径几厘米的孔洞，用内有旋卡的扁圆塑料钮堵着。我昨晚肯定扣上了圆钮，但它现在分明脱落在地上。

左左围绕玻璃缸四周打转，在我的监控下，它才敢向外围小幅度探索几步。不用说，左左是从犯，主谋和肇事者肯定是高智商的右右。但右右毫无踪迹，无论我怎么呼唤，它一点声音也没有。

所有房间搜查一遍，没有。难道，去了地下室？那里堆积书籍，收纳着过季的衣物，使寻找变得非常困难。我在地下室驻足，倾听，一片寂静。右右仿佛人间蒸发了。

可它再心思缜密，还是被自己的屎粒出卖行踪。看来，右右探索了地下室所有的边边角角，所有能够抵达的远方，它都已独立造访。我颇费周章地翻翻拣拣，同时感觉可笑，因为自己的行为正像一只巨型土拨鼠。我确信，右右此时正躲在某个角落的阴影里，窃喜。我抬起跑步机的液压轴，终于在合页深处，在这个最不易被发现的藏身之处，捉拿了自鸣得意的潜逃者。

等我把千辛万苦找到的右右送回玻璃缸，眼见它补充了半块草饼和几片胡萝卜之后，熟悉地回到那个配线口。右右再次试图转动旋钮，动作娴熟，就像电影镜头里的劫犯在转动银行金库的大门。

右右对食物不感兴趣。如果说左左有近处的苟且，右右就有诗和远方——从性情上看，右右像个文艺女青年。它喜欢抚摸和自由，尽管两者存在矛盾：一个需要远离人类，一个需要靠近人类。或许右右觉得，只要逃出笼

子，可爱的自己就能同时赢得自由和爱抚。尤其清早，右右疯狂地磕笼子，声音巨大，它大概觉得自己是只公鸡，是负责把我叫醒的。它爬上爬下，寻找越狱之路，运动天赋惊人。

阳台上有个亚克力材质的书报架，整体透明，中间只有几根细而光滑的不锈钢横杆——相距遥遥，超过左右体长。男家长判断，纵使土拨鼠拉长身体也够不着横杆，就没有移开放置到书报架顶端的塑料喷水壶。我第一次听到响声，发现喷水壶倒在地面上，以为是左左和右右撼动基底震落下来的。同样的情况发生第二次，我就猜到，大概是它们之中的谁爬到上面去了。

男家长不信，于是右右在他眼前当场表演一场精彩绝伦的攀缘。我们错愕地发现，右右以流畅的速度很快抵达顶端——快到，它借力用到横杆、侧板的孔洞、搭在后面的空调缠管，我们甚至不能复述它的行走路线。右右手脚的每个落点，都处于不可能的边缘，然后它完美地利用自己攀岩运动员般的头脑和肌肉，成功抵达。右右花样迭出地冒险，乐此不疲。

我愿意放出来散养……但猫狗在人类居室里可以随意走动，它们的自由是彻底放弃反抗带来的，是人类可以控制的自由，可以随时给予或收回。而黑尾土拨鼠，还不习惯受到限制。别看黑尾土拨鼠有金属光泽的皮毛那么顺滑，别看它们的爪子精致而脆弱，可它们的趾甲长而尖，就像库克船长的铁钩手。就是依靠看似易断的关节和弯成弧度的小镰刀趾甲，它们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能量和耐力，快速掘进，徒手开凿庞大而复杂的地下隧道。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它们只能到处啃咬和翻腾，来小试身手。无论是苹果枝还是火山灰的磨牙石，它们对这些专业磨牙用具不太感兴趣，更喜欢给人类带来烦恼的方式。它们啃家具、窗帘和鞋子，用它们的嘴来入木三分地了解这个世界。

最愁人的，是它俩没学会上厕所。

5

视频里介绍，黑尾土拨鼠不乱拉乱尿，会定点在笼子一角排泄。这样的传说，我有幸见到两次。左左右右初来乍到的几天，我半夜起来观察，惊喜不已。尽管笼子空间极为有限，左左右右竟然自觉划分区域：筑起相对的高台睡觉，屎尿分别位于距此最远的两个角落——哇，它们还分男女厕所呢。不仅如此，屎粒码垛整齐，都快成摆上地摊的工艺品了。这都是在半梦半醒的迷糊状态中完成的，我不禁感叹它们深入灵魂的文明。早晨起来，屎尿已经被它们到处乱窜的小脚丫搅匀在整个场地。我当时不担心，毕竟空间狭窄，闪躲不过；等有了大笼子，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错了。曾经目睹，有如幻觉。

别看左左和右右个头不大，圆圆的小肚子，是比印钞机速度还快的制屎机。我有段时间完全听不得“史料丰富”这个词，给我非常不好的画面联想，眼前浮现左左和右右的深色屎粒。我不断用一把扁小的扫刷，从土色的垫砂里，扫出密集的黑色颗粒，跟考古队员发掘考古现场似的。相对来说，食肉动物排便次数少，因为食草动物摄取的食物热量和营养物质更低，它们不停咀嚼，消化系统忙碌，排泄频繁——所以，厕所问题更为重要。

我买了陶瓷、金属、普通塑料、亚克力等各种材质，三角、矩形、半圆等各种形状，敞开、半封闭、封闭等各种方式……的宠物厕所，可它俩通通不会用，分不清食钵和屎盆。也许是垫材的问题，它们在干燥清甜的玉米芯中以埋屎为乐，将其当作游戏？可换了木粒也一样。我改用尿片，效果更糟。我早晨起来一看，它俩把屎粒摆放得如此均匀，像围棋盘，每个交叉点上都布置了一枚——屎粒几乎等距间隔，布满除棉窝外的几乎每寸空间。两个黑暗中的数学家，得有多么缜密的心思，才能完成这种掌控和布局。

我的呵斥无效，左左反抗般怪叫；右右开始一直不吭，后来学左左，有种泼妇般近于叫骂的音频。一个不遵守规矩，另一个遵守规矩的大概觉得自己吃亏了，立即效行。它们两个比着捣乱，劣迹斑斑的左左把乖巧的右右也带坏了。最可恨的，它们有时拉在窝里。我看着左左沿途掉屎粒，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左左的带动下，右右肆无忌惮，一边在跑轮上健身，一边甩动屎粒。也许是因为无论怎么维护家庭环境，左左转瞬就能把它变成屎食混合之地，右右索性迅速放弃了无效的清洁努力……笼子里，右右秀气的屎粒和左左粗犷的屎粒交相辉映。

宠物厕所，外有围挡，下有格栅。左左和右右似乎反感踏上半步台阶，讨厌踩在硌脚格栅上——只有厕所里是干净的。把厕所垫高，每天倾倒带着屎粒的垫砂，洗被它们弄脏的棉窝，我真是烦死了。我羡慕那些把生活打理得诗意盎然的女人，我非常不喜欢也不擅长家务，房间潦草而混乱，像就要搬家或刚被窃贼打劫过似的。我只把自己收拾利索，出门相当于“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但我偏偏强迫症一般，忍受不了它俩的狼藉，希望它们规整而清洁——这种心态，大概相当于，失意的父母指望孩子实现未酬的壮志。

后来我想想，也许怪不得它们。在最初的四个月里，它们生活的条件是和几十只鼠群宿，沆瀣一气，无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现在开始教育，也许能够改善和纠正。

我一发现左左和右右想要拉尿，就马上把它们推进厕所，并迫使它们待在那里。如果定点排泄成功，就给予零食加抚摸的奖励；如果相反，就用卷成筒状的报纸，轻打它们的小脑袋。从事教育的过程，令人沮丧，我整天像一个下流的窥私狂，专心盯着它俩的肛门。持续努力，结果基本失败。让我意外的，倒是左左偶尔会打破我的绝望，眼看它抬脚踏入厕所，煞有介事地出恭……可惜，是偶尔的。面对处罚，原本松弛的右右偶尔惊慌地横冲直撞，一旦镇静下来，就用不驯服的眼神瞥我。

不管怎样，左左和右右拒绝定点上厕所。有的猫不会用猫砂，轻度的不会掩埋排泄物，重度的几年都搞不懂这些沙砾的真实用途。我开始怀疑，左左和右右就是这样。

6

反思自己，我的奖惩也有问题，它们在移动中完成排泄的用时很短，我常常判断不出刚刚遗留的罪证到底属于它们之中的谁。我的犹疑使惩罚不能立即落实，让它们俩认为有时乱拉乱尿并无不良后果；假设我归罪错了，这就更加重它们的迷惑。一个多月以后，我痛下决心，强制分居；否则左右在一起，难以清晰划分责任，根本无法维持清洁，时间越长，越积恶成习。

右右留在原地，体格健硕的左左放在与客厅连接的封闭阳台上。北京的秋夜不算太冷，我怕突然降温，还是准备了很厚的棉窝。左右相见，声耳相闻，就是不能相互依偎——它们跟对山歌似的此唱彼和，大概在抒发想念和我这个强权者的愤怒。我幻想两个小魔鬼能平静下来，早日对自己的排泄物各负其责，不要在尿尿的问题上彼此连累，只有左右共同努力，才能维护好一桩美满自在的婚姻。

两小无猜的它俩从来交颈而眠，现在只能在孤枕长夜。分居不久，不知是因为想念还是恐惧，左左很快学会了一定要到厕所才开始尿尿，并且至少一半的尿量是准确投放的。左左的姿态稳健，表情凝重，上厕所的时候非常专注。当然遗撒现象时有发生，左左算不得从善如流，但对比自己的女友，它所创造的，已是令人瞩目的佳绩。

左左排泄有专门姿势，右右却没有改邪归正。右右只有锥尖大的私处，所用尿片面积，却堪比十几个妇女所需卫生巾面积的共和。右右毫不克制自己，须臾不能忍，它毫不在意括约肌的状况，无论是在眺望还是跳跃，随便什么姿势，右右的尿球就“扑噜扑噜”肆无忌惮地掉下来，它的排泄就像呼吸那么自然。甚至，是躺在我身上、眯起幸福的眼睛、享受抚摸的时候。它根本不在乎。分居期间，右右尿床，枕着自己的屁屁很香地入睡。

左左，从来没有。

这才发现，我可能冤枉了左左。我想当然地认定：大屎粒属于左左，小屎粒属于右右。左左不停地吃，它有足够的原材料来制造各种规格的屎粒实验，有粗大的屎段，也有秀气的屎粒；右右同样，屎粒有婉约的尺寸，也有豪放的尺寸。通过更为仔细的观察，我逐渐被迫承认一个事实：窝里排泄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右右。

别看左左壮硕，除了吃，就是睡，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智商不如右右；但时间稍长，就能发现它特别敏感。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左左的内心反应都丰富而剧烈，乃至有时防卫过当。奖励带来的安慰，惩罚带来的羞耻，在左左那里有天壤之别，所以能带来调整和变化。

右右在精神上更自由独立，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校正起来比左左困难。这位聪明过人的文艺女青年，以自我为中心，凡是有利于自己的本事都会，凡是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技能都不会，并拒绝学习——可爱就够了，还要怎么样？我怀疑，右右甚至会因为起夜时外面温度更低而懒得起来，它贪图棉窝里左右共同的体温带来的暖意。

左左比右右更容易养成好习惯。没想到，浪子回头，比起文艺女性从良……良家妇女的良，反倒容易些。右右始终不改。也许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无所拘束地排泄是右右唯一表达自由的方式。右右喜欢做所有我不喜欢它做的事情，去所有我不想让它去的地方，反正只要我不喜欢的，它都喜欢……这是一种淘气而倔强的挑衅。

看网上视频里，那些别人家的土拨鼠，如此听话，岂止会上厕所？它们会击掌，会绕圈，会跳跃，听得懂许多口令。我是糟糕的饲主，我幻想它们落在别人手里，一定会被调教得温顺，更有清洁习惯、良好秩序和超乎动物的教养。由于训练方法不对，或者互动时间有限，总之，我做不到让它们像视频里表现的那样言听计从。

在试用了十几款厕所之后，我放弃了努力，不再像其他土拨鼠家长那样在玻璃缸里分区明确。我定制了超大尺寸的不锈钢架子，把玻璃缸改造为整体厕所。这下，左左和右右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厕所。我们仨就不受困扰了，从此解脱。

左左和右右，重新团聚。所谓的离别之苦，对右右来说仿佛并不存在，它见到左左无动于衷，跃上跑轮开始日常的健身。而左左，激动得跌跌撞撞。当右右摊平身体小憩，左左卖力地用啃梳的办法，殷勤打理右右——顺毛修甲，状若男仆。

厕所问题解决之后，给它们洗澡的次数和麻烦都大大减少了。洗澡对左左和右右来说，就是劫难，是叫名副其实的“洗劫”。

作为享有社会生活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依靠自己的气味来标明领地，释放信息。这种气息是左右之间现在相互信任、未来彼此迷醉的；但作为人类的我，顾不了那么多，一切只以人类的喜好来决定。我自己倒是频繁洗澡，我怕自己让别人的鼻腔里飘过一丝可疑的鼠味而不自知。它俩必须清洁，我才能少受连累。

为防抓咬，我用洗猫笼。没有插销，洗猫笼采用扣环设计，门边对称的小圆环沿着由窄而宽的边门滑至底端，完成锁死。进入其中的宠物插翅难逃，因为它们无法均匀分配力量把两侧圆环同时推向顶端。担心它们害怕，我让左左和右右一起经历初次洗澡。

哺乳动物，从啮齿类到灵长类，感到恐惧的反应，常常是排泄系统的括约肌失控。猴子是这样，土拨鼠也是这样。进入洗猫笼内，魂飞魄散的左左和右右，各自拉出可观的尿量，真的被吓得屁滚尿流。尽管水流温热，经过缓冲才淋洒在它们身上，左左和右右依然恐惧和绝望，求生般拼命啃咬铁丝。

还是左左，最终在吹风机的暖意吹拂下，似有所悟，终于平静下来。左左以一种理解的眼神凝视着我，过了一会儿，在吹风机的噪声中开始梳理自己。

右右在整个过程从未放弃反抗，它以强烈的怒意，全程奋力啃咬，把笼子晃得地动山摇。右右曾咬断过简易的笼子越狱，所以它刻不容缓地想要复制成功经验。但洗猫笼铁条的粗硬，远超它的预判。有两次，右右发狠咬住伸进笼子的洗浴毛刷，传递到我的指尖，我能感受到它发自牙根的恨意。

淋浴过程中，我去拿浴巾的短暂间歇，右右曾想从笼子里挤出来；结果，脑袋钻出来了，铁丝紧紧卡住脖子。右右进退不得，被憋得窒息。我惊恐万状地想拉开间距，但铁丝硬度太强，没有弹力；而此时的右右紧闭双眼，身体几乎悬吊起来，一动不动，并伴有仿佛是临终前的失禁。我几乎崩溃，手边没有任何脱险的工具，最后用尽蛮力，才让右右退回身子，缓上那口压在胸腔的一丝余气。我惊魂未定，估计右右也吓得不轻。

即使在我的不停宽慰和暖风烘干的舒适中，劫后余生的右右依然表现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狂暴。它继续发疯啃咬，以至于架在洗漱台上的铁笼摆幅

剧烈，整体倾斜，“咔”的一响，一端掉入洗池凹陷的底部。我吓了一跳，这并未吓退右右，它没有中断，也没有减缓动作。右右罔顾自己站在陡峭的倾斜面上，它像一台电量充足的微型发动机，似乎是与死亡的倒计时争分夺秒，以惊人的爆发力和耐力，对抗着前方想象中的死亡。

吹干它们浸湿的皮毛，我把洗猫笼放在地下，准备到厨房拿点零食作为犒赏。就在我转身走出几步之时，我听到身后一阵狂啸……不可思议，右右竟然从洗猫笼脱身而出，它大叫，听起来像过分激动导致的打嗝声。我颇为诧异，不知道右右是如何做到的，它怎么会如此精通物理学，能够匀速推动圆环、抬升笼门？连我都控制不好，它竟然秒破难关？数日之后，右右重复了过程，我才知道，它是从一处稍宽的间隙中挤出来的。这样破解，如果无关智慧，至少是和勇气密不可分。刚刚才被卡得几乎窒息，仅仅十几分钟过去，右右就敢再次向死而生。

除了第一次洗澡，右右曾奋力逃脱，以后它就不逃了。其实右右心眼多，我只要拿出洗澡笼，它就瞬间躲远。左左不长记性，洗澡笼里放半个坚果，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请君入瓮。如果单独洗澡，右右能从略宽的那个格栅里钻出来；如果把胖左左也放进去，右右能跑也不跑了。如果往抒情文摘的方向，是不是可以说，彼此的情感，让它们觉得分离的恐惧大于其他？这种恐惧限制了右右的行为能力，哪怕需要一起面对灾难，它也放弃了对自由的尝试。

除了洗澡，除了晚上睡觉像大姐大一样把左左揽在自己怀里，除了这两项之外，右右对左左的关心不多。我曾以为右右是完美文艺女青年，后来发现，它在生理上容易失禁，心理也有点毛病和缺陷：它心眼小，嫉妒心非常强。无论训练上厕所时短暂限制了它的自由，还是在分瓜子时少给了它一颗，右右都会颤动两腮、磕击牙齿，一副“气得发抖”的样子。右右好妒，尤其是享受按摩服务的时候。如果我把右右当作重要抚摸对象，左左享受了一点顺势而为的余热，右右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主要关注度不在右右身上，左左多享受到了一点漫不经心的指端余热，右右也磨牙错齿，气到不行，会尽最大可能让自己的身体覆盖在左左身上，使抚摸之手只落在它的一己之身。而专注抚摸左左，会招致右右的强烈愤慨。我以前说右右是靠排泄来表达它的自由，只是修辞；后来才知道，这竟然是写实的描述。一旦我做出让右右不高兴的事，右右就会立即做出让我不高兴的事——那几乎是唯一的：在窝里乱拉乱尿，以排泄来排泄不满。这样想来，右右陪着左左洗澡是应该的，因为左左分明是受它的连累。

总体上说，左右相处不错，算是两个关系和谐融洽的小朋友。多吃多占的

左左从右右手里抢吃的，右右不在乎，抢就抢呗。右右在意的领域，膀大腰圆的左左未必能赢过右右。

有一天我看完晚场电影回家，天气降温。我看到两个色泽迥异的球体：一个棕黄，一个粉红。棕黄色的，是团缩着暴露在外的左左。右右呢？垫着一块小毯子，把另外一块粉红色的珊瑚绒毛巾紧紧盖在自己身上，并且掖好被子的边边角角——如此严丝合缝，把毛巾完全包裹成自己的体形。

再比如，小时候的左左右右，都对蹬跑轮乐此不疲。右右总在跑轮上，左左抢不过。我不用看，就知道谁在跑：右右有腾空动作，像啮齿类里的小豹子，连收窄的腰腹也像；左左无论怎样抵达自己的极限速度，也总有一只落地的脚，它不会腾空，它的体重无法“形而上”。我就像个竞走裁判一样，知道这是两种节奏，两种运动。灵巧的右右捷足先登，也想玩的左左就朝相反方向推动——它们在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的跑轮附近吵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右右必占上风。有时，左左把身体趴在跑轮的底弧，想阻止右右上机——直到，它的腹部被右右的小脑袋生生垫起来，活活掀翻在地。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我在卧室听到连续两三分钟的激烈争吵，两个小家伙，你一言我一语的，谁也不示弱。等我去客厅看个究竟，发现左左和右右分别占据玻璃缸两个距离最远的边角，背对背，互不理睬，处于明显的冷战状态。我为了调节对峙的气氛，打开音箱，放了几首经典的古琴曲。它俩竟长久驻足，一动不动，凝神倾听。我没想到，它们是如此专注的音乐爱好者，半张碟片放完，左左和右右依然没有改变姿势。我大为感动和震撼，它们的情感如此丰富，如此具有艺术鉴赏能力……当然，是我想多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左右的争执和抢夺，让跑轮的螺扣滑脱，轮盘从转轴上掉下来，不转了。左左右右在赌气，并非是音乐让它们灵魂出窍。

好在，随着左左越来越胖，越来越不爱运动，加之我升级为转动轴固定的不锈钢款，有关跑轮的争端，终于得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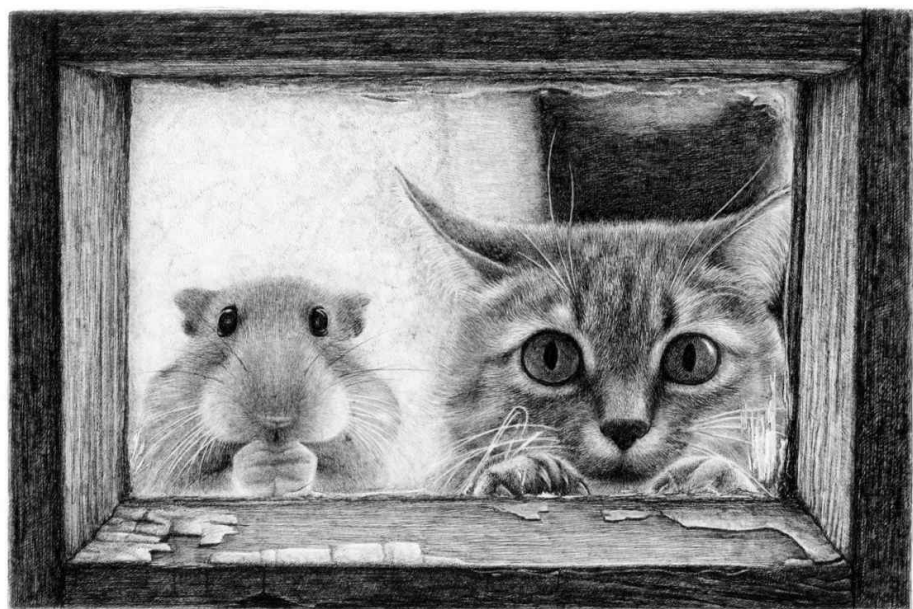
9

缺少运动，长期的室内饲养，易导致宠物缺钙。我定时让左左和右右去阳台上晒一会儿太阳。第一次日光浴的时候，右右颓坐之后马上开始打理皮毛，齿噬自己的肘臂，偶尔双手抱头，从后向前胡噜一下自己的脑袋，就像刚刚剪了寸头的小男孩那样。而左左急速抓挠光滑的笼子底网，幻想逃遁的样子分外滑稽，它总是不得要领。土拨鼠喜欢待在幽暗的地下，太阳光线本来就容易让左左紧张，何况，左左看到透明的玻璃推拉门外，有猫。

我住一楼，有个几近荒废的小院，七八只流浪猫在此安家，每天早晚等着喂食。猫猫们见到左左和右右，它们愣住了，挤在门边，兴奋得像在看色情表演。它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当志愿者冲出来帮我抓耗子。我没有驱散围观的猫，在潜意识里，我想用天敌来恐吓左左右右，由此凸显我是它们唯一的保护者；离开我，它们立即就会大祸临头。

猫猫们误以为这是为它们准备的新鲜食材，几天不见端上桌，不禁迷惑。流浪猫渐渐明白，两个鼠辈竟然是我的宠物。我的移情，我在价值观上的堕落，让它们猝不及防。流浪猫不理解我的立场和态度何以翻转，它们情绪落差很大，从错愕到伤心——随后几天里，它们不爱吃饭，腮部削尖，对我喵喵的撒娇声明显减少。

二橘从来不会离我很近，这只被绝育的公猫始终保持警觉和畏惧，它不会围着我的腿打圈，宁可放弃先到的罐头，也要等我远离，才靠近其他伙伴的剩饭。可自从发现左右那天起，二橘就成了日夜盯防的警察；它站在离土拨鼠最近的地方，等待一声令下的那个缉拿时刻。后来，我的保护和偏袒，让二橘对我深感震惊和鄙夷——在这两者的合力之下，二橘前所未有地向我靠近，即使我与它相隔的只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二橘也没有半步退缩。它法官一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凛然中压抑着愤怒；或许它想用这种无言的谴责和批判，唤起我的觉醒。



作为天敌的猫，难以理解鼠辈获得的宠爱。

作为天敌的猫，难以理解鼠辈获得的宠爱；许多的人，也把小型啮齿类当作该死的东西。自然条件下，生活在草原的黑尾土拨鼠都是草食，除非偶尔吃掉在吃植物时遇到的昆虫。它们依靠草原活着，而别的动物依靠它们活着。猎食者来自四面八方，熊、獾、貂、猫、狼、狐狸、蜥蜴，从鹰到蛇，天上地下的，谁都吃它们……它们卑微如草芥，它们繁殖力惊人，因为它们是最底端的肉。每个日子，都相当于一场苛刻的生存考验——它们颤抖着，知道自己的身体对众多猎食者来说，只是被包装好的重量不同的肉块。是的，几乎被所有动物吃——这种严重的不安全感，世世代代，追随它们一生之中的每时每分，乃至，作为一种恐惧的基因沉降在它们的血液里。

10

我毫无道理地持有某种偏见：特别怕蛇的，不怎么怕耗子；特别怕耗子的，不怎么怕蛇；两种都怕，和两种都不怕的，属于少数。我应该属于不怎么怕小型啮齿动物那种，不仅如此，我甚至存有某种偏爱。或许，这跟我几次与鼠接触的特殊记忆相关。

我多年前养过一对仓鼠，取名为瓜子和花生豆。在街上售卖的摊主为了解除我的疑惧，说这种号称金丝熊的宠物，天生不怕冷。信息误导，致使它们的生命在大学宿舍入夜的低温环境里难以为继，我亲眼看到，瓜子如何在我的掌心死去。最后的刹那，不透明的雾，瞬间覆盖了瓜子晶体状的瞳孔——它像瞬间变成了白内障，变成了盲人，湿润而闪烁的光熄灭了，只在秒钟的一次颤动之间。

另一次，是在我去体验饲养员生活的动物园。其中一项工作是喂养红鹮，我却体验到日常而让我触目惊心的残酷。

红鹮，是世界上颜色最红的鸟类。那是一种鲜艳到辉煌的红，一种极其明媚的猩红。我想起scarlet这个词，所谓猩红，指的是一种象征罪孽的深红色。我此前看过红鹮的资料，发现在同一条的注释里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说法。一说，红鹮的叫声高昂而忧伤；另一说，红鹮的叫声单调而暗哑……因为气管里没有鸣管和鸣肌。红鹮和鹦鹉一样是晚成年，不像小鸡那样出壳就能活动觅食，它们需要从亲鸟的喉间取食半消化的食物。红鹮是吃肉的，刚刚出生的幼雏无法处理肉块，在动物园环境，必须由人工育雏，用泥鳅、虾、面包虫等打浆填灌它们的肠道。

饲养员早晨为红鹮剥虾，去掉小虾的头尾，只留节状的背，免得幼鸟被虾的额剑和须刺划伤。众多被掐断的虾头堆积在塑料袋里，一动不动；而许多虾身的细弱附肢，还在频繁抽搐。桶里盛满清水，翻跃着身体光滑的泥

鳅们，将被捞出来碎尸万段。陪着虾和泥鳅一起被剁进馅儿里，要被粉碎机打成浆泥的，还有一日龄的仔鼠。

比一粒花生大不了多少。之所以选择一日龄鼠，因为它们皮薄骨脆，因为它们浑身软糯，因为它们没有覆毛，因为它们的眼睛来不及睁开，因为它们的嘴巴没吃过这世界上的一粒粮食，没喝过这世界的一滴水，所以没有不洁与感染的可能。这是每天送给红鹩的祭品。将近二十只幼鼠拱动在木屑里，盲目地寻找并不存在的母亲。它们的皮肤薄得像一张糯米糖纸，难以抵御早晨的微凉，而我掌心的一点暖意就让它们安静下来。作为哺乳动物，它们命如蜉蝣，甚至来不及朝生暮死。它们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速死。

那些喂鸟的饲养员是最温存的天使。他们爱抚雏鸟，陪它们玩，叫它们小名，和它们说话，吻它们的颈羽……为了它们做什么都可以，包括日常的杀生。但没有谁愿意忍受幼鼠被刀剁成馅料时几乎发不出声的惨叫，忍受它们喷溅的血滴和抽搐的残肢——所以饲养员先把幼鼠泡进盛水的透明塑料盒里，让它们溺死。

一日龄的幼鼠，像缺氧的鱼一样游动，靠频繁蹬腿的力量，把口鼻伸出水面，挣扎着呼吸。最弱的被踩在最下面，最先死。很快，水里躺着十几条被杀的、贱死的、小小的命，它们体色煞白，像被清空了血槽，呈现出一种失真的矿物色。

我从水里捞起一只小鼠，它冰冷，一动不动。不知为什么，我用食指的指肚，持续按压它的心脏。它竟然，慢慢恢复呼吸……开始是一顿一顿的，渐渐，手脚抽搐。它有着极其精巧的半透明趾爪，它蜷卧的样子，看起来就像电视纪录片里的熊猫幼崽。我捧着它，为了让它取暖，把阴影里的手伸到阳光下。它本能地把右爪搭在右眼上，似乎承受不了突然到来的光亮——它太小了，还没睁眼，眼睛的位置只是眼皮下一团小小的青蓝。它右手搭在右眼上的姿势，看起来，就像在委屈地哭。它有个小丑模样的发红鼻头，它从针尖那么大的嘴里叹气。它的皮肤如此细滑，它的身体如此软糯，它的趾爪如此晶莹，它的姿态如此乖巧……假如它诞生在实验室的无菌育婴箱里，假如它能长到成年，它的皮肤像白雪公主那么白，它的眼睛是深琥珀的棕色，它的趾爪终身保持婴儿一样的粉红色，它的叫声奶细，连尾巴都像根干净的刺……然而，它被宣判悲惨的死刑，似乎它根本不配活上一天。它的命运，远不及它那些被人类视为丑陋、肮脏、猥琐的同类。人人喊打的老鼠不曾拥有宠物的幸运，不曾被哺喂营养，不曾被抱拢在人类的怀里；它们的童年或成年之间的区别，只是经历着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的恐惧。

我手心的幼鼠，半透明，像个袖珍的工艺品。小小的幸存者，生命力极

强，几分钟之后，它缓过来，苍白的体色渐渐变得红润，只是体力尚未恢复。我不知该拿活过来的它怎么办，这样离开母亲的奶鼠根本不可能养活。饲养员过来看了一眼，从我手心拿起，再次把它淹到水里。原本虚弱的幼鼠求生欲如此强烈，它突然疯狂蹬踢，再次努力把口鼻探出水面。看它那么倔强地抗争，我不忍心，又把它捞出来。

其后几个小时，它一直活在铺着垫纸的塑料盒里，直到被饲养员送到猛禽或毒蛇的嘴边，去经历第三次的死亡。这只无辜的幼鼠，我什么都没有给予，只是给过它所用不到的人类短暂的怜惜，以及更多次的恐惧和死亡威胁。即使它多活几天又能怎么样呢？我随后在动物幼儿园里，看到了数只稍稍长大却依然娇小玲珑的白鼠，它们被喂养，是为了给薮猫之类的动物玩耍……至死的。

红鹮需要肉浆。即将被处理的食材里，包括泥鳅、虾、小白鼠，熟鸡蛋，奶粉状的进口狗粮，还有平常储存冰箱的一把面包虫。面包虫力图从周围混合的粉末里钻出头，漫长的饥饿之后，它们似乎终于有什么可以吃的——可惜，它们来不及享用半口最后的晚餐，就被旋转的飞刀打成残末和浆泥。即使是头部只有绒毛的小红鹮，也相当于成熟的杀手。

动物身上汇聚美与自由，也汇聚日常到无辜的暴力。在饲养员或兽医的眼里，不能说杀就是恶的，不杀就是善的。甚至不能说，杀比不杀更近罪恶。每救助一只食肉动物，就有无数牺牲品被献祭；救一只，等于杀一群，如同放生毒蛇到群鸟之中。存在的价值观，被相对论所动摇。没有绝对的慈善与温柔，没有绝对的残忍与冷酷，极致之中，必有彼此——我们如此看待动物，神如是看待我们。

可我始终难以忘记那只作为口粮的幼鼠，难以忘记它的淤青眼窝，难以忘记，我短暂延长它的生命，却在一次次增加死亡的重量。

两次与小鼠的密切接触，给我留下的都是悲伤的回忆。这是第三次机会，作为有罪的人类，我希望自己能善待左左和右右，让它们能体会到来自异类的宠爱。

11

黑尾土拨鼠之所以成为网红宠物，除了萌态可掬，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性格各异，它们不像鱼那样千篇一律，远比兔子和豚鼠生动。

右右体重轻，不仅是胖瘦的问题，它仿佛有着禽鸟那样中空的骨骼。左左沉，浑身都是体力劳动者那样结实得发硬的肌肉；在它睡着的时候，搬运它就像搬运一块大而圆滚滚的鹅卵石。没办法，右右挑食甚至厌食，而左

左实在太爱吃了。左左的胃有多大？栗子那么大？乒乓球那么大？它怎么能塞进那么多东西。我有时错觉，左左每天吃下的东西大于它的体积。它们主要吃手指饼干似的专用土拨鼠粮，吃无限量供应的提木西等牧草，包含蔬菜、燕麦和坚果等零食。左左对胡萝卜有强烈热爱。咔嚓咔嚓的，清脆的汁水在鼓胀的颊腮里溅开，它吃得兴致盎然，嘴唇附近的须毛染上菜汁的微黄。

据说土拨鼠不挑食，生菜、红薯、苹果等，几乎什么都吃。这个说法，不适合右右，它最初这些都不爱吃。很快，任何食物都难以笼络右右。即使胡萝卜它也食不甘味，咬一口就后悔似的扔在地下，甚至额外加了一点力道蓄意摔在地上，像打牌甩出了王炸，然后就跑去玩儿。它不仅对食物兴味寡淡，对咀嚼也缺乏耐心，不耐烦吃东西耽误了玩耍。右右是典型的一心二用，它不像左左做什么都有专业的架势。右右吃东西的时候希望享受抚摸，上厕所的时候还想着越狱——无论吃饭还是拉屎，稍微花费点时间它就不耐烦了。左左吃一个瓜子的工夫，右右能吃仨；进食太快，右右吃栗子也会噎着自己。饭吃两口，屎拉一半，右右就扔下吃的，挂着噤里啪啦掉下的屎粒跑开。

即使右右已经远远跑开，左左还在保卫它的食钵。食钵有一半功能是放置牧草的架子，需具备一定高度，所以防打翻的陶瓷食钵一面高耸，两侧有半高的围挡……形似微缩的男人小便池。不过，这个尴尬的造型非常有利于左左护食。左左的头脸深埋在食盆里，前肢也陷进去，它肩膀抵住，两臂撑开，用一己之身尽可能堵得滴水不漏，像个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它不仅防右右，连我都防，放进去的零食再想拿出来，没门。我的手指无论朝哪个方向移动，警觉的左左立即进行完美的防守——它的身子移靠过来，堵死出口，试图把侵犯者排挤出去。它已经习惯大量剥夺右右的份额，要吃一点五倍到一点七五倍。每天都像即将冬眠那样吃，抓紧时间，过度储存。左左吃得滚瓜溜圆，重得跟个铅球似的，我一狠心给它断了夜宵。被迫减肥期，发愁的左左咬开一截又一截的木柱，把它们当作想象中的粮食。

左左视若珍宝的，被右右弃若敝屣。情感需求强烈的右右，只要有玩耍，只要有摸摸和抱抱，茶饭不思。食物只要掉在地下，它十有八九就不吃了。不像左左，什么时候都能捡起来大快朵颐。我怀疑，哪怕沾了屎味，对它来说只相当于抹了点腐乳。

左左永远在吃，右右永远在玩。换句话说，左左活着只是为了吃，右右不得已才吃，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接着玩。

跑轮是锅状的，外面有个正方形支架，整体是不锈钢材质的，光滑得缺乏摩擦力。两个月以后，右右像是蜘蛛侠或者FBI里无所不能的特工，它两脚踩玻璃，两臂仿佛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竟然能爬至细窄的框架上方，并用头撞击天花板的纱窗。右右攀到跑轮光滑的顶端上去，把自己运抵左左仰头都看不见的地方。这个鼠里的女特务没有什么高颜值，但本事天大。右右每天进行野战军训练，并不断拓展新技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它开展许多健身项目，分别是奔跑、竞走、举重、跳高、跳远、自由体操、单杠——它可以完成标准的引体向上。无论我把它俩的小环境整理得多干净，把右右放进去半分钟，就给你折腾得天翻地覆。水壶倾倒。铁架床哐哐作响。右右通过执拗地拽动下面的衬布，竟然不可思议地掀翻了跑轮。我怕砸伤它们，从此再也不敢在跑轮下面放衬布了。

奇怪的是，胖左左并未因贪嘴而失去帅哥的美貌，甚至因为胖，睡起来都仪表堂堂。左左越来越懒，偶尔在跑轮上比画两下就适可而止地站定，像个微型北极熊似的默默打量着我。然而，半夜能清晰得听到静音跑轮的运转声，有时跑得地动山摇——不用问，一定是健身达人右右。

左左要撑着吃下最后一颗粮食，才能无憾地入睡；右右入睡前，要消耗掉最后一点精力，直到努力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才无奈地睡去。左左爱吃爱睡，话也多，包括梦话；右右有多动症，睡觉少。左左采纳养生的作息，睡得早，在下午四五点，就开始与整个夜晚相衔接地正式入睡。它仰躺着，横陈着，睡得永垂不朽的；旁边久久垂立着不知所措的右右，就像追悼会上的遗孀。

随着左左变胖，右右的守寡时间增多了，左左光天化日也睡得地老天荒的。尤其黄昏，右右每天都要承受绝对的孤独，房间里回响起它对抗寂寞的跑步声——右右不爱吃又太挑食，不知道哪儿来的能量。

有一次，我仿佛看到谋害亲夫的交通肇事现场：右右蹬踏着如汽车轮毂的跑轮，下面躺着不省人事的左左。左左的一半身子压在下面，一半身子露在外面，这样跑轮底端始终摩擦左左的腹毛，跑轮的外缘蹭着左左一只半举的手臂。右右有时停下来，低头嗅嗅左左，看看它是否一息尚存，然后继续狂奔，发泄尚未挥霍完毕的充沛精力。

这样说来，好像左左除了好吃懒做，一无所长。其实不是。我不知道土拨鼠的性格会像香水一样散发前后不同的调性，不到最后，无从得知它们真正的味道。

13

不错。左左显得笨拙。看人家右右，吃玉米时转动带芯的薄片，就像转动

微型汽车的方向盘。左左什么都拿不住，半个栗子壳都捧不住，能丁零当啷地不停掉落到地上很多回。左左的智商可能不如右右，但它有情商。左左懂事，慢条斯理，有种敦厚的温柔。

尽管对食物的态度狂热，左左从我手里接食物的动作非常缓慢，缓慢到失真的程度，像电影中的慢动作。自从发生因抢食而误伤我的事情，左左对待喂食过程，变得极为慎重，就像包含了某种仪式。它需要反复确认自己衔住的到底是什么，才肯用牙轻咬下去。它细嚼慢咽，像个法国人那样吃饭，啃过的栗子只剩油亮外壳和里面一层纤维状的棕衣。不像右右，狼吞虎咽，吃过的栗子必然留着一层薄厚不均的参差而浅黄的栗子肉。好在不浪费，左左会爱惜地捡拾起来，把剩饭打扫干净。左左需要减肥，右右需要增重——我给右右喂营养膏，左左是用来收尾的，它舔食过的餐具至少能达到洗碗机的清洁标准。

如果说右右是个捣蛋拆家的“败家娘儿们”，左左就是居家暖男的类型。它也参与拆家，但更像是附和右右的一种讨好。刚来的时候，两个小坏蛋几天就彻底拆毁一个暖窝。拆到第六个的时候，它们想出了新主意，掏出其中的棉絮，转移到笼子另外一端，铺成很大一团。右右主要负责破坏棉窝，左左最爱叼着棉絮来回奔波……它一嘴白胡子，弄得跟圣诞老人似的。睡在蓬松暄软的棉团里，白天沉湎于“白日梦”，晚上继续享受“云上的日子”——这样的云床，就是左左献给右右的笨拙的浪漫吧？

可棉絮哪儿哪儿都是。右右平常健身的功效不知哪里去了，吹了点风就闹了两回肚子，简直是鼠界里的林黛玉，沾了棉絮，笼子里更是一片狼藉，极不雅。我干脆撤了棉窝，改成不怕啃咬的铁架子床。自从换了全方位厕所和铁架床，左左没有垫砂可供扬撒，缺少棉织物可供撕扯，它养成了新的嗜好：铺床单。空置的两只小爪子轮流倒腾，左左跟个星级酒店服务员似的，一丝不苟地不停铺床。它有时平铺，有时把珊瑚绒毯子铺成既是褥子又是被子的筒状，直到累得晕倒过去……随后的漫长时间，左左坐月子般赖在床上，不下地了。

也许因为珊瑚绒毯子的质地和自己的皮毛类似，它们很少破坏，不会像撕裂棉窝那样暴力。原来从棉窝里用力拽拉取乐的右右，第一次见到铁架床的时候愣在原地，它张了张嘴，咬了咬空气，大概体会到了某种陌生的虚无感。受挫的右右拒绝换新，它赌气地缩到跑轮后面，思考鼠生。几分钟以后，不甘的右右重返战场，沿着铁架床一个又一个的镂花空隙，尽其所能把左左铺出的床单扯出来一角。再看睡成一团的左左，就像包子长了饺子边儿，半个床单都快被右右掏出去了；直到左左的部分肢体，仰躺在刑具般的裸露铁网上，右右才善罢甘休。而左左，在铁架床的持续震荡中或者接着睡，或者醒来，岿然不动，听凭自己的野蛮女友胡作非为。

最早左左欺负右右，后来右右欺负左左，最后它们培养出默契的相处模式。左左已经从一个莽撞的坏小子，成长为一位举止优雅的绅士。左左微微伸开胳膊，清除自己的腋下，就像要掀开皮毛大氅那样有派头。胖是胖点，但它胖得体面，胖得仪表堂堂，睡觉都气宇轩昂的。左左不再像曾经那样以右右为靠山，反而罩护右右，而且非常惯着右右，从不抱怨。即使熟睡的右右偶尔又拉尿在床上，左左默默爬出来，在棉窝外，另找地方凑合一夜。

好奇心强烈的右右在笼子里整天拨拉，到处翻腾和搜查，它登高下低地寻找逃避之路。左左属于姿态型的革命家，每天挠墙，一副为自由而奋斗的样子；其实它满足于在屋里喊口号，坚决不上街——真的门户大开，它半步都不肯迈出来，是个典型的宅男。我本来以为，带有推拉门的饲养缸是对越狱的终极解决方案，没想到，鬼机灵的右右竟然开始啃滑槽，这样让玻璃无法立住。帮助右右实现理想的左左，啃得比右右还卖力气。我一不留神，它们已在平常出入的左边把金属滑槽啃下去三寸的长度。我赶紧把推拉门调换一下位置，让这侧的玻璃贴紧内槽，让它们无从下嘴。没用！我吃个午饭的工夫，它们换了方向，跑到露出内槽的另外一侧，如法炮制，一寸的金属槽又被啃掉了。我只好在豁牙槽上，用棉签涂满辣椒酱，这才暂时遏制了事态的发展。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乐观了。左左为了右右好像什么都干得出来，可能过不了两天，它俩就学会吃辣了。

14

就像厕所教育一样，左左因为自尊心强，批评它，管用。如果我大声呵斥来制止它的行为，左左会停顿，慢吞吞地找个角落，反省似的低下头。扬沙子和铺床单等心理焦虑外化带来的小动作，左左基本克服。最初阶段，左左并非早睡的那个。如果我晚上在客厅看书，左左就跟陪着我值夜班似的——我不睡，它也不睡。我误把这理解为宠物的忠诚，后来想想：左左可能太敏感，开着灯，它睡不着。炽灯如昼，右右已熟睡，左左倒是半梦半醒，强迫自己睁着防范的眼睛。我必须去漫长抚摸，哄它睡觉，甚至情不自禁地即兴编曲哼唱：“好宝宝，坏宝宝，叽里咕噜肉宝宝。”左左这才放心，一旦睡着，它只差打起嘹亮的鼾声了。和体重相匹配，左左心重，它只有在充分获得安全感的情况下，才肯放开自己。

羞怯的动物往往谨慎，但它给予的情感更饱满，更可靠，更长久……似乎是经过了理性的选择。左左就是这样，它害羞腼腆，有着和它的超重体型不相匹配的细腻。它渴望亲近，喜欢被抚摸，但它很少表现得像右右那么不管不顾。爱惜脸面、像是害怕被拒绝的左左，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地经过；等听到我语气温柔的招呼，才把自己圆圆的脑袋和胖胖的身子靠拢过来。左左很享受，但它克制，表情不像右右那么夸张；有时它会装睡，把

脸埋进毛巾里，以掩饰自己。右一会儿歪过脸，一会儿抬起下巴，指引和指挥着我下一步的按摩应该如何进行，应该前往哪个方向。可无论我的手轻手重，无论速度是快是慢，左左对抚摸从来逆来顺受，什么都是好的，都是对的。曾被当作小混蛋的左左，分明是个暖男。

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照顾左左和右右，抚摸它们聊胜于无的袖珍耳朵，就像是从黄木耳上掉下的两粒碎渣，抚摸它们原本野生却已驯服的沙质皮毛，以及皮毛下面细滑如丝绸的肤质，喂它们新鲜的牧草和偶尔的零食，清洗和更换它们弄脏或者撕成褴褛的毛巾……我得承认，土拨鼠的萌态也会让人产生审美上的倦意和疲劳，另外，黑尾土拨鼠上镜，但本尊没有网上的盛装图片那么出彩——它们穿上衣服“人五人六”，脱了衣服“不三不四”。但它们有种特别可爱和生动的性情，当它们浴后散发微香，我会忍不住亲吻这两个小家伙。

就这样，当左左在我指甲上制造的咬痕还没有上升到可以剪除的边缘，这个心重而情痴的傻孩子，已经信任我了。我每次咳嗽，左左和右右都会热烈地呼喊回应；跟它们说话，它们倒未必接茬。大概因为咳嗽时，气息来自更深的胸腔，这酷似土拨鼠的表达方式，它们的每声叫喊，都气灌丹田，都像发自肺腑。左左像经过变声期的男孩，不那么怪腔怪调了，只是有时声音大到声嘶力竭，感觉它像是用尽了胸腔和腹腔里全部的力气。

15

我最大的感慨是，谁也别说什么大话，因为我当年不屑成为整日除了晒娃，自身毫无存在感的女性——她们对别人的客套和敷衍熟视无睹，真以为自家孩子是个万人迷——结果，自从我养了土拨鼠，跟别人聊天时，绕山绕水又无休无止地扯起这个话题，罔顾别人对陌生的啮齿动物的根本无感乃至反感。我沉浸其中，体会不到我享乐式的饶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讨厌的多嘴。

自从养了左左和右右，我出差期间就有点神情恍惚，常把酒店里玻璃隔间的淋浴房，虚拟为它俩自在的空间，仿佛看到它们用灵巧小脚跑来跑去的活动身影。出差时，我把左右寄养在我的图书编辑郭悦那里。售卖的店家有托管服务，但毕竟空间狭小，人家也不可能像对待宠儿那样纵惯着它们。郭悦是善良而聪慧、细心且靠谱的姑娘，喜欢动物，对动物的办法颇多，小朋友们在她那里既娱乐身心，又学习本领，每次都玩儿得不亦乐乎。尤其是迅速适应新环境的右右，更是从卖萌中赚到便宜。郭悦说，右右应该出版一本《马杀鸡姿势大全——如何更好地享受人类按摩》，一定会在土拨鼠界成为畅销书。

帮我照顾左右，郭悦也由此解开童年之谜。

她曾住在外搭出去的阁楼间里，曾以为精灵就住在自己的屋顶：白天悄无声息，夜深就听见精灵们像是用小笤帚走动的唰唰声。她深信，那绝非老鼠。因为不用开灯，只要她在黑暗里坐起来，声音就停止；甚至是只要她睁开眼睛，一切就归于安静，刚才的窸窣之声仿若幻觉般消失。老鼠再敏感，怎么能在绝对黑暗中隔开数米之远，感知到有人睁开眼睛？

左左右右的玻璃缸就放在郭悦的卧室，她在家时不关门，任由它们出入。深夜，巧合也好，异样也罢，入睡的郭悦明明听到什么翻捣的动静，等她睁开眼睛，周围安静。开灯，左右两个都无辜地酣睡在小窝里。只有一次，她抓到左右掩盖行迹时刚刚抽回的小脚和装睡中有所眨动的眼皮。小小的啮齿类动物，也许远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它们或许能感知人类的心跳，感知人类眼皮张开时瞬间改变却难以察觉的风向。

对左左和右右来说，去郭悦家，大概相当于度假或者走亲戚。每次接回来，它俩都是一副还没耍够的样子，但愿它们不要感觉自己从仙女家又落回到巫婆手里。

养到两个月的时候，要出差十天，这次我没往郭悦那儿送，让男家长代班。平常是我一个人喂食、打扫、陪它们玩耍，反正我不坐班，整天在家。男家长早出晚归，上班时它们还没起床，下班时它们早已入睡——所以在它们看来，那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不放心，反复叮嘱男家长，如果它们淘气，他必须要像个君子一样动口不动手：可以口头批评，不能打——因为黑尾土拨鼠非常记仇，它可能由此终生怀恨在心，难以再与人类亲近。

结果，忙碌且怕被咬的男家长，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它们放风。这打破了它们的生活规律，尤其剥夺了右右短暂而重要的快乐。是否，右右由此焦躁不安、深感不满？是否积怨总有爆发的一天？男家长说，正在享受抚摸的右右毫无征兆咬了他一下。虽然下口不重，也令人意外，因为右右从来不咬，无论怎么揉搓和摆弄，它都不张嘴。问题不在右右身上，右右肇事后立即逃逸，钻到跑轮后面的狭窄缝隙里，躲着不出来。反而旁边看热闹的左左，不知是为右右叫好，是要安慰受害的男家长，是不安，还是怕殃及自己，它夸张地表示惊讶，连续大叫起来。此种高亢之声，通常发生在左左表示问候或者得意炫耀的时候。我当时不在现场，难以从男家长的转述中做出判断。然而，恼羞成怒的男家长不解其意，以为即将遭到来自雄性的第二轮攻击，他举起卷起来的报纸筒，连续暴击左左。

出差之前，我和左左右右已经建立信任，从来徒手抱来抱去，不用担心受到攻击和伤害。不管它们在做什么，我只要伸手抚摸，它们像胖嘟嘟的肉雕塑一样，立即被时光凝住。左左已经放松地把宽阔的颌骨和短粗的前肢，搭在我的虎口，昏昏欲睡。它暂时还没有右右的胆量——我晚上写作或者阅读，有时会把入睡的右右抱出来，让它躺在我腿上接着睡。尽管这会让左左略有不快，也许并非嫉妒，而是左右习惯相互依偎。我相信，不久以后，就能把左左和右右抱在一起，当我晚上的暖手宝……没想到，左左无辜遭受男家长的体罚。

正因为左左懂事，突然的委屈和受辱，让左左一度心理扭曲。就像是人遇强光要抬起手臂遮挡视线那样——我回来后，只要我的手一靠近，左左三条腿撑地，头侧扭过来，用一只前臂挡在胸前，摆出持盾般的防御姿态。那个缓慢而稳重的左左不见了，它格外警觉，反应过激，像电影里的沉默武侠那样突然出招，快得暴躁而粗鲁。好在，它只是做出佯攻的样子，其实更像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抵挡。

我担心多日努力，会付诸东流——左左自己待在角落，连视线都不和我们交流。男家长反复道歉，拿左左最喜欢的零食贿赂。我也花了几天时间，不读书不看报，从早到晚陪伴左左，缓解它的紧张情绪。积怨并非立即消除，但左左性格憨厚，没有不依不饶，它似乎有所原谅。终于，可以抚摸它了……左左的肌肉又僵硬了，脊背也不自觉地抽搐。左左嘀嘀咕咕，发出各种怪声，像只蛤蟆，或者像个捏压发声的橡胶玩具。

数日之后，委屈的左左对男家长耿耿于怀，对我还是消除了芥蒂。给它挠挠下巴和肚皮，左左会带着分外的珍惜去享受，同时带了一些担忧我突然翻脸的防范。它更谨慎和小心，唯恐自己的行为招致无端责罚；直到确信我的宠爱，左左才翻过身，重新向我袒露圆圆鼓鼓的肚皮，以示它还在坚持信任。左左胆量本来就小，能够有这样的举动，算得上努力了。

好性格的右右无端要咬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个疑团。直到，不久之后，左左完全复制右右的行为——都是在男家长抚摸它们的情况下，都是在看似并未招惹它们的情况下，突然袭击。并非复仇。男家长回忆发现，两次被咬的共同点，都是发生在自己酒后。男家长恍然大悟，他当时喝高了，几近醉酒，没轻没重地抚摸它们。原来，这两个小家伙就像缉毒犬一样，对酒精极端敏感和反感，它们给予一个醉鬼切肤的教训和惩罚。

找到了隐蔽的原因之后，我格外小心。哪怕只是临睡前喝了半杯助眠红酒，我也绝不招惹左左和右右。试探出彼此的喜好和厌恶，我尽量不碰触它们的边界，以免冒犯。这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种尊重。

对男家长不再放心，我出差就把左右都送到郭悦那里了，免得爱喝几口的

男家长再次失控，酿成冲突。

17

郭悦认为，左左比右右年龄大一点，它们之间的形体差异不仅仅是食量和运动量导致的。证据来了，到了二〇一九年一月下旬，开始偶尔传来短促的打斗声和尖声的求救声，那是想初试云雨的左左激怒了不谙情事的右右。

此前，我数次摸到右右的皮肤有很小的疹粒，一直都有，此起彼伏的。它或许是对什么过敏，还是洗澡时皮毛没有被吹干？右右是如此天真烂漫，我根本想不到别的，以至于很久以后才反应过来，那是它小小的乳蕾。右右的心思和兴趣，都在儿童游戏般的玩耍里。右右不管不顾，奔行到哪儿都视左左为无物，每天踩踏无数回——不论是左左正沉入冥想的脸，还是它熟睡中袒露的肚腹，右右用带着尖钩的小脚丫，踩着从上面呼啸而过。以前左左对右右会绕行，它万分爱惜自己娇小的女伴；现在，左左开始试探和追逐它的新娘。

据说黑尾土拨鼠在发情期性格不稳定，行为表现不一。有的雄鼠非常暴躁甚至是暴戾，会咬人；有的，变化不明显。为了保险，许多人建议选择绝育，免生后患。可我对此事犹豫，一是左左温柔而憨拙，我怕它在被伤害后改变性情；二是我可怜左左，如果左左在野外的自然环境，怎么着也得三妻四妾，到如今只有唯一的伴侣，只有笼子里被迫的忠诚；再对受限的情欲斩草除根，我多少有点不忍。三是我存有侥幸，那些发作明显的雄鼠，也许因为孤独得无处发泄，才暴跳如雷，如果雌性存在的情况下，整天和右右耳鬓厮磨，是否会减少焦虑和压抑，也许情况会好些？

左左除了愈见肿胀发红的器官，除了对右右饶有兴趣的试探和追逐，我没看到它有什么其他变化。右右有时对骚扰无动于衷，有时负隅顽抗，结局总是左左草草收兵，它臊眉耷眼地，等待下一次的可能。所以，多数时间里，它俩相安无事。屡屡求爱失败，左左似乎感觉到尴尬，但它只是窝在角落生自己的闷气，从未无端发泄。心重而情痴的左左，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和自己的难堪，才能重建勇气，展开对右右的追逐。偶尔左左索爱过度，招致右右的激烈对抗。右右和左左短暂扭打之后，躲到跑轮后面或木桩底下掩护自己。左左不会家暴，无法得逞的时候只会郁闷地接着叹气。

右右心大，我晚上写作的时候，它就躺在我腿上呼呼大睡，甚至被送回棉窝时它都浑然不觉。着急的是左左，它来回踱步，心急如焚等待被偷走的新娘。左左不敢像右右那样，在别处留宿；左左越困，越焦灼地想要回到安全的窝里。尤其是进入发情期以后，左左格外关注右右，它难以独自成

眠。每当右右失而复得，左左总是略带嗔怪地看我，但并不真正计较，就如释重负地依偎着右右，很快睡着。发情期的左左对我们的态度没变，依然举止沉着而端庄，它没有像小时候那样犯浑。看到左左这么克制到懂事的程度，我觉得好像可以不做手术，在发情期间注意些就行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注意什么，它看起来并无太多异常。

作为宠物的它们，被囚禁，终身都将维护没有其他选择的忠诚婚姻，这是无法变节的爱意，就像没有自由一样，它们也没有背叛的资格。左左不必通过激烈决斗和漫长奔波去寻欢，它的新娘近在咫尺，它的性爱唾手可得。也许，不必冒险和竞争，这会让左左的平和延续下去？手术计划渐渐拖延下来，我不打算带左左去医院了。

随着左左的阴囊变成日渐凸起的狭长豆荚状，笼子里经常传来右右鸟叫一样的声音，我不太分得清，那究竟代表抵抗，还是诱惑。后来，我发现右右有了一些变化。没有遭遇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右右睡眠时团成球形，这通常是紧张和低温时的表现。不是温度的问题。右右变得谨慎，门铃的响声，塑料袋的窸窣窸窣，风吹草动，都让它迅速躲入跑轮后面的角落，甚至对我也存有不必要的警觉和提防。怎么啦？这不像是右右不管不顾的性格啊。我恍然有所悟，右右不再是无辜少女，成年就可能受孕，它以潜在的小母亲心态重新看待世界。右右无忧无虑的纯真时光结束了，因为即将成为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目的首先给雌性带来的，是警觉和隐忧。

无论左左还是右右，所作所为，终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努力。因为在家庭饲养环境中，黑尾土拨鼠的繁殖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孕。它们不会有真实的孩子，只有幻觉中的后代。

18

二〇一九年春节，大年初一，男家长回老家了，只剩我独自在家。我给左右放假，听任它们四处探索。春节是人类的节日，与它们无关，我的做法大概有点古代帝王因为自己的喜事而大赦天下的意思。我彻底打开笼门，眼看右右四处游走，开辟多条旅游路线；心存疑虑的左左只是趴在玻璃门框上，略略探出的肥胖上肢在上面摇晃了几下，许久，未敢越出雷池。我稍稍远离，左左终于可以跳出，两次把脚掌落到客厅的地板上，又像站到了烙铁上似的立即跳回窝里。

即将黄昏，是左左习惯入睡的时间，我想把它抱出来在外面多跑一会儿，遭到左左的反对。左左不想出来，它躲我，几次努力，都争不过我。它急于脱身，用牙在我拇指上轻轻咬了一下。我承认，只破了很少一点皮；但我怕感染，就用力挤压伤口，挤出数滴血。我想起每天精心的爱护与照

顾，想起为它们买过那么多食物、那么多棉窝、那么多厕所，想起我减少了出差和看电影的频率，想起我花费那么多精力，给它们清洁，陪它们玩耍，甚至每天数小时按摩，就差给它们讲睡前故事了……溺爱换来这样的结果，左左怎么突然变成了小白眼狼？

我决心给它点儿教训，不能让它小视我的威严。我故作生气地让左左看看它所制造的伤口，不知道是女人潜在的戏剧性倾向，还是要给它心理上制造教训，很奇怪，说着说着，我竟然流泪了，索性放声大哭了两三分钟。玻璃门里的左左，以一种特殊的眼光看着我——尽管物种不同，我依然从直觉上判断，那是一种关切和歉意。我决定不轻易原谅，免得左左养成咬人习惯。事实上，由于我的娇纵，它俩已经养成挑食和不定点上厕所的毛病，不能再增加坏习惯和恶行了。所以，尽管接收到左左眼神里的愧疚信息，我还是冷脸转身进了卧室，不再理睬左左。

随后，我进进出出，间或听到左左笨重的脚步声，听到右右被骚扰发出的尖叫，听到不知是谁搬动木桩的声音……我都不为所动。平常，我属于过度关注的类型，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立即像救火队员般赶到现场。这回，我要抓住机会教育左左，给它点颜色看看。

我偷窥，发现左左一直没睡。它平常下午四五点就睡得不省人事了；此时情形相反，是右右早已入睡，而晚上八九点了，似乎知道自己惹祸的左左，依然圆睁着毫无睡意的眼睛，不安排徊。

19

动物是否也有道德？看到左左因负疚而焦灼，我还是心软了。

大过年的，我不应该跟鼠辈计较。它的寿命不过数年，它只有我一个所谓的主人，一般情况下，左左听话，即使处于发情期的特殊阶段，它也算是少见的温驯了。它的睾丸肿得厉害，是个显赫而沉重的累赘。左左的身下像装备有两枚导弹，体积大得夸张，明显和身体不成比例，走路时垂坠着，几乎拖到地面。这相当于男人携带着两个吹鼓的篮球那么大的睾丸行动，当然多有不便，左左受困于步伐之间的障碍，比平常的样子更笨拙。而右右，还是一副懵里懵懂的样子。据说雌性甘尼森土拨鼠每年发情只有六个小时，黑尾土拨鼠是否同样？可怜的雄性必须不熄火地等待，以免错过珍贵的瞬间。自尊心和情欲同样强烈的左左，正因为经常被拒绝而苦恼，遭受折磨，烦躁不已。何况，起因应该怪我，是我违背了左左的意志，非要让它出来玩儿——我强迫着要给它一种拔苗助长的自由，这已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我又缺乏过程中的耐心，缺乏对它的尊重，才让左左对我示警。我又何必小题大做，逢场作戏，吓唬原本就心重的左左呢？

晚上九点钟了，踱来踱去的左左还没睡，它以前多梦，现在失眠了。我不忍，于是在小板凳上坐下来，向左左展示自己几乎已看不到擦痕的拇指，安慰它没事，让它以后注意好了。获赦的左左关切地凝视着我，饱含热望地靠拢过来。在我面前，它侧着身子低着头，动作笨拙又诚恳，一副认错的样子。我的手从左左脖子底下伸进去，去挠它的胸口和肚皮，它很喜欢这样。左左短胖的胳膊抱着我的手指，脑袋温顺地倚靠着，很享受地闭起眼睛……我的掌心，感受到它一阵阵轻细的鼻息。我们之间，弥漫着一种甜美而宁静的和平。

毫无征兆，左左偏过头，在我小指下端的掌侧位置，发狠地咬下去……像是识破了我拙劣的受伤表演，像是释放它一下午积攒的屈辱，像是伪装乖巧只是为了这一刻的复仇。左左的尖牙嵌进我的皮肉，疼痛让我惊叫起来，瞬间猛力抬手——左左沿着弧线，被高高甩离到玻璃缸以外，同时，我的血也疾速滴落在地板上。

顾不得教训滚回窝里的左左，我立即用清水冲洗伤口。在血流速度减弱之后，我拿上手机、钱包、社保卡等东西，准备去社区医院进行处理。就在这时，我一眼瞥见了电脑旁边空着的磨砂玻璃瓶子，愣住了。

这是四百八十毫升的糯米酒汁，度数大约只有零点五度，粒米无存，只有从其中压榨出来的微微透黄的浆液。我马上想起，在第一次把左左抱出来的时候，我只喝了两口；而在左左发动攻击之前，我喝下了整瓶……我根本没把醪糟当作一种酒。

醉酒的男家长在没有招惹它们的情况下遇袭，我总结过，它们的嗅觉对酒精极为敏感，一丝气息都可能导致它们失控。我平日小心，但过年的喜庆中，我的警惕性下降，没想到，在我看来度数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醪糟也会招致这样的后果。

我用纸团捂住流血的伤口，去社区医院。路口有违规燃放的焰火升腾，我在疼痛与恐慌中一路奔跑，无暇欣赏。值班医生说，必须打狂犬病疫苗和破伤风针剂。虽说我当初选择黑尾土拨鼠，就是因为据说它们经过进口检疫，不携带任何病菌，但狂犬病致死率达100%的统计数字，还是令我胆寒，我还是需要疫苗注射的心理安慰。

药剂分别注射，手掌两针，左肩一针，左腿一针。然而，注射在左腕的破伤风皮试，我呈现强阳性反应。医生建议我明天去其他医院打免皮试的破伤风，这种类型不像需要皮试的破伤风针那么常见，寻找起来，可能得费一番心思。

我当晚打车去了熟悉的协和医院看急诊，但那里也没有免试型破伤风。北

京在春节假期一贯空旷，尤其大年初一。打车无人接单，很久之后，我才等来恩人般的司机。从小区门口下车，已是临近十二点的子夜。冷，黑暗，空寂，疼痛，以及这几个形容词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恐惧，让我瑟瑟发抖。

打开家门，左左没睡，它见我进门，从角落直奔铁架床，一头扎进熟睡左右的身子底下——它的目的，是埋起脑袋，这样既能不看我，也能不让我看见它。

地上的血迹已变成暗色。我用湿墩布擦洗，空气中立即嗅到那种微微的腥气。

20

事先阅读过养殖知识，我知道部分土拨鼠发情期暴躁咬人，但溺爱之下的妇人之仁加上侥幸，我纵容左左的整个青春期，直至得到这样惨痛的教训——伤口不长，只有一两厘米，但左左的牙，在我的手掌犁出宽而深的血肉沟壑，快伤到神经了。

当一早赶回的男家长质问肇事者，玻璃缸里突然传来一种奇怪而陌生的声音，像是塑料扇叶连续而快速的颤动。我们分析不出哪儿来的怪声，直到反复确认：它源自左左。左左的嘴和腮都一点没动，它以奇异的方式，发出一种低微却高频次的威胁。它只对男家长示警，对我，倒是从来没有发射过这种响尾蛇般的电波。

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注射破伤风疫苗，而节假日期间的急诊室，咨询电话往往无人接听。我们顾不得左左的反应，马上出门，一家一家医院地跑。终于，找到了药。我带着六个针孔回到家，左左依然没睡——自从发生流血事件，它的睡眠时间锐减。它极其警惕，察看着我的一举一动。也许因为对可能到来的惩罚心生畏惧，左左才难以入睡？大年初二的这一整天，我都没有把它俩放出笼子，受伤的教训让我心有余悸。作为旁观者的右右，似乎也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它知道自己受到了左左的牵连，并没有像平常那样表示不满。我半夜偷偷用手电筒照射，左左的眼睛在反射光点。

大年初三，左左比右右更热切地想要从笼子里出来。我不想让严重失眠的它太难过，又拿不准它的态度，到底想忏悔还是继续施暴。因此，我的右手裹着包扎的纱布，左手握了一把塑料小铲，用来防身。

左左从有限的缝隙里侧身挤出来，小心翼翼地接近我，卑微而怯懦。我坐在矮板凳上，左左微微站起来，高度正好够着我的膝盖。我穿着珊瑚绒的

家居服，大概与土拨鼠的皮毛有几分相仿，殷勤示好的左左，开始在我的膝盖处像打理同类皮毛那样梳理起来。它卖力地，饱含热情地，一梳再梳。我时刻留意左左，果然就如前次，它陡然色变，从温柔敦厚到阴险剽悍，只在半秒之间——左左张嘴就咬，幸亏衣服厚，它迅速合拢的牙齿，擦着我的皮肤划过去，直接嵌进布料里。

我吓得从板凳上一下跳起，站着，飞快地用小铲剥落挂在膝盖处的左左。左左并无悔意，它弓着身子，眼神狂乱，准备冲过来，向我发动新的袭击。我原本舍不得打它，但两次警告性的触及无效，我被迫用塑料铲敲打了几下它的脑袋，这才与拿着报纸筒的男家长合力，把嚣张的左左驱赶回窝，迅速合拢玻璃门。

我惊魂未定，有种劫后余生的后怕与难以置信。再看玻璃门后的左左，无畏无惧。它的嘴不停地动，像念念有词，又像在骂人。它用锋利的爪子疯狂抓挠门框，随时准备蹿出来复仇似的。左左肋骨之下的腹部起伏明显——它的暴躁抵达暴戾，它的生气抵达狂怒。

21

从流血事件到蓄意咬人，仅仅三天，左左蜕变为另外的样子。尤其第三天，从早晨到下午的几个小时之内，左左变形剧烈，令我感到极为陌生。

目光不再温良，充满了强烈的敌意——左左目露寒光、气势汹汹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它是最凌厉的前锋，最出色的后卫，一旦有谁靠近玻璃缸，它极为敏捷地跳过去，封堵每个方向，并持续颤动口腔里的簧片，显示出极强的攻击性。左左的动作灵活，两个巨型睾丸也不再构成障碍，真的像导弹喷射着加速的火焰。我目瞪口呆，看到整日昏昏欲睡的小懒汉，变成眼神邪恶的暴徒。睾丸激素水平的急速上升，使它无法平息狂怒。凶暴的左左咄咄逼人、六亲不认，不仅让男家长感到害怕，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给它们喂食和清洁笼舍，变得困难。情况急速恶化，哪怕给无辜受到牵连的右右喂食，我们也只敢从只有几毫米宽的窄缝里勉强塞进去，努力躲避着发飙的左左——龋着几颗凶器般的尖牙，它可比一只决斗的蝥螭凶猛多了。“胆小如鼠”这个成语，原本用在左左身上是非常准确的，一点点动静，包括塑料袋的揉搓声，都会让它惊恐万状地奔逃。现在，它看我的眼神是桀骜不驯，看男家长的眼神简直是杀伐无赦了，往日的怯懦荡然无存。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喝下一瓶度数极低的酒酿，导致左左一场摆幅极大的变形记。我觉得酒精和荷尔蒙，都令人狂放，都具有相似的迷惑性。也许酒精散发出来的味道，与荷尔蒙的味道存在潜在的相似点，以至于发情期

的动物每当闻到，都把身上带有酒味的人看成了竞争对手。当初对于尚未到发情期的右右来说，酒味同样让它感觉到来自雄性的威胁，感觉到超越常情的危险。对于发情期的左左来说，意味着竞争者的入侵，它要捍卫自己的领地和权利。来无影、去无踪的荷尔蒙，真的像酒一样，让人丧失理智，它的威力如此巨大，可以彻底修改性格和命运。酒和荷尔蒙加在一起，如同酒精遇火，产生强烈的刺激性，产生某种爆破力巨大的化学反应；睾丸素鼓舞下的左左，随后立即进入癫狂状态。左左变得雄风凛凛，它不吃不睡，斗志高昂，睥睨一切，无惧于挑战任何庞然大物。

我想起那句俗语“酒壮人胆”，有的人在清醒状态和酒后判若两人，从内向谦卑，变得狂妄到不可理喻。左左一贯胆怯，那天在酒精刺激下的发作，或许连左左自己都是意外的，导致它闯祸以后的持续惶恐。自从见到他人的血，自从制造了他人的恐惧，左左就体会到暴力和权力的快感。过去种种，似成耻辱，似乎成了今天的复仇动力。为了看护自己的领地不被侵犯，自己唯一的新娘不被偷走，为了自己雄性的尊严必须得以证明，左左骁勇好战，带着病态的疯狂。

左左野性的苏醒，并非全无道理，此时此刻的野生同类正在忙于竞争和打斗。左左来自不知哪国的人工繁殖基地，假设它源自北美草原，那么作为买家的我，就剥夺了它一生的辽阔未来——我的买卖，造成了对它一生的伤害。如果左左真的觉醒，它认为自己不该是我的天生囚徒，不该是我的娱乐奴隶……那么，它的认识和反击，也谈不上什么误判。

左左不再回应我的呼唤，它不叫；我想如果它能叫，应该是咆哮了。不过，即使它不出声，这个突然演变出来的小野兽，也令我们瑟瑟发抖。这天正月初三，民俗里是“老鼠娶亲”的日子，说是要在灶房留一些糕饼，留给要办喜事的老鼠们。可惜正是这一天，我决意给左左做绝育手术——它再也娶不上亲了，从此将断子绝孙。

虽然人类给予宠物看似温暖的爱，可它们一旦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便毫不犹豫，手起刀落，结束它们的情欲或者性命。这些可怜的动物，本来和我们一样，各自完整地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它们将被取走自己的基因、后代和未来。因为只有它们破损，才能镶嵌在我们的生活里；只要是一个健康、完整、创造力旺盛的生命，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就难以作为奴隶和我们的生活兼容。

我给宠物医院打电话，约时间带左右去绝育。养黑尾土拨鼠的少，不是所有的宠物医院都能接诊，而且必须找到专门的异宠医生。手术时间约在初五，好吧，左左和右右还剩一天的蜜月期。

大年初四，左左已进入人工设置的绝育倒计时。

不吃不喝、彻夜难眠的疯狂，使左左看起来既精神燃烧又体力疲惫。左左依旧亡命徒般看护着自己的每寸土地，依旧想越出牢笼跟某个假想敌决一死战，但已逊于前夜的疯狂，它就像一个高烧病人正在缓慢降低热度。左左开始偶尔伸长身子趴着，通常这是放松的信号。它略为犹豫和停顿之后，还是隔着玻璃狭缝接过我递过去的生瓜子。被欲火烧坏了的大脑，似乎有所恢复。当然，情欲也“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尚存的余勇，足够支撑它闪转腾挪、左突右奔。

不过，左左的凶猛里有令人尊重的部分，它是为了保护妻儿——虽然暂无后代，但它扶着铁架床，尽职尽责，看护熟睡如婴的右右。左左小时候总是紧紧依偎右右，一副需要被保护的样子，我的朋友们看着照片都管它叫“伪娘”；现在，这是一个从生怯者的行列里站出来的勇者。我无法绕过这个野蛮的保镖，无法侵入它们的领地一秒钟——这个被戍卫的爱情孤岛，已无人胆敢来犯。左左以自己的锐利和披靡，让我看到一个鼠辈的忘我的勇敢。性，还是具有忘我之力。非洲草原，牛羚打斗，狮子就在一旁，牛羚对身边近在咫尺的威胁视而不见，无所畏惧。

平心而论，左左算是不错的丈夫。右右三千宠爱在一身，当它仰面熟睡，左左意乱情迷地凝望着它，百看不厌。值勤的左左寸步不离，一级戒备，高度提防，连我们路过时的影子侵犯了右右，左左都怒目而视。右右受到左左的连累，影响了它日常的食物和触摸，但右右似乎并不嗔怪左左，它在威武的左左身边突然变得小鸟依人，夫唱妇随了。雄性百倍于雌性的发情时长，那么，左左终于等到右右珍贵的春宵一刻了吗？我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它俩从来感情甚笃，即使因为性的问题发生争执，也转眼化干戈为玉帛，互相啃梳，打理起彼此的皮毛来。右右还不知道自己也要无辜受罚，要陪绑着走上手术台呢。

手术前，洗个澡妥当。尤其原来闪烁金色光泽的左左，经过几十个小时的炽燃，不仅明显瘦了，而且皮毛松散无光，黏结打绺，有点“马瘦毛长”的落魄相。绝育后很长时间不能洗澡，不知得臭成什么样。

我拿了洗澡笼，把玻璃门拉出等宽的缝隙，底端用洗澡笼卡死，上面用棉枕堵死。贼精的右右立即躲避，而凶相毕露的左左，试探之后，径直进了笼子。淋洗之前，我平常先把洗澡笼放在地面垫好的尿片上，搁置数分钟，过一会儿再来拿开，尿片上滚动着许多它们恐慌之下失禁的尿球。这回等我拿来浴液浴巾，安上吹风机，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再看移开的尿片上，洁净如新，一个尿粒也没有。这说明，被单独关押的左左毫无惧色。是在花洒喷水之后，左左才泄露了两三颗非常有限的尿粒。我慌张，不小心溅到左左眼睛上几滴水，它坚持不懈地死命嗑咬粗铁格栅，它的恼

怒显然大于它的恐惧。

23

大年初五，民俗要接财神，我要去支付一笔手术费用，针对左左右右。

左左必须绝育。对于右右绝育的问题，我非常纠结，以致失眠。疏于体育锻炼的我半夜踏上跑步机，疾行数公里，还是不能平息自己。送去医院做手术的前夜，直到深夜三四点，我才艰难入睡。原来每每打开玻璃门，右右直接起跳蹦到我身上，它被抚摸时因舒服而陶醉的可爱表情，它放心地在我腿上酣睡，被轻轻挪动也不醒来……而我要辜负这种信任了。我没勇气再冒险，再提心吊胆地假想右右下一秒就像左左一样勃然色变。我希望左左右右快乐，结果，却要带给它们此生最大的伤口和疼痛。而且，我都不能预测后果，一路惴惴不安，心怀隐忧：右右的好脾气是否因此消失，反而会变得像左左一样陌生而狰狞？

这天早晨，男家长和我戴好全套防护措施，动用各种手段和工具，颇费周折，屡败屡战；再加上左左对我的残余信任，我在前面导引着，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令人惧怕的骁勇左左关进洗澡笼。被单独关押的左左，以一种轻蔑的眼神回望我们；它令人生畏的表情和蛮力，让我们沿着笼子上了一圈小小的铁夹。

我选择了附近一家资质、设备和条件很好的医院，与遍布的小门脸店相比，已经算是动物医院里的“和睦家”了。专看异宠的宋医生，负责接诊啮齿动物、鸟类和两栖爬行类等非犬猫动物。宋医生说，雌鼠一般不用绝育，它的发情期短，破坏力也不像领地意识强烈的雄鼠那样大；而且雄鼠绝育，雌鼠不在化学气息的诱引之下，发情表现将会弱化。因为手术室正被占用，且手术进行过程谢绝参观，宋医生把左左留在医院，估计两三个小时以后，等左左手术结束，他会通知我。

宋医生说，有个问题。医院只有适合猫狗的伊丽莎白圈，用于术后防止动物啃噬伤口，接诊黑尾土拨鼠的机会很少，所以他们没有合适的尺寸。

这不是问题，我有！左左右右一直过着装备齐全的生活，我买了许多用得上、用不上的东西，堆满半个阳台，其中就包括这个黑尾土拨鼠专用的小尺寸脖围：伊丽莎白圈。主材是透明而可弯折的塑料片，用尼龙粘扣在宠物脖颈后固定，形成一个喇叭型的保护罩。这个脖围原本是为它俩洗澡用的，卡圈正好适合土拨鼠，可惜它俩反抗强烈，清醒时很难戴上，所以搁置起来。

我们抱着右右回家，它不知道自己侥幸逃过一劫。男家长取了脖围，返回

医院去接左左。虽然我是幕后那只被咬伤的黑手，但不愿自己被左左当作坏人记恨；如果把账算在男家长头上，似乎并无大碍，反正他们接触时间少，大不了相忘江湖。

我看着表，左左此时正在遭受宫刑。

24

左左刚回到家的时候，麻药劲儿没过去，它有点懵里懵懂，发蔫，走路也不太稳。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左清醒过来。临出院给它打过止疼药，现在，似乎明白自己处境的左左恼怒地抓挠我给它准备的新软垫——是的，恼怒，虽然缺乏支撑愤怒的体力，但左左看起来也是电量十足的样子。

第一眼看到左左，我诧异于它为什么没戴那个伊丽莎白圈，男家长不是专门回来取走的吗？男家长转告宋医生的说法：左左戴上脖围，行动受限，饮食也会受到影响，对它的情绪好转不利；何况伤口已被仔细处理好，里里外外精密缝合了三层；左左略长的尖牙，也被修平……这样处理之后，伤口应该不会被左左咬开。

离近了看左左，我发现，它的长相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急速变化。做手术前，我就知道它从小白脸变成了猛张飞，两侧对称生出放射状的黑须；而现在它的眼睛像画了烟熏效果的眼影，眼角还各描出一道长及耳际的黑眼线。我把照片发给郭悦，她非常惊讶，感叹：“真的完全不像左左，都认不出来了，感觉它变成了穿耳钉、化浓妆、留杀马特发型的街头混混。”是啊，对比过去憨憨的萌态，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位黑化了的大魔王就是左左。

大魔王的威风，止于外表，左左的身体内部伤痕累累。它的下腹和后腿，部分的毛被剃除了，露出肚皮中间一个墨滴状的胎记，刀口就在正中间，血痕隐隐。伊丽莎白圈还有个说法叫耻辱圈，左左虽然没有戴这个脖围，但它两枚具有核武器般攻击力的导弹被卸除了，留下两个或许被它自己视为耻辱的空囊。

我把那个很大的铁笼，放在厨房角落——这里既保温又通风，还有隐蔽性。术后的左左直接回到这里休息，我没有让它和右右相见——它们咫尺之隔，被一扇木框磨砂门阻挡了视线。右右并不知道，它威武忠诚的大丈夫已成不幸的小太监，因为左左一声不吭，没有用叫声来传递信息。它正在身心剧痛的突然重创之中，这种情况下见右右，也许会挫伤左左的自尊心，让它丧失生趣。作为罪魁祸首的我并非假仁假义，除了妇人之仁，隔离也是一种必要的保护——尽管没有这样的医嘱，我还是禁止左左和右右接触，担心失势的左左会受到右右欺负，也容易造成伤口的感染。我想让

左左恢复几天，再上演爱侣重逢的一幕。我电话咨询，宋医生说为了保险起见，的确应该让左右分居一周为好。

血祭之后，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拥有相安无事的春天？术后第二天，我隔着铁栅，小心尝试触摸左左的后背。左左没有勃然大怒，摘除了发动机的它不再狂飙，只是安静地缩在笼角——疼痛和劳动一样，都要耗力气的。

25

它又变回慢吞吞的左左。纵横内外的刀口，使它谨慎。吃东西的时候，左左一手握住食物，一手拄地，有时需要轮换双手的位置，它不再采用双手捧物的动作——三个落在地上的支点分担着压力，而以前的姿势，大概会压迫伤口。左左裸露的腹皮，胎儿肌肤般，极尽柔软、薄嫩、细滑；上面手术刀的割痕很细，长度，近乎它在我手上制造的咬痕。好了，债伤还清，不必计较了。

最初的几十个小时里，左左经常发呆，眼睛空无一物；即便回过神来，里面增添了一点陌生的内容，我不知那是否就是厌世的眼光。不过，我们的关系算是重回正轨，左左从允许到期待我的抚摸。左左似乎因为没能控制好体内的化学作用而愧疚，我潦草的仅限于一个指头的抚触，也让它浮现出陶醉和感激的样子。左左依然懂事，有着替人着想的情商——它竟然把头埋在软垫下面，甚至卡死在两根铁栅之间，示意我不必警戒，它不会再咬我了；假设它再张嘴，我有足够的时间后撤，不会再被利齿所伤。可能左左经历了来自其他人类的“虐待”之后，对比我过去的善待，回心转意，努力表达了重修旧好的愿望。

左左不知道，我才是使它沦入悲剧的真正主因；它和我们一样，在脆弱的时候，总是无知而盲目地，向伤害我们的阴谋家和凶手求援。术后的左左每每见到我，总是翻露出小肚皮——此时的动作显得一箭双雕，既表示对我的信任，又向我展示它疼痛中的伤口。

以前我在论坛里看过一个帖子，饲主说他的黑尾土拨鼠会装病。因为生病期间食物升级，还有额外的照爱，这只富有心计的土拨鼠在主人面前总是病病恹恹，一旦主人离开，视频记录里它上蹿下跳，活力四射；一旦主人前来，土拨鼠立即演回病人，一副体力不支的惨相。

左左术后第三天，我确认它也会演戏。左左在我面前，走路迟缓，步伐不稳，偶尔打晃；吃东西始终要用一只手拿，另一只手要努力撑住地面，好像时刻忍受着腹部的刀口疼痛；躺下来的时候，更是格外小心，像经过慢动作处理。我心疼左左受这么大罪，每每把食物都送到它嘴边，陪护着它，经常帮它按摩……左左虚弱地躺着，基本不动。

有段时间我没去厨房，左左大概以为我像平常那样出门买菜了。我听到奇怪的动静，于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通过门缝观察：左左跟特工007似的，身手灵活，飞檐走壁，踩着横格铁条，爬到笼子顶端。我慢慢倒退，回到卧室，带着加重的脚步声和蓄意的呼唤重新来到厨房：左左可怜地蜷缩在角落，气息奄奄的样子。

我忍住嘴角的窃笑，关严厨房门，就在客厅里安静阅读，等着那种铁条被晃动发出的异响。果然！当我突然推门，左左已攀至最高处，并且把脑袋从相当于天花板位置的格栅里探出来。被意外抓了现形的左左，愣了两秒，不知所措，然后它一撒手从上面掉下来……有脂肪来减震，我没看出左左有什么伤口剧痛的样子。左左愣在那里，暂时没想出什么蒙混过关的办法。

演技穿帮，左左讪讪地回窝，面壁去了。

26

术后的左左回家一连数天，没有发出叫声。大概是疼痛、屈辱和恐惧，让它哽咽难言。一门之隔，右右甚至无从察觉为它浴血奋战的左左就在数米之外喘息。左左手术之后的第四天，它突然发出的叫声让右右愣住了……原来失踪的爱人，近在咫尺。

隔天就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我安排它们短暂见面——隔着笼子，我怕右右的爪钩会划破左左裸露出来的有伤的娇嫩腹部。右右迷惑地看了一下，囚禁中的左左明显更为热切和激动。它们贴面，然后有个近似吻礼的动作——右右在左左的左颊上，把一点点皮轻轻咬起了一下。这大概表示亲密吧？左左和右右最早对我也这样表示过，用牙齿轻咬皮肉示好，但这种表达方式被我拒绝了。

令我意外，轻浅的问候之后，右右转身就去客厅玩耍……留下疯狂啃咬笼子的左左，它急迫，想延续短暂的团圆。左左一根一根地试，看能撼动哪根金属——带伤的它用了如此之大的气力，以至于整个抖动的笼子发出很大的噪响。右右没有回头，忙着在鞋架那里冒险，探索世界的热情远远大于探望伴侣。右右的好奇心分解了注意力，它无暇安慰左左——它从来不像左左那么心重。此后右右的表现近乎无情；它继续闲逛，似乎彻底忘了左左的存在，并未给予浓厚甚至是敷衍式的关心……即使左左为它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爱是什么？爱是有针对性的荷尔蒙和内啡肽——所以，不要向荷尔蒙寻求公正，不要向内啡肽讲道理。

我没想到，见面的第二天，二月十五日，左左竟不惜以自残的方式回到右右身边。

事先我没听到一点动静，是去厨房续水，我赫然看到惊骇的一幕：左左从笼子顶角的格栅里钻出五分之四的身长，体重使它失去平衡，头朝下倒栽着；剩下五分之一的身长卡在笼子内部，两条小腿朝上……左左斜悬在半空中，无论前肢还是后肢，都找不到着力点，格栅死死卡陷在它的深腹部——那正是刀口缝合之处。

我不知道它悬了多久，也不知道是不是牢牢卡束的粗铁丝使它无法振动胸腹发声，只知道，那种几乎是出现在人类魔术里的割裂效果，让左左的身体不再是一个整体，似乎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个部分。我惊慌地用棉垫拖起倒悬的左左，尝试让它的身体拱出或者退回。间距只有几厘米宽的栅栏卡得太紧，我竟不能让它移动丝毫。五分之四的左左侧枕在棉垫上，眼光柔顺，听凭我无效的努力，并且享受……我偶尔划过它腮颊的安抚的手指。过了几分钟，施救依旧没有成功，左左像是从我的无效努力中预感到了末日将至，它方寸大乱，一边乱叫，一边在棉垫上乱咬。之后，左左闪过一丝弥留之际的眼神，拉出一些不成形的稀便；然后它不再挣扎，放弃了身体耷拉两侧，呈现出别扭的弧度。

我这才想起工具箱放在何处，取出钳子，边剪裁边旋转，终于，把加固版的粗铁丝拧断。左左的身体瞬间恢复弹性，鼓出体积。获得解放的左左，刻不容缓，立即奔赴旧日爱巢，在阻隔团圆的玻璃门外，徒劳地连跳带蹦——它急于回到右右身边。

本来预计两天以后才合笼，但被剪断铁丝的大笼子已经缺角，无法再关住为爱亡命的左左。我只好拉开玻璃推门，放左左进玻璃缸里。左左和右右的重逢，倒毫无戏剧感，它们就像始终在一起那么自然，见面之后，擦肩而过。左左罕有地，立即跳在跑轮上走起步来——我不知道这个行为是纯系偶然，还是左左蓄意而辛酸的证明：它向右右表示自己体能尚佳？

与发情期的左左相比，右右似乎更接纳此时残疾的左左。它只是愣了半分钟，因为左左径直奔向跑轮，右右茫然于自己为什么突然失去了往昔的魅力。不过心无挂碍的右右很快从被动中摆脱，它从来都是率性的，奔放的，孩子气十足的，没心没肺的，不会为情事所扰。右右是天生不知失眠为何物的类型。它马上兴致勃勃地划拉门隙，想出去闲逛，并不知晓也并不在意左左为重逢所付出的危险代价。

我一整天都注意观察重回右右身边的左左，它还是偶尔倦怠，但我只看到几次它如同厌世的眼神；剩下时间，它似乎都是因满足而温柔的。左右殷勤地彼此梳毛，以各种姿势紧靠在一起，每晚依偎入眠。有时左左睡觉

中，也用两只小爪子撑起身体，观察并似乎依旧在保护熟睡中四脚朝天的右右。不过，右右很会耍赖，它入睡前，先是整个身体趴在左左后背上，找个角度扎下头来，再翻转方向，最大可能地靠拢左左。

对我来说，左左已经绝育，右右不会生育，我将从此养育两个终身制的儿童；对左右来说，对方是唯一的同类，除此，它们不会再有其他共度余生的亲人。

只要和右右在一起，左左就会平静得多。经过一天观察，我确认左左的状态平稳，毫无攻击意识，二月十六日，我才敢把左左放出来玩一会儿。就像当初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跳上跑轮，这次，左左同样展现了少见的好奇，进入陌生的领域探索，大约是跟随右右的缘故。它不愿与右右分开，离别的恐惧似乎超过了其他一切的恐惧。尽管左左从未像右右那样勇敢地跳上床垫，并且示威似的攥拳站在我的枕边——左左还是喜欢五斗橱底下的狭促之地。如果右右在附近，左左肯定会从阴影里走出来，陪着右右东张西望。

当晚，和右右抵足而眠，心满意足的左左睡得很香。

27

二月十七日中午的火车票，我要去参加天津的自然文学论坛，有个二十分钟的演讲。早晨醒了，我例行先去查看两个小家伙。我每天数遍检查，昨晚发现，左左腾空的阴囊左侧比右侧稍肿，可能完全吸收还需要假以时日；但伤口，已愈合成很不明显的一条细线，早知如此，我给左左绝育会更决断。现在，它们并肩仰躺着鼾睡，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的靠近也没有惊醒它们。

这时，我发现左左的伤口前端，渗出半滴汗液般的异物，肉红色，很像新生的肉芽，有些微微的湿润。这让我有些紧张，慌忙拍照给宋医生，问我能否赶在中午出发前带左左去看个急诊。宋医生当天休息，他让我明天带左左复诊，此前可以先戴上脖围，用碘伏消毒伤口。

当初宠物店老板曾经告诉我，黑尾一周不吃都没关系。我从来没有勇气进行这样的极限实验，但我猜一两天不吃，应该并无大碍。男家长白天有重要的会议安排，难以请假，再说他对左左尚存畏怯，许多事情只能我来——所以我要做的是十七日上午给它戴上脖围，十八日下午从天津赶回来带它看病。

左左非常温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顺，它像是要弥补之前的过失。我一边抚摸，一边先把脖围丢给左左，让它当玩具咬着玩儿，以放松警惕。

趁左左不备，我兜头把脖围的尼龙粘扣带牢牢粘住。

我再度辜负信任，这令左左难以置信。气愤的左左用力甩头，想把禁锢之物甩脱，结果是自己一次次失控栽倒。左左当然理解不了腹部渗液和脖圈之间的逻辑联系，只是认定，自己竟被人类一再背叛和欺骗。左左跌跌撞撞地想避开我的安抚，但空间有限，它总是绊倒；它发出连绵的喳喳声以示抗议，背对着我，气得浑身发抖。

怕伤口继续感染，我重新隔离左左。左左歪歪扭扭，困难地爬回自己的小铁床。它动作僵硬，努力把自己摆搁正确，让别扭的脑袋放在不那么别扭的角度。它戴了脖圈，不仅无法从断了铁丝的笼里钻出来，也无法进食和饮水，更无法打理自己。原本进食文雅的左左，现在不能擦嘴，不能举起小胖胳膊，胡噜自己的大圆脑袋。左左想喝水，但它无法接近喂水器的舔珠；想吃东西，但它脖圈卡住食槽无法衔起任何颗粒。尝试失败的左左，再次艰难地爬回小铁床，左左坚决不理睬我，对着墙角叹气。

我匆匆前往火车站，只能回来再安慰这个小可怜。

当晚住宿天津，男家长给我发来左左的视频。它很乖，像是已经接受了脖子上的塑料枷锁。左左显得逆来顺受，甚至没有委屈，它看人的眼神，万般温柔。因为左左戴了脖圈，男家长不怕会被它的利齿所伤，也敢于给小病号提供人工按摩了。仰躺的左左，被抚摸了一会儿之后，幸福地眯起眼睛。左左无法自主进食，男家长喂了它几粒剥了壳的南瓜子仁儿，然后问它：“好吃吗？”左左点头，用力吧唧小嘴，表情上极度配合，一副享受美味的样子。男家长给我拍了特写：坚持用碘伏消毒，伤口已看不出什么异常。

28

二月十八日论坛结束后，我没有参加后续的采风活动，就匆匆从天津返京。我一路狂奔，要尽快带左左看病。

左左见到突然到来的我，面有愠色，它几乎要从鼻子里喷出“哼”的一声，扭过头去，蓄意不看我。我惊讶，左左竟然已经挣脱了脖圈！那么，它今天已经正常饮食了？来不及多想，我赶紧抱起左左出门。跟宋医生约的时间是五点，我怕耽误人家下班。门口堆着新到的邮包，全是左左右右可能爱吃的东西，还有为它们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膏。但时间紧促，我来不及喂，只随手装了几颗生瓜子。我也没顾上跟右右打招呼，把左左装进外带包，只对右右说了一声：“回来再和你玩儿啊。”右右站立着，两只小小的前爪按贴在玻璃门上，错愕地看着我一阵风似的出现，又一阵风似的消失。

外带包放在副驾驶位置，是透明的硬塑料质地，上面打了六个直径约两三厘米的透气孔。我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恼火的左左飞快挠着布垫，余怒未消。趁着等红灯的间歇，我通过透气孔递给左左生瓜子，它一边赌气，一边勉强接过来，吃了。左左和右右最爱吃生瓜子，但喂食多了容易滑肠，对健康不好，所以我每隔两三天才喂两 three 颗，用于特别的奖励和情感贿赂。吃了三个瓜子之后，左左的情绪好转了。

到了医院，我可以用垫布抱左左，但宋医生需要检查伤口时它一点也不配合，防范心理很重，我也控制不住它的挣扎。在左左的闪跳与躲避中，我们窥见腹部的血点，似乎不大。左左越来越焦躁，强行查验，可能诱发它的攻击行为；若要得知翔实情况，只能麻醉处理。

宋医生提示，可能出现几种情况。最好的情况是，左左咬开的只是表皮，其他无碍，只需表面清创，然后口服抗菌药加碘伏消毒，伤口能够愈合。最坏的情况是，有一定面积的感染，那就要重新开刀和缝合，在体内埋管，连续半个月，每天用生理盐水冲洗它的腹腔……假设出现后者的情况，左左会非常痛苦。

我原以为最多只需要重新清创，没想到还存在这样糟糕的可能，远超我的心理准备。我只能祈祷，希望左左不要遭遇风险，希望麻醉后能准确判断，它并无大碍。

宋医生很快从手术室返回，赶来的郭悦也正好推门而入，我们一起听取检查结果。

左左啃咬伤口，造成的感染状况是最为严重的：虽然创面不大，只有五毫米的开口，但它的左侧阴囊有一处直径约4厘米的团块，被按压后，大量脓液就涌出腹腔。即使开腹再次手术，已不能进行再度缝合，要保持开放性伤口，每天大量冲洗腹腔和内脏——因为动物不会允许，所以这相当于无法完成的操作。即使把左左全程固定手脚，让它无法正常进食、饮水和排泄，让它每天痛不欲生地体验切割开的自己，也可能难以控制扩大化的感染。即使左左能够熬过一切漫长的酷刑，存活下来的概率也近乎为零，所能做的不过是延长几天生命。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换得的几天里，左左也无法感受快乐，因为连续手术和治疗造成的痛苦，将彻底撕裂左左与人类的情感，左左将陷入疯狂，不会再允许人类靠近，所以在濒死时光中，它将陷入狭小的空间和巨大的恐惧里，直到死亡。所以宋医生建议：立即对左左实施安乐死。说是建议，其实并没有另外的选择。

我毫无准备，如遭雷击。宋医生没有说完，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失控。

土拨鼠特别擅长隐藏自己的疾病和伤痛，因为它们害怕暴露弱点被食肉动物攻击，所以大部分家养土拨鼠生病看起来都是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的。左左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是它快被铁丝挤断身体导致的？还是它预感不妙，要获得与右右在一起的最后时光，才有那场拼命到几乎丧命的逃亡？想起左左极尽温柔的眼神，被抚摸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感恩式的回应，原来，这是它忍住身体疼痛，给予我们美好的告别。敦厚的左左，似乎因为自己的残缺存在而对右右和整个世界怀有歉意似的——它自伤，直到无法收场的地步。

宋医生抱愧，说接触黑尾土拨鼠的案例很少，的确缺乏了解，更没有预料动物性格特点和个体差异——没有采取防止舔咬的保护性措施，造成左左用挫平的牙，执拗地咬开三层的皮肉缝合。他甚至不能给出详细的解释，左左的感染到底是早已发生，一直在腹腔慢慢扩散以至积重难返，还是原本并不严重，后来短时间内急剧变化。

追究前因已无意义。对左左来说，一切，为时已晚。

29

宋医生和几个护士围着，郭悦和我也站在旁边。左左躺在中间的手术台上，脑袋上套着一个呼吸罩——它是漏斗型的，用来进行气体麻醉，样子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马桶搋子。左左的整个脸面几乎都埋在呼吸罩里，只露出下巴，昏迷中的左左就那么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如果不是这种结局，我会觉得它的样子有些滑稽；但现在，我只觉得心酸和悲伤。左左从未对陌生人如此信任，绝对摊平身体，纵容人类施予自己死刑。

左左比原来瘦了很多。发情期已有数天不怎么吃东西，术后疼痛使它不能大快朵颐，刚刚能进食又被套上脖圈，甚至都无法饮水。绝育的时候，左左已瘦到一点二五公斤；现在是绝命的时候，它只剩一点一三公斤。我的左左不再仪表堂堂，它皮毛暗淡，显得狼狈和潦倒……还不到一岁，这就是它的终点。

我哭得拿不住笔，捡起来，终于在安乐死的同意书上签字。左左还不到一岁，它大概自出生后再没见过父母——作为宠物，它必须拥有孤儿的命运；我是它的家长，是最初同意让它残疾、现在同意让它死亡的人。

这是左左生命最后的落幕时刻。异氟烷吸入麻醉，静脉留置针给丙泊酚后加氯化钾。我一只手摸着左左的小爪子，另一只手摸着它的胸腔……我的指端能感受到它的心脏，像一颗跳跃的小小豌豆，渐渐地，渐渐地安静。再没有了起伏。在它柔软的心室位置，空无一物。

里面是一张蓝色无纺布，外面是一条雪白布巾，把离开的左左包裹得就像刚刚降生的胎儿。我抱着左左，它是软的，温热的，高烧般的体温在它告别这个世界很长时间之后才慢慢退去。在心脏彻底停止跳动和被包裹在襁褓里之后，被宣布死亡的左左，它的小腿却有力蹬踏了好几回，像活着一样。它的神经系统还没有死。或者这是左左不甘，它没有跟右右告别。我漂亮的小胖子，心性胆怯，却为爱奋勇……它再也不回来了。

没有把左左带进家门，我们想让右右回避这样生离之后的死别。男家长回家取了花铲，绕到前院。我住一层，下沉式小花园外侧种了几棵玉兰树——我们将把左左葬在树下。月色下，男家长沉默地给左左挖墓。他满怀歉疚，因为无缘无故地打过左左；因为工作忙，因为害怕被咬，他没有抚摸过左左几次；因为我在天津的时候，他怕勒着左左，自作主张放松了脖圈，才导致左左得以挣脱脖圈继续啃咬，这可能加速了伤口的感染。

给贪吃的左左买了那么多好吃的，它再也吃不着了。我挑了一些，左左一生素食，没有吃过一个面包虫干，也没有像右右那样带着绝对放松的心情大胆探索过。左左没有躺过草坪。没有换过银白色的夏毛，它一生都没有见过春天……它自己酝酿的春天，也因我们的宣判戛然而止。当初我们购买黑尾土拨鼠的宠物店，就毗邻花店；可把左右带离的时候，我选择就近的出口，没有走那条鲜花簇拥的甬道。左左的一生，没有见过花。

可怜的左左带着一身的脓，体重却锐减那么多，它埋在玉兰树下，这是它此生中，离活着的植物最近的一次。

玉兰的花苞，介乎圆锥体和纺锤体之间，是最早开放的。花形大，而且庄重，有种膏质的光感，简直就是花的脂肪……我觉得玉兰，最像左左。

30

我同样，觉得自己对不起左左。

早知如此，我为什么要左左学习什么定点上厕所这种不必要的技能呢？收养宠物，我们迫不及待地依据自己的喜好对它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恨不得把自己的排便行为，看成世界上所有动物的法则。我对左左的教化，乃是来自人类的意愿和价值观；而野外的动物们，根本不需要学习这门功课。左左曾为此遭受羞辱和惩罚，并艰难地努力适应陌生世界的法则。

我为什么要喝酒酿呢？左左给了暗示，我还是没有警醒，才使事件上升为流血冲突。我一再背叛左左的信任，从骗它进洗澡笼，到给它套上脖圈，再到把它送上医院的手术台兼断头台……我辜负了左左。动物和人一样会用计谋，但动物和人不一样，它们不利用信任。鳄鱼不吃落进嘴里清理口

腔的小鸟，珊瑚也不对小丑鱼用毒，动物比我们诚信，它们都是干净的傻孩子。

左左不需要我的品德，它只需要我一点点的爱意和耐心，我没有做到。很多养宠物的人，都以爸爸妈妈自居，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左左右右的妈妈，以我性格而言，这个称呼有点害羞、矫情和难堪，现在我知道，是不配。

刚把它俩领回家时，我曾转过念头：它们如果活个八年左右，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不自由。尤其左左，我开始真不想要它。敏感的左左，自尊的左左，优雅的左左，情深意长的左左……它离开了，给我留下的，全是它的可爱。我还记得，早睡的左左睡在跑轮下，记得右右给左左“开追悼会”的戏谑样子，这些曾让我忍俊不禁的场景，竟是真实生活的预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听起来有些调侃的话，竟成左左的谶语：大年初一我被注射疫苗，正月十四它被注射安乐死，左左没能度过元宵节的前夜。

别了，我的左左。我想念它完美的眼睛、优雅的仪态，想念它在小毯子上的压痕，想念它在右右面前的温柔与坚强，想念它给予我的宽容与快乐。变成小暴君的左左咬了我一口，我却让它赔上一条命，究竟谁才是暴君呢？我是瘢痕体质，身体会记录每道伤口。这个咬痕，瘀脓的水泡将变成血痂，等血痂掉了将变成微丘形的硬茧，留下飞去来器形的印迹……这算是左左留给我的终生纪念。

安乐左左的当晚，我很晚才在药物的帮助下入睡。做了若干个梦，都是关于左左。比如，我梦见带左左去看病，擅长此道的女医生不值班，她让我换个时间。门外我的手拖着左左，它拼命挠那道打不开的门缝，尖利的趾甲不断刮划着，发出噪声。但我做的第一个梦里，左左并没有出现。我梦到天上的动物园，开始是从窗口看，不知怎么，我又站在那种悬停半空的游览车里，俯瞰地面的各种动物——有眼神淡漠的狮子，有皮肤湿而黝黑的雨蛙，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轮廓模糊的动物。在那个神秘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黑白的。我并没有特别清晰地意识到我是在找寻左左，但我肯定在努力找寻着什么。我在那个天上的黑白动物园没有找到左左，或许因为，它刚刚长眠地下。作为一只土拨鼠，左左此生第一次接触到土，第一次置身挖出的洞穴里……是在它死后。

巧合的是，左左此生接触最多的三个人类——我、男家长和郭悦，当晚，都梦到了左左。

左左的突然离开，让我好几天缓不过神。我曾记录它们的日常，以为是有兴趣和娱乐的风格，没想过伤感的结局。郭悦安慰我说：写文字，也算纪念

了。然而，这对左左有什么用呢？即使蚊子都夸我的献血美德，并把我评为劳模，这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郭悦反问：“那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是啊，每条命都终有一死，只有活着时候的善待是有意义的。也许我不能给左左一片自由的旷野，就注定带来一种必然的辜负。

能做什么，才能算作我对自己的惩罚呢？干脆为了左左，接着戒几天咖啡，至少为它守个七七。我喝咖啡成瘾，写作的极端时候每天喝五六杯，每篇作品都是几十杯甚至几百杯咖啡换来的。试过各种办法，但我缺乏自律，自制力非常薄弱，所以多年无法戒除。在狂犬病疫苗注射期间，需要戒烟戒酒，忌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医生特意嘱咐，连浓茶和咖啡也不要喝。最初只是疫苗的二十一天限制，随后变成我一种私人的纪念仪式，终于履行了自己对左左默许的诺言——十多年来，这是我最长时间没有喝咖啡的一次。虽然这是微不足道、缺乏意义而略显做作的付出，但戒饮咖啡的诺言只要持续一天，左左的作用力就在持续一天，它就在具体地影响着我的生活。

未曾预料的是，竟然是左左，帮我祛除了内心的迷咒——我一直觉得，是咖啡代替墨汁在帮我写作，离开咖啡，我在稿纸上寸步难行。原来不是。在肠胃断供的日子里，我竟然比平常速度快，因为不必像以往那样，无聊又无奈地等待咖啡因起效。这让我对左左有了更多愧意和谢意。

不过，我知道，我再喜欢左左，左左给我带来的也是玩宠之乐；我再怀念左左，它带给我的也是玩宠之觞……对我的生活，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意义的改变。我的缅怀早晚会变成遗忘，我对咖啡的抵触也早晚会变成再度的沉迷。左左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像，对右右的致命改变。

31

就在左左离开的当晚，右右就发生了非常奇怪的变化。

男家长在门外的玉兰树下掘土，我正给左左准备一些陪葬的食物。我难过，不仅为左左，也因为无法向右右交代——失去左左的它，漫长的以后会多么孤独啊。

我打开玻璃门，给右右放点安慰的零食。我摸摸右右的小脑袋，没想到，它蹿出笼门跑了，然后销声匿迹。平常，右右总是要和我玩一会儿，然后自动回窝睡觉。可那天，一小时过去，到处找不到右右的影子。

男家长埋葬了左左以后，和我一起找。右右就像凭空失踪了一样，哪里都没有。也许是我连续的焦急呼唤打动了右右，过了很久，它回应了两声。

循声而去，右右的藏身之处，是地下室最长一排书柜的后面。为了防潮，我在摆放书架的时候没有紧贴墙壁，留下七厘米的宽度。这与右右的身体宽度相仿，使它不能从侧面转身，只能靠上下翻转来调转身体的方向。我很奇怪，这条长达六米、宽仅七厘米的黑暗甬道空荡荡的，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右右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在此停留这么长时间？手电筒的光柱照射下，能清楚看到右右，但它就是不出来。

也许，右右眼睁睁看着我把左左掠走，却没有带回来，它害怕我了？可我以前，也把左左单独带离过，无论是去郭悦家度假，还是去做绝育手术，右右从未有过异常。这次，右右的表现，明显是在躲避我们。

聪明的右右一直是越狱专家，它知道从哪里下手，也能瞬间做出判断，选择难以被搜索和缉拿的藏身之所。长排书柜后面的缝隙，藏在这个地方，鞭长莫及，我们即使发现它也无济于事。书柜太沉，无法搬运；夹缝太窄，无法进入。我们只得眼睁睁看着它长时间徘徊在中间地段，通过上下翻身来转向；最后它长久不动，团成一个球形，似乎睡着了。那里又冷又脏，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窝也没有盖在身上的薄毯，竟成为右右的心仪之选。黑暗将至，没有左左的夜晚，右右好像感觉得到来自我们的威胁。

男家长想出一个办法。他先封死书柜一端的出口，然后踩着凳子，把拴了长铁丝的扫帚，从书柜上端探进夹缝里。然后他跳下凳子，从这端开始，拉动铁丝操纵的扫帚，沿途弄出声响，把右右朝我这端驱赶。受了惊吓的右右一点点退后，因为狭窄的空间里视线被阻挡，它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小半个身子已经退出书柜之外……被早就埋伏好的我一把擒获。

右右浑身蹭满灰尘和泥垢，被我当场抓去洗澡。右右讨厌洗澡，我希望它由此记住这个教训：地下室是禁区，以后别去，容易带来惩罚。当我用浴巾擦洗右右，不由得怔住了。我能闻到隐隐一丝……左左的味道。

我经常检查自己，担心身上沾染鼠味而习焉不察，接触它们以后，我不是立即洗手就是洗澡——我曾经希望，作为宠物的它们没有体味。而此时，干燥时间不到，被水打湿后弥散出来的……左左的味道，对我或右右，都是稍纵即逝的珍贵。

32

我承认，左左离开的第二天起，我就对右右更多宠溺。两只小宠，已经有一只遭遇不幸，我不希望另一只感觉不幸。我原来每天给它们放风一两个小时，怕它们啃噬家具和电线，我得随时盯着。我想给右右更多自由，只要我在家，就放养吧，我把充电器等都收束起来，免得它发生什么意外。

右右一出笼子，眨眼又不见了。它一点没接受几个小时之前半夜洗澡的教训，再次前往昨晚躲避的地下室长书柜后面。男家长上班了，我一个人无法完成协作才能达成的捕捉，只好听任它停留在那个没有食物和娱乐的黑暗里。

我从未见右右有过如此耐心，在我的反复干扰下，它依然在寂暗里抱拢身体。也许因为冷，右右的头深深地垂下，像害怕时的睡眠，像清醒时的祈祷。任何时候，我的手电光束照过去，它都维持这一个同样的姿势。不吃，不喝，不动，不为所动，保持着团抱。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右右的姿势基本没有变化，长时间保持宁静。浮生若梦，昼如长夜，右右像正在经历一个被延迟了的守灵之夜，又像童话里的公主，突然被针刺出血而陷入沉睡。

我想不通，它为什么突然怕我，为什么突然放弃玩耍，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它的多动症和顽皮？我不止一次当着右右面把左左拿走，带去郭悦家度假，过几天再让它们团圆，右右无动于衷。为什么右右这次举止反常？倘若知晓并确认了左左的死讯，它不再怀着任何希望，为什么右右像个教徒把自己关进黑暗狭窄的忏悔室里？我迷惑，为此做出各种猜想。

以前右右能够从洗澡笼中逃脱，因为挂碍左左，它只好忍受讨厌的水流和泡沫；现在与左左永无重逢，再困守监狱毫无意义……可如果说右右热爱自由，变得不自由，毋宁死，它此时不更是自我囚禁吗？蜗居之地，比它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小多了。还是说，那里的地貌，太像土拨鼠打洞的地方了：置身黑暗，前面只有纵深而延长的远方……它是否在怀恋自己从未去过却像候鸟头脑地图里一样存储着的故乡？

还有，左左离世的当晚，我注意到右右的生殖器比平常稍微凸起一点点。

那么，这是右右发情了吗？它是否要回避自己的尴尬时光？右右拉^屁和尿尿随性，有时我怀疑这并非无耻——它不采用专门姿势恰恰是为了有所掩饰，它装作梳妆、挠墙或者睡觉，表示身体下的这些颗粒与它无关，就像害羞的小女生不愿被别人看见走进厕所一样，以为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她也需要排泄。右右经常做出挽尊的动作，抓食物扑空险些跌倒，它就势扶住跑轮假装别有兴致地滚动，它扑向门缝以为要放它出来，当玻璃门快速合上使它的热望落空，右右会装作在笼子里跑来跑去地健身。右右是否觉得，发情期可能是一次巨大的尴尬，是激素水平失控而带来的一次难堪排泄，是不能暴露的？假设的确是发情期的原因，这种丧偶之后的逃避，是否再次展现了右右的高智商？右右猜出，左左因为发情期的攻击行为而丧命，所以它选择特殊时期的自我囚禁，把攻击性和破坏力降至最低？还是说，右右甘愿放弃珍贵的几小时陷入休眠，这是迟来的肉体苏醒，这是某种追悔导致的疑似殉情？种种解释，显得过度附会人类的煽情习惯，也许不符合科学；但这几近幻觉的表达是如此神秘，以至于什么样的解释，

都捉襟见肘。

那天我长时间抱着左左，它在我怀里渐渐僵冷……我从抱着一个小玩物的感觉变成抱着一个木偶。当我回家抚摸右右，无须言语交流，我手上沾染的气息，让它明白了并未目睹的一切。右右害怕，是因为我残留着刽子手的气息，还是残留着左左死亡的味道？土拨鼠，它们能倾听大地的心跳从而感知地震，能倾听季节的心跳从而感知春天，难道，它们也能倾听亡灵的心跳从而感知爱人？

我怔住了，流泪不止——那个荒凉而黑暗的禁锁之地，竟是我离左左埋葬之处最近的地方。右右上午待的中部位置还略有点斜，经过一系列调整，它最终停留的位置，和左左的葬身之所，几乎能画出一条最短的直线……它甘愿最大可能地靠近不再可能的爱人。右右和左左之间，相隔数米打不穿的土层。右右不再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右右了，它像被绝对的黑彻底冻住。

我看着黑暗深处默哀的右右，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不过，在男家长回来之前的十二个小时里，右右曾有两次主动现身。

第一次，是下午三点多。在我的呼唤下，右右自己从书架后面走出来，它慢慢向我靠近，暴露出整个身体。它甚至站起来观望，并且由于踮脚而导致身体轻轻摇晃。我怕惊动右右，蹲在离它几米的地方继续呼唤，但它扭身，回到狭长的黑暗深处。这时，我才发现失口了，我听到自己刚才下意识中一直呼唤的名字是：“小左左。”

第二次，发生在黄昏。光线转暗，我打开了地下室顶棚的射灯。还没等我过去查看，右右走出来，它一副完全不认识我的神情，无论我怎么试图互动，它也不回应。问题是，我也像不认识它一样。我简直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它的身体微胖，它的眼睛后面多了两条隐隐的眼线。从体型到面貌到神情……它更像左左。在长达数小时隔绝于世的蜷缩状态里，右右像茧蛹经历了羽化，它的模样和神情都是非常陌生的，像是左左右右的中和体，或者说更像是两者的孩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我几乎不能以右右来称呼它，与其说它是新的右右，不如说，它是一只陌生的叫作左右的土拨鼠。几米之外，它以迟疑的目光考量着我，远非曾经了无心机的那个玩耍孩童。它并不慌张，似乎并非出自躲避的目的，它踱步回到归属于它的黑暗中。很奇怪的是，这个现身时刻，终止了我自左左离开那一刻起断断续续流了一天一夜的眼泪。

等男家长加夜班回来，我们故技重施，把右右从黑暗深处吓唬出来，它依然不准备就范。右右随即钻到我的样书堆里，它能瞬间做出精确判断，选

择最利于隐身的犄角旮旯。它像是决意要选择一种殉葬的生活。我们又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决意告别的右右再捉回来——整个过程中，它一声不吭。

略微用湿巾给它清洁了一下，我不禁迷惑——它就是右右啊，根本没有什么形似左左的变身。我惊讶地发现，右右有一颗门齿明显变长了；当右右颤动嘴唇时，就在我眼皮底下，那颗门齿就像活着生长一样，越来越长……直到，我目瞪口呆地看到这颗牙掉下来，落在右右正在梳理的自己的前肢上。这颗牙有八九毫米长，如同一枚微型弯匕：从正面看，牙是尖的；侧过来，我发现门齿并非从正面看似的钉尖，而是有个用于铡断草茎的斜切面。这是怎么回事？右右平常咬木头、咬石头、咬玻璃、咬金属，尖锐的门齿始终牢固；它置身于一团黑暗的空气之中，没有接触什么东西，怎么会掉牙呢？极度痛苦的人会一夜白头，难道右右也相思成疾，以致一天之内竟然掉了整颗牙齿？

33

从二月十八日左左离开起，右右连续把自己囚禁在地下的冷宫。二月二十日早上我一摸，滚烫，它发烧了。果然，40度。

与此同时，我眼看着它仅剩的一颗门齿和昨晚一模一样——先是变得很长，然后脱离口腔，挂在嘴唇上，最后掉下来。右右的两颗门齿，都掉了。它就像豁掉前牙的老太太，瞬间失去某种活力。

我还是去找宋医生，尽管再次走入这家医院的诊室，我难以完全克服心理阴影。我妈妈是医生，我明白没有哪个医生不希望患者康复，哪怕那是一个小小鼠辈。左左发生意外，也让宋医生追悔，他承认自己的疏忽，并说此次教训会给他一生行医带来影响。宋医生不回避责任的态度，让我感觉诚恳，我相信他会对右右格外上心。

宋医生仔细检查了右右，依然不能判断高烧的具体原因，可能是长时间的低温环境导致的感冒，也可能是掉牙引起的应激反应，甚至是高度紧张的情绪反应。他说也不能通过血象等来确诊，因为黑尾土拨鼠被人类驯化的时间很短，兽医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且数据波动剧烈，参考值没有那么多。他建议，先喂些退烧药观察；如果这期间右右不主动进食，把草粉搅拌成糊状，用注射针筒强制喂食；即使它想吃东西，没有门齿无法进行剪切，所以需要把牧草截成小段，方便咀嚼。

右右发烧，每天都在四十度左右。一连数天，我没听到右右上过跑轮。它昏昏沉沉，一直睡，好像一个人要睡两个人的觉。白天的觉像是白睡了，右右接着睡晚上的觉。昼如长夜，长夜无尽，它似乎不想醒来。它睡着，

幽暗光线下，腹部有个隐约的墨滴——这个我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图案，也很像左左腹部的那个墨滴。像左左一样沉睡，这是不是右右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后来我想明白了，发烧时的体弱使右右无力踏上跑轮，至于昏睡，恐怕注射在它嘴里的药物不止消炎镇痛，应该还有镇静的成分。

过了一周，右右的体温稳定了，但它患上了厌食症。它以前就不像左左那么迷恋食物，连新鲜蔬菜都不怎么喜欢，它吃干草——我常摸着右右的小肚子，说它算是个“草包”。一场高烧过后，它什么也不吃，也很少喝水。右右像是有意绝食，几乎也不排泄，两三天下来，厕所里只有零星颗粒变得极为细小的屎粒。

我换了一家动物医院，找到经验丰富的异宠专家陈医生，治疗右右的厌食症，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脱水和掉毛现象。右右咬紧牙关，拒食任何东西，无论是流食还是药物，最后一个男护士只好用厚棉布蒙住右右的头脸和前肢，另外一个男护士协助固定它的两条后腿，一个女护士用针筒注射，推入大量水分和营养。即使我每天与右右斗争几十回合，用以喂食延续它生命的流食和水，但剂量远远不够。隔两天，就得来医院补液，右右的后腿上，针眼的数量在增加。

终于，增进食欲的药物起效，右右尝试用缺齿的口腔咀嚼切碎的草段。但右右变了。它变得敏感，甚至神经质，它会因为被触摸而颤抖，也会在正享受抚摸时突然警醒并躲避。它很少睡床，经常蜷缩成团，睡在有盖子的半封闭草食盒里……这间小忏悔室里的植物气息，能带给它安慰和安全感？孤独的右右，没有野外同类，也失去了唯一帮它站岗的左左；它将毫无防护，终生置身于一群巨妖之中。

我再也没有见到右右上跑轮，虽然它以前像跑轮的一个零件那样整天待在上面。总之，左左离开以后，那个天真烂漫、无拘无束，每天像小马达一样活泼好动的右右就消失了。而且，自从那晚以左左般的样貌从书柜后面现身，从此我叫“右右”的时候，它再也没有答应过，像是成了聋哑的。开始我以为是高烧使它的嗓子哑了，后来发现，右右知道是在叫它，它偶尔转头或者眨动眼皮，但就是有意不回应。以前我习惯叫“左左呀，右右呀”，或者连着喊“左左右右”，它俩以二重唱的方式此唱彼和；现在，右右像把自己的名字陪葬给了左左。据说，黑尾土拨鼠的语汇异常丰富。右右失去了唯一的对话者，它由此废除自己已不必使用的语言。右右沉默，它再也不需要这种语言——此生的世间，没有谁懂，说给谁听？于是，此后很长时间里，右右成了哑巴。

右右的很多新习惯，越来越像左左……它像是左左遗留下来的会呼吸的遗物。作为遗孀的右右再次到郭悦家寄宿的时候，郭悦第一眼就发现：有种孩子大了的感觉，右右开始像左左一样静止和冥想；眼神，也像个有故事

的女同学了。

我后来也做了一个关于右右的梦。我梦见土拨鼠右右，它有个非常奇怪的姓氏，在字典上找不到。假设是人类，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姓氏少见，产生一种奇怪的虚荣式的得意；但这只土拨鼠并不能从中获得安慰，而且，它忘了自己到底姓什么。我在梦里带着右右寻找它的姓氏，结果发现，它的恒牙就是它的姓氏。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平静下来。我在梦里忽略了醒了以后才意识到的事实：右右的门齿掉了。那么，这个梦，像是预示右右丧偶之后的守节吗？也许，它现在是随了夫姓的：左右右。

右右的情感苏醒了，但已太迟。右右怀念太重，以致要摧毁自己。右右有时卖力啃梳着珊瑚毯子，它耐心打理着，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左左的皮毛。然而，赶上换毛季节，右右自己的皮毛斑驳，就像深冬脱尽叶子的枝条那样裸出底色，迟迟没有生长。我跟别人戏言：“它是女宝宝，可头顶跟两臂都秃着，跟黑社会似的。”可我心疼，不知拿这个因愧悔而抑郁的右右怎么办。用了很长时间，右右的上肢才覆了薄薄的毛，下肢还是丰厚的冬毛，它看起来像个上着比基尼、下着草裙的夏威夷女郎。

右右后来有过一次原因不明的消化道出血，险些丧命。很突然，它稍一动作就大量便血，厕所和棉窝里，到处是血迹……由于失血过多，它的掌心 and 眼皮都是苍白的。我带右右去看急诊。它在路上昏迷了，怎么动都没有反应。除了大量失液导致的严重脱水，右右不发烧，血象正常，既非感染也不是中毒。专家也解释不了，只能再次用比我拇指还粗的针筒注射补液。如果不是我亲历，我会认定，这个情节是编撰出的狗血剧。而右右的确生命垂危，幸亏救治及时，我们再次把它从死亡线上夺回。

有人建议再给右右找个伴儿，重新配成一对。他们不知道，黑尾土拨鼠得从两三个月的幼鼠养起才能养熟，否则不亲。甚至有说，同一批土拨鼠或许出自同一亲族，有些不同亲族之间，可能一生敌对，无法和谐相处。左左走的时候是冬天，当年的黑尾土拨鼠尚未生育；即使等到夏天的幼鼠，它也无所作为，离性成熟还早着呢，无法及时弥补右右的情感需求。除了它们之间的年龄落差，我自己的心理障碍也难以逾越。我的左左是唯一的，我再也无法把这个名字给新来者。关键是，还要再次面对雄鼠绝育的问题，我已丧失勇气……去增加一次面对生死的考验。

都说这类啮齿类动物皮实，生存能力强，抗病能力和自愈能力超强……我看到的，却是脆弱。

用了三个月，右右才慢慢缓过来。

我养过猫，养过鸟，养过兔子，也照顾过几天别人寄养的狗。我溺爱，缺乏管理的本事、教育的智慧，普遍的猫狗我都养不好，何况是驯化时间很短的异宠？我对自己当初的购买冲动追悔，却不能修正错误——黑尾土拨鼠无法中途更换主人，因为它们很难建立信任；一旦建立，信任里就包含着某种执拗的忠诚。

在自然环境下，土拨鼠社群修筑庞大的地下宫殿和隧道。作为众多捕食者的猎物，草原土拨鼠的数量锐减，导致诸多动物受到影响，因为有些动物会使用土拨鼠的洞穴来避难或养育后代。土拨鼠滑稽可爱的模样和行为，能够激发人类的爱意；假设人工繁育以放归野外，能够有助维护种群的扩大，那么从中选取一定比例的土拨鼠作为家族宠物，似乎也无不可厚非。左左右右作为被人类圈养起来的小小俘虏，它们被迫学习异域的法则。一只野外的土拨鼠露出地面，它会被数百个洞口所包围；而一只宠物土拨鼠，它擅自钻入主人一件帽衫的袖口，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指责。我们需要它们的陪伴，就像狱警需要囚犯的陪伴。

几千年来，左左右的族类一直没有被驯化，它们没有彻底妥协，一直在反抗，因而没有像猫狗那样成为人类真正的宠物。我们对它们的偏爱与施恩，只是漫长驯化链上的一环。而在这漫长的驯化史中，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不过几个途径：作为食物来豢养，作为工具来使用，作为猎物来杀戮，作为宠物来娱乐……我们甚至会因此测试动物的智商，看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宠物。太笨，我们不开心，傻瓜很难真正受宠；太聪明，也不行，它们必须处于我们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改造野生动物的任何一点成功，都鼓励我们作为主人的信心，并且巩固这种剥夺自由的改造。我们提供食物，动摇和瓦解它们的反抗，让它们将我们这些软禁者视为恩人；我们抚摸，它们的信任也带给我们改造契约初步达成的快慰；智力优越的我们跑轮，以牺牲最小的空间来提供无限的运动，而它们无论怎么努力，也注定跑不出循环而失败的路；我们密切关注着它们的发育，关注它们从不谙世事到情窦初开，因为所谓的收养，我们就天然有权力把魔爪延伸到它们从如厕到交配的秘密领域。我们用尽一切手段，改变宠物的习性，瓦解它们的反抗，不惜剔除它们的睾丸。我们似乎以爱和关怀的名义，替它们设计和安排好了一切……有多少控制是以爱的名义进行？所有的控制看上去都像是呵护。普天下的宠物，无不生活在爱的囚笼。

从这个角度说，左左的死，有它遭受宫刑的绝望，也有它对自己性别尊严的捍卫。出色的手术，对左左来说是彻底的羞辱，它选择放弃与人类合作，放弃生，放弃自己唯一的爱情，义无反顾。

孤独的右右，它必须为过去守节，因为再也不会拥有其他的伴侣；它必须为未来守节，因为它再也不会拥有其他的主人。我已剥夺了右右所拥有的世界，并且成为它唯一的依托；哪怕我是魔鬼，也是它在这个世界上唯一

可能信赖的人。不过，挚爱着它的伴侣左左，以自己的死，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右右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和处境。

35

由于季节不对，左左从未尝过浆汁充盈的新鲜牧草；而右右，尝遍各种时令的丰富口味。

右右在房间里闲逛，翻翻找找，爱从犄角旮旯下手。经过它的一番拨弄，梯角线掉落，露出后面已然松散的砂浆，但它享受不被惩罚的赦免权。它一鼓作气，咬坏了各种管线，从手机的数据线到泡脚盆的排水管，然后抬着它的小板牙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下嘴的地方。

为了让右右心情愉快，我像袋鼠一样，整日把它装在宠物围裙暖意绒绒的大口袋里，做什么事都带着。我写作时偶尔用单手打字，因为另外一只手需要不停按摩右右，否则它立即用略带谴责的眼神提示我的失职。

右右甚至已经不太习惯笼子里的生活，它只是偶尔回去用餐。放回去时间稍微长了，右右就会焦急徘徊，气愤啃咬笼子，刷上大量辣酱的老办法已不管用——它已成为吃辣高手，一张嘴，就是老干妈的辣酱味儿。它热爱去高处探险，站在地上往沙发上跳，站在沙发上往窗台上跳，它神气活现地站在郭悦的肩上甚至头顶，眺望更高的世界。

右右甚至和郭悦后来捡回来的流浪猫成了朋友。团子是和右右几乎同龄的母猫，被人类理解为仇敌关系的两个小朋友，一见面就相处甚欢，不仅没有试探性的侵犯和厮杀，反而相互打理起皮毛。团子的猫厕所几乎是全封闭的，只留一道可以自由进出的活动门。右右竟然会用猫厕所，不知是因为它终于找到既宽敞又私密的心仪厕所款式，还是跟着团子学习的新技能，反正右右后来以自觉而体面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排泄物。这段猫鼠之间的美好友谊，甚至延续到下一代。团子被收留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已怀孕；团子的初次分娩之夜，陪伴它的，是两个单身女性：未婚的郭悦和丧偶的右右。

气温转暖之后，系上牵引绳的右右来到户外散步。右右的世界扩大到了室外，它见识到混凝土之外的天高与地远，它见识到根茎蕴蓄一冬的植物，见识到春天的花。

有些品种的花，开得繁茂时就像吵架。玉兰也从树梢到分杈，满枝都是，绽放时树枝上只有花，没有叶子，开得那么汹涌，又那么沉静。站在树下观赏玉兰，内心却涌起绝望：它开得笨拙又天真，开得那么挥霍，那么忘我，那么无惧死神之吻。玉兰的盛大之美令人瞩目，更令人震撼的，是它

崩溃般的凋谢。从繁茂到狼藉，从耀眼到邈邈，转瞬完成……花朵原来是闪烁釉光的新瓷器，大风一吹，就像被谁推倒了整个架子，所有的瓷器都碎在地上，成了残片。等花朵落尽，整棵树都像哑了嗓子似的，暗下去。衰败得如此之快，它像是一开花就在准备自己的葬礼。玉兰和很多花不同，它开的时候拼命，不管不顾，似乎不知进退；但死的时候却干脆，似乎对它来说，只有及时的死，才是体面的死。

玉兰，硕大而丰盈，短促而凝重，包括它凋谢时的迅急与潦倒。我觉得，它在花里的性格，最像树下埋着的左左。这大朵的、沉重的、忘情的，倏忽绽放又决然告别的花，是右右此生第一次看到的花，也是它遇到的最早的，并且是唯一的春天。

幻兽之吻

幻兽之吻里，

有致命的爱，致死的美，致残的深情，

有致意的问候，致歉的告别，致敬或致哀的命运……

1

海南三亚，下过小雨。晚餐后，我下楼散步。

小区道路的光线渐渐暗淡，通过路灯的映照，能看到一条反光而湿黑的路。我沿着这条混沌的小路向前，突然地上的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个被风吹得滚落的果子。我吓了一跳。低头看，原来是个小家伙。

我没有立即判断出到底是青蛙还是蛤蟆，像是两者的混血儿。我蹲下来观察，它坐姿端正，表情庄严，雕塑似的一动不动。个头不大，大概只有我的拇指那样的长度。它像揉过的纸巾，乍看松垮地团在一起，仔细看各部分的衔接又是紧凑的，双腿并拢在体侧，融成的整体严丝合缝。哦，这是遍布中国南方的常见品种：沼蛙。

它长久蹲坐，仿佛在思考何去何从。溪流在另一侧，而它正朝着人类的院落瞻望。这种迷失可能导致丧命。我想帮助它抵达正确的方向，又怕两栖类鼓起的眼睛。犹豫之后，我放弃了，决定继续向前散步，它自己会做出选择的。我想，等我折返的时候，如果它还在这儿，无论如何，我将克服恐惧，回家去拿长柄的扫帚和簸箕，把它拯救到彼岸。

这条路有一二百米，走到头，我看了一会儿月亮，再返回来。返程只到半途，远未到刚才见到沼蛙的地点，可我惊讶地发现，它停在大路中间，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态。这只懂得魔法的青蛙，它怎么不动声色地跟了我这么远？像童年那个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在你蒙起眼睛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靠近你，并在你睁开眼睛的瞬间，凝固动作。我低下视线，看它，它不动；离得再近些，它还是不动。我靠得太近了！毫无征兆，它的动作如此之快，几乎是侵犯式地向我冲过来，带着恼怒，带着超过挑衅的绝杀态度。我吓得连连后退两步，才保持了距离。它没有善罢甘休，直勾勾地盯着我，余怒未消。我不明白这只沼蛙的矛盾态度，为什么如此厌恶我靠近，又执意地追踪我？

我很快得知了谜底。我见到了它的孪生兄弟，不，是兄弟们。就在我看月亮那会儿，它们有许多只，个头几乎一致，偶尔有两三只只能目测出有体积差。隔上数十米，就有这么一位伫立的小矮人……小得，像不起眼的土块或卷起一半的落叶。这是一条人类铺设的步道，虽然夜晚人迹寥落，但依然危险，几十公斤的体重可能随时从天而降，而沼蛙的个头儿不过是一小摊垫脚的湿泥。我有一次险些踩中，即使鞋底与沼蛙差之毫厘，但它岿然不动。

我终于发现，它们为什么有如此表现。

我见到一对沉浸爱欲的情侣，雄性比雌性壮硕，却由弱者背负着蹦跳，发出很大的鸣声。我不知道这是正在进行的欢情时刻，还是前戏中的仪式，总之被我的唐突打扰，两只抱团的蛤蟆分开，各奔东西——雄性不忘冲着我的方向示威性地叫了几声。

原来，这么多沼蛙聚集，因为这是雨后的求偶时刻。体内的生物钟精确催促，它们如约赶往聚合地点，参加盛大的集体婚礼。

可惜，相遇似乎并非易事。多数时候，为了等待心仪者，它们就像抱柱的尾生那样漫长到无望地各自等候。似乎一直在倾听和分辨，众生喧哗的合唱中，会有一个歌喉，让它怦然心动。它那么凝神，那么专注，长久得仿佛忘了时间和等待的目的。每一只都坚决地压在自己的影子上，只有以极低的角度观察，才能在某个特别的角度，看见草地上的地灯把它的影子斜斜地拉长，像个小型的埃菲尔铁塔。我把手电筒的光源打在它身上，上下移动，它的影子一上一下地跳跃，但除了明显外凸的眼睛里反射出的光点，它丝毫不受影响，你看不到它有任何变化。头颅角度没变，坐姿纹丝不动，像个古代人盘腿在蒲团上。是的，它的腿折叠得多么好，贴合完美，隐藏着饱满而弹力十足的肌肉线条。它的内肘微弯，形成空置的弧形，像是随时抱拢伴侣。它自己是个多么有耐心的爱人啊，像思恋或失恋到了绝望那样，停在那里，没有任何表情与动作，不知道能够等多久。

我对两栖动物的脸，一贯怀有恐惧。但此时这些痴情者，使我产生好奇和兴趣。我再次靠近，观察另外一只沼蛙，它好像刚刚和爱侣分开。这只沼蛙没有脖子和腰窝，从头到胯骨，几乎可以拉成笔直的斜线。无论从正面，还是上方，都会发现它有个简直是严格符合几何学的三角脸。它也没有下巴，它的嘴是一道如此深的切痕，把它的脸一劈两半。这使它的头，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像个浅盒子，带着隆重的盔盖。它夸张而有些老龄化的双眼皮，给人以复杂的感受，说不清更靠近天真者还是纵欲者。这回，它不叫了，呼吸似乎很轻，我看见它似乎潮湿的鼻孔像两个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针眼。也许，它是靠隔夜茶色或锈铁皮色的皮肤呼吸的，可以不动声色。我的鼻子快贴到地面了，才发现它的喉结部分快速抽动，频繁

鼓起和收缩，像个正在漱口或吃药的老人。似乎一场欢爱过后，它已耗尽体能。

这场盛大的婚宴里，每一个它，都是冷静的、耐心的、克制的；每一个它，都是痴情如水、激情似火的爱人，迎着身体的狂欢节……未来的每一个蝌蚪，都是它长着一尾巴的美人鱼孩子，继承着基因里的遗传：随时为爱等待，随时为爱枯竭，为爱赴死。

2

还是在三亚。早晨六点五十分，我下楼晨练，遇到行动中的蚁群。

它们体型极小，蚁流保持一厘米左右的宽度，数蚁并行，速度很快，像摄影机下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奇怪，队伍中每隔几厘米，就有一只体型硕大的蚂蚁，以同样的速度，奔行在“车流”里，但一定是隔离带般出现在队形中间的位置。它们大得像属于另外的种群和部落，但左右都有小蚂蚁随行，我不能判断这是战俘、指挥官还是队伍里的篮球巨人。这些大家伙，就是所谓的兵蚁吗？兵蚁在蚁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能，个头大，它们的顎部发达，可以粉碎坚硬食物，也是保卫群体或发动攻击时的战斗武器。

我发现这条蚁流中有条醒目的肉虫，呈现半透明的焦金色，它作为蚂蚁的猎物在进行转运，就像一节储备粮食的车皮。除了小蚂蚁们，几只巨蚁先是出现在“车头”的位置，纤夫般承受着吃重的压力；后来，它们改变策略，均匀分布在肉虫的各个位置，就像是出现在长条箱子的角铁部位……乍一看，像是隆重的抬棺队伍，不过速度一点都不慢。

被高高抬起，肉虫始终保持僵硬的弦月般的弧度；在翻越一个沟坎时，它突然流畅地翻转了一下身体，像活了似的——可见蚁群完美的团队配合能力，能够克服路途上的坎坷，而不摔落它们的猎物。再仔细看，那条肉虫好像真的还活着。它只是浑浑噩噩的，任由大大小小的蚂蚁把它搬到新的家园或仓库。

蚂蚁的队伍很长，竟有四五十米之远，直至它们的行踪隐入繁密的草丛。我在距它们的终点十厘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只不知死活的紫褐色蜗牛，上面攀附着稀疏的侦察兵，似乎是瞭望和接应。这肯定不是蚂蚁倾巢搬迁的原因，因为从蜗牛这点硬壳里掏取的肉，根本不值得兴师动众地移动整个庞大的军团。我抬头看天，好像说今天有雨，这意味着多少千帕的滚滚雷声，此时就隐藏在透光的雪山般巍峨的云层后面。微不足道的蚂蚁，它们生活在地下的黑暗里，却远比自以为是的人类更敏感于天上即将发生的事。它们预知，所以它们行动。

等那只金黄发光的肉虫被一路运输，消失在地层之下，我才突然醒悟：也许并非食材，那正是它们至为尊贵的蚁后！它不动，并非因为麻木或受伤，而是它正被自己的奴隶们舒适地抬起、小心地呵护、安全地转移。它几乎是以半睡眠的状态，统治着自己子孙众多的世界。

最不像蚂蚁的，是它们的蚁后。

王所催生的，是不像自己的兵；兵也长得不像自己的王，像是毫无基因的传递——它们之间不是有些不像，它们之间是一点儿也不像。而这，或许正是统治的秘密。

3

如果有什么是美、暴力与王权的融合，就是虎。斑斓的皮毛，沉着的眼神，生杀予夺。老虎同时可以做到非常低调，野外捕猎时，这头体重达两百公斤的猫科动物可以潜行于半人高的枯草间，丝毫不会引起注意……直到，猎物细狭的瞳孔突然放大，善于弹跳的四肢被死死拖住，带血的喉咙被吻到窒息，身体轰然倒下，陷入比地球引力更无法摆脱的死亡深渊。

我看到过一只流浪猫捕食，看到它在好奇心和食欲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才上去咬碎了猎物的脸。猫科动物大多如此，天真又残暴，简单又华丽。老虎由于体型的缘故似乎没有那么顽皮，除了捕猎和进食，老虎多数时候处于厌世般的懒散中。无论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在荒野巡行的虎，还是动物园里隔着栅栏看到的——铁条和虎皮自身的纹路相互交叠，它像被砍下很多刀，尚还连缀为一体的活刺身，虎总是步态懒散，神情游离，目光苍茫，像是很难聚焦于某个目标。虎不像豹那么线条清晰而肌肉紧致，松懈的步态，总让人误以为老虎是乏力的——然而，王的凛然，也许必须保持在这种不屑一顾的倦意里。

有个朋友热衷探险，他给我讲过年轻时的一次相遇。那时少年得志，他十几岁时得了全国作文竞赛的金奖。为了纪念荣誉和奖励自己，他与银奖获得者乘兴从颁奖现场直接去了神农架寻找野人。莽撞的激情，他们贸然进入森林深处，却没有随身携带基础装备。他们迷路，几乎弹尽粮绝，食物只剩一个苹果。黄昏时分，不安的他们突然听到一声环绕着的低吼——回头，正看到一头老虎那张密布条纹的脸，忧闷又焦躁地凝视着他们。朋友说，他们在感到恐惧之前腿已经开始飞奔，狂泻千里地跑下山去。唯一的苹果飞快滚落，像他们的脑袋一样躲过了被啃咬的命运。他长大以后坚信，虎的闲散给他带来的震慑胜于狼的攻击。

我近距离接触过的，只有动物园的小老虎。泰国动物园里，不耐烦的它们被惊喜而陌生的游客轮番抱住合影，这种热爱独居的动物被迫裹入它们不

擅长并且反感的亲昵。我作为志愿者饲养过动物园里的小老虎、小狼和小狮子，三个小家伙生活在一起。小老虎憨直，玩起来不管不顾；小狼非常像小狗，激动起来会失禁；相比之下，小狮子害羞得多，面对面的时候它总是躲避着眼神和身体；等你回过头去，它会在你身后磨爪子……磨刀霍霍准备扑向你毫无防范的后背。它们与人建立信任之前，要经过谨慎的试探；等熟悉以后，三个小家伙就像撒娇的婴儿那么叫唤，欢呼着进食与玩耍。无论多么凶残的掠食者，在幼弱时期都是让人怜爱的，因为它们要保护自身潜藏着的破坏力，使之不受损地成长为杀伤力。

我倒是有过一次与狮散步的经历，还是在毛里求斯，那是当地著名的旅游项目。我站在一片很大的空场中间，向四周瞭望。到处是杂生的高高低低的植丛。这片土地面积很大，我看不到周遭的铁丝围栏。只是越过等同膝盖高度的灌木杂丛，隐约遥望到园区的一个铁门，提示这里只是仿造的自然，并非真正的旷野。我们这组游客大约十人，一起站在那里等待狮子，每人手握所谓用以自卫的武器——一根比拐杖还要细短的小木棍。等了许久，什么也没有，但空气中的不安气息越来越强烈。

远处的铁门打开。几个非洲裔园区工作人员的形影靠近，然后在隐约的草莽之间，我看到一前一后两条波浪般起伏的脊线——那是和驯养者走在一起的两头狮子。一头褐色雄狮，鬃毛披覆，它边走边舔舌，咽下驯兽者手里的肉块。另一头是神话般的白色母狮，保持着冷漠的悠闲和微妙而傲慢的抗拒。狮子们靠近……仅有一头狮子，都会给人以复数的错觉。我捏紧木棍，即使知道徒劳无功。游客们都不由自主绷紧脊柱和四肢，侧目注视走过的巨兽。我们被提示：不要走在狮子的前面，以免被当作猎物扑倒。所以站得笔直的游客，看起来像在接受狮子王的检阅；只不过，狮子漠视我们，保持着缓步的懒散。

大家很快就放松了，两头狮子在我们眼里渐渐成了两头可以接近的哺乳动物。我贴上去嗅它们的皮毛，没有任何体味。我想象的那种浓烈而生猛的腥膻在它们身上荡然无存，它们似乎有着毛绒玩具的化学性干燥，像刚刚被浴液和吹风筒处理过。也许，这些狮子从来没有直接处理过猎物，像人类一样，它们的食物都是从类似厨师那里获得的。没有杀伐之气，它们被安置在介乎王者和宠物之间的某个奇怪位置上。

游客与狮子合影，来显示虚彰的勇气。那些驯养者手里也拿着和我们类似的小木棍，这个道具必是狮子曾经的教鞭，才会让它畏怯，以致他们把木棍抵在狮子腋下，狮子就能始终面向前方，从不回头张望。刚才狮子在草丛间跳跃，跳过溪涧，轻捷得令人惊诧，庞大的体重丝毫没有形成阻碍，它依然拥有杀伐者的果断与矫健——然而，微不足道的木棍对它竟然构成威胁，以及包裹在人类肌肉后面细若木棍的骨骼。它安详而沉静，配合着镜头。除了打哈欠，狮子不会张开它气吞山河的嘴，它像个失忆老人似的

忘了撕扯和咀嚼。它们嘴里的肉块，切得像点心，更符合被豢养者的教养。

生命，不仅被未来引领，更重要的是被记忆所统治。一根木棍，是狮子关于权力的记忆，如同驯养者在狮子面前轻驰的自信同样来自记忆。驯养者以昵称呼唤他们的猛兽奴隶，而狮子奴隶抬起挂有隐约泪腺的面庞——被颠倒的等级，被置换的能量。狮子和人类游离了各自的领域，他们和它们都靠记忆和想象存活，遗忘了自己的能力与限制。

关于虎和狮子，我有个恍若幻觉的记忆——童年见到的狮虎兽。

那是一个动物园里的春天。狮虎兽独自伫立树下，大得诡异，仿佛幻觉中的动物。巨兽一动不动，混凝土制成的雕塑般，它被树冠投下的密如织网的阴影所笼罩。春天开始发亮的叶柄被风晃动，每片树叶的齿缘都精湛而一丝不苟，展现了神的缝纫工艺，它们将酝酿花朵、果实和种粒。春天开始发情的器官逐渐肿胀，动物们带着暴躁而激烈的情欲交配——这是性别之间的盟约，幼崽将由此诞生。春天的空气中，弥漫花粉与某种暖腥的气息，这是一个混沌而充满秩序的难以解释的神秘世界。那头狮虎兽厚阔的爪子踩在地上，却看似与这个世界毫无瓜葛。

狮子生活在草原，老虎生活在丛林，自然环境下相遇概率极低；但在动物园的环境，在人工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两者交媾产下混血的巨婴：狮虎兽或虎狮兽。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是北极熊，然后才轮到老虎和狮子；但狮虎兽的体内没有抑制成长的基因，所以它会一直生长。蛇是终身成长的，它不断复制自己；狮虎兽是越来越重地负载自己，直到无法承受自身的体积。狮子和虎都是各自领域的王者，但权力的叠加未能使狮虎兽更为强大——它被自身压垮和摧毁。尤其，狮虎兽不仅没有成皇成帝，成为王权的象征，反而成为被奴役的屈辱象征——它的角色，相当于食肉动物里的骡子。我们习惯骡子，出于实用功能——作为马和驴的后代，它高大有力，兼具父母的优势。骡子擅长负重，只是不会生育繁殖自己的后代——“骡”，这个字拆解下来，完美提示了它的悲剧，它是“更累的马”和“失户的驴”。然而，狮虎兽呢？它的存在何用之有？

神话传说中的灵兽与妖怪多是拼贴之物，像为人熟知的龙、麒麟、貔貅、凤凰，或者更为冷僻的毕方、帝江、陆吾、鹿蜀、赢鱼等，不外是蛇的身子贴有鱼的鳞片，鱼的身子粘了鸟的翅膀，或者是狗的身子长了牛的角，虎的身子长了狐狸的尾巴。它们是应该停留在传说而不应显形的动物，唯此才能维护神秘的能量。自然界也有天生具有拼贴感的动物，比如“四不像”的麋鹿，说它头脸像马，角像鹿，蹄子像牛，尾像驴，幼麋鹿身上有鹿那样的花斑，脸有点像去掉了长鼻子的小象；比如獭，体形有点像猪。也许因为麋鹿或獭等都是素食者，所以即使显形，也不具备可怖的法力。

素食的拼贴动物即使进入传说，也带有美妙的色彩。比如说麋鹿，原产于中国，但百年前就在本土几近绝迹，后来一个英国公爵重金将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等地动物园中的十八头麋鹿悉数买下，放养在庄园，竟然复活了整个种群——十八头麋鹿，是今天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比如说獾，在中国和日本的传说里，它会在月夜走出幽深的森林，来到人们枕边，因为獾以梦为食。它害羞又温柔，怕惊醒入睡者，所以会发出摇篮曲一样的哼唱，吞下梦境之后，它又悄无声息地隐居丛林。我们知道动物有拟态行为，它们常常模仿自然环境，为了隐蔽自己；其实拟态不仅是模仿环境，动物之间也相互模仿，比如无毒动物会模仿有毒动物来保全自己——动物之间的这种拟态，既是相互的形象抄袭，也算是相互赞美的证据吧。

然而，狮虎兽是吃肉的、拼贴的、显形的真实动物，它既与传说中的龙凤，又与现实中的麋鹿与獾都不同——它的产生没有什么实用之功，是一次被蓄意安排的杂交，是一场源于孤独并去往孤独的悲剧，只为证明人的自大。

我们把狮虎豹描述为残忍，因为它们有破腹的利爪、碎骨的牙，因为它们从汹涌的血泊中撕扯肉块。其实这些食肉动物算不得残忍，因为种种作为乃是生存所需。之所以说人类最为残忍，因为他们是精神上的食肉动物——他们的暴力出自快感，他们的作恶出自享乐。人类之所以创造狮虎兽，他们的扭曲、控制和决定并非简单出自畸形的审美，也许隐藏着并未被自己清晰认识的潜心理。活生生的狮虎兽，这头从幻想直接走入现实的巨物，有如一个成真的噩梦，给人带来无以名状的双重欢乐。狮虎兽，是成功僭越的证明，是渎神的典范，它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既篡夺了造物主的王权，又剥夺了兽王的王权……由此，人类由智力上的弱者和体力上的侏儒，跃升为超能的巨人——不，巨神。

地球存在了亿万斯年，腔棘鱼、锯鳐、鳄龟、鲎、鸭嘴兽从古老的时代延续到现在，但更多的动物加速度地消失和灭绝，像旅鸽、斑驴、袋狼、袋狸、巴厘虎等，人类甚至来不及观察和了解，它们就消失在地层之下。我们每个人的短短一生里，都目睹或听闻数种动物成为遗迹与传说。但，狮虎兽的灭亡，却是令我欣喜的——我愿，那种动荡而危险的美，永远消失在它原本就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那个童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看到狮虎兽。看到它长久呆立。看到它进食——不像老虎或狮子，狮虎兽吃东西时吞咽得特别慢，像掉牙的老人那样。看到它死了般的睡眠。在壮观的骨架下面，它像是中空的，显得特别脆弱。狮虎兽来自一场跨越物种的爱情，我迷惑——它的样子，到底更靠近杂交优化基因带来的勇猛，还是更像近亲繁殖带来的愚痴？

孤独的狮虎兽。

某个瞬间，我看到那个来去匆匆的短暂访客——一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鼠，左探探，右探探，路过可能被它视作老虎的庞然大物。也许由于体量的落差根本看不见，也许由于老鼠小到根本不配成为巨兽的食屑，狮虎兽无动于衷，任凭老鼠在自己的领地里蹿动。也许狮虎兽缺乏匹配的领地意识，那是捕猎和求偶才能唤醒的竞争——它根本用不到。狮虎兽被关在这里，将被豢养至死。动物园关着的，多是平时罕见的珍贵动物。所有高贵、独特与稀有的生命，都是人类的囚禁之物——他们关押，他们制造，他们展览，他们剿杀。像老鼠麻雀一类庸常之物，无人在意，它们随意来去，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跑来偷窃食物的老鼠，衔起一粒残渣，然后奔向它生来龌龊的自由。

4

蜻蜓的形态至为优美，但它们仿佛先天经过风干处理，仿佛没有体液，仿佛是夏天的金属钨丝——我记得那年以前的夏天，蝉声如瀑，蜻蜓如织，到处通电般地发烫。小孩子没有什么同情心，我童年捕捉过很多只蜻蜓，它们在我的掌心里痉挛般颤抖……这么多年，也许是因为愧疚，我才没有忘记它们的挣扎，没有忘记它们的翅脉如何被禁锁在我的掌纹里。但我想说的，是豆娘。



所有高贵、独特与稀有的生命，都是人类的囚禁之物——他们关押，他们制造，他们展览，他们剿杀。

豆娘的体型娇小纤细，看似袖珍版的蜻蜓，但它不是蜻蜓——如同有朴素的蝴蝶，也有艳丽的蛾子，但它们不一样。一只弱不禁风的豆娘，让我认识到，帮助幼小也并非易事。

我在楼体的墙角看到它：一只豆娘，大约两厘米长。它不断弯曲身体，以头部碰触尾尖，像是在尝试瑜伽动作，又像是模拟一个交配结。蜻蜓或豆娘交配时，雌雄会完美配合，衔接身体，两两组成一个“心”形的闭合环。不过，这回它所缔结的，是与死神的婚姻。这只豆娘被蛛丝捕获了，它几条黄绿色的腿细如丝线，也被缠缚。

我把豆娘从缭绕的蛛网上摘取下来，除去它躯干和胸腔之间的丝缕。蜻蜓的后翅宽于前翅，而豆娘有四片几乎同等大小的复制般的翅膀，停栖时它们叠合在一起，看似一个单片，像刃口斜切入案板的刀那样耸立在背部。豆娘飞行时，翅膀分成左右两组，犹如音乐指挥那样在空气中美妙划动。被解救下来的豆娘，翅膀近乎透明，但它不飞。

我发现，它的两只右翅没问题，但它左侧的两只翅膀牢牢贴合，末端那里更是有个小米粒大的白斑，像钙化或者胶粘似的。我试了试，根本分不开。豆娘的身体和腿都纤细得失真，它的翅膀太薄太透太弱，精致而如若无物。我的手太笨，它的翅膀太灵巧，我难以处理两片已经融合为一体的翅膀。稍不小心，一场拯救，就容易变成即刻的杀戮。避开它的细足，我用一根食指抵住它的袖珍头颅，用另一根食指尖触及伤翅的末端，极其小心地控制着位置、方向和推力，终于使严密切合的膜翅裂开细如发丝的一线。我重复这个动作，依然无法分离黏合的末端。

我从随身背包里找到一袋零食，因为里面装的豆粒富含油脂，所以这类食物的包装会在内层使用铝箔，这种材质有种超出预期的硬挺。撕开包装，取边角，用单层。铝箔反射出银光，这角斜裁的薄片就像把简易手术刀——我终于把它探入豆娘两翼的一线缝隙中。对我这样眼花手笨的人来说，分开豆娘又薄又小又透明到几乎不存在的膜翅，这项工作堪比一个钟表匠学徒修理复杂精密的发条，甚至更难。因为袖珍金属元件具有足够的硬度，豆娘细弱得让人不敢设想它针尖般的心脏。晌晴的正午，阳光灼烈，我花了远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在怀疑到绝望的心理中，终于使这只豆娘获得新生。

我由此猜测，那法力无边的造物之神，也许他解救每个陷入困境的挣扎中的生命，都绝非易事；也许并非因他无能，一切，乃是由于我们的脆弱。

昆虫环绕着我们，丰富、喧嚣又无声。随时随地，它们在我们身边，密集地，爱恨生死。我喜欢观察各种昆虫，它们呈现着一个袖珍而真实的魔法世界。

比如螳螂。螳螂抬起前肢，像太极高手那样拉开搅动风云的阵势。很多螳螂是拟态高手，擅长易容，穿着华丽的戏装，像煞有介事地虚张声势——其实，螳螂是个狠角色，爪子堪比猛禽，何况部分雌螳螂还有杀夫的嗜好。

比如独角仙。独角仙举着鹿叉般的角，它的个头巨大，壳体厚且油亮，走起来的步伐沉重，孔武有力，简直相当于昆虫里的公牛。它的肌肉太有力了，竟然能够支撑这么沉笨的身体从容起飞。

蜣螂，在我视力下降的情况下，它的字形看起来就像螳螂，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小体的独角仙——其实，它都不是。奇怪，我总是难以清晰记住蜣螂的样子，它长得太混沌了。也许作为人类的我们太过势利，因蜣螂的食性而忽略它，把它仅仅当作用来嘲笑的符号。

学名蜣螂，听起来似乎有几分书卷的雅气，但它俗称屎壳郎。我觉得它的存在，体现出上帝的幽默感。有一次，我看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科普纪录片，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画面。蜣螂把人类观念里肮脏不堪的屈辱工作，当作毕生热爱的事业。在搬运粪球的过程中，我发现蜣螂有些似无必要的动作，滑稽而令人迷惑。比如，它一边滚着粪球，一边忽然向上伸起空置的前肢，不知这个举重运动员是在热身、休息还是庆祝。它间或表演体操，向前推动粪团时，突然倒置身体，改为蹬踏——虽然蜣螂缺少表情丰富的五官，但它依然像个登台的杂技演员一样，传递着兴高采烈的表演氛围。

蜣螂如获至宝，它抱住粪团的狂喜，与女明星戴上珠宝的陶醉，别无二致。蜣螂滚动屎球的喜悦，与人类获得财富的兴奋，仿佛强度等值。它是如此知足、欢乐与感恩，即使得到的只是一团肮脏的秽物，一粒散发臭味的屎球。除了标明领地的作用，多数动物往往会嫌弃自己的排泄物，尽量让屎尿远离自己的巢穴和活动区域。弄蝶在毛毛虫形态的时候，可以把粪球射到一米五的空中，相当于一个成年人把屎甩到七十多米的高空。即使不嫌弃自己的排泄物，也会厌恶别人的，只有挚爱者才能克服障碍。比如羚羊的母亲会吃掉自己孩子的屎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给饥饿的肉食动物留下追踪的气味；一旦孩子长大，母亲就不再这么做，因为它的孩子已经能够通过快速奔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了。然而，蜣螂，小而密布世界的大自然清道夫，它竟凭本性做到了观念上的平等与行为上的牺牲。它的行为，体现了某种超越物种和立场的公正，曲折的公正，易被忽略的公

正.....甚至，近乎造物主那种道德意义之外的冷淡到宁静的公正。

说不出是令人啼笑皆非还是肃然起敬，这卑微又神圣的蜣螂，全世界据说有两万多种，分布在南极洲以外的任何一块大陆。

6

我在动物园当志愿者的时候，迷上了一只长臂猿。

它的名字叫小弹簧，品种是银白长臂猿，出生不久就被母亲遗弃，它在动物幼儿园里改由人工喂养。它那时七个月大，体重只有一公斤多点儿，有着老人般华贵的银色毛丝和儿童般晶亮的眼睛。这么幼小，我已能看出它未来的天赋，它将在不久之后拥有橡皮筋的胳膊、弹簧的脚。我每天给它喂食，陪它玩耍。虽然作为一只树居动物，小弹簧永远有种略带忧郁的表情，但它那种摧毁意志的可爱，简直令人涌起把它偷回家的犯罪念头。

长臂猿是种害羞的动物，喜欢生活在隐蔽的密林中。在薄雾弥漫的清晨，我们能够听到它们婉转起伏的歌唱。飞檐走壁是人类对侠客的想象和传说，但对长臂猿是常态。它轻盈、敏捷而灵巧，就像果实一样在枝条上自然悬吊和摆动，保持一种下落的危险感。它能够利用树枝的弹性，把自己抛向空中，完成短促的飞行.....优雅流畅，如空中芭蕾。树枝间的长臂猿，草原上的猎豹，它们的动作里都包含着一种奇怪而美妙的飘浮感，仿佛在某个瞬间，时间和重力对它们是失控的。必要时，长臂猿出手如闪电，在错综的丛林里它令人眼花缭乱地飞行。仿佛每棵树都是伸长的手指，它可以快速完成转移。对于猿猴来说，担心它没有看准树杈掉下来，就像担心鸟儿会飞累掉下来一样。长臂猿钢琴家一样修长的手指，之所以能在吊荡的绳索或树枝行走，因为它的每一步都是抓握而不是覆盖在上面。

照顾小弹簧一周之后，我离开动物园，我惊讶自己竟然因为想念它而哭过几回。这就是为什么时隔一年多后与小弹簧的重逢，让我欣喜若狂。即将成年的小弹簧早已离开幼儿园，离开了独自生活的展示橱窗，它被郝姓饲养员照顾得很好，甚至完全克服了它原来那种不停颠坐的刻板行为。不过，在蓬松银亮的毛皮之下，它还是保持着长臂猿特有的苗条体态和玲珑骨架。不知道是我的热情吓着了它，还是它对往日的记忆早已生疏，小弹簧紧紧靠着自己的饲养员，只允许我抚摸它的后背和手指，不肯被我抱着。

我几乎带着强制把小弹簧转移过来，并让饲养员郝先生躲避起来。失去了靠山的小弹簧，惊慌地寻找无果之后，似乎被唤醒了记忆。它在我的怀抱里渐渐松弛下来，安静又惬意。吃了几颗葡萄之后，它长手长脚地挂在我

身上——体重真轻啊，两岁多的它只有2.55公斤，轻如一只毛绒玩具。我甚至觉得，纤手纤脚、几丁质外壳里似乎只有空气的蜘蛛假设放大到同样体积，都比它沉。

我和小弹簧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午后。我特别理解它刚才的拒绝，也因它的接纳而温暖。即使是野外生存的长臂猿，它们生活在小型家族里，也极度渴望安全感。不会四处随意留宿，对成员和地域都有着近乎可怜的归属渴求。它们情感丰富，会用手搭在对方的臂膀上寻求彼此的和解。猿猴不仅有着强烈的妒火，它们对地位有着神奇的直觉。据说，它们会对官阶更大的人员示好，对其他入置若罔闻。如果它的饲养员在场，我想小弹簧未必会这么快地释放它的友谊。

第二天，我又来到游人禁入的动物园后区看望小弹簧。郝先生外出了，只有代班饲养员在。他负责喂食小弹簧，此外还有数只灵长类动物，还有一只金雕和一只蜜獾，都需要他照顾。在我的要求下，代班饲养员打开小弹簧的笼门，试图把它交给我。

隔了一个夜晚，小弹簧似乎又有所生疏，经过它的几次拒绝和我的几次努力，我才把它抱到自己怀里。我一边抱着它轻声细语，一边抚摸它蓬松的背毛，然后把变得安静的它抱到饲养员的办公室。这里数米见方，空荡荡的，地上有张桌子，有把条凳，墙上有黑板和悬吊在钉子上的值班记录本。此外，这里还连接着一间储备食物的厨房以及一个杂物间——两个分室和主区之间，分别隔着一道金属门。我给小弹簧喂了两颗葡萄、半个青椒，然后关上三个大门，放任它在室内空间里自由活动。

小弹簧开始略感迷茫，它很快体会到某种特权带来的快意。它在地面来回走路，需要举起并轻微摆动双臂，用以调节平衡，像人类走在钢索上那样。因为臂长，它走起路来头重脚轻，有时仿佛重心前倾到几近跌撞，这使它经常需要蹲伏下来。过了一会儿，小弹簧突然原地飞起，垂长的单臂吊在金属门的格栅上，然后又跳下，利用桌椅落差，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两岁多的小弹簧身手矫健，就像李小龙那么厉害。

在狂欢般玩耍之后，小弹簧和我的关系变得亲密，它格外信任我，并且对代班饲养员都态度隔膜起来。它原本有着“制服信赖”，小弹簧在穿工装的饲养员怀抱中长大，现在，似乎是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它躲避进入室内的饲养员试图的拥抱，并间歇地躲到我的怀抱里，或者抱住我的小腿，依偎在我的体侧。这只可爱的小长臂猿对我极尽容忍和接纳，即使在躲避饲养员的短暂时间里，它允许我抚弄它的皮毛，抓挠它的四肢和颈背，并在饲养员的手靠近之前，横空飞越饲养员和我的间距。对饲养员的排斥愈演愈烈，它对我的投靠越来越强烈。我的眼睛离它只有一厘米距离，因为猿类瞳孔的虹膜周围没有白色巩膜，所以它的盯视不会令人不安，原来，全

黑的眼睛同样胜任内容微妙的沟通。小弹簧努力用深邃而全黑的眼珠凝视我，表达着一种近乎深情的专注。

我们亲昵玩耍……直到，一个小时后，它真正的饲养员郝先生来了。然而，郝先生非常意外——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小弹簧竟然在拒绝他，并且，逃难似的寻求我的庇护！

过了几分钟，小弹簧突然从惯性中大梦方醒，它愣在自己的处境之中。小弹簧焦虑地吮吸着自己的拇指，不知所措地蹲在与我们等距的某个中间位置上——既不靠近我，也不靠近饲养员，只是仰起脸，轮流观察着郝先生和我，眼神游移不定。它恍惚而迷惑，不知如何选择立场；它犹豫，陷入分裂般的痛苦，它不知在两个老大之间如何判断和选择。

时间，就这样按下暂停键。

郝先生弯下腰，略带强制性地把它揽过。小弹簧终于明白：这个郝先生，才是能给自己带来长期实惠的老大，而我不过是带来短暂喜悦的过客。

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小弹簧就像受了多大委屈般，紧紧缩在郝先生的胸前，不再抬头看我。它又变成那个羞怯而紧张的小长臂猿，深埋它的小脸，紧缩它的小手。甚至在郝先生的劝说下，小弹簧才试探性地触碰了我的指尖……尽管这样，似乎依然难以克服它的害怕似的，小弹簧的黑眼珠里流露着陌生，脸上的表情更见勉强中的忧郁。

天啊，时隔几分钟，它判若两猿——完全不像此前我们友好到全然放松的关系——它赖在我的身上，舒服得几乎睡着了。小弹簧变得如此之快，我瞠目结舌。是否，动物也有道德？小弹簧平日受益于饲养员颇多，但在临时诱惑下，它曾经选择了背叛——现在的转折态度也许并非出于势利，而是出于忏悔？

不，我承认，这是动物乃至人类的本能和天性。小弹簧要投靠一个老大，表达绝对的忠心以寻求保护；它并不是真的怕我，它只是需要表演出对我生分、畏惧和被迫的样子，以博得老大的欢心……真是影帝级的表演。问题是，小弹簧一出生就离开不会养育孩子的母猿，在漫长时间里，它都是独自生活，丝毫没有从同类借鉴经验的机会，它从哪里懂得利益的权衡、生存的势利？它从哪里懂得这种对权力的依附之技？

我们对灵长类动物抱有复杂而古怪的态度，是因为它们的样子、它们的情感方式，映照出与我们极其相似的影子……令我们熟悉而不安。同为灵长类，猴子比猿多了尾巴，没有尾巴的猿更聪明，也更接近人类。猿比猴子不仅多了阑尾，据说，两者之间还有个像阑尾那样秘而不宣的区别：自我

认识。猿能够辨识出镜中的自己，而猴子则不能。这是多么重要的能力，即使是经纶满腹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们，假设缺乏自我认知以及与此相关的反省能力，那我们就没有进化到猿类的水平，不管我们表面看起来有多么聪明。

是的，习惯阿谀，从灵长类到人类，数代基因积累，我们直接生下谄媚的婴儿。经常有成人因为缺乏独立性被称作巨婴……其实我们今天，依然是长大以后的幼猿。

7

对我们来说，鱼是最为常见的动物，无论是在水塘里，还是在餐桌上。

我常去散步的地方，有条半清不浑的溪流。里面的鱼不多，大多色泽灰暗，便于隐蔽。这些游鱼不怕水流由于地势落差形成的响溅之声，却怕一口馒头掉下来的微弱动静，总是惊散之后，才嗅得食物的气息而再次聚拢——因为日日夜夜，它们习惯了水流的拍击。习惯的音频，让听者耳聋。

我曾以为，这条溪里的鱼任意游动，后来怀疑，它们的自由也受到限制。有人撒下喂食的面包屑，我看到一条鱼因为追逐面包屑，或许误入另一条鱼的领地，而遭到后者愤怒的驱逐。被领主啄击的鱼，一边躲避以防被咬住尾巴，一边试图快速吞食水面的残渣。涟漪荡漾，一直吹拂的微风把食物残屑吹向下游，吹到广阔的河面。两条鱼的冲突逐渐升级为缠斗，而引发战争的面包屑已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获胜奖品，因为它们越漂越远，进入其他鱼的领地，进入其他鱼的肠胃，进入彻底消失的虚无之中。

我有时觉得写作者之间的竞争，商业店家之间的竞争，莫不如此……为了转瞬即逝的名声或利益，时不我待地角逐不休，却在相互倾轧中丧失真正的财富。无论是哑巴的鱼，还是鼓噪的人，大抵如此——既急功近利又舍近求远，一场你争我夺的忙碌下来，也是一场一无所获的空欢。

我曾去国外的热带海岛潜泳。船上看不清楚，游入其中才能见识水里的珍宝。鱼体多么鲜艳，光斑多么耀眼，之所以在水面之上难觅踪迹，是因为它们依靠鱼鳞的反射隐蔽自己，仿佛被溶解，以防海鸟的空袭。鱼群绚丽，原来，在海底深蓝的秘而不宣的寂静中，每时每刻都在施放盛大的烟花。

当晚我顺着海岸线散步，看到当地人钓起用于熬汤的小鱼。它们比彩虹和霓虹还艳异，甚至比岛上那些毛羽鲜艳得像过狂欢节的鸟儿还艳异。可惜，通常吃鱼的时候，看不见它美丽的图案和斑点，它只是躺在那里颜色或苍白或微黄，纹路或清晰或隐约，肉质或紧实或松软的一团蛋白质。鱼

的美色溶解在盘子上的牺牲里，就像曾溶解在海水中的它的活力里。

浓密的鱼群，使水面显得黏稠——这样的场景总能给人带来丰收的喜悦；但我们的情绪会被骤然改写，假如，那是食人鱼。食人鱼是群居生活的，时常几百条甚至上千条聚集在一起，同时用视觉、嗅觉和对水波震动的灵敏感觉来寻找进攻目标。我们给予肉食动物隆重的尊敬，轻视、欺凌和屠戮草食动物，因为后者没有伤害我们的能力。同理，我们畏惧鲨鱼而无视其他……其他鱼就像水里长出来的没有痛感的庄稼。然而，食人鱼，体型虽小，它们的凶狠性情以及围绕着它们的种种残暴传说，让人类不寒而栗。食人鱼的颈部特别短，颌骨尤其坚硬，咬合力大到可以穿透牛皮和木板，甚至咬断金属钓钩。尤其受伤的猎物，会让它们兴奋到疯狂，它们用手术器械般的利齿撕咬和切割，使之很快变成一堆剔净肉屑的骸骨。

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公正，就像绝对意义的圆只存在于物理世界，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样。一个人一生可以吃掉无数条鱼，吃掉无数头牛羊；但他只要被动物吃掉一次，无论是被群聚的食人鱼还是被孤行的狼吃掉，都让人感觉格外残忍，哪怕他的身体是在死后被吃掉的。二者不可能画上等号，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能量平衡，因为，这个世界是被人类所统治的。因为我们是王，我们是法，我们可以在犯罪的同时宣判他者的罪行。虽然，人类个体在自然界中非常孱弱，他甚至对付不了一条鞋带似的毒蛇。人类对有能力伤害自己的狮虎熊狼之类的猛兽，怀有敬畏；对没有能力伤害自己的牛羊马鹿，毫不怜惜。食人鱼的习性，似乎超出人类的惯有认知，因而格外可憎。

事实上，即使你掉进水族馆的食人鱼缸里，也不必慌张。尿液或血液这种体液性的刺激会招致危险，不过，在一般情况下，食人鱼更愿意捕猎昆虫或者与自己大小相似的动物，它们没有传说中那么不自量力，除非是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它们并不会对远大于自己体量的动物贸然下嘴。然而，一旦猎物受伤，溢出血液，食人鱼就容易一拥而上，用自己错乱的尖牙，撕扯和切割猎物。

食人鱼既然这么凶狠，为什么在水族馆之外，还有爱好者饲养它呢？食人鱼还有一个独特的禀性：只有成群结队时，它才凶狠无比。这就是为什么鱼类爱好者在玻璃缸里养上一条食人鱼，为了在客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勇敢，故意把手伸到水里，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安然无恙。

难道不是吗？我们都是食人鱼。单独的人是怯懦的，面对稍大一些的猎物，我们会估量、盘算和退缩，迅速收敛自己的利齿和野心。然而，当我们成为乌合之群，就能够释放集体性的、远比勇敢更为狂野的凶残；尤其面对受伤的猎物，在合谋与合力的剿杀中，每一个人都如战士，骁勇无比。

我在美国旅行时，朋友自驾，带着我去圣迭戈看海豹。浪涌里远远近近的斑点都是它们的身影，沙滩和礁岩上，哪怕四周都是游客的脚，它们呼呼大睡，袒露布满斑点的腹部。有只造型感强烈，它雕塑般立在高出的平台上，享受合影者朝拜般涌来。我蹲在一只晒太阳的海豹旁边，观察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它几岁，因为它的表情就像婴儿，好奇、无辜又无所事事。别看它们纺锤形的身体脂肪肥沃，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可一旦回到海洋，它们就像丧失地球引力和自身重力。它们游弋、下潜、旋转，无比流畅灵活。

我小时候看马戏团的动物表演，惊讶于海狮海豹的聪明伶俐，经过训练，它们可以学会不少高超的技艺：顶球、投篮、鼓掌、跳舞、倒立。我的面颊，留下过海狮一个湿漉漉的亲吻——尽管这个所谓的吻对它来说，与情感无关，对我来说却是难忘的记忆。那只海狮有着大烟鬼一样的黄牙，半圆形的大头骨不仅是外观标志，也像回音室般给它的叫声增加了共鸣腔。

海洋中的哺乳动物，总是令我迷惑。比如鲸，能在海里待那么久，不会在高盐度下闭上眼睛，寒冷也不能击透它们宽厚的脂肪，它们巨大的胸腔里会涌现歌声；而海豹啊海狮啊海象啊，它们却能在陆地上待那么久，睡眠、求偶、养育幼崽，它们简直像有了两栖动物的神功附体。

上帝命名人类，让亚当和夏娃有着性别对称。人类效仿神迹，对动物命名，不仅有性别之分，还有陆地与海洋的对称、淡水与咸水的对称等。有陆龟就有海龟，有地上的蛇也有海里的蛇，有河里的鲈鱼也有海里的鲈鱼。两者之间，有时是逼真的模仿，有时是牵强的附会。比如河马和海马，一个壮硕，一个玲珑；比如大象和海象，从体型到习性都不像。大象有着沧桑者的眼睛，海象的瞳仁发红或者蒙着晶片似的，就像有了轻微的眼科炎症——我近距离观察过两者，觉得它们除了弦月形的长牙之外，找不到什么类似点。狮和海狮，狗和海狗，我觉得能找到的相似性更少——能说神似吧，但多少夹带了一点勉强。

然而，象、狮、豹、狗这些在陆地上截然不同的物种，到了海里，却让脸盲症者傻傻分不清楚。海象长牙；海狮有很小的外耳；海狗也有小耳朵，很像海狮，不过脸比较短……海狗比海狮的体表毛丛更多一些，不过雄海狮的颈部密生漂亮的鬃毛；海豹没有耳朵，它不能像海狮或海狗那样靠鳍状后肢在陆地上行走，退化后只能像虫子般蠕动前进，浑身脂肪就像涟漪那样一路荡漾；海象、海豹和海狗，都比海狮难以驯服，登台表演技能的多是海狮。怎么样，脸盲了吗？记忆混乱了吗？糊涂了吗？

在水族馆，我曾被安排给海狗喂食。海狗是食肉动物，野外生存时食物来

源十分广泛，它们吃鱼，也吃头足类的软体动物。无法咀嚼的海狗并非直接吞咽大鱼，它把食物撕成小块，是以凌迟的办法处理猎物的。动物园发给游客的小桶里，装几条一拃长的冰鲜小鱼，正适合海狗的胃口。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资料，说在海狗的胃中常发现石块，科学家却难以确定其生物学的用途。有人说，是为了降低其脂肪浮性——那么，这是自沉计划的需要？有人说，就像鸟的嗉囊里有用以磨碎谷物的沙粒一样，是用来帮助处理食物的——那么，海鲜是难以消化的食材？然而，尚以母乳为食的幼海狗胃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石子，这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自圆其说。在没有找到信服的答案之前，我们可以任意猜测。一个热衷维护身材的女友甚至告诉我，她猜这是海狗海狮们限制饮食的办法，因为它们已经过度肥胖。

当我拿着鱼桶出现，几只海狗立即从水中浮起。它们瓢形的头颅上升，露出浑然一体的肩颈，湿亮发黑的身体上有些微弱的色斑，它们专注而肃穆地凝视着我。

有个黑影跃起，它从反复游动也找不到食屑的清洁泳池里上岸，几乎撞上我的腿。这只海狗体型比其他稍大，我分不清，这意味着它的强壮还是衰老。左侧鳍肢按在身体漫出的水迹里，它用右侧鳍肢急切地拍打自己，发出很大的声响。但，这不是最大的声响。另外一只在我几米之外的海狗，身体大部分沉浸在水里，只露出前胸，发出极其高亢的连续叫声，分不出是呼救还是愤怒，总之，当我喂大海狗吃鱼的时候，它像目睹一桩谋杀案那样失控而吓人地嚎叫不已。它成功引起我的关注，或者说我畏惧那种可怕的噪声，所以向它扔出了鱼食。这只让它在抢夺和吞咽的间歇保持了短暂的停顿。因为奏效，它高分贝的惨叫声持续不断，有如恐吓。

亲近，示好，求乞，抗议……它们湿亮而黝黑的、离得太近的脸让我恐惧。以至于，我在后来的回想里有所犹豫，不能准确描述它们的眼珠和眼眶的关系，到底是微凸还是陷落，瞳仁到底是明亮还是隐隐有种白内障的感觉。

这些聪明、讨巧、很少顽劣的海狗们，甚至甘愿配合日常训练，甚至习惯某种程度的节食。这种狗一样的温驯，让我几乎忘了常识地把它们误当作某种食草动物。不，它们食肉，活生生的肉。我们之所以认为海里的狮与豹没有地上的狮与豹那么可怕，一是因为，它们吃鱼……鱼，就像海里的草，哪怕被撕碎，也哑言得仿佛缺乏痛感神经；二是因为，它们对人不构成威胁。只因为我们的指尖捏着一点散发腥气的食物，海狗就永远不会得知，它们仅仅是靠近，就足以暴露我们作为王者那虚拟的骄傲、真实的软弱。

邻居家的男孩是个恐龙迷，迷恋远古时代统治世界的王。房间里到处都是恐龙的形象，他对自己的收藏如数家珍。

他写作业的时候，都会在旁边放一只恐龙模型。由塑料制成的模型体态袖珍，只有两三寸的长度，但它身上仿佛携带着旷远的白垩纪：蕨类，沼泽，巨兽横行。这是什么品种？原角龙还是别的什么？它在鼻骨上方生出突起，有着沉重的脑袋和头盾，它头颅和脖颈上方硕大的褶边装饰，看起来就像驯鹿角的变异。它还有鸚鵡的嘴，外露的鼻孔，老年恶棍般褶皱而杀气腾腾的皮，布满粗糙的条纹刺青……令人望而生畏。

我怀疑，恐龙傲慢，宁可作为霸主灭亡，也不成为弄臣苟且偷安，因此它才能灭绝又活在永生的神话里。我们很难想象竟然存在翼展超过十米的恐龙，难以想象负载那么沉重的肉身它是如何飞起来的——这种想象，大概跟原始人类难以设想飞机是同一个道理、同一种难度吧。尽管我们喝掉的每杯水里，含有一个曾被恐龙喝过的水分子的可能性，接近百分之百，然而翼龙存在过的事实，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邻家的小男孩收藏许多模铸恐龙摆件，在自己的房间里营造侏罗纪公园的微型视效。他不仅收集恐龙资料和模型，热衷参观各种展览，也许因为对巨兽的爱屋及乌，还养了一个特别的宠物……天哪，鬣蜥简直就是恐龙的微缩景观。样子古怪：鳞皮和棘丛，皱缩的囊状喉袋，沉重眼睑下冷漠而不可一世的傲慢眼神……背了那么多的刺，它的造型太复古，穿着冷兵器时代的金属铠甲，每个鳞盾都坚硬无比，牢不可破。

我们容易误判鬣蜥，它的习性与样貌反差很大。鬣蜥经常像电影里的定格或慢动作镜头，但如果需要，一身重甲无碍于动作迅捷，它会像中世纪的剑客般闪电出手，它甚至长着一张复仇者的脸，行动之前被冷漠的表情覆盖。鬣蜥形似小型恐龙，丑陋、凶悍而嗜血，其实大多数野生鬣蜥只在幼年进食过昆虫，成年以后就像出家了一样成为素食主义者。它们吃树叶、草、花朵和水果，喝植物上的水滴……吃的跟童话中的仙女一样，性情也像仙女一样害羞、温柔、喜欢安静。吃饱喝足之后，它们会懒洋洋地停顿下来，做个舒服的日光浴，用以温暖身体和消化食物。

鬣蜥沉静得像个哲学家，最初父母同意饲养，据说不仅由于它以素食为主，还因为想法浪漫的他们希望让多动症的小男孩学习它的专注。的确，这只鬣蜥像个禅修的隐士那么宁静而克制，它同时又能满足孩子对恐龙复活的想象。直到，外出旅行的朋友把自己的爬宠——一条任人蹂躏的好脾气的红鬃狮蜥蜴放在这里寄养。不知出于嫉妒、蔑视还是发情期的孤独，一贯持重的鬣蜥，突然张嘴咬了主人一口。

是红鬃狮蜥蜴的鲜艳色彩构成了挑衅吗？还是说，鬣蜥成年了，它们在交配季节会唤起竞争本能？因为野生环境下，强壮的雄鬣蜥占有领地和成群的妻妾，其他雄鬣蜥如果不能以制胜的武力击败王者，就根本得不到繁殖的机会。这条勃然变色的闯祸鬣蜥事后毫无怯意，摆出喜怒不形于色的一副臭脸，威风凛凛地高昂着头——不过，它平常也是这样。在人类眼里，爬行动物的特点就是没有面部表情；我们无以判断，它的无动于衷是出于反应迟钝，还是宠辱不惊。那只寄养的红鬃狮同样无动于衷，披着一身熟蟹壳色的外皮，闭着眼睛，继续自己漫长的午后睡眠。

一眼望去，你能迅速区别鬣蜥与鬃狮吗？蜥蜴目是爬行纲动物中种类最多的：在鬣蜥亚目、壁虎亚目、石龙子亚目和蛇蜥亚目之下各种的科、属、种令人眼花缭乱。我同样会产生类似辨别海狮与海狗的脸盲症反应，最后干脆放弃。对我来说，就像奶油蛋糕的制作过程一样：壁虎就像基础的蛋糕坯子，加了奶油和水果变成光彩闪耀的蜥蜴，再加翻糖造型变成波光粼粼的变色龙，或者加上拉花拉丝等复杂工艺变成鬣蜥。

除了脸盲症，海陆命名的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鬣蜥与海鬣蜥。我们甚至把“渡渡鸟灭亡，蜂鸟存在”的例子，改为“恐龙死亡，蜥蜴繁多”，运用的不过是“巨人离开，侏儒留下”的公式。如此想来，这个近乎无限的辽阔世界，法则是有限的，最为重要的不过那么几条：繁殖法则、生存与淘汰的法则等——这是神的基础意志，所有都围绕着它们旋转，并不断将其验证。

鬣蜥，和它曾经吃过的虫子、现在依靠的人类、未来面对的死神……一切，始终，都置身于重复而伟大的循环之中。

10

鬣蜥的棘刺，在真正的“刺客”面前，相形见绌。刺猬、豪猪、针鼹、海胆，这些插针的刺球让掠食者难以对付；肉身像是专门用于戳扎的针垫，它们简直是动物界的仙人掌。看似浑身都是暗器和凶器，其实不过是自我保护的策略，并且略显防卫过度……它们没有狮子那种王者特有的懒散，也没有豹子那样慈善家般悲伤的眼睛。

鱼的体内有刺，体表通常光滑，但刺豚把刺长出了体表。除了嘴、鳍和尾巴，刺豚全身都被隐藏的骨针覆盖——这层严密的防御机制，使掠食者望而生畏，但这挡不住人类中的饕餮之徒。

海南有家顾客络绎不绝的渔家餐厅，漂浮在海上，这里的刺豚粥享有盛名。被熬煮之前，渔民用拇指和食指抠它的眼睛，或者用网抄的铁圈边缘连续挤压它的身体。一旦受到威胁，刺豚会给自己泵气，使身体膨胀得像

个气球，体积惊人。在食客看来，刺豚的愤怒和恐惧都不无滑稽。是的，我们残忍，在于可以把他者垂死而绝望的反抗都视作助兴的节目；它们的反抗并不能改变受辱和被消灭的命运，我们只会尊重那些能够突然伤害到我们的俘虏。微量的毒，些许的刺，我们享用它们带来的额外功效——养胃，或娱乐眼睛与身心。

我在岸上餐厅也吃过刺豚，它们游动在并列的玻璃水箱里，还在进食。一个牺牲品被选中，被捞出水，它气力很大，浑身尖利的刺丛让人难以碰触。它从网抄里直接被摔到地上，“砰”的一声，从它嘴里吐出半片被嚼碎的贝壳。厨师并未让刺豚表演临死的绝技，木棒打下来，一击致命，它半透明的头骨清晰地脆裂。被剁成块的刺豚经过烹调，每根鱼刺的硬度还在。这些袖珍的小三角形骨头，排列得步步为营……食客得小心地摘除鱼皮上密集的刺丛，使之成为美味而无害的胶质饱满的一团颤动的动物蛋白质。

我其实有一点心理障碍，因为，那条刺豚鼓着一双婴儿般纯真而略带惊讶的眼睛。果冻般晶亮的无辜眼睛，至死都保持该死的好奇；这样圆亮的眼睛，即使由天真转为惊恐，也不动声色。之所以觉得是孩子般的眼睛，因为它们在脸上所占的比例更大。所有动物，幼年当然都有儿童的眼睛，但刺豚到了成年，还保持着这种要命的天真。

动物中能活到成年的，是化险为夷的个体，是少数的幸存者，多数动物会在幼年夭折，死于自己或他人的饥饿。生命停留得如此短暂，它们很快消失，从母亲的子宫到掠食者的肠胃。

11

鸟类的名字有时与习性相关，有时毫无联系。比如紫胸佛法僧是非洲一种非常美丽的鸟，羽毛颜色多达八种，但它极具攻击性，不仅捕食昆虫和蜥蜴，也捕食其他小鸟和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敢于驱赶侵犯自己地盘的猛禽。别看名字有佛、有法、有僧，杀伐却是它的日常。蜂鸟，这个名字就特别形象恰切，它的确袖珍得比蜜蜂大不了多少，振翅发出的“嗡嗡”声也仿若蜜蜂。

不过，蜂鸟显得行动更为准确和精确。蜜蜂在稠密的花丛之间，那么多张可以直接取用的丰盛餐台，它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何处落座才是心仪之选，这些毛毛躁躁的访客，只好心慌意乱、跌跌撞撞地从一朵花跌到另一朵花上。蜂鸟呢？它不仅能快速飞行，还能悬停和倒飞，迅捷得像是经过动画片的剪辑，有时几乎看不到连贯的动作，它就已移动到另一丛花蕊前——太快了，在你还分不清它是一只刺蜂还是毒蛾的时候。纪录片里放

慢动作的蜂鸟会炫技般展示出，它如何用微型螺旋桨般的高频，完成飞行的魔法。蜂鸟小小的心脏，每分钟能够支撑八百甚至上千次的跳动。为了每秒五十次以上的振翅，蜂鸟一天之内可吸食甚至超过体重的花蜜。这相当于一个人每分钟喝掉三罐红牛饮料，或是每天至少吃下一百多斤食物。

为了适于啜饮管形花的蜜源，有些蜂鸟的喙长得超出想象——这根比例失调的长针简直不便携带，但蜂鸟依然能够把它当作一根篦梳上的齿针，别进毛丛中梳理自己。蜂鸟璀璨，就像发光的宝石。我想象蜂鸟豌豆一样精巧的蛋，觉得神秘不已……尤其，里面还能睡下一位比昆虫还小的天才。

蜂鸟是最小的鸟，让我想起一种著名的大型鸟——渡渡鸟，它被称为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之一。一六八一年，在被人类发现仅仅两百年后，它就灭绝了。渡渡鸟，是被自然气候和人类鼓胀的消化系统合谋消灭的。虽然渡渡鸟留下了真实的骨骼，也留下了人类的一些文字记录，但我们依然只能依靠想象去恢复它的样貌。我们看旅游商店的图片、木雕与玩偶的渡渡鸟形象：身躯臃肿，翅膀退化，一副蠢肥的样子，没有什么比它长得更像肉禽。它几乎就是超市里的某种肉质半成品，几乎生前就长成了标本。庞大、沉实、温顺……在人类眼里，渡渡鸟的样子几乎等同愚蠢的天真。蜂鸟微小、轻盈、不可驯服……它几乎是作为渡渡鸟的反义词活着。这就是小的力量，小的韧性。

恐龙灭亡，而昆虫繁盛。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已发现的有一百多万种，比所有其他动物种类加在一起还多。最小的，组成最大的群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矜傲，也没有什么真正卑微。看吧，蚂蚁爬行在象冢上……伟大是被最细小的东西所肢解的。

12

我骨质疏松，却懒得服用钙片，只是喝牛奶、吃虾皮。有一次，被朋友带去吃牛窝骨，据说，这颤抖在盅碗里半透明的胶状物，最能补充钙质。吃着吃着，我忽然想起悲伤的一幕。

那是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坐在越野车中——速度很慢，是因为天气不好，山间的大雾弥漫。道路盘盘转转，精神高度紧张的司机开了很长时间，终于开出群山。在一个相对开阔的平坦路段，他把车停到安全区域，抽口烟，缓缓神。我们站在路肩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休息。雾气散去一些，依然很重，但能见度稍好一些。空地旁边，是不高的山坡，绵延很长。其实站在这里，我并不怎么舒服，我不敢像其他同行者那样到几十米外去一探究竟。

浓雾中的山坡上，霜冻的草茎已有两尺多高。稠而湿的一片混沌中，我看

到两两头牦牛的轮廓，它们驻足于草坡，是几团不动的深棕色斑块。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在更远的背景里还有更多的牦牛，隐约在浓白的雾气深处。山坡上离我最近的那头牛，就像一座庞大的锈铁雕塑那样一动不动，就像它的肉被它的血冻住似的。它不移动，也许是恐惧不允许它从自己的命运中跑开——草坡之下，它目力所及之处，是现场屠宰的售卖点。那里，每天都要杀掉两头牦牛。刚才同行者跑去看那个栩栩如生的牛头，而我不敢离得那么近，想想就止步了。我怯于看到那双还未熄灭光亮的眼睛，怯于闻到那股雾气里混裹的血腥。所以我和另一个同行者站在一起，看山坡上那头活着却像死牛一样的牦牛.....的剪影。



没有什么值得矜傲，也没有什么真正卑微。看吧，蚂蚁爬行在象冢上.....
伟大是被最细小的东西所肢解的。

那头牛似乎是在凝望——眼皮底下，是自己同伴的屠体。昨天一起吃草，今天已被砍剁成大小不一的尸块。其实刚才停车之前，我从车窗里看到了那个刚刚完成现场宰杀的牛肉铺。

有弧度的肋排，看得见其中近乎平行排列的骨头……那具被发白筋膜包裹的深红肉身，挂在硕大而弯曲的铁钩上。那具尸体因毫无支撑而下坠着重量，拉长的体积几乎瘫吊到案板……案板上面，有溅落的肉屑和细碎的骨渣。案板之下的地面，半头牛面目全非。曾经，活着，它是自己的墙、自己的山峰、自己的碑，现在倒伏下去，成了一摊隆起的体积、撕裂的皮毛和剥开一半的漾血的赤红到刺目的肉。死去的牦牛比活着的屠夫体积大，半个它，已足够堆成壮观的一座小山，任人收拾——像无法自理的老者，任由他动作粗糙的护工，脱去身上的外衣、抬起松弛下来的胳膊和腿。

有雾是幸福美好的，草坡上咀嚼的牦牛们不必看清杀戮。不过即使没有雾，它们也会白内障般自觉升起眼里的雾，这样就不必看清明天的命运。每天杀掉两个同伴，恐惧已成为它们每天的常态，只要没杀掉自己，杀戮就是别人的噩运，就是在证明自己的好运。它们更专注地啃食草根，囫囵吞咽挂在上面的土粒。即使站立的草坡后面，就是连绵的群山和密林，它们也不会向着自由逃亡。

对死不胆怯吗？不，说它们勇敢不如说是一种懒惰。它们拒绝吉凶未卜的改变，在被动的命运面前，它们注定是无辜者。即使明天被杀，它们似乎更愿意接受这种懒惰里的无辜，它们害怕为自己选择的命运承担后果，这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做自己主人的恐惧，大于做别人奴隶的恐惧。它们在宿命的听从里，获得一种放弃思考带来的舒适，就像缺氧濒死之前短暂的美妙。

何况，牦牛是被熟悉的主人所杀，这使悲剧看起来没有那么狰狞。养育之恩就是杀戮之仇，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亲情与宿怨？这些自由咀嚼和自由走动的并非自由的生命，它们用给人类制衣制鞋的皮暂时包裹着自己，只是为了延长自己血肉的保质期。

我疑惑地啜饮似乎已经液化的牛窝骨。是的，牦牛所缺乏的骨气和钙质，我不知道同样匮乏的自己能否从中夺取。

13

洛杉矶的三月下旬，已进入春季，早晨依然有凉意。尽管贪恋睡眠，我还是挣扎着起床，去看那瑰丽的海。玫瑰色与品青色的晨光交叠下，大海壮阔无边。这个峡湾里几乎没有浪，洋面就像田畴那么平展，除了碰触岸礁的波涛，你看不到任何汹涌。

海边的路上，经常能看到野兔。它们的体型小巧，面貌清秀，褐灰的毛色并不匀整，甚至有些斑杂，但看起来依然干净。野兔的尾巴特别可爱，像是男人刮胡须前用于涂抹膏沫的球刷；有些兔子的绒球尾巴白得耀眼，可明显装歪了。它们在海滨悬崖上进餐，扯断短小的草茎，不停咀嚼，口腔频繁地快速抖动，像是含了满满的漱口水。有的兔子半直立着身体，遥望陡崖下的海浪；有的兔子竖起耳朵，开始出于警戒，很快就在僵滞中陷入了长久的空虚。如果有人靠近，这些树皮色的可爱小驼背，会弓起弧度剧烈的腰背，飞快逃遁，有时中途突然完成一个芭蕾般的跨跳。

兔子灵活而警觉，因为危险来自天上地下。空中阴云一样掠过的鹰隼，草丛里隐匿的郊狼和狐狸，从猫科动物的老虎猞猁到爬行动物的蛇蟒。有的动物对食物挑剔到相对单一，像考拉、熊猫；有的掠食者无肉不欢，只要是带血的脂肪和蛋白质便来者不拒，不在意它们被怎样的皮毛包裹。从热带到极地，到处都有兔子，它们繁殖迅速，被掠食者当作基础的口粮。兔子没有刺和毒，没有鳞和盾，没有寒光四射的齿锋和爪尖，它甚至没有什么表情。因柔软无害而遭到普遍的杀戮……友好的兔子，天敌最多。

但兔肉在人类食谱上无足轻重，与其他家禽家畜的地位不可等同。其中一个原因是，兔肉本身没什么鲜味，口感偏柴，跟鸡肉煮就是鸡肉味，跟牛肉炖就是牛肉味，是调料作用下的陪葬者。在人类的味蕾面前，乏味是种安全的自保手段。教科书说，动物和人的区别是动物不会使用工具，没有语言。我存疑，因为猩猩用树枝够取白蚁，海獭用石块击碎贝壳，乌鸦甚至会在基础物理学的起点上掌握综合运用工具的秩序；狗叫、鸟鸣、蜜蜂跳舞，其功用类似，只是没有人类的语言那么丰富和复杂。我倒觉得，可以说动物不会书写，它们没有走上文字的高端进阶……还有，就是不会烹饪。我甚至觉得，因为不会烹饪，动物所理解的食物更平等；人类因为掌握了烹饪，那些生前得不到尊重的动物遑论死后能获得什么尊重，我们肆意改变食材的味道和质地——甚至因为这种改变，我们把厨师都分为三六九等。

啊，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最温顺的小动物，没有谁会反感和畏惧。兔子在人类生活中得到卡通化的理解并受到宠物般的欢迎。它藏在魔术师的帽子里充当道具；它住在月亮上成为嫦娥的陪伴；它在漫画里扮演角色，在《伊索寓言》中阐释人类的道理，又在《爱丽丝漫游仙境》里，手持怀表把我们引向魔幻的黑洞。

形象可爱，兔子有著名的短尾和长耳。除了无尾动物，在我的印象里，自然界里多是尾巴比耳朵长的动物，像兔子这样耳朵比尾巴长的不多。其实，兔子尾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短，它只是把尾巴藏起来，只露出末端罢了。长耳朵当然是真的，像天线一样收集着环境中的各种声音，辨别声音后面潜在的杀机，兔子因此得以躲避无数尖牙利爪。兔子进行激烈的繁

殖，以应对捕食者突然打开的陷阱和深渊。它们不知道，过多献出自己的孩子也是招致杀戮的理由……当一只巨大的金属鹰隼从远处起飞，兔子的长耳朵就能听到那种难以忍受的鸣啸，像被魔法定住，它们将无处可逃——一个国外飞行员向我讲述，野兔繁衍过度，超出食材所需，也超出猎枪的射杀能力，所以当地被迫用直升机来播撒毒饵。他从驾驶舱里俯瞰，看到那些被诱食的兔子。整个大地就像一柄炒锅，野兔就像油爆的豆粒一样，密集而频繁地跳荡。有千百只野兔，就有千百种同时发生的剧痛，正在撕裂它们的内脏。飞行员如果不是洞晓其中的秘密，他会迷惑，未必能理解野兔垂死的行为——它们疯狂挣扎，却像在蹦床上无休无止沉迷于弹跳的小孩子。

我们是谁手里的兔子，在祈求怎样的垂怜和赦免？高空的神看地下的人，大同小异。我们被宠爱，我们被害害。我们乖巧，我们疯狂。我们爱，我们疼，我们告别。我们的一切看起来像在游戏之中。

14

辽宁锦州，有条天路。它每天从海水中上升，裸露着曾被覆盖的砂石，数小时之后，又蛟龙般再次潜入海底。天路上的石块之间，有时积存浅浅的水洼。赶海者穿着雨靴，戴着防护手套，在石头之间翻翻拣拣。

涨潮的海，总会解救自己那些迷路或避难的孩子。不过，也总有些小家伙回不去了。

一个足球那么大的透明水母，黏长的触丝挂在石头上，不知是死是活。我想移动它非常困难，因为伞盖无比顺滑又要回避那些凶吉未卜的触丝。隔着塑料袋，我把它吃力地拿捏起来，扔回海里……随波逐流，触丝松散，我等了许久，它也没有恢复心跳的频率。

水母没有那条小鱼的幸运。当我轻握小鱼有着斑点和横向条纹的身体，掌心里是一阵神经质的痉挛。我心里偷偷劝它，留着力气去海里游吧——当我张开手，小鱼就像一截蓄力已久的弹簧那样弹射出去。那些游弋的生命，谁会搁浅，谁又能躲过频繁的钩与网，在大海里自由成长？但愿那些鱼，长得比桨还长，让退潮的浪不足以把它们推上歧途。

一个商贩正在售卖八爪鱼：水桶里全是密集的身影，我估计得有一两百条。水，刚刚浸过它们半个指肚的高度。这些害羞的独居动物，现在无处搁放自己，它们光滑而垂坠的头囊拥挤着，不知去往何处——因为触手可及，都是繁多的和自己一样的触手。像是半流质的液化身体，如此稠密，它们活着已像一盆汤羹。八爪鱼会变色，会喷墨，会断腕求生并复生断腕，它们以足智多谋著称……在大海内腔似的内部，有着许多闪光而身怀

绝技的马戏团演员，每时每刻都在狂欢节里，而一旦离开剧场，就坠入灾难。一时的恻隐之心，让我买下被俘获的它们，放生。

据说八爪鱼一旦被捉到岸上，从来不会搞错海在哪个方向，至今尚未得到科学的明确解释。当我斜倾塑料桶，海水漫灌进来，有些八爪鱼立即展现出章鱼式的完美游动，它们像戴着运动员的泳帽，八条腿做出蛙泳运动员那样的屈膝动作，收束在一起，然后把自己发射出去。然而，有些竟不离开，即使水桶几乎完全浸在海里，它们还是紧紧扒住桶底，像捍卫着唯一可靠的家园，像是在寻求最后的庇护。我把它们取出来，要经过一种小心翼翼的轻度撕扯，才能克服它们腕足上遍布的吸盘的力量。剩余最后的两只撑开自己，因为腕足间有蹼膜连接，它们看起来就像谢幕演员拉开致意的裙摆。

重获自由的八爪鱼，有些就像溶解了那样消失，有些选择就近躲避。一只最小的八爪鱼以两条触腕缠缚着我的手指，握牢，让我的指端有种微刺感——当我从石缝里捞起它，它几近信任地立即与我建交。意外的是，这时另外一只竟主动从隐身处跃至海面，经过两度转折，奔向我的掌心。这只返场的小家伙在我的掌心里停留了几秒，才调整方向，彻底消失。它飞离的样子，像海里的空中飞人那么妙曼。

随后的数只八爪鱼体验了真正的“空中飞人”。因为看到一个赶海者靠近，我担心小家伙们因聚集而再被捕获，就把目力所及的八爪鱼尽量抛向远处，扔出连续的抛物线。也许因为此生从未经历飞行，这种惊悸让它们入水后弹出一腔墨液。这里那里，海面一时像写着神秘的草书，有着我不解其意的抽象之美。

无论它们撑开谢幕的斗篷，还是告别时施放墨团，我视之为一种交流，并心怀隐秘的感激。是的，是我在感谢得以目睹它们的魔法，而不是它们在感谢我。我并不把自己的放生理解为所谓的慈善。我不能因一次偶然的赎罪，而忘记自己常年的杀手身份，事实上我嗜好海鲜，经常把八爪鱼当作佐餐的美味。何况，八爪鱼本身就是足智多谋的杀手，有些小虾小蟹将因此丧生。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八爪鱼擅长猎杀，但它也会成为鲸、鳗、鲨鱼和海龟的食物。这个世界自有它残酷中的平等与公正，也自有它无情中的爱与美。

海面的墨痕，随浪涌而消散……如同一场短暂而美好的即兴写作。

即使这个季节，繁殖羽还没有那么怒放，它的美也足够嚣张。在昆明动物园开放区域里，孔雀或立或卧，珥琅质般，展示着五光十色的蓝——繁华而复古，华丽到了铺张和挥霍的程度，它简直是有着蕾丝和流苏的鸟。蓝孔雀色羽斑斓，在轻微的“簌簌”声中打开流光溢彩的尾屏，上面幽深的眼斑会让凝视者陷入恍惚……孔雀开屏时就像自己在施放身体的焰火，以至于我觉得它是远离真实的幻觉动物。蓝孔雀旁边的白孔雀即使穿了婚纱，也贫血似的相形见绌。

我觉得，孔雀是进化论的异数，几近悖论。它奢靡的晚礼服只适合摆拍，行动起来是多么沉赘碍事。在尼泊尔，我们坐敞篷吉普去野外观察野生动物——这是个旅游项目，不知道会与什么动物不期而遇，所以我们一路怀有带着轻微紧张感的兴奋。富有经验的司机一旦停车，我们立即在一人多高的草丛间搜寻……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弦月形的犀角从雾金色的草间显现并靠近，易于惊飞的牛椋鸟甚至没有在犀牛背上扑动翅膀。然而司机数次停车是因为孔雀。求偶季的孔雀频繁占据行车道，因为只有这条经轮胎碾轧的道路附近没有灌丛生长，算得上相对开阔，孔雀才能不受阻于草丛地顺畅开屏，像牌局老手那样得意亮出自己极度完美的花色。我们最初见到沿途炫耀的孔雀欢呼不已，听任它们挡在道路前方，从容完成整套求偶仪式；遗憾的是，其中多以失败告终，姿色平平的雌孔雀极其挑剔，不过这也是雄孔雀之所以绚丽到变态的原因。一次次停车，面对站在道路中间的孔雀……美，已用于打劫。我们后来熟视无睹，恨不能躲过那些花团锦簇的身影，它们的美让人疲倦。孔雀沉默而执拗，依然一遍遍释放着身体的彩焰。好在它们是沉默的——孔雀的叫声难听如哭婴。

我在昆明孔雀园的角落，发现一只孤独的家伙，离聚群的伙伴们很远。这只雄孔雀的嘴，细看有点歪。它有浓密而微蹙的眉毛，眼睫附近也是鳞波闪动。它像动画片一样，流畅中又略带卡顿地摆动汤勺形的头颅，顶部数根火柴棍般的翎毛却纹丝不动。它的胸前汹涌着大片层次丰富的蓝，有些地方带着铜绿色，层次堆叠，光感如丝缎。背部覆羽，在褐色底子上排布炭色的波浪横纹，状如鹰隼。孔雀把一生中的大量时间用于整理缤纷的羽枝，我看到它频频别过脖子，把头埋入颈后或翼下，沉浸在自己披覆一身的卓越美色之中。随着高频度的啄噬，它的羽毛如渐深的夜色，划过光的涟漪，一些极为细小的残屑难以察觉地掉落下来。

它的腿干枯而有力，腿上还有根马靴那样的后刺。它的脚踝部位，套着草绿色的金属环志：0114，这是它的编号，但它从未尝试碰触，就像它从未尝试越出孔雀园低矮的竹篱。也许，早就尝试过了，是昼夜之间千百次的努力，给了它永久的教训。也许，它出生于动物园，这里就是它被终身囚禁的摇篮，就是给它永久庇护的故乡。

我凝视着这只蓝孔雀，隔着只有二三十厘米高的竹篱，它也回敬式地凝视

着我，长达近十分钟。它毫无征兆地奔跑起来，带着突然的加速，直到另一个角落才停下来——那里没有人也没有孔雀，它可以继续它的孤独。当它跑起来我才发现，它有点跛足，原来不仅因为喙角的偏曲而离群索居。我开始怀疑，嘴和脚是打斗或意外受伤所致，难道，这只蓝孔雀是因为羞耻或自卑才拒绝回到集体之中？它会有这样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完美主义倾向吗？对美的极端追求，能否伴生出极度的敏感和特别的反馈，以致自身些微的残缺，都会成为走不出去的困境与牢狱？

美，永无尽头……因此，我们将终身被囚禁途中。

16

就像很难分清海狗、海豹和海狮一样，常人也很难分清麋鹿、驯鹿和驼鹿。给姜子牙当坐骑的是麋鹿，给圣诞老人拉车的是驯鹿。驼鹿体型最大，扁铲形的角就像划桨板镶上仙人掌的刺边。

有的鹿非常容易识别，比如梅花鹿，它的眼睛仿佛盛纳童话和梦境，还有降雪般落在它身体上的花期。长颈鹿作为现存最高的陆生动物，有着显著的身高和耀眼的几何斑块……神造物时是走神还是蓄意，使它有着与身体似乎不成比例的长颈。和脖颈短粗的猪或者头部直接焊接在肩胛上的河马相比，长颈鹿凭空多了出世的高贵与优雅……不过严格来说长颈鹿不能算作鹿，就像河马不是马、蜗牛不是牛一样；它是鹿科动物，但老虎狮子也不能因为是猫科动物而被算成一种猫。长颈鹿的拉丁文名字，意思是“长着豹纹的骆驼”。

鹿，给人的印象是芭蕾舞演员那样小巧的头颅和纤长而强韧的腿，如体操运动员般保持优雅的平衡，又如田径运动员般充满活跃的能量……鹿，美且有力，才能成为如此性感的生物，但并非所有的鹿都灵巧温柔。

每年在北美辽阔的草原上，都有许多脱落的鹿角。草是海绿色的，那些聚集的角又如一片珊瑚丛；而雄鹿伫立，身体优美如岛屿。夜晚来临，月色弥漫，依稀还是能看到角枝的轮廓，像被取走了火焰的烛台。雄鹿每年更换的角，从隐约的隆起开始，以每天几厘米的速度生长。最初的鹿茸中具有丰富的血管、神经和软骨，后来骨质变质，柔软如天鹅绒般的表层开始剥落，伴随着流血。失去痛觉的鹿并无不适，但挂着丝丝缕缕皮膜的肉红色的角枝，看起来就像做了一半手术跑出来的患者。雄鹿在树干或石头上蹭除角叉的表皮，亮出头顶用于决斗的剑柄。繁殖季过后，林地和草地像重归安静的战场，散落着曾经的武器。

驯鹿的雌雄都有角，不像其他的鹿只有雄性有角。驯鹿还以它们伟大而壮观的迁徙著称，寒冬到来之前，它们就开始了别无选择的远征……鹿群就

像被缓慢吹动的落叶，区别在于落叶漫无目的，而它们去意已决。渡河时鹿角林立，使水面萌生出大片灌木丛林；落雪时踢踏的步履不停，穿越漫无际涯的冰原，它们是地球上迁徙路线最远的生物。

驯鹿，曾是人类主要的食物。从前爱斯基摩人用鸟皮制作一种内衣，工序繁复，需要缝上细密的几千针。缝衣线用驯鹿背骨上多筋的肌腱制成，先要弄干、磨平、搓扭，才能制成一条粗拙的线。它的优点是遇水膨胀，因此衣缝基本不透水；另外还含有一小层脂肪，极端的饥饿条件下，人们可以吮吸缝衣线以短暂续命。

我曾前往中国北方的冷极地根河，探访居住在白桦林深处的鄂温克民族以及他们的驯鹿。我喂食苔藓，手心感受驯鹿翕张的鼻孔喷出的“咻咻”气息。不过它们最迷恋的，也许是盐。钱袋里晃动金币的声音，在人类听来最为悦耳；盐袋里晃动晶体的声音，在驯鹿听来最是动听……为此，野外放养状态的它们不惜定期返回养殖场。奇怪，羊或鹿之类的食草动物都迷恋盐的味道——就像食肉的熊迷恋蜂蜜的甜。驯鹿漫游，它们明明可以走得最远，却还是要回到宰杀者的怀抱。这些驯鹿如何看待人类？把他们当作恩人还是凶手？它们回归的行为是愚蠢还是勇敢？难道并非愚蠢，而是一种包含着恩义的勇气与慷慨——仅仅因为它们尝过人们掌心里的盐，就用自己身体里有咸度的血来回报？

林地中间，那些回归的驯鹿正在休憩，熏蚊的烟雾让它们免受叮咬。幼鹿也因人类的庇护而相对安全，每年新生的幼崽常常被熊吃掉一半。也许从驯鹿的角度，既然身体总是要奉献的，不如交给曾给予自己盐粒和蚊烟的人类。当然从人的角度，驯鹿的选择简直不可理喻，违反常规和理性。然而，大自然中的众生，亿万年来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吃别人，也被别人吃。即使素食动物啃食草叶，也会吃下许多寄生植物的昆虫。再残酷的法则，假设对所有人一致，那它就是公平的——比如，默许彼此之间的易子而食。动物幼崽只有少数幸存，多数夭折，生出来只是为了给其他生命作为食粮。人类不再遵循这样的法则，他吃别人的生命，但不允许被吃，哪怕是在死后；众生平等中的彼此尊重，演变为一己之私的侵略。人类的进化史，是人类的发迹史，其实也是人类的暴力史。在自然界的公平交易中，唯有人类，撕毁上帝的契约，做了无本万利的好生意——他是疯狂、狡诈而成功的商人，但不是好的合作伙伴。

驼鹿也有舔食盐碱的习性，不过相比驯鹿，它们体型更大。驼鹿——驼加鹿，一种动物的名字由两种动物的名字组成。这种名称，并不少见。有我们熟悉的狗熊、鱼鹰、蜂鸟。也有常人不太熟悉的鹤鸵、蜂虎、熊狸、貂熊。它们类似偏正和并列的结构，以前一种动物修饰后一种动物或者互为补充：熊猫、羊驼、燕隼、凤蝶、鲸鲨、鳄龟、鳄蜥、狐猴、蜂猴、蝙蝠、猫鼬……我猜其中部分隐含物种之间性的试探。许多动物没有任何越

界的可能，情欲止步于自己的物种；有些尝试带来了短暂的未来，无论是骡子还是狮虎兽，这些杂交动物不会拥有自己的后代，它们其实是违背上帝意志又得到上帝宽容的物种。

驼鹿具有史前动物的风貌，肩部高耸，喉部下方生有颌囊。成年驼鹿加上鹿角高达三米，据说最重的驼鹿能达到八百公斤，比一头棕熊还要庞大。它因此取得草食动物通常难以企及的荣誉，被人称为“森林之王”。发情的雄鹿低吼，双眼充血，焦躁地用角磨砺树干或豁开泥土。“噼啪噼啪”，激烈的击角声不绝于耳，仙人掌般的巨角甚至绞缠在一起，使无法脱身的两只雄兽因饥饿和疲顿而同归于尽。

我养过鱼，养过猫狗，养过黑尾土拨鼠，我经常牵挂和想念这些宠物，可假设计算连续专注于某个动物的时间，赢得其中之最佳的，竟然是驼鹿。我曾连续数小时，时时刻刻，无法把这个词从自己的意识里驱除。

那是加拿大的自驾游旅程。从贾斯珀国家公园出来，本来要在外面住一晚，但临时计划变更，我们连夜赶回温哥华。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夜晚的城市有如孤岛。我们很少时间是在穿越城市灯火，多数时间行驶在没有路灯照明的丛林。眼前只有前车灯照耀下的有限路面，反射着雨后的幽光。几乎遇不到车辆。车灯撕开前方的黑暗，身后尾随的黑暗迅速弥合……因为弱光，仿佛世上所有的黑暗都向此聚集，让人既害怕向前开，又害怕停下来。道路两旁的针叶与阔叶的混交林，同样融入浓稠的夜色。漫长的安静和黑暗……这时的安静，本身就是一种黑暗。车轮驶过路面传来微弱的沙沙声，但愿，这点敏感的声响不会惊扰什么，不会打破夜晚的平衡。是的，经常看到的三角警示牌，让我们提心吊胆。

从某种意义上说，驼鹿是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远远超过熊和狼。肉食动物牙齿的切口有限，而驼鹿的整个身躯都可以成为凶器。在发生的汽车交通意外中，与驼鹿相撞占了相当的比例。驼鹿有壮硕的头角和庞大的身躯，四肢偏细，一旦发生碰撞，骨头很容易断裂，沉重的身体重击挡风玻璃，车体会被压扁或碎裂——在美洲，每年有数百人因与驼鹿相撞而伤亡。驼鹿的性格刚猛，不仅会死于与同类的击角，还会死于与玻璃、金属和橡胶的惨烈撞击。所以，我们随时警觉丛林中任何的风吹草动，担忧突然跃出的身影。

黑暗而静寂的丛林，从未改变，就像古老的驼鹿。原本驼鹿不会给人造成伤害，几乎不会发生与人体相撞的事件，而汽车的速度，改变了二者之间的平静与平衡。与大多数动物相比，人类行动迟缓，不具备上天入地的灵活身手，但我们凭借交通工具，得以高效而频繁地自由穿梭。人类曾经脆弱，个体根本无法与野兽抗衡，但我们从拿起盾牌开始，渐渐，武装到牙齿……而今人类的牙齿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当再次穿越丛林，

我们躲进汽车，躲进宽大的金属甲盾里，却保持着矛的杀伤力。可我们无法摆脱恐惧，因为运速的提升，原本无害的素食动物也成了我们的敌人，甚至是庞大的杀手。当驼鹿与汽车相撞，当血肉与金属相撞，当古老生命与工业产物相撞……我们并非公平的竞争者，但我们依然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光，像一把刀捅入夜晚的内脏。不过，车头亮而前方黑，像是刀柄在未知里，而锋芒一直抵住我们。刀锋前面，是悬而未决的生死。我高度紧张，屏气凝神，虽然目力无法在黑暗中辨识，但我知道，驼鹿可能就在附近，它们的角枝就隐藏在丛林，像雨藏在河流里，燃料藏在火苗里。可能在我转头的瞬间，它“嘭”的一声到来，像沉着赴死的宣判者。

长达十个小时的车程里，我时时刻刻想着驼鹿，想着这个素食者里的草莽英雄，导致我在丛林边缘参差的黑暗里不断看到仿佛中的幻影。然而湿黑的雨夜里，驼鹿不动声色，从未真正显露行踪，哪怕是巍峨角叉的一个剪影。

丛林里的驼鹿，丝网上的蜘蛛，梦境里的鱼和神话中的独角兽……它们的鼻息、它们的毒液、它们闪耀的鳞斑和发光的皮毛，正在隐匿或靠近。人类的命运将被影响，被改变——被有如幻觉的动物，那销魂或惊魂的一吻。

跋：安静的风暴

动因

为什么写作？我不知怎么回答，可为什么不写呢？

写作里有我的乐趣和虚荣，而且是超过预期的虚荣。尽管这种虚荣被严密包裹，连自己都未必看得清。我本性羞涩，骨子里虚荣，所以，生了一口烂牙齿的人畏惧糖——我难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掌声，那会让我更为羞涩和恐惧。

文字和文字碰撞，会产生美好的乐音——有如最为宁静的掌声，我听得到。如果文字的物理组合，没有产生化学反应，那种沉闷会让我调整和放弃——我既没有炫耀中的紧张，也没有失落中的尴尬。写作是适宜的安慰，也包括，不会伤及尊严的自我批评。

对我来说，一生什么最重要？我想是安全感，以及在这之上的自尊与自由。既敏感，畏惧伤害；又好奇，热爱冒险……胆怯的我可以躲在率性的文字里，浪迹天涯，胡作非为。写作懵懂，一切，由执笔者性格所决定。

热情与冷漠，吝啬与慷慨，自私与利他，结合在同一个体之中……这是我。此岸和彼岸的我，天然和人工的我，拘谨和狂野的我，羞涩和无耻的我，泥浆里翻滚和云端上飞翔的我。这是每个写作者的境遇，在文字里遇到自己……那个无能和万能的“我”。

职业写作

专业作家，我想象不出比这更美好的职业，我由此放弃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有朋友替我惋惜，想象虚拟中的仕途前景，他们遗憾于我似乎放弃了什么重要的财富。

可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纠结，这不是52比48，而是悬殊的99.52比0.48，能有什么选择困难？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人告诫：不做编辑，就会失去文坛话语权，没人有兴趣再来联络和问候，你会备感冷落。我才不在乎呢。失去一个讨好者的同时，十个讨厌的人也跟着不见了，就像扔出去一个保龄球打倒十个小人一样。多好，清净。

有些作家书法、绘画、摄影、乐器、收藏……样样精通，无所不能。我什

么都不会。我的自卑培养了我的专注。就像借助凸透镜聚拢光线，我把所有热爱集中在一起。不要以看似专情实际空洞的眼睛去观察素材，心神足够凝聚，才能使它们释放火焰。专业写作，最重要的是专注写作。

写作是漫无尽头的、倔强而绝望的努力。每当有人自述在写作上高开低走，我就怀疑，写作开始阶段的高，高能高到哪儿去呢？我相信持续的自我训练。唯此，才能把词语的偶然性，过渡到趋向完美的必然性。

弦不能一直松着，需要拧；但不能拧断，也不能拧到固化……在压制、克制与控制中的走动，才是写作的有力节奏。侠客拿到一本错误的武功秘籍，但他专注投入，练得废寝忘食、走火入魔，乃至血液倒流、内脏错位……最后，竟无往不至，练出另一种周天。即使犯错，专注也会使你得到意外的回报。

训练敏感，训练精确，训练自己如何去制造一种并非习惯之物。

飞机能够飞行，因为它的流线形状和曲面构造，因为它的燃烧与旋转，因为它严格依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无论叠加多少个因为，你依然不能适应成吨的钢铁被悬举半空。写作，就是组装材料，以结构的严谨逻辑性，达至艺术效果的奇迹。

温度

写作时，我一定会喝咖啡。有人喝咖啡是因享乐而沉浸，有人是因成瘾而受束，除了这两个原因，我还出于畏惧。每每开始动笔，我都担忧和害怕，我不相信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独立完成。我需要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灵感就是皮肤透明的神，咖啡就是皮肤深棕的液体神。冬天必须喝烫口的，热气升腾，电脑上的字迹像隔着湿气轻微抖动的幻境；夏天，我消耗大量星冰乐或冷萃咖啡，它们携带着冰冷的温度和汹涌的热量，进入胃和血液。温度特别重要，凉了的热咖啡和热了的凉咖啡，根本不是咖啡。形容词的温度，一掌定乾坤。

同样，需要精确控制写作的温度。对美德或罪行，即使内心情感炽烈到几近燃烧的程度，我相反让笔调保持一种控制中的冷淡——这样，可以把读者引领到源头，不致因写作者强烈的态度而迷失途中。可以不用哭或笑来表达悲喜，那样温度释放太快，容易丧失后劲。写性，更要控制温度，要写得既惊心动魄又若无其事，既狂热又冷酷。

判断作品好坏，常常用到“情怀”这个词。先得有“情”，那个“怀”，才有栽植成活的土壤。这个“情”，不是抒情中泛滥的“啊啊啊”，而是热爱、好奇、尊重、悲悯，也包括貌似无情的冷漠与绝望……“情”绝非一味暖热，

恰恰它应该具有最丰富的温度层次。即使零度叙事，也需要格外的控制，并非尸体那么懈怠，然后炫耀获得所谓的冷静。温度决定烘焙的成色，写作炉火纯青，是在暗示一种关于温度的技艺。

形容词

我们有着奉简约为上的散文传统。起步阶段的习作者常常写得环佩叮当，成熟之后，他们与形容词的一夕之欢迅速瓦解，并耻于承认和回忆。这是修辞上潜在的种族歧视吗？动词站上台阶，名词驻足平地，劣势的形容词位居洼地。

那种昏天黑地、纸醉金迷的过度修饰存在问题，但唯简是尊，未必就是铁律。写意有写意的好，工笔有工笔的妙。有人是写作上省俭的环保主义者，极简主义无可厚非，很好。有人用字铺张，也谈不上罪过——毕竟词汇和物资不一样，浪费倒是个创造和积累的过程。这个世界，有素食主义者的佛教徒，也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游牧者……不能因为饮食清雅，就肉食者鄙。各自的身体和情感需要不同罢了。还是让天鹅和孔雀都好好活着吧，不用雁过拔毛把自己变成西装鸡。

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天然被辜负，包括被反复诟病的形容词。有人轻视乃至蔑视形容词的价值，他有他的道理；我为形容词辩护，也有我的原因。形容词是导向精确的条件，是对常规、平庸、简化和粗糙表达的一种纠正。比如月亮，它是公共的，但“温暖的月亮”和“荒凉的月亮”迥异，揭示出词语背后那个仰头的凝望者……所以名词是公共的，而形容词，隶属个体。

上帝命名万物，魔鬼用动词篡改，留给人类的，只剩形容词。我们通过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质的书写，标记各自独特的属性。

我觉得中英文不同。中文的名词里也隐含着某种形容词性，比如牛肉、鸡肉、鱼肉；英文的beef、chicken、fish，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为什么不简易地统称为“肉”？因为必须在形容词性的保障下才指代无误。还有动词，打和拍、掐和拧、扔和摔、摘和拽、推和揉……查阅这些动词的定义，联想这些动词的场面，你会发现暗含其中的，是形容词之别。我们斟酌使用哪个动词更准确，其实，就是在寻找和推敲这些动词里埋藏的形容词。我的英语水平堪称尴尬，有限的初级阅读正好让我形成足够的偏见：英文段落里的动词，作用至关重要，为了走向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所需要的精确；中文可以古道西风瘦马，可以老树枯藤昏鸦，这里面没有动词，为了走向模糊，并抵达唯有模糊里才能传达的精确。形容词，其实无所不在。

形容词里有我的狂喜和忧惧，也有我的淡漠……我爱慕它们。一个平凡的

形容词或者一个讨厌的副词，嫁给了对的名词或动词，可以成就近乎完美的婚姻。好的修辞也是一种意外而完美的镶嵌，天衣无缝。

大美不雕，对不对？当然对。但形容词的判断标准，是必要性，并非动辄概以修辞之过。李亚伟有句诗：“我在一群业余政客中间闻到了楼梯间寂寞的黑眼睛的香气。”哪个形容词应该去掉？一个都不能少。

可以朴素，不能赤贫。可以克制，不能乏力。我怕那种简单到简陋却自以为简朗的得道者，他们以法西斯的眼神看待每一个犹太形容词。

才华

写作需要才华。有看得见的才华，有看不见的才华。土地上的庄稼看得见，到了季节就收割；土层下也有别的，得找，找得着矿脉就丰富，找不着，就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无论是外部题材还是内在才华，都可共享这个比喻。

深藏的矿脉才华不稳定，然而，一旦发现，总比显见的才华更具价值。所以，挖掘题材和才华，无惧前方矿难般的危险和痛苦，才有可能找到那条难看而价值巨大的矿脉。

有人鼓励过，说我有才华。当然感激。可惜我只是偶尔且短暂地信一下，马上就是内心的否定。看看周围有多少人，写得那么好，那么元气饱满，令我羡慕不已。有人是天赋，我是运气。区别在哪儿？天赋，是每时每刻都不会离开的运气；运气，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转瞬即逝的天赋。

我伤感，即使我相信自己有才华又怎么样呢？我既无法放松，又无法炫耀，永远不能为所欲为。像个走钢索的人，在地面上我无法展示天赋，所以平常状态下我没有自信；即使有了钢索，到了写作的高空，全部精力都用于维护个人安危，无暇他顾……所以，我还是不自信。没有志得意满的时候，总是临近绝望。

困境

创作艺术品，如在心脏上雕镂，想象力和耐受力在博弈。

常遇困境。每当感到力量衰减、体能缺乏，我无法安慰自己说，登上的山峰越高，越要忍受稀薄的氧气——艰难并非预示即将登顶的成功，可能仅是自欺中的错觉；假设我被困枯井，同样会喘不上气，产生濒死中或难受或美妙的幻觉。

感觉以前努力，是在小数点之前的；现在，怎么都是小数点之后的位移，

变化甚微。真希望在写作里无所不能。谁有本事梦想成真呢？谁能面对尘俗，样子和心境都澄澈如婴儿，握着自己机器猫那样胖而万能的拳头？

别无他法，只有写作能解决写作本身存在的问题。障碍和瓶颈，只能边写边克服；仅仅靠思考，更像靠回避和停顿来解决问题，事倍功半。是的，我们必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钉在写作的椅子上，死在上面，然后复活在上面。

作家是随时自设牢笼以寻求突围的人。写作是与未来的自己博弈，一点点接近绝对可能的那种绝对不可能——你赢不了，才是妙处，在输局里可以精进技艺，并戒骄戒躁。一旦你赢了，那才不幸，意味着你输了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立场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阿多诺被反复引用的圣典，令人震撼。

但写小说不野蛮吗？写散文不野蛮吗？不写诗，是否就更文明？诗比之其他文体，潜在地多了语言上的修饰性，多了情感上的形容词效果。一个激进的朋友向我引述这句诗，似乎暗指，那时那境，诗人放弃个人技艺，投入体力式的营救才不羞愧。

然而，写诗，在婚礼上写，在葬礼上写；清醒时写，梦境里写；与仇恨相逢时写，与爱情诀别时写；在奥斯威辛之前写，在奥斯威辛之后写，无论如何野蛮……这是否也象征一种无畏、忠诚、牺牲与殉难？任何压力下，让笔尖裸露，一个人能否因为诗歌的脆弱或野蛮而成为圣徒？

何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本身就是修辞，它难道不是一句诗吗？

也许只要写，野蛮发生得就没有那么容易。即使是一个人的写作也具有社会意义。

遭受劳改、流放和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他的笔像脊骨一样从未弯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在极端年代，一个人极尽妥协和屈服尚不能保证自身安全。捍卫真理？将直接要了他的命。捍卫者像佩戴珠宝只身行走在夜色中，易招致劫掠乃至杀害。然而，孤往绝诣的独行者，是撕裂黑暗的一道闪电——短暂而强烈的光明，令人陷入失明般的恐慌，也使罪恶之手暴露发白的骨节。

以单薄个体，对抗机械般的制度，身怀螳臂当车的勇气……不要像嘲笑堂吉诃德一样。不，他是真正的勇气，知而后行，起而论道。洪流席卷，从集体到少数，从少数到个人——这是残酷的筛选过程，想要不改其志地活下来，相当于要在搅拌机里维持完整。珍贵的幸存者远比庸者坚硬。高贵的心未曾堕落，因为它不等待谁的拯救，它拒绝恩典里所包含的隐约权力。哪怕他的写作就是通过一支笔，通过这把掘进的锄头挖开自己黑暗中的坟墓，他也不停顿，他因这种致命的劳动而增长肌肉、骨骼和体魄。

海象鱼体型很大，又名巨骨舌鱼，它的舌头上真的有硬骨头。这是写作者的理想，成为大作家，应该在舌头上生出硬骨和反骨。

内力

“修辞立其诚”，我喜欢其中的内力，并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写作原则。我以为自己会始终勇敢，像个黑天使，善于对事物做出果断的形容，并无畏于后果。鱼能够承受海里的盐，真正的作家能够承受写作里的困境，这甚至是游动在文字之间必需的压力。不过二十年，我已不敢再对命运轻许诺言，这既是我的成熟，也是我的怯懦。

板凳坐得十年冷，说的是耐心，已鲜有人能做到；若是老虎凳坐得十年，恐怕谁也说不出什么内敛的漂亮话了。且不谈社会责任，仅仅是承受自身的重力，已让人犹豫和恐慌。如何贯彻写作的诚实？如何在逐渐沦陷的危机中自救？

想起在旅游景区，游客喜欢在岩石下面的缝隙里，摆上许多小小的树枝，这叫作撑腰木。据说撑上以后，自己的腰就不疼了。幼木棍承受得住巨石的重压——希望里怎能诞生这样的奇迹？这可笑的寄托，这天真的悲剧。

但在爬满苔藓的岩石下，我看到，一根截断的树枝魔术般生出一片嘴唇大小的绿叶。被野蛮砍下之后，它决定野蛮地生长。

写作者能够拥有植物的智慧吗？当我们不能像动物，自由地奔跑与捕杀，不能撕开猎物的血喉；当我们不能移动，被钉死在贫瘠的原地，却不能避开捕食自己的嘴和牙……我们依然可以保留蓄意的气味和毒素。即使我们像罪犯被拴上不能移动的铁镣，也能学习以奇迹般的化学魔法维持生命：把阳光转化为食物。

阅读

在所有休闲方式中，读书最累，在静态中耗费脑力、情感和体能。可它最有意思，我们得以进入万花筒中的魔法世界。

看书时，唯一的活动就是挪移视线。人的视网膜可以看作一个传感器，越往边缘去，传感效果越差。只有通过最中间一个叫作中央窝的地方，我们才能以视觉分辨。这个中央窝很小，只能容下八个字母。所以在阅读时，我们其实是从一个针孔似的小洞里窥探世界……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连续窥探，才能目睹豹纹锦簇，身形斑斓。每一个文字都是秘密的孔隙，让我们得以突破闭锁，看到众生和天下。精神上有轻微自闭倾向的人，阅读，是他对外部世界谨慎的眺望和试探。

我喜欢临睡前的阅读。读到什么，易在墨色夜中得到拓印。我的梦、我半夜醒来的瞬间、我清晨起床后持续的恍惚里，都荡漾着一些词语、诗句和句段……是残片。但一张剪纸比一张白纸更有创造力。

我平时阅读不规律，出差或旅游，倒是效率最高的时候。大概因为那种状态下，时间的压迫感和流逝感都变得特别具体，形成有效的催促。出门在外，没有带足够的书，比没有带足够的钱更易丧失安全感。总有一两本书带在身上，哪怕来不及看，平添负担；但这额外的重量，恰如灵魂的镇纸，让人内心踏实。

我买书的速度远远大于阅读，以平息缺少阅读的焦虑。不过，也有人买书追求满墙、精装、全套，他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阅读，而是怕别人发现他不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思考是负担而非快乐。啊，若有所思——他们只是要呈现这个姿态。若你追问，所思为何？什么也没有，里面是空的。他们摆出“若”的造型就够了。对他们来说，形式比内容重要，所思比思重要——买书只是日常生活里唯一能实现的行为艺术。

读者

我每隔几年出一本散文集。喜悦同时有点内疚，编辑为难了，几千册印数需要几年才能耗尽库存。滞销是我的命运，属于他人的畅销奇迹，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市场不景气。人们只看手机，纸书的江湖地位被撼动。谁会关心巴尔扎克怎么说？人们只关心扎克伯格。”类似的解释不成立，是虚假安慰。我也无法以严肃文学为借口，因为很多有品质的写作者风生水起。

从事出版的朋友，批评我缺乏宣传上的配合。属实。我对宣传的态度，目前停留在排斥和痛恨之间。我慌慌张张，缺乏对作品集的停顿和总结，只顾跌跌撞撞向前跑。我看似心无旁骛，看似缺乏经营功名的乐趣，其实绝非如此。我只是胆怯心虚，无法在观众前卖弄自己的知识或品德。我习惯躲在舒适的黑暗里，怕聚光灯，我是探照灯扫过来也想转身的那种人。更重要的，是我缺乏余力。如果有时间和精力，我为什么不继续写，或者舒

舒服地看本书呢？我对新人恐惧，对旧人怀恋；对事物的态度相反，好奇新物，厌倦旧物。我几乎没有第二遍读的书目，甚至少有耐心摘抄激赏的精彩句子，哪有心思反刍自己的文章？写的时候缠绵不已，印出来就恩断情绝。编辑认为，我由此错过推广自己的某个重要机会。然而，机会未必会在迎接或等待之后必然来临；并且，即使这个所谓的机会如约而至，我想起之前为此殉葬的时光，就觉得，它无论怎么重要都是不值得的。

竞争激烈的出版环境下，有些图书自说自话、自生自灭。即使如此，我认命。之所以不痛改前非，是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和风格根本不适合营销。即使我偶尔听从发行安排，一路摇唇鼓舌，我看销量未必能有起色。效果呢，不过像和一个高尚到丧失低级趣味的女子交欢，把自己累得够呛，她又不叫好又不叫床，唉，气死了。

好吧，耕植文字，我要它们在我内心成活，不急于嫁接到读者那里。其实没有观众也有益处——至少，写作者可以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演员，去爱或恨。写作，永远是孤军奋战，是一己之勇。还是尊重内心吧，无论是被褒还是被贬，被关注还是被冷落，被喝彩还是被呵斥，不改其志。

何况读者助阵的呐喊不能进入创作环境，那会相当于噪声。对于写作者来说，环境的安静和内心的安静非常重要，有助于专心地追踪题材。我想，成功猎杀的前提，除了需要锋利的牙和凶暴的趾爪，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安静。一个能安静的大动物，才能生杀予夺。

我一直喜欢宁静的事物，因此迷恋写作。一个书写故事的人，他所制造的惊心动魄比秒针走动的声音还轻，这太美妙了。我以前必须在真空般的寂静里写，后来改变习惯，边听音乐边写。奇怪，音乐没有加重声音的存在，反而，加重了安静。

你可以成为音乐的听众。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读者。

专业批评

我对评论的态度比较模糊，说不出是欢迎、淡漠还是反感。

有的批评无论下了多么重的猛毒，我都口服心服，只要蛇打七寸。无论下毒者是资深批评家还是网络闪客，无论与我关系亲近还是不睦。针对作品，不看脸色和眼色，我觉得专业批评就得是一叶障目、六亲不认。好的评论家，应该与写作者同道，或者背道而驰……真正称得上敌人或导师，可以同样赢得保持距离的尊重。他们拥有凛冽的独立性。

我不喜欢看具备专业水准的批评家勉强自己扮演表扬家，像失效的暖水袋

坚持散热。刻薄地说，这样的囊袋，不比酒囊饭袋强到哪儿去。一个从事专业批评的人，不储存贬义词，不具备挑毛病的眼光……仿佛手指已经发颤的外科医生其实不适合做手术了。人际关系代替专业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更像是照顾巨婴的保姆，最重要的工作，是随时处理后者的眼泪和屎尿。

批评家并非天然享有指点迷津的特权，他们需要在作品中学习，与写作者一起获得成长，绝非远隔或寄生。不好的评论，未曾触及作品的皮毛；不好的评论，会成为作品血肉里坦然的附属——像六指，像多余的肿块，甚至影响作品自身的天然性，使其健康受累。有的批评家，无论有着怎样的资格证书和多久的从业经历，我依然觉得他们是门外的徘徊者。他们想用一种理念的缰绳，套牢所有作品。比如有的业余批评家，支撑生涯，靠的是对苦难生活的崇拜。这样不令人信服的批评家，能奈我何？无论多么蓄意、敌意、恶意的攻击，我都不怕。他们以为的枪林弹雨，对我来说，不过节日里的鞭炮，噼里啪啦，助个兴而已。缺乏他们的批评，何憾之有？没有干扰，我可以扮演自己的批评者，扮演给自己施行手术的人。

远方

到达远方的时候，我们也许什么都没有收获，反而途中遗失太多；也许没有遗失，我们就根本无法抵达远方。有人写，是因为他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写不了了，就像人活一辈子，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一样。以写作为信仰的人，容易沦为殉道者，不过一笔一画，他也为自己的灵魂搭建天梯。

我对远方缺乏想象，写作之路本身足够回报我。过程九十九米，终点一米……如果可能，我愿永远都是过程。初心不改，写作始终是寂暗中的安慰，每一个写下的笔画，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擦出的光痕。

每个人一生所走的道路，相当于绕地球两周半；如果体内血管相连，我们也能抵达这样的长度。你的心要指挥你的笔，你的笔所传达出来的，重新抵达你的心——这个三角形，要完成连续而流畅的循环，所写的东西才是有效的。从身到心，写作是孤独漫游，是走到极境，又倦鸟归巢。我们可能因丰富而宽广，也可能因丧失纯粹而污驳。在这条路上，我们将看到自己的虚荣、软弱和恐惧……看清自己的能力，同时就会看清自己的无望，最后看清，无所畏惧也无所顾忌的悲伤。

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篇章……使自己的写作无限靠近自己绝望的期待。最美的前方，从来不是琼林宴或金銮殿，而是星宿满天的虚空。唯写作里，有我们的河流、星空和万神殿……

[本书封面插画根据摄影师尼古拉·季诺维也夫（Nikolai Zinoviev）作品绘制，特此感谢！因未能联系到摄影师，望有摄影师联络线索者与出版社联系，邮箱：guoyue@citicpub.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兽之吻/周晓枫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5

ISBN 978-7-5217-2882-8

I. ①幻...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9108号

幻兽之吻

著者：周晓枫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52千字

版次：2021年5月第1版

印次：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882-8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对立之美

西方艺术500年

严伯钧——著

Art in Parad
500 Years of Western Art

朗朗、薛兆丰、吕思清、俞潞、邬建安跨界推荐

一本能让你终身受益的艺术入门典藏书！

近 200 位艺术界超级 IP ★ 300 余幅世界名画 ★ 20 多个艺术流派

一条“二元对立”极简逻辑线，串起 500 年西方艺术史精髓

●——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

严伯钧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CONTENTS

导论 二元对立法

01 天主教与新教：西方艺术的精神根源

- (一) 精神与世俗
- (二) 犹太人与罗马人
- (三) 拉丁语与希腊语
- (四) 层级与平等
- (五) 朴素与浮华

02 意大利与德意志：西方艺术中的两极

- (一) 个体与整体
- (二)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

03 米开朗琪罗

- (一) 宗教与文化
- (二) 北方与南方
- (三) 绘画与雕塑
- (四) 科学与神学
- (五) 古典与浪漫

04 拉斐尔与提香：不同地区的文艺复兴

- (一) 天才与圣人
- (二) 威尼斯与罗马
- (三) 在朝与在野

05 哥特与巴洛克：西方建筑与雕塑艺术

（一）“大路”与“小径”

（二）“太阳”与“月亮”

（三）圆顶与尖顶

06 伦勃朗与鲁本斯：巴洛克绘画艺术

（一）“黑暗”与“光明”

（二）“庙堂”与“江湖”

（三）局部与整体

（四）传统与创新

07 “珍珠”与“珊瑚”：洛可可艺术

（一）手工艺与学科

（二）自然与人文

（三）巴洛克与洛可可

08 巴赫与亨德尔：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一）音乐与美术

（二）艺术与技术

（三）赋格与咏叹

（四）大师与公务员

（五）神父与教师

09 莫扎特与贝多芬：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

（一）复杂与简约

（二）歌剧与交响曲

（三）水与火

（四）使徒与英雄

（五）创造与颠覆

10 安格尔与戈雅：浪漫主义绘画艺术

- (一) 启蒙与狂飙
- (二) 德意志与法兰西
- (三) 色彩与线条
- (四) 西班牙与不列颠

11 勃拉姆斯与瓦格纳：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

- (一) 歌曲与歌剧
- (二) 律师与银行家
- (三) 起点与终点
- (四) 分裂与融合

12 威尔第与罗西尼：歌剧的艺术

- (一) 小提琴与钢琴
- (二) 美声与戏剧
- (三) 茶花与茉莉

13 马奈与莫奈：写实主义与印象主义艺术

- (一) 虚幻与真实
- (二) 复古与创新
- (三) 知识与感官

14 斯拉夫与法兰西：民族乐派

- (一) 民族的与世界的
- (二) 冬风与鬼火
- (三) 天主教与东正教
- (四) 工具箱与调色盘
- (五) 北欧与南欧

15 塞尚与凡·高：后印象主义艺术

- (一) 科学与艺术
- (二) 瞬间与永恒
- (三) 客观与主观
- (四) 先进与原始

16 毕加索与马蒂斯：现代主义艺术

- (一) 局域与完全
- (二) 达意与传情
- (三) 探索与表现
- (四) 艺术与哲学

17 达利与杜尚：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 (一) 符号与图形
- (二) 破坏与建造
- (三) 现实与梦境
- (四) 艺术品与艺术家

18 勋伯格与凯奇：20世纪西方音乐

- (一) 调性与非调性
- (二) 古典与新古典
- (三) 美洲与欧洲
- (四) 加法与减法

尾声

导论 二元对立法

本书阐述的是西方艺术的历史，但西方艺术史的规模异常庞大，想要用短短几十万字说清道明，实属不易。所以需要一套方法，让读者抓住西方艺术史发展的主线逻辑，即便将来碰到未曾了解过的新艺术作品或新的艺术知识，也能用这套方法融会贯通。

对某一领域知识的构建，其关键不在于记住多少知识点，而在于了解该领域的核心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推理逻辑。如同种树一样，一棵树是松树、柏树还是银杏树，从远处看，判断标准自然是树冠的造型，可实际上，这棵树的树根、树干才是其生命体征的根本。

对艺术史来说，一件件传世的作品就好比艺术史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片树叶。创作了300多件质量极高的绘画作品的“画圣”拉斐尔这片区域的树叶茂密，但如果不知道拉斐尔的“树叶”是如何长在“文艺复兴”这根粗壮的树枝上，以及文艺复兴这根“树枝”又是如何长在艺术史的“树干”上的，恐怕就算把拉斐尔的每一片“树叶”都数清楚，也于了解艺术史这棵大树并无大用。恰恰绝大部分人对于艺术的了解，都停留在一片片零碎的“树叶”上。

谈到西方艺术，人们脑海里涌现出来的通常是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以及数不清的艺术作品，但细说起来，却是熟悉又陌生。众多艺术家、多如牛毛的艺术作品，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一团乱麻”。

西方艺术，不论作品数量、题材、形式、内容还是技法，每一方面都极其繁复，都可写就一部厚厚的编年史。谁是哪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竞争对手，谁是什么技法的创始人……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大约可以帮助你艺术史领域拿到不止一个博士学位。

在西方艺术中，不论绘画、雕塑、建筑，抑或古典音乐，都经历了超过500年的发展与流变，积累了太多内容，再加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科技、便捷的交通，信息的不对称被极大地打破，人们可以轻易地欣赏到这些数量庞大的艺术品。但这些作品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其实它们已经丧失了时间属性。

举两个例子。在现代人的固有印象中，风景画是常见题材。但你可能不知道，风景画这种题材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才开始盛行。在这之前，风景画出现的频率非常低，而再早一些，如文艺复兴时期前，大多著名画家甚至没有将风景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

再譬如，自你接触西方绘画起，一定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西方绘画当中有如此多的女性裸体，难道西方人如此开放，看到这些裸体形象不会尴尬？其实，西方人也尴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从波提切利画中维纳斯的“奉旨裸体”到库尔贝的《世界起源》，女性裸体作品中，其尺度放宽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

无论是风景画出现得很晚这个事实带来的惊讶，还是充斥着裸体形象的西方绘画带来的疑问，本质上都来自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时间属性缺乏敏感度：它们被同时放到了人们的眼前，人们并不深究它们在创作时间上的先后。这也是为何学习艺术史或欣赏西方艺术，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分量沉重的风格、主义名词：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中包含大约几十个细分的“主义”以及流派）。这些风格、主义名词给500年的艺术作品排了先后。要明白艺术史，必须唤起对艺术作品时间属性的重视，不然如何称其为艺术“史”呢？但是那么多“主义”，要记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而方法论极其重要。

本书贯穿始终的方法论是“二元对立法”。本书采用的二元对立法，是在研究对象众多的领域中，首先找到其风格、特性最为典型却又互为对立的两个极端，并对其进行研究、归纳。这在艺术史中通常体现在一个艺术时期中成就极高且又风格迥异的两位大师身上。譬如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科学理性”和米开朗琪罗的“激情感性”，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直到19世纪初，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艺术流派身上，依然可以分别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艺术理念中找到其精神源头。掌握了这两个极端后，就可以把其他艺术家分门别类地归纳在两个极端中间，由此，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和艺术风格的坐标体系就被确立了。本书的章节标题都是“某某与某某”的形式，就是希望能帮助读者建立各个风格时期的“艺术坐标”。

实际上，二元对立法是人类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之一。研究对象最初都是杂乱无章的，这时只要找到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点”，再用一条逻辑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维度”。有了“维度”，才有大小、强弱、先后等度量概念。譬如在物理学中，把在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0摄氏度，再将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定为100摄氏度。有了低温和高温两个固定点以后，其他的温度就都有了参考标准，于是温度的概念就明晰了。

用二元对立法去理解艺术史，就好像晾衣服一样。晾衣服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衣服要晾，而是要撑起一根晾衣绳。了解了一个风格时期的“二元”，就好比撑起了这根晾衣绳，其他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直接挂在这根绳子上就好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正是帮助读者撑起这一根根艺术史中的“晾衣

绳”。

既然是为了了解西方艺术史的主线逻辑，那么必然要抓重点、做取舍。为此，在很多传统的编年史艺术书中必然会介绍的艺术家，本书会做一定的取舍。虽然有些艺术家成就极高，作品质量超绝，但是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史的进程中并未体现出巨大的推动作用，故本书不会用普遍艺术史类图书中必定使用的浓重笔墨进行描写，甚至不会提及。这批历史上极其优秀的艺术家包括但不限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波提切利；矫饰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雕塑家切利尼；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画家卡拉奇、雷尼；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毕沙罗、西斯莱、罗特列克；进入20世纪以后，巴黎画派的莫迪利亚尼、超现实主义的夏加尔和克利、雕塑家亨利·摩尔以及瑞士的贾科梅蒂；抽象表现主义的德·库宁和纽曼以及大量优秀的女性艺术家，如画家欧姬芙以及雕塑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等；再如西方艺术史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东方艺术家，如日本的藤田嗣治、中国的常玉和赵无极等。在此向这批顶端的艺术家致歉。

除了二元对立法的方法论，了解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触类旁通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就艺术讲艺术，不仅会显得学究气太重，可能也无法讲得透彻，因为艺术问题的答案也许并不在艺术领域之中。譬如，为什么相比其他作曲家，巴赫的钢琴音乐在乐谱的标记上看上去那么干净，几乎看不到什么强弱的记号？难道是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拒绝人世间的激情，所以要追求音响效果的平缓？从音乐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实际上，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在巴赫的时代，有强弱的钢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与现代钢琴不同，古钢琴是所谓的拨弦钢琴，一个音的振幅强弱跟弹奏的力度毫无关系，所以并不是巴赫拒绝强弱变化，而是无法做到强弱变化。相反，巴赫晚年接触到有强弱差别的新型钢琴后非常喜欢，还为之创作了不少作品。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三剑客”之一的卢梭就曾指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会对当地居民的性格、习俗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在艺术当中，卢梭的理论体现得极为显著，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北欧的艺术，方方面面都与其种族、人口、地理、气候、政治、经济密不可分，它们之间也都呈现出巨大的风格差异。

艺术史这棵大树固然美丽，但是把树木培育出来的土壤也甚为重要：为什么文艺复兴始发于意大利而不是不列颠？为什么19世纪的巴黎才是世界艺术之都，而非老牌的罗马、维也纳？这些问题的答案，艺术本身是很难给出的。所谓学科，是发展得艰深了之后，人为定义划分出来便于研究的，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是人为设定，而非天然存在的。各领域的从业人员都好比在攀登一座山峰，峰顶叫“真理”。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只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向上攀爬，目标实则一致。有时候，爬着艺术的路径，遇到了大

的障碍，再沿着艺术的路径走，也许不如绕到隔壁科学或者哲学的道路来得轻松，并且越接近峰顶，学科与学科、路径与路径之间的距离就会越小，这也是为什么在各个学科领域，成就最高的大师通常都是全才。触类旁通，追根溯源，透过历史看艺术，再透过艺术看历史，方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在内容设置上，本书把传统美术史内容，即绘画、雕塑甚至建筑知识与西方古典音乐一并阐述，本质上是为了减少学科间的界限感，更全面地还原西方文艺的历史，因为不论是造型艺术还是音乐艺术，都脱胎于时代，有许多共性。原本应再囊括文学与戏剧，把西方文艺看成大整体，但篇幅有限，本书主要对美术及音乐进行探讨。

尽管在对艺术史的了解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风格、主义名词，如哥特、巴洛克、洛可可，以及贯穿始终的二元对立法等，此处还需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此类名词或方法论，大多是后人为方便总结才发明出来的，不是艺术创作的根。古代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并无创作某种特定风格作品的主观意识，卡拉瓦乔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巴洛克风格，他只知道自己更喜欢高明暗、强对比的绘画风格罢了。若是把对于某种风格名词定义的掌握作为学习目标，则是本末倒置。因为风格、主义名词和方法论都仅仅是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享受艺术的工具，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人不应为了学习使用工具而使用工具。这就好比很多摄影爱好者最终沦为“器材控”一样，相机、镜头再好，也是为了拍出好照片，不锤炼技术而一味追求器材的高级昂贵，是缘木求鱼。

01 天主教与新教：西方艺术的精神根源

（一）精神与世俗

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总体上是精神化的，它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世俗影响力容易被忽视。但是，19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全面兴起以前，基督教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任何单一政府。

现代社会，对全世界十几亿天主教信徒来说，居住在梵蒂冈的教皇是精神领袖，但在古代欧洲，教皇的权威在世俗生活中也是至高无上的。

皇帝、国王以及贵族们会因为世俗控制权的问题与教皇、主教们发生斗争。这时候，教皇有两招“撒手锏”。第一招叫“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例如某地君主得罪了教皇，教皇就下一道谕旨：此地从今起，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从此，这个地方的神父不能为新生儿施洗，不能为新婚夫妇证婚，也不能代表上帝聆听信徒的忏悔并代表上帝赦免其罪，更不能为逝者主持死亡弥撒。简单理解，就是当地宗教系统全面瘫痪。这对该地人民的心理算得上一记重创，如果该地君主并不受其人民爱戴，就会受到来自人民的压力，也许就此向教皇妥协。

教皇的另一招叫作“绝罚令”，也叫“开除教籍”，意即教皇昭告天下，说此人从此失去当基督徒的资格，就算出生时受过洗，死后也无法上天堂。被绝罚之人十恶不赦，有魔鬼一般的品格，谁和他走得近，谁就不是好人。这招通常会用在君主身上，虽然君主很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和他能不能上天堂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极大地绑架了民众的心理，原本在被“绝罚”的君主与教皇之间保持中立的其他君主会向教皇靠拢。前者治下的臣民也会开始质疑君主作为国家领袖的合法性。

君主被绝罚，民心就会开始动摇，从而影响到君主统治的根基。受到绝罚的人相当于被整个基督教社会拉入了黑名单，他的仆从、军队、臣民都要离开他，并自动解除为其服务的职责。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督教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经历了很多错综复杂的演变和冲突。同时，西方艺术史的演变也大多和基督教的演变紧密相关，二者可以理解为“同构”关系。宗教上的大事件几乎都引导着当时主流艺术风格的重大变化。

（二）犹太人与罗马人

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承继自犹太教的经典。犹太教历史悠久，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存在。但犹太人的数量自古就不多，且犹太教是只属于犹太人的宗教，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小众且影响力有限的宗教。犹太教的神学体系与当时其他主流的神学体系都不一样，犹太教是“一神教”。在犹太教的神学体系里，只有一位神祇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这位神祇叫雅赫维（基督教人读为“耶和华”），即俗称的“上帝”。

一神体系与其他主流神学体系有本质上的差别。公元前300年左右，最主流的神学体系非古希腊神话莫属。古希腊的神学体系是标准的多神体系：不同的神明掌管不同的人间事务，分工细致。其中最主要的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众神之王宙斯，宙斯之妻、婚姻和生育女神、天后赫拉，炉灶和炊事女神赫斯提亚，海神波塞冬，谷物女神得墨忒尔，战争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战神阿瑞斯，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火神与匠神赫菲斯托斯，以及商业之神赫耳墨斯。再往下有更细致的分工，如掌管葡萄酒的神——酒神巴克斯，举着天空防止天塌下来的擎天巨神阿特拉斯，等等。之后，古希腊为古罗马所灭，而古罗马几乎原样照搬了古希腊的神学体系，只是把古希腊的神明改了名字：宙斯改成了朱庇特，阿瑞斯改成了马尔斯，阿佛罗狄忒改成了维纳斯等。

一神体系与多神体系的差别绝不只是神明数量上的简单差异。一神体系相对于多神体系更具有严肃性，甚至是攻击性。因为对于多神体系来说，世界本来就由多位神明掌管，多一神、少一神对这个体系来说并不那么关键。但一神体系不同，一神体系是说普天之下，甚至全宇宙，只有一个主宰，不存在其他神。一神体系甚至会坚决否认其他神学体系的正确性与正当性，因为其他神学体系的存在从根本上否认该宗教的“一神”。

一神教神学体系在与其他宗教的神学相碰撞时会产生矛盾，甚至兵戎相见。中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背后的精神根源正是基督教的一神体系排他性。

具有如此排他性的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压和迫害，除了因为犹太教只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血缘性的，基本只有犹太人才信犹太教，还因为犹太人数量少，且不会像基督教一样到处传教，试图把路人感化成信徒。这对罗马帝国来说并不是主要威胁。

但这时，出现了一名犹太人，名叫耶稣。耶稣建立了基督教，要把对上帝（或天主）的信仰传遍全世界。基督教的指导思想来自《圣经》，分为

《旧约》与《新约》。《旧约》记录耶稣诞生以前的事情，《新约》记录耶稣诞生以后的事情。犹太教的《圣经》是《旧约》，包含《创世记》等内容。

《创世记》的内容最为世人所熟知：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在蛇的诱惑和教唆下偷吃智慧果，并被逐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堕落至兄弟间自相残杀；为了惩戒人类，上帝发动了大洪水毁灭世界，同时给人类留下一线生机，授意挪亚造方舟延续生命，等等。

《新约》则是由耶稣的追随者们所撰写，比如有“四大福音书”，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述了耶稣的四个不同方面。《新约》最后的篇章是《启示录》，预言了世界最终会遭遇毁灭，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的，都要经受“末日审判”。

基督教与犹太教一样，是一神体系，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更为复杂，有“三位一体”之说。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即上帝；圣子为耶稣；圣灵，英文为the Holy Spirit，相对难以解释，可以笼统地解释为是神性在精神上的体现。但这三个“圣”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不同方面，神学里叫作神的三个不同“位格”。其实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基督教分支对其解释都各不相同，甚至教派与教派之间互相攻击，把对方列为“异端”：如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时期，阿里乌派坚持认为上帝与基督之间不存在一体之说。与之相对的尼西亚则是三位一体的支持者^[1]。不同教派中，这些看似细微但是能让他们大动干戈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圣诞节，有的教派主张庆祝，有的教派则不主张庆祝。

基督教认为不仅犹太人应该信上帝，连罗马人，甚至罗马皇帝也应该信上帝。例如“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马太，先是当着罗马帝国的税吏（税吏是为当时的犹太人所鄙视的职业），专门替政府收税，后来被感化成基督徒，最终以身殉教。基督教不断地对外传教，信徒人数逐渐增多，这是公然与罗马帝国当局作对，所以帝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打压，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自此以后三百多年间，罗马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基督教的镇压与迫害。直到公元313年，一个奇迹让基督教从此青云直上。这个奇迹便是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得以合法化。

当时的罗马帝国并非内外统一的大帝国，而是群雄割据。公元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加强帝国统治，另任命了一个共治者，两人分管帝国东、西部，两位共治者又各任命一名助手，由此便有两正帝、两副帝，他们在帝国内形成了史上著名的“四帝共治制”。戴克里先去世后，帝国内部开始军阀混战。最后消灭了所有对手并成功统一帝国的，是君士坦丁一

世，史称“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一世在与其他共治者争斗的过程中，发现基督教信仰对于凝聚军心以及树立战争正当性有极大好处，就于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并发还已没收的基督教资产，从此基督教可以公开举行宗教活动并自由传教了。

到了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索性把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即在罗马帝国范围内，只有基督教是合法的，其他宗教、神学体系均不合法。基督教从此日益壮大。

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可以统一罗马帝国，与其善用基督教信仰不无关系，客观上，基督教合法化对帝国统治有好处。第一，基督教是个传播力极强的宗教。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每个基督徒都“自带转发功能”，只要成为基督徒，就要给不是基督徒的人传教，这一点到今天都没变。把高效的宗教控制在手，必然会获得有力的统治工具。第二，基督教的教化成本低。基督教的一神体系传播成本低。当时帝国民众文盲比例很高，阐述“一神”体系相对容易，不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体系太过复杂。从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看，基督教具有显著优势。

[1]彼时的基督教信仰有所谓的阿里乌派与尼西亚之争，两派在耶稣的神性以及三位一体的概念上有显著分歧，公元380年，狄奥多西大帝立为国教的是尼西亚三一基督教（The Nicene Trinitarian Christianity）。

（三）拉丁语与希腊语

基督教在公元1054年经历了一次分裂，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这次大分裂的结果，就是把原本统一的基督教会分裂为统治西边的“天主教”与统治东边的“东正教”。

基督教会的分裂过程持续了约600年才正式一拍两散。原本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已是如日中天，但罗马帝国是个超大型帝国，西到不列颠，南至北非，东括土耳其，北达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北岸，所以狄奥多西大帝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五个大教区，有五个中心城市是教区首脑所在地，分别是罗马、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现埃及境内）、安条克（现叙利亚境内）以及耶路撒冷，并任命了五大主教来分管各自教区的宗教事务。

后来，罗马帝国的首都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布尔，狄奥多西大帝又把帝国一分为二，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进行东西分治。偌大的罗马帝国分成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从罗马帝国分治开始，东边和西边教会的关系就开始变得紧张，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双方只是互相不服气，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

公元476年，北方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奈何基督教感召力甚强，蛮族居然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了基督徒。但西罗马的基督教从构成上与罗马帝国时期的相比已然全面换血。相反，东罗马帝国则又延续了近一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拜占庭帝国”。

既然西边的教会已经被蛮族侵占，东边的教会就更不会承认西边教会的领导地位，双方的矛盾一直僵持到1053年，迎来了一次爆发。在此之前，两边的教会在语言使用上并不一致，西边教会传教使用拉丁语，东边教会则使用希腊语^[1]。两个教会在对方的领地上互有渗透，西罗马地界上有希腊语教会，东罗马地界上也有拉丁语教会。但在1053年，东边教会的宗主教（也叫“牧首”）下令要求东罗马境内的拉丁语教会统统关闭；然而时任西罗马主教（即教皇）并不想决裂，于是在1054年派出代表团与东罗马教会谈判。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代表团走到一半，西边的教皇突然去世，而该代表团则是去世的教皇所派，其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双方都不愿妥协让步，谈判便无法进行下去。

据说当时代表团的使者脾气暴躁，直接把教皇的绝罚令往圣索菲亚大教堂

[2]一扔就返回罗马了，这就代表西边教会要把整个东边的基督教徒开除教籍。当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也毫不示弱，宣布把教皇和他的使节都开除教籍。原本藕断丝连了600多年的东西教会彻底分手，从此对双方而言，对方都是异教徒。

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西边的教会是天主教（Catholic Church），天主教的译法是明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确定的。“Catholic”在英文中强调“广泛性”，普天之下只要是信仰基督的人均为其信徒，都归天主教管理。东边的教会是东正教（Orthodox Church），“Orthodox”在英文中表示“正宗”，东正教并不强调自己的广泛，而是强调自己“血统纯正”。

这一次分手极为彻底，双方教会自此没有过任何官方交流。直到2016年2月12日，时任天主教教皇的方济各与东正教俄罗斯大牧首基里尔才在中立地点——古巴的哈瓦那进行了真正“千年等一回”的会晤。

至此，从西方艺术史角度看来，拜占庭以及东正教的重要性一直若隐若现，但到19世纪时，俄罗斯艺术中东正教的影响才着重显现，此处暂且搁置，重点看天主教如何深刻地影响西方艺术。

[1]其实《圣经》的《旧约》原文以希伯来文为主，也是犹太人最早使用的语言，《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东边的教会更具有传承性。

[2]现伊斯坦布尔最为重要的名胜，拜占庭灭国后改成清真寺。

（四）层级与平等

自基督教被立为罗马帝国国教以来，西罗马教会经历了无数次与各国君主之间的斗争，且充满了动荡。

尽管如此，天主教在一千多年中所经历的冲击，没有哪一次比1517年由一个德意志修士所发起的宗教改革来得猛烈。这次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从天主教当中抽离出来一个新的教派，就是“新教”，又被称为基督教的“路德宗”。这位修士就是大名鼎鼎的马丁·路德，在2005年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的“最伟大的德国人”当中，马丁·路德名列第二。

为什么会发生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具体要改变的是什么？此处不得不探讨的是天主教的管理体系。正如前文所述，在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时间段里，天主教对整个欧洲的统治力是极强的，它不光支配人们的精神世界，还管理世俗世界，教皇的权力就如君主一般。

绝对的权力往往滋生绝对的腐败。16世纪，教廷的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米开朗琪罗有一件堪称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画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的天顶画作《创世记》。让米开朗琪罗画这幅天顶画的人，是一个非常野心的教皇，叫尤利乌斯二世，人称“战争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心要名垂青史，所以主持了不少“面子工程”。他最大的面子工程当属现今梵蒂冈的地标性建筑——圣彼得大教堂（A1）。尤利乌斯二世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大教堂竣工，因为教堂的设计极为奢华，要耗费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短期根本无法完成。

尤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这个来自欧洲第一财团——美第奇家族的“富二代”继承人也是穷奢极欲。利奥十世一心要把圣彼得大教堂盖完，但资金不足，怎么办？这时，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基因赋予了利奥十世灵感：发行赎罪券。信徒可以花钱买赎罪券，买得越多，他在凡间的罪孽就被抵消得越多，抵消完了，死后就能上天堂了。虽然赎罪券并不是利奥十世首创，而是在早几百年的中世纪就存在，但却在他手上得以“发扬光大”。



A1↑

/

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梵蒂冈

赎罪券发得太多，信徒对天主教的不满一直在积累，于是宗教改革爆发了。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A2）在德国威登堡的教堂大门上张贴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上面写的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思想，这件事情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起点。

马丁·路德的核心主张是，人从信仰上帝、信仰耶稣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死后就能上天堂，没有必要去服侍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教廷。在天主教的等级制度管辖下，普通信徒不能自己跟上帝交流，需要到教堂里跟神父忏悔。神父会代表上帝原谅忏悔的信徒，并代忏悔的人去跟上帝祷告。所以在天主教的体系里，普通信徒跟上帝之间的沟通需要通过神职人员完成。这就像是你要去一个叫“天堂”的主题公园，马丁·路德认为，只要信仰了基督，就等于买过门票了，里面的单独项目不再收费，你可以随意游玩。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信仰耶稣还不够，进去之后还要一项项收钱，在马丁·路德看来，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A2↑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73cm × 54cm 板上油画 1529年 德国奥格斯堡圣安娜教堂（St. Anne's Church）

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反对以天主教教皇为首的神权阶级领导。按照宗教改革的逻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神职人员，更不需要教皇。再加上天主教到处敛财，除了征税，还要发赎罪券，明明是侍奉上帝的的神职人员，生活却穷奢极欲、腐败至极。所以马丁·路德认为，根本不需要天主教会作为管理机构。

宗教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方各国兴起，通过宗教改革从天主教当中分离出来的教派就是“新教”。新教的管理系统相对“扁平化”，并没有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新教没有神父，有的主要是牧师，牧师的工作是布道，并不比普通信徒更高贵，信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的英国、美国，包括亚洲的基督教分支，大部分都属于新教。

马丁·路德只不过是一位职位普通的神职人员，他领导的宗教改革能够成

功，有多重原因。一是当时罗马教廷发赎罪券，引发了群众的仇恨，为宗教改革提供了群众基础。二是宗教改革成功发起的地区包括德意志、尼德兰（今荷兰与比利时）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意大利、罗马之间隔了一座阿尔卑斯山，古代交通又极其不便，所以对教皇来说，这些地方是“山高皇帝远”，想镇压也是鞭长莫及。再就是马丁·路德在发起宗教改革后，立刻变成了教皇的眼中钉，这时萨克森选帝侯把马丁·路德保护了起来。马丁·路德被保护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这样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圣经》了。在这之前，《圣经》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教会手中，而且教会传教的语言大多用属于上层阶级的拉丁语，普通民众在拉丁语面前几乎是文盲。此外，技术的进步也帮了大忙。宗教改革爆发的年代，德国已经有了印刷术，关于宗教改革的宣传单页，可以迅速印制数万份，发遍全世界，数不清的信徒选择了对宗教改革精神“点赞”和“转发”。

天主教与新教作为西欧基督教当中的二元对立，其间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历史上，双方的矛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五）朴素与浮华

作为二元对立的两个教派，天主教与新教除了在管理结构上的对立，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对核心教义的理解和操作上。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中有一条，简单来说，就是不可拜“偶像”。关于这段话的解释，其实并没有举世公认的标准，因为天主教和新教在对这条诫命的执行上明显有不同的见解。

有一个区分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好办法：凡是极尽奢华、巍峨恢宏且里面外面还有很多雕像、天顶画、壁画等装饰的教堂，基本是天主教教堂；如果装饰朴素，内里除一个十字架以外空空如也，大约就是新教教堂。从这一点区别上就能够看出，对于教义理解的差异是如何引导两个教派的艺术风格的。

天主教原本也恪守这条“不可拜偶像”的原则，在漫长的中世纪一千年中，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雕塑。但在人们的印象中，欧洲的雕像作品简直数不胜数。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公元6世纪，天主教会出了一位“格列高利一世”教皇，他是天主教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几位教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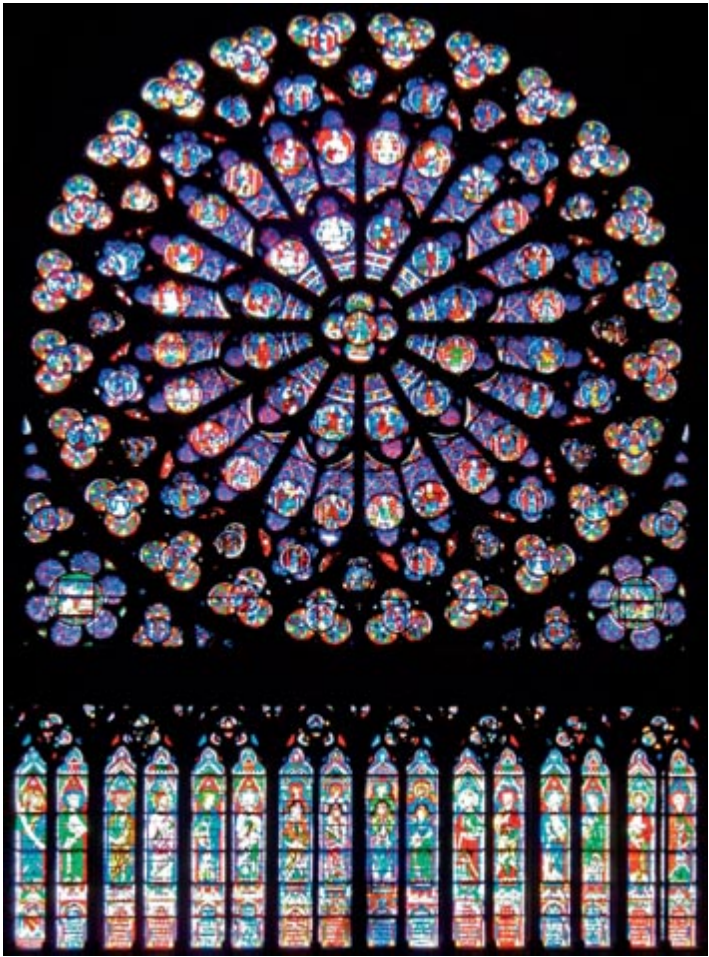
格列高利一世在位时，一心想着更好地加强信徒们对基督的信仰、对教会的忠诚。在具体实施教化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重要问题：信徒们的文化水平过低。天主教传道用的是拉丁语，布道时只能口传心授，连发个小册子让大家通过文字学习都难以做到，这就导致布道的效率极为低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列高利一世发明了“格列高利圣咏”，即以音乐的形式来唱赞美歌，让信徒们通过音乐去感受信仰的力量。“格列高利圣咏”是最早的、有记谱的、西方古典音乐形式。在这之前的音乐，主要靠口传心授。格列高利一世对流传在民间的三千多首民谣歌曲进行了编纂，并组织发明了记谱法，其时的乐谱是四线谱，不是现在通用的五线谱。用乐谱进行音乐传播，效率要比之前的“一对一辅导”高了许多。而且格列高利圣咏的曲调虽然没有之后的古典音乐发展得恢宏壮丽，还处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最初级阶段，但总体也是清澈空灵，在帮助信徒们被圣灵感动的方面助力不少。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化的效率，格列高利一世又发展了绘画艺术。

教义里说不可拜偶像，但并没有说不能用绘画的形式来把《圣经》里的故事画出来，如果能让信徒们直接看到《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岂不妙哉？这样他们就都可以时时刻刻地被神圣的故事感染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教堂中有相当多的壁画作品和几乎成为天主教标

准形象的彩色花窗（A3）。中世纪绘画的目的是为了教化，而不是追求美，所以中世纪绘画的特色是要把故事里的人物画清楚，把故事讲明白。因此，画面的风格不追求技巧，也不追求相似，整个中世纪美术给人的感觉是相对呆板、僵硬的（A4）。



A3↑
/

玫瑰窗（Rose Window）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



A4↑

/

《圣特里尼塔的圣母像》（*Maestà di Santa Trinita*）奇马布耶（Cimabue）[塞尼·迪·佩波（Cenni di Pepo）] 385cm×223cm板上蛋彩画1280—128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格列高利一世对“不可拜偶像”的全新解读开启了天主教追求造型艺术的传

统。这个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无限放大，为整个意大利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珍宝。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整个天主教社会花在造型艺术上的财力、物力可谓倾尽所有。一座教堂里不会存在空白着的墙，通通要用画面和装饰填满。墙上填满还不够，还要把天花板也画满。“画圣”拉斐尔最著名的画作应当要数他给教皇的“四个房间”画的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学院》。西斯廷教堂除了米开朗琪罗画的天顶画以外，西面的整堵墙还有米开朗琪罗画的《末日审判》，周围的其他墙面上也被文艺复兴的绘画大师们画满了。

相反，新教人士认为，这种追求表面功夫的错误思想会让天主教误入歧途。所以新教的人严格尊崇《圣经》的指示，不让任何造型艺术出现在教堂中。新教不追求浅表的浮华，而是追求内心的自省。天主教是外向的，新教是内向的。新教地区对造型艺术的抑制，以及追求内心自省的意识形态导致音乐，尤其是宗教式听感的音乐变得尤其丰富。音乐之父巴赫就是一位路德宗基督徒，他一生创作了至少1000部作品，其中与宗教相关的作品极多。

此处已然看出基督教在西方艺术史当中的重要性。本质上天主教地区能有如此多的、集中爆发于意大利的传世作品，跟天主教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教会是艺术品的主要买家，教会出钱，艺术家创作。其时绝大多数作品描绘的主题都是宗教，因此每个画家都要画大量的“圣母七喜”以及“圣母哀悼基督”。这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直到巴洛克时期结束，近300年的时间，你看到的除肖像画以外，几乎都是宗教作品的根本原因。

在新教地区，造型艺术被打压，甚至造成了当时北方各国一次美术界的“下岗大潮”。新教占据主导后，不会再有来自教会的订单，这逼得很多北方地区最优秀的画家纷纷转行或者逃离，如老勃鲁盖尔转型成了“农家乐”画家。老勃鲁盖尔善于描绘农村生活并率先在绘画题材中融入了大量的风景元素，创造了新的绘画品类——“风俗画”（A5）。再如美术史上在肖像画方面最为接近照相机精细度的一位画家——德国的小荷尔拜因，因为没有订单，无奈之下只能远游英国，为英国的王室与贵族进行肖像画的创作（A6）。



A5↑

/

《农家婚宴》（*Peasant Wedding*）彼得·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14cm×164cm板上油画1567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A6↑

/

《亨利八世肖像》（*Portrait of Henry VIII*）汉斯·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28cm × 20cm 板上油画 1537年 西班牙马德里提森—博内米撒艺术博物馆 (Thyssen-Bornemisza Museum)

历史上一代代艺术风格转变的浪潮，也与这两个教派的针锋相对有关。文艺复兴结束后，意大利迎来了巴洛克时期，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大背景其实是源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彼时，新教势力的蔓延趋势如火如荼，天主教在意识形态上选择反击的武器当然是他们一贯所信赖的——艺术。但是，从画面观感上看，文艺复兴时期典雅的艺术风格似乎不够强劲了，所以巴洛克时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绘画强调明暗差异、戏剧冲突以及对光线的运用，画面要更有冲击力，也更有教育意义和戏剧效果。

从建筑艺术来看，巴洛克时期的建筑更强调华丽的外观、恢宏的设计和复杂的装饰。天主教的一贯理念就是告诉信徒：我们很幸福，我们在基督的关照下，离天堂并不遥远。来到教堂，信徒们看到教堂华丽的设计和金碧辉煌的装饰，就好像置身天堂。



A7↑

/

《阿尔米达遇见入睡的里纳尔多》(*Armida Encounters the Sleeping Rinaldo*) 乔万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87.5cm × 216.8cm 布上油画 1742—1745年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天主教会对于华丽建筑的追求一直继续。在洛可可时期（18世纪中叶）的艺术中，教会的姿态从高压的说教，变成了充满关怀的劝诫；从威胁你“不信基督就要下地狱”，变成了“天堂很美好，快来信基督”。于是出现了像威尼斯的提埃波罗这样充满氤氲之息的宗教画作（A7）。

天主教和新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二元对立，它们产生的影响其实不止在艺术方面。例如，在饮食方面，意大利的饭菜要比德国强不少；与法国大餐比起来，英国人吃的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简直难以下咽。

其实这个规律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天主教地区的食物都好吃，酒也好喝，新教地区没什么好酒（德国的雷司令白葡萄酒算是个例外），食物也相较天主教地区简陋，究其原因也体现了一些在宗教仪式认知上的差异。欧洲各地的饮食文化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才集中发展起来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全欧洲的经济水平低下，要吃饱都很难，更不用说饮食文化。富有后，美食才变成一门艺术，比如美第奇家族除了赞助艺术家，在吃的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可以说是在佛罗伦萨推动了一场“舌尖上的文艺复兴”。

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圣餐仪式当中的葡萄酒、马拿（一种饼），它们分别代表了基督的血和体。所以天主教徒格外地注重基督的“血”和“体”，尤其是“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最好的葡萄酒多是出自天主教的修道院。葡萄酒里的绝顶佳酿——勃艮第的罗曼尼康帝，就是出产自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的圣维旺-德-维吉修道院。

新教对核心教义的追求在圣餐仪式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有贡献，他们的一大贡献就是17世纪尼德兰地区（荷兰）诞生的一类静物画（A8），代表画家有海达和考尔夫。

这类静物画会把桌上的餐食画得极为丰富，象征基督的身体，这里的身体指的是更广义的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本身。因为在新教的教诲中，所有信徒其实都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大家都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融合进一个身体。把桌上的餐食画得丰盛，是象征着教会的昌盛，毕竟新教不让画作里出现神圣的人物形象，那么就用食物来指代。且画作中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相对固定，每种食物都有宗教劝解的含义。如果让天主教的画家来画这个主题，想必会是恢宏无比的大场面，耶稣悬浮在半空，受万民景仰。

天主教与新教这一对二元对立构成了欧洲文化的背景色，有了对基督教的深入认知，就更容易理解西方艺术史。



A8↑

/

《有镀金杯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a Gilt Cup*）威廉·克拉斯·海达
（Willem Claesz Heda）88cm×113cm 板上油画 163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
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02 意大利与德意志：西方艺术中的两极

艺术家们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宗教信仰上也并非完全一致。人们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历史的发展如此奇妙，最终在特定领域占据主导的，却是特定的几个群体。西方艺术乃至西方文明也是如此，尤其是西方古典艺术，尽管作品浩如烟海，只要抓准其中最主要的二元对立——意大利和德意志，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里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局限于国家概念，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意大利文化区和德意志文化区。

在讨论这组二元对立之前，需要对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欧洲历史做简要了解。

欧洲的国家数量众多，并且每个国家的历史变迁不是线性的。国家之间的国境线一直在变动，想要了解欧洲艺术风格的变迁，最重要的是知晓三个文化地区，分别是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

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三个地区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是东西罗马分裂。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大陆就一直处在混乱状态，直到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去世后，法兰克王国又分成了西、中、东三个部分，分别演变成了法兰西、意大利以及德意志。

法兰西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法国全境，当然国土的边界与现在相比有显著差异。

由东法兰克王国演变而成的德意志，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已然与罗马帝国没有直接关系了，叫这个名字是要体现出它与罗马帝国是一脉相承的，显得更为正统。神圣罗马帝国本质上并不是自上而下、全面统一、层级分明的大国家，而是由众多王国、公国、侯国构成的大德意志联邦，每一个小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导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皇帝的产生并不完全依靠世袭，而是由七个选帝侯推举产生，但哈布斯堡家族实力过于强大，从1273年到1806年（有间断）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而且，从1438年开始到1806年^[1]的三百多年间，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查理七世短暂占据皇位以外，都由该家族的成员出任皇帝，与世袭几无差别。

意大利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它是由中法兰克王国演变而来的，但中法兰克王国很快就解体了。其领土融入或者演变成了现在的法国、德国、瑞士、尼德兰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现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以米兰为中心）。但此处的“意大利”是指亚平宁半岛中南部一直到最南边的西西里岛，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国诞生以前，其内部一直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皇占据罗马周边地区，统领“教皇国”，而美第奇家族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实行僭主统治，北面有维斯孔蒂家族控制的米兰公国，南面是那不勒斯王国，东北有威尼斯共和国，西西里岛自己也曾经是一个王国，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的天主教势力范围内，能称皇帝的，也就是用 emperor 称谓的君主，一直只有一个——查理大帝。查理大帝去世后，中法兰克王国的君主，也就是查理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继承了皇帝的称号。至此，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是“皇帝”，哪怕是完全不受帝国管辖的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也只称国王（king），或者女王。女性皇帝是女皇（empress），比如俄罗斯帝国1762年到1796年在位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拿破仑在征服欧洲之后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在巴黎圣母院接受教皇的加冕并称帝。同时，在东正教世界的皇帝有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直到1453年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俄罗斯大公就升级成为沙皇（tsar），也是皇帝。

帝国（empire）的君主叫皇帝，帝国境内往下是自治王国（kingdom），王国的君主叫国王（king），再往下，有公国（duchy），公国的君主叫大公（duke）。很多情况下君主是身兼数职的，比如莫扎特在维也纳活跃时期的皇帝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他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以及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的国王。

[1] 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推翻。

（一）个体与整体

当然，欧洲还有英国、西班牙、北欧各国和俄罗斯部分地区等地，尽管看上去国家众多，在文艺上理应百花齐放，可单就对艺术的贡献而言，意大利和德意志占据了这当中的绝大比例。

英国只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风景画领域打出一波小高潮，其中透纳和康斯特布尔两位画家居功至伟，毕竟文学、戏剧似乎才是英国人的专长。西班牙长期被阿拉伯人统治，直到1492年西班牙王室才收复失地，恢复统一，这导致西班牙未赶上文艺复兴的大浪潮。北欧到今天，总人口加起来和上海不相上下，马上能想到的知名画家只有一个蒙克，著名的作曲家有西贝柳斯(芬兰)、格里格(挪威)、尼尔森(丹麦)，倒是文学、戏剧领域的安徒生和易卜生名头很是响亮。俄罗斯更是到了19世纪初还存在农奴制，19世纪上半叶才出了第一个国际级的作曲家格林卡。

法国尽管12世纪在建筑领域有一项席卷欧洲的巨大贡献——哥特建筑，但在艺术上的爆发也要等到19世纪初。19世纪的巴黎可以说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要到这里谋求发展。那些独步天下的艺术大师，如西班牙的毕加索、达利、米罗，荷兰的凡·高，美国的惠斯勒……无一不是来到巴黎才变得熠熠生辉。

如果给西方艺术史划定一个所谓“古典艺术”的范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到现代主义艺术之前，那么意大利和德意志无疑是两个产出最多、存在感最强以及风格特色最为显著的文化地区，二者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

在宗教上，意大利无疑是天主教的正宗大本营，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巴伐利亚，尤其是之后的普鲁士地区，是新教的主要阵地。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最主要的国家除了德国，还有奥地利。它们都是说德语的国家，虽然在口音上有差异，但在文化概念上，德、奥经常被一同提出来。在宗教上，奥地利虽未全面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天主教依然是主流，但总体对境内的新教徒是持宽容态度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也一直打压和控制各个天主教的大主教在帝国的世俗权力，要把天主教的权力全面限制在精神信仰的范围内。莫扎特当年能在维也纳获得皇帝的重用，除了他的作曲才能（约瑟夫二世是个音乐迷），某种程度上皇帝也希望通过帮助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发展，来逃避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控制。当时的萨尔茨堡并不是奥地利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大主教教区，实行政教合一，即大主教不仅是主教，也是当地政府的首脑。由此可见，天主教在德意志地区的权力远不如在意大利稳固。

如果去研究意大利与德意志两个地区的艺术形式，甚至不用具体去看作品的风格，只要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雕塑家以及音乐家的名字列出来，然后统计一下他们的国籍，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造型艺术的大师绝大部分在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则基本在德奥。简单数一下，美术领域就有“文艺复兴三杰”和“威尼斯三杰”，以及一众大师如安杰利科、利皮、乌切洛和波提切利，还有巴洛克时期的卡拉瓦乔、卡拉奇三兄弟、雷尼等，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音乐领域，“德国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海顿、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布鲁克纳、理查德·施特劳斯、马勒（虽然是波希米亚人，但属于帝国文化圈范围内，一直在维也纳学习发展）、勋伯格，不是德国人，就是奥地利人。如此一来，最粗浅的一层二元对立就出现了：意大利擅长美术，德意志擅长音乐。这似乎粗略对应着天主教艺术的外放和新教追求的内省。

再深入地看，意大利擅长美术并不代表没有音乐，恰恰最早的音乐也是从意大利发源的。西方最早有记谱的音乐就是上一章提到的格列高利圣咏，意大利的克雷蒙纳更是提琴之乡，钢琴上的键盘系统也是意大利首创。德意志擅长音乐也不代表没有伟大的画家，丢勒、小荷尔拜因、弗里德里希都是划时代的超级巨匠。可哪怕是在同一领域，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二元对立也是明晰的。以音乐来说，德奥音乐的主要题材是交响曲、奏鸣曲、室内乐、协奏曲等多声部音乐（为了方便讨论，此处只用交响曲来举例，最典型的代表是贝多芬），意大利主要的音乐类型是意大利歌剧，以17世纪的蒙特威尔第、18世纪的凯鲁比尼以及19世纪的罗西尼、威尔第、普契尼等人代表。

交响曲对阵歌剧。交响曲是多声部交织的艺术，交响乐团当中有众多乐器，作曲家通过不同乐器的相互交织、穿插，创作出变化多端的和声以及音乐织体，以此构成一部内容丰富、听感充实的交响曲。在整部交响曲中，每件乐器都各司其职，并没有明确的主角和配角，乐器和乐器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作曲家在作曲时不会刻意突出某件乐器。想突出某件乐器的话，通常写成协奏曲。交响曲是群体的、整体的艺术。

歌剧则完全不同，虽然歌剧也由管弦乐团在乐池演奏，但歌剧的音乐逻辑是区分主唱与伴奏。尽管有庞大的管弦乐团参与演奏，但歌剧当中最著名的段落都是突出歌唱家的咏叹调，或者是歌唱家之间的重唱。观众所有的注意力，甚至作曲家在作曲时的侧重点，也大多集中在歌曲的主旋律上。歌剧中，虽然乐团的规模也不小，但在著名歌剧唱段中，乐团的地位几乎只是伴奏，甚至很多有名的唱段，乐团的伴奏简单得完全可以用钢琴代替。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之一的贝利尼所创作的正歌剧《诺尔玛》当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也是歌剧史上最著名咏叹调之一的《圣洁女神》，其伴奏就十分简约，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高音的独唱上。相较交响

曲，歌剧是典型的“个体的艺术”。

再向深处思索，德奥音乐中不是没有歌剧，意大利音乐中也不是没有交响乐作品。德奥歌剧的代表是瓦格纳歌剧，虽然莫扎特也是德奥作曲家，但莫扎特的歌剧是非常意大利式的，而且在莫扎特的年代，德奥的独特音响风格还没有成型。瓦格纳曾经公开表示自己的歌剧是一种“整体艺术”，不应该被称为“歌剧”，而是“戏剧”（在“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一章中详解）。如果去聆听瓦格纳的歌剧作品，会发现里面的唱段并不像意大利歌剧那样清晰地区分主唱与伴奏，瓦格纳在创作时，本质上是把人声当成了一件乐器，与乐团里的各种乐器交相辉映。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演唱瓦格纳作品的歌唱家有专门的称谓：如果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是“瓦格纳女高音”，就意味着她拥有异常强大的音量。因为当乐团不再为人声伴奏，而是与之竞争的话，歌唱家的声音必然要异于常人的响亮，否则一定会被乐器声轻松盖过。毕竟，乐团里可是拥有超过30把小提琴，而若是在楼道里吹奏铜管乐器的话，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意大利音乐中也不是没有交响乐作品，比如协奏曲。所谓协奏曲就是全程突出单件或者几件特定乐器的交响乐。在德奥的协奏曲作品中，比如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浪漫主义时期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独奏乐器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类似于歌剧当中的独唱，乐队与独奏之间也绝不是伴奏与独奏的关系，而是利用双方不同的音响效果交错演奏，相互竞争。甚至在很多德奥的协奏曲中，独奏乐器从头到尾并不过多参与主旋律的演奏，而是把主旋律交给乐队。

这样做，既保持了独奏乐器和乐队之间地位的对等，也顾及了音响效果的平衡。反观意大利的协奏曲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洛克时期威尼斯的，人称“红发神父”的维瓦尔第所创作的一系列弦乐协奏曲，以及19世纪初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写下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他们的作品中，小提琴的独奏、领奏特征就太过明显了。尤其是帕格尼尼，全然是意大利歌剧的写法，从头到尾都在突出小提琴，一首曲子演下来，整个乐队演奏的音符数量也许都没有小提琴独奏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并不是成功的协奏曲。

以上可以看出，从艺术形式的侧重，到音乐题材的差异，以及作曲手法的不同，由粗到细，由浅入深，都体现出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截然相对。意大利的个体性和德意志的整体性，体现在其艺术的方方面面。

（二）日耳曼人与罗马人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看看意大利和德意志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这组二元对立就体现得更为显著。

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语言。意大利语属于印欧语系，源于拉丁语，德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法语和西班牙语都源于拉丁语，意大利语则更是结合了拉丁语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方言改编得来；英语、荷兰语以及很多北欧的语言都属于日耳曼语族。拉丁语系语言的发音特点是元音多，意大利语就是字正腔圆，特别适合用于歌剧咏叹调的演唱；德语相对来说辅音多，辅音多的语言有更多不同的语气，更适合多变的音乐情绪以及多变的音乐角色，故德意志的声乐作品形式中以“艺术歌曲”最为突出，“歌曲之王”舒伯特便是其中代表。

在轻松一些的领域，比如足球，意大利足球与德国足球也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踢法。意大利国家队和德国国家队都水平高超，截至2018年，双方都得过四次世界杯冠军。但放眼球场则会发现，看他们踢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意大利队的观赏性较强，球员脚法细腻，带球、过人，小范围的传接和倒脚，很注重个人技巧和小范围的配合，看意大利队你可以关注里面的每一个球星。德国队的踢法则是一种整体的战略式踢法，整支队伍作为一个整体，配合度极高，喜欢战略性长传，甚至会用自己的身高优势采用大量的头球进攻，整体感极强，因此也被称为“德国战车”。

在汽车领域，你会发现顶级超跑大多来自意大利，如帕加尼、法拉利、兰博基尼、布加迪威龙（德国公司，意大利品牌）、玛莎拉蒂。但是要谈到量产、经久耐用或品牌接受度高，还是德国的奔驰、宝马、奥迪。又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最好的小提琴都是意大利造的，最好的钢琴不是德国就是奥地利造的（施坦威虽然现在是美国公司，但起家是德国人，现在亚洲的施坦威钢琴几乎都是德国汉堡的施坦威工厂制造的）。小提琴是旋律的艺术，钢琴则是和声的艺术。旋律与和声也是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元素，音乐作品大多要在这两个元素当中有所偏重，是音乐中的二元对立。

面对如此庞大的西方艺术史，我们现在已经抓住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即意大利与德意志的二元对立。这种艺术上的二元对立，与前文宗教的二元对立虽不能说互为因果，但是相关性极高。有了这条线索，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具体艺术形式以及艺术流派的分析了。

根源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二元对立其实也是两个民族的对立，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拉丁民族的对立，是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对立。5世纪，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诸蛮族强行移居罗马帝国境内，使得西罗马渐渐走向灭亡。日耳曼人侵占了西欧南欧大部，并在现今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建立起西哥特王国，在意大利和希腊的土地上建立起东哥特王国。11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的哥特式建筑，就是意大利人揶揄北方人野蛮，才用“哥特式”来形容该建筑风格。意大利地区对于教皇和天主教的笃信，德奥北方地区宗教改革的成功，本质上都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历史悠久的矛盾有关。虽不能说有严格的因果关系，但是民族的差异，似乎是埋藏在所有艺术现象背后的根源矛盾之一。

03 米开朗琪罗

（一）宗教与文化

如果要选出从古到今对人类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一个时期，相信大部分人会选择20世纪。人类在20世纪的科技水平和生活品质都达成了质的飞跃，这是之前几千年文明成果加起来都无可比拟的。

但笔者的答案却是15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以燎原之势全面蔓延开来的那个世纪，才是对人类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一个时期。

文艺复兴，英文是Renaissance，发明这个词的人叫儒勒·米什莱，是19世纪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但最早提到文艺复兴概念的人是16世纪的佛罗伦萨人瓦萨里。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是意大利文Rinascita。

瓦萨里是一个“三流的画家”以及“二流的建筑设计师”，但他是一个“超一流的传记作家”。当然这里说的“三流”是放在他那个时代而论，毕竟在瓦萨里周围，第一流的画家是“文艺复兴三杰”这样划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和“三杰”比起来，韦罗基奥、佩鲁吉诺、吉兰达约等大师恐怕也只能算“二流”，瓦萨里算作“三流”也不算委屈。不过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天顶画是瓦萨里画的，这应该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C1）。瓦萨里还是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这座美术馆最早是美第奇家族的办公大楼，“uffizi”对应的就是英语的“office”）的设计者。这座乌菲齐宫的顶层在17世纪被改成美术馆，是现代美术馆的雏形。但乌菲齐毕竟不是第一流的建筑物，所以瓦萨里的建筑设计能力只算得上是二流，而一流的建筑设计师自然是如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设计者布鲁内莱斯基这样不世出的天才人物。

但如果没有瓦萨里，我们也许根本无法了解那么多的古代艺术家——瓦萨里写了一套名为《艺苑名人传》的书，原书英文名为*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字面直译是“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及建筑家生平”。这套书记录了几乎全欧洲范围内最优秀的艺术家，超过260人，字数过百万。瓦萨里尽力做了翔实的记录，这套书几经修改后多次再版。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年代，如何对全欧洲的艺术家的做较为翔实的描述。瓦萨里这份抱负和决心令人敬佩。



C1↑

/

《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
直径约40米湿壁画1572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文艺复兴，Rinascita，在意大利语中的字面意思是“重生”，这里是说文化和艺术复活了，所以叫“复兴”。问题是，这里的“复兴”是复兴谁的文艺？

答案是“古希腊”与“古罗马”。

古希腊和古罗马，在雕塑和建筑领域的成就是极高的，比如古希腊的《米洛斯的维纳斯》（C2）。文艺复兴时期雕塑的代表作《大卫》（C3），粗略地看上去和《米洛斯的维纳斯》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但实际上《大卫》的制作年代比《米洛斯的维纳斯》晚了1600年以上，可见古希腊雕塑的影响力。



C2↑

/

《米洛斯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安提阿的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 of Antioch）高203cm大理石雕像约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100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C3↑

/

《大卫》（*David*）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高549cm 大理石雕像1501—150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



C4↑

/

《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of Knido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高230cm大理石雕像（原作复制品）约公元前4世纪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古希腊时期确定下来的审美标准甚至到今天都在影响我们，比如人们常以身材婀娜、呈“S”形的女性身体为美，其实这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是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了。“S形曲线”其实叫作“普拉克西特列斯曲线”，由古希腊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确立，他的代表作有《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C4），这应当是历史上第一尊裸体女性雕像。再如人们总是说超模身材比例好，是所谓的“九头身”，而“九头身”的审美标准也是在希腊化时期，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御用雕刻家利西波斯确立的。

在建筑领域，古典建筑的典型特征，一个是古典建筑中的柱式结构，即在装修界常说的“罗马柱”，另一个是古典建筑中的穹顶。所有立柱的类型，尤其是柱头的形状，都是在古希腊时期就确定下来的，分别是爱奥尼亚造型、多利安造型以及柯林斯造型（C5）。

之后的立柱无论造型再怎么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至于穹顶，自古罗马后，所有恢宏建筑的终极追求都是罗马的“万神庙”（C6）。

当时的古罗马人已经拥有混凝土技术，他们以火山灰和石灰为原料做成混凝土，浇筑成了万神庙的穹顶，这是古代社会的第一穹顶，直径达43.5米。然而这种混凝土技术在经历了蛮族入侵、基督教掌权以及中世纪的南征北战之后便已失传了。



C5↑

/

罗马柱（左至右）爱奥尼亚造型多利安造型柯林斯造型



C6↑

/

万神庙（Pantheon）阿格里帕（Agrippa）穹顶直径43.5m花岗岩建筑公元前27年兴建，公元120年重建意大利罗马



C7↑

/

《采花的少女》（*Spring*）作者不详约80cm×50cm壁画公元1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C8↑

/

《有桃子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Peaches*）作者不详约36cm×34cm壁画
公元1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再看绘画领域，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几乎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无巧不成书，公元79年，位于意大利西海岸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活埋了整个庞贝古城，意外地定格了古城的时间。当庞贝古城在18世纪重见天日的时候，人们有幸一睹古城里保存的壁画。这些壁画展现出来的高超水准是出人意料的。来看一幅《采花的少女》（C7），它的颜色丰富、题材轻松。

再看《有桃子的静物》（C8），甚至可以和19世纪末后印象主义大师保罗·塞尚的作品（C9）进行比较。若不进行说明，单从艺术风格上看，这两幅画看上去相差的年代似乎不会太远。玻璃水壶上的光斑、桃子映在红色木板上的阴影都已有了相当仔细的处理。

由此不难看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艺术造诣已经颇深了。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一统天下，宣告欧洲世界正式进入中世纪，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繁盛的15世纪，在这漫长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巩固教会统治上，至于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大约除哥特建筑外几无突出建树。



C9↑

/

《一篮苹果》（*The Basket of Apples*）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
65cm × 80cm 布上油画 1893年 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中世纪末期，意大利逐渐掀起了一股要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学术、艺术之昌盛的热潮，人们将精力从“上天堂”的宗教追求中抽离出来，开始关注世俗生活、关注艺术。想要发展文化艺术，为什么要学古人？因为在当时，古人曾经达到的成就是在能够学习和参考的资料当中最高的，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古希腊人的智慧已经到达顶峰，后人再也无法超越，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达到古人的水准。

把绘画以及雕塑创造得更精确、更写实、更贴近“描绘自然”，以达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水准，只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一种现象。文艺复兴的本质并没有这么简单，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把时间再从15世纪往回推两百多年，到12世纪，从一位至关重要的宗教人士讲起。

这个人，就是“方济各修道会”的创始人——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这里的“圣”，指其是天主教会所追封的“圣人”。天主教对于封圣非常谨慎，历史上的圣人不多，且要经过极为严格的考察：第一，“圣人”一定是死后追封的；第二，此人一生中至少要有两件“神迹”发生。这

是两个必要条件。所谓“神迹”，就是《圣经》中提到的那些由上帝施行的奇事，或者是一些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圣经》中的《出埃及记》里，摩西在上帝的帮助下把红海一分为二，让众人从海底通过；再比如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人。圣方济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神迹，传说他能够和动物交流，让小鸟也相信耶稣。教会在考察这些资历时非常谨慎，如著名的圣女贞德，教会考察了500年才将其封圣，相比之下，圣方济各在死后两年就能被追封为圣人，可见他在当时影响力之巨大。

历史作家盐野七生曾写道：“如果说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作品，是在文艺复兴环境下开出的一朵朵灿烂的文明之花，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培育这些花朵的土壤。圣方济各推行的全新的基督教思想恰恰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想要知道艳丽的花朵是如何绽放的，不仅要看花朵本身，观察培育花朵的环境也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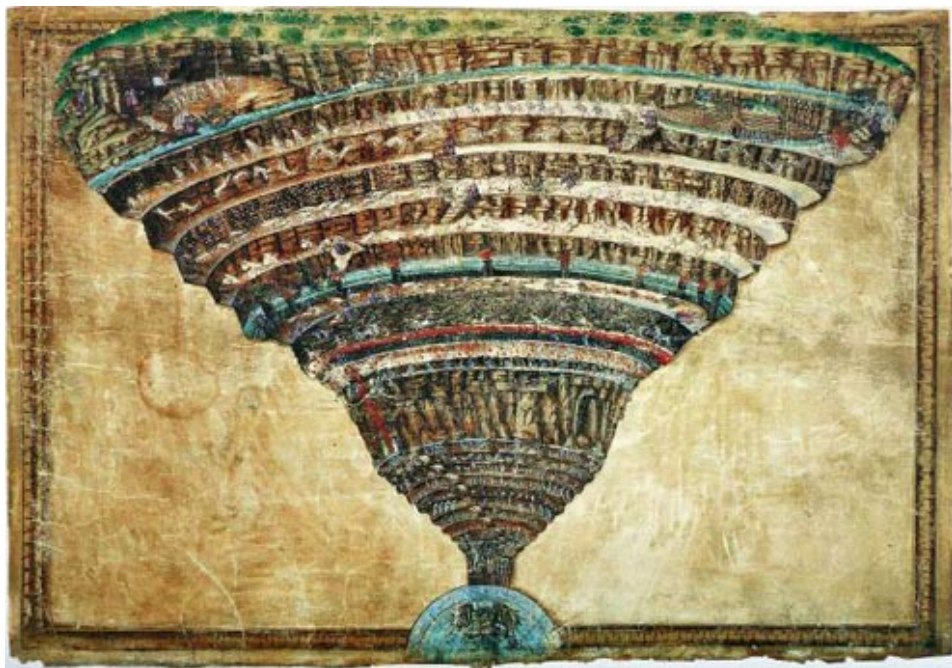
1182年，圣方济各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的一个上层阶级家庭，他的父亲一心想让他通过参与战争成为“骑士”。他20岁时参与了一场战争，吃了败仗，据传他在家休养时听到上帝对他说：“你要去把我的庙宇建造起来。”于是圣方济各就散尽家财给穷人，建立了方济各修道会。

方济各修道会是以穷人、平民为主体的修道会，推行的是用充满慈爱的方式传递基督的信仰。这在中世纪，算得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宗教创新。在圣方济各生活的中世纪末期，基督教往往通过训诫和恫吓，来达到传教以及稳固信仰统治的目的。所以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严父”式的教会。

与之相对，方济各修道会推行的则是一种“慈母式”的传教。方济各修道会强调耶稣对人类的爱，而不是强调不信耶稣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做法普遍受到平民阶级，尤其是商人阶级的欢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十分关键，从“不怎样怎样就要下地狱”变成“只要怎样怎样就能上天堂”，将一种负面的压迫变为正面的激励，让信徒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所以方济各修道会发展得极为迅速，规模扩展得很快。除了传教方式的改变，方济各修道会得以迅速扩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圣方济各是用托斯卡纳方言传教，而不是拉丁语。

今天的基督教主流推行的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慈母式”传教，或应说是“方济各式”的传教。从这个意义上讲，圣方济各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第一人”。

圣方济各一系列“接地气”的新型传教方式其实与天主教有极大的冲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质疑精神”的体现。



C10↑

/

《地狱深渊》（*The Abyss of Hell*）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32cm × 47cm 羊皮纸、彩铅 1480年 梵蒂冈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这种质疑精神。文艺复兴的支持者们开始质疑宗教的合理性，开始大肆批判教会的腐败和堕落（C10）。但丁的《神曲》描绘了地狱、炼狱、天堂，他把教皇打入地狱的最底层与恶魔为伍，在但丁心目中，教皇才是最堕落、最充满罪恶的人。“桂冠诗人”彼得拉克，公开声称自己的学术是“人学”，是人文主义的，以此来区分为宗教服务的“神学”。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用100个不同的故事全面地把天主教挖苦、讽刺了个遍，气得教会要在他死后掘他的坟。这些都是质疑精神的代表。质疑精神才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核心。

为什么说15世纪才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一个世纪？其实很简单，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精神分水岭。物理学中有一个现象，叫作相变，比如不断给水加热，最后水就会沸腾，从液态变成气态，成为水蒸气。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相变。

谈历史的时候，总有所谓的“古代”和“现代”之分，但到底哪一年是古代和

现代发生转变的年份？恐怕这样泾渭分明的界限并不存在。不过，笔者以为，文艺复兴至少是西方社会区别古代和现代分水岭的时代，过了文艺复兴，西方社会就逐渐进入现代。换句话说，文艺复兴就是西方文明经历的历史“相变”。

从社会形态、政治形态上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政治的雏形开始形成。在古代社会，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经济水平的提升，资产阶级的兴起，都是从王权到民权转变的必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古代人遇到很多问题主要靠祭司、靠宗教信仰去解决，而现代社会是科学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主张使用科学的办法解决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恰恰就处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期，因此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科学家。他们主张用科学的办法，用质疑的眼光去研究自然，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由他们开始，才有了以后的牛顿三定律、工业革命。在科学精神这件事上，文艺复兴也是一个分水岭。

文艺复兴对艺术的影响更显而易见。文艺复兴在造型艺术上的成就，好比提前发明了照相机，以科学的方法、细致的观察来描绘自然，奠定了其后三百年的写实技法基础，此后的所有艺术家都像是在给文艺复兴拍出来的这张照片做各种处理和微调。比如巴洛克绘画，是让这张照片拥有更强的“对比度”，洛可可是给照片中的人物加上“磨皮效果”，等等。文艺复兴对造型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它完成了整个古典绘画体系的确立。

文艺复兴让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盲从走向质疑，开启了科学探索之路。如果说20世纪人类在科技上进步、成就很大的话，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其实都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对科学实证思维方式的启蒙。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成绩实际上是之前所付出努力的一次集中大爆发，而这次爆发的源头是文艺复兴。

换句话说，20世纪的成就是后面许许多多“0”，15世纪的文艺复兴才是那个前面的“1”。

（二）北方与南方

在文艺复兴时期，相对于中世纪一千年，在各领域的变化中，艺术领域的变化最为剧烈。首先数量上呈现爆发的趋势，如果你现在到罗马、佛罗伦萨，甚至是佛罗伦萨边上较小的城市锡耶纳，随便找一个教堂走进去，几乎都能看到质量极高的壁画、天顶画。

相比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艺术作品有了“署名”，也就是说，有了“艺术家”的概念。在艺术匮乏的中世纪，哪怕一些绘画或者雕像得以保留，人们也无从知晓具体是谁创作了这些作品。那个时候，绘画和雕塑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工具，创造它们的人只是“工匠”，所以不会强调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只会强调其功能性，自然也不会有所谓艺术家的概念了。

从圣方济各以及但丁的时代开始，才渐渐有了艺术家的概念。能被叫出名字来的第一个大艺术家，应当是佛罗伦萨人奇马布埃。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画家，就是奇马布埃的得意门生，同为佛罗伦萨人的乔托。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相比中世纪的作品，最明显的特色就是画得更“像”了，即更写实、准确、有立体感。对于“画得像”这件事的追求，就是从乔托开始的，所以乔托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绘画之父”。

据传乔托12岁左右的时候，在奇马布埃处当学徒，调皮的小乔托趁大师出去办事，跑到大师正在创作的圣母像上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苍蝇。奇马布埃回来之后，以为这是只真苍蝇，就开始挥手驱赶，结果这只苍蝇如此倔强，怎么都赶不走，最后才发现是乔托捣鬼。由此可见，乔托在“画得像”这件事情上极具天赋。

乔托所处的年代是13世纪后半叶，方济各修道会如日中天，其以人为本、“慈母”般的教义对乔托影响深远。乔托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神圣人物形象都程式化，应该展现圣人更人性化的一面。



C11↑

/

《哀悼基督》（*Lamentation of Christ*）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185cm×200cm湿壁画1304—1306年意大利帕多瓦斯克洛文尼小教堂（Scrovegni Chapel）

乔托最著名的湿壁画作品，是位于意大利帕多瓦斯克洛文尼小教堂的《哀悼基督》（C11），画的是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圣母玛利亚与门徒们围上去哀悼的场景。这是一位放贷者委托乔托创作于自家礼拜堂中的壁画。在这幅作品中，乔托唤醒了很多古希腊时期的绘画技法，例如“缩短法”，就是从侧面的角度去观察物体的时候，它的长度是缩短的。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把手伸平，让他用手指指尖对准你的眼睛，如此看过去，手的长度就缩短了。

在这幅作品中，乔托为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给人物的面部和衣服的褶子都加上了阴影，这些细节在中世纪的绘画当中是几乎看不到的，充分展现出了对古希腊绘画技巧的复兴。

圣方济各、乔托，加上引领文艺复兴思想的诗人们，诸如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都是佛罗伦萨人，包括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三杰”，都与佛罗伦萨有着很深的渊源，还有作为艺术家最大赞助方的美第奇家族坐镇，佛罗伦萨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复兴第一城。

文艺复兴起源于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但同时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地区。1347年到1353年，欧洲暴发了大规模黑死病，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佛罗伦萨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城市，有十万以上的人口，传染概率更高，人口几乎减半。这一次浩劫让佛罗伦萨元气大伤，在文化艺术方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断代，直到15世纪上半叶才缓过劲儿来。

在这段时期，北方的艺术家率先在绘画领域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这里说的北方，指的是尼德兰地区。尼德兰大约是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部一带。尼德兰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尤其是布鲁日地区，纺织业尤其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萌芽的出现，尼德兰掀起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波艺术需求暴涨的浪潮。

尼德兰地区的画家颇具盛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约出生于14世纪末，被称为“北方文艺复兴三杰”的扬·凡·艾克、罗伯特·康平、罗希尔·凡·韦登。“三杰”中又以活跃在布鲁日的扬·凡·艾克为代表，扬·凡·艾克的艺术集中体现了尼德兰绘画的特色。

在普遍认知中，西方绘画指的是油画。据说，扬·凡·艾克是油画的发明人，被称为“油画之父”（尽管油画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阿富汗，但在欧洲范围内率先推广油画技法的是扬·凡·艾克）。当时的颜料是用各种矿物质以及天然材料研磨、提炼制成的颜料粉，与液体介质如蓖麻油调和后再使用。除此之外，扬·凡·艾克的“绝活”主要是极端细致的绘画方式。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阿尔诺芬尼夫妇像》（C12），该画作集中体现了扬·凡·艾克精细到极致的技巧。画中是一对年轻夫妇，新娘身着一件绿色长大衣，大衣上的褶子繁复，每一处都被处理得恰到好处，如果拿着放大镜看衣服上的白色绒毛，几乎每一根细丝都能看清，极为精细。

这幅画的高度大约是83厘米，相应的，画面中墙上的圆形镜子（C13），直径不到10厘米，镜框则不到2厘米。在如此狭窄的区域中，凡·艾克在镜框的圆形装饰区域中画进了三个人物，隐约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场景。

中国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中描述了能工巧匠如何在一枚方寸大小的核桃上雕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相信这样精细的核桃雕刻与扬·凡·艾克的精细画工不相伯仲。



C12↑

/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扬·凡·艾克（Jan Van Eyck）83.7cm × 57cm 板上油画 1434年 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C13↑

/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局部）

扬·凡·艾克还有一幅著名的三联祭坛画，叫《根特祭坛画》（C14），现收藏于比利时境内的根特市圣巴沃大教堂。《根特祭坛画》有一个大部分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仔细观察画中唱诗班的人物形象，会发现不同人物的口型是不一样的（C15）。



C14↑

/

《根特祭坛画》（*Ghent Altarpiece*）扬·凡·艾克（Jan Van Eyck）
350cm × 461cm 板上油画 1420—1432年 比利时根特圣巴沃大教堂（St. Bavo Cathedral）

这里展现出来的是古典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种作曲形式，叫复调。复调是非常高级的创作方式。在复调音乐当中，不同声部的演唱者会唱不同的旋律，甚至相异的歌词。这种复调音乐正是北方地区的音乐特色。能抓住这样的细节，可见扬·凡·艾克对于描绘真实的追求已经到了极致。

如果说北方文艺复兴的绝活是油画颜料以及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摹，那么南方艺术的独特创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透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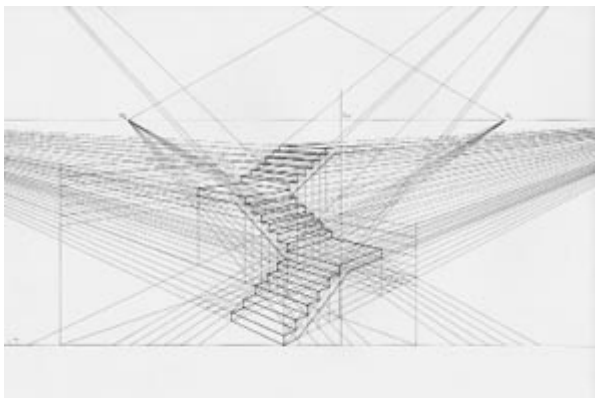


C15↑

/

《根特祭坛画》（局部）

所谓透视法，是将缩短法进行了定量化的升级。在透视法之前，画家们只知道画东西要“近大远小”，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事物，其长度有一定程度的“缩短”，但对具体缩短多少这些定量的规律是不了解的，所以画作仍然不够精确。透视法是能够给出具体“近大远小”定量的、几何学上的方法。绘画中的透视法，简单概括就是，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平行线，在一幅画作中都应该消失于同一点，即便没有在画面中相交，它的延长线也在画面外消失于同一点，这个点叫作“消失点”（C16）。



C16↑
/
透视法示意图

透视法的引入，对当时画家的作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有了透视法，下笔之前就可以先确定消失点的位置，再以消失点为起点画出向外散射的射线，再画出与之垂直的分隔线，当整个画面被分为若干个小格子后，再依照比例去确定建筑的位置、人物的形象，这样画出来的作品比例恰当、形态准确。

在绘画中率先使用透视法的艺术家是马萨乔，他的原名叫托马索·迪·乔万尼，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意思是“笨拙的”。据说此人平时因过于醉心绘画，与人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神神道道，故被人送了这样一个诨名。

马萨乔的代表作是画在佛罗伦萨新圣母教堂的《三位一体》（C17），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马萨乔画出了前无古人的立体感，虽然画在平面上，却让人误以为是墙壁凹陷了，景深的处理让人物异常逼真，形成了强烈的视觉震撼。这在今天看来也许习以为常，但当时的社会在中世纪教会的统治下压抑了长达一千年，人们看了太多失真的、规程化的画，习惯了旧的表达方式。马萨乔的画作给当时人们的视觉，甚至是宗教信仰，都造成了巨大的真实感的冲击。



C17↑

/

《三位一体》（*Santa Trinità*）马萨乔（Masaccio）[托马索·迪·乔万尼（Tommaso di Giovanni）] 667cm × 317cm 湿壁画 1427—1428年 意大利

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Basilica of Santa Maria Novella）



C18a↑

/

《圣罗马诺之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The Battle of San Romano: Niccolò Mauruzi da Tolentino*）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
182cm × 320cm 板上蛋彩画 1438—1440年英国伦敦 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C18b↑

/

《圣罗马诺之战：击败贝纳迪诺·德拉·齐亚达》（*The Battle of San Romano: Victory over Bernardino della Ciarda*）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82cm×323cm 板上蛋彩画 1435—145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C18c↑

/

《圣罗马诺之战：米凯莱托·阿滕多罗的反攻》（*The Battle of San Romano: The Counterattack of Michelotto da Cotignola*）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80cm×316cm 板上蛋彩画 约1455年法国巴黎 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只可惜马萨乔英年早逝，去世时还不到30岁，有人说如果马萨乔能多活10年，他的成就可能不会低于“文艺复兴三杰”。

还有一位叫乌切洛的画家，他同时也是一名数学家。在他之前，绘画作品中大多是三五个人、七八个人的小场面，但经过乌切洛对透视法的钻研和精确的数学计算，在一幅画中可以安排几十人，甚至上百个描绘对象的大场面。乌切洛的代表作《圣罗马诺之战》（C18a/C18b /C18c），是一组三幅的大型画作，有超过100个主体形象，包括骑士、步兵、旗帜、旗杆等，画面比例和谐，将一场战役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乌切洛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几何学才能，即便是混乱不堪的战场，他也刻意安排每一个细节，

甚至是折断在地的旗杆，也精确地符合透视法原则，延长线都消失于同一点。

乌切洛的创作方式就是先通过确定消失点（C19）画格子的方式把画面分好区域，再进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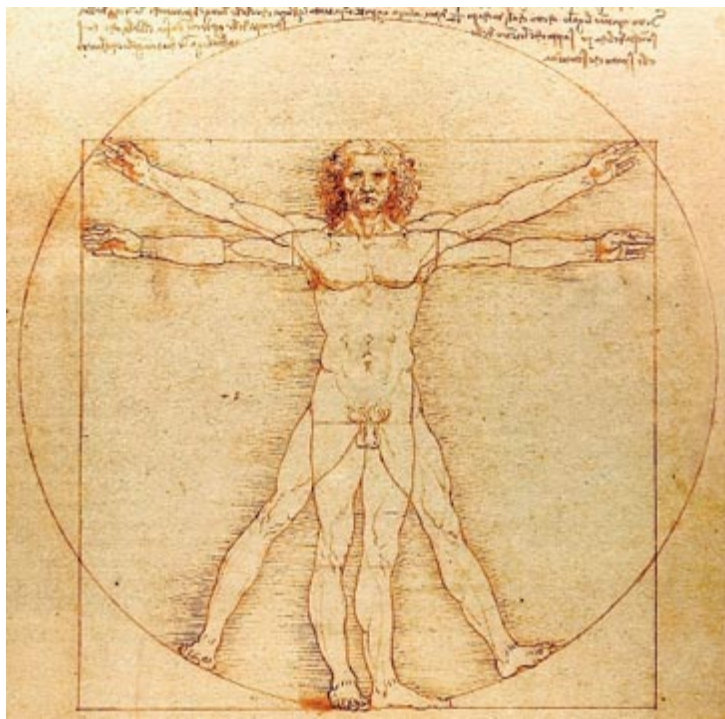
C19↑

/

消失点示意图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解剖学也已经开始萌芽。在中世纪，人体解剖是被教会明令禁止的。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管控没有中世纪时期严格，再加上佛罗伦萨有一贯对学术、艺术给予大力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坐镇，故风气更为开放，让解剖人体变成可能。达·芬奇就解剖过30多具尸体，据他自己的记录，他解剖过2岁的死婴，也解剖过100岁老人的尸体，并首次发现了心血管疾病的存在。

解剖学的发展让艺术家们更了解人体的构成，对人体比例的掌握也更为精确。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C20）。维特鲁威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家，曾总结描述了人体四肢比例的奥秘。在这幅素描中，达·芬奇把解剖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联系起来，总结了人体比例的具体规律，画出了人体最完美的比例。在《维特鲁威人》当中，男子以两种不同姿势站立，两种姿势的手与脚分别触到正方形和圆形的边缘，此时圆心位于男子的肚脐处。《维特鲁威人》用简单的几何图形解构了标准人体的比例。



C20↑

/

《维特鲁威人》（局部）（*The Vitruvian Man*）莱昂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纸上墨水1492年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Gallerie dell'Accademia, Venezia）

至此，南北文艺复兴的特色可以总结为：南北双方都在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力争画得更准确、更精细。“求真”是文艺复兴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南方和北方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北方是“看”，南方靠“算”。北方艺术家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对画面进行像素级的描摹；南方则是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研究，总结出来几何以及解剖方面的规律，用这些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从更宏观的视角指导绘画的准确性。

从创作材料上来说，北方的画法细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油画颜料的使用，油画颜料相对黏稠，画起来易于控制，可以把线条画得很细。同一时期的南方绘画，主流还是坦培拉，也叫蛋彩画，也就是用蛋黄或蛋清作为颜料粉的调和剂。蛋彩画的颜料相对较稀，从精细以及可控程度上不及油画颜料，直到15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才全面普及油画创作。南方绘画的一大类型还有前文提到的湿壁画。所谓湿壁画，是在墙上抹上热石灰泥，

在灰泥还没有干透时便在上面进行创作。因为绘画的过程中画面湿润，笔触无法做得太细，但湿壁画的好处是等灰泥干后，颜色就已经与灰泥一起干结，对于色彩的保存是有优势的。如果直接在墙壁上创作，虽然工艺较为简单，但画作不易于保存，容易褪色。湿壁画和蛋彩画的问题都是颜料较稀，画出来的作品色彩饱和度较低，所以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给人的感觉大多是清新淡雅，没有过多鲜艳的颜色，但从现代的审美潮流来看，反而给人一种清淡的“高级感”。



C21↑

/

《自画像》（*Self-Portrait*）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52cm×41cm板面油画1498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难道没有人结合双方之所长，把南北的技法结合到一起吗？有，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丢勒几乎做到了。

首先，在画得精细这件事情上，丢勒在无数的自画像中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精细画工（C21）。



C22↑

/

《基督与圣贤们》（*Christ among the Doctors*）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65cm × 80cm 板上油画 1506年 西班牙马德里提森—博内米撒艺术博物馆（Thyssen-Bornemisza Museum）

丢勒对人体比例以及人物动作的把握，也充分体现了他对解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他的名作《基督与圣贤们》（C22），这幅画作中每个人手部的姿势各异，且动作都不简单，要把这么多手画在一起，必须合理安排手的姿势，让画面看上去从容合理，且不能违背人的生理结构，这便需要相当的解剖学知识。

丢勒年轻时曾四处游历学习，南下到威尼斯，师从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丢勒关于南方画派的知识就是从贝利尼处学来的。对透视法的掌握程度，丢勒似乎并没有给后人太多的机会来检验，他应该并未画过太多景深很深的作品，这就导致后人无法检验其通过透视法安排大场面的能力。但至少丢勒的肖像作品中，他都非常合理地安排了消失点，这在尼德兰画家创作的肖像画中并没有被很好地关注。精细如扬·凡·艾克，也画出过透视不正确的失真肖像画，透视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三）绘画与雕塑

谈文艺复兴，必谈“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三位都出生于15世纪后半叶，同时期北方有丢勒，威尼斯有贝利尼，各地大师能人辈出，故三杰活跃的这一时期，被称为“文艺复兴盛期”。

为什么这三个人是“杰”？因为他们的艺术作品都达到了完全“自洽”的境界，即self-consistent。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虽然都有自己的特长，但也多少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乌切洛虽然透视极好，但人物形象的描绘过于平面化，导致画面失真；波提切利的人物虽然极美，但身体比例不协调。“三杰”的艺术风格虽各不相同，但都能够自圆其说，形成一套在他们自身框架内挑不出毛病的艺术体系。

三杰中达·芬奇最为年长，他1452年出生于佛罗伦萨边上一个叫芬奇的小镇，是一名公证人与酒馆服务员的私生子，西方世界喜欢叫他莱昂纳多，他的全名翻译过来是“来自芬奇的莱昂纳多”。达·芬奇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才以及全才，在众多领域都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将达·芬奇列在艺术大师的榜首，依然是一种“屈才”，因为达·芬奇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于绘画艺术。他的头衔还包括数学家、音乐家、工程学家、建筑学家、机械学家、医学家、解剖学家等。

绘画对于达·芬奇来说很可能只是“业余爱好”，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画作数量上看出来。除了最著名的《蒙娜丽莎》，达·芬奇的代表作能被人们想起名字来的，基本上只有《最后的晚餐》《施洗者圣约翰》《抱银鼠的女子》与两幅《岩间圣母》。达·芬奇活了67岁，以他的绘画造诣，应该留下大量的传世作品，但全球范围内，能确定是达·芬奇手笔的油画，一共不到20幅。相比之下，达·芬奇给后世留下了超过7000页的手稿，手稿内容涵盖数学、物理、天文、工程、地质、生理学等学科（C23a/C23b）。



C23a↑

/

《子宫中胎儿的研究》（*Studies of the Foetus in the Womb*）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30.4cm×22cm纸上墨水1511年英国英国王室收藏（Royal Collection）



C23b↑

/

《让弹簧均匀释放的螺旋齿轮》（*Spring Device*）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尺寸不详纸上墨水1500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由于教会的打压，达·芬奇的很多研究在当时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因为有太多是和教会的主张相违背的，想想伽利略的遭遇就能明白。爱因斯坦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整个社会的科技进程可以提前30到50年。

在达·芬奇的自我认知中，画家的身份似乎是最不值一提的一个。达·芬奇早年在佛罗伦萨很不得志，借由洛伦佐·美第奇派往米兰公爵处做使者的机会，给米兰公爵写了一封自荐信，信中提及了自己的种种能耐，唯独没有强调画技的高超。由此看来，在达·芬奇心中，他的真正身份应该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

再看米开朗琪罗。他出生于一个上层阶级家庭，祖上出过伯爵。和达·芬奇一样，米开朗琪罗也是集雕塑家、画家、建筑师以及诗人等各种身份于一身的大家。

米开朗琪罗最出名的作品，是画在现今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记》（C24）。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不到西斯廷，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米开朗琪罗花了4年多的时间画西斯廷的天顶，1508年动工，1512年完成，天顶画长40米，宽14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

但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却是一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早在14岁

时就决心要成为一名雕塑家，尽管他的绘画技艺超群。他一开始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交给他画西斯廷天顶的任务是拒绝的。之所以后来答应，是因为教皇准备用一笔巨款为自己修建陵墓，米开朗琪罗希望能参与这项工程，他希望能在陵墓的建造过程中把自己在雕塑方面的毕生绝学都施展出来，才答应先为教皇画一幅天顶画。

米开朗琪罗为教皇的陵墓计划了40尊像《大卫》一样的雕像。他的对手，负责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布拉曼特曾挖苦他说，光是《大卫》，米开朗琪罗就雕刻了4年，要造陵墓他得用160年。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后来教皇采纳了布拉曼特的建议，认为生前就放太多精力在自己的陵墓上，一是不大吉利，二是会给社会留下过于自私的印象，于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建造天主教世界的地标圣彼得大教堂上，米开朗琪罗算是壮志未酬。

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不仅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代表性艺术风格的二元对立，一直到几百年以后的浪漫主义时期，整个古典造型艺术在风格以及艺术理念上二元对立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这两位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集中体现了理性与感性、古典与浪漫这两种对立的艺术理念。

来了解一下两位艺术家如何看待绘画以及雕塑这两种艺术形式。

达·芬奇推崇绘画，轻视雕塑。他对绘画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其著作《绘画论》中。在这本书里，达·芬奇除了写下许多关于绘画的经验，还论述了他的绘画理念。达·芬奇认为绘画的本质跟科学一样，都建立在感性认知基础上，再用理性方法小心求证。科学最早的发端是好奇心，是对自然的感性认知，而绘画也是如此。此外，达·芬奇认为绘画和科学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去计算和推导，例如绘画中的透视法，本质上其实是对几何学的运用。达·芬奇喜欢理性的艺术创作，对他来说，进行绘画创作跟解决科学问题一样，都是一种探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达·芬奇有那么多未完成作品，很有可能是在他探索到一半的时候，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画完。

同时，达·芬奇很“瞧不上”雕塑。在他看来，雕塑就是一个体力活，没有绘画中的计算、透视、解剖等高级技巧，只不过是拿个凿子敲敲打打。自然界的东​​西是什么样，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就好了，思想上并没有类似于透视法这样的智慧内涵。此外，达·芬奇还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人，他觉得雕塑会让创作者灰头土脸，一点儿也不像优雅的艺术家。

达·芬奇对艺术的追求是理性的追求，本质上更是对智慧的追求。

米开朗琪罗则崇尚雕塑、轻视绘画。他认为，艺术的任务是描绘造物主的

伟大，造物主创造的世界本就是三维的，雕塑才是能从三维空间中最大限度还原造物主伟大的最好方式。相反，绘画是一种虚假的把戏，只不过是把事物的形象用一些俏皮的花招在二维平面上投影出来，少了一个维度的描绘，是偷工减料。由此可见，米开朗琪罗认为雕塑的维度是更丰富的，绘画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欣赏，而雕塑不仅能让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还能通过抚摸的方式去感受作品的曲线、质地与纹理。米开朗琪罗对艺术的追求是一种感性的追求，追求感官上的直接享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情感上的升华。

达·芬奇的艺术之美如数学定理，闪耀着真理之光；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之美则如诗篇漫卷，洋溢着信仰之辉。



C24↑

/

《西斯廷天顶画》（*Sistine Chapel Ceiling*）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m×40m 湿壁画 1508—1512年梵蒂冈 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四）科学与神学

在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所处的文艺复兴盛期（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虽然欧洲已经开始从蒙昧转向开化，但总体上，教会的控制力依然十分强大。两位大师在宗教信仰上可谓南辕北辙，这也是他们二位艺术风格差异巨大的根源之一。

达·芬奇是不信宗教的。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各类科学研究中，有不少是被教会明令禁止的。比如前文提到达·芬奇为了研究人体，私自解剖过很多尸体。

达·芬奇是个左撇子，留下的7000多页手稿中有很多是用左手写成的“镜像文字”，必须用一面小镜子对照着才能阅读。达·芬奇这么做也许是为了防止被人轻易发现，因为他做的研究在当时已经遭到教会反对。

在达·芬奇的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理性之美，是从容与和谐，以及精巧的设计。《最后的晚餐》体现出达·芬奇对戏剧性效果有着敏锐的把握和设计。在达·芬奇之前，很多画家都画过这个题材，但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前人画中的人物都相对僵硬（C25）。

而达·芬奇所画的每个人物的表情与动作都非常真实、准确，完美地展现了耶稣说到自己被人出卖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惊讶和不解。此外，通过精心的设计，达·芬奇还能让人一眼看出哪个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画面中间，其他人都是身体倾向耶稣，或者手指指向耶稣，只有犹大整个人向后倾斜，做背离状，达·芬奇完美地设计出了这一戏剧性瞬间（C26）。

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解决了当时很多画家都无法解决的难题：既保证透视的正确，又让画面整体构图显得和谐均衡。透视法的发现给画家们提供了异常准确的描绘自然的工具，但同时也带来不小的难题，因为在有透视法之前，画家只需要考虑画面的和谐，例如在中世纪，为了保证画面的平衡，人物的四肢可以以超越生理极限的形态进行扭曲。加了透视法这条原则，实际上是多了一条限定条件，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构图的难度，构图不仅要保证画面和谐，同时也要兼顾透视的正确性。这就好比让你从厨房端一碗汤到餐桌上，很容易，但如果要让你一边转着圈一边把汤端到餐桌上，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达·芬奇通过精确的计算以及合理的安排，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做到了这一点。



C25↑

/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多梅尼科·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约400cm×810cm湿壁画148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诸圣堂（Cenacolo di Ognissanti）

与达·芬奇相反，米开朗琪罗是一个信仰力量很强的人。西斯廷天顶画的计划原本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恢宏。尤利乌斯二世实际上是个审美品味不高的教皇，一心只想做面子工程，原本米开朗琪罗也只是打算应付一下教皇的委托，画上十二使徒草草了事。但后来米开朗琪罗幡然醒悟，觉得这样做一是不尊重艺术，二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于是他重新设计了整个天顶的构图，画出了《创世记》。人们能从米开朗琪罗的人物形象当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信仰力量的强大（C27/C28/C29）。



C26↑

/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460cm×880cm 石膏+蛋彩+油彩 1495年意大利米兰 圣母感恩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C27↑

/

《西斯廷天顶画：创造亚当》（*Sistine Chapel Ceiling: Creation of Adam*）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湿壁画1508—1512年 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C28↑

/

《西斯廷天顶画：大洪水》（*Sistine Chapel Ceiling: The Deluge*）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湿壁画1508—1512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都能从中看到肌肉异常发达的男子形象，这其实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分不开的。米开朗琪罗认为，上帝是超越人的存在，但根据《圣经》，上帝又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上帝不可能是三头六臂，但要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超人”的形象，表达上帝之力，唯有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异常健壮。要知道，肌肉发达到米开朗琪罗所造人物形象的那种程度，就算在当今社会，普通人也很难做到，除非是专业的健美运动员。而在文艺复兴的年代，人的营养水平远没有现代的好，自然更是不可能。



C29↑

/

《西斯廷天顶画：利比亚女先知》（*Sistine Chapel Ceiling: Libyan Sibyl*）
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湿壁画1508—1512年
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再譬如《大卫》。大卫是古代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国王，他的故事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大卫在少年时期，打败了战斗力以及体格都远胜自己的巨人歌利亚，并割下了歌利亚的头颅。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代表了雕塑艺术的至高水准，体格健美的大卫被认为是理想化的男性美。但大卫的右手有着米开朗琪罗刻意为之的“不完美”。相较于大卫的身高，他的右手实在过大，且青筋暴露的样子过于苍劲有力，不像一个少年能够拥有的右手。米开朗琪罗之所以给了大卫一只“上帝之手”，是为了表达在上帝的祝福下，大卫才能以弱胜强，这同样是米开朗琪罗信仰之力的展现。



C30↑

/

《梯边圣母》（*Madonna of the Stairs*）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56.7cm × 40.1cm大理石浮雕1490年意大利
佛罗伦萨博纳罗迪之家（Casa Buonarroti）



C31↑

/

《圣家庭》（*Doni Tondo*）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直径120cm板上蛋彩与油彩1507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为了表达这种属于信仰的、超人的力量感，米开朗琪罗作品中的形象，甚至连女性角色都拥有发达的肌肉和健壮的体格，以及一双大手（C30/C31/C32）。

米开朗琪罗为了他的艺术理念，会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一些主观的夸张，有一些“表现主义”的倾向，其根源则是对上帝的信仰。

在信仰科学以及信仰神学这组二元对立的信仰框架下，两位大师在艺术上的对立又一次被显著地展现出来。



C32↑

/

《西斯廷天顶画：库玛伊女祭司》（局部）（*Sistine Chapel Ceiling: Cumaean Sibyl*）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湿壁画1508—1512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两位大师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完成时，佛罗伦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讨论这尊雕像应该被摆放在什么地方。委员之一就是达·芬奇。达·芬奇率先反对把这尊雕像放在户外，理由是户外风吹雨淋对雕像的保存不利，但实际上达·芬奇是觉得这毕竟是一尊没有遮羞的裸体雕像，放在户外显眼处的话着实不够雅观。但米开朗琪罗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最终越过委员会，直接说服当时的执政官，把《大卫》放在了韦奇奥宫，也就是当时市政厅的入口处。

还有一次，据说米开朗琪罗在路上公开奚落达·芬奇，质问其曾经答应要给米兰公爵做一尊青铜骑马像，为何多年过去了，连个影子都没见到，以此讽刺达·芬奇不擅雕塑。

（五）古典与浪漫

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风格象征着西方古典艺术当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广义的古典主义”和“广义的浪漫主义”^[1]。

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新落成的能供500人集会的市政厅里，两位大师曾有过一场称得上“世纪之战”的正面对决。在这场对决中，整个西方古典艺术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股力量被区分出来，形成了整个西方艺术史中的二元对立。这之后西方古典艺术中的流派之争，本质上都是这两种艺术理念之争。



C33↑

/

《安吉里之战》（*Battle of Anghiari*）

两人画的两幅壁画内容是佛罗伦萨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战争。达·芬奇画的是《安吉里之战》（C33），米开朗琪罗画的是《卡西纳之战》（C34）。

这场“世纪对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传闻全意大利两位大师的崇拜者们都前来观战，在两位偶像休息的时候，追随者们就各自站队，展开骂战，为偶像争论不休。其他艺术家们也来围观，据说艺术家们看完之后都极为沮丧，因为他们发现两位大师把当时能够被创作的艺术形式都画到了

极致，再没留什么创作空间给其他艺术家。

在这场对决中，两位大师的艺术理念都被充分地表达在画作之中。《安吉里之战》代表着达·芬奇纯粹理性的绘画理念，描绘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士兵骑在马上厮杀的场景。画中有形态各异的马，它们的关节、肌肉都精准正确。要画一匹动作剧烈的战马，首先要知道马的关节能弯多少度。作为科学家的达·芬奇，着重于对自然的理解和刻画，整个画面充满精妙的计算。

与之相对的，《卡西纳之战》选择了充满戏剧性的场面：战士们正在河中沐浴，突然敌人杀过来，所有人慌忙穿衣应战。米开朗琪罗选择了这样一个突发场景的瞬间进行描绘，他对细节的抓取以及刻画都相当精湛。画中并没有描绘战争本身的激烈，而是从侧面展现了战争的紧张。米开朗琪罗不是表现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而是要凸显对整个场面戏剧冲突的洞察，整个画面充盈着力量感。



C34↑

/

《卡西纳之战》（局部）（*Battle of Cascina*）

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各自的艺术特点与长处，也在另两件作品中充分展现，形成强烈对比。达·芬奇在前往米兰服务于斯福尔孔扎公爵之前，曾受托创作一幅《三博士来朝》（C35），但未及完成，达·芬奇便启程远赴米兰。如今这件未完成作品被收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

也幸亏该作并未完成，后人才有幸得以欣赏达·芬奇的伟大之处。作品并未着色，但线条底稿已全部完成，该作充分体现出达·芬奇对线条的控制以及对布局的掌控力。《三博士来朝》中没有任何两个主体形象拥有相似的动

作和外形，画面中，所有对象都以各异的姿态呈现，同时却又连成有机整体，画面中无任一主体形象与整体画面独立无关。达·芬奇对微观和宏观的同时掌控，让画面呈现出平衡、动感、张弛有度的完美效果，好似借由造物主之手创造的有机生命体一般。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是有强烈韵律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肩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无论《快雪时晴贴》抑或《丧乱贴》，都是不论单个汉字还是整体气势，皆安排得当，笔墨所到之处，一气呵成，流畅无比。



C35↑

/

《三博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243cm×246cm板上油画148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C36↑

/

《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13.7m × 12m 湿壁画 1533—1541年 梵蒂冈梵
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达·芬奇对线条和布局的掌控前无古人并远超同行。纵观艺术史，再无人能在平衡感与有机感上超越达·芬奇，也许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安格尔摸到了一点儿边，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与《泉》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平衡感与有机感。

与之相对，米开朗琪罗的名作是画于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墙壁上的《最后的审判》（C36），画中人物形象虽多，但并不具有生动的有机感。画面明显划分区域，且各区域中人物形象大势趋同。虽有众多主体形象，其数目甚至远多于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但《最后的审判》的看点并非在大场面上，而是体现在个体形象中。米开朗琪罗始终是优秀的雕塑家，在刻画个体人物形象时，其充满表现力的雕塑艺术审美便展现其中。

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的对决，本质上是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的对决。古典讲究精确、典雅、平衡、节制，浪漫讲究想象力、表现力、对比度和放大的情感。这两种艺术追求的二元对立，其实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都可以找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之后的艺术家，如果要去概括他们的作品风格，大致可以归类到这两个范畴之内。威尼斯画派的一对师兄弟，师兄乔尔乔涅的画风沉静，刻画柔美，可以归类到广义的古典；师弟提香的作品，活色生香，色彩艳丽，看了让人凡心大动，可以归类到广义的浪漫。巴洛克时期的罗马，有风格互为对立的卡拉奇和卡拉瓦乔：卡拉奇的作品讲究匀称典雅，可以归类为广义的古典；卡拉瓦乔的作品离经叛道，讲究强对比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可以归类为广义的浪漫。同为巴洛克时期的北方画家，尼德兰的维米尔，照相机般的写实精确，色彩朴素平实，可以归类为广义的古典；佛兰德斯的鲁本斯作为巴洛克时期的集大成者，喜欢用对角线构图，最大限度地增加画面的戏剧性和律动感，色彩上极为明艳绚丽，可归类为广义的浪漫。一直到19世纪初，两大针锋相对的画派，大卫和安格尔师徒为首的“新古典主义”和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分别是标准的“古典”和“浪漫”。这种规律推行到其他艺术领域也成立，西方古典音乐中也有这样的二元对立。19世纪的勃拉姆斯和瓦格纳，就是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的典型代表。

从创作方式上，也可以分为广义的古典和广义的浪漫。古典派的作画方式，从拉斐尔开始，到安格尔达到顶峰，他们都要在正式进行油画创作前，先打好底稿，并对画面进行缜密的构思，可能要画几十张素描草图，详细研究好构图和布局，并规定好线条走向之后，才开始使用油彩。浪漫派的作画方式，以威尼斯画派的提香为首，到鲁本斯，一直到19世纪法国浪漫派的代表艺术家德拉克洛瓦，他们的创作方式更为直接，或是把线描稿转移到画布上随即开始创作，抑或是直接用颜色在空白的画布上创作，并不会如古典派一般在上油彩前反复地对素描进行推敲。



C37↑

/

《皮亚森人溃逃》（*The Rout of the Pisans at Torre San Vincenzo*）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7.6m×13m湿壁画1568—157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维奇奥宫博物馆（Palazzo Vecchio Museum）

世纪之战的两幅画最终都没有画完，达·芬奇没有遵守合约，提前接了另一个订单。米开朗琪罗也没有画完，就被召唤去了罗马给教皇修陵墓，西斯廷的天顶是后话了。之后佛罗伦萨的新执政官为了完成装饰任务，翻修了两面墙，找来瓦萨里创作了新的壁画（C37），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决战”时的草图以及其他画家临摹的版本，实为艺术史上一大憾事！

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都不能被认为是全职的画家，是因为在他们身处的年代，整个艺术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分工细致的地步。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对众多艺术领域的探索为后世的艺术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学习材料，由他们二人奠定的广义的“古典风格”以及广义的“浪漫风格”，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艺术发展，一直到19世纪末，众多艺术大师仍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吸收养分。

[1]“狭义的古典主义”通常用来形容18世纪的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而“狭义的浪漫主义”用来形容19世纪的浪漫主义绘画和浪漫主义音乐。此处的“广义”是指将古典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做大范围的延伸。

04 拉斐尔与提香：不同地区的文艺复兴

（一）天才与圣人

前文提到1504年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世纪之战”，前去观战的艺术家都十分沮丧，是因为两位超级大师已经把艺术的可能性挖掘透了，留给其他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已然不多，众人觉得前途渺茫。

在众多观战者中，只有一人暗自得意，这就是后来人称“画圣”的拉斐尔·桑西，一个生于1483年的“80后”小伙儿。他的父亲乔万尼·桑西也是一名画家，在家乡乌尔比诺颇具盛名。拉斐尔早年就跟着父亲学习绘画技巧，但很不幸，乔万尼在拉斐尔11岁时便已去世。由于母亲也早逝，拉斐尔便成了一个孤儿，13岁就独自撑起桑西工作室的招牌，开始接订单。

拉斐尔14岁时的画作《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D1），尽管技巧上还略显稚嫩，但从画面的整体构图、格局以及色彩运用上都已经全面超越了父亲（D2）。

拉斐尔是一位天才型画家，不仅早慧，而且学习速度超群。根据瓦萨里的记载，拉斐尔曾师从文艺复兴中期的绘画大师佩鲁吉诺，但拉斐尔在21岁时创作的与佩鲁吉诺同一题材的画作（D3/D4），似乎已超越了老师。佩鲁吉诺本人似乎也从未以拉斐尔老师的身份自居。

“文艺复兴三杰”并不是并驾齐驱的关系。虽然三人的艺术造诣都登峰造极，且三人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拉斐尔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另两位大师艺术精髓的吸收。“世纪之战”期间，拉斐尔从两位大师的创作过程中学习他们的创作手法，相比于观赏杰作的完成形态，观看其创作过程相对更为有益。

艺术大师给人的印象通常都桀骜不驯、恃才傲物、性格古怪且不易相处。据说达·芬奇就是个冷傲的人，平时不苟言笑，不与常人交往过密；米开朗琪罗性格乖戾，不把常人放在眼里，在罗马期间，他就有能耐让几乎全罗马的艺术家都与其为敌。拉斐尔的性格却并不像一个典型的艺术家，若非通晓人情世故，他又怎会在不到30岁的年纪就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首席御用画家。拉斐尔在两位大师之间游刃有余，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居然同时获得了势如水火的两位大师的青睐，他们都对拉斐尔的艺术创作

进行了指点。



D1↑
/

《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The Wedding of St. Catherine*）拉斐尔·桑西
（Raphael Santi）51.2cm × 37.7cm板上油画1497 年私人收藏



D2↑

/

《与基督复活的神圣对话》（*Sacred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乔万尼·桑西（Giovanni Santi）420cm×295cm湿壁画1481年意大利加利圣多梅尼科教堂（Chiesa di San Domenico）



D3↑

/

《圣母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the Virgin*）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170.1cm×118cm板上油画1504年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馆（Pinacoteca di Brera）



D4↑

/

《圣母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the Virgin*）彼得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234cm×185cm板上油画1502—1504年法国卡昂卡昂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Caen）

“世纪之战”时期，拉斐尔的作品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代表作是《草地圣母》和《金翅雀圣母》（D5/D6），在这两幅画中，圣母和婴儿耶稣以及婴儿施洗者约翰在画面中形成了三角形构图，这和达·芬奇的《岩间圣母》如出一辙（D7）。

而且，圣母面部刻画用到了达·芬奇发明的晕染法，圣母面容形象与达·芬奇惯用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定相似之处。画中人物一改传统画法中的僵硬形象，动作幅度较大，同时还保证了画面的平衡，这应当是受到来自米开朗琪罗雕塑技巧的启发。



D5↑
/

《草地圣母》（*Madonna in the Meadow*）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
113cm × 88.5cm 板上油画约1505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D6↑

/

《金翅雀圣母》（*Madonna of the Goldfinch*）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107cm×77cm板上油画约150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D7↑

/

《岩间圣母》（*The Virgin of the Rocks*）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89.5cm × 120cm 板上油画 1491—1506/1508 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拉斐尔只活了37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留下了300多幅绘画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拉斐尔四个房间》。这其实是教皇宅邸的四个房间，若你到梵蒂冈博物馆参观西斯廷天顶，这四个房间就在必经之路上。拉斐尔把这四个房间的墙壁都画满了壁画。在罗马的12年，是拉斐尔最巅峰、最辉煌的时期。这段时间他基本上以每三到四年画完一个房间的速度，为教皇的宅邸创作壁画。这些壁画记录了拉斐尔风格的演变，是其绘画艺术的缩影。

“四个房间”中的第一个是教皇的签字大厅，房间四面墙壁上的画作中，《雅典学院》最为重要，甚至被称为“文艺复兴第一画”：不只绘画技巧精湛、艺术成就高超，更是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精神的一幅画作（D8）。

雅典是古希腊最强盛的城邦。雅典学院是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主张下成立的，可供各个领域人才谈论学术、交流思想的组织。文艺复兴精神所追求的就是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荣光，要让学术、艺术领域再次繁荣，而最好的学习蓝本正是画中在雅典学园里高谈阔论的古代先哲们。

拉斐尔并不知道古人的具体样貌，于是把画中的古希腊哲学大师都画成了与自己同时代各领域大师的形象。画面中间的白发、长须、右手指天的老者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用的是达·芬奇的形象，可见拉斐尔对达·芬奇的崇敬；柏拉图身边站着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人物形象用的是布拉曼特，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建筑家，他向教皇举荐了拉斐尔，也是拉斐尔的同乡，若单论实力，布拉曼特似无资格与达·芬奇平起平坐，这里面或许有人情的成分在。画面下方托腮沉思的人，是犬儒学派学者第欧根尼，他靠在一个箱子上，人物形象来源于米开朗琪罗。也有说靠在箱子上的是赫拉克利特，而第欧根尼则是其身后台阶上的光头学者。拉斐尔并没有留下详细的人物信息，画中人物所用形象也是众说纷纭。

《雅典学院》对文艺复兴精神的彰显，还在于它所处的地点——教皇处理政务的房间。基督教是一神教，但在这幅画中，除了这些古希腊学者，拉斐尔还画上了古希腊的神——阿波罗和雅典娜的雕像赫然矗立在画面的两端。又有异教神，又是拜偶像，看似是在公然挑战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这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古希腊的文化已经被普遍接受了，甚至连教皇自己都认可。这也充分说明16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开放了许多，其实哪怕是在中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也一直是被教会的高层所接受的，对于他们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灿烂的文化也是智慧的源泉，从某些角度可以帮助天主教的高层寻求治世的方略。



D8↑

/

《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
500cm × 770cm 湿壁画 1509—1511年 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D9↑

/

《解救圣彼得》（*Deliverance of Saint Peter*）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 高560cm湿壁画1512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 (Vatican Museums)

《雅典学院》所展现出来的技巧之精湛，完全不输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幅画里的人数要比《最后的晚餐》里的更多，同样也是在保持透视正确的情况下，让每个人的形象和动作恰到好处。拉斐尔还非常俏皮地将自己和疑似他情人的女性形象也画进了《雅典学院》。画面中的人物要么是在讨论问题，要么是在自行思考，只有两个人是“看着”观众的，其中一个画面最右边的拉斐尔自己。他让自己和情人同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师们站在一起，好像在对你说：“没错，我们和他们在一起。”

第二个房间是签字厅边上的“艾略多罗室”，这里面的壁画凸显出了拉斐尔对“光线”的思考 (D9)。



D10↑

/

《波尔戈的火灾》 (*The Fire in the Borgo*) 拉斐尔·桑西 (Raphael Santi)
高770cm湿壁画1514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 (Vatican Museums)

在拉斐尔的年代，没有光线强烈的电灯可以打光，要画出这样明暗对比强烈的画面感，需要很强的想象力。这样的明暗对比，第二次出现是在近百年后的卡拉瓦乔的《圣马太蒙召》里，这种明暗对比可谓预言了巴洛克绘画的特色。

在另一个被称为“火灾室”的房间中，拉斐尔对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做出了回

应。这个房间里有一幅名为《波尔戈的火灾》的壁画（D10），描绘了小镇发生火灾，众人惊慌失措，教皇利奥四世令神迹显现，扑灭大火场面。拉斐尔之前的画中人物大多是优雅恬静的，而这场火灾中的人物则体现出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画中裸体男子的肌肉都异常发达，这展现出了拉斐尔从米开朗琪罗身上学到的雕塑技法，在把握动态的同时，还精准地刻画出了人体肌肉的不同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创作于1514年，而西斯廷天顶画1512年刚刚完成。据说米开朗琪罗在画西斯廷天顶期间，是不让外人参观的，唯有教皇可以进出。考虑到拉斐尔跟教皇的关系，教皇让他偷跑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创作过程，拉斐尔借此“偷师”，也未可知。

最后一间房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厅”，面积相当于另外三个房间的总和。这间大厅的绘制时间是1520年到1524年，可惜的是拉斐尔在第一年就去世了。按照当时的创作习惯和资料显示，拉斐尔绘制了详细的草图，每一个细节都应已敲定，剩余的部分由其弟子罗马诺带头完成，但依然算作拉斐尔的作品。大厅中最震撼的一幅壁画是《米尔维奥桥的战役》（D11），在画中能看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拉斐尔天才艺术下的无缝结合。而在这种结合下，你又会忘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这幅壁画气吞山河，把14年前佛罗伦萨市政厅“世纪之战”中未完成的《安吉里之战》和《卡西纳之战》的美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D11↑

/

《米尔维奥桥的战役》（*The Battle at Pons Milvius*）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宽约15米湿壁画1520年梵蒂冈梵蒂冈博物馆（Vatican Museums）

在拉斐尔的这幅“遗作”中，可以看到类似于《安吉里之战》中战士骑马厮杀的场景，也有《卡西纳之战》里河水中搏斗的场景。从全景来看，透视

法的运用极度精确；从主体数量上来看，远远多于惯常画大场面的画家，甚至超过乌切洛的《圣罗马诺之战》。在这幅恢宏巨制中，人们看到了文艺复兴名家的汇聚，透视法、解剖学、大场面、奇异的视角、近景远景的结合等等，不一而足。这幅画出现后，以佛罗伦萨和罗马为中心的南方文艺复兴，才真正达到了顶峰。

从拉斐尔的身上隐约可以总结出，要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圣人，需要满足以下几点：

首先，要集前人成果之大成。拉斐尔几乎集合了所有前辈大师的优点，尤其是达·芬奇的理性与优雅、米开朗琪罗的感性和表现力。

第二点，要对后世的从业人士有深远的影响和启发。在这一点上，拉斐尔可谓当仁不让。拉斐尔之后，几乎所有的“学院派”，譬如以普桑、安格尔为代表的法国学院派，以雷诺兹为代表的英国学院派，以及俄罗斯的皇家美术学院，他们所学习的以素描、透视、明暗为基础的绘画，本质上都是在追随拉斐尔的绘画理念。后世除了推崇拉斐尔的人受到拉斐尔的深远影响外，反对拉斐尔的人通常也是经受过拉斐尔学院体系训练的。譬如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诞生的“拉斐尔前派”，就是反对拉斐尔“完美主义”绘画理念的，主张绘画应该回到拉斐尔之前的绘画方式，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拉斐尔对后世影响之巨大。

除了要承上启下、承前启后，成为圣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属于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独创。拉斐尔在艺术上的独创，就是在绘画领域定义了“完美”。这里的完美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被动的完美”。拉斐尔在融合前人智慧结晶之后，呈现出观感完美的作品，这是他追求画技精进的自然结果。第二层意思是拉斐尔主动定义的“完美”。拉斐尔之前，文艺复兴的画家打破了中世纪的程创化创作方式，追求写实的效果，精确地描绘自然。他们找大量的模特进行人物形象的描摹。但拉斐尔在积累了足够经验后，会在脑海中勾画想象中最为完美的形象。举例说，也许拉斐尔画了一千个女性形象之后，他发现某一类眼睛特别美，某一类鼻子特别美，以及某一类脸型很美。之后，拉斐尔再进行创作，会刻意把这些对象往他认为最完美的方向去修改，由此达到他心目中最完美的状态。这也是拉斐尔的圣母形象如此温婉动人的原因之一。例如拉斐尔最著名的一幅圣母画像，如今收藏在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博物馆古代艺术大师馆的《西斯廷的圣母》（D12），就是他多年来对圣母刻画经验的总结，女性的慈爱、温柔都集中在同一个人物上，成为最“完美”的圣母形象。

当今社会的审美观之下，拉斐尔对完美的处理方式，会遭到一大批后世画家的反对，也是意料之中。这种做法相当于是给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做了一定程度的“整形”，虽然好看，但总体不够天然。就好比现代人会诟病经过

整容术做出来的脸，确实都挺好看的，但好看得千篇一律。



D12↑
/

《西斯廷的圣母》（*The Sistine Madonna*）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
269.5cm × 201cm 布上油画 1512—1513年 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博物馆古代
艺术大师馆（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二）威尼斯与罗马

威尼斯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个特殊的地方。在全欧洲都是君主制的情况下，威尼斯从正式建国以来就是共和国，实行终身制总督领导，这种政治制度维持了一千多年。威尼斯除了是个水城，它的商业也一直很发达：一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连接东西方的关隘，是重要的贸易港；二是由于威尼斯的资源有限，通过贸易富国强民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宗教上说，威尼斯几乎不在教廷管辖的范围内，人的宗教信仰也相对薄弱。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从宗教和文化上说，这里有大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宗教的交融，有穆斯林，有东正教徒。从历史成因上看，这又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建立过程息息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已经非常发达了，但威尼斯共和国能建立，并不是因为威尼斯的水土得天独厚，恰恰是因为威尼斯的“穷山恶水”。

这要追溯到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当时有一批逃难的西罗马人，为避免被劫掠的命运，决定跑到那些自然环境恶劣、不容易被抢的地方。于是威尼斯的第一批开拓者来到了一片位于意大利东北角的潟湖，这里陆地不像陆地，海洋不像海洋。威尼斯共和国就是在这样一片“不伦不类”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事实证明，这里确实易守难攻，历史上想要征服威尼斯的企图几乎都没有得逞。威尼斯共和国一路发展起来，这期间天主教廷自身难保，故威尼斯人一贯和天主教廷没有直接的管辖关系。在威尼斯共和国的认知里，远在罗马的教皇只是场面上的宗教领袖而已。全欧洲的大主教都由教皇亲自委任，唯独威尼斯搞特殊，威尼斯先是给教皇一个名单，让教皇在这份候选人名单中挑一个人做威尼斯的大主教，然后这个大主教在威尼斯就会被集体冷落，变得毫无存在感。

威尼斯的社会风气可以用“世俗”二字来形容。威尼斯的商业发达，宗教信仰薄弱，再加上多元的文化在此地碰撞，导致威尼斯人相比追求死后在天堂的荣耀，更追求现世的利益和及时的“享乐”。

威尼斯这种民风上的世俗以及喧嚣，集中体现在了威尼斯的绘画艺术当中。代表了威尼斯文艺复兴绘画最高成就的艺术家，自然是伟大的提香。提香在绘画上的地位重要到什么地步？开玩笑地说，如果文艺复兴三杰要凑一桌麻将，三缺一，要选第四杰，那么这个人必然是提香。提香没有一开始就成为四杰之一，相信主要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瓦萨里对提香实在是不够熟悉，作为佛罗伦萨人的瓦萨里必然更希望突出本土的艺术家。

提香是威尼斯画派的集大成者，是当时最有才能的画家之一。他对色彩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更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整体上的深远影响。



D13↑

/

《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690cm×360cm布上油画1516—1518年意大利威尼斯弗拉里荣耀圣母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活色生香”，是对提香绘画风格最贴切的形容。提香的画作色彩饱和度高，配色艳丽，且提香喜欢把互为补色的颜色画在一起，提高色彩上的冲击力，从而抓住观众的眼球。让提香在全欧洲一战成名的画作，是他给威尼斯弗拉里教堂画的祭坛画《圣母升天》（D13）。

画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形象是最上方的上帝，中上部的圣母，以及下方左右两边的圣徒。这四个主体形象都着红色外衣。为了让圣母和下面两个圣徒的形象形成稳固的三角形构图，足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提香安排下面的两个圣徒边上站着两个穿绿色外套的人。红色和绿色互为补色，放在一起会显得突出跳跃。圣母的斗篷是群青色的，和圣母身边橙黄色的光芒也互

为补色，导致圣母所处的位置异常显眼。画中的圣母与其在传统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大为不同，头顶没有光环，看上去只是一位面容姣好的世俗女子，观感舒适。提香就这样通过对色彩的精心设计，以及人性化的圣母形象，使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地被画面吸引。

威尼斯画派的色彩艳丽，一方面是来源于威尼斯画家的审美倾向，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威尼斯大贸易港的成本优势。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颜料都要靠各种矿石或植物等天然物质研磨制成颜料粉，再由液体介质加以调和使用。有一些颜色的矿石极其昂贵，难以获得，例如蓝色颜料，就要依靠从阿富汗进口的一种叫作“青金石”的矿石。这种矿石在当时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但由于威尼斯是贸易港，所以用来做颜料的矿石相对便宜。



D14a↑

/

《莱昂纳多·洛雷丹总督肖像》（Leonardo Loredan）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61.6cm × 45.1cm 板上油画1501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D14b↑

/

《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83cm × 66cm 板上油画 1480—1490年 意大利贝加莫卡拉拉学院
（Accademia Carrara）



D14c↑

/

《众神的盛宴》（*The Feast of the Gods*）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70cm×188cm板上油画1514—151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威尼斯画派的“创派祖师”，也就是提香的老师乔万尼·贝利尼。他的画作一大特点就是蓝色极多（D14a/D14b/D14c），懂行的人看到这样的画面，第一感受其实是“炫富”。洛可可时期之前的画作，画面整体偏灰暗，就是因为蓝色在整个画面的色谱中欠缺的缘故，且若是画面当中有蓝色，就几乎是以纯色呈现，因为蓝色得来不易，成本太高，如果与其他颜色混合使用略显浪费。贝利尼在作品中使用了太多的蓝色，几百年后其他颜色都褪色了，而这种蓝色恰恰因为质量极好不易褪色，使贝利尼的画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块块的蓝色扑面而来。

提香的画作在题材选取上不可谓不大胆，女性裸体在提香的笔下屡见不鲜，但她们几乎都有统一的身份，就是“维纳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大多爱画维纳斯，不是因为维纳斯好看，而是因为画维纳斯可以画裸体，因为在古罗马的神话体系中，维纳斯是从海上的泡沫中诞生的，本身就是裸体的形象。尽管是“奉旨裸体”，但提香的维纳斯也还是太过大胆了。



D15↑

/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19cm×165cm 布上油画 153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D16↑

/

《入睡的维纳斯》（*Sleeping Venus*）乔尔乔涅（Giorgione）[乔尔乔·巴巴雷里·达·卡斯特佛兰克（Giorgio Barbarelli da Castelfranco）]
108.5cm × 175cm 布上油画 1505年德国德累斯顿 茨温格博物馆古代艺术大师馆（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D15）是他的代表作。

其实在提香之前，他的师兄乔尔乔涅也画过一幅裸体维纳斯，叫《入睡的维纳斯》（D16）。

乔尔乔涅也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可惜33岁就因为瘟疫亡故，存世的画作能确定是其作品的不超过5幅，但每幅都是精品。《入睡的维纳斯》也并不是乔尔乔涅一人完成的，由于早逝，提香补完了这幅画。可以先看《入睡的维纳斯》，这是一幅被宗教压抑了一千年，算得上是真正惊世骇俗的作品。即便是没有宗教束缚的古希腊，这样的正面女性裸体作品也并没有被发现过。在文艺复兴的一线大师中，只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D17）与之类似，但还是用长发遮住了私处。然而《入睡的维纳斯》却“欲盖弥彰”：画中的维纳斯用左手遮住了自己的私处，但这只手的位置，横向位于画面的正中，纵向是处于画面高度的黄金分割点处，也就是说，没有比这只手更显眼的位置了。



D17↑

/

《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80cm × 280cm 布上蛋彩画 148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如果说乔尔乔涅的维纳斯是“惊世骇俗”，那么提香这幅《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就只能被形容为“岂有此理”了。《入睡的维纳斯》整体还是很含蓄的状态，整幅画是在人体美的基础上稍加性感元素，睡眠中的裸体也可被理解为不经意的裸体。提香的维纳斯则不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观众，简直是明晃晃的“挑逗”。这幅画的另一个露骨之处是人物所处的环境。提香之前有很多艺术家描绘过神话主题，但环境大多在野外，因为很多神祇都是自然的化身，融入自然之中，合情合理。而提香却将维纳斯置身于闺房之中，背景是两个女仆翻箱倒柜，可能是在找衣服，要赶紧给女神穿上。整幅画作除了画的名字里有维纳斯，完全找不到其他证明画中人是维纳斯的线索。这幅画据说是给一位贵族的新婚礼物，维纳斯也是参照当时威尼斯第一名妓的形象创作，这个名妓似乎也是提香的常用模特，出现在多幅提香的作品中（D18），不知这位贵族的新娘作何感想。



D18↑

/

《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Sacred and Profane Love*）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18cm×279cm布上油画1514年意大利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Galleria Borghese）

从构图上，提香的画作与拉斐尔式的四平八稳也不同。相比于对称美观的构图方式，提香偏爱能够让画面呈现出动态的非对称构图，比如那幅著名的祭坛画，就在《圣母升天》的旁边，叫作《佩萨罗圣母》（D19）。

这幅画是一个名叫佩萨罗的商人出资委托提香创作的，画面中穿暗红色长袍、双手合十跪在右下角的那位就是赞助人佩萨罗。提香一反祭坛画的惯例，把怀抱圣婴的圣母放在了右边，让整个画面有向右上角倾斜的趋势，用画面左边红色的旗帜、士兵的形象来达到构图上的平衡。相对于传统祭坛画的“中正仁和”与“四平八稳”（D20），提香的这种构图方式无疑充满动感，从气势上也更有说服力。这种艺术创作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巴洛克

时期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鲁本斯。



D19↑

/

《佩萨罗圣母》（*Pesaro Madonna*）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266cm × 478cm 布上油画 1519—1526年意大利威尼斯弗拉里荣耀圣母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Gloriosa dei Frari*）



D20↑

/

《圣母子与圣徒们》（*Madonna and Child Enthroned with Saints*）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约247cm×175cm板上油画 1504—1505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威尼斯画派除了画面色彩艳丽、热衷描绘人多的热闹场景外，对于所画对象的偏好也独具特色。与佛罗伦萨、罗马的南方文艺复兴相比，威尼斯画派还常常描绘大量的风景，尤其是贝利尼与乔尔乔涅。他们的画作中，风景的占比突出，有一些画作中风景所占面积超过画面一半，这样大比例的风景，以及对风景刻画的细致程度，在南方文艺复兴的画作中是少见的。在南方文艺复兴画作中，仅有的风景几乎都是以朦胧可见的背景形式出现（D21）。这是因为威尼斯忽视宗教，认为亲近自然、摸清楚大自然的脾气，可能对生活更有帮助，所以自然之美值得描绘。

威尼斯的文艺复兴与罗马的文艺复兴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直接用威尼斯和罗马对比，而不是佛罗伦萨，是因为1492年以后，艺术中心逐渐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主战场都在罗马。自从1492年美第奇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高贵者洛伦佐去世以后，整个佛罗伦萨的自由以及文艺风气急转直下。佛罗伦萨的新掌权者是一位叫萨伏

那洛拉的多明我修道会教士，他在佛罗伦萨推行极为严苛的宗教式管理，导致艺术中心逐渐向罗马转移。从成就上看，15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们还在探索阶段，到了“三杰”在罗马时期才算“神功大成”。



D21↑

/

《田园音乐会》（*Pastoral Concert*）乔尔乔涅（Giorgione）[乔尔乔·巴雷里·达·卡斯特佛兰克（Giorgio Barbarelli da Castelfranco）]
110cm×138cm布上油画1509—1510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提香和米开朗琪罗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寿命都很长，米开朗琪罗活了89岁，提香活了大约87岁，米开朗琪罗只比提香大不到20岁。在拉斐尔和达·芬奇去世后，米开朗琪罗的地位可谓天下无敌，也只有威尼斯的提香可以给他带来少许压迫感。威尼斯和罗马的二元对立基本上是围绕他们二人展开的。

威尼斯和罗马鲜明的二元对立有以下几点：色彩上，威尼斯的绚丽，罗马的淡雅；构图上，威尼斯讲究冲突、律动，钟情非对称构图，甚至是偏好有对角线倾向性的构图，罗马讲究平衡感，偏爱对称构图；题材上，威尼斯的更世俗化，罗马的更为宗教化；绘画对象上，威尼斯重视风景，罗马轻视风景。如果要研究威尼斯和罗马的二元对立，究其本质，还是要把眼光放在宗教上。

在对待风景方面，信仰宗教的地方认为上帝最高，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类次之，人类智慧所造的建筑房屋再次之，荒野风景根本不值一提；相反，忽视宗教的地方则认为亲近自然、摸清楚大自然的脾气，可能对生活更有帮助，所以自然之美值得描绘。

罗马文艺复兴和威尼斯文艺复兴的二元对立在绘画理念上，是“形”与“色”之争。例如，你用一盒水彩笔来画一幅彩色的人物肖像画，摆在你眼前的可选画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先用黑色把人物的形状轮廓全部勾勒出来，再用彩色的笔涂上颜色；第二种是不勾勒人物形态，直接用彩色的水彩笔，看到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

这就是“形”与“色”之争，是“形”为先还是“色”为先？罗马以及佛罗伦萨的答案都是“形”为先，威尼斯则是“色”为先。佛罗伦萨以“形”为尊的观点最为明显，这其中又以波提切利和其老师利皮为代表。他们的画作，尽管精美无比，但观感上更像漫画作品，而不像一张照片，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作画过程中忠实地贯彻用“黑水彩笔勾边”的形状至上原则，所以他们的人物在外形上都有很明显的黑线轮廓（D22/D23）。

佛罗伦萨的“绝活”是透视法和解剖学，它们给予佛罗伦萨绘画艺术的指导都是“形”上的指导。

重视形的画法，必然要先打底稿，在画布上做好详细的规划，形状到位了之后才开始进行创作。而重视色的画法，是简单打好线稿后，就直接用油彩在画布上开始创作。有一则故事突显了这两种画法之间的冲突。提香中年时名满天下，全欧洲的君主贵族，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要向提香订购画作。据说在提香老年时，皇帝到其工作室拜访，还曾经蹲在地上帮提香捡起他掉在地上的画笔。有一次，已经名满天下的提香来到罗马访问，教皇心想，威尼斯的“顶梁柱”都来了，我们可不能输了气势，于是安排当时罗马艺术界的头把交椅米开朗琪罗来与提香做面对面的交流。这应该是有记载的两位大师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会晤。据说两个人就艺术理念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对于提香带来展览的一些画作，米开朗琪罗也是赞不绝口。在回去的路上，友人问米开朗琪罗：“大师，您真的觉得提香的画作很优秀吗？”米开朗琪罗回答的大意是：“嗯，色彩还是非常绚丽的，但是他们的画，素描太差，一看就是草稿都没打，拿着颜色就直接往上刷，威尼斯这帮家伙都这个样。”可以看出，罗马的文艺复兴是多么地注重“形”。其实不是威尼斯画派素描差，而是从根本上，两个画派对绘画的基本认知不同。



D22↑

/

《春》（*Primavera*）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203cm×314cm布上蛋彩画1482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

威尼斯的绘画内部也有自己的二元对立。提香对威尼斯绘画的贡献不是一枝独秀，与提香对立的这个人就是曾经跟着提香学徒不过十天就被提香请回家，被认为是威尼斯画派“叛徒”的丁托列托。

伟大的艺术通常都有自省的一部分，丁托列托的绘画风格就代表着威尼斯绘画的自省。

丁托列托是威尼斯画家中最为特立独行的、重“形”的画家，他更崇尚米开朗琪罗的作画方式，崇拜他的素描法。丁托列托的代表作《发现圣马可遗体》（D24），讲述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在埃及的修道院中，想要从藏尸楼里将圣马可的遗体运走。从这幅画中就可以看出，丁托列托与提香、贝利尼等威尼斯代表画家有很大不同。画面严格遵循透视法原则，这在主要依托于色彩表现的威尼斯画派中较为少见。丁托列托也喜欢画有很深景深的作品，由此来制造画面的戏剧冲突，比如他的《最后的晚餐》（D25）就是一幅对角线构图、景深极深的作品。



D23↑

/

《圣母子与圣安妮生活场景》（*Virgin with the Child an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St. Anne*）菲利普·利皮（Filippo Lippi）135cm × 135mm 板上油画
1452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皮蒂宫（Palazzo Pitti）



D24↑

/

《发现圣马可遗体》（*Finding of the body of St. Mark*）丁托列托
（Tintoretto）[雅科波·康明（Jacopo Comin）] 405.2cm×405.2cm布
上油画1562年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馆（Pinacoteca di Brera）



D25↑

/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丁托列托（Tintoretto）[雅科波·康明（Jacopo Comin）] 365cm × 568cm 布上油画 1592—1594年 意大利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rgio Maggiore）

丁托列托基本上抛弃了威尼斯画派明艳的色彩，以黑暗系的色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他甚至专门描绘瘟疫给人世间带来的苦难。威尼斯人口密度高，不时暴发瘟疫。在丁托列托的中年时期，一场瘟疫又夺走了威尼斯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命。他曾用17年时间，以每年3幅油画的速度，为威尼斯的圣罗科教堂几乎免费创作了51幅画作，其中描绘了大量瘟疫场景以及基督的救赎，由此来警示世人。在威尼斯这样世俗浮华的社会，丁托列托的绘画象征着威尼斯的自省（D26）。

不仅伟大的艺术有自省的一面，最伟大的艺术大师也有自省的一面。文艺复兴“雕塑之父”多纳太罗、米开朗琪罗，甚至包括提香，在晚年都创作出了一反自身艺术风格的作品。如多纳太罗晚年的木雕《抹大拉的玛利亚》（D27），一反典雅风格，创作出了形容枯槁的老妇人形象，多纳太罗认为经过多年的岁月摧残，人物形象就该是这般真实，雕塑不仅要表现人物的外形，还要能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当你看到这尊《抹大拉的玛利亚》，会被她的精神感染力所震慑，同样类型的感动在400年后罗丹的作品当中也能找到。



D26↑

/

《基督被钉十字架》（*La Crocifissione*）丁托列托（Tintoretto）[雅科波·康明（Jacopo Comin）] 122cm×518cm布上油画1565年意大利威尼斯圣罗科教堂（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

米开朗琪罗晚年也创作出了含有“后现代意味”观感的作品，如他的最后一件作品《隆达尼尼的圣殇》（D28），从形态上，已经完全看不到米开朗琪罗盛年时期那种对人体力量的表达了。这件作品当中有种淡然以及超脱，甚至不会让人觉得这件作品没有完成。提香的晚年似乎也受到了丁托列托艺术风格的影响，也创作出了“黑暗向”的作品，如提香的最后一件作品《哀悼基督》（D29），这是一幅油画，画面上再看不到他的活色生香，只在斑驳中存有星星点点的色彩，似乎象征着耶稣仅存的恩典。



D27↑

/

《抹大拉的玛利亚》（*Magdalene Penitent*）多纳太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 高188cm 木刻雕塑1453—145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歌剧院博物馆（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



D28↑

/

《隆达尼尼的圣殇》（*Pietà Rondanini*）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
（Michelangelo Buonarroti）高195cm大理石雕塑1564年意大利米兰斯福
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不难发现，这种违背自己惯常艺术风格的晚期“自省”，几乎是顶级艺术大师的必经之路，也正是有这样一反常态的“自省”，这些顶级大师才真正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们能在成名之后，仍然对自己的艺术水准感到不满足，不断地挑战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高度。当艺术大师的声望达到不用取悦大众的时候，他们就能直面自己的艺术，抛弃浮华的成分，去追求返璞归真的境界。然而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不为当时的大众所接

受，就好比贝多芬晚期的作品，甚至被出版商指责不知所云，认为贝多芬江郎才尽，殊不知贝多芬晚期音乐作品深邃高远的程度几乎直接暗示了20世纪音乐发展的走向。



D29↑

/

《哀悼基督》（*Pietà*）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351cm×389cm布上油画1576年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Gallerie dell'Accademia,Venezia）

（三）在朝与在野

“形先于色”的画法在学院派这条路子上，一直比“色先于形”的画法更受推崇。“形先于色”的代表是拉斐尔，“色先于形”的代表应该说是以提香发端，之后有鲁本斯、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等人后继，但它的传承并没有如学院一般的官方组织，此处便有必要探讨关于艺术学院的知识。

总的来说，“形”这一派一直是“在朝”的，总有官方的扶持和帮助；“色”一派则是“在野”，大致自给自足。

理论上讲，17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学院。比较有名的大约是由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卡拉奇三兄弟最早创立的工作室，算是美术学院的雏形。在学院出现以前，欧洲的美术行业主要是以作坊的形式“接订单”。如果一个孩子想要成为画家，他的选择就是去一位画家的作坊或者说工作室，给艺术家当学徒。从做杂务开始，逐渐上升到为画家磨颜料，再过一段时间，画家会开始让学徒画一些画面当中不重要的部分。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学徒就可以自立门户了。比如当年达·芬奇最早是在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做学徒，有一次，韦罗基奥在画一幅宗教画（D30）的时候，交给达·芬奇画其中一个天使的形象，结果20岁的达·芬奇画出来的天使形象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老师。在这幅画中，左边的天使是达·芬奇的手笔，相较右边韦罗基奥的天使要更为生动，而且师父画的天使手掌过大，比例失衡。传说韦罗基奥竟然因此意欲封笔，不再作画。由此可见，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并无实据，彼时作坊忙碌无比，老师哪有心思让达·芬奇一遍遍地画鸡蛋。



D30↑

/

《基督受洗》（*The Baptism of Christ*）安德里亚·德·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177cm×151cm 板上油画 1472—147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

有一些名气大的画家会有很多学徒和助手，自己便画得越来越少，但这并不太影响最后画面完成的效果。比如鲁本斯在进行一些大尺幅作品创作的时候，先是做好画面构图，之后上色，大面上的事情由学徒和助手完成，最后再由鲁本斯本人做修改和调整。再比如达·芬奇，虽然真迹极少，但达·芬奇工作室出品的东西还是经常能看到。而且达·芬奇工作室出品的画作，画面效果整体看上去，尤其是人物形象，是非常“达·芬奇”的——有极多的晕染法，人物形象也都是达·芬奇风格的，比如画中人物的眉毛都比较淡。

比较成规模、成体系的美术学院，最早是在17世纪的法国由路易十四组建。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时间

极长，整整72年。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是法国封建时代最为鼎盛的时期。路易十四把法国的政治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巴黎边上的凡尔赛，并大兴土木，建造了全欧洲君主都艳羡无比，继而竞相效仿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还把全国的贵族、朝臣都聚集在凡尔赛宫，夜夜笙歌，以此麻痹各地贵族，让他们对自己俯首称臣。在这期间，路易十四在艺术上当然需要大量投入，于是主持建立了法国的皇家美术学院以及皇家音乐与舞蹈学院。

学院的建立对艺术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主要看学院的职能是什么。学院的一大功能当然是把现存的、散落在民间的知识、技法进行收集、编纂，然后把这些知识和技法汇总成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传授给学生。总体上，学院诞生之前的艺术市场，是更为商品化的市场。艺术的创作跟着客户的需求走，对技巧本身的传授仅限于作坊内部的代代相传，相对零散，失传的风险也不小。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艺术品的商品属性较强，并且艺术家在创作时需要考虑大众的审美层次以及审美需求，与人们今天所认知的“纯”艺术品有显著差别。开作坊的画家、雕塑家，虽然在本质上已经可以作为个人、艺术家，在作品上留下姓名，为人所铭记，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匠人”的属性，因为他们工作的模式需要依靠客户下订单。

学院建立起来后，艺术家的地位和以往大大不同。首先在艺术学院建立之前，早就有大学的存在，诸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剑桥大学，人们对学院中的“学科”是有一定认知的，如数学、法律、哲学等。这些学科不需要对所谓的“客户”负责，更不需要为大众的知识水平负责，他们钻研的就是大众不懂的“高精尖”领域。美术学院建立后，绘画、雕塑就从一门手艺、一门活计，被提升到“学科”的高度。艺术家自然就摆脱了“工匠”身份，变成和科学家、哲学家一样的学者。创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学院的画家会有一些按照自身意愿创作艺术品，客户是先看到了这些艺术品，再决定买不买。当然学院画家也会大量接受来自客户的订单，只是在传统的模式上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和当今社会艺术品市场的买卖规则已经基本一致了。

学院的好处是帮助艺术成为一门学科，艺术的地位自此大大提升。艺术家们有闲暇去创作自己喜欢的主题，而不是一直受雇于客户，也不必被品味庸俗的客户“拖后腿”。被客户拖累这件事确是广泛存在的，就连皇家学院的第一任建院院长，18世纪的雷诺兹，也一辈子为肖像画所累，尽管他更喜欢画风景，描绘自然，但总是被来自英国王室以及贵族的肖像画订单弄得焦头烂额。

美术学院的一大任务当然是要培养学生，但艺术创作这件事，有些能教，有些教不了。能教的东西是那些能被归纳、总结的知识性内容，如特定事物的画法、笔法，还有透视法、明暗法、解剖学等都可以教，但艺术性的东西是教不了的。人们当然可以总结拉斐尔的绘画特点，从而通过教学让

学生们画得像拉斐尔，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充其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拉斐尔的模仿者，这远远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是那些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作品。

正是因为美术学院能教的东西是那些可以被总结的、知识性的、技巧性的东西，所以，以拉斐尔为代表的以“形”为主的画法成为学院派的主流。“形”这一派的技法，是一直到今天的美术学院也在传授的知识，以“形”为主的画法是有限度的，相对理性、古典。

因此，以“色”为主的这一派就势必要变成“广义上的浪漫主义”，因为他们不受“形”的束缚，除了基本的色彩理论，对色彩以及色彩搭配的感受都是相对主观的。“形先于色”的艺术追求是有固定方向的。“形”这一派，到了19世纪初的安格尔达到顶峰，之后再无人能超越，安格尔的艺术已是最终答案，对“形”和线条的写实追求是有止境的。

学院存在的问题是，一旦有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有人在经济上、学术道路上把握住学生的命脉，那么学院就会有自己的倾向性，比如法国的学院会鼓励学生们创作古典主题作品，俄国的皇家美术学院曾经因为因循守旧，直接逼得14位学生集体退学，这14人中的12人积极推进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写实主义绘画，不为沙皇歌功颂德，而是积极描绘俄国的民间生活。

“色先于形”这一派因为没有“形”这一束缚，似乎不会迎来终结。把形状的束缚打破，以“色”的维度为主观出发点，可以有无限的排列组合，无限的发挥空间。不难发现，出现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德拉克洛瓦）、法国写实主义（库尔贝、米勒、柯罗），到印象主义（莫奈、雷诺阿），到凡·高、塞尚、高更的后印象主义，再到现代主义（马蒂斯、毕加索为代表）的绘画，这些画家大多与学院联系不深，而且他们的画作无一不被当时的学院反对。

这是不是代表着学院不好？作为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人是不是应该刻意回避学院？其实并非如此，人们就不应该把学院看作是为了培养艺术家而存在的。学院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对知识性的、技巧性的东西进行总结和传授，然后在这些领域上进行深度挖掘。艺术性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艺术家在学习了知识、经历了思考之后，创造出来独创性的东西。否则的话，只要把技巧和知识教给人工智能，它一样也可以进行艺术创作。

学院没有好与不好，一定要认清学院的任务，学院的目标不是培养艺术家，而是给想要成为艺术家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准备。能不能成为艺术家，要看学生自己。哪怕是在当代，也不是说抛弃传统的知识基础就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世人都知道毕加索的画作看上去和画得“像”毫无关系，但毕

加索说过：“我14岁就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但我毕生都在追求如孩童般绘画。”这样坚实的基础才会让毕加索拥有更广阔的创作视野。

05 哥特与巴洛克：西方建筑与雕塑艺术

（一）“大路”与“小径”

一定要明确，技术和艺术全然不是一回事。艺术是目标，技术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凡是能在艺术史上留名的，被称为艺术家的人，并非他们的技术有多高超，而是他们的作品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所谓艺术家独有的“艺术风格”。

很多艺术家在技术上有缺陷的，但其艺术风格却十分明显。如果用文艺复兴时期追求的透视准确、解剖到位、刻画精细的技术标准来看的话，波提切利的解剖明显没学好，乌切洛虽然透视法精准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但他的人物形象略为刻板，色块式的绘画方式让他的画作看上去有一种生硬的中世纪风格。可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被选入“世界百大名画”。

乔托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中世纪以来第一个追求把人物画得立体的画家，这是乔托表达方式的创新；马萨乔将透视法引入绘画中，这是马萨乔的创新；米开朗琪罗用“异常发达的肌肉”构成了他作品中的“超人”；达·芬奇有晕染法；拉斐尔创造了“完美”的定义；提香的色彩令人炫目……这些都是表达方式的创新，让人只一眼就能记住，甚至下次见到时瞬间就能辨认。如果作品的风格没有显著到让人过目不忘的话，那么只能说这位艺术家在个人风格的塑造方面不尽如人意。

西方艺术发展到16世纪中后期时，遇到了明显的瓶颈，可谓“盛极而衰”。文艺复兴盛期以来，米开朗琪罗和提香超长的寿命以及丰富的艺术创作，为后世艺术家留下了极大的难题：丰碑太多。这让后来的艺术家——哪怕是不世出的天才，想在文艺复兴的审美框架下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表达已非常困难。这句话的关键是“在文艺复兴的审美框架下”。那换个框架呢？或者说改造框架——创造一套全新的审美体系！

这就是艺术史会经历那么多风格演变的原因之一。每当一个风格时期出了几个最具天赋、顶级的艺术家时，艺术创造也跟着达到了巅峰。就好像一款游戏已经通关，就只好换下一款游戏打一样，一个风格时期的艺术可能性被挖掘殆尽时，审美标准的框架就必然发生变化。

当然，艺术家的艺术追求本身不是艺术风格演变的唯一动因，还有很多社会因素：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经济的发展，甚至科技的进步，都会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审美框架的变化。例如，洛可可艺术的诞生与世俗权力的崛起有莫大关系，浪漫主义的诞生与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甚至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有直接关联，印象主义的诞生与摄影术的发明密切相关，等等。

艺术的发展从来不是自成一统、曲高和寡、仅在象牙塔当中的，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思想、情绪，甚至民风的缩影。艺术其实和历史一样，包含了大量时代信息。

文艺复兴盛期的“游戏”被“打通关”之后，西方迎来了史称“巴洛克”的伟大艺术时期。在这一时期，美术、建筑、音乐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超级大师。

在进入巴洛克时期之前，其实有一个比较短暂的“过渡时期”，即16世纪后半叶的“矫饰主义”时期，是文艺复兴盛期后，艺术家们对新审美框架进行的摸索，只是还不够完善、“自洽”，所以不够被重视。

矫饰主义时期的作品在表现力上比较“满”，充满装饰性，有“矫揉造作”的气息。其精髓主要体现在“过度修饰”，甚至夸张到了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地步，这与文艺复兴以精确、典雅为基础的审美核心有了较为显著的差异，毕竟大师们已经把精确、典雅的“大路”走完了。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只好另辟蹊径，在尝试阶段难免走出一些“小径”来。米开朗琪罗在其后期的艺术作品中也展现出了很多矫饰主义的特征：戏剧性异常激烈、人物造型趋于极端化，例如西斯廷教堂墙面上的《最后的审判》（见C36），那是米开朗琪罗60岁以后的作品，来自教皇保罗三世的委托。

从1536年开始，米开朗琪罗花了5年时间完成这幅杰作。与西斯廷天顶《创世记》当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在《最后的审判》中明显有了更多极端的，甚至是扭曲的人物表达。《创世记》中人物形象的肢体动作无疑是更优雅自然的，而在《最后的审判》中，考虑到是“审判”这样属于基督教神学中最后的“大日子”，艺术家采用极端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样的紧张感和末日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的审判》中的“样式元素”不光表现在人物肢体的动作安排方面，也表现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如米开朗琪罗在画面中把自己的形象描绘成了一张“人皮”（E1a），以及地面上哪怕是已经化为白骨的人都要从坟墓中爬起来接受审判（E1b）。米开朗琪罗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据说画作完成的时候，教皇保罗三世竟在画作面前震惊得跪倒在地，或许是米开朗琪罗极具戏剧冲突的描绘方式让教皇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情不自禁地下跪想要祈求上帝的宽恕。



E1a↑

/

《最后的审判》（局部）

矫饰主义这种“妖娆”的文化现象，在当代也有迹可循。苹果公司推出iPhone 5S的同时，也推出相对便宜且五颜六色的手机，叫作iPhone 5C，但销量令人失望。其实这也可被看作一种工业设计上的“矫饰主义”。在乔布斯的设计框架下，苹果的产品一直走着高端典雅的黑白灰路线，新任领导者想必是要在设计上拓宽苹果的设计元素，所以从色彩变化以及平价入手，推出了5C手机，无奈在市场上受到重创，这十分类似于矫饰主义艺术的尝试。



E1b↑

/

《最后的审判》（局部）

矫饰主义时期，有四位画家值得铭记。他们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名作也不在少数，四人多少也和“文艺复兴三杰”有一些联系。其中一人便是帮助拉斐尔完成《米尔维奥桥的战役》的拉斐尔“大弟子”罗马诺。在完成了老师的“遗作”之后，罗马诺声名鹊起，成为意大利享有盛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是在意大利曼图瓦德泰宫的《巨人的陨落》（E2）。作品利用半球形穹顶做出了极多的夸张与变形，把壁画和穹顶画联系在了一块，达成“360度环幕观画效果”。这幅画描绘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战，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将泰坦巨人打败的场景。

蓬托尔莫是矫饰主义画家中使用色彩最为出奇的一位，代表作是《基督下

十字架》(E3)。作品中的用色展现出一种“水彩”感，明亮粉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用色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蓬托尔莫对于色彩的夸张、矫饰，甚至可以让人仅通过色彩就能判断出是他的作品。



E2↑

/

《巨人的陨落》(*The Fall of the Giants*) 朱里奥·罗马诺 (Giulio Romano) 直径约10m 湿壁画 1532—1534年意大利曼图瓦德 泰宫 (Palazzo del Te)

布龙齐诺是蓬托尔莫的学生，他在画中展现的矫饰主义精神主要依靠题材的怪诞扭曲，其代表作《维纳斯、丘比特，时间与愚神》(E4)。作品让人第一眼就感受到诡异，至少少许不适。画中的维纳斯拿着金苹果，她的儿子丘比特一边抚摸维纳斯的胸部，一边要去亲吻她，丘比特的身材比例也不似传统神话中的婴儿。整个画面主题错综复杂，甚至有些凌乱得让人不知主题为何，但又不得不承认，布龙齐诺的画工已算得上出神入化。从他对阴影的描绘，人物形象与肢体的摆放可以看出，布龙齐诺深得文艺复兴大师的真传。



E3↑

/

《基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蓬托尔莫（Pontormo）
 [雅各布·卡鲁奇（Jacopo Carucci）] 313cm × 192cm 板上油画 1526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 圣菲利西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Felicita）



《维纳斯、丘比特，时间与愚神》（*Venus, Cupid, Folly and Time*）布龙齐诺（Bronzino）[阿尼奥洛·迪·科西莫（Angnolo di Cosimo）]
146cm × 116cm 板上油画 约1546年英国伦敦 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来自帕尔马、人称“小拉斐尔”的帕尔米贾尼诺，年轻时就画技超群，被认为是拉斐尔的接班人。但帕尔米贾尼诺运气委实不佳，当他在罗马的艺术事业如日中天时，却遇上了“罗马浩劫”——自1527年5月6日始，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教皇克莱雷门七世（与发赎罪券的教皇利奥十世一样，来自美第奇家族）之间的矛盾，罗马遭受了帝国军队持续数天的洗劫。这对艺术、学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毁，罗马人流离失所。浩劫来临，帕尔米贾尼诺只得返乡，个人发展受到重创。帕尔米贾尼诺在矫饰主义方面的表现主要在于对人物肢体形象的扭曲。他的代表作《长颈圣母》中（E5），圣母的脖子、躯干、手指都超过正常长度许多，不符合人体比例。她怀中的圣子也身体过长，不是正常婴儿该有的比例。



E5↑

/

《长颈圣母》（*Madonna with the Long Neck*）帕尔米贾尼诺
（Parmigianino）[弗朗切斯科·马佐拉（Francesco Mazzola）]
216cm×132cm布上油画1534—154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

矫饰主义虽然不如文艺复兴那般持久灿烂，但这是一种可喜的文化现象。这恰恰说明，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功能性的了，否则，拉斐尔已经达到了顶峰，大家只要纷纷仿效拉斐尔，画

得和拉斐尔一样便是，为何还要追求艺术上的创新？矫饰主义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文艺复兴已经让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意识彻底觉醒。

（二）“太阳”与“月亮”

文艺复兴结束后，西方艺术进入了巴洛克艺术风格时期。“巴洛克”的原意是“不规则的珍珠”，来源于葡萄牙文的“barroco”。

巴洛克艺术时期没有明晰的划分标志，一般认为是从意大利伟大画家卡拉瓦乔的活跃时期，即1600年前后开始，一直到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去世的1750年结束，前后约150年时间。

其实很多风格、主义以及艺术时期的形容词都不是褒义词，甚至不是中性词，巴洛克亦然。巴洛克最早出自一篇评论文章，法国作曲家拉莫的新歌剧作品《希波吕托斯与阿丽西》上演后，法国的文艺评论杂志（《法国信使》，*Mecure de France*）刊载了一篇匿名的批评文章，说这部歌剧是“du baroque”——批评拉莫的音乐天花乱坠，没有重点，音符过多，有太多不必要的装饰。这是“巴洛克”这个词用来形容艺术风格的第一次亮相。

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诞生背景还是和天主教与新教之争有关。宗教改革在北方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天主教廷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也要有自己的宗教“运动”来与之抗衡。于是，南方掀起了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除音乐和绘画外，巴洛克风格最显著的体现实则在建筑领域，其开端间接是由教廷的会议规定出来的，尽管教会不叫它“巴洛克”。

1545年到1563年期间，天主教廷在意大利北部召开了特兰托会议，决定要对组织内部进行体制化改革，谋求自身进步，提升竞争力，从而应对新教徒给天主教廷带来的压力。这说明，当时新教的势力已然相当庞大，想要全面压制并消灭已无甚可能。会议决议产生的文件，算是新的“教义”，其中规定了新的教堂结构以及范式。

总体上，反宗教改革在艺术上的追求依然跟新教所提倡的克己复礼、清心寡欲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反对造型艺术，反对圣人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当中，反宗教改革就大力提倡造型艺术，要让基督的恩典、圣母的慈爱在造型艺术中获得更大的升华；宗教改革提倡自省与朴素的生活，上了天堂之后自然会有金碧辉煌的圣殿可供得救的信徒栖息，反宗教改革则要在人间把教堂建造得无比华丽，让信徒生前就能感受到天堂的幸福，要用神的手把信徒都拥抱在怀中。这再次显现了简约与繁复的对立，以及朴素与奢华的对立。

在反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天主教地区诞生了所谓的“耶稣会”，和之前提到过的方济各修道会一样，都是修会，耶稣会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男修会。与

方济各修道会以穷人以及平民为主体人群不同的是，耶稣会多由社会精英支持，如政府高层人士和贵族阶层等，这让耶稣会在调配人力、物力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明朝时期率先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成员。在实力雄厚的耶稣会推动下，欧洲又掀起了兴建恢宏教堂的狂潮。今天的罗马实际上是巴洛克式的罗马，众多教堂以及知名建筑都建造于16世纪末以及17世纪。

罗马的巴洛克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涡卷”，这种装饰风格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中并不多见。涡卷从建筑功能上来说只有装饰作用，并无实用功能。代表性的建筑有于1626年到1650年间，由耶稣会主持建造的以耶稣会创始人之一圣依纳爵命名的圣依纳爵教堂（E6）。赋予罗马的巴洛克建筑生命的，是建筑师中的“太阳”——贝尼尼。罗马，是贝尼尼的罗马。

贝尼尼是巴洛克建筑的集大成者，为后世留下了极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其代表作就是当时的罗马或者说如今的梵蒂冈的地标性建筑——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圣彼得广场（E7），广场本身及两侧的回廊（E8）均由贝尼尼设计。

圣彼得大教堂是在16世纪初期，由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主持建造，最早担纲设计总监的是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布拉曼特之后，拉斐尔也参与过设计方案的改进，最终是在米开朗琪罗手上定了下设计方案。到了贝尼尼，这座天主教世界的“第一教堂”才算真正定了形。

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中央矗立着一座青铜华盖（E9），也是由贝尼尼设计制作，极尽巴洛克装饰之能。



E6↑
/

圣依纳爵教堂（ Chiesa di Sant'Ignazio di Loyola ）乔万尼·特利斯塔诺
（ Giovanni Tristano ） 1650年意大利罗马



E7↑

/

圣彼得广场（ St. Peter's Square ） 济安·洛伦佐·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 梵蒂冈



E8↑

/

圣彼得广场回廊



E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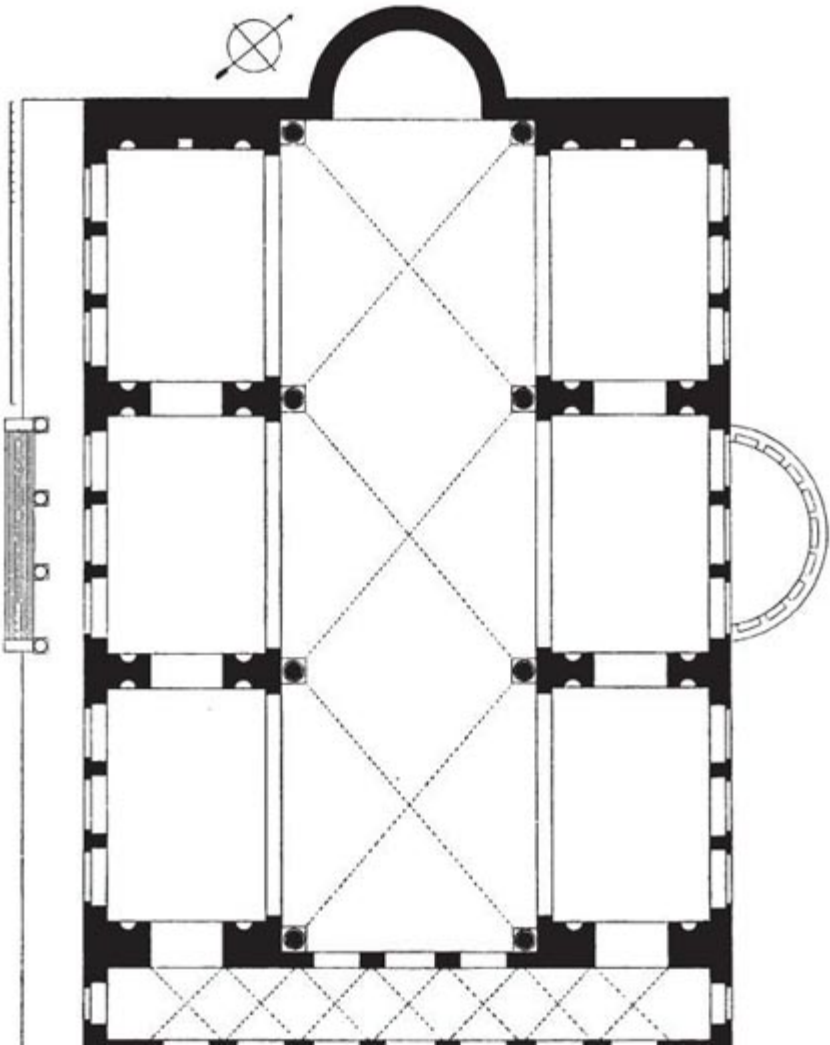
圣彼得大教堂青铜华盖

圣彼得本人的陵墓就位于华盖下方。这座青铜华盖有四根螺旋形铜柱支撑，花纹极其繁复。顶部装饰可谓美轮美奂，尽显巴洛克艺术的装饰性。这样一件作品，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件雕塑作品，还是一件室内建筑作品。

此处必须指出，传统教堂的设计大多采用所谓的“巴西利卡”结构，这种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传统的古希腊式神庙已经无法满足基督教的宗教需求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祀，并不需要广大民众在神殿内参与，但基督教的活动与之相反，例如主教对一众信徒的布道，需要教堂有剧院式的、能容纳足够多信徒的空间。巴西利卡式建筑正能满足这一需求。巴西利卡指的是宫殿，也就是当时的王宫。

巴西利卡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长方形（E10），图中是标准的巴西利卡俯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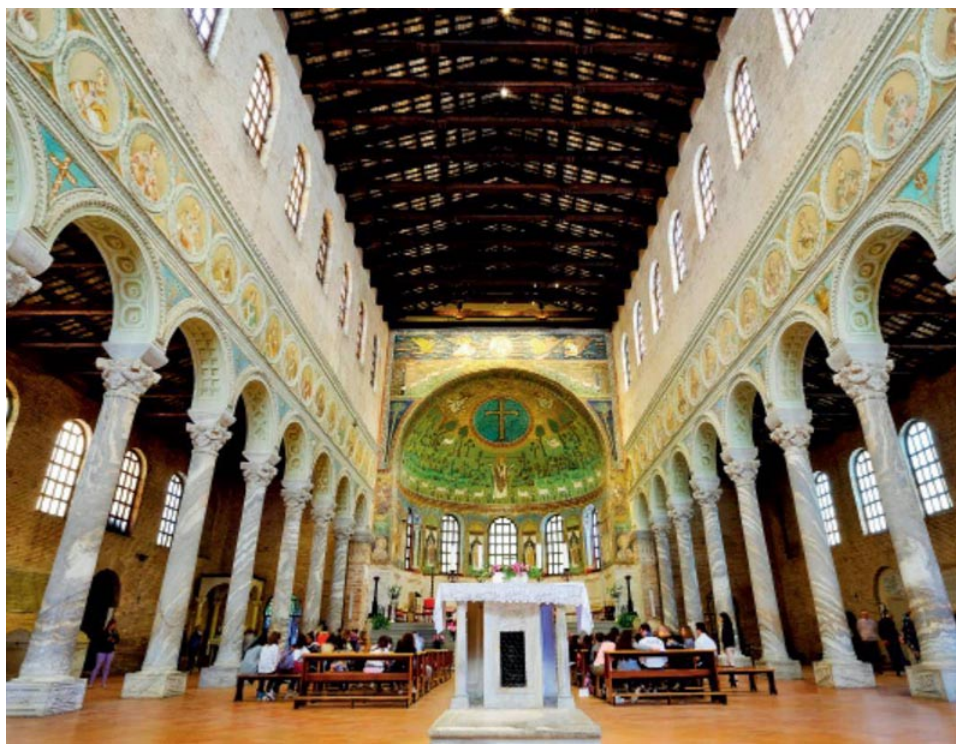
图，入口开在短边。例如圣维塔大教堂（E11），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沿海城市拉韦纳，主要结构分为中殿、后殿和侧廊三个部分。中殿相当于音乐厅的观众席，顶部是教堂的木制天顶。两边的侧廊是走廊（非正式区域），中间的过道是给神职人员走的。后殿是唱诗班、神父以及神职人员宣讲布道或做弥撒时的位置，类似于音乐厅的舞台，俯瞰下的后殿形状为半圆形（E12）。唱诗班和神职人员的布道在圆形的后殿发出声音，好比天上传来的神的声音。



E10↑

/

巴西利卡结构俯视图



E11↑

/

圣维塔大教堂室内意大利拉韦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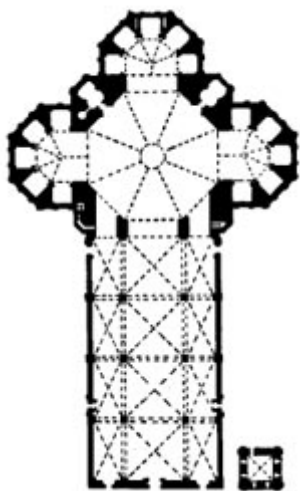
E12↑

/

圣维塔大教堂球形后殿意大利拉韦纳

布道和唱诗一般要站在圆形和顶点正中的位置，这样声音就会集中传向信徒所在的中殿，这可算是最早的扩音装置。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巴西利卡式教堂形成一个“十字”结构（E13），代表耶稣殉难的十字架，后来的主流教堂无一不是呈十字状结构。也有例外，如世界五大教堂之一的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E14/E15）。西班牙曾经被北非穆斯林摩尔人统治过一段时间，天主教逐渐恢复统治后，改造了很多当时的清真寺。再加上西班牙有很多犹太人，所以经常能看到“三教合一”的庙宇。塞维利亚大教堂就是由清真寺改造得来，内部的教堂结构虽然被改造成十字结构，但总体的外部轮廓并非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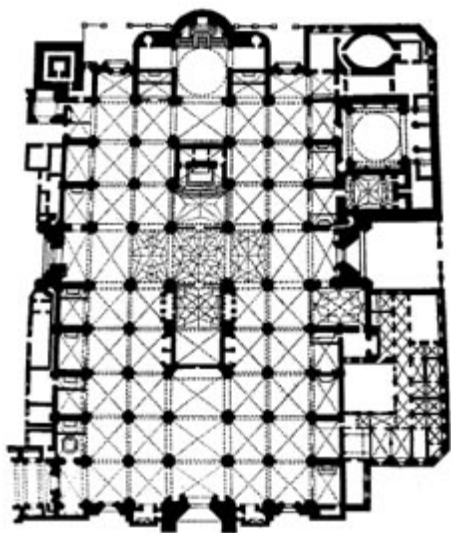
十字结构也分成拉丁教会的“拉丁十字”和希腊教会的“希腊十字”。拉丁十字的横竖两个方向长短不同，而希腊教会则是一个“正”十字。圣彼得大教堂的建造方案就经历了布拉曼特时期的希腊十字、拉斐尔时期的拉丁十字，最终米开朗琪罗确定的方案是给希腊十字加长一小截的方案（E16a/E16b/E16c）。



E13↑

/

圣母百花大教堂平面图



E14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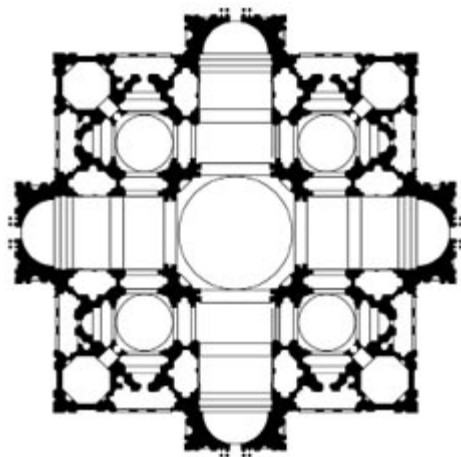
塞维利亚大教堂平面图



E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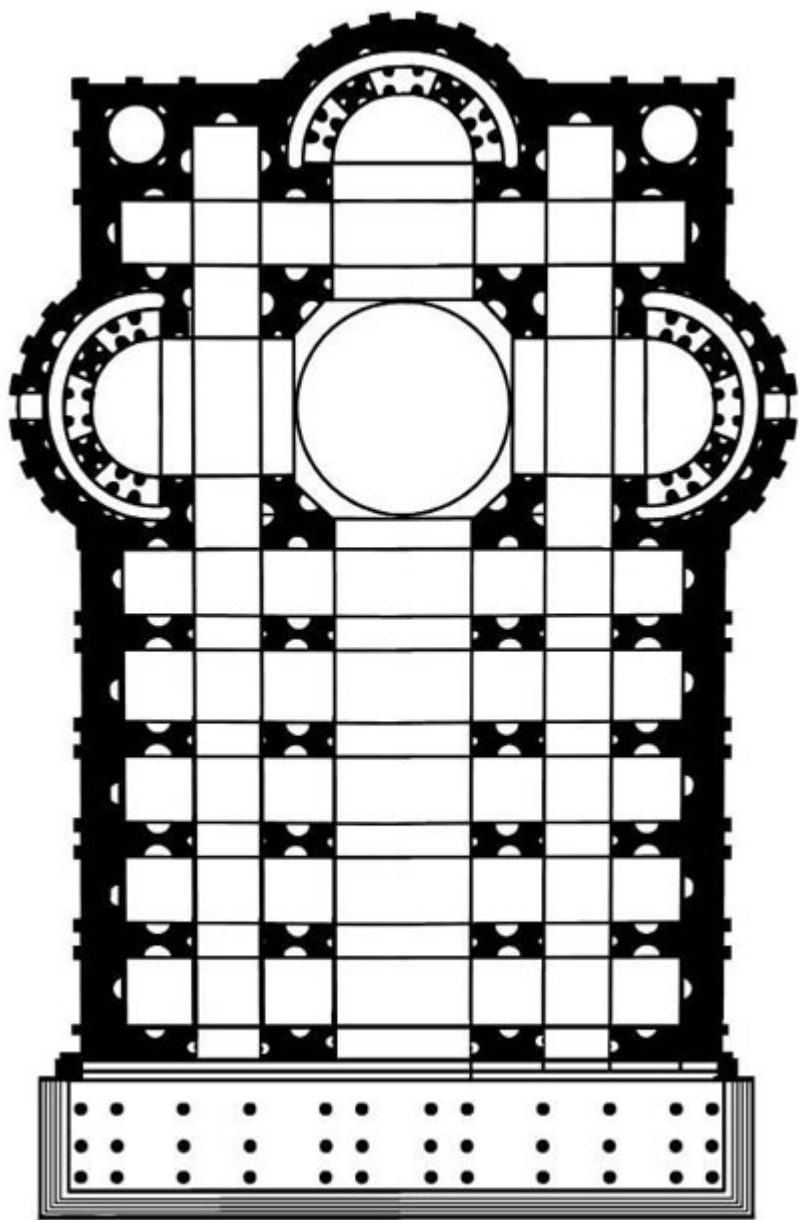
塞维利亚大教堂西班牙塞维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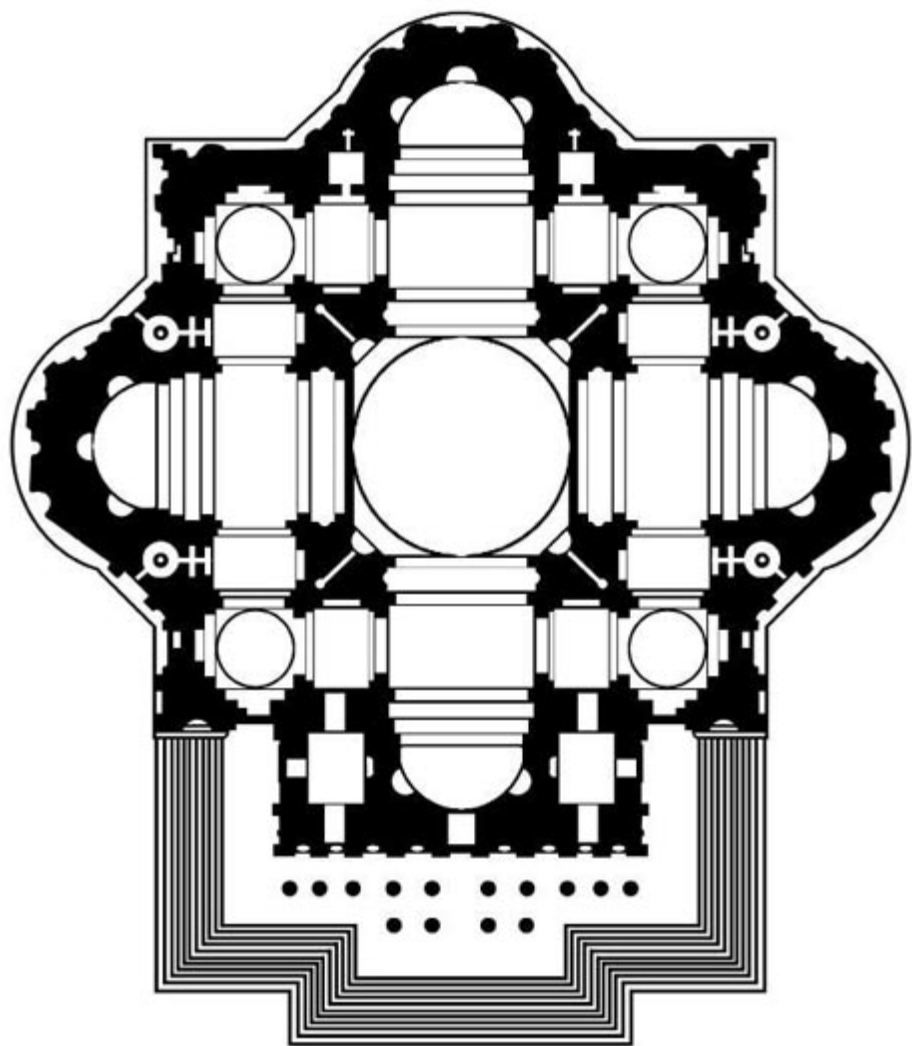
E16a↑

/

布拉曼特方案



E16b↑
/
拉斐尔方案



E16c↑
/
米开朗琪罗方案



E17↑

/

圣安德烈教堂平面图



E18↑

/

圣安德烈教堂 (Sant'Andrea al Quirinale) 济安·洛伦佐·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1670年意大利罗马

贝尼尼除了擅长处理宏大的建筑主题，在小的建筑主题上也别具一格。贝尼尼的晚期建筑作品有位于现在罗马的奎里纳莱街的圣安德烈教堂。这座

教堂实际上面积很小，由于施展的空间不大，所以贝尼尼就打破了传统教堂的十字平面结构，采用了椭圆形的平面结构（E17），把教堂的正门开在了椭圆形的长边（E18），尽管教堂的深度不够，但依然气势恢宏。这座教堂是贝尼尼最满意的作品，堪称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巅峰杰作。

那个时期的艺术家通常都是全才，贝尼尼也不例外。贝尼尼是一个标准的建筑、雕塑、绘画“三栖艺人”，被称为“雕塑界的莎士比亚”。在贝尼尼的时代，很难找到一个在雕塑艺术方面与之成为二元对立的艺术家，就如同米开朗琪罗在文艺复兴盛期一样。如果非要找一个的话，贝尼尼和米开朗琪罗倒是可以隔空对话，构成整个古典雕塑界的“二元对立”。米开朗琪罗的雕塑风格象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与永恒，贝尼尼的雕塑风格象征着巴洛克时期的律动和瞬间。

在雕塑艺术上，相比于永恒，贝尼尼更喜欢抓取瞬间。以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文艺复兴雕塑作品大多是安静、恒定的状态。贝尼尼则反其道而行之，喜欢捕捉人物瞬间的姿态、表情和情感。贝尼尼最出名的雕像之一是摆放于罗马胜利圣母教堂内的《圣特蕾莎的狂喜》（E19a/E19b）。



E19a↑
/

《圣特蕾莎的狂喜》（*The Ecstasy of St. Teresa*） 济安·洛伦佐·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真人大小大理石雕塑1645—1652年意大利罗马
胜利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



E19b↑

/

《圣特蕾莎的狂喜》（面部）

这座雕像展现的是一位叫特蕾莎的修女（死后被天主教封圣），梦见自己被神的箭矢刺穿心脏，感受到了一种幸福的痛苦的场景。这座雕像由半躺着的修女形象与手拿箭矢的天使形象组合而成，修女在飘浮上升中，似乎即将进入天堂。在这件作品中，贝尼尼极为注重人物表情的刻画，雕塑中的修女表情极不平静，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文艺复兴雕塑作品的人物面部大多没有太多表情，显得从容，这恰恰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对于永恒的追求，就好像你拍证件照的时候表情丰富的话，想必拍不出合格的证件照，要面无表情或有极小的微笑才算合格。



E20↑

/

《大卫》（*David*）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高170cm
大理石雕塑1623—1624年意大利罗马博尔盖塞博物馆（Borghese Gallery
and Museum）

这位修女嘴唇开启，显示出充满享受的喜悦，眉心则展现出被箭矢贯穿心脏的痛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中，衣服的褶子都是下垂且硬朗的状态，但贝尼尼对修女裙摆褶子的刻画则是大波浪曲线，天才地展现出修女是处在半空、失重的状态。这在传统美学中被解读为贝尼尼巴洛克风格对裙摆的加工与夸张想象，是为了增加雕塑的戏剧冲突效果。理性分析，这种褶子其实是一种极为真实的刻画。因为裙摆在失重情况下的确应该是蓬松、柔软的状态。但考虑到贝尼尼那个年代的科技水平，他不太可能观察到真实失重状态下裙摆褶子的情景。唯一可能帮助贝尼尼想象的，应该是模特穿着裙子泡在水中的形象。由于浮力的关系，可以展现出接近失重的状态。猜测准确的话，贝尼尼为了表现出“瞬间”下了不少功夫。

贝尼尼描述瞬间的另一尊代表作是《大卫》（E20）。

《大卫》是基督教经典题材，不仅米开朗琪罗创作过，被称为文艺复兴雕塑之父的多纳太罗也做过两尊（E21a/E21b）。

贝尼尼的《大卫》描绘的是少年大卫紧紧地抵住嘴唇，正铆足了全身力气弯下腰准备发射弹药的瞬间姿势，从头部到脚的连线和两条手臂构成的连线，使整座雕像刚好构成一个斜着的十字形，支撑住了整尊雕像。这种不稳定的斜对角构图充满动感和戏剧冲突，仿佛下一秒大卫就会将手中的石块投掷出去。贝尼尼雕刻《大卫》时才二十出头，若是让29岁创作了《大卫》的米开朗琪罗看到了贝尼尼的大作，他会不会也感叹一声：后生可畏！



E21a↑

/

《大卫》（*David*）多纳太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 高191cm大理石雕塑1408—140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Bargello National Museum）



E21b↑

/

《大卫》（*David*）多纳托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 高158cm青铜雕塑144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Bargello National Museum）

从贝尼尼的雕塑作品中，可以总结出巴洛克时期艺术的特色：在意动态和对比，喜欢抓取瞬间，要用坚实永恒的磐石刻画最为柔软的瞬间。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和冲突，之后在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当中也随处可见。

柔软是一种触觉，很难直接用大理石这样的坚硬材料直接表达出来，贝尼

尼的表达方式是抓取触摸的瞬间。他有一尊最著名的雕塑，现收藏于罗马博尔盖塞博物馆中，叫作《哈迪斯诱拐佩尔塞福涅》（E22a）。

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经典桥段：佩尔塞福涅是丰收女神德墨忒尔非常宠爱的女儿。无奈佩尔塞福涅被冥王哈迪斯看中，被绑架到冥界，做了哈迪斯的冥后。德墨忒尔四处奔走，请来宙斯做主，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年四季中有一季佩尔塞福涅要去冥界陪冥王，其他三季可以回到母亲身边。于是在女儿离开的那个季度，丰收女神极为悲伤，无心工作，原本四季如春、季季丰收的大地则在这一季陷入寒冬，颗粒无收。



E22a↑

/

《哈迪斯诱拐佩尔塞福涅》（*Rape of Proserpina*） 济安·洛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高225cm大理石雕塑1621—1622年意大利罗马博尔盖塞博物馆（Borghese Gallery and Museum）



E22b↑

/

《哈迪斯诱拐佩尔塞福涅》（局部）

在作品中，贝尼尼刻画了冥王双臂环绕美貌的少女，要劫走她的瞬间。在表现佩尔塞福涅吹弹可破的肌肤时，贝尼尼让冥王的手指掐进凹陷了的少女肌肤，这成了这尊雕像的点睛之笔（E22b）。

这又展现出巴洛克风格的另外一个宏观特点：把对立的元素在画面当中进行高度的融合以及统一。如贝尼尼用坚硬表达柔软，卡拉瓦乔用黑暗表达光明，巴赫用复杂表达空灵，等等。

除传统雕塑外，贝尼尼还创造了一种新型雕塑形式：园林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通常以独立作品的形式存在，纯粹为了观赏与装饰。而园林雕塑除了观赏性、艺术价值，也有一定功能性。贝尼尼最具代表性的园林雕塑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四河喷泉》（E23），泉水从雕塑中流淌而出，在具备功能性的同时，又有着雕塑艺术的观赏性。



E23↑

/

《四河喷泉》（*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济安·洛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647—1652年意大利罗马

这座喷泉也富有深意：喷泉与雕塑展现的“四河”分别代表非洲的尼罗河、亚洲的恒河、欧洲的多瑙河以及美洲的里约·德·拉·普拉达河，再加上最上方的方尖塔，象征着耶稣的荣光遍布全世界。

贝尼尼在绘画方面的成就虽然也算不俗，但与他在雕塑及建筑上的造诣相比，可以按下不表。从贝尼尼在整个巴洛克时期建筑和雕塑的影响力上看，他是当之无愧的“太阳”，用艺术的万丈光芒，照耀着欧洲大地。

在建筑方面，贝尼尼一生的对手是博罗米尼。如果说贝尼尼的建筑风格是耀眼的阳光，那么博罗米尼的建筑风格则是动人、柔美的月光。

博罗米尼是最为著名的巴洛克建筑大师之一，几乎与贝尼尼齐名。博罗米尼的作品在建筑线条卷曲、复杂程度上更胜贝尼尼一筹。他的建筑作品充满了诗意的变化和意外的灵感，个性十足，如果没有博罗米尼的建筑作品，巴洛克时期的建筑恐怕要缺失不少想象力。

两人的人生轨迹以及个人性格都极为对立。贝尼尼性格开朗自信、风流倜傥，再加上年轻时得到红衣主教博尔盖塞的支持，在他25岁时，就接到了来自巴贝里尼家族的新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召见，进驻梵蒂冈为其服务。一路走来，贝尼尼春风得意。博罗米尼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虽然最早的时候两人都在巴贝里尼宫服务，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抢订单”的竞争对手。博罗米尼性格忧郁内向，经常与委托人因为订单需求而发生纷争，毁约拖延情况屡见，最后甚至自杀身亡。贝尼尼一辈子顺风顺水也与他拥有拉斐尔一样人见人爱的性格有关。据说贝尼尼不仅对上级恭顺，对朋友友善，哪怕对学生也是和蔼可亲。这就与博罗米尼的性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似乎在外表上，博罗米尼也相较丑陋，贝尼尼则是英俊潇洒。



E24↑

/

圣卡洛教堂（Chiesa di San Carlo alle Quattro Fontane）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638—1667年意大利罗马

两人性格上的迥异也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建筑风格上。博罗米尼最具代表性的教堂作品是坐落在罗马的圣卡洛教堂（E24），恰巧与贝尼尼最后的圣安德烈教堂在同一条街，相隔还不到一百米。贝尼尼的教堂在博罗米尼的教堂建成后才建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贝尼尼在向他的老对手致敬。只是对比两座教堂的立面，就能感受到二者在设计理念以及审美倾向上的强烈反差。贝尼尼的总体风格是周正的、华丽的，博罗米尼的建筑则会给人剑走偏锋的感受，就连立面也要做成波浪形。

如果用音乐来类比二者的建筑风格，贝尼尼的建筑是光辉华丽的大调音乐，博罗米尼就是曲折婉转、充满忧郁色彩的小调音乐。

博罗米尼对几何有着深入的研究，这体现在对圣卡洛教堂天顶的设计上。博罗米尼用巧妙的方式，将八边形、六边形和十字架的形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了无缝过渡，并铺满整个天顶（E25），给人以炫目的新奇感。相比之下，贝尼尼的圣安德烈教堂天顶则显得单调了些，单纯用雕花极为繁复的六边形单元将天顶铺满（E26），单刀直入。博罗米尼在追求多变性上比贝尼尼更多了一份巧劲。



E25↑

/

圣卡洛教堂天顶



E26↑

/

圣安德烈教堂天顶

博罗米尼还喜欢在建筑中卖弄一些小技巧来进一步增加整个建筑物的多变性。在圣卡洛教堂中，阳台围栏柱子的摆放很特殊，相邻的花瓶状的柱子会上下颠倒，形成相间交错的效果。



E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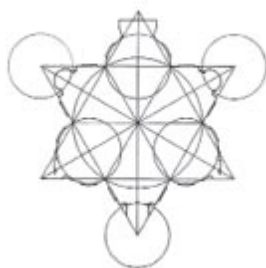
/

圣伊沃堂（Sant'Ivo alla Sapienza）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660年意大利罗马

博罗米尼的另外一件建筑作品也十分著名，是距离罗马万神庙不远处的圣伊沃堂（E27）。这座教堂完全颠覆了传统教堂应该有的十字架结构，是一座正三角形平面的教堂，整座教堂像是以三角形的塔顶为中心，旋转着向上建造而成的。这种三角形的造型也代表基督教核心的“三位一体”理念（E28a/E28b）。

如果不用一种整体的审美观来看待博罗米尼的建筑作品的话，难免会觉得他是一个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曲线而曲线，喜欢用奇技淫巧来哗众取宠的建筑师。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博罗米尼的建筑不会展现出一种建立在复杂以及卷曲基础上的高度统一感。博罗米尼是从理念上把建筑看成了一件雕塑品，正因秉持这样的观点，在他眼中，墙面、柱子等元素就不仅仅具有功能性，更具有装饰性，这些零部件实际是这座建筑雕塑整体的一部分。平面的墙体自然是最具建造效率的；柱子只是柱子的话，当然直的最

好用。但当它们成为建筑物这尊“雕塑”的一部分时，局部的部件就要服从整体的造型趋势。如果整体需要成为一座具有流动感的雕塑，则墙面和柱子都要配合着流动起来，那波浪形的立面也就不难理解了，适度地“矫饰”也变得尤为重要。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博罗米尼的建筑作品虽然复杂，曲线甚多，但是并不让人觉得冗余过分。



E28a↑

/

圣伊沃堂平面图



E28b↑

/

圣伊沃堂天顶

（三）圆顶与尖顶

在古代欧洲，一个地方无论再小、再穷、再偏僻，最高、最核心的建筑一定是当地的教堂，城镇的各种机关、设施也是围绕教堂所建。如果单看欧洲的教堂，总体可以分为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尖顶的教堂，一种是圆顶的教堂。

著名的尖顶教堂，有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E29）、德国的科隆大教堂（E30）、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斯蒂芬大教堂（E31）、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等。圆顶的著名教堂，有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E32）等。尖顶教堂是所谓的“哥特式”教堂，而圆顶教堂主要是文艺复兴式以及巴洛克式的教堂。



E29↑

/

米兰大教堂（Duomo di Milano）高103m 1386—1813年意大利米兰

提到哥特风格，出现在脑海中的形象通常都有些“暗黑”。恐怖、超自然甚至颓废等元素都与“哥特”相关，如哥特音乐、哥特文学、哥特式妆容等等。这种刻板的认知其实是对哥特建筑的巨大误解。

哥特风格起源于11世纪的法国建筑，可以被认为是早于意大利的、属于北方地区的文艺复兴萌芽，是建筑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哥特建筑这种尖顶的建筑风格，一开始并非建筑师艺术审美上的偏好，而是建筑技术的天然

走向。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国，开启了英国历史上诺曼王朝的统治，直到1154年才由金雀花王朝和平接管。威廉成为英国国王之后，大兴土木，要建造大量教堂建筑。前文提到，最早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屋顶都是木制，木质结构容易失火，在庄重感上亦有所欠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诞生的是诺曼建筑（又名罗曼建筑，E33）。



E30↑

/

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高157m1248—1880年德国科隆



E31↑

/

斯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高136.7m1160年奥地利维也纳



E32↑

/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克里斯多夫·列恩 (Christopher Wren) 高111m 1675—1710年英国伦敦



E33↑

/

诺曼风格建筑

在中世纪的一千年中，古罗马的混凝土技术已经失传，人们根本无法再建造出罗马万神庙那样完美的球形穹顶。诺曼建筑的设计者们想出了所谓“肋拱”的技术，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先搭房梁骨架，再用轻材料把屋顶填满”的办法。这种做法替代了木质屋顶的落后结构。

诺曼建筑是哥特建筑的前身。哥特一词是意大利人发明出来专门形容这种建筑风格的名词，跟“巴洛克”一样，也是贬义词。当年北方的日耳曼人入

侵罗马帝国导致了西罗马的灭亡，并建立东哥特王国以及西哥特王国，“哥特”是北方日耳曼人中的一个部落，是意大利人揶揄北方人土气的说法。

至此，现代建筑思想已然从诺曼建筑身上显现。盖房子的思路中，最直接的就是简易的平房思路：用砖块一层层地叠加上去。但是现代建筑的思路，是用钢筋搭“骨架”，再用混凝土浇筑，把建筑的“肉”填上去。哥特建筑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接近现代化建筑的思想。

哥特建筑把诺曼建筑的“先用立柱肋条搭框架，再填入轻材料”的思想应用到了整栋建筑上。不仅屋顶，连墙壁也用这种方法建造，因此，哥特建筑的墙壁不需要太多厚重的砖石，甚至可以用巨大的玻璃代替大面积的墙壁。现代的摩天大楼，不正是用全玻璃结构包裹整栋大楼吗？

哥特建筑的外形特点是尖拱以及飞扶壁。塔尖越高，似乎就越接近上帝，这确实是一种宗教上的审美选择，但前提是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但屋顶造得过高也会有问题——屋顶过重，向两边施加的侧推力太大，不够稳固。飞扶壁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来说，可以把它们想象为从地里长出来的多条手臂，去扶住墙体，用来承受屋顶太高所带来的侧推力（E34）。

哥特建筑的内部特点是，可以在房顶和墙壁上看到很多“肋条”（E35）。

由于多采用大面积玻璃，哥特教堂内部给人的感觉非常通透。哥特教堂与古罗马教堂相比，给人截然不同的视觉体验。古罗马时期的教堂非常敦实，给人保守、像安全堡垒一样的感觉（E36）；哥特式的教堂则很轻盈，光线通过彩色玻璃穿透进来，内部色彩通透斑斓，就好像《圣经》中所描绘的天堂场景一般，让信徒仿佛置身基督的怀抱。



E34↑
/
飞扶壁



E35↑
/
哥特建筑内部



E36↑

/

比萨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迪奥蒂萨尔维（Diotisalvi）高
54.86m1363年意大利比萨

哥特建筑会给人阴森恐怖的感受也不是不能理解。远看哥特建筑，刺猬一般的外形，加上拔地而起的飞扶壁群，像极了一具横卧在地上的骷髅。

如果不是混凝土技术失传了，可能哥特建筑根本不会出现。因为罗马的万神庙一直以来都是古典建筑审美中最崇高的完美范式：古希腊式的额枋与立柱，再加上球形的巨大穹顶，直径达43.5米。穹顶顶部中心镂空，光芒从穹顶当中直射下来。当时的人们坚信天堂的构造就是完美的球形，这样的穹顶放在教堂顶部，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象征天堂呢？可惜造不出来！北方的法国人等不及了，于是率先创造出了哥特建筑。

意大利不向“野蛮的”哥特风格低头，一直到15世纪初，一名“业余”建筑师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第一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

如今去到佛罗伦萨，不论你从什么方位前往、从什么角度观赏或眺望，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又名佛罗伦萨大教堂，E37）的穹顶。



E37↑

/

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穹顶直径42.2m，高106m1296年—19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世界五大教堂之一，无论从造型、色彩以及内部装饰等哪一方面来看，圣母百花大教堂都透着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独有的得体、淡雅以及适度的高级美感。

但这座举世闻名的教堂在建成封顶之前，当了一百多年不折不扣的“烂尾楼”，原因是教堂穹顶的设计直径太大，导致建造难度巨大。最终，由布鲁内莱斯基建成的穹顶直径达到了42.2米，几乎可以比肩万神庙，是自古罗马时代以来穹顶建筑的一个巨大进步。

圣母百花大教堂最初的设计者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以及雕塑家阿诺尔福·迪·坎比奥。在15世纪，意大利境内是城邦林立，各自为政。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主教堂。佛罗伦萨边上就是教皇国和锡耶纳共和国，就连比萨斜塔所在地的比萨都还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属地。在那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年代，城邦之间不仅会时不时发生小规模战争，还会比拼形象工程。一座主教堂的规模直接影响了—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的主教堂如果不够气派，就会侧面反映出该国的国力羸弱。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一座主教堂对—个国家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没有现代建筑科技，建造教堂费时费力，工期动辄

几十年，再加上不断地装饰、修整，耗时达到百年以上也不稀奇。

各国在教堂的建造上攀比归攀比，但也有几条约定俗成的共识。首先，不能抄袭他人创意。15世纪初期，北方的哥特风格风头正劲。但意大利人一向看不上北方人的野蛮，所以哥特风格他们瞧不上。第二，规模一定要大。用来判断教堂是否优秀的一个标准就是教堂的大小，越大越厉害。第三，在施工过程中不能出严重事故，例如设计好的教堂，盖到一半由于设计缺陷没盖起来，或者盖到一半倒塌，这种事故如果出现，国家就会颜面尽失。

想必设计师坎比奥非常清楚，自己是个设计者，教堂的建造肯定不用亲力亲为，因此不用太考虑施工难度。所以他干脆放飞想象力，把设计做得足够宏大、雄伟。很明显当时的执政者也缺乏基本的建筑常识，居然批准了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1296年，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圣母百花大教堂，一直到布鲁内莱斯基拿到穹顶委托的时候，教堂一直没有封顶。穹顶的建造难度主要在于直径太大、高度太高，且不说找不到合理的承重结构让穹顶跨出这么大的距离，这样的高度要把相当数量的材料运送上去都极为不易。当时的技术根本没有办法建造横跨40米以上距离的穹顶。

搁置了那么多年，据说当时佛罗伦萨人都放弃希望了，但执政者依然很坚持，因为这象征着国家的形象。佛罗伦萨，这个在当时代表着主流的共和国，主教堂长期不封顶，遭到周边国家耻笑还自罢了，毕竟当时通信也不发达，关键是象征国家形象的建筑一直半吊子，甚至会影响自己国民的信心，国家凝聚力恐怕会下降。

布鲁内莱斯基通过1418年的一次竞标比赛获得了穹顶的建筑资格。布鲁内莱斯基并不是一个专职的建筑师，他是一个金匠。值得一提的是，跟他竞标的另一位也是金匠，叫吉贝尔蒂。在上一次的竞标比赛中，是吉贝尔蒂赢得了佛罗伦萨洗礼堂北门青铜门扉的装饰项目委托，两人是一生的竞争对手。最终参加竞标的竟然是两位金匠，看来当时的专业建筑师都深知这项工程的难度，通通袖手旁观。你会发现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干成划时代大事的人常常是外行，因为被传统框架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士，往往无法冲破自身的思维定式，用创新的办法解决问题。

为了完成任务，布鲁内莱斯基还专门去了一趟罗马采风，研究万神庙。研究完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万神庙，真的是盖不出来了……但他发明了一套折中的办法。

布鲁内莱斯基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哥特”加“罗马”。简单

来说，就是学习哥特建筑的做法，先用肋条把圆形拱顶的轮廓搭出来，再用轻质的材料把空隙填满。用哥特建筑的技术基础，搭出罗马万神庙式的球形穹顶造型。

如此巨大的穹顶，重量也非同小可，非一般哥特式尖顶的重量可比。为了减轻穹顶的重量，布鲁内莱斯基采用了“空心拱”的办法，让大教堂的穹顶变成内外两层，中间留空。这样做大大减轻了穹顶施加给周围墙体的压力，而且空心拱中可以架设平台和楼梯，人可以从中间通过，检修也相当方便。但即便如此，穹顶的重量依然不小。这个问题如果让哥特建筑师来解决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后殿的外墙架设一圈飞扶壁。但是不要忘了，哥特元素是被佛罗伦萨反对的，而且飞扶壁这种略显张牙舞爪的设计，确实不符合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得体、适度的审美追求。布鲁内莱斯基想了一个办法，他在空心拱内部，用石头和铁链给八条肋条加上了几圈“紧箍”，把穹顶的八角形结构牢牢束缚住，由此缓解了穹顶施加在侧墙上的压力，省去了造飞扶壁的麻烦。

整个穹顶的建造过程耗时30年，布鲁内莱斯基花了16年时间盖完了穹顶，后来14年的时间花在了穹顶上方采光室的建造上（E38）。这个采光室会花那么久时间据说和当时的资金状况有关。可惜的是，直到去世，布鲁内莱斯基都没有看到整个采光室建成。

布鲁内莱斯基在建造穹顶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设计图纸，所有的方案都在他的脑子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布鲁内莱斯基害怕别人剽窃他的方案，可见布鲁内莱斯基在几何学、结构工程学和数学上的造诣是多么惊人。

圣母百花大教堂的设计方案以及最终造型奠定了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基础，而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穹顶更是意义非凡，此后的教堂，在修建圆顶时采用的都是类似的方案。米开朗琪罗在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穹顶时所采用的是16条石制肋拱的方案。据说他还故意把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直径限制在42米，比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直径短一点点，由此遥相致敬布鲁内莱斯基，以他为尊。由布鲁内莱斯基开始，欧洲人尤其是南方人，又可以再次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圆顶了。这与北方的尖顶哥特建筑正式地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建筑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施工过程中，布鲁内莱斯基还发现与发明了很多“副产品”。比如他偶然地发现了透视法原则，并把透视法教给了自己的朋友，前文提到的马萨乔，这才有了统治古典绘画几百年的透视法。再比如为了能够更好地运送建材，布鲁内莱斯基发明了类似于现代起重机的吊车装置。

实际上，如果布鲁内莱斯基不去造穹顶，那么“文艺复兴雕塑之父”这个称号也不知是否会就此易主。布鲁内莱斯基与雕塑之父多纳太罗是好友，有一次多纳太罗收到订单，对方委托他做一尊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的雕塑作品。雕塑完成后，多纳太罗邀请布鲁内莱斯基前来参观，但布鲁内莱斯基看完后只是不痛不痒地夸赞了几句。多纳太罗是个急性子，便立刻追问，于是布鲁内莱斯基直言多纳太罗这尊基督的形象不像一位神明，而像一名山野村夫。多纳太罗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揶揄，当即反唇相讥，大意就是“你行你上啊”。结果布鲁内莱斯基果真不声不响地也做了一尊同样主题的雕塑摆在家中，但秘而不宣。直到有一天这两人约好去布鲁内莱斯基家中聚会，据说是在买好了菜一同前往布鲁内莱斯基家的路上，布鲁内莱斯基借故说还有东西没买，让多纳太罗先去他家。这自然是要让多纳太罗在不尴尬的情况下自己感受两人在雕塑艺术上的差距。等到布鲁内莱斯基“买完东西”回家时，他看到多纳太罗错愕地把鸡蛋撒了一地，因为多纳太罗已经被眼前的作品深深地震撼了。这时，多纳太罗转而对布鲁内莱斯基说：“你说得对，我做的耶稣是山野村夫。”（E39/E40）



E38↑

/

圣母百花大教堂采光室



E39↑

/

《基督受难》（*Crucifixion*）多纳太罗（Donatello）[多纳托·迪·尼科罗·迪·贝托·巴尔迪（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 173cm×168cm木雕1406—140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



E40↑

/

《基督受难》（*Crucifixion*）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尺寸不详木雕141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Basilica of Santa Maria Novella）

06 伦勃朗与鲁本斯：巴洛克绘画艺术

（一）“黑暗”与“光明”

17世纪，进入巴洛克艺术时期，绘画艺术在欧洲已经逐渐铺开，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传统深厚的意大利和尼德兰地区继续引领潮流。当时，尼德兰南部的佛兰德斯地区，大约在今天比利时的位置，分立出来，是为天主教领地。而尼德兰的北部地区，大约在今天荷兰的位置，是新教领地。不过，自古以来佛兰德斯这块土地的统治问题就没有算清楚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甚至海峡对面的英国都要插一手。

除了意大利和尼德兰地区，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艺术方面也都大放光彩：西班牙逐渐摆脱阿拉伯艺术的影响，在文艺方面迎头赶上；法国逐渐建立起了以王室为主导的学院绘画体系；英国也通过重新塑造的王室形象来奠定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总之，巴洛克艺术时期的欧洲绘画界很是热闹。

首先，画家们的技巧都更为纯熟——透视正确、解剖到位；其次，油画更普及了，蛋彩画大致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对于不同画派之间的比较，几乎可以忽略画家基本功这个维度，直接从艺术表现手法的层次上来讨论其中的风格差异，巴洛克时期的绘画艺术已然进入了专业人士竞技的领域。

从大的题材上来说，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主题依然是围绕“反宗教改革”展开的。

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的宗教主题画作主要体现的是神性典雅的一面：耶稣、圣母慈爱圣洁，圣徒们睿智且乐于奉献。至于观者是否被感染，变得更爱基督，几乎全凭自觉自愿。对于“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来说，这样“愿者上钩”的态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宣传需求。绘画艺术一定要“主动出击”，要用一双双充满感染力的艺术之手，捧着观画者的脸庞，端到画作面前，接受画中神圣人物的诘问。落实到表现形式上，就要求绘画的内容要生动，要充满戏剧性，画面要有视觉冲击力，使观画者获得强烈的宗教体验。在这方面，全意大利做得最出众的当属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的绘画风格教科书般地展现了巴洛克时期绘画的特点。首先，追求强烈的明暗对比。这是一种专门的作画技巧，叫作“明暗法”，首见于文

文艺复兴时期。明暗法的原理是，先考虑整个画面是一团漆黑的，然后将一束光从某一个方向打过来把事物照亮。简单来说就是把暗的地方画得更暗，亮的地方画得更明亮，这有助于展现事物的立体感。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都是“光天化日”，那么这种使用明暗法的创作手法，则在画作当中用到了所谓“布光”设计：要充分考虑光线是从何角度照射过来。这样的做法，不仅使描绘对象有了更强的立体感，更对营造画面的戏剧性氛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相比，这种创作方式显然是一种更“有重点”的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几乎会事无巨细地把人物及周围环境全部画下来，就好像一个摄影师对着一处场景按下了快门，然后把照片里拍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给你看。卡拉瓦乔则选用了“抓重点”的做法——把他最想表达的地方突出给你看，就像一个会好好聚焦且热爱浅景深的摄影师。艺术并不只是一味显示构图有多精妙、刻画有多精细、勾勒有多准确，还要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这一点上看，卡拉瓦乔的做法，相较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创作理念上的一种进步，显示出他对于艺术任务的认知更加成熟。

同时，这种对比强烈、明暗分明的做法也更符合人眼的观察方式。人眼的观察方式本来就有重点，只能聚焦在一处，不被人眼聚焦的地方，是人眼余光所观察到的部分。如果画家事无巨细地把画面中所有事物都刻画得极为细致的话，我们除了感叹画家技巧的精湛，久而久之，从观感上会感受到一种“凌乱”。

卡拉瓦乔对明暗法的大规模使用，其实很好地满足了反宗教改革所需要的“金刚手段”。他向我们展示出，想要表现一个主题，除了正面的歌颂，反面衬托也许是更好的方式。

卡拉瓦乔明暗法的代表作是陈列在罗马圣王路易堂的布上油画《圣马太蒙召》（F1）。



F1↑

/

《圣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卡拉瓦乔（Caravaggio）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343cm×323cm布上油画1600年意大利罗马圣王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i）

这在《圣经》中是非常经典的故事。圣马太原本是古罗马帝国的税吏，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中，这是攫取人们血汗的邪恶职业。但圣马太在基督的感召下，最终成为圣人，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圣马太被耶稣感召的瞬间。整幅画作几乎沉浸在黑暗之中，右上方一道光线照射进来，映在众人脸上，伴随着光线而来的，是身处最右方头顶有光的耶稣。与耶稣一道的是光着双脚、衣着朴素的圣彼得。左边桌子围坐着的五个人，都是相关的税务人员，像是在数着桌子上的银圆。他们衣着光鲜，紧跟潮流，代表着世俗，与右边的圣彼得形成鲜明对比。左边五个人的脸，都被这道圣光照亮，展现了“天启”的瞬间。

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借鉴，耶稣向众人伸出的手与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记》中上帝向亚当伸出的手极为形似。如果是借鉴《创世记》中“上帝之手”的话，这层寓意就更为深刻了：上帝对亚当伸出的手是人类第一次被“天启”；现在，耶稣又向人类第二次伸出了手，这是在人类因为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接受的又一次“天启”，象征着耶稣代表上帝赦免了人类的罪。

在这幅画里，关于谁是圣马太是有争议的。较为主流的说法是左数第三个长着大胡子的人。理由有几个：第一，沿着右边照射进来的圣光方向看，这个大胡子形象处在圣光的中心；第二，在卡拉瓦乔另外两幅画作《圣马

太殉难》与《圣马太的启示》当中，圣马太的形象都有大胡子；第三，画中大胡子的手似乎是指着自己在问耶稣：“是我吗？”另一种不太主流的说法是，左边那个低着头数钱，并没有看向耶稣的人是圣马太，主要的理由是，很明显另外几个人是配角形象，以及大胡子的手指其实是指着低头的那个人问耶稣：“是他吗？”

后一种说法理由其实很简单，单纯从卡拉瓦乔绘画艺术所追求的戏剧效果来推测：首先，既然耶稣占据了画面最右边的位置，画面中另外一个主角圣马太，就应该占据最左边的位置，这样整个画面从对称性上来说才“压得住”。其次，既然圣马太是主角，则他的反应应该与众人有所区分，就好比前文提到的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能让你一眼看出叛徒犹大，是通过只有犹大一人的身体倾向是远离耶稣来体现的。在《圣马太蒙召》中，只有这一个人的脸没有被光照亮，且不看耶稣，他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第三，仔细观察，做一些“辅助线”就会发现，如果延长圣光的下沿和阴影的交界线的话，可以直接连到低头人的头顶，如果把耶稣的手和大胡子的手连线延长的话，指向的也是低头者，再把右边圣彼得的手和大胡子的手连线延长，指向的还是低头者。最后，对于善于使用戏剧对比的卡拉瓦乔来说，要在画面中表现耶稣感召力的伟大，一定要证明，这种感召力可以感召最为堕落的人。在画面中，除左边低头者还在摆弄桌面上的银圆，沉迷金钱，众人都已经看向耶稣。这样无可救药的堕落之人，不正是展现基督伟大救赎的最好对象吗？可以想象，下一秒马太就会在感召下缓缓抬起沉迷虚幻金钱的头颅，跟随耶稣而去。



《圣多马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卡拉瓦乔
 （Caravaggio）[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07cm×146cm布上油画1602年德国波茨坦无忧宫
 （Sanssouci Palace）

卡拉瓦乔的另一代表作《圣多马的怀疑》（F2），显著地表达了巴洛克绘画的一大特点——戏剧效果。这幅作品描述的是《圣经》里的经典故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三天后复活，但是托马斯也就是多马（Thomas的另外一种翻译），由于错过了耶稣复活的场面，对此并不相信。多马说：“除非我看到耶稣被钉过的伤痕，把自己的手伸到他的伤口里，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又过了一周，耶稣再次出现，并让多马伸手触碰他的伤口。耶稣说：“你见到了我，你才相信，而那些被祝福的，是尽管没有看见也相信的人。”在画面中，卡拉瓦乔依然采用了极为显眼的明暗法，光线从画面的左边照射过来。在西方艺术史中，描绘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画作非常多，描绘耶稣复活的画作也非常多。耶稣先死后生是一个动态的事件，需要时间线的配合，这对电影来说很容易，拍两组镜头串起来就好了，但要在幅静态的画作中同时表现这两件事情是困难的。《圣多马的怀疑》这幅作品安排多马去触摸一个死而复生之人的伤口，确实巧妙地把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极具戏剧效果。

除了戏剧性，卡拉瓦乔还极善于让观画者产生“参与感”，融入画作中。在《圣多马的怀疑》中，如果只有耶稣和多马两个人，参与感是不够的，所以在他们身边还站着两个人，聚精会神地看着多马去触碰耶稣的伤口。作为欣赏者，能看到旁边的人在围观，这个时候观画者的身份就由一个客观的欣赏者，变成参与其中的第三个围观者，如此，观众便“参与”到这幅画作中了。这种参与感甚至也存在于卡拉瓦乔的静物画中，比如他的静物画《水果篮》（F3）。



F3↑

/

《水果篮》（*Basket of Fruits*）卡拉瓦乔（Caravaggio）[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46cm × 64cm
布上油画1599年意大利米兰阿姆布罗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

这水果篮并不是在桌子上好好放着，而是有一侧沿跑到了桌子外面，在水果的重力影响下，篮子的边缘微微下垂，让观画之人忍不住想上去推一把，把篮子推回原位。

喜欢刻画瞬间这件事，其实是在没有电影技术的时代，画家对于“电影”的追求。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整个画面是没有“时间轴”的，时间变与不变，画出来都是同样的画面，画面并不是时间的函数，即画面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巴洛克时期描绘瞬间的画作只是抓住其中某一个时刻，贝尼尼的《大卫》抓住的是大卫铆足全身力气投掷出手的那一刹那，如果抓的是下一秒，大卫一定不是这个姿势了。描绘瞬间的作品都呈现了时间的函数：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画家的脑海里有一条时间轴，画面配上时间轴，就是电影了。不难发现，真正优秀的画家永远都在追求更丰富、更新

颖的表达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追求在现代科技框架下看，他们想要的是一台照相机，能够把现实描绘下来，用镜框裱起来，一直到永远。到了巴洛克时期，画家们想要的其实是一台摄像机。

卡拉瓦乔对于戏剧性和参与感的追求，导致他被一些反对者称为“自然主义者”。这里的自然指的不是大自然，不是野外，而是一种原始的、不经雕琢的描绘方式。这种对真实的追求让卡拉瓦乔不会刻意美化事物，而是要追求最真实直接、让人感同身受的表达。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的《圣母之死》（F4）。与之前提香、科雷乔等画家们描绘圣母升天的光辉场景不同，在卡拉瓦乔的笔下，圣母的脸色惨白，变成了一具普通妇人的尸体。这幅画作被当时的委托人拒收了，之后才在鲁本斯的推荐下被曼图瓦公爵买下。正是这种对真实的、原始感的粗放式艺术追求，导致卡拉瓦乔的作品常常展现出一种“暴力美学”。卡拉瓦乔会把砍头、淋漓的鲜血这类主题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例如他的《莎乐美接受施洗者约翰的头》（F5），描绘了圣人约翰的头颅血淋淋地被呈现给莎乐美的场景；再如《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F6），卡拉瓦乔把歌利亚的头颅画成自己的样子，因为他的一次斗殴中弄伤了一位圣殿骑士，故创作此画谢罪。最著名的血腥画作要数《犹迪杀死荷罗孚尼》（F7），藏于罗马的巴贝里尼宫国家美术馆，描绘了少女斩下侵略者的头颅，鲜血直流的情景。但很显然，卡拉瓦乔应当没有看过真实的砍头，人体内的血压极高，做喷射状的血液不会那么少，而且少女用刀的方式也有问题，这样的姿势根本使不上劲儿。



F4↑

/

《圣母之死》（*The Death of the Virgin*）卡拉瓦乔（Caravaggio）[米开

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 (Michelangelo Merisida Caravaggio)]
369cm × 245cm 布上油画 1605—1606年 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Musée
du Louvre)



F5↑

/

《莎乐美接受施洗者约翰的头》 (*Salome Receives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卡拉瓦乔 (Caravaggio)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91.5cm × 106.7cm 布上油画 约 1609年 英国伦敦 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



F6↑

/

《手提歌利亚头颅的大卫》（*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卡拉瓦乔（Caravaggio）[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25cm×101cm 布上油画 1610年意大利罗马 博尔盖塞博物馆（Borghese Gallery and Museum）



F7↑

/

《犹迪杀死荷罗孚尼》（*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卡拉瓦乔（Caravaggio）[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45cm×195cm布上油画1598—1599年意大利罗马巴

贝里尼宫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ncient Art in Barberini Palace）



F8↑

/

《七善行》（*The Seven Works of Mercy*）卡拉瓦乔（Caravaggio）[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da Caravaggio）]
390cm×260cm布上油画1607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皮奥蒙德拉仁慈堂（Pio Monte della Misericordia）

卡拉瓦乔被称为“历史上脾气最坏的画家”。他曾经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对手，从罗马逃亡到那不勒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去那不勒斯可以看到很多卡拉瓦乔的真迹。其中包括他最为著名的《七善行》（F8），他将七种善举画在了一幅画中，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创新。到那不勒斯没多久，卡拉瓦乔又来到了马耳他，加入骑士团。在这里他又惹是生非，弄伤了一名骑士，被骑士团关押了起来。接着他越狱成功，辗转到了西西里，最后又回到了那不勒斯。想必是卡拉瓦乔的艺术成就过于突出，最终拿到了教皇的特赦，结果他却在回罗马的路上死于热病，年仅39岁。卡拉瓦乔的古怪脾气和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也许是支撑他创作的灵感源头。

卡拉瓦乔使用的是一种“色先于形”的创作方式：直接在画布上用油彩开始创作，并不会打详细的底稿。在色彩的艳丽以及对比度强烈的特点上，能隐约看到威尼斯的提香和丁托列托的影子，虽然卡拉瓦乔与威尼斯画派并

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

放在二元对立中，卡拉瓦乔明显是属于“广义的浪漫主义”这一派，他在绘画艺术中追求的是表现力。

卡拉瓦乔可以被认为是巴洛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在他之后，沿着这条线路发展的，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画家都深受他的影响：佛兰德斯的鲁本斯、尼德兰的伦勃朗、西班牙的委拉斯开兹都继承和发扬了卡拉瓦乔的绘画理念。

在罗马，能与卡拉瓦乔形成二元对立的画家是卡拉奇。据说两人虽然是竞争对手，但私交着实不错，还经常进行绘画艺术方面的探讨。卡拉奇是巴洛克早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与两位兄长被称为“卡拉奇三兄弟”，三人在巴洛克早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卡拉奇出生于博洛尼亚，是文艺复兴古典艺术的传承者，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与巴洛克时期崇尚的一些艺术元素结合起来，为古典主义画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卡拉奇三兄弟都是欧洲较早的美术学院——博洛尼亚美术学院的创始人，是学院派美术的倡导者。

一个伟大的时代过去后，新时代的发展一般都会面临两种选择：“起点派”和“终点派”。卡拉奇就是标准的“起点派”：文艺复兴前辈大师奠定的技巧和艺术风格是新时代的伟大基石，新时代的艺术家应该在前辈们的基础上、框架下，继续努力深挖。卡拉瓦乔则是一个“终点派”：在前辈大师建立的框架下，留给后人的空间已经太少，新时代的人要摒弃前人的框架，发展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



F9↑

/

《圣母哀悼基督》（*Pietà*）安尼巴莱·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
156cm × 149cm 布上油画 1599—1600年 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美术

馆 (Museo di Capodimonte)

卡拉奇的作品也强调画面的明暗对比，在他的代表作《圣母哀悼基督》(F9)中，圣母和基督的皮肤惨白，轮廓线很深，整个画面光影强烈，拥有强对比以及“有重点”两大巴洛克绘画的特征。然而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更接近拉斐尔的画作特征，画中圣母的面容十分平静，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

总体上，卡拉奇对于卡拉瓦乔这种极端追求真实感的“自然主义者”是排斥的。卡拉奇在主题的选取上依然是古典的、文艺复兴式的，甚至是柏拉图式的完美主义者，这与拉斐尔的理念并无二致。他始终是一个文艺复兴式“永恒”的追求者，代表着古典的审美和艺术创作理念，也是后世学院派绘画的先驱。

（二）“庙堂”与“江湖”

从卡拉瓦乔开始，“色先于形”的创作方式在巴洛克时期占据了主流。在这一时期，传统绘画风气浓厚的尼德兰地区继续繁荣昌盛。只是这一时期，尼德兰产生分裂：如南边的佛兰德斯，是天主教的地界；如北边的荷兰则属新教。

这一南一北最重要的代表画家莫过于佛兰德斯的鲁本斯与荷兰的伦勃朗。他们的绘画集中体现了巴洛克绘画的精髓，二人也都深受卡拉瓦乔影响。

如果把鲁本斯和伦勃朗放到整个艺术史中，无论在哪个时代，他们都能跻身最伟大画家之列。虽然他们都有巴洛克的绘画特征，但鲁本斯和伦勃朗绘画的精神内涵是截然相反的，甚至巴洛克绘画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广义的浪漫主义”中的二元对立。

在对比他们的画作之前，先来简要了解一下尼德兰这块是非之地在17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社会结构深深地影响着艺术创作。

尼德兰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范围，从135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通过七个选帝侯推选产生的，原则上并非世袭，但从15世纪初到帝国最终瓦解，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实力过于强大，导致皇帝的位置几乎一直留在哈布斯堡家族。其实，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强大，一大策略就是他们喜欢到处搞“政治联姻”，通过血缘关系把全欧洲绑在一起。欧洲王室贵族的亲缘关系复杂到可能他们自己都算不清楚，例如瓦格纳的赞助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年轻的时候就差点儿和自己的表姑妈结婚，最后他因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放弃了婚姻。

15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尼德兰地区，从神圣罗马帝国中分离出来，赏给了自己的儿子腓力二世。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都是西班牙国王，于是尼德兰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变成了西班牙的属地。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是查理五世自己的身份就很复杂：他不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那不勒斯国王卡洛四世等等，一个人是好几个国家的君主，而且在每个国家的名号都不一样。究其原因就是哈布斯堡家族八爪鱼般的联姻策略：例如查理五世的父亲是腓力一世，原本是奥地利大公，和西班牙没什么关系，但他通过与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地区的一个王国，跟周边王国逐渐融合变成了整体的西班牙王国）王位继承人，史称“疯女胡安娜”的女王结婚，成为该王国的

共同统治者之一，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历史上首次打入西班牙王室。腓力一世的父亲，即查理五世的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查理五世作为他的孙子，在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同时，也继承了母亲在西班牙的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所以腓力二世作为查理五世的儿子，拥有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在分地盘时，查理五世除了让腓力二世当了西班牙国王，也把原本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尼德兰给了腓力二世，于是尼德兰就变成了西班牙管辖的尼德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则由查理五世的弟弟继承。

尼德兰北部民众不满西班牙的统治，加上当时正值宗教改革，新教在北部地区很受欢迎，作为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当局对尼德兰的新教徒（主要是加尔文教徒，加尔文教是新教六大宗派之一）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于是北方地区爆发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先以北尼德兰地区的独立告终，1581年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国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阶级为主导的国家，直到1609年，西班牙在事实上承认了其独立。欧洲的17世纪是属于荷兰的世纪，当时，荷兰的商业极为发达，商船数超过全欧洲其他国家商船数的总和。17世纪也被称为荷兰的“黄金年代”，然而尼德兰的南部地区自16世纪以来一直为西班牙所统治，以天主教为主导。虽然也遭受过不同国家的侵略和瓜分，但总体上，17世纪的荷兰和佛兰德斯，一个新教、一个天主教，一个联邦共和、一个王政集权的对立是非常明确的。

宗教、政治、经济、科技都会影响艺术的表现形式，更不要说这两个地方除了科技水平接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对立的，这一定会产生对立的艺术。

先来看鲁本斯。每每看到鲁本斯的画作，第一感受都是提香画的人物学会了做体操。鲁本斯和威尼斯画派有一些渊源，他早年时曾到意大利游学，首先去的就是威尼斯，并深深受到了威尼斯画派的感染，尤其是“威尼斯绘画三杰”——提香、丁托列托以及韦罗内塞，他们的作品给鲁本斯带来极大的启发。在鲁本斯的画作中可以看到极为丰富的色彩，而且它们艳丽异常，饱和度极高，整体呈暖色调。对于这种色彩的审美，就见仁见智了。很多人说鲁本斯的画作装饰太多，内容复杂，色彩斑斓，整体呈现浮华、绚烂的特点，相比之下，伦勃朗的画作似乎更为深邃、质朴。

在意大利游学期间，鲁本斯也有幸目睹了卡拉瓦乔的作品。尽管鲁本斯比卡拉瓦乔小不了几岁，但卡拉瓦乔这种极具戏剧性“自然主义”的创作方式却对鲁本斯的触动很大。鲁本斯也建议他当时的赞助人——曼图瓦公爵买下卡拉瓦乔被委托人拒收的《圣母之死》。鲁本斯也曾临摹过卡拉瓦乔的作品。

鲁本斯的绘画作品极富戏剧性，这体现了他对卡拉瓦乔艺术思想一定程度的传承：他在绘画时喜欢采用对角线构图，这种构图方式会让整个画面极不稳定，有一种摇摇欲坠之感，造成一种观感上的戏剧冲突。鲁本斯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被诅咒者的堕落》（F10a）、《屠杀无辜》（F10b）以及《劫夺吕西普斯之女》（F10c）。

《屠杀无辜》讲述了希律王害怕耶稣的降世会影响自己的王位，于是下令把伯利恒（耶稣的出生地）附近两岁及以下的婴儿统统杀死的故事。整个画面人物极多，但总体上所有人都聚在一块儿，形成了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对角线，这样的构图能让人感受到画面是动起来的，有整体向右的运动倾向。

在《劫夺吕西普斯之女》中，动感并不是来源于两匹马激烈的动作，而在于三个主要人物的肢体所串联成的一条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对角线，这样的构图让画面有整体向左倾的运动趋势，仿佛下一秒，吕西普斯的女儿就要被人从地上抄起并掳走。这种对角线构图方式所追求的动感，与文艺复兴时期追求的三角构图所带来的稳定感形成鲜明的审美差异。



F10a↑

/

《被诅咒者的堕落》（*The Fall of the Damned*）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286cm×224cm 布上油画 1620年德国慕尼黑 老绘画陈列馆（Alte Pikotheek）



F10b↑

/

《屠杀无辜》（*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42cm × 182cm 板上油画 1612年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



F10c↑

/

《劫夺吕西普斯之女》（*Rape of the Daughters of Leucippus*）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224cm×210.5cm布上油画1618年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Alte Pikotheek）

鲁本斯画作中所描绘的对象都极具个体律动，通常动作幅度都很大，而且从整体感上，对角线构图方式让整个画面都激动不已，就像是提香的人物都变成了体操运动员，在绚丽鲜艳的色彩环境下翩翩起舞。

至于画中的精神内涵，鲁本斯无疑是外放的。不论是在意大利游学，还是之后回到佛兰德斯的城市安特卫普担任宫廷画师，鲁本斯所处地区的大环境都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且处在反宗教改革的历史时期。这使鲁本斯画了很多祭坛画，也创作了很多描绘历史大事件，且拥有大场面的“历史画”。总体上，鲁本斯的作品与宗教、权贵息息相关，是一种“居庙堂之高”的艺术，大多展现伟大、恢宏、华丽的主题。

与之相对的是出生于莱顿、活跃于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他的绘画作品集中展现了新教地区所特有的内省与深刻，是一种“处江湖之远”的绘画艺

术。

首先从题材的选取上，鲁本斯身处反宗教改革的中心，创作了大量的大场面画作，画中人物众多，场景激烈；伦勃朗身处宗教改革中心的荷兰，从根本上反对宗教画，更是反对神圣形象出现在作品当中，这使伦勃朗的代表画作常以人物肖像画为主。

除了肖像画，伦勃朗在一定程度上还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绘画门类“自画像”。虽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画家就有画自画像的传统，比如丢勒就有好几幅著名的自画像传世，但像伦勃朗这样从自己青年时期一直画到老年时期的，几乎前无古人。除了肖像画和自画像，伦勃朗的绘画主题多种多样，有风景画也有部分历史画，但总体上场面远远不如鲁本斯的宏大。简单来说，伦勃朗的画面里人少、东西少，画面的整体观感更为灰暗、沉静。

与鲁本斯的色彩斑斓相比，伦勃朗的绘画作品朴素得简直像黑白照片一样。尽管如此，伦勃朗在色彩变化上的细腻把控程度完全不输鲁本斯。用物理学的表述可以如此形容：两位画家色彩变化的频率都很高，但很明显鲁本斯色彩变化的幅度要比伦勃朗的大很多。

从精神内涵上看，相比于鲁本斯的外放，伦勃朗绘画的精神明显是内敛的。鲁本斯在画面中展现饱满的激情，伦勃朗则体现了他深沉的思考。这种内秀的气质可以从伦勃朗的一系列自画像当中一览无余。他的自画像除了记录从青年到老年容貌的变化，还能够帮助后人了解伦勃朗从青年到老年心理状态的变化。伦勃朗年少成名，妻子是个“富二代”，因此年轻时的他似乎将“春风得意”写在脸上；中年时家道中落，惹上了官司；到年老又是晚景颓唐。伦勃朗在自画像（F11a /F11b）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系列心理状态的变化。



F11a↑

/

《青年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Gorget*）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38.2cm×31cm板上油画1629年德国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 Museum）



F11b↑

/

《自画像》（*Self-Portrait*）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80.3cm×67.5cm布上油画1660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对于个体人物心理的深层刻画一直是伦勃朗的强项，相比之下鲁本斯并不

太擅长个体人物性格的塑造，他更擅长“大制作”的安排。有人批评他“大而无当”，甚至专门发明出一个词语“rubesque”，直译过来是“体形丰满的”，用来形容鲁本斯的浮夸画面。鲁本斯的女性形象，尤其是裸体女性形象，经常胖得能看到脂肪堆积成块，产生所谓“橘皮现象”，可能这对鲁本斯来说符合他“富得流油”的观感。鲁本斯的女性裸体（F12）与他人的相比（F13）常常包含有比较明显的性暗示和色情意味，这就让讨厌鲁本斯的人越发觉得其恶俗难耐。

从对卡拉瓦乔技法的传承和发扬上，两位画家的选择也不一样。虽然伦勃朗一生从来没有像鲁本斯那样出国游学，但伦勃朗师从的画家拉斯特曼是一个Utrecht Caravaggist（Utrecht是荷兰的一个城市，译为“乌得勒支”，那里有现在荷兰最好的大学，乌得勒支大学），即“乌得勒支卡拉瓦乔主义者”——荷兰深受卡拉瓦乔绘画影响的一批画家，他们在自己的绘画风格中深刻落实卡拉瓦乔的绘画技法以及审美品味。可见卡拉瓦乔在尼德兰北方也影响甚广。



F12↑

/

《美惠三女神》（*The Three Graces*）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221cm×181cm板上油画1639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F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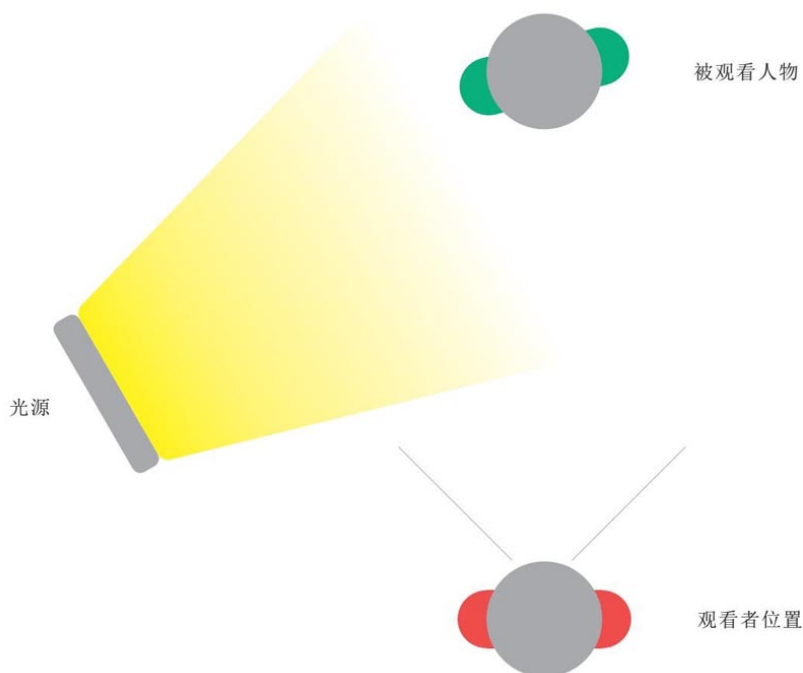
《美惠三女神》(*The Three Graces*) 拉斐尔·桑西 (Raphael Santi)
17.8cm × 17.6cm 板上油画 1504—1505 年 法国香提邑孔代博物馆 (Musée Condé)

相比之下，鲁本斯更多地吸收了卡拉瓦乔绘画创作当中戏剧性的部分，而伦勃朗则对明暗法情有独钟，不难发现，伦勃朗绝大部分作品的整体观感都是以暗色为大基调，然后从黑暗当中生出光明、生出人物形象，这是极具卡拉瓦乔特色的做法。

伦勃朗醉心于明暗法，深入地研究布光法，其独创的“伦勃朗式”布光法一直到今天还在人物摄影领域被频繁使用。“伦勃朗光”已然成为人像摄影艺术的经典技法。如果仔细观察伦勃朗的人物肖像，就会发现，他的人物在背光一面的脸颊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F14)，这就是伦勃朗光的特色。这样的布光方法 (F15)，既不像正面打光那样显得面部毫无立体感，也不像只有侧面强光一样形成“阴阳脸”，而是让人物的面部更立体，勾勒出人物的轮廓线，给人以稳定庄重的感觉，同时又平衡、和谐、生动。

绘画题材上的对立，可以归结为佛兰德斯与荷兰在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社

会结构上的差异。宗教上的差异势必导致两位画家创作题材的巨大差异，不仅如此，他们的订单类型也会有很大差别。鲁本斯会收到大量来自教廷、王室的委托，自然会追求主题的宏大、造型的华丽；伦勃朗的订单主要来自商人阶级，而那个时候的荷兰是联邦制共和国，并无王室，所以他的订单以肖像画以及集体肖像画为主，类比今天，这个需求其实和照相馆类似。



F15↑
/
伦勃朗光示意图



F14↑

/

《波兰贵族》（*Polish Nobleman*）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66cm×97cm板上油画163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两位画家的人生际遇也是相差甚多。鲁本斯是一位“学而优则仕”的画家，他依靠绘画技能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一辈子都顺风顺水，享尽荣华富贵。鲁本斯还获得西班牙王室的委任，出访各国进行外交事务，并成功地促进了西班牙和英国的友好关系，为此还被英国的查理一世封为爵士。

伦勃朗的遭遇则完全不同。伦勃朗生活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他的订单大多来自商业需求。早年的伦勃朗还算人生得意，因为才华出众，订单络绎不绝。但伦勃朗的毕生名画，有“世界三大名画”之一称号的《夜巡》（F16）却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荷兰社会对于绘画的需求几乎和照相馆差不多，因此经常出现“拍集体照”的需求。《夜巡》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射手队成员的群像订单，这幅画的费用，画面里的每一位成员都缴纳了相同数额。既然是集体照，大家出的钱又一样多，那显然应该画成哈尔斯《圣乔治射手连军官们的宴会》（F17）一般风格的画作：每个人的显眼程度都差不多。



F16↑

/

《夜巡》（*The Night Watch*）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363cm×437cm布上油画164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F17↑

/

《圣乔治射手连军官们的宴会》（*A Banquet of the Officers of the St. George Militia Company*）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175cm × 324cm 布上油画1616年荷兰哈勒姆哈尔斯博物馆（Frans Hals Museum）

而伦勃朗为了追求艺术上的表达，不甘于只是将人物机械地排列，因此打破传统，按照自己的创作意愿作画，有主次、有剧情、有表情，极大地突出了射手队队长的形象。这并不是一幅简单的“集体照”，而是伦勃朗精心安排的一出戏，像极了歌剧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作为主角的男高音和男中音在舞台正中唱着一首二重唱，身后的合唱团随声附和着，又或是两位主角在议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战役，正在进行战略部署，身后的射手们跃跃欲试，准备去打一场硬仗。

如此生动且具有戏剧性以及艺术性的作品，却导致伦勃朗官司缠身。因为出钱的人没有在画面的安排当中受到平等的对待，这在荷兰的商品经济社会看来是一种缺乏诚信、有违契约精神的做法。至此之后，伦勃朗的声誉一落千丈，订单越来越少，落得晚年穷困潦倒的结局。

人生际遇上的差别无疑也会影响两位画家的创作风格。这就是为什么鲁本斯的画作总是“大弦嘈嘈如急雨”，用大场面震撼你，伦勃朗却是“小弦切切如私语”，用深入的刻画感动你。

两位大师都是巴洛克时期最优秀的画家，在他们身上有很多共性。除了前述的戏剧性、强对比以及瞬间感，他们在创作技法上，具体说是绘画笔触上，都集中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绘画相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

虽然二位都深受卡拉瓦乔的影响，但他们在对于事物“层次感”的刻画上，要比卡拉瓦乔更进一步。如果仔细对比观察卡拉瓦乔作品以及鲁本斯作品对于人物或者事物阴影部分的刻画，会发现在鲁本斯的阴影中，哪怕是暗面，也会有丰富的变化与层次感。相比之下，卡拉瓦乔的阴影就好似漆黑一块，变化并不显著。与传统不同，鲁本斯并不是对画面进行直接的描绘，而是采取冷色与暖色交替分层的画法，一层层地把颜色铺垫上去，这样就会产生极为细致的纹理变化，让画面显得更为真实有层次感。相比之下，卡拉瓦乔的绘画虽然充满戏剧冲突，但这种过于分明的明暗差异，真实感略显逊色。在追求描绘自然的真实这方面，鲁本斯的技巧明显是更为进步与创新的。

如果近看了鲁本斯与伦勃朗两位大师的画作，会发现他们的笔触痕迹都很明显，他们并不刻意掩饰运笔的走向，颜料甚至可以被“一坨坨”地在画布上辨认出来。在鲁本斯的《屠杀无辜》中，最明亮的部分是直接把白色颜料以很厚重的方式直接“甩”到高光处，有凹凸感的油性颜料，让高光拥有更强的立体感。厚重的油彩还会反射自然光线，比单纯使用白颜料用传统方法涂抹晕开更为明亮，拥有更显著的强调效果。伦勃朗的粗笔触，让他的画作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能够让人迅速感受到画作的重点。看伦勃朗的画作甚至不用过分靠近去看油彩的厚度，只是看笔画的走向，就能感受到他粗犷的作画方法。这种方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法相去甚远。文艺复兴讲究看不到笔触，一定要把颜料涂抹平整，画面才算“完美无缺”。

（三）局部与整体



F18↑

/

《腓力四世》（*Philip IV*）迭亚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
57cm×44cm布上油画1628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在“概括性笔触”这方面做得最到位的，是西班牙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也是西班牙王室的首席宫廷画家委拉斯开兹。他的画作内容主要以王室形象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基因极为强大，只要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都有牙齿咬合问题，俗称“地包天”，所以不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肖像，还是西班牙王室的肖像，都常常会看到标准的“鞋拔子脸”（F18），哪怕女性家族成员也毫不例外。

鲁本斯在西班牙马德里期间，委拉斯开兹是唯一可以随时去拜访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艺术家”

鲁本斯的“小艺术家”，鲁本斯非常欣赏其才华并时时给予建议和指导。委拉斯开兹在鲁本斯的建议下，在30岁和50岁时到罗马游学，他在罗马期间得见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当然也有卡拉瓦乔的真迹，大受启发。委拉斯开兹也是“广义的浪漫主义”的一员，西班牙历史上的伟大画家大多是“广义的浪漫主义”，文艺复兴时期有埃尔·格列柯，浪漫主义时期有戈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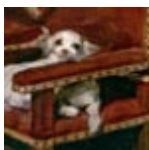
委拉斯开兹的粗放式笔触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概括式的画法。他用笔不多，但极其精准到位，能把画面的主要矛盾迅速抓住，一击解决问题。



F19a↑

/

《腓力王子像，腓力四世之子》（*Prince Philip Prosper, Son of Philip IV*）
迭亚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28.5cm × 99.5cm 布上油画1659
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F19b↑

/

《腓力王子像，腓力四世之子》（小狗局部）



F19c↑

/

《阿尔诺菲尼的订婚式》（小狗局部）

来对比两幅作品。第一幅是委拉斯开兹给西班牙王室腓力王子画的童年画像（F19a），这里面的关键不是小王子，而是小王子的宠物狗（F19b）。有了委拉斯开兹的宠物狗，再来看两百多年前的尼德兰画家，以精细著称的扬·凡·艾克在《阿尔诺菲尼的订婚式》当中所画的宠物狗（F19c）。乍看之下，两只狗都活灵活现，但两位画家的描绘方式截然不同。扬·凡·艾克使用的是“像素级”的工笔式画法，好像小狗长了多少根毛，他就画多少根毛。委拉斯开兹的小狗则全然不同，他的做法是通过观察小狗身上毛发的走向，用概括的方式，寥寥数笔就把小狗毛茸茸的形态勾勒出来。如果近看，甚至看不出委拉斯开兹的小狗长了“毛”，但如果远看，反而会觉得委拉斯开兹的概括画法更为生动。

委拉斯开兹在罗马游学访问期间，画下了一张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教皇肖像《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F20）。

把它和拉斐尔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肖像》（F21）做一个对比。这两幅肖像作品，人物的装扮、坐姿，都是类似的，不知道是委拉斯开兹在致敬，还是在挑战拉斐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委拉斯开兹画的教皇要比拉斐尔的生动不少。拉斐尔画的教皇尽管描绘极其细致，近看会发现拉斐尔大面积使用了“晕染法”，为的就是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更柔和，掩盖所有的笔触，感觉就像用图像处理软件PS（Photoshop）给教皇的照片做了“羽化”一般。但再看委拉斯开兹画的教皇，活灵活现，面部神采自不必说，尤其教皇的红色上衣上胸口一大片的白色反光，你几乎都能想象出这件衣服的材质，摸上去一定很光滑。但仔细近看，会发现这些白色反光完全不是精雕细琢的结果，它只有寥寥数笔，笔触的痕迹还很明显。教皇下半身的白色裙摆近看根本是毫无立体感的粗线条描摹，甚至只是分区域的色块而已。之后的印象主义代表画家马奈就深受这种画法的启发，“色块感”就是马奈绘画观感的一大特点。



F20↑

/

《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迭亚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40cm×120cm布上油画1650年意大利罗马多利亚潘菲利美术馆（Galleria Doria Pamphilj）



F21↑

/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肖像》（*Portrait of Pope Julius II*）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ti）108.7cm×81cm板上油画1511—1512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为什么这样概括性的、粗放式的、不经修饰的画法反而给人更为生动的感觉？这主要与人眼观察事物的方式以及人眼工作的生理原理有关。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趴得非常近去看一幅作品，就跟看见一只小狗，不会真的把眼睛凑到小狗身上去看小狗一根根的绒毛一样。人眼在正常情况下观看事物的感受实际上都是一种“总体感受”，远的东西，人眼看不出细微处的分别。人眼看到小狗觉得是毛茸茸的，事实上不是因为看到了一根根的毛发，而是小狗无数毛发集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毛茸茸的“趋势”。这种趋势本身是概括性的、粗线条的，作为画家，如果能用概括性的笔法把这种趋势抓住，那么就是抓住了事物的神髓，因为他抓住的不是物理事实，而是视觉感受。委拉斯开兹的这种画法是基于对事物形象趋势的观察，并做出敏锐把握的画法，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画法。虽然寥寥数笔，但需要的功力和积累却非一日之功。相比之下，扬·凡·艾克精细、诚实的办法反而是一

种“笨办法”，因为只要你肯付出时间和专注力，把每根毛都画清楚，效果总是不差。但说到要能画出一件事物的神髓，那么判断被画形象的趋势就极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山水写意画一直都是境界极高的。国画水墨不像油画能够层层覆盖，尽情修改，它讲究一气呵成，一招错、满盘输，对于画家观察力和概括能力的要求都极为苛刻。

委拉斯开兹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是同样隶属“世界三大名画”之一、绘制于1656年的《宫娥》（F22）。

在笔者看来，《宫娥》甚至是一出伟大的“戏剧”。历史上关于《宫娥》是如何神秘、如何重要、如何伟大的评价数不胜数，有说它展示了“绘画的神学”，有说它体现了“绘画的至高哲学”，认为它是“千古第一画”的人也不少。

在此要提出一个原创概念：《宫娥》的画面创造出了“第二人称”绘画。再现代一点，这可以算作是古代的“虚拟现实”，因为画作充分考虑到了观赏者的立场，如果没有观赏者的参与，这幅画并不完整。要知道这种为观赏者预设具体身份，以及需要观赏者参与剧情本身的创作方式在巴洛克时期前并不多见，这种意味的名画，大概还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和之后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三幅画作当中的女子都在看着欣赏者，与欣赏者存在互动，画家预设了欣赏者的位置，但其他三幅并不如《宫娥》预设得如此完整以及具体。



F22↑

/

《宫娥》（*Las Meninas*）迭亚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
318cm × 276cm 布上油画 1656年西班牙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大多数的古典绘画作品都采用“第三人称”绘画方式，欣赏者并不参与画面中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旁观者的身份，古典小说多由这种人称写成。“第一人称”绘画是观画者以上帝视角，并以自己为主角的视角来审视画面，这样的画作当中没有主角，也就是没有明显的主体人物或者事物，风景画大多属于这个类型。包含人物的作品中，可以被归类为“第一人称”绘画作品的有文艺复兴时期，北方的博斯所画的一些具有超现实主义精神的宗教作品，比如《人间乐园》（F23）以及《干草车》（F24）。再比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所创作的“风俗画”以及类风景画作品（F25）。

在《宫娥》中，欣赏者要和画中的人物互动，才能使作品变得完整。必须要把欣赏者的身份考虑进去，才能明白《宫娥》所描绘的是什么场景。很

明显，画中所有的人都在看着画外，公主在向你鞠着躬，侍女在服侍公主，等等。左边的画家胸口有一个红色十字（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标志，委拉斯开兹后来加入了这个骑士团），那正是委拉斯开兹本人，这个红十字应该是画家在完成之后才加上去的。画家很明显是在给“你”画着画像，而“你”又是谁呢？尊贵的公主会向谁行礼？御用画家会给谁画像？答案当然是国王腓力四世和他的王后。答案在远处的镜子里——远处镜子里的正是国王和王后的镜像，尽管已经是高度概括的刻画，也能隐约地看出国王的“鞋拔子脸”。画架的背面在画面中可算得上“神助攻”，因为一般在古典绘画中，这种粗糙的、不合时宜的、不美观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一幅画的前景，但正是这画架的粗糙背面，让“你”，这个此时此刻成为国王与王后的人，感到无比沉浸。如果用一段文字来描写，可能会是这样：“你站在大厅里，焦虑地看着委拉斯开兹给你和你的王后（国王）画着肖像，你心想，当国王（王后）可真累，还要每天过来一动不动地站两个小时。这狗倒是自在，想趴着就趴着。”



F23↑

/

《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205.5cm×384.9cm 板上油画/三联画 1490—1500年西班牙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F24↑

/

《干草车》（*The Haywain Triptych*）希罗尼穆斯·布斯（Hieronymus Bosch）135cm×200cm 板上油画/三联画 1516年西班牙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F25↑

/

《孩子们的游戏》（*Children's Games*）彼得·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18cm×161cm 板上油画 1560年奥地利维也纳 艺术历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四）传统与创新

从创作题材的角度看，天主教地区对于绘画艺术创作大体上持鼓励态度。反宗教改革的需求导致教会更加依赖绘画艺术：自公元6世纪，尤其从格列高利一世开创性地把绘画“解禁”以来，绘画艺术给天主教带来的反馈都是正向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教会在政策以及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天主教地区的绘画艺术在题材上较为单一，宗教画永远占据主流，哪怕是风景比例更多的历史画，总体来说也是描绘神圣人物、先哲学者、帝王将相的居多，这就导致天主教地区的绘画看久了之后多少有些审美疲劳。

相反，在新教尤其荷兰地区宗教画严格被排斥，此消彼长，在荷兰就诞生了一个在天主教地区不经常描绘的主题：静物画。在新教地区除了神像画不能画，来自商人、达官贵人的肖像画委托很普遍，还诞生了一大批“风俗画”。所谓“风俗画”，就是对一类特殊场景进行描绘，风俗画当中又以静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这其实就是一次在“传统”被封杀了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一轮创新。

虽说风俗画、静物画的诞生源自新教对宗教画的反对，但静物画这一类题材，实则与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尼德兰北方地区虽然不拜偶像，不在绘画中直接展现神的形象，但依然非常注重圣餐仪式。在圣餐仪式中，马拿和葡萄酒象征基督的“体”和“血”，因此在静物画中，描绘食物的丰盛，也可以算是比喻基督在世间的“体”，也就是教会的繁荣。除宗教寓意，静物画在当时社会也隐约成为一种“炫富”手段。17世纪的荷兰商业无比繁荣，除肖像画，静物画通过描绘食物丰盛的餐桌、艳丽的花束以及直接描绘的珠宝首饰、金盘银器等昂贵的物件来满足商人阶级彰显财富、地位的需求。

静物画创作的要点，首先在于精美的“摆盘”。一盘水果应该如何放置，一盆花应该如何插放，都是静物画当中的重要技巧。静物画必须有实物作为参照才能画，而这些实物则需要经过认真地挑选以及精心地安排，让不同物体的摆放形成和谐的关系，才能最终呈现出一幅完美的静物画。

精美的“摆盘”决定了画面的构图。静物画当中虽然没有人物，但也有对比和戏剧冲突的基本元素。静物画领域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海达。他几乎定义了餐桌主题静物画的创作模板。海达的静物画中时常会出现的杯盘狼藉景象，就是为了构图的需要而设计的。倒下的烛台、横放的杯子等，都是在给整个画面造成不稳定的冲突感，若是所有事物都工整地摆放，整个画面会显得单调，缺乏动感。当然，杯盘狼藉、食物残破的景象，也是为了警醒世人：世上的繁华总是短暂，终归尘土，做人还需常念基督恩典，方

得永生极乐。骷髅形象也经常出现在静物画当中，这更是警醒世人的一种明喻：人生苦短，唯有天堂才是永恒。

在人物画中，画家可以通过描绘衣物的褶子进行炫技，静物画中桌布的褶子自然也提供了这样的炫技空间。

除了对于摆盘的讲究、桌布的刻画，海达对于静物画的布光有着独特的贡献，他是较早注意到环境光影响的画家。通常，绘画中物体表面的光线都直接来自光源，而海达将物体反射后的光线也考虑在内，例如银器上映着柠檬反射的黄色光线（F26），让画面更为生动逼真。

海达也首创了“早餐绘画”这一门类。这种静物画描绘的是早餐后杯盘狼藉的景象，如吃剩的食物，乱放的刀叉，虽然客观是混乱的场景，但无论从构图、色彩，还是戏剧冲突方面，恰恰都是静物画当中最适合表现的内容。海达在他的早餐画作品中，总是会画入一只皮削了一半的柠檬，柠檬皮卷曲着耷拉下来，给本来硬朗的静物画面增添了柔和的元素，可谓是整个画面当中的点睛之笔。此举常常被海达之后的画家效仿（F27）。

“荷兰三大画家”说的是伦勃朗、凡·高以及维米尔。维米尔的画作在整个艺术史上都极为神秘。他的传世作品极少，能确定是真迹的油画不超过40幅。虽然数量少，但维米尔画作的价值属于顶级之列，《戴珍珠耳环的少女》（F28）更是有“北方蒙娜丽莎”之称。



F26↑

/

《有镀金啤酒罐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a Gilded Beer Tankard*）威廉·克莱兹·海达（Willem Claesz Heda）44.5cm×62cm板上油画1634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F27↑

/

《静物与饮酒之角》（*Still Life with Drinking-Horn*）威廉·考尔夫（Willem Kalf）86.4cm×102.2cm布上油画1653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F28↑

/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The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46.5cm × 40cm 布上油画 1665年荷兰海牙 莫里茨美术馆（Mauritshuis）

维米尔的作品并不具有古典绘画中的宏大、高尚、典雅等主题，而是专注于描绘市井琐碎的生活场景，主题朴素。总体来说，维米尔的这类“生活琐事”画作也可以被认为是“风俗画”的一种。在维米尔的画作中，人物形象多种多样，维米尔对他们却是一种恰如“静物画”般的刻画方式，完全看不到鲁本斯式的激烈场景，也看不到伦勃朗式的深邃意境，但恰恰是这种静物画一般的处理方式，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之感。维米尔画过许多生活场景，如倒牛奶（F29）、弹琴等，甚至他有一幅描绘自己正在作画场景的画作（F30）。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生活琐事造就了维米尔独特的风格与辨识度。

维米尔的画作中，常常有着浓厚的、大面积的湖蓝色，就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绘画作品一样。这种湖蓝色象征着富有，因为蓝色颜料极其昂贵，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维米尔的画作极少。传说维米尔夫人家非常富有，绘画也许只是维米尔的兴趣爱好，以他这样的创作速度，想必客户是等不及的。关于维米尔创作速度的缓慢，存在这样一种解释：2013年，有一位富豪为拍摄纪录片《蒂姆的维米尔》，重现了维米尔的作画方式，蒂姆猜测维米尔的画作之所以如此真实，以及对光线的把握如此到位，是用了所谓“小孔成像”的原理。他通过一个暗箱以及透镜系统，把真实场景中的景象投影到画布上方，再如同描红一样以“地毯式”扫描的方式，依葫芦画瓢，一笔笔地描摹，结果蒂姆这位毫无绘画基础的人，竟然真的画出了几乎与维米尔原作一模一样的作品，但这种绘画方式会让绘画变成“持久战”。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维米尔的作品会如此稀少。



F29↑

/

《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45.5cm × 41cm 布上油画 1658—1660 年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F30↑

/

《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20cm×100cm布上油画1666—1668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像描红一样作画，使得维米尔的画不论是构图、人物比例，还是光影变化，都精致得如同照片一般，因此也有评论家认为这不是艺术，维米尔只是一台“人肉照相机”。但看似机械的描摹过程，解决的只是形的问题，而创作过程中对于色彩、光影的把握以及对笔触的控制，也是艺术创作。即便在照相技术已经成熟的今天，摄影本身也是一门重要的艺术。就算维米尔的创作方式真是如此，那也说明，艺术的表达维度并不需要受到技术的限制。

维米尔的画作是在二战时期重新掀起了一股浪潮，才达到了今天的地位。原因是一位叫米格伦的画家，以伪造维米尔的名作出名，而希特勒非常喜欢收藏艺术作品，米格伦就把自己伪造的维米尔作品卖给希特勒的手下。米格伦战后被法庭判决，罪名为“售卖国家宝藏罪”，于是米格伦承认了那是自己伪造的作品，并非真的国宝，但他最终还是因“伪造国家宝藏罪”获刑。

至此，了解了代表巴洛克时期绘画风格最重要的几位艺术大师：卡拉瓦乔开强明暗、强对比、强戏剧性、抓重点、刻画真实绘画之先河；鲁本斯把戏剧性的大场面发挥到了极致，结合了如提香一般丰富的色彩，创造了历史上最为绚烂、华丽的画作；伦勃朗则是通过对明暗法的深入挖掘，创造出了最具情感深度的作品；委拉斯开兹用高度概括的笔触，勾勒出了巴洛克绘画史上最具有戏剧创造力的一幕。四位大师的创作数量都极多：卡拉

瓦乔的作品超过100幅；鲁本斯则有过千幅作品；伦勃朗的油画数量大约有600幅，此外还有大量的版画作品；委拉斯开兹的油画超过200幅。要感谢这几位大师的辛勤创作，让巴洛克艺术的动感在绘画史上抹下浓重的一笔。

这样看来，“色先于形”“广义的浪漫主义”式的创作方式，全面占据了上风，这似乎是米开朗琪罗、提香们在巴洛克时期的伟大胜利。属于达·芬奇、拉斐尔的“广义的古典主义”以及“形先于色”的这一派消失殆尽了吗？并没有，他们去了法国。

07 “珍珠”与“珊瑚”：洛可可艺术

（一）手工艺与学科

从19世纪开始，全欧洲范围内普遍存在着“反学院”的现象。现代艺术的源头便是19世纪后期这轮“反学院”浪潮。

浪漫主义以法国的德拉克洛瓦为代表，“反”的是法国学院派以大卫、安格尔为首的新古典主义；英国反学院的主攻手是“拉斐尔前派”，反的是英国乃至整个传统欧洲拉斐尔艺术理念至上的学院派审美；以克拉姆斯科伊、列宾、列维坦为主要代表的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其诞生的起源事件就是14名学院学生反对俄罗斯皇家美术学院设定的主题陈旧的毕业命题；法国的写实主义不仅反学院，也反对出身于学院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更是把整个传统的绘画理念，无论是“广义的浪漫主义”还是“广义的古典主义”通通推翻，重新定义对“真实”的认知……后来更不必说，凡·高、高更这样几无学院基础的艺术家的横空出世，把19世纪末的艺术界搅得好不热闹。

音乐界也是如此。德彪西对和声的全新认知，让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给他打出“不及格”的成绩；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直接拉开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序幕；普罗科菲耶夫，这位把钢琴当“打击乐器”用的怪才，在音乐学院的和声课挂出红灯……

19世纪开始的反学院狂潮奠定了现代艺术的基础，这才出现后来的能人大师横扫千军，为世人带来精彩纷呈的艺术珍宝。

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大多属于“广义的浪漫主义”“色先于形”这一派。在此期间，拉斐尔的后继者们似乎有些默默无闻，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卡拉瓦乔”们攻城略地的当口，拉斐尔的门徒已悄无声息地在最高权力的支持下，占据了艺术教育体系的制高点。这就是最早在法国成型的“学院艺术”。说到法国学院派绘画的诞生，首推普桑。

在普桑之前，法国并没有出现影响力大到足以开宗立派的画家，只有让·富凯，这个曾到意大利学画的法国“留学生”。富凯活跃的年代大约是15世纪中期，在他之前，法国绘画主要是宫廷绘画，且宫廷绘画又主要以英国画家的绘画为主，用“乏善可陈”来形容已算是手下留情。就像是请体育老师补习数学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在艺术方面亦未有太高建树，或者说，文艺复兴在美术方面的星火根本没有烧到英国。除16世纪上半叶德国

的小荷尔拜因曾到英国发展，并服务于英国宫廷，英国又等了100年，才等到鲁本斯最得意的弟子——凡·戴克爵士定居于此，从此整个英国的绘画事业被带了起来。对于15世纪还要靠英国画家创作宫廷绘画的法国，说他们的绘画艺术和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起来是“一片荒芜”，并不过分。

富凯可算作是在意大利学习工作后，第一个把文艺复兴风格引入法国的艺术家。富凯的作品哪怕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的创作相比，也算是杰出的。富凯的画作（G1）在透视、人物形象比例以及色彩运用上，绝非同时期法国的宫廷绘画可比，富凯为法国的绘画种下了文艺复兴的种子，直到普桑时期终于生根发芽。但严格来说，普桑手上的绘画艺术也不能算作纯粹的法国艺术，因为普桑也是一个“留学生”。



G1↑

/

《艾提安骑士与圣史提芬》（*Etienne Chevalier with St. Stephen*）让·富凯（Jean Fouquet）93cm×85cm板上油画1452年德国柏林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普桑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家境贫寒的他，早年于巴黎学艺、工作，但他非常不适当当时巴黎的艺术圈。当时的法国艺术市场已蓬勃盎然。这个时期的巴黎，艺术行业的运行模式更像是批量生产的工厂：一个工作室里，当家的画家带领好几个学徒共同创作，生意好的时候可能同时画着好几件作品。前文提到的鲁本斯，甚至连达·芬奇也有不少这样集体创作的“工作室”作品。

普桑非常讨厌这种创作方式，他认为艺术品就应该出自艺术家自己的手，

所以他喜欢一个人“慢工出细活”地进行创作。普桑在巴黎换了几次工作室，没有一间能让他满意，再加上普桑是一个外地人，无法融入当地的画家与雕塑家从业者行会，故而在接订单上并无太多优势。

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行会”制度——有点儿像“工会”，是由各个行业的从业者组成的民间组织。对个体的从业者来说，这个民间组织可以为大家提供订单信息。当然，行会还会聚集起来，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对“抢生意”的非行会从业者提起法律诉讼等，起到保护行会成员的作用。行会是很有帮派感、江湖气的组织，并且每个地方的各行业通常只有一个行会。作为一名画家，进了画家与雕塑家从业者行会，就算是得到了“江湖”对其水准的认可，算是“拜过山头”，是可以开张迎客的“师傅”了。

机缘巧合，普桑有一位朋友是法国王后的侍从，该王后来自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普桑在他的帮助下，有幸得见王后的艺术收藏，包括拉斐尔在内等文艺复兴大师的杰作。于是普桑便一心向往罗马，几经努力后，终于在30岁时实现愿望。当时的罗马是教皇乌尔班八世主政，就是贝尼尼一直服务的那位。这位教皇坚定不移地、全方位地支持艺术事业，恨不得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都聚集在罗马。这对普桑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

在罗马期间，普桑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是“广义的古典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悍将，尽管对威尼斯画派有着一定的研究，但其秉承的是“形先于色”的创作理念。普桑致力于在绘画中体现“高贵的设计”，追求“终极的和谐”。这和拉斐尔“想象中的完美”相似，追求让绘画达到完全宁静、和谐、自洽的状态。

普桑极为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画面整体的构图布局。他在创作之前会画很多黑白草稿，甚至会制作小的蜡像，再通过对蜡像的素描去捕捉对象的形态。在普桑的画作中，永远看不到多余的痕迹或浮夸的线条。

普桑在典雅、和谐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阿卡迪亚的牧羊人》（G2），这幅作品可以说是艺术史上最高深莫测的作品之一。画中四个人有的头戴花冠，有的拿着手杖，读着石碑上的铭文：“即使在阿卡迪亚，我也存在。”这句铭文使整个画面的含义变得晦涩，主流见解是其中的“我”代表死神，意思是说，即使在阿卡迪亚这样的世外桃源，死亡依旧不可避免，有警世寓意。普桑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悬疑元素，让人猜测。这幅作品中的主体人物虽然只有四个，但人物有一个整体造型，这个造型就如中国汉字一般拥有一种和谐感。



G2↑

/

《阿卡迪亚的牧羊人》（*Et in Arcadia ego*）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85cm×121cm布上油画1637—1640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普桑绘画中所蕴含的几何形象以及和谐感，在大约200年后大大启发了后印象主义画家保罗·塞尚，甚至揭开了以毕加索等人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的序幕。对比塞尚的《圣维克多山》（G3）与普桑的《圣让在帕特莫斯》（G4），不难发现，他们对于山体几何形状的表达极为神似。

普桑从未创作过属于他那个时代主题的东西。除了少数自画像，普桑也不给别人画肖像，因为他一贯反对法国流行的“绘画产业”。他认为绘画艺术应该追求永恒的完美，不应为利益驱使，去接客户的“照相订单”。普桑的画作，主要是“历史画”，描绘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古代哲人学者的故事，抑或是文学典故。当然，身处罗马，普桑也有许多关于宗教故事的画作。



G3↑

/

《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
73cm×92cm布上油画1892年美国费城巴恩斯基金会（Barnes Foundation）



G4↑

/

《圣让在帕特莫斯》（*Landscape with Saint Jean at Patmos*）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100.3cm×136.4cm布上油画1640年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与其他历史画家不同的是，普桑的历史画场景中，风景的比例占据主导。在这一点上，普桑比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画家们更为大胆，这是他创新的地方：人们第一次在一位顶级大师的画作中看到如此大比例的风景。其代表作有《第欧根尼于山野》（G5），人物的形象占比与周围的风光相比很小。但普桑的处理不应该被理解为对风景的单纯偏好——这是一种对绘画主题的深入理解。第欧根尼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犬儒主义”哲学家，这幅画作描绘的是第欧根尼的一则故事：第欧根尼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衣衫褴褛地行走于山野之间，只用一只破碗进食与饮水，但当他看到旁边的人俯身下去直接从河中饮水，便深觉自己不够极致，于是把手中的碗扔掉。画面中，普桑把第欧根尼画得很小，还位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实际是对第欧根尼哲学思想的思考：淡化个体，融入自然。

普桑46岁时达到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他声名远播，美名传回了自己的祖国。当时的首相是同时兼任主教的黎塞留，代表国王路易十三亲召其回国为宫廷服务。当年那个郁郁不得志的小画家，16年后回到祖国成了誉满天下的绘画大师，全法国没有一个画家的水准能望其项背。虽然受到了极大重视，普桑和法国绘画界依然“八字不合”，他不堪忍受宫廷生活的钩心斗角，只在路易十三宫中服务了一年多就借故再次前往罗马，从此再未回到法国。即便如此，普桑对法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依然极为深刻，被尊为“法兰西绘画之父”。



G5↑

/

《第欧根尼于山野》（*Landscape with Diogenes*）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160cm×221cm布上油画1647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虽然“神功大成”的普桑并未直接服务于法国的绘画艺术，但他有一个弟子叫夏尔·勒布朗，却是地地道道法兰西学院绘画的奠基人。

此处不得不对路易十四做简要介绍。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权势最为强盛的君主，他使法国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他建造的凡尔赛宫是令全欧洲君主都艳羡无比并竞相效仿的对象。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国有化”了法国文化艺术。

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似乎并非强权君主，连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中对于路易十三的描写，也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优柔寡断的弱主，执政期一直是首相黎塞留操持，实行君主专权。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去世后，年仅5岁的路易十四继位。路易十四年幼，之前黎塞留打下基础的君主集权又危在旦夕，各地的大贵族们都各自为政并蠢蠢欲动——在一场以孔代亲王为首的叛军与马扎然（路易十三王后的情夫，新首相候选人）为首的法国王室斗争中，以王室的胜利告终。路易十四亲政后，把法国的权

力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凡尔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未再设首相一职，他事必躬亲，是一位极为勤政的国王。

难以想象，凡尔赛宫的前身只是路易十三打猎时用来歇脚的野外小别墅而已，而今，凡尔赛宫是欧洲宫殿中最奢华的一座，它集中代表了路易十四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艺术风格上，凡尔赛宫也代表着法国巴洛克建筑风格，屋顶上都镶着大块的黄金雕花，置身金碧辉煌的“宫”中，那种压迫感让人透不过气。

路易十四把全国的贵族都聚集到凡尔赛，夜夜笙歌，用享乐麻痹他们。表面上看，这是贵族们的殊荣——国王出钱款待贵族，给他们好吃、好喝、好玩的，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事实上是把各自为政、蠢蠢欲动的贵族们，集中地管控起来。

路易十四平日的生活也极为烦冗，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场仪式，贵族们要在国王起床之前，来到他身边观摩。国王白天主持政事，晚上开派对狂欢，带领着贵族们过着极具仪式感的生活。多年下来，贵族们变得俯首帖耳，百依百顺。路易十四成功地巩固了中央集权，法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的权势能比路易十四的更大。

要维持如此奢靡的派对生活，艺术家的参与是少不了的，尤其是音乐和舞蹈。路易十四的宫廷乐师吕利就是法国巴洛克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虽然是个意大利人，但吕利入了法国籍，并终身服务于法国宫廷。吕利创作了许多芭蕾舞音乐，还把芭蕾舞融入意大利歌剧，发明了法国歌剧。

路易十四本人便是芭蕾舞高手，在宫廷派对中，他亲自演出过21部芭蕾舞剧。那时的芭蕾舞还是社交舞种，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样需要高超的技艺。芭蕾舞起源于佛罗伦萨，是由美第奇家族的卡特琳·德·美第奇带到法国宫廷的。路易十四同时还是高跟鞋的发明人。

一方面为把艺术发扬光大，满足自己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路易十四充分意识到，文化艺术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路易十四的授意下，法国的文化艺术被高度国有化：1661年路易十四建立了皇家舞蹈学院，从此，芭蕾舞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虽然芭蕾舞到19世纪在法国走向衰落，但之后又在俄罗斯获得了更深远的发展，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这样超绝的地步。

在造型艺术方面，法国的“绘画和雕塑学院”于1648年成立，但这是个民间团体，由一群艺术家组成，成员结构相对松散。到了1663年，路易十四把

它收编成为真正由国家支持的“皇家美术学院”。

皇家美术学院拥有系统化的教学体系，以培养未来的艺术家为宗旨，并资助大批高水平的艺术家，确保艺术为王室服务。在初代院长勒布朗的带领下，皇家美术学院致力于创造一种属于法国的“皇家艺术”，总体来说，就是歌颂王权，为路易十四服务。

勒布朗早先学艺于巴黎，后得普桑赏识，在普桑逃回意大利后，勒布朗追随普桑去了罗马，并继续跟随普桑学习了4年。从绘画理念上，勒布朗对普桑有着比较完整的传承。勒布朗对于形体极为看重。相比之下，勒布朗并不像普桑那般热衷于对风景的刻画，可能是长期服务于宫廷，他更善于把握宏大的主题，诸如宗教场景抑或是战争场景（G6）。



G6↑

/

《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Entrance of Alexander into Babylon*）夏尔·勒布朗（Charles le Brun）4.5m×7.07m布上油画1661—1665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学院国有化后的一大好处是教育体系更完善，对艺术家的培养也更为高效。路易十四的皇家美术学院几乎是所有官办艺术学院的雏形，在它诞生之前，欧洲的艺术学家学艺或者说技术被传承的方式，都是所谓“学徒制”。学徒制相对灵活、实用，但在技艺的传承以及系统化的归纳方面相对薄弱。皇家美术学院相比学徒制的工作室，有了更为完善的培训体系，技艺的传承也变得更高效。但这样做会遏制百花齐放的多样性，使得学院出来的艺术家，在整体风格上趋同。

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长，路易十四还设立了“罗马大奖”，就是当时的“公派留学”奖学金。获得罗马大奖的艺术学生，可去罗马留学，为此，路易十四还在罗马开设了“法兰西学院”供获奖学生继续深造。罗马大奖的影响极其深远，当时法国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无论是画家、雕塑家还是音乐家，很多人都获得过罗马大奖，比如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音乐家，还有布歇、大卫、安格尔等重要画家。

从勒布朗开始，普桑的“广义的古典主义”以及“形先于色”的绘画方式，或者说拉斐尔的绘画方法和艺术理念成为学院的“标准教材”，影响了之后法国100多年的艺术，直到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兴起，学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路易十四的学院开始，整个欧洲艺术界的结构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学院诞生后，艺术界的江湖气就逐渐衰退了，各国都开始纷纷推出自己的学院。取行会而代之的是学院的评审委员会，艺术从一项“手艺”变成了一个“学科”，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

（二）自然与人文

若真要给普桑找一个二元对立的话，大范畴内，前文讲到的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兹都是其对立面。然而从艺术成就上来说，这三位的艺术表达都比普桑的有辨识度得多，所以用来作为其对立面并不贴切。从绘画的内容以及艺术家的性格特点来看，“风景画之父”洛兰算得上普桑的一个对立面。但他们并非艺术风格上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同一主题框架下创作理念的对立。普桑的风景画（历史画）充满人文主义气息，讲故事、讲道理，洛兰的风景画充满了自然主义气息，讲审美、讲感情；普桑描绘风景是表现深刻的哲理，洛兰则是描绘优美的自然。

普桑与洛兰年纪相仿，都是法国人，也都在意大利发展。他们二人的绘画作品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经常被挂在一起展出，而且一眼望去，他们的绘画风格还很接近，除了一些特定的只有洛兰才会画的主题，比如一些海港景色（G7），其他作品很难一眼辨别出来具体是谁的，但他们的作品几乎只要一眼就能让人说出：“这幅画不是洛兰画的就是普桑画的。”

现代人肯定觉得，风景画题材的作品极为常见，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自两宋以来，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全然是主流的绘画题材，人物画反而并不占主导。但西方艺术史却并非这般光景，这与基督教神学体系下的艺术观有极大关系。在洛兰之前，风景画题材异常少见，是因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风景就被认为是相对“低等”的题材。最高等的自然是神的形象，其次是神圣人物的形象，再次是由神所造的人的形象，更次之是由人创造的建筑物，最后才轮到风景，因为那是不加修饰的荒野自然。



G7↑

/

《克娄帕特拉在塔尔苏斯登陆》（*Cleopatra Disembarking at Tarsus*）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119cm×148cm布上油画1642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洛兰之前的画家虽然也在风景画领域有所尝试，但最多算是人物远景，画中还是要将人物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描绘，譬如威尼斯画派的乔尔乔涅的一些作品，但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洛兰是第一个大规模画风景画的一流艺术家，在他的风景画作品当中，人物依然存在，但洛兰已经把对人物的刻画缩小到了极致，描绘手法几乎是几笔略过。

洛兰之所以选择风景画创作，一个原因是在当时的意大利，其他主流题材已经被挖掘透彻了，相比之下，风景画却是一块几乎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此外，还由于洛兰生性恬淡，闲云野鹤。洛兰喜欢去罗马郊外游玩，自然风景时常激发他的创作热情。洛兰与普桑相比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他甚至连自己的签名都写不好，因此他的风景画与饱读诗书的普桑不同，更具抒情气质，以及自然的纯粹之美，讲究返璞归真。

洛兰的风景画建立起了对自然风景的审美标准。他的风景画（G8）常常以金色阳光洒在绿色植被上的画面给人温和感，营造出唯美效果，这都是洛兰

通过户外观察后回到画室，在画布上虚拟出来的半观察、半想象的效果——用虚构世界支配真实世界的风景。可以说，你走到野外，碰到某处的风景，如果某处风景能让你想起洛兰的画作，则此处风景便算得上是一处美景。



G8↑

/

《随想曲与罗马广场的废墟》（*Capriccio with Ruins of the Roman Forum*）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118.8cm×79.7cm布上油画约1634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南澳大利亚美术馆（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

洛兰的画作对于大海的观察和描绘是前所未有的，洛兰之前似未有艺术大师认真描绘海景。洛兰还是最先把太阳的形象放到绘画作品（G9）中的一流艺术家，这也是他的一大创新。

洛兰死后，他的风景画在英国受到了强烈追捧，现今其作品有一大批都在英国。英国人庭园建造的范式受到了洛兰不少启发，英国人会按照洛兰的画作修建私家园林。洛兰的艺术对英国学院艺术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英国后世重要的画家们对洛兰的评价极高，如庚斯勃罗曾经说：“我们为什么还要画风景呢？洛兰明明已经把风景画画到极致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家康斯特布尔也说：“洛兰是最完美的风景画家。”被认为是英国最佳

大画家的透纳也曾要求把自己的海港作品与洛兰的海港作品挂在一起展出，以表达对洛兰的敬意。前二位实则过谦了，他们二位画了极多的风景画，而且康斯特布尔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风景画家之一。



G9↑

/

《示巴女王登船》（*The Embarkation of the Queen of Sheba*）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149cm×194cm布上油画1648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洛兰的艺术对英国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洛兰之后，英国诞生的擅长风景画的画家，相比西欧地区要多出许多。

（三）巴洛克与洛可可

巴洛克艺术时期之后的18世纪中后期，以法国的巴黎和凡尔赛为中心，诞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史称“洛可可”艺术。对于洛可可艺术最有意思的一句形容是：“巴洛克一发病，就变成了洛可可。”

“巴洛克”这个词原本被用来形容过度装饰的艺术风格，原意是“不规则的珍珠”，而洛可可（Rococo）是一个新造词，结合了“Rocaille”和“Baroque”两个词，是一种戏称。“Rocaille”是一种用贝壳、珊瑚、鹅卵石等材料进行室内装潢的手法。如果说巴洛克是“不规则的珍珠”，洛可可就是“张牙舞爪的珊瑚”。

洛可可艺术风格是把巴洛克艺术的过度装饰精神发挥到极致的风格，流行于路易十五时期的凡尔赛宫廷，并席卷全欧洲。洛可可风格从室内装饰开始逐渐蔓延到绘画、雕塑甚至音乐领域，是属于社会潮流性质的艺术风格。当然，“Rococo”的形容也是后人加上去的，在19世纪被艺术史学者广泛应用。

路易十四在位72年，是西方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终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强化自己至高无上的君主形象。为了配合路易十四至高权威的形象，皇家美术学院进行了大量歌颂王权的艺术创作，所以在艺术风格以及艺术形象上，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已经经过充分深化与强化，观感上金碧辉煌，形态上阳刚雄壮。这一视觉上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与路易十四高度集中化的强权统治，形成了固有关联，深深印在世人脑海中。

路易十四的继任者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因为路易十四的“超长待机时间”已经成功“熬死”了他的儿子和孙子。拥有这样一位，把法国国力提升到空前高度的“太阳王”曾祖父，作为新统治者，路易十五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

在旧统治者的框架下，新统治者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超越前人，路易十五亟须在意识形态和可视化上拥有自己在艺术上的视觉风格，需要世人对自己有独特认知，路易十五的时代要有属于路易十五的时代背景色。洛可可艺术风格正是路易十五的艺术背景色。

说起洛可可风格，不得不提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是社交名媛，也是一位深度参与了法国政治的女性，在政治上她是一位“铁腕女强人”。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与她有直接联系。

蓬巴杜夫人原名让娜·安托瓦尼特·普瓦松，出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据说在小时候曾有占卜师预言她会成为法国国王的情妇。

蓬巴杜夫人发迹的故事是典型的“灰姑娘”式的：长大后的蓬巴杜夫人通过婚姻获得了一处距离皇家牧场很近的房产，由于经常出现在国王打猎的路上，一来二去，蓬巴杜夫人就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国王的注意，并成为国王的情妇，一路青云直上。

18世纪上半叶，情妇在法国社会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身份，是“公开的秘密”。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圣经》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很明显，国王是很难遵从这一点的，因此就有了情妇这种关系，并逐渐流行于上流社会。关于这方面的社会人情状态可以参考莫泊桑的小说《漂亮朋友》，其对于法国社会的婚外情文化描写可谓十分辛辣到位。



G10↑
/
蓬巴杜粉

蓬巴杜夫人长期保持着对国王的吸引力，并非仅靠美貌就能做到。艺术是她的一件重要武器。蓬巴杜夫人在艺术上的品味引领潮流，她培养了许多艺术家，用美术、音乐以及戏剧来取悦国王，并让宫廷的专业艺术家和表演家创作一些世俗题材的内容给国王看。这与当时盛行的、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宏大题材截然不同。由此，她成功博得了路易十五的欢心，国王因此不断下放更多权力给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也一直保持着对艺术家以及学者的资助和支持，她甚至在时尚和艺术方面都有独特贡献，比如到今天还有人在梳的“蓬巴杜发型”，就源于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还发明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独特玫瑰粉色，叫“蓬巴杜粉”（G10）。

蓬巴杜夫人对室内装潢也有独到见解，洛可可艺术最主要的风格特色其实

体现在室内装潢上。凡尔赛宫从外观上看是标准的法国巴洛克风格，但它的内部尤其是小型的卧室、书房都是教科书式的洛可可装饰风格。装饰中充满了珊瑚般的触角、木耳一样的花边等造型，纹理十分繁复，最重要的是金碧辉煌到夸张的程度，恨不得在墙上贴满金质的雕花纹理，可谓极尽奢华。洛可可风格的艺术深得路易十五欢心，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能够用来对抗路易十四奠定的巴洛克“皇家风格”的重要艺术武器。

在凡尔赛宫的引领下，洛可可风格席卷欧洲，各国君主纷纷仿效，进而开始有一些教堂以及宫殿的建筑外部也呈现出洛可可风格。这一特色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维斯朝圣教堂（G11）、维森海利根教堂（G12）等，都是由内而外的洛可可风格。它们棱角极多、锐角也极多。巴洛克风格总体是圆润平滑的大波浪线主导，但洛可可艺术风格除了大波浪线的趋势，在大波浪线里还有小波浪线，可说是雕梁画栋。与巴洛克追求的雍容、对称、方正的审美不同，洛可可喜欢用不规则的、不对称的，类似于贝壳、旋涡等的纹理进行装饰，交错扭曲在一起。如果说巴洛克风格是“鳞次栉比”，洛可可则算得上是“盘根错节”。

洛可可的绘画艺术一反巴洛克艺术强明暗对比的特色，整体呈现出明艳、轻佻、氤氲的感受。奠定洛可可绘画风格的画家是华托，他出生于17世纪末的佛兰德斯地区，当时佛兰德斯处于法国统治之下，所以华托大致可被算作一位法国画家。

华托早年跟随画店师傅学艺，但很明显，他的老师不是什么优秀画家，所以华托也算自学成才，并在早年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绘画内容上看，华托的一大创举是发明了所谓“游乐画”，描绘的是一些嬉游的、充满欢乐气息的场景，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题材。细数一下，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除了人物肖像画，其他类型的画作，哪怕是风景画，都与宗教、历史、大事件有切不断的关系，艺术从来没有摆脱过宗教与王权的影子。游乐画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游乐画描绘的是世俗享乐场景。

华托在画中描绘贵族游玩时的场景，表现出在社会物质发达的环境下，人们热衷于享乐的生活状态。如此主题的画作折射出18世纪的欧洲社会，核心价值观从宗教信仰全面向世俗生活转移，这样的转移从文艺复兴初显端倪，到洛可可时期基本完成。华托这一派也叫“雅宴画派”。



G11↑

/

维斯朝圣教堂 (Wieskirche) 齐默尔曼兄弟 (The Zimmermann Brothers) 1746—1754年德国施泰因加登



G12↑

/

维森海利根教堂 (Basilika Vierzehnheiligen) 巴尔萨萨·诺依曼 (Balthasar Neumann) 1743—1772年德国班贝格



G13↑

/

《舟发西苔岛》（*The Embarkation for Cythera*）安托万·华托（Antoine Watteau）129cm×194cm布上油画1717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华托最著名的作品是《舟发西苔岛》（G13），描绘了贵族男女向西苔岛出发的场景。西苔岛是希腊神话中一个象征爱情和欢乐的岛屿，传说爱神维纳斯就住在那里。这幅画折射出当时的上流社会似乎并不关注宗教信仰以及国家大事，而是向往爱情，向往时髦的享乐生活。华托的游乐画对当时艺术界的影响就好像是在提倡文以载道、警世雄文的文坛中，突然杀出一部言情小说，这在当时是非常新潮的题材和创作方式，深受大众喜爱。华托也因为类似的几幅“西苔岛”作品被评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从此开始对学院绘画产生影响。

华托喜欢用厚重的白垩色增加层次感，堪称是画作的点睛之笔。他的画面明亮，色彩饱和度较低，有一种云淡风轻的高级感。他的绘画语言和传统的一大区别，体现在叙述方式的不同——传统的绘画作品，总体上是故事性的叙述方式，欣赏者需要通过画面中的具体人物形象以及相关剧情来了解作品的内涵，与此同时，画面的观感用于烘托剧情以及人物性格。华托的绘画作品则是以画面感代替故事性，欣赏华托的画作，并不需要对所画人物以及故事有所了解，而且通常游乐画也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画面本身就足以达到传情效果，能让人明显地感受到欢快、愉悦。

华托的艺术影响是深远的，连后世的音乐家都可以从华托的画面中汲取灵感，像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甚至西贝柳斯等作曲家都在华托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创作出有画面感的音乐。虽然不知是否有直接联系，第一次看到《舟发西苔岛》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响起了德彪西的《快乐岛》，这是德彪西写在新婚蜜月时的、听着略显古灵精怪的曲子，充满爱情、欢乐。

相比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的画作更为明艳生动，它的画面明亮，色彩也更丰富、平衡。这些特点其实与一项技术发明息息相关。在18世纪初，德国一位名叫迪斯巴赫的工人，在机缘巧合之下，用草木灰和牛血混合烧制，提炼出了一种新型的蓝色颜料“普鲁士蓝”，从此蓝色颜料的成本大大降低，再也不像以前需要用昂贵的矿石制备了。这使洛可可时期的画家可以大胆地使用蓝色，而且也更舍得把蓝色与其他颜色搭配调和出显眼生动的绿色，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绿色多以墨绿色出现。到了18世纪中叶，大部分颜料更是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从此颜料的限制被逐渐解除。

华托的弟子，也是洛可可时期最重要画家之一的布歇就是运用这种新型蓝色的高手。布歇深得蓬巴杜夫人的垂青，他也为其创作了多幅肖像，后世对蓬巴杜夫人形象的认知几乎是通过布歇的肖像画（G14）获得的。

布歇画的这幅全身像中，蓬巴杜夫人身着蓝绿为底、粉色相间的长裙，据说当年，蓬巴杜夫人就是穿着这样一套色彩搭配的衣衫成功地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注意力。布歇的绘画整体更为明亮、真实、鲜活，他在画中使用大量蓝色，例如在《狄安娜出浴》（G15）中，女性均配有蓝色浴袍。

布歇画作中的洛可可精神内涵相比他的老师华托表现得更为显著——布歇极其热衷于描绘女性裸体（G16），而且他的女性裸体在人物形象与人物动作的设计方面表现得直接大胆，毫不掩饰。布歇给他的妻子画了一张裸体画像，画面直白，据说当年著名的启蒙运动学者狄德罗看到后，诟病布歇是在给自己的妻子用绘画“拉皮条”。布歇却认为，女性的裸体是自然的绘画内容，是美好的事物，没有必要隐晦地传达。从这一点来看，布歇是一个敢于突破禁忌的艺术家，这与洛可可时期崇尚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是密不可分的。这也说明当时社会的开放程度远非文艺复兴以及巴洛克时期可比。



G14↑

/

《蓬巴杜夫人像》（*Madame de Pompadour*）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201cm×157cm布上油画1756年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Alte Pikotheek）



G15↑

/

《狄安娜出浴》（*Diana Getting Out of Her Bath*）弗朗索瓦·布歇
 （François Boucher）57cm×73cm布上油画1742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宫女》（*Odalisque*）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59cm×73cm
布上油画1745—1751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布歇担任过皇家美术学院院长，本来法国的绘画艺术就是以学院为尊，如今学院的首领尚且如此崇尚享乐主义精神，那整个洛可可时期的法国画坛，乃至全欧洲的绘画风格可想而知。

法国洛可可绘画的集大成者是布歇的弟子弗拉戈纳尔。弗拉戈纳尔的绘画作品集中代表了洛可可绘画的画面观感效果，总体展现出一种“氤氲之息”。说得简单一些，弗拉戈纳尔笔下的洛可可绘画作品，有一种给画作加了“磨皮滤镜”的感受。他画的人物大多面色红润，如小酌微醺般愉快，看了他的画总让人想起一句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洛可可时期的娱乐主题在弗拉戈纳尔的画作中表现得一览无余：它消磨你的意志，使你放开怀抱，投入到无尽的享乐中去。

弗拉戈纳尔最出名的作品是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秋千》（G17），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一段三角关系：女子被丈夫推着在秋千上玩乐。秋千在法语中是“escarpolette”，在英语中是“swing”，都是“摇摆”的意思，在此处形成一语双关。画面中，秋千上的女子明显是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一方面是在背后推着她的丈夫，另一方面，在秋千荡起来后，女子就向前方树丛里的情夫抛着媚眼，连鞋子都飞了出去，然而丈夫却并不知道妻子已经红杏出墙，还保持着愉悦的表情。据说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发明现代社会人人都穿的“内裤”，所以有人猜测，情夫所面对的是女子一览无余的裙底风光，女子实际是赤裸着下半身的，画作带有强烈的性暗示。画面中还有几座古希腊形象的雕塑，也许暗喻“人在做，天在看”，有一定警世寓意。



G17↑

/

《秋千》（*The Swing*）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e Fragonard）81cm×64.2cm布上油画1766年英国伦敦华莱士收藏（The Wallace Collection）

洛可可意大利也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意大利的宗教气息一直非常浓厚，但洛可可风格也适时地渗透到宗教画中，并表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到了18世纪中后期，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后，天主教和新教的势力范围基本固定，新教教徒不用再高举旗帜反对教皇，教皇也不用靠反宗教改革来打击新教，停留在语言论战已经足够，并无必要再发生肢体冲突、大动干戈，于是在意大利，宗教画也展现出新气息。

这方面成就最高的画家要数威尼斯的提埃波罗。提埃波罗的画作，单从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已看不到太大创新，因为古典绘画的根基已然稳固，在提埃波罗的画作中可以看到提香、鲁本斯，甚至还有雷尼的影子，绘画技

巧过硬。

在提埃波罗的宗教画中埋藏的是洛可可精神。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是典雅的，它通过优雅地展现神迹以及神圣人物形象来达到传递基督教诲的作用；巴洛克时期的宗教画一反文艺复兴时期“温吞”的姿态，采用戏剧冲突的表达方式，对欣赏者进行“震撼”；而洛可可时期，这两种方法似乎都已过时。

可以这么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笃信宗教，是“求着教会”想上天堂，所以教会不需要太用力，很安静自然地展现自己的伟大与神圣就够了，这就有了“典雅”的宗教艺术；巴洛克时期，人们依然信仰宗教，总体依然是“求着教会”想上天堂，但情况发生了改变，新教在和天主教“抢人”，天主教需要努力地让人们“转向”自己，所以巴洛克时期的宗教画是充满戏剧性且引人注目的；洛可可时期，整个社会已经逐渐从宗教抽离，更关注世俗，人们开始不那么“求着教会”了，没办法，教会就只能来“求你”了。提埃波罗的宗教画展现的不是神圣人物的伟大，也不威胁你“不好好侍奉就要下地狱”，而是集中展现天堂的美好。

提埃波罗洛可可式的宗教画着重描摹欢愉、幸福的宗教场景。这是一种“糖衣炮弹”式的描绘手法，通过绘画作品，传达出“宗教是欢愉的，天堂是幸福的”信息。其代表作是《皮萨尼家族的神化》（G18），画中已无法看到明确的、直接的宗教主题，而是充满了缥缈的、幸福的视觉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在洛可可艺术时期，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已变得显著。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就与清政府有一定往来，据说路易十四曾致信康熙皇帝，而康熙本人对西方的科学也很着迷，据说乾隆皇帝还很爱听西方管弦乐。



G18↑

/

《皮萨尼家族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the Pisani Family*）乔万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350cm×2350cm天顶湿壁画1761—1762年意大利斯特拉皮萨尼别墅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Villa Pisani）

瓷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洛可可艺术时期的西方诞生了全新的艺术形式，就是瓷器以及瓷塑。从巴洛克艺术时期开始，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君主就对瓷器极为着迷。瓷器珠圆玉润的观感、坚硬无比的质地以及釉料五彩缤纷的变化，都让西方人神往。西方的君主大多愿意为瓷器珍品付出巨大代价，譬如波兰国王，“强力王”奥古斯都二世，就曾用一支600人的“龙骑士”部队，换取了151只大青花瓷瓶。为了研制出自己的瓷器，奥古斯都二世可谓倾尽全力——他把欧洲范围内有名的炼金术士囚禁起来，命令其研究烧制瓷器的方法，终于发现瓷器的秘诀来自“高岭土”。奥古斯都二世还建立了瓷器厂，制造出了第一批属于欧洲自己的硬土瓷器。据说当年为了掌握瓷器制作的奥秘，西方人还派传教士专门去往景德镇，“潜伏”20年，就是为了获得制作瓷器的秘方。

蓬巴杜夫人在瓷器方面的贡献也十分卓著，在她的一手操持下，法国建立了“塞夫勒瓷器工厂”。塞夫勒瓷器工厂烧制了很多流传后世的经典瓷器（G19a/G19b），以各式各样的洛可可装饰雕花风格混搭中国风主题的绘画内容，诠释了什么叫作“极尽奢华之能事”。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是欧洲社会形态从君权到民权过渡最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末期。对于洛可可艺术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艺术品味和审美需求层面。洛可可风格的兴盛，深深地折射出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的剧变埋下了重要伏笔：对洛可可艺术的崇尚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有能力去关注世俗生活、追求世俗幸福。



G19a↑
/
塞夫勒瓷器



G19b↑
/
塞夫勒瓷器

根本上，这是因为社会经济水平的进步。人一旦富裕了，就会开始追求更多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资产阶级人群兴起

后，必然会去追求一个于他们而言更为公平、民主的社会，这就给王权统治带来了不安因素。再加上18世纪中后期，法国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伏尔泰等人公开反对王权统治，学术和艺术的兴盛也让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以及多元化。这一切都预示着法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酝酿已久的必然。

讲到这里，“物极必反”的道理在洛可可艺术和巴洛克艺术上也表露无遗。虽然洛可可是由极致的巴洛克演化而来，但在艺术风格以及视觉观感上，洛可可与巴洛克的艺术也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

在观感上，巴洛克艺术虽然也重装饰、重戏剧冲突，但总体上巴洛克艺术的建筑外形是圆润、向内收的，风格是周正、雍容的。而洛可可艺术风格则更为“矫饰”，总体是向外“喷张”的，风格是充满棱角的。在这一点上洛可可风格与矫饰主义风格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剑走偏锋，讲究夸张造作，存在时间也都相对短暂。洛可可之于巴洛克，就好像矫饰主义之于正统的文艺复兴风格。

绘画观感上，二者也形成了鲜明对立。巴洛克艺术的绘画，明暗对比强烈，甚至画面多有阴沉黑暗的视觉效果，如卡拉瓦乔、伦勃朗、委拉斯开兹等，甚至前文并未提及的，西班牙的苏巴朗（G20）、法国的拉图尔（G21）以及一众北方擅长画静物的画家们皆是如此，洛可可的画面则是明艳、光亮的；巴洛克绘画的色彩大多浓重深刻，洛可可的则是轻佻、淡雅；巴洛克绘画依然“文以载道”，喜欢“摆事实、讲道理”，洛可可则倡导娱乐至上，喜欢“论情调、重观感”。当然社会大背景的差异也是这两种艺术风格差异如此巨大的根本原因：巴洛克艺术与宗教紧密相连，洛可可则是属于世俗的艺术。



G20↑

/

《上帝的羔羊》（*Agnus Dei*）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38cm×62cm布上油画1635—1640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G21↑

/

《油灯前的马格达丽娜》（*Mary Magdalene with a Night Light*）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128cm×94cm布上油画约1640—1645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如果说巴洛克充满神性的威严、王权的阳刚，那么洛可可则充满女性化的温柔和纤巧多变。

08 巴赫与亨德尔：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一）音乐与美术

西方美术的高峰从文艺复兴方才开始，但西方古典音乐却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复兴。造型艺术以及建筑之所以能经历复兴，是因为它们拥有能被复兴的对象，即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艺术与学术。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都有大量建筑物和造型艺术流传下来，如位于雅典卫城的帕提侖神庙，众所周知的罗马万神庙、大斗兽场、凯旋门，以及图拉真纪念柱这样的雕塑与建筑结合的遗迹，古希腊的雕塑众多，最有名气的莫过于《阿佛罗狄忒》（《米洛斯的维纳斯》）与《拉奥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皆以古代遗留之范式为标准，致力于达到古人的成就，并且认为古人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造型艺术的有迹可循，让艺术家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音乐则全然不同。尽管学术研究表明，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已经非常发达——这一点从遍布南欧的古希腊剧场遗迹可考证，哪怕远在西西里岛的希腊化地区，也有规模庞大的圆形剧场，而戏剧经常会配以音乐进行演出，古希腊的琉特琴也是当时的主流乐器。但遗憾的是，公元6世纪格列高利圣咏被发明时才诞生了音位谱。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家并无太多前人遗产可作参考，只能“白手起家”，这便是为何西方音乐体系完善的进程要比文艺复兴晚了近两百年。

在西方音乐史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级作曲家，是意大利克雷莫纳的蒙特威尔第。蒙特威尔第被认为是从文艺复兴音乐过渡到巴洛克音乐最关键的作曲家之一，他启蒙了巴洛克音乐的作曲方式，也是意大利歌剧的早期发明人之一，极大地完善了西方古典音乐体系。

蒙特威尔第活跃在17世纪上半叶，此时已进入巴洛克艺术时期，音乐迎来第一波发展高潮：以法国的吕利和拉莫、德国的巴赫、意大利的维瓦尔第、英国的珀塞尔、服务于西班牙宫廷的意大利人斯卡拉蒂以及活跃于英国的德国作曲家亨德尔为主要代表。尤其是拉莫，建立了详尽、理论化、系统化的和声体系，堪比马萨乔把透视法引入绘画，从此让音乐的创作有了技术和理论的依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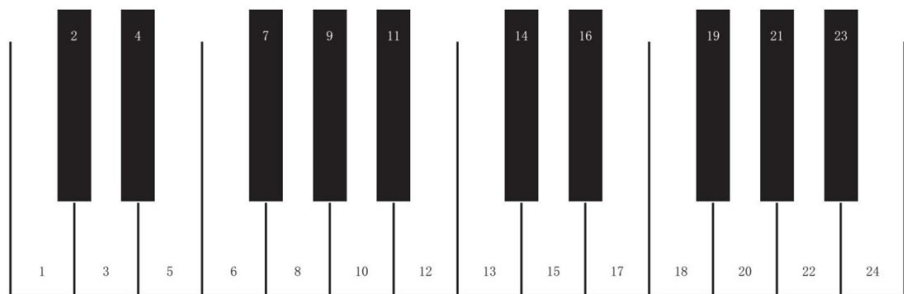
世人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认知中，德奥音乐似乎比意大利音乐占比更高。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几乎都发源于意大利，音乐也不例外。包括最

主要的乐器——现代乐团所用的“提琴家族”中的四种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它们的雏形最早都诞生于意大利；钢琴的键盘体系也由18世纪初的意大利人发明。

在西方古典音乐一穷二白的“创业”过程中，蒙特威尔第的贡献极为卓著。在他之前，音乐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廷服务，较著名的作曲家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塔利斯和帕莱斯特里纳等，他们创作了许多宗教音乐，包括牧歌、赞美歌、弥撒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技巧已然繁复，譬如塔利斯创作过四十个声部的合唱作品^[1]。到了蒙特威尔第，音乐从服务于宗教的功能性逐渐开始转变为面向世俗的娱乐欣赏性，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创作方式，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在详述蒙特威尔第做出的贡献之前，需清楚音乐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即旋律与和声。旋律很好理解，人们平常说一首歌很好听，实际指的是歌曲的旋律好听，旋律是不同音高的音符在时间线上的排列规律。和声则是个更复杂的概念。具体的、单个的和声类型叫作和弦。和声是不同音高的音符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不同音高的音在同一时刻发声。和声使音乐的表现力千变万化。和声自身拥有表达情绪的功能，比如大三和弦与小三和弦，虽然只有一个音的差别，但在听感上，前者是光明的，后者却是阴暗的。不同类型的和声在时间线上排列衔接，可以达到情绪变化的效果，能展现强烈的戏剧性，也能展现情感的聚集和递进，更能表达不同的情绪和气氛。和声就好像一个“工具百宝箱”，箱子中的每一件“工具”都能帮助音乐达到不同效果，不同“工具”的排列组合可以组成不同的情绪变化，烘托不同的环境氛围。

要理解和声主管情绪的原理，要从它最简单的情况开始：单看两个音同时发声的效果。例如在钢琴键盘上（x1），1号按键和8号按键同时发声，给人的听感是和谐的，这两个音可以相互融合。两个不同音之间的音高差距，叫作“音程”，1号和8号按键的音程关系叫“纯五度”，是Do和Sol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和谐、舒服的。如果换一个音程关系，比如1号和3号按键同时发声，这个音程关系是“大二度”，是Do和Re的关系，给人的听感则是不和谐甚至突兀的。依此类推，三个音同时发音，就有三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音和音两两之间都有音程关系，这些不同的听觉感受交织在一起，会给听者综合情绪的感受。比如8号、12号和15号按键同时发声，这组和声的音响效果总体上是明亮、和谐的。但这时若再加18号按键，四个音同时发声，由于与其他三个音之间新的音程关系，18号按键会与原本的和弦反应出新效果，这个新和弦给人“上升”、悬在半空的感觉，像是屏住一口气，呼之欲出。在这个和声里面，8号按键代表的Sol和18号按键代表的高八度的Fa是“小七度”的音程关系，此类和弦有一个专业名称叫“属七和弦”。



X1↑

/

键盘系统示意图

不同音程关系会给人不同的听觉感受，背后有其数学原理：两个音频率之比的最小公倍数越小，两个音的和音就越和谐。例如纯五度中，两个音的频率比是3：2，最小公倍数是6；大二度的频率比大约是324：289，最小公倍数是五位数，所以大二度远没有纯五度的听感和谐。

任何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都不可能从头到尾只出现单音。这就好比在KTV唱歌时，机器里放的是伴奏，而演唱者唱出来的则是旋律，没有伴奏的话则只是清唱。清唱的音乐大多是单调的，伴奏的功能就是在演唱旋律时，为旋律配上和声，让音乐听上去情绪饱满，使音乐丰富多彩。

虽然和声整体都对伴奏时的情绪传达有所贡献，但占主导的其实是和声中的最低音。在音响设备中，有“低音炮”的概念，它的作用其实是通过调整段音乐中的最低音来加强气氛。

蒙特威尔第的一大贡献是在创作中开始广泛使用“通奏低音”。在伴奏中，低音的功能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可以总结出一套“公式”来提高伴奏部分的创作效率：只要把每个和声的低音确定下来，属于这个和声的其他音按照一定的规律可以自由补齐。这和现在大部分流行歌曲的伴奏方式基本相同，民谣歌手之所以在看到乐谱上一些简单的字母和数字后，就能够通过扫弦来自弹自唱，就是因为吉他谱上的字母数字信息告诉了演奏者这段和声的类型，只要把这个和声的“公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即使乐谱上没有标注具体的音高，也可以进行演奏。这种演奏是公式化的、固定的。蒙特威尔第是较早地在音乐中使用这种伴奏方法的作曲家。在他的乐谱中，低音伴奏的部分只需要把单个低音写出来就够了，乐手会自动把这些音丰富成多个音的和声。这种通奏低音的做法，大大提高了创作效率，作曲家可以

将更多精力分配在旋律创作上。通奏低音的做法几乎贯穿了整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创作，是一件提升效率的武器，直到古典主义时期才逐渐式微。

通奏低音的通用是有社会原因的。在蒙特威尔第的年代以及整个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几乎都是服务于教会、宫廷等上层社会的，平时有大量功能性创作的任务，如宗教仪式、宫廷宴会等等。当功能性大于艺术性的时候，作品往往偏向同质化，在这种情况下，创作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蒙特威尔第对于西方音乐的贡献可类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之父”乔托。

蒙特威尔第另一大贡献是让歌剧这一题材成为主流。尽管蒙特威尔第不是第一个进行歌剧创作的作曲家，但他的《奥菲欧》可以说是歌剧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歌剧作品。《奥菲欧》是西方歌剧中的典范之一，堪比中国昆曲中的《牡丹亭》。

歌剧的基本形式也是在蒙特威尔第手上成型的。歌剧创作通常由作曲家与剧作家合作完成，剧作家负责写唱词，作曲家负责配乐，把故事情节和音乐旋律结合在一起，最终成为一部歌剧作品。在意大利传统歌剧中，一般分为咏叹调和宣叙调。咏叹调是用来抒情的，旋律性强；宣叙调是用来推动剧情发展的，叙述性强，总体上旋律不明显，甚至有说话念词的部分，其情感表达和音调变化远没有咏叹调丰富。歌剧中还有重唱、合唱部分。这些基本的构成形式在蒙特威尔第的歌剧中变得成熟。

蒙特威尔第几乎没有写过纯器乐作品，尽管他本人的器乐演奏水平很高。其实，在整个意大利范围内，无论什么年代，占据主导的都是声乐。

从文化溯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意大利注重声乐的现象在它绘画创作的题材偏好中也可以找到，这与意大利的宗教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神圣人物地位最高，人类次之，建筑再次。前文提到，在意大利天主教地区的绘画题材中，几乎都是以人物形象为核心，建筑、静物都较为少见，更不要说风景画。同理，对于音乐来说，由上帝创造的人的声音，无疑是最重要的。自公元6世纪的格列高利圣咏开始，人们最早用来赞美上帝的音乐就是声乐。这种一脉相承的宗教习惯，导致意大利不仅在绘画艺术上一直以人物形象为核心，连音乐也是以人声为绝对主导。虽然也有器乐，但器乐主要是人声的伴奏，这与德意志音乐对待器乐和人声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故意大利的艺术是重视“个体”的艺术。

[1] 《40声部经文歌：新的希望》（40 Part Motet: Spem in Alium）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1570年经文歌

（二）艺术与技术

在常人观念中，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是一件需要灵感的事情。音乐家需要灵感才能写出脍炙人口、传唱千古的旋律，就如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无论是《天鹅湖》^[1]还是《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2]的主旋律，都成了全人类共有的听觉记忆。这些动人的灵光一闪，是艺术家才能的展现。一部艺术作品的完成，尤其一部音乐作品的完成，其灵光一闪的成分，或者说一部作品中的“金句”，并非随处可见。一部音乐作品中有几千个音符，交响曲可能达到几万乃至十几万个音符，如此多的音符，怎么可能仅靠灵感一个个地谱写在纸面上？除了灵光一闪，作曲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

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断锤炼作曲上的技术，例如音乐学院里要精修所谓的“四大件”——和声、配器、曲式与对位法，这些都属于音乐创作的技术部分。

对东方人来说，和声相对陌生，尤其在中国，器乐演奏是以独奏单音旋律为主的，从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基中，找不到明显的和声迹象。和声是由不同音高的音同时发声构成，音的数量、高低可变，不同和声之间的连接也可变。如此一来，和声的种类以及可达成的效果千变万化，就好比你的工具箱中有众多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各种问题。但你必须要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不仅要学会单件工具的用法，还要知道不同工具如何串联起来，不同组合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此，工具箱才是有用的。和声学就是教人如何使用和声这个“多功能工具箱”的学问。

历史上第一个给和声这个工具箱写出体系化“使用说明书”的人，是法国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拉莫。拉莫要比之前提到的路易十四时代称霸法国乐坛的宫廷作曲家吕利小差不多五十岁，是继吕利之后法国乐坛的“掌门人”，但相较于作曲家身份，他更是一位令人崇敬的音乐理论家。1722年，拉莫出版了一本著作，叫作《还原到其自然原则的和声学》，简称《和声学》。这本书奠定了整个西方古典音乐和声体系的基本方法论。

拉莫在他的“使用说明书”中，确立了和声系统是以主和弦、属和弦以及下属和弦这三种最主要的和弦为基本构成，三者循环演进，推动音乐进行。这三种和弦具体在音乐上怎么理解？人们在听歌时一定都有这样的经历：一首旋律性很强、朗朗上口的歌曲，在听过几句后很容易跟唱，且唱到一半，哪怕原唱戛然而止，也能根据这首歌旋律变化的趋势，把后半句大致唱出来。这是因为我们抓到了旋律的趋势。这种趋势在音乐里普遍存在。音乐走向的大趋势是从不稳定到稳定，从冲突到和谐。这种音乐趋势或者

倾向性，在文学中也如出一辙，就像是议论文，在经历过一翻论证后，要回归中心论点，从动态趋向静态，从动荡趋向稳定。

拉莫的主和弦就像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稳定且处于核心地位的。但一篇文章不能通篇只给出论点，这是毫无意义的，必须要给出论据才行。就跟议论文需要论据以及小说需要戏剧性的剧情一样，音乐也要追求变化，不能从头到尾都很和谐，一成不变。这期间，属和弦就在音乐中主导变化，是与主和弦对立的元素，而下属和弦就很好地充当了两者的连接和过渡的角色。当然，和声的种类太多了，这三种最主要的和弦是组成音乐的三个最基本要素，其他和弦在这个基本逻辑的框架下，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神奇的效果。

今天，拉莫的作品已不再被经常性地地上演，但拉莫的这套和声理论体系依然是音乐学院和声教学的理论源头，虽然大家已不再用他的原著，但说到和声学，无疑是由拉莫的这本著作奠定的。拉莫将和声的运用系统化、理论化，是后世音乐家作曲时无往不利的神器，如果与绘画比较，拉莫的贡献堪比将透视法引入绘画的马萨乔。

真正的和声学要比此处描述的复杂得多，但可以看到，它和绘画、雕塑不一样，反而更接近文学、戏剧，因为它和后两者都是拥有“时间轴”的“动态艺术”，在大的艺术原则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如果说和声是一个抽象的、音乐情绪上的工具箱，那么配器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音乐工具箱了。配器理论讲的是在创作管弦乐时如何挑选和搭配乐器。挑选乐器相对比较容易，特定的乐器有特定的声音形象，例如：长笛最能代表田园风格，小提琴给人以优雅的印象，若要营造光辉、胜利的氛围，铜管乐则当仁不让。

配器学更多是讲述乐器之间的组合搭配。不同乐器同时发声，不同音色交织在一起，会产生全新的音响效果。这是因为乐器发出的声音本质上都是声波，不同乐器音色不一样是因为发出声波的波形不同，不同声波在物理上满足所谓的叠加原理，即把不同声波的振幅相加后融合成新的声波，如果两种乐器的波形相加后可以形成新的固定波形，就感觉听到了新的声音。如比才的歌剧《卡门》^[3]中的间奏曲，当长笛和单簧管一齐演奏时，便会出现这种效果。因此，配器学要求作曲家了解不同乐器间搭配会产生何种效果，以及对所有乐器的演奏能力、演奏难点、演奏法有充分的掌握。这并非所有作曲家都能做到，很多伟大的音乐作品虽然艺术价值极高，但由于作曲家本人并不很了解这件乐器的演奏习惯，会导致作品的演奏十分困难和“别扭”，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其中之一。

曲式很好理解，就像不同文章有不同结构要求一般，如奏鸣曲曲式就严格规定了音乐的格式，各种各样的舞曲规定了音乐的节奏类型，等等。

对位法则相对难以理解的概念。对位法是专门针对复调音乐的创作技巧。复调音乐是与主调音乐相对的音乐形式，一般的流行歌以及大部分巴洛克时期之后的音乐，都是主调音乐。主调音乐可以粗浅但并不完全准确地理解为主唱与伴奏的关系。复调音乐并不存在主唱与伴奏关系，不同声部相对平等，共同演奏，例如男女重唱，通常是复调音乐。在男女重唱中，男声和女声所唱内容不同，音调、歌词也不必相同，如何安排两个声部的音乐，让作品听上去得当，就是对位法研究的领域。当然，对位法要处理的很可能不止两个声部，巴赫所作的赋格曲^[4]可以同时处理七个声部，简直神乎其技！至此，不难发现，音乐创作要比常人所想象的更具有技术性。

前文讨论过为什么不应讨论学院的好坏与否，因为不应当把学院当作培养艺术家的地方。是否能成为优秀乃至伟大的艺术家，完全在于艺术家的个人追求。学院应当被看作是给想成为艺术家的人提供更高效掌握艺术创作必备知识与技能的地方。技术部分当然可以用科学的教学办法传授，但艺术的部分无法直接以知识、教学传授的方式教给学生。艺术是艺术家的原创以及“灵光一闪”。“灵光一闪”在作品中所占比例可能并不高，但只要存在，便能通过技术——这些“工具箱”里的工具放大，变得熠熠生辉，甚至流芳百世。

[1] 《天鹅湖》（Swan Lake）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75—1876年芭蕾舞剧Op.20

[2] 《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1 in b-flat min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74—1875年协奏曲Op.23

[3] 《卡门》（Carmen）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1874年法语歌剧

[4] 《赋格的艺术》（Die Kunst der Fuge）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740年键盘乐BWV1080

（三）赋格与咏叹

虽然巴洛克最早被用来形容拉莫的歌剧，但很明显，巴洛克时期最具影响力、最优秀的作曲家当属巴赫与亨德尔。这二人的音乐，从各个方面形成了巴洛克时期音乐的两座最高峰，且风格迥异，是“对仗工整”的二元对立。

两人生活背景有相似之处：虽然亨德尔主要在英国发展并加入英国籍，但他与巴赫都是德国人；两人的出生地也很接近，巴赫出生在距德国大城市莱比锡100多千米的爱森纳赫，亨德尔则生于莱比锡西北部不到20千米的哈雷；两人都出生于1685年，亨德尔比巴赫早生不到一个月；寿命上，亨德尔比巴赫多活了9年；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路德宗新教基督徒。

“意大利与德意志”一章中提到，意大利擅长美术，德意志长于音乐，这在巴洛克时期也得到了体现：巴洛克时期音乐的最高水准在德奥地区。

巴赫被称为“西方音乐之父”。经后人整理，巴赫一生创作逾千部。巴赫的主要作品都规模庞大，如弥撒曲、清唱剧、受难曲等，长度多在一小时以上，还有诸如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协奏曲、无伴奏奏鸣曲与组曲等等，都是大篇幅作品。后世作曲家无人能在创作数量上超越巴赫，唯有与巴赫同时期的泰勒曼做有超三千部作品，但作品质量却又与巴赫不可同日而语。泰勒曼的作品相对规模化及同质化，且创作手法相对单一，本书不表。

后人整理巴赫作品用的是BWV（Bach Werke Verzeichnis的缩写）编号，意思是“巴赫作品目录”，编号从BWV1开始排，新发现的作品则在表中扩充，截至2017年排到BWV1128。且一个BWV编号下，常有好几部次级编号不一样的作品，虽是编到BWV1128，总数实则犹有过之。BWV编号无法表现作品创作的先后次序，例如BWV1001到BWV1012是六部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与组曲和六部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但创作次序未必紧密相连。巴赫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极高，无甚“灌水”之举。相比之下，同样极为高产的莫扎特却有不少短小作品，略有赚取版税之嫌。

巴赫“西方音乐之父”的名号实至名归。他就好似音乐的上帝一般，除歌剧外，把古典音乐能做到的形式几乎都创作了个遍，虽然宗教作品依然占据主导，但形式上简单一数就有：康塔塔（BWV1—224）、经文歌（BWV225—231）、弥撒曲（BWV232—243）、受难曲与清唱剧（BWV244—249）、合唱曲（BWV250—438）、咏叹调与圣歌（BWV439—523）、管风琴作品（BWV525—771）、其他键盘乐（包括

各种钢琴奏鸣曲、前奏曲与赋格、创意曲、组曲，BWV772—962）、协奏曲（BWV971—987）、无伴奏器乐独奏（包括各种弦乐、管乐奏鸣曲组曲，BWV995—1013）、室内乐作品（BWV1014—1040）、乐队作品（BWV1041—1070）、卡农（BWV1072—1078）等等。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巴赫几乎挖掘了所有器乐及声乐的可能性。

巴赫创作了不少独一无二的器乐作品，如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无伴奏作品。纵观音乐史，除开几位自身是提琴演奏家的作曲家，便再无重要的小提琴无伴奏作品了。除此之外，巴赫还作有不少冷门乐器的独奏作品，如双簧管、巴松管，它们的曲目库里几乎都是巴赫的名字，因为后世音乐家不太为这些乐器进行独奏创作，即便有，其艺术价值大约也不能与巴赫的相提并论。巴赫好像一名伟大的矿工，对音乐这座巨大宝藏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探索与挖掘，为后世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亨德尔的创作也不在少数。他的作品被后人以HWV编纂，规律与巴赫大致类似，号码排到600多。不同的是，亨德尔作有42部歌剧。歌剧是所有音乐形式中平均时长最长的，三小时以上的不在少数。所以，创作量上，亨德尔能与巴赫比肩。

简单观察亨德尔作品的类型就会发现二人的第一个对立面：亨德尔相对于巴赫，更关注声乐作品，尤其是歌剧这类拥有大量独唱、咏叹调的作品，而巴赫在器乐作品上下的功夫明显多于亨德尔。亨德尔流传后世的作品大多是声乐作品，比如清唱剧《弥赛亚》，以及一众歌剧。巴赫虽然流传后世的声乐作品也很多，例如弥撒曲和受难曲，但巴赫的器乐作品在音乐史上明显拥有更高地位，如《平均律钢琴曲集》《哥德堡变奏曲》《赋格的艺术》《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英国组曲》《法国组曲》《意大利协奏曲》等都是巴赫所作键盘乐（如今多用钢琴演奏）。不论是钢琴演奏家，还是管弦乐演奏家，他们的曲库中，在音乐表现难度以及艺术造诣上，占据最高地位的，从来都是巴赫的作品。有些演奏家甚至终其一生都不灌录巴赫作品的唱片，因为巴赫的艺术造诣实在太高，不理解到位绝不敢触碰。

两位音乐家在声乐和器乐这两种形式偏好上的二元对立，主要体现在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上。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是两种相异的音乐创作手法。巴赫喜欢写复调音乐，而亨德尔最优秀的段落大多是主调音乐。并非巴赫不会写主调音乐，也不是亨德尔不写复调，相反，巴赫也有极其动听的主调旋律，而亨德尔也有不少赋格作品，只是在偏好以及专长上，二人有着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的侧重与区分。

主调音乐的主旋律只有一个，它的创作方式通常是把旋律写出来，然后给旋律配伴奏和声。如此，创作主调音乐，对和声学的理解便异常重要。

复调音乐是“多线程”的，每条线都有自己的旋律，大家旋律不一样，但是一同演奏出来，声部之间有交错感，产生戏剧性、交融感与丰富的对比。复调的创作方式并不是写好旋律再配和声，而是在创作时就设想好每个声部如何进行，当声部与声部交织时，每个声部发出的音是不尽相同的，客观上也能形成和声效果，这就更需要精心设计。创作复调音乐，对位法的研习极其关键。

当然，创作复调音乐也要充分了解和声，写主调音乐也要掌握对位法，因为古典音乐实际上要比现在的流行音乐复杂得多，一部作品中二者经常都被用到。此处谈的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只是大尺度下的总体特征，并不绝对。

如果用舞蹈形容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主调音乐就好比一个领舞的独舞者与众多的伴舞者共同起舞，独舞者的服装与伴舞者的服装有显著差异；复调音乐却是几名舞者相互配合共同起舞，服装接近，并无领舞伴舞之说，你来我往、交相辉映。主调音乐的代表形式是歌剧中的咏叹调。咏叹调是歌剧中用来抒发情感的段落，凸显的是歌唱旋律之美。为咏叹调伴奏的，可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管弦乐团，但乐团哪怕有100人，观众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独唱身上。复调音乐最具代表性的曲式是赋格。赋格至少有两个声部，但通常是三个或者以上，几个声部地位几乎平等。声部越多，创作难度越大。因为声部多，就有更多的音交织在一起，要处理的音程关系也更为复杂。巴赫最多写过七个声部的赋格。这就好像绘画技法中透视法的发明，一方面为画家提供了描绘自然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却又带来更大难题，那便是要保证透视正确的情况下，还要保证构图的和谐，在限制更多的情况下要达到画面合理自然更难。赋格的道理也是类似，声部越多限制就越多，处理声部之间的关系就越发困难。

除了声部多以外，赋格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同声部并非各自独立自由，而是都要基于同一音乐元素展开，每个声部虽“各自为政”，但在听感上、旋律上、音乐元素上必须类似。第一声部出现时给出主题旋律，第二声部出现时也要体现类似旋律，尽管第二声部的旋律可以是不同音高的变体，节奏型也允许变化，但要保证听众能清晰辨认出主题是一致的。当然，随后可以变化各异，但总体上，要稳定在同一框架内。

赋格就好比达·芬奇要画的是《最后的晚餐》，限定条件只是在透视正确的情况下，构图和谐、合理。这已经足够困难，此时又附加一个限定条件，要求每个人物所着衣物基本一样！如此一来，难度便更大了。原本还能通过服饰的差异让画面丰富，但若要求众人穿着类似，发挥的空间便更少了，也许只能让人物表情更丰富，动作更夸张，才能画出优秀作品。同理，优秀的赋格，讲究计算精巧，既要保证声部之间的均衡，还要保证主题明晰，更要保证听感悦耳，可谓极具数学美感的音乐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人都较为熟悉的“卡农”是一类特殊情况的赋格。赋格的每个声部，尽管主题元素一致，但音符排列还是不尽相同，而卡农则是每个声部都全然一样，只是出现时机有差异。比如最著名的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1]，实际上是三把小提琴在琴谱相同的情况下，相互错开两小节进入，等于是旋律自己与自己发生交错，是一种很有趣的音乐形式。但千万记住，卡农是一类曲子的统称，是曲式，并非某一首作品的名称。

^[1] 《D大调卡农》（Canon in D）约翰·帕赫贝尔（Johann Pachelbel）1680年卡农

（四）大师与公务员

为何亨德尔重视主调的声乐作品，而巴赫在复调的器乐作品上造诣更高？其内在逻辑是，声乐天然适合主调音乐，而复调音乐更能包容器乐。这源自声乐与器乐在表现维度上的差异。

不妨将人声与钢琴做比较。首先，人声可以持续发声，而钢琴如果不踩踏板，音长便短促，手指从琴键上移开，音就停止了；其次，人声在发音后是可操控的，可以控制一个音逐渐由弱变强再变弱，相对地，钢琴弹奏长音，该音一旦发出便不受人控制，钢琴的发音，由琴槌敲击琴弦一刹那的速度与力度决定，再无其他因素；再者，人声可以做颤音，听上去是音高在上下颤动，钢琴则无法颤音，一些经过改造的古钢琴除外，但并不常用。

管弦乐在这方面比钢琴强一些。管弦乐可以和人声一样发出长音并做变化，音量和颤音都可以控制。弦乐上的颤音技术叫作“揉弦”，通过手指在琴弦上前后揉动，改变振动中的弦长，从而达到音高上下颤动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声可以带入唱词，这是管弦乐无法做到的。加上唱词后，人声的表现维度更为广阔，旋律的传情达意做得不够充足的地方可以用歌词直白地唱出来；加上歌词后，声乐才有了文学性，表现力明显增强。很多人喜欢某首流行歌，其实是受其歌词感染。除歌词外，声乐比管弦乐更多的是“语气”，能够把人的情绪加进去，例如“哭腔”能更好地营造意境，这是器乐很难达到的（某些民族乐器例如二胡、板胡是少数可以做“语气”的乐器）。

从表现力来看，声乐确实比单件乐器强许多，要在表现力上赶上声乐，器乐就必须挖掘其他维度的可能。例如钢琴利用和声与对位上的可能性，通过多声部的互动交互，形成多变的音响效果，以弥补单音表现力的缺失。这也是为何最优秀的钢琴作品几乎均出自德奥作曲家之手，因为他们的钢琴音乐是和声性的，是多线程的。也许唯一能把钢琴写出极强歌唱性，旋律、和声并重的，就是肖邦了，后文详述。

用声乐创作复调作品相比较而言难度极大。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声乐部分用到了复调手法，也许只有贝多芬一般的伟大作曲家才能掌控自如。

以咏叹调的思路写器乐固然可行，但写出来的作品变化较少，虽然好听，但表现力却始终略显不足。比如活跃于19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歌剧作曲家

罗西尼，他的声乐作品登峰造极，同时也写过不少器乐作品，譬如“弦乐奏鸣曲”系列，尽管旋律优美动人，但久听之下略显单调，并无太多新意，也并非主流，上演以及灌录唱片的频率较低，算不得名曲。

赋格与咏叹调是音乐创作形式中较为经典的例子，尤其德奥地区的交响乐作品，虽然总体是主调音乐，但不同声部以及乐器之间的互动穿插是极其丰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奥地区优秀的交响曲虽然是主调音乐，但绝非简单的主奏与伴奏，创作方式更不似流行乐一般写了旋律后配上和声那么简单。意大利歌剧也并非千篇一律的咏叹调，而是伴随大量多声部重唱、合唱。

主调音乐与复调音乐的对立、声乐与器乐的对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亨德尔与巴赫在音乐听感上的二元对立。亨德尔的音乐线条清晰，是易于跟随且清新悦耳的音乐；相比之下，巴赫的音乐复杂多变，听者必须聚精会神以便跟随不同声部的变化。亨德尔的音乐像一件做工精美的珠宝，是精致、璀璨的，他的音乐之美是文学性的；巴赫的音乐则像一座恢宏建筑，具有强烈的结构感，层次丰富、规模宏大、构建雄伟，他的音乐之美是思辨性的。

在音乐情感的表达上，巴赫与亨德尔也形成了二元对立。亨德尔的音乐更世俗化，充满人世真情，巴赫的音乐总体上显得清心寡欲，充满宗教般的虔诚；在亨德尔音乐中能听到简洁直接的激情四射，而在巴赫音乐中能听到的更多是通过复杂作曲手法构建的内敛与沉静；亨德尔让人愉悦，巴赫启发思考。这两种音乐听感上的属性自然也 and 二人作品题材上的差异有关：亨德尔擅长歌剧以及各种世俗音乐题材，巴赫则著有大量宗教音乐作品。

音乐上的二元对立，与二人的学艺经历以及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巴赫祖上就是音乐家，家学渊源，再加上其故乡爱森纳赫是德国闻名的崇尚音乐的城镇，地方虽小，当地居民却都热衷音乐，音乐氛围极好。巴赫一生服务于教会与宫廷，以卓越管风琴演奏家的身份闻名，巴赫在世时，其管风琴演奏方面的声誉高过作曲。传说巴赫的作曲过程匪夷所思，他会挑一个下午，走进教堂，在管风琴边坐下，即兴演奏，两小时不间断，回去后，把先前演奏的内容记录下来，一部作品便大功告成。正是拥有如此神技，巴赫才能在50年中创作出1000部以上的高质量作品。终其一生，巴赫都未出国，晚年一直在莱比锡担任托马斯教堂乐长这一职务。

亨德尔的学习创作生涯比巴赫丰富得多，早年的学习经历也比巴赫的坎坷。亨德尔的父亲是一位理发师，觉得乐师是卑贱职业，一直反对亨德尔学习音乐。亨德尔为此经历了不少家庭斗争，直到他被当地一位贵族发现并资助。亨德尔青年时期通过自身努力赚取学费去意大利学艺，在巴赫

和亨德尔之前，德奥地区的音乐依然仰望着意大利。

在意大利三年的留学生涯中，亨德尔谙熟了意大利的歌剧艺术。他是一个对前途有主见、有计划的人，与巴赫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然不同，亨德尔认准了英国是能大展拳脚的地方。自英国巴洛克音乐大师珀塞尔去世后，英国音乐界尤其是歌剧界可谓一蹶不振，这对亨德尔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抄底”时刻。亨德尔随后前往英国，并通过一部歌剧《里纳尔多》^[1]获得极高声誉，此后，亨德尔服务于英国王室，成了王室及贵族们的座上宾。

亨德尔在世时便已享有盛誉，是妇孺皆知的音乐大师。巴赫则不同，一生服务于教会与宫廷，只是一名“文艺口公务员”。两人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风格。二人才华相当，甚至巴赫应该高出亨德尔少许，但巴赫的恬淡性格让他安于当一名勤勤恳恳的“公务员”，而亨德尔的好胜之心则注定他要扬名立万、誉满天下。亨德尔的音乐华丽高贵，巴赫的音乐深邃空灵。其实，巴赫与亨德尔的际遇与前文所述的鲁本斯和伦勃朗类似，一个名满天下，一个偏安一隅，一个外放激情，一个内敛沉静，但他们都是巴洛克时期成就最高的作曲家。

亨德尔音乐的世俗性和巴赫音乐的超然性的二元对立，与二人的音乐受众也直接相关。亨德尔服务于宫廷，著名的《水上音乐》和《焰火音乐》都是热闹非凡、优美动听的传世佳作。亨德尔要写歌剧，要面向大众，音乐必须是接地气的。巴赫主要服务于教会，无需对公众负责，音乐要接“神”气。亨德尔的音乐向下沉，巴赫的音乐则向上望。一个例证是，巴赫虽未创作过歌剧，却做有大量清唱剧。所谓清唱剧，基本上可认为是不带舞美和表演，且用拉丁语演唱的歌剧。清唱剧也有剧情，但大多是《圣经》故事，是“素颜”版的歌剧。以巴赫的才能，不可能不会写歌剧，之所以不写，主要应当是不需要。

亨德尔虽处巴洛克时期，但他的音乐在听感上并不具备典型的巴洛克特色。“巴洛克”最早被用来形容拉莫歌剧的复杂听感，其音乐特色其实与巴洛克绘画、建筑有共通之处：繁复、装饰性是这一时期所有艺术形式的共性。

亨德尔的音乐在巴洛克风格当道的主流圈中，可谓一股清流。他的音乐之美是简洁的，用纤巧、凝练的旋律迅速俘获听众。以《里纳尔多》为例，这部作品让亨德尔在英国一战成名，虽然剧情上并无太大创新之处，但唱段清新可人，对当时沉闷的英国歌剧界来说，可谓清风拂面。这让《里纳尔多》成为至今还经常上演的为数不多的巴洛克歌剧之一。

这又是亨德尔和巴赫的一个对立面。巴赫的音乐从复调创作手法上看是极

度巴洛克式的。他使用大量装饰音，这是巴洛克音乐的标志。巴赫的装饰音种类繁多，并且留给演奏家不少即兴创作的空间，因为装饰音的演奏并不固定，演奏家可在演奏时作即兴变奏。直到进入古典时期，装饰音才大量减少，且音型固定，只作为音乐中的点缀存在。可以聆听巴赫所作《哥德堡变奏曲》的两个版本（[2]/[3]），一版装饰音原封不动，另一版去除了所有装饰音，几乎是两首不同的曲子。这充分说明装饰音在巴赫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大量复杂多变的装饰音是巴赫音乐中典型“巴洛克”的地方。

亨德尔学艺于意大利，虽然时间不长，但其音乐的精髓却是意大利式的。亨德尔作为英国籍的德国人代表意大利又与巴赫的德意志二元对立了一回。

二人在去世后所受待遇也大不相同。亨德尔自始至终都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大师之一，但巴赫死后却很快被人遗忘，直到19世纪初，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重新发掘，才让巴赫走向复兴。这也不难理解：亨德尔去世了，是“伟大的作曲家”永远离开了我们，大众悲痛不已；巴赫去世了，只是一位年迈的“公务员”病故了而已。

巴赫的音乐对当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超前。一是巴赫的音乐并未大范围面向公众，在民间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二是即便巴赫誉满天下，其音乐也太过复杂。巴赫在世时尽管也算有名，曾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召见过，但总体影响力仅限于音乐圈内。哪怕今天，巴赫在德国人票选的“最伟大的德国人”中名列前茅，大众对其重要性的认知依然大多来自外界评价，而非对其音乐的直接认同。足见在任何年代，巴赫的音乐都是极其高深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对巴洛克音乐的并世双雄，终其一生都无缘相见。他们相互知道对方，并相互欣赏。巴赫骨子里是谦逊的人，加上亨德尔在欧洲红极一时，他深深地敬仰着亨德尔。亨德尔时常巡演，据说有一次巡演到离巴赫不远的城市，巴赫闻讯赶去，想和亨德尔见上一面，但无奈信息不准，待赶到时，亨德尔已经离开，这大概是二人一生中离得最近的一次。若是他们二人有幸能见上一面，甚至交流几日，将是何等令人神往，不知是否如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的“世纪之战”一般，为后世的音乐艺术开辟出两条崭新的路径。当然，相信他们的交流会友好温馨的，抑或二人无须开口，一同坐在管风琴前便已足够。

[1] 《里纳尔多》（Rinaldo）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706—1710年歌剧HWV7

[2] 《哥德堡变奏曲》（The Goldberg Variations）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1741年变奏曲BWV988郎朗

[3] 《哥德堡变奏曲》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1741年变奏曲BWV988威廉·肯普夫 (Wilhelm Kempff)

（五）神父与教师

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美术与建筑的发展如火如荼，音乐也毫不落后，除占据意大利音乐主流的功能性宗教音乐之外，正歌剧也是最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正歌剧也叫作严肃歌剧，其特点是故事剧情单一，大多是些上古神话、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以歌颂圣贤为主，且大多是悲剧。

正歌剧这个称谓并非开始就有，而是由后人总结所加，用以区别之后流行起来的喜歌剧。正歌剧的剧本不多，只有几十个经典故事重复创作。它的结构也显固化，大多分三幕，开篇介绍人物并点题，第二幕剧情发生变化，第三幕则必回归主题。正歌剧的重点大多不在戏剧本身，观众主要是去听歌唱家演唱，这导致作曲家的精力大多放在写出让歌唱家炫技的咏叹调上。于是，正歌剧以歌剧明星为绝对中心，艺术价值并不突出。相比之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亨德尔所作的清新简洁的歌剧能在当时获得极大关注。

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正歌剧是主流，数量多、体量大，意大利人的歌剧基因深深融入血液。可如今，对于当年那些专门创作正歌剧而出名的意大利作曲家，若不是专门了解，哪怕是古典音乐发烧友，亦不会有太多印象。

在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有两位被人铭记却不主攻正歌剧的重要作曲家，一位是“协奏曲之父”，来自威尼斯的职业神父维瓦尔第，一位是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奏鸣曲之父”斯卡拉蒂，后者是葡萄牙公主的音乐老师，公主嫁到西班牙时，他随同前去继续任教，终老于西班牙马德里。

维瓦尔第于1675年出生在威尼斯一个普通乐师家庭，从小跟随在教堂乐队担任小提琴手的父亲学习音乐，幼年便展现出惊人才华，据说其10岁时便能代替父亲演奏。25岁时，维瓦尔第选择成为一名神父，由于长了一头红发，人称“红发神父”。维瓦尔第担任女童孤儿院的指导老师期间，为训练女童乐队的演奏，创作了大量乐队作品，以弦乐为主。维瓦尔第的作品种类繁多，有歌剧、康塔塔、协奏曲、奏鸣曲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奏曲（concerto）。维瓦尔第并非协奏曲这一体裁的发明人，但协奏曲的结构确是由维瓦尔第确立。他一生作有400多首协奏曲，其中小提琴协奏曲居多，这与他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不无关系。在当时，音乐家的才能都是综合性的，要创作，又要指挥，还要演奏自己的作品。

协奏曲可粗浅理解为一件或几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相互竞奏。大部分

协奏曲只有一件乐器担任独奏。协奏曲在意大利兴盛与意大利流行歌剧、声乐是分不开的。协奏曲也常常被用来命名佐以乐队伴奏的声乐作品，如巴赫就用协奏曲来命名一些康塔塔作品。至少在意大利人看来，协奏曲本质上依然是咏叹调一般的声乐式写作，只是协奏曲比单首咏叹调更长，结构更宏大，独奏与乐队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

维瓦尔第做了两件事。

第一，定下了协奏曲“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一部维瓦尔第协奏曲，普遍时长在10分钟左右。第一乐章通常是快乐章，气氛相对活泼；第二乐章是抒情柔美的慢乐章，气氛总体柔和恬静；第三乐章则是比第一乐章还快的“急行”乐章，气氛是热烈激动的。若是听感较为黑暗的协奏曲，第一乐章通常是压抑紧凑的，第二乐章则是忧伤哀婉的，第三乐章也许是焦虑忧虑的。综上，“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经过维瓦尔第400多首协奏曲的打磨，被证明是符合听觉审美需求的。维瓦尔第之后200年，大部分协奏曲仍依照该结构创作，可见维瓦尔第的影响极其深远。

第二，维瓦尔第尝试了不同乐器组合与搭配的协奏曲。除大量小提琴担任独奏的协奏曲外，维瓦尔第还给双小提琴、三小提琴甚至四把小提琴写过协奏曲。而且，维瓦尔第还作有大量管乐协奏曲。

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作品是一套四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1\]](#)/[\[2\]](#)/[\[3\]](#)/[\[4\]](#)），每首协奏曲都描绘了一个季节。这套协奏曲直到今天都在以超高频率上演并被灌录成唱片，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入门欣赏作品就是《四季》。

从整体上看，作为西方古典音乐主流的德奥音乐，并非具象音乐。德奥的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在贝多芬、莫扎特的年代，内容上并无具体指代，也没有明确剧情，是抽象的“纯音乐”。这导致大部分德奥音乐作品的名称是编号化的，比如贝多芬的5部钢琴协奏曲都以“××调第×钢琴协奏曲”为名，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只是《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别称而已，且并不来自贝多芬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瓦尔第还是“标题音乐”的先行者。维瓦尔第为《四季》配了诗文，以之佐曲效果更佳。真正的标题音乐要等到19世纪上半叶，由柏辽兹和李斯特等人发明。

维瓦尔第的声誉不仅在意大利，更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了德奥地区。巴赫是在维瓦尔第协奏曲的影响下才进行了协奏曲创作，如巴赫作有三首著名的小提琴以及双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不少键盘协奏曲。巴赫更是将维瓦尔第的一些优秀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和管风琴作品，比如维瓦尔第的《b小调四小提琴协奏曲》（[\[5\]](#)）就被巴赫降调移植到钢琴上，变为《a小调四羽管键琴协奏曲》（[\[6\]](#)）。

维瓦尔第的协奏曲非常动听，旋律性极强，展现出天才般的音乐创造力。他的音乐是具象的，听的时候脑海中常有清晰的画面感，譬如《四季》之《冬》，听完第一乐章被“冻得”瑟瑟发抖，之后立刻进入第二乐章的温暖旋律，仿佛在雪地里遇到一间猎人小屋，推开门看到壁炉中柴多火旺，于是拍雪进屋，立刻被一股暖流团团包围。

协奏曲这个词让人对这种体裁有“协作”“协同”之感，似乎乐队与独奏的关系应当和谐同步。而其实独奏与乐队应是相互交织，甚至是竞争和对抗的。有时候，主旋律永远在乐队手上，独奏乐器则积极在其中穿插，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其中的典范。

如此比喻便更清楚独奏与乐队的关系：当独奏家和乐队共演时，不应把独奏家当作领头的将军，乐队也不是听命于这位将军的军队。独奏家与乐队的关系应是：独奏家是一名武功高强的侠客，这位侠客要以一敌多，同时与乐队里的100多个江湖人士过招。优秀的协奏曲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如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郭靖带着杨过去全真教拜师，在终南山脚下碰到全真教道士的阻拦，于是郭靖一人凭着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与由14个天罡北斗阵共98人组成的2个天罡北斗大阵酣战了一场。

优秀的协奏曲应当是交响性的，而不是歌剧咏叹调式的。这里又出现了德意志与意大利、交响曲与歌剧的二元对立。这就是为何虽然维瓦尔第奠定了协奏曲的模式，但浪漫主义时期优秀的大协奏曲，大多出自德奥作曲家之手。在浪漫主义时期后，协奏曲的“快—慢—快”经典结构也不时被打破，越来越多四乐章结构的协奏曲诞生，如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其中的典范。

斯卡拉蒂出生于1685年，与巴赫、亨德尔同年，同样是家学渊源，其父是当时著名的正歌剧作曲家，歌剧作品在20部以上。斯卡拉蒂的主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古典奏鸣曲式的萌芽。

此处“奏鸣曲式”和“协奏曲”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奏鸣曲式是曲式，协奏曲是体裁。体裁是更为宏观的结构，曲式则更具体。和写作一样，小说、散文、诗歌是体裁，而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用到的直叙、倒叙或插叙手法，则是写作方式。同理，协奏曲是曲子的大种类，它的形式是独奏与乐队竞奏；奏鸣曲式是乐曲的内部结构。协奏曲分“快—慢—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可以用奏鸣曲式，交响曲作品的第一乐章使用奏鸣曲式也是主流做法。

理解的难点是，进入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存在很多奏鸣曲，分三个乐章或更多，如贝多芬共作有32部《钢琴奏鸣曲》，其中约半数是三

乐章结构。实际上，奏鸣曲是体裁，而奏鸣曲式是曲式，通常整首奏鸣曲只有第一乐章用的是奏鸣曲式。奏鸣曲式是音乐的“格律”，跟古诗讲究平仄押韵类似，是文内结构以及行文规律。

奏鸣曲式代表了经典、逻辑性强以及最符合音乐叙述方式的音乐结构，是一类大型的音乐结构。关于奏鸣曲式的分析相当复杂，音乐学院的曲式学课程会对奏鸣曲式做深入分析，奏鸣曲式就好比音乐中的“议论文结构”，是表达观点最为有效的经典范式。

议论文的标准结构是：开头抛出论点，即文章的中心思想，随后摆论据，论证一番后再点题强调论点。

奏鸣曲式的结构逻辑与议论文结构并无二致。奏鸣曲式开头是呈示部，这个部分将给出作品主题，奏鸣曲不止一个主题，第一主题后还有第二主题。与议论文类似，议论文也有可能不止一个论点，例如写一篇文章，第一个论点是“全球变暖与汽车尾气过多有关”，之后还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全球变暖问题，其实换了电动车也无大用”。奏鸣曲式的第二个部分叫展开部，音乐要根据呈示部的主题进行发展变化，可类比于议论文的举证阶段，用于证明论点。议论文的论证部分，有一种方法叫正反论证，“如果不这样”，则会“产生什么后果”，类似于数学证明里的反证法。对应奏鸣曲式展开部里，音乐的调性可以发生变化，如大调转小调，光明的听感转为阴郁的听感，制造出与主题反向但又类似的听觉效果。奏鸣曲式最终的部分叫再现部，把呈示部的主题用统一调性手法再现，统一收尾，这与议论文文末总结论点、点题如出一辙。

奏鸣曲式的大致结构如此，但也有诸多变化可能。比如有的开头有一段“引子”（如贝多芬《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随后才进入呈示部，就好比有人喜欢在文章前作题记。奏鸣曲式结尾处也可能加入一段“尾声”，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类似于有些议论文，在结尾重申论点后，再提几个与主论点相关的问题，引发读者思考。

议论文结构是经过长时间锤炼总结出来的最为有效和精炼的表达方式，给人得体、紧凑、完备之感。从这个意义上看，奏鸣曲式之所以经典，在于这种表达方式符合人们对文艺作品结构的普遍审美。

斯卡拉蒂正是这种奏鸣曲式的奠基人，他一生作有555首钢琴奏鸣曲。斯卡拉蒂的年代主要以“大键琴”或叫“羽管键琴”演奏其奏鸣曲作品，现代人多以钢琴演奏。

斯卡拉蒂的555首奏鸣曲大多是短小精悍的单乐章作品，但每首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斯卡拉蒂的奏鸣曲并非都是完整的三段式结构，他似

乎更偏好二段式，即将展开部与再现部融于一体。斯卡拉蒂叫它们“练习曲”（[\[7\]](#)），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斯卡拉蒂写来给公主做练习用的“家庭作业”，他往往会在一首作品里集中解决一个演奏上的技术问题。

虽是练习曲，它们的旋律性却极强，鲜活精致。在这一点上，斯卡拉蒂的音乐风格如亨德尔一般，并无巴洛克时期的繁复与聒噪，在艺术追求上是“唯美”的，也不会出现过多复调。这些奏鸣曲虽然音少，技术难度也不高，但和声丰富，充满难以预料的情绪变化，拥有高级的趣味性。斯卡拉蒂的奏鸣曲充满想象力，且经常融入拥有民间风情以及地方特色的音乐元素。

赘述了不少曲式知识，如果诸君真用这些曲式工具对着乐谱研究具体音乐作品，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每遇新作，就会发现打破规则的情况，似乎作曲家们都“不按套路出牌”了。对作品来说，结构是死的，艺术家是活的。每每碰到例外作品，理论家们就想用新的框架去命名和定义这些例外情况，于是就有了引子、尾声等概念，曲式分析的书也越写越厚。

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上，对艺术作品进行归纳和总结无可非议。但作为艺术爱好者、欣赏者，需要了解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但不能本末倒置。本书开篇便已表明，用来形容艺术风格的形容词众多，但大多是后人为总结前人的艺术遗产，方便归纳而后造：巴赫创作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写巴洛克风格的乐曲。曲式、文体乃至古诗的押韵平仄都是固定的，尽管艺术家、文学家在创作时深谙这些规则，但它们并非首要任务，艺术家们创作时的心态大约不会是：“我要写一首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必须是三段式、两个主题，再现部不能太长，还要有引子和尾声，曲子不能超过20分钟。”

艺术创作是感性、灵性的表达。如前文提到，一部艺术作品，“灵光一闪”的部分可能很少，和声、对位、曲式都是放大精彩艺术瞬间的工具。规则是为艺术服务的，工具要为艺术让路，而不是艺术迁就工具。米开朗琪罗、贝多芬等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不断挑战旧有艺术的框架和规则，永远在创造新的表达方式。优秀的艺术永远给人以启示，而不是给规则交答卷。

现在在网络上搜索某部音乐作品，官方介绍都是扑面而来的术语：何种曲式、什么拍子。千万不要被这些术语吓倒，对艺术望而却步，艺术家创作时脑子里装的绝不是这些专业术语以及晦涩名词。

欣赏艺术应直奔作品本身，用直觉体悟，抛开专业术语，抛开名词解释，抛开评论家的眉飞色舞与口若悬河！用最纯粹、直接的感受力体会作品，只有这一时刻属于你自己；这层感受是艺术只为你一个人准备的，从不属

于他人。

[1] 《春》（La Primavera）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721年协奏曲Op.8RV269

[2] 《夏》（L'estate）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721年协奏曲Op.8RV315

[3] 《秋》（L'autunno）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721年协奏曲Op.8RV293

[4] 《冬》（L'inverno）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721年协奏曲Op.8RV297

[5] 《b小调四小提琴协奏曲》（Concerto for 4 violins in b minor）安东尼奥·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711年协奏曲RV580

[6] 《a小调四羽管键琴协奏曲》（Concerto for 4 Harpsichords in a min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730年协奏曲BWV1065

[7] 《E大调键盘协奏曲》（Keyboard Sonata in E major）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创作年代不详K.380

09 莫扎特与贝多芬：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

（一）复杂与简约

巴洛克时期的艺术风格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体现在音乐上则是复调手法成为主流。除了多声部交织带来的听觉上的“分裂感”，丰富多变的装饰音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巴赫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达到了顶峰。

物极必反，巴洛克音乐已现顶峰，音乐界的主流审美势必发生重大变化。1730年到1820年，西方音乐迎来了新的风格时期，这段不到100年的时间被称为西方音乐的“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最昌盛的地方是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最重要的作曲家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他们虽然不都是奥地利人，但都在维也纳发展。

对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来说，他们的音乐其实是新潮、现代的，并非古典，至少不“古”。“古典”是个相对概念，其英文是“classical”，译成“经典”更为妥当。“经典”的特性是不论时代如何变，美就是美，在人类审美观中是永恒的。

我们现在讲到经典首推莫扎特、贝多芬，但在莫扎特、贝多芬活跃的时期，维也纳的著名作曲家远不止这二位，欧洲范围内的著名作曲家比这二人更有名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在音乐圈占统治地位的宫廷乐长萨列里、意大利大提琴家及作曲家博凯里尼、“被遗忘的古典大师”施波尔，以及莫扎特的学生胡梅尔——这位天才钢琴家一生创作了超过200部作品，风头一度盖过贝多芬，其作品演奏起来极具难度。此外，莫扎特的对手——意大利音乐家克莱门蒂，还有被贝多芬奉为“当世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凯鲁比尼（以歌剧创作为主）都曾红极一时，名满天下。但二百年下来，他们大部分人的作品几乎被人淡忘，上演的次数越来越少，最终被留在了历史里。

关于什么是永恒、经典，总结下来，有一些基本规律：相比过度繁复的东西，简约的东西更有可能成为经典；太极端的东西往往经不住考验，适度、中正的东西更有可能成为经典；在一个新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创新性的作品更有可能成为经典。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恰好符合以上所有规律。与巴洛克音乐尤其是巴赫的

音乐相比，古典主义音乐远算不上复杂，其简约但并非空洞，是一种得体与适度。音乐形式上，古典主义时期的创新比比皆是：海顿是交响乐之父，格鲁克改革了歌剧，莫扎特发展了德国喜歌剧，当然还有贝多芬对整个古典主义音乐框架形成的推动。

古典主义音乐与巴洛克音乐的一个巨大差别就是前面提及的由复调音乐向主调音乐的转变，两种作曲手法有着本质不同。

先介绍四部和声，这是主调音乐最基本的声部组合形式，合唱中有四个不同的声部，全部音域由高到低分别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以及男低音。这四个声部正好涵盖了从高到低的人声音域。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声部虽然在中文翻译中有男女之别，但意大利语并未在性别上作具体指向，只不过高音天然适合女性，低音天然适合男性而已；在有童声合唱的情形下，男童声音很高，也可担任女高音声部的演唱。

合唱过程中，音高不同的四个声部形成合音，这个合音就是和声。这种和声的听感极为美妙。在广义上，凡占据着四个不同音域的音乐都可组成四声部，可以是声乐，也可以是器乐。

不同种类的和声掌管着不同的音乐效果，给听众以不同情绪乃至丰富的色彩感。不同和声所需音的数量未必相同，最少只要两个音，便能组成不同的音响效果。三个音的和声效果较为丰满，能给人以稳定的听感。四音和声则会让听者有奇异感受，比如上一章提到的属七和弦所带来的“上升”以及悬在半空感便属此类。五个或以上音组成的和声也有不少，但在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中使用得并不频繁。值得注意的是，钢琴经常有超过四个音同时发声的情况，但本质上这些音很多只是差一个八度，只为强调某个声部而已。原则上，合唱团里有高低不同四个声部，不仅能把音域从低到高全部覆盖，绝大部分和声也都能演唱。若真有五个音以上的和声，可于同一声部内再细分，例如女低音可分成两个声部演唱，这样的音乐才能满足基本要求：音域够宽，没有唱不出的音；声部数足够，并无表现不出来的常用和声。有了四部和声后，就好像一个人四肢健全，行动自如。如果四部和声里少任一声部，则会有残缺感。当然，到了之后的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在新和声的创造方面颇有建树，四部和声只满足基本需求，超过四声部的和声，想象空间极其广阔。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主义音乐的各式体裁中，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格调极高、极难驾驭的一种：弦乐四重奏由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组成，只满足了四部和声创作最低限度的要求，不似交响乐团般拥有数十种乐器能做出多变音色，也不像乐团甚至不如钢琴那样在音量上有超大幅度的动态范围，在创作上少了几个维度的表现手段。弦乐四重奏没有奇技淫巧，更注重纯粹的音乐艺术内涵，不少顶级作曲家在弦乐四重奏面

前望而却步。笔者心目中，弦乐四重奏体裁的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贝多芬、舒伯特以及20世纪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

合唱团演唱时，其他声部容易被女高音带偏。因为女高音演唱的是人耳最敏感的最高音域，且女高音声部通常负责朗朗上口的主旋律，其他声部都容易受它影响，一不留神还会被带跑，这就要求其他声部时时关注音准的同时还要提升配合能力。

一个和声的功能性大部分是由低音决定的。四部和声里最具存在感的是高音和低音。如果是清唱一首歌曲，会明显感到歌曲不完整，但这时只要再多加一个低音声部，曲子便会完整很多。

中间声部则是起到丰富和声结构的作用。这就像旋律是你要用工具箱解决的问题，低音告诉你具体是用螺丝刀、扳手还是锤子，要想完整解决问题，你必须知道螺丝刀具体是“十字”的还是“一字”的，锤子要多大，铁锤还是木槌，扳手是何形状，等等。中间声部就是具体告诉你这些信息的，让问题解决得精确、漂亮。

古典主义时期的主调音乐正是这种音乐，声音丰满，各个声部都齐备，但永远存在一条主导旋律，不像复调音乐般，各声部几近平等且无明显主导声部。相较于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更注重作品的整体结构，例如交响曲这类经典体裁的诞生，让音乐结构得以完善。就听感来说，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注重单旋律线条的塑造，对乐句也更关注。巴洛克时期的器乐作品不易哼唱，古典主义时期的器乐作品明显易于哼唱。巴洛克音乐好比一组人开辩论会，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一方未把观点陈述完就被另一方接替过去，且经常是多于三方的辩论，如此一来，每一方的言论观点都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总体略显聒噪。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像是一场演讲大会，哪怕会场里有好几个演讲者，他们持全然不同的观点，但一个个体有条不紊地发言，有充足时间表达自我，观众在下面安静地听着，能集中精神于每个人的声音。

总体上，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是由“乱”向“治”发展的。巴洛克时期的“乱”好似一种摸索过程。就好比神话里盘古挥斧劈开天地，世界始分光明，但纷乱复杂，轻质上升为天，重物下沉为地。古典时期就好比这天地形成期——不难发现，大量“冷门”乐器如中提琴、双簧管、巴松管以及各类铜管乐器独奏作品均在巴洛克时期被创作出来，这便是摸索过程。经过近两百年的摸索，音乐家逐渐明晰什么样的东西好用有效，排除噪音之后，符合人类审美的规则由此形成。摸索完成后，作曲家们发现“冷门”乐器不太适作独奏乐器，所以到了古典主义时期，这类乐器的独奏作品数量急剧下降。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方式趋于成熟，且具备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当然，此处并非在评价巴洛克音乐与古典主义音乐的优劣，而是阐述

艺术形式发展的天然过程。

（二）歌剧与交响曲

在古典主义音乐中，若要从体裁上找出一组二元对立，则应当是歌剧与交响曲。此处歌剧专指意大利歌剧——以正歌剧为起源，衰落后19世纪复兴于罗西尼之手，至19世纪中叶，歌剧世俗化，威尔第的喜歌剧占据主导，又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契尼的真实主义歌剧封顶的一类歌唱艺术。此处交响曲也并不单指四乐章式标准交响曲，还要算上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标题交响音乐，如交响诗、交响组曲等，亦包括其他乐队作品，如协奏曲，此处为与歌剧对仗故统称“交响曲”。

交响曲与歌剧的二元对立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地域上看，德意志与意大利分别是交响曲和歌剧最主要的根据地；从精神内涵上看，德意志与意大利也是针锋相对，总体上，意大利偏爱个体，德意志重视整体。意大利歌剧的主要形式是乐队伴奏烘托人声，独唱是绝对主角，乐队地位次之。有一佐证：法国作曲家比才的著名歌剧《卡门》，因乐队部分丰富、精彩，所以比才将歌剧中的著名段落改编成交响乐作品《卡门组曲》，而著名的意大利歌剧，印象中并未做过此类改编，因为意大利歌剧是绝对的歌唱本位。

交响曲则不同，管弦乐团有多种乐器，且对乐曲贡献相对平等。虽然各乐器都有自身音色特点，有功能性上的偏重，譬如小提琴声部在旋律中主导地位显著，而遇到表达光辉胜利形象时，则多要靠铜管乐器。作曲家创作交响曲时并不像写歌剧时着重考虑咏叹调旋律，再配以乐队伴奏。这并不是说意大利歌剧不讲求乐队部分创作，哪怕是伴奏部分，在配器以及与独唱的呼应方面，意大利歌剧也有独到之处，譬如罗西尼的歌剧配器就异常精致考究。创作交响曲内心要装着整体化音乐，不同乐器只是表达音乐不同方面的手段。意大利歌剧是一位穿着明艳的独舞者，身后有几十个舞者为其伴舞；交响曲则是身着各异服装的舞者，以不同姿态挥洒在舞台上，但相互之间的动作交互登对，形成精彩纷呈的整体舞蹈。

在古典主义时期，这两种艺术形式都达到了逐步稳定以及一定程度的进化。巴洛克时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交响曲，但管弦乐一直都有，比如巴赫著名的管弦乐组曲以及《勃兰登堡协奏曲》系列。

所谓组曲，可类比西方人的用餐方式。西方人用餐讲究次序，餐前酒、前菜、主菜、甜点、咖啡。巴赫组曲的创作方式是：上来多有前奏曲，算是开胃小菜，通常速度较快，展现乐器灵动轻巧的一面；随后是各类舞曲，比如萨拉班德舞曲、阿拉曼德舞曲、加沃特舞曲、吉格舞曲等，这些舞曲风格代表欧洲不同国家的音乐，巴赫把它们写到一起且顺序相对固定，大

有带着听众把欧洲各地菜肴通吃一遍的意思。当然，顺序不能随意颠倒，如适中的阿拉曼德舞曲通常前置，抒情的萨拉班德舞曲大多居中，快速的吉格舞曲总是末位。

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西餐式”的作曲方式基本固定，交响曲不再以“组曲”形式写成，而是有了更为严格的结构。古典主义时期确立下来的交响曲结构，和前文提到的协奏曲类似，大致也是“快—慢—快”。交响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快乐章，通常用奏鸣曲式写就，第二乐章和协奏曲一样，往往是舒缓的慢板或柔板，最后一个乐章是比第一乐章更快且更短小的乐章（有些规模庞大的作品末乐章也用奏鸣曲式）。不同的是，交响曲会在第二乐章与末乐章之间加入一段短小音乐，这段音乐通常舞蹈感较强，不算慢，但也不如末乐章动感，通常是小步舞曲（18世纪常见的欧洲宫廷舞蹈）。从慢乐章到最末的极快乐章，有了速度上的过渡，不致太显突兀，作为交响曲这般宏大规模的音乐体裁，全曲速度线条的安排更平滑，会增添规模感与整体感。

交响曲的结构根源上还是来源于意大利歌剧。就好比电视剧开头总有序幕、片头曲一般，意大利歌剧开幕时有“序曲”，序曲的结构便是“快—慢—快”。序曲不长，约10分钟以内，在序曲结构的基础上，慢乐段之后加入小步舞曲就成了交响曲的基本结构。到了威尔第时期，序曲逐渐从歌剧中淡出，直接进入主题唱段。

交响曲体裁结构的固定以及简化又印证前文所说，相比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是一切更为成型、稳定的时期。巴赫的音乐固然伟大，但从形式上看，交响曲的四乐章结构在音乐表达上更为简洁高效，能更紧凑到位地展现乐队特色，对作曲家来说，发挥起来更有的放矢。

让交响曲这种形式彻底成为古典主义时期创作主流的艺术家的，是号称“交响曲之父”的海顿。海顿一生创作了超过100部交响曲，有编号的到104号，实则不止。海顿对整个维也纳古典乐派（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活跃在维也纳的一批重要作曲家所形成的音乐风格流派）的音乐风格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当中也最为年长，被当时的音乐家称作“海顿爸爸”。他性格温和，乐于助人，愿意提携后辈，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受过他关照。这种帮助不仅是作曲艺术上的，在工作发展和日常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海顿的音乐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直接，没有复杂的装饰音，听觉上易于跟随，也易于传播。他确立了维也纳古典乐派优雅、得体的整体特征，哪怕是小调音乐也并无过多忧伤成分，最多是晴朗天空中飘来一小朵乌云，转瞬便消散了。

虽然海顿的音乐有种中规中矩的优雅感，但他其实极具创新精神。海顿在自己的交响曲中做过许多创新，譬如在《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即《惊愕》，[1]中，就设计了一个“吓人”的环节。海顿有感于参加他音乐会的达官贵人大多只是附庸风雅，并非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的艺术，所以决定捉弄他们一下。第二乐章刚开始，乐队奏出第一遍主题，那时曲子还很安静，但在第二遍重复时，整个乐队奏出了全曲最强音。据说当时的场景非常有趣，很多漫不经心甚至昏昏欲睡的观众都因这一下巨响被吓得心惊胆战，有人以为是战争打响，有人以为是地动山摇，甚至有人紧张得跑向音乐厅外逃命，这让海顿十分得意。

在《升f小调第四十五交响曲》（即《离别》，[2]中，海顿采用了新颖的设计：当时还未发明电灯，乐团演奏时都靠蜡烛放在谱架上照明，在交响曲结尾处，一组组乐手在演奏完自己的部分后就吹灭蜡烛，带着乐器依次退场，最后只剩小提琴首席与第二提琴首席两人完成作品的演奏。这样的安排与作品标题近乎完美结合，在诠释“离别”主题时又给人以视听享受，不得不说，海顿是一位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音乐家。

虽然海顿是交响曲之父，但确立交响曲四乐章结构的却是形成于德国曼海姆的曼海姆乐派。曼海姆乐派也是古典主义时期非常重要的音乐支派，在当时的德奥地区，曼海姆宫廷音乐十分发达，曼海姆公爵本人十分喜爱音乐，主持建立了当时全欧洲最优秀的管弦乐队，这支乐队曾让来曼海姆旅行演出的莫扎特大开眼界。

除了确立四乐章交响曲的基本结构外，曼海姆乐派还有很多技术上的贡献：在乐队演奏上，安排了“渐强”和“渐弱”的演奏方式，还废除了巴洛克时期处理低音的标准手法“通奏低音”。在复调音乐中，低音通常只以通奏低音形式作为伴奏存在，只负责简单的、重复性的功能。曼海姆乐派则开始重视低音，在创作中将低音独立处理，让其获得与其他声部平等的地位，这种创作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曼海姆乐派并未留下太多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其代表音乐家如施塔米茨、里希特等作为个体艺术地位也不算高，但由于它对作曲技术有着巨大贡献，故在音乐史上，曼海姆乐派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交响乐在古典主义时期经历的成长与进化，从相对自由的“组曲”形式变成了结构固定、规模宏大的四乐章交响曲。从曲式上，奏鸣曲式的广泛使用也对交响曲的定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为歌剧的演化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德国作曲家格鲁克。格鲁克曾担任过维也纳的宫廷歌剧院指挥，也曾前往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歌剧艺术。当时，意大利的歌剧艺术仍是正歌剧，法国歌剧经过路易十四的御用作曲家

吕利的改良，已与意大利正歌剧有一定区别。格鲁克的歌剧集合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奥本土的音乐风格，在当时极受大众欢迎。在他的推动下，歌剧艺术的重心逐步从意大利转向德奥地区。

格鲁克在歌剧领域十分高产，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当时，意大利的音乐发展陷入了僵局：音乐家们故步自封，音乐产业的环境不大健康，尤其是歌剧领域。在长时间发展过程中，意大利正歌剧逐步形成自己固有的“套路”，不再追求艺术表达，而是沦为音乐家、歌唱家炫技的工具；剧情老套简陋，缺乏细节；尤其一些阉伶歌手（对尚未发育的声音条件好的男童进行阉割，如此在发育以后既具有女高音或女低音的嗓音音质与音域，同时又具备成年男性的肺活量与耐力。据说阉伶的声音极具穿透力，能与小提琴的音域和灵动相媲美）在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就像今天的明星“耍大牌”一样，阉伶也时常恣意妄为，譬如违反演出规则、乱改剧本、排练迟到、缺席甚至提出各种离奇古怪的要求，已然成为歌剧艺术发展的一大阻碍，直到格鲁克打破僵局。

格鲁克一手推动了史称“歌剧改革”的文化运动。他意识到正歌剧越来越荒唐乏味，于是提出歌剧改革的口号：“歌剧应当优美而简洁。”在格鲁克的“简洁”主张下，可以再次看到从巴洛克向古典主义迁徙的风格倾向：化繁为简。

具体操作上，格鲁克主张一部歌剧中音乐的地位是最核心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都应应为歌剧音乐本身服务，音乐在歌剧中绝不是阉伶炫技的陪衬及附庸，音乐应当叙述剧情，烘托人物性格以及表达人物心理活动，集中展现作品的思想。格鲁克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很多人跳出来反对，尤其是那些拥护传统正歌剧的老派作曲家，但他们最终都没能阻止歌剧改革的进程。

1762年，格鲁克写出了一部令世人震惊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故事内容与前文提到的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大致类似。格鲁克歌剧改革的精髓——对简洁与优美的追求，都展现在这部作品中。这部歌剧在维也纳公演时反响强烈，虽是熟悉的故事题材，但新的歌剧形式让当时的音乐界为之震动。在《奥菲欧与尤丽狄茜》当中，格鲁克去掉了所有炫技部分，留下清晰明了的剧情。此外，他还打破了正歌剧只有咏叹调与宣叙调的传统形式，将合唱、芭蕾舞等艺术形式融入歌剧，甚至让乐队的演奏从伴奏的辅助位置晋级为极具表现力的主要力量。

总体上，巴洛克音乐的发展像是遇到了瓶颈，变得越发臃肿，而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在器乐和声乐两方面都进行了集体“瘦身”，且在音乐形态上，有了更多的结构化成果。

你可能会疑问，难道艺术不该是自由的吗？为何要给艺术加上曲式及题材上的规则？这明明是艺术的枷锁，怎么能算进步呢？要知道，绝对自由即没有自由，巴洛克音乐再自由，也还是要受调性、乐器、对位法以及和声理论的制约。艺术思想是自由的，但自由不代表没有重点。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表达不同内容时，表达方式却有优劣高下之分，好比长笛表达田园风光必定比长号适合，大提琴表达深沉感要比小提琴更贴切。艺术的发展不是盲目讲求自由，而是不断地过滤不恰当的，留下重要的，并从中总结规律。在规律的基础上挖掘深层内涵，方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为高远。

巴洛克时期，艺术总体是为上层人士服务——只有贵族阶级和少数富商能让画家为自己画像，乐队更是只有宫廷、教会才雇得起、养得起的“奢侈品”。作为服务宫廷的音乐，并不需要照顾大众审美，且不可否认的是，上层阶级整体文化水平更高，对复杂的艺术形式更易接受。进入古典主义时期，音乐艺术逐渐开始面向大众，面向公众的剧院、音乐厅建成开放，尤其到了莫扎特时期，听音乐几乎是维也纳人的共同爱好。

为了迎合公众，艺术形式必须简洁。迎合的公众越“众”，艺术的形式越简洁直接：必须易于理解。所以，复调音乐被更简洁的主调音乐取代，结构复杂的组曲被交响曲、协奏曲取代，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类似的艺术发展规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艺术一旦面向公众，就要向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发展。中世纪的教会之所以甘愿冒着违反核心教义的风险也要创作绘画，是因为面向大众信徒，绘画的传播方式更高效。后文还会提到，威尔第的喜歌剧会取代罗西尼等人的美声歌剧，是因为资产阶级兴起，剧场的扩大。流行音乐为何相较古典音乐更易传唱，篇幅也短？因为原本音乐面对的只是会去音乐会现场听、时间较完整、可以坐着听两小时以上的公众，留声机发明以后，音乐面对的则是更为广阔的大众，人们欣赏音乐的时间变得碎片化。

[1] 《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惊愕”》（Symphony No.94 in Gmajor“Surprise”）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91年交响曲Hob.I:94

[2] 《升f小调第四十五交响曲“离别”》（Symphony No.45 inf-sharp minor“Farewell”）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72年交响曲Hob.I:45

（三）水与火

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两位音乐家，非莫扎特与贝多芬莫属，莫扎特与贝多芬象征着古典主义音乐的最高成就。贝多芬的音乐直接推动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诞生，当然贝多芬音乐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哪怕到了今天，他对当代作曲家的创作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力，是当之无愧的“乐圣”。

音乐风格上，莫扎特流畅清新，贝多芬顿挫激昂，很容易构成一组二元对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在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一个观点：莫扎特的音乐像水，贝多芬的音乐像火。作为艺术家，二人在音乐史地位上各据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严格的二元对立，可以把莫扎特与贝多芬理解为音乐史当中两座稍有传承关系的丰碑，只是他们二人的音乐风格以及精神内涵确实可做一定程度的比对。

首先，莫扎特与贝多芬的人生际遇极不相同。莫扎特出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放在任何一个时代来看，小时候的莫扎特都能被称为“神童”。他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甚至是“骇人”的音乐天赋：未识字先识谱，5岁作曲，8岁创作第一部交响曲，12岁写出第一部歌剧，对钢琴和小提琴的演奏极为擅长。莫扎特成年以前就已经给全欧洲的贵族以及主教们演奏音乐，是欧洲上流社会追捧的童星，去世时年仅35岁。

相比之下，贝多芬只能算是大器晚成。他出生在德国波恩，比莫扎特小14岁，出版第一号作品——3首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的三重奏时，已经25岁（虽然贝多芬13岁就已发表过作品，但并非优秀之作，也并未正式出版），出版第一部交响曲《第一交响曲》（Op.21）时，贝多芬已经31岁了，31岁对于莫扎特来说，已属“晚年”。

莫扎特从小就红遍欧洲，与他父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莫扎特非常看中儿子的才华，精心培养，贴身守护，莫扎特在7岁到17岁的10年间，是在全欧洲的旅行演出中度过的。贝多芬的父亲是一名宫廷歌手，想效法莫扎特的父亲，所以逼着贝多芬从小学习音乐，练习钢琴、小提琴，也想把贝多芬打造成神童，甚至还把贝多芬的年纪报小两岁。为此，贝多芬小时候吃了不少练琴的苦。青年时期的贝多芬辗转来到维也纳后，开始跟随“海顿爸爸”学习，但似乎与海顿不是很合得来，最后不欢而散。与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

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较大。莫扎特善于交际，性格相对开朗外向，对自己的艺术无比自信。从莫扎特的书信集中就可以看出，莫扎特性格活跃且

充满恶作剧精神，情感也极其充沛，如果拿一种动物来比喻，莫扎特像一只活泼灵动的猫咪。而贝多芬一方面长相较为难看，身高较矮，据说只有157厘米，且性格暴躁，周围人都害怕他。贝多芬相较莫扎特更内向、孤高。另一方面，贝多芬自青年时期就开始有耳聋症状，中年时几乎全聋，这导致贝多芬性格愈发躁郁，犹如一头生气的雄狮。

在作品体裁方面，除歌剧一项以外，两位大师的创作体裁相对重合，都写了许多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以及各种室内乐作品及小品单曲。从数量上看，除钢琴奏鸣曲外，莫扎特几乎每一种体裁都多于贝多芬：莫扎特有约50部交响曲，贝多芬有9部；莫扎特有27部钢琴协奏曲，贝多芬5部；莫扎特有7部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1部；莫扎特有35部钢琴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10部；唯独在钢琴奏鸣曲一项上，贝多芬有32部出版的钢琴奏鸣曲，莫扎特有17部；室内乐方面，莫扎特的20多部弦乐四重奏略多于贝多芬的16部；在歌剧方面，莫扎特有22部作品，贝多芬只有1部歌剧；莫扎特的宗教作品，例如弥撒曲，也有18部，而贝多芬严格来说只有2部主要的弥撒曲。总作品数，只论出版的，莫扎特的作品编号到K.626，贝多芬则只有Op.135。（“K.××”是莫扎特作品按照创作年代编的编号，由奥地利植物学家克歇尔编纂整理，Op.即作品的拉丁语“Opus”的缩写，“Op.××”是贝多芬等一众音乐家作品的出版编号，按出版顺序编纂，与创作顺序并非完全一致。）再加上莫扎特只活了35岁，贝多芬活到57岁，从平均年产值来看，似乎莫扎特的创作能力更强。但这个问题不应该单纯比拼数量，或将其单纯地理解为天才程度、作曲能力上的差异。造成两人作曲数量悬殊的原因有几个，其中就包含了为什么两人音乐风格上会形成“水”与“火”对立听感的答案。

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创作在服务对象上并不完全相同。莫扎特5岁作曲，35岁去世，30年间从未中断，而在这期间，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有雇主，就连他25岁到维也纳发展时，虽然名义上是一名自由作曲家，但许多作品委托都与宫廷贵族尤其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瑟夫二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莫扎特的作品艺术价值极高，但多少保留着少许“活计”感。既然是“活计”，就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产出，这也是为何莫扎特每种体裁的作品数量都非常多。

与之相对的，贝多芬的主要作品都被当作纯粹独立的艺术品进行创作。这要求每一部作品都要比上一部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有明显的差异和突破。因此，贝多芬每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深的思考。如此导致的结果是，贝多芬作品的总数虽然明显少于莫扎特，但贝多芬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区别非常显著，而莫扎特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粗略听来，略显同质化，尽管这种同质化并非贬义。

可尝试比较贝多芬的5部钢琴协奏曲（如[\[1\]](#)/[\[2\]](#)/[\[3\]](#)），其中第1部和第2部

在听觉效果上相对接近，后3部则如大相径庭；相比之下，莫扎特的27部钢琴协奏曲虽然极为精彩，但总体上作品之间听感的差异远不如贝多芬作品显著。贝多芬如果创作类似的作品，通常的做法是把几部作品打包一同出版，比如Op.2就是最早的3部钢琴奏鸣曲，是题献给海顿的作品。再譬如弦乐四重奏作品中，第1号到第6号都包含在Op.18中，第7号到第9号的3部《C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拉祖莫夫斯基”》^[4]则收录在Op.59中，这是俄国大使拉祖莫夫斯基的委托作品。这可以理解作曲家于某段时间内，在某种艺术创作思想的主导下所完成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共同将这一特定艺术思想表达完整。

贝多芬无须如莫扎特一般，也无须像他的前辈如海顿、泰勒曼、巴赫等，写如此多听感趋于同质化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当时的维也纳还处在封建统治时期，但资产阶级兴起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国大革命后，民众的存在感及其需求在法国占据主流，艺术逐渐由面向统治者及上层阶级转为面向公众。类似的事情也在德奥地区发生。1806年，在拿破仑的征服下，统治了德意志地区800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帝国内的小国家纷纷独立，各自为政，变得更为松散，这让德意志地区的艺术在面向公众方面又推进了一层：宫廷需求减弱，公众需求增长，越来越多的民众到音乐厅聆听新创作的交响曲、协奏曲、歌剧。从创作层面看，贝多芬的年代，已不需要以超高频率创作新作品来满足上层阶级的需求了：譬如你服务的是一位公爵，你创作了一部作品，他很快就听厌了，那你就必须创作新作品；面对公众则不一样，每部新作品要在不同城市以及不同音乐厅反复上演，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公众熟悉，每部新作品都更为“耐用持久”。这也就允许贝多芬这个时期的音乐家有充足时间创作更具有变化的新作品。贝多芬之后的作曲家，作品数量能到200部以上的都属少见，还必须要拥有长寿体质，李斯特和圣—桑斯是其中代表。

听觉上，莫扎特作品的流动性及律动感更强，是“流淌着”的音乐，呈现出珠圆玉润的完美，极少听到过分强烈抑或气若游丝的夸张表现；贝多芬作品的冲击力和顿挫感更强，是“燃烧着”的音乐，充满激情，富有大动态和大对比，是“长满棱角”却又深邃无比的音乐。这两种听感从作曲手法上也可做比较。前文提到，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是主调音乐，主调音乐中能清晰找到主旋律，其他声部则处在伴奏式的和声地位。在一条旋律中，不同位置配不同和声，和声是由不同音高的音组成的，原则上这几个音要同时发出才能形成特定功能的和声，而两位作曲家在和声的处理上大不相同。

莫扎特的做法具有流动性：把一个和声当中的不同音拆解开来，再按顺序排布，把它们当成具有伴奏功能的旋律线演奏出来(x2)。如此一来，整体和声的冲击力被拆解成单音旋律，冲击力就被化解了，但和声功能还在，

因为这段和声的所有音都被演奏了出来，与旋律之间相互作用。这样的“伴奏型”其实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标志性手法，在海顿的作品以及贝多芬少数早期作品中也会见到，但在之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中则很难再见到。对该手法使用最频繁的就是莫扎特，几乎每部钢琴作品中都能见到该手法的痕迹（[\[5\]](#)/[\[6\]](#)/[\[7\]](#)/[\[8\]](#)）。



X2↑

/

《C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选段）（*Piano Sonata No.16 in C major*）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8年奏鸣曲K.545

贝多芬则不同。在和声伴奏问题上，他不仅不消除和声带来的冲击力，还会不断强调它。贝多芬的很多作品是不断重复特定和声，让该和声的震感不断地被强调。再用“工具箱”举例：同样是对付一根钉子，莫扎特是耐心地、柔韧地把钉子用螺丝刀转进去；贝多芬用的则是一把铁锤，一下下将钉子敲进去。

说到音乐的组成单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作“乐句”。就如一篇文章中的句子一样，一条完整的乐句相当于用音乐讲了一句话。写作时，句子有长短。乐句也有长短。人们在写作时有停顿，表现为标点符号；乐句也一样有停顿，乐谱上用休止符表达停顿，或没有休止符也能感受到两个乐句间是断开的，在音乐术语中叫作“断句”。比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乐句会发现，总体上，莫扎特的乐句比贝多芬长，贝多芬的乐句则要比莫扎特的停顿多。这导致从听感上，莫扎特的音乐更平滑，贝多芬的则显突兀。可随便找几段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一听（[\[9\]](#)/[\[10\]](#)），也可对比莫扎特与贝多芬二人的乐谱谱面。不难发现，贝多芬的音乐有更多休止符。这也不难理解，和人们说话一样，若句子长且无甚停顿，话的音量会显小，因为气息和肺活量的限制；相反，若是短促的话语，则适合作命令式的祈使句，甚至可用作呵斥与感叹。如此看来，短的、多有停顿的乐句，听上去更具有冲击力。19世纪时意大利歌剧从以罗西尼为代表的美声歌剧向以威尔第为代表的喜歌剧转变时，乐句特色的变化几乎同理。

莫扎特与贝多芬再次展现出意大利与德奥在音乐题材上的二元对立。莫扎

特创作了许多意大利语正歌剧及喜歌剧，正歌剧有《狄托的仁慈》，喜歌剧的代表作则有《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莫扎特在歌剧中所展现出来的流畅的旋律、优美的唱段，完全是意大利式的。贝多芬终其一生只有一部歌剧——以德语演唱的《菲德里奥》。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很高，演唱也极难，但不太符合当时大众对于歌剧的审美，因为《菲德里奥》是一部“文以载道”的“正经歌剧”。当时的维也纳是德奥的文化中心，聚集了全欧洲最优秀的音乐家，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来自意大利的优秀音乐家，因此即使在维也纳，歌剧的主流审美依然是意大利式的。

在歌剧创作上，莫扎特推崇格鲁克歌剧改革的思想，追求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他在故事剧情方面也展现出独特的戏剧天赋。意大利歌剧的复兴要等到19世纪初罗西尼的出现，而莫扎特的歌剧则代表着意大利式歌剧在18世纪的最高成就。如此，从是否善于歌剧创作这一点上，又能看出莫扎特所代表的意大利歌剧音乐与贝多芬所代表德意志交响音乐在地域性上的二元对立。当然，莫扎特也是德语歌剧的先驱，《后宫诱逃》是历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德语歌剧，莫扎特晚年的《魔笛》更是德语歌剧的巅峰之作。

前文提到，莫扎特不同作品之间听感显得雷同，这并非莫扎特在艺术创造力上弱于贝多芬，因为莫扎特的作曲过程是“天成”的。据说，在作曲过程当中，莫扎特从不会在乐句上反复推敲，而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让作品从内心流淌出来，这是极其天才式的自然流露。传说莫扎特的手稿与完稿一般，从无过多涂改修饰。莫扎特简直就如上帝的“抄谱员”，莫扎特的音乐是来自天上的，他只是在上帝的“硬盘”里把作品“抄写”在人间的乐谱上罢了。

莫扎特的作曲方式也和常人不同，被称为“纵向写作”。大部分人写一部交响曲，作曲方式是“横向”的：写完一个声部再写另外一个，将声部一一对应并补全。但莫扎特创作时，脑海中仿佛一直有个乐团在演奏，他在写下音符前就已在脑海中听到了声音，这种能力被称为“内心听觉”。莫扎特作曲不是每个声部挨个儿写，而是把各声部的首个音写出来，再写各声部的第二个音，依此类推，如此“纵向”。

这种流淌式而非推敲钻研式的作曲方式让莫扎特作曲效率极高，但同时又难免让音乐风格略显同质化。莫扎特甚至在众多作品中采用相同的方式来结束乐段。刚开始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往往难以理解莫扎特音乐艺术造诣的高超，因为听上去都差不多，但仔细聆听又会发现，每部作品的精神内涵以及音乐设计都各具特色，且常常出现“神来之笔”，精确地勾勒出作品的闪光点。

[1] 《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1 in C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95年协奏曲Op.15

[2] 《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 in B-flat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87—1789年协奏曲Op.19

[3] 《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3 in c min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0年协奏曲Op.37

[4] 《C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拉祖莫夫斯基”》（*String Quartet No.9 in C major“Razumovsky”*）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6年弦乐四重奏Op.59，No.3

[5] 《C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6 in C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8年奏鸣曲K.545

[6] 《降E大调第二十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2 in E-flat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5年协奏曲K.482

[7] 《A大调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3 in A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6年协奏曲K.488

[8] 《C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0 in C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3年奏鸣曲K.330

[9] 《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Piano Sonata No.8 in c minor“Pathétique”*）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98年奏鸣曲Op.13

[10] 《C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奏鸣曲“华尔斯坦”》（*Piano Sonata No.21 in C major“Waldstein”*）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4年奏鸣曲Op.53

（四）使徒与英雄

莫扎特在音乐中展现出显著的“宿命论”倾向。尽管其创作主要是光辉的大调作品，但在仅有的小调作品中，开头黑暗、阴郁，结尾几乎也都归于黑暗与阴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间兴许有欢快柔美的段落，但曲终还是归于沉寂。《g小调第二十五交响曲》（K.183，[\[1\]](#)）以及《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K.550，[\[2\]](#)）这两部作品的开头都极为著名，尤其是《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几乎成为莫扎特音乐的一张名片。这两部作品的慢乐章都是极优美的，洋溢着幸福感，但到终曲时，却又都在紧张、黑暗的小调主和弦中结束。

莫扎特的宿命论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必然联系。莫扎特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且老莫扎特极其重视莫扎特在信仰上的坚定。在母亲陪伴莫扎特旅行演出期间，老莫扎特在信中时常向莫扎特提及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牢记现世的短暂欢愉是来自上帝的恩赐。终其一生，莫扎特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他来说，无论现世如何，终要回归上帝怀抱，一世尘缘，终归尘土。如此便不难理解莫扎特音乐中的宿命论气息。

尽管如此，莫扎特的音乐也不应被错认为是认命的、消极的。恰恰相反，他的音乐充满了悲天悯人的赤诚，作品中的平衡与唯美则是这种慈悲心的表现。著名钢琴家傅聪曾评价莫扎特的音乐是“贾宝玉加孙悟空”。贾宝玉情感细腻，姐姐妹妹的心思他都能懂，都能体恤；像孙悟空则是说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神通广大，任意主题拿到手上立刻妙笔生花，七十二变。在莫扎特的歌剧作品中，哪怕是反派、小人物的唱段都极其优美；歌剧《魔笛》（[\[3\]](#)）中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的花腔女高音，演唱难度极高，这样吊着高音且应是歇斯底里的咏叹调，听上去却优美异常，是音乐史上著名的花腔女高音唱段之一。

莫扎特的人生算不上大富大贵，30岁以后则更是“晚景颓唐”，生活给他带来诸多不如意。但即便如此，也并未影响到他的音乐艺术，莫扎特始终用音乐不断安慰着世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创作出了像《魔笛》这样充满乐天精神的喜歌剧以及《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K.622，[\[4\]](#)）这样温暖抚慰的音乐。从幼年时的小品到临终大作《安魂曲》，贯穿莫扎特音乐始终的，正是这份不变的赤子之心。

莫扎特的音乐来自天上，毫无人世间的丑恶，也没有人世间的痛苦，更不带有人世间的挣扎与烦恼。他就像一位天使，无论如何被生活所折磨，音乐中的宽慰从不曾减少半分。

莫扎特有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贝多芬最喜欢的是《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5\]](#)）。这部作品和莫扎特的其他小调作品不同，虽然阴沉地开了头，却是以光辉喜悦的大调结尾，贝多芬还专门为该作品创作了华彩乐段，因为这部作品符合贝多芬的价值观。

贝多芬一生都是英雄、斗士，与生活、与世界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抗争。众所周知，贝多芬的耳聋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显露症状，到中年则几乎全聋。他作曲时要靠特殊金属设备贴在背后再通过颅骨传导感受声音。然而也正是耳聋变得严重，激发了贝多芬与命运抗争的意志，这让他写出了《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即《英雄》，Op.55，[\[6\]](#)），这部作品是贝多芬一生音乐艺术的分水岭，也是德奥音乐的风格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的分水岭，《英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德意志精神在音乐领域觉醒的标志。

《英雄》创作于1803年，是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委托贝多芬为拿破仑所作。这时的贝多芬正努力克服因为耳聋想要自杀的抑郁情绪，从人生低谷中重拾自信。贝多芬天性追求自由，他欣赏和崇拜拿破仑的勇气，拿破仑英勇无畏的精神激发了贝多芬的创作灵感和生活力量。《英雄》原本是题献给拿破仑的作品，但意想不到的是，拿破仑居然称帝了，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贝多芬原以为拿破仑要播撒自由共和的种子，与人民站在一起，未料想拿破仑也不过是野心和权势的奴隶，在征服各国君主后，做起了称王称帝的春秋大梦。于是贝多芬将乐谱上题献给拿破仑的字样“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愤怒地画掉，并改成“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

单从长度上看，《英雄》就已表现出结构上的恢宏。在《英雄》之前，古典主义时期的交响曲长度一般不超过30分钟，然而《英雄》却超过40分钟，光第一乐章的长度就接近20分钟。在结构安排上，《英雄》也极为创新：第二乐章是一首葬礼进行曲，这在当时前所未有；第三乐章又以谐谑曲代替传统的小步舞曲；第四乐章的主题曾在贝多芬的两幕舞剧《普罗米修斯的造物》当中使用过，很显然，希腊神话中将火种从天上偷出并送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在贝多芬心目中是英雄的象征。葬礼进行曲的情绪异常低沉，是整部作品情绪上的最低点；而谐谑曲相比传统古典主义音乐中用作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激烈且具有动感；整部交响曲在情绪上的动态幅度要比传统古典主义交响曲大得多。

前文提到，与莫扎特的音乐相比，贝多芬的音乐就像一把铁锤。在《英雄》里，第一乐章的开头就是铁锤重重敲击两下，雄浑的大提琴才带着主旋律进入。第一乐章中段，做阶段性总结的又是连续六下铁锤般的重击，就像英雄充满力量的铁拳向宿命发起攻击。整部作品在音高分布上，比起传统的古典主义交响曲，更向低音部分倾斜，给人刚劲有力的感受。《英雄》代表规模更大、构思更宏伟的创作理念，《英雄》带来的强烈震撼，预示贝多芬音乐中英雄主义的觉醒。在《英雄》之前，拥有强烈德意志精

神的作品不多。贝多芬的音乐，与其说是唤醒了德意志精神，不如说是重新定义了德意志精神。

贝多芬与莫扎特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也可以解释他们在音乐中表达的不同价值观。莫扎特是天主教徒，所以奈何你在世上是帝王将相也好，贩夫走卒也罢，死后都要到天主面前接受审判，这反映在莫扎特音乐的“宿命感”当中。贝多芬虽然是天主教家庭出身，但他并未展现出对宗教的笃信，宗教作品也很少，尽管《庄严弥撒曲》（Op.123）被他称为自己“最完美的作品”。虽不笃信宗教，但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贝多芬表现出了“泛神论者”的神学观点，即相信宇宙中存在主宰一切的力量，但未必是基督。贝多芬的音乐是开放式的、向上的、探索的、充满能量的，与莫扎特的“宿命论”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

谈到德意志精神，大部分人印象中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崇尚英雄气概，二是歌颂浪漫情怀，这在贝多芬音乐中可说是一览无余。以《英雄》为标志，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该时期的作品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以及强烈的斗争气息，比如：一系列的钢琴奏鸣曲，《月光》《黎明》《热情》；第三到第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各类富含浪漫旋律的小品；一系列管弦乐作品，如《c小调第五交响曲》（即《命运》，[7]）。《命运》的动机也是广为人知的“命运在叩门”主题，开篇紧张、极具压迫感，象征宿命的不可抗拒，当中又经历一系列挣扎，直到终章，全曲在光辉的胜利中结束，这便是标准贝多芬式的创作。同样地，在《埃格蒙特》序曲（[8]）以及《d小调第九交响曲》（即《合唱》，[9]）中，贝多芬也做了这样的安排。

贝多芬的音乐是充满正能量和抗争意味的，他永远不会被命运打倒。每每聆听贝多芬的音乐，总会惊叹于一个人遭遇如此悲惨，作为音乐家失去最宝贵的听力，在健康、情感、事业上诸多不顺，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送如此伟大的精神力量。从古到今，贝多芬的音乐不知道激励了多少人。

莫扎特的音乐来自天上，是慈悲的，是自上而下的关怀。贝多芬的音乐则代表人类自身：人类并不完美，但在经历苦难之后，仍不放弃心中希望，永远努力战斗下去，这正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

在贝多芬晚期作品中，百折不挠的精神逐渐转化为博爱，集中展现在《第九交响曲》最后的篇章中，这是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作品。贝多芬在终章史无前例地加入合唱团以及声乐独唱，唱出了感人肺腑、象征博爱与和平的，来自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据说《第九交响曲》首演时，观众彻底被震撼，现场沸腾了，人们欢呼着鼓掌，贝多芬前后返场五次接受致敬。由于耳聋，贝多芬并不能亲自指挥

《第九交响曲》首演，而是象征性地站在舞台上，面朝乐队，甚至全曲结束了，贝多芬也无法感受到现场雷鸣般的掌声，直到有人把他转向观众。创作了《第九交响曲》的贝多芬却不能用自己的耳朵聆听这支曲子，而它又激励了那么多人，为全世界送上温暖和力量，是自由、平等和希望的象征。我们只能期望，在贝多芬心中，埋藏着真正只属于他自己的《第九交响曲》，能给予他内心永远的平静和宽慰。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时，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组织全世界的音乐家，组成了一支“国际爱乐乐团”，在柏林演出这部作品来歌颂自由，并将《欢乐颂》德语唱词里的“欢乐”（freude）改成了“自由”（freiheit）。

[1] 《g小调第二十五交响曲》（*Symphony No.25 in g min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73年交响曲K.183

[2] 《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Symphony No.40 in g min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8年交响曲K.550

[3] 《魔笛》（*Die Zauberflöte*）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91年德语喜歌剧K.620

[4] 《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Concerto for Clarinet in A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91年协奏曲K.622

[5] 《d小调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0 in d min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85年协奏曲K.466

[6]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Symphony No.3 in E-flat major“Eroica”*）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3—1804年交响曲Op.55

[7] 《c小调第五交响曲》（*Symphony No.5 in c min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4—1808年交响曲Op.67

[8] 《埃格蒙特》（*Egmont*）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9—1810年为歌德戏剧所作配乐Op.84

[9] 《d小调第九交响曲》（*Symphony No.9 in d min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24年交响曲Op.125

（五）创造与颠覆

贝多芬一生的创作可分为四个显著时期：早期、中期、过渡期以及晚期。

贝多芬的早期作品相对古典，与海顿、莫扎特的音乐接近。但即便是早期的贝多芬，也开始用四乐章这种属于交响曲的结构来创作奏鸣曲了，这在海顿和莫扎特的奏鸣曲中是没有的，而贝多芬在音乐中展现出的力量感，也是海顿与莫扎特的音乐所不具备的。

通常以《英雄》为贝多芬创作中期的标志。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在该时期成熟定型，展现出宏大感以及浪漫主义气息，到创作《第五钢琴协奏曲》（即《皇帝》，Op.73，[\[1\]](#)）时，贝多芬的中期风格达到顶峰。

窃以为，贝多芬的过渡时期始于《第五钢琴协奏曲》后的一部作品，编号为Op.74的《降E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2\]](#)）。这部作品中，贝多芬用四把提琴“拨弦演奏”模仿竖琴的发声，全曲音响效果新颖奇特。过渡时期的贝多芬已不满足自己鼎盛时的创作风格，写出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磅礴作品对其已不再有挑战，他要探索全新的创作方式。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展现出“奇特”的听觉效果，如《降E大调第二十六钢琴奏鸣曲》（Op.81a，[\[3\]](#)）。

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只能用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来形容，以其最后5首钢琴奏鸣曲为标志（Op.101、Op.106、Op.109、Op.110、Op.111，[\[4\]](#)/[\[5\]](#)/[\[6\]](#)）▲注《降A大调第三十一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31 in A-flat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21年奏鸣曲Op.110：▲/[\[7\]](#)）。经历过渡期的探索，贝多芬最终找到“终极音响效果”。晚期贝多芬的音乐语言已然褪去了年轻气盛时的锋芒，全然脱去抓人耳目的奇技淫巧，显得返璞归真，大道至简，但在作曲手法以及和声变化上又极其丰富、创新不断。此时贝多芬已奠定大师地位，无需再创作迎合大众审美的“好听”音乐，而是专注在情感上展现出博爱，抑或是深邃、充满哲学意味的探索。

纵观整个艺术生涯，贝多芬不断追求的是对旧风格、旧形式的推翻，以及对新形式、新音响的探索，人们甚至能在贝多芬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中听出少许爵士乐的味道，虽然贝多芬所处的年代还远远没有爵士乐的踪影。从创新意义上看，贝多芬对后世的影响要比莫扎特大得多。若音乐史中从未出现莫扎特，古典主义时期会显得黯淡，但并不会因此减缓发展脚步；可若是没有贝多芬，恐怕音乐史的进程将受到重大干扰——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无一不受贝多芬的深远影响。

贝多芬所追求的突破和创新，是对音乐创作的整体框架进行改革。即便在其最鼎盛，创作出最多脍炙人口“好听”音乐的中期，创新和改革也从未停止。简单举例，《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Op.58，[\[8\]](#)）开篇第一个音便一反传统惯例：维也纳古典时期，协奏曲通常由乐队开头，带出主题，一番陈述后，独奏方才进入，而《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个音便由钢琴奏出，引出作品动机。

华彩是协奏曲中独奏家用以炫技的部分，一旦进入华彩，乐队停止演奏，独奏乐器则依照乐曲中的音乐元素进行炫技性独奏。华彩通常于乐章结束前出现，但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则是由钢琴华彩般的独奏开始，一分多钟后，乐队才奏出主题。这般的创新案例还有不少，贝多芬的一系列创新寻求了音乐创作的各种可能，将音乐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谁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这个问题，虽无明确定论，但争议基本只在巴赫、莫扎特以及贝多芬三人之间。至此，可将三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与文艺复兴三杰一一对应，不难发现，三位音乐家对音乐的影响与文艺复兴三杰对美术的影响几乎是类似的。

巴赫创作极多，且质量极高，除客观原因并无歌剧作品外，已把能尝试的音乐形式都写遍了，这与达·芬奇很像，都是所处领域的“缔造者”，是全能式的人物。虽然达·芬奇油画创作很少，但通过其留下的大量手稿可知，他对各个领域的艺术乃至科学都做了极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即便在绘画领域，对透视法的改进和运用，以及明暗法、晕染法的发明，均可谓是划时代的贡献。

莫扎特与拉斐尔都是各自领域的“经营者”。他们自幼天赋异禀，乃不世出之少年天才。拉斐尔13岁当家，接绘画订单，早早超越了自己的父亲和老师；莫扎特5岁作曲，12岁便写就第一部歌剧。他们都在当时时代框架下，把各自的艺术推向时代最高峰：拉斐尔以300多幅画作充分展现“画圣”气度；莫扎特则是在古典主义的框架下写出了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等范式的最高水平，其歌剧艺术造诣也是当世之翘楚，无人能出其右。

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则都是艺术的“改革者”。米开朗琪罗在进入成熟期与晚期后，便不断寻求新表达方式，创作出超现实的人物形象，甚至表现出强烈的矫饰主义气息；米开朗琪罗追求戏剧性冲突和超强表现张力，实际是预示着后世巴洛克艺术的核心追求。同样，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都在寻求创新，他不断拓宽音乐创作的整体框架，并直接催生了音乐中的浪漫主义。二人甚至在性格上也很是相似：脾气不大好，且精神力量极其强大。米开朗琪罗拥有超人的信仰之力，支撑他完成了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这在常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贝多芬则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战胜

了耳聋带来的抑郁，用作品中的正能量激励着全人类。

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也莫不如此。拿物理学来说，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前辈物理学家初步建立起经典物理模型，是物理学的“缔造者”；到了19世纪末，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等一众大师，几乎以解析方式定量描述了经典物理范畴内的所有事物，物理学至此如日中天，他们是“经营者”；来到20世纪，爱因斯坦、普朗克、狄拉克、海森堡、薛定谔这批物理学家，推翻了经典物理，建立起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物理学，无疑是“改革者”。

艺术也好、科学也罢，艺术家的创作、科学家的研究，都像在盖楼：前辈们作为缔造者打地基、造外型，经营者添砖加瓦搞装修，最后来一批改革派，把旧楼推倒重来，再建一座新的，更高更豪华。如此循环反复，该领域便不断演化进步。

[1]《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Piano Concerto No.5 in E-flat major “Emper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9—1811年协奏曲Op.73

[2]《降E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竖琴”》（*String Quartet No.10 in E-flat major “Harp”*）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9年弦乐四重奏Op.74

[3]《降E大调第二十六钢琴奏鸣曲“离别”》（*Piano Sonata No.26 in E-flat major “Les Adieux”*）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9—1810年奏鸣曲Op.81a

[4]《A大调第二十八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28 in A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16年奏鸣曲Op.101

[5]《降B大调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29 in B-flat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18年奏鸣曲Op.106

[6]《E大调第三十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30 in E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20年奏鸣曲Op.109

[7]《c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32 in c min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22年奏鸣曲Op.111

[8]《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4 in G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5—1806年协奏曲Op.58

10 安格尔与戈雅：浪漫主义绘画艺术

（一）启蒙与狂飙

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蓬巴杜夫人几乎一手推动了洛可可风格的诞生，称得上是洛可可风格的发起人。

洛可可奢靡浮华的装饰风格，看似代表着蓬巴杜夫人的性格特点，让人容易把蓬巴杜夫人与“挥霍败家”联系起来，但这种认知太过片面，摆脱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认知是客观看待历史的重要一步。就像说到末代皇帝就必昏庸无能，谈及开国君主则必励精图治，如此脸谱化的刻画虽能让后人对复杂历史做到概括性地快速理解，但若在做深入了解前，标签就已贴好的话，恐怕于发现真相无益。

世人只看到蓬巴杜夫人的奢侈浪费，却未看到她的睿智运筹。否则一个只知铺张消费的女子，路易十五真能不察到任其坐拥如此巨大权力？

对洛可可奢华艺术风格的促进，只是蓬巴杜夫人的一个方面；蓬巴杜夫人对学术研究以及知识分子的支持更是有力量且重要的。著名学者狄德罗主编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影响巨大的大型工具书《百科全书》，便离不开蓬巴杜夫人的大力支持。

这套《百科全书》对宗教重新定义，将宗教信仰归类为“迷信”。《百科全书》针对宗教的归类虽然只是一张简单的示意图，但意义非凡——这套书首次正式推翻了从中世纪以来就统治欧洲人精神世界的基督教世界观，并开启了现代社会对宗教的认知。

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由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者牵头的启蒙运动，让科学和民主在西方世界传播，推动了整个西方的文明进程。

现代人的普遍思想是以科学为主导的，这与古代社会追求神学信仰，相信死后往生极乐大为不同。古代社会是以君权为基础，当今社会则以民权为根本。如此显著区别，在历史进程中必有一段分水岭般的时期主导该转变，这个分水岭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张以理性和科学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达到更高的文明状态。

在18世纪中期，整个欧洲的科学水平已进入“解析”时代。所谓“解析”，即已能使用精确的数学工具定量描述事物规律。在数学方面，高等数学的基础如微积分、微分方程等理论已得到较完备的发展。法国的拉普拉斯、勒让德等对微分方程及偏微分方程贡献卓著的数学家便生活在这一时期。物理学方面，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分析力学也开始崭露头角，拉格朗日等分析力学奠基人也生活在这一时期。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甚至在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已全面超越古希腊和古罗马，对当时人们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知道，自文艺复兴起，大多艺术家只是以达到古人的成就为最终目标。但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一固有认知被科学进步打破了，原本认为无法突破的疆界被突破：古希腊人不再伟大，今人更了不起。这无疑打开了人们长期被宗教禁锢的思想枷锁——也许上帝也并非那么重要了。如此一来，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逐渐被释放出来，形成一股足以颠覆当时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这股力量被释放的结果，可称得上是区分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变革不断——神圣罗马帝国倾覆，美国崛起，英国的君主立宪全面深化……启蒙运动作为这一系列变革的精神源头，影响极其深远。

启蒙运动的思想在西方扩散，在不同国家激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其中在德国最为激烈——引发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它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神源头，连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创作都深受其感染。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场文学运动。“狂飙突进”一词来源于克林格的一出剧目，名为《狂飙与突进》（*Sturm und Drang*），字面直译过来是“风暴与冲动”。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是理性、科学，凡事讲逻辑。虽然从反封建统治、反上层压迫这一点上，德国文艺界，尤其出身中产及平民的文化人士与启蒙运动学者持一致观点，但德国人不喜欢这种理性温吞的方式，他们追求情感的爆发、个性的显露以及天才的创造，他们要的是真性情与真感受。德国人要以充满感染力的暴风骤雨式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主张。

在狂飙突进思想影响下创作的作品更注重故事想象力，通常具有离奇剧情；主张体现个人情感，如恋爱、恩怨等；描写角度也更重个人想法和心理。

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大文豪歌德以及诗人席勒。歌德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极为重要的人物。在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将笔墨凝聚在一个名叫维特的青春期少年身

上，集中描写了少年对爱情的懵懂与渴望，维特最终因爱情的苦痛和绝望而自杀。这在当时是非常标新立异的主题。书中包含大量心理活动描写，把着眼点从家国天下的大主题转移到个人心理的小主题上。这类关注个人、关注内心、关注自我的描写方式，集中代表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核心。

席勒的代表作《强盗》，让他获得了“德国莎士比亚”的美誉。这部作品讲述了伯爵两个儿子间相互斗争的故事：大儿子酷爱自由民主，小儿子则阴险歹毒，因贪图父亲财产设计陷害哥哥，并导致哥哥与父亲决裂，变成一名杀富济贫的强盗。

《强盗》通过个人故事折射社会问题，除了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突外，也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主张，使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席勒对故事的设计充满想象，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莫扎特青年时代的诸多作品，譬如他的第一部德语歌剧《后宫诱逃》，就展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情怀。贝多芬的作品自然更不用说，与歌德本就是好友的贝多芬甚至比歌德更“狂飙突进”，从其创作中期开始，贝多芬的作品都深刻蕴含浪漫主义气息。

根据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化主张，不难获得关于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些关键点。相比于高尚、宏大的理念和思想道德，浪漫主义更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推崇个人情感的张扬和抒发，注重情感的释放而非思想的表达。

当人们评价某人浪漫时，通常是指其在爱情方面表现出的投入或关注，如此对于浪漫主义的理解是片面且狭隘的。浪漫主义关注个人情感和想象力，乐于描绘戏剧性场景，讲究灵感式地抒发，热衷感性描写。从该意义上看，巴洛克艺术恰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因为巴洛克艺术注重动态、对比以及戏剧性瞬间，且充满装饰性的表达方式可被理解为浪漫主义追求的夸张表达。暂且不论这一时期普桑、勒布朗这一支法国学院派，总体上，巴洛克艺术是具有“广义浪漫主义”精神的。

（二）德意志与法兰西

浪漫主义在绘画方面，德国的弗里德里希与龙格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弗里德里希的画作甚至到20世纪初，还被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现代画家重新发掘，并从其艺术中获益。

弗里德里希与贝多芬几乎同时代，主要创作风景画。在弗里德里希之前，著名的风景画家是普桑与洛兰。与他们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几乎没有纯粹写实的风景。他的风景画不在于表现自然风景的优美，而在于自身感受的表达。弗里德里希作有大量“黑暗系”风景画，诸如《山上的十字架》（J1）、《橡树丛中的修道院》（J2）等等，这些画作中风景的面貌在真实世界中并不会见到。

例如《橡树丛中的修道院》，橡树群以枯枝形象伸展，象征荒废与死亡；修道院残破不堪，甚至庙宇已然消失，只剩一扇窗户，这大概象征宗教没落及道德崩坏。画面苍白无力、阴森可怖，如死亡笼罩大地。明明是修道院，却被狰狞的枯枝环绕，犹如置身恶魔手掌之中。再如《海边修道士》（J3），画中修道士形象占比极小，修道士代表宗教信仰，而其面对的却是阴郁庞大的海面，似乎象征着信仰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据说初展时，弗里德里希要求两幅作品一同展出，《橡树丛中的修道院》在上，《海边修道士》居下，大约是让人感受画面情绪的承接所作的特殊安排。这样的画作在观赏之后，已不会让人在意具体画工笔法、构图用色，而是被其直击情感深处。画作用精神寓意笼罩审美感受，让人不禁遐想，远处微弱的光芒是否象征希望，预示黑夜虽久，黎明终将到来，抑或是以黑暗衬托光明？还是这仅存的微光也要逝去，世界终将被黑暗吞噬？让观者产生如此复杂以及纠结的感受，弗里德里希的浪漫主义无疑大获成功。



J1↑

/

《山上的十字架》（*Cross in the Mountains*）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15cm×110.5cm布上油画1808年德国德累斯顿新大师美术馆（Galerie Neue Meister）



J2↑

/

《橡树丛中的修道院》（*The Abbey in the Oak Wood*）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10cm×171cm布上油画1809—1810年德国柏林老国家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



J3↑

/

《海边修道士》（*The Monk by the Sea*）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10cm×171.5cm布上油画1808—1810年德国柏林老国家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



J4↑

/

《雪中的修道院废墟》（*Monastery Graveyard in the Snow*）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21cm×170cm布上油画1817—1819年曾收藏于柏林国家美术馆，二战空袭中被毁，仅存照片

弗里德里希的精神世界是悲观的，他不断描绘黑暗、缥缈、充满绝望的主题。弗里德里希尤其热衷描绘“废墟”和“灾难”，这与画家幼年遭遇有关——弗里德里希13岁前便经历了母亲和3位哥哥姐姐的死亡，死亡的恐惧于弗里德里希并不陌生。《雪中的修道院废墟》明确地表达了黑暗可怖的视觉感受，可惜这件作品在二战中被毁，如今只能看到画作的照片（J4），但苍白阴森的颓丧气息依然清晰可见。灾难主题，前辈画家并非没有描绘过，只是那些画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督教神学体系内，例如“大洪水”或“末日审判”等题材，是为劝诫世人警醒，本质上都是宗教化的。弗里德里希的《冰河中的航船失事》（J5）则是直接表现灾难的惨烈，是基于真实事件创作。弗里德里希对于悲剧主题、负面情绪，从不美化粉饰，而是选择直接、激烈，甚至于夸张的表达，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艺术的特征。

弗里德里希在作品中也时常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惯常挖掘的主题。艺术家们把眼光从宗教、历史以及宏大光辉的人类主题中抽离出来，直接关注自然本身。同样的做法在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中也不鲜见，贝多芬很多作品就是关于自然的，譬如在《第六交响曲》（即《田园》，Op.68）中，贝多芬不光通过管弦乐描绘自然风光的绮丽与旖旎，还通过对“电闪雷鸣”场景的刻画展现了自然力量的不可抗拒。在描绘自然这条道路上，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乐派作曲家，如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以及一众英国作曲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J5↑

/

《冰河中的航船失事》（*The Sea of Ice*）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96.7cm×126.9cm布上油画1823—1824年德

国汉堡汉堡美术馆（Kunsthalle Hamburg）

尽管是描绘自然风景，但本质上弗里德里希表达的是个人情感，这是最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做一个跨度更大的横向对比：参考弗里德里希绘画的精神内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在很早的阶段就已饱含深刻的浪漫主义精神了。中国古代画家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画家，因为中国古代大量优秀绘画作品是由文人们创作的。文人的艺术修养大多很全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此外还大多精通诗文写作。绝大多数文人的正经职业是考取功名后出仕为官，艺术创作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主要在于抒怀。且文人偶出佳作，不论诗文或丹青书法，不少都创作于人生失意阶段，或名落孙山，或贬谪左迁，心中积郁，便寄情山水。当艺术创作的目的是遣怀抒情，那么技术进步、写实精确便不是第一要务，而是作品中须有诗意，甚至是“失意”。

中国最优秀的山水画作大多不以写实闻名，无论是黄公望枯笔淡墨《富春山居图》（J6）抑或王希孟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J7），都看不到画家创作时想尽力写实的影子，志趣和气度却跃然纸上。



J6↑

/

《富春山居图》（局部）黄公望枯笔淡墨1350年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J7↑

/

《千里江山图》（局部）王希孟青绿山水1114年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的浪漫主义体现在景色中，那么龙格的浪漫主义则展现在人物里。龙格并不多产，且33岁就英年早逝，要看龙格的真迹并非易事。弗里德里希热衷描绘黑暗、阴郁的风景，而龙格笔下的人物则神态诡异，大有“恐怖片海报”之感，就连龙格描绘的孩童形象，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可爱，而是透着诡谲之气，让人猜不透这些孩子在想什么。加之龙格笔下孩童，长相大致相似（J8），这更让人深感不安。

龙格的浪漫主义精神并非直接体现在人物的具体形象上，而是埋藏于他对色彩的认知中。龙格的色彩认知表现出显著的象征意义，他认为绘画的三原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带有强烈象征指代含义，例如他认为红色代表耶稣，也象征破晓和黄昏，蓝色代表上帝及夜晚，而黄色则代表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基本神学观，由此看来龙格是信奉宗教的。



J8↑

/

《胡森贝克家的孩子们》（*Die Hülsenbeckschen Kinder*）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131cm×141cm布上油画1806年德国汉堡汉堡美术馆（Kunsthalle Hamburg）

这种象征意义实则凸显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与启蒙运动所主张的科学理性相对。理性与科学讲究凡事有根据、重推理，与之相对的是讲直觉以及无显著逻辑联系的跳跃式思维方式。龙格把三原色与宗教意义联系到一起——基督用“红色”的鲜血洗净人世罪恶，圣灵来自上帝的智慧闪耀着“金黄色”的灿烂光辉，上帝从“蓝色”的天上降世（J9），等等。这些全是感官的、经验性的联想，没有理性依据，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表达。这好比“通感”或“联觉”，从某一感官获得的感受引发另一感官的反应，譬如莫扎特的音乐给人水的印象，贝多芬的音乐则带给人火的感受。水与火的感受来自视觉与触觉，然而音乐却是通过听觉感受的，这种通过听觉刺激调动视觉与触觉反应就是一种“联觉”。联觉是人作为主观观察者所特有的，从浪漫主义更关注个人感受这点来看，龙格艺术中的象征意味可谓极

具代表性。

至此，德国浪漫主义绘画带给人的感受大致是深沉甚至略显阴暗的。但很明显，浪漫主义绝不仅仅是阴暗深沉，浪漫主义应有大量激情澎湃、感受热烈的表达方式。若要追求慷慨激昂式的浪漫主义绘画，就必须去法国。



J9↑

/

《清晨》（*Der Morgen*）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
109cm × 85.5cm 布上油画 1808年 德国汉堡汉堡美术馆（Kunsthalle Hamburg）



J10↑

/

《梅杜萨之筏》（*Le Radeau de la Méduse*）泰奥多尔·籍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491cm×716cm布上油画1818—1819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集大成者是德拉克洛瓦，被誉为“浪漫主义的雄狮”，他的老师盖兰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的学生。德拉克洛瓦一路接受严格的学院派训练，但他厌倦学院派过分理性、保守的风格。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画风并非来源于继承。

激发德拉克洛瓦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的是一幅画——法国画家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J10）。

籍里柯英年早逝，并未留下太多作品，但《梅杜萨之筏》却颠覆了统治法国100多年的学院派审美，是开法国浪漫主义绘画之先河的重要画作。

传统学院画以唯美、典雅为尊，《梅杜萨之筏》的画面却凌乱异常，且色调昏暗，充满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总体布局隐隐透着鲁本斯式的对角线构图。《梅杜萨之筏》展现出来的诸多艺术特点，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大多特征。

《梅杜萨之筏》的题材并非神话故事或历史典故，而是发生在与画家同时期的真实悲惨故事，在当时是闻名欧洲的大事件：一位对航海一窍不通的贵族带人盲目出海并遭遇海难，未能逃生的乘客被弃于残破的木筏上，在茫茫大海上听凭命运摆布。这期间，木筏上发生了人吃人事件，获救者寥寥无几。由于发生了人相食的丑闻，政府极力掩盖。籍里柯在创作过程中

为了还原当时木筏上的场景，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并用黄疸病人做模特，模拟在极度饥饿与绝望情形下所生出的氛围，由此才创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大作。

德拉克洛瓦在这件作品影响下，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式。德拉克洛瓦的创作是典型“色先于形”的，他认为线条是人造概念，并非存在于现实当中。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有《希俄斯的屠杀》（J11a）、《自由领导人民》（J11b）以及《撒丹纳巴勒斯之死》（J11c）。其中《希俄斯的屠杀》不论从画面或题材内容上，都明显深受《梅杜萨之筏》影响，笔触粗重狂放，色彩黑暗凝重。



J11a↑

/

《希俄斯的屠杀》（*The Massacre of Chios*）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419cm×354cm布上油画1824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J11b↑

/

《自由领导人民》（*The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欧仁·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260cm×325cm布上油画1830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
物馆（Musée du Louvre）



J11c↑

/

《撒丹纳巴勒斯之死》（*Death of Sardapalus*）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392cm×496cm布上油画1827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在内容选择上，德拉克洛瓦也体现出浪漫主义精神。德拉克洛瓦热衷描绘激烈甚至血腥的场面，他最著名的作品便是《自由领导人民》，是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所作。七月革命是法国人民为推翻波旁王朝复辟而发动的民主革命，过程异常激烈，并最终取得胜利。德拉克洛瓦疑似把自己的形象也画了进去，他戴着帽子端着枪，站在自由女神右手边。德拉克洛瓦以这幅画来呼应法国文豪雨果的著作《悲惨世界》，该画作曾被法国政府印在法郎纸币上。

德拉克洛瓦擅长描绘充满戏剧反差的画面，从视觉上给人造成强烈的不安感，《撒丹纳巴勒斯之死》是其中代表。该画作讲述了一则神话故事——撒丹纳巴勒斯是亚述最后一任国王，眼看城池将破，便下令处死所有侍妾，焚烧宫殿和财宝，以防被敌人侵占。然而撒丹纳巴勒斯自己却神态自

若地躺在床上，似是享受最后的醉生梦死，周围的年轻女子不断挣扎，国王表情却麻木不仁。画中不同人物的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被动荡、混乱和不安所充斥，交织出异常奇诡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德拉克洛瓦的肖像作品，德拉克洛瓦似乎是沿着伦勃朗的路子，用笔触刻画人物内心，且做得更为深入。

在德拉克洛瓦的肖像画中，最抓人的必定是画中人物传神的内心世界，你几乎不会去关注任何画面细节。德拉克洛瓦最著名的一幅肖像画主人公是“钢琴诗人”肖邦，这幅画作原本描绘的是肖邦与他的情人——作家乔治·桑同坐，肖邦弹奏钢琴，乔治·桑在肖邦身旁，手里拿着香烟，似是凝望。这幅画作并未完成，后被一分为二出售，似也预示肖邦最终与乔治·桑分手。若熟悉肖邦，就知道肖邦的作品透着浓浓的忧郁气质以及对故土波兰的思念。在德拉克洛瓦的《肖邦像》（J12）中便能看出这种忧郁以及丧乱的气息。

法国浪漫主义的热烈奔放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沉静深邃相对。法国的浪漫主义充满幻想、画面明艳，像是沿着提香、鲁本斯的路子传承下来的。而德国浪漫主义绘画则更接近伦勃朗的精神内涵。从地理位置和宗教上，德国与荷兰确实更近，法国则近佛兰德斯。虽并无严格传承，只是拥有相似的文化环境，便创作出了气质相近的艺术作品。



J12↑

/

《肖邦像》（*Portrait of Frédéric Chopin*）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45.5cm×38cm布上油画1838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三）色彩与线条

浪漫主义艺术，不论绘画、雕塑抑或音乐，都牢牢统治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初期，与之形成二元对立的，是法国学院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艺术风格，不如说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整个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变。这种激变，以最显著的方式体现在新一批的建筑风格上。新古典主义建筑是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在欧美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色简单概括起来是“帕提依神庙加上万神庙”，有三样标志性特征：立柱、额枋以及大穹顶。

立柱好理解，不论什么样式的立柱，都离不开古希腊和古罗马时就确立的三种风格；额枋是整排立柱上方的三角形区域，可理解为西方建筑中的“门楣”，通常刻有浮雕装饰；穹顶则是万神庙式混凝土浇筑球形穹顶或圣彼得大教堂式的肋拱穹顶。

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有法国巴黎的先贤祠（J13a），以及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J13b），二者的立柱与额枋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典范。位于美国波士顿边上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J13c），其标志性建筑虽无额枋，但有立柱与万神庙式穹顶。

除去建筑物，像“凯旋门”这种古罗马纪念碑式建筑也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得到复兴。1806年由拿破仑下令建造，为纪念1805年打败俄国和奥地利联军的巴黎大凯旋门，在外观上与古罗马时期的凯旋门几乎无异。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是古典建筑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到了20世纪，古典范式的建筑全面被现代建筑，抑或包豪斯建筑，全面代替。

新古典主义建筑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王权统治，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这一时期的法国人，尤其巴黎人普遍认为巴黎代表西方主流新秩序、新趋势，代表自由、平等、民主，巴黎人更称自己为“新雅典公民”。既然是新雅典公民，自然要追求属于雅典的、古希腊的古典建筑特色，于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就此流行起来。



J13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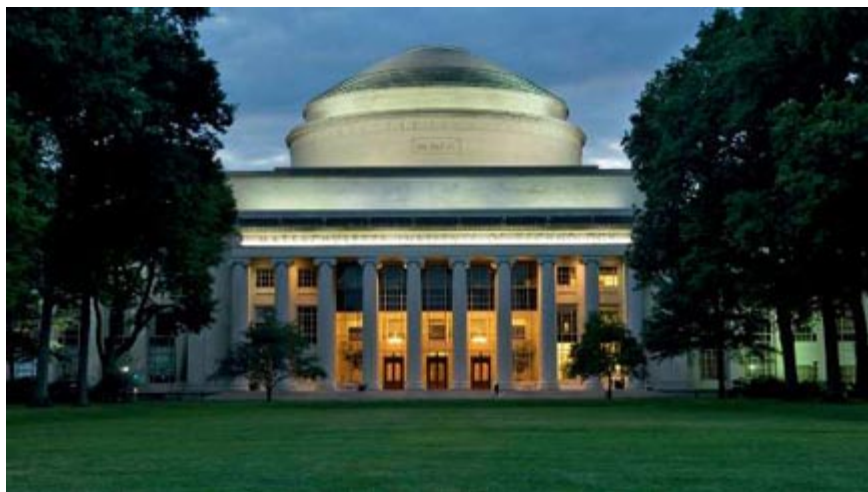
先贤祠 (Panthéon) 法国巴黎



J13b↑

/

国会大厦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国华盛顿



J13c↑

/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美国剑桥市

新古典主义绘画艺术的奠基人是著名的雅克—路易·大卫。既然旧王权已被推翻，象征旧社会的、腐朽的、享乐主义的、代表贵族阶级生活的洛可可风格绘画自然被打入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社会新秩序的艺术风格。这种情形下，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自然要担当重任，大卫正是扛起这面大旗的领导者。大卫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后获“罗马大奖”赴意大利深造，他在技法上秉承普桑、勒布朗一脉的学院绘画技法，审美上则贯彻自拉斐尔以来就一脉相承的，追求理想和完美的绘画理念。

大卫一生经历了法国多个历史时期。大卫先是在1784年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彼时的法国，路易十六依然在位，大卫是为王室服务的画家。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大卫又创作了《布鲁特斯》（J14），这幅作品的精神寓意暗合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很受公众欢迎。而大卫最出名的画作是1793年创作的《马拉之死》（J15），这预示着他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政的雅各宾派的支持。再之后雅各宾派被推翻，大卫因曾服务雅各宾派被捕入狱。直到拿破仑掌权，大卫又成为拿破仑的首席画师，拿破仑一系列最出名的画像几乎都出自大卫之手（J16a/J16b）。



J14↑

/

《布鲁特斯》（*The Lictors Report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323cm×422cm布上油画1789年
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J15↑

/

《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65cm×128cm布上油画1793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馆
（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

大卫一生都热衷于古典主义，尤其醉心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卫众多知名作品都是古代历史题材，例如《布鲁斯特》描绘的就是罗马共和国执政

者发现自己儿子阴谋叛变，在亲情和国法之间选择了大义灭亲。另一幅名作《荷拉斯兄弟之誓》（J17），也取材于罗马历史故事。



J16a↑

/

《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Napoléon Crossing the Alps at the St Berrod Pass, 20th May 1800*）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260cm×221cm布上油画1800—1801年法国吕埃尔—马尔迈松马尔迈松堡（*Château de Malmaison*）



J16b↑

/

《拿破仑·波拿巴在杜伊勒里宫办公室》（*Napoléon Bonaparte in His Study at the Tuileries*）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205cm × 128cm 布上油画 1812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Horatii*）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330cm×425cm布上油画1784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大卫的画风完整地诠释了新古典主义的“新”与“古典”。“新”体现在对色彩的使用上，大卫所处的年代颜料工艺发达，可用色彩已然很丰富，不像拉斐尔时期，一般难以获得。“古典”则体现在大卫精细的绘画技法，以及对绘画题材的选取上。大卫的画作笔触细腻，色彩均衡，画面具有较高对比度，有刀片剪裁而成的锋利感，极具锐度，让人眼前一亮，这无疑是古典画法所推崇的。作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大卫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们都成为至少在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艺术家。大卫众多学生中，最优秀且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是象征新古典主义绘画顶峰，甚至整个古典主义绘画顶峰的安格尔了。从创新意义上来看，安格尔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大卫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继承人。很明显，安格尔为看似陈旧的古典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若不是安格尔，新古典主义美术在艺术史中未必如此重要。安格尔曾多次赴罗马学习，深入研究古典大师的作品，他尤其推崇拉斐尔。安格尔还担任过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至此不难发现，所有“形先于色”“广义的古典主义”这条艺术逻辑线的根源就是拉斐尔。

“形先于色”的绘画方式在安格尔的作品中达到顶峰。安格尔追求的是简洁与优美，他使用许多贯穿画面的大线条。安格尔最乐于创作的主题与老师大卫不同，不像大卫喜欢画古典题材，安格尔钟爱描绘女性身体，有《大宫女》（J18a）、《瓦平松浴女》（J18b）等名作。

这些画作中，最抓人视线的是女性身体形象的大轮廓线。简练的线条却又是粗中有细，人物皮肤的细节及光影变化处理得精准异常，具备大理石雕塑般的润滑感。



J18a↑

/

《大宫女》（*The Grande Odalisque*）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91cm×162cm布上油画1814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J18b↑

/

《瓦平松浴女》（*Valpinçon Bather*）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46cm×97.5cm布上油画1808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对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刻画，安格尔最优秀的一件作品是世界名画《泉》（J19）。这幅画作前后创作了36年，是安格尔最为得意的作品。在《泉》中，安格尔集中展现了他对线条的理解，全然摆脱了肉欲的、纯粹的形体美感。

哪怕在人物形象众多的情况下，安格尔对线条的把控和安排也是“临危不乱”，井井有条，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土耳其浴室》（J20）。画面并无过分多变的色彩，以便观众尽情地被画中女性的身体线条所吸引。安格尔通过安排不同人物的远近，有侧重地描绘各个人物形象，让画面显得错落有致，有条不紊。画面中的蓝色衣物以及枕头形象最为跳脱，把重点人物形象与次要人物形象区分开来。画中虽人物众多，但布局合理，在画面节奏

感与线条感上已臻化境，这是安格尔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线条的成果。



J19↑

/

《泉》（*The Source*）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63cm×80cm布上油画1856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用色方面，安格尔的色彩是单纯且直接的，这又与其老师大卫不同。大卫的色彩过于艳丽丰富，而安格尔在绘画中对色彩的选择有显著倾向性，每幅画作都有主色调。这也是安格尔为突出优美线条所做的必然选择。若要突出线条，便不能使用过于斑斓的色彩分散观众注意力，在色彩分布相对单纯一致的背景上所勾勒出来的线条，明显比在五彩斑斓背景上所勾勒出的线条更引人注目。这也是安格尔的作品要比大卫的更抓人眼球的原因。



J20↑

/

《土耳其浴室》（*The Turkish Bath*）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08cm×108cm布上油画1863年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安格尔推崇拉斐尔“想象中的完美”，也在追求完美线条的道路上贯彻这一点。落笔前，完美线条就已在脑海中成形，最终呈现在画布上的是胸有成竹的唯美线条，给人以和谐、完满、平衡之感。

安格尔对线条的极致追求，与德拉克洛瓦用色彩表现激烈情绪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二元对立。很明显，安格尔是“形先于色”的极致，德拉克洛瓦贯彻

的则是“色先于形”的主张；安格尔追求的是平衡、和谐、从容，德拉克洛瓦追求的则是动感、对比、冲突。

安格尔代表的不光是新古典主义以及法国学院派，而且是从达·芬奇和拉斐尔开始的“广义的古典主义”以及“形先于色”学院绘画的最高峰。这条艺术逻辑自达·芬奇、拉斐尔始，至安格尔终，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和创造力。安格尔是集大成者，他为古典学院绘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至此，在古典主义这条道路上再无人能超越安格尔，或者说，在学院古典画法道路上，已不存在超越安格尔的可能性了。拉斐尔心目中的“想象中的完美”，安格尔已然做到。

到19世纪下半叶，能与安格尔为代表的学院绘画相对抗的，便不只是德拉克洛瓦们的浪漫主义绘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兴画派以及艺术风格陆续诞生，如以库尔贝为首的写实主义，以莫奈、雷诺阿等人代表的印象主义，等等。进入这一时期后，以安格尔为代表的学院派成了艺术大论战中的众矢之的，原因很简单，安格尔们占据了官方对至高艺术的认知，艺术要发展，他们自然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普遍认为，相比后来的先锋画家，安格尔所代表的学院绘画是陈旧的，安格尔则更是旧世界艺术的象征。这样的看法是偏颇的。艺术确有发展、进化的过程，但不能站在历史结果上，因看到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后来居上，看似拥有更高艺术价值，便把安格尔代表的学院绘画看作因循守旧，从而降低对安格尔的评价。作为优秀艺术家，重要的是对自身艺术理念的坚持。一个艺术家价值是否高，在于他能否在自己坚信的艺术理念中，把该理念表现到极致，做到完美自洽。很明显，安格尔追求优美线条，他相信的一直是拉斐尔的完美主义，他对绘画的认知一贯是“形先于色”，安格尔便沿着这条路把线条发挥至前无古人的高度，这足以奠定其伟大艺术家的地位。

相比之下，后人在理念上也许更大胆甚至更先进，但只要没能把自身艺术理念发挥到极致，依然不会有太高价值。譬如在印象主义画家中颇有名气的毕沙罗和西斯莱，这二人画功不弱，但他们的绘画风格一直在跟随大趋势改变，甚至粗糙地说，当你看到一幅作品，像是莫奈的，但又不如莫奈优秀，那大约就是毕沙罗或西斯莱的作品。因此，在这个标准下毕沙罗和西斯莱并不比安格尔重要和伟大。对艺术家的认知和评判，应跳出结果论，站在艺术家的角度看待艺术理念之间的斗争，只要艺术家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到极致，那便是了不起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之间没有输赢胜负，他们都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四）西班牙与不列颠

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具有区域性不同，浪漫主义时期，文化艺术在欧洲各地都普遍得到发展，就连在艺术上相对落后的西班牙和英国，在浪漫主义时期也颇有建树。

西班牙是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在西班牙从未出现过如德、法、意一般成群结队的艺术大师，但西班牙偶尔出一位大师，都是冠绝天下。如文艺复兴晚期的格列柯，巴洛克时期的委拉斯开兹，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戈雅。更不消说，建筑大师高迪——科尔内、艺术巨匠毕加索、超现实主义的达利以及米罗。西班牙的艺术，似是透着一股“妖气”。

戈雅生活在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是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宫廷画师，被归类为浪漫主义画家。戈雅善于描绘“丑恶”的主题与形象，与古典主义画家想表达的完美截然不同。例如戈雅的代表作《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J21），记录了法国军队残暴镇压西班牙人民起义。这件作品没有运用任何古典技法，构图凌乱、笔触恣意、色彩浓烈，将枪杀现场的惨烈暴露无遗，情感冲突极为强烈。之后马奈向这幅作品致敬，也创作过类似的作品（J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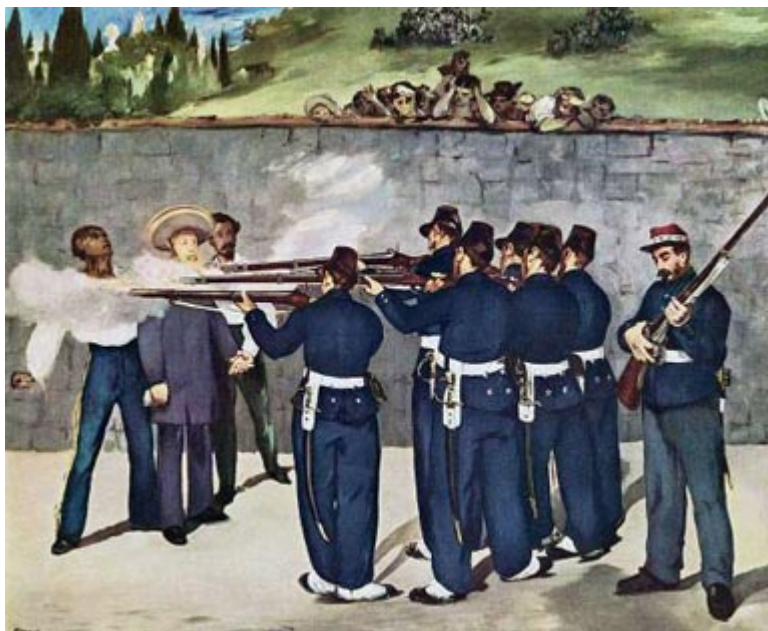
戈雅的绘画展现了对欧洲绘画所一贯追求的“美”的艺术观的颠覆，艺术家不再只是美化自然，艺术家也可以表现丑陋、凶恶等社会中所必然包含的阴暗面。戈雅的《吞噬其子的农神》（J23），题材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第二代天神克洛诺斯（罗马神名为萨图尔努斯），因为自己是通过反叛其父获得天神之位，便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也会反叛自己，所以每生出一子就把他吃掉。原本的故事中，克洛诺斯只是把孩子吞进了肚子里，并非像戈雅画作中那样，茹毛饮血地咬断孩子的脖子。戈雅在画作中展现出血腥与暴力，天神的形象也极端原始及残暴，丝毫没有人们传统印象中该有的高贵与优雅。



J21↑

/

《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The Third of May 1808 (Execution of the Defenders of Madrid)*] 弗朗西斯科·戈雅 (Francisco Goya)
266cm × 345cm 布上油画 1814年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J22↑

/

《枪决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The 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
爱德华·马奈 (Édouard Manet) 252cm × 305cm 布上油画 1868—1869年
德国曼海姆曼海姆美术馆 (Kunsthalle Mannheim)



J23↑

/

《吞噬其子的农神》（*Saturn Devouring His Son*）弗朗西斯科·戈雅
（Francisco Goya）146cm×83cm布上油画1819—1823年西班牙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J24↑

/

《费迪南七世》（*Portrait of Ferdinand VII*）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212cm × 146cm 布上油画 1814年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J25↑

/

《巨人》（*The Colossus*）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
116cm×105cm布上油画1808—1812年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戈雅与委拉斯开兹一样，也为西班牙王室创作了众多肖像作品。奇怪的是，与传统宫廷画师对王室成员的美化不同，戈雅的画作中甚至能看到对王室成员的“丑化”。例如费迪南七世的肖像画（J24），戈雅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基因特征，前文提到的“鞋拔子脸”丝毫不加以掩饰，甚至描绘得更为夸张。可见戈雅在作品中追求的是表现力和艺术张力，他要抓住场景中的主要情绪并加以放大，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

戈雅的版画也充满浪漫主义情怀。他在版画中从未诠释过任何一种已知题材，而是充满神奇的想象。在戈雅之前的任何版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丢勒也好，巴洛克时期的伦勃朗也罢，他们所表现的形象大多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参照的，而戈雅则会虚构一些充满恐怖色彩的形象，例如幽灵、怪诞的噩梦等等。戈雅的代表作《巨人》（J25）中的形象就是充满想象力的虚构人物，这种想象力在戈雅之前也许只有文学家才拥有。

英国人在绘画领域一向并不擅长，相比之下，他们在文学方面倒一直占有统治地位。英国绘画的历史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荷尔拜因算起。因着宗教改革，德国以及后来的瑞士都无法容下画宗教画的小荷尔拜因，在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推荐下，身为德国人的小荷尔拜因远赴英国为王室服务，因此小荷尔拜因在英国留下一大批传世画作。

小荷尔拜因之后，英国绘画水平最高的依然是一个外国人——鲁本斯最得意的弟子凡·戴克爵士。

凡·戴克通过美化英国王室成员，一手塑造了深入人心的英国王室高贵冷峻的形象。之后150多年里，英国绘画大体是在凡·戴克所奠定的范式中之发展。例如所谓的“凡·戴克姿势”，是最经典的男性肖像造型，后世英国画家纷纷效仿，觉得这简直是男性肖像最完美的形体摆放。凡·戴克还留有所谓的“凡·戴克胡子”，这种胡须造型流行多年，直到现在，欧美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男士把胡子修剪成这般（J26）。

再后来，英国也建立了皇家美术学院，建院院长叫雷诺兹，是当时英国最优秀的画家之一。不难发现，各国参与建立皇家美术学院的重要艺术家，几乎一定去意大利留过学。普桑、勒布朗如此，法国大革命之后，重建法国皇家学院的大卫、安格尔也如此。雷诺兹当然也是从意大利留学归来，极擅宏大风格的历史画。雷诺兹与英国王室关系很好，为王室创作了许多肖像。同时期还有一位重要画家叫作庚斯勃罗，也为王室画了不少肖像，在绘画风格上与雷诺兹的宏大风格形成对立，庚斯勃罗更注重描绘内秀婉约的人物气质。两人都偏爱风景画，但无奈来自王室与贵族的肖像订单太多，他们一生都被肖像画创作所累。

值得一提的是，庚斯勃罗发明了一种新型题材，即儿童画。庚斯勃罗育有二女，从幼儿时他就为两个女儿画像，并非正经八百的肖像，而是生活场景或闺房雅趣，大有当今社会家长乐于给孩子拍生活照的意味。他从两个女儿幼儿时一直画到成年，记录了女儿们的成长过程。画小孩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为古代医疗条件差，也无防病疫苗，幼儿身体脆弱，很多活不到成年便夭折。童年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令人担心的，是充满厄运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孩子赶紧长大，这与当今社会普遍认为童年是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全然不同。（J27）

直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才出现了“并世双雄”。两人都隶属皇家美术学院，分别是康斯特布尔和透纳。这二人虽然都是标准的学院派出身，但他们在绘画风格上的创新却为英国的学院绘画注入了盎然生机。



J26↑

/

《迪格比爵士肖像》(*Sir Kenelm Digby*) 安东尼·凡·戴克 (Anthony van Dyck) 117.2cm × 91.7cm 布上油画1640年藏地不详



J27↑

/

《有猫的艺术家的女儿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s Daughter with a Cat*）
托马斯·庚斯勃罗（Thomas Gainsborough）76cm×63cm布上油画1759年
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康斯特布尔虽是学院出身，但他非常反对套路化的学院创作。康斯特布尔擅画风景，认为风景画应该描绘真实的自然。这种对真实风景的追求，与后来的印象主义绘画不谋而合，都是主张走到自然中创作，将看到的风景如实展现出来。这可以与“风景画之父”洛兰的绘画理念作对比：前文说到，洛兰的绘画有“美丽的风景”的标准范式，人们甚至用洛兰所画的风景来制定真实世界中美景的标准。洛兰对风景的“优美”概念实际与拉斐尔对人物的“完美”概念类似，都是理想化的“模型”，并不实际存在。

康斯特布尔在风景画中尝试创新，打破了许多传统风景画的固有规则。康斯特布尔的代表作《从主教花园望见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J28）基本破坏了此前风景画中的所有“规矩”。康斯特布尔之前的风景画审美认为应用暖色作前景色，但《从主教花园望见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前景却是绿色，天空也违背了传统风景画的惯用技巧，布满乌云。康斯特布尔并未机械地“创造”优美风景，而是忠实地将真实风景描绘出来。



J28↑

/

《从主教花园望见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View of Salisbury Cathedral*）

from the Bishop's Grounds) 约翰·康斯特布尔 (John Constable)
88cm × 112cm 布上油画 1823年 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透纳在风景画领域的挖掘和创新甚至比康斯特布尔走得更远。透纳被誉为“英国绘画史上最具天才的人物”，同时也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当选时仅27岁。但透纳在进行绘画创作时并未受到学院传统的束缚，他不看重线条，在透纳的代表作中，甚至找不到明确线条。透纳看重的是光影和色彩，他有大量描绘海景的作品，画面观感极为缥缈（J29a/J29b/J29c）。从早期到晚期的海景作品，线条的存在感越来越弱。

透纳充分挖掘了海景和烟雾这两类前人极少涉及的题材。之前的古典绘画题材，多为界限分明、明确的人物或事物，而海景和烟雾都缺乏明确的线条，难以捉摸，更难以描绘。既然没有线条，自然会着重光影和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景和烟雾的物理属性天然就是“浪漫主义”的。在透纳的代表作《暴风雪中的汽船》（J30）中，风雨冲击下，船的线条都被刻意地进行了模糊化处理，这是透纳为了让人在主观上充分感受惊涛骇浪所做的夸张。不妨想象一下，若真是置身于狂风骤雨的海面上，又如何能看清对方船只呢？对船只线条的模糊化处理，能够给观者身临其境之感。把你带到画中去，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追求。此处甚至可理解为，狂风暴雨猛烈得把船体都撕扯得模糊不堪了。



J29a↑

/

《游艇入港》（*Yacht Approaching the Coast*）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02cm × 142cm 布上油画 1835年 英国
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 (Tate Modern)



J29b↑

/

《岬角之间的日出》（*Sunrise, with a Boat between Headlands*）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91.5×122cm布上油画
1840年英国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Tate Modern）



J29c↑

/

《有海怪的日出》（*Sunrise with Sea Monsters*）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91.4 cm×121.9 cm布上油画1845年
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

透纳的作品充满创造力，且融入了极端细致的观察。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雨、蒸汽和速度》（J31），这幅作品描绘了火车开过一座大桥的瞬间。为了表达“速度”这一抽象概念，火车周围的景色大多做了模糊处理，让人

在视觉上充分体会到速度感。根据人眼的观察习惯，速度很快的东西，往往只能看得到“残影”。因此透纳把除蒸汽机车以外的车厢都模糊化了，这代表着人眼的聚焦，与印象主义的做法几乎一致，所以透纳往往被认为是印象主义的先驱者。



J30↑

/

《暴风雪中的汽船》（ Snow Storm: Steam—Boat off a Harbour's Mouth ）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
91cm×122cm布上油画1842年英国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 Tate Modern ）



J31↑

/

《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90.8cm×121.9cm布上油画1844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浪漫主义是贯穿欧洲19世纪的主流艺术思想，总体上远离理性、远离知识和经验，要让艺术充满想象，精神上更关注个人。尽管后来产生了多种各异的艺术风格——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乃至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众多流派，但它们多是由浪漫主义精神出发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宽广的艺术理念，它集中代表了主流艺术创作发展的大方向，而非限制在某个特定框架内的具体风格。

11 勃拉姆斯与瓦格纳：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

（一）歌曲与歌剧

用二元对立法看艺术，固然能快速抓住重点，但世事无绝对，尤其在文化艺术领域。规律大多为后人总结，艺术家创作时并不管后人如何评说，只是遵循自己的艺术理念而已。

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似乎意大利人更为见长。但歌唱终究是人类天性，德奥地区怎可能没有声乐？在声乐领域，德奥地区所擅长的“艺术歌曲”，在作曲方式及演唱方法上也与意大利歌剧形成了二元对立。德奥系的大作曲家都写过艺术歌曲。把艺术歌曲创作推至顶峰的作曲家，是被称为“歌曲之王”的舒伯特。在短暂的一生中，舒伯特创作了超过600首艺术歌曲。虽然没有像贝多芬一样对音乐史的进程做了巨大推动，但就作品的艺术水准来说，舒伯特是全然不输贝多芬的，甚至在某些体裁的作品如弦乐四重奏中，舒伯特的音乐在拥有贝多芬般深邃的同时，也兼具了乐曲的动听优美，而贝多芬的这类作品似是只在乎表达，并不太在意乐曲对普通人而言是否悦耳动听。

艺术歌曲与歌剧咏叹调对创作的认知凸显了“群体”与“个体”的对立。意大利的咏叹调，人声担任主角，乐队全程伴奏。大部分情况下，艺术歌曲是人声加上钢琴的编制，而艺术歌曲在贝多芬、舒伯特，甚至之后的舒曼、勃拉姆斯手上，均以钢琴作为“合奏”，而非“伴奏”。德奥音乐是群体性的，虽然艺术歌曲中的唱词让听众更关注人声，但同时也能明显感到钢琴旋律性的穿插对人声的呼应。

艺术歌曲与意大利歌剧在创作观念上的差异，也体现在另一种音乐体裁中。人们常谈论某些著名作曲家的“小提琴奏鸣曲”，如贝多芬有十部小提琴奏鸣曲，勃拉姆斯有三部小提琴奏鸣曲，等等。实际上，此翻译不够准确，是一种省略。原文Sonata für Violin und Klavier直译应为“为小提琴与钢琴所作的奏鸣曲”。作曲家在创作这些奏鸣曲时，在概念上，并非为小提琴写一部作品。对德奥作曲家来说，钢琴自然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和声乐器，把它和小提琴配在一起，就能兼具旋律与和声，岂不妙哉？于是，在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中，可以听到极其复杂的钢琴演奏，钢琴部分的演奏难度绝不亚于小提琴部分的，二者交融极多。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Op.47，[\[1\]](#)）是其中典范。平心而论，《克鲁采

鸣曲》钢琴部分的技巧难度还要比小提琴的大一些。钢琴若只是单纯作为伴奏的话，实际可以写得很简单，甚至用通奏低音就能解决。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小提琴奏鸣曲中的钢琴伴奏正是这种简单写法，只是单纯的“小提琴奏鸣曲”。

艺术歌曲的创作思路和钢琴小提琴奏鸣曲的类似，是声乐与钢琴双方都要被悉心照料的音乐形式。相比小提琴与钢琴在奏鸣曲中的关系，艺术歌曲里声乐要更占主导，因为歌词的存在感是无法被掩盖的，但相对于意大利歌剧这种纯粹属于歌唱家个体的艺术，艺术歌曲更讲究人声与钢琴的配合。

在艺术表现上，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善于直接抒情，更接近当代流行歌，魅力主要在于从头到尾的优美歌声，能直接带给人美的享受。艺术歌曲的艺术性则全然不同，虽然形式简单，只有人声与钢琴（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大量人声与乐队的艺术歌曲被创作出来，例如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众多艺术歌曲），但其中包含的内容要比意大利咏叹调的更为复杂，听众能在一首艺术歌曲里听到故事剧情，甚至多个角色，多种情绪表达。舒伯特的名曲《魔王》（[\[2\]](#)）是其中典范。《魔王》是舒伯特根据歌德同名诗创作的，歌词用的是歌德诗中的原句。故事说的是一位父亲带着孩子在黑夜中策马奔驰，孩子病了，在病中看到了魔王，他将这件事告诉父亲，但看不到魔王的父亲并不相信，只是一路安慰孩子，这时魔王却不断地引诱孩子，最终两人回到家时，孩子断了气。这首歌一共4分钟左右，一位男高音歌唱家要诠释四个角色，四种声音，三种情绪变化，钢琴还要在其中不断配合，这是多么精巧的艺术！

乐曲开头，钢琴激烈奏出三连音，此时父亲正抱着孩子骑马奔驰，三连音代表马蹄声。随后钢琴用低音奏出魔王动机：悄悄地，魔王脚步在靠近。最先出现的声音是旁白，声音是坚实有力且周正的。第二个出现的是父亲的声音，他的声音更低沉，显示出父亲的威严。父亲以安慰的口吻，轻声问孩子为什么要藏起脸。孩子的声音很虚弱，他问：“我的父亲，你没有看到魔王吗？”父亲继续说：“我儿，那是一团烟雾。”这时魔王的声音出现了，开始引诱孩子，钢琴同时也从开始的紧张疾驰变得缓和，甚至有些欢乐的音乐。魔王说：“来，跟我去，可爱的孩子，我要和你一同做有趣的游戏。”孩子被吓到了，继续问父亲：“我的父亲！你没有听见魔王对我许下的诺言吗？”父亲让孩子安静，说那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魔王继续引诱，而且花样更多了，钢琴变成翩翩起舞一般地愉悦，魔王继续说：“伶俐的孩子，你可想与我同行？我的女儿们会伺候你十分殷勤，跳着、唱着、摇着，使你熟睡。”孩子再次受到惊吓，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我的父亲！你瞧见没，魔王的女儿们站在阴暗的地方？”父亲继续说：“我儿，那是几颗灰色的老杨树。”魔王失去了耐心，从引诱变成了恫

吓：“你要是不肯，我就要动用武力！”孩子最后呼唤父亲：“魔王来抓我了！”孩子的声音达到了全曲最高亢的地方，由此表现出极度惊吓。最后是旁白出现：“父亲策马奔驰，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已断气。”

相比意大利歌剧，欣赏这样一首艺术歌曲难度更大，意大利歌剧只要跟着情绪变化，把注意力放在歌唱家身上就能获得美的享受。而《魔王》这样的歌曲，要分辨出四个角色语气、音色的差别。演唱者表演难度也很大，不仅要唱出四种声音，每种角色的性格特色还要通过语气变化来刻画：因为孩子越来越惊恐，孩子的声音从开始的虚弱到逐渐扩大，演唱者要把这种情绪递进地表现出来；父亲的声音是低沉、冷静的；魔王则是先礼后兵——先是引诱，态度很好，带着哄骗的语气，到最后爆发成为“风霜刀剑严相逼”。该曲对钢琴部分要求也很高，需要跟随不同人物情绪的变化快速做出调整，比如从魔王哄骗时的欢愉要迅速转换成孩子看见魔王的惊惧，再继续弹奏代表马车疾驰的三连音。在短短4分钟内要兼顾如此多方面，这便展现出德奥音乐多线程思维的精髓。

演唱歌剧和艺术歌曲的难点是不同的。歌剧演唱有不少难点是在硬技巧上，嗓音条件很重要，不仅要音色美，音域宽，还要音量大。因为歌剧是剧院艺术，古代没有扩音设备，歌手要与乐团抗衡，音量尤为重要。艺术歌曲则更为多变，哪怕音量不够大，对嗓音变化的控制也要精确，抑扬顿挫的相对幅度必须精心设计和把控。总体上有一个规律，以唱艺术歌曲见长的歌唱家和以唱歌剧见长的歌唱家大约是两批不同的歌唱家，能同时把歌剧和艺术歌曲都修炼至顶峰的人并不多。

艺术歌曲的创作方式可参考中国宋词，但其创作过程与宋词恰好相反：宋词有特定的词牌韵律，先有曲，再填词；艺术歌曲则是先有词，作曲家受到诗词感染，为其配曲。此中讲究甚多，音乐的写作也并非完全自由，而要根据唱词发音走向以及唱词含义进行安排。

当然，不能因艺术歌曲在戏剧性和内容上丰富，就觉得歌剧在这方面不足。歌剧毕竟不是单曲，而是一出完整的剧目。歌剧有多至3小时以上的时间来表达方方面面。

舒伯特歌曲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两套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3\]](#)）与《冬之旅》（[\[4\]](#)）。这两套声乐套曲都是舒伯特从著名德国诗人缪勒的同名诗集中选取若干篇目，为之谱写音乐，然后组成一个大集子，是为“套曲”。声乐套曲的精神内涵是庞大的，比如《冬之旅》一共有24首歌，堪称是一部以歌曲写成的戏剧，刻画了诗人完整的内心世界。这组诗的社会背景是拿破仑战争后，德国陷入衰败，百姓生活也变得愈发艰苦，诗文描述的就是主人公走在一望无际的冬季旷野中，触景生情，感慨万分。《冬之旅》表现的宏观的心境变化，是在绝望、悲凉的旅途中，诗人

不断寻找内心平静，最终获得安宁。24首歌曲完美地展现了这种巨大的心理转变过程，为刻画、诠释诗人的心境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除极其擅长创作艺术歌曲外，舒伯特在各类古典主义时期盛行的音乐体裁的创作上都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准。舒伯特写过10部交响曲（《第十交响曲》停留在草稿阶段），其中只有两个乐章的《b小调第八交响曲》（即《未完成》，[\[5\]](#)）和《C大调第九交响曲》（[\[6\]](#)）是最知名的两部。舒伯特还作有22部钢琴奏鸣曲，其中最后3部晚期奏鸣曲可谓是世界钢琴文献中顶峰的作品。另有19部弦乐四重奏，以及许多器乐小品。唯一遗憾的是，舒伯特并无任何成型的大规模协奏曲作品。

舒伯特的音乐从演奏技巧来看相当简洁。以钢琴作品为例，自然不用去跟浪漫主义时期肖邦、李斯特作品的复杂度进行比较，哪怕是和莫扎特、海顿的相比，舒伯特的钢琴作品也不需太多复杂指法便可弹奏。但技术上简洁并不代表音乐上简单，例如舒伯特的音乐当中有许多单音重复，如何处理一系列重复音使其不致无聊，还要展现音乐的歌唱性，这是极困难且需要音乐想象力的。舒伯特的音乐在织体与和声变化上，有许多难以处理的地方。舒伯特写钢琴音乐的思路是歌曲化的，要用钢琴这件敲击乐器演奏出歌唱性，是很大的挑战。而且，从调性变化、情感内涵的快速转变来说，要把握和处理好舒伯特的曲子需要深刻的音乐素养，顶级大师才能演奏好。（[\[7\]](#)/[\[8\]](#)/[\[9\]](#)）

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我们永远能听到一种谦卑。舒伯特的音乐与莫扎特的不同，莫扎特的音乐大多是轻快优雅的，充满自信的灵动；舒伯特的音乐在拥有优雅气质和流畅旋律同时，总能听出淡淡的忧伤，用英文形容的话，最准确的词应该是melancholy。每每听到舒伯特音乐中最感人，堪称神来之笔的地方，笔者总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双膝跪地、双手合十、虔诚祈祷的卑微人物的形象。舒伯特音乐中的谦卑与他的际遇有关，尽管舒伯特的艺术成就在今人看来已登峰造极，但很明显，他在生前并未享有莫扎特、贝多芬在世时一般的盛名，甚至出版自己的作品都很困难，这也是为何舒伯特有大量未完成的作品。

从艺术成就上来看，尤其前文提到过，弦乐四重奏是所有古典音乐形式中格调极高的体裁，舒伯特弦乐四重奏的成就无疑是顶级的。舒伯特最后一部室内乐作品《C大调弦乐五重奏》（D.956，[\[10\]](#)），是由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加上一把额外的大提琴演奏的。这部作品编制庞大，犹如一部交响曲一般，时长达50分钟，单第一乐章就可演奏20分钟以上。这部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深邃以及作曲手法变化之丰富，不输贝多芬晚期任何一部四重奏作品，且在旋律悦耳方面更胜一筹。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之一阿图尔·鲁宾斯坦曾公开表示，要在自己葬礼上请人演奏这部弦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对鲁宾斯坦来说，这代表天堂的声音。

一方面，舒伯特一生都崇拜贝多芬；但另一方面，舒伯特又有一种自卑感，在他内心可能从未想过会成为贝多芬般伟大的艺术家。舒伯特31岁时就因梅毒去世，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留下近千部作品，创造力可见一斑。也许他并未意识到，其艺术实则不在贝多芬之下了。

[1] 《克鲁采奏鸣曲》（*Sonata für Klavier und Violine Nr.9*）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5年奏鸣曲Op.47

[2] 《魔王》（*Der Elkönig*）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15年艺术歌曲D.328Op.1

[3] 《美丽的磨坊女》（*Die Schöne Mullerin*）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3年艺术歌曲D.795Op.25

[4] 《冬之旅》（*Winterreise*）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7年艺术歌曲D.911

[5] 《b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Symphony No.8 in b minor “Unfinished”*）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2年交响曲D.759

[6] 《C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Symphony No.9 in C major “The Great”*）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6年交响曲D.944

[7] K7/《c小调第十九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9 in c minor*）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8年奏鸣曲D.958

[8] K8/《A大调第二十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20 in A major*）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8年奏鸣曲D.959

[9] K9/《降B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21 in B-flat major*）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8年奏鸣曲D.960

[10] 《C大调弦乐五重奏》（*String Quintet in C major*）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828年弦乐五重奏D.956

（二）律师与银行家

通常认为，舒伯特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之间的过渡人物。这样的过渡人物有很多，被誉为“德国莫扎特”的门德尔松也算一个。门德尔松的作品在结构上更简洁、工整，但从音响效果和旋律走向看，他的作品充满浪漫主义气息，且门德尔松的交响曲也开始有了具体指代的意味，他的《第三交响曲》（即《苏格兰》，[\[1\]](#)）、《第四交响曲》（即《意大利》，[\[2\]](#)）及《第五交响曲》（即《宗教改革》，[\[3\]](#)）的音乐语言都很形象化。

德国作曲家卡尔·玛利亚·冯·韦伯也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过渡人物。韦伯是海顿弟弟的学生，也是莫扎特的小舅子——莫扎特的妻子是韦伯的堂姐。韦伯一生创作也算丰富，主要成就在歌剧上，他最著名的歌剧《魔弹射手》（[\[4\]](#)）被认为是第一部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韦伯用了一种叫“主导动机”的创作手法，大大影响了之后瓦格纳的创作。

其实，真要去定义风格、主义，以及谁是“过渡”，是缘木求鱼，因为这个界限根本就不存在：风格、主义是死的，人是活的，哪怕再死板、再没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也有灵光一闪的瞬间，这个瞬间是充满想象的，这种不受任何规则束缚，纯粹依靠艺术灵性诞生的灵感瞬间，就是艺术的价值所在。若过分苛求去定义某位艺术家是什么主义，非要争个明白，那当真是不得要领。

浪漫主义音乐大致覆盖了整个19世纪，与古典主义音乐比起来，规则束缚更少，创作更自由，体裁更多变，题材也更宽泛。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虽从巴洛克时期的过分繁杂变得简练，但这种简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新的作曲规则达到的，它对各类曲式的规定都更为严格、程式化，难免有一些矫枉过正。哪怕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也会大量地把音乐走向建立在一些固定音乐元素之上。

古典主义音乐的整体旋律走向、乐段连接都不太自由，很大程度上依赖作曲规则，不会太“出格”。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作曲规则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声部之间不能交错：音乐进行过程中，在任一时刻，高音声部的音不能比低音声部的音低。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许多规则都被打破，无论在曲式、和声，还是在旋律的想象力上。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创作的自由其实得益于音乐家们在长时间的创作中，将古典主义作曲理论研究得更为透彻，实是“艺高人胆大”。作曲技巧成熟了、提升了，音乐家们才能够放开手脚，找到创作的新天地。正是因为对规则熟悉，才知道如何打破规则。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应当是德国人舒曼。简单分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谱面，不难发现，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谱面，音符密度较小，尤其像莫扎特（X3）和海顿的音乐，都是“四两拨千斤”，哪怕贝多芬的作品，音固然不少，但谱面总体也十分工整（X4）。此时只要看一下舒曼钢琴作品的谱面（X5），浪漫主义音乐的特色不用听大概也能猜出一二：浪漫主义音乐的音符密度要高出不少；另外，升降号更多，这说明在作品中，需要转调和离调的地方更多。这标志着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变化更多，想象空间更大，毕竟已开始从规则中解放。浪漫主义重在表达内心情感，有细腻、复杂、深层次的情感流露。这种情况下，需要的表达工具自然更多。如此，音符更多，音型更复杂，和声类型更多变，和声间的连接也更丰富，便都顺理成章了。



X3↑

/

《F大调第十二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2 in F major*）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K.332第一乐章



X4↑

/

《f小调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Piano Sonata No.23 in f major “Appassionata”)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Op.57第一乐章

在海顿、莫扎特的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一大用途是服务宫廷，追求听感舒适。所以海顿、莫扎特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大调作品，大调作品的听感是明媚、愉悦的。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创作则更关注个人感受

的表达，而音乐家的内心感受常常是忧郁、痛苦、纠结的，需要抒发。如此一来，以舒曼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音乐，小调音乐占比高便不奇怪了。

从旋律上的想象力来看，舒曼的创作相较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显得更自由。哪怕是在一些典范的古典曲式中，如舒曼的钢琴四重奏作品（Op.47，[\[5\]](#)），其旋律也是如歌的。舒曼唯一出版的钢琴协奏曲《a小调钢琴协奏曲》（Op.54，▲注《a小调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45年协奏曲Op.54：▲），在曲式结构上，甚至预示着后来瓦格纳等人所主张的“整体艺术”的倾向。原本舒曼只是想写一部乐队与钢琴的单乐章作品，是一部幻想曲。然而出版商觉得这部作品在曲式上不够严谨，不是标准范式的三乐章“快—慢—快”结构，为此舒曼又补齐了后两个乐章。尽管如此，作品所拥有的整体感还是舒曼所追求的。相比传统的古典协奏曲，舒曼这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只是一首间奏曲，间奏曲通常在歌剧中用作幕间过渡，是短小的、过渡性质的音乐。舒曼这首间奏曲极具动感，并不如传统协奏曲慢乐章那样舒缓，且与第三乐章之间并未作显著分割，而是通过一个强音衔接，直接进入充满律动的第三乐章。

sempre vivacissimo

f

pff
p

lento

il basso parlando

X5↑

/

《升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 in F-sharp minor) 罗伯

特·舒曼（Robert Schumann）Op.11第一乐章

从精神内涵来讲，笔者认为舒曼这部钢琴协奏曲定义了什么是“浪漫”。舒曼深爱着妻子克拉拉，而克拉拉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钢琴演奏家，也是舒曼创作灵感的源泉。这部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开篇，实际是舒曼呼唤克拉拉的名字，在德语中K与C可互换，例如德语的钢琴，拼写为Klavier，也可拼写为Clavier，舒曼钢琴协奏曲开头的音是C、A、A（Do、La、La），代表克拉拉。全曲在第三乐章达到最高潮，似乎舒曼对克拉拉的爱是充满奉献精神的，是“爱但不占有”的感情。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Op.64，[\[6\]](#)）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协奏曲。首先，这部作品的旋律充满想象，几乎奠定了后世对小提琴旋律的认知。其次，三个乐章虽然速度与调性都有明显区别，但乐章与乐章之间无缝衔接，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并无被分为三个乐章的界限感。最后，小提琴独奏与乐队的对话和互动频繁，符合优秀协奏曲的标准，乐队并未作为伴奏一味地配合小提琴。

从以舒曼与门德尔松为代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创作在职能上发生了一定转变：音乐不再为形式而是为表达。一件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不管具体或抽象，应有核心观点，并前后统一。因此，若只因传统规定要分三乐章就机械照乐章、曲式创作，不免流于形式。对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来说，让人从听感上获得音乐享受是核心任务，保持曲式的稳定、得体以及结构的严谨非常重要，因为这类结构被证明于听众是适宜的。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表达、阐述核心思想及情感成了第一要务，不论曲式、结构、技巧，都应表达服务。古典主义追求客观的得体与适度，浪漫主义关心主观的艺术性表达。音乐艺术从客观走向主观的转变，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特点。

除去曲式结构方面的创新，舒曼还有其他重要的贡献，他已开始创作主题鲜明的“小品集”。舒曼创作了许多钢琴小品集（又称钢琴套曲），在一整套作品集中包含许多首乐曲，每首乐曲描绘一个特定主题，如特定场景、人物等等，再把它们集合起来，表达一个大主题。其最著名的钢琴小品集是《童年情景》（Op.15，[\[7\]](#)），根据克拉拉的童年经历创作。除此以外，还有《狂欢节》（Op.9）及《克莱斯勒偶记》（Op.16）等等。从这些小品集不难看出，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更关注对具象事物或思想的表达，逐渐脱离“纯音乐”的古典主义时期的创作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贝多芬也有这样的小品集，比如《六首钢琴小品》（Op.126），是6首钢琴小品的合集，但这些小品之间哪怕相互联系，也都还是抽象的纯音乐，内容并无明确指代。

在舒曼与门德尔松活跃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社会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人们对艺术的欣赏，尤其对音乐的欣赏，已经由古典主义时期的以宫廷贵族为核心转变为以公众为主。宫廷中的赏乐场景，不少是为宴会娱乐配乐伴奏，并非正经八百的音乐会，故纯音乐作背景显然更适用。但面向公众后，有主题、有实质内容的形式更受欢迎，听众需求的转变也推动了音乐内容的具体化。

从门德尔松与舒曼的家庭背景来看，二人皆非音乐世家出身。门德尔松是标准的“富二代”，父亲是银行家，衣食无忧，纯粹是因为对音乐的兴趣才从事作曲，且门德尔松的绘画、文学造诣也颇高。舒曼则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极具文学修养的书商，希望舒曼做一名律师，在当全职作曲家之前，舒曼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之后你还会发现在音乐家中原本要当律师的人很多，如法国的肖松、俄国的柴可夫斯基等等。不知道律师和作曲家之间有何共通之处，但很显然，最终他们也都成了“律师”，但谙熟的不是法律，而是音律。

[1] 《a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Symphony No.3 in a minor*“Scottish”）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29—1842年交响曲Op.56

[2] 《A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Symphony No.4 in A major*“Italian”）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51年交响曲Op.90

[3] 《d小调第五交响曲“宗教改革”》（*Symphony No.5 in d minor*“Reformation”）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31年交响曲Op.107

[4] 《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卡尔·玛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821年德语歌剧Op.77J.277

[5] 《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Piano Quartet in E-flat major*）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42年钢琴四重奏Op.47

[6] 《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38年协奏曲Op.64

[7] 《童年情景》（*Kinderszenen*）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38年钢琴套曲Op.15

（三）起点与终点

浪漫主义音乐，尤其是德奥音乐内的二元对立，是围绕如何处理与贝多芬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贝多芬已然把传统体裁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贝多芬没有《第九交响曲》，浪漫主义作曲家在传统体裁上或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在《第九交响曲》中，贝多芬已把交响曲这种体裁的可能性发挥到了空前高度，后世音乐家想在交响曲这条道路上再创新，写出超越它的作品，实在困难。从作曲手法和精神内涵上，人们可以切实说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结尾高潮的设计更辉煌，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更深邃，马勒《第八交响曲》的规模更具开创性，等等。但考虑到是在历史上首创以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历史上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客观影响力，实在无法找出任何一部交响曲可以在“最伟大交响曲”的认知上把它比下去。

其他体裁的作品也是如此。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被称为钢琴音乐中的《新约圣经》（钢琴音乐中的《旧约圣经》指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贝多芬的5部钢琴协奏曲以及小提琴协奏曲，至今都是世界范围内上演频率最高的协奏曲作品；室内乐方面，贝多芬有16部登峰造极的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去世后，摆在19世纪作曲家面前的问题很显著：贝多芬已把古典曲式写到了极致，作为后世音乐家，想有所建树甚至青史留名，该怎么办？

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把贝多芬当成起点。贝多芬已充分给出如何把古典体裁写好的范例，新时代的作曲家，要基于祖师爷打下的坚实基础，在祖师爷庇荫下，继续深挖，创作出更多的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以及室内乐作品。第二条是把贝多芬当成终点。承认贝多芬的伟大功绩，但从此放弃对贝多芬已达顶峰的体裁的挖掘，转而去探索贝多芬从未深入挖掘的领域。

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因此分成两个鲜明派别：选择把贝多芬当起点，继续经典范式体裁创作的“起点派”；选择把贝多芬当成终点，挖掘新型创作领域的“终点派”。起点派的代表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终点派的领头人则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他们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才是贝多芬的正统继承人。两方相互斗争，各方作曲家、评论家甚至写文章互相口诛笔伐。

从数量上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哪怕是勃拉姆斯这一派的作曲家，在传统

体裁作品的创作上也变得谨慎：数量上超过9部的一线作曲家几乎没有，勃拉姆斯和舒曼都是4部，柴可夫斯基有6部交响曲，西贝柳斯写了7部，等等。协奏曲、室内乐的数量就更少了。

勃拉姆斯是著名的“德国3B”之一，“3B”指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三人名字都以B开头。3B是宣传策略，由当时勃拉姆斯阵营的著名指挥家冯·彪罗发明，将勃拉姆斯与两位德国前辈大师并列。勃拉姆斯深受舒曼器重，天赋极高。勃拉姆斯首先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在一次演出中，勃拉姆斯要与一位小提琴家合作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这部作品钢琴部分的难度甚至还在小提琴之上，但在临上场前才发现音乐厅的钢琴忘了调音，所有音都低了半个，本来剧院经理想取消演出，但勃拉姆斯表示完全不必介意。他直接上场，将一首a小调的曲子生生拔到降b小调进行演奏，将所有音都拔高半音，不仅曲谱要做出重大改变，降b小调的指法还比a小调困难许多。要做到这件事，除了演奏者钢琴水平超绝外，还要对作曲规律无比熟悉，做到临时转调。这场演出中，舒曼也是观众之一，在当时欧洲范围内最优秀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的介绍下，勃拉姆斯结识了舒曼夫妇。

勃拉姆斯是当之无愧的“起点派”，贝多芬的继承人。首先，勃拉姆斯一生都坚持“纯音乐”创作，他认为音乐不该有任何具体指向性，所以从未创作过歌剧和标题音乐，作品体裁总体上是传统的：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室内乐以及各类小品。这一点他甚至比老师舒曼更为传统，舒曼还有具体情境指代的钢琴小品集，但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集都没有具体标题。

勃拉姆斯有4部交响曲，其中《c小调第一交响曲》（Op.68，[\[1\]](#)）前后构思长达20年之久，可见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对交响曲这种至高的作曲形式是多么如履薄冰。这部作品被誉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把贝多芬想说但未说的话都说尽了。《c小调第一交响曲》在整体结构上确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有相似之处，它开头的调子极端黑暗，以定音鼓沉重地敲击开头，感觉每一下都重击在心脏上，如同英雄在极大的困难和压力下匍匐前行；小提琴声部奏出的音极高，感觉世界在尖叫、咆哮着；在末乐章，我们可以听到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重合的主旋律，连勃拉姆斯自己都说，任何人都能听出来这是在致敬贝多芬。不得不说浪漫主义的勃拉姆斯比贝多芬更善于营造强烈对比，全曲在末乐章最高潮时给人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冲破九霄、拨云见日之感：黑暗的日子终将过去，光明总会到来。

虽然勃拉姆斯秉承了贝多芬部分的作曲理念，被看作是贝多芬的继承者，但不应认为勃拉姆斯是单纯的模仿。勃拉姆斯的作品在总体上比贝多芬的更复杂、更丰富。贝多芬的作品尽管激情澎湃、规模宏大、和声变化丰富，但总体上是泾渭分明的写作方法，声部与声部之间界限相对明晰，是

干净果断的；而勃拉姆斯的则复杂得多。这在两位作曲家乐谱谱面的音符走向上就能看出：贝多芬的音符排布相对规则，勃拉姆斯的音符则错落有致。

创作理念上，勃拉姆斯对音乐“交响性”的贯彻更为深刻。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作品，独奏乐器所承担的演奏任务总体多于乐队，但到了勃拉姆斯手上，独奏乐器的地位与乐队达到平衡。这体现在练琴时，若单独演奏独奏部分，略感无聊，因为有太多乐队与独奏乐器问答的段落，若没有乐队配合，听感是不完整的。而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哪怕只听独奏部分也很好听。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交响乐的道路上，勃拉姆斯确实比贝多芬走得更远。

到了晚期，勃拉姆斯对音乐创作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他晚期的钢琴小品集可以看出，这批作品包含精确的计算，但与巴赫赋格中的计算并不相同。勃拉姆斯的晚期作品是不留任何计算痕迹并浑然天成的，譬如作品Op.118的第二首——《间奏曲》（[\[2\]](#)），演奏时已不分左右手、高音低音，只剩音乐本身，就好比一件制作精良的榫卯结构家具一般，形状美观，结构完美，且看不出连接痕迹，一根钉子都找不到。不够了解勃拉姆斯的人会认为他的音乐过分离琢，匠气太浓，这确实是勃拉姆斯创作未成熟时期的缺点，譬如早期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3\]](#)）就会带来少许卡顿感，但真正成熟之后，匠气就并非来自“工匠”，而是“巨匠”了。

与勃拉姆斯截然不同，终点派的瓦格纳则坚信传统音乐形式已被贝多芬吃完了，再挖掘也无深远意义，瓦格纳要探索贝多芬未深入挖掘过的领域——歌剧，确切地说，是德语歌剧。贝多芬只有一部歌剧《菲德里奥》，莫扎特的德语歌剧也不多，且从听感上还是意大利式的。该领域在当时是一片荒芜，需要瓦格纳们大展拳脚。

瓦格纳并非一开始便创作德语歌剧。瓦格纳唯一一部交响曲写于19岁，是听过贝多芬的交响曲后感而作，甚至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进行了钢琴上的移植。在创作了第一部交响曲以及少数钢琴奏鸣曲后，瓦格纳明显对传统体裁并无太多灵感，于是开始转投歌剧的怀抱。瓦格纳的第一部歌剧是《仙女》，参照韦伯的歌剧风格写就，自此开弓没有回头箭，德语歌剧创作贯穿其终生。

虽然瓦格纳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歌剧，但不应将瓦格纳歌剧与意大利歌剧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是有本质区别的。瓦格纳不把自己的作品叫歌剧，而是叫戏剧。瓦格纳一直推崇“整体艺术”，这和舒曼整体化的协奏曲便有了精神共鸣。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的任务是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情感，音乐的结构、形式都该为这个目的服务。如果说舒曼的艺术是初

露“整体艺术”端倪，那么瓦格纳则是彻底地贯彻了整体艺术：作品的所有部分都应出自艺术家。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都需要剧作家与作曲家合作，剧作家负责剧本与台词，作曲家负责音乐创作。瓦格纳的戏剧则不然，瓦格纳不仅写音乐，同时也负责舞台脚本创作，甚至还负责舞美以及充当舞台上的戏剧导演。如果瓦格纳生活在现代，一定还会成为灯光师。发展到最后，瓦格纳甚至觉得现有剧院已不能演出他的戏剧了，于是瓦格纳组织建造了位于拜罗伊特的剧院，专门用于上演自己的剧目。在音乐结构上，瓦格纳的歌剧不像意大利歌剧，有咏叹调和宣叙调来分别掌管抒情及叙事，瓦格纳的歌剧唱段中自然就包含剧情的推进。

瓦格纳“整体艺术”的概念更贴近纯艺术，彻底脱离了自巴洛克时期以来“艺术服务上层阶级”的功能性束缚。笔者十分认同瓦格纳的创作理念，但具体到瓦格纳的音乐风格，是否喜爱就见仁见智了。

瓦格纳的音乐理念与勃拉姆斯的针锋相对。勃拉姆斯认为音乐应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指代，音乐就是音乐。瓦格纳恰恰认为音乐应是具体的，就好像绘画能把人物形象描摹得栩栩如生一般，音乐也应具体。瓦格纳通过“主导动机”，塑造了他音乐中的具体指向性。所谓主导动机，就是在音乐中用特定的旋律、音型来指代具体对象。这种手法其实在现代影视音乐中常被用到，譬如所有人都对抗日主题影视作品中“鬼子进村”的音乐印象深刻，这便是音乐刻画具体形象的能力。瓦格纳的音乐中充满主导动机，且指代对象范围很宽泛，不单指代具体人物，还指代抽象概念，譬如在《莱茵的黄金》^[4]中就有描绘莱茵少女的动机、悲伤的动机，甚至具体到长矛的动机，等等。前文已提到，韦伯在歌剧中也使用过主导动机，相信瓦格纳从中获益良多。

贝多芬的作品预示着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觉醒。德意志精神包含两种元素，分别是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都在贝多芬作品中清晰可见。笔者认为，勃拉姆斯集中放大了贝多芬音乐中的浪漫主义，他赋予听众的感受是情感上的触动，能激起听众的感动、忧郁、兴奋、狂喜等情感层面感受。相比之下，瓦格纳集中放大了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主义气息，并逐渐把这种英雄主义气息上升到了“神性”高度。瓦格纳音乐给予听众的是一种崇高感，会激起听众亢奋、奉献、战斗意志方面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更接近宗教体验，尽管瓦格纳并非笃信宗教之人。瓦格纳的宗教信仰是新教，但有证据显示他后来成为泛神论者。

瓦格纳音乐中的英雄主义和神性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题材上，瓦格纳热衷描绘神话、传说以及古老的历史故事。这类题材是脱离当时社会现状的，艺术理念的指向是“向上”的，即虚无缥缈之神之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瓦格纳的大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是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歌剧，由四部“分歌剧”组成，分别是《莱茵的黄金》、《女武神》、

《齐格弗里德》以及《众神的黄昏》。每部歌剧都有四小时以上的长度，分四天上演。总体上，《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基于北欧神话故事创作的。从歌剧故事的选材上，就能发现瓦格纳作品英雄主义的特点，相比之下，意大利歌剧世俗得多。

除了内容的宏伟以及音乐规模的庞大以外，瓦格纳歌剧在听感上是极富交响性的，对铜管的使用尤其突出。铜管乐器是管弦乐团中最为响亮的，瓦格纳歌剧的演唱者，因经常要和铜管乐抗衡，嗓音都异常洪亮。善于演唱瓦格纳歌剧的歌唱家会被单独区分开，若某人是一名“瓦格纳男高音”，通常说明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巨大音量。

瓦格纳歌剧对音量要求如此巨大，是因为其交响性的创作方式。意大利歌剧的创作方式是咏叹调式的，乐队就算庞大，也是人声的伴奏，所以人声容易突出。但瓦格纳歌剧明显只是将人声当成一件会念词的乐器使用，器乐与声乐交织，乐队并非伴奏，而是与人声相互碰撞，自然对人声的音量有非一般的要求。这再次体现了与意大利歌剧互为二元对立的德奥交响乐创作思路。

听感上，瓦格纳音乐给人延绵不绝的感受，从头至尾均无明显间断。瓦格纳通过“无终旋律”的手法来达到这一听觉效果。单独唱段中，除非该唱段结束，否则难有喘息机会。

抛开艺术成就不说，能凭一己之力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瓦格纳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真要从音乐的悦耳程度以及创作能力的高低来说，勃拉姆斯在纯音乐上的创造力无疑更胜一筹。瓦格纳音乐给人的享受并非是纯粹听觉上的，他的乐段几乎难以哼唱，也让人记不太住。瓦格纳音乐打动人的方式是气氛式的、和声式的，刺激的不只是听觉，还能调动人在精神上更深层次的，甚至于接近宗教体验层面的感受，其知名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5]是其中代表。

瓦格纳的前半生动荡漂泊，挥霍无度，基本在欠债中度过，且因政治问题一度流亡国外。后来，因为巴伐利亚新继位的18岁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其忠实支持者，瓦格纳从此平步青云，不仅摆脱贫困，连在拜罗伊特盖剧院的钱也主要来自国王。瓦格纳虽然一直创作充满神性、崇高的音乐，但据说他本人十分市侩，极其在意功名名利禄，乐于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所以不喜欢瓦格纳的人觉得瓦格纳的音乐中表现出的崇高是惺惺作态，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包括20世纪最伟大指挥大师之一的切利比达凯。虽然这种评论略显过激，但笔者认为不无道理，与贝多芬那种自然流露的抗争精神以及源源不断迸发出的正能量相比，瓦格纳的音乐确实是造作了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瓦格纳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故事。尼采是个业余作曲

家，也是瓦格纳的崇拜者，曾经被瓦格纳音乐中的反叛精神深深吸引。尼采主张“上帝已死”，在他看来，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上的旧世界道德观已落伍甚至崩坏，人类社会亟须建立新道德体系，而这种创新和革命式的改变正是瓦格纳音乐中所饱含的。但在瓦格纳创作了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6]）之后，尼采选择与瓦格纳决裂，并发表了一篇《尼采反对瓦格纳》，因为《帕西法尔》回归宗教、回归基督的倾向让尼采大失所望。

[1] 《c小调第一交响曲》（*Symphony No.1 in c minor*）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76年交响曲Op.68

[2] 《六首钢琴小品》（*Six Pieces for Piano*）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93年钢琴套曲Op.118

[3] 《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1 in d minor*）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58年协奏曲Op.15

[4] 《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54—1874年歌剧WWV86A

[5]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57—1859年歌剧WWV90

[6] 《帕西法尔》（*Parsifal*）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82年歌剧WWV111

（四）分裂与融合

和舒曼处在同一时期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其最著名的作品《幻想交响曲》^[1]为法国的浪漫主义音乐开了先河，甚至影响了整个西方作曲潮流的发展。

《幻想交响曲》是标准的标题音乐，音乐内容具象有指代，与前文强调古典派的纯音乐形成对立。此外，《幻想交响曲》也是交响曲体裁的音乐首次正面地表达爱情主题，是由柏辽兹的单相思衍生出来的作品。英国女演员史密森小姐来巴黎演出后，柏辽兹陷入对其无法自拔的爱恋，在这种感情的冲击下，写出了《幻想交响曲》这一不朽名篇。

《幻想交响曲》内容的具象化不仅体现在其副标题上（副标题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甚至曲中每个乐章都用文字明确地標示出音乐所述内容。作品共分为5个乐章：第一乐章“梦、热情”，表达艺术家对爱情的憧憬；第二乐章“舞会”是一首圆舞曲，在先前的交响曲中可谓罕见，表现主人公在一个热闹的宴会遇见恋人的场景；第三乐章“原野风光”表现主人公惴惴不安的心情；第四乐章“走向断头台”描绘主人公的噩梦，他杀死了爱人，被判死刑；第五乐章是“魔鬼的晚会之梦——魔女的回旋曲”，继续描写梦境，主人公参加自己的恐怖葬礼。

从音乐配置上看，《幻想交响曲》也尽显浪漫主义色彩。相比德奥交响曲的常规编制，《幻想交响曲》的配器极其绚烂，甚至用到了两架竖琴，这在柏辽兹之前的知名交响曲中从未见过。在第三乐章开头，柏辽兹甚至让一支英国管在幕后演奏，以产生奇特的悠远音响效果。曲中种种元素都预示着浪漫主义音乐在法国拉开帷幕。

柏辽兹本人的故事也很有趣。绝大部分作曲家都会演奏钢琴，钢琴是一件强大的和声乐器，能给作曲带来诸多便利，但柏辽兹擅长的乐器却是吉他和竖笛，这在作曲家中极为罕见。柏辽兹的爱情故事也跌宕起伏：他起先爱上了英国女演员史密森小姐，但因史密森小姐的社会地位比柏辽兹高出许多，柏辽兹高攀不上，于是奋发图强努力创作，期间也有过一段感情，但对方似乎给他戴了绿帽子。在外出差的柏辽兹非常恼火，决定要杀掉女方再自杀。多亏了19世纪欧洲交通并不便利，柏辽兹在路上有足够长的时间冷静，放弃了这一可怕想法。柏辽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幻想交响曲》第四乐章，也因此曲名声大噪，赶上了史密森小姐的社会地位，两人最后有一段维持了7年的婚姻。

继续将标题音乐深化，并拿出实质成果的，是在钢琴演奏艺术上统治全欧

洲，人称“钢琴之王”的李斯特。李斯特发明了新型的交响乐形式，即所谓的“交响诗”。交响诗是单乐章的、有具体描绘对象的交响乐。

交响诗这种艺术形式将整体艺术的特征具体化了。交响诗体裁无疑是与勃拉姆斯阵营所坚持的传统交响曲针锋相对的。交响诗都有具体标题，不再是“×调第×交响曲”的命名方式（贝多芬的标题作品，譬如《英雄》《命运》《田园》，原则上都不算标题音乐，因为交响曲本身并无故事剧情，且这些标题多是后人或出版商后加的）。交响诗的发明将音乐形式往现代音乐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迎合了前文提到的大规律：浪漫主义音乐面对的欣赏者越发地“众”，形式内容则越发具体，如此才能与大众审美品味更契合。交响诗逐渐成为19世纪后期作曲家创作的主流体裁，写抽象交响曲的作曲家越来越少，写交响诗的作曲家却越来越多。

李斯特是全能型的音乐家，也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最重要、最具奠基性贡献的音乐家之一。除了钢琴作品数量众多且技巧超绝外，李斯特的交响乐成就也颇高，虽然并未创作过歌剧，但他创作了大量的交响诗，改编了大量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包括舒伯特的许多歌曲，这些改编作品成了钢琴文献中的重要作品。李斯特早年在巴黎，后来活跃在德国魏玛，几乎让魏玛成为欧洲的音乐中心。李斯特在祖国匈牙利也颇为活跃，在意大利影响也不小，他时常于四地之间往返，创作、演出、教学都很频繁，音乐事业遍布全欧洲。

李斯特是车尔尼的学生，车尔尼又是贝多芬的弟子。在12岁时，李斯特见过一次贝多芬。据说，贝多芬惊叹于这个天才少年的演奏，抱起小李斯特亲了又亲。自此，李斯特似乎有了被“上帝亲吻”的感觉，据说此后他常年将贝多芬胸像置于钢琴之上，并将贝多芬的9部交响曲统统移植到了钢琴上，立志成为贝多芬一般的伟大人物。

李斯特对钢琴的贡献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他大大拓宽了钢琴在演奏上的想象力和可能性。他发明了诸多钢琴上从未有过的技巧，且率先主张在音乐会中，独奏者需背谱演奏，以此来凸显其超凡的记忆力。自此之后，所有独奏家都背谱演奏，当然与他人合作室内乐时除外。同时，李斯特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全欧洲范围内都有他的高徒。这些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世界各地的钢琴学派，往上追溯几代，几乎都能与李斯特搭上关系。

作为瓦格纳阵营的重要成员，除了大力推广标题音乐外，很多瓦格纳的作品都由李斯特指挥首演。值得一提的是，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原本是指挥家冯·彪罗的妻子，同时也是李斯特的第二个私生女。李斯特实际上是瓦格纳的岳父，尽管李斯特只比瓦格纳大两岁。李斯特最后因肺炎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家中去世。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在很多领域都适用。其实，艺术流派以及艺术理念的分歧，往往诞生于一个领域的萌芽时期。因为领域很新，需要挖掘的未知数太多，再优秀的艺术家，在早期大概也只能选择一个方向钻研，如此便分出派别。一旦不同方向都被钻研清楚，后来的艺术家在前人基础上，已谙熟不同方向的优劣，不同艺术方向便开始融合。

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在20世纪之前，关于光究竟是什么有两种观点。菲涅尔、惠更斯等人认为光是波，麦克斯韦将其描述为电磁波；而以泊松为首的人却坚持认为光是粒子，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也只能用光的粒子性解释。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有了20世纪初德布罗意提出的物质波理论，再加上后来薛定谔、狄拉克、海森堡等人所完善的量子力学，人们充分理解了“波粒二象性”：光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它又既是波又是粒子，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特性而已。这便是理解层次以及认知维度提升后发生的融合。

到了浪漫主义晚期，接近19世纪末，两派斗争已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双方阵营的悍将都逐一去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化在融合。

在交响乐领域，布鲁克纳与马勒二人都活跃在维也纳，算是正宗的德奥系音乐家，两人相差36岁，亦师亦友。马勒年轻时的作曲理论课有一部分是布鲁克纳教的，他们都著有9部交响曲。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个诡异的规律，即“顶级作曲家交响曲不过9”，这就像是一个诅咒：最伟大的音乐家写交响曲都不超过9部，因为贝多芬只写了9部。其他作曲家要么是第9部没写完就去世，比如布鲁克纳，要么是第10部仅开了个头便去世，比如马勒，其他如舒伯特、德沃夏克、英国的沃恩·威廉姆斯，都止步于9部交响曲。

布鲁克纳与马勒一生写就的作品数量都不多。除9部交响曲外，布鲁克纳还有一些宗教作品。布鲁克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其宗教性在庄严的作品中一览无余。马勒除9部交响曲外，还作有交响套曲《大地之歌》与《少年魔角》等声乐交响作品。两位作曲家作品不多，因他二人的第一职业都不是作曲家。布鲁克纳主要担任教职，虽然作曲成就比教学高得多，但他一生似乎都在为谋取教职奋斗；马勒在交响曲被世人广泛接受前，是名满天下的指挥家。二人都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作品都很长这一点上，似乎都得了瓦格纳真传。世界上最长的古典交响曲是马勒的《第三交响曲》，时长90分钟以上。有人戏称布鲁克纳与马勒写交响曲似乎是在比谁写得更长。

布鲁克纳崇拜瓦格纳，他的《第三交响曲》就是题献给瓦格纳的，甚至在瓦格纳去世后，他还莫名地被瓦格纳的支持者推举为瓦格纳接班人。但实际从结构上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是严谨的四乐章结构，可看作是建立在

贝多芬交响曲结构基础上的扩张。第一乐章通常是奏鸣曲式，且是扩大的奏鸣曲式，有些大到拥有三个主题的呈示部；第二乐章通常是慢板或柔板；第三乐章是谐谑曲；第四乐章又是奏鸣曲式。从结构上看虽然古典，但从作曲手法和音响效果上看，布鲁克纳的作品无疑又受到瓦格纳的深刻影响。布鲁克纳的作品极为复杂，音响效果丰富多变，和声变化令人匪夷所思，瓦格纳作品中“摇滚乐”般的效果在布鲁克纳的音乐中也能听到，《c小调第八交响曲》（[\[2\]](#)）是其中典范。当然，布鲁克纳的音乐是更深沉的。

马勒的音乐地位也极高，只是在他生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推动下走向复兴，逐渐达到今天在交响作品中具有的统治地位。马勒深受瓦格纳影响，作为指挥家，他也是瓦格纳音乐最优秀的诠释者。马勒的9部交响曲，从结构上看，除《第三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外，其余7部的乐章安排都是相对工整的四乐章或五乐章结构，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等都被频繁使用，这是属于勃拉姆斯派的一部分。但马勒的每一部交响曲在内容上又有较为清晰具体的指代，《D大调第一交响曲》（即《巨人》，[\[3\]](#)）首演时是被作为两部分的交响诗上演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4\]](#)）描绘对大自然的认知，《第六交响曲》（[\[5\]](#)）则是对自己悲惨遭遇的总结。这种具体的指向性是马勒音乐中瓦格纳派的部分。在交响曲中，马勒还大量加入声乐，一方面旋律极为优美，一方面又与乐队交织得十分深入，让人想起勃拉姆斯或舒曼的艺术歌曲。在乐队的编制上，因为是指挥家的缘故，马勒熟悉所有乐器的能力范围，做了许多创新尝试。马勒交响曲的乐队规模比一般交响曲都大不少，在有“千人交响曲”之称的《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6\]](#)）中，庞大的交响乐团、两个标准合唱团、一个童声合唱团再加上七个独唱，演出的音乐家达千人以上。可想而知，如此的音响效果会有多么震撼，这一点也是极其瓦格纳式的。在听感上，从旋律的优美程度来看，马勒又是偏向勃拉姆斯的。

学者们总结发现，马勒的交响曲从具体手法上看，古典主义元素甚至多于浪漫主义元素。尽管在时期上，马勒被划分为浪漫主义晚期，但从风格上，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将马勒划归到20世纪兴起的新古典主义音乐中去。

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交响曲都是极具个性的伟大作品，不论是作曲手法、曲式结构，还是精神内涵，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只能暗暗庆幸，贝多芬在交响曲上的至高成就没吓退他们，从而他们给后人留下如此优秀的交响乐作品，将乐团的表现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融合力方面，称得上集德奥艺术之大成的，是德国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此处提到的是德国的施特劳斯，需与奥地利创作圆舞曲、波尔卡和进行

曲的施特劳斯家族父子四人做严格区分。每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施特劳斯家族的曲子）。在施特劳斯的作品中，已看不到所谓起点派或终点派、勃拉姆斯或瓦格纳的界限。施特劳斯有许多古典形式的作品，大约20岁时，他就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之后又作有圆号协奏曲、双簧管协奏曲，再之后则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等。施特劳斯的协奏曲并不传统，譬如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实际是一部叫作《堂吉珂德》的交响诗作品，大提琴独奏扮演堂吉珂德。与一般交响诗作品的长度不同，这部作品的规模完全是一部浪漫主义大协奏曲，全曲长度达到45分钟。（[7]）

施特劳斯还作有大量交响诗作品，不过这些交响诗作品的长度都和一部完整的大规模交响曲相差无几，且具有明确主题。有根据尼采同名著作创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8]），描绘英雄主题的《英雄的一生》，以及描绘自己攀爬阿尔卑斯山全过程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等等。从施特劳斯的作品中，我们能品味出他的音乐是自由的，想要表达什么就使用相应的创作方式，曲式、和声、乐器编制等规则都不再重要。施特劳斯的创作方式可谓一种极大的融合。

施特劳斯的歌剧作品也极具代表性，甚至艺术歌曲和歌剧这两种原本看似对立的音乐形式也在其歌剧中融合。他的代表歌剧有《莎乐美》、《玫瑰骑士》和《埃勒克特拉》。在剧情设置上，施特劳斯的作品无疑要比瓦格纳的丰富得多，《莎乐美》中甚至有一段舞蹈叫“七纱舞”。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简直是最早的脱衣舞，却被搬上大雅之堂。施特劳斯的歌剧音乐也不是单纯的意大利咏叹调写法，而是更接近艺术歌曲的写作方式，在突出声乐的前提下，声乐与乐队互动丰富，旋律异常优美，并非瓦格纳一般的亢奋。

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无疑达到了这类艺术的顶峰，尤其是他最后的作品《最后四首歌》（[9]）。这四部作品中，乐队和声乐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但又相得益彰地搭配在一起，歌里讨论了和死亡相关的终极哲学问题，立意高远，虽然规模不大，但大千世界尽在其中。

[1] 《幻想交响曲》（*Symphonie Fantastique*）艾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30年标题交响曲Op.14

[2] 《c小调第八交响曲》（*Symphony No.8 in c minor*）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90年交响曲WAB108

[3] 《D大调第一交响曲“巨人”》（*Symphony No.1 in D major“Titan”*）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87—1888年交响曲

[4] 《d小调第三交响曲》（*Symphony No.3 in d minor*）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96年交响曲

[5] 《第六交响曲“悲剧”》（*Symphony No.6“Tragic”*）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904年交响曲

[6] 《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Symphony No.8 in E-flat major “Symphony of a Thousand”*）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910年交响曲

[7]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82年协奏曲Op.8

[8]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96年交响诗Op.30

[9] 《最后四首歌》（*Vier Letzte Lieder*）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948年艺术歌曲Op.posth

12 威尔第与罗西尼：歌剧的艺术

（一）小提琴与钢琴

讨论完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奥交响乐，再看同时期与德意志音乐并存的意大利音乐。

笔者初到罗马旅游时，飞机着陆达·芬奇机场，等行李时，传送带边有一架钢琴，走近一看边上竖立的牌子，写的居然不是“Do Not Touch”（请勿触摸），而是“Play Me”（弹奏我）。笔者便愉快地坐到琴凳上，想着既然来到意大利，便该弹一些意大利音乐，可在脑海中搜寻半晌，除斯卡拉蒂的奏鸣曲外，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意大利名曲，居然一首也想不出，无奈之下，只好演奏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选段了事。后来，与一位钢琴家朋友谈起此事，问道：“你们意大利有那么多优秀钢琴家，连钢琴这件乐器都是你们发明的，为何著名的钢琴作品却不多？”钢琴家笑笑说：“因为我们的作曲家都去写歌剧了，可能发明钢琴是想更好地为演唱伴奏吧。”

意大利本土音乐自巴洛克时期的维瓦尔第后，似乎在音乐史中失去了存在感。曾被贝多芬评价为“当世最伟大作曲家”的凯鲁比尼，固然是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但其创作生涯基本在法国。直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时期，意大利的正歌剧、交响乐、宗教音乐作品源源不断，在数量上不输德奥，但在质量与知名度上却远远不及。而且大部分推动音乐前进的人和事都在国外，如德国的格鲁克推动歌剧改革，德国的曼海姆乐派为古典交响乐的形式做出贡献，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这般不世出的伟大人物都不在意大利。直到19世纪初，意大利歌剧才重归主流视线。让意大利歌剧重新焕发生机的，是当时在欧洲范围内红到连贝多芬都要嫉妒的人——罗西尼。

介绍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前，有一位音乐家应当先着重讲解，这便是人称“小提琴魔鬼”的尼科罗·帕格尼尼。在19世纪意大利歌剧全面复兴以前，意大利的音乐精髓已被其在小提琴上复兴了一次。帕格尼尼在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当时，人们觉得帕格尼尼定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否则以人类的能力，无法将小提琴的演奏精进到如此地步。

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人，和贝多芬处于同一时期，1782年出生，1840年去世。在他之前，意大利小提琴作品的演奏难度到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或意大利小提琴家塔尔蒂尼的作品，便大约到顶了。[塔尔蒂尼最

著名的作品是一部奏鸣曲，叫《魔鬼的颤音》（[\[1\]](#)）。传说塔尔蒂尼有一次梦见魔鬼演奏，音乐极其优美，醒来后立刻记下，但已所剩无几，即便如此，也成就一部流传千古的名曲。该故事是否他本人为宣传而杜撰，便不得而知了。] 德奥地区的小提琴音乐也莫不如此，除开巴赫的6首《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与组曲》（[\[2\]](#)/[\[3\]](#)/[\[4\]](#)/[\[5\]](#)/[\[6\]](#)/[\[7\]](#)）技巧难度很高外，古典时期以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小提琴奏鸣曲、协奏曲等为代表，总体上对小提琴技巧性的要求不高，且演奏并不复杂。

帕格尼尼横空出世，发明了无数小提琴专有的“超绝技巧”。这集中体现在他创作的《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8\]](#)）中。这24首随想曲可认为是24首专为小提琴创作的练习曲，每首曲子集中练习至少一种小提琴的特殊技巧，尤其第24首，是一支变奏曲，主题之后每个变奏都用一种特殊演奏技巧根据主题变奏。该曲的主题是帕格尼尼最具标志性的旋律，后世不少音乐家都根据该主题进行了创作，简单一数便有李斯特、勃拉姆斯以及拉赫玛尼诺夫。

起初，欧洲音乐学院里的小提琴专家看到这部《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甚至觉得可笑，认为这是帕格尼尼写出来唬人的，以便吹嘘自己的技巧——这样的曲子，在专家、学者看来是根本无法演奏的。这套作品里有太多闻所未闻的技巧，例如第一首的“抛弓”。通常认为，小提琴是一件拉弦乐器，它的演奏是用琴弓拉动琴弦，但抛弓是让琴弓在4根弦上来回跳动，每根弦都轻点一下，让人听到清脆、快速的一组8个音。除此之外，《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中还有连顿弓、连跳弓；左手技巧也有换指八度、左手拨弦、双泛音等常规作品中几乎用不到的技巧。这套《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被誉为“小提琴家的试金石”，在帕格尼尼的年代，这套作品几乎只有他自己能演奏。

帕格尼尼以其超绝的琴技唤起了全欧洲对小提琴演奏以及意大利音乐的关注，这实际预示着意大利歌剧的崛起。帕格尼尼《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固然重要，但从音乐性上看，只是彰显技术的练习曲，并不十分悦耳，也无太深刻的音乐艺术性。随想曲之外，帕格尼尼的某些代表作传递的则是意大利歌剧式的音乐审美。其中最典型的，是帕格尼尼的6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又以《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9\]](#)）最为著名。

《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技巧要求固然极高，但此处技巧的难度，并非单纯追求炫技，而是歌剧式审美的音乐表达。随意挑选几段旋律，便会发现这些旋律歌唱性极强，甚至配上歌词便能演唱。《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有一些极其复杂的三度、六度双音。这其实是在体现歌剧中二重唱的歌唱魅力，且在小提琴上表现这些独具歌唱性的段落，能做出声乐做不出的效果：首先，声乐的音域没有小提琴的高，更没有小提琴的音域宽广；其次，若是演唱快速的音乐，声乐无法达到小提琴的速度及清晰

度。

在欧洲巡演时，帕格尼尼的音乐感染了许多人，更是激励了不少日后的著名作曲家：舒曼便是在听到帕格尼尼的演奏之后，放弃攻读法律，立志成为专职音乐家——舒曼声称在帕格尼尼的音乐中听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舒曼音乐的旋律已是极美，能激励舒曼的，不知该是多么美妙的音乐了。帕格尼尼也激励了李斯特，后来李斯特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他确实做到了，如帕格尼尼一般，李斯特把钢琴的演奏技巧推到全新高度。

帕格尼尼在欧洲拥有着巨大影响力，从王宫贵族到市井小民，只要关注音乐，无人不知他的大名。帕格尼尼在当时欧洲受追捧的程度，大约和今天红极一时的摇滚明星差不多。通过这样的影响力，帕格尼尼输出的不仅是高超的技巧，还有蕴藏在音乐中的意大利歌剧式审美。自帕格尼尼开始，一大批专为小提琴创作音乐的作曲家涌现出来，有西班牙的萨拉萨特、意大利的巴齐尼、摩拉维亚（现捷克属地）的恩斯特、波兰的维尼亚夫斯基、比利时的维厄唐等等。自此，小提琴的曲目库被极大地丰富了。帕格尼尼大大地开发了小提琴演奏的可能性，让后世作曲家彻底放飞了小提琴创作的想象力。

小提琴被称为“乐器皇后”，钢琴则被称为“乐器之王”。这两件独奏作品数量最多的乐器，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

小提琴是旋律乐器，钢琴则是和声乐器。虽然小提琴也能演奏和声，但现代小提琴最多做到双音同时发声，更多的音便要用到分解和弦，无法做到同时发声。所以在机械结构上小提琴的和声较吃力，哪怕是小提琴的双音进行，也应更多理解为二重唱，而非和声变化。小提琴发音，只要琴弓在拉动，声音便可延绵不绝；音高、音量、音色都能随时调整，还能做震音，在弦乐技法上表现为揉弦，这样的发声特点与人声的几乎相同。诚然，钢琴也可演奏美妙的旋律，但在发声原理上，钢琴发音的音量、音质，只与琴锤敲击琴键一瞬间的速度有关，音发出后，便不受控制。钢琴胜在音域宽广，可多音同时发声，哪怕十个音也不在话下，能奏出丰富的和声。钢琴能通过对十根手指的控制，做出多声部进行的交响效果，譬如贝多芬的钢琴独奏作品便是高度交响性的，优秀的钢琴家在演奏过程中脑海里要装着一个交响乐团：不同声部的音色、音量都有相应的走向和变化，钢琴是天然适合演奏和声的乐器。

上述钢琴与小提琴的演奏特性差异只在机械结构上，并非绝对。反例有巴赫与肖邦。巴赫著有6部无伴奏的小提琴组曲与奏鸣曲，在这些作品中，巴赫把小提琴当成和声乐器。在其众多赋格中，巴赫甚至是用管风琴四部和声的思路去写作小提琴音乐的。在巴赫所处的年代，琴弓的弓毛并不像

现代琴弓的一样紧绷，而是柔软得能在小提琴上同时演奏4个音。巴赫的无伴奏作品具有丰富的四部和声，若同时演奏出来，效果与管风琴接近。有些小提琴演奏家在演奏巴赫这套作品时，选择少揉弦或不揉弦，如此小提琴不发出震音，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小提琴的歌唱性。肖邦则是通过独创性的技巧，如装饰音、自由节奏以及独特的音形走向等，把钢琴变成一件具有强烈歌唱性的乐器。他一向教导学生要多听歌剧，可见他对歌唱性的追求。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笔者会有早先在罗马机场的尴尬了，因为从二元对立角度看，钢琴这件和声乐器与意大利主流的歌唱性音乐的创作思路是相悖的。

[1] 《g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Violin Sonata in g minor “Devil's Trill”*）朱塞佩·塔蒂尼（Giuseppe Tartini）1713年奏鸣曲B.g5

[2] 《g小调第一奏鸣曲》（*Sonata No.1 in g min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BWV1001

[3] 《b小调第一组曲》（*Partita No.1 in b min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组曲BWV1002

[4] 《a小调第二奏鸣曲》（*Sonata No.2 in a min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BWV1003

[5] 《d小调第二组曲》（*Partita No.2 in d min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组曲BWV1004

[6] 《C大调第三奏鸣曲》（*Sonata No.3 in C maj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BWV1005

[7] 《E大调第三组曲》（*Partita No.3 in E major*）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无伴奏小提琴组曲BWV1006

[8] 《二十四首小提琴随想曲》（*24 Caprices for solo Violin*）尼科罗·帕格尼尼（Nicolo Paganini）1802—1817年随想曲Op.1

[9] 《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No.1 in D major*）尼科罗·帕格尼尼（Nicolo Paganini）1817年协奏曲Op.6

（二）美声与戏剧

罗西尼是意大利歌剧的复兴者。若问到罗西尼在歌剧方面的创新，其实说不出太明确的如格鲁克“歌剧改革”这般的功绩。罗西尼会受到当时全欧洲的追捧，无他，全靠内容质量取胜。

在罗西尼的时代，意大利的正歌剧日薄西山，经法国歌剧以及歌剧改革的洗礼，正歌剧已不再是主流，加上莫扎特对喜歌剧的挖掘，在面向大众方面，喜歌剧逐渐获得更多关注。与正歌剧不同，喜歌剧充满跌宕起伏的剧情。正歌剧结构死板，通常有三幕，内容上是“总、分、总”。喜歌剧则并未规定幕数。喜歌剧所选故事总是相对接地气的，观众容易对剧中故事感同身受，而不像正歌剧那般，尽是帝王将相、神仙妖怪这类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主题。在罗西尼的年代，歌剧已越发面向公众了。

罗西尼的音乐充满优美的、天才般的旋律，他本人更是少年天才，被称作“意大利的莫扎特”。罗西尼最著名的喜歌剧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其主人公和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一样，都是费加罗，剧情上算起来还是《费加罗的婚礼》故事之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机智的理发师费加罗如何帮助伯爵获得真爱，当中有不少喜剧元素。《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也是罗西尼至今为止被上演最频繁的歌剧，在近年世界范围内演出频次的排名中，它也是罗西尼唯一进入前十的剧目，其序曲是歌剧序曲中最具盛名之属。

除喜歌剧外，在老派正歌剧领域，罗西尼也成就颇高。《塞米拉米德》《坦克雷迪》《奥赛罗》等都是正歌剧作品中上演频率颇高的剧目，其中唱段都优美异常，是歌唱家出专辑时的必录曲目。

罗西尼一生作有38部歌剧，演唱难度极高，这也是尽管罗西尼的成就如此之高，大部分歌剧却都不常被上演的原因，并非艺术价值不够，而是难度摆在那里。

罗西尼有一点饱受诟病，就是作品同质化较为严重。罗西尼热衷于自己“抄”自己：发现一个创作套路好用便一直用下去。这可能源自罗西尼极其懒惰，据说他在创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时，从未下床，全靠仆人伺候，不过也是天赋异禀，他创作这部作品只用了13天。有时，在创作新歌剧时，因为懒得写序曲，他就拿自己不太火的歌剧序曲来顶替。唱段同质化也很高，经常是先以慢板抒情的方式唱一段，之后乐队进入并逐渐加速，歌唱家的声音也开始抖动加速并提高音量。由于这种手法使用得太频繁，罗西尼还被人戏称为“渐强先生”（Signor Crescendo，Crescendo表

示逐渐增强音量)。曾有一张专辑，把罗西尼不同歌剧的著名唱段都收集在一起，听的时候非常有趣，两首曲子之间居然可以无缝衔接。幸好罗西尼的年代没有信息产业，更无留声机技术，一个城市演完一部歌剧，再去别的城市演另外一部，观众难以比较，也无法如今天这般，找一张专辑，把这些曲子凑在一起听。所以，同质化的问题在罗西尼的年代对其声誉并无大碍。

尽管活了70多岁，但37岁之后，罗西尼便再未创作过任何歌剧。罗西尼在37岁后创作了一些歌剧以外的作品，包括宗教音乐，譬如著名的《圣母悼歌》^[2]，但无一例外，均是以歌剧的声乐思路创作的，若不考虑题材、歌词，听起来就是活脱脱的大咏叹调。罗西尼甚至创作了许多器乐作品，他是大提琴演奏家出身，在弦乐独奏方面颇有心得，作有单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及众多弦乐奏鸣曲。但这些器乐作品的影响力与他的歌剧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在“意大利与德意志”一章中详细讨论过，简单来说，是由于表达维度的局限，器乐作品本不适合以歌剧咏叹调思路创作，因为人声的表现维度丰富，相较之下，器乐的表现维度相对人声更单薄，撑不起咏叹调的写法。

罗西尼的歌剧被归类为“美声歌剧”，以区别后来威尔第、普契尼等人的“戏剧歌剧”。历史上有“美声三杰”的说法，罗西尼自然是其中之一，另两位是多尼采蒂与贝利尼。

印象中，歌剧演唱都会用到“美声唱法”（bel canto），中国的音乐学院里教声乐，也分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虽然歌剧唱法可以笼统地概括为美声唱法，但“美声歌剧”却是大部分人都不清楚的概念。

歌剧的唱法需要调动身体各个部位产生共鸣：通俗唱法主要靠声带发声，歌剧唱法虽然声源是声带，但需要调动身体共鸣，中低音区需要胸腔参与共鸣，高音区则胸腔不再参与共鸣，变成头腔共鸣。这就好比音响系统，声源是喇叭，木箱是用来共鸣的，可以放大声音。美声唱法的发声原理跟音箱大致相同，本质上除却嗓音优美外，还要尽可能地调动胸腔和头腔共鸣，把身体当成一台扩音装置。这便是为何歌剧演员站在台上演唱，能与一个管弦乐队抗衡，并且不带扩音装置也可让整个剧院都听得清楚。这也说明为何不少优秀的歌剧演员身材都异常魁梧甚至肥硕，并非因为他们唱歌剧所以身材魁梧，而是因为他们身材魁梧，胸腔和头腔作为“人肉扩音器”的功率更大，身体条件天然适合唱歌剧。另外，身体肥硕说明声带周围的脂肪更厚，声带振动时发出的声音也更饱满。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并非胖，而是头腔更大，下颚、脖子的部分更宽阔，胸腔体积也大，这些都为歌唱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共鸣腔”。共鸣腔的容积大还有一大好处，便是能激发出丰富的泛音列。当一个腔体振动发声时，人耳听到的音高，是振动腔体的基本频率。除基本频率外，腔体还会被激发出更多高频率的

音。人耳最终听到的是基本频率与其他高频叠加在一起的复合音，这些被激发出来的高频音序列便是所谓的泛音列。泛音列越多，复合音的总体效果就越丰富，给人以充实、优美之感。泛音列中频率越高的音越难以被激发，但振动腔体大的话，这些高频泛音相对容易被激发出来。20世纪最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琼·萨瑟兰，就以泛音列极多而闻名，而她的头部也是出名的硕大。

明白了美声唱法的原理，继续讨论何为“美声歌剧”。关于美声，并无简单定义，它集中代表了一种对音质的审美追求。歌剧可拆分为“歌”和“剧”，即观众可以关注音乐部分，也可关注戏剧部分。美声歌剧几乎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歌”上。在歌唱里，有“Messa di Voce”的概念，直译过来是“声音的位置”。美声歌剧要求声音的位置永远处在适中的发声区域，不论剧情、人物性格如何变化，都要永远保证声音质量的饱满、唯美。这对换声区的把控有极高要求。“换声区”指的是演唱从较低音区切换到较高音区的过渡区，此时，共鸣区切换，生理上会发生自然音色变化。能够平滑无缝地过渡，是美声歌剧的审美和技术要求，有些曲子听上去难度不大，但若是音高时常在换声区附近游走，便会极其难以控制。相比之下，为了剧情变化以及人物性格塑造，戏剧歌剧会用到许多极端唱法。

美声歌剧的另一特点，是“连音”（legato）较长。此处需介绍声乐中的两个基本音乐表达元素：连音与断音（staccato）。断音较易理解：在一段旋律中，音与音之间是断开的，音响效果上，音是跳跃着出现的。与之相反的是连音，音与音之间无间隔缝隙，平滑过渡，在乐谱上表现出来的符号是一条线，把音符都连接在一起。当然，连线只是狭义的连音，连音的概念甚广，并非连线那么简单，更广义的连音要将演唱内容的含义、情绪都考虑进去。有时音断了，或是歌唱家换气的口气，但由于这句音乐还没唱完，接着唱时，语气、音量、音色必须连贯，哪怕音之间是断开的，音乐的意味不能断。广义上，对连音的设计很考验歌唱家对音乐及人物的理解。譬如两段乐句之间，音乐逻辑并无直接联系，但戏剧含义上是相互递进，兴许是该角色在不断发出追问，追问让音乐断开，但情绪是递进的。这时虽然从音乐上不要求两句之间在演唱上连音，但优秀的歌唱家会考虑剧情走向以及人物性格，适当地把这两句处理成大线条的连音。美声歌剧的一大特点是连音更长，常会听到一句旋律怎么也唱不完，情绪不断在变化，婉转悠扬。相比之下，戏剧歌剧的连音较短，跳动更多。

“美声三杰”中，罗西尼无疑是综合成就最高的一位，音乐浑然天成。多尼采蒂和贝利尼则是分别沿着美声歌剧中“剧”与“歌”的方向深挖了一层。

多尼采蒂是极为高产的作曲家，一生创作70多部歌剧，是罗西尼在世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多尼采蒂的创作速度也极快，据说当年有人跑去告诉他，罗西尼13天就写出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多尼采蒂的反应居然

是：“我真是太相信了，像罗西尼那么懒的人确实要13天才能写完。”言下之意，若是自己来写，根本用不了13天。

在歌剧创作方面，多尼采蒂擅长挖掘作品的戏剧表现力，这与他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狂热追随者不无关系。多尼采蒂对莎翁的恢宏历史观极力推崇，甚至改编了不少莎翁的戏剧融入歌剧创作中，比如以英国都铎王朝历史为背景创作的“女王三部曲”，其中的戏剧冲突是极大看点。

多尼采蒂最著名的作品是《拉美莫尔的露契亚》（[3]），讲述了一段三角恋的爱恨纠葛。第三幕时，因为露契亚的哥哥用计谋拆散了她和原本的爱人，迫使其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丈夫，新婚之夜，露契亚深受刺激便刺死了新郎，以浑身带血的形象在阳台上歌唱，表达了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此时的露契亚已然发疯，开始看到幽灵鬼魂，堪称歌剧史上最有戏剧冲击力的一幕，被称为“Mad Scene”（疯狂场景），人尽皆知。

多尼采蒂后期来到巴黎发展，创作了许多法语歌剧，让意大利式的美声歌剧在法国焕发光芒。此前，法国自巴洛克时期始便是法国歌剧的天下，最早由吕利等人从意大利歌剧中改造得来。多尼采蒂最著名的法语歌剧是《军中女郎》（[4]），是一个赞扬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故事。剧中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咏叹《多么快乐的一天》，需要在两分钟内唱足九个“High C”（高音C），比通常男高音的极限高音要再高一到二度，让众多男高音望而却步。多尼采蒂许多作品未被频繁上演，一大原因也是诸如此类的高难度段落太多。20世纪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便是因为1968年演唱《军中女郎》时，能够轻松地唱出九个High C，从此一炮而红，被誉为“高音C之王”。

贝利尼与多尼采蒂恰好相反，相比于多尼采蒂对“剧”的看重，贝利尼终身致力于对“歌”的挖掘。贝利尼将主要创作精力集中于塑造最为精致柔美的旋律唱段，刻画了众多鲜活而深刻的女性形象。贝利尼作品中的许多唱段成为世人对歌剧咏叹调的基本认知。贝利尼最著名以及最重要的歌剧是一部两幕正歌剧，名叫《诺尔玛》（[5]），其中最著名的唱段《圣洁女神》堪称塑造了全人类对于女高音演唱的听觉记忆。细数历史上著名的女高音唱段，不论如何排名，《圣洁女神》都应位列前三名。从该曲的伴奏方式不难发现，贝利尼的精力都用于塑造和突出女高音的清晰声线，因为这首咏叹调的伴奏是极为简单的分解和弦轮奏。它的演唱集中代表了美声歌剧唱法的精髓，对“声音的位置”极其重视，始终保持在适中、绵密的发声区域，且连音的连线乐句相当长，其间虽会多次出现换气、断音，但音乐的思绪与连线一直持续着。

虽然贝利尼把精力放在塑造音乐线条上，但这种对音乐的极致塑造，也是对角色复杂内心的极致挖掘，尤其是对女性角色内心极其深入的刻画。贝

利尼是个很懂女人心的音乐家。与其他作曲家相对脸谱化的女性形象相比（譬如罗西尼笔下的女性通常是清纯甜美的少女，威尔第偏爱具有批判精神的女性，普契尼则热衷于刻画相对“矫情”的女子），贝利尼笔下的女性角色性格更鲜活，内心层次更为丰富。就拿《诺尔玛》来说，故事发生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女主角诺尔玛是大祭司，本应心无旁骛，恪守贞节，终生奉献宗教，但诺尔玛未抵住诱惑，与男主角偷情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偷偷交与人照顾。尔后男主角移情别恋喜欢上一个青年女祭司，诺尔玛召集众人，说要揭发“一个违背自己使命”的神职人员。男主角本以为诺尔玛要揭发他的新欢，结果没想到诺尔玛是自我揭发，并要以身殉教。最终男主角认识到诺尔玛对自己伟大的爱，选择与诺尔玛一道被执行火刑殉情。作品中诺尔玛的内心情感极其复杂：作为祭司，对信仰负有责任，信仰与爱情是一组矛盾；作为母亲，在信仰职责与亲情之间是第二组矛盾（最后的自白当中，诺尔玛恳请自己的父亲善待她的两个孩子）；情人与青年女祭司有染，作为祭司不能过分显露内心的嫉妒与愤怒，同时第三者与自己身份类似，便又多了一份推己及人的同情，则是第三组矛盾。在几种不同情感矛盾的冲击下，交织出诺尔玛复杂、煎熬的内心感受。贝利尼通过对声音的塑造，成功地表现了诺尔玛复杂的性格，最后一段殉教前的独白，诺尔玛用哭腔进行演唱，可谓全剧点睛之笔。

多尼采蒂与贝利尼虽都是美声歌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但作品风格存在显著差异，各自侧重不同。这种差异可类比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大卫和安格尔师徒。大卫画面宏大，色彩多变且对比显著，很像多尼采蒂对整体戏剧性的强烈追求；相比之下，安格尔追求的则是在画面整体沉静的情况下，对完美线条的刻画，这种“以少为多”、抓取重点的做法让人想起贝利尼对声音线条的极致刻画与追求。

[1]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816年喜歌剧

[2] 《圣母悼歌》（*Stabat Mater*）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831—1841年宗教音乐

[3] 《拉美莫尔的露契亚》（*Lucia di Lammermoor*）葛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1835年三幕悲剧歌剧

[4] 《军中女郎》（*La Fille du Régiment*）葛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1840年两幕法语喜歌剧

[5] 《诺尔玛》（*Norma*）文森佐·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1831年正歌剧

（三）茶花与茉莉

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从正门进去，正厅左右两侧立有四尊雕像，是意大利人民心目中的四位歌剧英雄，其中三尊是“美声三杰”，另一尊则是威尔第。罗西尼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纵观意大利歌剧史，地位有可能在罗西尼之上的，便只有威尔第了。威尔第被认为是意大利的“歌剧之神”。虽然在艺术成就和作品格调上见仁见智，但若论社会影响力以及塑造意大利人民听觉记忆方面，威尔第无疑居冠。

威尔第的作品代表着戏剧歌剧的高峰，其与美声歌剧在唱法及审美倾向上略显对立。戏剧歌剧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变得更复杂，美声歌剧的“剧”都是为“歌”服务，戏剧歌剧虽不能说“歌”为“剧”服务，但戏剧歌剧中的音乐走向与戏剧走向更为一致，而非某一方配合另一方。这是欧洲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后，对艺术的要求趋于整体化的表现：艺术是为了表达，应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

在美声歌剧中，演员形象常常与剧情不符，经常能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甚至有些“五大三粗”的女演员出演一位妙龄美女。但在威尔第的戏剧歌剧中，唱功和演员的外在形象以及演技都很重要，譬如在威尔第的著名歌剧，根据法国小说家小仲马同名小说改编的《茶花女》（[\[1\]](#)）中，女主角薇奥莱塔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剧目中薇奥莱塔的演唱难度极高，且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同时薇奥莱塔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这要求歌唱家演唱水平高超的同时还要兼顾外形的美艳；《茶花女》剧情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充满矛盾与冲突，要把薇奥莱塔诠释好，不光靠歌唱技巧以及外形得体，演技到位也十分重要。

除歌唱与戏剧统一外，在音乐特色上，戏剧歌剧在发音上讲究动态与瞬态的大对比，比如从极弱到极强的突变，超高和低音域的切换使用等，不再像美声歌剧那样对“声音的位置”有严格的要求，为了在总体上表现戏剧性，声音多变反倒是戏剧歌剧的追求。

从乐句长度方面看，威尔第的音乐并无许多长连音，相对于美声歌剧音乐线条的百转千回，更加简洁果断，朗朗上口，方便大众记忆和传唱。

威尔第去世时，受到意大利国葬的待遇，这与他歌剧中的精神内涵息息相关。彼时意大利正处于摆脱奥地利统治的革命浪潮中，威尔第通过歌剧作品表达了对贵族阶级的批判和对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情，塑造了意大利人民的共同听觉记忆。

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威尔第则是坚定的国家统一支持者，统一战争打到哪里，威尔第歌剧的主题几乎就写到哪里。统一威尼斯时，威尔第一气写下三部歌剧，分别是《茶花女》《弄臣》与《西蒙·波卡涅拉》；统一西西里时，基于13世纪西西里人民反抗法国统治者的故事，威尔第又创作了《西西里晚祷》（[\[2\]](#)），人们以晚祷钟声为号，发动革命。由于题材敏感，为防止当局干涉，便在各地以不同名字上演，直到意大利全境统一，才重新以《西西里晚祷》冠名。威尔第将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歌剧作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彼时社会思潮高度统一。威尔第的作品也许是一针催化剂，加速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他也成了意大利当之无愧的歌剧英雄。

美声歌剧向戏剧歌剧转变，源于19世纪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兴起，歌剧艺术由上流社会走向大众。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剧场比以前更大了。剧场更大，对歌剧演员的音量要求就提高了。但在纯美声唱法中，如果歌唱的乐句过长，音量和气息相对来说都不足；而短的乐句正相反，这就好像在大声呵斥的时候，句子一定很短，但是如果讲很长的一句话，就很难做到全程音量都很大。歌剧面向大众后，剧情也需要更为多变、有趣，需要更多故事上的创新，才能唤起公众更多的共鸣。欣赏人群的变化，导致了欣赏需求的变化，戏剧歌剧做出的这些变化就是追随该趋势的结果。

歌剧的主流形式从美声歌剧转变为戏剧歌剧的过程，在中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昆曲是中国最传统的剧种之一，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京剧又成为主流。简单对比，不难发现，昆曲的特点是规模小，乐句极长，可谓一唱三叹。不妨参考经典剧目《牡丹亭》中的《惊梦》，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短短四句话，能唱足两分钟。在京剧中，唱段便更短促、果断，就算要拖长音听变化，通常也只是在句末一个字上作文章。本质上，主流由昆曲到京剧，二者演唱特点及音乐特色的改变也是由剧目服务小众（昆曲多为古代富人家中娱乐）变成面向大众导致。

唱法上，依照美声歌剧与戏剧歌剧的演唱特点，可把歌唱家分成两类，例如女高音分为抒情女高音与戏剧女高音。整体上，抒情女高音的音域更高，声线相对纤细，音色柔美，适合演唱歌唱性强、连音丰富的美声歌剧；戏剧女高音则音量更大，动态幅度也更大，音色更厚重、有穿透性，适合演唱戏剧性强烈的戏剧歌剧。顺便一提，演唱瓦格纳歌剧的都是戏剧女高音，且瓦格纳女高音对音量的要求更高，甚至会专门被划归为“瓦格纳女高音”。从艺术审美上，德奥歌剧和意大利歌剧的区别是明显的，据说威尔第很瞧不上瓦格纳，有人问威尔第对瓦格纳著名歌剧《汤豪塞》的看法，威尔第的评价大致是：“我相信《汤豪塞》的内涵是很深的，一遍

肯定没法看明白，但我也也不想看第二遍。”

不能把“花腔女高音”与“抒情女高音”和“戏剧女高音”搞混，这三个称谓并不对等，不属于同一类别。花腔是一种特殊技巧，是女高音唱到高音区后在声音上的变化，让声音听上去更丰富，总体表现为强烈的颤音，且有众多局部快速变化的音型。“花腔女高音”是说特定角色需要做花腔，抒情女高音和戏剧女高音都能做花腔，且并非只有女高音可以做花腔，其他声部都可以做花腔。当人们说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是花腔女高音，是说她善于做花腔，但并不影响她是抒情女高音抑或戏剧女高音。具有代表性的花腔女高音角色，意大利语歌剧有威尔第《茶花女》中的薇奥莱塔，德语歌剧有莫扎特《魔笛》中的夜后，法语歌剧有德利布《拉克美》中的拉克美。

威尔第之后，在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歌剧进入了“现实主义歌剧”阶段。这个阶段的艺术家更关注社会现实乃至底层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描绘的主题在戏剧上更具创新性，擅长以小见大，让观众易于产生共情。极具代表性的有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3\]](#)）和列昂卡瓦罗的《小丑》（[\[4\]](#)）。这两部歌剧短小精悍，起初都是独幕歌剧，后来《小丑》改为两幕，但总体依然不长。

《乡村骑士》是马斯卡尼参加创作比赛的获奖作品，这部歌剧以西西里岛的普通乡村现实生活为素材，讲述了一段四角恋的悲剧，和当时常见的高贵题材相比，堪称歌剧界的一股清流。《乡村骑士》对歌剧界的影响不亚于之后法国巴比松画派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绘画对绘画艺术的影响，相比威尔第等人的主流歌剧，《乡村骑士》无疑更质朴动人。值得一提的是，《乡村骑士》中的一首《间奏曲》是流芳百世的名曲，并被多次用到电影中。

列昂卡瓦罗则是在《乡村骑士》的感染下，创作出了《小丑》。此后这两部作品经常被一起提出，甚至经常被一道灌录在一张唱片中，内行也会用“Cav & Pag”的简称来指代它们。《小丑》根据真实谋杀案件改编，据说列昂卡瓦罗从他当法官的父亲处听来。《小丑》最吸引人以及最创新的地方在于，它是一部“戏中戏”。剧团的一对演员夫妻分别饰演剧团剧目中的男女主角，男主角是小丑，女主角是小丑的妻子，在剧目中，女主角准备与情人私奔。而剧中的“现实生活”中，女主角也红杏出墙，确实准备和现实中的情人私奔，这件事被“现实生活”中的丈夫发现了，于是丈夫逼问妻子情夫的名字是什么，但因为戏马上就要开演，两人只好回去演戏。在戏中，最终的剧情也是小丑逼问戏中的妻子，情夫姓甚名谁，就在这时，现实与戏剧融合了，戏里的观众不断欢呼。因为演得太逼真了，在观众的嘲笑和煽动中，最终小丑分不清楚现实和舞台，用刀杀死了妻子，观众的欢呼达到顶点。《小丑》的剧情极具想象力，对演员演技的挑战极大，充分满足了19世纪末观众对剧中强烈戏剧性的观赏需求，刻画了一个内心饱

受屈辱，并将这种屈辱转化为暴力输出的形象，塑造了后世对小丑恐怖形象的认知。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认知中，小丑也常是骇人形象，譬如电影“蝙蝠侠”系列中的小丑，恐怖片“电锯惊魂”系列中的玩偶小丑等。这类关于小丑恐怖形象的文化认知，其根源就是列昂卡瓦罗的写实主义歌剧《小丑》。

马斯卡尼在读书期间有个厉害的室友，可说是为意大利的歌剧艺术画上了完美句号，此人便是普契尼。在观赏了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后，普契尼深受感染，决定成为一名歌剧作曲家。其作品中的一些唱段，至今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如《贾尼·斯基基》（[5]）中的《我亲爱的爸爸》，其地位几乎可与贝利尼的《圣洁女神》相媲美；《托斯卡》（[6]）中的《为艺术，为爱情》以及《图兰朵》（[7]）中的《今夜无人入眠》等，都是歌剧唱段中的经典之作。普契尼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世人对于“什么是歌剧”的听觉认知。不论题材、听感还是谱写方式，普契尼的歌剧都已开始接近20世纪的现代音乐。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走进剧院，歌剧的艺术形式也变得愈发通俗，这也是为何有人戏称普契尼是歌剧中的“百老汇”。

普契尼音乐中不乏东方元素，如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艺伎乔乔桑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并育有一子，结果丈夫始乱终弃，乔乔桑在把孩子交由丈夫与丈夫的新夫人照顾后，选择自杀的故事。普契尼最后一部未完成的歌剧《图兰朵》讲述的则是中国元代的故事，直接引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主旋律，虽然该剧对中国文化曲解甚深，但当时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可见一斑。这其实也是当时欧洲的一大潮流趋势，许多音乐家在创作时都会借鉴东方的艺术元素，有的甚至使用中国的五声音阶进行创作，法国的德彪西是其中典型。

与前辈大师相比，普契尼的创作手法其实并不复杂。他善于用“平地起金句”的手法让观众达到兴奋点：在经典唱段中，通常会以一系列平淡铺垫开头，在抓住情绪走向后，突然冒出一句极其优美的“金句”唱段。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在感染力方面却屡试不爽，但若把普契尼的经典唱段凑起来听，会听出一定同质化。这种感受罗西尼歌剧中也有，但罗西尼的做法更复杂。普契尼的创作手法相比前辈大师，已经开始展现20世纪流行音乐的特征。

普契尼的歌剧创作有一定脸谱化倾向，在艺术创新上略显逊色。他经常为作品中的女主角安排悲惨结局，歌剧《波希米亚人》（又名《艺术家生涯》）、《蝴蝶夫人》以及《托斯卡》等，都是在一段凄惨的自述唱段后，以女主人公之死宣告结束。这种脸谱化的创作虽然艺术价值不够高，但便于宣传，加深了人们对普契尼的印象，以上三部歌剧都是全球范围内上演频率排行前十的歌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音乐的发展趋势：随着

经济繁荣，信息的不对称性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普罗大众频繁地接触到歌剧，为迎合观众需求，歌剧的形式必须发生转变，预示着流行音乐逐渐占据主流。

纵观意大利歌剧的发展，自巴洛克时期始的正歌剧，经过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到莫扎特歌剧，再到罗西尼等人复兴的美声歌剧，威尔第时期巅峰的戏剧歌剧，一直发展到以普契尼收尾的真实主义歌剧，整个历程与德奥音乐的发展大规律也可一一对应：巴洛克时期的正歌剧繁复、浮夸、过分地炫技并充满装饰性，对应德奥巴洛克音乐的复杂和充满装饰音；经过歌剧改革后以罗西尼为首的美声歌剧，追求声音的高质量，总体抛弃了正歌剧时期浮夸的弊病，就好比德奥音乐进入古典主义时期后的简洁而富有结构感；威尔第的戏剧歌剧注重戏剧冲突以及情感表达，对应浪漫主义时期德奥音乐追求恢宏效果以及整体艺术的表现力；普契尼等人的真实主义歌剧关注生活中的点滴，更亲民并开始拥有现代性，对应着19世纪后半叶在维也纳流行的以施特劳斯家族为代表的大量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的创作，无独有偶，约翰·施特劳斯写过一部轻歌剧《蝙蝠》，与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从听感和剧情上大有共通之处。

把这样的大规律与美术界的发展规律进行比较，也可一一对应。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后，绘画进入写实主义思潮，法国的库尔贝明确地说自己是“写实主义画家”；巴比松画派则走到乡间描绘农村生活；英国的拉斐尔前派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用心灵创作；俄罗斯的巡回展览画派也走向民间，描绘属于俄罗斯的艺术。这类写实主义倾向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全面开展，社会阶层的变动，以及一定的全球化趋势。信息不对称一直在被打破，艺术家对周边生活环境与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认知也更为全面深入。和开篇说的一样，艺术风格的流变与发展，究其根本，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政治、经济、科技全方位地影响着艺术。因此，不必将艺术从社会中单独剥离出来，艺术本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所有不同方面组合起来，才是人类文明本身。

至此，意大利与德意志二元对立的逻辑主线大致论述完毕。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形而上”的“道”指支配现实世界具体事物运动和变化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法则，“形而下”的“器”则是现实本身。意大利艺术表达得更多的是“形而下”的内容：想表达对基督的信仰，就雕一尊圣母哀悼基督；想了解《圣经》的神圣故事，就把《创世记》画下来；想歌颂人世情爱，就用歌词唱出感情，且唱得美妙动听。德意志艺术“形而上”的成分更多：想加深对上帝的信仰，就写一首管风琴作品，在教堂里听着音乐，默默祷告；想表达爱意，就把爱恋变成思绪，融入纯音乐的创作中，写下无数奏鸣曲。

两种艺术表达方式并无高低之分，只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感染着人

们。德意志艺术是具有逻辑性的、充满哲学智慧与思辨的艺术。它感染人的方式是给人无尽的激励、宏大的思想，让人感受艺术之“崇文尚理”，让人不断前进、奋斗，好像在父亲伟岸的身影中前行。德意志艺术是站在高处、天上来的艺术——朝闻道，夕死可矣。意大利艺术则是具有同情心的、充满人间温情与抚慰的艺术，它感染人的方式，是给人无尽的关怀、诚挚的话语，让人感受艺术之“善解人意”，让人不再忧心、不再疲倦，好似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休憩。意大利艺术是陪伴左右、常在人间的艺术——此心光明，夫复何求？

[1] 《茶花女》（*La Traviata*）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53年三幕歌剧

[2] 《西西里晚祷》（*Les Vêpres*）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55年五幕歌剧

[3] 《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波特罗·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1888年独幕歌剧

[4] 《小丑》（*Il Pagliacci*）鲁杰罗·列昂卡瓦罗（Ruggero Leoncavallo）1892年两幕歌剧

[5] 《贾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917—1917年独幕喜歌剧

[6] 《托斯卡》（*Tosca*）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99年三幕歌剧

[7] 《图兰朵》（*Turandot*）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924年三幕歌剧

13 马奈与莫奈：写实主义与印象主义艺术

（一）虚幻与真实

进入19世纪，工业化全面兴起，信息与交通愈渐发达，在政治结构及社会体制方面，欧洲国家进入了相对多变的时期，这使得人们愈发能关注到自身阶层之外的事物。

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起便未平静过，一路经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及普法战争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此后，德意志地区大小国家各自为政，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统一声浪始于19世纪初，至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罗马教皇从此丧失对世俗世界的统治力，逐渐统一后的意大利以强国形象活跃于世界舞台，展开了对欧洲以外土地及资源的争夺。此时的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殖民扩张如火如荼。俄国作为列强之一，也频繁侵略北欧及亚洲。

总体上，欧洲各国的发展和进步，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便未停止，19世纪进入加速期，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剧烈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思想上最敏感的群体，艺术家自然不会无动于衷。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全欧洲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艺术浪潮，这便是著名的“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指的并不是画面上写实，并非追求画得“像”，而是所画题材的“真”，真人、真事、真情实感。写实主义绘画的领头人是法国画家库尔贝。

库尔贝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奥尔南，离瑞士很近，虽是富农，但家族血液里似乎充满反抗精神，库尔贝的外公就参加过法国大革命。

在艺术创作上，库尔贝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库尔贝在20岁时到巴黎发展——去巴黎几乎是那个时期法国艺术家的必然选择，至19世纪末则几乎变成全世界艺术家的必然选择。库尔贝最开始也选择在画家工作室做学徒，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学院派的绘画理念，于是就带着画具终日泡在卢浮宫，临摹前辈大师作品。直到今天，去卢浮宫参观，还是会碰到不少

这样的人——不知道是美术学院学生、独立画家，抑或只是绘画爱好者，他们会带着成套画具，坐在某幅古代大师杰作前专心临摹。

库尔贝之前，法国绘画界的主流，是以安格尔为首的新古典主义学院式绘画以及以德拉克洛瓦为首的浪漫主义绘画。但对库尔贝来说，这两批艺术家的创作都很“没劲”，明明周围的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值得刻画和描绘的对象，为何要整天画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说得直接些，为何要画“假”的东西？

库尔贝的观点一针见血。新古典主义绘画和浪漫主义绘画，其内容大致分几类：新古典主义绘画中，除古代贤者及英雄故事外，歌颂当权者的威严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毕竟学院是政府资助的，譬如最具有影响力和认知度的拿破仑肖像画作，都出自大卫与安格尔之手；浪漫主义则喜欢画充满幻想以及情绪强烈、情节起伏巨大的题材，如德拉克洛瓦的《撒丹纳巴勒斯之死》和《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抑或是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和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一类的社会大事件。占据当时美术界主流思潮的，是对聚光灯下的主题进行描绘，画有名的、有寓意的、立意高远的主题。正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的漠视，所以描绘的总是古代的、伟大的甚至虚幻的东西。在库尔贝看来，现实世界要比古代故事和幻想中的虚无缥缈有意义得多。因此，库尔贝的“写实主义绘画”描绘的就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库尔贝描绘的许多人物，甚至是社会底层人物。

库尔贝最著名的画作之一，是《采石工人》（M1），可惜二战时，在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中被毁。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工人身边还有个少年，小小年纪就要被迫做如此粗重的工作讨生活。这是库尔贝在路边偶然遇到的景象，他觉得这种景象很是难得，能把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展现出来，于是邀请这两位采石工人第二天到画室做模特。这件作品切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虽然迅猛发展，但也伴随着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采石工人》被认为是库尔贝所创作的，代表写实主义的第一幅杰作。



M1↑

/

《采石工人》（*The Stone Breakers*）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65cm × 257cm 布上油画 1849年

与前辈艺术家不同的是，库尔贝已有关于自己的艺术具体属于哪种“主义”的认知了。库尔贝之前的艺术家，有的只是对绘画理念的观点和偏好，并未上升到具体风格、主义的程度，如安格尔们认为线条该当是绘画的根本，提香们则觉得表现色彩的变化才是绘画的首要任务，这些都是艺术理念和审美倾向，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对艺术的具体认知。而库尔贝则明确地称呼自己为“写实主义画家”。1855年，库尔贝的两幅作品《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M2a/M2b）被当时的万国博览会评选团拒绝，库尔贝一怒之下，在博览会的展览厅附近，自己搭了个棚子，取名为“写实主义展馆”，展出了自己的40件作品。

库尔贝的绘画技法偏向于“广义的浪漫”“色先于形”这一脉，并不很注重透视法，在库尔贝的画中也不会看到安格尔那样明确的线条。库尔贝在风景画题材的挖掘上也相较法国同时期的画家要深入。库尔贝在激进的艺术表达上走得很远，创作了许多在内容上充满争议的作品，例如《世界起源》与《睡眠》被批评为充满色情意味：《世界起源》因为画面过于夸张大胆，一直到1988年才被公开展出，《睡眠》则有描绘女同性恋者床第之欢的嫌疑，1872年展出时甚至有人报警。



M2a↑

/

《画室》（*The Artist's Studio*）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361cm×598cm 布上油画 1854—1855年法国巴黎 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M2b↑

/

《奥尔南的葬礼》（*A Burial at Ornans*）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315cm×668cm 布上油画 1849—1850年法国巴黎 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库尔贝创作出如此离经叛道的绘画主题，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为了表达某种主张，只有用近乎“矫枉过正”的方式，才能获得足够关注。库尔贝的夸

张正是如此。他希望被关注的是作品中反传统的一面：传统主张优雅，库尔贝就主张笨拙；传统主张适度，库尔贝就主张奔放。这在库尔贝的自画像作品中也可可见一斑：若把库尔贝的自画像与历史上著名的，如丢勒、伦勃朗的自画像放在一起，便会清楚地发现，库尔贝创作自画像时，或许并非想画自己，而是通过自身的姿势、状态，表达自我的、真实的存在感。因为只有当你做出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表情，自画像才是真实的，而不是“摆拍”、想象中的形象。（M3a/M3b/M3c）也许是家族传承，库尔贝是位极其关心政治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一向致力于表现社会问题，尤其是要揭露社会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1871年，库尔贝参与了“巴黎公社”，为公社运动在艺术宣传上助力。巴黎公社失败后，库尔贝被捕入狱，后被朋友保释，并流亡瑞士。

至此不难看出，库尔贝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其实已和现代艺术家有许多相近之处。他们都非常关心社会，常以反战、反工业化，以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为主题进行创作，这在库尔贝之前并不多见。学院建立之前作坊式经营的艺术家，他们身上“手艺人”的标签占比更多，做的是具有艺术性的“活计”。学院建立后，艺术家地位从“手艺人”



M3a↑

/

《自画像》（*Self-Portrait*）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52cm × 41cm 板上油画 1498年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M3b↑

/

《戴帽子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Plumed Hat*)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89.5cm × 73.5cm 板上油画
1629年私人收藏



M3c↑

/

《绝望的男子》（*The Desperate Man*）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45cm × 54cm 布上油画 1843—1845 年私人收藏

上升到“学者”层次，创作转变为地道的艺术品，艺术也从“手艺”变成“学科”，艺术家开始在特定方向不断挖掘，屡创新高。学科是停留在象牙塔中的门类，而库尔贝这样的艺术家不需要学院做支撑，他们直接接触社会，关心的问题更广泛。当然也得益于当时信息业愈发发达，艺术家接触公众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报纸、杂志等媒体行业的兴起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艺术中去，艺术家的职能更为丰富，地位也上升到思想家范畴。从这点看，到高层次后，学科之间界限并不明显，无论任何领域，只是用不同方式改变世界而已。

要真实刻画社会和生活，除开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还有许多主题可供选择。只要是取材于真实世界的、正在发生的、与常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都算写实主义。于是便出现了“巴比松画派”，他们以刻画乡间风景与民间风情为己任。

巴比松画派，于1830年至1840年的法国兴起。该画派活跃的时间甚至比库尔贝早不少，因此，巴比松画派的“写实主义”与库尔贝的“写实主义”，实是“不谋而合”，并无严格的从属或相互影响的关系。恰是在这一时期，全欧洲范围内都流行着写实主义，这是当时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结果。该画派之所以得名“巴比松”，是因其中代表画家都住在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画家有着比较集中的艺术倾向：绘画应描绘更多真实事物。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一批画家厌倦都市的纸醉金迷，更愿亲近自然，热衷于走到乡间捕捉自然风景与乡村生活。他们离群索居，来到风景秀美的巴比松，即枫丹白露森林的入口处。最具代表性的巴比松画派画家有三位，分别是卢梭、柯罗以及米勒^[1]。

卢梭是巴比松画派最主要的创始人及领导者，他的风景画是在写生环境下创作的。在卢梭之前，诸如古典主义风景画奠基人洛兰、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庚斯勃罗等，他们笔下的风景多为想象中的完美范式，哪怕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透纳与康斯特布尔已大大打破这种范式，但其作品几乎还是在画室中完成，充满想象成分，尤其是透纳笔下的虚幻场景，是浪漫主义风景画最高水准的呈现。卢梭的绘画作品（M4），虽传世数量不多，且有大量未完成作品，但从写生创作、走到户外去、画看到的风景，这样的创新之举看来，卢梭的艺术无疑有重大意义。这提前揭示了印象主义绘画的创作理念：走到自然中，画看到的东西，所见即所得。

柯罗是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和肖像画家。柯罗出身古典画派，性格豁达，只想认真创作，对派别之间的斗争毫无兴趣，这一点倒是与库尔贝形成鲜明对比。

柯罗的风景（M5）总会蒙上一层淡淡的银灰色，画面整体色彩饱和度很低，给人以内敛沉静的感受。柯罗的审美偏好再次展现了写实主义所秉持的真实——透过艺术家双眼所看到的真实，这便解释了为何柯罗虽是写实主义画家，但在他质朴的绘画主题框架下，画面散发出来的个人审美却是强烈的。可见写实主义追求的真实只是题材上更贴近现实生活，并非描绘技法的写实。这种艺术家眼中的真实，恰恰是后世印象主义艺术家们所追求的。



M4↑

/

《树丛风景》（*Landscape with a Clump of Trees*）西奥多·卢梭（Théodore Rousseau）41.6cm×63.8cm板上油画184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M5↑

/

《阿弗雷村》（*Ville d'Avray*）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49.3cm × 65.5cm 布上油画 1865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批评者们认为柯罗的作品以银灰色调为主，同质感太强，但优秀的艺术家并不只流于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抑或奇技淫巧般的创新，而是即便在雷同表面下，也有极具魅力与特色的点睛之笔。如前文所述，莫扎特的音乐便是这种至高的艺术。

在巴比松画派中，成就最高的是被称为“法国近代史中最受法国人民喜爱的画家”的米勒。米勒善于描绘乡村生活，这与他农民家庭的出身有关。青年时代的米勒当过农民，对乡村生活相当熟悉。米勒早先来到巴黎学艺，但因出身贫寒，所以“土里土气”的他，常受老师与同学排挤。也正因与大都市格格不入，导致米勒开始专注挖掘熟悉的乡村题材。米勒专注于刻画乡村生活场景，譬如名作《播种者》《拾穗者》《晚钟》（M6a/M6b/M6c）等。

这些都是极其平凡的、每天都会发生在农村的场景，但在米勒笔下，人们能感受到强烈的、质朴的、返璞归真的舒适与放松感，并深深为这质朴所感动。远离巴黎的纷扰和嘈杂，来到乡间，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亲切，对

内心焦躁的人们来说，无疑是种解放。



M6a↑

/

《播种者》（*The Sower*）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01.6cm × 82.6cm 布上油画 1850年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米勒的《晚钟》是笔者最喜爱的画作之一。19世纪时，宗教主题已不再是创作主流，但《晚钟》却感人至深。对于乡下村民来说，他们接触不到城市里学者们的雄辩与论著，也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去理解宗教和教会，他们只有不怀疑，只有默默地相信着，这种淳朴的信仰便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快乐源泉。也许他们手里正在忙着农活，但只要晚祷钟声响起，就会立刻放下手中活计，在田野中双手合十，向上帝祷告。这是多么淳朴的感

情。

艺术之间常有不谋而合的现象，偶然发现会让人为之欣喜：上一章中介绍的真实主义歌剧《乡村骑士》，描写西西里乡村的四角恋故事，其中一段《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更是传唱千古的名曲。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从精神内涵上，《间奏曲》与米勒的《晚钟》配在一起可谓相得益彰，都是描绘乡村生活中的质朴情感。《间奏曲》中小提琴奏出引子，好似《晚钟》中远处夕阳铺散的光芒，温暖而柔和；加上竖琴点缀，比作晚祷钟声也十分贴切；再之后全曲高潮，那种感动和深情，也像《晚钟》中所表现农民夫妇的信仰一般——他们双手合十，专注、虔诚地祷告着。



M6b↑

/

《拾穗者》（*The Gleaners*）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84cm×111cm布上油画1857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M6c↑

/

《晚钟》（*The Angelus*）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55.5cm × 66cm 布上油画 1857—1859 年 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1] 有些学者不把柯罗、米勒列入此画派。——编者注

（二）复古与创新

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殖民策略的全面展开，19世纪的英国进入了史上最强盛的维多利亚时期。彼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堪称“日不落帝国”。但社会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也制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极端的贫富差距和随处可见的血汗工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英国屡见不鲜。这一时期也有大量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揭示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表面光鲜，实则问题重重的19世纪的伦敦。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英国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绘画流派，他们主张反工业化、反现代化、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这与法国写实主义有类似的地方，但他们绘画的主题比写实主义还宽泛不少。这便是英国19世纪中叶名噪一时的拉斐尔前派。该组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绘画流派，不是“School”，而是“Brotherhood”，直译即“兄弟会”。拉斐尔前派创立时由七位画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三位是罗塞蒂、米莱以及亨特，三人都是美术学院学生，因拥有共同艺术理念组成团体。

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追求的也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和法国写实主义的真实并不相同。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追求的是主观的真实：可以画宗教主题的绘画，但表达方式要真实，切勿像前代宗教画一样，把耶稣画得神圣不可侵犯。例如米莱创作的《基督在父母家》（M7），这幅画作不看名字，明显只是一幅描绘木工家庭生活场景的画作，画面并未如文艺复兴时，在耶稣和圣母头顶加上光环或刻意神化。相反地，为了追求真实，让画面中孩童耶稣手上的鲜血逼真，米莱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在模特手上。



M7↑

/

《基督在父母家》（*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86.4cm × 139.7cm 布上油画 1849年 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

拉斐尔前派主张的真实，是让真实的人物处在真实的场景中，让艺术家灵性的真情实感流淌出来。拉斐尔开始的学院画作，人物动作、构图、光线都被一一设计过，哪怕巴洛克时期描绘瞬间的画作，也是经过“设计”的瞬间，把动作摆好、光线布好，一切准备就绪，达到完美才按下快门。相比之下，拉斐尔前派将正在发生的场景描绘出来的作画方式，构图也许不平衡，光线可能显得诡异，人物动作甚至别扭难受，但这正是拉斐尔前派所追求和主张的灵性的真实。在这种艺术理念的指导下，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包括宗教、神话故事、戏剧、日常生活等等。只要绘画方式是真实的，内容并无局限。

拉斐尔前派对于“真实”的追求，似乎比库尔贝主张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对拉斐尔前派的艺术来说，库尔贝们的写实主义依然流于表面，并无深刻精神上的追求。而拉斐尔前派艺术家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灵性，甚至是神性，是发乎心灵的纯粹，是脱离传统逻辑的真挚表达。为此，他们向中世纪的艺术寻求灵感。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的人信仰纯粹，并未受到实证主义逻辑的影响，这种单纯的信仰，恰恰是灵性的体现。与之类似的，追求纯粹灵性并超乎逻辑之外的艺术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艺术中达到高峰，原始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都从中汲取过灵感。

拉斐尔前派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中世纪式的构图方法，画面缺乏足够平衡

感，色彩极为艳丽、饱和度高。拉斐尔前派引领了新一轮复古，此处的“古”指拉斐尔之前、中世纪的古代潮流，但在技术上较之古代进步太多。

罗塞蒂善于描绘女性之美，作品展现唯美主义追求。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珀尔塞福涅》以及相关系列作品（M8a/M8b），画中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有标志性“大红唇”，眉宇之间略显男性的英武之气。据说这位经典的女子形象源于一名建筑师的妻子，她同时也是罗塞蒂的情人。



M8a↑

/

《珀尔塞福涅》（*Proserpine*）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25.1cm×61cm布上油画 1874年英国伦敦 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



M8b↑

/

《白日梦》（*The Day Dream*）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57.5cm×92.7cm布上油画 1880年英国伦敦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9↑

/

《伊莎贝拉》（*Isabella*）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尺寸不详布上油画1849年英国利物浦步行者美术馆（Walker Art Gallery）

米莱是少年天才，11岁便被学院录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院学生，比英国历史上公认的绘画天才透纳还早了三年。米莱善于设计瞬间，例如代表作《伊莎贝拉》（M9），构图毫无端正之感。最令人奇怪的是画面左侧占据主导地位的男子在伸脚踢狗的屁股，整个人的身体是往前倾的，让人担心他的凳脚会不会压到躺在凳子下的另一只狗。宾客喝酒的姿势也很诡异，跷着兰花指。画作以晦涩的方式讲故事：穿粉色衣服的仆人与右侧穿银色服装的伊莎贝拉有私情，伊莎贝拉的哥哥洛伦佐反对，用脚踢着象征仆人的狗的屁股。画面充满讽刺意味，久看之下不禁深感诡谲，与学院追求的“中正仁和”毫无关系。再如米莱的名作《奥菲莉娅》（M10），描绘的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场景。奥菲莉娅唱着歌跌入水中，将要死去，然而她自己并无知觉，或者奥菲莉娅已经死了，只是一直保持歌唱状态。该场景在莎翁戏剧中并未被演出来，而是借旁人之口转述。米莱用真实的、还原文学描述的方法把这个场景表达出来，不加任何掩饰，不加诗意美化，画面效果震撼人心，被认为是拉斐尔前派创作的第一名画。



M10↑

/

《奥菲莉娅》（*Ophelia*）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尺寸不详布上油画1852年英国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Tate Modern）

亨特，是拉斐尔前派中乐于描绘宗教主题的艺术家，他通过描绘宗教主题来表达反工业化情绪。例如代表作《良心觉醒》（M11），画面中描绘了一个情妇形象的女子，她的手上戴满了戒指，唯独没有婚戒。这幅画表现了偷情的女人想要改变生活的现状，要起身从情夫怀抱中挣脱。这幅画要与

另一幅《世界之光》（M12）一起欣赏。

《良心觉醒》中的女子像是听到叩门声一般，满脸期待，而叩门的正是《世界之光》里的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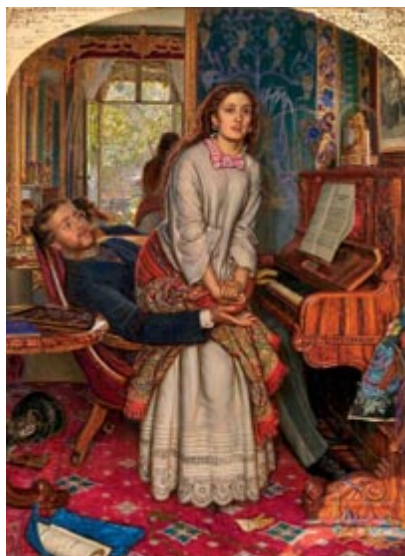
写实主义浪潮也影响了遥远的俄国。俄国的主流宗教与欧洲的不同，是东正教，历史也较复杂。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中心从君士坦丁堡逐渐转移到了莫斯科。

自15世纪开始在西欧、南欧兴起的文艺复兴浪潮并未波及俄国，这里整体文化艺术水平较落后，甚至在社会结构上，直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才迎来农奴制度的全面解体。19世纪中期，俄国艺术家开始大规模学习欧洲艺术，大量的艺术家前往法国巴黎学习深造。至此，俄罗斯艺术才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俄国直到18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正规的皇家美术学院，但与17世纪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如出一辙，俄国皇家美术学院也将绘画重点放在帝王将相、神话故事及歌颂君权等所谓“宏大主题”上，距离普通民众十分遥远。

1863年俄国皇家美术学院颁布了毕业作品命题：以神话故事中死神聚宴的场面为主题。以克拉姆斯科依为首的14位学生站出来公开反对毕业命题，认为应自由命题。他们的主张被学院拒绝，14位学生退出皇家美术学院，自发组织成立了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后来克拉姆斯科依与几位画家一起创立了巡回展览画派。

巡回展览画派以“让俄罗斯了解俄罗斯艺术”为宗旨，用艺术来展示俄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这无疑是典型的写实主义倾向。巡回展览画派打破了只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进行美术展览的惯例，足迹遍布俄国，作品以平民生活和自然风景为主题，展现日常生活中的艺术。



M11↑

/

《良心觉醒》（*The Awakening Conscience*）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76cm×56cm布上油画1853年英国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Tate Modern）



M12↑

/

《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 125.5cm×59.8cm布上油画1851年英国牛津基布尔学院
(Keble College)

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艺术家有克拉姆斯科依、列宾、列维坦及苏里科夫等人。

克拉姆斯科依追求的写实，是人物内心状态的真实展现。他擅长人物肖像画，能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克拉姆斯科依最著名的画作之一是《荒野中的基督》(M13)，描绘了基督在旷野中三次经受魔鬼试炼的《圣经》经典故事。在克拉姆斯科依之前，几乎没有画家描绘过在试炼中耶稣焦虑的一面。在传统画家的描绘中，耶稣永远是从容的、神圣的。而《荒野中的基督》中的基督形象，若不考虑是基督本人的话，不难感受到画中人物的焦虑、忧愁及内心的交战，这便是克拉姆斯科依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展现了基督作为人的一面。

列宾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俄国画家之一，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M14)的介绍文章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

列宾生于乌克兰，其作品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对俄国底层人民艰苦生活的描绘，控诉沙皇暴政，二是将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当作心中的绿洲。在其代表作《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M15)中，列宾描绘了查波罗什人写信嘲讽苏丹王时开怀大笑的场景。查波罗什人是哥萨克人的自治组织，哥萨克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固有印象，好比美国的西部牛仔一般，放浪形骸、豪情万丈、快意恩仇。这幅作品讲的是，在一场战争中查波罗什人明明打了胜仗，对方的苏丹王居然要他们投降，查波罗什人自然觉得这种要求荒谬无理，于是写信嘲讽。历史上确有其事。这种开怀大笑的场景在西方绘画中是难以见到的，是画面情绪达到热烈顶点的难得佳作，也象征着列宾向往自由的天性。



M13↑

/

《荒野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Wilderness*）伊凡·克拉姆斯柯依（Ivan Kramskoy）180cm × 210cm 布上油画 1872年 俄罗斯莫斯科特列季科夫美术馆（Tretyakov Gallery）



M14↑

/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伊里亚·叶菲莫维奇·

列宾 (Ilya Yafimovich Repin) 131cm×281cm 布上油画 1870—1873年
俄罗斯圣彼得堡 俄罗斯博物馆 (Russian Museum)



M15↑

/

《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The Reply of the Zaporozhian Cossacks to Sultan Mahmoud IV*)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 (Ilya Yafimovich Repin)
217cm×361cm 布上油画 1878—1891年俄罗斯圣彼得堡 俄罗斯博物馆
(Russian Museum)

大体看来，列宾对俄国的描绘通常是负面的。在名画《伊凡雷帝杀子》(M16)中，列宾描绘了历史上一位暴虐的君主失手杀死亲生儿子的戏剧化场景。列宾集中抓取了人物表情和动作的细节，在情感刻画上甚至比一众意大利的古典大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伊凡雷帝呆滞、惊恐的眼神，是沉浸在丧子之痛中，还是忧心丧失了唯一的继承人，抑或是要让观众有幸灾乐祸的反应？



M16↑

/

《伊凡雷帝杀子》（*Ivan the Terrible and His Son Ivan on November 16, 1581*）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ya Yefimovich Repin）
199cm×254cm布上油画1885年俄罗斯莫斯科特列季科夫美术馆
（Tretyakov Gallery）

巡回展览画派中，成就最高的是列维坦。在俄罗斯，列维坦在绘画界的地位犹如柴可夫斯基在音乐界一般崇高。列维坦深受法国写实主义影响，对巴比松画派柯罗画作中银灰色的高级气息推崇备至，而恰好俄罗斯自然风景的色彩饱和度偏低，植被的颜色偏“苍茫”一系，天然给人灰蒙蒙的感觉，自然便成为列维坦描绘的绝好对象。

列维坦常为风景画赋予深刻寓意，代表作《弗拉基米尔路》（M17），乍看是一条普通的土路，但这条路对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有非凡意义。这条弗拉基米尔路是许多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去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路旁象征着希望的十字架已然破败，表达了西伯利亚是一个上帝都管不到的绝望之所，然而远处列维坦安排了地平线的曙光，或许是象征着希望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同情。据说当年这幅作品展出时，不少知识分子在看到后都感动落泪。

进入19世纪中叶后，写实主义浪潮在全欧洲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这不能单纯理解为艺术风格的发明创造，而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及资

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落后年代中，人们去一趟周边城市都实属不易、价格不菲，更遑论出国旅行，因此大部分人能够接触到的人与事，都同属一个阶层，人们缺乏对社会不同阶级现状的认知。进入19世纪，交通、资讯都更为发达，社会也变得更自由，艺术家作为在思想上最敏感的一群人，自然容易关注到社会发展及其伴随的问题。

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艺术家的订单主要来源于教会及贵族、富人，所以在题材上，艺术家并无太多选择权，创作也多少是为生计。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学院的长期培养，艺术的创作已变得更纯粹，连艺术的商业模式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艺术家开始创造纯粹的艺术品，根据喜欢的题材和个人的艺术理念进行创作，再由藏家买下，于是艺术家对作品主题开始拥有选择权。若还是按照富人和政府的需求创作，大概永远不会有描绘世间疾苦的画作问世。艺术风格的变化，永远离不开社会的变迁，从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便一贯如此。



M17↑

/

《弗拉基米尔路》（*The Vladimir's Road*）艾萨克·列维坦（Isaac Levitan）79cm×103cm布上油画1892年俄罗斯莫斯科特列季科夫美术馆（Tretyakov Gallery）

（三）知识与感官

对并无太深艺术史知识储备的大多数人来说，除开文艺复兴，还能有所耳闻的大约便是印象主义了。凡·高，以其天价画作以及充满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几乎成为这个领域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凡·高是后印象主义艺术家，其艺术理念与印象主义有本质区别。

印象主义艺术的画作常给人模糊不清的观感。“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让人以为印象主义艺术家在创作时是纯凭印象为之，而印象总是模糊，再加上画作的模糊观感，便导致人们对印象主义的艺术理念存在一定误解，认为从印象主义开始，艺术界便不追求写实了。

印象主义艺术家们大约活跃于库尔贝之后，在19世纪后半叶。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总被官方沙龙、展会拒绝。印象主义的集中亮相是1874年，印象主义艺术家自发举办了独立沙龙。在此次沙龙中，展出了被认为是印象主义开山之作的《日出·印象》（M18）。

一位记者觉得该画作太过简陋，就用讥讽批评的态度给这批艺术家起了“印象主义者”的称号，印象主义绘画因此得名。巴洛克、洛可可甚至早先的哥特风格，均是由这样贬义的称呼得来，各个时代的评论家似乎都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印象主义绘画的核心艺术理念，与所谓的依靠印象作画截然相反，恰恰是眼见为实。

印象主义画家们认为，所谓真实，只来源于双眼的观察，即来自反射到眼睛里的光线。若想用画笔描绘真实，便要把光影画下来，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所以印象主义艺术，是描绘光影的艺术。不能因为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感觉是模糊的、不像的，便认为印象主义追求的不是写实，恰恰相反，从追求真实的意愿看来，印象主义所追求的是比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更直接的真实。大家目标一致，只是对于真实的定义不同。



M18↑

/

《日出·印象》（*Impression, Sunrise*）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
48cm × 63cm 布上油画 1872年 法国巴黎马蒙丹—莫奈博物馆（Marmottan Monet Museum）

这是古典绘画所追求“知识”与印象主义所追求“感官”之间的二元对立。自文艺复兴以来，绘画艺术中有许多知识和技巧被总结和发明出来。技巧上，如达·芬奇发明的晕染法、明暗法，知识方面则有透视、解剖，风景画中则有对背景色、前景色搭配等各类知识。这样的技巧和知识被学院集中总结归纳，并传授给学生。但要注意的是，知识，未必是真实的，知识是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后所总结的规律，再用这些规律去对未知的、将要发生的事进行预测，这便是知识做的事情。但在描绘真实的时候，若由知识左右，反而容易描绘出虚假的真实。例如印象主义在进行户外主题创作时，通过观察，艺术家们发现阳光中的阴影并非灰黑色，而是伴随着蓝灰、紫灰等斑斓的色彩（M19）；在强光照射下，尤其户外，人物形象看上去实际无甚立体感，而是呈色块状。这些是依靠知识的绘画从未做到过的细节认知，是传统古典绘画未曾关注的。



M19↑

/

《干草堆·雪景》（*Grainstack, Snow Effect*）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66cm×93cm布上油画1891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莫奈曾说过一句话，大意为他希望自己是天生眼盲的人，突然间获得了视力，这时他抓起画笔，把看到的東西统统描绘下来。莫奈这句话，精确地诠释了印象主义绘画理念。天生眼盲的人不论对物体的形状或色彩都无任何概念，跟一个天生眼盲的人说太阳是红色的、大海是蓝色的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法理解什么是红色和蓝色，天生眼盲的人不存在对色彩的感知维度。这时若他突然获得视力，举例说，他睁开眼，看见一个西瓜，这时哪怕他曾经吃过西瓜，也不会知道这是一个西瓜，这件物体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绿色的球体上带有黑色花纹而已。当然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是绿色什么是黑色，更不知道什么是球体，也不知道什么是花纹。这种情况下，他对于这个西瓜的视觉知识是零，他有的只是对这个西瓜纯粹的视觉感受。这时你给他颜料和画笔，他能做的只是把他看到的颜色尽可能一五一十地涂抹在画布上。这便是印象主义画家对真实的认知。

为此，印象主义画家主张户外写生，带着画布、颜料、画笔直接坐到要画的事物面前，看到眼前风景迷人，就迅速将其搬到画布上。这与传统绘画方式大不相同。传统作画讲究在画室中深思熟虑，苦思冥想，学院画派甚至要画许多草图后再下笔。印象主义画家能做到这样快速的写生作画，与当时的技术进步有关。印象主义时期，已有挤出即用的管状颜料了，不像原来在使用颜料前要花时间研磨，否则可能在研磨的时间里，已与美景擦

肩而过。

通常认为，马奈是印象主义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奈出身名门，家族中不乏政界、商界巨擘，父亲是法国内务部首席法官，母亲是瑞典国王的教女，家中也一早为马奈安排好了前途远大的工作，但奈何马奈只对艺术真心热爱，义无反顾地成了一名画家。

马奈的绘画基础是较为学院式的，他经受过非常严格的学院派绘画训练，基本功扎实。但马奈从理念上不认同古典绘画，而更认同以库尔贝为首的写实主义。与库尔贝一样，马奈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普法战争时参加过国民自卫军，也与巴黎公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这批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屡屡不被官方沙龙接受，所以他们经常集结在一起举办自己的展览，马奈却均未参加。马奈是自成一派的画家，游走在官方与印象派之间。马奈一方面支持印象主义艺术家创作，另一方面也常把作品拿去参加官方沙龙。马奈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显赫的家世使他不需依附任何人，反倒是别人会来依附他。马奈被称为“印象主义之父”或有印象主义艺术家对其依附之嫌。

1863年，由于参选官方沙龙的落选作品实在太多，据说达到六成，艺术家们意见很大。当时法国处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治下，君主是拿破仑的侄子，即拿破仑三世，算是位开明君主，于是他专为落选艺术家举办了一场“落选者沙龙”，马奈的作品也在此展出。马奈当时最让人震惊的作品是《草地上的午餐》（M20）。

这件作品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一位裸体女性身边坐着两位衣冠楚楚的男子。正常情况下，古典绘画中若出现裸体，则所有人物都呈现出裸体倾向（参考安格尔、乔尔乔涅等人的画作），抑或是“奉旨裸体”的神话人物（如维纳斯，参考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而这幅《草地上的午餐》中为何只有一位女性赤身露体，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合理解释，哪怕是在幻想场景中也很有难度，有人便以淫猥观点来理解这幅画作。《草地上的午餐》尺幅巨大，完全是古典绘画中用来描绘宏大历史画的尺幅。从技法和构图来看，这幅画的不合理之处也有不少，如：远处女子身形过大，若按照透视规律计算，该女子在现实生活中应是身高3米的女巨人；阴影关系和景深关系也极为混乱；笔触十分粗犷，且整幅画似乎并未完成。马奈在创作该作品时的想法和用意至今也没有确切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奈并不认同古典绘画理念，不断用具有冲击力的、争议性的绘画主题来挑战公众以及业内对于绘画的认知界限。再如马奈最著名的《奥林匹亚》（M21）。这幅画与提香、乔尔乔涅笔下的维纳斯动作相似，但比起那两幅作品，《奥林匹亚》不再含蓄，而是异常直接，画中的女性形象甚至展现出傲人的女权主义气息。



M20↑

/

《草地上的午餐》（*The Lunch on the Grass*）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208cm × 265.5cm 布上油画 1863年 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M21↑

/

《奥林匹亚》（*Olympia*）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

130.5cm×190cm布上油画1863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马奈的绘画理念，有一点与印象主义绘画甚为贴合：马奈认为绘画要表达的是人类的视觉感受。但视觉感官本质上是二维感官，古典绘画在二维画布上表现出的三维立体感和景深感，源于透视法以及明暗法的知识。而印象主义绘画的核心观点是，美术应忠实于视觉，要将二维画面描绘彻底，而不是遵循知识去虚拟三维的投影。

马奈的画作笔触粗糙，甚至画面常由大色块构成，更适合远距离观看，有异常真实的代入感。且大多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都有这一特性：眯眼相隔一定距离欣赏，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究其原因，是这批画家不再研究所画对象究竟“是”什么样，而是描绘对象“看上去”是什么样。

在这一点上，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启发了不少印象主义画家。前文曾经用委拉斯开兹画的小狗与扬·凡·艾克画的小狗进行对比，指出委拉斯开兹的画法是高度概括的画法，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小狗绒毛的“趋势”便会赋予小狗毛茸茸的感觉，但近看却看不出具体的狗毛。马奈的大色块，比委拉斯开兹的概括画法更进一步。委拉斯开兹明白他要描绘的是狗毛，因此只是把狗毛概括了。马奈创作时，甚至不在意自己所画事物的属性，而是单纯地把真实形象描绘出来，进一步“抛弃”了知识。

为何印象主义艺术家的画作，远看，甚至眯眼看更具真实感？是因为这些画家们画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视觉。一个人在观察时，眼睛是有聚焦、有重点的，所以真实的视觉有概括的，甚至模糊的部分。马奈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阳台》（M22）。这幅画作用古典绘画的标准看，女子的脸庞可谓毫无立体感可言，但不妨尝试在生活中观察，在烈日照射下，人的面庞确实倾向于白色一大块，猛烈的光照让你无法感受立体感。



M22↑

/

《阳台》（*The Balcony*）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
170cm×124.5cm布上油画1869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成熟的印象主义风格是由几位画家联合“开发”出来的，主要成员有莫奈、雷诺阿、巴齐耶和西斯莱，其中成就最高、坚持最久、影响力最大的，自然是莫奈。莫奈活了86岁，一生创作近1200幅油画作品，晚年甚至得了眼疾，几乎失明，但依旧未间断创作。

莫奈青年时期也在大学里经受过较为正统的美术训练，同马奈一样，他反对古典创作方式，便与上述画家们结成艺术小团体，常到户外写生。普法战争期间，为避战乱，莫奈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有幸欣赏到透纳的作品，并被透纳绘画中对光影瞬间的描绘深深吸引。之所以说透纳是印象主义先驱，就是因为在对光影和瞬间的追求上，透纳无意间迈出了第一步。

战争结束后，莫奈回国，在1874年独立沙龙上，他的《日出·印象》成了印象主义画派诞生的标志。这幅作品源自莫奈回到家乡勒阿弗尔的一系列

创作，共6幅作品，6个场景，其中以《日出·印象》最为著名。这与他在英国看到透纳的日出主题作品不无关系。据说莫奈的创作过程只有半小时，在日出的短暂时间里，莫奈迅速用画笔捕捉了自然。莫奈将这种对于光影和瞬间的追求贯彻了一生。



M23a↑

/

《鲁昂大教堂西侧》（*Rouen Cathedral, West Façade*）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100.1cm×65.9cm布上油画1894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M23b↑

/

《阳光下的鲁昂大教堂西侧》（*Rouen Cathedral, West Façade, Sunlight*）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00.1cm × 65.8cm 布上油画 1894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莫奈对于瞬间和永恒这一组二元对立的认知，表现在他的系列作品中。莫奈为了让人看出他在画作中对光影变化的把握，会对同一主题，选择不同时间进行创作。把这些统一主题的不同画作放在一起，便能看出在不同光影条件下的视觉感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鲁昂大教堂”系列（M23a/M23b）与“睡莲”系列（M24a/M24b/M24c/M24d）。

“鲁昂大教堂”系列画的是一座哥特式教堂，位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鲁昂市。这一系列作品超过30幅，描绘了不同光照环境下大教堂形象的变化。若你有幸看到真迹，不妨靠近画面观察其笔触，就会发现画面上不存

在任何具体线条。完全无法想象莫奈是以什么为指导思想画出这种在局部并无任何线条走向，但宏观却层次分明的观感。

莫奈其他画作也有该特点，譬如“伦敦”系列（M25）和“威尼斯”系列（M26），不过这些作品本身描绘的便是雾气弥漫场景，因为伦敦是众所周知的“雾都”，威尼斯则是“水城”。相比之下，教堂这种线条分明的建筑物能做到不用任何线条，单纯只依靠对光影的描绘，便能塑造出如此生动的建筑形象，可谓神乎其技。



M24a↑

/

《睡莲与日本桥》（*Nénuphars et Pont Japonais*）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90cm×90cm布上油画1897—1899年美国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M24b↑

/

《睡莲》（*Water Lilies*）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89.9cm×94.1cm
布上油画1906年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24c↑

/

《睡莲：清晨的柳树》（*The Water Lilies—Clear Morning with Willows*）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200cm×1275cm布上油画1914—1926年
法国巴黎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



M24d↑

/

《睡莲：两棵柳树》（*The Water Lilies—The Two Willows*）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200cm×1700cm布上油画1914—1926年法国巴黎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



M25↑

/

《伦敦国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 London*）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81.2cm×92.8cm布上油画1900—1903年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M26↑

/

《傍晚的圣乔治马焦雷岛》（*San Giorgio Maggiore au Crépuscule*）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65.2cm×92.4cm布上油画1904年英国卡迪夫威尔士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Wales）

“睡莲”系列是莫奈在巴黎向西约70千米处的小镇吉维尼故居中开始创作的，也是莫奈进入晚年集中创作规模最大的一类主题作品，大小尺寸不一，加起来足有200多幅。其时莫奈已开始拥有不小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可观的收入，可供其建造大型工作室，创作超大尺幅作品。最大的一幅《睡莲》长度超过12米，高达2米以上。在200多幅“睡莲”的系列画作中，莫奈描绘了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的睡莲，让人充分感受光影变化的魅力。可惜的是，莫奈的原意是要200多幅《睡莲》放在一起，在对比中欣赏，但如今它们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个梦想恐怕再也无法实现了。

莫奈对于瞬间的痴迷，简直疯魔。莫奈39岁时，他的妻子死于肺结核，这时的莫奈竟还要抓住瞬间，为妻子画下遗像（M27）。只是我们从画中能感受到，在悲痛的情绪下，莫奈也无法做到客观，画面透着丧乱之气。



M27↑

/

《莫奈夫人去世遗容》（*Camille Monet On Her Deathbed*）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90cm×68cm布上油画1879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
（Musée d'Orsay）



M28a↑

/

《洼塘》（*la Grenouillère*）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75cm × 99.7cm
布上油画186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28b↑

/

《洼塘》（*la Grenouillère*）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66cm×81cm布上油画186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 Stockholm）



M29↑

/

《红磨坊街的露天舞会》（*Dance at Le moulin de la Galette*）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31cm×175cm布上油画1876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雷诺阿与莫奈可谓“一时之瑜亮”，二人是关系要好的朋友，也是印象主义绘画核心圈的艺术家人物。雷诺阿常与莫奈相约写生，在同一处画同一题材（M28a/M28b），二人绘画风格粗看相似，但在笔触、色彩和题材方面都有显著区别。之前提到莫奈的作品笔触粗犷，整体看不到显著线条。雷诺阿则不然，雷诺阿的画作中能看到具有明显走势的长笔触，这导致在观感上，雷诺阿的作品更柔顺。在色彩方面，雷诺阿热衷于用互为补色的色彩组合营造冲突感，给人以鲜亮跳脱之感。莫奈的作品则灰度更高，给人以朦胧之感。从题材上，雷诺阿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代表作有《红磨坊街的露天舞会》（M29）等，而莫奈的画作中，人物则通常只是点缀。

雷诺阿也是一位光影的追随者，他的作品常给人色彩斑斓之感。雷诺阿的人物作品常描绘面容姣好、皮肤细嫩的女性形象。雷诺阿为在画面中展示女性人物皮肤光泽柔软，会用光斑表现皮肤反光，在细微之处对环境光反射进行刻画，例如将环境的蓝绿色映衬在皮肤上，以此表现如镜面般光滑的女性皮肤（M30），这成为雷诺阿独具特色之处。



M30↑

/

《阳光下的裸体》（*Nude in the Sun*）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81cm×55cm布上油画1875年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

(Musée d'Orsay)



M31↑

/

《拿水壶的小女孩》(*A Girl with a Watering Can*) 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Pierre-Auguste Renoir) 100cm×73cm 布上油画 1876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雷诺阿作品中还有着极具辨识度的绿色 (M31) , 甚至可以通过这种独特的绿色来判别雷诺阿的作品。雷诺阿的绿色是一种蓝绿, 但并非纯粹的蓝绿单色, 而是带有细节纹理。

雷诺阿的印象主义绘画理念并不像莫奈一般贯穿一生, 而是随着绘画上的成功, 雷诺阿走访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 受到了文艺复兴艺术的深刻感染。在受到文艺复兴艺术冲击之后, 雷诺阿又展现出回归古典绘画风格的倾向, 例如他的晚期作品《大浴女》(M32) , 人物形象的线条明晰, 刻画精细, 但对光影的处理方法依然保留了之前的风格。

雷诺阿的晚期风格展现出复古倾向, 并不难理解。相比于莫奈, 雷诺阿创作了许多人物画。风景画线条感不强, 所以天然适合莫奈无线条的创作方式, 而人物的线条丰富得多, 要用无线条的方式强行处理, 难度颇大。在雷诺阿之前, 德拉克洛瓦、伦勃朗都有过类似尝试, 结论也很明显: 线条不能百分之百被抛弃。



M32↑

/

《大浴女》（*The Large Bathers*）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15cm×170cm布上油画1884—1887年美国费城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有一位出身学院，自始至终不认同印象主义绘画理念，却被归为印象主义代表人物的画家，他就是著名的“偷窥狂”画家，爱画芭蕾舞者的德加。德加不是标准的印象派画家，但为表现自己的绘画在理念上有异于传统，他曾在入选官方沙龙后主动退出，加入莫奈、雷诺阿等人的印象主义沙龙。

印象派画家虽然经受过学院训练，但他们很早就抛弃了学院派的作画方式。再之后的塞尚、凡·高、高更则更是几乎没有学院根基，可算作“野路子”画家。德加却不同，他的老师是安格尔得意门生拉莫特。从这个角度看，德加算是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嫡传弟子，有明确的古典主义学院绘画传承。因此，德加从根本上认同古典画派关于优美线条的追求。德加热衷于描绘芭蕾舞女，他画了大量在排练、候场、演出等各类情境中的芭蕾舞演员（M33a/M33b/M33c），而人们却在画面中感受到了显著的印象主义风格。

画中人物，都是以概括性笔触描绘，不算清晰，与其他印象主义画家描绘人物的方式类似。虽有着与莫奈等人相似的概括性笔触，但德加也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德加的人物轮廓线明晰，依然推崇安格尔式的明确线条，而其他印象主义画家通常是以色块直接描绘人物。

在经受古典绘画训练的同时，德加也深受法国写实主义影响，主张在绘画

中抓取生活场景的瞬间。例如某些画面中，尽管描绘的是某个舞者的特写，却能看见周围其他舞女的腿部，可见德加不是在构图“摆拍”，而是对画面进行具有“瞬间感”的安排。



M33a↑

/

《芭蕾课》（*The Ballet Class*）爱德加·德加（Edgar Degas）85cm×75cm
布上油画1871—1874年法国巴黎 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



M33b↑

/

《彩排》（*Rehearsal*）爱德加·德加（Edgar Degas）46cm×61cm布上油画1879年美国纽约弗里克收藏馆（The Frick Collection）

德加并非典型的印象主义者，还因为德加依然秉持画室创作，而非户外写生。芭蕾舞主题不适合现场创作，但德加时常出现在排练场地，画着芭蕾舞者们速写。在德加的芭蕾舞主题作品中，对舞女面部以及腿部动作的光影描绘，确是充满印象主义特色的表现手法。

总的来说，印象主义受到了库尔贝写实主义的影响，且更进了一步。他们不仅描绘了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事物和风景，同时还找到了最“真实”的表现形式，亦即所描绘对象“散发”出的光影。

其实，印象主义的诞生与两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是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古典绘画，尤其肖像画、人物画，往往充当“照相机”的作用，要尽可能画得“像”。摄影术的诞生无疑宣告了古典绘画核心理念的崩塌。当时的艺术家不得不思考，除开画得“像”之外，绘画艺术还能做什么？印象主义画家从人眼观察事物的方式出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实。照相机再精准，抓住的也只是以线条为基础的形似。要做到神似与身临其境，定要从人眼感受事物的方式出发，对光影无比真诚，才能做到像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系列般，并无任何单一线条，却能呈现丰富层次。19世纪摄影术刚刚发明，还未达到如今天这般高超的技术水准。当

时的摄影术所需要的曝光时间很长，所以大多用来拍摄人物肖像以及静态风景。印象主义绘画描绘的光影和运动感都是当时摄影术所无法表达的，这是印象主义绘画艺术对摄影术的回应。



M33c↑

/

《绿色的舞者》（*The Green Dancer*）爱德加·德加（Edgar Degas）
66cm × 36cm 布上油画 1879年 西班牙马德里提森—博内米撒艺术博物馆
（Thyssen-Bornemisza Museum）

第二是东方艺术带来的启示。19世纪中叶，欧洲与东方通商已然频繁。彼时日本出口大量货物到欧洲，为防止运输途中磕碰损毁，日本人用废纸将货物包裹。这些废纸当中，就有日本的绘画艺术——浮世绘。当然，这些废纸不是名家原作，只是些招贴画，如日本的色情行业场所门口张贴的充满色情意味的揽客海报。马奈、莫奈等人见到这些浮世绘作品后，深受感染。浮世绘并无透视与解剖，创作方式与欧洲中世纪的类似，但画面却展现出纯粹美感，色彩也无比鲜艳。这无疑给了印象主义者们以启示。

印象主义画家依然在描绘真实，只不过他们描绘的是“感官”的真实，而非源自知识的真实。印象主义画家描绘瞬间，因为这是光影存在的最好证明，所谓“浮光掠影”，光影的变化将时间维度囊括进来，形成了更完整的真实。

至此，若再进一步地追问：光影的本质又是什么？是否存在着比描绘光影更深、更本质的真实？这个问题，要等到进入新印象主义及后印象主义时期之后，由一只脚踏进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给出答案。

14 斯拉夫与法兰西：民族乐派

（一）民族的与世界的

古典音乐的庞大体系中，除德奥交响乐与意大利歌剧之外，很难找出如它们一样拥有如此显著特征及相当数量作曲家的音乐区域了。

虽然每个作曲家的音乐品味各不相同，作品影响力与艺术价值的高低也难以用客观数字衡量，但若以录音频次及上演频率做统计，除德奥交响乐和意大利歌剧外，还有一类音乐可被归为一大类，这便是斯拉夫音乐。

将斯拉夫音乐归为一大类可看作是笔者自创，因为正统学术界大多不会如此划分。要理解“斯拉夫”概念，需从历史讲起。公元4到6世纪，斯拉夫人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6世纪开始，斯拉夫人开始侵袭当时属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7世纪时，已有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定居，受到当时拜占庭先进文明的影响。从7世纪起，斯拉夫人开始在各地建立国家，如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大摩拉维亚国、基辅罗斯公国、捷克公国、波兰王国等。斯拉夫人对现今东欧地区，一直蔓延至俄罗斯，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俄罗斯、乌克兰的建国也与北欧维京人渊源甚深。传统音乐理论将这一地区的音乐和一些北欧音乐划为民族乐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者确有取材于民间的共同特点，但听感上差距不小。根据卢梭的地理决定论，无视这些客观影响，而将其统称为民族乐派，略显草率。而波兰音乐、捷克音乐、俄罗斯音乐甚至部分匈牙利音乐，却在听感上有共通之处，故笔者将其归类为“斯拉夫音乐”。

要概括斯拉夫音乐的特性，“极具民族特色”固然是保险的说法，但只解释了一半。“民族特色”指的是斯拉夫音乐惯常取材于民歌，旋律性强，易于传唱，有民歌特色。民歌通常旋律性极强，否则民间并无记谱法，旋律性弱的音乐无法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播。另外，斯拉夫旋律具备深重的悲情色彩。悲情有很多种：善感（sentimentale）、忧郁（melancholy）、悲伤（sorrow）、惆怅（nostalgia，多指乡愁）、悲痛（pathétique）、悲壮（solemn）等。这几种情感看似差异细微，对艺术家来说，实际差别巨大，且无法用语言直接形容。这种悲情气息是宽广的、深埋在民族性深处的、具有豪迈气质且又极度浪漫的。斯拉夫音乐的优美旋律拥有大线条，传达出“荡漾”及“摇曳”的感受。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1\]](#)）中描绘捷克母亲河的《伏尔塔瓦河》，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以及俄国的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都呈现出这类气质。

斯拉夫人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天气异常寒冷，斯拉夫音乐中的苍茫感大约与之相关。再加上斯拉夫人经历过太多动荡，迁徙是家常便饭，从斯拉夫音乐中常能听出“国破山河在”的故国情怀。在历史上，斯拉夫人所处地区，尤其捷克、匈牙利这块地界，经历了多次外族侵略，王朝更迭相对频繁。即便是斯拉夫音乐中欢快的部分，也并非莫扎特音乐那般天真纯粹，在热情外表之下，总垫着伤春悲秋的背景色，以及朝不保夕、居无定所情形下的及时行乐之感。德奥音乐中的欢欣、愉悦，让人像是置身金碧辉煌的宫殿中，贵族们身着盛装，跳着优雅的华尔兹；斯拉夫音乐中的欢乐，则是在苍茫的草原上，一群牧民围绕篝火，跳起热烈的民族舞蹈，晚会结束后又要启程去往下一个目的地。若要表现英雄气概，德奥音乐描绘的会是一位言出如山、骁勇善战、一呼百诺的将军，而斯拉夫音乐表现出来的，则是一位江湖豪侠，无拘无束、盖世无敌。

捷克音乐是斯拉夫音乐中的代表，最重要的作曲家是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两人在创作形式上略微形成了二元对立。虽然都推崇瓦格纳，但从勃拉姆斯与瓦格纳所代表的音乐阵营来划分，斯美塔那的创作是更认同瓦格纳的，他创作了众多交响诗作品，并开发了捷克语歌剧。德沃夏克虽也创作过歌剧，但其作品中，古典体裁的交响曲、协奏曲以及室内乐等作品更为主流。

斯美塔那可看作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虽然捷克从来不缺音乐家，但第一个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非斯美塔那莫属。他的音乐强调民族性，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斯美塔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也是其标题音乐的代表作。套曲用6段音乐来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及民间故事，其中第2段《伏尔塔瓦河》最为著名，描绘捷克的母亲河伏尔塔瓦河。曲子开头以长笛婉转的曲调奏出伏尔塔瓦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随着弦乐声部主旋律的显现，细流汇聚成大川大河。

斯美塔那可被归类为浪漫主义时期瓦格纳阵营的音乐家。民族乐派的音乐具有强烈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也是瓦格纳阵营所追求的。例如在《g小调钢琴三重奏》中，斯美塔那深刻地表达了对夭折女儿的思念，感人至深。在另一部自传性作品《我的生活》中，斯美塔那用弦乐四重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斯美塔那开了民族乐派歌剧之先河。在他之前，歌剧语言由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牢牢统治，三分天下。斯美塔那摆脱了传统束缚，创作出了用捷克语演唱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成为捷克历史上最重要的歌剧之一。这部歌剧也成为非德、法、意三语演唱歌剧中上演频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从这一点看来，斯美塔那对捷克语歌剧的开发，好比瓦格纳对德语歌剧的重新定义。

德沃夏克比斯美塔那年轻近20岁，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也是民族乐派作曲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他的作品不仅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且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强烈的国际化特征，可以说带领捷克民族音乐真正地走向了世界乐坛。

虽然对瓦格纳评价颇高，但德沃夏克的音乐创作却偏向勃拉姆斯阵营，其作曲体裁多为传统形式，例如标准四乐章结构的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14部弦乐四重奏等。其歌剧中，大部分为捷克语文本。

德沃夏克的发迹也与勃拉姆斯息息相关。一次作曲比赛中，勃拉姆斯作为评委，发现了德沃夏克的才华，并劝说评委会将奥地利国家奖颁给他。在勃拉姆斯的扶持下，德沃夏克越发受到关注，在欧洲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勃拉姆斯甚至把德沃夏克介绍给自己的出版商，随后在出版商的建议下，德沃夏克参照勃拉姆斯写下的《二十一首匈牙利舞曲》（[2]）的形式，创作了带有强烈斯拉夫民族风格的钢琴二重奏《八首斯拉夫舞曲》（[3]），后改编成管弦乐组曲，共两套。

德沃夏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e小调第九交响曲》（即《自新大陆》，[4]），其末乐章常被电影引用，第二乐章更是“思乡曲”教科书般的经典呈现。除大部头作品外，德沃夏克还有许多旋律性极强的名曲小调，例如钢琴独奏作品《幽默曲》、歌曲《妈妈教我的歌》，都流传甚广。

不论创作形式是偏向瓦格纳还是勃拉姆斯，在精神内涵上，斯拉夫音乐的民族性以及爱国主义情怀都是斯美塔那与德沃夏克音乐不变的主题。相比之下，强调民族性的做法在西欧文化体系当中并非主流，他们的艺术有着比民族大义、爱国主义更为中性的追求，如情爱、宗教、哲学甚至各类抽象情感。

艺术关注点上的差异与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分不开。在欧洲范围内，德、法、意这类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相对更发达，不易遭受外国的单方面侵略，有着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不会将国家存在感与民族大义这类主题上升得很高。相反，捷克这类国家在历史上饱受战争骚扰、侵略和压迫，斯拉夫人心中的抗争精神相对强烈，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感普遍受到极大关注，成为主流的社会情绪。

[1] 《我的祖国》（*Má Vlast*）贝德里赫·斯美塔那（Bedřich Smetana）1874—1879年交响诗套曲JB1:112

[2] 《二十一首匈牙利舞曲》 (21 *Hungarian Dances*)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69年交响套曲Wo O.1

[3] 《八首斯拉夫舞曲》 (8 *Slavonic Dances*) 安东·德沃夏克 (Antonín Dvořák) 1878 年和1886年交响套曲Op.46 , Op.72

[4] 《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Symphony No.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安东·德沃夏克 (Antonín Dvořák) 1893年交响曲Op.95

（二）冬风与鬼火

波兰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肖邦，但肖邦又并不像上述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一般，被认作纯粹的波兰民族乐派作曲家。肖邦的音乐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完美体系，自成一脉，与此同时，波兰音乐也被肖邦带向国际化。

肖邦出生在华沙西边50多千米处的村庄。肖邦在20岁时来到巴黎发展，此后再未回到波兰。肖邦一度活跃在巴黎的艺术家圈子中，经常参加沙龙音乐会，以作曲及教学为生。

由于长期受巴黎文艺气息的感染，肖邦的音乐中除却波兰音乐特有的斯拉夫式的忧郁外，更多了一份属于巴黎的精致。主要为钢琴创作音乐作品且依然能在音乐史中获得如此重要地位的，纵观世界乐坛，大概仅有肖邦一人。在他一生的作品中，除少数声乐作品、一部钢琴三重奏、一首大提琴《波兰舞曲》以及一部《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之外，钢琴是绝对的主角。

德奥的钢琴协奏曲强调管弦乐团与钢琴的交织呼应，因为钢琴本质不是旋律乐器，而更善于和声。肖邦有两部钢琴协奏曲以及一些钢琴与乐队的单乐章作品，但无一例外，在这些作品中，乐队的存在显得并不必要。两部协奏曲（[\[1\]](#)/[\[2\]](#)）除开头引子、乐章中段过渡以及乐章结尾总结外，即便没有乐队参与，也几乎不影响钢琴独奏部分的听感。在《平稳的行板与辉煌大波兰舞曲》（Op.22, [\[3\]](#)）当中，乐队更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部作品后被改编成纯钢琴独奏，毫无违和感。这也是肖邦音乐独具魅力的地方，他把钢琴这件乐器的歌唱性发挥到极致，这是其他作曲家的钢琴音乐难以做到的。

肖邦对钢琴音乐的审美有一半是意大利歌剧式的。他极其推崇意大利歌剧，尤其对贝利尼的美声歌剧情有独钟，并惊叹于贝利尼歌剧对旋律线条的塑造，甚至嘱咐自己的学生：若要把钢琴弹好，就要多听意大利歌剧。前文曾提到，钢琴天然不是为了演奏优美旋律而设计，但在和声方面却无比擅长，若是能把钢琴的歌唱性以某种手段挖掘出来，再配之以钢琴变化多端的和声能力，岂非可将钢琴的表现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肖邦做到了。首先，其钢琴作品的旋律无一例外都极其优美，这是他在旋律上的绝对天赋。再者，肖邦用了不少特殊技巧来弥补钢琴在歌唱性上的不足，例如安排了音符在时间线上的伸缩来弥补钢琴无法做出的歌唱性震音，例如一小节内前几拍时间拉长一些，后几拍则把时间缩短，这样整体节奏是准的，但在小节之内形成了摇摆伸缩感。音高上的摇摆（即震音）

既然做不到，就用时间上的摇摆来弥补。再如前文提到，贝利尼的美声歌剧极其讲究连音，同样，肖邦音乐也讲究连音，乐句连线、贯穿是其让钢琴作品体现歌唱性的一大重要手段。肖邦还有所谓的“自由节奏”，本质上是一长串装饰音，在左手相对规律的节奏框架下，右手一气奏出几十个连音，且连音的音高走向极具旋律上的创造性。这种技巧就像歌唱家在演唱时，在某些极具表现力的自由段落加入大量即兴的连串音符。这些音符灵动多变，歌唱家的即兴能力得以体现。肖邦的自由节奏段落就拥有类似的即兴感，不同演奏家的处理方式也大为不同。

在肖邦的年代，现代钢琴的机械结构基本成型，可以通过不同触键方式做到变化的音色。踏板技术的成熟，使得钢琴家可以在钢琴键盘上安排丰富的音色变化。对于钢琴音色，肖邦的看法与德奥音乐家显然不同。德奥体系中对于钢琴练习的基本观点，是将每根手指练得尽量均衡，力度、速度都均匀齐整。肖邦则认为，人的十根手指本就生来不同，应当发挥它们的个性，而非练到个个相同，没有区分。他更看重音色的变化，强调在演奏时要推敲不同音符用何种指法才能达到理想的音响效果。

和声方面，肖邦对德奥音乐的研究是深入的，他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使和声拥有丰富的变化，不落俗套。当然，我们可以猜测肖邦其实并未好好学过配器，因而并不具备如他的同行李斯特那样的乐队写作能力。但对于肖邦来说，也许他并没有必要创作乐队作品，因为表达他音乐理念的最好载体就是钢琴。在钢琴上，肖邦融合了贝利尼歌剧般的旋律以及德奥交响乐中变化丰富的和声，再结合自身波兰民族中特有的斯拉夫式忧郁气质，以及巴黎精致的文艺气息，成功地塑造了属于自己的“诗意”音乐，无怪乎被称作“钢琴诗人”。

体裁方面，肖邦传统曲式的作品不多，只有两部协奏曲、三部钢琴奏鸣曲、一部大提琴奏鸣曲以及一部钢琴三重奏。肖邦可说是一手将一些不太主流的体裁推广得人尽皆知，例如叙事曲、谐谑曲、即兴曲、圆舞曲、夜曲、玛祖卡舞曲、波兰舞曲以及各种短小作品（如船歌、摇篮曲、幻想曲），还有20余首主要的练习曲和20多首前奏曲。这些作品的长度大多不超过20分钟，但每部作品的内涵都丰富无比，从技巧难度上也都不好驾驭。肖邦自己的钢琴演奏水平在当时也是罕逢敌手，大约只有李斯特这类超级钢琴家可与之相提并论。

肖邦创作的玛祖卡舞曲和波兰舞曲，大大提升了世人对波兰音乐的认知度。这两种舞曲都是波兰的民族音乐。当然，肖邦的波兰舞曲与玛祖卡舞曲都无法随之起舞，只为欣赏之用；他的圆舞曲也同样只能欣赏，不为伴舞所作。

肖邦音乐中的波兰元素甚多，且从精神内涵看，总带着对波兰故土的浓浓

乡愁。自20岁离开波兰后，肖邦就再未回国，小学课文里我们也学过《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著名钢琴家傅聪曾形容肖邦的音乐犹如南唐李后主的词，这种形容是精准的，在肖邦音乐中似乎永远能听到“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惆怅。

与肖邦几乎同岁的李斯特（肖邦生于1810年，李斯特生于1811年）可与肖邦在钢琴艺术方面形成二元对立。李斯特是匈牙利人，且比肖邦更早来到巴黎，并在肖邦于巴黎发展时对其颇有接济。李斯特对匈牙利民族元素做了一定程度的挖掘，作有19首《匈牙利狂想曲》，展现出浓厚的匈牙利民间风情（[4]）。但是，李斯特的音乐创作总体而言是综合性的，并未展现出肖邦那样显著的民族特征。

李斯特对钢琴演奏技巧的开发，犹如帕格尼尼对小提琴技巧的挖掘。他将钢琴演奏的“硬功夫”推上了全新层次。李斯特早年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李斯特钢琴作品的演奏技术难度，甚至比肖邦还高一个档次，但这只是纯技巧上的难度，譬如著名的12首《超技练习曲》（*Etudes D'exécution Transcendante*），“transcendante”译作“超绝”。借用数学中的例子，“transcendental equation”被翻译成“超越方程”。数学中的超越方程很难求解析解，只能以计算机“暴力”算出。虽然不知李斯特本人数学如何，但是对“transcendate”一词的使用，已表明他在高难度钢琴技巧创新方面的决心。

肖邦钢琴音乐中那些难以演奏的段落并非为追求高超技巧刻意为之，而是音乐为先：要创造如此听感的音乐，必须有与之配合的技巧，这些技巧很好地展现了肖邦所需要的音响效果，只是碰巧这些技巧大都难以把控。平心而论，肖邦作品的技巧难度实属“正常”范畴，都是“有必要的难”，绝到不了李斯特“超绝”的程度。肖邦作品中技术难度最高的音乐，主要是两套共24首的《练习曲》。但不难发现，这些“每一首解决一个技术难点”的练习曲，尽管演奏着实困难，但都是音乐性强且动听的曲子，难得“很有必要”。李斯特的《超技练习曲》从听感上稍不如肖邦练习曲动人。

在音乐的听觉形象上，李斯特与肖邦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这与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生际遇有关。李斯特是当时欧洲音乐界的超级巨星，极为风光体面，也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花边绯闻全欧洲都津津乐道，其音乐有着华丽、辉煌的气度。肖邦外表瘦弱，为人内向，性格忧郁，尽管也很有名，但收入水平、生活状况与李斯特相差较远，在与离异女作家乔治·桑纠葛多年后不得已分道扬镳，自此一蹶不振，不久便去世。因此，其音乐中常有忧郁的、哀叹的诗人气质。

从谱面上也能看出二人的差异。对比肖邦极具代表性的《练习曲第十一首“冬风”》（[5]）练习曲和李斯特的《超技练习曲第五首“鬼火”》（[6]）

练习曲，总体上都是表现“身姿摇曳”的艺术形象。尽管音符极多，琳琅满目，但肖邦的风格是流淌式的，有大的旋律主线，伴随音符虽多，却是众星捧月式地围绕大旋律展开。李斯特则是用相对固定的音型，在平稳不变的范围来回变化。在钢琴艺术的技巧上，肖邦更为“灵动”，讲求巧妙、多变、对比；李斯特则更“硬”，讲求速度、力度、跨度。

实际上，二人的音乐难以划分归类，他们的音乐中都有属于各自民族的音乐元素，但又经过巴黎这个世界文化中心的洗礼，很难说清这类音乐的从属。抑或本就没有民族音乐或世界音乐，只要影响力足够大，音乐足够优秀，形成一套完整自治的体系，这便是属于世界的音乐了。

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早年曾苦恼于无法摆脱自己音乐中的日本元素，不能写出纯正的西方古典音乐。后来他意识到，属于日本的民族元素，恰恰才是他自己的声音。贝多芬、莫扎特这样伟大的德奥作曲家在创作时，并无所谓主流的、世界性音乐的概念，他们只是跟随内心的灵性歌唱，他们的音乐来自天性流露，而非匠气雕琢。

[1] 《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1 in e minor*）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30年协奏曲Op.11

[2] 《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 in f minor*）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29年协奏曲Op.21

[3] 《平稳的行板与辉煌大波兰舞曲》（*Andante Spianato et Grande Polonaise Brillante*）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30—1834年波兰舞曲Op.22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Hungarian Rhapsody No.2*）弗兰兹·李斯特（Franz Liszt）1847年狂想曲S.244/2

[5] 《练习曲第十一首“冬风”》（*Étude No.11, “Winter Wind”*）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1835年练习曲Op.25

[6] 《超技练习曲第五首“鬼火”》（*Transcendental Étude No. 5 “Feux Follets”*）弗兰兹·李斯特（Franz Liszt）1826年练习曲S.139

（三）天主教与东正教

捷克、波兰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气质。然而，不管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斯拉夫人最重要的音乐是俄罗斯音乐。虽然民族上接近，但在宗教上，俄罗斯与捷克、波兰等地有所差异：捷克、波兰、匈牙利居民多信奉天主教，俄罗斯居民多信奉东正教。

对于基督教体系中“末日”的认知，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有所差异。对天主教来说，末日的重点在于审判，故天主教宣扬在世时要多行善举，以确保自己在天堂中的席位；新教则不同，他们已经解决了上天堂的问题——凡是基督徒，信耶稣必上天堂，问题是在人间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东正教的末日认知则是“受难”认知，世间的苦难是来自上帝的考验，东正教大有“为天下人受难”之感，所以给人以深重、苦难、宿命论的宗教感受，这也是俄罗斯音乐中充满深沉、恢宏与悲壮战斗感的一层原因。俄罗斯民族音乐性格的背景色与东正教息息相关。

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当时并未赶上文艺复兴浪潮，故其社会形态、文化发达程度都较欧洲大陆落后。俄罗斯的音乐发展与其美术类似，并无太多前人积累，而是充分学习西方经验。俄罗斯音乐的兴盛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

通常认为，第一位世界级的俄罗斯作曲家是柴可夫斯基誉为“俄罗斯音乐中的沙皇”的格林卡。格林卡青年时游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地，充分了解并学习了欧洲音乐，与门德尔松、柏辽兹等人均为好友，打下了坚实的西欧音乐基础，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音乐元素。格林卡毕生的音乐创作都致力于写出属于俄罗斯人自己的音乐，是俄国歌剧的开创者，好比“美声三杰”让意大利歌剧重新散发艺术光辉一般。

在意大利游学期间，格林卡结识了贝利尼、多尼采蒂等意大利歌剧巨匠，萌生了创造俄罗斯风格歌剧的想法，其歌剧作品《伊凡·苏萨宁》^[1]是开俄语歌剧先河的伟大作品，讲述了俄罗斯民族英雄苏萨宁为了保护沙皇，反抗波兰军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其中融入了俄罗斯的民谣风格旋律，展现出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俄罗斯人战斗式的、具有压迫感的气势在作品中一览无余。《伊凡·苏萨宁》的序曲便展现了这种俄罗斯所独有的情怀，而其间的双簧管独奏则又凸显了俄罗斯民族音乐中特有的旋律感。

格林卡最著名的歌剧当属《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Ruslan and Lyudmila*）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1837—1842年俄语五幕歌剧：♣）。武士鲁斯兰为解救身陷魔窟的柳德米拉公

主，历经艰险，最后抱得美人归。这种充满离奇幻想和神秘历险的故事，是俄罗斯音乐偏好的惯常主题。《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序曲集中体现了格林卡的音乐特点，以极其快速的弦乐音阶开头，造成风卷残云般的雄浑听感，而在进入第二主题后，又以优美生动的主旋律展现出俄罗斯豪迈的民族特性。格林卡的作品集中展示了俄罗斯民族乐派的音乐特色：一是旋律性极强便于传唱，当然几乎所有民族乐派音乐都有该特点；二是带有悲情、豪迈的俄罗斯特色；三则是将音乐重心往低音倾斜，制造出雄浑有力的音响效果。

格林卡之后，俄罗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曲家，以发扬俄罗斯音乐为己任，其中的代表便是“强力五人团”，分别是：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居伊。若把格林卡算作俄罗斯第一代音乐家，在“强力五人团”为代表的第二代俄罗斯作曲家手上，俄罗斯音乐形成了强大的自我风格。五人团中的音乐家各类音乐体裁上各有建树，奠定了属于俄罗斯音乐的特色。譬如鲍罗丁奠定了俄罗斯音乐特有的“史诗风格”，代表作是《b小调第二交响曲》（[\[2\]](#)）。鲍罗丁还充分挖掘了俄罗斯音乐当中的东方特色。众所周知，虽然俄罗斯是欧洲国家，首都莫斯科地处欧洲大陆，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实则身处亚洲，与亚洲众多国家接壤，文化、商业上都互有往来，从该意义上看，俄罗斯音乐中吸收东方音乐的特色并不意外。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3\]](#)）描绘的便是中亚土著商队在草原中穿行的场景。《D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4\]](#)）的开头旋律乍听之下甚至恍若中国音乐。鲍罗丁可能也是最为“跨界”的作曲家，因为鲍罗丁的主业是一名化学教授，作曲更像是业余爱好。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充分体现了俄罗斯音乐热衷于探究、描绘异域风情和神话故事的特色，《舍赫拉查德》（[\[5\]](#)）是其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取材于东方神话《一千零一夜》（也叫《天方夜谭》）。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大约是《野蜂飞舞》，这段音乐选自他的俄语歌剧，改编自普希金的童话诗《萨尔坦沙皇的童话》。经过一大批第二代俄罗斯音乐家的努力，俄罗斯音乐逐渐成为西方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俄罗斯音乐的最高峰自然是柴可夫斯基。对于柴可夫斯基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俄罗斯最伟大音乐家”抑或是“俄罗斯音乐代表”，柴可夫斯基对整个西方古典音乐的影响力都极其巨大，应当与“德国3B”，与莫扎特、瓦格纳们一道，堪称整部西方音乐史上最闪耀的明珠。

当提到民族乐派时，旋律性强永远是其共享的优点。论到柴可夫斯基在旋律上的天赋，民族乐派音乐家中似无人能出其右。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不过近百部作品，但其中名作比例极高。柴可夫斯基的名作几乎都有扣人心弦的旋律，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和传唱度甚广，已深深刻入全人类的集

体听觉记忆中，简单举例便有《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中的段落，还有《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一众小品，都是脍炙人口的绝顶佳作。柴可夫斯基是当之无愧的旋律大师，在旋律上的创造性，柴可夫斯基称第二的话，怕是无人能自信称第一。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体裁偏纯音乐，著有6部交响曲、1部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3部钢琴协奏曲、1部小提琴协奏曲，大量的钢琴小品套曲以及管弦乐组曲，还有11部歌剧以及3部芭蕾舞剧等。其创作体裁较为自由，古典范式写了不少，自由如舒曼那般的小品套曲也写了不少，每部作品都极具歌唱性。

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创新力极强的作曲家，他许多作品的创新性都有类似遭遇：起初被业内排斥，之后却又红遍全球，成为人类音乐文献中的经典。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献给俄国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作品，但鲁宾斯坦拒绝首演也拒绝接受这部作品，因他觉得这部钢琴协奏曲是一部粗糙的作品。其实哪怕从现代观点来看，鲁宾斯坦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演奏水平并不高明，甚至算不得合格的钢琴演奏者，相比之后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顶级钢琴家，柴可夫斯基在技巧和弹奏适宜度上显得生涩。被鲁宾斯坦拒绝以后，柴可夫斯基转投德国指挥家彪罗的怀抱，彪罗将其一手捧红，让这部《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欧美获得了巨大声誉。这时鲁宾斯坦又幡然悔悟，希望柴可夫斯基再为其创作一部类似的钢琴协奏曲，这便有了《G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6]，从创作手法上看，它比《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更成熟，但知名度却远远不及。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7]最早是献给当时在俄国的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兼教育家奥尔的作品，奥尔开始也提出了细致的批评，很显然这部作品从演奏规律上看实在太别扭。专业演奏家不怕技术艰难的作品，例如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而会拉琴的作曲家写的小提琴作品尽管困难，但演奏上却也符合小提琴的演奏规律。如柴可夫斯基这般不会拉琴的作曲家，只是单纯地放飞自己的音乐想象力，导致其《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技法极端不合理，需要许多特殊指法、弓法才能把曲子演奏出来。同样的问题勃拉姆斯在创作《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8]时也遇到了，不过好在勃拉姆斯有挚友约阿希姆这位小提琴大师做参谋，才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首演时恶评如潮，直到后来奥尔及奥尔徒子徒孙们的全力推广（奥尔的弟子们都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如“琴皇”海菲兹、米尔斯坦、埃尔曼等），才变得家喻户晓，位列“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注：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分别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61，^[9]）、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

奏曲》（Op.77）、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Op.64）、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35）】。

虽不能说是原创体裁，但在芭蕾舞剧领域，柴可夫斯基是绝对的王者。在“世界十大芭蕾舞剧”中，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便占其三，此外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余6部则是专为芭蕾舞配乐的作曲家作品，这些作曲家在整体西方音乐家之林中几乎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

芭蕾舞艺术是文艺复兴时期始于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的一种社交舞蹈，由美第奇家族的女儿嫁入法国宫廷时引入，并在法国王室、贵族之间流行起来，到路易十四时期空前鼎盛。路易十四甚至建立了皇家舞蹈院专门发展芭蕾舞事业，他自己便是芭蕾舞高手。皇家舞蹈院确立了芭蕾的5个基本舞姿，建立了程式化的芭蕾舞动作体系。但路易十四能跳的芭蕾舞与现代技巧高超的、只能由专业人士表演的芭蕾舞相去甚远，其本质依然是交际性质的舞蹈，只不过比先前宫廷流行的小步舞曲动作更大，速度更快。

芭蕾舞有六大流派，分别是法兰西学派、俄罗斯学派、丹麦学派、意大利学派、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在技巧、观感和审美品味上各不相同。其中法兰西学派是一切芭蕾舞学派的基础，也是最早出现的芭蕾舞流派，在舞蹈特点上讲究动作流畅、线条优美，在舞台走位上要求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是典型的法式审美。到了19世纪，芭蕾舞在法国全面衰落，却在俄国达到空前的水准。欧洲的主流作曲家们并不热衷于创作芭蕾舞剧，直到柴可夫斯基的三大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横空出世，才使得芭蕾舞剧成为主流的艺术形式，风靡至今。

《天鹅湖》无疑是全世界芭蕾舞剧中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一部，其在芭蕾舞剧中的地位可媲美歌剧中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卡门》，不但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段落，也奠定了人们对芭蕾舞以及俄罗斯风格旋律的固有认知。

《天鹅湖》设置巧妙，由同一位舞者出演白天鹅与黑天鹅两个角色，将白天鹅的高贵优雅和黑天鹅对真爱渴望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其中用小提琴分别表现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独奏段落，更成为小提琴独奏文献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以断言，芭蕾舞剧这个艺术门类，若没有柴可夫斯基，其艺术地位大约只能与美国百老汇流行的音乐剧相当，怕是无法在西方音乐之林当中占据较为主流的位置。

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精神内涵总体是充满“矛盾”的。在他的音乐中，能听到贝多芬般的抵抗和斗争，也能听到莫扎特般的宿命论情结。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内涵整体经历了从阳光到阴郁的风格转变，这与他同性恋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在那个年代，同性恋被定义为精神病，为了缓解这种痛苦，柴可夫斯基曾草率地与一位女性崇拜者结婚，但这段婚姻在半年之内便宣告结束，这也是他创作的转折点，恰好是《f小调第四交响曲》（[\[10\]](#)）写就

的时期。

第四、第五、第六这3部交响曲象征着柴可夫斯基从抗争走向死亡的过程。第四交响曲开头即是光辉的铜管，虽是一部小调交响曲，全曲却在无比的辉煌激扬中结束。到了《e小调第五交响曲》（[\[11\]](#)），开头成了由单簧管阴沉地吹出主旋律，第一乐章异常压抑，但末乐章依然从e小调转成了光辉的E大调，全曲在极其亢奋的快节奏中结束。据说《b小调第六交响曲》（[\[12\]](#)）称作“悲怆”，原由作曲家命名，寄给出版商之后又去掉，但出版商又怎会放过如此卖点，便保留了“悲怆”的名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是他的安魂曲。这部传世之作开头由巴松管奏出阴暗悲伤的动机，中间乐段尽管优美，却散发着宿命感，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般的叹息；全曲结尾，大提琴和低音号奏出葬礼般的低吟，并逐渐淡出，甚至不知何时才算具体结束；交响曲结尾处真是气若游丝。在亲自指挥这部作品首演9天后，柴可夫斯基便与世长辞。

如果说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钢琴部分的创作上稍有空洞单一之嫌，那有着“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最后一位大师”称号的拉赫玛尼诺夫，可谓俄罗斯钢琴界的“救世主”。

拉赫玛尼诺夫活跃的年代已是20世纪，其音乐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感。具体来说，拉氏音乐中充满着电影音乐的画面感。拉赫玛尼诺夫首先是一位顶级的钢琴演奏家，《留声机》杂志曾做过“20世纪百大演奏家”排名，拉赫玛尼诺夫位列第8，其钢琴作品演奏的难度甚至在李斯特之上，音乐性及旋律的美感又不输肖邦，在乐队的驾驭能力上也实属超群，加上俄罗斯音乐独有宽广的浪漫主义气息，让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音乐在钢琴文献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李斯特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将钢琴演奏的想象力又推上了新的高峰。

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作品众多，共作有4部钢琴协奏曲，1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俗称“拉五”），一系列钢琴前奏曲，大量钢琴独奏曲，以及一系列超级练习曲，等等。拉氏钢琴作品演奏难度极高，其中以《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13\]](#)）为最，被认为是音乐史上所有钢琴文献中综合难度最高的钢琴作品。拉氏钢琴作品需要演奏者手指跨度极大，这也跟拉氏本人的身体条件有关，他手大脚长，据说其手指可以轻松跨越十二度，作品中常见十度。李斯特作品中十度有若干，而贝多芬作品中连九度都不常见。

音响效果上，除了拥有极其优美的旋律外，拉赫玛尼诺夫偏爱低音，在《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14\]](#)）的开头，拉氏用钢琴的最低音区模仿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特有的钟声，产生了庄重低沉的音响效果，也正是因为拉赫玛尼诺夫对低音情有独钟，他几乎未创作任何小提琴作品，许多小提

琴家都对此表示遗憾。

尽管拉赫玛尼诺夫在钢琴音乐的创作上拥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定位与肖邦截然不同。拉氏在交响乐、艺术歌曲、歌剧上的成就皆为不俗。其《第二交响曲》更是经久不衰的传世杰作。其实在拉氏的音乐中，除开俄罗斯风情，其广阔感往往让人联想起美国的风土人情。这里的原因其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大量的文化人士与艺术家选择移民美国，拉氏也是其中之一。恰是这批文化人士和艺术家，帮助塑造了美国文化的整体风貌。因此并非拉氏的音乐中有美国风情，而是美国风情的形成很大程度来源于这批外国艺术家。

由于整体文化进程落后于西欧，直到19世纪，俄罗斯才在文化艺术方面有了全面的发展，但俄罗斯追赶神速，到20世纪直至苏联时期，俄罗斯音乐已颇具全球影响力。除开热爱艺术的民族天性，这其实跟俄国的学院体系建立有莫大联系——虽然俄国没有经历贝多芬、莫扎特的兴盛年代，但俄国起初便建立了完善的学院制度，俄国的音乐家接受的都是高效的学院式教育，音乐训练的一大块是纯技巧性且有规律可循的，学院的迅速普及以及音乐教育的成熟，令俄罗斯音乐发展神速。

[1] 《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1836年俄语四幕歌剧

[2] 《b小调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 in b minor*）亚历山大·鲍罗丁（Aleksandr Borodin）1869—1876年交响曲

[3] 《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亚历山大·鲍罗丁（Aleksandr Borodin）1880年交响诗

[4] 《D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2 in D major*）亚历山大·鲍罗丁（Aleksandr Borodin）1881年弦乐四重奏

[5] 《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1888年交响组曲Op.35

[6] 《G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 in G maj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79—1880年协奏曲Op.44

[7]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78年协奏曲Op.35

[8]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78年协奏曲Op.77

[9]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806年协奏曲Op.61

[10] 《f小调第四交响曲》（*Symphony No.4 in f min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77—1878年交响曲Op.36

[11] 《e小调第五交响曲》（*Symphony No.5 in e min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88年交响曲Op.64

[12] 《b小调第六交响曲》（*Symphony No.6 in b minor*）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93年交响曲Op.74

[13] 《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3 in d minor*）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1909年协奏曲Op.30

[14] 《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 in c minor*）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1900—1901年协奏曲Op.18

（四）工具箱与调色盘

谈到法国艺术，很难用简单的词汇对其风格进行概括。法国艺术的充分发展，始于路易十四建起各大学院。若不将哥特风格建筑算在内，18世纪在法国宫廷出现并席卷全欧洲的洛可可艺术，是法国艺术在艺术史中第一次大规模整体亮相。音乐方面，虽从巴洛克时期开始法国音乐便非常高产，但从整体艺术价值上看，却并未如德奥交响乐和意大利歌剧那样给后世留下如此之多传唱至今的经典。

法国艺术的蓬勃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美术方面，先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后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现代主义艺术依次诞生，中心都在巴黎。音乐方面，法国在19世纪诞生了极多优秀作曲家，创作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

要注意，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19世纪，虽然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仍然难以找出属于法国艺术的整体风格，不像德奥交响曲、意大利歌剧，甚至早年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绘画、雕塑、建筑，总能看出它们总体的风格倾向，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性质。

不难发现，19世纪法国在艺术方面的繁荣并非纯靠法兰西本民族，有不少外国人参与其中。至19世纪末，全世界的优秀艺术家都来巴黎发展。进入20世纪，连东方艺术家也来巴黎深造。这种艺术的蓬勃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艺术舞台。究其原因，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壮大，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统治，虽然之后混乱多年，但还是转向共和，有了开放自由的社会基础。正因这样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前往，才使得法国的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法国人自己也习惯了这样丰富多彩的艺术。这与二战后的美国很像，纽约成了世界文化中心，那时全世界的优秀艺术家都去纽约，所以也说不出自纽约艺术的整体特性。若真要概括法国艺术有什么特点，应该说是种类繁多、精彩纷呈。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艺术总体是以王权为核心的，路易十四又是如此一位强权君主，一早就认定艺术要为政权服务，要帮他牢牢把控社会意识形态，所以彼时的法国艺术多少有一些沉闷。

19世纪法国诞生了许多划时代的优秀音乐家，如写出《卡门》的天才作曲家比才，长寿且多产的“法国莫扎特”圣—桑，反浪漫主义先锋弗兰克，法国艺术歌曲集大成者福雷，还有著名歌剧《浮士德》的创作者古诺、音乐中的“裸体主义者”萨蒂等，数不胜数。这些作曲家都成就极高，但要讲对

西方音乐最有推动作用的，还是要属19世纪后半叶诞生的一位奇才作曲家，他打破了古典音乐的传统框架，建立起一套全新的音乐创作体系，其独创的音响效果，可算是法兰西音乐的独特听感。这便是印象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德彪西，尽管德彪西本人反对这样的称呼。

德彪西对和声的认知与拉莫建立起来的以主和弦、属和弦以及下属和弦为核心要素的功能化的和声构架（即前文所述“工具箱”一般的和声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在拉莫体系内，每个和声都像工具箱里的工具一般，在作曲的过程中拥有不同功能性，在地位上并不平等。然而，德彪西对和声的认知却是“色彩性”的。对德彪西来说，不同的和声是调色盘上的不同色彩，在德彪西音乐中的地位相对平等。

德彪西看待和声的方式与之前的，甚至同时代的音乐家均不相同，这是挑战传统作曲理论体系的全新视角，意义非凡。

音乐的谱写用的是钢琴键盘系统中一个八度内黑白键加起来的12个音，加上多个八度的重复，12个音排列组合。作曲的过程绝非杂乱无章，随机凭着感觉选取需要的音，而是依据一定的作曲规律展开。

音乐最基本的构成元素之一是音阶。西方音乐中，7个音从低到高按顺序排列为Do、Re、Mi、Fa、Sol、La、Si，形成上行音阶，反之，从高到低排列则构成下行音阶。这7个音的选取可以有变化，音阶的音响效果产生变化。12个音当中挑选不同的音组成音阶会带来不同的音响效果。例如X6的大调音阶听上去光辉、舒畅，X7的小调音阶则阴暗、忧郁。再如其他排列，能做到“阿拉伯风情”的听感（X8）。一个音阶当中也未必定有7个音，如中国的五声音阶只有5个音，蓝调爵士的音阶里只有6个音，等等。



X6↑
/
大调音阶



X7↑
/
小调音阶



X8↑
/
阿拉伯音阶

音的不同排列组成不同类型的音阶，这叫“mode”（模式）。同一首曲子更换模式，风格立刻发生巨大变化：把大调模式换成小调模式，阳光明媚的曲调转瞬变得阴雨连绵；在模式中加入小二度和增二度，俄罗斯风格的曲子立刻透露着日本风格；等等。模式的变化多种多样。

选择具体的音阶模式，就好比写文章选择语言一般。作曲家们在作曲时用的模式也有差别，例如德国作曲家喜欢用旋律小调以及和声小调，俄罗斯作曲家则偏好自然小调。选择了作曲“语言”，对音阶里的音进行排列组合就变得有的放矢。之后是给音乐配上和声：和声中的音是从音阶里选取的，譬如西方古典乐标准的大调模式，则Do、Mi、Sol是主和弦，Sol、Si、Re是属和弦等，依此类推。这便是传统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框架。在此基础上，和声不断被丰富，再配以转调、离调等技巧，创作出丰富的音乐。德彪西经常使用一些新颖的音阶模式，例如全音音阶，这从根上决定了德彪西某些作品的听感是怪诞的。

选好特定模式后，还要选择创作调式，所谓调式就是要在曲中选择你认为最主要的音定为“主音”。古典音乐作品的名称不少是“××调第×交响曲”，例如C大调就是以“C”为主音。有了主音后，就能根据选定的模式来决定曲子里用到的具体音。有了模式以及主音后，就能确定该曲是什么调了。对不同作曲家来说，不同调式代表不同情绪，且对应不同的音乐色彩感，这种感觉并不绝对且非常主观。

定下调式就好似确定了要使用的语言，可还未选择具体要用该语言的哪种口音，也许降E大调好比北方话，听起来豪迈铿锵，a小调更像吴侬软语，听起来亲近婉约。

配和声阶段，传统西方古典乐体系对和声的选择有明确规则，即前文提及

的解决不同问题要用不同“工具箱”，所谓对症下药，这是对功能性和声的理解。

德彪西全然不同，他会选用所谓的Chromatism（12个音当中所有可能的和声）。因为很明显，在12个音里面选择一部分音组成音阶，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把12个音全选，组成音阶。德彪西时常用这种特殊方式作曲，比如写了某个调性的曲子，但配和声时，并不理会和声只能在该调性模式中选择的功能性规则，而是完全尊重不同和声的听感，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和声。如此一来，和声的功能性在音乐中就减弱了。

德彪西还有更创新的作曲手段，如“双调式”，就是在同一首曲子中同时出现两种不同调性。这两种调性在听觉上相对抵触，产生新奇效果，好似你听两个人对话，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讲广东话，两个人却又对答如流，想必非常神奇。

德彪西并非当时法国唯一对音乐有大胆创新思想的音乐家，同时期还有配器大师拉威尔、音乐“裸体主义者”萨蒂、西班牙来的法雅等等。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还组成小团体定期举办沙龙，讨论艺术，互相学习，当然德彪西的音乐是沙龙的重要研究对象。那个年代恰好是法国印象主义绘画活跃的时期，不难发现，当时巴黎的文艺界，不论是美术、雕塑、还是音乐乃至文学戏剧领域，都处在创新力爆发的阶段。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美术是典型。德彪西、拉威尔的音乐被称作印象主义音乐情有可原，德彪西确实公开赞赏印象主义绘画，表示欣赏他们的绘画理念。

若直接欣赏德彪西的音乐难免略显怪诞，但若配上特定的绘画作品同时观赏，则又相得益彰。相比之下，传统西方古典音乐是叙事性、故事性的，在时间线上依次排开。德彪西的音乐则充满浓烈的画面感，譬如著名的管弦乐《大海》（[\[1\]](#)），第一乐章是《海上的黎明到中午》，第二乐章是《波浪的游戏》，第三乐章是《风和海的对话》，配以透纳的海景绘画作品欣赏，效果极佳。

19世纪后半叶，到巴黎发展的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在寻求艺术上的创新，他们不满足于在传统艺术规则之下创造熟练的作品，而是要改变艺术的规则，创造新的审美观。这恰恰跟法国大革命以来贯彻法国社会的普遍思潮不谋而合。这样的艺术创新大爆发出现在法国、发生在巴黎并非巧合，法国具备这样的文化土壤。印象主义诞生在法国，这只是整体创新思潮的一个结果。长时间来看，不仅印象主义，之后现代主义时期众多流派的艺术都在巴黎诞生、活跃并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并非巴黎创造了这一轮艺术创新的大爆发，而是艺术创新的大爆发随着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要来，只不过法国彼时的社会环境让巴黎“招标”成功。

从该意义上看，虽然无法给法国艺术风格加特定形容词，但前文开头用的“精彩纷呈”似乎仍是贴切的，因为法国的艺术是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不断探索全新可能性的艺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将带领世界艺术进入20世纪，进入艺术创造的全新纪元。

[1] 《大海》（*La Mer*）克洛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1903—1905年交响音画L.109

（五）北欧与南欧

德奥交响乐、意大利歌剧、斯拉夫民族音乐、法国创新型音乐介绍完毕，至此，我们对欧洲音乐的主要板块已建立较为系统的认知，再来看看欧洲其他地区——北欧、西班牙以及英国的音乐。

北欧人口很少，北欧五国（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冰岛）2002年人口约2400万，在世界史中并不显耀，倒是北欧的维京人在中世纪把欧洲“搅扰”得好不热闹。相比其艺术贡献，北欧在其他领域的贡献要显著不少。文学方面，挪威的易卜生开女权主义之先河，其戏剧《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女主人公娜拉的“砰然关门”，可说是女权主义给近代社会第一记响亮的耳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文学之外，20世纪初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是物理学界的一股中坚力量，贡献卓著。

北欧最重要的作曲家、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是挪威的格里格和芬兰的西贝柳斯。二人都曾在德奥地区深造学习。格里格早年在莱比锡学习，西贝柳斯则是在柏林和维也纳深造。两人都是自己国家的国宝级大师，格里格去世时享受国葬待遇，西贝柳斯则获得在芬兰境内餐馆吃饭免单的特权，这让西贝柳斯成为一个以“喜欢请人吃饭”而闻名的艺术家。

格里格的创作题材很自由，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芭蕾舞剧《培尔·金特》，根据易卜生同名幻想诗剧创作而成，讲述了浪子培尔·金特所经历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冒险故事。格里格还把舞剧中的优美段落重新组合写成了两部组曲（[\[1\]](#)/[\[2\]](#)），从此流芳百世。

格里格音乐中的原创精神多体现在他的抒情小品集与声乐作品中。他的抒情小品多采用挪威民间曲调，并无斯拉夫民族音乐中常见的忧伤情绪，而是侧重表达挪威的恬静与淳朴。格里格的妻子是一位歌唱家，因此他也创作了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声乐作品。

西贝柳斯也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乐派作曲家，音乐中能感受到较强的“耳压”。在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芬兰颂》（[\[3\]](#)）中，开篇用铜管乐器里中低音域的圆号、长号和大号吹出了北风的咆哮。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西贝柳斯的交响乐作品却是如德奥音乐一般主流的。与德沃夏克浓烈的民族气息不同，西贝柳斯的交响乐作品继承了德奥交响曲的经典内核，在纯音乐和思想层面上，比一般民族乐派音乐家更为深刻。他一生共写过7部交响曲，其中《C大调第七交响曲》（[\[4\]](#)）虽然之后指挥家在录音时会分成4个乐章，但实际上，西贝柳斯在创作时并无乐章界限，是独具一格的交响乐作品，其听感也属晦涩深邃。

西贝柳斯的音乐总体给人以悲愤中崛起的力量感，这种听感和北欧神话的价值体系有着一致性，这种力量感甚至渗透在他的钢琴小品中。除此之外，《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5]）也十分优秀，可与“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媲美，其技巧难度极高，无论从音乐的旋律性还是结构的庞大感，或是乐思变化的丰富度上看，都是一流的小提琴作品。

英国本是崇尚音乐的国家，但根据罗曼·罗兰的说法，宗教改革精神传到英国时，这堆音乐之火在烧起来前就被浇灭了。在以新教为国教的情形下，英国艺术处于低迷态势，直到19世纪才全面复苏。

埃尔加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其创作风格深沉稳健，带有强烈的“雾都气息”，塑造了英国音乐的固有形象，是英国音乐当之无愧的复兴者。进入20世纪，埃尔加的音乐虽然被认为是守旧陈腐的象征，但确实又是“英国之声”，其音乐整体上展现出史诗般深沉、厚重的恢宏气势。他的《威仪堂堂进行曲第一号》（[6]）被誉为英国的“第二国歌”。

埃尔加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爱德华派，因此其作品也凸显了英国王室的庄严形象，可与绘画中一手塑造了英国王室高贵冷峻形象的凡·戴克爵士相类比。埃尔加将协奏曲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7]）中甚至能听出工业革命时伦敦的街景，全曲逾50分钟，整体结构异常宏大，第三乐章长度甚至超过第一乐章，这在协奏曲中绝无仅有，甚至让这部作品饱受诟病，成为小提琴演奏家们的噩梦。埃尔加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8]），作于晚年，彼时埃尔加的友人相继离世，他时感悲伤，怀着对友人的哀思，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

埃尔加可谓“居庙堂之高”，与之相对的，则是“处江湖之远”的英国音乐家沃恩·威廉斯。沃恩·威廉斯深入挖掘了英国的民间音乐，写出了具有英国民族特色的优美作品，象征着英国民间的诗意与亲和。他热衷于收藏和编辑英国民歌，可说是英国民族乐派的代表作曲家。有一首所有人都熟悉的英国音乐叫《绿袖子》，最早便是由他编纂成了交响乐。

威廉斯也是“顶级作曲家交响曲不过九”的“范例”，一生作有9部交响曲（如[9]）。此时已进入20世纪，威廉斯的交响曲已然不是纯粹的古典范式，他的交响曲大多有具体指代，如第一交响曲的“大海”、第二交响曲的“伦敦”、第三交响曲的“田园”、第七交响曲的“南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廉斯活跃的年代，电影工业已经起步，威廉斯同时是一位电影配乐大师，比如《第七交响曲》就是改编自他为电影《南极的斯科特》所作的配乐。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似乎一直是欧洲的“化外之地”。西班牙被摩尔人统治了近700多年，整个社会的文明根基与西欧极为不同。除开艺术创作

上未赶上文艺复兴大潮以外，西班牙的精力也一直放在扩展海外实力上，而这条道路同样十分坎坷：虽然率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是最早的殖民者，英国人却后来居上，西班牙殖民地逐渐减少。在20世纪两次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中，也并无西班牙的身影，甚至二战后西班牙周边的欧洲国家无一例外进入了民主共和体制，只有西班牙还在实行弗朗哥的独裁专治，直到1975年弗朗哥去世才还政于流亡在国外的胡安·卡洛斯，建立君主立宪的西班牙王国。

与周边主流国家迥异的历史发展和复杂的文化背景让西班牙艺术拥有独特气质。前文提到西班牙的绘画艺术充满“妖气”，其实这种“妖气”在西班牙音乐中也极为典型。西班牙音乐体裁偏短小，交响曲、协奏曲、歌剧这类传统西方音乐体裁的作品并不多见。重要的音乐家多活跃于浪漫主义时期，作曲风格总体上呈现出浓浓的西班牙风情，不禁让人联想到热情似火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作曲家笔下，即便是规模较庞大的作品，也多以组曲形式出现，最著名的作品有阿尔贝尼兹的《伊比利亚组曲》（[\[10\]](#)）以及格拉纳多斯的《戈雅之画》（▶注《戈雅之画》（*Goyescas*）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1911年组曲Op.11：▲）。

最能代表西班牙音乐特色的乐器是古典吉他。古典吉他基本是西班牙作曲家的专利，其主流曲目大多由西班牙作曲家创作，其他国家的作曲家在吉他方面，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似乎都太客气了。

吉他这门乐器可分为古典吉他与民谣吉他。在演奏难度上，古典吉他远高于民谣吉他。民谣吉他的主要功能是伴唱，弹奏伴唱的和弦大致便已足够，加上民谣吉他还有转调夹这种“作弊利器”，入门门槛很低，学习一周就能弹唱简单歌谣。古典吉他则不然，不仅要求演奏者弹奏和弦，对旋律也要有精准把控。但因吉他是拨弦乐器，不像提琴这样的弓弦乐器可持续发音，所以音量是吉他的弱项。

塔雷加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吉他演奏家，少年天才，22岁进入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最后才发现吉他是其一生挚爱。塔雷加被后人誉为“吉他上的肖邦”，共作有70多首吉他曲、120多首改编曲，在技巧上充分体现了吉他的音乐特色，其中不少曲目是吉他音乐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如《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11\]](#)）、《阿拉伯风格奇想曲》等。

除作曲以外，塔雷加还挖掘了大量的吉他演奏技巧，譬如吉他的八度泛音。泛音是种提琴技巧，用手轻轻搭在琴弦的整数分割处，拉出来的声音具有口哨般的清脆感。这种技巧被塔雷加移植到了吉他上，因此吉他在音色方面的表现力被大大丰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塔雷加甚至可被认为是“吉他上的帕格尼尼”。无独有偶，帕格尼尼也创作了许多吉他作品，并曾说：“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

塔雷加将巴赫、舒伯特、莫扎特等古典名家的大量作品改编成吉他作品，这其实是冷门乐器的必经之路，例如竖琴和马林巴都拥有大量从钢琴移植改编的曲目。

吉他文献中最重要作品的创作者并非塔雷加，而是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格。罗德里格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12\]](#)）几乎是古典吉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第二乐章的主旋律已成为西班牙风情的代名词，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虽然这部协奏曲在首演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但罗德里格因此获得的版税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首西班牙乐曲。《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是所有吉他协奏曲中演出频率最高的作品，也被视为吉他演奏家的试金石。

前文所述的德奥交响乐、意大利歌剧、斯拉夫民族音乐，以及精致优雅的肖邦作品和低沉深厚的北欧音乐，实际上都是古典音乐框架下的调性音乐。与之相对的，则是20世纪由勋伯格为首的作曲家所发明的无调性音乐。在无调性音乐的领域里，德彪西反而是先行者，他对半音音阶的使用让无调性音乐初见端倪。

[\[1\]](#) 《培尔·金特第一组曲》（*Peer Gynt Suite No.1*）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1888年管弦乐组曲Op.46

[\[2\]](#) 《培尔·金特第二组曲》（*Peer Gynt Suite No.2*）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1891年管弦乐组曲Op.55

[\[3\]](#) 《芬兰颂》（*Finlandia*）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900年交响诗Op.26

[\[4\]](#) 《C大调第七交响曲》（*Symphony No.7 in C major*）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924年交响曲Op.105

[\[5\]](#)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904—1905年协奏曲Op.47

[\[6\]](#) 《威仪堂堂进行曲第一号》（*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o.1*）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1901年进行曲Op.39

[\[7\]](#) 《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b minor*）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1909年协奏曲Op.61

[\[8\]](#) 《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1919年协奏曲Op.85

[\[9\]](#) 《e小调第九交响曲》（*Symphony No.9 in e minor*）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1956—1958年交响曲

[10] 《伊比利亚组曲》（*Iberia*）艾萨克·阿尔贝尼兹（Isaac Albéniz）1905—1909年组曲

[11]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Recuerdos de la Alhambra*）弗朗西斯科·塔雷加（Francisco Tárrega）1896年吉他小品

[12] 《阿兰胡埃斯协奏曲》（*Concierto de Aranjuez*）华金·罗德里格（Joaquín Rodrigo）1939年协奏曲

15 塞尚与凡·高：后印象主义艺术

（一）科学与艺术

19世纪，人类对科学的认知已经达到了非凡的高度。简单举例，电力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关于电学研究，麦克斯韦在1864年写下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原则上能解释一切经典电学现象；在交通领域，发动机技术的发明使得日后汽车得以普及，而汽车发动机最主要的问题——热机效率及工程学问题，著名法国物理学家卡诺早在19世纪上半叶便已给出过预言性答案；数学领域的分析、几何、代数还有微分方程，在应用方面都已足够强大。与科学的发展相对应，在19世纪，人类对哲学的探索也来到全盛时期。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这些哲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都出现在18和19世纪。到19世纪后半叶，欧洲已基本脱离蒙昧，宗教统治力日见衰弱，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梦想似乎正逐步实现。同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也逐渐显现。

印象主义之后，一大批优秀艺术家涌现出来，在艺术创新上挖掘出各种各样新奇的视觉效果。以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的新印象主义艺术家便是其中典范，他们受到科学理论的启发并将其运用在绘画创作中。

修拉的代表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01）由极小的色点构成，也就是所谓的“点彩”画法。这种画法源于对光线的追求，与印象主义对光线的追求一致，只是修拉更彻底。印象主义追求的是光影给人眼留下的形象，而修拉希望通过点彩手法构造光线本身。在烈日下，人们常遇到某处风景被阳光照射得太过耀眼，以至于觉得景色耀眼，但在欣赏一幅画时，哪怕光线再强烈，除开纯白色的地方，其他部分也很难给人刺眼炫目的感受，这是因为光线经由颜料反射后，达不到足够光强。



01↑

/

《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207.6cm×308cm布上油画1884—1886年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在深入研究色彩原理后，修拉用点彩法提高了画面的光强。点彩法的理论根源与现代荧光屏、显示器等成像原理相同，只是在修拉的时代，彩色电视机还未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拉可算是一位预言家式的艺术家了。

颜料色彩与光线色彩都有“三原色”理论。颜料三原色是红、黄、蓝，原则上，除白色外任何颜色都可以由三原色组合得来。除三原色外，还有白色及黑色用以调节色彩的饱和度和灰度。光的三原色是红、蓝、绿，原则上所有颜色的光线，除黑色外均可用这三种颜色配比得来。根据色彩理论，颜料色及光线色恰好相反，颜料色是“减法色”，光线色是“加法色”。简单来说，把不同颜色的光线混合后，光强是增加的，每加新的光束到原有光束中，不管这束光的颜色怎么变，总体强度是增加的，因为更多“光子”参与进来，能量自然增强。但颜料色不同，把三种原色混合，得到的便是黑色，亦即颜料色给出的光强，是混合得越多，颜料越暗，光强反而越弱，这便是所谓的“减法色”。只有从黑色中，不断把颜色“减去”，色彩才会变亮，光强才会变强。这恰恰是为何凡·高画作看上去比莫奈的更鲜亮，因为凡·高奉行“颜料不调主义”，颜料挤出来往往不经仔细调色就涂抹在画布上，而莫奈的画面色彩灰度更高，是经过调色的结果。

看懂这套色彩理论，修拉创造的“点彩”原理也很简单。譬如要表达绿色，传统做法是把黄色与蓝色混合，因为颜料色是减法色，所以混合的绿色光

强比黄色和蓝色单独的光强弱。若不把黄色颜料与蓝色颜料混合，而是把它们各自发出的黄光与蓝光，在光线层面上混合，这两种光线混合依然得到绿色光，但光强是增强的。所以，若将画布上的黄色与蓝色以此方式放在一起，让两种颜色的光分别从画布反射到人眼里，在人眼里进行黄色和蓝色光线的混合，如此得到的绿色会显得更鲜亮。修拉的想法从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践上却不尽如人意。人眼实际能分辨的最小距离，可以小到现代显示器的像素点程度，这远比画家能画出的点与点之间最小的距离小得多。尽管修拉尽力了，依然无法达到理论效果。但修拉确实从色彩理论得到启发：因为光的三原色之间色彩差异较大，尤其红色和绿色互为补色（即平日穿衣搭配时说的“撞色”，是混合起来会成为接近黑色的一对颜色），这对颜色放在一起会显得异常扎眼，这种扎眼效果可大幅提升画面的跳脱炫目程度，所以修拉在点彩画法中又配以撞色，例如在基调蓝色处，加入红色点彩，这块蓝色便会有“飘浮”着的感觉。再加上修拉的点彩法并不会将白色画布完全填满，所以白色画布会给画面蒙上白光，让画面看上去更明亮，这好比液晶显示器背后有灯光照明一般，哪怕屏幕是黑屏，但只要开着，便不是纯黑。

修拉追求色彩亮度的点彩画法，其实可看成最早的对显示器、荧光屏的追求。凑近分辨率不高的老式电视机屏幕看，在细微尺度下，可见荧光屏每一格都有红色、蓝色和绿色。现代科技发达，显示器分辨率越来越高，苹果公司推出的所谓视网膜高清屏Retina Display，屏幕像素点已小得比视网膜能分辨的最小距离还小，故人眼在正常距离内看不到红绿蓝三色组成的像素点。

现代喷墨打印机使用的便是修拉点彩法的原理。打印机的墨盒只有红、黄、蓝以及黑色，但打印出来的颜色却千变万化，这是因为在机器控制下，修拉追求的色彩在细部的微小距离已可以做到。如此看来，修拉的追求其实更像是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

（二）瞬间与永恒

塞尚对于现代主义艺术有奠基意义，毕加索曾说“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诚然，塞尚的艺术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立体主义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刻。

一般观众对于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别，最大的判断标准便是看这件作品“像不像”，若是写实作品，便是古典的，若画面扭曲变形，甚至不知所云，则必然是现代艺术。其实，这样的判断标准不够，因为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最本质的区别，是在艺术任务的认知上。

为何我们通常认为一只脚踏进了现代主义的是后印象主义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如塞尚、凡·高、高更，而非印象主义艺术家如莫奈、雷诺阿，因为印象主义对于绘画任务的认知与古典艺术基本相同，都是为了描绘自然，描绘客观世界的真实，追求画得“像”。二者只是对“什么是真实”的认知不同。古典主义认知的真实，来源于对三维世界事物规律的研究和学习，并通过这种知识和技巧将三维世界投影到二维画布上；印象主义则认为“眼见为实”，人眼感知到的才是真实的，无须刻意在二维中再造三维，真实地表现二维就够了，所以印象主义写生主张深入观察，抓住光影瞬间。在追求真实与描绘自然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只是对执行过程意见不一。

现代艺术之所以有扭曲变形甚至抽象到“不知所云”的绘画、雕塑作品，本质上是因为现代艺术的任务已不再是描绘自然，而是着重表达自我，包括个人情感、思想认知，甚至上升到哲学观等。

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在艺术任务上形成一组二元对立——描绘自然与表达自我。塞尚、凡·高、高更这三位后印象主义艺术家，虽不能说已是纯粹地追求自我，但他们的作品已经明显开始用“自我”去影响笔下的“自然”了。三位艺术家用了三种不同方式去影响、改变，甚至扭曲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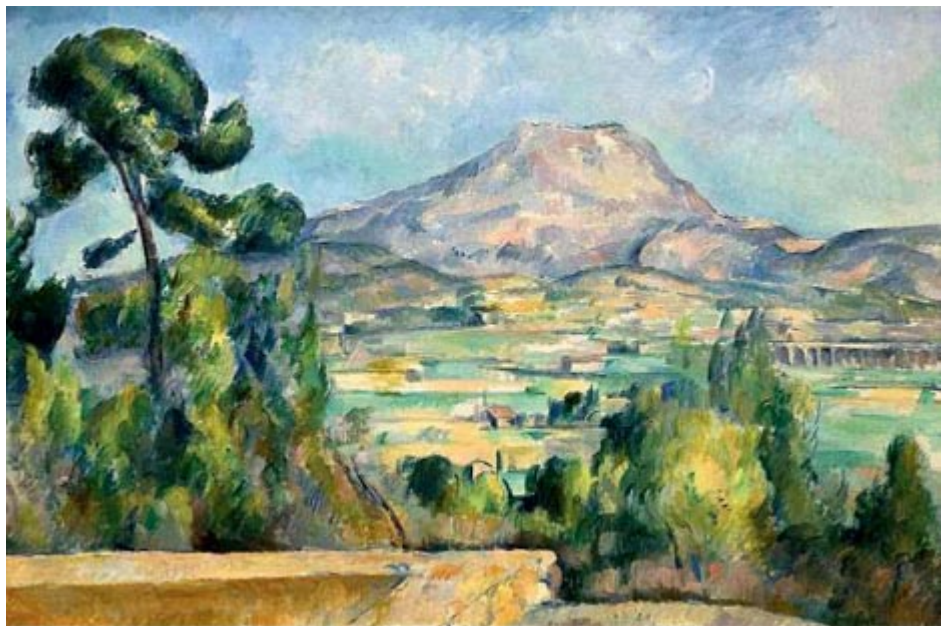
塞尚是从物体的形状上扭曲自然，他对于事物形体的认知是高度几何化的。塞尚早年曾报考美术学院未获录取，但家庭条件优越的塞尚依靠家产度日，在巴黎混迹于印象主义艺术家圈子，交流学习，随后回到南法老家普罗旺斯的艾克斯过着隐居生活，终日绘画创作，不为生活发愁。

塞尚觉得莫奈等人太过追求所谓“光影瞬间”，这种稍纵即逝的瞬间固然美好，但画面难免凌乱，没有内在的自洽与和谐，缺乏终极的平衡感。在塞尚心目中，一幅佳作应呈现出一种永恒的境界，在画中展现颠扑不破的美，就像他一直崇拜的普桑，这位在意大利学习、生活和创作的法国学院

绘画开创者的画作中便存在这种终极和谐。

为了在绘画中达到这种和谐，塞尚的做法是把事物抽象成基本几何图形，如三角形、圆形、菱形、矩形，再对几何形状进行排布，如此便容易抓住画面构图的重点，搭建出和谐稳固的整体形象，不会在绘画过程中被其细节特征所吸引，以至丢掉整体形态。这其实与中国的书法中汉字结构类似，楷书写得方正，结构合理，整个字才好看，而书写过程本质上便是对一些基本笔画的安排：横、竖、撇、捺、横折弯钩这些笔画的结构都是基础性的，然而要把这些基本笔画安排成美观的汉字却并不简单，是书法家审美观的体现。在对事物形状做抽象化处理后，塞尚的作品明显具有了几何感，画面观感上确实不再有印象主义画家笔下那种“凌乱”感受。在回到南法家乡隐居的漫长时间中，圣维克多山一直是塞尚惯常的描绘对象，在他笔下，圣维克多山像是被一系列三角形堆叠出的几何形体（02）。对比普桑类似的山景便不难理解，塞尚是从普桑的画作中获取了灵感。对所画事物进行几何图形抽象化的绘画理念，深深影响了以毕加索为首的青年画家。塞尚常建议青年画家，让他们多关注几何图形，如正方形、圆柱形、锥形，毕加索进入立体主义时期后，画作中便充满了这样的几何图形。

当采用抽象化的几何语言去审视事物时，必然会出现一组矛盾：事物局部形态的准确性与宏观形态和谐度之间的矛盾。塞尚的选择是让局部服从整体，为了整体构图的和谐稳定，他选择牺牲事物的正确性。从这一刻开始，现代主义绘画的思想开始闪光，因为事物局部的正确性是来自“自然”的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但整体的和谐与稳固是艺术家的主观感受，是“自我”的一部分。当“自然”与“自我”形成矛盾时，塞尚选择了偏向“自我”。



O2↑

/

《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尺寸
不详布上油画1890年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

塞尚有许多静物画作品，譬如这幅《高脚果盘、玻璃杯和苹果》（O3）。整体上，观者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但再看画中果盘，视角却又是从果盘侧面看过去的，观者可同时看到果盘的侧面和盘里。为了画面和谐，塞尚把盘子向后扭曲一定角度，这是典型的为了宏观和谐牺牲局部正确性，也可认为是把不同观察角度的图像拼接在一个画面中。到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我们还会看到大量人物侧脸与正脸拼接的情况，这便是塞尚“多点透视”的极致，启发了后世画家对于观察本质的重新探索。

塞尚曾说：“我要用一个苹果震惊巴黎。”当欣赏者抛开画面内容是一堆苹果的事实，并单纯地被几何式的美感所吸引时，塞尚就成功了。笔者最喜欢的画作之一，是目前藏于巴黎橘园美术馆的一幅塞尚静物作品《苹果与饼干》（O4）。这幅画作所展现的和谐、适度的美感，牢牢地抓住观者眼球，这无疑“自我”的胜利。塞尚通过对“自然”



031

/

《高脚果盘、玻璃杯和苹果》（*Compotier, Glass and Apples*）保罗·塞尚
（Paul Cézanne）46cm×55cm布上油画1879—1880年私人收藏



O4↑

/

《苹果与饼干》（*Apples and Biscuits*）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
45cm×55cm布上油画1879—1880年法国巴黎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

的修改、变形及重新定义，创造出自然界本不存在的美，完全属于艺术家纯粹艺术性的创造，也正是现代主义艺术伟大的地方：它大大拓宽了艺术的可能性——在过去人们只能描绘美，但如今人们可以“发明”美。

类似的事情也在当代发生过，这就要说到苹果公司在2013年由“拟物化”变为“扁平化”的设计风格改革。所有图标都做了最大限度的简化，原来的相机图标设计得像一个真实的镜头——有阴影、反光，简化后的相机则是能看出相机轮廓即可（O5）。对于新设计，业界和民间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扁平化的设计语言已成设计界主流。这背后的原因若用塞尚的审美观来解释，就是扁平化的设计语言让图标们都“永恒”了。真实世界闹钟的形象各不相同，永远找不出唯一代表闹钟概念的拟物形象。因此，只有把闹钟形象简化、扁平化到“再减少一个部分，闹钟概念就要崩塌”的地步，方能满足所有人对闹钟的认知。而这个认知也恰恰是最“永恒”和稳固的，今

后无论如何变化，闹钟形象都不会从根本上被颠覆。这也就是为何多年来，扁平风一直主导着设计界。下一次何时回归拟物风格难以预见，会不会发生回归也未可知。



O5↑
/
苹果图标对比

（三）客观与主观

总体上，塞尚对现实进行扭曲和改造的方式相对理性，而凡·高扭曲现实的方式则是感性的。

凡·高的故事奠定了大部分人对画家职业的习惯性认知，也让“艺术家是贫穷的”固有形象深入人心。凡·高与历史上的伟大画家如拉斐尔、伦勃朗、安格尔这些古典绘画大师并非一类。这些大师无一例外都对客观世界、对美感有着极强洞察力，是描绘“自然”的高手。凡·高则完全不同，他的天才是与生俱来对情感的表达欲望，是对“自我”的无限放大。凡·高的画作在“自我”与“自然”的权衡上，比塞尚更偏向于“自我”。

凡·高是荷兰人，年纪比莫奈、塞尚小十几岁，入门非常晚，27岁方才正式开始绘画创作，在此之前做过学徒、牧师。凡·高的绘画生涯不过短短10年，虽然他的死在历史上争论不断，但官方说法是，凡·高37岁时因精神错乱开枪自杀。

凡·高的画作极具感染力，且观者须站在真迹面前才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凡·高的艺术给人带来这般感受，“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原因都有。“形而下”的原因大致有两点：色彩与笔触。首先，凡·高的画作色彩极其鲜亮，这与他采取所谓的“颜料不调主义”有关。当然，凡·高不可能做到所有颜料都完全不调色，只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凡·高倾向于纯色，其整体画面的饱和度及亮度也因此增强，凡·高画作的浓烈色彩正来自于此。但实际上，凡·高绘画生涯的前半段用色灰度颇高（O6a/O6b），直到来巴黎发展，接触到印象主义画作后，凡·高对色彩的认知才“开窍”，开始使用浓烈的色彩。

除开浓烈的用色，凡·高与前人最大的区别，是他标志性的笔触。凡·高极其强烈地强调笔触本身。其画作中的颜料都极厚，这也是为何欣赏凡·高画作，真迹与画册感受会极其悬殊。通过厚实的颜料塑造笔触本身，这种厚度给凡·高的画作以深浅上的“浮雕感”，而这种浮雕感在照片上是感受不到的，少了一个维度的表现力，观感差异自然极大。



O6a↑

/

《被修剪过的柳树》（*Pollard Willow*）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38cm×56cm布上油画188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



O6b↑

/

《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82cm×114cm布上油画188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

另一方面，凡·高对笔触的刻画也彰显了“个体与整体”的发展关系。这是一条自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发展到凡·高的逻辑线：画面本身是“整体”，组成它的每一笔都是“个体”，从文艺复兴直到凡·高，“个体”的地位是在不断被强调以及凸显的。以拉斐尔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绘画甚至整个古典主义绘画，至安格尔为高峰，对笔触都尽力隐藏，因为个体在组成整体后，便无存在必要。前文也曾对比，委拉斯开兹的教皇肖像画较拉斐尔的教皇肖像更为生动传神，委拉斯开兹的笔触是概括的、粗犷的，这便是“个体”开始崭露头角。再到伦勃朗，对笔触更是毫不掩盖，通过看似“信手”留在画布上的一抹颜料，让画作呈现出“斑驳”感，有助于刻画人物内心状态。委拉斯开兹、伦勃朗的个体笔触依然需要依托整体形象才能达到烘托情感深度的作用，但凡·高已经能通过笔触本身展现情感，他将笔触作为个体的表现力又提升到新层次。这条逻辑线还未终结，到20世纪中后期，波洛克又将这条“整体”与“个体”的逻辑向前推进一步。



07↑

/

《凡·高的椅子》（*Van Gogh's Chair*）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92cm×73cm布上油画1889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从这层意义看，中国书法的确是个体与整体协调搭配得最平衡的艺术：单独的笔画对字的整体形象极为重要。一个字写得好，也许看不出某一笔画的重要性，出现败笔时，“个体”便显得十分重要。再放眼整件书法作品，每一个字作为个体优美与否，与作为整体的书法作品美观程度也未必是正相关的。比如，每个字都精致无比，也许整体只算是蝇头小楷或印刷文本。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字，其设计都极为重要，笔画简单的字和笔画复杂

的字要怎么处理，甚至不同含义的字在通篇中处在什么位置，都要考虑进去，才能写出形神俱佳的书法作品。

凡·高画作中形而上的精神内涵来自他扭曲自然的方式。凡·高是以自身感官的感受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来扭曲自然形象的。感官方面，由于精神原因，凡·高看到的事物极有可能与常人不同，许多艺术家试图通过酒精或药物来寻找所谓灵感。

人的感官很容易被影响和欺骗，例如在阳光下对强光照射的白墙盯上10秒钟，再回到室内，会发现所见事物有各色重影。来看一幅凡·高的代表作《凡·高的椅子》（07），描绘的是一把偏黄的椅子，但在椅子边缘处能看到蓝绿色边框，该边框便是因凡·高主观情绪而加上去的。他拥有比常人更强的情感感受力，所以使用了更能表达自我的方式来描绘物体。在作品《阿尔勒的卧室》（08）中，凡·高用鲜艳的色彩描摹了黄色床脚、淡蓝色墙壁和鲜红被单。在与弟弟的通信中，凡·高表示画这个房间可以让他的情感得到休息。在凡·高不同的自画像作品中，注意笔触的形态，会发现有些画作直线居多，有些则是曲线居多，这些直线曲线显然不出现在真实场景中，只是凡·高的主观感受。



08↑

/

《阿尔勒的卧室》（*Vincent's Bedroom in Arles*）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72cm×90cm布上油画188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Van Gogh Museum)



09↑

/

《星夜》(*The Starry Night*)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73.7 cm × 92.1 cm 布上油画1889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除开自身情感的强烈外，凡·高一直饱受家族基因中遗传性精神错乱的影响，生命后期还染上梅毒，梅毒晚期时患者可能出现精神状态异常。如此，凡·高对于事物的夸张描绘并非完全来自他自身的强烈情感和旺盛表达欲，其精神状态同样深刻影响了事物在他眼中的形态。从笔触和笔画的走向中我们能隐约感受到，凡·高其实是老实实在地、一笔一笔地把看到的事物记录下来。由于凡·高几乎从未受过严格的学院式绘画训练，所以笔触中藏着一种笨拙感。这种笨拙恰恰以纪实的方式，将主观情感支配下的真实所见和情绪感受忠实地记录下来，画布上的情感冲击力即便跨越百多年的时光，仍能让人切身感受到。(09)

仅10年的艺术生涯里，凡·高创作了近2100件作品，其中油画860幅，这已然比莫奈还高产了，而莫奈在漫长的艺术生涯创作了近1200幅油画，已称得上是“油画印刷机”。这个数字更说明，凡·高观察得少，输出得多，因为印象主义的关键在于对光影的观察，这要花掉不少时间。但对凡·高来说，

观察自然不是最主要的，尽管他常常写生创作，但很明显凡·高的写生只是在“自然”中为他的“自我”汲取更多养分。凡·高画作中的客观事物是什么已不是关键，对他来说，“自然”只是“自我”的载体而已。以凡·高为起点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叫“表现主义”，之后还有“抽象表现主义”。顾名思义，所谓表现主义，便是绘画应当纯粹地表达自我，是发乎感性的、最直接的艺术表达方式。

关于凡·高，世人有不少误解。其实，他生前的穷困潦倒并非全因创作不被世人接受，关键还是在于其寿命太短，绘画生涯则更短。凡·高在法国的时间不过匆匆5年，5年时间对一个非科班出身，27岁才开始正式创作的艺术家的来说，无论他多有才华，也还是太短，更何况是在高手林立、能人辈出的19世纪末。若凡·高多活10年，生前影响力一定不止于此。在凡·高去世之前，已经有目光敏锐的艺术家注意到凡·高的才华。在凡·高曾经参加过的印象主义独立展览上，莫奈就曾犀利指出，凡·高的作品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

在雕塑界，与莫奈、塞尚、凡·高几乎同一时期的罗丹之所以能在艺术史上获得如此崇高地位，也是因为其雕塑艺术在雕塑史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罗丹的雕塑在艺术语言上与凡·高有相近之处，都展现出表现主义的端倪。

首先，罗丹对古典主义雕塑有所传承。普法战争后，罗丹在35岁时去了一趟意大利，被多纳太罗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深深吸引。回到比利时后，罗丹做了一尊名为《青铜时代》（010）的真人大小雕塑，以一名比利时士兵为模特，灵感来自米开朗琪罗的《垂死的奴隶》（011）。由于这尊雕像技艺太过精湛，对人体的把握过于精准，被时评家们污蔑为造假，他们不相信罗丹未用真人模特翻模。这种对真实形体的刻画能力，展现了罗丹的古典传承。

罗丹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也是雕塑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思想者》（012），是与古希腊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齐名的作品。《思想者》起初并非独立雕塑，而是罗丹受了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委托，为该艺术馆做了一扇青铜大门。尽管这间博物馆没有盖起来，这扇门却成了不朽杰作，现收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这件雕塑叫《地狱之门》（013），是但丁《神曲》中通往地狱的大门。罗丹在门的上下前后共刻画了180多个人物形象，而“思想者”正是坐在门框上方横梁的那一位。从思想者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在审视着走到地狱门口的人们。罗丹曾说，他并非单纯通过人物的眉间紧蹙或者苦思冥想的姿势，来表达“思想者”的思考状态，而是要让“思想者”的每一块肌肉和每一寸肌肤都可以表达思想的力量。若仔细观察“思想者”的皮肤纹理和肌肉形态会发现，这已然不是正常人类身体能有的“坑坑洼洼”了。除《思想者》外，在罗丹40岁之后许

多中晚期雕塑中，保留了大量的粗糙感。在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全身像（O14）中，为表达巴尔扎克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罗丹在创作过程中做了大量调研，最终才选择了在常人看来较为“奇怪”的人物形象。果不出意料，这尊雕像被委托罗丹创作的作家协会拒收了。



O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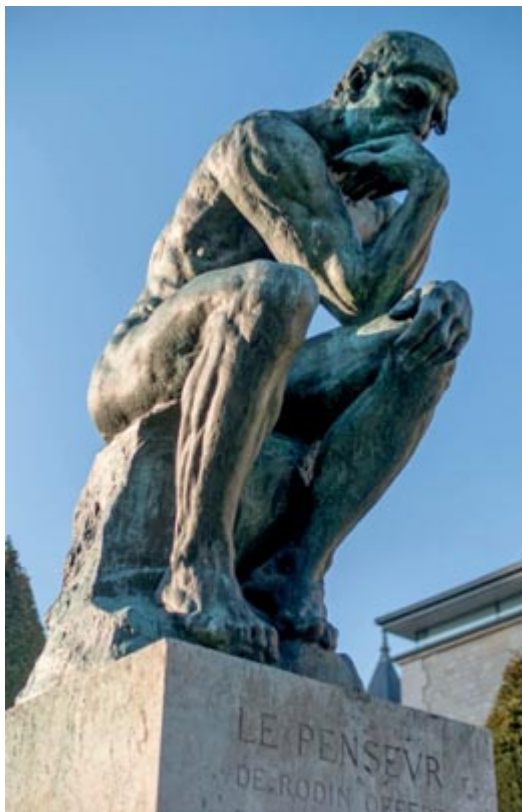
/

《青铜时代》（*Age of Bronze*）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真人大小 青铜雕塑 1870年多地收藏



011↑
/

《垂死的奴隶》（*The Dying Slave*）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高2.15m 大理石雕塑 1513—1515年法国巴黎 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O12↑

/

《思想者》（*Le Penseur*）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多种尺寸 青铜雕塑 1880年多地收藏



O13↑

/

《地狱之门》（局部）（*The Gate of Hell*）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青铜雕塑1880年美国费城罗丹博物馆（Rodin Museum）



014↑
/

《巴尔扎克塑像》（*Cast of Balzac*）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真人大小青铜雕塑1891—1898年法国巴黎罗丹博物馆（Musée Rodin）

在雕塑的局部刻画中，罗丹丝毫不隐藏雕琢痕迹，这种做法与凡·高的笔触异曲同工。罗丹通过这种方式将情感倾注到雕塑作品中，是其改造“自然”的典型做法，大有表现主义倾向。罗丹之后的雕塑家显然越发地放飞自我，“自我”愈发占据主导，甚至抛弃具体形象，如布朗库西、博乔尼、阿尔普，以及贾科梅蒂，无一不受其影响。

（四）先进与原始

凡·高到巴黎后，结交了一位也是“半路出家”的圈中好友。凡·高曾邀他一同到乡间同住并创作，结果因艺术理念分歧，两人分道扬镳。此人便是著名艺术家、前证券经纪人、富有的保罗·高更。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艺术，不论哪个风格、哪个流派，多多少少都受到过高更的影响。

高更一直在探索着“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并将答案引向了“原始主义”。高更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艺术被越来越多的技巧所制约，而真正的艺术应来自人类内心最本源、天然、自发的创造力，而知识和技巧恰恰剥夺了这些天性。因此，追求本能的创造力是高更艺术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自19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写实主义狂潮就多少带有这种意味：法国写实主义和巴比松画派觉得当时学院艺术太“假”，应当多描绘身边事物以及自然形态；英国的拉斐尔前派觉得，应当回到拉斐尔之前的并无人造“完美”概念的绘画中去；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要让俄罗斯人民认识俄罗斯艺术，于是开始刻画俄罗斯大城市之外的风情风貌。

为何印象主义艺术家都对日本浮世绘感兴趣？因为日本浮世绘给了“艺术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可能的答案。浮世绘没有透视、解剖，并不追求正确，也不追求描绘自然，虽然许多情况下浮世绘只是夜总会的招贴画，含有大量色情意味，拥有浓烈色彩和夸张表达，但这恰是一种原始的、不受客观技巧和知识束缚的表达方式。

德彪西等人的印象主义音乐也是如此。德彪西对和声的使用是建立在个人听觉上的音乐色彩感，他部分抛弃了巴洛克时期就发展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功能性的和声理论，更专注于本能地、感官地面对不同和声。从该意义上看，德彪西的音乐创作无疑是更接近原始主义的创作方式，深得印象主义艺术家青睐。如此一来，尽管德彪西自己不愿意，他“印象主义音乐家”的名号终究坐实了。

在艺术生涯的后半段，高更为追求原始天然的表达，常驻太平洋上一个叫塔希提的小岛。岛上生活着许多土著居民，他们毫无科技可言，文明也极其原始。土著文明恰是高更追求原始化创作的最好题材。在这期间，高更创作了大量以土著人、土著生活为主题的画作，并借此对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探索，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名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将去往何处？》（O15）的巨幅油画。



O15↑

/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将去往何处？》（*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39.1cm × 374.6cm 布上油画1897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O16↑

/

《两个大溪地女人》（*Two Tahitian Women*）保罗·高更（Paul Gauguin）94cm × 72.4cm 布上油画189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高更在创作过程中更发展出象征主义（也可理解为符号主义）的艺术倾向。在高更的土著题材作品中，画中人物的面容形象表现出了高度的同质化及脸谱化，简单来说就是高更笔下人物长得几乎一样。（O16）

高更将同一主题的对象进行同质化处理，并运用大量纯色以及色块，这便是象征化、符号化的初始征兆。对目标对象进行简化和抽象化是象征主义的开端。这可类比于中国汉字的成型过程。当今汉字的具体形象，相较于它们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无疑是抽象的。抽象汉字是经由最早的甲骨文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象形文字演化而成。最早人们要表示一条鱼，就画一条鱼的形象，逐渐地，鱼头、鱼身、鱼尾都演变成笔画，象形文字的不同部分都被抽象、简化成了笔画，如此造字才具有延展性。这便是为何高更作品中，简化以及脸谱化的刻画展现了象征主义。



O17↑

/

拉斯科洞窟壁画（局部）发现于1940年法国多尔多涅省

对高更来说，这样的手法无疑能够表现土著人简单、朴实的形象，也更接近纯真的、反技巧的、孩童式的绘画方式，全面摆脱技巧指引，这无疑是对返璞归真的追求。迄今已知最早的人类艺术创作，是1940在法国拉斯科洞窟发现的壁画（O17），有野牛等形象。这头牛的符号感和象征意味与高更的画作似乎心有灵犀，虽然高更并不知道这头牛的存在。

高更的原始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大大启发了后世艺术家，如：著名的纳比派追求的是艺术家的主观美学观对现实事物的变形；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主义绘画追求粗放的刻画，是对内心艺术感受不加修饰的、爆发式的表达方式；还有毕加索的名言，“我14岁就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但我毕生都在追求如孩童般绘画”。虽然学术界并无公论，但在笔者看来，20世纪之后的抽象艺术、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多少都受到高更的原始主义精神的影响。

塞尚、凡·高、高更这三位大师被认作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本质区别具体是什么？就笔者看来，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在于，古典艺术描绘“自然”，现代艺术表达“自我”。一方面，不妨对比古代艺术家与现代艺术家的工作性质和商业模式。古代艺术家的创作是为满足客户需求，以客户的要求为指导思想，在这个大目标下艺术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同时追求艺术造诣；现代艺术家则完全按照自身感受和意志进行创作，买家再根据自己的艺术品味及作品的投资价值进行收藏。另一方面，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从古代到现代有着巨大转变。在古代，艺术家同时肩负着“商家”的使命，要满足大众及委托方的各种需求，如肖像需求、装饰需求、宗教教化需求等，对于写实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古代艺术家必须要准确地描绘“自然”，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所谓艺术表达；现代艺术家不用在意公众品味，只顾表达自我，只要自己满意，觉得表达清楚，就达到了艺术创作的目标。艺术家职能与地位的差异以及艺术品功用和性质的差异，造成了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巨大差别。

19世纪后半叶西方艺术发生了如此的跳跃式剧变，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技术进步。再精确一些，是源自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摄影术的发明意味着描绘自然的写实绘画根基崩塌。从此，追求“画得像”这件事走到终点。如此，19世纪后半叶的艺术家便不再把“画得像”当成不言自明的必然追求，随之而来的印象主义绘画虽然并未放弃描绘自然，但很明显地已经在追求与传统的“照相机式写实”相异的表达方式。印象主义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印象主义画作虽然在“形”与“线条”的方面仍然无法比拟照相机，但他们重新定义了真实：真实应是人眼看到的光线，而不是由人类对三维世界知识的掌握从而构成的理念世界。摄影术的发明将艺术家从描绘自然的基本追求中解放出来，迫使他们追求更广阔的艺术表达空间。

第二是学院体系的建立。学院体系虽然弊端众多，却也让艺术由一项“活计”变成一门“学科”，艺术家也由“手艺人”变成拥有和学者类似的社会地位。有了皇家和政府的支持，艺术家便可摆脱世俗需求的桎梏，专心艺术创作。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出现了罗马大奖等激励措施，大大提高了艺术家的培养效率，艺术家在艺术学习上的资源也更丰富。学院的建立让艺术脱离了对大众需求的迎合，成为和数学、物理学一样可以深度钻研的领域。

第三是19世纪资产阶级兴起。艺术具有投资价值是从古代便已达成的共识，并一直站在人类消费链顶端。由于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能够收藏、购买艺术品的人逐渐增多，这导致艺术行业规模变大，制度更健全。经济水平的提高刺激着19世纪资产阶级不断追求更高的消费，对艺术的需求也不再是对“照相馆”的功能性需求。因此收藏家以追捧概念新潮的艺术家为

荣，举办官方沙龙、展会，开办画廊、拍卖行。如此一来，艺术创作与艺术品买卖成为良性循环。资产阶级兴起给艺术家追求自我的创作方式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种基础必不可少。

塞尚、凡·高、高更这三位后印象主义艺术大师对于西方艺术史进程的推动极为重要。他们的艺术对后世艺术家的启示在于激发他们思考“什么是艺术”这一终极问题。在对艺术任务的认知发生切实变化后，新的艺术就此诞生。接下来，让我们拥抱20世纪的现当代艺术。

16 毕加索与马蒂斯：现代主义艺术

（一）局域与完全

20世纪是人类历史迄今物质文明变革最彻底的100年，与之对应的精神文明变革也极其剧烈，尤其在艺术领域，可谓天翻地覆。20世纪发生了许多世界性大事件，如一战、二战。每次大规模战争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旧世界中心兴许就此衰落，新世界中心可能从此崛起。二战之前，德国尤其是格丁根大学是世界学术中心，学术期刊论文多由德语写成，而非像当今多由英语写成；而纽约作为新世界的艺术中心取代了自19世纪始便享有“艺术之都”盛誉的巴黎。

世界格局的变迁与社会阶级的重新划分对艺术史的发展起着关键推动作用。前文提到，自路易十四建立皇家美术学院后，学院化的艺术界让艺术家的地位显著提升，至少与学者相当。而相较于学者，彼时的艺术家更关心社会与政治。自19世纪中叶以来，艺术不断着眼并取材于社会和平民。逐渐地，社会问题和政治主张不断融入艺术，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现在。大体上，现代艺术尤其是先锋艺术，必谈社会问题和政治主张，艺术成了现实生活的镜子，社会的变革必将推动艺术的演变。

进入20世纪以后，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重要分水岭，西方艺术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19世纪末到一战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毕加索和布拉克等人为代表的立体主义，以及以挪威的蒙克、德国的基希纳等人为代表的表现主义；一战到二战为第二阶段，对战争的恐惧、谴责以及抵触促使了追求无意识以及“反艺术”的达达主义在瑞士诞生，直接影响并催生了超现实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是现代艺术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流派，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能看到它的身影；二战后到现在为第三阶段，世界艺术中心转移到纽约，艺术在形式上大大超出了传统艺术的范畴，疆界被极大地拓宽，从波洛克、罗斯科、德·库宁、纽曼等人的抽象表现主义开始，经过与之相对的极简主义艺术，再加上艺术理想更为广义的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全新技术领域的洗礼，西方艺术史开始了从现代艺术往当代艺术进发的过程。

除画面观感外，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艺术家对艺术风格的主观认知。古典艺术的年代，所谓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主义名词，几乎都是后人为了归纳和研究为之命名。在卡拉瓦乔看来，相比于拉斐尔，他只是更注重明暗对比和对戏剧性瞬间的刻画，并不知道自己在创作巴洛克风格的绘画。现代主义艺术家则完全不同，他们非常清楚自

已在创作某种特定风格的艺术，甚至会主动发明新的艺术风格或发起艺术运动，推动某种新风格的发展。比如在1910年的意大利，就有一批艺术家倡导所谓的“未来主义”艺术，并为此写下了“未来主义宣言”，后来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也都是作为文化运动诞生的。

古典艺术时期的审美标准接近统一，大体是追求照相机能做到的写实美感。20世纪照相机技术的日益成熟让艺术离传统美学越来越远，不再具有统一的审美标准，艺术的目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表达真和美转向情感宣泄或对思想领域的探索。因此，概念性、思想性，是艺术进入现代主义时期后的一大特征。现代艺术是具有哲学意味的艺术，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将艺术作为表达工具的哲学探索，它的思想与情感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艺术表达。哲学让现代艺术拥有了自由的羽翼，风格、流派数不胜数。

但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哪怕繁复如此，也依然可以针对风格、流派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塞尚、凡·高、高更三位大师是现代艺术的起点，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以及它们各自衍生出的艺术风格，分别是塞尚和凡·高的遗产。

立体主义是一种“探究型”的艺术风格，而表现主义则是“表达型”的艺术风格。

受塞尚绘画思想的影响，毕加索和布拉克于1908年开创了立体主义绘画。这个年份甚至被认为是现代艺术真正成型的元年。立体主义绘画的大致创作方法是从不同角度观察所画对象，得出一些形象，再把这些形象经过几何性的抽象和简化，在画面上拼接呈现出来。例如毕加索和布拉克都画过乐器（P1a/P1b），都是把乐器的不同部分以及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形象重新在画布上拼接。

立体主义绘画所表达的艺术思想其实是对三维空间在画布上的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三维的、立体的，但因为人类的视觉是二维的，所以传统绘画是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去描绘属于人类视觉上的立体感。这种立体感说到底只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并不真实。为了打破“假的”立体感，艺术家需要去思考人类观察事物的方式。怎样的视觉表现才能更完善地展现出“事物是立体的”这个事实呢？

很明显，如果用摄像机拍摄一只杯子，只要围绕着杯子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就能展现这只杯子是拥有不同侧面的立体事物。但绘画不是拍摄，画家拥有的只有画布和画笔，因此，为了把事物的不同侧面展现在同一平面中，同时又保证新的形象是一个有机整体，立体主义艺术家的做法是把事物的不同侧面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如此，一件真正立体的事物就在二维平面上展现出来了。



P1a↑

/

《小提琴》（*Violin*）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00cm × 73cm 布上油画 1911—1912年 荷兰奥特洛克罗勒—穆勒博物馆（Kröller-Müller Museum）



P1b↑

/

《拿吉他的男子》（*Man with a Guitar*）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16.2cm×81cm布上油画1911—1912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 MA）]



P2↑

/

《咖啡馆中的舞者》（*Dancer in a Café*）让·梅金杰（Jean Metzinger）
146.1cm×114.3cm布上油画1912年美国水牛城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立体主义的绘画不局限于创作方式，而是一种更具有哲学意味的探索。立体主义艺术家有很多，除了主要创始人毕加索和布拉克之外，法国画家梅金杰明确提出了立体主义在探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视觉上表达事物的“完全性”（P2）。这恰恰就是上述立体主义艺术家们的做法。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立体主义绘画除了同时展现事物的不同侧面形象之外，还会做

很大程度的抽象化。这种抽象化来自对事物完全性的进一步探索，是事物特性中更为形而上的部分。譬如说，在外观上不同山峰的形象之间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但是根据塞尚的观点，它们大多都具有三角形的轮廓。所以，根据形而上的规律，塞尚这种几何式抽象化的三角形更接近山峰形象的本质，代表了事物更本质的、永恒的、持久的完全性。

这其实与数学中拓扑学所关注的事物属性有共通之处。拓扑学所研究的，是可以通过连续形变进行互相转化的一类形状的特性。譬如说，一只把手的咖啡杯和一个甜甜圈的拓扑性质完全相同，因为本质上它们都有一个洞。如果用橡皮泥捏出一只咖啡杯的形象，然后再去重新塑造这个橡皮泥咖啡杯，在不闭合把手上那个洞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慢慢地把咖啡杯捏成一个甜甜圈的形象。由于能完成这样的操作，所以咖啡杯在拓扑上与一个甜甜圈是一回事，叫作“拓扑等价”。拓扑性质是事物形状更形而上的性质，立体主义所做的抽象化与拓扑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看，立体主义艺术是探究性的，它追求的是事物的完全性，这种完全性甚至是一种形而上的完全性。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分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与“综合立体主义时期”。1908年到1909年是分析立体主义时期。这很好理解，就是上述的“分解、抽象、再重构”的过程，象征着对特定事物的分析、解构以及对事物完全性的探索。之后4年，毕加索把立体主义的“分解、抽象、再重构”的思想进行扩展：如果艺术表达的不是特定物体，而是更大范围的对象，譬如描绘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事物，把这些事物的部分元素拿来同时表达在一幅画作当中，就会得到“综合立体主义”。正因为这样广义的立体主义思想，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常显得具有界限感^(P3)。这种界限感体现在色彩的变化更为剧烈，拥有明显的色块区域，这是把不同事物的不同部分以艺术家的逻辑连接在一起的结果。毕加索甚至创造了拼贴艺术，把不同来源的纸张以及不同材料，如报纸、彩色纸张等拼贴在一起，可谓拼贴艺术的先驱。

从探究性的意义上来说，立体主义在概念上大大拓宽了艺术的疆界。此前，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探讨过观者欣赏一幅画的方式。因为观者，也就是人类的眼睛是存在于同一个平面上的。只要简单思考鱼类是如何观察世界的，就会获得很大启发：鱼的两只眼睛长在两个不同的平面，所以鱼可以同时看到两幅相对摆放的画作，不难想象，如果一把尺子放在鱼的正面，鱼看到的尺子应该是弯的。其实所谓事物的视觉形象并不客观、唯一，还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方式，对鱼这类生物来说，同时看到一件事物不同角度的形象并非难事，而人类的想象力其实是被自己的视觉感官限制了。此前，一直是欣赏者观看画作，而立体主义却让画反过来质疑欣赏者，对欣赏者的观察方式提出疑问，这其中蕴含的探索意味不可谓不深

刻。



P3↑

/

《有果盘与玻璃杯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Compote and Glass*）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63.5cm×78.7cm布上油画1914—1915年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艺术博物馆（Columbus Museum of Art）

立体主义的影响极其深远，是现代主义艺术分支中诞生最早、影响最广、大师数量最多的流派，之后的风格流派几乎都受其影响。

首先感知到立体主义的影响力并做出强烈反馈的艺术流派诞生于意大利。1909年，意大利诗人、文艺理论家马里内蒂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主义宣言》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未来主义”这一主张；1910年，以博乔尼为首的一众艺术家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的一座剧院里宣布成立未来主义艺术流派，并发表了《未来主义绘画宣言》。“未来主义”并不限于艺术，而是一场根植于意大利的全面文化运动，未来主义主张与腐朽、陈旧的文化思想

及道德体系作切割，崇尚现代和未来的新事物，例如机械、工业、科技。



P4↑

/

《拴着皮带的狗》（*A Dog on a Leash*）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
89.8cm × 109.8cm 布上油画 1912年 美国水牛城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为了追求未来的、现代化的事物，未来主义艺术从主题上热衷于表现动感、速度这些现代化特色的元素。未来主义的代表作其实是一幅小作品，来自艺术家贾科莫·巴拉的《拴着皮带的狗》（P4）。这幅作品画面虽然简单，但却将奔跑着的小狗的腿抽象成了飞速旋转的轮子，以此来表现运动感和速度感。艺术家是把一条时间轴上不同时刻小狗腿的位置画在了同一平面。这种做法其实跟摄影艺术中利用长曝光时间制造具有动感影像的手法类似，都为表现所描绘对象的运动。

未来主义成就最高的艺术家无疑是博乔尼，绘画代表作有《充满活力的自行车手》（P5a）和《城市的兴起》（P5b）等。其整体视觉效果都是通过上述“残影”式的手法展现所画对象的运动，构图上有立体主义的抽象化手法，因为做规律运动的事物在空间中划过的轨迹通常都是一些规律的几何形状，例如天体运动的轨迹主要就是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三大类。雕塑作品方面，博乔尼的著名作品则是《空间中连续的形》（P6），刻画了一个正在行走的人。有行走倾向的人物艺术形象在传统雕塑作品中也有不少，

例如罗丹的《施洗约翰》（P7），通过将施洗者人物形象重心前倾的方法表达行走，而博乔尼的做法更为直接，他把人物行走时在空间中划过的轨迹做成了“加粗”的人物形象，由此表达人在行走时的状态。



P5a↑

/

《充满活力的自行车手》（*Dynamism of a Cyclist*）翁贝特·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70cm×95cm布上油画1913年意大利威尼斯古根海姆收藏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P5b↑

/

《城市的兴起》（*The City Rises*）翁贝特·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
199cm×301cm布上油画1910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 MA）]

从画面上看，未来主义充满了炫丽的色彩和动人笔法，观感上可谓琳琅满目，而从核心表达方式上看，未来主义也是“探究性”的。



P6↑

/

《空间中连续的形》（*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翁贝特·博乔尼（Umberto Boccioni）高111.44cm青铜雕塑1913年意大利米兰二十世纪博物馆（Museo del Novecento）

相比立体主义追求所谓事物的“完全性”，未来主义追求的是事物的“未来感”，具体说是事物的运动和时间感：通过描绘对象在一段时间内形态的变化表现出速度和时间的流逝，即指向未来。其实，这种未来感也是一种完全性，只不过立体主义追求的完全性是事物在空间上的完全性，未来主义追求的，是事物在时间中的完全性，二者实际上拥有一定的等价特性。

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相对的。当一位艺术家从各个方向去观察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形态时，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理解这一行为。立体主义对此的理解方式是，艺术家作为观察者从各个角度观察了所画对象，对象不动，观察者在动。但根据运动的相对性，同样也可以认为观察者未动，是所画对象在运动。从这种观点入手，观察到的动作就转变为所画对象在一定时间内做出的运动，这便是未来主义的理解方式。所以说，未来主义的表达方式跟立体主义是等价的，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完全性也是等价的。

为什么精神内涵如此激进的未来主义，会诞生在文化历史悠久的意大利？这恰恰是源自一种“文化焦虑”。中世纪之后，意大利众多地区率先进入了文艺复兴，从15世纪到17世纪这300年间，所有艺术几乎都起源于意大利。

利。但从18世纪开始，意大利艺术似乎不再强盛，此后200多年也一直
在“吃老本”。这当然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息息相关。17世纪，
在路易十四的领导下，法国崛起；18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神圣罗
马帝国如日中天；19世纪，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英国则进入了全盛
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还是一盘散沙，羸弱不
堪，直到1870年才全境统一。这就导致意大利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全面焦
虑：为何在文化上曾如此优秀和先进的意大利会变得不如周边列强？他们
把原因归结到自身文化的陈旧和腐朽上。意大利作为天主教的核心国家，
象征着基督教旧道德观的正统。博乔尼最为崇尚尼采的学说，主张打破以
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旧道德体系，建立属于新世界的全新道德体系。正
是这种否定传统艺术的文化焦虑导致意大利诞生了“求新”“求进”的未来主
义艺术。



P7↑

/

《施洗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 Preaching*）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高203cm青铜雕塑1878年多地收藏

（二）达意与传情

同一时期的探究型艺术流派，还有以俄裔法国艺术家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艺术。康定斯基是一位音乐水平高超的画家，在30岁成为全职画家以前，在爱沙尼亚一所大学里担任法学教授。康定斯基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抽象的绘画元素直接表达人类情感，他想要用绘画表现出如音乐一般直接的传情效果。

音乐表达的情感是抽象但直接的，任何人听到大三度和弦都会感到光辉明亮，听到小三度则黑暗紧张，这种感受不依托任何自然界中已有的声音形象。而从文艺复兴开始，如果绘画要表达悲伤情绪，其做法是依托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比如《哀悼基督》，把圣母的神情画得无比哀恸，便是悲伤。康定斯基所做的抽象艺术探索便是试图用不具任何实际形象的笔画、色彩、构图来直接表达情感，甚至是场景和故事情节。

1910年，康定斯基画出了第一幅抽象艺术水彩画，这件作品甚至没有确定的名称，看上去如孩童涂鸦一般（P8）。

自此，康定斯基的作品里几乎再未出现过具体形象。康定斯基最著名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要属他“构图”系列（如P9），总共10幅，前3幅在纳粹举办的“颓废艺术展”中被销毁。康定斯基认为“构图”系列，就好像交响曲之于作曲家一般，是最为经典、丰满以及完整的作品。前7幅“构图”表达的都是与宗教相关的主题，可以追溯到康定斯基深刻的东正教信仰。比如《构图6号》（P10），描绘了上帝发动的大洪水，整幅作品并无任何明确的洪水形象，但却让人能感受到汹涌的波涛、惊骇的万物。康定斯基的尝试无疑取得了一定成功。



P8↑

/

《无题》（*Untitled*）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49.6cm × 64.8cm 纸上水彩、墨水及铅笔 1910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
（The Centre Pompidou）



P9↑

/

《构图4号》（*Composition IV*）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59.5cm × 250.5cm 布上油画 1911年德国杜塞多夫艺术收藏馆
（Kunstsammlung）



P10↑

/

《构图6号》（*Composition VI*）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95cm × 300cm 布上油画 191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

可以更形而上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我们尝试以任何一种媒介来表达一件事物时，表达方式可以简单到只用语言讲述，也可以复杂到拍一段影片并配上音乐。无论何种表达，都包含两个基本元素，一个是所表达对象的具体信息，是“达意”，另一个则是与所表达对象相关信息伴随的情绪，是“传情”。就好比你说别人发大水了，“洪水的暴发”是具体信息，是达意；而你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洪水的形态，你选择用平淡的语气还是焦急的语气来表述，决定了“大洪水”给听者带来的直观感受，是传情。



P11↑

/

《格尔尼卡》（*Guernica*）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349cm×776cm布上油画1937年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不带歌词的纯音乐，可以把所描绘事物的直观情感形象传递给听众，是超脱语言之外的直接表达，只“传情”不“达意”，显得极其纯粹。康定斯基觉得这样非常高级：艺术应该做语言做不到的事情。传统绘画在表达情感方面无法摆脱具体形象，“达意”的成分太多了。康定斯基的做法便是用抽象的视觉元素把描绘对象的直观感受表达出来，彻底刨去“达意”，只留“传情”。

这种艺术追求，毕加索曾有过一番言论，极具启发性。毕加索在完成了他的旷世杰作《格尔尼卡》（P11）之后，曾经有人问他想在画中表达些什么，毕加索的回答大意是：如果我能用具体的语言表达清楚我想画什么，为什么我还要画呢？我直接写篇文章不就好了。艺术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受体并不光是人的理性认知。



P12a↑

/

《构图7号》(*Composition VII*) 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200cm × 300cm 布上油画 1913年俄罗斯莫斯科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Tretyakov Gallery)



P12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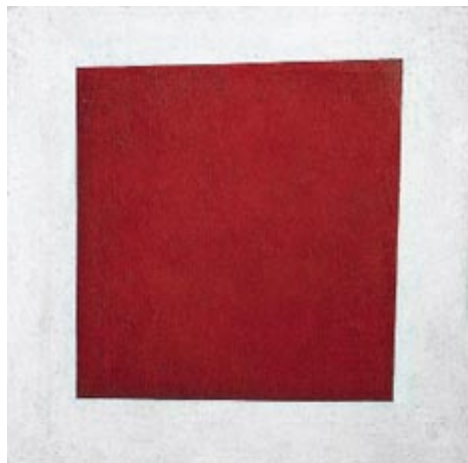
《构图8号》(*Composition VIII*) 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40cm × 201cm 布上油画 1923年美国纽约 古根海姆博物馆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康定斯基10幅“构图”的最后3幅，观感与前面7幅截然不同，画面明显是由

基本的几何图形组成，显得更为规则、严谨。《构图7号》（P12a）与《构图8号》（P12b）的创作年代相隔10年之久，在这期间一战爆发，康定斯基从德国回到俄国，看到同事马列维奇的创作，受到很大启发。尽管康定斯基那些观感“飘忽不定”的作品在传情的效果上令人满意，但与音乐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音乐的总体效果虽然千变万化，但组成它们的音乐元素却是确定、具体的，诸如调性体系以及和声体系。康定斯基前期的抽象作品明显没有确定性的视觉元素，全是信马由缰的笔画、色彩。从《构图8号》开始，其作品中开始充满了确定的、具体的几何图形，他希望通过这些基本图形，来构成抽象绘画中那些类似于音乐中和声体系的基本元素，这一时期康定斯基的创作极具探究性。

康定斯基的同事马列维奇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的“至上主义”是这种探究型艺术的一座高峰。所谓至上主义，是讲究人类感觉的“绝对至上”，与其研究如何在画面上表达，不如把眼光放到观察者身上，找出那些构成人类基本视觉情感的元素，再对它们进行有机结合，构成复杂多变的形象。例如，要研究人类的味觉，如果把精力放在研究甜味食物上，那么可以找出几千几万种，但如果把眼光放在人类味觉本身，找出产生“甜味”味觉的生理机制，就能明白构成甜味的关键。通过化学手段，就知道不只是糖才能让人觉得有甜味，而是只要是含有某种特定化学式的分子都能让人感知甜味。这样就可以人为制造非糖类甜味食物，譬如木糖醇，从而掌控了甜味觉。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甜味的味觉是至上的，带来甜味感受的具体食物并非甜味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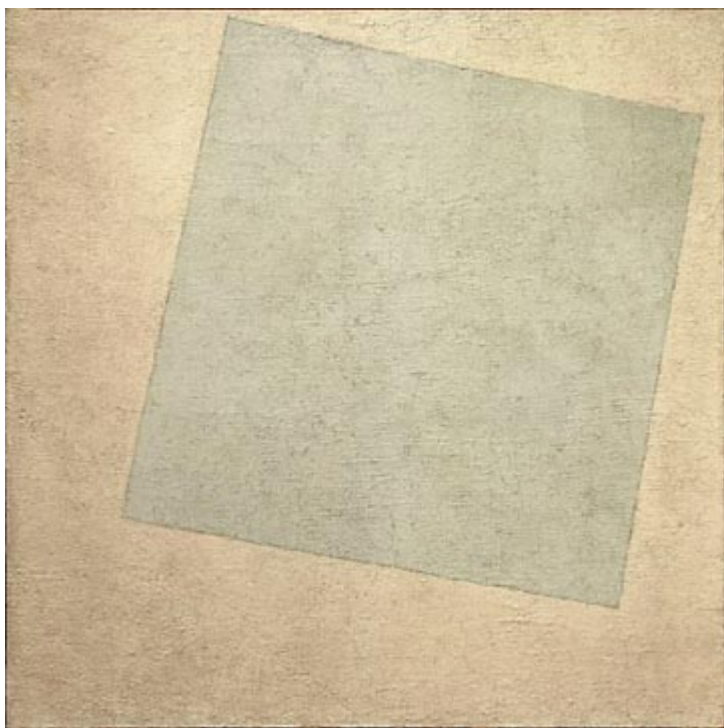
马列维奇通过绘画中那些最基本的图像元素来寻求这些“至上”的视觉感受。很显然，从图形角度来说，方形、三角形和圆形都是基本的几何图形；从色彩的角度看，黑色是最基本的。此处的颜色是从视觉角度出发的颜色，而构成视觉的颜色不是颜料的颜色，而是光线的颜色。视觉是人类视神经对光线的感知，当任何光线都不存在时，人只能感知黑色，而当所有光线都存在时，人就感知到了白色。除此之外，画布上还有红、黄、蓝三原色。马列维奇用这些构成视觉感受最基本的形状和色彩创作了许多作品。第一次看到它们的人，总会感到被“冒犯”，因为这些所谓“作品”看上去毫无技术含量，简单的红色方块（P13a），甚至还有在白色画布上的白色方块（P13b）。



P13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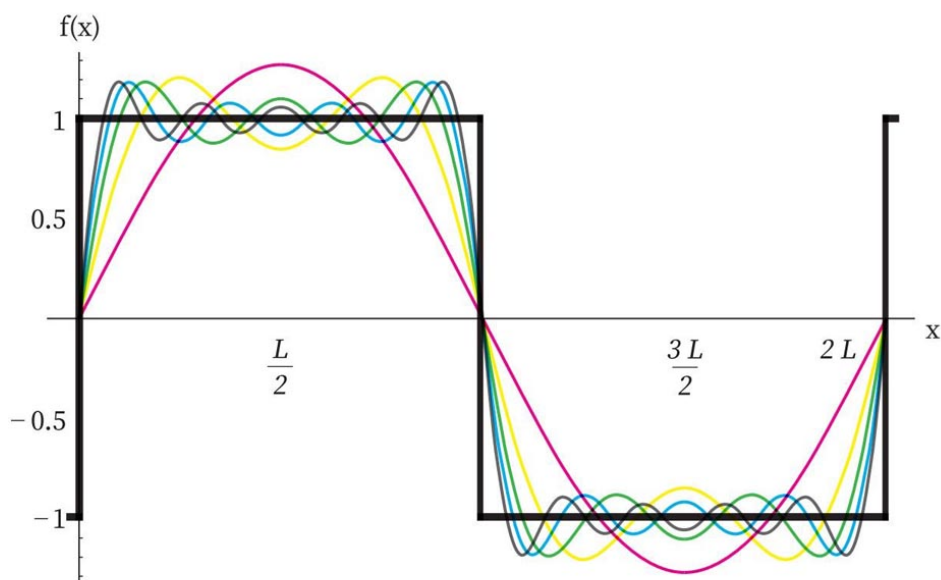
《红色方块》(*Red Square*) 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 (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 53cm × 53cm 布上油画 1915年 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Russian Museum)



P13b↑

/

《白色之上的白色》(*White on White*) 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
(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 79.4cm × 79.4cm 布上油画 1918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P14↑

/

方波的傅里叶变换示意图

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追求，用“傅里叶变换”的数学概念来类比，便再明白不过。傅里叶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工程师。所谓“傅里叶变换”，指的是无论多复杂的形状，都可以拆解成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和余弦波的叠加。比如一个方波，明明方形，却可以用一系列规则形状的正弦和余弦的曲线“拼”出来 (P14)。“傅里叶变换”揭示了这样的规律：形而下的形状千变万化，但形而上的规律却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图形的差异只是组成它们基本元素的配比不同而已。在“傅里叶变换”中，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和余弦波就是构成复杂图形的“基本构成元素”，被称作“基”。通过这些基本元素的排列组合，就可以把复杂图形组合出来。马列维奇创作的这些黑方块、蓝色三角形，就是他所认为构成人类复杂视觉的“基”，原则上任何视觉感受，都可以由这些“基”组合出来。

欣赏马列维奇的作品，不应抱着纯粹审美的眼光，而是要尝试将马列维奇的不同作品放在一起欣赏，才能感受这种逐步构建的过程。除了基本图形作品，更应该欣赏的是一些较为复杂的，用基本图形构建出来的作品，诸如《至上主义构图》（P15）。这类作品给人的综合感受才是马列维奇的真正追求，单独黑方块之类的作品，应当理解为探究性的解构过程。

十月革命后，俄国进入苏联时期，出现了一个与至上主义互为对立的艺术流派，即以塔特林、罗德琴科等人为首的构成主义艺术。苏联政府是无产阶级政府，在艺术上强调实用主义。至上主义主张艺术无用，强调艺术的纯粹性，而构成主义则主张事物应该去掉一切不必要的装饰性——“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导致在观感上，构成主义的作品（P16）与至上主义极其类似。



P15↑

/

《至上主义构图》（*Suprematist Composition*）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88.5cm×71cm布上油画1916年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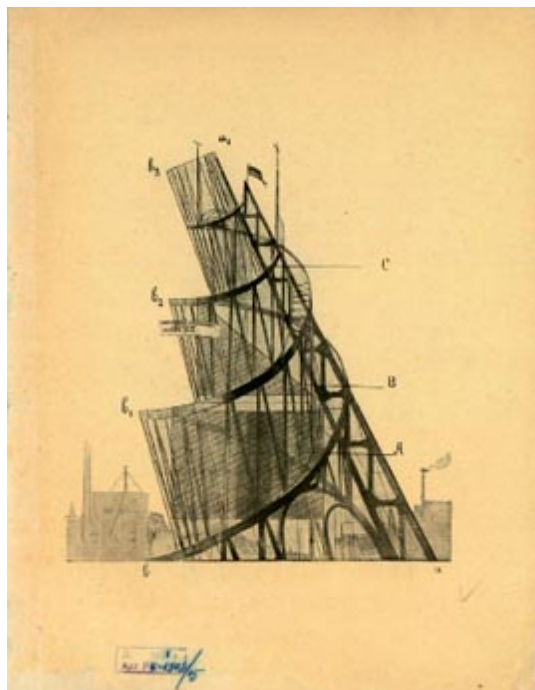
构成主义的作品除了绘画，还涉及日常生活用品，他们主张抛弃传统的艺术材料，用更为现代的材质如金属、纸板、玻璃进行创作。从广义上来说，这些材质也可以被认为是造物的基本元素，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实用至上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构成主义的代表性建筑作品是塔特林创作的第三国际纪念塔（P17），虽然最终并未建成。构成主义的思想与一战后诞生于德国包豪斯学校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P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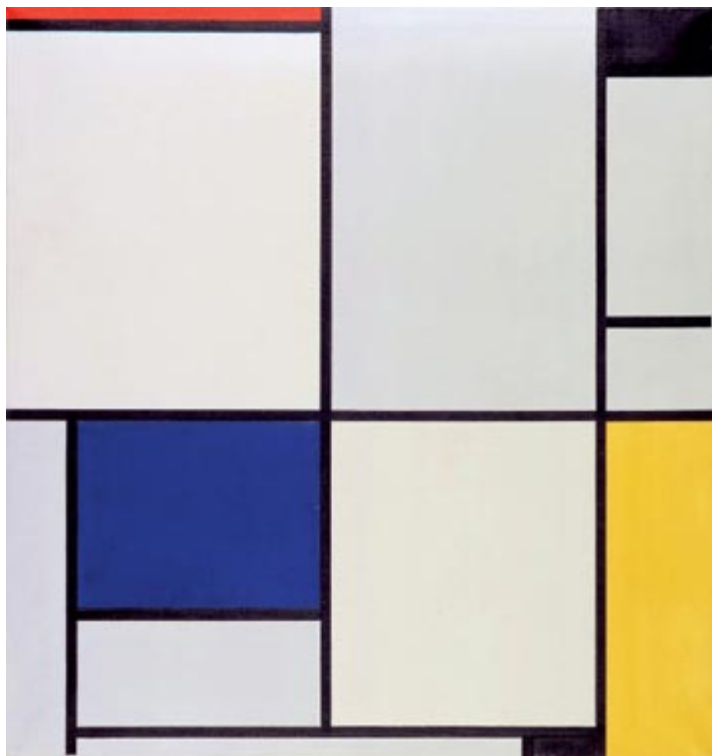
《旋转》（*Proun G.B.A*）埃尔·李西茨基（El Lissitzky）77.5cm × 82.7cm
布上油画1923年荷兰海牙海牙市立博物馆（Kunstmuseum Den Haag）



P17↑

/

第三国际纪念塔设计草图



P18↑

/

《画面 I》(*Tableau I*) 皮特·蒙德里安 (Piet Mondrian) 103cm × 100cm
布上油画1921年荷兰海牙海牙市立博物馆 (Kunstmuseum Den Haag)

说回探究型艺术，马列维奇并没有走到极致，在这条探究型艺术的道路上走到极致的，是荷兰艺术家蒙德里安。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艺术流派叫作“风格派”（De Stijl），诞生于1917年的荷兰，同年他们创办《风格派》的杂志，蒙德里安也是撰稿人。蒙德里安的作品看上去只是不同颜色的方格子，比起马列维奇的作品似乎更没有技术含量。绘画是在二维平面创作的艺术，而平面是由无数的点构成，对绘画来讲，平面上任何一个点只有两个参数，即它在平面上的位置和它的色彩。而点的位置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由该点在x轴和y轴上投影的位置坐标唯一确定。对于绘画这种艺术来说，最基本的不是各种形状，而是x轴和y轴两个方向，所以蒙德里安画的并不是方格子，而是横向和纵向的线条（P18）。

横向和纵向的线条是最基本的元素，它们把二维的画布平面作了划分，再把划分的不同区域填以三原色及灰白色这五种最基本的颜色，如此创造出

来的画面比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更贴近二维平面作画的基本构成。实际上，虽然只有横线和竖线以及不同的基本颜色，但不同的分布的确能造成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人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蒙德里安不同作品带来的不同情感冲击（P19a/P19b）。



P19a↑

/

《纽约市之一》（*New York City I*）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19.3cm × 114.2cm 布上油画 1942年 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The Centre Pompidou）



P19b↑

/

《有红蓝黄的构图》（*Composition with Red, Blue and Yellow*）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86cm×66cm布上油画1930年私人收藏

“方格子”的艺术风格并不能归功于蒙德里安一人，同时期的杜斯堡也画方格子，只是他画的是“斜”格子。从概念上讲，这种做法与蒙德里安的差别不大，但视觉观感上还是有较大差异。从数学上来看，杜斯堡只是给二维平面选了一组跟蒙德里安不一样的“基”，蒙德里安取的是 $(1, 0)$ 和 $(0, 1)$ ，杜斯堡则取了 $(1, 1)$ 和 $(1, -1)$ ，都是相互“正交”的“基”，在数学上完全等价（P20）。

当然，从数学上来说，要表达一个二维平面上的点，不只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也可以用极坐标系，即选取平面中的一点作为原点，并以该原点为出发点确定一条射线，则平面上任何一个点的位置可以用这个点与原点的距离以及它们的连线与射线之间的夹角做唯一确定。如果这样去拆分平面并进行创作的话，那结果会是一系列不同颜色的圆圈。二维平面还可以用双极坐标系做唯一确定：在平面上任意选取两个不重合的点作为两个焦点，则平面上任何一个点的位置可以由这个点与两个焦点的分别连线和两条连线与焦点之间连线的两个夹角唯一确定。用这种办法拆分平面并进行创作的话，画出来的应该是多个彩色同心圆圈。



P20↑

/

《反构图8号》（*Counter Composition XIII*）特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50cm×50cm布上油画1925年意大利威尼斯古根海姆收藏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也许是无心插柳，1912年前后，从立体主义绘画中分离出来一个抽象艺术流派——以德洛内夫妇为代表的“俄耳甫斯主义”，他们创作出大量拥有上述观感的作品（P21）。俄耳甫斯主义从立体主义当中分身出来，追求“纯洁的艺术”，追求一种纯粹的视觉体验，并不依托具体事物，所以他们的画作必然是抽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耳甫斯主义的追求与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等人的方向大体相同，只是没有这几位走得彻底。俄耳甫斯主义自立体主义而生，也可算作“探究型”艺术的一个流派。



P21↑

/

《圓形的形式》(*Circular Forms*) 罗伯特·德洛内 (Robert Delauney)
67.3cm × 109.8cm 布上油画 1930年美国纽约 古根海姆博物馆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三）探索与表现

现代艺术中属于感性表达的艺术流派，以诞生于德国的表现主义为核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挪威艺术家蒙克的《呐喊》（P22）。表现主义可以算是对几个不同艺术流派的统一概括。顾名思义，表现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表达，通常是表现强烈的内心情感，如惊恐、扭曲、狂喜等，旨在体现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艺术家描绘的不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艺术家眼中抑或是艺术家主观感受的事物，是一种追求感性表达的艺术形式。



P22↑

/

《呐喊》（*The Scream*）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91cm×73.5cm布上油画1893年挪威奥斯陆国家美术馆（Nasjonalgalleriet）



P23↑

/

《打开第五封印》（*The Opening of the Fifth Seal*）埃尔·格列柯（El Greco）225cm×193cm布上油画1608—1614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立体主义的祖师可以追溯到塞尚，表现主义的精神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凡·高。凡·高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倾注到笔触中，用夸张、浓烈的手法描绘其主观认知中的世界，这正是一种表现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20世纪初表现主义绘画所特有，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埃尔·格列柯的画作也不讲究严格的透视和解剖，笔法张扬浓烈，甚至与凡·高的画作有共通的观感，也充满了表现主义精神（P23）。

以马蒂斯（P24）和德兰（P25）为代表，诞生于法国的野兽派绘画被认为是表现主义诞生的前兆。野兽派融合了凡·高的精神、高更的审美以及西涅克的

技巧，用极为夸张的绘画手法来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这来源于凡·高以主观情感扭曲客观形象的精神传承。高更画作的笔触、线条都较节制，多以简洁的轮廓线出现于画作中，构图简单、直接，使用大量拥有象征主义气息的大色块，充满了原始的粗犷。这样的审美情趣也被野兽派吸纳。西涅克的短笔触有益于情感的表达，所以野兽派画作中也多见类似的笔法。在野兽派看来，绘画中明确的线条并非纯粹感性的创作状态，他们主张将绘画对象的大致特征以最极端、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展现，如此才能将情感挥洒极致。



P24↑

/

《戴帽子的女人》（*Woman with a Hat*）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80.6cm × 59.7cm 布上油画 1905年 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P25↑

/

《查令十字大桥》（*Charing Cross Bridge*）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
82cm×101cm布上油画190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野兽派得名的故事与印象派类似。1905年，在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厅中央是一件古典雕塑，四周挂着马蒂斯等人的作品，艺术评论家看到之后惊呼：“多纳太罗被一群野兽包围了！”原本讽刺批评的词汇成了这一画派的名称。马蒂斯早年就是极其优秀的画家，古典主义和印象主义风格的创作技法信手拈来（P26），他被认为是把整个西方艺术带入现代主义的伟大艺术家。在接触到凡·高的作品后，马蒂斯受到极大触动，开始尝试野兽派的绘画风格。

相比凡·高，马蒂斯的野兽派绘画更具表现主义色彩。在凡·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画家本人并未刻意破坏所画对象的原有形象，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情绪对它们的形象做了艺术化处理。凡·高的表现主义依然是基于现实的表现主义。相比之下，马蒂斯画作中的形象几乎没有事实形象的依托，如其代表作《红色的和谐》（P27），整幅作品最吸引人的是画面浓烈的色彩，人物、事物形象都被高度符号化。你只能通过这些事物的形象大致看出它们是什么，它们的具体形象已不再重要。

拥有表现主义元素的绘画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作为个体笔触的功用。所谓“整体”，就是整幅画作给欣赏者带来的整体画面感受，“个体”则是构成整体画作的每一笔。整体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艺术家理智、智慧的部分，是理性思考的展现。而个体的张扬则来自艺术家情感的表达，因此像蒙克的《呐喊》，在如此标准的表现主义作品中，人物的具体形象已经被彻底扭曲，欣赏者除了能看出来画中是一个人以外，看到的一笔一画，都代表艺术家所要表达的“焦虑”。



P26↑

/

《水果与咖啡壶》（*Fruit and Coffeepot*）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38.5cm × 46.5cm 布上油画 1898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



P27↑

/

《红色的和谐》（*Harmony in Red*）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0cm × 220cm 布上油画 1908年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

1905年诞生于德国的“桥社”，是较早的表现主义艺术团体，最初是由四个建筑专业的学生所创立的艺术社团，主张在优秀的古典艺术传统之上，追求并探索未来的艺术。桥社艺术的表现主义主要体现在极端的笔法和乖张的色彩上，但在构图上趋向古典艺术的经典感。桥社最重要的艺术家是基希纳，他同时也是桥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走在路上的红衣妓女》

(P28)。



P28↑

/

《走在路上的红衣妓女》(*Street with Red Streetwalker*)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 (Ernst Ludwig Kirchner) 125cm×90.5cm布上油画1914—1925
年西班牙马德里提森—博内米撒艺术博物馆 (Thyssen-Bornemisza Museum)

画中人物形象模糊，色彩渲染极其绚丽张扬，但主要人物比例以及周围人物的排布大致还是遵循了古典绘画中前景透视的原则。基希纳的《夏天的

达沃斯》(P29)，画中乡间小镇的房屋排布平衡，甚至能让人感受到少许巴洛克时期荷兰风景画的气息。

桥社之后重要的表现主义画派还有以康定斯基和弗朗兹·马尔克为代表的蓝骑士画派，同样诞生于德国。蓝骑士画派的名字源于康定斯基还未进入抽象艺术之前的一幅同名作品(P30)。

在东正教传统中，“蓝骑士”象征着对真理的追求，蓝骑士画派以此表明对艺术探索的决心。他们在绘画创作上比桥社艺术家更为激进，画作中不再有任何古典绘画的元素(P31)。

康定斯基早期抽象绘画的视觉感受非常具有“表达性”，被认为是一种表现主义的画作也并不奇怪，不然他也不会是蓝骑士画派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康定斯基后期的作品又充满了规则的几何图形，所以，说到底康定斯基的艺术追求还是“探索性”的。



P29↑

/

《夏天的达沃斯》(*Davos in Summer*)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 (Ernst Ludwig Kirchner) 121cm×170.5cm布上油画1925年瑞士达沃斯基希纳博物馆 (Kirchner Museum)



P30↑

/

《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55cm×65cm布上油画1903年私人收藏



P31↑

/

《做梦的马》（*Dreaming Horse*）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

39.6cm × 46.8cm 布上油画 1913年 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四）艺术与哲学

讨论绘画中的表现主义气质，就不能忽略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与席勒。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维也纳，是欧洲具有中心地位的城市，文化气息浓厚。前文提到的著名作曲家马勒，就是在维也纳从事指挥活动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彼时尚未步入政治舞台的希特勒也活跃在维也纳，一心想成为一名学院画家，奈何天赋不足，三次考试均未如愿。克里姆特是这个时期维也纳最重要的艺术家，他的创作高峰期甚至早于德国表现主义。克里姆特所代表的艺术流派叫作维也纳分离派，“分离”并不象征某种特定的艺术风格，而是表明了一种与传统古典绘画切断关系并追求现代绘画的态度。

克里姆特的画作拥有浓厚的“拼贴艺术”气质。例如代表作《朱迪斯》（P32），画中人物面部非常写实，其余部分则使用大量金箔作为创作媒介，这是充满表现主义艺术特点的夸张手法，对画作的主体思想与核心情感进行突出的展示与夸大。克里姆特画作中的拼贴感可与巴洛克时期的肖像创作进行比较。巴洛克时期的肖像画中，人物形象通常置身于黑色背景中，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来烘托人物形象，达到“突出重点”的艺术目的。而克里姆特则把人物形象从背景之中“拽”出来，在人物形象与背景之间多加入了一个“维度”，让人感觉人物形象并不置身于画中，而是飘浮于画面之上。这种拼贴手法，比明暗对比更进一步。

克里姆特的独特表达方式与他在威尼斯地区的游历有很深关系。威尼斯地区深受拜占庭艺术的影响，这一点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装饰风格就可以看出来——充满了金碧辉煌的装饰性。马赛克也是拜占庭艺术的一大表现媒介。克里姆特在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下，开启了装饰艺术风格绘画的新思路。



P32↑

/

《朱迪斯》（*Judith and the Head of Holofernes*）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Gustave Klimt）84cm×42cm布上油画1911年奥地利维也纳美景宫美
术馆（Österreichische Galerie Belvedere）



P33↑

/

《隐士》（*The Hermits*）埃贡·席勒（Egon Schiele）181cm×181cm布上油画1912年奥地利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

席勒恐怕是艺术史上最有才华的早逝艺术家，28岁死于弥漫欧洲的大流感，同年克里姆特也因为这次流感去世。席勒早年是克里姆特的追随者，创作了许多与克里姆特风格相近的作品。但在之后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席勒创造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表现主义风格（P33）。

席勒的绘画与前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的表现主义几乎都依靠线条实现。在席勒之前，所有西方绘画全都是用色彩填满画布，但在席勒的绘画中，占最大面积的居然是灰白色（P34）。

尽管席勒创作的也是油画，但视觉上却大有素描或水彩画之感，这种表达方式在之前的西方艺术史上从未有过。席勒的绘画理念从根本上背离传统，他不会让画面充满色彩，而是用极其扭曲甚至野蛮的线条对所画对象的性格特色进行强化。尽管线条夸张，离实际形象很远，但对所画对象特征的刻画十分到位和精确。例如席勒的自画像（P35），就和他本人的长相特征吻合，一眼就能认出他画的是自己。



P34↑

/

《坐着的男性裸体》（*Seated Male Nude*）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152.5cm × 150cm 布上油画 1910年 奥地利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
（Leopold Museum）

席勒几乎是用线条来表达全部情感，如果将他的作品做黑白处理，基本不会影响主题和思想感情的表达。在创作人物形象时，席勒会对人物骨骼、肌肉的连接处进行充分夸张，人物的关节都显得巨大，男性的肌肉线条则处理得极端扭曲。席勒对色彩的使用非常节制，他用得最多的颜色是橙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直接表现。席勒在绘画中除去了画中人的主观意识，人物常常面无表情，有一种呆滞感。这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赤裸裸”的展示，也是表现主义精神追求的一种极致体现。



P35↑

/

《低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His Head Down*）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尺寸不详布上油画1912年奥地利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

克里姆特与席勒的画作中都蕴含着不少负面情绪和“颓废”元素，例如强烈的色情元素和性暗示。席勒比克里姆特走得更远，甚至会直接描绘性爱场景。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受到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对和抵触，席勒还因此被告上法庭，因妨碍公共视听而获罪。这其实与他们所处年代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克里姆特与席勒活跃的年代正是一战一触即发的时期，席勒的作品更是清晰地呈现出战争的阴霾与压抑。考虑到19世纪末到一战之前，欧洲弥漫着所谓的“世纪末情绪”，表现主义的兴盛与该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其实，在艺术史上，关于如何定义表现主义一直是个难题，因为创作的本

质就是在进行表现，只是表现程度深浅有区别而已。一条线具体应该画在哪里，从而界定“表现”的程度超过某个特定界限，就被归为表现主义，并无明确判断标准。

可以将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做一组对比。表现主义的英文是 expressionism，印象主义则是 impressionism。两个单词的前缀不同，“ex”在方向上代表向外，“im”在方向上则是向内，而“press”则有推送、按压的意思，所以表现主义是“向外推送”，印象主义是“向内输送”（press加ion表示名词形式，ism作为后缀则表示是一种主义）。这充分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绘画理念。印象主义的向内输送是由外向内的过程，信息的来源在外部，即主观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所以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任务是去描绘自然，而且是以纯粹的方式描绘视觉所接收到的光线，这恰好就是莫奈、雷诺阿等印象主义艺术家的追求。表现主义的向外推送是由内向外的过程，信息来源在内部，即艺术家作为主观个体的情感才是表达的主体，客观世界不再重要，艺术描绘的客观事物只是情感输出的载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表现主义还是可以被大致定义的，也就是我们判断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其信息主体来源如果是艺术家作为主观个体的感受和情绪，则这件作品可以算作一件拥有表现主义精神的作品。在这样的判断标准下，康定斯基的早期抽象作品是表现主义的作品，虽然他表现的是一种探究性的感受，但这种感觉不是客观感觉，而是来源于艺术家内心的主观感受。

梳理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至上主义一直到荷兰的风格派等探索型艺术流派，以及野兽派、桥社、蓝骑士画派、维也纳分离派等表现主义的表达型艺术流派，这一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主线还可以再做一次更深刻的归纳。如果我们将目光再往前推200年，回到德国诞生的浪漫主义与法国诞生的新古典主义这组二元对立，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源头——文学领域“狂飙突进运动”与法国知识界掀起的“启蒙运动”的对立。这种广义上探究性与表达性的对立，虽然无法被严格证明，但数次高度重合，代表其根源依然指向欧洲原初的南北对立，是民族与人种的对立，始于南方西罗马帝国的拉丁人、高卢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本矛盾。似乎日耳曼人总是感性浪漫的，罗马人则是理性探索的，这种对立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开始，一直没有消失过。

现代主义艺术，无论是以立体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一脉，还是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感性”一脉，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艺术表达的对象开始从客观向主观的方向转移。艺术家开始探索视觉所观察的客观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并强调观察者在艺术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中，所谓的“美”或者“真理”并不能脱离人这个主观唯心的观察者而独立存在。这种艺术趣味的转移被二战之后诞生于纽约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推到极致，甚至对行为

艺术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各个领域的发展到了顶端都具有显著的共性，甚至有强烈的时代感。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就算领域不同，到了顶端之后，他们之间的学科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同样也是在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发展所揭示的哲学道理明确指出了，哪怕物理学世界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所有的客观都来自主观个体的观察与测量。人们不能脱离主观观察讨论客观现象。物理学的唯物基础也受到了量子力学的挑战。由此看来，艺术与科学，确是殊途同归。

17 达利与杜尚：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一）符号与图形

塞尚与凡·高分别启发了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由此，一战之前的现代艺术能够厘分出“探究型”和“表达型”这两条在艺术追求上互为对立的脉络。但探究型也好，表达型也罢，本质上它们在时间的指向性上都是直指未来的艺术。与之相对的是受高更启发的象征主义和原始主义，在时间指向性上，它们指向远古。这里的“远古”并非指古典，而是遥远如古埃及、原始的土著文明，否则就变成新古典主义或拉斐尔前派的追求了。

高更的画作有强烈符号感和原始化倾向，后期的高更甚至生活在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上，专注土著文明题材的创作。在高更的画作中，人物形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人物容貌更是如出一辙，极其简化，这正是典型的象征主义倾向。高更的这种艺术追求也是源自对“什么是艺术”的思索，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来自人内心深处最为天然、淳朴甚至是自发性的东西。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被太多社会性、知识性的思想占领心智。这种天然、淳朴以及自发性的，属于真正艺术创作的能力，或者说是这股“灵气”，已经被现代文明所淹没。想要重新挖掘，就必须要向较为原始的地方去探索和追求。与塞尚和凡·高相比，高更的主张似乎影响最为深远，纳比派、象征主义、原始主义，一直到后来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都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高更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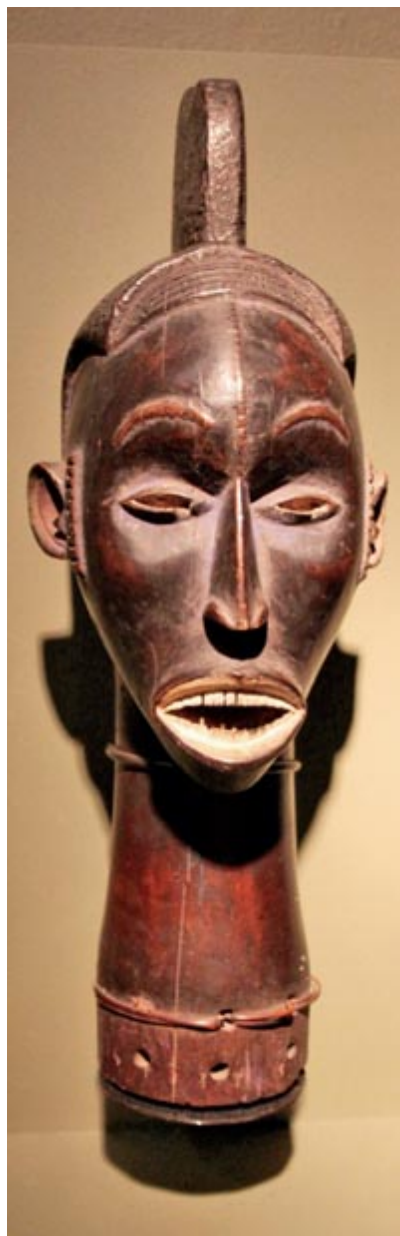
象征主义与原始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甚至互为充要条件。原始主义的审美倾向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创作中屡见不鲜，如毕加索在进入立体主义时期之前，就创作过大量拥有原始主义趣味的作品，其中，被认为是立体主义开山之作的《亚威农少女》（Q1）就是一个典型。



Q1↑

/

《亚威农少女》（*Les Femmes d'Alger*）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243.9cm×233.7cm布上油画1907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



Q2↑
/
非洲面具形象

画中的少女形象拥有非洲土著图腾观感，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抽象化，不禁让人想到非洲部落的面具形象（Q2）。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多少都受到非洲土著艺术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在北非拥有大量殖民地，艺术家能方便地接触到非洲原始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原始文化对欧洲文化界的冲击是猛烈的，这完全是几千年文明教化之下的欧洲所不曾见识到的艺术形象，完全是“反知识”的纯粹观感。毕加索就说过：“我14岁就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但我毕生都在追求如孩童般绘画。”“如孩童般绘画”指的是追求一种纯粹、淳朴、直接的创作方式。相信正是非洲部落面具形象的淳朴与直接击中了毕加索。其实类似的文化交融一直在发生，如17世纪中国瓷器传入西方，再如19世纪日本浮世绘冲击印象主义艺术家，“异域风情”似乎永远是西方人的一大追求，哪怕到今天也不曾减弱，简单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鲜感”。

原始主义必然导致象征主义观感，这一现象可以从古埃及的装饰艺术当中找到必然性。古埃及的装饰艺术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需求。法老、贵族们的陵墓、棺椁都需要极尽奢华的装饰，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哪怕是到“阴间”，也要保证自己尽享奢华。为统治阶级服务，最重要的不是艺术家个人对艺术创作的追求，而在于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这与中世纪天主教艺术及拜占庭艺术的追求是一致的。为保证传达的信息准确无误，必须要找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形象载体，这种需求必然造成象征主义符号的选择。为什么古埃及壁画看上去没有缩短法，更没有任何形式的透视？为什么掌管生死的神灵、犬头人身的阿努比斯永远侧面对着观众？……这是因为使用了象征主义的表达方式。法老陵墓里的壁画不在于画得有多好、有多像，而是要让所有看了的人都能立刻判断出这是某个特定的事物，而缩短法和透视法等写实技法兴许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专制集权和高压统治时期的艺术需求都是类似的，可以参考中国清代的郎世宁。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是随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修士，侍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为清宫十大画家之一。郎世宁早年的绘画风格是标准的巴洛克风格，讲究明暗法，突出戏剧对比，但是这样写实和充满表现力的风格并未受到皇室的赏识。后来郎世宁潜心学习中国画，创作了不少“中正仁和”的帝王肖像，这种规程化的创作才获得了专制统治阶级的喜爱，因为这些艺术的首要目的还是服务于政治（Q3）。

象征主义久而久之一定会变得符号化，中国汉字的形成就是象征主义符号化的集中代表。汉字的前身是甲骨文，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几乎以最简化的方式把所描绘对象用简单的笔画“画”下来，在使用过程中被不断地普及与传播。久而久之，当人们都逐渐熟悉甲骨文之后，再在形象的基础上逐渐发生形变，就演变成了今天汉字的形象。好比尽管草书写得无比概括、潦草，也不影响懂书法的人阅读，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书法的基础认知，在这个基础上，一定的潦草并不影响信息的传达。只要不影响传达，

符号化、简化就是必然的趋势。原始的文明带来了象征主义的观感，象征主义的艺术形象满足了原始文明的需求。

尽管象征主义和原始主义似乎是原始文明的产物，但是经过现代艺术家的二度挖掘，却成了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象征主义的代表艺术家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布朗库西。罗马尼亚属于拜占庭文化圈，在艺术传统上，拜占庭特有的符号化、马赛克式的艺术风格在罗马尼亚非常普遍。布朗库西是现代主义雕塑的代表，在雕塑界的地位堪比毕加索之于现代绘画。布朗库西曾赴巴黎跟随罗丹学习雕塑，但是布朗库西认为“大树底下永远长不出大树”，便很快离开老师，自立门户。不得不说，布朗库西的决定极具洞察力，纵观人类历史上各个领域的大师，作为优秀的老师并教导出同样是一流大师的人，少之又少。



Q3↑

/

《乾隆画像》（*Portrait of Qianlong Emperor*）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79.2cm × 238.5cm 绢本1736年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

布朗库西的第一件象征主义代表作品是《祈祷者》（Q4），这座雕塑的线条极为简化，只能隐约看出是祈祷中的人物形象。但局部的简化带来的是整体的美感，整尊雕塑的几何感、和谐感彰显出布朗库西雕塑之美的精髓。象征主义是把表现对象符号化，但符号化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极致的象征主义？布朗库西的《吻》（Q5）给出了答案。

这件作品刻画了两个正拥抱并亲吻着的人物形象。除了人物形象和动作的极致简化以外，还有一个特点：这件作品中所涉及的元素，人的头发、头部和躯干、环抱的手臂以及相对的眼睛和嘴，都是表达“吻”这个主题的必要元素，少了任何一个，我们都无法感受到“吻”的状态。这件作品为象征主义树立了典范：“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Q4↑

/

《祈祷者》（*The Prayer*）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尺寸不详青铜雕塑1907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立现代美术馆（Muzeul National de Art Contemporan al României）



Q5↑

/

《吻》（*The Kiss*）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
27.9cm × 26cm × 21.6cm 石膏雕塑 1907—1908年 藏地不详

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必须存在且有它的功用，缺一不可。不残缺、不冗余，恰到好处。

布朗库西的《沉睡的缪斯》（Q6）也是这方面的出色代表。

艺术家没有选择把女神的全身都雕刻出来，而是巧妙地只塑造了女神的头部，并让头部躺倒，形成侧卧状，以此来表达入睡的状态。女神的面容也极为概括，眉眼鼻唇都仅有一个“势”而已，不禁让人叹服艺术家对事物特

征的凝练和概括能力。

当艺术家想要突破某种艺术风格的极限时，很有可能会创造出全新的艺术风格。艺术史上每一次整体风格的变迁，无不伴随着对极限的突破。如果突破了象征主义的极致疆界，再把事物形象进一步简化，就会创造出拥有抽象艺术观感的作品。布朗库西的《空间的小鸟》（Q7）是其中代表。

这件雕塑作品完全不见飞鸟形象，有的只是布朗库西对“空中飞翔”这个状态的象征主义概括。看到这尊作品，虽无法理解飞鸟在何处，但飞翔的流畅感却是显著的。这种表现力已和康定斯基所追求的刨去“达意”，纯粹“传情”大大暗合，只是布朗库西的表达无疑更为凝练，因为布朗库西只用极其简约的形态就做到了。



Q6↑

/

《沉睡的缪斯》（*Sleeping Muse*）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多种大小多种材质1909年多地收藏



Q71

/

《空间的小鸟》（*Bird in Space*）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多种大小多种材质1923年多地收藏

象征主义艺术的追求可谓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在艺术目标上，象征主义的艺术本质是表达型的，布朗库西的作品打动人的依然是纯粹的形态美。但象征主义的审美手段却是充满思索的，在形态塑造上极为节制。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说过，每一个物理问题都有很多种不同的解，但总有一个解是最简洁、美丽的。象征主义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似乎也是在寻求最简洁的解，他们惜墨如金，不胡乱多添一笔。象征主义作品的观感似乎都极其简约，但不能因此把象征主义与极简主义相混淆，象征主义本质上还是表达型的艺术，但是极简主义却是一种典型的探究型艺术。

（二）破坏与建造

总体上，象征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追求，是当时的艺术家对学院艺术不满的表现。对于什么是艺术该有的样子，他们的答案是逃离现代文明社会，把眼光投射到原始文明中去。但很显然，这样的做法并非对传统艺术的彻底否认。如果要推翻传统艺术，就要破坏传统的审美体系，破坏传统艺术的话语权分配。“破坏一切”这种激进并彻底的追求，便是达达主义的主张。

达达主义初现于1915年的纽约，正式诞生则是在1916年瑞士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中，德国画家、诗人雨果·巴尔还为此发表了《达达主义宣言》。伏尔泰酒馆的建立便是为了聚集这批达达主义艺术家，此时还处于一战时期，瑞士作为中立国是避难的好去处。达达主义艺术的核心要义，简单理解就是所谓的“反艺术”。达达主义者认为，正是传统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说得直接一些是上层阶级利欲熏心，下层人民就要跟着遭殃。这批传统的上层阶级主宰着传统的艺术审美标准。这样的艺术是腐朽的，应该被推翻。达达主义的艺术要打破传统的艺术秩序：传统审美追求平衡、令人愉悦，达达主义就要追求混乱、非理性、不舒适；传统艺术取悦人，达达主义就要冒犯他人。其本质上是要击溃掌握传统艺术话语权的旧审美。对达达主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艺术领域，达达主义是一种广泛的思想，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如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达达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达达”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些文艺家在法德字典中偶然翻开一部，用手随便一指，恰好指到“dada”一词；另一种说法是，dada是婴儿在学说话时能够说出的第一个音节。无论哪种说法，都代表着达达主义追求随机性、自发性，追求无意识、反艺术的表达方式。传统艺术总体上一一直在寻求意义，而达达主义要的就是无意义。



Q8a↑

/

《生长》（*Growth*）让·阿尔普（Jean Arp）109cm × 44.5cm × 28cm 大理石雕塑1938年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Q8b↑

/

《云朵牧羊人》（*Cloud Shepherd*）让·阿尔普（Jean Arp）高约150cm 青铜雕塑1953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

阿尔普的雕塑艺术是达达主义艺术的代表，他本人也是1916年伏尔泰酒馆中达达主义团体的创始人之一。阿尔普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德国人，在法国时他的名字是让·阿尔普，在德国时则为汉斯·阿尔普。阿尔普作品中凸显出强烈的无意识和自发性，这两种元素都是达达主义的核心追求。

阿尔普也曾是蓝骑士画派的一员，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不应该参考任何自然界的既定形象，这一点与康定斯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阿尔普的创作思路与康定斯基正好相反，康定斯基讲究的是以主观意识的感受来创作表达个人体会的作品，而阿尔普追求的是抛弃主观意识，大有信马由缰，让作品自由生长的意思。阿尔普雕塑艺术的一大贡献，是解决了作品底座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传统艺术家要考虑雕塑的摆放问题，不得不单独制作雕塑的底座，然而阿尔普则是将底座和作品本身融合在一起，让雕塑更具有整体感（Q8a/Q8b）。



Q9↑

/

《泉》（*Fountain*）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现成品1917年多地收藏

美籍法国裔艺术家杜尚也许创作出了历史上最具有达达主义精神的作品，一尊世界闻名的小便器《泉》（Q9）。

1917年，杜尚买了一尊小便器，签了一个假名“R.Mutt”，命名为《泉》，并送去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独立艺术家展览。虽然展览表示，只要是艺术家付了报名费，作品就不会被拒绝，但很显然，杜尚的行为实在令评审团难以接受，最终拒绝了这件作品，而该作品的照片随后被发表在杂志上。现今，艺术评论家及艺术史学家们都认为《泉》是20世纪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从“冒犯人”这个角度看，《泉》无疑是符合达达主义追求的。杜尚这尊小便器的冒犯性是长存的，当任何不了解这件作品的人第一次被告知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时，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智力被深深地冒犯了。

《泉》是一件伟大的作品，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因为这件“作品”只是从商店里买来随便签了个名字，并没有“创作”的过程。《泉》的意义不在于这尊小便器本身如何，而在于杜尚的整个行为过程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影响力和启发性。首先，小便器是从商店里买回来的商品，有实用价值，但是当它作为展品进入展馆时，这一层实用价值便消失了，不会有任何精神正常的人在博物馆里使用它。但这件作品也不具有任何传统艺术上的价值，无论古典艺术还是现代艺术，至少所有艺术品都应是精心打造的独一品，而小便器的复制品千千万万。当它在博物馆里展出时，小便器是无意义的，再加上小便器的形象充满冒犯与戏谑，让人联想到这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和嘲讽。从这个意义上说，《泉》可谓充满达达精神的代表作。

《泉》之所以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很大，是在于这件作品拓展了艺术的疆界，为“什么是艺术”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日常生活用品剥离了原有的实用意义，也能够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无疑是对艺术范围的扩充。《泉》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现成品艺术。艺术不再需要借由绘画、雕塑的手段精雕细琢，生活中的现成品也可以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元素。笔者曾经在某个艺术展中，看到一件震撼人心的现成品艺术作品。艺术家使用了几百只平时洗碗用的红色橡胶手套，将其排列成一个矩形，再在下方装上鼓风机。鼓风机开启之后，整个画面犹如千百只来自地狱的手在诉说苦痛。这是一件反战主题的作品，现成品艺术在表现力方面未必逊于精雕细刻的传统艺术。

但《泉》这样的艺术品，我们必须承认它毫无技术含量。这再一次印证了艺术并非技术，技术是达成艺术的手段，有时并不必要。再如前文所介绍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有人曾试图从技术上为其正名，论证蒙德里安把直线和颜料均匀涂抹在画布上的技术是很难做到的。但实际上这样的论证全无必要，没有技术含量但思想深邃的艺术品并不少见。杜尚率先用小便器创作之后，别人再用小便器就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对艺术的独特洞察和挑战性思维是极具启发性的。

达达主义的出现是20世纪初整个欧洲文化界对现实不满的集中爆发。世俗矛盾的爆发体现在一战，达达主义运动则是在精神世界对战争的反动，这是一场反对传统艺术的战争。达达主义追求的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对传统进行破坏，这种推翻旧有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趋势，在其他领域也十分显著。每次大规模战争都是对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这种新秩序的建立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音乐领域中美籍俄国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也被认为蕴含了显著的达达主义精神，尽管《春之祭》创作于1913年，当时还没有达达主义的提法。

在建筑与设计领域，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分水岭发生在一战之后。包豪斯艺术关于建筑和设计的主张可说是一手塑造了现代城市和现代工业品的整体

形象。“包豪斯”一词是德语Bauhaus的音译，由德语词汇hausbau（意为房屋建筑）倒装而成。包豪斯原本是一所设计学校（Q10），因其秉持的设计理念极具开创性，逐步成为一个艺术风格的概念名词。包豪斯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当时的包豪斯学校可谓大师云集，最先锋的艺术家几乎都曾在这里任教，其中就包括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以及荷兰风格派的杜斯堡。

现代建筑的代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外面包裹着巨大玻璃，并无过多装饰和繁复线条，与古代讲究立柱、额枋、穹顶以及雕花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包豪斯的理念正是二者的分水岭。包豪斯学校始建于1919年，位于德国魏玛，当时正值一战结束，德意志帝国瓦解，魏玛共和国建立。新世界格局已经形成，需要新的设计理念。而在一战时期，现代化、工业化已成为社会主流，包豪斯学校的教学宗旨，是让机器“进入”艺术，让科学“融入”艺术，顺应现代化潮流，迎合现代制造业。因此，在包豪斯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艺术和设计，还要学习与一线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包豪斯学校看中设计的实用性，现代设计领域中的工业设计专业便是从包豪斯开始的。



Q10↑

/

包豪斯学校德国德绍



Q11↑

/

包豪斯风格水壶玛丽安娜·布兰德 (Marianne Brandt) 1924年

包豪斯有着与古典艺术完全相反的设计观，认为一切都应该从需求和功能性出发。例如做一只水壶，古典设计思路是考虑如何让它美观、奢华，包豪斯则会首先满足作为一只水壶该有的功能，确保那些基本的部件，在此基础上去除不必要的装饰 (Q11)。

包豪斯的全新设计思路也延伸至建筑领域。古典建筑首先讲究的是美观与气势，而现代建筑则首先考虑实用性和建造效率，然后再考虑整体外观。这样的做法使得现代建筑的美感多来自整体的线条和结构，并不似传统建筑那样雕梁画栋。建筑的基本功能是要容纳人和物，如果只为满足这种功能，“方盒子”造型无疑最为合适，所以在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中，方形、圆柱形是最基本的建筑外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包豪斯学校自身。

康定斯基在包豪斯学校任教时，艺术观点已深受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主张的设计理念是最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完成设计过程。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包豪斯设计并发明了直到今天在孩童间仍然流行的积木玩具，用基本图形和基本色彩发挥孩童的想象力，从而构造出综合性的视觉效果，这与至上主义的追求相当吻合。

包豪斯可以看作是与“新艺术运动” (Art Nouveau)、 “装饰艺术” (Art Deco) 相对的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可谓把建筑和生活用品设

计的装饰性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极致之后的“物极必反”，包豪斯在一战后社会思潮的洗礼下应运而生。

新艺术运动可被认为是对学院艺术的反动，在欧洲各地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艺术运动追求装饰性，常常从自然形象中寻求灵感，比如植物、花卉的曲线等等。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的建筑便拥有强烈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倾向，神圣家族教堂（Q12）以及米拉之家（Q13）等代表作都富有强烈的生物感，线条复杂，创意新奇。

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兴起”成为艺术发展的关键词组。由于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拥有科技含量的生活用品逐渐步入寻常家庭，资产阶级人群愈发壮大。因此，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各类需求开始成为消费的主流。资产阶级自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一战前达到高峰，人数庞大。他们的需求是批量生产的商品，虽然对产品品质和美观有更高的追求，但资产阶级依然无法达到贵族阶层的用度标准。他们虽然会大量购置手工艺品，但是在装饰风格方面逐渐摒弃了贵族式的家徽、纹章以及繁复的花纹，转向结构鲜明、装饰性强的风格，这极大地刺激了装饰艺术的发展。

装饰艺术的发展拥有官方基础，被法国大革命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就建立过专门的装饰艺术学校。18世纪末，艺术开始进入生活用品，不再是纯粹的绘画、雕塑。装饰艺术的视觉风格主要表现为色彩丰富、线条复杂，并融入了很多现代艺术的元素，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装饰艺术受到东方艺术、土著艺术的影响也颇多。装饰艺术的另一个特征是现代化，例如纽约除了受包豪斯影响外，同时也是装饰艺术的重镇，暖炉大厦（Q14）、克莱斯勒大厦（Q15）、通用电气大厦（Q16）等，都是标准的装饰艺术风格。

可以说，装饰艺术是资产阶级兴起后的一次审美狂潮。刚刚富起来的人难免要炫富，而绚丽的风格往往是不二之选。

一战后的包豪斯依然迎合大众需求，从功能性出发，而装饰艺术虽然也是针对大众的艺术风格，但本质上还是继承了来自社会上层的传统审美。经过一战洗礼后，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阶层趋于平等，来自王权和贵族的审美标准不再占据主导。因此，包豪斯的实用性成为主流。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年轻一代在居住和生活用品方面倾向选择“简约风”有着类似的规律。



Q12↑

/

神圣家族教堂（Sagrada Família）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始建于188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



Q13↑

/

米拉之家（Casa Milà）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1906—191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

不论是诞生于一战中的达达主义，还是建于一战后的包豪斯，都象征着对艺术旧秩序的破坏，并给出了新艺术应该追寻的方向。不破不立，正是达达主义和包豪斯的核心精神。当然，真正属于达达主义的“立”，要等到1924年超现实主义诞生后才完成。



Q14↑
/

暖炉大厦（American Radiator Building）雷蒙德·胡德与安德烈·富尤
（Raymond Hood & André Fouilhoux）1923—1924年美国纽约



Q15↑

/

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威廉·凡·艾伦（William Van Alen）
1928—1930年美国纽约



Q16↑
/

通用电气大厦 (General Electric Building) 1929—1931年美国纽约

（三）现实与梦境

现代主义艺术时期可认为是从19世纪后半叶始至20世纪60年代终。此处以大规模战争作为划分现代艺术主流精神内涵的分水岭，因为每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但背后蕴含的却是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不是战争单方面导致社会思潮的演变，社会矛盾及社会思潮的演变也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内在动力，二者互相影响、一体两面。

现代艺术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以塞尚、凡·高、高更三位大师为首，现代艺术开始萌芽，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到高峰。一战的爆发促成了达达主义诞生，进而推翻传统艺术审美，建立新的艺术框架，扩大艺术疆界。第二阶段是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超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二战结束到1991年冷战结束，在这一时期，艺术中心转移到纽约，以纽约诞生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为主导，一直到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可认为是当代艺术的范畴，由于当代艺术沉淀的时间还不够久，并无定论，本书不做详细讨论。

一战后诞生的最重要的艺术流派，当属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最初是一种泛哲学主张，影响力渗透文学、戏剧甚至政治等领域。超现实主义是否可以在艺术领域实现，最初是被艺术家们所怀疑的。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更应被归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超现实主义是对达达主义“反艺术”主张的回应。严格来说，达达主义虽明确表示要推翻一切陈旧艺术，但实际上并未明确提出推翻之后如何重建，也许对达达主义者来说，混乱本身就是追求，无需重建。超现实主义的发端既做到了部分符合达达主义所追求的颠覆，又给出了颠覆之后，重建之路在哪里的答案。

超现实主义给出的答案似乎是“潜意识”。达达主义的要求是先把主观意识清空，追求无意识，超现实主义则是从现实世界的规则、经验和逻辑中解放出来，追求潜意识中人类纯粹意识的展现，是超越现实物理世界的存在。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诗人安德烈·勃勒东。他在1924年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论述了由潜意识自然流淌出来的自动主义，将艺术从传统的决定论思想中解放出来。

在与绘画相结合之前，超现实主义主要是以自动主义的形式体现在写作中。自动主义写作即追求无意识语言的自然流淌，写出来的诗句前言不搭后语，看似十分奇幻，有呓语梦话之感，诸如：“现在是忧伤谎言的终

结，火车站都已经死了，像被来自金银花的蜜蜂蜇了一般……”这种诗句给人带来的只是纯粹的心理感受，不仅句子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就连一句话中的语素都没有必然联系，极其怪异，如同一部电影在使用快速且无逻辑关联的蒙太奇一般。自动主义绘画的尝试，创作出来的图像就好像是手抓着笔在纸上胡乱涂抹，且涂抹的过程中双眼并不看画面，由此得到随机图像。

传统绘画，哪怕是表现主义这类与客观形象相去甚远的绘画方式，本质还是主观意识的展现。所以一开始，超现实主义是否能在绘画领域中得到体现是被质疑的。给了超现实主义绘画启发的，是身处意大利，以基里科为代表的形而上绘画。

形而上绘画的技法其实是古典且写实的，但画面中的场景却是荒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类感知到的真实世界都是通过自身感官所感受到的“形而下”的世界，而背后主宰形而下事物运行规律的，是“形而上”的法则，不为肉眼所见。因此，形而上绘画所描绘的景象都是正常情况下不会存在的场景。例如基里科的《爱之歌》（Q17），将大卫雕塑的头部与皮手套一起放置在户外，远处似有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景象，这样的摆放在现实生活中虽能做到，但合理情况下绝不会出现。

基里科的作品中有许多惯常出现的固有形象，例如古典雕塑、马、绿色的球体、修道院、街道、火车等等。这些元素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和场景，正常情况下不会一同出现，但形而上绘画把它们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类似自动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式。基里科作品中的固有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梦魇”的体现，这里的梦魇是在梦中不断出现的，在艺术家潜意识中扎根，甚至是艺术家恐惧的事物。



Q17↑

/

《爱之歌》（*The Song of Love*）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
73cm × 59.4cm 布上油画 1914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 MA）]



Q18↑

/

《令人不安的缪斯》（*The Disquieting Muses*）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97.16cm × 66cm 布上油画 1916—1918年私人收藏

阴影作为固有元素，在基里科的画作中从不缺席，代表基里科形而上艺术的表达方式与艺术风格。基里科想要表达的是：大千世界的种种只是“形而上”的“道”在“形而下”世界中的投影，并非本质的规律和法则。在基里科的代表作《令人不安的缪斯》（Q18）中，站立着的奇怪形象并不能让人联想到代表美和艺术的缪斯女神。

基里科的绘画技法是古典的，并没有立体主义的多点透视，也没有表现主

义的扭曲夸张，色彩上甚至比较单一，这导致他的作品几乎都拥有类似的观感。基里科只是将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用一种打破常规逻辑的方式摆放在了一起，像极了之前提到的自动主义写作：每个词语都很正常，也没有生僻字，但却以一种非逻辑性的方式组成诗句，给人带来奇异的感受。

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明显受到了形而上绘画的深刻影响，只是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要比形而上绘画走得更远。超现实主义绘画，如恩斯特、马格里特、达利等人的作品，技法都是古典写实的，这与形而上绘画的技法一致。形而上绘画中，虽然事物的连接方式不符合常理，但这种连接并不违反物理定律，形而上绘画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刻意摆放，可以实现。与之相比，超现实主义绘画所展现的画面、场景则违反物理定律，在现实生活中全无可操作性。

超现实主义的“超”字如何理解？这里的“超”可以被认为是“现实”以外的“现实”。所谓的“现实”，是被物理定律捆绑的现实，是有疆界的。但在梦境中，物理定律可以被打破，人的潜意识可以任意地组合出各种场景。这种现实只存在于唯心的主观意识当中，是超脱于物质世界的。超现实主义认为，物质世界的现实并非完整的现实，精神世界的现实是超越物质世界的，只有物质世界的现实和精神世界的现实组合起来，才是“超越现实”的完整现实。超现实主义绘画反而是用古典写实技法实现的，这是因为完整的现实必须有意义，这些意义来源于现实世界，超现实世界虽然逻辑被颠覆了，但事物的形象依然拥有其现实世界中的形象。若连具体形象都没有，只保留抽象存在，“超”是具备了，“现实”却不复存在，所以古典写实的创作技法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必然选择。

表达物质世界之上、属于精神的世界，“梦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梦中，人的意识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现实物理定律制约，任何奇特荒诞的事情都可以在梦境中发生。比如几乎人人都梦到过不借助任何机器的飞翔。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关于梦境解读的学说大行其道，思想界、文化界都对梦境兴味盎然，再加上受到“形而上绘画”在表达方式上的启发，超现实主义绘画便表现出浓重的“梦境”感。

德裔法国艺术家恩斯特和比利时艺术家马格里特是率先创作出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两位重要艺术家，在画面风格与精神内涵上，两人形成了二元对立。虽然二者都被归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但恩斯特的作品中带有浓烈的表现主义色彩，马格里特的审美则更明确地表现一种思辨探究气息。

恩斯特是最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战退役后，他就在德国科隆建立了“达达小组”，沿着达达主义提出的艺术问题去寻找答案。随后恩斯特来到巴黎，加入超现实主义大军。很多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就是恩斯特归纳出来的，例如超现实主义应该具有“惊奇”和“抽搐”之美，绘画作品的情

境应当是现实中不可想象的，是进入了无意识状态之后感官的放大。据说恩斯特为此时常出入精神病院，观察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因为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缺乏正常逻辑，且感官时常处在放大状态，与之前说到凡·高的遗传性精神分裂有共通之处，这就不难想象恩斯特作品中呈现的表现主义气息。（Q19）



Q19↑

/

《荒野中的拿破仑》（*Napoleon in the Wilderness*）麦克斯·恩斯特（Max Ernst）46.3cm × 38.1cm 布上油画 1941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 MA）]



Q20↑

/

《北极星》（*Pleiades*）麦克斯·恩斯特（Max Ernst）25cm×18cm拼贴艺术1920年私人收藏

恩斯特的表现主义有一股“邪劲”，时常伴有暴力美学和病态美学元素，例如恩斯特曾经提出，想通过作品表现出“优美的尸体”（Q20）。

他的艺术理念无疑是与传统审美价值体系甚至与传统道德体系相去甚远的，符合达达主义的追求，这也再次体现出超现实主义脱胎于达达主义，且是达达主义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在私生活上，恩斯特也“突破”了传统的界限，他不仅在去巴黎发展时抛弃妻子，之后更与艺术家保罗·艾吕雅及其妻子加拉保持了一段三人婚姻的关系，而加拉之后又成为达利的灵感缪斯和长期情人。

恩斯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不仅有理念上的引领，在技法上也有诸多创新。比如拓印法：将拥有具体形象的物体放在画布下方，再用笔轻轻描摹，其形象就会极其准确地呈现出来，其原理与把纸蒙在一枚硬币上，然后用铅笔在上面描摹类似。这种方法有助于艺术家对现有形象进行高效地移植。对超现实主义画作而言，使用写实技法与其说是为了写实，不如说

是为了把现实形象重新组合与拼贴。如果重点是拼贴再组合的话，快速移植现实形象到画布上，这无疑是最高效的创作方式。恩斯特还和米罗一起创造了刮画法：将颜料涂在画布上，再用刮刀刮掉，留下颜料被刮掉后的特殊纹理。再如模印法，是将不同颜色的颜料挤在画布上，再对折画布，把颜料按在一起反复摩擦，展开后，颜料在随机外力下形成奇特纹理，这种奇特纹理经常出现在恩斯特的画作中，大有梦魇气息。

与恩斯特不同，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则是从概念上挑战欣赏者的固有逻辑。马格里特的画风并无表现主义观感，甚至可以说他的画技稀松平常，但画技与视觉效果不是马格里特作品的看点，马格里特的价值是其作品的哲学思辨能力。

马格里特的代表作《这不是一支烟斗》（Q21），画中明明画着一支烟斗，但下方却用法语写了一行“Ceci n'est pas une pipe”（这不是一支烟斗）。这幅作品提出了问题：当人们提到“烟斗”这个概念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烟斗的概念是视觉性的，是文字知识性的，还是两者皆有？在这幅画作中，烟斗的定义被打破了。你是相信画面还是相信文字？是认为写在画上的这句话只不过是画面的一部分，还是选择相信这幅画的名字？在现实中这件事物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烟斗，要么不是烟斗，但在画面中，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同时出现，象征着一种更加完整的现实。于是，“超现实”的目的达到了。虽然这幅画从技法上看毫无技术含量，但在概念上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Q21↑

/

《这不是一支烟斗》[*The Treachery of Images* (*This is not a Pipe*)] 雷内·马格里特 (René Magritte) 63.5cm × 93.98cm 布上油画 1928—1929年 美国洛杉矶洛杉矶艺术博物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马格里特的代表作《爱人》（Q22）、《知其不可而为之》（Q23）等，都是极其讲究概念和探究性质的画作，都在挑战人对传统概念的认知和逻辑。

《爱人》中两个蒙着脸的人在亲吻，隔着面纱的吻究竟还是不是吻？一位画家企图在空间中用画笔“创造”出女子人物形象，这在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但在超现实中呢？这多么像是一个充满执念的画家的梦境！马格里特的画作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安迪·沃霍尔所代表的波普艺术便深受马格里特的启发。

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也最被当作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名片的，自然是西班牙艺术家达利。达利不光是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参与与推动体现在方方面面，有雕塑、设计甚至超现实主义电影。达利拥有超级巨星般的媒体声誉，他的行为也极具存在感与辨识度，似乎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艺术家的代表，例如他与杜尚都在蒙娜丽莎的肖像上画过两撇胡子，他本人的胡子造型也异常夸张，达利声称这能让他感受到宇宙的震动（Q24）。



Q22↑

/

《爱人》（*The Lovers*）雷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54cm×73.4cm
布上油画1928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



Q23↑

/

《知其不可而为之》（*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雷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05.6cm × 81cm 布上油画 1928年私人收藏



Q24↑
/
达利照片

达利的创作技法是全面写实的，而且比恩斯特和马格里特都要纯熟。达利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是在画面中弱化拼接感，并用柔软的线条达成一种“连接感”。其最著名的作品当数《记忆的永恒》（Q25），画面中的钟表都以疲软的姿态耷拉着，似乎是在以柔软的状态表达连时间本身都厌倦了时间，时间停止流淌，记忆则在没有时间的空间中达到了永恒。在画面中央躺着的是个无法说清的事物，乍看像一匹马，但似乎又有人的鼻子，鼻子边上是闭着的眼睛，可以看到修长的睫毛，又或者根本不是眼睛。

达利的艺术充满戏谑精神，体现了他反权威和质疑传统的气质。例如《伟大的自慰者》（Q26）使男性与女性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奇诡的方式“生长”在一起。而在《达尔夫特维米尔的鬼魂可以被当作一张桌子》（Q27）中，达利借用了维米尔名画中的形象，并将他的右腿做了戏谑性的拉长，以略带讽刺和挑衅意味的做法挑战传统审美，这无疑是超现实主义手法对达达主

义精神的延续。



Q25↑

/

《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í) 24.1cm × 33cm 布上油画 1931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Q26↑

/

《伟大的自慰者》（*The Great Masturbator*）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10cm×150cm布上油画1929年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博物馆（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是融合性的，虽然开创性并不如恩斯特和马格里特显著，但从绘画技法以及对超现实主义核心主张的表达上，无疑最为全面。不仅如此，达利因为其艺术家的世界声誉定义了大众心目中的超现实主义。



Q27↑

/

《达尔夫特维米尔的鬼魂可以被当作一张桌子》（*The Ghost of Vermeer van Delft which can Be Used as a Table*）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18cm×14cm布上油画193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达利博物馆（Salvador Dalí Museum）

在笔者看来，进一步挖掘了超现实主义的可能性的，反而是虚长达利10岁，同样来自西班牙的米罗。1924年，米罗在巴黎加入超现实主义大军。前文提到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是以写实技法对现实中的形象进行打破逻辑的组合，但说到底，这种拼贴、连接的手法，依然是形而下的排列组合，事物之间仍拥有自身边界，而米罗的画作是没有边界的。米罗的代表作，例如《晨星》（Q28）、《飞鸟围绕的女人》（Q29），画中主体形象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以象征主义手法进行了简化，相互交叉并融为一体。只有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方式才能将不同事物真正联系在一起，呈现高度的一体化。这种整体感是其他以写实技法创作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不具备的。艺术界通常认为，米罗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抽象的绘画方式，但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因为米罗的追求与康定斯基或者蒙德里安这样的抽象艺术家完全不同。米罗明显是要展现一个传统逻辑和意义被打破的、想象中的世界，而抽象艺术通常是把着眼点放在纯粹的情感表达上。不过，米罗在画作中运用的元素太多，也不应被理解为标准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Q28↑

/

《晨星》（*Morning Star*）胡安·米罗（Joan Miró）38cm×46cm纸上水粉与油画1940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米罗基金会（Fundació Joan Miró）



Q29↑

/

《飞鸟围绕的女人》（*Woman Encircled by the Flight of a Bird*）胡安·米罗（Joan Miró）336cm×336cm 篷布上的丙烯颜料 1968年 西班牙巴塞罗那 米罗基金会（Fundació Joan Miró）

除了用象征主义手法将事物形象深层融合，米罗的画作并不如传统绘画一般有所谓的中心感，即米罗画作中没有明确的主体形象。这在传统绘画中极为罕见，就好像一种全新类型的沉浸式戏剧：传统戏剧都是看舞台中心的人物在表演，而沉浸式戏剧并无舞台概念，观众可以选择从任意人物开始，跟随其对应的支线剧情去看。米罗“去中心化”的表达方式给人带来的感受是新鲜的。

米罗的画作常展现出类似孩童般的纯真与童趣，但这种理解也不够准确。米罗所用的简笔画方法，实际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象征主义手法。他在表达方式上的创新，可说是对现代主义艺术过往的一次总结。正是凭借简笔画一般的刻画，米罗才能用象征主义创作手法构建出画作中的各类元素，让它们看起来是由同一种“材质”构成的，以此营造出不同事物共享边界的效果，并在互相交接，甚至互相穿越时融为一体。这种交融是形而上的交融，艺术内涵更为稳定。

（四）艺术品与艺术家

二战之后，西方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这很好理解，总体上，艺术跟着钱走，也可以说是钱跟着艺术走，二者互为动因。二战后，美国无疑成为最大赢家，一方面经济中心落在纽约，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摧残下，欧洲大批优秀艺术家来到美国，纽约自然也成为他们的聚集地。从此，西方艺术逐渐步入“当代艺术”时期。我们不妨将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个时段称作“现当代”艺术时期。

二战之后在美国最早兴起的艺术运动就是大名鼎鼎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它与之前艺术流派的不同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并不像立体主义、表现主义以及象征主义一样可以大致描绘出该艺术流派的视觉特征，抽象表现主义是对创作精神的概括。波洛克和罗斯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两人虽同属抽象表现主义，但除了画作中都没有具体形象，他们的绘画风格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波洛克侧重笔画，罗斯科则完全靠色彩征服观众。

波洛克是美国人，被认为是使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的功臣。在波洛克的作品中，画布上不存在占据大面积的主体形象，只有各种各样的笔画，且色彩单一。其代表作有《第五号作品》（Q30）、《第八号作品》、《大教堂》（Q31）等。

可以将波洛克与康定斯基《构图八号》之前的作品做对比，虽然两人的作品观感都是抽象的，但二者的艺术目的却是相反的：康定斯基的画面看上去虽也汹涌澎湃，泼墨挥毫，但正如前文所说，康定斯基是以抽象的艺术语言表达对“画面传情”的理性追求；而波洛克的创作过程是纯粹的、接近无意识的、自发的。画家们大多是支起画布作画，波洛克则是将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然后以一种快速的、近乎舞蹈的方式将颜料挥洒在画布上。这种创作方式无疑是表现主义的追求，是极端感性的。抽象表现主义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表现主义，只不过与德国表现主义不同，用的是抽象视觉元素。



Q30↑

/

《第五号作品》（*Number 5*）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243.8cm×121.9cm纤维板上油画1948年私人收藏



Q31↑

/

《大教堂》（*Cathedral*）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81.61cm × 89.06cm 混合技法 1947年 美国达拉斯艺术博物馆（Dallas Museum of Art）

波洛克将从拉斐尔开始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发展到了极致。在绘画中，“整体”自然是指画面的具体形象，“个体”则是指组成画面的每一笔。自拉斐尔始至安格尔终的古典主义绘画，完全强调整体，个体被彻底抹去。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的委拉斯开兹，用概括性的笔触描绘出无比生动的形象，他证明了足够强大的个体胜过千万个毫无存在感的普通个体。到了伦勃朗，他更是刻意地把笔触留在画布上，这些笔触作为极具表现力的元素，充分提升了画面的情感张力。在伦勃朗手上，个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个体直接构成了表现力的来源，在局部，个体的存在感超过整体。到了凡·高，整体的地位已经全面让位于个体，形成凡·高画面超强表现力的正是那些看似粗糙并存在感极强的笔触，画笔的走向、颜料的厚度以及浓烈的色彩，才是凡·高艺术伟大表现力的来源。在凡·高的画作中，整体不是绘画的目的，而只是个体表现力的载体。至此，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到了波洛克，就与拉斐尔形成了完全的倒错：在波洛克的作品里，没有整体，只有个体。波洛克作品的表现主义来源都是个体的笔画，整体不复存在，个体也不需要依托任何整体形象进行表达。从拉斐尔到波洛克，从古典艺术到现当代艺术，艺术家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在经历了近500年之后，完成了一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彻底转变。从这个意义来看，波洛克的创作是价值非凡的。

与波洛克恰好相反，俄裔美国人马克·罗斯科的抽象表现主义，主要的视觉元素是色彩，而且是只有色彩，并不存在笔画，更没有整体和个体之争。波洛克的绘画，与其说是“抽象”，不如说是“无相”。在罗斯科的代表作中，如果说还有形状的话，那么就只是一个个不同颜色的“矩形”，但是在这里将这些色块理解成矩形明显是不得要领的，因为这些矩形大多没有规则的边缘，而是以一种过渡的方式逐渐隐匿在背景色中。这只能理解为罗斯科在创作时，尽力想隐去“形”的概念，只留下色彩，但是色彩变化要分区域，只能尽量让不同色块的外延减弱存在感。很显然，在矩形画布上，任何矩形以外的形状，如圆形、三角形、多边形，都是突兀的，不利于将“形”隐去。由此，边缘模糊的矩形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罗斯科的纯粹色彩表现力代表着“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罗斯科的代表作画幅都很大，尽量让视觉被色彩充满，不要让画作的边缘出现在视线之内，如此观者才能感受到最为直接、纯粹的色彩以及色彩的变化搭配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观赏罗斯科的画作要尽可能地靠近，并以一种眼神“虚焦”的方式去观赏。有一种生活经验可以为如何感知罗斯科的画作提供参考：如果在热烈的阳光中闭上双眼，人在视觉上还是能够感知到橙红色的，但这种视觉感受是抛弃所有实际形状的，给人带来纯粹的温暖感，这种视觉感受便是沉浸式的。罗斯科通过敏锐的色彩感和历经实验的色彩搭配，用沉浸式的方法描绘出视觉情感上的直接感受，这是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表达方式。（Q32a /Q32b）



Q32a↑

/

《第5号/第22号》（*No.5/No.22*）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297cm × 272cm 布上油画 1949—1950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Mo MA）]



Q32b↑

/

《第3号/第13号》（No.3/No.13）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216.5cm × 164.8cm 布上油画 1949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与抽象表现主义的感性艺术互为对立，并在艺术观念上与之互为反动的，是稍晚于抽象表现主义发展起来的“极简主义”，也可译作“极少主义”。极简主义艺术是探究性的艺术，本质上与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有类似之处，但极简主义的做法显然更加克制，也更具探究精神。

造型艺术中，极简主义的代表艺术家有唐纳德·贾德，他的作品看上去十分简单，甚至有一些“简陋”，几乎每件作品都是带有某种颜色的长方体自上而下或自左而右的重复排列。这恰恰揭示了极简主义的两个基本构成：一是基本元素，二是元素的重复。在贾德的作品中，单个长方体自然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开则是基本元素的重复。虽然创作方式并无技术难度，但从概念上，贾德的作品实际上定义了“三维空间”，并且用最少的元素解释了空间的本质。不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空间中空无一物，我们如何能知晓空间是三维的？若要体现空间是三维的，则必须在空间中存放

物体，且有长、宽、高三个属性。能同时表达这三个属性，并拥有最简形状的，自然是长方体。贾德的作品中几乎不会出现正方体，因为贾德使用的长方体的长、宽、高各不相同，如此可以表达三个维度是各自独立的。除了拥有三个独立维度，空间是具有延展性的，是均衡的，因此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基本单元，重复的长方体则表现出了空间的延展性。（Q33a/Q33b）

贾德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工业化的，他并不亲手制作他的作品，而是委托他人进行工业化生产。他更多的是选择工业材料，以求作品与艺术家、与艺术媒介剥离，这从根本上更接近极简主义的追求：尽量摆脱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性本身与作品要揭示的空间特性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对作品来说是冗余的，应该剔除。

造型艺术中的极简主义不会少了基本元素与重复这两个最核心的要素，只是不同的艺术家对基本元素的选取有差异，比如在弗兰克·斯特拉的作品中，基本的元素是五角星、多边形、曲线等，作品中的颜色也更多变。很显然，斯特拉对基本元素有自己的认知，这就好像至上主义一样，基本元素是你选取的一组数学概念上叫作“基”的东西，构成目标对象的所有基本元素组成了这组“基”，它们通过组合叠加的方式再构成目标对象。

（Q34a/Q34b）



Q33a↑

/

《无题》（*Untitled*）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2单元
22.8cm×101.6cm×78.7cm垂直间距22.8cm镀锌铁漆1967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Q33b↑

/

《无题》（*Untitled*）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0单元
 15.2cm × 68.6cm × 61cm 垂直间距15.2cm 不锈钢与琥珀树脂玻璃 1968年
 美国芝加哥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Q34a↑

/

《菲鲁扎巴德》（*Firuzabad*）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304cm × 458cm 布上高分子涂料 1970年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Q34b↑

/

《波斯之星II》（*Star of Persia II*）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81.3cm × 66.1cm 纸上丙烯 1967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

粗略地看，进入现代艺术后，艺术作品的总体趋势是技术成分逐渐减弱，画面及造型观感趋于简单，似乎越发不知所云，其简陋程度甚至会让观众觉得受到冒犯。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艺术的载体逐渐从艺术品本身向艺术家身上转移。当人们谈起古典艺术，其实语境中默认的是艺术品，并未特别强调艺术家作为艺术品的创造者本身所具备的艺术性。而随着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作为艺术的载体越来越突出，人们也越来越被作品背后所揭示的艺术家思想及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家本身的艺术性所吸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杜尚的《泉》，这件作品本身毫无欣赏价值，但它的艺术性体现在杜尚创作《泉》的行为本身。不妨回想一下第一次知道一尊小便器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品这个事实时的惊讶，你就能明白《泉》的艺术性完全是在艺术家身上，而不是在作品上。同样，波洛克的作品，其艺术性已不能完全由其作品表现，我们通过作品的笔画、泼墨，除了它们形态上的艺术感，亦能够感受到波洛克激昂挥洒的创作过程。波洛克作品

中，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性已然有一部分承载在艺术家身上，再将这个趋势往下推，就是行动艺术及行为艺术。行动艺术的艺术性，大部分体现在艺术家或艺术家的人体延伸。譬如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让模特裸体浑身沾满颜料在画布上滚动，借此作画。这样的作品留下的不是画面，而是用某种方式记录下来的人体运动，艺术性在艺术家身上。行为艺术则最为彻底，艺术家就是艺术品本身，所谓“作品”，就是艺术家自己的种种行为。譬如行为艺术教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关联》（Q35），她与恋人乌雷背对着端坐，将头发捆绑在一起，两人看不到对方，但由于头发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借此行为表达“关联”这一概念。

总体上，进入现当代艺术以后，艺术作品的概念性更占主导地位，其价值标准已不在于作品技艺高超与否、视觉美感如何，而主要在于作品对特定艺术理念的表达是否到位。此处有两个步骤，第一是有无表达新观点，第二是观点是否表达到位。尤其当代艺术最强调的就是观念性，所谓“观念艺术”，就是这种艺术的集中体现，它几乎去掉了所有传统艺术中所谓的创作过程。观念艺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了90年代以后，观念艺术的成分在所有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重要的艺术家有美国的约瑟夫·科苏斯，他的代表作是《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Q36），这件“作品”毫无艺术的“创作”过程，完全是观念的体现。科苏斯将一把普通的椅子放在中间，椅子左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张椅子的照片，椅子右边的墙上悬挂着chair（椅子）这个词在词典中的定义。这件作品的观念性在于它挑战了人们传统观念对于事物的认知：将不同定义置于同一空间中时，椅子的传统定义被打破了。于是，一种新的关于椅子的定义产生了。在此之前，当我们谈论“椅子”时，我们只是通过椅子这个单词做到沟通无障碍，而科苏斯的这件作品实际上是对椅子的定义做了一次“格式化”：“椅子”这个“文件名”有了一个真正的后缀，就好像图片格式的jpg、png等，“椅子”被“定义”了。当然，除了《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科苏斯还有很多同系列作品，只是将椅子换成了其他事物。



Q35↑

/

《关联》（*Relation in Time*）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及乌雷（Marina Abramović and ULAY）1977年



Q36↑

/

《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One and Three Chairs*）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现成品1965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The Centre Pompidou）

科苏斯认为，杜尚之后的艺术本质上都是观念艺术。杜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泉》本身就启发了“现成品艺术”，从而拓宽了艺术的疆界。现成品艺术告诉大家，艺术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原创，也未必借助传统艺术媒介。在杜尚之前，艺术的疆界局限在绘画、雕塑、拼贴等传统材质及媒介内，这种限制一旦被打开，艺术家举一反三，艺术疆界的拓展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前文所述艺术性向艺术家本身转移的趋势，说到底也是艺术疆界的扩张。例如，鼎盛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国的波普艺术，其诞生的社会背景是高科技与现代化的大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流行文化风靡，社会处在消费品急剧膨胀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是安迪·沃霍尔和罗伊·利希滕斯坦，他们直接取材于流行文化，创造了风靡全球的波普艺术。波普艺术在观念上非常创新，说是观念艺术的一种表达也不为过。例如，安迪·沃霍尔把玛丽莲·梦露的经典照片做成漫画感的版画，又将速食罐头排布在一起；利希滕斯坦则将漫画中的情节放大，用波点化的处理来模仿批量印刷的观感（Q37a/Q37b/Q37c）。这些做法都是现成品艺术的取材方式。从更深的观念上来说，波普艺术的创作者不仅仅是这两位艺术家，流行文化之所以是流行文化，除了有流行文化的创作过程，还有大众的筛选过程。波普艺术的创作者是艺术家，也是广大民众，大众的审美也被纳入艺术创作当中。

可以看到，杜尚之后的艺术，无论多少，必谈观念性。说杜尚启发了观念艺术，是当代艺术的祖师，甚为有理。



Q37a↑

/

《玛丽莲》（*Marilyn*）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多种大小丝网印版画1967年多地收藏



Q37b↑

/

《金汤宝罐头》（*Campbell's Soup Can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多种大小丝网印版画 1962年多地收藏



Q37c↑

/

《溺水的女孩》（*Drowning Girl*）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
172.7cm × 172.7cm 布上油画 1963年美国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Mo MA）]

18 勋伯格与凯奇：20世纪西方音乐

（一）调性与非调性

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分水岭是勋伯格。总体上，勋伯格之前的音乐家，写的都是“调性音乐”。关于调性，在“斯拉夫与法兰西”一章当中已有提及，其创作体系最早是由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拉莫所确定下来的，是以主和弦、属和弦以及下属和弦为主要动因的和声体系。这就像古典绘画总是以描绘自然为目标，古典音乐也一样，音乐拥有调性是不言自明的“默认设置”。否则古典音乐中，尤其是在古典时期的作品中，就不会有大量“ $\times \times$ 调第 $\times$ 交响曲”的命名格式了。

进入现代主义艺术时期后，无论绘画还是雕塑，艺术家都抛弃了描绘自然的基本追求，纷纷开始“表达自我”。现代主义音乐的标志就是象征着古典音乐基本理论框架的、调性体系的崩塌。勋伯格及其两位弟子——韦伯恩与贝尔格为代表的新维也纳乐派，是推动无调性音乐诞生的主要力量。

在勋伯格之前，打破音乐调性的情况并不少见。早在浪漫主义时期，李斯特的音乐中就时常能听到调性被破坏；瓦格纳音乐中和声的多变与创新，也使其音乐作品中不时出现“无调性”的音乐听感。到了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音乐，调性与传统和声体系已经不是其创作的基本方法论，德彪西平等地对待一个八度内的12个音在音乐中的地位，只是纯粹地用所谓“色彩感”来选择所需要的和声与音程。听俄罗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感受，他甚至明确地给出了不同调性的音乐色彩。

在音乐“色彩感”的全新认知框架下，印象主义音乐的听感与调性的，与传统和声式的，尤其与以德奥交响乐为代表的作品有了本质区别。德彪西音乐中的无调性是纯粹的音乐性追求。德彪西通过自己对音乐的全新理解，客观上创造了少许无调性音乐的听感，但这并不是主动的创造，更没有总结出无调性音乐的理论框架。这就好比在绘画艺术中，以莫奈、雷诺阿等人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绘画作品，在画面观感上与古典主义绘画虽然极为不同，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要去描绘自然，只是描绘的方法有巨大差异。但到了塞尚、凡·高和高更，绘画的目标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描绘自然让位给了表达自我。勋伯格和塞尚等人类似，从根本上推翻了调性音乐的基础，发明了“十二音作曲法”。

古典音乐作曲所使用的律制系统主要是十二平均律，即一个八度内有12个音，把一个八度平均分成12等分。等分是指每相邻两个音之间的声频关系

是等比关系，以钢琴键盘系统为例，一个八度以内，有7个白键、5个黑键，共12个音。十二音是勋伯格发明的一种特殊作曲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曲子一定会打破调性。十二音的规则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写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必须是在之前的乐段中没有使用过的，除非12个音都已经被用过一遍。如此一来，无论如何创作，曲子的调性都将不复存在。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C大调的曲子，用到的全部都是钢琴上的白键，如果按照十二音体系来创作的话，一段音乐中，如果先穷尽了7个白键，这时剩下的5个音只能用黑键，黑键的音完全不在C大调的音阶体系中，如此一来调性就被打破了。

十二音体系似乎是一种通过计算进行音乐创作的音乐体系，因此饱受反对者唾弃，他们觉得这根本不是音乐，不是发乎内心的自然流淌，只是一种机械的计算。这样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勋伯格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十二音创作的作品，其创新价值极高。

在十二音的基础上，勋伯格的弟子韦伯恩又发明并完善了“序列音乐”，把无调性音乐的作曲方式又推进了一层。序列音乐作曲技法是把12个音以作曲家的意愿排成一个音列，如以“C、E^b、G、B^b、D、C[#]、F、A、B、E、A^b、F[#]”为一个音列，如此一来，这个音列就成了这段音乐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这个基本元素进行种种“操作”，典型的有“倒装”，就是把所有音的顺序倒过来排列，还有所谓的“翻转”，相当于把乐谱颠倒过来，高音变低音，低音变高音。这一系列操作创造了很多新的音乐元素，再经过音高、音长、节奏等诸多手段的修饰，一部基于音乐序列的作品就被创造出来了，并且可以保证这部作品是没有调性的，因为构成序列音乐的最基本元素——12个音的排列规律从根本上来就打破了调性。

由于古典音乐牢固的传统，无调性音乐从听感上是难以被接受的。

总的来说，无调性音乐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受。有人曾做过实验，给一群孩子从小听无调性音乐，实验结果是人类听觉感受对于调性的接受度并非是天生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听无调性音乐，那无调性音乐对他来说就会是顺耳的，听调性音乐反而会觉得不顺耳。用中国京剧所用的音阶系统举个例子。中国的京剧中，尤其是京胡的定弦，两个音的音程与西方音乐的音阶体系并不重合，但是听久了京剧的人并不会觉得听感奇怪，反倒是熟悉了平均律体系的人去听京剧，时常会有“音不准”的感受。这实际上是听觉习惯的差异所导致的。欣赏无调性音乐的美感，也许需要浸淫在无调性音乐中，逐渐形成听觉习惯才能继续深入。

无论悦耳与否，无调性音乐为作曲家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方式，以及全新的看待音乐的方式。十二音、序列音乐，无疑是更客观的创作方式，它独立

于人类主观听觉系统而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音乐形而上的规律。
([1])

[1] 《钢琴协奏曲》（ *Piano Concerto*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
1942年协奏曲Op.42

（二）古典与新古典

达达主义是对传统艺术审美的极端颠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领域的写照。在一战爆发之前，各个文化领域都显现出了这种矛盾的积蓄。

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之于20世纪的现代主义音乐，就好比毕加索之于现代主义绘画一般，两人年龄也相仿。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1]）是当时创新音乐作品当中，最能体现“一战预兆”的。《春之祭》是一部芭蕾舞剧的配乐，拉开了现代主义音乐的新篇章。这部作品表现的是俄国原始部落祭祀大自然的一种仪式，再现部落推举出的祭春少女用剧烈跳舞的方式升天，最终与太阳神联姻的壮丽场面。

从技法上看，《春之祭》的作曲手法极为丰富，无论是调性、音响效果还是节奏型，诸多方面都与传统音乐切断了联系，处理手法极为创新，甚至充满了革命性。尤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不和谐的新和声以及前文提到过的双调式，这些都成为《春之祭》中的不安因素。

1913年，《春之祭》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剧院首演，引起了巨大轰动和争议。据说首演现场混乱不堪，观众席中充满了唏嘘、鄙夷、惊讶以及喝倒彩。由于该作品与传统音乐的听感差别太大，很多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与达达主义对艺术的追求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春之祭》是具有达达主义精神的作品，虽然此时达达主义还没有诞生。这也是为何《春之祭》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如此崇高，它象征着旧音乐时代走向终结。其地位之于现代音乐就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于古典音乐一般。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似乎并没有沿着《春之祭》这条充满破坏性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这部作品实在太过于颠覆了，在当时遭受了社会各界极其猛烈的批判，强如斯特拉文斯基也未经受住舆论的攻击，于是他几乎是“矫枉过正”般地提出了“音乐应该回到巴赫”这一主张，又引领了一波“新古典主义”音乐的风潮。

前文曾提到，古典主义音乐以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的早期作品为代表。“classical”一词应被翻译为“经典”，即指不随时间的流逝而黯淡的事物。相对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音乐是精炼的，它留下了音乐中相对普遍的部分，确立了形式简洁、曲式相对固定的音乐风格。最直接的证据是古典时期各种曲式在结构上趋于固定，交响曲、协奏曲的四乐章与三乐章结构也趋于牢固化。在巴洛克时期，能找到各种冷门乐器的协奏曲，然而进入古典主义时期之后，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在数量上变得具有压倒性。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作曲家们发现小提琴与钢琴作为独奏乐器是协奏曲

体裁中最有效的。在创作元素上的“瘦身”，是“经典化”的重要特征。

古典主义时期的创作手法成熟后，确定下来的创作元素不能一成不变，于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在古典主义基础上加入了更多创新元素，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厚重的浪漫主义音乐。浪漫主义时期有无数的创新和探索，最主要的是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一派，在他们手中，和声被大大地丰富，形式也被深刻地挖掘。哪怕是勃拉姆斯的古典派，也在音响效果、配器的想象力以及音乐织体的丰富程度上对古典音乐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丰满。

新古典主义音乐正是在融合了现代音乐各种创新元素的基础上，相对于浪漫主义音乐，又进行了一次“瘦身”。新古典主义音乐中包含了很多在当时是先锋的创作手法，就比如无调性的听感。尽管如此，新古典主义音乐无论从篇幅、织体层次以及音乐结构上都更为简洁，曲式上甚至能看到很多古老的如巴洛克时期的痕迹。

斯特拉文斯基属于新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是《圣诗交响曲》（[2]）。这部作品听感异常奇特，有着明显的无调性音乐特征，它在结构上更为简洁，没有恢宏的音响效果，织体也不具有浪漫主义音乐般丰富的层次，是运用了现代创作手法的、结构更为紧凑的音乐。

斯特拉文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3]）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新古典主义音乐。这部作品的结构十分简单，一共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只有大约五六分钟，而且每个乐章开头的和弦也完全相同，可以说整部作品都由这单一动机展开，并且其音程结构对于小提琴来说是极为创新的。开头是一个和弦，但和弦的两个高音横跨十一度，在小提琴上，这个音程的双音不属于常规的演奏技巧，因为十一度双音对小提琴演奏来说跨度太大，并不能正常演奏。据说在创作之初，斯特拉文斯基曾与一位小提琴家边就餐边探讨，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个和弦。小提琴家当场表示，这个音程在小提琴上无法演奏，但回到家后，又在琴上进行了尝试，惊奇地发现，手大的小提琴家其实是可以演奏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部小提琴协奏曲。

同一时期，德国的新古典主义代表作曲家有欣德米特。欣德米特的作曲风格早年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德国表现主义风格，作品随后也被归类为新古典主义，但这种新古典主义内涵与斯特拉文斯基是极为不同的。欣德米特的作品听感很新奇，但这种新奇又并非以类似十二音手法的无调性创作方式达到的。相反，欣德米特的作品有一种连贯的调性平移，可以想象为调性的时常转换，在每个局部，音乐是拥有调性的，只是这种调性在乐句之间的变化非常迅速。

欣德米特音乐中的新古典主义元素主要表现在“对位法”的使用，歌剧及同

名交响乐《画家马蒂斯》([4])是其中典型。在纳粹统治期间，欣德米特的作品被归类为颓废艺术。希特勒厌恶《画家马蒂斯》，德国媒体集体封杀了欣德米特，但欣德米特逃亡土耳其后上演了该作品，并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一次著名的对纳粹极具讽刺意义的文艺政治事件——“欣德米特事件”。

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是新古典主义音乐中的一组二元对立。他们的音乐都包含浓厚的俄罗斯风格，但是在政治主张和音乐风格上，二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普罗科菲耶夫音乐中的新古典主义特征十分显著，例如他的《第一交响曲》就叫“古典”。这部作品开篇光辉柔顺，充满古典气息，甚至让人联想起海顿的交响曲。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结构通常十分紧凑，少有大部头作品，音乐中的新奇元素来源于他常用的“多调性”手法。多调性就是在创作中同时放入超过一个调性的旋律，达到极其交错的效果。和声之间的奇异连接也是普罗科菲耶夫音乐的一大特色。在和声创新上，普罗科菲耶夫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有着独到的见解，常常打破传统理论进行创作，以至于在音乐学院上学期间的和声课未及格。

普罗科菲耶夫善用铜管，音乐充满了金属气息和能量感。这种打击乐感甚至能在他的钢琴作品中感受到，譬如《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5])和晚期的钢琴奏鸣曲，都有把钢琴当作打击乐器使用的创作手法，钢琴奏出的音乐抓人注意力的不是旋律，而是节奏感和敲击感。

肖斯塔科维奇则完全不同，他的音乐深邃延绵，层次丰富，甚至略显晦涩，音乐内涵无疑更深。肖斯塔科维奇是更具融合性的作曲家，虽然在他的作品中能找到很多古典元素，肖斯塔科维奇也因此会被认为是有新古典主义音乐家属性的作曲家，但是很明显，从他音乐的规模上看，庞大的音乐结构和丰富的音乐织体，与拥有简洁明快风格的普罗科菲耶夫形成了鲜明对立。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规模通常都异常恢宏庞大，例如他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6])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就超过了25分钟。从音乐织体和音乐规模上看，肖斯塔科维奇无疑是偏浪漫主义的。

在对待苏联当局的态度上，二人也极其相对。普罗科菲耶夫无疑是服务于苏联当局的标准爱国主义者。这与他的个人际遇有关。普罗科菲耶夫早年曾到美国发展，但是在美国的事业并不如他的前辈拉赫玛尼诺夫一般顺利，直到回到苏联才如鱼得水，成为被当局器重的艺术家。普罗科菲耶夫积极投身到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和适合广大民众听觉习惯的创作当中，例如他的《升c小调第七交响曲》([7])，通篇的优美旋律。相比于普罗科菲耶夫的爱国主义情怀，肖斯塔科维奇则是处在对苏联当局的恐惧、担忧以及讽刺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有一句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形容，说他是“一

生都在等待被枪决的人”。肖斯塔科维奇反对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一生生活在克格勃的威胁之下。据说，斯大林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放有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逮捕令，奈何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都极高，因此并不能随便逮捕。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后，据他的友人回忆，原本应该歌颂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第七交响曲》，实则“暗藏杀机”：小军鼓敲击的动机贯穿始终，以此暗讽克格勃压迫人民的脚步逐渐逼近，甚至第七交响曲的结尾蕴含着只有少数人才能听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

在音乐史上，法国作曲家普朗克虽然并不被归类为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但以普朗克为首的法国“六人团”无疑在简洁的音乐语言上最有发言权。在音乐创作理念上，普朗克等人追随的是“裸体主义者”萨蒂（[8]）的步伐。

普朗克的音乐具备强烈的现代感，但这并非是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那样的先锋感，而是一种类似于流行文化的现代感。首先，普朗克的音乐作品依然是以调性音乐为基础，创作手法并不包含太多创新性的和声，但普朗克在旋律方面天赋很高，传统的东西到了他手上，能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古典音乐的效果。

新古典主义音乐的简洁甚至是简短，都能在普朗克的音乐中找到。例如他的代表作《黑人狂想曲》（[9]），全曲5段，每段只有两分钟左右，从篇幅上就能看出普朗克的现代性。从学术价值上看，普朗克的音乐正是因为太过“动听”，似乎并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就好像古典音乐中的流行乐一般，所以学界并不把普朗克归类为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但以笔者个人感受，普朗克的音乐才最能代表法国20世纪初的听觉感受。

但普朗克在宗教音乐方面的造诣容易被忽视。当时，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兴起，普朗克的“动听小曲”迎合了大众的需求，因此受到更多关注。其实，普朗克的宗教音乐大有用全新手法诠释古老体裁的创新意味，艺术价值甚高，代表作《圣母悼歌》（[10]）和《荣耀经》（[11]）虽然以传统的合唱形式写成，却非常具有现代听感。可以将其与罗西尼的《圣母悼歌》作一番对比，相比罗西尼意大利式的浪漫主义风格，普朗克的《圣母悼歌》则蕴含了轻盈灵巧的现代感。

20世纪前半叶，要说融合了调性与无调性、传统与现代成就最高的音乐家，匈牙利的巴托克必定居前三。不少学者认为巴托克的成就甚至可与贝多芬比肩。之前提到的音乐家，成名的前提是总有几件“绝活”在手，如勋伯格有十二音，斯特拉文斯基有《春之祭》。巴托克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机地融合了传统和声与奇异和声，也融合了调性与非调性，两种技法和两种音乐观在其作品中融会贯通。

除此之外，巴托克音乐的一大创新是将“噪音”融入音乐之中。在物理上，

乐音和噪音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存在固定的音高和波形。巴托克在音乐中追求一种原始的，甚至是粗暴狂野的音响效果。譬如在他的《钢琴奏鸣曲》（[12]）中，除了不和谐的和声，第三乐章的极端和声中，一个和声7个音，除了F，另外C、D、E、G、A、B 6个音都同时发声，这样一来，该和声的音高就被淹没了，音高是不明确的。这种没有明确音高的和声效果，是一种近乎噪音的听觉效果，就好比并不是用手指弹琴，而是一巴掌拍在钢琴键盘表面，某一片区域的琴键同时发出的噪声。

巴托克的音乐甚至有类似于摇滚乐的音响效果。在巴托克的钢琴作品中，演奏者时常要用近乎“砸”钢琴的力度去弹奏，因此，钢琴也被巴托克挖掘出了打击乐功能。在音乐中注入野蛮狂暴的声音是因为巴托克在对匈牙利民族音乐挖掘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原始主义的道路，这是巴托克表达旺盛生命力的独特音乐语言。

[1] 《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913年芭蕾舞音乐

[2] 《圣诗交响曲》（*Symphony of Psalms*）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930年合唱交响曲

[3]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931年协奏曲

[4] 《画家马蒂斯》（*Symphony: Mathis der Maler*）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934年交响组曲

[5] 《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2 in g minor*）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1913年协奏曲Op.16第四乐章

[6] 《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Symphony No.7 in C major “Leningard”*）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imitri Shostakovich）1941年交响曲Op.60

[7] 《升c小调第七交响曲》（*Symphony No.7 in c-sharp minor*）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1952年交响曲Op.131

[8] 《三首裸体舞曲》（*Trois Gymnopédies*）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1888—1895年

[9] 《黑人狂想曲》（*Rapsodie Nègre*）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917年FP3

[10] 《圣母悼歌》（*Stabat Mater*）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950

年宗教音乐FP148

[11] 《荣耀经》（*Gloria*） 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960年宗教音乐FP177

[12] 《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926年奏鸣曲Sz.80

（三）美洲与欧洲

20世纪美国已经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这自然就是诞生于美国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的爵士乐。爵士乐可以被认为是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碰撞所产生的一种全新音乐形式，逐步风靡全世界。肖斯塔科维奇就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过两套著名的爵士组曲（[\[1\]](#)/[\[2\]](#)）。

爵士乐在音阶体系、演奏编制以及节奏规则上与古典音乐都有着巨大分别。首先，爵士乐的音阶体系与古典音乐的大小调体系截然不同。以蓝调爵士为例，音阶为C、E^b、F、G^b、G以及B^b这6个音，若用这6个音去演奏钢琴，不难发现，无论如何演奏，出来的音乐总有浓烈的爵士乐气息。

乔普林是美国黑人作曲家，可以被认为是黑人音乐历史中祖师爷级的人物，也被称为“拉格泰姆之王”。拉格泰姆是早期爵士乐的一种，诞生于新奥尔良，被认为是爵士乐的前身，影响了爵士乐的诞生。拉格泰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于切分音节奏的使用，如果是在钢琴上，左右手主题与伴奏之间错开半拍，造成一种身姿摇曳，“拽”着人的听觉往前走的律动感，戏剧冲突也从中展现。（[\[3\]](#)）

将爵士乐元素融入管弦乐创作的是美国作曲家格什温，他是20世纪前半叶，美国活跃的音乐家中名气最大、天赋最高的一位。格什温基本是自学成才，他将爵士乐的元素融入古典音乐的创作当中，代表作有著名的《蓝色狂想曲》（[\[4\]](#)）。开篇处的单簧管滑音是标准的爵士乐演奏方式，其主旋律也充满浓厚的爵士乐气息。格什温曾到巴黎学习，希望师从拉威尔学配器，但是拉威尔委婉地拒绝了他，理由是拉威尔认为格什温已经音乐风格成熟，不需要再跟其学习配器了，反是拉威尔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钢琴协奏曲蕴含浓烈的爵士乐气息，可能是拉威尔反向受到了格什温的影响。格什温创作的《波吉与贝丝》（[\[5\]](#)）是最重要的一部黑人英语歌剧，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丝的悲剧爱情故事，其中很多唱段均广为流传，如《不必如此》《夏日时光》等。

爵士乐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受欢迎，哪怕在冷战期间的苏联，作曲家尼古拉·卡普斯汀也用严肃古典音乐的作曲方式创作了大量的爵士风格作品，其他的钢琴练习曲系列最为著名。卡普斯汀甚至还有爵士乐风格的，类似于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钢琴作品，爵士乐赋格可谓是独树一帜。但是，卡普斯汀本人拒绝被人称为爵士钢琴家。格什温也好，卡普斯汀也罢，他们的音乐只是拥有爵士音乐元素，而并非爵士乐本身，因为爵士乐的一大特色是即兴演奏，这在格什温和卡普斯汀的音乐中是不具备的。（[\[6\]](#)）

即兴演奏指的是在真正开始演奏之前，台上的音乐家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将会演奏成什么样。开始演奏时，也许只是根据小号手即兴吹奏的一个音乐动机，其他的乐手就会即兴开始演奏。爵士乐能够被用来进行即兴演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爵士乐的节奏型和音阶体系是高度风格化的。只要用的是爵士乐的音阶系统，无论你怎么演奏，流淌出来的音乐都是爵士风格的，这就好比用宫商角徵羽5个音去演奏，无论如何，音乐中总有“中国风”一般。如果是用古典音乐的大小调体系作即兴演奏，就没有这般容易了，因为这需要音乐家对乐理与和声理论有精确的把握。

[1] 《第一号爵士组曲》（*Jazz Suite No.1*）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imitri Shostakovich）1934年管弦乐组曲

[2] 《第二号爵士组曲》（*Jazz Suite No.2*）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imitri Shostakovich）1938年管弦乐组曲

[3] 《演艺家》（*The Entertainer*）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1902年拉格泰姆

[4] 《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924年协奏曲

[5] 《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935年英语歌剧

[6] 《24首爵士前奏曲》（*24 Jazz Preludes*）尼古拉·卡普斯汀（Nikolai Kapustin）1988年

（四）加法与减法

就如二战之后现代艺术迎来了一次全新的转变一样，现代音乐也进入了当代音乐，甚至是实验性音乐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就如当时的艺术家们一样，尝试扩大音乐的疆界，试图重新定义音乐。

新音乐版图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去挖掘全新的音响效果，跳出传统音乐的管弦乐范围，寻求新奇的声音、全新的音乐语言。

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驱，他首次在交响乐中加入了电子音乐。譬如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委约作品《图伦加利拉交响曲》（[\[1\]](#)）中，梅西安使用了一种叫作马特诺琴的电子乐器，能发出频率连续变化的声音，其音响效果在早年经常被用在电影中，例如烘托外星人或者UFO（不明飞行物）等奇异事物出现的场景。马特诺琴是标准的电子乐器，前身是世界上第一件电子乐器特雷门琴。特雷门琴的原理是通过手在电磁场中的位置来决定音高的变化，在演奏时，演奏者的双手以及全身不与该乐器有任何接触。

在对新音乐探索的过程当中，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应当是最出色也是最著名的一位。凯奇对新音乐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几乎等同于杜尚之于当代艺术，他对音乐的概念性探索可谓前无古人。

凯奇的《4分33秒》对于音乐艺术的震撼程度，并不亚于杜尚那惊世骇俗的《泉》。《泉》是一件不需要去实地观看的作品，同样，《4分33秒》也是一部不需要真正去聆听的作品，其表演过程甚至可以称作行为艺术：演奏者拿着乐谱走上舞台，把谱子摊开、摆放好、坐下，在接下来的4分33秒里，演奏家会煞有介事地翻动乐谱，但不会弹奏任何一个音符。而现场观众的质疑声、咳嗽声等均成为《4分33秒》中的音乐元素。看似一个音也没有，但《4分33秒》却从概念上打开了音乐艺术的疆界，即“无声”。凯奇在这件作品中表达的理念是，组成音乐的不只有发声的音符，还有那些无声的沉默。在传统古典音乐，尤其是在古典音乐的演奏中，对于休止符即音乐停顿时刻的处理也是极其重要的。凯奇还试图通过《4分33秒》传达出音乐的本质不是演奏而是聆听，音乐有了欣赏者才有意义。

凯奇早先从事绘画创作，后放弃绘画转行作曲，并师从勋伯格。但勋伯格似乎并不看好凯奇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认为他对和声不敏锐，不具备成为优秀作曲家的潜质，似乎还曾劝说让他回去继续画画。也许确实是对和声没有强烈感受的缘故，凯奇把创作精力放在了对全新音响效果的开发上，发明了“预置钢琴”的演奏音乐形式。钢琴通过琴槌敲击琴弦造成振动而发

声，预置钢琴则是将各种事物置于琴弦上，如叉子、海绵、钉子等，这样再去弹奏钢琴所发出来的声音，其音响效果是新颖奇特的。（^[2]）

凯奇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进修时，对东方的禅学产生了兴趣，并在禅学“无形”“无相”理念的影响下，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机会音乐”，也被称为“偶然音乐”。传统音乐无论如何先锋，作品中要出现的音符都已在乐谱上被确定好，凯奇则是要打破音乐作品这一最基本的特性。因此，凯奇在音乐中不断探索随机性、不确定性以及完全出于自发自动的效果，而这些元素也成为其音乐最给人以惊喜的部分。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凯奇有很多古怪的做法，其中有不少被称为“骇人”也并不过分。例如，他曾要求钢琴家在演奏前，往钢琴里扔一条死鱼，因为死鱼压到哪根琴弦是随机的，如此弹奏出来的音乐也充满随机性。

在凯奇的乐谱中，也许会有一些标注，比如演奏到某处时，会请演奏者根据当时的情绪在琴键上乱按一番，完全即兴，没有任何来自乐谱的约束。这些随机的创作元素是约翰·凯奇对于音乐本质这一终极问题的探索。

梅西安、约翰·凯奇们做的事本质上是在音乐中加入从未在传统古典音乐中出现的音乐元素，是一种“加法”式的音乐。与之相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减法”式的音乐，即极简主义音乐。

极简主义音乐的特点可以与极简主义的造型艺术做平行比较。极简主义在造型艺术当中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需要展示基本的构成元素，比如贾德作品当中的单色长方体；第二，要有基本元素的重复，贾德的作品大多是长方体的纵向或横向排列。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极简主义音乐中也是必备的。但是，音乐和美术最大的区别在于，音乐是有时间轴的艺术，音乐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绘画艺术如果放进时间轴，就变成动画或者电影。作为有时间轴的艺术，音乐必须要有变化，否则就是单一波形的持续重复，这样的音乐几乎毫无意义，由此也引出了属于极简主义音乐的第三个特点：拥有极其细微的变化。

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是极简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格拉斯的代表作钢琴曲《疯狂的冲刺》（^[3]，X9），乐谱谱面极其简单，可以找出单个重复的小节作为构成音乐的基本元素，并不断地重复。如此一来，极简主义的头两个元素——基本元素和基本元素的重复就都具备了。在此基础上，每过若干重复的小节，就有一个音被换掉，这个音被换掉后，整体的听觉效果会产生显著的变化。

Mad Rush

Philip Glass

♩ = 120

p legato

(R.I.)

Repeat from A with Repeats

♩ = 130

f

rit.

X9↑

/

《疯狂的冲刺》（选段）

极简主义音乐的另外一位代表是著名的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亚当斯的极简主义音乐，仍然具备上述三个基本特点。但是在第三个特点，也就是拥有细微的变化这个特点上，与格拉斯不同，亚当斯并未选择音高上的变化，而是使用节奏上的变化。亚当斯的音乐，旋律感并不强，笔者甚至至今不记得亚当斯音乐中的任何一段旋律，然而印象深刻的却是其丰富的节奏变化。亚当斯的代表作有歌剧《尼克松在中国》。

极简主义的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其实并不简单，也并不会令听众觉得单调无聊，因为人类的听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传统的古典音乐假设人的听觉是静止的，所以音乐要不断地变化，才能给人传递变化的感情。但人的听觉与音乐变化的运动是相对的，哪怕音乐不变，人的感受也会随之变化。对于重复信息的接收，人的情绪与感受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重复元素的积累会在听觉情绪中产生变化，当这种变化趋于一个极端时，就需要有改变的元素出现。这时，需要变的元素实际是极少的，因为之前对于原有元素的强调，会让听觉对固定元素的重复无比熟悉，想要改变听觉感受，只需要极少的变化就可以。这就是极简主义音乐的听觉基础：听觉与音乐之间的变化关系是相对的。

由于听觉的相对性，极简主义音乐更适合用作电影配乐，比如格拉斯给电影《时时刻刻》创作的配乐就是标准的极简主义音乐。这背后的逻辑是，电影拥有丰富的剧情和对话，所以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观众的主观意识主要集中在画面、剧情和人物对话上。这时，对于音乐的理解只剩下纯粹的情感烘托，就好比用视觉余光观察到的视觉信息几乎永远都是单纯的色彩。极简主义音乐最大限度地去除了占据听觉主观认知的“信息”部分，只留下听觉上以被动形式就能接收的音乐情感部分。因此，从烘托剧情的角度来说，极简主义音乐无疑是高效无冗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极简主义音乐无疑成了电影音乐的良好选择。

[1] 《图伦加利拉交响曲》（*Turangalila-Symphonie*）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46—1948年交响曲

[2] 《图腾祖先》（*Totem Ancestor*）约翰·凯奇（John Cage）1942年预置钢琴作品

[3] 《疯狂的冲刺》（*Mad Rush*）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1989年钢琴独奏

尾声

著名艺术史学家、奥地利裔英国人贡布里希爵士曾在其著作《艺术的故事》中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关于艺术是什么，想用一句话做完整且精确的定义确实很难。但就笔者个人而言，艺术显然是存在的，艺术的定义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数学中存在如抛物线、双曲线、贝塞尔函数、勒让德函数等各种各样漂亮的函数。这些函数在数学上都拥有高度自洽的美感，可以用“ $y=f(x)$ ”的具体形式来表述。但现实并不如此美好，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必须采用数值解法，即无法用简洁、漂亮的方程来描述某个函数，只能“暴力”枚举，明确该函数在 x 取某个数值时， y 对应的数值是多少。用这组对应的 x 与 y 的关系也能定义函数，只是看上去再无上述解析函数漂亮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向定义”，虽然无法说出目标对象是什么，却可以通过描述目标对象所包含的特性，从而定义：包含了这些特性的对象就是所要定义的对象。

关于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可以尝试反向定义。首先总结几百年来不同时期的艺术都有哪些共性。此处将用“实用价值”“审美追求”“受众人群”“探究性”对不同时期的艺术进行归纳。

本书以十八章内容介绍了西方艺术跨越五百年的发展流变，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段：自文艺复兴开始直至莫奈为首的印象主义艺术，连同这段时间的古典音乐，归类为古典艺术；自塞尚、凡·高等人为首的后印象主义开始，到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达利等人达到高峰，直至二战后以波洛克、罗斯科等人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加上这段时间音乐界从奥地利的勋伯格开始，经历德国的欣德米特，俄国的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匈牙利的巴托克等作曲家，归类为现代艺术；二战后，由杜尚在20世纪初引发的现成品艺术，到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音乐界以约翰·凯奇为起点，直至今日的艺术，都被归为当代艺术。三段艺术时期并非泾渭分明，相互之间亦有交叠，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界限，这些分割并非全由艺术家主观创造，更多来自后人为研究所做的归类。

古典艺术毫无疑问是艺术的典范。直至今日，说起美术，大部分人心中第一反应依然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等；说起音乐，则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莫扎特的《魔笛》、比才的《卡门》。古典艺术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无数名画来

自教会及上层人士委托，教会需要借艺术教化信徒，上层人士则需要装点门楣歌功颂德，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典音乐是为宫廷服务的。古典艺术的审美观无疑是普遍的，追求的美感主要是唯美、正面、令人愉悦和感动的。古典艺术的受众几乎是“所有人”，哪怕并未受过任何艺术审美教育的人，也能轻易感受到西斯廷天顶画的壮丽与伟大，也能轻易听出莫扎特旋律的优美。因此，古典艺术的探究性并不显著，主要体现在技法的发展，而非对于艺术形式本身的创新以及对于艺术任务的思考。

随着教会、宫廷等象征封建、帝制时代的权力机构成为历史，学院化的积累以及摄影术的发明，艺术的实用需求被大大削弱，古典艺术的审美系统逐渐失效。到了现代，艺术的实用性已大致消失。因此，现代艺术不得不做出创新与系统性的改革。在审美观上，现代艺术的审美无疑超越了传统，或者说相较古典艺术的唯美审美观，现代艺术的审美观无疑拥有更广阔的疆界，达达主义这样破坏型、冒犯性的审美也被纳入现代艺术的审美范畴。现代艺术的受众不再是所有人，要欣赏现代艺术，观众必须拥有一定艺术教育背景和相当的知识水平。毕加索的追随者固然千千万万，但若拿着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给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夫看，恐怕不会得到好评。

相比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又多跨出了一大步，就好像科苏斯认为的：杜尚之后的艺术都是观念艺术。当代艺术几乎不再追求任何既定的审美，因为观念性最为重要，是否表达出与以往艺术不同的全新艺术认知才是核心。这也导致当代艺术中几乎一个艺术家就代表一个流派，只有第一个做出该观念的作品才具有最大艺术价值，后来者不乏有效颦之嫌。只有杜尚的《泉》才重要，后来者若是仿效，例如在洗脸盆上签名，就算不得艺术。当代艺术的受众比现代艺术更小，几乎只局限在所谓的“艺术圈”，即局限于艺术家、收藏家以及特定的“当代艺术爱好者”之中。当代艺术不用在审美上为公众负责，它的价值几乎全部集中在探究性上。

如此看来，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除都作画，都雕塑，都用音符作曲发出声响外，似乎并无太多共性。三段艺术虽然从技法和年代上一脉相承、逐步发展，但本质上并非同一件事物。在笔者看来，它们是三种不同的艺术，而这三种不同艺术的“祖师爷”都不一样：古典艺术的祖师爷是乔托，是“文艺复兴三杰”，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现代艺术的祖师爷是塞尚、凡·高、高更，是勋伯格；当代艺术的祖师爷则是杜尚，是约翰·凯奇。

现今当代艺术当道，那古典艺术就是过去式，不再发展，已然死去了吗？并非如此。虽然当代艺术家不再以古典艺术家的手法和技巧作画、雕塑、创作交响曲，但古典艺术的审美和创作理念并未消失。古典艺术的审美方式和创作技巧仍旧活跃在当代电影和摄影之中。作为文化产业的主流，电

影无疑是极具实用性的。从审美上，卖座的好电影无疑是符合人类普遍审美价值的，是令人愉悦动容的。商业电影的受众也无疑是“所有人”，毫无电影专业知识的人也会觉得《泰坦尼克号》拍得好。大部分电影的探索性也并不太强。当然，在电影和摄影艺术中也存在探索性的、概念性的艺术形式。当代艺术中，影像艺术、摄影艺术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艺术还有更多表现形式，如装置艺术及前文提到的行为艺术等。全新创作媒介的发明必然伴随着新艺术形式的诞生。

由此看来，贡布里希的观点似乎还是对的。不同时期的艺术表现在前述四个参数数值配比之间的差异，很难说出它们之间除创作媒介以外的共性，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面对不同的艺术，采用不同的“反向定义”。

不管艺术是什么，唯独一点不用怀疑：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生活中都不能少了艺术。无论物质条件多落后，人类都需要艺术，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依据，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有力证明。近两万年前的原始人过着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日子，尚且要在洞穴中创作壁画，何况已被艺术滋养过2000多年的现代人？艺术本就是语言。即便无法用文字定义形容也无须沮丧，因为艺术就是艺术。毕加索说过：“若能用语言表达，为何还要进行艺术创作？”尼采也曾说：“语言尽头，音乐响起。”艺术当然是存在的，它如此真实地透过一代代天才大师的手笔将人类的“生存”变为真正的“生活”。

艺术，是奔向心灵自由的真正方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 / 严伯钧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4

ISBN 978-7-5217-2733-3

I. ①对... II. ①严... III. ①艺术史 - 西方国家 - 青少年读物 IV. ①

J1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019211号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 年

著者：严伯钧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 mm×1092 mm 1/16

印张：36.25

字数：660 千字

版次：2021 年4 月第1 版

印次：2021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733-3

定价：1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美

古典生活文化研究者

孟晖

重现东方女性
美学智慧

精选百张
珍贵文物图片

动脉影

著名文博摄影师

美，不仅来自精致的五官与倩丽的形体，
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
风仪、韵致、氛围。



孟晖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图

美人图

孟晖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斗妍

因风散花与蜂蝶相随的对决

莺莺与环佩

宫斗催生留仙裙

镂花高底 步步生莲

情寄

玉连环，情未已

彩笺芳翰两情深

胭脂泪，寄深情

灯花眉黛付多情

美人香气帝王思

误把荷包当香囊，让谁羞愧？

顾太清与香串

佳节

闹蛾灯球映上元

吴月娘的元宵节

宋时端午的珠符袋

醒骨纱与芙蓉布

七夕赛巧斗穿针

素馨花艇渡七夕

红妆

辞岁小葫芦 迎新梅花妆

韶光悄随玉步摇

同心结

莫琼树与蝉鬓

武则天与行障

风流无尽香山子

贵妃出浴的盛唐气象

服饰

衣带也风情

太妃的帷帽

裙底的鸳鸯鞋

见证盛世的异域宝石

珠络的华衣

飞燕的金衣

波希米亚风的钗黛

宝钗的项圈

昭君套

杜十娘的便携保险箱

起居

花光芳脆

宋惠莲的烧猪头

朝姝与琉璃屏风

洛神与金带枕

虎皮壁幔与黑貂暖帐

东渡的行障

幻影魔术的酒杯

雅趣

巾带题诗赞美人

暖翠楼上的盒子会

叶笺寄情思

东太后的留影

煮香与煎香

从琉璃行殿到水晶宫

斗
妍



因风散花与蜂蝶相随的对决

最近有缘第二次游览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对奥斯曼苏丹的后宫也就生了些兴趣，于是在网友的推荐下，看了筱原千绘正在创作中的《梦之雫黄金的鸟笼》。这部漫画取材大胆，以著名历史人物苏莱曼大帝、许蕾姆苏丹及权相易卜拉欣帕夏为主要角色，还给他们虚构了复杂的三角关系。

目前，《梦之雫黄金的鸟笼》开篇未久，在讲述许蕾姆苏丹进入后宫之初的遭遇。作为一名来自乌克兰乡村的美丽女奴，她身陷残酷的后宫竞争当中，必须设法脱颖而出，获得苏莱曼的宠爱来保证生命安全，实现人生梦想。不过筱原千绘好像也没有替许蕾姆苏丹想出什么高招，无非让她擅长吟诵经典诗篇，热爱学习，关心天下事，善于察言观色，懂得退步抽身。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笔下倒是记录了不少美女们试图在同性竞争中胜出的招数，那可是缤纷变化，既有设计上的创造性，又有艺术上的想象力，还异常大胆。不管实效如何，反正在纸面上读着让人觉得特有美感，特富灵气，要啧啧叹赏不已。

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有一则“袖里春”，就是讲述往时的美女如何在春游时节让自己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元（玄）宗为太子时，爱妾号鸾儿，多从中贵董逍遥微行，以轻罗造梨花散蕊，裹以月麟香，号‘袖里春’，所至暗遗之。”据这则故事，当唐玄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宠爱过一位叫鸾儿的侍妾。这位鸾儿居然自己设计了一个化身散花天女的戏码：

每年入春时分，这位太子的宠妾都会带着婢子们一起把丝织

的轻薄白罗剪成片片细小花瓣，再攒粘成一朵又一朵的象生梨花，然后，将这些罗梨花放置在大容器内，花底埋入一个纱囊，纱囊内满裹一种名叫“月鳞香”的名贵香料。容器经密封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内里的象生花便浓熏上了月鳞香的芳气。

待到春花遍野、长安人倾城外出踏青的日子，鸾儿便特意改换成民间富家女子的装扮，然后将一些熏香的罗梨花盛藏在宽大的袖管内，只由一名叫董逍遥的太监陪伴，隐去皇室内人的身份，悄然出行，混在赏花的人群中。与众不同的是，但逢佳景盛处，或遇微风起时，她都会悄悄地让几朵罗梨花由袖管内飘坠，杂沓在天然的落花之间，于是，长安的春光里，竟有一位缓步陌上的美人随时洒落芳香的蕊朵，倒仿佛哪棵梨树幻化成了女仙，参与到尘世凡人的游乐中。



清 沙韻 《梨花仕女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此图由作者提供。全书图片如无特别说明，均由作者提供，以下不再另

这些无声飘零的人造花朵零落在地，若有人出于好奇而捡起，就会发现它们散发着浓鲜的、迥异于普通花香的香气。因为是轻罗制成，所以即使收贮起来久久放置，也不会枯萎，而是在珍藏者的怀里袖里、枕内盒底，始终盛放，幽麝徘徊。

鸾儿还给自己袖内藏花、随行随撒的做法起了个极其诗意的名字——“袖里春”，意思是她的双袖里就酝酿着一分春光。《云仙杂记》并没有说明，鸾儿如此处心积虑地上演这般游春散花的戏码，其意图何在。然而也不难推测，想来，她是让自己具有一个仙气飘飘的形象，编织魅力的神话，通过在公众空间中营造的轰动效果，提升在同侪当中的竞争优势，让太子充分意识到她的与众不同。

在我们的印象中，传统女性都是羞涩的，谦退的，内敛的，不敢竞争，不敢表现自己。其实，文献中呈现的她们往往并非如此，为了争取一方生存空间，为了在残酷的社会淘汰中获得优势地位，其中一部分勇敢者在搏出位时表现出惊人的胆量，以及超凡的能力。

竞争场中的一个流行策略，是自我赋予某种超乎寻常的特质，由此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具体手法或简单或复杂，但都看得出智商在其中闪烁的火花。据说唐代权相元载有一位叫薛瑶英的宠姬，“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杜阳杂编》），她非常细心地让自己的身体特别是皮肤永远飘散着香气，同时编造了一个说法，说她母亲从小就拿香料喂她吃，她因为一直吃香料，因此身体内涵藏了香素，自然就能散发香气。世上的女人都只能借助熏衣、佩香囊、抹头油一类方法，才能带上香气，但她薛瑶英不同，她的身体就是香的，是人间奇物，不二

珍品！

到了宋代，《类说·遁斋闲览》曾记载一位慧黠美妓的轶事，她把薛瑶英的计策发展了一步，融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佛教信仰，替自己加分：

欧公知颍州，有官妓卢媚儿，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为尼，诵法华经二十年。一念之误，乃至于此。”公后问妓：“曾读《法华经》否？”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经示之，一览辄诵，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经，则不能也。

按宋人笔记中的说法，欧阳修做颍州太守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官妓卢媚儿，这位卢媚儿也许是很不怕辛苦地永远在口中含着带有莲花香气的香丸，也许是设法调配了一种能散发莲花香气的唇膏（当时叫“口脂”），总之，她持续不断地由双唇间轻溢莲花特有的芬芳。

精彩的是，媚儿还连带着构思出一整套感人的情节。她暗中约请一位蜀地来的僧人，在某个场合假装第一次见到她，并让这位蜀僧装作拥有能观测前世的高深智慧，对着众人感叹说：“这个女子呀，上辈子曾经是个尼姑，整整二十年不停念诵《法华经》。可惜偶尔犯了一念之差，没想到此一世竟然沦落到做妓女的地步！”消息传开以后，连欧阳修都感到好奇，问媚儿：“你读过《法华经》吗？”媚儿一派单纯地回答：“不幸沦陷在这样堕落的生涯里，哪有工夫顾上这个！”欧阳修就让人把《法华经》取来展示给她看。令人惊叹的是，卢媚儿看了一遍之后，居然立刻一字不差地把整卷经背诵了出来，仿佛从来就刻印在记忆里一样。于是欧阳修又让她看其他佛经，结果她就完全不认识了。这

下可算是坐实了蜀僧为她下的断语，随之，卢媚儿因为前生长诵《法华经》所以今生口内永远散发莲花香的说法不胫而走，轰动一时。

卢媚儿自抬身价的本领显然段位很高，两段关键情节都非常出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内涵的道德训诫则让佛教盛行时代的善男信女们伤感、叹息，不由自主对媚儿另眼相看，产生爱慕甚至敬畏之情。

她编造了一个关于自己身世的神话，层层递进的情节发展简直就像文学创作一样，然而，这还不算段位最高的创意。更加激情迸发、才华横溢的艺术创作，是化身成忽然降临的仙女，在人间上演一个神秘而绚烂的片段，再抽身消失。像鸾儿那样，利用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有限机会，光芒四射地登场，营造一个专属个人的、随身行走的、动态生动的美丽场景。将自己的形影直接塑造成一首久吟不绝的诗或一幅连绵展开的画卷，就是古代那些秀慧女子经常用的竞争手法。



清 吴友如 《百美图》之“媚儿”

《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则“蜂蝶相随”的轶事，一位叫楚莲香的名妓所制造的效果，相比鸾儿，还更为神奇：“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每次她外出，因为身上散发的香气非常独特，特别吸引蜜蜂、蝴蝶，因此总会有蝴蝶、蜜蜂一路追随着她。即使安坐下来，这些追来的蜂蝶也还是会绕着她翩飞，或者落在她的钗头、身上，栖息到她身旁的器物几案乃至花丛树枝间。推测起来，楚莲香或许是在发髻或者衣饰上的某处抹了蜂蜜，也可能是调制了某种针对蜂蝶独具诱惑力的香品，暗藏在华服内，所以造成了蜂儿蝶儿像眷恋花朵一样绕着她上下飞舞的美妙奇迹。明代香谱《香乘》中就记载有一款“蝴蝶香”，其妙处在

于“春月花圃间焚之，蝴蝶自至”。春天在花园内焚这种香，便能招来蝴蝶。莲香大概就是用了类似的合香妙品吧。

如果说鸾儿等人的手段算出奇，那么另一位叫丽娟的前辈则属于搞怪。《洞冥记》里写道，丽娟在尚为十四岁的少女时就博得了汉武帝宠爱，她居然把由琥珀制成的成串佩饰悄悄挂在衣裙的内里，让这些佩饰在自己举止行动之间发出清悦的轻响，却告诉大家说，这是她身上骨节的响声。看来丽娟是“骨感美”的先锋，而且把这个概念推向了极致。编造这类奇怪的说法，无非是强调自己“仙姿玉质”，值得珍惜。暗含的台词则是，其他女子虽然也有姿色，但只是平凡的世俗之躯，一个趣味高级的男子，应该是不会舍弃仙姿玉质而青睐俗物的。



清 改琦 《仕女册》之『莲香出游图』



清 吴友如《百美图》之『丽娟』

这位声称身上骨节能发出玉声一般轻响的丽娟，还搞出一则近似于神怪巫术的事迹。她曾经在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当时殿庭前树上枝头的花朵居然在歌声中纷纷飘落。也许只是巧合，当丽娟唱歌的时候，正好有一阵轻风拂过殿庭，吹落了枝头的众多芳蕊，但不管怎样，这个小小的事件被她大肆渲染，变成此位美人歌声神妙无比的明证——她的歌声竟能让大自然都被感动，让枝头的繁花都因歌声而情不自禁地荡漾起来，飘飞不已。

古书记载的这些美人斗胜事迹，究竟实效如何，有多少夸张的水分，诚然很难评价。不过，在今日的文艺作品中，把这些记

载重新演绎一番并不难，而且一则又一则的美丽情节实在动人，想必女性观众会看得开心。设想在一出古装电视剧里，安排一场后宫齐出游春的大戏，众妃嫔纷纷借机创作各自的精品形象，一位在袖里兜了熏香的罗绢假蕊，逢到轻风拂过时便悄然散花；一位则在手腕下暗暗垂了只银香囊，囊内焚着专招蝴蝶的香品，惹得蝴蝶翩翩飞来，盘绕不离，甚至悄然落在簪头；一位则让宫女太监事先摘下许多零碎花瓣，再小心地一片一片放置到树上的花朵里、叶簇间，当她在花林前表演舞蹈的时候，甩出长袖轻拂树梢，便带动许多的花瓣从树上飘落。

这样的情节，应该比简单的善于吟唱、好学、知进退，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动作性，更悦人眼目。只要今日的作家编剧敢于发挥与再造，那么如此的斗法可以发生在中国的历代宫廷，也可以照搬到土耳其苏丹的后宫，或者其他时空。不管发生在哪里，都会因衬有残酷底色的美感而撩人心弦。

莺莺与环佩

《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的初次邂逅是非常匆促的过程，根本没有机会搭话，甚至无法凑近。一对青年男女只是彼此短短打了个照面，兰心蕙质、闺秀风范的莺莺便按照当时礼制的要求，带着红娘一起转身离去。不过，玉人虽然走了，但张生有那么片刻依然能够清晰感受到她的存在，甚至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她的魅力，因为“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

有意思的是，在后续的情节中，莺莺听到张生隔墙传来的琴声，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通过这几句唱词，往昔中国女性的形象显得既遥远模糊，又清楚无比：她发髻上的花翘轻颤不已，簪钗的端头垂下玲珑坠饰，随着耳环一起轻摇，并连同手镯、挂佩一起发出悦耳的轻响，幽馥的香气从她的周身轻轻飘散。

在她也许还隔着一道珠帘，也许还在回廊转角的那一侧之时，你已蓦然闻到了不知从何而来的暗香，听到独特的、别无一致的金玉饰物的和声。然后她出现了，眉如远山，双鬓似蝉翼一样轻透，一身衣裙也许是锦绣绚烂，也许是轻纱薄罗，但头上花翘微颤，流苏晃荡，配着同样悄荡不已的长佩、裙带、飘带、锦帕、荷包……让你觉得似乎目光难以聚焦，觉得眼前人像云中仙影一样变幻不定。然后她过去了，在身后留下悠长的、久久不肯彻底消失的香气的余韵，还有渐渐远去的佩声，每一声都在牵引着你的灵魂，召唤你追随而去。你还在惊艳中没有回过神，却又看到，她行经的地面上留下了两行白色的莲花纹——从她鞋底漏下的香粉印就的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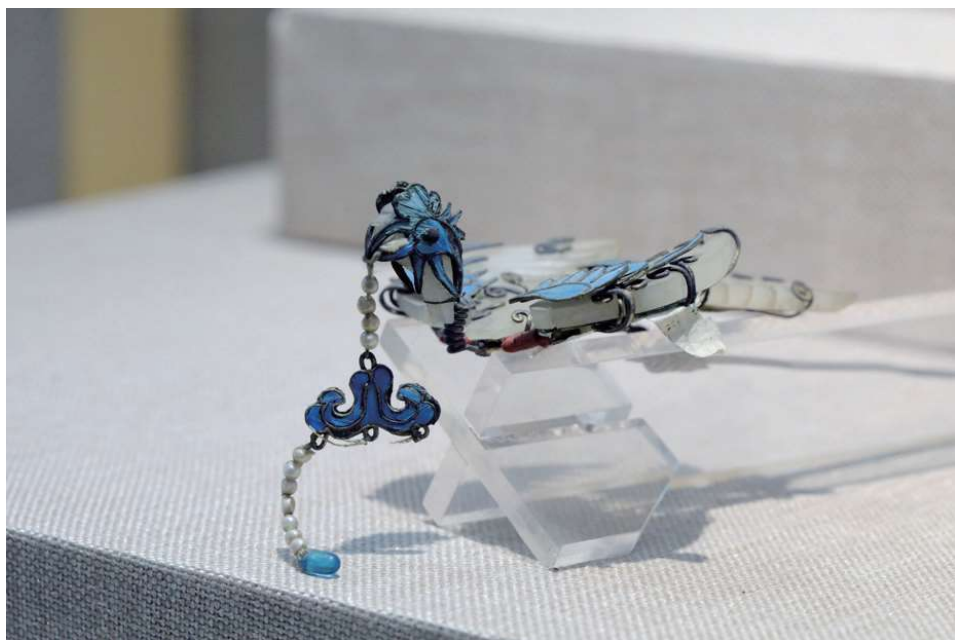


元 青花西厢记梅瓶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古代的中国女性深深领悟，美，以及魅力，不仅来自精致的

五官与倩丽的形体，不仅借助巧妙的化妆与华美的衣裙，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风仪、韵致、氛围，换用今天流行的概念说就是——气场。韵致，气场，又如何能够形成？古代女性的要旨是，通过暗示，通过施加给视觉、嗅觉、听觉的感受，在旁人的心理上熏洏印记。

按礼教规矩，女性必须安静端庄，不能轻言妄动。也许正是为了克服由此造成的呆板形象，传统女子的遍身上下偏偏要点缀种种轻易就会颤晃的饰物，比如称为“翘”或“颤”的花钗，将天然的或者由珠宝绢罗制成的花朵、凤雀、蜂蝶缀在弹簧式的金属丝上，高挺在髻畔，随时凌空颤动；步摇则是在钗头挂有珠宝的穗子，伴着行步而荡来荡去。此外，襟前、裙侧都可以垂挂长长的金银珠玉的长佩。有了这样的饰物，女性便宛然如一束挺立的花枝，任何一丝微风的轻拂都会引发花叶的摇曳，从视觉上，让旁人感知她的敏感、纤秀、轻盈。



清 簪子
山西民俗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白玉花形金簪
首都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点翠宝石簪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明 玉禁步
蕪春县博物馆藏藏
(摄影：动脉影)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尤其重视利用听觉来制造“气质”，调动悦耳的声音来赋予魅力，所以自先秦时代起，无论男女都流行在身上吊挂用玉牌与珠子穿成的长串玉佩。女性更是特别用心以佩声来塑造与众不同的印象，甚至有传说讲述，汉武帝宠幸的美人之一丽娟将琥珀雕就的佩饰悄悄系挂在衣裙之内，却哄骗大家说，雕佩相击的玎铮乃是她体内骨节发出的声音，以此为自己制造神秘色彩。

为了营造特别的、足以与他人区别的音响，女性身上的声源是多样的，钗头、鞋帮、裙带、飘带都可以系吊铃铛、步摇、耳环、长佩上则是金叶或玉片互碰形成的玎玲，甚至鞋跟里也可以安放小铃球。于是，“环佩叮当”变成了中国传统女性予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以致在古典文学中“环佩”本身也可以作为女性的代指。

香气也是营造幽雅、迷人、具有个性特征的氛围的经典手段。中国女性尽管也熟悉并利用香水，但远不止于这一种方法。一如声音的营造一样，女性身上的香源也是多重的，由此塑造出重重叠叠的、互相添加的、复合型的香氛。衣裙要在熏笼上熏香，作为内衣的抹胸则可以于夹层中暗藏沉檀香粉或者排草、干玫瑰花瓣。此外，香囊亦是必不可少的细节，系在裙边或内衣襟上，也常常掖在袖内。很重要的是，每一样化妆品也都添加有香料，包括头油、面脂、画眉墨、胭脂粉、白色妆粉、口脂（口红）、润手膏等。于是，对古代男性来说，最魅惑的体验之一，就是当女性依偎过来窃窃私语的时候，她唇上口红的独特香气也会随着话语一起发动暗袭——“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韦庄《江城子·一名水晶帘》）

审美，是一种心理感受，对此，传统女性也许不会进行长篇

大论的剖析与思辨，却在实践中最精妙地把握其要旨。在她们那里，“女性美”的营造是声光形色的综合效果，甚至衣饰上金线银线的闪光、不同织物质地的彼此映衬，也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细节。因此，她们的美，不仅被看到，也被嗅到，被听到，是——被所有的感觉器官一起感知到。是让他人不得不动调各种感官来接受她美的信号，从而在心理上，在意识中，将她的美确立为事实，确立为强烈而浓郁、无法退却的刻痕般的记忆。

宫斗催生留仙裙

古人有种说法，褶裥裙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是一场险恶宫斗的意外副产品。

赵飞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人之一。但她还有个妹妹赵合德，在她们同时代人的看法里，这个妹妹在容貌风采上要比姐姐更为动人，在后宫的境遇也比姐姐更为成功。虽然是亲生姐妹，两人的体态风韵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飞燕以纤柔轻盈取胜，合德以丰满莹润醉人。另外，据说合德相比飞燕在智商与情商上都更胜一筹，因此，二人之间既是瘦美人与胖美人的对决，也是强势与柔缓、咄咄逼人与心计深藏两种不同做人格式的周旋。

姐姐飞燕先得到汉成帝宠信，立为皇后，合德则是借阿姊之缘，比飞燕晚一步获蒙圣宠，封为昭仪。从进宫开始，这一对姐妹花就联手结盟，排斥异己，终于将整个后宫掌握在她们手中。但是，实际上，飞燕做了皇后之后，皇帝便逐渐对她失去兴趣，却被赵昭仪迷得神魂颠倒，于是妹妹恩渥日隆。两位真实历史人物颇具传奇色彩的沉浮吸引着历代文人，在小说家的笔下，两姐妹不仅唇齿相依、彼此利用、互相回护，同时，她们钩心斗角的一面也得到细细描绘，二人极为独特的、弥漫情感与欲望的纠结关系几乎成了故事的主题。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堪称《赵飞燕外传》，据说其作者为汉代人伶玄，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这部文言作品真是惊人古老的一部“宫斗”小说！

然而，必须承认，《赵飞燕外传》大致应该是唐人作品，即

便如此，这篇揭示人性幽微的奇特小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文中对飞燕与合德两姐妹的性格、气质以及智力类型都有丰富的演绎，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觉过时。两个人都很有心计，但心计的路数截然不同。赵飞燕被塑造成完全负面的形象，强硬、急躁、心胸狭隘、嫉妒心与控制欲旺盛。但是她也有自己的机灵，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一个宛如仙境的曼妙场景里，飞燕对汉成帝施展人格操控，试图挽回败势，便是小说中光彩照人的情节之一：

一次，赵合德用豪华大船将汉成帝与赵飞燕一起接到太液池中的瀛洲岛上，三人一起带着宫人们登上高四十尺的台榭，消遣时光。赵飞燕以腰细、身轻著称，当日她身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外罩碧琼轻绡的薄衫，以台顶的露天空场为舞台，一边唱着歌一边翩翩起舞，接连表演《归风》《送远》二曲。这时，忽然一阵狂风刮过。高台空阔，让风力变得格外强劲，竟将她的长裙倏地扬起，蓬张在她的腰周围，使得她像是由一张风帆兜起，又宛如经一片羽翅托住。此刻，赵飞燕一路歌舞，恰好转到高台边缘，与汉成帝等看客有一定距离，这给她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位美女立刻启动表演人格，先是假装惊慌地叫道：“快看我，快看我！”——意思是狂风要把我刮走啦。等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后，她便舒展开双臂，将轻纱广袖高高扬起，摆出乘风欲飞的姿态，高声感叹：“让我成仙吧！我马上要成仙了！”接着，抒发情怀时还不忘含沙射影：“啊啊，舍弃旧日的眷恋，迎接新的欢乐！何不就此将心中一切羁绊全都忘掉！”



明 仇英 《人物故事图册》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这一幕当然让包括汉成帝在内的所有人大惊。当时只有为赵飞燕伴奏的乐工冯无方跟随在她附近，于是汉成帝急忙命令冯无方去拉住她的裙子。冯无方越是拉扯，赵飞燕就越是做出一副要驾风而去的决绝姿态，二人相持了好一会儿，以致那云英裙都揉出了褶皱。

待到风停了，赵飞燕才缓和下来，又立刻转换成委屈悲伤的态度，扑到汉成帝面前啼哭：“多谢陛下赐恩，让我想要化成飞仙离开的心愿没有实现！”说着嘴里且歌且吟，唱着无词之歌，一边泪流不止。此际，汉成帝被彻底打动了，他因将宠眷转移到合德身上而感到愧疚，猛然间爱恋之意重燃，当晚便临幸皇后宫中。



汉 舞蹈俑
徐州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分析起来，赵飞燕口口声声要化仙飞去，大概只是一次机智的、姿态优美的自杀威胁。也许是临时来的灵感，也许早就在心里伏了想法，当一阵大风袭来的时候，她非常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迎风角度，张开手臂，让长裙与纱衣、广袖都在风中舒展成很优美的形态，整个人的身影望去如随时会飞走的仙女一般，就这样声声喊着：“让狂风把我带走吧！让我化成神仙离开这个世界吧！”动人地、雅致地，威胁要从高台顶上跳下去。冯无方上来拉住她时的相持不下、事后一边低吟着歌调一边哭泣，大概也都是精致的、艺术水平很高的表演。

这一招的效果非常明显，不仅当即激发了汉成帝的怜意，而且让赵飞燕在宫中具有了神话色彩。她制造了这样一个说法：若不是皇帝不肯放弃她，对她隆恩优渥，那么她那一天就会驾着风，以衣裙为羽翼，化成女仙，飞向天边，摆脱尘世的羁绊了。

对于宫中的女性们来说，在意的是她能出奇制胜，凭一个大招就挽回皇帝的恩宠。于是，彼时的汉宫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时尚：凡是刚刚经皇帝临幸、沐浴过天恩的妃嫔、宫女，都要做一条长裙，在裙上打满褶裥，模仿赵飞燕在瀛洲高榭上长裙被揉皱的样子，号称“留仙裙”。这些在竞争场上身不由己的女子们希望由此借得赵飞燕的灵气和运气，让帝王对自己的垂顾也能持久。

在古人的思路中，褶裥就是这样出现在女裙上，从此，世世代代的中国女性都把褶裥裙作为最基本也最喜欢的一种裙式。史实是否真的如此？很难证明。无论中外，习惯思维都有一种定式，把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文化成就归属到某个具体的名人身上。其实，这些成就往往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一点点获得，其萌芽与最终瓜熟蒂落的时刻，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没有留下明确印记。

在新疆出土的东汉魏晋时代服饰中，确实有长裙饰以整齐的褶裥，一些长袍也在腰部打折，裙、袍边缘的荷叶边更是做出密集的细折，是标准的千折边。相比之下，考古发现的西汉时代服饰中，至今尚未发现褶裥的影迹。所以，就中国传统服饰来说，很可能是在东汉时代形成了褶裥裙式。但，也许是因为赵飞燕作为知名美女特别有吸引力。人们把在服饰上打折的做法与这个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赵飞燕外传》的情节在宋代一度广为士大夫文人熟知，如宋人乐史所著《杨太真外传》中提到“汉成帝获赵飞燕，身轻欲不胜风”，还编排道，唐玄宗拿这个典故与丰腴的杨贵妃开玩笑说：“如果是你，多大风也吹不走！”宋代词人张炎《绿意》一词咏亭亭碧荷的高洁，便以赵飞燕被风吹起的裙裾形容卓立水面的荷叶：“回首当年汉舞，怕飞去、谩皱留仙裙折。”很自然的，这个既美感又生动的情节激发了想象的涟漪。

至于褶裥裙，则自东汉以来成了中国传统女裙的基本样式，几乎每一条裙子都打折为饰。宋代词人蒋捷《小重山》词描写少女在春日里一起玩“斗草”游戏，便是：“银红裙裥皱宫纱。风前坐，闲斗郁金香。”女孩子们一起坐在草地上，以采来的花草展开比赛。此刻尚是暮春时节，所以她们身上的粉红褶裥纱裙是一件罩裙，围系在绫锦裙或彩裤之外，形成里外两重衣色的互相映衬。



南宋 褐色罗印花裙
福建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传统褶裥裙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晚期流行的“鱼鳞百褶裙”，这种裙的表面打满细折，相邻的细折则会用丝线有规律地隔一段就钉连在一起。这样，穿裙人一旦行动起来，彼此钉连的细折就会形成水波一样的曲纹，看着也颇像层层鱼鳞，由此而得到其独特的名称。

至于穿裙人的人生故事，也如褶裥裙一样，一代一代，既有变化，也有重复。



清 红暗花罗彩绣镶带侧褶裙
清华艺术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镂花高底 步步生莲

你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有鲜花随之盛开——我们愿意想象，世界上就是有如此美丽的人，她（或他）的美强大到足以唤醒大自然的热情，以至步履所落之处，立刻有花朵破土而出，迎风绽放。

这种天神般的美丽形象，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印度佛经故事《鹿女夫人缘》中。鹿女是由母鹿所生的美丽少女，她每走一步，地上就会出现一朵盛放的莲花。一次，她向一位隐居山林深处的苦修僧借火，僧人见到这陌生女孩的特异“足迹”十分惊讶，就请她先围着自己的居舍绕行七圈，然后再入庐取火，并在离去时同样绕舍转行七圈。不久后，一位国王打猎路过此地，发现这位苦修僧的草庐居然被十四重莲花包围在当中，非常惊讶。向僧人问清事情原委之后，国王便顺着一路逶迤的莲花形成的路径寻踪深林，最终找到美丽的鹿女，将她娶为王妃。

这则故事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传统文化里激起了活跃的反响。一个非常有名的效仿事件是，南北朝时，南齐昏君萧宝卷命令工匠把金箔凿刻成莲花的形状，一片一片地粘贴在宫殿、宫道的地面上，然后让最宠爱的妃子潘玉儿在这些金色莲花上行走，用萧宝卷的话说就是：“此步步生莲花也。”



敦煌莫高窟138窟晚唐壁画局部，鹿女“步步生莲”开出的一路莲花。



清 冷枚 《十宫词图》之一

萧宝卷的做法不仅奢侈靡费，而且也缺乏诗意。从记载来看，直到明代晚期，中国女性才终于发明出妙法，让花朵的形象随着自己的行步一一显现。清初人余怀《妇人鞋袜考》中就谈道：

至于高底之制，前古未闻，于今独绝。吴下妇人以异香为底，围以精绫者。有凿花玲珑，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则服妖。宋元以来，诗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赋香奁、咏玉台者。

如今的人都知道，明清时代，女人缠足。但是，很少人注意，那时女人的一双缠足还要穿高跟鞋，当时的习惯称之为“高底鞋”。

当然，高跟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更早的年代。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湿热多雨，上层社会的人们接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流行穿“屐”。所谓“屐”，就如今日木屐一般，在鞋底前后安装一对齿跟。不过，在那个历史时期，贵族所穿之屐，有些如今日的人字拖鞋，但也有一些实际采用鞋的形制，只是下面装有木或金属的齿跟而已。当时的上层社会标榜举止舒缓，认为从容不迫乃是优雅风度的表现，于是便出现了齿跟超高的屐子。例如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夫妇墓出土的一对木屐，屐长25厘米，齿跟高达6厘米。

此外，唐代有重台履，据推测也是一种高跟鞋，大约接近清代旗女所穿的“花盆底”“马蹄底”，使整个鞋底增高，由此让身形更显高挑颀长。

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女性穿高跟鞋变成了普遍、持久的风气，一直沿袭到清末、民国缠足陋习被逐渐废弃，这种传统特色的高跟鞋——“高底鞋”才渐渐消失。从今日所能见到的明代出土女鞋实物来看，高跟曾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如江西南城益宣王妃孙氏墓出土之绣鞋，在整个鞋底下面加装一层厚底；另一种则如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皇后绣鞋，高跟的样式大致如一枚象棋子，在设计上与今天的高跟鞋一样，被纳装在鞋底的后部。

定陵出土的明代皇后绣鞋中也有平跟鞋，但高底鞋有十双之多，在比例上远超于平底鞋，从中可见当时的流行风气。鞋的通长只有12厘米，鞋跟却高达4.5厘米，人穿上这样的鞋，那情形也正如今天女性穿高跟鞋的效果——只有脚趾部分能够实在地落到地面上。据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如此的措施可以让缠足显得更加纤小，因而也就显得更美。

到了清代，鞋形得到进一步发展，鞋的底面被制成微微弯拱的弧面，侧看如同跨越河道的拱桥，称为“过桥”，也叫“弓底”。依当时的观念，头儿尖尖的弓底鞋，就像一弯新月，或者一枚莲瓣，简直就是优美的极致。鞋跟的造型也倍用心思，雕制成底面呈杏叶、莲子、荷花等形状的玲珑花柱。至于制作高跟的材料，定陵女鞋“为多层草板纸相叠，用合股丝线缝在一起，外包红素缎”，此外还有毡跟、木跟，而以木跟最为常用。



清 蓝缎彩绣暗八仙钉珠马蹄底鞋

恰恰是利用鞋上的高跟，明清时代的女性创出了许多新鲜花样。比如，把高跟掏空，在其底面和侧面都做出镂空花纹，然后，在这鞋跟里安一个小抽屉，放上香料，让香气从鞋跟的镂空花纹中向外发散。还有人在掏空的鞋跟里放个小铜铃，人一走动，脚下就叮铃铃地不断轻响。

最大胆的做法是，把高跟制成中空的形式，安个活动小抽屉，并且鞋跟的底面与屉底雕出一致的镂空花纹，再将一只装满白色香粉的绢囊置于屉内。女性穿上这样的鞋，一旦走动起来，就会有香粉从鞋底的镂花中点点泄落，让她每走一步，都在地上印出一个莲花或兰花的完整图案。于是乎，环佩声远，这粉印的花纹却淡香依依，宣告着她的曾经到来与离去。

“步步生莲花”，原本只是可以想象却无法实现的神话，但是，明清女性借助高跟，却把想象变成了现实。清代江南文人顾璠《竹枝词》中，姑苏女子到佛寺进香的场景便是：“长廊转处笑相迎，朵朵兰花履印轻。”何以如此？作者注云：“高底鞋刻空，入以胡粉（即化妆用的白粉），一步一兰花也。”另一文人周文燝《闺中竹枝词》也有句云：“镂花高底步莲生。”可见，在明清的日常生活中，一位女性在身后留下一串香气依约的花朵形脚印，竟是并不罕见的景象。

这种“生花”鞋最初出现在明末的江南地区，不过，清代满族贵族妇女当中也有人效仿。满族女性的“旗鞋”要装“三寸半底儿”，也就是花盆底、马蹄底的高跟，于是，这花盆底、马蹄底里正好安设洒香粉的机关。徐珂《清稗类钞》中就录有一则逸事：乾隆皇帝选秀女的时候，“忽见地上现粉印，若莲花”，原来

是有一位参选女子“雕鞋底做莲花形，中实以粉，故使地上莲花随步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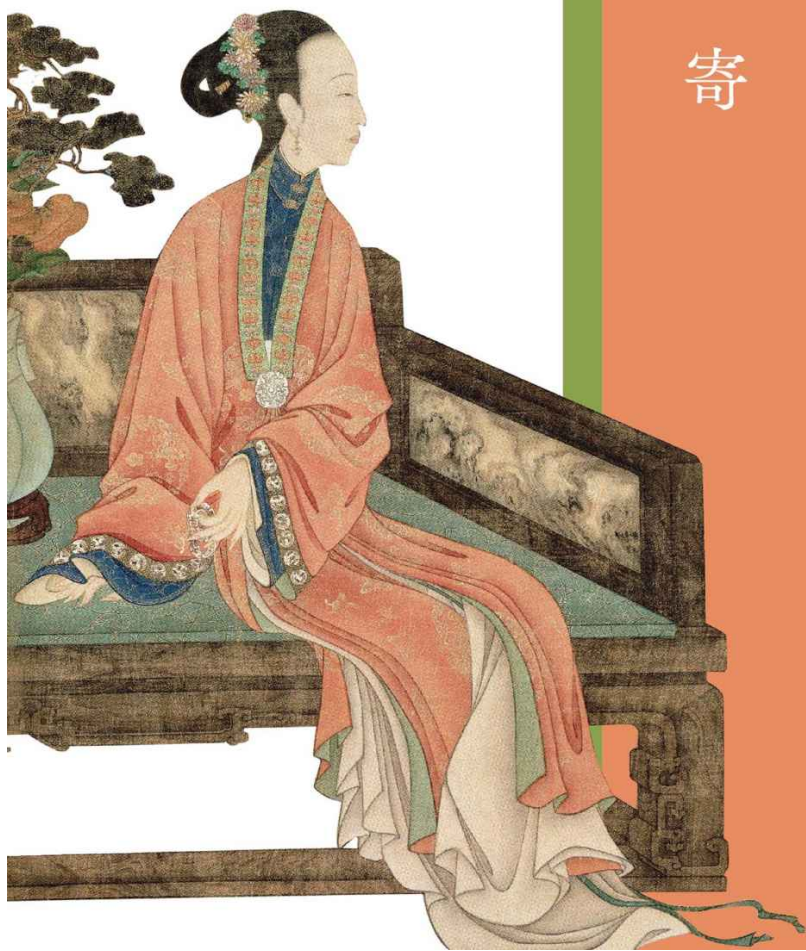
因此，并不让人惊讶的是，纳兰性德在词作中两次提到“屐粉”，也就是鞋跟中香粉留下的花痕。其中一首《虞美人》如此吟道：

银床淅沥青梧老，屐粉秋蛩扫。采香行处蹙连钱，拾得翠翘何恨不能言！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女子行经之处留下了成串的香花足印，并且，在那足印上还叠落有她的一支翠钿头花。翠花是无意间掉下，还是被有心丢弃？只有当事人才心内清楚。总之，男子捡起头花，一腔浓情无法倾诉，竟是“回廊一寸相思地”“十年踪迹十年心”。那曾经印有一朵朵白粉花印的地方，成了他一生的怀念与牵挂。

情
寄



玉连环，情未已

传统文化中，包括在绘画里，对于两性情感的表达其实很丰富，发展出了诸多特定的符号，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语汇，这本是很有趣味的话题。

明代佚名画家的仕女画卷《千秋绝艳图》选取历史上或文学中著名的女性形象一一加以呈现，其中一位名为“玉箫”，是一位梳丫髻的少女，用两手握着一对互相套在一起的圆环，相配的赞诗则曰：“手弄双环亭下玩，亭亭弱质似湘娥。”查证起来，这位玉箫应该是唐代笔记体小说《云溪友议》中一则言情故事的女主角，不过，在原故事中，意中人韦皋只是送给她“玉指环一枚”而已。那么《千秋绝艳图》的作者为什么要修改情节，非让她手持双环呢？

唐人韦应物有一首《连环歌》（亦作《行路难》）：“荆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双环连，月蚀中央镜心穿。故人赠妾初相结，恩在环中寻不绝。人情厚薄苦须臾，昔似连环今似玦。连环可碎不可离，如何物在人自移……”不难理解诗意，一件奇巧的工艺品——连在一起的两只玉环，作为爱意的象征，由一位男子赠送给诗中的女主人公。只可惜赠环人的情感并不长久，最终受赠女子只能面对玉饰，惆怅对方的薄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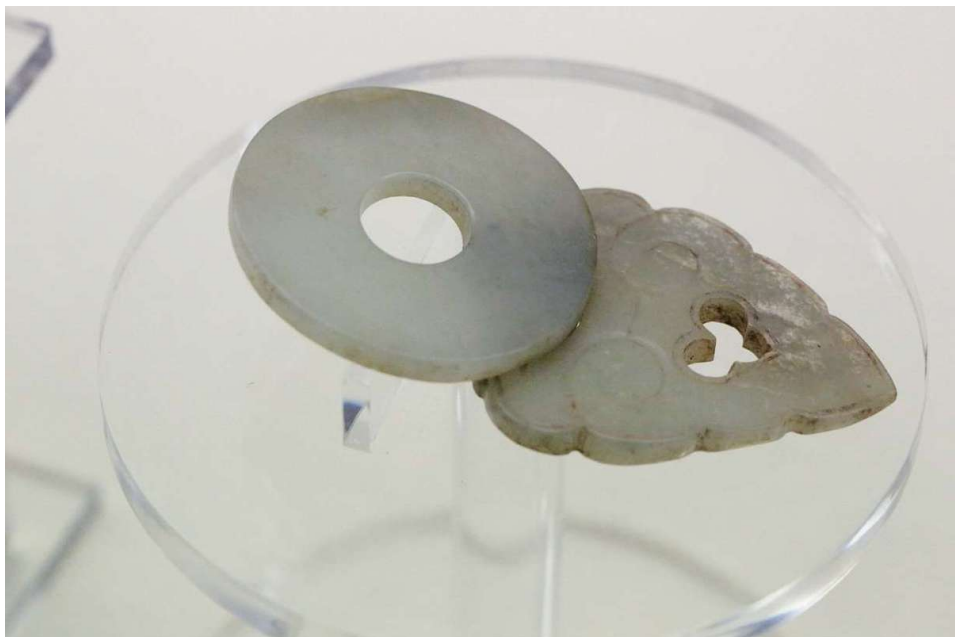
到宋代诗词中，也一再出现以连环式的玉环表达爱意的描写。典型如朱敦儒的一首《浣溪沙》讲述，一位艺妓派人给词人送来两样表情之物，一样是打有同心结的香佩，另一样是“帕儿双字玉连环”——绣有伊人闺名的手帕，帕子一角吊着一件玉雕

的双连环。此外，欧阳修《别后》诗：“连环结连带，赠君情不忘。”是分别时以系在绦带上的连环相赠。赵彦端《菩萨蛮》：“美人书幅幅，中有连环玉。不是只催归，要情无断时。”则是在两地远隔的情况之下，女子随信送上一对玉连环，希望对方不要情断恩绝。

中国自古珍视美玉，发展出一套高超的治玉工艺，结果居然会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示爱方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传统治玉工艺中有一种“掏雕”技巧，玉工能够在—块整料上琢出一双甚或多个活环，但让这些环彼此串在一起，无法分离。玉环浑圆无缝，使得其相互套合的状态仿佛是天然生成—样，神奇得令人惊叹。这一工艺成熟极早，出土的商代玉器上就已带有掏雕成的活链！到了战国时代，玉活环技术变得异常发达，出现了曾侯乙墓出土十六节龙凤形玉佩—类的精彩作品。此后，从瓶盒衔环、印纽到耳坠，玉制连环在历代奢侈品中都是活跃的因素。



明 佚名《千秋绝艳》图卷之“玉箫”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宋 云璧连环玉佩
衢州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费丹旭《弄镯图》局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清代皇家的开合玉连环，两个半环的内剖面上均镌刻并钐金乾隆皇帝《咏开合玉连环》一诗的诗句。
现藏故宫博物院。

韦应物《连环歌》等唐宋诗词表明，至晚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独立的玉连环，这种雕环不再是奢侈品上的附件，而是单独的一件饰品，只有两个圆环，彼此相套。它成为爱情的象征物之一，多情男女会以这种小饰品相赠给所恋的对方，表达二人生命“可碎”而情感“不可离”的意愿。南京溧水柳家村元墓出土的一件“螭龙灵芝环”便是一件“玉连环”，它是用一块玉料琢出两个圆环，环的正面雕有龙纹，背面则各带一个鼻环，这两个鼻环相衔，由此联成整体。另外尚有一种更流行的玉连环形式，以一对大小一样、形状对称的圆环互相套在一起，故宫博物院现即藏有这种样式的清代实物。

《千秋绝艳图》中玉箫所持的“双环”，正是第二种形式的玉连环。依《云溪友议》的原版本，玉箫保存着韦皋临别时留赠的

玉指环，等待了漫长的七年，最终料定对方无意履约，于是绝食身亡。到《千秋绝艳图》的画面上，画家把玉指环置换为玉连环，这是利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符号，将玉箫明确塑造为《连环歌》所咏的那种女性形象，一方面因为男子的负心而神伤，悲哀“如何物在人自移”；另一方面仍然痴心于薄情者，坚持“连环可碎不可离”的单方面的忠贞。

《千秋绝艳图》中的玉箫并非孤例。手持玉连环独自伤情的女子，在明清绘画中，实际上成了一个固定的“画样”。由宫廷画家所绘的《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中，有一幅便是一位女性头簪菊花，手持一对玉连环，望着门外的喜鹊出神。另外，清人费丹旭绘有一幅《弄镯图》，画中女子一手持扇、一手持玉连环，则是把“秋风纨扇”与“连环情未已”（晏几道《洞庭歌》）两个固定主题结合在一起，纨扇象征男性的负心忘情，玉连环则喻示女性的坚守与期待。如果不清楚这样一个固定画样在明清时代的存在，有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相关作品的含义。





清代宫廷画家所绘《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之“持环相思”，图中美人持有一枚开合玉连环。

此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彩笺芳翰两情深

依照唐代传奇小说的观念，一位女子有才情而又有品位的标志，就是能在碧色小信笺上写情诗。当然啦，在唐人文学里，女子们吐露幽怀的诗句也每每写在红笺上。不过，到底还是碧笺更显得富有风致，它可是用芙蓉叶汁染就的，或者甚至是用水中青苔制成的呢！

唐人围绕“诗笺”发展起来的特殊风雅，在悲剧性的爱情故事《飞烟传》中得到充分绽放。少年文人赵象在见到比邻而居的美人步飞烟之后，爱意萌生，于是将小诗写在一叶“薛涛笺”上，托看门老妇转送，表达自己“一窥倾城貌”之下的慕恋心情。步飞烟则借着“金凤笺”上的回诗流露出一腔幽恨，这让赵象大受鼓舞，再次以“玉叶纸”挥写诗句，发出婉转而又大胆的告白：

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

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

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

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面对陌生少年的热情，飞烟又一次回复小诗吐露心迹，这一次，“暗题蝉锦思难穷”的句子便是写在“碧苔笺”，亦即碧色的信笺之上。一段精巧的小说情节，本意在于表达年轻爱情的清新无敌，却无心间展示出唐人笺纸的极端精美。四次以诗传情，所用的笺纸绝不重复，而且各具美质。玉叶纸是以剡溪藤制成的雪白

细纸；碧苔笺则是用水中苔菜为原料，其色浅绿；以木刻印花版蘸上金泥或者掺有硫黄的云母粉泥，在色纸上印出翔凤花纹，便是“金凤笺”；至于“薛涛笺”，则是蜀地特产的、染色缤纷、印花精巧的上好笺张。

唐代的染色印花小笺，千百年里，都与著名的女诗人、美妓薛涛联系在一起。据记载，蜀地早就以出产精美的彩色纸张而闻名天下，不过，薛涛对其加以了优化改进，不仅督促工匠发展出更为丰富多变的染色，而且将长卷大幅改裁为单叶小张，每一叶小纸上仅仅能够题写一首诗。薛涛所发明的小张彩笺，正好响应了唐代中期以后生活方式更加精雅化的潮流。

唐人爱诗，更爱作诗，诗人们不管身处哪里，都要身携竹或布制的“诗筒”，一旦忽然想到好的诗句，就要赶紧写在纸上，放入诗筒，以免才思一过，事后难以追忆。独自成张的“薛涛笺”恰好最适合放在诗筒里，随时抽出一张，记录自己苦吟所得。另外，文人雅集时，作诗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这时候，宾主各取一张丽色不一、纹花蹁跹的薛涛笺，挥毫立就即景生情之作，无疑让集会获得了形式上的雅致与优美。因此，薛涛所发明的小幅彩笺立刻受到文人才子的追捧，随后在整个唐代上层社会风行开来，被专称为“薛涛笺”，因为产于成都的浣花溪畔，所以又称“蜀笺”，甚至还获得了一个美丽之极的芳名“浣花笺”。

十竹齋珍藏



明 胡正言辑印 《十竹斋笺谱》彩笺图案之一

据《成都古今记》所记，蜀笺的色彩多达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样的变化，其中的精品还会套印上山水林木、折枝花果、飞禽走兽等饰纹，因此唐人也喜欢称之为“彩笺”，如诗人韦庄就有《乞彩笺歌》放声咏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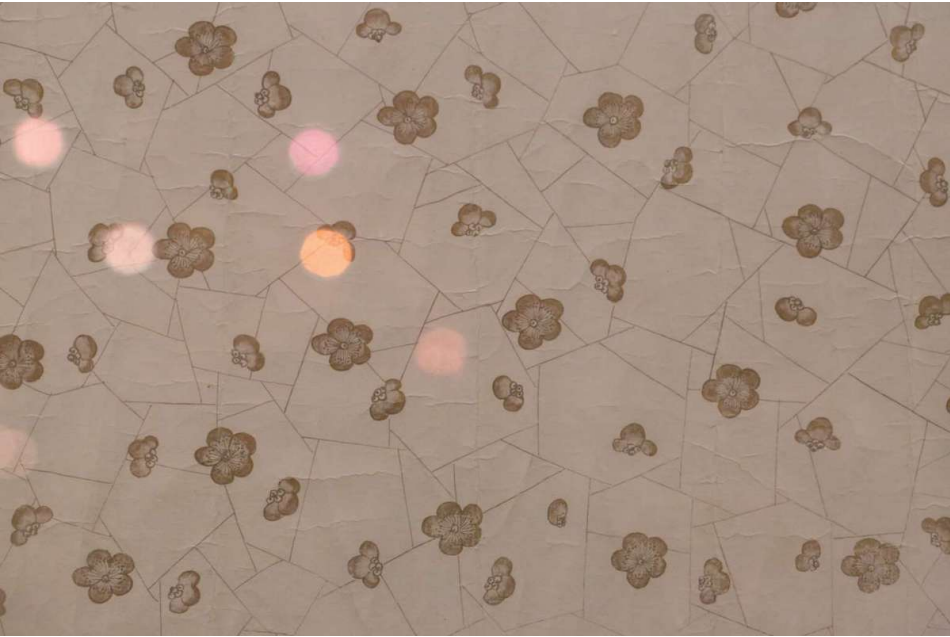
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
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

在爱诗的唐人那里，或猩红或天碧的薛涛笺主要是一种专用的“诗笺”，首先用于题写诗词；其次，也作为信纸，达成社交中彬彬温雅的信札往来。一位叫作李建勋的唐代官员在吟赞《蔷薇》的诗作末尾，便有句为：“彩笺蛮榼句休日，欲召亲宾看一场。”他准备趁着每月旬日那一天的公休假日，召集亲朋好友共同欣赏盛开的蔷薇，而聚会上一定会预备的助兴之物，除了美酒（“蛮榼”即酒壶）之外，便是供题诗之用的彩笺，富有诗情的唐人一旦花光照眼，免不了要“诗动彩笺忙”！

如此一来，毫不奇怪的，崔莺莺那猜谜一般的约会通知，因为是采用了诗体，所以也定然要写在一叶“彩笺”上：“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就是有了如此一张娟秀清雅的通行令在手，才“急急如律令”，大胆地半夜跳墙投奔佳人。另外，在《源氏物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末摘花曾用紫笺写信给源氏公子；源氏则以红梅色笺回信给槿姬，还将这封信系在一根梅花折枝的枝头。类似的情节在这部著名小说中屡次出现，足以表明，运用彩笺的风尚也在深受唐代文化影响的日本贵族阶层中广为播散。

诗，始终是士大夫文化中最能寄情抒怀的一种表达。于是，

由“薛涛笺”一路发展的各种彩笺也始终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文人生活。



清 梅花玉版笺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胭脂泪，寄深情

“我把眼泪寄给你”——听来很像当代流行歌曲中的歌词。这句话如果真的由歌手唱出来，我们肯定会觉得，句中的说法只是一种比喻，一种伤感的表达。然而，其实在中国的往昔，女性们真的流行把自己的“泪痕”寄给心上人，作为最真挚的爱的信物。

在宋代，有位叫张君房的文人编写了一部言情故事集——《丽情集》，其中收录了多篇在唐宋时代广为流行的动人传说，其中一篇的题目即为《寄泪》。这则故事随后转录在《绿窗新话》内，改称《灼灼染泪寄裴质》。故事的女主角灼灼，史上真有其人，唐人韦庄曾作《伤灼灼诗》，称其为“蜀之丽人”。围绕这位美人演绎出的“寄泪”故事则交代，灼灼是一位官妓，因才艺而名动锦城。她偶然在一次宴会上与御史裴质相遇，彼此一见钟情，可惜此后便两地分隔，再无见面的机会。绵绵的思念中，灼灼以软绡多聚红泪，密寄心上人。

眼泪怎么会是红色的？又如何能用柔软的手帕收集起来，再寄送出去？其实，如果了解古代化妆品的具体形态，便不会感到惊奇。恰恰是传统生活中特定的化妆方式，催生出“寄泪”这样一种奇妙的示爱之道。



清 张淇 《寄泪图》
无锡市博物馆藏



辽 夹纻萱草纹罗方巾
内蒙古庆州白塔寺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至晚从汉代起，一直到元时，女性化妆时的普遍方法是把红色的妆粉扑在双颊上，由此让颊色秀艳。这种妆粉的主要配料为白色铅粉与朱砂细末，二者与其他一些香料和具有美容功能的中药粉混在一起，成品称为“红粉”“胭脂粉”“桃花粉”“芙蓉粉”。如此上妆之后，一旦女性哭泣，泪水流过脸颊，便会混入红粉，成

为“粉泪”，因此也就被染上了红色，变成“红泪”，亦即所谓的“胭脂泪”。所以说，“胭脂泪”在古代生活中乃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是指被妆粉染为红色的泪水。这类情况对古人来说颇为常见，于是，唐宋诗词往往很自然地便会提及：“手持金箸垂红泪。”（唐人刘言史《长门怨》）“别酒更添红粉泪。”（宋人贺铸《玉连环》）

逢到与钟情之人长久分离的情况，女性在独自思念的寂寞时刻，难免泪水长流，这时当然要用手帕揩泪，于是，帕子便被染上一抹又一抹的胭脂泪痕：“近水远山都积恨，可堪芳草如茵。何曾一日不思君。无书凭朔雁，有泪在罗巾。”（宋人刘过《临江仙》）由之，大约在唐代，巧慧的女子们发明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深情的方式，那就是把渍沁了红色泪痕的手帕直接寄给情人，让对方知道，思念如何折磨得自己泪水流淌不尽。元稹的《鱼中素》一诗便细腻地展示了如此传情的过程：“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馀泪迹，知著脸边来。”诗中说，某位男子——也许就是作者自己——收到了一封折叠仔细的素白帕子，打开之后，其上并无一字，只是浮印着几抹斜斜的丹色染痕，让他一下悟到，这手帕曾经为相爱的玉人揩去颊上的泪，带着从她面庞传递而来的余泽。

此般传情方式在宋人当中也很盛行：“有情奈无计。漫惹成憔悴。欲把罗巾暗传寄。细认取、斑点泪。”（宋人杜安世《卜算子》）直到元曲的时代，徐再思《寿阳曲》“手帕”一作仍道是：“香多处，情万缕，织春愁一方柔玉。寄多才怕不知心内苦，带胭脂泪痕将去。”女性们认为对方不能体会自己为情所困而经受的心理磨碾，便把染满了红色泪痕的手帕送过去，用活生生的证据进行事实教育。

《灼灼染泪寄裴质》的故事就是产生在如此的氛围中。灼灼

对裴质难以忘情，但两地远隔，无缘相见，她唯有用一方手帕反复擦拭自己思念的泪水，于是混有红粉的泪痕在帕面上染出一抹又一抹的霞痕，重叠或交织，形成一首泪水写就的无字诗。所以，“寄泪”并不是说真的寄送液体的泪水，而是把满布红泪印痕的手帕递送到心上人手中。

灼灼“寄泪”的传说出现之后，一度颇为流行，显然，那个时代的无数多情男女都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真实经历，所以很容易产生共鸣。沁了红泪的手帕在晾干之后，一抹一抹的淡淡胭脂染痕就如印花一样驻留在绢面上，不肯轻易消退，无论对于寄帕的一方还是收帕的一方，都胜过千言万语，道尽了深藏的心迹。



清 佚名《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灯花眉黛付多情

中国传统的爱情戏中，一对璧人一见钟情，找个机会互相试探，是必有的关目，且称之为“情试”或“情挑”。当此时节，双方时而火辣大胆，时而退守防卫，男性作家们显然觉得特别刺激，总是会“小宇宙爆发”，把那细腻的心理节奏演绎得甜美缠绵，把氛围打造得极端暧昧，在纯洁与肉欲、爱情与色情之间徘徊。

在我看来，《娇红记》中的“分烬”一折尤属其中之上品。当然，这一折的基本情节并非明代戏曲家孟称舜的发明，而是存在于更早的小说《娇红记》之中。不过，对我们习惯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分烬”表现的内容是过于陌生，我就好长时间都没有读懂，直到有一天翻到《娇红记》小说中的相关环节，才忽然明白过来，再返回去读戏文，由此大悟到这一折的温香荡漾。

男主角申纯以“谢诗”为名来到娇红的闺房，撞见她在实施化妆仪式中的画眉环节，具体方式则是“把灯烬描着眉儿”。申生于是问：“敢问这是灯煤耶，烛花也？”娇红回答：“灯花耳。妾用意积之，近方得之。”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和曾经的我一样，对如此的对话，以及随后的展开感到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俩在说啥。密码存在于《事林广记》一书中，这是传为南宋人陈元靓编撰的一本“生活知识实用书”，传授“画眉集香圆”的做法是：“真麻油一盞，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盞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中，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

原来，眉妆用品的传统制作方法，与书写用墨在原理上一样：把多条灯芯线紧紧搓成一个粗条，置于灯碗内，注满生芝麻油，然后让这个灯碗半浸在水中，由此降温来减慢油烟挥发的速度。点燃粗灯芯，再将一个小碗之类的容器倒扣在灯碗上，这样，灯芯燃烧形成的油烟就会附着在倒扣器的内底上，随时注意将这些油烟扫下、仔细收集起来。提前三天，以龙脑、麝香泡在少量生芝麻油内，令油浸得香气，然后把收集到的灯油烟与这香油调匀在一起，形成黑色的油膏，捏成小圆球，就是“画眉集香圆”，其效果比乌漆还黑。

据《武林旧事》，在南宋临安，“画眉七香丸”（即“画眉集香圆”）已经形成了商业化的生产和流通。不过，女性也可以在家中动手自制此般“画眉墨”，南宋人华岳有《田家十绝》描绘当时农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句云：“画眉无墨把灯烧，岂识宫妆与翠翘”——农家女子没有途径买墨画眉，就点起油灯，采集油烟，作为对策。

然而，《事林广记》中还有这样一句：“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浸在油内的灯芯——也就是近代俗称的“灯捻儿”，会逐渐烧焦成黑炭，叫“灯花”。灯花多了便影响灯焰的亮度，所以需要时而剪去，本来是传统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麻烦。但是，古代女性居然把这种丝或麻——以及明清时的棉——线的余烬开发成化妆品！她们发现，把此般灯烬收集起来，画眉的效果比灯烟做成的集香圆更佳！

搞清了这一技术背景，我们才能明白“分烬”一折里那些道白与唱词的含义。申生问娇红，你画眉用的是“灯煤”还是“烛花”？“灯煤”是指烧灯取烟后制成的眉黛，即画眉集香圆的做法；“烛花”则是说蜡烛中的芯线燃余的残烬。娇红回答，两者都不是，而是“灯花”——油灯中灯捻儿的残烬。《事林广记》中提

出，芝麻油灯捻儿之炭烬于画眉效果最佳，《娇红记》显然熟悉并同意这一观点，并试图利用这套观念来刻画女主角娇红的细心与优雅，所以强调她用的既不是灯油烟，也不是蜡烛芯烬，而是公认的最佳选择。把灯油捻儿的灯花一点点积存下来，那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多么不懈的坚持，所以娇红说“用意积之，近方得之”，留心攒了很久，最近才获得了足够的分量，加工成画眉之黛墨。



清禹之鼎《闲敲棋子图》，把唐人温庭筠《咏寒霄》一诗中的“委坠金釭烬，阑珊玉局棋”两句转化成画面。

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这幅作品仔细表现了“委坠金釭烬”的状态，油灯盏内的灯芯草一端点燃，

燃烧中形成了黑色炭烬。这些炭烬一点点地落到下面的灯盘上。无意中，让我们了解到，传统女性如何收集灯烬，原来只要随时把落到灯盘上的炭烬细心扫到小容器内即可。

宋龍泉窯乙花雞足燈

圖七十九



明项元汴撰《项式历代名瓷图谱》中有一张“宋龙泉窑乙花鸡足灯”图，描绘了项元汴同乡士绅家的一件实物灯具。《闲敲棋子图》中的鸡足灯与此灯在造型上风格相近，显示这幅作品非常注意反映真实的生活细节。

由此，也就明白何以这一折叫“分烬”，因为申生向娇红讨要她的画眉妆品，借口是要用那以灯烬调油而得的眉黛代替墨，去写一封家信。随之，旖旎的“情试”过程逐步展开，每一环的进展都出乎观众想象，而每一环都是又露骨又遮掩的互相挑逗。先是双方借着兰烬眉黛，以言辞撩拨，然后娇红应申生索要，用手指挖出一半黛膏，分装于另器，指尖因此染了黛污，便以双关的语气，假意嗔怪：“都是因为你才会这样，你不要没事人一样啊！”说着竟将手指直接在申生的衣服上擦拭。申生也立刻回应：“这个指痕印，我绝对要永远保留着，视如定情的礼物啊！”下一刻则是固定套路，一旦男子如此直白，小姐就立刻变了脸，发怒说：“我对你兄妹相待，你却对我轻薄。”然后威胁要去向父母告发。公子则赶紧赔罪，下跪求饶，并慌忙离开。这让娇红却又担心，她这一番严词说教会引发对方的误会。

“几许兰烬积久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灯捻儿的焦烬竟能成为少年男女彼此试探感情的媒介，真佩服古代文人的才华。不脱衣服不裸体，甚至没有肌肤的直接接触，却让写作者、表演者、读者和观众都被激发起不安分的性欲，脸热心痒，跃跃欲试，这要算传统戏曲的一大成就，也是最迷人的成就之一。

难怪《娇红记》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啊。

美人香气帝王思

让我们一起来编一出传奇吧。

这传奇绝非完全的虚构，人物、情节都是真实的，是历史上的真事，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动用一点浪漫，将它们联系到一起而已。

北宋仁宗是位多情的天子，一生宠爱过的美人众多，其中，却以张贵妃风势最盛。这位贵妃甚至没有在史册中留下芳名，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她最初并没有在起跑线上占到有利位置，相反，幼年相当不幸。因为丧父无依，被母亲送入宫中做宫女，相比其他显宦之家出身的后妃，本来就缺乏竞争力。然而，一入豆蔻年华，她以普通宫女的身份，竟迅速博得仁宗的“盛宠”，先后封为清河郡君、才人、修媛、美人，一路升至贵妃。

张贵妃除了容貌美丽之外，唯一可以运用的就是天生的“巧慧，多智数”，也正是凭着这一智力上的优势，她才得以从众多的宫人当中胜出。文献中记录的一个体现其明慧的细节是，即使她所住宫阁中焚爇的香品，也是出于亲自精心设计，与众不同。

宋朝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因此也是奢侈品消费中心之一，世界各地的名贵香料都被运至中国，供上层社会装点风雅生活。然而，对于宋代的有教养阶级来说，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而重要的熏香事项，到了张贵妃这里，也被渲染上了鲜明的、个性化的格调。当时为富贵人家所疯狂消费的沉香、檀香、龙脑、麝香之类，她都避而不用，却独独欣赏以荔枝壳、松子膜、苦楝花等若干朴素材料制成的香品。于是，芳气迥异于其他后妃殿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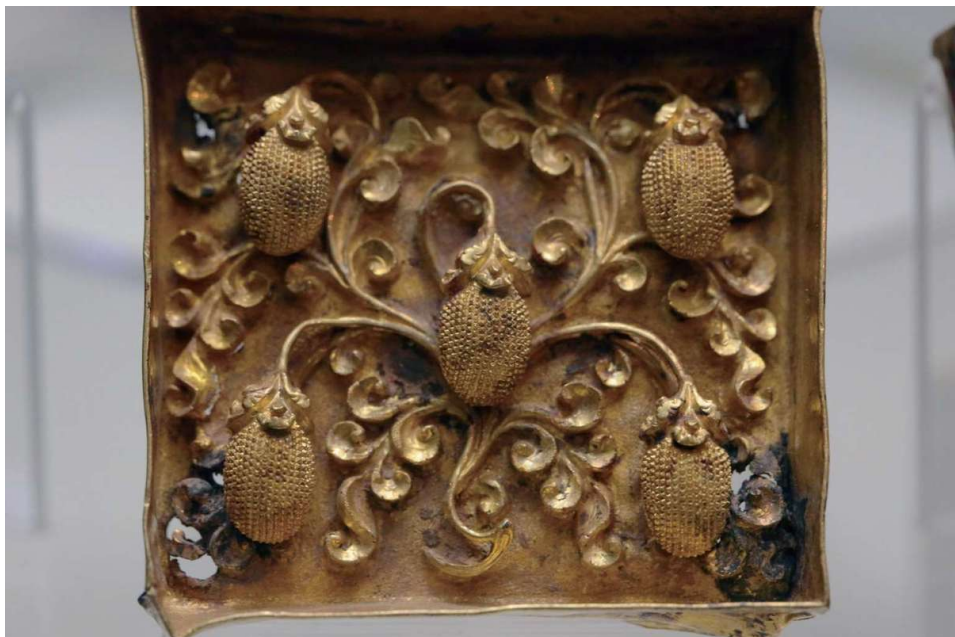
的“张美人阁中香”不仅在宫中名动一时，甚至被传入民间，引发贵族与士大夫阶层的好奇和模仿。

这种香品的具体内容，可以由文献中大致得其仿佛，如明人周嘉胄《香乘》记有“脱俗香”：

香附子（半两，蜜浸三日，慢焙干）、橙皮（一两，焙干）、零陵香（半两，酒浸一宿，慢焙干）、楝花（一两，晒干）、榧櫨核（一两）、荔枝壳（一两）。右并精细拣择，为末，加龙脑少许，炼蜜拌匀，入磁盒封，窖十余日，旋取烧之。

该书又引《墨娥小录》，有“四叶饼子香”：

荔枝壳、松子壳、梨皮、甘蔗粗，右各等分，为细末，梨汁和，丸小鸡头大，捻作饼子，或搓如粗灯草大，阴干，烧，妙。加降真屑、檀末同碾，尤佳。



南宋 荔枝纹金腰带扣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惊人的是，清人况周颐所著《眉庐丛话》中有这样一条信息：

每岁元旦，太和殿设朝，金炉内所薰香名“四弃香”，清微澹远，迥殊常品，以梨及苹果等四种果皮晒干制成。历代相传，用之已久，昭俭德也。

在清朝，除夕之后，元旦的清晨，要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上举行一年伊始的隆重大典，文武百官庄严叩拜万乘君王。想不到的是，偏偏在这至为尊贵的场合，殿前一具具大香炉中所焚非沉非檀，反而是用梨皮、苹果皮等四种果皮制成的香品。由于四种

果皮本属于多半会被丢弃的东西，于是所成香品便取名“四弃香”。之所以特意在新年的第一天采用这样一种香料，意义在于醒示天下，俭朴的美德乃是天子、国家以及臣民品行的立基所在。

因此，年年的元旦，太和殿上下都是被梨、苹果等四种水果合成的香气缭绕。就在这清淡而缥缈的氤氲中，迎来新升的太阳照耀到紫禁城琉璃瓦上的曙光。

不过，本是粗犷的马背民族的满族皇室并非这一思虑深远的仪式细节的发明者。相反，在元旦大朝上使用四弃香，乃是“历代相传，用之已久”。以果皮、果渣制作香料，是在宋代出现的制香技术，因此，可以断定，“四弃香”用于朝会的古老传统不会早于宋代。



宋 汝窑三足弦纹樽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南宋“中兴复古”香饼
常州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于是，我们又可以大胆地开动想象了。为什么不呢？想象宋仁宗正是在张美人阁中如丝如缕的香气中批阅奏折，忽然产生念头，决定将这种出身微末的香料用于朝堂上的重大仪式，以这一象征性的气息，向臣子，向天下，宣示勤政爱民、天下为公的圣衷，从此立下了代代相传的法则。

其实，以宋代香道的发达，有着各式各样由制香、用香、品香生发的优美迷人的情节，完全可以供今人将其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国际贸易等方面串联起来，编成一部回肠荡气、慷慨与多情兼具的电视传奇长剧。江山美人，文人侠客，画堂朱户，歌台舞榭，经由一缕又一缕的酩酊烟缕，再现出如水墨般洇晕重叠

的形影。

误把荷包当香囊，让谁羞愧？

话说，元代作家乔吉曾经收到一只纱香囊，这只香囊是由一位叫作李楚仪的艺伎相赠，表示她对他别有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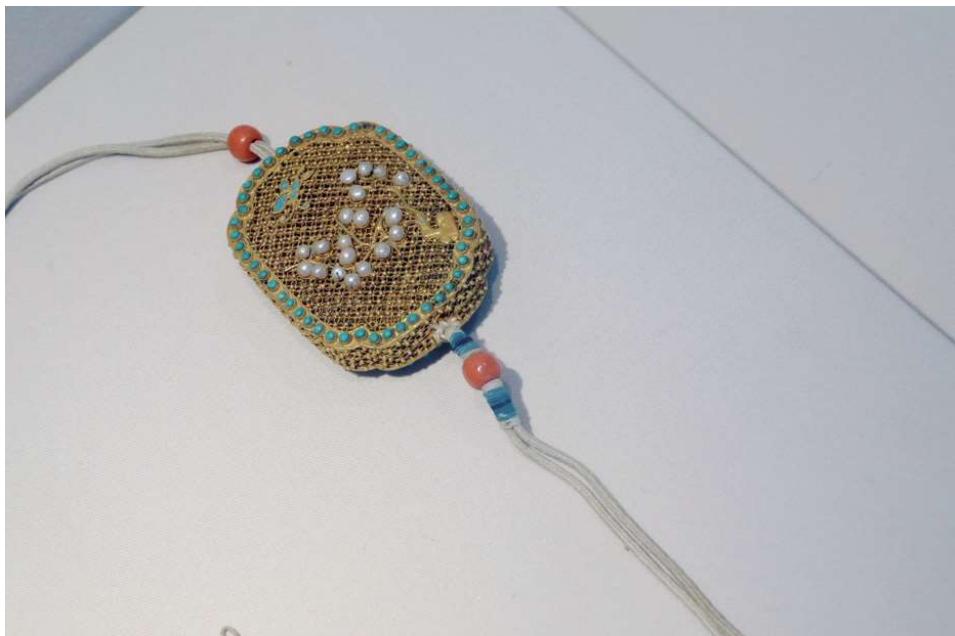
才子佳人之间私相授受，旁人怎么能知道？原来才子为了这件事特意咏成《水仙子》一曲，题为“楚仪赠香囊，赋以报之”，其曲则云：“玉丝寒皱雪纱囊，金剪裁成冰笋凉，梅魂不许春摇荡。和清愁一处装，芳心偷付檀郎。怀儿里放，枕袋里藏，梦绕龙香。”于是，从此以后天下爱八卦的民众就都知道，这位优质作家收到的香囊是以白色绉纱为材料，由李楚仪亲手制成，内里盛装了气息近似梅花的香料，让人觉得仿佛早春的一点碎片就此被捕捉并锁闭在小纱袋内。女方将这只满载着爱意与愁绪的香囊悄悄送给中意之人，让他白天揣于怀内，夜晚置于枕袋里，日夜都被香气围绕。

应该设法做个普查，除了中国、朝鲜与日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在历史上也利用香囊来香身？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的民众习惯拿香水擦在身上，这一做法在传统中国却没有得到普及。至晚从汉代起，流行的做法就是佩戴香囊，这一风俗一直沿袭到清代。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佩戴香囊的做法像诸多传统生活方式一样，不知不觉便遭淘汰了。结果发生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在当今许多人的认知中，香囊居然与荷包相混淆，尤其是居然把“抽口荷包”当作香囊。

历史上的“香囊”一名下包含了多种材质、多种形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金银、玉、翠等硬材制作的小盒，盒面镂

空以散发香气；一类则是以纱、罗、锦、缎等织物缝成的软质小袋，到了明清时也称为“香袋”。

织物做的香囊一般拴系在内衣上，是与一个人的身体最为亲近的小物件，往往由女性亲手精心绣、缝而成，所以，不奇怪这种散香小袋常成为多情男女之间传达爱的载体。从出土与现存实物来看，从汉到宋，织物做的香囊为带有开口的小袋，可以多次更换其中的香料。但是，从元代开始，很多织物香囊在装入香料之后即将开口缝死，也就是说，香囊内的香料不能更换，变成了“一次性用品”。一旦囊内香料的香气散尽，这件织物香囊也就服役期满，就此弃置不用了。推测原因，大约因为织物香囊往往贴身佩戴，难免沾染汗与尘，又不方便洗涤，所以干脆用过一次之后就放弃。然而，如此的一次性香袋都是设计精心，造型表现寓意吉祥的主题，动用各种精湛的女红技艺，需花费做袋人极大的心血，件件均为上乘的工艺小品。这些精美巧丽的绣花香袋在香尽之后便被替换，实际上是时时翻新裙边带下的小饰品，倒也属于传统生活中一种无法复制的奢侈。



清 金镶珍珠香囊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辽 绣花荷包
内蒙古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唐 褐地刺绣香囊
甘肃省博物馆
(摄影：动脉影)



清 红缎地盘金绣团寿纹荷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荷包则是盛装各种零碎物品的活口小包，与香囊属于两类截然不同的日常用物。中国的传统服装上一直不曾出现“衣袋”这个组件，于是，人们出于实际需要，会在腰带或衣带、裙带上垂挂一个或多个活口小袋，在其中装盛随手会用到的物件。这种随身小袋在历代的叫法不同，样式也变化不已，“荷包”一词大致出现在元代，也是在这个时代，抽口荷包的样式开始流行。

所谓抽口荷包，就是于荷包接近开口的部位穿系一条绦带，通过拉扯绦带将荷包的开口收紧，反之则能令荷包的开口松开。绦带的多余部分还可作为挂绳，拴系到腰带或裙带上。这种形式既简便又灵活，不仅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变成荷包的主流形式，还传入日本、欧洲，于东洋、西洋的上流社会都大大的走俏。

荷包与香囊的功能不同，彼此无法代替对方的角色，当然也就决定了二者在形态上彼此相差很远。《红楼梦》中，黛玉误以为宝玉把她亲手做的荷包给了小厮，一怒之下铰坏了没做完的香袋，这个情节就很典型地反映出，传统生活中，这两种物品彼此绝不混淆。由于抽口荷包的实用性极强，所以得以一直传承下来。但是却造成很多人把荷包误当作昔日的香囊，这不仅委屈了香囊，更委屈了属于我们的历史。

顾太清与香串

爱情是永恒的，但对爱情的比喻，却需要即景生情，取决于痴心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如果仔细盘点，围绕香气的诸般谈情说爱的现象，在当代人这里应该不多，即使涉及，也无非玫瑰，百合，香水，有限的几样，单调而空泛。

但在往昔的中国，特别是在上层社会的风雅生活里，以香之种种来喻爱意，譬情思，诉离苦，盼重逢，纷纷纭纭的缠绵委婉，简直是个熟练活计。

说起这等前尘碎事，今人大约首先想到的会是香袋，亦即香囊。传统生活中，香囊往往贴身佩戴，拴在内衣的系带上，与意中人肌肤相亲，自然是表情仪物的优选，也频频地见诸文学表达，表达情感的深切。今天的人，大概难以想象用香炉来示爱吧？所以如果有人唱“我是香炉你是香”，大家一定觉得这人是在搞笑。但是，在南北朝时，就有这样的民谣：“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因为，那时贵族居室中普遍摆设博山炉，而且一座赛一座的精美。



汉 错金银博山炉
河北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博山炉兴起于两汉时期，大概炉顶香烟袅袅很容易让人想到云烟出岫的场景，所以不知由谁起的灵感，把海中仙山的意象赋予了青铜香炉：炉顶铸造为层层耸立的山峦，其间还点缀着各种动物形象。炉体下方为单足座，雕成盘龙，象征由龙来沟通天、人、地的观念。当时，香炉一定要放置在一只圆盘当中，燃香的时候，盘中注上热水，让热水散发的蒸汽浸润炉中升起的香烟，由此增加湿气，并且承接炭灰。于是，在古人那里，水盘便象征大海，而盘中之炉则象征孤矗大海中的蓬莱仙山。由此，把对长生仙境的向往，寄托在席畔案前的香炉上。

很有意思的是，晋唐以后，佛教大兴，博山炉所配香盘又被赋予“旃檀香海”的佛教观念，沿袭到元明，又被添加了“福山寿海”的吉祥含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很自然的，南北朝时的多情男女会想到以博山香炉与进口沉香的关系，比喻双方难以分离，天然相配，非常珍贵，值得珍惜。

从唐代开始，香炉的造型愈发丰富，不同造型的香炉还有了不同分工，于是，以香炉表达心绪的措辞也益发婉转机巧。有一种做成动物造型的小香炉，以鸭形最多，此外也有鸂鶒、兔、狮子等，这种小香炉固然可以派各种用场，但人们喜欢将之放置于床帐内的一角，令其在静夜中悄悄吐香，氤氲就枕人的眠寝。于是，唐人和凝一首《何满子》中就有了这样的慨叹：“却爱熏香小鸭，羡他长在屏帷。”因为爱慕一位美人却不能如意，便不由得羡慕她床帐内的鸭形小香炉，在每个夜晚，都能陪伴在她身畔，共度梦沉梦醒的私密时光。



西汉 鎏金银竹节熏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北宋 汝窑天青釉鸳鸯钮熏炉盖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藏
(摄影：动脉影)

往昔，还曾有一种特殊的“时钟”，叫印香、香印或香篆，利用燃香的缓慢过程来标示时间。其大致方法是将若干种特定的香粉配在一起，通过木制或铜制的花范，在香炉内的灰面上形成绵长不断、回环转曲的长带。然后点燃一头，于是，一星燃火就会慢慢蚕食香粉塑就的回转长纹。配料特殊的香粉不仅燃烧缓慢，而且燃速均匀，这样，人们根据燃香的进度，便可知道具体的时辰。当时有专门善于打香印的手艺人，能够保证一只香篆匀速燃烧一个昼夜，他们会为固定的客户终年提供服务，每天前去制作一个表示十二个时辰进展的燃香时钟。在乔吉笔下，这种奢侈的钟表也用以表达情感的失意与爱恋的坚执：“一点雕盘萤度秋，半缕宫窗云弄愁。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乔吉《凭栏人》）那沿着粉带缓缓移动的红色火星，恰像绵绵不断的思念，而升起的轻烟则如同丝丝愁绪。就像香篆一定烧到尽头才会熄灭一样，只要情感的缘分一日未尽，就一日不肯放弃，不肯轻易心灰意冷。

幾生修得到梅



清丁月湖《印香图谱》中的香篆图案之一——“几生修得到梅花”

往昔，无论男女，都有佩戴散香饰物的习惯，尤其是夏季，

更是身上须臾不可少，以此来祛除汗味，让身体芳洁。散香饰物精致多彩，形式不一，除了香囊之外，还有用香料与中药合成的各种固体小饰品，到了清代，香珠成为最流行的选择，入夏以后，无论男女都会佩戴它。香珠均采取手串的形式，一串上有珠十八颗，可以戴于左腕上，也可以悬挂在位于右胸处的衣襟第二颗纽扣上。因此，清代有身份的男性与女性在左腕或右胸佩一串香珠，是非常普遍的景象。随之，便有了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的词作《南柯子·咏香串效唐人体》：

宝串垂襟软，温香著体柔。青丝贯取意绸缪。只要心心相应、总无愁。步月难寻梦，临风怕倚楼。江皋玉佩为谁留。又惹一番牵挂、在心头。

词中以“江皋解佩”的典故，揭明所咏的香珠串乃是有情人表明心意的赠物，惹动着受赠一方的心潮。而那贴身散发的柔和香气，恰如对方的温情款洽，贯穿珠子的丝线则象征着恋情的持久不断，成了一对人儿共同心愿的最好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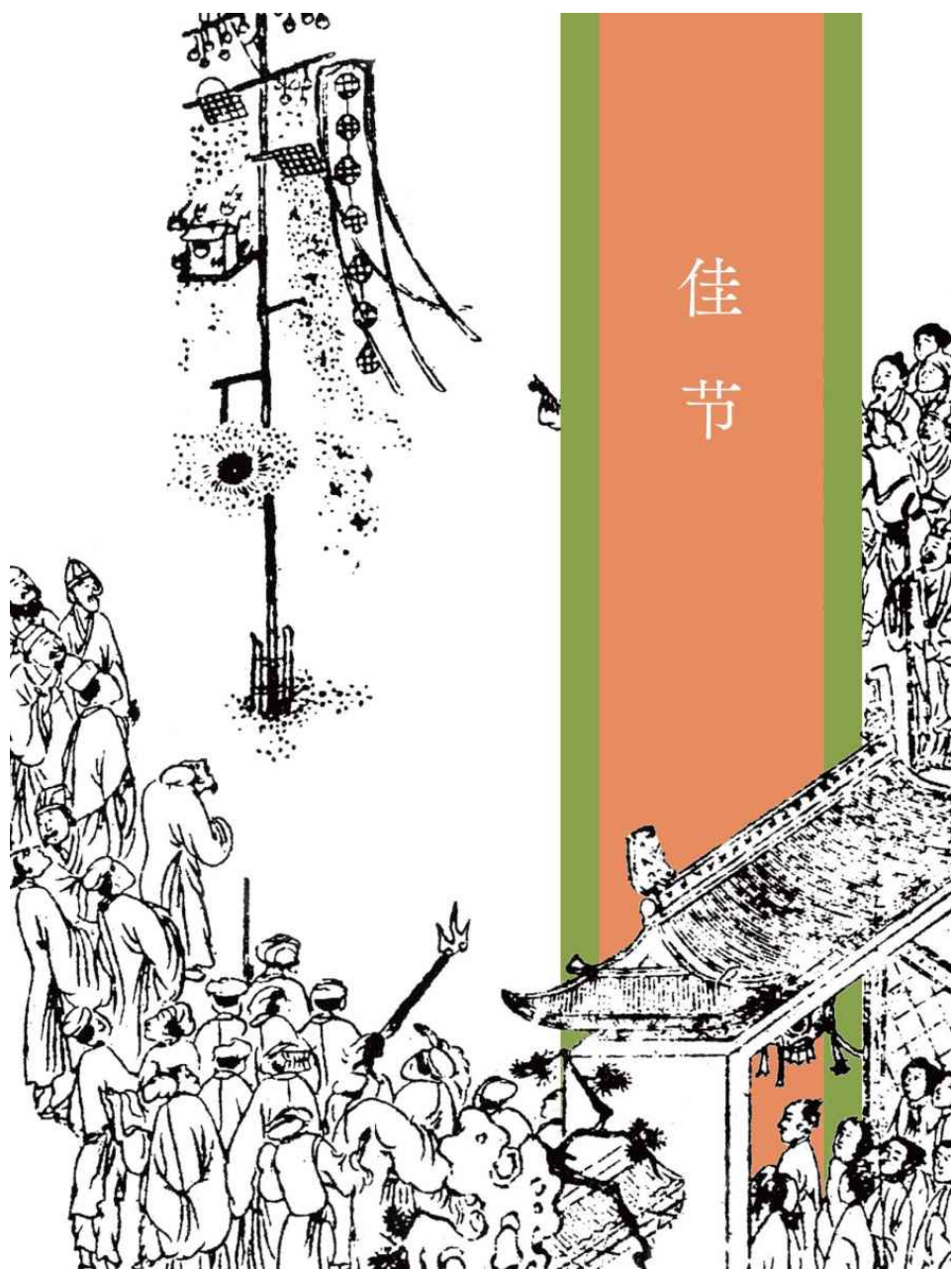
在今天，如果有谁写下这样的句子：“你以香奈儿今年夏日的最新款香水，让我那条去年的爱马仕丝巾重焕芬芳。”一定会贻笑大方吧，读者大概会觉得这种句子真是俗气的恶趣味。然而，在往昔的世界，在传统的文化氛围里，类似的表达，为什么就那么自然大方，那么畅行无阻啊？



清 迦南香嵌金长圆寿字纹十八子手串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佳节



闹蛾灯球映上元

正月十五是上元节，也是富于狂欢气氛的灯节。在宋代，这个节日对于女性来说有一项特殊的快乐，就是在头冠上插满多种唯此时才会佩戴的特定小首饰，打扮得光彩华艳，然后出门赏灯。

上元节小首饰的花色，以朱弁《续骈韵说》“元宵词”一条列举较全：“都下元宵观游之盛……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鬟簪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于何时。”

诸般头饰中，第一不可或缺的就是各式袖珍灯笼，当时叫“灯球”。女性把这些小灯笼挑在钗头，形成独特的上元节专款步摇。此般应节玲珑物看来可以凭多种材料与方法制作，宋代侯寘作有《清平乐》词一首，题为“咏橄榄灯球儿”，就展示了很新鲜的一种情况：

缕金剪彩。茸绾同心带。整整云鬟宜簇戴。雪柳闹蛾难赛。休夸结实炎州。且看指面纤柔。试问苦人滋味，何如插鬓风流。



清 金嵌玉簪
首都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词所咏灯球儿戴于发环、插于发鬓，且与“雪柳、闹蛾”争胜，显然正是指元宵节女性头上所戴之物。在词中，是把金箔、彩帛、彩纸等剪碎（“缕金剪彩”），贴在橄榄果的表面上形成花纹，这样让橄榄果转变成小彩灯笼的形象。然后用绒线吊住橄榄果变身的灯球即“橄榄灯球儿”，打出同心花结（“茸绾同心带”），就可以系挂到簪钗头。在善于女红的宋代女性那里，这样的小玩意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所以词中说“休夸结实炎州。且看指面纤柔”——虽然小果子是产自南方，但在玉指灵动下完全改变了外观与用场，以致词人凑趣说“试问苦人滋味，何如插鬓风流”——橄榄本来味道苦涩，借上元节的机会转而垂在钗头，在乌鬓边晃荡，为女性添媚，倒是更妙的用场。

据词中透露，元宵节时女性插戴小灯笼的风格是“簇戴”，不是挂一个两个，而是一下戴若干个，形成一簇。类似的风尚一直沿袭到明代，如《金瓶梅》里就描写，正月十五之夜，潘金莲的

打扮是“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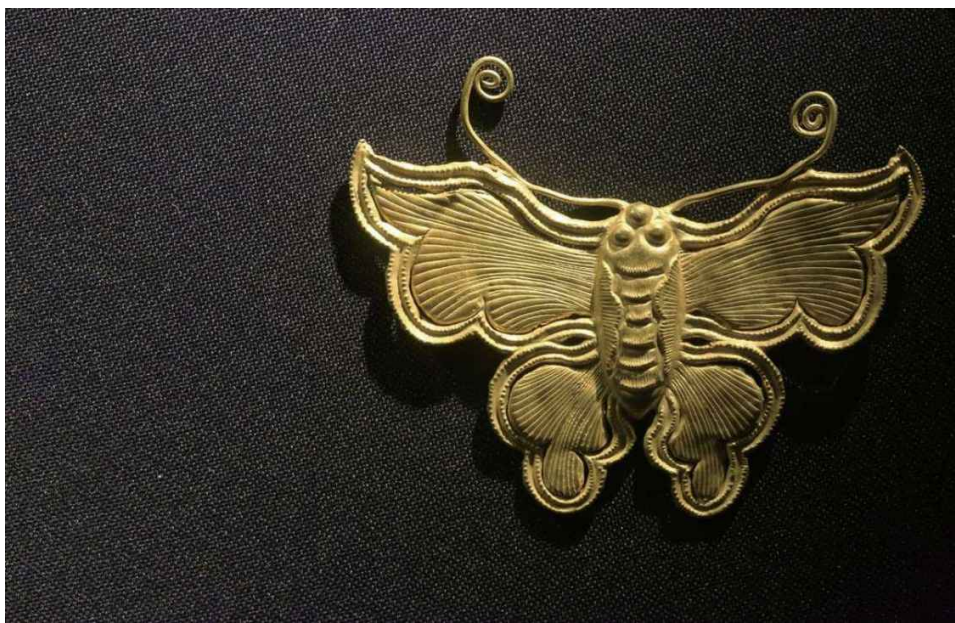
大约因为灯节的夜晚会有很多蛾子绕灯扑飞，宋时上元夜里另一项主打头饰居然是“闹蛾”，也就是各种飞蛾。史浩《粉蝶儿·元宵》云：“闹蛾儿、满城都是。向深闺，争翦碎、吴绫蜀绮。点妆成，分明是、粉须香翅。”由此可知，闹蛾是用绫绮等织物剪成，往往由妇女动用剪刀功夫亲手制作，在剪好的蛾形上还要用色彩描画须子、翅纹。这一习俗发展到明代，则是从除夕起就开始戴闹蛾，如刘若愚《酌中志》所记：“自岁暮、正旦，咸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或簪于首，以应节景。”明代宫中的闹蛾是乌金纸剪就，以颜彩添画翅纹等细部。



清 灯形金耳坠
宁夏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明~金 金耳饰
大同市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明 蝴蝶形金饰
南京市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必须明白的是，宋代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只要稍有点地位、财力，都要在头上戴各式各样的冠子，把发髻罩扣在当中。所以，闹蛾、灯球等饰物乃是插饰到冠子上，至于具体方式，是“闹蛾斜插”（杨无咎《人月圆》），飞挑在半空，人一动，闹蛾等也就会摇颤不止，那样子很是活泼。据康与之《瑞鹤仙·上元应制》：“闹蛾儿满路，成团打块，簇著冠儿斗转。”可知女性冠上的闹蛾同样以多为胜，是一簇又一簇的插戴，拥堆成团。于是成群的彩蛾围绕在“冠儿”周围，随着伊人的行动而晃颤翻飞，真像成群的飞蛾绕着灯球嬉闹一样。满街出游的妇女，个个都是一头围冠振翅的闹蛾，场面便很壮观：“闹蛾儿转处，熙熙语笑，百万红妆女。”（赵长卿《探春令·元夕》）

闹蛾、灯球之外，冠子上要插戴的小饰物尚有蝉、蜂、蝶以及玉梅、雪柳、菩提叶等。赵师侠有一首《洞仙歌·丁巳元夕大雨》便极生动地呈现道：“元宵三五。正好嬉游去。梅柳蛾蝉斗济楚。换鞋儿、添头面，只等黄昏，恰恨有、些子无情风雨。”元宵节当天，一位女性着意打扮，换上新鞋，精心插戴多种首饰，冠子上更是应节小饰物一样不少。就等着黄昏一到，如此形象光鲜地出去游街，看灯看人看热闹，也让自己的形象任旁人看。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忽然下起了大雨，没法出门，白打扮了！

吴月娘的元宵节

近年春节的一个奇葩话题是，一些乡下地方仍然延续着“不许女人上桌”的陋习。而网友们犀利地指出，这种所谓传统，其根源无非是贫穷造成的窘迫。

对于此种现象，我们也许可以参考一下《金瓶梅》中的描写，小说里展现的是明代北方城镇的市民生活，西门庆和他的妻妾虽然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社交圈子里，公认的准则是男主人招待男客，女主人招待女客，也就是“男女不同席”，而不是“女人不上桌”。

《金瓶梅》把西门庆新官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当作重头大戏，从四十一回一直写到四十六回，其间，女人们互相请来请去，正月十二日是乔大户娘子请西门庆的妻妾去吃酒，席间促成了乔家女儿长姐与李瓶儿所生官哥的娃娃亲；十四日是正室吴月娘率金莲玉楼们在家中宴请“众官娘子”——西门庆“同事”们的太太；十五日同样是由吴月娘主持，摆酒招待乔家的“皇亲”乔五太太，并且替李瓶儿过生日；十六日晚则是月娘几人去吴大妗子家吃酒看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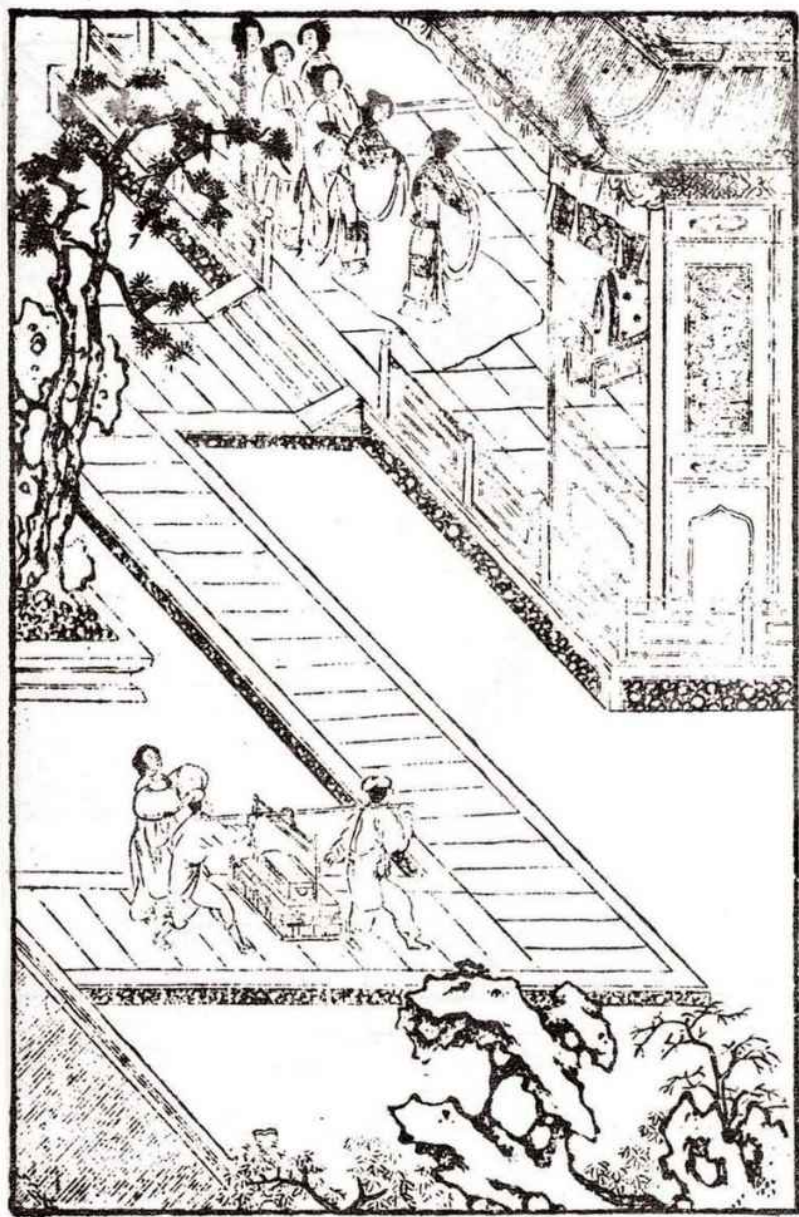


明代木刻《金瓶梅》插图“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这四场宴会的奢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其中一个细节是，这些阔太太出门吃顿饭，要有下人负责抬衣箱、女仆跟着收叠衣服。这是因为大家正式拜会时都要按照丈夫的官阶、各自的身份穿最高级的礼服，佩戴满头珠宝。这套衣冠非常贵重，绝对不能沾染污渍，又不方便行动，所以完成最初的见面仪式之后，就要立刻换一套相对轻便的衣服。吴月娘等人到达乔家，先被迎到后厅中“叙礼”，在互相打招呼当中排定尊卑次序，决定各人的座位。坐定后，丫鬟上一道茶，同时男主人乔大户露面拜见月娘，接着，这些女客就被引到房中去“宽衣服”，也就是换下礼服，另换一套华美衣裙。

这第一次更衣之后，有一道吃茶环节，主人摆出各种各样的糕点零食水果，大家喝茶吃点心。然后宾主一起入座酒席，席间有四道大菜，上过第三道后，吴月娘与孟玉楼再次离席更衣。也就是说，外出赴席一次，至少要准备三套衣服，其中两套都是由下人带到主人家后更换。

小说中，这些展开在女性世界中的宴席非常豪华，与男性的宴席一样，要请专业厨师来置办酒席、有名的戏班子来演戏、妓女来席上弹唱，在主宾之外，还要请身份相称的多位女宾作陪，摆出的席面也是十分铺张，如吴月娘招待乔五太太，吃茶时伴以四十碟茶果，酒席则是五道大菜与三道汤。当时还有个规矩，主厨会亲自来献上每一道大菜，而主宾都要当场赏赐银子，另外戏班子、妓女也都要给赏钱。可见，传统社会中的所谓“礼法”，竟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



賣富貴吳月攀新

明代木刻《金瓶梅》插图“卖富贵吴月攀新”

在吴月娘等女眷活跃于宴请之时，西门庆倒是很上心地扮演“女人背后的男人”，忙前忙后地张罗，事无巨细地考虑周到。十五日当天，众官娘子来家中做客，他甚至特意到另一处房产中去过节，把正宅让给女人们。西门庆深知，这些宴会自有意义，是当时社会中重要的社交活动，会给他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利益。瞧，吴月娘去了一次乔大户家，不是三天后就引来了乔五太太吗？“当今东宫贵妃娘娘”是这位老太太的亲侄女呢！

如果留意翻阅古典小说，不难发现不少类似的情节。在往昔的中国，上层社会、富裕地区以及城市里，大致采取类似的“礼制”，男人请男人的客，女人请女人的客，互不混淆。所谓女人只能吃男人的剩饭，根子确乎在贫穷，然而，在落后地区，虽然今天也未必缺吃少穿了，却由愚昧的人当作宗族家法来维持。贫穷并不可耻，而是人类的痛，应该由所有人一起去努力消除。由于贫穷而产生的陋习，则只配鄙弃。

宋时端午的珠符袋

最近看到，日本设计师推出了一种“福袋”项链，项链的吊坠是个金珠或银珠串成的小袋，袋里放有一颗大珍珠，这让我立刻想到了宋代端午节簪挂符袋的习俗。

说起端午节的传统，今人大多都知道要在衣襟上挂香包，但是，大约从宋代起，人们在节日这天还要在簪头系吊带有吉祥含义的彩符，叫“钗符”。苏轼有一首《浣溪沙》，描写“明朝端午浴芳兰”的佳节气象，便道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此外，宋词中相关描写很多，最有意思的是李石的《长相思·重午》：“鬟符儿，背符儿，鬼在心头符怎知？相思十二时。”——就算这些灵符真能驱邪，但藏在心里的情感，符儿猜不到，也管不到呀。

据《梦粱录》解释，《抱朴子》中有言，应该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把赤灵符挂在心前，以此祛避灾异，宋人乃是沿袭了此一风俗。从“背符儿”一词可以看出，在宋代仍有把赤符挂在身上的做法，不过，是簪在钗头的“钗符”成为主流。陈元靓《岁时广记》“钗头符”则具体解释：“端五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鬟髻之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可知钗符大多为女性自己用彩色绢罗剪成，不过，天子会向后妃、王公重臣赏赐内廷的精制品，各家道观则主动将这种瑞符送到贵宦之家的府邸上。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由道士做过法术、写有咒语的钗符是最佳选择，带在髻畔，格外吉祥：“御符争带，更有天师神咒。”“双凤钗头，争带御书符。”（《岁时广记》引宋人词句）“玉燕垂符小，珠囊结艾青”（崔敦《淳熙七年端午帖子

词》），端午时分，女性或垂钗符，或簪符袋，也或者将两样小饰物同时系于髻畔，成了节日里最迷人的细节之一。这一风俗一直流行到明时，符袋简化为纱罗制成，内里安放道家符篆，如明人高启即有《钗符》诗云：“灵篆贮纱囊，薰风绿鬓傍。从今能镇胆，不怯睡空房。”与之形成印证的是，在北京定陵，万历皇帝的皇后之一——孝靖皇后入殓时，发髻上便插有一支银簪，梅花形簪头上串着一个长2.1厘米、宽1.5厘米的小纱袋，袋内装有朱砂，考古出土时沙袋依然完好。这很显然正是明代符袋的实物遗存。

很有意思的是，在宋代，端午节饰中还有一种叫作“道理袋”“搐钱儿”的小袋，是用红白两色绢罗做成一个开口小袋，“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岁时广记》），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抽绳荷包，但特意在拉紧抽绳时，让收束的袋口褶皱得如一朵花。这种红白两色的小荷包，如果其内装入稻米和李子，就是“道理袋”，否则就是“搐钱儿”，“或带，或钉门上”。当时有端午词描绘一位时尚女子的节日打扮，即包括“香袋子，搐钱儿，胸前一对儿”。



明 孝靖皇后发髻
定陵出土
(摄影：动脉影)



南宋 珠袋与金钗
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
(摄影：动脉影)

很可惜，这些有趣的风俗细节在今日已基本消亡。倒是日本的首饰设计师设计出的福袋吊坠，反而无意间再现了中国古代符袋的韵味。

醒骨纱与芙蓉布

欣赏传统诗词，时而会读到关于“试衣”“换衣”的描写，如李清照有“乍试夹衫金缕缝”之句。原来，古人随着季节的转换，会有规律地换穿面料不同的服装，“试衣”是指初次试穿为新季节预备的衣服，“换衣”则是说，随着季节转换，服饰也要来一次彻底的变更。“试衣”“换衣”虽然属于生活琐事，但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年光流转，世事匆匆，所以每每见诸诗词，文人借之抒发或喜或悲的感怀。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个风俗，端午节这一天固定成为全社会集体换穿夏季服装的日子。因此，一直到宋代，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之一都是试穿夏衣，这一天，宫中要向皇帝进献夏季御服，皇帝也要赏赐群臣用特定面料制作的清凉服饰，民间则是全体都在这一天收起春装，改穿适合新季节的、轻薄料子裁制的衣裙。

夏服所用的面料一定要透气、透汗，所以以蚕丝织成的纱和罗为上选。不过，在唐宋时代，利用纱、罗裁成的夏季服装有个专称“生衣”，与之相对的则是其他三季所穿的“熟衣”。生衣与熟衣的区分在于加工程序不同，熟衣采用绫、绮等厚实织物，要刷上粉浆，再用石杵反复捣打，称为“捣练”。经过这种处理，织物更会变得经纬紧密、厚而不透风、质地结实、不易脱丝，做成衣服也就更为保暖，并更耐磨耗。相反，生衣免去了捣练的环节，经纬较为稀疏，形成透气的孔眼，因此散热的性能良好。白居易就有《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一诗，形容他送给元稹的生衣是“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袴薄于云”，长衫与裤子都是采用丝

织的轻纱，如雾如云。注意，如此精美的纱衣并非女子的专利，男性也一样可以享受，白居易所寄的生衣就是专门为好友元稹定制。

杜甫著有一首《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诗中说，端午这一天，他作为百官中的一员，享受到获赐精美夏服的福利，对圣恩充满感激。出于皇家工坊的夏衣中既有丝织的轻罗，也包括细软的葛纱。这就触及一个重要的历史情况，即，在丝织物之外，各种利用植物纤维制成的软纱，同样也是重要的夏季面料。

《天工开物》中专辟“夏服”一节，介绍苧麻、葛、苘麻、芭蕉所成的纱、布，可见植物纤维对于夏季面料来说意义重大。其大致工艺是把植物的茎皮加以剥析，分出一条条细细的长丝，再捻成线，作为经纬加以纺织。



明 香色麻飞鱼袍
山东曲阜孔府博物馆藏

麻、葛、芭蕉织纱的历史都很长。据《清异录》记载，在五代时，江西临川、上饶的巧匠还创制出把芭蕉茎丝与蚕丝捻在一起形成长丝的方法，然后用这种合成的长丝织就轻纱，“夏月衣之，轻凉适体”，于是得到一个清新的名称“醒骨纱”。当时的时髦人士用这种蕉纱做成样式典雅的长衣，称为“太清氅”，相应的，短衫则叫“小太清”。

《广东新语》在葛、麻之外，还提到用竹皮、木芙蓉茎皮析丝捻线织成的细布，称为竹布、芙蓉布，同样适于做夏服。另外，苏州一带出产一种“黄草心布”，是将一种“黄草”的梗芯析丝捻线，织成品几乎如丝罗一般洁白精细。自宋至清，黄草布在江南一直持续生产，始终是倍受青睐的夏季专用面料，不仅裁作衣装，还可缝制蚊帐、充当糊窗的窗纱，甚至被用作灯笼上的罩纱。这些记录今天听来显得颇为奇异，其实正反映出，古人在开发植物纤维一事上经验丰富，非常善于调动自然资源，提升生活的品质。

无论纱、罗，还是葛纱、蕉布，因为质地轻薄，所以都是半透明的状态。人们在家闲居时，会直接穿着以如此料子制作的服装，像《金瓶梅》中就写道，盛夏之日，李瓶儿上穿白银条纱衫，外罩大红蕉布坎肩，下穿大红纱裤，其外围一条带有金线绣花纱裙。结果，日影一照，不仅红纱裤映现在裙色中，更能透过裙、裤的两重纱色清晰看到她的一双玉腿的轮廓以及雪白的肌肤。

一旦身处郑重场合，当然不能穿着如此透漏，因此，在往昔，即使炎夏，无论男女，逢到办正事时，都要在华丽的纱衣下衬穿一套密实衣料做成的袍服，以此避免暴露身体。这种风俗固然难免令穿衣人汗流浹背，不利于祛暑，但视觉效果却华丽典雅。据说，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曾命人用各种彩色绢罗剪成花

叶，缝到纱衣的面上，形成精美的花鸟纹样，然后在纱衣下衬以色彩既具对比又不失和谐的长衫，里外虚实相生，让层次感更为突出。

其实，田贵妃的做法并非多么出奇，在往昔生活中，不仅女性，上层社会的男子一样善于玩转里外两层服色互相映彩的游戏。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万历时，宫中大太监们不守礼法，夏天逢到先帝的忌日时，外罩颜色沉素的青色或油绿色纱袍，却在内里再衬穿一道玉色素纱袍，让浅蓝的纱色在青绿纱下泛映出来，按照当时的观念，实为大不敬之举。

总之，古代的中国男人闷骚得很，夏季穿官服或者礼服，都是一层衬服之外再套穿轻纱袍服，纱影翩翩，映在内衬的衣色上，让各种或织或绣的华丽花纹更加鲜明绚丽。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去宫中上朝，去参加士大夫的聚会，塑造着传统社会独有的奢侈与典雅。



清 石青暗花纱袂服与龙袍罩穿的实物搭配
沈阳故宫博物馆藏



清 佚名 《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像》
山东曲阜博物馆藏

七夕赛巧斗穿针

七夕是传统的女性节日，这一天的主角为年轻女性尤其是未婚少女，因此也叫“女儿节”“女孩儿节”。随着时代与地域的不同，七夕节这一天开展的活动也有着多种的变化。不过，其中有一项竞赛性的游戏自始至终延续不绝，永远属于节日的中心环节之一，那便是“月下穿针”。

《西京杂记》中讲述道：“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依其说法，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夜晚女性们聚在一起比赛穿针的风俗，包括宫廷中都年年开展这一活动。另外，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明确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由此可知，这一风俗至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确立，甚至可能上溯到汉代。

“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士民之家皆效之。”（《开元天宝遗事》）“向月穿针易，临风理线难。”（唐祖咏《七夕》）七夕穿针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月光下进行，也就是说，特意避开灯光，没有人工照明的帮助。一如近人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一书中介绍清宫乞巧活动时所言，在夜月下穿针，光线过于模糊，其实根本不能依靠目力，“全凭感觉”，凭的是大家在日常女红劳作中培养起来的灵敏手感，依靠手指对针与线的极度熟悉与超常掌控力来完成引线入针的动作。所以，这个活动类似现代士兵蒙起双眼拆装枪支的训练，实质是检验年轻女性们的女红水平，并且是通过穿针这个一切缝纫工作的最初步的环节来展开测评。

中国古代女性在针线功夫上的精湛也着实惊人，自小学习女红的年轻女孩子们显然大多能自信地参与七夕穿针比赛，并且顺利过关。自南北朝至唐代，人们会在节日前特制七孔针、九孔针、双眼针等，这些只为七夕预备的针具往往以金银为材，针身上排列多个针眼。比赛时，参赛的女伴们按照约定的规则，在一枚多孔针的每个针孔之内各穿入一条不同色彩的丝线，然后还要“连针学并蒂，萦缕作开花”（徐悱妻刘氏《答唐娘七夕所穿针》）——把两枚多孔针的彩线彼此结在一起，再打出精致复杂的花样。这一在昏暗中进行的高难度游戏必须于规定时间内完成，以速度快者为优胜，然后还要从线缕是否匀整、结出花样的难度与巧意等各个方面来进行评定。



清 吴友如 《海上百艳图》之“针穿七孔”

到了明清时代，不再流行多孔针，改用普通钢针，要求参赛者先为一组十根细针一一穿入细线，再为一组十根粗针分别穿入粗线。关于清代七夕之夜女孩子们的“赛针会”，《宫女谈往录》一书有生动细致的讲述，读来温暖动人。

从汉代以来，将近两千年里，中国女性能够在月下“盲”穿针线，“盲”打花结，一如现代士兵蒙眼拆装枪支的娴熟与快速，说起来真是了不起的奇迹。传统女性一向被标签为“大多不识

字”“没文化”，其实，经过一代代的训练与传承，她们在某些“物质文化”领域如女红、烹饪上个个都是特种兵的水平，只是其成就遭到无视而已。

素馨花艇渡七夕

“七夕悬素馨灯乞巧。”明末文人黎美周《花底拾遗》里如是写道。这一条可不是无中生有的空想，而是反映了作者家乡广州的真实风俗，通体缀满素馨的花灯，为明代广州的夜晚营造着风情，更将这个城市的节日点缀得分外绮丽。

素馨花又名大花茉莉，花朵白而细碎，香气浓烈，但带有清寒的韵味，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因此从宋代起就是制作香品、化妆品的重要原料。这种花远从波斯（今伊朗）移植而来，自宋至明，广州城外一直有大片的素馨花田，形成了专业的种植基地。于是，广州人可以非常奢侈地随意使用素馨花，结果是这种香花一度成为广州的城市生活中异常活跃的因素。

文献记载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素馨灯，《广东新语》记载道：

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龙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葳蕤，间以朱槿以供神。



清 居廉《十香图册》之“素馨”
香港艺术馆藏

当地有专门擅长制作这种花灯的匠人，他们用铜丝串连素馨的花朵，编成鸾凤、翔龙、飞禽、游鱼等复杂造型的立体灯笼，一旦在其中点上蜡烛，倒像是寒冰或白玉雕镂而成的玲珑工艺品在发光，随着光焰一起的，还有不绝的花香，二者携手悄然冲击夜色。平日，当人们夜晚出行的时候，会把素馨灯挂在车轿上，或者由仆役提着这种花灯走在车马前引路。一旦逢到元宵、七夕、中秋三大节日，素馨灯便要扮演装点节日气氛的重要角色。

更为美妙的是，七夕时，人们还为女孩子们特意扎制“素馨花艇”：

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

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

在明朝的广州，七夕这一天的晚上，未婚少女们要举行“七娘会”，聚在一起乞巧，然后在海珠、西濠或沉香浦乘坐“素馨花艇”，于水面上纵游。素馨花艇非常神奇，为了模仿传说中的“星槎”，一律采用尾部翘起的“高尾艇”，艇上不仅有素馨灯，还需“芳蕤作幄”，用无数素馨花串成的长流苏在艇上纵横垂挂，密集如同帐帷。因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花艇”，船体遍覆雪白的花络，周沿则是冰玉般的花灯流光吐麝。

据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曾经有敢于冒险的人登上在海上漂浮的“仙槎”（槎即木筏，传统艺术中总将其表现为尾部翘起的形式），向着大海深处一路航行，最后竟然驶达天上的银河，遇见在河边牛饮的牛郎。广州人将这一古老传说融入七夕节日的内容之中，每到佳节将近时，船家会在高尾艇上搭起篷架，“翠羽为篷”——篷顶完全用孔雀的翠尾覆盖，形成一座碧羽结成的华帐，周围以素馨茉莉的流苏长络装点，再垂吊冰玉般的素馨灯，同时也会点缀一些用茉莉花串成的茉莉灯。在那个时代广州人的想象里，传说中的“星槎”就该如此华丽，然而，这般神奇的船儿即使天上也不会有啊！

黎美周是地道的番禺人，对于素馨花在当时生活中的作用无比熟悉，他著有《素馨赋》，其中描写“双七之宵”为：

则芳蕤作幄，新月如钩，海上载求仙之童女，水际排乞巧之高楼。灿明灯于重檐，俨列冕之垂旒，何玲珑之雕玉，

覆火齐而作舟。总贯蘖之所为，若镂冰而笼篝；布经纬以如意，象禽鱼之优游。恒有香以避暑，纵无声而知秋。

在赋文的描写下，七夕时沉香浦等地的场景真是辉煌而奇妙，不仅花艇，沿岸并肩连幢的高楼也悉数以素馨花装饰。人们把素馨花灯连成长串，一条一条地垂挂在这些楼房的屋檐下，看上去仿佛帝王冠冕上的珠旒成排，以如此的方式，让水畔的居民楼在当晚化身成乞巧楼。女孩子先在这些为素馨花香笼罩的楼阁上开展乞巧活动，拜织女星、穿针、看水碗中浮针的映影……然后结伴转移到溢放着素馨灯、茉莉灯的光与香的素馨花艇上，乘着花艇在水上泛游。

当花艇纷纷启行之后，广州一定是那一刻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沿岸的楼阁上垂着鲜花灯笼的成排流苏，水上则是无数垂挂着花灯的船艇来去悠游，一起明亮在经素馨花香洇透的夜色里，彼此互相成为观赏的对象。远远看去，仿佛有无数传说中的大夜明珠“火其珠”绕舟缀挂，再一定睛，却原来每只花灯都具有奇巧造型，这个是鱼，那个是飞禽，又一盏呈龙形，再一盏为鸾凤，让人幻觉众多的珍禽异兽浩浩荡荡出行，在花香洇透的夜色中浮游。

灯光自雪白的香花间泄出，照亮了花艇上的翠篷，篷下华服盛饰的少女结伴并坐，真的仿佛一艘又一艘载乘着仙女的仙槎正横渡银河，仿佛一颗又一颗漂浮高天的明星投射在人间的映影。幻想中的银河仙境，经由广州人一代又一代持续的集体创作，就这样呈现在凡间。



清 象牙镂雕小船
故宫博物院藏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这些“星槎”的模拟物带有巫术的性质，是一座又一座活动的“鹊桥”。水面上有许许多多的“鹊桥”渡来渡去，似乎天上也会有所感应，于是牛郎织女能够更容易地渡过银河，一夜团圆。人就是这样天真和优美，会用一种比拟式的行为，来化解自己幻想出来的不幸。牛郎织女的传说喻示的其实是人类自己制造给自己的困境，广州七夕让少女们集体乘坐星槎充当鹊桥使者的风俗，则是展现解决这种困境的愿望与努力。

到了中秋节，素馨灯、茉莉灯虽然不如七夕之盛，但也是处处悬挂，而元宵节则是素馨花灯争奇斗艳的又一个日子，家家户户都要悬挂这种花灯，匠人们也着意将灯的造型塑造得生动多变，“白麟雪狮，翠凤玉龙”，白花装缀的各种飞禽走兽的花灯玲珑逗人，轻垂在门前檐下。同时，一些重点建筑上还要垂挂无数素馨花的流苏长带，以致在节日之际竟如“琼岛之雪宫”。

非常可惜的是，入清以后，广州的素馨花种植业逐渐衰落，

于是，这座城市也不复有素馨花灯浮光流麝的夜晚，不复有素馨花艇在水上争游的七夕之夜。

红
妆



辞岁小葫芦 迎新梅花妆

《红楼梦》里，刘姥姥曾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在清代，一旦春节将临，普通人家包括乡村农户都要买些年画张贴在家里，营造喜庆气氛。由于近年来一直把年画当作重要的民间艺术来宣扬，所以大家往往对于这一风俗有些印象。可是，贾府的老爷公子、太太小姐们，逢年过节，他们各自的房中是否也会挂画？挂的又是什么样的画？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人反而不太了解。

其实，传统上层社会的居室布置十分讲究，各种形式的绘画作品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现代人家中一旦在墙面上安设好画作或照片，或许一两年甚至几年不再变动，这在古代的讲究人士那里可行不通。在往昔的富贵府邸、士大夫园林内，装饰居室的绘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年四季不断更换，在各个季节，在每一个节日，都该张悬和主题相呼应的画作，与岁月的流转合拍。

这些画作可不是印刷的年画，而是由画家用心绘成的独创作品。最受推崇的是前代流传下来的传世珍物，其次则是当代名家的精彩之作。很有意思的是，上层人士买画大多采用“定制”的形式，以相应的银两聘请士大夫画家或职业画工，讲定需要的尺寸以及大致的主题，然后由创作者在预设的前提下尽情发挥。也就是说，出现在室内的每一幅挂画都是真正的艺术品，体现着居室主人的修养品位。

明代专门讨论文人园林设计的《长物志》一书有“悬画月

令”一节，列举了每个节日相衬的主题。如除夕、元旦时悬挂福神或者古代先贤像，正月与二月则以表现春游仕女、梅花、山茶等呼唤春天的画面为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梅花仕女图》，相信任何人看到都会被画面上奇妙的情节打动：在傲寒的梅枝下，一位年轻女子亭亭玉立，一手持镜照向自己的面容，另一手的食指点向她额间的一朵五瓣梅花的花影。如此清雅的画面，可能很难让人想到，它正是一幅用于正月悬挂、喜庆新春的主题绘画。

这幅画巧妙地采用了脍炙人口的“梅花妆”故事：在某一个“人日”——即正月初七，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含章殿的庑檐下小睡了片刻，结果居然有一朵梅花落下，恰好坠至公主的额头上。待公主醒来，却发现这朵落花居然贴在了自己的额头，拂拭不去，直到三天之后才被洗掉。奇迹轰动了整个皇宫，妃嫔宫女们都觉得眉心有梅花影迹的公主实在美丽，于是纷纷用绢罗剪成小花片贴在各自的额头上，由此形成了“梅花妆”。



元 佚名 《梅花仕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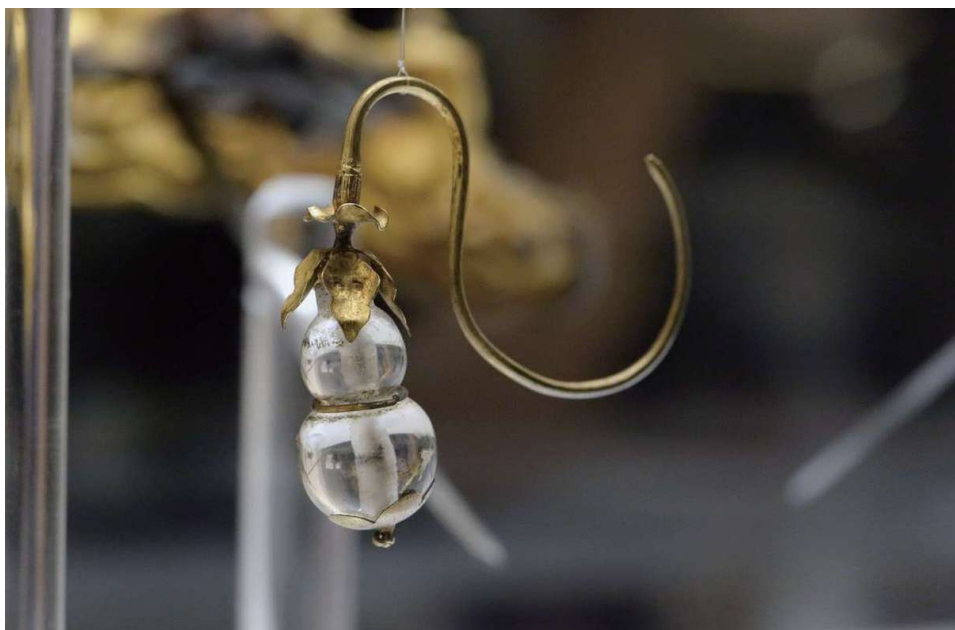




明 金玉葫芦形耳坠
上海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此画的作者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古代职业画家，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一个故事，呈现了正月与二月的固定主题——“春游仕女”与“梅”。此外，故事发生于正月初七，这就更为具体地将画中的时光定位在“春节”。这位画家还在树畔填画两簇水仙，此般娇美花卉是春节时的典型风物，同样给观看者“过年”的暗示。画中还有一个小细节，现代观众很难注意到，也就不容易理解创作者当初的用心——仕女的耳上挂着一只小葫芦耳环。元代开始出现了小葫芦形耳坠，并且广为流行。到了明代则形成固定风俗，每一年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女性们都会佩戴各种样式的小葫芦耳环，另外，无论男女，插冠、挽髻的簪钗上也都要挂个小葫芦作为垂饰。葫芦谐音“福禄”，也象征长寿、多子，因此，年年岁末，大家都要佩戴小葫芦做的首饰，或者穿着带有“大吉葫芦”纹样的华衣，以此寄托祈福纳祥的心情。

不过，小葫芦垂饰不管多么精美，也只能佩戴到正月十三日。一旦元宵节来临，耳坠、钗坠都要改为各式小灯笼。所以，对于明清人来说，一看到小葫芦耳坠，就会自然联想到辞旧迎新的日子。《梅花仕女图》的作者正是利用了当时人的习惯，不露痕迹地将明代辞岁的风俗引入笔下，也让画面上出现了福禄、长寿、子孙兴旺的象征。



明 金镶水晶葫芦形耳坠
上海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梅之意义在于“占春前消息，腊后风光”（宋人王安礼《万年欢》），是报春的使者。花期早者在腊月将尽时即开，如宋人李德载《早梅芳》所吟：“残腊里，早梅芳。春信报新阳。晓来枝上斗寒光。轻点寿阳妆。”因此，画面上的梅花与小葫芦耳环、水仙恰好在时序上一致，均从腊月下旬即开始活跃。由此可见作者何等的苦心设计，让手下作品完美地符合其用场，完成其任务。

报春也好，福禄也好，都是很俗气的贺岁主题，但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将这些元素不露痕迹地带入笔底，创作出的竟是一件意境高洁的作品，让观者只会产生“玉人独幽”“不染纤尘”之类的感受。不再熟悉往时风俗的现代观众，会完全无法察觉这一画作的功力目的，只看到梅花姿清，伊人纤立，一个毫无烟火气的场景。该画作者的才情与格调，着实令人起敬。

总之，非常明确的是，对于往昔上层社会来说，这是一幅专门在腊月下旬到正月上旬悬挂于室内的绘画。由此可以想象，即使在一年之中最为热闹的时节，有教养人家的室内仍然是多么典雅的气氛，一切布置一方面随分从时，合着整个社会的节拍，一方面依然气质不坠，没有小户人家喧闹的花花绿绿。想来，怡红院、秋爽斋等处，甚至贾母房中，年年新春时的室内挂画就会是这一类水平的佳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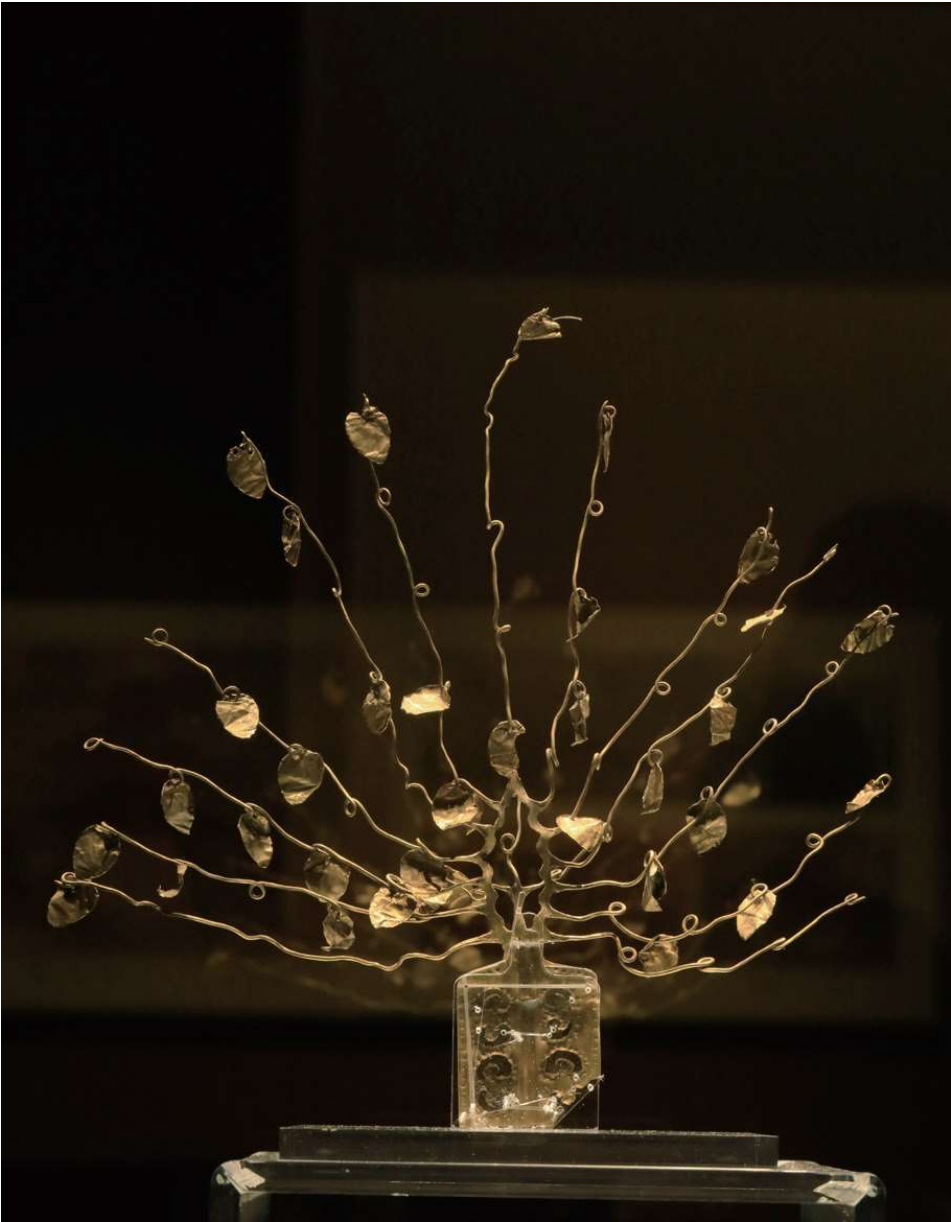
韶光悄随玉步摇

古人喜簪花，是往昔时光的美好记忆之一。然而，不仅鲜花，玲珑小巧的水果也一样会构成女性的鬓边风情。新果初熟之时，选一对并蒂果，亲手做成步摇的垂坠，在唐宋时代，曾是闺中饶有情致的风气。

当一位中国古代女性将形形色色的头饰装点云髻之时，步摇是绝对不可缺席的主演明星。东汉刘熙《释名》如此定义：“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因为簪头垂有珠子串成的挂络——或称流苏、挑牌，会随着插簪人的行动不停轻摇，于是名之为“步摇”。历代艺术表现与出土文物中，带有串珠流苏的花簪现影的频率极高，这些步摇在造型、纹样组合乃至寓意上的缤纷多变，灵活无定，显示出中国古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及创造上的高度自由、不受拘束。

步摇中，最常见的造型为钗头嵌接一只金、玉、水晶的凤、鸾、雁等飞禽，呈展翅翱翔之姿，鸟喙里垂下珠串流苏。金或玉的花朵、云头昂起在钗端，其下悬吊坠饰，也是广受喜爱的流行款式。不过，古代的簪钗取材广泛，简直没有任何约束，匠人们兴之所至，几乎能将一切物件转化成钗花的主题。其中，采用戟、钺、锤等兵器之造型的花簪，大约尤其衬出我们今人在饰物设计上的缺乏胆量，如《儿女英雄传》里就写道，安太太“戴着一枝方天戟，拴着八颗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的小挑（即小珠串）”。此外，僧人使用的带环锡杖，仪仗中使用的挑杆，甚至龙头拐杖、竹杖，也一一化成秀簪，飞上女性们的乌髻。明代定陵甚至出土了以金铸、玉琢的乌龟为钗头花饰的步摇，显然是寓

意长寿，乌龟的龟甲以宝石或圆珠嵌就，口内衔着宝石串成的短挂络，憨态可掬。



晋 花树状金步摇

辽宁省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唐 银凤鸟形簪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摄影：动脉影)

至于吊在这些千姿百态的步摇钗下的流苏，那就愈加的随心所欲，活泼多趣，成了人们尽情挥洒才气的舞台。突出佳例为现藏首都博物馆的一件清代累丝凤鸟纹步摇，凤喙所衔竟是一只金质鹦鹉笼，笼架上立有鹦鹉一只，足扣金链，甚至不忘将一对鸟食罐分置两旁。试想一位女性的髻侧始终有个袖珍的鹦鹉笼不安分地悄晃，任谁看在眼里，也要被逗得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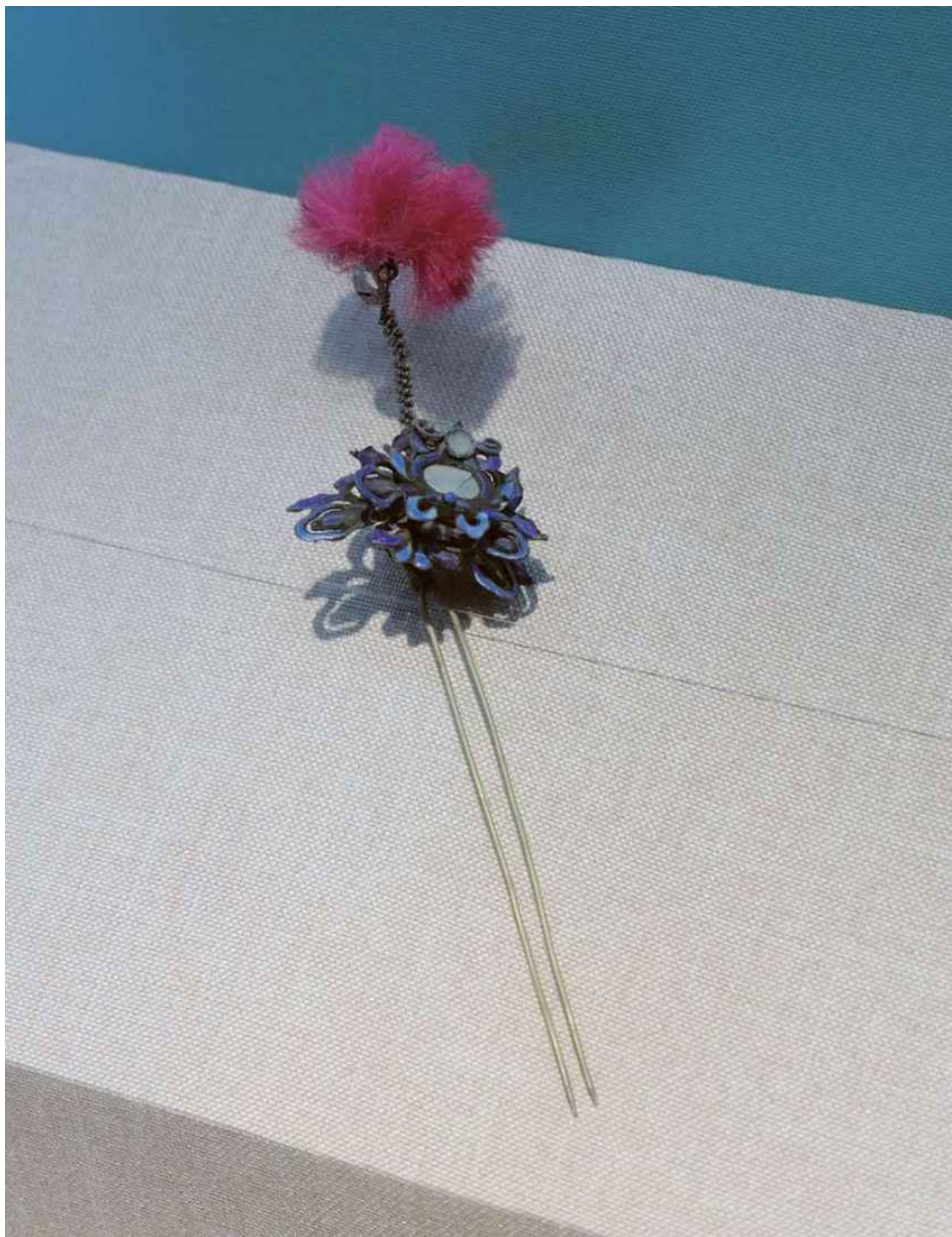
同样迷人的乃是朱家潘《故宫退食录》中所记往事：他的夫人赵仲巽有一位被下人呼为“五老爷”的女性长辈，善于培种袖珍葫芦。有一次结得了一个长仅三分多的小葫芦，赵仲巽就出主意，到玉作坊定制一根竹杖形的碧玉簪，然后由金店打一条赤金绦带，一端以圆环套在小葫芦的腰处，另一端挂于碧玉簪头，由此形成一个带小葫芦坠的独特玉步摇，将苏东坡“杖头惟挂一葫芦”的诗句予以形象化的再现。这则记载可谓显示了传统“高级定制”的雅与奢，顾客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让玉作坊、金店打造只此一件、别无重复的首饰。店家会有各种现成主题提供给顾客，如以飞雁为钗头花，意味着“雁塔题名”，适合夫或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女性主顾。不过，文化修养高、富有艺术才华的人士往往自行设计步摇的纹样与寓意，然后交由珠宝工匠依式巧造。



清 簪子
山西民俗博物馆
(摄影：动脉影)



清 凤鸟金簪
首都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簪子
山西民俗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并且，女性们也不肯完全依赖匠人。她们擅长女红，心灵手巧，所以时常利用各种成本低廉、宜于操作的材料，自己动手串制吊坠，缠挂在簪、钗头上，这样让鬓边风光不断更新，永不呆板。如果一位女性祈求早日生子，往往会将金、玉乃至犀角、玳瑁材质的花钱^[1]挂在钗头，据说这种花钱有“宜男”之兆。清时，北京的花市出售一种红丝球，茶杯大小的球体内涵有一个小铃，女性们就非常时兴买入这种红丝球，然后亲手将其吊在钗头。于是，艳红的球儿在半空晃荡，映得粉面愈加娇艳，同时球中的小铃轻轻发出清响，女性那样行来的时候，一定别有一番风韵。

实际上，随着季节的变化，节日的轮转，女性们需按习俗在钗头缠吊各种带有相应主题的坠饰，这使得她们的髻畔鬓边一点不会单调，新颖的小饰物依次显影，韵味悠悠——

正月十五元宵节，吊坠应由“灯球”即小灯笼组成。女性把这些小灯笼挑在钗头，形成独特的上元节专款步摇。

立春时，则悬挂金箔、银箔或彩帛、彩纸剪成的小幡条，成簇飘在钗梁下的幡信随轻风舞动，让大家更能产生春意将至之感。

春天到来，百花盛开，此际时兴在钗头挑戴小花篮，以此应和当前季节的特点。

端午节时，绽放在钗头的小饰物更是热闹。其中最不可少的是符袋儿，袋内盛有道士施过法咒的符篆与朱砂，据说可以避邪。宋代的高档符袋为珠袋，用金丝或银丝串系珍珠编成，实为精美的工艺品。非常珍贵的是，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真的出土了一枚宋代珠袋，袋内有朱砂包，用银丝挂在一支金钗上，就插在墓主周氏的头部。

就在这一“随手自制主题型步摇”的传统中，聪慧的女性们开

创了将小巧果实吊上钗头的做法——唐宋时代，女性还时兴把一些小巧的鲜果直接挂到钗头，包括梅子、青杏，以此方式庆祝春去夏来，果实成熟。当时荔枝属于高档水果，于是荔枝上市之时，钗头挂荔枝也成了时尚。有个闺中约定俗成的规律是，无论是挂哪种果子，一定要取并蒂的小果作为吊坠，以此祈愿美满和谐的婚姻归宿。



清 锡杖花篮金簪
宁夏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元 金镂空荔枝簪
湖南临沅元墓出土

由于荔枝谐音“利市”，又恰在端午节时上市，所以，在宋代，女性插戴垂着成双荔枝的“自制步摇”，变成了端午节的固定风俗之一。宋人李石以《长相思》词咏“重午”即端午，便描写道，一位佳人在这一天不仅鬓边斜挑着“钗符儿”——避邪的符袋儿，同时还以“钗头双荔枝”傲人。

闺中生活的这一类琐细内容，当然很容易地就被后人遗忘了。于是，古代女性钗头的轻盈悬荡，也就无法流传下来，转化入今日时尚设计。

[1] 花钱：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自娱自乐的玩钱，具有钱币的形态，但不作流通使用，是具有钱币形态的辟邪品、吉利品、纪念品。

同心结

同心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大约都会在心里存一分好奇。

明人王圻《三才图会》有“魂帛图”，其中介绍“结帛式”为：“用白绢一匹，结如世俗所谓同心结式。”配图则展示为：把一条白绢从正中对折，在近对折处打出一个结。这个结的编制显然需依循特定技巧，能同时在结的两边各挽成一个装饰性的圈环，两环的大小与形状均形成对称。依书中说法，这样的结就是“同心结”。

苏州南郊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出土有一条绸带，是将经过裁剪缝制、两端呈剑形的白绸对折，并在近对折处接连打出两个结，这两个结的两侧均带有对称的圈环。如此的形制恰与《三才图会》所示“魂帛”之“结帛式”相近，不同处仅在于打了双结。因此，曹氏墓所出绸带应该正是一条“魂帛”实物。那么，这条魂帛上的结，也就是古代同心结的实物标本了。

曹氏魂帛上的同心结，不仅带有对耳式饰环，而且中央的实心结被精心打成“田”字形。一旦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在出土以及传世文物中，如此中心打成“田”字形、带有对耳式环的花结出现频率颇高。由此或可推论，标准的同心结，乃是此类通过固定打法形成“田”字结心、且带有对耳式环的花结。



元 百结衣带
苏州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汉晋时代的贴金香囊，以缝缀在囊腰的四条飘带打出一双同心结作为垂饰。新疆尉犁营盘出土。

南朝梁武帝《有所思》一诗有句云：“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说来让人惊奇，现代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亲见甚至比梁武帝的诗句还要更有岁月的同心结实物。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三十号墓出土有一件汉晋时代的“镂金”锦香囊，该香囊有四条长飘带，每两条相绾在一起，打出一个标准的同心结，这样，就在香囊两侧形成一双对称的、饰有花结的流苏飘带。另外，新疆尼雅墓地出土的一件汉晋时代锦缘毡帽残件，则是在帽的尾部垂一对

长带，带上打出同心结。由此看来，早期，同心结被用在服饰、器物的饰带之上。

不过，据《隋书·后妃传》记载，杨广曾“遣使者赍金合子，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宣华）夫人”，“见合中有同心结数枚”。这里出现的同心结竟是独自成件，不附属于任何他物，并且一送就是好几枚。河南偃师杏园唐李郁墓出土有一件银盒，盒盖上的主题纹饰居然是一个用两束长丝编成的独立的同心结。相比汉晋香囊、帽缘上真实的结饰，银盒盖上的这一图案有着远为复杂和精巧的组织结构，甚至串有一颗心形的珠子或宝石。此般线索显示，到隋唐时代，出现了独自成件的同心结，这种同心结并非依附在服饰、器物上的装饰细节，而是作为一件单体的工艺品加以设想、编制，其上有时甚至贯穿珠宝，实际上成了贵重的饰物。也只有这样的精美小玩意，才可能在一个小金盒里放入数枚，送到意中人面前讨巧卖乖啊。

辽代陈国公主墓中，更是进一步出现了以玉材琢制成的、高度图案化的同心结。这一玉同心结长6.5厘米、宽4.1厘米、厚0.6厘米，被作为一组玉佩的“花题”，下侧环带上系有五条镀金银链，每条银链末端吊有一件玉坠。可见，同心结在长期流行当中，还演变出以玉、金等珍材制作的形式。因此，古时多情男女互相赠送的同心结，有时会是这类金鍤玉琢的饰件，而不必然是丝穿带绕的软结。

至于以丝、带打同心结的方法，似乎日本人武内元代《实用系结大全》中介绍的“总角结”颇可作为参考，后者与前者的形态完全一致。不管怎样，对于古人来说，同心结的编结是会者不难，几乎个个都熟练掌握其打法。所以，逢到需要告白的场合，含情的男女往往会临时起兴地打个同心结，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一腔深意。欧阳修《武陵春》“金泥双结同心带，留与记情浓”，便

是女性以发带、衣带一类私密物件打成同心结，送给中意之人。再如《初刻拍案惊奇》之《乔兑换胡子宣淫》：“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拨他一撩拨，开了箱子取出一条白罗帕子来，将一个胡桃系着，绾上一个同心结，抛到女子面前。”《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赵县君乔送黄柑》：“中又有小小纸封，裹着青丝发二缕，挽着个同心结儿。”



辽代陈国公主的玉坠领，用一枚玉雕的同心结作为花题，系着五条鎏金银链，每条链的末端吊一只禽鱼玉佩。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传)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细部之一
大英博物馆藏

另外，据说有一种“流苏髻”，乃是将同心结引用至发式设计中的结果：“轻云鬓发甚长，每梳头，立于榻上，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丝效其制，亦自可观。”（《谢氏诗源》）名叫“轻云”的巧慧女性头发特别浓密，无法全部绾入髻中，每次盘髻之后，总是会在左右各剩出一指粗的发绺。于是她想到把每束发绺分成两股，编出一个同心结，再装饰上珠宝，然后任余绪自然地垂向肩头。髻的两侧各有一道带花结的乌丝垂下，恰如流苏飘带，于是叫作“流苏髻”。这一巧创引发了跟风，其他女性没有那么多的头发，便以黑丝线作为假发，制成垂在髻子两侧的黑丝流苏。

不知是否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流苏髻”的风行。反正在弄清同心结的具体形态之后，至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心海里完成流苏髻的可能的美丽。

莫琼树与蝉鬓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妆容中，双鬓曾是极受重视的焦点之一，传统观念认为，造型轻灵娇俏的乌鬓足以最鲜明地传达女性的性感，唤起异性的注意力与兴奋情绪。

因此，女性们也就格外着意于双鬓的塑造，漫长的历史中，乌鬓的形态因而多种多样，幻化灵奇。如果仔细观察古代艺术中保留下来的相关线索，其实很可以为今天的时尚设计增添灵感。

著名的《列女仁智图》便展示了一种奇特的假鬓，是末段为方头的长长一条，大约是绢帛制成，犹如一对飘带轻垂在颊旁，长度约略至肩部而止。妙的是，这一条飘带式垂鬓在向外一侧采用发丝的乌黑色，向内一侧却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浅色，故意要让旁人看出这是人工制物。随着女性的动作，这一对垂鬓会晃动飘飞，于是，内侧的浅色一面时时翻转过来，显露在外，大概就是在刻意寻求如此双色不断变动的游戏感。

到了《女史箴图》中，这种假鬓转变为长长的一缕乌丝，下垂过肩，末段往往形成分绺。《列女仁智图》与《女史箴图》相传为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但原稿的创作年代其实更早，出现于东汉到魏晋时期，因此，这两卷伟大经典中呈现的，乃是东汉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晋的鬓发时尚。



(传) 晋 顾恺之
《列女仁智图》细部
故宫博物院藏



(传) 唐 张萱
《虢国夫人春游图》细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代崇尚奇诡多变的“时世装”，鬓样的形态自然也是肆无忌惮，异想天开。如传为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展示了一种不对称的鬓式，即，脸庞的一侧梳出半月形的蝉鬓，另一侧的鬓角则只有短短一绺。不过最奇的当属晚唐到五代时期，从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陪葬俑上可以看到，女性流行一种硕大的假鬓，就像一对鸟翼一样对称地撑开在脸庞两侧。其中一些顶部还向后翻卷，令人联想到《妆台记》中曾提到的“翻荷鬓”。如此的假鬓是用何等的材料制成，实在很难猜测。从这种鸟翼式假鬓又发展出一种“丛鬓”，就是将这种假鬓加以缩小，但要做出两三层，如山峦叠嶂一般堆在额头两侧，在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浮雕加彩绘画面上，可以最为清楚地观察如此“丛鬓”的具体样态。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女性时尚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鬓式无疑为蝉鬓，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流行一阵。据传说，蝉鬓最初是由三国时代魏文帝的一位宠妃莫琼树发明，她刻意将鬓发梳成蓬张开来的状态，并且疏薄到半透明，“望之缥缈如蝉翼”，所以得名“蝉鬓”。顾名思义，蝉鬓就是接近蝉翼一样的视觉效果，一方面如同舒展的鸟翅一样，在脸庞两侧撑张成半片轻云，一方面发丝疏朗，让双鬓变得如纱似雾，透过鬓影可以隐约看到其后的景物。因其轻而透的特质，也被称为“云鬓”“雾鬓”“轻鬓”“薄妥鬓”等。

实际上，时代不同，蝉鬓的样式也变化不定。如传为张萱所作《捣练图》中反映出的中唐蝉鬓式样，就是下垂的末端呈椭圆形。明清时期的蝉鬓则更为夸张，近乎三角形，斜张开去，当真宛如鸟儿起飞时扬开的双翅，对于这种鬓式，当时有个很形象的称呼，叫作“挑鬓”。

要梳成蝉鬓的形状并且令之定型，当然要靠发胶。古代女性

运用生活智慧，从自然界中寻找到多种可以制作发胶的天然材料，可惜见诸文献记载的只有零星线索。例如，可以把白芨添加到头油或水中长时间浸泡，由此让油或水带有黏性。另外，据说明代宫中曾经流行将桑叶捣出汁液，再加入香料，凭之梳理鬓发。不过，在明代，最为流行的方法是用鹿角菜自制发胶。鹿角菜其实是一种海藻，饱含胶质，将其投入热水之内浸泡一阵，即可融化成粘胶。所以，明时，售卖女性梳妆用品的商铺或货郎都会备有鹿角菜，女性买下之后，将其浸于热水中，就能很简便地制出发胶。梳发时，则以理鬓专用小刷“抿子”蘸上鹿角菜胶，刷到鬓发上：“四个铜钱替我买条红头绳札子个螺蛳，饶星鹿角菜来刷刷个鬓傍。”（明代吴地山歌《烧香娘娘》）到了清代，普遍以“刨花”代替了鹿角菜。所谓刨花乃是指由榆木或桐木上刨下的木质长条，也是由售卖女性用品的商铺或货郎供货，女性买得刨花，自行用水浸泡，便可获得用于梳发整鬓的粘浆“刨花水”。



清 佚名
《仕女图》局部
中央美术学院藏



(英) 约翰·汤姆逊19世纪70年代的摄影
《晚清广州盲艺人》(局部)
英国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藏

无论是蝉鬓还是其他鬓式，女性都喜欢在其上粘贴金箔或彩色绢、纸剪制的小花片，让双鬓更加惹人注目。据说，北魏时，高阳王元雍的宠姬艳姿就“以金箔点鬓，谓之‘飞黄鬓’”（元龙铺《女红余志》），而一直到了《金瓶梅》的年代，潘金莲也还曾“拖着一窝子杭州攒，翠云子网，露着四鬓，上粘着飞金”（第二十七回）。宋人笔记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曾经流行“鬓撑金凤”的形式；明代宁献王朱权《宫词》中咏及当时宫廷内的妆容风格，也有句云“笑贴鬓钿双飞燕”，可见，贴于鬓上的花饰会制成凤、燕等形象，轻巧玲珑，足以让着意梳就的乌鬓加倍吸引目光。

随着现代生活的开始，中国女性在形象塑造上产生了与历史截然断裂的改变，双鬓的消失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实际上，东亚女性的眉眼比较细巧，在脸颊两侧塑造一对轮廓分明、造型奇幻的乌鬓，会让旁人在感觉上以为迎面看到的女性面容更为醒目，由此也就更加受吸引，不由自主地加强注意力。因此，古人认为女性的双鬓是性感的最强劲象征之一，自有值得重视的道理。

武则天与行障

八十八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依然骑着骏马出行，引发世人一片感叹。这倒修正了我一向以来的一个错误想法。

《资治通鉴》中写道，神功元年，武则天“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按这里的描写，当时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骑马在内苑漫游散心，由重臣吉顼亲自为她拉着马辔头，于是皇帝便一边闲逛一边向随行的吉顼询问最近的民情。本来，我一直觉得这一则事迹完全不可信，年过七旬的女性，还能骑马？可是，伊丽莎白二世以实际行动宣告了我的怀疑并不成立，这位陛下快九十岁了，仍然稳乘御骑闲庭信步呢。

因为唐代贵妇习惯骑马出行，所以我们今人往往喜欢赞誉这个时代风气开放，性情豪爽。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越是地位高的贵妇，越不能让凡人看到自己的形象，外出除了要披戴羃离、帷帽之外，甚至由“行障”围绕起来。武则天上尊号为“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之后，临朝听政，接见大臣，则是在座前垂一道纱帘，隔着帘子与男性臣下议政。



唐 彩绘骑马女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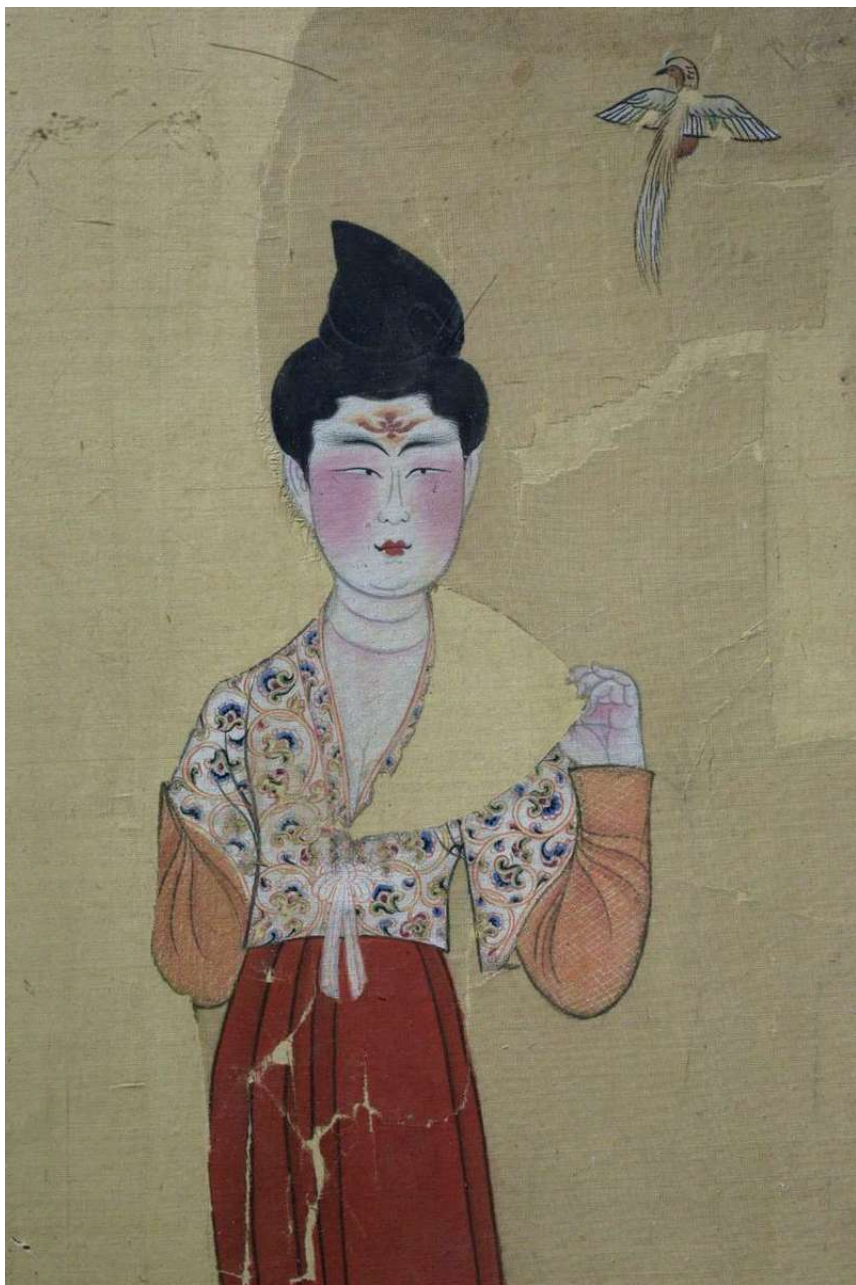
最近，很多人对于历史上“武则天究竟长什么样子”很感兴趣，各种考据，各种推测。其实，你真的未免想多了，就算有机会生在那个时代，哪怕像狄仁杰、吉顼那样贵为宰相级别的忠臣，也没有什么机会看到女皇帝的面容。

那么，你想，如果你不仅能不偏不倚穿越回那个时代，还恰好变身为唐高宗，夫妻相处，总有大把机会看自己太太的样子吧？可是呢，古时女子崇尚化浓妆，最重要的是，唐代女性人人都在脸上贴或者描画“花钿”。花钿也叫花子，常常是金箔、绢罗或者鱼鳞等剪成的小花，上面还描有彩色花纹，贴在额头、眉间、眉梢、鬓边、双颊等部位。尤其惊人的是，约定俗成，大家必定在嘴角两边贴一对圆形或花形的假酒窝“靥钿”，这对假酒窝可能是黑的，可能是红的，可能是金色的，还特别流行绿色的“翠靥”！一对带着绿色酒窝的女子向你微笑，你能适应吗？有胆量细看吗？

贴钿之外，唐代女子还很有创作精神地自己动手用笔在脸上描画，往往在额头画出花朵，双颊两侧则是类似流云、飞霞、翔凤的曲纹，半抽象半具象，特别考验画与看双方的想象力。所以，一张妆容完整的唐代女性脸庞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都被花钿占据，而且这些金色或红翠的小花缤纷灿烂，只怕比五官本身还抢眼。唐代男人对于心爱女性的印象，大概主要来自这些绚丽多变的纹饰吧！我很怀疑，一位女子一旦改变脸上花钿的风格，比如由主打绿色改为多用红紫，本来喜贴小花却忽然一脸云气，她的意中人就会认错人或者猛然不再认识她，这种情况当时想来并不少见。至于小叔、甥侄们，大概一生也弄不清自己家中嫂子、姨婶们的具体长相，换一脸花钿，就被家里男性亲戚搞错身份的事情也该时有发生。



唐 彩绘木胎舞蹈女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
《仕女》屏风画局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所以，虽然唐高宗与武则天算得上是朝夕相处，想必太太面庞上巧妙的装饰花纹也会对夫君产生极大影响，在他对太太的颜值感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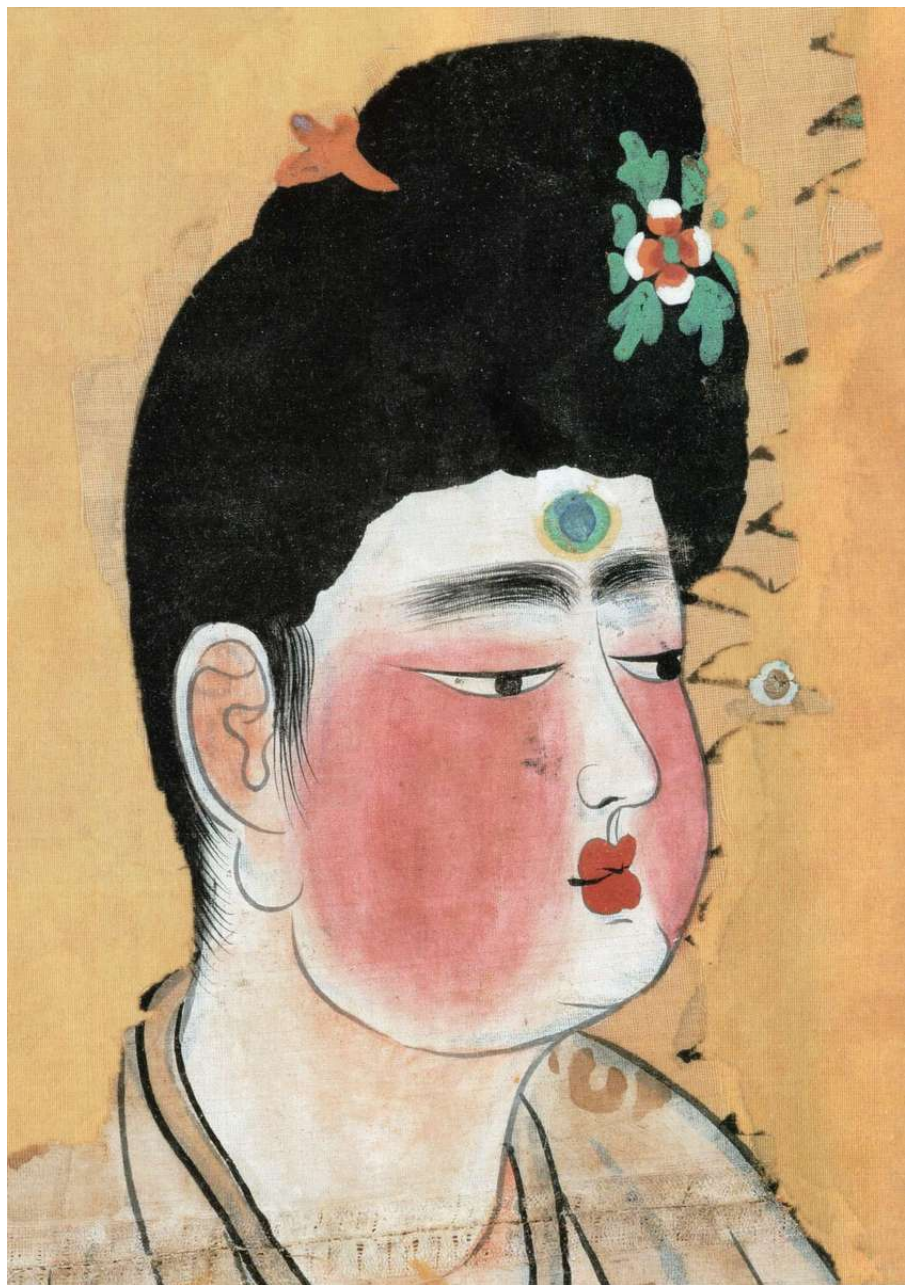
那么，到了晚上，妆会残吧？就能显露几分真容吧？可是，古代贵族女性早就知道防止妆残颜败的局面，到了黄昏的时候，一定要重新上一次妆，称为“晚妆”“暮妆”。于是，她们从早到晚都是描画精致，鲜艳整齐，通过华贵端正的仪容，让尊贵的地位在直观上就具有说服力，看得旁人心服口服。

那么，睡觉前，一定要卸妆喽。这时候武则天会是素颜一张，从李治到她周围的宫人，肯定能真切看清她具体长什么样子咯。然而，在那个时代，注重仪容的女性会在睡觉前上一层淡妆，甚至在眉间贴一枚花钿。仅仅贴一枚小花钿，相比白日里的满面缤纷，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已经是低调与朴素了。更关键的是，女性临睡前需在面上、脖颈、前后胸、双臂甚至全身大量地擦粉，这种粉是以米粉为主料，加入养颜护肤的中草药与香料。在传统的美容观念里，夜晚在身上擦粉，能够让皮肤在沉睡状态中充分地、从容地吸收粉内的营养，因此是最重要的养护皮肤方式。任何一个自爱的贵族女子，睡前擦粉这道程序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所以，唐宋文人们便经常在诗词中写到，与自己同寝的女人第二天早晨残妆半退，脸上的白粉沾到半颊的蝉鬓上。更有甚者，欢爱时刻的汗水会混着女人身上的白粉，在枕头上、锦被上、凉席上洇出鲜明的粉痕，还散发着浓烈的香气。这种现象完全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男子性爱体验的一部分，以致他们当中的才子们屡屡以享受的心情，在文学作品中加以描咏，不是嫌弃，而是津津乐道地描咏。

若是普通人呢，睡到大天亮，估计淡妆也不剩什么了吧。偏偏宫廷中又是勤勉得很，皇帝天不亮就起身准备早朝！因此，即使亲如李治，几十年里也未必能有几回看到武则天的素颜。

实际上，武则天非常知道化妆的力量，也极其重视通过化妆以及精心打扮来塑造形象。《资治通鉴》就记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她深知，要君临天下，除了治理国家的业绩、挫败政治对手的才干，具有说服力的仪态也很重要，因此，即使上了岁数，也仍然十分注重化妆。因为将个人形象打理得漂亮爽目，所以周围的臣下发自内心地认为她并不老，在他们心中，她始终都是女神级的存在，是圣佛转世。



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弈棋仕女》屏风画局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武则天十四岁时因为“美容止”被召入宫，先天生成的底版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真实面容其实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因此，是靠了精致用心的化妆，靠了妆容昼夜不凋，靠首饰发型衣裙，来让自己的形象从进宫的一刻起就明亮出众，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美丽而又智慧的形象。不仅如此，她还要靠雾□、帷帽，靠殿上长垂的纱帘、围护着她走上封禅台的锦障，营造出独特的魅力气场，其中既盈荡着高贵美丽女性的性感气息，又闪烁着刻意制造的神化色彩。所以，武则天与今天某些人理解的男性化的女强人不同，她是刻意把女性气质转化成政治中的正面因素。

或者说，武则天的真实长相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就算你是她的同时代人，而且还是她的身边人，也基本没机会看到她素面无妆的时刻。大概，只有每日贴身伺候她洗沐梳妆的女官、宫女，能够短暂窥见这位女政治家的本初面容。除此之外，即使身为她丈夫的唐高宗，也永远只能看到一个精心修饰、无懈可击的形象。

这倒很符合法国人的观念。在法国人那里，没有丑的女人，只有没有魅力的女人。任何女人，哪怕真的天生五官不佳，只要发现自己的特点着意加工，扬长避短，就能富有魅力，变得性感，而性感和富有魅力的女人就是漂亮女人。这种经后天的才华自我制造的性感与漂亮，也不因青春逝去而衰减，相反，就像美酒一样，岁月只会让聪明女人的魅力愈发酵厚与精粹。

因此，别相信什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说法。武则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印证了法国人的观点，天生的美貌也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生不懈的自我塑造，这塑造由内心到外表，由此形成个性化的、他人可以清晰感受与辨识的魅力气场。



南宋 如意纹银粉盒
德安县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南宋 菱花形银胭脂碟
德安县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风流无尽香山子

今日的古装电视剧特别爱展现古代美女入浴的场景，而且总让她们享受“花浴”，浴盆或浴池里飘着厚厚一层玫瑰花瓣。其实，芳香的玫瑰花到明代才在中国得到普及种植，所以，汉唐美人们的洗澡水上是不可能漂有玫瑰花瓣的。再说，中国古人给洗浴之水添加香气的手段多得很，才不靠向水上洒香花这么简陋的办法，唐代华清池内所采用的策略，就远出我们的想象。

据说，华清宫里，除了唐玄宗、杨贵妃专用的两所“汤池”（也就是浴池）之外，还创置了几十间“长汤池”即大型浴池，用于赐浴给宫女和随驾前来的王公百官。这些浴池一律用玛瑙石镶砌池底与四壁，池中还安设有各种雕镂精美的装饰物，其中之一，就是用各种贵重进口香料，如檀香、沉香、丁香，制成山峰的形状，固定在浴池当中。一旦池中注满热水，香料做的山峰四周明波映漾，热气蒸腾，就仿佛传说中的瀛洲、方丈等海上仙山浮现在海面的景象，而这正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唐代“室内设计师”们所刻意要制造的效果。想一想吧，当唐宫宫女们纷纷步下“长汤池”群芳戏水之际，一座座硕大的香料山子浸泡着滚烫的池水，内含的香分不断沁入水中，再随着蒸汽升散，一间间宏阔的浴厅里会是怎样的芬芳回荡哟。

不要以为这只是传说，在近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文物中，真的有四件整块天然香料制成的小型假山，而地宫出土《衣物帐》上记得明明白白：“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就其中的檀香山来说，已经破为残段，但造型仍然完

好，可以看出当初是被着意地加工成假山的形状，而且还有描金装饰。

实际上，从唐代开始，用整块天然香料雕成山峰之状，摆放在起居空间里，作为芳香室内空气的陈设，这样的做法蔚然成风。宋人陶谷的《清异录》中就记载，五代时后唐的龙辉殿中陈设有“一铺”——也就是一套——假山水，是用沉香做山峦，四周绕以江河形状的水池，水池里注满蔷薇香水和苏合香油；山上与江畔满插着用零陵香草、藿香草以及丁香做成的林树；再用薰陆香雕制成袖珍的城郭模型点缀其中，城门上还挂有小小的匾额，上书“灵芳国”三字；城郭里则有黄檀、紫檀做的微型屋宇，还有白檀雕的偶人。这一座采用多种香料做成的山水模型摆件，“方围一丈三尺”，折合成今天的公制，大约为12平方米或17平方米（唐代有小尺与大尺之分），规模十分的惊人！



唐 描金木香山子残段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清 宫廷旧藏天然木山子嵌玉石人物花卉盆景
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宋代，香料做的假山模型——当时称为“香山”或“香山子”——甚至不再限于皇室或大贵族，在士大夫的生活中也使用普遍。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就曾经把一座“沉香山子”作为生日礼物特意送给苏辙，二苏为此还写有赋文相咏和。其中苏轼《沉香山子赋（子由生日作）》一文非常清楚地描述，这一件珍贵生日礼物来自海南的原始森林，形状奇美，像太华山，也像凌云直上的孤松，起居空间当中陈放这样的清雅摆设，生活于其中的人，自然会沾染上它的芳气。

在明清时代，一种名为“伽南香”的名贵香料成了制作香山子

的上选材料。明人文震亨在其著名的优雅生活指南书《长物志》中就介绍：“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膻气。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盘盛之，满室皆香，真为奇物；小者以制扇坠、数珠。”原来这种香料不适宜于焚熏，但是其散发的天然香气浓烈而怡人，于是就用来制作假山摆件、佩戴饰品了。香山子在明代所参与的故事，大约要以汪然明与张宛之间的一段情缘最为动人吧。

汪然明是明末的一位巨商，这位商人同时也是文化的热衷者，他熟谙风雅，喜欢吟诗作文，与当时的士大夫名士、名妓往还酬唱，其在杭州西湖的私人园林与游船，更成了文人雅集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一次聚会上，汪然明遇到了名妓张宛，立刻对她很钟情，但张宛却很孤傲，始终未与他交谈一语。席上，汪然明相邀张宛到西湖一游，张宛也未予理会。直到三年之后，张宛遭到恶人的迫害，势急之下，想到了实力雄厚的汪然明，于是突然前来投奔。汪然明并不在意张宛此前的无情，反而为她的终于到来而喜出望外。据他事后讲，自己拥有一张名工制作的紫檀床、一只汉玉鸳鸯嵌枕、一件绿结伽南香山、一张嘉文锦席，都是用于床榻之间的美妙“清供之具”，但是，作为这四样珍物的主人，汪然明却在内心一直暗暗遗憾没有遇到配得上使用它们的佳人。如今，心仪已久的张宛终于光临，他感到这四样妙具终于适得其所了，于是把它们特意陈设出来。

为了迎接意中人，汪然明在其风雅的“朱萼堂”举行一次名流毕至的雅集，张宛虽经困厄危难，却始终不改清高性情，中途便因倦暑而退席。于是，汪然明将她引到陈设着檀床、玉枕、香山、锦席的室中休息，据汪然明后来回忆——

其日酷暑熏蒸，香山与兰花芬馥，宛仙神情若倦，因试枕之，不觉熟睡。予启北窗，绿荫笼榻，香风袭人，观其艳

态，真海棠睡未足也。

在伽南山子与兰花的香气中熟睡的孤傲美人，给予汪然明如此美好的记忆，以至他事后特意出了一本《梦香楼集》，刻版印刷，付行于世，以纪念这人生难得的珍贵一刻。这就叫真正的多情吧。《梦香楼集》中首先有汪然明本人咏述其事的文与诗，而他的名流友人也纷纷作诗唱和，最有意思的是，事件的女主人公张宛同样为“檀床、玉枕、文席、香山”所流露出的殷勤而感动，于是也步韵和诗，“以志主人情重”。那因了汪然明的多情凝视而留驻于时光的浮生一刻，乃就此成为尽显明人之温雅风流的不灭佳话。



明 陈洪绶 《华山西园雅集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香山，在唐代宫廷，呈现的是无边无尽的奢华气派；到了明人那里，却反映出一派意绪缠绵的柔情蕴藉，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使然吧。

贵妃出浴的盛唐气象

唐玄宗与杨贵妃，无疑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人物。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两句，则让“贵妃出浴”成了传统文化中最著名的形象之一。不过因为诗歌体裁的限制，诗人没有交代“华清赐浴”的前因后果，所以可能很多读者不太明白这件事的具体背景。

“华清池”，意思是指华清宫内的温泉浴池，而华清宫则是修筑在骊山的富丽行宫。每年一入阴历十月，唐玄宗就会率着杨贵妃等人转移到骊山的这一处行宫，待第二年开春天气转暖才重回长安。如果对清代有兴趣就会知道，清代皇帝与后妃每年都到圆明园避暑，快入冬时才会回到紫禁城过冬，到慈禧太后时，则是改到颐和园度过夏天。唐玄宗正好相反，春夏秋三季在长安的皇宫中生活，却到骊山华清宫过冬，大概是因为华清宫这里地出温泉，冬天比其他地方更为温暖，当然可以洗温泉浴是最重要的原因。

随着天子与贵妃，固然要有一大群宫人也来到这里，另外，王公外戚文武百官当中的受宠分子都会蒙恩陪驾，等于是一个精简化的小朝廷被整个挪来。这么多的人都要在骊山过冬，于是乎，当时的显要人物纷纷在骊山脚下建起了各自的“别馆”，这使得山麓一带雕阁相望，华宇连绵，与半山上的皇家宫苑一同彰耀着盛唐的壮阔与浮华。

《明皇杂录》《津阳门诗》等作品中都有关于华清宫内浴池具体形制的描述。尤为重要的是，直到北宋的时候，华清宫昔日

重要建筑的残基依然约略留存，相关记录保留在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中，这实在是珍贵异常的资料。

据《南部新书》记录，在华清宫的宫垣之内，共有八九处温泉眼。唐玄宗与杨贵妃各自占用位于最高处的两个泉眼，在其上筑就为这二人独享的浴殿。唐玄宗的专用浴殿称为“御汤”，其内的浴池长宽均达数丈之广。杨贵妃的浴殿位于御汤的西北侧，在面积上比御汤稍小，名曰“妃子汤”，也叫莲花汤。

这两所至尊级别的浴殿在装饰风格上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洁白”。浴池的内外全部以莹澈如玉的白石铺砌，池的四周为一圈白石铺成的平台，每一边都设有白石的台阶，一级级地逐渐降入池水，这样，唐玄宗或杨贵妃入浴的时候，就可以带着随侍宫人顺着台阶从容走到池内。池面上横架着浮雕精美的白石梁，大约是为放置物品而设，浴池的内里更是玉一般的白石壁，玉一般的白石底，但是镌满鱼龙花鸟的浮雕纹饰，千变万化，难以名状，一旦池水漾动，满池的鱼纹花影也随着水波轻轻动荡起来，像是有了生命，正在水底潜游。



华清池海棠汤
(摄影：动脉影)

池内的喷水设备极富美感：御汤的池中部，立有两根白石柱，每根柱的顶部托起一只雕成莲花形的白石盆，热泉不断从盆中心涌出，再由花瓣式的盆缘泻下，为浴池提供着地温热水。

莲花汤的出水方法与御汤不同，乃是设在浴池的一侧，由四只莲花形石盆形成出水口，其中两只用白石做成，两只用红石做成。这一红一白相间的四只莲盆嵌入在白石的池底上，也就是说，石盆的边缘与池的底面齐平。因此，在妃子汤，热泉水是从池底不断涌出，在水深处形成汨汨的暗流。

杨玉环与李隆基两人的浴殿居然莹洁如雪，可见二人格调不俗。然而更妙的是，据《旧唐书·郑朗传》记载，风流天子与他的爱妃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情侣装”，这是两件饰有金色鸟纹的彩锦袍，被他二人作为入浴前、出浴后的“浴袍”穿在身上。散发

着芳香的身体披裹一袭金辉闪烁的锦袍，在如雪如玉的背景前，被众多宫女环绕着殷勤服侍，此时此刻，娇如海棠的贵妃与她的君上俨然仙境中的天人。

当时，皇帝“赐浴”的对象绝不只是杨贵妃一人，还包括身份不一的各色随驾人众。像安禄山特别受宠，唐玄宗不仅专为他修了一座新汤池，而且，随安禄山一起来骊山的、他手下的胡族将领们也都会领受到“赐浴”之恩。看起来，在华清赐浴一事上，唐朝天子绝对的君恩浩荡，让大家集体泡温泉，一齐开心。为此，在“御汤”“妃子汤”之外，还建有几十间（一种说法是只有十六间）各自独立的大型浴堂，叫“长汤池”或“长汤屋”。这些室内浴池有些建在后宫的范围内，供宫女们使用；有些分布在外廷，供外戚王公、文武大臣使用。想来，如此众多的浴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使用对象，沿山势次第分布，其位置规划一定蛮复杂的，势必分为几组错落分布的建筑群。



清 李育《出浴图》
故宫博物院藏

在御汤以及妃子汤各自占用一处泉眼之外，其余几处泉眼便

是为这些长汤池供水，为此，工匠们用石凿的水管串连成复杂的输水系统。这些石水管埋在地下，形成沿山势而向下蜿蜒的暗渠，一处处温泉水分别汇入不同的石水管，通过这一暗渠输水系统由高向低迤逦奔流，前往各所汤池。也就是说，华清池多达几十间的洗浴场所完全依靠埋在地下的石“暗渠”来供水与排水。

《津阳门诗》咏道：

暖山度腊东风微，宫娃赐浴长汤池。

刻成玉莲喷香液，溯回烟浪深逶迤。

大概，由于泉眼位于山势较高之处，借助水压的作用，各个汤池里才能形成温泉由石莲花中不断喷涌的奇观吧。最妙的是，这些石莲花的高度也是刻意计算好的，当池水灌满的时候，水面就会恰好与莲花的表面齐平，在这样的情况下，莲花的喷水在池水的表面所形成的是细巧、急密的微涡与涟漪，汨汨不断，也就是所谓“溯回烟浪深逶迤”意欲呈现的景象。

按照《明皇杂录》等书的记述，与李、杨二人浴殿的风格相反，供臣下泡温泉的浴池反而装饰绚丽，极尽镂金错彩之能事。这些浴池全部以带有天然花纹的玛瑙石砌面，也是在池中树有白石莲花喷水盆，喷涌出温泉水。另外，池水中还立有装饰假山，一种假山是把半透明天蓝色玻璃块堆粘成山峦的形状，放置在浴池当中，让玻璃的蓝色与荡动的明波互相折映；还有一种假山则是用贵重的天然沉香块或檀香块堆粘而成，浸在荡漾的清水里，会向蒸腾的、湿热的空气中吐放幽香。此外尚有带银饰的漆制小船、白香木制的小船，它们立在柱杆头，安插在水中，看上去仿佛这些小船就漂浮在池面上一一般，桨橹均以珠玉装点。这类工艺品般的小船摆设，想来是用于放置洗浴用品之用。

赐浴于宫女或臣下的温泉浴池采用玛瑙石砌面，装饰华丽，与之对照，唐玄宗专享的“御汤”池及杨贵妃的“妃子汤”却里外一色镶砌白石，雪一样的不染纤尘，这是何等出人意料的对比啊！不难察觉，华清宫的浴池装修颇富异域色彩，与中亚、西亚甚至古罗马的浴池有相近的风貌。近代考古学者在骊山成功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的遗址，均为石材铺砌、边设台阶，显示唐代华清宫内的浴池形制大体统一，《南部新书》等文献所记颇为可靠。所以，今人在吟味“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性感诗句、想象千百年前水汽蒸腾中的玉体的时候，也许不妨拿伊丽莎白·泰勒在电影《埃及艳后》里的奢华洗浴场面作为参考。

遗憾的是，史料没有留下关于这些汤池的建筑外观、内部装修方面的资料，也无从知道其中的取暖方式是否有特殊之处。根据唐代的普遍情况来看，可以推想，池馆之内会沿墙悬挂一层甚至双层的华丽丝幕来保温，还会张设帷帐以隔绝寒气。至于起芳香空气作用的各式香炉则肯定不会缺席，静静喷吐着袅袅如丝的芬霭。唐朝天子非常具有“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的气质，不仅要把骊山的浴池赐给宠臣们，让他们享受寒冬泡温泉的快乐，而且，赐浴的时候，还一并颁发洗浴用品以及浴后的护肤美容品。不要以为唐朝人洗温泉只是就着热水泡一泡而已啊，当时的卫生和保养用品也都很有门道呢！就拿其中最重要的澡豆来说，其作用相当于后世的肥皂，洗澡时就靠它来为身体除垢，因此，具有去油污性能的豆面和猪胰是其主料。然而，高档的澡豆在豆面、猪胰之外，还要掺加各种美容护肤的中药，另外更要兑入多种香料以生香。所有这些配料都被研磨成细粉，混合在一起，洗浴的时候，则将这些散着淡淡香气的粉末盛放在金、银或玻璃的小碗中，供人取用——当年，“御汤”的白石横梁上、“长汤池”中的小船上，摆放的正是如此讲究的洗浴用品，供唐朝的贵族们享

用。

华清宫连同其温泉浴池早就烟灭于时光中，后人只能通过文献记录领略那一等的华丽。然而，这一份记忆始终值得持有，因为它所映现的，是大唐盛世在烟花般消逝之前的堂皇气象。

服飾



衣带也风情

唐朝的女士们出门，不需要带手包。在纸巾发明之前，没有哪个女人能离得开手帕，而唐人徐夤《尚书筵中咏红手帕》中有“罗带绣裙轻好系”一句，显得手帕在那时是直接系在“罗带”上，以这样的方式被携带着四处走。更有甚者，逢到节日去赶集，难免要买点时新小首饰之类的玩意儿吧，那就——

数钱红带结，斗草茜裙盛。（吴融《个人三十韵》）

这样，一旦看中头花什么的，就可以——

同心带里脱金钱，买取头花翠羽连。（施肩吾《少女词》）

对唐诗宋词稍有兴趣的人都不会陌生于“衣带”这个词，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之类的句子哪个念不上来呢？然而，这因了经典文学而如此著名的衣带，在唐代，差不多就是被当作手包来使的。先举牛僧孺《玄怪录》中的《裴谡》故事为例吧，因为这个故事里相关情节所营造出的景况可说是最为暧昧和尴尬，因而也最为迷人。大致情节是，坚持修炼而得道的裴谡，决心戏弄半途而废的王敬伯，在张宴款待他的时候，动用法术把王敬伯的妻室赵氏女招来作乐妓。其时，由于王敬伯为了仕途而长期在外奔波，夫妻分别已久，在这种场合下意外相逢，迷离恍惚，不敢相

认，“敬伯坐间取一股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王敬伯找机会把一颗红李子扔给赵氏女，赵氏女回眸看向他，然后把李子悄悄系到衣带上。这一招很管用，宴会之后，裴谡再次用法术把赵氏女送回家，这颗李子自然也跟着衣带的主人一起上路。日后，赵氏女就以这颗李子为凭据，让娘家人找王敬伯算账——你凭什么用妖术戏弄你的妻子，让一位闺秀出台！王敬伯好一顿解释才得到妻子及其娘家的原谅。

传统服装一般不设衣兜，这就让古人携带小物件的方法五花八门，各朝有各朝的高招。在唐代，女服是采用上襦（袄）下裙的样式，上襦，也就是上衣，总是很短小，采用对襟的样式，用缝在两襟上的一对细带在胸部稍下的地方打个结，就足以把上衣系束住。挂系物件的所谓“衣带”，就包括这一对上衣的系带。“玉兔捣药”的传说家喻户晓，大概没人注意到在唐人传奇《裴航》中这仙药的出处——女仙云英“亦于襟带间解药付航，航即捣之，每夜犹闻捣药声，航窥之，见玉兔持杵而捣”。“襟带”，显然应该是指上衣两襟的系带。另外，唐代女服注意强调长裙的形象，特别是在盛唐以后，裙腰高升到腋下，短襦的下摆被收束在裙腰之内。裙腰的两端缝有裙带，女性把这两条裙带当胸绕身一周，然后在胸前打结，以此来系牢长裙。这裙带特别长，在胸前打结之后，还有一对长长的余端垂在身前，成为一种惹眼的装饰，因此，小物件也常被系到裙带上。实际上，与《裴谡》在情节上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还出现在《太平广记·张李二公》里，只是搞低级恶作剧地改为一张姓无赖老道，他不仅用法术把人家的妻室招来弹筝侑酒，席散之际，还“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真的属于恶劣行为。

真不错，唐代女性可以甩着手四处走，呃，当时恐怕更习惯的是两手笼在袖中四处走，但总之不用手里提东西。有什么非用

不可的，或者须臾不能离身的物事，系挂到衣带上就是了。

《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姚司马》中讲道，一位高僧在为姚司马家二小姐驱鬼的时候，“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钥也”——二小姐衣带上系了个小黑袋，其中放有一把小钥匙。这把小钥匙的发现，成了高僧最终侦破精怪之原形的关键线索。像钥匙这样的小用品，细小琐碎，很容易丢失，自然是装在小袋子里更为妥当。此外，再如唐人李景亮所撰写的小说《李章武传》中，女主人公——实际此时已是幽魂——在与情人永别之际，“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可见，装有各种零碎杂件的小袋——按明清以来的习惯叫荷包，是衣带上的常客之一。如果根据这些唐人故事做理解，那么，系在身前垂带上的小荷包，里面往往保藏着女主人认为重要的小宝贝，这小宝贝还一定携带着不可为他人知晓的秘密。把自己最珍爱的秘密放在小袋子里，挂在身前，就既不容易丢，也不容易被忘记——女性似乎都特别容易忘记自己的藏带着秘密的小宝贝。通过这种方式，也等于把自己的秘密安全地、不露声色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定多少缓解了不能张口泄密的憋闷感吧。

不过，另一种喜欢在身前悬挂的、其实更为唐代女性所珍视的，乃是做工精美、质地珍贵的小盒子，简直可以说，这种做法构成了时代流行时尚之一种。如沈亚之《秦梦记》中写道，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得到一枚西戎国主赠送的“水犀小合”，并把这小盒转献给了秦国公主弄玉，“主悦，尝爱重，结裙带之上”；《元柳二公》中，“紫衣、凤冠”的女仙也是“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从故事中还可以看出，贴身而挂的这类小盒子很为唐代女性所珍视，她们喜欢在特殊的场合把这种小盒当作特殊的礼物。《元柳二公》中的女仙实际上就是把那装着神秘物品的琥珀盒子作为礼物送出；《淳于芬》中则讲到，小说

中的两位女仙曾到孝感寺听讲经，一位女仙当场施舍金凤钗两只，另一位称为“上真子”的女仙则施舍“水犀合子一枚”。因此，不难理解，以小盒子作为爱情的象征送给心上人，在唐代小说中就成了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举动。《玄怪录》有一则题为《崔书生》的故事，女主人公与情郎不得不分手的时候，便是“出白玉盒子遗崔生”。《曾季衡》故事中更是非常细致地写道，女鬼王丽真与曾季衡分别之时，“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当场从衣带上解下小盒，又从发髻中抽下一只翠翘，送给所爱的情郎。

由于女性普遍以小盒作为胸前挂饰，少年郎向女性赠送象征爱情的礼物的时候，往往也会选择小盒子。《唐暄》中，永别之际，张氏留赠一条罗帛子，唐暄则以“一金钿盒子”作为答赠。再如《霍小玉》中，“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盒子，方圆一寸许，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在这个小盒里盛着几样表达男女爱悦之情的小玩意——两颗相思豆、一只叩头虫，还有媚药。

想来，正因为是在这样的风气中创作《长恨歌》，白居易才会想出“钗留一股盒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爱情宣言吧？已经升仙的杨贵妃把自己的一支金钗掰成两股，再把一个钿盒上下相合的两扇分开，让使者把一股钗脚、半扇盒身带给唐明皇，作为相思不灭的见证。在表达深情的方式上，已成女仙的杨太真，竟和那位女鬼王丽真是一样的！在陈鸿依据这首长诗所作的《长恨传》中，所想象的场景是：“指碧衣取金钗、钿盒，各析其半。”（《全唐诗》卷四三五）命令婢女取来那两件信物。这种举动当然很符合贵妇派头，但是，白居易所设想的情境会是如此吗？抑或，白大诗人想要表达的，乃是王丽真式的行为，多个故事中都提到的行为，唐代普

通的男男女女都最熟悉不过的行为，即，女性当场取下自己身上的饰物，作为最宝贵的信证交出。这位伟大的诗人可是坚持要老太婆都明白他的诗句在说什么啊！



北京密云乾隆皇子墓出土的宋代白玉小盒，以子母口扣合，上雕一对鸳鸯作为挂环。
现在藏首都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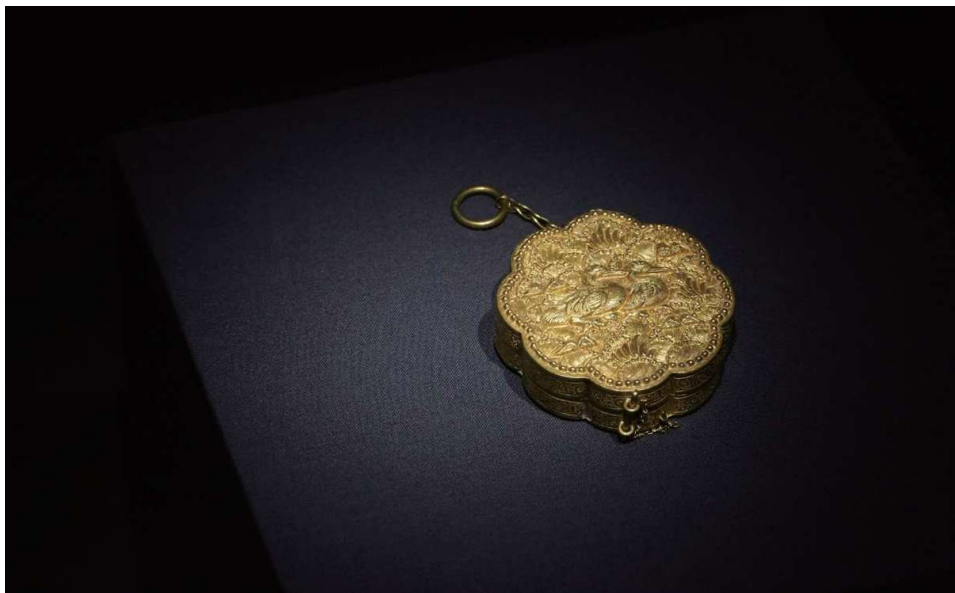
唐 玉方粉盒
西安博物院 鸳鸯纹盒

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唐代金、银、玉、石、陶各式小盒并不少见，但是，这些小盒一般都不带穿环，显然无法直接挂系。然而，一九六九年出土于西安曲江公社的一只青玉小盒却与众不同。它由彼此独立的两扇盒身对合而成，在两扇盒身的盒沿上，各雕有一片相对展翅的鸳鸯纹样，鸳鸯纹当中透雕有镂孔，显然，丝绳可以由其镂孔中穿过，也就是说，这精美的鸳鸯纹恰恰起着吊环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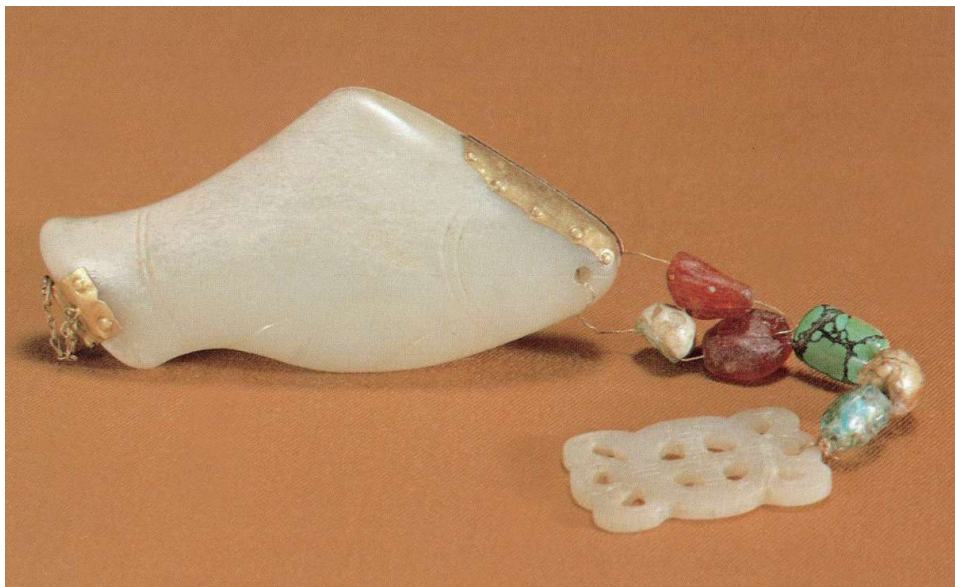
应该注意的是，与这只小玉盒在形式上一样的小盒，在时代更晚的墓葬中时有出现。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见于辽代陈国公主墓，公主尸殓的腰部、腹部放置着多件带链的挂饰，显然，在女主人生前，这些挂饰应该是垂挂在她的腰带上。其中恰恰有几件小盒，其中如一件“八曲连弧形金盒”，由两扇各自独立的盒身组

成，以子母口相扣合。在盒沿的上下，焊接着两对对称的金环。上端的一对金环作为吊环，其内各穿有一小段金链，这两条小链又归系到同一条金链上，成人字形。人字形短链的顶端再系一金环，由此，就可以把金盒挂系到其他物件上。下端的一对金环则是作为销栓使用；在这对金环的侧旁，其中一扇盒身上另焊有一个小金环，一条细金链一端穿在此小金环内，另一端装有一个小插栓。在两扇盒身的子母口扣合之后，把小插栓插入盒下端的这一对金环，就等于是为盒身上上了栓锁，小盒的两扇便无法彼此脱开。公主尸殓上尚有一件鱼形玉盒、一件鱼形琥珀盒，都采用完全一样的形式，小小有别之处，是在两扇盒身的鱼嘴处对称开孔，以此来代替吊环。另外还有一件龙凤纹玉盒，则是只带可供穿系的镂孔，但没有配装固定盒身的插栓装置。

陈国公主的这几件小盒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扇盒身互不相连，彼此独立，但带有吊环或穿孔，以挂链穿系在两扇盒身的吊环或穿孔之中，通过这一方式，把两扇盒身相连起来。同时，下侧有栓销，起到让扣合的盒身不松脱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唐代青玉小盒恰恰与陈国公主墓的这几件小盒完全一样，也是由独立的两扇盒身组成，盒口做成子母口，可以互相扣合；一端装有金环，可以在其中插小横栓，防止扣合的盒身松脱（小横栓已经失落不见）；与金环相对的一侧则为鸳鸯纹吊环。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几件小盒，与玉佩、金香囊等饰物一道，安置在尸身的腰腹部，这应该意味着，在主人生前，它们是系挂在她的腰带上。由此推测，唐代小玉盒在当年的用场很可能与陈国公主墓的小盒们接近，也就是说，是用于系挂在身上。不过，陈国公主穿辽族服装，因此，她的小盒是挂在腰带上，但是，唐代女服只有裙带与襟带，那么，这件唐代小玉盒是系挂于何处，也就不言自明了。



辽 八曲连弧形金盒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摄影：动脉影)



辽 鱼形小玉盒
陈国公主墓出土

今天展示在小雁塔畔西安市博物馆里的唐代青玉小盒，以及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小盒，盒身不装活轴，凭借绳、链穿系环孔的形式来连接两扇盒身，这样的形式居然能够长久流行，想来，一定有使用上的便利让人们喜欢吧。陈国公主的陪葬金、玉、琥珀小盒，小者为5.5厘米长，大者也不过7.8厘米长，恐怕作为装饰佩件的功能远大过实用性。唐代青玉盒更是小巧异常，长才4.5厘米，宽则仅3.5厘米，其鸳鸯纹上的镂孔只能穿系丝线，大约除了放一点口脂之类的化妆品之外，并不能派上其他实际用场，这样的小盒估计也只能挂在衣带上，起个点缀装饰的作用。

也许，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白居易能够想到“钗留一股盒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这个生动的细节，灵感也得自彼时普遍流行的、常用为情物的小盒的具体形式——两身盒身并非以活轴固定在一起，而是彼此分离，由绳索穿过盒身的吊环来相连，只要把绳索拆掉，盒身立刻就分成了两半，无论连还是分，都非常方便。更有意思的是，小盒的盒身虽然各自独立，但为了能够扣合，所以在大小、形状上要完全一致；口沿必须做成一子一母的形式，并且一定要制作得彼此严密相合，一旦相扣就不会轻易松脱；为了穿系稳当，两扇盒身的吊环在形式上也一定是一致的，这些设计本来是为了服务于实际的需要，却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爱情的理想状态——两个个体彼此达到完美的一致，灵魂与身体都深相契合，无法分离。

从出土实物来看，这类小盒在两扇盒身上的装饰图案往往也呼应对称，并且多以成双鸳鸯、成双水禽为内容，或者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龙凤纹玉盒，一扇刻龙纹，一扇刻凤纹，象征着两性的和谐与忠贞。看了这样的实物，我们对于“合分钿”的含义，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钿”，钿花也，也就是工艺品上的装饰花纹。本来合为一体的盒身被分开，两扇盒身上互相对称生辉的花

纹也就失去了另一半的伴映。杨贵妃，或者不如说是作者白居易，用这样一个日常可见的现象，比喻相爱的灵魂被拆分之后的残缺感。唐时的多情男女们读到或听到这几句诗的时候，想来一定心领神会，别有感触吧。

太妃的帷帽

唐太宗的后妃们习惯于骑马出行，如果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些难以想象，那么就去看一看越国太妃燕氏墓的墓室壁画中那位手捧“帷帽”亭亭玉立的侍女。

这一壁画片段意义丰富，最基本的一点是，让我们得以看到初唐时代帷帽的具体形制。1990年，燕妃墓壁画得以清理出土，而在那之前，关于帷帽，只能凭借文献记录与后世的图绘资料去理解。

《旧唐书·舆服志》有一段很重要的总结，勾勒出唐代前期女性出行时专用服饰的递变过程：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幂䍦；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

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䍦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䍦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

唐太宗时期，贵妇们骑马外出时会用叫作冪的长面纱兜头罩下，把整个人形笼在里面，一如今日阿富汗女性所披的“波尔卡”。但到高宗时代，帷帽兴起，代替了冪。

帷帽的最初用途在于遮挡风沙与日晒，游牧民族骑马跋涉时普遍戴用，很可能就是游牧文化的发明。唐帝国建立以后，沿袭北朝以来的风气，贵族女性，包括宫廷中的后妃、宫女，都习惯于骑马外出，于是，到初唐时代，帷帽被她们充作面纱，用以在马背上遮蔽身形。《旧唐书·舆服志》中便明确提到，帷帽的用途在于宫人、百官家眷骑马走在道路上时起障蔽作用。

至于帷帽的形制，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条注文解释得清楚：“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网也。”这是一种在帽檐周围垂挂一圈纱网的帽子，显然“帷帽”之称即是因护帷回绕而来。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中，“席帽”条则云：“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朱（珠）翠，丈夫去饰。”依其说法，周沿缀帷之帽实际上属于男女通用的一种帽具，不过女用帷帽的垂络上会装点珠翠！

《图画见闻志》说帷帽是“垂网”，这让后人容易理解为纱、罗一类疏薄织物。《中华古今注》却指出这种帽子是“垂丝”。稍加观察便不难发现，燕妃墓壁画上的侍女手中所捧明显为一只竹丝或藤丝编的斗笠，斗笠的周沿接缀有一圈长丝绦，这些垂绦的排列颇为密集，形成一道薄幕，正是体现了“垂丝”的形式。如此的描绘倒与《中华古今注》的定义相符，由之可以确定，第一，画工在此所意欲展现的正是一只帷帽；第二，帷帽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帽檐周围缀挂丝网，一种是缘帽檐周边悬吊一圈长丝穗。

壁画中手捧帷帽的侍女只有一位，那么，她掌上之物就只能

是为墓主预备，画意是表现恭顺的侍女随时等待将帷帽献给女主人，伺候她上马出行。须知燕氏可不是普通女人，她十三岁即为秦王李世民侧室，生越王李贞、江王李器，后封德妃，至高宗朝册为越国太妃，在王府与皇宫中度过了大部分人生，且地位尊贵。这样一位皇妃的墓室中，特意画出预备她骑马使用的帷帽，初唐时代果然气质剽悍。

实际上，据《旧唐书·舆服志》所记，帷帽兴起于高宗统治初期的永徽年间（650～655）。令人心生莫名感慨的是，燕妃于咸亨二年（671）年底入葬位于昭陵的陪葬墓，正是在这一年，帷帽的流行竟至于惊动到唐高宗，使得他第二次出手试图扭转不正之风。敕令中云“比来多著帷帽，遂弃幂䍦”，显示高宗时是帷帽逐渐取代幂䍦的过渡期。因此，燕妃前半生所熟悉、常用的乃是幂䍦，帷帽要算她人生最后二十年中逐渐接受的新时尚。





唐 捧帷帽的侍女壁画
陕西礼泉燕国太妃墓出土

也就是说，燕妃墓壁画呈现的，乃是帷帽盛行初期的样子。墓中所绘帷帽的帷裙很长，将此帽戴在头上，垂络大约能够遮蔽大半个身形。显然，帷帽最初乃是这般帷裙长坠的形态。从图中来看，长穗条条顺滑，并不紊乱，也没有缠绞在一起的情况，推测起来，彼此之间会以一道道横向的细丝进行编结，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长穗还是形成网络的形式。如此的围网显然要比纱、罗稀疏，帷中的身形也就更多地从疏网中泄露形象——难怪就在咸亨二年，唐高宗曾亲自下诏想要阻止帷帽的流行呢。

在那丝穗连成的疏网上装点珠宝或翠鸟毛，形成缀珠或贴翠而成的莹亮花纹，定然是异样的华丽。这是珠光宝气的面纱啊，也就难怪女性们不肯放弃，面对官方的压制，“初虽暂息，旋又仍旧”，皇帝的意志遭遇时尚流行的时候，会顿时变得软弱无力，宫廷内外的女性，负责装饰墓室的画工，都将圣旨当空气。

于是，帷帽很轻快地击退了天子的干预，到武周时期，竟气势如虹地变成了一统天下的女性骑马服饰。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武则天在少女及少妇时代，都常披戴兜头面纱即□，在她成为皇后之后，如果骑马出行，会戴一顶燕妃墓中那样的帷帽。

帷帽盛行之后，帽“裙”即垂网或垂穗逐渐缩短，日益失去遮蔽女性身体形象的作用，最终收缩到肩部，仅仅能将女人的面庞笼在纱影里，身体的形象却暴露无遗。这就意味着，武则天时代，凡有能力骑马出行的女性，全都戴用这种浅纱至颈的帷帽。

到了开元年间，连帷帽也被抛弃了，仕女们索性“靓妆露面”。最有意思的是在唐人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提到：“中年至西京市……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褕□，必为瓦石所及。”大约到天宝年间，女人戴帷帽反倒显

得不合时宜，如此打扮着外出会遭到戏弄与侮辱。因此，如果在影视中表现开元、天宝时期的杨贵妃、虢国夫人等人骑马戴帷帽，那就犯了不准确的错误。

帷帽作为上层社会富贵女性流行服饰的全盛期，大约自永徽至开元初，前后为一个半世纪。不过，种种线索显示，这种形制的帽具并未就此彻底绝迹，一个最有趣的例子便是，直到当代，广东惠州等地客家女性的传统“凉帽”仍是帷帽的基本形制。相关记载见于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韩公帕苏公笠”条：“惠州、嘉应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传说中宣称是苏轼将此种斗笠引入当地，因此拥有一个极催惹思古之幽情的雅称——苏公笠。从今日能见到的实物来看，苏公笠周沿的垂帛很短，不能遮挡面孔，其意图在于“以遮风日”，利用垂下的护帘遮阳避风。实际上，如此的形式与宋代广泛使用的“席帽”——即帷帽的男性版一致，因此，“苏公笠”的传说有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这种帽具是在宋代传播到惠州一带。



唐 戴帷帽骑马仕女泥俑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寻踪帷帽向周边国家的扩散也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日本在历史上便引入了与燕妃墓壁画所示异常相近的“帷帽”，结果，恰恰是在这个国家的现代影视作品中，帷帽与贵妇、与武士等形象联系在一起，被提炼为神秘、独立、飘忽无定、诱惑等多重含义的符号。黑泽明的《罗生门》中，无心的风将帷帽的长纱忽然拂开一线，那是风的错误吗.....

不过，挑战笑点的是，经由日本影视得知这样一种风吹仙袂、容易营造神秘感的帽具，近年中国影视人也快活地迷上了帷帽，大片或热剧里，先秦、秦汉的美女们纷纷顶着轻纱飘晃的帷帽妖娆，根本不管是否制造了时代错误。

其实，早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指出：“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帗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帗帽兴于国朝。”原来大画家阎立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让王昭君头顶帷帽出了塞。但张彦远明确指出，帷帽是唐朝才兴起的一种服饰，因此唐以前的女性与之绝缘。

但是看来即使张彦远这样权威的声音也不能阻止今天的高人们。

裙底的鸳鸯鞋

当代时装有个“拼色”的概念，即，用不同颜色的衣料拼成一件整衣，夸张的情况可以是一条长裤的两条裤管一红一黑或其他对比强烈的搭配，让人联想到嬉皮作风。然而，其实中国传统服饰早就利用“拼色”手法，最突出的一例当属宋时发明的“错到底”女鞋。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道：“宣和末，妇女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北宋末年的女性流行用两种颜色的布帛做鞋面，这样，一只鞋自鞋尖至后跟会呈现两种不同色彩，所以得了个奇巧的叫法——错到底。

“错到底”鞋式一经出世便颇受女性青睐，直到元代还常见。元人周文质有《双调·折桂令》一首，便明白地题为“二色鞋儿”，也就是说这一首小令专为咏讴“二色鞋儿”而作：

轻摇环佩丁东，半露新荷，半掩芙蓉。花柳些些，霞绡点点，锦翠弓弓。绿绡扇轻拈落红，茜萝尖微印苔踪。心恨难通，裙底鸳鸯，出落雌雄。

揣其意不难明白，二色鞋儿的鞋面正是半扇用绿罗、半扇用红罗，所以鞋面一侧红、一侧绿。显露在裙底，自绿的一侧这边看来如荷叶抽角，自红的一侧那边看则似孤片莲瓣。走动起来，只见一抹如霞的红绡与一抹欲滴的翠色，低低的，交错晃眼。两只弓鞋的拼色对称地一致，所以被周文质比喻为一对华丽的鸳

鸯，同行并立。

显然，周文质是在玩味他于生活中亲眼看到的实物，所以才能写得如此生动活泼。由此可知，陆游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情，二色鞋或说“错到底”式鞋确实曾经存在，曾经在往时女子的裙底俏丽。

文献中还出现有“合色鞋”一称，《醒世恒言》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一篇，就是以少女潘寿儿的一只合色鞋作为贯穿线索。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介绍嫁接花木中的“过贴”技术，即，把相邻两棵树或两株花的各一根枝条削切后封合在一起，令它们逐渐长成一体，其中有言：“欲花果两般合色，则勿去其梢”——如果乐意在培植过程中看到接合在一起的两根枝条同时各开其花、各结其果，形成两种花并肩开放、两种果错杂轻垂的有趣景象，那么操作时要保留枝梢，不要砍成秃枝。“花果两般合色”一句正显示出，古人会把两种不同颜色并列的情况称为“合色”。因此可以推测，合色鞋乃是“二色合成”之鞋，因此如二色鞋一样，是“错到底”鞋式的另一种通俗叫法。



元 白色斜纹绸彩绣翘头女鞋
隆化民族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合色鞋一称早在宋代已经流行，宋人王千秋《桃源忆故人》词便咏为：“移灯背月穿金缕。合色鞋儿初做。却被阿谁将去。鹦鹉能言语。”写一位女子亲手新做成的“合色鞋儿”居然被不知谁人偷走了一只。剩留的一只宛如失掉伴侣的“孤鸾”，因此词尾叹道：“若念玉纤辛苦。早与成双取。”如果真心怜惜女子做鞋的辛苦，还不如趁早把一双鞋都取走。显然，此处是双关语，其实是暗示有情人赶紧把鞋的主人娶回家。这样看来，所谓丢失的合色鞋多半也是女子作为信物赠给了心上人，一如潘寿儿把自己的一只合色鞋从楼上窗中丢给少年郎张荇。两种颜色拼合而成的鞋面很容易转为“成双”“相伴”的寓意，形象地表白女子的心意，在男女难以通过语言直接剖白感情的时代，倒是挺适合作为信物。所谓被人偷走一只，不过是鞋主人瞒骗众人的托词罢了。

另外，周密一首《浣溪沙》词描绘一位佳人在夏日的清雅装扮：“合色麝囊分翠绣，夹罗萤扇缕金书。十分凉意淡妆梳。”她所配挂的香囊正是“合色”也就是双色帛料拼成，满布鲜丽刺绣。由此亦可见出，在往昔中国，“拼色”一法不仅用于女鞋，而且活跃于各种服饰。



元代丝织幡形饰物，主体为红、绿二色的“合色”拼配。
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

见证盛世的异域宝石

明代崇祯年间，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型世言》印刷发行，公开在书坊内销售，供人买回家阅读。这本三百多年前的话本小说集中，《宝钗归仕女》一篇以锦衣卫王指挥家的一支祖传金钗带动情节的发展，那支钗上镶有蓝宝石、石榴石、酒黄宝石等“四五颗都是夜间起光的好宝石”。

当年，明代官员家着的首饰可以如此奢华，嵌满不同种类的宝石？是讲故事人在夸大和美化吗？非也。近年来，考古发掘令数量惊人的金首饰从明代墓葬中出土，这些首饰的一大特色正是特意以色彩不同的贵重宝石组合排列，达成缤纷瑰丽的视觉效果。明代上层社会可以拥有如此的奢侈，这固然出乎很多今人的意料。可能大家更加想象不到的是，这些宝石全部来自异域，是通过国际贸易进口而来。

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之一，因此也是经久不衰的贸易顺差大户。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巨大收益促使中国成为吸引全世界奇珍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本土天然匮乏的缤纷宝石亦在其列。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向西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向南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到东汉时，进出口贸易便发展为前所未有的顺畅，异国传入的新鲜物品让贵族生活焕发全新的风貌，其中就包括“玫瑰”和“琅玕”两种宝石。据研究，琅玕是绿松石，玫瑰则是红玛瑙，当时是从南方或西域进口而来。汉代工匠将绿松石和红玛瑙切割成小粒，再打磨为光滑的圆凸状表面，彼此相错地镶嵌在金器或鎏金铜器上，形成赤碧对比的绚丽效果。

学者们推测，“玫瑰”与“琅玕”这两个在汉代突然出现的词称都是异国语言的直接音译。不过，随着语言的变迁，从南北朝开始，人们不再把进口玛瑙呼为“玫瑰”。然后，从唐代起，这一名称被转而指称花朵，沿袭至今。如今我们一提起“玫瑰”，便会立刻想到芬芳娇艳的花卉，这个字形悦目、发音悦耳的词汇最初的意义却少为人知了。

同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汉代文献中出现了“璧瑠”“璧流离”一词，乃是古波斯语中“水晶”（发音大致为bolur）一词的音译。到唐代，该词译成“玻璃”。在汉唐人那里，“璧瑠”“璧流离”“玻璃”都是专指来自异域的天然彩色宝石。我们如今所熟悉的人造玻璃，在那时则是称为“琉璃”。不过，从宋代起，玻璃逐渐用于指称异国生产的人工玻璃器，沿用至今，以致我们忘记了它当初的意思。



清 金累丝嵌珍珠宝石九凤钗口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在唐朝，进口“玻璃”的种类增加到红宝石、蓝宝石、黄宝石、绿玉髓等，宋时则出现了伊斯兰世界出产的孔雀石。不过，自汉至宋，这些宝石的贸易量不大，仅属宫廷以及少数贵族巨宦独享。要等到元代，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促使这片大陆上形成流动通畅的贸易网络，由此，异国宝石进口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数量亦大为增加。因为这些贵重宝石多数从伊斯兰世界进口，所以俗呼“回回石头”。同时，人们又借用阿拉伯语“宝石”一词的发音（大致为“yagut”），写成“鸦鹛”或“亚姑”，用来标示从中亚、西亚贸易而来的透明宝石。红宝石称为红亚姑、黄宝石为黄亚姑、白宝石为白亚姑，蓝宝石则称为“青亚姑”“鸦鹛青”，

到明代简称作“鸦青”。在这个时期，猫眼石、祖母绿等名贵宝石也引进到中国，备受珍视。

明人沿袭元风，仍然喜爱从异国千里而来的彩色宝石。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美洲白银的发现，为中国提供了扩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于是，明朝期间，中国与世界多地的贸易可谓全面启动，从瓷器、丝绸到稻米、棉布乃至香精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中国几乎各个领域的产品都具有鲜明的竞争优势，成为异国市场欢迎的对象，这就造成白银迅速且大量地流入中国。在空前的富裕当中，进口名贵宝石的规模也进一步加大，相应的，消费群体也发生了扩充，富商、中级官员之家都有能力享用镶嵌彩色宝石的首饰。《宝钗归仕女》一篇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种反映，类似描写在明代通俗文学中往往可见，《金瓶梅词话》中就提到，李瓶儿私房宝物内包括“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还有过世公公花太监生前所用的“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二刻拍案惊奇》中“襄敏公元宵失子”一篇描写小主人公头上打扮，“只头上一顶帽子，多是黄豆来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双凤牡丹花样，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睛光闪烁，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乃是鸦青、祖母绿之类”。出土文物印证了文学描写的可信性，以定陵出土万历帝后的首饰为代表，这些明代首饰实物往往会在一件饰品上刻意以红、蓝、黄、绿、猫睛石以及珍珠、玉石等交错排列，富丽华贵。

由于宝石长期依赖进口，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汉语中关于宝石的称谓往往直接借用外来语。其中，最富有诗意者无疑当属“碧霞洗”。这种宝石乃是从缅甸等地进口而来，在清代开始受到赏识，据说慈禧太后尤其喜欢，她的这一偏好引发整个社会跟风，于是在晚清成为价格异常昂贵、宛如时尚象征的珍物。此类宝石在引入的时候，也是采用了异域语言的音译作为名称，以

致有一段时间内清代文献“书无定字”，写作“碧研玺”“碧鸦玺”等，流传到今日，被简化为“碧玺”。然而，清人赵翼《檐曝杂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种译法“碧霞洗”，不仅让单纯的音译变得具有了意境，而且还生动地体现了所指对象自身的最大特点，可谓翻译中的成功例子。此种宝石如水晶一般透明，有着粉、黄、绿等多种色彩，不过，其最典型的色泽正是粉霞色，恰如晴霞彻映的天空一般闪着粉红或浅紫的透明光泽，名之曰“碧霞洗”，真算得上传神。



明 佚名
《夫妇像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明 金镶宝石冠
云南省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碧玺翡翠十八子手串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因此，当我们凝望那些借考古发掘而重现于世的古代首饰时，应该意识到，点缀在其上的颗颗精美宝石，不仅是中国古代工艺高超水平的证明，同时也昭彰着中国文明和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不断推进的历程。

珠络的华衣

据传，光绪皇帝曾经动用千颗珍珠以及若干翡翠为珍妃做了一件“珍珠旗袍”。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则是说，珍妃做了一件“珍珠披肩”。无论是旗袍还是披肩，总之都很惹慈禧太后动怒。其实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值得怀疑，须知，在当时，旗袍上饰珍珠，或者用珍珠编成云肩，应该算蛮普遍的风气。

把珍珠乃至金珠钻出细孔，用丝线钉到服装的表面，形成华丽的纹饰，这是中国传统高档华服的一种常用手法，文学中称为“珠服”。唐宋时代，流行的方法是在衣服上用翠鸟毛贴出蓝色、微微闪光的花纹，然后钉缝珍珠，形成微凸的图案，如此形成珠与翠在色泽、质感上的对比。珠服的最高峰是在宋代，当时高档华服一律用珍珠装饰边缘与接缝。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就记载，在由官方绘制的皇后画像上，皇后头戴“翠凤冠”，身穿“珠络泥金”的宽袖礼服。所谓“珠络”就是指衣服上不同部位拼缝的地方以及领边、衣边全部装缀一溜珍珠。足相印证的是，今日可见的南薰殿旧藏宋代皇后像，正是戴翠冠，袍领缘以珍珠，更为醒目的是，其中宋仁宗皇后像上绘有立侍两旁的一对宫女，二人所穿盘领袍的衣缝、襟缘、领缘均一路缝缀珍珠，甚至内衬袂衣的领缘、袂缘也同样以白珠饰边，恰是所谓“珠络”之衣。珠络衣在宋代女服中广泛存在，文献记载，公主下嫁时，陪嫁衣服中包括饰有珍珠的礼服与长上衣，以及“珍珠翠领”的四季服装；宫中妃嫔也会受裳“北珠缘领道氅”“珠翠芙蓉缘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民间女子只要有足够的财力，也都会制作几件钉珍珠的华服，风气泛滥得太厉害，以至于端拱二年（989），

宋太宗专门下诏规定：“珍珠装缀衣服，除命妇外，余人并禁。”很有意思的是，这道诏令仍然允许受赐诰命的贵妇们穿着缝珍珠的礼服，只是试图禁止平民女性也享受同样的奢侈。不过，类似的圣旨一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遵行，时尚会我行我素，各阶层的女性照样统一以珠服为美为贵。



清 慈禧佛装像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必须清楚的是，缝缀珍珠的装饰手法并非仅用于女服，《宋史》中就记载宋徽宗曾经现场脱下身上“珠袍”赐予臣子，《元史》中也提及皇帝赏赐功臣“贯珠袍”。男性最高贵的华服缝钉珍珠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据《万历野获编》，曾经有万历皇帝宠信的老宫女偷走“御前珍珠袍”，交给私好的“菜户”太监卖掉，事后追查起来，却连累一群掌管皇帝服装的太监受尽苦难。及至清代，则有珍贵的钉珍珠龙袍实物幸存至今，一般都是用小粒珍珠——当时称为“米珠”——有规则地钉在龙纹部位，由此让整条龙纹都由珍珠组成。

其中堪称人间奇宝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时期“孔雀羽穿珠彩绣云龙纹吉服袍”。这件礼服袍以蓝色素缎做袍面，但是，除花纹以外的部分全部用孔雀羽线绣满。也就是说，整个袍面都被孔雀羽线满覆，根本看不到蓝缎。花纹部分则采用米珠钉绣的方式形成大小九条龙纹，而龙须部分以及周围的蝙蝠纹以小红珊瑚珠钉绣，另外还用金线、银线、五彩丝线绣出龙身的细节以及云纹、海水江牙纹等。珍贵的材质制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让人不禁感叹乾隆时代国力的强盛、工艺的高妙。

在清代，钉珍珠这一豪华装饰手法并非仅用于正式礼服。慈禧太后曾命美国女画家为她绘制一幅油画肖像，在这幅画像中，权倾一时的“西太后”便穿了一件钉珠旗袍。这件旗袍的袍面上分布着一串串紫藤花，每簇花上均钉满硕大的珍珠，同时还用珍珠在圆领、袖口界出一道珠边，尤其是旗袍下摆，装饰了疏密不一的四道珍珠镶边，正是一件名副其实的珍珠旗袍。

珠服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有趣的形式，那就是用金属线或丝线把多颗圆珠直接串成联珠网络，编织为特定的形状，从而成为一种服饰。早在汉代，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当中就包括“珠襦”，是把珠子用金属丝串起，编织成一件硬挺的短袖罩衣，罩穿在礼服

之外。据记载，那个时代，天子王侯们下葬时也一律穿珠襦。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发现了一件珠襦的残件，乃是用上千颗浅蓝色玻璃珠编成，由此可知，珠襦不一定全用珍珠，往往是利用玻璃珠、骨珠等更为便宜的材料。

慈禧太后也很喜欢这种珠编的服饰，具体来说，她中意的是用大号珍珠串成的网络式云肩，拍照时几次披挂上场。包括与美国公使夫人等西方使节夫人的合影，她也是着意在旗袍外套了一件大珍珠编就的珠络云肩。传说中珍妃所做的珍珠披肩，其实就是这种珠络云肩而已。

必须一提的是，清代有一种“璎珞衣”，乃是藏传佛教大喇嘛举行重大佛事时所穿的法服。这种璎珞衣包括珠络云肩，不过云肩的正前与背后都会垂下珠串的璎珞。另外还带有帽饰、肩饰与臂饰、佩饰，尤其耀目的是一件珠络式下裳（裙片），均为珠编而成。这些璎珞衣并非以珍珠为材，而是用砗磲、驼骨等磨成圆珠。根据等级不同，编衣的串珠被染成五种颜色，最高一级为红珠，其次则为蓝、白、绿和明黄。如此的法衣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由江南三织造（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承制，清朝皇帝将它们颁赐给各级大喇嘛，以此表示对大喇嘛们地位的认可。因此，每一套璎珞法衣都精工巧制，这些法衣一般还会配有软衬，也就是丝绸制作的衣饰零件。如乾隆时代的一套红砗磲璎珞衣，便配以云肩、双袖与裙围，均为大红缎裁制，利用金线、五彩丝线绣出祥云、蝙蝠、八宝、如意头等吉祥纹样，同时在云肩垂胸中绣有佛像。如此独特的珠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自成特色。



宋 佚名
《宋仁宗皇后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勋龄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

故宫博物院藏

说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既然以珍珠钉在衣裙上的风气、制作编珠服饰的风气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那么即使珍妃真的曾经做过这类衣装，也不至于成为让慈禧怒不可遏的理由。所以这两则传说大概属于民间演义。如今，钉珠始终是女性服饰上常用的手法，至于纯粹以珠子串成的璎珞衣，在现代时装中也间或有类似的例子，但并不多见。也许，将中国古代的这一服饰形式加以翻新、改造，会催生出有趣的时装设计思路。

飞燕的金衣

《西京杂记》中记载，西汉时，赵飞燕与妹妹赵合德同时受到汉成帝宠幸，赵合德为了缓和姐妹争宠的紧张形势，呈送给赵飞燕一批精美礼物，其中有一件“金错绣襦”。古老的服装名称似乎显得难以理解，其实，翻译成今天的说法，“金错绣襦”就是贴有金箔花纹的绣花坎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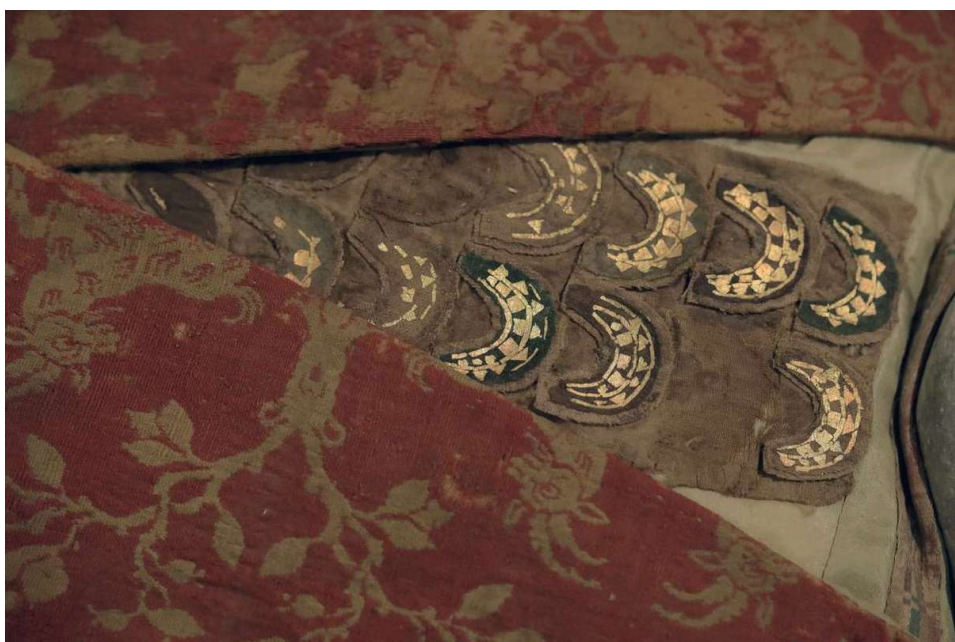
“襦”是“裯襦”的简称，意为坎肩儿、背心。“错”则借用当时金属镶嵌工艺的习惯用词，转而形容以金箔贴饰服装的做法。因此，按照《西京杂记》透露的信息，早在西汉时代，贴金工艺就已经运用在皇家服饰中。

到东汉时代，贴金服饰在上层社会日渐流行，至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装饰手法迎来了鼎盛时期。所谓贴金、贴银，就是把成片的金箔、银箔直接贴到服装的表面，形成反射金色与银色光芒的花纹。黄金、白银之所以可以直接贴到丝绸的表面上，是因为这两种贵金属具有超级良好的延展性，熟练的金工可以通过特定的工序与技巧，把金片、银片一点点捶打成极薄的金箔、银箔。晋人陆翊《邺中记》记载，十六国时，后赵国主石虎的仪仗扇贴有金箔，就是“薄打纯金如蝉翼”，当时已经能把黄金捶打到蝉翼一般薄的程度。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成熟的金箔制造工艺，贴金银衣裙才成为汉代以来中国贵族服饰的重要装饰手法，也让自汉至宋上千年间的华美衣装金光烁芒，银辉流溢。

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仍是借用金属镶嵌工艺的用词，把服饰上贴金银的工艺称为“镂薄（箔）”“镂金”“镂银”“金银饰镂”“镂

金银薄（箔）”等。因此，在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一旦见到这类描绘，就该明白，文意是指贴有金箔或银箔的华丽服饰。如庾信《春赋》中“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是在描写一位女子服装异常华贵，衣袖上贴有镂刻成花纹的金箔，领巾则钉着颗颗珍珠作为点缀。

非常珍贵的，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中，尉犁县营盘等处的汉晋古墓出土了那一时代的多种贴金服饰实物，包括贴金的袍、衣、裙下摆、衣褶残片，也包括完整的贴金绮夹襦，让我们得以亲眼看到“镂薄”的精彩动人。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出土男尸的身上服饰，在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的领口之内，露出内衬的淡黄绢袍，这绢袍的前胸装饰用小片金箔贴出穹形花纹；同样的，在男尸足袜的绢面上，也有金箔贴成的花纹。在十几个世纪之后重见天日，这些金箔依然光芒夺目。神秘墓主一身的罽袍、绣裤，本来就已经非常精致、华丽，贴金的光辉，闪烁在这一身完整的、汇聚着多种文化传统的珍贵服饰上，就像是昔日的高贵与荣耀的一次沉默凯旋。



汉 营盘男尸
新疆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从这些实物上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是把金箔剪成几何形状的小片，按照预定的设计一一贴到衣料面上，组合在一起，形成菱形、三角形等复合图案。赵飞燕从妹妹那里得到的贴金绣花坎肩，大致就是这样的风貌。

镂薄工艺同时也称“金帖”。所以，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词描写一位女性晨起梳妆，打扮妥当之后，开始穿上华丽的衣裙：“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当时的人一看就明白，这里呈现的是一件采用贴金工艺的短上衣，在前襟上，一左一右，一对用纯金箔贴出的鹧鸪纹辉光芒丽。

入宋以后，同一工艺改称“贴金”。1975年发现的福建福州南宋黄升墓中，出土了带有贴金饰的宋代女装实物，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到了唐宋时代，贴金箔、贴银箔巧妙地与凸版印染技术结合到一起，其具体过程为：

把刻成各种图案的凸版（阳版）涂满胶液，先在织物上印出胶液的花纹图案，然后贴上金箔，再去除多余部分，就形成了金箔的花纹。

利用这一方法，金箔可以在织物上显影成任意形状的图案，工匠也就随心所欲地利用金箔来进行艺术创作。

实际上，黄升服装上的贴金印花，就是宋代花鸟画高度成就的微缩版，例如一条褐色牡丹花罗镶花边夹衣，其长长的领条上，婉转生动的牡丹、芙蓉、山茶等花纹，与今日所见宋人花卉小品同样传神，但是，这衣上小品的花与叶，都是用金箔贴成，其上再加以彩绘。看着它，我们足以完美地领会“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当年在清晨阳光中的视觉效果。可以确信，温庭筠笔下晚唐美人短袄上的金鹧鸪纹必是移用了活泼、健劲的唐代花鸟画，是一幅金色的花鸟小品，如同花影移墙一般，清晰地显影

在美人的身前。

到了明清时代，随着金泥、金线绣以及织金锦等工艺的后来居上，古老的贴金工艺反而失去了优势，退居小配角的地位。一般是将金箔剪成窄条，贴在衣边、鞋口等地方，起一点装饰作用。在清代，随着时尚风气的转换，贴金几乎从贵族服饰中彻底消失。《红楼梦》中有那么多的盘金等金线绣的服饰，以及织有金线的锦、缂丝等高级衣料，但是金箔只能以“掐金”的形式，化身为窄窄的细条，作为花纹外缘的边饰，偶尔露脸在袜、鞋上。



南宋 印金领抹山茶花罗上衣
黄升墓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南宋 销金花边花绫裙
黄升墓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南宋 印金彩绣芍药灯球花边
黄升墓出土

波希米亚风的钗黛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只写了一次林黛玉的服饰，一身御雪冬装：

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

在这里，靴、帽、绦都算是提色之笔，塑造形象的关键在于那件“鹤氅”，此种服装的形态很特殊，没有双袖，有点像今日的墨西哥披风“萨拉佩”，但在长度与宽度上都更为夸张。明代太監刘若愚《酌中志》记录：“鹤氅，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曰‘氅’也。彩、素不拘。”清人曹廷栋《养生经》里则说：“随寒暖为外加之衣，夹与棉与皮必俱备，为常服之最适。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由此可知，传统服饰中有一种秋冬户外专用服装，室内静坐时也可以披之御寒，名叫鹤氅、氅衣、一口总、罗汉衣。这种外衣的基本形态如一幅被面，为长方形，从中对折，形成一样长度的前襟与后襟，前襟在正中开一道竖缝，一直延伸到对折之处，在此做出领口。人们穿上它时，宛如把一幅被面从当中披在身前后，形成一件兜兜荡荡的宽松长罩。所以，可以说，这种罩衣更接近一件披肩，不过特别长大，一般底缘会下垂到将近脚

面的程度，甚至拖落在地面。它属于常服，不在礼服之列，只适合日常穿着，可做成皮、夹、棉等不同形式。

奇妙的是，传统上，鹤氅的前襟与后襟之间的底缘并不缝合，就令其随意敞开着。《酌中志》便特意指出，到了明代中期，出现了将鹤氅两翼缝为衣袖的做法，但传统的样式却是不缝两翼的。实际上，《养生经》显示，有如被面对折的鹤氅在底缘不加缝合，直到清代，仍是广为人们熟悉与习惯的处理方案。

鹤氅虽然形式简单，但实用性强，穿脱都很方便，并且两翼飘飘，颇有神仙凌风之态，潇洒俊逸。《晋书·谢万传》提及谢万曾“著白纶巾、鹤氅裘”，似乎其在晋代就已经是一种便衣性质的华服，穿上它，让人显得既高贵又脱俗。到了明代，宫廷及富贵阶级空前地热衷于鹤氅，《金瓶梅词话》只提到一次斗篷，一旦涉及御寒外衣，便夸耀各色奢侈织物制作的鹤氅，典型如第六十九回，西门庆与林太太首次见面，西门庆“身穿紫羊绒鹤氅”，林太太则是“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袖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襟裙子”。这种巨型长方披肩还进入道教的服装体系，成为道士在公众面前做法事时必穿的最外一层“法衣”，《金瓶梅词话》中就一再提到道士们的“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大红五彩云霞二十鹤氅”等。



黄缎平金彩绣鹤氅正面与背面
首都博物馆藏

入清以后，斗篷逐渐占据了御寒外套当中的主要地位。《红楼梦》中，曹雪芹让其他女孩都穿斗篷，唯有黛玉、宝钗穿了鹤氅，可见他对笔下这两位女主人公的偏爱。其中，黛玉的形象尤为鲜明夺目，“罩了一件大红羽纱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翻译一下就是说，她披着一条超大号红色长方披巾，面料是以羊毛与丝合织而成的西洋进口织物，内衬为白狐皮，这披巾长度近乎垂地，单单用一条金、蓝、绿三色线编成的长绦拦腰松松一系，而绦子在身前以一对玉环作为固定卡扣，由绦子穿过双环后打成花结来束住。如此的潇洒随意作风，不就是波希米亚风格吗？感觉林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前徜徉的当代女大学生啊！



明 陈洪绶 《女仙图》
故宫博物院藏

正因为一件几乎拖到地面的鹤氅掩盖了黛玉的全身，所以她身上能看到的其他细节便只有雪帽、绦子和红色羊皮小靴了。但这是多么耀眼的一套装束！与之相反，宝钗则是一贯的“低调奢华有内涵”路数，穿了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丝的鹤氅”。揣摩曹公的设计，蘅芜君的这件“雪褂子”虽然色彩比较谨慎，为淡紫色，却是采用更为少见的进口面料，乃是不知哪个国家出产的羊毛与棉合织成的花呢，具有彩锦一样的效果，在紫底上显有绚丽织纹。其他人的羽纱或者猩猩毡虽然也是进口面料，但都是单色织物，不带图案。唯独宝钗用上了类似织锦的洋呢，这个细节真是如此符合小说中对于薛宝钗的设定，似乎不张扬，但在品质的精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极致奢华上，总显出他人无法与之竞争的豪气与霸气。

宝钗的项圈

《红楼梦》中，与“木石前盟”相对的是“金玉良缘”，象征着俗世的安排。宝玉是神奇地含了块玉出生，而宝钗则总是戴着一只后天打造的金锁。

据宝钗自述，在她小时候，有个“癞头和尚……给了两句吉利话儿……他说必须镌在金器上……叫天天带着”，于是父母特意定制了一只金锁，把那吉利话镌刻在上面。这只金锁带有长命锁的意义，于是，在作者的思路里，就按照当时俗常做法，挂在一只金项圈上，与宝玉、官哥儿的寄名锁形式相同。不过，奇怪的是，传统绘画中表现项圈，几乎都是一个夸张大圆环硬撅撅地扣在人的肩头。然而，《红楼梦》中明确写道，宝钗“一面说，一面解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个，共成两句吉谶”。也就是说，宝钗平时都是将金锁掩于外衣之内，其他人轻易看不到。在本回当中，挂有金锁的项圈便是藏在“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儿”两层冬季外衣之下。因此，她所带的项圈肯定不会如绘画中那样，制成一个与人体完全不相贴合的大圆环，斜撑在肩头。假如似画中的表现，这等大环怎可能服帖地藏于外衣的下面？宝钗哪还能有个正常的形象？

郭若愚先生早于1979年发表的《〈红楼梦〉与文物考古：什物工艺编》一文已提出，《清稗类钞》里所记录的一款出于和珅家的“项圈锁”堪为理解《红楼梦》相关细节的关键。这条资料其实是出于包世臣的《司盥项锁赋序》，清人李岳瑞所著《悔逸

斋笔乘》对于其赋其序予以了全文载录。李著中“和珅婢妾服御之侈”一条先介绍道：“安吴集中，有《司盥项锁赋》一首，为和珅作也。”然后便直录包世臣之序文——

扬州玉肆，有圈锁一具，圈式作海棠四瓣，当项一瓣，弯长七寸，瓣梢各镶猫睛宝石一颗，掩钩搭可脱卸；当胸一瓣，弯长六寸，瓣梢各镶红宝石一颗，掩机钮可叠。左右两瓣，各长五寸，皆凿金为榆梅，俯仰以衔东珠。两花蒂相接之处，间以鼓钉金环。东珠凡三十六颗，每颗重七分，各为一节，一节可转为四（《清稗类钞》此处为“节节可转”）。玉环者九，环上属圈，下属锁。锁横径四寸，式以海棠，翡地周翠，刻翠为水藻，刻翡为捧洗美人妆。其背镌“乾隆戊申造，赏第三妾院侍姬第四司盥”十六字。锁下垂东珠九颗，各九珠，蓝宝石为坠脚，长约当脐。估客云：“某寺尼所寄售也。”尼少侍贵人爱姬入都，锁所镌，即姬小像。

这件制于乾隆年间的宝饰分为项圈与挂锁两部分。从结构来看，金项圈分为四节，即颈后一节、当胸一节、左右各一节。颈后一节的两端装有挂钩，可以与左右两节的上端相钩合，也可以随时脱钩。当胸一节的两端与左右两节的下端则是凭特殊的转钮相连，带项圈时，利用转钮，可以先把左右两节打开，形成足够的宽度，然后再恢复成圆弧形，并与颈后一节挂接。摘项圈时步骤则与之相反。

从装饰的角度来看，颈后一节的两端各镶饰一颗猫睛石，当胸一节的两端则各镶饰一颗红宝石。左右两节十分复杂细致，分为十八个小单元，每一单元为两朵金质带叶梅花相对开放，中间衔一颗大珍珠。单元之间通过带有鼓钉纹的金环相接，所有这些细部皆以活轴彼此嵌衔，于是珠、花、环都能独立转动（或者理

解为每一组衔珠梅花在手指拨动下可以转动)。

另外，当胸一节上套有九个玉环，这些玉环下垂吊着一枚翡翠锁，海棠形的锁面材质珍异，周边为翠绿色，中心为紫色或粉红色，正面刻有一位捧着水洗的美人形象。锁下还垂有九串东珠，每串珠络的末端都用蓝宝石做坠脚，长度大约直达肚脐部位。

包世臣所见的“项锁”实物固然华丽之极，不过，我们不难观察到，其项圈部分与清代“领约”十分相近。在清代朝廷正式规定的仪服制度中，领约为后妃贵妇朝服的配套饰物之一。所谓领约其实就是项圈，但是拥有固定的、颇具特色的形式，环体是由三节组成，正中一节与左右两节之间各以活轴或球形转钮相连，可以打开，方便于佩挂或摘脱，也可以扣合成项圈应有的圆弧形。至于左右两节，则在颈后部位留出一个活口。《司盥项锁赋序》的记述显示，清时，采用类似结构的颈饰物不仅限于正式的礼服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一样会佩戴形式相近的项圈，并且私自佩戴的项圈甚至会比用于重大仪式的领约在材料上更奢侈，风貌上也更华丽。

这一消息让我们将注意的眼光落到佚名宫廷画家所作的《雍正行乐图》上。此画中共有四位美人，两位着满装的旗袍，另外两位着汉装，其中一位满装女子在颈上带有一只项圈，明显与今日所见“领约”实物非常接近。另一位梳旗头却穿汉装的女子在对襟长衫的领部罩有小巧的云肩，云肩上也佩一只项圈，同样的，与领约形制相同。然而，在此处，“领约式”项圈并非与朝服相配套，而是装点在日常衣装之上。若是没有《司盥项锁赋序》作为提示，我们或许会对这幅作品中的如此表现不以为意。但是，包世臣所见“捧洗美人”翠锁项圈表明，至少在清代前期与中期，项圈曾是女性日常佩戴的饰物之一，并且在样式上恰与领约相近，

那么，我们就该考虑到，《雍正行乐图》中两位女性的颈上项圈乃是现实情况的写照。



清 佚名

《雍正行乐图》细部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金点翠锁
南京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内蒙古博物馆藏有一件“双龙戏珠纹鎏金银项圈”，形制与清代领约相同，只是一对转轴不如清物精巧。此件银项圈出于内蒙古奈曼旗苇莲苏元代窖藏，因此是元时之物，由此则可知，这种形式的项圈有着颇为长远的历史。很醒目的是，项圈的圈环上呈现二龙相对的浮雕纹样，两只龙头之间为环体的正中点，却留出孔洞。很明显，这一孔洞是为衔挂坠饰而设。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中写到官哥儿的“银脖项符牌儿”时，也称为“一付银项圈条脱，刻着‘金玉满堂，长命富贵’”。条脱本是指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手镯，用在这里，应该是指银项圈形式灵活，开合

便捷。因此，官哥儿的挂有寄名锁的项圈很可能也是采用“双龙戏珠纹鎏金银项圈”的形制。这样说来，至晚从元代起，经明朝，带有双转轴、可灵活开合的项圈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实际上，直到清末、民国，民间所制的传统儿童长命锁的配套项圈始终采用这一双转轴的形式。

在清朝，如此双转轴、可开合的项圈被引入国家制度，成为后妃贵妇朝服的设定配件。然而，《雍正行乐图》与《司盥项锁赋序》共同显示，在清朝前期、中期，这种项圈也作为普通饰品的一种，于日常生活中装点女性的身影，并且既可用于满装，也可用于汉装，在样式上则分为两类，一类衔配挂坠，一类则如“领约”，仅以环圈为饰。



清 金镶玉领约
辽宁省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清 崇庆皇太后八旬画像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与之呼应的是，《红楼梦》中，恰恰王熙凤也是日常佩戴项圈的一位，且拥有若干异常华贵的项圈制品。

凤姐于第三回第一次出场，便“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以“双龙戏珠纹鎏金银项圈”为参考，不难想象，“赤金盘螭”乃是在金质圈环上凸现一对相向盘舞的浮雕螭虎饰纹。另外，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累丝嵌玉双龙戏珠金项圈”，在球形转钮的两边各作出龙形，构成二龙戏珠的纹样，把项圈上出于实用而设的机关转为纹饰中的双龙所捧之珠，可谓构思巧妙。根据它，我们也可以想象凤姐之“盘螭璎珞圈”以及宝玉“项上金螭璎珞”的精美。

其实《红楼梦》中有一处很微妙的细节设计，凤姐每次哭穷时居然会上演一个常设戏目：当项圈——

第六十九回，贾琏为尤二姐的丧事向凤姐要银子，凤姐便道是：“家里近来艰难，你还不知道？……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你要就拿去。”

第七十二回，夏太监府来人打抽风，凤姐“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银子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平儿答应了，去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着。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项圈，那珠子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起一半来，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节。”

第七十四回，邢夫人以“做八月十五日节间的使用”为借口向

贾琏强要二百两银子，凤姐“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索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去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着那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很明显，此次“押金项圈”距上一次之间并没有多少日子！随着情节一路至此，读者自会明白，这事儿不过是凤姐、平儿与旺儿媳妇串通好的一场戏。哭穷的同时却还要尽情炫耀富贵，凤姐的性格就是这样华丽，这样既讨厌又让人不自禁地喜欢——俗气，逞强，无耻以及狡诈，尤其是，虚伪。

凤姐反复假意抵押的两个“金项圈”，“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项圈，那珠子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将之与《司盥项锁赋序》相参照，大致可以想象清代盛期贵族所佩项圈的华贵。由此而更进一步，第二十八回，凤姐命宝玉为她记私账，“大红妆缎四十匹……金项圈四个”，我们也就会明白这简单的“金项圈”一称其实意味着何等的珠装宝嵌。

同理，凭借《司盥项锁赋序》的描述，宝钗“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便显得具体起来。《红楼梦》中总是把“项圈”与“璎珞”混用，大约正因为彼时的项圈满布珠宝，如璎珞一般璀璨吧。《雍正行乐图》中，汉装美人所带项圈极为小巧，仅比领圈略大，尚不及云肩的下沿。从实用角度来看，这种项圈是金银做成的圆环，尺寸不能过大，否则会显得俗蠢，然而又需摘带方便，因此灵巧的开合机关便属必需的配置了。环分三节或四节，其间以球形转球及搭钩相连，堪称传统设计的成功经验之一。

想来，只有如此形制的小巧项圈，宝钗才能将其掩于外衣之下。因此，关于宝钗的项圈，需要依照《雍正行乐图》中的表现

去理解、去想象。

昭君套

《红楼梦》中的各种描写都带有迷人的特质，包括美食、服饰这样的细节。小说中每每提到人物的穿扮，但或虚或实，需要读者根据文献资料的参考，自行加以分辨。

曹公笔下，一些穿扮属于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艺术化处理，典型如宝玉外出时“头上戴着束发嵌宝冠”，便是采用了前朝——明代的王侯服制，但说这宝冠上还树立着“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一只红绒球，就正如邓云乡先生所言，是搬入了戏曲服装的因素了。但是，也有完全依照当时现实表现的情况，其中尤以凤姐最为突出，小说中，她的首饰、服装，均呈现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富贵女性的典型时尚。

也因此，小说中凤姐形象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留意。例如刘姥姥一入荣国府时，她眼中见到的王熙凤，头上“家常戴着紫貂昭君套”。昭君套的名称听来很有趣，其实，在明清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帽饰，有地位女性冬季在室内时，普遍习惯戴着它护头御寒。传统女性本来就体质弱，寒冬时节，靠炭盆、火炕取暖，一室之内的温度往往并不均衡，所以，即使在家居状态，也要用皮帽罩在头部免受寒侵。不过，她们或者梳有造型奇巧的高髻，或者在发髻上罩有金、银等材质的宝冠，并且无论高髻还是宝冠上都插满簪、钗等贵重首饰以及真花或绫绢假花，为了不破坏这一派精心设计与打造的华丽风光，昭君套便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由皮毛制成的环形帽套，缝制得与女主人的额头大小正相合适，将其套在额头，这样，环绕着头部便有一圈皮毛保护，但发髻、宝冠则从皮环的当中耸立出来，不会遭受压损，精致的

造型也就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各样珠宝、花饰也显露在帽套之上，炫耀着昭君套主人的尊贵与俏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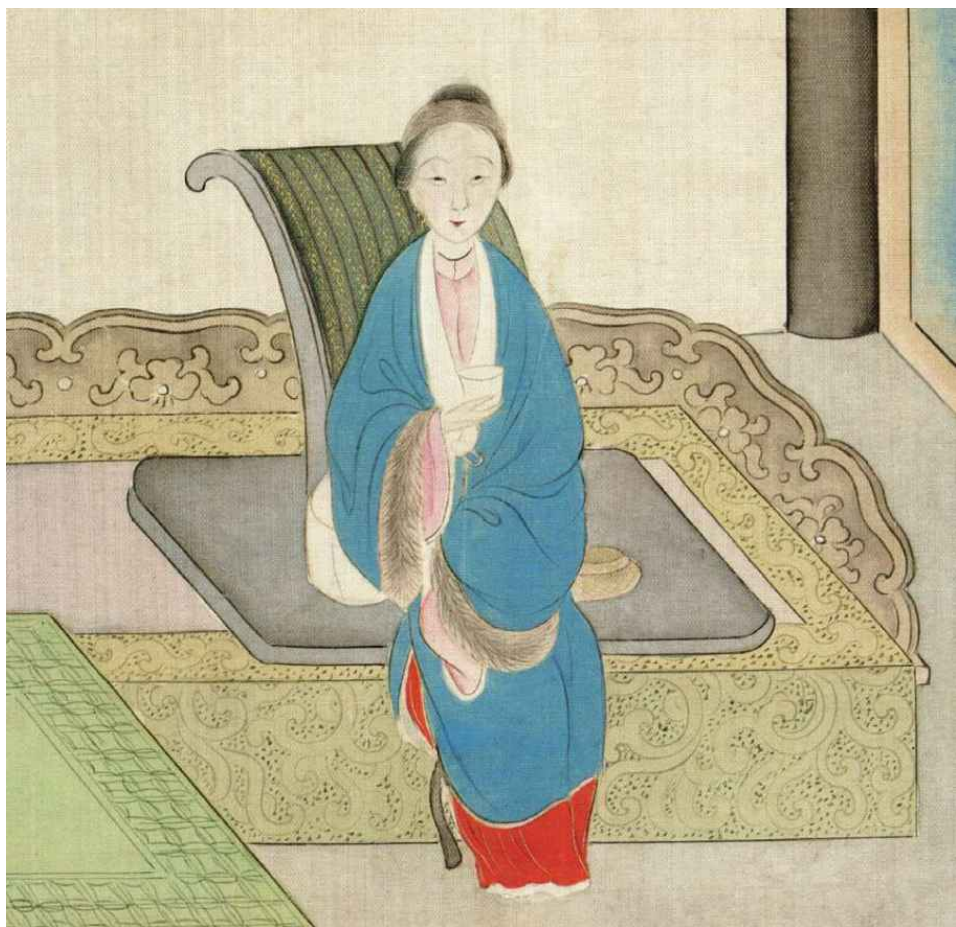
大约因为一圈茸茸皮毛横卧在女性头部，有点像个可爱小兔伏卧的形象，所以在明代，这种特型护头无顶帽还有个更可爱的名称“卧兔”。《金瓶梅》中便把昭君套一律叫作“卧兔儿”，如西门庆的正室吴月娘头戴金梁冠、海獭卧兔，侧室孟玉楼与潘金莲戴着银丝编的假髻、海獭卧兔，妓女郑爱月则是梳了个发髻，插满金钗、金梳与翠梅花钿，同样套了个海獭卧兔儿。

有意思的是，在往昔生活中，类似昭君套的皮帽圈，并非仅限于女性，男性也会用到。原因在于，清代以前，男性也一样梳髻，在公开场合，则需戴各式冠、巾（其实也是绢罗制的软冠）、帽，将发髻罩在其内。依照传统观点，男子如果当众把发髻露出来，属于非常不自尊的行为，对他人也是极其不敬，所以，一年四季，都要戴着冠帽。待到冬天，便也喜欢把个皮头套罩在冠帽之外，由此，既达到保暖的目的，同时不至于头顶上的分量过重。

据《酌中志》记载，明代皇帝以及重臣在冬天会罩戴“披肩”，这种披肩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披肩完全是两回事，它是一个高六七寸的皮圆圈，但在两侧对应耳朵的位置各缝缀一条皮毛的长片。裁制时，要注意让皮圈的宽径与具体使用者的官帽——冠、乌纱帽等——的大小正相吻合，并在脑后部位缝缀一对套环。这样，皇帝也好，官员也好，还有权高位重的大太监，在冬日，先戴好冠、巾或者乌纱帽，然后将皮圆圈直接套在冠帽的外侧，再把一对套环套到冠帽在脑后部位竖起的饰件“山子”之上，由此将其挂住。这样，皮圈护罩脑部，两侧的长片则将耳朵掩住，但帽冠的主题造型仍然得以呈现。尤其是在戴乌纱帽的时候，一对横向展开的帽翅丝毫不受拘束，照常神气地凌翘在半

空。因为这种帽套在两侧有一对护耳的皮毛长条披垂到肩头，所以叫作“披肩”。

此外，还有级别更低一级的“暖耳”，其实与披肩形制完全相同，只是皮帽圈的宽度要小得多，仅有二寸高。《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便因官阶不够高，冬天不能戴披肩，只能戴暖耳，小说中便一再写及他在寒冬的帽饰是头戴忠靖冠或忠靖巾，配以貂鼠暖耳。



清 改琦

《彩绘红楼梦图咏》之“凤姐”



明 佚名《千秋绝艳》图卷之“王昭君”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不过，到了清代，男子改为剃去前额的头发，然后将脑后的长发编成长辫子，垂在身后。既然不梳髻，不戴明式冠巾与乌纱帽，明式披肩与暖耳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流行。到了冬天，皇帝与官员们戴清式暖帽，庶民则直接戴皮帽。但是，汉族女性仍然梳高髻或戴假髻，所以，在清代，她们依旧保留着冬季戴卧兔的习惯，只是将这种皮帽套改呼为“貂覆额”或“昭君套”。

为什么称为“昭君套”呢？大概是因为当年王昭君去匈奴和亲，塞外乃苦寒之地，一到冬季必然得穿皮衣、戴皮帽，以抵御冰雪冷风的侵袭，所以人们就把女性御冬的专用皮帽套归在她的名下了。有趣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有一卷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的《千秋绝艳》图卷，按照明人的想象描绘历代著名美女，其中，王昭君就是用乌纱将发髻包裹住，然后再套一顶卧兔。至于历史上真正的王昭君本人是否曾经戴过卧兔，则目前还没有线索可供考察。

杜十娘的便携保险箱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流传甚广的情伤故事。不过，今天的读者或许不会注意，在小说压轴情节中起关键作用的“百宝箱”，其实就是明代非常流行的“便携式保险箱”。也就是说，虽然故事可能属于虚构，但出现在其中的重要道具的确具有写实性，是明人很熟悉的一种日常用具。

这篇小说中很具体地写道，所谓的“百宝箱”其实是一只“描金文具”，“封锁甚固”。最终，杜十娘“取钥开锁，内皆抽替小箱”，随后“抽第一层”“再抽一箱”“又抽一箱”“最后又抽一箱”，显示该只“文具”内的抽屉共有四层。

文具，也叫“文具匣”，正是明代盛行起来的一种设计周全的小型储物匣。概括来说，这是一种“抽屉匣”，即，在一个完整的匣箱上分列三至多层抽屉。不过，匣体之上还会加设一层活盖，此盖在匣背一侧凭合页与匣体相连，前方正中则装设金属面叶。同时，正面配有一张插板，匣体的前缘为之设有插槽，一旦把插板沿插槽自上向下插到底，便可将抽屉悉数遮住，这就有效地阻止抽屉在搬动中滑脱而出。插板上端正中也装有金属面叶，把活盖扣合之后，盖前面叶上的吊牌套入插板面叶上的锁管，然后把挂锁插入锁管之内加以锁合，这时，整个匣体便被闭拢的活盖与插板牢固地密封住，外人休想轻易染指匣内的收藏物。

文具匣一般都在顶面或两侧装有提手，所以很方便提携、搬移。只有掌握挂锁钥匙的匣主人可以亲手开闭这个小匣，因此，它实为明清时代的“小型私人保险箱”。这种小保险箱满足了人们

收藏重要物品的要求，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得极为普及，稍有身份的人都会备上一只，用以保存珠宝等贵重物品以及印章、重要文件之类。阐述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专著《长物志》中，就将文具匣列为书房应备的陈设之一，以之贮存文玩小品。

到了清代，文具匣逐渐改称为“官皮箱”。人们甚至赋予其一个颇诗意的叫法——七星箱，把匣上排列的大小不等若干只抽屉比喻为交映的群星。清初的知名生活设计家李渔就由朋友赠送了一只七星箱，结果他立刻巧动心思，将之进行了改进。

按照李渔的想法，可以在匣体后面正中凿出一个孔洞，然后将一根铜条作为暗栓，从洞中插入，穿过整个箱体，一直抵达正面的插盖。插盖上的相应位置则制出一个凹槽，让铜栓条的顶端插入，以这种方法将插盖固定。铜条的另一个末端突出在匣的背面，正可即便加设锁具，这样，原来只能挂在匣前的明锁便改置于匣的背壁，转成轻易不能看到的暗锁，这让匣正面的形象浑然完整，陈列在几案上，显得更为美观。



明 剔红蟠松寿字文具匣
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匣内的宽抽屉，李渔也设计了一种方法，为其单设保险小锁，其思路也颇有意思。据李渔的经验，宽抽屉在抽拉时容易歪斜，手感很差。于是，他让工匠在这种宽抽屉当中也添设一根

铜栓条，栓条的末端固定在匣体后壁上，前端则从抽屉正中破壁冒出，且端头制成环形。铜栓条的两边都加设一道薄木片，将栓条夹在当中，既将匣内分为两格，也形成由栓条控制方向的滑轨。这样，抽屉一经拉动，只能顺着栓条笔直向外移动，再无左右进出不匀之虞。同时，在抽屉正面的外壁上，于铜栓冒头之处的左右各置一个小铜环，于是，当抽屉归位的时候，把小锁套入铜栓端头鼻环及并列左右的两环，就可以将抽屉锁住。

一旦理解了古代文具匣的具体形制，杜十娘的故事也就变得更为生动明白，也就更加惹人唏嘘。其实，小说中的这个情节恰恰展示了文具匣是多么符合实用功能，可叹的是，杜十娘并没有能凭之摆脱不幸的命运。这位美女要改变命运的意志十分坚决，且心思缜密，事事筹划在先。例如她料到鸨母会翻脸，会吞没她住所的一切财物，所以提前把锁满珍宝的描金文具寄存到干姐妹那里。更不用提，她居然能攒下一笔价值可观的珍宝，这一成绩本身就彰显了她的能力不凡：

杜十娘的那只百宝箱，第一层抽屉里盛满了“翠羽明珰，瑶簪宝珥”，即各种贵重的女用首饰，这些首饰或镶嵌珍珠宝石，或由美玉雕琢而成，不同工艺、不同材质，价值大约几百两银子；第二层抽屉为“玉箫金管”，也就是金或玉等制作的当代工艺品，包括乐器；第三层抽屉内贮“古玉紫金玩器”，即各种有年头、有说头的古董文玩，这两项加起来相当于几千两银子；第三层抽屉里存着一只独立的小匣子，小匣子里是祖母绿、猫儿眼等进口宝石，还有成把的大珍珠，都是尚未经过加工的原石、原珠，很难具体估价，总之非常珍贵。

小说极尽夸张，通过这样一笔“浓缩精华”的私人财产，表现杜十娘心思细密，规划清楚，天生有经济头脑，换在今天，也许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然而，偏偏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上，她犯了致命错误——选择了一个顶没用的男人。用今天的话说，李甲就是个奶嘴男。拿着老爹的钱，他可以对杜十娘百依百从，温柔体贴。一旦没了经济来源，他就成了废物，稍遇挫折，自私、懦弱、轻浮的本性便全部显现了出来。

当李甲连为杜十娘赎身的三百两银子都筹集不到的时候，按说，杜十娘应该看出他是个没用的废柴。但是，杜十娘的反应竟是偷偷送去自己平时积攒的一百五十两碎银子，帮李甲凑这笔钱！这一笔散银是她用滴滴血泪换回，何其不易，最终却铺平了通向毁灭的道路。

明明自身条件不错，甚至才能出众，偏偏会在情感上犯错误，莫名其妙地爱上完全不值得爱的人，还一味痴情，非要向“废柴”托付终身，一条道走到黑，结果人生一塌糊涂，这似乎是女性容易犯的错误。杜十娘没有能凭“百宝箱”换来幸福，五百年前，古人已经通过这个故事讲清楚了其中的道理。



清 文竹绳纹提梁文具箱
故宫博物院藏

起居



花光芳脆

又是一年的牡丹盛时，南宋皇苑中的钟美堂随之变身为一座灿烂的花殿，梁间、柱身、窗畔挂满青竹做的壁瓶，满插成簇的新卉，殿上、庭中更是层层台架，排列着瓶插或盆栽的珍品名种。当宫人们忙着将春光洋溢的波斯玻璃瓶、金瓶以及官窑瓷盆安置在殿堂内外之时，御厨中却是另一种忙碌。最为精细的厨人仔细摘选娇红、粉艳、嫩黄、浓紫的花瓣，将它们洗净、晾干，裹上薄薄一层甘草水调的面糊，然后入素油炸脆。

柔软的牡丹花瓣经油炸的锻炼反而获得了轻俏的坚挺，铺在玉碟中，比在枝头时甚至更显烂漫。再撒上一层糖粉，这些香酥焦脆的花片便被送往天子与后妃们的盛宴。如此的讲述可不是在编小说，而是在追忆八九百年前的赏春乐事。

传说中，南宋高宗的皇后——吴皇后就是牡丹入馔的倡导者。每到春天，这位皇后都会谕令御厨从皇苑中采摘新开的牡丹，或者把花瓣拌在凉菜当中，或者油炸成酥脆小吃。须知，她之所以如此，其根基乃是出于信仰。尽管拥有“母仪四世”之尊，但吴皇后因为信佛，所以反对杀生，故而饮食中尽量避免荤腥，不贪口腹之欲。然而正是这种坚持让她得以注重另一种近乎禅意的享受，冬天品尝寒梅，春天咀嚼牡丹。



宋 牡丹册页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对于宗教的虔诚竟能成为一种动因，激发审美力闪烁华彩，这种事似乎唯有在宋人那里才能发生。由于佛教反对杀生，长期坚持吃素便在宋代的信众当中成为普遍的风气。不过，于漫长生活岁月中逐渐积累而成的精致感受力，让人们能够给素食也打开想象的空间。把鲜花做成精致的点心、小菜甚至粥汤，任春色滋润舌尖，便是这种灵感的风华。“油炸牡丹花瓣”在宋代朝野广泛流行，风气之盛甚至影响到了同样信奉佛教的金国。在那个时代，女真族栖息的草原上有一种白色的野生牡丹花星星遍布，逢到需要做素斋待客的时节，女真族的女性们就到草野当中去采下满把的牡丹花，兜在袍襟里，带回穹帐之中。然后，在穹帐前支起油锅，用油把裹上面糊的花瓣炸酥，在盘中堆起一座花瓣的小山。

按通常的观念，宗教只与善有关，却不必然与美发生勾连。然而，宋人所发明的油炸牡丹花瓣，却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证明对善的向往如果有精雅文化品位的引导，确实可以走上美的道路。“油炸花片”的风气既开，从此一路活泼泼地发展，到了明清时代，炸栀子花、炸芍药、炸玉兰、炸玉簪花、炸荷花也列在了素馔的名单上。然而也许更该惊奇的是，宋人还将木香花的嫩叶、菊花的嫩苗也制成清爽可口的油炸小吃。及至明清时期，又扩及嫩菊叶、茉莉花的嫩叶、花椒树的嫩叶、枸杞芽、新茶叶、嫩藿香叶，甚至盛开莲花中的莲须也被一一摘择，形成特色独具的素食小吃“炸莲须”。不过最该一提的是，在清代僧人手中，由藿香嫩叶竟生成一味颇为奇妙的小吃“红香绿玉”，是在炸好的藿香叶上浇以玫瑰酱，再撒以白糖。虽然制法并不复杂，但挟一筷入口，清香无比。酱绯叶碧的相映则让清人想到借用《红楼梦》中的典故，贴切地名之为“红香绿玉”。



清 恽寿平 《山水花卉图册》之“牡丹”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不难看出，最常用以炸制成美味的鲜花，恰恰都是历史上广受喜爱的观赏花朵，在传统园林里种植得最为普遍。对于古人，巧制花之饌，并不需要什么千金难求的珍贵食材，而是来自身边的寻常事物——就种植、生长、开放在自家的花园或者庭院里。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于《弇山园记》一文中记述他私家花园的风貌，书房“弇山堂”前便是“左右各植玉兰五株，花时交映如雪山琼岛，采而入煎”——直接从书房前的花树上摘下新瓣，送到厨房中随即炸制，成品乃是“芳脆激齿”。

实际上，菊、莲、茉莉、木香花、花椒树、藿香等均为传统庭院中的常备。古人想要品尝春天的滋味，只需走下台阶，哪怕台阶下只是一座小小的普通民居院落。一旦传统生活方式消失，与之相连的花饌美食似乎也就于悄然中随风而逝。而这，究竟是否属于不可避免的丧失？

宋惠莲的烧猪头

《金瓶梅》中，宋惠莲做了一次“烧猪头”，小说描写得十分馋人，以致总有朋友问我，她这道美味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实际上，当时同一只猪头一起买回来的，还有四只猪蹄，所以宋惠莲是连猪头带猪蹄一起烧熟。至于具体做法，小说讲述颇为简略：

起到大厨灶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

可知其大致程序为：猪头、猪蹄拌上咸香作料，放到特制的密封容器“锡古（盬）子”里，再将锡古子安置在灶上的汤锅内，灶内烧一根大粗木柴。

也就是说，所谓的“烧猪头”，其实是隔水干蒸，最大的特点是猪头与猪蹄本身都不沾水，这样肉香与作料的香味就不会融化在汤里。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北方化的特色，主要的作料不是酱油，而是黄豆酱。清代盛期出现的食谱《调鼎集》里，有一道“锅烧猪头”，看起来与宋惠莲的做法大致相仿：



庵園女俑

此件陶俑為唐代作品，其造型與唐代陶俑中的「女俑」相似，但較為矮小，且無明顯的服飾細節。其底座飾有蓮花紋樣，整體風格簡樸，可能為民間所製。



汉 庖厨女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把猪头洗净后在滚水里焯一下捞起。再以一斤甜面酱与大料、茴香、花椒、细葱一起拌匀，用这酱料将猪头里外匀抹一遍。然后，在铁锅下部横撑数根铁条，形成一个铁架，把猪头放置在这个铁架上。接着向剩余的酱料倒下两茶盅量的水，调成酱汁，将此酱汁倾倒在铁架下的锅底，但不要漫及猪头。最后一环便是用大盆盖住锅，以豆腐渣泥密封接口，小火烧半天。

把猪头、猪蹄架空，隔水慢蒸，在传统烹饪中其实是颇为普遍的做法。清人袁枚《随园食单》里，作猪头的方法之一便是“加作料，闷入桶中，用文火隔汤蒸之”，为此，人们甚至设计了专门的容器：做一个木桶，桶内安设一个铜屉板，猪头置于屉板之上，这样，密封蒸制过程中，猪头溢出的油腻会从屉板的格眼里留下，肉脂也就更为清爽鲜香。

不过，美食高手们往往采用更简单的办法，在锅底上架设木棒、铁棍、瓦片、竹架等，将猪头置于其上。最有意思的是《调鼎集》中的“蒸猪头”法，要先把一些瓦片磨光，再浸在肉汁中煮过。上火前，把这些瓦片紧凑而有序地平铺在锅底，其上则支个竹架，猪头置于竹架之上，以这样的方法，防止猪头接触到金属锅的铁或锡底。如此细心的安排，大概是为了避免肉皮沾染金属味道吧。



汉 庖厨俑
绵阳市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调鼎集》中的这一道蒸猪头，恰恰是“一根柴缓烧”，用一根粗木柴慢火加热，与宋惠莲的妙技一致。因此，如果谁有兴趣的话，确实可以依照此本清代食谱中的“锅烧猪头”与“蒸猪头”法，大致复制一下为潘金莲、孟玉楼等人赞不绝口的宋惠莲

烧猪头。

朝姝与琉璃屏风

在谈论中国传统玻璃的时候，古代文献中关于“琉璃屏风”的逸文也应该包括进去。琉璃屏风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东晋及南北朝作家们的小说里，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诗意的一则相关故事见于《拾遗记》。今天的读者可能大多想不到，这则故事反映了某种历史真相，有着现实生活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把玻璃称为“琉璃”，所以，所谓琉璃屏风，其实就是镶嵌玻璃屏面的屏障。传为东晋人王嘉作品集的《拾遗记》如此讲述道：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与爱姬四人，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

据故事说，三国时，吴主孙亮命人制作了一架绿色玻璃折叠屏风，经常于夜色明净时张设在月下，四面围合起来，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半透明空间，然后让他最喜欢的四位宠姬坐在屏风当中。旁人可以清楚看到四位美人的形影，却闻不到她们的香气，最好地演绎了“可望而不可即”一词的意境。

实际上，在东晋及南北朝作家们的小说里，“琉璃屏风”屡次出现，孙亮以屏风围绕宠妃，可算其中最动人的一则。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一旦提到琉璃屏风（也就是玻璃屏风）往

往会强调其透明特性。如《太平御览》引录《汉武旧事》一条，汉武帝所建的神台上，门窗之扉、屏风“悉以白琉璃作之，光冶洞彻也”。又录有《拾遗记》里的一则有趣逸文：汉武帝曾经赐给美男子董偃一架紫琉璃屏风，董偃将其张设在床后，结果，侍者隔着琉璃屏风望到床头的烛光，误以为中间并没有隔挡之物，于是立在屏风的外侧而用力为主人扇凉，当然是费了很大劲儿也不能达到目的。

要理解这些故事，必须关注时代背景，即，传统玻璃制造工艺在晋代与南北朝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的玻璃制造历史很长，到汉代已达到惊人发达的水平，不过，自先秦至汉，受崇尚玉的观念的影响，玻璃制造的最大目的是仿造玉器，并在“仿玉”这个领域取得了精彩的成就。另外，从汉代起，波斯、罗马等异国生产的透明玻璃器进口到中国，被珍视为奇宝。大约在晋代到北朝期间，异域的玻璃制造技术一波波传入，其中也包括烧制透明或半透明玻璃的珍贵技术。



清 吴友如《百美图》之“孙亮四姬”

相传为东晋人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就有一条著名的记录：“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很明确地记载，广东地区的人获得了外国做玻璃器的技法，做出的器物类似水晶，即无色透明玻璃。

《北史·列传·西域》中也有一则重要记载：“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说北印度有人在太武帝时来到北魏都城，把北印度的玻璃烧制技术带来了，就地烧制玻璃，一下让玻璃变成了平常物品，不再那么珍贵。这种玻璃烧制技术制造的产品有多种色彩，但同样带有透明的特点，太武帝甚至下令制作了一座大帐（行殿），帐帷镶满了彩色玻璃窗。



隋 玻璃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汉 蓝色琉璃耳珰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摄影：动脉影)

因此，在《西京杂志》《拾遗记》等作品成书的时代，上层社会普遍把进口或本土制作的透明玻璃制品作为奢侈品来享受。这就激发了作家们的想象，把他们时代的新事物赋予前代生活，甚至赋予遥远的西汉宫廷。

实际上，汉武帝时代、三国时代大概都不会有半透明玻璃屏风，但到了东晋及南北朝时期，这种豪华陈设应该在贵族生活中并不鲜见。当然，那时还无法制作大块的平板玻璃，因此，屏面上只能是满布木框骨架，再于其中嵌上一块块的小片玻璃。彼时的玻璃中，需要更高技术水平的无色透明制品较少，大多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彩色玻璃，故而屏心上所嵌也都是“紫琉璃”“绿琉璃”等彩色玻璃。

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东晋南北朝作家笔下的透明屏风一般都带有色彩，在这一细节上，虚构的文学可说是无心地记录了真实的历史。

洛神与金带枕

今天的人有机会在展厅中面对西汉中山王后窦绾的“镶玉鎏金铜枕”之时，往往并未察觉，某种程度上，自己正在复制一个传说，一如据说曾经显现在一千七百年多前的洛河夜色中的甄氏遗魂那样，在凝视着不可追返的昔日韶华的一款遗物，与往事相见，也即是与往事永别。

《洛神赋》是如此的深情动人，以致不管哪个时代的读者都不可避免地要追问潜藏在文章背后的真相，或者说，要追究催动文学家才华爆发的奥秘，结果便是由晋唐人敷衍出了一段情感错结的“本事”。莫辨真假的传说以一只“玉镂金带枕”为线索，说是曹丕将甄氏的这只宝枕展示给曹植，其时，甄氏已因失宠怀怨而被曹丕赐死。两个曾经是政治对手的兄弟，此刻面对着同时爱过的女人的遗物，弟弟当即泪下，兄长也因追悔于自己的无情而黯然。怀着复杂的失落感，曹丕将这只宝枕送给了已然是失败者一方的弟弟，于是，在归向封国的途中，于洛河边停宿的深夜，曹植梦见甄氏前来相诉：“我本是钟情于你的，结果却没能遂意。这只枕乃是我当年的陪嫁物，曾经归于你的哥哥，而如今终于枕在你的头下，对我来说，这也就是莫大的慰藉了。”曹植因梦触动，写下了缠绵绮丽的《感甄赋》，后来被魏明帝——也就是曹丕与甄氏的儿子——改名为《洛神赋》。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镶玉鎏金铜枕”的出土，让今世的读者恍然明白，曹氏兄弟与甄氏的三角恋情传说中所涉及的“玉镂金带枕”，并不仅仅是小说杜撰，在汉代真有这样的实物存在。“镶玉鎏金铜枕”通体以铜质做成长方形枕的框架，并在两端

铸成昂翘的兽头，框架上花纹遍布，外表鎏金。多块雕有花纹的玉板镶嵌在铜框内，形成函匣式的玉质枕体。中空枕匣内填满作为香料的花椒，而玉板上都开有镂孔，供香气外溢。显然，“玉镂金带枕”之“金带”，乃是指此类宝枕之鎏金金属枕框；“玉镂”，则是意谓带有镂空花纹的玉质枕板。从墓中出土的“镶玉鎏金铜枕”固然属于葬器，不过，依据文献可以确知，这一类材质珍贵的硬枕在往昔的贵族生活中确实作为日常寝具使用，而且并不少见，如《宋书》中便记载，南朝宋高祖时，“宁州尝献虎魄（琥珀）枕，光色甚丽”，而《旧唐书》《元史》则提到权贵们使用的瑟瑟枕、碧玉宝枕。宋人笔记中也提到，北宋书法家蔡襄有一件水晶枕，颇为奇异的，枕体内的天然纹影呈现为一枝桃花的生动姿形（《铁围山丛谈》），此外，彼时还有着内含半开杏花纹的水晶枕（《夷坚志》），与这种文字记录相印证，唐代法门寺地宫中出土有一枚小巧的水晶枕实物，它整体用天然水晶琢成，澄澈透明，本是唐朝天子的御用寝具。





西汉 河北博物馆 鎏金镶玉枕
(摄影：动脉影)

“江南六月暑未阑，一尺花冰试枕看。”古人在夏季为了避暑去热，普遍使用材质清凉的硬枕，一般人所用乃是木雕、瓷烧、石凿、藤编，至于富贵人家走奢侈路线，便琢美玉、割水晶或者拼嵌犀角、白角、宝石成枕。一如“镶玉鎏金铜枕”所展示，这类硬枕往往采用中空的函匣形式，以在其中放置清息去秽的各种香料。实际上，古人异常重视睡枕所散发的气味，道家专著《云笈七签》中特意介绍了一种“药枕”，是以柏木凿成枕函，顶面制成活盖的形式，并且面上镂出三行小孔以散药气，然后把多达三十二种的中草药放在绢包中，置于木枕函内，其理论依据则是：“夫病之来，皆从阳脉起，今枕药枕，风邪不得侵入矣。”认为内包药料的睡枕能够保护阳脉，从而促进健康。古老的《肘后备急方》中则有云：“作犀角枕，佳，以青木香纳枕中……”将犀角制成枕板，镶在枕框上，形成犀角面的枕函，内里放置青木香，可以“辟魇寐”，亦即避免人睡觉时做噩梦。如果能够在洁净怡人的气息中入睡，自然会精神安稳，睡眠质量提高，这是现代卫生观念经常强调的道理，不过，何以今人反而并不在意香枕的意义？它本是极为古老的传统，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绣枕即已填满“佩兰”香草！



宋 洛神赋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摄影：动脉影)

我们对于传统形式的睡枕即已疏离，也就只有凭借内里填满花椒的镶玉鎏金铜枕重见天日，才能明白“玉镂金带枕”故事里潜含的逻辑：玉质的枕面润泽着鬓发与脸颊，草木香料的幽芬悄然盈漾，就在如此予人感官以细腻抚慰的枕上，绽放出曹植的那一场缠绵怅惘的绮梦，从而催发了千古名章的出世。就这样，古人用一个传奇为一篇名赋作注，用一个美丽的故事解释了另一个更为美丽的故事。

没有把《洛神赋》改编成舞剧，可以说是当代舞蹈界的一桩憾事。没有戏剧冲突，没有性格对立，没有罗里吧嗦的叙事情节，只有一次水边的邂逅，跨越阴阳两界，交集着怀念与遗忘，激荡着神的激情与人的迷惑，相遇、情挑、缠绵，道破真相之后

的恍悟，永别之际的痛绝，串联着黄昏至入夜时分一个更比一个瑰丽的洛岸胜景，难道还有比这一传说更天然地适合于用舞姿演绎的故事吗？

相比之下，梅兰芳何其幸运，他身边的文人谋士是传统文化的槛内人，有足够的慧心看出“洛神”传说内在的舞蹈性格，于是为他量身定做了情节异常单纯而以歌舞场面争胜的《洛神》一剧。在梅兰芳的《洛神》里，剧情创作者可以说调动了这一传说中所有诗意的因素，比如为了防止场面单调，将《洛神赋》中一笔带过的“汉滨游女”“湘水神妃”具体化，让全戏的高潮在两位女神为洛神伴舞中展开。另外，因为毕竟是要将一篇散文转变为一出戏，于是，还把昔人由《洛神赋》衍展而出的曹植与甄氏的传奇故事也引为情节，让曹植在孤灯下摩挲观赏心上人的遗物，并搂着宝枕伏案睡去，然后，由甄氏幽魂升仙而成的洛神前来驿舍，面对记录了自己生前坎坷青春的金带枕，面对与枕相伴的隔世恋人，“睹物伤情，益增悲感”。

正是怀着如此的哀凉，梅兰芳的洛神在情人的梦境中显影，约他翌日在洛川上进行那为了诀别的会面，从而，将曹植与观众一起引向仙带飘飘、凌波微步、“乘清风扬仙袂飞凫体”、“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千古不灭的缤丽一刻。

虎皮壁幔与黑貂暖帐

很多人反对在今天还使用皮草，我也在其中之列，因为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已经让皮草变得不再必要。不过，回顾一下历史上使用皮幔、皮帐的奢侈生活，还是挺有趣的。

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后，把游牧生活中大量使用皮毛的风气也带入宫廷生活，当时，元大都的主要宫殿一到冬季居然会满墙垂挂皮壁衣，还架设皮暖帐。熊梦祥《析津志》中就记载，皇宫中的秋冬铺设是“便殿银鼠壁（壁）衣，大殿上虎皮西蕃结带壁（壁）幔之属”。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云：“至冬月，大殿则黄□皮壁幃、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幃、黑貂暖帐。”元代宫廷的室内装饰真是自成特色，竟以无数虎皮缝缀成壁毯一样的巨大帷幕，垂挂在正殿——大明殿——内部的四壁，将整座殿堂的墙壁都遮挡起来。大明殿后边的三间香阁（即便殿）则用档次略低的银鼠皮——不过也是贵重皮毛呀！——联缀成的整面壁衣悬垂一周，让各间殿室的四围墙面全部由银鼠皮遮覆。书中还提到，延春阁后面的一间华美香阁也是“楠木寝床，金缕褥，黑貂壁幃”，这间殿堂宽一百四十尺、进深七十五尺，要把墙壁都用黑貂皮制的巨幕遮住，那得用多少貂啊。

大明殿、延春阁的侧畔皆有正式的寝殿，但寝殿内反而不用毛皮护壁，看来动用这种装饰的意图主要在于制造威严的气势、堂皇的氛围，甚或是渲染游牧民族生活的传统。大明殿为“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巨大空间内只安设龙榻以及诸王百官的坐床，所以榻、床上铺设黑貂褥。与之不同，香阁为闲居或者搞小型活动的场所，于是还设有黑貂暖帐。这种皮缝的帐

子并非床帐那么小，而是属于所谓的“漫天帐”，既高且大，张吊在殿内，如同一间软墙软顶的小室，不仅设有床，还会安置书几、座椅、香几、小书架、炭盆等，就是个独立而保暖的袖珍起居空间。

在明清两代，元宫使用皮壁衣的做法没有承袭下来，但皮暖帐一直为上层社会熟悉。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喝醉酒的嘉靖皇帝竟与他宠爱的尚美人一起“于貂帐内试小烟火”，以做大死的精神，在貂皮帐里放烟火玩，结果四溅的火花将帐幕引燃，并迅速蔓延，终至整座永寿宫焚毁。清人曹庭栋《养生随笔》则谈道：“皮暖帐世俗恒有，非必黑貂耳。但就枕如入暗室，晓夜不能辨，必于帐前开如圆月，纱补之以通光，玻璃尤为爽亮。”由此可知，皮制暖帐在传统生活中实非罕物，使用率颇高，但一般不以贵重皮毛为材料。这种皮暖帐还会在正面开个圆窗，糊纱罗或者镶嵌玻璃（当时民间也已开始消费西洋玻璃）。



清 佚名《乾隆赏雪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足相印证的是，《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中记录，雍正九年曾经为乾清宫西丹墀下的板房内重做一顶羊皮帐，这座所谓的羊皮帐相当于一明两暗的袖珍套房，正中设有门，门两侧用羊皮垂幕做成“隔断”，把帐内空间分成三份。每侧的软幕

隔断上都开有一对方窗，衬糊轻纱，由此透亮。至于由羊皮隔断分成的两个“皮帐”暗间，则均在外侧帐面上做出一扇玻璃窗。此座羊皮帐是安设在一所板房之内，于是，在板房墙壁上对应这两个玻璃窗的位置又特意添设窗口，以便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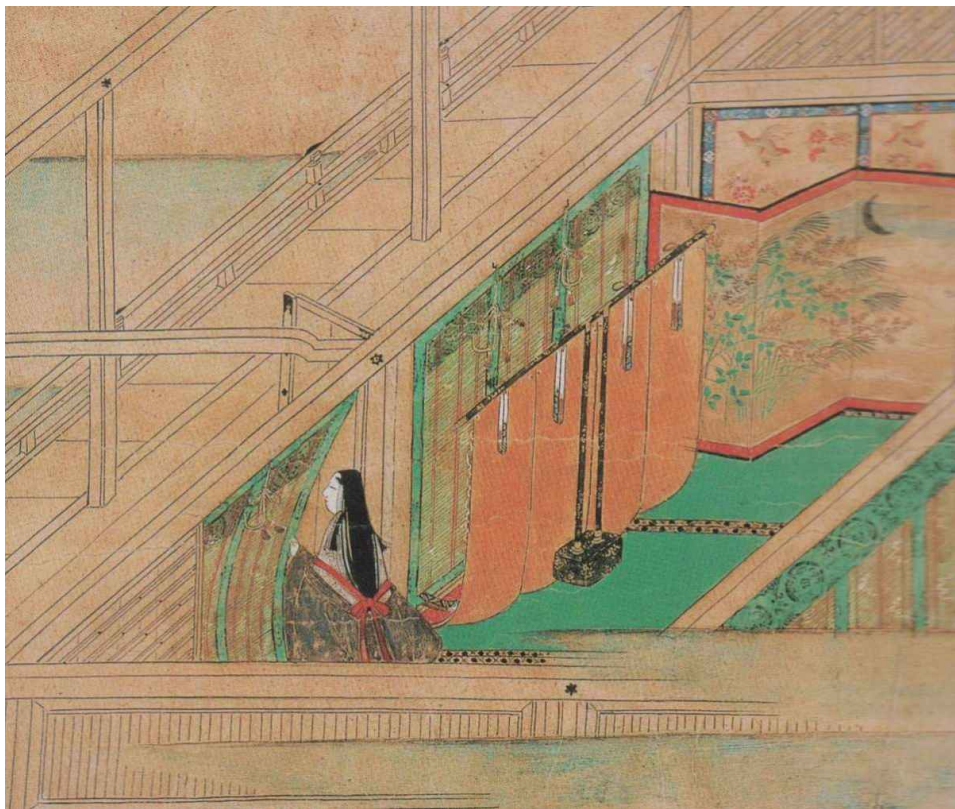
雍正皇帝因为各种原因有时会到板房内暂住，这顶羊皮帐规划仔细，帐内还设有床，显然就是为他特制，所以尺度、细节都非民间皮帐可比。不过，帐用羊皮、开窗透光，都与《养生随笔》所述一致，可见当时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使用这类制作讲究的皮暖帐。

只不过，紫禁城内的寝殿皆有“满地炕”，温暖如春，所以日常并不需要皮帐，只在暂住板房时才借助到它。但在民间，却是将皮暖帐设在卧室里，以之抵御漫长冬季的寒夜。

东渡的行障

朋友去日本旅游，带给我一本《源氏物语》历代插图合集的画册。翻开第一页，便赫然看到“行障”！这一页上的画面乃是《石山寺缘起绘卷》的局部，该作品创作于1497年，传为土佐光信的手笔。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间闺房的内景，其中颇醒目的一个细节就是，对着竹帘低垂的门户，树立着一座金漆“丁”字形——或说“T”形——撑架。撑架的横梁悬挂着一面华丽的帷幔，长垂至地，尚有多余的部分软软地拖落在席面。横梁上显露有系结帷幔的绳结，与绳结相对应，四对纹饰华丽的短带轻垂于梁下。

如此的形式简直让人立刻会联想到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中所录陆畅《咏行障诗》：“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笑语声。”此诗把“行障”的形制介绍得十分清楚：一根竖杆上撑有一道横梁，形成“丁”字形的障架，垂有成对的绣带。贵妇们聚在行障之中，明明能听到她们的笑语，却看不到她们的形影，显然，丁字架的横梁系有织物，长垂至地，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传）日本土佐光信绘《石山寺缘起绘卷》局部，这一画卷是表现《源氏物语》内容的名作之一。

行障是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家什，可于室内分割空间，贵妇外出时亦会凭之以遮蔽身影，扬之水有《行障与挂轴》一文对此梳理甚详。这种轻型家具可以灵活搬移、灵活摆设，在任何的起居所在，都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放置，由此形成适合当前场合的格局，因此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居室布置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为《南齐书·宗测传》所言：“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说明行障可以带有绘画，并且陈设于室内，显然很容易移动，所以宗测无论白日起居还是夜晚寢息随时将之置于身畔。

行障当然也可用于室外。敦煌榆林窟第25窟五代时期《婚礼图》即呈现一个树立在露天的“丁”字形撑架，戳立于底座之上，横梁垂下帷幔，并挂有四条长带。其形制与陆畅所咏相合，且文献中明确记载唐人婚礼中会设置行障，因此，画中无疑展现的就是唐时之行障。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是，《源氏物语》历代插图中，频繁出现与唐代行障非常近似的器什，唯一的不同就是立杆增加为两根。以插图对照小说描写可知，丰子恺将这一轻灵家具译为“帷屏”，林文月则译为“几帐”。典型如《空蝉》一节：“许是怕热的缘故吧，挡眼的几帐也掀上了帷幔，所以室内的景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该场景显然属于经典之列，每每见于诸家插图，其中，17世纪土佐派《源氏物语》插图画稿、18世纪《源氏物语图屏风》在进行具体表现时，均描绘了一个“丁”字形撑架，一双立杆戳在底座中，所挂帷幔被卷起一半，绕于横梁上。同一细节亦见于张培华《源氏物语绘本》所引江户时代承应三年版绘入本。这无疑是最明确的证据，显示“几帐”为垂挂帷幔的“丁”字形撑架，采取了唐时行障所具的样式。



辽代壁画摹本《侍寝图》，图中，带有垂帷的行障兼做衣架，搭满衣袍以及革带等。现藏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

“几帐”一称亦见于林文月译《枕草子》，而周作人译《枕草子》对于同一器什也称作“几帐”，并作注云：“几帐为屏风之属，设木架，上挂帷帐凡四五幅，高五尺余，冬夏材料不同。”可见《枕草子》中之“几帐”与《源氏物语》中之“几帐”确实为同一物。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稍加留意，就不难意识到，几帐在平安时代的贵族居室尤其是闺房中是很重要的一种实用性陈设，置于室内的床畔、帘侧等处，戏份吃重。

日本几帐与中国行障形制相近，功用相仿，可以下这样的结

论：前者正是对于后者的几乎原样不动的引进。关于行障的具体使用方式，中国文献中记载极少，《源氏物语》《枕草子》对几帐却有活泼缤纷的描写，如《空蝉》表明天热时会把垂帷卷起一半，便是很有趣的信息。同样，《源氏物语》历代插图亦对几帐的设置方法进行了多样的呈示，中国传统艺术中恰恰缺少行障在室内运用的再现。因此，仔细研究日本文学作品与绘画中的几帐，会大大地有助于复原行障曾经的风貌，从而增进对于晋唐时代室内陈设与生活方式的了解。

当然，平安时代贵族的生活状况与隋唐时差异很大，引进几帐之后，必然依据在地的需要增减其功能。比如女子会将几帐架设在面向走廊之处，对之有意的男子则坐立在几帐外的走廊上，双方隔着一层帷幔谈情说爱，这显然非唐人能有的风气。于是，甄别其中哪些源于中国、哪些属于创新，便会是很有意思的侦探工作。

明白了行障和几帐的具体样式，可以让人更好地赏味《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情节与意境。如《枕草子》“宫廷女官住所”一节的描写：

帘子的色泽青青，已饶风情，加以几帐之帷幕又鲜明悦目，末端稍稍露出女官们的裳裙缤纷……

门口虽立着三尺之几帐，不过，帘子的帽额与几帐之间，仍有少许隙缝，若是正巧那站在外头的人与坐在内里的女官的脸得以闪现，那就更有情趣了。

平安时代贵族男女谈情说爱的方式，比几个世纪之后罗密欧冲着阳台上的朱丽叶喊话，要微妙得多呢。

幻影魔术的酒杯

一个美丽的女性送给心上人一套奇妙的酒杯，一旦注入清酒，每只酒杯的杯底就会显现不同的花影，一只杯内是桂花，另一只为梅花，又一只为兰花……然而，待酒喝干，杯内的花影便会消失。这样的情节，即使安设在今天的影视剧中，也会引发观众兴趣吧。

从文献来看，利用光学原理制作带有特定视觉游戏的酒杯，是在宋代出现的工艺。其具体方法是，在杯底加装一个凸透镜，即一片球面的水晶片或透明玻璃片，镜底与杯底之间则水平地夹置一页袖珍绘画。当空杯时，夹嵌画片在焦点之外，图画的成像在人眼一侧为实像，目力不易看清，结果就造成了杯底无物的幻觉。

一旦将酒或其他饮料注入杯内，由液体形成了一个凹透镜，与固定在杯底的凸透镜结合成为一个凹凸相接的复合透镜。这时，嵌画进入复合透镜的焦点之内，其成像是在杯底一侧的放大的虚像，人眼可以清楚看到。由人的感觉来说，就像是倒酒入杯之后，酒杯里忽然浮现出某种物体。因为是映像，所以如果伸手到酒中去捞，当然捞不到任何东西。待到杯中酒饮尽，复合透镜自然解体，放大的虚像也随之灭迹，人眼便看不到嵌画上的形象了，这就让人产生幻觉，仿佛是杯中的物体悄然消失了一样。

历史上，显然只有很少的工匠掌握了相关技术，并且在师徒之间悄悄传授，因此产品不多，古人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一旦接触到，便总是惊诧为神奇的珍物。一条鱼或一对鱼是这种酒杯

杯底小画片上最常见的主题，如此，注酒的杯内会显现出灵巧鱼影，仿佛真有鱼儿在酒中游动，魔术效果最佳。其次是袖珍美人画，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一度出现了以当红明星小照代替传统古装美人画的魔术酒杯，杯内盛酒之后，就会显现影视女星们的笑容。

清代则有“蝴蝶杯”，把绘有翩飞蝴蝶的画片嵌在杯底。动人之处在于，这种杯满蝶现、酒干蝶隐的奇巧酒具激发了文人才子的灵感，没有留下署名的清代剧作家编写成一出传统戏《蝴蝶杯》，引发各地民间剧种竞相翻演。“蝴蝶杯传家宝世上罕见，斟美酒蝴蝶出飞舞翩翩”（河北梆子唱词），到1965年，邵氏拍摄黄梅戏电影《蝴蝶杯》，足见这出戏脍炙人口的程度。

元人伊世珍《琅嬛记》里有一条记载，说一位叫关关的美女送给她中意的文人俞本明一套“青华酒杯”，“酌酒辄有异香，在内或有桂花或梅或兰，视之宛然，取之若影，干则不见矣”。在历代记录的同类酒杯中，这一套无疑意境最雅。如果按照明清古意再创梅花露鸡尾酒、蔷薇露鸡尾酒等花露鸡尾酒，并配以带有相应花卉显影的酒杯，或许倒显清趣。



元 青瓷印花碗
浙江义乌工人路窖藏出土
义乌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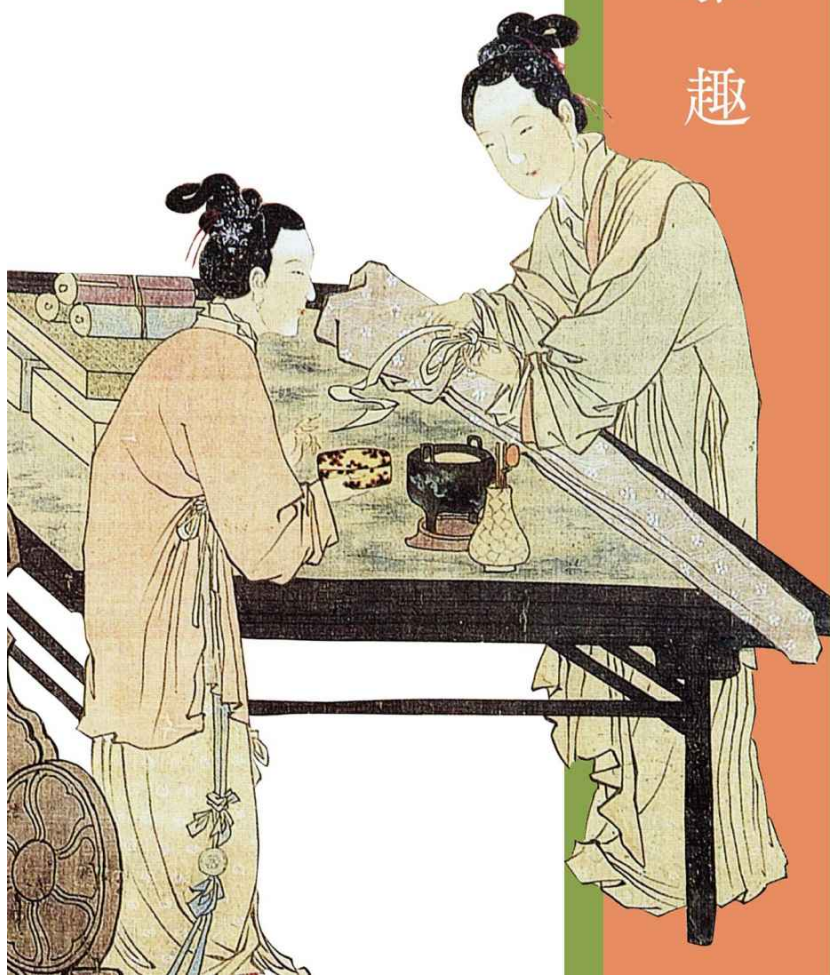
明成窯紫玉蘭酒杯

圖四十九



明 项元汴《项式历代名瓷图谱》之“明成窑紫玉兰酒杯”

雅
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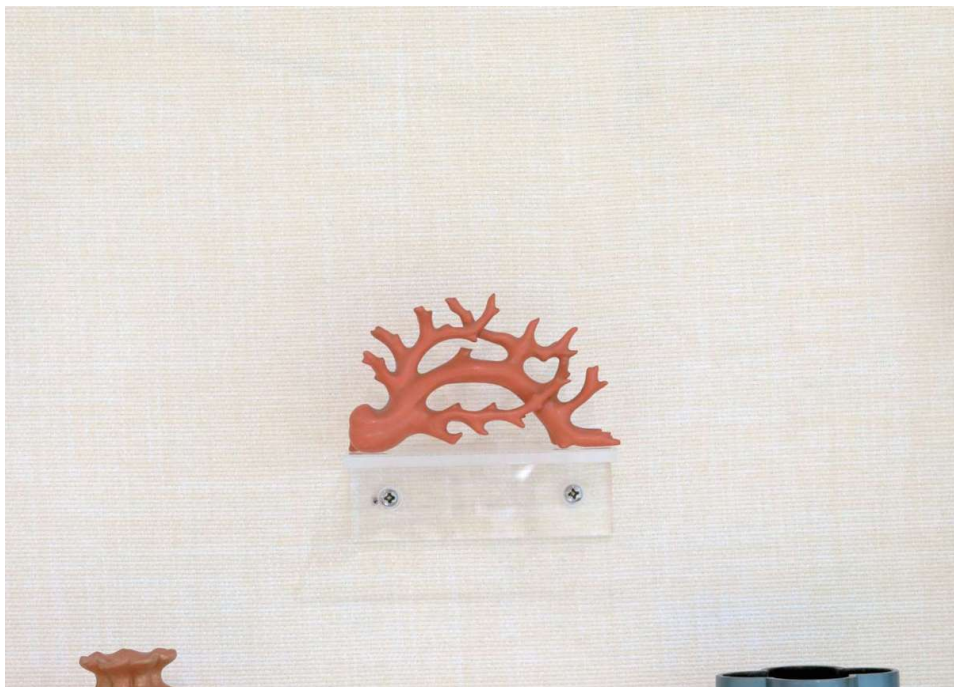


巾带题诗赞美人

今人对于历史往往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误解，比如一想到宋代士大夫，就认定他们必是道学先生的古板样子。其实欧阳修苏轼陆游们个个风流倜傥、潇洒开朗。那个时代居然流行一种风气，文人可以向陌生女性献诗，优雅婉转地赞美她的美貌、仪态以及才巧。女性们出于对名士的倾慕，也特别喜欢请这些异性文人把自己作为主题写入诗词，日后作为夸耀的法宝。

这种献诗都是当场立刻吟诵成篇，所以非常考验作者的临场发挥能力。并且，很经常的情况是，吟赞的对象乃是第一次相见，必须立刻抓住眼前陌生女性的出众特质，予以传神的描写，意象生动，辞藻华美，让现场围观群众一致哄然称妙。尤为奇特的是，女性向名人雅士求诗之际，一定会递上最具私密性质的用物，请赋诗者当场挥毫，书写在上面。常见的当然是扇子与手帕，不过，宋代女性其实最喜欢拿出心爱的领巾或者裙带，请男性文人题诗其上！收藏一条或若干条由名士亲笔题写、歌颂自己的领巾、裙带，简直是闺中的一种时尚。逢到聚会场合时，取一条这样的领巾绕在颈上，或者将写有题诗的裙带系在腰间，任一对墨迹淋漓的长带轻垂在身前，会觉得特别神气。擅长歌舞的艺伎们经常出席士大夫的聚会，所以最有机会请他们题诗。实际上，美丽多才的艺伎拿出扇帕巾带当场向才子求诗，而受邀者很快地吟成诗词一首并潇洒题写，基本上是宋代高级别社交场合的一个固定环节，能引发所有人的兴致。聪慧的艺伎自然也是本领过硬，能随即将这诗或词稍加改动，变成与特定曲调相配的歌词，然后将之宛转演唱给大家听，这就把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

良家女性，甚至包括皇宫中的妃嫔女官，也一样的可以请求文人题写赞颂自己之美质的诗词。话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名臣王珪在禁城内的翰林院值夜班，没想到，宋神宗在举行过正式的赏月宫宴后，觉得兴犹未尽，想找雅人一起喝个小酒聊个大天，便以“赐酒”的名义，派太监来宣召王珪前往皇宫中一处小殿内。王珪随太监赶到小殿，便亲睹了如仙境一般的场景：一队女童吹奏着清乐踏月而行，引导着神宗所乘的步辇款款前来。让王珪吃惊的是，天子居然坚持如民间待客一样，分设主宾席位，君臣平等地对坐，把酒月下，兴致勃勃地交流了一番关于文学的见解。愉快地聊天到三更，皇帝反而兴致更浓了，干脆命令左右妃子、乐伎、宫女都来请王珪题诗，并且让太监用象牙案捧出御用的金镶水晶砚、珊瑚笔格、玉管笔供其使用。既然得了天子的口谕，妃嫔宫女们也都活跃起来，这个当即解下颈上的霞帔，那个取来刚刚熏香的裙带，有人掏出袖底的帕子，有人持来纨素的团扇，依次向王珪请诗。王珪可是个才子，面对这么多宛如天人一般高贵而曼妙的女子，毫不怯场，文思如飞，对每一位求诗者都能吟出符合其身份、称扬其专长的诗词，特别是那些容貌出众的宫人，他一定能用恰当的修辞描述出其独特的美丽，于是，得到题诗的女性们个个欢喜得面上生光。



清 珊瑚笔山
南京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这时，神宗含笑言道：“哪能白白劳烦学士呢，你们都得掏润笔费呀。”让宫人们每人从头上摘下一朵珠花作为酬谢。这些深得恩宠的女性当即调皮地把王珪的头冠摘下当作盛器，结果头冠很快就被珠花填满，于是，她们又纷纷把珠花塞进王大学士的双袖之内，还有伶俐人儿当即取来针线，把那一双袖口缝合起来，免得珠花掉落。在规矩森严的宫禁生活中，此刻竟有了这样一场小小的放纵与狂欢，搞得神宗也心情特别愉快，看到已是月影西沉的残夜时分，便命内监撤下天子所用的涂金莲花形巨烛，为已带酒意的王珪照路，护送他回到值班院休息。

宫中尚且如此，民间风气就更为活泼热闹。最有意思的是，

这种氛围竟催动苏轼在路过华清宫时做了一个神秘而诗意的梦，梦见唐玄宗命令他为杨贵妃的裙带题词！即使在睡梦中，诗人的才思也毫无凝滞，且醒来之后记忆清晰。

假如记载可信的话，虚龄二十一岁的苏轼在出川应试的路上，曾经在华清宫的废墟畔有过“春梦”一场：

轼初自蜀应举京师，道过华清宫，梦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觉而记之。今书赠何山潘大临邠老，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縱縱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元丰五年十月七日。

这是《东坡志林·梦寐》一章中以“记梦赋诗”为题的一则苏轼“自述”。

然而，就在同一章中，稍后又出现了一条“梦中作靴铭”，说苏轼任职杭州的时候，梦见被宋神宗召入禁中，并有红衣女童捧来一只红靴，让他在靴上题写文辞，“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眎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縱縱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一个男性梦见暗示着异性身体的女人裙带，要算典型的春梦了。关于第二场春梦，文献中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发生于苏轼在黄州之时。后人因此就觉得不解，一种春梦居然有两三个歧出的版本，这有什么意思呢？睡觉做梦还能做出一个系列剧？如果是编造的故事，那么又何必如此？

有意思的是，在宋人笔记中，宋神宗这位天子似乎屡屡与题有文人墨迹的女人裙带发生关系。南宋人王明清《挥麈余话》中记载一则轶事说，擅长书法的沈辽曾经应人之约在一条裙带上墨

书题词，结果这条裙带被辗转买入宫中，居然由受宠皇妃系在了身上。初登君位的宋神宗看到之后大为不悦，定义为“士大夫……为倡优书淫冶之词于裙带”，导致沈辽最终削籍为民。然而，《钱氏私志》中却有着情调截然相反的传说：有一年中秋之夜，时为翰林学士的王珪被宋神宗单独召入禁中“赐酒”，“夜漏下三鼓，上悦甚，令左右宫嫔各取领巾、裙带或团扇、手帕求诗”，而王珪则有求必应，挥笔不停，“尽出一时新意，仍称其所长，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搞得皇帝与妃嫔们都非常高兴。

观察文献可以看到，宋代女性热衷的时髦之一就是找机会请名士在自己的裙带、领巾之类服饰上题写诗词，并且那诗那词最好是名士当场即兴讴颂衣服主人之美好魅力的专题作品。文人们应约或主动向陌生女性献上赞美之词，只要意涵优雅，不涉褻狎，就不算耍流氓——不过他们的这类作品其实往往相当轻浮。这一风气是否也如笔记所述那般传入皇宫之中？皇妃、宫女们是否真的会把写有诗词的裙带系在身上？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古人文献的可信性。不管怎样，苏轼的两场春梦，都必须放在这一极特殊的风雅当中，才会容易理解。



明 杜堇《宫中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春梦一号，其实暗含着相当软情色的情节——风华正茂的苏轼居然把自己的才华挥洒在了杨贵妃的裙带上。在传奇中，李白的三章《清平乐》也不过是写在金花笺上而已！如果苏轼真的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那么无疑反映出他在初出茅庐之际的自信与自负，反映出他对不远的未来的期许。

春梦二号，含义就幽昧朦胧得多了。仅仅从情节的层面上来看，故事是说，苏轼当初那一场成功“穿越”时题上墨迹的、杨贵妃的裙带，居然经由冥冥的力量再度逆穿时空，出现在神宗身边的宫女身上，神宗在注意到这条裙带之后，特别宣召苏轼入宫，以题靴的方式检验了一下他的才华，最后，又特意派系有那条裙带的宫女送苏轼下殿，以此让他明白圣心的用意。这个所谓的“梦”大概是一个婉转的隐喻，也许是苏轼自己编排出来借以表述心迹；也许干脆是他人的杜撰，是人们对苏轼在那一段危厄时期的遭际的一种理想化、神秘化的解释。

其实，沈辽因题裙带而被黜、王珪在中秋夜于皇妃们的裙带上留墨，又怎能确定就是事实呢？也一样可能是一种隐喻，一种辗转地编排成型的传奇模式，一场宋代士大夫集体成就的“春梦”。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类型的明显是异性恋气质的春梦中，真正的“梦中人”其实是一个男人，一个至尊的男人——天子。坦白讲，相对于这一种“春梦”所蕴含的复杂纷纭的深层内容，我更满足于欣赏它在字面上的美丽。紧张、残酷、混乱以及让所有卷入者在心理与生理上都备受伤害的政治斗争，却能催生出如此缠绵婉转的隐喻的表述，这，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极其丰盈的文化才能具有的能力，套用今天的话说，是真正的“软实力”。



(传)明 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局部

暖翠楼上的盒子会

清代名剧《桃花扇》中，对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见面，作者孔尚任安排了一个春光洋溢的场合，即，秦淮名妓们在清明节举办“盒子会”的时刻。

盒子会是明朝南京真实存在的风俗。明代著名大画家沈周撰有一篇《盒子会辞》，介绍说，在南京这里，“色艺俱优”的名妓们流行结拜“手帕姐妹”，多达二三十人一同拜作干姐妹。每年春天三月三是传统的“上巳节”，从这一天起，这一群干姐妹就要轮流举办宴会，赴宴时，每人都要带来一只名为“春盘”的食盒，不仅食盒本身务求精巧，盒内之物更必须是最珍贵最上等的食品。谁带来的吃食最为稀奇且美味，就算赢家，比赛中的输家则要受罚，向赢家敬酒。宴席上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这些美人轮流表演各自擅长的文艺才能，弹奏乐器、演戏、唱曲等，席间灯火辉煌，笑语喧哗。这样的盛会竟会持续一个月之久，因为参与者每人都送来一只食盒，所以叫“盒子会”。

《桃花扇·访翠》一折正是把真实的风俗加以最美丽的演绎，戏中，盒子会的主要目的变为名妓依次呈演乐器，一起钻研音乐技艺，互相观摩，彼此切磋，在竞赛式的表演中获得提高。因此，干姐妹们带着满盛精美肴馔的盒子聚齐之后，会在一处楼阁上进行这次演艺比赛，并且将底层的楼门紧闭，不容闲人上楼，以免被打扰。风流子弟只许在楼下“赏鉴”，竖着耳朵遥听楼上的乐声，如果哪一曲将他特别打动，可以将一件贵重饰品立刻抛到楼上去，叫“打采”。假如楼上那位刚刚奏罢一曲的美人看到抛物上来的这位男子恰好觉得喜欢，就会把一些新鲜水果扔下

楼，作为回敬，也是一种委婉的互表好感。

孔尚任将《桃花扇》中的这一次盒子会安排在清明节当日，“莺花三里巷，烟水两条街”，金陵正是最秊软的时光。女主人公李香君随养母李贞丽一起到名妓卞玉京家，参与卞宅内暖翠楼上的竞技雅会。男主人公侯方域与友人一起闻讯跟来，在楼下，听到楼上一曲箫音美妙到让他“销魂”，激动之下当即将一个伽楠香扇坠抛了上去。奏箫者正是李香君，她从楼上看到抛扇坠上来的翩翩佳公子，竟是一见倾心，也就用白手帕包了一包樱桃扔下，以为回应。

接着，李贞丽带着香君下了暖翠楼。因为主人卞玉京在楼上主持盒子会，无法分身，香君便代替她招待侯方域及其友人，先品茗，后饮酒、行雅令，由此，才子佳人第一次在社交活动中面对面地接触，啊，随即触发的，便将是剧中那曲折而悲情的爱情传奇！

在整个世界戏剧史中，这一次的男女相遇，都因其无比的风雅蕴藉、出人意表的情节设置，而熠熠夺目。比较起来，莎士比亚显得太粗糙了。



清代彩绘本《桃花扇》中“访翠”一帧，亦即盒子会的情节。

叶笺寄情思

将心中涌起的诗句写到一张叶子形的彩笺上，然后扬手将其抛向空中，看轻风携着一叶小笺，携着自己的片段悄语、随性感喟，渐渐飞向山谷，飞向碧潭，最终归入大自然的苍莽之中隐没不见。这想必会是很畅神的体验。然而，如此的做法曾经真实存在，在明代，文人士大夫游赏山水时，就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向天地抒发情怀。

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套明崇祯十三年闵齐伋刻《西厢记》彩图，其中第三幅即绘有两张形态不同的叶形彩笺。一张为蕉叶形，是蕉叶笺，上面题写着张生在月下的吟诗。另一张为枫叶形，是枫叶笺，录写着崔莺莺的和诗。每张笺旁都有一只蝴蝶蹁跹，仿佛正伴随着笺叶在半空中飘飞。这一精美的画面实在是为明代叶笺做了宝贵的留影。

叶笺这一灵奇的创意大约受益于历史上种种“书叶”的传说。据说，盛唐学者郑虔年轻时颇为贫寒，热爱练习书法却买不起纸，便到慈恩寺中寄住，每日从寺内柿林中采摘柿叶作为纸的替代品，于叶上练字，最终成为一代书法名家。不过更动人的是围绕“叶上题诗”情节展开的数则爱情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为宋人小说《流红记》：士人于佑黄昏独自在御沟旁散步，偶然发现一枚大树叶随着水流从宫墙下漂出，浮在河面上，叶面居然题有宫怨诗一首：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于佑为人敏感多情，几天之后竟特意跑到御沟的上游处，把一片亲自书写了诗句的红叶放入水中，让流水将其带入宫墙之内。叶上题诗是：“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直到十年之后，宫女韩氏得到机会出宫，经人做媒与于佑成婚，结果，二人惊异地发现，各自都保留着题有对方墨迹的那片红叶。十年的牵挂，十年的等待，终于一朝花开。

在唐代，“红叶题诗”还有另一个版本，更惹惆怅：一位名为侯继图的文人在秋天登临大慈恩寺的高塔，正在凭栏远眺，忽然有一枚木叶随风飘来，落在他身边。叶上题写有抒发相思的诗迹，其中有句为“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带着诗句的木叶不知出于谁人之手，亦不知从何而来，徒令偶然拾得者倍感迷惘。

正是在唐代，出现了专门为录诗而设的“诗笺”。明代文人的“叶笺”乃是把诗笺的悠久传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据高濂《遵生八笺》介绍，这种特型笺纸设计精巧，要制作出专为显现叶脉图案的凸花印花模版，利用传统蜡印花笺的工艺，在红、绿、黄三色笺纸上印出叶脉的纹迹，然后将外缘裁成叶形——红笺剪作枫叶的形廓，绿笺则模仿蕉叶，而黄笺制为贝叶，这样，便得到了一张张宛如树叶的诗笺。

韓翠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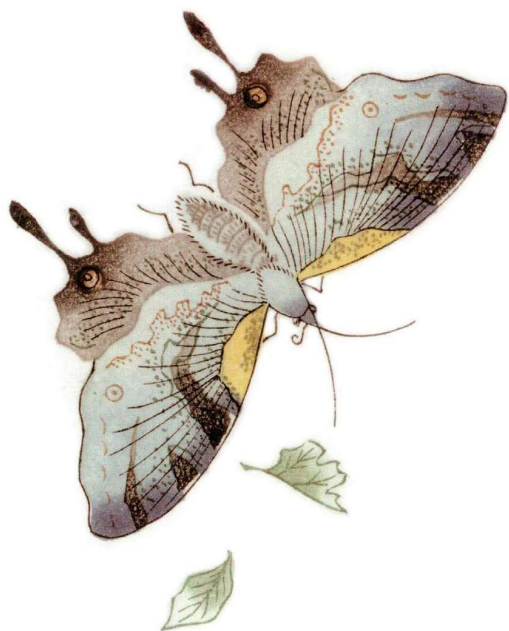
明刻《历代百美图》中正在题叶的韩翠蘋

叶笺乃是传统文人用以书写诗作的专用小笺。动人的是，明代文人在出游的时候，喜欢将其作为纵情山水的载体，一如《遵生八笺》所述：

若山游偶得绝句，书叶投空，随风飞扬，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有许多幽趣。

不管独自还是与友人一起，也不管是空山踏翠还是泛舟碧波，高濂这位《玉簪记》的作者总是携带内含叶笺的诗筒，一旦才思灵动吟得诗句，便题写到叶笺上，然后将片片轻笺抛向空谷或丢入明波，任其随风浮飞，漂波逐流，最终寄身自然。

在当今电子化的时代，纸笔已经变得陌生。其实，或可利用枫叶节、情人节等时机，重拾明人风雅，比如枫叶节时，鼓励人们用特制的枫叶笺写下自己的诗作或者心愿，挂到树上、枝头；赏荷节时则改为莲瓣形笺、荷叶形笺；情人节来个各色花笺叶笺随意选择，并设立许愿墙供大家张贴带着自己心迹的花叶……这种方式优美但并不靡费，却可以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体验在纸面上书写诗式语句的乐趣，重温书写这一人类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方式。



明 胡正言辑印 《十竹斋笺谱》彩笺图案之一

东太后的留影

慈禧太后喜欢拍照，喜欢让人给她画像，她的肖像和照片都流传了下来，后人也就清楚知道了她的容貌。相对来说，在今天，慈安太后的形象便显得比较模糊。其实，晚清以来民间口中的“东太后”一样留有画像，只是不大引人注意而已。

其中如佚名画工为她绘就的一张《慈竹延清》图，便很显示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品性。画中人的装扮并不绚丽，穿一件石青色的氅衣，袍面布满金绣的寿字纹，二钮上挂饰的多宝串竟并非珠翠，而是一串沉暗的香珠。因为孀居的身份，所以看上去依然很年轻的皇太后不涂胭脂、不画唇红，但她微漾笑意，姿态轻松从容却不失娴雅，显得内心颇为坚定。当时她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掌握着一个帝国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威势的女性之一，然而，如果观看者不善观察，也许就会觉得，从肖像画上看不到权力与尊贵的气息。

画里也没有走一般贵妇珠翠满身的路子，太后的首饰不出十样，“看去不觉奢华”（《红楼梦》描写宝钗之语）。不过，如果真的以为这位皇太后不奢华，那就太天真了！且看那全套的翡翠首饰，包括成对的翡翠手镯与耳环、一枚小小的翠戒指以及一支翠耳挖长簪。长簪的簪梁上雕出一个镂空的如意绶带纹，这得需要多么大的一块翠料才能制成！同时，这些翠色的细节，也与牡丹的枝叶，更与背景的大簇绿竹形成了色彩上的照应。

不过，这幅画的点睛之处，并不在人上，却在人旁的花上。太后身畔，盛开着鲜艳的牡丹，在几朵娇粉与艳红之花的陪衬

下，极醒目的，是一朵深紫色的硕大花朵昂首在半空，花心的花瓣色深如墨，显然是非常罕见的名种。

紫牡丹似乎不算稀奇，在宋代，洛阳的魏姓花匠便成功培育出了“魏紫”，此后，历代都有新的变种出现，不过，这些各具特色的紫牡丹都属于紫红色系，花色偏红，于红中泛紫。唯有一种名为“墨紫”的花品，花瓣的色泽浓重到接近黑色的程度，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即记道：“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藂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陆游《天彭牡丹谱》亦云：“泼墨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单叶，深黑如墨。欧公记有叶底紫，近之。”近黑色的紫牡丹也称叶底紫、军容紫、泼墨紫，《慈竹延清》中，盛开在东太后身畔的，恰恰是这种牡丹。因此，这幅肖像的立意很独特，是借用一种罕见的牡丹品种，来彰显画中人的尊贵。



清 沈振麟、沈贞绘《慈竹延清》
(故宫博物院藏)





清 沈振麟、沈贞绘《璇闥日永》
(故宫博物院藏)

更妙的是，慈安的两把头^[1]上，在左侧插有一对墨紫牡丹的绢花，花上有蝴蝶踮跹，形成“蝶恋花”的主题。从《红楼梦》“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回可知，在传统生活中，“宫里头做的新鲜样法”的宫花因为工艺高超、款式新颖，既意味着刚刚发布的最新流行时尚，也意味着顶级精品，对任何一位女性来说，若得几枝以耀首，那都是再美不过的事。《慈竹延清》这幅画流露的信息是，因为皇宫内有墨紫牡丹盛开，造办处便仿照墨牡丹的模样为皇太后专门制作了“同款”绢花，供她赏花时插戴。那头上的绢花与身畔的真花彼此呼应，如此的“独家定制”，大概要艳羡煞了天下女子。

慈安还有另外一幅御容像《璇闼日永》，看得出来，这两幅御容属于同时完成，画中的服装完全一样，改变的只是首饰等细节。同样的，《璇闼日永》也出现了红牡丹、粉红牡丹与墨紫牡丹，与《慈竹延清》不同，前者不仅有栽在苑内的牡丹，还多添了一只花瓶，里面插着粉、墨紫以及白三色牡丹的折枝。这一次，慈安的头上是一对粉牡丹宫花，与硕大的天然粉红牡丹形成呼应，不过，在两把头右侧斜插了一支点翠“福”字簪，让石青长袍的青色再次出现。最出彩的是描绘了一只窑变花瓶，瓶身以紫色为主，把墨紫牡丹的紫色加以延伸。另外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细节，两帧御容中，慈安外袍的两只袖口下，冒出内里三层衬衣的袖边，由外向内分别为紫、黄、蓝——紫袖边同牡丹之紫、蓝袖边同长袍之深青为同色系，在细节上进行色彩的协调。

应该说，在清代宫廷肖像画中，如此注意色彩的呼应，很是少见。实际上，清代宫廷肖像画似乎没有“主色调”这样一个概念，以青色与紫色在画面上形成沉稳的主色调，就更为少见。此外，桌子、轩厅也都采用素雅的色泽，建筑不施彩画，都让这幅作品偏向端庄沉稳。

有人或许会认为，用蓝、紫这两个沉稳颜色统摄整个画面，再以细节与之呼应，是这两幅肖像创作者的主意，体现的是画家的水平。不过，足以作为参考的是，慈禧太后也有一幅御容中出现了墨紫牡丹与粉红牡丹同芳，而且她在钹子上也插了墨紫宫花，但是这幅作品就不见主色调的设计，而是多种鲜艳色彩彼此竞争，黄色蟒袍上遍布五彩花纹，紫与粉的牡丹花枝插在一只绿花瓶里，绿锦垫旁是紫锦垫……而且充斥着奢侈品和高档家具，包括镂花白玉果盘、镶碧玺的碧玉如意、粉彩唾盒等。由此可以推断，当事人的意见会直接影响画师的画样，最终肖像能成什么样，很大程度由“委托人”决定。因此，慈安太后的两幅御容应该是在她的授意之下完成的，创作过程遵循了她的懿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本人的品位与修养。



清 沈振麟、沈贞绘 《慈禧太后像》
(故宫博物院藏)

坐于山石之上的那幅御容，上方题有“慈竹延清”四字，笔迹颇显稚嫩，钐“同治”白文印、“敬书”朱文印，鉴藏印钐“同治尊亲之宝”朱文印。很显然，是尚在少年阶段的同治皇帝亲自题写了这四个字，祝愿母后皇太后长寿。另一幅御容，则是小皇帝在画面一侧题写“璇闼日永”，同样有“同治尊亲之宝”“同治”“敬书”三印。虽然与小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身为宗法社会重视的嫡母、正宫皇太后，慈安太后与慈禧一样，与同治是母子关系，同治亲自书题，正是这种关系的表现。

据李湜《同治、光绪朝如意馆》一文，同治四年四月一日起，如意馆画士沈振麟、沈贞应召“进内恭绘慈安皇太后御容、慈禧皇太后御容”。他们二人作画的时间接近牡丹的花期，与慈安两幅御容中的季节一致。同治四年这一年，慈安二十八岁，也与画中的年轻模样相符。因此，有可能，这一对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沈振麟、沈贞，他们用画笔保留了1865年时慈安太后的形象。

在后人的印象中，东太后一直被西太后的锋芒遮掩，近年普遍流行的论调认为，她只是个陪衬角色，缺乏个性和光彩。其实只要稍微想想，能和慈禧这样的人联手，并且在近二十年内形成稳定的政治搭档，主见、智商、气度、判断力，总之综合能力缺了哪一项，都是做不到的。要知道，她不仅与慈禧一起成功发动辛酉政变，而且，两位太后一同垂帘听政的时期，收拾了咸丰留下的烂摊子，创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其中包括开展洋务运动。在那个时期，她们二人在朝野中的声望并不坏，薛福成在《庸庵笔记》里就对慈安极尽溢美之词，包括这样的描述：“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

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如此高的評價，也可能是作者戴了濾鏡之後產生的感受，是對慈安自覺不自觉地進行了美化，不過，至少說明，慈安沒有特別昏聩的行為，沒有做過讓人無法忽略的蠢事，破壞她在朝臣心中的形象。

不管怎樣，兩幅肖像畫里展示的慈安太后沉着大氣，自我認識清楚，文化修養與審美品味頗佳，對政治上的權力，她並沒有任何畏縮，反而很是自豪。而且，她還很善于表達這種自豪，毫無暴发戶的俗氣，相反散發出含蓄內斂的權勢感。

[1] 兩把頭：又稱二把頭，是滿洲婦女具有代表性的髮式。即將頭髮分成兩綹，結成橫長的髮髻，再將余髮梳成燕尾巴式扁髻。

煮香与煎香

品香，如今日益成为雅人的流行好尚，不过，从各种相关介绍来看，今日所谓“香道”的薰香方法似乎颇为单一，中国古人发展出的种种便捷经验尚未受到注意。

当今冠以“香道”“香席”名号的品香雅事是从日本重新传回中国，带着日本人的认真劲，焚一小片沉香，要求大家都屏息静气，打起十分精神去闻嗅那香芬，倒仿佛练功一般。在中国的往昔，文人雅士诚然会有如此凝神赏香的时刻，不过，焚香更多的是一种日常行为，是美化居住环境的一个必要方法。所以，古人很关心的就是，如何让一小片香料能够长时间地经受焚薰，在无须人费神打理的情况下，始终散发柔和而恬美的芳息？

自晋唐以来，薰香形成了固定的方法：在香炉内堆好香灰，于灰内埋下一枚烧红的小炭饼，然后在香灰的顶面放置一枚隔火片，再将香料置于隔火片上，令其接受炭火的熏烤，催发出香气。从日本传回的香道正是采用这一方法。不过，此法的麻烦在于，香料受熏的一面容易烤焦，于是就需要人不时地将香料进行翻动，改变香料被火熏的部位，诗词中咏及的“翻香”即是指此。



南宋 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摄影：动脉影)



清 芙蓉石蟠螭耳盖炉

针对这种麻烦，古人也发明了一些对策。沈复《浮生六记》就写道：“静室焚香，闲中雅趣。芸尝以沉速等香，于饭镬蒸透，在炉上设一铜丝架，离火半寸许，徐徐烘之，其香幽韵而无烟。”芸娘喜欢的巧法是在香炉内立一个小铜丝架，距离香灰面大约有半寸的高度，将蒸过的沉香片、速香片等天然香料放置在架上。这样，香片与炉内炭火之间隔着一定的空间，火力的影响更为柔缓，也就不会出现香片被烤焦的遗憾，相反，香片受热程度减低，挥发香精的速度也就更慢，其芬息显得更有“幽韵”。

如果说芸娘的方法是对香片隔空加热，那么明人周嘉胄《香乘》中记录的一则“煮香”法，则是利用了隔水加热的途径：“香以不得烟为胜。沉水隔火，已佳；煮香，逾妙。法用小银鼎注水，安炉火上，置沉香一块。香气幽微，翛然有致。”按这一段文字的介绍，沉香片置于隔火片上，固然效果很好，但还是比不上“煮香”之妙。至于煮香的具体方法则是：在安排好炭火、香灰的香炉当中架设一只迷你银鼎，向鼎内注入适量清水，然后把一块沉香直接放在水中。如此，炭火慢慢将鼎中水加热，热量再传递给沉香块，促使香精挥发。经过水的中介，香块避免了火力的直接熏烤，不仅没有焦糊之虞，甚至不会散发烟气。因此，其效果更接近今日香精油的效果，芬氤微淡而持久，润而不燥。





明 杜堉 《玩古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清初人屈大均《广东新语》里记载了一种所谓“煎香”法，与煮香法一样，是借助水来消灭烟气。虽然名为煎香，但其实仍然遵循爇香的经典程序，将香片置于隔火片上，接受来自隔火片下炭火的熏烤，只是事先要让香片受熏的一面沾少许水。沾水后的香片变得“滋润”，也就不容易烤焦，这一方法虽然简单，但“香一片足以氤氲弥日”，一片香料就可以在炉中散香一整天，效力持久。

见于往昔文字中的这些古人经验，在今天，也许仍然值得尝试，以便丰富既有的品香方式，甚或在这些旧经验之上形成创新。

从琉璃行殿到水晶宫

当你游览故宫的时候，在延禧宫内，会看到一座砖石与钢材组成的建筑框架，伫立在干涸的水池中央。这就是未完工的“灵沼轩”，见证着传统中国建造水晶宫的最后一次努力。

你可曾想象过，一座宫殿式的大帐，镶满彩色玻璃窗，伫立在草原大漠，北魏君臣团团围坐在帐内，宴饮歌舞？

你可曾想象过，在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曾经有两座圆顶的宫殿，通体用玻璃镶成，坐落在苑池中央，向碧波投下水晶般的灿影？

今天，很多人都误以为玻璃是近代才从西方传入的东西，其实，中国人制造与利用玻璃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战国时期，只不过习惯上称之为“琉璃”。发展到晋朝，半透明彩色玻璃的制作技术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宫殿上出现了镶嵌绿、白玻璃的窗扉，贵族居室中则会设有满布紫或绿玻璃片的折叠屏风。

南北朝时，甚至出现了满嵌玻璃窗的移动式宫殿。史书记载，北魏太武帝下令制作了一座大帐，帐顶与帐帷都开有成排的窗口，窗口内则镶上五彩玻璃。这座大帐设计得具有宫室的基本形状，但可以折叠起来由车马运载，也可以随时打开并在地上撑起，因此叫作“行殿”。此一移动的宫殿异常巨大，一旦张撑开来，足以容纳上百人在其中就座。阳光由密集排列在帐顶与四围幕帷上的彩色玻璃窗映入，帐内光彩变幻，斑斓陆离，这让太武帝的臣子们无比惊奇，以为是神仙用魔法化出的作品。

到了唐代，冶制无色透明玻璃的工艺发达起来，也就在这个

时期，人们开始试图仿造传说中的海底水晶宫。据《云仙散录》，中唐时，大宦官鱼朝恩命令工匠用双层的玻璃墙围出一间独立的房间，两重玻璃墙之间留有中空的夹层，夹层内灌满江水，再植入水草、浮萍，并养以不同种类的活鱼虾。人处其中，四周的玻璃夹墙水光漾动，藻草与萍叶漂浮，鱼虾轻灵游动，仿佛置身水底的洞穴内，故而取名“鱼藻洞”。

另外，元朝的时候有记载说，当时有一位权臣燕铁木儿，他在府邸内让人修造了一座“水晶亭”，这座亭子的形制与鱼藻洞相近，但竟然以天然的水晶板代替玻璃，来做成亭子四侧的中空夹层透明墙壁，可谓穷奢极欲的极致。水晶亭与鱼藻洞有个迷人的特点，那就是把观赏水箱与小型建筑结合为一体，在亭内可以休息、会客、宴饮，同时四壁上鱼影不定，花草摇曳，形成活泼的动态墙景，并向亭内投下变幻的映影，如果在亭中或亭外点起灯烛，则愈发的奇妙如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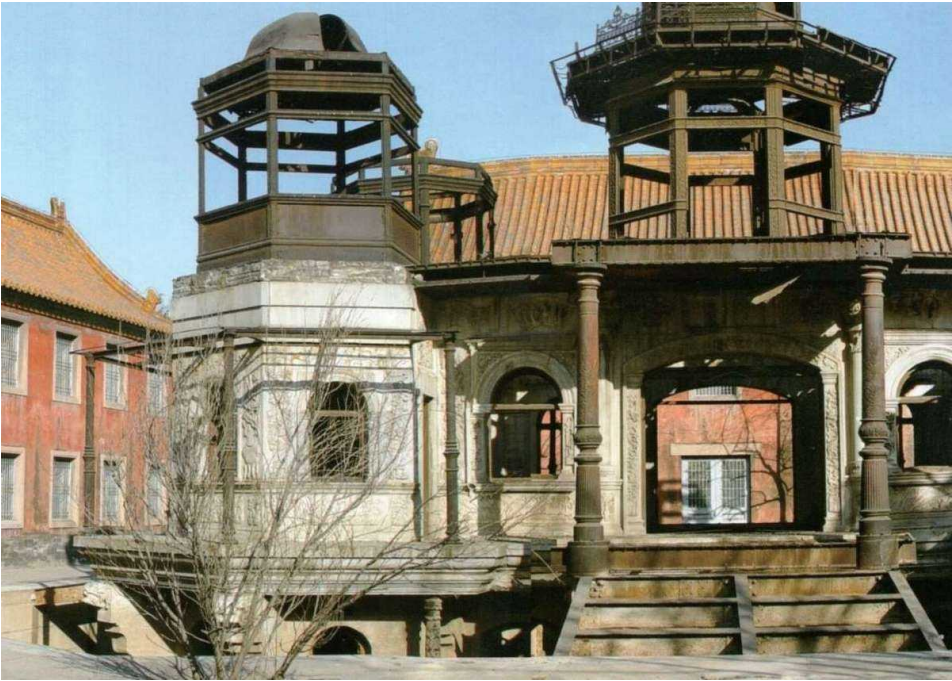
尤为惊人的是，明初文献《故宫遗录》记录了元代大都（今北京）皇宫的大体规制，其中写道：“新殿后有水晶二圆殿，起于水中，通用玻璃饰，日光回彩，宛若水宫。”由此可知，元宫内有两座圆形的透明宫殿，矗立在苑湖的中央，从殿顶到墙壁全部用玻璃装饰，映着阳光，不仅晶莹澄澈，还有折射形成的虹彩，恰如水铸成的宫殿一般，因此称为“水晶殿”。

不过，古人并没有轧制大块平板玻璃的技术，在修造这类玻璃建筑的时候，唯一可能的做法是，利用砖石、泥膏、木材甚至金属将墙面做成方格式框架，再以小片玻璃逐一嵌满方格。因此，无论唐时的鱼藻洞，还是元代的水晶殿，都不会具备今日常见的整片玻璃幕墙，而是将无数玻璃片嵌满墙壁以及屋顶。

宣统元年（1909），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延禧宫内建造灵沼

轩，俗称“水晶宫”，这是一组规模不小的西式钢结构楼阁，本意是在钢框内满嵌玻璃，形成透明的顶与壁，周环的水池内蓄养金鱼以及莲花。不过，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造到一半的灵沼轩便停工搁置了。

其实，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灵沼轩即使真的建成，实用效果也未必理想，维护则更是困难。“玻璃房”内冬冷夏热，在没有空调的时代，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神奇如鱼朝恩的鱼藻洞、燕铁木儿的水晶亭，墙壁的夹层内需换水、供氧等，亦是前现代社会无力解决的技术难题。因此，今日四处风行的“海底餐厅”，竟是古人早就向往、却限于技术条件无法享受到的体验。



故宫灵沼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图 / 孟晖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4

ISBN 978-7-5217-1773-0

I. ①美... II. ①孟...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2024号

美人图

著者：孟晖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89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5217-1773-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人间烟火

掩埋在历史里的
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 著

通过对典型个案细致入微的讲述
打捞起沉潜于历史角落中
被人们忽略的日常生活
通过带有温度的讲述
还原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

中信出版集团

人间烟火

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食 舌尖上的历史

饥饿史与饮食发达史

饼与中国的主食革命

《齐民要术》里的神奇菜谱

脍炙的退撤

吃饭的故事

吃茶去

衣 服饰往事

丝麻棉演义：从“小貂”说起

穿衣的讲究

胡风吹扇衣冠变

缠足恶史

住 安得广厦

田园生活的烦恼

古人的住房问题

城市的秘密过往

“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

《李娃传》里的城市生计

行 天下熙熙

道路的性格之“关”

道路的性格之“驿”

路上匆匆行者谁？

一个士兵的旅程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宦游路上的妻儿

传统时期的女子

妻妾

夫妇

贞节

奇花：程氏不嫁女

奇花：女仆张行婆

传统时期的男子

从众还是从心？

失败者

任性

鼠辈

序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所谓“日常生活”，是由“日常”与“生活”两个词构成。

“日常”是指按照常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会遭遇、发生的一切，其实，日常与历史记载是“八字不合”的。现代新闻界流行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也说明了传媒的本质——求新猎奇，抓人眼球，追求点击率。就像现代传媒一样，传统的历史记载也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比如“崔杼弑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论治”。一般的狗咬人当然不是新闻，但如果大人物的狗咬了大人物，或许就是新闻了——对象的不同寻常也可以赋予寻常事物不寻常的意义。普通人喝酒唱歌属于日常，而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属于由外交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因为这关乎国家体面，甚至秦赵两国关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场曲水流觞的兰亭盛会，则因王羲之的绝妙书法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和文学意义而得以流传。传统历史记载中，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它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异的传统追求相左。

“日常”在历史记载中多有缺失。举个例子，通常我们读到的思想史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重要思想家的生平，一是重要作品的介绍和重要理论的解读。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一般性的思想状况——大多数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好比对中国地貌的介绍，只介绍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和峰顶的无限风光，一千米以下的地貌一概阙如。当时的记录者之所以忽略了日常，是因为那是家喻户晓的，不认为有说明、记录的必要。可是对现代读者来说，古人的“不言而喻”却早已变得完全陌生——过去是一个外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们这种后发国家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严重割裂了现代与传统。对现代读者来说，传统的“日常”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对“日常”的关注，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而如何从传统记载中把“日常”打捞出来，则是历史学者的专门技艺。能够说清楚的，是历史学在转变，开始从传统史学的套子里跳出来，立足现代向过去提问，关注日常，关注普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图一：元 赵孟頫 《兰亭修禊图》（局部）

《兰亭修禊图》，元代赵孟頫（款），257厘米×23厘米，手卷，设色绢本，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何后世有这么多人喜欢《兰亭序》？不仅因其书法造诣高深，更因文中将兰亭雅集的高雅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160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王羲之与谢安等40位好朋友齐聚山阴兰亭，临水禊祭。自古有“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从序文不难看出，此次雅集不只是行禊祭之礼，更是社会名士以文、以酒会友，吟诗作赋，尽唱和之雅兴。他们将酒杯放入水中，让其随水漂流，漂到谁面前，谁就将其捞起饮尽，而后赋诗一首。画中既有酒杯点心，又备有笔墨纸砚，有的朋友坐久了就起身伸个懒腰，春天的气息便从画中扑面而来。

中文中的“生活”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与饮食起居相关的情况、境遇，也可以指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寻常、最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汉文帝听贾谊讲课，听得动心不觉“前席”，因为他们都跪坐在席子上。李商隐有诗咏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怜夜半虚前席”是说皇帝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往前蹭，只可惜蹭也白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个“虚”字着落在这里，强调的是贾谊的抱负与皇帝兴趣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不是让席子空着。从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变化，发生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中。这是“生活的日常”。



图二：唐 孙位 《高逸图》之刘伶饮酒

《高逸图》，唐代孙位绘，168.7厘米×45.2厘米，绢本设色，现藏上海博物馆。《高逸图》是孙位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唐代绢本作品之一。该画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现存已残缺，经考证仅存山涛、王戎、刘伶与阮籍。此画面中即是“天下第一酒鬼”刘伶，据说其每饮必醉，每醉必吐，吐又复饮。画面中呈现的即为其醉后将吐酒的样子，其身后的童子手捧一个壶正准备接他吐的酒。虽已喝吐，但他依旧手捧六角酒杯，似乎准备继续喝，果然是“天下第一酒鬼”。而且他有个颇为任性的行为：每出门游玩都命童仆扛个锄头，并告知，若我喝死了，就随便挖个坑将我埋了，由此可见魏晋名士刘伶看淡生死的那种洒脱与不羁。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等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

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12世纪后期以降，大多数华夏女子还要忍受缠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最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

“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尽管我们每天会在发达的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但我们绝对不是史上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处在时势的裹挟之中，在制度的规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驱使之下，在海量信息供给的当下，我们更可能是史上最知情的群体。通过探究“生命的日常”，我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度过人生，体味生命。



图三：明 唐寅 《听琴图》（局部）

《听琴图》，明代唐寅绘，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画面展现的是一位雅士正在极目远眺、专心抚琴。因抚琴者心无旁骛地拨弦时，琴声最是动听，所以后面几位文士为了不叨扰抚琴者，或趋步或侧耳，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偷听悠扬的琴声。从画中几案上的烛台可知，此场景发生在夜晚。国画展现夜晚，通常会借助其他符号或意象来表达，而不会画成黑漆漆的一团。嵇康有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顾恺之则从绘画角度进一步生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意为要画出手拨五弦的样子较容易，毕竟这是种客观呈现；难的是要画出目送归鸿的深沉意境。中国画重写意，写实次之。我们还看到画面中一段残缺的墙垣上覆满茅草，并以瓦片压实，这是为防止断壁久淋雨水倾塌做的一项保护措施。朴实而真实的画面，充分展现了古代文人雅士虽居陋室，却依旧能保持高雅意趣的情怀。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文中回忆了他的个人生活在四十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简短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日常生活史。一个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以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完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高中之前，家里照明靠油灯，他晚上读书打瞌睡，第二天就得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去上学；到县城上高中，他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并于1995年和朋友们筹款四万多元，给村里通上了电；然后，他看着通了电的村庄不断吸收着工业革命的成果——购买各种电器，甚至用上了自来水。人类日常生活如此高密度地快速变化，只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积极进取、勇于改革的后发现现代化国家。它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后发者有前例可循，有榜样可学，无须太多创造，只要肯学习；第二，我们肯学习，见贤思齐，有谦卑的态度和开放的心胸，有容德乃大。

传统时期的日常生活，从某些角度看几乎是静止的。比如1900年前后，法国摄影师方苏雅在云南拍到的独轮车，跟汉代画像石上的没什么两样。而在某些偏远地方，这种独轮车可能至今仍然在发挥着运输功能。

倘若我们以为传统的日常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永恒不变，它又会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服饰、衣冠、起居制度、生命的预期，无一不在变化之中。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记载了一个好玩的段子：有个叫翟伯寿的人，喜欢穿唐代的服饰，自己取了个名儿叫“唐装”。有一天，翟伯寿去看他的朋友许彦周。许彦周头上梳着两个小髻髻，穿着犊鼻褌（样式参考日本相扑手制服），脚上蹬着高底木屐就迎将了出来。翟伯寿顿时看傻了眼儿。许彦周则不慌不忙地说：我穿的这是“晋装”，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故事发生在宋朝。也就是说，就服饰而言，晋装不同于唐

装，唐装不同于宋装。显然，这唐装不是当下坊间所谓的“唐装”。



既可拉货又能载人的独轮车



图四：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之独轮车

《清明上河图》（辛丑版），明代仇英绘。绢本设色，工笔画，797厘米×34厘米。上面几幅小图展示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造型。据说其原型为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一种名为“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史载，诸葛亮北伐曹魏，因蜀地距中原甚远，军粮运输异常困难，为解决此难题，诸葛亮设计了此运输工具。木牛流马的承重量为“一岁粮”（400斤以上），日行可达30里，因为只有一个车轮，它可以在狭窄的山道、乡间小路上行进。这一运具较好地解决了蜀汉大军的运粮难题。史料中虽有“木牛流马”名字的记载，却无实样参考，后人认为是独轮车。照此推算，独轮车发明距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历史，且一直在民间大量使用。上面几幅图即为《清明上河图》中运货、载人的独轮车的呈现，尤其载人的独轮车，似有古代黄包车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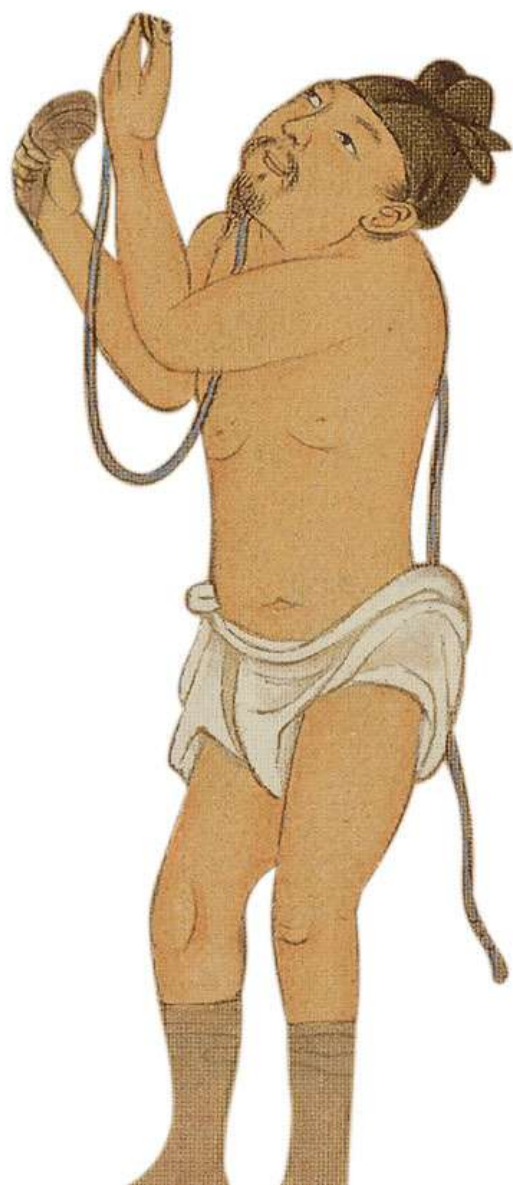


图五：北齐 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局部）

《北齐校书图》，北齐杨子华绘，绢本设色，144厘米×27.6厘米，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图中所绘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为整理出供皇太子学习的书籍，命颇有文才的樊逊和高干和等十余人勘定群书的场景。我们知道，汉人服饰、发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齐校书图》人物着装便可清楚地看到：画面中间这位坐在马扎上校书的长者，头上梳着两个小髻髻，其左旁侍立的仕女，头上也梳有两个更明显的小髻髻。沈从文先生在《中国服饰史》中曾专门讲到过“髻髻”这一发式，在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髻髻也已出现了。所以，梳着两个小髻髻的许彦周不慌不忙地告诉翟伯寿：我这是晋装打扮，有什么好奇怪的。



图六：元 赵孟頫 《浴马图》（局部）



穿犊鼻褌的奚官

《浴马图》，元代赵孟頫绘，绢本设色，154厘米×2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展现的是奚官（养马人）浴马的场景。我们看到，在盛夏时节，数位奚官正在清溪中为骏马洗澡。有的奚官已洗完，骑在了马背上，洗完澡的马儿正悠闲地饮水；有的奚官正拿着刷子洗刷，尚未洗完的黑骏马似乎显出了些许的不耐烦，而身着犊鼻褌的这位奚官则牵着缰绳，与马儿四目相对，似乎在安慰它，别急别急，马上洗好。我们清晰地看到，奚官所穿的犊鼻褌类似于日本相扑运动员的制服，也接近于今天的男士短裤。在整幅画作中，马儿有行、有立、有卧，人物有赤膊者，有穿衣者，画面自然生动，流露出一种轻松的氛围，即便是一条简单的犊鼻褌，其上的纹理褶皱也清晰可见。由此看出赵孟頫绘画技巧之精湛。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透过历史烟尘，我们来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看变化，也看不变。

无论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最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

食 舌尖上的历史



饥饿史与饮食发达史

多年前，我跟一位德国的同行前辈感叹中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之际所遭遇的断裂。他反驳说：“你说得不对。你看中国人的餐桌，文化就在那里延续。”我愣了一下，忽然有种“仿佛若有光”的感觉——也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不就是从南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吗？清兵入关，可以强令江南百姓剃发，却不能对他们的食谱做任何强横的约束。相较于庙堂宫廷的历史，日常饮食的历史是最顽强坚韧，也最具人民性的。营养的改善提振了人的健康水平和精神状态；知识的拓展、观念的转移及商业营销改变了食物的身价；餐桌上的礼仪奠定了一个人教养的基石，以及个体对社会秩序的最初认知；自幼熟习的配方和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衡量饮食优劣的标准。我们多半会说“中国菜最好吃”，但是也得接受一个意大利人说“意大利菜最好吃”——在味道的世界里，只有不同，无关优劣；来自异域的食物和菜式给口腔和肠胃以新的刺激，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广大和文明的多元。尽管“从前慢”，但文明之间的饮食交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未断绝。乔治·奥威尔曾说，日常饮食的变化可能比朝代更替，甚至宗教变革来得更为重要。^[1]

在讲述华夏饮食发达史之前，先简单地说说饥饿史和与饥饿做斗争的历史。中国史书记载了千千万万饿死的人，他们无名无姓，隐藏在一些数字背后，而这些数字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很少是出于哀悼或反思的目的，而是另作他图，比如表彰善举。《元史·朴不花传》记载，1358年前后，“京师大饥疫。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师，以故死者相枕藉”。得宠的宦官朴不花“欲邀时誉”，大发慈悲，在皇室的支持下主持埋葬死者，“前后瘞者二十万”。在朴不花的仁慈背后，是惨绝人寰的灾难，那场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夺去了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那些无名无姓的死者就长眠在了北京城下。

现代科技发达，各种文明间知识流通，我们因此得以知晓，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饥饿和由饥饿引起的死亡，主要发生在地球气候的寒冷期。中国并非唯一的受害者——那是人类所遭遇的集体生存挑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元末明初和明末。当气候变冷，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武力南压，华夏农业经济区粮食减产，华夏国家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受到严峻挑战，而这种时候又往往会出现吏治腐败、政府无能。比如说，东汉末年，黄淮海平原气候转冷，“至第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南北朝时期继续处于气候寒冷期”。^[2]这是气候之变。与此同时，华夏国家管理能力下降。从公元189年董卓乱长安到589年隋灭陈的四百年间，有三百六十三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其间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五百余次。人祸加剧天灾，“千里无烟爨之气，

华夏无冠带之人”，文明悬于一线。生存的欲望压倒了人类的理智，于是出现了人吃人的极端状况：曹操军队的军粮“杂以人脯”；前秦苻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3]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用“天人感应”来解释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然而对大自然存一分敬畏之心、忧惕之心，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理性，却是必须的。

伴随着饥饿史的，还有华夏先民与饥饿做斗争的历史。传统时期，农业产量并不稳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人靠天吃饭。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明白，要建立丰富的粮食储备以备荒年饥岁，保持社会稳定。《淮南子·主术训》说：“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除了粮食储备，古人还尽可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开荒，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一是通过技术，比如轮作复种、灌溉、水稻育秧移栽，以及良种的推广等技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追求最大收益。汉代在关中推广种麦，宋代引进推广高产的占城稻，明代白薯、玉米自美洲传入并推广，这一系列措施都大大缓解了粮荒。但总体而言，饥饿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等到现代，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要永远怀抱感激与敬意。

华夏饮食发达的历史，首先要提及的是食物种类的不断丰富。华夏民族的食谱对主食、副食有着明确的区分。主食以粮食制品为主，副食包括蔬菜和动物性食物。在农业出现以前，人们的食物来自采集和狩猎，以野生动植物为主，肉类的烹饪方法主要是烧烤，植物性食物则以烤制和生食为主。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农业开始产生，人类有了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的食谱变得越来越丰富。在距今约八千年的河南裴李岗，人们种植粟，养殖猪、狗和鸡。到了距今约七千至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食谱中增加了黍、麻、水稻和栽培的蔬菜。历史继续向前推进到距今五千至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猪、狗、羊、牛、马、鸡六畜齐备，粮食富余到可以酿酒。



图七：《屠房》 莫高窟第八五窟 晚唐

《屠房》为莫高窟第八五窟一幅晚唐时期的壁画。提到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食肉问题，我们会在一些古代画作中看到相关情景，敦煌壁画中的《屠房》便是其中之一。此画左上角有一段榜文，这段榜文其实出自佛经，意思是说，肉是污血混合物，人应该少食肉，多吃素。但画面中呈现的内容却正好与之相左——一位胖胖的屠夫正在宰羊，一旁的屠案上放着宰杀完毕的羊，后面的架子上也挂满了羊腿。画面中有两只狗，一只正在屠案下啃骨头，另一只趴在屠案一边，眼巴巴地瞅着屠夫，似乎希望屠夫扔一块骨头给它啃。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作为耕作动力来源的耕牛受到政策保护，不可随意宰杀。而猪肉因上层饮食习惯的洁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肉食的次要来源。于是，羊肉便成了贵族阶级青睐的肉食。此壁画生动地反映了晚唐时期的屠房内景，是了解中国古代食肉问题的重要的图像史料。

西周时，华夏先民的食谱仍然相对简单。主食以稷和黍为主，黍比稷贵重。稻与粱并称，是席上之珍。王公贵族祭祀，所用动物性食物有牛、羊、豕、犬、鸡、雉、兔、鱼。烹饪方法则以蒸、煮、烤、煨、干腊及菹酿为主。《国语·楚语下》曰“庶人食菜，祀以鱼”，普通老百姓日常饮食是主食加蔬菜，鲜少有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代。

麦取代粟成为北方人主食的核心，是华夏主食结构的一大变化。这一变化

启于魏晋南北朝，至宋始告完成。先秦乃至魏晋南北朝，北人主食以粟为主，南人主食以稻为主。稻米在北方是稀罕物。《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于孔子，嫌时间太长。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食稻”与“衣锦”对称，可知在春秋末年，稻是珍贵的食物，非服丧者所宜食。隋统一之后，稻米在北方仍然是稀缺物资。陈的散骑常侍徐克入隋，居关中，徐母患病，“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之后，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之焉”^[4]。徐孝克以“常啖麦”来表达对亡母的追思，是因为粒食（非面食）的麦有着粗粝食物的文化符号意义。麦起初只是北方的备荒作物和穷人的食粮。魏晋南北朝时期，麦的地位开始上升，至唐宋时期成为北方的主粮，粟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北方食麦，南方食稻”的主食结构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

“炒菜”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中华饮食最具特色的烹饪技法之一，油煎快炒之法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起于中古。要想“炒”起来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要有锅，能够胜任炒功的锅，战国时南方就已经出现了。第二要有油，魏晋时期，植物榨油技术有了较大发展。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提到用麻油来制作豆豉。锅里的油热了，炒却不会自然发生。要让炒真正成为主流的烹饪技法，还需要第三个条件——燃料匮乏。“炒”是一种更为节能的烹饪技术，要想让习惯了熬煮蒸烤的人们改变烹饪方式“炒起来”，还须等到燃料变得金贵起来，这恐怕是唐宋以后的事情了。形势比人强，许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都是形势倒逼的结果。

从宋到明，副食领域发生了一项有趣的变化，老百姓的当家菜从葵（冬寒菜）变成了白菜、萝卜。元代以前，葵一直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

《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亨葵及菽”。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将葵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卷三《种葵》专门介绍了葵的种植要领。北宋黄庭坚有诗云：“附郭小圃宜勤锄。葱秧青青葵甲绿，早韭晚菘羹糝熟。”他的小菜园里种了葱、韭菜、葵和菘（大白菜），大白菜和葵已经并肩出现了。元代王祯的《农书》仍然将葵尊为“百菜之主”，说它堪“备四时之馔……诚蔬茹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到了明代，葵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下降，李时珍《本草纲目》把葵降到了草部：“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

在时间的推移中，中国的味道也一点一滴地丰富起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华夏先民就已经使用天然的霉菌和酵母制作“曲”和曲制品，这些曲制品包括酱、酱汁、腌肉、腌菜、酒和醋。梅子是天然的酸味来源。《左传·昭公二十年》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是春秋时期的食谱，煮鱼和肉用的调料有盐、梅子、酱汁和醋。战国秦汉的随葬品常有梅子，希望墓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仍然能够活得有滋有味。唐代以前，甜味的主要来源是蜂蜜和麦芽糖，曹丕得到西方进口的蔗糖“石蜜”，便向东吴人炫耀说：“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桃、石蜜乎？”^[5]甘蔗榨糖技术是唐朝

从“西天”印度取来的真经。古代典籍中提到的“椒”指花椒，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有西汉的花椒。汉魏时期，四川的蜀椒和甘肃、陕西的秦椒最为著名。胡椒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唐朝，宰相元载被抄家，“胡椒至八百石”，[6]



图八：明 沈周 《卧游图》之白菜

《卧游图》册，明代沈周绘，纸本设色，共十七开，每开37.3厘米×27.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册第一开自书遒劲有力的“卧游”二字，而后依次绘：仿云林山水、杏花、蜀葵、秋柳鸣蝉、平坡散牧、栀子花、秋景山水、芙蓉、枇杷、秋山读书、石榴、雏鸡、秋江钓艇、菜花等小景。每开或应景赋诗，直抒胸臆；或追忆往昔，凭吊古今。书画呼应，相得益彰。画中所取之材虽为杏花、蜀葵、秋蝉、枇杷等平常之物，但方寸间妙趣横生。我们看到，白菜也作为小景之一与其他常见的素材一并进入了绘者笔下，可见，随着葵地位的急速下降，白菜也已成为老百姓的家常菜之一。



图九：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之食肆与地摊





《清明上河图》卷，北宋张择端绘。绢本，淡设色，528厘米×24.8厘米。该长卷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汴河两岸热闹的街景。全卷由三部分构成：首段所绘为汴江市郊的景色，中段集中展现汴河两岸及“上土桥”商贾络绎的街景，后段是市区街景。上图中呈现的是刚入城，靠近汴河一带的街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上车辆络绎不绝，来往行人熙熙攘攘，茶肆食店鳞次栉比，食客列坐其中。除了店铺，还有热闹的街边摊周围围着的众人，仿佛能听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的交谈声。北宋汴京城繁荣发达的饮食概貌跃然画中。

实在奢侈。而辣椒则要到明末才进入中国，^[7]跟辣椒差不多同时进来的，还有同样产自新大陆的白薯、西红柿和土豆。

日常生活的变化常常需要跨越几个世纪才能逐渐完成，所以时间尺度必然会拉大，讲述视角必然会宏观一些。倘若一定要跟朝代挂钩，可以把宋朝视为华夏饮食文化的初步成熟期，在宋朝，我们能够想象的华夏饮食的基本特征，除了辣椒基本齐备：炒的技术已经产生；“油盐酱醋茶”，滋味完备；餐饮业繁荣，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南食店、北食店、川饭店，风味各

异。北宋东京饮食文化的概貌，与今天世人所熟知的中国饮食，几乎无甚差别。

饮食恒处于变化之中。人群的迁移，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异动，比如东晋和南宋的南渡，以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西迁，都将上层所主导的高雅的饮食文化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域，上层的饮食追求与当地食材、食俗的结合，又会生发出新的精美滋味。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则将华夏饮食带往更远的地方，也将远方的滋味引入华夏——多少我们自以为纯粹的中国味道，其实是历史时期的外来风物。人类的饮食和而不同，包容与开放才是美味之道。



图十：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之胡饼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首段，我们可以看到一处颇有争议的街景：在护城河桥靠左边，有一个摊位，小摊上面虽覆有伞盖，但依旧可以看到一个挨一个齐整码放的圆形食物。放大后，还能隐约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儿，有人说这是切开的西瓜露出的瓜瓤，虽然西瓜自五代就已传入中国，但清明时节应该不是西瓜上市的时候，且摊贩不可能一次切开如此多的西瓜。所以这些圆形食物只有一种可能——来自西域的胡饼，类似于今天新疆的馕饼。饼上黑点儿或是黑芝麻，或是其他香料。随着人群迁徙，中外饮食文化不断交流，华夏饮食传向了更远的地方，而异域风味也被逐渐引入中原。这种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美味，在满足了人们味蕾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饮食文化的基因。

[1] 参见George Orwell, *The road to Wigan pier*, Penguin Books, 1937, p.6.

[2]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482页。

[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二《虞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4页；《晋书》卷一一五《苻登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48页。相关论述，参考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 [唐]姚思廉：《陈书·徐孝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38页。

[5]《太平御览》卷八五七《饮食部·蜜门》，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版第3810页。

[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14页。

[7]曹雨：《中国食辣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

饼与中国的主食革命

山西有一种特产叫“煮饼”。按我们通常的理解，饼由面粉或者米粉加水制成，外形扁平，表面相对干燥；而“煮”是一种烹饪方式，应该有一锅水，食物在水里加热，直至熟透。饼可烧可烙可炸，还可以煮？

现在我们已经不煮饼了，然而古代的饼确实是可以煮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个小段子：曹魏时期的何晏“美姿仪”，姿态优雅，仪容美丽，“面至白”，皮肤白到令人妒忌——古人对男性的外貌其实很讲究，男子“长大肥白”，身材高大健硕、皮肤白皙，便会让人觉得资质非凡、能成大器，关键时刻单凭长相还可救命。比如汉初封侯拜相的张敖，早年“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1]。这样的故事不止一则。对“长大肥白”的崇拜，多半与普遍性的营养不良有关。说句题外话，男性之追求肤白貌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近乎变态的地步——男子化妆。徐克的电影《梁祝》里有这样一个桥段：祝英台被逼出嫁，啼哭不止，眼流血泪，妆怎么也化不上去。一帮婢女束手无策。这时候，脸白得像日本艺伎一样的祝爸爸走过来，气急败坏地说：用我的粉！这神来之笔，令人绝倒。

说回何晏，魏明帝怀疑他“面至白”不是纯天然，“疑其傅粉”。于是“正夏月，与热汤饼”，大夏天让人煮饼给何晏吃。何晏吃得满头大汗，“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肤色像月光一样莹润白皙，更好看了。

这种热汤饼的做法，根据贾思勰《齐民要术》的记载，是把面团擀成两指宽的面片，两寸一断，然后再用手把这两指宽、两寸长的面片尽量扯薄，越薄越好，开水下锅，大火煮熟。煮熟之后，浇上肉汁就可以吃了。说白了，“热汤饼”大概就是打卤面片，好像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西晋的美食博主束皙却不惜笔墨予以赞颂，说汤饼形状美，“弱如春绵，白若秋绢”，柔弱洁白，惹人喜爱；味道佳，“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嚙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香浓气味随风飘扬，进入每一个人的鼻腔，那不幸处于下风向的人流出了口水，小厮们捧着空酒杯斜眼向碗里瞅，端着碗的仆人在舔嘴唇，侍立在一旁的仆人在咽口水。这样的好东西最适合冬天食用：“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2]最冷的时候，大清早去朝会，鼻涕都冻住了，胡子上结了霜，此时来一碗热汤饼，管饱又暖和，最好不过。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最盛行，同时也是成就最高的文体依次为诗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赋虽然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但到了唐宋时期，吟诗作赋仍然是文人的基本功。赋的特点是骈四俪六，文辞华美。换句话说就是充满了生僻字，很难读。如此盛大华丽的文体，竟然用来赞美“饼”，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放在西晋，就很正常。因为在那个时候，“饼”代表着创造和美，是一种既时髦又高贵的食物。

在面食以前，北方的主粮是粟，也就是小米。秦汉时期的老百姓是很不愿意种麦子的，汉朝政府曾经两次推广种麦，目的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但是老百姓的响应度并不高。因为麦子直接煮了很不好吃。用麦粒或者麦粒煮的饭叫作“麦饭”。麦饭是穷人的食物，有地位的人吃麦饭只有三种可能：第一，正在服丧或者修道者，想要从肉体上折磨自己，以示与众不同；第二，艰苦朴素或者比较抠门儿的守财奴，因为麦子便宜；第三，好这口的人。秦汉时期的人之所以不吃面条或者烙饼，主要因为他们还没学会面粉的制备和饼的制作技术。

麦是外来作物，大约在一万一千年以前，生活在西亚的人类祖先首先驯化了麦，大约在五千年前，麦抵达中国，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麦类实物是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发现的小麦粒和大麦粒。面粉的制备技术和饼的制作技术传入得更晚。束皙就观察到先秦经典“不说饼”，因而推断当时“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今天我们从文献中能找到的“饼”的确在束皙说的“近代”。汉元帝时，宦官黄门令史游编纂的识字教材《急就篇》就把“饼”和“麦饭”并列在一起，有云“饼、饵、麦饭、甘豆羹”^[3]。关于“饼”的来历，束皙根据“饼”的奇异名称推测说：“若夫安乾粬之伦，豚耳狗舌之属，剑带案盛、饴飴、髓烛，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4]“法出乎殊俗”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推断。

全世界已知最早制作面包的是埃及人。他们制备面粉的工具是石磨盘和石磨棒。此物在博物馆中通常成对展出，底下略大而表面平整的石头是石磨盘，上面像擀面棍一样的短粗石棒是石磨棒。它的工作原理就像今天用擀面棍在案板上制作花生碎一样，但是它们要碾碎的是生麦粒，所以工作量很大，忙活一天也只能制作出当天吃的面粉。埃及法老金字塔壁画中有制作面粉的画面，由女性以跪姿操作，需要把整个身体的力量压上去，长年累月恐怕会导致残疾。这样磨出来的宝贵的面粉质量并不高，通常牙碜，所以法老的牙齿都被磨坏了。在这样的制粉技术水平之下，面食是很难普及的，只能属于最高阶层。

当面食传入中国的时候，小麦制粉技术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人们不再用石磨盘与石磨棒来磨面粉了，而是用那种上下两扇的磨来制粉。磨的工作原理是：两扇圆形的石头相压，两片石头相交的面儿都凿出一定的纹理来，

叫作“磨齿”；将麦粒置于两石之间，当上面的石头被外力推动时，磨齿就会像人的牙齿一样把麦粒“咬”碎，经此过程反复研磨，就得到了面粉。

最初的磨齿是窝点状，磨制效率不高。东汉出现了放射线状磨齿，磨制效率得到提高。唐代还出现了水力推动的碾坊。面粉加工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达官贵人们纷纷在长安附近的河上置办碾坊。比如，唐玄宗时候著名的宦官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泮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5]，碾坊利润可观，但也对农业灌溉产生了恶劣影响。比如唐初郑白渠的灌溉能力本来是一万多顷，后来下降到六千二百多顷——截水作碾影响了水稻灌溉。政府起初试图打击碾坊以恢复水稻灌溉，但后来也开始经营碾坊以赢利；随着小麦种植的扩大，政府也向小麦征税，新税制“两税法”最终取代“租庸调制”。藏在郑白渠兴衰与税制改革背后的，是小麦与水稻的竞争。最终，小麦击败了水稻。^[6]

东汉末年以后，小麦制粉技术和面食技术逐渐推广开来，麦子变得“好吃”了，这时的种植面积才开始增加。但是一直到唐代前期，粟的重要性仍然是超过麦的。因此，北魏到唐代前期，均田制国家地租的征收对象仍然是粟。只有到了唐代后期两税法的实行（782年），夏税的征收对象才变成麦子。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大部分地方实现了粟、麦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到了南宋，麦的种植推广到了长江以南地区。之所以能推广得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喜欢吃面食的众多北方人迁居南方，这必然会产生消费需求，有需求自然会推动生产。另一个是，当时佃户租种地主的地，交租的时候是按种的稻子算的，也就是说，如果佃户在同一块地上种了麦子，打下来的麦子全归自己，所以佃户种麦子的积极性特别高。当然，小麦过江并没有改变南方人吃米的习惯。点心归点心，米饭归米饭。



图十一：南宋 楼璘（传）《耕稼图》之舂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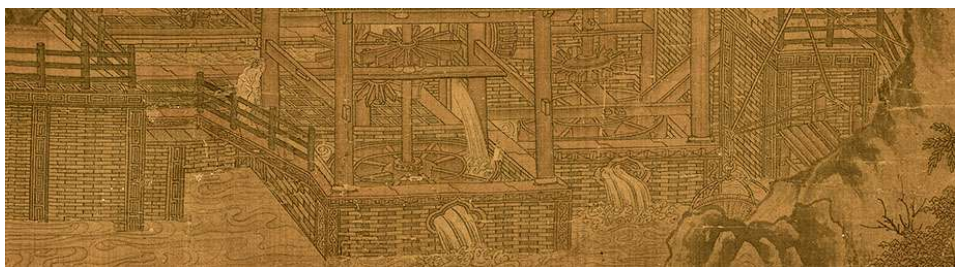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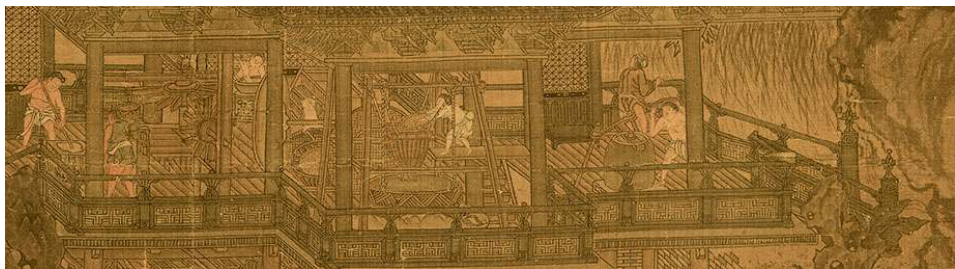


扬米去糠

《耕稼图》手卷，传为宋人楼璘绘，共45幅，设色绢本，506.4厘米×26.7厘米。该手卷前段已残缺，目前仅剩九幅，每幅画卷都配有一首楼璘的五言八句诗。据说楼璘在於潜（今浙江杭州市）任县令时，看到农人、蚕妇着实辛苦，遂绘此卷以记之。文中展示的是《耕稼图》之一的《舂碓》。我们从画中看到，一位长者正用木锨往碓中添加谷物；数位男性左右推动碓，正为谷物脱壳；画中的三个拐角处，分别另有三位男性在用簸箕扬米去糠。画卷左侧的《舂碓》诗云：“娟娟月过墙，簌簌风吹叶。田家当此时，村舂响相答。行闻炊玉香，会见流匙滑。更须水转轮，地碓劳蹴蹋。”通过此段画卷，我们不仅看到了凝聚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生产工具碓，也从侧面解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情况。



图十二：元 佚名《山溪水磨图》（局部）



《山溪水磨图》轴，元代佚名绘。绢本设色，界画。152.3厘米×96.3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扬之水先生在《楮柿楼集·物中看画》中提到，以盘车水磨为题材的画作，出现在约唐五代时期，最著名的有三幅，而这幅《山溪水磨图》为元人所绘。我们看到，在层峦叠嶂的山涧里，一座规模庞大的磨坊坐落其中。涧泉自远山后奔腾而出，注入了水磨作坊里的闸口中。水磨坊有上下两层，楼上是用以加工谷物的碾、磨等工具，楼下则是在激荡的水力作用下的车间。画中建筑整体以界画勾勒，磨坊顶部设两个“老虎窗”，加之飞檐翘角的歇山顶风格，整个画面规整不失灵动，雄浑不乏细腻。湍流的俯冲，盘车的转动，人物劳作与交谈的动态，与威严的群山、观水的僧侣，构成了一幅动静交错的画面，而曾经出现于历史上的这座大磨坊的整个生产过程也跃然眼前。

面食自西汉传入中国，至唐宋时期完成了主食革命，“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的习惯就此形成，一直延续至今。而这场主食革命的开端就是“饼”的出现。宋人黄朝英曾说：“余谓凡以面为餐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淪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宜矣。”^[7]“饼”这个名词需要解释，说明它已经退出了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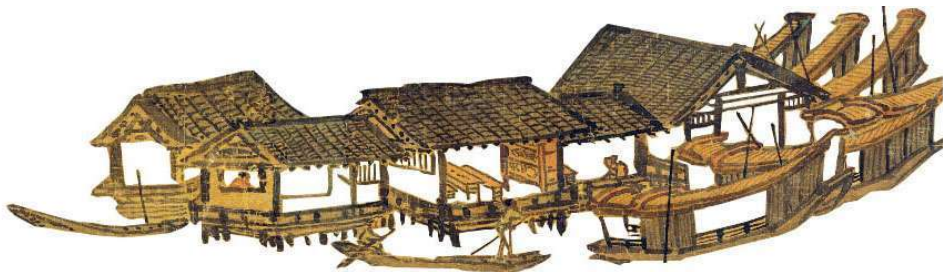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阳谷县卖炊饼，与此同时，他在东京开封府的同行“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则把饼店做到了“五十余炉”的超大规模。每天天不亮，伙计们就起来“擀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8]。武大郎的炊饼和开封城饼店卖的饼，有蒸的，有炸的，有烤的，唯独没有煮的了。

让何晏吃得满头大汗的“煮饼”，此时被称为“面”。汉语中的“面”字在“麦粉”的义项之外，又添了“面条”的义项，这大约始于宋朝。“面”的品种很丰富。北宋开封的小吃店分为三类：分茶店供应冷淘、鼍生软羊面、桐皮面；南食店供应桐皮熟脍面；川饭店供应插肉面、大燠面。食客可以各取所需。南宋临安则出现了专业的面食店，卖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拨肉面、炒鸡面、大燠面、子料浇虾燥面，以及三鲜棋子、虾燥棋子、虾鱼棋子、丝鸡棋子、七宝棋子、抹肉银丝冷淘、笋燥齏淘、丝鸡淘、耍鱼面等。“棋子”指形如棋子的水煮面食。“淘”是过水面，“冷淘”就是凉面。“燥”亦作“臊”，想知道它是什么的朋友，可以到陕西馆子要一碗臊子面。

唐代中央官食堂例供的饮食中，冬季有汤饼，夏季有冷淘，均属季节性加餐，^[9]汤饼还是水煮的。到了宋朝，面（条）登场，汤饼淡出，饼也就不再煮了。山西的煮饼可以说是饼界的活化石。但是，此煮饼非彼煮饼，山西的煮饼不是水煮饼而是油煮饼，叫作“油煮”而不叫“炸”，这可以上溯到《齐民要术》的“以膏油煮之”^[10]。



图十三：南宋 夏圭 《西湖柳艇图》（局部）



西湖边上的食店

《西湖柳艇图》，南宋夏圭绘。绢本设色，107.2厘米×59.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夏圭画作中为数不多的立轴。画作远近分明，层次清晰，远景以淡水墨处理，流云氤氲，意境邈远；近处的元素则颇为丰富，柳堤、田塍、水榭、画舫、湖泊、篷船、船夫、食客等错落相间。我们将画面拉近，便可看到沿岸食店中落座的食客，以及店内陈设的器物与食材。夏圭此画作于南宋“偏安”之时，在宋金两不相侵的状态下，城市里的各行各业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至于画中西湖边上的食店中售出的是丝鸡面、三鲜面，还是鱼桐皮面，就不得而知了。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75页。

[2]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饼第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3页。

[3] 沈元：《〈急就篇〉研究》，载《历史研究》1962年3期，第61—87页。

[4]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八十七《饼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924页。

[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8页。

[6] 西嶋定生著，韩昇译：《碾础寻踪——华北农业两年三作制的产生》（原文见于1966年东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史研究》），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377页。又收入氏著，冯佑哲等译：《中国经济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83页。

[7] [宋]黄朝英撰，吴企明点校：《靖康缃素杂记》卷二《汤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16页。

[8]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四《饼店》，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129页。

[9]参见[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五《光禄寺·太官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6页。黄正建：《唐代的衣食住行》，见李斌城等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0]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51页。

《齐民要术》里的神奇菜谱

《齐民要术》是一本神奇的书。英国汉学家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的扛鼎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是一部面向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工具书，在欧美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曾获“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奖，并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工具书的作用是为研究者提供指南，通常并无趣味，此书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见多识广、好玩爱吃又不乏幽默的汉学家，他躲在满坑满谷、顶天立地的书架后，时不时地探出头来，一脸严肃地说上一段趣事。关于《齐民要术》，魏先生首先引用前人研究指出：

关于北魏时期的饮食，作者提供了许多资料。贾思勰所记录的日常饭食的制备方法，是现存类似记载中最早的，其中的很多可以当作食谱来用。

《齐民要术》共记载了280种食谱，根据贾思勰本人提供的注释，其中有160种来自已经失传的《食经》和《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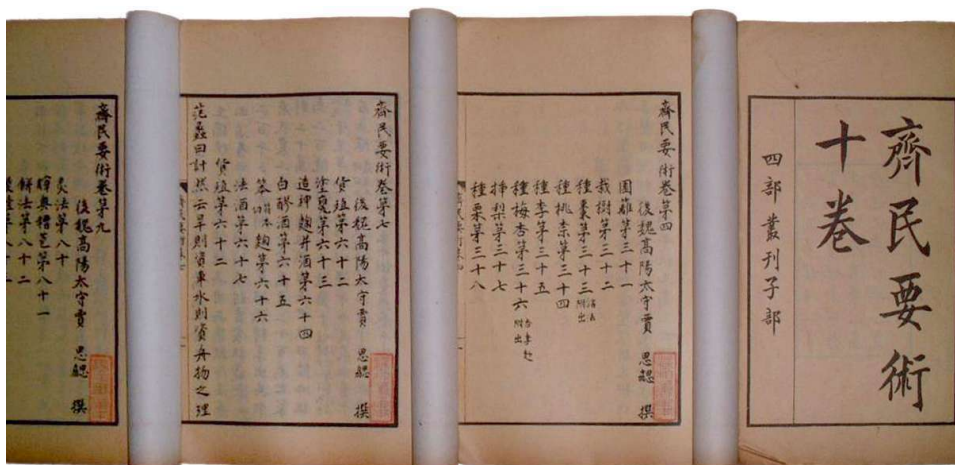
既然是食谱，当然要照做。勇于探索、乐于实践的魏先生写道：

1999—2000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做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实验。我要求我的厨师按照6世纪早期的农书《齐民要术》中的烹饪方法、食材和配方来做菜。食材包括很多种草，比如宽叶香蒲和各种麻，东西并不好找。但是，对于喜欢素食的人来说，还不讨厌。最起码，这些菜的味道都很重，因为它们或者是用了发酵过的肉、鱼和大豆做的羹来调味的，或者是用豆豉烹煮的。我发现，酱油、菜油、花生油、糖、辣椒、西红柿等晚出食材的缺席，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休憩；而熬煮和烘烤则是对今天常常会碰到的单调的油炒的解脱。然而，我的大多数中国客人都觉得他们吃的是外国菜，而不是中国菜。

多么有趣的试验。这段文字中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知识：第一，在《齐民要术》的时代，最主要的烹饪方式是熬煮和烘烤，而不是炒——炒的烹饪技术尚未被发明出来。第二，当时的调味品严重不足。甘蔗榨糖技术要到唐朝才从印度引进，所以北方基本是没有蔗糖的；酱油、菜油的登场大概要等到宋朝；花生油、辣椒、西红柿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得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才能进入中国，那已经到明朝了。贾思勰的调味料除了盐，就是各种各样的酱汁和豆豉。第三，假定魏先生对菜谱的破译准确，他的厨师操作无误，那么，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6世纪的中国味道，已经像是外国的了，换句话说，从6世纪到如今近一千五百年中，“舌尖上的中国”早已面目全非。

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先生研读《齐民要术》的方法非常特别，他和厨师合作，直接动手把安安静静的文字变成了热气腾腾的菜品，然后用舌头和牙齿品尝了“历史”。菜端上桌，吃下肚，就没有了。不能产生论文，写到书里也只能算插曲，不能算正儿八经的论述。这种研读，大约也只有欧盟驻华大使可以做得。

《齐民要术》的内容要远远多于那二百八十个食谱。全书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字，是一部6世纪以前华北庄园农业生产生活指南：“起自耕农”，从平整土地开始讲；先讲田里种的，包括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蔬菜、饲料、林木、染料、漆树；接下来讲家里养的家禽家畜，如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鱼；最后“终于醯醢”，醯是醋，醢是酱，把谷物酿成酒和醋，制作成麦芽糖，把豆子做成酱和豉，把肉类干制，把小麦磨粉制成各种饼；除了食物的制作，还有煮胶、制墨、制笔的方法，“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凡是对生产、生活有帮助的事情，没有不详细说明的。



图十四：《齐民要术》善本书影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由东魏农学家、高阳太守贾思勰著。该书成书于公元535—544年间，共10卷92篇，计11万字。该书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与畜牧业的生产状况。内容所涉，十分广泛，包括谷物、蔬果、树木等作物的栽种之法，禽畜类的豢养之法，酒的酿造、菜的腌制等知识，凡有关农业、牧业、民生的内容，皆有涉及。具体有土地保墒，作物轮栽、播种、施肥、除草、防冻，有对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和家禽的饲养，还有酿酒和制造酱、豉等方法。《齐民要术》记载的农业生产经验沿用至今，为我国农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该书也是古代农业实用科学的代表

作。

贾思勰的目标读者是庄园的经营管理者。一般来说，这种庄园的基本规模是二十口之家，再配备二十个奴婢，良田十顷，^[1]可支配土地面积大、人手众多，因而足以维持门类齐全的农业生产，产出庄园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包括粮食、衣物、蔬菜、水果、鸡鸭鱼肉、建筑材料、燃料和照明物资，“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2]

但是，细看贾思勰的写法，他又总是在算经济账，看起来并不像是关门过日子自给自足的模式，倒像是在为市场而生产。比如他写白杨树的种植，耐心细致地讲完了扦插法之后，又说：种白杨，一亩分三垄，一垄种七百二十株，一株两根，因此，一亩就能得到白杨树四千三百二十根。这小小的白杨树苗，三年之后就可以用作蚕槁（卷丝的工具），五年之后就可以用作房屋的椽子，十年就能当栋梁了。先不说别的，咱就说蚕槁，一根五文钱，一亩地一年就能收入两万一千六百文。一年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3]

贾思勰教人种树，像是高超的农艺师；算经济账，又绝对是精明的农场主；他循循善诱，教人靠经营农业发财，利国利民。《齐民要术》的实用性是毫无疑问的。魏根深先生把纸上的食谱读成盘中的菜式，贾思勰若泉下有知，定会引为知音。只可惜，像魏先生这样的读书人，在现代已凤毛麟角，在古代恐怕也难成主流。那么，传统时期的中国人是怎样阅读《齐民要术》的呢？



图十五：南宋 杨威（传）《耕获图》（局部）



耕



XI



春



磨

《耕获图》，绢本设色，25.7厘米×24.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威工田园山水画，据传此纨扇小品山水画为其所绘。我们看到，画面所描绘的是宋代地主庄园里的劳作场景。在坐落于山脚下的农庄里，阡陌纵横，河水潺潺，廊檐下，院落中，田地间，到处是忙于农事的身影。画面最下方的农人正忙着抢收，割毕的谷物被挑至河对岸的场上，部分搭架晾

晒，部分用连枷打场，接着将打下的谷物用簸箕去糠，而后拿去或舂或磨。从收刈到舂磨入仓，整个细节流程在画面中的呈现颇为清晰。画面偏中上方，有人在犁地、薅草；右下方，有人在插秧；河边上还架着一个小型水磨，四人正踩着动力装置，帮岸边的人汲水灌田。借此画面，我们对江南农家日常劳作的情形便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一点，在古代，一本书写出来并不等于就能够被读到。时代越往前，书籍被读到的可能性越小，读者面越窄。宋代以前，书籍的复制方式是抄写，最初主要抄在简牍上；东汉以后，“又造纸以当策”，与简牍并行；公元403年，桓玄代晋，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4]书籍复制的简牍时代结束，进入纸质写本时代。至宋代，又更上层楼，迈入雕版印刷时代。从韦编三绝的简牍时代到纸质写本时代，再到雕版印刷时代，知识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广泛，更多人得以读到更多的书，中国人的知识量与知识面不断拓展。在雕版印刷时代，《齐民要术》的读者范围扩大了。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四川利州路转运使李防请求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两部农书，发放到各地的劝农司，“以勸民务”，这是第一个版本。^[5]几年之后，《齐民要术》的一个精刻本诞生，这个刻本的印数并不大，“非朝廷要人，不可得”。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舒州知州张璠又根据北宋的版本重刻了《齐民要术》，“以广其传”，“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务农重谷之道”^[6]。《齐民要术》的宋朝读者应当包括劝农司的官员们，“朝廷要人”及其友朋，以及“天下之人”。

北宋末年，《齐民要术》曾经在山东地区流行，山东士人果然有施行“《要术》中种植蓄养之法”^[7]的，一时传为美谈。劝农司的官员当然会把《齐民要术》当作农书来读，但他们是国家官员，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宋代土地经营规模没有那么大，时代不同，立场不同，这些官员能够从贾思勰这里汲取的东西不会太多，技术性的东西还可以有，经营方式就没办法照搬了。时代的差异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作者与读者。贾思勰是土地的主人，依靠土地为生。宋代的士大夫是国家的官员，靠做官为生。在贾思勰眼里，土地是生活的来源。在宋朝的士大夫眼里，土地是老百姓的生活来源，而他们是管理老百姓的人。比如，土地上的树，贾思勰讲种树之法，讲怎样赢利。而司马光只是用树来打比方讲道理：“子不见夫树木者乎？树之一年而伐之，则足以给薪苏而已；二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桷；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栋。夫以为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乎？”^[8]桷是方形的椽子，楹是堂屋前的柱子，栋为房屋的脊檩。贾思勰看到的是实打实的树，而司马光透过树木看到的是道理。

还有人引用《齐民要术》来展示自己学问博雅。宋代陈师道有一句诗“丛篁侵道更须东”，同为宋朝人的任渊给这首诗作注说：《齐民要术》曰“竹

性爱西南引，谚云：‘东家种竹，西家治地。’此言更须东，谓自己侵道，不须复东引也”。近人余嘉锡认为，任渊的掉书袋实在“迂曲难通”，陈师道的诗意思十分简单，是说他要去东山拜谒外祖父的墓，“墓在东山，谒墓须向东行”^[9]，更无他意。

贾思勰自谦写作《齐民要术》的初衷是指导家童怎么工作，“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10]。“不尚浮辞”的《齐民要术》，在五百年之后的宋朝已经成为典故的来源；宋朝至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语言变迁，《齐民要术》已经变得非常难懂了。

在现代，《齐民要术》首先属于学术界，只有专家学者才读它。读《齐民要术》的学者一部分是语言学家，一部分是农业史专家、饮食史专家，一部分是普通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把《齐民要术》当语料库看，因为它的语言相当接近当时的口语，使用了一批新兴的常用词，还有大量的新词和新义，既可补现有辞书之不足，也反映出此期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齐民要术》的语言学研究题目有“连词研究”“否定副词研究”“新生复合词中的同义词研究”“使令兼语结构分析”等。农业史家用《齐民要术》来研究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比如种桑的密度。普通历史学家研究贾思勰的生平、《齐民要术》的成书年代、版本流传情况。关于《齐民要术》的成书年代，没有直接记载，前辈学者根据贾思勰所作的《齐民要术》注中的点滴资料，一点一点比定，判断《齐民要术》成书时间在公元535—544年，而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北魏，而是东魏，所以要硬抠的话，“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图十六：清 焦秉贞 《耕织图》之采桑





《耕织图》，清代焦秉贞绘。焦秉贞师从汤若望，是第一位融合西方画风

的清代画家。该组画由23幅耕图与23幅织图构成。其中诗由康熙题作，画由焦秉贞绘就，与《诗经·周颂》的完成模式如出一辙。据说康熙南巡时，见耕农、织女之辛苦，遂命焦秉贞绘《耕织图》。此画以南宋楼璹的《耕嫁图》为创作原型，描绘了耕种、织布、采桑等农业生产过程。在以农立国的社会，统治阶级颇为重视农业生产，故《耕织图》也成为历代帝王看重的绘画题材。本段呈现的是“织”幅中的采桑场景，左侧诗云：“桑田雨足叶蕃滋，恰是春蚕大起时。负笥携筐纷笑语，戴簪飞上最高枝。”画中，有人正用前襟接桑叶；有人正攀缘而上采桑叶；有人斜倚挑担上，优游地等桑叶入筐，以便担走；还有人在桑树下摸鱼发呆。焦秉贞以透视法让画作显得饱满立体，鲜活细腻，农耕时代朴素的美感扑面而来。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贾思勰祖籍武威，九世祖避祸来齐，故里在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县治约在今寿光城南十里）。这就引出了《齐民要术》的另外一个密集读者与作者群。根据粗略观察，21世纪的《齐民要术》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山东特质”和“寿光主导性”，比如山东农业大学的硕士论文有《浅谈〈齐民要术〉与现代寿光蔬菜种植》。到2018年，寿光“齐民要术研究会”主持的中华农圣文化国际研讨会已经开到了第九届，其出版的《中华农圣贾思勰与〈齐民要术〉研究丛书》共计二十册五百余万字，蔚为大观。其中，《齐民要术与蔬菜产业发展》一书的两位作者令人瞩目：一位是“中国大棚蔬菜之父”王乐义，一位是寿光农业局管理专家信俊仁。这套丛书的书评写得很有意思：

（“丛书”）一改以往农史研究非高校即科研机构的局限。研究者更接近生活，其成果也就更接近现实需要；研究视域更加开阔，其成果内涵也就更加丰富实用……从著作内容情况看，其研究深度或有浅显之处，行文逻辑抑或有值得推敲之处，但……作者群体扎根于生活和科研一线的实际，让“丛书”少了些学院派阳春白雪的“闺”气，多了些现实派下里巴人的“土”气，这对农史研究来说，不是坏事，恰恰是值得肯定的好事。

大棚蔬菜之父来研究《齐民要术》，当然是好事。实践性本来就是《齐民要术》的灵魂。只是已过去近一千五百年，世易时移，当年童仆能读懂的文字已经变得专家都不容易读懂了，所以，还得从那些看上去离得最远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入手，才能真正读懂贾思勰。当然，若论精神，贾思勰与寿光今天的农业经营者是息息相通的。

一部《齐民要术》，竟有如此多的读法。但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能加入魏根深先生的课题组，用舌头来品尝历史。

[1] [北齐]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五《止足第十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345页。

[2] [北齐]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页。

[3] [北宋]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8—429页。

[4] [唐] 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纸第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7页。

[5] 参见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第2191页。

[6] [宋] 葛祐之：《齐民要术后序》，见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4页。

[7] [宋] 葛祐之：《齐民要术后序》，见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4页。

[8] [宋] 司马光：《释迂》，见《全宋文》卷一二二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册，第199页。

[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二《集部三·别集类七·后山诗注十二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77页。

[10] [北魏]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

脍炙的退撤

“吃肉”是一个重要问题。《曹刿论战》中讲到，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战前，鲁国平民曹刿请求面见庄公讨论战局。曹刿的乡邻嫌他多事，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是肉食者才应该讨论的事情，你又如何必插一杠子？曹刿回答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见识浅薄，没有远虑。

“肉食者”意指“吃肉的人，当权者”。这个注释来自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注》：“肉食，在位者也。”为什么肉食者就是在位者呢？唐代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在《孟子》所描述的王道世界中，庶人生活的理想状态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由此可以推知，七十岁以下的“贱人不得食肉”，所以说肉食者即在位者。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提到“子雅、子尾之食”时说：“公膳日双鸡。”《左传·昭公四年》说“颁冰之法”时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由此可见，“则大夫以上，乃得食肉也”。

“肉食者鄙”是曹刿的主观判断；按制度，春秋时期贵为大夫，方可食肉。秦汉以后的官僚同样也是“肉食者”。初唐王梵志诗云：“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得禄四季领，家口寻常饱。职田佃人送，牛马足□草。”^[1]此诗大俗写实，当官的确有饭吃。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人称“阮步兵”，因为他做过步兵校尉。这步兵校尉是阮籍主动求来的，“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2]。唐代官员的工作餐，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和监察御史，每天的定量是三头羊，到了大朝会的日子，人多，再加一只；冬天加热汤饼和黍臠（黍米肉粥），夏天加冷淘、粉粥，每遇节令还有特殊的加餐，比如端午节的粽子、寒食节加了麦芽糖的饧粥。所有官员中吃得最好的，当然是宰相府。唐朝宰相府人称“政事堂”，宰相的小厨房称为“堂食”或“堂饌”。唐代宗时，宰相常袞认为堂饌过于丰盛，想要稍加减损，遭到了同列的一致反对。当时政坛所认同的观念是“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3]。当多大的官、负多大的责任，就吃多高级的饭，若无才干，就应当辞职，而不应该辞去俸禄。窃以为，以此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比一味强调私德、忽略治理能力要强得多。当然，我们做此评论是有前提的，传统中国是等级社会，没有平等观念，而丰盛的堂饌属于制度规定，光明正大，无可厚非。

那么，古人所吃的究竟是什么肉？牛肉虽美，但绝对不是评书说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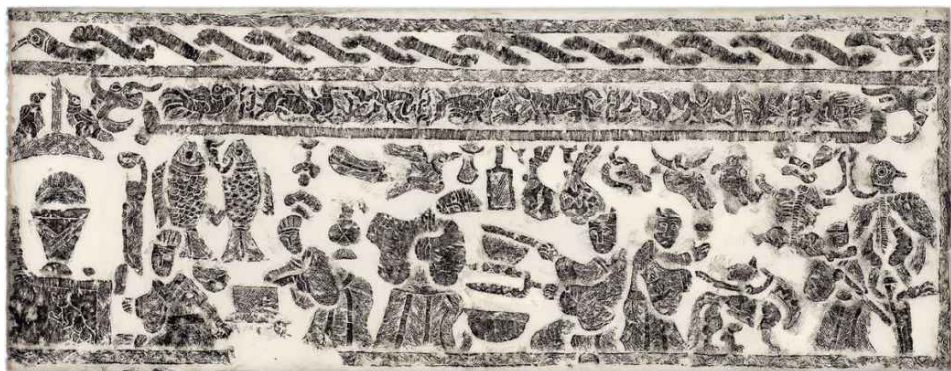
随便就能让小二“切二斤牛肉来”。牛和马一样，是主要的动力来源，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牛）、少牢（羊）是尊贵的祭品，非寻常肉食，“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秦汉以降，历代均有屠牛之禁。“牛者，所以植谷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之者诛，故曰必亡之数。”^[4]

秦汉时期的肉食种类，主要是猪、狗、羊、鸡和各种野味。猪和狗是最常见的肉源，各地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只要出现庖厨图，宰猪和屠狗都是最常见的”^[5]。从北朝开始，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原的肉食习惯发生了重大转变——羊肉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6]根据《唐六典》，亲王以下所赐食料“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岁末，“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这“三千口”是一次性下发给官员的过节羊。此外，“供御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百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7]。这个数字让后唐明宗惊骇。宋神宗时，御厨一年的肉食消耗量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8]。肉食者胃口惊人。

相较于羊肉，猪肉长期被认为是一种不太美味或者不太健康的肉类。宋朝的御厨原则上“不登彘肉”，实际上还是有的，只是不多。传统医书，从南朝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到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猪肉的评价一直相当负面，比如说它“味苦，无毒，主闭血脉，弱筋骨，虚肥人，不可久食；动风、金疮者尤甚”。上层对猪肉的喜爱应当来自金朝和清朝，是东北习俗。清朝杨双山的《豳风广义》就认为北方的猪肉比南方的好：南方的猪肉仍然是“弱筋骨，虚人肌，不可久食”的；北方的猪肉则“味甘，性平，无毒，大能补肾气虚损，壮筋骨，健气血”，但吃无妨。

老百姓难得有肉吃，自然不会挑剔，日常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主要是小鱼、小虾和鸡蛋，20世纪70年代的唐山农村仍然如此。用“斗酒只鸡”来餽祀亡人，^[9]物虽微而足成敬意。“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被认为是安居乐业的标配。^[10]“丰年留客足鸡豚”是民间的盛宴。上层不爱的猪肉，却是民间难得的美食：“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遇到见多识广、爱吃能煮的苏子瞻，就创造出了流传千古的“东坡肉”，想起来便觉齿颊生香。《东京梦华录》描写北宋末年开封赶猪进城场面，煞是可观：“民间所宰猪，须从此^[11]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第二天一亮，这些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猪就成了案子上的肉，“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

刀之类”。镇关西的同行们就在这里熟练地操刀卖肉。



图十七：汉画像石 《庖厨图》

汉画像石《庖厨图》，画面尺寸为121.5厘米×44.5厘米，现藏临沂市博物馆。从拓片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方形灶台，上置一烹煮器具，有一妇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在其右后方，悬挂着两尾大鱼；再后面是一躬身沽酒的妇人，妇人身后有一男子一边举着酒壶等待盛酒，一边歪着头瞅着一旁的烤串儿；画面中间正是跪坐着烤肉串儿的男子，只见他左手举肉串儿，右手持一把扇子扇火，此刻的厨房里或已弥漫着烤肉的香味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厨房右侧的墙壁上，悬挂着羊腿、羊头、牛头、猪头、猪腿及飞禽等各类肉食。通过此画像石，我们对古代的食肉情况便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图十八：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图出自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太显眼的一角。我们看到，画面中有一群猪从树荫下晃悠悠走了出来。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了北宋末年赶猪进开封城的场面，煞是可观：“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赶猪人从南熏门将次日待宰的数十万头猪赶入开封城，次日天一亮，这些活蹦乱跳的猪就成了砧板上的肉：“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上层不爱的猪肉，却是民间难得的美味：“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而猪肉遇上爱吃能煮的苏子瞻，就有了千古美味“东坡肉”，想来也觉齿颊生香。



图十九：宋 佚名《雪渔图》（局部）

《雪渔图》，宋代佚名绘，绢本设色。《雪渔图》全卷呈现的场景，既有撑竿捕鱼的人，又有下罾捞鱼的人，还有岸边骑驴的旅人。本书将生动的捞鱼画面放大呈现：冬雪初霁，溪江岸边有数人下罾捞鱼，他们弓身压着方渔网的支架，静静地等鱼儿入网，旁有一扛竿敞衫者，似乎待会儿要下水去捞浮着的鱼篓。画作笔触精妙细腻，构图疏朗简约，似也稍稍淡化了雪霁后的冬日寒意。

肉的吃法，在炒法发明推广以前，主要是炖煮和烧烤两种。后来演变为礼器，成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鼎，本来是煮肉器。《左传》载，鲁宣公四年（前605年），郑灵公得到了一只鼋（大甲鱼），煮了大宴群臣，邀请了公子宋，却故意不给他吃，公子宋“染指于鼎，尝之而出”，以示愤怒，最终谋害了郑灵公——这大概是史上最贵的一鼎甲鱼汤。今日俗称的“烧烤”在古代叫作“炙”，是另外一种古老的肉食烹饪技法。孔子的学生曾子食脰亦食炙。《齐民要术》卷九记载了二十二种炙法，烧烤的对象包括肉类、灌肠、动物内脏和各种水产，丰富之程度可与北京簋街的烧烤相媲

美。《齐民要术》炙法之讲究，绝对值得学习借鉴。比如“捧炙”（捧亦作俸），大牛用臂（里脊肉），牛犊可以用腿肉；烤的时候“逼火偏炙一面，色白便割，割遍又炙一面”，刚一变色就切下来，以确保肉质“含浆滑美”。贾思勰还提醒操作者“若四面俱熟然后割，则涩恶不中食也”。魏晋时期的烧烤，南北通吃。《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自幼“讷于言”，语言发育略为迟缓，“人未之奇”。十三岁时他去拜谒周顗，周顗“察而异之”，觉得这位王公子不一般。当时最流行“牛心炙”（烤牛心），周顗烤好，先割下来给王羲之吃，于是王羲之“始知名”。士族高门亲自操刀烤肉，以啖宾朋，场面颇具社交意味。



图二〇：《烧烤》 嘉峪关壁画墓 魏晋

这是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一幅烧烤图。嘉峪关位于长城最西端，被称为“河西咽喉”“边陲锁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据点。此壁画所描绘的燔炙（烤肉串），本为胡人饮食，此时已是河西豪族宴饮时必不可少的佳肴。士族高门亲自操刀烤肉，以啖宾朋，场面颇具社交意味。《晋书·五行志》对北方饮食有如下记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画中三叉戟外形的肉串颇具特色，左边食客蓄着的小八字胡也颇为亮眼。席地而坐，烤肉谈天，不失为一种轻松的交流方式。

与炙齐名的肉类烹饪技法是脍，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就是切得很细的生肉。《礼记·内则》中所列“八珍”的烹调术中就有生食肉类的捣珍和渍。捣珍的做法，是“取牛羊麋鹿麀五种里脊肉等量，用槌反复捣击，去筋，调成肉酱”。渍是取生牛肉横断薄切，浸湛美酒，一日一夜，取出

与梅子酱同食。^[12]脍最常见的食材是淡水鱼类。《诗经·小雅·六月》有“饮御诸友，炰膾脍鲤”。杜甫《丽人行》“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所描述的也是斫脍场面。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写了一个小故事：和州（今安徽）有刘姓前任官员，饭量奇大，“尤能食脍”，常说自己食脍从来没吃饱过，于是就有好事者打了一百多斤的鱼，纠集了一帮人来看着他吃，结果就吃出个“大如黑豆”的“骨珠子”，见风就长，“顷刻长及人”，抓住老刘就打。老刘被打得头破血流，“自是恶脍”。这“骨珠子”大约是用来寻仇的鱼类之精。

在唐代，脍虽仍然南北通有，却已经开始了由北向南的退撤。研究认为，“大致上最迟从9世纪初以来，生活在北土的一般平民当已几乎没有人吃鱼脍了”，“吃生鱼的地域主要是在淮河之南的南土，其中江南吴越一带尤为著名”。^[13]脍因此成为南方人的家乡菜，食脍成了他们在北方长期生活时慰藉乡愁的良方。北宋中期，“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脍者，以为珍味”。安徽宣城人梅尧臣家里有个老婢“独能为之”，于是，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临江人刘敞、刘攽兄弟“每思食脍”，便会提着鱼去拜访梅尧臣。^[14]而每当梅尧臣得到了适合斫脍的食材，也一定会催促各位赶紧前来。“主人爱客不计钱，少妇缕脍情可怜。蜀姜吴橘正相益，炊菰絮羹还慊然。”^[15]啖美味访挚友，相谈甚欢，令人向往。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外放河北，有人大老远地送了梅尧臣十六尾鲫鱼，梅尧臣想到当年与欧阳修同食鲫鱼脍的情景，黯然伤神，为诗曰：“昔尝得圆鲫，留待故人食。今君远赠之，故人大河北。欲脍无庖人，欲寄无鸟翼。放之已不活，烹煮费薪棘。”^[16]“欲脍无庖人”，看来那个善于斫脍的老婢已经不在，而梅家也没有培养出新的斫脍人。“烹煮费薪棘”，梅尧臣心疼柴火也是对的。在北宋，开封周边的燃料供应已经比较紧张，所以开始流行炒。人们放弃炙的原因除了燃料紧张以外，可能还有士大夫行为方式的变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文雅，再自己动手烤肉，恐怕会有“焚琴煮鹤”之憾了。鱼生的退撤，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从汉代张仲景起，历代医书都在不断地提醒人们生食的坏处，比如“食脍、饮奶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17]，瘕就是寄生虫。

在北宋还吃鱼脍的江西人和安徽人，到了明清也放弃了这种口味，鱼脍继续向南退撤，一直退到广东、云南等边远地区。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所作的《广东新语》就提到当地风俗，冬至要“食脍为家宴团冬”，又说“鱼生以鲙鱼为美，他鱼次之。予家在沙亭乡，池沼颇多，亲戚相过，必以斫脍为欢，以多食脍为韵事”。

我很晚才知道鱼可以生吃，而且还很好吃。我以为鱼生是日本食俗，没想到中国古人也吃，而且吃了很多年；而烧烤也绝对不是西北特产或者韩国食俗。曾经脍炙人口的两种烹饪方式，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淡出华夏食俗；

又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异域食俗再次丰富了华夏饮食。作为首都的北京，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而且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风味，尽管很多时候未必那么地道，但是足够多元。饮食的多元不仅是口味的宽容，也是见识的广大和胸襟的开放。

[1] [唐]王梵志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0—1361页。

[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87页。

[4]这是东汉高诱的注。[汉]刘安编，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一六《说山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1页。

[5]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等著：《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6]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7]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4页。

[8]朱瑞熙、张邦炜等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9]这是曹操与桥玄的约定，典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7页。

[10]参见[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五五《罗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9—1370页。

[11]指南熏门。

[12]许倬云：《西周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42—243页。

[13]萧璠：《中国古代的生食肉类肴馔——脍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2分（2000年6月），第247—365页。

[14] [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四，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涵芬楼旧

版，第8页。

[15] [宋]刘攽：《和梅圣俞食鲙歌》，见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页。

[16]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一一《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欧阳永叔》，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四库全书》荟要本，2005年，第373—90页。

[17] [东汉]张仲景著，[清]高学山注，贾成祥等校注：《高注金匱要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

吃饭的故事

2018年底，网上流行过一个名为“看看老外是怎么吃中餐的”有趣视频。画面中六个老外围坐在大圆桌旁，一人面前放一盘菜，各吃各的，有两个干锅、两个砂锅、一个清蒸鱼，还有一位女士面前是空的，应该是在等菜。桌子中间的转盘上有两盘菜，目测其中一盘大概是杂粮馒头就小炒黄牛肉，还有一盘是炆炒圆白菜，这两个菜都已经动过，可能属于共享部分。从画面呈现的周围环境可以断定，这顿饭食的地点是国内的某个餐馆。从画面中几位老外使用筷子的熟练程度来看，他们应该都是吃中餐的行家。但是，他们采用的进餐方式却是绝对西式的，前菜（圆白菜和杂粮馒头）一人分了一点儿，而主菜则是一人一道，各吃各的。这种充满着个人主义色彩的分餐制，显然不是中国式吃饭的正常方式。我们的是合食制，所有菜品，不管是谁点的，都应当摆在圆桌中间那个玻璃转盘上，哪个菜转到谁面前，谁就用公筷夹一点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爱吃的可以不夹，但是再爱吃的也不能独占，一顿饭吃下来，只要你不挑食，所有的菜都吃到了。

这就是合食制，合食制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共享。这种共享，在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是平等而友爱的，我们会彼此谦让，希望对方吃到自己认为好吃的那道菜，当然也会尊重对方的品味，无论如何也要尝一尝对方极力赞美的菜品。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合食制共享而不平等，餐桌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秩序的微型展示场。据说会看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桌上谁是买单的，谁是最尊贵的客人，谁是陪吃的——当然，能够看出来的前提，是这桌人得是“会坐的”。某老师刚从外单位调到北大历史系，私底下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北大的人不会坐，坐得都不对。”我这才知道，原来餐桌座次是有所谓对错的，而北大历史系在这方面一贯懵懂。我们敬爱师长，却没有把这种尊重上升为等级关系，进而物化到现实座次当中；而我们的师长也糊里糊涂地快乐着，平等杂坐于众人之中，言笑晏晏，不觉有他。

现代人常常以为，合食制与分食制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甚至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分别。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卫生部官员、传染病专家和烹饪专家合力抨击合食制是陈规陋俗，“津液交流”一词即出自语言学家王力的散文《劝菜》，文中说道，这“是一种不良的吃饭习惯，必须加以改革”。2003年非典时期也出现过短时间的“合食恐慌”。但是，抨击也好，恐慌也罢，都没能动摇合食制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加上一双公筷，卫生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最主流的吃饭方法还是同桌共享；不然，那六个老外也不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围观。然而，我们认真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传统中国也曾实行过分食制。在华夏饮食发展史的时间序列上，分食制在前，合食制在后。



图二一：北宋 赵佶 《文会图》（局部）

《文会图》，北宋宋徽宗赵佶绘。绢本设色，立轴，184.4厘米×123.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谈到合食与分餐，我们可从《文会图》中看到一些表现。古代食制与环境有一定关系，在高足坐具出现前，古人多席地而坐，这种坐姿导致大家之间的距离相对远一点儿，且不容易站起来，所以，进食时就采用较为便利的分餐制，一人一份，各食各的。但当高足桌椅出现后，大家围桌而食，且椅子可靠得更近，那么，合食制就应景而生。当然，食制的变化与物质资料的丰匮也有一定关系。当食材相对紧张时，分餐制可保证每人都能吃到差不多的食物，但当食物丰富时，不受限制享用的合食制便应运而生。画中，徽宗与九位文臣围坐在摆满杯盘碗盏的方桌边，或私语，或畅聊，或倾听，或换盏，意兴盎然，颇为惬意。



古琴与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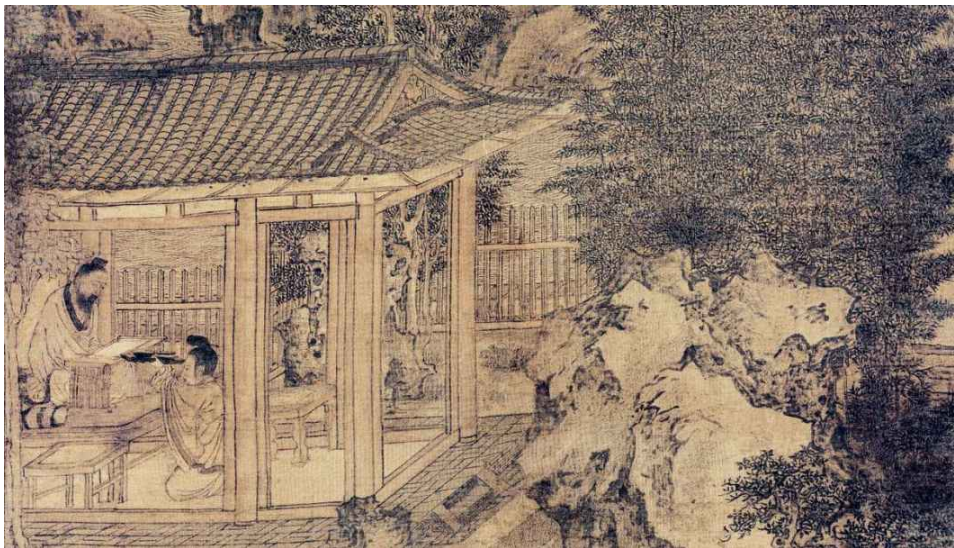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门下养了许多食客，“孟尝君舍业厚遇之……食客数千人”，不分贵贱，吃的都跟孟尝君本人一样。有一天晚上吃饭，由于照明条件不好，一位食客发现自己的饭不如别人的，以为受到轻视，大怒，丢下饭碗就要告辞。孟尝君赶忙站起来，“自持其饭比之”。现场比对的结果证明，这两份饭是一模一样的。“客惭，自刭。”为了一顿饭竟然自杀了。当然，我们能理解客人的惭愧不是因为饭食本身，而是因为自己心胸狭窄、自信不固，对孟尝君信任不坚，辜负了主人的好意。这样血气方刚、重义轻生的中国人，大概也只存在于战国和后战国时代了吧。那才是真的不谙世故，一派天真，把原则看得比性命重要，容不得任何道德瑕疵。由此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分食制就已经存在了。

可以肯定地说，春秋战国以至于唐，中国人吃饭的方式都是分食制。成语“举案齐眉”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一位很有德行的贤士，他娶妻以德，娶了贤而丑的女子孟光。梁鸿带着孟光从陕西老家跑到南方，穷得借住在别人家廊庑底下，靠出卖力气替人舂米为生。然而，在这样的穷困潦倒之中，孟光每次给梁鸿端饭，都“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主人于是觉得，这个男人能够被老婆这样尊敬，一定很了不起，绝非凡人。“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案和盘都是用来盛放食物的，案就是有腿儿的盘子。孟光齐眉捧的案上面放着的，就是梁鸿一顿吃的饭，这是分食制的明证。

分食制与当时的家居形制相匹配。分食制时代，人们的饮食起居都是在地板上，进门需要脱鞋。《庄子·列御寇》说，伯昏瞀人来拜访列御寇，发现列家“户外之屦满矣”。唐成玄英疏云：“适见脱屣户外，跣足升堂，请益者

多矣。”汉末乱世之中，两个年轻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达官贵人经过，车马喧哗。管宁“读书如故”，华歆扔下书跑出去看热闹，满脸羡慕。管宁把席子一割两半，对华歆说：“子非吾友也。”割席断交，这是在跪坐时代才能发生的故事。皇帝赐给大臣的特殊恩典之中，有一项很特别的“剑履上殿”，允许大臣佩剑、穿鞋上殿，这也是要放到跪坐时代才好理解的情形。席地而跪坐，臀部坐在脚底上，这是当时的正常坐法；臀部离开脚底、上身直立起来，叫作“长坐”；箕踞（叉开腿坐）被认为是很粗鲁的行为，当然，像佛那样结珈趺坐（盘腿坐）应该是端庄的。吃饭、读书、写字依靠的是较矮的案或者几，不讲究的人可以“据案大嚼”。

将目前已有的文字、图像和考古实物资料综合起来看，中国家居制度的演变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宋朝才进入高桌大椅时代。最初的新式坐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自西方传入，因此被称为“胡床”。胡床的支撑结构和使用方法都类似于今天的马扎，“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1]，所以隋朝以后改称“交床”。交床高，可以“着靴垂脚坐”^[2]，不用脱鞋了。这种由新坐具带来的新坐姿被称为“胡坐”，它让人的身体姿态更为舒展。“胡床”“胡坐”从进入中国到发展成为完整的家居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代墓室壁画当中的坐具已经有一定的高度，可以垂足而坐了，但还不够高，而且相对宽大，可以供几人盘腿而共坐，有模仿席子的感觉，足见旧起居制度影响之顽固。可以确认为南唐作品的《重屏会棋图》，坐具的腿已经足够高，人的坐姿基本上像现代人，但是《重屏会棋图》里的坐具没有靠背，坐久了肯定相当辛苦。



图二二：五代 卫贤《高士图》

《高士图》，五代卫贤绘。绢本，淡设色，立轴，134.5厘米×52.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的是东汉隐士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后汉书·梁鸿传》载：“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梁鸿受雇为人舂米，每次回来，孟光就将为他备好的饭食端来，并将托盘举到齐眉位置，以示对丈夫的敬重。画面中，梁鸿盘腿坐在高足大床上，孟光跪于床前，恭敬地奉上饭食。孟光齐眉捧着的案上放的，正是梁鸿一顿吃的饭，这是分食制的明证。



图二三：唐 孙位 《高逸图》之王戎



卷轴



酒器

画中是唐代孙位所绘《高逸图》中“竹林七贤”之王戎，王戎是“七贤”中年龄较小的一位，比山涛小29岁。他是富家子弟，善清谈。画中王戎蹠足趺坐，右手执如意，左腕悠闲地搭于右手上，似正与对面的人侃侃而谈。庾信在《对酒歌》中有“山简接篱倒，王戎如意舞”的描述，正是画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如意这种器物，在古代象征祥瑞，是一种爪杖，通常用骨、玉、木、石、铜、铁等材质制作，长约三尺，前端形似手指。若脊背感到痒痒，而手不能及，便用来抓挠，能如人意，因之得名。这样看来，其实就是现在痒痒挠的原型。在王戎左后侧，是一位怀抱书卷的书童。从王戎的坐姿、身旁的器物，以及周遭的树石，我们可以感受到崇尚清谈与自由的魏晋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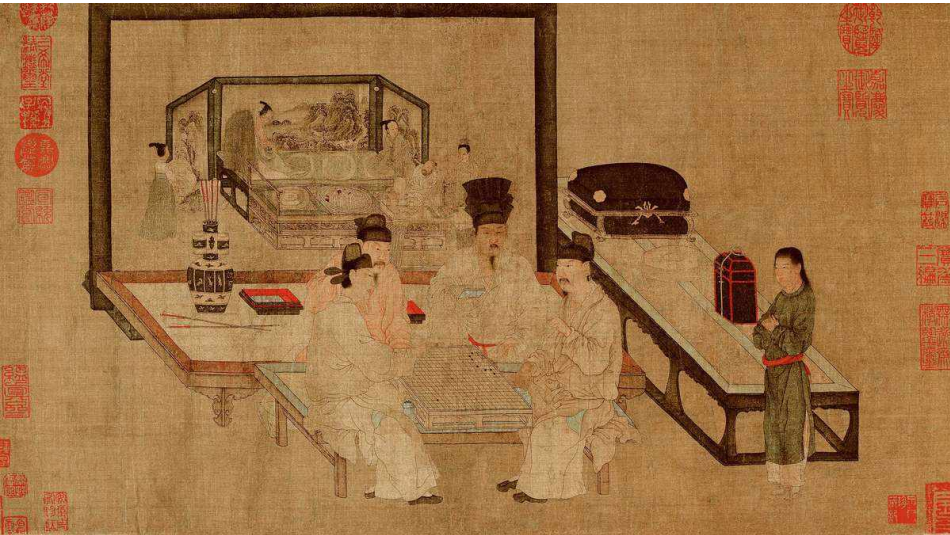
到了北宋，白沙宋墓壁画夫妻对坐的《开芳宴》图上，桌子、椅子就都是高桌大椅版的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人盘腿坐在靠背椅上，这种坐姿显然是席地而坐时代的流风余韵。倘若我们相信《韩熙载夜宴图》作于南宋，那就不得不感叹习俗的顽固了。有趣的是，“剑履上殿”的恩典一直到宋初还有两起，一起是宋太祖给主动投诚的吴越王钱俶，一起是宋真宗给长兄元佐。难道此时的朝堂还需要脱鞋上殿、席地而坐吗？我表示怀疑。这两起“剑履上殿”多半属于文字遗留，已经没有实际内容，只是荣誉而已。

高桌大椅与合食制差不多同时出现，当然，并不是说高桌大椅就一定会导

致合食制。一方面，高桌更大的表面积为食物的陈放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合食制能够出现，还要得益于食物种类的日渐丰富与食物供应量的相对充足。20世纪80年代批评合食制的人，认为分食制更卫生，可是分食制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卫生的需要，而是由于食物供应量有限，倘若不事先分配好，可能会导致有人多吃多占，有人吃不饱。只有食物数量足够多，品类又足够丰富的时候，围桌共享才吃得愉快而热闹。



重屏——白居易“偶眠”情景与山水屏风



图二四：五代南唐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

《重屏会棋图》，五代南唐周文矩绘。绢本设色，70.5厘米×40.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反映宫中生活的写实画作。该画作因其构图特色而在历史上颇为有名，画面分近、中、远三景。近景所绘，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晋王景遂、江王景邕、齐王景达对弈的情景。图中四人围坐于高足坐具上，戴高帽、持盘盒，正面观棋者为李璟，弈者是景达和景邕。中景为一个高胡床，上摆放有投壶等器物。远景是绘有白居易“偶眠”之景的屏风，该屏风里独具匠心地又绘了一扇山水屏风，“重屏”因之得名。此画另一有趣之处是，景深有种透视感，但与通常认为的近大远小恰好相反——远宽近窄。因远处宽点儿，屏风能更大点儿，就可以布局更多内容，小屏风中的细节也能精致入微地呈现。这是中国画透视画法的创见。画中人物“着靴垂脚坐”，起坐方便，也不用脱鞋。但我们看到坐具没有靠背，坐久了或会感到辛苦。



图二五：《开芳宴》河南禹州市白沙镇1号宋墓前室西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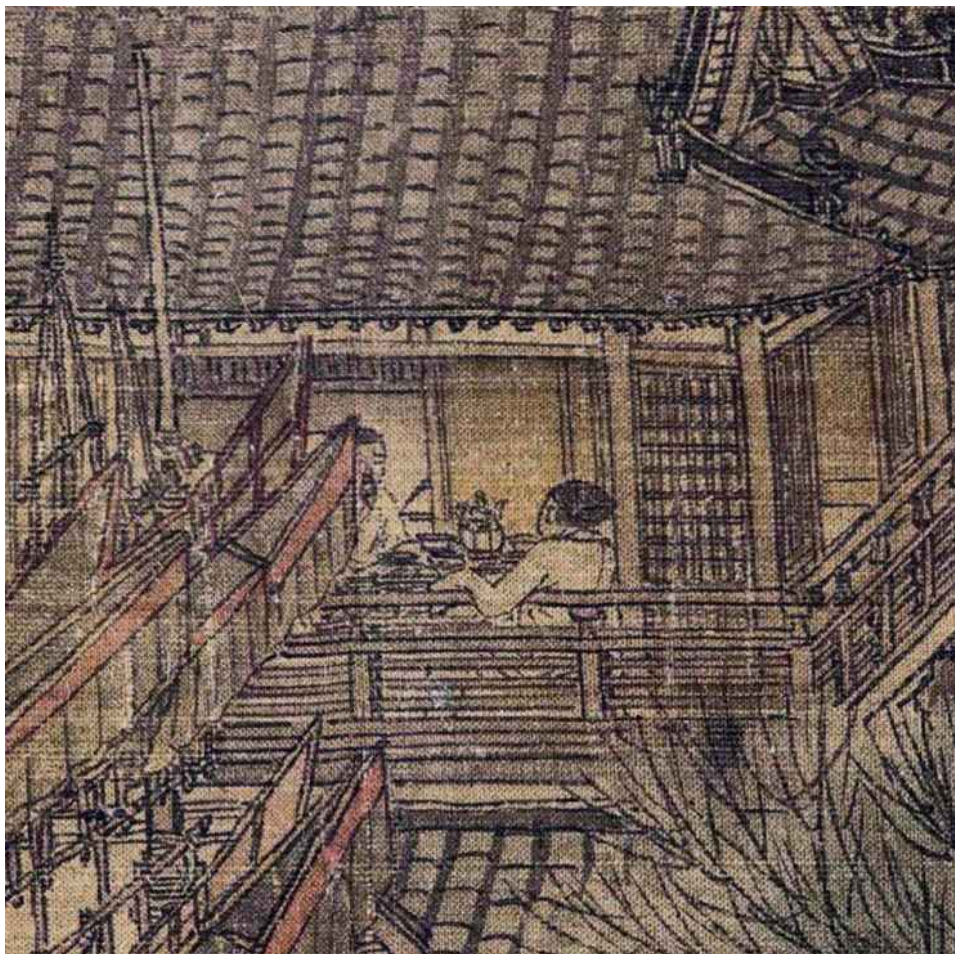
《开芳宴》是一种墓葬中较常见的装饰图，多见于宋辽金元墓葬，其功用主要是传达墓主夫妇间和谐恩爱的关系，借此表现时人理想的家庭模式和道德观念。“开芳宴”是种特定宴席，与之对应的还有“开华宴”，前者由男方主办，后者由女方主办。此图为河南禹县白沙镇1号宋墓前室西壁的墓主夫妇，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对坐于两扇屏风后，画中桌椅皆为高足，且椅子还带有靠背，桌上摆放有酒壶、酒杯，屏风后的随侍者端来了其他食物，或正准备放在桌上。从此画中我们也可看到合食制的一些迹象。

在北宋东京的餐饮业中，合食与分食是同时存在的。正店——大酒楼以喝酒为主，兼卖下酒茶饭，实行合食制。《东京梦华录》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这种杯盘设置，跟今天两人下馆子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器具材质却与今天有着本质的区别——开封的大酒楼用的是银盘银碗，那一套摆下来就是近百两的银子，这阔气劲儿是今天的普通馆子比不了的。当时酒店的下酒茶饭之丰富和服务态度之开放，今天的餐饮业恐怕也难以媲美。按烹制方法，下酒茶饭有羹、汤、签、烤、炙、煎、炒、烧等等，可以明确分辨的食物原料有羊、鸡、鹅、鸭，兔子、鹌鹑、鱼、虾、蛤蜊、蟹，有腰子、肺、肚、肱（牛百叶），还有蘑菇。所有这些下酒茶饭，都能做到“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缺”，客人临时要求改变菜谱，“或别呼索变造”，也能做到“即时供应”。不只如此，宋朝的酒店还允许外来商贩入店兜售各种熟食酒菜、时令鲜蔬、干鲜果品，“又有小儿，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倘若仍不能令食客满意，酒楼还可以“使人外买”下酒菜蔬。当然，北宋的酒店之所以在菜品上如此大方，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们是酒店，拿了政府的配额造酒、卖酒，酒是主业，菜只是下酒之物，跟设法卖酒的望之恍若神仙的浓妆妓女一样，都是酒的推销员。

下正店一等，是专为吃饭而设置的食店，流行的似乎是分食法。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开封食店行菜的小二哥简直就是最强大脑。“客坐，则一人执筋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后厨。须臾，“行菜者左手权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食客点菜，是“人人索唤不同”，而“行菜”端出来的，也须“尽合各人呼索”。这样看来，食店所供应的菜饭似乎是份儿饭，连菜带饭一人一碗，各吃各食。食店的就餐工具，“旧只用匙，今皆用筋矣”，从勺子到筷子的变化发生在北宋晚期。同样还有一个发生在宋朝的变化，是一日三餐制的普及，而从前是两餐制。



图二六：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之正店



这酒真是清冽醇厚

此孙羊正店出自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放大细看，可以看到正店门口有很多卖小食的摊位，这些摊位售出的多为方便带走的速食；若想堂食，便可从正门入店。此正店共两层，进入后，你可以在一楼就座，也可拾级而上，到二楼落座进食。我们透过开着的每扇窗户，可看到店内的正在进食与交谈的食客，以及隐约可见桌上摆放的食器与酒壶，其中或为各色熟食酒菜、时令鲜蔬、干鲜果品等。倘若店内食材不能令你满意，你亦可以让酒楼“使人外买”下酒菜蔬，这或为今日外卖之雏形。大酒楼以喝酒为主，兼卖下酒茶饭，这便是古代合食制的一个生动体现。



图二七：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之食店

下正店一等，专为吃饭而设置的食店，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体现。这些小食店临街开设，密密麻麻地坐落于汴河边上。放大观察，小食店错落相间，鳞次栉比。店前还架有纳凉的凉棚，有的业已残破。店内食客有的在与店家交谈，有的正等着店小二上菜。只见一小二哥端着两碗饭食匆匆向等待的食客走去。或许这位小二哥也有“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迭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的功夫。画面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北宋汴京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沿街一角。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3]孟元老笔下的东京梦华令人神往。故国神游，初夏须上清风楼，尝新酒，配青杏、樱桃，吟诗作歌；天冷可往任店，打两角味道甘滑的羊羔美酒，让人烧起风炉，搞一个扑霞供（火锅涮肉），来一份炒蟹、一份旋切莴苣，切一只入炉羊腿，再请小二哥去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的胡饼店里买三只新样满麻的烧饼来，“且有团圞暖热之乐”^[4]。

[1]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五十八·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胡注引程大昌《演繁露》，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22页。

[2]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62

页。

[3]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梦华录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4] [宋]林洪撰，乌克注释：《山家清供》，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吃茶去

现代世界的饮料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比如白酒、啤酒、葡萄酒、调制酒；二是不含酒精但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主要是咖啡和茶；三是既不含酒精也不含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超市里一大排的各种汁和水。传统中国的饮料基本上也不出酒、茶和汁水这三大类。宋末元初周密写的《武林旧事》，其中有一处令人颇感惊讶——南宋的临安城里竟然存在一个琳琅满目的饮料王国，它的“凉水”（冷饮）就包括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香薷饮和紫苏饮，一共十八种，按照今天的标准，其中一些应该算凉茶了，这是夏天的供应。那款香薷饮解暑汤，《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还在喝。^[1]南宋临安的冬天则供应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和盐豉汤，往孤山上踏雪寻梅之后，热热地来上一盏，身体就由内而外地暖和了。当然，这些品类繁多的冷饮与热饮终不及酒与茶来得重要，它们通常是地方性和季节性的，可以在早市和夜市上摆摊售卖，质朴亲切，却成不得大气候。而酒和茶则完全不同，它们关系国计民生，影响政权之间的关系，而且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酿酒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夏朝。酒最初的用途主要是娱神，用于祭祀；秦汉以后，酒逐渐世俗化、平民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饮料。《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五月，“秦既平韩、赵、魏、燕、楚五国”，统一在望，“天下大酺”。唐代张守节对“大酺”的解释是“天下欢乐，大饮酒也”。在“天下”或者某一区域范围内实行“大酺”，与民同乐，这种做法被后世帝王继承。最喜欢大酺的皇帝，唐代是武则天 and 唐玄宗，宋代有宋真宗。关于“大酺”，我理解为中国式的狂欢节，是中國人在相对严格的等级秩序、行为规范之下舒展身心的难得机会。既然要放松，当然要喝酒。就像宋真宗时的刘筠在《大酺赋》里说的：“有肴如阜，有酒如川。既醉既饱，无党无偏。”酒精的作用就是让人放松，微醺之时，身心舒泰，大醉之后，暂时忘掉已经内化于心的规矩束缚，或者假装如此，说一些平时抹不开面子的掏心掏肺的大实话，做一些正常状态下不敢做的肢体语言，酒醒之后，回归正常。

酒能醉人，靠的是酒精。酒精度的提高靠的是蒸馏技术，蒸馏酒可以达到四十度以上。蒸馏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主流的是元代说，其他的还有宋代说和唐代说。在蒸馏酒出现和普及之前，大多数酒是酿造酒，度数最高不超过二十度，所以，爱酒人士大可不必过分仰慕刘伶、阮籍和李白，他们喝二锅头也喝不了多少。传统的酿造酒度数虽然不高，喝多了也能醉人。《三国志·韦曜传》记载，三国吴的末代皇帝孙皓，特别喜欢灌人喝酒，只要一开宴席就是一整天，在座之人不管酒量大小，

每人七升，“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灌也得给灌下去。等到诸位大臣都喝高了，孙皓就会派自己身边的心腹拿话头儿去挑逗、嘲弄他们，让他们互相揭短，倘若哪一位不小心触犯了孙皓的名讳，就会被捆起来，甚至被杀头。史官韦曜“饮酒不过二升”，酒量浅，起初孙皓对他很客气，允许韦曜少喝或者“密赐茶荈以当酒”。后来，韦曜得罪了孙皓，最终被灌醉，收监下狱杀害。韦曜下狱是在公元273年，六年之后，魏灭吴，孙皓的“霸王宴”终于结束。三国时期的一升大概相当于二百三十毫升，韦曜的酒量两升是四百六十毫升，相当于小玻璃瓶装的燕京纯生一瓶半；孙皓灌酒的量是每人七升，也就是一千六百一十毫升，相当于五瓶多。只能喝两升的人非要照着七升灌，不喝光便是瞧不起寡人，喝光之后把心里话说出来，就犯了寡人的忌讳，足证是真的对寡人不忠——这大概就是孙皓的逻辑。在孙皓的宴席上，七升美酒无异毒药。



图二八：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 《周颂·清庙之什图·思文》



祭奠先祖后稷



祭祀的各种礼器与酒器



祭祀仪仗

《周颂·清庙之什图》由被誉为“小吴生”的南宋宫廷画家马和之绘。绢本，973厘米×32.6厘米，现藏辽宁博物馆。全图绘《清庙之什》共10篇，字画各10段，右书左画，书画相间，其中文字部分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笔书法。画作包括《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等篇。本书呈现的是《思文》篇，反映的是娱神祭祀与颂扬周代先祖功德的场景。右侧书：“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

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古人在祭祀时，多以各种酒食作为祭祀的供奉之物，故以各种酒器、食器盛放上丰富的酒食进行祭祀。通过画面我们看到，那些本来只用以吃饭、饮酒的器物，如鼎、樽、角、爵、豆、卣、盃等也就上升为了礼器，因为它们不仅作为容器存在，更承载着孝敬祖先的一种仪式感。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古往今来，无论抒怀、作别、叙旧、寄情，与酒相关的诗词佳句可谓不胜枚举，可见酒自有它的好与妙处，只是应该“樽前常对知心人，席上不劝霸王酒”。

相较于酒，茶走的是安静高雅的路线。中国人以茶为饮料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西南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地之一。汉代以前，巴、蜀、南中的人已经开始茶的采摘和饮用。西汉蜀郡“资中男子”王褒戏作《僮约》，规定童仆必须承担的工作当中，就有两项与茶有关：一是“武阳买茶”，二是“烹茶尽具”。可见当时茶已经进入当地的一般家庭。

东晋南朝，南方饮茶蔚然成风。南齐武帝临终遗诏，“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禘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饼、茶饮、干饭、酒和脯（肉干）应该是当时南方通行的饮食。与此同时，北方最流行的饮料是奶制品——酪浆。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同年，南朝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的后裔王肃怀抱杀父之仇北奔，王肃与魏孝文帝的相遇，成就了北方的礼乐制度建设。在王肃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南北两种饮食文化的碰撞。王肃北奔时三十一岁，他人到了洛阳，胃口却还是南方的，最常吃的是鲫鱼羹，渴了就喝茶，不吃羊肉，不喝酪浆。《洛阳伽蓝记》载，几年之后，王肃和孝文帝一起吃饭，“食羊肉、酪粥甚多”。孝文帝逗他：“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回答说：“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意思是说，鱼和羊肉南北风味，各有千秋；茶水是不行的，只配为酪浆做奴婢。茶的别名“酪奴”就得之于此。看起来当时北方宫廷的宴会上也有茶，只是喜欢喝的人不多。

茶的北传在隋朝统一之后继续进行，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参禅打坐者需要靠茶长时间保持清醒，饮茶逐渐普及。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了饮茶习俗流行的盛况：“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饮茶从此成为全国性的风俗，并且“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

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茶马贸易成为中原与边地之间一项重要的交流内容。

唐宋两代茶的主流不是我们今天习见的茶叶，而是饼茶，又称“片茶”“团茶”。茶叶成为茶饮的主流要到明朝。

今天也有茶饼，比如普洱茶中的七子饼，是将茶叶紧压而成的，撬一块下来用水泡开仍然是茶叶。而唐宋饼茶是完全看不见茶叶形状的，根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的记载，饼茶的制作方法如下：第一蒸，将采摘下来的茶叶拣选、清洗，“然后入甑，俟汤沸蒸之”；第二榨，将蒸过的茶叶“淋洗数过”，使之冷却，然后尽可能榨出其中的水分及茶膏（即汁液），“必至于干净而后已”；第三磨，把去除了水分和汁液的茶渣放入瓦盆内，加水，用木棒反复研磨；第四添加香料，“荡之欲其匀，揉之欲其膩”；第五定型，最后放入特定的茶范内定型，再置于笪上晾晒，使之干燥，就得到了完美的茶饼。这种饼茶在反复的蒸榨研磨之后，又掺入了香料，以色白为上品，《东坡志林》引司马光的话说“茶欲白，墨欲黑”，茶是白的好，墨是黑的好；这样过度加工的片茶之中，究竟还能保存多少茶之真味，我深表怀疑。



图二九：五代南唐 李昇（款）《货郎图》

《货郎图》，五代南唐，李昇（款）。绢本设色，27厘米×2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所绘为四个货商打扮的人在一处临河树荫下纳凉喝茶的情景。画中共五个货架，架中摆放着瓷器与茶具。画中着褐色衣服的三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似乎在谈论茶汤的味道与色泽；另有一人右手握蒲扇，左手扶货架，正一边烧水一边转头倾听他们的对话。此画右侧偏中下处有“李昇”字样的落款，还有三方模糊不清的印章。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对流行的饮茶习俗这样记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从这幅《货郎图》，我们对封演描述的“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的饮茶之风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唐代流行的饮茶方式，是陆羽《茶经》所提倡的煎茶法，也就是煮茶。先要把饼茶烤干、碾碎、罗细，“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然后以釜煎水，煎水时必须小心观察水的沸腾程度。“其沸如鱼目”，冒出鱼眼大小的水泡时，加入食盐调味；“缘边如涌泉连珠”时，舀出一瓢备用；然后加入茶末，不断搅动，同时将之前舀出的那一瓢水陆续加入，以缓和沸腾，培育“汤花”。最后，将茶釜从火上取下，将茶汤倒入茶盏，这叫“分茶”，分茶的关键在于均分“汤花”。对爱茶的人来说，煎茶的整个过程都是一种身与心的放松与享受。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云，“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醒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煎茶法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程序繁复。饮茶者必须配备茶砧、茶椎、茶铃、茶碾、茶罗等一系列器具，而每次饮茶都必须经历椎、炙、碾、罗等步骤，非富足而闲暇者不能备其事。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了一整套的金制茶具，是唐朝皇帝的供佛之物，备极精致，备极繁复。或是宋朝人也觉得麻烦，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更易操作的点茶法。其做法是将研碎、罗好的茶末直接置于茶盏中，先注入少许沸水调匀，再继续注水，同时“环回击拂汤上”，在茶汤表面形成一定的汤花图案。点茶法追求汤花图案的鲜明特别，因此对茶瓶、茶盏、茶匙都有特别的讲究。茶末的颜色以白为上，因此茶盏的颜色以黑为上，以便突出汤花图案；盏壁要微厚，以便保温。这些都是点茶专家的讲究，宋人有斗茶习俗，比试的便是茶汤表面图案的美。在博物馆看宋代文物，看到颜色绀黑、纹如兔毫的建盏，那就是上品了，它的审美趣味是独特的。



图三〇：南宋 佚名《斗浆图》

《斗浆图》，南宋佚名绘。绢本设色，40.6厘米×33.8厘米，国家一级文物，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图中描述的是南宋街头的小贩们在休息时斗浆的情景。斗浆即为斗茶。画中斗茶者共六人，他们头扎裹巾，一手提注壶，一手端茶盏，正围于一处品茶、交谈、斗茶。宋人有斗茶习俗，比试内容有：谁的茶汤汤色更加鲜亮，谁的茶味更加甘醇清香，谁的茶汤表面图案更美等。从街头斗茶者的着装、身旁的器物，到他们参差的姿态与丰富的表情，南宋时期别具特色的斗茶文化便跃然眼前。

北宋中期，市面上开始流行末茶，也就是将茶饼碾成末再出售。喝茶变得更为简单，只要有茶盏有注壶，把水烧开，就不愁没茶喝。末茶大概相当于速溶咖啡，大大方便了寻常百姓饮茶。

茶叶在宋朝已经出现，但它真正成为茶饮的主流是在明朝。明人许次纾《茶疏》说：“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这是对饼茶的公然否定；又说：“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

香色俱全，尤蕴真味。”“近时制法”就是流传至今的炒茶法了。茶的形态改变了，饮茶器具的美学追求也发生了改变。宋代茶盏以黑为上，明代茶盏“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宋代茶道中那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在日本茶道中还有余韵，中土茶道反而走了另一条路。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创新的勇敢，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抛弃过去的决绝。

仔细想来，令人唏嘘。这两千年来，唯一不变的，其唯饮酒乎？



宋 马远 《月下把杯图》

[1]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页。

衣 服饰往事



丝麻棉演义：从“小貂”说起

“小貂”是东北地方对貂皮大衣的爱称。2013年，我去美国开会，在飞机上聆听了邻座大姐与小貂的半生纠缠。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貂流行，但大姐的钱都拿来供儿子上学了，并未舍得为自己添置一件貂皮大衣。儿子毕业留美工作，钱不再是问题，但大姐还是没买小貂，可心里却放不下，她说：“在我们东北，人家都说只有两种女的，穿得起小貂的和穿不起小貂的。唉！”

这一声叹息，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寒冷，貂皮保暖性强，小貂是理想的御寒衣物，但也并非无可替代。大姐对小貂念念不忘，是因为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小貂象征着一个女人的体面，是女性展示其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符号——小貂越是昂贵，穿貂的女人就越是尊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母亲对小貂的主动舍弃，就成了非常有分量的牺牲。

告别大姐之后，我曾尝试“狗尾续貂”，给“小貂”故事设想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儿子购买小貂作为礼物送给母亲，那么故事就会获得一个俗套而温暖的结局。可是儿子会这么做吗？不容易。这不是钱或爱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儿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小貂的意义与母亲记忆中的小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动物权益的伸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的价值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美无须建立在杀戮之上”，古驰、阿玛尼、范思哲、香奈儿……越来越多的顶尖大牌放弃使用皮草，小貂逐渐退出时尚前沿，沦为野蛮、残忍、落后的标志。因此，“小貂”故事最可能的结局恐怕是：母亲接受新观念，放弃对小貂的执念；她偶尔还会说起小貂，但是她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孙儿和孙女，单凭生活经验，将永远无法理解祖母为了一件衣服所做出的牺牲。

在上面的故事中，小貂成功地展示了服饰多方面的功能。服饰的基础功能是遮蔽身体、保暖、防晒，使身体免受侵害。就像汉代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说的：“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保暖、防晒、遮羞、修饰身体，这是服饰最基本的功能。

服饰的延伸功能是其符号功能。作为符号的服饰，主要有如下几个功能：

第一，可以标志财富、地位、权力等。比小貂更具标志性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中加身的“黄袍”。这种特殊颜色的袍服是皇帝的禁脔，普通人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黄袍”“加诸身”，就等同于公开谋反。“黄袍加身”的这类故事，只能发生在唐代以后，因为皇帝独占某种黄

色是从唐代开始的。而且，唐代皇帝的袍子颜色也不是大家在电视剧里常见的明黄，而是一种更加偏红的赭色，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杂伎》诗云：“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用官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等级的制度也是在唐朝正式确立的。唐朝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朱，五品以上皆属于贵官，“朱紫盈门自称贵”^[1]，朱紫就是用服饰的颜色来代指高官。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偶遇同样来自长安的过气歌女，闻琵琶声而伤身世，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最后两句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两句诗给后世学者出了一道难题：查《元和郡县图志》，江州属于上州；又查《旧唐书·职官志》，上州司马属于五品官，五品当服朱，白居易何以着青衫？“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唐代的职事官相当于职位，阶官之级别、品服颜色，依据的是阶官品位。白居易的职位江州司马虽然是五品，他的阶官却是最低级从九品下阶的将仕郎。^[2]九品之官，当然是“青衫憔悴泪交流”。

第二，可以用来标志身份或者生活状态。各种制服是一目了然的身份标志。军服的颜色，汉代为赤色，东晋为黑色，南朝是绛红，隋朝是黄色，唐代是黑色。知道了唐代军服的颜色，才能明白薛仁贵在辽东战场穿白衣的良苦用心。他主动投军，为的就是建功立业，被皇帝看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南宋时候，“辰、沅、靖州蛮”（湘西少数民族）有一项特殊的风俗，“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金鸡羽毛、海螺串的作用就是昭告天下：来追吧，我单身！

第三，还可以标明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及相对关系。传统的丧服服饰就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郑玄《三礼目录》这样解释《仪礼·丧服》之义：“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存居于彼焉，已亡之耳。”衣服和年月就像是横纵坐标，标识出服丧者与死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从而展现出礼的隆杀等级。比如，先秦时期的丧服礼，最高级别的斩衰，皆服三年，适用于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以对应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次一级的齐衰之服则可细分为四级：父卒为母，母为长子，服三年；父在为母，子为出母（母被父休弃者），夫为妻，服十五个月；为祖父母，为兄弟，出嫁女为父母，服十三个月；为曾祖父母，服三月。^[3]

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东北到21世纪初的西方，作为服装材质的貂皮经历了从高贵到野蛮的陵谷变迁。起初，稀有珍贵的野生貂皮是上流社会追捧的御寒上品；之后，随着水貂人工饲养技术的发展，更多生活在寒冷地区、家境殷实的大姐也可以通过小貂一展体面了，貂皮的珍稀度在下降，但仍然是高级的；最后，在更为发达的西方，思想观念的变迁让动物皮毛遭到唾弃，貂皮变成了野蛮残忍的标志。

小貂地位的变迁，与人类服装材质的早期发展史遥相呼应。曹魏董巴的

《大汉輿服志》言：“上古衣毛而冒皮，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在亚当和夏娃的无花果树叶之后，动物皮毛成为人类最原始的服饰——“衣毛而冒皮”。随着文明的进步，皮毛逐渐为丝麻等人工制品取代，这就是所谓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遗址出土了一根骨针，通体磨光，针孔窄小，针头尖锐；缝线应当是用动物肠衣或者韧带纤维制成的。穿针引线，把动物的皮简单地连缀在一起，就是山顶洞人的衣服。1926年，在距今五千多年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半个蚕茧。这半个蚕茧究竟是经古人驯化的家蚕，还是后世混入而并非五千年前的东西，这点曾饱受争议。1958年，距今约四千七百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丝织品的残片，其丝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四十八根。随着越来越多年代相近的丝织品残片、陶制蚕蛹、蚕纹纹饰及纺轮的发现，西阴村那半个蚕茧已经成为中国丝绸业发端的一个明证。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驯化、培育家蚕的历史可以上推到七千年前。丝绸是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件重要礼物。吴兴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麻布片。^[4]

丝麻的出现将华夏民族的着装史从动物毛皮时代推进到纺织品时代。纺织品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丝麻时代和丝麻棉时代，这两个小时代的分界线在宋元。北宋的福建、广东、四川已开始种植木棉，到了南宋，木棉继续向两浙和江南推广。元代，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已经相当可观。当然，棉花取代丝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南宋晚期的夏税已经开始输纳棉布，但是至少从各地输纳给中央的税赋贡品来看，直到明代中期，丝、麻、棉在纤维作物中大体还是呈三足鼎立之势。

在棉花广泛种植以前，丝絮还是重要的保暖衣被的填充材料。春秋时期，漂洗丝絮是一种职业，《庄子·逍遥游》里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絖即纩，就是丝絮。“洴澼者，漂絮于水上”，容易造成皮肤干裂，拥有护手霜秘方的家族，更有优势把漂絮事业世代经营下去。杜甫诗有“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句子，布衾的表面材料是麻织物，填充材料是丝絮，而非棉花。孔子弟子闵子骞以孝道著称，南朝人所写的《孝子传》特别强调闵子骞的隐忍，说后妈给他做的棉袄“皆藁絮为絮”，给亲生儿子的“则绵纩重厚”，绵纩是丝絮，藁絮就是草和麻，草和麻填充的当然不暖和。这个故事后来就发展成了“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的“鞭打芦花”。其实，孔子当初夸闵子骞孝顺的时候，根本就没提到后妈这茬儿，故事被添油加醋，越讲细节越丰富，这是民间传说的一般规律。

[1] [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七〇《读五侯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656页。

[2] 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6页。

[3]参见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3页。

[4]参见《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86页。

穿衣的讲究

服饰之中隐藏着权利，自由来之不易。这一点，对大多数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朋友来说，可能已经比较难理解。年青一代关于服饰的典型吐槽是，“有一种冷叫作你妈觉得你冷”。这句话所表达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隐含控制，孩子被剥夺了自由感受冷暖并做出选择的权利。这个吐槽只涉及家庭之中的代际关系和教养方式。生于70年代的我，却有机会亲身观察、体验服饰中自由的来之不易。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校长、老师拿着剪刀在校门口“猎杀”喇叭裤、大鬓角的场面，年轻一些的朋友看了可能觉得荒唐可笑，而真正经历过的人却不免心生寒意。喇叭裤、大鬓角、蛤蟆镜（太阳眼镜）这些今天人们司空见惯，可以自由评判、自由选择的东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却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与道德败坏、不守规矩，甚至流氓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我和我的同辈仍然是最幸运的一代，我们经历了制度和文化的“奇装异服”最后的围剿，也目睹了着装自由的艰难降生。后来的观察者赞美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

1978年，“真理”这个词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变得神圣。人们在真理的襁褓中，察觉到日常生活的美好。真理给人以智慧，也给人以找寻“美”的勇气。这时，一种裤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恰恰有一个张扬的名字，像大声朗诵给这个时代的青春宣言，像民众向往个性与自由的旗帜。它所向披靡，迅速横扫了神州大地。它的名字就叫“喇叭裤”。^[1]

在喇叭裤横扫神州大地以前，服饰被进行了阶级分析和强烈禁锢，“西装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是修正主义的，旗袍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着装必须“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作”。^[2]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列宁装和红卫装，千篇一律，雌雄莫辨，毫无美感，遑论个性，以表面性的无差别掩盖实际上的不平等，压抑人性。那大概是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变态的一段插曲。

相比之下，在传统时期，个人虽然不拥有穿衣戴帽的全部自由，但是群体对美的追求却是持续不断的。在传统中国，穿衣戴帽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政权和礼法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应该穿什么、戴什么，以及同一个人不同的场合之下该穿什么、戴什么。这就是服制——穿衣戴帽的制度，服制是明文规定了的。想象中的周代衣冠是服制正统性的源泉，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历法用夏朝的，车制用商朝的，服制用周朝的。实际上，夏商制度渺茫难知，周最晚出，吸收了夏商的好处，用南朝梁皇侃的话来说：“以周世比视于夏、殷，则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备也。”“周既极备，为教所须”，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3]当然，就实际发展而言，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积累变化的；但是，传统时期任何一次制度调整打出的旗号都是“吾从周”——从先秦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周代制度中寻依据、找靠山，服饰制度也不例外。

帝制时期服制的正式确立，是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秦汉之际，周代衣冠曾经短暂缺席，“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4]。从皇帝后妃到官员，穿得都比较简单。西汉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绋，夫人自纺绩”。张安世“身衣弋绋”，按唐代颜师古的解释：“弋，黑色也。绋，厚缁也。”^[5]“弋绋”并非张安世的个人爱好，而是当时官员常服之色。张敞做官二十多年，自云：“敞备皂衣二十余年。”^[6]这位张敞，就是勇于在皇帝面前承认为老婆画眉的那一位。西汉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定天下，制度上承秦制而宽简，崇尚黄老无为，到武帝时才确立了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开启了儒家对帝制国家的全面改造。而东汉光武帝是儒生出身，学养深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至明帝永平年间，始全面建立服制，其主要依据是儒家经典中的《周礼》、《礼记》和《尚书·皋陶篇》。

“永平服制”奠定了帝制时期的服制原则。第一，服制是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它的覆盖面是社会全体，自皇帝以至庶民，“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7]。普通老百姓被规范的部分主要在嫁娶等礼仪场合。《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了，贾珍存心大葬，乐得铺张；奈何亡人的丈夫贾蓉不过是个监生，没有官位，场面终归受限，贾珍心下甚不自在；幸得大太监戴权及时送货上门，助他花一千二百两银子替贾蓉买了一个五品的龙禁尉，这才把想摆的谱光明正大地摆出去了。

第二，服制讲究的是上下有序，必须“顺礼”。“礼”的核心是什么？对等级秩序的尊重与坚守，“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礼制下的服制讲究的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缙”^[8]。服制下的服饰，以繁复、稀有、贵重为尊贵，位愈高而服愈繁。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纹饰，合称“十二章”，是权力的象征。东汉制度，皇帝“备文”，十二章全绣；三公和诸侯只能绣山、龙以下九章；而九卿则只能使用华虫以下七章。作为“文儒者之服”的进贤冠，则以冠梁（帽子上突起的骨）的多少来标志尊卑等级，“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9]。

第三，实践中的服制实行“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10]的原则，穿衣的自由与地位成正比，地位高的人享有更多的穿衣自由。比如宋画《听琴图》，不管是否为宋徽宗亲笔，但其中的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正在抚琴的宋徽宗穿道服，显得非常悠闲；而旁边侧耳倾听的两位臣子则穿朝服，坐

姿端正，态度恭敬。

服制的倾向是保守的，以维护现存尊卑等级秩序为己任。因此，最能体现服制精神的礼服常常是过时的。服制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日常生活中不再穿用的服饰，会进入礼服序列，保留在相对正式的场合，成为仪式性的服装。比如冠，“男子二十而冠”，冠在先秦、秦汉本来是成年士族男子的日常服饰，到了中古时期幞头出现，冠则退居到礼服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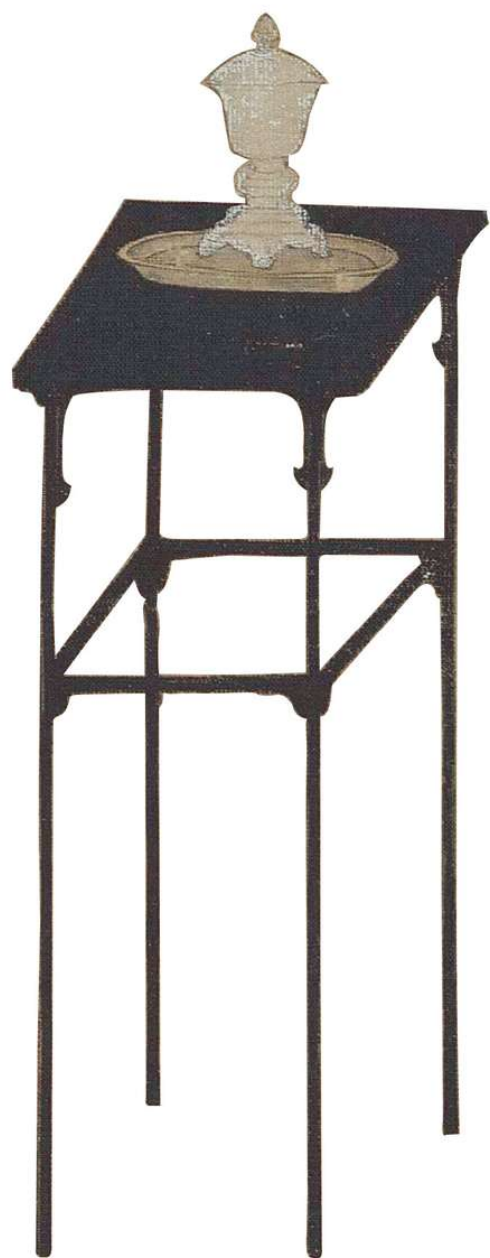
俯首聆听的蔡京



仰首听琴的童贯与身旁童子



奇石



高脚几



图三一：北宋 赵佶（款）《听琴图》

《听琴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绢本设色，工笔画，147.2厘米×51.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表现的是松下抚琴与听琴的情景。画中，宋徽宗正襟危坐，头戴黄冠，身着缁衣，作道士打扮，身后左侧有一株苍松，枝叶繁茂，树旁有稀朗的翠竹数竿。右侧立有一高脚几，上摆放一香炉。徽宗轻抹慢挑，略微垂首，显得沉静安宁。画面中另有二人坐于下方倾听，态度谦卑而恭谨，据说此二人即为童贯与蔡京。画面最上方，有蔡京所题绝句一首：“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在古代，穿衣自由与地位成正比，地位高的人享有更多的穿衣自由。《听琴图》中抚琴的徽宗便着道服，而旁边侧耳倾听的童贯和蔡京则穿着朝服。

礼服来自过去，是传统在现实中的短暂演出，代表着现在对过去的尊重。现今中国人的一大憾事，大概就是没有属于华夏民族的礼服了。我的韩国师弟穿着韩服来给导师祝先生拜年，进门就跪在地上磕头，把祝先生磕得手足无措。我却只有羡慕的份儿。传统节日与传统服装一起营造了一种传统氛围，让学生可以跪拜在老师膝下，以最为传统的方式表达感激。

怀有此种遗憾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华夏传统服饰在礼仪中的复兴因此一度成为热门议题。我虽然遗憾没有民族礼服可穿，却也并不看好复兴之议。以出土的服饰实物与传世图像、文字资料相配合，传统服饰的复原工作并非难事。比如，仅南宋福州黄昇墓，就出土了二百〇一件女性服饰和一百五十三件丝织品。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十六岁出嫁，十七岁夭折，她父亲做过掌管进出口事务的提举市舶司，家境优渥，陪葬的都是上乘好物。黄昇上身穿了九件，下身穿了十一件，是全套的盛装。^[11]然而，即便可以制作出丝毫不爽的古服饰，华夏礼服的复兴仍然面临着诸多实际困难——汉服与唐装不同，宋装与明装各异，即便是一个朝代内部，服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本身恒处于变化之中，回到传统，究竟该回到哪里？

现代人所感受的是礼服缺席的窘境，而古代人则感受着礼服繁复难穿的尴尬。南宋的朝服除重大祭祀外，难得有机会穿，朱熹诉苦说，朝服平时不穿，“到临祭时取用，却一齐都破损了，要整理又须大费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里”^[12]。元朝的大礼服称为“法服”，穿的场合同样稀少，可是层次却更为复杂，所以有人专门编写了歌诀，来说明穿戴的顺序，以免错穿，歌云：“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绅绶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13]

对服制构成挑战的，是外来的刺激、人们对美和新奇的追求，以及财富的积累。起而挑战服制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比如王孙公主，既爱美又有足够的财富追求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上元观灯，“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滂待罪。诏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滂宜夺两月俸钱。’”公主“衣服逾制”，

驸马夺俸，是因为皇帝“性节俭”^[14]。大多数时候，逾制是必然发生而无可奈何的事。服制的另外一种挑战者来自统治集团之外，主要是商人和娱乐业从业者。

教坊与宫廷因而成为时髦的两大策源地。比如，女性缠足的先驱是宫中舞姬，“后主宫嫔窈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令窈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曲有凌云之态”。缠足风气初兴于宫中，又自宫中流播于外，至北宋晚期，遂为汴京一绝，时人戏称“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15]“至南渡后，妓女窄袜弓鞋如良人也”——北方上流社会的缠足习俗被南方的妓女所效仿，从而掀起一个新高潮。妓女与贵妇争奇斗艳，引领时尚。商人作为占有较多物质财富的庶人，是服制惯常的挑战者，他们虽然未必有挑战政治权威的自觉，却会触动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南朝刘宋时，有人忧心忡忡地观察到“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16]平民穿得像王侯一样好，让人们看见车马分不出贵贱，看着服饰不知道这是尊贵的王侯，还是富有的商人。这实在是令人担忧啊！这说的哪里是衣服，分明是等级秩序。



图三二：宋 佚名《宋仁宗后坐像》



仁宗曹皇后



皇后身边婢女

《宋仁宗后坐像》图轴，宋佚名绘。立轴，设色，172.1厘米×165.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坐像为宋仁宗之曹皇后。我们看到，画中的曹皇后双手拢于胸前，正襟危坐，两位侍女分立皇后两侧，一执唾盂，一捧长巾。最醒目的，是她们翠绕珠围的服饰与妆容：曹后头戴九龙纹钗冠，面贴珠钿，身着翟衣；两位侍女头戴花冠，身穿碎花锦袍，额、鼻、颌以“三白法”敷之。画中人物珠光宝气，神态端庄肃穆、典雅精致，显示出宋代皇室的雍容华贵之气。但也不难想见，如此精细繁复的妆容，流程之复杂，穿戴实为不易。

还好，大多数中国人终于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并且享受着穿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1978年以后才慢慢展开的。

[1] 叶匡政：《1978年流行语：喇叭裤》，载《观察与思考》2009年第7期，第56页。

[2] 相关研究请参看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第84—101页；陈旋波：《喇叭裤的见证与记忆：一种文学社会学视角》，载《华侨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55—166页。

[3] [梁] 皇侃撰，高尚集校点：《论语义疏》卷二《八佾第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4页。

[4] [汉]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五《车服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3页。

[5]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52页。

[6] [东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7页。

[7] [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舆服志下》引蔡邕《表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78页。

[8]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卷《舆服志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40页。

[9]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卷《舆服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6页。

[10] [宋]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政事·禁约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2页。引自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四月颁《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式诏》。

[11] 参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2] [宋]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一《礼八·杂仪》，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24页。

[13] [元]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五《披秉歌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7页。

[14]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文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页。

[15] [宋] 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鯖录》卷四《东坡评诸葛氏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5页。

[16] [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八二《周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8页。

胡风吹扇衣冠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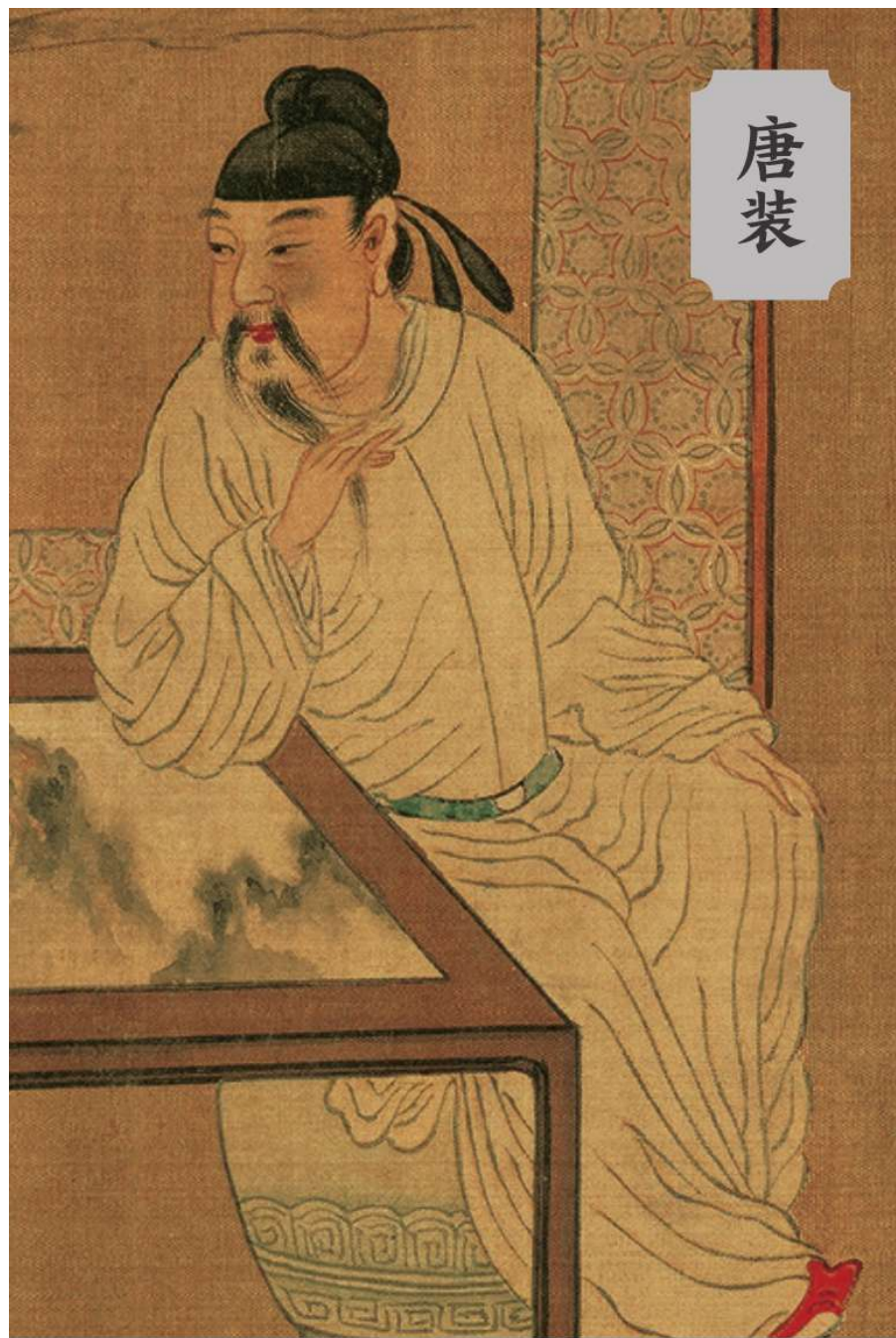
宋人翟伯寿喜欢穿着自制的唐代服饰，号称“唐装”；许彦周瞧他不顺眼，便梳起髻髻，穿着犊鼻褌，脚踏木屐，说自己穿的是“晋装”，以示讽劝。翟伯寿穿的是否是地道的唐装，许彦周穿的是否是地道的晋装？未必。但是，这两个宋朝人没有穿宋装。华夏服饰恒处于变化之中，唐装不同于晋装，宋装不同于唐装，同一个朝代之内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流行风尚。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学者对晋装、唐装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绝对要超过宋朝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摆在那儿，不着一字，却胜过千言万语。在传统中国，服饰作为礼仪的内容和表达符号，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传统中国讨论服饰的工具却相对薄弱，主要靠文字，很少有图像，几乎没实物。这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大缺憾。南宋有个郑樵，通常被视为史学家。梁启超说：“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这样充满了诗意的话语，是才子对才子的赞美。郑樵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有创造力的学者。他提倡“图谱之学”，希望能通过图谱把知识具象化，成为可以具体操作的“实学”，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实践性的学问。郑樵说：“图谱之学不传，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如果不想付诸实践，只是嘴上说说，纸上练练，那可以不用图谱。“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如果真想成就一番事业，那没有图谱绝对是不行的。顾颉刚说“郑樵的学问……富于科学的精神”，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郑樵对图谱的重视，与达·芬奇对绘画的重视有灵犀相通之处。达·芬奇说：“真正的绘画是一门科学，是自然的亲生儿子。”^[1]可惜的是，达·芬奇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郑樵的却像彗星划过天际，惊鸿一瞥，后继无人。图谱之学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一直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存在，要么没有图，要么只是非常不准确的示意图。于是，当学者们谈到像服饰这样的内容时，就会出现如下状态：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显得特别有学问，实际上却不得要领。

晋装



唐装





图三三：《洛神赋图》、《十八学士图》、《春游赋诗图》（均为局部）

提及晋装，我们会想到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的人物形象。此图以曹植所作的《洛神赋》为蓝本绘就，主要描写曹植与洛水女神的爱情故事。画作将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天人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而其他人物造型的绘制也毫不逊色。画中曹植头戴梁冠，身着宽大的袖袍，保持着王侯的尊贵与优雅，侍立其身旁的几位官员衣袂飘飘，尽显魏晋雅士之风流。而讲到唐装，我们从宋人所绘的《十八学士图》中便可看到头戴踞样巾、身着圆领长袍的文士，文中所选的这位文士正凝神捋须，侧目看着旁边文士提笔作画，其身上的唐装样式一目了然。到了宋代，服饰样式又发生了新变化：从南宋马远的《春游赋诗图》中，我们看到数位雅士围聚一处，正观看其中一位提笔赋诗，只见桌旁立一位头戴进贤冠，身着交领长袍的雅士，他正神情专注地看着赋诗者挥毫。我们对其所穿的宋装的基本样式也便有了认识。

比如深衣。《礼记·深衣篇》赋予了深衣深刻的象征意义：“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规、矩、绳、权、衡”是五种度量工具，度量工具代表着标准，能够对应五种标准的衣服，是一种高尚的衣

服、神圣的衣服，“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先王贵之”。那么，如此尊贵的衣服，款式如何？《礼记》接着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要不长不短的，既不能露肤，也不能拖地。但是“续衽，钩边，要缝半下”又该怎样理解？深衣流行于战国至西汉，东汉以后的人们就只能靠学问和想象来理解它了。鉴于深衣在礼仪制度中的特殊地位，宋代以后一直到清，深衣研究都算是一项重要课题。北宋的司马光写过《深衣制度》，南宋的朱熹在司马光的解释之上有所改进。南宋的文天祥还作过《深衣吉凶通服说》，专门讨论深衣的适用场合。元代有人写过《深衣外传》《深衣说》。明末的黄宗羲也研究过深衣。这么重要的问题，热衷考据、功夫深厚的乾嘉学者当然不会放过，主要成果有江永的《深衣考误》、戴震的《深衣解》、任大椿的《深衣释例》等等。虽然历代对深衣皆有研究，但我们对深衣款式的印象似乎依旧不甚明朗。

朱熹本人穿深衣。他的学生回忆老师当年风度说：“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缘，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出。”深衣是朱熹乡居时期春夏两季穿的外套。那么朱熹的深衣是根据什么制作出来的呢？他的学生也同样好奇，“问衣裳制度”。朱熹的回答很诚实：“也无制度，但画像多如此，故效之。”学生穷追：“有尺寸否？”具体尺寸根据什么来的？朱熹答曰：“也无稽考处，那《礼》上虽略说，然也说得没理会处。”尺寸这么细的东西，没地方可以去考证。《礼》书上虽然有记载，但是太简单了，实在不够用。一言以蔽之，朱熹的深衣基本是宋儒的自我作古。宋儒的集体理想是回向三代，重现圣世，深衣是三代的一个重要符号，至于深衣款式、尺寸等，无图无真相，作为大儒，司马光、朱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创造。

从善于创造的宋儒，到穷于考据的乾嘉学者，古人没能解决的问题，随着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深衣实物的发现，在我们的时代终于得到了“稽考处”。沈从文先生考证，“续衽”是一种特殊的缝纫技巧，在腋下嵌入一块长方形的布，从而起到美化衣服形态、让两臂运动自如的作用。这个东西就叫作“衽”，又叫“小要”。若有兴趣仿制地道的深衣，不妨去看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孙机先生的《深衣与楚服》。

因为不用了，所以从生活中消失，被逐渐淡忘；因为没有图，所以连很有学问的人都不懂了。这样的例子还有“袴褶”。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经膳部郎中归崇敬建议，唐王朝改革朝服制度，废除了初一、十五百官穿袴褶上朝的制度。归崇敬建议废除袴褶装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袴褶装缺乏儒家经典依据：“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第二，袴褶装来历不明，“亦未详所起之由”，不知道怎么兴起来的，“隋代以来，始有服者”。袴褶装从此退出朝堂，也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五百年之

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看到“袴褶”二字深感困惑，“不知所谓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袴褶肯定是衣服，但它是一件套还是两件套？马端临应当算是宋末元初最博学的人，制度是他的强项。认真查阅典籍后，他在唐代的相关记载中发现了“绯褶、大口袴”，由此推断，袴和褶“似是二物”，应当是两件套，“然不知所谓绯褶者，衣乎？裳乎？”绯褶，绯红的褶，是上衣还是下裳？没有图片，没有实物，马端临以学者的审慎不做猜想，把问题抛给了未来：“当俟精识考古之士而订之。”^[2]



图三四：南宋 朱熹 《书翰文稿》（局部）



《书翰文稿》是朱熹的代表作之一。行草，纸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

卷分为两部分：前段33.5厘米×28.2厘米，后段113.6厘米×28.2厘米。本书选取了稿卷前的肖像画，其中左边年长者为朱熹。我们看到，画中二人皆着深衣。朱熹的学生曾回忆了老师当年的风度：“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褙，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出。”由此可见，深衣是朱熹乡居时期春夏两季穿的外套。但他的深衣是根据什么制作的呢？朱熹诚实地答曰：“也无制度，但画像多如此，故效之。”所以，上图中的深衣，是朱熹根据濂溪画像的深衣形样自己制作的。虽然此深衣是朱熹据画像而做，但我们至少对深衣有了具象化的了解。



关于袴褶，当今的“精识考古之士”已经给出了答案。袴褶是两件套，褶是上衣，袴是下裳，即裤子，而且是合裆裤。华夏民族最早的裤是开裆的，裤的功能是护腿而非护裆，所以外面必须要再穿一层裳才够保险。而北方游牧的骑马民族很早就穿起了合裆裤，考古发现，三千年前生活在新疆的

人就已经穿着合裆裤。合裆是骑马的需要，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进所谓“胡服”，上着紧身、窄袖、左衽的齐膝短衣，下着裤装，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袴褶装。此后，短衣、合袴就保留在武士的服装中。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受鲜卑文化的影响，袴褶装流行，文武通服，并且进入了朝堂。唐代后期，新出现的幞头和圆领缺胯袍流行，又把袴褶装挤出了朝堂。



图三五：南宋 陈居中（传）《胡骑春猎图》之袴褶装

《胡骑春猎图》，传为南宋陈居中绘。绢本设色，27.3厘米×24.1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图描绘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骑射出猎的场景。画面近处是骑在马上观猎的众人，远处有一人策马奔驰，正向两只飞禽追猎过去。画中人或仰头、或伸手，注意力紧紧地聚焦于两只飞禽上，而两只飞禽也在上下翻飞，激烈争逐，其中一只应该是猎鹰。画面左侧有简笔勾勒的一片稀疏的茅草荡。整个画面远近呼应，疏密交错，有苍茫空灵之感。放大细看，近处观猎者上着紧身、窄袖的齐膝短衣，下着裤装，这便是最早的袴褶装。袴褶装打猎、骑射、行军尤为方便，故短衣、合袴就保留在了武士的服装中。南北朝时期，受战乱与鲜卑文化的影响，袴褶装颇流行，文武通服，且进入了朝堂。

华夏服饰一直都在变化之中，汉晋不同，唐宋各异。推动服饰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来影响，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胡服因素。传统时期，华夏之于周边，在文化上一直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向周边辐射，与此同时，周边因素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并影响着华夏文明。胡服对华夏衣冠的影响，南宋的史绳祖有敏锐的观察，他指出，宋

朝人穿的戴的，从头到脚无不透露着周边的影响：头上戴的幞头，“乃后魏狄制”，是北魏鲜卑人影响的结果；身上穿的一件套的圆领缺胯袍，也是北魏鲜卑人影响的产物，如果按照华夏传统应当是上衣下裳两件式的；脚上的乌皮六缝靴更是外来物品，“至赵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而至今服之”。至于鲜卑帽变成幞头的过程，比史绳祖更早的北宋沈括，有十分精准的描述：“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3]原本有着四脚（四条带子）的鲜卑帽，前面两脚环至脑后打结下垂，后面两脚反折上去，在头顶打结固定，由此开启了一种新帽式。鲜卑帽后面的披幅原本的作用是颈肩部的保暖，汉地冬季相对温暖，因此得以“折上”。

孔子曾经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春秋时期公子纠的臣子。公子小白与公子纠兄弟争位，小白最终胜出，成了齐国的主人，史称齐桓公，名列春秋五霸。公子纠被杀之后，管仲转而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和学生一起讨论管仲的历史评价问题，子路、子贡都质疑管仲的仁义。孔子却坚持管仲有大仁大义，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维护了天下的稳定，老百姓到今天仍然享受着他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咱们恐怕都要“被发左衽”了！“衽”在这指衣襟，“左衽”就是左襟压右襟，右衽反之。“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也”；“束发右衽”则是华夏的服饰文化特征。孔子的那句话，其实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早就沦为夷狄了！



图三六：南宋 佚名《文姬图》

《文姬图》，南宋佚名绘，绢本设色，222厘米×24.4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较之“文姬归汉”这一带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文姬图》所表现的则是蔡文姬在匈奴生活的场景，是一个相对个人化的故事题材。画面中，文姬与丈夫骑马偕行，怀中各抱一个孩子，他们边行进边交谈，画中洋溢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同时，我们也看到，蔡文姬的丈夫戴幞头，着圆领缺胯袍衫，足蹬长靴，是典型的胡人装扮。华夏服饰一直处于变化中，汉晋不同，唐宋各异，而推动服饰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来影响，也就是胡服因素。正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我们的着装才渐趋多元化，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孔子看来，服饰及服饰所代表的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是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重要标志。倘若生硬地照搬这个标准，则今日之中国人人剪短发、穿

洋装，华夏岂不荡然无存矣？所以，我们需要对孔子的这句话做一个更为宽泛的理解，凡为华夏之文化所化者，无论束发、披发、断发，都是华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接纳华夏服饰的变迁。

[1]转引自肖鹰：《美学与艺术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2] [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二《王礼考七·君臣冠冕服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47页。

[3]孙机：《幘头的产生和演变》，载《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56—167页。

缠足恶史

缠足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丑陋的文化现象。

我一边翻阅高彦颐的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1]和《步步生莲：小脚鞋》一边反胃——那是种毫不夸张的生理不适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西安军医大学的学生做过缠足的实地调查^[2]，调查报告里有缠足的裸照和X光片——一只好好的脚，四根小脚趾骨都被生生地压折了，只有骨头折了，那四根小脚趾才能被藏到脚背下面，从而让脚的前端形成一个以大脚趾为尖端的锥面。缠得严重的，脚面是一个大鼓包，脚后跟根本无法着地。

好端端的脚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我不见其美，只见其恶。因为缠足问题，我对原本崇敬的苏东坡产生了嫌隙。德国洪堡大学曾收藏过一只从香港取得的缠足标本。2010年，他们要办一个很小型的纪念活动，想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报告。因为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我临危受命，速成为缠足问题专家，在盛暑之中闪电访问柏林。任务达成，心里却对苏东坡生了芥蒂——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赞美三寸金莲的词就是苏东坡写的：“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纤细美妙不可言，捧在掌上细细把玩的分明就是小脚了。大约在宋神宗朝晚期，这项从宫中舞女兴起的恶习，在开封的上层家庭中流传开来。当时有人从外地到开封，发现首都三绝：洛阳花、福建茶和妇人足。洛阳的花木嫁接技术发达，培育了不少优新品种，花市一直开放到夜晚，“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福建茶指的是福州、建州进贡来的团茶，以及源自福建地方的斗茶习俗。妇人足就是裹的小脚。苏轼的朋友赵令畤给苏轼写信说，首都妇人的妆容和小脚冠绝天下。可见这小脚在当时只是首都时尚圈的高端时髦，外地还没有。到了南宋，缠足开始普遍流行，成为女性美的标志。南宋福州黄昇墓出土弓鞋6双，鞋长13.3—14厘米，宽4.5—5厘米。黄昇死的时候十七岁，已经成年。一个成年女性穿35码鞋的脚约长22厘米，宽6厘米。黄昇的脚应该是在未成年时就被强制停止生长了，她的两只脚上还各自裹着一段宽9厘米、长210厘米的裹脚布。

裹脚习俗起于宫廷，首先蔓延到首都的上流社会，继而向外辐射，最终成为华夏民族上层（包括为上层服务的）女性的标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然，不是所有汉人女子都缠足。清朝“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3]。缠足习俗兴起之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和满人是不缠足的。蒙古

人粗疏，管不到这些。满人入关之初，曾经明令禁止缠足，然而缠足禁令遭到了汉人抵制。在满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下，女人的缠足与男人的束发同样被赋予了悲壮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结局却大相径庭：最终，男人还是剃了头穿起了满式袍褂，而女人的脚却越缠越小、越缠越紧。

与此同时，男性的恋足癖（金莲癖）愈演愈烈。清人李渔靠写戏、经营戏班为生，是一个诚实的享乐主义者，他曾经这样炫耀自己的小脚鉴赏水平：“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觉刚柔相半。即有柔若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向在都门，以此语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间拥二妓，一晋一燕，皆无丽色，而足则甚小。予请不信者即而验之，果觉晋胜于燕，大有刚柔之别。”^[4]他在这里把“金莲”当玩具细细把玩、津津乐道，我想到看过的图片，想到人的脚竟然会被折磨至此，便觉不忍。



图三七：“三寸金莲”鞋样 清末

上图是清末山东地区的黑绸花纹弓鞋，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大约从11世纪80年代起，缠足这项从宫中舞女兴起的恶习，在开封的上层家庭中流传开来。时人从外地到开封，发现首都有三绝：洛阳花、福建茶和妇人足。一些文人雅士也曾赋诗赞美过三寸金莲，东坡便有：“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池去。只见舞时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至南宋，缠足之俗始风行，已然成为女性美的标志之一。



图三八：喜靴 清末

此图为清末喜靴，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该喜靴虽呈靴状，但其鞋面及鞋底部分依旧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形样。靴管为缎面，上面平绣着西瓜与蝴蝶，寓意瓜迭（蝶）绵绵，象征着婚姻美满，多子多孙。我们看到，鞋头呈尖状，鞋面极短，且呈近45度的立角，鞋底略带后跟。要在不足巴掌大小的鞋腔内塞下双足，不难想见，裹脚手段之残忍，裹脚过程之痛苦。

裹脚的过程非常残忍。为了裹得小，就得下手早，通常五六岁或者七八岁，趁着“足骨脆弱”就要裹起了。负责裹足的通常是母亲，小孩子怕疼，所以“初缠之时”，做母亲的要“甘言诳诱，极似渔翁之饵鱼”；缠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持之以恒，每日用力缠裹，不然就又要长回去了，在小脚的定型阶段，母亲要“严束狠捶，又似狱吏之遇犯囚”；终于，小脚定型，忘记了它本来的生物学形态，此时，母亲也恢复了温柔，“指导鞋样及妙姿，语温意挚，俨若循循善教之良师矣”^[5]。

《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缠足违背孝道，所以大儒程颐家的女孩子“不缠足，不贯耳”^[6]，程家的这个规矩一直到元初仍然坚持。程家对女子自有一种儒家的尊重，后世学者动不动就把明清陋习怪到程朱理学上，这个锅不该让程颐背。程家女儿的故事，我们后面细讲。南宋的明白人车若水曾质问：“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7]

缠足究竟有何用呢？满足李渔们的恋足癖，是实用之用。在此之上，更有所谓纲常之用。清朝民间读物《女儿经》中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8]清末名医王士雄认为，古人之所以要把女子的脚缠裹起来，“非饰美丽也，为拘游走也”。对女性要“拘游走”，王士雄没意见；但是他认为，为了“拘游走”，“顾为此戕贼形躯之事，忍莫甚矣！拙莫甚矣！”缠足“相习成风，陋俗难革”，作为医生的王士雄所能做的，也只是提供了一个裹脚辅助方——“庶易效莲钩之式，聊纾玉趾之疼云尔”^[9]。不能改变习俗，只能缓解痛苦。面对陋习之大势，他只能做个善良的医者。

明朝人在某些方面的“奇思妙想”令人瞠目结舌。曾经有个叫瞿九思的人，异想天开，竟然要用缠足来腐蚀北方强敌蒙古人。具体做法如下：让蒙古的女人效法中国，把脚缠成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以为此弱虏制虏妙策”。先不说蒙古人是否上当，单说这瞿九思竟一厢情愿地认为，一旦女人裹了小脚，男人就会“惑溺”，可见其人是多么地“惑溺”于小脚！如此荒唐的想法却被认为是“弱虏制虏妙策”。他哪里知道，隆庆元年（1567年），“大虏攻陷山西石州，掳所得妇女驱之出塞，憎其不能随马疾驰，尽刖其双足以车载归，百无一活”^[10]。可叹这瞿九思，既不知蒙古，亦不知本朝，却在那里冒充诸葛亮指点江山。

“妇女缠足，合地球五大洲九万里，仅有中国而已。”^[11]缠足把华夏民族接近一半的人变成了残疾人，而且培养了种种让现代文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恶趣味。“缠得小来，不知何用？”有益于女性自身、有益于家庭、有益于社会的真用处，半点也无。然而，当缠足变成一种社会习俗，当缠过的小脚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的象征，当缠足能带来大好姻缘，当恶趣味成为男

性的集体偏好，缠足就在男女之间制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差异，缠足的拥护者又将缠足与女性贞洁联系一处，将缠足打扮成道德的守护神，缠足从此成为日益僵化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缠足是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游戏，男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玩家和裁判，女性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的对象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脚。选妻、选妾都要从脚开始，脚小者得良配、得恩宠、得资源。“在这样一种全景式的监督下，妇女无从逃脱，唯有接受并内化男人的价值标准和要求。这些内化了男人价值标准的妇女，又以主动的态度顺从与迎合缠足，由此便创造出了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中国女性缠足文化。”^[12]西汉的张敞为妻子画眉，让人告到了皇帝面前。张敞并不回避，只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皇帝爱惜张敞的才能，没有继续追究，然而张敞也最终没能做到宰相。为老婆画眉、喜欢爱妾的“金莲”，在传统文化当中都是“做得说不得”的事情。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女人的小脚却忽然成了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



图三九：红绸弓鞋 清末

此图为清末山西地区的红绸弓鞋。鞋尖边缘刺绣了佛手、凤凰，佛手的“佛”与“福”谐音，取福气之意；凤凰则寄予了祥瑞高贵之意。将佛手与凤凰绣于鞋边儿上，寓意福气与祥瑞并举。清末山西大同还有“亮脚会”——每年农历六月六，妇女列坐家门口，将三寸金莲伸出，供往来路人观摩、品评。民国初，有好小脚者作《品莲说》，其中将“金莲”分了等级与品类，共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或五类。从形样到尺寸，每

等每类皆有严格的评判标准。上有“四照金莲”“铲头金莲”“单叶金莲”三类，中等有“锦边金莲”“鹅头金莲”“千叶金莲”“并头金莲”“并蒂金莲”五类。从上述对小脚五花八门的叫法中，足见当时兴盛的缠足之风下扭曲与变态的审美观。



图四〇：紫红绸带拽跟鼻弓鞋 清末

上图为清末紫红绸带拽跟鼻弓鞋，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我们看到，弓鞋短小精致，鞋面以平绣法绣有白菜与蛱蝶，因“蛱”与“官”谐音，寓意升

官，“白菜”与“百财”谐音，寓意发财。且“蝻蝻”与“哥哥”谐音，民间又称“喜叫哥哥”，寓意祈求生男孩，多子多孙。缠足是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游戏，男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玩家和裁判，女性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的对象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脚。在这种全景式监督下，妇女无从逃脱，唯有接受并内化男人的价值标准和要求。那些内化了男人价值标准的妇女，又以主动的态度顺从与迎合缠足，由此便造就了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中国女性缠足文化。

“西方人通过新闻报道、临床医学、摄影照片、X光扫描机及博览会等手段，剥去了古代妇女缠足的外在形式美——华丽的绣鞋和精美的膝裤，向人们展示、揭露和呈现了缠足妇女的赤裸畸形肉足。”缠足从此被视为一种肮脏、邪恶、野蛮的存在，是中国衰弱的原因。何以至此？因为缠足使妇女“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弈世体弱”。而“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13]。缠足导致民族衰弱的观念，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逐渐被更多的人接纳。

首先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然后是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觉醒中，近代中国在女人的脚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反缠足”运动、“不缠足”运动、“天足”运动。1875年，光照牧师（Rev. John MacGowan）在厦门设立了戒缠足会，这是最早的反缠足组织；1883年，康有为在海南创立不缠足会。反缠足运动迅速席卷广东、湖北、湖南、澳门、福建、天津、甘肃、四川等地，北京部分广东籍的京官也订立不缠足约。1901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敦促汉人士绅“渐除积习”。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3月发布《内务部通飭劝禁缠足文》，斥之为“害国凶家”的“恶习”，以为“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14]。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全国禁止缠足。

这场“女人脚上的革命”有着温情体贴的一面。比如，放足或者天足女性的出嫁问题得到了重视。梁启超等人组织的上海不缠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在入会之后所生之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若其子在入会前已经长大，无不缠足之女可娶，或入会人尚少，择配不易相当，算作例外。”而四川重庆府二百五十家士绅互相订约，女子不缠足，男子不娶缠足妇。脚放开之后还能嫁得出去，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考虑：放足之后，弓鞋不能穿了，那穿什么鞋？1900年，西方传教士在武汉倡办的天足会发布广告：“请中国闺秀各出心裁，制一天足履式，不尚精巧，专尚大方。制就送交汉口汇丰银行代收。汇齐评定甲乙，取中第一，赠洋五圆，以次递减，至半圆止。”^[15]

不缠足运动解放了中国女性，让女性有可能走入现代文明。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在从缠足到天足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极为尴尬。比如清初的缠足禁令是这样规定的：“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

三千里。”事情发生在女人的脚上，惩罚的却是男人。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规定。因为，在不缠足这件事情上，虽说受益者是女性，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男性。那么，女性在哪里呢？

通常书上会说，1928年或者1949年之后就没有缠足了。国家这么大，地域差别这么大，哪有这么顺当的事情。1965年，云南省政府还发布过禁止缠足的命令。很多时候是女性主动要缠的。为什么？因为裹了小脚可以避免大田劳动。进入21世纪，还有所谓的“女德班”鼓吹缠足的好处。今夕何夕，令人恍惚又诧异。



宋 佚名 《盥手观花图》

[1] [美] 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参见秦为径:《中国四省部分地区现存缠足畸形抽样调查》, 第四军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3] [清]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一《弓足》,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656页。

[4] [清] 李渔:《李渔全集》第3卷《闲情偶记》,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4页。

[5] 李荣楣:《浚南莲话·阿母施缠之三态》, 见姚灵犀:《采菲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49页。

[6] [元] 白斑:《湛渊静语》卷一, 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 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第129页。

[7] [宋] 车若水:《脚气集》卷一, 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 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第129页。

[8]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 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第186—187页。

[9] [清] 王士雄:《四科简效方》丙集, 见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 第563页。

[10] [明] 沈德符撰, 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第502—503页。

[11] 郑观应:《郑观应论缠足之害》, 见姚灵犀:《采菲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第55页。

[12] 李志生:《试析缠足文化涵义的对立特点》, 载《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第60页。

[13] 李志生:《试析缠足文化涵义的对立特点》, 载《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第58页。

[14]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敕内务部着各省劝禁缠足令》,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264页。

[15] 杨兴梅:《被“忽视”的历史:近代缠足女性对于放足的服饰困惑与选择》, 见陈廷湘主编:《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一·中国文化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537—554页。

住 安得广厦



田园生活的烦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在我小学的时候，父亲买回来了一套儿童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其中就有这篇《归园田居》。自此，我便喜欢上了陶渊明。

本以为我和陶渊明一样，是田园的赤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后来我发现喜欢陶渊明，只是因为我也有一颗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心，但是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之后，我已经离不开城市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便利中长大的人，很难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近年来，我时常会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城市精英下乡改造传统民居的故事，主人公通常是设计师或者有设计改造能力的理工男女，夫妇二人带着一双儿女，把破旧的民居改造成理想的田园。这样的故事让人心生羡慕。但故事里的田园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它是通过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与城市生活高密度联结的现代田园。传统的田园生活本身，并没那么多诗意，诗意是像陶渊明这样自由的灵魂赋予的。

退一步说，陶渊明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他若不当官，大约也只能归园田居，因为他生活在传统时期中国精英居住状态的第二阶段。我在此斗胆将传统时期中国精英的居住状态分为三个阶段。这种说法尚未经过仔细论证，肯定有不准确之处，姑且竖个靶子，大家一起思考。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西周封建，贵族通常居住在自己的封地上；春秋战国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新兴的士阶层四处游走找工作，找到工作的会在诸侯的都邑建立新居所，如果获得封地，也可能在政治上失势后回到封地居住。比如卫人吕不韦辅佐子楚登上秦国王位，子楚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文信侯的封地在洛阳，吕不韦先后辅佐子楚、嬴政，一直居住在咸阳，直到他被嬴政免了相国之位，才“就国河南”^[1]，回到洛阳居住。

秦汉以降至于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官员居住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地方长官为中央任命，但数量不大，居住在政区所在城市；为数众多的地方佐官就是本地精英，在本地居住，过着田园生活。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就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精英也会受国家的任命到外地做官，但是他们的根在土地上，他们通常拥有大量土地，是大庄园的主人，比如我们讲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其中讲的就是大庄园的经营，而那种大庄园是有能力自给自足的，除了盐和奢侈品之外，几乎生产一切。陶渊明家未必有这个条件，但靠土地维持自足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隋唐以后，传统精英的居住状态进入第三阶段，官员全部由国家选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任职。这是一个土族瓦解，平民崛起，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的时代，“千年田换八百主”，大部分官员没有足够的土地保障基本收入，因此，俸禄等做官的职业收入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官员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获得任命之后会从故乡“连根拔起”，搬入城市居住，在故乡以外的地方购置房屋、土地，死后也不再归葬故乡。比如，欧阳修是江西吉州庐陵人，他的父亲葬在泃冈，欧阳修曾经写下千古名篇《泃冈阡表》，追忆父母生平，以志哀思。但是，欧阳修中年之后搬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毫不掩饰对颍州风土的爱，他主动请求做颍州的地方长官，爱颍州老百姓淳朴、很少有人打官司，土厚水甘，于是“慨然有终焉之志”。离开颍州之后，他的“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欧阳修在颍州买房地应该很早，1052年，他母亲去世后葬在了颍州，因此他为母守孝也是在颍州。1070年，欧阳修回乡拜祭了父亲的坟墓，写下了《泃冈阡表》，次年正式退休，归老颍州。南宋的江西人洪迈对欧阳修没有回故乡十分介意，他批评欧阳修的思颍诗“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可惜没有一个字提到故乡坟墓。又说，欧阳修生了四个儿子，但他们都是颍州人了，泃冈之上，就再也不会有子孙光临。“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因为一代做了大官，故乡坟墓却成为隔绝的他乡。洪迈说“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其中“二序”指《思颍诗序》和《续思颍诗序》。洪迈“太息”得有道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无法在官场大展身手的读书人已经回到了乡下，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活动。但是总体而言，进城居住是主流，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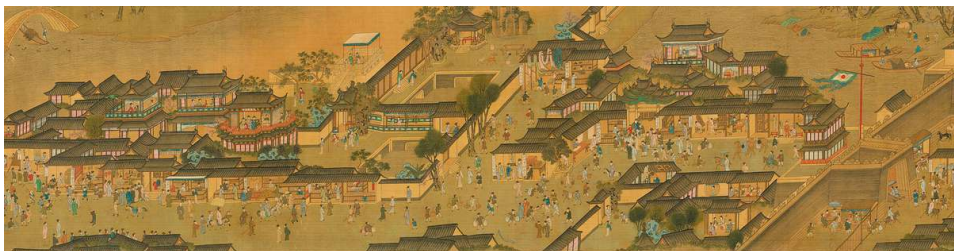


图四一：北宋 赵令穰 《陶潜赏菊图》（局部）

《陶潜赏菊图》，北宋赵令穰绘。绢本设色，全卷416.4厘米×30厘米，画心84厘米×30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代皇室很重视绘画，皇室成员中也出现了数位有名的画家，这幅《陶潜赏菊图》的绘者赵令穰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五世孙，其子赵伯驹也是宋代著名画家。此画所绘的是临江小亭内，二人对酌的情景。画作层次分明，远处雾锁群山，幽远缥缈，近处红枫翠竹掩映，溪涧江水环绕，意境淡雅邈远。据说，画中对酌者所饮的正是重阳节的菊花酒。二人把酒对饮，相谈甚欢，世外桃源中悠然自得的意境呼之欲出。

为什么要进城？最简单的理由是城里生活方便。传统中国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西欧的是封建堡垒以外新兴自由民商业聚落。传统中国的城市则首先是帝制国家的各级行政中心——最高级别的是首都，其下是州城、县城等各级政府所在地；然后，由于政治的集中，优秀人才、优质物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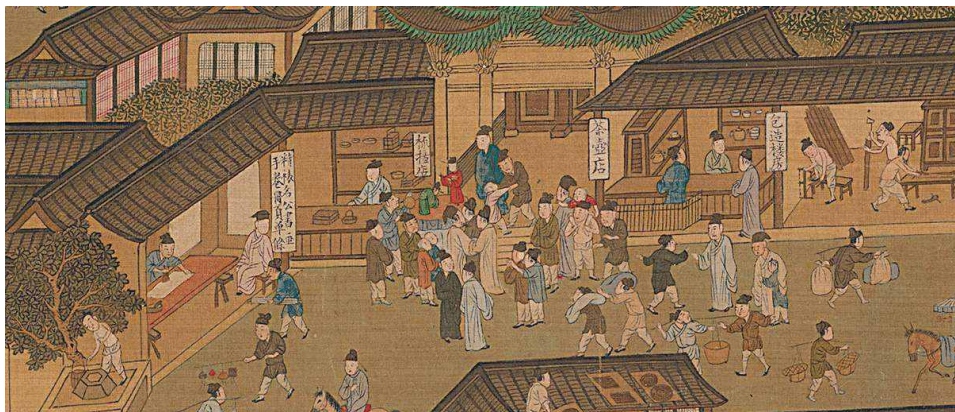
向各级城市辐辏集中，人流和物流集中之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娱乐业因此繁荣。在城市生活的映照之下，田园生活就显得不方便了。



图四二：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版）（局部）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最早由北宋张择端所绘。其后，古代熙攘的街市景象便成了一种样式，历代画家多有效仿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仇英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仿绘的《清明上河图》。随着政治的不断集中，优秀人才、优质物资逐渐向各级城市辐辏靠拢，人流和物流集中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业街市便迅速繁荣起来了。从画中看到，街上行人络绎不绝，两旁店铺鳞次栉比，既有梳妆店、茶壶店、字画装裱店，又有银店、药材行、字画古玩行等，可谓各行各业一应俱全。充分体现了城市生活的丰富与便捷。

如何不方便？“医药弗便，饮膳难得。”南宋的张九成是绍兴二年（1132年）的状元。中进士之前，因为家里穷，张九成在盐官乡当“村教书”，教村塾，村子偏僻没有市场，实在没什么吃的，村里供给教书先生的只有蔬菜和笋子。吃多了伤胃，不时发病。“建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予自村中归，忽中邪风，未及息肩即病，上呕下泻，胸中烦而子腹急，证为伏阴伤寒，六脉俱绝，累然待尽而已。”如果不是当时有朋友想起一位懂医理的僧人，只怕张九成就一命呜呼了。



梳妆店、茶壺店、字画装裱店



银店、药材行、字画古玩行

除了医疗条件差，餐饮条件差也是农村生活的一大不便。讲个故事：北宋有个三鸦镇，在河北边境，地方偏僻，只设有一名镇官，俸禄微薄。当时为了阻挡辽朝骑兵南下，在河北边境广开塘泊，所以水产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市场上除了莲藕、鱼蟹，没有其他东西供应。三鸦镇地处偏僻，上级领导也很少到这儿来视察。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一名转运使。三鸦镇上静悄悄，“入其治，则官吏已悉委去，无簿书可寻诘。徘徊堂上，顾纸屏间题字尚湿，试阅之，乃小诗曰：‘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唯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前任镇官不堪忍受贫穷寂寞，刚刚弃官逃跑了。镇官虽然卑微，好歹也是官。吃藕吃到落跑，实在夸张。其中的真实部分，是小官的穷困和偏僻乡村的落后，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田园。



图四三：南宋 李唐《灸艾图》

《灸艾图》（又名《村医图》），南宋李唐绘。绢本设色，立轴，68.8厘米×58.7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所绘的是一赤脚郎中为村民医病的情景。在一片树荫下，坐在矮凳上的郎中手持燃着的艾条，正为患疾老翁疗病。因艾灸炙烤很疼，接受治疗的老翁正大张着嘴巴叫疼；他面前有一人以双手紧捏其手腕，同时以脚踩其股，保证他不要扭动；老翁右侧是一老妪，正半眯缝着眼，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还有一童子干脆躲在大人身后，吓得不敢看。红红的艾头在老翁身上一下下地炙着，郎中身后的童子已备好狗皮膏药，待艾灸结束，就将膏药贴于病灶处。画中人物表情刻画生动，现实主义的生活场景反映逼真，从人物着装可看出，此地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偏鄙之乡，缺医少药或为常态，也只有走方郎中能为村民医点儿小病。

乡居生活还有一大不便，是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孤独。陶渊明的时代，因为大家都会归园田居，所以找个伴儿应该还不难。比如陶渊明四十八岁搬家至南村。他想搬去南村的愿望和欧阳修想要住到颖州的想法，一样由来已久和坚定。为什么？“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求是人之常情。当历史进入第三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里去住，如果你想要找到可以共赏奇文、同析疑义的人，进城去恐怕是必须的。但是，究竟选择哪个城市？这还是要费一番搜寻功夫的。

[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2512—2513页。

古人的住房问题

于人而言，住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中国，住的问题困扰了许多人。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解决住房问题的呢？住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一是长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住房可租可买，买又包括买现房和买地自建房。

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营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则上每三十里设一驿，宋代改为“六十里有驿，驿有饬给”，但是每二十里有马铺、歇马亭。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欧洲。

驿站的“站”字来自蒙古语。“驿”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介绍信”，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适用范围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唐后期凭借“转牒”（节度使的批条）也可以住驿。朝堂上各路势力你争我夺，此起彼伏，在驿馆中也会上演。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监察御史元稹夜宿华州华阴县敷水驿（今陕西渭南华阴市西敷水镇），刚在上房住下，宦官刘士元驾到，他非要让元稹腾让房子。元稹不从，刘士元大怒，破门而入，元稹鞋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往里屋跑，刘士元追上去用马鞭打破了元稹的脸。结果如何？“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1]唐后期宦官势力之猖獗，可见一斑。

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驿舍按道理讲是临时居所，但也有人长期借住。比如北宋仁宗时的杜衍“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2]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杜衍身世坎坷，自幼贫穷，这位相里氏夫人却是富人之女，挨到丈夫过世才买房，可见杜家当家的还是杜衍。

除了官营馆驿，道路之上还有私营的旅店。战国时，已经有旅店业。《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欲舍客舍”，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舍人无验者坐之”，收留无证旅行者有罪，遭到拒绝。荒村野店，往往罪案高发。《水浒传》将孙二娘的黑店选址在十字坡，很有眼光。北宋的张咏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的朋友过活，这种谋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风”或者“打抽风”。汤阴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带着一个小书童往家赶，“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3]。张咏一看就知道是个黑店，又不能不住。结果怎么样呢？

店主人图财，对张咏下手，遭张咏反制。次日天不亮，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带着书童赶着驴，走了——黑心的店主人已经被张咏用短剑解决。当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赚取利润，我们不能像武松那样疑神疑鬼。

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 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比如程颐、程颢家，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在开封泰宁坊赐了一套宅子给程家。“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中，但是这套宅子只住过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给葛家看守这套宅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前后居者无不苦之”，“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让这对老夫妇表现出了柔顺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王老太太“涕恋不已”^[4]，很是舍不得。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同类相求，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个很好的选择。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来租房。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王雱说：并非如此，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司马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抱怀疑态度。但是，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的确是在开封比邻而居。



图四四：北宋 李成 《晴峦萧寺图》（局部）

《晴峦萧寺图》，北宋李成绘。绢本淡设色，111.4厘米×56厘米，现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此画所绘为冬日山中景色。画中群峰连绵，层峦叠嶂，远处山峰沟壑纵横，直入云霄；群峰下有一座楼阁，掩映于枯木后。视线拉近放低，可看到山脚下水榭、馆亭错落散布，上有行人或于其中补给歇脚，或正匆匆挑担赶路，或在茶余饭后临水发呆；一座木桥搭建于山的两端，有骑驴担担者正欲过桥。此画下方反映的即为一处供旅人歇脚停留的旅店，店内或只提供饮食，无住宿服务。旅店以界画绘就，笔触细腻，线条流畅，山体褶皱、茅屋边缘和人物表情皆清晰可辨。整幅画面雄浑壮观，细节处又不失精巧灵动。所谓“仰画飞檐”，即出自李成之画作。



图四五：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之邸店

上文讲到的馆驿、旅店都在路上，而城市中的旅店业也相当发达。我们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可看到这一景象。在整幅图的左边，即孙羊正店对面，有一处树木掩映下的硬山顶构造的房屋，屋前立一牌子，上有“久住王员外家”的字样，这便是一家邸店。“王员外家”并非指王员外的家，而是说可在属于王员外的邸店长期居住。从开着的窗户望去，还可看到画中有位读书人端坐桌前正在读书。他背后有扇书法屏风，书法屏风在北宋算是种较高档次的家什，加上该邸店四围露出的檐廊，可见这是间规模较大、档次较高的邸店。有趣的是，放大可看到廊檐下有一处虚掩着门的小隔间，其中摆放的器物是个马桶，由此可知北宋已有了独立卫生间。汴京城临河分布有多处邸店，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 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因邸店利润极高，所以达官贵人皆争相投资开店。

传统时期的房源也和今天一样，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看位置。但位置绝佳的地段价格必然不菲——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

水区域，贵。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书丰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傲直常高一倍”^[5]。

租房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一辈子租房住，哪怕土地使用期限只有七十年，还是要拼了老本买房。古人也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只要条件具备，房子还是要买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在二十六岁时生活还很窘迫，他写信哭穷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6]当然，韩愈的穷跟陶渊明的穷一样，是相对的穷，最起码他还有马，真穷就骑驴了。为了取得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积累资历，韩愈后来进入节度使幕府服务，“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7]，收入大大增加。

不断增长的俸禄，再加上给人写作碑文、志文所赚取的丰厚稿费，到四十九岁，韩愈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房。这座房子有中堂，这是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东堂风景很好，“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北堂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此外还有南亭，南亭外面是菜地，“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润谷居”。韩愈把这所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8]三十年奋斗，韩愈终于在首都买了房，后来他还在城南置办了一个小别墅，当然，韩愈是在长安城的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的。^[9]

买房子、盖房子，追求高大上，这一点，古今之人概莫能外。把这种追求发挥到极致病态的，就是那些权势上的暴发户。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们，仗着皇帝宠爱，“竞开第舍，极其壮丽”，比赛盖房子，看谁的高级，一间大厅的花费，动辄超过千万缗。更为变态的是，房子盖好，发现别人家盖的竟然有超过自己的，立刻推倒重建。敢于“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作风更是豪横。一日，她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10]，扔给韦家十亩荒地了事。这韦嗣立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与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被强拉进韦后的外戚团队。想当年，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中宗亲临祝贺，赏赐优厚，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清虚原幽栖谷”。韦皇后倒台之后，韦嗣立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幽栖”不能。此时，韦嗣立已死，韦家全无势力可言，所以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权力的蛮横，权贵的野蛮丑陋，由此可见一斑。

宋真宗朝的“圣相”李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范。李沆做宰相，在开封盖房子，大厅前面建得很窄，仅能容一匹马掉头。有人批评太寒碜了，

李沆笑着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11]“太祝、奉礼”指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是官僚子弟恩荫入仕的常用官衔。李沆的意思是，倘若子孙无能，只能靠父祖荫庇做个小官儿，那也就无所谓了。宋朝的高官以俸禄优厚著称，钱不是问题。后来，夫人又劝他买新房，李沆说：“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李沆的回答，显示了佛教对他的深刻影响，也透露出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信息。



图四六：宋 佚名《会昌九老图》（局部）

《会昌九老图》卷，宋代佚名绘，绢本设色，245.5厘米×28.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所绘的是公元845年，白居易在洛阳香山居住时，邀九位好友在家雅集的场景。因赴约者皆为七十多岁的老人，故名“尚齿”会。此画虽以“会昌九老”为名，但画中建筑亦极为醒目。绘者以准确精微的界画手法，将水榭、亭台、板桥、栅栏、石阶、石凳等建筑与物件刻画得形象生动，同时对抚琴者、对弈者、观书者、点茶者、洒扫者，乃至撑篙者等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纵览全图，我们可以感受到颇为明显的立体感，这说明绘者不仅注重写实，同时还应用了透视法来突显建筑的通透之感。通过观摩《会昌九老图》，再联想下王维的辋川别业，我们便可对文中描绘的韩愈的宅邸与城南的小别墅有个基本的想象了。

李沆的代际传承观念，并非绝无仅有。宋初的武将郭进的表达更加直率，他在开封城北的大宅子落成，举行宴会庆祝，“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让建筑工人坐上首，自己的儿子坐下首。有人问他：“诸子安可与工徒齿？”郭进指着工人们说：“此造宅者。”又指着儿子们说：“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12]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

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1]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1页。

[2] [宋]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三一《居士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9页。

[3]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六《张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1—232页。

[4] [宋]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文集》卷一二《上谷郡君家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4页。

[5] [宋] 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1页。

[6] [唐]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75页。

[7] [唐]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七《与卫中行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04页。

[8] [唐] 韩愈著，[清] 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99页。

[9] 参见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见其著《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256—258页。

[10] [宋] 司马光著，[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92页。

[11] [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41页。

[12] [宋] 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6页。

城市的秘密过往

我们对传统时期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比如，你会觉得它一定有墙，一定热闹，一定“像个城市”。其实未必。

我家附近曾经有一处海淀区的文物保护单位——齐白石墓。一座坟墓，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与居民楼朝夕相对，老实说，这不是中国人习惯的阴阳相处方式——活人不舒服，死者恐怕也会被扰攘。那么，为什么居民区会建到齐白石墓前？真实情况是，齐白石墓在前，居民小区在后。1945年，齐白石就为自己选定了这块墓地，亲自篆额立碑。1957年逝世后便归葬于此。齐白石选择在此地安息的原因很简单——1945年齐白石为自己选定长眠之时，这片地方正是湖南公墓。湖南人葬在湖南公墓，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落叶归根了。这样来看，直到1957年齐白石入土为安，我所住的这一片其实都是墓葬区。按当时的城市发展状况来看，此地在西直门外，远离喧嚣，正是死者可以含笑九泉的地方。2013年，齐白石墓迁往西山。从1945年到2013年，六十八年间，齐白石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见证了海淀区的发展，城市的生长也一点一点地挤占了死者的栖息之地。

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时期的城市中也曾上演。北宋淄州（今山东淄博）有一位隐士王樵，他也给自己修了一方墓，号称“蜚室”。

二三十年之后，新任知州要表彰隐逸，想拜祭王樵墓，却发现那地方“已构屋为民居”^[1]，已经盖上房子成为民居。幸好，王樵还有个外甥，把他的坟墓迁到了更偏远的地方。

严格说来，王樵构筑蜚室的地方，跟齐白石所选择的墓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齐白石的墓地选在了近代城市的公共墓地中，而王樵构筑蜚室的地方是在淄州城里。也就是说，传统时期的城市之中，其实有很多“非都市化”的地块。

比王樵略晚，11世纪80年代，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筑“东坡雪堂”，自此从庙堂才子升华为中国人人格美的典范，成为“苏东坡”。苏轼在东坡，日子过得艰苦而乐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能够盖五间房子，还能种稻，种一百多棵桑、十多畦蔬果，“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农庄了。那么这个小农庄在什么地方？黄州城中。同样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谈道：“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2]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黄州·景物上》说“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距离

知州衙门一百多步的地方，竟然能找出十多亩空地，这黄州城的城市面貌肯定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样。传统的城市之中常有空地，都市之中亦有乡村或者说“非都市化”的地块，这是传统城市的第一个秘密。

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城市的性质密不可分。城市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城”指城堡，《墨子》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城具有军事防卫功能，是政治控制的中心。“市者，买卖之所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兼具政治控制、军事防卫与经济中心的功能，最核心的是政治控制功能。帝制时期的中国城市首先是政治和行政中心，行政区划决定了城市的层级和分布。比如北宋时期，东京开封为一国之首都，这是最高级别的城市；次一级是18个转运使司所在的州城，这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对本路的其他州县具有辐射功能；再下一级是333个州城，这是本州的中心；最下一级是1234个县城，这是本县的中心。^[3]这种政治与行政而非经济主导的城市特质，决定了有的城市经济生活发达，有的城市经济生活沉寂。像黄州那样有东坡可供耕作的城市，直到近代仍然存在。沈从文的小说《山道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县城——此地距离贵州有五天的路程，“本县城内共计一百卅二户，大小人口三百四十四人，还将县长本身算在这一个数目里面。”县长连个办公室也没有，住在一间小客栈中，“每天到一个旧庙中审点案，判断一些小生意人的争持，晚上就回到小店中的住处来吃饭睡觉……作县长的五日一场才有新鲜猪肉吃”^[4]。这一类的小县城，在传统时期曾经更广泛地存在。



图四七：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版）（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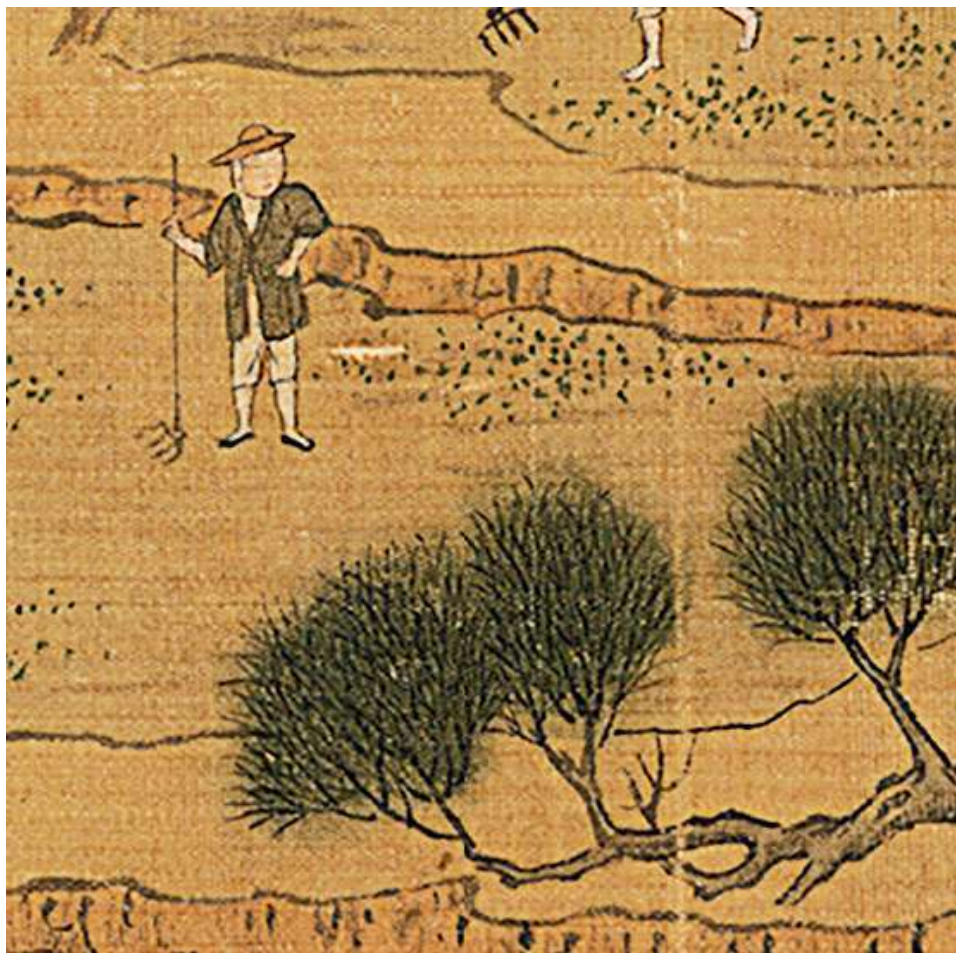
古今奇观尽在台上



地头卖茶水的小摊



奶奶领着孙子来田间送饭



歇口气接着干

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前半段，我们可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一处临河空地上，散落着几方农田，农田一侧的戏台上正热热闹闹地上演戏剧，台下观者甚众，点评者也不乏其人。其间还有抱小孩者，有卖凉茶者。或是台上戏剧颇为有趣，引得田里耙地的农人也忍不住停下来叉腰观戏。戏台旁还有专为达官贵人设的观戏雅座，这熙攘热闹的场景似是在城中才能看到，但旁边散落的农田又让人感到此地是在郊区。这便是传统城市的一个秘密——城市之中常有空地，都市之中亦有乡村或者说“非都市化”的地块。仇英所绘的这几垄散落在城中的田地，便是文中讲的“非都市化”地块的真实写照。

传统城市的第二个秘密是关于城墙的。通常认为，传统时期的城一定有

墙，不但有墙，墙外面还要有护城河——被墙圈起来的地块儿才叫“城”。但是，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却在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关于城和墙关系的传统认识可能只是一种靠不住的刻板印象。研究指出，“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治所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期才开始大量筑城”，而在“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中，主要以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为主，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圯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的常态”。^[5]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中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中的不同地域，城与墙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战时和边境地区，墙是必须的。比如北宋的河北诸州，在澶渊之盟以前，主要靠城墙防御，辽兵打过来，人员物资退入城里，坚壁清野，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又比如，“明初修筑了大量卫所城市以及与卫所同城的府州县城，永乐至天顺时期社会安定，筑城数量很少，成化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全国开始普遍筑城”。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则促使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联合，共筑城防。边境需要城墙，内地则憎恨城墙。新政权削平群雄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拆除新并入州的城墙，以防再度形成割据势力。比如北宋打下太原、兼并北汉之后，就曾下令拆除当地的城墙。而蒙古人“在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就已经有意识地采取毁城政策来防止当地人民的反抗”，元朝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则是“毁城与长期禁止修城的政策”。在接纳了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总结传统时期城与墙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城都有墙，当然，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保持对传统城市的经典印象。

传统城市的第三个秘密是关于坊市制的。唐长安是坊市制城市的典范，其特点首先是空间上的区隔有度，宫城和皇城（中央政府办公区）位于城市的北部中央，宫城南门的朱雀大街向南一直延伸到京城的明德门，将整个城市分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被相对均匀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和两个市，东区有东市，西区有西市。其次是坊与市在功能上的严格分工：坊是居民区，仅供居住；市是商业区，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都在市中进行。最后是整个城市在时间上的统一管理，坊和市都建有围墙，坊门与市门均按照统一的时间开合。《大唐令》规定，坊设坊正，“掌坊门管钥、督查奸非”。

通常认为，坊市制从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开始，以唐代的长安最为典型，坊市制的城市相对封闭，追求控制，具有中古时期的特征。而北宋开封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城市的出现。在开封，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就像现在一样，任何客流量足够产生利润的地方，都可以进行买卖，各种店铺临街而设，京城最宽、级别最高的御街两旁的御廊，原本也是允许“市人买卖于其间”的，直到徽宗时才禁止。御街一直向南，过了州桥，两边都有住家，住家与店铺杂错分布。街东的名店包括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过了州桥往街西去有一条大街，名叫“曲院街”。曲院街南有遇仙正

店，装修豪华，前有楼子后有台，开封人叫它“台上”，店里的酒美而贵，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曲院街北有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从这里再往西去就到了“院街”，也就是“红灯区”。这一段“北宋东京旅游指南”，出自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种城市布局所带来的逛街的感觉，是现代人非常熟悉的。

同样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还有早市、夜市、鬼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焦酸饘、猪胰胡饼、和菜饼、灌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6]北宋的开封与洛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先有夜生活的城市。灯光已经成为酒楼正店招徕酒客的手段，白矾（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7]。洛阳的花市也是要到天黑以后，在莹煌的灯烛之下，才渐入佳境，“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8]。多少年以后，在临安的熏熏暖风之中，宋人仍然在怀念甜甜的东京夜色，“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9]。



图四八：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左段，我们可以看到一座气势雄伟的城门。通

常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城一定有墙，不但有墙，墙外还要有护城河——被墙圈起来的地块儿才叫“城”。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我们对城和墙关系的传统认识或是一种刻板印象：其实并非所有的城都有墙。我们看到的这座城门两侧，直接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有一座桥，桥上各色行人穿梭往来，络绎不绝。顺便说其中一个有趣的画面：桥上有两人与一只毛驴正奋力拉着一辆满载的独轮车往外运送货物，车上的货物被一块写满书法的布盖着。据说，这是当时因为党争被抄家，从官员家中抄出的财物。而这块布，很可能是从一块屏风上揭下来的绢。同时，我们还可看到桥上有一高一矮俩乞丐，正在向临河观景的人行乞。此段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汴京城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街角一景。



车夫与毛驴正奋力将抄家抄出的财物往外运送



官人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点儿吧



图四九：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一段类似北宋东京旅游指南的文字：……街东的名店包括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过了州桥往街西去有一条大街，名叫“曲院街”。……从这里再往西去就到了“院街”，也就是“红灯区”。这段生动的文字所描述的街景，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具象化的体现：街面上开设有各类店铺——酒楼、食店、香铺、茶铺、肉铺，以及红灯区的青楼等。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熙来攘往，逛街的人中各色人等都有——骑马出远门的、挑担随行的、牵马开道的，站着交谈的书生与和尚，负经笈而行的苦行僧，赶着驴车的车夫等，隔过画面仿佛能听到熙攘鼎沸、高低起伏的街市声。汴京城的布局所带来的这种逛街的感觉，是我们现代人再熟悉不过的了。

在通常的历史讲述中，从唐长安到北宋东京，是中国城市革命性的进步，唐长安以控制为第一导向，实行具有中古色彩的坊市制，北宋东京呈现出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大都市的面貌。近年以来，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这种说法也遭到了挑战。学者发现，第一，北宋东京所在地的汴州，在唐代作为州一级的城市，可能本来就不曾存在过像首都长安那样严格的坊市制度，所以，就北宋东京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不存在一个“坊墙倒塌”的过程——既无坊墙，何来倒塌？第二，唐代长安，在东市和西市以外的地方，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比如，邸店可能一直都有，再比如，唐代后期已经出现了推倒坊墙、临街开市的做法，尽管政策并不鼓

励。但是，不管汴州在唐代的城形态如何，也不管长安的其他区域是否存在零星的商业活动，唐长安与北宋东京这两座城市在空间布局、功能区分和时间管控方面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讲述“坊墙倒塌”的故事。

[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王樵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40页。

[2]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一《尺牋·与李公择十七首之九》；卷六〇《尺牋·与子安兄七首之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9、1829页。

[3]北宋宣和四年，共计351州，1234县。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页。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页。

[5]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见[日]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6]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马行街铺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

[7]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页。

[8] [宋]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七《游花市示之珍》，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94页。

[9] [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清]管庭芬、蒋光煦补：《宋诗钞初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8页。

“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

中西比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比较，我们希望在他者的映照之下，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或者奋起直追精神的，也是“比较”。比如说，谈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学者，常常会拿宋代东京与同一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相比较。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在一百二十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城市巴黎在13世纪的时候，人口才刚刚达到二十四万；僻处一隅的伦敦12世纪的人口是三万，13世纪达到了四万五千人。就城市面貌而言，欧洲城市更是无法与北宋东京相比。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在缝隙处填着稻草。火一直是个安全隐患”^[1]，拥挤、肮脏，给人的感觉实在谈不上愉悦。而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富庶华丽得如同天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不惜笔墨，用绮词丽句来赞美东京的繁华：“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空气里飘荡着美妙的音乐，街道上绿柳繁花，茶坊酒肆里，男男女女衣着体面，季节流转，风雅变幻，夜色阑珊，意兴不减。“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所有器具皆为银制，全部加起来“即银近百两矣”。近百两银子的家什，就这样随随便便摆出来招待普通客人，这是何等的富足与文明自信。宋太宗的女婿柴宗庆写过一句俗诗，“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梁园指的是开封，开封以外皆农村，这是柴驸马的自傲。相比开封，同时期的伦敦就气派而言，的确是个村儿。

以数字来看，就人口和物流规模而言，北宋东京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足的城市。但是，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只有鲜花、音乐和美食？百万人口的城市，饮用水源的问题怎么解决？燃料从哪里来？生活垃圾、粪便和污水怎么处理？同样是木结构的房子，伦敦存在火灾隐患，规模更大的东京又怎么可能不着火？这些“月亮背面”的问题，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是不可能看见的。

《东京梦华录》是北宋人南渡之后，对故都旧日美好的追忆，它在本质上是一场甜甜旧梦，不太可能触及东京城市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即便是谈到问题，它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叙述方式。比如关于火灾，《东京梦华录》的叙述重点是防火的制度：在每一个坊巷之中，隔三百来步就设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这是地面的火警和治安巡逻系统。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还有砖砌的望火楼，楼上有人守望，这是空中

立体监测报警系统。望火楼下是潜火队的营房，潜火队规模达百余人，所配备的救火家什包括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铁钩）等等。潜火队由军人组成，每当有火灾发生，全由军人扑灭，“不劳百姓”。望火楼不仅都城有，其他大城市也有。南宋末年的诗人、乐师汪元量的组诗《湖州歌》记录了一群宫廷表演艺术家被元人掳往北方的悲惨经历，其中的第四十二首这样写道：“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儿女泪交流。淮南渐远波声小，犹见扬州望火楼。”扬州的望火楼是亡国奴眼中对江南的最后一瞥。这是后话。

以北宋东京为代表的这套包括地面巡逻、高台瞭望和消防扑救在内的救火制度，的确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开封是否真的就由此避免或者减轻了火灾对城市生活的巨大伤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三鼓时分，也就是深夜十一点，大火从荣王元俨的府邸烧起，一直烧到“翌日亭午”，也就是次日中午十二点，宋朝的左藏库、皇帝直接支配的内藏库和国家图书馆都遭到了惨烈破坏，“祖宗所积……一朝殆尽”。研究表明，“宋代城市火灾之普遍，破坏之惨烈，对城市民生影响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2]。烧毁民舍超过万家的火灾，据史料所见，唐代仅有两次，而南宋仅临安府在建都的一百五十余年，就遭遇了七次；烧毁十万家的超大火灾，在宋朝也不是没有的。火灾如此频发，以至于寓居在临安邸舍之中的候选官员只得把官员身份的认证文件——诰命和敕书随身携带，生怕被一把火烧了，前程无着。宋朝火灾比前代多发且破坏惨烈的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建筑的密度更高了；第二，大部分城市平民的居所仍然是茅草房，防火性能差；第三，与唐宋城市形制的变化有关——夯土筑成的坊墙本来兼具防火墙功能，最起码可以把火灾控制在一坊之内；而宋代城市普遍没有坊墙，万一扑救不及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蔓延。

火灾给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东京梦华录》是不会记载的，而主要依靠这类书籍所建立的东京意象或者说宋代城市繁华意象，也像是那些著名旅游景点的“某某印象”演出一样，华丽喧腾，不落实地。按照常识推断，现代城市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宋朝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越来越多地展露在我们眼前。想要通过史料钩沉看到宋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可以读一读包伟民教授的《宋代城市研究》，它让我们对宋代城市的认识终于从“梦华”落到了地上。

城市化过程中，另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生活污水的处理。尽管考古学家从南宋临安太庙两侧挖出了砖砌的排水沟，但总体而言，宋朝的城市尚未建立覆盖整个城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是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则用渗井。开封新城和旧城的排水沟共计二百五十三条，污水直接排入黄河，为了防止居民倾倒灰土等生活垃圾堵塞排水沟，

1026年，开封府开始派专人巡逻守护。这些排水沟，还要定期淘泥维护，以保障畅通。淘渠在每年春天进行，这给沿渠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时不便，梅尧臣就曾经写诗抱怨说：“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塍，当途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屈曲措足高复低，芒鞋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啼。”^[3]尽管如此，淘肯定还是比不淘好。

“盖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生活污水淤积是导致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总结出来的。欧阳守道是江西吉州人，他从吉州的教训中发现了地方长官作为、城市污水治理与本地瘟疫发生率之间的关系。欧阳守道清楚地记得，端平二三年间，福州人林长官治理吉州，最重视下水沟渠的问题，“疏通浚导之后，民无疫者数年”。后来，豫章（南昌）人李知州、于潜（浙江）人徐知州相继担任吉州知州，欧阳守道每年都提醒他们沟渠疏通的事情，这两位也做，但是不如林知州做得彻底，即便如此，“病者亦少”。自从徐知州之后，“郡政不复及此”，州政府不再疏通城市下水道，其危害有目共睹：“沟渠不通，处处秽恶，家家湿润，人之血气，触此则壅，气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達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则安得不病？”^[4]欧阳守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当新到任的王知州请求他为本地发展献计献策的时候，欧阳守道就写了一封极长的信，我们也因此得知了吉州知州与下水道和瘟疫之间的关系。

读此长信，令人颇多感慨。第一，福州人林知州（三山林侯）、南昌人李知州（豫章李侯）、于潜人徐知州（于潜徐侯），以及后来在下水道问题上不作为的长官们，都已经离开了吉州，他们和吉州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相处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做得好不好，吉州人民自会记得。欧阳修说，做地方长官，关键是要老百姓满意，这实在了不起。第二，各位长官在吉州是来做官的，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让中央满意以便获得升迁；吉州百姓却要在这里把日子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过下去。然而，吉州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长官决定的。第三，疏通全城的下水道，不是一两家土豪就能完成的，即便像欧阳守道这样有影响力的地方士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完成；土豪能做的是逃往更干净的地方，吉州“十数年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第四，下水道所导致的城市卫生问题，汉代的郡太守是不会遇到的，当时的城市，人口规模、房屋密度都还不足以引发此类问题。吉州的各位长官遇到的，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宋代的中国城市的确获得了不同以往的新发展，当然，也出现了新问题。问题的存在，并不减损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的成就；了解古代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城市发展与环境、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欧阳守道有没有读过梅尧臣那首抱怨淘渠的诗，倘若读过，他一定会羡慕北宋的东京人，淘渠只得一时不便，不淘渠却是有可能要死人的。

[1] [美] 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著，杨宁、李韵译：《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 参见包伟民：《试论宋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载[韩]《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

[3] [宋]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61页。

[4] 欧阳守道：《与王吉州论郡政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〇〇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册，第349页。

《李娃传》里的城市生计

大部分人的历史知识是从通俗文艺开始的，通俗文艺的传统形式包括小说、戏曲、评书、相声等，其现代形式则包括电影、电视和网剧等。通俗文艺的核心目标是讲故事，以情动人，它要吸引、打动的人是当下的读者、听众与观众。因此，通俗文艺编故事的基本逻辑和常识背景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历史只是一个幌子，通俗文艺不追求历史知识的真实可靠，只要不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来就没问题。

正因如此，历史学者通常不会计较同时代通俗文艺作品中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以考据严谨、结论谨慎为特征的职业训练，会让历史学者显得拙嘴笨舌，唯恐说错，遇到一点儿疑问就要回到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依据。但未知的范围取决于已知的边界，这是历史学者从多年专业训练中得到的最大教益，所以，对同时代通俗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知识，历史学者通常该看看戏，图个热闹，不去较真儿。但是，历史时期的通俗文艺却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因为它构成了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其中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可能不真实，比如主人公和具体情节可以是虚构出来的，然而故事发生的常识背景、主人公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却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作者（不一定是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时代普遍性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搞清楚作品产生的年代之后，历史学者可以放心使用通俗文艺作品作为还原历史真实的对象。

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李娃传》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莺莺传》内容性质接近，都是科举路上士人与女性之间的爱恨情仇。只不过《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莺莺的形象始终是被动的；而在《李娃传》中，妓女李娃的形象则是主动而大气的——她与郑生之间的关系，始于虚伪的钱色交易；床头金尽之后，李娃伙同鸨母用欺诈手段无情地抛弃了郑生；然而，就在郑生贫病交加流落街头的时候，李娃良心发现，生出真怜悯收留了郑生，并为他出钱买书，供他准备科考。当郑生高中，重归上流社会的时候，李娃又主动提出离开；而郑生却在父亲的支持之下，将李娃明媒正娶，二人共同分享了荣誉、地位和前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人性的善良战胜了良贱壁垒和门第观念。到了宋朝，随着中国进入科举时代，这种科举路上的姻缘故事变得更为流行，由此以至明清，一代代讲下去，不断有属于时代的新内容加入；但是后来的类似故事，却很少有如此圆满磊落的结局。每个人都激发出善良，善良成就善良，这样的故事，后来已鲜有人讲了。

我之所以喜欢《李娃传》，并非因为它善良圆满的结局，而是它所记述的

唐后期长安城里形形色色的职业生计。郑生初到长安，住在布政坊的邸店中，迷上李娃之后，就搬到了平康坊李家，起初以租住名义入住，后来就合为一家。他因被李娃算计，从宣阳坊李娃“姨母”家仓皇回到平康坊，发现李家大门已经上锁，锁上还加了封泥。此时天色已晚，坊门紧闭，郑生无奈，只得脱下衣服来“质馕而食，赁榻而寝”。次日，郑生转去宣阳坊再寻“姨母”，已是人去宅空——原来那豪华的大宅子是骗子租来设局用的，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由此可见，在实行坊市制的长安城，房屋租赁和邸店服务业仍然是各坊都有的，而且租期相当灵活，长租、短租皆可。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行当，《李娃传》中最有趣的行当是丧葬服务业——凶肆。走投无路之下，气得发疯的郑生回到了布政坊的邸店，这是他刚到京城的住处。住下之后，郑生怨恨难平，心病引发身病。邸店主人担心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凶肆之中。凶肆虽经营丧葬服务业，却也收留垂死之人，不知是何道理。不管怎么说，在凶肆从业者的安慰、照顾之下，郑生身体渐好，并且开始在凶肆打工。起初就是打打幡，赚点生活费。在这个过程中，郑生的一项特殊才能——唱哀歌得到了充分挖掘。起初，他是一边打幡一边听别人唱，因为胸中有块垒，直听得“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回去之后就学着自已唱。要知道这郑生是何等聪明，又有文化，理解力强，久而久之他便“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高门大姓出身的落魄书生成了长安凶肆的头号哀歌手。

长安城实行的是坊市制，主要的商业经营活动都在东西两市举行，凶肆也有两支队伍，东肆和西肆。东西两凶肆之间的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竞争主要在两个领域发生：一个是送葬器具，比如车舆；另一个就是哀悼演出，特别是唱哀歌。东西两肆决定在天门街举行公开比赛，赌注高悬，一较高下，于是《李娃传》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出现了。

唐帝国丧葬界最高水平的比赛如期举行，数万群众围观。比赛从早晨开始，首先是丧葬器具的展演，东肆一直力压西肆。到了中午，哀歌比赛正式开场。首先出场的是西肆，他们在舞台的南面搭建了数层高台，一位长须飘飘的歌者在众人的簇拥下“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哀歌本来是西肆的专长。长髯歌者唱罢，顾盼左右，旁若无人，以为必胜。过了一会儿，东肆长亲自在舞台的北面铺设了长榻。一位清瘦少年，头裹黑巾，在五六个手举羽翳的同伴护卫下，缓缓登台，整顿衣裳，唱起了古老的挽歌《薤露》，声音清越，响振林木，一曲未终，听者皆已是唏嘘掩泣。高下已见，西肆长为众人嘲笑，羞愧难当，把赌金偷偷放下就溜走了。故事展现了长安城里丧葬业的存在与竞争，古人重视葬礼，也重视婚礼，既然有凶肆，想必也应当有喜肆。

这清瘦少年便是郑生。郑生在凶肆的哀歌比赛上出尽了风头，也暴露了他的行藏。到长安来述职的父亲由此发现了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儿子。被

传统门第观念支配的父亲，完全没有幼子失而复得的喜悦，而是感到了莫大的羞耻。一流高门荥阳郑氏的子弟竟然沦为卑贱的凶肆歌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父亲把郑生带到僻静之处，处以私刑，鞭打至将死，弃之而去。郑生的命运自此跌落至谷底，直到被李娃收留，才重获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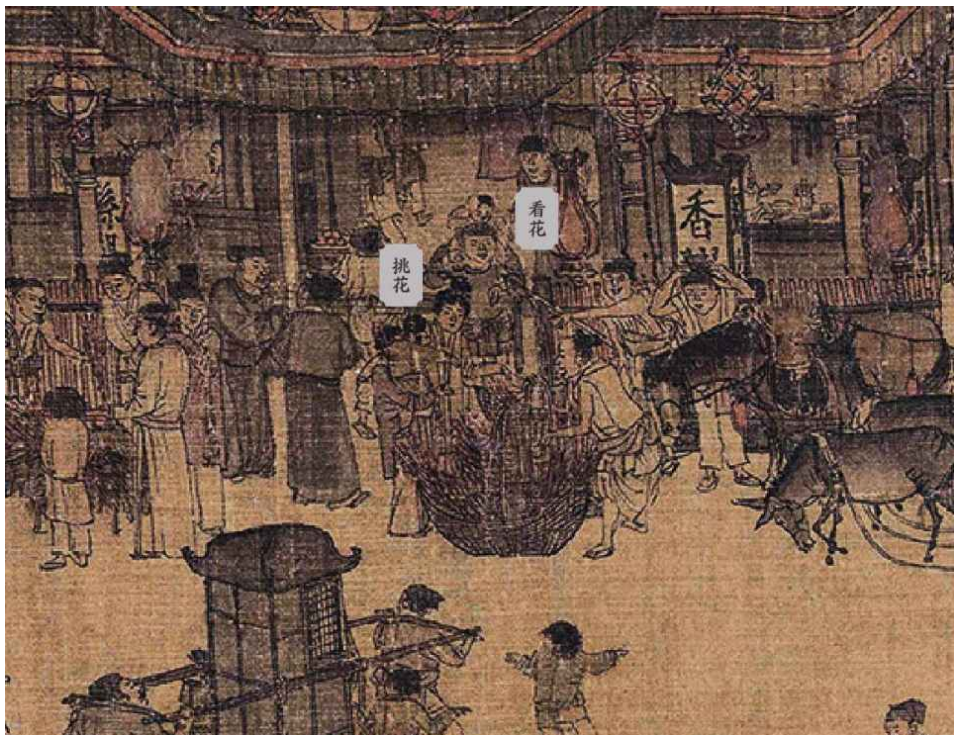
一年以后，在李娃的精心照顾下，郑生恢复了健康，李娃又套上香车，郑生骑马随从，一起来到了“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旗亭，市楼也”，指市场中的望楼。“鬻坟典之肆”是卖书的地方，唐代后期，雕版印刷还没有用于印制儒家经典，这些书摊上贩卖的，还都是抄本，因此弥足珍贵。郑生买一次书，竟然要花费百金，可见价格之昂贵。

由上述可知，在《李娃传》中，我们看到了唐代长安的房屋租赁业、邸店业、丧葬业和抄本书籍售卖业的基本业态，当然，还有李娃最初所从事的行当——情色娱乐业。这些为城市生活而生的服务业，在宋代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繁荣。

比如，园艺在宋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能赚钱的行当。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在开封、洛阳、扬州、杭州等大城市，花卉的种植、观赏和销售已经成为产业，“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扬之人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故开明桥之间，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1]花开时节，私家花园也对游人开放。“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至花落乃罢。”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虽小，也常有游人，守园人“积游赏者所得”，盖了一间公共厕所。洛阳与开封之间，甚至有鲜花快递，一名衙役乘着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籍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当然，这样的鲜花快递仅限于知州巴结皇帝，跟普通人的美好生活关系不大，当时真正优秀的官员也是不屑于此类行为的。蔡京知扬州，模仿洛阳作“万花会”，热闹非凡；苏轼到任，正遇花时，看档案发现花会“用花十余万枝，吏缘为奸”，宣布取消，“人皆鼓舞欣悦”。^[2]花要好，必须经过嫁接。所以，那些拥有超高嫁接手艺的接花人就成了达官贵人们争相延聘的对象，接一头花五千钱，秋天签合同嫁接，到春天花开付账。

再比如，就饮食业而言，北宋东京不仅店铺林立，而且层次齐全，可以满足不同经济状况的食客的需要。大的酒店、酒楼又称“正店”，正店七十二家，是开封饮食业的龙头。它们自酿美酒，自行零售兼批发，又卖下酒茶饭，酒器精美，美食、美酒、美器三美合一，更有妓女歌笑助兴，是“侍从文馆士大夫”燕集、游息的上佳去处。正店之下又有食店，供应饭菜，疗饥解饿，食店分为三大流派——分茶店、川饭店和南食店。食店之下，是专营某一种食品的小吃店，比如馄饨店；又有饼店，制作、出售各种

蒸、烤面食。开封饮食业的最底层是摆摊、提篮售卖的各种小吃。诸宅舍宫院之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鹌、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爌、香药果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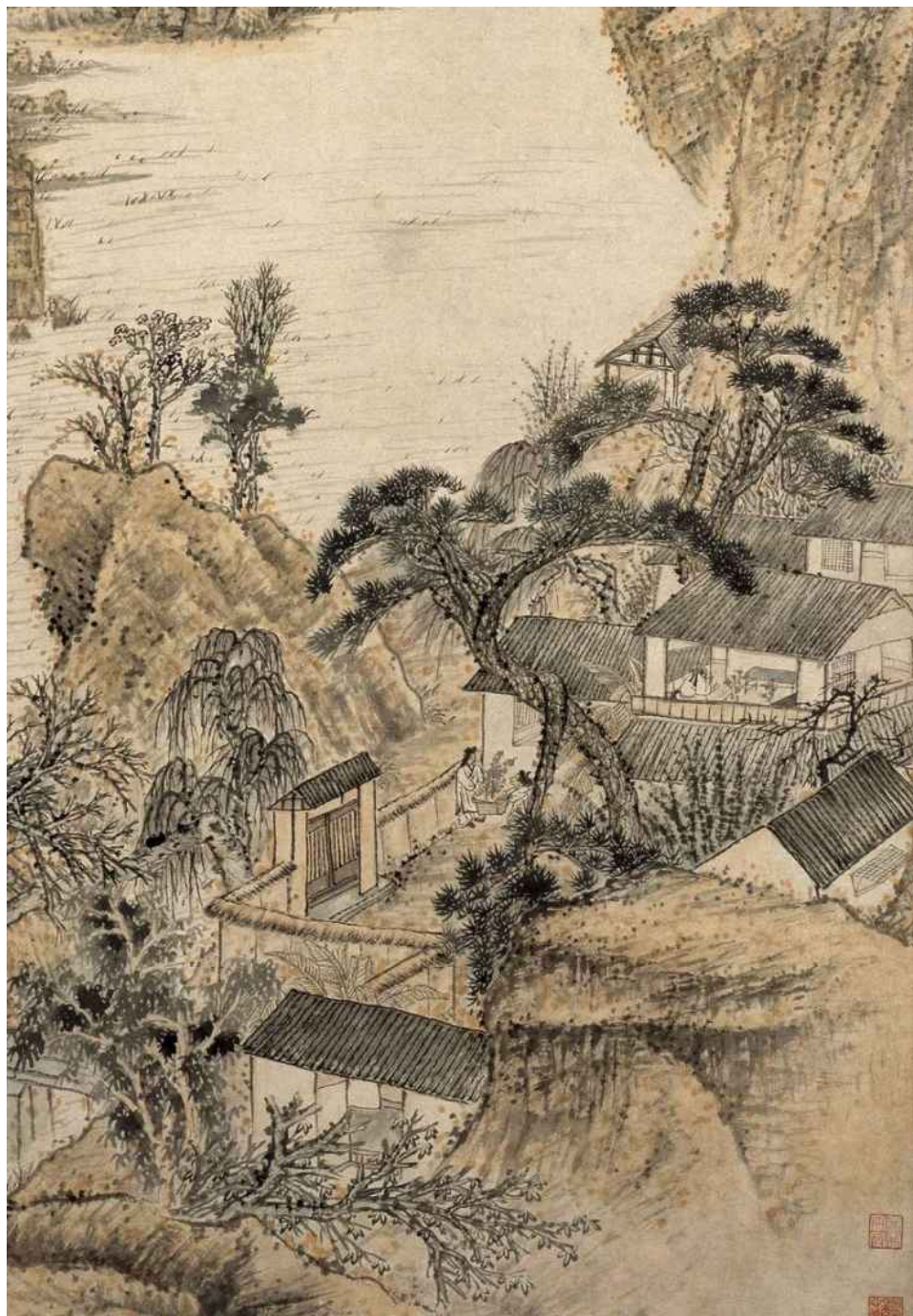


图五〇：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孙羊正店门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副担子，里面究竟放的是什么呢？放大细看，原来是一副卖花的挑担，里面摆放着一束一束的鲜花。在汴京城郊，有很多花农种植花卉，等到了花季，他们就用担子将各色即将绽放的花卉挑到城里来卖。一位头盘芙蓉发髻、身着对襟长裙的少妇正在花担边挑选花，一旁的奶奶怀抱幼女，这个头上扎着小发髻的女孩儿仿佛正急不可耐地用手指着说：那朵好看，我要那朵。在她们身后，有一位脖子上架着个小男孩儿的身形魁梧的男子，此男子正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五口正在挑花的场景格外生动。园艺在宋朝已成为一个非常能赚钱的行当。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在开封、洛阳、扬州、杭州等都市，花卉的种植、观赏和销售已成为产业，画中便形象地反映了汴京城花卉业兴旺发达的态势。

除了餐饮业，宋朝还出现了“宴会假赁”这个新行当。执业者又细分为“四司六局”，四司指帐设司、茶酒司、厨司、台盘司（白席人），帐设司管“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茶酒司负责饮料供应，厨司管“吃食下酒”，白席人管“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有着相当严格的行业规范。开封人享其便利，“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3]

有如此发达的服务业，宋代的城市已经俨然是现代模样。



清 石涛 《对菊图》

[1]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2]参见〔宋〕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九，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9页。

[3]参见〔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筵会假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7—418页。

行天下熙熙



道路的性格之“关”

“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行”的主体可以是人员，可以是物资，也可以是信息，比如一封信，一个消息。“行”的本质是在时间中实现空间距离的跨越，因此，速度是“行”的关键，它决定着“行”的实质效果和人们对“行”的心理感受。从北京到杭州近一千三百千米，高铁最快四个多小时到达，周末赶去西湖看看孤山的梅花，喝一杯茶，周一就可以赶回来上班；若按照唐宋时期官方规定的旅行速度，步行或骑马一天走五十里，需要五十二天才能到达。“从前慢”，是真的慢；“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真的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是真的远隔。

影响速度的因素包括道路状况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水平。工业革命以前，水路是最舒服的长途旅行方式和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向东流，缺乏南北向的自然水道，开凿运河因而成为沟通南北、连接帝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手段。宋代，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条件。陆路交通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车和马方面，特别是马，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匈奴人那里学到了骑兵作战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4到5世纪，马镫的推广使用标志着骑乘使用马具的完备，“在军事上，它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也更自如，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使许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也能很方便地上下马和驾驭马，甚至妇女也能稳骑马上。骑马者的姿势也由以前的踞坐式改为挺身直腿”^[1]。“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虢国夫人的马上英姿，便得益于马镫的使用。

西周以来的贵族居家食肉，出门坐车，孔子虽然极爱颜回，却拒绝卖车给颜回操办葬礼，因为车是他下大夫地位的标志。西晋的美男子潘安出门，道两旁围观的女子们纷纷往他的车上扔水果，潘安就这样被一路欢呼着、满载果香回了家。北朝经隋唐至北宋，官员骑马上朝。唐宪宗时，藩镇派人来刺杀主张削藩的政治家，宰相武元衡被杀，御史大夫裴度连中三剑，从马上摔下来，保住了一条命，继续坚持强硬路线，最终迎来刘禹锡所赞美的中兴局面：“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2]坐轿被王安石认为是非常“不道”的事情。王安石退休回金陵之后，出门骑驴，只一小童随侍，根本看不出来是做过宰相的人。他的老对头司马光晚年病重，得到太皇太后特许，可以乘轿子上下班，这是特例。坐轿成为官员出行的常态要到南宋以后，南方潮湿路滑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越往南去，马也越不容易养了。大规模养马需要草场，也需要相应的人才，唐代前期会养马的官儿，多半是北方游牧民族出身。

《诗经·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赞美周的道路平而直。其实那种土筑的路坚硬程度非常有限，而当时的车轮为木制，硬度较大。雨雪天里，不用太久车子就会在路中间形成两道辙印，如同凹陷的铁轨，轨制不同的车走在上面极易颠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布“车同轨”的政令，为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秦汉帝国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将首都与各大经济区联系起来，后世又不断地丰富发展。



图五一：五代 郭忠恕 《雪霁江行图》

《雪霁江行图》，五代郭忠恕绘。绢本墨笔，74.1厘米x 69.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所绘的是大雪初霁，船夫们辛勤忙碌的场景。作

品以界画方式精妙入微地勾勒了两艘大型漕船的轮廓，船上的舱室、窗格、物资、甲板、橦桅、纤绳等绘制得纤毫毕现，甚至可以看到船身上的雕花纹路。高耸的桅杆在过桥时可放倒，过桥后再竖起来。劳作的船夫们，有的奋力撑篙，有的搬运物资，有的袖手而行。我们看到船一侧吊着一捆竹竿（用来减缓靠船时的冲击力，类似今日船帮捆轮胎的作用），系着一艘小船，船尾还挂着用来操控船舶航向的升降式平衡舵，无须改变航向时，升舵以减少阻力；若要改变航向或风浪大时，降舵至最低，以保持航向并减轻船体的晃动幅度。由此看出，画家体察生活细节时的用心与精湛入微的画技。在古代，水路是最舒服的长途旅行方式和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大江大河向东流，而开凿运河与发展漕运，成为沟通南北、连接帝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手段。通过此图，我们可对此情景有更清晰的了解。

道路之上，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交通制度——关与驿。关的目标是控制和管理，“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3]，它代表着道路谨慎提防的一面，负责审查那些试图进入中原、靠近首都和中央的人，以保护“内核”的安全。

关往往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门户上。唐代“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焉”。^[4]六个上关是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这六个关所包围的，就是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李白《蜀道难》诗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一语道破关的奥秘。秦末大乱，南海尉赵佗下令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绝道聚兵自守！”^[5]又发兵兼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王。三关“绝道”，切断中原乱兵南下的通道，是赵佗割据岭南的关键。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贰师城取善马，李广利西征受挫，只得撤回敦煌，向武帝报告说道路遥远，军粮不继，请求暂时停止行动，增兵再战。武帝“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斩之”。^[6]李广利无奈，只得滞留敦煌。一使者“遮玉门”便可阻挡千军万马，所凭借的当然是皇帝的权威，关的门禁作用也跃然纸上。

关的日常工作包括控制人员往来，查验违禁物品，以及缉拿罪犯。



图五二：明 唐寅《关山行旅图》（局部）

《关山行旅图》，明代唐寅绘。纸本设色，129.2厘米x46.3厘米，现藏北

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主体是一城郭的关门。画中晨雾弥漫，虬枝枯树交错散落道旁，山路从关门蜿蜒向远方，四围静寂。在这萧瑟荒凉的关门前，一位风尘仆仆的赶路者肩负行李，行色匆匆，正欲过关。古代关城多设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门户上，正如图中所呈现。唐代“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六个上关是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这六个关所包围的，就是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从画中，我们对明代拱券式关门与古代关隘的门禁作用有了进一步认知。

唐代规定：“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7]在汉代，严格控制出入关的物品包括马匹、金铜、弩机等，其中，对马的控制是最严格的。然而，走私在所难免。《后汉书·鲜卑传》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遁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走私的武器和偷渡的汉人，被认为是鲜卑武力和智力水平提振的重要原因。

大侠走到关门，迎面撞见捉拿自己的海捕公文。这样的状况是有可能实际发生的。汉代的金关发现了一则通缉令，原文如下：

诏所名捕平陵长藿里男子杜光，字长孙，故南阳杜衍□，多□，黑色、肥大、头少发，年可卅七八，□□□□五寸□□□杨伯初亡时，驾驪牡马，乘阑輦车，黄车茵，张白车篷，骑驪牡马。因坐役使流亡□户百廿三，擅置田监史，不法不道，丞相御史□执金吾家属所，二千石奉捕。^[8]

这位违法犯禁的杜大侠，年纪已经不轻了，头发也掉得厉害。

需要过关的长途旅行，必须获得旅行证明。汉代平民常用的通关文书叫作“传”。《释名》这样解释传的含义：“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亦曰‘过所’，过所到关津以示之也。”过所一直沿用到唐朝。在唐代，旅行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过所，这是普通旅行者的旅行证，由户口所在地的州一级政府颁给，在外地旅居的，由旅居地州政府根据原籍所颁发的旅行证明给过所，“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第二，行牒，“出塞逾月者，给行牒”，出国旅行，所持的旅行证明叫作“行牒”；第三，长籍，“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猎手长期在外，因此需要特殊旅行证“长籍”。以上是平民的旅行证明，由于公务原因而引发的旅行，则有特殊证明：“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讞。”^[9]外国客商在入境关检查登记、缴纳税费，其余的关就不再重复收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定。没有证件私自过关者，属于违法偷渡行为，“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10]。唐僧玄奘法师当年西

行求法，就是私渡出去的。他取经归来之后，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唐太宗的亲切接见，二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11]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过所公文是怎样证明持证者即为本人？汉代的旅行公文上要标注持证者的个人身份、年龄、身体特征、居住地，以及随身所携重要物品的名称特征，过关之时，关吏不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现场查验，而且还要抄录相关内容，以便旅行者返回时核对。比如，汉代肩水候官遗址出土的一枚简牍上面是这样写的：“书佐忠时年廿六，长七尺三寸，黑色，牛一车乘，第三百九十八，出。”^[12]这是一则出关记录，编号三百九十八，出关人职业书佐，姓名忠时，年龄二十六岁，身高七尺三寸，肤色黑，驾着一头牛拉车出关。唐朝人唐益谦从西州去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津等关”，他向西州都督府申请过所的牒文，详细记明他带有二奴、二婢、八匹马、四头驴，对马匹的毛色、齿岁、牝牡等也都一一详细说明。^[13]传统中国的文书行政发育之早、之成熟，真是令人感叹。



图五三：元 佚名《山溪水磨图》（局部）

《山溪水磨图》轴，元代佚名绘。绢本设色，界画。152.3厘米×96.3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陆路之关为“关”，水路之关为“津”。提及古代“津渡”，我们便想到《山溪水磨图》轴下半段车夫牵牛拉车涉水渡河的情景。我们看到，画中每辆车都由两头牛牵拉，为保证平稳渡河，几位光着膀子的车夫全力牵着往前冲的牛，前车已上岸远行，后面的才刚涉水。从他们奋力牵牛的姿态可看出行路之艰难。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以界画绘制的篷车，车辐清晰，木纹可辨，由此可见绘者精湛的绘画技艺。

陆路之关为“关”，水路之关为“津”。关津之官，在唐代的官员职业管理中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关津官员的最高评价标准是“讥察有方，行旅无壅”，又能防范奸宄，稽查非违，又能保障商旅的畅通，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走向首都的人，行至关前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那一刻，他仰望关城感到的是政权的威严。对那些将要出关的远行人来说，关则意味着强烈的愁绪。王维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韩愈左迁潮州，行至蓝关，以诗示侄孙韩湘，追思被贬之由，语气尚且豪迈，遥想前路烟瘴，则不免心生悲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道路上，除关之外还有一种制度设施，那便是驿。驿为行路人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工具之便，为各级官府转运文书信息，代表着道路沟通、交流、开放的一面。

[1]孙机、张正涛：《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见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2]刘禹锡：《平蔡州三首》其二，见[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65页。

[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页。

[4][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67页。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9页。

[7]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页。

[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号183.13，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9]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尚书省·刑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0—1201页。

[10] 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八《卫禁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40—641页。

[11] [唐] 慧立、彦惊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8页。

[1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号280.3，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

[13] 参见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4—225页。

道路的性格之“驿”

驿站是古代传递公文的官员中途换马、休息之处，“站”这个词到元代才出现。通常认为，“站”是蒙古语jam（札木）的音译，它更原始的来源是突厥语“yam”。类似的语言文物还有“胡同”——蒙古语“水井”的音译。北京市海淀区的魏公村是元朝维吾尔族人大都之后聚族而居的地方。

驿与关代表道路两种品格，关代表着审查、排拒与隔绝，而驿则代表着服务、沟通与交流。驿主要提供两种服务：第一，它向过往官员、使节提供食宿、交通之便利；第二，它传递文书，主要是各级官府上下行公文，从宋代开始也传递官员的家书，这就更像是现代的邮政系统了。在不同历史时期，驿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制度。

《周礼·地官·遗人》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每十里设有迎宾之庐，供应饮食；每三十里则提供住宿。汉代负责接待过往官员、使节，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的设施称为“传”。汉初，田横割据海岛，汉高祖召之，“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遂自刭”。“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1]“厩置，置马以传驿也”^[2]，是有能力提供马匹脚力的驿站。

秦汉“十里一亭”，主要交通线上每隔十里设一个邮亭，有房舍，负责为官员旅行提供方便和传递信息。亭有“亭长”“亭侯”。刘邦起事之前就做过亭长，他肯定是不怎么着家的，这个工作符合他的性格。邮亭的密度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成正比。湖南郴州一带，在汉代属于桂阳郡，桂阳境内的含洄、浞阳、曲江三个县地处偏远，距离郡治远的甚至近一千里，到东汉还没有邮亭设置。官员公务出差，必须临时征发老百姓和民船提供交通饮食服务，这叫作“传役”。“传役”临时征发，没有一定之规，不法官员趁机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而至于抛家舍业逃往深山。卫飒担任桂阳太守的时候，“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开通官道，设置邮亭系统，建立官员出差接待制度，“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3]

唐代三十里一驿，相比汉代十里一亭，密度反而变小了。而宋代的官路，“二十里置马铺，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4]宋驿比唐驿的分布更为稀疏。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马镫的应用让官员的旅行方式从坐车变成了骑马，旅行速度加快；二是汉代的亭兼有维护地方治安、招待所和公文速递三项功能，唐代的驿剩下了招待所和公文速递两项功能，而宋代的驿不再有公文速递功能，完全沦为仅供公差

人员食宿和领取出差补给之所。

唐代的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官员旅行可以乘驿，这是做官的好处，王梵志诗说：“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5]“行即食天厨”指的就是官员出差乘驿的权利。但既然是出差，就不能随心所欲，一方面要遵循相应的制度规定，不同级别待遇不同，另一方面，旅行速度也是有要求的：“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6]这些规定唐之前就应该有，唐之后也继续存在。



图五四：北宋 燕文贵（传）《扬鞭催马送粮忙》（局部）



这饭菜味道挺可口，有壶烧酒更好



边喂娃边看看热闹



这么多送粮食的人啊

《扬鞭催马送粮忙》，传为北宋燕文贵所绘，纸本设色，水墨卷，953.8厘米×51.4厘米，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为巨幅长卷，描绘的是秋收后，农人运送官粮的情景。狭长蜿蜒的山道上，一行推着独轮车的农人，翻山涉水过桥，向坐落于山涧中的一处驿站走来。车上满载官粮，至驿站，农人皆停车歇脚，三两人围坐一桌，简单补充给养，而后继续上路。驿站虽为简陋的茅草屋，但为行脚人准备的饭菜、茶水等基本给养尚且充足。除驿馆外，周边还有房舍、长廊，以及远处的水磨。从驿馆后房舍开着的窗户望去，可看到一妇人正一边哺乳一边观看驿站的热闹场景，驿站城门右侧的一处栈道廊檐下，一位手持书卷的观书人正与身后的书童愣神地望着远道而来的运粮人。临水栈道上，有人抬担，有人观水，有人发呆……此水墨画卷，颇为细腻地再现了古代驿站生动逼真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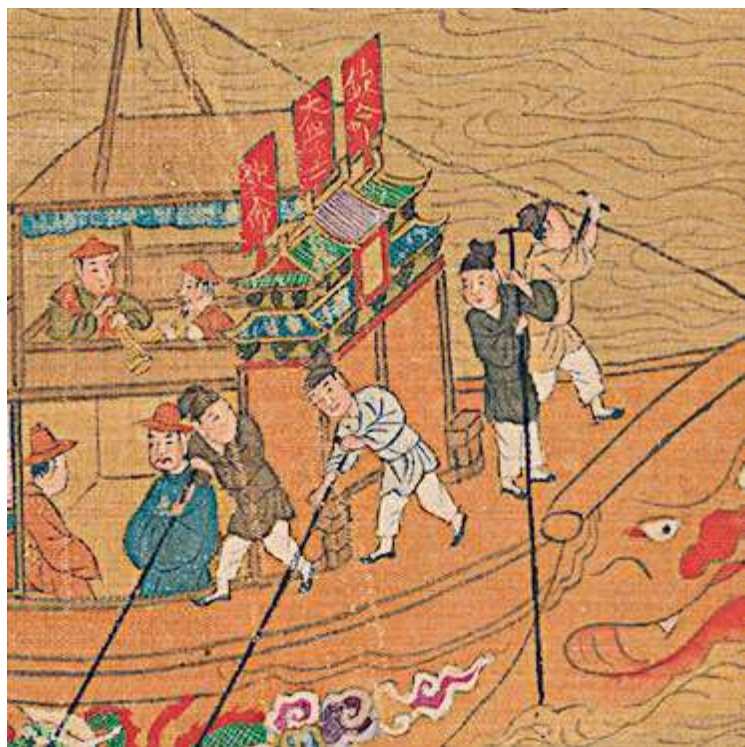
在旅行速度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公文递送速度的办法只有一个——接力。

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治河内郡，他九月到任，立即让人准备了五十匹骏马，“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建立了河内与长安之间的专属信息传递系统。然后，他就开始抓捕郡中的豪强，连坐者达一千多家。抓捕之后，他随即上书长安，请皇帝批示，“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两三天之后，就得到了武帝的批准，“天子可其奏而论决之”，“至流血十余里”。汉代的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从河内到长安，一千多里地，皇帝的批示竟然这么快就下来了。河内人“皆怪其奏，以为神速”。^[7]酷吏往往高效，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道不拾遗”的治理效果，只是不能长久。

同样高效的，还有理财之臣。唐代后期的刘晏是理财名臣，他担任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时，为了及时了解各地物价，创立了“度支递”。“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出大价钱雇用脚力好的人，分段设置递铺，接力快跑，将各地的信息迅速传递到首都。因此，他可以做到“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8]谁在第一时间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财富，掌握了开合敛散之权。政府如此重视物价，表明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已经在向商业领域倾斜，到宋代，商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刘晏所创立的度支递后来成为唐代国家的专业文书传递系统。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诏：“自今以后……除事关急切须遣专使外，其余诏书文牒，一切分付度支入递发遣。”^[9]宋代延续了这一新制度，驿负责人员接待，递负责文书传递。递铺分布比驿更为广泛，“以县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诸县不通驿路”的地方也有“递传之路”。^[10]



图五五：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辛丑版）（局部）



钦命大学士

在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段，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在河中，有一艘颇为豪华的官船，从船舱打开的窗户望去，里面坐着一位身着红色朝服的官员，从船上阁楼前竖立的红色牌子上可看到“钦命大学士”的字样，据说此人即为大学士王鏊。他正端坐船舱中观书，船前有两艘敲锣吹唢呐的开道小船，虎头船船头的甲板上，有四人正撑篙划船，阁楼上还有两人也在吹唢呐，阁楼后的顶篷上有一把赏风景时坐的虎皮交椅，岸边还有六个纤夫在拉纤。古代官员旅行可乘驿，这是做官的好处，但旅行速度是有规定的，“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唐之前既有，唐之后继续存在。王鏊出行便是一个真实写照。

说到“递”，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所谓“金牌”应该是指金字牌，朱漆金字，按规定日行五百里，这是最高级的速递，金字牌创立于王安石变法时期，沈括说它“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

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11]。下金字牌一等为“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再下是“马递”，日行三百里；最慢是“步递”，日行二百里。

有美国学者曾比较过各大帝国的邮传最快速度：北宋日行五百里，等于一百五十五点三四英里；印加帝国一百五十五英里；罗马帝国一百英里。中国跑第一。^[12]

但实际上的邮递速度恐怕要慢得多。宋孝宗时发布大赦，用金字牌，自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荆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时，稽九日方至”^[13]。快递为什么会变成慢递？跟今天双十一期间物流速度减缓的道理是一样的，“率与常递混淆，故行移稽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递马是劣等马。宋朝的马分为十五等，大致前三十三等充战马，递铺所用的属于最末二等，“低弱不被甲”的马。

宋代以前，私人书信是不能走官府邮递路线的。东汉袁安在县里当功曹，有公务拜访州的从事。从事就请袁安带封信给县令。袁安拒绝说：“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14]袁安公私分明，从事只好作罢。如果没有其他隐情的话，这实在是很不通情理的做法。

允许家书附递，是宋朝开始的事情。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这是一项非常体贴的德政。官员宦游，远离故乡亲人，若不是达官贵人，谁有能力派专人传书？“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15]当然，官员的家信也加重了邮递系统的负担，拉低了邮递速度。南宋中期创立“摆铺”，专营成都与临安之间的信息传递，“率一月而达”。“自后私书丛委，每递至百数，由是往来稍逾期，自成都而东，犹不过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16]

靠人力、畜力，哪怕是接力快跑，速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古人对距离所造成的隔离感要比今人敏感得多，陆游在四川幕府遥想绍兴老家，作《渔家傲·寄仲高》，词云：“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跟今日的即时沟通相比，古时的情况令人何其沮丧；然而，那种因空间睽隔、时间迟滞带来的强烈思念，今天的人恐怕也很难体会了。

^[1] [唐] 房玄龄等著：《晋书》卷三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5页。

^[2] [汉] 司马迁：《史记》卷九四《田儼列传第三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

版，第2648页。

[3] [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六《卫飒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9页。

[4] [宋] 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类书丛刊”1992年版，第184页上—185页下。

[5] [唐] 王梵志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6]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0页。

[7] [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王温舒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48页。

[8]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15页。

[9] [宋]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五《大臣·录勋·叙用勋旧武臣德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3页。

[10] [宋] 马光祖修，[宋]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铺驿》，中华书局影印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1990年版，第1536页下。

[11] [宋]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3页。

[12] Peter J. Golas. “The courier-transport system of the Northern Sung,”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on China 20 (1966): 1-22.

[13]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〇，宋孝宗乾道四年，兵部侍郎王炎上言，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510页上。

[14] [汉] 班固：《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7页。

[15] [宋]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五《入递发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

[16] [宋]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51页。

路上匆匆行者谁？

让我们把目光从道路、关卡、驿站转向行人。我们的历史教育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安土重迁。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特征的总结。《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社会学家对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进行的学术性观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之后，1947年的“乡土中国”早已不复存在。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个总结，适用于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确，他们像庄稼一样长在地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离开家乡。现代历史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农业的推广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商鞅变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推广农业，因为农业既能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又能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

即便如此，华夏大地的道路上仍然是人流不息、物流不息。倘若我们以延时摄影的方式，把摄像机架在古道旁，拍摄一千年、两千年，然后再把这一两千年的影像浓缩到一两个小时里去放映，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条有时稠密、有时稀疏，却从未断绝的人流。那么，那些在路上匆匆前行的人究竟是谁？《诗经·召南》有一首《小星》，这样写道：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大意是这样的：“小小星儿泛微光，三三五五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早早晚晚为公忙。命运与人不一样。小小星儿泛微光，参星昴星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抱着被子与床帐。命运与人不一样。”^[2]

《小星》里“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的主人公，应当就是当时国家的低级官员。宋代的洪迈说：“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3]“君命”固然“不敢慢”，用“寔命不同”来做结，到底还是有抱怨的。奔波在路上似乎是这位官员生活的常态。他甚至还得自带行李，“抱衾与裯”。而这包床上用品的存在，却造成过极大的误解。汉代的毛公把这首《小星》解释成妻子不妒忌，“贱妾进御于君”，贱妾得以抱着被窝去侍奉主君；唐代的孔颖达则更进一步，赞美妻妾双方都懂事“尽心”，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甚至把“小星”作为“妾”的别称。可怜的

召南小官只是发了发牢骚，竟然被误解成贱妾，也可以说是一桩千古奇冤了。

传统时期的官员在衙门的工作量，绝对没有现代这么大，但是，部分官员出差的频率和在外奔波的绝对时间却也不低。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是东海郡功曹师饶的工作日记，根据这份日记可以发现，在一年的三百五十四天中，师饶坐曹理事的时间不过八十七天，除去休假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出行状态，这或许反映了部分郡县属吏的日常工作情况。^[4]《元延二年日记》与传世史料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后汉书·应奉传》载，应奉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这种为了履行职责在辖区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旅行，是后世负有监察督导责任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常态，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宋代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等。中央定期或不定期派出的各种巡视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履职的，比如唐代的监察御史和明代的巡按御史。

隋代实行官吏分途，官员的任免权力全数收归中央，选任集权加强。从理论上讲，此后直至帝制终结，所有官员都必须到首都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取任官资格，然后从首都的选任部门获得职位任命，再奔赴全国各地履职，任满之后，又须回到首都通过任职资历的认证，获取新的任命。由此，诸位可以想象隋以后帝制时期官员生活的常态：从取得官员资格起到退休止，他们一直都在帝国范围之内奔波往返，通常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三或四年，然后便得回到首都，再从首都奔向下一个岗位。这就是宦游。

科举时代还催生了另外一种旅行——赶考，从隋唐到北宋前期，都是一年一考，北宋中期以后改成每三年一考。考试分级进行，先在本地考，取得资格之后再首都去考，路途虽然遥远，举人心中却充满了希望，“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5]，这样的黄粱美梦，在去程之中不知多少人做过。然而终究还是名落孙山的多，归途之中是怎样地黯然神伤，又是如何去克服沮丧，很少有人会提到。我们看到的旅行，往往是金榜题名者的记录。1099年冬，二十三岁的衢州解元卢襄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开封赶考的路，他抵达开封的时候，宋哲宗刚刚驾崩。但是科举考试照常举行，只是取消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所以，国丧并未影响这位年轻人的心情。二月初一日，在某个客栈之中，即将下场的卢襄完成了自己的旅行日记，题为《西征记》。第二天，宋徽宗开始“听政”。三月二十三日，科举放榜，一共录取五百六十一人，卢襄也应该在其中。在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靖康年间，他正在江宁知府的任上。从文学角度看，卢襄的赶考游记水平并不高，但正因如此，才显得非常典型，体现了普通举人的旅行状态。他走得很悠闲，每到一地的主要事宜就是探访古迹，追昔抚今，赋诗抒怀，歌颂本朝。比如他看到运河，就联想到隋炀帝：“遂念隋大业间炀

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6]隋和宋之间还隔着唐五代，这一点卢举人是不加理会的。



图五六：南宋 陈清波 《湖山春晓图》

《湖山春晓图》，南宋陈清波绘，绢本团扇，水墨淡设色，26.7厘米×2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淡雅的西湖小景图，所绘为西湖早春时节的景象。全图中心部分为一处绿树掩映下的廊檐翻飞的层楼，楼后有阡陌水田纵横交错，远山接天，近水横卧，意境清雅幽远。而在最下面的长堤上，散落着瘦松数株，赶路人三两位，其中一骑马者，一抱琴者，一挑担者，他们一边赶路，一边似在品评身后的无限风光。此画面像极了进京赶考者在路上追昔抚今、赋诗抒怀的情形，侧面展现了普通举人的旅

行状态。



图五七：清 石涛《山水册》十二开之九（局部）

《山水册》，清代石涛绘。纸本，共十二开，现藏上海美术家协会。石涛善画花果，兼工人物与山水，用笔洒脱淋漓，笔意淡雅幽远，从这幅行舟图即有所体现。画中一叶扁舟溯流而上，船篷内坐一人，似在低头观书，船首尾各有一撑篙者，正奋力划船。两岸山石势如斧劈，上有几株倔强的虬枝从石壁间扎出。笔势雄宏不乏恬淡，苍劲不乏细腻。舟中埋首者恰似一进京赶考的士子，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意境。

卢襄对运河本身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对开凿运河的隋炀帝的评价则是负面的，他批评隋炀帝疏通运河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私欲。这个评价非常典型，今天的民间记忆仍然认为隋炀帝到扬州主要是为了看琼花。总体来说，华夏文化对皇帝的出行持负面态度，比如对喜欢出游的秦始皇、隋炀帝的评价都相当负面。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手敕礼部，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南北两直隶、山东泰安州等处，尊奉圣像，供献香帛，祈福安民”。^[7]这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其实就是他本人。为了能出游，正德皇帝制订了豪华的旅行计划，想要从北京出发到山东泰山，然后经徐州、扬州到南京，再由南京下苏州、杭州，而后溯江而上到湖广各地，登武当山，遍观中原。这个旅行计划遭到了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批评者拿来吓唬皇帝的历史教训，就包括隋炀帝：“故八骏游而周替，骊山幸而秦亡。夏之太康，隋之炀帝皆以弃离宫阙，远事巡行，卒致祸败。兴亡之迹，可为殷鉴。”隋炀帝的确是在扬州被叛军杀死的。快意事做不得，这让武宗很恼火。明朝的皇帝发起脾气来是要打人的，为了南巡，武宗一共廷杖大臣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然而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南巡计划。最终，武宗还是如愿以偿了。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叛乱。文武双全的大儒王守仁很快就控制了局面。这么好的借口，武宗哪肯放过——他压下了王守仁胜利的消息，亲自南下。结果在回程中不幸落水，疾病缠身，直至驾崩。

这为皇帝出巡增加了一个反例。

儒家政治文化反对皇帝出巡的理由主要是费钱、折腾。封禅被认为是“天下太平功成”的标志。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禅的皇帝。真宗治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华夏正宗与北方夷狄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到底意难平。于是便大搞封禅，想要在文化建设上宣示正统与高明。开工之前，真宗先用一壶珍珠贿赂了宰相王旦；封禅完毕，刹不住车，又去祭祀后土，认神仙祖宗，大搞神圣崇拜运动，把两朝积累的国库都掏空了。王旦因未能阻拦皇帝的折腾而愧疚追悔，临终遗嘱，要“削发披缁以殓”。（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儒家反对皇帝出巡，还有一个物质条件，那便是传统中国很早就发展出发达的赋税收集、转运能力，因此，皇帝端坐首都就可以安享天下供养。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则不得不花费时间在各个领地上巡行，目的就是要接近物资的供给地。当然，随着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隋唐以后的皇帝也出现过从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现象，“就食”即去吃饭，政治中心庞大的附属人群到物资转运更方便的洛阳去吃饭。而到宋代，则干脆把首都安到了运河上的城市——开封。

其实，皇帝的出巡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隋炀帝、康熙和乾隆的下江南，其实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要对新征服的土地宣示主权，宣扬本朝统治的合法性，笼络人心，压服潜在的反对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皇帝出巡还带有本民族的色彩。比如辽的“四时捺钵”，金的“春山秋水”，元朝皇帝的上都之行，以及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



图五八：清 徐扬 《乾隆南巡图》之阅示黄淮河工卷

《乾隆南巡图》，清代徐扬绘。有绢本与纸本设色两种，全套均为12卷，总长154.17米，绢本已佚。《乾隆南巡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组长卷画，上图所展现的《阅示黄淮河工卷》，68.6厘米×11.6厘米。通常我们认为皇帝出巡皆为游山玩水，实则不然。皇帝出巡绝不只为满足个人私欲。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隋炀帝、康熙和乾隆的下江南，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征服的土地宣示主权，宣扬本朝统治的合法性，笼络人心，压服潜在反对者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这次南巡，即为仿康熙南巡旧例，从北京起驾，自绍兴回銮，历时112天，作诗500多首，后从中选12首，命画家徐扬分卷描绘。从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沿途经济文化、风物人情、社会生活等景象。巡游队伍声势浩荡，壮观雄宏。

今有人说，旅行就是花钱买罪受，古有诗云：“出门不如在家好。”^[8]在路上的人，无论皇帝、官员还是小民，倘若主动上路，多半还是心中有所追求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国利民、利他利己，都是利。正当的利益追求符合人性，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 译文综合了王延海的《诗经今注今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和袁愈芑的《诗经今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3]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小星》，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48页。

[4] 参见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第108—113页。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休制度》，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7页。王俊梅：《秦汉郡县属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5] [宋] 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笔谈》卷二三《讥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3页。

[6] [宋] 卢襄：《西征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二〇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册，第367—368页。

[7] [明]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六六《巡幸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9页。

[8] [元] 胡奎：《听雨轩为夏节兄弟作》，见杨镰主编：《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册，第254页。

一个士兵的旅程

宋朝人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中有一首古诗，写的是汉代一个普通士兵的遭遇，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1]，西汉前期，十五成丁，开始为国家服役。服役的期限，按规定是所有男丁每人每年三天，实际执行中，有人役期一年，当役而不服者“出钱三百，以给戍者”。^[2]随着汉朝对西域的开拓，越来越多的士兵带着家属长期在西北屯田，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学者根据汉代留下的简牍分析发现，戍边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家庭规模一般在五口左右。比如说，居延（靠近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出的西汉永光四年（前40年）“橐佗延寿燧长”孙时所持的“符”（旅行证）表明：孙时是橐佗延寿（烽）燧的燧长，他的妻子孙第卿二十一岁，籍贯在昭武乡万岁里；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王女，刚刚三岁；跟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孙时的妹妹，名叫耳，九岁。这些汉王朝的拓边者会用故乡的名字来命名新家园，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开拓者的共同做法。老兵“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他的戍边之地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当生命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他选择叶落归根。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笔下的故乡，人丁兴旺，温暖热闹，游子虽老，仍然是有家可归的。而“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却遭遇了无家可归的寂寞凄冷。老兵在熟悉的乡路上遇到了同乡，赶忙打听家里的情况，在乡里人的指点下，老兵的少年记忆与眼前现实出现了残忍对接：“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家园已经彻底荒芜，野谷、野葵丛生。老兵用颤抖的手拿出了简单的行军炊具，“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回归故土，与亲人分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支撑老兵跨越漫漫旅程的唯一动力，他以为回到故乡，孤独便能结束，却没想到漫漫旅程之后，他得到的却是终极孤独，“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肯定有文学夸张的成分。然而，其中描述的戍边老兵的骨肉分离之痛，个人和家庭为国家民族所做的牺牲，却是真实存在的。郭茂倩把这首诗收在“鼓角横吹曲”类中，“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3]。“军中之乐”不回避个体的牺牲与痛楚，诚为难能可贵，有仁者之心。唐诗中有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4]，是属于不能细想的，细想便有无限凄凉意。短短十四个字，就像电影蒙太奇手法所呈现的一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定河边乍暖还寒中无名战士的枯骨；镜头

一转，却是故乡春闺年轻妻子梦中甜蜜的娇嗔，妻子对丈夫战死的事实一无所知，仍然在期待重逢，梦想属于他们的未来。

古人从军，除了出于臣民责任的服役以外，还有一种是主动的从军报国觅封侯，这是比读书应举出现得更早的传统前程。唐代遇有大规模战事，除征发府兵之外，还会招募普通老百姓从军。唐初老百姓对从军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5]老百姓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对唐帝国的忠诚和身为唐人的自豪感肯定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从军立功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光明大道。军人立功可以获得勋官，就是《木兰辞》里说的“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有了勋官就可以获得占田的特权，从三十顷到六十亩不等，而一个普通男子的永业田限额是二十亩。当然，并非你有了勋官，政府就分配这么多土地给你，而是有了勋官之后，你就可以合法地拥有相应等级的土地了。勋官还有法律上的刑罚减等优待：勋官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犯死罪者，并为上请”；七品以上勋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6]勋官为政府服役达到一定期限，还可以通过吏部或者兵部的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花木兰应当是文武双全的，她能得到尚书郎的职位，肯定是通过吏部的身言书判考试。建立功勋，取得特权，这应当是很多人从军的主要动力。当然，能力特别强、运气特别好的从军者甚至还可以获得提拔，直接成为官员，进入统治阶层。



图五九：明 唐寅 《蕉叶睡女图》（局部）

《蕉叶睡女图》，明代唐寅绘。手卷，纸本墨笔，61.0厘米×20.3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男性到一定年龄段皆要服兵役，杜甫《兵车行》中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陈陶的《陇西行》中也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反映的情景皆与服兵役有关。我们或可用明代唐寅的《蕉叶睡女图》，来借指陈陶的这句诗所表达的情景：无定河边，乍暖还寒，风中散落着无名战士的枯骨；而在

故乡，却是年轻妻子梦中甜蜜的娇嗔。熟睡在蕉叶上的妻子，面容恬淡安静，似还略带着点儿淡淡的笑容，而她对丈夫战死的事实一无所知，仍在梦中期待重逢，梦想属于他们的未来。由此反差，便可清晰地突显出古代经年累月服役的残酷。

唐太宗贞观末年征辽东，绛州龙门人薛仁贵应募从军。大军攻打安地城，太宗命令诸将分四路进军，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着白衣”，唐军的制服是黑色的，而薛仁贵偏偏穿白，为的就是要醒目，好让在高处瞭敌的皇帝看见自己。果然，太宗远远望见一名白衣小将，“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本人也是武将出身，见此奇才，惊为天人，赶紧派人来问“先锋白衣者为谁”，随即接见了薛仁贵，“赐马两匹、绢四十匹……并赐生口十人”，立即授予他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都尉”职衔，还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从一个平民直接跃升为五品官，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战场上。宋代以后的状元郎，虽比这个风光，却远不如这个实在。

薛仁贵军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高宗时率兵西征天山九姓突厥。当时九姓突厥坐拥十多万，势力强大。突厥人派了几十名勇士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三名勇士应声落马，其余人等慌忙下马请降。唐军乘胜进军，大破突厥。“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雄壮军歌响彻了天山南北。

薛仁贵晚年，曾因犯错误被免职。六十八岁时，唐高宗起用他对付突厥人。老将出马，威名犹在，且仍然能打。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7]。两年之后，即永淳二年（683年）

二月“己卯，左领军卫大将军薛仁贵卒”。紧接着薛仁贵的死讯，《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三月庚寅，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围单于都护府。”将军死而长城坏，增重了薛仁贵的威名，却也不得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薛仁贵的故事特别适合用来做征兵宣传。这个故事传递出来诸多的正面信息，在这个国家控制一切的等级社会中，存在着相对平等的文武关系，武人地位高尚，从士兵到将军道路畅通，只要你有能力、有军功。但事实上，薛仁贵的故事恐怕只是一个特例，薛仁贵的武艺、军功、机遇，包括自我宣传的能力，实在超迈群伦。在薛仁贵从军不久之后，普通立功军人的上进之路就开始出现了日渐堵塞的现象。国家对立功军人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比如对待为国捐躯的烈士，从前是“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但是自从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8]勋官的获得越来越难，即便是获得了勋官，也很难享受到相应的特权。相反，勋官因为被官府记录在案，反而成

了容易受到征发的对象。当兵的好处越来越少，逃避征兵于是成为普遍行为。

为了获得稳定的兵员，唐后期开始实行职业兵制，宋代又吸取五代陋习，在士兵的脸上刺字，从而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军人群体——募兵。募兵脱离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国家财政养活，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脸上的刺字将募兵同普通百姓区别开来，募兵因此遭到鄙视；但是，募兵却是武力集团，是有能力保护也有能力危害百姓的群体。

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太可能发生像薛仁贵那样的传奇故事，大多数募兵生活得更像是一种低级小官吏。宋代军人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军人子弟从军，二是平民应募，三是像林冲那样的罪犯配军。军人及其妻儿构成小家庭，住在国家所提供的营房里，俸禄是小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军人之妻往往也来自军人家庭。按制度，宋代禁军要定期轮流戍边，因此，分居是宋代军人家庭生活的常态。这其中也有节制生育的考虑。每三年，皇帝会亲自检阅所有的军官，从高到低，依次升迁，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十几天。这是皇帝维持军人忠诚的一种方式。军官升迁完毕，下面的士兵也会得到机会被提拔为低级军官。皇帝的大阅是整个军营的节日，军营门口销售活鸡、活鸭的摊贩，这时候的生意最好。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军人的跋扈骄横。比如西北开战，朝廷慌了手脚，一味增兵，甚至想到了要把开封的犂夫（抬轿子的兵）送上战场。这些人当然不干，于是直接闹上了街。但并非所有军人都能如此骄横。底层军人的状态其实相当可怜。宋朝军队的最底层是厢军，也就是专门干杂役的兵。宋朝用厢军来承担政府所需要的某些服务，比如长途运输。江宁府（南京）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往来官船众多。来来往往负责押运的士兵也很多。士兵在中途生病，基本上就会被留在江宁，住在特殊的营房之中，一年总计不下几百人。这几百人，很少有能活下来的，基本上都被饿死了。因为按制度，生病士兵留下来之后，才向江宁府申请“粮票”，“给券乃得食”，拿到粮票才能到仓库里领粮食，领了粮食才有饭吃，这一套手续走起来并不容易，等到手续走完，病号就已经饿好几天了。这种情况，直到理学家程颢担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时，才得以改善。程颢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先在营房里备好米，病号来了就管饭。^[9]负责押运物资的厢军会在旅途之中遭遇生死考验，而这种时候，他们命如草芥，除非遇到像程颢这样有良知、负责任的官员。

[1] [东汉]班昭：《为兄超求代疏》，见《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5页。

[2] [南朝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

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4页。

[3]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一《横吹曲辞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页。

[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四六《陇西行四首》之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92页。

[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93页。

[6]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名例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7—128页。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80—2783页。

[8]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93页。

[9] 参见 [宋]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见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1—632页。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对宦游人来说，离别是人生日常。宦游人是帝制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产物。战国的游士是他们的先驱，只是战国游士的“游”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彻底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有可能一席话打动诸侯为卿相，成就名垂青史的伟业；更有可能遍访诸侯而不得一用，穷困潦倒为亲友所不齿。帝制时期的宦游有官僚制度做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官僚体系，从哪条路进来的，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发展，路径基本清晰，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则要看个人造化。帝制时期的官僚是高度职业化的群体，从入仕到致仕，在从职位到职位的奔波中，在各种关系的纠缠撕扯中，宦游人一直都在路上。

如何处理与上司的关系，是宦游者必须经历的考验。上司的态度对下属的仕途发展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朝代，它被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唐代的州刺史和各部长官要为下属书写“考词”，也就是业绩评语；而在宋代，下层文官（称“幕职州县官”，指级别）向中层（称“京官”，指级别）的跃升，必须有五封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多半必须来自直接上司。那么，跟上司对着干就成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上司做的明明就是错的呢？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否利国利民，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下属与上司的关系，这是官僚队伍内部的关系问题。皇帝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就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因此，把事情做对本来是第一位的；然而这种上司决定下属命运的管理方式，却迫使官员把上下级关系作为第一位的事情来处理，为了个人前途，官员宁可牺牲是非道理也不得罪上级。

而那些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敢冒得罪上级风险的宦游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担任光山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光州知州盛度为了执行中央命令，下令所属四县在三日之内完成上供建材的收购任务。命令下得突然，所购建材又并非本地土产，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光州下属四县，四位县令中只有司马池一人表达了抗议。接下来事情发展得很有趣：第一，四县之中，按时完成任务的反而只有光山一县。原因也简单，光山老百姓听说县令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竟然公然抗上，因此人心齐泰山移，更何况买些木材呢。第二，就在光山任上，司马池获得跃升中层所需的五封推荐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来自被他顶撞的知州盛度。其他四封推荐信的获得，恐怕也与盛度对司马池的赞赏不无关系。因为耿直，司马池在下层的级别上徘徊了十七年，在顶撞盛度之后，反倒是提上去了，着实不易。



图六〇：明 唐寅 《垂虹别意图》（局部）

《垂虹别意图》，明代唐寅绘。纸本水墨，107.6厘米×29.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全卷由唐伯虎绘，祝枝山题“垂虹别意”的引首，戴冠作序，以沈周为首的30余人题诗于卷后。此长卷以书画形式记录了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众吴门才子送别戴昭时的情景。在群山绵延下的垂虹桥畔，杨柳依依，与君话别离。唐伯虎题诗云：“垂虹不是灞凌桥，送客能来路亦遥。西望太湖山阁月，东连沧海地通湖。酒波汨汨翻荷叶，别思茫茫在柳条。更欲传杯迟判袂，月明倚柱唤吹箫。”对宦游人而言，离别乃人生常态。帝制时期的官僚是高度职业化的群体，从入仕到致仕，在从职位到职位的奔波中，在各种关系的纠缠撕扯中，宦游人一直都在路上。

在我看来，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具有典范作用，因为其中的偶然因素太多了。司马池并不难得而盛度难得，那些碰不到“盛度”的“司马池”，也只能沉迹下僚了，而且那些沉寂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我们看见。帝制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在骨子里把皇帝摆在国家之上，而且还在实践中把官僚内部的关系摆在国家之上，明明是治理的工具，反而成了治理的目的，本末倒置，令人警醒。而沉浮于其中的宦游人，也便大半在这文化之中消磨了理想与锐气，把升官与发财相关联。

宦游人必须面对的，还有与地方的关系。在汉代，酷吏代表朝廷打击豪强，循吏则着力发展教育，培养地方士人，开凿道路，设置邮亭系统，移风易俗。在一般的史学叙述中，酷吏与循吏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地方治理方式，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放长后进行观察，便会发现，无论酷吏还是循吏，都是帝制国家推广其政治秩序与政治文化的手段，酷吏与循吏殊途同归，都扩大了中央的影响，巩固了中央集权。而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汉中央能够派出的只是地方长官，地方佐官出自本地精英，汉朝的郡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中央代表与地方精英的共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些外地人长官的行为，特别是酷吏对地方豪强的打击行为，应当是冒了极大

的风险。从长远上看，循吏以温和的方式，酷吏以血腥的手段，共同缔造了帝国的统一。隋朝以后，实行地方佐官的中央任命制度，自此所有官员的荣辱浮沉都归于中央，任职在地方的所有官员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中央的官。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中央所规定的任务成了多数地方官员的第一选择，地方利益在实质上变得无足轻重，只要不出事便好。

比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下水道问题。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下水道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通畅的下水道系统可以保障城市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而整个城市下水道的疏通，必须由地方政府出面。可是这样新兴的工作，却不在中央设定的地方官考核条例中，因此，干不干就要看知州的意愿。若是良知与理想的知州就没问题；而若是知州懒惰，不愿意费力气整治，那么地方士绅的代表也只能干瞪眼。那些有良知的官员，会被本地人记住，甚至列入祠堂永世纪念，可是地方性的尊崇却未必能给被尊崇者带来仕途的升迁。宦海浮沉，并不一定取决于你为当地百姓做了什么。

当然，那些有理想的政治家仍然会努力有所作为。对那些真正有理想的人来说，宦游之路是一段内心的艰难旅程，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诱惑、原则与妥协，不断地磨砺，“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那些至今仍然屹立在华夏理想人格殿堂中的历史人物，是真正的偶像。

宋代的范仲淹，在贬谪中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他始终“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不以寒温改其节，立朝敢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治军有术，使西夏称臣，边境得安宁；得位敢为天下先，勇于向官僚集团的利益开刀；在地方则积极治理。他晚年的最后一站，是在经历过大水灾后的青州，以衰朽残年之躯尽力做好灾民的安置返乡工作。

与范仲淹基本同时代，包拯对人情的冷暖有着敏锐的洞察，对人性的软弱又抱着高度的警惕。包拯年轻的时候，跟一位姓李的同学一起在老家庐州的一座庙里读书——庙里有房子住，还管待斋饭，所以从唐代起就很流行在庙里读书。当然，这也是穷学生的做法。庙的附近住着一个大财主。这财主常常看见两位读书人从家门口过，知道他们书念得好，早晚会中进士、做大官，于是有心结交，总想请他们到家里坐坐，但包拯和李同学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有一天，财主就特地备好一桌酒席，专门下了帖子，请二位秀才“光临寒舍”。盛情难却，李同学就要洗脸更衣准备赴宴了。包拯一把拦住他，严肃地说：不能去。咱们是读书人，早晚要做官。他是个富人，咱们现在如果吃他的请、得他的好处，万一将来被派回老家来主政地方，他若有不合礼法的事情求到咱们，那该怎么办？李同学一听有道理，最终两个人都没去。后来，包拯和李同学果然都中了进士，并且在若干年后，都曾主政庐州，干得都还不错，其间并未受到人情干扰。

这个故事，南宋大儒朱熹给自己的学生讲过。朱熹做过地方官，深知利害，他耳闻目睹多少地方官员平时跟当地富人打成一片，导致不能公平施政，甚至被富人拖下水，因此以包、李二位为榜样教导学生，做地方官，特别是主政一方，为人处世，处理与当地士绅的关系必须有所节制，有所不为，才能保持超脱公正的立场，守住原则。^[1]

宦游之人，始终在路上；宦游之路，充满艰辛，充满诱惑。隋炀帝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2]，从此之后，朝廷对家属随行的规定越来越倾向于支持鼓励，宦游人的旅途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是单身上任，如今是携家带口。司马光于1055年底从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到并州（今太原）上任，写下了一首《苦寒行》，记述“穷冬北上太行岭”“万险历尽方到并”的艰辛之旅。他带着张夫人和独生子随行。风雪交加，小孩子冻得直哭，做母亲的却束手无策。干粮没带足，仆人们一直在喊饿，瘦马也吃不饱肚子，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这样的旅程，当不在少数。家属的随行让宦游不再孤单，但也带来更多的变数，比如旅途中的死亡。



图六一：宋 佚名 《雪渔图》（局部）

《雪渔图》，宋代佚名绘，绢本设色。《雪渔图》全卷中，除了撑杆捕鱼者，下罾捞鱼者，还有在冬雪初霁的寒冷天气里骑驴出远门的旅人：画中有两位骑驴者，另外两位是跟在身后的童子。从他们翻飞的头巾、帽檐和衣袖，似乎都能感受到刺骨凛冽的劲风。身后跟着的俩童子都瑟缩着身体，其中一位还用袖子掩着嘴巴，似在遮挡寒风，又似乎是在擦拭鼻涕。在如此寒冷的冬雪天不得不出远门，他们或为始终在路上的宦游人；而除了严寒，宦游之路也充满了各种艰辛。《雪渔图》的一角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宦游路上的不易。



[1] 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3页。

[2] 〔唐〕魏徵、〔唐〕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页。

宦游路上的妻儿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提供了有关传统时期人情世故的丰富知识，比如，《清宫外史》里的这一句“俗话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就道尽了宦游路上的人情冷暖。太太死了，老爷还在任上，当地士绅巴不得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合情合理的机会，可以向老爷示好，来吊唁的人当然会“压断街”；而老爷死了，权势、地位烟消云散，人人都忙着去迎接新老爷，谁还理会一个死人？“死去元知万事空”，老爷死了倒也无所谓了，只可怜活着的太太、少爷和小姐，孤儿寡母不知是否有回家的盘缠。宋朝史料记载，某公做官，地点大约在湖南、岭南交界的地方，是内地人往来岭南的必经之地，他眼见宦游人卧病滞留的、客死岭南无法归葬的、孤儿寡母踽踽独行的，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中不忍，特地向中央申请资金，以作为上述人士补助慰问之费。此公非名人，也没有做大官。偶然留下这样一条史料，昭示当日宦途艰难，令人鼻酸。

自隋炀帝开始，官员可带家属随行，女性和孩子便随着丈夫和父亲踏上了漫漫宦游路。这路有多长？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一件申请过所的文书，领衔申请的这位女士，是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媵薛十五娘，她只有十八岁，被唐循忠的两个侄子护送着，带着三个奴、三个婢、一个作人、八匹马、五头驴，要从安息四镇的首府龟兹去往福州，这一段漫漫旅程长达11 696里。薛姑娘的旅行证上注明，她可能经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金城关（今甘肃兰州市北黄河渡口）、乌兰关（今甘肃靖远县西南）、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陇山下）、潼关（今陕西潼关）、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等关津。潼关和蒲津关都是东渡黄河出关的要道，两关并列，应当是为了让旅行者可以有所选择。这一年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当年秋天，关中久雨，粮食供应不足。次年正月，唐玄宗率领百官往东都洛阳“就食”，走的是潼关。届时，潼关道路必定拥挤不堪，关门的安检也会比平常严格。在路上的薛姑娘需要做出选择，究竟走哪条路。当然，这个选择不是她来做，而是她丈夫的侄子来做，特别是二十三岁已经做官的唐益谦。11 696里，以一天50里的速度计算，就算是一天不歇，也需要234天。这趟旅行需要从西北到东南，从茫茫戈壁到大海之滨，从秋天到夏天。习惯了飞机旅行，又被高铁速度“惯坏”了的今天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真是走着走着就老了。更何况，前路茫茫，吉凶难料。

北宋王定国谪居广西，歌女宇文柔奴不离左右，数年之后，又随定国返京，苏轼为之作《定风波》词，下阕歌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万里归

来年愈少”便令人口角含笑，多少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女性在男性宦游之中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宦游是一种运动不定的状态，男性的宦游把女性带上了漂泊的旅途，女性在男性的宦游之中承受着双重的不稳定，一方面是丈夫的宦海浮沉，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可能遭遇的种种诱惑给女性情感带来的冲击——当然，这时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和“不得以妾为妻”的法条，以及“正室范儿”都是有益的帮助，它起码维护了女性在婚姻中稳定的地位。而女性向男性所提供的则是家庭，是陪伴、照顾，是稳定感和延续性。

旅途之中最可怕的是疾病和死亡。传统时期医疗水平差，疾病与死亡往往联袂登场，那些陪伴父母宦游的儿童通常是最先被击倒的对象。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为激烈批评唐宪宗供奉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正月十四日得诏，即日上路。他的第四个女儿女挈，当时只有十二岁，正卧病在床，只能看着父亲离开。韩愈离开之后，其政敌又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为由，逼迫韩夫人卢氏离京。滴水成冰的正月天气，女挈被抱上牛车，母亲尽可能地把她包裹得暖和点儿，可病弱的身体哪里受得了这番折腾，走到商州南边的层峰驿，女挈便离世了，这一天正是二月二，龙抬头。次年年底，韩愈奉召回京，路过层峰驿，看望了长眠地下的女儿，不免想起妻子对他说起女挈下葬时的凄怆仓皇，于是在驿馆的房梁上留下一首悲凉的诗：“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女挈死在这荒凉的驿馆，全是父亲的罪过，如今父亲贬谪归来，重获重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女挈的生命，在女儿的坟前，韩愈是愧疚的：“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1]

宦游是父亲和丈夫的选择，而接受宦游命运的还包括父母与妻儿，他们是真正荣辱与共的一家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韩愈的愧疚，现代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舍生取义是大丈夫的美德，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有没有资格让妻子、儿女为此牺牲呢？这个问题成立的前提是现代性，在韩愈这里，他可以感到愧疚，但不会质疑自己的选择。传统中国的仕宦以家庭为计量单位，有封妻赠亲之法和恩荫子弟之途，同样，也会有抄家连坐之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皆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是入土为安，而葬礼是开支极大的项目。从社会阶层来看，宦游者阶层普遍高于普通老百姓，其葬礼要求理应更高。但是，宦游的漂泊状态却让宦游者的丧葬呈现出窘迫的状态。山东金乡人吴萼，在宋太宗朝高中进士，官至侍御史，后来以洛阳为家，把自己的父亲葬在了洛阳的金谷乡。吴萼死后也和父亲葬在了一起。吴萼的儿子吴元亨，靠父亲的恩荫入仕，做过两任县官。元亨的母亲刘氏在丈夫死后，就跟随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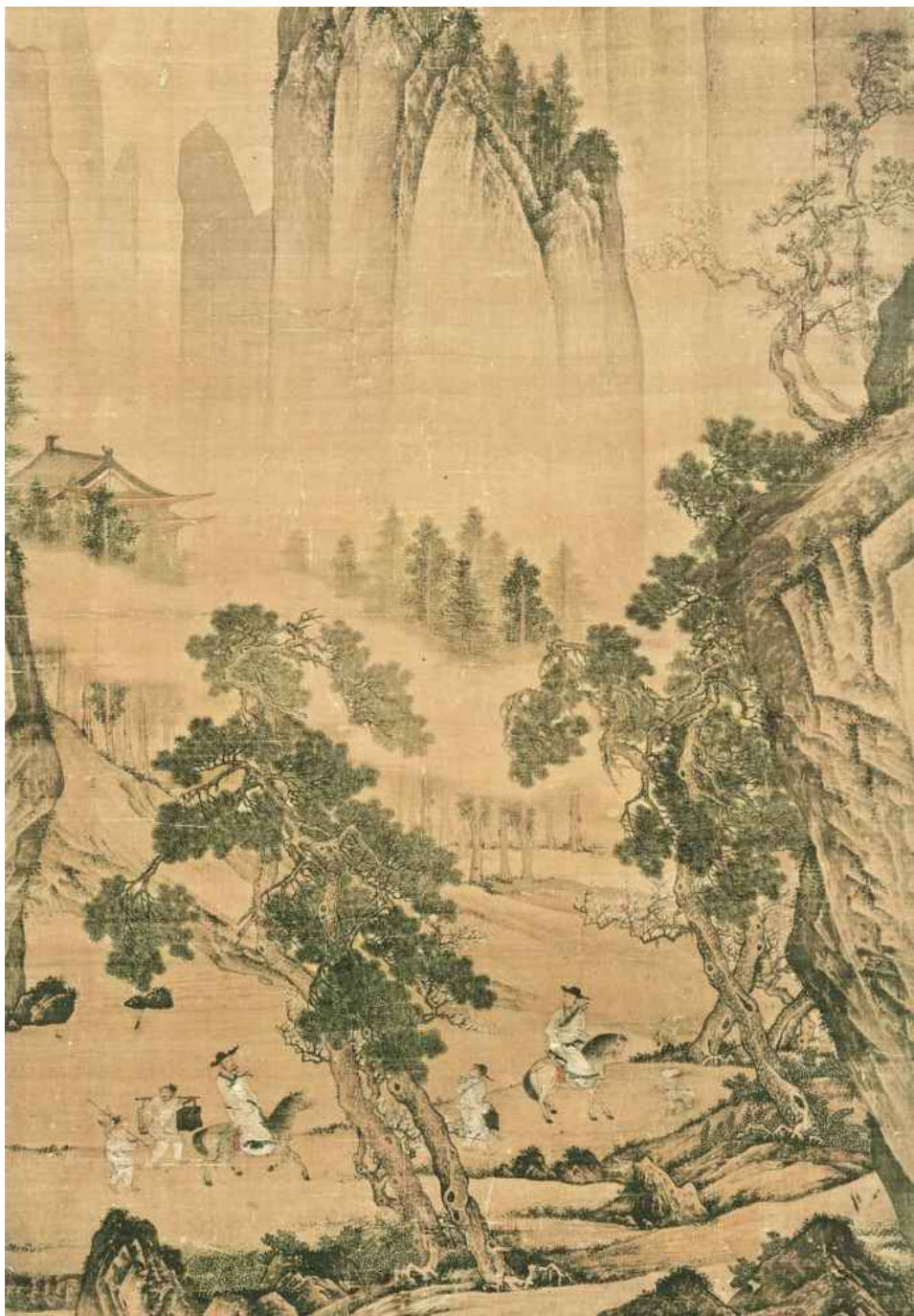
宦游，可能是在元亨返京述职的时候，刘氏死在了京城，元亨没有财力让母亲归葬洛阳，只得把母亲的灵柩暂时安置在京城广济寺。若干年后，吴元亨死在了洛阳，终年四十一岁。吴元亨的长子吴顥当时只有十八岁，次子几复更是个孩子，几复还有个妹妹。在洛阳知县的帮助下，吴元亨的夫人聂氏把吴元亨的灵柩安置在了洛阳的永安佛堂之中。

聂氏的姐姐是司马光的母亲，当时司马光一家在郑州。吴顥到郑州去向姨父姨母报丧，“入门，哭且拜，问故，又哭”。吴顥个子很高，相貌堂堂，议论慷慨，才思敏捷，文章写得也漂亮，正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司马光的母亲不由得感叹：我妹妹命苦，早早地没了丈夫；还好有这样的好儿子，妹妹还是有指望的！可是谁都没想到，两年之后，高大英俊的吴顥死在了风陵渡。吴顥的弟弟吴几复是个非常有志气的少年，他拼着一股子劲儿，把哥哥的灵柩背到了汝州，同样安放在了佛寺里。又过了两年多，母亲聂氏也去世了。聂氏死在哪里，是如何安葬的，史料并未交代。我们只知道，在父亲、兄长和母亲相继过世，家中“无一金之产”的困境中，吴几复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并且得到了蓬州知州的任命。在往蓬州上任之前，吴几复决心完成祖母、父亲、母亲和兄长的葬礼。这时候，离祖母刘氏过世已有四十二年，离父亲吴元亨过世二十九年，离兄长吴顥过世二十六年，离母亲过世也已二十四年了。

吴几复要完成的是一项大工程。首先，找到祖母灵柩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祖母过世的时候，吴几复只有两岁，祖母停灵的经过他也只是听哥哥说起过。京师有两个广济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在葬礼前十年，吴几复就已经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终于，当吴几复再次造访城西广济寺时，偶遇了当年协助父亲为祖母停灵的小和尚，眼前的小和尚已经变成了老和尚。按照老和尚的指点，吴几复找到了祖母的棺木，棺木的漆早已剥落，只剩巴掌大的一小块儿，就在这仅存的一块漆片上，居然辨识出了父亲的字迹。吴几复放声大哭。

那个在宦游途中失去了父母、兄长的少年最终完成了所有的葬礼，让亲人入土为安，他还把妹妹嫁给了比阳县令李鹏，这桩婚姻门当户对。吴几复真是宦游路上的英雄，他以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科举成功，维持了家族门第，无论是妹妹的婚姻，还是亲人的葬礼。^[2]

当下常说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二字，今天如此，古代亦然。宦游之人本来就是艰难进取的一个群体，是受雇于皇帝国家又心怀天下苍生的群体，他们与妻子儿女，道路相扶，同甘共苦，写下了宦游路上的悲欢离合。



明 唐寅 《松林扬鞭图》

[1]莫砺锋：《刚强人的辛酸泪——读韩愈哭女挈诗》，载《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第74—78页。

[2]以上信息来自司马光所作的《宋故渠州邻水县令赠太常博士吴君墓志铭》《宋故进士吴君墓志铭》《宋故侍御吴君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见〔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五，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91—495页。

传统时期的女子



妻妾

“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起源于基督教道德影响下的中世纪西欧”，在爱情与婚姻之间建立普遍联系，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这是西方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一夫一妻制、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离婚自由等，都是现代婚姻规则，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立足本土看，这都是舶来品。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一夫多妻制。在这个婚姻结构当中，夫妻“敌体”，男主外，女主内，妻与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而妾则是夫妻之下的辅助性存在。有妻、妾然后有嫡、庶，正妻所生的子女为嫡子、嫡女，妾之所出则为庶子、庶女。嫡庶之别，有如天壤。

《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王熙凤称病，庶女探春代理荣国府家政，表现抢眼，生母赵姨娘却来撒泼，幸而被王熙凤的助理平儿镇住。平儿回家报告。王熙凤感慨探春虽然能干，只可惜是庶出，“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不服气，王熙凤就说出了下面一席话：

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而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正庶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

王熙凤虽然不读书，却是《红楼梦》里一等一的聪明人，在人情世故上看得极透彻，这一番“嫡庶论”便说得头头是道，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正出庶出一样，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之中的子女，母亲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是谁，社会地位父系传承，子女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父亲的家族。第二，就社会现实而言，在结婚这一女性最关键的人生转折点上，庶女实际上受到歧视。王熙凤虽未展开说受歧视的原因，却也不难推想。庶女没有地位相当的舅家作为社会关系的依托，也没有母亲的嫁妆作为可能的经济基础，自身所附带的资源相对匮乏，附加值不高。因此，如果有选择，在相同或近似条件下，男性家族当然会选择嫡女。第三，王熙凤说，其实这些世俗的考虑都是浮云：“庶出的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具体到探春姑娘，谁娶到她那是对方的福气。作为嫂子的王熙凤，可算是探春的知音。

关于嫡庶子女的安排原则，唐朝的褚遂良有更为精确的表达：“主祭祀之胄，必资于嫡长；擢文武之材，无限于正庶。故知求贤之务，有异于承家。”也就是说，第一，凡是涉及“承家”，也就是与家族传承有关的，比如

主持家族祭祀，或者包括皇位在内的爵位继承，“必资于嫡长”，适用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子继承原则；第二，凡与国家的人才选拔相关联的，比如官学的入学资格、充当皇帝宿卫的资格，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受推荐升迁的资格，则“无限于正庶”，“人才能进，不论嫡正”^[1]，适用“看爹不看妈”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庶子庶女是有可能凭借自身能力和运气实现逆袭的。

讲完庶女，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庶女的生母——妾。《礼记·昏义》论“娶妻之义，内教之所由成也”，曰：“婚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尽管要借由一男一女的身体来实现，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结合。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以延续家族香火，虽不能说是婚姻唯一的目的，却也是最主要的。换句话说，生育虽然在时间上后于婚姻，但逻辑上先于婚姻，结婚是为了生育，家庭的功能是养育。而妾在家中存在的唯一合理原因，就是为了更广泛地繁衍子嗣。

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看，《聊斋志异》确实是本奇书，故事虽然都是编的，故事背后的观念和欲望却是真的。对照《林氏》和《段氏》两个故事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妾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功能。林氏是好太太的代表，她刚烈贞洁，曾因抗拒北兵强奸而自杀，被救活后脖子歪了。林氏的丈夫戚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本来是喜欢狎妓的，把老婆救回来之后，发誓永不相负，守着一个歪脖子老婆，不去妓院，不讨小老婆，不招惹家里的婢女。林氏过意不去，想尽办法终于让婢女海棠怀上了丈夫的孩子。林氏试探丈夫的口风，问他假定婢女怀上了怎么办。戚生回答说：留犊鬻母——孩子留下，母亲卖了。林氏不忍，保护海棠生下孩子送回自己娘家抚养。就这样，海棠生了两儿一女，都养在林氏娘家。若干年后，戚生已老，感叹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孩子。于是林氏捧出了三个孩子，戚生大喜说：“何不早告？”林氏说：我要是早告诉你，就怕你把他们的母亲卖了。最终，林氏接回了婢女海棠，皆大欢喜。婢女地位低于妾，海棠可以怀孕生子，却始终没有母亲的身份。全仗着林氏的贤德，才没有被卖掉。像林氏这样的妻子，蒲松龄说：“可谓贤德矣。”她完全不妒忌，为了让丈夫能接纳海棠，百法用尽。但是，蒲松龄说的“贤德”其实有它特定的历史含义，最关键的内容是为丈夫的家族延续子嗣，而子嗣之有无是关系到戚生与林氏夫妇的养老送终、财产继承等一系列问题的。

这一点在《段氏》中看得更清楚，商人段氏的老婆连氏，生性奇妒，段氏无子，不敢纳妾。与一个丫鬟发生了关系并使她有了身孕，丫鬟最终被卖到了别人家。段氏过了六十岁，侄儿们开始觊觎他的丰厚家产，段氏想正式过继一个侄子，可其他的侄子不依不饶。连氏气得跺脚，给丈夫连买两个妾，希望能为段家绵延子嗣。可惜，这两个妾都没能生下男孩。段氏死

后，侄儿们在灵前分家，一点儿都不打算留给连氏和两个妾及妾生的女儿，连氏束手无策。正在这时，当年被卖掉的丫鬟生的儿子回来了。连氏大喜，大声呵斥侄子们：老娘也有儿子了。你们拿走的家什，牵走的牛马，都给我乖乖送回来，不然就等着吃官司吧。让段家孤儿寡母绝处逢生的，正是当年在娘肚子里被赶走的私生子。学者们对传统时期女性的继承权问题有着大量的讨论，认为其基本走向是江河日下的。即便在现代的某些偏远地区，父亲死后儿子们分家，没有母亲的份儿，也不是稀罕事。没有儿子，财产就会被侄子等同族男性掠去，为保证老有所养，丈夫死后不至任人欺侮，就必须帮丈夫生儿子。只不过，贤德的林氏是未雨绸缪，妒忌的连氏是亡羊补牢。故事里说，连氏活到七十多岁，临死，把女儿和孙媳妇都叫来，嘱咐说：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如果到三十岁还生不出儿子，哪怕是典当钗环首饰，也要给丈夫纳妾。没有儿子实在是太惨烈了。



图六二：五代南唐 周文矩（款）《浴婴仕女图》

《浴婴仕女图》，五代南唐，周文矩（款）。绢本设色，团扇。35.9厘米×35.8厘米，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很重视传宗接代，在艺术中也多有体现，故在中国画中专门有个门类就叫作“戏婴图”，这类图主要描绘的是孩子们如何成长，如何游戏等过程。此

画展现的就是婴儿洗浴的场景：画中仕女们极为疼爱这几个婴孩，帮他们脱衣服，给他们洗澡，其中一个孩子流鼻涕了，一位仕女正在帮他擦鼻涕。画中孩子天真活泼，头上的小髻髻样式各异，显得细腻生动。这类画作的大量出现，即可反映出当时对生育的重视程度。

《聊斋》的这两个故事一正一反，形象地说明了儿子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就经济和宗族关系而言，妻子和丈夫是一体的，在父系传承的家族制度下，丈夫的儿子就是妻子的儿子，为丈夫纳妾或是婢女以求子，是一个无子的妻子最理性的选择。《聊斋》是男人写的，所以他们从来不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倘若不孕不育的是男主人，那该怎么办呢？

故事中的婢女和妾，都只是生育工具。“留犊鬻母”也不是不可以的，无损主人的德行。历史上，妾的地位曾有过沉浮。西周实行封建制，妻妾之间界限严格。春秋时期，葵丘之盟约定“无以妾为妻”，“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2]盟约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妻妾界限的松动，这其实也是封建制礼坏乐崩的表现之一。春秋战国以至两汉三国，妻妾界限一直处在相对混沌的状态，常常受权势的摆布。西汉“妇制莫厘。高祖帷簿不修，孝文衽席无辨”。孝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每与皇后同坐”。^[3]出身高贵的女子嫁为人妾，亦不以为耻。汉成帝许后的姐姐寡居之后，即嫁淳于长为“小妻”，“小妻”就是妾。三国时曹魏和孙吴，妻妾位错乱之风颇为盛行，以宠夺嫡的现象多见，君有，臣也有。魏明帝先娶河内虞氏为妃，即位后立爱妾毛氏为后，虞氏斥之：“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4]孙权“废嫡立庶，以妾为妻”。^[5]钟会的妾母深得其父钟繇宠爱，“为之出其夫人”。^[6]孔子为治，以“正名”为第一要务。妻妾易位，容易造成秩序混乱。东汉末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检讨的声音，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下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这是两汉以来第一次用诏令的形式严格划分妻妾界限，从而体现了儒家之礼。从此之后，妾的地位日益低下，甚至出现了“以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若婢”^[7]的现象。

《唐律》正式将“以妻为妾”定为罪名：“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为什么“以妻为妾”“以婢为妻”是社会秩序所反对的？《唐律疏义》的司法解释是：“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侔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亏夫妇之正道，黷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

“妻者，齐也。”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内部，夫妻之间还是有平等之意的，那么，传统家庭之中夫妇之间的感情状况如何呢？

[1] [唐]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表》，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

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4页。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刻本七，《春秋左传正义》卷六〇，《春秋公羊传注释》卷一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38、4882页。

[3]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9页。

[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明悼毛皇后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7页。

[5]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8页。

[6]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84页。

[7] [唐]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表》，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4—1505页。

夫妇

“张敞画眉”的故事出自《汉书·张敞传》。儒生张敞担任京兆尹（首都市长），长安人多官大，京兆尹难当，每个市长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然而，干得长的两三年，干得短的一年，甚至几个月，“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遭到诋毁，名声受损，因犯罪或者犯错误而被停职，基本上就都灰溜溜地下台了。在一段时期内，干得长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张敞。能在京兆尹位上干得长，这说明张敞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是超强的，非一般迂腐儒生可比。张敞的儒学修养和应对重大问题的思考能力，也折服了包括皇帝在内的长安政坛，朝廷每遇重大议题的讨论，张敞都能“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可惜的是张敞“终不得大位”，始终没有做到宰相。为什么呢？

《汉书·张敞传》认为，这是因为张敞“无威仪”，缺乏威严仪态。张敞“无威仪”的例子之一就是“为妇画眉”，长安城中人人都说“张京兆眉妩”，翻译过来应当就是“张市长画得一手好眉毛”——听起来的确有些不严肃。果然，就有人报告了宣帝。宣帝很重视，当面质问张敞。张敞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这个回答掷地有声。《张敞传》接着说：“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皇帝爱惜张敞的能力，没有特别责备他，但张敞也因此最终没能位极人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皇帝爱才而大度，第二层是说张敞为画眉这样无威仪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就是东汉儒生班固对“张敞画眉”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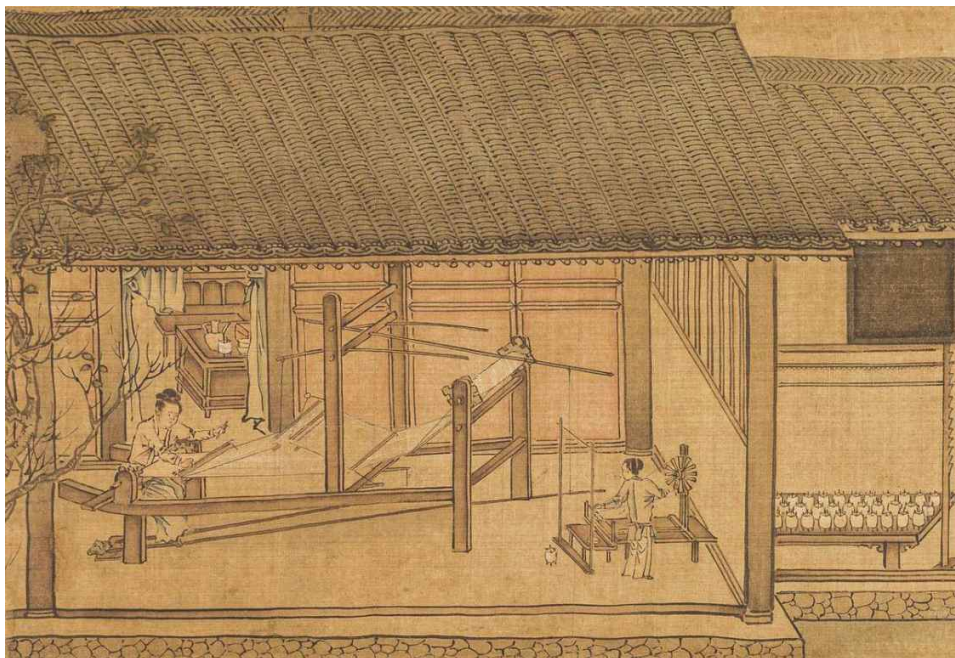
在现代汉语中，成语“张敞画眉”通常用来形容夫妇感情好，已经变成一个褒义词。然而在传统时期，“张敞画眉”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正经的褒义词。比如唐代李翰编撰的启蒙教材《蒙求》里有一句，就是“张敞画眉，谢鲲折齿”，把“张敞画眉”与“谢鲲折齿”对举。“谢鲲折齿”是什么典故？东晋谢鲲，“不修威仪”，曾经担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僚属，因为“任达不拘”被除名，谢鲲根本不在乎，照样“清歌鼓琴”。邻居高家的女儿有美色，谢鲲出言挑逗，“女投梭，折其两齿”。^[1]人人都以为这下谢鲲该收敛一点儿了吧，可是人家照样不在乎，“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倘若谢鲲和高姑娘都是单身，那么谢鲲追求高姑娘也没什么不对。但在当时的常识背景下，以谢鲲的身份地位，不可能还是单身，而且高姑娘的门第肯定配不上陈郡谢氏，所以谢鲲对高姑娘毫无疑问是单纯挑逗，的确轻薄无礼，一梭子打断两颗牙齿是重了点儿，也不算过分。相比“谢鲲折齿”，“张敞画眉”又错在哪里？以现在的标准看，夫妻关系讲究的就是秀恩爱、着情侣装、十指相扣、甜蜜对视等，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规动作。张敞画的是自己老婆的眉，“为妇画眉”应该是加分项，它说明长安市长张敞夫妻关系和谐，是一个对家庭忠诚而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张敞是传统中国的汉朝人。按照以班固、李翰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点，“为妇画眉”只能说明张敞“无威仪”，而一个无威仪的人是不配拥有“大位”的。尽管闺房之内有过于画眉者，一个有修养的男人却不应该做出“为妇画眉”这样亲昵的举动，哪怕是在闺房之内也不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绵延子嗣，“有过于画眉者”的事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画眉不行。隐藏在“张敞画眉”故事背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夫妻关系的潜规则——妻子不是爱欲的对象，公开表达对妻子的爱是羞耻之事。

传统时期的妻子是丈夫家庭责任的分担者。

妻子的首要职责是侍奉公婆，所谓“夫人之职，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2]新媳妇嫁过来时公公婆婆都健在，则须小心伺候，吃穿用度能够做到“非出其手，舅姑弗悦”^[3]，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妻子。科举时代，异地做官是原则，儿子游宦四方，老太爷和老太太“乐间里，与姻族游”，不愿随行，怎么办？那便只能是“夫人愿侍左右”了。范仲淹笔下的胡夫人陈氏，丈夫在外做官二十年，她在老家服侍公婆二十年，“缝衣□殮，必躬亲之。至舅姑之终，与公执丧三年，然后就公官所”。范仲淹赞曰：“此夫人大节，无愧天下之为人妇者，有声诗之义焉。”二十年太久，陈氏的丈夫胡公会一直单着吗？当然不可能，他的身边一定会有婢妾服侍左右；当然，婢妾虽亲，却不能动摇夫人的正妻地位；只是这样的夫妻关系必然是责任恩义大于情感，此夫人“又性好礼，自少至老，对公如宾客”。^[4]万一嫁过来的时候公婆俱已过世，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当然，这个遗憾是可以弥补的。南宋史绳祖给他的第二任太太杨氏写的墓志铭，就特别强调了一句：“君念不逮事吾亲，春秋时祀，严毖吉蠲，躬执馈盥。”因为没赶上伺候公婆，所以岁时祭祀，都是格外严肃认真，亲自整治祭品。伺候公婆，是妻子的首要责任。

妻子第二重要的职责是抚养、教育家中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儿，自己生养当然好，但并非绝对必要，前妻所遗、妾之所生亦可，只要是丈夫的骨血。北宋前期，高氏嫁赵家，前妻遗有五子一女，“夫人煦育教诱，过于己之所出”，高氏又生了四个儿子，活下来两个。培养这七个儿子是高氏最重要的贡献，“夫人每闻诸子之宾至，必解衣为赏酒脯，使延之，从容以讲习道义，故七子皆举进士，有闻于时”。



图六三：南宋 梁楷（传）《蚕织图》（局部）

《蚕织图》，传为南宋梁楷绘。绢本设色，长卷，531厘米×27.5厘米，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也就是男耕女织的基本生产模式。《蚕织图》即反映了江浙一带养蚕人家养蚕织布的生产场景。此长卷由24个画面构成，场面宏大，布局严谨，从人物面部表情到身体动作，皆栩栩如生，仿佛能听到画面中人物的交谈声与织布机发出的嚅嚅声。图中出现的众多器物与屋舍，皆采用工整严谨的界画方式勾勒，设色古朴淡雅。此局部画面中，我们看到一妇人正忙着织布，旁边还有位娇小的女子正在纺线，女性居家劳作的情形在画中有生动的呈现。

其中最小的儿子赵概，“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课以书，使调四声作诗赋”。赵概从十七岁开始考进士，父亲死后二十四年，终以高科及第。^[5]

妻子职责的第三条是照顾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包括很难伺候的大姑姐及乡下亲戚。南宋初年，孙氏嫁苏瑒，苏瑒的姐姐“性坚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责以法度，不知者以为过严”，只有孙夫人“能事之，则终身怡怡，未尝少忤”。^[6]很多关于夫人的墓志都表扬她们生活简朴，却拿出大把的钱来照应丈夫的寒族。司马光“以为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故止叙其事，存于家，庶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耳”。他笔下的夫人张氏可以说

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君性和柔敦实，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尝见其有忿懣之色，矫妄之言。人虽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终不与之辨曲直，已亦不复贻于怀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莫不悦而安之。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无妒忌心。……平居谨于财，不妄用，自奉甚约，及余用之以贍亲戚之急，亦未尝吝也。”^[7]司马光有道德洁癖，是个正经到骨头里的人，他笔下妻子的形象也是极为端正的。

丈夫为妻子所作的墓志铭，另有两篇比较特殊的：一篇是唐代后期杨劳为夫人郑琼所写的，另一篇是南宋后期史绳祖为夫人杨君槪所写的。两朵奇花，别有真意，值得一表。

杨劳的妻子郑琼，出身一流高门荥阳郑氏，她十九岁嫁给杨劳，三十三岁过世，生了四个女儿，死时长女杨李九岁。如果杨李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那么郑琼是在二十四岁结婚，五年之后才生育的。墓志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不知何时，杨劳在外面有了个私生子。杨劳三十岁时，这孩子也能满地爬了。杨家上下大概无人不知，单单瞒着郑夫人。有一次，小丫鬟不小心说走了嘴，郑琼知道了外面这个儿子的存在。于是她很大度地赏赐了这个丫鬟，并且说：哎呀，要不是她，就让我的儿子流落在外面了。郑琼对丈夫私生子的称呼是“吾儿”。这个片段是身为丈夫的杨劳记录下来的，他也许此时心怀感激吧。私生子的地位要低于妾所生的庶子，郑琼对这个孩子的接纳应当赋予了他类似于庶子的地位。杨劳说，郑琼早死是因为迷信，在郑琼小时候，有个和尚说她活不过三十岁，所以她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神经兮兮地念经，做各种莫名其妙的祈祷活动。^[8]杨劳笔下的郑琼除了大度接纳私生子这一点，其实并不太像一个典型的好妻子，在念经上花费很多时间，家政水平和对公婆的服侍肯定不会太理想，又没能生出儿子来。读杨劳的文字，总觉得他的嘴角挂着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史绳祖给杨君槪写的墓志，则是另外一种典范。史绳祖和杨君槪算是二婚——史丧妻，杨守寡。他们在一起风风雨雨三十二年，情深义重。史绳祖笔下的杨君槪是平生知己，灵犀相通，生死与共。史绳祖写道：淳祐初年（约1241年），我担任四川制置司的参议官。蒙古入侵，大帅逃跑，把兵船物资推给了我。敌人侦察到我的位置，一万骑兵“夹岸而逼”，包围了我军。这时候很多人都想丢下船只和物资上山逃命。只有我的夫人说，现在四面都是贼，上岸也是个死，不如战死。我受夫人的话鼓舞，带领夫人和儿子登船率先冲向了敌阵，最终我们保全了船只和物资。可是后来的大帅妒忌，冒领了我的功劳，有人为我叫屈。可是我的夫人说，保全性命，不辱使命，足了！^[9]

在墓志当中，史绳祖始终都用“君”来称呼杨君槪，这个称呼表达了尊重与爱。史绳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平等的家庭内部，也可以有志同道合、情深义重的夫妻关系存在。只不过这种家

庭结构牺牲了女性的自由，把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内部，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和事业。北宋末年，孙家有个小姑娘非常聪明，李清照很喜欢她，“欲以其学传夫人”——名满天下的导师李清照主动要求收学生，可结果怎样？这个当时只有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拒绝了李清照，理由是“才藻非女子事也”^[10]。最终，这个小姑娘成了一位贤妻与良母。这是对社会规范的自愿驯服。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但社会规范不是，好的社会应当给所有人更多选择的自由。

善事公婆、教养子女、照顾亲戚、和睦家族，是儒家文化中理想妻子的应尽之责。所有这些责任均与丈夫相关联，却并不直接与丈夫发生关系。丈夫与妻子作为男人与女人性的关联，是传统文化有意回避的部分。就算是老婆死了，丈夫悼亡，也要特别强调妻子的贤惠。举两个例子。唐代元稹的悼亡诗：“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荇筐，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11]宋代贺铸的悼亡词：“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12]元稹的诗和贺铸的词对亡妻的思念都是有关美德的。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小轩窗，正梳妆”一句，非常侧面地提到了容颜，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一切以丈夫为中心，满足了一个落魄文人的一切幻想，却最终遭到夫家驱逐，结局凄惨，也是不难想象的。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九《谢鲲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7页。

[2] [宋]范仲淹：《胡公夫人陈氏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八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册，第42—43页。

[3] [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四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册，第214页。

[4] [宋]范仲淹：《胡公夫人陈氏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八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册，第43页。

[5] 参见[宋]苏舜钦：《广陵郡太君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八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册，第135页。

[6] [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四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册，第214页。

[7] [宋]司马光：《叙清河郡君》，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二四，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册，第248页。

[8] 参见张海艳：《唐荥阳郑琼墓志释文校补》，载《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2014年，第201—212页。

[9] 参见[宋]史绳祖：《归齐郡宜人杨氏圻志》，见衢州市博物馆编：《衢州墓志碑刻集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10] [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四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册，第214页。

[11]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九《伤悼诗》，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第112页。

[12] 唐圭璋编：《全宋词·贺铸·半死桐》，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02页。

贞节

今天的我们相信，在爱情和婚姻中要保持忠诚，且这种忠诚应当是相互的，不分男女。而贞节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单方面的忠诚要求，它强调的是女性单方面对男性及其家族的义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诬陷下狱，谋害至死。在临终前写给妻子张氏的绝笔信中，杨继盛说：妇人家有丈夫死了就一起死的，是因为夫主没留下儿女可以守望，活着没用，所以跟着丈夫去死，这才是“当死而死”，死得重于泰山，这叫“贞节”。倘若夫主死了，身后还有幼女孤儿无人收养，那么这妇人的身上，就肩负了夫主的祖宗祭祀、命脉、一生事业，这当口就死了，那便是抛弃夫主的祖宗祭祀、隳坏夫主的事业、辜负夫主的重托，给夫主的身后遗留下无穷忧虑，这种死法不但是轻于鸿毛的，而且会为众人唾骂，骂她是个不知道理的妇人。

这段话，曾经被学者引用，来说明在明朝的贞节观下，丈夫对妻子生命的漠视。然而，当我们把整篇绝笔信耐心读下来，就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深情，杨继盛其实是在劝说妻子不要自杀，忍痛苟活。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我就死了，留得你在，教导我的儿女成人长大，各自成家立计，就当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欢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无有我也罢了，无有你，一时成不得便人亡家破，称了人家的愿，惹人家的笑。你是一个最聪明知道理的，何须我说千万，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儿女为重方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杨继盛对张氏的深情，毋庸置疑。然而他用来劝说妻子苟活的逻辑，又确实是贞节观念所主导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你的生与死都应当以我和我家的需要为转移；若我无儿女无父母，那你也不活也罢；今我有儿女，你自当苟活于世，保全我的血脉。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后，浮冰错杂的海面上，杰克和罗斯只有一块浮板可以容身等待救援，杰克选择松手沉入海底，把生的机会留给心爱的女人，即使这个女人没有怀着自己的骨肉，即使这个女人后来跟别人结婚、给别人生娃，丰富多彩地过完一生。这种情节，杨继盛和他所处的时代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杨继盛甚至还先后买过两个妾，而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他对张氏的深情，因为在极端的贞节观下，这都是说得通的。

那么，如此极端的贞节观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现代学者有种讨巧的说法，喜欢称“宋明”，将元朝一百多年忽略不计，直接把宋和明连成一片说。比如说到贞节观，最省事儿的说法就是“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样极端的话语。这

句话的确是宋朝理学家程颐说的，但是贞节观这个锅，宋朝却不能随便就替明朝背起来。程颐本人主张婚姻的最高理想是男女双方都从一而终，他指的“失节”既包括女性的失节，也包括男性的失节，而非片面责备女性。在实践上，“二程”也并不反对女性再嫁。程颐能够欣赏和赞美女性的学识与才华，他甚至主张，优秀的女子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那么不妨独身。

自从汉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表彰对象之中就有所谓“烈女”“节妇”，且以她们作为女性榜样。但是烈女之“烈”，节妇之“节”，却并不一定与守贞有关，它可以指女性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特殊成就，比如说善于教育孩子，保持家风。宋代的女性榜样基本上仍然处于这种价值多元的状态，比如包拯的儿媳崔氏，就是一位受到朝廷表彰的节妇。

崔氏出身名门，十九岁嫁给包拯的长子包繹，产一子。两年之后，包繹过世。过了四年，他们的儿子夭折。包拯与夫人董氏“以其妙龄”，询问崔氏的心意，劝她改嫁。崔氏誓死不从，继续留在包家，尽孝持家。包拯晚年，得幼子包绶，家中婢妾所生，由崔氏负责教养。几年之后，包拯过世，崔氏扶老携幼从开封搬回包氏的老家庐州。这个时候，崔氏的母亲吕夫人亲自赶到庐州，逼着女儿改嫁自己娘家哥哥的儿子，崔氏护送母亲去见舅舅，取得舅舅的支持之后，又回到了庐州。最终，崔氏为董夫人养老送终，又为包绶选择名师，教养成成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崔氏甚至还辗转找到了包绶的生母，把她接回包家来，成全了包绶的孝道。民间故事里包公“嫂娘”的原型，应当就是这位崔夫人，只不过她并非包公的嫂子，而是包公的长媳。

为了表彰崔氏，当地地方长官亲自为她作了《节妇传》，朝廷也特事特办，给了崔氏诰封和“旌表门闾”的荣誉。旌表门闾的具体形制不清楚，大体就是在大门口设置特殊的标记，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光荣所在，作用接近于明清的贞节牌坊。但是，宋朝的旌表门闾与明清的贞节牌坊，所表彰的东西却有着极大的差别。明清人像看贼一样盯着女性身体，而宋人看到的却是女性对家族和社会的贡献。崔氏的旌表门闾敕书是由苏轼起草的，至今还在，其中最核心的是这一句：“使我嘉祐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尔之功。”让嘉祐名臣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血，成为一个有成就、有操守，让世人称道的人，这是你的功劳啊，尊敬的崔夫人。你的这种精神，将会振作我们的社会风气，“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也是宋朝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嘉祐名臣，指的就是包拯。

在改嫁相对自由的风气之下，崔氏两次选择了留守。这是她的主动选择，而非外界所强加。没有人会对她说：丈夫死了，你又没个儿子，不如干脆自杀，跟了丈夫去！自始至终没有人把她的价值绑定在她死去的丈夫身上，崔氏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受到了足够尊重：公婆询问她的心意，如

果她愿意，就可以改嫁；母亲逼着她改嫁，是因为心疼女儿年轻守寡；舅舅虽然愿意接纳她做儿媳妇，但最终还是尊重她个人的选择。而崔氏最终选择留在包家，实际上也获得了一片施展才华、有所作为的天地，尽管这片天地只在包氏庭院之内，但是其影响却超出了包氏门闾。这就是宋朝的节妇，她的头顶上没有贞节牌坊，身后也没有贞节观的阴影。

传统社会，父系家族出于血缘纯洁性的考虑，对被视为生育工具的女性的纯洁性有所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走到极端变态的地步，片面强调女子的贞节，将失身视为比失去性命还可怕的事情，反对再嫁，把守节本身当作一项社会工程来抓，是明朝才开始的事情。明朝发明了贞节牌坊这种女性贞节纪念碑，有明一代，见于记载的节妇烈女多达35 829人，平均每年130人。而清朝人自诩本朝“表彰节孝，旷越前代……偏方下邑，穷檐小户，皆获上邀旌典。是以妇女相奖为节孝者，数十倍于明以前”。

“夫为妻纲最是吃紧”“女人最污是失身”，这样的话就像紧箍咒一样，从明朝开始，一直念到了三十年前。在当下的Me too运动中，有那么多男性站在了受害者这边，男性和女性合力打破了贞节魔咒，共同反抗强权与暴力，建设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奇花：程氏不嫁女

在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女无外事”，女性生命的价值通常附丽在家庭上——必须结婚，成为妻子，才能在丈夫的成就中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必须生儿育女，成为母亲，才能在丈夫的家族传承中获得现世的承认和死后的追祀，以及在儿子的功业中与外部世界建立进一步的联系。

一个女人在成年之后，倘若不能通过婚姻进入另外一个家族，成为妻子和母亲，她的生命则近乎荒废，死后肉体 and 灵魂也将无处安顿。武则天晚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心怀犹疑，明明亲生儿子已经备位东宫，却还有数百人上疏拥戴她的侄子武承嗣做太子。最终，李昭德的一席话打消了武则天废子立侄的念头，李昭德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1]哪有侄子做了皇帝，为姑妈立庙享祀的呢？陛下想要在死后享受子孙的血食祭祀，就必须立自己的儿子，侄子姓武也没有用——父系传承，子孙奉养和祭祀的是自家的列祖列宗，姑妈是别人家的鬼，“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2]姑妈不在侄子的祭祀范围之内，这是制度，是文化，是传统时期人们赖以安顿身心的信仰。通过婚姻和生育成为夫家的祖妣，进入夫家的祭祀序列，从而获得灵魂的安顿，血食永享，这是传统世界中女性生命的终极价值。所以，在传统世界中，婚姻对于女性而言不是选项，而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没有不结婚的女人，只有嫁不出去的女人。

在传统的传奇故事中，像“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西式的结尾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传奇的圆满结尾一定要夫贵妻荣、子孙繁衍、婚宦两得才好。比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妓女李娃与高门子弟郑生的传奇故事，结尾就非常典型：首先，郑生官运亨通，这是必须的；其次，“李娃封汧国夫人”，这也是必须的；再次，还必须有“绵绵瓜瓞”的内容——李娃生的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官儿最小的也是个太原尹；哥儿四个娶的老婆都出自高门甲第，郑家的兴隆繁盛，举世无双。唯有这样的结尾，方称得上美满。这其实很像宋朝正常女性的墓志铭：必须要嫁，要孝顺公婆，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照顾公婆，那就恭谨地祭祀追悼；必须要生，儿女双全，福寿绵绵；必须要教，丈夫不幸早逝，寡妻则要承担儿子的教育工作，克服丧夫和贫困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为了给儿子寻找最好的学区，要不惜搬家，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要舍得拔下钗环首饰换钱买酒菜款待儿子的学友；必须要亲睦丈夫的亲族，自己的生活可以很简朴，但是丈夫用家中钱财来周济亲戚，则必须舍得，不能吝惜。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最终在儿子和丈夫的仕途成功中得到了丰硕的回报，这样的故事，一直是传统时期女性人生故事的主调。

不仅如此，通过儿子和丈夫的舍生取义，母亲与妻子还获得了名垂青史的

机会。东汉末年，宦官兴起党锢打击儒生官僚，范滂被捕，唯一不放心的母亲，母亲反过来以名节勉励范滂从容就义。“滂母”成为后世贤母爱子以义的典范，“汝能为范滂，吾岂不能为滂母耶？”这样的话，包括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内的很多贤母都说过。“岳母刺字”的民间故事里，隐隐然也有“滂母”的影子。范滂与滂母之间的联结已经从血脉、伦理上升到了道义。通过儿子的舍生取义，母亲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丈夫与妻子之间也有类似的关联。明嘉靖年间的忠臣杨继盛被贬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他创办超然书院，购置学田两千亩，以为书院永久之资，还拿出了自己的俸银，又“鬻所乘马，出妇服装”，把自己的交通工具卖了，还卖了老婆的衣服。杨太太张氏对此的真实反应，以杨继盛为主角的记载是不会加以理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用现代女性的心理来妄意揣度，认为杨太太一定是委屈的。现代婚姻的基本逻辑是两个自由独立的个体间的自愿结合，结婚之后，夫妇之间在经济权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仍然有着清晰的你我界限，在现代婚姻之中，人们衡量利弊得失的基本单位越来越倾向于个人。而在传统时期，家庭才是利弊得失的基本计量单位，在家庭之中，男性是核心与主导性因素，女性是依附性因素。所以，杨太太应该是能理解并接纳丈夫要求自己所做出的牺牲的。有时候，女性对大义大节的秉持，会比男性纯粹果决。比如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当南明政权覆亡之际，按照钱夫人柳如是想法，是要夫妇一同殉节的，钱谦益面有难色，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钱氏夫妇后来都投身了反清复明的民族大业，可是在投水殉国的那一刻，柳如是比钱谦益坚决。

“妇人隐德闺门，非遇事莫显”，女性的日常活动的空间是在闺门之内，只有遇到特殊事件，女性的美德才能光大彰显。这就是传统社会所认定、允许的女性价值。传统时期为女性所提供的人生选择空间是极度狭窄的，相夫教子是唯一正途。出家为比丘尼、女道士是不得已的选择。不幸堕入风尘，纵然有千种风情、万般才华，也不过是文人风流的点缀而已。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个体活出不同一般的精彩。这些精彩个体的存在，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无法上升到一般，她们是特殊的奇异花朵。但是，她们存在于黄茅白苇之中，就尤显珍贵，值得褒扬。

奇花之一是程家的女儿，虽然她终身未嫁，却赢得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尊重与赞美。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九月初一，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程颢的府上又添了一位姑娘，这是程颢最小的女儿，程颐的侄女，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这一年程颢三十岁，虽然官职卑微，却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四年前，程颢中进士，跟他同年考中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曾巩和张载，而他们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程颢、程颐兄弟的学术声誉在

程颢中进士之前就已经确立。张载在开封，开办《周易》系列讲座，他坐在铺了虎皮的椅子上讲，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兄弟来旁听，并参与了讨论。次日，张载就让人撤去了虎皮，说：你们还是向程氏兄弟学习吧。当时张载三十七岁，程颢二十五岁，程颐二十四岁，都是在开封准备参加科举的举人，那种追求真理当仁不让的锐气与胸襟，令人感佩。程姑娘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家，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程姑娘从小就是一个安静爱思考的孩子。因为是女孩子，所以程家并没有刻意教她读书，只是小姑娘耳濡目染，“自通文义”。到了十六七岁，程姑娘开始谈婚论嫁。“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从宋朝开始，中国进入科举时代，选女婿的最核心标准是能不能读书，科举成功的概率有多大。程家的官位虽然不高，但是学术声望极高，特别是程颢“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而且，从程颢的高祖程羽开始，五代为官，社会关系资源丰富。按道理讲，选一个能读书、肯上进的女婿应该不难，然而“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或许因为程姑娘遵从自己的本心，没有把世俗标准放在眼里，而家人又十分尊重程姑娘的心意，所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人。

二十岁过后，程姑娘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问题人物——“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交旧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家人甚至曾想找个差不多的人家把她嫁出去算了，然而终是不忍心，“不得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知，盖度其不屑也”。二十四岁，程姑娘的母亲过世，在为母服丧期间，她因悲伤劳累，也染上了重病，次年（1085年）二月初二，程姑娘病逝。她被葬在了洛阳伊川程氏家族墓地，也就是父母身旁。

程颐亲自为侄女书写了《孝女程氏墓志》。志文中，程颐回顾了程姑娘临终前的一幕：姑娘病得很重了，我想这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她开心的，就对她说，你喜欢听道义，就让我再为你讲一讲吧。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程颐给予侄女的可谓儒家的最高礼遇，像圣人一样，闻道而后死。程姑娘喜欢读书，她的父亲、叔父都是当世大儒，可是在此之前，由于性别限制，她都只能是旁听生，没有听讲的资格。终于，在这一刻，程颐赋予了程姑娘“闻道”的资格。待程颐讲完，侄女说：叔父为什么没早点教我呢？我现在脑子已经不行了。不过我死而无憾了，只可惜没能为母亲完成丧礼。说完，程姑娘让人召来了家中的兄弟和晚辈，嘱咐安抚完毕，溘然长逝。

对短命而亡的侄女，程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呜呼，是虽女子，亦天地中一异人也。如其高识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励俗，并前古贤妇，垂光简册。不幸短命，何痛如之！”对程姑娘的未嫁，程颐也明确地表达了态度：“众人皆以未得所归为恨，颐独不然。颐与其父以圣贤为

师，所为尚恐不当其意，苟未遇贤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没世。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3]

“恨其死，不恨其未嫁”，是宋朝大儒对家中未嫁女儿的悲悯。对程姑娘，程颐既有对侄女的怜爱，更有对一个同样高尚的灵魂的尊重之爱。有学者研究汉代女性“过时不嫁”的现象，认为史书中晚嫁的女性，主要包括了贫女、丑女、巫女、宫人，以及残缺家庭的长女等。纵观历史，还有像程姑娘这样自愿选择不将就的。而在芸芸的催嫁父母中，也有像程颐这样赞美、尊重、怜惜不嫁女儿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希望她好，给予尊重。宋朝人有这样的觉悟，况今日之父母乎。

^[1]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2855页。

^[2] [魏] 何晏集解，[唐] 陆德明音义，[宋] 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50页。

^[3] [宋] 程颐：《孝女程氏墓志》，见[宋]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0—641页。

奇花：女仆张行婆

张行婆虽然是个身世坎坷、地位卑微的女仆，却活出了生命的精彩与尊严。

张行婆出生在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继娶，继母是个狠毒的女人，张行婆在七岁的时候就被她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最终把张行婆卖到了尚书左丞范家，范家给张行婆取名菊花，这是个丫头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样。张行婆自此就叫张菊花了吗？我认为不是，她被叫作菊花的时候，已是范家家奴，应当姓范或没有姓，所以她的名字就是菊花。菊花模样乖巧，手脚勤快，范家女儿出嫁时，就把菊花做了陪嫁丫头，菊花跟着范姑娘来到了泗州全家。范家姑娘出身高贵，菊花勤快谨慎，在全家很受器重。

二十八岁那年，菊花跟着太太回娘家，在范家的大门口，她看见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卖柴老头，越看越像自己的父亲。一问之下，果不其然。二十一年前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不见了女儿，继母说是孩子淘气，跑丢了。父亲疯了一样地冲出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于是哭瞎了一只眼睛。转过年，皇上大阅禁军，瞎了一只眼的父亲是混不过去的，于是被解除了军籍，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因为没有别的营生，只好卖柴为生。

菊花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如今她找到了父亲，全家就干脆放她自由，让她回家与父亲团圆。父女团圆，狠心的继母该怎么办？按老头的意思，这狠毒的女人就该打一顿赶出去。可菊花说：要不是母亲，我也到不了范家这样的贵人家，母亲是有德于我的。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如今上天保佑，我重新见到了父亲，我回来却赶走老太太，我怎么能安心呢？听了这话，父亲留下了继母。二十一年过去，当年那个身强力壮、凶起来似乎能把她撕碎的女人，已是一个干巴巴的老太太了，因为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又卖了前房所生的女儿，她备受谴责。

菊花回归，三口团圆是好事，但是日子该怎么过呢？父亲已经年近八十，没有收入，没有田产。听父亲说，他当兵之前在潍州老家是有田地的，只是出来的时间长，田地已被他人霸占。听到这话，菊花二话不说，带着父亲就回了老家，击鼓鸣冤。官司打赢后，张家有了田产，日子就有了着落。不久，父亲便过世了。父亲的过世让继母内心充满了恐慌——当年她卖了幼小的菊花，如今菊花正当壮年，见多识广，连官府都敢进，而她已是垂垂老矣，倘若菊花要报复，她只能任凭宰割。但是，让继母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菊花真的像女儿对母亲一样照料了她的晚年。继母的腿不好，稍微远一点儿的路，菊花就背着她，就这样，一直背到了继母过世。

而后菊花选择了结婚，她嫁给了邻近一个很普通的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没几年丈夫过世，菊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终于熬到儿子娶了媳妇，女儿也出嫁了。按照一般故事的人生走向，菊花这时候就该做个有福气的老太太，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是她没有。

儿子结婚之后，菊花对他说：我一直是信佛的。咱们这一片有一座古庙，荒废很多年了。我要带领邻居们把它修好，住进去后就“不复为尔母矣”，不再做你的母亲了。

古庙修好，菊花就离开家，成了修行人。而且，她告诫儿子不要到庙里来：庙里所有的是众人的财产，是用来兴修佛事的。如果儿子进进出出，那么别人会起嫌疑之心，不容易讲清楚。在菊花这里，修行之地和世俗之地泾渭分明。

菊花还去看望了故主，她去泗州拜会了全家，又步行几千里到陕州拜会了全家的小姑子，这位小姑子嫁到了陕州夏县的司马家。在司马家，菊花虽然是客人，但是安守女仆的本分，勤俭节约，为年幼的女仆洗头洗澡、缝补衣服，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家里养的猴子和狗，她也每天定时投喂，跟这些小畜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菊花离开之后，猴子和狗一直伤心地叫，好几天都不肯吃东西。

就是在陕州夏县的司马家，菊花遇到了她的传记作者司马光。司马光的文集之中，只有四篇传记，其中的一篇就是为菊花写的。他遇到菊花的时候，菊花已经步入老年，被人称为“张行婆”，“行婆”



图六四：北宋 王居正 《纺车图》

《纺车图》，北宋王居正绘。绢本设色，69.2厘米×21.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所展现的是两位妇女在互相配合着纺线，其中一位是相对年轻的怀抱幼子的村妇，另一位是老妪。老妪站在稍远点儿的地方，为年轻的村妇牵纺线。在年轻村妇身后，有一个蓬头稚子正在逗玩一只蛤蟆，还有一只小狗在纺车后兀自撒欢儿。从画中人物打着补丁的衣着来看，她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但老妪和村妇脸上所露出的恬淡的表情，让整个画面看上去宁静、朴素。这与文中讲到的张行婆的人生现状与态度

相契合——她并未因眼下拮据的生活现状而显出丝毫的抱怨，而是一直保持淳朴向善的本色。

就是信佛而在家修行的老年妇女。司马光为什么会给张行婆作传？因为他在张行婆身上看到了儒家士大夫都相当缺乏的四样美德——忠、孝、廉、让。在司马光的理解中，张行婆对故主人的深情，是忠；为父亲和继母养老送终，是孝；守护庙产不许儿子随便进入，是廉；对主人家年幼女仆的照顾，是让。司马光是非常纯粹的儒者，对张行婆的佛教信仰，他是看不起的。所以，司马光在传记结尾这样说道：张行婆有这样的美德实属难得，可惜她被浮屠蒙蔽，无法进入儒家的礼义之途。尽管如此，张行婆的行为确实有值得推崇的地方，所以我才敢私下记录她的生平故事。

这其实是司马光的狭隘之处。佛教信仰正是成就张行婆所有美德的基础。比如，她人生最大的悲剧肇始于继母的出卖和欺骗。但是，当她历尽艰辛跟瞎眼的父亲团聚之后，却阻拦了父亲对继母的惩罚，她给父亲的解释，也应当是她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她把得入贵人家为奴婢看作自己的好运气，而继母的出卖则是她进入贵人家的原因，继母的出卖虽然是恶行，却最终导致了好的结果，当她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佛教的因果链条上去看时，就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继母其实有恩于自己。所以，以佛教徒的善良，张行婆理解并心悦诚服地接纳了她的命运。至于对父亲和继母的照顾，特别是对继母晚年的好，司马光以孝道来解释，我更愿意认为这是种天生的善良。孝道是外在的约束，善良是内在的驱动，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张行婆的结婚和生育，司马光说得太简单，因为这与他所表彰的美德关系不大。张行婆结婚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这在宋朝算是超级大龄。女性没有传承家族香火的责任，普通女性可能会因为生计选择婚姻，而张女士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她为什么选择结婚？父亲和继母死后，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那她可能会孤独终老，但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按理说张行婆应当是不惧怕这种孤单的，可她最终选择了结婚。

丈夫死后，她独自养大三个孩子，帮助他们完成了嫁娶，然后飘然离去，修庙，看守庙产，独自修行，临别之前对儿子说一句“不复为尔母矣”，含笑断尘缘，实在是了不起的潇洒。

我很佩服这个在历史长河中微尘般的张行婆。她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担当，不畏惧，能接纳，懂感恩，独立又自尊。一个女仆，最终活出了这样的精彩，值得赞叹！

传统时期的男子



从众还是从心？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人生选择要丰富得多，家庭以他们为核心构建，社会的广阔天地向他们开放。生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生物性延续；扬名显亲，以个人的社会性成就来维系、光耀家族的名誉地位。这就是传统中国对男性的普遍性要求。具体到扬名显亲这一判断标准，其实是比较单一的，简言之就是：要做官。一定要与皇帝国家建立直接的联系，才称得上功成名就；而且做官的标准，越到后来就越趋向狭窄，大致而言，宋朝以后，只有进士出身做文官才是真正光荣的。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同时展出的还有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真迹，这幅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画终于重现人间。在这幅长卷的卷后，有一段黄庭坚的跋文：

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也。”

伯时是李公麟的字，李公麟二十二岁中熙宁三年（1070年）榜的进士，五十二岁因病主动请求退休。“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指像谢灵运一样有钟灵之气又善于自律的人，这是黄庭坚对李公麟人品的高度评价。这样高贵的人品，假以时日，应当能够做到宰相，可惜李公麟太喜欢画画，最终被爱好所拖累，未能大用。这是当时士大夫对李公麟的爱重和叹惜。作为李公麟的知音，黄庭坚代李公麟告白说，这些世俗之物，伯时是很不在乎的！



图六五：北宋 李公麟《五马图》

《五马图》，北宋李公麟绘。纸本墨笔，225厘米×29.3厘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李公麟工于画马。这幅《五马图》已成为后世画马的最佳范本。图中所画的是五匹从西域进贡的名马，每匹骏马旁有一位奚官（养马人）。这五匹马皆有名字，自左往右分别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川花。每匹马身后还有黄庭坚的题字，对马的年龄、名

字、进贡时间等进行了介绍。李公麟笔下的马身姿矫健、形态各异、形神兼备。这幅画也颇为传奇。2018年1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颜真卿特展，而这幅《五马图》居然列于展中。而此前大家都认为该画早已毁于二战，但它居然在不经意间给大家一个惊喜。

是否真的不在乎？李公麟究竟还是去官场中走了一回，他真的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只有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在龙眠山庄的隐居生活才完全属于他，属于绘画。宋人邓椿所辑画家列传《画继》卷二，提到李公麟，言其“立朝籍籍有声，史称以画见知于世，非确论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以其余力留意画笔……”邓椿写李公麟，特别强调他“立朝籍籍有声”，只“以其余力留意画笔”，像是在回应“朝中士大夫”的叹息。相比之下，“朝中士大夫”和邓椿的看法才是主流：作为一个士大夫，做官、做大官才是正道，艺术追求可以有，然而必须是“以其余力”为之的业余爱好。

在李公麟的例子中，绘画与做官在价值评判上的高低之分，来自外部世界，我们没有看到李公麟本人的态度，他能够在五十二岁辞官，应当是爱绘画超过爱做官，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他考进士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考，他做官只是因为考中进士的人都做，而他必须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在唐代大画家阎立本这里，绘画与做官之间的冲突从外部世界进入了内心世界，给画家造成了困扰，甚至影响到了阎家子孙后代人生方向的选择。阎立本最擅长人物写真。有一次，唐太宗与侍臣学士泛舟春苑，水中有奇丽的鸟儿随波容与，太宗大悦，下令在座的学士们作诗吟咏，并立即传召阎立本前来写生，皇帝有命，宫中传呼“画师阎立本”觐见。此时阎立本已经做到了吏部的主爵郎中，堂堂五品官，竟然被称为“画师”。他急匆匆赶来，“奔走流汗”，在水边埋头作画，“手挥丹粉”，遥望御舟之中优哉游哉的各位同列，羞愧得面红耳赤。回家之后，阎立本告诫儿子：“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1]

阎立本、李公麟们无法想象，千年之后，大浪淘尽风流人物，只有他们还能凭借绘画这门“末伎”被更广阔的世界瞩目。绘画是“末伎”，医药是“治道绪余”^[2]，所有与实践有关、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技术性行当，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支持，而帝制国家又不肯把这一部分内容从官僚系统中剥离出去，为它单独设立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与官僚体系基本持平的评价体系，结果就是技术官僚始终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位被混杂在普通职位当中，以同样的标准升迁轮转，最终泯然众职，未能建立起技术性职业的尊严，从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图六六：唐 阎立本 《萧翼赚兰亭》

《萧翼赚兰亭》，唐代阎立本绘。绢本设色，158厘米×28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图绘的是萧翼从辩才和尚手中“赚”取《兰亭序》的故事：唐太宗甚是痴迷王羲之的《兰亭序》，于是派人四处寻访。有人说《兰亭序》或在辩才手中，于是唐太宗最终派萧翼去索画。萧翼在与辩才喝茶谈天的过程中与其结为忘年交，而后拿出王羲之的另一幅真迹，抛砖引玉，从辩才口中套出了《兰亭序》的下落，并将辩才拿给他看的《兰亭序》即刻收入囊中，而后拿出了诏书……就这样，《兰亭序》到了唐太宗手中，最终被他带入了昭陵，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是摹本。此图对辩才与萧翼谈天经过进行细致摹画，画左侧一老一少正烹茶，画右侧一童子怀抱《兰亭序》刚走出来。画作主次分明，虽年代久远，但人物神态惟妙惟肖，清晰可辨，足见阎立本画技之精湛高超。

阎立本的家族所传承的是建筑专业，绘画只不过是建筑大行当中的一个部分，这就像是现在的建筑设计师都要学线描、画水彩。阎立本的父亲阎毗做过隋朝的殿内少监，“以工艺知名”，阎立本和哥哥阎立德“早传家业”。阎立德曾经主持制作皇帝御服的“袞冕、大裘等六服”，以及“腰舆、伞、扇”，也就是说，阎立本画的《步辇图》上的腰舆，就出自乃兄的设计。唐高祖的献陵、太宗的昭陵，也是阎立德主持修建的。太宗东征高丽，行军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是阎立德“填道造桥”，才使大军得以通过。太宗的翠微宫和玉华宫，也出自阎立德的手笔。阎家的祖传技艺包括宫殿和陵寝的营建、桥梁建筑和服饰仪仗的设计制造，不仅有技术的部分，还有组织施工的部分，实在是一个大学问，令人叹为观止。阎立德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也保持在专业领域，包括将作监和工部官员，阎立德的最后职位是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正三品官。有意思的是，阎立德死后被追赠为吏部尚书，同样是正三品，但是在六部尚书中排第一。^[3]阎立本在兄长生前做过吏部的主爵郎中，在兄长死后接任工部尚书，后迁右相，阎立本比较缺乏政治才干，时人评价他：“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而当时的左相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相比之下，阎立本就像是个漂亮的摆设。有人借用《千字文》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4]一个伟大的画家、合格的建设部部长，偏偏要做宰相，这

才是自取其辱，然而这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帝制时期的官场如同华山，只有一条不断升迁的路。

在宋代以前，当兵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宋代以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从军这条路还可以走，但是所能取得的光荣却日渐稀少。光荣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科举成功者。可是科举成功者又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做官，做各种缺乏技术含量只有地位高下区分的官，听皇帝命令，看上司脸色，努力做到高官。中国最优秀的男青年的路，就这样越来越窄了。与此同时，男人也收窄了女人的路，当男人开始接纳无条件的忠君，他们要求于女人的，就有了无条件的贞节。清代江南学者，家有田产的，去北京兜一圈儿，早早地退休回家做学问倒是条自由之路。只可惜，他们所钻研的学问，又跟现实世界离得太远，方法是理性的，对象却是疏离的，与自然疏离，与政治疏离，深则深矣，无补于世。

[1]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七《阎立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0页。

[2] [宋]曹孝忠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二一，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563页。

[3] 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七《阎立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79页。

[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七《阎立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0页。

失败者

本节我们讲两个失败者的故事。

赵至生活在魏晋时期，是嵇康的晚辈；王樵生活在北宋，与寇准同时代。这两个人生活的时代相距七百年，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独特”的失败者。

赵至在三十七岁那年呕血而死，他死于强烈的不甘心。唐长孺先生有一篇论文，以赵至的身世为核心讨论魏晋时期的士家制度。^[1]在历史学论文中，史料比比皆在，理论也是所在皆有，智慧偶尔闪光，朝廷国家、帝王将相、制度、文化、群体都很常见，最难得一见的，是像你我一样的小人物，以及对个体心灵的关照、对个体命运的同情与思考。唐先生这篇是个例外。而王樵一生最奇异的地方在他生命的结尾——他“设计”并完成了自己的死亡。王樵为自己的坟墓取名“茧室”。在初次读到王樵的故事时，我对他谜一般的作茧自缚感到新奇和困惑。

在历史学上，能够构成意义、值得关注的普通个人，一定得有他的普遍性价值。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深刻地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当中，并在“这一个”特殊的个体当中展现得异常鲜明，让人无法移开眼睛。那么，蕴含在赵至和王樵生命故事背后的普遍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按时间顺序，先看赵至。赵至的家当时在河南缙氏，他十三岁时，新县令到任，赵至和母亲一起围观。母亲说：你有一天也能有这样的荣耀吗？听了母亲的话，赵至开始拜师读书。他在学馆，“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老师感到奇怪，问他，赵至回答说：“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这发自内心的孝道，让老师对眼前这个小毛孩儿刮目相看。

十四岁，赵至“诣洛阳，游太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名士嵇康，嵇康正在太学抄写石经。赵至追随嵇康不愿离去，终于，他鼓起勇气开口，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颇感惊讶地说：小孩子问我的姓名做什么？赵至说：“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2]，赵至能够看到嵇康不凡的气度，并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赵至的勇气。

从此，嵇康就成了赵至的偶像和渡船。他曾经偷偷跑到洛阳去找嵇康，但刻舟求剑，哪里还能找到。寻嵇康不遇，赵至开始反复离家出走，“走三五里，辄追得之”，被追回来之后他也并不安生，“又炙身体十余处”，用火烧自己。周围人都说这个孩子疯了，怕是要废了。就在人们扼腕叹息时，

赵至成功出走，这一年他十六岁。

赵至出走的第一站是邺城，他在那里改名翼。不久，嵇康来邺，赵至与偶像重逢，跟随嵇康回到山阳，改名浚。嵇康死后，赵至辗转“乃向辽西而占户焉”，在辽西，他取得了户籍、身份和地位，成为辽西太守的属官，太守信任他，派他到洛阳去“上计”，也就是代表辽西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又得到冀州刺史的辟举，“断九狱，见称精审”，被推荐为良吏报送中央，再一次回到洛阳。这一年他三十七岁，意气风发，正大步走在人生的上升路段；然而，赵至的生命却在是年戛然而止——“号愤恸哭，呕血而死”。

赵至因永远失去了母亲呕血而死。其实早在他代表辽西来上计那一次，母亲就已经去世。那一次，他见到了父亲，父亲却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并且千叮万嘱，让他不能回家。那么，父亲为什么要瞒着他？因为，他的一切都是在隐姓埋名之后获得的，他必须要一如从前假装成别人，才能获得社会接纳。如果要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做官、建功立业都全无可能——赵至的父亲是一名士兵，而曹魏的士兵是终身和世袭的，父亲当兵，儿子只能当兵。十六岁开始服役是一个坎儿，逃得出去就有希望，逃不出去就成了兵，从此更无其他希望。这就是为什么赵至在接近十六岁的时候装疯卖傻、屡次逃跑——那是他唯一的机会。赵至成功逃跑，成功入仕，建立了个人的荣誉地位。然而，这一切成功的前提，是他必须切断与亲生父母的联系。倘若让人知道他是士兵的儿子赵至，那么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来说，都将是灭顶之灾。

可是，赵至追求这一切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孝经·开宗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儒家所追求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并非单纯的个人成功，而是以个人的成功来荣耀父母，是“孝之终”，也是“孝之大者”^[3]，是每一个真正的孝子生命的归宿。这就是赵至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偏偏在这个意义上，赵至完全无法抵达真正的成功。他在现实成功的路上走得越远，上得越高，就越发远离他的双亲，越发远离真正的成功，这就如同抱冰取暖。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前，赵至可以欺骗自己还有行孝机会；母亲的死则宣告了他显亲扬名的彻底失败，他再无机会孝顺母亲，甚至不能公开哀悼。那么，这二十年来的一切隐忍、发奋又是为了什么？赵至的生命丧失了意义，他的死不可避免。

赵至的成功之路，就是死亡之路。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他的出身和规范他出身的士家制度，士之子只能为士，因此，为了“立身行道”，赵至只能装疯卖傻，弄虚作假，赵至变成了赵翼、赵浚，这是制度造成的恶。变成了赵翼，赵至逃脱了现实的制度网罗。可是在他头顶的苍穹之上，还有一张更大的网罗——儒家孝道，孝道规定他内心的圆满和真正的成功都必须与父母家族联系在一起。这一张观念的网罗是天罗地网，赵至无法逃于天地

之外。当然，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或者他相信有独立于家族的个人的存在，那么他是可以活下去的，而且会活得很幸福。可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要到近代才从西方输入中国。士家制度和孝道观念，就像是两扇巨大的齿轮，咬合在一起，把赵至从心灵到肉身碾得粉碎。一个士兵的儿子，本来是没有资格学习《孝经》的，赵至不仅学了，还信了，并且用生命去实践了。

再来看王樵。王樵是一个被时代潮流抛弃的人。故事的开头，王樵同北宋和平时期的所有书生一样，读书应举，预备走修齐治平的金光大道。他还练剑，会武术，算得上文武双全。这时候，宋和契丹之间常有小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主要发生在河北边境一带。王樵的家乡虽然离河北不远，但是在黄河以南，对他来说，战争遥远而抽象，可以激发国仇，但并不能引惹家恨。可是这一切忽然发生了逆转。这年正月，契丹的一支小部队渡过黄河，袭击了王樵的村庄，掠走了他的父母亲人。王樵和妻子可能去岳父家拜年了，因而幸免于难，然而这悲惨中的幸运却让王樵和妻子的人生从此跌入了另一场灾难。王樵决定潜入契丹去寻找父母，他抛弃了妻子，史料之中从此再无这个可怜女人的消息。

数年后，王樵的曲折寻亲宣告失败，他回到家乡，为父母亲人造了衣冠冢，立了神主牌位，按照礼制服完了所有的丧服。哀悼是复仇的前奏。王樵逐一拜访边防大帅，献上有关契丹的情报，鼓动出兵，他愿为前驱，一血国仇家恨。但是没有人真正理会他。宋辽之间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的皇帝和辽国的皇帝结成了异姓兄弟，朝廷严令，边将不得轻举妄动，破坏协议。和平当然是美好的，官员乐意，百姓安宁。可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过伤的人该怎样治疗创伤？在欢庆和平的喜悦中，王樵被朝廷和时代抛弃了。

王樵再次回到家乡，过起了平凡的生活。他还有姐姐，姐姐家有小孩，他逗外甥玩儿，开学馆授徒，闲时读书、击剑。他朋友虽不多，但是质量很高，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王樵成了当地闻名的教育家。地方官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会王樵，以此来表示重视教育。看得上眼的，王樵礼貌待客；看不上眼的，长官从前门进来，王樵从后院翻墙逃走。

一切都很平静，只是那件曾经最重要的事情被王樵放弃了，那就是参加科举。他放弃了进入朝廷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朝廷和时代抛弃了王樵，王樵也不再追随朝廷。晚年的王樵自号“赘世翁”——他早就多余了，当他的国家开始放弃攻打辽进入平时，王樵就多余了。

晚年王樵费力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修筑“茧室”。预知死亡将至，王樵“入室，自掩户，卒”，他缓缓走入亲手建造的坟墓，合上了门，躺平身体，闭上眼睛——光明消失，永恒的黑暗降临，王樵告别了那个让他爱恨

交织的世界。在中国人的死亡史上，“茧室”和王樵之死是极为独特的。



图六七：金 杨邦基 《出使北疆图》（局部）

《出使北疆图》，金代杨邦基绘。绢本设色，152.5厘米×26.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图描绘的是宋金交聘的历史画面，故又名《聘金图卷》。我们看到，全画远处崇山峻岭，一道河谷在雾霭中若隐若现，近处有三棵松树高高矗立，松下有两座亭子，亭子旁边是宋朝的使臣和金兵。从亭子中的桌椅陈设可看出，金人设宴席待客刚刚结束，由此可见，这是宋代官员出使金国的一个画面。而文中所讲的宋与辽之间亦复如是，宋代官员也常出使辽国。这两国于1005年签订了澶渊之盟，自此，宋朝皇帝和辽国皇帝结成了异姓兄弟，朝廷严令，边将不得轻举妄动破坏和平协议。追求和平是最好的，但那些在战争中受过伤的人却最终在和平的喜悦中被时代抛弃了。

王樵的死亡和生命的状态跟赵至是很不一样的。他接受了自己不能左右的命运，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过去，由此保持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当朝廷不再求战，家的过去与国的未来分道扬镳，王樵选择远离庙堂，他优游江湖，投身教育，追求学问，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余生。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无法与时代对抗；于是，他一手安排了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不能做主的交给时代；能够做主的，从心所欲，而不是随波逐流。正因如此，王樵的生命和死亡才散发出独特的美感。王樵是失败者，也是成功者，他以失败宣告成功。

像赵至一样，像王樵一样，每一个人都会和时代、制度遭遇，程度不同，方式不同，有时激烈，有时温和，我们的时代不再有像赵至时代那样绞杀人性的制度，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可以像王樵一样，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活出生命的精彩和美感来。



图六八：榆林窟第二五窟 吐蕃时期 《弥勒经变中·临终》

《弥勒经变中·临终》是榆林窟第二五窟的一幅壁画，属于吐蕃统治时期。该壁画所呈现的是老人入墓前与家人临终作别的场景。我们看到，这位头戴黑帽、身穿白衣、手拄藤杖的白须老者，坐在墓穴门口，正与家人作最后的告别。他身旁站着的三位女性表情哀伤，其中一位忍不住以帕拂泪；在老者前面，一名头扎俩小髻髻的孩童正伏地跪拜，也是在伤心地拜别；而一旁立着的红衣男子，则伤心地以袖掩面。在泣别图的下方，有古藏文墨书题记一方：“此人寿满一纪（八万四千岁），自诣墓茔。”图中入墓老者神情平和淡然，足以看出其已能平静面对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方式，与文中讲到的自称“赘世翁”，为自己修筑“茧室”的王樵如出一辙。他们坦然地接受生命，也从容地选择死亡，如此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也散发着一一种独特的从容之美。

[1]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8页。

[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九《嵇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9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

任性

《晋书·王衍传》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王衍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死了，山简去吊丧，王衍悲伤得难以自制。山简不以为然，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传统时期儿童死亡率高，即便是有着一流医疗保育条件的皇家，皇子与公主夭折仍然是很常见的，所以山简会认为王衍的悲伤超过了正常的限度。王衍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为王衍痛哭了一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句话，后来引用率极高。“圣人忘情”又作“太上忘情”，“圣人”或者“太上”已经超脱了人类的情感，“最下”之人尚未摆脱生存困境，没有资格奢谈感情，但不代表他们没有感情。丰富的感情使人类区别于动物，也使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正是因为有感情因素的存在，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能够做到符合理智，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名垂千古。可是，谁能想到，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带领赵国走向富强的王，竟然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饿死的。赵武灵王的一生，兴于理智，死于情感。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他是“赵氏孤儿”的第十一代孙，姓赵名雍，少年即位，竟有难得的谦虚从容，听政之初，先向父亲的老臣肥义咨询，给肥义加官进爵。赵武灵王还是一个不慕虚荣的人，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封建秩序崩解，诸侯滥用名号，“王”原本是周王的专属，周王孱弱，完全无法掌控局面，“五国相王”，即诸侯彼此称呼对方为“王”。而赵武灵王则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赵国人称呼自己为“君”，说：没有实力，怎么敢当那个名义呢？“赵武灵王”是后世对他的称呼。赵武灵王想要的是赵国实实在在的强盛，他审时度势，决定“胡服骑射”。

用今天的话来说，“胡服骑射”就是引进北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来建设骑兵。华夏各国使用马匹作战的传统方式是车战，四马一车为一乘，衡量国力的方式就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辆战车，比如《孟子》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北方游牧民族使用马匹作战的方式是骑马射箭，两相比较，当然是直接骑乘的机动性更强，效率更高。赵武灵王想要引进的就是北方的骑射技术。引进骑射必须同时引进与骑射配套的服装，当时华夏族的服装是上衣下裳，上衣相对宽大，裳就是裙子，之所以穿裙子，是因为里面的裤子是开裆的。裆部不合拢的裤子是不能骑马的，骑马要利索，且必须有裆。马镫的使用还要等六百年，没有马镫，骑士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是压在马背上的，臀部和大腿根部受到巨大的挤压和摩擦，因此，穿合裆裤是必须的。但是，骑射的这套东西都属于“远方蛮夷”之俗，“群臣皆不欲”，阻力极大，怎样才能说服赵国人接受“胡服骑射”呢？

赵武灵王首先说服了自己，并且与老臣肥义统一了思想，获得了实力派的支持，接着，他亲自出马说服自己的叔父、赵国贵族公子成，让公子成带头穿胡服上朝，给贵族做出榜样，于是“始出胡服令也”。有肥义的支持、公子成的榜样，其他贵族的反对就都是小菜了。赵武灵王用来说服公子成等贵族的一番言辞是一流的演讲稿，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在他的领导下，赵国建设了强大的骑兵，很快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胡服骑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西略胡地”。“二十一年，攻中山”，占领了中山国的四个邑，“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中山国仰仗齐国势力，侵赵地、略赵民、夺赵城的怨恨，终于得报。赵武灵王还派得力之臣出使秦、韩、楚、魏、齐，折冲斡旋，看起来似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但是，第二年，赵武灵王忽然宣布退位，把赵王之位传给了小儿子何，赵何史称“惠文王”。此时，赵武灵王四十出头，正当壮年，身体健康，赵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退位不等于退休，这只是赵武灵王所制定的赵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性步骤。按照赵武灵王的安排，赵何在即位之后成为赵国的新王，享有赵国贵族的忠诚，“大夫悉为臣”，赵武灵王最器重的老臣肥义做了新王的相国，辅佐新王。



图六九：辽 李赞华 《获鹿图》（局部）

《获鹿图》为辽代李赞华绘，78厘米×24.6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李赞华（899—937）本名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契丹灭渤海国后，耶律倍被册封为东丹王，辖渤海国旧地。因在弟耶律德光即

位后遭猜忌，于931年投奔后唐明宗，赐姓名李赞华。他擅画契丹人物，精通音律、医药。此幅《获鹿图》中，一骑马飞驰的猎手正追杀一头飞奔的野鹿。猎手身体前倾，左手持弓，右手似引满而发，骏马绷直后腿全力奔驰，画面充满了动感，极为传神。众所周知，鹿的奔跑速度极快，但再快也快不过猎手的箭——野鹿最终中的。可见马背上的契丹族极善骑射的剽悍战斗力。而早在战国时期，为增强国家战斗力的赵武灵王，就积极引进北方骑射技术，也即军事技术来建设骑兵，“出胡服令”，实行“胡服骑射”政策，最终使得赵国一跃而起，成为足以与他国抗衡的强国。



图七〇：金 张瑀《文姬归汉图》之胡服骑射

《文姬归汉图》，金代张瑀绘。绢本设色，工笔，147.4厘米×107.7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儒学大家蔡邕之女蔡文姬被羌胡俘虏，后被迫嫁于南匈奴的左贤王。自此，在异邦度过了十二年的漫长时光。至曹操当权，才以重金将其赎回。《文姬归汉图》所反映的即是蔡文姬回归汉室的经过。我们从此图的最后部分，可看到一位极为典型的胡人形象：他头戴毛皮帽，身穿毛皮圆领长袍，足蹬短靴，左手握缰绳，右手端苍鹰，侧腰上挎一个箭篓，正骑马急行，一只瘦骨嶙峋的猎狗紧随马侧。借由此胡人形象，我们对“胡服骑射”这几个字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有了大夫的忠诚，肥义的辅佐，赵国内政可以无忧，新王赵何也可以慢慢学习如何治理国家。赵武灵王为自己安排的任务，是主持军事，继续对外

扩张。退位之后的赵武灵王自称“主父”——国主的父亲。“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这就是赵武灵王所制定的赵国发展战略，父子协力，有肥义主持内政，后顾之忧，赵武灵王心无旁骛，他将率领这支身穿胡服的骑兵队伍，建立赵国的霸业。

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件令诸侯大惊失色的冒险行为。他冒充使者出使秦国，亲自拜见了他的邻居秦昭王。按照司马迁的叙述，秦昭王接见完赵国使者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那个身材健硕、仪表不凡的赵国使者，神情举止、谈吐气度实在不像一个臣子，那他究竟是谁呢？难道……秦昭王恍然大悟，大叫一声，赶忙派人去追，可是那个气度不凡的使者已经出境，再也追不上了。赵武灵王为什么要出使秦国呢？因为秦国也是他扩张的目标。他想要亲自观察地形，还想看看秦昭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敌人。

在这个情节中，赵武灵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真性情，他像一个勇敢的少年，敢于以身犯险。我猜想，当他快马加鞭越过边境进入赵国境内的时候，一定会勒住马头，仰天大笑，说不定他还会回望秦国，做个鬼脸。对赵武灵王来讲，这小小的冒险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然，他的性情背后仍然是有理智支撑的，他已经不是赵国的国王，所以，就算秦国人抓住他，也不会影响到赵国的存亡。

赵武灵王不是那种冷静得像石头一样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激荡着热烈的情感。即使是他的“胡服骑射”，背后又何尝不澎湃着对赵国的深情？我们退一步想，其实像“胡服骑射”这样要打破传统、放下优势民族的面子，向夷狄学习的惊世骇俗之举，倘若只有理性的冷静算计，没有激情的推波助澜，是很难迈出关键一步的。凡为大创造者，必有赤子之心。然而这一颗赤子之心，倘若失去了收拾约束，也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像赵武灵王这样的风流人物，感情生活不可能循规蹈矩、无波无澜。他早年娶韩国女子为妻，生长子章。十一年之后，又娶吴广的女儿孟姚。赵武灵王娶孟姚的起因是一个梦。他在梦里见到一个美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喝酒喝到开心处，不禁对众臣说起这个绮丽的梦，还描述了“梦中情人”的美丽模样，不胜向往。说者是否无心，我们不知道，听者有意是肯定的。听者之中有一个臣子叫吴广，就把自己的女儿孟姚送来了，模样跟赵武灵王所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姚成了赵武灵王宠爱的女人。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赵何。

赵武灵王娶孟姚发生在“胡服骑射”之前，可见对孟姚的宠爱并未使他变作昏君，相反，得到“梦中情人”很可能对赵武灵王发生了正向的刺激，让他更有激情去做一个开疆拓土的大英雄。他也果然做成了。孟姚在嫁给赵武灵王九年之后过世。赵武灵王对孟姚的爱似乎并未因孟姚的死而减少，至

少，短期之内没有。孟姚去世两年之后，他把王位传给了孟姚所生的儿子赵何。赵何只有八岁，是个小朋友，但是没关系，赵武灵王把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臣肥义给了他。或者说，赵武灵王是把赵何托付给了肥义，他让肥义当面发誓终生保护赵何，“坚守一心，以歿而世”，还让肥义把誓言记录在籍。这个安排很好。

韩国女子所生的长子赵章，被封到了代，成了异母弟弟赵何的臣子，他的心里当然是不服气的，赵武灵王为赵章安排的辅佐之臣田不礼也不是个善茬，用肥义的话来说，“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赵章和田不礼的组合一发布，肥义一派就感到危险重重。肥义对他的手下下了严令：“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谁能召见赵王呢？只有王的父亲“主父”赵武灵王——虽然已经交出了王位，但是手握军队的赵武灵王仍然是赵国实际的主人。肥义既受赵武灵王之托，发誓效忠新王，他的忠诚、他的心思和他的身家性命，就都与赵何（而不是赵武灵王）捆绑在一起了。

那么，赵武灵王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王赵何举行大朝会，接受群臣的朝拜。赵武灵王从旁观察，看见长子赵章不情不愿地向弟弟称臣礼拜，一副丧家犬般的委屈模样，他心中生出了怜悯爱惜之意，竟然想要把赵国一分为二，另立赵章为代王，与赵何分庭抗礼。这个计划，如果快刀斩乱麻地实施了，赵国可能会陷入内战，兄弟相争；如果不能实施，那么最好烂在他心里，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哪怕只有一点儿苗头。可是这样不动声色、不宣于口，显然不是赵武灵王的风格。分裂赵国的计划没有实施，但是赵章和赵何两方面都知道了主父的心思——这是最糟糕的结局。从赵何和肥义的角度来说，危险增大，必须提高警惕，甚至如果可能，要先下手为强，但是肥义没有。

从赵章的角度来说，父亲的怜悯增加了他的委屈，田不礼的撺掇赋予了他行动的勇气。赵武灵王和赵何一起巡视到沙丘，分别住宿。赵章果然谋反，假称以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见赵何，肥义果然就像他所承诺的，挺身而出，挡在了赵何的前面，被叛军杀害。其余的人护着赵何击败了叛军。

当这一幕兄弟相残的惨剧发生的时候，赵武灵王就在邻近的另外一座宫殿中，赵章丢盔弃甲，浑身是血跑来求父亲救命，赵武灵王让人开门放儿子进来。没想到小儿子的军队却包围了宫殿，没办法，赵武灵王交出了长子。赵何的军队已经没有了退路，他们商量说：我们为了追赵章包围了主父，就算现在解散部队，（只要主父活着）我们就会被杀。于是，他们继续围困赵武灵王的宫殿，并且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所以宫里面的人就都跑出来了，单单丢下一个赵武灵王，“欲出不得，又不得食”，只好掏窝里的小鸟吃，就这样被围困三个多月之后，大英雄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在

了沙丘行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武灵王究竟都想了些什么呢？三个多月的艰难挣扎，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反观自己的一生。作为赵国的王，他足以告慰列祖列宗。作为父亲，他爱两个儿子，王位只有一个，他给了赵何，因为他更宠爱赵何的母亲，既然给了赵何，名分已定，就应该像肥义一样，“坚守一心，以死而世”。可是他又因为赵章的委屈而动心，最终葬送了赵章的性命和他与赵何之间的父子之情。每一个人的情感都应该由他自己去满足，旁人只能疏导帮助，却无法让那一颗躁动的心得到安宁。赵何是一个人，赵章是一个人，赵武灵王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们是父子。可惜，这样的道理，过于自信的赵武灵王是不能明白的。他一手安排了赵何的即位，他以为自己也可以亲自动手满足赵章的欲望。天下父母之糊涂，大概如此。

鼠辈

《史记》对李斯生命历程的描述，是从两只老鼠开始的。年轻的李斯在故乡上蔡做小吏，看见两只老鼠。一只住在机关宿舍的茅厕之中，吃的是脏东西，每当有人和狗走进，都会惊恐地逃窜。另一只住在粮仓之中，吃的是粮仓里积存的小米，在高大的屋檐底下活动，很少受到人和狗的打扰。李斯于是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就是李斯从两只老鼠身上得到的启迪。他的贤、不肖的标准是外在的地位，而不是内心的安宁，李斯没有一个独立于权势地位之外的自主的高洁人格。

老鼠的启示贯穿了李斯的整个生命历程。他永远都在向上爬，为了把自己摆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李斯的心中，除了外在权势，没有什么永恒，是值得坚持的，他总是在调整自己的姿态，如何调整？就看风朝着哪个方向吹，利益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法家李斯最初的老师，却是大儒荀子。荀子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在荀子的心中，真理高于权势地位，“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对于老师的这一套，李斯是不以为然的，他更看重权势。他曾经以秦国的发展历程为例，向荀子提出质疑：四代秦王以来，秦国以优势兵力逞强于海内，威势横行凌驾于诸侯，这都不是靠仁义得来的，而是逐利而行的。不仁义的战争，为秦国带来了相对于六国的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仁义有什么用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李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最终，他决定告别荀子，投奔当时最强大的势力——秦国。

临别之际，李斯有一番自我剖白：没有比地位卑贱更可耻的，没有比穷困更可悲的。一个人长期处在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地，却非议世道、厌恶名利，自称无为，这不是一个士该做的。我要西去，游说秦王。

李斯告别了荀子，也彻底告别了儒家的仁义，他带着荀子教给他的有关法令制度方面的知识，走向了秦国，彻底倒向了法家。

在秦国，李斯发展得很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的时候，李斯已经做到了廷尉，主管刑狱，紧接着，他准确地把握了秦始皇的需求，在有关地方治理方式的大讨论中及时地站在了秦始皇一边，从而爬上了丞相的高位。“皇帝”这个名号是秦始皇的发明，然而“皇帝”绝对不只是一个新名号，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其本质就是皇帝的独尊专制。皇帝已立，那么，皇帝究竟应当怎样统治这个版图空前广大

的国家？是全面推行新制度，也就是郡县制，还是回到传统实行分封制，又或者因地制宜，郡县与分封并行？这是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丞相王绾首先提出的是一个郡县加分封的方案，在大多数地区实行郡县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新占领区，比如燕、齐、楚的故地实行分封制。秦始皇下令群臣展开讨论，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表示反对，最终，秦始皇做出决定：“廷尉议是。”李斯的意见是对的。一锤定音，确立了秦帝国的地方治理方案——全面推行郡县制。

那么，为什么只有李斯一个人彻底反对分封？因为李斯看到了秦始皇的内心。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他坚信人性绝对的恶，坚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彼此算计的，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没有谁靠得住。他心中早有定论，之所以把王绾的建议开放讨论，就是要试探群臣的反应。这场有关郡县制的讨论，表面上讨论的是地方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秦始皇对官僚思想倾向的试探。只有李斯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答案。果然，八年之后，李斯已经成为宰相，而王绾，可能早已被打倒消灭。八年之后，李斯又建议焚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浩劫。焚书的第二年，又出现了坑儒事件，坑儒的主导是秦始皇，但是李斯显然是无条件支持的，否则，李家的富贵不可能抵达那样的巅峰。

在整个咸阳，皇帝一家独大，接下来大概就是李斯家了。他的儿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儿嫁的都是公子。大儿子李由担任三川太守，回家探亲，李斯大宴宾客，咸阳城里像样儿的官员都来了，门口停了一千辆车，真真是富贵至极。

秦始皇的丞相和其他高官的结局大都不好，而李斯算是一个例外，他的富贵比秦始皇的统治长久。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出巡的归途之中，跟随他出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是丞相李斯。关于这一现象，其实不太好直接解释为秦始皇至死都信任李斯，因为秦始皇无法预见并且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只能说，秦始皇一直都相信他是可以控制并有效使用李斯的。然而，秦始皇一死，李斯的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始皇帝临终遗嘱，让镇守北边的长子扶苏回咸阳来主持葬礼，换句话说，秦始皇的意愿是要扶苏回来继承大位。但是，这道命令在秦始皇生前并未公布于众，而且，承载着这道命令的公文落在了符玺令赵高的手里，赵高是始皇幼子胡亥的支持者，而胡亥是秦始皇身边随行的唯一皇子。赵高想要扶立胡亥，必须先过李斯这一关。

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意，也知道那封始皇遗命的存在，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始皇卫队究竟掌握在谁手里，但是从道义上讲，李斯应当遵照始皇遗嘱办事。可赵高一席话就让李斯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赵高说：您觉得您的能

力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吗？您比得上蒙恬得天下人心吗？长子扶苏对您的信任又比得上他对蒙恬的信任吗？

蒙恬是秦国的大将，此刻正与扶苏一道镇守北边，扶苏即位，蒙恬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辅佐，到时候，李斯必然要靠边站。一边是始皇的遗命，一边是个人的富贵，李斯陷入了沉默。赵高又进一步，乘胜追击说：我在秦国混了二十多年，从没见过罢免了的丞相、功臣能够维持两代荣华的，都是被杀的。扶苏要是当了皇帝，必然会用蒙恬做丞相，到时候你是不可能封侯还乡、富贵终老的，这是明摆着的。扶苏不如胡亥仁慈厚道，好打交道。

这一番话送到了李斯的心里，于是，他羞答答、半推半就，跟赵高结盟，以始皇帝的名义下诏，立胡亥为太子，勒令扶苏自杀，蒙恬赐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法家的悲哀——单方面依靠权势地位实行专制统治，蔑视道德建设，在上者一朝得大位、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令行禁止，好不威风快意，然而一旦人去权散，则半点儿影响都不能残留。当初商鞅如此，而后的秦始皇又是如此。在下者唯上命是从，无论对错，无论是非，在权势的威压之下，他们战战兢兢地揣测，亦步亦趋地服从，目的就是让自家富贵。无论在上还是在下，一切以势力为转移，无所谓是非，无所谓良知。

为了自家富贵，李斯站到了赵高一边，跟赵高一起拥立了胡亥，胡亥上台之后，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对蒙氏家族和兄弟姐妹痛下杀手，自毁长城。同时糊涂地认为恐怖才可以令统治长久，贤主就应当穷奢极欲。胡亥给李斯出了个难题，让他从理论上论证一个好皇帝是可以穷奢极欲而安天下的，二世的逻辑是：一个人假如连让自己享福都做不到，那怎么可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呢？这样的文章，李斯竟然做了，做得一本正经。他说：贤明的君主就是要独断专行，不受任何束缚，怎么办？要善于运用“督责之术”，发现罪犯，重刑处置。俗话说，慈母有败儿，严厉的惩罚之下没有不听话的人，一个贤明的君主就是要做到轻罪重罚，那就没人敢犯重罪了。为了做到这些，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远离节俭仁义的人、喜欢讲道理提意见的人、动不动就用生命来威胁君主的人，要用权术来控制臣子，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只要督责之术玩得溜，想要什么有什么。群臣、百姓一天到晚惶惶不安、唯恐得罪，哪里还敢想别的？

李斯答应做这篇文章的理由，司马迁说是因为他的儿子李由没能抵挡起义大军，朝廷正在追查，李斯也将受到牵连。无论怎么说，我都觉得这个情节荒唐极了，怎么会有二世这么糊涂的人呢？竟然相信穷奢极欲能够安天下。而李斯竟然也写得出这样违背人性的牵强文字？曾子曰“君子恶居下

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像二世这样少年即位的亡国之君，被抹黑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司马迁所处的又是推翻秦朝的汉代。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二世想要翻案，恐怕是不容易了。著名的亡国之君当中，隋炀帝的案基本上算是翻过来了，现代学者承认隋炀帝雄才大略，但是没搞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又穷兵黩武，给老百姓造成了伤害；艺术家宋徽宗赵佶的案子，到今天为止，基本上也只能一分为二：艺术的归艺术——我们承认他是天才，政治的归政治——当皇帝真不行，穷奢极欲倒是真的。在赵高的主持、李斯的纵容之下，二世的荒唐走向巅峰，他躲在宫里不出来，成了赵高的傀儡，而赵高则把黑手伸向了曾经的盟友李斯。

二世最终相信，李斯背叛了自己。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判处在咸阳市上公开腰斩。跟他一起被送往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两人都被捆着，李斯看着儿子，说：我现在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从上蔡东门出去追兔子，还能够吗？这是李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他回忆起在上蔡牵狗逐兔的快乐，那么上蔡的那两只老鼠呢，他是否还记得呢？也许不记得了，也没必要记得，那两只老鼠早就成了李斯生命的一部分。他一辈子都努力成为仓库里的老鼠，却没想到，一只老鼠，不管是在厕所里，还是在仓库里，都只是一只老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赵冬梅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4

ISBN 978-7-5217-2388-5

I. ①人... II. ①赵... III. ①社会生活 - 生活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9317号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著者：赵冬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03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印次：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388-5

定价：9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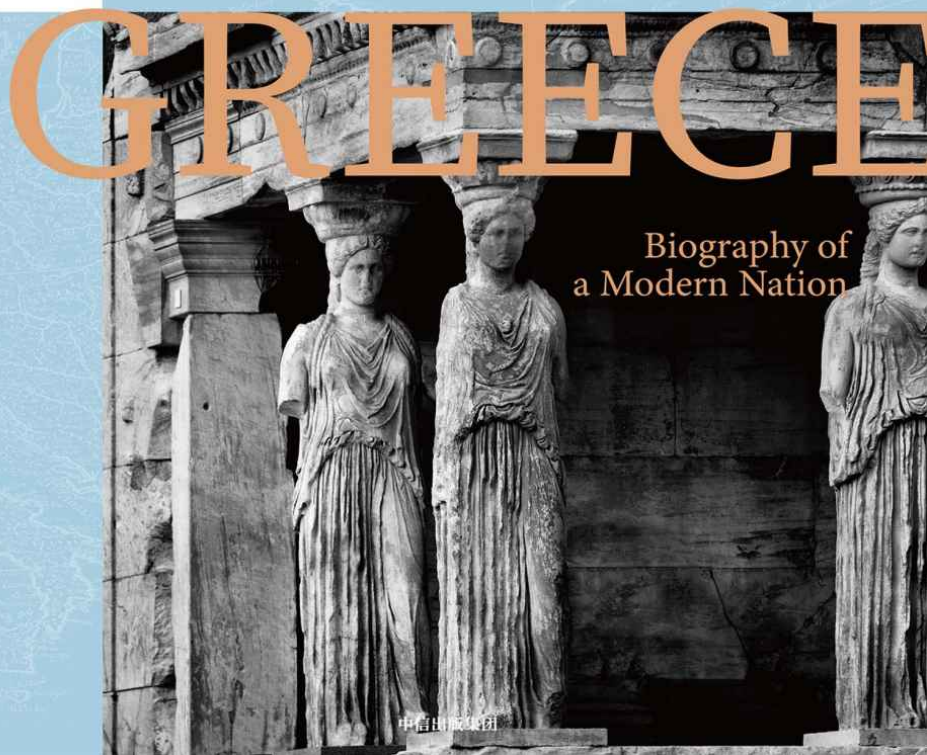
希腊 三百年

[英] 罗德里克·比顿 著
(Roderick Beaton)

姜智芹 王佳存 译
陈莹雪 阙建蓉 钱颖超 审校

朗西曼奖三届得主最新作品
《金融时报》年度历史图书
《卫报》年度历史图书
入围2020年坎迪尔历史奖

讲述希腊三百年的
激昂斗志、钩心斗角、家族政治
希腊真的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
是什么决定了谁是希腊人？



希腊三百年

[英]罗德里克·比顿 著

姜智芹 王佳存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关于日期和职衔的几点说明

致读者

前言 希腊及其祖先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相遇（1718—1797）

第二章 种下一粒种子（1797—1821）

第三章 浴血而生（1821—1833）

第四章 蹒跚学步（1833—1862）

第五章 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痛苦（1862—1897）

第六章 军事行动（1897—1913）

第七章 自我分裂（1913—1923）

第八章 从头再来（1923—1940）

第九章 彻底崩溃（1940—1949）

第十章 山姆大叔的庇佑（1949—1974）

第十一章 欧洲时代的到来（1974—2004）

第十二章 中年危机（2004年至今）

资料来源及延伸阅读

致谢



18世纪末期的东正教联邦，显示了希腊族人口和教育的中心以及与现在国家边界的叠加情况



19世纪末期的欧洲、西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希腊民族的地理范围，显示了说希腊语的人口地区、城镇。当时，这些人口的定义和比例有着很大的争议。日期标明了大迁徙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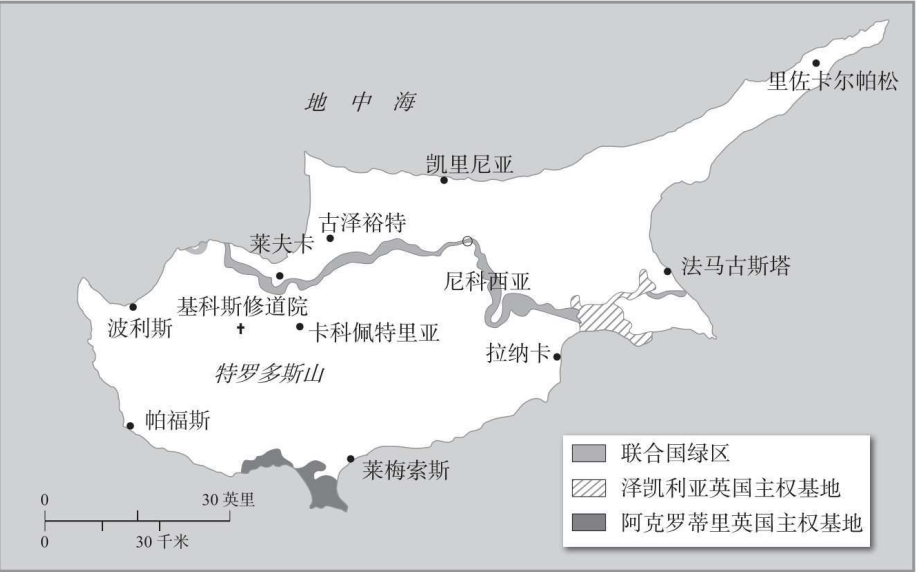
希腊的扩展（1832—1947年）



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涉及的主要地点



1923年以后的希腊及其近邻



1974年分裂后的塞浦路斯

本书地图为原书插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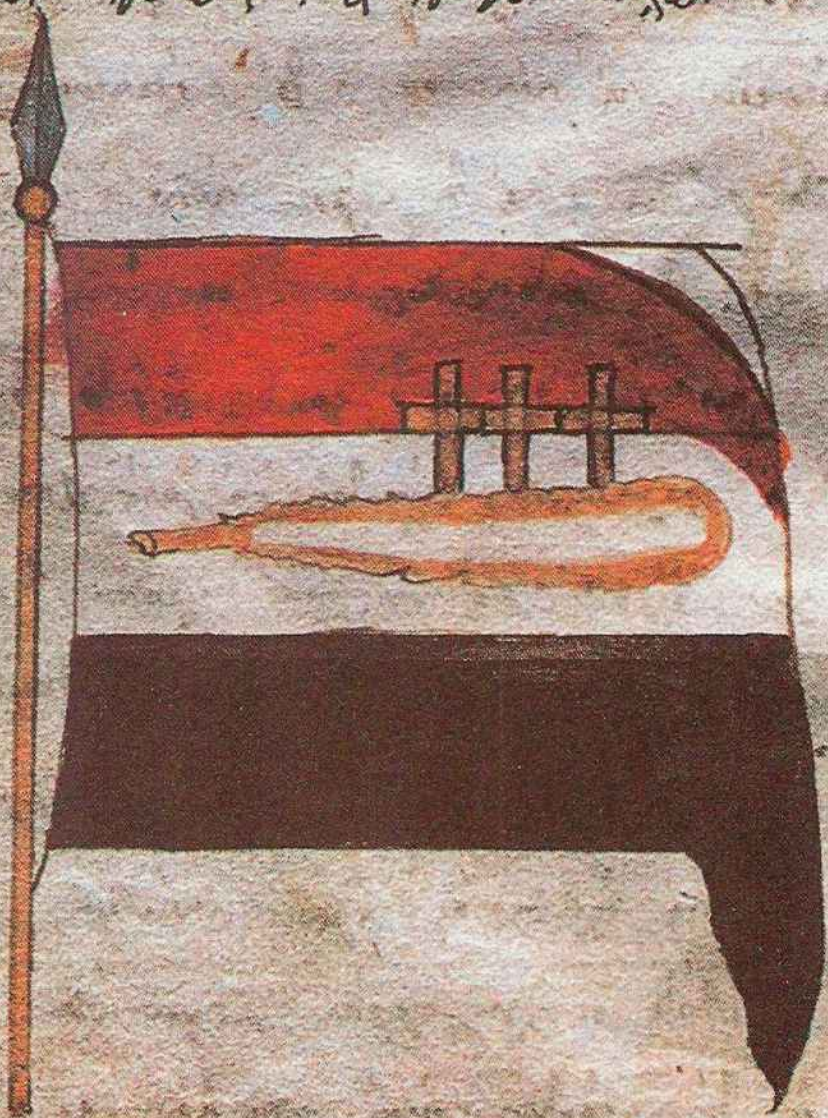


ΡΗΓΑΣ
ΦΕΡΡΑΙΟΣ



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也叫费莱奥斯（1757？—1798），他在1797年首次为未来的希腊共和国规划了宪法（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 Athens）

es: veyen . l'lo in veyen . l' va po
no, d'vayen . in veyen . d'vayen



维莱斯汀利斯设计的希腊共和国的三色旗，上面有赫拉克勒斯的装饰着3
个小十字架的手杖的图案 [Library of the Roma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s. Gr. 928, f.275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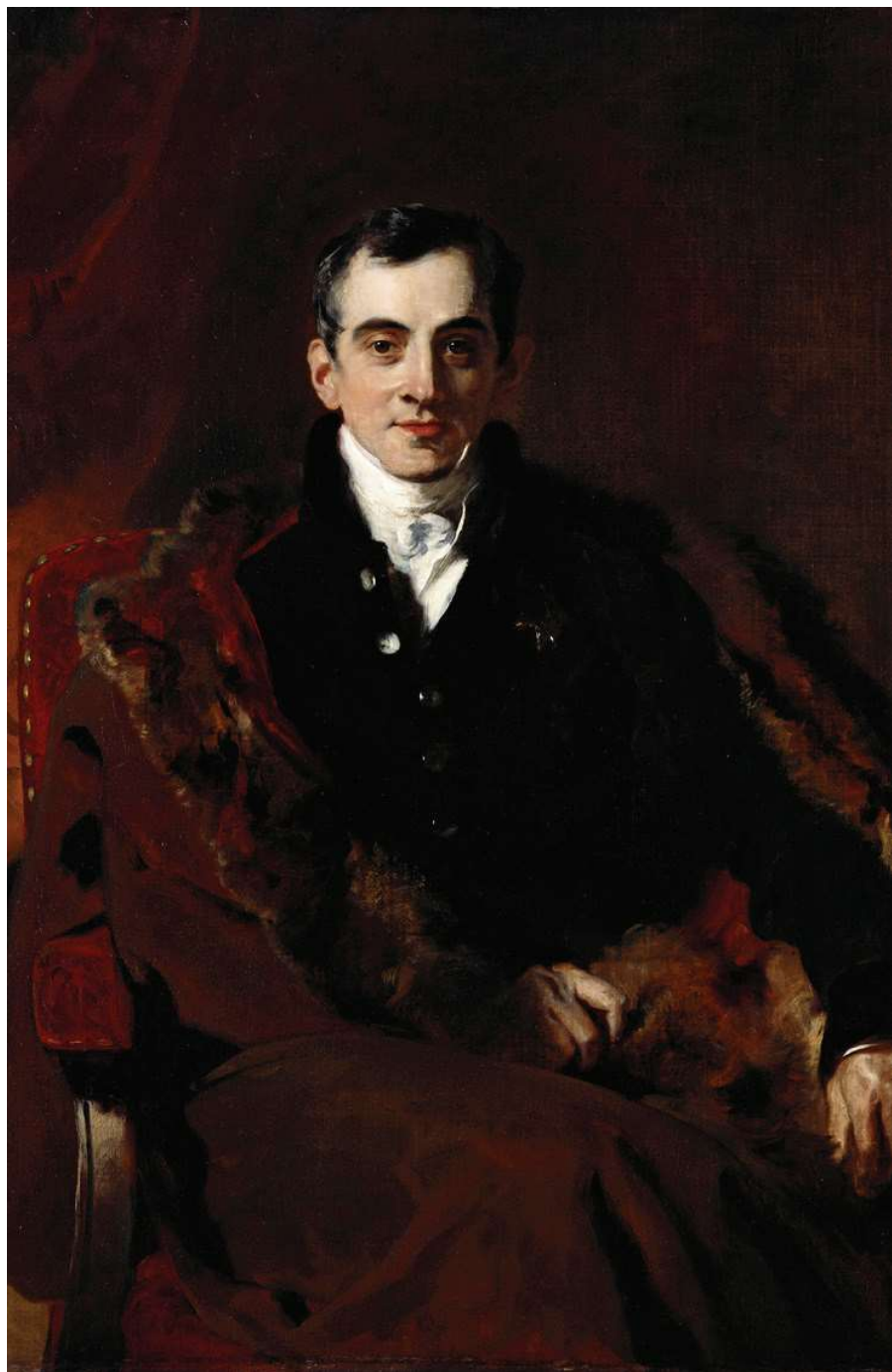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基（1748—1833），“希腊的思想之父”（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 Athens）



《卡赖斯卡基斯在阿拉荷瓦战役中的战利品》（阿萨纳西奥斯·伊阿特里蒂斯，水彩画，1827年）。画上的文字是“希腊人战胜野蛮人。总司令（乔治斯）卡赖斯卡基斯立于此布拉格”（Benaki Museum, Athens；Bridgeman Images）



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卡尔·克拉则森，1827年5月14日；National Gallery-Alexandros Soutzos Museum, 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 Athens）



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公爵，俄国前外交部部长、希腊总督（1827—1831年任职；托马斯·劳伦斯公爵，1818—1819年；Royal Collection Trust；Copyright.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2018/Bridgeman Images）



希腊国王奥托于1833年2月6日抵达纳夫普利奥（彼得·冯·赫斯，油画，1835年；Neue Pinakothek, Munich；Copyright. Blauel Gnammm/Artothek）



年轻时的希腊国王奥托 (Benaki Museum, Athens ; De Agostini/Getty Images)



身穿国服盛装的希腊国王奥托，这是极其罕见的早期照片（银版摄影，约1848年；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 Athens）



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1791—1865），希腊总理（1833—1834、1841、1844、1854—1845年任职；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

Ath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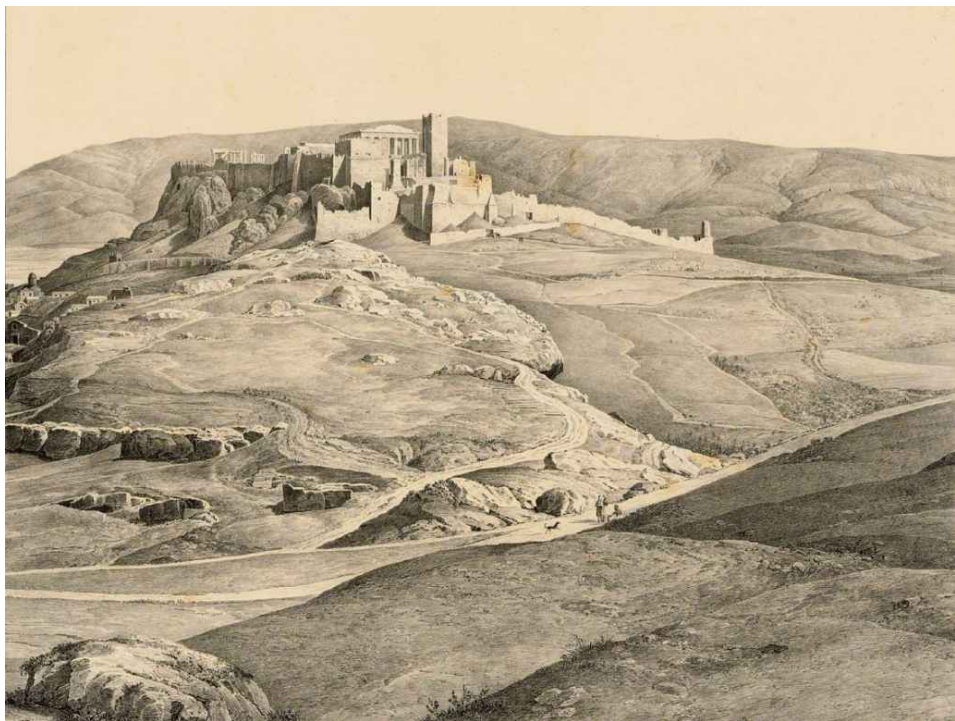
扬尼斯·科莱特斯（1773—1847），希腊总理（1834—1835、1844—1847年任职；Benaki Museum, Athens, Greece；Gift of Aspasia Botasi

and Dora Lauder ; Bridgeman Images)

于19世纪30—40年代建造一座首都（设想中的和实际的）



带有卫城和阿雷奥帕古斯的雅典理想全景（利奥·冯·克伦泽作，1846年；
Neue Pinakothek, Munich；Copyright. Blauel Gnammm/Artothek）



雅典全景图，与实景一模一样（F.斯达德曼绘制的印刷品，慕尼黑，1841年；Private collection；Christie's/Bridgeman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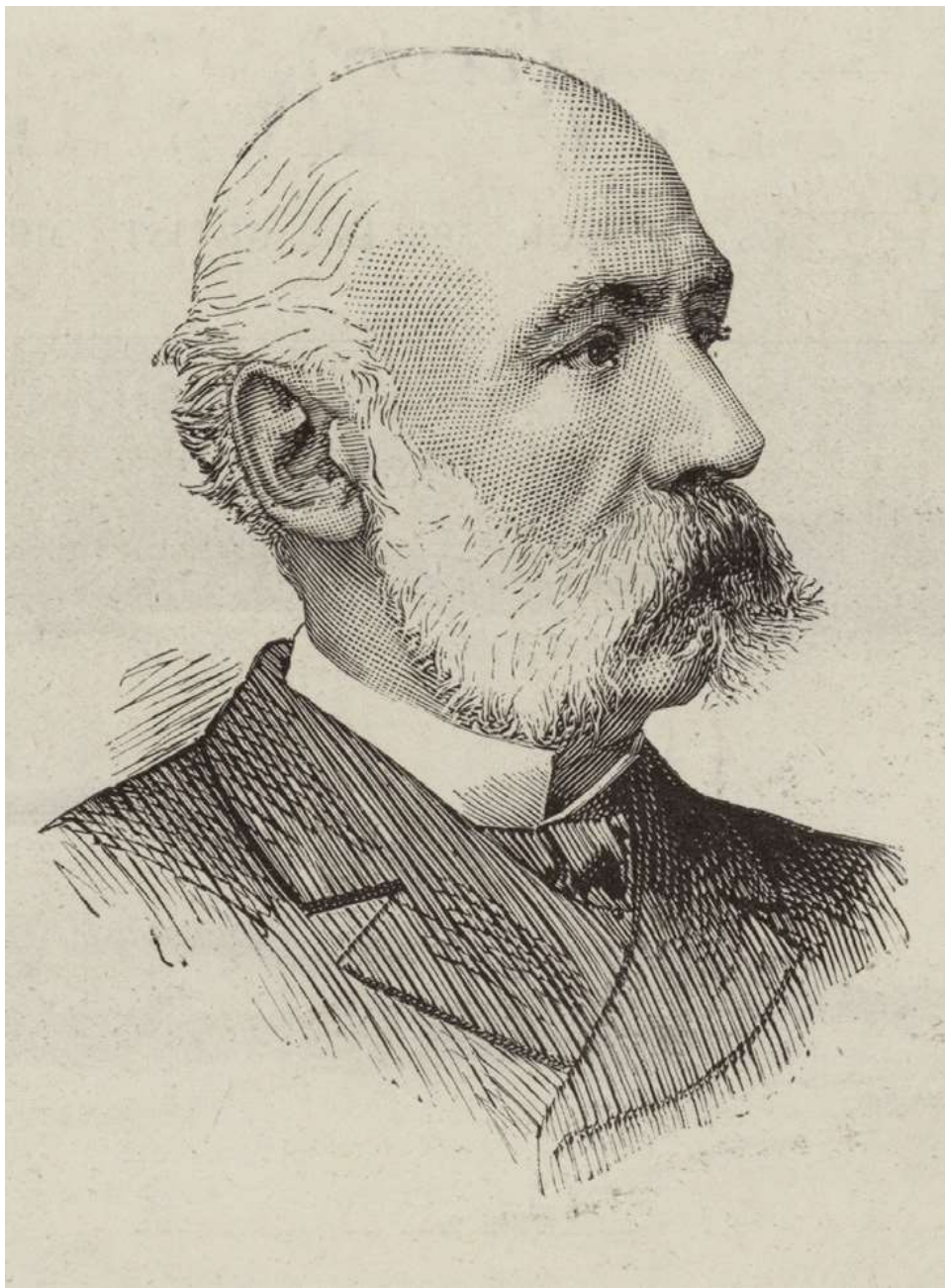


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863—1913年在位；The 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康斯坦丁·沃拉纳基思创作的油画《科林斯运河开通》（1893）。这是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实施的最宏伟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导致了当年年底希腊的破产（Collection of Alpha Bank, Ath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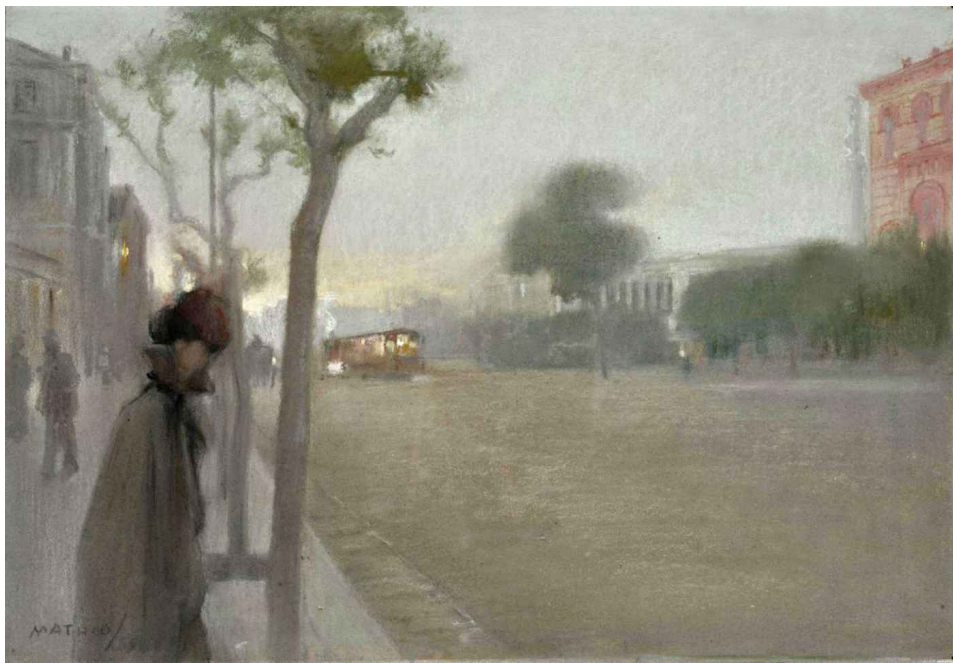
总理及其政敌



赛奥佐罗斯·迪里吉安尼斯 (1824—1905 ; 刊于The Graphic ; Look & Learn/Bridgeman Images)



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 (1832—1896 ; 刊于The Graphic ; Look &Learn/
Bridgeman Images)



保罗·马蒂奥波洛斯创作的《帕尼匹斯提米奥街》。“绅士、淑女穿着西方最新款式的时装，可以徜徉在大道两边，或者坐在一位美国游客描述的‘像巴黎咖啡馆一样’的咖啡馆外面，欣赏由马拉动的公交车缓缓驶过”（National Gallery-Alexandros Soutzos Museum, 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 Athens）



帕弗洛·梅拉斯（1904年）。乔治·雅各布兹根据梅拉斯在马其顿丛林战斗牺牲前不久拍摄的照片绘制（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Athens）



伯里克利斯·贾诺波洛斯。他于1910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自杀。（索菲亚·拉斯卡利多的木炭画，1897年；Municipal Art Gallery, Kallithea）



未来的对手：（右）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1864—1936）和（左）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1913—1917、1920—1922年在位；拍摄于巴尔干战争期间；De Agostini/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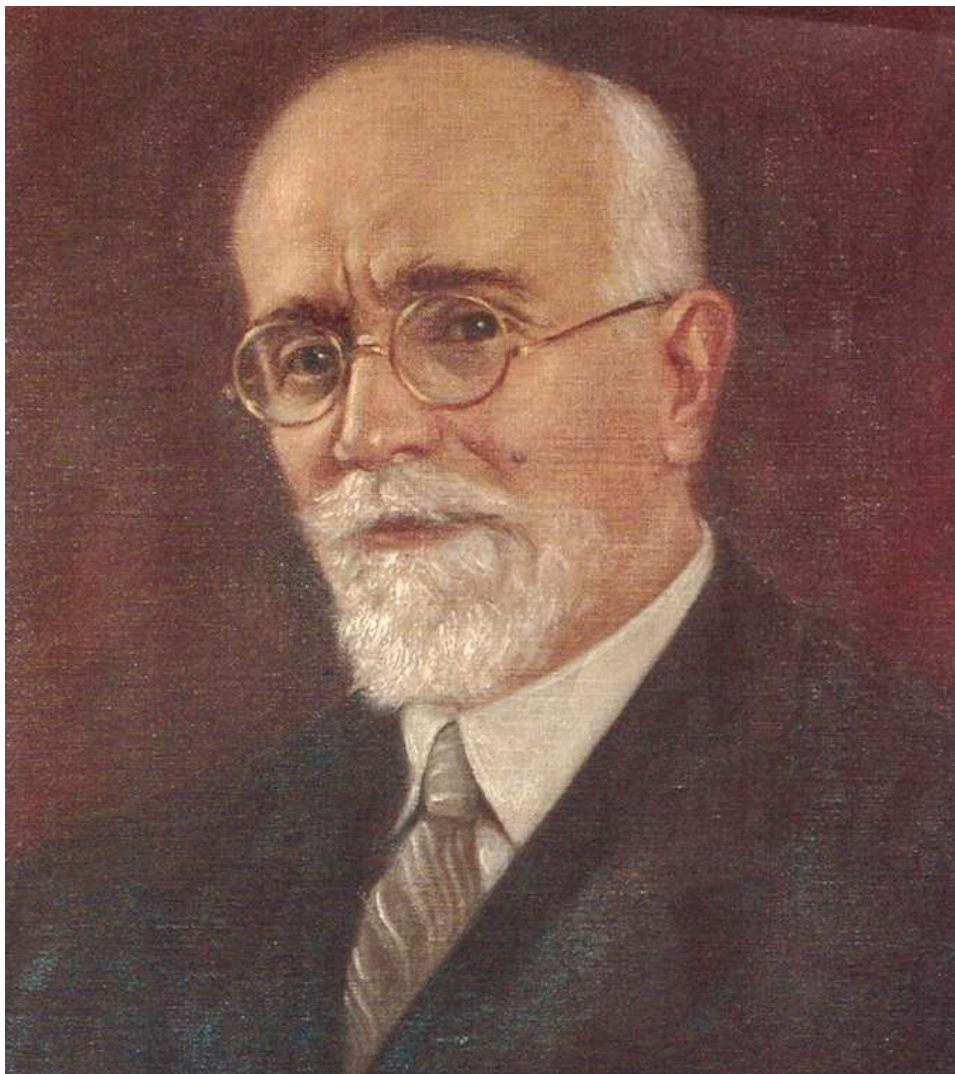
此前从未发表过的巴尔干战争照片（1912—1913）。塞雷（上）在1912年被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然后又在1913年被希腊军队攻占。兹拉马附近的多克萨托村（下）于1913年6月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战争中被摧毁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nglo-Hellenic League, Katie Lentakis Collection (AHL Acc3619)]



1922年9月被打败后，生活在西安纳托利亚的到了当兵年龄的希腊男人在土耳其被掠为战俘。根据美国外交官亨利·摩根索的描述，1923年7月被释

放后，他们抵达希腊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nglo-Hellenic League, Katie Lentakis Collection (AHL Acc3619)]





1928年的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他领导的政府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最后一任稳定的、被选举出的希腊政府（F.帕波拉斯，1928年；Municipal Gallery of Athens Collections/Eleftherios Venizelos Museum）



20世纪30年代的布祖基琴乐队。像这样的音乐人都受到了梅塔克萨斯专制政府的迫害，但是在二战以后，雷贝蒂卡成为希腊流行文化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来自伊利亚斯·佩特罗普洛斯的《雷贝蒂卡歌曲集》（Athens,1968, plate 41）



德军于1941年在雅典卫城升起纳粹“卐”字旗（World History Archive/

Alamy)



“自由希腊”的“人民统治”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League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collection (MGA/PH2)]



希腊被占领时期的雅典“集中营”里被监管的男人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League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collection (MGA/PH1)]



被烧的山村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League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collection (MGA/PH1)]



民主军队的年轻士兵在希腊内战（1947—1949）的最后阶段被美国支持的政府军击败 [King's College London Archives. League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collection (MGA/PH5)]



电影《决不要在星期日》里的玛丽娜·墨蔻莉（1960年）。她在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三届社会主义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1981—1989、1993—1994年任职；United Archives/Alamy）



1973年11月17日凌晨，一辆坦克准备碾轧雅典理工大学的校门。亚里士多特里斯·萨利考斯塔斯拍摄（AP/Rex/Shutterst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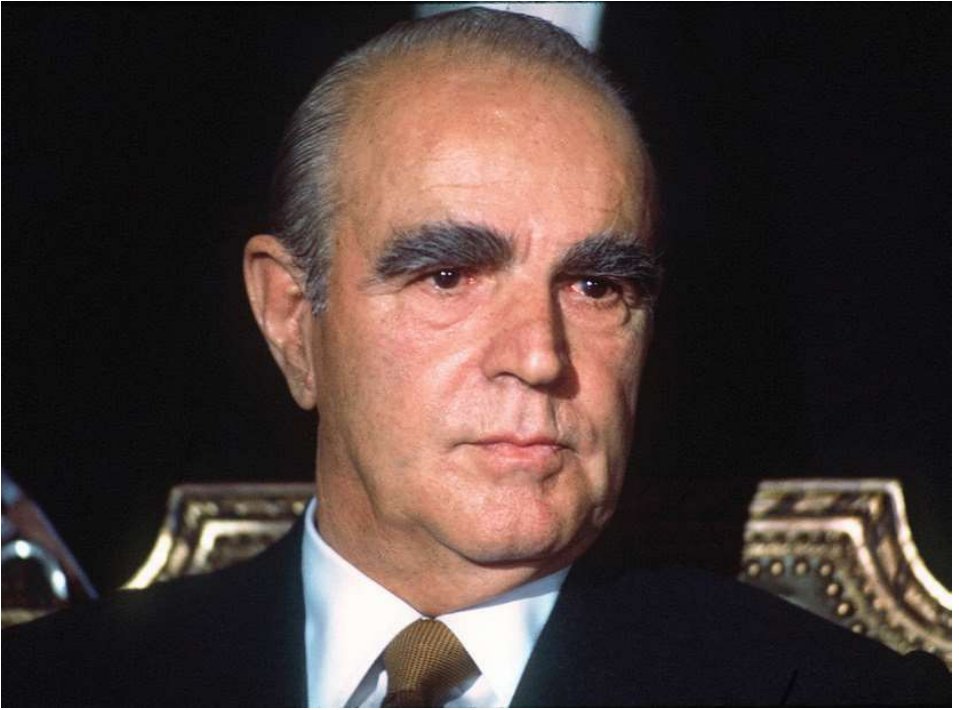
ΕΛΛΑ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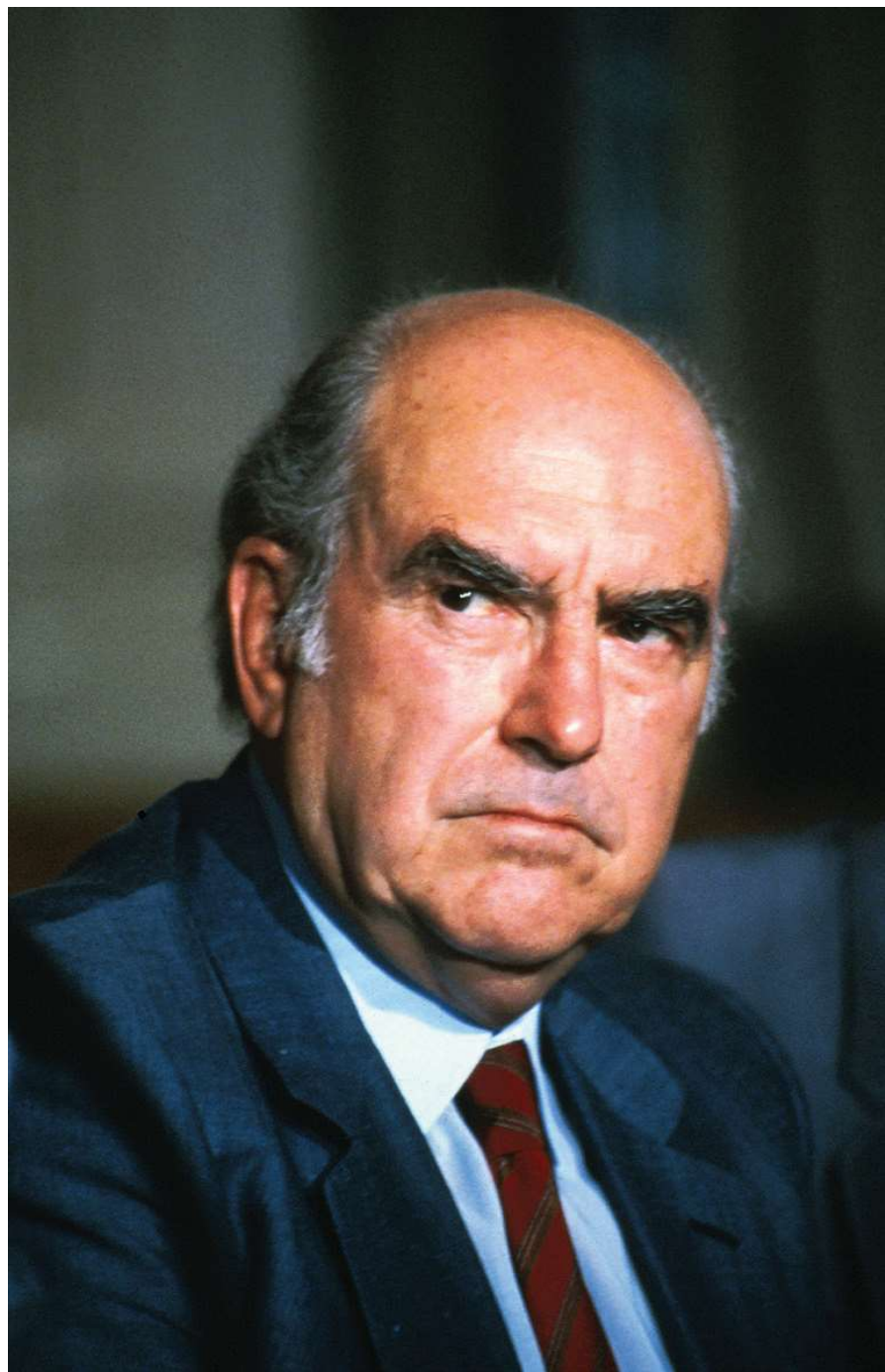
ΖΗΤΩ
Η 21^Η ΑΠΡΙΛΙΟΥ 1967

ΕΚΔΟΣΙΣ ΡΕΚΟΥ ΘΕΣΣΑΛΟΝΙΚΗ - ΑΘΗΝΑΙ

“上校”统治时期（1967—1974）的宣传画，画上的文字是“希腊，1967年4月21日万岁”（Private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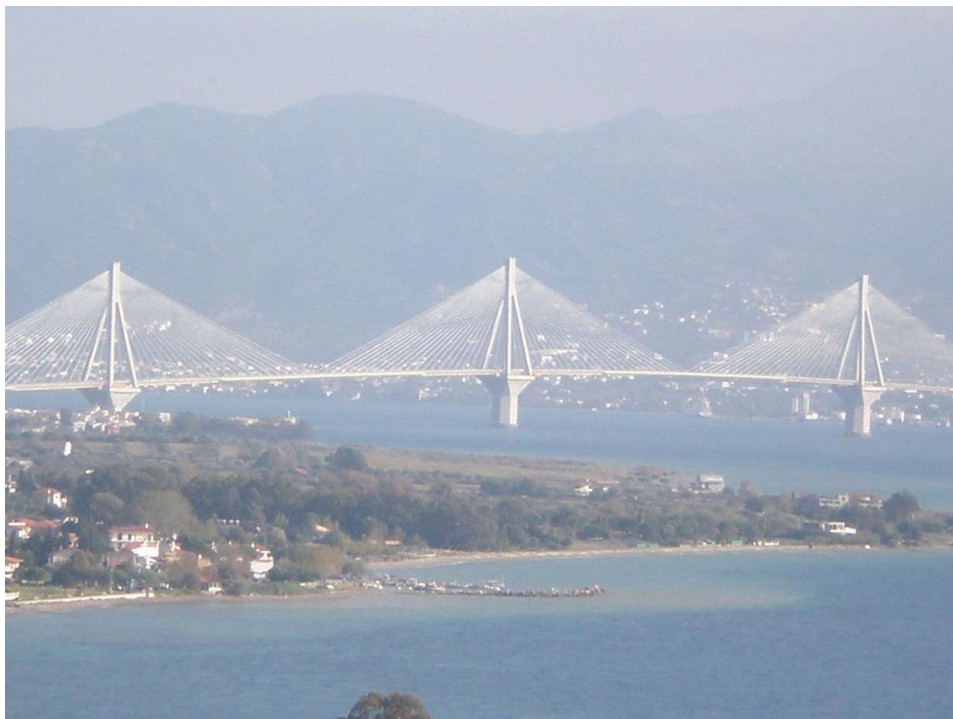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希腊总理（1955—1963、1974—1979年任职），后来担任总统，在1974年恢复了希腊的民主（摄于1975年；AFP/Getty Images）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变革”的设计师（1981—1989、1993—1996年任职；摄于1984年6月；Bridgeman Images）



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推动希腊“实现现代化的人”，是希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1996—2004年任职；Yves Boucau/AFP/Getty Images）



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将希腊西北部与伯罗奔尼撒和雅典等连接起来，于2004年开通（Author photograph）



塞浦路斯第一任总统、大主教马卡里奥斯三世（1913—1977）的铜像，位于特罗多斯山基科斯修道院的附近（Author photograph）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旗远望着塞浦路斯共和国首都尼科西亚被分割的希腊塞浦路斯占领区（ Author photograph ）



沿着停火线将尼科西亚分开的“死亡区”（ Author photograph ）



2010年“危机”后的街头艺术：贫穷是革命和罪恶之母（Street art by Wild Drawings, Exarcheia, Athens, 2013 ; Mystic Politics）



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于2015年1月25日在雅典大学的“山门”里庆祝他的竞选胜利。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与20世纪7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关。就在那个柱廊下，壁画上的希腊第一位统治者奥托一世往下看着，手势与齐普拉斯举起的手势相互配合。那个壁画是在奥托一世于1862年失去王位后不久完成的（ Nikos Pilos/laif/eyevine ）

谨以此书纪念我深爱的父母，是他们第一次把希腊介绍给我，并在我持续不断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希腊神奇之处的研究中，一直给予我支持。

珍妮特·玛丽·比顿

1922年7月24日—2018年4月15日

邓肯·麦吉利夫雷·比顿

1922年9月13日—2018年4月7日

永恒的回忆

Τα μάτια μου δεν είδαν τόπον ενδοξότερον από τούτο το αλωνάχι.
.(余目所视，若土之美，无比于此谷场也。)

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被围困的自由》（1826—1829）

那些当前在希腊依然被遵循的原则，不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将逐渐地产生影响……我不能……计算出希腊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迄今为止，这一直是狂热分子和激进分子赞美与哀叹的主题，但是从现在开始，它会引起政治家的注意。

拜伦勋爵在希腊迈索隆吉翁的讲话（1824）

民族是什么？布鲁姆问，民族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或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一群人。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

一个有内在精神的民族，即使最后面临绝望的深渊，也会激发出反抗绝望的力量。这种力量会突然爆发，不需要什么预兆，也不需要什么准备……勇敢的先驱时刻做好这样的准备。

乔治斯·塞奥托卡斯：《自由精神》（1929）

关于日期和职衔的几点说明

1923年3月1日以前，东正教和希腊使用的历法是更古老的儒略历法，该历法是以儒略恺撒的名字命名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采用的是格里高利历法，这部历法是以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名字命名的，于1582年被启用。儒略历法通常被称为“旧历”，在19世纪，该历法的日期比同时期的格里高利历法（新历）早12天；在20世纪，则早13天。所以，在19世纪的雅典，人们是在1月6日庆祝圣诞节。在1922年以前（包括1922年），希腊的圣诞节是在1月7日。用希腊语撰写的历史书籍在叙述1922年以前的事件时，一般来说仍然使用旧历。这可能会造成时间上的混乱。在本书中，正文的所有日期都采用西欧的格里高利历法，也就是新历。（在注释中，参考文献的日期仍遵循原文献的时间。）如果旧历日期很重要，或者经常被引用，我就会提醒读者注意时间的差别，比如按照旧历，传统上说的希腊革命的开始时间是1821年3月25日；按照西欧的格里高利历法，希腊革命发生在当年的4月6日。

在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外交官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官。二战以前，只有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使团才能被外交部门赋予“大使馆”的称谓，其负责人被赋予“大使”的职衔。那个时候，英国在雅典的外交使团是一个公使馆，其负责人的职衔是公使，严格说来，就是特命全权大使。在正文和注释中，我使用的是当时的职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使”和“大使”没有任何的不同。

致读者

我是从2015年8月开始写这本书的。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希腊在经济动荡中差一点儿要第三次退出欧元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出现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在我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我的祖国英国已经启动了退出欧盟的程序。希腊“脱欧”几乎快被人们忘记了。在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英语中的热门新词汇，即使“希腊脱欧”事件是先发生的，首先面对生存抉择的是希腊人。现在，希腊人已经渡过难关，来到了发展的彼岸。在现代，希腊人往往是先行者，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很清楚，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写下来的。这一刻就像在眼睛的一睁一闭之间，就像在希腊“脱欧”和英国“脱欧”之间。希腊“脱欧”没有发生，英国“脱欧”产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一刻就是“当下”，或者是“今日”，本书的每一页都会体现这一特质。但是，本书的缘起和真正的核心内涵需要追溯到更久远的时间。

我长大后的生活一直与希腊及说希腊语的世界有关。学生时代，我生活在军事独裁政府的阴影之下。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在雅典的街道上，我疲于奔命，躲避坦克的碾轧和屋顶狙击手的子弹。后来，我来到伦敦国王学院，担任现代希腊及拜占庭历史、语言和文学专业的克雷斯讲席教授整整30年，一直到2018年夏，我都在这所大学的演讲厅和研讨会上作有关希腊的报告。作为老师，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点儿也不少于对学生的要

求，持续不断地学习，向同行学，向同事学，特别是向大批的学生学，因为很多学生都是希腊人。从学生那里，我学到了从诸多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的方法，这在我改变对希腊的认识、深化对希腊的理解、了解现代社会中的希腊人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为一个国家，希腊演进的故事是激动人心的，有时也是令人心碎的，但让我如此长久地深深着迷的不是这些故事，而是其具象的国家建设史实与抽象的思想、态度以及愿望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些思想、态度以及愿望的聚合，形成了对于国家意识的共识。为了揭秘一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需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重大的历史事实，不能只看领导人的行动和言语，也不能只看那些反映跨越群体和种族的人类活动的图表和数据。一个国家的故事，还必须是其人民如何思考自身、如何思考世界以及如何思考其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故事。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把所讲述的故事称为“传记”而不是“历史”的原因。史传不仅要求作者对传主有长期的研究和深入的了解，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距离。通常来说，你不会为你亲近的人或者自己的家人写传记。我与希腊以及希腊人没有宗亲关系，我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书写希腊故事的，我与希腊之间的距离有助于我在撰写此书时采取与其他人不同的讲述方式。但是，我并不是说我在写作时心如止水。我相信，而且是充满激情地相信，希腊和希腊民族的现代历史非常重要，远远超出了全世界的希腊族共同体这个范围。写作此书，我尽了最大努力；阅读此书，您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您自己会判断我所写的正确与否。

前言

希腊及其祖先

希腊人是谁？是什么样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追求和成就，塑造了今天世界上的1 000多万希腊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位于欧洲东南角的两个欧盟成员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当然，凡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大陆，都有希腊族生活的社区，这些社区被称为“希腊流散区”。

很多书中都出现过这个问题，过去谁是希腊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欧思想家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3 000~2 000年前，欧洲这个东南角落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在文学、哲学、政治和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艺复兴以后，学者和旅行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文明。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对“欧洲”或“西方”文化的界定，包括对艺术、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的界定，都建立在古代希腊文明缔造者所奠定的基础上，而那些缔造者正是“希腊人”。

那些早已作古的希腊人在本书讲述的故事中也发挥着作用，但是本书的故事不是关于他们的。本书从头到尾论述的，都是当今时代的希腊人，主要探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方式、他们及其先辈曾经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对塑造自我所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本书探讨了集体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就过去两个世纪的希腊人而言，把集体身份认同称为“国家身份认同”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希腊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和巩固。所

以，我们就从国家开始谈起吧。

对于国家的构成要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20世纪末以来，历史思考中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是对国家进行重新界定，把国家看作一个现代现象，认为国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政府和多数公民的自愿参与，那么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也有人重提与此不同的观点，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称得上“种族”的人类群落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这些群落不可以被称为“国家”呢？

希腊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根据第一个定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希腊这个国家，是基于地理概念的，有着共同的体制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是在19世纪20年代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从另一个方面，在有记录的、连续的历史上，希腊语一直被使用，在当今希腊所在的地理位置上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如此说来，作为一个国家，希腊的故事难道不是源远流长吗？

这两个定义都有其依据。但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关于希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故事。因此，对于国家的定义，我选择的是更加狭义的、更加严格的含义，故事讲述时间的起点选定在民族国家诞生的那个世纪。

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把这个现代国家想象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是一个有生平传记的传主。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一个人的生命旅程，表现出神奇的甚至是富有启发性的相似。那些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思想往往是个体生命的有机隐喻。因此，让我们先搁置疑惑，假定“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革命之中的希腊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与人生的历程有一些共性，就像人物传记梳理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一样，我们能够追溯希腊

这个国家的历史。

与个体的人一样，一个国家也有遥远的祖先以及可以立刻进行查询的谱系或“家谱”。就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言，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希腊，现在应该被看作青壮年。一般而言，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有其典型的特点，但就本书而言，我很高兴地说，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特点。一个国家在成熟的时候可能会向其他方向演变，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国家演变的终点是死亡。具体到希腊来说，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们不会看到这个国家的讣告，给希腊写传记的作者也不用像对一个完整的、终结的生命那样，对其进行盖棺论定式的回顾。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请你把本书看作一部“名人”传记，而且传主依然处于盛年期，并且星光闪耀。本书的写作虽然结束了，但希腊的故事并没有随之结束。

不过，我们首先需要审视这个国家的先祖，以及由先祖而来的复杂的继承延续问题。

祖先：古希腊人以及中世纪罗马人

没有人知道我们最遥远的祖先是谁。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构成国家人口的个体的生物学祖先，而是某种比喻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复杂现象的祖先，尽

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国家”，人们还是存有疑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文明时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主权国家。不过，希腊人与那些他们称之为“我们的远祖”的人，有一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最近几十年，“我们的远祖”这个术语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此说来，此术语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界定希腊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乔治·塞菲里斯给出了最为精妙的描述。他在1963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我不是说我们（与古希腊人）有着同样的血统，因为我对种族理论有种恐惧感，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同样的山峦隐没在遥远的海平线上。”^[1]塞菲里斯还强调了语言的连续性。他指出，描述“太阳光线”的词汇，从3 000年前的荷马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塞菲里斯在20世纪30—40年代经历了纳粹种族主义者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他强调的是一种亲近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自然风貌和语言的基础上，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发展起来的，是从心灵深处感知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武断的教条主义，不是建立在基因推测基础上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希腊人。希腊于2010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全世界有很多漫画家在媒体上发表他们依据希腊经典模式和形象创作的漫画，直观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曾经创造伟大文明、而今处于糟糕状况的国度的看法。有的漫画描绘了希腊古代神庙，熠熠发光的大理石上布满了裂纹；有的漫画把欧元硬币上的铁饼描绘成歪斜的形状，寓示着希腊给欧元带来的混乱。这些漫画形象在远离希腊的国家引发了大众的想象，总的来说，即便人们的态度不是完全充满敌意，也是批评性的。就希腊人而言，这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让他们呼唤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的回归。这

些雕塑原本是帕特农神庙的石雕，在19世纪初被埃尔金勋爵拆下来运走。自1817年以来，这些精美绝伦的雕塑就一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出，其创作者在2 500年前就已经作古，但是后人一直对其进行称颂、揣摩。这其中就有玛丽娜·墨蔻莉。她曾是电影明星、流行歌手，后来担任希腊文化部部长。她的赞叹感人至深：“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名牌……是希腊文化的精髓。”[2]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至少是不能轻易抹掉的。有人认为，经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和战争入侵，古代希腊人的基因库不可能保存下来。有人摒弃对希腊先祖的迷恋，以此作为回避历史事实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样说都没有抓住要点。我们讨论的是亲近关系的感觉，是一种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观证明的现实。与先祖的亲近感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解释的历史事实。这种亲近感是如何存在的，尔后又怎样产生了如此持久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希腊如何变成现代国家这个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地把“现代希腊”作为古代希腊的延续，因此很难想象，在距离我们十分久远的古希腊时代，讲希腊语的人相互间是不存在这种亲近感的。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人”的那些人，在当时可能不是这样称呼自己。“希腊人”和“希腊”这两个词源于拉丁语“Graecus”（神）和“Graecia”（希腊）。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让“希腊人”和“希腊”这些称谓变得尽人皆知。古希腊人自称“Hellenes”（希腊人），这个词在英语和希腊语中的拼写几乎是一样的。古希腊人生活的地方统称为“Hellas”（希腊）。到了现代，希腊人的拼写形式变成了“Ellines”（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希腊的拼写形式变成了“Ellas”（旧式的拼写）或“Ellada”，这些名字的现代拼写在

今天被视为标准的拼写。那么，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说来话长。4世纪的时候，那些说希腊语、写希腊语、居住在东部地中海沿岸内陆的人，已经在古罗马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百年。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奉为国教的时候，希腊语中的“Hellenes”这个词被保留下来，意指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得到新宗教恩典的希腊人。由于没能皈依基督教，那些希腊人就不不可避免地成为异教徒。过了不长时间，“Hellene”这个词的含义进一步得到扩展——用来指“异教徒”。也就是说，它可以指任何一个非基督教徒。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Hellene”在希腊语中的主要含义就是“异教徒”。随着世俗理念在18世纪的传播，“Hellene”变成了一个代表古风古义的词汇；“Hellenes”表示的是古希腊人，而此时说希腊语的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后来，希腊人又进行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那是在1822年1月，希腊临时政府第一次全国国民议会做出决定——恢复一些古代名字的用法，即用“Hellenes”指那个时候新的、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公民，用“Hellas”指新的国家政权。[\[3\]](#)

同样的道理，有人建议，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就应该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货币”。从这种货币的名字可见，你想象它有多古老，就有多古老，但是截至1833年，在约170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从未被铸造过。再举一个例子，在和希腊诸城邦对抗的时候，古代的雅典一直执着于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长期以来，雅典城中心卫城上的那些被毁坏的古代神庙被当作希腊的标志，这很容易让人认为，雅典从古至今就是希腊的都城，但实际上，雅典在1834年12月13日才第一次成为希腊的首都。

地名和人名等常常暗示希腊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更紧密的亲

属关系。你在任何一张希腊地图上看到的至少一半的城镇和具有地理特色的名字，都能在古老的文献中找到。但是，很多名字是在希腊独立后被重新启用的，取代了使用数百年的惯常用名。那些旧名字依然存在于从前的地图和游记里，比如，在科林斯海湾，难读的“Aigio”（艾吉奥）替代了“Vostitsa”（沃斯提萨）。拜伦勋爵当年曾经造访过这个地方，1821年还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革命领导人秘密会议。“特罗林纳”是神话故事中忒修斯的出生地，曾是中世纪一个法国男爵的领地。这个名字在19世纪20年代被重新启用，取代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达玛拉”。以前使用的旧名字被古老的名字替代，也就是用一种历史替代另一种历史。我们再举一些人名例子。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信希腊东正教的父母有一半会用教堂日历上的圣徒名字，为他们的受洗的孩子命名。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父母在给受洗的孩子取名字时，要么将圣徒名字和古希腊著名人物的名字搭配使用，要么只用古希腊著名人物的名字，完全不用圣徒的名字。如今，希腊人的名字可能是奥德修斯、苏格拉底或欧几里得，也可能是珀涅罗珀或卡莉欧碧。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名字从古代开始就一直被家族使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你需要了解的你的祖先的另一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当然，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要减弱这些祖先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努力强化希腊集体认同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只有全面认识千百万希腊人在那些岁月里做出的选择，才能充分看到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规模和范围。从大约1800年开始，希腊逐渐强化自己与逝去的古代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这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既不无争议，也有很强的选择性。想一想那些完全被摒弃的古代做法，比如裸体、男色、奴隶制度、女性性奴、杀婴行为、异教信奉、动物献祭等，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作为一项政策，强化希腊与逝去的古代文明的亲缘关系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与漫画上欧元硬币扭曲的铁饼、古代神庙大理石廊柱上累累的裂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那些漫画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切，只是更令人感伤而已。

即便祖上只有一个出名的祖先，这也是极不容易的。希腊这个国家出名的祖先，不止一个，共有两个。希腊的第二个祖先从来没有获得第一个祖先那样高的盛誉，至少在西欧是这样的。另一方面，第二个祖先不仅从时间上看没有第一个祖先那么深远的根底，而且与很多希腊人在情感上也许显得非常遥远。这第二个祖先就是19世纪以来被冠以“拜占庭”名字的文明。不过，拜占庭是另一个聚讼纷纭的术语，因为“拜占庭人”自己从来不那么讲，而且在说英语的人中间，这个词的发音也没有达成共识。通常来说，拜占庭帝国肇始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城市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个城市位于面对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如今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那是330年，君士坦丁堡正好在那一年接纳了基督教。从那以后的1000多年里，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在他创建的东方都城中统治了一个基督教帝国，其官方语言很快变成了希腊语。这就是说希腊语的人逐渐失去旧名“希腊人”（Hellenes），并将自己定义为“罗马人”（Romans）的原因。如果以希腊语进行字母转换，“Romans”就可以写成Romaioi，后来演变为Romioi，读作Romyí。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之所以称自己为罗马人，是因为从政治上说，他们所属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即便在1453年罗马帝国灭亡以及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以后，他们依然使用“罗马人”这个称谓。正是这个原因，直到19世纪初期，现代希腊语都被称为“罗马语”（Romaic），而不是“希腊语”（Greek）。在1500年的时间里，被西方人称

为“希腊人”（Greeks）的那些人，一直把自己定义为“罗马人”（Romans）。

在那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欧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边到北非国家和意大利，东边到波斯。除了公元前4世纪短暂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说希腊语的统治者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么辽阔的疆域，也从来没有统治过那么多的属国，这一盛况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拜占庭文明常常被描述为过度注重精神层面，甚至接近禁欲主义。从拜占庭文明流传至今的文学、建筑和艺术来看，的确是这样，因为其目的是高度宗教性的。但是，拜占庭人或者至少其精英阶层，有着深厚的修养，享受着高水平的世俗教育。他们是严谨细致的学者和深究幽微的读者，研读古希腊的戏剧、诗歌、哲学和历史。的确，我们今天知道的全部古希腊文学和大部分科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而且在14世纪以后沿着适当的路径传播到西欧，要归功于拜占庭帝国的图书管理人员、书籍抄写者和有识之人（其中有些是女性）。拜占庭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获取了无上的权力，此前或之后说希腊语的人很少拥有这样的荣耀。

罗马帝国最终在1453年灭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之所以依然对希腊人的创造力有着强大的影响，以上所述都是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东正教体制的延续，因为在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几百年里，东正教一直在传教布道，从来没有中断过。与此相较，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时代开始形成的组织机构，没有任何一个能像东正教那样延续下来。现代的最高法院保留了古代雅典使用的名字“Areopagus”（战神山议事会），但那只不过是1844年以后的事儿。戏剧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大的影响，古希

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复兴让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观众欣喜若狂。但是，不管是在希腊还是在别的地方，戏剧演出的历史都曾中断过。

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全国性的组织机构不断建立起来。乍一看其遵循的模式极有可能是从东罗马帝国那里继承来的，而且符合当时多数说希腊语的人的宗教传统，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拜占庭帝国只是在后来才成为现代国家效仿的榜样。那是另一种选择，并对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性才被认可，成为继古希腊之后的第二个卓越祖先。

希腊人的后裔：西方的“Hellenes”还是东方的“Romioi”？

至少在150年的时间里，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卓越的祖先在希腊的国家形象构建中互相激荡。在对古希腊的初步综合分析方面，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并称之为“希腊—基督教文明”。但是，这个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到希腊军政府的抵制，从那以后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怎么被使用了。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人们一般不会相提并论。

对这两个如此不同的祖先同时进行回顾所造成的结果，将会是身份认同的非凡叠加，或者身份认同的分裂，也许那样会更好一些。在将一个人描述为“希腊人”的时候，现代语言有两个词，分别是“Hellene”和“Romios”（Romioi是其复数形式）。如果我

们对这两个词进行翻译，那么，它们有着同样的含义。但是，它们不可以相互替换。“Hellene”（Ellinas）是标准用语，从1822年开始，官方就一直使用这个词。事实上，在英语中，希腊这个国家的官方名字是“Hellenic Republic”（希腊共和国）。而“Romios”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护照上或政府文件上。19世纪初以来，这个词逐渐变成了非官方的、希腊人称呼自己的更加亲切的表达用语，也常常是希腊人彼此之间相互使用的更显亲密的表达方式。“Hellene”是一个对外使用的术语，让外国人确定了希腊人的含义。“Romios”则包含了一种情感的因素。诗人克斯蒂斯·帕拉马斯在20世纪初创作了大量诗歌，他在“Romios”中发现了“某种具有诗意和音符的东西，某种激情澎湃的东西，某种可以让人们充满青春活力的东西，甚至是某种让人们迷醉的东西”。[4]这种认识和感情是自己人共同拥有并欣赏的，与其他人无关。玛丽娜·墨蔻莉在出任社会主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之前，被军政府剥夺了希腊国籍。她在自己灌录的一首歌中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嘲讽，因为他们胆敢说“我不再是一个Romia了”。这首歌的要点是，国籍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剥夺，但是一个人作为Romia或Romios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被剥夺的。这种身份认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官方无权干涉，甚至是无法企及。

有时候，人们建议将“Hellene”和“Romios”这些相互交叠但又明显不同的身份认同，都整合进希腊的文化特质或行为模式中。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当希腊人认为他们是“Hellenes”的时候，就会在脑海里想到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从而在政治和文化喜好（比如喜爱古典音乐）上与西欧寻求身份认同，采用世俗的世界观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是“Romioi”的时候，其目的是强调亲密性和非正式性，与传统形式的文化寻求身份认同，采用宗教的世界观以及自发性、感性的

思维方式。希腊传统文化与巴尔干半岛、中东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比如喜爱蓝调雷贝蒂卡，这是一种源自黎凡特传统的音乐形式）。[5]

我们并不是将人群进行分类，把一部分人归为一类，把其他人归为另一类，而是认为，一个人拥有两种身份认同，也许这两种身份各自占的比例是不同的且不固定。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引言中两次提到玛丽娜·墨蔻莉。一次是作为呼吁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回归希腊的最具感召力的代表人物，那是一个典型的Hellenic选择；一次是作为Romaic身份认同的坚定的倡导者，她满怀鄙夷地挑战西方思维观念中的官僚习气。

正如上面的例子已经显示出来的，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祖先之间的二元性，促进或者反映了思想和认知在深层次的二元性。希腊（希腊人）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希腊的两个祖先的文明繁盛的具体地理空间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们一直认为古希腊是属于西方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古希腊首先对古罗马产生了影响，并在很多年以后，又对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位于东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1054年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以来，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现在也是）东正教的核心，认同拜占庭帝国就是认同正教传统。现在，坚持正教传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书中指出了这样的悖论：“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而古典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6]事实上，希腊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200年里，希腊人已经确定了这

一点。但是，正如希腊对其祖先的二元继承所显示的，它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这是同一个二元性的一部分，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单一的论断。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

事实也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位学者在2015年撰写了见解深刻的文章，这也算是对亨廷顿的回应。他写道：“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200年里，希腊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要放弃西方。”^[7]19世纪20年代以来，希腊的每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决议，包括每一个政府行动和每一项民主选择，都一再证明其与西方的结盟；还在适当时候，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为这种反复证明所付出的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项决议只有在经历内部冲突之后才得以通过，而且是凭借最微弱的优势。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内战，国人之间相互残杀，希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与西方结盟的问题。这样的伤疤是不容易愈合的。

巴尔干半岛在20世纪90年代重燃战火，前南斯拉夫围绕是否坚持共产党执政而发生了分裂。此时，希腊公众的意见一边倒地站在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阵营。有时候，政府的政策罕见地与西方不一致。最近一次的不一致发生在2015年的春夏之交，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郑重地考虑：如果希腊不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就应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结盟。即便从最终结果上看，希腊一直都在与西方结盟（或多或少），但它从来都不是全体公民的一致选择，有时甚至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以上那些例子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希腊祖先的故事揭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形势迫使人们进行两难选择时，不管人们做出哪个选择，其注定会损耗一部分对希腊最诚挚的忠诚。

鉴于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人们认为未来的决定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不明智的。

家谱

遥远的祖先是重要的示范样板，是评估成败的参照点。另外，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通过家谱可以追溯自己的起源。从拜占庭帝国的崩塌，到导致希腊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波萌动，这中间的几百年的时间被一位近代历史学家称为“隐匿的世纪”。这些“隐匿的世纪”，可以重构希腊的谱系。^[8]

在“隐匿的世纪”里，希腊的延续靠希腊的语言和东正教堂来维系，其中希腊语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语言和东正教是现代国家必备的两个因素，在18世纪以前，两者都存在，而且其背后均有悠久的传统。在近几百年里，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身处的政治和文化体系是什么样的呢？这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每一种情况下，说希腊语的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1453年，但是它的崩塌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注定了。拜占庭帝国是一个说希腊语的基督徒世界，给这个世界的政治统一带来的致命一击不是来自东方，也不是来自伊斯兰国家，而是来自信奉天主教的西方。这个致命一击让拜占庭帝国支离破碎，轰然倒塌。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因缺少攻打圣地的资金而改变目标，最终攻打了君士坦丁堡。在这场以圣战名义发起的战争中，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城市被基督徒们洗劫一空。斯蒂文·朗西曼是研究十字军东征历史的学者，用他的话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莫过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9]那次浩劫过后800年，也就是2004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此事向同为宗教领袖的东正教牧首巴多禄茂发表了历史性的致歉信。

1261年，拜占庭人想对首都进行重新规划、重新建设。但

是，被破坏的建筑难以再修复了。1204年以来，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他们的统治者经常为了争夺权势而相互残杀。有些说希腊语的人继续做拜占庭皇帝或其藩属国的臣民，只要他们活着，就一直是东正教徒。其他说希腊语的人去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管辖区，而那里是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讲希腊语的人在战争征伐中，被伊斯兰教徒吸纳到不断扩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

1261—1453年，君士坦丁堡及其越来越小的内陆地区，存在着一个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小国。一些偏于一隅的属地，也延续了长短不等的时间，比如西边有伊庇鲁斯公国，其位于今希腊的西北部；南边有摩里亚公国，这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名字；东边有特拉比松帝国，其位于黑海的南岸，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帝国，一直到1461年才覆亡。在14—15世纪，这些拜占庭帝国最后的藩属，包括其首都君士坦丁堡，都只不过是城邦而已，到了这个时候，其势力和财富根本不能与那些它们不得不与之竞争的伟大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同日而语。

其他地方的统治者是十字军的后裔和继任者。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个独立的邦国，其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期持续繁荣，其统治者是一位实行殖民制度的法国贵族，后来这个城邦被拜占庭帝国迅速夺了回去。遥远的东边的塞浦路斯岛上生活着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只是这个岛在1204年之前就被十字军占领了。后来，法国吕西安王朝开始统治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国。1489年，威尼斯掌握了塞浦路斯岛的控制权，在统治了近一个世纪后，该岛于1571年被奥斯曼帝国攻占。1211—1669年，威尼斯人掌控了克里特岛，占领了位于希腊大陆西边的爱奥尼亚群岛。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岛，尤其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

期，见证了艺术的繁荣。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宗教绘画学派孕育而生，戏剧和诗歌由希腊语的克里特方言写成，主要城镇有戏剧演出。在这些作品里，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与当地的叙事传统实现了融合，就像同时期的莎士比亚和其他英国剧作家的戏剧创作完全融合一样。威尼斯治理下的克里特岛为世界培养了著名的画家多米尼科斯·提托克波洛，在西方，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埃尔·格列柯。克里特岛上的最大城市甘地亚（今伊拉克利翁）在当时是一座文化很发达的城市，不输于17世纪早期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克里特的贵族、商人和艺术家喜欢他们居住的岛屿，喜欢融合了希腊和意大利特色的生活方式。

最后，我们谈一谈奥斯曼帝国本身。奥斯曼帝国于14世纪30年代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向欧洲扩张，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扩张采取的是雇佣兵形式，即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一方的雇佣兵与另一方的雇佣兵进行搏杀。到了1669年，大量说希腊语的人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这样一来，他们就被剥夺了只有穆斯林才能享有的很多特权，同时还要缴纳特别的税，受到特别的限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异教徒”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时那样的一系列的迫害。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要求其统治下的臣民整齐划一。在苏丹的统治下，通过希腊语接受教育的东正教徒同样可以提升自己，成为贵族和精英，他们能在奥斯曼帝国体制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一点儿都不会失去自己鲜明的宗教身份认同。

以上就是希腊民族国家经历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迁，也是希腊的谱系或“家谱”。与任何一个真实的家谱一样，这个国家谱系也有自己的“害群之马”，只不过其后代会选择忘掉那些经历。来自西方的十字军东征，或者东方征服带来的奥斯曼文明，可能不怎么受当代多数希腊人的待见，特别是与古代希腊或拜占庭帝

国那些更加遥远的荣耀相比时，更是不被希腊人提及。但是，不管喜欢与否，这些历史以及其他中世纪末期和现代早期历史的次要经历，都至少会在现代希腊这个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怎么发生的？现代希腊这个国家形成的故事始于18世纪初。

[1] Giorgos Seferis, Δοκίμ.. [Essays], vol. 3, ed. D. Daskalopoulos (Athens: Ikaros, 1992), 167 (original in French).

[2] Speech by Melina Mercouri to the Oxford Union, 12 June 1986 (original emphasis) <<http://www.parthenon.newmentor.net/speech.htm>> (accessed 27 February 2018).

[3] Loukia Droulia, 'Towards modern Greek consciousness', *The Historical Review / La Revue Historique* (Institute for Neohellenic Research, Athens) 1 (2004), 51–67 (see p. 51). For the original Greek text see the website of the Hellenic Parliament.

[4] Kostis Palamas, .παντα [Complete Works], 17 vols (Athens: Biris, n.d.), vol. 6, 279.

[5] Patrick Leigh Fermor, *Roumeli: Travels in Northern Greece* (London: John Murray, 1966), 96–101, 106–13; Michael Herzfeld, *Ours Once More: Folklore,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18–21.

[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2002; .rst published 1996), 162.

[7] Stathis Kalyvas, *Modern Greec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4.

[8] David Brewer, *Greece: The Hidden Centuries. Turkish Rule from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o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I. B. Tauris, 2010).

[9]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rst published 1951–4), vol. 3, 130.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相遇

(1718—1797)

希腊民族国家诞生于基督教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碰撞中，是从奥斯曼帝国中孕育出来的。这一切发端于两个相互对抗的宿敌之间的相对和平共处时期。

1683年，随着维也纳第二次被围困，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的扩张告一段落，不过，和平并没有马上降临。奥地利人和威尼斯人在分别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两年多的战争，与俄国人进行了一年的战争后，才共同建立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可以防御的、相互之间多少能形成共识的边界线，从而将信奉伊斯兰教的帝国排斥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之外。1718年7月，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签署《帕萨罗维兹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这些边界线。

在西边，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是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在北边，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是多瑙河形成的自然边界，多瑙河在贝尔格莱德折转东流，然后注入北海。在欧洲方向，奥斯曼帝国有3个自然边界，与此相对应，就有3个缓冲区，或者边疆地带。第一个边疆地带是由7个爱奥尼亚岛屿形成的，一直延伸到希腊半岛，从北部的科孚岛到南部的塞里沟（古代与现代基西拉）。第二个边疆地带包括多瑙河北边的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第三个边疆地带由北海的北岸以及相关的陆地构成。在每一个边疆地带，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都占据着精英的位置，享受着财富和教育带来的恩惠。也正是在这些边疆地带，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互动。

边疆地带

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就在爱奥尼亚群岛建立了自

己的统治，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到了18世纪，那里的情况与威尼斯人曾经统治的克里特岛非常相似。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的统治在1669年结束了。事实上，克里特岛的很多上层人士在本岛受文艺复兴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本岛安身立命。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在克里特岛上安居乐业的人都信奉东正教，在日常生活中说希腊语的当地方言。但是，当地的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贵族的子孙被送到意大利的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思想在这100年里被渗透、传播到克里特岛的上流社会。一般来说，这种教育只有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乡绅才能负担得起，所以不可能导致革命的思潮。在18世纪，接受良好教育的爱奥尼亚人首先要忠诚于他们的故土、东正教以及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

第二个边疆地带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它们是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个区域没有多少说希腊语的本土居民，他们大部分信奉东正教，说的是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我们现在知道，它是罗马尼亚语，当时被称为“瓦拉几”或“瓦拉几亚”。1718年签署的《帕萨罗维兹条约》进一步确认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地位，但是奥斯曼帝国并不进行直接统治，而是由苏丹任命信得过的代理人。那些代理人是由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藩属中选拔出的最富有、最有教养的“君王”担任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大都会的精英阶层从给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的宗教服务中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半贵族的群体。其成员被统称为“法纳尔”，因为当时主教所在城市的城区的名字就是法纳尔，现在该城区依然是主教的所在地。这个精英阶层的人不管母语如何，都通过希腊语接受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纳尔可以被认为是“希腊人”，尽管从现代的、“种族”的意义上看，其中很多都不是希腊人。

逐渐地，从17世纪末开始，这个精英阶层在奥斯曼帝国的体系中得到信任，特别是那些掌握语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任命到政府机构担任重要的职位。在军事扩展逐步让位于外交手段的年代，政府需要一批合格的外交人员。那些学富五车的语言学家往往被授予“译员”的职衔，他们也是东正教徒。在18世纪，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加入奥斯曼帝国的治理体系之中。

从1711年到1821年希腊革命爆发，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治者一直是法纳尔君王，只不过这中间发生了短暂的战争。法纳尔君王职位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的任期往往也很短，其中尼古劳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任职时间最长。他先在瓦拉几亚短暂任职，然后转任摩尔多瓦，最后在瓦拉几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安顿下来。他从1719年开始统治布加勒斯特，一直到1730年去世，统治时间长达11年。

与爱奥尼亚群岛上的说希腊语的贵族持续地、坚定地效忠威尼斯一样，绝大多数法纳尔在18世纪都对奥斯曼帝国忠贞不贰。毕竟，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此显赫，又受到如此多的信任。因此对东正教徒来说，截至18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帝国体系内，追求荣华富贵的标准路径是，掌握希腊语以及在富有的法纳尔和东正教设立的教育机构内接受教育。

第三个边疆地带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今乌克兰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地带才进入我们的故事之中。1768—1774年，俄国人和奥斯曼人战事连连。最终，俄国人赢了，获得了对黑海海岸以及北边内陆的控制权。这场战事冲突也对多瑙河流域上的公国产生了影响，使得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被纳入俄国的控制范围，同时还对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的一些岛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769年年底，俄国的一支舰队首次从圣彼得堡起航，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了东地中海。俄国人半心半意地

诱使与他们同信奉东正教的说希腊语的教友起来造反，支持后者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地区的叛乱。俄国舰队撤退以后，这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些事件在希腊语中被称为“Orlofika”[俄国海军上将伯爵的名字就是Orloff（奥尔洛夫）]，常常被作为一种最初的国家革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上的基督教居民的自决权，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如果造反成功了，俄国人承诺的军事支持兑现了，那么当地人也只不过是换来了另一个外国主子。

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更大的影响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对在黑海以北新获得的土地进行人口移民和行政管理，并将这片新土地命名为“新俄国”。大约在1770年，俄国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安置计划，将在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掳掠来的东正教徒及其家人迁徙到“新俄国”。据估计，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至少有25万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移民到了“新俄国”。[\[1\]](#)

到18世纪末，俄国南部、黑海以及第聂伯河沿岸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俄国中这些说希腊语的臣民手里。俄国政府以及军队中的重要职位也向这批移民人口中的精英开放。就在这一时期，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旨意，俄国建设了新的城市，并将其命名为马里乌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很显然，这些都是希腊名字。也是在这一时期，黑海上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和亚述海上的海港城市塔干罗格发展了起来，两个城市都有大量的说希腊语的人口。在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大臣们制订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建立基督正教拜占庭帝国，并将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如果计划成功实施，希腊民族国家的独立就会成为泡影。但是到了1792年，俄国又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仗，尽管最终斩获颇丰，但是很明显，攻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宏大的重建计划就被无声无息地搁浅了。

与多瑙河公国的情况一样，在俄国南部新领土上生活的希腊精英也来自奥斯曼帝国。但是这一次，他们不是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来自他们的经商才华，源于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在这里，他们不是贵族，而是中产阶级。从其他方面看，他们的情况很像另外两个边疆地带的精英的情况。这个精英阶层有充分的理由对支持其发展并确保其活动成为可能的政权，保持无限的忠诚，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精英要忠诚于俄国。

最后，在18世纪下半叶，第四个边疆地带出现了，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与西欧人在那里实现了交流、融合。与前三个边疆地带不一样，这个边疆地带不是一个单独的地理空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靠近边界，而是包括一系列由商人、店主在整个基督教大陆上的威尼斯、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里窝那、马赛、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和贸易中心建立的当地社区。（当然，后来更远的地方也出现了这样的社区。）这些散布在各地的希腊语社区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希腊“流散社区”的先驱。

这些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768—1774年的俄国—奥斯曼之战影响的结果，虽然这些进展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

《凯纳甲湖条约》的签订为那场战争画上了句号，同时也赋予了奥斯曼基督教商人新的贸易权利，使得他们从俄国得到一些名义上的保护。但是，在俄国新定居的商人和在西方建立贸易中心的商人有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新俄国，希腊贸易社区的建立和繁荣是俄国有意进行政策支持的结果。在西方，很多不同的贸易中心则是自发出现的结果。因此，与俄国的希腊社区比起来，西欧的希腊社区在政治上更加独立，或者说，正是这个原因，西欧的希腊商人也比爱奥尼亚群岛的贵族或者多瑙河公国的法纳尔在政治上有着更加独立的思想。假如当时的西欧发生了一场革命，那

么最积极、最活跃地准备和响应革命的人可能就出现在西欧的商人社区之中。当然，这场革命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发生。

跨越边界：行动中的人、思想以及商品

以上就是18世纪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之间发生交往与互动的四个边疆地带。在每一个区域，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都占据着精英位置。

这些精英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极大的流动性，不只是沿着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轨迹行动，比如，爱奥尼亚群岛上的人往来威尼斯，法纳尔在多瑙河公国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活动，定居者和商人在他们的新家和出生地之间穿梭。在那个时代，长距离的旅行总是需要很长时间，也不舒适，有时还有危险。如果我们查看当时一些最知名的人的事业轨迹，就会看到其到过的地方是那样多。以艾弗耶尼奥斯·弗格里斯为例。他于1716年出生在科孚岛的一个贵族之家，先后学习、写作和教书的地方有伊庇鲁斯的阿尔塔、威尼斯、爱奥尼亚、约阿尼纳、科扎尼、阿陀斯山的东正教修道院自治社区、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雅西（摩尔多瓦的首都）以及德国城市莱比锡。当时，莱比锡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庇佑之地。弗格里斯从那里继续旅行，在黑海北边的新俄国土地上成为受到敬仰的第一批东正教主教之一。他最后的岁月是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的宫廷里度过的，享年90岁。纵观弗格里斯动荡的一生，他的脚步走过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中间的三个边疆地带，包括威尼斯、莱比锡等欧洲的中心城市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及其在东南欧的几个行省。

弗格里斯在18世纪所走过的世界，在20世纪被描述为“东正

教联邦”。[2]也就是说，所谓联邦，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以及使用希腊语获得的共同教育。这个“联邦”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中心，它的核心地带可以描述为欧洲的东南角，也就是今巴尔干半岛。它一方面与俄国腹地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安纳托利亚和中东一些地区保持着联系。这样的区域汇聚了各种背景的人，后来这些人经过磨炼形成了各自独具一格又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比如，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以及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还有希腊人。尽管这个“联邦”的集体身份认同非常松散，但能够跨越边境地带不同精英的不同政治效忠理念。

在18世纪，两个具有变革力量的成就与这个联邦有关。一个是教育的发展，与之伴随的是用现代希腊语撰写的印刷书籍的发行和流通以及改编和译自西方的世俗知识的传播。另一个是贸易的扩展。从后来国家历史的视角，这两个成就都被看作19世纪20年代的铺平革命道路的先驱。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为人所知的希腊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从法国、英国和德国向东、向南传播的过程，并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出版或流通的很多书以及手稿，特别是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从西方翻译和改编过来的。那么，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些“启蒙者”到底是怎样启蒙的？其实，“启蒙者”这个名字是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多数启蒙者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宣传的。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用希腊语对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知识所进行的阐释，来自尼基弗罗斯·塞奥托卡斯于176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一本书，而塞奥托卡斯后来成为俄国新领土上的一位主教。在18世纪中后期，任何一位用希腊语写作的

人都可以对宗教所揭示的真理进行质疑，或者对教会的体制进行批评，只是这样的情况太少了。^[3]这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这些启蒙者大多数都以某种形式任职于宗教神职体系之中，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惊奇，因为18世纪希腊教育初期所成就的慷慨资助者，就是东正教本身。在涉及政治的时候，有些人成为改革者，有些人会对政治理论感兴趣。但是，不管从什么意义上看，没有人会成为一个民主人士，更不会成为一个革命人士。

就后来的启蒙者而言，在很多方面具有示范性的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尼古劳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他是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任职的法纳尔君王中的首批启蒙者之一，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法纳尔君王。他的父亲是在意大利接受的教育，他本人却很少外出游历，这有点儿不同寻常。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除了现代希腊语（母语）外，还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奥斯曼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晚年又学习了希伯来语。作为统治者，他向东南欧介绍引进了“启蒙君王”的模式，改革古代封建制度，鼓励创办学校。马夫罗科扎托斯是真正的哲人王，他留传下来的著作中，有一本箴言录，旨在回应17世纪法国贵族拉·罗什福科的更知名的《道德箴言录》。他还写了一本有关统治术的书。马夫罗科扎托斯也创作散文，这些散文赞美书籍和阅读，谴责抽烟的恶习。他撰写的一篇关于当代礼仪的长文，被有些人誉为第一部现代希腊语小说。^[4]

如果希腊真的有启蒙运动，那么它也没有对哲学或科学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些先驱可能对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看得见的贡献，但他们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发现。

这个发现是从地理起步的。基于西方资源、用现代希腊语撰写的地理论文问世，第一篇发表于1716年，第二篇发表于1728年。很明显，作者的目的是教育，这些论文涉及整个世界。但是，当这些作者试图更改被称为“Graecia”（希腊）的土地的描述时，他们觉得需要利用那些对他们来说容易找到的资源以及他们熟悉的、用自己的语言撰写的文献，比如，拜占庭帝国编年史。

这样做的结果是地理和历史的怪异杂交，是现代西方和中世纪东方在看待同样的事情方面所使用的截然不同的方式的离奇混合。1760年，格里戈奥斯·法泽伊斯在威尼斯出版《地理原理》以后，他的读者发现，他们被不加任何区分地称为“Romans”“Hellenes”“Greeks”。其实，在这三个词语中，第一个词语是拜占庭人在称呼自己时使用的，当时多数说希腊语的人依然那样用。“Hellenes”这个词语在那个时候仅指古代基督教产生以前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希腊人。而“Greeks”这个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词语是法泽伊斯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出现的词汇，既称呼这些地区的古人，也称呼这些地区的今人。难怪法泽伊斯和他的读者会糊涂。

就在同一时期，说希腊语的读者开始熟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在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世界，也居住着人，这些人形成了不同的、定义不怎么严格的松散的群体，这个群体被后人称为“国家”。当然，这还没有到国家主义的时代，更谈不上民族国家的自决。但是，当时的人意识到了，也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习俗和环境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将导致19世纪初的对“国家”的思考的出现，而奥斯曼帝国中常见的宗教依附则做不到这一点。在18世纪80年代，用希腊语写作的作家或学者开始把他们自己的人（依然有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称为一个国家，这意味着新

的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在西方出现。

18世纪90年代初期，历史地理学有了更大的进展，尽管这些进展仍然不是非常革命性的。丹尼尔·菲利普迪斯和格里高里斯·康斯坦塔斯是表兄弟，都出生于色萨利皮立翁山区的米里斯小镇上殷实、兴旺的商业家族。两人在教会中担任底层职务，后来作为专业教师，被吸引到多瑙河流域的公国。基于这些经历和思考，他们于1791年在维也纳出版了鸿篇巨制《现代地理》的第一卷，其中“关于希腊”那一部分的字数很多，它对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和爱琴岛的地理面貌进行了最新的记述。“关于希腊”部分的前面是“希腊编年史和变迁史”，篇幅长达100页，分析了希腊从古代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他们所描述地区的居民就是“现代希腊人”，是古代的一个“民族”的后裔。只是，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些现代人不如他们的祖先那样快乐和富足，一个是他们有争吵的坏习惯（在作者看来，这是他们继承的那份优秀遗产的糟粕），另一个是统治他们的“专制政府”。

这两位作者用了好几个段落哀叹奥斯曼帝国中法制的缺失，认为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没有法国那么富裕。尽管如此，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在著作中依然表现出对苏丹的忠诚。根据奥斯曼帝国征服异域后的做法，兄弟俩称呼苏丹为“国王”，这一直是拜占庭基督教国王的官方头衔。他们的想法是从内部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尽管比前面的先驱更加坦率和直接，但菲利普迪斯和康斯坦塔斯在书中没有一字鼓励他们的同胞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君主。这两位作者的政治追求与当时很多受过教育、说希腊语的人一样，倾向于游移不定。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诉求是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出版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与俄国交战，该书对俄国不吝溢美之词，他们计划将其献给“俄军总司令格列高里·波将金”。

[5]但是，希腊革命后，兄弟俩再次选择回到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在独立后的希腊度过余生。

这个自我发现过程的钥匙是语言。很明显，希腊语是无可争议的共同元素，将没有宗教信仰的古希腊人、基督教拜占庭人、当今的东南欧的东正教精英以及大量散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说着各自方言的人连接在一起。众所周知的希腊“语言问题”，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东正教联邦”的精英非常尊崇并认可希腊语，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规范。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教育未来一代读书写字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恰当的、正确的、“官方的”希腊语言形式？这个问题涉及的都是书面语，他们从未试图规范口语的多样性。[6]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阅读和书写希腊语，随着每年越来越多的希腊语图书出版发行，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在用希腊语出版的书籍中，哪些语言形式是对的、可接受的？如此说来，早在人们严肃认真地构想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几十年前，对民族语言的追寻就已经开始了。

对希腊语规范的争论往往有很浓的火药味，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敌对情绪和感情因素，更多的是看谁的话语权更大，而不是看寻求共同利益的愿望。很显然，他们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直到1976年，对希腊语的书面形式进行规范的立法建议才得到普遍认同。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执一词，有着不同的背景，尽管他们在家里说的是希腊语、斯拉夫语、瓦拉几语（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甚至是奥斯曼土耳其语，但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这种还没有规范化的希腊书面语言，以及他们对东正教信仰的依附。这就是“希腊启蒙”自我发现得以发生的语言。这种语言也是东正教联盟在18世纪取得第二次变革成就所依赖的媒介，既在

奥斯曼帝国内部扩大了贸易，也在帝国和基督教欧洲之间扩大了贸易。

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期，爱琴海的沿海贸易大幅增长，其中多数贸易的货物是用小船运输的，航行的距离相对较短。对长距离航线的控制，逐渐集中在3个小岛上，分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海岸的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以及爱琴海东部的普萨拉岛。船只是当地建造的，归小商人所有，在运行管理上以家族为基础，实行利益共享，强权保护，风险同担。这个商业模式为奥纳西斯、尼阿科斯以及其他船王的传奇航运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免令人称奇。

到了19世纪初，从3个小岛驶出的船只的吨位为100~200吨，每艘船的船员最多有60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吨位的大部分船只属于奥斯曼帝国。船只所有者在奥斯曼帝国登记注册他们的船只，支付费用，从而获得奥斯曼帝国的保护，悬挂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奥斯曼帝国的文献显示，大部分船主是东正教徒。西方港口城市保存的记录也显示，船长是“希腊人”。^[7]即便在地中海相对和平的年代，海上贸易也很危险，常有海盗出没。按照惯例，商船都配备武器（事实上，表示“装船出海”意思的希腊传统词汇就是指给船配备武器）。根据记录，1805年最大的商船“海德里欧特”号装备了“16门大炮、60条步枪、40支卡宾枪和60把手枪”。^[8]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商人和船员在当下是不是“希腊人”还有待商榷。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上的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阿尔巴尼亚语，但是他们现在在姓氏之后加上了希腊语的后缀。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形成书面文字，因此所有的文献都是用希腊语记载的。当时，希腊语也是他们的宗教所使用的语言。

通过这种方式，3个小岛走上了富裕之路，其中最成功的商

人和船长逐渐掌握了整个地中海的知识。他们还能组织大批的船只和强大的火力。一旦敌对性的革命发生，他们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前20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船只和火力是用于商业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

在这个时期，陆上贸易也有了扩展，这是巴尔干半岛上出现的相对和平的年代所带来的自然结果。长长的驼队从今希腊北部的城市中心出发，翻越巴尔干半岛的山峦，到达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雅西，或沿着海岸去君士坦丁堡。一般来说，这些商人从“种族”上是瓦拉几亚人，在家里说罗马尼亚语，但是与他们在爱琴海上的表兄弟一样，他们在做生意以及记账时，使用希腊语。后来，为了让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子弟扩大生意范围，他们兴建了学校。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依赖的是东正教，因此所使用的语言自然是希腊语。在这种方式下，希腊语教育的基础通过东正教联邦越来越多地延伸到世俗社会。商品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携手并进，都得到了有力的强化。

这些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它们，希腊民族国家就很难建立。尽管这些是必要的基础，而且这些基础上还会有新的建设，但其本身并不能必然引发革命性的变化。

古老土地上的旅行者

人的活动和思想的活动并不都是单向的。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新的机会，这让西方人来到了地中海东部的城市，也就是当时多数人称之为黎凡特的沿海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士麦那、贝鲁特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但有些人在那里扎下了根，

比如来自北欧国家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在这些城市生活了下来，一直到20世纪。这个人员迁徙过程与说希腊语的商人去欧洲贸易中心的过程，大致是并行对称的，只不过来奥斯曼帝国的西方人的数量可能要少很多。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这种并行对称被打破了。

说希腊语的人除了到欧洲做贸易，还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学习。这些人回来后撰写的著作内容全是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很少涉及他们去了哪里以及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但是，往另一个方向的交流则不是这个情况。不断有旅行者离开家乡，探索基督教欧洲边界以外的世界。旅行回来后，他们很多人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极其详细地描述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英国和法国关于希腊以及黎凡特的游记文学构成了各自18世纪文学的亚类，有些作品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游记作者的影响甚至比旅行者还大，那是因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旅行的经历，但是写出了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希腊”的故事。

关于这些游记，最令人奇怪的一点是，这些旅行者在他们游历的国度里几乎没有遇到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的精英。事后看来，这是最令人伤感的事之一。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7世纪末和整个18世纪，这些人到东方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去结识与他们一样的人并进行思想交流。因为交流思想可以在家里进行。他们的目的，正如17世纪的一篇论文题目所写的，是“追寻古典希腊”。

最受人尊敬、最经常被人提及的旅行者之一，是约瑟夫·皮顿·德图内福尔。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委派，他在1700—1702年率领一个小探险队，考察了今希腊、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次考察的记述，以两大卷的形式在1717年发表，第二年被翻译成英语。德图内福尔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本人是植物学家，不是古文物研究者，他的任务是官方委派的，是科学考

察，但即便如此，他在对此次考察的简介里，也包括了“古代与现代地理的比较”的内容。^[9]其他旅行者详细描述了古代纪念碑的建筑样式，记录了古代的石刻并试图验证和辨识古代文献记载的地方。

后来在考古学建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是17世纪70年代来自法国的雅各布·斯庞和来自英国的乔治·维勒爵士以及18世纪50年代的盎格鲁—苏格兰组合詹姆斯·斯图亚特和尼古拉斯·瑞威特。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那些西方的书斋旅行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雅典的古代遗迹上来，使之成为希腊首都受人瞩目的焦点。依据今天的标准，不太被人注意的一点是，那些西方旅行者返回时带着当地的古代艺术瑰宝，而且有时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将整个古代建筑或其被雕刻、被装饰的部分运回来。这里仅举几个最为知名的例子，比如，1817年在大英博物馆展览的精美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本是帕特农神庙里的雕塑；还有巴黎卢浮宫里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等。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古代艺术鉴赏家眼中，这种习惯是理所当然的。

我并不是说，旅行者只关注文物，对他们旅行的地方的居民漠不关心。对现代希腊人倾注了大量精力的，是另一位法国人。皮埃尔·奥古斯丁·古伊斯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在奥斯曼帝国生活了很多年。古伊斯很了解希腊人，因为他每天都和他们打交道——做买卖。他在1771年出版的著作的全名中就透露了这一点，第一卷的名字非常中规中矩——《伤感的希腊之旅》，问世不久就被翻译成英语。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可以直译成“关于古代和现代希腊人的通信及其行为和习惯的比较”。通过书名，读者已经得到了某些提示，也注意到了书名中词汇的顺序——“古代”出现在“现代”的前面。在那些旅行者脑子里，认知顺序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意味着，在很早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记述中，现代希腊人的“特点”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叙述语言中充斥着“下贱的”“被奴役的”等词汇。这些旅行者基本不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不自觉地就忘记那个时候欧洲人的政府远远没有苏丹政府专制，所以在评判旅行中遇到的人的时候，就以自己脑子里已有的古代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形象为依据。一般人所说的“大奥斯曼”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生活的奴隶制度情况，很少能激起旅行者的同情，更多的是引发他们的蔑视。与奴隶制度相关的还有奴性。这种性格被反复言说，指的是有些人心甘情愿地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让旅行者难以理解。旅行者的游记中经常提到“现代希腊人”的性格，还有欺骗和狡诈。希腊的先祖中有史诗英雄人物奥德修斯，有人注意到了他与后人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在旅行者眼里，奥德修斯的英勇难以减弱他的后代的罪恶，后代的罪恶反而更加凸显了他的卓尔不群和出类拔萃。

游记中只有个别地方涉及一些更加正面的、更具积极意义的讲述。约翰·赫尔曼·冯·雷德谢尔是整个18世纪唯一一个游历奥斯曼帝国统治区的知名德国人（他甚至用法语写游记）。雷德谢尔于1767年从意大利出发，去往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他是瑞士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忠实信徒，期待在希腊当地居民身上看到某种卢梭笃信的人类自然存在的原初的纯真。在结识的希腊人身上，雷德谢尔发现了一个妙方，可以医治他为之哀叹的当时欧洲城市生活中存在的腐败。当然，这一观点在当时看来有点儿自以为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显得曲高和寡。后来，小说家亨利·米勒和劳伦斯·达雷尔在20世纪改进了这一观点，使之流行起来。^[10]

在促进北欧精英关于希腊的思想认识方面，有一个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旅行者还要大。他就是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虽然

他从来没有去过希腊，但是其在去世半个世纪后被誉为“现代历史上获得欧洲声誉的第一位德国作家”和“一代德国人的英雄”。

[11]温克尔曼于1717年生于普鲁士，写作最盛的岁月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在罗马获得了历史学家以及古代艺术鉴赏家的名声。他放弃了好几次去希腊的机会。在研究希腊方面，他为德国学术界参与希腊思想研究确定了基调，而且这一基调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温克尔曼根据自己在意大利的研究结果，尝试说服那个时代的艺术领域的人，使其相信古典艺术的真正源泉和真正伟大之处不是来自罗马，而是来自希腊，罗马只不过是希腊的复制。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出版于1764年，他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关于古希腊的理论，使其植根于欧洲精英的思想意识之中，其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古代希腊艺术之所以比其他艺术都具有优越性，是因为它孕育于最完美的氛围之中（如果你从来没去过那儿，那么你只能这样写）。如此说来，古希腊人最看重自由。希腊人是最早实验初期的民主形式的民族，并提出了政治自由的理念。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温克尔曼及其志同道合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断言“希腊一直拥有自由，即便是国王的王座都由自由包围，国王的统治充满父爱”，是公然夸大其词。[12]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政治体制的有些撰述，明显是离奇荒诞的。据他所言，人类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完美状态。艺术的孕育、政治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全部神奇地汇聚在古希腊。这个伟大成就是不可复制的，同时也是现在或未来任何踌躇满志的文明都不可匹敌的参照点。

鉴此，现代欧洲人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文明”，甚至以那个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古伊斯《伤感的希腊之旅》的英文版在1773年出版，其匿名译者增加了一个前

言，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为该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欧洲文明国家急切地抓住每一个了解那个民族信息的机会，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因为它们曾从那个民族那里得到那么多的恩惠。因此，我们应追溯我们的本源，至少，我们应该说，追溯我们行为方式的源泉以及我们知识的来源。

[13]

“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欠下了希腊巨大的文化债务”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希腊历史和希腊集体意识之中，而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获得了新的反响，因为这一时期的希腊陷入了对欧洲国家的巨额债务之中，被债务折腾得焦头烂额。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观念起源于西欧，起源于温克尔曼及其同时期的旅行者的时代。那些旅行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那些行省是“希腊”，因而不辞辛苦，去那里寻求他们自己的根源。的确，正如最近一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18世纪的“欧洲观念”与“希腊观念”是不可分割的。[14]

西欧“对古典希腊的追寻”没有与其对应的项目“希腊启蒙”相遇，当然不能发现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错失的机遇。同样，在东正教的东方，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执着于弄清楚他们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希望到当代“欧洲国家”的示范样板那里寻求一些新思想以及他们高度推崇的新繁荣。[15]这两个方面的追寻都对古代的希腊着迷，都试图在希腊人生活的土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有意义的联系。但是，这期间没有思想的相遇。西方学者越是将古代希腊理想化，就越难在与希腊语言有着更直接关系的那些文人雅士身上找到共同的追寻。即便今天出现了关于“希腊启蒙”的优秀研究成果和关于那个时期西方旅行者以

及理想主义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也没有人会想到探寻这两种成果之间的平行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显得那么不同。

这种理解上的失误，从一开始，甚至在希腊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现代国家以前，就对后来的很多东西投下了阴影。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希腊人和其他西方人出现误解或彼此不信任的情况时（这种误解还经常出现），那种不信任的源头都会追溯到这两条平行的、永远不相交的路径上。

农民、渔夫、僧侣

截至目前，我们讲述的故事主角一直是精英阶层，有的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偏远的边疆地带，有的生活在帝国内陆，有的生活在西欧。但是，还有一些人的后代在大约百年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希腊人”，构成了新的希腊民族国家的人口。这些人是什么情况？除了受过教育并有能力和闲暇反思这个问题的精英阶层外，在18世纪，还有哪些人是希腊人？

希腊独立以后的历史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希腊族群很容易分辨。但是，奥斯曼帝国并不依据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来划分其统治下的臣民，而是通过宗教对其进行分类。在官方术语中，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被称为“鲁密”，这个词的意思与希腊语中的Romioi意思相同，被界定为米利特，指的是宗教社区。但是，所有的东正教徒不可能都是母语为希腊语的人。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书面文字使用的增加，才使希腊语奠定了其在构成鲁密、米利特不同语言群体中的共同语地位，这在某些方面与今天英语国际地位的形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那些把希腊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也不必然是东正教徒。奥斯曼帝国偏远的诸岛中有罗马天主教社区，另外，大城镇中也有罗马犹太人。这3种信仰的教徒还有皈依伊斯兰教的选择，有些人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希腊语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么多数情况是，希腊语以后仍然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克里特岛的这种情况最为明显，在19世纪占据全岛人口大约40%的穆斯林居民中，大多数是克里特人，当地只有希腊的克里特方言，没有其他的语言。说希腊语的人也可能是穆斯林。

不过，在有例外情况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总体上的概括。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多数岛屿、克里特、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依然是摩里亚），以及现在希腊大陆南部的那时被人称作“鲁梅里”的松散区域，居民以希腊语为第一语言。只是，即便在那些地方，发展好的区域里的居民大多说阿尔巴尼亚语。比如，从事贸易的岛屿海德拉和斯派塞斯以及鲁梅里的东南角，既包括古代的（以及现代的）维奥蒂亚、阿提卡，也包括雅典。巴尔干半岛更远的北部地区、环绕马尔马拉海以及沿着安纳托利亚的爱琴海海岸，也有不少说希腊语的人，但是在这些地区，他们散居于说其他语言的居民之中，各种语言的人口比例也更加均衡。甚至远东的黑海沿岸特拉比松附近的地区和卡帕多西亚，也有说希腊语的人居住的飞地，其中特拉比松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古代的蓬托斯地区，卡帕多西亚在希腊语中指的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开塞利周边的地区。

那么，这些说希腊语的人是谁？除了语言（对很多人来说，但不是全部）和宗教，他们还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那些人多数是农民、小商人、渔夫、船员、僧侣以及低级别

的神职管理人员，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地区的条件极为艰苦。可耕作的土地被大海和高山挤压，被分割得很零散。社区一直很分散。在20世纪中叶以前，生存的危险一直存在，当地的经济基本上仅能让居民维持温饱。到了18世纪，年轻的男人才能往外迁徙，到国外找工作，年轻的女人才能嫁到本地社区以外的地方去。后来，需要吃饭的人口超过了赖以生存的资源，于是，另一个解决方案出现了，即在山区里杀人越货，在大海上抢劫掠夺。因此，在鲁梅里、奥斯曼帝国招募当地军人，可以镇压那些土匪和海盗，这些军人多是东正教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军人是从同一个要被镇压的土匪或海盗团伙中招募来的。因此，那些把拿着枪杆子作为唯一职业的人就来回变换身份，不是从军人变成强盗，就是从强盗变成军人，要么是执法者，要么是犯法者。马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迫近19世纪，那里的海盗已经臭名昭著。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即便有相对和平的机会，机会也很稀有。祥和的普通生活常常是短暂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作物歉收和饥谨，从来没有远去。

这些不同的人群分散在幅员辽阔、严重割裂的区域，如果他们不是像后来的有些人那样积极主动地去思考，那么任何将这些人群进行一概而论的尝试，都注定与主观臆断差不多。如果不这样去做，那么我们能从中分析出什么样的证据呢？证据倒是有几个，不过，我们必须小心求证，因为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我们来看欧洲旅行者。我们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记载了大量的趣闻轶事和风俗习惯，记录了人们的观点和迷信，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东西可能就失传了。比如，他们记载了活死人或吸血鬼的例子，这成为希腊曾流行迷信的首要证据，日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类型小说和恐怖电影的根源。

审视这些人生活情形的另一个可能的窗口，也是外来者的视

角，这个视角主要来自现代人类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美国、法国和后来的希腊人类学家便开始研究希腊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所谓传统社区。对希腊社区的经典性研究，是由约翰·坎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被称为“萨拉卡莎努瓦”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孤傲、内敛，在那个时代依然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夏天在平都斯山的高原和草甸上放牧，冬天则赶着羊群来到平坦的海岸边。在外人看来，这种现象反映的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公民生活”，但是坎贝尔却发现，基于荣辱廉耻的共同价值观，在规范和处理没有任何亲缘性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16]

如果你不信任与你没有任何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那么只有当同样的义务或责任把他们和你绑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依靠他们。共同的行为规范能约束人，遵守这样的规则是可敬的，破坏它则是可耻的。因此，那些遵守规则、履行义务的人，是社区中最受尊敬的人；而任何离经叛道的人，则会受到鄙视，甚至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这是一个自我维护机制。一方面，它涉及礼物的给予；另一方面，它又涉及馈赠的接受。在现代的、民主的、负责任的体制中，这种前现代的体系被视为“腐败”。但是在没有现代体制或者现代体制软弱无力、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生存的机制。

现代人类学的这些深刻认识可能会进一步解释早期旅行者以及以后很多不同的外来观察者，在面对人们经常谈论的希腊“不忠诚”时所经历的困惑。尽管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资助人和受助人所实施的腐败体系最重视“信任”的价值，只有所有的人都遵守同样的（不成文的）规则，这样的体系才行得通。反过来，这些相同的规则都可以在传统的、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荣辱廉耻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圈外的人被认为不会受到这种规范

的制约，所以即便圈外的人说要信守承诺，也不会得到信任。因此，在内部约定俗成的逻辑就变成这样：如果你不信任他，那就可以欺骗他。[17]

当然，人类学家注重的总是当下。坎贝尔本人就认为，他观察到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自拜占庭末期以来可能没有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今天的人类学家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则更加小心翼翼。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18世纪说希腊语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一定都是这么运作的。

现在，我们应该到那个时期去寻找证据。在这儿，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尽管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末以前，识文断字的人还是非常少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书面的证据极难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罕见的例子，这段历史是“来自下层”的人写的，写于18世纪初，讲述了奥斯曼人1715年给伯罗奔尼撒带来“灾难和奴役”的故事。这位作者是来自爱奥尼亚的一位曼索斯人，很明显，他目睹了一些事件。此人后来定居在威尼斯的希腊社区，并在威尼斯出版了以押韵对句的形式写就的历史。这位曼索斯人既谴责了战败的威尼斯人，也谴责了取胜的奥斯曼人，因为他的同胞遭受了奥斯曼人的镇压。这本书详尽描述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崩塌后不久普遍出现的悲叹情绪，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Romans”，也就是那些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其中绝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人。

这位曼索斯人把这些“Romans”看作因其他人的行动而变得无助的受害者。他的整个叙述中，只提到一次那些人采取的反抗措施，即在偏远的伯罗奔尼撒中部山区，一些村民象征性地抵抗了一次，参加抗争的人就包括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祖先，他们在100多年后的革命中赢得了荣誉，成为英雄。那些懦弱虔诚的曼索斯人则在这个时候逃到了遥远的威尼斯，寻求避难

之地，同时认为那几位捍卫自己信仰的同胞“都是疯子，他们应该知道不能那么做”。^[18]这种受迫害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中常常会再度抬头，在18世纪早期已经广为流行。

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奥斯曼帝国在1770年爆发了战争，这次战争引发了克里特人的反抗。迫近18世纪末，反抗的故事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被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次反抗的发源地是克里特岛的西南山区斯法基亚，《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之歌》就是在这个地方口头创作的。从表达的内容上看，这首诗歌是在它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整整16年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诗歌的主人公是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他是斯法基亚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最“尊贵的”基督徒之一，被称为“约翰老师”。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有天赋，还能同其他地方说希腊语的人进行交流。俄国军队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消息传来后，他支持抵抗，反对当地教会的逃离建议。所有的抵抗进行得都不顺利，最终成为一场悲剧。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和他的随从被俘，在囚禁期间，他坚贞不屈，直到被甘地亚（伊拉克利翁）帕夏活剥。

这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是以史诗般的生动和史诗般的篇幅讲述的。如果这首诗歌真的是在1786年定稿的，那么这位英雄对他抗争动机的解释就反映了当时的态度。达斯卡罗基阿尼斯宣称了他采取行动进行反抗的理由：

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的家乡，其次是为了我的信仰，
最后是为了其他生活在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

因为如果我是斯法基亚人，如果我是克里特的子孙，
那么看到克里特受难，我心里就极度酸楚。

爱国主义起源于英雄的家乡斯法基亚，并从那儿扩展到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诗歌的讲述中，没有包含更宽意义上的“国家”身份认同意识。尽管诗人在讲述中不厌其烦地铺陈着更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辞藻，但在诗歌结束时得出的结论与曼索斯人并无不同，即教会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斯法基亚人早就在实践中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享受了独立，但是由于达斯卡罗基阿尼斯的莽撞行动，他们又不复独立。[19]

《达斯卡罗基阿尼斯之歌》可以说是我们发现的18世纪以口头形式创作，然后以书面语言记录下来的唯一案例。但是此后不久，从爱奥尼亚群岛到塞浦路斯，从克里特岛到巴尔干山区的脚下，人们开始收集各种各样丰富的叙事和抒情歌曲，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说希腊语的社区都有口头创作传统。这些歌曲揭示了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人往往是英雄，他们要通过挑战和暴力行为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美丽而谦逊的，但是在任何年龄，她们都有可能变得薄情和狡诈。为死去的人感到哀恸的，是女人；为那些被流放到遥远地区（xenitiá）的人感到哀恸的，也是女人。xenitiá这个词在当时用得很多，既可以翻译成“流放”，也可以翻译成“外国”，但总是代表比死亡好不了多少的情况。爱情歌曲总是激情洋溢，迸发出浓郁的、独出心裁的意象，常常有隐含不明的意义。歌曲中离奇的、不合常理的意象从来都没有远遁，比如，鸟和野兽能说话，雷电反映并放大着人类的行为，死去的人在云中策马（吸血鬼再现了）。

一些特点鲜明、传播广泛的主题均与死亡有关。在一个你只能通过公然挑战比你更强大的对手来证明你勇猛刚强的男性世界里，最终的考验就是拥抱死亡本身。死神有一个拟人化的名字——哈得斯，其是古代神话中冥界里斯提克斯河上的一个船夫的

名字。死神冷漠、乖戾，总是穿着黑色的衣服，骑一匹黑色的马。在人们的口中或笔下，他常常被描述为后面跟着一长队无助的妇女和儿童，全然一副奴隶贸易者形象，在18世纪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一个威胁。在这些歌曲中，哈得斯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理想化的男性英雄的反面。男性英雄对生活有着不可抑制的热爱，哈得斯深受刺激，嫉妒之后便是愤怒，于是就找到男性英雄，要求他立刻死去。男性英雄当然拒绝从命，他提出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决斗。双方的决斗在打谷场上展开。在实际生活中，将谷壳和可以食用的谷粒分开，是用猛烈的击打实现的。男性英雄将他的敌人打倒9次，但是哈得斯不能忍受失败。由于不能以承诺的对等条件获胜，哈得斯就以欺骗的方式，抓住英雄的头发，把英雄撂倒在地。^[20]所以，死神取胜了，因为他最后必须赢得胜利，只不过违反了荣辱廉耻的道德规范。死神终归是外来者，他以极端的方式证明外来者永远不可能被信任，因为死神是一个骗子。所以男性英雄作为荣辱廉耻的信奉者，即便死了，也是道德上的胜利者。

我们在很多歌曲中都发现了与此相似的价值观，这些歌曲口耳相传，讲述那些被称为“绿林好汉”（klefts）的山贼的生活故事，还有他们悲壮的死亡。“kleft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kleptis”，字面意思是小偷、贼寇或土匪，那些被招募的军人在18世纪的确就是盗贼。不过，他们集战士和土匪于一身，后来在革命中成为最具战斗力的人，这种新的角色形象给那些“贼寇或土匪”蒙上了一层英雄色彩，而且色彩从未褪色。纪念或歌颂这些人的歌曲开始在革命期间发表、传唱，至今仍然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这些歌曲多数纪念或歌颂生活在18世纪初的人，但是有几首歌曲中的人物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其中最古老的故事可能发

生在1750年前后的鲁梅里。在那个故事中，克里斯托斯·米利奥尼被禁止进入奥斯曼帝国。一个名叫苏莱曼的穆斯林被派去接应他。

（苏莱曼）在阿尔米罗斯与他接上了头，他们像朋友一样拥抱，

他们彻夜同饮，直到晨曦初露；

东方破晓，他们出发去土匪的老巢。

苏莱曼对米利奥尼上尉高喊：

“米利奥尼，苏丹在抓你，伊斯兰贵族要杀你。”

“只要米利奥尼活着，他就不会向奥斯曼土耳其人屈服。”

他们手里拿着火枪，勇往直前；

枪声大作，他们两人都倒下了，献出了生命。[\[21\]](#)

这首歌曲描写的米利奥尼蔑视强权的特定形式是1750年或大约那个时期的真实记录，还是反映后来故事讲述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不管哪种情况，这首歌曲都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传递了奥斯曼统治之下，在鲁梅里山区中谋生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武装分子之间的共同的行为规范。

最后，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之中，还流传着一系列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帝国衰亡与天意及未来复兴联系起来的故事和预言。这类文字材料也是通过后来出版的书籍为我们所知，其中包括所有民歌中最著名的歌曲。有一首歌曲十分简洁，名字叫《圣索菲亚》或《圣索菲亚的最后弥撒》，其只有十几行歌词，讲述的是

奥斯曼人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东正教大教堂举办的礼拜仪式突然被从天上传来的一个声音打断，那是上帝的旨意，让“这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落入异教徒之手。这些虔诚的教徒感受到的震惊投射到了圣像上，不可思议的神迹出现了，所有的圣像都开始哭泣。那个声音也许是来自诗人或歌手的声音，以感人的、和蔼的语调安慰着这些忧心如焚的圣人。比如，有一张圣母像中的圣母就像世间的一位母亲，正在安慰一个哭喊的孩子。这首歌最后对圣母唱道：

嘘，圣母，不要哭喊，不要哭泣，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更迭，这一切还会属于你。

[22]

在19—20世纪初，这些歌词是对未来有积极意义的宣言。但是，在最古老的版本中，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时间不是未来，而是当时，被翻译成“还会”意思的词，也有“依然”或“仍然”的意思，从而在气势上更有力量。《圣索菲亚》这首歌是在1821年革命前不久开始传唱的，其传达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是东正教徒确认不论发生什么，自己的信仰不会因异族的征服而丧失，将自己与每一个教堂里熟悉的圣像之间联系的纽带也不会断开。如果说这些歌词还暗含着一种在未来实现救赎的预言，那么其所喻指的也是东正教，而不是希腊民族国家（后来曾被人如此解读）。

另一个经常被人讲述的故事是关于“大理石皇帝”的，即君士坦丁十一世国王帕里奥洛格斯。他的城市在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陷后，他的尸首一直没有被找到。这个故事说，帕里奥洛格斯没有死，而是被天使带到城内的一个秘密地方，在那儿变成了石头。各种不同的版本都预言说，根据上帝的旨意，总有一天国王

会起死回生，并率领高奏凯歌的大军，把侵略者一路赶回他们的中亚老家去。

其他预言也可以通过书面材料追溯到15世纪末，甚至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如果这些预言建立在本地固有的、流行的传统之上，那么我们也很难讲其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这样的传统。比如，有一系列“神谕”据说源自13世纪的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的名字是阿伽唐格洛，名字的意思是“好天使”。这些神谕在18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流传。但是，这些有模有样的欺骗、伪造，好像是从上到下的有意运作的结果。比如，神谕说，一个来自北方的长着金色头发的或有着金色皮肤的民族将带来救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1768—1774年的战争及以后所杜撰的预言就利用了这些材料。那些救赎者一定是俄国人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所谓“阿伽唐格洛”神谕传播的证据，主要出现在18世纪末，也主要来源于书面材料。所以，我们很难弄清楚早期的这些神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被人们尊奉，以及被人们尊奉到何种程度。

但是，这个故事真正可以告诉我们的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不断传承与积累的传统以及对衰亡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一些集体记忆，有着极度的忠诚。当提及过去的时候，这些人中的精英以及西方的旅行者的热情就会遇到令人困惑的诧异或怀疑。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信仰东正教的人知道，那些被称为“Hellenes”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所信仰的都是假上帝。因此，这些“Hellenes”就是那些18世纪优雅的、知荣辱的、敬畏上帝的“Romioi”的对立面。很多口头的传统讲述，在后来都被文字记录下来，说的是“Hellenes”一定是一个巨人民族，曾经建造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得见的城墙和纪念碑。异教徒的神庙，特别是那些雕塑，一看就知道拥有超自然的、危险的力量，所以，毫无疑问，对国王的向往就变成了对大理石的向

往。

即便在19世纪，当旅行者和古文物研究或收藏者前来寻找古代德尔斐圣迹废墟的时候，当地人也充分利用了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聪明才智，让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说“我的主啊”的那些人不是基督徒，这就是没有人看到他们画十字（东正教的方式）的原因。他们来源于古代的异教徒阿德尔斐人，那些人把他们的宝藏放在阿德尔斐的城堡里，这个城堡得名于建造它的两位王子，他们是兄弟俩。当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基督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周围的所有人都皈依为基督徒，不过阿德尔斐人想，他们自己还是当少数人为好。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这儿，前往弗兰克兰（也就是今天的西欧）了，并带走了全部的财宝。说“我的主啊”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后裔。这些后裔现在来这儿，就是想拜拜那些石头。[\[23\]](#)

这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它不仅凸显了将本土希腊村民与西方古文物考古者分隔开来的认识鸿沟，也凸显了将他们与说着同样语言、信奉同样宗教的“东正教联邦”的精英们分隔开来的认识鸿沟。如果说这就是希腊独立以后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在此前的100年里，东方的基督徒和不断向世俗身份认同靠近的西欧人，在思想认识上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共识？这些最初的共识充其量是局部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充满着误解。不断往东传播的新思想促使东正教联邦的精英开始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认同，而绝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却对此无动于衷。不断扩大的商业活动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很多以前不知道机遇为何物的人带来了机遇。但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是在精英层

面还是在大众文化层面，我们很少能看到任何可称为“革命性情感”的东西。

当18世纪的脚步走到终点，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1] Lucien Frary,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k Identity, 1821–18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27.

[2] Paschalis Kitromilides, *An Orthodox Commonwealth: Symbolic Legacies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Aldershot: Variorum, 2007), ix–xv.

[3] On science: Paschalis Kitromil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2, 365 n. 108, 366 n. 111; Efthymios Nicolaidis, ‘The Greek Enlightenment,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modern science’, in Paschalis Kitromilides (ed.),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in the Orthodox World*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6), 49–62. On anticlericalism see Kitromil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250–59.

[4] Nicolas Mavrocordatos, *Les Loisirs de Philothée* [parallel Greek and French texts], trans. Jacques Bouchard (Athens and Montre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1989).

[5] Daniel Philippidis and Grigorios Konstantas, Γεωγραφία νεωτερίκ., Περ. τη. Ελλ.δo. [Modern Geography: On Greece.], ed. with introduction by Aikaterini Koumarianou (Athens: Ermis, 1970), editor’s introduction (18–19, 28, 30–1) and text (37, 38, 44–51).

[6] Peter Mackridge,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reece, 1766–19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0–83.

[7] Gelina Harlaftis and Sophia Laiou, ‘Ottoman state policy in Mediterranean trade and shipping, C. 1780–1820: The rise of the Greek-owned Ottoman merchant fleet’, in Mark Mazower (ed.), *Networks of Power in Modern Greece: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Campbell* (London: Hurst, 2008), 1–44 (see 9–15). The authors do not indicate whether the characterization ‘Greek’ is their own (presumably inferred from recognizably Greek names) or already to be

found in their sources.

[8] Harlaftis and Laiou, 'Ottoman state policy', 17.

[9] David Constantine,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Gods: Travellers to Greece and the Quest for the Hellenic Ideal* (London: I. B. Tauris, 2011), 52.

[10] Johann Hermann von Riedesel, *Remarques d'un voyageur moderne au Levant* (Amsterdam, 1773); Henry Miller, *The Colossus of Maroussi* (San Francisco, CA: Colt, 1941); Lawrence Durrell, *Prospero's Cel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5).

[11] Matthew Bell, 'The Greek body beautiful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Romanticism', in Ian Jenkins (ed.), *Defining Beauty: The Body in Ancient Greek Art*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15), 40–49 (42–3 quoted).

[12] J.J. Winckelmann, *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 trans. H. F. Mallgrave (Los Angeles, CA: Getty,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1764), 187.

[13] P.A. Guys,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Greece* (Dublin: Milliken, 1773;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1771), vol. 1, iv; Nasia Giakovaki, *Ευρωπαϊκός Ελληνισμός. Μια χαμπ. στην ευρωπαϊκή αυτοσυνείδηση, 17ο. –18ο. αιώνα*. [Europe via Greece: A Turning Point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 17th–18th Centuries] (Athens: Estia, 2006), 26–7, 448.

[14] Giakovaki, *Ευρωπαϊκή [Europe]*, and (quite independently) Paul Stock, *The Shelley–Byron Circle and the Idea of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9–11, 175–97.

[15] Iosipos Moisiodax, *Θεωρητικά της γεωγραφίας*. [Theory of Geography] (Vienna, 1781), x; Stratos Myrogiannis, *The Emergence of a Greek Identity (1700–1821)*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2), 92.

[16] John Campbell, *Honour, Family, and Patronage: A Study of Institutions and Moral Values in a Greek Mountain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first published 1964), v (quoted), 318–19, 353–6.

[17] I am indebted to the anthropologist Maria Couroucli for this insight.

[18] E. Legrand, *Bibliothèque grecque vulgaire* (Paris: Maisonneuve, 1881), vol. 3, 312, based on the earliest extant text, published in 1784.

[19] V. Laourdas (ed.), *Μπαμπά-Παντζελιό.. Το τραγούδι του*

Δασκαλογι.ννη [Barba-Pantzelios: The Song of Daskalogiannis.] (Heraklion, Crete: Marmel, 1947), lines 8–9, 12, 754–8 (quoted), 989–94.

[20] Anton Jeannaraki (ed.), .σματα κραγιητιχ. [Cretan Songs] (Leipzig: Brockhaus, 1876), 142; reprinted in Giorgos Ioannou (ed.), Τα δημοτιχ. μα. τραγαγο.δια [Our Folk Songs.] (Athens: Tachydromos, 1966), 30. Variants on the theme can be found in almost every anthology of Greek folk songs.

[21] Alexis Politis (ed.), Το δημοτιχ. τραγαγο.δι. κλ.φτιχα [Folk Songs: Kleftic] (Athens: Ermis, 1973), 2–3.

[22] Claude Fauriel, Chants populaires de la Grèce moderne, 2 vols (Paris: Dondey-Dupré, 1824–5), vol. 2, 340.

[23] I. Th. Kakridis, Οι απαρχα.οι Ελληνη. στη νεοελληνιχ. λα.χ. παραγ.δοση [The Ancient Greeks in the Modern Greek Popular Tradition.] (Athens: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Bank [MIET],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1966), 39.

第二章

种下一粒种子

(1797—1821)

1797年6月28日，一支由战舰和兵船组成的法国海军中队驶抵防御坚固的科孚港。科孚港是爱奥尼亚群岛的行政都城。此前600年，爱奥尼亚群岛一直是“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领地。但是，自从法国军队6月登陆那天起，爱奥尼亚群岛上的每一个居民获得的第一个信息都是，“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不复存在了。当然，法国将军传达这个信息的口吻还是友好的。数百年来，威尼斯在爱奥尼亚群岛的统治者，一直享有“总督”的尊号。法军指挥官却称呼爱奥尼亚群岛的最后一任总督为“公民”，并命令他为刚刚抵达的法国军队准备兵营。这位将军在信中解释道，威尼斯参议院已经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强大火力下投降，因此法国现在成为这个群岛的合法统治者。信的日期使用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日历，写的是共和国5年6月6日。法国军队上岸以后，科孚城到处都是用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写的宣传标语，宣称要为“长期受到奴役的希腊”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使得整个西欧陷入混乱之中，现在东欧也面临这一局势。

两天后，法国人在科孚城的主广场上栽下了一棵“自由之树”。在向“最高主宰”（在法国大革命万神殿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感恩的仪式上，贵族的种种标志被当众烧毁。对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有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是此后不久加入这个海军中队的，他在报告中指出，对于他和他的同胞的到来，当地人总体上是满意的，但又补充道，“贵族，即那些前政府的官员及僧侣并不满意”。^[1]就这样，爱奥尼亚群岛上传统的官僚制度突然之间被颠覆了。到了1797年秋天，法国已经在群岛的7个岛屿上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统治。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法国人要留下来。他们甚至以3个新设立的省为基础，创建了新的行政机构，把爱奥尼亚群岛纳入法国的版图。

过了几个月，1797年12月20日那天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全然不同的事件。的里雅斯特是亚得里亚海上的一個海港城市，属于奥地利。当地的总督布里几多男爵给在维也纳的上司冯·波根伯爵写了报告，说自己发现了一场阴谋。的里雅斯特城的一个希腊商人的举报让不少人被逮捕，当局发现了涉罪的证据。那些被捕的人一直密谋要在邻近的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法国式的革命。这伙人的头目并不是商人，而是瓦拉几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说希腊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审讯发现，这些密谋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待在维也纳，并印刷革命册子。那些册子最近才在他们的物品中被发现。据说，这个头目是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

1797年12月19—20日，当局有关人员从维莱斯汀利斯的物品里搜出了一些文件，它们是一整套按照法国模式将奥斯曼帝国演变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文件中甚至还有激情澎湃的、富有韵律的“战斗檄文”或“战歌”，其中包括对新建立的想象中的共和国的效忠誓词。

奥地利帝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任何引发法国式大革命的苗头。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根据《坎波·福尔米奥条约》，法国和奥地利瓜分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土地，该条约同时逼迫奥地利将位于北欧的国土割让给法国，并承认拿破仑对意大利的征服。在此以前，奥地利人一直以为，法国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维也纳。到了年底，两国只是恢复了外交关系，且这一关系还很脆弱。如今，奥地利的土地上竟然发生了革命性活动，即便活动矛头指向另一个国家，也足以让奥地利当局感到恐惧。因此，奥地利当局的反应是迅速的、极端的：对维莱斯汀利斯阴谋叛乱的事秘而不宣，同时把涉嫌人员秘密押解到维也纳，对这些人进行了一系列审讯，但是179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没有公开

审判的内容。最终，包括维莱斯汀利斯在内的所有8名涉嫌颠覆奥斯曼帝国的人员，从多瑙河上被运送到奥斯曼帝国，戴着镣铐被从奥地利人手里转押到奥斯曼人手里。6月24日夜里或者大致那个时间，这些犯罪嫌疑人在贝尔格莱德的监狱里被执行死刑，他们的尸体被扔到多瑙河里。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个故事在当时对公众意识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对于维莱斯汀利斯及其同伙的审判，不论一开始在的里雅斯特，还是后来在维也纳，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审判的副本才为人所知。媒体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只有几家奥地利和德国媒体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从多瑙河上被引渡到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过程刊发了一些报道。的确，奥地利当局在销毁这个阴谋的所有蛛丝马迹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致维莱斯汀利斯在维也纳印制的3000份革命宣言册全部消失。只有“战歌”很快在公众中传唱开来，尽管是在其作者就义几个月以后才传到法国控制的科孚城，但这已经足够了。

从另一方面看，奥地利审讯者做得并不那么成功。虽然他们存档的文件足以证明维莱斯汀利斯有革命行动，但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维莱斯汀利斯如何实施他的革命行动，也不了解他抵达的里雅斯特并发现他和他的同志们被出卖后，是否有针对性的策略。根据第一项记述，维莱斯汀利斯的下一站是威尼斯，并在那里亲自与拿破仑举行会谈。根据第二项记述，维莱斯汀利斯和他的同伴要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去那里领导凶残的、半独立的马尼军阀的叛乱，马尼军阀建造的坚固塔楼至今仍然是荒野山区风景的一部分。根据第三项记述，维莱斯汀利斯一行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希腊大陆西岸的普雷韦扎城，那个小城是爱奥尼亚群岛的属地，所以也在法国的控制之下。第一个计划无疑是浪费时间，因为拿破仑那时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当然，维莱斯汀利斯未必知

晓。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三个计划，这也是奥地利人所相信的。但在没有法国军事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仅靠几名政治理想主义者就能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权威，让人很难理解。法国利用爱奥尼亚群岛在希腊大陆上获得了几个立足点，普雷韦扎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说法可能不无道理，但是维莱斯汀利斯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针对性的策略。现有的证据表明，在投身革命的人群中，维莱斯汀利斯并不是最注重实际的。

不管是否是精英阶层，绝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可能疏于关注。但是几年以后，拿破仑在欧洲征伐荡起的涟漪蔓延到了整个东方。维莱斯汀利斯的名字在希腊已家喻户晓，他成为一个还未曾被掀起的运动的“殉道先驱”，但是这个运动不久就风起云涌，甚至会让维莱斯汀利斯本人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新兴的自决运动，而且很快演变成“民族”运动。

动荡不安的世界

在179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欧洲没有人能说得清拿破仑下一步的棋会怎么走。奥地利暂时摆脱了困境，但是直到1805年才迎来真正的转机。拿破仑有可能入侵英国，不过，维莱斯汀利斯和他的朋友希望有另一种可能，法国军队既然能够占领爱奥尼亚群岛，那么从逻辑上推断，也能够占领奥斯曼帝国，这样想的不止他们几个人。况且也有证据证明，拿破仑1797年在意大利停留的时候，也开玩笑地提出过这个想法。最后，法国革命的军队的确是往东开进，进攻奥斯曼帝国，但不是进攻其在欧洲的行省。1798年7月1日，法国远征军登陆亚历山大里亚港，开启了拿破仑对埃及为期3年的占领。

几百年来，埃及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不过，拿破仑入侵的时候，埃及马木鲁克的统治者基本上是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但是，欧洲入侵的震惊消息还是一路报回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到了8月，霍雷肖·纳尔逊统领下的英国皇家海军在阿布吉尔湾的战斗中（尼罗河战役）击溃法国舰队，切断了拿破仑占领军的补给线。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奥斯曼帝国首都进行的外交斡旋，竟然建立了最不可能形成的联盟：有着百年宿怨的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走到了一起，两个帝国现在都加入了英国的联盟。

此后15年的动荡局势给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带来了影响。我们以爱奥尼亚群岛的命运为例。爱奥尼亚群岛的7个岛被纳入法国版图仅一年后，就被俄国和奥斯曼海军联军在1798年岁尾夺走了。时针走到1800年，新的统治者在岛屿统治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就在俄国的名义保护下，建立了塞普丁修拉共和国，也就是七岛共和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让说希腊语的人管理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且有着“共和国”这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只是，这个试验并不太成功。共和国延续期间，英国军队曾经在1801年短期驻扎，维持科孚港的社会秩序。到了1802年，俄国人又回来了，掌握着对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当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俄国人的控制是通过一位全权代表实现的，这位代表是爱奥尼亚群岛的一个贵族成员，属于那个时候已经将实力和影响远远延伸到俄国领土的东正教联邦。1807年，亚历山大沙皇与拿破仑握手言和，俄国将爱奥尼亚群岛奉还法国，当然，严格地说，这个群岛不是俄国的，俄国是无权奉还法国的。其后的两年里，爱奥尼亚群岛被并入已经更名的法兰西帝国。但是，到了1809年秋天，除了科孚港，所有的地盘都被英国皇家海军夺走了。最后，根据1814年签署的《巴黎条约》，科孚港也被英国拿走了。此后50

年，爱奥尼亚群岛都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你糊涂了吗？那么那个时候说希腊语的人一定更糊涂。爱奥尼亚群岛和奥斯曼帝国没有报纸，消息传播得慢，也常常不可信。这些权力更迭没有一次是决定性的，而且每一次很快就会被下一次更迭取代。在这样的权力博弈中，多数大国至少进行过一次甲方、乙方的身份转换。如果你生活在爱奥尼亚群岛的任何一个岛上，并亲身经历了这些动荡不安和起起伏伏，或者很久以后听说了这一切，那么你一定会认为，所有看起来确定无疑的政治事件都随风飘逝了。

在位于多瑙河北部、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公国里，情况甚至更糟糕。这个地区是几个边疆地带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公国里说希腊语的精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相比，这个边疆地带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几乎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个冲突是1806—1812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公国境内并由公国权力引发的，其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城市围困以及坚固城池的溃败事件。在长达6年的战争时间里，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成为俄国的附属国，传统的君王统治体制被废除。尽管如此，两个公国原有的行政机构大部分都像以前那样，继续在同一帮说希腊语的东正教精英手里运行。直到1812年沙皇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场残酷血腥的、始终没有定论的战争才停了下来。随着拿破仑对俄国采取决定命运的入侵行动迫近，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12年5月28日签署了《布加勒斯特条约》，从而建立了和平。俄国将摩尔多瓦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除此以外，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恢复了18世纪时的友好关系。说希腊语的君王再度回到满目疮痍的公国，与以前一样，依然采用苏丹的管理体

制。

拿破仑在1812年发起的对俄国的战争，标志着法兰西帝国覆亡的开始。法兰西帝国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投射出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孕育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某种理想主义。到了1814年夏天，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当然除了拿破仑戏剧性地从囚禁他的厄尔巴岛逃脱，并最终在1815年6月18日以滑铁卢战役结束了“百日王朝”。此前一年，获胜一方各自的代表聚首维也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在欧洲重建高度保守的政权工作。维也纳会议以后，所有革命性话语和改革措施都被从欧洲大陆中清除了。欧洲协调机制在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有了新的口号，那就是“恢复”。但是，曾经激发1789年革命的那种精神，以及对拿破仑·波拿巴所向无敌的完美战术的怀恋，在欧洲的很多地方依然清晰可见。1815年以后的“恢复”岁月充满了诡计和秘密团体，充满了阴谋和流产的革命。这就是孕育1821年希腊革命的那粒种子的气候。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来自外部的、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及其边疆地带说希腊语的人身上的变革与动荡，只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在几个不同地区生活的东正教徒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西方的历史一度认为，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处于衰退的末期，其实力在一次又一次与日益强大起来的俄国的交战中，被严重地削弱。从奥斯曼帝国内部看，高度中央集权的苏丹政权，在区域性、本土化等不同层级势力兴起的情势下，受到极大的侵蚀。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帝国当然很快就会崩溃，这也是官方的说法。的确，在18—19世纪，很多观察家都相信现实会这样发展，其中包括拿破仑——如果他不那样认为，就不

会入侵埃及了。就这样，“东方问题”应运而生，并在19世纪主导了欧洲对欧洲东南边界的外交和战略态度，也是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背景的一部分。但是，“东方问题”除了是一个概念外，还有其他的内涵吗？

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的迅速灭亡提前了100多年，因为拿破仑在埃及失败了。此后在经历了1914—1918年的一战和安纳托利亚世俗国家主义运动的兴起后，奥斯曼帝国才走向覆亡，这时已是1923年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就已身处复杂的内部变革中了。但是，就像今天发生的变革一样，那并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衰退。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以及19世纪的前20年，奥斯曼帝国的确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内部威胁，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除了希腊独立这一问题外，它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他威胁。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希腊的成就显得更加了不起。

这些威胁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正如传统希腊词语所描绘的，在很多地区的最底层，越来越多的武装土匪“啸聚山林”。社会权力逐步集中于拥有土地和相对富裕阶层的人手中，尽管权力规模持续扩大，但是依然发生在相对基层的水平。根据法律框架，所有的资产都只属于苏丹。不过，在18世纪，包税制在帝国的行省中已经变得很普遍。帝国的官员会将征税和交税的职责分包给当地的贵族，这些贵族就像英国传统的主教。如此一来，这些“主教”就不遗余力地雁过拔毛，征收的税多，上缴的税少，从而通过吃差额过着优渥富足的生活。

在一些地区，比如穆斯林人口稀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这一特权的富裕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东正教徒。在警察等中央权力缺失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当地的秩序，基督教主教就像穆斯林统治者一样，依赖招募的地方力量。在19世纪初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土匪成灾，以致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在

1806年联手将土匪彻底剿灭。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土匪被消灭，还有一些逃窜至爱奥尼亚群岛。直到希腊革命爆发以前，这些土匪都没有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过，由于这些土匪加入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占领爱奥尼亚群岛的外国军队，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斗力更强了。

当地的土地拥有者和包税人充分利用当时中央权力的弱化，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只是当那些基督教“主教”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时，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阿里帕夏就代表非常知名的案例。他也被称为阿里·特皮德兰利，因为他的家乡是阿尔巴尼亚的特皮兰奈，有“约阿尼纳之狮”的绰号。阿里帕夏出生于一个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家庭，当时，他们全家刚皈依伊斯兰教不久。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阿里帕夏都将狡黠的外交手段和冷酷的镇压结合起来，成为一块狭长地带上的卓有成效的统治者。这片领土包括今阿尔巴尼亚南半部和希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名义上，他的很多权力都是苏丹授予的，但是，“约阿尼纳帕夏”这个官衔与他以前获得的其他官衔一样，是事后补授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简直是在抢夺地盘，苏丹尽管极不情愿，但也只能默许。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阿里帕夏已经牢牢地掌握自己王国的权力，开始发动战争，甚至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本不向苏丹汇报。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军阀。在多瑙河南边的维丁，奥斯曼·帕斯凡诺格鲁成为公开反抗苏丹政权的第一位军阀。他在1795年发动暴乱。一份材料显示，苏丹派遣的20万官兵用了3年时间，才勉强将暴乱镇压下去。不过苏丹接着就赦免了帕斯凡诺格鲁。1807年，这位军阀死在了自己的床上。[\[2\]](#)过了20年，70多岁的阿里帕夏提出要完全独立。这一

次暴乱的结果与上一次不同。1822年，阿里帕夏的头颅被割下来，放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外面示众，头颅上还留着他著名的长长的白胡子。这个事件发生在希腊革命爆发的一年后，奥斯曼帝国在这个事件中再次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中央权力。

奥斯曼·帕斯凡诺格鲁、阿里帕夏等军阀造成的内部威胁，与宗教信仰无关，也与我今天说的种族忠诚无关。这两位军阀都是穆斯林，都是向临近的基督教徒开战，但是他们还在自己的幕府里欣赏和重用东正教精英中的成员。世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里格斯救了帕斯凡诺格鲁的命，帕斯凡诺格鲁曾经在里格斯被处死的前夜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游行，希望将里格斯救出来，从而报答里格斯的救命之恩。这个故事也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里格斯的“战歌”将帕斯凡诺格鲁凸显出来，将之视为英勇的自由战士，使其成为希腊人学习仿效的楷模。

在爱奥尼亚群岛，阿里帕夏踌躇满志，把自己的宫廷打造成“启蒙君王”的宫廷，从整个东正教联邦中吸引饱学专家和艺术人才。老师、教育家阿萨纳西奥斯·普萨利达斯以及诗人、翻译家扬尼斯·维勒拉斯都受雇于他的宫廷。年轻的扬尼斯·科莱特斯是一名私人医生，他受委托照顾阿里帕夏的一个儿子，后来在希腊独立后的20年里成长为最有成就的政治领导人之一。阿里帕夏宫廷重视知识和规范，所有官方往来函件都是用希腊语记录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阿里帕夏与其说是个启蒙者，更不如说是个专制者。与所有从主教转变而来的军阀一样（不论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阿里帕夏除了扩大和强化自我权势，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当阿里帕夏最后以孤注一掷的行为反抗他的主人苏丹时，他就像早前的帕斯凡诺格鲁一样，除了代表他自己的个人野心外，什么都不能代表。这至少是他们两人失败的部分原因。

苏丹政权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帝国内部的军事制度。几百年来，禁卫军一直都是一支精英突击部队，担负着保卫苏丹的重任，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战争中，一直都是急先锋。那个时候，禁卫军士兵是从基督教徒中招募的。年幼的男孩子被迫离开家庭，皈依伊斯兰教，在军营里长大成人，过着简朴苦行的生活。禁卫军士兵不能结婚，所以除了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不知道该忠于谁。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到18世纪末，禁卫军士兵已经成为自私自利的落伍于时代的人，成为毫无节制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征兵的特权阶层人员。维持这支部队的成本不断提高，相应的军事效率却在下降。曾有几年，苏丹塞利姆三世想对禁卫军进行改革，但是在帝国中，军队被军人完全掌控，所以对于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禁卫军强烈抵制。实际上，禁卫军的权力已经非常强大，为所欲为，甚至成为在首都爆发的一次叛乱背后的支持力量，从而导致1808年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两位在位的苏丹被谋杀，他们分别是推动改革的塞利姆三世和他的继任者穆斯塔法四世。正是在这种国将不国、大厦将倾之时，苏丹马哈穆德二世上任，并挽狂澜于未倒，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塞利姆统治时期，禁卫军对于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以为然，认为权力唾手可得。在帝国一个偏远的角落，禁卫军的放肆、傲慢引发了一场地方冲突，这成为后来所发生事件的先声。1804年，塞尔维亚发生农民起义，这个事件常常被视为第一个“全国性”叛乱，导致后来的现代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建立。但是，这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读罢了。事实上，贝尔格莱德省发生了极其凶残、惨烈的杀戮，这是由禁卫军发动的，旨在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从而替代苏丹派往贝尔格莱德省的执政代表。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东正教徒不自觉地加入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力量中，抗击苏丹内部的敌人。1804年的叛乱终于被平定，用时长

达9年，而且由于俄国人的介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1815年发生了第二次叛乱，首次成功地争取到由一位东正教徒军阀主管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这位军阀是米洛斯·奥布莱诺维克。苏丹马哈穆德全神贯注于应对政权面临的更大的威胁，也满足于接受这种安排，以为此举可换取新军阀的忠心。与在遥远南方的伊斯兰教徒阿里帕夏相比，米洛斯·奥布莱诺维克根本不是什么威胁。不过，这毕竟破了先例。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旷日持久的斗争逐渐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历史上掀起了后来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国家自决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就这样，这个反帝国的、要求权力下放的力量（禁卫军），引发并推动了一系列事件，即便禁卫军不存在了，这样的事件也层出不穷。苏丹马哈穆德在1826年完全取消了禁卫军，那时的希腊革命风头正炽，消灭禁卫军是这个无情帝国取得的最为显赫的成就之一。

在19世纪的前20年，尽管欧洲有时疯传着一些可怕的预言，但是奥斯曼帝国经历的内部沉浮与改革的步子还是很缓慢的。这些起伏和变革将走向哪里？谁也说不清。在所有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在精英阶层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会在应对共同的生存威胁方面携起手来。忠诚是变动不居的，会随着不可预知的权力从一个中心或机构向另一个中心或机构转变。从某种角度看，它只不过是1789—1815年观察欧洲其他地方的一面镜子。

在所有这些动荡和混乱之中，国家自决、公民权利以及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开始传播。在接受希腊语教育的东正教徒构成精英的边疆地带，这些思想传播得最为迅猛。尽管在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有这些思想。

革命思想

第一位公开自己思想的人是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也就是命中注定要在1797年被逮捕的那位阴谋家。对于维莱斯汀利斯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出生于1757年或1758年，家境殷实，家乡是色萨利的维利斯提诺村，距离今沃洛斯不远。他的父母为他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条件，使他拥有了进入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精英阶层的通行证。他受洗的名字是基里西斯之子安东尼奥斯。成年以后，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选择“里加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希腊语里常见的名字，而是一个很寻常的词，意思是“国王”，而且大多用在寓言故事以及扑克牌游戏里，从来不只指称真正的国王。在维莱斯汀利斯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里，没有一个人有专属于自己的姓氏。所以，与很多人一样，他以自己的出生地作为姓。令人糊涂的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维莱斯汀利斯，意思是“来自维利斯提诺的人”；一个是“费莱奥斯”，意思是来自费莱伊的人，费莱伊是当地的一个古代地名。根据留存下来的肖像，维莱斯汀利斯脸色红润，长着卷曲的黑头发和同样卷曲的胡子，脖子粗短，大腹便便，乌黑的眼睛里泛着淡淡的哀愁。

据我们所知，维莱斯汀利斯的事业奋斗之路与东正教联邦中多数人的路子是相似的，从农村到首都，从首都到多瑙河地区公国都城之一的所在地布加勒斯特，最后加入说希腊语的宫廷。在布加勒斯特期间，维莱斯汀利斯可能去了几次维也纳。他的多数作品坚守着“希腊启蒙”的精神和实践，主要包括翻译作品和改编作品。

没有什么选择比维莱斯汀利斯最后的选择更加激进，他在1793年翻译了《法国革命宪法》。那个时候，对那些被维莱斯

汀利斯作品感动的同时代人来说，令他们震惊、兴奋以及感到新奇的是，维莱斯汀利斯竟然把西方的思想引进到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人群中。另一方面，对后来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来说，维莱斯汀利斯翻译西方作品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翻译成什么，而在于他为原著增加了什么。

我们从书的名字就可看到译者增加内容的印记。原著的书名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词——《宪法》，在希腊语里变成了《欧洲土耳其、小亚细亚以及地中海诸岛和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居民的新文官政府》（以下简称《新文官政府》）。[3]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不是建设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家乡，而是建设一个涵盖奥斯曼帝国所有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全部的“希腊共和国”（包括今希腊、土耳其以及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维莱斯汀利斯最令人惊讶的成就是，他将巴黎“恐怖”时期经过血与火锻造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彻底改造，并引入奥斯曼帝国多文化、多信仰的现实之中。

维莱斯汀利斯的愿景是包罗一切的，而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这不免令人称奇。《宪法》的第7条提出了宪法原则：

享有主权的人民包括这个帝国的所有居民，不以宗教区分，也不以语言区分，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

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享有主权的人”被命名为“希腊人”以及“希腊人的后裔”（古代希腊人的后裔）。[4]很明显，这些人口不是按照统一的基因遗传来定义的，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的语言群体以及宗教社区都自愿认可的共

和国原则。

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常常被描述为乌托邦，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是乌托邦，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并不必然是乌托邦。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一种尝试，试图进一步强化利用某些以东正教联邦形式真实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希腊语作为教育通用语言的地位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彻底建立起来了。尽管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完全是世俗的（他甚至将法国原著中的“至高存在”参考资料都去掉了）[5]，但为其整个理论大业默默提供支持的是东正教的等级制度以及接受希腊教育的法纳尔群体。正是由于它们的现存的作用以及影响，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才得到传播。

《宪法》的第4条是更加包容的。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如果他的服务对国家有用，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莱斯汀利斯首次在希腊语里使用了“民族”这个词。居住地、宗教或语言，也可以作为成为希腊人的证据：“如果一个人说现代或古代希腊语，帮助过希腊，那么即便他生活在安特波地斯，也可以被看作希腊人，或公民（因为希腊酵母粉已经传播到南北半球）。”宗教包容是根本的。平等也是这样的。所以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比法国原著走得更远，把平等的权利从男人延伸到女人。他甚至想让女人到军队服役，“她们在不会用步枪的时候，可以拿一根长矛”。[6]

这一切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某些方面来看，维莱斯汀利斯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直到2016年，英国和美国军队中的所有作战职位才对女人开放）。20世纪末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往往被人们怀旧地归功于奥斯曼帝国。维莱斯汀利斯在他的《新文官政府》中就使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设计一条现代化道路，一旦这一

想法实现，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就可能早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变成多元的、民主的、法制的城市。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希腊的”，英国诗人雪莱在其后不久就说，整个欧洲也是“希腊的”，因为两者都是古代希腊文化遗产的继承者。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党人曾在一段时期内，努力以古典雅典和罗马为示范样板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和体制，大西洋另一边的各种各样的欧洲移民也在寻找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身份，如此说来，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发生的类似事情，并不必然就是不切实际的。

1793年的法国宪法是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还不到两年，它就被另一个不激进的宪法替代。即便在法国，那些维莱斯汀利斯试图将条款规定植入差异很大的奥斯曼帝国的想法，也早就证明行不通。维莱斯汀利斯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在他的书中，有些后来的条款是他自己起草的。这种完全来自国外的思想在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神权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大的机会？新的机制应该怎样引进到已经存在的机制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确实有一些乌托邦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一点儿实际的计划，比如可能会出现的新的状态等。即便他提到了一点儿实际的计划，计划看起来不是诡辩骗人，就是夸夸其谈。在他增加的关于军事起义组织的一段中，他只是告诉我们，每十人要有一个十人长，每百人要有一个百人长，以此类推。士兵的衣服要用共和国的3种颜色，其中衬衣是黑色的，外衣是白色的，靴子是红色的。真是红色的靴子吗？这样选择颜色，不算是维莱斯汀利斯的错，因为这也是为了凸显共和国三色旗帜的特色。纳粹的标记“卐”也采用了这3种颜色。维莱斯汀利斯写道：“每个士兵都要戴头盔，每个公民都要戴帽子，上面都要装饰着共和国的符号。”这个符号是赫拉克勒斯的手杖，手杖上装饰着3个小十字架。[\[7\]](#)

很明显，维莱斯汀利斯在法国原著以外增加了很多东西，其目的是劝说，而在1793年的巴黎，这是不需要的，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而且死刑采用的执行方式是上断头台。维莱斯汀利斯为译文增写了辞藻华丽的前言，详述了奥斯曼帝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和罪恶。更加感动人和更加振奋人心的是《新文官政府》最后的“战歌”，这完全是原创的，其目的是发出激昂的号角，呼吁人们进行革命。而这种鼓动人心的语言，是法语官方文本所没有的，也是其不需要的。^[8]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完全新创的东西，那就是欧洲东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当代地图被印在了十二张大纸上，上面标注着古代的地名以及历史事件的图像。维莱斯汀利斯这样做，是为了让在前一个世纪就逐渐兴起的新历史地理灵动起来，并为政治大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这些形象化的做法的效果一点儿不亚于鼓舞人心的“战歌”，具有特别强的说服力，影响的大众比那些仅阅读和理解正文的人可能还要多。

维莱斯汀利斯为想象中的“希腊共和国”写的宪法将继续是一纸空文，他的革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是胎死腹中的婴儿。但是，他借鉴法国革命而提出的希腊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从1798年夏天维莱斯汀利斯被执行死刑的那刻起，这一思想就再度被人强调，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阐述。

1798年，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已经年近五旬，住在巴黎。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事业还没有开始。科拉伊斯知道维莱斯汀利斯及其同伙被逮捕和被引渡，但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他对维莱斯汀利斯命运多舛的《新文官政府》的了解也不会很多。但是，他所知道的就足以让他致敬“那些为了自由而献身的英雄”。^[9]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科拉伊斯放着一本希腊语小册子，其是东正教最高权力机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会牧首管区新设

立的印刷所出版发行的。这本小册子提醒那些心怀虔诚的信徒，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从而统治他们，为信仰东正教的教徒带来最终的好处，确保“上帝选民的得救”。这些说辞无甚新意，一直是15世纪以来教会的官方立场。有新意的是下面的话：心怀虔诚的教徒要警惕魔鬼最近编造的阴谋诡计，那就是在现世和来世诅咒信徒。这句话指的是“广为宣传的政治自由”。[\[10\]](#)这个小册子的名字是《慈父指南》，它不是东正教对来自法国的新的、危险的、世俗思想的第一次反应，却是最强烈的反应。从时间上看，它可能是对维莱斯汀利斯失败这一消息的反应。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曾经是身穿绫罗绸缎的商人，是训练有素的医生，是自我教育的古典学者，是在他寄居的城市里密切关注法国大革命每一步进程的看客。这时，他拿起自己的笔，开始反击教会。他选择的是匿名撰文，为了嘲弄他痛击的小册子，他给自己的批驳文章起名为《博爱指南》。作为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的第三个要素的“博爱”，已经来到了说希腊语的世界。科拉伊斯的信仰坚定虔诚，他熟读经典教义，博学多才。但是，他还积极宣传从荷兰新教徒那里学来的教义。对于顺从上帝，科拉伊斯给予了怒斥：

顺从上帝不是指别的，而是指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指人民全体一致的、共同的意见，所以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因此，他得出结论——不应该顺从奥斯曼统治者，“那些被暴君统治的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采用一切方式，摆脱暴君施加的枷锁，重新享有自治政府的宝贵礼物”。[\[11\]](#)

由此，科拉伊斯开启了长达35年的奋斗历程，他是希腊独立大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设计师，也常常因此被颂扬为“希腊国家之父”。

如此说来，科拉伊斯似乎很自然地成为维莱斯汀利斯思想衣钵的传承人，继续推动维莱斯汀利斯已经开创的事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科拉伊斯生于1748年，比维莱斯汀利斯年长10岁。这两人无论是知识修养，还是背景、外貌以及性格，都截然不同。科拉伊斯出生在城市，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士麦那长大，而维莱斯汀利斯出生在地方的行省。维莱斯汀利斯是在帝国之内接受的教育，而科拉伊斯是在欧洲接受的教育。从肖像上看，维莱斯汀利斯一定非常享受生活，科拉伊斯则显得律己甚严，上衣领子高高竖起，完全是西方打扮。他看起来胸膛凹陷，两肩瘦削（他可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他的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表情凝重，仿佛对古典罗马肖像有意见似的。维莱斯汀利斯可能梦想过亲自将自己的思想变为现实，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面。科拉伊斯的一生则献给了书籍，不是读书，就是写书。当然，他还做了些其他事情，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经营父亲的产业，在蒙彼利埃当医生等。不过，据他自己所言，他做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12]对科拉伊斯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积极地参加政治事务。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就在巴黎定居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巴黎。的确，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再次踏入今希腊的任何一块土地，他一生都是一个思想者。

维莱斯汀利斯超越时代，积极为想象中的共和国制定法律；科拉伊斯却从来没有为独立后的希腊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在很久以后，受1821年希腊革命的驱使，他才拿起笔提了几点建议。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是法国东方远征军曾

驻扎埃及，此后不久，科拉伊斯就认为，法国军队可以成为解放希腊的力量。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府能够统治他的同胞，正如1797年和1798年爱奥尼亚群岛上所短暂发生的那样，那么他会非常满意，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了。但是，即便在科拉伊斯政治思考的最早期，他的思想也有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有了完全不同的转向。

维莱斯汀利斯的宪法翻译借用了法语中的词汇“nation”（民族），但实际上在文中主要指的是“state”（国家），科拉伊斯使用的是一个希腊语的词汇“ethnos”（民族），以此翻译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共同体”（ethnic group）[13]，这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也更加模糊的概念。维莱斯汀利斯允许巴尔干半岛所有不同宗教信仰、所有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申请获得一个新的“希腊人”的身份，而根据科拉伊斯的逻辑和立场，他理解的“国家”不包括那些不是希腊民族的人。

科拉伊斯与爱德华·吉本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其他研究古代史的史学家一样，认为古代的希腊世界很早就灭亡了。他说，希腊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臣民了，臣服于说希腊语的皇帝从君士坦丁堡施加的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科拉伊斯在1801年撰写了另一篇论辩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匿名出版的，痛悼拜占庭遗产对当时希腊人的影响：

很多次，（拜占庭）军队没有将真正的罗马人扶上王位，被扶上王位的是色雷斯人、保加利亚人、伊利里亚人、特里巴利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更凶残野蛮的专制君主，他们施加的枷锁变得更加沉重，从而（古代）希腊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了……[14]

现在，自由已经深深地融入国家的血液里。维莱斯汀利斯的政治愿景建立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的或唯意志论的民族主义之上，个人或团体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选择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此前40年，罗素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对科拉伊斯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其遗产继承定义的。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大量的研究精力用于他所说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要害之一”的希腊语言。[\[15\]](#)其实，早在19世纪初的论著中，科拉伊斯就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来定义希腊国家的含义。

科拉伊斯没有将最早的这些完整的思想讲述给他的希腊同胞，而是讲述给了巴黎的一个知识团体——人类观察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都是现代人类学的先驱，除了科拉伊斯，他们都是在本土出生的法国人。该协会创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1803年1月6日，科拉伊斯向他们宣读了题为《希腊文明现状》的论文。[\[16\]](#)在这篇论文里，科拉伊斯与维莱斯汀利斯思想的不同就变得非常明显。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有一些新东西。“拥有主权的人民”可以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但是其政治体系与曾经存在的体系都不一样，除了初出茅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体系。与此相反，在预想未来独立的希腊是从过去的体制中复活的方面，科拉伊斯看起来是第一个。科拉伊斯的文章是用法语写的，他在开篇语中介绍了他用来定义政治途径的术语，比如“国家”“再生”“文明”。最后一个术语是深受启蒙主义者喜爱的概念。尽管一般人认为希腊人发明了这个词，但是希腊语中并没有与此对应的词汇。围绕这个含义，科拉伊斯首先造了一个词，这个词一直到今天还是标准用语。科拉伊斯坦承，希腊词语“国家”反映了18世纪法国和英国旅行者使用的术语已经“从古代先贤的美德中堕落了”，目前正在以一种“野蛮状态”停滞不前[\[17\]](#)。但

是从20世纪中叶，这种糟糕的状态就开始转变了。

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讨论的是几十年来希腊在教育 and 商业方面取得的进展。归结到一点，科拉伊斯认为，这些进展的作用一点儿不亚于一场“革命”的作用，这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道德”的革命罢了。^[18]在法国真实革命的推动下，这场“道德”革命的进程加快了。但是，这篇论文没有提到暴力行动。科拉伊斯反倒描述了希腊人的“觉醒”——承担起责任，不辜负他们所继承的古代先人的名声。（用法语说这些要比用希腊语容易，那个时候，说希腊语的人依然被当作Romioi或者Graikoi（科拉伊斯更喜欢的术语），而不是Hellenes。“祖国”的再生已经开始。最后，在谈及祖国的化身时，科拉伊斯总结道：“只有你们在民族之林中重新获得地位，我的生活才会变得有意义。”^[19]

从那以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科拉伊斯将自己的精力都用在说希腊语的人身上，尤其在奥斯曼帝国里的那些人中间宣扬这一观点。为了宣扬这一观点，他设计、编辑了一系列古代文本，并将其命名为《希腊研究文本集成》。这些文本在印制时采用了经典研究最高的标准，有很长的前言。科拉伊斯在前言中用现代语言详细阐述了他的关于语言、教育和道德的改革的思想，他相信这些改革会带来他所渴望的再生。在这些文章中，科拉伊斯回避了他早期的、未署名的论辩文章所彰显的暴力和革命，而是以很长的篇幅不断充实自己最初用法语表达的“再生”的观点。他不奢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实际上，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坦陈希腊要想获得独立，要等到1851年，那是在希腊革命爆发30年以后。^[20]

并不是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如此有耐心。《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当时是一部激情洋溢，甚至是放纵暴烈的著作，匿名出版于1806年，发表地点可能是意大利海港城市里窝

那。全书共有250页，以现代希腊文撰写，文字排得密密麻麻，不分章节甚至段落。该书的作者至今仍不明确。[\[21\]](#)

这是一部纪念维莱斯汀利斯的著作，把维莱斯汀利斯描述为一个“伟大的希腊人”，一个“英雄”，一个“热爱希腊的人和爱国者”。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卑鄙无耻的同志、最一文不值的叛徒的下贱和怯懦”，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叛徒将维莱斯汀利斯指认给奥地利人，那么维莱斯汀利斯会成为“希腊的解放者”。这些描述能让你感受到这部著作的语言风格。尽管作者对维莱斯汀利斯非常敬仰，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比科拉伊斯对维莱斯汀利斯政治思想的了解还要多。这位匿名作者所知道和钦佩的，是那首革命的战歌以及维莱斯汀利斯遭背叛和被处死的故事。维莱斯汀利斯死后不久，那首战歌就在法国统治下的科孚岛发表了，维莱斯汀利斯的故事也得到大范围传播。[\[22\]](#)另一方面，这位匿名作者的观点更接近科拉伊斯的思想，而不是他所崇敬的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他在提及科拉伊斯的时候，也充满着敬佩。

这部著作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幸福和发展的唯一保证是法治。“nomarchy”（法制）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是对“monarchy”（君主制）的仿写，“君主制”这个词在希腊语和英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作者将两个辅音字母进行调换，从而几乎调换了词语的意义，不再是“一个人”（monos）的统治，而是“法律”（nomos）的统治。整部著作的诉求就是解放，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解放，但更为具体的是作者所指称的“Hellenes”的解放。“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仍然存在，通常指古希腊人。即便科拉伊斯在当时谈到他同时代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词语都是来自拉丁语的名字“Graikoi”。但是现在，在《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部著作中，现代希腊人不再像科拉伊斯和维莱斯汀利斯所说的那样，仅仅指古希腊人的后裔。在菲利普迪斯

和康斯坦塔斯1791年出版的《现代地理》中，他们甚至还不是“新”希腊人或“现代”希腊人。现在，他们是希腊人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那在1806年是多么大的进步。事实上，“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增加了一个用法，这个用法在欧洲的其他语言中已经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标准，其中，同样的词语（“希腊”和“希腊语”）被用来指称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和居民。

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来说，这些“Hellenes”很自然地要依附于一片土地。几乎在每一页，他都用法语写上“Hellas”，正如科拉伊斯用法语写上“la Grèce”（希腊）一样。这两个人都没有就这片土地的边界在哪儿给出任何明确的意见。当然，当时的政治地图上也不会有任何边界。对照起来，维莱斯汀利斯不论在地域命名上，还是在实际绘图上，都精确得多，他认为构成他理想中的“希腊共和国”的地区是欧洲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维莱斯汀利斯一直努力从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着手工作。科拉伊斯和《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都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外进行写作，他们看不到帝国内机构的合法性。科拉伊斯认为，国家“再生”已经开始孕育。为了响应这一观点，并呼吁尽快完成国家“再生”，《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结束的时候反复号召“国家复苏”。[\[23\]](#)

关于国家“再生”的方式、方法以及帮助“被奴役的希腊人”重获自由所依赖的实际资源，这位匿名作者比他的两位前辈有更多的发言权。他谈论的诸多内容中，就有希腊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为了再一次回应科拉伊斯，他坚持认为，尽管希腊多年臣服于外国主子的专横统治，但是希腊人的“性格”和“道德”并没有被削弱和淡化，依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在这方

面，他提出了19世纪“民族性格”的思想。在其他方面，他依据史实判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仍然具有古代斯巴达的战斗精神。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中，英勇抗击波斯侵略者，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他还援引住在山区的苏里奥特人在过去20年里奋勇抵抗阿里帕夏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已经成为传奇。他从苏里奥特人身上看到了“被奴役的希腊的英雄和荣耀，以及希腊即将到来的解放的出发点和推动者”。绿林好汉和山贼土匪这些善于发动游击战争的人的习性，已经引起了维莱斯汀利斯的仰慕。《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也许是第一个赞美那些亡命之徒的道德品质的人，并把他们刻画成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斗士和将来本土战斗力量的核心。[\[24\]](#)

来自国外的力量也很重要，但这些力量并不在期待之列。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信任外国政府，那么我们就是智力障碍者，因为所有的外国政府都是由“专制暴君”领导的，都是为维护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为什么用一个专制暴君来换另一个专制暴君呢？尽管作者没有点名，但这是对老牌帝国俄国和新的法兰西拿破仑帝国的旁敲侧击。作者没有把希望放在外国人身上，而是放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国外学习或经商的希腊人以及他的书能够影响到的多数人身上。他敦促他们，最后一定要回家，将他们在外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另一个国外的力量来自敌人的薄弱地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可能是引起大家关注“东方问题”的第一个希腊人，很快西方人就开始研究“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经烂透了，他让读者相信，拿回自己东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更早的时候，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奥斯曼帝国的很多地区，东正教徒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80%左右，即便如此，他们的数量也没有超过希腊人。[\[25\]](#)

《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本书还有其他的新东西，

有对未来分歧的预言，那是对内部敌人的强烈谴责。那个出卖维莱斯汀利斯的同伙商人后来证明是唯一的叛徒。对于东正教会的等级制度，匿名作者使用了一些最为严厉的词汇。《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呼应法国革命反对教权主义的著作之一。从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荒唐可笑的头衔），到东正教主教公会的腐败，再到僧侣的无知和恶行，匿名作者对神职人员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仅无知、自私，而且作为奥斯曼帝国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叛国者。对于法纳尔阶层和地方君王，该匿名作者的看法也都一样。

这些人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更大的不幸，给希腊人带来了噩运，他们出生在希腊的土地上，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延长我们祖国被奴役的时间。

当然，那些精英阶层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希腊土地”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古怪。匿名作者满含厌恶地总结道：“这些人将成为他们后代的耻辱。”^[26]

我们已经得到警告，与所有革命事业一样，希腊的革命事业也会受到来自其要取代的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的威胁。匿名作者心目中的英雄维莱斯汀利斯所想象的包容一切的纲领，已经永远地随风飘逝了。

黑暗中孕育的东西

这些思想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农民、渔夫、农场主和僧侣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会参与这些革命事

业？就以维莱斯汀利斯来说，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他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静静地被埋在奥地利的档案卷宗里。科拉伊斯未署名的论辩宣传小册子以及《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原版书流传到今天的不过寥寥几本。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秘密出版的，收藏或拥有它们是危险的，很多出版物一定被收缴、隐匿或销毁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在1821年希腊革命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出版物到底有多少人阅读，或者经过口耳相传，有多少内容为人所知。科拉伊斯的《希腊研究文本集成》有25卷，收录了他的关于教育和语言的论文。这本书的出版由一位有着相同思想的商人资助，可能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些书籍没有公开宣传颠覆活动，所以帝国当政者也没有禁止它们发行。这些书籍的印刷数量为1 000~1 500本，对于用希腊语撰写的书籍，这个数量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了。即便希腊革命前只有一半的书籍真正得到发行[27]，流传到社会上的数量也还是相当大的。这些书籍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到了19世纪20年代初期，国家复兴的思想至少已经在受过教育的革命支持者心中扎根。但是，大致而言，这些人做了什么呢？

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还得从国外寻找，外国旅行者在游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时写得还很详细。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由于拿破仑战争阻碍了去欧洲其他地方的道路，越来越多的英国旅行者穿越所谓“希腊”的陆地。21岁的拜伦爵士和他的旅行同伴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在第一次听说科拉伊斯后，就对他充满了敬仰。那是1809年年底，他们正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个地方君主的家里。仅仅维莱斯汀利斯的名字就能让听到的人产生一种“迷幻”。从霍布豪斯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拜伦后来翻译并以此获得声望的那些诗篇，在维莱斯汀利斯被处死仅仅11年后就已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被人根据马赛曲的曲谱传唱：

起来，希腊的儿男！
光荣时刻已到来，
要效法我们祖先，
不枉作英豪后代！
起来，希腊的儿男！
挥戈向敌人迎战，
让他们腥臭的血川，
像河水在脚下奔窜！[28]

事实上，这些歌词可能不是维莱斯汀利斯写的，但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依然是同样重要的。截至1809年12月，暴力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中。我们可以从这些以及其他旅行者那里得知，法国大革命赞歌的曲调已经在很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希腊人的口中哼唱。

其他外国游客也在大约同时期听到类似的社会传言。亨利·霍兰在181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提到“不管在欧洲这一块土地上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国家，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它都会在文明世界的所有事务和事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思考的事”。最后，根据1812年在希腊几个月的游历，霍兰尝试性地得出结论——这里可能会建立一个国家。[29]

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显，某粒种子已经发芽，正在成长。这粒种子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是否会出现新的生命，是否会像维莱斯汀利斯的筹谋那样胎死腹中，没有人知道。根据科拉伊斯的描述，正在“觉醒”的人，不只是希腊

人。1800—1821年出版的大量游记，尤其是在伦敦出版的游记，在增强当地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与18世纪相比，这些游记的作者更加详细地记述了他们走过的国家的现状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中间，而且在更加遥远的西方，这种激发拜伦、霍兰等旅行者的好奇心的“思考”孕育生长起来。

拜伦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1812年出版前两章后，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它的面世标志着作者“积年盛誉”的开始，使作者成为现代的第一个名人。但是，“一夜成名”的不只是这首长诗的作者。一夜成名的还有希腊和希腊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以诗的语言叙述了拜伦在希腊土地上的“伟大游历”，还包括他对希腊现状和未来的考察以及思考的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继《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以后，拜伦还用诗文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传奇故事的畅销书。这些书被称为拜伦的“东方”或“奥斯曼土耳其故事”，都是根据他最新的游历创作的。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样，这些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受到欧洲各地人民的追捧。那个时候，拜伦还不是希腊人（后来是了）。他在1821年前写的作品，从未直言不讳地支持希腊革命。但是，不管他的读者生活在哪里，他们都会突然提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腊再生能实现吗？

1814年11月—1815年6月，在维也纳会议上相聚，能决定拿破仑被击败后的欧洲格局的政客、君王以及他们的顾问和外交官，根本不费神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次大会形成了欧洲协调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确定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建的边境为永久化的国界。但是，这一切安排的主设计师，也就是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几年后公然否认意大利的存

在，认为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表述”。维也纳会议上没有奥斯曼帝国的代表，其欧洲行省的未来命运好像也没有任何人提及。但是，“没有四强国（后来是五强国）的同意，欧洲诸国疆界就不能变更”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到了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都已注定。思考是诗人和幻想家的事，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同时，受过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正在为实现希腊复兴的大业悄悄地积聚力量，协作行动，兴办报纸和建立知识社团变得越来越常见。早在1790年，维也纳就创建了第一份希腊语报纸。这份报纸创办了7年。维莱斯汀利斯密谋事件发生后，尽管这份报纸本身并没有涉及颠覆性活动，但是当局还是以此为借口把它给关闭了。1811年，第二份报纸《有学识的赫尔墨斯》创办，这是影响最大、创办时间最长的报纸。在创办后的十多年里，这份报纸几乎两周出版一期，得到了当时希腊语言教育方面最优秀人物的支持。报纸关注的主题是“哲学”，所以对有关政治的任何问题一概不关心。但是给这份报纸撰稿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希腊革命中知识阶层领导人的重要成员。

在社团方面，最知名的是热爱缪斯协会，它于1813年在雅典建立。该协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拜伦爵士曾经的现代希腊语导师扬尼斯·马麦罗托尼斯。第二年，同名社团在维也纳成立，得到了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公爵的资助。这个人是科孚人，当时正在参加威尼斯会议，为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服务。这些社团至少都公开地致力于推进教育和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复兴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社团有可能涉及一些隐秘活动。但是，与报纸一样，这些社团都是公开运行的，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朋友协会（也称“友谊社”）就大为不同了。在英语中，其拉

丁名字“友谊社”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秘密社团，致力于民族解放战争。关于这个社团的仪式、层级以及黑话，很多文章已进行介绍。与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秘密政治团体一样，这个社团最终是以共济会为靠山的。这个社团建立于1814年，总部设在敖德萨。敖德萨位于新的“边疆地带”的核心，几乎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向黑海北部开放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起，说希腊语的商人就被鼓励去那里定居，现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区。在实际生活中，这个社团好像只是从1817年开始，才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而且是在君士坦丁堡发挥作用。

[30] 社团创立者营造了神秘氛围，部分原因是夸大其与俄国的联系，目的是促使协会的支持者相信，协会的后台是沙皇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民族解放是这个社团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呢？

在这个社团中，不同层级的人都要发誓，誓言冗长。这些誓言成为我们了解社团最可靠的证据。誓言中最核心的一段话如下：

我发誓，我要在我的心中，对我的祖国的暴君、他们的帮凶以及与他们有着同样思想的同伙，永怀刻骨的仇恨。我要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方式，打击他们，彻底消灭他们。

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民族”“祖国”“自由”是反复出现的词汇。社团的会员被称为“希腊人”，社团不允许外国人加入。社团的宗旨是实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复兴”。正如此前的《宪法》，这个社团的很多办事程序、协议草案以及秘密，都没有保存下来，即便在其秘密存在的时期，那些东西也没有得到很

好的保存。[31]

社团的会员并不多，但其重要性远不是其会员数量可以代表的。据推测，截至1820年年中，它的会员只有700人，到希腊革命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增长到2 000~3 000人。一份不完整的档案里记录了1 000多个会员的名字。在那些会员中，只有一个会员是农民。所以，这个社团所开展的根本不是一个大众运动。

[32]尽管如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组织，而且致力于革命。

这个社团的本质从某些方面看是矛盾的。它精心设计的所有神秘机关，就是让入会人员相信自己进入了一个等级结构。上升的层级越高，就越神秘。最大的秘密只有几个被选中的人才知晓，掌握了这些秘密，就意味着进入了最高统治者阶层。这样一种机制并不是要保护这几个难以企及的社团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要掩饰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低下，这才是整个秘密社团机器的真正目的。秘密社团的真实结构不是从上至下的，而是从下至上的，其煽动者来自刚刚兴起的商业中层阶级，没有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商业圈里占据显赫的位置。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组织秘密社团、招募会员方面是成功的，其中一多半的会员是商人，会员还包括医生、老师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会员甚至还有地主、教会神职人员等。

这样一来，社团最顶端的一个职位就是空缺的。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在关键时刻统领全局。社团核心圈的人距离这个位置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都不能胜任，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位有望接替这个职位的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人是科孚公爵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他在1816年被提拔，担任沙皇的外交大臣之一。社团的会员都笃信，卡波迪斯特里斯就是他们的隐匿的、不得不承认的领袖。但

在反复劝说下，卡波迪斯特里斯还是不想与社团有任何瓜葛。不过，在很久以后谈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卡波迪斯特里斯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成为希腊人，然后再缔造希腊。”^[33]

就其本身来说，这个社团的存在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征兆，而不是一个事业。那个时候，欧洲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的建立，都是由对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和安排的不满意引发的。矛盾激化之下，革命就爆发了，先是发生于1820年1月的西班牙，接着发生于同年6月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然后发生于1821年的撒丁岛和皮埃蒙特。但是，这些革命都是由要求政治改革的“立宪主义者”推动的和平暴动，而不是秘密社团策划的全面战争。所以，这些革命必将是短命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性变化要等到1848年以后。

那么，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带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不久以后希腊革命得以成功？在那些地区，有人也许会认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其实，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中央集权已得到稳步加强，尽管很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来了，又走了。拿破仑和他的征服也是如此。对很多东正教徒来说，自由的诱惑与魅力一定就像1798年《慈父指南》所警告的那样虚无缥缈。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永远地被改变了。比如，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稳定的状态了，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片土地在过去的50多年，一直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变革。拿破仑战争的不确定性只是进一步增强了不确定性的幅度和水平。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人们开始反思。曾经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燃烧起来的热情可能已经消失，但是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开始以“希腊人”的身份思考自身。1803年，科拉伊斯在巴黎撰写的《希腊文明现状论》已经证明了希腊船主和船长用他们的古代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船只的新习惯。个人在起名时，也是如此。人们在传统的教名之

外，再起一个古希腊的名字，也是这个新习惯的标志。

思想意识的巨大转变正在发生。这个转变不可能是统一的。比如，在有些地方，很多人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其他人则拒绝思想转变。在那些拥护思想转变的人中，最积极的是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人以及可以与外界进行商业交往并走南闯北的人。这个新的、初步的、分布不均衡的“希腊”身份认同意识本身，未能使18世纪处于分散状态的社区在19世纪的前10年变得更加团结一致。如果这中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新的思考方式让它们变得更加分散。但是，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区多么努力地试图适应这种思想转变，思想变革仍然不可期待。

这并不是说思想意识的变革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当然，没有几个人会急切地希望发生那种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科拉伊斯和卡波迪斯特里斯等渐进主义者就是这样教导大家的。即便在发生敌对冲突以后，有人也依然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可以不通过革命就能实现希腊自治政府的目标。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为什么一旦发生就是爆发呢？1815—1821年发生了3件本来不需要发生的事情。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关联的。不过，这3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会引爆一切。

第一件事情是长期的，是经济方面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掌握在奥斯曼帝国欧洲行省东正教徒手里的船运和跨越大陆的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好。随着战争的结束，属于西方国家的商船开始回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实行保护主义。在这样的政策下，不论在奥斯曼帝国，还是在国外，希腊的商业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将这种情况类比为今天的希腊经济危机。^[34]有些外国旅行者也注意到了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多家庭的两三代人已经习惯了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好日子消失了。这是一个令

人沮丧的生活预期。在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人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儿子要比爸爸的日子过得好，女儿要比妈妈嫁得好。最坏的情况是，贫困可能随时而至。你能希望的最好情形就是把握好你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有些人来说）戛然而止。那些有财富的、有信念的、有才华的人猛然发现自己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直潜伏的。1820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事情，它们共同将经济衰退和人们的绝望推向了暴力。阿里是爱奥尼亚群岛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帕夏，他公然站出来反对奥斯曼帝国。4月24日，这个社团的高层发现了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领导人。

[1] Panagiotis Chiotis, Σειρά.. ιστογραφικ. απομνημονευμ.των, τ.μ. Γ. [Historical Memoirs Series, vol. 3] (Corfu: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863), 573 (quoted), 584, 586; J.-P. Bellaire, Précis des opérations générales de la Division française du Levant (Paris, 1805), 11.

[2] Christine Philliou, 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49–51.

[3] Rigas Velesinlis, Ν.α πολιτικ. διο.χησι. των κατο.χων τη. Ρο.μελη., τη. Μιτχηα.. Ασ.α., των Μεσογε.ων Ν.σων και τη. Βλαχομπογδαν.α., ed. P. M. Kitromilides (vol. 5 in the series Ρ.γα Βελεστινλ.. .παντα τα σωζ.μενα [Rigas Velesinlis: Complete Surviving Works.]) (Athens: Hellenic Parliament, 2000), with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 including the French text of the 1793 constitution. Hereafter: ‘Rigas’. Substantial excerp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can be found in Richard Clogg (ed. and trans.),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149–63.

[4] Rigas, 48 (Constitution, article 7); 33 (Preface); 45 (Constitution, articles 1–2).

[5] Rigas, 35, 119.

[6] Rigas, 46–7 (Constitution, article 4); 67 (Constitution, article 109).

[7] Rigas, 44 (Rights of Man, article 35); 70–71.

[8] Rigas, 33–5 (Preface); 73–7 (‘Thourios’[‘War song’]).

[9] Adamantios Korais, *παντα τα πγραωτ.τυπα .γραγα, τ.μ. Α*. [Complete Original Works, Vol. 1], ed. G. Valetas (Athens: Dorikos, 1964), 40. Hereafter: Korais, Complete.

[10] Cited in Korais, Complete, 44–5; Clogg (ed. and trans.), Movement, 56–64.

[11] Korais, Complete, 54, 56–7.

[12] Korais, Complete, 1 (‘Autobiography’, 1829).

[13] See further Stratos Myrogiannis, *The Emergence of a Greek Identity (1700–1821)*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2), 142–50.

[14] Korais, Complete, 65–6 (‘Martial trumpet-call’, 1801).

[15] Korais, Complete, 853 (‘Improvised thoughts I’).

[16] *Mémoire sur l’état actuel de la civilisation dans la Grèce*, par Coray [Korais] (Paris, 1803), photographic reprint,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Neohellenic Research, Athens (1983).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Adamantios Koraes, ‘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civilization in Greece’, in E. Kedourie (ed.),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153–88.

[17] *Mémoire*, 1; Koraes, ‘Report’, 153.

[18] *Mémoire*, 33, 37, 52; Koraes, ‘Report’, 169, 172, 179.

[19] *Mémoire*, 33, 37, 52, 63, 65; Koraes, ‘Report’, 180, 183–4, 186, 186 (quoted).

[20] Korais, Complete, 8, 9 (‘Autobiography’, 1829).

[21] *Ανωθυ.μου του .λληνο., Ελληνικ. νομαραγγ.α. .τοιλ.γο. περαγ. ελευθεραγ.α*. [Anonymous the Hellene, Hellenic Nomarchy, or Discourse on Liberty.], ed. G. Valetas (Athens: Vivlioekdotiki,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06). Hereafter: ‘Anonymous’. For a translated excerpt see Clogg (ed. and trans.), Movement, 106–17.

[22] Anonymous, 52, 82–3 (quoted), 218.

[23] Anonymous, 197, 200, 202, 205, 217, 219.

[24] Anonymous, 78–82 (81 quoted), 210–17.

[25] Anonymous, 205–7, see also 136 and 217.

[26] Anonymous, 150–4, 163–82 (163 quoted), 201, 204 (quoted).

[27]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41.

[28] Lord Byron,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ed. Jerome McGann, 7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93), vol. 1, 330–2.

[29] Henry Holland, *Travels in the Ionian Isles, Albania, Thessaly, Macedonia, &c. during the Years 1812–1813* (London: Longman, 1815), 530–31.

[30] The fullest early accounts are Ioannis Philemon, *Δοχμὶον ἱστορητικὸν περὶ τῆς Φιλικῆς Εἰσιγγραφῆς*.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riendly Society.] (Nafplion, 1834) [hereafter: Philemon, Friendly], and the 'Memoirs of Emmanouil Xanthos' (1845), translated in Clogg (ed. and trans.), *Movement*, 182–200. See also K. Svolopoulos, 'Ἡ συστάσις τῆς Φιλικῆς Εἰσιγγραφῆς. Μία επαναπρόσγγιση'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iendly Society: A reappraisal'], *Ta Istorika* 35 (2001), 283–98.

[31] Philemon, Friendly, 155 (quoted), 172, 173.

[32]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49–51.

[33] Philemon, Friendly, 128. Compare the famous saying of Massimo d'Azeglio, after the achievement of Italian independence, 'L'Italia è fatta. Restano da fare gli italiani' ['Italy has been made. Now it remains to make Italians'].

[34] Vasilis Kremmydas, *Ἡ ἐλληνικὴ ἐπανάστασις τοῦ 1821. Τεκμηγρια, ἀναψηλαφ.σει., ἐγγραμηνε.ε.* [The Greek Revolution of 1821: Documents, Investigations, Interpretations.] (Athens: Gutenberg, 2016), 38–9, 49–53, 58.

第三章

浴血而生

(1821—1833)

毋庸讳言，那就是一场大屠杀。

就革命的计划性而言，几乎从一开始，事情就摆脱了计划者的控制。从任何角度来看，计划的制订都非常仓促。这不是一场有领导人率领、有目标引领的革命。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甚至不是一国之内有着明显不同的派别之间的战争。希腊之外的历史学家通常将它称为“独立战争”。其实，它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在希腊传统上，它被看作“革命”，或者更经常地只是以年份命名，在所有后来的希腊历史上被写成“1821”。

杀戮一旦开始，就变得疯狂起来，显示了集体的愤怒和恐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各方（有很多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参与方）都毫无例外地诉诸可以想象的最极端的暴力。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外交延续”，这是通往野蛮的堕落。启蒙运动所捍卫的理性、自由的价值观往往受到推崇，但这场革命波及的所有地区，几乎没有重视这些价值观的迹象。希腊革命的故事不是一个理性行动和反应的故事。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真实的婴儿降生，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个灾难。

这场暴力的受害者多半是平民以及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人。除非外国人提出要求，否则交战双方通常不会放行局外人员，而且一如既往地杀害俘虏和人质，不管年龄，不分性别。一场小型战斗后，双方都会把各自击毙的人员的头割下来，堆放在一起，作为战利品。所有行凶者，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刽子手，还是处死穆斯林俘虏的基督教暴徒，都怀着同样的强制性心理——要让最后的惩罚方式多样化，他们使用了毫无必要的羞辱形式，有时候还让被处死之人的痛苦更加骇异、更加持久。据推算，截至1828年，希腊的平民人口数量比敌对行动爆发以前减少了20%。庄稼、牲畜、磨坊和住房是农业生活的必需品，其被破坏

的程度比人口的减少幅度大得多，例如，牲畜数量锐减了90%。

[1]革命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地区不再有穆斯林。宣礼塔被拆毁，清真寺被改成仓库、市议会厅或者（很久以后）电影院。这些建筑物与周围建筑物的朝向不同，今天，它们朝向麦加，这常常提示人们它们最初的意义。在19世纪20年代争取希腊独立的那些地区，我们很难再找到刻着古老奥斯曼文字的纪念碑或石碑，也难以找到奥斯曼时期的墓碑或建筑。

在第一批研究这段冲突的希腊历史学家中，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冲突结束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证实了他的同胞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的原因。他说：“希腊人的不端行为，是奥斯曼土耳其教育的结果，是由奴隶制度引起的。”[2]那个时候，外国观察家则持怀疑态度。最近发现的非希腊人的记述显示，冲突双方采用的极端暴力不相上下。在地方层面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暴力形式都难分伯仲。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建立的报复模式，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它本想要控制的威胁。在1821年4月和5月的几个星期里，一个多世纪的成就被损毁殆尽，法纳尔阶层被彻底消灭。那个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执行的所有死刑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处死年迈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4月22日复活节那天，他在自己教堂的大门上被绞死。在那几周的时间里，有100多位著名的法纳尔在君士坦丁堡被当众砍头。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可能是恐慌的信号。尽管那些措施对希腊族很残忍，但它们也损害了奥斯曼人自己的利益。几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发现，有些过去由法纳尔担任的最高职务，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了。同样的自我伤害行为一年后再度发生。那个时候，希俄斯岛种植乳香的村庄惨遭洗劫，这被当作对另一个岛上的希腊人叛乱的惩罚。1822年4—6月，对希俄斯岛的大屠杀因奥斯曼帝国体制内的另一种报复形式（奴隶制度）而变得复杂

起来。希俄斯岛上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1822年的夏季与秋季被驱赶到黎凡特奴隶市场。这些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两年后，欧仁·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希奥岛的屠杀》，它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奥斯曼人的残暴。但是，君士坦丁堡高层社会的贵妇人已经习惯于咀嚼只在希俄斯岛集中种植的乳香，那里的乳香还有药用价值。现在，由于奥斯曼人的报复，她们再也品尝不到那些乳香了。

与此相对照，希腊没有与奥斯曼帝国相匹配的国家权力，所以不能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实施惩罚行动或报复行为。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地方领导人，通常都不能下达命令实施暴行。根据1822年的《临时宪法》，奴隶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希腊之所以发生那么多的暴行，是因为希腊领导权的缺失。一般认为，乔治·芬利是在研究希腊革命方面最有见识，也是至今最有威信的历史学家，他对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这么强大的军阀不能阻止那些暴行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些领导人并不懦弱。他们了解所统率的士兵。作为领导人，他们知道士兵信赖他们的基础，并知道那个基础是多么脆弱。1821年10月和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特里波利斯与雅典分别向希腊革命者投降，签订了投降条约。但是，投降条约被撕毁，大批投降人员被杀，这对欧洲人造成的震撼一点儿都不亚于奥斯曼人在希俄斯岛上犯下的暴行。但是，人们一定会疑惑，不管希腊领导人多么才华横溢，如何风度翩翩，他们是否能够控制住那些情况下喷涌出的大规模杀戮之欲，同时又无损于自身权威？

芬利相信“希腊革命真正的光荣存在于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从不懈怠的坚持之中”。^[3]他亲自参与了这场革命，到他写作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已经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大半辈

子。从那以后，他的历史观点就一直占据主流位置。但是，秉承“我要小心谨慎”座右铭、为人为学都审慎的斯考特，在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浪漫化的手法。冷酷的真相一定是，芬利笔下的英雄（“人民大众”）在极端的情况下受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的驱使，使自己沦落为疯狂暴力的受害者。这种病态式的暴力既感染了基督徒，又感染了穆斯林。正是在这种恐怖、相互仇恨和嗜血的狂暴中，希腊这个民族国家降生了。

友谊社的灭亡

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名字还被读作“西普斯兰特斯”，他是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俄国的前瓦拉几亚君王的长子。依普希兰狄斯在俄国接受军训，参加了俄国抵抗拿破仑的战役，表现极为突出。他在德累斯顿城外的一场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从那以后，他就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席了维也纳会议。在所有的记述中，依普希兰狄斯都深得亚历山大沙皇的信任。后来，虽然他不再适合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还是被提拔为俄国军队的少将。他当时正在休假，所以友谊社的代表很容易就与他取得了联系。1820年4月，这位27岁的年轻人同意担任友谊社领导层空缺的最高职位，成为友谊社长久以来苦苦寻找的领导人。到1820年年底，依普希兰狄斯在基希讷乌建立了秘密司令部。基希讷乌现在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当时在俄国的领土之内，靠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多瓦的边界。

在友谊社看来，机会突然降临，千载难逢。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领导这一切。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开拔，围困了在首都约阿尼纳造反的阿里帕夏。整个鲁梅里（伯罗奔尼撒半

岛北部的大陆)被两股穆斯林势力之间的战争吞噬。敌对双方是阿里帕夏和苏丹中央集权政府。这好像是最完美的起义时刻。但是,从哪儿开始?如何起义?一开始,起义计划是照着维莱斯汀利斯的思路来的。按照计划,依普希兰狄斯要乔装打扮,秘密潜入的里雅斯特,并从那儿乘船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个地区,友谊社的代表成功地招募了很多当地的地主、主教等,使之加入了希腊独立的大业。如果依普希兰狄斯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么他和友谊社的命运,或者确切地说希腊革命进程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谁又能说得清呢?但是,在最后一刻,计划改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革命者自己安排了行动计划,因此希腊革命的旗帜将转而在多瑙河流域的公国里竖立起来。

依普希兰狄斯穿着俄国军服,身边只有几个仆从跟随,在1821年3月6日乘船横渡普鲁斯河,来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同一天晚上,他抵达摩尔多瓦当时的首都雅西,在那儿受到法纳尔君王的欢迎。从此,法纳尔君王就背叛了他曾宣誓效忠的苏丹。两天后,宣言书被印刷出来,随后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欧洲的报纸上发表。

希腊革命爆发了。

在摩尔多瓦的第一天,依普希兰狄斯就组建了一支由200名当地支持者组成的武装队伍。一周内,这支队伍的人数就增加到4倍。到了6月,他的队伍暴增到5 000~8 000人,包括2 000名骑兵。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招募的。尽管奥斯曼帝国当局有着各种猜测,但是从俄国陪同依普希兰狄斯一起来的只有几位随员,根本没有战斗部队。

尤为了不起的是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最为核心的500名来

自欧洲各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正是《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一书中所指的那些希腊人。他们被称为“神圣营”，穿着黑色制服，行军于维莱斯汀利斯设计的红、白、黑三色旗下。他们有了新的标志，那是从火中奋飞的凤凰，标志上面有“我从灰烬中再生”的口号。大多数战士都是说着各种语言（或来自各个民族）的自愿参加的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在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带生活的哥萨克人。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支东正教联邦队伍。如果革命成功，维莱斯汀利斯的全球性“希腊共和国”的理想就可能会成为现实。

但是，依普希兰狄斯的革命事业有着致命的缺陷。友谊社的创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革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这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依普希兰狄斯可能认为自己与沙皇及其宫廷的私人关系将会在这方面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时机太不凑巧了，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传到沙皇耳朵里的时候，沙皇正在莱巴赫（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出席欧洲协调机制的一个常规性会议。在那个场合，当着其他几个强国代表的面，这位俄国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支持邻国革命造反。毕竟，欧洲协调机制的会议目的就是强化181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亚历山大沙皇立刻将依普希兰狄斯从俄国驱逐，剥夺了他所有的官衔和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平定这场叛乱。

即便如此，依普希兰狄斯还是尽最大努力让人们继续相信他，俄国沙皇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依普希兰狄斯私下说，他的俄国主子已经向他保证，俄国援助不久就会到来。但是，起义的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很快就到了终点。1821年6月19日，在瓦拉几亚公国的德拉加什战役中，友谊社的军队被人数更少的奥斯曼军队打垮。依普希兰狄斯逃过边境线，到奥地利避难，他在

公国招募的军队的幸存者只能自生自灭，有些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有些则被俘虏、被处死。依普希兰狄斯本人被奥地利人监禁。他遍体鳞伤，监禁解除后不久就死去了，年仅35岁。

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希腊革命就这样很不光彩地失败了。

同时，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和爱琴海地区，形势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转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拥有最大商船的岛屿，当地领导人热切响应友谊社的号召，参加起义的人数比其他地方都要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至今不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当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贸易状况一直很不好。在大陆，依赖葡萄干和丝绸等出口产品的富裕地主惨淡经营。在友谊社代表的敦促下，有些人撕毁了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的几十年的、曾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协议，与诸如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等曾经的土匪、山贼结成联盟。科洛科特罗尼斯已经开始从流放地爱奥尼亚群岛返回。

依普希兰狄斯在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刚传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就同时在几个地方爆发了。友谊社的代表本来将希腊革命的启动日期定在1821年3月25日（西历为4月6日），因为这个日子有象征意义：与宗教的圣母领报日在同一天。从那以后，3月25日就成为希腊的国庆节。但是，这个被传颂的故事实际是这样的。3月25日，希腊老帕特雷城的杰尔马努斯主教在卡拉夫里塔高山之上的圣阿吉亚·拉夫拉修道院升起了起义反抗的大旗。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第一批宣告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城镇有南方的卡拉马塔和北方的帕特雷。其他的城镇随后响应。到了4月中旬，整个地区都揭竿而起了。

这不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与依普希兰狄斯在多瑙河公国的

做法不一样。这是游击战争，规模很小。各自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主教”或前土匪头子，在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些来自国外的、少量的满怀理想主义的志愿者的帮助。关于这些志愿者，我们后面再详述。虽然这些游击队之间缺少合作与协同，但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区中，这样的起义暴动方式极其有效。

即便到了这时候，也不是所有说希腊语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都宣布支持革命。在鲁梅里的北部，由于阿里帕夏和苏丹之间的冲突，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地区，由基督徒组成的武装部队几十年来一直镇压土匪，这些部队人员多数来自他们要控制的同一支土匪队伍。因此，这里就演化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机制：他们在当地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来回摆动，变换着自己的忠诚。因为只要阿里帕夏还在约阿尼纳坚持抵抗，有些土匪就可能被收买到他的那一边，其他土匪可能会被收编到奥斯曼的军队中。到了那年夏天，多数地方武装力量都加入了希腊革命这个新的事业。但是，只要希腊革命还没有结束，很多土匪就不会放弃他们左右摇摆从而寻找盟友的战略习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存基地的安全。

最富裕的海德拉岛起着关键的作用。反对传统船主的寡头统治的行动发生以后，海德拉岛就加入了希腊革命。后来当船主们再度控制局面的时候，海德拉岛就难以实现对希腊革命的承诺。不过，爱琴海另一边的斯派塞斯岛和普萨拉岛附近，停泊着来自海德拉岛的商船，船上有拿着武器的商人，他们很快就加入反抗的队伍，他们的船队比奥斯曼帝国的船队厉害得多。特别具有杀伤力的、让奥斯曼水手胆寒的，是希腊的火攻船，老旧的船体外面被涂上了沥青。然后希腊船员点着火，驾驶着这些火船，精准地驶向他们的目标。在撞击之前，这些船员乘小船撤离到安全地带。几个月后，这些非常规的船队就控制了爱琴海。尽管他们从

从来没有想过要封锁敌人的海上通道，但是从1821年夏开始，他们一直控制着爱琴海，甚至是爱奥尼亚海到西方的海岸地区。

在爱琴海的很多小岛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总是比在大陆的统治弱化得多，但是这些小岛上的革命热情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高涨。中世纪后期，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锡罗斯岛、蒂诺斯岛和圣托里尼岛等岛屿生活的罗马天主教友，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不愿意牺牲安逸生活，去支持他们的东正教友。在大陆的更北边，几十年来一直是商业和教育中心的皮立翁山区爆发了起义，但是起义很快就被平定了。内陆腹地萨洛尼卡也发生了起义。奥斯曼人在这儿的报复特别残忍血腥，但是也很有效。同样的举措在南方能点燃革命的热情，而在北方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在南边和东边，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的基督徒热情地加入了革命，不过，直到20世纪，这两个岛才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一部分。在爱琴海上的另外两个大的岛屿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基督徒坚定地避免卷入这场革命，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于安纳托利亚海岸艾瓦勒克和士麦那的反叛被镇压了。在所有地点中，距离雅典最远的地方——塞浦路斯岛上没有一个人反抗，但是教会的主教们依然被处死了，仅仅是因为疑似与友谊社会谋。

1821年年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整个农村地区和鲁梅里的南部地区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清洗”。那些没有逃跑、没有被杀、没有被赎回的穆斯林，都到十字军或拜占庭时代建造的一系列堡垒中去避难了。有些级别高的穆斯林，可以拿钱赎回自己的命。希腊独立战争第一年的决定性的胜利是10月初摩里亚公国首都、防守坚固的城市特里波利斯的投降。城市投降后，大约8 000名穆斯林和犹太教居民被屠杀。在当时的语言中，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描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与我们今天

称呼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没有任何关系。很多被害者，可能包括所有犹太人，都将希腊语视为第一语言。多数穆斯林不是说希腊语，就是说阿尔巴尼亚语。决定一个人生或死的是宗教信仰。1821年年底，冲突的本质已经确定，不可改变。同样，希腊革命的地理中心区域也已经确定，在经历种种相互影响的命运变迁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初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第一块国土。

到了这个时候，希腊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在1821年3月和4月打响革命第一枪的人（也许是所有人），都是友谊社的会员。但是，随着不久后依普希兰狄斯领导的战役在北方瓦拉几亚的惨败，友谊社作为一个组织已经陷入了困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如果起义的人得不到上面的指示，那么没有人能对起义负责。直到6月，友谊社的全权代表才抵达希腊的解放区，声称代表协会领导革命。这个人是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弟弟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迪米特利亚斯也有在俄国军队服役的背景。他只有25岁。在海德拉岛上岸的时候，迪米特利亚斯受到狂热的欢迎，因为人们相信他带来了俄国援助的承诺。即便摩里亚最有实力的军阀，比如马尼军阀首领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以及51岁的前土匪头子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都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迪米特利亚斯很悲伤，因为他抵达海德拉岛的那天，正是他的哥哥在德拉加什遭遇惨败的日子。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伯罗奔尼撒，而迪米特利亚斯刚刚在那儿建立了他的指挥部。在人们知道哥哥已经放弃了革命事业，到奥地利避难，且弟弟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俄国政策向好的转变之后，迪米特利亚斯不仅不可能强化他声称的代表友谊社的权威，而且就连友谊社本身也开始变得无关紧要了。尤为严重的是，友谊社甚至可能让人蒙羞。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了。至少在希腊革命初期制定

未来希腊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他比其他人的贡献都要大。他是18世纪统治多瑙河公国的首位且最出名的法纳尔君王的后裔——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他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在为其叔父效命的历练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的叔父曾担任瓦拉几亚公国的君王，为苏丹效力。希腊革命的不少领导人以前从来没有踏足过他们为之奋斗的那块土地，这让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心怀某种怨恨，而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希腊革命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他智力超群，精通8门语言，很快在希腊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希腊唯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他穿着一套欧洲双排扣长礼服，而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穿着俄国军服。几乎除马夫罗科扎托斯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西方的志愿者）都身着当地奥斯曼式样的衣服。马夫罗科扎托斯是一位天生的政客，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

特里波利斯的10月杀戮发生以后，各地区的领导人忙于争权夺利，扩大影响。形势的发展要求已解放的地区召开一次国民大会。迪米特利亚斯希望有这样的进展，并以此确定他自己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马夫罗科扎托斯也期待这样的会议，但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在11月初筹备这次大会的时候，马夫罗科扎托斯向友谊社的主要代表写了封信，极其坦诚地详述了观点：

协会的错误引发了欧洲各国对我们的敌视。因为欧洲各国会自然地认为，我们是欧洲雅各宾派的工具。这些事情让俄国疏远了我们，而俄国每每在其他事情上都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要再使用什么“领导人”“全权代表”“助手”的头衔了。在目前的形势下，经过我们的指导，当地的人民应尽量自己组建政府……拒绝一切让欧洲列强怀疑我们是雅各宾派帮凶的做法……不要再用夸夸其谈的语言向欧洲陈述我们正义的要求，而是要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简明扼要，克制适度。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强调，现在应该“尽一切可能，将人民团结起来，从而组建政府”。[4]

大会如愿召开。会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822年1月13日（根据西历，正是新年那一天），在古代圣地埃皮达鲁斯遗址的附近，大会发布了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临时宪法。这份文件和维莱斯汀利斯曾经起草的文件一样，大量借鉴了法国大革命1793年和1795年的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的名字是“希腊”，其公民是“希腊人”。根据首次在美国实行的权力分立的原则，希腊建立了行政和立法部门。民选的第一总统（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元首）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二总统（大致相当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是迪米特利亚斯。临时宪法没有提及友谊社。同时，维莱斯汀利斯曾经建议的国旗的红、白、黑3个颜色被蓝、白2个颜色替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国旗的颜色。

谁最后走到了权力顶端是一清二楚的。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第一个临时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芬利在40年后写道：“希腊人在埃皮达鲁斯为欺骗欧洲做了很多，为把希腊组织起来做了很少。”他的这番话为其后的历史学家定下了调子。[5]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临时宪法就是一个骗局。临时宪法所传达的是强烈的愿望，而不是实际的政策。但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革命行动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获得认可，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骗局。友谊社已经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革命现在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变成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所说的“一个欧洲事件”。[6]

什么样的自由

在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军队一直在希腊的北方镇压阿里帕夏的造反，希腊在南方的革命因此而受益。但是到了1822年1月，苏丹的军队进入了帕夏所在的首都约阿尼纳。阿里帕夏曾被拜伦爵士形容为经验老到的“穆斯林·波拿巴”，却也在2月5日被捕并被杀死。造反结束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投入到这场冲突中的大量军队现在可以用来解决希腊的问题了，而且已经全副武装地逼近了希腊人的家门。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集中大量兵力，对刚刚成立的希腊发动了第一次全面的反击。

奥斯曼帝国的一支部队从鲁梅里东部往南开进，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其目的是解救被困在科林斯和纳夫普利奥的奥斯曼要塞部队，并与他们合力征服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国家。另一支部队沿着平都斯山脉的西麓前进，其主要目标是贸易港口迈索隆吉翁。因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前年抵达希腊以后，就把他的活动集中在迈索隆吉翁。奥斯曼帝国被围困的前哨还有雷班托（今纳夫帕克托斯）以及鲁梅里城堡（今安提里奥），它们都需要解救。在这两场战役中，希腊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奥斯曼军队的人数。

在西边，奥斯曼军队的统帅已经替代阿里帕夏。奥默·维耶尼斯作为新的约阿尼纳帕夏，没有他的前任那样的雄心，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非常精明地攻击了造反的希腊人，利用了当地希腊人以及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武装人员或土匪的不断变化的忠诚。一场相对传统的对阵大战始于1822年7月16日。维耶尼斯的

军队遇到了希腊的一支正规军，这支正规军是由西欧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志愿者组成的，指挥官正是马夫罗科扎托斯，战役发生在城外跨过阿尔塔河的一个叫佩塔的地方。这是一场歼灭战。外国志愿者严格坚持西方的军事训练原则，即没有总司令的命令，绝不行动一步，而当时总司令却不在场。那些非正规的部队，本来应该在山里打掩护，但是他们谁的命令也不听，听到枪响就跑得没影儿了。佩塔之战的溃败对于希腊革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尤其可怕的是，它打击了已经抵达希腊参加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的士气。最为严重的是，这场失败对正常军事理论的整体概念的建立投下了阴影，将国家军队单一军事指挥的创建推迟了好几年。

在希腊的另一边，结果却是极大的不同。马哈穆德·德拉马利是奥斯曼帝国部队的司令，这支部队大约有20 000人，其中包括8 000名骑兵，它成功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里，抵抗这支部队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当地游击队“队长”率领的人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竟然能够将进攻者挡在了纳夫普利奥之外，然后在奥斯曼军队通过德凡纳基亚关隘往北撤退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伏击，击毙了大量人员。佩塔失败仅仅用时10天，这次胜利给游击队非正规的战术以及冷酷无情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包括现在已经星光黯淡的迪米特利亚斯，但是德凡纳基亚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科洛科特罗尼斯。不管是否有道理（芬利认为没有道理），这场胜利肯定提高了战役领导人在其他希腊人心中的政治地位。截至1822年夏末，在希腊东部的希腊人就不再面临大的军事威胁了。

确保希腊西翼的安全，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佩塔灾难以后的几个月里，马夫罗科扎托斯要通过守卫当地的主要城镇迈索隆吉翁来救赎自己。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忠心不改的军人在那里进行了

重新组合。在暴风雨和来自海德拉岛的船只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坚定信念，城镇守卫者在1823年1月6日成功地突破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围困。根据东正教历法，这一天正是圣诞节。这是希腊革命期间三个围困中的第一个，使得迈索隆吉翁这个名字在整个欧洲变得无人不晓。第一个围困的结束意味着，从1823年开始，刚刚站立起来的、危机四伏的希腊民族国家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这个喘息之机延续了整整两年，主要归功于革命起义者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当然，在这段时间，边境上依然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地方的边境都是有漏洞的。偏远的岛屿尤其薄弱。1824年夏天，普萨拉岛和卡索斯岛上的居民被全部消灭。同一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重新控制了克里特岛。但是，除了这几个特殊的情况，从1823年开始到1825年春天，叛乱不断的希腊依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

不过，这不是和平时期。现在的舞台就是让希腊人进行内部思考的。所有的人都会团结在“自由或死亡”的旗帜之下。但是希腊人既然已经赢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在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一个回答是基于启蒙主义思想的。马夫罗科扎托斯和那些像他一样思考的人坚定地推进中央政府的建立，设立现代的、进步的机构，推行法治和民主，所有这一切都在埃皮达鲁斯宪法中被奉为神圣（被芬利和其他人斥为一种“骗局”）。对这些人来说，任务是将那个期望变成现实。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称这个团伙的人为“现代化推进者”。与他们对立的是持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当地领导人，一般可统称为“军阀”。对科洛科特罗尼斯和马夫罗米查尔斯等人来说，自由就是绝对自我独立，拒绝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权威。在他们的等级中，领导人是最强大的，

是最有感召力的，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本地性的，或者最多是区域性的。他们对扩大冲突没有很大的兴趣，对鼓励外国干涉更没有兴趣。尽管他们期待俄国干预，但也不是完全坚持不懈地希望俄国出手相救。他们的目标就是口头传统中所表达的自由概念，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被收集、出版和翻译并从此以后在国家庆典上被演唱的绿林好汉歌谣中的自由概念。

这些分歧在1823年4月走向了公开化。那时，第二次全国国民议会正在召开，会议地点是距离纳夫普利奥不远的、当地人称之为“圣约翰的草屋”的地方，这个地方因这次会议而恢复成古代时的名字“阿斯特罗斯”。新的选举将行政权力交到知名军阀马夫罗米查尔斯和科洛科特罗尼斯等人的手中。马夫罗科扎托斯则被降到一个含义模糊的职位。科洛科特罗尼斯后来被选为立法机构负责人，但是他盛气凌人地拒绝出任，这让事情变得极其荒谬。分权运行得并不是很好。

从1823年年底到1824年年初，希腊有两个政府，它们都试图通过一个不同的权力基础来压倒对方。1824年3—6月，效忠不同政府的力量兵戎相见。经过一次不稳定的休战和竞争双方一些机会主义的调整改组，第二次内战于11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这些事件中的牺牲备受瞩目：一个是直接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长子帕诺斯，他被特里波利斯城外的希腊同胞杀死；另一个是间接的，是拜伦爵士，他是来帮助希腊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中最有名的。

拜伦于1824年4月19日在迈索隆吉翁去世，这形成了传奇，但对于他在希腊斗争中真正的贡献，人们的认识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拜伦刚踏上希腊这片土地的时候，遇到了其他希腊领导人面临的同样的困境，那就是他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拜伦在深思熟虑以后，用自己的名声和个人财富来支持马夫罗科

扎托斯以及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具有现代意识的船主们。拜伦仅仅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3个月，就因发烧而死亡。但是，他的战略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投入和广泛的国际宣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没有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对迈索隆吉翁的第二个围困在1823年年底被解除了，据说解除的唯一原因是英国的勋爵资助了一批希腊船只，其开往迈索隆吉翁解围。从长远看，拜伦更为重大的影响是他在近一年的冲突中，给予了现代化推进者决定性的支持，反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阀们。

到1825年年初，唯一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推进者的政治领导权从马夫罗科扎托斯转移到一个新的政客那里。他是扬尼斯·科莱特斯，虽只有50岁，但在希腊内战中比马夫罗科扎托斯显得更冷峻无情、更不拘谨克制，他毫不心慈手软地下令使用武力对付他的希腊同胞。科莱特斯出生在阿里帕夏封地的一个说瓦拉几亚语的社区，他利用在东正教会接受希腊语言教育的机会，到意大利学习医学，回来后在约阿尼纳担任宫廷医生。他在阿里帕夏的宫廷里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权谋套路，当然也毫无疑问地了解了他的主子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与英法等强国势力开展复杂外交的左右逢源之术。因为这个经历，科莱特斯将从阿里帕夏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与西方的、现代的观念进行了融合。从这个时候到他去世（1847年），科莱特斯虽然与马夫罗科扎托斯都站在同样的、宽泛的现代化推进者的一边，但他们一直是竞争激烈的政治对手。马夫罗科扎托斯看起来文质彬彬，书生意气，有着知识分子的学术修养，相比起来，科莱特斯更像一个平民主义者，在两人的竞争中，科莱特斯往往略胜一筹。

根据21世纪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推测，“拯救希腊革命的恰恰是内战的结果”。[\[7\]](#)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推测决定了希

希腊民族国家未来的格局和方向，而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那次内战结果的代价是让希腊社会的结构产生了一条裂纹，而且从那以后，这条裂纹再也没有被修复。裂纹的一边是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推进者”的后裔，他们是讲政治的、沉稳的、实用的、主张融合的人；另一边则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念念不忘绿林好汉之歌中颂扬的绝对自由以及希腊革命期间一些军阀所尽享的光荣自治的短暂时光。在后来的希腊历史上，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追溯这些冲突，才能得到解释。在希腊民族国家孕育诞生的斗争中，这些理念冲突就第一次出现了。

但是，如果希腊革命要成功，首先就要生存下来。

革命之火几乎熄灭

崇尚现代化的中央政府刚刚在与军阀的内部争斗中获得优势，其一直担心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反击就开始了。这一反击很快被证明是致命的。早在1822年，苏丹一直采用从北方走陆地进行两路进攻的战略，但是失败了。到了1825年，再次发起的进攻不仅通过已经熟悉了的陆路，还同时从南边走海路进行。这次军事进攻的主要人物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辛。穆罕默德·阿里一出生就是穆斯林，来自今希腊北部卡瓦拉的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家庭。10年前，他废黜统治埃及几百年的马木鲁克王朝，消灭了作为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的埃及。那些年里，在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帮助下，穆罕默德·阿里在与欧洲接壤的边界彻底强化了他的部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苏丹和他的这位总督决定联手消除来自希腊的威胁。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在君士坦丁堡，因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舰队和船员的加入而变

得更加强大。埃及海军的指挥官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辛。易卜拉辛被任命为摩里亚帕夏。

易卜拉辛于1825年2月23日率领埃及部队在莫顿登陆，莫顿就是今迈索尼，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侧。莫顿和科隆是那个地区的两个要塞，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掌握在奥斯曼人的手里。为了缓解防守部队面临的威胁，易卜拉辛一下子增援了50艘战船，其规模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经过一场迅猛的战役，希腊人被从相邻的根据地纳瓦里诺要塞中赶了出来，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差点儿丢了性命。纳瓦里诺湾的停泊处位于希腊大陆和斯巴克提里亚之间，在以后的两年里，为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的联合舰队提供了安全的基地。

同时，在北边，新的司令官取代了奥默·维耶尼斯。他是雷希德帕夏，在佩塔战役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在1825年4月底，实行了对迈索隆吉翁的围困。这是希腊革命中的第三个围困，也是最后一次围城的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鲁梅里南部其他地区的战乱导致了希腊部队在科林斯地峡以北几乎所有地区的溃散。只有西边的迈索隆吉翁和东边的雅典的卫城还在坚守着，两座城市都被奥斯曼军队围困。雷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肆虐鲁梅里的时候，易卜拉辛率军有条不紊地重新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到之处的庄稼和房屋被烧杀抢掠一空。到1825年夏末，希腊人被迫放弃了特里波利斯。随着易卜拉辛大军的高歌猛进，埃及部队已经进入了希腊根据地、临时首都纳夫普利奥的守军的视线里。乔治·芬利对此进行了冷峻的总结：“埃及正规部队发动了灭绝一切的战争，而希腊应对战争的是游击队。”他认为，战争的后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希腊逃脱了战火，也逃脱不了饥馑。”^[8]

迫近1825年年底，双方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对迈索隆吉翁

的围困上。在奥斯曼帝国一边，易卜拉辛与鲁梅里的雷希德合兵一处。迈索隆吉翁的陆路和海路都被切断了。数月来，来自海德拉和斯派塞斯的船只冲破封锁线，给守城战士送去给养。虽然当时统治该岛的英国人明令禁止帮助迈索隆吉翁，但爱奥尼亚群岛扎金索斯岛上的志愿者依然不顾危险，为迈索隆吉翁提供帮助。希腊政府被紧紧地挤压在苟延残喘的纳夫普利奥，根本无力提供任何军事救援，只是不遗余力地筹备钱粮，努力确保迈索隆吉翁守城者的后勤供给。但是，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还是越来越紧了。

截至1826年4月中旬，被围困在城内的人员除了饿死、投降、突围，别无选择。他们选择的是最后一项。突围是在4月22日圣枝主日的夜间实施的。这注定是一次英雄主义的行动。被围以来的城池幸存者大约还有9 000人，突围成功的不到2 000人。易卜拉辛炫耀道：“斩首3 000名男人，3 000~4 000名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几百名年老体弱逃不了的人最后到克里斯托斯·卡普萨利斯的家里避难。拜伦曾生活在这栋房子里，两年前也死在这里。这栋房子后来改成了一个弹药库。大家心照不宣，为了不落入敌人的手里，年迈的卡普萨利斯点燃了火柴，扔进了弹药桶，里面所有的人壮烈牺牲。

托马斯·戈登曾为希腊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成为研究希腊革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尽管他为人矜持，但依然把迈索隆吉翁的陷落描述为“光荣的悲剧”。乔治·芬利亲身经历了希腊30年的争斗岁月，最后变得阴郁沉闷。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迈索隆吉翁守卫者致以敬意：“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不仅在希腊革命中罕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种精神充溢着每个人的胸膛。”^[9]在希腊，“撤离迈索隆吉翁”很快成为史诗和巨画创作的主题。从那以后，这个事件就像宗教一样被纪念。1937年，希腊政府授予迈索隆吉翁“圣城”的称号，而且该称号一直被

官方延续至今。

随后的几个月是希腊革命最为黑暗的时刻。在纳夫普利奥、海德拉和斯派塞斯，一切好像都要结束了。易卜拉辛的大军迟早会攻过来。与迈索隆吉翁相比，纳夫普利奥的防御要坚固些。但是，再坚固的防御设施，也抵御不了饥饿。海德拉人和斯派塞斯人每天都生活在埃及舰队要猛然袭击的噩梦中，担心步他们在普萨拉岛的革命同志的后尘，遭受彻底的毁灭：1824年夏，普萨拉岛被夷为平地，所有居民都被杀死。在这种惶恐之下，据说有些头面人物甚至考虑飞到英国统治的爱奥尼亚群岛生活。在几周的时间里，斯派塞斯岛的所有居民都迁到了海德拉岛。相比之下，斯派塞斯岛要比海德拉岛小很多。

在迈索隆吉翁陷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情况变得越来越坏。解救雅典之困的不断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失败。高素质的外国志愿者的到来，外国资金的注入和船只的增加，似乎也难以阻止希腊军队命运难以遏制的颓势。在这艰难时世之中应召唤而参加希腊革命的一个外国人是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伯爵。他是科孚城的一个贵族，曾担任俄国联合外交大臣达6年之久，直到1822年被解职。1827年4月14日，充满敌意的第三次全国国民议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达玛拉（今特罗林纳）召开，议会决定将政府最高的职位授予卡波迪斯特里斯。这正是友谊社10年前一直努力而没有达成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卡波迪斯特里斯这一次在权衡希腊的形势后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他不是马上答应的，且是在一年后才到任。在这期间，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对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掌控。到处是违法乱纪行为，到处是饿殍饥谨，到处是强盗劫掠。

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件事情凑在了一起，拯救了希腊革命。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一件事情是一批希腊人及其领导人坚持

以顽强精神战斗到底。当然，希腊的决心也和奥斯曼帝国的拒绝让步或对起义人员的严惩有关。不过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鲁梅里，当地人与奥斯曼人达成了和解，结果是那儿的革命失利了。另一件事情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科拉伊斯、前法纳尔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商人、船主等在扩大这场冲突的国际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国际方面的参与，希腊革命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结果，但同时也加深了未来要继承的革命遗产中的裂纹。

国际参与

从一开始，希腊革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事件，不只属于希腊人。友谊社一直在寻求俄国的军事支持，其领导人也做出了承诺。也许更令人想不到的是，1821年4月9日，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向欧洲发出了宣言，仅仅一周前，他的马尼亚特部落控制了卡拉马塔城。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把自己宣传为“斯巴达军队总司令”，呼吁“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给予援助”。他说：“希腊是我们的母亲，是照亮你们的明灯。”18世纪的欧洲旅行者也说过这样的受恩惠的话语。现在是报答的时候了，“武器、钱财、建议，都是其希望从你那里获得的”。^[10]这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用的语言已经在欧洲遥远的前哨扎下了根，尽管拿破仑6年前就遭受了最后的失败。

后来的发展证实，马夫罗米查尔斯在实践上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的那份宣言与几个月后的埃皮达鲁斯临时宪法一样，是一个愿景。但了不起的地方是，这两者都得到了注意。临时宪法不久后就传播到伦敦，到了著名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手里，边沁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并将

意见反馈给希腊政府。当然，边沁不知道希腊革命的现实，否则他可能就不那么做了。但问题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认为这份文件是值得他研究的。同样，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关于国际援助的呼吁也得到了回应。

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是遥远的美国的志愿者们陆续抵达希腊。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人，其中两位最早且最好的研究希腊革命的历史学家是托马斯·戈登和乔治·芬利（两位历史学家都是苏格兰人），还有更为著名的拜伦（拜伦如果从出生地上看是半个苏格兰人，从成长经历来看就是完全的苏格兰人）。[11]很多国际志愿者长眠在迈索隆吉翁的英雄花园墓地里，其墓碑上刻着多种语言的纪念文字。迈索隆吉翁的这块墓地美丽、安宁，但是其历史的气氛非常沉重。英国冒险主义者理查德·彻奇和托马斯·考克瑞恩勋爵在希腊革命中被委以重任，一位指挥陆军，另一位指挥海军。同样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拿破仑的战友、法国老将查尔斯·法布维尔。也许，在军事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弗兰克·阿布里·黑斯廷斯。黑斯廷斯由于不顺从上级被解职，但是他在希腊革命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海军将领。他指挥了当时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卡尔坦里亚”号，他在1828年牺牲于夺取迈索隆吉翁的战役中。

这些志愿者一般被看作亲希腊者，他们并不是被雇用的战士，到希腊来也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事实上，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他们往往要躲避本国安全人员，因为后者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去国外。在多数国家，政府特别害怕我们今天所说的“极端主义”的传播，因为那会与革命行动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亲希腊者的数量从来就没有很多，总数大概为1 000~1 200。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人道主义干涉”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出现的亲希腊者。但是，这样说就是误解了那些志愿

者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后，有些人自愿到西班牙参加战斗。与这些人一样，那些亲希腊者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参加别人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战争里也有他们的份儿。在古伊斯游记的匿名译者、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和诗人雪莱的笔下，那些志愿者的心中充满感动，他们试图去偿还一个债务，因为他们觉得要为自己文化的发源地做点儿什么。这就是雪莱在希腊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所写的值得纪念的句子“我们都是希腊人”的真正含义。新兴的欧洲建立在古典基础之上，亲希腊者把古希腊看作他们自己的古典基础，而奥斯曼人则横亘在新兴欧洲的建设之路上。这就是志愿者们响应号召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其他亲希腊者对希腊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对于希腊的灾难，有些人亲身经历，更多的人是在自己安全的家中读到的，他们都为希腊提供了帮助。瑞士人和美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瑞士银行家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德在迈索隆吉翁陷落之后的那个冬天组织了大规模的赈济希腊饥民的活动。就美国人而言，精力充沛、乐善好施的塞缪尔·格里德利·豪于1827年在波罗斯岛建立了一家医院。后来，他不仅表示出对希腊的敬意，而且也提出了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组织清理了当时希腊的首都埃伊纳岛上港口城镇之外的陆岬上的古代神庙废墟，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可以使用的海港，为数千名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否则他们可能会饿死。

亲希腊者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赢得决定性的战争。几乎1/3的志愿者牺牲在希腊，或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疾病。但是，他们去希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只踏入门槛的脚，这只脚引来更多的、更有效的国际参与。

亲希腊者带来的不只是靴子。除了志愿者以外，更多的人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亲自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希腊的战争。那

时的社会虽然处于现代社会的早期，但是新闻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亲希腊委员会募集资金，购买了三艘蒸汽动力的战舰、一艘在美国建造的巨型护卫舰，并在迈索隆吉翁陷落以后的几个月里资助希腊，使之创建了第一支正规军队。1824年和1825年，伦敦股市为希腊临时政府发放贷款，向私人投机者募集资金。不只是希腊，所有采取这些措施筹集经费的国家都陷入了丑闻，而且出现让人震惊的浪费行为。即便如此，这一切还是在希腊最黑暗的时候帮助了希腊革命，使其顽强地坚持了下去。

但是，个人甚至是私人资金的力量所能做的事是有局限的。如果说亲希腊者已经将他们的脚踏入了门槛，那么这扇门还没有完全打开。马夫罗科扎托斯比其他人都高瞻远瞩，他明白应该做什么。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不协调的双排扣礼服，坚持不懈地将欧洲列强拉入希腊革命的事务之中。

一开始，他的努力似乎毫无希望。1822年秋，欧洲协调机制在维罗纳召开第五次（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希腊临时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参加。但是，希腊人还没有抵达，会议就已经拒绝了希腊。尽管如此，协调一致的强国之间的团结在维罗纳会议上出现了裂痕，这就是这次会议是欧洲协调机制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原因。当然，希腊的起义者对此一无所知。这次会议的争议焦点是西班牙，不是希腊。但是英国率先提出一个“不干涉”政策，这使其与欧洲协调机制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开始疏远。卡斯尔雷勋爵持超保守主义的观点，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在他1822年8月割喉自尽之前，他开展的最后的外交活动之一是，简明扼要地向威灵顿公爵介绍了公海上承认希腊船只为参战船只的必要性。威灵顿公爵是当时英国参加维罗纳会议的代表，他对希腊的革命事业一点儿都不支持。卡斯尔雷勋爵的建议只是在对待希腊问题上前进了一小步。第二年3月，卡斯尔雷勋

爵的继任者、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宣布了这一小步的变化。尽管是托利党人，但是坎宁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是雄辩滔滔的演说家，赢得了反对党阵营里的很多辉格党人的尊敬，特别是拜伦的尊敬。在担任外交大臣以及1827年8月前短暂担任首相期间，他在扩大希腊冲突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死后仅仅两个月，他的希腊政策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承认公海上交战者的权利，可能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这并非正式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希腊冲突中，英国仍然中立。至少从名义上，受英国保护的爱奥尼亚群岛也应该实行中立的政策。从法律上看，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眼里，手持武器的希腊人不再是海盗或罪犯了。这是某种形式上的承认，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其给予了希腊行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

知道英国政策的变化后，马夫罗科扎托斯迅速采取行动，在1823年6月和7月连续致信坎宁和其他英国高层官员，阐述他关于在新独立的希腊和英国之间建立联盟的设想。这种联盟主要基于共同的海洋和贸易利益。不过，马夫罗科扎托斯期待的不仅是这些。像现今的多数希腊人一样，他希望俄国能够支持希腊的革命。马夫罗科扎托斯心知肚明，俄国和其欧洲对手之间的竞争是希腊获得国外支持的关键。希腊人的手里掌握着那个著名的不能解决的“东方问题”的钥匙。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盟友，是平衡欧洲权力最好的保证，同时在奥斯曼帝国注定衰落的形势下，可以限制俄国的扩张。

马夫罗科扎托斯的第一步是秘密进行的。这个时候，很多希腊人对这个建议充满恐惧。其他人会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外人，是一个狡诈的阴谋家，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不会信任他。（在这些指控中，只有最后一项指控，也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指控，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被完全排除掉。）关于这些行动的谣言让

科洛科特罗尼斯用武力威胁来阻止马夫罗科扎托斯担任立法机构的议长。但不管情况如何，坎宁都没任何回复。

马夫罗科扎托斯暂时只能满足于推进他第一次提出的一大笔国外贷款的申请。这笔贷款在伦敦募集，并不是巧合。这次的贷款申请行动与此前的行动不一样，得到了几个月前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国民议会的全力支持。科洛科特罗尼斯当时都投票支持，但不久后，这位“摩里亚的老人”有预见性地对来访的拜伦的使者吐露自己的担忧，提出了反对：

大英帝国可能会从希腊获得过多的东西，而我则希望希腊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英国可能会助力马夫罗科扎托斯和法纳尔的阴谋，那些人.....就会想方设法地中饱私囊，获得最大的利益。[12]

国际化总是有其负面影响的。

1824年8月，现代化推进者赢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对英国外交大臣来说，希腊这次新的示好是清楚无误的，橄榄枝是以希腊政府的名义公开抛过来的。这个时候，欧洲协调机制团结中的裂痕已经进一步扩大。俄国的一份秘密备忘录的内容也泄露了。俄国的计划是削弱这场革命的力量，将革命的成果分成各自独立的属于欧洲诸强的“影响区”，每个区在名义上仍然归属于苏丹。这样一来，维持现状的文章勉强还可以做下去。新获得授权的希腊政府很快抓住这个机会，给坎宁写了封信，强烈谴责了俄国的计划，请求英国给予帮助。这一次，英国外交大臣回复了，尽管依然没有任何褒贬。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利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的政策开始慢慢见效了。

当易卜拉辛及其埃及大军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的时候，当现代化推进者的优势地位因其在第二次内战取得的胜利而得以强化的时候，多数希腊领导人开始思考引入一个或多个欧洲强国势力。但引入谁？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希腊的现代政治党派领导人表达自己观点的首要做法，是推进依附英国、法国或俄国，从而使不同的政敌形成。尽管他们从未承认自己用过这些名字，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希腊确实有一个马夫罗科扎托斯领导的“英国”党、一个科莱特斯领导的“法国”党和一个科洛科特罗尼斯发起成立的“俄国”党。论政治精明，很少有人能与马夫罗科扎托斯相比，他认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依附这三个欧洲列强中的哪一个，而在于利用其中一个国家的利益来制衡其他国家的利益。马夫罗科扎托斯自己在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他的这一看法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战略很快就被采纳。

1825年，易卜拉辛的大军逼近纳夫普利奥和迈索隆吉翁，雅典已处于围困之中，希腊政府中的对立党派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一个党派正在与法国秘密磋商，要把希腊王位送给法国内穆尔公爵。科洛科特罗尼斯则正式致函俄国，要臣服俄国，只是俄国对此置若罔闻。到了7月，希腊各方领导人非常罕见地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不久后送到伦敦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是1825年8月1日，声明“希腊将其神圣的自由、独立和政治存在置于大英帝国的绝对保护之下”。^[13]尽管希腊1825年致函或磋商的这三个强国都没有承认希腊革命者拥有任何权利，更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希腊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虽然没有给予直接反应，但英国外交大臣派遣他的表兄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出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并指示这位大使在赴任途中取道爱奥尼亚群岛和希腊。在这两个地方停留期间，他要

与希腊临时政府进行磋商。在海德拉对面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荒凉海岸上，他在1826年1月9日与马夫罗科扎托斯会面。会晤刚刚结束，搭载这两人的船只突然遭受了暴风雨。大使的船只丧失了所有的船帆。马夫罗科扎托斯乘坐的船只沉没后，他不得不游泳逃生。^[14]即便如此，国际干涉的基础也第一次奠定了，这个基础涉及希腊的一个让步，一旦被希腊国内知道，马夫罗科扎托斯就不会得到宽恕。一方面，希腊境内（没有指明区域）不再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指的是穆斯林）；另一方面，希腊必须向苏丹上缴岁贡，并继续附庸于奥斯曼帝国。这不是希腊人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彻底独立。在随后的4年里，希腊的完全独立依然只不过是在外交桌上。马夫罗科扎托斯极具外交智慧，他知道要保持耐心。

而在伦敦这边，英国外交大臣一直耐心地等着，直到听到这次会晤的结果。此时，俄国有了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亚历山大沙皇的皇位。为了表示祝贺，坎宁委派威灵顿公爵根据那些条款内容与俄国签署双边协议。1826年4月4日，就在迈索隆吉翁被围进入最后阶段的日子，一份议定书在圣彼得堡签署。俄国和英国政府与苏丹进行磋商，实现马夫罗科扎托斯代表希腊政府的安排。

同时，奥斯曼帝国的立场甚至变得更加强硬。早在1824年，拜伦等头面人物的介入以及伦敦给希腊进行第一笔国外贷款的募集就引发了奥斯曼帝国的强烈抗议。一直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思维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它清楚地看到了所面临的现实，只是它的欧洲对手一开始不愿意承认其对希腊的支持。上述措施没有得到官方同意，都是个人行为，它们违反了政府所谓的“中立”立场。那年5月，俄国关于分割希腊的建议泄露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内部那些主张采取更加仁慈的

手段赢回希腊反叛者的声音，也沉默下去了。[\[15\]](#)虽然希腊在战争的另一边高喊“自由还是死亡”，但奥斯曼帝国这边的认识里，只有完全的投降、彻底的消灭。

即使从外交方面看，在1826年冬天和1827年上半年，希腊独立的命运看起来也是死亡。的确，正是问题的严峻性和越来越大的毁灭可能性才促使下一轮外交谈判的产生。欧洲都市中传言，易卜拉辛试图杀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将北非的穆斯林迁移过来，从而报复希腊人1821年实施的种族清洗。不管是真是假，这些谣言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迈索隆吉翁的命运给希腊大陆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两年前，拜伦死在那儿，这让全世界知道了迈索隆吉翁这个名字。雅典是西方文明的老家，它被围困，最终投降。持强硬立场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政府不能漠不关心了，因为这些领导人隐约地感受到自己的某些权益正在受到威胁，尤其在那些亲希腊的媒体可以自由表达思想以及鼓动大众意见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世界各地会一致赞同干涉希腊冲突。早在1824年1月初，美国国会围绕公众强烈支持希腊事业的热情进行辩论，排除了以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尽早承认希腊独立的可能性。虽然法国这个时候热爱希腊的情绪已达到顶峰，但是法国政府秘密地给埃及海军建造了战舰，甚至在这些战舰于1827年服役时，派遣法国军官随同担任军事顾问。[\[16\]](#)在英国，除了坎宁之外，执政的托利党对任何带有革命味道的东西都是怀有敌意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的本能反应，因此他在这件事情的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儿讽刺的意味。

尽管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一直存在，但欧洲列强的态度在慢慢转变。法国政府也收到了希腊的请求，对在圣彼得堡签署的双边协议中自己被甩在一边心怀怨恨。早在1827年，法国就自己

起草了一份国际协议的草案。7月6日，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一个三方协议，那个时候，坎宁已经担任英国首相。协议的条款内容与以前的大同小异。如果奥斯曼帝国认为希腊革命是其国内事务，且苏丹继续排除任何国外干涉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如何强行干涉和调停交战双方，这个三方协议是含糊不清的。英、法、俄这三个强国没有对协议内容的字斟句酌倾注大量精力，反而立即向地中海地区派遣了一支联合海军力量，从而支持自己的协议。这是解决冲突的良方，事实的确如此。

决定希腊革命前途的战役是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打响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的船只数量仅占交战对方战船的1/3，但是三国战船的火力超强，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港口几乎被摧毁殆尽。关于欧洲列强的这次干预，至少有一整本厚书对其进行了记录。在当时及以后，关于谁开了第一枪，关于总司令、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激烈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整个希腊革命期间精心谋划的为数不多的战役之一。纳瓦里诺之战改变了一切。没有一名希腊人参与这场战役。这次国际干涉的程度令人震惊，是用马夫罗科扎托斯和其他希望将希腊冲突国际化的人的决心换来的。

从这时开始，希腊革命的结果不可分割地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和高层政治交织在一起。但是，它不是与其中一个强国交织在一起。从希腊的视角看，这正是此事的美妙之处。尽管希腊的各对立党派就希腊应该忠诚于哪个强国的的问题大打出手，但是纳瓦里诺之战带来了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这个趋势无法偏向欧洲列强的任何一方。如果希腊的命运现在要由远在希腊之外的力量来决定，那么绝不在单独一个强国的手里，而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对手的博弈中。这就是三个强国代表常务会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个会议被称为“伦敦希腊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826年年底召

开，这个会议机制一直持续到1832年年底。从1827年夏到1829年秋，这三个列强轮流坐庄，主导外交方案中的军事行动。

在纳瓦里诺，英国派遣的舰队最大，也承担着总体指挥作战的任务。那次军事行动的影响是清除了来自海上的所有对希腊的威胁。一年以后，在英国，坎宁的政策大多被新任首相威灵顿公爵修正了。也许是在威灵顿的鼓动下，乔治四世国王在1829年元月给议会的讲话中就纳瓦里诺发生的“麻烦事件”向奥斯曼人道歉。但是，伦敦会议是一种三方参加的跷跷板游戏。当英国对希腊的支持减弱时，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就上升了。

1828年夏，将最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赶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是被委以重任的尼古拉斯·梅森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这与亲希腊者的干涉完全不同，尽管亲希腊者依然参与希腊事业。梅森将军直接听命于巴黎政府。1829年3—9月，俄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新的攻击。这正是友谊社曾经极力谋划所要获得的结果。但是，形势大为不同了。人们认为，在帮助希腊争取独立上，俄国在军事方面做得最多。的确，俄国海军在爱琴海上一直很活跃，打压海盗。^[17]但是，在这个新发动的俄国—奥斯曼战争中，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位于高加索的遥远的黑海岸边。希腊的命运只不过是顺应这最新的行动而起伏，俄国的一系列战争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当梅森的军队于1829年抵达距离奥斯曼帝国首都不到100英里^[18]的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时，形势变得令人激动。几周以来，俄国人仿佛要直捣黄龙，进军君士坦丁堡。这个时候，那位极端保守的、不是希腊朋友的威灵顿公爵出来说话了。这位英国首相于9月11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我们必须重建希腊帝国，除了俄国的必要支出外，欧洲诸强哪一个都不能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19]最后，那个局面没有发生。铁腕勋爵的

这封信发出3天后，苏丹就恳求和平，签署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接受了一些相对屈辱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1826年初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和马夫罗科扎托斯在海德拉对岸的海岸上冒着暴风雨会晤达成的关于希腊的协议条款。希腊将成立自治政府，但是在名义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要给帝国政府上缴岁贡。

尽管威灵顿后来也认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1823年第一次给英国外交大臣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欧洲的和平依赖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力量，从而制衡俄国。希腊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英国政府虽然不太满意，但是在盟友猜忌的刺激下，在终极的解决方案中投入了最后的、出乎意料的元素。这个新的希腊为什么不能获得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希腊完全独立，那么3个欧洲强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就会被迫撕下它们的伪装，因为它们都想统治希腊，让希腊成为它们的附庸。

没有哪一方敢反对。就苏丹来说，他已经受困于《阿德里安堡条约》，所以他不得不接受任何决定。欧洲强国根本不听取希腊的意见。英国、法国、俄国政府的代表于1830年2月3日签署的《伦敦议定书》第一次宣称：“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享有依附于一个完整独立国家的所有政治、行政和商业权利。”^[20]

最后的推动

到了这个时候，希腊事务几乎全部围绕着一个人的品格和行动而运转。在希腊出现集体恐慌、国家生命命悬一线的时刻，卡波迪斯特里斯被选为最高领导人。1827年，第三次全国国民议会专门赋予他一个希腊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以后也不再会使用

的头衔“Kyvernitis”（总督）。在希腊语中，“Kyvernitis”的意思与拉丁语的“gubernator”（长官）的含义完全相同，英文中的单词“governor”（总督、州长等）就是从“gubernator”演变而来的。“Kyvernitis”最初的意思是“舵手”，后表示船长或机长。多数英语文献里都说卡波迪斯特里斯的职务是“总统”，但是希腊语里与此对应的词汇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临时宪法里就已经被使用了——特指政府中最高的职务。选举卡波迪斯特里斯担任领导人是一个临时方案，是一个应急措施，时间最长不会超过7年。在希腊语里，卡波迪斯特里斯从来没有担任过希腊的总统，他只是希腊的总督，一直到希腊革命最终结果的到来。

卡波迪斯特里斯到底对谁负责，人们从来都没有搞清楚。是对推举他上任的欧洲列强负责？还是对希腊人民负责？还是对保障他当选以及后来被他依照程序废除的希腊临时宪法负责？卡波迪斯特里斯是科孚人，在威尼斯统治的国土上出生，是一个贵族。他既是一个自家人，也是一个外来人。他是东正教联邦的产物，但是他在国外度过了大部分成年生活，积攒了政治经验。他一开始在俄国生活，后来在瑞士流放。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让他在选举人眼里有了权威。不论是卡波迪斯特里斯的教养，还是他的风度，都不能让他适应19世纪20年代末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世界。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都无法融入那个世界。

卡波迪斯特里斯这个人本身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即便我们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后知后觉，但他的统治之术同样是高深莫测的。他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孤独而严峻，在有些人眼里，他（至今仍然）是将他的国家从混乱状态拉到有序状态的救星。支持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在他执政三年半并被刺杀以后，希腊又出现了剧烈动荡的无政府状态。这次的无政府状态没有1824年内战那样的特点和借口。在内战期间，关于希腊革命的本质和目标的真正

的、不可逃避的紧张形势是一触即发的。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抵达之前，伯罗奔尼撒半岛已经陷入武装暴乱之中了。他在分属于不同欧洲强国的战舰的护送下，乘船进入纳夫普利奥，他发现对立的武装力量正在相互轰炸，并炮击两个大的要塞之间的城镇。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卡波迪斯特里斯从来没有失去大多数民众的爱戴的原因。同时，他好像也乐于对民众表达浪漫的、家长式的情感。在他作为总督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谁比他更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他对其他希腊领导人，甚至对忠于他的那些人的不信任，是他垮台的原因。

希腊革命最后的几次战役都是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执政期间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在外围前沿地区。对希腊人来说，这有点儿虎头蛇尾的感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肃清易卜拉辛及其麾下的奥斯曼军队残余势力的任务，是由梅森将军指挥他的正规法国军队完成的。这支奥斯曼军队是于1825年登陆的。经过1828年最初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希腊在鲁梅里重新站稳了脚跟，夺回了迈索隆吉翁，并向更远的北方推进，再次实现了控制。在鲁梅里的军事行动中，来自英国的热爱希腊的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和理查德·彻奇发挥了很大作用，黑斯廷斯也因此牺牲。但是，随着俄国在4月底对奥斯曼帝国的宣战，曾经攻占迈索隆吉翁和雅典的令人敬畏的雷希德帕夏被调遣，率领所有部队奔赴巴尔干地区。随着雷希德帕夏的撤离，当地一下子变成了真空地区，说希腊语、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武装分子打了起来，或根据需要形成新的联盟。在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穆斯林。

1829年9月，最后的战役在底比斯和里瓦迪亚之间的隘口爆发了。这场战役只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而已，胜利的荣耀归于依普希兰狄斯的弟弟迪米特利亚斯。依普希兰狄斯在八年半前

开启了希腊革命。但战争胜利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根据俄国人强制奥斯曼人在1829年9月签署的《阿德里安堡条约》，科林斯地峡以北将成为希腊国土的边界。这不是通过军事行动决定的，而是通过欧洲地图上的线条决定的。

卡波迪斯特里斯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夫罗科扎托斯在1823年就已经启动的外交战役。对于这项工作，尽管他有着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但他行动的自由依然很有限。伦敦会议已经形成了不征求希腊意见就做出决定的习惯。卡波迪斯特里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理应为他的国家赢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他的优势变为一个劣势，成为一个不利因素。总督纯熟的外交技巧是在俄国工作时锻炼出来的。英国代表和法国代表断然不会相信他能真诚地代表希腊进行磋商，更愿意相信他是俄国利益的秘密代表人物。令人悲哀的是，梅森也不信任他，尽管梅森曾在他离开俄国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虽然卡波迪斯特里斯在外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很难说最后的解决方案中的哪一点是来自他的建议。

卡波迪斯特里斯在国内事务方面影响最大。乔治·芬利等批评人士指责卡波迪斯特里斯是暴君，其一切行为都表明其自私的野心。^[21]从正面的角度看，卡波迪斯特里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鼓励采用欧洲大陆最新的试验方法建立新式学校。他以硬币为基础，在希腊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货币——凤凰，还创建了国家银行。他组建了司法系统，开创了希腊急需的土地登记工作。即便将近两个世纪以后，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土地登记工作依然是急需的工作，而且仍然没有完成。他还引进了后来每个希腊酒馆和餐馆都供应的主食——土豆。

所有的记录都认为，卡波迪斯特里斯在政治上倾向于他非常熟悉的俄国独裁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整个执政理念在希

希腊革命期间兴起的民主的、多元的氛围中显得方枘圆凿。他的政治观点与曾经试图请他担任会长的友谊社没有很大的不同。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执政的日子里，希腊的政治倒退了。他被称为“启蒙的专制者”，这个说法似乎还算靠谱。^[22]尽管他只有50出头，但他的政策在独立后的希腊已经落伍了。也许他的统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未来某些想当国家“救星”的人会效仿他，并将他视为独裁专制主义的示范人物。

从1831年年初，卡波迪斯特里斯开始镇压来自反对派的两次造反。一次造反的是海德拉的船主和商人，另一次造反的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家族领导的马尼地区的傲慢军人。这两次造反的起因都是税收。中央政府希望最富有的国民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而维持政府的运作，而人们是不愿意交税的，尤其是马尼亚特部落人，他们从来没有向奥斯曼人交过任何税，所以现在也拒绝向卡波迪斯特里斯的代理人交税。希腊诸岛上的船主也都有自己的安排，而且在希腊革命前一直运作得很好。现在，他们也面临着上缴税款的压力。这些人和当地的其他利益集团的人不仅不愿意资助公共财政，还希望政府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源泉。他们甚至有理由——生活在10年战争期间受到很大影响。10年的破坏让每一个人都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中央财政。反对卡波迪斯特里斯的叛乱，从本质上看，就是抗税。

但是，那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马夫罗科扎托斯曾与希腊诸岛的中层阶级走得很近，现在却成为反对总督的政治派别领导人。卡波迪斯特里斯拒绝恢复他当选总督时依据的临时宪法，这对马夫罗科扎托斯来说太过分了。人们怀疑总督准备放手让俄国干涉，这更是火上浇油。当海德拉的海军上将米奥利斯公然挑战政府时，矛盾就变得一触即发了。米奥利斯上将的舰船被一支俄国舰队堵在波罗斯的海港内，他没有屈服让步，而是把希腊舰队

的旗舰“希腊”号炸毁了。这艘旗舰是美国的亲希腊者募集巨资建造的。炸毁旗舰造成了浪费，真是荒唐无比。

到了夏末，两次造反都被平定了。但是，卡波迪斯特里斯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截至10月，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和他的两名亲属依然被政府作为人质拘押在纳夫普利奥。马夫罗米查尔斯是部族首领，也是马尼亚特人无可争议的领袖。看起来他并没有直接介入抗税的风波之中，他的弟弟康斯坦提诺斯和儿子乔治斯是否直接参与了抗税叛乱，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在监狱里，其他两人也处于松散的监押之中，只被允许在城墙内进行自由走动，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名武装人员看护着。

1831年10月9日周日，上午一大早，卡波迪斯特里斯正要进入位于纳夫普利奥城一条后街的圣斯拜里顿教堂，此时，康斯坦提诺斯和乔治斯正分别站在门的一边，拿着武器等着他。这两人是有人看管的，但是很显然，管理并不严格。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好像是经过舞台彩排似的。总督看见了他们两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几乎好像是自愿走向了死亡。他应声倒在地上。教堂门口的走道上有一个小洞，据说小洞是那枚射穿卡波迪斯特里斯的子弹留下来的，现在，游客可以顺着指示标记看到。其中一个刺客被当场处以死刑。由此可进一步证明，卡波迪斯特里斯尽管与政府其他领导人不和，但是依然深得市井大众的敬爱。另一个刺客也被抓住，经过审讯被处死了。

一个多世纪以后，诗人和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1944年这个希腊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上，将这些事件搬上了舞台，把卡波迪斯特里斯的死亡描写成因国家分裂而做出牺牲的、像耶稣基督受死那样的行为。那个时候，政治上被笼统地称为“自由的、进步的人的反应”，往往是过激的。在有些地方，行刺者被盛赞为古典希腊刺杀暴君的哈摩第欧斯和阿瑞斯托吉顿的衣钵传承

者。科拉伊斯这位鸿儒是第一位阐发希腊作为现代国家的思想的人，他在著作中抱怨道：“那两个谋杀犯救了他，让他这个犯法者逃脱了违犯希腊法律的惩罚，这个惩罚比死刑还重——将他驱逐出希腊，使其颜面尽失，无地自容。”^[23]

总督被刺杀的消息一旦传开，无政府状态就会再次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且更加猛烈。

此后一年多，独立的希腊的政治生活支离破碎。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领导人能够一家独大，这些党派或领导人也不允许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党派或领导人做大，成为政治的主导。希腊的政治就像是欧洲强国在对立的矛盾中疯狂涂抹的一幅漫画，只有最具远见的革命者才能成功地利用其错综复杂的矛盾。最后一次全国国民议会于1832年秋在屈辱中收场，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议会大厅……绑走了议长和几个副手，把他们当人质，以此让政府支付欠他们的军饷”。^[24]这次厄运连连的会议在纳夫普利奥城边的一个荒凉小镇召开，这个小镇是卡波迪斯特里斯创建的，目的是收容在希腊其他地方因为战事而流离失所的逃难者。它的名字是“普罗诺亚”，意思是“上帝”。卡波迪斯特里斯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关于在8月那天出席议会会议的代表是否注意到某种反讽，这没有任何记载。

就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希腊革命在国内秩序的几近崩溃中结束了。这个时候，暴力不是发生在希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而是发生在希腊同胞之间和基督徒同胞之间。的确，暴力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但是，希腊依然有生命丧失，这带来更多民生问题。最后的敌视行动发生在距离首都纳夫普利奥不远的城镇阿尔戈斯，时间是1833年1月16日。几天后，希腊的新国王抵达，带着一支德国军队恢复了社会秩序。

1830年《伦敦议定书》签署以后，3个欧洲强国在落实约定方面需要一段时间。卡波迪斯特里斯被刺杀以前，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动乱不断，英国也出现政府更迭，因此它们的视线都从希腊移开了。但是，希腊这个国家的命运再一次在欧洲北部的都市里被决定。这至少说明，这样的安排是导致希腊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直到1832年年初，伦敦会议才再度召开，并同意将希腊的王位授予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还未成年的第二个儿子奥托。他们此前中意的人选是萨克森—科堡王子利奥波德，只是，利奥波德在深思熟虑后拒绝了这一好意，他后来成为比利时历史上的第一位国王。各方对奥托这位人选都表示满意，不过，他们又一次地没有征求希腊人的意见。这个时候，希腊已经没有具有威信的个人或团体能够代表国家了。奥托正像卡瓦菲斯的著名诗歌中的野蛮人一样，可以被看成“某种解决方案”。

1832年5月，欧洲列强在伦敦签署了新的议定书，修改了1830年确定的一些条款。奥托要在1835年达到法定成年人年龄后才能成为国王，在那以前，一位巴伐利亚摄政将代他行使权力。这个时候，希腊这个新国家的疆界要比一开始谋划的疆界大得多，但是仍然有3倍于生活在希腊境内的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被排除在新的希腊之外。希腊北部的边境是从东部的沃洛斯以南一直延续到西部的阿尔塔以南。伦敦会议还确定了哪些岛屿并入这个新的国家，主要有距离大陆最近的爱琴海诸岛以及远在北边的斯波拉泽斯群岛，但是积极参加希腊革命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克里特岛、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这些更大的岛屿都被排除在外。在希腊有语言记载的3 500年历史上，希腊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欧洲地图上。

随着奥托乘着一艘英国战舰于1833年2月6日抵达纳夫普利

奥，希腊作为一名新生儿，就降生了。新的希腊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像是一个计划外的婴儿，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父母是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不过，与任何人类新生儿一样，希腊也是一个新的孩子，它要成长，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不可预见的品格。

[1]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59; Thomas Gallant,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7; Thomas Gallant, *Modern Greece: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2nd edn (London: Bloomsbury, 2016), 119.

[2] Spyridon Trikoupi, *Ιστοραγ.α τη. Ελληνικ.. Επαναστ.σεω.*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4 vols (London, 1853–7), vol. 1, 9, echoed in 2016 by Vasilis Kremmydas, *Η ελληνικ. επαν.σταση του 1821. Τεκμ.γραφαι, αναψηλαφ.σει, εγγραμνε.ε.* [The Greek Revolution of 1821: Documents, Investigations, Interpretations] (Athens: Gutenberg, 2016), 99.

[3] George Finlay,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1861), vol. 1, 283; see also vol. 1, 119, 177–8, 195; vol. 2, 194, 381.

[4] Mavrokordatos to Dimitrios Ypsilantis, 27 October [= 8 November] 1821, first published in Ioannis Philemon, *Δοχ.μιον ιστογραφαι.ν πεγρα. τη. Ελληνικ.. Επαναστ.σεω.* [Historical Essay concerning the Greek Revolution], 4 vols (Athens: Karyofyllis, 1859–61), vol. 4, 513–14.

[5] Finlay, *History*, vol. 1, 299.

[6] Petros Pizanias (ed.), *The Greek Revolution of 1821: A European Event* (Istanbul: Isis Press, 2011;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2009).

[7] Pizanias (ed.), *Greek Revolution*, 64.

[8] Finlay, *History*, vol. 2, 81.

[9] Christos Evangelatos, *Ιστοραγ.α του Μεσολογγ.ου* [History of Missolonghi] (Athens: Govostis, 2007), 377; Thomas Gordon,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1832), vol. 2, 265, 260;

Finlay, History, vol. 2, 105; see also vol. 2, 111.

[10] Gordon, History, vol. 1, 183. The Greek text, presumably the original, given by Trikoupis (Ιστογρ.α [History], vol. 1, 368–9) does not include the .nal sentence quoted.

[11] Lord Byron, Don Juan, canto 10, lines 135–6.

[12] Roderick Beaton, Byron's War: Romantic Rebellion, Greek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2–3, citing James Hamilton Brown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23, to the seat of war in Greece',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vol. 36, no. 226 (September 1834), 404.

[13] Gordon, History, vol. 2, 283–4.

[14] Gordon, History, vol. 2, 278–9.

[15] Hüseyin Şükrü Ilicak,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empire: Ottoma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26)'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169, 193, 196, 257–60.

[16] Gary Bass, Freedom's Battle: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Vintage, 2009), 92–7; William St Clair,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The Philhellene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Open Book, 2008; .rst published 1972), 274–6.

[17] Lucien Frary,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k Identity, 1821–18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4, 53.

[18] 1英里 ≈ 1.6公里。——编者注

[19] Douglas Dakin, The Greek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Batsford, 1973), 273.

[2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Greece, Service of Historical Archiv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Major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1830–1947), ed. Ph. Constantopoulou (Athens: Kastaniotis, 1999), 30 (in French). Facsimile of the original in J. M. Wagstaff (ed.), Greece: Ethnicity and So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1–5.

[21] Finlay, History, vol. 2, 199, 209, 217, 218, 220, 227.

[22] Kremmydas, Επανάσταση [Revolution], 198–9.

[23] Peter Bien, Nikos Kazantzakis: Politics of the Spirit, vol. 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7–223; Adamantios Korais, .παντα τα πγρα-ωτ.τυπα .ραγγα, τ.μ. Α. [Complete Original Works, Vol. 1], ed. G. Valetas (Athens: Dorikos, 1964), 802 (Καποδιστραγιταχο. δι.λογοι Ε. [Capodistrian Dialogues, no. 5], dated 30 October 1831); C. M. Woodhouse, Capodistria: The Founder of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02–3.

[24] Finlay, History, vol. 2, 275–6.

第四章

蹒跚学步

(1833—1862)

这样的冬日，在希腊语里被称为“美好安宁的时刻”。太阳暖暖的，大海静静的，海水蓝蓝的。3 000名士兵已经上岸，他们是来自德国的雇佣兵。来自几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停泊在纳夫普利奥的海港，帆索上装饰着彩旗。一声接一声的炮响向年轻的未来国王致敬，欢迎他的驾临。枪筒里冒出的白烟遮掩了远处的风景。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外，在史前的梯林斯城墙附近迎接未来国王及其随从的到来，并陪同他们入城。这是一片颜色亮丽、欢快雀跃、人声鼎沸的景象，是12年战争结束以后的胜利庆祝。17岁的奥托身材高挑、修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身穿天蓝色的制服，被轻骑兵簇拥着，后边跟着3位巴伐利亚摄政，这些摄政将在奥托成年以前执掌希腊王国的权力。

希腊革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躬身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科洛科特罗尼斯戴着华美的头盔，好像一直看着别处。马夫罗科扎托斯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厚厚的眼镜，科莱特斯戴着他的红色土耳其毡帽。两人都半转着身，向那位他们从现在起就要效力的统治者投以疑惑和敬畏的目光。这些一直为这片土地的未来筹划的人，现在已经行动起来，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命运的新人。而在路的旁边，是一队骆驼，它们耐心地等着帮主人们驮东西。此后不久，这片景象就被描绘在一幅四米高、两米长的油画上，今天还挂在慕尼黑的美术馆里。这幅画的作者是彼得·冯·赫斯，他当时参加了欢迎宴会。

乔治·芬利是另一位见证者，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希腊革命的历史》中用罕见的一段抒情文字来描述这一盛况。他在将近30年后写道：“不同军队和海军的制服，不同的语言都证明，大多数文明国家派遣代表来参加希腊再生的盛典。”芬利继续回忆，从那时起，人们“都希望希腊第三次焕发活力，再一次在世界上取得灿烂的成就，占据重要的位置”。盛典结束一年后，年轻

的、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用希腊语在自己的小说里描述了亲临现场后的激动。因为事情仅隔一年，所以他无法预知数十年后的情况。他的小说是希腊王国独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发出了激情洋溢的欢呼：

噢，希腊国王！旧的希腊将知识的灯光馈赠给德国。因为您的到来，德国加倍地回馈了那份馈赠，以此表示感谢。您就是那位要复兴地球长子的人。[\[1\]](#)

欧洲欠希腊债务的说法，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旅行者那里就有了，现在更是深入地、真正地进入现代希腊人的意识中了。这种认识会一直流传下去。所以说，欧洲的未来和希腊的未来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希腊获得独立后的一个逻辑上的推论，那么“再生”或“复兴”这两个主题既然在欧洲欠债和未来交织这两个叙事中占主导地位，情况亦然。

那些提着脑袋闹革命并生存下来的希腊领导人成功实施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策略，说服现代最保守的3个强国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3个强国的革命不是自由的、全国的革命（当然是了），而是一种古老时代的复苏。希腊领导人的策略起作用了。在整个欧洲“复苏”的气候下，一个全新的希腊国家的降生可以被看作一个终极的复苏，这种复苏比欧洲现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复苏都古老。

事情并不是这样。在欧洲于1830年承认希腊的独立后，一种新的政体进入欧洲的地缘政治中，那就是民族国家。一年以后，欧洲大陆出现了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利奥波德国王领导下的比利时。这种体制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直到1848年才变得明显起来，因为1848年是欧洲大陆革命风起云涌的一年。只是

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分别进行了成功的“统一”以后，民族国家才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从而荡涤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存在的多国组合而成的帝国模式，而且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依然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方面，希腊是先行者。

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政治氛围下，希腊探索国家体制建设实践的成功依赖于低调的风格。的确，在那个时候，官方叙事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影响大而深，所以欧洲研究国家建设的历史学家对1830年希腊独立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希腊历史学家对此也不愿意多费口舌，因为直到20世纪末，他们几乎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特例，特别古老，因此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新的希腊王国降生后的20年里，孕育了长盛不衰的概念“希腊国家”以及更宽泛的、更难定义的概念“希腊民族国家”。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这些概念。

在西方的目光下

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希腊的第一个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政治的考量所决定的。当然，机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路德维希一世的第二个儿子正好合适。巴伐利亚皇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作为希腊新王国保护人的3个对立的强国，都没有任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选择能被各方接受。对于被选中的人的品行和素质，似乎没有人在意。奥托在年轻的时候被描述为“自负、固执、轻浮”，后来则是“不可救药的优柔寡断”。^[2]不过，在这种形势下，不论哪个人被指定为君王，他都别无选择，

只有边干边学，就像奥托那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国王统治国家近30年，那么他的性格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到底有多大？尽管奥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统治下的希腊要比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治理时期的希腊好得多。毫无疑问，奥托对他移居的国家希腊感情深厚，他在出生地巴伐利亚流放的时候，也穿着希腊的民族服装，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当1832年机遇来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促使巴伐利亚年轻的王子，或者是他的父亲代表他，接受了希腊的王位。此前10年，亲希腊主义就在巴伐利亚泛滥，并进入政府高层，影响了很多国家政策。就这方面来说，巴伐利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亲希腊主义”这个词本来的意义是指“对希腊一切东西的热爱”。希腊革命前，这个词用来指被温克尔曼思想感染的那些人。德国的亲希腊主义主要是指对古典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敬仰。对于希腊古典成就的仰慕，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巴伐利亚当时的首都慕尼黑。如今慕尼黑很多的纪念碑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

路德维希一世对奥托的王国也感兴趣，为奥托指定3个摄政（都是巴伐利亚人）的人就是他。路德维希一世甚至参与希腊王国具体的事务，比如，王宫在雅典的选址。奥托的统治中未设立议会、未实行宪法的决定就出自路德维希一世。1832年的条约的条款对君王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定。考虑到希腊的无法无纪状态以及政治秩序已滑落到绝境，路德维希一世给予了奥托充分的支持——派了3 000人的德国军队，为奥托的赴任保驾护航，并让军队在希腊驻留了好几年。同样，他还让精明强干的几位顾问陪同奥托，帮助奥托站稳脚跟。

在第一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王国与其说是条约里描述的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殖民地。这个特点

被历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确在大众记忆中留下了印痕，给这一时期贴上了一个与其说是慈爱不如说是感伤的标签——“巴伐利亚统治”。但是，这些安排的重要性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如果说殖民统治者的本性是强加给统治对象什么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就是德国的亲希腊主义，这在慕尼黑路德维希一世宫廷里盛行一时。婴儿般的希腊王国刚迈出的几步，是在具有高度保护意识的保姆的照顾下实现的。保姆以自己的生活为示范，认为她照看的孩子应该长成她喜欢的样子。俗话说得好：“保姆懂得最多。”

希腊要变成西方的、欧洲的、现代的国家。但矛盾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要往回转，回到遥远的过去，“要由古人领导现代的人奔向现代化”。^[3]变成现代国家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是，希腊和希腊人不辜负革命期间给他们带来很大帮助的宏大叙事。对此，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大部分精英都认可。新的国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是“希腊”的。我们必须记住，采用“希腊”这个古代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第一次通过的1822年临时宪法实现了国家名字的法定化。不仅如此，这个新的国家还必须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民族”的。

拿破仑战争期间，说德语的人生活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德国几乎已经完整地发展并宣传了民族主义，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思想。不管1833年来希腊的那些人是否在统一德国方面有着同样的激情，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希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试着了解在他们自己国家30年后才出现的那些思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希腊再一次成为先行者，尽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想起那个不怎么让人愉快的比喻“天竺鼠”，特别是在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可以经常听到这个比喻。这就说来话长了。

在奥托成年以前，摄政统治已经为国家军队和国家行政、司

法和教育系统奠定了基础，至少在理论上到达了王国的各个角落。希腊王国要建一个国家银行，已经通过制定政策来处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或穆斯林地主、现在属于“国家”的土地。卡波迪斯特里斯建立的全国货币“凤凰”，被重新命名为“德拉克马”。

很多举措从王国初年就开始实施了，但要开花结果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土地分配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画上句号。德拉克马一直到王国结束后才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传统的奥斯曼帝国的货币。这再次提醒大家，愿望和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但是，决心从一开始就有了，所有国家化的项目最终都能实现。

在所有国家化的项目中，重中之重的是国家军队。在军队方面的大力投入不是为了保护王国的边境安全，因为所有的边境安全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保证。王国的敌人在国内。与此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巴伐利亚人下决心清除军阀割据的地方权力基础和只效忠其头领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在创建国家军队的过程中，他们确定要对王国军队的指挥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也许是一个现代国家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也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能取得结果。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新的国家机构就发展起来了，甚至比巴伐利亚王朝的还要强大，并最终见证了巴伐利亚王朝的覆亡。1843—1974年，希腊的国家军队反复不断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巴伐利亚人10年统治的另一个遗产。

东正教会也国家化了。教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希腊公民与东正教联邦的其他教徒相隔离了。但是，在巴伐利亚人以及在巴黎生活的科拉伊斯等很多希腊爱国者眼里，东正教联邦的领导人，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已经有了污名，因为他们效忠于那个可恶的奥斯曼帝国。教会国家化的措施是有争议的。因为毕竟在希腊革命中，多数战士都是以他们宗教的名义，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对穆斯林的屠杀和驱逐。在雅典的希腊自治教会

和在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之间的正式分裂只是延续到1850年。但即便在今天，雅典和全希腊教会大主教依然对19世纪构成希腊王国的那些地盘实行宗教统治，而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对其余地区实行宗教管理。教会和国家在希腊从来就没有完全分离，这两者之间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希腊革命时期。但是，在巴伐利亚摄政时期，随着1833年“自治的”国家教会的创立，这个认同就变得体制化了。

新王国的认同在把雅典建设成首都的计划中体现得无以复加，其形式的凸显度和长久度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从纳夫普利奥迁都的决定是在1833年做出的。奥斯曼帝国位于雅典的部队在卫城坚固的城堡要塞中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宁愿向巴伐利亚人投降，也不向希腊人投降。新首都的庆典仪式在第二年的12月举行。除了地上的古代神庙，希腊城的大部分建筑都已成为废墟。在希腊革命期间，雅典被希腊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两次，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一次。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现代都市，需要极大的信仰力量。

都市新规划的布局和公共建筑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比例，也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实力。尽管都市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缩水，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出最初的建设雄心有多大。新的城市面貌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提醒，这些基础都是在奥托统治的第一个10年奠定的。新都市不仅有建设的问题，还有保护的问题。选择雅典作为首都的总体考虑是因为它有着众多的、卓越的遗迹以及这座城市在古希腊文明历史（也是所有欧洲国家的文明历史）中的作用。这些废墟、遗迹必须成为焦点。这恰如国家本身。矛盾的是，雅典不仅要变为一个完全现代的城市，还要再现其早就丧失的古代荣耀。因此，保护和采用各种措施全面展示能够体现希腊荣耀的

一切东西，在新政府的规划中占据核心位置。

为达到这个目的，新政府的有关机构在希腊语中引入一个新词，向公民的心中植入了一个新概念。这个词是“考古学”，其词根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对古代的研究”，只是后来才进入西方语言的词汇表中。从语义上说，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完全是一个新词。1833年年初，希腊设立了考古服务局，第二年颁布了第一部考古法律，此后陆续公布实施了一系列考古方面的法律规章。1837年，雅典考古协会成立，《考古学报》创刊。考古学成为将未来规划与展现古代文化联系起来的新科学。截至目前，它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是，考古学也见证了一些毁坏。实现国家复兴，将新的和古代的进行无缝对接，从客观上要求把过去2 000年时间里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所有人类活动痕迹统统抹去。保护古典和建设新城固然好，但更让人痛心的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破坏。

人们常说，在希腊王国的最初几年，为了给新的雅典城市规划让位，几十座精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拜占庭教堂被夷为平地。其实，破坏的程度被夸大了，因为教堂中的“精华”，比如位于厄鲁姆大道上的卡普尼卡里亚教堂就逃脱了厄运。实际上，大多数极端地去除“所有野蛮时代遗迹”的行动都发生在卫城。^[4]王国首都迁都后，城市兴建工作就立即开始了。雅典曾是一座拥挤的城堡，街道、房屋和花园与古代建筑杂乱地拥挤在一起。现在，晚于罗马时代的一切东西都被清除了。地基甚至一直被挖到基岩，也就是今天游客可以走到的位置，那些地方在此前3 000年的人类居住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完整地暴露过。1843年，建在帕特农神庙里面的小清真寺消失了。雅典城里引人注目的地标是14世纪由佛罗伦萨公爵主持建造的法兰西塔，到了1874年，这座塔也不见了踪影。巴伐利亚建筑师利奥·冯·克伦泽主持

推动的都城修建计划，得到了当时主要的希腊知识分子的支持，这让希腊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从19世纪下半叶的照片来看，巨量的建筑垃圾和废料堆砌在卫城的南墙下，等着被运走。当时的卫城被彻底拆除。今天的考古学家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废墟里辨认着那些证据。但是，19世纪30年代的做法就是，城市里的一切威胁很古老的和很新的东西并存的事物都要被清除。

宽阔的、笔直的大道铺设起来了，新的建筑物开始出现，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建筑是王宫，奠基仪式于1836年举行。奥托的王宫坚固魁伟，被有些人比喻成一个兵营，在1842年完工。（今天，希腊议会在这幢建筑物内办公。）紧接着完工的是希腊的第一所大学和天文台。那所大学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是希腊唯一的大学。新的国家的重点在这些建筑中得到完美的体现。除了在1862年建成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大教堂，其他公共建筑物的设计都呈现出了古典风格。包括大教堂在内，这些建筑物都是德国训练的建筑师设计的，其中多数建筑师是德国人或丹麦人。私人建筑也遵循这个原则，从最宏伟的大楼开始建设。那是建成于1842年的王宫广场对面的建筑，后来它成为大不列颠酒店。就这样，虽然新古典主义的楼堂馆所的单个规模比不上王宫，但逐渐在雅典市中心和多数省城如雨后春笋般建成了，主导着希腊的城市风景。20世纪50—70年代，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才被钢筋混凝土大楼取代。

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其设计风格让古典建筑形式得以复兴。但是，它们是在同时代其他国家推动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复兴的精神下实现的。所以，希腊建筑在致敬古代的时候表面上像是欧洲前一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不是说希腊落后了。建筑设计师深知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对本地传统的影响。但是希腊的本地传统直接对应着古代，中间不允许

有任何东西插入。所以，王宫、天文台、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议会（后来的名字）、考古博物馆、理工学院、雅典市剧院以及扎皮翁展览馆等，都必须看起来像那些曾经为古希腊风景带来荣耀的神庙。

新国家的语言也经受了同样的待遇。在这方面，障碍更加难以克服。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而建筑物却没有。语言的反击会在百年的后半叶到来。但是在最初的10年里，希腊王国不遗余力地让国家语言的书写形式看起来尽可能地像古代希腊语言，虽然古代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在词汇、语法和句式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两者的发音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视，因为政府只考虑了语言的书写形式。没有人建议对希腊语的书写系统进行改革，其现代书写形式（今天依然如此）与古代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与建筑物一样，书写是可看见的，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总是最重要的。除了最开始的阶段，后来希腊的建筑师不是德国人，而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希腊人。

1834年，希腊王国颁布实施7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该法律同时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古代希腊语的语法规则，不能按照现代希腊语的规则阅读和书写。很快，古代希腊语不仅在受教育的人中间，而且在各行各业成为时尚，大家都用古代的词汇替代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词汇，用古代的语法规则替代现行的词法和句法规则。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复古从未在19世纪成为官方政策，却是那个世纪初远在巴黎的科拉伊斯积极倡导的——要对一个现代语言进行“修改”，对它进行搽脂抹粉，因为那个现代语言在几百年里已经失去了古典神韵。不论在科拉伊斯的理论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这听起来都像一个美容过程，正如一个世纪后的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所观察到的，这就是在现代建筑上粘贴一些古代的山花。

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为奥托和巴伐利亚人的到来大唱赞美诗的小说家和诗人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在语言复古方面走得更远，宣称要实现“古代希腊语言的复兴”。苏索斯在1853年写的一个小册子中说：“古代希腊的语言和我们自己的语言应该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语法和我们的语法也应该是同一种语法。”^[5]他使用将来时的时态表述这番话，完美地展现了当时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默默地接受看起来即将繁荣复兴的对立面。我们再一次看到，通往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是要复兴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是，这样的复兴道路太漫长了。科拉伊斯自己都承认，复兴一门已经死亡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在语言方面采用的都是科拉伊斯建议的零散式的、化妆式的措施。不久，这种混合式的书写形式（塞菲里斯称之为“雅典科学院的建筑”）就广为人知，且有一个名字“katharevousa”（净化语），直译就是一种“正在纯化、规范”的语言。

所有这些重大的变革都是从上而下的，多数是巴伐利亚人启动的。他们带着欧洲人偏爱古代希腊的先入之见，并利用这些观念为一个功能健全的现代国家奠定基础。那些支持并实施变革措施的希腊人都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他们也希望新的希腊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并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让希腊至少看起来像一个西方国家。就这一点来看，他们与巴伐利亚人是一样的。因此，“希腊民族国家建设”从本质上就变成了“希腊国家建设”。希腊这个民族国家就被定义为希腊国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说即便有人这么想，他们也不总是这么想。

东方地平线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国家建设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一面。这个希腊新王国的机构还应该定义为“民族的”，但是民族国家本身的含义更难确定。国家的地理边界已经确定了，但也是随意确定的。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1832年尘埃落定之前，哪些希腊族人口应该包括在希腊公民之中一直都没有确定。如果以语言、宗教或者两者兼顾为标准，那么大致还有3倍多的可以被称为“希腊人”的人生活在希腊王国的边界之外，比如西边有爱奥尼亚群岛（当时依然是英国的保护领地），北边、南边，特别是东边有奥斯曼帝国。所以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地方，希腊王国的建立被看作未完成的事业。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希腊流行。2013年出版的一本为儿童撰写的通俗希腊革命史的著作的副标题是“从未完成的开始”。[6]

在希腊革命期间，很多人认为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说希腊语的、东正教世界的人都得到解放。数百年来，那个世界历史上的首都一直都是君士坦丁堡，其名字的意思是“君士坦丁的城市”，在希腊语传统中被简称为“城市”。君士坦丁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的所在地。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东正教联邦中，从来都只有一个“城市”。雅典在希腊革命前大约有1.2万人口，从来没有被当作东正教联邦的中心。因此，在1833年第一次讨论将国家首都从纳夫普利奥迁到雅典的时候，资深革命领导人扬尼斯·科莱特斯提出反对意见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希腊唯一可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科莱特斯反驳道：“如果君士坦丁堡不可能成为首都，那么新的希腊就不应该有首都。”在希腊革命爆发5周年时，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纪念活动，人群中异口同声地呼喊口号：“到城市去。”

赢得君士坦丁堡的这个长久的、强烈的愿望可以追溯到1821年的希腊革命以前。从1824年开始，希腊快速发展的新闻媒体对此推波助澜。^[7]1833年以后，对巴伐利亚人的西方化统治最为不满的那些人是所谓的“俄国党”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纳皮斯特”。这些人集聚在资深军阀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儿子根奈奥斯的周围，是那些关于山贼强盗以及后来的山区游击队的歌曲所颂扬的自足自立理想的继承者。他们矢志不渝地把目光投向东方，既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又希望通过谋占奥斯曼帝国的地盘来扩大希腊王国的疆域。

刚开始的时候，新政府下决心给这些人一些颜色瞧瞧。巴伐利亚人抵达希腊7个月后，科洛科特罗尼斯及他的一些追随者就被捕了。1834年，他们被公开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些被判刑的人是最受希腊人尊敬的革命英雄。也许，判决只是奥托所展示的宽宏仁慈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在那些人服刑一年后，奥托就赦免了他们。同时，奥托给予了曾经很自由的新闻媒体严厉的限制。事实上，公审和大度赦免是权势力量的一种展现，但其背后隐藏着10年前内战期间的第一次裂开的缝隙。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随从犯有叛国罪，他们对抗奥托王朝，竭力策动民众，呼吁俄国助其将奥托和摄政驱逐出去。他们甚至还煽动山里的土匪。巴伐利亚人如果要活下来，就必须应对这个威胁。但是，科洛科特罗尼斯一直忠于“民族国家”的理念，这个国家主要是以东正教来定义的，远远超出了希腊国家的范围。

对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逮捕、审判和监禁以最冷冰冰的形式显示了那道裂痕。但是，所有怀着更大、更强烈愿望的人并不都反对巴伐利亚人或他们的建国大业。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的小说用充满热情的笔触描述了奥托的到来，其中一位农民对新国王的

权力表达了单纯的信仰：“他的手一动，就能搅动整个希腊民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克里特岛；他的头一点，就是发起全面革命的信号。”人民群众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而不是以反对者的姿态）纪念1821年的革命，并喊出了“到城市去”的口号。第二年，苏丹驾崩后，奥托本人甚至冒出一个念头，要乘船去君士坦丁堡继承苏丹的王位。这个传言大致如此，当时的一个记录很有可信度。[8]

不久，机会降临，人们再次考虑利用国际政治实现希腊王国扩张的可能性。1839年，马哈穆德的继任者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面临着来自埃及总督的挑战，那个总督就是曾经率大军蹂躏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帮助征服迈索隆吉翁的易卜拉辛。有一段时间的欧洲强国外交处于混乱之中。在雅典，秘密社团不断兴起，都以参与过希腊革命的友谊社为样板，其中一个社团是纳皮斯特，它积极推动与俄国的亲密联系，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科洛科特罗尼斯的儿子是该社团的领导人之一，热爱东正教协会，密谋废黜奥托国王，很快便声名扫地，其中的内幕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热爱东正教协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对相邻奥斯曼帝国行省的秘密战争，从而将其地盘归入希腊的版图中。

此后不久，色萨利和克里特就发生了叛乱。尽管政府对其自由横加制裁，但雅典的新闻媒体达成了罕见的共识，依然给予了战争激情洋溢的支持。在1840年和1841年较短的时间里，克里特至少是具备与希腊实现统一的条件的。当时，欧洲列强的意见不统一，奥斯曼帝国前途未卜，希腊可能会有获得更大地盘的机会。就奥托本人来说，虽然他一开始有点儿手足无措，但一直对希腊王国的开疆拓土投以极大的热情。事实上，这是奥托统治期间为数不多的获得民众欢迎的领域之一。至少当时在首都精英圈

之外发行量不大的一份报纸是这样说的：“我们就姑且信之吧。”

下面发生的就是对奥托及其顾问的警告了。危机又一次在远离希腊的欧洲国家中消失了。1841年，欧洲强国再度走到一起，支持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老政策。奥托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欧洲强国认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协调机制之上，对此感到很失望。但在国内，这恰恰是希腊民众希望他做而他又没有做好的事。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奥托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任何宪法或议会的约束和限制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半殖民地形式的巴伐利亚统治模式要让位于更像本国统治的模式。如果你冒险将传记的类比延伸到如此之远的话，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年幼的王国会本能地投向东方，因为那里有它的母亲。只是这种往东方的转向，引发了变革。

变革是从一次金融危机开始的。随着1832年国民议会事件的解决，希腊背负了6万法郎的新贷款，这是由欧洲强国担保的。从那以后，债务还本付息就成为希腊财政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为了弥补亏空，实现收支相抵，希腊政府每年都被迫申请新的贷款。1843年，在国际危机发生以后，欧洲强国变得严厉起来，不再给希腊新的贷款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是再度聚首，召开了曾经首先保证希腊独立的伦敦会议。无奈绝望之下，奥托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措施，但是马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不过，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843年夏，国王被迫同意屈辱的条件；国家未来税收的一部分要归债权人所有，直接支付给他们在雅典的代理人。而且在350万法郎的经费支出方面，希腊必须厉行节约。希腊的这种处境与其在2015年7月遭遇的所谓第三次紧急援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5年，希腊政府同样被迫将自己的财政自主权拱手交给了欧洲债权人。

欧洲强国1843年的这次出手相救不是针对某个国王，所以

即便奥托不服从命令，它们也会施以援手。只是这次奥托在国内的对手要造反了。9月14日晚，驻扎在雅典的骑兵上尉迪米特里亚斯·凯勒基斯观看葛塔诺·多尼采蒂首次排演的歌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那标志着巴伐利亚人到来以后的10年里，“有文化”的希腊人所发生的变化。）歌剧结束后，上尉回到他的兵营。他犹豫了几分钟，嘟囔了几个词，举起他手中的剑，然后高呼“宪法万岁”。^[9]骑兵和步兵一起大步走到王宫，从一扇窗户里向国王递上了他们的一系列要求。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士兵们递上的诉求来自因奥托独裁统治而靠边站的政客们。但是，将这些诉求付诸实施并确保成功的是军人，而军人正是巴伐利亚人创建的用以维持他们带来的新秩序的那个力量。奥托会保有他的王位，但是说话算数的是军人和政客们。10年的独裁统治走到了终点。希腊要拥有赢得独立后的首部宪法了。根据某些资料，这次政变的第二天（按照现在的历法是9月3日）代表希腊革命的真正结束。雅典市中心的一个主要大街直到今天还以这个日期作为它的名字。王宫前面的那片开阔空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当迷人的名字——“缪斯的花园”，后来被改名为“锡塔玛广场”，也就是“宪法广场”。

1843年11月，来自希腊王国各地的被选代表开始陆续抵达雅典。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844年3月底完成。相较于改变国家治理的方式，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是“伟大理想”。它是在宪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中被提出来的，自那以后就是指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从一开始就被忽略的所有未完成的希望、渴望和愿望。

紧接着的建议是只有出生在希腊王国的人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除了希腊教会自治外，这又在希腊民族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其造成的影响是继续缩小希腊民族的定义，甚至将希腊

局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主持全国国民议会的人是当时已经70岁的科莱特斯，他依然穿着他的家乡伊庇鲁斯山区的褶裥裙，那个地方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其他优秀的议员一样，科莱特斯议长提出那样的建议时，也冒着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自己要告别议会的风险。在时人的眼里，科莱特斯有着准确拿捏公众情绪的本能，并具有将此天赋化为政治优势的技巧。希腊革命期间，他一直是现代化促进者一派在1824年内战中赢得胜利的主要设计师。20年后，他仍然是一位有着令人敬畏的力量的人物。

在1844年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科莱特斯一开始就提到他和很多人（包括已经不在世的人）在希腊革命初期许下的誓言：“这个誓言是为了支持祖国的自由，我们发誓，为了希腊的自由，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牺牲，甚至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他继续阐述祖国在那个时候的世界地位：

从地理位置上看，希腊是欧洲的中心，东方在它的右边，西方在它的左边。通过衰落和覆亡，希腊注定启蒙了西方；但是，希腊要通过再生，来为东方启蒙。这两个使命中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祖先完成的；第二个使命，要由我们来完成。

这番话再一次说明希腊革命的国际维度。在这个世界上，希腊远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地球的中心。科莱特斯继续说道：

根据这个誓言和这个伟大理想的精神，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全权代表们相聚在这儿，这不仅为了决定希腊政权的命运，还为了决定希腊民族的命运。[10]

在定义国家时，科莱特斯远远不是依据国家的地理边界，而是依据当时人们说的国家语言来定义的，他寻求民族的、基于种族的身份认同。这方面事情已经清楚了，不怎么清楚的是，这个身份认同与那个古怪地飘荡在空中的词语“伟大理想”到底怎样联系起来呢？

“伟大理想”这几个字又出现了，这一次我们哀叹“自己已经偏离祖国的伟大理想那么远了，而那个伟大理想，我们知道最先是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歌曲中表达出来的”。这里指的是“战歌”，它是维莱斯汀利斯注定失败的政治规划中唯一被广泛传播的东西。对于这份政治规划，我们要比科莱特斯或与他同时代的人了解得更多。事实上，这首“战歌”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清晰的“祖国理想”。但是，这首战歌的确在奥斯曼帝国不同的人群中传唱。从地理上说，维莱斯汀利斯的“战歌”从贝尔格莱德一直唱到了埃及。当然，维莱斯汀利斯并没有促进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的事业，而是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新世界里，这一点可以轻易地忽略。毕竟，维莱斯汀利斯已经明显地呼吁解放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统治的整个帝国。这一点也被附加到“伟大理想”的含义中了。

“伟大理想”这个词语现在在希腊通常用大写字母来书写，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使命，不仅要“教化”东方，还要扩展国家的边界，从而惠及民族国家所有的成员，而不管他们在哪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这种使命感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不断衰落的、从来没有体制化的“英国党”“法国党”“俄国党”逐渐归于一个新的二元对立，不再是赞成还是反对伟大理想，而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实现它。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在此后的80年里实施“小心翼翼”政策的第一位领导人，他在巩固已取得成果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慢慢扩大帝国的

边界。科莱特斯是根据1844年宪法当选第一位总理的人，他在执政方面的态度更加雄心勃勃，尽管他在议会中的讲话经过精雕细琢而显得很温和。

从科莱特斯1847年去世到20世纪初，“伟大理想”就简化为一个国家扩展计划，扩展的视野注目着东方。为什么年轻的希腊王国长大后要变成一个像它的祖先拜占庭那样的帝国呢？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基督教大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新的国家叙事

在19世纪50年代初，基于西方的希腊国家在融合统一广泛分散的希腊民族国家方面变得更加步履维艰，因为希腊民族大多数仍然被奥斯曼人统治，民族国家的中心地带还属于东方。希腊国家建设所依据的复兴叙事，一下子把希腊中间的2 000多年的历史抹掉了，而民族国家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叙述或政治规划。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规划已经受到了攻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攻击来自巴伐利亚。1830年（在欧洲强国的保证下希腊第一次实现独立的那一年）以及早在巴伐利亚人被任命为希腊第一个国王之前好几年，有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利普·伐尔麦耶的年轻的奥地利教师在慕尼黑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中世纪摩里亚半岛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在6年后出版，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全部书写。这是一段充满论争的历史，是从政治议程的角度写的。伐尔麦耶撰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希腊，因为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希腊这个独立的国家几乎还不存在。让他如鲠在喉的是在他寄居的国家巴伐利亚到处弥漫的亲希腊主

义的氛围。伐尔麦耶试图在他的著作中证实，亲希腊主义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古希腊精神的每一处痕迹、古希腊人的每一滴血迹，都被数百年来罗马人、哥特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伯罗奔尼撒征服者们彻底抹去了。因此，所谓希腊的复兴或再生，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事物了。

伐尔麦耶的理论是无法自证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没有人认为文化是由种族决定的。但是，他的抨击的确击中了希腊国家叙事中的一个薄弱点。当然，实现长久湮灭的古代文明的“复兴”、“再生”或“复苏”，甚至设计建设都城作为古代文明可视的代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有着历史观念的人迟早会问，“现代和古代中间发生了什么”。毕竟，根据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多数历史书籍（包括希腊人自己撰写的历史），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在维奥蒂亚的凯罗尼亚战役中击败希腊城邦联军时，古代文明的光荣时代就结束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38年的事。那时与1821年希腊革命爆发之间，有一个太大的时间缺口，这需要某种解释。

其他历史学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方式。^[11] 尽管雅典的建设和城市规划或者语言改革的计划可以不张扬地、无挂碍地进行，但缺口一旦打开便再也合不上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新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都需要它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打通的不仅有那些“丢失的”世纪，而且更明显的是，希腊民族和希腊国家这两个认同要素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打通。这个缺口或鸿沟不仅是历史上的，还有地理上和观念上的，存在于公元前338年和1821年之间、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以及在对希腊人的两种不同的认识之间。

对此，有两位学者迎难而上，接受了这个挑战，他们来自老

东正教联邦地域的两头。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群岛莱夫卡达的贵族；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则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家人在奥斯曼人1821年的报复中幸存下来，避难于俄国，并在希腊独立后回到希腊生活。这两人都出生于1815年，年轻时在欧洲学习和游历。赞贝利奥斯利用其家族优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依然是英国保护领地的爱奥尼亚群岛首都科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小说家。帕帕里戈普洛斯则不得不自己谋生，早期是中学老师，后从1851年开始在雅典大学担任了40年历史学教授，直到去世。

新的历史就这样形成了，没有任何先兆，几乎是完全建立了起来。完成决定性一步的人是赞贝利奥斯。他于1852年在科孚出版了一本700多页的书，他写道：“希腊文明的选民在神秘地触及并走过那段朦胧的、未被探索的历史后，才将文明的薪火从古代传递到现代，使之来到自由的时代。”这是关于那些“迷失的”世纪的第一次论述。寻找希腊历史有两个路径。这本书的书名是《希腊的民歌》。普罗大众的口头传统直到现在都被希腊人忽视，但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口头传统的研究是寻找希腊历史的一个路径。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希腊口头传唱的民歌。另一个路径是“关于中世纪希腊主义的历史研究”，这个研究对象所占的空间相比第一个路径，就大得多了。因此，口头传统歌谣中的民间的、大众的历史和拜占庭时代的文献记录的历史，共同填补了这个缺口或空白。[12]

希腊的历史思考就这样猛然往前迈进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希腊”突然重生的叙事开始被赞贝利奥斯所称的“希腊主义”“长时段历史”取代。像考古学一样，“希腊主义”是另外一个词，看起来像古代的词，但实际上在当时是新词语，至少从那

以后所具有的含义是新的。希腊精神开始出现于德国的历史书写中。对于将这一术语用于系统阐释基于希腊语言持续性的身份认同这个最重要的概念，赞贝利奥斯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人。在今天的希腊语中，“希腊主义”被定义为“生活在世界上的全部希腊人、希腊民族的总和”，或“希腊文明以及承载那个文明的所有希腊人的总和”。^[13]赞贝利奥斯还是将新命名的“希腊主义”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3个时期的第一人。他宣称，基督教已经“成为希腊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来的“中世纪希腊主义”也是现代希腊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所获得的权利是一样的。他说：“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是中世纪的孩子……我们不能丢掉那个将我们与拜占庭中世纪联系起来的东方特征。”^[14]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综合推论的开始。

帕帕里戈普洛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已经出版了历史著作，其中第一部著作就是对伐尔麦耶的回应。但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读了赞贝利奥斯的书以后，其思想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很薄的书，起了个很平和的书名《儿童版希腊史：从最遥远的古代到现代》。需要指出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第一次讲述的故事的文本只有230页，而且是大字版，遵循的是赞贝利奥斯前一年详述历史的路子。两者不同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对一种设想给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他的故事有始有终（舍弃了民歌的内容，毕竟他是历史学家）。为了让“希腊主义”听起来不那么抽象，帕帕里戈普洛斯讲述的是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且在第一页就非常简洁地给出了定义：“希腊民族国家是所有将希腊语作为自己语言的人的名字。”^[15]

这个历史叙事后来被扩展为五卷本著作，著作于1860—1874年出版。这部巨著不再是儿童读物，而是有着最广大的读

者群的通俗易懂的历史类图书，没有烦琐的文献来源等信息，也没有学术争辩的莫测高深的观点。这部五卷本著作进一步深化和阐述了19世纪50年代初就出现的新思考。帕帕里戈普洛斯还是推动另一种新观念的第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这种新观念在最近几十年的德国历史书写中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这种新观念就是“历史相对论”，它把历史定义为一个过程。进化的理论还没有诞生，但是德国历史相对论从知识方面看与进化理论属于同一个框架，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连续演进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把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时代发展连续过程中的持续叙事来讲述，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独特贡献。他的历史讲述将历史相对论的新视野系统应用于3 000年来保存在希腊语言里的历史记录中。一位现代思想史学家将这一创新盛赞为“19世纪希腊学术最重要的成就”，帕帕里戈普洛斯受之无愧。[16]

在新的研究体系中，“复兴”被“持续”代替。被重新纳入视野进行研究的那些世纪，说希腊语的拜占庭国王统治的时代，那些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尴尬的空白岁月，现在已成为最终被1821年希腊革命和新王国建立证实的几百年历程的组成部分。

帕帕里戈普洛斯在其儿童版著作第一页的简明定义发表以后，一切就随之而来。如果语言是定义民族国家的唯一条件，那么希腊和语言就必然一样古老。扣人心弦的、经久不衰的历史叙事也由此产生，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复杂多变的事变沉浮中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的时候像古典时期和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时期那样取得了胜利，更多的时候成为其他国家胜利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它都一直坚守着“国家品格”，并在严峻的历史熔炉里不断地进行自我磨炼。这是一个大胆的、与时俱进的观念，与“国家历史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书写的”的理论不谋而合。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在1874年就完成了，进而转

入对“伟大理想”这个理论进行必要学术支持的阶段。希腊国家不再与希腊民族的主张相冲突，而是为其做好服务工作。在无限古老的历史框架和极其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希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现有边界以外寻求自己的命运，这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说希腊语的地方。

那时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朝代，年轻的希腊王国的历史将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19世纪50年代，看看那段历史是怎样终结的。

现实的考验

1839年的《伦敦议定书》向希腊国家承诺“完全的独立”。前10年里，在巴伐利亚人的托管之下，希腊并没有体会到完全的独立。随着1843年的暴动，巴伐利亚人的影响结束了。除了国王本人，他的亲属和几个亲近的随从以及其他的巴伐利亚人都被遣送回国了。但是，如果“保姆”被解雇了，为人“父母”的欧洲强国就应该比以前“照料”得更多。19世纪40年代初的事件对奥托和他的大臣来说，应该是一个警醒，因为后面还有更严重的事件等着他们。

伟大理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还没来得及检验，奥托的国家主义就与另一个著名的、更加有权势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个人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是“炮舰外交”的发明者，是英国公民在全世界的权利和自由的坚定实施者。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人，希腊这个小王国根本不是其对手。奥托和英国驻希腊的大使相互憎恶。在希腊的英国人，包括大使自己，一直受到冷漠、傲慢的对待。到了1850年，英国人的几次抱怨终于引起了其国

内的注意，得到了外交部的重视。在向国内抱怨的人中，有一位是历史学家乔治·芬利，他的一些土地被政府征用，用于建设新的王室花园（现在是国家花园），但政府不给予任何补偿。这个花园就在王宫的旁边。

最终激发英国政府采取行动的事件是，在1847年复活节庆典期间，一个犹太商人的家遭到焚掠。唐·帕西菲科在直布罗陀出生，所以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他在自己的家被焚以后要求希腊政府赔偿，但是两年多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帕麦斯顿命令英国皇家海军采取行动。1850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将比雷埃夫斯港口封锁。希腊船长拒绝封锁，所以几艘希腊商船被英国用武力扣押。这一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在法国的斡旋下才得以解决。

唐·帕西菲科事件后来人尽皆知，这是希腊王国遭受的最痛彻心扉的耻辱。奥托和他的大臣再一次希望利用欧洲强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好处。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新情况，因为有一个欧洲强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一事件开了一个丑陋的先例。更难看的是，焚掠帕西菲科家的事件让希腊隐藏的反犹太主义露出水面，从而揭穿了人们通常听到的希腊没有反犹太主义传统的谎言。对此，英国也是有反响的。应议会的要求，帕麦斯顿为自己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最全面的雄辩。不过在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刊载的一幅漫画把希腊描述成失败者，上面写着“你怎么不攻打与你规模相当的国家呢？”^[17]唐·帕西菲科事件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可能正因如此，希腊才相对轻易地过关，同时也因国家小而免于命运变得更坏的惩罚。

3年后，当黎凡特爆发新的国际危机时，这个事件依然让希

希腊人觉得恍如昨日。新的危机起源于俄国和法国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监护权而起的争议。由于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充当裁决人。苏丹站到法国那一边，就相当于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让俄国和奥斯曼这两个多年的宿敌再次进入战争，并于1853年10月宣战。对奥托和希腊政府的很多人以及新闻媒体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在上一次这两个帝国打仗的时候，希腊就从战后的和平条款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那是1829年。现在希腊独立了，支持俄国抗击共同的敌人，对希腊来说是更加自然的事。如果这回把宝押对了，那么希腊一定会再一次获得回报。

到了1853年年底，希腊的非正规部队跨越了边界以北的奥斯曼人控制的地盘。19世纪40年代初发生的危机又重演了，北面的伊庇鲁斯和南面的克里特都发生叛乱，而且都得到了希腊政府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希腊无法得到其他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法国这个时候正在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忙于建立“第二帝国”。在英国，掌权的依然是帕麦斯顿的辉格党。英国和法国共同决定，俄国不能肢解奥斯曼帝国，同时，这个帝国第一次被戴上了“欧洲病夫”的帽子。早在19世纪20年代，马夫罗科扎托斯就竭力说服英国外交大臣相信，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希腊如果站在逐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拥有扩张雄心的俄国之间，就会成为解决“东方问题”最好的方案。1829年，威灵顿公爵曾经差一点儿就让这个方案成为现实。但是，时移世易，时势异也。解决“东方问题”的好方案再一次变成以前采取的措施，那就是让那个“病人”活着。因为那是保持欧洲和平的唯一办法，即便这会使另一个欧洲强国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英国和法国在1854年的春天参战，站在奥斯曼人的一边，很快就派兵登陆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多数战役爆发的地方。在希

腊，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要求奥托宣布中立，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撤回所有的非正规武装。遭到奥托拒绝后，英法向比雷埃夫斯港派遣联合海军舰队，去保护奥斯曼人的侧翼。希腊的这个主要港口又一次被封锁了，而且这一次还被占领了。奥托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他的军队。后来，收拾残局的活儿落到倒霉的马夫罗科扎托斯身上，他是当时最温和的、最具外交智慧的政治领导人，组建了政府，推行了引发众怒的中立政策。

这一次，希腊没有一点儿颜面可以挽回。雪上加霜的是，英法还以1832年条约的条款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明其正当性，这就赋予了它们以武力强行要求希腊每年归还所贷款项60 000法郎本息的权力。1843年，欧洲强国曾威胁要冻结希腊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一直都没有执行。现在，这些强国根据法律条款，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种威胁，那就是入侵行为。希腊王国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在英法两个强国眼里，希腊就是一个还未长大却要求自主的孩子。这两个大人派兵的做法似乎是捏着闹事的年轻人的鼻子说：“翅膀还没长硬，你怎么能乱飞呢？国家都还没有实现收支平衡，怎么能养得起军队去开疆拓土呢？”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在双方的筋疲力尽中结束了，俄国惜败。《巴黎条约》再次确认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对希腊人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伟大理想的实现似乎不可能了。英法联军继续封锁希腊，在占领比雷埃夫斯港之后，封锁又持续了一整年的时间，直到“控制委员会”能够监管希腊债务的最近偿还安排，英法联军才解除封锁。这之后，奥托在民众眼里的威望惨不忍睹，掉到了冰谷里。

这不是奥托的错。夹在群情激奋的国内舆论和两大欧洲强国“不可抗力”的国际势力之间，不论谁领导希腊政府，都很难有

所作为。不过，英法这两大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政策也经不起历史的评价。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

奥托在1836年回德国的旅程中迎娶了来自奥登堡的阿马利娅。20年后，这对夫妻仍然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因此从嫡系上看，奥托一世不会有直接的继承人。此外，奥托是天主教徒，他的王后是路德教徒，两个人都更适应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和服饰，但他们都不愿意皈依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会名义上的首脑属于对立的、传统上不被信任的基督教分支，这个事实一直是很多地方还有不满情绪的根源。这一点让那些亲俄国的“纳皮斯特”尤其感到愤怒，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他们是最为痛苦和焦虑的人。

到了1859年，欧洲协调机制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很快就被证明是致命的。南欧的一个小王国要挑战欧洲强国，且看起来大有占上风的势头。撒丁岛王国和皮埃蒙特王国成为长期酝酿的“意大利统一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的先锋。这次运动的名字是“Risorgimento”，意思是“复兴”。只是，这里要复兴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古代文明——罗马帝国。作为这次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朱塞佩·马志尼年轻的时候在希腊求学，对希腊的“复兴”充满仰慕。在革命早期的关键阶段，意大利得到了法国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与撒丁岛王国精明地结成了联盟。1861年，意大利王国在皮埃蒙特王国的首都都灵宣布成立。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案。意大利王国希望罗马成为首都，不过这要在10年后，待意大利彻底统一的时候，罗马成为首都的愿望才能实现。对任何一位能够读报纸的希腊人而言，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是相似的，意大利的统一历程让他们的眼睛熠熠发光。截至1861年，意大利人已经站到了希腊人1833

年站到的那个位置。新的意大利王国正像希腊王国一样，也把视角投向了那个古代的帝国之都，希望它成为自己未来的首都，毕竟，在过去的1000年里，君士坦丁堡不是一直被称为“新罗马”吗？这好像没有被阻止，那么为什么希腊不能这样做呢？

对奥托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他的王位。虽然希腊人弱小贫困，但能帮助意大利的人也不多，只有一些个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就像意大利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一样。但是奥托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奥地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意大利赢得了统一复兴的斗争，那么这对奥地利的统治是不利的，因为奥地利从1815年就管辖着意大利北部大片的土地。当关键的站队时刻到来的时候，希腊政府站到了奥地利的一边，本来它可以一劳永逸地宣布自己的革命理念以及与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共同拥有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两大“统一”运动风起云涌，标志着多民族帝国的老欧洲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1918年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大陆转折。奥托本可以率领希腊人民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样的话，他的前途就会变得明亮起来。毕竟，希腊人是先行者。不过，在希腊这个多灾多难的小王国所犯的错误中，这个错误也许是最大的。

世事如昨，总是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即便宪法已于1844年生效，奥托也依然没有失去对独裁政府的兴趣。1859年的议会选举受到了很多干预和恐吓。那年夏天，雅典大学的学生中形成了骚动，这标志着一种力量开始进入政治。以后的每一代希腊政治家都不得不应对这种力量。1861年的前几个月，由于拒绝接受最温和的改革，奥托几乎遭到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反对。2月，有位心怀不满的、支持“伟大理想”的狂热大学生，差点儿成功刺杀阿马利娅王后。

1862年年初，纳夫普利奥的卫戍部队爆发骚乱，政治气候不断恶化。到了秋天，国王和王后乘坐游艇，泛舟伯罗奔尼撒海岸，其目的是亲近他们的人民，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当他们乘船向民众示好的时候，有几个省的军人进行反叛。10月22日，致命的一击发生了。就像1843年的叛乱一样，这次反抗巴伐利亚人统治的依然是国家军队，是被巴伐利亚人招募和严格训练的士兵。只是这次，领导造反的不是将军，而是中层的指挥官。第二天，新的“革命政府”在雅典宣布成立。当国王和他的王后乘船返回比雷埃夫斯的时候，他们的船被一艘英国战舰礼貌地拦住了。欧洲3个强国都不支持奥托继续担任国王。就这样，奥托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目送下黯然离开了希腊。

就像奥托的英国死敌帕麦斯顿说得那样，希腊“长大了”。

[18]

帕麦斯顿的断言可能为时尚早。但是，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奥托到底有哪些成就？不论持何种态度，各类证据都相互交叉着，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很多项目在奥托扩张的时代依然在进行。很多中央政治和行政机构还不完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需要进一步强化。但是，从政治上看，奥托就像他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是一个落伍的人。希腊的情况是小国寡民，主权不完全独立。几百年来，在这样的王国中担任具有启蒙思想的专制统治者，曾是德国的君主们所熟悉和适应的，但是到了1833年，这种情况就遇到压力了。30年以后，那些小国君主被集中到一个新的“王国”中，只是这个王国只有名，没有实。在希腊，1822年第一个临时宪法标明的进步政治，在1828年卡波迪斯特里斯上台后就被压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改变这种情况，是下一个王朝非常重要的任务。

希腊的变革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至少对在雅典和其他

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散居在山谷和岛屿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好像没有改变多少。很显然，除了精英阶层能推动变革，其他人都是随波逐流。

19世纪60年代初，精英阶层中的顽强固执的乐观主义和一种神秘的期待更好未来的希望携手并进。“伟大理想”正好为这些希望提供了一个聚焦点。但是，与这些希望并存的，还有公众幻灭、嘲讽以及自怨自艾的暗流。在奥托统治的最后几个月，报纸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的氛围：

希腊曾经是欧洲世界梦寐以求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统一的中心，但是如今的它如此狼狈，被欧洲世界看作一个负担，以及一个实现东方未来的障碍。

这份报纸甚至还指出，希腊“在奔向文明的进程中”，竟然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很多好的东西”。这种阴郁并不是过眼云烟，未能随风散去。整整10年后，在对另一个“危机”的评价中，这种阴郁的氛围再度升起，依然在希腊的上空飘浮：“希腊自从解放后一事无成。”^[19]

这种心灵追寻的内在原因之一，并非源自那些谴责或谩骂，而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希腊王国只是在蹒跚学步，它的老对手奥斯曼帝国却并没有停滞不前。1839—1856年，奥斯曼帝国推动了被统称为“重组”的系列改革，以确保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这个“欧洲病夫”以自己的方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些改革对奥斯曼帝国中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王国的影响或以“伟大理想”的名义所说或所做的，这些教徒人数3倍于希腊人口。法纳尔阶层在1821年爆发的报复行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们就像其先辈一

样，再次受到社会的青睐。东正教徒又一次在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统治下的具有改良主义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中占据了很高的职位。

乔治·芬利在奥托国王被驱逐后不久提出，奥托统治下的希腊最大的失败是，其在革命之后“没有建立起一个人口增长、领土扩张的民族国家……没有形成数百万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之中的希腊人在定居希腊后能享受自由的洪流”。^[20]与此相反，希腊王国的公民却常常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萨洛尼卡等日益现代化的、发展繁荣的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讨生活。直到19世纪70年代，包括雅典和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在内的大都市才开始有了能与其他地方相媲美的发展。

1862年10月，希腊再一次群龙无首。与卡波迪斯特里斯被刺杀以后发生的情况一样，社会秩序的溃败好像一触即发。由于新的历史叙事及伟大理想的普及，希腊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很快稳定了局面。但是，它的未来如何？在“通向现代化”（变得更像西欧那样）的比赛中，谁也说不准哪一方会率先抵达——是老态龙钟的“欧洲病夫”，还是新的“东方模范王国”？因为希腊就要有一个新的国王了。^[21]

[1] George Finlay,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1861), vol. 2, 290–93; Panagiotis Soutsos, *Ο Λαόνδραγο*. [Leander], ed. A. Samouil (Athens: Nefeli, 1996; first published Nafplio, 1834), 130.

[2] Leonard Bower and Gordon Bolitho, *Otho I, King of Greece: A Biography* (London: Selwyn and Blount, 1939), 72; Thomas Gallant,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0.

[3] Alexis Politis, *Ρομαντικά. χρονία. ιδεολογία και νοοτροπία. στην Ελλάδα του 1830–1880* [Romantic Years: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Mnimon, 1993), 108.

[4] Leo von Klenze, speaking on the Acropolis in 1833, cited in Yannis Hamilakis, *The Nation and its Ruins: Antiquity,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1, 89.

[5] Roderick Beaton,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307–8; Peter Mackridge,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reece, 1766–19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2–4.

[6] Athina Kakouri, 1821. *Η αγραχ. που δεν ολοκληγρα.θηχε* (Athens: Patakis, 2013).

[7] John Koliopoulos and Thanos Veremis,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from 1821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rst, 2002), 229.

[8] Soutsos, Α.ανδγραο. [Leander], 101; Elli Skopetea, *Το .πγρα.τυπο βασ.λειο. και η Μεγ.λη Ιδ.α. .ψει. του εθνικο. πγραοβλ.ματο. στην Ελλ.δα (1830–1880)* [The ‘Model Kingdom’ and the Grand Idea: Aspects of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Polytypo, 1988), 274.

[9] John Petropulos,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Kingdom of Greece, 1833–184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445.

[10] *Η τη. τραγ.τη. Σεπτεμβραγ.ου εν Αθ.ναϊ. Εθνικ. Συν.λευσι.. Πραχτιχ.* [The ‘3 September’ National Assembly in Athens: Proceedings.] (Athens, 1844; photographic reprint, Athens and Komotini: A. N. Sakkoulas, 1993), 190–4 (190 quoted).

[11] James Emers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B.C. 146,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Colburn & Bentley, 1830); Johann Wilhelm Zinkeisen, *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Anfange geschichtlicher Kunde bis auf unsere Tage* (Leipzig: Barth, 1832); George Finlay,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 7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7; originally published between 1844 and 1861).

[12] Spyridon Zambelios, *.σματα δημοσιχ. τη. Ελλ.δο.* [Folk Songs of Greece] (Corfu: Ermis, 1852), 5–7 (5 quoted).

[13] G. Babiniotis, *Λεξιχ. τη. ν.α. ελληνιχ.. γλ.σσα.*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Greek Language.], 2nd edn (Athens: Centre for Lexicography, 2002).

[14] Zambelios, *ῶματα δημοτικᾶ*. [Folk Songs], 20, 63–5, 23.

[15] 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 *Ἱστορία τοῦ ἐλληνικοῦ ἔθνους*. [History of the Greek Nation.] (Athens: Koromilas, 1853), 1 (original emphasis).

[16] Paschalis Kitromilides, ‘O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Greek nationalism: Paparrigopoulos, Byzantium and the Great Idea’, in David Ricks and Paul Magdalino (eds),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25–33 (28 quoted).

[17] Dolphus Whitten, ‘The Don Paci.co affair’, *The Historian* 48/2 (1986), 255–67 (260 quoted).

[18] Robert Holland and Diana Markides, *The British and the Hellenes: Struggles for Master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850–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0, citing a letter of 4 November 1862.

[19] Skopetea, *Τὸ πρᾶγ.τυπο βασ.λειο*. [The ‘Model Kingdom’], 240–41, 235.

[20] Finlay, *History*, vol. 2, 382.

[21] Skopetea, *Τὸ πρᾶγ.τυπο βασ.λειο*. [The ‘Model Kingdom’], 162.

第五章

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痛苦

(1862—1897)

1862年年底，没有人能说出下一步谁会坐上希腊已经空缺的王位。希腊公众看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二个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挑选新国王的会议是由曾经废黜奥托国王的临时政府在12月召集的。在将近25万张选票中，95%的人支持阿尔弗雷德王子。这一民意选择让当时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这种对英国突如其来的热情，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在英国出生的君王可能会在统治中比奥托更加尊重议会和宪法。这其中还有爱奥尼亚群岛的因素。10年前，希腊人就心生不满，希望英国结束对爱奥尼亚群岛的领地保护，使其与希腊统一。传言说，在领地保护将近50年后，英国准备放弃了。也许由英国皇室的人担任希腊国王会有助于说服帕麦斯顿爵士领导的政府将爱奥尼亚群岛归还给希腊。若情况真是这样的，那就对了，尽管归还的方式是所有人都无法预见的。

这次选举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只有93个选民希望由本国公民来担任国王，这些选民的人数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奥托后来的人望很低，他的统治还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回忆，但是仅仅两年前才开始实行的选举依然被深深嵌入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君主统治；另一个原则是国家的首脑应该是外来者，远离或超脱于对立激烈的希腊政治生活。这两个原则之间当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只是那要等到20世纪了。

3个为希腊作保的欧洲强国签署了一个约定，约定声明“法国、英国和俄国的王室和皇室成员都不能接受希腊的王冠”。^[1]这个消息传到希腊的时候，希腊选举国王的投票还没有结束。在任何情况下，维多利亚女王都不会让她的儿子去冒风险，重蹈不幸的奥托的覆辙。1863年2月，希腊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英国不允许希腊人选举的阿尔弗雷德王子担任希腊国王。但是，这次选举结果让英国政府有了信心，要为希

希腊选择下一个国王。只不过，英国的选择要经过希腊国民议会的批准。在1832年，国民议会的批准仅仅是一个程序而已，但现在不是了。让希腊国民议会接受英国选择的动力是爱奥尼亚群岛。

这样就只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找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基督徒威廉·费迪南德·阿道夫斯·乔治·格鲁克斯堡是丹麦王子（和哈姆雷特一样），年龄为17岁（也许更年轻些）。他的姐姐是亚历山德拉，将嫁给威尔斯王子爱德华，从而会成为英国的未来王后。威廉（人们一般这样称呼他）和奥托被任命担任希腊国王时的年龄是一样的。早在1862年12月希腊选举的时候，他就是候选人之一，获得了6票。让丹麦皇室的成员担任希腊国王不是希腊人的主意，而是英国政府的想法。在雅典，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深知风是往哪儿刮的。所以，选举结果宣布还不到两个月，甚至在威廉王子还没有正式接受担任国王的邀约时，希腊国民议会就一致同意，选举他作为希腊国王。在丹麦王子的名字中，只有“乔治”可以融入希腊语中，它也是东正教历法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的名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丹麦王子在1863年10月30日踏上他的王国后，希腊就在乔治一世的统治之下了。

乔治一世抵达后，希腊政府就立刻获得了在革命后期被拒绝的一部分自决权力。1864年批准的宪法是希腊议会的成果，20年前，奥托控制了对宪法的修改，此后，他以对自己有利与否为前提随意地操纵宪法。现在，国民议会决定，国王再也无权干涉宪法。乔治一世在上任的第一天发表公开讲话，以誓言约束自己，接受新的国家体制和机制的安排。这一次，国家主权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864年版的宪法比上一个版本更进步的是，将投票权赋予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成年女性获得投票权要等到1952年）。在那个时候，希腊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民主

的体制之一。希腊又一次成为先行者。

希腊的另一个创新是国王头衔的名称，这也是国民议会的成果。奥托加冕皇冠时的称号是“希腊国王”，他的继任者在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就成了“希腊人的国王”。在近20年的时间里，“伟大理想”的进展也就是这一点了。国王称号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法语里几乎不存在，在今天的英语中也不存在。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奥斯曼帝国派驻伦敦的大使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所以他认识到了这一改变的重要性，看到了其中的挑战。虽然新的称号在欧洲强国依然得到了一致通过，但是其官方翻译发生了改变。[\[2\]](#)就这样，欧洲强国在不经意间就通过这个称号赋予了希腊新国王统治整个希腊民族国家的权力。

事实上，在乔治一世执政期间，希腊王国的疆域扩张了。执政第一年，英国履行承诺，在1864年10月让爱奥尼亚群岛成为希腊王国的一部分。英国通过殖民办公室对爱奥尼亚群岛以“领地保护”的名义进行统治，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将爱奥尼亚群岛归还希腊，成为一个世纪以后开始的非殖民化时代的第一次彩排。对希腊来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土边疆扩张开始了。

这半个世纪和新国王的统治时代几乎是重合的。

扩张的政治

乔治一世掌管国家的前途命运那么长时间，而且在任期间没有像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国王那样出现任何大的君臣争斗或政权分裂，但是，这样的一位国王竟然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现

在留存的只有一本他的传记，而且还是100多年前的传记。后人很难评价他的个性，如果后人从留存的他的几封私人信件来判断，那么他可能有点儿平淡无奇。^[3]但是，乔治一世既不是一个空头傀儡，也不是一个独裁统治者。从一开始，他就接受了奥托一直抵制的宪法对王权的限制。但是，他保留了任命政府部长和首相的权力。乔治一世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似乎总是能够不显山露水地把握着“国家之舟”行驶的船舵。他于1867年迎娶了沙皇的侄女奥尔加女大公，确保了王后及未来的继承人将像臣民一样信仰东正教。这样做就一下子解除了困扰前任国王统治的烦恼。从那以后，在王朝关系上，这位希腊国王与希腊的三个保护国中的两个强国的统治家族建立了联系，与奥托总是与这些强国剑拔弩张相比，乔治一世获得的稳定局面是让人艳羡不已的。虽然希腊的这位国王从来没有像那些让他在政令上签字的主要高级官员那样声名显赫，但他也从来不像后来的王位继承人那样引起过激烈争议。因此，我们很难说希腊在这半个世纪的成功和失败，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或归咎于管理这一切的唯一公众人物——国王的身上。

1864—1882年，希腊组建的政府不超过33个，其中几个“联合”政府没有说一不二的首脑。直到1875年，希腊才确定这样一个原则：组建政府的任务由在议会中享有多数支持的领导人负责。即便如此，这个原则并不常用于实践。政党是松散的团体，志趣相近的人组合在一起，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领导人。从希腊革命时起，这一特点就没怎么变过。19世纪70年代，希腊有4个党派，后来有5个党派。第一次出现像两党制那样的体制是在1880年以后，但那也和政党组织没有多大的关系，更多的是看两大对立党派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他们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主导希腊的政治图景，与更早的英国的格莱斯顿和

迪斯雷利一样。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大对立党派的领导人是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时期出现的那道旧裂纹的继承者和保存者。裂纹的这一边是开放的，希望加强与西方的交往；而那一边则是传统的，有着目空一切、自我满足的理想，希望向东方进行扩张。就希腊而言，这不仅源自政治，还源自家族裙带关系。

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妻子的侄子。马夫罗科扎托斯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领袖，在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中，积极推动与欧洲强国的合作，比任何人做的都多。特里库皮斯的父亲是斯拜里顿，在希腊革命期间及以后的长期政府任职中都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忠实支持者，他在伦敦还担任过希腊驻英国大使，长达10多年。特里库皮斯还用希腊语撰写了最权威的有关希腊革命史的书，书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伦敦撰写和出版的。特里库皮斯很像他的姑父马夫罗科扎托斯，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历，曾在他父亲担任大使的大使馆里担任秘书。在那个时代，裙带关系非常普遍，同时，靠此上位而能力总是不及的人也普遍存在。

赛奥佐罗斯·迪里吉安尼斯有一位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叔叔——卡内洛斯·德利吉安尼斯，他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位富有的地主，在希腊革命期间也颇有声望，曾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时他在19世纪20年代内战期间反对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现代化推进者。他们的姓氏在写法上有些不同，标志着两代之间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侄子姓氏中的“Dili”，听起来要比叔叔姓氏中的“Deli”更像古希腊人的姓氏。“Deli”是希腊姓氏中一个常见的前缀，来源于奥斯曼土耳其语。近年来，历史学家为特里库皮斯的事业和思想倾注的精力远远大于对他的政敌的关注。迪里吉安尼斯就像科莱特斯一样，具有很快赢得民众欢心

的天赋。他可以轻易地激发听众的热情，其煽情的方式要比更具知识修养的特里库皮斯的方式更加自然，更远胜于之前的马夫罗科扎托斯。

在这两个人的言论和政治事业中，旧的裂纹的阴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下半叶。但是这一次，意见分歧造成的颤动可以控制在议会系统之内。与以前和以后不同的是，这道旧的裂纹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分裂。议会政敌所领导的党派并没有根据思想意识站队，也没有置身于对事情的对立态度中。特里库皮斯往往被描述为“进步的”，而迪里吉安尼斯则被描述为“保守的”，但是两个人都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的追随者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迪里吉安尼斯被人引用最多的话是“只要是对手支持的，我都反对”。这反映了那个时候希腊党派体系的局限性。

所以，就当时而言，那道裂纹只是在表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和国王的个性以及他发挥宪法作用的方式有关。但是，不管怎样，在对希腊民族国家的本质和目的的认识上，这是一个难得的意见统一的时期。融合了“伟大理想”和新的历史叙事的理论体系在帕帕里戈普洛斯于1874年出版了第五卷《历史》后更加完善了。在乔治一世时代，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扩大疆域，尽最大可能把更多的地盘纳入边界以内。这一目标既作为适度和克制的最大底线反映在特里库皮斯的政策声明里，也反映在迪里吉安尼斯的更富挑战性和更加激进的语调中。1876年的东方危机期间，特里库皮斯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说：“希腊主义的国家思想就是要解放希腊的土地，建立包括全部希腊民族的统一的希腊国家。”^[4]

现在，人们记得特里库皮斯，主要是因为他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富有远见的投入，比如，道路、铁路、港口、科林斯运河等，

以及他将工业化引进到一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今天，人们对他的这一遗产表达的最直观的敬意，是那座长3公里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它优雅地横跨科林斯海湾的入口，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西北部的道路网络连接起来，是在2004年建成通车的。但是，在21世纪，所有国内扩张的目的都是为国外扩张搭建一个跳板，这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希腊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

在1864年和平地将爱奥尼亚群岛纳入本国版图以后，希腊在19世纪末以前进行的新的领土扩张的机会应该不少于4次。历史学家往往会夸大希腊政客在这些关键时刻犯下的错误。但是，希腊政客面对的困难是很大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困难关系到他们当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能提供多少真知灼见以及后来的希腊政府（学会）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式。

在这些困难中，有些是希腊政客们已经熟悉的。欧洲强国的保护一方面确保了希腊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希腊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侵犯。创立国家军队本来是为了恢复国内秩序，现在却废黜了一位国王，军队规划建设从来就不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希腊这个国家资源贫瘠。即便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强行重组以后，希腊依然深陷债务。奥斯曼帝国虽然是“欧洲病夫”，但也许病得并不是那么厉害，反而比希腊大得多、强得多，从三面环伺着这个小王国。

不过，最大的困难是那些新出现的困难，因为它们来自完全意料不到的领域。希腊自1830年以来取得的一切成就，现在被整个欧洲大陆效仿。以民族为界限的国家主义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尽管政客们依然在口头上对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建立的欧洲协调机制表示尊重，但是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人们在19世纪下半叶更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权力平衡”。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各自进行的“统一”活动永远地改变了欧洲的地图。随着普鲁士在军事上击败奥地利和法国，新的德国在1871年横空出世，成为另外一个欧洲强国。一切皆有可能。自从普鲁士人在1871年元月进入巴黎以后，这个新的野心勃勃的民族国家的任何要求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这些事不仅发生在西方。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中，已经赢得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民族，越来越多地以自己定义及治理的方式逐渐向民族国家靠拢。1829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859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多瑙河流域的公国也开始自治，采用了新的名字“罗马尼亚”。在争取独立的人群中，最大的群体是巴尔干山区和黑海内陆地区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他们开始以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要求得到承认，组建自治政府。

在19世纪60年代，希腊是东南欧唯一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但是其他的国家正在效仿它的路子。希腊现在面对的国家对手，大多在20世纪获得独立，它们的起步时间则是19世纪。如果要追溯巴尔干人的“巴尔干化”，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会早于19世纪中叶。[\[5\]](#)

面临这种态势，第一个受害者是东正教联邦。东正教基督世界的精神和文化都在1821年的革命浪潮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同年的报复中遭受了严重打击。1833年以后，这个联邦出现分裂，希腊单方面采取行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现在则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1860年，君士坦丁堡中说保加利亚语的人也提出建立自己的教会。对基督教会的管理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的影响在10年后则显得非常大。1870年3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保加利亚督主教会。为了报复，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两年后开除了保加利亚

督主教会的基督徒。新的、尖锐的宗教对抗因此上演。

保加利亚人并不是唯一的案例。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建立的罗马尼亚公国通过使用瓦拉几亚语积极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从此开始称呼公民为罗马尼亚人。曾经在18世纪统治过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100年的接受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现在变为压迫者，他们因为与当地人的离得更近，接触得更多，所以遭受的憎恨比奥斯曼人还要多。如果正如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和其他人设想的那样，东正教联邦整合成一种政治势力并在决定整个地区的前途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可能性在19世纪60年代就彻底消失了。

正在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俄国的态度。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俄国精英在民族问题上有了新的视角，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列夫·托尔斯泰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是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完成的，这本书将那个时代的态度变化投射到了更早的时候。俄国的国家政策（也被称为“公共同情心”）不再支持东欧的信仰东正教的信徒，而是支持那些说斯拉夫语的人。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应运而生。就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为俄国党的生存提供30多年滋养的希腊民众舆论和政治生活很快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影响了。俄国现在支持的是希腊的对手，而希腊还没有真正面对这些新对手。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唯一的敌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希腊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同心协力决定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一个更像是三维立体国际象棋的规则，这让事情的实施难度变得更大了。

第一个机会出现在1866年。那年9月，克里特国民议会单方面宣布克里特加入希腊，与希腊实现统一。19世纪，在奥斯曼帝国所有的欧洲行省中，克里特是最不稳定的。这个岛上的东正教

徒在1821年的革命之初，就差一点儿实现了统一。他们在1841年再一次造反，最近的一次造反是在1858年。与其他现代革命不同，克里特在19世纪掀起的不下于7次的革命所奋斗的目标不是自治，或自决，而是合并，实现与希腊的统一。克里特的诉求将希腊政府置于艰难的境地。希腊这一次依然延续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做派，蒙上了一块保持中立的遮羞布。但同时，在其后的3年里，希腊的舰船冲破奥斯曼人的封锁，将志愿者和武器弹药运送到克里特岛，将因战事而导致的无家可归的逃难者从克里特岛运出来。

19世纪，希腊非正规武装多次到境外参战，出兵克里特岛仅是其中的一次。在这些人中，一些人是希腊公民，另一些人则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这样的战争是秘密进行的，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即便在希腊国内，也是有争论的。所以，这样做往往导致国内土匪的暴乱，同时也显示了让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希腊政府依然不能对自己国土上的军队进行统一、绝对的领导。惨剧终于在国内发生，那是在克里特岛暴乱结束一年后的1870年，一支来自英国的贵族旅行队伍在距离雅典仅几英里的地方被土匪抢劫，有几位贵族被杀害，这事骇人听闻。从另一方面看，希腊革命初期的几场战役的胜利，是这些非正规的武装游击队赢得的。直到19世纪末，希腊政府和民众对这些非正规武装的态度都充满着矛盾。

克里特叛乱发生以后，欧洲强国一如既往地介入进来。俄国依然处于向其后期政策泛斯拉夫主义转型的时期，所以有一段时间，它是鼓励暴乱的，看起来也支持希腊王国的愿望。在19世纪，希腊第一次且唯一一次在与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地位的巴尔干邻邦建立联盟方面，进行了很认真的尝试，取得的具体成果只有一项，那就是与塞尔维亚签署条约，内容是不管哪方反抗奥斯曼

帝国，另一方都给予支持。这个条约注定是短命的，在解决现在称之为“克里特问题”的难题方面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联盟的形成本身就显示了东南欧政治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希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根据自己的意愿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它的国际关系不再仅仅限于与欧洲强国之间的周旋。先后独立的国家可以在“后院”磋商，互助互利。不过，这种可能性要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

这次叛乱在所有克里特叛乱中是最惨烈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一直持续到1869年年初。那个时候，奥斯曼人已经重新占了上风。欧洲强国再次召集会议，带来了解决方案，从而及时避免了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但丢人的是，希腊政府被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除了接受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确定的条款，别无选择。比起1841年和1854年，这次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希腊扩张领土的第二个机会，差不多在10年之后降临。那时，政局的复杂状况变得更具挑战性。新的东方危机的最早征兆出现于1875年。那年夏天，在巴尔干半岛与希腊对着的另一边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地方性的暴乱。1876年5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同时，保加利亚行省也发生叛乱。在第一轮的对峙中，奥斯曼人获得了胜利。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报复，引起了英国反对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等高层人士的不满，使之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政策。针对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残暴，英国人对基督徒也采用了暴力手段。针对这一点，希腊内部出现很大分歧。

作为共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这些敢于蔑视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而创立自己教会的保加利亚人，从传统的敌手那里争取自

由，这应该得到支持吗？或者，那些保加利亚人是否像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也对希腊和希腊的利益构成了同样的威胁？

1877年4月，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大力捍卫斯拉夫的权利，这是它以前从来没有为希腊做过的。在雅典，秘密社团和公开的委员会再次兴起。很多奥斯曼帝国行省中的希腊领事开始贮备武器弹药，并将其提供给当地信仰基督教的武装分子。志愿者和土匪（两者之间的区别经常不明显）再一次跨过希腊北边的边界，加入俄国人的阵营，攻击奥斯曼帝国的后方。到了1878年年初，即便一向谨慎的乔治一世也考虑发动战争，而且在雅典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希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征兵。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目的，不是帮助有着共同基督教信仰的教友，不管他们是俄国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及不可避免的和平会议进行分赃以前尽可能多地获取奥斯曼人的土地。

1878年2月初，一支25 000多人的希腊军队跨过边境，进入色萨利，只是发现俄国人和奥斯曼人的仗已经打完了。俄国人再一次逼近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恳求和平。希腊军队被紧急召回，没有放一枪一弹。在其他地方，比如，色萨利、马其顿甚至是克里特，希腊志愿者和游击队参加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其间得到雅典城的非官方委员会的支持和煽动。

与战争一样，后来的和平几乎是乱作一团。《圣斯特法诺条约》创建了一个新的、面积很大的保加利亚公国，但是希腊和塞尔维亚什么都没有得到。条约的名字来自君士坦丁堡一个区域的名字。这一次，新的欧洲强国——德国出来说话了。德国国王的外交大臣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首都召集了一个会议。1878年7月的这次柏林会议对原来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进行了修正，条约确定了以后20年东南欧的政治走向。保加利亚的地盘被肢解，分割成两个不同的公国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这两个公国都没

有完全独立。为了认可既成事实，条约同意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国家独立。条约承诺，希腊拥有其原边界以北的土地。这次柏林会议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它们都在以后引发了反响：一个副产品是奥匈帝国有权占有和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另一个副产品是双边协议让奥斯曼帝国赋予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同样的权利。

给希腊的领土的承诺要等到3年以后兑现，因此这一兑现将会大打折扣，而且柏林又举行了新一轮磋商，乔治一世在国内还进行了第二次征兵动员，从而给在前方进行外交磋商的首相提供支持，直到奥斯曼人最终签署协议。参加外交谈判的首相是一向反对战争的特里库皮斯。1881年7月2日，领土问题得以解决，希腊获得了213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位于色萨利和伊庇鲁斯南部。因为这次领土扩张，希腊的肩上首次扛上了管理相当多的穆斯林人口的担子。色萨利是希腊王国19世纪获得的第二块、也是最后一块土地。第一块土地是爱奥尼亚群岛。而色萨利是希腊北部的一块新土地，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的，不是通过战争抢来的，尽管争夺过程非常艰难。

年轻的希腊王国在学习，也在成长。19世纪80年代初，它获得了新的领土，但也增加了新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敌人是新成立的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的背后站着强大的俄国。突然之间，欧洲强国让“欧洲病夫”活着的政策好像不再那么强势了。因此，如果奥斯曼帝国崩塌以及被一个敌对的东正教国家强力接管，那么奥斯曼帝国中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应该怎么办？在1860年以前，这个问题会显得不可理解。而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迫。

保加利亚人为希腊人打开了通向第三个机会的道路。1885年9月，普罗夫迪夫发生了一场革命，单方面将保加利亚和东罗

美利亚这两个不同的公国都纳入索非亚政府的控制之下。塞尔维亚和希腊都把此看作一个威胁。但是希腊这一次没能与保加利亚共享边界，因为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处于两者之间。所以，采取行动的是塞尔维亚，它与保加利亚一样都是斯拉夫国家，只是在行动中被保加利亚彻底打败了。在希腊，迪里吉安尼斯刚刚上台，就发现掉入了被自己滔滔雄辩燃起的战争热情的陷阱。随着敌对状态的减弱，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统一，就差名义上的认可了。迪里吉安尼斯不甘心，竭力想从奥斯曼人那里抢夺土地，以补偿自己。但是，当希腊的军队开到边境前线的时候，迪里吉安尼斯发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部队撤不回来了，这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托国王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两个老牌强国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海军，两个欧洲新贵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1886年5月和6月封锁希腊30天。这一次，希腊注定得不到什么好处。迪里吉安尼斯被迫将政府交给他的死对头特里库皮斯。

19世纪，希腊王国扩张的最后一个机会是在1897年。不过那个时候，特里库皮斯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和军队扩张规划让希腊濒临破产。我们在讨论希腊世纪末如过山车般的胜利和灾难之前，还是先把眼光放远一点儿，看看国家边境以外的地方，探索一下这个国家更广阔的前景，因为希腊国内的很多人当时也是这样做的。

民族国家及其界限

在希望与希腊统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愿望比克里特强烈。“统一或者死亡”曾题写在克里特1866年革命的旗帜上。

这句标语源于希腊1821年战争的口号“自由或者死亡”，只是改动了前一个词。在爱奥尼亚群岛，“统一”一直是进行征兵动员的响亮口号。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克里特的战争都是发生在爱国人民和外国压迫者之间。事实上，克里特25%~40%的人口是穆斯林，这些人有自己的爱国主义。他们是1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克里特人的后裔，对于本土的克里特传统，他们感到很自豪。多数人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的克里特方言，对奥斯曼土耳其语似乎没什么了解。

根据帕帕里戈普洛斯的定义，正如今天所称，“克里特人”应该是“希腊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在19世纪的克里特，人群区分的标准是宗教，而不是语言。与穆斯林一样，克里特人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鼻息，以求保护，他们忠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体制。与残杀或驱逐所有穆斯林的国家进行统一，对他们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在起义造反的克里特人眼里，其他克里特人（尽管他们也说希腊语）就像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官员，都是凶恶的敌人。所以，19世纪的克里特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跨群体的斗争。

从克里特往东，就到了更远的塞浦路斯，那里的情况有点儿特殊。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要比克里特大，大约是80%。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说的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尽管整个塞浦路斯岛通行希腊语。英国在1878年进行的统治，一开始是受欢迎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里第一次有了与希腊统一的呼声，到了20世纪，统一运动形成了汹涌的势头。

安纳托利亚的说希腊语的飞地——蓬托斯和卡帕多西亚，从来就没有多少与希腊统一的愿望。希腊语学校是给富人建的，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到自己是希腊人。对其他人来说，“希腊族的农民和奥斯曼土耳其族的农民都通过自己的信仰，组织和参加

社会活动，根据当地主流的穆斯林统治等级制度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6]那些地方没有多少变革的机会。在卡帕多西亚以及君士坦丁堡，相当多的来自东正教徒社区的人使用希腊字母，但是他们说和写的语言是奥斯曼土耳其语。这些人被称为“卡拉曼里人”。19世纪下半叶，希腊曾尝试说服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希腊人，但是这没有什么效果。在19世纪，这些社区的人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现在依然不清楚。

从安纳托利亚海岸往西，人口的增长和迁徙模式为希腊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侧面。埃登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它包括士麦那。在那里，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这不仅影响了城市，因为士麦那的希腊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最大的族裔；而且影响了农村，特别是沿着铁路网络不断扩张的乡村。同时，其他移民者向美国远行。对很多希腊的穷人来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国家经济不能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有时甚至连他们的生存都不能保证，而如果他们走出国门，就能活下去。19世纪末，对希腊王国的公民来说，“机会的乐土”不仅在东边的奥斯曼帝国，还在西边大西洋的彼岸。

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富裕商业区和埃及首都开罗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商业区来说，尤其是这样。19世纪初，希腊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埃及。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导致了国际市场对埃及棉花需求的极大增长。很多希腊人在那些年赚了钱，比如，本纳基家族。后来，这个家族出了一位杰出的雅典市长，他将自己的私人艺术收藏品捐给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本纳基博物馆。英国地中海舰队轰炸亚历山大里亚后，埃及沦入英国的直接控制之中。在埃及生活的希腊人继续发大财，还经常与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希腊侨民联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新的政治状况，那些希腊人的后裔大多数回到了希

腊。

吸引外来者的另一块热土，是被誉为“世界欲望之都”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这座城市，很多希腊家族寻求可追溯到拜占庭时代的先祖。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占以后，这座城市一直有意吸引东正教徒，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100多万的总人口中，大约1/4的居民是希腊人。^[7]奥斯曼帝国体制启动系列改革后，最先被改革的对象就是这些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是从1839年开始的，而且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势头很猛，其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来自帝国欧洲盟友的压力。

1861年4月，一群优秀的公民在佩拉（今贝伊奥卢）一所时尚的日子里聚首，商讨一个文学社团的创建。佩拉当时是“欧洲人”集聚的地方。虽然引燃希腊革命的友谊社已经过去了40年，但是希腊词汇“协会”依然能造成极度紧张的气氛。所以，文学社团创建者们就必须换一个不同的、听起来没有破坏性的希腊词汇，于是确定了“学会”这个词。就这样，君士坦丁堡希腊教育学会诞生了。^[8]它是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几十个这样的学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会。通过创建、资助和组织学校，这些学会成为在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社区中传播世俗和进步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渠道之一。“民族再生”和“民族责任”的思想能够传播到奥斯曼帝国中所有受过教育的说希腊语的人那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学会。

这些学会通常与希腊国内具有相同志向的人保持密切、友好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是希腊的代理人，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它们都不能公开地这样做。有时候，它们的确会引起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怀疑或敌视。但是，这些怀疑大多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任何根据。孩子的父母在上学和成长的过程中认为自己在希腊文中是

Romioi，在奥斯曼帝国官方的话语中是Rum（意思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臣民），而这些孩子在学校里则被告知，他们是希腊人，是两大古代文明的子孙。但是，在所有的社交方面，他们依然是Rum。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往往不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高官权贵，就是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商贾巨富。当然，负责人不只是这些人。

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多东正教希腊人担任奥斯曼帝国高官，而且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才华横溢，声名显赫，一点儿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法纳尔。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管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他们在后来的国家历史中消失了。在政治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后就没有了继承者。如果他们将个人所思所想诉诸笔墨，那么他们所写的文字还有待于发现。他们中间有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西奥多里斯，也被称为“喀拉蒂奥多利帕夏”。他的父亲是苏丹的私人医生，是教育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的母亲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一门远亲。卡拉西奥多里斯曾两次担任奥斯曼帝国的驻外大使，在其长期的外交生涯中成为最受信任的、最成功的大使之一。作为奥斯曼帝国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的主要代表，他受命参与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从而使条约的多数条款对帝国有利。

奥斯曼帝国驻希腊的历代大使都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这令人称奇。身处雅典的奥斯曼帝国大使在对帝国的忠诚上从没有二心。康斯坦提诺斯·墨索罗斯，也被称为“穆苏鲁斯帕夏”，他是奥斯曼帝国驻英国任期最长的大使，赴任前对乔治一世的新王室头衔提出了反对意见，成功地改变了此头衔在法语里的官方翻译。他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拜占庭希腊语，并于19世纪80年代在伦敦出版。穆苏鲁斯帕夏绝不是希腊王国的朋友，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最有知识的希腊人之一。

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占据优势的领域还有传统的商业以及新兴的金融业。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银行机构是希腊人创立的，其大部分管理人员也是希腊人。苏丹宫廷也与希腊的公司做金融买卖。这是现代化的前沿。这些个人和机构的活动为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提供了金融支持，还资助了有利于家乡发展的项目，比如，学会以及那些学会创办的学校。有些人 and 机构还在希腊进行投资。让特里库皮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为可能的很多“国外”资金，实际上来自奥斯曼帝国富有的希腊人。这些投资活动到底有哪些是在民族团结的理念下被推动的，哪些是在冷冰冰的商业投机中被推动的，这很难说得清。

希腊银行家中最为知名的是安德烈亚斯·辛格洛斯，他通过联姻进入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成为喀拉蒂奥多利帕夏的一门远亲。辛格洛斯在君士坦丁堡赚了很多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金融家之一。然后他在19世纪70年代把自己的家搬到雅典，并在那儿广施善款，成为著名的慈善家，从雅典城中心到海边法利罗的宽阔大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这样成就的希腊人还有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保留着奥斯曼帝国的国籍。虽然可以全球旅行或者到伦敦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定居，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成为希腊王国的子民。

当然，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没有人谈论与希腊的统一。下面是君士坦丁堡一位希腊银行家的观点，他在1861年用法语对一位来访的考古学家说道：

希腊人（东方对独立后的希腊居民的称呼）就是一个个大孩子。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就像他们吃东西一样，他们会认为事情很容易，然后事情就办完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们在君士坦丁堡不需要他们。至少奥斯曼土

耳其人不掺和。[9]

这样的倨傲和坦率非常罕见。但是，我们也能确可以看出，对于希腊王国的“伟大理想”，君士坦丁堡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希腊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在他们心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不是垮塌、被肢解，而是继续和深化从1839年就开始的改革进程。通过这种方式，假以时日，奥斯曼帝国会重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强国。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将凭借其智慧和财富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收获。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在1876年颁布了新的宪法。在参加短命的奥斯曼议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中，有19名代表是希腊族（总数是130人）。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份文件中，有些代表表达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希腊—奥斯曼国家”的愿望。这将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东方大国，包括基督徒、穆斯林，从而成为制衡西方、控制斯拉夫扩张的力量。[10]在过去，希腊人和奥斯曼人这两个对立矛盾的群体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立刻握手言欢。希腊文化（赞贝利奥斯和帕帕里戈普洛斯所定义的）和奥斯曼文化（帝国改革计划所定义的）是能够学会和平共处的。

1878年，奥斯曼帝国被俄国打败，议会解散，宪法搁浅，即便如此，这些想法也依然流传了下来。在随后的30年里，奥斯曼帝国再次回到过去的专制轨道上。不过，虽然帝国守旧，但是至少在1912年以前，很多希腊族个人以及组织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奥斯曼身份认同。他们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臣民，但是在家里以及相互之间是希腊人。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还有一个地区不存在商量的余地。1878年《柏林条约》签订以后，所有的“欧洲奥斯曼土耳其”的

地盘就剩那一块长条的领土了——从君士坦丁堡往西，沿着爱琴海北岸，穿过巴尔干半岛南部，一直到亚得里亚海。不论是希腊语，还是欧洲其他语言，它们都保留了这些地区的古代名字，比如，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

在这些地区的说希腊语的人中，我们很难发现他们对希腊统一这一理想的热情，虽然在这些岛屿中，那份热情在不同的时代都存在过。如果希腊语在这些地区的生活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可能在书面语中被广泛使用，那么它也不过是很多共存了数百年的语言之一。对大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来说，有东正教徒的身份就足够了。那些称呼自己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的压力，几乎都来自外面，到了19世纪末，这种压力不断增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政府以及压力集团收集和发布的证据就不应全信，特别是马其顿的各种利益集团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11\]](#)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希腊和保加利亚组织鼓动当地武装分子，去恐吓村民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古代教会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的教堂以及由保加利亚大主教任命牧师的教堂，成为希腊人的攻击目标。同样，那些遵守希腊祈祷仪式以及效忠于希腊大主教的教堂，则遭到保加利亚大主教支持者的攻击。在有两种语言的社区，这些做法往往是奏效的。为了和平，为了息事宁人，整个村子的人往往会改变信仰，然后过些日子，当另一拨拿着武器的人到来时，他们再改回信仰。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来说，这片土地成为被可怕的选择蹂躏的地方，而那些选择是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的。

由于有这样那样的诉求和反诉求，将要开启的对马其顿的争夺就不像对语言和教育的争夺那样全心全意了。如果人们能够被说服，或者被威逼利诱，用希腊语进行祈祷，并学会用希腊语阅

读、写作，那么他们就被纳入了希腊国家的范围之内。“国家扩张”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们在当时对此如何看待，文献上几乎找不到记载。而那些能够写下自己想法并将其留给子孙后代的人，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因为你一旦拿起笔进行写作，你必然需要选择使用“希腊语”或者“保加利亚语”，因此你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

在城镇以及那个地区最大的城市萨洛尼卡，受过教育的希腊族的确表达过意见。与在君士坦丁堡的人一样，他们因为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制约而必须保持中立。但是，对于对立的东正教民族群体，他们可以尽情地显露鄙夷。这些地区的学会要比奥斯曼首都的学会在政治上活跃得多。比如，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拉德斯托斯，也就是今天的泰基尔达，一个新成立的教育学会于1871年提出宗旨：“如果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立刻行动起来，那么希腊的缪斯就会在短时间内改变生活在这儿的斯拉夫人，使他们从敌人变为教会和希腊文化的淳朴孩子。”学会创立者的目的是将“希腊化”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实现，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因为他们面对的斯拉夫威胁“由于人们知识传播方面的懈怠而变得更加可怕”。^[12]这也同时表明，学会创立者的爱国热情在群众中的根基比他们希望的要浅。

这是一个地方性的计划，但是在这些地区，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这些当地群体组织的活动与雅典的压力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会显得黯然失色。截至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社团是1869年在雅典建立的希腊学术传播协会。在19世纪80年代，雅典的报纸在“来自马其顿”的大标题下定期发表报告和评论。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建议，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完全希腊化”的地区应该独立，而不是被斯拉夫人或奥地利人占领。让马其顿与希腊王国统一的最为强烈的声音不是来自马其顿，而是来自雅典。

[13]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之一，萨洛尼卡正值鼎盛时期。在这个城市中，希腊族的人数少于穆斯林和塞法迪犹太人，其中后者是最大的群体。犹太人仍然说着属于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那是他们的祖先在15世纪末从西班牙撤回时带来的。其他人都是从基督教国家最近的宗教迫害中逃难来的。他们对于融入另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欲望，特别是他们回忆起特里波利斯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1821年被残杀的时候。萨洛尼卡的第一份希腊语报纸在1875年创办。当然，为了遵守奥斯曼帝国的审查，这份报纸的主编积极推动与城市其他社区的友好关系，宣传君士坦丁堡正在兴起的“希腊奥斯曼文化”，而不是宣传雅典的扩张或反保加利亚的政策。[14]

所以，当萨洛尼卡于1908年7月23日爆发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时候，当宪法权利要赋予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希腊族的人与其他人一样兴高采烈，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此次革命之后，马其顿成为锻造20世纪以及更远未来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的熔炉。

胜利和灾难

1893年7月25日，科林斯运河正式开通，乔治一世亲临现场。来到现场的还有安德烈亚斯·辛格洛斯，当承建这个工程的法国公司破产以后，他送来了及时雨，拯救了这个项目。希腊海军的汽船鸣放礼炮。与1833年希腊第一个国王奥托上岸那天的仪式相比，这个竣工仪式不免显得有点儿寒酸。此后不久，这个场面就被在慕尼黑接受艺术培养的希腊画家康斯坦提诺斯·沃拉

纳基斯画在了油画里。爱琴海到爱奥尼亚海、比雷埃夫斯到帕特雷，第一次实现了通航，缩短了100英里的路程，人们再也不必拐个大弯绕行马塔潘角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那片汹涌澎湃的海域。科林斯运河的建设历时将近10年，是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启动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最宏大壮观的一个。

7月的一天，主政希腊公共生活达10年之久的总理，却不和他的办公室里。因为国王在2个月前解除了他的职务，解散了他领导的政府，试图将王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19世纪80年代的10年是疯狂借贷和花费的10年。希腊的债务从独立革命时代就开始了，1878年的债务重构使得希腊第一次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特里库皮斯就任总理职务之初，面临着投资基础设施或军队建设的抉择，结果他两项都选了。他通过借钱使这两个建设同时进行。一位当代评论家指出，经过这10年的大规模建设，希腊实际上已经破产了。[\[15\]](#)

解除造成经济跌宕起伏的设计师的职务，是一个错误决定，国王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外国投资者对刚刚组建的新政府信任不足。那年夏天，紧急关头到来了。科林斯运河入口的礼炮的烟雾还没有散尽，希腊主打的出口产品——无核小葡萄干的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到了11月，特里库皮斯再度担任总理，承担这个恶果。1893年12月22日，他在议会中的发言内容也许是虚构的——“很不幸，我们破产了”，但这件事是真实的。希腊再一次成为国际弃儿，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再一次转移到外国债权者的手中。

希腊倒下了，但是并未出局。就在法国和英国的银行家精明地算计能从一个陷入瘫痪的国家经济中获得哪些回报时，另一位法国人正在酝酿一个几近完成的想法。这位法国人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爵士，他是一位教育改革者，深信体育运动在道德和身体

方面的作用。他的想法在希腊宣布破产前一年就提出来了，那就是重新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际体育竞赛的盛事。1894年，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组建。多亏迪米特利奥斯·维凯拉斯充满激情的慷慨陈词，雅典被选为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城市。维凯拉斯是一位希腊商人和作家，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在伦敦和巴黎度过。

特里库皮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很快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总理办公室。他对举办奥运会提出反对意见，他坚持希腊不投入一分钱。但是，顾拜旦与希腊皇室以及其他名门望族有着良好的关系。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顺利举行，开幕式时间为希腊革命的官方纪念日——1896年3月25日，按照西历是4月6日。那天也是周一，是复活节，象征完美。

现代奥运会的举办非常成功。4天后，从马拉松湾到雅典市中心重建的泛雅典体育场的25英里长跑带来了奥运会的高潮。这是第一个马拉松，是为了重现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战争的辉煌时刻而设计的。（古代没有这样的比赛。）8万多名观众潮水般地涌进体育场，观看曾经是希腊士兵的斯皮里东·路易斯冲过最后的终点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马拉松冠军。路易斯快到终点的时候，两位皇室王子康斯坦丁和乔治从他们爸爸的身边跑过去，与路易斯一起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是比国王大不了几岁的王国的胜利时刻。第二天，远在法国地中海度假胜地戛纳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去世了。

从某些方面看，雅典奥运会的胜利要归功于希腊王国的最初几年的建设。雅典新旧结合的城市面貌依然在塑造之中，重建的体育场是最新的建筑，城市建设的规划是由19世纪30年代德国建筑师做出的。外国游客看到新东西在古老基础上的无缝叠加后，无不感到震撼。奥运会的复兴和希腊的复兴可以看作两位一

体，完全是一个东西。希腊革命以及巴伐利亚人带来的亲希腊的王国蓝图所启动的进程的顶点就是复兴。

但是在19世纪末，现实还得继续，复兴还没有实现。希腊人对他们古代遗产的强烈自豪感一点儿都没有减少，但是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国家看作实施复兴行动的国家，也不再像顾拜旦和第一届国际奥委会真正相信的那样，认为他们设计的这个现代盛会将重现希腊古代体育运动的竞赛。赞贝利奥斯和帕帕里戈普洛斯已经填补了将现代和古典分开的时代空白。拜占庭被重新发现。现在，对希腊民族国家来说，一厢情愿地实施复兴行动是不够的，更不用说从来没有很好地、欢欣鼓舞地实施过。不管奥运会的复兴对世界体育意味着什么，对希腊来说，它意味着对一个复兴的复兴，是对60年前就臻于成熟的思想的具体化。

即便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希腊王国以外的地方，比如，它的北方和南方，跨区域之间的暴力依然难以控制。在马其顿，拿着武器的说希腊语、说保加利亚语的基督徒之间发生了冲突，以暴力恐吓群众，让群众在他们之间站队。在克里特，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和说希腊语的穆斯林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在这两个地区，相互间的谋杀每天都在发生。乡村地区已经变得难以治理。在希腊，影响公众情绪的不是对受害者的人道主义关心，而是对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目标被对手抢夺的担忧。当欧洲强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特问题上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时，那个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成为希腊一部分的“大岛”好像就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希腊的视线，最终从希腊的手里滑落了。如果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占了上风，那么希腊人可能就永远地丧失了那里的土地和民众。

面对这些危险，为了未雨绸缪，一群年轻的军官在1894年年底模仿曾经的友谊社，创建了另一个秘密社团。这个社团是民族协会，从兵营和隐蔽处应时而生，成立不久就成为一个颇有影

响的压力集团。它的会长是与军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雅典大学的校长、著作等身的拜占庭历史学家、王储的导师，（极有可能的）未来总理。1896年10月，民族协会公开化了，通过新闻媒体募集资金，支持非正规的军事行动，甚至对国王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其他社团显得更隐蔽，也显得更加安静，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奥运会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伟大理想”看起来真的要实现了。19世纪的最后一个月已经到来了。

这个时候，迪里吉安尼斯再度执政，但是在1897年的最初几个月酝酿出来的公众情绪，即便这位老练的平民主义者也掌控不了了。由于奥运会马拉松项目的胜利历历在目，所以人们要取得胜利的欲望非常强烈。克里特倒是相对平静，不过其在前年的春天和夏天刚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岛的暴力事件。欧洲强国再一次出手，与奥斯曼帝国一起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方案实施得并不是特别好。到了1897年2月，希腊采取了行动，这是革命以来任何一届政府也没有公开进行过的。

在国王的次子乔治王子的率领下，一个小型舰队全副武装地从比雷埃夫斯驶往克里特当时的首府哈尼亚，用了不到24个小时就上岸了。3天后，希腊远征军登陆。乔治国王的侍从武官迪莫利翁·瓦索斯上校宣布，以乔治一世的名义对克里特进行军事占领。在苏丹的同意下，克里特的控制权转给了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不过，希腊这次遇到的小挫折并没有浇灭民族协会的热情，因为革命热情已经影响了王室、新闻媒体、军队以及一开始谨小慎微的政府。雅典到处是激奋的群众示威游行。所有阶层的人都来到大街上，要求宣战。这幅景象就像1914年很多西欧城市所发生情况的预演。1897年3月，45 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部署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边界的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统率这支军事力

量的人是王储康斯坦丁，他曾在半年多前陪伴着马拉松冠军一起向终点冲刺。希腊非正规武装对奥斯曼领土的袭击促使苏丹在4月17日向希腊宣战。

1897年的战争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希腊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能力上，都远逊于最近接受过德国训练并配备帝国武器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位未来国王以及他的随行官员所展示的领导能力受到特别尖锐的批评。希腊军队大溃败。得胜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捣希腊领土的腹地。希腊的拉里萨和蒂尔纳沃斯及其在沃洛斯的前沿作战基地都落入奥斯曼人之手。色萨利遭到蹂躏，10万多名难民流离失所。1881年之前的边界以内的第一个城池拉米亚，也被希腊军队弃守了，因为希腊军队一直往南撤退，希望在古战场温泉关附近进行最后的抵抗。

欧洲强国的又一次干预挽救了康斯坦丁和他率领的部队，使他们避免经历最后的生死考验。欧洲强国的磋商一直持续到年底，其间，苏丹被要求放弃他的军队取得的所有成果，从而换取一笔巨额赔偿以及边界的些微调整。在莫纳斯提尔（今北马其顿共和国比托拉）的奥斯曼军事学校受训的一位17岁的学员，对欧洲强国的横加干涉有着强烈的挫败感。据说，他从此痛苦地认识到：“如果奥斯曼帝国赢得胜利，欧洲列强就出来干涉；但如果失败了，它们就不管了。”这位军校学员的名字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阿塔土克，他是“现代土耳其国家之父”。^[16]这次短暂的战斗结果所决定的，不只有希腊的命运。

在1897年的崩溃中，还有一个认识需要明确。保证希腊独立的协议签署了快70年了，现在依然奏效。希腊这个国家的存在，从来都不只是希腊人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他们自己能保卫的。现在，随着19世纪末的到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论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是在决定欧洲大陆未来的几个强国那

里，希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保证。不管20世纪的“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希腊肯定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爱国的新一代奥斯曼官员来说，这个现实不管有多么让他们愤慨，他们都不可能通过武力来改变希腊革命以及随后几十年取得的成就。

即便如此，鉴于以前发生的和以后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希腊这次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希腊财政破产，对苏丹的赔款只能由欧洲强国来支付。为了归还这笔资金和其他的巨额债务，欧洲强国在第二年成立了国际金融委员会，这是从希腊政府的控制下夺取国家经济的有效一步。希腊独立以后，这种事已经发生3次了，而这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对希腊来说，1897年的这次失败紧随1893年的破产，是对19世纪国家颜面的一次最大羞辱。对年轻的国王来说，在所有的教训中，最痛彻心扉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现实：虽然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它既没有军事实力，又没有经济实力。

1897年的灾难是对特里库皮斯政策的死后辩护。^[17]就其本身来说，这么大规模的灾难即便证明了某种事情的正确，这种正确也是很怪异的。希腊国家唯一的进展是克里特在第二年成为一个自治的公国，受到欧洲强国的保护，由乔治王子担任首脑。在随后的岁月里，特里库皮斯启动实施的很多项目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在1912年和1913年带来的回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随后15年里的更大的胜利以及更坏的灾难证明，1897年所揭示的那个痛苦的现实，就像物理学定律那样是不可改变的。

^[1] George Finlay,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 7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7), vol. 7, 281.

^[2] Eleutherios Prevelaki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Change of Dynasty in*

Greece (Athens: n.p., 1953), 167–8; facsimile treaties in J. M. Wagstaff (ed.), *Greece: Ethnicity and So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8–90. The Greek title,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1863 and in use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fter that, is Βασιλευ.. των Ελλ.νων.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was emended from *Roi des Grecs* to *Roi des Hellènes*.

[3] Walter Christmas, *King George of Greece* (New York: McBride, Nast, 1914); Aristeia Papanikolaou-Kristensen (ed. and trans.), *.Φ.λ.α.τ.α.τ.ε. Επιστολ... απ. την Ελλ.δα 1897–1913* [“Dear . . .”: Letters from Greece 1897–1913] (Athens: Ermis, 2006).

[4] Konstantinos Svolopoulos, ‘Η εξωτερικ. πολιτικ. του ΧαΤριλαου ΤΤρικου.πη. ΔιαχΤρονικ. θε.Τρηση’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arilaos Trikoupis: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n Kaiti Aroni-Tsichli and Lydia Tricha (eds), *Ο Χαγρα.λαο. Τγραixo.πη. και η εποχ. του* [Charilaos Trikoupis and his Times.] (Athens: Papazisis, 2000), 28.

[5] Mark Mazower, *The Balka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0), 1–4.

[6] Gerasimos Augustinos, *The Greeks of Asia Mino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9.

[7] Konstantinos Svolopoulos, *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η 1856–1908. Η ακμ. του Ελληνισμο. [Constantinople 1856–1908: The High Point of Hellenism]* (Athens: Ekdotiki Athinon, 1994), 37–8.

[8] George Vassiadis, *The Syllogos Movement of Constantinople and Ottoman Greek Education, 1861–1923* (Athens: Centre for Asia Minor Studies, 2007), 55–6.

[9] Alexis Politis, *Ρομαντικ. χγρα.νια. Ιδεολογ.ε. και νοοτγραοπ.ε. στην Ελλ.δα του 1830–1880* [Romantic Years: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Mnimon, 1993), 103–4, quoting in Greek translation Georges Perrot, *Souvenirs d’un voyage en Asie Mineure* (Paris, 1864), 11.

[10] Hasan Kayal, ‘Elections and the electoral proces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19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7/3 (1995), 265–86 (see 266–7); Alexandros Alexandris, ‘Οι .λληνε. στην υπηΤρεσι.α τη. Οθωμανικ.. αυτοχΤρατοΤρι.α. 1850–1922’ [‘Greeks in the servi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50–1922’], Δελτ.ον τη. Ιστοραγικ.. και Εθνολογικ.. Εταιραγ-ε.α. τη. Ελλ.δο.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and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Greece.] 23 (1980), 378–9, citing a letter from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era to Lord Salisbury, December 1876.

[11] See Thomas Gallant,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0–71, for a compilation of competing census data from the period; see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269, for what are probably the most accurate figures.

[12] Augustinos, *Greeks*, 241, cf. 197, citing in translation letters from the Educational Society of Raideustos to the Hellenic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Constantinople, dated 1871 and 1872.

[13] Vasilis Gounaris, *Τα Βαλκ.νια των Ελλ.νων. Απ. το Διαφωτισμ. .ω. τον Α. Παγχ.σμο Π.λεμο* [The Balkans of the Greek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Thessaloniki: Epikentro, 2007), 403–4.

[14] Mazower, *Salonica*, 245.

[15]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207, citing a speech to parliament in 1894.

[16] Andrew Mango, *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42–3.

[17]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230–33.

第六章
军事行动
(1897—1913)

在雅典和整个希腊王国，这次失败带来的震荡是深远的，将持续数年。与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遭受的失败相比，1897年的失败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还是很有限的。但是，宣扬了半个世纪的一整套论断突然之间受到了质疑。每个人都在找替罪羊，就连国王和王室也以那些奥托国王统治最后几年里听到的种种诽谤中伤的话来开脱。乔治一世和他的王子们能这样做吗？希腊所有的机构都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之中。公民群体的心灵追寻以及自我憎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在这出大戏里，只有一个角色免于责备，正如一位战争辩解者所说的：“被打败的是希腊国家，不是希腊民族。”^[1]

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可以自由扩展的。这个超领土的实体看起来越是受威胁，越是不可触及，由失败而激发的各种想象就越令人激情澎湃。一位热情洋溢、能言善辩、年轻的外交家、激进主义分子、作家、日记作者、社会人物以及未来政治暗杀的受害者全力支持这种新的态度。他的名字是伊万·德拉库米。1897年，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将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的关系比作衣服和穿衣服的人之间的关系。希腊这个民族在其3 000年的历史中穿过很多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外衣。现在的王国穿的是最新的制服，但所有的衣服都是过渡性的，最终都会被替代。真正重要的是穿衣服的人，也就是希腊民族。^[2]

在进入20世纪之前，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从来没有那么远距离地分开过，或者从来没有如此艰难地融合统一：希腊国家实力太弱，根本不能扩展；希腊民族在物理上太分散，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从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能实现作为“伟大理想”的统一的国家。没有人能预见这两个观念对希腊人来说意味着怎样的致命争斗，或者说最终将几近全部的希腊民族纳入同时期大大扩张的希腊国家边界之内会引发怎样的冲突。

国内的颓废

1900年的雅典是一个充满极端对比的地方。自1834年成为首都以来，雅典的人口增长了9倍多，从大约12 000增加到超过120 000。在它未与比雷埃夫斯港口连在一起时，比雷埃夫斯港口在同一时期的人口从0增加到50 000左右。即便如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口两地的居民总数也不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1/5，不到士麦那的1/4。雅典市中心有宽阔的大道，精致优雅的开阔空间——两边坐落着新古典风格的科学院、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宏伟建筑，中间是川流不息的六车道。绅士、淑女穿着西方最新款式的时装，可以徜徉在大道两边，或者坐在一位美国游客描述的“像巴黎咖啡馆一样”的咖啡馆外面，欣赏由马拉动的公交车缓缓驶过。那个时候的照片以及在巴黎接受过训练的印象派画家保罗·马蒂奥波洛斯的作品都传达着“优雅、高贵和满足”的气息。

[3]

但是，仅仅在几百米之外的雅典城的西边，就是贫民窟，数百名从乡村来城市找工作的单身年轻人在那里居住。19世纪80年代以来，雅典的暴力犯罪规模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的首都城市。据估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谋杀案数量比同时期伦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多50多倍。[4]暴力甚至发生在国家的最高层。1898年，国王本人差点儿被刺杀。迪里吉安尼斯就没有国王那么幸运了。因为1897年的失败，迪里吉安尼斯被迫辞职，后于1905年重新上台。他在议会的台阶上被刺身亡。杀手是一名专业赌徒，对政府宣布的限制赌场的措施深感不满。这些措施的实施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那时的社会普遍存在黄、赌、毒现象。

普西里区等地、提塞翁等古代神庙以及比雷埃夫斯港口，滋

生蔓延着吸食大麻的毒窝、妓院和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组织。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在山区、岛屿的小社区中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而形成的，现在则要适应新的城市下层阶级的穷困环境。男性英雄主义依然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而且基于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荣耀。但是，这儿的“英雄”已变成草寇或流氓，这些人靠自己的小聪明混迹于社会，除了憎恶有钱人和鄙视顺从的、以自己诚实劳动讨生活的人，什么也不干。草寇们的做派一般是蔑视权贵，他们出刀迅速，在复仇方面冷酷无情。他们能吸食大麻，纵情豪饮，同时还要时刻保持农村祖先遗传给自己的强大的自控力。对于女人，他们会逢场作戏，显得若无其事，有时会采用暴力、压榨手段，从而有意地显示自己的冷漠和性能力。这样的黑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一方面是作为逃避被发现的暗号，另一方面也是加强组织团结的形式。

在临时的大麻毒品窝、酒馆以及被称为“阿曼咖啡馆”的具有东方情调的咖啡馆里，来自黑社会的男人会用歌曲来表达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傲慢和忧伤。歌曲通常用一种当地改造过的土耳其长脖子鲁特琴演奏，这种鲁特琴也叫“萨兹”，在希腊语里被称为“布祖基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雷贝蒂卡”的音乐和歌曲文化的初始。这一文化现象看起来神秘莫测，在希腊和其他国家备受推崇。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类音乐就被看作能与美国蓝调相媲美的希腊蓝调。孕育这一蓝调的传统和城市黑社会既被国家主义者厌恶，又因显露出内敛和失败主义而被左派鄙弃。那个时候，雷贝蒂卡传统中的最早的歌曲都是某种更宽泛的暴力、犯罪和绝望等氛围的征兆和特别的展现，这种氛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想象的，弥漫于世纪之交的希腊首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个新的目的地向正在寻找工作的希腊年

轻人敞开怀抱。不少人在那里找到了比在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萨洛尼卡等奥斯曼大都市工作还好的机会。现在，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创建说希腊语的社区。去往美国的人数最多，这些人把希腊底层社会的歌曲也带到了美国。由于唱片业快速发展，纽约和芝加哥为雷贝蒂卡的商业成功奠定了基础。希腊的移民高峰是在1907年，移民人口达到36 000，他们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单身男青年。[5]

希腊社会群体的另一个对立面是那些年还出现了其他更加需要知识以及审美的人生通道。在万马齐喑可哀的时代，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寻求其他东西来逃离曾经的宿命。这就是第一个妇女运动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妇女被严格地禁锢在家庭里，总是被隔离在男人世界之外。《妇女杂志》于1887年在雅典创办，发行了20年，其编辑、撰稿人以及读者都是妇女。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卡利罗·帕伦是希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第一位终身写作的女作家。杂志的很多社论呼吁政治改革，比如将投票权等权利赋予妇女，直到半个世纪后，妇女才拥有投票权。1897年的战争及其造成的影响为妇女运动增加了动力，因为很多妇女在战争中充当护士，或在慈善组织里工作。[6]

1900年以后，其他的代表新思想的著作从法国传播到希腊，其中就有法国翻译的德国哲学著作，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著作的节选。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在希腊得到宣传。希腊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1902年，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团体成立了，并在1907年发表了宣言。[7]在法国，那个时期被称为“世纪末”时代，正在兴起所谓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等运动。这些运动的拥趸赋予艺术和个人享乐至高无上的价值，从而导致人们厌倦或憎恶现实世界。这些态度与1897年希腊战败以后的雅典受教育的年轻人一拍即合。1906

年，雅典大学一个22岁的学生以卡马·尼尔瓦米的化名出版了一部小说，他似乎很推崇这种态度。这部小说名为《蛇与百合花》，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的故事。这对情人宁可自杀，宁可在充满异国情调的鲜花的肉欲芳香中窒息而死，也不愿意过世俗眼里圆满幸福的爱情生活。小说出版后，这个学生紧接着发表了一篇论辩文章，对小说主人公的症结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根源可以被描述为早期从法语中翻译过来的术语“世纪病”。又过了很长时间，二战以后，这部小说的作者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作品，创作了《希腊人佐尔巴斯》和《基督最后的诱惑》，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就是希腊的文学天才尼科斯·卡赞扎基斯。

生活好像在效仿艺术。这个“世纪病”吞噬着希腊。几年后，雅典第一公墓真的发生了一对年轻恋人的自杀事件，这引发了公众关注，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被称为“希腊开自杀风潮的先声”。^[8]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希腊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猛然增加的自杀率类似。但是，100年前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些人好像是被一种确定自我个性的急迫感驱使，这在某种形式上与他们所在地区的草寇的反社会行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中，自我毁灭都需要在舞台上呈现，而且是以一种美学上的审美行为来呈现。

在另一个高冷的事件中，艺术和生活以一种怪异、悲剧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伯里克利斯·贾诺波洛斯是一位报纸专栏作者和散文家。1910年4月，他40岁，穿着一套白色法兰绒西装，戴着白色的手套，骑着一匹马，疾驰着冲向大海。在海深处，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两周后，他的尸体被发现。自杀前不久，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对“希腊精神”或“希腊性”大加赞赏。在贾诺波洛斯看来，做一名希腊人就是做一名人类的成员。但是，好像只有希腊人才完全具备人类的这个品质，

因为：

希腊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对宇宙的人性教化。[\[9\]](#)

贾诺波洛斯在很多方面都与他同时代的德拉库米不同，但是对于在20世纪初经历的极端对立的雅典生活，他们都做出了反应。他们深受肇端于1897年的失败主义气候的影响，似乎一生都没有摆脱失败主义的阴霾。不论解决方案有多么极端，他们都像飞蛾扑火一样寻求那些关于民族主义、艺术和美学的思想。贾诺波洛斯对古典希腊的精神肃然起敬，德拉库米则更欣赏神秘莫测的“民族灵魂”。但是，这些思想本身以及在德拉库米眼里的行动，都是从两个人极度猜疑的西欧传播而来的。他们对希腊民族国家的理解不是源于古希腊，而是源于法国查尔斯·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鼓吹的当代神秘民族主义。这就是德拉库米于1913年提出“民族是新的宗教”论断的根源。[\[10\]](#)贾诺波洛斯的死亡风格直接来自巴黎文学和知识圈的核心。这些思想和行动与雅典的咖啡馆、宽敞大道和公共马车及其在印象派画家保罗·马蒂奥波洛斯油画中的迷离而朦胧的招魂，都是契合的。

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公众生活中有更多的、传统上的不满。1906年以前，短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特里库皮斯和迪里吉安尼斯崛起之前、乔治一世统治初期那样，反对党派动辄进行阻挠。报纸社论大声疾呼“民族危机”“国将不国”。

1901年和1903年的有组织政治抗议出现暴力升级，致使雅典死了几个人。人们上街示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希腊语言问题。早在1888年，语言学家扬尼斯·萨卡利斯就强烈呼吁，将希腊的口语或“通俗”语言作为国家正式的书面语言。萨卡

利斯是第一个提出“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的人。的确如此。支持他的激进思想的人开始用日常通用的希腊语的形式来翻译一系列基督教福音典籍，这种行为既冒犯了传统的宗教感情，也让传统的民族主义情感难以被接受。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卫城报》刊载的那些翻译后的文章，足以引发大学生的骚乱——搜查报社的办公室，砸坏印刷的机器。两年后，一部古典希腊悲剧的译作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只不过规模要相对小一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街闹事的都是有着保守思想的学生，而且受到一些教授的纵容和教唆。在这个新的、躁动不安的氛围中，任何威胁国家统一理想的事情，都会激发人们的狂躁情绪。现在，在公共场合下选择使用哪种形式的希腊语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证明一个人对国家的信仰。如果你是通俗语言的使用者，那么你会重视希腊语的口语形式，并把它作为国家“灵魂”的栖息地。如果你属于对立的阵营，那么你会看到，古典希腊语言任何向现代希腊语言的让步都会被当作对希腊人天赋权利的背叛。

不过，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并不都是坏消息。在1897年以后的15年时间里，经济得到强力复苏。国际金融委员会对希腊财政进行了严格监管。20世纪初期，希腊经济走向的预期甚至需要调高，这与2010年后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体上说，进入20世纪，希腊人的生活要比他们的父辈好。教育上，特里库皮斯20年前就开始推动的教育普及逐渐见到效果。截至1907年，超过40%的8岁以上的人口可以读书写字，这是30年前的两倍。考虑到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少，这个数据可能意味着，希腊王国中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就脱掉了文盲的帽子。[\[11\]](#)

但是不久后，改变整个地区面貌的活跃力量不是在希腊的国

境之内，而是在国境之外。

国外的行动

在南方的克里特岛，占人口大多数的基督教徒与往常一样，坚定地追求与希腊的统一。不管希腊的自信在国内受到多大的打击，这种悲伤的情绪好像从来没有越过克里特海。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对此毫不介意，他们可能是在1897年的战争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人群。从名义上看，克里特公国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欧洲强国的坚持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1898年就撤走了。同时，一支由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负责维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在雅典的希腊政府对于遭受的失败依然记忆犹新，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希腊没有哪届政府会冒险接受克里特与希腊统一的诉求，尽管每一届希腊政府都非常渴望统一。

所以，实现统一的路就只有靠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自己来走了。1905年，作为克里特岛的统治者，乔治王子与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极度疏离，以致有些人和他们的武装支持者占据、封锁了白山脚下的村庄塞里索斯，不准人进入。最后，塞里索斯叛乱得到和平解决，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乔治王子为此丢掉了他的职务。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一位40岁的律师，来自哈尼亚，在1897年的叛乱中第一次崭露头角。这次叛乱标志着克里特在通向最终与希腊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也标志着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政治生涯的起步。维尼泽洛斯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且最具争议的政治家。

在另一个方向，马其顿变成了一座慢慢喷发的火山。在这个

地区，奥斯曼人依然掌权，尽管不能对地区进行完全控制。说希腊语的人和说斯拉夫语的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加剧了。现在，希腊人不得不在整个地区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两个方面的力量争夺当地人群对希腊国家意识的认同。有些说斯拉夫语的人甚至还积极推动马其顿独立运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不像其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更倾向于支持保加利亚，而且其方法都是极端革命性的。1903年4月，这个组织的一伙人在萨洛尼卡引发了大规模的爆炸事件。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恐慌以及受到警察的严厉镇压后，爆炸肇事者并没能激发更大范围的报复，进而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叛乱。

1903年8月2日夜里，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这个组织在莫纳斯提尔地区策划发动了一场起义，但是在希腊非正规武装和希腊东正教卡斯托利亚主教的帮助下，这场起义被奥斯曼帝国无情地镇压了，起义的领导者被处以极刑。从那以后，这场起义就被保加利亚人称为“圣以利亚日伊林顿起义”，因为起义那天正好是圣以利亚日。这一天后来被北马其顿共和国确定为国庆日，自1992年起，北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在马其顿这个国名问题上一直争得不可开交。

我们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让当地人以及雅典的希腊人愤怒的因素，不是有着共同信仰的东正教徒的命运。伊林顿事件就是一个警示性的信号。在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衡的情况下，如果其采取行动，那么整个地区很快就会被保加利亚教会（督主教会）控制，并被普及保加利亚语言，最终被尚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保加利亚公国主导。马其顿与克里特岛的情况不同，希腊不会去冒公开干预马其顿事务的风险，更没有兴趣为了马其顿而打上一仗，因为政府没有资源，也没有海外外交影响力。但是，在新

闻媒体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施加的压力下，雅典在1904年年初成立了一个马其顿委员会。

在驻萨洛尼卡领事馆的掩护下，希腊向马其顿派遣了军官，充当其代理人。这些军官领导的非正规武装的对手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招募和控制的非正规武装分子克米塔吉斯人。非正规武装的指挥官对雅典的马其顿委员会负责。每当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强国发难，历届希腊政府总是否认那些非正规武装与希腊有瓜葛，辩称在马其顿的希腊人进行的所有武装行动只不过是自卫行为。这就是马其顿乡村的暴力情况，这种说法尽管远没有反映整个事实，但流传了好几年。

今天，位于萨洛尼卡海岸附近的曾经的希腊领事馆已成为马其顿革命博物馆。这个名字中的“革命”指的就是希腊语中所说的冲突，代表一场非官方的、未宣战的、秘密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开始时间，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按照惯例，这场冲突的时间指的是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开始于1904年雅典的马其顿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于1908年。但是，小规模敌视行为在那之前已进行了10年之久，在那之后也一直持续，直到1912年整个地区的格局再也不可更改时才彻底结束。希腊对马其顿的战术与对奥斯曼政府的战术是一样的，包括恐吓、敲诈、折磨、暗杀、告发、攻讦等手段。因此，希腊的目标是很小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克里特那样的胜利，也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领土。不过，希腊那些挑事者的目的是“征服心灵的领土”，意思是尽最大可能地在当地农民心中植入希腊的国家意识，因为那些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宗教，而不是语言和国籍。^[12]

由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马其顿革命采用了古老的游击战术。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也曾采用游击战术，从那以后，希腊国土以外的冲突中也零星地使用过这一战术，且都取得了明

显成效。为了鲜明地召唤过去，很多志愿者穿着褶裥短裙、朱阿夫夹克、背带交叉的衣服、牧羊人斗篷、厚重的鞋子等，这些服饰充分显示了绿林好汉以及古老武士英勇事迹的“民族性”。比如，鞋子被称为塔苏基亚山地靴，是平都斯山脉另一边的山民所喜欢的。志愿者战士和职业土匪之间的区别也逐渐凸显出来。志愿者战士依然拿着希腊的军饷，而职业土匪则像他们的19世纪20年代前辈那样拼命地抢夺每一分钱。当时的威胁迫使这两部分人通力合作。志愿者战士从当地土匪那里学会了极端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技能。土匪则非常厌恶服从命令，特别是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中的时候——在这样的战事中，土匪往往明白如何避免此类危险。^[13]

在所有的志愿者战士中，最著名的是帕弗洛·梅拉斯，他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最年轻的士兵之一。他是一位政治家的儿子，娶了伊万·德拉库米的妹妹。伊万·德拉库米本人也参与了这场“革命”，他当时的身份是希腊驻马其顿的高级领事官员。梅拉斯与他的内兄一样，在雅典的社会里深受尊敬，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物，他受命指挥1904年2月从西部进入马其顿的第一支希腊队伍。8个月后，他因被奥斯曼帝国的巡逻队误认为在逃的保加利亚人而遭到伏击，并因此牺牲。他有一张穿着游击队衣服的戎装照片，照片是他在牺牲前不久照的。照片上的上尉英俊潇洒，后来成为一幅广为流传的油画上的主人公。人们通过无名氏口头创作的歌谣这一传统形式来哀悼他的牺牲，把他歌颂为英雄。从那以后，在希腊语中，帕弗洛·梅拉斯这个名字就成为马其顿革命的一个象征。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和肖像都有助于招募新兵，实现“伟大理想”。几十年来，萨洛尼卡还保留着关于他的记忆，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营。他牺牲的地方位于卡斯托利亚附近的斯达迪斯塔，现在则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梅拉斯”。

在随后的几年里，雅典人对保加利亚人及其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愤怒，而且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1904年希腊议会保存的记录里有这样一句话，“伏尔加河里跑出了怪兽，横冲直撞”。此外，报纸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评论，怒斥保加利亚人“狡诈、野蛮、不文明、无道德、像狂野动物、嗜血如命”。1903年，一位作者在社论中写道：“拜占庭历史学家曾经描述的那个污蔑上帝和憎恶上帝的国家依然如故，而且延续到我们现在的时代。”^[14]这个说法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很快就得到人们的赞赏。在文学中，关于这种思潮的最广为人知且经久不衰的样板是佩内洛普·德尔塔创作的儿童小说《在保加利亚人屠夫的时代》。这部小说出版于1911年，将读者带回将近1 000年前，即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辉煌的东征西杀时代。巴西尔二世逝世于1025年，此前不久，他征服了大部分巴尔干人，并在征伐过程中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这个绰号，这也是小说书名的由来。“保加利亚人屠夫”还被当时伟大的诗人科斯提斯·帕拉马斯作为史诗中的英雄歌颂过。在那部史诗中，高潮部分是马其顿革命。

这些文学作品将有着千年历史的“保加利亚人屠夫”拉回到雅典市民的公众意识中。10年来，一件最为重要的事已经开始改变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了。这件事也发生在马其顿，但与那儿正在进行的民族斗争无关。按照第一次公开宣称的日期，这件事是1908年7月23日在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爆发的土耳其革命。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要求恢复未实施的1876年宪法。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很快从策略上做出必要的让步。第二天，人们的欢呼就从马其顿传到了首都和整个帝国。

在萨洛尼卡，位于海港边的奥林珀斯广场一夜之间更名为自由广场。从这个广场往塞尔迈湾望去，人们就可以看到古代众神

的家园。时至今日，这个广场的外形改变了很多，但是还保留着这个名字。不过，在每天从那里经过的人群中，很少有人会联想起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之奋斗的自由。就是在这个地方，革命后的几天里，革命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向狂热的群众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雄文，有一位当地法国人目睹了那一刻：

公民们！今天武断专制的统治者消失了，坏政府再也不存在了。我们都是兄弟。再也没有什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穆斯林了，我们都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为成为奥斯曼人而感到自豪。[\[15\]](#)

选举的消息在整个帝国传开了，选举也在几个月后如期举行。奥斯曼希腊人再一次在君士坦丁堡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自己的席位。即便在冲突不断的马其顿，对立的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也停止了敌视状态。在萨洛尼卡，两个族裔群体的代表坐到了一起。奥斯曼帝国再也不是“欧洲病夫”了，它旧貌换新颜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者们，比如，恩维尔帕夏，的确是年轻人，但在土耳其语中，这个运动的名字实际上并不是指“年轻”，而是指“新的”。这次革命的领导者的正式官方名字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是关于现代化的运动。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看看当时希腊人的反应，包括在奥斯曼帝国和希腊王国的希腊人。由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反应没有完全被人遗忘，也大多被当作历史的注脚。但是至少在1908年年底和1909年的几个月里，当地的整个政治态势看起来是全然不同的。

土耳其革命爆发后仅3周，希腊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就写回

函件，对发生的一切给予审慎的欢迎，他将这次革命称为“两个民族国家（指的是希腊和土耳其）在自由方面的合作，即实现了公民的真正平等，以及对已获得权益和优势的尊重”。但是，他还提出警告，称“骨肉兄弟之情”的新精神可能是一个幌子，或者只浮于表层。如果青年土耳其党的目的是将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吸纳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土耳其文化”之中，那么真正的改变，即希腊社区的真正利益的获得，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16]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怀有戒心。一个最不可能发声的人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个人是希腊总理维尼泽洛斯，他在1909年1月的一份克里特报纸上写道：

所有的希腊人……深有感触……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不仅拯救了土耳其政权国家，而且拯救了希腊文化，使之免于被肢解和陷入灾难……土耳其宪政国家的建立，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理想的实现。

和维尼泽洛斯一样，德拉库米也是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也在这个时候的日记里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伟大理想’实现了。”他在一个比拜占庭的限制还多的国家看到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的未来。他继续写道：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拜占庭有着同样的首都，只要这个国家存在，这个城市（君士坦丁堡）也会是希腊的首都，特别是现在土耳其已经拥有了一部宪法。[17]

1907—1909年，德拉库米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使馆工

作。土耳其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与在马其顿的另一位希腊资深领事官员阿泰纳斯·奥斯·索利奥蒂斯—尼克莱迪斯，联合支持半官方的希腊行动，希望在对付保加利亚国家主义方面能够找到与土耳其革命的共同基础。君士坦丁堡组织从1908年延续到1912年。在这些年里，希腊代表继续积极加入奥斯曼帝国新组建的议会，根据他们的一份声明，他们加入议会的目的是，“与我们共同的祖国（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民族一道，创建宪政的奥斯曼政权国家，履行同样的义务，享有同样的权利，为这个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18]这种新形式的奥斯曼文化在君士坦丁堡以及莱斯博斯岛（米蒂利尼岛）等希腊东正教徒较多的周边地区，反响特别强烈。这些地区明显缺乏与希腊进行统一的愿望，与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等其他南部的岛屿形成鲜明对比。[19]

随着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很多希腊人一定在思考，“伟大理想”是否已不同于人们半个多世纪前所建议的那样，也许人们没必要再为此而战斗了。这样想的不只是希腊人。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的外国观察家也这么想，因为从“进步”和法治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已经取得了更好的成就。[20]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希腊人来说，也就是对在希腊国家之外的希腊人来说，“希腊奥斯曼文化”也许会是个问题的答案。毕竟，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国家不必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越来越趋于成熟的希腊王国和一个现代化的、复兴的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同舟共济。难道这不是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改革开始以后的多数时间里的实际情况吗？

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把我们知道的关于20世纪的历史放在一边，努力看到可能在当时出现的景象。同样，对一个当地观察家来说，他很难预测今后几年将发生什么，对希腊王国，或

对奥斯曼帝国中的希腊人，或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事实也是如此。

拿起武器

土耳其革命后不到3个月，不祥迹象就出现了。在奥斯曼帝国的边缘，有些人正等着利用新国家成立所带来的机会。1908年10月5日，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一夜之间，费尔南德王子从苏丹名义上的一个臣民成为“全保加利亚人的沙皇”，这个头衔与希腊的乔治一世的头衔，有着同样的含义，很明显是为了一争高下。第二天，奥匈帝国单方面宣布，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纳入自己的版图。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行省从1878年《柏林条约》以后就一直由奥匈帝国管辖，但是在正式的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行动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第一波新的东方危机，在随后的几年里撕碎了那份实行了30年的条约，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克里特来说，这个突然到来的时刻太好了，其绝对不能错过。对维尼泽洛斯和地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土耳其革命在理论上可能对希腊的利益有好处，但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对希腊的利益没有好处。对于克里特的未来与希腊王国休戚相关，他们从未表示过任何怀疑。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后没几天，克里特地方政府再一次宣布与希腊统一。庆祝活动在首府哈尼亚举行。现代评估以及当时的人所做的一些评估表明，如果希腊政府推动这一事件，那么可能在1908年就把克里特纳入自己的版图了。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当时的希腊总理是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他来自科孚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为人谨慎，所以把此事

交给了欧洲强国来处理。因此，克里特的状况又持续了好几年。

这一切进展对奥斯曼帝国的声誉造成了伤害。那个时候，帝国内新的统治者掌握权力的能力还很脆弱。这种脆弱在几个月后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09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反动集团不仅轻易推翻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还全面恢复了苏丹的权力，宣布国家回到1839年前的伊斯兰教法之中。这是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倒退。首都爆发的这次暴力冲突持续了10天，最终以青年土耳其党重新掌权而结束。这一次，苏丹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傀儡人物。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人巩固了他们对帝国的控制权。但是，1909年4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件第一次显示了帝国的大多数穆斯林臣民，特别是那些说土耳其语的人的意见的深度和广度。这些人（用现在的话说）是被改革进程“抛在后面”的人，大多被遗忘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一直被适应和“追赶”欧洲思想和欧洲强国的愿望推动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青年土耳其党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导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青年土耳其党所领导的政府几乎就像它的前任一样，变得独裁专制。同时，它在处理生活在国内和国外的大量基督教徒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强硬态度。奥斯曼主义还没有让位于10年后才出现的土耳其国家主义。但是，不管一开始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希腊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在1908年革命爆发时产生的疑虑，很快就会得到证实。青年土耳其党的奥斯曼主义越来越认同伊斯兰教和土耳其的语言。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奥斯曼帝国内外的基督徒越是强调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主张，说土耳其语言的穆斯林领导人越是打压他们。执政党越是变得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就越是疏远说其他语言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这让民族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更宽了。

同时，希腊也发出声音，呼吁实现自己版本的复兴。1908年10月，雅典日报《卫报》敢说敢言的编辑夫拉西斯·加夫瑞里迪斯在一系列社论中呼吁进行“和平革命”。可能也是在10月，一群低阶军官开始在雅典秘密集会，密谋效仿青年土耳其党进行自己的革命。^[21]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对于国家没有实现与克里特统一的不满，为这些革命计划的实施增加了推动力。经济困境是短期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此感受很深。反抗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政府最高层领导的反应让人错愕，更让人情绪低落。希腊总理塞奥托卡斯竭力逃避责任，在1909年3月底提出辞职，终于在7月卸任。这个时候，新的克里特危机正在酝酿。根据安排，最后一支国际维和分队将撤离克里特岛，对于以后的和平如何维持，政府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于是，希腊实现与克里特岛的统一有了新的可能。不过，此时已经让政府恢复稳定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可能等闲视之。希腊反对派领袖迪米特利亚斯·拉里斯经过几天的考虑接受了国王的命令，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掌权的政府，但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乔治一世看起来也一反常态，好像准备随时放弃一切。自从1897年革命失败后，他的人气一直没有恢复。他的儿子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一事，遭到公开批评。乔治一世深感大臣都在应付他，欧洲强国在克里特问题上也不支持他，所以向英国驻希腊大使吐露了要逊位的想法——带着所有的家人，“横下心走了，再也不回来”。^[22]8月，王宫里的这些传言被泄露给新闻媒体。到了这个时候，希腊底层军官的密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果不其然，英国的战舰再一次出现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形势像是奥托国王最后日子的重现。在雅典，似乎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人们能达成一致的認識是一切都乱作一团。

1909年8月，雅典要塞的初级军官走进了这个权力的真空，他们的密谋实际上从7月才真正开始。他们组成了军事联盟。在一位有着同样想法的日报编辑的机智联络下，他们很快就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这个联盟要求军队进行改革，公共服务实现大众化，不过联盟成员的身份一直都是秘密。即便政府屈服于压力要实行联盟所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很难完成的，因为执政者在议会里并不占多数，而且政府没有向军事联盟低头。

密谋者在公共假日圣母安息日采取了行动。在8月28日（根据当时希腊使用的日历，是8月15日）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雅典要塞中的大部分军官走出了城市，在许墨托斯山下的一个低矮的小山头古蒂的山顶上抢占了有利的位置。现在，这个地区是几家军队医院和雅典大学医学院的所在地。那个时候，这个小山头是战略要地，扼守着进出雅典、通向北方和东方的一条大道。在古蒂，军事联盟建立了一个加强营。加强营大约有3 000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有着很强的作战实力。很快，来自北方基菲西亚的骑兵支队，加入了军事联盟的队伍。天未破晓，联盟就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拉里斯政府宣布下台，新政府宣誓就职，承诺满足军方的要求。在希腊，军方迫使政府更迭的情况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像古蒂事件一样，军方独自行动还是第一次。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完全成功的。从这些方面看，它与土耳其革命很相似，其支持者也会毫无疑问地将其称为一场“革命”。不过，与青年土耳其党相比，军事联盟的根底要浅得多，相对来说，它的要求是很有限的，而且主要与军队内部程序方面的问题有关。那些关于触及更大领域的大问题的要求都非常温和，而且大而化之，所以无关紧要。^[23]就其本身来说，联盟除了推翻了一个政府，自己什么也

没有得到。其推翻的政府在民主合法性上有问题，而新上任的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则更大。这次政变成为一个例子，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被多次效仿。不到几个月，这次政变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其依然策划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成为其最后的遗产。正是在军事联盟的邀请下，一个新的人物、一个全新的政府开始主导希腊王国的政治生活。

即便是在今天，对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的影响的判定在希腊依然会引起很大的分歧。没有任何一位希腊政治家能像他一样从欧洲强国那里赢得那么多的尊重。可能除了卡波迪斯特里斯以外，没有任何一位希腊政治家能在希腊民众中获得毁誉参半的评价，支持者和反对者界限分明，旗鼓相当。不管人们爱戴他还是憎恶他，维尼泽洛斯在永久性改变希腊的地理版图方面比任何人做得都多。但是，被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人的思想和整个思维方式与以前也不一样了。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变化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维尼泽洛斯是一个谜，他没有留下任何日记或其他私人文字，人们无从了解他的思想和动机是如何发展的。作为一位政治家，他集成了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外交智慧和耐心以及科莱特斯或迪里吉安尼斯的公众魅力。他的政敌向别人抱怨的他的鲁莽、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战略家的实用主义。那么，他的一生应该被写成圣徒传了，因为人们几乎以宗教般的虔诚将维尼泽洛斯奉为预言家和国家的救世主。如果不是有些小肚鸡肠的人嫉妒他，那么他那些经过深入思考而制订的计划会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取得胜利。不管今天的人如何评价他的贡献，有一个事实是，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社会是分为两极的，那就是“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和“反对维尼泽洛斯的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与之前的马夫罗科扎托斯

和卡波迪斯特里斯不同，维尼泽洛斯既是一名希腊人，也是一名外来者。他来自克里特，他的上任标志着—个更宽泛意义上的、遥远的民族掌握了国家的运转。对此，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即便有军队联盟的支持和乔治一世勉强的默许，维尼泽洛斯的上台执政之旅依然显得有点儿横行霸道。他第一次在雅典与军队联盟的军官和政客们的协商是秘密进行的，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访谈中，维尼泽洛斯断然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被军队联盟邀请到雅典来商讨担任未来总理的事。^[24]在那样的形势下，他在雅典只停留了3周，但是他在雅典停留后，后来的计划都被安排好了，好像是遵照他的意愿制订的。解决导致政变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对宪法进行彻底修正。新的制宪大会在选举之前，需要组建一个临时政府，同时解散军队联盟。

所有这一切都如愿发生了，只是进展很缓慢。制宪大会议员选举会议—直拖到1910年8月才召开，并替代议会。会议期间，维尼泽洛斯不在雅典，他先去了克里特，后去瑞士度假。但他的名字出现在包括首都在内的那个选区的选票上。最后，他的票数高居榜首，当选议员。新的制宪大会在9月14日首次召开。4天后，维尼泽洛斯乘坐—艘特制的轮船离开比雷埃夫斯港口，直抵雅典中心，在锡塔玛广场向大约—万名群众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希腊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对新的制宪大会清晰明确的职权范围进行了深奥分析。这就是他的演讲口才和个人魅力的力量，维尼泽洛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个月后，这位从克里特来的政客走马上任，担任希腊总理。

在制宪大会中，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基本上各占—半，这位新总理能否控制其中的多数人还是—个未知数。被任命为总理—周后，维尼泽洛斯说服国王解散现有的制宪大会，

在12月11日进行一次新的议员选举，组建所谓的“修正的国民议会”。选举前三周，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是维尼泽洛斯成立了他自己的政党，二是现有的、在前一个议会中占有半数以上议员席位的3个党派决定联合抵制新的议员选举。

选举的结果无须多说。这被称为“宪法政变”和“议会专制”。
[25]维尼泽洛斯新创建的自由党几乎完全采用了他在克里特领导的同名党派的运作模式。于是，自由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地方党组织，第一次将纪律严明、结构有序的党派引入了希腊政治之中。自由党的控制权紧紧地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维尼泽洛斯在全国强化他的权力基础。在权力的对立一方，其他党派对选举的抵制成为希腊议会政治中几个重大行动的先声，不过这个抵制行动注定会事与愿违。这3个抵制党派的领导人到底要通过抵制行动达到什么目的，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从技术上说，维尼泽洛斯要求解散制宪大会并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这违反了1864年宪法的规定。这是因为制宪大会与正常的议会不一样，除非自己做出解散决定，否则是不能被解散的。但是，抵制选举永远也不能废除曾经做过的事。

1910年12月11日的选举使维尼泽洛斯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获得了权力，他可以授权监督“修正的国民议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宪法的修改以及其他的改革措施。此前，希腊已经出现了变革，只是变革还没有完全体现在法律条文上。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立法活动，对宪法的修正很快就完成了，其主要目的是精简政府机构，简化办事程序。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得到加强，但是宪法增加了新的条款，那就是在极端的例外情况下，他们的权利可能会被悬置。修宪的一个创新是第一次将一直争论不休的“语言问题”在正式的法律层面进行讨论。维尼泽洛斯赞同那些推进口语成为希腊官方语言的

改革者，但是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面临劲敌的反对，他仍然允许这样的法律条款的存在：“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起草宪法和法律文本的语言，所有对语言的改变都是被禁止的。”^[26]宪法和法律所用的语言被称为“净化语”。口语和“净化语”的正式分离一直持续到1976年，这可能是维尼泽洛斯几年后在希腊社会划开更深裂口的预兆，这个裂口的修复同样需要很长时间。

修正后的宪法在1911年6月生效。在随后的9个月里，“修正的国民议会”继续行使权力，而且现在已正式改组为一个正规的议会。在那段时间里，议会颁布了337部新法律，数量之多让人震惊。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关于规范政府程序的，还有一些是关于社会改革的，其中包括拆分色萨利的巨型农场等问题，在那些农场上劳作的农民看起来和农奴没有什么两样。那个地方是1881年进入希腊版图的，是农业生产率最高的省份，但不可思议的是，直到30年后，它才为国民经济贡献了收入。监狱的条件和司法的程序得到改善，工会的地位得到承认，对劳动中的妇女和童工的剥削受到了限制。

维尼泽洛斯上台后的18个月里所取得的多数成绩，可以归因于他的个人能力和激烈的政治竞争。到1912年3月新议会选举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有了盈余，这是一个现在还不能得到完全解释的不小的奇迹。政府终于有钱投入建设19世纪80年代特里库皮斯时代确定的军事和民用项目了。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军事小组来完善海军和陆军的组织结构以及装备设施。

如果从事后分析，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这一切归结于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就像维尼泽洛斯能够预知1912年要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一样。其实，不管是维尼泽洛斯所做的，还是他所建议的，都没有恩维尔帕夏和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采取的变革措施激进，更比不上一战后穆斯塔法·凯末尔推动的巨大变革。

维尼泽洛斯在宪法和立法方面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正如他于1910年在雅典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中所说的，都是在修正的精神上进行的。在推动国家基础设施、经济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为“伟大理想”奋斗的进程中，他所做的完全是实施特里库皮斯30年前确定的项目。维尼泽洛斯上台初期的成就是理顺政府机制，让事情得到处理，然后再进行机制改革。如果说维尼泽洛斯有什么“愿景”，那就是希腊从前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在1897年失败后变得黯淡无光，但是并没有被放弃。尽管这个愿景已少了一些诉求，但其在1912年遭受的争议并不比15年前多，更不会造成分裂。

那年3月议会选举的时候，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希腊都比以往有更充分的准备。“老”党派认识到他们在上次选举抵制中的错误，再次参加了这次的选举。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机会了。维尼泽洛斯及其领导的自由党包揽了所有的席位。新的议会授权和以前一样沉甸甸的，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对其合法性进行诽谤中伤了。

到了1912年夏天，希腊已经准备好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要干什么。

战事纷起

在希腊之外，自1911年下半年以来，事态一直急速发展。19世纪末，欧洲就几乎结束了对非洲大陆的殖民扩张，因为那里再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征服了。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及其腹地曾经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30年以后，法国控制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在1882年控制了埃及。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摩

洛哥被法国和西班牙瓜分。奥斯曼帝国手里就只有一段非洲海岸了，那个时候它被称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行省，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而且，参与殖民地竞争的欧洲强国又多了一个，虽然它来得比较晚。1908年，奥斯曼帝国外部的行省都被抢走了，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现在，轮到意大利了，它对北非那片土地提出了要求，那片土地也正好是离它的海岸最近的地方。

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战争爆发于1911年9月29日。这场战争对意大利人并不利，所以第二年年年初，意大利人就将他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爱琴海。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包括距离安纳托利亚西南端最近的12个岛，含罗得岛在内，岛上居民绝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它被意大利单方面纳入自己的版图。意大利对这个群岛的占有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意大利的战舰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于是“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或“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战争”开始了。[\[27\]](#)

这就是巴尔干半岛各对立的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一系列双边谈判的背景，其中很多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1912年3月签署了正式条约。维尼泽洛斯本人利用《泰晤士报》的记者，开始谨慎地打探保加利亚政府的消息。当时，希腊民众依然沉浸在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人屠夫”的英雄形象之中，希腊非正规的游击队武装还在马其顿继续与保加利亚的克米塔吉斯人作战，所以，维尼泽洛斯的战略是高风险的。但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的战争显示，奥斯曼帝国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土耳其革命最初的包容一切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烟消云散了。希腊在5月30日与保加利亚签署了互助条约，此后，维尼泽洛斯将注意力转向塞尔维亚，希望与其达成这样的一个救助备忘录。

就其本身来说，这些外交活动还不足以在巴尔干半岛掀起战争。但是，奥斯曼帝国在另一边还面临着压力。在与亚得里亚海接壤的奥斯曼帝国行省，阿尔巴尼亚人站了出来，要求独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从1912年1月开始，不断起义，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同情阿尔巴尼亚人，因为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侵害了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利益，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他们的革命运动不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因为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有信仰东正教的，有信仰天主教的，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且不同信仰的人数都差不多。但是，正如1821年发生的阿里帕夏政变在客观上给伯罗奔尼撒的起义者提供了保护伞，1912年阿尔巴尼亚人的这次造反行动也束缚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

另外，君士坦丁堡的又一次政变将青年土耳其党暂时逐出了政坛。7—10月，奥斯曼帝国首都陷入“内战”的状态。^[28]随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在9月让步，其与意大利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叛乱者之间的敌对形势才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疲弱已经有目共睹。即便如此，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时候，多数欧洲国家还是大吃一惊。战争打响以后，人们认为就像以前那样，奥斯曼人能够解除这一次的威胁。

黑山在1912年10月8日向奥斯曼帝国宣战。10天后，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宣战。希腊就像15年前那样，派了两支部队翻越山隘，往北开进，一路从色萨利进入马其顿，一路从西边进入伊庇鲁斯。去马其顿的部队的兵力更强一些，依然由康斯坦丁王储指挥。同时，希腊海军很快控制了通往北爱琴海和东爱琴海的航道。10—12月，萨摩斯、利姆诺斯、萨索斯、萨莫色雷斯、米蒂利尼（莱斯博斯）、希俄斯、忒涅多斯和伊姆布罗斯等岛屿，一个接着一个地竖起了希腊的旗帜。从那以后，除了后

面两个岛屿，其他岛屿一直在希腊人的手中。在1912年12月16日海峡入口附近的达达尼尔战役中，帕弗洛斯·康德里奥迪斯海军上将乘坐无畏战舰“阿维罗夫”号，率领一支小的希腊舰队取得了胜利，封锁了从地中海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同时，保加利亚的陆军直接往东南猛切，向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和君士坦丁堡推进。不同队伍的高级指挥官相互间很少协作甚至没有协作，这无疑帮助希腊在马其顿赢得了最大的利益。11月8日，康斯坦丁王储率军进入萨洛尼卡，仅用几个小时就打败了保加利亚的一个师。4天后，在一个寒冷的雨天，王储迎来了他的父亲乔治一世和维尼泽洛斯。这三人骑着马，在当地希腊居民的欢呼声中，志得意满地穿过插满蓝白色希腊国旗的街道。实际上，这些希腊族居民仅占当地人口的1/3，其余的市民可能因为大雨而待在自己家里。但是，对希腊和希腊人来说，这是继希腊革命的辉煌岁月后，希腊取得的最大胜利。希腊国家获得了第二大城市，这座城市后来被誉为“陪都”。这才是“伟大理想”应该取得的成就，而此前一直都没有做到。

11月底，巴尔干半岛的盟军几乎在各个战线都赢得了胜利。只有希腊人当时在伊庇鲁斯的主要城镇约阿尼纳陷入困境，所以拒绝加入12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参战各方以及欧洲强国的代表齐聚伦敦，参加和平会议。维尼泽洛斯不甘心希腊置身事外，尽管他的国家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依然从萨洛尼卡乘火车到巴黎，于12月12日抵达伦敦。可以想象，希腊的未来又一次在欧洲强国的一个或多个首都中被人摆布，因为此前一直是这样。只是这一次，维尼泽洛斯下决心要亲自到场，他是一个天生的谈判家，可以应付自如，纵横捭阖。

在这次和平会议上，事情的结果与从前大相径庭。1912年12月和1913年1月进行的第一轮磋商，在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

1月23日，会议磋商彻底脱离轨道，因为在君士坦丁堡，一场血腥的反政变运动让被赶走的青年土耳其党再度控制了政府，其随即拒绝接受来自伦敦会议的和平条款。维尼泽洛斯把此信息作为努力的一个线索。返回国内的时候，维尼泽洛斯带回的不是和平协议的条款，而是一些更有诱惑力、更具有深远影响的东西。在到达伦敦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先是拜会了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然后拜会了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通过一系列的私人会谈，他规划了未来与英国（也许包括法国）进行“协作”的可能性，这正是将近100年前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一次向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建议的全部内容。这一次，希腊的民选总理亲自来磋商这一问题，大卫·劳合·乔治大为动容。据报道，他在维尼泽洛斯离开伦敦的第二天说：“维尼泽洛斯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随后的10年里，面对巴尔干和平会议未取得成功的阴影，维尼泽洛斯的很多对外政策都是基于伦敦那些卓有成效的私下会谈制定的。[\[29\]](#)

同时，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密的。不过，维尼泽洛斯还是努力获准与他的国王分享其在伦敦讨论的内容。在回雅典的途中，维尼泽洛斯在萨洛尼卡短暂停留，只是为了告诉国王伦敦会议的情况。没想到，那是他与国王的最后一面。那之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3月18日，乔治一世照例下午出门散步，去城市最著名的地标——位于海边的白塔。陪同他的只有一名侍从。保持一定距离并尾随其后的是两位克里特的警官。国王返回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从一直坐着的长凳上跃起，在很近的距离内从后边对着刚刚经过的国王开了一枪。国王当场死亡，而希腊原本会在6个月后举办他登基50周年的庆典。尽管人们有各种猜测，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场刺杀有政治动机。刺客是亚历山德罗斯·席纳斯，被官方宣布为“耽酒症患者”和流浪者，在被警察关押后不久

就死了。

乔治一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他所统治的国家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上实现了翻番。在他登上王位的第一年，爱奥尼亚群岛就纳入了希腊的版图。在他去世前，希腊军队终于在1913年3月6日攻进约阿尼纳，从而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平并没有带来边疆的稳定。但是截至目前，希腊最大的领土扩张主要是在乔治一世的统治下实现的。他治下的希腊国土已经和现在的面积差不多了。

关于维尼泽洛斯与乔治一世的继任者分享了多少他从伦敦带来的消息，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30\]](#)

在巴尔干战争中，基督教国家获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从历史上说，这一地区永远失去了欧洲强国所强制安排的长久和平。其实，欧洲强国也做了尝试。1912年12月和1913年1月，欧洲强国还召开了伦敦大使会议（与维尼泽洛斯在伦敦参加的会议同时进行），参加人员是来自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是修正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和平安排的条款，从而使其适应巴尔干半岛新的现实。会议代表基本上按照当时的军事形势，为已经疲惫不堪的各个交战国编制新的条款。《伦敦条约》在1913年5月30日签署，是欧洲协调机制采取的最后几个行动之一。

这个条约也是效果最差的条约之一。条约还没签署，获胜的巴尔干国家之间就已经打起来了。保加利亚抢占了色雷斯的爱琴海沿岸，领土直接与君士坦丁堡的西部接壤，但是丧失了在马其顿的土地。占有马其顿的国家主要是塞尔维亚和希腊。条约签署的那一天，保加利亚的新政府在索非亚成立。也是在这一天，维尼泽洛斯与塞尔维亚签署了双边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舞台

已经搭建好了。

保加利亚首先在1913年6月底采取行动，同时向在马其顿的希腊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发起进攻。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时间短，也更混乱。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携手作战，不让保加利亚人进入马其顿。保加利亚人变成了公敌，任何人都可聚而攻之。青年土耳其党再一次在恩维尔帕夏的领导下抓住机会，从保加利亚人手里夺回了东色雷斯，包括埃迪尔内。罗马尼亚没有参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次则从保加利亚那里夺取了一块位于多瑙河沿岸的土地。[31]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持续时间仅仅一个多月，于7月30日戛然而止。罗马尼亚首都被选为协商和平停战条款的地方。8月10日，来自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代表签署了《布加勒斯特条约》，有些代表似乎希望欧洲强国插手，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改条款。但是，欧洲强国之间的分歧几乎与这些巴尔干半岛对立各方之间的分歧一样大。因此，东南欧的版图是巴尔干半岛国家自己重新划定的，这是该地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情况之一。11月，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单独签署了《雅典条约》，最终将克里特岛统一到希腊王国的疆域之内。至此，希腊的国土面积增长了68%。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希腊的人口从270万增长到480万。

这些条约签订以后，希腊也迎来了一位新国王。康斯坦丁有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比多数士兵高一头。作为希腊军队总司令，他积极履行责任。他在1897年的失败已经被人遗忘了，也被人宽恕了。康斯坦丁加冕国王时已40岁，年龄是他前面两任国王就职年龄的两倍多。他成为国王之前有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历练。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与英国王室和俄国皇室有亲戚关系，同时又迎娶了德国皇帝威廉的妹妹。如果这种关系在不可预料的

欧洲政治版图中还能起到作用，那么康斯坦丁是最具优势的，他是截至当时希腊历代君主中与欧洲强国王室和皇室渊源最深、最广的一位国王。

希腊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国王成功加冕。维尼泽洛斯作为总理在议会中有压倒多数的绝对优势，他的统治也有了可以依据的新修正的、现代化的宪法。国王尽职尽责，维尼泽洛斯在外交和国家治理上可圈可点，君臣同心，领导着希腊走向胜利。几年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目前正在写入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已经退出了欧洲。希腊国家踌躇满志，期待成为幅员辽阔、影响深远的民族国家。那么，“伟大理想”最终成为政治现实，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 Gerasimos Augustinos,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Nationalist Critics of Greek Society, 1897–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77), 26, quoting (in translation) Neoklis Kazazis in *Ellinismos* 1 (1899), 7–8 (emphasis added).

[2] Ion Dragoumis, *Ελληνικὴ πολιτισμὴ*. [Hellenic Civilization] [1913], in *Ἔργα* [Works], 2 vols (Athens, n.p., 1927), vol. 2, 180.

[3] Eleni Bastéa, *The Creation of Modern Athens: Planning the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4, and .gs 73, 77, 78, 85.

[4] Thomas Gallant,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215–16.

[5] S. Victor Papacosma, *The Military in Greek Politics: The 1909 Coup d'état*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70.

[6] Maria Anastasopoulou, *Η συνετ. απ.στολο. τη. γυναικε.α. χειγγραφεσ.α.: Καλλιγρα γρα.η Παραγραγ.ν* [The Discreet Apostle of Female Emancipation: Callirhoe Parren] Athens: Συλλογο. παγο. Διαδοσιν Ωφελιμων Βιβλιων [Association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Useful Books], 2012); Gallant, *Edinburgh History*, 303–4.

[7] Georgios Skliros, Το κοινωνικ.ν μα. ζήτημα [Our Social Question.] (Athens: Konstantinidis, 1907); Gallant, Edinburgh History, 302.

[8] George Margaritis, ‘The 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Social aspects of life and death in Greece (1896–1911)’, in Philip Carabott (ed.), Greek Society in the Making, 1863–1913: Realities, Symbols and Visions (Aldershot: Ashgate, 1997), 87–98 (97 quoted).

[9] Pericles Giannopoulos, .παντα [Complete Works], vol. 1, ed. D. Lazogiorgos-Ellinikos (Athens, n.p., 1963), 191, 162.

[10] Dragoumis, Ελληνικ.. πολιτισμ.. [Hellenic Civilization], 234; Augustinos, Consciousness, 114–15.

[11] Douglas Dakin, The Unification of Greece, 1770–1923 (London: Benn, 1972), 155;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222, 236–7; Alexis Dimaras, ‘Modernisation and reaction in Greek education during the Venizelos era’, in Paschalis Kitromilides (ed.), Eleftherios Venizelos: The Trials of Statesmanship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9–45 (see 321, 339 n. 8).

[12] Cited in Dimitris Livanios, “Conquering the souls”: Nationalism and Greek guerrilla warfare in Ottoman Macedonia, 1904–1908’,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3 (1999), 195–221 (see 196).

[13] John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Brigandage and Irredentism in Modern Greece 1821–191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215, 222–7, 234.

[14] Vasilis Gounaris, Τα Βαλκ.νια των Ελλ.νων. Απ. το Διαφωτισμ. .ω. τον Α. Παγκ.σμο Π.λεμο [The Balkans of the Greek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Thessaloniki: Epikentro, 2007), 411.

[15]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275, citing in translation A. Sarrou, La Jeune Turqui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Berger-Levrault, 1912), 25.

[16] Konstantinos Svolopoulos, 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η 1856–1908. Η αχμ. του Ελληνισμο. [Constantinople 1856–1908: The High Point of Hellenism] (Athens: Ekdotiki Athinon, 1994), 98, citing Ioannis Grypari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hens, 30 July 1908.

[17] Eleftherios Venizelos, cited in translation in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Venizelos’ diplomacy, 1910–23: From Balkan alliance to Greek–Turkish settlement’, in Kitromilides (ed.), Venizelos, 140; Ion Dragoumis, Ο ελληνισμ.. μου και οι .λληνε. (1903–1909) [My Hellenism and the Greeks (1903–1909)], in .ραγγα [Works], vol. 2, 144.

[18] Svolopoulos, 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η [Constantinople], 23, citing Greek rep-rentatives in the Ottoman parliament, shortly after its reconstitution.

[19] Maria Mandamadiotou, The Greek Orthodox Community of Mytilene: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Greek State, 1876–1912 (Bern: Peter Lang, 2013).

[20] Cited in Svolopoulos, 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η [Constantinople], 79. 21.

[21] Papacosma, Military, 42, 49.

[22] Robert Holland and Diana Markides, The British and the Hellenes: Struggles for Master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850–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3, citing a Foreign Of.ce memorandum of 17 June 1909.

[23] Translated text in Papacosma, Military, 190–6.

[24] Papacosma, Military, 115–20, citing J. B. Bouchier in The Times, 13 January 1910.

[25] Giorgos Mavrogordatos, 1915. Ο Εθνικ.. Διχασμ.. [1915: The National Schism] (Athens: Patakis, 2015), 28; Dakin, Unification, 186.

[26] Alexis Dimaras, Η μεταρραγγ.θμιση που δεν .γινε [The Reform that Never Was], 3 vols (Athens: Ermis, 1974), vol. 2, 75–7.

[27] Sean McMeekin,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London: Allen Lane, 2015), xv–xviii, 62–5.

[28] McMeekin, Endgame, 68–9.

[29]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 Hurst, 1998; .rst published 1973), 17–20 (18 quoted).

[30] Athina Kakouri, Τα δ.ο β.τα [The Two Vs.] (Athens: Kapon, 2016), 84.

[31] Richard Hall,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Prelude to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2), 107–23.

第七章

自我分裂

(1913—1923)

随后不久的全球冲突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此映衬下，1912年和1913年两场巴尔干战争期间交战各方的生命损失并不明显。但是，这两场战争对该地区的平民百姓产生了更加致命、更加长久的影响，甚至对战争以外的地区也产生了影响。数以万计的穆斯林被迫离开欧洲。大批基督徒也无奈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说的语言不对，因为他们在教堂里使用的祈祷仪式不对。很多人再也回不到生养他们的故土了。

穆斯林逃难者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给公共秩序带来了威胁。他们继续迁徙，很多人最终定居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乡村，那里正好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人数最多的地区。在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安纳托利亚所有的爱琴海岸，从巴尔干半岛逃难而来的穆斯林逐渐把怨气撒到希腊族居民身上，他们因曾经遭受的损失而向希腊族居民进行报复，这种报复常常得到当地奥斯曼当权者的默许和纵容。随着希腊的城镇和村庄被摧毁，新的移民浪潮开始了。1914年上半年，几千名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族居民放弃了他们的家园，去希腊寻求避难。

当然，不是所有东南欧的穆斯林都能够逃离，或愿意逃离。《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的时候，希腊已经接纳了大约35万名穆斯林。1912年以前，希腊唯一的比较重要的穆斯林居住区集中在色萨利，建立于1881年。现在，希腊的穆斯林差不多占到新增人口的10%。突然发现自己所在的国家不是自己所选择的、不是自己发自内心所效忠的人，不只有穆斯林。希腊很多基督徒说的是斯拉夫语，如果他们不移民到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不同的国度，在那个社会成为少数族裔。这种社会身份会为以后埋下隐患。还有一些人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语或瓦拉几亚语，而不是希腊语。在萨洛尼卡的一个60 000多人的犹

太社区中，大部分人说的是一种西班牙方言——拉地诺语或犹太西班牙语。这些新的公民如何被同化为希腊人呢？

几乎是同时，人们开始谈论“古希腊”，从而区分1912年以前的国家疆域以及从那以后进入希腊版图的“新土地”。在某些背景下，这些术语仍然存在。一旦胜利带来的欢欣鼓舞开始消散，被派到新土地上的为当地公众服务的官员和士兵有时会对他们新的同胞显露出令人震惊的殖民主义心态。1913年5月，一位有雅典上层社会背景的高级军官在萨洛尼卡给家人写信，信上说：“在这个城市中，9/10的人是犹太人，人们怎么会喜欢它呢？它没有希腊的东西，也没有欧洲的东西，什么都没有。”^[1]

同时，200多万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依然生活在希腊的边疆之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有希腊人居住的社区，这些人发现自己因属于少数民族而处于危险境地。但是截至当时，数量最大的希腊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中。在那里，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态度更严厉了，它在1913年年底与保加利亚单独签署条约，确定了交换少数族裔人口的原则。迫于形势，为了在海外的希腊人，维尼泽洛斯在第二年也开始考虑与此类似的措施。

巴尔干的形势瞬息万变，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可能会爆发，一切都可能发生。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一名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开了致命的一枪，使得奥匈帝国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去世。近年来，巴尔干半岛的任何一次危机都反复证明它会威胁整个欧洲更加脆弱的权力平衡。这一次，危机又得逞了。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几天内，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也就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站在战争的哪一边

战争的爆发将欧洲大陆的各个强国拉入战场，进行捉对厮杀。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强国建立协调机制，强化外交斡旋，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战争。在1914年8月最初的几天里，欧洲分裂为两大联盟，每一方都咬牙切齿地要消灭另一方。一方是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和俄国；另一方是同盟国，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

不论愿意与不愿意，希腊要想置身事外，可能性极小。对希腊政府来说，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趋利避害，一方面抓住机会，另一方面让威胁最小化。人们选择哪个阵营都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强国的冲突中，尽管希腊的国土已经翻了一番，但依然是一个小国，很容易就会被大国之间的战争碾轧。

就希腊而言，面前有3个选择。很少有人赞同希腊加入同盟国。即便有人拿出说服力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或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强烈愿望，地缘政治这个简明的现实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战争爆发以后，康斯坦丁很坦诚地对他的舅舅德意志皇帝说：“地中海在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的虎视之下。”希腊商船、希腊岛屿和希腊港口可能面临毁灭。[\[2\]](#)如此，希腊的选择就减少为两个：要么参加协约国，要么保持中立。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希腊都有完美的、合理的理由。问题是，这两个选择如何取舍呢？

选择加入协约国既有地理方面的考虑，也有历史关系方面的因素。俄国近些年一直对希腊不怎么够朋友，但是协约国的3个成员国正巧都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签署协议让希腊成为独立国家。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1月加入同盟国后，突然出现了欧洲

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力量——按照希腊在友谊社之后和1821年革命之前所梦想的集结在一起的那种态势。19世纪50年代，希腊的3个“保护国”中的两个结成一伙，对付另一个，还强制要求希腊保持中立，因此那种大国结盟的形势没有出现。现在，希腊的3个保护国结盟了，传统的敌人都到了对立的阵营之中，希腊政府为什么要避而远之呢？这是奥托国王和他那时候的政治领导人最渴望做的事了。

协约国的胜利当然会带来长久盼望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那么所谓的“东方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正是采取了早在1823年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一次大胆地向英国时任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所提的建议。如此一来，俄国人会尽享君士坦丁堡这顿大餐，而希腊可能就无缘这份最令人垂涎的胜利品了。但是，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在1912年年底与维尼泽洛斯的会见中，谈到了在安纳托利亚获得其他成果的前景，特别是那块包括士麦那的飞地。士麦那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希腊族聚集地。巴尔干战争让希腊控制了几乎整个爱琴海，包括靠近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几个最大的岛屿，比如，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在大陆获得一块立足之地，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考虑到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成功，如果希腊站到协约国的一边联合战斗，那么这也许会为1821年就开始的希腊革命大业带来一个胜利的结局。

如果参战，那么希腊在国家防御上也有好处。截至目前，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只有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的攻击之下参战。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黑山都保持中立，阿尔巴尼亚还不是一个被完全承认的国家。保加利亚做什么都非常关键。协约国的海上力量可能会很好地保护希腊，打消保加利亚对萨洛尼卡的企图，协约国的保护比同盟国对保加利亚施加的压力更有效。不过，以

协约国作为“保护国”也有不利的方面。这些潜在的盟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以最初的保护条约的名义侵犯希腊的主权。希腊的港口在19世纪被封锁了不下三次，分别是1850年、1854—1857年、1886年。希腊在最初进行政策讨论时好像没有考虑这个方面，但是也许应该考虑。政策考虑并不需要最高大上的动机，但是希腊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时也要符合一定的政治逻辑，而不应该冒着被那些强国劫持的风险，违心行事。

同样，保持中立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要简单得多。像希腊这么大的国家，军事力量有限，其根本不可能影响欧洲战争的结果。如果希腊加入战争的一边，希腊人民就会成为参战军队和战争事件的抵押品，而参战军队和战争事件永远不是希腊能控制的。为什么要拿近一个世纪已经获得的一切去冒险追求未知的、虚无缥缈的、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未来呢？最好的情况是，一旦战争结束，不论结果如何，完全的、合法的中立就应该保证希腊新建立的边界的完整。最坏的情况是（尽管这个情况可能只是在后期才开始显现），最近获得的领土要再交出去。但是这能保证1912年之前边界之内的王国领土没有危险吗？另外，希腊还有奥斯曼帝国中的希腊族的问题。如果希腊保持中立，就可以确保那些希腊人不会被其所在国扣押为人质。希腊人的生活，希腊人的财产，希腊人的幸福，在国内外都会得到保护。战争造成的可怕的人员伤亡就会避免。毕竟，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不同，希腊并没有受到同盟国的直接威胁。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选择。希腊在一战中的故事，以及从那以后为人所知的“政治大分裂”往往被委婉地淡化为个人对立，他们是民选政府总理维尼泽洛斯和加冕国王康斯坦丁。就像他们在1823年和1824年国内冲突中所做的那样，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魅力和倔强、坚定的性格肯定会发挥作用。那个时候的国

家也参与了一场波及范围很广的战争，也被弄得四分五裂。但是，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国内冲突，这个“分裂”不仅仅是个人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人之间的分裂。这不仅是对主权或统治权的争夺。从根本上说，这甚至不是关于合理决策的分裂，因为两种决策都基于完全、完美的理性建构，虽然用于实施这些决策的方法不怎么完美。注定将希腊分裂的恰恰是选择的本质，因为战争本身将欧洲分裂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的分裂。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的特殊环境下诞生，并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下孕育发展，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破裂的欧洲大陆以及破裂的欧洲文化的缩影。

在做出决策的最高领导人之中，有人与欧洲分裂的这方或那方有着亲密的个人和工作关系，都是不足为怪的。在克里特岛自治的15年间，维尼泽洛斯通过与欧洲保护强国的交往，使自己的外交才华得到了历练。那些保护强国是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维尼泽洛斯的第一外语是法语，他第一次去伦敦访问的时候，与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了密切交流。维尼泽洛斯是地地道道的岛上居民，他的地缘政治是基于大海的，他与那些国家的思考方式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康斯坦丁娶了德皇威廉的妹妹，且在德国军事学院受过训练，非常推崇德国的军事训练方法。他的参谋长，也是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之一，是扬尼斯·梅塔克萨斯，非常能干，也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与他的观念一致。在战争开始时，维尼泽洛斯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是乔治斯·斯特里特，这位部长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当年与奥托国王一起来到希腊，他曾在德国学习法律。这些人的德语都很流利，在说德语的国家中就和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德国军事机器将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正如后来所显示的，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国”。他们都是希腊精英的一部分，是在希腊革命塑造的王国里长大的。这个王国受到欧洲强国的干涉，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德国19世纪亲希腊主义的影响。希腊的精英通晓欧洲主要的语言和文化，这是现代希腊王国的本质特点。只是，这些欧洲强国正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不管是哪一方的希腊精英，都能与交战国此方或彼方的外交代表进行更容易和更坦诚的交流。不过，他们彼此之间无法顺畅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后来的分歧。

但是，分歧有更深层的原因。一直以来，19世纪20年代所形成的裂痕从来没有愈合，只是在前50年里，它隐藏在完美的一团和气的表层之下。后来，这道裂痕主要体现在关于自由的对立认识上。现在，希腊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快100年了，其分歧在于怎样看待希腊人的使命。对一方来说，最重要的是解放希腊这个民族国家；对另一方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保护希腊这个政权国家。希腊的分歧就像一战的缩影，两个选择是不相容的。1915—1922年，从内心分别认可这两个不同选择的人，在不断地相争。

裂痕再现

1914年8月，希腊政府达成的共识是保持中立。首先打破这种共识、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维尼泽洛斯。8月18日，一战爆发还不到3周，他向协约国在雅典的大使提议，如果协约国邀请，希腊就会在战争中加入它们的行列。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和多数巴尔干国家都保持中立，协约国对于在东南欧开辟新战场都不

热情。希腊的提议被礼貌地拒绝了。但是当奥斯曼帝国在11月加入同盟国阵营的时候，协约国政府的军事规划者开始重新思考维尼泽洛斯的建议。英国大使问他：“希腊愿意帮助塞尔维亚吗？”维尼泽洛斯回答：“如果这种帮助只是为了打击奥匈帝国，那么希腊不愿意。但是，奥斯曼帝国里的希腊少数族裔正在遭受更大的压力。如果奥斯曼帝国被攻击，而且在战后被肢解，那么希腊即便在巴尔干半岛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这能解放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少数族裔。”基于此，协约国在1915年1月24日向希腊发出了正式参战的邀请。

这个邀请直接将维尼泽洛斯与国王及其总参谋部置于面对面的冲突之中。那个时候，国王等人只要一想到把领土给（依然中立的）保加利亚从而换取在安纳托利亚更大的但是可能无法防御的领土时，便感到恐惧不安。这种怀疑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当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一方后，为了阻碍维尼泽洛斯计划的实施，康斯坦丁和那些同样的顾问居然能拱手让出面积更大的马其顿领土，这个“分裂”的讽刺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到了2月，达达尼尔战役爆发。希腊应不应该派遣军队去加里波利支持协约国军队的登陆？维尼泽洛斯是全力支持。有一段时间，国王和他的顾问甚至也动心了。尽管国王加冕时的称号是“希腊康斯坦丁一世”，但他喜欢让自己的称号更有神秘感，在称号上加上了拜占庭最后一名国王的序号。所以在部队（他最有威望的地方），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康斯坦丁十二世”，也就是说，他是拜占庭帝国的国王。达达尼尔战役的目标是夺取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理所当然的是，翘首等待的国王应该在那里，以“得胜大将军”的身份走在他的部队的最前头。“得胜大将军”是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称谓，难道康斯坦丁的支持者已经开始视康斯坦丁为拜占庭帝国的国王了？

最终，这都纯属瞎操心。正如我们知道的，加里波利登陆以耻辱收场，成为协约国在整个一战期间惨败的战役之一。不过无论如何，俄国都会否决希腊任何形式的加入，因为君士坦丁堡已经许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变成“沙皇格勒”了。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希腊国王在1915年3月6日接受了总参谋长的意见，驳回了总理的提议。维尼泽洛斯深感挫败，愤怒之下提出了辞呈。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明天，协约国将成为加里波利的主人，后天将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我们的旗帜将不能出现在我们梦想城市的解放之中……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3]

从这一刻开始，雅典的媒体为了它们所支持的人展开论战。从数量上看，支持维尼泽洛斯的媒体和支持国王的媒体大致平分秋色。支持维尼泽洛斯的媒体运用生花妙笔，连篇累牍地呼吁解放君士坦丁堡，实现“伟大理想”，在奥斯曼帝国的“完全属于希腊人的土地上”废黜专制暴行。另一方则更为温和，淡化关于“伟大理想”的期待，让读者相信，在英明的君王的领导下，希腊已经免除了一些灾难。^[4]从此刻起，所谓“分裂”的界限就划下了，双方的争斗也开始了。康斯坦丁走马灯似的换着总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在反维尼泽洛斯主义的旗帜下，1909年政变后一直靠边站的“旧”党的政客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党派——国家主义党，其领导者是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议会演说家迪米特利亚斯·古纳里斯。

维尼泽洛斯很快卷土重来。1915年6月13日，他领导的自由党在3年里的第一次选举中获胜。虽然总票数有所减少，但其依然拥有执政要求的多数选票。那年夏天，国王卧病在床，他的病情也许比当时披露出来的更严重，他好像再也没能真正恢复健康。虽然康斯坦丁再一次强打精神参加了新一届政府的就职仪

式，但他不愿再与维尼泽洛斯共事的情绪还是很明显的，新政府的就职仪式一直拖到8月底才进行。几天后，康斯坦丁向德国驻希腊的大使吐露了自己对一个人的失望之情，这个人“直到昨天还宣称，坚信协约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5]国王心中的信念正好相反，他无意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但是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德国军事的超强实力。他与维尼泽洛斯不可能合作，事实也证明如此。

几个星期后，保加利亚于9月21日启动军事动员。很明显，希腊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老对手就要参战了，它加入的是同盟国一方。希腊也马上进行了自己的军事动员，这样做不会在国内引起任何争议，因为希腊人知道，保加利亚人一直有所图谋，想重新夺回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赢得的但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又丢失的爱琴海沿岸，以及在1912年差一点儿成为他们的国土的萨洛尼卡。对协约国来说，它们的关注点与希腊是不同的，在它们心中，保加利亚参战势必对塞尔维亚形成新的威胁，而塞尔维亚此前就一直抵抗着更强大的奥匈帝国的反复猛攻。

于是，维尼泽洛斯再次向英国和法国提出，如果保加利亚人进攻，那么希腊军队可以帮助其守卫塞尔维亚。不过，希腊的总司令是国王，不是总理。24小时内，维尼泽洛斯不得不收回他说的话。但是，他将此提交议会讨论。1915年10月4日，保加利亚正式向协约国宣战（尽管不是向希腊宣战），维尼泽洛斯在议会赢得了支持。但是国王不受议会的约束，他无视“多数赞同”的原则，又一次解除了总理的职务。

对协约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塞尔维亚的防御问题。在其后的几周里，塞尔维亚同时受到奥匈帝国从北边、保加利亚从东边的进攻。康斯坦丁国王可能对于解除维尼泽洛斯的职务颇为得意，因为他在给柏林的一封私人电报中曾如此夸耀自己。但是，

对于英法联军1915年10月开始的萨洛尼卡登陆，他无计可施。这支登陆部队有数千人，由英国、法国和殖民军队组成并由法国将军莫里斯—保罗·萨拉伊指挥。同时，英国在10月正式向希腊政府提出建议，如果希腊加入协约国，那么希腊将拥有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这是协约国的最后一次协商，既有强制，又有诱惑。即便如此，协约国依然没有赢得康斯坦丁以及维尼泽洛斯被迫辞职后希腊组建的由少数党派执政的政府的同意。因此，英国和法国就干脆以强制性的措施解决了问题，直接占领了希腊各地的岛屿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包括克里特的索达湾、通向萨洛尼卡的海路入口的卡拉布努要塞以及整个科孚岛。万一出现特殊情况，科孚岛就是被击败的塞尔维亚流亡政府和军队的所在地。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已成为英国新建的海军基地，具体地点为穆兹罗斯。协约国的这些行动根本无视希腊政府的想法，明目张胆地侵犯希腊声明的中立立场。

到了这个时候，康斯坦丁被迫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因为他的政府已经丧失了议会的信任投票。选举是从1915年12月19日开始的。根据维尼泽洛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看法，这次选举是违宪的，因为他的自由党依然享有议会的多数支持，他的政策提议从10月起就一直搁置于议会。而且，在全民动员的条件下举行选举也是不公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尼泽洛斯1910年就是通过同样的办法对付康斯坦丁的前任乔治一世并成功上台的。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尼泽洛斯竟然也重复了当时被惹恼党派的愚蠢做法：抵制选举。的确，12月19日的选举的投票人数比6个月前少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因为投票人（只有男人才有投票权）在前方打仗，还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自由党抵制的号召。不管怎么说，选举的结果表明，作为议会中的一个力量，维尼泽洛斯领导的自由党成了牺牲品。不论是无意还是有意，不可

避免的是，竞选的功夫从此以后要下到议会以外了。

1916年上半年，紧张局势继续升温，5月底出现转折点。这个时候，塞尔维亚人被奥地利人和保加利亚人击败，他们的国家被颠覆了。塞尔维亚的残余部队首先被疏散到科孚岛的安全地带，然后从海路被部署到萨洛尼卡，与已经在那儿的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混编。正如后来人们所知的，随着意大利军队（现在是协约国一方的）和俄国军队的到来，马其顿防线得到加强，变得越来越宽。希腊的志愿者成立了新的兵团，他们大多数是从“新土地”上被征募而来的，因此，马其顿防线的协约国交战方就增加到了6个。从官方上说，希腊依然是中立国，但是已经完全卷入了战争。从协约国的角度看，希腊的军事力量对其后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从另一方面看，在同盟国眼里（特别是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希腊政府像以往一样全力推行的中立政策赔笑大方，因为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国土之内的战略要冲的控制。

1916年5月底，德国开始对希腊提要求了：希腊的前沿要塞鲁佩尔必须向德国的盟友保加利亚投降。康斯坦丁控制下的政府准备满足德国的要求，这让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大为震惊，但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协约国出面了，在靠近雅典的地方展示了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6月21日，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希腊军队立即解散，要求希腊政府成为一个“非政治”实体，让协约国成员国在希腊自由行事。这是对希腊国内事务的公然干涉。为了证明这一照会内容的合法性，英法两国援引了1832年保护希腊条约中“保护国”权益的条款，据说该内容还写进了希腊1864年的宪法。康斯坦丁别无选择，只有照办。

协约国的横加干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激起了希腊民

众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也是针对维尼泽洛斯的，背后是国王及其政府的支持。维尼泽洛斯给法国总理发了封电报，表达他的感谢：“保护国就像父母一样，完全行使了它们的权利。”^[6]康斯坦丁对德皇吹嘘如何解雇总理，至少还是在私下进行的。但是，维尼泽洛斯的这封电报的内容被泄露给新闻媒体，这引起轩然大波，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本来，英法这个“照会”的目的是解散希腊的军队，进而解除其对协约国军队的威胁。但是，由于希腊出乎意料反应，这一照会让数千名完全忠于总司令（国王）的武装人员回到社会上。他们无人管束，更没有什么纪律约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自称“在乡军人”，成为暴力和恐怖的代名词。忠诚于维尼泽洛斯的人成立了一个“国家在乡军人联盟”，与忠诚于国王的人对着干。这是内战即将发生最明显不过的标志了。

8月，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一方，马上改变了马其顿防线的军事力量平衡。萨拉伊将军指挥的部队和保加利亚、奥匈帝国与德国的联军进行了激烈的厮杀。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国、英国以及塞尔维亚的残军重整旗鼓，在其盟军的支持下，在西马其顿略占上风，稍有斩获。同时，保加利亚开始将东马其顿纳为己有，这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它的军队将所到之处的说希腊语的人赶尽杀绝。9月初，战略要地卡瓦拉镇投降，一起投降的还有防御这个镇的一个希腊整编师。“中立”的希腊正在被欧洲大战的两方瓜分，它的军队刚刚被解散，它的国家领导人则吵得不可开交。

1916年8月27日，维尼泽洛斯在雅典市中心对大规模的人群发表了演讲。他依然呼吁与国王的合作，他认为国王是受了参谋长的蛊惑而走偏了道。但是，他也很明显地暗示了即将采取的措施。两天后，他的意思就变得很明白了。在萨洛尼卡，希腊的军

队驻扎在那儿，军队的军官是最近成立的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表示不再忠诚于雅典的国王和政府。这一行动往往被描述成叛乱，尽管参加的军官根本无意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原因是萨拉伊将军的大力支持。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起义，所以被希腊政府指控为最高形式的叛国罪。

现在已到了维尼泽洛斯的时刻，但是他还在犹豫是否采取行动。最后，在9月25日，他乘船去了克里特，那是他曾经出发的地方。在克里特首府哈尼亚的外面，按照百年来的革命传统，维尼泽洛斯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民众面前，宣布成立新的希腊王国临时政府。他发布的宣言称，“我们是一个国家，在政府缺位的时候，我们必须应对国家危机”。宣言继而解释说，“如果政府背叛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国家就应该行动起来，完成其赋予政府的任务”。^[7]从此以后，大约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分裂”一直横亘在1912年之前的王国“旧希腊”和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新土地”之间。

国家与政府

维尼泽洛斯从克里特经过海上诸岛，来到萨洛尼卡。这座希腊规模第二、新获得的城市马上要成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在其后的8个月里，希腊将有两个政府，一个在雅典，一个在萨洛尼卡。这是1823年和1824年的历史重演，与那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每个政府都指控对方非法。位于萨洛尼卡的临时政府在11月向同盟国宣战，而在雅典的“官方”政府则依然保持中立。1916年12月，临时政府在萨洛尼卡宣布，国王被废黜了；而在国王统

治的雅典以及“雅典和全希腊教会”教区，维尼泽洛斯则被视为十恶不赦之人，被教会驱逐，其肖像被虔诚的公民在祈祷仪式上扔的数千个石头埋了起来。

与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个政府的军队与另一个政府的军队针锋相对。11月初，在旧希腊边界附近，马其顿的卡泰里尼在经历了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后被国防军占领。后来，法国在旧的边界上建立非军事区进行干预，当地才没有发生更多此类的行动。到了12月初，内战蔓延到雅典的街头。因为当时希腊使用的日历比西历晚13天，所以从那以后，这个冲突在希腊就被称为“十一月事件”。康斯坦丁的政府被停泊在法利罗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战舰围困。将希腊军队遣散已经不能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了。希腊没有加入维尼泽洛斯和萨洛尼卡临时政府的那部分机构，仅仅按照其一直宣称的那样保持中立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进行中立化。

12月1日，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向雅典的希腊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其交出军工厂和重武器及弹药。那天发生的事和28年后几乎同一天在雅典市中心的另一场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后一个冲突标志着希腊内战中最后的、最剧烈的冲突阶段的开始。1916年12月1日星期五，3 000名盟国士兵（多数是法国人）在登陆希腊后抢占了双方争夺的军火库和军需用品。他们发现被解散的希腊军队在等着他们。当天上午11点左右，第一枪打响了。盟国士兵和希腊军人之间的战斗在雅典几个地方爆发。外国人被击退，盟国舰船上发射出的炮弹在市中心爆炸。

康斯坦丁最多是赢得了一场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经过调和，盟军的部队撤回到舰船上，当时只归还了一部分抢到的武器装备。但是，星期五那天的事件变成了全城对被怀疑为维尼泽洛斯支持者的人进行打、砸、抢的信号。在大不列颠酒店里，枪声

四起。雅典市长、备受尊敬的希腊埃及裔棉花百万富翁、慈善家艾玛纽埃尔·本纳基，被暴怒的民众从家里拖走。他的女儿是小说家佩内洛普·德尔塔（《在保加利亚人屠夫的时代》的作者），她笃信，正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那样，那些暴徒把她的父亲带到伊利索斯河，将他私自处死了。第二天，她去市监狱寻找，“不知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是否还活着”。后来，她的父亲毫发无损地被放了回来。^[8]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被控为叛国罪。其他人被谋杀或被殴打，其财产被抢掠。两年后，巴黎出版的一份官方报告称，在那两天的暴力冲突中死亡的有35人，将近1 000人被监禁。支持维尼泽洛斯的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办公场所被捣毁，其编辑被拘押。那些暴徒和在乡军人对入侵首都的“保护强国”无可奈何，就拿自己的同胞泄愤报复。尽管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但是据说，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一直计划发动一次起义，从而配合可恶的外国人的登陆入侵。

在乡军人在那两天时间里的行动以及后来几个月里的更差的表现，被100年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描述为“原法西斯主义行为”和“大屠杀”。^[9]在乡军人的袭击目标是逃难者，不少是一贫如洗的难民，他们从安纳托利亚逃出来，躲避那里的迫害，到自由的希腊寻求安全，却被视为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希腊新土地，他们期待维尼泽洛斯能解放他们的家乡，而这被认为是支持维尼泽洛斯政策的表现，所以被看作最大的错误。在反维尼泽洛斯的阵营里，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来自希腊旧国境线以外的人，称他们为“陌生人、外来者、逃难者、克里特人”，认为他们是“花钱买到的贱民”，是“恶棍坏蛋”。^[10]“伟大理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就这样结束了。

暴行并不总是发生在一方。维尼泽洛斯的临时政府在其控制的地区颁布了戒严令，任何抵抗都会被无情镇压，最严重的镇压

发生在萨洛尼卡附近的哈尔基迪基半岛以及拿索斯的阿皮兰索斯村，那里的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于难。甚至维尼泽洛斯的老家克里特岛以及萨摩斯岛，也发生了骚乱。

“十一月事件”及其后果对希腊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无法弥补的影响。在此之前，欧洲强国一直不愿意正式承认萨洛尼卡的希腊临时政府，现在，它们正式承认了。同时，它们还对旧希腊实施严密的封锁。在遭受羞辱之外，雪上加霜的是希腊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有报道称，军需用品被绝望的公民哄抢一空。除了保留他们赖以存在的保持中立的遮羞布之外，国王的政府几乎再无任何作为，好像只是寄希望于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以推翻位于萨洛尼卡的临时政府。如果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获胜，国王的政府就将马其顿的大部分国土送给保加利亚。此时，古老的战术又复活了。非正规的志愿者战士穿过边界，扰乱敌人，但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只不过这次的“边界”是旧希腊和新土地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前用来为王国开疆扩土的办法，现在则用来对抗位于北部的对立的希腊政府。

1917年5月，临时政府组建的希腊军队第一次在马其顿防线采取行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部队的人数增长到6万。就希腊的国内事务而言，协约国认为可任意摆布这个分裂的国家，它们又一次在伦敦做出了关键的决策。那是在5月底，它们在伦敦召开会议，认为必须废黜康斯坦丁，且在必要时会采取武力。这个要求依然是以“保护国”的名义发出的。国王和他的直系亲属在6月15日离开希腊。他并没有正式逊位，经协约国同意，他的王位由他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继承。

维尼泽洛斯返回雅典担任统一后的希腊的领导人的道路，现在被打通了。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经过将近3年痛苦的分裂，希腊与协约国达成了和平协议，首次正式参战。所以，“政治大

分裂”应该结束了。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1917年6月底，维尼泽洛斯在雅典市中心的自由广场向公众发表演讲，现场听众人数比他1910年第一次上任时欢迎他的人少多了，人们也忧郁多了。在他讲话的时候，法国军人全副武装地占领了城市里每一个房顶和每一个战略要点。很多法国军人来自非洲殖民地，这一点尤其让希腊当地人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用今天的话说，那里的种族歧视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严重）。维尼泽洛斯是以“国家”的名义执政，那么主人是谁？即便维尼泽洛斯是滔滔辩才，也难以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被“保护国”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上的。当然，19世纪20年代以来，希腊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正是那些对此颇有怨言的人愤怒的原因。

在讲话中，维尼泽洛斯期待希腊人民的“精神统一”。他宣布，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会被报复。但是，情况远不是如此。没人相信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议会被解散了，但是，对一个刚刚全面动员参战的国家而言，现在又不可能举行大选。比自由党抵制的1915年12月那次选举早两年的选举重新回来了，因而赢得了“拉撒路^[11]议会”的绰号。在这个人为恢复的议会中，维尼泽洛斯于1917年8月获得了信任投票。

前政府的领导人和支持者被连锅端掉，被流放到科西嘉岛，法国人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虽然维尼泽洛斯在早先的讲话中对级别较低的人有过承诺，但他们一样被清洗了，被赶出了军队、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甚至教会。曾经宣布维尼泽洛斯为“十恶不赦之徒”的大主教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克里特人，他是维尼泽洛斯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1917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18年的第一个月，当协约国正

在准备应对同盟国对马其顿防线的下一次进攻时，希腊比以前分裂得更严重了。1918年5月，3个希腊师在斯科拉迪莱根，也就是希腊与北马其顿共和国现在边界线以内的地方，与协约国的盟友一起战胜了保加利亚的军队。这3个师都是在希腊的新土地上招募的。那年的早些时候，旧希腊的军队整建制地发生哗变，遭到严厉惩戒。在这些处罚活动中，克里特军警的作用非常明显。他们来自大山深处，作风强悍，让其他希腊人深感恐惧，他们疯狂效忠于他们的同胞维尼泽洛斯。尽管表面上，统一的希腊在一战中为协约国盟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的内部依然秘密进行着一场残暴的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其顿防线在1918年9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希腊军队在协约国投入马其顿防线的军事力量中占1/3。在保加利亚人提出单独议和的那一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从柏林发来消息，战争打输了。这场战争首先是在东方结束的。10月30日，在利姆诺斯岛穆兹罗斯的英国海军基地，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最后的停火协议是关于西线战场的，在11月11日签署。第二天，得胜的协约国的部队进驻君士坦丁堡。由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再参战，所以也就没有人谈论什么“沙皇格勒”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联合组建的军管机构负责管理君士坦丁堡，管理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希腊军队也得到允许，发挥了一点儿作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族居民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无畏战舰“阿维罗夫”号，这艘战舰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就获得了荣誉。

这个时候，维尼泽洛斯已经到了伦敦。早在停战前，他就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交了他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详细建议。根据他1912年与还是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交流的内容，维尼泽洛斯建议以3种方式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安纳托利亚，其

中，整个西部地区（与爱琴海接壤的地区）划归希腊。虽然贡献微薄，但是他的国家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维尼泽洛斯早早地提出要求，希望在胜利的大餐中分得一杯羹。

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持续了整整一年，其影响是改变了欧洲和中东的版图，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时候依然在演进的民族国家替代了历史悠久的帝国。这次会议最为人所知的成果是《凡尔赛和约》。这份和约的编制速度比较快，到6月就完成了，而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磋商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其间，维尼泽洛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希腊以外的他擅长的谈判桌上度过的。英国年轻的外交人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对他非常钦佩，并不吝赞誉：“他和列宁是欧洲仅有的两位真正伟大的人物。”每当听维尼泽洛斯发言，尼科尔森就深深折服于其“混合着优雅、匪气、政治、爱国、勇气和文学等多种特质的魅力，最重要的是，维尼泽洛斯是高大威猛的、健硕的、微笑的汉子，两只眼睛在镜框后面熠熠发光，头上戴着一顶方形黑丝无边便帽”。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对于维尼泽洛斯“滔滔不绝”的雄辩也有深刻的印象。[\[12\]](#)

通过坚韧和巧妙的政治手腕，维尼泽洛斯在领土上和声望上为希腊赢得了巨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在1919年5月获准占有士麦那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埃登行政区；第二个收获是根据一年多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获得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一片面积更大的土地以及不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色雷斯大部分地区。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两个很明显的收获对于希腊是灾难性的，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预见。这两个收获不仅是参战并获胜的结果，还是在对立的、更强的国家之间锲而不舍地寻求结盟、利用矛盾的结果。实际上，希腊之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取

得显著的成绩，也是因为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1920年8月12日，《色佛尔条约》签署刚刚两天，维尼泽洛斯就离开巴黎了，因为他在那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希腊对士麦那的行政管理刚刚过了一年的时间。希腊在英国印刷了10 000张写着“伟大希腊”的彩色地图，这些地图不久后还要印制在明信片上。地图上的橙色部分是希腊的领土，几乎完全包围了爱琴海。地图上，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块空白地带是国际管理区。根据《色佛尔条约》，地图上的安纳托利亚的西南角和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一块空白地带，将划归意大利。地图还对希腊进行了拟人化，希腊好像是一位长发少女，一只手举着一面巨大的希腊国旗，另一只手拿着一张布告，布告上面写着：“希腊注定要活下去，应该活下去”。地图的左上角有维尼泽洛斯的头像，他留着络腮胡子，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透镜。这是新的希腊，“涵盖两大洲、五大洋”，维尼泽洛斯和他的支持者总喜欢如此描述。除了色雷斯的一部分地区，《色佛尔条约》定义的新希腊的所有地盘都已经有希腊的驻军。色雷斯很快也会有希腊驻军。

希腊已经实现了现代建立国家以来一直渴望实现的主要目标——不断地开疆扩土，将所有的希腊族的人都纳入进来。维尼泽洛斯非常自信，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希腊国境线以外的希腊族的人，他要么通过同样的外交手段扩大边界，要么吸引那些国境线外的希腊人回到家园，比如，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奥斯曼帝国残余的地盘，而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徒进入希腊控制的地区。

1920年8月的那个晚上，当维尼泽洛斯在巴黎里昂站候车的时候，“伟大理想”完结了。那一刻，两个持枪男子跑过去，开了枪。经查明，开枪人是希腊前军官，在最近的整肃中被革除了职务。希腊的内乱战火已经烧到了文明世界的首都巴黎。从那时

起，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和平的幻想开始崩塌。

“伟大理想”的终结

维尼泽洛斯逃过一劫，只受了点儿轻伤，在巴黎的诊所里待了没几天就出院了。维尼泽洛斯遇刺的第二天，消息传到雅典，整个城市反应强烈，这引发了对已知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的暴力浪潮。尽管规模小一点儿，但这场暴力活动被描述为“十一月事件”的重演。伊万·德拉库米当时批评维尼泽洛斯的言辞最犀利，暴力活动最盛的时候，他被安全部门的特工从小汽车里拽出来，当场打死。这个暴行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繁忙街道之上，发生在靠近今雅典希尔顿酒店的地方。雅典市长艾玛纽埃尔·本纳基在1916年曾被指控犯有合谋串通罪，当他受到暴徒威胁的时候，德拉库米肯定是无动于衷的。现在，内战依旧，只是人的命运反过来了。

这就是维尼泽洛斯在签署《色佛尔条约》并获得胜利后返回时的雅典的氛围。他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议会选举。出于实施戒严令和在安纳托利亚进行征兵动员的需要，“拉撒路议会”已经人为延期了两次。1915年6月后，希腊就没有举行过全面竞争的选举。所以，戒严令被解除，选举定于11月举行。持反对立场的政客最终获准从流放地科西嘉岛返回希腊。迪米特利亚斯·古纳里斯创建的“国家主义党”现在更名为“人民党”。古纳里斯在1920年10月的第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到“废除现任政府的专横暴行”。在未来，国家“应该净化，去除任何专横暴行的温床”。

[13]他的竞选之路并没有赢得开门红。

亚历山大大国王在雅典城外的塔托伊皇家园林被一只宠物猴子

咬了一口，伤口化脓感染，并因此去世。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让希腊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在就任国王后的3年时间里，康斯坦丁的这位年轻继任者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迫行事，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为了举行国王葬礼，也为了确定一名摄政，议会大选不得不推迟一周。11月14日，当大选举行的时候，它不再是只针对维尼泽洛斯政府执政情况的投票。让维尼泽洛斯的反对者怎么都想不到的是，这次大选还真有一个另外的选择，成为一场各具魅力的对手的竞争，他们在过去的10年里各有胜负，这两个人分别是维尼泽洛斯和被流放的康斯坦丁。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与人民非常亲近。1917年后，康斯坦丁一直在瑞士的流放中荒废时光。在过去执政的3年里，维尼泽洛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才刚刚回到希腊。维尼泽洛斯与其血肉相连的支持者之间保持距离，这有助于营造自从“十一月事件”以来就环绕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宗教狂热的氛围。一份支持维尼泽洛斯的报纸将维尼泽洛斯视作英雄，把他比作基督和穆罕默德，称他是上帝在人类启蒙历史的新的关键时刻派来的先知。对支持者而言，维尼泽洛斯就是弥赛亚，是上天在世间的代表。可以想见的是，对敌人来说，维尼泽洛斯就是“假先知”，是“伪造的弥赛亚”，是被“撒旦的欲望”驱使的神经错乱的疯子。[\[14\]](#)

自由党输了。忙乱的投票和计票结束后，99%的选票都支持康斯坦丁，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康斯坦丁回到希腊，又登上了他的王位。早在投票结果还没公布的时候，新的希腊政府就收到一份代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照会”，上面写着“那个人在战争中对协约国不忠诚，且其敌视行为为协约国带来了巨大耻辱和巨大损失，如果希腊让他重登王位，必须先得到它们的同意”。[\[15\]](#)这不公平？可能吧。这是干涉国家内

政？当然。但是，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份公报说得更清楚，如果康斯坦丁回来当国王，那么欧洲强国就不会为希腊提供任何金融资助。这个警告再清楚不过了。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新的希腊政府曾表示不再占有在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并撤兵，但这次一意孤行，表示继续占领安纳托利亚。

维尼泽洛斯下台前，曾请求劳合·乔治授权希腊军队继续向东推进，从而履行《色佛尔条约》中的条款。自从希腊军队1919年5月在士麦那登陆以来，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由于希腊军队的到来，一个新的力量进入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之中。的确是这样，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前面曾提到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当时还是来自萨洛尼卡的一名17岁的军校学员，没有参加1897年的战争，但是对欧洲强国干涉奥斯曼帝国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希腊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战败，却被欧洲强国拯救。凯末尔在世界大战中表现优异，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成功地阻击了协约国的加里波利登陆，在俄国和美索不达米亚防线也进行了成功的阻击。那个时候，他还没获得“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国家之父）”的称号。

1919年5月，就在希腊军队从士麦那撤离4天后，凯末尔抓住机遇，在安纳托利亚张贴公告，宣布自己为新运动的领导人，反抗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1919年9月，土耳其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起草并发布了《国民公约》。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建设蓝图，一直延续到今天。

凯末尔无视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权威，与其他民族主义者迅速在安卡拉成立了对立的临时政府。因为苏丹已经沦为傀儡，他的政府已被占领国控制，所以《色佛尔条约》的条款一公布，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就决定拒绝接受。有你的初一就有我的十五，现在轮到安纳托利亚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对付说希腊语的基督徒了，就像百年前基督徒对付穆斯林那样。奥斯曼帝国已成过去。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将按照欧洲的模式，在安纳托利亚说土耳其语的核心地带，以及包围伊斯坦布尔的一小块欧洲土地上，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伊斯坦布尔将不再是首都。而且，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支持者们为了将国土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所谓外国占领者，指的就是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是，维尼泽洛斯从协约国那里接受了占领士麦那和埃登行政区的指令，这就意味着希腊成了占领军的代表。于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爆发了战争，战争从1919年持续到1922年，这场战争被土耳其看作“独立战争”。希腊和土耳其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都以对方为对手，打了一场“独立战争”，从对方的占领和奴役下独立出来。

当然，在1921年年初，人们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希腊在雅典成立了新的政府。将新政府组成人员及其支持者凝聚在一起的，只有对曾迫害过他们的维尼泽洛斯支持者的仇恨。维尼泽洛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希腊，但依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多数观察家看来，凯末尔在安卡拉获取新政权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叛乱，新生国家还没有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巴黎和会的整个逻辑是，战胜者主宰失败者的命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逻辑有点儿问题。德国的莱茵兰被法国占领了，其经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瘫痪，经济瘫痪的部分原因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奥匈帝国解体。不论巴黎和会如何分配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这都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新命令，它都必须遵从。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维尼泽洛斯才在1920年10月给劳合·乔治写了封信。凯末尔的公然挑衅和威胁只不过是促进了《色佛尔条约》的强制实施。

如果有一个《色佛尔条约》主要签署国的授权，维尼泽洛斯就会再一次派遣希腊军队去奥斯曼帝国执行《色佛尔条约》。

这也是雅典新的保王派政府早在1921年就决定实施的战略。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依然是一个谜，因为这个战略是他们痛恨的维尼泽洛斯的遗产，而且他们还要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康斯坦丁重返希腊王位，失去了英国的支持。有人认为，虽然希腊新政府害怕国内的敌人维尼泽洛斯，但是同样憎恨驱逐希腊族的凯末尔及其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因此强打精神，向世界，尤其向英国展示，即便没有维尼泽洛斯，政府也一定能管理得很好。如果希腊新政府不对凯末尔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被推翻。这一旦成真，“维尼泽洛斯式的恐怖”就会重演。希腊即便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中被土耳其打败，也比面对维尼泽洛斯回来要好一点儿。^[16]

所以，又是因为深度撕裂的政治，希腊新政府在1921年春天陷入与凯末尔战争，派去打仗的部队正是那支几个月前刚刚清洗过军官的部队。这些军官是上一任政府提拔的，所以遭到了清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战功，参加了1917年和1918年的马其顿防线战役。希腊军队在3月的第一次进攻被击溃。此时恰逢希腊革命爆发100周年，这次失败显得尤为不光彩。经过重组，人民党领导人古纳里斯再度领导希腊政府。出于对第一次军事失败的不甘心，康斯坦丁亲自率兵去士麦那，不过他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最高指挥官罢了。请求康斯坦丁亲征，好像是古纳里斯的主意。扬帆出征的那个日子是另一个纪念日——5月29日，那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陷落于奥斯曼人之手的日子，最后一任拜占庭康斯坦丁皇帝在战争中死亡。1921年的这一天，拜占庭康斯坦丁皇帝的精神继承者、被一些人称为“康斯坦丁十二世”的希腊国王带兵出征了，旨在实现“圣城”回归东正教的古老预言。不要

对康斯坦丁过于苛求，他虽然才50多岁，但“已经老态龙钟，病容满面，没有了往日的固执和意志”。[17]7月10日，两个希腊武装纵队往东进发，攻击凯末尔的临时首都安卡拉。

萨卡里亚河之战被描述为“一战的最后的战役”，[18]是于8月底和9月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酷暑中进行的。希腊军队的补给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土耳其人则有着可以从远东不断地补充兵员的优势。但是，土耳其人也缺少粮食、武器和弹药。安卡拉的临时政府不能像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那样动员一切资源。希腊有着更好的组织和更强的军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战争的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凯末尔甚至制订了放弃安卡拉的应急计划，首先撑不住的却是希腊人。经过将近3周的鏖战，希腊下令撤退。其实，希腊的军队距离凯末尔的临时首都只有不到50英里的距离。但是，希腊已无计可施，只有撤退。

战争的残局拖了整整一年。希腊军队依旧坚守在战争开始前构筑的防线上——距离爱琴海岸以东大约200英里。11月，古纳里斯政府在雅典的议会里赢得信任选票，竭力游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希望英国出面调停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并希望得到一笔贷款来应付军队高居不下的支出。英国方面半心半意地答应了，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为了筹集资金，希腊政府采取了越来越疯狂的措施：在1922年春天，将所有流通的钞票全部召回，要将它们一分为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希腊政府最终在1922年5月倒台，新的联合政府上台。所谓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维尼泽洛斯主义反对派的联合。

随着战场上的战火拖延不熄，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战役没有任何体面结束的迹象，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增大。过去6年持续不断的内战以及其他冲突搅动起来的所有丑恶开始浮出表面。8月，一份亲政府的报纸《每日报》发表了

一篇著名的社论，题目是《回家……》。社论呼吁“再也不能在那个还活着的人无情地施加到希腊人身上的冒险事业上流血牺牲了”，当然，那个人指的是维尼泽洛斯；现在“应该放弃小亚细亚，把它还给其尊贵的居民吧”。在希腊语里，从罗马时代起，小亚细亚一直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使用“小亚细亚”这个词汇好像是为了抹去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之间的差别，而这一差别是希腊从一开始建立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该报编辑乔治斯·弗拉乔斯后来承认那篇社论是在古纳里斯的授意下撰写的。对古纳里斯来说，现在重要的不再是“已经解放了”的民族国家的未来的问题，而是希腊国家及其机构的荣誉和名声，特别是军队的荣誉和名声。

也许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出自希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职衔最高的政府官员——土麦那高级专员阿里斯泰迪斯·斯特里贾迪斯之口，此话似乎是预言。有人问：“在已经不可能避免一场人类灾难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帮助希腊人逃离那个城市？”据说，斯特里贾迪斯是这样回答的：“他们最好待在这儿，被凯末尔杀掉，如果他们返回雅典，就会把那儿的一切弄得天翻地覆。”^[19]尽管1922年那场噩梦般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那种恐惧依然没有散去。

与一年前的萨卡里亚河战役一样，结局是在夏末酷热的几周里突然而至的。土耳其人于1922年8月22日拂晓在很长的战线发起攻击，两天后，希腊军队全面撤退。截至9月8日，残兵败将龟缩在土麦那的狭小腹地中。根据命令，希腊残军迂回土麦那，往南撤退，然后从切什梅港上船回国。切什梅港与希腊希俄斯岛中间仅隔了一道很窄的海峡。对将近一个世纪的扩展梦想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一种耻辱。“伟大理想”死了。

第二天，也就是9月9日，凯末尔的先头部队进入土麦那。这

一天依然是士麦那的纪念日。1982年，度库兹埃路尔大学在士麦那创立，大学名字的意思就是9月9日。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就要开始了。亚美尼亚人无处可去，在自己的家中被有组织地杀害。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希腊妇女和儿童涌进城市。士麦那著名的码头有1英里多的海岸线，全挤满了绝望的难民。岸边建有新古典样式的高楼，欧洲强国盟友的战舰停泊在海湾中，但是船员接到了严格的命令——只能搭救自己国家的人。到了夜里，土耳其人的探照灯扫射着岸上的人群，机关枪和狙击枪肆意地向这群人开火，将试图游到装甲舰安全地带的人击毙。恰在此时，有一位美国慈善家伸出援手。他的船队使数千名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在凯末尔的最后期限到来以前离开了士麦那，多数人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适龄的男人早就被围捕了，被征入劳动营，到内陆服苦役。

整个城市很快就淹没在火海中。从9月13日起，一连三天，大火烧毁了这个“异教之城士麦那”的大部分。这场大火受到美国人、希腊人、获胜的土耳其军队以及后来进城的非正规军的谴责，纵火被认为是犯罪。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有证据表明可能是无意），大火的结果是几乎将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所有可视痕迹全都清除了。这些外来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百年，把士麦那建设成了黎凡特最大的文化圣地和商业中心之一。

1921—1923年，在士麦那城及其周围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到底有多少希腊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丧生，谁也不知道。据推测，大概上万人丧生。这么巨大的死亡数字也只反映了奥斯曼统治之战期间各方全部生命损失的一小部分，这场战争长达12年，现在终于要结束了。据估计，截至1923年，生活在奥斯曼帝国1911年疆域之内的所有人口，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减少了20%左右。也就是说，人口死亡率（包括进出帝国的难

民)是1/5。[20]一年多后，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在它的年鉴中，伊兹密尔(士麦那)的攻取标志着国家独立战争取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对希腊人来说，这座城市的毁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和驱逐出境，成为他们记忆中的“小亚细亚大溃败”(往往简称为“大溃败”)中最恐怖的一幕。

惩罚

那个时候，希腊的反响很迅速、很强烈。士麦那的灰烬还没有变凉，分散在附近岛屿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上的部队军官就在9月2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政府解散、康斯坦丁立即退位，进而为这次灾难负责。革命者搭乘的船只还没有到达比雷埃夫斯港，惊慌失措的政府就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康斯坦丁在月底离开了希腊，这一次是永远离开了。他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乔治二世。不久前在士麦那城外被击败的大约12 000名士兵，现在则昂首进入雅典。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政府。这次事件本来可以成为抹平过去几年来恶性分裂的一味精神良药，但是机会好像很快就消失了。没过几周，新的军政府背后的主导力量渐渐浮出水面，他们是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这位希腊前总理一直隔岸观火，在国外表示自己愿意代表新的政府。

同时，应外国政府及其在雅典的代表的强烈要求，希腊成立了公审法庭，判决对这次灾难负有最大责任的5名政客和1名军事指挥官有罪。“六人”(这是日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在古蒂的山顶上被处决。古蒂这个小地方既可以成就胜利，也可以见证失败。1909年，这里首倡暴动，将维尼泽洛斯第一次送上权力的宝座。现在，这里成了那“六人”事业和生命的终点。他们是希腊

前总理迪米特利亚斯·古纳里斯；外交部部长乔治斯·巴尔塔季斯；战争部部长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当时不幸担任总理的佩特罗斯·普罗托帕帕扎基斯；尼古拉斯·斯特罗斯，是维尼泽洛斯的宿敌，刚担任外交部部长；军队参谋长乔治斯·查兹奈斯蒂斯。

军事法庭对那“六人”叛国罪的指控当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被指控有罪的那几个人，会愿意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更不用说摧毁了。但是，指控定罪和判刑执法完全反映了一战初期以来在维尼泽洛斯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流行的谴责和反谴责的语言风格。“叛国罪”是对国家真正利益的误读。很明显，那“六人”成了替罪羊，是在国家蒙羞和报复失败的狂乱中被依法谋杀了。正如前面所观察到的，这样的放血治疗只能让谁该为这次灾难真正受到惩罚的问题沉到了表面之下，而且让问题隐藏了几十年。^[21]

这个事件引发了维尼泽洛斯个人应负多少责任的问题。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害怕和憎恶维尼泽洛斯的政策以及影响的人或者那些在“维尼泽洛斯式的恐怖”岁月中受到迫害的人来说，罪魁祸首就是维尼泽洛斯，这是不证自明的。至少从1915年起，维尼泽洛斯就被他的对手称为“卖国贼”。不论是因为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的国家耻辱，还是因为那“六人”的死刑判决；不论是在维尼泽洛斯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多年，希腊社会的这一批人是不愿原谅维尼泽洛斯及其支持者的。更为冷静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对维尼泽洛斯及其遗产都没有敌意，但也不愿意宽恕他。

还有一种说法被提出，那就是那次灾难的根源在于维尼泽洛斯1919年决定接受协约国的授权并派遣军队去士麦那。一年半后，他在选举中败北，由于没有认清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真实本质，他让自己犯下的错误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安纳托利亚腹地与凯末尔进行新的军事决战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最终的灾难是维尼泽洛斯的错误导致的，他是这次失败的始作俑者，他的继任者只不过是将其计划推向了痛苦的终点。不管怎么说，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构建一个希腊飞地，从来都是行不通的（正如梅塔克萨斯将军1915年警告的那样）。在那个地区，任何边界都抵御不了土耳其人从东边的进攻。将土麦那从其穆斯林土耳其腹地隔绝，在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希腊统治那个地区，那么土麦那几年后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22]所以，这个说法还有令人信服之处。

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思考。但是，我们先来谈第二点，将土麦那与萨洛尼卡的情况比较一下。两个城市的自然背景和经济历史非常相像，甚至都被大火烧毁过，而且烧毁之前的传统城市布局也差不多。一个城市在1917年发生了大火，另一个城市在1922年发生了大火。土麦那的希腊人口和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都大于萨洛尼卡。自从1912年成为希腊的一部分后，萨洛尼卡在很多方面都与大陆腹地隔断了。这包括在冷战期间将欧洲分开的“铁幕”存在的那半个世纪。那道“铁幕”就从萨洛尼卡北部50公里处经过。希腊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边界是在1913—1923年勘定的。1941年遭受入侵时，希腊根本无法防御。可以设想一下，维尼泽洛斯和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商定了希腊的边界，在没有后来发生的人口急剧变动的形势下，这个城市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毕竟，维尼泽洛斯1923年在洛桑与凯末尔的代表伊斯梅特帕夏以及1930年与凯末尔的磋商，充分证明了他解决争端的外交才华和实用技巧，而希腊当时面临的形势还没有1920年和1921年的形势有利。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上面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与中立的土耳其毗邻的希腊安纳托利亚省就可能成为20年后希腊逃脱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唯一通道。

那么，1919年就会有进入安纳托利亚的重大决定。关键在

于，维尼泽洛斯只有在确保能够得到欧洲强国的支持后，才会采取行动，也总会采取行动。[\[23\]](#)1919年，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欧洲强国的支持；1920年，他下令军队在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扩大占领区时，也得到了他需要的欧洲强国的支持。在黯然离开总理办公室时，他又一次期待得到欧洲强国对他留任的支持。与他的总理继任者不同，如果没有得到更强有力的保证，那么他绝不会在1921年继续推进领土扩张。但即便没有这些保证，那场战役也几乎大获全胜，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在萨卡里亚河之战中，希腊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土耳其人都做好了放弃安卡拉的准备。即便凯末尔本人似乎也经历了绝望的时刻，有可能放弃战争。[\[24\]](#)协约国军队尽管不再积极支持希腊人，但是依然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与黑海之间的海峡。它们占据前奥斯曼帝国那个立足点的决心还没有受到考验。（1922年9—10月的恰纳卡莱危机期间，考验降临，随之而来的让步使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黯然辞职。）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即便在那年8月土耳其反攻的时候，优势的天平依然偏向希腊这一边。如果希腊军队的士气再高一点儿，那么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25\]](#)

因此，即便在维尼泽洛斯第一次派遣希腊军队的3年后，即便在他卸任总理将近两年后，安纳托利亚的失败也并不是必然的。同时，即便希腊没有后勤保障和外交优势，如果维尼泽洛斯一直担任总理，那么通过军事力量击败凯末尔的战略也要比一般认为的更容易成功。

如果说维尼泽洛斯有错的话，那么他的根本错误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他与外国政要进行磋商的才华远远高于在国内使用的政治手腕。正是因为他过早地坚持希腊加入协约国，他的国家才被强加上了“政治大分裂”，协约国成员国也认为维尼泽洛斯的建议有点儿超前。他本来还可以再等等。他本来可以与康斯坦丁和参

谋长进行合作。他本来可以把他的游说才华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正是离他的家最近的地方。国外和国内两个阵营之间丧失信任，似乎发生得太早了点儿，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被证明是不可弥补的。维尼泽洛斯的国家扩张计划的总体逻辑是基于他作为克里特人，也就是一个对外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的。如果他想获胜，那么他就得把他理解的国家概念贩卖给旧希腊的领导人和民众，因为那些人已经习惯于19世纪30年代巴伐利亚人到来以后的舒适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梅塔克萨斯将军的观点完全具有代表性，他是康斯坦丁的前参谋长，也是后来将希腊带入二战的独裁者。在1914年7月战争一触即发时，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在这次巨大的灾难中，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小小希腊能够幸免。”^[26]在“分裂”声最大的那些日子里，保王派的新闻媒体天天在宣传这样的观点，一点儿都没有个人的真诚。维尼泽洛斯及其支持者怒斥这些东西，将其称为“狭隘主义”，而他们与此相反，去竭力追求“民族国家”没有边界的地平线。维尼泽洛斯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那些希望维持“一个小小的、光荣的希腊”的领土完整的人的激情和恳切，没有让他们得到渴望的东西。维尼泽洛斯好像不能理解他的对手的观点，所以就诉诸与磋商和沟通完全对立的措施。比如，大概是1915年夏天，他曾断定，实现他的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推翻他领导的政府的宪法基础，废除国王的权威。维尼泽洛斯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会强化他在国外的作用，但会致命地削弱他在国内的作用。

最多晚至1914年，灾难的种子便种下了。但是，维尼泽洛斯在一件事上是没有做错的，不能被冤枉。那就是他已经完全吸取了1897年的教训。1912—1920年，希腊的每一点军事进展和外交成果都是与外国合作伙伴联合取得的。军事和外交是协力推

进的，一方促进和服务于另一方，一方对另一方经历的机遇和困境给予积极回应。在1921年和1922年，尽管这两方都很重要，难分伯仲，但是希腊保王派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恢复与外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希腊政府自己也感觉到了，因为在1922年8月面对土耳其的进攻时，希腊新招募的军队缺乏斗志，士气低落。作为现代国家，与土耳其相比，希腊是先建国的，其外交和战争双管齐下，意在扩大疆域。“大溃败”的直接原因是外交的失败。这个错误，维尼泽洛斯永远也不会犯。

代表希腊参加和谈的是维尼泽洛斯，这次和谈是由新成立不久的国联主持的，安排在瑞士的湖畔小镇洛桑。维尼泽洛斯的谈判砝码不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代表是伊斯梅特帕夏，后来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伊诺努。他态度强硬，不妥协，一定要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完整的和平条约的内容直到第二年7月才尘埃落定，其条款包括国际社会承认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是一战以后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之一。如果从希腊开始算起的话，那么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就将近一个世纪了。

维尼泽洛斯和伊斯梅特帕夏于1922年11月聚首洛桑，他们在外交磋商中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一场即刻就要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大约80万希腊人已经逃离安纳托利亚，还有25万人正在从东色雷斯蜂拥而出（希腊军队于10月解救出来的人）。伊斯梅特帕夏态度很明确，新的土耳其政府不准备让这些人再回去。磋商的结果是一个大胆的人口迁徙计划。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是前所未有的。1923年1月30日签署的《洛桑条约》，对20世纪和以后解决未来冲突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条约的开端就赤裸裸地言明希腊和土耳其全权代表达成的协议：

从1923年5月1日起，两国进行强制性的人口交换，交换的人口是居住在土耳其领土上的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土耳其公民和居住在希腊领土上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希腊公民。

没有土耳其政府或希腊政府的批准，这些人不得返回他们生活过的土耳其或希腊。

唯一的例外是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和生活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 [27]

一夜之间，几乎整个希腊民族国家被塞进希腊国家的现有边界之内。“伟大理想”在士麦那城外的战场上结束了，没有想到的是，它现在以这么一种方式完结，但这毕竟也是一种实现。但是，一战期间重现的那道裂痕，直到50年后才得到修复。

[1] Cited in translation in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295.

[2] George Leon, *Greec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14–1917* (Thessaloni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1974), 29, citing a diplomatic telegram of 7 August 1914.

[3] Cited in Leon, *Greece*, 145.

[4] Despoina Papadimitriou, ‘Ο εθνικισμο.. στο βενιζελικο. και αντιβενιζελικο. τυ.πο και η εσωτερικ. διαμα.χη 1914–1917’ [‘Nationalism in the Venizelist and anti-Venizelist press and the internal conflict, 1914–1917’], in Συμπ.σιο για τον Ελευθ.ραγιο Βενιζ.λο, Πραγαγτικ. 1986 [Symposium on Eleftherios Venizelos, Proceedings 1986.] (Athens: ELIA and Benaki Museum, 1988), 96.

[5] Leon, *Greece*, 218, citing a German diplomatic telegram of 2 September 1915.

[6] Giorgos Mavrogordatos, 1915. Ο Εθνικ.. Διχασμ.. [1915: The National Schism] (Athens: Patakis, 2015), 84.

[7] Mavrogordatos, 1915, 93, 217.

[8] Mavrogordatos, 1915, 271, citing the diary of Penelope Delta.

[9] Mavrogordatos, 1915, 89, 99.

[10] Mavrogordatos, 1915, 226–7, 274–5, quoting newspapers of the period.

[11] 拉撒路是《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人物。耶稣在拉撒路死后断言其将复活，也确实如此。此处借用这一记载，以指该议会“复活”。——编者注

[12] Cited in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 Hurst, 1998; first published 1973), 67, 140.

[13]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146; Mavrogordatos, 1915, 134, citing Gounaris's speech on 25 October 1920.

[14] Mavrogordatos, 1915, 168–9 (citing a newspaper of 15 August 1920), 171–4.

[15]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166.

[16] Mavrogordatos, 1915, 142–3, 154.

[17]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224.

[18] Sean McMeekin,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London: Allen Lane, 2015), 456.

[19] Mavrogordatos, 1915, 228–30.

[20] McMeekin, *Endgame*, 483–4.

[21] Mavrogordatos, 1915, 150–5, 314–18, and George Mavrogordatos, *Μετ. το 1922. Η παραγ.ταση του διχασμο.* [After 1922: The Extension of the Schism.] (Athens: Patakis, 2017).

[22] Compare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134, citing Venizelos to Lloyd George, 5 October 1920, with p. 203, citing Metaxas's diary for 11 April 1921. On defensibility, see the views of Metaxas as early as 1915 and Toynbee in 1921–2, both summarized in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48–51, 55, 109–10; on economic isolation from the hinterland,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73 n., citing the view of an American analyst in 1918; Mavrogordatos, 1915,

[23] For instances see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117, 124, 131.

[24] Andrew Mango, *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316–17; Halidé Edib, *The Turkish Ordeal* (London: John Murray, 1928), 284–310.

[25] Douglas Dakin, *The Unification of Greece, 1770–1923* (London: Benn, 1972), 237

[26] Ioannis Metaxas, *Το προσωπικ. του ημερολογιο* [His Private Diary.], 4 vols (Athens, 1951–64), vol. 2, 314 (emphasis added); Athina Kakouri, *Τα δ.ο β.τα* [The Two Vs.] (Athens: Kapon, 2016), 150.

[27] Text reproduced in full in Dimitri Pentzopoulos, *The Balkan Exchange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2; reprinted with a new preface by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London: Hurst, 2002), 257–63, and Renée Hirschon (ed.), *Crossing the Aegean: An Appraisal of the 1923 Compulsory Population Exchange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Oxford: Berghahn, 2003), 282–7.

第八章

从头再来

(1923—1940)

世界上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现在成为100年前在革命中诞生的希腊国家的公民，这在希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结果是，1922年以后的20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与19世纪30—40年代希腊独立后最初那些年很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几乎一切将从头开始建设；再一次，就像巴伐利亚人统治时期一样，人们苦苦思索——如何马上变成希腊人和现代人，所谓现代人也就是西欧人。到处都是新的思想，到处都对欧洲开放，特别是对西欧开放。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的东方遗产再一次黯然失色，人们更愿意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渊源，从最绚烂的古希腊文明直接承继到今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地理上说，希腊是那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带，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雅典和斯巴达正好与希腊国家基本上确定的疆界相吻合。当希腊军队从安纳托利亚狼狈地撤离以后，那个东方的地平线就永远地消失了。将拜占庭帝国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此联系起来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1922年“小亚细亚大溃败”以后的20年是各方面都大力复兴的时代。因为国家的政治基础几乎被打破了，经济已经崩溃。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说，希腊在两次战争期间要比10年动乱之前还要穷，还要落后。^[1]一个世纪前也是这样，那时现代希腊刚从革命造成的破坏中诞生。在这两个时期，独裁政府要么是一个现实存在，要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希腊现代历史上的其他时候则没有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30年代那样，再一次，当人们说起希腊民族国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指的是希腊国家。20世纪20—30年代的复兴，将以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方式聚焦希腊国家及其国家制度的建设。

复苏和重建

1922年以后对土耳其难民的安置，被称为“希腊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最大成就”，这是很公允的。^[2]但是，与希腊国家将近200年里的其他成就一样，这个成就也是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取得的。协调国际救援行动的是成立不久的国联，具体事务由美国外交人员亨利·摩根索负责，这一工作持续了7年时间。洛桑会议的调停人是挪威前极地探险家弗里德约夫·南森，他是国联第一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联出面协商安排的外国贷款也很必要。再一次，希腊前方的路不只与希腊人有关。

1922—1925年，到底有多少难民来到希腊，这可能永远也没有人知道。最可靠的推测是130万~14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希腊原来人口的1/4。为了便于理解，如果我们以这个比例计算，就英国而言，2019年的移民人口就是1 600万，是在3年时间里陆续消化吸收的。而就美国而言，这个数字就是8 000万左右。洛桑会议规定，希腊新来的难民要把在希腊生活的大约1/3的穆斯林“换出去”，从而使得希腊净流入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根据1928年人口交换后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希腊，每5人就有1人是难民。^[3]

希腊这个国家被改变了，这种改变不只是人口上的，还有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甚至还有体格上的。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萨洛尼卡等城市周围，涌现出一大批棚户区小镇。在马其顿、伊庇鲁斯、色雷斯、爱琴海北部和东部岛屿以及克里特等新国土以及希腊早在1881年就获得的色萨利，世代安居乐业的穆斯林家族和社群被迫离开，从而为新来的难民让位。多数点缀乡村风景以及在古老绘画和摄影中凸显萨洛尼卡天际线的宣礼塔被拆掉了，清真寺被改成仓库或电影院。据说，不论是当时还是从那以后，很少有希腊人对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穆斯林表示同情。在克里特，艺术史学家和小说家潘泰利斯·普雷韦拉基斯目睹了

说希腊地方言的“土耳其克里特人”被强制搬离的过程，并记录下来：

军人在土耳其人居住区的周围拉上了警戒线，控制了港口的入口，然后让土耳其人排成一列，依次上船……他们甚至因悲伤过度而昏厥过去……他们从家里走出来，穿着破旧的衣服，双手有着血污。妇女摘掉了她们的头巾。他们走在两排士兵之间，就像是被现场抓获的小偷，他们红着眼睛往边上看着曾经的家园，他们的嘴巴紧闭着，强抑着内心的悲伤。

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在西安纳托利亚这个新的被安置的家园生活，保留了克里特方言以及一些克里特习俗。[\[4\]](#)

在希腊，所有的眼睛都关注着那些新来的难民的困境。摩根索大使描述了他于1923年11月在萨洛尼卡港口看到的司空见惯的场景：

我看到7 000人挤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只能乘坐2 000人的船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在甲板上拥挤着，蠕动着，这简直是人类惨剧。他们在海上已经漂泊了4天，船上没有地方允许他们躺下睡一会儿。他们没有东西吃，无法上厕所。四天四夜里，他们一直站在空旷的甲板上，任凭秋雨浇淋，任凭夜风透骨，任凭艳阳暴晒。他们上岸的时候，眼窝深陷，衣衫褴褛，病容满面，浑身虱子，饥饿不堪，散发出恐怖难闻的屎尿味道，绝望地弯腰前行……[\[5\]](#)

这是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溃败以及士麦那大火一年多以后的情况。当时逃离士麦那、西安纳托利亚以及东色雷斯地区的难民的遭遇一定比这还要糟糕，其惨状可能无法想象。摩根索看到的是洛桑会议的决议正在实施时的情况，希腊人口从远东的疏散和撤离相对来说比较有序，他们不是直接从战场上被抓住并在威逼下逃难的。而且，这些船上还有些军人，他们是俘虏，在土耳其腹地的劳动营的残酷条件下幸存下来，终于等到《洛桑条约》的签署，在1923年7月敌对状态结束后最终被释放。

人们常言，这些难民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人力，对世界更宽阔的认识，更辛辣、更具异国情调的食物（最后一项肯定是真的）。这一切都为希腊带来了长远的利益。但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感受绝不是如此。与很多不同历史危机中的多数移民一样，这些难民好不容易才适应新的家园。首先，迎接他们到来的是大量的恐惧和怀疑。1916年希腊内战期间，雅典城里第一次出现市民对那些逃离奥斯曼帝国迫害的人的谩骂。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谩骂的声音被放大了——新来的人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希腊人，而是“土耳其的杂种”，不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只不过是“在酸奶里浸洗了一下”。^[6]

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有些人来自城镇，有些人是农民或牧民。很多人发现，他们被安置的地方是他们不适应的环境，比如，以前的城市居民被安排在农业地区，农民面对的是不熟悉的土壤、地形地势和气候。有些人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腹地的东正教徒，说的不是希腊语，而是土耳其语。而希腊狂热者认为，来自黑海沿岸特拉比松附近地区的本都人说的方言，比其他语言都更接近古希腊语，但是其他地方的希腊人已经很难听懂这种方言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难民”已成为一个类别，被作为一个未同化的（巨大的）因素，在希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非常突出。

比雷埃夫斯郊区的一个难民区，是希腊最为著名的难民区之一，后来以绰号“科基尼亚”进入了希腊神话，这个绰号直到今天都几乎让官方名字尼凯阿黯然失色。尼凯阿的名字源于《尼西亚信经》的诞生地尼西亚，就是今土耳其伊兹尼克。真正的同化可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成。

其他族裔的人群尽管人数少得多，但在同化吸收方面更为困难。虽然人口交换使希腊免除了为大部分穆斯林寻找居住地的麻烦，但还是有少数穆斯林留在了希腊，他们生活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居住区，受到《洛桑条约》的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居住区与希腊的其他地方割裂了。西色雷斯的穆斯林是希腊唯一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其他没有通过人口交换而离开的穆斯林，有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恰梅里亚人，他们都生活在伊庇鲁斯。在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现在还有）瓦拉几亚人社区，他们是说与罗马尼亚语相似的语言的基督徒。希腊的好几个地方都有一些存在了几百年的犹太社区，那里的人说的是希腊语（这些人是拜占庭犹太人）。但是在萨洛尼卡，有个社区与犹太教保持着明显的身份认同，说的是源自西班牙语的一种语言，这个社区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有5万多人。在20世纪20—30年代，马其顿还有很多从前归属于保加利亚教会而且依然说斯拉夫方言的人。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人数可能达到了25万，但是希腊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他们，他们被称为“斯拉夫马其顿人”。^[7]

与1913—1923年相比，现在不愿意留在希腊的人少多了。但是这些依然生活在希腊的其他族裔的数量，一点儿不少于那些从种族上被认为是希腊人但又往往因为是“他者”而被鄙视的人的数量，在随后的20年里将遭遇很大的同化压力。^[8]在国家和内涵更宽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几乎都被抹去以后，中央政府仍在努力

同化其不同民族的国民。但即使同质性出现了，这也不是因为希腊政府，而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完全崩塌——一场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残酷的占领。当那个时刻到来，那些不同的民族多数会因为自身的不同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艰难的挑战，但20世纪20年代也有一些了不起的成就。难民得到了安置，与其他人一样，居者有其屋。经济开始复苏。新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正在思想和观念激荡的熔炉里成长起来。其中一位是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他在下一个10年开始写作，在全景式的小说《阿耳戈号》中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大学里的青年学子。那些学子被称为“阿耳戈号英雄”，他们会为了每一个新的哲学、政治和艺术思想或运动进行充满激情的辩论，但是会深情凝重地、意志坚定地团结在所继承的“伟大名字”之下，并不辜负它。对这些年轻的男人以及少数的女人来说，现在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要让自己从贫瘠的过去中解脱，面朝大海，再一次追求精神生活，不再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伟大的祖先以及比他们祖先还晚出现的国外先贤，而是要当探索者，当征服者，当真正的希腊人。[9]

塞奥托卡斯在文章中回顾了这些极富创新的一代人成长的岁月。他们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而且体现在所有的艺术方面。在文学上，他们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代”，但是早在10年前，也就是在小亚细亚大溃败刚结束时，他们这个群体就孕育形成了。塞奥托卡斯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29年，以辩论的形式展现了希腊艺术的新时代。这本书的名字是《自由精神》，作者一开始想象自己在高空的飞机上俯视欧洲大陆。在这样的高

度，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隐去。《自由精神》认为，尽管欧洲有种族的不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希腊人应该走出去，到大欧洲中实现自己的命运。小亚细亚大溃败已经吹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如欧洲其他国家在一战的创痛之后凤凰涅槃，希腊富有创新能量的年轻人应该抓住机会。塞奥托卡斯得出结论：“对勇敢的先锋探索者来说，时机成熟了。”^[10]

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是塞奥托卡斯的朋友，他早期的一首诗摆脱了传统诗文创作的束缚，成为所在城市现代地平线上的一个象征符号。诗的名字是《辛格鲁大道（1930年）》，这让人想起那条宽阔的、笔直的大道。那条刚落成的大道将雅典市中心和法利罗海岸连接了起来，大道的名字来自君士坦丁堡银行家和慈善家安德烈亚斯·辛格罗斯。^[11]这两位作家在幼年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其中塞菲里斯在士麦那，塞奥托卡斯在君士坦丁堡。两人在巴黎完成学业后都定居雅典。20世纪20年代末，奥德修斯·阿莱普德利斯还在巴黎，学习和吸收新兴起的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并翻译该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保罗·艾吕雅的诗作。阿莱普德利斯后来取笔名埃利蒂斯，一部分原因就是表达对艾吕雅的敬意。20世纪后半叶，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分别在1963年和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名字只是其中的著名的名字，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进入20世纪30年代，希腊前所未有地出版了大量的进行新思想和新技巧试验的诗集与小说，这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引起了轰动（也常常引起愤怒）。其他的艺术领域也是这样。1925年，在巴黎和慕尼黑完成学业后，季米特里斯·皮基奥尼斯返回希腊，成为几十年来对希腊建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皮基奥尼斯最为人称颂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对围绕雅典卫城的矮坡的景观设计。在绘画领域，尼科科·吉基里亚科斯—吉卡斯，超现实

主义画家尼科斯·恩戈诺普洛斯、扬尼斯·察鲁希斯和扬尼斯·莫拉利斯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作曲家尼科斯·斯卡尔科塔斯在德国艰难度日，在1933年回到希腊以前，他下定决心要走阿诺尔德·勋伯格倡导的音乐先锋派的路子。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在20世纪50年代最为人知的头衔是纽约交响乐团指挥，还是一名先锋作曲家，并在离开希腊去美国前走上了与勋伯格相似的音乐道路。这些艺术领域的创新者或早或晚都获得了国际认可，他们赢得国际荣誉的规模是任何一代希腊人都不能比拟的，空前绝后。

获得国际认可的不只是年轻人。尼科斯·卡赞扎基斯40多岁时，已经转向了共产主义，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苏联的游记。同时，他开始构思可能是后来出版的最长的诗，是他为荷马的《奥德赛》写的续集。与其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安杰洛斯·西凯利亚诺斯。1927年和1930年，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伊娃·帕尔默一起在德尔斐组织举办了古希腊戏剧节。戏剧演出的目的是重现古希腊戏剧曾经拥有的全部要素，将戏剧台词与音乐、舞蹈和舞台可视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古代剧院变成了一种超级现代的艺术形式。新的电影艺术媒介第一次用于拍摄在原始舞台场景下演出的古希腊戏剧。尽管没有马上引起其他地方的效仿，但是德尔斐戏剧节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蓬勃兴起的国际艺术节的先驱，特别是希腊雅典的阿迪库斯剧场和埃皮达鲁斯的剧场多次举办的艺术节的先驱。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希腊文化和知识生活中充满着青春的生机与活力，但是其政治阶层或政治体制中的情况不是这样，掌权的是年老的一代。大溃败后最初的几年里，正常的国家政权控制都实现不了，因为10年前的分裂在继续凸显。

政客和军人

在国外惨败的军队在1922年归国后就开始掌权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其在当年11月处死了那“六人”。1923年10月，忠于乔治二世的军官试图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虽然计划失败了，但是这为后来两次战争期间的多次军方干预开了先河。首先解决君主政治问题的是军人，而不是政客。总的来说，政客的知名度不如军人高。

传统上，军队一直坚定地忠于王室，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效忠于康斯坦丁。但是，在因不满而导致的1909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中，一小部分人想彻底废除君主政治。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裂痕被军官从1916年开始的一系列党派清洗和反清洗不成比例地放大了。对每一个在职的高级军官来说，至少还有一位曾被解职的同级别军官伺机再度上台。在两次战争期间，希腊实际上有两伙军方高级官员，但是岗位只够一伙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是政治忠诚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保住就业岗位（如果在职）或夺回就业岗位（如果在野）的问题。在随后的20年里，体现这个现实做法的是支持君主制还是支持共和制。政治领导人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发现自己被抵押给相互之间横眉冷对的军队对立派别。

1923年年底，希腊从名义上回归文官治理，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的状况。在一个典型的事与愿违的事件中，希腊在12月举行了小亚细亚大溃败以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但是选举受到了支持国王的、反对维尼泽洛斯的所有党派的抵制。1924年最初的几周时间里，维尼泽洛斯返回雅典，被选为总理。但他也没有能力管住军方，让军方不插手政治。3月召开的一次选民大会通过投

票废除了君主政治体制。在制宪大会确认选举结果后，希腊在4月正式成为共和国。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君主政治是希腊政治生活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

1925年，塞奥佐罗斯·潘加卡斯将军解散制宪大会，很快就任命自己为总统，对此，好像没有人感到奇怪，更不用说振臂一呼抗议了。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潘加卡斯是1909年古蒂“革命”的发动者之一，那次革命把维尼泽洛斯送上了权力的宝座。潘加卡斯只当了一年多总统，就被他的对手赶下了台。这位对手也是一名将军，名叫乔治·孔季利斯，很快就迫于压力恢复了议会制度。1927年，希腊的主要党派试图用几个月的时间搁置争议，协作管理政府。但是，直到第二年年年初，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合作。至此，政治舞台又留给了年迈的维尼泽洛斯，因为他才是唯一能够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领导人。

维尼泽洛斯多次声明，他已经退出政坛。但是在1927年4月，他从自我流放地回到了克里特老家。一年后，他宣布自己是新改组的朝气蓬勃的自由党的党魁。1928年8月19日，距离他的生日还有几天的时间，维尼泽洛斯领导的自由党以希腊选举历史上的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与其他小党派联合，在全部250个席位中获得了223个席位。待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塞奥托卡斯在小说中把维尼泽洛斯重返议会的场景放置在高潮部分：

（他）个子高挑，身材笔直，瘦削，结实，脸颊刮得锃亮并泛着健康的红润，朝四下里微笑致意，神秘的微笑中有慈父般的温和、女人般的优雅和高高在上的透视一切的能力；他专制又友善，平易近人，心胸开阔，待人亲切，意志坚定，对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应付自如；他是个

铁汉，但有着不同寻常的柔情、良善、智慧和灵活性。这就是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他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充满着激情、力量、精神以及最为重要的艺术气质。[12]

对诸如塞奥托卡斯等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以及像他那样从新的土耳其迁徙到希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是一个令人狂欢的时刻，它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腊唯一稳定的、民选政府的开始。这个统一的机会能将那么长时间走不到一起的所有党派聚集起来。毫无疑问，维尼泽洛斯是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不要介意这儿的夸张），他获得了修复那道裂痕的授权。在那道裂痕形成的过程中，他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宣称，他要改变希腊的面貌，让这个国家“完全变个模样”。这就是被称为“维尼泽洛斯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开端。[13]塞奥托卡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似乎就要完全实现了。

这一切的开端非常好。几乎20年前，维尼泽洛斯第一次总理任上启动了不少项目，但是后来都停顿了，现在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让它们得以复苏和实施。土匪是希腊农村生活苦难的根源，巴伐利亚人在一个世纪前就想消灭他们，此刻终于把他们彻底剿灭了。现在依然使用的社会安全体系是在那时候建立的。新的农业银行的成立、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沼泽湿地的垦拓，都促进了主要靠土地生活的人口的繁荣和发展。

希腊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正如1923年与意大利、1925年与保加利亚发生的小摩擦所显示的，希腊新边界的安全还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证。从希腊在安纳托利亚被击败的那一刻起，维尼泽洛斯就接受了新希腊地缘政治的现实。他开始系统地与以前的对手和敌人建立区域性的联盟，一个接着一个地修复了与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以及新成立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关

系，并确定了边界。希腊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在上一任政府那里就已经变密切了。维尼泽洛斯还尽最大努力与保加利亚达成谅解。这些外交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现代共和国——希腊与土耳其在1930年10月底签署的影响深远的《友好、和解和司法解决条约》。这是促成1934年建立巴尔干联盟的条约，包括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地区性强国中，只有保加利亚还没有完全与希腊和解，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比以前好多了。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维尼泽洛斯就任总理不久就出访巴黎和伦敦，期待与从19世纪就延续下来的“保护国”重建友好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它们那么依赖。俄国已成为苏联，早就废除了沙皇时代签署的一切协议和条约。在与英国和法国的合作方面，对维尼泽洛斯来说，重要的不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保护，而是资本投入和贷款。在这些方面，他也取得了成功。他还效法英国，坚持实施金本位制，但这一决定很快被证明是造成他的国家和政府失败的原因。

失败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对外政策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希腊和土耳其在自己的国家和战场上杀戮对方的公民这一事件仅仅过去8年，维尼泽洛斯就和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达成了外交谅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为了说服议会和公众相信传统的敌人现在必须变成朋友，维尼泽洛斯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所有的论辩技巧都用上了。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必要的，所付出的代价是那些难民的巨大的、未实现的要求。实际上，谅解让那些在逃往希腊过程中失去一切的难民不得不放弃将来可能获得的赔偿。尽管谅解文件的措辞是两国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出两个国家并在另一个国家购置房产，但是其政治影响恰恰相反。希腊1/5的选民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在此以前，难

民手中的选票几乎都投给了自由党或支持维尼泽洛斯的党派，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在选举投票上的损失要到两年后才能显现，到了那个时候，更大的灾难将为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带来很大的困扰。

维尼泽洛斯政府刚执政一年多，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国际银行和金融系统随之崩塌。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遭受大萧条的时候，希腊一开始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到了1931年9月，英国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急剧贬值。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和其经济状况马上遭遇难以忍受的压力。希腊在历史上第二次被迫违约，不能还债，最后宣布国家破产。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4月25日。政府虽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剧了经济危机。自由党内部的丑闻和分歧弱化了维尼泽洛斯的权威。他本人倒是没有卷入任何一件恶行之中。但是，维尼泽洛斯从来不向他手下的部长们咨询，也不向他们吐露自己的心事。由于缺乏信任，加上一定程度的自负，随着进入古稀之年，他渐渐发现自己被孤立了。

影响维尼泽洛斯选举的重要因素：一是在汇率方面，将本国货币德拉克马绑定英镑，以及金本位制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二是与土耳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掀起的余波。希腊的烟草种植主要集中在新土地上，那里一贯最支持自由党，而国际烟草贸易的溃败使自由党的处境雪上加霜。维尼泽洛斯意识到社会大潮逐渐离他而去，所以就在9月打响了选举战役，选票重新揭开了旧伤口。他认为，这次自由党必须在“从1915年就一直持续的内战”中获胜，要么通过协作的方式，要么通过一方胜利的方式。^[14]从政治上看，希腊在1932年第二次破产后，修复源自一战的裂痕的机会已经消失了。双方的政客及其军方的支持者根本无意于减弱旧的分歧，也没有进行任何沟通，反而开始相互争斗，重新点燃

将近20年前的仇恨。更为严重的是，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是一个年代的人，都是在那个两极时代成长起来的。当塞菲里斯和塞奥托卡斯与其同时代的年轻人推动希腊艺术转型的时候，政治阶层好像非常缺乏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思想。

选举结果是自由党和人民党的票数非常接近。人民党现在的党魁是帕纳伊斯·察尔扎里斯，他是“一位善意的地方律师，没有维尼泽洛斯的魅力、能量或远见”。[\[15\]](#)自由党4年前获得重大选举胜利所依据的全部优势，都随风消散了。一开始是察尔扎里斯，后来是维尼泽洛斯，他俩先后组建了政府，但都不稳定，而且在第一次信任投票中就没有过关。1933年又举行了一次选举，结果两边的票数完全相同，但这一次根据选举制度，人民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于是再一次，军队的将军们上场了。

在维尼泽洛斯执政的4年间，军方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一直是靠边站的。现在，他们回来了。选举第二天，武装部队中最狂热的自由党支持者之一发动了军事政变，试图改变选举结果。尼古劳斯·普拉斯蒂拉斯是有前科的，他是在1922年战争失败后夺取权力并创建“革命”政府的两名军官之一。与两次战争期间多起这样的事件一样，由于缺乏全面的支持，这次行动在几天后就无疾而终了。维尼泽洛斯依然很讲政治，自觉地与那些以他的名义行动的军官保持距离。

但是，政治正在无情地摆脱议会的控制，滑向暴力的深渊。那年6月，维尼泽洛斯和他的妻子差一点儿被刺杀：在从雅典到基菲西亚的路上，枪手追着他们的汽车开枪，子弹打在他们的车上。政府好像无动于衷，没有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所以被指责为“拖延怠政”。在其后的两年里，人民党执政，议会成员上演“金武行”。维尼泽洛斯只是作壁上观，任由事态发展，“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爆发，而且采取的是最残暴的内战的形式”。[\[16\]](#)

1935年3月1日，内乱爆发了。普拉斯蒂拉斯再度出山，这一次，他得到了维尼泽洛斯的全力支持。从谋划到实施，这场内乱都像是教科书上的案例，将军（或政客）毕其功于一役，发动最后一战。与1916年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次政变试图通过新土地来对抗旧希腊，同时在克里特、海上诸岛和马其顿等地举行起义。政变者好像不是要直接挑战政府，而是再一次将目标设定为分裂国家，在萨洛尼卡这个陪都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战斗在北方打起来了，过了几天，察尔扎里斯的政府瘫痪了。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叛乱的计划再周密些，领导再有力些，说不定就成功了”。^[17]

但是，普拉斯蒂拉斯失败了。他和维尼泽洛斯都逃离了希腊。其间，他们都被缺席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维尼泽洛斯再也没有回来，一年后死在巴黎。不过，普拉斯蒂拉斯在希腊政治中还有自己的未来。3个低级别的叛乱者很不幸，被公开审判，并遭处决。其他人被当众羞辱。所有涉嫌的军方高级军官以及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人，都被清除。如果说维尼泽洛斯希望通过支持普拉斯蒂拉斯的行动从而像1916年那样重新掌控政权，那么其死敌则竭力进行报复从而像1922年那样夺回政权并处死那“六人”。

这些事件还未尘埃落定，一场民众都不怎么热心的选举就在戒严令中开始了。为了这场选举，戒严令只是在6月9日被临时解除。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的反应与人们在1916年受到威胁后的反应一样，那个经典的、自食其果的错误——对选举进行抵制再次出现了。这一次，他们的抵制没有任何作用。军方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根本无意于依靠任何政治党派，甚至不愿意依赖那个将他们从荒蛮战场上拉回来的党派。他们是被边缘化了十几年的人，只是在报复那些镇压未遂政变的人的新浪潮中，才被卷入了

权力的顶端。结束维尼泽洛斯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共和国，将乔治二世从英国流放地请回来。没有人会认为，恢复君主政治能够修复政治裂痕或带来更稳定的政府治理。恰恰相反，在那些被憎恶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看来，那只不过是证明现在谁掌权而已。老的“分裂”又强势回归了。

首先遭难的是总理察尔扎里斯，这位人民党的党魁曾被无可争议地选举为政府的首脑。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武装部队的头脑们于1935年10月10日，在察尔扎里斯去雅典的路上，把他的汽车截住，并礼貌地请他辞职。后来，议会系统也沦陷，成为军队中同样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势的牺牲品，这种敌对态势已经酝酿发展20年了。

军方对民选总理的逮捕实际上是另一次政变。这次政变将乔治·孔季利斯将军送上了权力的宝座，他就是那个曾经推翻不受欢迎的潘加卡斯将军的人，并从那以后改变政治观点，成了一个保王主义者。在孔季利斯的第二次政变中，他的个人抱负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在军方保王派分子的支持下，他首先再次实行戒严令，并在这些条件下于11月3日围绕恢复君主政治进行了匆忙的全民公投。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有97.87%的选票赞成国王的回归。

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35年11月25日登陆法利罗。自从独立革命后，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延续了11年半。有一个经典的现代研究给这个共和国贴上了“夭折”的标签。因为它只是建立在政治权宜之计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军方支持，不过，参政的军官的职衔和政治分量都被20世纪最初10年的内乱不自然地夸大了。这个共和国的根基太浅，没有建立长久的体制。不管是总统，还是民选的下院，都没有吸引卓有威望的人，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要与共和国体制一起被废除。如果维尼

泽洛斯自己竞选总统（有个时期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事情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往事如风，希腊共和国的覆亡只是更大的政治失败的一部分。两个政治派别都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向威权主义转型。到了1935年，两者之间确实有再次发生内战的危险。[18]

乔治二世与乔治一世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则有着更大的不同。乔治二世第一次登上王位是在1922年，当时康斯坦丁在安纳托利亚战败后被驱逐出希腊。乔治二世只当了18个月的国王，就面临了与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尽管他并没有被迫退位。这些经历让乔治二世心怀怨恨。他再次回到曾经被拒绝的国家后，总体上是不信任希腊人的，尤其是不信任希腊的政客们。据报道，他曾这样说：“希腊不能被看作一个西方国家。希腊人是东方人，他们向来将好心对待看作软弱可欺。”[19]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分别是丹麦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乔治一世曾经勤政爱民，希望成为臣民的领袖。他之后，康斯坦丁努力让自己变得比希腊人还像希腊人，赢得了率领的冲锋陷阵的将士的爱戴。乔治二世是被希腊民众认可的本国的第一个君王，他之前的奥托等国王，不管是在他们自己心中，还是在他们的臣民眼里，都是外来者。

乔治二世在英国流放的时候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英国王室成员。当然，他与英国王室也有亲戚关系。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他发现，向英国大臣锡德尼·沃特洛吐露心声要比向他的同胞更加容易，正如他的父亲和维尼泽洛斯在一战期间与他们的外交对手谈判那样。乔治二世的回归确保了希腊与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当然，前提是他稳坐在王位上。重返王位的国王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依赖好像在短期内为两个国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不管双方如何表达善意，这种亲密关系都会在下一个

10年里对希腊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扭曲的影响。

国王一开始做得很好，解除了孔季利斯的职务，坚持举行了一个自由的、公平的议会选举，这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这次选举是在1936年1月举行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抵制，选举结果又是维尼泽洛斯派和人民党领导的反维尼泽洛斯派打了个平手。议会制政府恢复了，但是僵局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这次有不同的理由。这次的不同在于，权力的制衡掌握在一个此前一直在希腊政治中发挥微小作用的政党的手里。希腊共产党从此进入了希腊历史的舞台。

政治断层转移

希腊社会主义劳工党是在1918年成立的，当时得到了维尼泽洛斯的鼓励和支持，因为他希望工人阶级在“政治大分裂”的争斗中能站在他的一边。1924年，希腊社会主义劳工党改名为“希腊共产党”。同时，它也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希腊共产党的思想严格遵从苏联模式。事实上，即便苏联已经解体很久了，它的信念到今天依然存在。

在后来的10年里，一些希腊共产党的代表有时在议会中能赢得几个席位，但产生的影响很小。从在城市居住的、从事工业劳动者的意义上，它几乎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但是，共产主义在烟草业发现了自己的追随者，因为该行业的大量劳动者的工资很低，工会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了一些支持者。1935年以前，也许是受到19世纪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挥之不去的回音的影响，共产国际支持“在希腊的北部省区

为斯拉夫马其顿人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如果与其放弃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一起被统筹考虑，这个想法就足以疏离大部分希腊人。

随着国际运动逐渐在希腊扎根（尽管扎下的根还很浅），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以前，共产主义就已经让希腊政治的当权派警惕了。希腊对一个非常恐惧但又不怎么理解的现象的下意识反应，是维尼泽洛斯在1929年7月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法律主要针对颠覆“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犯罪行为”。后来，这部法律被称为《特殊法》（*Idionym Law*），主要针对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Idionym”这个词在希腊的法律术语中的意思是“特殊”。这部法律饱受诟病，尤其受到希腊左派的批评，希腊左派把它当作维尼泽洛斯试图推行威权主义的证据。希腊第一次通过法律宣布，政治意见不当要负刑事责任。在维尼泽洛斯执政的最后3年里，约有1 500人基于这部法律被判刑。1931年，对于罪犯，希腊再度引入国内流放的刑罚，通常是将罪犯流放到爱琴海上的一个偏远的小岛上。这种刑罚以及《特殊法》一直实施到1974年，这个时候，真正的或可能的共产党人已经呈指数级增长了，当然，被拘留的共产党人也呈现同比例增长。

1935年，共产国际改变了它的立场。两年前，希特勒走上了德国权力的顶端。现在，共产主义者被鼓励参加更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说斯拉夫语的人拥有自己的国家”的口号被舍弃。希腊议会的大门也向希腊共产党打开了：希腊共产党赢得了15个席位。共产主义者夺取希腊的权力、颠覆“既定社会秩序”的风险很容易被夸大，截至当时，那种所谓的风险只在俄国发生过，而且是在世界大战的特殊压力下发生的。但是在193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希腊的秩序的确受到极大的威

胁。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看看希腊经济在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开始，希腊的农业出口就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截至1932年，烟草、酒和葡萄干的产量都减少了1/2，数千名工人失业，1932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只有3年前的60%。希腊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3，失业率却增长了1/3。^[20]随着国际市场的崩溃及大幅度转型，希腊与其他国家一样，被迫依赖自己的资源。“自给自足”成为当时的口号。在最后几个月里，维尼泽洛斯的自由党执政政府采取了与经济自由主义完全相反的一套措施：上调了进口产品关税，国内生产在政府的行为下有意地增加。希腊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大幅度地干预过经济，而且一旦措施到位，这就变成国家在干预，而不是政府在干预。在1933—1936年的那些政治越来越混乱的日子里，经济管理被那些“技术官僚”掌控，比如，希腊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官员以及高级公务员。短命的政府除了袖手旁观，什么也做不了。

非常了不起的是，这一切措施都管用。截至1935年，国内外的观察家在感受到“经济从危机中获得了极大的复苏”以及“人们比两三年前更看好国家繁荣的氛围”时，感到非常惊奇。农业银行通过积极干预促进新的、产量更高的小麦品种的种植，大幅度降低了希腊积重难返的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经济好转的成功却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并将改变那些年影响希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裂痕。在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新情况下，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消耗现有系统能力并最终重置政治力量的，是经济增长。”^[21]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国家机关越来越没有能力应对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1935年和1936年的最初几个月，罢工和示威变成家常便饭。1936年5月，萨洛尼卡烟草工人的罢工使得整个城市

陷入停滞。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升级，5月9日的大游行示威遭到了武装宪兵的镇压，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英国大使锡德尼·沃特洛在这些事情发生前一个月给外交部写信：

随着新问题的成形，新的裂痕可能会逐渐地遮蔽旧的裂痕，将过去的仇恨转入新的渠道.....也许，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也许，议会制政府会轰然倒塌。[22]

他是对的，4个月以后，政府垮台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打击不是从下面来的，不是从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来的，而是从上面来的。

截至目前，在我们的讲述中，扬尼斯·梅塔克萨斯是一个多次出现但多数情况下都不怎么起眼的名字。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追溯到1897年的战争灾难，当时的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对多数关注那些年公共事件的希腊人来说，他们对梅塔克萨斯的印象基本上也是那样。不过，1936年年初，梅塔克萨斯的时刻到来了。几位主导希腊政治20多年的老政客在1936年陆续驾鹤西游！被流放的维尼泽洛斯在3月去世；人民党领袖察尔扎里斯在5月撒手人寰；孔季利斯将军（他推翻了两届政府，一次是维尼泽洛斯支持者，另一次是保王党）走得更早，在1月底就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命运使然，在4月，国王任命的临时总理也翘了辫子。梅塔克萨斯临危受命，帮助议会度过过渡期，直到新的政府组建。梅塔克萨斯在那个月过了65岁的生日，在政客中，他不是最年轻的，但是他还能活5年。他度过5年光阴的方式，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预料到。

不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没有想到自己要担负的重任。“梅塔克萨斯将军远没有作为一个独裁者要取得成功所必备

的强健体质，”英国驻希腊大使沃特洛的继任者于1939年写道，“他个子矮小，大腹便便，穿着邋遢，从来不会激发大众的热情。”^[23]梅塔克萨斯这位“将军”自从在一战开始时担任康斯坦丁的参谋长以来，就没有穿过军装。宣传照好像对他进行了美化，隐去了他的大肚子、秃头顶，特别是他圆圆的、胖胖的脸颊。宣传人员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般的形象，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火爆的、钢铁般的形象完全相反。

但是梅塔克萨斯有着另一种不同寻常的钢铁意志。他出生于爱奥尼亚群岛上的一个贵族家庭，不过他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贵族头衔。对于希腊唯一的官方认可的世袭家族王室，他一生都充满尊敬。他恪守军事纪律，年轻时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从政治上来说，他最为关心的是希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一战期间，梅塔克萨斯是最积极倡导中立的。后来，在维尼泽洛斯于1920年选举失败的时候，他几乎是独自一个人站在保王派的一边，反对继续进行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显得非常与众不同。梅塔克萨斯的坚韧和精明让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并顽强地领导这个党派一直前进。他与维尼泽洛斯一样，推崇实用主义，是反维尼泽洛斯阵营中的第一个承认共和国的政治人物。不过，在1935年维尼泽洛斯派政变失败，政治大潮涌动倒退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放弃共和国的人。

但是，与维尼泽洛斯不一样的是，他在选举方面从来没有获得多大运气。他的自由思想党常常被误解为“自由思想者”，从名字和行动上都很难得到那些痛恨并反对维尼泽洛斯“自由党”的选民的支持。1936年，梅塔克萨斯的党获得的席位比共产党还少。选民从来没有对梅塔克萨斯热心过，他也从来没对选民示好过。在这个时候，他甚至已经开始鄙视整个议会制度了，而这个制度则是希腊在过去20年来发展演变的结果。在这方面，他绝不

是孤立无援的。维尼泽洛斯曾经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给普拉斯蒂拉斯的信中暗示过这点，当时的普拉斯蒂拉斯正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

那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最不可能的人物是怎样在1936年8月4日后成为独裁者的呢？

1月底，议会的选择从数学上看无非有3种组合。第一种组合和第二种组合是，自由党或者以人民党为首的维尼泽洛斯的反对党派分别与共产党联合，形成多数。第三种组合是，这两大拥有多数席位的派别搁置争议，联合执政，把共产党挤出去。维尼泽洛斯的反对党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谅解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太大了。这就只剩下自由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以及自由党和维尼泽洛斯的反对党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组合也都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之中。

选举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自由党和共产党各自让步，从而联合组建了政府。但是，军方的参谋长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看守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向乔治二世传达了军方意见。国王立即召见梅塔克萨萨斯，让他负责国防部的管理。几天后，梅塔克萨萨斯被任命为副总理。在军方的反对声中，看守政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936年4月13日，看守政府的总理康斯坦提诺斯·德穆尔齐斯死了。乔治二世根据1864年宪法的规定，行使了他的特权，任命所在党派在300个议员席位的议会中仅拥有7个席位的人担任总理，他就是扬尼斯·梅塔克萨萨斯。两周后，他在议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信任投票，事后看来，这好像很神奇。通过这种方式，主要政治派别的议会代表都像在梦游似的，都愿意废除那个他们本来应该服务的民主制度。

赢得选举5天后，梅塔克萨斯宣布议会一直休会到9月。事情进展得很快。罢工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愈演愈烈。5月，萨洛尼卡发生了暴力行动，这让人们深感恐惧，以为共产党组织的大起义就要来临了。梅塔克萨斯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来消除那些恐惧。乔治二世可能也对那些传言感到恐惧。那个时候，外交观察家认为威胁被夸大了，此后的历史学家也认同这个观点。到了7月，各个政治党派第二次认真地尝试组建新的政府。但是，这个新政府很快就像共产党参与组建的上一个政府那样，也不被军方接受。自由党人为了支持反维尼泽洛斯派所付出的代价，是召回被军队开除的人，这些人在前年因报复维尼泽洛斯派而被赶出军队。这一下子就让现役军官的工作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些人就是代替那些人上岗的。而那些入又是上一次清洗的受害者。

国王看起来接受了各党派领导人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实际上却和梅塔克萨斯决定要采取行动了。采取行动的托词是，希腊工人联盟要在8月5日星期三举行24小时的大罢工。大罢工开始的前一天，希腊宣布实行戒严令，宪法条款被搁置，议会被解散。很快，所有的党派被解散，包括梅塔克萨斯自己的党。希腊“8月4日独裁政权”开始了。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甚至不需要有人站出来展示实力。没有任何人发起任何抵制。到了有人想起来要反抗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梅塔克萨斯和他的支持者经年累月、不厌其烦地宣传的理由是，要预防共产党的暴力夺权。

现实并不是这样。看起来真正让梅塔克萨斯采取此行动，并让他说服国王支持他的原因，是他害怕军队中会再度出现1916年那样的内战。如果维尼泽洛斯派与反维尼泽洛斯派实现大联合，两大对立集团的官员拼个你死我活的情况就真有可能出现。西班牙刚刚发生的事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恐惧和担心。

仅仅在梅塔克萨斯攫取权力两周前，驻扎于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军队对西班牙共和国刚刚选举的人民阵线政府宣战。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后来显示出是一场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各自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在最初的几周内，这个特点并没有凸显出来。希腊那些思考缜密的观察家可能会认为，西班牙发生的就是一场国内一半军事力量对另一半军事力量的战争。同样的事情真的会在希腊发生？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结果来进行判断。西班牙佛朗哥将军在7月的干涉引发了内战，希腊梅塔克萨斯将军在其后3周的干涉则没有引发内战。另一方面，不管梅塔克萨斯和乔治二世的动机如何，从长远看，他们行动的影响不是阻止国内冲突，而只是延缓了冲突。

可能分裂希腊社会的那道裂痕游移不定，而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就像是在裂痕上浇筑了一层厚厚的水泥。当被浇筑水泥的整个板块再度开始运转时，推动运转的力量的本质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不断积累的压力，水泥并不能压制，也不能疏散，但是可以让其沿着不同的轴线进行分裂。希腊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中的威胁，只不过是1936年夺取权力的借口，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政府摧毁了。但是，希腊添油加醋的描述反而助长了它的勃发。1936年，共产主义在希腊不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但是10年后，它不可小觑。

尽管希腊官方一直压制左派，左派力量却吊诡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的受益者，将继续主宰着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随着1936年极右独裁政府的上台，现代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进入了希腊的政治舞台。当裂痕在下一个10年里再一次出现时，它将沿着左派—右派的轴线分裂，从而将希腊分成两半，这导致了20世纪希腊的第二次内战。

“新国家”和“第三希腊文明”

新的独裁政权首先对新闻和交流进行了彻底控制。第一天的晚上，警察搜查了全国所有报纸机构的办公室，下达了对言论的指示，编制了具体的行为指南。政府甚至不让公众知道他们阅读的报纸已经完全变成了独裁者的宣传工具，尽管这个秘密并没有隐瞒太久。当月中下旬，独裁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新闻和旅游宣传局，其职责如下：

指导公众舆论，管辖的事务涉及希腊和对外的报刊，各种类型的会议和展览，剧院，电影院，留声机唱片，所有形式的广告、讲座和报告，出版物以及各类普通的印刷品，现场或通过技术手段重新制作的表演，确保以上内容符合国家传统和民族理想的框架要求，包括对广播电台的控制。[\[24\]](#)

新闻和旅游宣传局这个机构的名称虽然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它是戈培尔在柏林建立的臭名昭著的宣传部为样板创建的。事实上，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采用的大部分宣传措辞以及宣传方法，就是直接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那里借来的。新的新闻媒体完全是为了控制舆论，促进独裁政府的政策在全国的宣传。不久，到处都是宣传口号，这些口号甚至印在灯泡上、信函的邮戳上以及农村的各个地方。其他从纳粹那里学到的东西是，存在时间很短的劳动营以及梅塔克萨斯最得意的创举——全国青年组织。该组织是强制性的，传授课程必须包括政治教导。全国青年组织的年轻成员（1939年，其人数达到100万）和工人被征入劳动营，学习使用一种类似纳粹军礼的仪式，不过据说“领袖”本人从来还不还礼。

梅塔克萨斯和政府的其他老年高官（几乎没有一个部长有着从政的背景）对于希腊民族国家和希腊国家不加任何区别。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的东西是公司式国家。梅塔克萨斯对于“希腊国家”的信仰是他的执念。在他看来，国家就是一个“活着的生物体”，有自己的存在，有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民众”之上。在独裁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它开始推进建设所谓的“新国家”。梅塔克萨斯第一次在萨洛尼卡给希腊第二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内容令人不寒而栗：

我禁止你们，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有不同于国家思想的想法。我要求你们不仅要具有和国家思想一样的想法，还要信仰国家思想，满腔热情地在国家思想的指导下工作。如果你们有人有任何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在这儿接受教育。

[25]

与希特勒声称其建立的是第三帝国以及墨索里尼声称其建立的是第三罗马一样，梅塔克萨斯在1937年6月的那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第三希腊文明”的思想。这与其说是要描述现在的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表示未来的目标，要建立“一个比过去更为优越的文明，让我们的国家立于那些优秀的、值得人民骄傲地生活的民族之林”。[26]希腊独裁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拥护者从过去的时代中选择的示范样板，不是民主的雅典，而是军事化的、公司化的、纪律化的斯巴达，斯巴达激发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甚至可追溯到纳粹之前很久。

但是，希腊“8月4日独裁政权”不只是意识形态和口号，它的大多数国内政策（包括压制共产党的措施）都不是新的，而是对从维尼泽洛斯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政策的强化。事实上，维尼

泽洛斯4年的议会制统治时期和梅塔克萨斯的专制统治之间的连续性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强。

国家体制首先进一步加强，公民服务水平得到提高。警察体系也得到强化。独裁政府启动了一大批公共工程。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32年经济复苏后引发的劳资关系危机，解决了之前任何一届民选政府都无法处理的问题。罢工被宣布为非法，但是雇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也是违法的。8小时工作制开始实施。在工业领域的纠纷中，双方必须接受强制性的仲裁。社会安全体系是维尼泽洛斯时代的遗产，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现在得到长足发展。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改革”和“财富的公正分配”，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在复苏年代遭受严重损失的工人和失业者中最为突出的问题。^[27]依靠国家推动的扩大就业的措施，似乎也不是非常成功的，税率又提高了。不过，在增加小麦产量方面，希腊继续执行了维尼泽洛斯执政最后一年启动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1936—1938年，小麦产量实现了翻番，这相应地减少了对进口粮食的依赖。

很多新出台的法律都能直接安抚心怀怨气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梅塔克萨斯将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公司式国家的管理之中，把自己塑造成被压迫者的“领袖”，竭力减弱来自下层社会的威胁。精心设计的公众形象、讲话和广播报道，把独裁者宣传成“第一农民”和“第一工人”。不管那个时代的形象塑造现在看起来多么离奇古怪，甚至荒诞不经，它们与梅塔克萨斯推广口语或民间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一脉相承的。梅塔克萨斯首倡编写正式的希腊口语语法，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阻止了民间语和政治左派相联系、官方语言（净化语）和政治右派相联系的趋势。

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采取了直接针对共产党并在后来逐步扩展到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些做法，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内部措

施。他最喜欢的专政工具不是军队，而是警察。公安部部长康斯坦提诺斯·马尼亚扎基斯是希腊最令人恐惧的人。他不仅是农村宪兵队和市警察局的负责人，还负责秘密侦查工作，而且干得很有效。数千名共产党人被围捕、被审讯并被灌蓖麻油，很多人被押送到偏远岛屿上的拘留营。如果他们想被释放，就得签“悔改声明”。1940年，希腊独裁政府夸口有47 000人签了声明，而这个数字是1936年记录在案的共产党人人数的3倍多。^[28]至于共产党组织本身，在那个时候已经转入地下了，其领导人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以及中央委员会委员都进了监狱。独裁政府夺取权力时所借口的那个威胁，即便曾经存在过，现在也被消除殆尽了。另外，数千名被独裁政府伤害过的人现在有了一个出口——可以在今后发泄新的不满，只是付出的代价是进入拘留营。如果独裁政府没有对付共产党，那么这个出口是不会有。

事后看来，1936年的希腊正在逐步滑向极权主义，阻止独裁专制是很难实施的，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到处都有极权专制，而且其在二战发展到顶峰。议会民主先受到威胁，继而逐渐不得人心，这一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希腊。墨索里尼从1922年开始就在意大利独掌大权，希特勒从1933年开始在德国独裁专政。很多国家也跳进了这股极权主义的洪流。对20世纪30年代中晚期的很多希腊人来说，过去几年的政治动乱和1936年无数议会的僵局显露了民主体制的局限性，这种民主体制不仅在希腊国内瓦解，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发生崩裂。当一切都试过并失败后，那个矮胖的、自诩为“领袖”的人及其似乎永不停歇猎取权力的极权主义措施，真的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公开的反抗很少。普遍的观点好像是“新国家”有很多让人期待的地方，这总比以前的混乱好吧。至少现在再没有人谈论内战的威胁了。有组织地推翻独裁政府并恢复议会制政府的

尝试只发生过两次，都是在1938年，只是昙花一现，被立刻镇压了。到了那年秋天，所有人都很清楚，梅塔克萨斯已经坐稳了江山。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也不明显。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出现的“上校”独裁专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时候，除了诗人科斯塔斯·瓦尔纳利斯和年轻的扬尼斯·里佐斯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过第一部希腊革命史的扬尼斯·科尔达托斯，其他艺术大师鲜有认同共产主义的。里佐斯只是在地下出版物中发表过几首诗作，比如共产党的报纸《激进主义者报》。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没有明显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均发表在受到审查的主流期刊上。就多数情况而言，作家和知识分子与独裁政府刻意保持着距离。公开焚书以及禁止这些作家从前出版的作品，也很难让他们受到读者更多的喜爱。这种情感似乎应该是双向的，梅塔克萨斯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尽管尊敬纯粹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得承认，我与从事其他具体职业的人沟通起来更为畅快。”^[29]

这并不是说，就像这个时期的纳粹德国发生的那样，希腊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招安了，就是屈服于高压而噤声了。希腊也不像德国那样，出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大逃离。诗词、小说、视觉艺术、戏剧和电影（最后两项受到独裁政府严格的控制）已经开启了它们自己的、更加精巧的对自给自足的追寻，寻求具有独特希腊特征、历史和文化的本土之根，并在同一个方向上共同前进。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绘画和音乐，20世纪20年代末在希腊这片国土上迸发的先锋实验技术，与同时期兴起的民族自我发现的历程实现了融合。在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的小说《希腊人佐尔巴斯》是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的，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去审

视，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独裁专制政府本身（相比起来显得粗糙简陋和沉重缓慢）。

希腊社会中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归顺独裁政府，独裁政府也看不起他们，不愿意管理他们。这就是城市下层阶级，他们的声音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才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这部分人的数量早已大大地膨胀，随着20世纪20年代难民潮的到来，他们自我表达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展。在比雷埃夫斯港口码头以及雅典、萨洛尼卡、其他较大城市的贫困郊区周边，很多一贫如洗的人涌进这些地方的底层小偷小摸的世界和公然反社会的曼杰斯社区中。被称为“雷贝蒂卡”的音乐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种与正统音乐和歌曲完全不同的自给自足的追求。

在政治上，让贫穷人口栖身并维持他们的歌曲的曼杰斯社区和城市底层阶级从来没有被组织起来。但是，独裁政府上台几周后将“留声机唱片”这一项目令人惊奇地列入媒体审查名单，这正是源于他们。对独裁政府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来说，雷贝蒂卡就像一块红色的破布。它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其音乐本身一点儿都不受政府的影响，其自身的价值甚至比国家推崇的价值还高，它的实践对“新国家”代表的一切都产生了腐蚀。诞生孕育“第三希腊文明”的社会里，怎么能容忍大麻瘾君子、犯罪行为和对公司式国家的蔑视呢？

也许，雷贝蒂卡最令人反感的是其音乐本身。曼杰斯最喜爱的乐器是布祖基琴，它与土耳其的萨兹琴属于同一个乐器家族。雷贝蒂卡的音乐依然是遵从模式体系的，主要是基于木卡姆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中东音乐的特色。它听起来不像“欧洲音乐”，更不像西方的音乐。那个时候，希腊比100年前都更坚决地将自己视作西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这类让人们想起“东方的”过去的东西，都必须抹杀掉。也许比让人们想起土耳其统治

更严重的，是雷贝蒂卡的音乐让希腊人回忆起他们曾经大范围在东方流散以及希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与现代土耳其的睦邻友好这件事，是维尼泽洛斯出于国际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启动的，梅塔克萨斯从未干扰。但是，奥斯曼人的历史记忆以及希腊民族国家的面积远大于希腊国家的历史记忆，是不能被容忍的。

希腊独裁政府采取了行动。音乐类型、乐器以及发声技巧等一切被看作是“土耳其”的东西，都被从唱片录制公司的订货本或节目单上清除了。作曲家和演唱者被监禁或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上去，其理由是他们涉嫌各种各样的“反社会”的行为。布祖基琴在这个时候被看作等同于土耳其的过去，等同于孕育这个琴的底层社会的犯罪，在独裁政府的眼里成了颠覆国家的象征。乐器很容易被搜查，被销毁，它们的主人则被传唤审讯。此时，布祖基琴“年轻的近亲”巴格拉马斯琴登上音乐的舞台，它更容易隐藏在衣服的里面或者被放在外衣特别缝制的口袋中。

尽管这些措施被采纳，但与其他或真实存在或假想臆造的敌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贝蒂卡繁荣起来了。虽然雷贝蒂卡被审查“清除”掉了，但它的留声机唱片从来没有如此受欢迎过。两次战争期间最伟大的词曲作家和布祖基琴演奏家马科斯·万瓦卡里斯很多年后回忆，20世纪30年代末的夏天，他和他的小布祖基琴演奏乐队的成员在雅典破败凋敝的小镇沃塔尼科斯开了一个小商店：

每天夜里都喧嚣吵闹……各色各样的人都会来商店，既有高等社会的贵族，也有曼杰斯和街头混混，他们要在这儿一直闹腾到天亮。雅典全部的精英都来这儿……雅典、比雷埃夫斯这两个城市的所有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都来这儿。来

这儿的人还有拉里萨的、萨洛尼卡的以及希腊其他地方的人。[\[30\]](#)

自吹自擂、言过其实是希腊人言语风格的一部分，但这些语言还是反映了一部分真相的。雷贝蒂卡发展起来了。不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那的确是在梅塔克萨斯执政的岁月里实现的，希腊这个特别的身份表达开始从孕育它的底层阶级走出来，进入主流社会，并被画家雅尼斯·察鲁希斯盛赞为“现代希腊文化存在的唯一证据”。[\[31\]](#)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政府不会认可这一说法。但是在一个所有公共言论都被控制、所有关于公众态度的直接证据都不允许被收集的社会，这种音乐的生存以及在那些年里往各个社会阶层的传播本身就是希腊精神特质的证明，是任何独裁专制政府从来都不能驯服的。

雷贝蒂卡的发展为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就独裁专制政府及其中央集权愿景发表的结论提供了佐证：“对希腊人来说，与希腊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希腊国家一直是普通民众嘲笑的目标。因此，在他们的古老传统中，对于这个伟大的设计，他们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口惠而实不至。”[\[32\]](#)

最后通牒

从一个方面看，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政府和纳粹以及法西斯政府没有什么两样。墨索里尼1935年就暴露了他往海外扩展的帝国野心——派兵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德国，纳粹思想意识的核心是，以牺牲东欧和亚洲的“低等”人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国土，为自己的民族营造“生存空间”。希腊“8月4日独

裁政权”与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都无关，希腊在1922年就有了更加痛苦的教训。那个时候，梅塔克萨斯就反对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希望“我们亲爱的小小希腊能够幸免”，这是他在一战开始时的一封信件中表达的，并一直伴随着他走到二战的关键时刻，走到生命的终点。

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政府延续了维尼泽洛斯设计安排的当地防御联盟体系，包括与土耳其的协作。对希腊独裁政府来说，最头疼的问题是来自欧洲强国的威胁（这也是任何一届希腊政府都头疼的问题），因为强国之间好像又一次发生了冲突，而这个冲突一定会导致战争。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那么墨索里尼要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舒展一下筋骨，进行领土扩张，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地中海东部能够与意大利抗衡的唯一强国是英国。英国时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宣布实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后没过几天，也就是1938年10月3日，梅塔克萨斯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坦率真挚的请求：

与英国结盟是我想要做的事。为什么不呢？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发生欧洲大战的情况下，使用希腊的岛屿和港口将是英国海军和空军的必然选择。即使贵国没有主动把希腊看作一个盟友，也会被迫这样做……

当然，这是1916年发生的情况。对于那段痛苦的经历，梅塔克萨斯和很多希腊人都记忆犹新。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悄悄地借用他当时的政敌维尼泽洛斯的政策，主动争取联盟，而不是陷入被占有和发生内战的致命困境之中。[33]

梅塔克萨斯在日记中袒露了他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的建议会被拒绝。想想一年半以后，如果英国和德国战事正炽，但是意大利和希腊还没有开战，那么他可能会琢磨：“这些国家现在会向我们提出结盟吗？我不寒而栗。但是这样也许会更好。”^[34]不管怎么说，梅塔克萨斯的直觉是对的。在英国，绥靖的气氛四下弥漫。更实用的计策是（这是一种短视），即便英国不背负盟友的责任，最后也能获得梅塔克萨斯承诺的一切。^[35]所以，这些国家都跌跌撞撞地走向了战争。

1939年3月，德国军队进入此前没有被第三帝国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到了月底，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第二次访问希腊。他与梅塔克萨斯进行了会面，对希腊在战时将保持中立偏德国的态度表示满意。就梅塔克萨斯而言，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用电码标注道：“两边都要有保证。”^[36]一周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城市都拉斯登陆，24小时后占领了全国。梅塔克萨斯再也没有什么保证了。又过了一周，英国和法国政府发布声明，支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反对侵略。这个声明根本不能起到任何保证作用，注定会被雨打风吹。接着，在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二战爆发了。

前9个月的欧洲战事常常被称为“假战争”，而在巴尔干半岛，这却是“假和平”。意大利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这个时候，多数北欧国家都已经在纳粹的炮火中沦陷。不列颠之战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进行，到了9月，德国的轰炸开始摧毁英国的城市，温斯顿·丘吉尔政府无暇他顾，即便在意大利要马上进攻希腊的时候，也不能为希腊提供多少支持。

8月15日，正是一年一度的蒂诺斯岛朝拜圣母马利亚的高潮时刻，一艘由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口外边的希腊巡洋舰“艾利”号。没有人怀疑那艘潜水艇是意大利的，但是新闻不

允许这样说。梅塔克萨斯给英国政府发了紧急电报，请求其在意大利进攻希腊时给予帮助。几天后，丘吉尔亲自回答了电文，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梅塔克萨斯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对新闻媒体只字不提他与英国的磋商，主要是避免刺激意大利采取更大的行动。

同时，梅塔克萨斯与德国政府保持秘密的接触，他还没有放弃希望，期待希特勒能够对他的盟友墨索里尼施加限制。但是，纳粹提出的条件是，希腊必须加入轴心国。对此，梅塔克萨斯不能冒险答应，他的理由与当年康斯坦丁拒绝德皇同样要求的理由完全相同，依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而英国则是大海的主宰。[\[37\]](#)在那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仲夏，梅塔克萨斯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灰暗的宿命论思想：

如果德国人赢了，我们就都得成为德国人的奴隶。如果英国人赢了，我们就会变成英国人的奴隶。如果两边都没有赢，欧洲就会分崩离析。不管怎样，大厦将倾。我的主啊，多么绝望啊！[\[38\]](#)

那年，希腊的夏天持续了很久。10月都快结束了，夜里还很热。雅典有传言说意大利人要从阿尔巴尼亚打过来了。政府已经起草了秘密命令，准备一有情况就马上进行后备役军人的紧急动员。10月25日星期五，政府依然没有发现意大利军队进攻的迹象。那天晚上，梅塔克萨斯去歌剧院听一个意大利演出公司上演的普契尼的作品《蝴蝶夫人》。他在日记里写道：“热烈欢迎。”第二天，意大利驻希腊大使埃马努埃莱·格拉齐邀请演出人员以及希腊政府的要员到大使官邸进行庆祝。到了星期天，意大利的新闻就声称，希腊的暴徒袭击了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

军队。[39]

10月28日星期一，格拉齐和梅塔克萨斯再度会晤，时间是凌晨3点，地点是梅塔克萨斯在基菲西亚简朴的家中。梅塔克萨斯不得不从床上起来，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表情尴尬的意大利驻希腊大使格拉齐此行是来送达最后通牒的：希腊必须开发未特别指定的战略要地，允许意大利军队借道经过，且不受任何阻碍。据说，梅塔克萨斯的回答就一个字，“不”（Ochi）。从那以后，这个日子就被希腊确定为国庆节，为了纪念这个抗争的行为。事实上，当时不论发生怎样的对话，双方都是用法语进行的，因为法语是当时的国际外交语言。梅塔克萨斯真正说的话可能是他的第一个部长不久后参加紧急内阁会议时所记录保存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先生，我们就打仗吧”。[40]

在20世纪，希腊第二次被卷入一场欧洲战事，这场战事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世界。梅塔克萨斯作为军事和政治独裁者，向来不受民众的欢迎，但是在一夜之间，他成了国家的英雄。

[1]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264, 291.

[2] Stathis Kalyvas, *Modern Greec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6, 79.

[3] Dimitri Pentzopoulos, *The Balkan Exchange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2; reprinted with a new preface by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London: Hurst, 2002), 96–100. For the number of Muslims covered by the Convention see p. 69. See also Renée Hirschon (ed.), *Crossing the Aegean: An Appraisal of the 1923 Compulsory Population Exchange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Oxford: Berghahn, 2003), esp. 3–37.

[4] Pantelis Prevelakis, *Το χρονικό μ.α. πολιτε.α.* [The Chronicle of a Town] (Athens: Estia, 1976; first published 1938), 85. See also Sophia

Koufopoulou, 'Muslim Cretans in Turkey: The reformul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n Aegean community', in Hirschon (ed.), *Crossing*, 209–33; Bruce Clark, *Twice a Stranger: Greece, Turkey and the Minorities they Expelled* (London: Granta, 2006), 184–7.

[5] Henry Morgenthau, *I Was Sent to Athen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29), 101; Pentzopoulos, *Balkan Exchange*, 96.

[6] Vasso Stelaku, 'Space, place and identity: Memory and religion in two Cappadocian Greek settlements', in Hirschon (ed.), *Crossing*, 188.

[7] John Koliopoulos and Thanos Veremis,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from 1821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rst, 2002), 112.

[8] On Jews, see K. E. Fleming, *Greece: A Jewish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109;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402–20. On other groups see Giorgos Margaritis, *Ανεπιθυμητοί συμπατριώτες. Στοιχεία για την καταστροφή των μειονοτήτων στην Ελλάδα* [Undesirable Compatriots: Evidenc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Minorities in Greece.] (Athens: Vivliorama, 2005); Elisabeth Kontogeorgi, *Population Exchange in Greek Maced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Giorgos Theotokas, *Argo*, 2 vols (Athens: Estia, [1933, 1936]), vol. 1, 57–8.

[10] Giorgos Theotokas, *Ελευθεργια πνευμα* [Free Spirit], ed. K. Th. Dimaras (Athens: Ermis, 1973; first published 1929), 70.

[11] George Seferis, *Complete Poems*,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dmund Keeley and Philip Sherrard (London: Anvil, 1995), 41.

[12] Theotokas, *Argo*, vol. 2, 107.

[13] George Mavrogordatos, *Stillborn Republic: 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Greece, 1922–193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36–7.

[14] Mavrogordatos, *Stillborn*, 41.

[15] Mark Mazower, *Greece and the Inter-War Economic Cri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278.

[16] Mavrogordatos, Stillborn, 47–8.

[17] John Campbell and Philip Sherrard, *Modern Greece* (London: Benn, 1968), 154.

[18] John Koliopoulos,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18, citing a Foreign Of.ce telegram of 13 May 1935.

[19] Koliopoulos, *British Connection*, 98, citing a Foreign Of.ce memorandum of 12 October 1938.

[20] Ioannis Stefanidis, ‘Reconstructing Greece as a European state: Venizelos’ last premiership, 1928–32’, in Paschalis Kitromilides (ed.), *Eleftherios Venizelos: The Trials of Statesmanship*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3–233 (see 208–9).

[21] Mazower, *Economic Crisis*, 276 (citing Emmanuel Tsouderos,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Greece) and 301, 285 (citing Sydney Waterlow to Foreign Of.ce, January 1935, original emphasis).

[22] Mazower, *Economic Crisis*, 292, citing Waterlow to Foreign Office, 8 April 1936.

[23] Marina Petrakis, *The Metaxas Myth: Dictat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reece* (London: I. B. Tauris, 2006), 206 n. 100, citing Palairret to Foreign Of.ce, 21 August 1939.

[24] Εφημερά. τη. Κυβεράγν.σεω. [Government Gazette], 31 August 1936, cited in translation in Petrakis, *Metaxas Myth*, 9; original available online.

[25] Constantine Sarantis, ‘The ideology and character of the Metaxas regime’, in Robin Higham and Thanos Veremis (eds), *Aspects of Greece, 1936–40: The Metaxas Dictatorship*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1993), 151, citing (in translation) speeches of May and November 1937; Jon Kofas, *Authoritarianism in Greece: The Metaxas Regime*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100 (quoted), citing a translation sent by Waterlow to Foreign Office, 30 October 1936. The original Greek is not included in Ioannis Metaxas, *Λόγοι και σκέψεις, 1936–1941* [Speeches and Thoughts, 1936–1941.], 2 vols (Athens: Ikaros, 1969).

[26] Koliopoulos, British Connection, 79, citing a state paper signed by Metaxas, quoted in translation in a British Legation despatch dated 2 June 1938.

[27] Sarantis, 'Ideology', 154, citing (in translation) a speech by Metaxas in 1939.

[28] Τ.σσαραγα χρον.νια διακυβεραγν.σεω. Ι. Μεταξ. [Four Years of Government I. Metaxas], 4 vols (Athens, [1940]), vol. 2, 213; Petrakis, Metaxas Myth, 34–5, 209–10 n. 28.

[29] Metaxas, Λ.γοι [Speeches], vol. 2, 124 (speech by Metaxas on 8 August 1939); Petrakis, Metaxas Myth, 63.

[30] Markos Vamvakaris, Αυτοβιογραφ.α [Autobiography], ed. Angela Kail (Athens, 1973), 175, 187. A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by Noonie Minogue is available from Greeklines, London.

[31] Stathis Gauntlett, Ρεμπ.τιχο τραγαγο.δι. Συμβολ. στην επιστημονικ. πραγ.σ.γγιση [Rebetiko Song: Contribution to a Scholarly Approach.] (Athens: Eikostos Protos, 2001), 68.

[32] Thanos Veremis, '1922: Political continuations and realignments in the Greek state', in Hirschon (ed.), Crossing, 53–62 (60 quoted).

[33] Koliopoulos, British Connection, 89, citing Waterlow to Foreign Office, 3 October 1938.

[34] Ioannis Metaxas, Το πραγ.σ.σ.π.ι.χ. του ημεραγ.ολ.γ.ι.ο [His Private Diary.], 4 vols (Athens, 1951–64), vol. 4, 311 (20 October 1938), vol. 4, 460 (2 April 1940).

[35] Koliopoulos, British Connection, 91.

[36] Mogens Pel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taxas dictatorship in the context of Fascism and Nazism, 1936–41',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2/3 (2001), 143–72 (164 quoted); Metaxas, Ημεραγ.ολ.γ.ι.ο [Diary], vol. 4, 362 (1 April 1939).

[37] Pelt, 'Establishment', 165–6, citing German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June and July 1940.

[38] Metaxas, Ημεραγ.ολ.γ.ι.ο [Diary], vol. 4, 484 (14 July 1940).

[39] Metaxas, Ημεραγ.ολ.γ.ι.ο [Diary], vol. 4, 512–15.

[40] Metaxas, Ημερολογ.γιο [Diary], vol. 4, 747.

第九章

彻底崩溃

(1940—1949)

结果几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最感到惊讶的是意大利独裁者。最后通牒下达两周前，墨索里尼给他的参谋长勾勒了他的占领希腊的计划，就像他此前占领阿尔巴尼亚那样，当时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随着德国军队在北欧的节节胜利，欧洲南部的轴心国意大利也跃跃欲试，要实现自己攻城略地的计划。墨索里尼根本没有咨询希特勒，他认为胜利应该唾手可得。

但是，在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将军指挥下的希腊军队在伊庇鲁斯奋力抵抗，这让意大利军队向希腊的推进迟滞了好几天。1940年11月14日，希腊军队开始反击。正如后来希腊语所描述的，这是一场“阿尔巴尼亚战役”，希腊军队击败了从阿尔巴尼亚进攻的意大利军队，至今这场战役都被人奉为史诗之战。

在1940年到1941年的冬天，希腊军民同仇敌忾，一心对外。军衔较低的维尼泽洛斯支持者终于回到1935年政变未遂后被迫离开的军营，而且受到欢迎。直到现在，和解统一的精神都没有感染上层军官。但不管怎么说，很多被驱逐的军官自愿参战，为抵抗外辱贡献他们的英勇、才智和力量。曾几何时，军队人满为患是1916年内战留下来的一个致命的遗产，现在竟也有对国家有利的一面，这些军人慷慨赴难。截至1941年1月10日，帕帕戈斯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多有斩获，深入意大利占领区30英里左右。

这一直被毫无争议地称为希腊“最光辉的时刻”，与丘吉尔在不列颠战役前夕为议会所做的、经常被人引用的演讲《最光辉的时刻》形成强烈的呼应。^[1]希腊的胜利是靠同样的团结和牺牲精神赢来的，这种精神在那时得到英国战时领袖的大力倡导。而且，正如不列颠战役的胜利，希腊阿尔巴尼亚战役的胜利也是在一个国家为了自己民族生存而独自抗击强敌的形势下取得的。终

于，那个让梅塔克萨斯痛彻心扉、一生都耿耿于怀的1897年的惨痛教训，可以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过去了。

或者，它真的被翻过去了吗？

10月的那个早上，梅塔克萨斯送走意大利驻希腊大使后，在日记中写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白慕德打电话，请求英国帮助。”英国驻希腊大使赶到的时候，天还未亮，内阁成员还没有到齐。^[2]从那一刻起，希腊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始终保持胜利，而梅塔克萨斯和他的政府则在外交上走着钢丝。迟至1941年1月，尽管英国增兵最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梅塔克萨斯依然不敢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希特勒会把英国增兵看成一种挑衅，而且英国新增的部队数量太少，根本不能保护希腊抵抗第三帝国的进攻。那年冬天，希腊的新闻媒体都不能在报道中说，国家正在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因为我们也是法西斯国家”。根据官方口径，希腊只是在与“意大利的武装力量”作战。^[3]但是，面临来自英国和德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希腊的这种态度或立场还能维系多久？

到了4月，梅塔克萨斯就年届古稀了。他的健康有段时间亮起了红灯。他最后一则日记的时间是1941年1月17日。1月29日，他死于肺炎，留下了待解决的紧急的困境。英国驻希腊大使白慕德在3天后给外交部发回报告，对梅塔克萨斯不吝赞誉，说他是“希腊的伟人之一，实际上也是欧洲的伟人之一，他的行为和个性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白慕德完全相信这位独裁者对“大英帝国的善意和友好”，认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梅塔克萨斯都“坚定地参战，与英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不仅反抗意大利，还反抗德国”，白慕德对此深感满意。^[4]

不过，梅塔克萨斯本人并不这么看。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

所写的一则很长的日记中，他抱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出尔反尔，德国的领袖和意大利的领袖都背叛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他写道：“自8月4日起，希腊已经成为一个反共产党的国家，一个反议会的国家，一个极权国家。”在梅塔克萨斯看来，这些是应该接受庆贺而不应该被指责的。他继续写道：

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人真诚，他们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支持希腊。即便基于地缘政治的短期利益或需要让希腊与英国走得近一点儿，他们也应该默许。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以及有些情况下必要的友好关系之外，希腊与英国一直保持着距离。希腊从来没有给予英国或承诺英国什么帮助。[5]

梅塔克萨斯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秉承着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他的军队在世界上第一次开始打击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梅塔克萨斯领导他的人民解决了延续了1/4个世纪的分歧，“新国家”以及“第三希腊文明”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威胁了，因为那本来就是施加和维系独裁统治的借口。从1922年小亚细亚大溃败就开始的痛苦的，有时甚至是痴迷的希腊国家及其机制的重建，在1940年11月和1941年3月的同心同德、联合抵抗意大利入侵者的战斗前线中，得到了最后的证实。

这个希腊国家的突然的、完全的崩溃就在眼前，造成崩溃的原因是希特勒。但是，崩溃早在1941年1月29日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国家崩溃

国家崩溃是从顶层开始的。“8月4日独裁政权”没有宪法依据。梅塔克萨斯是“终身独裁者”，却没有制定“终身独裁者”的更替机制。乔治二世现在面临的机会之一是，一举废除专制政府，以广泛的政治人才和利益的联合取而代之。考虑到希腊没有议会以及没有选举时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乔治二世可以效仿英国的做法，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就是在上一年就职的。不过，国王却将视线投向了希腊国家银行行长亚历桑德罗·科里齐斯，任命他为新的希腊总理，只是后者的政府阅历极其有限。独裁政府的其他机构和人员一并照旧。

梅塔克萨斯在生命最后几周还备受困扰的窘境直到2月底才解决。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英国驻中东军队的指挥官韦弗尔将军到访希腊以后，最终确定向希腊派遣军队。从3月开始，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登陆比雷埃夫斯港。同时，保加利亚宣布加入轴心国，德国军队立即在那儿集结。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早在前一年12月就下定决心入侵希腊了。

进攻在1941年4月6日发起，德国的步兵师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第一波进攻是从保加利亚发动的，几天时间就结束了。萨洛尼卡4月9日被占领。一周后，德军沿南斯拉夫全线推进，从西马其顿进入希腊。这使得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无法长久坚守阵地。同时，希腊陆军的主力在阿尔巴尼亚前线击退意大利军队的一次新的进攻后，突然发现自己差一点儿就被包围了。希腊军队在山区暴风雪和零度以下的环境中经过近6个月的苦战已经疲惫不堪，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没有士气迎击从身后迫近的以逸待劳的、战斗力更强的德军。几天时间里，希

腊军队的纪律开始涣散。由于得不到来自希腊的正式命令，当地指挥官开始自寻出路。

那么在雅典，谁有权下达命令呢？4月18日正是东正教的耶稣受难日。那天下午，希腊内阁在大不列颠酒店的总指挥部召开会议，会议由国王主持。消息已经泄露出去，希腊政府将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克里特岛。各地的士气都很低落，尤其是内阁，有些内阁成员甚至敦促投降。根据职责，科里齐斯本来应该主持这次会议，可是这位可怜的银行家却请求国王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接受他的辞职。因为遭到国王的拒绝，科里齐斯到家后竟然开枪自杀了。希腊没有了军队，没有了政府，一半的国土已经落入了敌手。

最后的抵抗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军队，时间是4月22—25日，地点是温泉关——最有名的古战场之一。但是，与公元前480年的列奥尼达和他的300名勇士的壮举一样，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为了迟滞敌人进攻罢了，是为了疏散英国认为必要的政府和人员而赢得时间。4月27日，德国国防军第一个装甲纵队开进雅典。纳粹的“卐”字标志在卫城升起。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德国占领期开始了。

由于科里齐斯自杀，乔治二世有了第二次创建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经过动荡不安的3天，总理人选落到了另一位银行家的头上，而这3天则是由国王亲自负责的。埃曼努伊·楚泽罗斯比他的前任干得时间长。他还有其他的特质，特别是政府搬迁到克里特岛以后，这些特质显得更有用。克里特岛是维尼泽洛斯的家乡，这里对梅塔克萨斯的反对声一直是最有力的。楚泽罗斯从出生就是克里特人，在过去积极支持维尼泽洛斯。虽然有这一点优势，1941年4月底从雅典逃离的希腊政府依然没有成功改组，没有

对“8月4日独裁政权”的罪行进行大的清算。楚泽罗斯在总理的位子上干了将近3年，成为在那些动荡岁月里连续担任总理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不过他在任期内不需要参加激烈的竞选，也不需要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

希腊政府在克里特岛逗留了不到一个月。5月20日星期二，德国开始在克里特岛的战略要地进行伞兵登陆。防守克里特岛的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部队。克里特岛上所有能打仗的男人都在上一年秋天被调拨到阿尔巴尼亚前线，他们在其指挥官向德国人投降后被遣散。即便如此，克里特民众也都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他们很快会遭到残酷的报复。同时，乔治二世以及最后一批公务员不得不仓皇穿越白山，从海上前往埃及这个安全的地方。克里特战役在10天内就结束了。德军占领了克里特要塞，它成为德军的前哨，直到二战结束。

而后，希腊政府处于流亡状态，由乔治二世和他的总理楚泽罗斯率领，在英国的保护下，慢慢地逃亡，经过亚历山大里亚和开普敦到伦敦，两年后最终到达埃及首都开罗。直到1942年2月，“8月4日独裁政权”才寿终正寝，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国家已分崩离析。

德国单独打败并占领了希腊，但是希特勒对他新征服的这个国家仅有3分钟的热情。与其他被征服的国家相比，希腊在纳粹眼里好像只是一个战利品，而不是围绕自身利益进行滋养培育和保持维护的国土。希特勒很快将希腊大部分地区交给那些方便行使管辖权的盟友，比如，保加利亚和意大利，这使得纳粹的态度更明显了。

西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区和东马其顿全部地区都被交给了保加

利亚管理。巴尔干战争和一战期间的“种族清洗”在这两个地方立刻又开始了。德国人只控制那些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区域，比如，最靠近中立国土耳其的岛屿和大陆以及毗邻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萨洛尼卡、克里特岛的大部分地区、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周围的小部分地区。其他地盘则全部由意大利负责。

希腊傀儡政府宣誓就职，为首的是乔治斯·措拉克戈鲁，他是强迫伊庇鲁斯守军投降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之一。政府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占领国的全权代表手里，并体现在不同的往往是相斥的日常事务中。公民事务管理很快就分崩离析了。轴心国征用老百姓的粮食，不仅将其作为军粮，还将其运回自己的国家，从而让自己国家的人吃。由于年初战争的爆发，希腊被占领后的第一个夏季的粮食收成大幅减少，正常的粮油分配和供给制度被破坏了。因此，农民和牧民大多拒绝交出他们的粮食。公民的粮食定量不得不持续减少，直到低于生存水平。物价飞涨，德拉克马断崖式贬值。被占领后的第一年，面包价格从每份70个德拉克马涨到2 350个德拉克马，到了1944年，则涨到200万个德拉克马。

即便在最好的年成，希腊在粮食谷物方面也从来没有自给自足过。生产过剩的产品，比如，烟草、葡萄干、柑橘和橄榄油等，传统上是用于出口的，以帮助国家支付所需的进口产品，但是现在都被占领者抢走了。英国依然具有海上霸权优势，可以实行严厉的封锁。这正是梅塔克萨斯和其他人早在1914年就预见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与一个控制海洋的国家作对，是没有活路的。现在，希腊人别无选择。希腊国内真的发生饥荒了。

在被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天，仅仅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就有4万人被饿死。1941—1943年，饿死的人据估计达到了25万，接近总人口的5%。城市的情况最糟糕，那些能够自己生产粮食养活

自己的地方的情况最好。希腊就这样突然地回到了残酷的生计经济时代，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时代的经济就是这个样子。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萨洛尼卡和其他较大的城镇已经发展到没有相对复杂的交换体系就不能正常运转的规模，但是那个交换体系也崩溃了。最后，多亏红十字会的努力，一些有限的救援物资被允许通过封锁线。第一个冬天的情况最坏。在整个占领期，几乎每一个人都依赖黑市生存，黑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合法的经济。如果饿死的危险有所减弱，那么其他危险很快就会出现，因为暴力已经控制了希腊的各个角落。

陷入暴力

随着入侵者的到来，希腊出现了极端的暴力。这也是从顶层开始的。到了被残酷占领的第三年，其腐蚀性的影响蔓延到希腊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希腊人内斗。自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以来，希腊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从一开始，任何公然反对占领军的迹象都会引发监禁、折磨或处决。很快，大规模的行刑以及整个村庄的毁灭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到占领期结束的时候，“1 000多个村庄被夷为平地，100多万希腊人眼看着他们的家园被洗劫、被焚烧……有20 000多平民被德国国防军杀害或打伤，有的被射杀，有的被绞死”。^[6]那些数字还不包括伤亡于意大利人和保加利亚人之手的数字，现实中的情况远不像路易·德·伯尔尼埃在其畅销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中描述的那么温情。那些数字也不包括一些希腊人伤害其他希腊人的数字。

在占领军有意谋杀的希腊公民中，有高达8万人的死亡不是

因为抵抗，他们被杀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犹太人。1943年春天，德国人把萨洛尼卡全部的西班牙系犹太人集中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驱逐出境，再塞入货车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那儿的记录显示，有48 974名犹太人来自希腊北部，其中37 386人被立即毒杀。几乎没有一位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些数字最令人恐惧的是它们的精确性，而希腊在20世纪40年代遭受的大部分暴行是没有如此精确的数字来说明的。后来，雅典、爱奥尼亚群岛、约阿尼纳和克里特较小的犹太人社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据估计，“希腊90%的犹太人被杀死”，这是欧洲犹太人被杀害的最高比例之一。^[7]

大屠杀的全部恐惧真相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为人所知。但是，随着入侵者的到来而产生的暴力趋势很快四处蔓延。第一批认真组织抵抗和报复的计划是1941年秋季在雅典制订的，只是希腊政府权力中心很快从雅典搬走，于是希腊开始了艰苦的、各自为政的国家解放历程。希腊毕竟是大山之国，在短短几个世纪以前，每当中央政府比较弱，大山之中、大岛之内就会成为滋生土匪、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地方。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些人之间的区别很明显，但在希腊的历史上，他们的行动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1821年，解放希腊大部分国土的大多是小规模的、基于当地的游击队，而奥斯曼人则主要集中在城镇和沿海要塞。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模式再度重演。

关于这些游击队的很多信息，不论是战后马上披露出来的，还是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的，都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以及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发布的。总体来说，大约400名英国人和美国人跳伞空降到被德国占领的希腊，与希腊人联合对敌。在英国人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叫克里斯托弗·蒙塔古·伍德豪斯。英国人都叫他“蒙迪”，希腊人则叫他“克里斯”，他

在希腊中部的山区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被任命为美英驻希腊游击队联合军事任务团团团长。与比他早一个多世纪的乔治·芬利一样，伍德豪斯也用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撰写他耳闻目睹的历史，并将它们放在中世纪和现代希腊以及希腊人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与芬利一样，伍德豪斯也对希腊人民怀着深沉的、真挚的爱，同样也对那些希腊领导人的缺点和政治软弱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更早时期的亲希腊的人一样，伍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对他们所目睹的战争结果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到底是什么作用，至今历史学家仍然争论不休）。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与亲希腊的人一样，要帮助希腊，但是各自的原因不同；他们要帮助当地的希腊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人的目的也是不同的。

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角度看，一些很特别的战时目标有待实现。最初的任务是破坏德国对北非隆美尔部队的补给线。拉米亚山区戈尔戈波塔莫斯峡谷上铁路高架桥的炸毁一直为人所称颂，尽管它发生得太晚了，对北非战役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那时是1942年11月。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目的是蒙蔽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让他们相信盟军要在欧洲开辟的新战场是在希腊。这需要不停地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破坏，而且很明显，英国特别行动处取得了一些成功。盟军于1943年7月攻进西西里岛，意大利投降，在希腊的英国特别行动处接到命令，继续骚扰占领军，对其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尽最大努力维护希腊各游击队之间的和平，直到德军撤退。

英国特别行动处以及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希腊的故事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被多次讲述。这是一个关于英国特别行动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兵的顽强、勇敢的故事，更是关于他们深深同情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经历严峻考验的希腊人民的故事。但是，

这个故事难以避免地歪曲了希腊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战的事实。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心怀叵测地利用了希腊的抵抗运动，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虽然有些人如此。其实，英国人和希腊人有不同的考虑。

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山中战斗的希腊人来说，北非隆美尔部队的补给线可能只是在理论上有吸引力。“动物行动”是盟军于1943年欺骗德国时使用的战役代码，如果希腊人知道其内容，那么可能更不感兴趣，当然，盟军不会告诉希腊人这个假战役的事。希腊人所知道的，而且十分清楚的是，盟军的破坏行动以及英国人不停地敦促希腊人做的那些事只能招致德国人对希腊平民的大规模报复。英国军官和美国军官看到希腊游击队不愿意直接参与对德军的抵抗时，认为希腊人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希望将来德国占领军撤离后独享战争成果，所以两国军官时常感到很懊恼。但是，他们这样想，恰恰是没有抓住希腊人抵抗行动的要旨。

对那些参与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来说，最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扩大他们对地盘和资源控制，同时避免激烈的战争、不必要的伤亡以及敌人的报复。1942—1944年，在山区中，生命的意义就是每天都活着。与很多在二战期间被占领的国家一样，“解放”不是由将来的强大的军队、国王和将军带给他们的，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点儿一点儿争取到的。到了1943年夏天，那片山区已经成为“自由希腊”。

第一波有效的抵抗是由希腊共产党发动的。德国占领军进入希腊后，释放了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很多共产党人。毕竟，在那个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还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所以德国有所顾忌。但是，希腊共产党的强硬领袖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依然被关押在监狱里。战争期间，扎哈里亚季斯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度过的。在希腊，一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快组成，这就是1941年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希腊语缩写为EAM）。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机构是从底层建立的。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它的宗旨是寻求广泛的民族团结的基础，而不是得到某个特别党派的支持。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早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地下政治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整个德国占领期中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中有乔治·西安托斯，他是扎哈里亚季斯缺席领导岗位时的代理总书记，也有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西安托斯不拘成文规定，与约安尼季斯共同领导希腊共产党。西安托斯曾是一名烟草工人，伍德豪斯后来这样描述他：“尽管他冷酷无情、野心勃勃，但是依然有着朴素的友善和很强的幽默感。”^[8]

这个新的组织在成立一年后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在著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希腊民间语推动者季米特里斯·格利诺斯签署的宣言中发布出来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份宣言让人想起了为希腊1821年革命铺平道路的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和友谊社的宣言——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斗争”。这个组织只提出了非常宽泛的目标，宣言里短短的一句话是“直到希腊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当然，其目标还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所有宪法规定的权利都被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取消了），以及制宪大会选举等。^[9]

在这份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就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其希腊语缩写为ELAS，读起来与希腊国家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支部队在1943年2月只有2 000人，后来人数呈指数级增长，到了6月，这支部队发展到12 000人。那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德国军队直接控制了保加利亚人占有的希腊东北部以外的所有地区，而这个时候，希腊人民解

放军的人数又翻了一番。从意大利军队夺取的武器极大地扩充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山区的军火库。到了1944年秋天德军从希腊撤出的时候，希腊人民解放军指挥的军队据估计有5万人。

在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联手取得了希腊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不依靠任何一位有魅力的个人和特定的党派，组织发动了群众运动。实际掌握控制权的共产党人有意地让自己躲在阴影里。希腊人民解放军里很多扛枪的人不是共产党人。据说，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这样感叹：“我怀疑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这是那些年里一再被人提起的话题。[\[10\]](#)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给希腊的村庄以及后来被解放的城镇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伍德豪斯本来对它们的领导能力及动机是不信任的，但是在初次看到这些变化后，很快就表达了敬意：

除了德国人使用的主要通信设备外，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给这个国家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山区里的通信方式，不管是通过无线，还是通过信使，还是通过电话，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机动车道也被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修建好了，投入使用了……文明和文化的恩惠如涓涓细流，第一次进入山区。学校、地方政府、法院和公共设施曾在战争中被毁坏，现在又能运转了。剧院、工厂和公民大会首先开始运行了。[\[11\]](#)

截至目前，一切都很乐观。在被德国占领、饥谨的混乱之中，希腊的山区里重建了可以运转的国家机器。人民被赋予了未曾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她们在希腊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投票的权利，她们的作用……得到各种形式的肯定”。[\[12\]](#)自从希

腊独立后，公共通知和报纸首次使用每个人都懂的语言——希腊民间语。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还有另一面，那是更为黑暗的一面。

对此，1942年底流传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宣言中已经有明确的暗示，它将极大的注意力投向了国内的敌人。国王和“旧的政治党派”成为预定的目标。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警告，“以任何方式拿起武器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统一的人……都被视为通敌分子，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叛国者”。它用整整一个段落威胁那些与敌人发生性关系的妇女。在最后，它发布命令，要“缉拿和羞辱所有的告密者、卖国贼、密探和通敌分子”。它还宣称，“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挫败所有残暴的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叛徒的一切阴谋”。^[13]

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全希腊吸引热情洋溢的青年自愿参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其他人。如果“卖国贼”是指那些愿意支持占领国思想和行动的人，那么在1942年年底是很难找到的，对于意志消沉的城市警察和农村宪兵，希腊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只是把他们当作傀儡政府的鹰犬。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使用的语言和策略表明，即使它们有着有效的组织体系、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坚定的信念，也永远不会在德国占领期垄断抵抗活动。

从前的军官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客选择利用偷渡者的路线逃出希腊，经由中立国土耳其，最后到达中东，并在那里为流亡政府服务，把家乡的纷争广而告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离开国家的机会，如果不逆来顺受，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希腊老话所说的，“到山里去”。但是，所有无奈之下走这条路的人绝不会加入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在当地享有忠诚口碑的组织及其有魅力的领导人，往往要比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

民解放军浮夸的公开吹嘘及其有意隐身的领导人，更能提供安全可靠的团结环境。

在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是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希腊语缩写为EDES）与民族社会解放运动（希腊语缩写为EKKA），它们都是由1935年末遂政变后被解职的维尼泽洛斯军队支持者领导的。他们是恣肆张扬的拿破仑·泽瓦斯和上校季米特里斯·普萨罗斯，后者更是赢得了与他并肩战斗的英国突击队的尊重。泽瓦斯的指挥基地在伊庇鲁斯，而普萨罗斯则在鲁梅里一带活动。至少从对待占领军这个角度看，无可置疑的是，在宗旨方面，这两个组织以及其他很多的、更小的活跃于希腊不同地方的组织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是相似的。当第一支英国突击队在1942年9月底抵达希腊的时候，军人们就发现山区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游击队力量，并顺理成章地做出决定，要说服那些游击队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与他们一起战斗。

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私心。民族解放阵线在宣言中敦促并在其散发的数千份公告中反复号召的全体希腊人民的团结，与英国人的共识、劝说或合作都没有任何关系。德国占领军的野蛮残暴已经激起公愤，而希腊人民解放军及其武装部队——人民斗争保卫团（其希腊语缩写OPLA，在希腊语里是一个单词，意思是“武器”）似乎要在野蛮残暴方面与德国占领军一争高下。希腊革命后，在这些山区里看不到的那些行为，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比如，就地正法、死前酷刑折磨以及死后的分尸肢解、悬挂砍掉的头颅等。虽然山区里所有的组织都有这类的恐怖暴行，但目击者和历史学家直到今天都是有选择地详细介绍其中一部分。[\[14\]](#)

1943年10月，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大约有4 000人，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月里围剿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将其大部分士兵击毙

或策反。一年后，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民族民主联盟重整旗鼓，人员发展到7 000人。民族社会解放运动的成员好像从来没有超过800人。^[15]这个组织在1943年被希腊人民解放军两次攻击和遣散，很多成员被诱惑改变信仰，包括其二把手尤里庇德斯·巴基尔济斯，他不久后成为民族解放阵线中的一个领导者。后来，民族社会解放运动对英国人调停的一次战役进行公然挑衅，最终在1944年4月被一支更大的希腊人民解放军部队攻击，并被击溃遣散。在那次攻击中，民族社会解放运动1/4的成员被击毙，很多人在后来的山村清剿中被捕杀。在被击毙、被俘后处死或受酷刑而死的人中，有这个组织中备受尊重的领袖普萨罗斯。希腊共产党的代理总书记西安托斯认为，如果这些行为得到宣传，民族解放阵线就会面临一场灾难。在1943年中期和1944年年底，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其他抵抗组织被消灭的惨剧。

这些极端的暴行中有一个令人发指的案例。当事人曾是一名来自拉米亚的学习农业的学生，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关在监狱里，后来在希腊人民解放军中负责全面指挥游击队的行动。他的真名是阿塔纳修·克拉拉斯，但是他的声名和荣耀几乎都是以其战时所用的名字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获得的。其名字的含义是“维卢西峰的阿里斯”，包括古代希腊战神的名字和希腊中部一座山峰的名字，那座山峰是从前绿林好汉具有象征意义的基地，也是现在这些新的游击队队伍的家园。在所有的记述中，维卢西奥提斯都是一位魅力四射的领导人物，蓄着胡须，扎着醒目的子弹带，身配队长之剑，说话轻声细语，但令人信服，不怒自威，是一个“特别刚烈暴虐的人”。^[16]1945年，他因为拒绝履行那年2月已经签署的停战协议而受到共产党领导层的指责。在被政府军包围以后，他宁死不降。维卢西奥提斯和另一位同志的头颅被悬挂在特里卡拉的一个路灯柱子上。他

的就义与事迹就像传统的草莽英雄歌曲所颂扬的那样，他被人们当作英雄来纪念。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0岁。

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在德国占领期间，希腊人是在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进行选择。[\[17\]](#)这当然是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支持者愿意讲述的观点。但是，希腊那些年里发生的一切要复杂得多。在当时极端的条件下，决定人们如何抉择的是暴力的程度，这比政治的考量还要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19世纪20年代那样，人们并不考虑抽象的政治，甚至在必要时根本不讲什么情理，只是希望能够活下去，能够保护他们的家人和生活，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看起来不会改变，而且要没有尽头地继续下去。激发其他组织拿起武器反抗的，正是希腊人民解放军镇压所有对立者所使用的方法，那就是暴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使得国家“至少分裂为两个政治派别——喜欢部分暴力的派别和喜欢完全暴力的派别”，这是一位社会学家对希腊内战的看法。[\[18\]](#)

那么，怎么解释在那个时候为外来观察家所不解，此后又一直困扰希腊历史学家的一个现象呢？随着1943年年底的到来，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同时它的武装抵抗能力也大大增强。这得从雅典的一项政治行动说起。4月，属于右翼和保王阵营的老政客扬尼斯·拉利斯被轴心国邀请领导希腊傀儡政府。他接受了，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他的政府必须有武装，并能招募希腊士兵围剿在山区里的共产党。他建立的武装叫治安营，起初，其士兵招募进展缓慢，而且依赖强制。但是到了秋天，随着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不过，希腊人民解放军不仅抵抗侵略军，还杀害其他抵抗组织的人，而指挥那些加入治安营的人打仗的可能是希腊军官，但最终的命令来自纳粹。一旦德军的行动扩延至山区，治安营和其他通敌的武装就会

进入恶性循环，在镇压游击队方面争夺当地的主导权。希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占领军，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一度无可匹敌。那里的小规模战争频发，对平民的暴行愈演愈烈。1944年年初，希腊的通敌武装分子大约有7 000人，这与同时期的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可以打仗的人数相等。但是，在德国那年秋天撤退的时候，通敌武装分子飙升到25 000~30 000人，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差不了多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那么多人以前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没有丝毫的同情，对国家遭受的残酷征服也少有怜悯，而他们竟然在意大利投降、第三帝国军队撤退时突然接受了纳粹的思想。其实，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向希腊革命期间常规形态的一个回归。为了生存和保护乡亲，为了争夺对当地的控制，那些武装分子不论外来的力量是谁，都会与其进行暂时的合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是关键，其与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对“法西斯”和“卖国贼”的指责一样，容易被煽动起来。有一位志愿者曾于1944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地区参加“治安营屠杀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的暴行，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在希腊北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宗教和民族的伤疤还没有愈合的那些地区，内战的原因更加复杂。半个多世纪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慢慢地梳理。

[19]

在德国占领期的最后一年，希腊人之间的恶性斗争蔓延至雅典的街头。在居住着来自小亚细亚的难民的贫困社区和城镇棚户区里，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是清除异己：

熟睡的居民突然被大喇叭的声音叫醒，社区中所有的男

人都接到了马上到大广场集合的命令。宪兵和治安营的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有人躲藏，就开枪打死他。在清晨冰冷的灰暗光线下，几千名男人坐在地上，而戴着帽子的告密者会挑出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或支持者……[20]

那些被挑出来的人要么被立即枪杀，要么被带到城市郊区那个臭名昭著的哈伊扎里监狱。他们在那里可能被折磨，也可能从那里被送到德国进行强制劳动，或者在下次进行杀人报复的时候随时被执行死刑。分别效忠拉利斯政府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人员相互抢夺，在街上暴力相向，这已经不足为奇。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解放阵线于1944年3月在山区“自由希腊”成功地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即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既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非共产党人。在敌军占领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希腊的政府不少于3个：一是在开罗的流亡政府，被英国控制；二是在雅典的拉利斯领导的傀儡政府，被德国控制；三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被希腊共产党控制。尽管如此，但希腊并没有真正的政府。当德国人从9月开始撤离的时候，希腊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那些相互竞争的组织中，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提出一项被各方接受的建议。唯一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具备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组织。

舞台已经搭好，但也只是通过暴力滋生更多、更大的暴力，直到20世纪4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新的演员走上了舞台。随着1944年的结束，人们终于看到了二战结束的曙光，不过在希腊，人们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前景。

新的断层

1944年10月，德军从希腊全面撤退。除了克里特岛和一些更小的岛上的几个孤立的要塞守卫部队外，德国最后一批占领军于11月4日离开希腊。希腊的命运再一次被远离国境的其他事件决定。在北边，苏联红军正稳步推进到巴尔干地区。在西边，英美联军正在穿越意大利和法国，并取得突破。第三帝国需要在希腊撤退之路被完全切断之前，将主力集中到离德国更近的地方。在摧毁一些村庄并屠杀当地居民后，德国对希腊三年半的占领结束了。

希腊终于重新回到正常的政治生活了，需要填补突然出现的权力空间。但愿是这样。

权力接收工作在几个月前就启动了。领导这次准备工作的是英国人，具体负责人是英国驻希腊开罗流亡政府的大使雷金纳德·利珀。正是在英国的极力坚持下，乔治二世才首先解除了总理楚泽罗斯的职务，然后任命了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乔治·安德里欧·帕潘德里欧（为避免混淆，后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极其偶然地从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及时抵达开罗，并于1944年年底就任希腊总理。老乔治·帕潘德里欧“个子高大，深沉阴郁，盛气凌人，是一个精明的健谈之人”。尽管当时有一位观察家说他是华而不实的吹牛大王，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偏见。^[21]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是在20世纪20年代旧的自由党时代升起的几颗政治新星之一。他在政治思想上比维尼泽洛斯偏左，但同时又强烈反对共产党。利珀和英国在开罗的权力机构支持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当希腊总理。

在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同时受到利珀的监督），

希腊流亡政府终于清除了“8月4日独裁政权”的一切痕迹，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国民联合政府”的形象。根据5月在贝鲁特外的一个村庄以及9月在意大利城镇卡塞塔的希腊流亡政府达成的协议，“自由希腊”的临时政府最终决定与流亡政府合并。在更广泛的联合战线里，民族解放阵线最初就像是少数党，至少，那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当然，从传统意义上讲，民族解放阵线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党。考虑到它的创立背景和历史，它怎么能是政党呢？民族解放阵线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控制着希腊被占领区90%左右的土地。另外，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做出决定，英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安排，未来希腊政府的唯一合法来源将是君主政治和国王乔治二世本人。这是公然无视国王就是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的主要设计者和支持者的尴尬事实，而希腊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无论人们怎样看，没有比在刚刚解放的希腊恢复充分运作的、议会多党民主的政治更糟的了。也许，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竟然同意与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合作。双方各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合作不会长久，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了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

在城市中，德国占领期结束后的平静的日子到来了。在雅典，街头曾出现短暂的大众狂欢。从德军10月12日撤离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国民联合政府的到来，整整6天的时间，就这样在和平中过去了。一同到来的还有6 000名英国士兵，他们是为新政府保驾护航的，被认为是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雅典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第二天，作家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雅典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像汽油桶一样熊熊燃烧。”^[22]在萨洛尼卡，希腊人民解放军公然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在希腊解放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指挥部队进入城市，然后将城市驻防交给一支英国维和部队。但是，市长被民族

解放阵线控制下的城市权力组织替代。

在城市以外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没有完全控制的地方，秩序崩塌后造成的混乱更加严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马其顿的一些地方尤其如此，在希腊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当地的对手之间发生了最邪恶的报复和反报复。伊庇鲁斯暂时被泽瓦斯和希腊民族民主联盟控制。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国民联合政府的权力无法管理雅典、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和帕特雷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的地方。

从政治上看，很快会引燃导火索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国家的武装力量。在19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希腊到处都有武装队伍。希腊解放的时候，手拿武器的人大致分为两派，而且他们旗鼓相当，一派是忠于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一派是反对他们的人。英国人发现自己遭人厌弃，与此前的德国占领军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多数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者似乎都把英国人看作盟友和解放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狐疑。因为毕竟英国还在与苏联肩并肩地同德国作战。但是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和在希腊北部的其他非共产党的抵抗力量，则是因英国保护而未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消灭。更为尴尬的是，意志消沉的城市警察和农村宪兵也这样想，所有被德国人武装起来抵抗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现在都被当成了通敌者。因此，希腊的国内冲突（而不是政治选择），再一次在希腊的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英国和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决定依靠的武装力量，正是不久前还在敌对阵营中执行敌人命令的那部分人。

1944年11月底，协商陷入僵局。希腊政府宣布，希腊人民解放军必须与其他非正规军事力量一起解散。最后的期限定为12月10日。所有的军人都被纳入新的国家军队之中。对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及其支持者来说，他们要接受君主主义者和前通敌分子

的指挥了。在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看来，这一步走得太大了。

在11月的最后一周，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继续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马其顿的一些地区。12月1日，首都郊区甚至还有小规模的战斗。在雅典，共产党的日报《激进主义者报》预告，除非政府改变主意，否则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这是一个自证的预言。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国民联合政府里的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的6位部长递交辞呈。至此，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将近10年的希腊共产党将总部搬到了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上的一座大楼里，共产党总部正对着在广场一边的市警察局总部与广场另一边的在大不列颠酒店办公的英国军队总指挥部。照片显示，共产党的缩写字母“KKE”被高高地竖立在大楼的顶上，几个字母有20英尺^[23]高，直对着天际。

现在，希腊首都已经摆开了战争的阵线。一边是共产党、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和所有同情他们的人，包括冒着生命危险拿起武器抵抗轴心国的绝大多数人。另一边是刚刚丧失“国民联合”前景的政府、很快就被证明因力量太弱而不能保卫希腊首都乃至全希腊的英国军队、一支在北非和意大利抵抗轴心国进攻并在战火中接受残酷洗礼的希腊小部队以及一个更大规模的、有污点的、有通敌嫌疑的武装队伍和个人的集合。

事后看来，考虑到双方不信任的程度，哪一方都没有为下一步怎么办而做出准备，甚至都没有任何严肃的行动计划，这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几位部长从政府辞职后，马上在12月4日星期一进行大罢工，而且在此前的星期日上午，在宪法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后果，民族解放阵线甚至根据规定向当局提交了举行

游行抗议的申请。最初的时候，这个申请得到当局批准，但是几个小时以后，政府陷入恐慌，于是收回了同意游行的指令。这时已是星期六深夜，但是所有的报纸上依然醒目地刊载了游行取消的消息。不过，共产党的日报《激进主义者报》在头版没有刊载游行被禁止的消息，反而号召所有的读者在11点以前到宪法广场集会。一位目击者估计，游行的人数达到了6万。[\[24\]](#)

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宪法广场。在入口处，他们被一排排武装警察拦住了。为了以防万一，广场内、警察局大楼以及大不列颠酒店前都布满了警察。那天来游行抗议的人好像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但是中间有共产党的干部，有些人还拿着枪。当然，我们没办法知道，那些人会在情急之下掏出来什么样的武器。快到11点的时候，有一群示威者被阻拦，无法进入广场，于是他们便转身去围攻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居住的房子。有人扔出两个手榴弹，一名警察开了枪，当场打死一个平民。这个时候，示威者和警察在广场的其他入口也发生了冲突，相互扭打起来。蜂拥而至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11点，广场上挤满了人，示威者挥舞着希腊和盟军的旗帜，有些人还呼喊反对政府的口号。

手榴弹在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房子外面炸响的同时，广场里面就开始了射击。根据最可靠的解释，紧张不安的警察从警察局大楼一层窗户中打出了第一枪。很快，好几个方向的人同时往广场射击。为了自保，人们成堆地趴在地上。惊慌失措的群众离开广场的时候，身后至少留下了7具尸体（也许有22具尸体）。考虑到当时的混乱状况，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具体的伤亡数字。不过，至少有66人受伤。而这只是开始。

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旋即开始在全城攻击警察局，逮捕和处死“叛国者”。同时，在希腊人民解放军没有控制的那些地区，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强化了对敌手的进攻。在伊庇鲁斯，希腊

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新的攻击，最终将希腊民族民主联盟赶了出去。泽瓦斯及其组织的幸存成员后来在英国的护卫下进入科孚岛的安全地带。很久以后，试图对这一切进行梳理分析的历史学家们，在希腊人民解放军对雅典12月3日星期日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协调的方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5]这两方面的原因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山区中可怕的战火烧到首都来了，充斥着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和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传承下来的恐怖暴力。不论在雅典，还是其他地方，不管什么级别和资历的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官，都被报复心驱使着，满脑子都是加倍的暴力报复，这也是占领军的遗产。如果他们要处心积虑地夺取权力，那就得谨慎一些，说不定还能成功。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场冲突的全部特征在于所有的暴力都是希腊人对希腊人。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极不愿意对英国人开打，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他们的目标是多么有限，好像希腊人在场上拼抢的时候可以依赖围观的外国人当裁判似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低估了丘吉尔的决心。自从1912年他在伦敦被维尼泽洛斯的魅力折服后，他就对希腊持有浓厚的兴趣。英国首相在盟军最终逼近纳粹德国并要大开杀戒的时候，是不会被“可怜的希腊土匪”吓倒的。别的领导人也许会把希腊的种种事件看作无关紧要的事，认为不值得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分心。但是，丘吉尔不会那样做。

12月5日，丘吉尔给英国在希腊的指挥官罗纳德·斯科比将军下达了著名的命令：“不要……犹豫不决，假设你是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里，而那里正发生一场地方叛乱……要采取行动。我们要控制和主导希腊。”^[26]现在，英国玩儿真的了。于是，从这一刻起，在德国占领期间已经被撕破表面并撕裂希腊社会的那道内

部裂痕，现在完全与将东部的共产主义和西部的资本主义分开的地缘政治裂痕重合了，这道新裂痕进而在以后的45年里将欧洲和整个世界分为两部分，被称为“冷战”。

战斗持续了一个月。雅典卫城的纪念碑在德国撤退的时候得以幸存，这个时候被希腊人民解放军当作坚固的掩体，军人们在上面架起了机关枪。斯科比的手下试图说服希腊人民解放军从古迹中撤离，但是被希腊人讽刺为“不敢让叛乱分子攻击他们自己的遗产”。英国人只好从意大利通过空中和海上帮助希腊人民解放军增兵，并委派了新的总司令，从而让希腊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多数记述认为，这场战争势均力敌。

乔治·塞菲里斯是外交官，也是诗人。他白天上班的路线是从他在普拉卡的家步行到紧靠着宪法广场的外交部。这段路不远，但是他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战争前线。冲突刚发生4天，他就在日记里写道：“今天醒来我就想，田园牧歌般的普拉卡已经变成了英国和苏联之间第一场战争的战场。”^[27]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雅典之战”常常被描述为当时还没有开始的冷战的先导。

我们现在知道，情况不是那样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都是本土自生力量。虽然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关系密切，但是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希腊的抵抗与苏联几乎是完全隔离的。苏联与山区临时政府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已经到了1944年5月底，西安托斯和他的同志好像得到苏联的指示，被要求与英国和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合作。在那个时候，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试探已经开始了，不久就在所谓的“百分比协定”中达到顶峰。这个协定是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0月9日在莫斯科达成的一个非正式文件，达成协定的日子仅仅比德国最后的军队从雅典撤离早3天。4个月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聚首，由此出现了战后分赃的正式分歧，而百分

比协定则是刺向这个分歧的第一刀。这个协定在很久以后才为公众所知，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同意英国可以在战后在希腊事务上有90%的控制权，得到的回报是他自己就可以在巴尔干其他国家的事务上不受约束。

很多评论家都对斯大林在这个协定中所做出的如此大的让步表示惊讶，因为他最为人所知的特质是不迁就、不守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斯大林这次的确是信守了承诺。在1944年的夏天和初秋，没有人知道苏联红军的推进在哪儿能停下来。到了9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苏联占领。保加利亚有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如果斯大林命令他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入希腊，那么苏联部队至少也会像在仅仅几年前加入轴心国的那些国家里那样，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根据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百分比协定的相关内容，丘吉尔要求还驻留在希腊的所有保加利亚军队撤军，于是斯大林马上下达了命令。这个史实很少被人提及，但这就是保加利亚于1944年10月结束对希腊省份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侵占的原因。

此后不久，苏联军队继续向巴尔干其他地区和东欧推进。最终“铁幕”建立，这成为冷战的原因之一，而希腊注定成为冷战中的前线国家。不管希腊共产党及其国内众多的支持者怀着怎样的希望，斯大林从来没有给予希腊任何实际的支持，最多是为希腊在战火中艰难生存的共产党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个中原因与意识形态无关，一切都源于地缘政治。梅塔克萨斯和他在一战中为之服务的去世多年的国王对此非常理解。斯大林并未因为希腊而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为敌，其原因与100年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并未因支持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俄国党”的诉求而与西欧强国为敌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历史事件已经反复说明，对希腊的控制依赖于地中海东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俄国除了在18世纪

70年代有短暂的、较强的海上力量外，从来就没有具备过那样的实力。苏联在1944年当然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海军。在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中期的苏联，其战略重点（即便苏联已经解体多年，如今依然如此）一直没有改变。

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在1944年12月中旬，也就是与政府的敌对状态开始大约两周后，发现自己被英国人抛弃，而且英国人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因此他们只有靠自己了。在长时期的对峙中，除非斯大林改变主意，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注定必输无疑。但是，从现在开始，只要冷战不结束，那个将希腊一分为二的裂痕的阴影就会一直在那儿。

将欧洲分为相互敌对的共产党和反共产党两大阵营的裂痕在那个时期也会映照在希腊的社会中。这将成为1944年12月的遗产。

战斗到最后

很明显，到了12月的第三周，随着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从意大利通过空中和海上抵达雅典，英国占据了上风。丘吉尔本人一时兴起，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在圣诞节那天飞向希腊，就像救世主一样降临到雅典。丘吉尔带着他自己的手枪，第二天在装甲车的护送下进入雅典市中心。在紧锣密鼓的3天会谈中，他确立了希腊问题新的解决方案的基础。“国王乔治二世回归”这个容易引起政治爆炸的问题被搁置。同时，一名摄政将上任，监督针对君主政治的未来而进行的全民公投。此后，希腊将举行10年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

被选为摄政的人是雅典和全希腊教会大主教。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在与丘吉尔的第一次会见后，丘吉尔就对其印象深刻：大主教“身材高大，外穿长袍，头戴高帽，是希腊教会的显要人物”。^[28]在德国占领期间，达马斯基诺斯因为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尊严而受到广泛的敬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本来在冲突开始的时候，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就提出了辞职，但是丘吉尔不允许。现在，他被恩准离开了。

临时总理的人选落在了一位最出乎意料的人物头上。他就是尼古劳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也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1922年）和两次失败的军事政变（1933年和1935年）的主要推动者。他最后一次未遂的政变，再一次将长期延续的“分裂”延长到内战的边缘。逃亡以后，他从1942年开始担任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希腊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希腊民族民主联盟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由于希腊民族民主联盟那个时候被伊庇鲁斯山区中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剿灭，把普拉斯蒂拉斯列为总理人选简直就是一个态度温和的声明，尽管没有人会指控普拉斯蒂拉斯是一个保王派。这将是旧的拥护共和政体的右派最后的、短暂的亮相。即便如此，对这位经历过1912—1922年所有希腊战事的老兵而言，他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还不到结束的时候。

1945年1月初，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迫进入防御阶段。即便丘吉尔已经在来希腊的路上，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也依旧挟持大批平民人质。在其后两周从城市的撤退中，众多人质被迫跟着部队在路上艰难行走，人质既有男人，也有妇女和儿童，他们都饥寒交迫，但如果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处死。很多人后来被残酷地杀害。几周后，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绑在一起，被草草地集体埋在墓穴里。即便那个时候，自由世界的公共

舆论依然支持叛乱者。丘吉尔在向下议院争取给予希腊行动支持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那么多无辜的平民被当作人质并被杀害，这从另一个方面逆转了舆论的浪潮。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的疯狂举动，对其事业以及其在国际舆论上的形象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这种手段是德国占领时期流传下来的肆虐的、无差别报复的做法的另一种回归，甚至可以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和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中找到根源。

1945年1月15日午夜刚过一分钟，敌视状态正式结束了。2月12日，“希腊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雅典的海边郊区瓦尔基扎签署了最后的和平协议。希腊人民解放军要彻底解散，其成员要交出他们的武器。那些违法犯罪的人不能免于法律的惩罚。无须重申的是，民族解放阵线参与国家政府的机会永远也没有了。一年之内，希腊要就是否实行君主政治进行全民公投，举行新的制宪大会选举。举行选举是对失败一方仅有的重大让步，也只不过是确认了丘吉尔在12月底所说的那些内容。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其中一人是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他不久后在反抗政府军的一次游击队行动中被杀害。从那以后，对很多左派而言，《瓦尔基扎协议》一直被当作共产党领导层一个不可原谅的投降行为，因为那时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仍然控制着希腊大多数地盘。左派们为之刻骨铭心，为之痛惜遗憾，为之愤慨谴责。

政治生活的回归是缓慢的。在整个1945年以及第二年，真正的政治方向不是来自未经选举的、不稳定的希腊政府，而是来自英国人。和平再一次建立，不管这个和平多么不尽如人意。与政治和立宪等问题比起来，更为急迫的问题是粮食短缺问题，因为人们仍然生活在温饱线之下。国家的基础设施被破坏了，重建既需要时间，也需要资金。德国占领期间的极度通货膨胀摧毁了

希腊货币体系。早在1944年11月新德拉克马推行的时候，500亿个旧德拉克马才能兑换成一个新德拉克马。这显示了问题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这个问题直到1946年才得到解决。同时，黑市继续繁荣，新的货币也失去了它的价值。提供急需粮食的应急行动是由新组建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组织的。

慢慢地，在《瓦尔基扎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年，政府逐渐控制了希腊各省区。这种控制权转移的代理人往往是非官方的当地武装人员，他们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抵抗希腊人民解放军或遭受其剿杀的那些人的继任者。这些人现在得到官方在当地的代表，特别是乡村宪兵的宽容或鼓励。尽管希腊人民解放军本身被政府解散了，但是它的很多前成员为自保而重新组成小规模的小部队。暴力和恐吓再一次成为常态。只是这一次，不管在哪里，受害者变成了那些与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战时抵抗有关的人。只要你被确定与一个“共产党人”有关，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你就可能被殴打、逮捕、监禁，甚至被杀害。据希腊左派所述，《瓦尔基扎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年陷入“白色恐怖”。这个术语现在已经被多数历史学家毫无争议地接受并采用了。与通常情况一样，我们很难弄清楚具体的死亡数字。毫无疑问的是，迫害范围很广。

对此，英国人发现自己无力阻止。他们在希腊的力量很有限，而且集中在靠近城市和主要城镇的地方。重组的政党都忙于在临时政府中耍花招、争权夺利，它们要么是1936年前的自己的暗淡苍白的影子（比如，自由党和人民党，每个党都紧靠着一位前领导人的接班人），要么是新的、短命的微不足道的团体组织。希腊议会选举早于计划中的关于君主政治的全民公投。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举行的时候，希腊的政坛已经变得严重两极化，一边是希腊共产党左派，另一边是反对希腊共产党的右派。右派力量逐渐地聚集在支持君主政治的旗帜之下，认为君主政治是已建

立的社会秩序的唯一保证。长久以来与维尼泽洛斯的名字相联系的中右的共和主义，则在这两个极端中受到完完全全的挤压。

对两个极端的政党来说，维尼泽洛斯温和的共和主义遗产是一个新的选择，但是另一位消失在公众视线达10年之久的政治领导人的回归给它以致命的一击。这个人是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是斯大林1931年亲自任命的代表，一开始在监狱，后来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度过了近10年的时间。把扎哈里亚季斯带回希腊的是英国人。1945年5月，他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归国。于是，希腊共产党有了新的管理体制。

10年里的第一次希腊议会选举在1946年3月31日举行。希腊共产党自上次显示自己在竞选方面的实力以来，10年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希腊共产党虽然力量小，但地位举足轻重，能平衡两大党。不过，扎哈里亚季斯可能不知道这些，而且也不知道下一次竞选的机会要等到1974年。他本来是一个顺从谦卑的奉斯大林指示为圭臬的人，但这次固执己见，否决了自己党内很多同志的不同建议，无视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明确指令，下达了抵制选举的命令。这种做法在希腊政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对那些发起抵制的党派来说，每次的结果都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所以，灾难看来又要重演了。

由于共产党（以及一些小的共和党）的抵制，3月31日的选举是在恐吓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只是非常歪曲地反映了公众意见的真实状况。拥护君主政治的右派势力取得竞选胜利，是意料之中的事。从某种角度看，比真正的选举结果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次选举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不少迹象显示，如果抵制选举的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共产党与共和主义者赢得的选票加在一起，会让其排在选举的第一位。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根据外国观察家的分析，希腊共产党将赢得20%的选票，那会是共

产党在很长的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有人认为，假设自由党的资深领导人塞米斯托克利斯·索弗利斯能够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建新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会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会凭借党派组合的力量，为希腊解决其内在问题提供最好的机会”。[29]

但是，机会不再有了。扎哈里亚季斯领导下的希腊共产党已经被持续的白色恐怖行动挤压到死亡的角落里，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得艰难地走向与和平投票选举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武装斗争。在选举的前一天夜里，一支由希腊共产党支持者组成的队伍袭击了位于奥林波斯山脚下的一个警察哨所，这些希腊共产党的支持者杀死了12名宪兵。希腊有三次内战，而这次事件通常被看作第三次内战的开端，是希腊内战中最为血腥的，其造成的后果也最为严重。不过，从1943年夏天开始，希腊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谓的“第三次内战”也可以理解为因轴心国占领而引发国家四分五裂，进而导致冲突的最后阶段，只不过这个最后阶段的持续时间更长，过程更加痛苦。

1946年3月以后，希腊就只有两个政治派别了：要么是共产党，要么不是共产党。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人，那么你就属于国王阵营。对很多希腊人来说，这一定是个无奈的选择，因为不管他们心里真正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只要被甄别为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就难逃遭受暴力、折磨甚至死亡的命运。虽然受到明目张胆的恐吓威胁，但是在君主政治支持者的政府的监督下，希腊终于在9月1日围绕君主政治举行了早就承诺的、推迟了很久的全民公投。结果乏善可陈，完全在意料之中。9月底前，已经56岁的国王乔治二世结束第二次流放，及时返回希腊，只是他的生命只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回来后没有做人民的救星，不能也不想把人民团结起来。两害相权取其轻，希腊人民将这个不受人爱戴的、顽固的、自私自利的家伙请回来当希腊的国王。

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妥协和解的政治愿望，都早早地随风而逝了。现在的裂痕已经非常深，两边对于和平统一都没有任何兴趣。除了希腊革命的内战时期，希腊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依赖于裂痕的这一边或那一边。英国驻希腊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在希腊解放前就一直忙于希腊政府的管理，他在1946年2月最后的报告中说：“两边都流了太多的血，种下了太多的仇恨，不可能再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了，任何人都难以进行调停。”^[30]

没有人清楚到底哪一边会赢，只能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946年3月，康斯坦提诺斯·查达里斯被选为总理，他是自由党战前领导人的侄子。现在自由党又成了执政党。年轻的查达里斯曾被描述为“小肚鸡肠的平庸之人”。^[31]在他碌碌无为（又强硬）的领导下，白色恐怖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的政策。新的安全法律允许随意逮捕人民。军事法庭可以进行判决，判处国内流放，甚至死刑。1946年年底，政治死刑犯的人数是116，在随后的几年里呈大幅度的增长。在很多地区的基层，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和以前一样，官方正式的部队与私人拥有的武装、彻头彻尾的土匪之间，区别很细微。

由此而形成的结果是，虽然越来越极权的政府加紧了对城市和城镇的控制，但是在希腊的农村，尤其在其腹地山区中，德国占领期的混乱卷土重来。历史学家认真、仔细地梳理了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的言论，试图寻找其行动的动机。但实际上，直到1946年和1947年年初的几个月，希腊共产党才逐步控制了各地反政府的、各自为政的游击队力量。希腊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政府压制行动的结果，而是政府无奈之下默许的结果。希腊人民解放军解散以后，其残余势力在1946年下半年再度啸聚山林，不过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巅峰时候的一半。12月，一支新的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一位希腊

人民解放军游击队的前领导人马科斯·瓦菲亚迪斯。一年后，共产党重建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这曾经是1944年存在了6个月的“自由希腊”组建的另一个政府的名字。现在，这个政府的总理是瓦菲亚迪斯，其控制了希腊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山区，大部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德国占领期间曾经解放的领土。直到1947年年底，4年的内战才算是正式开始，战争的双方是两个政治对立的政府，各自拥有一支正式组建起来的军队。

正如希腊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决定希腊未来的最重要的因素都来自国外，这次来自英国和美国。1947年年初，在二战结束后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开始从世界事务中抽身，在以后的20年里，英国从大英帝国变成了联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宣布，英国将在3月底从希腊撤军。就在最后期限的3周前，也就是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提出了后来尽人皆知的“杜鲁门主义”。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担心苏联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根据杜鲁门主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受到共产党的威胁，那么美国就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大规模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将是最先受到援助的国家，但希腊的需要更为迫切。

美国对希腊政府的援助几乎马上就到来了。美国并没有向希腊派遣任何战斗部队，因为希腊不同于朝鲜和越南，尽管有人认为杜鲁门主义在希腊的成功规划成为美国后来干预后两个国家的蓝图。^[32]但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向希腊提供的武器、美元和粮食非常多，远远多于苏联向希腊北面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3个新的共产党邻邦提供的有限援助。这3个国家与希腊一样贫困。斯大林和苏联尽管在援助希腊共产党问题上的措辞显得更加坚决，但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帮助希腊共产党了。那么，根据杜鲁门主义，美国对于希腊援助的计算是不是

完全算错了账？或者，如果美国没有通过大规模援助而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那么斯大林会不会改变主意并干涉希腊事务呢？

即便胜利的天平如此显著地向希腊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倾斜，困难依旧存在。英国人将希腊事务交给美国人以及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好像很多观察家还认为游击队“注定会赢”。^[33]一年后，双方的对峙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关于双方组织混乱的战役、反复不断的暴行以及愚蠢的战略错误的详细记述，令人不堪卒读。两边都从交战区抢走了大量幼童，并将他们送到希腊政府控制的地区或共产党东欧国家控制的地区的特殊营进行系统训练。有很多文字记述了这种做法。希腊政府认为，叛乱分子是在复兴那个十恶不赦的强征幼童并将其训练成精锐禁卫兵的奥斯曼传统。但是，正是有着如此观点的这个政府，拒绝接受这些孩子归国，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在那儿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

战争的最后一年，希腊政府强行迁移其控制范围内的山区村民，以免村民被民主军征为士兵。70多万人（大约总人口的10%）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到战事结束的时候，双方都大量地依赖强制征兵。希腊政府将数千名政治犯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半荒凉的小岛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阿提卡东岸的马克罗尼索斯岛。在这些监狱中，归化教育被沿用到成人身上。早在梅塔克萨斯独裁专制时期，希腊政府就已经开始通过身心折磨来逼迫人们放弃政治信仰了，现在则有了更新的花样。直到双方的冲突结束多年后，很多被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才被释放。

到了1949年春天，希腊的共产党被驱赶到北方，所有的力量被挤压到靠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的格拉莫斯和维齐两个山区中。惨烈的近距离激战、从空中投下的美国新研制的摧毁性武器汽油弹，使得希腊的政府军和空军占了上风。7月，最后

的战役——格拉莫斯围困之战还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下令关闭了他的国家与希腊的边境。8月29日至30日晚上，扎哈里亚季斯和他的最后一名同志撤到共产党执政的阿尔巴尼亚的安全地带。6周后，也就是10月16日，希腊共产党在“铁幕”后的流亡之地宣布武装斗争结束了。虽然1950年1月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暴力抵抗，但是希腊内战确定无疑地结束了。

21世纪的历史学家一直宣称这场冲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战争。^[34]它比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之后的任何一次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都大。根据一项估计，1951年希腊的总人口要比10年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少11%。20万希腊人要么在内战中丧生，要么被长期流放。被其他希腊人杀死的希腊人，“可能超过6万人”。国家的基础设施几乎还没有开始重建。^[35]正如冷战的新术语所描述的那样，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产生的新的政治和文化裂痕会继续将希腊一分为二，并延续两代人以上。那么，开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诉求一直是基于向1821年革命精神的回归。在20世纪40年代的极端条件下，它们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完成向全面的国家自决过渡的进程，这个进程曾经因为外国势力干预希腊国家的建设而中断，并一直没有恢复。这是一个简明的信息，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民族解放阵线诉求的本质，经过共产党领导人处心积虑但不一定是愤世嫉俗的演绎，变成了要实现被轴心国肢解的民族国家的完整。在同一个阵营里，要找到那些与侵略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其他敌人，并不困难。根据这样的叙事策略，自希腊独立以来，外国人一直密谋阻止希腊人民实现他们最重要的、唯一的目

标，那就是完全的、彻底的自由。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争取这个自由的机会了。19世纪20年代，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军阀们以多种方式表达这个意思。就像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俄国党”在希腊独立后的10年间所做的那样，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编制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名单中也不包括俄国。

1944年10月，希腊刚刚解放后，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在他的家乡拉米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像在讲述一个童话故事”：

我们现在行走的地球的这个角落，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希腊的这个地方，从前非常伟大，有着2 500年的文明，一直为全世界所敬仰……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希腊性。事实是，我们的国家（在1821年）再度崛起，犹如重新降生，又一次获得了自由。

“希腊性”是梅塔克萨斯和20世纪30年代末“新国家”的设计师特别偏爱的术语。维卢西奥提斯笃信的“童话故事”是对希腊身份认同的叙事，是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和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19世纪50年代构建起来的。后来，这个叙事没有什么变化。再后来，这个叙事继续追问：“我们要扒开神父的外衣吗？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可以看到，今天有数千名神父走在了我们运动的最前列。”^[36]这一切都是真的。很多乡村里的神父加入了山区对侵略者的抵抗运动。希腊解放的第一天，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在雅典看到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为首的人是“高唱着‘人民统治’的神父”。两个月后，在城市的一场巷战中，一位英国士兵看到对方的一位狙击手在两次射击之间不停地画东正教十字架，认为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37]其实，这只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希腊革命时期的模

式，那个时候“火药神父”的传统形象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想象。20世纪40年代，很多低级别的神职人员以及相当多的主教就像他们的先辈在19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样，加入革命者的阵营，而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则继续忠于教会制度。

反对者可能永远不能理解或者从来不愿意理解的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希腊左派支持者的心里是如何注入深刻的甚至是虔诚的作为希腊人的身份认同感的？

的确，在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共产党领导人宣布，共产党愿意将领土让给希腊北边的邻邦。这是为了让民主军在战场上获得后勤支持而付出的代价。这一直是希腊共产党自我宣传中最薄弱的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49年年初这些让步提出之前，希腊政府的一贯做法是，给这些人贴上“民族解放阵线——巴尔干半岛人”的标签，称他们是拱手出让希腊国土的卖国贼——将巴尔干战争期间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土地，送给了包括现在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保加利亚等敌国。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标签一直贴到了今天，而且还会贴下去。但是，两方都不是坚定的、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者，各自的爱国主义都打了折扣。痛斥共产党向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出让边界土地的那个保王派政府，先后向英国人、美国人出让了希腊很多的主权，目的是获得打败国内敌人所需的武器弹药。考虑到这一点，哪一方依靠的外国实力强大，哪一方就能独占鳌头。但是，无须怀疑的是，双方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一个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希腊身份认同而投入战争，这个身份认同是他们自己想象的生活和未来家园。

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如果希腊共产党在这场内战中获得了胜利，那么是像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走向共同执政之路，还是建

立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38]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环境下，在德军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在大山深处怀着的民族自决的崇高理想，永远没有机会实现。希腊左派在“自由希腊”的山区中创建新型社会的尝试，从21世纪的观点看，只不过是一场“未宣布的社会革命”而已。[39]但是，从20世纪末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

与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一样，20世纪40年代的分崩离析也没有促成一个狂飙突进的国家的再生。

[1] John Koliopoulos,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213; C. M. Woodhouse, *Modern Greece: A Short History*, 5th edn, revised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 first edition 1968), 236.

[2] Ioannis Metaxas, *Το προσωπικ. του ημερολογίου* [His Private Diary], 4 vols (Athens, 1951–64), vol. 4, 516.

[3] Giorgos Seferis, *Χειρ. γράγαφο Σεπ. '41* [Manuscript Sept. '41] (Athens: Ikaros, 1972), 51–3.

[4] Koliopoulos, *British Connection*, 220, citing Palairot to Foreign Office, 1 February 1941.

[5] Metaxas, *Ημερολογίου* [Diary], vol. 4, 552–4 (553 quoted) (2 January 1941).

[6]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3, 155.

[7]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44, 256.

[8] C. M. Woodhouse, *The Struggle for Greece, 1941–1949* (London: Hart - Davis, 1976;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Clogg: Hurst, 2002), 14.

[9] Dimitris Glinos, *Τι είναι και τι θέλει το Εθνικ.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 Μέτωπο* [What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is and what it Wants.] (Athens: Rigas, 1944; reprinted by Estia, n.d.), 39, 41.

[10]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11.

[11] C.M.Woodhouse, *The Apple of Discord: A Survey of Recent Greek Politics in their International Setting* (London: Hutchinson, 1948), 146–7. David Brewer (*Greece: The Decade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Civil War* [London: I. B. Tauris, 2016], 86) is sceptical, and notes that Woodhouse's later account (*Struggle*, 62–3) is 'more guarded'. But by the time the later account was written Cold War attitudes had hardened. In 1948, Woodhouse was recording what he had seen and the impression it had made on him at the time.

[12]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79.

[13] Glinos, Τι ε.ναι [What . . .], 60, 61, 62–3 (emphasis added).

[14] For example,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155–261) devotes a great deal of space to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occupying forces, whose dynamics and motivation he examines closely, but gives no specific instances of extreme violence by EAM/ELAS, though he accepts that they happened. André Gerolymatos, on the other hand, repeats contemporary reports of murders and mutilations by ELAS and the KKE (*A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Greece, 1943–1949*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8–9, 108, 162, 164, 222–6), but is silent on the achievements of 'people's rule' in the mountains and does not so much as mention Mazower's classic study.

[15] David Close,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vil War* (London: Longman, 1995), 94.

[16]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125–7; cf. Woodhouse, *Struggle*, 3–5, 63.

[17] See, for example, Thanasis S.kas, Π.λ.ε.μ.ο. και ε.φ.α.γ.ν.η στη στρα.γ.α.τ.η.γ.ι.α. του ΚΚΕ, 1945–1949 [War and Peace in the Strategy of the KKE, 1945–1949] (Athens: Philistor, 2001), 15, 20.

[18] Stathis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

[19] The source for the remark quoted is presented as a work of fiction: Thanasis Valtinos, *Orthokostá* (Athens: Agra, 1994), 114,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ne Assimakopoulos and Stavros Deligiorgis (London a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5. The novel consists of detailed oral testimonies

closely based on real events. See also the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edition by Stathis Kalyvas. On northern Greece, see, for example, John Koliopoulos, *Plundered Loyalties: Axis Occupation and Civil Strife in Greek West Macedonia, 1941–1949* (London: Hurst, 1999; first published in Greek, 1994–5).

[20]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42.

[21] Procopis Papastrati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Gree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7; Roderick Beaton, *George Seferis: Waiting for the Angel. A Biograph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5–6.

[22] Giorgos Theotokas, *Τετραγ.δια ημεραγολογ.ου, 1939–1953* [Diary Notebooks, 1939– 1953], ed. Dimitris Tziovas (Athens: Estia, [1987]), 509 (13 October 1944);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62.

[23]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24] John Iatrides, *Revolt in Athens: The Greek Communist 'Second Round', 1944– 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2.

[25]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68; Close, *Origins*, 137.

[26]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Cassell, 1954), 97, 289.

[27] Giorgos Seferis, entry for 7 December 1944 in his *Μ.γαε. Δ.* [Diary, vol. 4] (Athens: Ikaros, 1977), 374; Beaton, Seferis, 252.

[28] Churchill, *Triumph*, 271.

[29] Haris Vlavianos, *Greece, 1941–49: From Resistance to Civil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257.

[30] Close, *Origins*, 159, citing Leeper to Foreign Of.ce, 22 February 1946.

[31] Close, *Origins*, 190.

[32] Spyridon Plakoudas, *The Greek Civil War: Strategy,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Monarchy* (London: I. B. Tauris, 2017), 120.

[33] G.M.Alexander,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 British Policy in Greece, 1944–194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251.

[34]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324; John Koliopoulos and Thanos Veremis,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from 1821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rst, 2002), 98.

[35] David Close, 'Introduction', in David Close (ed.),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 19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7–11; for the fullest figures available for 1946–9, see Giorgos Margaritis, *Ιστορία του ελληνικού εμφύλου πολέμου* [History of the Greek Civil War], 2 vols (Athens: Vivliorama, 2000), vol. 1, 50–51.

[36] Panos Lagdas, *Αρης Βελουχιώτης*. [Aris Velouchiotis], 2 vols (Athens: Kypseli, 1964), vol. 2, 461, 466; Woodhouse, *Struggle*, 4–6.

[37] Theotokas, *Τετραγ. δια* [Diary], 507;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314; Seferis, *Μ.παγ. Δ.* [Diary, vol. 4.], 381–2.

[38] Close, *Origins*, 131; Heinz Richter,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 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 trans. Marion Sarafis (London: Merlin, 1985), x; John Hondros,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The Greek Agony, 1941–44* (New York: Pella, 1983), 234; John Iatrides, 'Greece at the crossroads, 1944–1950', in John Iatrides and Linda Wrigley (eds), *Greece at the Crossroads: The Civil War and its Legacy* (Philadelphia, P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3.

[39] Antonis Liakos, 'Greece', in Peter Furtado (ed.), *Histories of Nations: How their Identities were Forged*, 2nd ed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17), 39–46 (45 quoted).

第十章

山姆大叔的庇佑

(1949—1974)

暴力和流血的10年终于结束了。始于1943年的内战持续了6年，这几乎是引发这场内战的外国占领时间的两倍。战争之后，胜者为王的和平时代到来了，输的那一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1947年年底，希腊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禁止。数千名共产党支持者亡命他乡，生活在“铁幕”之后。根据苏联当局的指令，很多人集中生活在塔什干。在希腊，20世纪50年代被从监狱中放出来那些人依然受到监控和骚扰。从前与纳粹狼狈为奸的人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很容易立足，常常被委以信任，还能获得生活津贴。而那些与纳粹及希腊通敌者抗争的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这样的待遇。

今天的历史学家把20世纪50年代的希腊描述为一个“反共产党的国家”和“美国的附庸国”，这种说法有充分的理由。^[1]在希腊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19世纪在欧洲列强势力主导下诞生的希腊民族国家被一个非欧洲国家引领和控制。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时势使然。希腊政府之所以赢得了内战胜利，是因为美国的干预。内战结束后，执希腊政治牛耳的就是美国人。在开始的阶段，希腊政坛混乱不堪，3年里换了不下7届政府，进行了3次议会选举。在美国人的坚持下，希腊在1952年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开启了右派政党长期执政的时代，中间再没有执政党更替，一直到1963年。同时，希腊修正了宪法，第一次赋予了妇女投票权利。在美国的力主下，希腊在1951年10月与土耳其一起加入了北约。在后来遏制全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行动中，两个国家都发挥了作用，往朝鲜半岛派遣了部队和飞机，给予了美国及其盟国支持。

美国的干预对希腊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杜鲁门主义实行一年后，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为期4年，向遭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从而

帮助其在二战后重建家园。那个时候，希腊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得到了1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如此丰厚的经济援助的突然到来，就像美国用武器赶走了共产党一样，极大地改变了希腊的生态面貌以及希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40年代，电力供应几乎到不了希腊的山区和海岛。30年后，你要想找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庄，就得走很远的路才能发现。从阿提卡海岸一直到雅典西边，这个很长的地带布满钢铁厂、炼油厂和船坞，这一切都是那个时期建造的。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希腊再一次尝试将生计农业升级为可盈利的产业，进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结果。

早在革命之前，希腊的造船业就非常成功，在20世纪40年代末更是实现了强劲的复苏，并在此后达到了产业发展的顶峰。在陆地上，20世纪50—60年代是大建设的时期。雅典、比雷埃夫斯和萨洛尼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态势，也推进了这一态势。1951—1971年，希腊首都的人口几乎翻番，达到250万。^[2]这是雅典式公寓楼的时代，每幢公寓楼都是一样的模式——五六层楼高的水泥建筑，外观未经任何装饰。今天的城市景观面貌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内战期间，很多农村人口凋敝，房舍被摧毁，后来再也没能完全恢复，有些就被彻底废弃了。希腊大量的青年小伙子再次选择离开自己的祖国，到海外谋生，这次的新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特别是工业热土联邦德国。同时，大众旅游的基础也建立起来了。廉价航空、团体旅游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游轮产业的发展，开始让希腊成为从前付不起费用的游客的观光旅游目的地。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再是朝着一个方向了。

有的项目是从美国开始实施的，在希腊落地时经过了本地机

制的筛选。但是，美国的庇佑对希腊经济最大的影响应该是释放了创新创业活力，创新创业意识曾经在18世纪晚期蓬勃发展，但在欧洲强国干预时期因中央集权的力量而黯淡下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小型的家庭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特别是在建筑、旅游和船运业方面。据估计，1950—1973年，希腊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是“南欧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也可能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最高的”。[3]

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希腊的面貌从来没有那么好过。美国人就是新的巴伐利亚人。正如巴伐利亚人在1833年所做的那样，美国人的干涉结束了希腊长达10年的流血斗争，尽管所用时间比巴伐利亚人长很多。美国人并没有传播他们的文化，带来的是冷战现实政治主导下的政治议程，为希腊新的现代化时代打开了通道。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希腊国家在1922年小亚细亚大溃败以后的30年里付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其叙事依然没有完成，国境线外的希腊民族再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这造成的影响在当时无法估算，即便半个世纪以后，也依旧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被重新发现的民族

1922年的失败看起来几乎消灭了希腊国家和外延更广的希腊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二战结束的时候，希腊国境线以外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仍然有信仰东正教、说希腊语的人建立了几百年的居民点。其中一个居民点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在希腊语中常常被称为“北伊庇鲁斯”，但大家对此称呼还

有争议)。冷战带来的政治分歧使那里的状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会有任何改观。另一个地方是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包括12个岛屿和周围的小岛，位于爱琴海的东南角，紧靠土耳其大陆。战争在1943年9月爆发，终结了意大利从1912年起对这些岛屿的占领。从那以后，这些岛屿的管辖权先是被转给德国人，再是被转给英国人。1946年，佐泽卡尼索斯群岛要成为希腊的一部分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虽然土耳其的前政府曾经反对希腊向土耳其扩张，因为佐泽卡尼索斯群岛距离土耳其大陆太近，也因为群岛中最大的罗得岛上当时仍居住着大量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裔，但是土耳其的新政府默许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归属希腊的行为。1947年3月，这12个岛屿正式进入希腊版图。

还有一个地方是塞浦路斯。在北伊庇鲁斯的问题上，当地的人民没有说话的机会。在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问题上，当地的人民没有说话的必要。而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情况就不一样了。1878年，塞浦路斯被从奥斯曼帝国转到英国手中，从1925年开始，就一直是英国的王室殖民地。在大约60万人中，有80%的人是说希腊语塞浦路斯方言的东正教徒，这比其他后来成为希腊国土一部分的地区的说希腊语的人的比例还高，特别是克里特和马其顿，还包括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希腊“共同首都”的萨洛尼卡。大部分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以及很多在希腊本土的人，一致认为正如对爱奥尼亚群岛的做法那样，英国人早晚都得让塞浦路斯成为希腊的一部分。

这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英国早在1915年就提出过将塞浦路斯还给希腊，以此为诱饵拉拢反维尼泽洛斯的政府加入一战。30年后，当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以摄政的身份造访伦敦的时候，他那时的私人秘书乔治·塞菲里斯就敦促他将塞浦路斯加到他向新的英国工党政府提的要求里，乔治·塞菲里斯不仅是他的秘书，

还是诗人和外交官。英国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后来，在1947年，英国从印度次大陆撤回了它的殖民统治，一个月后，又单方面从希腊撤军，从而为杜鲁门主义让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旧的帝国正在撤退。

希腊此后的历届政府从来没有热心地推动过塞浦路斯的问题，因为对希腊而言，英国是极其重要的盟友，希腊不能冒一点儿疏远英国的风险，去支持统一塞浦路斯的诉求。另外，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开展希腊统一运动的地区中，塞浦路斯距离希腊最远。尽管希腊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公开表达过意见，但如果希腊将塞浦路斯纳入国土，那么统一后的希腊可能在防御方面会遇到很大的后勤补给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的问题就都留给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自己去推动了。他们于1931年10月造反起义，当时的希腊总理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倡导更广阔国土面积的希腊民族国家的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但是那个时候，维尼泽洛斯正全身心地应对英国上个月废除金本位所带来的后果，处理国家随即将要破产的烂摊子。尽管希腊表现得焦虑不安，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已经感觉到自己与希腊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委屈在希腊得到了共鸣，所以很多人急迫地想进入希腊的怀抱。

至于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如此急切地想加入希腊大家庭的问题，是值得好好讨论的。塞浦路斯人一直置身事外，远离观察希腊国家的解体及其造成的可怕影响；他们自己幸免于此，应该感到很欣慰。塞浦路斯从来没有被轴心国攻击过。尽管塞浦路斯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主动为英国军队服务，但是他们加入希腊的心情与以前一样迫切。不论在塞浦路斯，还是在希腊，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竟然还有那么大的威力。

塞浦路斯的多数说希腊语的社区的政治领导与东正教会是合二为一的，在英国殖民政府于1931年骚乱后废除选举出的立法委员会之后，世俗的领导体制就不存在了。东正教会的领导是塞浦路斯的大主教。16世纪以来，大主教还拥有另外一个头衔——行政长官。这个终身职位需要从岛上的主教中选出。但是，由大主教担任的塞浦路斯的行政长官不仅仅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且这个传统是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延续下来的。他要充当所管辖人民的发言人、保护者和捍卫者。政治权力、责任以及相应的大笔财富统统汇聚于塞浦路斯教会，这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英国历届殖民统治者在成长过程中所耳濡目染的是教会和国家权力的分离，所以他们对于塞浦路斯这样的体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形势下，问题终于爆发了。

1950年1月，塞浦路斯教会组织教徒进行了非正式的全民公投，选举是在教堂中举行的，所以不是什么秘密。虽然选举是非正式的，但是历史学家认为，96.5%的有效选票支持与希腊统一，这是公众愿望的真实体现。6个月后，80岁的大主教、行政长官马卡里奥斯二世去了天堂。1950年10月，他的继任者“以高票当选大主教，得到97%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支持”。^[4]迈克尔·穆科斯是克里斯托杜洛的儿子，出生于帕福斯区的一个小农牧家庭。后来，他进入教会，根据当时的习俗，放弃了自己的姓，换成了僧侣常用的名字马卡里奥斯，意思是“神圣有福的”。担任大主教以后，他的名字就变成了马卡里奥斯三世。他还不到37岁，是担任这个职位最年轻的大主教之一。他不只年轻，而且具有非凡的精力、才华和魅力。在以后20年的时间里，马卡里奥斯周旋于英国、希腊、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塞浦路斯的政客和外交官之中，而且游刃有余，成为20世纪下半叶希腊民族国家政治历史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罗多斯山脚下的基科斯修道院中有他

的壮观的墓地，他的青铜雕像大约有30英尺高，他依然穿着标志性的教会长袍，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

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不出意外地被英国殖民当局扔在一边。但是，在马卡里奥斯当选大主教以前，塞浦路斯东正教会就下定决心要保持与希腊统一的态势，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从岛外寻求支持。其第一个想到的是希腊，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希腊，代表团于6月抵达雅典，带去了全民公投期间投票支持者签名的合订本。此时，距离内战结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希腊公民还没有来得及舔舐伤口，更别说治愈伤口了。塞浦路斯代表团的到来，是从遥远的国境线之外吹来的号角，立刻让希腊公民想起了1821年和1912年的光荣时刻。甚至更好的一面（除非你特别近地观察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内部政治，因为大多数在希腊的人是看不到的），是这个统一大业可以将所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对右派来说，民族主义者可以沿着传统的道路继续斗争；对左派来说，意义更大，他们可以更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实上，从希腊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被击败的、边缘化的左派在赞成马卡里奥斯以及与塞浦路斯统一的公众意见方面，给予了最有效的舆论上的支持。

在那段时间里，希腊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由尼科西亚编制的并由马卡里奥斯推动的统一议程的影响。尽管希腊政府的部长们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塞浦路斯的投怀送抱拒之千里之外，但是统一大业已经在希腊迅速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民众去大街游行示威，报纸开专栏呐喊呼吁。早在1950年5月，希腊议会就表达了统一的心声，即便在19世纪40年代，希腊议会也会如此表达。这个心声是希腊政府有责任“保持一个民族的完整，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狭义上的具有政治边界的国家”。民族的概念排在了第一位，民族概念内的公民“从来并不只包括希腊王

国里的公民”。[\[5\]](#)

由于马卡里奥斯的坚持，前陆军元帅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领导的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系列直接的要求，就有秩序地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的统一进行磋商。其中一次磋商是1953年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后来，希腊方面认为，帕帕戈斯在会晤中受到了平白无故的侮辱。第二年，英国人变本加厉，一位副部长在下议院信口开河，说塞浦路斯有英国的一些殖民资产，因为战略的原因，“永远也不能”从英国的主权中剥离出去。相较于上届工党政府于1945年第一次表达的尝试性开放态度，1951年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态度倒退了很多。

盟友和曾经的“保护国”的多番断然拒绝，在希腊民众中燃起了更大的火焰。希腊政府就像被钳子钳住了，一边是马卡里奥斯，另一边是英国人。但是，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领导人不满足于通过希腊政府向英国施加压力。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心通过联合国将与希腊统一的诉求进行国际化。这一次，他们的政策主张的基础不是坚持那个百年的诉求，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伟大理想”，而是坚持让塞浦路斯多数人自决的原则。不过，现实的问题是只有那些已经实现自决的人才有权向联合国这个平台提出诉求。因此，这个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希腊政府身上，希腊政府首先游说联合国大会允许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议案，然后再耐心地做工作，推动这个议案通过。但是，英国的势力很强大，直接阻止了希腊的诉求进入联合国大会。尽管希腊政府进行了多次尝试，但是这个议案从来就没有被联合国接受过。

塞浦路斯领导人现在努力做的就是重复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所采取的成功策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条件下，国际化也会带来新的危险。虽然塞浦路斯的历史学家没有看到国际化，但是希腊的历史学家马后炮般地把国际化看作一个致命的错

误，如果民族自决问题提交联合国，那么这就意味着向土耳其打开了大门，而土耳其可能会进行干预，从而保护土耳其少数族裔在塞浦路斯的利益。[6]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前5年看，这个危险好像要比后来回顾时小得多。土耳其的阿德南·曼德列斯政府和民主党在1950年选举获胜后开始执政，并表示要与希腊保持睦邻友好。两个国家的政府都积极参与北约的事务，在1953年2月签署了新的和平与友好条约。与此前的凯末尔和伊诺努政府一样，塞浦路斯问题根本没有在曼德列斯政府的议程上。土耳其国家的领土疆域是由1919年9月土耳其民族运动初期所制定的《国民公约》确定的，并不包括塞浦路斯。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土耳其已经将所有关于塞浦路斯的诉求都转给了英国。如果殖民国家进而将此权力转给当时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的其他国家，那么这又该怎么解决呢？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耳其的态度很清楚——对此事不感兴趣。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东正教领导人和希腊的决策者没能预测到下一步要发生什么，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首先对统一进程提出异议的不是希腊的宿敌土耳其，而是英国。

1955年夏天出现了危急情况。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发出紧急通知，邀请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派遣外交部部长到伦敦参加三方会议，商讨塞浦路斯岛的未来。会议开始前不久，麦克米伦在给属下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态度越强硬，对我们和他们越好。”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要实现“分而治之”，所以他引导人们看到“此次阴谋诡计的高风险特征及其一点儿都不让人尊重的特色”。当时，马卡里奥斯将其称为“歪门邪道”。[7]当然，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塞浦路斯参加。

这个时候，曼德列斯和他的外交部部长法丁·佐卢的口吻变得更富民粹主义的特质，非常引人注目。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很担心，因为导火线已经被点燃了，如果爆炸发生，那么没有人能够控制局面。事实也的确如此。9月15日，会议快进入尾声的时候，佐卢好像认为英国人将在希腊的要求下让步。如果佐卢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完全误解了这次会议真正的目的。那天晚上，这位土耳其的外交部部长从伦敦给伊斯坦布尔的官员打了个电话，据报道他说了句“搞点儿小活动可能会有效”。^[8]第二天，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希姆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游行示威人群。贝伊奥卢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在希腊语里被称作“佩拉”），发生了潮水般的暴力。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

1955年9月6—7日的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的暴乱被希腊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称为一场“大屠杀”。警察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70座东正教教堂被抢掠和焚烧，希腊族的商业铺子和家宅被掠夺。仅仅24小时的时间，古老的仇恨冲出了理智的表面，破坏了可以追溯到1930年且因北约而得到强化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友好关系。那两天的事件为之后主导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对抗仇恨确定了基调。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族东正教社区大约有几十万人。1923年，根据《洛桑条约》，这些人被免除了强制性迁徙，后又开始了快速撤离。几年后，这里的希腊族东正教徒减少到了几千人。

为了获得短期的政治优势，为了更久地控制塞浦路斯，麦克米伦和他的政策在土耳其最大、最强的城市里引出民粹主义愤怒的恶魔，但是恶魔出来后就再也无法被装进瓶子里了。6年后，曼德列斯和包括佐卢在内的多数内阁成员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绞死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煽动这些事件。但是后来的土耳其政府，

不管是什么政治颜色，不管是军政府还是平民政府，在60多年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都没有发现让步的可能性或权宜之计。

伦敦三方会议召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上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1955年4月，拿起武器的游击队宣布自己成为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希腊语缩写为EOKA）。其领导人是希腊军队的前上校乔治斯·格里瓦斯。他本来就是塞浦路斯人，在阿尔巴尼亚抗击意大利人。德国占领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短时期内领导了一支对付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部队因其希腊语名称的首字母“X”（音“chi”）而知名。格里瓦斯与其说是一名军事家，不如说是一名政治家，与他的政治导师马卡里奥斯在支持武装斗争方面深具谋略一样，尽管英国谍报人员一直在追捕他，但他总能成功逃脱，化危险于无形之中。冲突期间，格里瓦斯给自己换了个名字——迪耶民斯，这让人想起所有说希腊语的人都知道的传说中的典型英雄形象。今天，尼科西亚的一条主要大街被命名为“格里瓦斯—迪耶民斯”大道。

在英国人眼里，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在其支持者眼里，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成员是献身于国家解放的自由斗士。他们伏击的目标是军人和警察，二战期间，游击队曾经用这些方法在希腊抗击轴心国侵略者。这些方法都是英国人教导他们使用的，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英国人，英国人被当成了敌人。同时，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对那些被查明的“叛国者”进行惩罚，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它还对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希腊语缩写为AKEL）的党员进行附带性的袭击。这更让人想起希腊内战期间双方的战略战术。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一开始对警察局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前3个月里有200多次攻击。很快，英国人做出反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形势下，不管什么人，只要携带武器，就会面临死刑的判决。

根据紧急法，第一批死刑于1956年5月执行。其中，迈克尔·卡拉里斯（又名“迈克拉基斯”）被判刑的时候只有23岁；另一个是安德烈亚斯·迪米特里欧，他只有21岁。他们都是经过正常程序被判刑的，一个人的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尼科西亚市中心打死一名希腊族塞浦路斯警察，另一个人的罪行是在法马古斯塔枪击并打伤一名英国人。但是在希腊人眼里，这些审判是有问题的，因为关键证人以及指控人员都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死刑判决在塞浦路斯和希腊都引起了公众的震惊。塞浦路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共游行示威，但是在5月9日的雅典，当第二天要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发怒的群众涌向协和广场，试图冲击一幢被武装警察封锁的大楼。此情此景令人想到了1944年12月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恐怖事件，所以紧张不安的警察就开枪了。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9]

后来，希腊的一些城镇和广场正式地更名为那些被处死的人的名字，而且沿用至今，其中包括英国驻希腊大使馆在其雅典驻地前的那条街道。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马上给予反击，把他们押为人质的两名英国下士枪毙了。这些从未伤害过别人的无辜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牺牲了。

总体来说，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在斗争中造成了500多条生命的消失，受伤的有1 000多人。在死亡的人数中，一半以上是希腊族塞浦路斯平民，这远远多于英国军人或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成员的死亡人数。与20世纪50—60年代其他反殖民斗争相比，其伤亡不大。[10]作为一场军事冲突，它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希腊民族国家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解决方案都是来自遥远的国境之外，这次则是来自美国、瑞士和英国。

在那之前，英国政府于1956年3月在尼科西亚机场逮捕了正准备去雅典进行磋商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进一步疏远了在塞浦

路斯和希腊的希腊族的人。经此异变，马卡里奥斯到达预定目的地的时间被推迟了13个月。在这期间，这位塞浦路斯的行政长官实际上被监禁在特别遥远的英国殖民地塞舌尔岛。1957年4月17日正值东正教的圣周，马卡里奥斯在这一天终于到达雅典，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按照美式风格，一个摩托车队护送他从机场前往位于宪法广场的大不列颠酒店，中间多次停下，以便于他接受当地名流的问候和祝福。这一时刻被称为“他整个个人生涯的巅峰”，这个说法是非常恰当的。[11]

马卡里奥斯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即兴演说，下面广场上的听众中一定有一批人，他们在将近50年前，站在同样的位置，聆听维尼泽洛斯从同样的阳台上发表同样振奋人心的演说。那时，维尼泽洛斯第一次从克里特来到雅典，担任希腊总理，后来领导希腊人民赢得了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更多的人可能是从他们的父辈或历史教科书中了解这段历史的。那么，复兴的精神是否能再一次从更广阔的希腊民族国家进入，将困扰希腊国家的倦怠、挫折和争斗一扫而光呢？

但是，时势异也，人也不同了。没有证据表明，马卡里奥斯胸怀统治希腊的雄心壮志。维尼泽洛斯1910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战火纷飞的家乡，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的家乡和希腊的统一。马卡里奥斯去希腊，仅仅是因为英国当局不允许他回到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维尼泽洛斯之所以被邀请到希腊，是因为那儿的政权最高层虚位以待。而1957年则没有这种职位，即便当时的政党领导人无论在能力、魅力或者受民众欢迎的程度上，都无法与马卡里奥斯相提并论。也许，马卡里奥斯错过了一个可能改变希腊历史进程的机会，但更可能的是，这样的机会本身就不存在。

不管什么原因，从那以后，促进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的大业

开始缓慢而无情地从马卡里奥斯的手中滑落出去。

到了1957年，国际背景发生了变化。此前一年，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政府试图夺回，但最终失败。苏伊士危机成为旧的欧洲殖民强国的转折点。就英国而言，它也结束了安东尼·艾登的政治生涯。上一年，艾登在年迈的丘吉尔之后继任英国首相，但是在次年1月就辞职了。新任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是关于塞浦路斯前途的那个噩梦般的三方会议的始作俑者。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治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只要英国还在塞浦路斯拥有军事基地，就再也不可能放弃塞浦路斯。土耳其一方现在也督促塞浦路斯与希腊划清界限。于是，1957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塞浦路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此，两大阵营可能最终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身份认同，那就是塞浦路斯人。

正当这些建议在遥远的政坛上酝酿的时候，塞浦路斯事件让形势发生了转向。从历史发展上看，这应当被视为一次严重的警告。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19世纪的克里特的族裔关系那样，为了争取与希腊统一而形成了相互间的仇视和敌对，爆发了相互间的暴力行动。即便在始于1955年4月的反抗斗争之后，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好像也没有把土耳其人作为敌对的目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地方安全部队中占据很高的比例，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攻击。1957年11月，塞浦路斯警察特别支队的一位土耳其族高级警官被刺杀。在安卡拉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此事很久以后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这个回应呈现出了新的暴动形式（根据不同的视角，其可以被看作“恐怖分子”或“自由斗士”）。它被称为土耳其抵抗组织

（土耳其语缩写为TMT）。现在，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反抗斗争在最后阶段变成了一个三方作战，其在1958年一直处于混战之中。最严重的暴力之罪是在两个秘密的游击队组织在针对另一方族裔的平民时犯下的，这是以前没有过的。1958年1月和6月，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尼科西亚发起了暴力行动，暴乱的受害者被以私刑处死。6月，英国护送下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俘虏被伏击，有几个俘虏被砍杀。于是，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开始反击，掠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同时还威胁恐吓自己的族裔，阻止他们从土耳其族控制的地区搬出去。在塞浦路斯的各个地方，家家户户开始悬挂国旗，或者是希腊的，或者是土耳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了塞浦路斯独立历史上悬挂国旗的开端。

但是，有人还真找到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来自看起来不可能的地方。1958年12月4日晚，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辩论上，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佐卢向他的对手希腊外交部部长埃万盖洛斯-阿维诺夫—托西萨提出质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能就塞浦路斯的问题摈弃两个国家的分歧呢？”事实上，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英国政府在边上默不作声，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人也如此。两位外交部部长发现，他们可以在让塞浦路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达成共识。如此一来，希腊就会放弃统一塞浦路斯的思想，土耳其就会放弃分离塞浦路斯与希腊的思想，英国就会放弃其关于塞浦路斯主权的思想，但是依然可以保持其军事基地。各方都是失败者，但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获胜者。从这个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在19世纪30年代初获得独立时采取的方式，当然结果是不一样的。

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分别于1958年12月在苏黎世以及第二年2月在伦敦兰卡斯特大厦召开会议，匆匆讨论研究了塞浦路斯独立的细节问题。马卡里奥斯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被叫了

进去。在希腊外交部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强大压力下，马卡里奥斯依然拒绝在他没有参与讨论却要负责实施的最终协议文本上签字，这一下子在兰卡斯特大厦引发了几乎难以承受的紧张局势。不过，难堪和紧张的时刻终于过去了，马卡里奥斯后来在协议上签了字。1959年2月19日下午，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了。

3月1日，在时隔将近3年后，马卡里奥斯乘飞机抵达尼科西亚机场，他向等候他的官员和记者说了一句话。公元前490年，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将雅典人战胜波斯人的消息第一个带回雅典，当时他说的古希腊语正是这句话：“我们赢了”。马卡里奥斯是怎么想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他一定很清楚，这不是什么胜利。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戴着他那极具特色的外交帽子，在这个问题的磋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感到很震惊。即使如此，与其他人相比，塞菲里斯对此事造成的可能后果的预测都更准确，协议签署一年后，他在日记中袒露心迹：“我们（希腊人）干不了大事。”^[12]最令人伤心的墓志铭是，古老的“伟大理想”已经埋葬在将近40年前的士麦那废墟里，但是那挥之不去的记忆依然没有完全消逝。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为了保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权力分配，塞浦路斯在宪法中进行了详细安排。总统必须一直由希腊族人担任，副总统则由土耳其族人担任，低级别的官员大致根据人口比例进行分配（不论是国家独立前还是独立后，这种分配一直都处于讨价还价中）。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既有希腊语，也有土耳其语，国旗上有代表塞浦路斯岛的地图，白底之上有两个橄榄枝，其代表和平。英国对阿克罗蒂里和泽凯利亚上的军事基地拥有永远的主权。羽翼未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将受到英国、希腊和土耳

其这3个促使其降生的国家的保护，这样的安排让人想起19世纪的希腊。

随着塞浦路斯前景的尘埃落定，希腊政府对希腊民族国家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强化。塞浦路斯冲突持续期间，希腊和英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但是从那以后，由于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利益纷争，所以关系很快就恢复了。美国是希腊新的保护人，在整个塞浦路斯冲突期间，一直作壁上观，看着事态的发展，带着某种迷惑、恼火，有时甚至是惊愕。一旦土耳其明显地介入，美国的重点就变成了尽最大力量减少对北约的影响，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希腊。希腊大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其发端可以追溯到那些年月。1959年，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政府开始寻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进行新的联合，这就不足为奇了。^[13]

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希腊的创新精神开始探索“成为希腊人”的不同方式。

与佐尔巴斯一起跳舞

在20世纪50年代，去电影院是花费少的一种外出方式。在新的优惠条件下，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在好莱坞的影响下，逐步发展成了一种本土的电影产业。如果我们以人均制作的电影数量来衡量，那么希腊的生产效率就可以与好莱坞媲美。在城市和较大的乡镇，电力供应已经覆盖多数社区。10年以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电影院的数量好像不少于500家。闲置的建筑用地可以很容易地改建成夏季的露天电影院。1956—1968年的高峰期，年票房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希腊人平均两周就去一次电影

院，这让希腊成为欧洲观影频率最高的国家。1944—1974年，希腊发行了1 500多部电影。^[14]

那个时候，电影业还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生产效率如此之高的电影业中全都是民营企业。最近，希腊政府的作用逐渐发挥出来。政府补贴艺术电影，为将来的产业发展开辟了路子。另一方面，电影审查很严格，而且一直持续到1974年。在电影中，共产主义、内战、当代政治以及任何可能冒犯外国游客或投资人的内容都不能出现。对于国家的军人、警察或古代的纪念碑等，电影必须给予尊重。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控制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审查实施起来通常都是轻轻放下，大家对此基本上无感。如果电影故事脚本不是基于共产党员的作品，那么演员或音乐家的选择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即便他们属于极左派。1967年以前，电影审查人员很少介入。电影导演自己已经将所有的问题进行了内部化处理。与好莱坞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20世纪50—60年代的希腊电影也有自己的禁忌。

电影的制作预算都很少，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通常都是黑白片，面向广大群众，描述的是郊区或乡村发生的故事，大多数观众都非常熟悉这些故事，所有这一切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让历史学家直到21世纪仍然对电影不够重视。希腊社会的变革非常快。电影后来广受欢迎就是这些变革的一部分。当然，尽管电影中的场景与生活别无二致，但是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不过，它们还是反映了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希望和焦虑，有大量的人背井离乡，来到那些匆匆建造的郊区，忍受着那些新发现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而不管自己是否也分享了那些财富。

如此繁荣的电影制作中涌现了一些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斯黛拉》是1955年发行的，是来自塞浦路斯并在英国接受教

育的年轻导演迈克尔·卡柯扬尼斯的第二部电影。它也标志着希腊未来政治活动家和文化部部长玛丽娜·墨蔻莉电影事业的开端。由于《斯黛拉》这部电影需要在宏观上体现希腊经典悲剧的特色，反映传统希腊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残酷现实，所以选择了乔治·比才的家喻户晓的歌剧《卡门》中的故事进行改编，把背景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雅典的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墨蔻莉扮演的人物排斥传统希腊社会为女性规定的繁文缛节。我们可以想见，她为此付出了代价。社会规范得到维护。但是，墨蔻莉精湛的演技使得观众从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很有心机的美丽女主角身上，认识到所有希腊男性价值中最受人珍爱的价值，那就是面对极端困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般的蔑视。

不久后，希腊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引起更多注意。有些导演是希腊族美国人，已经在美国电影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戛纳，墨蔻莉结识了在美国出生的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并与之结成秦晋之好。他们共同出演了《决不要在星期日》，这部电影也是达辛导演的作品。这是一部很“希腊”的影片，是最早用英语对话的希腊电影之一，在1960年发行。达辛在影片中扮演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在第一次去希腊的旅途中，遇见了墨蔻莉扮演的比雷埃夫斯妓女伊莉雅，两人成为朋友。伊莉雅听起来不像希腊语中一个真实女孩的名字，而像希腊语词汇“太阳”的阴性形式。由于男主角的名字是荷马，所以男主角认为伊莉雅一定是那个带他到希腊进行心灵追求的“象征”。与萧伯纳《卖花女》中的希金斯教授一样，荷马认为，他应该承担改造她的责任。他告诉她：“2000年前，希腊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伊莉雅反驳说：“现在依然是。”这个来自比雷埃夫斯的有着金子般心灵的无忧无虑的少女和那个来自美国的乐观向上的少年荷马（这要比《辛普森一家》中的荷马早很长时间），让把一切看得更明白的

观众不禁会心一笑。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新的10年中，希腊真实的现实或者可能要成真的现实，捉摸不定地游移在希腊人之间以及他们之外的某个地方。

墨蔻莉凭借《决不要在星期日》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那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授予了马诺斯·哈齐扎基斯，他是这部电影插曲的作曲者。这是希腊电影成就的一个侧面。这些电影让当时的希腊创造力在另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受到大众的欢迎，并最终帮助其引起国际观众的注意。这就是希腊的流行音乐。

哈齐扎基斯和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都出生于1925年，是同时期的音乐家。10年前，他们就推动了一种新型音乐的形成，并让布祖基琴声誉鹊起。那时，布祖基琴只是希腊城市底层人民使用的和雷贝蒂卡传统中的一个普通乐器。根据雷贝蒂卡的典型韵律和一些音调发展起来的这种新音乐，还吸收了希腊乡村音乐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元素，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新浪潮”。其结果是一种更具活力的音乐融合。它一下子受到西方人的喜爱，比孕育它的纯正的雷贝蒂卡或中东传统音乐还容易被接受。这种融合后的音乐与19世纪意大利的歌剧一样，婉转悠长，迷人悦耳，别出心裁。

这次音乐运动的发起双雄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都是离经叛道之人。哈齐扎基斯是同性恋，当时的希腊公众对性的态度非常保守。西奥多拉基斯是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曾遭受毒打，被当作死人扔在一边；在内战期间不经审判就遭羁押，受到酷刑折磨。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与“官方的”希腊国家格格不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引进到希腊音乐里的“新浪潮”竟然“得到国家的认可，受到左派和右派两方的称赞”，这很具讽刺意味。[15]

1960年，这种新的音乐形式的所有要素都集中体现了出来，它们体现在西奥多拉基斯为共产党诗人扬尼斯·里佐斯的8首诗谱写的乐曲里。这些诗当时允许传播，多多少少是一个奇迹。歌词选用的里佐斯的诗，曾在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执政前不久发表在共产党日报《激进主义者报》上。诗句哀悼一位年轻烟草工人的死亡，他是在1936年的一次罢工中被警察开枪打死的，梅塔克萨斯曾以此罢工为借口夺取了权力。那个时候，书写的文字不会被审查，但是留声机唱片的内容会被审查。

更了不起的是，西奥多拉基斯不久后进入政坛，成为议会的议员，代表联合民主左派。这个党派相对偏左，是被禁止的希腊共产党的前线团体。西奥多拉基斯继续给里佐斯的诗配乐，其中包括《希腊人》，这成为他最脍炙人口、最受人喜爱的乐曲之一。里佐斯的诗写于1945—194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把希腊身份认同的历史看作与残酷的环境和凶残的侵略者永不停息地斗争的历史。在1966年《希腊人》这张唱片发行之后，所有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倾向的希腊人都会跟着高亢的鼓点和响亮的布祖基琴声，用嘶哑的嗓音唱出：

当他们握紧拳头，

世界上就一定有阳光。[16]

成为“新浪潮”音乐歌词的，不只有共产党诗人的作品。乔治·塞菲里斯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分别在1963年和197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奥多拉基斯为其诗歌谱的深受欢迎的曲子。很快，每一位作曲家都这样做。那个时候，希腊诗坛中的多数知名诗人急切地寻求与作曲家的合作。那些书写在纸上的意蕴丰富的诗句因谱曲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有时甚至

还获得了新的意义。两者的结合变调形成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一下子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又让人感觉其植根于具有独特希腊元素的大众传统之中。那就是雷贝蒂卡以及希腊山区和海岛中的更古老的韵律和曲调。

这种大众音乐和“高雅”文学的神奇联姻在由卡柯扬尼斯执导、1964年发行的另一部电影中达到巅峰。《希腊人佐尔巴斯》这部电影是根据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德国占领期间创作且随后发表的一部小说改编的，使用的语言是英语，采用了英语译本更朗朗上口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卡赞扎基斯的原创小说《亚历克斯·佐尔巴斯的生活和想法》就变成了现代希腊人真实身份认同的一个童话，尽管电影的一号男主角由墨西哥裔美国人安东尼·奎恩扮演，二号男主角的身份从一个非常理智的希腊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傻头傻脑的、由阿兰·贝茨扮演的英国人。这部电影是在克里特拍摄的，群众演员都是当地的村民，电影音乐是西奥多拉基斯编配的。在一切都焦头烂额、变成一地鸡毛之后，电影故事达到了高潮，才华横溢的“老板”谦逊地要求质朴粗犷、精力旺盛的佐尔巴斯教他跳舞。在小说中，这是解放的时刻，是超越心灵和身体之间障碍、理智和情感之间界限的短暂狂欢。在电影中，两个人物的舞蹈一开始是缓慢的屠夫舞，那是雷贝蒂卡主题内容之一的哈萨匹克舞，然后变成节奏更快的哈萨波赛尔维克舞，尽管舞蹈的名字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延续乡村传统的完全不同的舞蹈。从那以后，西奥多拉基斯开创的这种有着断奏节律的、让人铭记在心、血脉偾张的音乐就被称为希塔基民谣，它后来发展成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传统”希腊舞蹈。

两位外国演员在克里特的沙滩上，循着一种对观众来说全新的曲调，欢快地跳着一种新创作的、融合的舞蹈，这就是《希腊人佐尔巴斯》最后的画面。对国内外来说，这种音乐范式都是全

新的。这再一次证明，不管是好还是坏，希腊的事从来就不只是希腊人自己的事。到了1964年，希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几乎和希腊政府及其体制没有任何关系。

政治势力的碰撞

纵贯希腊历史，政治生活中缺乏创新艺术领域“大胆探索”的活力，这不免令人发出一声叹息，但也不是第一次了。1952年以来选举出的稳定的右翼政府，在10年后出现崩溃的迹象。执政党最初的名字是希腊大会，其在领导人前陆军元帅帕帕戈斯去世后改组为民族激进联盟，并从1955年开始由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领导。在1958年的议会选举中，联合民主左派超越其中立派对手，成为最主要的反对派，部分原因是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强烈反对政府退让。1961年，反对党变成了组建不久的中左的中间联盟。

中间联盟的前身是尼古劳斯·普拉斯蒂拉斯创立的党。普拉斯蒂拉斯是资深造反派，在内战结束的时候是维尼泽洛斯主义最后的真正的支持者。早期，普拉斯蒂拉斯领导的党与旧自由党的最后势力有过短时间的合作，旧自由党是由维尼泽洛斯的儿子索福克勒斯领导的。现在，中间联盟的领导权转到了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手里，他曾在1944年的混乱时期担任希腊总理。1961年10月，中间联盟在民意投票中惜败。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发出强烈抗议，认为选举被所谓的“政府庇护”操纵。这个势力虽然模糊不清，但绝不是虚构想象的，主要构成人员是警察以及军队中的右翼人员。在选举中，这些人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来就没有人能说清。但是，也许这些影响还不足以决定选举的结果。不

过，那倒是让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有了动力，并进而宣布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

胜利的第一缕曙光在两年后照射进来。1963年夏天，民族激进联盟领导的政府步履维艰。卡拉曼利斯与国王保罗产生了分歧。保罗是乔治二世的弟弟，乔治二世在激烈的争议中返回希腊，不久后（1947年）便驾崩了。格里戈里奥斯·兰布拉基斯是联合民主左派在议会的议员，他4月在萨洛尼卡被谋杀。这件事成为“政府庇护”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后来通过瓦西利斯·瓦西利科斯在1967年发表的小说《Z》以及科斯塔·加夫拉斯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为全世界所知。在政治形势变革的氛围下，老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中间联盟在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第一，但是优势很微弱，不足以让他组建新的政府。于是，老乔治·帕潘德里欧请求国王取消此次选举结果。1964年2月，希腊举行了新的选举，中间联盟获胜。

哪怕是相对偏左一点儿的政府，希腊以前也从未有过。这个政府在进行激进的改革中需要采取审慎的措施。在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教育更普及，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层面上。政府推行了语言的通俗形式，这受到了死硬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因为内战后，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可恨的希腊共产党才在公共场合使用通俗希腊语。但是，在那些让希腊人产生分歧的问题上，比如，共产主义和国家对北约的承诺，老乔治·帕潘德里欧与他的前任一样，是一点儿都不妥协的。1944年，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得到英国人的赏识。20年后，形势变了，美国人一点儿都不接受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也许是偶然），中间联盟执政后，就赶上了塞浦路斯修宪危机。1963年年底，从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斗争的最后一年开始的两大民族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塞浦路斯的混

乱。1964年，希腊举行选举的时候，伦敦正在召集和平会议，努力为塞浦路斯的冲突找到解决方案。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选举胜利才刚刚过了3周，联合国就通过了决议：联合国要派维和部队去塞浦路斯，负责调停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对立。由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干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才得以避免。

一个月后，美国提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计划。这个新计划被称为“艾奇逊计划”，是由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主持制订的，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计划的内容是取消难以实施的1960年宪法，允许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根据塞浦路斯人口中土耳其族人口的比例，将塞浦路斯的一个军事基地租借给土耳其。同时，土耳其还会获得一个希腊小岛卡斯泰洛里佐的主权，这个小岛是希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距离本土最远的一个岛。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正要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时候，马卡里奥斯阻止了他。如果塞浦路斯和希腊统一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双方在雅典和尼科西亚之间有关希腊外交事务的控制方面，都不需要争抢。无论如何，两种做法都会在未来10年后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间联盟政府的另一个坏运气是，国王保罗在登上皇位后仅4个星期就死于癌症。与他的兄长比起来，国王保罗更加维护团结，而不是制造分歧，在位期间做了很多弥合依然存在的旧的“政治大分裂”的事情，至少是在反共产党的阵营内，做了不少愈合的工作。他的儿子继位，被称为康斯坦丁二世。新国王很年轻，几个月后才满24周岁，希腊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国王了。上一位年轻的国王是乔治一世，距离现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了。几个月后，年轻的康斯坦丁二世和76岁的总理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所造成的破坏，一点儿不亚于新国王的祖父和维尼

泽洛斯在半个世纪前的冲突所造成的破坏。

表面上看，他们的冲突是关于军队控制的。阴谋反叛的谣言已经传了多年，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存在一个极右军官组织，其缩写是IDEA（在希腊语和英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对国王、右翼反对势力以及“政府庇护”派的所有反共产党势力而言，更让人烦恼不安的是一个新的被称为“盾牌”（据其希腊语缩写ASPIDA一词而来）的组织。这些左翼军官不仅密谋颠覆军队和国家政权，而且还声称总理的儿子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这个时候40多岁。此前不久，他放弃了在美国研究经济的大好前程，回国加入了他父亲领导的希腊政府，成为一名顾问。从政治上看，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观点要比他的父亲偏左，他的名字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火把”，正是他这个火把让他父亲的政敌感到了真正的恐惧。到了1965年夏天，在越发相互怀疑的氛围中，军队控制的问题变得很严重。比起希腊王国初年要密谋废黜奥托国王的热爱东正教协会，即便盾牌的行为是真的，颠覆性也更小。一位当时在雅典公干的美国前外交官后来写道：“盾牌军官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吓唬一下那些反对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的寻衅滋事的右翼军人罢了。”^[17]

7月，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感到自己的职位受到国防部部长的威胁，所以就解除了后者的职务，并提出由自己兼任。在希腊的议会历史上，这两种做法都有很多先例。但是国王更信任被解职的国防部部长，他拒绝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这个职务，因为总理的儿子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正在接受是否参加了谋反活动的调查。当老乔治·帕潘德里欧重复了50年前的维尼泽洛斯的（很不成功的）做法提交辞呈时，康斯坦丁二世看出了他的虚张声势，马上就同意了。于是，这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老乔治·帕

潘德里欧追问：“谁统治希腊？是国王还是人民？”^[18]

此时，国王采用了他的叔父乔治二世为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打开通道的做法。所以，希腊政府会再一次走向独裁政府，只是这一次没有马上实行。康斯坦丁二世一次又一次地找议员谈话，希望他们组建政府，在第三次，他终于成功了，执政党中间联盟的一些议员在引诱（比如贿赂）下与中右的反对派形成联合，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打败了自己的党。斯特凡诺斯·斯特凡诺普洛斯以及人们口中的“叛党者”，在1965年9月走马上任，组成了新政府，共执政15个月。

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提交辞呈的消息被人们知晓后，暴力再一次涌向雅典的街头，很快就引发了“七月事件”。“叛党者”政府执政期间，城市的正常生活一直被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困扰。内战时期的两极化好像又回来了：右派担心被左派夺走政权，所以就禁止共产党；左派则担心议会体系的坍塌以及右翼专制独裁的出现。“马上要政变”的谣言满天飞，谣言中的谋反活动和谋叛者有很多，但那个名单中竟然漏掉了真正密谋的那个人。他竟然逃过了所有人的注意，甚至逃过了美国中情局的眼睛。这导致不少希腊人怀疑那就是美国中情局干的。

经过更加紧张激烈的政治活动，希腊最终确定了新的议会选举的日期，那就是1967年5月28日星期天。老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中间联盟党最有可能获胜。极左的联合民主左派得到很大的支持，也有获胜的机会。4月15日，现有议会解散。3天后，一群中级别的军官在其中军衔最高的斯蒂利亚诺斯·帕塔科斯准将的家里集会，参加集会的人有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以及其他希腊秘密机构的警察。这些人掌握应急计划的细小安排，那是由北约起草制订的，其确保与共产党发生战争后的国家的安全，代号是“普罗米修斯”。4月21日凌晨，在国王、部队总司令不知晓

的情况下，在计划拥有者美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普罗米修斯计划实施了。

装甲部队从兵营开出来，占据了首都各处的战略要点。坦克包围了雅典北部郊区国王在塔托伊的乡间行宫。全副武装的士兵占领了电话控制和交换中心以及国家广播电台。雅典市民一大早醒来，发现大街上除了坦克和穿着制服的士兵之外，别无他物。他们的电话被掐断。广播里反复播放着军队进行曲，中间插播与爱国纪念有关的传统民间舞蹈音乐。只有几份报纸可以公开发行。在那些日子里，雅典没有社会媒体，也没有私人广播电台。当时，电视在希腊还处于发展初期，当然也由国家垄断。多数在家的高级别政客被羁押，部队中比叛乱分子级别高的军官也被监管，直到他们表示效忠新的政府。左派的标签不仅针对共产党人，而且针对他们的同情者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亲朋好友。不久，几千人被监禁、软禁或流放到爱琴海中那些人迹罕至的小岛上。那些小岛很快都成了监禁左派人士的地方。“上校”独裁专政（希腊语里也使用西班牙词汇“军政府”来表示），在希腊政坛上演了。

被固定在石膏夹板里

新政府最初颁布的法令非常像1936年的翻版。宪法权利被废除，包括集会的权利。审查制度严格实施，禁书目录（包括一些古代希腊经典）和禁止播放的音乐目录（包括当时希腊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共产党人西奥多拉基斯的所有作品）出现了。“严厉禁止男人留长头发和女人穿超短裙”就发生在“摇摆的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时期。每个人都要去教堂。即便是那些执政的“上

校”们，也不能随便提起“第三希腊文明”，因为那会让人轻易联想起第三帝国。但是，他们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口号是在军事政变将近一年后，接着这个口号就被传开了。这个口号是“希腊基督徒的希腊”。这些领导人（或他们的幕后智囊）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少，他们的知识比梅塔克萨斯还有限。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们的言论都贻笑大方。看看帕帕多普洛斯这个人吧，他是独裁政府的“强人”，曾经是军中的少校，6年后官职就升到了摄政（后来的总统），还当过总理、国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他于1968年3月29日在萨洛尼卡对希腊第二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

从遗传和传统上看，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有着最完美的文化和奇迹，为整个人类进行了启蒙……那么，根据我们的种族来源和国家意识，我们是希腊人；根据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基督徒。这两个方面，再加上丰富的知识、传统和历史事实，描述了我的理想，描述了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理想，描述了我们国家希腊人的理想。

那么，如果要坚守那个理想，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理想。我们必须再一次成为希腊基督教徒……[19]

为了让希腊社会的大部分人听话，“上校”们还效仿梅塔克萨斯的经济政策，一直到1973年，希腊都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企业家获取资本的途径要比以前多。1968年，农业债务被取消，农村地区释放了积怨。在政府的主导下，道路交通网络明显扩大，电话系统和电视进入了以前从来没有进入的地区。尤为特色的是，希腊在1968年开通了第二个电视频道，并将其命名为武装部队信息服务。随着急需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关的

控制力度也不断增强。在攫取权力的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独裁政府在发现、侦破和预防反对势力方面，与梅塔克萨斯的国家机器一样，效率高，行动快。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个独裁政府是很不同的。1967年，康斯坦丁二世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奈地成为一场政变的帮凶。那年早些时候，他发现塞浦路斯问题会让人们担心与土耳其开战，对战争的恐惧好像让军队中产生了裂痕，所以他试图强化自己的权力，推翻军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武装部队最终要效忠的是君主，而不是独裁者。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不是那样了。国王在1967年12月13日的反政变行动彻底失败了，他匆匆逃离国家，再也没有返回。旧的裂痕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不论是君主政治，还是君主本人，都无法激发出早些年热情。20世纪60年代末，在希腊军方，反共产主义超越了一切，比忠诚还重要。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武装力量的作用。实际上，在“上校”们统治国家的7年里，武装力量总是指陆军，数量更少的、传统的精英集团以及海军和空军则不参与争权夺利。与希腊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不同，在这7年里，陆军军人从军营里走了出来，走上了社会，进入了国家的各个岗位，控制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上校”们及其上司帕塔科斯准将在很早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的职务委任状，但是军政府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宣言。全国各地都张贴着标语，其宣扬“1967年4月21日革命万岁”。巨大的广告牌和固定的海报栏里，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形象，背景是浴火重生的凤凰。陆军的控制体现在各个方面，到处都能看到。如果有人违背军政府的指令或只是被怀疑违背，就会受到严酷的处罚。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军政府最喜欢的比喻是做外科手术。

帕帕多普洛斯在政变6天后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新闻媒体代表的面前，他用特有的蹩脚语言解释道：

绅士们，别忘了，我们发现自己的面前有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如果外科医生实施麻醉和做手术期间不把病人绑在手术台上的话，这就有可能要了病人的命，而不是让病人恢复健康。

更为著名的比喻是石膏，他对其基本意思进行了详细描述：“我们有一个病人。我们给他打上了石膏。我们要测试一下，看看他不用石膏是否能走路。”^[20]作家萨纳西斯·瓦蒂诺斯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那是希腊作家集体检测“改革审查法律底线”的行动的一部分，小说认为石膏那个比喻荒诞不经。在瓦蒂诺斯的故事中，那个倒霉的病人被绑着，当他被打上石膏，他圆睁的眼睛里只有恐惧。正当湿乎乎的东西强行灌进他的嘴里并让他永远闭嘴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见过那个外科医生。早些时候把他绊倒并造成交通事故的人，正是那个外科医生。^[21]

在真实的世界里，多年过去了，那个病人从来就没有从石膏中解脱出来。到了1973年夏天，帕帕多普洛斯认为，他可以冒点儿风险进行一个有限度的尝试。7月，围绕采用新的共和宪法这一主题，希腊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在这种情况下，公投通过就不意外了。即便如此，仍有1/4的选民弃权，不愿意冒被迫害的风险。帕帕多普洛斯几度向前政客们抛去橄榄枝，但只得到一个人的回应。1973年10月1日，希腊宣布成立新的政府。帕帕多普洛斯被选为总统。唯一回应的那个政客成为总理，并谈及希腊将在2月10日举行大选。在那之前，石膏还需多久才能拆除，其

他知名的政客是否参加大选，都是未知数。

但是帕帕多普洛斯在这次改革尝试中把自己赔进去了。那些对独裁统治怀有最深怨恨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满的迹象。一旦相对的宽松出现了，那些怨恨就会浮出表面。1973年5月，海军军官的一次哗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更大的麻烦在大学中生成。6年来，大学生没有权利选举学生会成员，而从传统上看，学生会在希腊大学生活中极其重要。从1973年年初开始，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抢占教工大楼的行为，这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11月4日，很多学生走向雅典市中心的街头，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有30多名学生被捕。在军政府政变前，这类游行示威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现在，时隔6年，这个场景又回来了。9天后，学生大规模地涌向雅典理工大学。

那些是可看见的迹象。对独裁政府来说，还有一些迹象是看不见的、更致命的，即很多1967年政变最初参与者的反应。这就是去掉石膏引发的麻烦。对于帕帕多普洛斯似乎要承诺的东西，他可能有意为之，也可能不是。但是，对那些从来都没想过把权力交回平民政府的人来说，最近发生的骚乱不安的事件足以证明新总统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尽管雅典理工大学的校园和报告厅里响彻年轻学子的呼喊——“面包—教育—自由”，但是帕帕多普洛斯在总统宝座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从11月14日星期三开始，3天来，雅典理工大学的报告厅和四方院子很自然地成为群众行动的焦点。当局因为害怕出问题，关闭了一些大学，而那些大学的学生全都奔向雅典理工大学。尽管不久后成立的占领校园协调委员会这一临时组织极大地维护了团结和秩序，但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局面。这3天里，一直有学生运动同情者加入占领校园的队伍之中，其中包括学生、心怀不满的工人、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更多的是来自两个政治极端

的破坏分子。到了星期四，大约有1万人聚集在雅典理工大学校园栅栏外面宽阔的大街上，不断呼喊支持学生的口号。第二天，这些人的数量暴增，差不多达到10万。即便如此，3天后，政府依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作为。

被封锁在雅典理工大学校园之内的年轻人和聚集在校外的支持者的心里，涌动着躁动狂欢的浪潮和权力交替的感觉。占领校园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用被占领的实验室里的临时设备，建立了一个短波广播电台。从星期四凌晨开始，全雅典的各家各户都能听到“雅典理工大学在这儿”的呼号。年轻播音员声嘶力竭地呼吁政治改革，这样的声音6年半都没有出现过了。“法西斯主义今晚死亡”是重复最多的口号之一，控诉“军政府”的口号也常出现，“军政府”这种叫法在公开场合还是第一次听说。广播里还发出宣言，号召推翻独裁政府，回到“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上来。

[22]

多年后，当人们回顾此事时，认为那是一个好像一切都有可能的时期。有个人说：“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在这一刻是无所不能的。”另一个人认为：

每个人都自信满满，不管对你来说这有多么疯狂，这都是一种超越……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以前的一切再也不会羁绊我们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此刻书写了新的历史。 [23]

说这句话的人是约安娜·卡瑞斯提安娜，她后来成了一位小说家，在2018年被提名为希腊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同时，在雅典理工大学外面的街道上和市中心的其他地方，形势逐渐恶化。星期五下午，游行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

下午5点，警察开始喷射催泪瓦斯。一个小时候，保卫公共秩序部大楼的警察已有枪支。晚上7点半左右，当一些示威群众试图强行进入大楼的时候，枪声响起了。晚上8点，雅典警察局的局长不得不承认：“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24]

派兵镇压似乎是帕帕多普洛斯一个人的主意。给部队的命令是在夜里11点多下达的。那个时候，雅典理工大学之外的街道以及几个街区之外的公共秩序部周围的暴力还在继续。警察神射手从公共秩序部大楼的顶上向示威群众射击，受伤人员被抬到雅典理工大学之内。学生电台开始紧急寻求医生和医护设备。官方媒体声称，拿着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屠杀警察。警察中的确有伤亡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的伤是枪伤。

11月17日星期六凌晨1—2点，3辆坦克开向雅典理工大学校园的外大门。学生代表勇敢并不失尊严地提出有秩序地撤退，没有任何抵抗。那些站在低矮的墙上、紧抓着对着大街的栏杆的人以及聚集在后面的人，挥舞着蓝白国旗，唱着国歌。“这是一场共产党叛乱”的说法一点儿都不可信（即便学生中最出名的人属于被禁的极左社团）。随后，第一辆坦克慢慢地驶向锁着的双层熟铁大门，作为路障停在门外的一辆汽车被碾轧，被碾轧的还有大门以及一个女学生的双腿。这一幕发生在凌晨3点。学生广播电台此前一直不停地对外面的暴力和坦克行动进行报道，现在则鸦雀无声了。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拿着安装着刺刀的枪，冲过大门，猛烈地驱散学生。那些离开的一到大街上，马上就遭到在那儿等着的警察的毒打，上千人被逮捕。那天夜里留在大众记忆中的，是坦克冲进大门、国家武装部队把枪口对准自己青年的景象。但是，那天夜里杀害游行示威群众和学生的，好像是警察，而不是军人，死亡的24个人是在雅典理工大学附近的街道上倒下的。

戒严令实施，军人在大街上停留了好几天，零星的暴力行为依然在继续，现在是士兵使用致命武器的时候了，多数时候是趴在房顶上的狙击手。11月17—20日，大概20个平民被枪杀。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欧洲国家来说，它从来不能确定地说出死亡和受伤人员的具体数字。那些痛失亲人的由于害怕受到更多的迫害，都尽可能地掩盖自己失去亲人的事实。总体来说，从第二周开始，官方的人员逮捕数字几乎达到3000。非官方的估计数字接近官方数字的3倍。更多的人则藏了起来。

尽管那些事件充满着戏剧性和恐怖性，但是导致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政府下台的，并不是雅典理工大学的学生造反。11月25日星期天，就在雅典理工大学被袭事件爆发一周后，坦克再次回到希腊各地的大街上。在一场波澜不惊的不流血政变中，军队中的强硬派实施了他们精心策划了几个月的计划。帕帕多普洛斯的遮羞布般的平民政府被解散。新的挂名首脑和国家领导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费登·吉奇克斯，他的总理更是不为人知，从穿着上看，是一个平民。雅典很快就传言，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新的军政府背后的1967年政变主要策划者之一的人的手里。他叫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曾是一名上校，后来升为准将，担任令人闻之色变的军事警察局局长。约安尼季斯尽管不在帕帕多普洛斯政府或吉奇克斯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但是真正掌握希腊权力的人是他。1973年11月的学生叛乱远没有成为第一缕解放希腊的曙光，而是注定被埋没在比以前更深的石膏里了。

今天，从希腊各地的大街和广场名字中，人们还可以看到“雅典理工大学英雄”的字样，但是这些英雄付出的勇敢和乐观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另一方面，这一称呼在希腊逐渐被“雅典理

工大学风暴”代替，其相当于法国的“五月风暴”。从那以后，如果我们不提1973年的那些日子及其后来镌刻在公众心中的记忆，就讲不通希腊政治发生的一切。这是“雅典理工大学”留下来的真正遗产。

随着1973年的过去，1974年在阴冷的天气中到来了，一切都稳定下来还需要几个月。正如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场风暴的收官之战将在希腊民族国家的一个遥远角落里上演，受到牵连的人将不只是希腊国家中的公民。

1967年政变以后，塞浦路斯和希腊两个政府间的关系一直充满着恶意。尽管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截至1973年夏天，马卡里奥斯已经两次从希腊军政府的刺杀下逃生。1968年，雅典郊区发生爆炸，这差点儿要了当时乘汽车的帕帕多普洛斯的命，后来发现，这次爆炸事件是由马卡里奥斯那些特立独行的支持者策划的。在希腊被绑在石膏之中、议会和民主被搁置的时间里，马卡里奥斯于1968年和1973年高歌猛进，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统一的理想，现在转了个180°的弯。塞浦路斯成为说希腊语的世界中的民主自由的最后一块阵地，只要希腊军政府存在一天，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就不会与其实现统一。

希腊军政府自有想法。

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是在1964年的骚乱后建立起来的，多数人是被征召入伍的，他们是当地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但其军官是临时从希腊调派的。1971年，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领导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抵抗英国人的格里瓦斯在暮年秘密地从雅典回到塞浦路斯。此后，塞浦路斯岛上活跃着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名叫“EOKA—B”。据说，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格里瓦斯合作。

由于不能依靠自己政府的微不足道的武装部队，马卡里奥斯开始招募预备队成员，这些成员效忠于他。他还向共产主义阵营示好，为自己羽翼未丰的共和国争取不结盟国家地位，这为未来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在早期，这也许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当时的形势下，马卡里奥斯的做法完全引起了理查德·尼克松领导的美国政府，特别是他的鹰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警觉。当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武器抵达塞浦路斯的时候，这两个希腊族的塞浦路斯武装力量为了那批武器大打出手。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夏，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一直处于未宣战的内战中，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则苟且偷安，躲在自己的飞地上，完全退出了岛上的政治生活。

到了1974年7月，这一切到了决一死战的地步。那年1月，格里瓦斯去世，希腊为他举办了英雄般的葬礼。6月，在北约的一次峰会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被希腊的军政府肆意破坏，这好像是“无所不能”的约安尼季斯下达的命令。3位希腊部长马上辞职，并认为国家正在引发一场战争，而且很难获胜。7月初，马卡里奥斯给希腊的军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后，信的内容被泄露给塞浦路斯的报纸。马卡里奥斯认为自己是“希腊文化所在的一大块土地上的民选领导人”，他要求结束EOKA—B的活动，并且要求希腊军官从国民警卫队中撤出。[\[26\]](#)

7月15日星期一的上午，马卡里奥斯收到了唯一的答复。国民警卫队的装甲车开进战略要地，炮轰马卡里奥斯刚刚抵达的尼科西亚总统府。上午11点，塞浦路斯国家电台已经被军方控制，广播“总统马卡里奥斯死了”的消息，取而代之的是尼科斯·桑普森。他曾是一名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游击队战士，没有任何政治阅历，但是与希腊军政府关系密切。

桑普森政变受到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强烈抗议，不过随后发

生的事件将政变的影响淹没了。7月，塞浦路斯发生了4天的全面内战。即便没有外面的干涉，希腊军政府也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塞浦路斯。反击短命的桑普森政府以及抵制单方面宣布与希腊统一的，是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他们在塞浦路斯总人口中占比很大，依然忠于自己选出的总统。

从叛乱策划者的角度看，事情发展得非常顺利。马卡里奥斯有着惊人的个人勇气，在忠诚的属下的帮助下，他从被炸成废墟的总统府死里逃生。多亏了他的老对手英国人不计前嫌，他从英属阿克罗蒂里军事基地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在两天后抵达伦敦。他在那儿邂逅了正在游说英国政府插手塞浦路斯事务的土耳其总理。这次政变公然违反了确保塞浦路斯岛独立的条约。英国、希腊和土耳其都是条约签署国。这3个北约成员国，再加上它们共同的“大哥”美国，是能够就塞浦路斯问题消除分歧并找到解决方案的。如果这个目的能达到，塞浦路斯的流血牺牲就能避免，希腊也就能重新回到文官治理的模式上来。

失败的一个原因是3个北约成员国的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极度不稳定。在英国，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2月的选举中获胜，但缺乏足够的票数，所以英国在10月还得再举行一次选举。在土耳其，新当选的比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中左政府依赖于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关系，差点儿成为短命的政府。在美国，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政府瘫痪了好几个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久后就下台了。在那几个星期，美国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在伦敦，相关各方没有采取共同的行动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面对英国拒绝采取行动的困境，埃杰维特决心进行单方面的干预。土耳其在1974年7月19—20日夜里，从海上和空中袭击了塞浦路斯的北岸。分裂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对此毫无办法。

在希腊，这个时机好像正是军政府所等待的。几个小时后，

希腊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实行军事动员，要求全国各地的在乡军人回所属单位报到。但是，希腊的军人们7年来除了向政府要到最多的补贴外，根本没有能力对付外来的敌人，他们所有的本事都用来镇压国内民众了。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最初的24个小时内，希腊政府做了有限的尝试，假意向塞浦路斯派遣援军，最后无果而终。

在7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宣布，塞浦路斯的停火协议已经达成，并在下午生效。虽然会上没有提出感谢希腊的军队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希腊免去了陷入战争的危险。塞浦路斯的命运将由国际磋商来决定，随后的几周内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解决了上述问题。留下的问题就只有希腊军政府的问题了，这个独裁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最后的36个小时内彻底解散了。军方资历最深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与约安尼季斯划清界限，都把自己关在吉奇克斯总统的办公室里，以寻求一个能够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7月23日下午，希腊宣布军方统治结束了，文官政府将于第二天就职。欢腾的人群挤满了大街小巷，在雅典，所有的交通都停顿了。广场和周围的街道上都是人。他们挥动着国旗，唱着被禁的音乐家西奥多拉基斯创作的歌曲，手舞足蹈，喜气洋洋。在全国各地，独裁政府的各种标记、象征等都被推倒、拆毁，踩在了脚下。

随着夜幕的降临，一个新的口号开始在群众中酝酿传播——“他来了”。“他”指的是中右的民族激进联盟前领导人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在自愿流放巴黎之前，曾担任8年希腊总理。7月24日凌晨2点，欢呼的支持者去雅典机场迎接卡拉曼利斯。希腊向民主过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上校”们的统治结束了。

付出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这既包括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

也包括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8月中旬，日内瓦进行了两轮磋商，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都没有达成。在美国，理查德·尼克松于8月9日辞职。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基辛格负责，只是塞浦路斯的命运不是基辛格最关注的点。8月14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新一轮进攻，3天后就推进到可控制塞浦路斯岛37%的分界线上。又过了3天，第二次停火协议达成。几百年的民族杂居化为历史尘烟，因为数万名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在土耳其军队来之前就往南逃离了，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则背井离乡，往相反的方向跑了。这一次，1/4的塞浦路斯人迁徙到了其他地方，有数万人被杀，还有两万“失踪人员”的命运至今无人知晓。

40多年过去了，相关各方也没有就和平条款达成共识，更没有签署一个和平条约。从1974年8月起，一条地理线将塞浦路斯分开，但它并不是国际边界，而是土耳其军队在8月的征服行动中抵达的地方。40多年来，总有人在分析关于土耳其那次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简单的事实是，土耳其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确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行动的目标限于恢复桑普森政变之前的状态；而第二次行动，则在国际法上得不到解释。[\[27\]](#)

这就是民主回到希腊需要付出的代价。对希腊来说，1974年7月标志着偏离常规之路的结束，但也开启了更为痛苦的分裂时代，这种分裂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希腊语中的词汇“metapolitefsi”的意思是“政体的变革”，如今不仅用来指代当时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还用来表示始于1974年并延续了30多年的政治成熟和繁荣的全部时期。

[\[1\]](#)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331; Thomas Gallant, *Modern Greece: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2nd edn (London: Bloomsbury, 2016), 255.

[2]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351.

[3] David Close, *Greece since 1945: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2002), 52, 48.

[4] Stanley Mayes, *Makarios: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81), 39.

[5] Ioannis Stefanidis, *Stirring the Greek Nation: Political Culture, Irredent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Post-War Greece, 1945–1967* (Aldershot: Ashgate, 2007), 81, citing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 May 1950.

[6] Stefanidis, *Stirring*, 77–8; Evanthis Hatzivassiliou,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yprus, 1955–5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odern Greek Studies Yearbook supplement*, 1997), 14;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341; Stavros Panteli, *A New History of Cypru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nd The Hague: EastWest, 1984), 248–55.

[7] Robert Holland, *Britain and the Revolt in Cyprus, 1954–195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69 (citing Macmillan to Foreign Of.ce, 16 July 1955), 65; Hatzivassiliou, *Britain*, 32, citing Makarios.

[8] Holland, *Britain*, 76.

[9] Holland, *Britain*, 89–91, 127–31; Stefanidis, *Stirring*, 105.

[10] David French, *Fighting EOKA: Th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on Cyprus, 1955–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07.

[11] Holland, *Britain*, 184–5.

[12] Roderick Beaton, *George Seferis: Waiting for the Angel. A Biograph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58, citing Seferis's diary for 29 February 1960.

[13] Stefanidis, *Stirring*, 80, 174–6; James Edward Mi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History and Power, 1950–1974*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56–65; Susannah Verney, 'Greece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os Katsoudas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Gree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onel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253–70.

[14] Vrasidas Karalis, *A History of Greek Cinema*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12), 79–80; Achilleas Hadjikyriacou, *Masculinity and Gender in Greek Cinema, 1949–1967*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66–7; Maria Stassinopoulou, ‘Reality bites: A feature .lm history of Greece, 1950– 1963’ (Vienna: University of Vienna, Habilitationsschrift, 2000), 3.

[15] Dimitris Papanikolaou, *Singing Poet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Music in France and Greece* (London: Legenda, 2007), 84 (emphasis added).

[16] Giannis Ritsos, Ποιήματα [Poems], vol. 2 (Athens: Kedros, 1989–90), 59–72.

[17] Stan Draenos, Andreas Papandreou: *The Making of a Greek Democrat and Political Maverick* (London: I. B. Tauris, 2012), 133, citing the testimony of Robert Keeley.

[18]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356.

[19] G. Papadopoulos, Το Πιστεύω μας. [Our Creed], 7 vols (Athens, 1968–72), vol. 2, 80 (original emphases).

[20] Papadopoulos, Πιστεύω [Creed], vol. 1, 11, vol. 2, 171; Karen van Dyck, *Kassandra and the Censors: Greek Poetry since 196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17.

[21] Thanasis Valtinos, ‘The plaster cast’, trans. Theodora Vasils, in Willis Barnstone (ed.), *Eighteen Texts: Writings by Contemporary Greek Auth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3–9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1970).

[22] Kostis Kornetis, *Children of the Dictatorship: Student Resistanc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Long 1960s’ in Greec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13), 269–70.

[23] Kornetis, *Children*, 255, 270.

[24] C.M.Woodhou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ek Colonels* (London: Granada, 1985), 134.

[25] Kornetis, *Children*, 273–80.

[26] Woodhouse, *Rise and Fall*, 151–2.

[27] James Ker-Lindsay, *The Cyprus Proble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4–6.

第十一章
欧洲时代的到来
(1974—2004)

1974年以后，很多事情将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了。国家军队一直被当作控制国内的手段，现在它的这个作用废止了，好像是彻底废止了。军队的这个作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巴伐利亚人执政时期。1909年以来，军人用自己的力量反复地组建政府，推翻政府。现在，军方尝到了7年军事独裁统治完全失败后的苦果。从独裁政府向多元民主的转型，需要卡拉曼利斯的治国智慧和政治才能。因为哪怕军方再获得一点儿机会，军方中的不调和因素就会掀起另一场政变。的确，在转型民主的早期，希腊政府挫败了几次军方的阴谋。

近10年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在1974年11月17日举行，此时距军政府的垮台才刚刚过去4个月。第一次议会之所以在这一天举行，是因为它是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运动被镇压后的首个纪念日。一个新的政党顺利地赢得了选举，这个政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立，是从卡拉曼利斯在20世纪50—60年代领导的民族激进联盟改组而来的。新民主党的创立体现了其领导人的理想追求。卡拉曼利斯曾在巴黎流放10年，他心目中的榜样是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主义者。

这个新兴的中右政治力量在另一个方面也与前军政府截然不同，强烈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因为冷战而自动地站在美国的一边并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一去不复返了。卡拉曼利斯重返总理职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宣布希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这是释放公众对美国不满的一个措施，因为至少美国放纵了“上校”们的独裁专政，很多地区（直到今天还在）指责美国造成了塞浦路斯的灾难。卡拉曼利斯的另一个行动，是重新申请希腊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在政治上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由于上届独裁军政府的原因，希腊上一次的申请被欧洲经济共同体冻结了，所以在1975年再度启动了申请程

序。20世纪50年代，塞浦路斯冲突开始后，希腊倒向了美国，现在又从美国抽身，投向欧洲的怀抱，这一进程要在随后15年的时间里完成。

最重要的是，希腊恢复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使这个党赶上了11月的选举。从1947年起，希腊政府宣布希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希腊共产党上一次参加议会选举还是在1936年1月。这一次，希腊共产党的得票率较1936年有所增加，但因选举制度的变化，议席数较之前有所下降。现在，它不像1936年那样具有制衡不同党派之间力量的作用了。新的议会中，主要的反对派还是中间联盟党，它这次是由乔治斯·马夫罗斯领导的，他曾是军政府时期前的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时期的中尉之一。很快，中间联盟党就在另一个新成立的党面前黯然失色。这个党的成立时间只比共产党解禁复出的时间早一点儿，也是在1974年走上政治舞台的，不过在3年后就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从1981年开始主导希腊的政坛，而且长达30年之久。

这个党就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创立并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以下简称“泛希社运”），其希腊语缩写为PASOK。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朋友和敌人的眼里，这位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激进左翼观点让政府和外交界感到恐惧。军政府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此成为反对独裁专制政府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在形势不明朗的1974年，属于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泛希社运在那年9月3日发布了成立宣言，它宣称“这个新政党的成立”，旨在表达“普通希腊人的愿望和需求，开展属于农民、工匠、雇员、雇主和我们勇敢的、进步的青年的运动”。它的宗旨是创建“一个没有外国控制和干涉的政府，一个不受经济寡头操控和影响的政府”。[\[1\]](#)泛希社运成立之初就综合了国家主权完整的大众诉求，提出了从前只

有共产党建议过的社会改革议程。根据泛希社运的主张，希腊现在应该在不结盟国家的世界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应加入冷战时期的任何一个阵营。

最重要的是，这个新政党的一切都是“新的”。泛希社运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的标志是暗绿的半个太阳，上面有绿色的光线，其寓意是“升起”，尽管也可被理解为“落下”。泛希社运在1981年上台，上台后不久，一位历史和政治学家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其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泛希社运是……中间联盟的浪子，而不是左派的私生子。”^[2]但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决定未来政体的变革的两个政治力量都不是新的，不论是泛希社运，还是新民主党，它们都是其各自极富魅力的领导人的投射，而两党的领导人的事业都是在军政府前的那个时代开创的。

如此说来，政体的变革代表着更宽范围的转型，而不仅限于政治体系的改革，虽然政治体系的改革本身就是巨大的。选举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卡拉曼利斯在12月8日就是否保留君主制度举行全民公投。在另一个是否与军政府前的历史划清界限的问题方面，卡拉曼利斯的中右政府则不置可否。所以，是否保留君主制度的全民公投可能是希腊历史上人民能够对政治问题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唯一一次机会。77%的选民投票，近70%的选票支持建立共和国。第二年，希腊采用了新的共和宪法。从那以后，希腊的官方名字就成了“希腊共和国”。这个宪法直到今天还有效，只是后来进行了几次修正。一年后，经过充分的审议和公众讨论，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法案要求教育以及多数社会领域（除了教会和法律）都用通俗希腊语代替“净化语”。这一决策终结了20世纪初期被法定的希腊书面语的不同形式的对立。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让希腊分裂半个世纪之久的不同裂痕终于快速地消失

了。

1974年以来发生的另一个变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影响至今。这个变革发生在希腊的国土之外，不是希腊政府及其机构能控制的。它就是土耳其军队造成的塞浦路斯的分裂。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实际上管辖的领土不足塞浦路斯岛屿面积的2/3。1960年的宪法依然有效，塞浦路斯有自己的国旗，希腊语和土耳其语都是其官方语言。从国际法上看，除了两个英国军事基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拥有管辖塞浦路斯所有地区的权力。但是1974年以来的现实是，南部塞浦路斯成了第二个都是希腊族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想到德国和奥地利）很少出现，每个人都会考虑未来该怎么办。

1974年以后，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在国际支持下，重建自己千疮百孔的家园，重振自己处于崩溃的经济，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一时期，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两个希腊族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没有回到希腊军政府与马卡里奥斯领导下的民主塞浦路斯之间相互仇视的境地。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国防上，希腊历届政府都给其姊妹国家塞浦路斯坚定的支持。不过，尽管塞浦路斯在很多方面都学习希腊，比如，国歌、国庆、教育和政府中使用的希腊语的形式等，但1974年以后，双方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开始出现差异。比如，“Helladic”这个词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的使用率都越来越高，是指希腊国家和公民，从而与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机构和公民区分开来；这个词与“Hellenic”有着微妙的不同，尽管两个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是一样的希腊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974年以后的希腊民族国家的故事，可能主要是一个希腊国家的故事，但永远不会只是希腊国家的故事。

10年“变革”之路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社运在1981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得到了近50%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了近60%的席位。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基于一个词——“变革”。10年的时间里的确发生了很多变革，尤其是关于执政党及其魅力四射的领导人的变革。

这是希腊人第一次明确地选举出的社会主义政府，也是自2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完全通过民主进程，而不是通过来自军队、国王和外国列强或实际的或怀疑的暴力、暴力威胁以及干涉实现的政府变革。历史还会证明，从一届政府到下一届政府，它将是很多有秩序的变革中的第一个，这个模式在本书写作时还没有被打破。

泛希社运带来的最激进的、影响最深远的改革都是其在执政最初几年启动的。所有的改革都是国内方面的，可以笼统地归属于社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早就应该解决的，是政府对二战期间作为民族抵抗力量奋勇抗击侵略者的所有战士的合法性承认。将近40年里，共产党和其他的左派支持者在抵抗轴心国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得到公开的认可。历史学家再也不用被迫绕过这个禁忌话题。那些参加过二战的人的回忆录开始出版。作家曾经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现在则开始搜寻和挖掘自己以及集体的记忆，开始接受那些直到那时都一直被埋没的人们的经历。资深的左派人士不仅不再受到迫害、不再被边缘化，而且还可以领到生活津贴。在20世纪50—60年代，“反共产党政府”给前通敌分子提供这份津贴，却没有给左派人士提供。那些在内战期间去苏联避难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生平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回到自

己的国家了。已经被耽误很久的治愈过程开始了，直到泛希社运第二届政府在1989年下台后不久才完成。

其他立法方面的变革与婚姻家庭法有关。通奸不再是刑事犯罪。离婚（虽然天主教国家从来没有宣布过不合法）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而不必像从前那样要证明一方有通奸的过错，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尽管教会反对，但是国家推行了不采用宗教形式的公证结婚。妇女权利和新的性别平等标准第一次写入法律法规。在泛希社运执政的第一个4年任期内，生活津贴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预算几乎上升了50%。1983年，希腊建立了全国医保体系。新的大学和学院在希腊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建起来。同时，原先的大学管理模式出现改革，在某些程度上向美国的教育体系靠拢，那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非常熟悉的，因为他曾在美国当过经济学教授。

泛希社运还改变了政府运转的方式。从1982年开始，高级别公务员的任命改为政治任命。政府日常的管理运作变得更为政治化，这与早期处于不稳定或极端状态下的政府，如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的运作模式是不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评论家注意到，政府之间更替时，再也不需要有能力的资深公务员来管理权力的交接，或者就政策的实施提供咨询建议。^[3]希腊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党，这对一直以来饱受批评的传统赞助体系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议会的个体议员不再需要为其选民提供特权，但是党要为其党员提供特权。传统的政治赞助人和被赞助人机制往往意味着“腐败”，泛希社运主导政坛的结果，远不是要废除那个被继承下来的体系，而是将其重塑进国家政治体制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不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而是

由政府扩张带来的。其间，政府的作用一直被称为“寄生虫”。在20世纪80年代，泛希社运政府的公务员增长幅度比前任新民主党政府要大，但是在1991年之前的20年里，政府公务员的数量翻了一番。泛希社运在福利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受到了更尖锐的批评。根据一个刻薄的说法，中左政府实施的传统的“量入为出”政策，在希腊那里变成了“出而不入”，因为税收体系本身已经变成了历届政府（不只是泛希社运）“买”选票的途径之一。^[4]

尽管20世纪80—90年代的希腊出现了变革，但不论是政府，还是被治理的人，其对税收和国家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19世纪20年代末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奥托国王的巴伐利亚人顾问，对此都有完美的认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和泛希社运与那些早期的先行者一样，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致力于带领国家进入那个时候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样至少从表面上看，与20世纪30年代的先行者一样，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希腊刚建立国家后的情况一样，将源自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实践在政体的变革的时期内化为有着截然不同传统的、民族的态度和行为，会再一次产生断裂。人们常说，那些态度是奥斯曼人统治几百年的遗产，事实是，它们是在希腊这个现代国家诞生时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而现代希腊从降生伊始就被当作摇钱树，虽然没有被掠夺，但一直被榨取，当那些压迫者离开时，希腊已经身无长物了。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那种看法到底有多大的变化，或者今天是否发生了变化，都还没有定论。

吊诡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推动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元素之一，同时也是对生活水平以及国家面貌影响最大的要素之一，既不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也不是泛希社运，而是双方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

体。多亏卡拉曼利斯的个人努力和积极推动，希腊在1981年1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10个成员国。卡拉曼利斯的推动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担任希腊总理期间以及1974年再次担任总理以后。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0个月后，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上台。泛希社运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变革”的议程对于依赖外国力量，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余地，不管是美国（1974年后，美国对希腊再也不复之前的影响力），还是新兴的欧洲超国家组织。但是，希腊的“欧洲怀疑论”在1981年10月的选举中达到顶峰，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极不情愿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4年后，泛希社运政府在1985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突然发现，加入这个欧洲组织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希腊经济步履维艰，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里面最穷的成员国，希腊是净受益国，而且受益远远超出预料。在实现1992年欧洲单一市场之前的日子里，欧洲经济共同体划拨了一大笔预算，将钱从最富裕的国家转移到最贫困的国家。这简直就是希腊自己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放大版。通过“援助框架”和“稳定计划机制”，大量的钱进入希腊，同时，共同农业政策又为希腊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希腊的农民很高兴。希腊终于愿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了。

在第二个任期内，泛希社运几乎是主动地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西方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希腊一开始对欧洲有着本能的恐惧，但是后来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欧洲一体化。由于欧洲资金的注入，随着对欧洲态度的变化，希腊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更像西方。1968年以后，希腊电影院让位于电视，再也没有重塑往日的辉煌。现在，人们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特别是1990年第一批商业频道上线之后。传统的咖啡屋只对男人开放，上了年纪的居民

去那里下棋，喝咖啡，聊一些当日报纸上的新闻八卦。现在，传统的咖啡屋被时髦酒吧替代，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那里聚会。以前，传统小餐馆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饭菜，定价受到政府控制，现在逐渐地与提供国际餐饮的西餐厅竞争了。古老的、甚至有点儿太过热情的希腊待客之道变得更加令人舒适、轻松。客人可能会被希腊主人带到一家餐馆就餐（当然客人是永远不需要付钱的），而不是在主人家里吃一大桌子菜。在西欧或北美游客的眼里，希腊变得不那么有“异国情调”了，变得更“欧洲化”了。对多数希腊人来说，生活变得比以前更舒服了。

不久，希腊的变革扩展到基础设施上。20世纪80年代末，在欧洲项目资助下启动的工程经过15年的实施陆续完工，其中有高速公路（将山区中的交通时间从一整天减少到几个小时），大大扩建的地铁系统，雅典的新机场以及2004年开通的将近3公里长、横跨在科林斯海湾入口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

尽管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在政府的原计划之内，但这可能是希腊外交政策方面最小的“变化”。在对外政策上，泛希社运被描述为“一个拥有西方思维方式，但内在属于第三世界的政党”。^[5]在早期，泛希社运对外的口号和表达方式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它的行动通常表现得更加务实，较为紧密跟随西方的步调，这就造成它的语言与行动不相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政策的实际变革就比很多观察家期待的少得多。

泛希社运在第一次选举获胜的时候，其上一任政府已经重新加入了北约。希腊曾在1974年退出北约，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北约不能阻止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但是希腊只有通过军事联盟成员国的身份，才能保持与实力更强大、武器装备更先进的邻邦在比例上差不多的武装力量。北约的调停看起来仍然是防止同一个联盟的成员国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希腊势单力薄，处于

弱势，在冷战期间，其在战略重要性方面比不上土耳其。尽管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不是1974年后的希腊民主政府的错，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那场战争是由希腊军政府（而不是土耳其）发起的，其目的是推翻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政府，强制推行希腊的大一统。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一个因素使得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紧张。1973年年底，人们在希腊北部的萨索斯岛发现了一个油田。那年秋天，赎罪日战争造成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始产生影响。面临石油短缺对整个西方经济的威胁，土耳其勘探船在爱琴海国际水域的大陆架之下进行探测。这就是至今都没解决的争端的开始，争端的内容是希腊对爱琴海的领海和领空的管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土耳其政府再一次试图修改《国民公约》，理由是一战结束后起草的这份公约没有能预见后来出现的形势。对此，泛希社运的反应要比希腊上一任政府强烈得多。的确，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措辞更加咄咄逼人。1976年夏天，当一艘土耳其考察船在爱琴海进行资源勘探的时候，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作为反对党领袖大声疾呼，要求卡拉曼利斯政府击沉那条船。自从泛希社运1981年上台之后，没有人会说希腊左派在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态度“软弱”，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最后，希腊社会生活中有更黑暗的一面，这让政府承诺的“变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就是国内的恐怖主义。1974年以后，在极左阵营中，因为反对独裁统治，希腊形成了一大批小的、零散的团体，其中有些团体源自1973年11月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起义。为了抵抗“上校”独裁专制，令人尊敬的教授和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自制了炸弹。今天被称为“恐怖主义”的那些手段，在反抗极权政府的人们中间得到大力提倡，也得到一些国外支持者的首肯。在军政府时期，这些行为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在希腊

转向文官治理以后，一些小团体仍然利用秘密结社、炸弹攻击和定点暗杀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些恐怖主义团体中，最臭名远扬的、持续时间最久的是“11月17日革命组织”，简称为“17N”，名字中的日期是为了纪念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起义被镇压的那个历史日子。17N最终于2002年被希腊警方消灭，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原来是曾经在大学读数学专业的大学生，从1971年就过着秘密的地下生活，被警方抓住的时候，已经58岁了。

17N的活动开始于1975年，其成员谋杀了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站的站长。那个时候，这个事件被看作到处弥漫的反美主义的极端体现，此前一年，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也在反美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被谋杀。被谋杀的人还有警官，他们要么参加过军政府统治时期的镇压活动，要么参加过最近的强制公共安全秩序活动。1983年，也就是泛希社运第一个任期刚过一半的时候，17N加快了行动。共有23个人在17N的枪口下丧命，其中包括某知名报纸的老板、几位企业家、议会议员以及美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官。

面对将近30年的小规模但致命的恐怖活动，历届希腊政府都没能制止，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责，或者被认为无能，或者被认为合谋，或者被认为兼而有之。17N这个组织宣称的思想可归纳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反极权主义”。^[6]这类组织虽然有成为群众运动先锋的野心，但是从来就没有获得任何机会，不过，希腊公众也有这样的想法。2017年11月，希腊政府让17N的一名头目获得假释，这引发了国际批评，但是监狱外的一些支持者表示欢迎。尽管17N已成为过去，但政治暴力并没有从希腊消失。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听到类似观点，有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仍然是潜在的威胁。泛希社运执政近20年，给希腊带来了“变革”，而17N的历史就是其案例之一。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什么变革都没有泛希社运本身行政管理的变革激进。在其第二个任期，从1985年开始，泛希社运的慷慨大度导致了普遍的、想当然的权力意识的增长。同时，政府入不敷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贷款条件非常严格。有一段时间，这一切极大地降低了希腊工资的价值。人们对执政党及其承诺产生了幻灭情绪，随后的几年里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很快，这种想当然的权力意识也蔓延到各级党组织中，甚至一直到最高层。欺诈和滥用公共资金的案件常常出现。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同时也是一家支持政府的媒体的老板，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其中2亿多美元的资金是他从他供职的银行贪污和盗用来的，这一丑闻的影响甚至波及希腊之外。这个被指控的银行家叫乔治·科斯科塔斯，他在美国的临时避难处声称，自己曾向希腊政府高官行贿巨额钱财。1989年夏天，当希腊准备议会选举时，有几位部长在愤愤不平中被迫离职或辞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本人也被指控，直到1992年在最高法院中以微弱优势被宣判无罪。

科斯科塔斯丑闻可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其与1988年和1989年前6个月发生的其他事情交织在一起，共同注定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第三次连任总理竞选的失败。政府部门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调查所披露出来的内幕，一下子让人想到军政府之前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政府庇护”。我们再看看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本人吧。选举开始前不久，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英国做了手术。在短时间内物色一位新的领导人的任务，一下子让这个党瘫痪了，因为此前它从来没有独立地、不在其富有人格感召力的领导人的领导下运行过。不过，现在领导人的人格感召力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闹出了绯闻，这早在1988年就尽人皆知，绯闻的另一位

主角是迪米特拉·利亚尼，她是一名空姐，年龄只有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一半。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态度越来越坚决，表示要与其美国妻子离婚，然后娶利亚尼为妻。他们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关于婚变在多大程度上损毁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名声，这很难说。常言道，思想传统的男性投票者看重和认可国家领导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雄性气质。但是另一方面，离了婚的玛格丽特·帕潘德里欧是希腊妇女运动的捍卫者。她本人、他们两人的孩子以及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人并不赞同离婚这件事。

将近10年的“变革”之路在1989年6月18日结束，新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胜出，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得到组建政府所必需的足够的席位。

冲突中的身份认同

当上述一切发生的时候，这个巴尔干小国政党及政党领导人的命运（泛希社运下台事件甚至比塞浦路斯事变的影响还要小）被其他地方更重大的进展淹没了。那些进展足以改变欧洲地缘政治的地图，不可逆转地重塑整个世界之中的国家关系。在欢欣鼓舞的日子里，西方严肃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历史的终结”。

泛希社运在1989年6月的败选恰好与波兰的第二轮投票在同一天。波兰在第二轮投票以后，开启了和平转型。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又一个地发生巨变，终于将分隔欧洲大陆的“铁幕”拉下。而希腊的政权统治则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合作，比如，曾经被政府禁止的包括希腊共产党在内的极左派与中右的新民主党联起手来，挤走了泛希社运，这样的党派联合在

希腊以前的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那年11月，希腊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这正巧碰到柏林墙的倒塌。这一次，希腊由多个党派组成的联合大政府，在极度不稳定的权力平衡中走过了3个月。1990年4月，希腊举行了第三次选举，新民主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多数选票，组建了新政府，在随后的3年里执政。

1989—1993年，希腊三任政府在执政期间最值得纪念的不是它们做了哪些事，而是这几个政权在更迭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序性。这种井然有序是民主制度最终完全嵌入希腊政治生活最强有力的证据。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首脑是70多岁的康斯坦提诺斯·米佐塔基斯，他是维尼泽洛斯家族的后裔。执政期间，米佐塔基斯政府在希腊实施了“新自由主义”议程，这与10年前美国罗纳德·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采取的执政措施别无二致，但也为多年后的财政紧缩政策和“过苦日子”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些国内政治的变动与冷战结束造成的影响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1989年以后，希腊人与所有人一样，将不得不面对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他们是怎样做的，以及他们在变革中有着怎样的新压力和焦虑，将是20世纪最后10年以及以后的岁月里希腊民族国家建设故事的主线。

最重要以及最明显的是，这个新现实给希腊和希腊人带来了无限机会。20世纪30年代以来，希腊第一次不再与北面的巴尔干腹地隔绝。当其他的巴尔干国家发现自己被迫突然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时，希腊已经是该地区整体融入西方体系的唯一一个国家了。如果着眼于历史，不受“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的扰乱，那么希腊人就可以看到东正教联邦复兴的可能性，因为此时的形势与18世纪下半叶完全一样。希腊人和他们的语言及其深深嵌入的体制，将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发挥变革性的作用，并且这一次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

成熟民主国家的自我利益之上。几乎整整两个世纪之前，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曾梦想过这种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前景从来没有这么好。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前景已经慢慢地、适度地在这些年实现了。希腊的公司在其北部的很多邻邦做生意，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希腊人的存在和发达禁不住让人（有限度地）想到18世纪那一地区的法纳尔阶层的崛起。如果不是受不久后就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欧盟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合作进程无疑会进一步加速。

但是希腊和希腊人自1989年以来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期待的要小得多。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甚嚣尘上。希腊幸免于10年中让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真刀实枪的战争，但是并不缺乏推动战争的激情和恐惧。

这是因为冷战结束造成了第二个影响，它使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种族”对立以及强化对立的更深层次的宗教分歧再次回归。在这些冲突中，有一个冲突被集权统治冻结了半个世纪，它就是马其顿地区的争夺。这一争夺在20世纪的前10年达到顶峰，直到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才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告一段落。后来，马其顿地区被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胸怀抱负的国家瓜分。但不可避免的是，这并未解决问题，事情远没有完结。

有很多“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说斯拉夫语的人在1912年后变成希腊王国的臣民）在20世纪40年代的希腊内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后来，加入人数大大减少。由于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这一群体的规模很难得到

可靠的推测。可能，该地区更多的希腊人在家里说的是斯拉夫语，但是在外边不愿意被看作“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几十年里，尽管希腊官方对这一群体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没有其他希腊人更忠诚于国家。在国界的另一边，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并位于其最南端的那片国土，从1943年后变成了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成为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只要南斯拉夫一直是完整的、独立的联邦，那么这就纯粹是南斯拉夫人的内部问题。可是，1991年9月8日，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就像几个月前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样，结果是赞成完全的独立。于是，新的马其顿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和联合国，以得到国际的承认。

希腊和全世界希腊族的反应是真切的、极端的。国外的观察家，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外国使节以及全球各地的媒体对希腊方面的强烈反应一再表示难以理解。这个新的国家身处内陆腹地，积贫积弱，没有军队，其人口只有希腊的1/5，还分为两派，一是占多数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二是占少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它能有什么威胁呢？[7]

那个时候，具有国际思维的希腊评论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届希腊政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在其后的4年里，希腊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四面楚歌。在巴尔干半岛重新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前景，好像就这样无端地黯然消逝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很难说是政府和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引导大众舆论，还是被大众舆论引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也经常出现。1992年的前几个月，在雅典和萨洛尼卡，大量民众涌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报社的立场强硬坚定，一点儿都不妥协。抗议不只发生在希腊。在澳大利亚，有几个城市里发生了希腊移民和南斯拉夫移民之间的冲突。[8]1996年，英国

一家学术出版商取消了一份根据希腊北部田野考察做出的严肃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合同，就是因为害怕自己在希腊的出版业务受到商业上的报复，作者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

希腊人的愤怒之所以飙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不是因为希腊北边的共和国要求获得独立，而是因为其国名有问题。一个国家所要声称使用的国名，却被希腊人看作希腊历史和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希腊的一个地区的名字是“马其顿”），希腊人把它视为生存威胁。1992年2月，米佐塔基斯政府向它的公众承诺：“政府不允许那个新独立的国家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否则就不予承认该国。”这就使自身陷入了困境，无异于将已经疯传的、虽然读起来笨拙但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句口号是“不准用马其顿这个名字及其派生的词汇”。^[9]如果你那时抵达雅典机场，那么迎接你的是佩戴着徽章的地勤人员，徽章上面用英语写着“马其顿是希腊人的，请读历史”。

正在这个时候，年高德劭的希腊考古学家马诺利斯·安得罗尼克斯去世了。1992年4月1日，他的葬礼在萨洛尼卡举行。这为希腊人提供了在这个国名问题上情感总爆发的机会，因为早在1977年，安得罗尼克斯在希腊北部一个叫韦尔吉纳的村庄发现了古代马其顿王朝的皇家陵墓，并挖掘出了这个古代王国消失已久的都城遗址，在其中一个陵墓中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二世火化后的部分遗骸。有些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些则深信不疑。不过，在1992年以前，这一发现已经被广为接受。自发地送安得罗尼克斯最后一程的群众就像在哀悼自己的去世的君王那样。腓力二世国王遗骸的现身，而且是现身于无可争议的希腊国土上，为群众提供了穿越历史迷雾的真切可感的脉络。安得罗尼克斯的发现看起来是一个能带来慰藉的、可视的证据，说明“马其顿是希腊人的”。不管是从名字

上说，还是从地点上说，抑或是兼而有之，马其顿都是希腊的。

[10]

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经过艰难磋商，各方围绕国名问题终于在联合国达成了妥协。新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将采用一个临时的名字，以后再寻求更圆满的解决方案，这个名字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FYROM。希腊以前拒绝接受任何包括“马其顿”的国名，现在也勉强同意了。几个月以后，由基罗·格利戈罗夫领导的新共和国的政府也勉强同意了。于是，在此后的25年中，国名问题就这样僵持不下，多数国家默认希腊北边邻邦国家的名字是“马其顿”。但希腊不认可，该国简称“FYROM”在当时仍然是强制使用的。有些希腊政客甚至不允许使用全名，好像这个简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词语，而且和人们争论不休的“马其顿”没有任何关系。在希腊的日常话语中以及通往边界的路标上，希腊继续用首都斯科普里这个名字来指代它的邻邦。在希腊语中，“马其顿”的名字只能用来表示希腊北部的省份。在英语中，在大西洋的两岸，马其顿作为一个国名现在已经普及，但是这仍然会让多数希腊人耿耿于怀。就国名问题，双方都有所妥协，希腊和马其顿两国的总理于2018年6月17日在距离卡斯托利亚镇不远的边界上签署了协议，各自的议会在2019年年初批准了该协议。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称谓将正式变成北马其顿共和国，或简称为北马其顿。

早在1993年，由于向“FYROM”的国名妥协，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下台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外交部部长安东尼斯·萨马拉斯于上一年被政府解职。作为回应，他自己发起成立了对立的政党——政治之春，提出了明确的民族主义的议程。仅仅两名执政党议员的叛变就结束了政府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地位。泛希社运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重新掌

权，但是在关于邻邦国名的问题上，他们很快就决定采取与萨马拉斯的民族主义更为接近的政策，与前任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

正如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看到的，希腊被西方盟友遗弃，所以就在1994年2月采取单方面行动。对FYROM的贸易禁运损害了两国的经济，可能也加剧了那个新兴国家里种族关系的紧张局势，从而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引发了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和占少数的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希腊的措施对于解决国名问题无济于事，特别是多数外国人认为，国名问题纯属小事，根本不值一提。此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进行着惨烈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事。能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也就是希腊和FYROM在1995年达成的临时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希腊同意解除制裁，承认其北方邻邦的暂用国名，由此换来对方宪法和国旗的修改。

这是重要的让步。因为，即便国际社会一直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FYROM争取独立最初阶段的行动恰恰是民族主义激情所激发起来的，这一激情弥漫在整个前南斯拉夫。FYROM国旗最早的样式就是基于旭日或韦尔吉纳星的图案来设计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个国旗图案一直让大众联想起腓力二世国王，因为它醒目地显示了安得罗尼克斯发掘出的财宝的装饰形式。在初期的版本中，新共和国的宪法将它自己的在希腊的马其顿子民称为“少数族裔”。它狂妄地论及将领土扩张到大海之边，将萨洛尼卡纳入版图之内。这听起来很不合情理，且对邻里关系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如果其第一任领导人格利戈罗夫后来在雅典出版的回忆录可信的话，那么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议程或雄心与19世纪后半期主导希腊理论思维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实现了1/3马其顿人的自由……在马其顿的其他流散之地，我们还有兄弟，我们还没来得及解决他们的问

题”。[\[11\]](#)

但是即便此危机在1995年得到缓解，希腊的国际声望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丧失了实现其在巴尔干半岛扩大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潜力。

冷战结束造成的另一个变化更加深远，也更加不可逆转。这就是向希腊移民的问题。历史上，希腊一直在输出过剩人口，除了1912年和20世纪20年代初，因为在这些年，大量的难民涌进希腊。移民希腊的人都是东正教徒，大部分人说希腊语。现在，随着北部边境的开通和对俄罗斯公民旅行限制的放松，希腊移民潮日趋稳定。一开始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很多移民从“种族”上看是希腊人，要么来自阿尔巴尼亚，要么来自俄罗斯的黑海腹地。这些最后来的移民往往被轻蔑地统称为“俄罗斯庞蒂人”，他们说的是一种与标准希腊语完全不同的方言，或者多半说的根本不是希腊语。他们的先祖于两个世纪前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被吸引到俄国定居。阿尔巴尼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处于恩维尔·霍查的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甚至都不与苏联建立联盟。二战结束的时候，有不少家庭被活活拆散。几十年后，亲人再度团聚，其间悲喜，一言难尽。[\[12\]](#)

不久，翻山越岭进入希腊西北部的就不只是希腊“族裔”的人了。当时，阿尔巴尼亚非常穷，这让希腊在一夜之间成为移民的热点。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移民大多是阿尔巴尼亚人。很快，希腊的移民服务机构就招架不住了。很可能大多数移民在希腊从事非法工作。希腊的犯罪率上升，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抢劫增多。尽管那些关于案件的推测并非来自警方，但是新闻媒体和每日要闻依然一如既往地责难阿尔巴尼亚人。不久后，有些移民从更远的地方来了，比如，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1996年的一个移民报告提及波

兰人、菲律宾人、埃及人和其他非洲人，并推测非法移民人数占希腊总人口的5%~7%。[\[13\]](#)希腊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成为历史上的快速变为多元文化的国家。

同一时期影响世界很多地区的另一个发展，是宗教作为身份认同决定性因素的回归。在东欧，这一回归特别明显，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前，那里的东正教传统非常强大。在希腊，多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拥有政治左派相关的背景，开始呼吁人们“重新发现那个被遗忘的但是真实存在的东正教传统”。这个运动“是对希腊东正教文明精神遗产的真正认识，而不仅仅是宗教的复兴，因为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14\]](#)这个知识潮流从来没有因其倡导者而为人所称道，只是被笼统地称为“新正统神学”，但是它已经和宗教复兴实践的其他可看到的现象齐头并进了。这些现象包括在希腊、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澳大利亚那些更远的地方，去教堂的人逐渐增多，新的东正教教堂得到资助和建设。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阿陀斯山东正教修道院自治社区的变革。那是东正教的圣山，在近几十年里出现了显著的复苏。不少活力焕发且往往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僧侣加入其中。[\[15\]](#)

克里斯托斯·吉安纳拉斯是学术素养很高的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提出了希腊社会和公民生活所具有的必要的拜占庭基督教底色和本质，期望将墨守成规的来自异端西方的思想和实践从希腊同胞的身上剥离出去。科斯塔斯·祖拉里斯以更加政治化的方式，极力在希腊历史的所有阶段寻找这种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本质”的希腊生活方式。祖拉里斯曾是一名共产党人，也是一名作家，但是他在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政府任内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代表的是联合政府中的另一个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在马其顿问题上，祖拉里斯态度强硬，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这个事实显示了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之间的不稳定的共

存，因为FYROM的大多数东正教人口从逻辑上都属于东/西方分隔线的同一个方面，这个分隔线因为新正统神学的兴起而再度凸显出来。

尽管从来没有像邻邦前南斯拉夫的冲突那样演化升级为暴力行动，但是这些紧张形势和身份认同的交错碰撞在希腊一直很强烈，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进入了新世纪。有时候，它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场。比如，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公众一般站在塞尔维亚人的一边，有时候态度还很坚定。这就使得希腊处于西方世界的口诛笔伐之中。原因并不难解释。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有着同样的东正教遗产，他们都是在对统治了自己几百年的奥斯曼人的憎恶中建立了现代身份认同。在南斯拉夫成立以前的岁月里，希腊与塞尔维亚并肩作战，抵抗共同的压迫者。（那个时候，塞尔维亚拥有FYROM的国土，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是身份认同的交错碰撞之一。）

南斯拉夫内战中最后的战争是1998年和1999年关于科索沃省的战争。当时，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多数人宣称要从只剩下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的联盟中独立出来。与此前大部分冲突不同的是，这次冲突遭到了来自国外的、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力量的干涉。1999年3—6月，北约的轰炸机袭击了塞尔维亚。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希腊被迫宣称支持这次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派兵参与。同时，希腊大量民众涌向城市街头，进行反抗示威，曾一度突破警戒线，侵入英国驻希腊大使馆。大使后来回忆，这次冲突之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因为大使馆的门房是一位克里特人，他警告那些闹事者，他们要抢掠的这个房子曾经属于伟大的维尼泽洛斯。^[16]

公众反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行为得到了上一年当选的希腊大主教和雅典主教的支持。克里斯托杜洛大主教在他的10年任期

内，为教会重返希腊公众生活的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来不惧怕引发论辩，是一位激情似火的演说家，能很快地点燃群众的情绪。在某些方面，他还是一位现代技术的使用者，比如，第一次系统利用社交媒体，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教会的慈善工作。他支持新正统神学运动，深度怀疑全球化，坚持希腊东正教历史的特殊性。这一观点使他与当时的希腊政府处于冲突之中，因为政府正在努力强化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当时，所有希腊公民的身份证上都需要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2000年，泛希社运政府决定将宗教标识从身份证上去除，从而符合欧盟其他国家的惯例。对此，克里斯托杜洛大主教和其他主教再一次鼓动公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抗争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呼吁在身份证上恢复宗教信仰信息的请愿书，获得了300多万个签名，签名人数接近希腊成年人口的1/2。

最后，希腊政府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身份证事件趋于平息，教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要求，因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在希腊得到彻底讨论，其造成的反响还没有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身份证这个案例上，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正如在希腊自治教会创立的19世纪30年代时，人们第一次所做的那样，希腊人会再一次问自己，怎样才算是希腊人？是什么界定了希腊人的身份？是宗教，民族，古代遗产（正如关于FYROM的名字争论所显示的），还是所在国家的世俗体制？

冷战结束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和希腊国家一样古老的问题正在寻找新的表达形式，但并不一定有答案。

欧洲好公民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死于1996年6月23日。6个月前，他病重躺在雅典奥纳西斯心血管医院的时候，他的党选举了一位与他完全不同的人继任总理，并在此后非常勉强地选举此人担任党的领导人。新总理是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曾在德国和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与前任一样，西米蒂斯在成为政客以前一直在学术界工作，不过两者的共同之处也仅限于此。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非凡的个性总能激发人们强烈的热情，相比起来，西米蒂斯则沉稳安静，不事张扬，为人谦和，几乎缺乏自信，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不善社交的隐居之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总是雄辩滔滔，言永远大于行，而西米蒂斯则默默地采取行动，敏于行而讷于言，慢慢地改变着希腊政治以及希腊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后来，人们把西米蒂斯描述为“希腊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理之一”。^[17]他还是连续担任希腊总理时间最长的人，比卡拉曼利斯（1955—1963年）以及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1981—1989年）的任期略长。西米蒂斯的支持者和政治圈的人一直到今天还这样评价他：“他的执政理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现代化’。”他执政的措施就是今天所说的“专家治国”。他把新的专业人才纳入他的顶层团队之中，让他们成为高水平的顾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尼科斯·塞梅利斯，他在1996年成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一直尽心尽力地辅佐西米蒂斯。塞梅利斯精力充沛，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撰写历史巨著，生动形象地反映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统治期间的希腊社会生活，比官方描写得更加细腻。在基础设施建设、退休金改革、信息技术应用和行政管理等方面，西米蒂斯邀请学术专家提供建议。并不是所有专家的建议在政策上都能得到落实。2001年，专家就提出了养老金改革的建议，但当时迫于政治压力没有实施，如果当时能落

实，那么2010年债务危机后，养老金大幅削减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据说，西米蒂斯的“技术官僚”统治“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希腊选民的支持”。^[18]但是，1996年和2000年的连续两次选举胜利证明，他所领导的泛希社运至少与10多年前一样受欢迎，那时的泛希社运以民粹主义起家，还未受到后期不能兑现执政承诺的影响。反对西米蒂斯“现代化”执政理念的最大的声音来自泛希社运党内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追随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其为榜样，但对西米蒂斯的总理权威来说，这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西米蒂斯2004年辞职以后，这个派别就将那些“现代化推动者”从高位赶了下来。政府政策的实施掌握在如此少的可信任的顾问手里，这个事实本身就被批评为执政的一个弱点，当然这个弱点并不只限于西米蒂斯的政府。^[19]

“现代化”项目很快就围绕着两个高层次的、相互交叉的目标进行整合。这两个目标都很吸引眼球，可以在很广的领域动员民众并得到广泛的支持，甚至超越了党派政治。一个目标是举办2004年奥运会，另一个目标是加入欧元区。西米蒂斯政府上任一年后，就在1997年9月成功申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欧元项目上，希腊一开始受到欧盟的冷遇，但其加入欧元区的申请还是在最后一刻被接受了，而且在2001年年初进入了第三阶段。最终在一年后欧元正式发行时，希腊成功加入了欧元区。

这些成绩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们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连锁性的反应。奥运会成为实施一系列宏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焦点，建设地点不仅包括雅典及其周边，还包括全国的各个地方。虽然在奥运会举办前的几年里，外国媒体对希腊表达了很深的怀疑，但希腊所有的建设目标都实现了，尽管有些工程是在最后一刻完工的。除了体育设施，自20世纪80年代末

以来，利用欧洲资金启动的多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完工了。同时，雅典卫城脚下大片曾经忙乱、肮脏的街道的景致得到很大的改观，质量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其他城镇，这些公共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民营企业得到同步完善，全国各地的宾馆、餐馆等都进行了翻新整修，扩大了规模。

至于加入欧元区，单一货币成员国的鼓励措施就足以在那些年给希腊带来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或者说，至少那时看起来是一个经济奇迹。

1994—2003年，希腊GDP增长强劲，从1997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根据一组数据，希腊人均收入增长了33.6%，同时期超过它的只有爱尔兰。[\[20\]](#)希腊的生活水准从来没有那么高。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西米蒂斯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外国人对希腊的态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加入欧元区只是希腊保持其“魅力攻势”最明显的招数，其目的是使希腊前所未有地进入欧洲核心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希腊国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希腊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大致是这个顺序）在促成欧盟1992年成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框架之内，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泛希社运从1996年开始，在欧盟峰会、欧洲议会和其他欧盟组织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或政党加强互信，达成共识。2003年的前6个月，希腊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表现受到广泛赞誉，这标志着多年的欧洲好公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西米蒂斯两届政府的领导之下，希腊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虽然“FYROM”的名字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希腊至少在国际社会中不再孤立了。在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短暂的转圜，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两

国关系不断恶化。1996年，来自两国的突击队员登陆靠近土耳其海岸的两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并各自在那儿竖起了自己的国旗。这两个小岛在希腊语里被统称为“依米亚”，在土耳其语里被统称为“卡尔达克”。战争即将爆发，再一次由于美国干预才得以避免。塞浦路斯政府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系统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直到1999年2月，西米蒂斯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希腊在争议声中接待了来访的阿卜杜拉·欧加兰，这个人是库德工人党的领导人，是土耳其通缉的恐怖分子。在一次重大行动中，土耳其的特殊部队在欧加兰离开希腊驻内罗毕大使馆的时候把他逮捕了，并用飞机将其带回土耳其进行审判。对于希腊外交，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时刻。

不过，这也是一个转折点。欧加兰事件让泛希社运的外交部部长塞奥佐罗斯·潘加卡斯（暂时）丢了乌纱帽。潘加卡斯是一位恣肆张扬的政客，他的祖父曾是1909年暴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那次暴动让维尼泽洛斯走上权力的顶峰，并在20世纪20年代以独裁者的身份短期统治希腊。替代潘加卡斯的是一位更具有说服调解能力的人物。乔治·帕潘德里欧（后称“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也有一位著名的祖父。这位帕潘德里欧往往被人亲昵地称作“小乔治”，从而与他同名的祖父区分开来。他的祖父曾在1944年担任希腊总理，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出山。作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儿子，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将是他这个政治家族的第三位总理。他于1999年被西米蒂斯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几十年的冷漠僵化带来了一丝轻柔和新的措施。

从政治上说，两个密切联系的事件使得希腊马上与土耳其进行了对话，这次对话不仅及时，而且很有必要。这两个事件都和欧盟及其雄心勃勃的东扩有关。塞浦路斯已经是欧盟候选成员

国，得到了希腊的大力支持。土耳其早在1987年也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但是希腊政府在土耳其1995年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后，就一直行使否决权，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多数国家都把加入欧盟作为未来发展最好的途径，很显然，如果希腊和土耳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那么至少在欧盟扩张方面，两方都会得到好处。1999年6月，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作为希腊外交部部长和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伊斯梅尔·杰姆进行了初步对话。

接着，最出人意料的是，大自然的力量介入了。8月17日一大早，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被现代最严重的地震之一夷为平地，5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上万人死亡。地震伤害甚至波及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随后的国际救援方面，来自希腊的训练有素的灾难恢复小组最先到达现场。对于邻邦这么大规模的人间悲剧，希腊的反应是广泛的，自发的。3周后，该地区再次发生地震，这对雅典北部郊区造成严重损坏，给整个城市带来恐慌。这一次，财产和生命损失要轻得多。这一次轮到土耳其出手相救了，土耳其的救援队在救助生还者和帮助清除废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灾难救援和公众同情现在已变成相互的了。

在两国的媒体和公众意见以及政治圈中，恐怖的、被鄙视的古老“他者”形象正在被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的消亡形象覆盖，因为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地壳运动的规律。希腊和土耳其在地震后的行动很快被贴上了“地震外交”的标签，这为政治家积极推动双方走出旧的政治宿怨提供了新的动力。地震以及双方的反应带来了两国民众意见的真正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在其后的几年里一直持续。^[21]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在1999年年底召开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希腊解除了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的限制。从实用的角度看，希腊此举强化了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

团结，有百利而无一害。2005年以前，在启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方面，其他制约因素也一直存在。土耳其和希腊随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的加入欧盟之路在10年后有了微小的、遥远的可能。但是，对西米蒂斯和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来说，他们依然赢得了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奖赏，那就是塞浦路斯成功加入欧盟。

到了1999年，沿着将塞浦路斯分开的“绿线”所进行的正式和平努力已经持续了25年。双方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自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一方是在1983年建立的，但是当时（现在也是）只得到土耳其的承认。对塞浦路斯人来说，来往于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及被占领国土（在希腊语中，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被占领国土”）是被禁止的，不过持外国护照的人可以穿过尼科西亚中心的一个由联合国人工管理的检查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势下，塞浦路斯在加入欧盟后，如何在自己国内以及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实施《欧盟法律》和实现自由旅行？

突破性进展是在2002年取得的，当时，此前在土耳其被禁止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大选中被选为总理。尽管这次事件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在2002年就职后坚定地推进全面加入欧盟。因此，埃尔多安准备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让步。土耳其政府“强龙压倒地头蛇”，不顾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资深领导人劳夫·登克塔什的强硬立场，在联合国开启了对话，目的是实现塞浦路斯的统一。成功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是解除土耳其加入欧盟最棘手的障碍之一。

安南计划应运而生，这一计划是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名字命名的。从2002年年底到2004年3月，这一计划先后起草了五稿，欧盟、联合国、1960年宪法中的“保护国”以及

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的“安南计划”将根据瑞士联邦的模式，建立由“希腊族州”和“土耳其族州”平等组成的松散的中央政府。未来塞浦路斯的国名为“联合塞浦路斯共和国”。每一位塞浦路斯人既是共和国的公民，也是“希腊族州”或“土耳其族州”的公民。“希腊族州”和“土耳其族州”拥有同样的宪法权利，不管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有多大的差异。1974年丧失家园的人将再也不能回去，但将获得一定的补偿。新划定的国内界限将扩大希腊族控制的地区——大约增加7%，在3年内完成。在更长的时间内，多数外国军队将撤出塞浦路斯，但不是全部撤出。

对于塞浦路斯“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综合解决方案。2003年4月，塞浦路斯和其他9个欧盟候选国在雅典的古代市场遗址上签署加入欧盟的条约。安南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从国际社会赢得了大量的人气，集聚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一笑泯恩仇，实现罕见的联合。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还得到了欧盟和联合国的支持。欧盟磋商人员提出，最后的解决条款可以在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根据条约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时候敲定，这个建议也无可厚非。加入欧盟协议在雅典签署几周后，人们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期望更高了，因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自己一边开通了几个关口，让塞浦路斯两大区域的居民出入。上万名希腊族塞浦路斯人通过关口，跨越界线，重访将近30年没有见过的家园，后来出生的人当然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老宅。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年底的大选中选举了一位比资深的登克塔什更为温和的领导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开始支持安南计划。

但是，有句俗语精辟地说明了很多此类磋商的特点：“除非一切都达成了共识，否则就相当于都没有达成共识。”磋商到了

最后关头，但是没有就所有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自己对着空空的安南计划的协议文本，也只能徒唤奈何。塞浦路斯的未来最终由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同时举行的公投来决定，公投的日期定于4月24日，恰恰是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条约生效的一周前。此前一个月，在希腊，西米蒂斯在议会选举中输给了新民主党。作为反对党，泛希社运支持安南计划。希腊新政府的领导人是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他是前总理的侄子，宣称新政府对安南计划持中立立场，没有反对意见。埃尔多安依旧强烈地推进安南计划的实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控制地区的民调显示，公投很可能得到“赞成”的结果。很明显，欧洲官员正等着民众投票的结果，从而在更高层达成的协议上面盖上那枚橡皮图章。大家期待着，公投结束一周后，塞浦路斯能够以国家统一的面貌加入欧盟。即使公投出现另一个结果，磋商人员也没有B计划，不会推迟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更不会重新就条款内容进行磋商。

与半个世纪以前不同，2004年的希腊政府不可能在外交政策上被塞浦路斯左右。当然，希腊政府也不可能主导另一个主权国家——塞浦路斯的公民意见，尽管那个国家的公民也是希腊民族的一部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治理自己的国家，他们根据1960年宪法，在1/4的世纪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自1974年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经济远远超过了贫困、闭塞的塞浦路斯岛北部地区，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比希腊的公民高很多。尽管泛希社运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自己的外交议程，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对自己国土上的事有着自己的主见，他们要自己做主。

塞浦路斯的总统都是直选的，有着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塔索斯·帕帕多普洛斯于2003年上台，他曾是一名律师，在20世纪50

年代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大选中得到了左右两派的支持，两派都担心其对土耳其做出让步。在4月24日公投举行前的日子里，帕帕多普洛斯举政府之力反对安南计划。他用希腊语说出了简明的、常常被引用的话：“我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保证，我不会给我的下任留下一个更小的国家。”安南计划被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拒绝了，72%的选票反对，而“绿线”那边同时举行的公投结果是赞成，赞成的比例要比另一边反对的比例低一点儿。

对很多国际观察家而言，以及在多数人看来，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丢弃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在那个时候及以后，从希腊的角度看，安南计划及其缺点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22]2004年两次公投的结果的确固化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分歧，即便没有受到公投结果的影响，在10多年后，这种分歧也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希腊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并不怎么担心。欧洲磋商人员可能会认为，他们所谈判的是整个塞浦路斯岛加入欧盟，从技术上看，即便在今天，情况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获得了加入欧盟的所有好处，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却被排除在外。就像最初在塞浦路斯建立独立的国家那样，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如此的结果，更没有人期待这样的结果。即便如此，这仍然应该被看作科斯塔斯·西米蒂斯领导的泛希社运政府取得的又一个成功，如果没有西米蒂斯和他的外交部部长小乔治·帕潘德里欧的外交倡议和寻求共识，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西米蒂斯政府的第二个4年任期到2004年4月结束。希腊在年初确定下一次议会选举将于3月7日举行，西米蒂斯此时表达了从党的领导人的位子上退下来的想法，继他以后，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担任党的领导人。但是，候选人只靠家族的名声是不足以

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更谈不上复兴泛希社运的大业。泛希社运已经执政11年，与很多此前的希腊政府一样，这一任政府在其任期最后的阶段也深陷金融丑闻。西米蒂斯本人倒是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但是在处理那些卷入丑闻的官员方面行动迟缓，所以就引咎辞职了。因此，他领导的政府在最后时刻取得的那些成就，比如，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以及8月举办奥运会，都是在这些成就的总设计师缺席的情况下获得的。

雅典奥运会被全世界的媒体广泛描述为一次成功的盛会。对希腊族的人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奥运会向曾经在1896年举办过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雅典的回归，证明了他们的民族及其地位在现代世界得到百年认可。2004年8月13日，奥运会在雅典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内举办了完美的开幕式，呈现了希腊4 000多年历史的辉煌画面。这个开幕式一开始展现了青铜时代初期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出现的抽象的大理石雕像，继而穿越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的王宫，然后进入古典时代的艺术、体育和雕塑世界。亚历山大大帝乘着他的战车，拿着他的长矛登场，再现了著名的古代形象。接着是拜占庭东正教教堂的圣像，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就一下子展现了1821年希腊革命以及1896年奥运会中的英雄。代表20世纪出场的是卡拉格奇奥基斯皮影戏、演奏布祖基琴的雷贝蒂卡乐队和雅尼斯·察鲁希斯的绘画，至少前两种艺术都是扎根于希腊的东方传统和奥斯曼历史之中的。很多乐曲来源于希腊山区和海岛的古老农村传统。从视角上看，全部的舞台造型中都突出了扇动着翅膀的天使形象。

开幕式中没有表现出来的希腊历史和重现的历史一样精彩。从古代罗马人到中世纪晚期奥斯曼人的历次征服被开幕式完全摒弃了。希腊历史承载的辉煌过去，被浓缩在一系列具有震撼力的视觉形象之中。至少在奥运会举办的3周内，近年来以不同形式

重现的身份认同的冲突可以被放在一边了。

雅典奥运会是自信的、完美的。在19世纪50—60年代，第一次被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构建的《希腊史》，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最精彩的元素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在2004年8月的那个夜晚，这个现代国家最终成熟了吗？

[1] Michalis Spourdalakis, *The Rise of the Greek Socialist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88), 289–90.

[2] George Mavrogordatos, *Rise of the Green Sun: The Greek Election of 1981*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Centre of Contemporary Greek Studies, 1983), 9, 55 (quoted).

[3] 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s Papadimitriou, *Prime Ministers in Greece: The Paradox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45, 90, 217.

[4] David Close, *Greece since 1945: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2002), 161–2, 178–82; Stathis Kalyvas, *Modern Greec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0–42, citing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 Gerassimos Moschonas.

[5] Theodore Couloumbis, 'PASOK's foreign policies, 1981–89: Continuity or change?', in Richard Clogg (ed.), *Greece, 1981–89: The Populist Decad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120.

[6] George Kassimeris, *Europe's Last Red Terrorists: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17 November* (London: Hurst, 2001), 206.

[7] See, for example, Misha Glenny, *The Balkans, 1804–1999* (London: Granta, 1999), 656.

[8] Loring Danforth, *The Macedonian Conflict: Ethnic National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2–12.

[9] Thanos Veremis,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17), 143, 145–6.

[10] Yannis Hamilakis, *The Nation and its Ruins: Antiquity,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5–34.

[11] Cited in Veremis, *Modern History*, 151–2.

[12] See, for example, Sotiris Dimitriou, *May Your Name Be Blessed*, trans. Leo Marshall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0).

[13] Close, *Greece*, 197; Thomas Gallant, *Modern Greece: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2nd edn (London: Bloomsbury, 2016), 303.

[14] Vasilios Makrides, 'Byzantiu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The Neo-Orthodox current of ideas', in David Ricks and Paul Magdalino (eds),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142.

[15] Graham Speake, *Mount Athos: Renewal in Paradis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Athens: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xford: Signal, 2004), 207.

[17]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384.

[18]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383–4, 386.

[19] Featherstone and Papadimitriou, *Prime Ministers*, 1, 165, 203.

[20] Gallant, *Modern Greece*, 306–7; Miranda Xafa, 'Back from the brink: How to end Greece's seemingly interminable crisis', in Spyros Economides (ed.), *Greece: Modernisation and Europe 20 Years 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llenic Observatory, 2017), 46–53 (see 47–8).

[21] Dimitrios Theodossopoulos, 'Politics of friendship, worldviews of mistrust: The Greek-Turkish rapprochement in local conversation', in D. Theodossopoulos (ed.), *When Greeks Think about Turks: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193–210.

[22] See, for example, James Ker-Lindsay, *The Cyprus Proble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8–74, and the critiques of the Annan Plan in Andrekos Varnava and Hubert Faustmann (eds), *Reunifying Cyprus: The Annan Plan and Beyond* (London: I. B. Tauris,

2009).

第十二章

中年危机

(2004年至今)

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几个月前泛希社运向其政敌新民主党的顺利交接以及塞浦路斯30年分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解决，2004年的希腊人踌躇满志，向往极其美好的未来。加入欧盟，进入欧元区，不论在外部安全方面，还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方面，都给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希腊族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未来只会变得更加光明。

有一段时间的形势的确看起来很光明。

希腊新的中右政府没有思想包袱，没有需要实施的具体项目，没有需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没有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毕竟，该做的，希腊都做到了。新总理的名字已家喻户晓——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包袱，除了他有一个与他同名的更有名的叔叔。除了在两党制的国家里，两个党派都是由其创立者的后裔来领导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的执政风格在各种描述里都是宽松随意的，甚至被政敌批评为懒政怠政。政府高层表现出来的某种形式的不作为，被看作新民主党5年统治的典型特征，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2009年。西米蒂斯政府启动的改革被悄无声息地放弃了。“买”选票的做法（如在大选年宣布税收减免）是从20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10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执政时期开始的，现在则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据说，这一做法在卡拉曼利斯2007年“用类似的方式取得连任”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便如此，在进入新民主党执政第二任期的一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希腊的各项经济指标一如4年前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自21世纪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增长4%的态势。^[1]

问题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中显露出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于2007年在美国爆发，到了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

的破产而达到顶峰。但是，不管是希腊本身还是希腊的银行，都没有直接形成导致全球银行业处于崩溃边缘的高风险性特征。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与希腊擦肩而过，不过只是看起来擦肩而过。

2008年12月，希腊的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自我反省，其文章有指控，也有反指控，还有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进行自我反省有几方面的原因，它们都可以在国内找到。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希腊的危机也可以追溯到前一年的夏天，但这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2007年8—9月，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死了68个人，烧毁了大面积的林地。这是受希腊气候影响的季节性灾难，每年都会发生。不过，另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指出大火是人为造成的。2007年的大火比往常严重得多。特别是在9月的大选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对火势施加控制。全国土地登记项目是由卡波迪斯特里斯在1828年启动的，当时还没有完成，这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到一些说法上，即森林大火的背后有投机者，有主谋，他们非法烧毁了森林，其目的是大发横财。

到了2008年秋天，希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丑闻，这让任何一个执政3年多的政府都难以置身事外，其中一个丑闻涉及文化部一名高级官员的怪异自杀行为。更大的丑闻是，政府的部长们与阿陀斯山瓦托佩蒂修道院有权钱交易。这个修道院是东正教的圣山，是一个自治机构。这个丑闻迫使卡拉曼利斯的左膀右臂塞奥多洛斯·鲁索普洛斯在2008年10月这个关键的时刻递交了辞呈。从那以后，“政府好像放任自流了”。[\[2\]](#)

自从1974年实现民主过渡以来，希腊，特别是雅典，总是潜伏着一股暴力街头抗议的暗流。这种暴力行为在传统上被看作“雅典理工大学风暴”遗产的一部分，暴力实施者通常会声称自己的行动所秉承的是1973年11月占领雅典理工大学的学生的精

神。到了2008年秋天，无政府主义者穿着帽衫、带着汽油弹走上街头，他们走向雅典市中心伊格萨基亚区的大街，那里靠近国家考古博物馆。几年来，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和警察之间的夜战几乎已变成一种消遣形式。这种被仪式化的冲突是一种非正规武装生活的离奇重演，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则，但双方都心照不宣，知道暴力游戏可以玩到什么程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或希腊革命的时代，法律管不到大山深处，那些非正规武装就在那里无法无天地厮杀，打得你死我活。非正规武装就是土匪，其首脑从来不认国王，只认自己，这样的示范样板从未完全消失。

后来，在2008年12月6日的夜里，这些不成文的规矩被打破了。那天夜里，在对立冲突中，一个15岁的学生在伊格萨基亚广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而死者 and 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激起了公愤，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雅典市中心挤满了愤怒的游行示威者，有些是暴力分子。不同寻常的是，游行示威在全国蔓延，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城镇。公众已经对警察失去了信任，因此警察无法执法。商店被抢劫和烧毁，汽车被掀翻和点燃。低水平的恐怖主义再次回到雅典，对财产和警察的武装攻击也出现了。

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当时把此类事件解释为“在一连串的体制、社会和道德危机所构陷的社会中受虚幻推动的、支离破碎的爆发”，而且这比将要来临的更大的“危机”的第一波冲击，早了好几个月。这位历史学家继续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认为其代表“民族标准、理性主义和相互尊重这些品质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衰败”。另一位在若干年后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起义”的任何一方都缺乏连贯一致的或共同明确的要求。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政治左派遭遇了完全的失败，既没有从此类事件中获得任何政治资本，也没有从这种“抗争”中获得领导权。[\[3\]](#)这个迹

象表明20世纪40—80年代，将希腊人分开的那道旧裂痕真的已经转移了。2008年12月，雅典的街头明显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很少有人在那个时候预测下一道裂痕会在哪里显现，更没有人预测在未来10年将希腊社会撕裂的力量的本质是什么。

“危机”中的政治

到了2009年4月，雅典的街头再次拥有了和平，只是这种和平让人心神不宁。卡拉曼利斯政府想方设法地借了足够的钱满足当年财政预算的需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崩溃后的经济氛围中，政府借款的增长引起了欧盟的注意。因此，欧盟要对财政赤字实施欧元区的规则，这就意味着要缩减公共支出。这方面并非没有先例。20年前，泛希社运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也遇到过类似的处境。那时采取的措施不得人心。泛希社运在1989年下台，也许那些措施是泛希社运下台的部分原因。但是既然以前的类似问题得到了控制，为什么现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呢？

卡拉曼利斯在2009年10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比第二个任期正常结束提前了两年，此举的动机受到质疑。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参加竞选，但有人依然认为他是有意甩开一个新民主党再也承受不了的包袱。几乎一个世纪前，人们对他的前辈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也进行了同样的谴责，且不无道理。2009年，泛希社运的领导人是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对于希腊面临的困难，他根本没提出能达成共识的解决办法，只是坚持强调希腊根本没有遇到问题，形势仍旧一片大好。10月4日，泛希社运获得44%的选票，在30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160个席位。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成为希腊总理。

新政府上任两周后，向议会报告严峻的经济形势的任务落在了财政部部长乔治斯·帕帕康斯坦丁努的头上。尽管他在经济形势分析的措辞上很谨慎委婉，好像是说不同时代的事，但是听者所获得的信息就和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早在1893年说出的简洁的如炸弹一般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很不幸，我们破产了”。在帕帕康斯坦丁努做报告的第二天，后来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卢森堡召开了欧元区财长会议，他对希腊问题的回应更为简洁：“完了。”^[4]对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来说，接受经济灾难总体规模的事实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在2010年年初，全世界的媒体都知道详情了——希腊处于危机之中。受影响的不只是希腊，因为希腊是欧元区中的一员。当时欧洲的银行和欧盟的机构依然在2008年金融崩溃的影响余波中苦苦挣扎。如果有一个欧盟的成员国突然出现主权违约，那么这就会威胁整个欧元区，也许还会威胁欧盟本身，威胁整个欧盟政治大厦。鉴于此，欧盟呼吁采取特别措施。

关于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在希腊发生的“完美风暴”的技术因素，专业经济学家已经探讨了很多。现在还有很多争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希腊政府在2010年4月不能按合适的利率贷款了，所以就不能偿还现有的债务。这种事情此前在主权国家也发生过，单单在希腊就发生过3次，分别在1843年、1893年和1932年。阿根廷在2001年也出现过这种事情。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拖欠巨额债务、让货币贬值并重建国家经济。20世纪30年代，这个做法在希腊很成功。截至2009年，它在阿根廷实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违约还没有先例。由于希腊的经济规模不大（占欧元区经济的比例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其可以出现主权违约，而且其违约不会在世界市场的大海中掀起一点儿涟漪。但是，如果作为统一货币区域组成部分的国

家发生主权违约，那么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欧盟突然意识到，如果欧盟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必须确定相关规则。

无独有偶。居于欧洲地理边缘的其他国家也在痛苦地挣扎，面临着因两年前银行崩溃而产生的同样的压力。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购买已经破产的银行的债务，以这种方式挽救纳税人存在银行的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财政也几近破产。“欧洲债务危机”用国家名字的首字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词汇和比喻。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是“欧猪五国”，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后来也加入了进来。最大的恐惧是“传染”，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影响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此危机有一个现成的、简单的解决办法，它的非正式术语是“保释”（有能力拿出保释金的人把他的同伙从监狱里捞出来），正式术语是“救助备忘录”，或简称为“MoU”，在希腊语里为Mnimomio。救援的顺利实施需要开展新的合作，从而让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各司其职。这种新的、特设的合作机制很快就有了一个绰号——“三驾马车”。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2010年4月23日正式提出了“保释”要求，也就是经济救援申请。5月2日，希腊和“三驾马车”签署救助备忘录。为了获得1 100亿欧元的贷款，泛希社运政府需要服下一剂猛药——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以北欧那些更具活力的经济为标准，对自己的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这就是“紧缩政策”的开始。6个月前被选上台的政府曾向选民承诺，一切都很好，大家不需要勒紧腰带。救助备忘录签署3天后，约上万人走上雅典街头示威抗议，示威抗议后来升级为暴力行动。游行示威的群众放火烧了市中心的一个银行，烧死了3名银行员工。难道就像20世纪4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这次拯救欧元的代价是希腊社会秩序

的崩塌吗？

虽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希腊的社会秩序好像要崩塌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或者至少截至目前不是这样。不过，与其他采用过同样措施的国家不同的是，希腊的经济崩塌了。

人们很快发现，救助备忘录中确定的目标太乐观了。给予希腊的资金90%都没用于重振希腊经济，而是用于还旧账和重振外国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银行。[\[5\]](#)接下来的4年里，希腊的人均收入下降了1/3，失业率达到27%，年轻人的失业率比总体失业率高一倍多。希腊经济总量萎缩了1/4，银行存款转向国外，投资额下降了近1/2，公司倒闭，公共服务减少。

退休和失业人群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救济站门前排起了长队，曾经的中产阶级失去了房子，只得流落街头，自杀率骤增。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过更加严重的情况，很多在雅典等大城市活不下去的人们纷纷返回自二战以来人口一直外流的乡村老家，因为那里有家族的根。有高等教育背景、可以在知识经济中一展身手但在雅典找不到工作的人们，选择充分利用欧盟公民可以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便利，到国外生活。根据2017年的统计，在过去的7年里，约50万大学毕业生离开了希腊，相当于希腊劳动力的10%。税率的不断上升造成了通货紧缩。

希腊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对于“欧猪五国”，欧盟一视同仁地开出了“药方”，其他国家的“病”都好了，为何独独只有希腊的“病”没有好，反而像是吃了毒药，依然深陷危机之中呢？

近年来，不少理论试图解释希腊深陷危机的原因。大多数专家认为，希腊和欧盟各有各的错，不能只怪其中一方。希腊本身有系统性的问题，欧盟在结构上存在弱点，尤其是欧元区在没有统一财政管制权力的情况下管理统一货币，这些共同产生了负面

的化学反应。但是，除此之外，这些专家众说纷纭，很难达成一致。全世界的媒体以及许多严肃的评论员指责希腊人“奢侈”和“懒散”。有些人看不惯欧盟意欲达成“更深入的欧洲整合”或者有统一货币的经济和财政雄心。因此，当这两方面的弱点暴露于希腊不断扩展的“危机”之外的时候，人们就有话要说了。

于是，对希腊社会主义实践有看法的批评家们紧紧揪住泛希社运的某些特定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对其进行大肆抨击。他们常常提及公共部门的铺张浪费，特别是高等教育、医疗卫生部门，以及政府没有收税和公民没有支付的例子。充分的数据证明，希腊人并不“懒”，就是劳动效率有点儿低。^[6]一位泛希社运政府前部长曾经在2017年提出，希腊处于“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无能、庇护盛行、机构孱弱、缺乏竞争”。不过，事实似乎与媒体报道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到经济突然崩溃”的趋势不同。从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到现在，希腊的GDP增长十分平缓，低于同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每年不到1%。或许自那以后，希腊的经济就没有“真正”恢复过？^[7]

许多“事后诸葛亮”说：“希腊当初就不该加入欧元区。”不过，2012年2月希腊第二次请求欧盟救援时提出的“希腊脱欧”议案，是最终不得已而为之的“核手段”。虽然许多人预测希腊会脱欧，但是不论希腊一方，还是欧盟金融一方，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先提脱欧之事。

2011年年初，形势很清楚，希腊若想避免政府破产，就需要再次接受欧盟的援助，并且承诺采取更多的紧缩措施。6月底，雅典市中心再次爆发了暴力游行。面对欧盟新的条款，以及10月的更大的内乱威胁，总理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万般无奈之下宣布举行全民公投。希腊人将通过选票决定国家是接受欧盟的

援助和条件，还是冒着国家破产的风险脱欧。10月31日，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了举行公投的决定。而11天后，他就下台了。因为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召开紧急会议，并告知这位不幸的希腊总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希腊都不能举行公投。因此，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只能辞职。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下台后，“技术官僚”掌控了政府。由欧盟央行前副行长、希腊银行前行长卢卡斯·帕帕迪莫斯领导的新政府，获得了3个政党结成的联盟的支持。帕帕迪莫斯政府不是通过选举上任的（也许当时的形势不适合选举），在2012年2月2日见证了希腊与欧盟签署第二次援助协议。当夜，雅典市内再次出现暴乱，不过该发生的已经发生，暴乱也改变不了什么。希腊用“剃头”（希腊对主权债务进行部分减记）和承诺缩减开支换来了1 300亿欧元的新贷款。“剃头”对希腊的银行造成了重击，并且意外导致危机于次年“传染”给了塞浦路斯。

第二次欧盟援助的救助备忘录签订之后，选举的日子到了。此时，主要在野党新民主党的领导人是安东尼斯·萨马拉斯。萨马拉斯由于曾经在马其顿国名争议中坚决反对希腊北面的邻邦以马其顿作为国名，最终愤而退党，这导致新民主党在1993年的选举中失利。这一次，萨马拉斯的选举口号是“让我撕毁救助备忘录”，他采取了其竞选对手小乔治·帕潘德里欧3年前的策略。萨马拉斯只成功了一半，2012年5月6日的选举，出现了悬浮议会的情况，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成功组建政府。第二次选举被安排在6周之后。欧盟领导人毫不妥协：“如果希腊拒不履行救助备忘录的义务，就会被踢出欧元区。”对此，相当多的选民通过选举向新民主党传递了一个信息，萨马拉斯可以不用一党执政，可以与泛希社运和另一个小党组成联盟共同执政。

2012年的两次选举是希腊政治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自

1977年以来，希腊就一直实行明显的两党制。希腊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两党联合执政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每一届政府不是由泛希社运组建，就是由新民主党组建。而在5月的选举中，这两个党派都没拿到绝对多数的选票。在6月的选举中，很多选民转投新民主党来防止其崩盘，但尽管如此，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的选票率依然没超过30%。民众对泛希社运的惩罚是致命的，其在2012年6月仅获得了13%的选票，而且3年后的得票率更低。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崛起，终结了希腊的两党轮流执政制度。

激进左翼联盟（希腊语缩写为SYRIZA）最初是在2004年由一些左翼小党组成的竞选联盟，但不包括传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腊共产党。从那时到2009年，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为3%~4%，正好达到进入议会的得票率门槛。2008年后，激进左翼联盟主席是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前学生运动分子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激进左翼联盟坚决地反对缩减开支以及“三驾马车”在救援方面强加给希腊的条款，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以17%的支持率超过泛希社运，成为第二大党。6周以后，其支持率升至27%，仅仅比在新的联合政府中主导政权的党派少两个百分点。激进左翼联盟过于非主流，所以无法成为联合执政的党派之一。不过一个极左的边缘政党，能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议会中最大反对党，并不是偶然。

在右翼方面，从新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新兴政党“独立希腊人”由于采取反对救助备忘录的立场，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0%的支持率，但6月的支持率便有所下降。而在希腊和海外国家看来，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是希腊第一个且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法西斯或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的崛起。金色黎明起初是一个非常小的政党，在1996年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时，仅仅

获得了不到1%的支持率，而在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与其他反对欧盟救援的政党不同，金色黎明在第二次选举中的得票数只有一点儿下降，相比5月时最高的7%的支持率，其仅仅失去了少量选票，而且在3年后，再度保有7%的支持率。金色黎明的徽章是“河流”，也就是“希腊钥匙”的形状，颜色是纳粹“卐”字的颜色，形状也类似。多年以来，金色黎明及其成员都是暴力行动的代表，行动目标是移民和同情移民的人群。金色黎明的理念源自尚武的斯巴达人，意图维持希腊血脉的纯洁，在当今时代算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和极端民粹主义。金色黎明惯用的一些语言修辞和符号，令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时期和1967—1974年的希腊军政府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时期的政府统治都不是源自某项群众运动或某个政治组织，而是源自上层。希腊出现草根出身的法西斯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2010年以来的“危机”的结果以及社会对新环境的反应。

由于大多数选民不再支持曾经达成广泛共识的政治改革，希腊的政治格局再一次发生变动。一个全新的政治派系横空出世了，它在2008年年底的希腊街头暴力抗议的紧张局势中初见端倪，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发展壮大。一些评论家将希腊政治的新分裂定义为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和不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其他评论家认为那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对抗。[\[8\]](#)不管怎么说，这道新的裂痕跨越并代替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革命时期的国内冲突。这个冲突是因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彻底的自给自足，另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现在，希腊人又一次必须做出选择了。

2015年1月，萨马拉斯政府正在争取满足第二次欧盟救援的

条件，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可能会让希腊经济出现微弱复苏。希腊被迫进行财政紧缩，经济恢复好像遥遥无期。选民在2009年的大选中信任中左派，在2012年又将票投给了中右派，两派都没能达到选民的期望。失望的选民将选票交给了政治新秀、反对党领袖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希望他能比萨马拉斯和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做得更好。在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下，希腊这个小国这一次要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仗势欺人的债权人进行勇敢抗争。“三驾马车”为希腊危机开出的药方不管用，希腊必须换一个药方，激进左翼联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2015年1月25日的选举投票标志着希腊新的党派界限的形成。支持欧盟援助方案的党派，包括完全丧失民众信任、近乎崩溃的泛希社运在内，获得了不到40%的支持率。反对欧盟援助的党派有激进左翼联盟、从新民主党内分离出来的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金色黎明和希腊共产党。其中，希腊共产党不愿与任何人合作，而任何人都不敢与金色黎明有瓜葛。这两个反对欧盟援助的极端党派总共拥有12%的支持率。作为左翼政党的激进左翼联盟拥有36%的支持率，是当时最大的党派，可以获得额外50个议席的奖励，所以只要再多两个议席的支持，就可成为掌控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政党。这完全符合希腊全新的政治格局，极左的激进左翼联盟与极右（非法西斯）的独立希腊人联合执政，双方合计拥有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62个席位。组成新政府的这两个政党，都是因向选民做出了国家自给自足、反抗“三驾马车”插手希腊经济的承诺而上任的。

民主政权不再统一、完整，不过执政的目标十分清晰。摸爬滚打多年的政坛老手既然没法让选民满意，那就应该让位给曾经位于“边缘”的政治力量，由它们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希腊政局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古希腊的经典悲

剧，也可以说是一场闹剧，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分析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事情的主角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电视达人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他在2015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在混乱不堪的6个月里信口开河，揭开了事件双方互相背叛、内部分裂和言行不一的盖子。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愚蠢、腐败的政客一败涂地之时，面对“欧洲强权”，受命于危难之际，敢于为希腊选民而斗争的英雄。他试图引领一场“希腊之春”，推动一次“起义”，但最终被那些顽固不化的欧洲势力“无情镇压”了，他本人也被自己的政党背叛了。

齐普拉斯最初的想法与瓦鲁法克斯一样，瓦鲁法克斯自始至终都认为，希腊人民信任他们，让他们执掌希腊的政权，就足以迫使欧盟改变其对待希腊债务的政策。他们的心情固然迫切，但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仅有1 100万人口的国家的财政部部长，要对足足有5亿人口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发号施令，无异于螳臂当车，永远不会达到任何目的。齐普拉斯的对手、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2015年2月11日的欧元区领导人峰会上反唇相讥：“选举不能影响经济决策。”不过朔伊布勒也是被选民选上来的，更何况选他的民众数量比希腊民众数量还多，而且他对被新闻称作“欧元大家庭的老鼠屎”“破产穷光蛋”的希腊人的印象还不怎么好。^[9]

到了6月底，希腊又一次无法还清债务了。而此时，除非希腊政府签署类似2012年“技术官僚”政府曾经接受的一揽子条款协议，否则就不会得到第二次欧盟援助计划的最后一笔资金。然而，如果政府这么做了，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联合政府对选民的承诺就成了一纸空谈。齐普拉斯没有这么做，他宣布将于7月5日周日举行全民公投，请选民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开出的援助条件，而当时距离公投仅有一周的时间。6月29日是齐普拉斯宣布公投

的第一个工作日，欧洲中央银行在那一天取消了为希腊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的安排。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不得不紧急实行资本管控，关闭银行数日，并在银行重新开门后对民众提款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大多数激进左翼联盟成员，包括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独立希腊人党派成员和极端右翼党派金色黎明成员，都呼吁人们在公投中投“否”。

虽然希腊选民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压力，面临希腊银行关门以及可能不再开张的威胁，但其选择出乎欧盟的预料，有61.31%的选票为“否”，尽管参投率有点儿低（根据希腊标准）——只有62.5%的人参加了公投。希腊政府小心翼翼地强调，公民的选择并不能决定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这次公投并不是为了挺欧或是反欧，不过很多投“是”票的人（包括希腊境内和境外的人）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留在欧元区和欧盟的人，要比公投中反对欧盟援助特别条件的人多。虽然希腊人民再一次对希腊必须缩减开支以及欧盟机构的颐指气使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欧盟本身。

公投次日，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提交了辞呈。到了周末，在支持接受欧洲援助的党派建议下，希腊议会就重返欧盟并寻求签署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进行了投票。在瓦鲁法克斯书内的众多爆料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齐普拉斯私下为这次向欧盟“屈服”找的借口：“他告诉我，他担心如果我们坚持对欧盟不松口，在‘古蒂’的命运就有可能重现，在1922年的那次政变中，有6名政客和军队领袖被处决……（他）接着暗示我，像那样的政变有可能再次发生。”^[10]如果瓦鲁法克斯说的是真的，那么一位民选总理的怯懦岂不是昭然若揭？这是一位民选总理最不应该有的表现。或者说，瓦鲁法克斯其实在暗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希腊的“深层建构”中有一股力量最迟在2015年就会推翻希腊的民主

制度，甚至不惜动用极端暴力，使希腊再次陷入100年前那样的政治动乱中。

7月13日，欧元区各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签订欧盟对希腊第三次援助的救助备忘录。接下来的3年，希腊将总共接受860亿欧元的救助，其中的一半将用于支付希腊的债务，另一半则用于希腊经济结构的大规模改革。与希腊在公投中拒绝接受的上一次援助的最后一笔资金相比，这次的援助金额要多出数倍，但是条件也更加苛刻。正因为如此，希腊变成了“债务殖民地”。曾经的“欧盟对希腊的象征性殖民”又往前走了一步。[\[11\]](#)欧洲债权人向希腊人表明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截至目前，根据希腊政治的逻辑，有人认为激进左翼联盟和总理齐普拉斯将受到选民的责问和惩戒。每次希腊最终接受欧盟援助的条件时，下一任政府的态度相比上一任都会有180°的大转弯，而这一次救援条件是三次援助中最苛刻的，造成的结果是执政党分裂了。但是，齐普拉斯依靠反对党议员的支持支撑了下来。不仅如此，齐普拉斯意识到了自己的执政不稳，便宣布于9月20日举行提前大选。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激进左翼联盟内部闹分裂的派别，也就是反对欧盟援助计划和反对希腊留在欧盟的那一派出局了。这些人新组建了一个政党，但是得票率没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各党的得票结果几乎是1月大选结果的重现，得票率波动与之前相比，不超过2%。最大的两个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与1月大选结果相比，各自的波动甚至没有超过1%。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再次联合执政。在本书撰写期间，可预见的是这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还将延续3年。

在批评家的眼中，齐普拉斯宣布公投的决定毫无道理，公投的结果无法执行，而且希腊最终接受的条件比10天前欧盟提供的条件还要严苛。对那些于2015年8月退出激进左翼联盟的极左翼

来说，希腊政府态度的180°大转弯是对希腊人民的背叛。从此以后，瓦鲁法克斯公开支持后者的观点，不过他并不支持希腊脱欧。另一些人则认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尤其是瓦鲁法克斯，让“希腊经济损失了大约1 000亿欧元”。[\[12\]](#)3年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第三个声音。这个声音认为，也许那上千亿欧元就是让希腊社会各阶层获得深刻认识所付出的代价。除了接受“三驾马车”强加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外，希腊别无选择。对希腊来说，早点儿接受欧盟开出的药方，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过，经历过了3次欧盟援助以及政府的3次更迭，到了2015年秋季，希腊依然无路可走。这难道意味着“危机”即将结束了？

与“危机”共存

“危机”二字，从字义上来讲，是“决断”的时刻，是变革的转折点；从词源上来讲，是古希腊人留给今天全球化世界的另一个词汇遗产。但是，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谈论希腊的其他地方，在过去的10年里，“危机”的含义已经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指决定性的时刻，而是指一种状态。正如人们看到的，那种状态的部分本质是，国家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或无所作为。这与“危机”的正常词义大相径庭。正因如此，本章提到希腊2010年后的“危机”状态时，就会给这个词打上双引号。在希腊，“危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完全因突然贫困的影响而产生。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像希腊经济那样在5年之内足足萎缩了1/4，国民养老金和收入至少降低了1/4，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率更是接近60%。希腊2015年7月实施的资本管

控和银行账户限制，直到2018年9月都没有被解除。

除了明显的经济损失，这些影响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更深远，也可能更持久。自冷战结束以来，希腊社会经历了快速的、不平衡的变革。自2003年中东战乱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东难民前往欧洲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借道希腊，尤其是2013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难民，已经入不敷出的希腊政府和私人慈善团体不得不负责他们的生存和福利。仅2015年上半年，自土耳其抵达爱琴海东部群岛的难民人数就有10多万，2015年是难民人数最多的一年。2016年，难民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其他在北面的国家封闭了国境，开始搭建围栏，将难民拒于国境线之外。这种措施并不适用于希腊，因为希腊有数百个岛屿，其大陆也三面环海。因此，上万人滞留在一个他们本来不愿意停留的国家。结果是希腊的社会服务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让已经在内部“危机”中苦苦挣扎的社会雪上加霜。

新的难民潮或移民潮的到来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希腊自1923年以来，再次有了相对数量的穆斯林居民。历史的记忆很难被抹去，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有人第一次提出在雅典兴建一座清真寺，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多年激烈的争论。虽然希腊在2016年确定了选址，批准了建设计划，但是在本书完成之时，那座清真寺还没有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也大大增加。战后的希腊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乎没有街道犯罪和抢劫。希腊“危机”改变了所有美好的一切。即便在雅典最富有的社区、贫困迹象最少的地方以及设计优美和维护良好的地铁上，抢劫犯罪也时有发生。雅典西部郊区的大片地区，甚至包括某些靠近市中心的地区，已经成为警察和守法公民都不能进的“禁区”，被人贩子和毒贩子等黑社会成员控制。这些黑社会盘剥欺诈那些在“危机”中变得无家可归的希腊人以及没有合法身份

的移民。据说，走投无路的居民求助于极右政党金色黎明的非法武装组织，以求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因为希腊的警力严重不足，且警察士气低落，甚至与黑社会成员同流合污，根本不能保护市民的安全。

一般来说，人们上街示威后的几年内，绝望和颓废的浪潮就会出现。尽管希腊缺乏暴力疏通的渠道并受到幻灭和失去希望的影响，但其社会秩序还没有崩溃，因为希腊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包括最重要的传统的家庭单位，以及基于现金和以物易物的黑市经营。许多希腊人不怎么信任银行，多年来，银行的官僚衙门程序从机制设计上看，简直就不是为客户服务的。如果你要找一些其他的做生意的方式，那么这也不难。那些有能力的人离开希腊到国外工作了。从前，历代希腊人一直生活在希腊这片国土上，在民族国家20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远比这次严重的“危机”更恶劣的条件。帮助希腊人渡过难关的是他们的忍耐或韬光养晦的特质。尽管与以前一样，希腊如今遇到的依然是困境，但希腊目前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希腊需要做出生死抉择，如果希腊人还是只依靠古老的、传统的特质继续前行，那么其前景将一片暗淡。

说是这么说，但在“危机”的阴影下，有些领域还是能为希腊人带来希望，比如文化和艺术领域。从传统上说，诗歌是希腊人用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所依仗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繁荣，催生了新的形式、新的种类和新的环境。有些最新的希腊诗人（移民身份）能同时用他们的母语和希腊语进行双语创作。用最近的一部英文版的希腊诗歌选集的编辑的话来说：“所有的希腊诗歌以不同的形式见证了‘如今希腊与巴尔干半岛上的人们生活的艰难’，但同时也‘带给人们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新途径’。”^[13]在文学方面，小说家继续拓宽他们的题材，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表现与希腊迥然不同的情况，或者塑造与希腊有关的代表“他者”的人物形象。也许由于如今希腊的犯罪率极高，侦探小说终于自成一派，进入鼎盛时期。帕特罗斯·马卡里斯创作的几部犯罪小说都很畅销，小说的主角是词典爱好者、检察官哈若托斯，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他的《危机三部曲》在2010—2012年出版，以含沙射影和尖酸刻薄的方式描述了处于“危机”最初几年的希腊人民的日常生活。

其他的艺术形式也“在希腊危机中出现了爆发性的创新，尤其是在戏剧、电影和表演方面”。^[14]以基尔戈斯·兰西莫斯、亚历桑德罗·阿万纳斯为代表的希腊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在海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电影甚至是用英语拍摄的。古典和“艺术”音乐的传统里，出现了新的曲目和公众演出。自“危机”以来，雅典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中心，其上演了一些令人惊叹的节目。例如，2010年启用的奥纳西斯文化中心以及2017年3月建成的、包含新歌剧院和国家图书馆在内的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文化中心。这两个新的文化中心都是希腊经济取得极大成功的体现，这种成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个时候的经济收益从传统上来说都是来自国境之外，也就是通过船运获得。2017年在雅典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国际艺术展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总计接待了3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雅典的街头艺术也从以前的胡乱政治涂鸦、大学校园的“牛皮癣”升华成了繁荣、睿智、勇悍、有创造性的另一种艺术形式。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希腊与欧盟签署的救助备忘录在有些人眼里还是有效的，至少在受到资助方面，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从数据上来看，萨马拉斯政府在2014年年底成功实现了基本的财政盈余，其后的政府在2018年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2017年，至少在一位希腊经济学家看来，希腊民众的观念有所

改变，不再那么反对政府负债，并开始赞成“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约束”。这一观念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夏季以后，正是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执政联盟的政策出现实用性转向之时。^[15]

经过三年半的执政，曾经位于政治边缘的极左党派激进左翼联盟逐步演变成了它之前替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泛希社运。自2015年7月的惊人反转之后，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不仅没有感到有损自己颜面，反而继续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好像全靠他的个人魅力和权威，与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成功的总理的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执政的扬尼斯·科莱特斯。如果当下的激进左翼联盟真正取代了泛希社运，那么齐普拉斯则是新一代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齐普拉斯的仕途之路起步于共产党左派，靠着呼吁实现希腊自给自足的国家民粹主义理想成为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国内和欧洲权力现实的影响下，其执政权力很快就会被削弱。

对希腊而言，目前最好的消息是，之前预言的种种最坏情况至今为止尚未发生。例如，希腊没有发生国家违约，也没有从欧元区退出，当然也就没有出现脱欧混乱；希腊的公共秩序没有崩溃，最近几十年在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威胁国家主权完整的分裂运动，并没有在希腊出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掀起的地区独立运动以及在某些更大的地区发生的自治运动，都没有在希腊发生。在希腊历史中，大规模的起义和运动都是在统一愿望的驱动下发生的。大雅典地区之外的希腊有将近一半的希腊人口，他们大多拥有很强的地区身份认同。不过，哪怕是在身份认同情感最强烈、最有可能独立的克里特岛，也从来没有哪个政党严肃地提出过从希腊分裂出去的主张。尽管经济危机给希腊带来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截至目前，希腊都没有出现任何闹独立的潜在威胁。

在另一个希腊族国家——塞浦路斯，情况则大为不同。1960年之后，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逐渐对立，后来又因为地理上的分隔，两族对立越发严重。现在塞浦路斯同样陷入了这场危机，但是它和希腊相似的处境已经结束。2012年希腊第二次签订救助备忘录以后，塞浦路斯金融业因为希腊银行的债务减记而损失惨重。2013年3月，塞浦路斯政府也面临国家违约的风险，不得不向欧盟寻求援助。自此，塞浦路斯政府施加了资本管控，银行存款支取数额也受到了限制。在之后的2015年，希腊也实行了这两项措施。比起希腊，欧盟给塞浦路斯开出的条件更高，塞浦路斯的第二大银行被迫破产，所有银行的储户损失了高达10%的存款。2013年3—4月，塞浦路斯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同时期的希腊大得多。塞浦路斯的民营经济承受了巨大损失，企业纷纷倒闭。但是，公共领域的情况要好一些，其构筑了防御危机的堤坝。几个月后，银行存款支取数额的限制就解除了。两年之后，外汇管制也取消了。

2015年夏，在希腊经济再次崩溃、希腊第三次向欧盟求援时，塞浦路斯的经济已经从危险中走了出来。自1974年民族流血冲突之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再一次证明自己具有在短时间内摆脱经济危机的能力，希腊人却不行，一直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两个国家同本同源，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就是它们之间越来越多的差异的一个明证。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欧盟援助和希腊主权债务这个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是这场越来越深的“危机”中的一个问题。从最底层分析，这场危机其实是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10年“危机”带来的新的重压下，各行各业的希腊人（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希腊）都发现自己不得不停下来反省思考，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历史，看看伴随自己成长的价值观，看看自己的身

份认同和世界归属。希腊政府重申自己属于西方阵营，也就是属于现在代表西方的欧盟，是整个欧洲文化圈的一部分。不过，希腊的欧盟之路再一次证明，希腊与欧洲的融合充满艰难险阻，而且付出的代价巨大。

根据调查和民意统计，支持希腊留在欧盟和欧元区的选民人数有所减少，不过即便是现在，希腊也没有出现多数选民支持脱欧的迹象。一份2017年年底发布的私人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希腊公投时，留欧派占69%；而到了2016年年底，这个比例下降至53%。最近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也在希腊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源自“雅典理工大学风暴”的反美主义，正在向反德方面发展，这形成了对德国的敌视，因为德国被看作造成希腊财政紧缩的罪魁祸首。在一些报纸漫画里，德国财政部前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身着纳粹军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成了希特勒的化身。^[16]10年“危机”在一些地方引发了要求德国为其二战期间对希腊所犯暴行进行赔款的呼声。更令人讶异的是，德国被要求归还德意志帝国占领希腊时强制从希腊国家银行借出的款项。这些呼声在2015年“希腊之春”时最强烈，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

民粹主义抬头造成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催生了金色黎明。它在当今的希腊政坛已站稳脚跟，民调显示其影响力大约占7%。也就是说，其影响力与最近100年中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共产党的影响力差不多。至少，金色黎明只与有着共同生物祖先的种族缔结联盟，特别是奉行军国主义的、反民主的斯巴达人。希腊政治图谱的另一边，是与右翼民粹对立的试图追随之前的俄国及苏联的左派。此前，大约30名因抗议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而退党的来自激进左翼联盟的议会议员，正属于那些左派。在2015年“希腊之春”运动期间，对他们以及齐普拉斯来说，如果“进一步融入欧

洲”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一个审慎的备选方案就是复兴与俄罗斯密切相关的古老梦想。

与俄罗斯亲近并不是希腊人的臆想。激进左翼联盟首次控制政府后，就派遣不止一名内阁成员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齐普拉斯也于2015年4月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2013年年底，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形势最为焦灼紧张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曾设想将希腊、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邀入俄罗斯总统倡议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12月，普京在一场演讲中说：“由于信仰同一种宗教，我们与希腊有特殊的关系。”^[17]而齐普拉斯作为回报，在上台一个月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

就在希腊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在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周旋磋商的时候，其他希腊政要也在寻求向俄罗斯借款的可能性。如果谈判成功，那么希腊或许就不用再接受“三驾马车”的援助，或者最起码在退出欧元区的时候，谈判成果能为希腊提供一个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不过，普京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希腊并无太多的兴趣。据说，齐普拉斯在公投当天晚上得知普京拒绝了希腊政府的贷款请求后，希腊对于与欧盟签署救助备忘录的态度便彻底改变了。^[18]

在希腊民众以及不少政府高层甚至最高层的眼里，希腊仍属于东正教或因复杂历史关系而形成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寻求希腊或塞浦路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想法在2013年可能显得有点儿操之过急。不过，俄罗斯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以塞浦路斯为例，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提供资金，但是塞浦路斯能在2013年恢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俄罗斯民间投资的几笔令西方观察者担忧的大钱。如今，在尼科西亚的餐馆里，菜单上不仅有希腊语和英语，还有俄语。如果你抵

达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国际机场，那么迎接你的是房地产公司的俄语广告。有权有势的俄罗斯“寡头”被授予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身份，因此也就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身份。2018年3月，当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因俄罗斯涉嫌在英国使用被禁止的神经毒剂而驱逐自己国家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不应和此举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目前来看，希腊大多数的“危机”应对措施不是“评古”就是“论今”。所谓“评古”，就是寻找并依赖历史上的行之有效的资源和策略；所谓“论今”，就是放低姿态寻求未实践过的新途径。不过，无论希腊采取哪种应对措施，“危机”中还有一个反复发生的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还需要用一些比喻。自2010年以来，希腊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或者变成了实验对象，也就是“天竺鼠”或实验动物。在所有比喻中，最令人后背发凉的比喻是“矿井中的金丝雀”。在矿井中放置这个笼中鸟的目的，是让鸟发现人类感知不到的有毒气体，并给人类警告。如果笼子里的金丝雀死了，那么矿工在窒息前还有时间逃出矿井。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就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丝雀。这些组织及其支撑起来的全球金融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脆弱不堪。依据上述比喻的逻辑，希腊就是这些组织放在笼中的弱小的“金丝雀”，即在危机来临之时，为了更多国家的利益，希腊可以被牺牲。

这些比喻及其表述很不受希腊人的待见，但是希腊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常常将这些比喻挂在嘴边，唯一的作用是向世人强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在希腊大众文化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另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先锋”。

所谓的“先锋”是先于大军进入战场、提前为大军探路的步

兵。如此来说，先锋与金丝雀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先锋即便要服从命令采取行动，也依然拥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他可能为了保护队友负伤，乃至献出生命；另一方面，他可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找到安全的通道，引领战友走向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作家乔治斯·塞奥托卡斯1929年在一次很大的民族灾难后，用他的笔召唤“勇敢的先锋”走出希腊，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去，以实现希腊文化的复兴。

对希腊来说，这场“危机”以及接下来的数年不仅仅会带来更明显的威胁，也一定会带来机遇。希腊是通过救助备忘录得到援助的第一个国家，这个救助备忘录是“三驾马车”专门建立的。希腊也是唯一一个通过救助备忘录机制得到3次经济援助的国家。希腊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忍耐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政府与人民最终都经受住了考验。欧洲、欧元和欧元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比以往更强了，这多亏了希腊这个“先锋”。正是由于希腊承担了风险，欧洲的强大才有了可能。

在200年前的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是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旧欧洲塑造成现在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新欧洲的先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希腊和希腊人在今后还会一直秉持“西方”的价值观、传统和政治。考虑到地缘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希腊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是，在2021年希腊庆祝建立国家200周年之时，希腊人都应该为他们取得成就的方式而感到自豪。这种方式是，他们的成就从一开始就是循着自己的本性，经过艰难的每一步，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赢得的，而不是通过闭关锁国取得的。如此成就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因为不论人们理解希腊还是误解希腊，希腊从来都是现代欧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1] Stathis Kalyvas, *Modern Greec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3, 156.

[2] 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s Papadimitriou, *Prime Ministers in Greece: The Paradox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9.

[3] Giannis Voulgaris, *Η μοιραία πενταετία. Η πολιτική της αδράνειας, 2004–2009* [The Fateful Five Years: The Politics of Inaction, 2004–2009.] (Athens: Polis, 2011), 311 (10 January 2009); Kostas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388–9.

[4] George Papaconstantinou, *Game Ove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Greek Crisis* (English edition privately published, 2016), 30–40 (37 quoted).

[5] Loukas Tsoukalis, *In Defence of Europe: Can the European Project be Sav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89.

[6] Kalyvas, *Modern Greece*, 163.

[7] For the period 1974–2000, see David Close, *Greece since 1945: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2002), 168–70; for 1999–2015, Miranda Xafa, 'Back from the brink: How to end Greece's seemingly interminable crisis', in Spyros Economides (ed.), *Greece: Modernisation and Europe 20 Years 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llenic Observatory, 2017), 46–53.

[8]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416; Dimitris Tziovas (ed.), *Greece in Crisi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usterity* (London: I. B. Tauris, 2017), 26.

[9] Yanis Varoufakis, *Adults in the Room: My Battle with Europe's Deep Establishment* (London: Bodley Head, 2017), 237 (quoted); Johanna Hanink, *The Classical Debt: Greek Antiquity in an Era of Auste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0, 223, citing headlines in the German press from 2010.

[10] Varoufakis, *Adults*, 469.

[11] Varoufakis, *Adults*, 48; Hanink, *Classical Debt*, 219.

[12] Varoufakis, *Adults*, 474.

[13] Karen van Dyck (ed.), *Austerity Measures: The New Greek Poetry*

(London: Penguin, 2016), xviii.

[14] Tziovas (ed.), *Greece in Crisis*, 4.

[15] George Pagoulatos, 'From project modernisation to forced adjustment: two decades of incomplete reforms (1996–2016)', in Spyros Economides (ed.), *Greece: Modernisation and Europe 20 Years 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llenic Observatory, 2017), 37–45 (44 quoted).

[16] Tziovas (ed.), *Greece in Crisis*, 30; see also Hanink, *Classical Debt*, 255–7.

[17] Denis Vovchenko, *Containing Balkan Nationalism: Imperial Russia and Ottoman Christians, 1856–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29.

[18] Kosti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421.

资料来源及延伸阅读

18世纪以来的希腊历史和文化

Beaton, Roderick,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Beaton, Roderick and David Ricks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Nationalism, Romanticism, and the Uses of the Past (1797–1896)* (Farnham: Ashgate, 2009)

Campbell, John and Philip Sherrard, *Modern Greece* (London: Benn, 1968)

Clogg, Richard, *A Concise History of Greece*, 3r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Dakin, Douglas, *The Unification of Greece, 1770–1923* (London: Benn, 1972)

Fleming, K. E., *Greece: A Jewish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allant, Thomas, *Modern Greece: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2nd edn (London: Bloomsbury, 2016)

Gallant, Thomas,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768 to 1913*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Hamilakis, Yannis, *The Nation and its Ruins: Antiquity,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olland, Robert and Diana Markides, *The British and the Hellenes: Struggles for Master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1850–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alyvas, Stathis, *Modern Greec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Koliopoulos, John, *Brigands with a Cause: Brigandage and Irredentism in Modern Greece 1821–191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Koliopoulos, John and Thanos Veremis,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from 1821 to the Present* (London: Hurst, 2002)

Koliopoulos, John and Thanos Veremis, *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 (Hoboken, NY: Wiley, 2009)

Kostis, Kostas, *History's Spoiled Childre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Greek State*, trans. Jacob Moe (London: Hurst, 2018;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in 2013)

Mackridge, Peter,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reece, 1766–19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zower, Mark, *The Balka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0)

Veremis, Thanos,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17)

Veremis, Thanos, *The Military in Greek Politics: From Independence to Democracy* (London: Hurst, 1997)

Wagstaff, J. M. (ed.), *Greece: Ethnicity and So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oodhouse, C. M., *Modern Greece: A Short History*, 5th edn, revised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 .rst edition 1968)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相遇

跨越边界：行动中的人、思想以及商品

Frary, Lucien,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k Identity, 1821–18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Greene, Molly, *The Edinburgh History of the Greeks, 1453–1768: The Ottoman Empi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Kitromilides, Paschalis,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Kitromilides, Paschalis (ed.),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in the Orthodox World*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6)

Myrogiannis, Stratos, *The Emergence of a Greek Identity (1700–1821)*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2)

Philliou, Christine, *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古老土地上的旅行者

Constantine, Davi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Gods: Travellers to Greece and the Quest for the Hellenic Ideal* (London: I. B. Tauris, 2011)

Eisner, Robert, *Travelers to an Antique Lan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Pollard, Lucy, *The Quest for Classical Greece: Early Modern Travel to the Greek World* (London: I. B. Tauris, 2015)

Spencer, Terence, *Fair Greece Sad Relic: Literary Philhellenism from Shakespeare to Byr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4)

农民、渔夫、僧侣

Alexander, John, *Brigandage and Public Order in the Morea 1685–1806* (Athens: n.p., 1985)

Beaton, Roderick, *Folk Poet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reprinted 2004)

Campbell, John, *Honour, Family, and Patronage: A Study of Institutions and Moral Values in a Greek Mountain*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first published 1964)

Herzfeld, Michael, *Ours Once More: Folklore,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reprinted New York: Pella, 1986)

Roudometof, Victor, 'From Rum millet to Greek nation: Enlightenment, secular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Ottoman Balkan society, 1453– 1821', *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 16 (1998), 11–48

第二章 种下一粒种子

动荡不安的世界

Alexander, John, *Brigandage and Public Order in the Morea 1685–1806* (Athens: n.p., 1985)

Fleming, K. E., *The Muslim Bonaparte: Diplomacy and Orientalism in Ali Pasha's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hilliou, Christine, *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ratt, Michael, *Britain's Greek Empire: Reflections on the Ionian Islands from the Fall of Byzantium* (London: Collings, 1978)

Vucinich, Wayne S. (ed.), *The First Serbian Uprising, 1804–1813* (Boulder, CO: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982)

革命思想

Clogg, Richard (ed. and trans.),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Dascalakis, A., *Rhigas Velestinli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réludes de l'Indépendance hellénique* (Paris, n.p., 1937)

Kitromilides, Paschalis,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Kitromilides, Paschalis, 'From republican patriotism to national sentiment: A reading of Hellenic Nom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5 (2006), 50–60

Kitromilides, Paschalis (ed.), *Adamantios Korais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0)

López Villalba, María, 'Balkaniz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Rhigas's New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n Dimitris Tziouvas (ed.), *Greece and the Balkans: Identities, Perceptions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Aldershot: Ashgate, 2003), 141–54

Myrogiannis, Stratos, *The Emergence of a Greek Identity (1700–1821)*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2)

Woodhouse, C. M., *Rhigas Velestinlis: The Proto-Martyr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Limni, Evia: Denise Harvey, 1995)

黑暗中孕育的东西

Angelomatis-Tsougarakis, Helen, *The Eve of the Greek Revival: British Travellers' Perceptions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1990)

Xanthos, E., 'Memoirs of Emmanouil Xanthos' (1845), translated in Richard Clogg (ed. and trans.),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182–200

第三章 浴血而生

Abney-Hastings, Maurice, *Commander of the Karteria* (Bloomington, IN: Author House, 2011)

Barau, Denys, *La Cause des Grecs. Une histoire du mouvement philhellène (1821– 1829)*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9)

Bass, Gary, *Freedom's Battle: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Vintage, 2009)

Brewer, David, *The Flame of Freed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 1833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Dakin, Douglas, *The Greek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Batsford, 1973)

Finlay, George,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1861)

Gordon, Thomas, *History of the Greek Revolution*,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1832)

Ilicak, Hüseyin Şükrü,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empire: Ottoma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26)'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Koukkou, Helen, Ioannis A. Kapodistrias: *The European Diplomat and Statesman of the 19th Century*. Roxandra S. Stourdza: *A Famous Woman of her Time. A Historical Biography*, trans. E. Ghikas (Athens: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Greek History, 2001)

Pizanias, Petros (ed.), *The Greek Revolution of 1821: A European Event* (Istanbul: Isis Press, 2011; Greek original published 2009)

Rodogno, Davide, *Against Massacr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15–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 Clair, William,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The Philhellene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Open Book, 2008; first published 1972)

Woodhouse, C. M., Capodistria: The Founder of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Woodhouse, C. M., The Battle of Navarino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65)

第四章 蹣跚學步

Bastéa, Eleni, The Creation of Modern Athens: Planning the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azer, Charles,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Independent Greece, 1821–18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Koubourlis, Ioannis, La Formation de l'histoire nationale grecque. L'Apport de Spyridon Zambélios (1815–1881) (Athen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Néo-Helléniques, 2005)

Petropoulos, John,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Kingdom of Greece, 1833–184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olitis, Alexis, Ρομαντική. χρονία. Ιδεολογία. και νοοτροπία. στην Ελλάδα του 1830–1880 [Romantic Years: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Mnimon, 1993)

Skopetea, Elli, Το .πρωτότυπο βασίλειο. και η Μεγ.λη Ιδ.α. όψει. του εθνικού. προα-οβλ.ματος. στην Ελλάδα (1830–1880) [The 'Model Kingdom' and the Grand Idea: Aspects of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Polytypo, 1988)

第五章 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痛苦

扩张的政治

Carabott, Philip (ed.), *Greek Society in the Making, 1863–1913: Realities, Symbols and Visions* (Aldershot: Ashgate, 1997)

Christmas, Walter, *King George of Greece* (New York: McBride, Nast, 1914)

Finlay, George,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7) Jenkins, Romilly, *The Dilessi Murder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61)

Prevelakis, Eleutherio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Change of Dynasty in Greece* (Athens: n.p., 1953)

Skopetea, Elli, *Το .πραγ.τυπο βασιλειο. και η Μεγ.λη Ιδ.α. όψει. του εθνικο. πραγ-οβλ.ματο. στην Ελλ.δα (1830–1880)* [The ‘Model Kingdom’ and the Grand Idea: Aspects of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Greece (1830–1880)] (Athens: Polytypo, 1988)

Vovchenko, Denis, *Containing Balkan Nationalism: Imperial Russia and Ottoman Christians, 1856–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民族国家及其界限

Augustinos, Gerasimos, *The Greeks of Asia Mino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logg, Richard (ed.), *The Greek Diaspor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Detorakis, Theocharis, *History of Crete*, trans. John Davis (Heraklion, Crete: n.p., 1994)

Doumanis, Nicholas, *Before the Nation: Muslim-Christian Coexistence and its Destruction in Late-Ottoman Anatol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Gondicas, Dimitri and Charles Issawi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Darwin Press, 1999)

Hill,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Mazower, Mark,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4)

Şenışık, Pina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Crete: Revolts,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2011)

Vassiadis, George, *The Syllogos Movement of Constantinople and Ottoman Greek Education, 1861–1923* (Athens: Centre for Asia Minor Studies, 2007)

胜利和灾难

Ashmead Bartlett, E., *The Battlefields of Thessaly* (London: John Murray, 1897)

Kitroeff, Alexander, *Wrestling with the Ancients: Modern Greek Identity and the Olympics* (New York: Greekworks.com, 2004)

Levandis, John, *The Greek Foreign Debt and the Great Powers, 1821–189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Llewellyn Smith, Michael, *Olympics in Athens 1896* (London: Pro.le, 2004)

第六章 军事行动

国内的颓废

Augustinos, Gerasimos,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Nationalist Critics of Greek Society, 1897–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77)

Gauntlett, Stathis, *Rebetika, carmina Graeciae recentioris* [in English] (Athens: Denise Harvey, 1985)

国外的行动

Dakin, Douglas, *The Greek Struggle in Macedonia, 1897–1913* (Thessaloniki: Institute of Balkan Studies, 1966)

Karakasidou, Anastasia, *Fields of Wheat, Hills of Blood:*

Passages to Nationhood in Greek Macedonia, 1870–199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Mandamadiotou, Maria, The Greek Orthodox Community of Mytilene: Betwee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Greek State, 1876–1912 (Bern: Peter Lang, 2013)

Mazower, Mark,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Veremis, Thanos, “The Hellenic Kingdom and the Ottoman Greeks: The experiment of the “Society of Constantinople”, in Dimitri Gondicas and Charles Issawi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Darwin Press, 1999), 181–91

Yosmaoğlu, İpek,, Blood Ties: Religion,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 in Ottoman Macedonia, 1878–190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拿起武器

Kitromilides, Paschalis (ed.), Eleftherios Venizelos: The Trials of Statesmanship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pacosma, S. Victor, The Military in Greek Politics: The 1909 Coup d'état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战事纷起

Hall, Richard,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Prelude to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2)

McMeekin, Sean,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London: Allen Lane, 2015)

第七章 自我分裂

Housepian Dobkin, Marjorie, *Smyrna 1922: 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London: Faber, 1972)

Leon, George, *Greec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14–1917* (Thessaloni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1974)

Llewellyn Smith, Michael, *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 Hurst, 1998; first published 1973)

Mackenzie, Compton, *Greek Memories* (London: Biteback, 2011; first published 1932)

Mango, Andrew, *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Mavrogordatos, Giorgos, 1915. *Ο Εθνικός Διχασμός* [1915: *The National Schism*] (Athens: Patakis, 2015)

Milton, Giles, *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 The Destruction of Islam's City of Tolerance* (London: Sceptre, 2008)

Pentzopoulos, Dimitri, *The Balkan Exchange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2; reprinted with a new preface by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London: Hurst, 2002)

Petsalis-Diomidis, N., Greece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Thessaloni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 1978)

Toynbee, Arnold, 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A Study in the Contact of Civilisations (London: Constable, 1922)

第八章 从头再来

复苏和重建

Clark, Bruce, Twice a Stranger: Greece, Turkey and the Minorities they Expelled (London: Granta, 2006)

Hirschon, Renée (ed.), Crossing the Aegean: An Appraisal of the 1923 Compulsory Population Exchange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Oxford: Berghahn, 2003)

Lytra, Vally (ed.), When Greeks and Turks Mee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since 1923 (Farnham: Ashgate, 2014)

Pentzopoulos, Dimitri, The Balkan Exchange of Minorities and its Impact on Greec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1962; reprinted with a new preface by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London: Hurst, 2002) Tziovas, Dimitris (ed.), Greek Modernism and Beyond (Lanham, MD,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eld, 1997)

政客和军人

Mavrogordatos, George, Stillborn Republic: 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Greece, 1922–193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azower, Mark, Greece and the Inter-War Economic Cri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政治断层转移、最后通牒

Butterworth, Katharine and Sara Schneider (eds), Rebetika: Songs from the Old Greek Underworld (Athens: Aiora, 2014; .rst published 1974)

Gauntlett, Stathis, Rebetika, carmina Graeciae recentioris [in English] (Athens: Denise Harvey, 1985)

Higham, Robin and Thanos Veremis (eds), Aspects of Greece, 1936–40: The Metaxas Dictatorship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1993)

Joachim, Joachim, Ioannis Metaxas: The Formative Years, 1871–1922 (Mannheim: Bibliopolis, 2000)

Kenna, Margaret,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Exile: Greek Political Detainees in the 1930s (Amsterdam: Harwood, 2001)

Kofas, Jon, Authoritarianism in Greece: The Metaxas Regime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Koliopoulos, John,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elt, Mogens, *Tobacco, Arms and Politics: Greece and Germany from World Crisis to World War 1929–41*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98)

Petrakis, Marina, *The Metaxas Myth: Dictat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Greece*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etropoulos, Elias, *Songs of the Greek Underworld: The Rebetika Tradition*, trans. Ed Emery (London: Saqi, 2000)

Vatikiotis, P. J., *Popular Autocracy in Greece, 1936–41* (London: Frank Cass, 1998)

第九章 彻底崩溃

Alexander, G. M.,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 British Policy in Greece, 1944–194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Baerentzen, Lars, 'The demonstration in Syntagma Square on Sunday the 3rd of December, 1944',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Modern Greek* 2 (1978), 3–52

Baerentzen, Lars, John Iatrides and Ole Smith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Civil War, 1945–1949*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87)

Beevor, Antony, *Crete: The Battle and the Resistance* (London: John Murray, 1991; Penguin, 1992)

Brewer, David, *Greece: The Decade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Civil War* (London: I. B. Tauris, 2016)

Carabott, Philip and Thanasis Sfikas (eds), *The Greek Civil War: Essays on a Conflict of Exceptionalism and Silences* (Aldershot: Ashgate, 2004)

Clogg, Richard (ed.), *Greece 1940–1949: Occupation, Resistance, Civil W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Close, Davi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vil War* (London: Longman, 1995)

Close, David (ed.),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19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Danforth, Loring and Riki van Boeschoten, *Children of the Greek Civil War: Refuge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Delis, Panagiotis,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 The battle of Athens, December 1944', *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 35 (2017), 211–37

Gerolymatos, André, *A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Greece, 1943–1949*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Hart, Janet, *New Voices in the Nation: Women and the Greek Resistance, 1941–196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tzipateras, Kostas and Maria Fafaliou (eds),

Μαραγκουραγ.ε. 41–44. Η Αθ.να τη. Κατοχ.. [Testimonies 1941–1944: Athens under Occupation], 2 vols (Athens: Kedros, 2002)

Higham, Robin, *Diary of a Disaster: British Aid to Greece, 1940–1941*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Hionidou, Violetta, *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 1941–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ondros, Joh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The Greek Agony, 1941–44* (New York: Pella, 1983)

Iatrides, John, *Revolt in Athens: The Greek Communist ‘Second Round’, 1944–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Iatrides, John (ed.), *Greece in the 1940s: A Nation in Crisis* (Hanover, NH,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1)

Iatrides, John and Linda Wrigley (eds), *Greece at the Crossroads: The Civil War and its Legacy* (Philadelphia, P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Kalyvas, Stathis, ‘Red Terror: 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 in Mark Mazower (ed.), *After the War was Over: Reconstructing the Family, Nation, and State in Greece, 1943–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2–83

Kalyvas, Stathi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oliopoulos, John,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Kousoulas, D. George, *Revolution and Defeat: The Story of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zower, Mark,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pastratis, Procopis, *British Policy towards Gree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lakoudas, Spyridon, *The Greek Civil War: Strategy,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Monarchy* (London: I. B. Tauris, 2017)

Richter, Heinz,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 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 trans. Marion Saras (London: Merlin, 1985)

Vlavianos, Haris, *Greece, 1941–49: From Resistance to Civil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Woodhouse, C. M., *The Apple of Discord: A Survey of Recent Greek Politics in their International Setting* (London: Hutchinson, 1948)

Woodhouse, C. M., *The Struggle for Greece, 1941–1949* (London: Hart-Davis, 1976;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Clogg: Hurst, 2002)

第十章 山姆大叔的庇佑

Close, David, *Greece since 1945: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2002)

McNeill, William, *The Metamorphosis of Greece since World War II* (Oxford: Blackwell, 1978)

Mazower, Mark (ed.), *After the War was Over: Reconstructing the Family, Nation, and State in Greece, 1943–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ller, James Ed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History and Power, 1950–1974*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被重新发现的民族

French, David, *Fighting EOKA: Th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on Cyprus, 1955–19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Hatzivassiliou, Evanthis,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yprus, 1955–5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odern Greek Studies Yearbook supplement*, 1997)

Holland, Robert, *Britain and the Revolt in Cyprus, 1954–195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Mayes, Stanley, Makarios: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81)

Stefanidis, Ioannis, Stirring the Greek Nation: Political Culture, Irredent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Post-War Greece, 1945–1967 (Aldershot: Ashgate, 2007)

Vryonis, Speros, The Mechanism of Catastrophe: The Turkish Pogrom of September 6–7, 1955,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Community of Istanbul (New York: Greekworks.com, 2005)

与佐尔巴斯一起跳舞

Hadjikyriacou, Achilleas, Masculinity and Gender in Greek Cinema, 1949–1967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Karalis, Vrasidas, A History of Greek Cinema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12)

Papanikolaou, Dimitris, Singing Poet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Music in France and Greece (London: Legenda, 2007)

Stassinopoulou, Maria, 'Reality bites: A feature .lm history of Greece, 1950 –1963' (Vienna: University of Vienna, Habilitationsschrift, 2000)

政治势力的碰撞、被固定在石膏夹板里

Draenos, Stan, Andreas Papandreou: The Making of a Greek Democrat and Political Maverick (London: I. B. Tauris, 2012)

Featherstone, Kevin and Dimitrios Katsoudas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Gree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onel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Ker-Lindsay, James, *The Cyprus Proble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Kornetis, Kostis, *Children of the Dictatorship: Student Resistanc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Long 1960s' in Greec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13)

van Dyck, Karen, *Kassandra and the Censors: Greek Poetry since 196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Woodhouse, C. M., *Karamanlis: The Restorer of Greek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Woodhouse, C. 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ek Colonels* (London: Granada, 1985)

第十一章 欧洲时代的到来

Clogg, Richard,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Greece: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London: Hurst, 1987)

Clogg, Richard (ed.), *Greece, 1981–89: The Populist Decad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Close, David, *Greece since 1945: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2002)

Danforth, Loring, *The Macedonian Conflict: Ethnic*

National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Featherstone, Kevin and Dimitris Papadimitriou, Prime Ministers in Greece: The Paradox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Giannaras, Chrestos, Orthodoxy and the West: Hellenic Self-Identity in the Modern Age, trans. P. Chamberas and N. Russell (Brookline, MA: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2006)

Kassimeris, George, Europe's Last Red Terrorists: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17 November (London: Hurst, 2001)

Kassimeris, George, Inside Greek Terrorism (London: Hurst, 2013)

Makrides, Vasilios, 'Byzantiu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The Neo-Orthodox current of ideas', in David Ricks and Paul Magdalino (eds), Byzantium and the Modern Greek Identity (Aldershot: Ashgate, 1998), 141–53

Mavrogordatos, George, Rise of the Green Sun: The Greek Election of 1981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Centre of Contemporary Greek Studies, 1983)

Roudometof, Victor and Vasilios Makrides (eds),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21st Century Greece (Farnham: Ashgate, 2010)

Spourdalakis, Michalis, The Rise of the Greek Socialist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88)

Varnava, Andrekos and Hubert Faustmann (eds),

Reunifying Cyprus: The Annan Plan and Beyond (London: I. B. Tauris, 2009)

Veremis, Thanos, Greeks and Turks in War and Peace (Athens: Athens News, 2007)

Woodhouse, C. M., Karamanlis: The Restorer of Greek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第十二章 中年危机

“危机”中的政治

Economides, Spyros (ed.), Greece: Modernisation and Europe 20 Years 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ellenic Observatory, 2017)

Karyotis, Georgios and Roman Gerodimos, The Politics of Extreme Austerity: Greece in the Eurozone Cri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Mitsopoulos, Michael and Theodore Pelagidis, Understanding the Crisis in Greece: From Boom to Bus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Ovenden, Kevin, Syriza: Inside the Labyrinth (London: Pluto, 2015)

Papaconstantinou, George, Game Ove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Greek Crisis (English edition privately published, 2016)

Triandafyllidou, Anna, Ruby Gropas and Hara Kouki (eds),

The Greek Crisis and European Modern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Tsoukalis, Loukas, In Defence of Europe: Can the European Project be Sav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zogopoulos, George, The Greek Crisis in the Media: Stereotyp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Farnham: Ashgate, 2013)

Varoufakis, Yanis, Adults in the Room: My Battle with Europe's Deep Establishment (London: Bodley Head, 2017)

Vasilopoulou, Sofia and Daphne Halikiopoulou, The Golden Dawn's 'National Solution':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Far Right in Gree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Verney, Susannah, 'Waking the "sleeping giant" or expressing domestic dissent? Mainstreaming Euroscepticism in crisis-stricken Gree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3 (2015), 279–95

与“危机”共存

Chiotis, Theodoros (ed. and trans.), Futures: Poetry of the Greek Crisis (London: Penned in the Margins, 2016)

Douzinis, Costas, Philosophy and Resistance in the Crisis: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2013)

Hamilakis, Yannis, 'Some debts can never be repaid: The archaeo-politics of the crisis', 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

34 (2016), 227–64

Hanink, Johanna, *The Classical Debt: Greek Antiquity in an Era of Auste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Knight, Daniel, *History, Time and Economic Crisis in Central Gree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Lemos, Natasha and Eleni Yannakakis (eds), *Critical Times, Critical Thoughts: Contemporary Greek Writers Discuss Facts and Fiction*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ine, Richard, *Greece through Irish Eyes* (Dublin: Liffey Press, 2015)

Tziovas, Dimitris, 'From junta to crisis: Modernization, consumerism and cultural dualisms in Greece',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41 (2017), 278–99

Tziovas, Dimitris (ed.), *Greece in Crisi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usterity* (London: I. B. Tauris, 2017)

van Dyck, Karen (ed.), *Austerity Measures: The New Greek Poetry* (London: Penguin, 2016)

致谢

此书的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机构和单位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对所有相关的人员和组织致以诚挚的感谢。对于后者，我最需要感谢的是伦敦国王学院，那几乎是我所有学术研究的基地；我还要感谢前拜占庭和现代希腊研究系（现更名为“古典系”）、希腊研究中心的前同事们。撰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利用图书馆的大量资源，否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图书馆是人文研究的“实验室”，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就英国而言，伦敦国王学院的毛姆图书馆所收藏的希腊语图书以及关于希腊和希腊人世界的期刊最多，它们都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收集而来的，具体馆藏于布罗斯收藏室和福伊尔特藏图书馆。在这些有着丰富藏书的图书馆中，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时间。我要特别感谢图书馆外联部经理特雷莎·埃尔姆斯以及特藏部主任凯蒂·萨姆布鲁克一直以来给我的大力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单位是雅典的英国学校，这是在英国科学院支持下开展前沿研究的一个学院。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研究生期间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我就与这所英国学校有了联系。这所学校的招待所以及与美国古典研究学校（那真是现代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个绿洲）共用的花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次去那儿都身心愉悦。我在那里利用其资料丰富和环境舒适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全天开放），并将那里作为利用希腊其他必要资源的基地。在其他资源中，最重要的是金纳迪乌斯图书馆，这是我写作本书时查找

到的资料最多的图书馆，它就在英国学校的对面。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工作人员也为我提供了帮助，其中有雅典大学、塞萨洛尼亚里士多德大学、克里特大学、国家希腊研究基金以及塞浦路斯大学。

我在本书的准备和研究中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有些人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为我提供了帮助，聊天的片段或某个研讨会上的学生提问，常常在很久以后给我启发，而当时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为本书分析希腊历史和文化提供帮助的人，并不都认可我的内容和观点。在有些方面，特别是我撰写本书后面几章的时候，我与受访者的谈话遵循了查达姆宫规则——尊重受访者的隐私。

这本著作的出版将带着企鹅出版公司的标识，我感到很自豪。书稿最终的形成归功于我的代理人费利西蒂·布赖恩以及艾伦·莱恩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西蒙·温德尔的热情。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关注我的这个研究项目，并一直给予我慷慨的支持、积极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特别幸运的是，本书的初稿得到了目光犀利的专家和读者的审读，比如，西蒙·温德尔，他是历史领域的多产作家；哈里斯·弗拉维亚诺，他是希腊美国学院的历史教授，还是希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很有社会影响力；我的儿子迈克，他攻读的第一个专业是历史专业。理查德·梅森对本书最后的文稿进行编辑排版，让本书成为集细腻、纯熟等特质于一身的风格和内容方面的典范，成为注重细节的样板。我还要感谢塞西莉·麦凯在图像处理方面为我提供的专业帮助。毋庸置疑，书中所有的不足以及对历史事实和观点的选择与阐释，都只与我个人有关。

罗德里克·比顿
于伦敦国王学院

2018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三百年 / (英) 罗德里克·比顿著 ; 姜智芹 , 王佳存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1.3

书名原文 : 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

ISBN 978-7-5217-2322-9

I. ①希... II. ①罗... ②姜... ③王... III. ①希腊 - 历史 IV. ① 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94709号

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 by Roderick Beaton

Copyright © 2019 by Roderick Bea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希腊三百年

著者 : [英] 罗德里克·比顿

译者 : 姜智芹 王佳存

审校 : 陈莹雪 阙建容 钱颖超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 : 453千字

版次 : 2021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 : 01-2019-5363

审图号 : 国审字 (2020) 6765号

书号 : ISBN 978-7-5217-2322-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Simone de Beauvoi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She has dark hair pulled back and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with a patterned colla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B e c o m i n g
B e a u v o i r

Simone de Beauvoir

成为波伏瓦

[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

刘海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成为波伏瓦

[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

刘海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 她是谁？

第一章 像个女孩一样长大

第二章 端方淑女

第三章 信仰上帝还是相信自己？

第四章 传奇之前的爱恋

第五章 女神和花花公子

第六章 她自己的房间

第七章 原本是四角恋的三角恋

第八章 内心的战争，外界的战争

第九章 被遗忘的哲学

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第十一章 美国困境

第十二章 备受诽谤的《第二性》

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第十五章 老年

第十六章 风烛残年

后记：西蒙娜·德·波伏瓦将会成为什么？

参考文献

致谢

图片来源

波伏瓦重要作品简称表

人名索引

快速地回想一下，所谓的文学经典里那些虚构的女性角色。我觉得她们之间的关系都太过于简单了。省略的东西太多，根本没有人尝试过……我们所看到的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在展示她们与男人的关系。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解放女性意味着不再把她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并不是割裂这种关系。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献给帕梅拉

怀着爱悼念

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她是谁？

1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并梦想着从中找到一种她可以身体力行的哲学理念。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对此，波伏瓦无法认同，她惊愕地反驳道，爱绝不仅仅是感激，不是我们因为别人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感到亏欠他们的东西。第二天，波伏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懂爱！”^[1]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也不知道她的人生经历会被后人如此大量书写，并广为流传。光是她的书信和自传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字^[2]，她的写作范围极广，囊括了哲学论著、获奖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旅行见闻、政治时评以及新闻报道——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是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当时年纪轻轻的波伏瓦也许想不到，之后的自己能够与人合办政治期刊，成功地推动立法，为遭受不公的阿尔及利亚人伸张正义，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甚至领导政府设立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成为20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让-保罗·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

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1986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讣闻标题里赫然写着：“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3]波伏瓦研究者托莉·莫伊教授在1994年写道：“在阅读现有的波伏瓦传记时，如果你会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她跟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们离经叛道的关系，这也是可以原谅的。”[4]

在这些文字写下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系列关于波伏瓦的新发现渐渐浮出水面，让很多原以为了解她的读者大吃一惊。但讽刺的是，这些发现并没有破除这样的错误认知——最有意思的是，波伏瓦的爱情生活，反而进一步掩盖了她思想家的身份。然而，让波伏瓦纵情一生并且不断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学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哲学的选择。”[5]

当波伏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执笔写作时，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读者。人们认为，波伏瓦最畅销的自传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即力图展现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6]。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然而，波伏瓦所表达的观点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除了与他者的联系，波伏瓦的自传背后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认识自我对于过好一生有多么重要。苏格拉底说，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人，你必须“认清你自己”；尼采写道，生而为人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对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学反驳：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

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所生活的时代见证了女性所能拥有的可能性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她的一生中（1908—1986），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接受大学教育，也获得了选举、离婚和避孕的权利。波伏瓦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亚风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在这些文化的转折点之间，波伏瓦《第二性》的面世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在这之后，女性能够公开地自我思考，甚至最终坦诚地谈论自己。波伏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在她的同辈人中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但尽管如此，当年近不惑的波伏瓦开始思考“作为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她还是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到了。

在20世纪，“女性主义”这个词争议不断，波伏瓦对长篇累牍的关于女性的愚蠢论点感到厌烦，为“女性主义的争吵不休”^[7]所浪费的大量笔墨也让她感到疲惫，因此，她决定创作《第二性》。但当波伏瓦落笔写下她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时，她并不知道这本书会给她以及追随者的人生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人们已经着墨很多去解读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本书中，我要探讨的则是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18岁时，波伏瓦写道，她认为她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的过程中；她说，读自己前一天写下的日记时，就像在读已经死去的一个个“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样。^[8]波伏瓦是一个哲学家，她始终反思和质疑她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义。

波伏瓦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经历至关重要，因此，这本传记是遵照她的生平年表展开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她之所以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希望“展现出变化、成熟的过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转的老去”。因为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徐徐展开，而波伏瓦想要“追随年轮的线索”[9]。在这一点上，波伏瓦依然是那个读亨利·柏格森的少女。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10]，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

波伏瓦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过一个被他人所看见的一生，还是不为他人所看见的一生更好？笛卡尔借用奥维德的话说：“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须不被看见。”[11]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而问题是，什么才是对的方式呢？这取决于谁在看你，以及在什么时候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刚刚年过50的女性，你最近决定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从少女时代写起，然后回顾自己风华正茂的过往，已经接连出版了两卷回忆录。在书里，你记录了自己21岁时和一个男人的对话，这个男人后来成了你的恋人，也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哲学家。虽然你和他一样功成名就，名驰天下，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女性写作还没有到达那个分水岭的时刻。那时的女性还不能公开承认她们的勃勃野心，也不能表达她们的愤怒，更不可说出那个名扬天下的大哲

学家满足不了她的性欲这样的话。想象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了传奇，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你的整个人生，虽然它只是你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

波伏瓦回忆录里的两个故事塑造了她的公众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扭曲了她的形象。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29年10月的巴黎，两个哲学系的毕业生坐在卢浮宫外面，大胆地讨论着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他们刚刚在竞争激烈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金榜题名（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马上就要开始他们哲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那一年，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按照回忆录里的故事记载，萨特不想要那种忠于彼此的传统伴侣关系，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按照这个约定，他们是彼此“本质的爱”，但同时他们准许对方同时拥有“偶然的爱”[12]。这是一段开放式关系，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心是属于对方的。他们对彼此毫无隐瞒，无话不说，刚开始是一个两年的契约，以后将会延续下去。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这对伴侣将会成为“一对值得效仿的楷模，他们拥有一场长久的秘密合谋，他们实现了卓越的成功。显然，他们实践了难以调和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始终保持自由、平等以及对彼此坦诚”。[13]

萨特和波伏瓦的多元恋“契约”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有许多本传记是专门围绕着他们的恋爱纠葛来写的；在《法国人如何创造了爱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一书中，作者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写他们俩；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头条称他们为“第一对摩登情侣”[14]。卡洛·莱维称波伏瓦的《盛年》（*The Prime of Life*）一书讲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15]。黑兹尔·罗利2008年出版的书中描写了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她写道：“就像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16]一样，萨特和波伏

瓦最终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是世界上的一对传奇的情侣。我们不能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分开来单独看待。”^[17]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传记，也是因为我们很难撇开波伏瓦或者萨特，去单独思考另一个。在此之前，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萨特的早期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怀疑波伏瓦和萨特受到的关注是不对等的。为什么波伏瓦去世时的每一篇讣告都提到了萨特，而在萨特去世时，却有一些讣告对波伏瓦只字未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波伏瓦都没有被人们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去看待。一部分原因是波伏瓦在自传里讲述的第二个故事。1929年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终于下定决心同萨特分享她在自己的笔记中酝酿了很久的一個哲学灵感：多元的道德（pluralist ethics）。然而，萨特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这一下子让波伏瓦对自己智识上的“真正能力”^[18]产生了怀疑。在那个法国哲学星光闪耀的年代，波伏瓦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那个夏天，年仅21岁的她成了有史以来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人。同萨特一样，那时崭露头角的哲学新秀莫里斯·梅洛-庞蒂也会找波伏瓦对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在生活里保持对话，并在出版物里对谈彼此的哲思。但即便如此，在后来的人生里，波伏瓦都坚称：“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文学作家，萨特才是哲学家。”^[19]

美第奇喷泉旁的这段对话让后人不禁发问：写出了《第二性》的波伏瓦是否低估了她自己，抑或是故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为什么她要这样做？波伏瓦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她有很多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她的所作所为更是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新的

道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20]。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显然也没有做到。这本传记正是要讲述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见和偏见里苦苦挣扎并勇敢反击的。

仔细阅读过波伏瓦传记的人常常会怀疑，波伏瓦是否在自传里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往往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那个爱情契约的故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誓要真相的女性形象，同时，《第二性》着力展现女性真实的境遇和遭逢。是否是因为公众的关注迫使波伏瓦放弃袒露真实的自我？如果不是，为什么她要隐藏起她哲学智识和个人生活里的重要部分，不让公众知道呢？为什么现在重新思考如何铭记她的人生尤为重要？

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来源于我们接触到的关于波伏瓦的新材料。波伏瓦的自传在1958年到1972年间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她一生中也写就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自传性的内容，比如1948年出版的西部美国游记，1957年出版的中国游记，1964年出版的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81年出版的关于萨特的回忆录，以及1983年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部分信件。^[21]

波伏瓦在世的时候，在萨特和她的小圈子，也就是那个被称为“萨特家族”——或简称“大家族”——的圈子里，不少人都自认为他们很了解波伏瓦写自传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写自传不过是为了塑造她自己和萨特的公众形象。很多人甚至认为波伏瓦这么做是出于嫉妒，认为她是想在萨特的罗曼史上独占鳌头，作为“本质的爱”被永远铭记。

然而在几十年后，1986年波伏瓦去世之后，她的日记和信件被公之于众，打破了小圈子里那些人一厢情愿的猜想。1983年波伏瓦出版了萨特写给她的信，因为曝光了他们关系的细节，波伏瓦失去了一些朋友。在波伏瓦去世后的第四年，她的战时日记以及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被出版了，很多人大吃一惊，发现原来波伏瓦不仅有过女同性恋关系，而且交往的恋人还是她之前的学生。她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友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哲学交流上的，人们也发现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很多讨论。[\[22\]](#)

1997年，波伏瓦写给她的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出版。这些信件的出版让大众看到了一个他们意料之外的波伏瓦：一个温柔敏感的西蒙娜，饱含激情地给情人纳尔逊写情书，而且这些情书比之前写给萨特的要热情百倍。直到2004年，她与雅克·洛朗·博斯特的信件出版，人们这才发现，在波伏瓦与萨特爱情契约的第一个十年里，波伏瓦就与别的男子有过十分热烈的爱恋，而且直到她生命结束，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大众原来的想象中，萨特才是那个站在波伏瓦和萨特浪漫情事顶峰上的神，但现在，他跌落了神坛。是萨特努力地让波伏瓦留在他哲学世界的中心，甚至公开承认她对他作品的重要影响。但是，评价波伏瓦的一生显然需要我们毫不留情地把萨特从那个中心位置移开。

在过去的十年里，更多的新材料和文件不断面世，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波伏瓦。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她在遇到萨特之前的哲学思考，以及她对他们俩关系的早期印象。这些材料让我们发现，波伏瓦真实的生活其实和她之前在回忆录里呈现给公众的相去甚远。但是这些日记是在2008年以法语出版的，因此只有学术小圈子里的研究者了解波伏瓦的这一段人生

经历。2018年，研究者们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材料，包括波伏瓦写给她的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他们发现，朗兹曼是唯一一个被波伏瓦用法语中最亲昵的第二人称“tu”去称呼的人。[23] 同年，波伏瓦的回忆录被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伽利玛出版社收录于七星文库中[24]，这个版本包括了波伏瓦之前从未出版过的日记和创作手记。除了这些新的法语出版物以外，最近几年，玛格丽特·西蒙斯和西尔维勒·邦·波伏瓦也一直在编辑一套波伏瓦系列丛书，她们搜集、翻译、出版和再版了很多波伏瓦早期的作品，不仅包括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哲学散文，还有给《时尚》（*Vogu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撰写的杂志文章。

根据这些新材料，我们发现，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隐去了很多内容。当然，这些省略背后不无原因。在如今这个充斥着各种媒体的网络时代，我们很难想象波伏瓦出版自传给当时的隐私惯例带来了多大的挑战。她的四本回忆录（如果算上她在母亲和萨特去世后写的两本回忆录，一共是六本回忆录）已经让她的读者对她的生活十分了解。而且波伏瓦并没有承诺说要交代所有细节。实际上，她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在自传里她有意地模糊了一些事情。[25]

从最新发现的材料，也就是波伏瓦的日记和给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里，我们可以发现，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模糊和隐去的不仅仅是她的情人们，还有她早期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哲学创作对萨特的影响。波伏瓦一生曾遭到不少人质疑，质疑她的学术能力和原创性。其中有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更有甚者，指控说波伏瓦的长篇巨著《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的两个假设，然后借此发挥出来的；也有人谴责她盲目地把萨

特的作品奉为圭臬[26]。虽然后来波伏瓦在她的一些作品里明确地反击了这些不实的指控，但这种怀疑和指控在她生前死后从未消停过。波伏瓦去世时，有一篇讣告说她只不过是萨特思想的普及者，另一篇更是贬低她“完全没有能力做哲学性的原创思考”[27]。

也许今天的读者会很愕然，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竟然会被谴责没有原创性。但是很遗憾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女性创作者都会面对这种指控，而且很多时候她们甚至内化了这种自我贬低和轻视。波伏瓦当然是有她自己的原创哲学思考的，而且其中一些和萨特的哲学论述很相像。波伏瓦曾有一次用萨特的署名发表了她自己的文章，当时萨特很忙，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萨特也承认，他那备受舆论好评的首部作品《恶心》（*Nausea*），之所以以小说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大部头形式呈现，实际上是波伏瓦帮他出的主意。在萨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波伏瓦一直帮他阅读手稿，提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波伏瓦写作和出版了不少哲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也批判了萨特，甚至最终改变了他的想法。在波伏瓦后来的作品中，她回应了那些污蔑她没有能力的指控，严正声明其实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她就有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只不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一样。当然了，萨特还是继续以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存在与虚无》这本书。实际上，很多人称为“萨特式”的思想其实并不完全是萨特自己独创的。但可惜的是，波伏瓦所做的关于她的哲学创作独立性和原创性的辩解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是有意无意地被无视了。

这就引出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波伏瓦的一生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传记往往能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社会真正在乎和重视的是什么。去了解另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其实能够

让我们对自己的时代和价值观有更多的认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她指出女性气质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投射和幻想。^[28]很多谬论的产生，是因为男性无法把女性当作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去对待。波伏瓦告诉我们，女性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创造。她们想要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爱人和被爱，因此当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时候，女性会感到痛苦。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的一年，她和自己的父亲有过一段关于爱情的争执。18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关于爱情，我憎恨几样东西。”^[29]其中一点便是，人们从来没有要求男性像女性一样把爱情当作自己的毕生理想。波伏瓦在一种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她接受到的教育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学会“像爱你自己一样地去爱你的邻居”。但在波伏瓦的经验中，她发现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在她的观察里，人们似乎总是要么过度自恋，要么不自爱，波伏瓦从书籍和真实生活里都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道德范例。

波伏瓦后来的情感生活有没有让她感到同样失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波伏瓦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一生要以哲学为伴，不断反思，用她的哲学思考去指导生活，自由地过一生。为了实现这一点，她尝试进行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同萨特保持终生的对话。在大众的想象里，波伏瓦和萨特被一个很模糊的词语捆绑在了一起：“爱”。而“爱”是波伏瓦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和认真审视的一个哲学概念，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波伏瓦一生的原因。

重新审视波伏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波伏瓦对于人们描述她人生的方式感到不满。她拒绝了传统婚姻，却被大众误会成了另一种情欲纠葛的老套情节。甚至在她去世后，很多人还

是用“女人想要什么”是一回事，但“女人真正能做到什么”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思路，来臆断她的一生。在他们的想象里，波伏瓦不仅沦为了萨特的爱情猎物，在智识上也对他甘拜下风。

在他们俩的关系里，波伏瓦之所以被看作受害者，是因为人们仍然坚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还是想要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只爱她。萨特和波伏瓦做了五十多年的传奇伴侣，在这期间，萨特无数次打着“偶然的爱情”的名义，去公开追求各种女性，拈花惹草。然而相比之下，波伏瓦就显得小巫见大巫，她的回忆录里只记载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偶然的爱情关系，而且都在她50岁出头的时候切断了联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隐去了其他的情人，但很多人都认为，是萨特巧妙地哄骗波伏瓦进入了这段不对等的关系里。他们相信，尽管波伏瓦和萨特一直没有结婚，但实际上萨特还是玩着已婚男人最熟悉的桥段：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有时候，波伏瓦的生活被描述成父权制的牺牲品，当然，这种看法影射的其实是，一个老去的知识女性远没有一个同样老去的知识男性有魅力。也有人认为，波伏瓦上当完全是因为她的愚蠢。她教过的学生比安卡·朗布兰是这样评价她的：波伏瓦拒绝婚姻和家庭，实际上是“亲手种下了她日后不幸的种子”^[30]。路易丝·梅纳德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波伏瓦是一个可敬的女性，但她也不是千年寒冰。尽管她有不少风流韵事，但她的文字却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能够独占萨特，她愿意不惜代价放弃一切。”

对比之下，波伏瓦学生时期的日记向我们呈现了故事的另一面。认识萨特之后的几周，波伏瓦感到很高兴能邂逅这样一个人，于是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

不可替代。”[31]在后来给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她向阿尔格伦解释道，萨特于她，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友谊。因为萨特并不是很在意性生活。波伏瓦坦言：“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尽管我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跟他相处之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渐渐地，我觉得继续跟他做情人不仅没用，甚至是不礼貌的。”[32]

这个所谓的“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会不会其实只是一段友情故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波伏瓦同样被描绘成了萨特的手下败将、父权制的受害者，以及她个人失败的产物。波伏瓦究竟有没有自己内化厌女症情结？她是不是对自己的哲学能力没有信心？很多人认为波伏瓦终其一生，只不过是“普及宣传”了萨特的思想。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来说，波伏瓦就好像一面反射放大镜，拥有“诱人的魔力，能够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实大小的两倍”。[33]更糟的是，有人指责波伏瓦就这样满足于做一个反射镜的角色。

我们很难判断波伏瓦这样的“从属”地位到底应该归咎于波伏瓦和萨特，还是我们文化里针对女性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系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专业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时，我们用的被动语态多于主动语态，各种消极负面的性别差异也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中。举个例子，“尽管身为女人，波伏瓦却可以像男人一样思考”。此外，在传播女性言论时，人们常常用转述和概括，而不是直接引用。

当代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出版物一直把波伏瓦定义为萨特背后的女人，甚至会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表述：

1947年2月22日，《纽约客》

“萨特身旁的女知识分子”；“你见过的最美的存在主义者”

1958年，威廉·巴雷特（哲学家）

“那个女人，他的朋友，就是写了女性抗议的书的那个”[\[34\]](#)

1974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性学者，萨特的信徒”

1986年，伦敦《泰晤士报》

“在政治和哲学思考中，她都追随他的指引”[\[35\]](#)

1987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的信徒和伴侣，一个热情的女性主义者”

1990年，戴尔德丽·贝尔，波伏瓦首本传记的作者

萨特的“伴侣”，她“应用、传播、澄清、支持、践行”了他的“哲学、美学、道德和政治思想”[\[36\]](#)

2001年，《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萨特的性奴？”[\[37\]](#)

因为许多波伏瓦自己的言论直到最近才被公布，所以很多有见地的评论者在此之前也都把她看作一个臣服在萨特光环下的被动角色。有人形容波伏瓦是“一个深柜里的哲学家”，分析说她是因为发现学识渊博和性别诱惑不可兼得，于是不愿承认自己有哲

学思考的能力，甘愿沦为萨特的附属品。[38]托莉·莫伊分析波伏瓦的爱情时写道，与萨特的关系是波伏瓦生命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甚至她一贯的批判精神在这儿都失灵了。[39]贝尔·胡克斯认为“波伏瓦被动地接受了萨特挪用她的哲学灵感而不承认出处的做法”。[40]但在波伏瓦心里，尤其是在与萨特相处的早期阶段，她对萨特是怀有批判态度的。她也为自己的哲学思考原创性辩解过。当然，这些批判和辩解都是波伏瓦在后半生看到人们总是误解萨特对她的影响，给出很多不实的指控和一边倒的论调之后，才逐渐强烈起来。

除了被刻画成一个受剥削的受害者之外，波伏瓦也被描绘成一个陷害他人的坏女人。波伏瓦去世后，她在“二战”期间写给萨特的信件和她自己的日记相继出版。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波伏瓦曾经和三位年轻女子有过性爱关系，而且她们都是波伏瓦曾经的学生。她们中有人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性伴侣。于是有人认为波伏瓦是故意把比她年轻很多的女子作为猎物，引诱她们进入不平等的关系中。波伏瓦真的是特地为萨特去诱骗这些年轻女性的吗？这对制定了传奇契约的伴侣显然都追求绝对的真相，并对彼此坦诚，这也是公众神化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他们的“三人行”细节曝光后，人们感到无比吃惊和恶心，波伏瓦和萨特的形象也轰然倒塌：“这两个言之凿凿地鼓吹要讲真话的人，竟然一直在对一群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孩子满嘴谎言。”[41]

但萨特和波伏瓦因这件事招致的鄙视和唾弃，又一次不在一个量级上。也许是因为波伏瓦是个女性，也许是因为她后来写就了《第二性》，人们接受不了她做出这般行为。2009年，波伏瓦的《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在英语国家出版，有个评论者觉得恶心至极，于是以“谎言与虚无”为题写了一篇评论，讽

刺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谎话连篇[42]。在有些读者的眼里，波伏瓦成了一个只顾她自己的自私者，她创作小说也只不过是因虚荣心作祟。1991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在英语国家出版的时候，理查德·赫勒评价波伏瓦是个“索然无味”的女人，感慨她的信件让人失望透顶，她自己却自我陶醉[43]。

当有些读者读到波伏瓦是如何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也许会忍不住从此放弃她。波伏瓦的一个女性情人，也是一个跟她保持了一辈子友谊的女性，后来在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出版之后也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读到波伏瓦那时候的信，看到波伏瓦那样描述自己，她感觉自己被利用，被背叛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集赞美和污名于一身的女性？这个因为私人生活和感情纠葛贬低其他女性的波伏瓦，和那个在作品中呐喊应当把女性当作有自主意识的自由人类个体去尊重的作家，是同一个人吗？我们暂且将此按下不表。因为波伏瓦，“性别歧视”（sexism）这个词才被加入法语词典中。[44]她也被托莉·莫伊和贝尔·胡克斯这样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深深崇拜。贝尔·胡克斯甚至这样描述波伏瓦：“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家兼作家，她用我梦想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到了极致。”[45]

现如今，我们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波伏瓦已经不在人世，但她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拿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万灵药，并且屡试不爽。而波伏瓦会不会同意这些观点显然是不得而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图腾，以及一个后女权时代的消费品。有人这样总结，波伏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一个商标，她被变成了一个品牌”[46]。但波伏瓦这个品牌的形象却是以变幻无常而臭名远扬。一些女性主义者赞叹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但波伏瓦对人们爱情理

想的批判却在她那个时代触犯了众怒，因而遭到了报复性的贬低和侮辱。1949年5月，波伏瓦在一家期刊上发表了《第二性》里的一个选段。在这段节选里，波伏瓦论证说，女性其实并不想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只是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欲望的同时也能得到尊重。当时著名的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讥讽地评论道：“这是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的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夫人来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47]当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探讨爱和正义之间是否矛盾时，人们认为他是在做哲学讨论。当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和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讨论爱在道德中的位置时，人们认为他们也是在做哲学思考。^[48]而当波伏瓦把爱和正义的讨论延伸到两性亲密关系的范畴时，有人却用“夫人”来戏称波伏瓦，借此来羞辱她未婚的身份，讽刺她降低了哲学的标准和格调。

站在今天往回看，我们不难发现，波伏瓦当时是陷入了一场完全针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有的人批判她是个失败的女性，说她背离了女性该有的样子；有的人批判她是个失败的哲学家，说她没有自己的原创性，只是在套用萨特的东西；有的人甚至批判她是一个失败的人，说她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水准。因为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人们不再把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当回事，觉得它根本不值得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实际上，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刻意人身攻击不仅会发生在女性身上，也会发生在男性身上。人们常常用这种手段去转移注意力，不去讨论眼下真正的话题，转而诋毁当事人的人品，或者说他们动机不纯。但波伏瓦所遭受的，并不仅仅是被指责人品不好、动机不纯，人们甚至指责她没有人性，而且做女人做得一塌糊涂。心理学最近有研究表明，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拥有主观能动性，充满竞争力，有自信和魄力，但也经常因为拥有主导地位

而受到惩罚。她们通过赢得竞争打破固有的性别等级，占据那些往往由男性占据的位置。于是人们对她们指指点点，说她们为人傲慢，具有攻击性，等等。人们会有意甚至是无意识地把这些女性“拉低”，打击她们，让她们回到“应该在的”位置上，从而维持住男性至上的性别等级秩序。[\[49\]](#)

波伏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等级秩序。她的思想颠覆了千千万万男性和女性的生活，而且她也尝试了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过自己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波伏瓦自己的故事和她与萨特的故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女性和这个男性的真相是什么，而是我们今后该如何去谈论男性和女性。在今天的学界，“男人”和“女人”这样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也开始质疑这样的分类。我们能走到这一步，跟波伏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当年的波伏瓦却因为敢于这样思考而受到惩罚。

从她的学生时代起，到写完最后一本理论作品《老年》（*Old Age*），波伏瓦在哲学上一直把“成为自我”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由内而外对自我的审视，一个是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想要更清楚地看波伏瓦由内而外的自我审视，也许我们只能依靠她的回忆录。但我们显然得对回忆录里的内容存疑，因此，当新发现的材料能够证明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或者与她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相左时，我会尽量地在这本传记里呈现出来。

同时，我也尽力去关注，波伏瓦对自我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我们知道，人类对自己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变化。心理学的研究也反复表明，“自我”的概念一直处在变化当中，而且我们会选择性地用我们的记忆与变化的自我相呼应。[\[50\]](#)我们也知道，人类会根据“观众”的不同而用不同的

方式去呈现自己。对于波伏瓦人生中的某些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去了解。但信件往往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的，日记也有可能是带着给后人看的心理写下的。伏尔泰有句名言可以拿来借鉴：对于生者，我们应给予尊重；对于逝者，我们应还他们真相[51]。但是，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和讲给他人的故事，以及他们所讲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这三者又孰真孰假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而在为一个女性写传记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难上加难了。卡罗琳·埃尔布兰曾说：“撰写女性人物的传记，往往要考虑人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讨论，以及应当删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作品才有可能刊行于世。”[52]波伏瓦的一生都在反抗传统，如果她真的完全诚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且不谈会不会暴露他人的隐私，以及是否触犯了大众的道德规范，她的故事必然会引起一片哗然，惊世骇俗，也会让她的读者对她感到陌生。因此，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故意把自己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个人感情关系等排除在外，隐去了很多由内而外的自我审视。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会在后文把这一点还原到她生活的场景里去探讨。但在这之前，因为波伏瓦是一位哲学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对于理解波伏瓦的生活和哲学作品，一部传记显得尤为重要。

有些哲学家认为，伟大思想家的生活与他们的哲学是无关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存在于作品中了，不管哲学家们的生活是充满趣味的，还是单调乏味的，都应当与他们的哲学分隔开来。相反地，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作品不可以被单独孤立起来解读，而是必须要对照着他的生活来看。了解一个哲学家的生活，对我们了解他的哲学作品的真正含义是很必要的。首先，割裂生活和作品的做法，有着潜在的缺陷，那就是脱离历史的解读

常常会带来误读。比如，这种阅读哲学的方法就使我们误以为是萨特创作了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但事实上是波伏瓦先写作和出版这部分内容的，而萨特直到去世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种把作品和生活合在一起看的做法，会有把人简单化成一系列外因的产物的风险。这种类型的传记作家，常常热衷于将本来没有的意思加进去，试图去解释一个人的人生，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呈现它本来的样子。这种做法的确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但同时也有可能让我们忽略传记主人公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把他们当作某种童年影响或社会阶级的产物，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成为的人。[53]

上面这种做法所代表的理念其实是：作品不等于生活，生活也不需要创作。可想而知，波伏瓦应该会拒绝这种把个人生活和哲学作品粗暴割裂的做法。波伏瓦的一个核心的哲学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存在于一个特别的身体、特别的地点和时空里，存在于和他人的关系联结中。这种处境的种种变数影响着他们想象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而且这会在一生中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变化。此外，几个世纪以来的性别偏见和歧视也一直在影响着女性的处境。

书写波伏瓦的传记，也面临着另一种挑战。除了找寻她童年经历的影响，还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切入，分析经济、阶级、社会的因素，也需要考虑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结构性影响。波伏瓦的作品曾经遭到大幅删减，译本错误百出，有的根本没被翻译成英文。这些删减和误译有时候已经严重到完全扭曲了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波伏瓦的作品遭到删减和误译，也让我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甚至意义都不明确？一个女性的“自由选择”，在另一个女性那里，有可能就成了“压迫”。一个男性的幽

默风趣，在另一个男性那里，有可能就成了性别歧视。而这种模糊性，正是波伏瓦后来想要从哲学角度去探讨的话题。

波伏瓦的哲学作品和自传向我们展示了，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对于成为一个道德的“自我”是多么关键。波伏瓦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她自己生活的影射，因而饱受争议。但她的文学作品里所探讨的“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与道德的自我”这个主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在1945年波伏瓦出版的小说《他人的血》（*The Blood of Others*）中，她笔下的主人公埃莱娜十分反对把她的想法和行为简单归因于她的底层出身：“总是用外部环境来解释人们行为的做法，实在是很可笑。这就好像我们怎么想，我们是谁，根本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54]波伏瓦的哲学作品也探讨了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这个主题。在散文《模糊性的道德》（*Ethics of Ambiguity*）中，波伏瓦写道：“如果历史只是在机械性地往前推进，人在其中只是被动地传导着外界的力，那行动这个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55]

我写这本传记，并不奢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波伏瓦，因为任何传记都不可能用上帝之眼去看待一个人的人生。我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既不会割裂地看待波伏瓦的生活和作品，也不会只聚焦她的私人生活。我想通过这本传记去证明，波伏瓦取得的成就靠的是她自己的努力，以及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要掌控你所成为的那个人物的方方面面。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道，女性总是“面临对立角色的两难选择：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偶像。而且女性从来没法选择自己的命运”^[56]。在波伏瓦的后半生，她逐渐意识到成名后的自己，必须做那个公众眼里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而且这个“波伏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波伏瓦的人生哲学让她始终铭记，她所能做的一切，只有忠实于自己，并成为她自己。

从15岁开始，波伏瓦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必须从事写作事业，但她对于自己变成这样一个作家并没有很开心。在她早期的一篇哲学作品《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 and Cinéas*）里，波伏瓦认为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想要同一样东西，她写道：“生命中没有那种一切都被和解的瞬间。”^[57]有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觉得她的生命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但有的时候，波伏瓦又被自我怀疑所淹没，待人待己的方式都让她深感后悔。波伏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改变了世人的想法。波伏瓦曾沮丧不已，但她也热爱生活，害怕变老，恐惧死亡。

波伏瓦晚年同意了戴尔德丽·贝尔为她写传记的采访邀请。她答应这个要求的一部分原因，是贝尔提出想要为她写一本不仅关于女性主义，而是关于她整个人生的传记。^[58]波伏瓦从来都不喜欢他人片面地解读她的人生。1990年，贝尔写的书出版，作为波伏瓦去世后的首本传记，它仍然是很多人了解波伏瓦的第一选择。虽然这本传记的取材得益于作者对波伏瓦本人的采访，但其中很多内容也只是重复了波伏瓦已经公之于众的故事。

我所写的这本传记将会取材于波伏瓦之前从未公开过的事。在这本传记里，我会去展现在遇到萨特之前，波伏瓦变成一个知识女性的过程：她如何进行哲学创作，如何为了激发读者的自由而去创作小说，写《第二性》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以及在她希望自己作品的影响不只停留在读者的想象中，而是切实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时，又是如何转向生命写作以及参与女性主义活动的。

撰写这本传记让我感到紧张不安，有时候甚至到了战战兢兢的地步。波伏瓦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想扭曲她的记忆，哪怕是其中那些让人费解、望而生畏和感到不安的部分。不管再怎么好地去记录一个人的一生，生活的记录永远也不能等同于生活

本身。对于这本书的选材，我显然被自己所在的处境影响着，同时我也不得不依赖于波伏瓦已经选择性地呈现出来的材料。即便如此，我仍试着去展示一个完整的波伏瓦：她的踌躇满志与自我怀疑，她的意气风发和万念俱灰，她的求知若渴和恣情纵欲。在这本传记里，我没有将波伏瓦的每一次讲演、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个情人都囊括其中，但我在尽己所能完整地呈现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部分，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复杂矛盾的波伏瓦。

波伏瓦是个云游四海的人，传奇的一生中跟很多人有过交集：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贾科梅蒂，到美国黑人舞蹈家约瑟芬·贝克、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以及爵士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更不用提20世纪一系列著名的文学、哲学和女性主义的偶像级人物。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和著名建筑家勒·柯布西耶曾到纽约参加专门为波伏瓦举办的派对。波伏瓦自己甚至透露曾经连吸六支大麻烟卷都没有感到“嗨”^[59]。这一切固然很精彩，但如果没有哲学，波伏瓦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波伏瓦是萨特跟班”这个误解已经存在太久了，而他们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哲学讨论才是波伏瓦成为她自己的关键部分。

但这些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963年，波伏瓦写道：

作者在公众面前所呈现的生活，只是这个作者众多面中的一面。与我的作品有关的一切，也只是我个人生活的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努力地，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读者，去弄明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拥有一个公众形象，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60]

尽管波伏瓦对萨特的哲学和爱情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一直是她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这段友谊开始于他们初见之后的几周，之后持续了整整一辈子。波伏瓦的许多想法在她所生活的时代是惊世骇俗的，她因此被禁言、被嘲笑、被讽刺。但是她选择了一生坚持思考和写作，因为她珍惜自己的思想，也坚信自己能够一直思考下去。19岁那年，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生命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我的思想。”^[61]之后的59年里她经历了很多，但78岁那年，她仍然保持初心：“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62]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述。”^[63]但波伏瓦有很多故事都被隐藏在了黑暗中，等待着被讲述。我们在她的日记和信件里读到的——她对哲学的热爱和她想要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爱的渴望——改变了我们这些后辈度过人生的方式。

^[1] DPS 266, 28 May 1927.

^[2] 参见Toril Moi,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6.

^[3] Claude Jannoud, ‘L’Oeuvre: Une vulgarisation plus qu’une création’, *Le Monde*, 15 April 1986.

^[4]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 27.

^[5] Beauvoir,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18.

^[6] Sandrine Sanos, *Simone de Beauvoir: Creating a Feminist Existen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8.

^[7] SS 3.

^[8] DPS 57, 7 August 1926.

^[9] FC 288.

[10] Henri Bergson,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Dover, 2001, p. 178.

[11] Ovid, Tristia III.iv.25, 引自Descartes (Descartes, Letter to Mersenne), April 1634, *Oeuvres de Descartes*, ed. 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 volume I, Paris: Cerf, 1897, pp. 285–6.

[12] PL 22.

[13] Annie Cohen-Solal, *Sartre: A Life*, London: Heinemann, 1987, p. 86

[14] <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71211-were-sartre-and-de-beauvoir-the-worlds-first-modern-couple>

[15] 引自马德莱娜·戈贝伊对波伏瓦的采访, ‘The Art of Fiction No. 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16] 阿伯拉尔 (1079—1142), 是欧洲“12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中世纪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之一。他与爱洛伊斯由师生变为情侣, 由私通走向婚姻之后, 却由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清规和社会的压力而被迫分离, 双双遁入修道院。(若无特殊说明, 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17] 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The Lives and Loves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 London: Vintage, 2007, p. ix.

[18] MDD 344.

[19] Beauvoir, 引自Simone de Beauvoir, Margaret A. Simons and Jane Marie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Hypatia* 3(3) (1989): 13.

[20] Alice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conversations 1972–198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4, p. 13.

[21] 本段中提到所有的出版日期均指法语首版。

[22] 玛格丽特·西蒙斯发现, 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的英语译文也没有改善这个问题, 译文删除了法语原文里三分之一的内容。从1939年11月到12月, 有38处提到波伏瓦的小说《女宾》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参见Margaret Simons, ‘Introduction’, PW 5.)

[23] 这些信件可以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查阅到。

[24] 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 伽利玛自1931年起编订“七星文库” (La Pléiade), 出版对法国影响卓著的世界作家的作品。

[25] PL 8.

[26] Robert D. Cottrell, *Simone de Beauvoi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5, p. 95.

[27] 'Elle est incapable d'inventer, de s'oublier.' P. de Boisdeffre, 'LA REVUE LITTÉRAIRE: Deux morts exemplaires, un même refus: Jean Genet et Simone de Beauvoir',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86): 414–28.

[28] SS 166.

[29] DPS 77, 21 August 1926.

[30] Bianca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trans. Julie Plovnick,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 1993], p. 161.

[31] CJ, 758, 2, 3, 4 September 1929, 'l'ami incomparable de ma pensée' (italics added).

[32] SdB to Nelson Algren (NA), 8 August 1948, TALA 208.

[33]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in *A Room of One's Own/Three Guinea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0, p. 32.

[34] William Barrett,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见 pp. 231–2.

[35] 'Simone De Beauvoir',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5 April 1986: 18. The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4 March 2018.

[36] Deir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A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0, p. 514.

[37]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rivate/sartres-sex-slave/>

[38]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p. 44–5.

[39]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 39.

[40] Bell Hooks, 'True Philosophers: Beauvoir and bell', in Shannon M. Mussett and William S. Wilkerson (eds), *Beauvoir and Western Thought from Plato to Butler*,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2, p. 232.

[41] Rowley, *Tête-à-tête*, p. 13.

[42] Elizabeth Bachner, 'Lying and Nothingness: Struggling with Simone de Beauvoir's Wartime Diary, 1939–41', *Bookslut*, November 2008.

[43] Richard Heller, 'The Self-centred Love of Madame Yak-yak', *The Mail on Sunday*, 1 December 1991, 35.

[44] The 1978 edition of *le Petit Robert*. 见序言'Everyday Sexism', Notes, FW 241.

[45] Bell Hooks, 'Beauvoir and bell', p. 231.

[46] Sarah Churchwell, *The Many Lives of Marilyn Monroe*, New York: Picador, 2005, p. 33.

[47] François Mauriac, 'Demande d'enquête', *Le figaro* (1949), 30 May. 见 Ingrid Galster,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Paris-Sorbonne, 2004, p. 21.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第197页有讨论对于这个章节的反应。

[4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第二章中讨论了公平和“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样的思想，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49] Laurie A. Rudman, Corinne A. Moss-Racusin, Julie E. Phelan and Sanne Nautes, 'Status Incongruity and Backlash Effects: Defending the Gender Hierarchy Motivates Prejudice against Female Lead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 165–79.

[50] 参见 Z. Kunda and R. Sanitioso, 'Motivated Changes in the Self-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989): 272–85; R. Sanitioso, Z. Kunda and G. T. Fong, 'Motivated Recruit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990): 229–41; R. Sanitioso and R. Wlondarski, 'In Search of Information that Confirms a Desired Self-perception: Motivated Processing of Social Feedback and Choic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004): 412–22.

[51] Voltaire, 'Première Lettre sur Oedipe' in *Oeuvres* (1785) vol. 1.

[52] Carolyn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8, p. 30.

[53] 举例来说，心理分析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记作家们试图通过人的童年经历、经济状况和其他社会结构来理解人的一生。参见 James Conant, 'Philosophy and Biography', lecture given at a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Biography', 18 May 1999.

[54] BO 39.

[55] EA 20.

[56] SS 88.

[57] PC 120.

[58] Bair, p. 13.

[59] SdB to S, 24 April 1947, LS 451.

[60] ‘A story I used to tell myself’, UM 159.

[61] DPS 297, 29 July 1927.

[62]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 86; DPS 296, 29 July 1927.

[63] Virginia Woolf, ‘Not One of Us’, October 1927, CE IV, p. 20, 引自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London: Vintage, 1997, p. 773 n. 42.

第一章

像个女孩一样长大

1908年1月9日，凌晨4点30分，在社会陈规令人窒息的巴黎第六区，面朝拉斯帕伊大道的一个二楼房间里，西蒙娜·露西·欧内斯廷·玛丽·贝特朗·德·波伏瓦[1]出生了。小波伏瓦长到4岁的时候，跟着她母亲一起外出拜访，就已经能熟练地从自己的天鹅绒小包里拿出精美的名片来。尽管她出生时，波伏瓦家族已经开始没落，但波伏瓦几乎一辈子都住在时髦的巴黎第六区。[2]

贝特朗·德·波伏瓦家族是来自勃艮第的贵族后代。1786年，他们的一位先人被授予贵族头衔，不料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被砍头。尽管这件事发生在波伏瓦出生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但波伏瓦的传记作者对她的家族社会地位的看法却存在着分歧：贝尔十分看重波伏瓦的家世，但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则认为家世并没有那么重要。受人敬仰的先人被砍头之后，整个波伏瓦家族都对自己的贵族身份保持低调。[3]

尽管如此，波伏瓦家族还是顺利继承了他们在法国利穆赞的一座庄园。但由于波伏瓦的父亲乔治·德·波伏瓦并不是长子，因此没能继承这座庄园。乔治天资聪颖，外表迷人，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但他的志趣并不符合他父母的期望。他父亲劝他从事一份更体面的职业，最终体面占了上风：乔治研习了法律，随后入职巴黎一家著名的律所工作。乔治并没有太多野心，他的父亲和长兄也都不需要为了生计而工作，尽管他母亲曾经试图向他灌输工

作的价值，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乔治却很想结婚成家，因此，他最终辞掉了律所秘书的工作，出来自己单干，希望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1908年夏，在法国蒙提涅克，被家人环绕着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从左至右依次为：乔治、埃内斯特（波伏瓦的爷爷）、弗朗索瓦丝、玛格丽特（波伏瓦的伯母）和她的丈夫加斯东（乔治的哥哥）。

乔治的父亲通过媒人给乔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弗朗索瓦丝·布拉瑟尔，一个家在巴黎北部、拥有丰厚嫁妆的年轻女子。尽管布拉瑟尔家族不像贝特朗·德·波伏瓦家族那样，名字中间有代表贵族身份的“德”字，但相比之下，他们家族要富有得多。弗朗索瓦丝的父亲古斯塔夫·布拉瑟尔在凡尔登是个成功的银行家。弗朗索瓦丝是他的第一个女儿，同时也是最不受喜爱的孩子，因为她的出生让父母获得男性继承人的愿望落空了。弗朗

索瓦丝从小在一所女修道院里接受教育，但她父母鲜少对她表示关心，直到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他们才想起已到适婚年龄的弗朗索瓦丝。布拉瑟尔家族重男轻女，不止一次地因为女孩的诞生而感到失望：弗朗索瓦丝为人女时遇到过，而为人母时再次遭遇，终其一生都承受着她父母冷漠态度的折磨。[4]

1905年，两个家族在诺曼底乌尔加特的一个度假村首次见面。弗朗索瓦丝对这次见面并不是很憧憬，而且一想到不得不参与这种仪式就感到有点紧张。根据当时的风俗，待嫁的女孩和追求者的初见，必须发生在一个精心安排好的场景中。在度假村的酒店里，弗朗索瓦丝被她的修道院同学们簇拥着，她的美貌与社交礼仪在喝茶聊天时的举手投足中一一呈现，乔治据此判断她作为他的未来伴侣是否合适。这次见面几周之后，乔治就向弗朗索瓦丝求婚了。尽管他们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但两人也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在一起的。1906年12月26日，两人举行婚礼。[5]在波伏瓦的早期回忆里，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她父母的关系都是充满激情的。[6]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刚过没多久，波伏瓦就出生了。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对这个孩子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不过，当时21岁的弗朗索瓦丝和31岁的乔治仍在为共同的生活以及不同的期待磨合着。他们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街103号，这足以体现出乔治的贵族地位，但房屋的室内陈设则不然。乔治想要再现祖宅往日的辉煌壮丽；但弗朗索瓦丝少不更事，又来自乡下，周身的一切都让她感到不知所措。

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分歧（或许是因为所处的环境，这些分歧并没有暴露出来），他们一家三口仍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仆人路易丝每天给波伏瓦洗澡、喂食，还负责做饭和其他的家务事。乔治每天早晨去法院上班，晚上回家都会带一束弗朗索瓦丝最爱的花。夫妻俩会趁着路易丝没带他们的宝贝女儿上床睡觉时

陪她玩一会儿，再等路易丝回来为他们端上饭菜，一起享用晚饭。饭后乔治会大声朗读，而弗朗索瓦丝则在一旁做刺绣，一起愉悦地消磨夜晚的时光。夫妻俩各自肩负着责任：乔治为自己的妻子提供与其阶级相称的文化生活，弗朗索瓦丝则要保证她的学识不超出自己的性别所允许的范围。

乔治和弗朗索瓦丝结婚两年半之后，弗朗索瓦丝的嫁妆仍然没有着落。当时弗朗索瓦丝的父亲古斯塔夫·布拉瑟尔在凡尔登出了事，灰头土脸地逃走了。1909年7月，古斯塔夫的银行被破产清算，所有东西都被没收变卖，甚至连他们家族的财产也未能幸免。更糟的是，古斯塔夫被送进了监狱，等了13个月才被审判，要坐15个月的牢。布拉瑟尔之前的势力稍微起了一点作用，让古斯塔夫提前结束了他的牢狱之灾。古斯塔夫出狱后，带着妻子和小女儿搬来了巴黎，跟弗朗索瓦丝住得近一点，打算重头来过。

这件事让弗朗索瓦丝的嫁妆彻底泡汤了。好在这并没有打乱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小家庭的和谐，他们仍然心怀希望，开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至少目前看起来，他们的财产状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乔治的工作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他继承的财产虽然不多，但也进行了投资理财。乔治对弗朗索瓦丝一直很温柔，弗朗索瓦丝过得很开心。[\[7\]](#)

1910年6月9日，乔治和弗朗索瓦丝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她的名字叫海丽特·埃莱娜·玛丽，但在家族里大家都只叫她埃莱娜，或者“Poupette”（意思是小洋娃娃）。尽管埃莱娜只比波伏瓦小两岁半，但波伏瓦当时已经把妹妹看成是一个需要自己教导的学生了。小波伏瓦在那时就已经是个小老师了。大家本来都期盼能迎来一个男孩，因此埃莱娜出生时，波伏瓦明显感觉到了家人的失望。在回忆录里，波伏瓦用她常用的低调陈述的口吻谈到

这段时期：“也许小埃莱娜的摇篮旁总是有叹气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8]埃莱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她出生以后，她的祖父写了一封信恭喜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喜获麟儿。当时的乔治和弗朗索瓦丝都懒得纠正他们生的其实是一个女儿，只是在回信的附言里潦草地加了一句：“上帝送给了我们一个小女孩。”[9]

波伏瓦描述自己的童年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直到她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才不复存在。小时候的波伏瓦喜欢到户外探索大自然，她常常在草坪上跑来跑去，蹲下来欣赏叶子、花朵和豆荚，还会盯着蜘蛛网看好久。每年夏天，全家都会去乡村待两个月度假，其中一个月在姑妈的房子里，这是一座19世纪建造在拉格里耶尔的城堡，另一个月则待在爷爷在梅里尼亚克占地200多公顷的大城堡里。在这里，波伏瓦有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欣赏大自然之美。波伏瓦一辈子都很喜爱大自然，也一直认为乡村生活可以享受孤独和极致的自由快乐。[10]爷爷的城堡虽然很大，但没有电力和自来水供应这点让一些来自巴黎的拜访者很是吃惊。[11]

波伏瓦在巴黎的家，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豪华，闪闪发光，而且洋溢着红色。公寓里铺着红色地毯，文艺复兴风格的餐厅也被布置成了红色，餐桌上的刀整齐地放在银质盘子里。窗边挂着红色天鹅绒和丝绸质地的窗帘，画室的墙上装着一面大镜子，映照着水晶吊灯的光芒。家里有时候会高朋满座，弗朗索瓦丝会和穿着天鹅绒纱裙的女儿道一声晚安，然后去为客人们弹奏钢琴。在巴黎的家里波伏瓦很少能像在爷爷家那样享受孤独，如果想在大自然中玩耍，波伏瓦只能去巴黎的卢森堡公园。[12]

波伏瓦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家里人也很有心地去培养她的阅读兴趣。父亲乔治专门整理了一部诗集送给波伏瓦，并教她如何声情并茂地背诵这些诗，母亲弗朗索瓦丝也经常带波伏

瓦去图书馆。[13]波伏瓦出生那年，法国的国立学校终于开始允许女孩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了。但那个时代的女孩一般不上国立学校。在1913年，波伏瓦5岁半的时候，家里决定让她去上一所天主教的私立学校，艾德琳希望学校（这是她给学校起的昵称）。波伏瓦这种贵族出身的小女孩是不应该去学校上学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会请私人女教师。但当时的波伏瓦对于自己能去学校感到兴高采烈。她一周只在周三和周六上课，其他时间都是由她母亲在家监督学习，波伏瓦的父亲也会辅导她学习。[14]

波伏瓦和妹妹埃莱娜的感情很好，在波伏瓦去上学的日子里，埃莱娜会想念她。一方面是因为埃莱娜和波伏瓦相处得很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的母亲不允许她们拥有很多的小伙伴，所以她们没有什么机会和家庭以外的人玩。

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对大女儿波伏瓦投入很多，而对于二女儿埃莱娜，他们还没把她看成一个独立的小人儿。埃莱娜也知道父母一直以波伏瓦为骄傲，因为波伏瓦在班级里得了第一名的时候，母亲会大大地表扬她，而当埃莱娜得第一的时候，母亲却说这是因为有姐姐波伏瓦的帮助。埃莱娜那时候就认识到自己作为二女儿，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但是埃莱娜很喜欢姐姐，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波伏瓦并没有站在父母那边来欺负我，她总是对我很好，帮助我，所以我们俩关系很好。”[15]虽然当时家里没有什么玩具，但是小姐妹俩总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16]

在7岁那年，波伏瓦第一次参加了教堂里的领受圣餐仪式。在那之后，波伏瓦一周去三次教堂，有时候跟母亲一起，有时候是在希望学校的小教堂里。同样是在7岁那年，波伏瓦写出了她人生里的第一个故事——《玛格丽特的不幸》（*Les Malheurs de Marguerite*），共有100多页，是在她的外公布拉瑟尔送的小笔

记本上手写完成的。[17]

小时候的波伏瓦一直觉得，没有哪个小孩子能让她心生佩服。直到8岁那年，波伏瓦找到了一个例外，她的表哥雅克。虽然雅克只比波伏瓦大6个月，但是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而当时只有男孩子能接受到这种教育。波伏瓦被雅克的自信满满迷住了。有天雅克送了一块彩色玻璃给波伏瓦，上面还刻着她的名字。两个小孩子决定要在上帝的见证下结为夫妻，波伏瓦甚至称呼雅克为自己的未婚夫。[18]后来埃莱娜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儿时没有什么玩伴，波伏瓦可能不会对青梅竹马的表哥如此倾心——毕竟之后的十年里，波伏瓦都觉得自己将来真的会嫁给雅克。



弗朗索瓦丝和她的女儿们，左为埃莱娜，右为波伏瓦。

在9岁那年，波伏瓦遇到了第二个小家族以外的让她心生佩服的人。这个人的生与死对波伏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就是伊丽莎白·拉库万，波伏瓦亲昵地称呼她为扎扎[19]。扎扎和波伏瓦是希望学校里的同学，扎扎是个活泼调皮的学生，她和波伏瓦形成了一种友好的竞争关系。扎扎的出现，让波伏瓦体会到了生命中一种全新且美好的维度：友谊。和埃莱娜在一起，波伏瓦学会了“我们”意味着什么，而和扎扎在一起，波伏瓦第一次品尝到了思念的滋味。

埃莱娜·德·波伏瓦印象里的扎扎是个很冲动的人，她“像一匹健壮且优雅的赛马，随时准备要冲出去”[20]。在波伏瓦眼里，扎扎惊为天人。她不仅钢琴弹得很好，而且文笔优雅，既有女孩子的美，也不失男孩子的勇敢，还有与众不同的喜恶。扎扎古灵精怪，在钢琴独奏会的时候敢伸出舌头对她母亲做鬼脸。尽管这么调皮有个性，扎扎的母亲还是很爱她。

和扎扎的这段甜蜜友谊，也让波伏瓦渐渐发现了人生里的一些苦涩滋味：攀比。

波伏瓦后来意识到，拿自己的人生和扎扎的去比较，以及拿自己的母亲和扎扎的母亲去做对比，都是不公平的。“我对自己的感知是从内向外的，但我知道的关于她的都只是从外界看到的。”[21]18岁的时候，波伏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来她在作品中也常常用到这个二元对立：由自己的内在观察到的自己和从外界观察到的自己。[22]

波伏瓦的父母在很早就知道扎扎的母亲家世显赫，并且鼓励波伏瓦和扎扎交朋友，但年幼的波伏瓦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一点的。扎扎的母亲拉库万夫人出身于一个背景显赫的天主教家庭，她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生了9个孩子。拉库万夫人家

境殷实，十分富有，因此她对扎扎的叛逆很包容。拉库万夫人有足够的底气在聚会上毫无顾忌地放肆大笑，但波伏瓦的母亲没有这样的资本。

如果可以用两句话来简单总结一个人的童年的话，那波伏瓦童年便是“你不能做不得体的事情”和“你不能看不适合你的书”。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成长于一个管教极其严格的环境中，女修道院的道德教育把她训诫得相当古板。^[23]弗朗索瓦丝是个天主教徒，对上帝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生活中也恪守礼仪，她甚至连做梦都不会违反社会道德。^[24]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如果一个男性有婚外恋，人们仍然会欢迎他来家里做客，但是会把他的婚外恋对象拒之门外。弗朗索瓦丝全然接受这种社会观念。波伏瓦和妹妹埃莱娜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弗朗索瓦丝把跟性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罪恶的，她认为欲望本身就是罪恶。当时的社会陈规允许男人可以不检点，而女人就只能独自默默承受苦果，弗朗索瓦丝不假思索地认同这些。她嫌恶一切有关身体的问题，也从来不与女儿们讨论。波伏瓦甚至不得不从表姐马德莱娜那里学习关于青春期的知识。

马德莱娜比波伏瓦年长一些，因而知道更多关于身体的知识，以及身体的“不得体”用途。有一年夏天在乡村度假的时候，马德莱娜告诉波伏瓦和埃莱娜她们的身体即将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说她们将会见识流血和“防血垫”。马德莱娜也告诉她们那些看似神秘的词语的含义，比如“恋人”“情妇”。这些激发了波伏瓦和埃莱娜对于“女性为何会生孩子”这个问题的的好奇心。学了新知识的两姐妹回到巴黎之后，忍不住问她们的母亲，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弗朗索瓦丝说是从肛门里来的，一点也不痛。像这样在身体认知方面误导自己女儿的事情，弗朗索瓦丝干过很多次，以至于波伏瓦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低俗的、讨厌

的。[25]

在另一方面，弗朗索瓦丝十分重视思想教育，为了能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她甚至学习了英语和拉丁语。乔治和弗朗索瓦丝都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认为阅读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关于宗教，他们的理念就出现了分歧。母亲弗朗索瓦丝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父亲乔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个分歧给波伏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父亲一直精心挑选各种伟大的文学作品给她看，而母亲则一直给她读宗教文学，并以身作则地示范一个自我牺牲的天主教徒。波伏瓦就读的希望学校允许10岁以下的孩子的父母来旁听课程，弗朗索瓦丝经常会去波伏瓦的课上旁听。弗朗索瓦丝也经常带着波伏瓦和埃莱娜两姐妹去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和圣叙尔比斯教堂。波伏瓦15岁的时候，她受到的教育和天主教熏陶让她和父母之间有了一些矛盾。后来波伏瓦称自己的童年是怀疑主义和忠诚信仰之间的一场拉锯战，这种不平衡让她的一生都充满了“无休止的驳斥”。波伏瓦认为这也是她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26]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乔治和弗朗索瓦丝担心巴黎会沦陷，于是举家去了拉格里耶尔避难，等待巴黎恢复平静。波伏瓦记得自己在那段时间里，为了战争做罐头并尝试针织，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愉快地做女红。[27]在这之前的一年，波伏瓦的父亲乔治因为心脏不好，被批准退伍了。但即便如此，战争一爆发，他又被征召入伍，并在10月被派往了前线。几周之后，乔治心脏病再次发作，被批准离开前线，去到一个军事医院疗养。1915年初，乔治出院回到了巴黎，在战争署任职。巴黎彼时已经通货膨胀，乔治的收入微薄，之前的投资也没了着落，但花钱时却仍然大手大脚的。

在这段时间，波伏瓦快乐的童年时光也结束了，迎来了充满

烦恼的少女岁月。妹妹埃莱娜出落得美丽动人，像个洋娃娃一样。而波伏瓦因为吃得很少，看起来病恹恹的，还得了脊柱侧凸。巴黎当时实行灯火管制，波伏瓦家的经济状况也越发拮据，在母亲严格的道德管教之下，渐渐地，波伏瓦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想方设法获得父母的认可。

波伏瓦想要变成一个端方淑女，但是她的世界却从此开始摇摇欲坠。

[1] 波伏瓦的出生证明上的名字原来的拼写是Simonne.

[2] 尽管他们家的地址是蒙帕纳斯大街103号，但是根据埃莱娜的回忆，房子是面朝拉斯帕伊大道的。参见HdB to Deirdre Bair, 引自Bair, p.620 n. 18.

[3] 戴尔德丽·贝尔在波伏瓦传记中写道，贝特朗·德·波伏瓦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们的祖先是巴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圣安塞尔姆的弟子，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名门望族。在我采访西尔维·勒·邦时，她否认了这一点，并证实了《回忆录》（*Souvenirs*）里埃莱娜的说法（HdB p. 14）。对于波伏瓦的童年，我们主要依据了《端方淑女》、《人都是要死的》、戴尔德丽·贝尔写的波伏瓦传记、埃莱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及西尔维·勒·邦《回忆录：第一卷》里的“大事年表”（Chronologie）。

[4] MDD 37.

[5] 参见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Chronologie', MPI lv; 对于波伏瓦父母的初次见面，戴尔德丽·贝尔的记录是依照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埃莱娜·德·波伏瓦的采访，见Bair, pp.27-30.

[6] Simone de Beauvoir, 引自Bair, p.620 n. 19.

[7] MDD 37.

[8] MDD 42.

[9] HdB, *Souvenirs*, p.13.

[10] MDD 75, 24, 25.

[11] HdB, *Souvenirs*, p.16.

[12] MDD 23.

[13] MDD 36, 51.

[14] HdB, *Souvenirs*, p.44.

[15] HdB, *Souvenirs*, p.58.

[16] MDD 43.

[17] SLdB, 'Chronologie', 1915, MPI lvii.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端方淑女》中，波伏瓦没有提到这个故事。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记录的自己写的第一个故事是89页的《玉米家族》（*La Famille Cornichon*），于1916年10月写成，当时的波伏瓦只有8岁。波伏瓦童年的其他作品被保存下来了，但是没有出版，其中包括一篇献给她妹妹的故事，题为“让诺·拉平的故事”（*Histoire de Jeannot Lapin*），写于1917到1918年之间，是一个由波伏瓦手写了45页的故事；此外还有写于1918年到1919年间的19页故事《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Contes et Histoires Variées*），以及写于1919年6月的23页故事《两个女友的唱和》（*Correspondance de Deux Petites Amies*）。

[18] MDD 61.

[19] 在《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她被化名为伊丽莎白·马比勒（*Elisabeth Mabile*），以保护她的身份。

[20] Héléne de Beauvoir，引自Bair, p.133.

[21] MDD 114.

[22] DPS 67, 16 August 1926.

[23] VED 33.

[24] MDD 38.

[25] MDD 41, 82.

[26] MDD 41.

[27] 引自Bair, p.47.

第二章

端方淑女

幼年时代的波伏瓦对家庭有很强的归属感，她对于童年的记忆多是快乐的。^[1]但是从11岁开始，家里人对波伏瓦的期待让她感到困惑。她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并不是家里人所期待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鼓励她阅读和质疑的父母，现在却要求她停止思考，放弃阅读，不再提问。她感到痛苦，闷闷不乐。一部分是因为她提出来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一部分是因为她眼见着敬爱的父亲变成了自己不喜欢样子。小时候的波伏瓦觉得父亲特别伟大。^[2]曾经的乔治是一个充满智慧、学识渊博、喜爱诗歌、能够侃侃而谈的人。父亲的才华让波伏瓦折服，她觉得谁也比不上他。乔治曾经也喜欢表演，很享受自己成为派对中心人物的感觉，但是家道中落使他渐渐失去了幽默感，曾经的巴黎花花公子现在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整日垂头丧气。

“一战”之后，乔治·德·波伏瓦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更差了。他以前投资的俄国股票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全家只能靠他少得可怜的薪水过活。波伏瓦偶然听到父母亲为了钱的事而争吵：弗朗索瓦丝不明白乔治为什么不肯重拾法律，而乔治却总是旧事重提，说如果弗朗索瓦丝的嫁妆没泡汤，家里的情况也不会这么差。争吵和怨恨使得他们对彼此的热情渐渐冷却。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保姆路易丝一起回家后，看到母亲被打肿的嘴唇。

^[3]事情的真相是，乔治已经没有本钱去从事法律工作了，他连

租一间办公室、置办一些家具，或者买办公材料的启动资金也掏不出来，何谈靠他的生意来养活全家。乔治此时已经40岁了，他有两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健康状况也不大乐观。弗朗索瓦丝所希望的，乔治根本没有心力，也没有体力去做了。

幸运的是，之前让乔治觉得丢脸的老丈人，古斯塔夫·布拉瑟尔一直有自力更生的习惯，他及时地解救了他的女婿。在战争的两年间，布拉瑟尔开了一家鞋厂，成功拿到了为军人做靴子和鞋子的订单。这笔生意利润很高，布拉瑟尔大方地给乔治提供了一个副厂长的职位。^[4]虽然这对于拥有贝特朗·德·波伏瓦的贵族身份的乔治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但乔治因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乔治认为自己只是在工厂挂个名，并不想好好地去上班，于是经常能不去就不去。战争结束后，对军靴的需求没了，布拉瑟尔工厂也就随之没有生意可做了。这时候，好在又有一个家庭成员伸出援手，给乔治提供了一个报纸广告位销售员的工作。但乔治既没有销售天分，也不是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这份工作也没有做太久。

从那之后，乔治就一直消极怠工。乔治改不掉自己原来贵族公子哥的生活做派，因此丢掉了好几份工作。尽管家庭经济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乔治仍然每天睡到10点才起床，11点去股票市场晃悠一圈露个脸，午饭时去办公室看一眼，接下来一下午的时间都用来打桥牌，晚上去咖啡店喝一杯，然后优哉游哉地回家吃晚饭。^[5]虽然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总是赞扬父亲，但在妹妹埃莱娜眼里，波伏瓦家族里的男人们基本上都游手好闲，不爱工作，而女人们则坚强地替家族挽回一点尊严。^[6]波伏瓦之所以一直把父亲描绘得很美好，可能是因为童年时她深深地崇拜父亲，但也有可能是她对于家族的荣誉感使她不自觉地美化了父亲的形象。但更有可能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写回

忆录时预想到了，如果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谈论她父亲，会让很多读者产生敌意，认为她完全没有同情心，这些读者就会借此来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从而否定她的一切。

“一战”结束之后的一年里，蒙帕纳斯大街渐渐恢复了往常的光景。然而，当1919年的夏天来临时，波伏瓦家的经济状况依然没有起色。为了节省开支，波伏瓦一家搬到了位于雷恩街71号的一处公寓。他们住在五楼，这里幽暗肮脏，既没有电梯，也没有自来水，甚至连浴室和中央供暖都没有。^[7]家里房间不多，除了客厅和主卧以外，父亲占用了—个房间做自己的书房。这使得波伏瓦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姐妹俩不得不共用一个小小的房间，小到姐妹俩的床之间只容得下一个人走动。当时他们的仆人路易丝还在，仆人们统一住在公寓的六楼，那里是所有仆人集中住的地方。但是不久之后，路易丝结婚了，搬到夫人街去了，于是弗朗索瓦丝不得不自己收拾这个破破烂烂的房子。^[8]一开始，弗朗索瓦丝借口说找不到好的帮佣才不用了，但实际上是家里已经请不起帮佣了。

请不请得起住家帮佣是当时巴黎社会的阶层分级标志。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至少有一个住家仆人，而后者是负担不起这笔开销的。弗朗索瓦丝本来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虽然有时候她也试着把这种生活的磨砺当作锻炼自己美德的机会，但近来她变得常常发脾气。她渐渐地不再打扮自己，也不注重身材的保养，波伏瓦和埃莱娜也渐渐开始穿已经破旧的裙子。但是在母亲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弗朗索瓦丝已经开始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生活，她安慰自己说虽然他们没什么钱，但是他们有文化，有信仰，而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后人的眼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小说家和自传作家，

文笔优美，散文的文字富有质感，同时她也是一个打扮时髦且有个人风格的女性。但是，波伏瓦和妹妹都因为在少女时期没有优雅的着装而苦恼过，后来波伏瓦把她们的这种状况戏称为“半贫穷”（semi-poverty）。[9]波伏瓦所就读的希望学校里也有女孩穿得比较寒酸，但波伏瓦认为那至少是“得体的贫穷”。任何一个想要被别人尊敬的女孩都应当穿着得体，以免被别人说成是卖弄风骚，但当时波伏瓦的同学们认为她的穿着比那还要糟糕。[10]

尽管后来波伏瓦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但是童年的记忆让她变得对金钱格外敏感。在学校的时候，她为了省着用笔记本，把字写得越来越挤，有时候字小得连老师都抱怨看不清。她不仅节衣缩食，对自己也很抠门：“我一直坚信要物尽其用，对待自己也是一样。”[11]她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当中，同时也发奋要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很快，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牧师称赞她有一个美丽的灵魂。[12]波伏瓦后来加入了一个为儿童创办的宗教组织，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然完成了成为一个好女孩的转变。我努力塑造我想要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性格，这让我获得了很多表扬，我对此感到很满足，我现在完全认同自己塑造出来的自我，这就是真实的我。”[13]但与此同时，波伏瓦的很多同学都讨厌她，认为她自命清高，自认为无所不知。

12岁的时候，波伏瓦对待宗教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但在童年时期，宗教的确启发了她去思考和质问女孩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一问题。波伏瓦在《波伏瓦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后简称《端方淑女》）中写道：“在上帝面前，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和小男孩的灵魂一样宝贵，但自己为何还要去嫉妒那些小男孩呢？”[14]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重新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她觉得这种严格的宗教氛围对她帮助很大，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她把自己想成是一个

有灵魂的人。波伏瓦认为：“在灵魂的层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我是男性还是女性，上帝都会一样地爱我。男女圣人之间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完全是一个无性别的领域。”波伏瓦发现，在宗教中，人是一种道德平等和精神平等的种族，这种观念也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15]但波伏瓦渐渐注意到一种不和谐，那就是宗教所宣扬的平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得到实践。她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经骄傲地说：“波伏瓦有一颗男性一样的头脑，她能像男人一样思考，她就像个男人一样。”当时的波伏瓦反驳父亲说：“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都把我当作女孩对待啊。”^[16]

随着波伏瓦渐渐长大，波伏瓦意识到父亲不仅重视对自己的教育，也开始同样重视她的外表。^[17]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对一些我之前觉得应该避之不及的人物角色感兴趣，比如说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里的女主角乔·马奇，让我获得了很多灵感。”早在11岁时，波伏瓦就对这个小说人物感到着迷。^[18]乔在自己的姐妹中并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善良的，但是她对于学习的热情和写作的欲望，在年少的波伏瓦看来，简直就是灯塔一般照耀着她。小时候的波伏瓦非常在意父亲对自己的看法，只要得到了父亲赞许，她就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底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对波伏瓦的赞许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乔治·德·波伏瓦认为女性应当追求优雅和美丽，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做得更好。在波伏瓦眼里，埃莱娜就好像《小妇人》里的艾米一样，因为美丽赢得了人们的肯定和爱慕。

而波伏瓦就像乔一样，把自己完全泡在了书堆里。她读《效仿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和《关于禁欲和神学的手册》（*A Handbook of Ascetic and Mystical Theology*）这样晦涩

难懂的宗教书籍，也读父母推荐的各种历史和文学类书籍，法语的、英语的她都读。波伏瓦喜爱英国文学，《爱丽丝梦游仙境》和《彼得·潘》都是她儿时钟爱的故事，这也为她后来阅读勃朗特姐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做好了铺垫。[\[19\]](#)渐渐地，因为父母的禁止和表姐马德莱娜的旁敲侧击，波伏瓦发现有些书能教她父母不愿意教她的内容。表姐马德莱娜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但是波伏瓦却被管得束手束脚。[\[20\]](#)所以当波伏瓦有机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就会偷偷潜入父亲的书房，如饥似渴地读保罗·布尔热、阿方斯·都德、马塞尔·普雷沃、莫泊桑和龚古尔兄弟的作品，这些书籍弥补了波伏瓦缺失的性教育。[\[21\]](#)

阅读小说也帮助波伏瓦发现生活中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小妇人》中的女主角乔·马奇不愿意做家务，因为家务事使得她没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性仍然要做家务，而男人却不用做家务？波伏瓦所受的传统教育告诉她，婚姻就是女性的命运，但是乔·马奇就能够因为自己不想结婚就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命运，波伏瓦想知道，自己也可以这样吗？[\[22\]](#)波伏瓦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读了乔治·爱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成了波伏瓦在后来的人生和哲学中一直追问的问题。爱略特笔下的麦琪·塔利弗天资聪颖、桀骜不驯，她十分讨厌浪费自己的时间做重复劳动的针线活。如果说女性做这种家务事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波伏瓦如何才能既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别人对她的期待？如果“爱”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必须牺牲很多，而男性却不需要牺牲，那么对于女性来说，为爱牺牲值得吗？早在1926年，当波伏瓦还是学生时，她就在日记中思考，究竟要保持多少自我，以及放弃多少自我。[\[23\]](#)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的主人公麦琪·塔利弗最终和史蒂夫坠入情网，波伏瓦为麦琪感到不值得，她没法理解麦琪为何会陷入

这样的爱情。波伏瓦为此写道：“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一种爱情兼友谊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只有彼此交换读书之后的思考，才能永远地连在一起。”[24]

书籍不仅给波伏瓦提供了知识，也是她从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现实世界里逃离的避难所。虽然波伏瓦在书里找到了一条反抗的道路，但是这并不足以把她带到一个女性能够自主做选择，不再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的新世界。年轻的波伏瓦常常被书中人物的精神生活鼓舞，但是肉体的一面却让她感到尴尬不适。用波伏瓦自己的话说，当时的她对待性太过于大惊小怪了。在母亲弗朗索瓦丝35岁那年，父亲乔治因为婚外恋抛弃了她。[25]尽管如此，波伏瓦知道自己的父母也曾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年轻的波伏瓦对性感到很恶心：“在我看来，爱情和肉体完全没有关系。”[26]

在搬到雷恩街之后的五年里，父母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波伏瓦经历了青春期的不安，还目睹了两个生命的离去。她喜爱的保姆路易丝，在结婚后生下一个男婴。可惜这个男婴得了小儿支气管肺炎，不久后就死掉了。这是波伏瓦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死亡，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吓得并不轻。路易丝和她的丈夫住在一栋公寓顶楼的单间里。当波伏瓦一家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波伏瓦目睹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她从未见到过的贫穷。波伏瓦走上那栋公寓六楼的走廊，一进去就看见有十几个门，每一扇门背后都是一个单间，不大的房间里住着一家子人。[27]不久之后，波伏瓦家的公寓门房的儿子也生病了，这个孩子得了肺结核和脑膜炎，病了很久，最后死得很痛苦。进出这栋楼的人经过楼梯的时候都不得不目睹这个可怜的孩子。波伏瓦看着这个孩子每况愈下，心里很担心，她怕自己和埃莱娜会像这些孩子一样得病死掉。

波伏瓦创作的小说里有些情节和她的真实生活很接近。在她1946年写的小说《他人的血》里，波伏瓦重新回顾了童年时目睹的这些早夭的孩子。小说的主角，一个叫让·布劳马的男人，听到“路易丝的孩子死了”的时候仿佛感觉到了“原罪”：

我又一次看见那些扭曲的楼梯，石头铺的走廊两边有很多扇门，每扇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妈妈告诉我，每一扇门后面都住着一大家子人。我们走进其中一扇门，是路易丝的家。路易丝见到我，把我迎进她的怀里，她的两颊松垮垮的，有点潮湿。妈妈在床边坐下，坐在路易丝的旁边，同她低声地说话。襁褓里有一个面如死灰的孩子，双眼已经闭上。我转头打量了这间屋子，贴着红色瓷砖，煤气灶后面斑驳的墙上一个窗户也没有，我忍不住开始抽泣。我一边哭，妈妈一边在说话，而那个孩子死了，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28]

在这之后的几页，主人公布劳马自问，当他知道路易丝在哭泣的时候，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每每听闻人们对同胞的苦难漠不关心的事情，她都感到骇然不已。

波伏瓦和妹妹埃莱娜回忆起自己的少女岁月，都觉得痛苦不堪，她们跟母亲的关系也尤其紧张。波伏瓦甚至希望母亲能对她和妹妹冷漠一些。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波伏瓦觉得母亲对自己充满敌意，她也完全没法忍受母亲。妹妹埃莱娜说当时的母亲完全像是一个暴君[29]，甚至说母亲弗朗索瓦丝希望自己比女儿们长寿，还说女儿们应该为了她而活。显然姐妹俩都不想这么做。

[30]

她们的不情不愿并不难理解。一直以来，尽管父亲越来越过

分，但母亲弗朗索瓦丝忍气吞声，扮演着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父亲原本会在下午打桥牌，现在变成了晚饭后打桥牌。此外，父亲还浪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买醉和赌博，而母亲弗朗索瓦丝则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白天的时候，波伏瓦和埃莱娜看着母亲努力地把家撑起来，而当母亲跟父亲开口要一点家用时，他却大发雷霆；夜幕降临之后，姐妹俩很晚才能听到父亲回家的声音。而他一回来，就因为去妓院、情妇和赌博的事情跟母亲争吵。

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里面，波伏瓦回忆起那段岁月，当时母亲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被逼急了德·波伏瓦夫人不得已扇了丈夫耳光，甚至用针扎他。弗朗索瓦丝和乔治开始不分场合地争吵。后来，波伏瓦在书里反思了自己的母亲在矛盾欲望中的挣扎：

没有人可以一边说着“我在自我牺牲”，一边心里不觉得苦。我母亲的矛盾在于，她完全相信奉献是伟大而高尚的，但是奉献和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厌恶、欲望和各种苦涩已经到了她自己没法承受的地步。我的母亲一面强迫自己不断地奉献和牺牲，一面苦苦对抗自由被剥夺的痛苦。[\[31\]](#)

一个人该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到底是应该自我奉献地过一生还是应该只为了自己过一生？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波伏瓦的脑海里。学生时代的波伏瓦经常在日记里问自己这个问题，后来波伏瓦写存在主义的道德，以及女性主义的作品时，也探讨过这些问题。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就用圣人和殉道者的故事熏陶她们。这些故事让波伏瓦相信，自我牺牲是成为一个楷模的重要因素。而且有的时候，自我牺牲甚至到了神化自我的地步，因为

只有彻底放弃自我才能成为神。波伏瓦渐渐觉得只有孤独才是最令人愉快的状态，她想要独自掌控自己的生活。 [32] 在波伏瓦后来的作品里，宗教的讨论经常出现，她对母亲的态度也渐渐变成了批判。尽管波伏瓦不承认《第二性》里有些篇章是自传性质的，但其中有一个段落跟波伏瓦的人生经历很相像。波伏瓦写到女儿们目睹了母亲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一味地自我牺牲，于是十分激烈地反抗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们看到在现实里，母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付出并没有把她变成一个神。倘若做一个受害者，她会受尽嘲讽，而如果做一个悍妇，她会遭人憎恨。她的女儿们都不想步她的后尘。 [33]

波伏瓦家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好在学校还能给她提供一些稳定感和陪伴。和扎扎待在一起，波伏瓦觉得比自己最喜欢的独处更开心，和扎扎的友谊也让她变得快乐、自信。波伏瓦和扎扎都很爱学习，在班里排名不相上下。她们俩总是在一起，老师和同学们甚至戏称她们俩为“连体双胞胎”。波伏瓦和扎扎的父亲都是贵族阶层，而且拉库万夫人也愿意亲近德·波伏瓦夫人。因此波伏瓦和埃莱娜常常去扎扎的家里做客，去了之后她们才发现，拉库万虽然家世显赫，但是他们在家完全不讲究什么礼仪和规矩，小孩子可以在家里尽情跑跳，弄坏家具也不会被批评！ [34] 埃莱娜觉得扎扎的存在抢走了波伏瓦对她的爱，但家里的其他人都对波伏瓦和扎扎的这段友谊感到很满意。

波伏瓦和扎扎都很爱思考。在扎扎面前，波伏瓦可以无话不说，毫无顾虑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疑问。波伏瓦在学校通常是成绩第一名的那个，但扎扎的体育和音乐比波伏瓦更好。两个小伙伴一起长大，扎扎变得越来越漂亮和优雅，但是波伏瓦却因为脊柱侧凸变得姿态不佳，脸上也长了斑。17岁的时候，波伏瓦意识到，自己的外貌和家境都不如扎扎，连家庭关系也没有扎扎家和

睦幸福。

波伏瓦和扎扎彼此分享了很多东西，但是波伏瓦对于亲近的渴望得不到扎扎完全的回馈。扎扎想要的是一种和她母亲那样的关系，但这不是波伏瓦想要的，波伏瓦也给不了这样的关系。扎扎的生活很充实，她有八个兄弟姐妹，有一个事业成功的父亲，但是她想要母亲只关注她一个人，因为只有这种时候她才觉得自己很特别。波伏瓦觉得拉库万夫人把女儿扎扎当作知己。有一次，波伏瓦和扎扎聊得很深入，扎扎偷偷告诉波伏瓦，她母亲跟她讲了新婚之夜的“可怕”经历。拉库万夫人告诉扎扎她觉得性非常恶心，她的九个孩子都是在没有激情的情况下怀上的。^[35]拉库万夫人受的教育并不多，所以尽管扎扎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但是拉库万夫人认为扎扎在家里好好帮忙才更重要，因为这样扎扎才能为日后当个好妻子和一个好妈妈做好准备。拉库万夫人尤其希望扎扎能嫁个好人家，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波伏瓦一直不太理解扎扎的家庭关系，有一年夏天，波伏瓦去扎扎家在兰德斯房子看望他们的时候，对扎扎的所作所为大跌眼镜。波伏瓦到了之后，发现扎扎坐在沙发上，腿上有个很大的伤口。当只剩她们俩的时候，扎扎告诉波伏瓦其实这个伤口是她自己弄的，她故意用斧头弄伤了自己的腿。波伏瓦很吃惊地问：“为什么？！”扎扎说，因为她就是想让自己负伤动弹不了，这样就不用去走亲访友，也不用参加什么花园派对，更不用去照看弟弟妹妹。后来，波伏瓦在《第二性》中也写到了这件事情，不过她没有点明扎扎的身份。^[36]

波伏瓦和妹妹埃莱娜渐渐长大了，她们对家里也渐渐产生了不满和怨恨。两姐妹开始反抗，尽管方式没有扎扎自残那么极端。两姐妹常常趴在家里的阳台上，一连几个小时盯着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看，因为里面的顾客看起来都神采奕奕的，让她们很

是向往。于是当父母不在的时候，她们便会偷偷溜出家门，去街对面的那家圆亭咖啡馆（La Rotonde）一边喝咖啡，一边享用奶油甜点。[37]

父亲乔治越来越觉得，两个女儿能好好读书完全是因为他。乔治认为自己事业失败，没法给她们提供嫁妆，所以波伏瓦和埃莱娜得为了找工作而努力学习。在“一战”之后，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许多法国资产阶级家庭为女儿准备的嫁妆都因为通货膨胀几乎一夜蒸发，所以这些女孩不得不通过接受教育来保证自己今后能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但是波伏瓦的父母所在的阶层仍然认为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职业培训就象征着他们贵族身份的失败。

当波伏瓦还小的时候，乔治很高兴看到她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学会看书学习，因为他希望这能帮助波伏瓦今后在社交圈里成功地钓到金龟婿。因为在乔治的印象里，一个女性想要在社交圈里如鱼得水，需要的可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她还得是一个谈话高手。他欣赏拥有智慧的聪敏女性，但是他不喜欢女性成为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女性争取权利。最终乔治对波伏瓦的希望全都落空了，因为波伏瓦的堂姐珍妮成功继承了家族里的大城堡，成为富有的女主人，而波伏瓦什么也没有得到。乔治对此很失望，苦涩地感慨，也许自己的女儿们永远都嫁不掉了，她们只能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38]

波伏瓦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各种期待：作为一个女性，她想要成功，就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所成就；但是同时，受教育程度又不能太高，更不能太有成就。而弗朗索瓦丝的愿望更是让她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因为他们家已经请不起仆人了，所以弗朗索瓦丝希望女儿们能帮忙料理家务。但是波伏瓦需要努力学习，所以她拒绝花时间做家务，而且她也并不想成为

一个家庭主妇。弗朗索瓦丝在家里常常将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发泄到波伏瓦身上。

那时候的波伏瓦不管看向哪里，都能感觉到他人的期许压在她的身上。好在各种期待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同时，终于有一点点新鲜空气进来。波伏瓦儿时青梅竹马的对象雅克·尚皮涅勒，对波伏瓦两姐妹都很喜爱。虽然父亲乔治已经不怎么跟波伏瓦和埃莱娜聊天了，但是雅克很喜欢跟她们聊天。雅克的父亲有一家彩色玻璃制造厂开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离波伏瓦的家不远。所以雅克常常去波伏瓦家拜访，父亲乔治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把他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弗朗索瓦丝也很欣赏他的彬彬有礼。

乔治渐渐不再觉得波伏瓦的想法很有趣，波伏瓦的存在也会使他想起自己的失败。所以雅克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乔治和雅克常常坐在画室里，两个人谈笑风生，然而家里的女性，就像《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女主角麦琪·塔利弗一样，被认为就该安静地坐在一旁刺绣或者素描。波伏瓦对此感到很困惑。起初，雅克对乔治毕恭毕敬，但是后来他们越来越不拘泥于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雅克变得直言不讳，开始挑战叔叔的保守主义。因此乔治决定不再跟雅克聊天了，为了不耽误自己打桥牌，他直接离开了公寓，让雅克跟自己的女儿们聊天去。在与雅克聊天的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自己能够吸引男人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头脑。至少当时的她确定，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被她的思想所吸引的。

然而雅克对波伏瓦忽冷忽热，有时候他会定期拜访波伏瓦一家，但是有时候他会突然消失很久，且不做任何解释。尽管波伏瓦后来在回忆录《端方淑女》里，对这段关系轻描淡写，说自己只是把雅克看成是一个大哥哥^[39]，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波伏瓦都曾幻想能跟雅克拥有共同的未来——甚至是在遇到

萨特之后，雅克、萨特和另一个男人都曾经用不同的方式争夺波伏瓦的喜爱[40]。

波伏瓦对雅克的喜爱，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好朋友扎扎的生活里出现了男性追求者。扎扎的母亲在那段时间里开始给她不断地介绍结婚对象，这让扎扎很反感。因为在扎扎看来，为了利益而跟某个人结婚，几乎就跟做个娼妓没有什么区别。她受到的教育要她尊重自己的身体，如果因为金钱或者家庭原因就把自己的身体给某一个男人的话，实在是太不自爱了。可惜在拉库万家族里，女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结婚，要么去修道院做修女[41]，但这两条路扎扎都不想走。

拉库万家给五个女儿每个人都准备了25万法郎的嫁妆，要对追求者们进行精挑细选。然而，家道中落的波伏瓦家没法这么做。后来的波伏瓦回忆起这段岁月，她觉得自己其实是为了跟上扎扎的脚步，才幻想着自己爱上了雅克。从她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记来看，她身边人也表示其实她对雅克的感情并没有很深，她当时对雅克的若即若离感到很气愤。埃莱娜认为雅克故意想做花花公子，压根儿配不上波伏瓦。

在波伏瓦情窦初开的这段时间，法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这些改革也影响了波伏瓦后来的人生重大决定。1924年，波伏瓦从希望学校毕业了。在她毕业的十年前，一位国立高等学校的女老师认为，教育和工作将变成女性的必需品：

现如今，大多数女孩子……都想要继续接受教育，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一份专业的工作。虽然所有女性都想要坠入爱河，走入婚姻，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在我们这个金钱主导一切的不公正世界里，并不是每一位女性都能过上这惯常的生活，成为人母。……她们很清楚，教育能够拓宽她们的职

业道路，让她们不再依附于男性，自立自强。[42]

对于波伏瓦来说，通过婚姻获得男性的帮助，并不如靠她自己的能力来得可靠。至少她父亲让她明白了这一点。波伏瓦努力学习，很快拿到了各种资格证。1924年7月，16岁的波伏瓦以优异的成绩拿到高中毕业会考证书，这个证书在不久之前才刚开始颁给女性。当波伏瓦去领取证书的时候，考试官酸溜溜地嘲讽她：“你是来多拿几个文凭的吗？”[43]

尽管希望学校在很多方面都很保守，但是这所一流学校鼓励女性学生继续求学，通过两个级别的考试拿到中学毕业文凭。在通过中学毕业文凭第一级别的考试之后，学校会鼓励像波伏瓦这样资优的学生继续留校一年，学习哲学、文学和科学，这样她们今后毕业后就能够在同类学校中胜任教职。这个课程的本意是想要好心地帮助女性学生，因为尽管跟婚姻相比，去学校教书是差一点的选择，但至少这样能够让结不了婚的女性还留在她们原本的阶级里。

中学毕业文凭第二级别的考试难度增加了很多，希望学校的女校长最近把哲学也加到了必修科目中来，因为哲学课在法国国立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中变得流行起来，校长想借此举提高学校招生时的报名率。哲学课由一个牧师来教，尽管波伏瓦很喜欢哲学，但是她发现授课老师能力严重不足。这个哲学老师上课只是照本宣科，波伏瓦在回忆录《端方淑女》中抱怨说，老师每堂课的结束语都是：“根据托马斯·阿奎那[44]的真理……”[45]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彻底被哲学迷住了，她发自内心地想要学更多的哲学。初尝到哲学的滋味之后，原来波伏瓦擅长的那些学科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了。[46]

波伏瓦通过了中学毕业文凭第二级别的考试。尽管这次没有拿到优秀，但乔治还是很高兴，带着波伏瓦去戏院看戏庆祝。乔治现在又对波伏瓦提起了兴趣，或许是因为波伏瓦的脸不再像青春期时那么坑坑洼洼了，整个人也出落得苗条一些了（没办法，乔治总是很在乎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又或许是因为关于她未来将面临的实际问题越发凸显。^[47]乔治不赞成波伏瓦学习哲学，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舞文弄墨。弗朗索瓦丝也不赞成，因为她不希望波伏瓦因此变得堕落，失去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但是波伏瓦已经下定了决心。她了解到在塞福勒有一所精英培训学校，专门培养女性成为公立学校和学院的教师。弗朗索瓦丝对这所学校闻所未闻，她打听到了这所学校的一些传闻，据说管理严格，但道德松散，完全不讲宗教信仰。波伏瓦的父母这么多年来花钱培养她上私立学校，并不希望她最后只是成为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而且最重要的是，塞福勒这所学校是寄宿制的，也就意味着学生们的母亲没法近距离地监督她们了。

虽然乔治认为哲学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是他退一步想，哲学也许可以为今后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战”以后，渐渐有女性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了，如果波伏瓦能够在国家行政部里面找到一份法律相关的工作，她一辈子都能有稳定的收入了。波伏瓦不是一个急于做出判断的人，她读完《拿破仑法典》（*The Napoleonic Code*）后明确地告诉父亲：不。母亲提议说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也不错，但是波伏瓦的回答仍然是坚定的“不”。

波伏瓦下定了决心要学习哲学，但她父母却坚决不同意。因此，波伏瓦采取了沉默对策，只要他们跟她讨论起她的未来，波伏瓦都沉默以对。时间久了，家里氛围越来越尴尬，越来越令人窒息。最终波伏瓦的父母让步了，勉强接受了她的志向，当然也没少为这件事大吵大闹。

有一天，波伏瓦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写法国第一位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列奥塔尼·赞塔的文章。波伏瓦觉得自己找到了奋斗的目标。文章的配图是列奥塔尼·赞塔的照片：她坐在书桌前，姿态严肃，面露沉思之色。文章还提到赞塔和领养的侄子生活在一起。波伏瓦觉得这个女人富有智慧，又不乏“女性的敏感”，梦想着未来的某一天也能有人这么写她。[48]

如果波伏瓦早出生几年，这一切都不会成为现实了。早出生五年的话，波伏瓦甚至都没法参加大学的入学资格考试。波伏瓦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少有女性走过的路。在那个时候，只有六位女性通过了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这是一项竞争极其激烈的国家级考试，波伏瓦誓要成为通过这个考试的前驱者之一。[49]

波伏瓦早年学习哲学时写的作品很多都没有保留下来。但流传下来的有一篇她写于1924年末的论文，分析了经典的科学哲学文章——法国科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在这篇论文里，16岁的波伏瓦写道：“这部作品很有趣，但最有趣的部分是，贝尔纳指出了哲学式的质疑是有价值的。”贝尔纳认为最伟大的实验原则便是质疑精神，哲学质疑能够给人类的思想以自由和积极性。他认为有些形式的怀疑是无益的，但是有意义的质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思想的边界：“人类的思想是有限的，既不知道万物的起源，也无从得知其最终的归宿，但是我们至少能尝试去掌握中间的部分，也就是周围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一切事物。”[50]

波伏瓦在学校里读的哲学课本是由查尔斯·拉尔神父所写的《哲学手册》（*Manuel de Philosophie*）。这本书也讨论过质疑的意义，但是它警告读者不要过度质疑，因为质疑会破坏甚至是毁灭你的宗教信仰。尽管当时的波伏瓦还只是一个学生，但是她

拒绝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把思想禁锢在系统里，剥夺思想的自由。[51]波伏瓦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对自由的哲学感兴趣，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她后来的人生决定、哲学理念，还有世人对其人生的误解都有很大的帮助。20世纪20年代，波伏瓦读了19世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耶的作品。富耶对自由的看法和让-雅克·卢梭截然不同，他认为“人不是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的”[52]，自由是一种“思想力”，也就是说思想拥有影响着人生发展进程的力量。人的行为和命运究竟是出于自我意志与创造，还是命中注定？富耶对这样由来已久的问题很感兴趣。有人认为人类注定会以某种方式行事，富耶就此反驳道，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本身就能使得我们变得自由。

有些人担心欲望和情感会折损我们的自由，但是富耶认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不同于其他的欲望，因为对自由的欲望能够抗衡别的欲望。对自由的渴望让人类想要的不仅仅是“好的事物”，也不仅仅是“好的决定”，而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决定。[53]

波伏瓦希望她的未来完全掌控在她自己手中，想要一生过得自由自在，还想学习哲学。当她母亲告诉希望学校的老师波伏瓦选择的科目是哲学时，学校里的修女们说，在索邦用不了一年，德·波伏瓦小姐就会被带坏，放弃信仰，走上歪路，这让波伏瓦的母亲十分忧虑。[54]所以，一家人各自退让了一步：波伏瓦可以先学习文学。

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培养哲学顶尖人才的圣地。然而1925年时，巴黎高师这座久负盛名的学校并未对女性开放，波伏瓦的哲学世界被关上了一道门。波伏瓦不得不在索邦大学先读一个学位，然后拿教育学的文凭，再去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25年，她开始在天主教学院学习数学，在圣玛丽学院学习文学和语言。这两所学校都为天主教信仰的学生准备索邦的

考试，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对世俗文化的接触。

德·波伏瓦夫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女儿选了一所这么好的学校，她之所以选择圣玛丽学院，只是因为那里的天主教氛围很浓厚。波伏瓦在那里遇上了马德莱娜·达尼罗老师，她是当时全法国学位最多的女性。达尼罗老师认为教育才是解放的关键，她的丈夫查尔斯·达尼罗是一名议员，跟她持有相同看法。因为女儿们都长大了，乔治也不怎么在家，弗朗索瓦丝便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读书和学习，她跟着波伏瓦一起学习教材。弗朗索瓦丝其实很有天赋，她读波伏瓦的教材越多，越佩服达尼罗夫人的课程设计。

波伏瓦对于母亲所给予的关注感到既甜蜜又苦恼。她知道母亲想要让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能像朋友一样，想要建立那种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亲密母女关系。但是她总是强迫波伏瓦，所以导致了波伏瓦的逆反情绪。据埃莱娜说，弗朗索瓦丝甚至会开封并阅读波伏瓦所有的信件，甚至到波伏瓦18岁的时候，她还是把她认为不合适的那些信件直接扔掉，不让波伏瓦看到。^[55]波伏瓦当时的字已经小得难以辨认了，但她决定要写得更小些，好像这样就能逃过母亲那窥探的目光。

母亲的过分管束让姐妹俩感到窒息。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雅克来雷恩街拜访波伏瓦一家的那天，德·波伏瓦夫人却一反往常，放松了管束。雅克已经快一年没有来了，这一次他刚买了一辆跑车，想来炫耀一番。年轻气盛的雅克渴望别人的关注，他向波伏瓦侃侃而谈那些住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作家和艺术家。埃莱娜迅速意识到其实雅克并不是专门来看波伏瓦的，但是从波伏瓦殷切的目光和绯红的双颊，埃莱娜看得出来波伏瓦是喜欢着雅克的。当雅克提出要开车带波伏瓦出去兜兜风时，一向保守的弗朗索瓦丝欣然同意了，这让埃莱娜惊讶不已。埃莱娜不想被留在家

里，因为她知道波伏瓦和雅克一走，自己就得看着母亲“狂喜”。弗朗索瓦丝其实希望雅克能够娶了波伏瓦，有没有彩礼都无所谓。

接下来在雅克和波伏瓦之间发生的，看起来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戏码了。这也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次传统的求爱。雅克开车带着她逛巴黎，他们一起在布洛涅森林里漫步，一起读禁书、逛画廊、听音乐。但突然有一天，弗朗索瓦丝就禁止他们再一起外出了。弗朗索瓦丝希望通过欲擒故纵的方法让雅克对波伏瓦感情升温。但同时弗朗索瓦丝也开始对波伏瓦衣服上的烟草味和酒精味感到疑神疑鬼，她猜测波伏瓦已经开始出入酒吧和咖啡馆了。

那年，波伏瓦以高分通过了考试，她的哲学老师鼓励她继续在圣玛丽学院深造，以及在索邦大学修读尽可能多的课程。波伏瓦拿到了高等教育的三个资格证：数学、法国文学和拉丁语。这是什么概念呢？想要拿到一个相当于现在本科学历的文凭需要先拿到四个资格证，而一般的学生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一个资格证。

同年，雅克没有通过法律考试，打算第二年从头再来。雅克渐渐地变得懒惰，也开始酗酒，但是波伏瓦却故意无视了雅克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她不愿意承认，雅克对她其实只是逢场作戏。她和雅克其实也没有更深入地交往，甚至都没接吻过。雅克经常不在，就算在，也老是心不在焉。但是波伏瓦把这种疏离都归咎于她自己的不足。我们很难想象成熟后的波伏瓦，回看自己那段时间的日记，会不会感到失望。在《端方淑女》以及她成熟的哲学论著中，波伏瓦用了大量篇幅谈及两人的感情。雅克含糊其词地提到过结婚，会说些像“看起来我很快就要结婚了”这样的话，但是从来没有真的向波伏瓦求婚。后来，波伏瓦反思为何当时自

己那么迫切地想要结婚，也许她只是想通过婚姻实现别的目的：只有结了婚，她才能获得家人的爱和尊重。

波伏瓦内心是很矛盾的，她在日记里对比着想象中雅克·尚皮涅勒夫人的一生与她口中“自由的一生”。1926年的夏天，波伏瓦在乡村和亲戚们一起度过，她努力地让自己开心起来。9月份回到巴黎的时候，她想要见雅克，但是弗朗索瓦丝不允许。

那年夏天，18岁的波伏瓦第一次开始尝试写小说，但是这本叫作《埃莲娜》（*Éliane*）的小说她只写了9页。[\[56\]](#)尽管她对哲学充满了热情，但是波伏瓦并不想创造出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她想要写一本关于内心生活的小说[\[57\]](#)，展现她笔下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她之所以生出这样的想法，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作品的启发，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里倡导小说家们都应该勇敢起来。波伏瓦在日记里引用柏格森的话：“文学能够撕开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所精心编制的网。”阅读柏格森的时候，波伏瓦感到智识上的愉快，因为她在柏格森的哲学里看到的不是逻辑的建构，而是能够被切实感知的现实。[\[58\]](#)

在日记里，波伏瓦写下自己要“思考生活”，要把哲学思考带进生活中。在接下来的两年间，波伏瓦一直在写短篇故事，并在写作里贯彻这种“思考生活”的方式。她细致入微地描写体验，这也是她日后作为一个哲学家所感兴趣的现象学的典型。现象学从第一人称视角去研究意识结构。现象学塑造了波伏瓦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而女性主义的创作反过来影响了波伏瓦的现象学。1927年，波伏瓦想要写关于生活的散文，她想要创作的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能够连接小说的哲学。[\[59\]](#)

在1960年出版的《盛年》里，波伏瓦写道她不是哲学家，

萨特才是。[\[60\]](#)然而在1926年的夏天，波伏瓦的日记里记录了一段让她震惊、羞愧、反思良多的经历，这其中也有之后她的哲学思考中的一些中心主题。三年之后，波伏瓦才遇到萨特，而当时波伏瓦的思考对萨特后来的作品也有很深的影响。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姑妈一起去法国卢尔德游玩。在旅途中，她见到很多深受重病折磨的人痛苦地寻求帮助，等待治疗。这一切冲击了波伏瓦的价值观。在这些病人面前，波伏瓦觉得那些舞文弄墨、小情小调的追求都显得太过轻浮。跟这些人的痛苦和不幸相比，自己的烦恼简直不值一提。在那一刻，波伏瓦感到羞愧，她觉得必须牺牲自己，奉献他人。[\[61\]](#)

但在认真思考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的结论并不对。波伏瓦在日记里劝慰自己不该为自己的生活而感到羞愧，她被赋予了生命，就应当把生命活到极致，活出最好的可能性。如果完全牺牲自己，奉献他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杀。而且这种自我牺牲比痛苦地抉择多大程度上放弃自我、多大程度上保留自我要来得简单。波伏瓦觉得她需要的是一种平衡，既要为他人奉献，但也不要为为他人奉献的过程中失去自我。[\[62\]](#)

6天之后，波伏瓦在日记中重新回顾了这个主题，她讨论了两个极端的可能性：完全的自我奉献和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考虑到波伏瓦的童年经历，我们很容易从她父母身上找到这两种极端的原型。虽然波伏瓦在日记中没有提及母亲不幸的自我奉献，也没有提到父亲顽固不化的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从她后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推断，波伏瓦的家庭的确给了她一种不公平感。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她想要为他人奉献，因为她是喜欢他人的。但是她也希望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能够统一，所以她问自己：有没有一种道德观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的欣赏之上？不管这对他人可行不可行，波伏瓦决定要自己尝试这种道德观：[\[63\]](#)

我固然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但是这真的会妨碍我去无私地爱别人，以及为他人奉献吗？在我看来，我有一部分生来就是要奉献他人的，有另一部分生来就是要保持自我的。第二部分能够独自成立，而且它保证了第一部分的价值。

[64]

18岁的时候，波伏瓦觉得现有的哲学讨论很多都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她开始思考从理性的角度认知某件事情和在真实的生活感知某件事情之间的距离。[65]波伏瓦认为文学填补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我很喜欢那些能够重新发现生活的作家，以及那些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连接生活的作家的哲学家。”[66]波伏瓦也想做这样的中间人，她尤其想要展现人类的二元性，从内向外审视自我和从外向内审视自我，同时有内心的丰富世界，和与外在他者的紧密联系。9月的时候，波伏瓦尝试着写了另一本68页的小说《一次试探性的存在》（*Tentative d'Existence*）。[67]

1926年秋，波伏瓦对雅克的喜爱让她感到很纠结。在那个时候，波伏瓦仍然天真地相信雅克能够回应她对他的爱。波伏瓦想要的是：“一种能陪伴我一生，而不是吞噬我一生的爱。”波伏瓦认为，爱情不应当使生活里其他的一切都消失，而应该为其锦上添花。[68]

不过很快波伏瓦又改变了想法，她觉得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结婚。而且如果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话，也许婚姻是一件伟大而美好的事情。但同时弗朗索瓦丝让波伏瓦觉得很烦心，弗朗索瓦丝觉得波伏瓦和雅克之间进展得不够快，还总是担心雅克不向波伏瓦求婚。[69]于是弗朗索瓦丝故意安排波伏瓦出去跑腿置办东西，让她在路上偶遇雅克。弗朗索瓦丝原以为这样做波伏瓦会高兴，但实际上波伏瓦特别别扭。在11月的时候，波

伏瓦在日记里写道：“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无力感，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切都是强加到自己头上的，最后我只能在我的生活里放弃自己。”[\[70\]](#)

波伏瓦的母亲在结婚这件事情上一直对波伏瓦紧逼不放。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角色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我我觉得有价值，必须得让我先认同那个角色才行。”很明显，波伏瓦看待爱、人生和幸福的方式和她父母截然不同。她拒绝不加思考地过活，不想在别人安排下做所谓正确的事情，读别人认为适合她读的书。1926年，波伏瓦终于得出结论，她尊敬那些思考自己人生的人，既不是那些只思考的人，也不是那些只生活不思考的人。[\[71\]](#)

根据波伏瓦的第一部传记的作者戴尔德丽·贝尔记载，1927年新年过后，弗朗索瓦丝决定带她去拍一张生日纪念照。这种纪念生日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波伏瓦知道母亲其实另有企图，那就是雅克。弗朗索瓦丝故意不让波伏瓦摆出拍生日照片常用的姿势，而是要摆出拍订婚照片常用的姿势：原本应该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握着花束。弗朗索瓦丝就是故意要凸显波伏瓦的手指还是空荡荡的。弗朗索瓦丝特意送了一张照片给雅克，没想到雅克就这么欣然接受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弗朗索瓦丝对此简直气得头顶冒烟。

波伏瓦对这件事情怎么想，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有可能是因为波伏瓦故意没在日记里记录，也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西尔维勒·邦·波伏瓦否认了曾经有这样一张照片的存在，波伏瓦的日记对这个话题也是避而不谈。在1926年12月初到1927年4月这段时间，波伏瓦的日记内容少之又少。但贝尔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就这么结束了。1927年春，埃莱娜也从希望学校毕业了。本来因为雅克的出现，埃莱娜和波伏瓦有些疏离了，但最近

因为母亲脾气暴躁，两姐妹又联合了起来。弗朗索瓦丝对于雅克迟迟不求婚这件事感到十分挫败和无力，因为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雅克手里，她只能干着急。但是弗朗索瓦丝的满腔愤懑无处发泄——现在也不能嘲笑和讽刺自己的女儿——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出来。那天晚上，波伏瓦一家和尚皮涅勒一家共进晚餐，一晚上雅克都没有向波伏瓦提出求婚。弗朗索瓦丝忍无可忍，愤然离席，步行了几个小时回家，她大声叫嚣着一定不能就这么让女儿被羞辱，然后就离开了公寓。当时乔治是在家的，但是他懒得下床。埃莱娜听到母亲的话之后，赶忙披上衣服追了出去，一直追到蒙帕纳斯大街。弗朗索瓦丝来到尚皮涅勒的家门口，开始大喊大叫。母亲出门时的声音把波伏瓦也吵醒了，她跟着追了过来。看到失控尖叫的母亲，波伏瓦和埃莱娜赶紧带她回家。[72]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我们甚至要怀疑当时弗朗索瓦丝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了。在那之后，波伏瓦作品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女性角色，她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有时候甚至到了在发疯边缘徘徊的程度。[73]

我们从两姐妹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从1926年到1927年的那段时间，即使没有男性追求者或是女性年长监护人的陪同，她们俩也被允许出门了。波伏瓦经常去圣吉纳维夫图书馆的女性专用阅览室，同时她也开始去一所叫作“社会装备”的机构教课。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由一位年轻有为的哲学教授创办的，旨在帮助巴黎东北部的工人阶级。[74]弗朗索瓦丝同意了波伏瓦做慈善的要求。实际上，波伏瓦有时候拿教书做借口，好在晚上偷偷地离开家出去闲逛。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在巴黎的街道上散步，有时候她会去看埃莱娜画画。在教课的学校里，波伏瓦遇到了很多男性女性，他们聚在一起谈理想。在埃莱娜的绘画课上，波伏瓦看到许多自信地裸露身体的模特，以及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绘画者们。

姐妹俩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么多有趣而多样的人。

除了读纪德和普鲁斯特，波伏瓦还跟着雅克学会了喝鸡尾酒，现在的波伏瓦也成了酒吧的常客。有时候波伏瓦不去教书，埃莱娜也翘掉自己的艺术课，俩人一起去酒吧和咖啡馆，她们还常常去光顾小时候一起去的那家圆亭咖啡馆。波伏瓦也开始在圣玛丽学院当助教，有了一点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她可以负担自己的花销了，除了买书，还能余下一些钱。

尽管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晚上波伏瓦也常常出去闲逛，但她在学业上依然很优秀。1927年3月，波伏瓦拿到了哲学史的高等教育资格证。4月的时候，她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感慨自己“好好地学习了哲学史，还加强了本来就很尖锐的批判思维和严谨的逻辑（哦天哪！）”。^[75]我们不禁好奇，到底是什么使得波伏瓦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哦天哪！”？是什么让她觉得自己不该有尖锐的批判思维和严谨的逻辑呢？她为何对自己拥有才华感到担忧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会看到，这些是不是跟她的宗教信仰，或者女性气质，抑或是人生幸福相冲突了呢？

1927年6月，波伏瓦又拿下了一个高等教育资格证——哲学概论。在这门考试中，她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薇依后来成了著名的思想家，她的哲学和自我牺牲启迪了她身边的很多人，包括阿尔贝·加缪和乔治·巴塔耶。这次考试中的第三名莫里斯·梅洛-庞蒂，后来也成了法国哲学界的翘楚。除了这个资格证之外，波伏瓦同时拿到了希腊语的资格证。在短短两年间，波伏瓦就拿了6个资格证，相当于一个半的大学文凭。

波伏瓦在《端方淑女》中写道，学业上的成功不仅为她带来了尊重，还让她感受到深切的孤独和迷茫。她坦言：“我脱离了

自己本来属于的阶层。我到底应该去到哪里？”[76]我们在她的日记里也能体会到这样的孤独感。1927年3月，波伏瓦记录道：“学业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非常孤独，也非常迷茫，仿佛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我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我要说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想到雅克此前对自己的哲学追求嗤之以鼻的做法，波伏瓦在日记里坚决地写下：“我的人生只有一次，而且我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他不能把我的人生从我手里偷走。”然后波伏瓦在旁边的空白处打了着重号。[77]

也是在那天，波伏瓦重新想起自由，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和随机应变，真的自我才能显现。”波伏瓦身边的人都在谈论着人生选择，比如结婚，但是她们总认为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便可以一劳永逸。波伏瓦认为没有什么选择是一劳永逸的，相反，她觉得每一个选择“都处在变化之中，每次我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实际上重复了自己的选择”。那天波伏瓦在日记里总结道，婚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道德的，今天的自我怎么能够为明天的自我做选择呢？

虽然波伏瓦那时仍然没有放弃雅克，但是她也开始与别的男性见面。当她和查尔斯·巴尔比耶聊起哲学和文学的时候，她发现查尔斯并没有像雅克那样对她嗤之以鼻，一笑而过，而是报以真诚的欣赏。这样的经历让波伏瓦意识到她的未来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她不得不扼杀掉众多的可能性，只选择一种。这样她的人生就只有一种现实，因为人只能过一种人生，但问题是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78]

波伏瓦很早就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她深信自己需要发声表达，被别人听见。在《端方淑女》里，波伏瓦甚至引用希伯来先知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使命感。在一个《圣经》故事中，上帝需要一个使者，便问以色列人：“我该派谁去呢？”先知以赛亚回答

道：“我去，派我去。”波伏瓦在回忆录里面写道，自己心里也不断回荡着一个声音：“我去。”^[79]不管有没有上帝，波伏瓦知道自己将来要表达的内容很重要。同时她也意识到，会有各种各样的阻碍——有的是正面冲突，有的是背地里使坏——阻拦她表达她的想法。

波伏瓦虽然很坚定，但是她还是会自我怀疑，会在乎他人的期待。她的父母不满她所读的书，有时候甚至为此大发雷霆。波伏瓦渐渐觉得自己的父母完全不接纳她。^[80]她跟父亲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多。父亲甚至扬言要把她赶出家门，狠狠地指责她只有大脑，没有了感情和心灵。^[81]

在雅克对波伏瓦的哲学热情嗤之以鼻那件事的前一周，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产生了争执。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波伏瓦当时在读已被今人遗忘的哲学家阿兰和于勒·拉尼奥的作品，她说，她在拉尼奥的作品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她看来，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懂爱，不认为互相回馈是爱的必要条件。^[82]1927年7月，波伏瓦再次下决心，“要清楚地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她想要深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爱”^[83]（她在日记中打上了双引号）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对立”^[84]。对于19岁的波伏瓦来说，“爱”的观念不仅关乎浪漫，还关乎伦理道德。

在日记里，波伏瓦叮嘱自己：“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样就可以了。”^[85]

波伏瓦也和扎扎在一起讨论“爱”；她们都热爱哲学，都担忧着自己的未来，这样的共同点让两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亲近。她们在学校的哲学课上一起探讨“爱”的本质，两人的讨论贯穿整个

学习周，甚至在参观博物馆或者打网球的时候也不忘讨论一番。

[86] 弗朗索瓦丝是认可两人的友情的，但是拉库万夫人却担心起来，她觉得扎扎对学习的兴趣过于浓厚了，而波伏瓦的存在对此更是火上浇油。扎扎不想要那25万法郎的巨额嫁妆，而是想去索邦大学念书，她的父母对此很是费解。

渐渐地，波伏瓦开始结交新朋友，社交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20岁那年，波伏瓦去扎扎家位于兰德斯乡间别墅做客的时候，遇到了她们的家庭教师斯捷帕·奥迪科维奇；斯捷帕后来成了波伏瓦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当时的波伏瓦眼里，这个波兰-乌克兰裔的移民女孩充满了异国情调，且勇敢：她家庭富裕，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之所以选择做家庭教师，是因为她对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很感兴趣。跟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斯捷帕完全不羞于谈论自己的性取向。回到巴黎之后，波伏瓦和斯捷帕几乎天天见面。斯捷帕跟波伏瓦住得很近，在外交部做翻译，收入很可观，对朋友也很慷慨。有时候斯捷帕会笑话波伏瓦过于拘谨保守，也会像个大姐姐一样为她的天真烂漫而担心。

埃莱娜把波伏瓦介绍给了在艺术课上认识的杰拉尔丁·帕尔多，她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杰杰”。杰杰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决定今后无论结不结婚都要继续工作。杰杰的热情洋溢和能说会道打动了波伏瓦，跟杰杰的相处也让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阶层并非决定一个人言谈举止的必要因素。

斯捷帕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担心天真的波伏瓦。这是因为波伏瓦开始沉溺于去酒吧冒险，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无伤大雅，但其实隐藏着很多危险。斯捷帕和波伏瓦在酒吧里的时候，会有男人主动请她们喝酒，一开始斯捷帕也会接受，但是波伏瓦喝了酒之后还会坐着这些男人的车，回他们的公寓。这些男人显然是想跟她上床，但是波伏瓦并不打算这么做。尽管最后波伏瓦成功

脱身了，但是看到波伏瓦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危险当中，斯捷帕很生气，尤其是这时候波伏瓦还摆出一副自己快要和雅克订婚了的样子。

18岁的波伏瓦虽然在哲学上非常早慧，但是在生活上她有时候相当鲁莽，做事不顾后果。有一次波伏瓦去看望快要成婚的斯捷帕，她的未婚夫叫费尔南多·杰拉西。波伏瓦到斯捷帕家的时候，发现费尔南多在斯捷帕的房间里，房门紧闭，波伏瓦对此感到很惊讶。她问斯捷帕难道不担心自己会名誉扫地吗？后来费尔南多为斯捷帕画了一幅裸体肖像画，波伏瓦更是大惊失色，连看都不愿意看。波伏瓦的朋友们觉得她假正经过了头，但没想到波伏瓦反过来跟斯捷帕和杰杰说她们的不检点行为都是因为出身不好没有家教导致的。^[87]这样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实在是让人感到不解。当然了，当时年轻的波伏瓦应该也会对她自己后来的小说以及人生里的很多场景都大惊小怪。

波伏瓦还在日记里思考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问题。她开始把她的存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为他人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88]波伏瓦对于存在的分类比萨特在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里的分类“自为的存在”（being for it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 for others）早了很多年。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是萨特的分类影响了波伏瓦的小说和《第二性》，其实波伏瓦早在他之前就独立地创造了这个分类。^[89]

从1927年到1928年，波伏瓦决定再拿三个科目的资格证，这样她就可以拿古典学和哲学的两个文凭。不过波伏瓦也并不总是享受自己给自己提要求，有时候她会抱怨要花很多时间在家或是图书馆学习，她觉得当时的自己就好像一个踏步机上的老鼠。1928年3月，波伏瓦成功拿下了道德和心理学的资格证，获得了哲学文凭。古典学还差一门科目，但波伏瓦觉得文献学太枯燥无

味了，不想在上面花时间和精力，最后她决定干脆不要古典学的文凭了。乔治强烈反对，他认为波伏瓦已经没法在结婚这件传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了，那就应该在非传统的道路上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但是波伏瓦坚持己见，放弃了古典学的文凭。

波伏瓦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她的优秀也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在哲学概论的资格证考试中，莫里斯·梅洛-庞蒂被两位女性超越，屈居第三。排名第一的西蒙娜·薇依是个犹太人，天主教徒梅洛-庞蒂觉得他们可能没法成为朋友，于是很想认识排名第二的、同是天主教徒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但其实波伏瓦根本不会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天主教女性”。^[90]很有意思的是，后来西蒙娜·薇依倒是成了一个有狂热信仰的女性，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则成了无神论的拥护者。

^[1] MDD 72.

^[2] MDD 106.

^[3] MDD 16.

^[4] MDD 71.

^[5] Bair, p.51.

^[6] Hélène de Beauvoir, 引自Bair, p.58.

^[7] MDD 97.

^[8] MDD 131.

^[9] VED 35.

^[10] Thion de la Chaume, 引自HdB, *Souvenirs*, p.27.

^[11] MDD 66.

^[12] MDD 29.

^[13] MDD 30.

^[14] MDD 55.

[15] *Entretiens avec Simone de Beauvoir* [1965], in Francis Jeanson, *Simone de Beauvoir ou l'entreprise de vivre*, Paris: Seuil, 1966, 引自Deguy and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Ecrire la liberté*, Paris: Gallimard, 2008,p. 99.

[16] MDD 121.

[17] MDD 36.

[18] SLBdB, 'Chronologie', MPI lix. 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在1919年7月给了西蒙娜一本。

[19] 1965 Paris Review interview.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interviews/4444/simone-de-beauvoir-the-art-of-fiction-no-35-simone-de-beauvoir>

[20] MDD 85.

[21] MDD 109.

[22] 波伏瓦读到结局时，发现劳里和艾米结婚了，气得把书扔到了房间对面；而乔·马奇嫁给了一个老教授，从此封笔，开办了一所学校。波伏瓦写道，这个男性角色的闯入让她不爽(MDD 104–5)。在《第二性》中波伏瓦也提到了这些。

[23] DPS 63, 12 August 1926.

[24] MDD 140.

[25] 见VED 36–7.

[26] MDD 166.

[27] MDD 131.

[28] BO 10–11.

[29] HdB, *Souvenirs*, p.29.

[30] Bair, p.55.

[31] VED 35.

[32] MDD 57.

[33] SS 320.

[34] MDD 92.

[35] 见Bair, pp.79–80.

[36] SS 378.

[37] HdB, *Souvenirs*, p.36.

[38] MDD 176.

[39] MDD 121.

[40] 见CJ 744, 3 August 1929.

[41] 见MDD 152.

[42] Félicien Challaye to Amélie Gayraud, in Amélie Gayraud, *Les Jeunes filles d'aujourd'hui*, Paris: G. Oudin, 1914, pp.281–3.

[43] Bair, p.90.

[44]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 是除了圣奥古斯丁外基督教神哲学中另一个顶峰人物, 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两座高峰一样。

[45] MDD 157.

[46] MDD 158.

[47] 见MDD 101–2, 107.

[48] MDD 160.

[49] MDD 160.

[50] Claude Bern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85, 引自Margaret Simons and Hélène N. Peters,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Bernard's Introduction', Beauvoir, PW 18.

[51] Bern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37, 38, 39, 73, 引自Margaret Simons and Hélène N. Peters,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Bernard's Introduction', Beauvoir, PW 18.

[52] 'On ne naît pas libre, il le devient'这句话引自波伏瓦当时的教科书 Charles Lahr, S.J., *Manuel de philosophie résumé du cours de philosophie*, Paris: Beauchesne, 1920, p. 366. 另一句相同句式的话 ('one isn'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free') 通常被认为出自诗人兰波, 简洁地概括了斯宾诺莎关于自由的哲学。见Alain Billecoq, 'Spinoza et l'idée de tolérance', *Philosophique* 1(1998): Spinoza, pp. 122–42.

[53] 见Alfred Fouillée, *La Liberté et le déterminisme*, 3rd edn, Paris: Alcan,

1890.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写道富耶的作品是她的哲学课上布置的阅读作业，但是我们不清楚波伏瓦指的是富耶以下作品中的具体那一部:Fouillépublished three essays on ‘idées-forces’ between 1890–1907: L’évolutionisme des idées-forces (1890), La psychologie des idées-forces (1893) and La Morale des idées-forces (1907). 见MDD 157; MPI 146.

[54] MDD 160.

[55]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42; HdB, *Souvenirs*, p.67.

[56] 见SLBdB,‘Chronologie’, MPI lxi.

[57] MDD 208.

[58] 见DPS 58–61, 66, especially 16 August 1926.

[59] Simone de Beauvoir, carnets 1927, unpublished holograph M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54–5;引自Margaret A.Simons,‘Introduction’to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PW 264.

[60] PL 265–6.

[61] DPS 55, 6 August 1926.

[62] DPS 55, 6 August 1926.

[63] DPS 63, 12 August 1926.

[64] DPS 63, 12 August 1926.

[65] 见DPS 65, 63.

[66] DPS 67, 16 August 1926.

[67] SLBdB,‘Chronologie’, MPI lxi.

[68] DPS 68, 17 August 1926.

[69] 见DPS 112, 12 October 1926.

[70] DPS 162, 5 November, 1926.

[71] DPS 164, 5 November 1926.

[72] 见Bair, p.112.

[73] 见Elizabeth Fallaize, *The novels of 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 Routledge,1990, p.84.

[74] MDD 171–3.

[75] DPS 232, 20 April 1927.

[76] MDD 195.

[77] DPS 246–8, 6 May 1927.

[78] DPS 246–8, 6 May 1927.

[79] MDD 82. 见以赛亚6：8和创世记22：1，亚伯罕姆也用到同样的话。康德和克尔凯郭尔讨论到献祭以撒（Akedah）的道德时也谈到这里。

[80] MDD 188.

[81] MDD 193.

[82] DPS 265, 28 May 1927.

[83] DPS 277, 7 July 1927.

[84] DPS 279, 10 July 1927.

[85] DPS 274, 29 June 1927.

[86] MDD 158.

[87] 见Bair, p.119.

[88] DPS 163, 5 November 1927.

[89] 人们一般认为萨特在黑格尔提出的“in-itself”（自在）和“for-itself”（自为）的基础上加上了“pour autrui”（他），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在阿尔弗雷德·富耶的作品中找到的。萨特和波伏瓦都在青年时期读过阿尔弗雷德·富耶的作品。见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volume 2, The Hague: Springer, 2013, 472–3.此外，波伏瓦“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和“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的分类也有一部分是受到亨利·柏格森的形而上学中类似分类的启发。见*The Creativ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Mabelle L. Anderson,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92.

[90] 见Bair, p.124.

第三章

信仰上帝还是相信自己？

在波伏瓦19岁生日前夕，她在日记里失落地感慨自己不再信仰上帝。在孩提时代，波伏瓦相信是上帝主宰了一切。不管回过头来看，上帝主宰得好不好，现在的波伏瓦不得不面临没有了上帝之后的种种问题。如果没有上帝感召，一个人还会有天职和使命吗？如果没有上帝，那是谁赋予了众生、万物以价值？波伏瓦喃喃自语：“也许我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价值必须存在。”^[1]思考着这些问题的不止波伏瓦一个人。进入20世纪以来，巴黎的哲学贤者们就在讨论继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哲学的信仰和体验到底还有何益处。^[2]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两次失去对她影响至深，一个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一个是挚友扎扎的去世。扎扎去世之后的至少30年里，波伏瓦都觉得她的自由是用扎扎的生命换来的。

1928年，波伏瓦在巴黎发现了生活里其他的一些乐趣：波希米亚风潮的兴起和反叛的精神、超现实主义、电影戏剧和芭蕾舞表演。^[3]那一年，波伏瓦开始在索邦大学念书，遇到了一帮优秀的同侪。但很可惜的是，在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中名列第一的西蒙娜·薇依和名列第二的西蒙娜·波伏瓦并没有成为好朋友。波伏瓦对于西蒙娜·薇依的名声早有耳闻，但不是因为西蒙娜·薇依的聪慧过人，而是因为她对他人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心。当时中国爆发了大饥荒，听闻此事的西蒙娜·薇依竟然掩面而泣，

这件事让波伏瓦很惊讶，她觉得薇依竟然能够为地球另一端的人而心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波伏瓦很想认识这个不寻常的女性，但她们的初次对话就在冲突中结束。薇依认为革命更重要，而波伏瓦认为弄清楚人类的存在更重要。薇依当时用一句话结束了她和波伏瓦的交流：“很明显，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痛苦。”在波伏瓦看来，薇依是用有色眼镜看待她，并武断地给她贴上了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的标签。^[4]当时波伏瓦觉得薇依这样的判断有失公允，毕竟薇依并不了解她的真实处境，就仓促地下了结论。其实后来薇依也对自己年轻时做的这个仓促判断感到后悔。

在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中位列第三的梅洛-庞蒂后来成了波伏瓦的密友，波伏瓦甚至亲昵地称呼他为“庞蒂儿”。梅洛-庞蒂当时在巴黎高师读书，他的家庭背景跟波伏瓦很相似，梅洛-庞蒂也为自己的信仰问题感到疑惑。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的排名公布之后，梅洛-庞蒂主动去找了波伏瓦，提出要跟她交朋友。渐渐地，他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也交换阅读彼此的作品。梅洛-庞蒂非常喜欢波伏瓦，于是把自己的好友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介绍给她认识。莫里斯对波伏瓦的聪慧过人赞叹不已，也对波伏瓦的信仰状态很感兴趣。同样地，波伏瓦也很喜欢梅洛-庞蒂，于是把自己的好朋友扎扎介绍给他认识。很快，他们四个人就玩到了一起，每周日的早晨他们都一起打网球。梅洛-庞蒂是扎扎认识的第一个知识分子。跟他们交往之后，扎扎开始对之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充满期待：她想要遵照家人的要求结婚，但同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精神自由和对真爱的追求。

波伏瓦对遇到梅洛-庞蒂这个谈得来的朋友感到兴奋不已。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都是在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中长大，尽管梅洛-庞蒂一开始自认为是一个安静的不信者。后来

在巴黎高师念书的时候，梅洛-庞蒂加入了被戏谑为“伪圣人”的组织，因为他们都不太虔诚，也不怎么尊敬神父们。当时的波伏瓦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像她一样在学校继续念书，而且她也会用宗教信仰或是家庭背景来轻易地给女性贴标签，不怎么搭理她们。

[5]反而，她倒是和“伪圣人”组织里的其他成员成了朋友，比如让·米歇尔。他和波伏瓦一样都师从当时的著名学者让·巴吕齐，接受他的指导准备论文写作。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写到她去听让·巴吕齐的课。让·巴吕齐有篇关于圣十字约翰的文章受到很高的评价。[6]波伏瓦不仅去听了巴吕齐的课，还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另一篇论文。波伏瓦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巴吕齐的敬意，因为他认真地对待波伏瓦，给了她很多批判性的意见。[7]但是在波伏瓦公开的回忆录中，她一直对这篇论文的内容避而不谈，只是说涉及了人的个性问题[8]，导师巴吕齐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之后可以发展成一个正式的作品[9]。波伏瓦的日记明确记载了自己在论文里讨论了爱情和道德的问题[10]，但是回忆录里的闪烁其词不禁让人想问：为什么波伏瓦的日记和回忆录有出入？很可惜波伏瓦的这篇论文并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没法去其中寻找答案。[11]但是根据日记里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那个时候波伏瓦的思考已经为后来20世纪40年代她关于道德的哲学思考埋下了伏笔。因为波伏瓦这部分日记之前一直没有公开，很多人都认为波伏瓦关于道德的思考完全是借鉴萨特的。所以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隐藏自己的早期作品不让读者知道吗？是因为她担心公开了之后会有损萨特的名声吗？还是因为她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没法相信一个女性哲学家能够影响伟大的让-保罗·萨特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波伏瓦在生活中很难找到跟她一样对哲学充满热情的女孩子。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从男性友人身上寻

求思想的碰撞，她也享受跟他们的交谈和友谊。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坦言，当有女性对男性采取敌对态度时，她感到很惊讶。因为对她来说：“从一开始，男性就是我的同伴，而不是我的敌人。因此我完全不会去嫉妒他们。我现在理解了我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不寻常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我享受了某种特权。”^[12]回望过去，波伏瓦认识到自己因为学业优异，享受了某种象征意义上的平等，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种象征意义上的平等是有问题的。在学生时代，波伏瓦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跟男性不平等，其实是因为这些男性根本没有把她当作竞争对手去看待。因为在法国的教育系统里，男女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波伏瓦和其他女学生只是定额外多出来的，她们也不会和男学生去竞争相同的工作。当时的法国给女性提供教育，但是这些女学生今后就算学成了，也只能去女子学校教书，因为大众认为男性不适宜去女子学校当老师。

根据戴尔德丽·贝尔的记载，当波伏瓦发现梅洛-庞蒂并不像她一样是无神论者之后^[13]，她对梅洛-庞蒂热情有些减淡。因为波伏瓦很失望，梅洛-庞蒂竟然认为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真理。对于这件事情，波伏瓦日记里的记载再次和回忆录中出现矛盾。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浓墨重彩地描写自己不再相信上帝之后的失落，却在日记里对此一笔带过，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在回忆录里，她写道当自己领悟到上帝不存在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之前的信仰”。^[14]她斩钉截铁地告诉读者，她的无神论信仰自此从未动摇过。^[15]她借用圣奥古斯丁和布莱士·帕斯卡的例子，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世间万物一瞬间都安静了。不再信仰上帝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感觉到了“孤独”之不能承受之重。^[16]

然而波伏瓦日记里记载的远没有这么决绝和突然。直到

1928年，波伏瓦20岁的时候，她仍然对天主教态度暧昧。^[17]后来波伏瓦也坦言自己童年时笃信上帝是因为家庭环境使然，并非发自内心。读大学的时候，她猛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智力超群的信教者当中，他们在拥有信仰的同时也保持着质疑的精神。当时的波伏瓦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遇到新的异见时，她不会选择固执己见，也不会为了坚持前后一致而假装不为所动，她能够辩证地去审视它。

让我们重新回溯一下波伏瓦回忆录所记载的内容。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波伏瓦说自己儿时坚定地信仰着上帝，堪比她那虔诚的母亲。波伏瓦一周会做三次弥撒，也会定期参加静修。她自己会进行冥想，甚至会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想法和“圣洁的心愿”。她想要更靠近上帝，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18]那时候的波伏瓦认为未来最好的人生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一心信奉上帝。

波伏瓦在后来的人生里积极地投身政治，但是年轻时的她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一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自己无力去改变外部世界，因此只能转而关注她能够控制的范畴，也就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波伏瓦看来，宗教会训诫人们谨守道德，同时波伏瓦也在书籍里读到另一种神秘的宗教：故事里的圣人们笃信上帝，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与上帝结合，从而获得永恒的平静与快乐。基督教里历来有肉体憎恶的传统，世界各地的宗教也常常宣扬对身体实施苦行主义能够带来神秘的体验。波伏瓦也试着给自己创造了一种苦修的方式，她用浮石刮自己的皮肤直到出血，用项链狠狠地勒自己。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带给她期待的结果。

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解释说自己想当修女只是随口一说，但其实波伏瓦可能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小时候在乡村度夏的时候，波伏瓦为了看大自然渐渐苏醒的样子，早晨会很早起

床，就为了享受“美丽的地球和上帝的光辉”。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及自己与上帝和自然之美产生连接的神奇感受。然而，回到巴黎的时候，波伏瓦感觉“上帝似乎被人们藏起来了，因为他们埋首于自己的事情当中，忙得头重脚轻”。[19]

波伏瓦开始对从不露面的上帝感到困惑。她甚至认为上帝完全是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的局外人。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和学校里的老师都认为教皇是圣灵选出来的，波伏瓦的父母认为教皇不该干涉俗世的事情。因此，当莱奥教皇十三世几度为了社会问题而发出教皇通谕时，弗朗索瓦丝认为教皇背叛了自己神圣的使命，乔治认为教皇背叛了国家。作为被上帝选出来的在尘世的代表，教皇却不可以关注尘世，波伏瓦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悖论。[20]

波伏瓦开始对这些掌管尘世的所谓的基督教徒感到反感。她觉得学校里倾听她忏悔的神父辜负了她的信任。16岁那年，波伏瓦在圣叙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个书店寻找一本书。当时她向一个男店员询问，他走到书店里面，要波伏瓦跟他过去。波伏瓦以为他要拿书给她，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勃起的阴茎露出来给波伏瓦看。波伏瓦被这件毫无预警的荒唐事吓着了，落荒而逃。[21]

埃莱娜也说过，她和波伏瓦的童年感觉好像被上帝压垮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上帝的重压。[22]家里所有的男人，不管是在巴黎的还是利穆赞的，都从来不去参加弥撒。埃莱娜由此得出结论：男人是一种更高级的物种，他们被上帝豁免了。[23]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波伏瓦会反对童年时笃信的天主教义，因为这些教义只不过是用来巩固已经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男人们一个个恣意挥霍，成天享乐，却要求他们的妻子要像圣人一样受苦受难，然后再拿天主教义去美化女人所经受的苦难，说这样女性才能自洁成圣。

在《端方淑女》里，波伏瓦说自己那个不信教的父亲和极其虔诚的母亲就好像是她内心两个极端的代表。父亲代表了理性的那一面，而母亲代表了灵性的那一面。这两个异质的领域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波伏瓦也渐渐觉得人类的文化、政治、商业、礼仪和风俗都和宗教没有关系。因此她把上帝和尘世的生活分开。这样的态度对她后来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24]

面对哲学的空白和宗教的伪善，波伏瓦决定不再相信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造物主，而是选择想象一个没有造物主的世界。[25]当她放下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之后，波伏瓦跟好友扎扎坦白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作家。扎扎回应她说，像她母亲那样生九个孩子，跟作家写书一样好。这个回应让波伏瓦很震惊，因为在她看来，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可比之处。波伏瓦觉得，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只是在无止境地重复相同的事情。[26]

生活和作品对于波伏瓦来说总是不可割裂的。波伏瓦的生活会提供给她需要解答的问题。这些宗教问题波伏瓦后来在《第二性》中也都有探讨。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不得不为了自己的信仰踌躇，一开始是为了学业，后来是因为失去了重要的朋友，波伏瓦不得不直面死亡和不公。

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其实她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绝对存在，可以“合理化她的人生”，不过她不想从理性的角度去承认这一点。波伏瓦的一生中很多次渴望能出现这样一个存在，帮助她找到意义或者是救赎。1927年5月，波伏瓦写道：“我想我还是想要相信上帝的。”[27]到了7月，她写道：“要么信上帝，要么什么都不信。”但是为什么一定是基督教上帝呢？[28]波伏瓦没法从哲学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她和好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几次，她感到梅洛-庞蒂太过于相信天主教信仰和理性推理。1927年7月19

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庞蒂儿支持哲学是因为他相信理性的力量，而我支持哲学恰恰是因为理性的无力。谁能证明笛卡尔一定要优于康德？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我在索邦时候写的：如果你只有理性，你最终只会剩下非理性的元素。”

我们从波伏瓦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她觉得哲学有时候太过于异化，因为它总是要求冷冰冰的推理。波伏瓦觉得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推理，还要有一颗渴望征服的心灵。因此我仍然想要做一个女性，也许我的头脑更男性化，但是我的情感仍然是女性化的”。^[29]波伏瓦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身体力行的哲学，因此她开始对哲学家于勒·拉尼奥产生了兴趣，因为拉尼奥不仅写理性推理，也写自由和欲望。拉尼奥认为，人的欲望也是一种需要去相信的有力冲动。^[30]波伏瓦对此非常认同，她在日记里写道：“哦！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会有那种我爱到想要为之付出全部的人吗？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我不知道，我感到很疲倦，为什么找到他如此困难？”^[31]

波伏瓦觉得自己的心灵极度空虚，她在日记里写道：“能够填补我心灵空洞的人并不存在。”^[32]如果这些文字在她日记中出现得更早一些，读者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是波伏瓦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之后写的。后来波伏瓦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在旁边的空白处又加了一个标注：萨特——1929年。有没有可能是萨特的出现填补了她之前在心里留给上帝的位置？1980年萨特去世之后，波伏瓦把他生前写给她的信出版成书，起名叫作《我生命的见证者》（*Witness to My Life*），而法语中“见证者”（*temoin*）这个词，几个世纪以来也被基督教徒用来形容万能的上帝对自己的凝视。

波伏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跟她人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她对哲学的探索有很大的关系。她个人一直很钦佩扎扎和

梅洛-庞蒂对上帝的笃信，鄙夷斯捷帕和杰杰那样的开放和自由。扎扎和梅洛-庞蒂之间的贞洁恋爱给少女时期的波伏瓦带来了许多快乐。^[33]她由衷地希望扎扎能够获得幸福，希望扎扎的婚姻能像扎扎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要因为利益而过着像娼妓一样的婚姻生活，也不要再在婚姻里心如死灰。扎扎和梅洛-庞蒂之间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拉库万夫人不让扎扎继续在索邦念大二了，理由是她的姐姐已经嫁人了，现在轮到她了。家里人要求扎扎待在兰德斯的大房子里，这样就可以随时准备好和相亲对象见面。1927年夏，拉库万家没有像往常那样邀请波伏瓦去兰德斯的乡间别墅待几个星期，只在7月邀请她过去玩了几天。因为梅洛-庞蒂的老家在波尔多，波伏瓦去扎扎家的时候能顺道路过那里，于是波伏瓦决定和梅洛-庞蒂在波尔多见一面。正好他们俩都喜欢的一个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老家在波尔多，所以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一起进行了一段文学朝圣之旅。旅途过后，波伏瓦很高兴能够给扎扎带去她心上人的消息。

当波伏瓦到达扎扎家的时候，扎扎正在为究竟该怎么做而苦恼不已。一方面，她很清楚自己深爱着梅洛-庞蒂，但是另一方面，她并不想违抗自己的母亲。但是拉库万夫人说什么都不愿意扎扎和梅洛-庞蒂在一起。谁都不知道为什么拉库万夫人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这之前她从来没说过梅洛-庞蒂不好，况且梅洛-庞蒂也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但是现在一旦谈话有可能涉及梅洛-庞蒂，拉库万夫人就迅速转移话题。一开始波伏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渐渐地，她也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愤。拉库万夫人到底为什么要反对？难道她完全不顾自己女儿的自由和感受吗？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波伏瓦已经情绪紧张，但现在波伏瓦觉

得自己更加焦虑了，而且似乎一切都在往更坏的方向上发展。于是她用自己一贯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大量的阅读和写作。8月的时候，她在日记里给自己制定了每天的日程：

9点到11点，处理信件与写日记

11点到1点，哲学[34]

3点到5点，哲学与阅读

5点到8点，写作

这个夏天，波伏瓦给自己定下目标，要读司汤达和柏拉图，还要读当代书写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作家：亨利·弗雷德里克·埃米尔、亨利·德拉克鲁瓦、让·巴吕齐。[35]她在日记里反思自己读的书和写的信件，还写下了大段大段对雅克的告白，但是她很苦恼，因为不知道雅克到底在想什么。

9月的时候，波伏瓦读自己之前的日记，总结说1927年一整年自己都在三种情绪中摇摆：“爱情带给我的苦闷、对人性虚无的感慨，以及寻找的渴望。”[36]于是她又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新的学习计划，她要完成导师让·巴吕齐布置的两项作业，还要写一本书，而且必须在1月结束之前完成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以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8点，起床

9点到中午，在房间里工作

2点到6点，认真地学习

6点到8点，谈话、画画、阅读，但是不要做无用功

9点到11点，备课，为俱乐部活动做准备

11点，午夜日记

她读了很多书，有保尔·克洛岱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的，有其他很多作家的小说，有神秘主义的书，还有关于哲学家和小说家生活的书。[37]波伏瓦在为创作小说搜集素材做准备，她想要理清女性是如何发现能够“自由地选择做自己的”。[38]虽然波伏瓦当时的笔记还比较零星琐碎，但是她已经开始探究“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的关系（也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存在和行动的关系）。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已经开始酝酿在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虽然后人都认为是萨特提出了这个观点：“是行动证明了我们的存在。”波伏瓦又继续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没有行动，我们是不是不存在？还是说我们只是不确定自己存不存在？哲学家莫里斯·布隆代尔在此不久前写了一本关于行动的书，书中探讨了人类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以及人到底有没有宿命这样的宏大问题。布隆代尔写道：“人的本质就是其行动，行动造就了人。”[39]波伏瓦为小说准备的笔记似乎是在回应布隆代尔和尼采。波伏瓦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从自己的行动中了解自我——我们是不是一直就存在，或者说是行为造就了我们。布隆代尔显然是认同后者的，然而尼采要求你要成为你自己。但是波伏瓦对此充满了疑问：“成为你自己？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能看见你自己吗？”[40]

波伏瓦严格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稍有松懈，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沉迷于友情而迷失了自我。[41]尽管如此，当扎扎11月回到巴黎，告诉波伏瓦自己又要被送到柏林时，波伏瓦深受

打击。扎扎的家人嘴上说这是为了让扎扎去德国练好自己的德语，但其实扎扎的德语已经非常好了，这次柏林之旅只是为了让她彻底忘了梅洛-庞蒂。父母的反对让扎扎非常痛苦，她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反对这桩婚事。波伏瓦去问梅洛-庞蒂，但是他的回复也让她很困惑。梅洛-庞蒂说他一直祈祷，相信上帝的公正和善良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波伏瓦觉得梅洛-庞蒂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波伏瓦想不通他怎么能指望着这种缥缈的公正。且不说上帝是不是公正的，波伏瓦觉得拉库万夫人在这件事上显然是不公正的。

1929年冬天，扎扎从柏林回到了巴黎，一切安好，她对梅洛-庞蒂的爱也更加坚定了。但是扎扎母亲却制造了更多的阻碍，甚至都不允许扎扎去见波伏瓦。好在她没有禁止扎扎去国家图书馆看书，在那里扎扎终于能和波伏瓦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她们一起偷偷地喝咖啡，谈天说地。

1929年1月，波伏瓦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课的女教师。跟她一起在詹森萨伊中学教书的还有梅洛-庞蒂，以及不久之后将会在20世纪法国文坛家喻户晓的人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也是结构人类学的开山鼻祖。这所学校里的男学生都不怎么重视哲学，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都是理所当然的。过去的波伏瓦也许会嫉妒这些男孩子，因为对她来说，受教育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今的波伏瓦已然成为法国文化精英的一分子，她觉得自己正走在通向最终解放的道路上，波伏瓦甚至觉得现在的自己无所不能。回过头看，波伏瓦当初放弃古典学文凭的决定是对的。那时，波伏瓦正在巴黎哲学圈重要人物里昂·布兰斯维克的指导下，写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哲学论文。

1929年的春季和夏季，波伏瓦的人生春风得意，但是扎扎

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7月的时候，扎扎还像往常一样去了乡间的房子度假，临行前她告诉波伏瓦自己已经和梅洛-庞蒂暗许终身了。梅洛-庞蒂要去服一年兵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两年之后再告诉双方父母这件事情。波伏瓦很惊讶：“既然你们很相爱，为什么要等？”

之后扎扎从兰德斯寄来的信件变得越来越含糊其词和令人费解。扎扎说她母亲告诉她一些她无法解释的事情。下一封信更是让波伏瓦抓狂，扎扎在信里问：“孩子会继承父母的罪恶吗？他们是不是有罪的？他们的罪能被宽恕吗？他们身边的人也会因此受苦吗？”^[42]从扎扎的来信里，波伏瓦了解到梅洛-庞蒂让扎扎很失望。尽管他们已经私订终身，但是梅洛-庞蒂给扎扎写信的口吻却越来越冷淡，写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扎扎很想念波伏瓦，她说自己备受折磨，但是她试图拿自己的苦难跟基督比较，好赋予自己的苦难以意义。^[43]



1928年9月，扎扎和波伏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波伏瓦很担心，她督促扎扎和梅洛-庞蒂赶紧向家里公开他们的感情。波伏瓦认为拉库万夫人之所以犹豫，也许就是因为扎扎和梅洛-庞蒂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们对彼此的爱。然而波伏瓦的提议遭到了扎扎和梅洛-庞蒂的一致反对。扎扎跟波伏瓦说，如果梅洛-庞蒂有理由不这样

做，那么这些理由对我来说也一样成立。^[44]波伏瓦不满意扎扎的回复，于是她写信给梅洛-庞蒂，想着如果他知道了自己所谓的“理性”给扎扎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那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做了。然而没想到的是，梅洛-庞蒂回信告诉波伏瓦，因为他姐姐刚订婚，而他的兄弟马上要离开法国，他母亲没法承受所有的孩子一下子全都离她而去。

可怜的扎扎日渐消瘦，她又一次被送到柏林。起初，扎扎看起来对梅洛-庞蒂为了自己的母亲而牺牲她的决定没有什么不甘心，但是不久之后拉库万夫人就写信告诉波伏瓦扎扎病了，而且病得非常重。真相是，不甘心的扎扎自己去见了梅洛-庞蒂的母亲，情绪失控地问梅洛-庞蒂夫人为什么要反对他们的婚事，为什么要恨她。梅洛-庞蒂夫人试图在她儿子回来之前安抚扎扎，但是完全没有用。扎扎的额头和双手都因为发烧而发烫，担心不已的梅洛-庞蒂叫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扎扎离开。在车里，扎扎对梅洛-庞蒂嗔怪道：“你都没有吻过我，你要补偿我。”梅洛-庞蒂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梅洛-庞蒂把扎扎送到家后，拉库万夫人赶紧找来了医生。拉库万夫人也和梅洛-庞蒂长谈了一次，决定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拉库万夫人不想再让自己的女儿不幸福，梅洛-庞蒂夫人也同意了这桩婚事，表示一切都可以安排。可是扎扎高烧到了40摄氏度，在诊所里待了四天都没有退烧。

当波伏瓦见到扎扎的时候，扎扎浑身冰凉，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手里握着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

1929年11月25日，扎扎去世了。几乎过了30年，波伏瓦才了解事情的真相。当波伏瓦为了扎扎的死悲痛不已、几近绝望的时候，她想到自己和扎扎还有梅洛-庞蒂之前的沟通就又气又

恨。扎扎和梅洛-庞蒂都把自己的苦难神圣化，试图通过苦难来磨砺自己，而不是去寻找真正的始作俑者：那该死的礼数。做错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他们，然而上帝却无动于衷，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上演。

[1] CJ 255–62, 4 January 1927.

[2] 见George Pattison and Kate Kirkpatrick, *The Mystical Sources of Existential Thought*,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especially chapters 3 and 4.

[3] MDD 234–43.

[4] MDD 239.

[5] 见Bair, p.124.

[6] MDD 262.

[7] DPS 277, 7 July 1927.

[8] 西蒙娜·德·波伏瓦，《端方淑女》，314页。“人的个性”是当时那个阶段波伏瓦阅读的书籍里的讨论到的一个概念。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里，亨利·柏格森写道：“当我们的行为是发自我们完整的个性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个性能够表达出自己，这就好像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一样，他们有一种无法描摹的相似性。”之后波伏瓦在巴黎高师读书的时候，在里昂·布兰斯维克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关于莱布尼茨的论文。莱布尼茨指出他者的位置（laplace d'autrui）是思考政治和道德的真正角度。见‘La Place d'autrui est le vrai point de perspective’ in Jean Baruzi, *Leibniz : Avec de nombreux textes inédits* (Paris: Bloud et cie, 1909), p. 363.

[9] MDD 265.

[10] DPS 277, 7 July 1927.

[11] 据我所知，这个论文没有留存下来。这一点也在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和让·路易·让内勒之间的对话中得以证实。

[12] MDD 295.

[13] Bair, p.124.

[14] MDD 137.

[15] MDD 138.

[16] MDD 138.

[17] CJ 771, 'résumé de ma vie'.

[18] MDD 74.

[19] MDD 125.

[20] MDD 132.

[21] MDD 161.

[22] HdB, *Souvenirs*, p.39.

[23] HdB, *Souvenirs*, p.43.

[24] MDD 41.

[25] MDD 138.

[26] MDD 141.

[27] DPS 262, 21 May 1927.

[28] DPS 284, 18 July 1927.

[29] 在这里，波伏瓦把理性和男性联系到一起，把心灵和女性联系到一起，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在法国哲学传统里，心灵历来都被认为是和认知有关联的。布萊斯·帕斯卡有一句著名的话：心灵有自己的理性，超越一般理性。也就是说，心灵的理性是通过直觉和欲望，而非推理来驱动我们的。

[30] Jules Lagneau, *De l'existence de Dieu*, Paris: Alcan, 1925, pp.1-2, 9. 拉尼奧认为“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的论证”一定不如“人追求完美的欲望是有道德证明的”更有说服力。

[31] DPS 289, 20 July 1927.

[32] DPS 299, 1 August 1927.

[33] 见CJ 733, 20 July 1929.

[34] 在日记里，她还在括号里标注了冥想。——原注

[35] DPS 303, 304, 5 and 6 August 1927.

[36] DPS 311, 7 September 1927.

[37] 见'Notes for a Novel', 1928年手稿，UM 363-4.

[38] ‘libre de se choisir’, ‘Notes for a Novel’, UM 355.

[39] 引自Jean Lacroix, *Maurice Blondel: Sa vie, son oeuvre, avec un exposé de sa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p.33.

[40] ‘Notes for a Novel’, UM 367.

[41] DPS 315, 3 October 1927.

[42] 这封信引自Bair, p.137.

[43] 见MDD 349–60.

[44] 引自MDD 354.

第四章

传奇之前的爱恋

扎扎那“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幻灭了，波伏瓦也开始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以及他的好友冈迪拉克关系很好，这也让她明白她完全够资格跟巴黎高师的学生们——这些巴黎学术圈子里精英中的精英——平起平坐地交朋友。而在1929年的春天和夏天，波伏瓦还邂逅了一位让她为之倾倒的巴黎高师男学生。

这个巴黎高师学生并不是传奇中的让-保罗·萨特。关于和萨特的初识，1929年波伏瓦在日记里所记载的和后来她向公众所展示的，其实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读者能够接受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要“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以及并不是所有原创的思想都来自男性哲学家，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重新解读波伏瓦和萨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波伏瓦并不是一遇到萨特，就被他彻底地征服了。

1929年春天，波伏瓦和一个叫勒内·马厄的巴黎高师男学生成了好朋友。波伏瓦在回忆录里称他为埃尔博，在自己的日记里波伏瓦则给他起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昵称：拉马。马厄是一个独特的三人小团体中的一员，另外两个成员分别是后来成为小说家的保罗·尼藏和成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自己已经打入了巴黎高师学生们的圈子里，但与她一直保持亲密关系的是马厄所在的小团体。波伏瓦第一次见到马厄是

在1929年布伦茨施维奇的一次研讨班上。当时的马厄已经结婚了，在研讨班上波伏瓦看到他上台演讲。波伏瓦喜欢马厄的脸庞、眼睛、头发，还有声音。实际上，波伏瓦喜欢他的一切。后来有一次波伏瓦在国家图书馆遇到了马厄，她在午饭时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不久之后，马厄开始给波伏瓦写诗，还送她自己画的画。

马厄给波伏瓦起了一个跟了她一辈子的外号：海狸。这个外号的起源是，有一天马厄在自己的本子上，随手用大写字母写下波伏瓦的姓氏，并在后面加上了海狸：“BEAUVOIR=BEAVER（波伏瓦=海狸）。”对此马厄解释说，波伏瓦和海狸有相似性，他们都喜欢陪伴，而且都很善于“筑坝”。[1]

波伏瓦曾经在回忆录里说，马厄对她产生的影响和斯捷帕很相像。在1929年时，波伏瓦写道：“我已经受够了圣人那一套伪善的东西。我很高兴马厄这样对待我，也只有他和斯捷帕能够这样对我。他们都把我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欲的人来对待。”[2]波伏瓦回忆说，马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有一张赏心悦目的脸，和马厄在一起，波伏瓦仿佛看见了一条她想要去探索，但是还没有鼓足勇气去探索的道路。我们并不清楚波伏瓦和马厄有没有成为情侣，以及什么时候成了情侣，波伏瓦对此也一直很谨慎，不愿公开谈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波伏瓦遇到萨特的时候，马厄已经在她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她甚至说和马厄共度的那段时光充满了快乐和喜悦，让她品尝到了做女人的甜蜜和美好。[3]

许多作家都认为马厄是波伏瓦的第一个情人。[4]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很清晰，而且我们已经很难去考据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了。当波伏瓦的首部传记作者贝尔问波伏瓦这是否属实

时，波伏瓦言辞激烈地否认了。波伏瓦坦承，尽管年少时她和好朋友杰杰以及埃莱娜去酒吧疯玩过，但是在遇到萨特之前她没有亲吻过任何一个男人。^[5]不过和当时贝尔写传记的时候接触到的材料不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波伏瓦的信件和日记。

尽管波伏瓦和萨特在讲堂、研讨班，以及卢森堡公园打过很多次照面，但在很久之后他们才正式见面。马厄的占有欲很强，他想要波伏瓦只属于他一个人，所以一直故意不把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萨特介绍给波伏瓦认识。但是从1929年春开始，萨特就想要认识波伏瓦，而且对自己对波伏瓦的兴趣一点也不害臊。萨特听说波伏瓦的论文是关于莱布尼茨的，于是他画了一幅画送给她。在这幅画里，一个男人被一群美人鱼围绕着，名字叫“莱布尼茨与‘单子’一起洗澡”（莱布尼茨把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小精神实体单位称为“单子”，美人鱼是萨特自己的艺术发挥）。^[6]

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前三周，波伏瓦和马厄每天都见面。1929年6月17日的笔试长达七个小时，非常折磨人，应试者要当场写一篇论文，那次的考试题目深得波伏瓦的心：自由和偶然性。在6月18日又是一场四个小时的考试：论直觉与演绎法推理。最后，在6月19日，还有一场四个小时的考试：论斯多葛派和康德的道德。^[7]

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结束之后，马厄带着他的妻子离开了巴黎十天，他走之前告诉波伏瓦他会回来继续与尼藏和萨特一起学习。马厄、尼藏和萨特都希望波伏瓦加入他们的学习小组，萨特还想带她出去约会。马厄把萨特的约会邀请告诉了波伏瓦，但是马厄让她不要跟萨特一起出去。波伏瓦喜欢马厄说这话时看她的样子，相反地，波伏瓦不喜欢萨特的长相。^[8]所以他们决定戏弄一下萨特，让埃莱娜代替波伏瓦去赴约。在约会那一天，埃莱娜按约定的时间去见了萨特，跟他撒了个善意的

谎言：波伏瓦临时有事，不得不赶回乡下。

波伏瓦在这段时间过得很快乐，她的朋友渐渐多起来。最重要的是，她有了马厄、梅洛-庞蒂，还有扎扎。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五个月后扎扎就会生病离世。在这段日子里，波伏瓦最高兴的是，身边的人都希望她成为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尽管扎扎开玩笑说波伏瓦只是想成为一个没有道德的女性。^[9]埃莱娜代替波伏瓦去赴萨特约的那天晚上，波伏瓦情绪异常高涨。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特，我感到自己内心极其丰富，而且这种丰富会留下痕迹，我将会说出被别人倾听的话，我的生活将会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我很确定这是我的使命。”^[10]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段感受，但在日记里她还补充说自己不再觉得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了，她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很特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她不该自己独享，而应该与这个世界分享。

埃莱娜回家后告诉姐姐她选择待在家不跟萨特一起出去是对的，因为萨特根本不是传说中的聊天高手。埃莱娜说萨特只是带她去看了场电影，人也挺和善，但是完全不像马厄说得那样天花乱坠。^[11]

尽管萨特这一次没有成功地吸引到波伏瓦的注意，但是他一点也不气馁。马厄赞叹波伏瓦聪慧过人，这让萨特更加好奇了。其实萨特也无须通过道听途说来认识波伏瓦，他已经亲眼看到了波伏瓦的魅力。1973年，马厄这样描写当年的波伏瓦：“她有一颗卓越的心灵！她真实、勇敢、叛逆，美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风格，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人能像她一样。”保罗·尼藏的妻子亨丽埃特·尼藏也回忆说年轻时的波伏瓦有一双令人销魂的眼睛，她非常漂亮，声音有一点点沙哑，但是这让她更迷人了，而且她有一种不自知的美。^[12]

年轻时的萨特在巴黎高师是个响当当的明星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哲学功底好，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总是开各种不成体统的玩笑。萨特给自己画过一幅裸体讽刺画，还曾经大喊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尿来了！”，把装满水的气球从大学教室的窗户扔出去。萨特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在前一年的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他说自己本来应该拿全国第一的，但结果没有通过，这是因为他在考卷上大谈自己的哲学观点，根本不按考题来回答。

那天埃莱娜代替波伏瓦去赴约的时候，萨特当时就起了疑心。埃莱娜直接向萨特走过去，并做了自我介绍。于是萨特问埃莱娜：“你怎么确定我就是萨特？”埃莱娜支支吾吾地说：“因为……你戴着眼镜。”萨特指指旁边的男子，说他也戴着眼镜啊。其实萨特就算不是天才，也猜得出来埃莱娜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肯定是因为波伏瓦已经提前告诉她萨特长得又丑又矮。[\[13\]](#)萨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而且他也知道自己长得丑。不过这也是萨特乐于去勾引女人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得手就能证明长相并不重要，言语才是征服女人的关键。

马厄邀请波伏瓦加入他们的学习小组，对此波伏瓦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代表着巴黎高师人对她的尊重，也意味着她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喜爱的拉马在一起。萨特是个很势利的人，他从小一直都享受着巴黎最好的教育，他认为那些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人都比自己低一等，不值得和他们交朋友。在1974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谈起萨特为人傲慢，她回忆说年轻时的萨特、马厄、尼藏都是出了名的心高气傲、玩世不恭，尤其看不起索邦的学生，而波伏瓦就曾是索邦的学生。萨特当时半开玩笑地回应说，那是因为索邦的学生都是非人类。[\[14\]](#)

虽然这也是在夸索邦的学生出类拔萃，但是当年的波伏瓦还是有点害怕萨特的。因为萨特、马厄和尼藏的三人小团体瞧不起

索邦学生，索邦学生也不甘示弱，他们说巴黎高师那群人没心没肺，毫无灵魂，而萨特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5]

6月底的时候，萨特还没有和这个他发誓一定要认识的女人正式见面。一直到1929年7月8日那个星期一的清晨，萨特才真正和波伏瓦见面。波伏瓦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参加他们的学习小组，萨特礼貌地欢迎她。一整天波伏瓦都在谈论莱布尼茨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文。[16]也许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头，对于波伏瓦来说的确不是。但是那之后的几周里，波伏瓦和萨特之间还是擦出了火花。

现在，波伏瓦加入了萨特、马厄和尼藏的三人小团体。接下来的两周里，这个四人小团体每天都会见面。第一天的时候，波伏瓦在日记里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心爱的马厄穿着衬衫，半蜷着身子，头枕着胳膊斜躺在床上的画面。他们几个人一起步行回家，直到萨特离开，只剩波伏瓦和马厄两个人的时候，波伏瓦才觉得那段路甜蜜无比。她甚至都不记得到底和马厄说了些什么，回家后她忍不住在日记里写满了对拉马的赞美。[17]

第二天，他们接着讨论莱布尼茨。萨特还带了一幅日本画送给波伏瓦，但波伏瓦在日记里说那幅画十分难看。第三天，他们还是谈论莱布尼茨，萨特又送了波伏瓦不想要的礼物，这一次是一些瓷器，波伏瓦在日记里说这些礼物很荒唐。[18]

到了星期四，他们终于谈论完了莱布尼茨，开始学习卢梭。这次由萨特领头讨论，萨特思考的方式让波伏瓦刮目相看，她转变了自己对萨特的印象。波伏瓦这样形容萨特：“他待人非常慷慨，我是说真的很大方。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去解释清楚一个哲学难点，让每个人都能明白，自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他和索邦学生口中的萨特完全是两个人。”[19]

但是之后的一天，波伏瓦和马厄俩人没有来参加学习小团体，他俩在文诺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开了一间房，根据波伏瓦的回忆录，他们那天对外宣称她是去帮马厄翻译亚里士多德。[\[20\]](#)但是从波伏瓦的日记可以看出，实际上他俩那天没怎么学习和工作。马厄那天也告诉波伏瓦他担心自己过不了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那天屋子里氤氲着恰到好处的暑气，一切都因此显得怡人而迷醉。她和马厄的友谊又多了一些柔情蜜意，她永远都不会忘记。[\[21\]](#)

之后的几天里，波伏瓦在日记里总是提到“我的拉马”，不过马厄也告诉波伏瓦，萨特已经被她深深地吸引了。[\[22\]](#)7月15日时，马厄开玩笑说他要亲波伏瓦。波伏瓦在日记里坦白，她对马厄的欲望让自己很困扰。之后的一天他们对彼此说了“我爱你”。[\[23\]](#)

7月17日，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写作部分出成绩了，就张贴在索邦大学。因为考试合格的人数是严格按照法国教育体系里教职的空缺数来定的，所以通过这个考试的人可以在法国教育体系里获得终身教职。波伏瓦进门的时候，萨特正好出来，他告诉她，通过笔试的26个人里面有自己、波伏瓦还有尼藏，但是没有马厄。

那天晚上，马厄离开了巴黎，萨特乘虚而入。我们不清楚当时的萨特知不知道马厄和波伏瓦的关系，但是情况的改变显然是对萨特有利的。首先，马厄已经不需要去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口试了，所以四人小组现在变成了三个人。萨特的学识已经给波伏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萨特可以借此进一步追求她，而且萨特非常肯定波伏瓦的确如传说中一样优秀，一点也不夸张。

波伏瓦的回忆录里记载着当时萨特对她说的话：“从今往

后，我会一直保护你。”[24]在日记里，波伏瓦没有记录下这句话，但她写的是，萨特让她成为他想要的样子，不过波伏瓦挺喜欢萨特霸道的方式，而且萨特十分接纳她、放纵她。[25]波伏瓦告诉萨特，之前有不少男人都说她谈论哲学的样子很不可爱[26]，萨特嘲笑这些男人有眼无珠。萨特故意跟波伏瓦只谈哲学，这让波伏瓦很开心。波伏瓦和萨特之后常常一起学习，周围的人也开始注意到他俩常在一起。

马厄离开巴黎之后，波伏瓦和萨特每天早晨都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小咖啡馆见面聊天，这个习惯之后持续了整整51年。波伏瓦的出现取代了萨特一些原来的伙伴。雷蒙·阿隆回忆说：“我和萨特的友谊在他认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那一天开始就改变了。在那之前，萨特一有什么想法就会跟我分享，也希望我能给他当参谋。但是自从他认识了波伏瓦，他就再没来找过我。”[27]波伏瓦的好朋友扎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扎扎一直不喜欢学识渊博的萨特，她觉得萨特很讨人厌。扎扎认为早在认识萨特之前，波伏瓦就已经选择好了她自己的道路，可以说萨特的出现加速了波伏瓦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道路。[28]

认识萨特之后的第9天，波伏瓦在日记里把他和马厄这两个都想要吸引她注意力的男人放在一起做对比。波伏瓦写道：拉马只要爱抚女人的脖子就能让她神魂颠倒，但萨特赢得一个女人的方式是把他的心展示给她看。[29]7月22日，波伏瓦形容萨特对她的影响非比寻常。在认识萨特13天后，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他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30]波伏瓦觉得自己在智识上需要萨特的存在。波伏瓦和萨特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对哲学的热爱，他们对文学也有着相同的兴趣，而且都想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他们俩对各种哲学观点和文学典故都信手拈来，而且默契十足，从来不需要对彼此解释什么概念或者

讲述故事情节。波伏瓦和萨特两人都是从小就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作家，如今毕业后的他们虽然仍有雄心壮志，但不得不在实用主义和现实面前低头。

当然了，虽然有着相似的梦想，但是波伏瓦和萨特所面对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萨特来说，有无数的先贤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他，数不清的法国伟大作家因为他们的文学或哲学成就留名青史。而对于波伏瓦来说，想列举出来几个女性文学大家都很难，更不要说女性哲学家了。而且这些女性前辈往往都因为拒绝传统的女性价值观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们常常得牺牲个人的幸福才能获得自由。波伏瓦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她想要一种更好的结果：为什么自由和爱情二者不能兼得？

波伏瓦和萨特除了一起学习，也渐渐开始一起去河边的书报摊散步，有时候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酒吧里喝着鸡尾酒听爵士乐。萨特会给波伏瓦唱《老人河》（*Old Man River*），大谈他的理想，也会问波伏瓦各种问题，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她。波伏瓦回忆说，当时的萨特是真的想要通过她自己来了解她，真正地理解她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萨特会鼓励波伏瓦，要“保持最珍贵的自我，保持你对自由的热爱、你对生活的激情、你的好奇心，还有你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即便如此，当波伏瓦在7月27日晚上再一次见到她的拉马的时候，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波伏瓦问自己，为什么当萨特和马厄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时候，萨特就丧失了魅力？波伏瓦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无法抵抗马厄对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更能让她心潮澎湃。^[31]7月28日，波伏瓦读了萨特的小说稿《亚美尼亚人埃尔》（*Er L'Armenien*），并与他共度了一整天。萨特的这本小说里包含了和克罗诺斯、阿波罗、密涅瓦及其他人关于时间、艺术、哲学和爱情的对话。^[32]波伏瓦被萨特的才华所折服，在日记里她也开始用亲切的昵称去

称呼萨特，而在此之前，她只会对马厄使用昵称。夹在萨特和马厄中间的波伏瓦，感觉自己寝食难安。[33]

威廉·詹姆斯有一篇名为“人的意义在哪里？”（*What Makes a Life Significant*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詹姆斯问为什么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杰克都觉得自己的吉尔完美无缺，美若天仙，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吉尔毫不出彩，平平无奇。是这些人看不见吉尔的魅力吗？詹姆斯写道，实际上是因为杰克想要和吉尔产生深层次的联结，因此才能看到吉尔的美。如果没有人想要认真地去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又会在哪里？

波伏瓦有着像杰克一样的眼睛，但是问题在于，她既能看见马厄的迷人，也能看见萨特的魅力（而且坦诚地讲，波伏瓦也没有忘了雅克的好）。波伏瓦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对自己这一段两难的选择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这样的低调处理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也可能是考虑到了当时的读者。毕竟，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读者们大概是不能接受一个吉尔同时爱着杰克、让-保罗和勒内的。在《盛年》里，波伏瓦呈现了一个简化版的故事：在遇到萨特之后，她就从最突出的位置上淡出了。在自己的日记里，波伏瓦提到，跟萨特、马厄和尼藏在一起的时候她终于可以做自己了。不过在回忆录里，波伏瓦记载说当她跟萨特在一起的时候，她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智识上不如别人。[34]这种自卑感在后来波伏瓦和萨特那段著名的对话之后更强烈了。那次对话发生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向萨特分享了她自己酝酿了很久的一個哲学灵感，然而萨特却对此嗤之以鼻，最终波伏瓦承认她输了。后来波伏瓦回看这个事件，她对当时的自己感到有些失望，但她仍然带着谦卑之心：“我的好奇心比我的好胜心要强很多，比起炫耀自己，我更想要向他人学习。”[35]

虽然我们仍然推崇谦虚，认为保持谦虚好学的状态要比被自己的骄傲蒙住双眼要好，但是波伏瓦在那次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谦卑，让后来几十年的女性主义者们都感到不解。在那之后的很多场合，波伏瓦都强调萨特才是他们俩中的哲学家。事实上，萨特和波伏瓦分别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一和第二。当时的波伏瓦才21岁，是有史以来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考生。当时的三人考试评审团中，有一个人坚持认为波伏瓦应该得第一，一开始另外两个人也赞同，认为波伏瓦比萨特更优秀。但是在最后，评审团决定第一名还是应该给来自巴黎高师的高才生，所以才给了萨特第一名（我们不清楚他参加了两次考试且前一年没有通过考试这一点有没有被评审团考虑进来）。[36]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表示，萨特并没有强迫她用一种更谦虚的态度看待自己。她其他巴黎高师的朋友们，尼藏、阿隆、普利策，都花了比她更长的时间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而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和资源。他们能成为哲学家的境况跟波伏瓦的完全不一样。当时只有男性才能进入巴黎高师学习，也只有男性才能得到最优秀的老师的教诲，只有男性才有自信去和那些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人一起辩论。

波伏瓦的日记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看法。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波伏瓦和萨特、阿隆一起去喝酒。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来讨论善恶，回家之后波伏瓦觉得他们太优秀了，自己完全被碾轧了。波伏瓦写道：“他们的讨论如此精彩，以至于我已经无法肯定我原来的想法了。”波伏瓦感到，跟他们自由而丰富的学术氛围相比，自己一直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她羡慕他们能有如此成熟的思考和强有力的辩证。波伏瓦对自己承诺，有朝一日自己一定要达到他们的高度。[37]

尽管波伏瓦学生时代没能接触到最优秀的哲学老师，但波伏

瓦的同辈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卓越哲学家。莫里斯·德·冈迪拉克这么形容她：“严谨、精确、高要求、功夫到家……我们都一致认同她这个人就是哲学本身。”^[38]但是波伏瓦自己常常否认自己的哲学家身份，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这让我们很费解。托莉·莫伊也不解：为什么波伏瓦要抓住一切机会去表明自己在哲学上不如萨特呢？^[39]

托莉·莫伊的结论是：波伏瓦为了保持吸引力而放弃了哲学上的成功。^[40]在早期的回忆录里，波伏瓦的确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在公开场合，她总是把聚光灯留给“伟大的哲人”萨特。但是在波伏瓦的日记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学生时代，波伏瓦优异的哲学成绩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比如在并没有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马厄面前。在和马厄的关系里，波伏瓦无须隐藏自己的光芒。那为什么后来在萨特面前就不一样了呢？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其实波伏瓦并没有真的抓住一切机会去显示自己不如萨特，有时候她也会公开辩驳对她思想原创性的质疑。那么，是不是因为波伏瓦假想了一群特定的读者——这些读者会怀疑她的能力，认为她应该好好听听那些让她不要尝试去做哲学家的声音，她是不是因为“这些读者”才说自己不如萨特的呢？对于这些读者来说，萨特是不容置疑的天才，而波伏瓦竟然公开评论萨特年轻时的文章稍显稚嫩，简直是胆大包天。^[41]

在1929年，萨特还不是那个伟大的“让-保罗·萨特”。当时的萨特25岁，比波伏瓦大三岁，是第二次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而且比波伏瓦多花了一倍的时间去准备这场考试。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对自己的成就故意表现得很谦虚，有可能是因为敏感的波伏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察觉到了不安全感，因而选择低调行事。也有可能是因为巴黎高师在法国的地位，波伏瓦不得不说自己比不上萨特。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俩的能力，也关系到他们

所代表的不同团体的文化资本和势力。在进入巴黎高师之前，萨特一路名校，分别就读的是鼎鼎大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和路易大帝中学。从履历上看，没有人比萨特更优秀。而且萨特也无须展示他的学历——正如托莉·莫伊所说，他已经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天才，完全无须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42]

相比之下，一个女性天才就必须小心翼翼，以免自己锋芒毕露。1929年，已经有不少女性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的成绩比男性更高，当时的法国教育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结果必须公开，所以这个像体育赛事一样的排名会被公众知道。名单上的人按分数高低排名，虽然上榜的人都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但是男性考生往往会担心自己因排在女性考生候选人的后面而有失颜面。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从189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把男女考生分开来排名，但在1924年，又恢复了男女考生一起排名。

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波伏瓦的处境，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当时法国的女性境况。萨特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大约是在1909年。当时萨特的母亲匆忙地带着他离开了巴黎，因为她担心萨特会被带离她的身边。在当时的法国，如果丈夫去世了，女性将无力获得孩子的合法监护权，一般情况下孩子归夫家抚养。在波伏瓦的学生时代，法国女性仍然没有选举权，也没法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波伏瓦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法国大学里的女性占比为24%，这个数据已经比上一代有了巨大的飞跃。在1890年，法国一共只有288名女性大学生，在所有大学生中仅占1.7%。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女性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甚至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能留在身边，那么她到底有什么权利呢？

在那之前不久，波伏瓦独自在国家图书馆女性阅读室读哲

学。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她想要哲学指引自己的人生——过思考的一生，而不是只思考不生活，或是只生活不思考。波伏瓦决定要书写她丰盈的内心。后来她读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作品，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暗恋对象。其实在读爱默生之前，波伏瓦就已经得出了和他一样的结论：“我们在生活中主要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能驱使我们去做自己能做的事。”^[43]

1929年7月22日，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和萨特在一起，她会被驱使着成就一番事业。虽然萨特有时候挺讨人厌，波伏瓦偶尔也会害怕他。但尽管如此，那天波伏瓦还是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把自己交给这个男人，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44]

最后的最后，也许波伏瓦也会去思忖一下这个决定是不是限制了她自己。

^[1] MDD 323.

^[2] MDD 313.

^[3] In French, 'la douceur d'être femme'. Résumé de September 1928–1929, CJ 766.

^[4] 希拉·罗博特姆声称波伏瓦“开始了一段恋情”（《第二性》2009年译本“前言”），Fullbrook and Fullbrook (2008) 也对他们的性亲密做出推断，但我从波伏瓦的文本中没有找到证据。见Edward Fullbrook and Kate Fullbrook, *Sex and Philosophy: Rethinking de Beauvoir and Sartre*, London: Continuum, 2008.

^[5] Bair, p.129.

^[6] MDD 321.

^[7] SLBdB, 'Chronologie', MPI lxv.

^[8] CJ 704, 22 June 1929.

^[9] CJ 709, 25 June 1929.

[10] 引自MDD 331. 日记中的原始记录在CJ 707, 25 June 1929中可以找到。

[11] MDD 331-2.

[12] Bair, pp.144, 142-3.

[13] HdB, *Souvenirs*, p.90.

[14] A 245.

[15] Sartre, Jean-Paul, with Michel Contat and Alexandre Astruc, *Sartre by Himself*,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pp.21-2.

[16] MDD 334.

[17] 见CJ 720, Monday 8 July 1929.

[18] 见CJ 721, 10 July 1929.

[19] Sartre, Jean-Paul, with Michel Contat and Alexandre Astruc, *Sartre by Himself*,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p.23. 又见CJ 723, Thursday 11 July 1929.

[20] MDD 337.

[21] CJ 724, 12 July 1929.

[22] CJ 727, 14 July 1929.

[23] CJ 730-1, 16 July 1929.

[24] MMD 339.

[25] CJ 731, 17 July 1929.

[26] CJ 731, 17 July 1929.

[27] *Le nouvel observateur*, 21 March 1976, 15; 引自Gerassi, *Jean-Paul Sartre: 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 vol. 1,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91.

[28] 14 July 1929 journal entry, *Zaza: correspondance et carnets d'Elisabeth Lacoïn (1914-29)*, Paris: Seuil, 1991, pp.304, 367.

[29] CJ 731, 17 July 1929.

[30] CJ 734, 22 July 1929.

[31] CJ 738-9, 27 July 1929.

[32] 见Jean-Paul Sartre, *écrits de jeunesse*, Paris: Gallimard, 1990, 293 f.

[33] CJ 740, 29 July 1929.

[34] CJ 731, 17 July 1929; MDD 343–4.

[35] MDD 344.

[36] Bair, pp.145–6.

[37] CJ 734, 22 July 1929.

[38] Maurice de Gandillac, 引自Cohen-Solal, Sartre, p.116.

[39] Moi, 2008, p.37.

[40] Moi, 2008, pp.44–5.

[41] MDD 343.

[42] Moi, 2008, p.71.

[43] Ralph Waldo Emerson, ‘Considerations by the Way’, from *complete works*, vol. 6, ‘The Conduct of Life’, 1904.

[44] CJ 734, 22 July 1929.

第五章

女神[1]和花花公子

1929年8月，波伏瓦回到老家梅里尼亚克度夏，她决定要在这个夏天好好回顾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只有在梅里尼亚克的时候，波伏瓦才能有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独立房间，所以她要趁着有隐私空间，赶紧“回顾、整理、评估”一下自己的生活。此时的波伏瓦十分信任萨特，她认为自己对萨特日渐生情，但这并不代表自己背叛了拉马或雅克。[2]在马厄离开巴黎之后的几周里，波伏瓦和萨特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更加亲密了。虽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发生关系，但后来波伏瓦在首部传记中对贝尔坦白，其实在大学城萨特的宿舍里，他俩“除了最后一步，其他的都试过了”。[3]

接下来的一周，波伏瓦继续回顾、整理自己的回忆和感情。她发现自己近来情绪起伏很大，有时候怀疑一切，有时候万念俱灰，有时候又兴高采烈。[4]对于这种情绪变化，波伏瓦觉得不应该自责，而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原因。波伏瓦觉得她“需要”萨特，但是她“爱”马厄。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爱萨特，是爱萨特带给她的东西，而她爱马厄，是爱马厄这个人本身。[5]在那个时候，萨特还不是波伏瓦“本质的爱”。

波伏瓦的爷爷去世了，全家人因此聚到了一起。这是波伏瓦生命中第一个没有爷爷的夏天，好在法国中西部科雷兹省的天气宜人。梅洛-庞蒂的天主教朋友冈迪拉克去波伏瓦家拜访，提议

波伏瓦两姐妹也可以去他家玩，毕竟只要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即使冈迪拉克是一个信天主教的年轻人，弗朗索瓦丝也觉得他不错，但是她还是不同意，说这样不符合规矩。所以冈迪拉克提议大家一起去近一点的蒂勒市游玩，这次弗朗索瓦丝同意了，但是尴尬的是弗朗索瓦丝坚持全程陪同，监督两姐妹。^[6]8月9日，波伏瓦和冈迪拉克一起去乌泽什游玩，但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萨特。之后的一天，他们在韦泽尔河岸边散步，波伏瓦又一直想着拉马。^[7]虽然母亲一直跟着，但是波伏瓦脑子里想什么，弗朗索瓦丝是看不见的。不久之后，波伏瓦找到了躲开母亲的办法。8月19日，德·波伏瓦一家离开了梅里尼亚克，去到拉格里耶尔的姑姑家。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波伏瓦的表姐马德莱娜冲进厨房，告诉波伏瓦外面草地上有个人正在等她。

是萨特。

波伏瓦知道萨特会来，一想到他会来，波伏瓦就开心得不得了。^[8]在萨特来之后，波伏瓦没有再写日记。直到萨特离开之后，波伏瓦才重新拾起笔，记录她和萨特在一起的时光，以及他们的灵感和缠绵。^[9]显然萨特一来，波伏瓦就把自己原先严格的学习时间表抛在了脑后。

在萨特抵达之后的第一天，波伏瓦提议一起出去走走。但萨特拒绝了，他说自己对叶绿素过敏。于是波伏瓦和萨特一直坐在草坪上聊天，他俩简直有说不完的话。萨特住在圣日耳曼莱贝莱斯的布勒勒奥酒店，波伏瓦每天清晨醒来，一边想着好多要跟萨特说的话，一边兴高采烈地穿过草坪去找他。他俩一起躺在草地上，波伏瓦跟萨特倾诉关于自己父母、埃莱娜、扎扎、雅克和学校里的事情。听到波伏瓦说起雅克的事情，萨特说他觉得婚姻其实是一个陷阱。不过萨特也知道，对于波伏瓦这种背景的女孩来说，婚姻几乎是避不开的。萨特敬佩她的“女神精神”，他对波伏

瓦说，如果她哪天失去了这种精神，他会很难过。

8月艳阳炙烤下的草坪微微发热，波伏瓦和萨特坐在上面，开始一起规划他们的未来：他们要一起旅行，一起冒险，努力工作，写出名作，过激情而自由的生活。萨特对波伏瓦说：他可以给她很多很多，但是不能把全部的自己都给波伏瓦，因为他必须要保持自由之身。萨特之前订过一次婚，但是现在的他恐惧婚姻、孩子和羁绊。波伏瓦很惊喜萨特能向她展露自己敏感的一面。萨特坚信自己生来就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向波伏瓦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必须保持自由之身，才能去实现伟大的前程；必须做一个无拘无束、云游四海的漫游者，才能为伟大的作品搜集材料。萨特向来喜欢用文学和哲学中的复杂典故，这次他把自己比作爱尔兰剧作家J.M.辛格的作品《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中的花花公子。

人们常常通过波伏瓦回忆录中的这段对话来认定，是萨特定下了他和波伏瓦关系的基调，也认为是萨特强迫波伏瓦接受了他的放荡不羁。但是从波伏瓦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她心里有好几个爱慕的对象，而且对每一个的爱都有不一样的原因。在这个8月，在梅里尼亚克，萨特和波伏瓦促膝长谈自己笔记上的各种灵感和有关心理学的思考，以及他关于偶然性的理论。波伏瓦和萨特都涉猎甚广，在谈话中他们发现彼此读过很多相同的书。除了为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而读过的哲学书，他们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波伏瓦和萨特共同拥有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深刻的精神世界。波伏瓦觉得萨特的很多想法都很有趣，充满启发性，甚至令人充满希望，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萨特“美丽而严肃的头脑”深深吸引了。^[10]

波伏瓦故意告诉她的父母，她和萨特正在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希望他们因为痛恨共产主义而忽视礼节、体统问

题。但是波伏瓦的这个方法好像并没有很管用。在萨特到达之后的第四天，波伏瓦和他一起躺在草地上。乔治和弗朗索瓦丝突然走过来，两人吓得赶紧跳起来。波伏瓦的父亲脸色很难看，他对萨特说周围的人们已经开始指指点点了，让萨特早点走人。波伏瓦听了很愤慨，质问父亲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她的朋友。弗朗索瓦丝也看不下去了，大声呵斥波伏瓦。萨特见状便承诺波伏瓦的父母会尽快离开，但是必须先跟波伏瓦一起把手头的哲学课题完成。波伏瓦的父母对此将信将疑，萨特和波伏瓦赶紧回到屋子里。几天之后，9月1日那天，萨特才离开。

萨特离开之后，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她只需要“萨特愿意给她的这些片刻时间就够了，她不希求更多”。波伏瓦开始想象一个独立和爱情并存的未来，这让她激动不已。她在日记里写道：这个柔弱的小女孩身体里住着一位强大的快乐“女神”。波伏瓦相信自己能够强大起来，变得像萨特一样强大。[11]

在萨特离开之后，波伏瓦享受着一个人的状态，她感觉自己完全属于自己，自由而强大。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波伏瓦也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不确定。波伏瓦很确信自己爱上了萨特，但是她也爱着拉马，而且她可能还爱着雅克，她用不一样的方式爱着他们。但是她不知道如何调和自己的爱。[12]

9月2日到4日，波伏瓦继续她的“回顾、整理、评估”。她感觉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自己期盼已久的生活似乎终于要到来了，波伏瓦兴奋不已。她的快乐显然跟萨特是分不开的。但是大众一直以来认为的萨特是她快乐的唯一源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就像波伏瓦之前在日记里写的：萨特之于我，是“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13]。

波伏瓦最终决定：“我要把每一个情人都当作唯一去爱。我会享受每一个情人能给予我的全部；我也会给予他我所能给予他的全部。这样的话，有谁还能谴责我呢？”的确有一段时间，波伏瓦没法确定自己对萨特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她唯一能确定的是，那还不是爱。[14]

在波伏瓦和萨特的那个传奇7月之前，波伏瓦得出结论：自己要用不同的方式同时去爱几个男人。早在1926年，波伏瓦就在日记里写道，不能因为情人希望你呈现什么形象，你就放弃自我而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做对自己非常不诚实；一个人应该“只给予她所能给予的”。[15]

两天之后，拉马来看波伏瓦，他们在酒店开了两间房。波伏瓦很享受和马厄一起度过的两个早晨，她怀念马厄穿的蓝色睡衣，以及他说“早安，海狸”时的温柔嗓音。[16]波伏瓦在日记里写到马厄的时候，总会表达出对他身体的迷恋，她会细致入微地描写他的身体、脸庞、嗓音、姿态以及穿着有多么适合他。不过波伏瓦也开始拿马厄和萨特作比较，她觉得马厄对自己来说只是“部分的”，自己并不敬重马厄，也不崇拜他。[17]

所以马厄算是波伏瓦的第一个情人吗？波伏瓦的日记对此没有明说。当戴尔德丽·贝尔采访波伏瓦的时候，波伏瓦否认和马厄有性关系。但是萨特和马厄的说法都和波伏瓦的相反——萨特和斯捷帕的儿子约翰·杰拉西曾经很确定地说：“马厄爱着波伏瓦……波伏瓦也爱着马厄。实际上他是她的第一个情人。”[18]基于此，有的人甚至推断说，那个下午在酒店，马厄和波伏瓦根本不像波伏瓦说的那样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在《盛年》里，波伏瓦写道，她是“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第一次的”。但是波伏瓦没有明说自己的第一次是和谁。[19]波伏瓦日记里的另一段文字也许可以支持波伏瓦对于自己跟马厄发生关系的否认：“这个男人

（马厄）十分迷人，但是我们发乎情止于理，这很美好；不过跟萨特，虽然他不怎么性感，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很合拍，这也使得我们的爱情更加美好了。”^[20]

波伏瓦给我们留下一个难解之谜。波伏瓦否认自己跟马厄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其他人却不这么说。当我向波伏瓦的养女兼朋友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求证的时候，西尔维说波伏瓦确实被马厄所吸引，他们的关系也很亲密，但是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波伏瓦的确没有和马厄上床。在那个阶段，波伏瓦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天主教女性，有些事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天主教女性绝不能做的。晚年时波伏瓦在一次访谈里被问到，有没有什么是她后悔没有写进回忆录里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她后悔没有在回忆录里坦诚而冷静地记录自己的性事。她后悔，自己没有给出一个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真正意义上真诚的记录。”^[21]甚至在日记里，波伏瓦也没有完全坦诚地记录自己的性经历。也许是因为当年的波伏瓦怕自己的母亲会偷偷读她的日记？彼时的波伏瓦还不知道今后她的私人生活会在自己出名后被各种曲解和误读，人们会因为关注她的私生活而忽视她的哲学作品和政治参与。

^[1] Valkyrie，即女神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一个婢女，她驰骋在战场上，收集死去的英雄。

^[2] CJ 744, 3 August 1929.

^[3] Bair, p.148.

^[4] CJ 734, 22 July 1929.

^[5] CJ 749, 8 August 1929.

^[6] 埃莱娜·德·波伏瓦的信，引自Bair, p.148.

^[7] 见CJ 749-50.

^[8] CJ 753.

[9] CJ 756.

[10] CJ 757.

[11] CJ 757.

[12] CJ 757.

[13] CJ 758, 2, 3, 4 September 1929, 'l'ami incomparable de ma pensée'.

[14] CJ 759. 2, 3, 4, September 1929.

[15] DPS 76, 21 August 1926.

[16] CJ 760, 6, 7, 8 September 1929.

[17] CJ 762, 10 September 1929.

[18] Gerassi, *Jean-Paul Sartre*, p.90. 马厄在和杰拉西的一次访谈中证实了他是波伏瓦的第一个情人。见Bair, p.628.

[19] PL 62.

[20] CJ 763.

[21] Alice Schwarzer, *After the Second Sex: conversation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trans. Marianne Howar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84.

第六章

她自己的房间

1929年9月，21岁的波伏瓦回到巴黎，搬出了父母的公寓。波伏瓦的外婆在丹费尔-罗什洛街91号有一处房产，波伏瓦租了这栋房子五楼的一个房间。和其他房客一样，波伏瓦也要交房租。波伏瓦买来橘色的墙纸贴在墙上，埃莱娜帮着她一起置办了一些二手家具。波伏瓦从家里搬走的时候，弗朗索瓦丝眼里噙着泪。不过母亲没有大哭大闹波伏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1]除了每年夏天去梅里尼亚克的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平常波伏瓦都得和埃莱娜挤在一间房里。现在她终于有了一间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波伏瓦感到非常高兴。

波伏瓦那时候还没有工作，不过她已经和萨特讨论过他们两个人的未来。在萨特去服兵役的时候，他们会尽可能多地保持见面。波伏瓦选择留在巴黎，而不是找一个全职的教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有时间创作小说。波伏瓦在维克托·杜鲁伊学校一周兼职几个小时，教教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样她能挣够自己生活的基本开销。^[2]

经历过之前备考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日子，波伏瓦觉得工作其实也没有像她父母说的那样任务繁重。相比起重重困难和不断的挫败，波伏瓦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就像一场长假一样轻松。现在的波伏瓦，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波伏瓦的母亲之前总是让她穿耐磨的棉质或者羊毛

质地的衣服，常常显得很土气，现在波伏瓦给自己买了丝绸、纱，还有天鹅绒质地的衣服。波伏瓦笔下曾有一个叫尚塔尔的文学角色，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老师。尚塔尔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当她站上讲台上课时，台下的“学生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他们觉得老师简直不像是真实世界里的人”。[3]

在《盛年》里，波伏瓦写到1929年10月和萨特重逢的时候，她断掉了和其他男人的关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和萨特的恋爱当中。[4]其实，波伏瓦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她之前未公开的日记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那年9月到11月，波伏瓦在日记里仍然书写着自己对雅克和马厄的柔情蜜意。波伏瓦的出版物和日记的相互矛盾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波伏瓦要在回忆录中抹掉其他的男人，给萨特一个最重要却与事实不符的位置？

1929年，波伏瓦仍在权衡自己要不要选择萨特。9月2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萨特不懂爱情，尽管他是个情场老手，但是他从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爱情。[5]直到10月8日，波伏瓦仍然在忧虑这个问题。她说“当自己在萨特身边的时候，就必须得学会不后悔自己选择了这段爱情”。[6]9月波伏瓦回巴黎，她又一次见到了雅克，旧情复燃，也忘记了马厄。波伏瓦觉得自己必须得在“和雅克在一起的幸福”和“跟萨特在一起的不幸福”之间选择。[7]波伏瓦写道：“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一点也不好玩。”[8]

根据波伏瓦回忆录里的记录，在1929年的秋天，萨特对波伏瓦说他觉得她有双重人格。考虑到当时的波伏瓦纠结于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她对复杂生活的失控感，不难想象萨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波伏瓦甚至给自己的未来生活面临的可能性起了个名字：我的可能性）。萨特说，平常的时候，她是海狸。但是有时候，海狸消失了，一个他不那么喜欢的“德·波伏瓦

小姐”就出现了。德·波伏瓦小姐会忧伤和悔恨，但是海狸不会。[\[9\]](#)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是萨特故意给波伏瓦洗脑[\[10\]](#)，为了让波伏瓦不断自我怀疑，从而不去质疑他的可疑行为。但其实海狸和“德·波伏瓦小姐”这种分裂也并非萨特首创，其实早在1927年波伏瓦自己的日记里，我们就发现了类似的分类。当时的波伏瓦在日记里叮嘱自己“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社会既定的框架。适合自己的就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了”。[\[11\]](#)

10月14日，星期一，萨特和波伏瓦在卢森堡公园一起散步。那个下午他们的对话启发了无数后人试图去效仿。波伏瓦和萨特在那个下午的讨论，为后来他们的开放性关系定下了关键的契约。波伏瓦和萨特从一个两年的契约开始，除了彼此以外他们可以有别的情人，并且他们许诺会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为了把自己和别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情人区分开，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essential）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contingent）爱。”[\[12\]](#)波伏瓦和萨特把他们的关系称为“贵庶通婚”（morganatic marriage），这个词的原意是指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婚姻关系，比如路易十四与曼特农夫人的爱情（但波伏瓦和萨特没有说他们俩谁是贵族，谁是平民）。

波伏瓦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写道，一开始她觉得契约中互相告诉彼此一切的承诺让她感到难为情。但是后来，波伏瓦渐渐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因为有萨特这个观察者的存在，让她能够更加不偏不倚地看待自己，而这是她一个人时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波伏瓦称萨特为她一生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都把彼此当作一个毫无恶意的读者，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像一本书一样完全打开呈现给对方，这种信任让他们感觉很舒服。[\[13\]](#)

波伏瓦完全信任萨特，她觉得萨特给她的是一种绝对的、永不止息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她曾经只能从父母或者上帝那里感知到。[\[14\]](#)波伏瓦曾经非常重视“由内而外对自我的审视”，她也常常回溯自己的人生，但我们很难弄清楚为什么波伏瓦会对萨特对她“从外向内的观察”如此充满信心。她对萨特的信任是必要的吗？萨特也同样信任她吗？

《盛年》里描绘的萨特和波伏瓦，对于和彼此分享真相，其实一直都很谨慎，因为真相有可能是伤人的利刃。后来的波伏瓦也觉得自己并没有掌握成功沟通的万能法则。波伏瓦觉得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伴侣双方完全理解对方。经常会有人问波伏瓦是怎么维持她和萨特的关系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在一起的两个人必须一起商量并定下两人之间的协议。年轻时候的波伏瓦，错误地以为对自己适用的能够对所有人都适用。到1960年的时候，无论人们批评还是赞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都会感到很恼火[\[15\]](#)，毕竟人们其实对于他们俩相处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1929年，波伏瓦一度对萨特爱得目眩神迷。但是自从7月见了萨特之后，波伏瓦便开始动摇。实际上，在波伏瓦和萨特订立契约之后的一周里，波伏瓦的内心也充满了怀疑和焦虑。10月17日，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度过，那一天萨特觉得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德·波伏瓦小姐”差点又要出来。当时的波伏瓦很沮丧，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她还是尽力掩盖自己伤心的情绪。直到萨特走后，她才实在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16\]](#)1929年10月21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年如果没有萨特，我没法活下去”，并在“没法活下去”下面画了一道线。[\[17\]](#)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两天之后，雅克局促不安地告诉波伏瓦他和别人订婚了。[\[18\]](#)第二天，马厄和斯捷帕都赶来安慰伤心的波伏瓦。马厄对波伏瓦说，雅克这样的男人18岁的时候很吸引

人，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失去魅力，因为他们都是依靠家里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白手起家的人。雅克的确继承了他父亲的生意，而且他完全不拒绝这种给他设定好的人生道路，而波伏瓦对此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斯捷帕带着波伏瓦去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喝热可可，波伏瓦很欣慰有马厄和斯捷帕来陪伴自己。尽管波伏瓦对雅克以外的男人也有感情，但是她还是为此伤心大哭了一场。她的伤心也许是为了雅克，也许是为了她先前想象过的那个和雅克一起的未来，那个能够满足家人对她的期待的未来，也许两者皆而有之。[19]

在《盛年》里，波伏瓦回忆起她和萨特年轻的时候都有些自命清高。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激进而自由，一方面其实对很多束缚都没有看透。当时的波伏瓦和萨特不承认自己对任何人有情感上的义务，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理性的，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依赖别人。实际上，波伏瓦和萨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是被保护着的，从来没有真正地直面过生活的惨淡和世界的险恶。波伏瓦和萨特那时候没有多少钱，但他们对财富嗤之以鼻，视金钱为粪土，都觉得：“去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20]因此，波伏瓦和萨特一直在他们共有的丰富精神世界里遨游，他们沉溺于各种各样的故事、灵感和图像，所谈论的不是文学便是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或者是笛卡尔，两个人也是画廊和电影院的常客。

在11月的时候，萨特去圣西尔的气象兵部队服兵役。萨特打算两年兵役结束后，和波伏瓦分开一段时间。于是萨特申请了一份在日本京都的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从1931年11月开始，萨特就会离开法国去到日本。萨特告诉波伏瓦，他们还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见面，比如伊斯坦布尔。然后他们可以再次分开，重新开始各自的冒险。

波伏瓦并不想独自冒险，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法告诉萨特她的真实想法。

即使这样，萨特仍然只是波伏瓦生活的一部分。在11月3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她希望萨特“嘴唇贴着自己的嘴唇”。紧接着这一段，波伏瓦提及了雅克的来信，然后她描述了自己见到斯捷帕时的喜悦心情。再然后，波伏瓦说，她希望拉马的手指穿过自己的头发，身体轻触着她的身体。^[21]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波伏瓦仍然煞费苦心不让萨特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很清楚的是，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波伏瓦完全不觉得自己同时爱着几个人有什么问题。

萨特服役期间要在圣西尔训练，这里离巴黎非常近。所以一周有三四天，波伏瓦都可以去和萨特一起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和他们共同的朋友皮埃尔·吉耶和雷蒙·阿隆一起。周日，萨特会来巴黎看波伏瓦。训练结束之后，萨特被派遣到圣西姆福里安气象站，这里离图尔市不远。大部分时间，波伏瓦和萨特都会给彼此写信。每个月除了周日之外，萨特还能休假一周，所以在萨特回巴黎和波伏瓦每周去图尔市以外，他们也能定期见面——但即使这样，波伏瓦还是想要更频繁地见面。当时的萨特称呼波伏瓦为“我的小妻子”，波伏瓦称呼萨特为“我的小丈夫”。但是夏天之后，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浓情蜜意很快就消散了。

之后的那个月，1929年11月25日，扎扎去世了。波伏瓦那天在日记里只写下了一行日期，旁边有一滴眼泪模糊了笔迹。

在扎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波伏瓦的日记都是空白的。直到再下个月，波伏瓦因为萨特又一次伤心，她才重新开始提起笔写日记。当年波伏瓦加入马厄、尼藏和萨特的三人学习小组的时候，她以为她遇见了一群能够接纳她本来样子的人。跟萨特的相

遇让波伏瓦以为，她遇到了一个想要寻找真相并如此生活的哲学家。但是现在萨特似乎对波伏瓦有了过分的期望。萨特也开始像别人一样，开始对波伏瓦指手画脚，也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她明白和不明白什么。波伏瓦写道：“我比他更理解什么是偶然的生活。”^[22]

在扎扎葬礼的前一天，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萨特指责波伏瓦太过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波伏瓦为此流下了眼泪。波伏瓦说：“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23]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波伏瓦和萨特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每当波伏瓦情感上需要安慰的时候，她会去找别人而不是萨特。扎扎去世之后，波伏瓦去找了埃莱娜。但即便如此，在12月13日扎扎的葬礼上，波伏瓦还是忍不住痛哭流涕，因为出席葬礼的这些人都是原本她以为会在扎扎婚礼上看到的面孔。^[24]

萨特很清楚波伏瓦完全有能力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萨特对波伏瓦的苦难没有同情心。在订立契约后的第一年里，波伏瓦一直对萨特、她自己以及他们的契约对别人的影响感到忧心忡忡。1929年12月，当马厄来到巴黎时，他在波伏瓦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萨特写给她的信。在此之前，波伏瓦一直没有告诉马厄她和萨特之间的关系变了，气急败坏的马厄说自己再也没法信任波伏瓦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波伏瓦，要她必须趁他在巴黎的时候来见他。波伏瓦摘抄了马厄的信拿给萨特看：“因为之前跟你在一起的9月，和之后那充满谎言的两个月，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你们俩精心搞这么一出，让我承受了如此的敷衍……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25]

马厄不想要“如此的敷衍”？那他希望得到什么？作为一个有

妇之夫，他自己对婚姻都不忠诚，还反过来要求波伏瓦对他忠诚，未免太双标了。在萨特面前，波伏瓦也没有对马厄表现出什么同情心，反倒是指责马厄的嫉妒心和吃醋让她难受。但是波伏瓦也渐渐开始明白“偶然的生活”对于她和对于萨特来说，完全是两码事。波伏瓦从来不想伤害她所爱的人，她想要跟他们在一起。但目前的生活让她什么也不是了——雅克要结婚了，马厄在千里之外，而萨特也要启程离开。[\[26\]](#)不过我们也不清楚，这时候的波伏瓦质疑的是“偶然的生活”的价值本身，还是只是这种生活的一个片段。

在波伏瓦搬出家自己住的第一年，她仍然常常回家和父母一起吃午饭，但是她并不跟父母分享她生活的近况。尽管萨特不在的时候，波伏瓦很想念他，但是她也很享受这种有机会独自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进行各种冒险的生活。那段时间几乎一有人邀请，她就去约会，甚至还去了一次妓院。乔治不理解为什么波伏瓦还不开始正式的教职工作。乔治轻蔑地跟自己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波伏瓦正在和巴黎度蜜月。波伏瓦知道自己的第一份教职很可能被分配到外省，而她不想离开充满诱惑的巴黎。有段时间，波伏瓦也考虑过当一名记者，因为那样可以继续留在巴黎，但最终她还是更想要教哲学。[\[27\]](#)

1930年6月，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她感到自己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工作、想要创作的强烈欲望。她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生活的首位，在这一点上萨特和她意见一致。而那时，波伏瓦一想到她和萨特的两年之约快要到期了就感到惴惴不安，她甚至把这比作死亡临近。波伏瓦很确定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她也时常担心自己写作的能力，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实现当作家的梦想：“我没有才能，我写不了！”波伏瓦一方面自责自己懒惰，缺乏意志力，一方面又无法判断萨特给自己的帮助到底是不是她所

期望的。波伏瓦觉得“萨特跟我对话时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女孩。萨特只想看到我开心，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很满意，他又不开心了……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只能对他撒谎”。[28]一开始，波伏瓦觉得自己和萨特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当他俩讨论哲学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想要发掘真相。但是为什么一涉及她的情绪，萨特就不愿意发掘下去了呢？为什么拒绝当端方淑女的波伏瓦，现在却愿意去做一个假装快乐的女人，尤其是面对一个把她当作小女孩来对待的男人？

波伏瓦觉得自己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写作的灵感，甚至没法再相信萨特对自己说的“我爱你”。[29]我们并没有找到萨特具体说了什么才让波伏瓦如此沮丧和气馁，但我们知道波伏瓦的父亲以及波伏瓦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给她传达的信息都是：女性天生就没有创造性，历史几乎就是女性缺乏创造性的记录。埃莱娜回忆起小时候，她们俩都很喜欢文学和艺术，但是她和波伏瓦从来没有一个灵感迸发的时刻，能够高呼自己今后要做画家或者作家。埃莱娜花了好多年才摆脱这种想法对自己的束缚。而波伏瓦也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尽管感到写作是自己的天命，但也会对缺乏创造性感到绝望。对于她们来说，让自己的想象力尽情发挥，做具有原创性的创作，看起来是不可能的。[30]

乔治·德·波伏瓦对于女性的贬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整个文化里的共性。波伏瓦所阅读的那些哲学作品也浸淫着这种想法。在学生时代的日记里，波伏瓦曾引用了叔本华《论女人》（*On Women*）中的几句话：女性就是“第二性，在每个方面她们都劣于第一性”。女性存在的意义只是延续人类种族。叔本华觉得女性可以有才华，但绝对不可能有天赋。[31]

当波伏瓦考虑从事新闻业的时候，她有个富有的表亲向她伸出援手。这个表亲也是当年帮助她父亲的那个人。他们安排波伏

瓦和《新欧洲》(*L'Europe Nouvelle*) 的联合编辑普瓦里耶夫人见了一面。普瓦里耶夫人告诉波伏瓦，想要在新闻业站住脚，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她问波伏瓦，你有想法吗？波伏瓦回答说：“没有，我说了，我没有。”^[32]而与此同时，当编辑的丈夫普瓦里耶先生跟波伏瓦见面的时候，他对波伏瓦动手动脚，并暗示波伏瓦还有另一种上位的方法。普瓦里耶先生说如果波伏瓦愿意的话，他可以介绍有权有势的人给她认识。波伏瓦拒绝了他。但是后来这对夫妇邀请波伏瓦去参加一个鸡尾酒派对时，波伏瓦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为了机会前去一试。当波伏瓦到了之后，她发现自己格格不入。她身上的羊毛裙，在一屋子的绫罗绸缎和锦衣玉食面前显得格外寒酸。

1930年秋天，波伏瓦开始思考她对萨特的爱是不是已经开始反噬自己。她完全活在他的期待中，忽视了自己的生活。波伏瓦写道：“我失去了自己的骄傲，我也因此失去了一切。”^[33]回想起之前10月的生活，她和萨特重逢，浓情蜜意，但是她明显感觉到萨特的爱不如自己的深。看起来她也只不过是萨特众多冒险中的一个，而萨特在她的印象里则是惊为天人，她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给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我。^[34]波伏瓦还爱着萨特，但是她描述自己的爱“更多的是出于习惯，没有从前那么热烈了，也没那么纯粹和温柔了”。在波伏瓦面前，萨特失去了完美的光环，现在波伏瓦能看透他想要取悦别人的那种欲望，他的自尊、他大声说话时涨红的脸，以及他是如何轻易地受到别人影响的。^[35]

波伏瓦对萨特的爱逐渐冷却，同时他们之间也出现了身体不合拍的问题。波伏瓦感觉到自己的欲望被唤醒，需要被满足。但是在这一点上萨特却不同步，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问题更严重了。相比于性，萨特更喜欢吸引的过程。现在我不难理解为什么波

伏瓦会立即同意和萨特的契约——只有同时与马厄和雅克见面，波伏瓦才能在当下和未来为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找到爱的寄托。当马厄和雅克不在的时候，波伏瓦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欲望。尽管波伏瓦和萨特承诺过要对对方无话不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波伏瓦对萨特只字不提自己欲求不满的事情。^[36]波伏瓦成长的环境从来都不鼓励主动表达个人的欲望，也不重视个人的情绪。当然了，波伏瓦现在之所以对自己的情绪如此严苛，也有可能是因为不满萨特对情绪的态度和他所宣扬的哲学。

萨特在他1943年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性欲就是麻烦，因为它遮蔽和折损了我们的自由。”对于情绪，萨特同样也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一个自由人可以做到选择不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因此自由人就应该这样做。萨特的一个旧情人西蒙娜·若利韦，曾写信告诉萨特自己感到忧伤。当时21岁的萨特在给西蒙娜·若利韦的回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她感到恶心：

你是希望我看到你的忸怩作态就态度温柔起来吗？你以为我会因为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改变立场吗？我一度也想要搞这种戏码……但现在的我憎恨和鄙视所有像你这样陶醉在自己的忧伤里几个小时无法自拔的人……要知道，伴随忧伤而来的总是懒惰……你我相隔500公里，你以为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忧伤，我就能跟你一样沉湎于忧伤情绪中吗？要是能这样，那你干脆写信给国际联盟吧。^[37]

波伏瓦曾经有一次在电影院看到萨特的眼睛里泛着泪光，但萨特那次的眼泪是为艺术而流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值得萨特流泪。波伏瓦不能向萨特倾诉自己的复杂情绪，也不能向他表达自己的性欲，只能转而诉诸笔端，记录在日记里，只有日记本不会

像萨特那样对她的情绪和欲望恶语相向。

后来波伏瓦回忆，其实自己有时候也会偶尔佩服萨特的这种疏离态度。萨特认为伟大的作家都需要培养出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因为他们要捕捉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但有的时候，波伏瓦觉得，语言“必须先谋杀现实，才能描摹现实”，但是波伏瓦并不希望现实就这样死去。波伏瓦想要细细体味生活给她的百味，而不是为了创作出流传后世的作品就把它抹杀。[\[38\]](#)尽管波伏瓦和萨特都认为文学很重要，但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他们持不同意见。萨特赞同文字是有力量的，但是他认为所有的文学都带有欺骗和隐瞒。波伏瓦坚信文学可以成就更多，她带着敬畏之心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为伍尔夫意欲填补文学和生活之间的沟壑，而波伏瓦也想要了解和揭露这个真实的世界。[\[39\]](#)

波伏瓦在第二卷回忆录中写道，萨特在哲学上常常不拘泥于细节，天马行空。波伏瓦认为，正是因为萨特的不拘小节使得他的想法常常比她自己那些一丝不苟的精确想法更加出彩。[\[40\]](#)不只是这一次，在其他很多时候，波伏瓦都表示萨特比自己更胜一筹，也更有自信。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称萨特是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她从15岁开始就梦寐以求的男人。波伏瓦说：“我理想中的两性关系是，夫妻俩有很多的共同点，是彼此精确的观察者。在以前，上帝是我生命的观察者。通过这种方法，我能排除爱上一个不同的人的可能性。除非我遇到一个既比我有成就，也跟我一样平等的人，否则我是不会结婚的。”[\[41\]](#)

但是萨特这个观察者并不像波伏瓦写的那样精确：萨特拒绝把波伏瓦的情绪看成是有意义的，也不予理会波伏瓦的性欲。[\[42\]](#)20年后，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恋爱中的女人”一章，里面描写了女人是如何在恋爱后把所爱的男人当作她生活的

中心，并且在恋爱中失去自我的。

恋爱中的女人甚至失去了自我判断力，试图通过她爱人的眼睛去看待一切。她追随他的一切喜好，包括书籍、艺术和音乐。如果没有他陪自己一起看世界，她就对世界失去了兴趣，她只对他的想法、他的朋友、他的观点感兴趣。她觉得自己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她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被他爱着。当她听到他说“我们”，她就感觉到无上的快乐，因为她觉得被所爱的男人当成了他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她和他就连在了一起，享有他的威望，可以和他一起去征服世界了。[43]

黑兹尔·罗利等作家认为这段话其实是波伏瓦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毕竟，在她的自传中，波伏瓦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辅助的存在”，是一个“智识上的寄生虫”。[44]从波伏瓦日记中的有些篇章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并没有扪心自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问自己想对萨特表达什么，而是问自己怎样才能成为萨特想要的样子。尽管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略去了萨特的种种缺点，但是在日记中她都悉数记录了下来。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她已经在读萨特读的那些书：纪德、克洛代尔、佩吉、阿兰、帕斯卡、莱布尼茨、拉尼奥、尼采，以及一系列英语书籍，但萨特却无法独立读英语书。波伏瓦的确是用了“我们”，但是并不是只跟萨特用。尽管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和萨特恋爱的女人，但是我们不确定在现实生活中她是否就是那样的女人。波伏瓦把自己描绘成萨特从属的样子，并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不是为了叙事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她认为用某种方式去讲述这个故事能达到更好的女性主义的效果。

尽管波伏瓦早在18岁时就已经坚信自己有要表达的内容，尽管那时候的波伏瓦已经聪慧过人，但是年轻的波伏瓦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智识也同样优秀到了能够吸引别人做她的“寄生虫”。

如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波伏瓦和萨特那时候来往于图尔市和巴黎之间，在火车上他俩会交流彼此的观点。每次萨特都很高兴见到波伏瓦，因为他可以告诉她自己最新的哲学理论构思了。波伏瓦听了之后会指出其中的问题。波伏瓦帮助萨特完善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就是萨特日后赖以成名的关键。但是，当波伏瓦告诉萨特她的观点时，萨特会对波伏瓦说，你的原创性不够，他甚至对波伏瓦说：“当你这样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在思考。”^[45]

萨特的批判既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蔑视，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鼓励。在《盛年》中，波伏瓦写道，萨特对于波伏瓦对自己的依赖感到厌烦，但他的厌烦并不是因为这种依靠，而是因为他觉得波伏瓦不如刚见面那会儿那么才思泉涌了，他觉得波伏瓦可能要变成那种放弃自我独立，甘心做男人助手的那种女人。当萨特告诉她这些的时候，波伏瓦生气极了。不过波伏瓦生气的原因是，她让萨特失望了。^[46]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波伏瓦身上这种独立与依赖的并存：有的时候波伏瓦不确定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否是最好的，她也不确定萨特究竟有没有激发出她最好的部分。尽管波伏瓦很早就感觉到写作是自己的天命，但是她始终不够自信，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总是拒绝赞美。波伏瓦总是不重视作品受到的褒奖，而是只看到负面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波伏瓦和萨特的友谊流传后世，让大众看到了萨特的自信和波伏瓦的自我怀疑，但事情的全貌并不是这样的。

1930年10月，波伏瓦对萨特产生了诸多疑虑，甚至已经到了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程度。波伏瓦好几次想要离开萨特。她为扎扎和曾经的自己心痛；尽管她已经获得了她原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她仍然觉得壮志未酬：“柔情、工作、快感，仅此而

已吗？”[47]在日记的最后，波伏瓦缅怀失去的其他可能的未来，以及在别的朋友的陪伴下本可以成为的自我：

我有罪过，我有罪过，我有罪过！噢！我不想我的生活就像这样！噢！这不是我梦想的样子。明天我要见亲爱的小男人（萨特）了，一切都将结束。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我的悔恨是从哪里来的。噢！雅克，我的纯洁，我的梦想，我的爱。但是现在一切都物是人非。

扎扎，我不能忍受你已经不在了……没有了你，我孤身一人，我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离开，我想要离开萨特，和你一起走，我想要和你说话，想要爱你。想要远离这里，离得远远的。[48]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波伏瓦的回忆录和信件来了解她，因为我们没法获得她“从内向外地审视自我”的视角。尽管波伏瓦对于自己和萨特在一起这件事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萨特。不过波伏瓦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萨特的“柔情、工作和快感”里。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都认为如果当时波伏瓦嫁给萨特，她也许会更幸福。但是这个判断显然忽视了两点。首先，波伏瓦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认定婚姻是不道德的。第二，萨特在波伏瓦生命中的位置从一开始就被波伏瓦界定清楚了：他是她“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在这个方面，萨特对于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性和情感上，他远没有那么重要。

波伏瓦参加完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在巴黎的第一年，失去了很多原来的朋友。扎扎去世了，雅克结婚了，其他的朋友都搬走了。波伏瓦也不再见梅洛-庞蒂和他们的那个“伪圣人”小团体。她介绍给萨特认识的只有埃莱娜、杰杰、斯捷帕和她的未

婚夫费尔南多。但不久之后，斯捷帕和费尔南多也离开巴黎去了马德里。

不过，萨特的各路朋友倒是帮波伏瓦转移了注意力。波伏瓦后来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称为“一场充满了各种人事、混乱而愉悦的大杂烩”[49]。在经历了之前一年为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紧张的学习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松懈了下来，变得很懒惰。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学者的状态，重新开始读书和写作。她大量阅读英美作家的作品，除了和萨特一起读的书以外，她自己还读了惠特曼、布莱克、叶芝、辛格、西恩·奥凯西、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所有作品，以及亨利·詹姆斯、乔治·摩尔、弗兰克·斯温斯顿、丽贝卡·韦斯特、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当时的萨特对神秘主义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波伏瓦在日记里就写过她曾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也读凯瑟琳·埃梅里希和福利尼奥的圣安杰拉。[50]波伏瓦习惯把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做到极致。[51]即使是去旅行，波伏瓦通常也只是换个地方工作。[52]

在波伏瓦和萨特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契约并没有得到各自家庭的认可。萨特的继父约瑟夫·芒西知道波伏瓦和萨特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直接拒见波伏瓦。[53]对此萨特也没有抗议，他依然每周自己一个人回家看父母。萨特的母亲偶尔会单独溜出来见波伏瓦，但这种会面通常很短暂，也极少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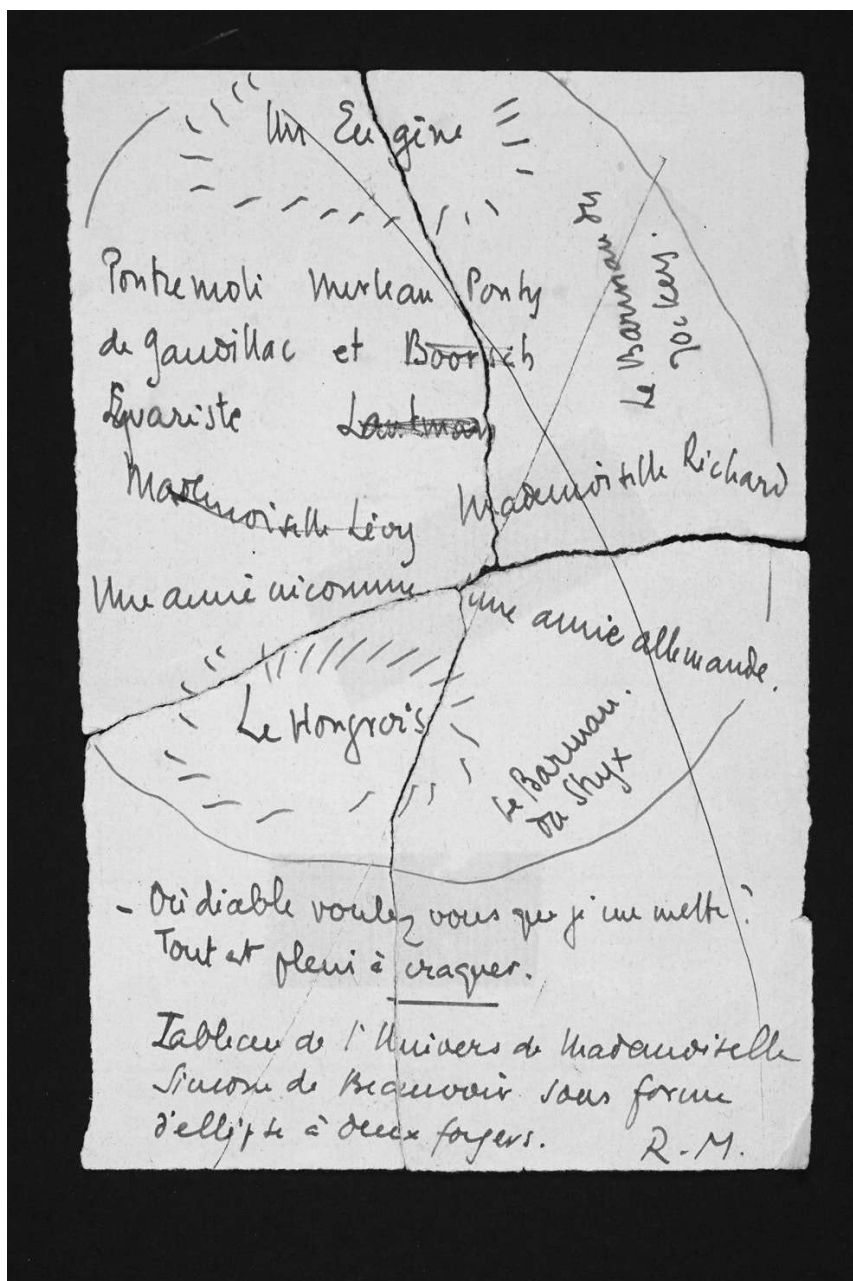
波伏瓦和萨特之间产生了问题。萨特的确如他自己承诺的那样，毫不隐瞒自己对于“偶然的”情人的爱慕，这让波伏瓦很是生气和嫉妒。西蒙娜·若利韦算是萨特第一段认真的“偶然的爱情”，也是萨特想用来“诱使波伏瓦走出不作为的状态”[54]的工具。波伏瓦虽然生气，但是她认为西蒙娜·若利韦只不过是能够在律师和政客面前背两句尼采的高级妓女罢了。波伏瓦从来没有和自

己不爱的男人同床共枕过，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能如此轻率地对待自己的身体。[55]但萨特反而觉得波伏瓦的情绪是可鄙的，他觉得波伏瓦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相信被情绪所控制只会妨碍个人自由。萨特认为，情绪只是一个蹩脚的借口，波伏瓦应当发挥个人自由，去做出别的选择。

波伏瓦也尝试过放下自己的嫉妒，但是和萨特在一起，她常常很挣扎。除了要处理自己的嫉妒，波伏瓦对别人因为她而产生的嫉妒和痛苦也感到敏感和苦恼。波伏瓦步入和萨特的关系时，心里其实也装着别的男人。和萨特在一起之后，波伏瓦依然可以继续欣赏别的男人，但是这些人并不完全能接受她的不专一。有一次，波伏瓦正打算和她与萨特的共同朋友皮埃尔·吉耶进行一次为期十天的公路之旅。但这时候，马厄突然来了巴黎。他的妻子没来，马厄打算在巴黎待两周，并且希望波伏瓦能够陪陪他。上次12月马厄发现了萨特的信件之后，他们已经和好了，但是现在波伏瓦却告诉他，她要跟别人一起离开巴黎十天。马厄告诉波伏瓦，如果她去了，他就再也不会见她了。波伏瓦说如果她不去，对吉耶也太不公平了。波伏瓦觉得这样太重色轻友了，如果不是不得已，她不愿意这样做。波伏瓦和马厄陷入了一个僵局——马厄不信任波伏瓦，也不愿意收回他的最后通牒，所以两人带着矛盾一起去看了场电影，但波伏瓦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56]

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很享受2月她跟吉耶的旅行。她仍然觉得坐车旅行很新奇，尽管她之前跟尼藏夫妇一起开车逛过巴黎，但是这次为期十天的旅行让她看到了很多之前只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他们去了阿瓦隆、里昂、乌泽尔切、博利厄、罗卡马多以及她最喜欢的普罗旺斯。他们沉浸在普罗旺斯的阳光里。波伏瓦也很喜欢卡玛格、艾格斯-莫尔特斯、莱博和阿维尼翁的景

色。



1929年5月到6月，勒内·马厄的画《西蒙娜·德·波伏瓦小姐的宇宙》，在椭圆

圆的形状下面，马厄写道：“你到底想把我放在哪里？到处都装满了。”

除了新地方的美丽风景，这次旅行也让波伏瓦亲眼看见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不公平。跟西蒙娜·薇依之前对她的挖苦恰恰相反，波伏瓦其实经常饿肚子，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即使这样，她也是生活在特权阶级的。从巴黎南下的路上，波伏瓦和吉耶去拜访了波伏瓦的一个表亲，他带她参观了一个工厂。工厂作坊里灯光昏暗，到处弥漫着金属粉尘。在这之前的一年，波伏瓦读了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劳动力和价值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那只是在巴黎时读的文字，跟在一个工厂实地感受到的相差甚远。波伏瓦问工人们要工作多久，工人回答说，8个小时一班的三班倒，波伏瓦听了难过得湿了眼眶。[57]

当他们回到巴黎的时候，萨特收到了一封信，通知他没有获得京都的那份工作。同时，波伏瓦收到马厄的信，告诉她他们之间结束了。萨特决定不再等待法国教育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那年春天，他被指派到勒哈弗尔市教书，那里离巴黎不远，萨特接受了。[58]波伏瓦也被分配了一个教职，但是在800公里之外的马赛市。

远距离让波伏瓦很焦虑，她也意识到虽然自己有时候渴望孤独，但是她其实也很怕孤独。之前一年的经历让她对即将到来的“流放”充满了恐惧。萨特看出波伏瓦很不安，于是提议说他们可以结婚。因为如果有了婚姻关系，国家就必须给他们分配两个位置相近的职位。萨特说，没有必要为了原则而折磨自己，我们反对婚姻，但是没必要做婚姻的殉道者。

尽管萨特提议的结婚只是在法律上走个形式，但波伏瓦还是对他的提议感到很惊讶。波伏瓦觉得他们双方都有理由拒绝这个提议。婚姻“能把一个人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负担都翻倍”，而这两

者都不是波伏瓦想要的。此外，波伏瓦也不想被别人憎恨，而成为萨特的妻子很可能会让她成为被憎恨和厌恶的目标。这时的萨特没有得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在日本的职位，也没法去圆一个周游世界的花花公子的梦想了。萨特已经在为自己的期待落空感到不满，现在又被分配到巴黎外区教书。加入已婚男人的队伍显然不是他想要的。尽管在回忆录里，波伏瓦把她拒绝结婚的理由放在了前面（她并没有明说在哲学上自己对此的异议），但是人们常常无视它，认为波伏瓦是为了萨特才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说她决心不走入婚姻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唯一有可能改变她想法的是孩子。在少女时期，波伏瓦曾经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现在觉得这已经不可能了。波伏瓦已经看透了，养育孩子只是“毫无目的且不合理地为地球增加人口”。^[59]波伏瓦认为自己放弃要孩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天命。波伏瓦拿加尔默罗修女打比方：只有放弃养育自己的后代，加尔默罗修女才能为全人类祈祷。波伏瓦很清楚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所以她说：“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波伏瓦和萨特没有选择婚姻，而是选择修改契约的内容：他们的关系要更加亲密，要比最初制定契约时更投入。波伏瓦和萨特决定他们可以短暂地分开，但是不可以长久地分离。这次的新承诺并不是一生一世的，他们决定等到30岁的时候重新考虑两地分居的问题。要去马赛教书的波伏瓦，不得不和萨特分开，但波伏瓦是带着对两人关系更坚定的信心和对他们共同未来的清晰规划，踏上离开巴黎的旅程的。

1931年夏天，波伏瓦第一次出国。当时的波伏瓦23岁，在那之前她就一直很想出国旅行。之前扎扎从意大利回来，波伏瓦常常目眩神迷地听她讲起旅行中的各种人和地方。这年夏天，正好斯捷帕的丈夫费尔南多邀请波伏瓦和萨特去马德里玩，所以他

们决定也顺道去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看一看。萨特从他的祖母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手上还有一些余钱。于是他买了票，把法郎换成了西班牙货币比塞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第一晚，波伏瓦和萨特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菲格拉斯，兴奋地一直大喊：“我们到西班牙啦！”在那之后，他们去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塞戈维亚、阿维拉、托莱多以及潘普洛纳。9月底的时候，波伏瓦和萨特分别回了马赛和勒哈弗尔。

后来波伏瓦回顾自己在马赛的那一年，她觉得那是自己事业上的一个全新转折。^[60]当时的波伏瓦孤身一个人抵达马赛，行囊空空，举目无亲。之前一年的经历让波伏瓦开始觉得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到了马赛之后，她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重新认识自己。马赛那里都是小地方的人，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因为萨特不喜欢户外运动，波伏瓦已经很久没有远足了。现在来到马赛，波伏瓦正好重拾起自己户外运动的爱好。没有课的时候，波伏瓦一大清早就出门去户外远足。穿着一身旧裙子和帆布鞋，波伏瓦一天能走五六个小时，走到很远的地方。尽管朋友和同事都告诫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边走会有危险，但是波伏瓦还是大着胆子搭便车，有几次她都从危险中幸运地逃离出来。波伏瓦很享受独自一个人远足，她觉得这种消遣能让自己忘记无聊，克服抑郁和悔恨的情绪。波伏瓦有时候变得有点强迫症，一定要走完自己计划好的远足路线，有时候甚至有点开始走极端。

波伏瓦的新教职让她的家庭关系缓和了一点。在弗朗索瓦丝的劝说下，乔治甚至休假一周去马赛看望波伏瓦。弗朗索瓦丝现在觉得波伏瓦很了不起，在她眼里，波伏瓦是一个职业女性，有很高的收入。但是萨特仍然出现在波伏瓦的生活里，这一点让弗朗索瓦丝很失望。她觉得哪怕是做一个老处女，也比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好。当乔治看望完波伏瓦启程回巴黎后，波伏瓦觉得如

释重负，因为她又可以继续远足了。[61]埃莱娜也来看过波伏瓦两次，在这之前两姐妹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她们很想念彼此。波伏瓦带着埃莱娜一起远足，有一天埃莱娜发烧了，但波伏瓦执意要完成自己的远足计划，于是她把瑟瑟发抖的埃莱娜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门口等回去的公交车，然后自己继续远足去了。波伏瓦对于计划的执念已经超越了她的同情心，而且这并不是她唯一一次这么不近人情。

在教学工作中，波伏瓦完全不羞于去教授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波伏瓦给学生们讲劳动力、资本和正义，这让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到震惊。[62]在很多方面，波伏瓦都渐渐变得像自由派了，但是在性方面她仍然是一个保守派。当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向波伏瓦示好的时候，她感到很愤慨。[63]

在马赛，波伏瓦的生活少了很多干扰，她重新拾起笔开始写作。波伏瓦在这段时间没有出版什么作品。她所写的东西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他者的幻象”以及诚实、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把这个特殊的主题变成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因此她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样一来，她们的关系就不会带有任何性的暗示。[64]

波伏瓦一有时间就会回巴黎。如果时间不多，她就只去看萨特和埃莱娜，如果时间充足她就去看看别的朋友。[65]在两地分居的这段时间里，波伏瓦和萨特一直保持着通信。当他们能见面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就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当时的萨特正在写一篇关于偶然性的论文。

1932年6月，波伏瓦听说自己下一年的教职将会在鲁昂，那里离勒哈弗尔只有一个小时，离巴黎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盛年》里，波伏瓦把在马赛的那年看作自己的涅槃。远离自己最重

要的爱人和朋友，波伏瓦不得不忍受孤独，但也正因为如此，波伏瓦知道了自己是靠得住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波伏瓦告诉贝尔，在马赛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不快乐的一年。她爱萨特，想要和他在一起，而在那一年里，自己都分不清心里的苦闷究竟是因为想念萨特，还是因为悔恨。[66]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更多地方旅行，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摩洛哥。新学年开始，波伏瓦搬到鲁昂，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拉罗什福科酒店里。火车的汽笛声让波伏瓦感到莫名安心：因为逃离就在咫尺之外。波伏瓦在鲁昂交了一个新朋友：科莱特·奥德里。奥德里是尼藏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圈子里认识的，跟波伏瓦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波伏瓦主动向奥德里介绍了自己，一开始奥德里觉得波伏瓦唐突，而且很资产阶级。[67]奥德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68]，波伏瓦对她有点畏惧。奥德里总是穿着考究，信心十足，还总是讨论政治。不过没过多久，波伏瓦和奥德里就经常在保罗啤酒厂共进午餐了。

奥德里欣赏波伏瓦的意志力，也喜欢她的畅快大笑。奥德里觉得波伏瓦是个感情激烈的人。波伏瓦的率直有时候让人承受不住，这也让波伏瓦那“不能忍受愚蠢之人”的名声跟了她一辈子。当萨特来鲁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波伏瓦向奥德里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基于真理而非激情的一段关系。奥德里形容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深刻而激烈，简直让人沸腾，这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关系。奥德里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感受，我无以名状。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69]

在鲁昂的这一年，波伏瓦和萨特在维持契约方面要便利得多了。他们俩往返于鲁昂、勒哈弗尔和巴黎，能有不少时间在一起。波伏瓦和萨特都开始对戏剧感兴趣起来。正好西蒙娜·若利

韦的情人查尔斯·迪兰是一个戏剧导演，波伏瓦和萨特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不管在哪个城市，波伏瓦和萨特都跟人交谈甚欢。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自欺”（*bad faith*，即 *mauvaise foi*）的概念——这是一个关于不诚实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更能准确地描述人类的体验。

[70]

在《盛年》中，波伏瓦把这个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她和萨特。一开始的时候，波伏瓦说是萨特想出了这个概念，但在那之后她一直用“我们”。“我们”一起创造了“自欺”这个概念。波伏瓦一个同事的行为让她瞬间有了灵感：“有了！”波伏瓦告诉萨特：

“吉内特·卢米埃不是真实的，是一种幻象。”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假装自己有了某种信念或者有了某种感觉，但实际上并没有的人。我们创造了“装腔骗人”（*playing a part*）的另一种说法。[71]

“自欺”这个概念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概念之一。萨特在他的著名作品《存在与虚无》中用“侍者”这个角色阐述了何为“装腔骗人”。那为什么波伏瓦提到创造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用“我们”呢？20世纪30年代的波伏瓦和萨特对彼此影响极大，我们很难判断出究竟是谁受惠于谁更多。埃莱娜的丈夫利昂内尔·鲁莱这样描述波伏瓦和萨特：“他们一直在对话，他们分享一切，他们相互映衬，没有人能把他们拆分开来看待。”[72]

在那段时间，波伏瓦和萨特也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多年以后，波伏瓦回看当年的自己和萨特，给出了“精神上骄傲自大，政治上盲目无知”这样的评价。[73]当时的他们通过奥德里和其他人，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波伏瓦和萨特对无产阶级的斗

争没有归属感，因此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斗争。[\[74\]](#)他们的斗争是哲学层面的，波伏瓦和萨特探索着如何理解人类理性的自我和生理性的自我，他们想要理解自由。萨特觉得，人的肉身、食欲和习惯都有碍于自由。1929年时，波伏瓦仍然包容着萨特这种无视情绪和激情的态度。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波伏瓦开始提出异议。那时候的萨特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只是由肌肉组成的，跟情绪毫无关系。萨特认为，向眼泪低头或者晕船，都是软弱的象征。而波伏瓦相信眼睛和胃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特定的生理现象跟软弱无关。[\[75\]](#)

波伏瓦和萨特大量地阅读，进行研究和写作。1932年年底，萨特、波伏瓦和雷蒙·阿隆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餐厅（Bec de Gaz）吃晚饭。当时阿隆刚从德国回来，他在柏林的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进修了一年，学习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思想，以及他那著名的现象学方法论。当时，法国人对现象学还闻所未闻。波伏瓦在《盛年》里回忆这一段，说阿隆当时指着自己的鸡尾酒杯，对萨特说我们可以就此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萨特听到这些的时候激动得脸都变白了，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让哲学回归到日常生活，扎根到对于经验的描述里。

萨特和波伏瓦之后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现象学方法论，但两个人都为其赋予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开山鼻祖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是描述事情本身和现象，但是要剥离开所有日常生活和公认的正确看法所造成的干扰因素、陈规习俗，以及假设猜想。现象学认为事物的表象和真实（或者说我们认为的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对于萨特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发现。但是对于波伏瓦来说，现象学的方法论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在索邦曾师从让·巴吕齐，而让·巴吕齐已经接触过现象学，他的作品也关

注过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体验。此外，柏格森的“具体的形而上学”也用了类似的方法。^[76]我们知道，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读到柏格森赞美那些作家能够撕开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精心编制的网时，她对此感到激动不已。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现出“能被感知的现实”。^[77]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柏格森和巴吕齐都不如胡塞尔流行。柏格森名气最盛的时候，人们会蜂拥到他上课的教室，挤在门口和窗户边，伸长脖子听他讲课。但是因为去的很多都是女性，男人们开始怀疑柏格森教的不是哲学。191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甚至这样写道：“去听柏格森课的女人们身上的香水味，都快让柏格森无法呼吸了。如果柏格森真是个哲学家，那么没有女人会去听他讲课。”^[78]

193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去伦敦度复活节假期。他们对于满眼的英式风情感到十分新奇，到处都是圆顶高帽和雨伞，还有海德公园里的演讲者、伦敦的出租车、茶馆以及独特的时尚。因为旅途中没法像在法国时那样分居两地，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越发明显。波伏瓦比萨特更了解英国文学和文化。波伏瓦想循着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足迹走一走，也想去看看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汉普顿宫。然而，萨特想去伦敦底层人民所在的街区晃悠，想去感受那里的氛围，去揣度人们脑子里的想法。

在给波伏瓦的信件里，萨特有时候会充满爱意地说恨不能与波伏瓦“合二为一”。但是伦敦之旅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在牛津时，萨特觉得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公园不错，但是他瞧不起英国大学生的势利，所以拒绝进入牛津大学。波伏瓦对他的无理取闹很气愤，自己一个人去逛了牛津。在伦敦，他们对去哪里又出现了分歧：萨特竟然不愿意去大英博物馆？^[79]

波伏瓦很钦佩萨特的很多想法，但是她实在没法欣赏萨特的全部。坐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萨特滔滔不绝地跟波伏瓦说着怎

么把伦敦放进他理解世界的宏大框架里。波伏瓦向来很烦萨特这种凡事都要归纳的习惯，觉得他的假设都站不住脚。这其实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波伏瓦和萨特已经因为这个吵过架。波伏瓦再次强调：语言不能完全概括现实，应该面对现实中的所有好与坏、所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之处。

萨特的回应是，光是观察世界和做出反应是不够的，应该试着把现实压缩到文字里。对此，波伏瓦觉得简直毫无道理：一次仅仅为期12天的旅行不可能让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伦敦。比起生活和体验，萨特更想用文字把经历记录下来，而这和波伏瓦的信念完全冲突，波伏瓦信奉“生活！此时此地的现实”。[80]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元首；5月2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升起了带有“卐”的纳粹党党旗。在此时此地的现实里，波伏瓦和萨特目睹着犹太学者们自愿流亡，同时柏林开始焚烧书籍。波伏瓦后来在自传里说自己 and 萨特都不参与政治，他们在那时只关注“他们自己、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即将出版的书”。当时的萨特和波伏瓦对公众和政治事件毫无兴趣，他们只想退回到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她的原话是：“只关注自己手臂够得到的地方。”[81]）波伏瓦在《盛年》里写道：“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我们当时都没有直面现实的沉重，只是靠着所谓的‘激进的自由’而感到骄傲。”[82]

但是波伏瓦也并未完全脱离社会。8月，波伏瓦对巴黎的一桩谋杀案非常感兴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维奥莱特·诺齐埃的年轻女工人。事情的起因是诺齐埃被她的父亲强奸了，然后她就把自己的父亲杀了。然而很多媒体却称之为“乱伦”，这让很多女性读者困惑不已。诺齐埃的审判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以至于人们把它和德雷福斯事件[83]相提并论。[84]

在鲁昂，波伏瓦继续她的哲学和文学创作。1933年，波伏瓦开始写一本新小说，同时也跟科莱特·奥德里介绍给她的一个德国难民每周学习两到三次德语。[85]波伏瓦在创作小说时模仿司汤达的风格，她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个故事，来展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停滞不前亟须个人反抗。尽管波伏瓦自己不是主人公之一，但她把扎扎化名为安妮写进了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虔诚、忠诚的典范。波伏瓦后来也把扎扎写进自己的其他作品。波伏瓦渐渐发现，文学书写能够帮助她厘清和纾解情绪。波伏瓦对于自己的首部小说并不满意，她觉得人物缺乏深度、不够真实，所以不久之后便放弃了。不过，波伏瓦在之后的作品中还是常常会写到同样的主题和人物。

尽管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个阶段并不富有，但是他们尽可能地去旅行。1934年，他们去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萨斯和科西嘉岛。他们在德国的汉诺威市拜访了莱布尼茨的故居。[86]那一年，波伏瓦没有尝试写任何东西，她有意识地选择只阅读和学习。波伏瓦研究了法国大革命，阅读了胡塞尔的德语原著。[87]萨特一边努力地完成着自己关于胡塞尔哲学的大部头作品《自我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一边修改关于偶然性的手稿，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萨特在柏林的那一年，波伏瓦休假两周去看他。萨特在柏林有了一次“偶然”的恋爱，这次是个叫玛丽·吉拉尔的女人，萨特很喜欢她陪在身边。[88]波伏瓦也见到了玛丽，并且还挺喜欢她的。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萨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另一个女人真正产生兴趣，按照他们的契约，波伏瓦对此不应有什么不满，实际上波伏瓦也没有觉得不舒服。[89]尽管她还是会有点吃醋，但波伏瓦对萨特有足够的安全感。波伏瓦和萨特一起阅读福克纳和卡夫卡，摸索着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把生活描写得更好。此

时的他们，都相信艺术可以实现救赎。[90]不过，萨特的传记作家却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们关系的“第一次危机”。[91]

从个人角度来说，波伏瓦最在乎的仍然是那个从学生时代起就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究竟要保持多少自我，放弃多少自我。波伏瓦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自己内心对于独立的渴望和想要靠近另一个人的冲动。波伏瓦在课堂上会说一些引起争议的话，比如：“养育孩子并不一定是女性的天命。”[92]同时，波伏瓦也会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学生，而其中有不少都让家长非常不满。有些家长向学校投诉波伏瓦，指责她玷污了家庭的神圣，好在学校的检察员最终站在她这边。

那个时候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是默默无闻的哲学教师，萨特甚至抑郁了一段时间。那时候，萨特失望无聊，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人生中“最黯淡无光的岁月”。[93]当时萨特的生活单调乏味，他的才华无人赏识，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他不想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院校教书。相比之下，他的朋友们似乎都风生水起。保罗·尼藏已经出版了两本书：1913年出版的《阿拉伯的亚丁》（*Aden, Arabie*）和1933年出版的《安托万·布洛耶》（*Antoine Bloye*），两本书都好评连连。连当初没有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马厄，事业也有了起色（马厄日后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理事长）。然而萨特却还没有出版任何作品。毫无名气的萨特开始担心：“都28岁了还没有成名，恐怕就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了。”[94]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想有些荒谬，但是一想到自己一事无成，就更生气了。

11月的一天，波伏瓦和萨特坐在勒哈弗尔的一个海边咖啡店，两个人都垂头丧气，担心自己的生活就这么陷入无休止的重复，再也不会会有新的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波伏瓦格外沮丧，她泪流满面，眼前甚至浮现出曾经的精神支柱：上帝。[95]情绪低迷

的波伏瓦，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呵斥萨特怎么能认为生活值得奋斗。第二天，波伏瓦还是走不出沮丧的情绪，跟萨特吵了一架。因为萨特认为酒精和眼泪不能给波伏瓦带来真相，她的伤心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只是酒后悲观罢了，然而，波伏瓦觉得，正是酒精帮她看清了丑陋的真相。

当时的波伏瓦和萨特都不得不面对自己对于生活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萨特甚至开始脱发，他觉得自己关于偶然性的手稿太枯燥，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波伏瓦想出来一个主意：何不把它写成小说呢？虚构小说的深度和悬念也许能够拯救它。萨特曾经也喜欢侦探小说，也许真的可以把一个哲学问题融入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去。后来萨特在第三稿时，把小说设定在勒哈弗尔，基于自己创作了一个主要人物安托万·洛根丁。波伏瓦对萨特的建议常常是一针见血，这也是为什么萨特总是会听取她的意见。[96]

萨特也开始写他的哲学散文《想象》（*Imagination*）。这是亨利·德拉克鲁瓦给他布置的一个任务，是为学术出版社阿尔康（Alcan）写的一篇文章。为了研究这个课题，萨特一直在思考梦和幻想。萨特在巴黎高师有个朋友丹尼尔·拉加什主修精神病学，他告诉萨特如果想亲自体验一下幻觉，他可以安排萨特尝试一下迷幻药“麦司卡林”。

1935年2月，萨特去到巴黎的圣安妮医院，医务人员给他注射了“麦司卡林”。但是很可惜，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萨特并没有体会到他所期待的那种快乐的幻觉。相反，他看到屋子里的东西都变得畸形，追赶着他，他甚至出现了幻视，看到螃蟹和其他甲壳类动物，接下来的几周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见到波伏瓦的时候，萨特跟往常判若两人。[97]

最终，萨特向波伏瓦承认了自己在对抗抑郁，并且他小题大做地觉得自己可能会长期处在幻觉以及精神错乱的边缘。波伏瓦听了，故意挖苦他说：“根据你自己的理论，理智控制身体，那么你的疯癫只是你的理智认为自己疯了而已。”^[98]

1935年3月，希特勒颁布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德国军队从10万迅速激增到了55.5万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开始紧张，因此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斯大林同意援助法国国防。当时一边是苏联，一边是法国，看起来德国没有赢得战争的机会，应该不会愚蠢到真的发起战争。波伏瓦后来回顾那段时间，说自己应对时事的方式显然是太轻率了。那时候的她觉得，应对希特勒造成的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逃避。^[99]在1935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里，只有7月28日那天的信被收录进《给萨特的信》

(*Letters to Sartre*) 里出版了。她完全没有提到政治，只能说她在阿尔代什省唯一能接触到的报纸就只有《小马赛人报》(*Le Petit Marseillais*) 了吧。^[100]

那一年的复活节，他们去了意大利，萨特似乎心情还不错。但是回到法国以后，萨特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再假装一切正常了。萨特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医生建议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因此，波伏瓦尽力陪伴着萨特，如果她实在没办法陪着他，也会安排别人陪着萨特。

当时的波伏瓦没法真的理解萨特的危机，在很多年后的1960年，波伏瓦想明白了，尽管当时她和萨特的境况看起来相似，但是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和拥有一份专业的工作，对于萨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站在马赛那些台阶最上面的时候（1931年，波伏瓦开始教书），我幸福得都

眩晕了。在我看来，我没有默默承受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了我自己想走的路。在萨特看来阻碍他自由的职业，对我来说却是解放。[101]

波伏瓦一直从哲学阅读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对她来说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她也一直写作。当时的她在创作一个短篇故事集《精神至上》（*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其中一个故事便是关于扎扎是如何被清教徒式的禁欲道德观逼至失心疯，最后走向死亡的。[102]另一个故事则被认为启发了萨特的短篇小说《战前童年》（*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103]在1926年到1934年之间，波伏瓦七次尝试写小说。[104]但是直到40年之后，这些小说才被出版。后来萨特也最终获得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功，他们的关系也变成了一段三角恋，至少看起来是变成了一段三角恋。

[1] VED 40.

[2] PL 12. SLBdB, 'Chronologie', MPI lxvi.

[3] WT 50.

[4] PL 14.

[5] CJ 789.

[6] CJ 795.

[7] CJ 788, 24 September 1929.

[8] CJ 783, 20 September 1929.

[9] 该分类是在《盛年》第19页由萨特提到的。在日记中出现的情况参见CJ 801-2, 14 October 1929.

[10] 原文用词为gaslight，即“煤气灯效应”，又叫认知否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操控者通过长期将虚假、片面或欺骗性的话语灌输给受害者，从而使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的认

知、记忆和精神状态，最后达到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

[11] DPS 274, 29 June 1927.

[12] PL 22.

[13] PL 24.

[14] PL 27.

[15] PL 25.

[16] CJ 801–2.

[17] CJ 807.

[18] CJ 808, 23 October 1929.

[19] CJ 808, 814.

[20] PL 15–16.

[21] CJ 815, 3 November 1929.

[22] CJ 825, 12 December 1929.

[23]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24] CJ 828, 13 December 1929.

[25] Maheu, copied in SdB to Sartre, 6 January 1930, LS 3.

[26]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27] PL 52–3.

[28] CJ 839, 9 June 1930.

[29] CJ 839, 9 June 1930.

[30] HdB, Souvenirs, pp.71, 96.

[31] 见Christine Battersby, 'Beauvoir's Early Passion for Schopenhauer: On Becoming a Self', 即将出版。

[32] PL 52.

[33] CJ 839.

[34] CJ 842, 6 September 1930.

[35] CJ 842, 6 September 1930.

[36] CJ 814–15.

[37] Sartre to Simone Jollivet , 具体日期不详(1926), 记于*witness to My Life*,pp.16–17.

[38] PL 40.

[39] PL 41.

[40] PL 42. 又见MDD 343–5.

[41] MDD 145.

[42] CJ 827.

[43] SS 710.

[44] PL 70–74.

[45] PL 47.

[46] PL 61.

[47] CJ 848–9, 31 October 1930.

[48] CJ 848–9, 31 October 1930.

[49] PL 59.

[50] PL 51.

[51] PL 54.

[52] FC 287.

[53] Cohen-Solal, *Sartre*, p.43.

[54] PL 82.

[55] PL 71.

[56] PL 56.

[57] PL 57.

[58] PL 76.

[59] PL 78.

[60] PL 88.

[61] Bair, p.177.

[62] PL 94.

[63] PL 95.

[64] PL 80, 101.

[65] PL 106

[66] Bair, p.176.

[67] Colette Audry, 'Portrait de l'écrivain jeune femme', *Biblio* 30(9), November 1962: 3-5.

[68] 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信奉托洛茨基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全世界的不断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69] Bair, p.173，引自一个与奥德里的访谈。

[70] PL 128.

[71] PL 128.

[72] 引自Bair, p.201.

[73] PL 16.

[74] PL 134.

[75] PL 129.

[76] 让 - 路易·韦亚尔 - 巴龙表示，法国哲学里后来被称为“现象学的方法”和宗教研究的实际上就是柏格森所说的“具体的形而上学”。见‘Présentation’ to Jean Baruzi, *L'Intelligence Mystique*, Paris: Berg, 1985, p. 16.

[77] 见DPS 58-61, 66 especially 16 August 1926.

[78] Anon. 'Views and Reviews', *New Age* 1914 (15/17): 399.我很感谢埃丝特·赫林提醒我注意到这个。

[79] PL 143.

[80] PL 145.

[81] PL 17, 18.

[82] PL 15.

[83]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

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84] SLdB, 'Chronologie', MPI lxx. 关于诺齐埃事件，见 Sarah Maza, *Violette nozière: A Story of Murder in 1930s Pari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85] PL 149.

[86] PL 181.

[87] SLdB, 'Chronologie', MPI lxxii–lxxiii.

[88] 见 Cohen-Solal, *Sartre*, pp.99–100. Jean-Pierre Boulé, *Sartre, Self-formation, and Masculinities*, Oxford: Berghahn, 2005, p.165.

[89] PL 184.

[90] PL 186.

[91] Cohen-Solal, *Sartre*, p.100.

[92] PL 153.

[93] PL 162.

[94] WD 87.

[95] Jean-Paul Sartre, *War Diaries*,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Verso, 1984, p.76, 引自 Rodolphe Töpfer.

[96] 库萨的尼古拉和其他很多人都称上帝为“绝对者”(the Absolute)，见 WD 77; PL 207.

[97] PL 107.

[98] PL 206–9.

[99] PL 210.

[100] PL 213.

[101] SdB to Sartre, 28 July 1935, LS 6–7.

[102] PL 212.

[103] PL 222.

[104] 见 Eliane Lecarme-Tabone, 'Simone de Beauvoir's "Marguerite"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Jean-Paul Sartre's "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 trans. Kevin W. Gray, in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eauvoir & Sartre: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七章

原本是四角恋的三角恋

1934年，波伏瓦邂逅了一个名叫奥尔加·科萨基维奇的学生，这个女孩后来使得她和萨特饱受争议和猜疑。波伏瓦在自传《盛年》中记录了奥尔加，她和萨特也把奥尔加写进了各自的小说作品里：波伏瓦《女宾》（*She Came to Stay*）里的泽维尔和萨特的《自由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里的伊维奇都是以奥尔加为原型创作的角色。根据埃莱娜·德·波伏瓦回忆，奥尔加并不喜欢萨特和波伏瓦在小说里对自己进行的文学化描写，不过奥尔加一辈子都和波伏瓦保持着朋友关系[1]。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波伏瓦曾与三位比她年轻的女性有过亲密关系，这些女性都曾经是波伏瓦的学生。与此同时，萨特也对这三位女性发起过追求，有时候他能够成功得手。因为萨特和波伏瓦如此对待他们的偶然情人，法国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称波伏瓦和萨特为“持自由论的恐怖分子”。也因为这个时期的作为，很多人认为波伏瓦在性方面浪荡不羁，因此抵制她的作品。[2]纵使波伏瓦后来写出了伟大的哲学作品，但这些关系给她后来的个人生活和公众形象都带来了很深的影响，我们不禁想问：当时的波伏瓦到底是怎么想的？

波伏瓦是经科莱特·奥德里介绍认识奥尔加的，当时奥尔加是鲁昂那所学校里出了名的“小俄国人”。奥尔加的父亲是俄国贵族，母亲是法国人。奥尔加美貌过人，她有一头金发，皮肤白

哲，不过她的文笔就没有长相那么动人了。有时候，奥尔加交上去的作业太短，以至于作为老师的波伏瓦都没法给她评分。但是在学期末，当奥尔加拿回自己的作业看到分数时，她大吃一惊，因为她竟然得了全班最高分。

不久之后，奥尔加参加高中毕业会考的模拟考，在考卷上她什么也写不出来，大哭起来。波伏瓦关心说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帮她看看是什么在困扰她。奥尔加答应了，她们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一起在河边散步，聊上帝和波德莱尔。波伏瓦和奥尔加都觉得对方很有魅力，波伏瓦觉得19岁的奥尔加很聪明，想要帮她建立起自信；奥尔加觉得27岁的波伏瓦很迷人，因为她跟学校里的其他老师都不一样。在奥尔加眼里，德·波伏瓦小姐优雅、知性、新潮。

奥尔加·科萨基维奇的父母是在俄国相识的。奥尔加的母亲年轻时去基辅给一个贵族家庭当女教师，后来跟这家的一个儿子结婚了。这个儿子是个工程师，后来在沙皇手下工作。1915年11月6日，奥尔加出生了[3]，不久之后，在1917年，她的妹妹万达也出生了。不久之后，俄国大革命爆发了，奥尔加一家成了流亡贵族。他们先搬家去了希腊，辗转几处，最终在法国定居。奥尔加和妹妹是伴着跟随父母流亡在外的乡愁和身为贵族的优越感长大的。

奥尔加在高中会考中表现很棒，尤其是哲学这一科目。那一年夏天，她回家过暑假，和波伏瓦仍然写信保持联系。不久之后，奥尔加的父母就把她送回鲁昂，让她学医。但是奥尔加不想当医生，她厌恶同班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也憎恶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同学。1934年到1935年的那个秋冬，法国政治局势大变，经济一路下行，连莎尔玛生[4]这样的大公司也开始裁员，雪铁龙也申请破产。法国当时失业率飙升，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

恨情绪也越发强烈。

作为外国人的奥尔加和不少移民成了朋友，其中不乏犹太人。同时她也和波伏瓦保持着朋友关系，她会向波伏瓦倾诉自己每天的生活，以及她的新朋友们面临的问题。有一天，奥尔加问波伏瓦：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波伏瓦回答说：“什么都不是。‘犹太人’并不存在，只有人类。”波伏瓦后来意识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抽象到了可悲的程度。当时的波伏瓦声称自己知道这些社会分类真实地存在着，也知道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是波伏瓦非常不赞同她父亲的等级观念：“法国人和犹太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其既定的阶层。”[5]

1934年秋，奥尔加和波伏瓦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仿佛可以短暂地逃离鲁昂那可怕的小地方粗鄙气息。每个星期，波伏瓦和奥尔加都会一起吃一次午饭，有时候晚上一起去看歌剧或者参加政治集会。在波伏瓦眼里，奥尔加还是个孩子，波伏瓦很喜欢奥尔加看世界的方法[6]。她写信给萨特说：“奥尔加是个有独创意识的人，她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思考着这个世界。”[7]

在见到萨特之前，奥尔加就已经听波伏瓦说起过他的各种传奇事迹，萨特的古怪反倒给他增添了一层光环。在那次尝试迷幻药之后，萨特通过幻视看到的龙虾还一直挥之不去，这让奥尔加觉得他身上带有悲剧色彩。奥尔加曾说：“萨特非常浪漫，像是中世纪的骑士。”[8]之前，波伏瓦和萨特通常更愿意在勒哈弗尔，而不是鲁昂见面。不过从1935年初开始，萨特来鲁昂的次数渐渐多了，也越来越频繁地和奥尔加见面。一开始的时候，似乎每个人都受益于这段关系，奥尔加享受着波伏瓦和萨特对她的关注，萨特被奥尔加深深地吸引，波伏瓦看到萨特渐渐地从抑郁症里走出来也松了一口气。但是从1935年春开始一直到1937年

春，萨特原本低迷的心情被另一种疯狂取代：他开始狂热地迷恋奥尔加。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对于波伏瓦来说很艰难。波伏瓦真心喜欢奥尔加，也希望奥尔加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潜力，并且去发挥自己的潜力。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以一种波伏瓦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变得复杂起来。波伏瓦搬进了奥尔加推荐的“小绵羊宾馆”。波伏瓦一直鼓励奥尔加好好学习，但奥尔加只坚持了一个学期。在那之后，奥尔加变得自由散漫，不分昼夜地喝酒跳舞，阅读和聊天，但就是不好好学习。1935年，奥尔加在7月和10月分别参加了两次医学考试，但都没有通过。

随着奥尔加的情况越来越复杂，1935年夏，波伏瓦重新开始独自徒步——她仍然穿着她那双帆布鞋，徒步法国。萨特这时候正和父母一起在挪威游船度假，他在桑特塞西莱-德安多格那里和波伏瓦会合，加入了她的徒步之旅。其实只要萨特愿意，他也是个不错的徒步者，但是他担心波伏瓦会不顾健康走极端。

[9]1929年的时候，萨特跟波伏瓦说自己对叶绿素过敏，其实是夸大其词的。但是比起自然树木，萨特的确更喜欢人文历史景观，所以这次波伏瓦特意安排了一条能够经过城镇、乡村、修道院和城堡的徒步路线。在那次迷幻药试验之后，萨特一直有幻视现象，能看到甲壳类的生物。有一次和波伏瓦一起乘坐巴士的时候，萨特突然说自己彻底受够了龙虾，想用意念驱赶它们，但龙虾整个旅途都跟着他。之前波伏瓦一直觉得徒步能够帮助自己厘清思绪，赶走心魔，现在萨特也尝试着用徒步来驱赶自己脑子里的怪物。[10]

当萨特忙着用意念驱赶自己幻觉里的甲壳类生物的时候，波伏瓦在思考为什么最近自己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进展。波伏瓦决心要重新开始写作，但问题是写什么呢？波伏瓦注意到，萨特近

来的哲学写作比小说写作更成功，她为什么不也尝试一下哲学写作呢？萨特告诉波伏瓦，她能够比他更快更准确地掌握哲学。波伏瓦也承认，萨特在阅读其他作品的时候总是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假设中去解读。^[11]后来在1946年，波伏瓦回忆道，萨特认为自己的创造力完全来源于他自己，没有什么灵感是从外界获得的（当然除了从波伏瓦那里获取的灵感）。波伏瓦记录当时的萨特：“几乎不阅读，如果他想读几页书的话，随便一本都能让他开心。萨特只是需要那几页文字来支持他自己的想象和想法，就像占卜师看着咖啡渣的形状就能预测未来一样。”^[12]

从波伏瓦的角度来看，萨特总是不愿意跳出自己的视角，当然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波伏瓦完全相反。波伏瓦毫不抵触其他的思考方式，她能够看出各种观点里的瑕疵，也能够发现进一步阐发的潜能。当波伏瓦遇到一个让她信服的理论时，她没法不受到影响，它会“改变她与世界的关系，并让她所有的经验大放异彩”。^[13]

尽管波伏瓦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进行多少写作，但是她也没闲着，她在学习德语——尽管萨特此前在德国待过一年，但是他的德语还不如波伏瓦的好——此外，她也一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但是她并不想开始动笔创作。回看当时的自己，波伏瓦觉得她并没有为还没发表过任何文章而感到焦虑，毕竟她的偶像司汤达达到了40岁才开始写作。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就在风格上模仿了司汤达。^[14]

回到鲁昂，奥尔加很显然没能学医。奥尔加的父母想把她送去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省会城市卡昂的一所寄宿学校，但是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都不想她离开他们的小团体，但问题是奥尔加到底擅长什么？奥尔加的哲学似乎还不错，于是萨特提了一个建议，波伏瓦也觉得这个建议好极了。当时萨特和波伏瓦都有不错

的薪水，他们完全有富余可以帮奥尔加租一间房。而且萨特当时正在辅导那些想拿教育学文凭的学生。于是波伏瓦给奥尔加的父母写信，并安排了一次见面。奥尔加的父母同意了波伏瓦提出的建议：让奥尔加在波伏瓦的指导下继续学习。萨特和波伏瓦给奥尔加安排了课表、阅读书目和散文，帮她在“小绵羊宾馆”租了一间房，距离波伏瓦不远。

与此同时，他们也制定了一个谁可以在什么时候见谁的时间表，因为他们既想要两人会面，也想要三人一起的时光，于是他们也安排了名为“全体出席”的会面。波伏瓦后来回看那段时间，她觉得在那些三人度过的时光里，自己从来都不太自在。波伏瓦常常觉得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石之上。波伏瓦和萨特想要在学业上帮助奥尔加，但是收效甚微。奥尔加只想读书的时候看一点书，也只想学习的时候才学习，而她很少会有想学习的心情。一开始萨特和波伏瓦觉得他们是为了奥尔加好才帮助她的，但是后来波伏瓦承认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萨特和波伏瓦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将奥尔加“占为己有”。^[15]波伏瓦和萨特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变得衰老且无趣，而奥尔加的年轻和不羁让他们好像间接地拥有了青春一样。

波伏瓦当时的确是在乎奥尔加的，波伏瓦曾经给奥尔加写信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而你是其中的一个。”^[16]不久之后，奥尔加对波伏瓦的感情“越发炽烈”^[17]，奥尔加和波伏瓦的肉体关系也让萨特觉得十分挫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萨特一直狂热地迷恋着奥尔加，但是奥尔加一直都不愿意和他上床。

奥尔加是波伏瓦和萨特第一个“共有”的“偶然的”情人，不过这种共同点并没有延伸到性方面。尽管萨特一直鄙视情绪的存在，也能够自由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奥尔加拒绝和他上床倒

是让他妒火中烧。[18]萨特的行为也越来越古怪。更让波伏瓦感到不安的是，萨特对奥尔加产生了对波伏瓦从未有过的感情。萨特对奥尔加痴迷了整整两年，波伏瓦对此痛苦不堪，过度的嫉妒让她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19]

然而奥尔加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勒哈弗尔的学校里，萨特的得意门生之一是个叫作雅克·洛朗·博斯特的年轻小伙子。博斯特家里有十个孩子，他是老幺，比奥尔加还小六个月。博斯特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有个哥哥是巴黎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博斯特个子很高，嘴唇丰厚，乌黑的头发衬着绿色的眼睛。尽管波伏瓦写到过自己被博斯特所吸引，但是在回忆录里她对博斯特几乎只字未提。[20]实际上，博斯特是波伏瓦生前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直到2004年，波伏瓦和博斯特的信件在法国出版后，他们长达十年的激情澎湃的爱恋才为大众所知，而这些信件目前还没有以英文出版过。奥尔加后来和博斯特发生了性关系，萨特觉得奥尔加背叛了他。于是萨特转而去引诱奥尔加的妹妹万达以挽回自尊。奥尔加最终提出结束自己和萨特以及波伏瓦的三角恋，波伏瓦觉得这是明智之举，但萨特对此很不满。让萨特的情绪进一步恶化的是，伽利玛出版社拒绝了他的小说投稿。

对于波伏瓦来说，这段三角恋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不过这段关系显然也关乎她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当时19岁的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她想要阐发“自我和他者对立”的哲学关系。十年之后，波伏瓦和奥尔加以及萨特的关系让她用一种新的方式面对这个问题。尽管奥尔加很享受萨特和波伏瓦对她的关注，并且与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她深知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奥尔加阴晴不定，常常沉默不语。波伏瓦甚至回忆说：“她站在离我

不远的地方，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我好像被变成了一个客体，要么是偶像，要么是敌人。”[21]

波伏瓦对于这段关系也一直摇摆不定。在自传里她写道，这段三角恋让她再次意识到两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需要持续不断的维护。[22]早在1927年，波伏瓦就已经得出结论，爱情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需要“不断地去创造，使之永葆青春”。[23]不过，尽管波伏瓦不断地完善她关于自由、行动和爱情的观点，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和萨特“本质的”结合会伤害到他们“偶然的”情人们。

奥尔加很少接受采访，但是回看当年的自己，她觉得自己和博斯特以及万达就好像是被印度舞蛇人催眠了的蛇：“波伏瓦和萨特对我们的关注，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们想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24]尽管当时波伏瓦和萨特还没有出名，但是他们俨然是一对充满了吸引力的组合，他们的魅力使人神魂颠倒。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波伏瓦在这个阶段曾担忧他们和这些年轻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不管是年轻或是衰老，富有或是贫穷，这些“偶然的”情人是能自由为自己的行为做选择的，不是吗？

那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去意大利和希腊旅行，波伏瓦很高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同时有个好消息值得庆祝：假期之后波伏瓦终于可以搬回巴黎了！她获得了巴黎莫里哀学校的一个教职。但是当波伏瓦和萨特9月回到巴黎的时候，他们发现政治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他们无法忽视的地步。西班牙内战开始了。波伏瓦、萨特和费尔南多·杰拉西交往甚好，去西班牙旅行之后更是对西班牙人充满了好感。当时法国成立人民阵线政府不久，总理莱昂·布卢姆决定不去插手这场战争。当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给西班牙反革命势力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法国却不顾自己和西班牙

牙的贸易协定，不愿意给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25\]](#)这让波伏瓦觉得很过分，最终费尔南多没法忍受一直在巴黎隔岸观火，于是赶回西班牙参加战争。萨特、波伏瓦、斯捷帕以及其他朋友们，一起去车站给他送行。

回到巴黎之后，波伏瓦在盖特街的皇家布雷塔涅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萨特不在巴黎教书，但是想到博斯特在索邦念教育学，埃莱娜也在巴黎，波伏瓦就觉得很欣慰。奥尔加也搬到了巴黎，在萨特和波伏瓦的帮助下开始追求演艺之路。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萨特疯狂地寻欢作乐，导致他和波伏瓦的契约濒临破裂。据说当时波伏瓦一直在帮萨特修改他的小说*Melancholia*（即1938年出版的《恶心》）。当时波伏瓦常常在圆亭咖啡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给萨特的文稿做批注。当波伏瓦在帮助萨特修改手稿的时候，他却在逍遥快活。后来萨特告诉大家，《恶心》之所以能出版，完全是因为波伏瓦在上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带有波伏瓦批注的那份手稿后来丢失了，因为萨特喜欢把重新抄写的干净整洁的手稿留给后人，而波伏瓦也说她把带有批注的手稿扔掉了。[\[26\]](#)

1937年春天，波伏瓦勤勤恳恳地工作，很少休息，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博斯特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精英咖啡馆（Le Select）聊天，突然她开始止不住地颤抖。[\[27\]](#)平时身体出现小毛病的时候，波伏瓦都是选择直接忽视，但是这次实在太严重了，她只好立马回了家。一晚上波伏瓦都发着高烧，第二天她躺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波伏瓦才觉得自己躺在床上休息了一天实在是太懒惰了。那天晚上，萨特从拉昂回到巴黎。波伏瓦觉得自己能够坚持出门，她强打精神，穿好衣服跟萨特一起出去参加派对。但是当他们抵达派对的时候，波伏

瓦却因为太虚弱不得不找个地方躺下休息。她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波伏瓦说自己没事，但最终萨特还是带她回家，给她找了医生。不久之后，波伏瓦被诊断得了很严重的肺水肿，住进了医院。她没法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波伏瓦一想到自己成了一个病号就很不舒服。她躺在床上，听医生们像说一个物体一样说她的身体。波伏瓦意识到他们是在谈论她，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和疏离感。

波伏瓦康复之后，另外一件事值得高兴的事也发生了：萨特要回巴黎了，这样他们就终于又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了。萨特在米斯特拉尔酒店订了两个房间，一间给波伏瓦，一间给自己。波伏瓦就住在萨特的楼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既享受同居的好处，又避免了其不方便之处”。^[28]这家宾馆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离他们喜欢的圆亭咖啡馆、多摩咖啡馆（Le Dome）、圆顶餐厅（La Coupole）、精英咖啡馆都很近。1937年5月，萨特的文学之路终于开始了，他关于偶然性的小说终于被出版社接受了。

那年夏天，波伏瓦、萨特和博斯特一起去了希腊旅行。他们在房顶上睡觉，一起远足，被太阳晒得不成样子。有时候波伏瓦和博斯特两个人单独出去一起游泳，而萨特会在咖啡馆里工作或者给万达写信。

新学年开始了。当波伏瓦想要写作却又不知道写什么好时，萨特鼓励她，可以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萨特的《恶心》，就是因为修改时把自己作为原型重新塑造了洛根丁这个角色，之后的投稿才被出版社接受。萨特认为，波伏瓦的《精神至上》是不错，但是波伏瓦本人要比她笔下的人物瑞内和丽萨更有趣，她为什么不从自己的生活里取材呢？

波伏瓦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去写的话很容

易受到攻击。尽管波伏瓦经常会在和萨特以及其他人的通信里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和公开发表出来让所有人看，并不是一回事。波伏瓦一直在思考那个自从少女时代就困惑着她的哲学问题：他人的意识。波伏瓦在新闻里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乘坐出租车的男子，因为羞于没有钱付车费，于是杀死了出租车司机。波伏瓦不禁想，为什么人类会如此强烈地被自己的羞愧所驱使。为什么人会为了他人而活，会试图表现出某种样子给别人看，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波伏瓦想在小说里以西蒙娜·薇依为原型，创造一个与主角波伏瓦截然不同的人物。萨特的建议是，奥尔加其实是个更好的对照。^[29]波伏瓦一听就觉得很对，奥尔加的确是个完美的对照。1937年9月，波伏瓦和奥尔加在阿尔萨斯度假时给萨特写了封信，信里的这段话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奥尔加）科萨基维奇迷人极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悠闲得恰到好处，她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而且比原来想的要亢奋得多，甚至都像个法国人了。”波伏瓦所说的亢奋，并不是性方面的，因为波伏瓦在信中紧接着就说奥尔加对远足兴致高昂，完全没有受到刮风下雨的影响，一走五六个小时，甚至一天七个小时都没问题。^[30]

1938年，萨特的《恶心》终于出版了，扉页上写着“献给海狸”。不久之后，赞美如潮水般涌来，评论家们认为萨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文学新闻》称这部作品是“我们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作品之一”。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The Wall*）在不久之后也出版了，安德烈·纪德评论说：“这个让-保罗是何方神圣？看起来我们可以期待他未来写出更多好作品。”^[31]波伏瓦的《精神至上》先后被伽利玛和格拉塞两家出版社退稿。^[32]当亨利·米勒给波伏瓦写退稿信的时候，他觉得波伏瓦对被压抑的资产阶级女性的描写很好，但是其他人也在写相同的问题，而波伏

瓦并没有写出相应的解决方式。他在信中对波伏瓦说：“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有给出任何提示。”[33]

波伏瓦没有放弃，十年之后，她为“新秩序”写了一个宣言：《第二性》。当萨特在巴黎文人圈混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波伏瓦从她父亲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挖苦和讽刺。乔治嘲笑女儿的作品一直没有出版，只能做一个无名小卒的荡妇罢了。[34]

虽然一直被退稿，但是波伏瓦在教学方面十分出色。法国第16区的莫里哀学校是一所女子学校，波伏瓦的学生都对她印象深刻。波伏瓦总是打扮入时，她穿着丝绸衬衫，化着妆去上课。波伏瓦对自己的课堂掌控得很好，常常不看笔记直接脱稿讲课。

[35]她给学生讲授笛卡尔、胡塞尔和柏格森。她带学生们讨论弗洛伊德，不过是为了推翻弗洛伊德，她更喜欢讲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以及康德。[36]

1937至1938那一学年的毕业生里，有个叫比安卡·比嫩费尔德的学生对波伏瓦格外着迷。比安卡写信告诉波伏瓦，她很喜欢波伏瓦的哲学课，想要在大学里继续学习哲学，问波伏瓦是否愿意跟她见面聊一聊。

约好时间之后，波伏瓦和比安卡在蒙帕纳斯大街见面了。当时的比安卡17岁，她是一个犹太女孩，跟着父母一起从波兰来到法国，希望能少受一点反犹太主义的罪。比安卡的父亲之前是一个医生，很有家教，波伏瓦很欣赏比安卡的聪明才智。她甚至告诉博斯特，她很尊敬比安卡，有时候她都忘了自己是在和一个年轻女孩聊天。[37]

不久之后，波伏瓦和比安卡就经常一起过周末了，比安卡每

周都一路小跑到帕西站等着见波伏瓦。波伏瓦向比安卡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她告诉比安卡她和萨特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想保持自己的自由，所以没有结婚，并且可以拥有别的情人。波伏瓦告诉比安卡他们和科萨基维奇姐妹的事情之后，比安卡十分着迷，但同时比安卡也很生气波伏瓦如此纵容科萨基维奇两姐妹。在比安卡看来，科萨基维奇两姐妹只是懒惰加上反复无常罢了，不值得波伏瓦为她们付出那么多时间，而且这些时间本可以拿来陪伴比安卡的。[38]6月快要结束的时候，比安卡写道，她想要成为像波伏瓦那样的人。[39]

这一学年结束了，波伏瓦和比安卡也不再是师生关系了。她们俩一起去了法国摩文山区，进行长距离的远足。走了一天的路之后，波伏瓦和比安卡找了一间便宜的小旅馆，挤在一张床上。在这次旅行中，比安卡写道，她和波伏瓦终于有了肉体上的关系。[40]之后波伏瓦否认自己曾和女性有过性行为[41]，却在信里很直白地写道自己和女性曾经很亲密。7月22日，在写给萨特的一封信里，波伏瓦说比安卡写给她的信都充满了激情。

比安卡·比嫩费尔德1921年4月出生于波兰，与波伏瓦发生关系的那年夏天她才17岁。[42]也许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比安卡当时还太过年轻，但是在当时，比安卡已经到了可以结婚或进行性行为的合法年龄。在1938年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证据表明，当时的波伏瓦曾担心过她和比安卡的年龄差距，以及曾经的师生关系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在波伏瓦去世之后，比安卡说她是一个狩猎者，在“自己的女学生中寻找年轻的新鲜肉体，自己品尝后拱手送给萨特享用”。[43]比安卡认为，这就是波伏瓦对她和奥尔加所做的事情，显然比安卡并不知道，奥尔加一直没有同意萨特想要发生关系的请求。

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信件和日记都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

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法还原出事情的原貌了。我们所看到的比安卡对于那段恋情的叙述，也是50年以后写的了。当时的比安卡发现自己的身份和名字被公之于众，一怒之下出版了一本书。波伏瓦在世的时候，一直遵守诺言，没有公开过比安卡的真实身份。但是1990年，戴尔德丽·贝尔用英语发表波伏瓦的传记时，她没有保护比安卡的隐私，把她婚前婚后的姓氏全都公开了。法国的《私人生活法》（*Law of Private Life*）保护公民的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禁止出版有可能损害个人生活的信息，然而美国的法律没有这样的禁止。比安卡一夜之间在大西洋彼岸出了名，于是她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44]比安卡坦言自己写这本书的动机很复杂，同时她也坦白说，直到萨特插足，事情才开始变得戏剧化。^[45]

比安卡在书中说波伏瓦是她爱了一辈子的女性。比安卡非常直接地表示，她所受到的伤害并非完全源自波伏瓦的行为，而是因为一系列的背叛。比安卡写道：“在我遇到萨特之前，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当萨特进入了我们的感情世界，一切都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46]不管比安卡是出于什么原因出的书，很显然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并不简单，而且波伏瓦给她留下了强烈且复杂的感情。

1938年7月，波伏瓦和比安卡越来越亲密。这一次，她们俩和博斯特一起去上萨瓦省远足。萨特把波伏瓦送到车站，和她告别。萨特要留在巴黎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并和万达见面——萨特已经追求万达一年多了，但是到现在万达仍然对他不感兴趣。万达觉得萨特长得很恶心，还告诉萨特他应该改善自己的饮食。萨特已经习惯了被她拒绝，而且把这当作自己要克服的一个挑战。他觉得万达缺乏才智，甚至说她是苍蝇脑袋，但是即便如此，萨特还是下定决心要赢得万达的芳心。

波伏瓦离开之后的那一天，萨特写道他不喜欢和波伏瓦告别。萨特开始想象波伏瓦在灰色的山顶说：“如果你没有那种奇怪的执着，非要一口气完成几千米的远足计划的话，你现在完全可以在我身边，充满了美好的小微笑。”^[47]（在写作时，萨特的语调读起来可能有些屈尊俯就，但是“小”也是波伏瓦最喜欢在书信里用来形容萨特的词之一。）当波伏瓦到达安纳西的时候，博斯特已经在车站等她，“博斯特晒得黑黑的，穿着一件黄色的套头衫，看起来很养眼”。^[48]博斯特也是一个远足爱好者，不过即便是他，也要很努力才跟得上波伏瓦的步伐。波伏瓦和博斯特一整天都在远足，晚上一起享受当地的美酒和丰盛的晚餐。他们根据天气状况来决定是在帐篷还是小旅馆过夜。假期第五天的晚上突然下起了雨，波伏瓦和博斯特在蒂涅的一个谷仓里歇脚。过了几天之后，波伏瓦给萨特写信，细致地描写了那天晚上的光景：

当然了，是我向他主动示爱的。我们俩都想要这样……我看着他傻笑，他问我：“你在笑什么？”我说：“我在想象如果我跟你提议我们上床吧，你会是什么表情。”然后他说：“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想‘我想亲你但是我不敢’。”之后，我们俩缠绵了一刻钟，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吻了我。当我告诉他我对他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柔时，他很惊讶。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经爱上我很久了。^[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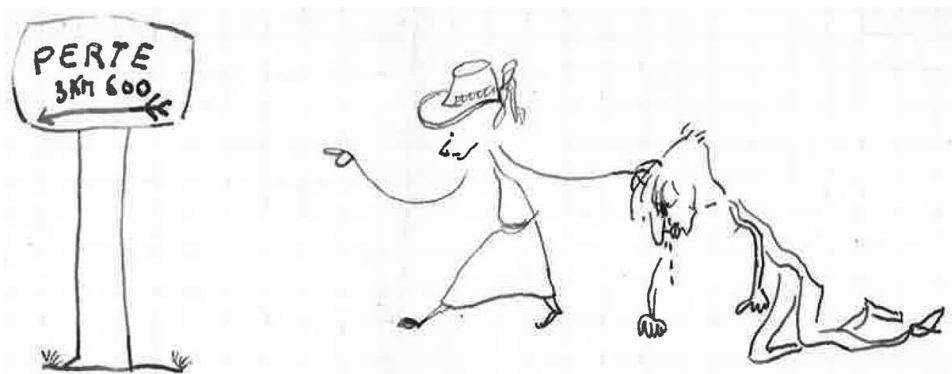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一周，波伏瓦和萨特在马赛见面了，接着一起去摩洛哥的丹吉尔旅行。萨特问波伏瓦，有没有考虑到，如果她和博斯特的关系持续下去，她的生活会因此变得多么复杂。他们都知道奥尔加不会同意波伏瓦和博斯特发生关系，而且波伏瓦和奥尔加又是亲近的朋友，波伏瓦怎么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情？

波伏瓦自己也不是很肯定。奥尔加并不是一个很专一的人，而波伏瓦和博斯特又两情相悦。现在的波伏瓦只想让自己今后不要后悔。1938年7月，波伏瓦启程去见萨特之后，博斯特一个人在阿尔卑斯山又远足了一段时间。但是波伏瓦走后，他远足的兴致就失去了大半。博斯特写道，一天中至少有三次，他都有一股想要见到波伏瓦的强烈冲动。而且他的脑子里会不断地回放他和波伏瓦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五天。[50]博斯特写给波伏瓦的信里充满了温柔和期盼[51]：“我无比地爱你。我想要你知道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希望我的爱能带给你快乐。我很喜欢给你写信，因为给你写信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出你的脸庞，也可以想象到，这时的我笑得像个傻子一样。”[52]

博斯特的文笔显然和萨特和阿尔格伦的很不一样。波伏瓦写给博斯特的信同样也表现出她充满柔情的一面，而这种柔情从来没有得到过萨特的回应。波伏瓦在博斯特面前无须隐藏自己对他身体的渴望，她在信里明确地说想要亲吻他的脸颊，他的眼睫毛，他皴裂的嘴唇。[53]在摩洛哥旅行期间，波伏瓦和萨特谈论着丹吉尔、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菲斯、克萨尔苏克、梅克内斯。但听到广播里播放的情歌时，她不得不抑制住自己对博斯特的想念，忍住不落泪。8月22日，波伏瓦和萨特抵达了克萨尔苏克，波伏瓦在上床睡觉之前写信给博斯特：“我特别渴望见到你，我的爱，我的爱，我多么希望能够和你抱在一起。”[54]

博斯特在进入和波伏瓦的关系的时候，是十分清醒的。当时的博斯特同时在追求奥尔加，并且最后和奥尔加结婚了。博斯特崇拜萨特，他还在给波伏瓦的信末附上给萨特的玩笑话。博斯特知道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也知道波伏瓦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的关系。有时候，当波伏瓦在外面旅行不能及时收到信件的时候，她会让博斯特写信给萨特来安排和她的下一次见面。[55]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故意隐藏起自己对博斯特的爱，把自己对博斯特的欣赏、友谊和尊敬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看来，这种低调处理正是波伏瓦故意隐藏的内容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后来也有别的竞争者来争夺这一殊荣。从1936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在这50年间，博斯特都是波伏瓦亲密忠实的朋友——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博斯特不仅是一位朋友。^[56]波伏瓦和博斯特决定不告诉奥尔加他们的关系，所以直到1983年奥尔加去世，她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雅克-洛朗·博斯特的画，画上代表着西蒙娜·德·波伏瓦拖着他走向他的毁灭，1938年。

早在1939年，波伏瓦就在日记里记录了她对此事感到良心不安。比起写给萨特的信，波伏瓦更多地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不安。和博斯特相恋一年后，有一次和奥尔加聊完天，波伏瓦写信给萨特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懊悔的，但是我的确有种欺骗了别人的感觉。”^[57]1938年8月末，波伏瓦和博斯特安排着他们的下一次约会。波伏瓦想要和博斯特完整地度过一天一夜，但是他们犹豫着究竟是在勒哈弗尔博斯特的家还是在鲁昂见面更好。波伏瓦觉得，巴黎固然好，但是她怕会遇到奥尔加。

在1938年时，波伏瓦也曾为这段感情感到心烦意乱，局促不安。她在9月抽出了十天时间和奥尔加一起度过。当她听到奥尔加谈起博斯特的时候，波伏瓦觉得十分不安；想到奥尔加和博斯特在一起的场景时，她又会觉得很痛苦。

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但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跟你分离了，我的爱。有的时候，我已经没法很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了。快快写信给我吧，写长长的信给我吧——告诉我，我们能够两个人一起度过很长的日子，我们能够像在安纳西一样的开心。告诉我，你对我的爱是强烈的，我的爱——因为我是如此强烈地爱着你。[58]

博斯特的信让波伏瓦感受到了坚定的回应。当博斯特想起奥尔加的时候，也常常觉得心里一沉，但是他告诉波伏瓦说这种感觉不会持续很久，因为“我太爱你了”。在博斯特和波伏瓦成为情人之前，他们是朋友，博斯特觉得他们的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会轻易地瓦解。[59]博斯特爱着波伏瓦，但这也让波伏瓦和奥尔加在一起的时候特别难熬。奥尔加每天都会写信给博斯特，也经常在波伏瓦面前提起博斯特；波伏瓦一开始的时候尽量不给博斯特写信，但是之后她实在忍不住，便趁奥尔加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写信给博斯特。因为思念博斯特，波伏瓦甚至难以入睡，有时候一想到自己和博斯特见面时的画面，她就不禁泛起泪光。[60]

1938年9月26日，波伏瓦和博斯特见面了。他们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到了28日的时候，战争看起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30日的时候，《慕尼黑协定》重新带来了和平。在巴黎的一个月里，波伏瓦和博斯特享受着平凡的日子，每天都能见到彼

此。但是到了11月3日，博斯特不得不重新回到亚眠，因为他得在部队服役整整两年，十个月后他就要开始现役。

波伏瓦和博斯特、奥尔加以及比安卡不为人知的关系，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她和萨特在性方面不和谐，也让我们看到她身上有一种欺骗他人的倾向——尤其是欺骗其他女性。对于和博斯特的关系，波伏瓦隐瞒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一辈子。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波伏瓦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驳：“奥尔加是那种会向每个人不断索取的女孩，她对每个人都撒谎，所以我们也都不不得不对她撒谎。”^[61]

不管奥尔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波伏瓦的行为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毫无疑问是有欺骗性的，而且从很多层面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当波伏瓦和博斯特坠入爱河并欺骗奥尔加的时候，波伏瓦同时也继续着她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的关系。1938年夏，波伏瓦和博斯特分处摩洛哥和法国，波伏瓦在给博斯特的一封信中说，比安卡的母亲读了她写给比安卡激情洋溢的信件后大发雷霆，她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下去。^[62]比嫩费尔德夫人指责波伏瓦“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老处女”。^[63]不过这并没有给这段恋情画上句号。1938年11月，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再也没法像爱波伏瓦那样爱上别人了。^[64]当时的比安卡18岁，在索邦大学学习哲学，她和波伏瓦一周见几次面。但实际上，波伏瓦并没有向比安卡袒露多少自己的事情，也完全没有提及自己跟博斯特的关系。^[65]

1938年圣诞节，波伏瓦把比安卡介绍给萨特认识。他们三人一起去梅杰夫小镇滑雪，比安卡住在附近的阿尔博伊斯山宾馆，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在滑雪时也讨论哲学。1939年1月，当他们回到巴黎的时候，萨特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比安卡身上。比安卡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她很多索邦的同学都曾经是萨特的学生，而波伏瓦也常常对萨特赞叹不已，关于《墙》的评

论称萨特才华横溢、独出心裁，她觉得自己被大明星恋上了。

在回忆录中比安卡写道：“就好像侍者本色出演一个侍者一样，萨特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恋爱中的男人。”^[66]萨特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文字如此优美，使得比安卡都忘了嫌弃他的长相。萨特问比安卡自己能否爱她，比安卡说可以，但是波伏瓦怎么办呢？比安卡非常在意波伏瓦，不想伤害她。萨特回复说波伏瓦不会在意的。萨特和比安卡讨论着他们第一次上床的事情，并定好了日期。这是比安卡第一次和男人上床，她对此充满了期待。但是当他们一起走向米斯特拉尔酒店时，比安卡在听到萨特说的话之后突然打了个寒战：萨特告诉她宾馆打扫卫生的人待会儿会进来一下，因为前一天他刚刚睡了另一个处女。

萨特的行为让人感到不安，这不仅仅是在比安卡这件事上。萨特早已开始了一段三角恋：他一边追求万达，一边与比安卡睡觉。波伏瓦渐渐觉得他们和比安卡的关系让人不安。波伏瓦给博斯特写信说她、萨特和比安卡三个人在咖啡馆的谈话开始变得尴尬，而且比安卡不知道在同一个地方面对多个情人该如何自处。“她不知道该怎么把两个人之间的温柔放在三个人之间；她拿起我们的手，握着我们的手，然后放下，重新拿起，她努力地想要把自己平分给我们。”^[67]最终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觉得自己对萨特有爱，但那不是激情；她问波伏瓦能否把这一点解释给萨特听。

同时，博斯特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奥尔加和波伏瓦之间平衡自己。波伏瓦的信里充满了想要见到他、拥抱他的迫切心情。当博斯特放假的时候，如果波伏瓦不能第一个在车站见到他，分享他在巴黎的时光，她就会觉得痛苦不堪。最终博斯特决定不再详细告诉波伏瓦自己的安排。

波伏瓦仍然喜欢和奥尔加在一起，但是她对奥尔加和万达在她和萨特生活中的位置感到越来越不舒服。这种不适，经常被解读为波伏瓦的嫉妒。当然，波伏瓦的确是想要保护好自己和萨特独处的时间，但是波伏瓦更生气的是，萨特把事情变得如此复杂。同时，萨特也开始在经济上帮助万达，帮她搬家到巴黎，安排她去上绘画课，共用埃莱娜的画室。万达对波伏瓦充满了怀疑，她质疑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萨特告诉她说自己和波伏瓦只是朋友。

1939年5月，波伏瓦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一边是波伏瓦在欺骗着奥尔加，而一边万达又憎恨着波伏瓦。波伏瓦写信告诉博斯特自己有时候气得直哆嗦：她觉得，整件事情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但是如果萨特没有向万达撒谎的话，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复杂。她觉得自己在科萨基维奇姐妹的意识里被解剖开来分析，她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即便如此，波伏瓦认为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他人和自己的经验一样真实吗？[68]波伏瓦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这也是她小说的主题，因此波伏瓦在给博斯特写信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波伏瓦听到奥尔加谈起博斯特的时候，波伏瓦知道在奥尔加的意识里，博斯特和波伏瓦没有任何联系，这让她很困扰。

博斯特在回信中斥责了波伏瓦。令他生气的是，波伏瓦居然对这些可能暴露波伏瓦、萨特、他自己、万达和奥尔加复杂关系的判断和对话毫不紧张。博斯特对波伏瓦说：“你必须严正地否定这一切，因为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看，我们都欺骗了自己的伴侣。”博斯特不想在信里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他警告波伏瓦如果她因为举棋不定而背上坏名声，他也不会打退堂鼓。博斯特直言，当他同意波伏瓦的观点的时候，她是可爱的，但是这一次他不同意。[69]

波伏瓦不想跟博斯特争执。她回信给博斯特，说她觉得他的判断是不偏不倚的，是对的，而且他对她很坦诚。但是一周之后，博斯特再次批判波伏瓦对待他人的方式。这次讨论的是比安卡，尽管萨特越来越猛烈地追求比安卡，使得波伏瓦对于比安卡的爱恋减弱了，但波伏瓦还是和比安卡保持着关系。那天，波伏瓦和比安卡共度了一个下午：她们先去圆顶餐厅吃了午饭，喝了香槟，然后去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喝了咖啡，最后回到米斯特拉尔酒店里波伏瓦的房间。波伏瓦写道：“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并不是同性恋，因为我对同性没什么欲望，只是觉得和她在一起很陶醉，而且我也喜欢在晴朗的午后在床上躺着。”^[70]

博斯特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直接跳了起来。他觉得“陶醉”（charming）这个词简直“淫荡到了吓人的地步”。博斯特说这让他感觉很怪异，倒不是因为波伏瓦如此轻率地谈及比安卡，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波伏瓦在物化比安卡。反正，“陶醉”这个词让博斯特脸红。^[71]博斯特已经因为愧对奥尔加而感到难过，而在这封信里波伏瓦也坦白自己虽然不后悔，但是感到有些自责。毕竟，奥尔加对博斯特是诚实的，但是他却骗了她。

波伏瓦读到这些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脑子木了几个小时候。波伏瓦勉强支撑着自己，晚上和奥尔加一起外出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她止不住地哭起来。波伏瓦回信告诉博斯特，他的信件让她产生了一种“病态”的焦虑，醒来以后也仍然万念俱灰。波伏瓦和母亲一起吃了午饭，她强忍住眼中打转的泪珠。

因此波伏瓦决定用肯定的语气向博斯特袒露自己的心声：“我只有一个肉体的生活，那就是和你。”波伏瓦不希望博斯特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她想要博斯特一直在。这和比安卡不一样，从性方面来讲，和萨特也不一样。波伏瓦解释道：“是

的，我的确和萨特有身体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做，而且多是出于温柔——我不确定该怎么描述——我不觉得自己很投入，萨特也不是很投入。”^[72]波伏瓦已经和萨特说过这件事好几次了，如今她向博斯特坦白了这件事，因为她希望博斯特能够知道他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以及她有多么在乎他们的关系：他是她生命中的情人。

博斯特的回信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是波伏瓦和他的关系持续下去了。

夏天的时候，波伏瓦去侏罗省远足，去了日内瓦，在普罗旺斯走了很多路。1939年7月，法国政府通过了《家庭法典》（*Code de la Famille*），旨在提高人口出生率，鼓励母亲在家带孩子，并且禁止贩卖避孕用品。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已经赋予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性超越女性的权威。这一次的民事法典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效，而波伏瓦日后会成为瓦解这项法典的女性之一。

1939年8月，博斯特休长假。博斯特和波伏瓦、萨特在马赛见面了，他们住在瑞昂莱潘一个朋友的别墅里面，离昂蒂布不远。博斯特觉得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萨特还执拗地持反对意见。

博斯特和奥尔加的关系进展也不错。自从接受了波伏瓦的建议，奥尔加开始参加查尔斯·迪兰的演员工作坊，变得更加自信了，同时也对博斯特更加投入。博斯特写道，他和奥尔加之间变得认真起来，如果奥尔加发现他和波伏瓦的关系，后果将不堪设想。波伏瓦会烧掉博斯特写给她的信吗？博斯特甚至也开始考虑烧掉波伏瓦写给他的信。（但最终他们俩都没有这么做。）在博斯特离开瑞昂莱潘之后，波伏瓦再次饱含泪水：战争快来了，她

可能会同时失去博斯特和萨特。不管有没有战争，她都和比安卡以及科萨基维奇姐妹不和。波伏瓦后来回顾说，20世纪30年代末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一边战争在即，一边是她和萨特、奥尔加、比安卡以及博斯特的关系错综复杂，仿佛自己掉进了陷阱里。[73]



1939年8月，波伏瓦和萨特在瑞昂莱潘。

[1] HdB, Souvenirs, p.115.

[2] Julia Kristeva and Philippe Sollers, *Marriage as a fine Art*, trans. Lorna Scott Fo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

[3] 但她在市政厅登记结婚时把日期改到了1917年。见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p. 59.

[4] 莎尔玛生（Salmson，1919—1957）：20世纪法国知名的泵、飞机和汽车的制造商。

[5] PL 165.

[6] PL 166.

[7] WML 249, SdB to Sartre, 24 January 1940.

[8] 约翰·杰拉西与奥尔加·科萨基维奇的访谈，May 1973, Gerassi collection at Yale.

[9] PL 218–19; WML, S to SdB, 3 May 1937.

[10] PL 220.

[11] PL 220.

[12] Beauvoir, 'Jean-Paul Sartre', PW 232.

[13] PL 221.

[14] Simone de Beauvoir，与马德莱娜·戈贝伊的访谈，'The Art of Fiction No.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15] Simone de Beauvoir，引自Bair, p.194.

[16] 引自Rowley, p.357: SdB to Olga, 6 September 1935;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rchives.

[17] PL 226.

[18] PL 239.

[19] PL 261.

[20] PL 246.

[21] PL 260.

[22] PL 260.

[23] DPS 267, 3 June 1927.

[24] 与戴尔德丽·贝尔的访谈，引自Bair, p.200.

[25] PL 276–7.

[26] Bair, p.203.

[27] PL 288, 290.

[28] PL 315.

[29] PL 316.

[30] SdB to S, 10 September 1937, in LS 9.

[31] 引自*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January 1970, p.78.

[32]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vant-propos' to *Correspondances Croisées*, p.8.

[33] 引自PL 327.

[34] Bair, p.197.

[35] 见Sarah Hirschman, 'Simone de Beauvoir: professeur de lycée', *Yale French Studies* 22 (1958–9), 引自Jacques Deguy and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Ecrire la liberté*, Paris: Gallimard, 2008.

[36]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18; Jacqueline Gheerbrant and Ingrid Galster, 'Nous sentions un petit parfum de soufre ...' *Lendemain* 94 (1999): 42.

[37] SdB to Bost, 28 November 1938, CC 136.

[38] SdB to Sartre, 19 January 1940, LS 262.

[39]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25.

[40] 在戴尔德丽·贝尔所著的波伏瓦传记出版之后，比安卡用婚后的名字“比安卡·朗布兰”写了一本关于她和波伏瓦关系的书《一段不光彩的情事》（*A disgraceful Affair*，其中第8~9页指出了比安卡这么多年后写这本书的原因）。

[41] 与阿莉塞·施瓦策尔的访谈，见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112.

[42] 见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p.6, 25.

[43]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p.6, 9.

[44]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p.8–9.

[45]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171.

[46]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p.6–7.

[47] WML, 1938年7月，周日（具体日期不详），p.145.

[48] SdB to Sartre, 15 July 1938, LS 16.

[49] SdB to Sartre, 27 July 1938, LS 21 (translation modified).

[50] Bost to SdB, 6 August 1938, CC 52.

[51] CC 74和其他几处.

[52] Bost to SdB, 3 August 1938, CC 47.

[53] SdB to Bost, 30 July 1938, CC 33.

[54] SdB to Bost, 22 August 1938, CC 57.

[55] SdB to Bost, 21 September 1938 CC 86; SdB to Bost, 27 August 1938, CC 62.

[56]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vant-propos to CC 12.

[57] SdB to Sartre, 6 July 1939, LS 30.

[58] SdB to Bost, 28 August 1938, CC 64.

[59] Bost to SdB, 13 September 1938, CC 79.

[60] SdB to Bost, 21 September 1938, CC 84.

[61] SdB to NA, 8 August 1948, TALA 209.

[62] SdB to Bost, 25 August 1938, CC 59.

[63] SdB to Bost, 2 September 1938, CC 69.

[64] SdB to Bost, 28 November 1938, CC 136.

[65] 见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5.

[66]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39.

[67] SdB to Bost, 5 February 1939, CC 233.

[68] ‘what kind of reality do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other have’, SdB to Bost, 24 May 1939, CC 373.

[69] Bost to SdB, 25 May 1939, CC 376.

[70] SdB to Bost, 4 June 1939, CC 386.

[71] Bost to SdB, 7 June 1939, CC 391.

[72] SdB to Bost, 8 June 1939, CC 397.

[73] PL 319–20.

第八章

内心的战争，外界的战争

1939年8月31日，博斯特被征召上前线。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巴黎到处是征兵海报，号召所有18到40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参军，萨特也回到米斯特拉尔酒店收拾行囊准备上前线。萨特分别给比安卡和万达写了告别信，但还是决定和波伏瓦共度最后一个夜晚。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在凌晨三点的警报声响之前睡了一会儿。波伏瓦送萨特到多摩咖啡馆喝了咖啡，随后出发去巴黎东站。萨特告诉波伏瓦他在气象兵部队待过，不会有危险的，并安慰波伏瓦一切会像从前那样，还跟波伏瓦约定要书信联络。然而波伏瓦不确定还能不能给萨特寄信。两人拥抱之后就分开了，波伏瓦含泪目送着萨特渐渐远去的背影。

自9月2日起，波伏瓦经历了多次情绪崩溃，她常常担心博斯特会阵亡。雅克-洛朗·博斯特是带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典型的左翼思想入伍的。他的思想深受阿兰、季奥诺、罗曼·罗兰、纪德这些参加过战争且无条件支持反战主义的作家的影响。博斯特本可以在部队里迅速升迁，但是他对追名逐利不感兴趣，也不想违背自己不当炮灰的初心。波伏瓦重新开始写日记，一是为了记录现实，二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有在写作的时候，人才能不胡思乱想。”^[1]

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对德国开战。1936年的时候，埃莱娜遇到一个来自勒哈弗尔的男学生利昂内尔·鲁莱，他

也是萨特的学生。利昂内尔对于“有着惊人智慧的女哲学家”[2]早有耳闻，不过他对埃莱娜一见钟情。到了1938年，利昂内尔和埃莱娜相爱了，当时萨特和波伏瓦已经开始称呼他们的小圈子为“大家族”，利昂内尔和埃莱娜后来成了“大家族”里最长久的一对儿。在对德宣战的那一天，波伏瓦对埃莱娜说可以给她一笔钱，让她去葡萄牙找利昂内尔。埃莱娜很感激波伏瓦，接受了她的资助离开了巴黎。

战争和离别让波伏瓦的生活严重失衡。战前波伏瓦就已经开始感到惶惑和沮丧，现在越发严重了。9月4日，波伏瓦发现自己在早晨还可以勉强撑过去，但是到了晚上却越发难熬。9月5日，波伏瓦经历了严重的恐惧发作。空袭警报也让她睡得不安稳。有一次，睡梦中的波伏瓦被爆炸声和警报声惊醒，她在黑暗中慌忙地穿上衣服，撤离住所，后来好不容易回到住处，重新躺到床上之后，波伏瓦决定干脆和衣而睡，这样逃走的时候就能快一点。

[3]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人们都被派遣到部队了，许多平民逃走了。波伏瓦的学生甚至戴着防毒面具到教室上课。在八个月的“假战”——没有战争的宣战期，波伏瓦的日记里充满了对博斯特或者萨特有可能会阵亡的恐慌和绝望。时间每过去一个小时，似乎都会耗尽波伏瓦的希望，看书也没办法让她平静下来。波伏瓦想要弄明白上战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开始读阿兰和纪德。她跳着读纪德的《1914日记》（*1914 Journals*），读到了战壕里的“毫无必要的折磨”。[4]

后来波伏瓦收到了信件，她觉得看到了一丝希望。有一天波伏瓦同时收到了博斯特和萨特的消息，她觉得幸福无比。但是紧接着，波伏瓦又充满了罪恶感。（毕竟，纪德说：“一个人因为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而放声大笑很简单，但是也未免太过不得体

了。”[5]) 后来的波伏瓦和萨特，回头看那段时间，他们都承认战争使他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力量。战后，波伏瓦和萨特都说，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之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旁观者的心态。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个人生活。9月14日，奥尔加告诉波伏瓦，如果博斯特死了，的确是个悲剧，但是她在“内心深处”并不会受到影响。波伏瓦说，听到奥尔加这么说，更坚定了她不放弃博斯特的决心。奥尔加搬家的时候，甚至都懒得把信件转去新的地址。这就意味着，奥尔加几周都没法收到博斯特的消息，但她对此无所谓。波伏瓦没法理解她的冷漠。[6]

相比之下，比安卡的热络让波伏瓦也喜欢不起来。比嫩费尔德一家逃离了巴黎，9月16日，波伏瓦收到比安卡的信，她在信中责备波伏瓦不去看她。波伏瓦和比安卡之间渐生嫌隙：随着萨特的离开，比安卡想要在波伏瓦的生活中占据更加中心的位置，但是波伏瓦渐渐发现了比安卡的颐指气使和强烈的控制欲。在巴黎的时候，波伏瓦重新发现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快乐，但比安卡不怎么尊重波伏瓦一个人的空间，这让波伏瓦有些厌烦。[7]

即使如此，波伏瓦还是在9月20日去坎佩尔看望了比安卡。当波伏瓦抵达的时候，比安卡正坐在台阶上，两眼噙着泪等她。波伏瓦和比安卡一起去喝了咖啡，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母亲很不高兴波伏瓦来看她，因为她母亲之前偷看了她的信件，并且威胁她要把信寄给教育部。（波伏瓦在日记中说：“我根本不信，而且我也没有因此而生气。”[8]) 20日和21日，波伏瓦和比安卡一起走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们拥抱告别，但是波伏瓦并不是很享受，只觉得“窒息”。[9]

战争让波伏瓦和萨特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跟波伏瓦分开也让萨特意识到波伏瓦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萨特写道不管怎么样，有一点不会变，他告诉波伏瓦，不管

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他感谢战争让他明白他和波伏瓦是一体的：

我的爱，你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因为我甚至都不后悔，因为你永远是我。你是如此丰富，是你让我看到了未来，并得以实现任何一种生活。此刻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近。[\[10\]](#)

从现在来看，我们已经知道萨特可以同时好几个女人说：你是我不可替代的唯一。这让我们很难把他在这封信里的誓言当真。但是在萨特的日记中，波伏瓦的确占了最重要的位置。10月14日他们“贵庶通婚”的十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萨特回顾自己是需要波伏瓦的——没有她，世界将会是“一片荒漠”。萨特有三天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这使他意识到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完全来自“被海狸理解、支持和肯定”。萨特说：“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都会分崩离析。”[\[11\]](#)

萨特和波伏瓦当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彼此，萨特甚至都不被允许告诉波伏瓦他所在的位置。虽然在服役，但是萨特仍然有教职薪水，所以他可以支持奥尔加和万达继续住在巴黎。不然的话，她们就得离开巴黎，或者找工作养活自己了。因为男人们都上战场了不在身边，波伏瓦和奥尔加、万达两姐妹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一些，萨特称呼她俩为“科萨两姐妹”（The Kosaks），她俩和波伏瓦一起搬到了位于瓦万街的丹麦酒店。但是波伏瓦对此有些不满，她一直努力地工作，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而与此同时，波伏瓦和萨特一直在资助科萨基维奇两姐妹。波伏瓦为埃莱娜和万达共用的画室付钱，然而她们却在所谓的艺术追求之

路上没什么进展。

奥尔加公开写信给博斯特，万达公开写信给萨特，就好像对方是自己的男人一样；而波伏瓦只能偷偷摸摸地给萨特和博斯特写信。和奥尔加在一起的时候，波伏瓦会忍不住偷瞄博斯特寄给奥尔加的信件，想看看有没有比寄给自己的信件多。奥尔加收到的信件看起来似乎比波伏瓦收到的要厚，波伏瓦不禁想，博斯特写给奥尔加的信会不会更加温柔？波伏瓦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妒忌和内疚。有天晚上，波伏瓦梦到奥尔加突然要看她正在写给博斯特的信，吓得一身冷汗，惊醒过来。^[12]两周以后，奥尔加走进波伏瓦的房间，当时波伏瓦才刚刚读完博斯特寄来的信。其实奥尔加并不知道波伏瓦刚刚读了什么，但波伏瓦心里充满了“不好的感觉”，波伏瓦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她知道博斯特爱着奥尔加。她只是在找借口：“也许博斯特爱着奥尔加，但是我也可以爱着博斯特，尽管我感到很痛苦。”波伏瓦感到非常苦恼，她希望萨特能帮她剖析情况。^[13]几周以来，波伏瓦都沉浸在低迷的情绪和惶惑当中：“我的周遭正在发生战争，我的心里也兵荒马乱，我感到极度痛苦，但不知道该如何消解。”^[14]

当波伏瓦试着让自己用别的关系来分心，不再纠结的时候，她似乎滑向了另一个深渊。一个波伏瓦教过的学生纳塔莉·索罗金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波伏瓦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使我心神不宁。”^[15]这边，和比安卡的关系也往坏的方向发展。比安卡写信给波伏瓦，说让波伏瓦把别人都送走，比安卡的自我及强烈的占有欲让波伏瓦感到厌烦。^[16]波伏瓦和萨特、博斯特以及奥尔加的关系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不可能因为比安卡一声令下，说断就断。波伏瓦的生活里唯一进展顺利的，似乎只有她的小说。波伏瓦尽力保护自己的写作时间不被打扰，她的小说渐渐成形了。

10月末，萨特写了一封信，以代码的形式告诉波伏瓦他的详细位置。^[17]波伏瓦大费周章地去看望萨特，为了获得旅行文件，她甚至假装生病，拿到医学证明。波伏瓦在10月31日深夜时分抵达，第二天早上波伏瓦去了萨特吃早饭的客栈，好让他知道她来了。波伏瓦和萨特不能一起外出，因为萨特当时还穿着制服，于是波伏瓦带他去了她的酒店房间。波伏瓦的通行证只能持续24个小时，但是她想要待久一些。

最终，波伏瓦一直待到11月5日。波伏瓦和萨特讨论哲学，也分享了彼此混乱的感情生活，还有他们的小说。波伏瓦读了萨特正在写的《自由年代》，萨特读了波伏瓦的《女宾》。波伏瓦建议萨特重新打磨他的女性角色马赛勒。波伏瓦几乎忘了这种跟人促膝长谈，重新找回自己精神伴侣的感觉。^[18]虽然在萨特走后，波伏瓦一直有教书和保持阅读，但即使是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纪德、赛珍珠、毛姆、莎士比亚、果戈理、杰克·伦敦、笛福、阿加莎·克里斯蒂、阿瑟·柯南·道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弥补不了这种深入谈话缺失所造成的精神空缺。

波伏瓦很难过，自己不能独占萨特和博斯特服役期间的假期。波伏瓦不想看到萨特和奥尔加、万达两姐妹在一起，而且现在比安卡也想要争夺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萨特安慰波伏瓦，尽管他对万达有感情，但是她只有22岁，幼稚且善变，他不指望自己和万达的感情能够持续到战后。虽然萨特还在给比安卡写信，但是他经常直接把写给万达的话一字不改地搬给比安卡，而且萨特对比安卡也渐渐不那么热情了。萨特休假的四个夜晚里，波伏瓦和他共度了两个激情的夜晚。尽管这是1939年分别之后波伏瓦和萨特的首次重逢，但是他们的性生活已经彻底平淡无味了。

^[19]

波伏瓦告诉萨特，她因为博斯特还爱着奥尔加而感到难过，

而且现在波伏瓦尤其不想把博斯特的假期分享给奥尔加。萨特提醒波伏瓦，是她自己选择了去爱一个爱着奥尔加的男人，实际上，如果没有奥尔加，这段关系就不会稳定了。波伏瓦自己都做不到专一，却反过来要求博斯特专一，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渐渐地，波伏瓦意识到，她并没有变成自己曾经想要变成的那种女性。波伏瓦写道：“曾经有段时间，我试着相信自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博斯特的出现，波伏瓦意识到了“偶然的、激情的爱的存在”。波伏瓦在日记里表示发现自己的这一面很有趣：“我离了解自己又近了一步，这挑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正变得更加轮廓分明。……我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尽管我还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20]在工作上，波伏瓦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1939年10月她获得学校的表彰，也收到了许多学生表达谢意的卡片以及一起喝咖啡的邀约。^[21]但是这些就够了吗？

几天之后，波伏瓦从萨特那里回到巴黎，比安卡也到巴黎来看她。对此波伏瓦并不高兴，因为她发现比安卡最近的来信越来越狂乱，也渐渐对比安卡提不起兴趣了，波伏瓦对此感到担心。波伏瓦一想到比安卡和萨特的关系，以及自己和比安卡的感情，就觉得惶惶不安。但是波伏瓦还是和比安卡发生了关系。之后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她和比安卡之间的肉体快感是“变态的”。波伏瓦知道自己“利用了”比安卡的身体，她的感官享受是粗野的，没有一丝温柔；在此之前波伏瓦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态的感受。波伏瓦写道：“这就好像是坏掉的劣质鹅肝酱。”^[22]

波伏瓦去世之后，她的信件和战时日记以法语出版。上面这样的篇章让巴黎的媒体称波伏瓦“像莽夫一样粗野”。^[23]不过，这也不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一次被人说行动思考像男人了，但法国媒体对于波伏瓦竟用如此冷漠的男性口吻说话还是感到很震

惊。而且，波伏瓦明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野和病态，却仍然那么做，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第二天，比安卡指责波伏瓦不应该在经济上给埃莱娜帮助，认为如果波伏瓦不这么做的话，波伏瓦就能负担起更多她来巴黎的花销。如果波伏瓦不再教书，就能有更多时间陪她。比安卡的这些无理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讨人厌了，波伏瓦告诉比安卡自己快要被她压得喘不过气了。之后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在幻想要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给一些马上要上战场的朋友，这样他们就不用死都是处子之身了。[24]

比安卡来看波伏瓦的第三天，波伏瓦已经觉得比安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且不说比安卡的幻想，波伏瓦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比安卡看待爱的方式和她完全不一样。比安卡觉得爱是“共生”，比安卡不明白人们真的可以在独处中找到快乐或者真心想要工作。当比安卡发现波伏瓦爱萨特胜过爱她时，她情绪崩溃，当场大哭。对此波伏瓦感到骇然：“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最爱她啊。她这样轻易地给自己制造这些幻想，我实在是受不了。”[25]

波伏瓦试图鼓励比安卡“把自己想象成自己生活的中心”，而不是把波伏瓦或者萨特放在那里。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比安卡必须变成一个与自我有联系的人。”但是她很清楚，这对比安卡来说太难了。比安卡离开之后，波伏瓦仍然觉得心绪不宁，她的心里既有悔恨，又残存有对比安卡的爱，波伏瓦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可耻。[26]

进入11月之后，波伏瓦仍然纠结于自己对奥尔加的欺骗。但是不久之后，奥尔加告诉波伏瓦她已经不再写信给博斯特了，而且她感觉自己再也不想给博斯特写信了。奥尔加说：“我没法时时刻刻都想着博斯特。而且，如果只能每几个月或是隔几天才能

看到对方，这样的感情还有什么意义？”战争开始才几个月，奥尔加就已经毅然决然地要跟博斯特分手。波伏瓦很同情博斯特，博斯特并不想结束和奥尔加的关系，希望奥尔加能继续写信给他。

波伏瓦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不了奥尔加。如果奥尔加爱博斯特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跟博斯特分享自己的生活？奥尔加怎么能把给博斯特写信看成是浪费，而不是甜蜜？要知道，奥尔加的几句话就能温暖远在战场上的博斯特，让他开心起来。对于波伏瓦来说，写信几乎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波伏瓦想要分享博斯特的生活，也想要分享萨特的生活。尽管在与萨特的关系中，波伏瓦已经意识到：“精神生活对我和萨特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会使一切容易许多。”^[27]

1939年年底，波伏瓦发现即使萨特不在巴黎，她自己也可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一次，她的朋友科莱特·奥德里邀请她和哲学家让·瓦尔共进晚餐。一开始波伏瓦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去，因为如果她临时改变日程安排，奥尔加还有其他一些人就会大发雷霆。最终波伏瓦还是决定去赴宴，因为她需要“出去和别人见面，需要进行一些正儿八经的谈话”。那天晚上，波伏瓦突然有一种预感，自己的小说《女宾》一定能够出版。在席间，波伏瓦觉得“自己受到了认真的对待”，她也惊讶于自己颇有侃侃而谈和与别人交谈甚欢的能力。12年前在索邦念书时，波伏瓦就在日记里问过：为什么自己总是觉得别人比她更加“正儿八经”呢？^[28]

渐渐地，波伏瓦觉得她应该研究她自己。波伏瓦的一个朋友玛丽·维尔告诉波伏瓦，萨特在压制她。（波伏瓦回复：“这一点也不新奇。”）不过波伏瓦的确开始对萨特的哲学观点持异议，她同意萨特对意识的看法，但是质疑他阐发道德的方式。^[29]

斯捷帕也开始向波伏瓦抛出一些问题。在11月比安卡到巴黎看波伏瓦之后，斯捷帕问波伏瓦是不是女同性恋。波伏瓦此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性向，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异性恋。但是不可否认，波伏瓦总是会吸引一些女性，尤其是她所在学校里的年轻女性。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自己渐渐开始享受这种关系。

[30]波伏瓦是喜欢和女性做爱的，但是她似乎总是暗示自己，这不应该是第一位的。直到1939年圣诞节，波伏瓦仍然和比安卡保持着性关系。12月中旬，比安卡搬回了巴黎。但这时候，波伏瓦那位毕业班的学生纳塔莉·索罗金已经完全迷上了她。

纳塔莉的父母是俄国人，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离开了俄国。纳塔莉个子很高，皮肤白皙，脾气很暴躁。纳塔莉在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波伏瓦很喜欢和她谈论康德和笛卡尔。纳塔莉想要继续学习哲学，但是因为她的母亲离婚了，付不起索邦的学费。纳塔莉的母亲希望她能停止学业，开始工作。波伏瓦决定替纳塔莉交学费，纳塔莉才得以在1939年进入索邦继续念书。

纳塔莉出生于1921年，和比安卡一般大。从10月开始，纳塔莉就不断地央求波伏瓦和她上床。而且纳塔莉嫉妒萨特、博斯特、奥尔加以及比安卡占据了波伏瓦的生活，她觉得自己被挤到了第五位。纳塔莉可以算是一个问题少女，她会偷自行车，甚至会把商场里的文具套装顺手牵羊拿到学校里卖掉，给自己换零花钱。纳塔莉告诉波伏瓦，她的父母把她叫作“寄生虫”，却对于拿走纳塔莉的钱一点也没有感到良心不安。在12月的时候，波伏瓦明确地告诉纳塔莉她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性关系。但是，在1939年12月14日那一天，纳塔莉本该研读康德，可她却故意去勾引正襟危坐的波伏瓦。那天晚上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我阻止不了她，她非要和我睡。”[31]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其实自己并不

想那样，“但是招架不住欲火焚身的纳塔莉，这让人厌恶，难以忍受”。[32]

一周之后波伏瓦再次写信给萨特，说纳塔莉已经跟她告白，说自己爱她，并试图亲吻她，一副觉得和她在名正言顺地恋爱的模样。波伏瓦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有这种自由的话”，也许会痛快地开始这段恋情。但是一想到被比安卡和纳塔莉同时热烈地爱着，波伏瓦还是觉得无法接受。[33]我们并不清楚，波伏瓦为何突然觉得自己“没有这种自由”。显然波伏瓦觉得没必要跟男人保持忠贞的单偶制，但是为什么面对女性时，波伏瓦会改变自己的标准呢？即便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波伏瓦也没必要感到“没有这种自由”。在1942年的时候，同性恋的合法性行为年龄被提高到了21岁（而异性恋的年龄仍然是13岁）。即使是在1939年，波伏瓦与比安卡以及纳塔莉交往时，她们也都已经达到了合法的结婚或性行为年龄。

波伏瓦的不安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月萨特写信告诉她，他已经在计划和比安卡分手了。显然，波伏瓦觉得分手并没有萨特想得那么容易，而且她不得不直面他们俩“利用”了比安卡的事实。[34]

1939年圣诞节，波伏瓦一个人在梅杰夫小镇继续她的写作。波伏瓦充满了灵感，精神专注，对于自己的写作进展感到欣喜。看到手中的作品即将收尾，波伏瓦也开始展望接下来的作品了，她想要创作一部“关于整个一生的作品”。[35]这段时间，波伏瓦也在读萨特的作品，帮他提出修改意见。萨特在研究自由的概念，波伏瓦看了他还没完成的稿子后，大大地赞许了萨特，说这可以和柏格森和康德的哲学著作相提并论。但是波伏瓦也表示，在看到完整的论述之前，她没法给出什么批判意见。如果现在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她想问的问题是：当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自

由之后，该做什么呢？[36]

少女时期的波伏瓦就读过柏格森、富耶、拉尼奥和其他一些哲学家的作品。自那之后波伏瓦就对关于自由的哲学很感兴趣。同时，这也是她和萨特参加的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里的一个核心话题，波伏瓦和萨特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概念。把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考虑是很容易的，以及像萨特那样，声称所有的自由都是平等的也不难。但是波伏瓦想要的是能够身体力行的哲学。看过了很多种人生之后，波伏瓦认为：自由是不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自由也会因人而异。[37]

1940年1月12日，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小说《女宾》的前160页，她希望萨特来看她的时候能够读一读。此外，波伏瓦也告诉萨特，她和比安卡又“亲热”了，波伏瓦甚至告诉萨特，比安卡身上除了以往一直有的一种气味之外，好像还有一股粪便的味道，让波伏瓦恶心得难以忍受。波伏瓦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比安卡可以做朋友，但是发生关系，对波伏瓦来说已经索然无味了。[38]

波伏瓦笔下这样夸张的描述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因为波伏瓦显然是享受和其他女性发生关系的，而且波伏瓦也和比安卡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那么波伏瓦真的有对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感到如此恶心吗？当波伏瓦最终和比安卡分手的时候，她说自己更喜欢和男人做爱。[39]尽管当时的波伏瓦对比安卡以及她俩的关系感到恶心，甚至在1941年1月，波伏瓦一看到比安卡就感到一阵寒意，但她还是同意每周花两个晚上的时间和比安卡在一起。[40]

萨特写信告诉波伏瓦，除了她以外，他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什么也不是（除了对他自己的母亲）。战争结束之后，萨特将会蜕去旧的自己，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那些女伴没一个对他保

持忠贞。[41]在这之后的两天，波伏瓦在信里向萨特描述了自己和纳塔莉上床的经历：她俩赤裸地躺在床上，本来想一起读几页关于意志的哲学材料，“但是我们开始亲热，彼此都有回应。这显然和跟奥尔加在一起时不一样，因为我已经喜欢上纳塔莉的身体了”。[42]

萨特在1月16日回复了波伏瓦：“我已经忘了身边有个人是什么感觉了，更不用提是像你这样能够理解我的所思所感的人。”[43]第二天，萨特又感慨道：“这到底是怎么了，亲爱的你现在竟然有这么多桃花运！”[44]

萨特这时正在写的作品便是日后的《存在与虚无》。波伏瓦听闻之后说：“这听起来是多么诱人啊！虚无的理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45]次月，萨特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波伏瓦，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标签：“我的脑中也开始有时间理论的灵感，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创作这个部分。你知道吗，这一切都多亏了你。你小说里弗朗索瓦丝的执念启发了我：当皮埃尔在泽维尔房间里的时候，有一个物体独自存在着，别人的意识都没有察觉到。”[46]（弗朗索瓦丝、皮埃尔以及泽维尔都是波伏瓦的小说《女宾》里的人物。）

第二天萨特没有收到波伏瓦的回信，便又接着写信给她。萨特仍然在钻研他的时间理论，但是他内心感到很空虚……为什么波伏瓦不给他回信呢？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里，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47]

就在萨特写信感谢波伏瓦激发他想出时间理论的那天，波伏瓦意外地在教室里收到一张小字条。6个月不见的博斯特终于回来了，波伏瓦高兴得颤抖。她一路小跑着去见博斯特，和他兴奋地聊起天来。在这之前的一年，波伏瓦告诉博斯特说自己是

在“用整个灵魂”爱他[48]，她也曾觉得博斯特未来会是她生命中绝对的，甚至是本质的一部分[49]，但是最近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觉得自己和博斯特“没法实现给彼此的承诺了”。

也许是因为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万达发现了萨特之前的恋人，也许是因为萨特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不管是什么原因，萨特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处在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在我疯了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不安了……我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我爱你。也许因为我的种种谎言，在你看来我很卑劣……恐怕你也会突然问自己……他是不是在撒谎，是不是只说了一部分真相？我亲爱的海狸，我的小人儿，我向你发誓在你面前我是纯粹的。[50]

第二天，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自己不想再玩诱惑的游戏了。为了简化一切，萨特写了一封分手信给比安卡。在那之后波伏瓦见到了比安卡，比安卡很受伤，生气极了，也充满了怀疑。在比安卡看来，萨特的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因为仅仅几周之前，萨特还在信里大谈战争结束后，他、比安卡和波伏瓦三个人的美好未来。现在突然收到萨特的分手信，比安卡当然会错愕不已，愤愤不平。波伏瓦对萨特说他俩对待别人的方式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51]

波伏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她也直面萨特的错误。但是木已成舟，他们没法抹去自己做过的事情。1940年，比安卡经历了一次情绪崩溃，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心碎不已，彻底被击垮了”。[52]

我们能确定的是，在1940年，萨特写了一封信向比安卡提

出分手。[53]萨特还写信告诉波伏瓦比安卡是如何严词指责他的。在2月27日，波伏瓦先简短地向萨特表示了同情，接着便谴责他：“你真的做得太过分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比安卡来看波伏瓦时，给她看了萨特的信。鉴于波伏瓦以往的行为，虽然这封信没有留存下来，但波伏瓦的反应到底是伪善还是真诚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在给萨特的信里，波伏瓦说比安卡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伤心不已：“我觉得比安卡这样激烈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你的信实在是太过分了。”[54]

对此，萨特也有些懊悔，他也觉得那封信的确是太过分了。[55]接下来的几周，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通信内容大多都围绕着比安卡：波伏瓦觉得比安卡一开始难以接受，但是现在逐渐振作了起来。波伏瓦继续和比安卡一起吃饭，和她讨论哲学，比安卡也会帮波伏瓦读她的小说。比安卡觉得《女宾》里的思想太深奥了，更喜欢那种没什么深度思想的美国小说（比如海明威的）。[56]在波伏瓦“偶然的”情人里，觉得她小说里的思想太深奥的并非只有比安卡。但是在波伏瓦的一生中，和比安卡的这段关系恐怕是最缺少思想深度的了。1940年的头几个月，波伏瓦承认，她和萨特给比安卡带来了太多的痛苦。3月3日，波伏瓦写信给萨特：“我自责，也责怪你。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应该让比安卡如此痛苦。”[57]

从3月23日到7月11日，波伏瓦没有跟任何人通书信。[58]1940年5月7日，伽利玛出版社接受了波伏瓦的小说。[59]三天后的5月10日，德国进军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博斯特被派遣到比利时边境。5月12日，德军包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陆空双管齐下袭击法国周边地区。5月21日，博斯特被炮弹碎片击中腹部受伤，大量失血，被担架抬到红十字站，再转到军事医

院做手术。博斯特很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获准撤离前线。萨特写信安慰波伏瓦说博斯特能够撤离前线已是万幸。^[60]博斯特所在的军团，人员大幅伤亡，5月23日，保罗·尼藏在敌军的战火中牺牲了。

1940年6月9日晚，波伏瓦收到比安卡的留言条。比安卡已经找她找了一整天了，留言条上说：“不管多晚，请一定要来花神咖啡馆找我。”波伏瓦去到那里之后，发现一屋子的人都愁容满面。比安卡的父亲消息灵通，知道德国人快要攻进巴黎了。比安卡和她父亲打算第二天就离开。他们知道，波伏瓦不是犹太人，不用急着撤离，但是比安卡还是希望波伏瓦能够跟他们一起离开。

一想到法国已经沦陷，而她的两个情人一个中弹受伤，一个马上就要成为战犯，波伏瓦不禁流下眼泪。第二天波伏瓦加入了比安卡一家，和其他三百万人一起逃离巴黎。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22日，法国贝当元帅与纳粹签署了停火协议。德军控制了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地区，贝当元帅退守到法国南部的小城维希，管理包括维希在内的非占领区，也就是自由区。

波伏瓦在拉普厄兹乡间一个靠近拉瓦尔的朋友家待了一个月，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想获知萨特和博斯特的消息。波伏瓦觉得他们俩甚至有可能在巴黎。波伏瓦搭了德军军事卡车的便车启程返回巴黎。回到巴黎后，波伏瓦看见卢森堡公园的参议院到处都插着德国国旗。波伏瓦看了自己的父母以及纳塔莉，然后搬到了祖母家。^[61]波伏瓦去了丹麦酒店，发现那里有一封萨特寄来的信在等着她，是她离开巴黎那天到的。

波伏瓦打电话给博斯特在塔夫尔尼的父母打听他的下落，得知博斯特已经被转移到了阿维尼翁附近的一家军事医院。^[62]波

伏瓦给奥尔加也打了电话，得知奥尔加和她的家人在拉吉尔，也平安无事。埃莱娜和利昂内尔仍在葡萄牙，但是她离波伏瓦很远。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在《维希誓言》（*Vichy Oath*）上签了名，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63\]](#)多年之后，波伏瓦表示很羞愧当时签了名，但是在那个时候波伏瓦别无选择：

因为不得已，我只能选择签名。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我的教职工资：我的定量供应卡、身份文件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依赖于它。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我讨厌这么做，但是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我是谁？谁都不是，无名小卒一个。就算我这个毫无名气的老师拒绝签署这份声明，那又能有什么用呢？显然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我反而会因此丢掉工作，失去收入。在战争年代，在那样的境况下，谁会傻到去冒那样大的风险？[\[64\]](#)

贝当元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法国人堕落颓丧得太久了，现在需要重新恢复秩序，重拾他们早已忘却的价值观，“工作、家庭、祖国”就是当时的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65\]](#)波伏瓦觉得，在沦陷的巴黎，“连呼吸都意味着妥协”。[\[66\]](#)时间采用的是德国时间，宵禁开始之后，当波伏瓦从自家阳台向外看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光。[\[67\]](#)

纳塔莉仍然在巴黎，奥尔加在7月中旬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和奥尔加见面后说了几个小时的话。这时候的奥尔加怀孕了，但孩子不是博斯特的（博斯特一直在前线）。奥尔加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想要堕胎。在攻占时期，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诊所做堕胎手术。不过波伏瓦还是想方设法帮奥尔加找到了，但是奥尔加未

后感染了，波伏瓦整整照顾了奥尔加两个礼拜。

8月，萨特被转移到了靠近特里尔的第十二战俘营。那里条件还勉强过得去，萨特一周能够写两张明信片。萨特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创作了他的首个剧本，继续写《存在与虚无》。在巴黎，波伏瓦步行去多摩咖啡馆写小说或者去国家图书馆读黑格尔和让·瓦尔的时候，总会在路上看到纳粹党的十字旗。^[68]7月，波伏瓦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里找到一段文字，很受启发，觉得可以用在《女宾》里。

波伏瓦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课本里，波伏瓦觉得黑格尔是那种她会敬而远之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一个系统的逻辑发展，认为思想可以解释一切事物，而个人体验没有什么价值。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过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只给了我们一座“思想的宫殿”，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只满足于“解读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但在“二战”期间，波伏瓦觉得阅读黑格尔成了她“能找到的最能抚慰自己的活动”。这让她回想起她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手边有实实在在的书本，里面有关于人类历史的思想，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心。”^[69]

在工作以外，波伏瓦在生活中也坚持严格的时间分配：每周有两个晚上和奥尔加度过，两个晚上和纳塔莉度过。纳塔莉十分讨厌波伏瓦如此吝啬自己的时间，说波伏瓦就像是“冰箱里的计时器”，一到时间就要工作。有时候纳塔莉会去波伏瓦住的酒店外面等她，早上等着她离开酒店，下午等着她下班回来。波伏瓦会和纳塔莉一起去剧院看戏，战时的票价很便宜。

9月，博斯特回到巴黎，开始了一份教学工作。这意味着在

大部分工作日，波伏瓦都可以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了。星期四，波伏瓦会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吃午饭，每周六的晚上，博斯特会和波伏瓦一起度过。波伏瓦继续自己的写作，那时禁止犹太人入内以及禁止雇用犹太人的指示牌也竖了起来。博斯特想要成为记者，因此波伏瓦帮助他提高写作水平。那年冬天，波伏瓦潜心阅读克尔凯郭尔以及康德。现在博斯特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希望萨特也能回来。

在博斯特回来之后，波伏瓦向比安卡坦白了她和博斯特的关系，同时也表示她俩应该减少见面的次数。当比安卡意识到波伏瓦之前对自己撒了谎，她觉得备受打击，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像溺水了一样难受”。2月时萨特对她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让她感觉很糟糕，但是这次波伏瓦的疏远让她绝望透顶，因为比安卡更加依恋波伏瓦。^[70]当时的波伏瓦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她和萨特把比安卡伤得有多深，她写信告诉萨特自己和比安卡差不多分手了。她发现比安卡和伯纳德·朗布兰（比安卡的同班同学，也曾是萨特的学生）恋爱了，波伏瓦觉得事情会好起来的。

比安卡的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美国人，这样她就能离开法国。比安卡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名字“大卫·比嫩费尔德”会给整个家庭招致危险。比安卡不想跟不认识的男人结婚，但是她的父亲十分坚持。他在蒙帕纳斯找到一个愿意假结婚的美国人，付了钱给他，比安卡也妥协了。但是在约定好婚礼的那天，美国人没有出现。后来，在1941年2月12日，尽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安卡还是和伯纳德结婚了。比安卡的父母看到她终于能有一个听起来更像是法国人的姓，感到如释重负。

^[71]

1940年11月，波伏瓦想到自己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萨特了，心情无比灰暗沮丧，她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72]1940年1月的

时候，波伏瓦就已经没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哲学书”了。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她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唯我论者：只关注自己的意识和自由，只相信从内向外的自我审视是真的，认为周围的人都只是做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蚂蚁——萨特在1930年写过一篇名为“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us*）的短篇故事，故事里骄傲的主人公从七层的阳台向下看，觉得下面所有的人就像“蚂蚁”一样——波伏瓦和萨特曾经都不关心普罗大众，后来在《战时日记》里，波伏瓦说她觉得曾经的她和萨特不应该这么做。[73]

波伏瓦后来再读《女宾》时，她带着自己过去所特有的疏远看待它。这本小说直到1943年才出版，但是在1941年，波伏瓦就已经得出结论：“这本书所基于的哲学态度已经不再是我的了。”[74]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她读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卡夫卡和雅斯贝斯，思考一些古老的问题——对于救赎的渴望。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下一部小说是关于个人境况的，描写作为一个个体人和社会人之间的道德挣扎。1941年中，波伏瓦开始写新的作品，也就是后来的《他人的血》。

波伏瓦的日记再次展现出和回忆录里不一样的内容。波伏瓦说，萨特的政治热情和她的思想与行动背道而驰。波伏瓦已经整整11个月没见过萨特了，1941年3月，波伏瓦收到一条留言，上面说萨特回到了巴黎。为了逃出战俘营，萨特用他那只几乎全盲的右眼作为掩护，谎称自己是平民。波伏瓦当然高兴能见到萨特，但是几天之后她就开始怀疑，这还是曾经的那个萨特吗？萨特开始大谈道德，焦躁不安，他对波伏瓦签署了非犹太人声明的举动感到很震惊。萨特说，获得自由固然很好，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行动起来。萨特大谈反抗，认为应该把德国人赶出法国。但那时的波伏瓦还是认为，作为个体的他们对此是无力反抗的。

1941年7月8日，乔治去世了，他什么都没留下。乔治留给波伏瓦的遗言是：“西蒙娜，你很早就开始自己挣钱独立了，但是你妹妹花了我很多钱。”[75]波伏瓦没有因为父亲离世而落泪[76]，却为母亲重新开始生活新篇章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惊讶。对于母亲来说，成为寡妇反倒是一种解放。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早已厌恶了雷恩街上的那间公寓，觉得那里被乔治的暴脾气搞得乌烟瘴气。[77]1942年，弗朗索瓦丝搬到了布洛梅特街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弗朗索瓦丝参加考试拿到证书，在红十字会里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弗朗索瓦丝还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听讲座、结交新朋友以及去旅行。不过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放下波伏瓦所说的“古板心态”：她仍然认为自己的女儿生活在罪恶当中。[78]

乔治去世不到六个月，弗朗索瓦丝的母亲也去世了。[79]在布拉瑟尔夫人的葬礼上，弗朗索瓦丝情绪失控了。波伏瓦一整晚都陪着55岁的弗朗索瓦丝躺在床上，照顾她。在乔治去世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大女儿波伏瓦。波伏瓦当时已经在接济埃莱娜，帮她支付工作室的租金，同时也在赞助“大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因此波伏瓦不得不节约开支，勒紧裤腰带，现在他们不能再经常出去吃饭了。

萨特的反抗小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首次会议是在米斯特拉尔酒店波伏瓦的房间里召开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搬回了这家酒店，仍然各住一间。他们做了宣传小册子，和巴黎的其他团体见了面，潜入维希政府的交界地带，试图和其他反抗团体成员建立联系。但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1942年5月，共产主义团体更庞大了，也更有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转移了阵地。不久之后，萨特的反抗小组团体宣布解散。

与此同时，萨特拒绝签署非犹太人声明和共济会会员声明。

即便这样，萨特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教职。因为教育局总检察长也是反抗派的成员，他纵容了萨特的不服从。到了10月，他把萨特调到了更有声望的孔多塞学校。

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又陷入了教书和写作的重复中。冬天，被占领区非常冷，他们到圣日耳曼大街上的花神咖啡馆取暖。萨特还在继续见万达，享受她那充满占有欲的爱。“大家族”里有的成员并没有因为萨特回到巴黎而感到高兴，纳塔莉把萨特看作抢夺波伏瓦时间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见到萨特之前，纳塔莉觉得萨特只是一个伪天才。但是在1941年，纳塔莉和萨特正式见面之后，纳塔莉勾引了萨特。就像萨特一样，纳塔莉也以调情为乐，她还对博斯特下了手。

1941年12月，纳塔莉的母亲向维希教育局提交了一份申诉。在这份申诉文件中，纳塔莉的母亲索罗金夫人指责波伏瓦使自己的女儿走向堕落，正式的指控叫作“诱骗未成年少女”。^[80]当时政府规定的合法结婚或性行为年龄是13岁，而这份报告被提交时纳塔莉已经20岁了。索罗金夫人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详细记述着德·波伏瓦女士勾引了她的女儿，还介绍她认识了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诱奸了她的女儿。索罗金夫人尤其指出，德·波伏瓦女士的生活方式不符常规，她单身未婚，住酒店，去咖啡店写稿，还明目张胆地做让-保罗·萨特的的情妇。德·波伏瓦女士还在课堂上教授道德沦丧的同性恋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的作品。简而言之，任何一个爱国者都应该明白，法国不需要这样的女性做中学老师。在贝当元帅的统治下，当时的法国正试图通过弘扬家庭价值观来找回失去的尊严。像德·波伏瓦女士这样的女性不应该去影响年轻人的未来。

教育部倾向于认同这些指控，于是开始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调查。

关于这件事情，波伏瓦告诉她的传记作家贝尔的版本是，索罗金夫人3月来找过她，请她帮忙干涉纳塔莉的生活。当时纳塔莉在和一个叫作布拉的年轻男子交往，他是个一穷二白的犹太人，索罗金夫人不同意他俩交往。波伏瓦告诉索罗金夫人说她会转告纳塔莉她们见过面了，但是波伏瓦觉得自己并不像索罗金夫人期望的那么有影响力。波伏瓦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来索罗金夫人向教育部提交了申诉。

1941年至1942年，哲学家让·瓦尔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免去了在索邦的教职。1942年，他被软禁在德朗西。同年6月，被占领的地区越发限制犹太人的自由，立法要求所有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犹太人标记，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星）。犹太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他们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在银行开户，任何未经允许进入自由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但是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就与博斯特一起偷偷进入过自由区，到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骑自行车。

针对波伏瓦放荡行为的指责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由于纳塔莉否认自己和波伏瓦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两位男士也否认和纳塔莉发生过关系，所以教育部没有证据去证实这些指控。但是波伏瓦的生活方式以及把普鲁斯特和纪德放进课程资料的安排都得到了证实。1940年7月17日，贝当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用来排除掉那些不能为“民族振兴”做贡献的政府职员。1943年6月17日，教育部引用这项法律，吊销了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81\]](#)波伏瓦被免职在当时就像是反抗派的一枚荣誉勋章。1945年，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恢复。那个时期的学生都记得波伏瓦是一个启发人心的哲学家，在法国大学里流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前，波伏瓦就已经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了自己的学生。[\[82\]](#)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回去继续教书，自那以后，波伏瓦开始专职写作。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跳过了放荡指责这件事，她把这件事当作索罗金夫人因为她没能让纳塔莉离开布拉而做出的恶意报复。不过，在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吊销时，未来看起来的确是不确定的。波伏瓦虽然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她也需要金钱来过日子。弗朗索瓦丝把女儿每个月给她的大部分生活费都攒了起来，她主动提出来要还给波伏瓦。但是波伏瓦让她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之后的那个夏天，波伏瓦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写作的工作——在维希电台当专栏制作人。[\[83\]](#)当时有两个国家电台，一个是维希电台，另一个是受纳粹意识形态控制的巴黎电台。根据工作来判断，为维希电台工作不会被看成是通敌。波伏瓦当时在做一个关于中世纪音乐的节目，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立的。但由于共犯和通敌之间难以区分，波伏瓦也因为参与这个节目引来了一些争议。

英格丽德·加尔斯特的研究表明，波伏瓦的广播内容没有通敌。但是即便如此，波伏瓦的批判者还是指控她不关心政治，甚至说她通过主动参与制作广播节目，来鼓励听众逃避自己抵制纳粹的道德责任。而波伏瓦的捍卫者认为，波伏瓦参与制作的节目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因为波伏瓦故意选择了那些反抗自己同时代统治者的价值观的人和文本。在被攻占的巴黎，想要划清通敌和共犯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的。[\[84\]](#)

存在主义有句名言：“人就是其行为的总和。”尽管波伏瓦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启发无数人的女性，但是她当时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无论作为老师还是女性，波伏瓦都明确地拒绝贝当政府的价值观。然而，波伏瓦并没有实践后来她所宣扬的互相回馈的道德观，尤其是在对待其他女性的时候。在1933年到1942年的这段“灰暗”时期，波伏瓦几次跌入人生低谷，后来她决定要

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在这段时期，波伏瓦也完成了两部小说——《女宾》和《他人的血》，但直到战争结束、出版审查解除后，《他人的血》才得以出版。这两部小说将使波伏瓦名声大噪，也将塑造她的公众形象。[85]

[1] WD 40, 2 September 1939.

[2] Bair, p.201.

[3] WD 51, 5 September 1939.

[4] WD 85, 3 October 1939.

[5] André Gide, *The Journals of André Gide*,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Knopf, 1948, vol. II: 1914–27, p.91, 16 October 1914.

[6] WD 61, 14 September 1939.

[7] WD 63–70, 16–19 September 1939.

[8] WD 73, 20 September 1939.

[9] WD 75, 22 September 1939.

[10] WML 275, 2 October 1939.

[11] Jean-Paul Sartre,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Paris: Gallimard, 1995, pp.116–21, 10 and 11 October 1939. 1995年的这一版本包括了第一本笔记，涵盖了1939年9月至10月的内容，而首版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则省略了这一内容。

[12] WD 105, 15 October 1939.

[13] WD 120, 20 October 1939.

[14] WD 86, 4 October 1939.

[15] WD 98, 11 October 1939.

[16] WD 119, 29 October 1939.

[17] Sartre to SdB, 30 October 1939, WML 322–3 .

[18] WD 129–30, 2 November 1939.

[19] SdB to Algren, 8 August 1948, TALA 208.

[20] WD 132-3, 3 November 1939.

[21] 见WD 109 for the commendation.

[22] WD 143, 147, 9-12 November 1939.

[23] 见Annabelle Martin Golay, *Beauvoir intime et politique: La fabrique des Mémoires*,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13, p.147.

[24] WD 144, 10 November 1939.

[25] WD 147, 11 November 1939.

[26] 见WD 147-9.

[27] WD 157, 16 November 1939; WD 159.

[28] WD 176-7, 2 December 1939.

[29] WD 192, 14 December 1939. 玛丽·维尔的评论见WD 187. 玛丽·维尔在回忆录和日记中被称作玛丽·吉拉尔或“月亮上的女人”(the MoonWoman)。

[30] SdB to Sartre, 11 December 1939, LS 206.

[31] SdB to Sartre, 14 December 1939. *Lettres à Sartre*, p.351 (French edition).

[32] WD 192, 13 December 1939.

[33] 在这封信里波伏瓦没有提到被奥尔加以这种方式爱。SdB to Sartre, 21December 1939, LS 223.

[34] WD 210, 30 December 1939.

[35] WD 210, 30 December 1939.

[36] SdB to Sartre, 14 December 1939. *Lettres à Sartre*, p.350. 同一天, 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 “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来写道德观。”(14 December 1939, WD 192.)

[37] Beauvoir, 引自Bair, p.270.

[38] SdB to Sartre, 12 January 1940, LS 252.

[39] 见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90.

[40] 见WD 217-20.

[41] Sartre to SdB, 12 January 1940, QM 25.

- [42] SdB to Sartre, 14 January 1940, LS 255.
- [43] Sartre to SdB, 16 January 1940, QM 31.
- [44] Sartre to SdB, 17 January 1940, QM 33.
- [45] SdB to Sartre, 19 January 1940, LS 261.
- [46] Sartre to SdB, 18 February 1940, QM 61.
- [47] Sartre to SdB, 19 February 1940, QM 64.
- [48] SdB to Bost, 5 February 1939, CC 234.
- [49] SdB to Sartre, 18 February 1940, LS 277.
- [50] Sartre to SdB, 29 February 1940, QM 87–8.
- [51] SdB to Sartre, 4 March 1940, in LS 285.
- [52]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9.
- [53]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86.
- [54] SdB to Sartre, 27 February 1940, LS 279.
- [55] Sartre to SdB, 28 February 1940, QM 85.
- [56] SdB to Sartre, 1 March 1940, LS 282.
- [57] SdB to Sartre, 4 March 1940, LS 285.
- [58] 见LS 311.
- [59] SLBdB, 'Chronologie', MPI lxxix.
- [60] Sartre to SdB, 29 May 1940, QM 206.
- [61] SdB to Sartre, 11 July 1940, LS 312.
- [62] SdB to Sartre, 11 July 1940, LS 315.
- [63] 更多参见Ursula Tidd, *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 Reaktion, 2009, p.70.
- [64] Bair, pp.242–3.
- [65] Sandrine Sanos, *Simone de Beauvoir*, p.88.
- [66] 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 l'âge*, Paris: Gallimard, 1960, p.549.
- [67] PL 456–7.

[68] PL 456–8. 又见WD 304–9.

[69] WD 304, 6 July 1940.

[70]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89.

[71]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p.94, 92.

[72] WD 318, 19 November 1940.

[73] WD 320, 9 January 1941.

[74] WD 320, 21 January 1941.

[75] VED 104.

[76] VED 31.

[77] VED 15.

[78] VED 42.

[79]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Chronologie', MPI lxxxiii.

[80] 18世纪90年代，同性恋在法国受到歧视。在1942年8月6日，维希政府在《刑法典》里加入了一条新法规，把同性恋可以进行性行为的合法年龄提高至21岁。当时，异性恋性行为的合法年龄是13岁，后来于1945年提高至15岁。[《刑法典》第334条（1945年2月8日移至第331条），第45-190号法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81] 见Ingrid Galster, *Beauvoir dans tout ses états*, Paris: Tallandier, 2007.

[82] 至少在1942至1943学年的卡米尔塞学院（Camille Sée），波伏瓦就已经给自己的学生教授现象学。她的学生之一热纳维耶芙·塞维尔描述波伏瓦的课程为“由现象学的视角来提纲挈领”，并很感谢波伏瓦“把现象学早早地介绍给她，让她能够接触到胡塞尔和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法国还不是教授课程。Geneviève Sevel, 'Je considère comme une grande chance d'avoir pu recevoir son enseignement', *Lendemain* 94 (1999): 48.

[83] 见SdB to Sartre, 20 January 1944, LS 380.

[84] Ingrid Galster, 'Simone de Beauvoir et Radio-Vichy: A propos de quelques scénarios retrouvé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8. Bd. H. 1/2(1996):.112–32.

[85] 见LS 384 n. 320; 'Chronologie', MPI lxxxi.

第九章

被遗忘的哲学

波伏瓦被撤销教职的1943年，萨特和她分别发表了日后能让他们在法国文人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6月，萨特“献给海狸”的《存在与虚无》出版，8月，波伏瓦的《女宾》出版。同时萨特也开始创作剧本，他通过改编古希腊神话来表达自由和反抗的思想，他的作品受到了公众的好评。

20世纪40年代前半段，波伏瓦的思想经历了重要转变。在战前，波伏瓦一直都是唯我论的，而到了1941年，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奉《女宾》里的哲学态度。^[1]波伏瓦在1943年到1946年之间创作的小说和剧本里，就已经展现出对政治和道德的关心和参与。不过直到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之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点。1943年，波伏瓦就已经在发问：对于社会来说，谁是有用的，谁是无用的？谁又有决定有用和无用的权力？

1943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离开了蒙帕纳斯去到圣日耳曼区，他们搬到了塞纳河街60号的路易丝安那酒店，每人一个房间，一直住到1946年末。同月，波伏瓦开始写一篇讨论萨特自由观的文章，波伏瓦将自己的想法与之对比，把她和萨特在几次对话中的讨论记录到文章里。^[2]自此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波伏瓦和萨特“从不间断的对话”，以及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也因此对他们的精神交流有更清晰的认识。当波伏瓦成为公众人物之

后，她的声音被出版记录了下来。当时波伏瓦的观点并不仅仅是用来为萨特做广告，而是用来批判他的。

早在战前，波伏瓦和萨特就讨论过他们和奥尔加以及万达的关系的道德性。对他人撒谎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幸福的，这样是不是不道德的？对于她向奥尔加所隐瞒的，以及对于奥尔加向博斯特所隐瞒的，波伏瓦是不是应该感到悔恨？在《女宾》里，波伏瓦探索了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困扰她的哲学难题：“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很显然，这本书讲的是一段三角恋：皮埃尔和弗朗索瓦丝是一对儿，他们邀请了年轻的泽维尔进入他们的关系。泽维尔激起了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弗朗索瓦丝唯一能想到的逃脱方法就是杀掉自己的情敌。波伏瓦把这本书献给了奥尔加，书的题词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每一个意识都在渴求他者的死亡。”

不过，书中还有第四人：一位有着绿色眼睛、乌黑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他是泽维尔的男朋友热尔贝。“我对于自己拥有的很高兴。”在书里，泽维尔告诉弗朗索瓦丝，“能够完全地拥有某个人是一件让人内心安宁的事情。”^[3]但是在小说中，泽维尔并没有完全拥有热尔贝，因为热尔贝也和弗朗索瓦丝有爱恋关系。很难想象，奥尔加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女宾》中，弗朗索瓦丝和热尔贝一起去远足旅行，然后在一个谷仓中共度良宵，成了情人。回到巴黎后，热尔贝告诉弗朗索瓦丝他从来没有像爱她一样爱过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泽维尔被杀并不是因为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和挫败，而是因为泽维尔发现了热尔贝写给弗朗索瓦丝的信。弗朗索瓦丝，就像那个因为没钱付出租车费而羞愧得杀了司机的男人一样，她宁愿杀了泽维尔也不愿面对她指责的凝视。

小说里那些生动的对话其实是仿照真实生活里萨特、波伏瓦

和奥尔加的对话写出来的。不过博斯特和波伏瓦坚称小说里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在《盛年》里，波伏瓦坦白说自己那样写《女宾》的结尾完全是为了宣泄情感。波伏瓦认为，通过在小说里杀了奥尔加，能够帮助自己排解负面的情绪，以及抹去他们关系里那些灰暗的记忆。^[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波伏瓦的解释都会让读者们认为波伏瓦想要驱除的是嫉妒之情。但是后来在2004年波伏瓦和博斯特的往来信件被曝光后，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疚。因为奥尔加终其一生都不知道波伏瓦和博斯特背着她有情人的关系。

当波伏瓦躲闪着科萨基维奇姐妹的眼神时，《女宾》里的弗朗索瓦丝在纠结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弗朗索瓦丝说：“很难相信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存在，也会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对于我来说，弄明白这一点是很可怕的，我们会因此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并不存在，只是别人臆想出来的事物。”^[5]

波伏瓦这部小说收获的反响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是可耻的，有的人认为这是鼓励读者们去反抗维希政府所宣扬的“工作、家庭、祖国”的教条理念。但是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波伏瓦的小说提供了两种与他者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承认他者和自我意愿都是有意识的存在，都有丰富和脆弱的内在生活。第二种是拒绝看到前者，拒绝互相回馈的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者要么是对我们有用的物，要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第二种方式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阐发的很相像。而人们在报道波伏瓦人生的下一阶段的时候，都只会关注到波伏瓦在战后名声大噪，听爵士乐，办派对，

而不关注波伏瓦和萨特严肃的哲学对谈。为什么波伏瓦会被如此误解？为什么她会被贬低为萨特的“圣母”，以及为什么波伏瓦要缩手缩脚地去避免那些因为她的女性主义作品而针对她的人身攻击？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进一步去了解波伏瓦对萨特的哲学所持异议的具体内容。

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曾经写道，每一个有脑子的西方女性肯定都在某一个时间点问过这样的问题：“像西蒙娜这样的漂亮女孩为什么要去倒贴萨特这种无聊的丑八怪，跟他浪费时间？”卡特接着给出答案：“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甘情愿地陪跑。”^[6]不过在1943年，萨特不仅是一个无聊的丑八怪，更糟糕的是，还是一个极其悲观的哲学家。哪怕是按照悲观的哲学家的标准来看，萨特对人性的期待也是十分低的。萨特认为所有的人都想要主导别人，因而所有的关系都是充满冲突的，以至于爱是不可能的（用萨特的原话是：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时的波伏瓦并不能算是一个“陪跑的”，她是一个不认同萨特观点的哲学家。那时候还没有人把波伏瓦的人生当作武器，讨伐和攻击她。

在《存在与虚无》里萨特提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是一个人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个人扮演被主导者的角色。一个人是“主体”，他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而另一个人是“客体”，他内化了那个统治他的人的视角。萨特认为，有时候我们倾向于去统治别人，有时候也喜欢被别人统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平等地和彼此互动。

萨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提出过著名的“主奴辩证法”^[7]，其中的内容和萨特的非常相似。而早在黑格尔之前，圣奥古斯丁就认为所有人类都受到支配欲的驱使，这也是人类大部分苦难的起因。波伏瓦在战争期间曾仔细研读黑

格尔，她感到孤独和思考能够让自己得到慰藉。波伏瓦在小说《女宾》里也设置了黑格尔式的主题。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萨特《存在与虚无》里的很多核心想法都剽窃自波伏瓦。如果不是因为性别，萨特所获得的那些认可本应属于波伏瓦。^[8]尽管《存在与虚无》是在6月出版，而《女宾》比它晚了两个月，但是萨特早在军事休假期间就已经读过《女宾》，也就是说萨特在进行《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写作之前就已经在波伏瓦的虚构小说中接触到了这个概念。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分类就是“自为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如果暂时抛开艰深晦涩的哲学术语，我们就会发现萨特提出的这个哲学概念其实和波伏瓦在1927年的日记里说的“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和“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有不谋而合之处。

但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在哲学的层面，萨特“窃取”波伏瓦的灵感这样的说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永不间断的对话”。即使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互相回馈，波伏瓦和萨特在智识上也是“互相”鼓励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都是浸淫在法国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都不屑于去标注每个概念的出处，更不用说非要声称自己拥有某一个想法。此外，对于波伏瓦来说，某个具体的哲学思想属于谁、由谁占有，远没有证明出这个思想正确与否来得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也极力批判过“占有”这个概念。

与此同时，波伏瓦对萨特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来波伏瓦会意识到占有的概念在延续权力、决定谁会被后世铭记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存在与虚无》里有一个概念叫作“自欺”，波伏瓦和萨特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一起探讨这个概念。在波伏瓦的作品《精神至上》里也有出现，这个概念对波伏瓦后来的很多

作品都有着深远影响，但是靠这个概念闻名于世的却是萨特。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概念的起源时，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想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没法选择的因素，比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以及身体。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

萨特认为，当“真实处境”和“超越性”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这会使得一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萨特用“侍者”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一个侍者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侍者，认为自己是侍者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欺”的状态。因为这个侍者永远都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他自己的“超越性”。不过，如果这个侍者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侍者，试图去做一个首席执行官，那他就是以相反的原因处在另一种“自欺”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

这个例子也许听起来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把侍者换成“犹太人”“女人”“黑人”就能看出它的深刻之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这种拿他人“真实处境”的单面向来以偏概全的做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完整人性。1943年时，历史仍然在重蹈覆辙。不过当时萨特并没有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道德观，也没有就那个物化他者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就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9]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以及《模糊性的道德》这两篇哲学文章中进一步详述她对此的批判观点。同时波伏瓦也不得不处理《女宾》给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风波。

在波伏瓦首部小说出版之前，弗朗索瓦丝对她的生活知之甚少，她甚至认为波伏瓦还是一个“好女孩”。小说《女宾》出版之后，波伏瓦迅速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各种流言蜚语也打破了弗朗索瓦丝的幻想。弗朗索瓦丝既对波伏瓦书里的内容感到震惊，也为她获得成功感到高兴。此外，因为波伏瓦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的成功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好处。[10]

《女宾》出版以后，人们对它主要有三种解读。在1945年之前，波伏瓦和萨特还没有声名鹊起，人们认为这本小说描绘了波希米亚式的巴黎生活；后来，它被当作波伏瓦和萨特三角恋的隐匿真名的纪实小说；第三种解读是女权主义者们[11]把它看成是三个非传统女性在一个专横的传统世界里的记录。在这本小说里，有些篇章很容易让读者把主人公弗朗索瓦丝和波伏瓦联系在一起。比如，皮埃尔有了别的女人，弗朗索瓦丝却不想因为难过而浪费自己“宝贵的工作时间”。[12]弗朗索瓦丝自认是一个“忠诚的”人[13]，对于不能长久的浪漫关系不感兴趣[14]。因为弗朗索瓦丝深深地相信要忠诚于自己，她拒绝成为一个在爱情中索取的女性[15]，她要自己和热尔贝之间是两情相悦的[16]。不过，书中的男主人公皮埃尔关心的则是，弗朗索瓦丝有没有问自己是否

处在“自欺”当中。整本小说在情节发展中穿插着弗朗索瓦丝对自己和皮埃尔关系的反思，有些部分也被猜测是波伏瓦对奥尔加的反思：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从他那里获得的东西，她盲目地爱着他。但是她已经向自己承诺过，一定要爱他本来的样子，哪怕是他为了自由而逃避她，她也不会被第一个障碍绊倒。

[17]

波伏瓦的读者会疑惑：这是波伏瓦在借弗朗索瓦丝说出自己的心声，还是完全是她自己的想象？在小说中，弗朗索瓦丝对泽维尔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定了型的、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存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造就的。”[18]波伏瓦把自己的小说写得和她的生活很相像，激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她这么做，也是让读者自由地去想象一个波伏瓦。

波伏瓦自己也欢迎读者把她小说里的一些内容解读成自传性质的。波伏瓦曾经告诉弗朗西斯和贡捷，她诱惑博斯特的场景和《女宾》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不过波伏瓦并没有透露博斯特的名字。[19]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回忆过引诱博斯特的事情，这些信件在萨特和奥尔加去世之后被出版。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波伏瓦信中和小说里的描写有何不同。在给萨特的信里，波伏瓦轻松地谈起这件意料之外的风流韵事：“三天前，我和小博斯特睡了，当然了，这事是我主动的……不过我们俩都要。”[20]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则是，弗朗索瓦丝经历了好些日子的“模模糊糊的渴望”，有一天，这种渴望突然变成了“按捺不住的欲望”；不过在那之前，因为弗朗索瓦丝觉得热尔贝“遥不可

及”，所以一直压抑着自己没有主动。[21]

在正式出版之前，波伏瓦原本给这本小说起的名字叫作“自卫”（*Légitime Défense*）。[22]回看过去，波伏瓦觉得20世纪30年代的自己对所有人都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决绝态度，她“仗着自己有萨特的凝视，想要忘记周围其他人的眼色”。后来当波伏瓦不得不承认其他人的存在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适。波伏瓦在《女宾》中描写过这种不适感的发作。[23]她不再任意地去秉持对他人盲目的态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哲学，这是一个死胡同。

1943年，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都大获成功，他们的社交圈急速地扩大。阿尔贝·加缪与波伏瓦和萨特成了朋友，通过加缪，他们又认识了雷蒙·格诺和米歇尔·莱里斯等人在内的反抗派作家。莱里斯夫妇住在大奥古斯丁站的一个公寓里，波伏瓦在那里结识了毕加索。1943年，波伏瓦和萨特搬到了塞纳河街60号的路易丝安那酒店，那里比之前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豪华，因此波伏瓦开始常常邀请客人到他们那儿做客。波伏瓦和莱里斯夫妇、格诺、加缪、纳塔莉及其男朋友布拉，还有博斯特、奥尔加、万达一起开派对。1944年春，从乔治·巴塔耶开始，他们轮流举办持续整夜的“嘉年华”派对，把酒言欢，唱歌跳舞。为了能够在战时有足够的食物办宴会，他们平时都攒着粮票。博斯特在塔夫尔尼的家里办过一场，西蒙娜·若利韦和迪兰也在巴黎的公寓里办过一场派对。

波伏瓦当时已经和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艺术精英们玩在一起了，但是她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在被攻占时期，巴黎的生活也不如往日，供暖的煤变少了，食物也渐渐稀缺。1938年到1942年间，盟军仍然把战略港口、工厂和车站当作攻击目标，人们的牛奶消耗量减半，而面包的价格几乎翻倍了。

4月20日和21日，巴黎北部遭到盟军轰炸——这次进攻在“霸王行动”里是有争议的，企图阻断所有进入巴黎北部的铁路交通。4月21日，拉夏贝尔铁路调车场遭到袭击，有64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当时萨特和波伏瓦在拉普厄兹，他们收到博斯特寄来的信。博斯特在信里写道，周遭都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非常可怕，仿佛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碎石堆里的一具尸体。在那之前的一个月，纳塔莉的犹太人男朋友布拉和他的父亲被抓了，后来就被转移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24]虽然纳粹旗还在巴黎参议院上空飘扬，但是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解放了。8月19日，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德军向东撤退，城市里贴满了法国反叛军号召民众武装起来的传单。萨特四处奔走，忙得不可开交，波伏瓦用他的署名帮他为《战斗》杂志（*Combat*）写了好几篇文章。^[25]

1944年8月25日，波伏瓦、万达和纳塔莉都在博斯特和奥尔加在沙普兰的酒店房间里。她们用土豆做了晚餐，正当她们吃晚饭的时候，广播里说戴高乐将军抵达巴黎了。人们开始欢呼，在大街上高兴地叫起来——在多摩咖啡馆门前，人们蜂拥着去到瓦万街上。但随后出现了坦克，人群从枪声和纳粹党卫军的汽车中逃离。

第二天，埃菲尔铁塔上挂上了法国国旗，戴高乐将军带领法国和美国军队穿过巴黎，一直到香榭丽舍大道，波伏瓦和奥尔加在凯旋门那里欢呼雀跃。

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巴黎自由了。

波伏瓦的第二卷自传记录了从1930年到1944年的这段时间。她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才开始出版，而对于自己的哲学关注和成就，波伏瓦在《盛年》里只是一笔带过，这也使得

很多人认为在他俩之中，萨特才是哲学家。不过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在这个阶段大量阅读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关于女性的性的书籍（尽管这些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很多）。她阅读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阿兰、美国文学、雷蒙·阿隆、柏格森、乔治·贝尔纳诺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德里乌·拉罗谢尔、英国文学、被她称为“娱乐性垃圾”的作品[26]、福克纳、弗洛伊德、纪德、朱利安·格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海明威、霍尔德里、胡塞尔、雅斯贝斯、乔伊斯、卡夫卡、克尔凯郭尔、拉罗什富科、莱布尼茨、米歇尔·莱里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雅克·马里坦、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莫里斯·梅洛-庞蒂、尼采、普鲁斯特、雷蒙·格诺、圣埃克苏佩里、谢勒、斯凯特克尔的《女人的性冷淡》（*Frigidity in Women*）、司汤达、斯多葛学派、瓦莱里、让·瓦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作品。

那么波伏瓦到底略去了什么呢？波伏瓦的首篇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是在1943年写完的，但是直到1944年9月法国解放之后才得以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4年才出版。因此，看不懂法语原文的读者一直没法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完整的哲学对话，也看不到波伏瓦独立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也开启了她文学生涯的“道德阶段”。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许是因为和博斯特的关系，又或许是因为好不容易结束了和纳塔莉的纠葛，以及意识到自己和萨特伤害了比安卡，又或许是因为担心和萨特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要么是以上这些原因都有，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和关系才算是道德的？而在回答这个道德问题之前，波伏瓦不得不回答一个基本的存在主义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一切，而不是虚无？

1943年，萨特的鸿篇巨制《存在与虚无》出版了，很多人批判这本书描绘了人性的惨淡。萨特用足足几百页来分析人类的境况，让人读着十分压抑，在这之后萨特仅用了两页半来写道德。萨特认为，“自欺”会导致很多人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不管是一人独醉，还是统领数国，都是一样的。^[27]萨特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虚无主义是错误的，比如为什么生命是有意义的或者如何才能真正地活着。萨特给读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自由本身能成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吗？自由是人重要的原因吗？自由必须要像许多宗教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根据和“一个超越的价值”（也就是上帝）的关系来定义吗？^[28]

萨特和波伏瓦一样，都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自由的概念以及人类渴望追寻意义这个课题着迷不已。波伏瓦和萨特都曾经思考，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超越存在来赋予人类自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和波伏瓦不同的是，萨特还没有找到把道德观融入他的自由论中的方法，也没有找到解决超越问题的答案。波伏瓦分别以散文、小说和剧本这样的文学形式给出了她的答案。但波伏瓦的散文和剧本直到21世纪才被翻译成英文，而她的小说也被广泛解读成只是披着小说的外壳对萨特的哲学思想生搬硬套。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以来错误地认为是萨特独自创造了存在主义道德观——21世纪最为流行的哲学运动之一。但事实是，波伏瓦早在1945年就曾明确地表示是她，而不是萨特，阐发了存在主义道德观。

波伏瓦的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开篇是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一段对话。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谏臣。当他们在商讨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计划时，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着有什么区

别？”[29]萨特认为，人就是要出去成就事业，给自己制定目标，设置极限，尽管那些目标经常被超越，极限也会被重新划定。甚至在实现了追求的目标之后，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有时候，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为了追求的过程；有时候，一旦得到了，想要的欲望也就随之消散了。所以行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意自己的行为道不道德？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和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的问题很相似：一个人独醉和成为众国首领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人怎么能这样想呢？波伏瓦认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独醉的人和众国首领有不同的境况，而且他们改变他人所在的世界的能力也不一样。波伏瓦把自己生活里的场景融入哲学论述：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她家公寓门房的儿子去世而哭泣。对此，她的父母有些不耐烦，说道：“这个小男孩又不是你的兄弟。”听罢，女孩擦干了眼泪。但是这样教孩子是很危险的。如果为陌生的小男孩哭泣没有用，应该随他去，那人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兄弟哭泣呢？[30]

波伏瓦当年十分不解自己的父母对于门房儿子去世的冷漠态度，不管她后来变成什么样，她都没有忘记这种困惑。但是波伏瓦也明白，这世界上有太多苦难和不公，如果真的要在乎，要为之哭泣，那我们就只能整日整日地以泪洗面了。我们的能力有限，也并不总是清楚该去在意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去同情所有同样性别、同样国别、同样阶级的人，或者与整个人类认同，那我们也只是在口头上扩大我们在乎的范围罢了。

真正的问题是：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

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创造和维持连接你和他人的关系，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31]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一天一天地去创造以及再创造，有时候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会被忽视，有的时候会被滥用消亡。[32]

波伏瓦和萨特花了整整十年多去探讨自由的概念。波伏瓦曾经信仰上帝，于是遵照天主教的教义去生活，而后来她想要遵照哲学理念去生活，但是她发现“自由”的概念行不通。萨特曾经在剧本《禁闭》（*No Exit*）里称他人为“地狱”，那一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哲学评论。萨特相信，人在世上是孤独的，而波伏瓦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如果人是孤独的，那么人的命运将会很悲惨。只有和他人一起，我们才能成就某些事。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回到爱和奉献的主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曾在学生日记中写下的哲学思考。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想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寄托。大部分人，尤其是女性，是在为他人奉献、为他人活着中，找到了寄托。有的人认为自己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意义，有的人认为自己在奉献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寄托。[33]

但是，通过奉献来合理化一个人的存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你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对方是否接受一个他不太想要的东西上时，你为之奉献的对象很可能会厌烦你。而且，如果我们用奉献去限制他人的自由，违背他人的意愿，那我们对他人的奉献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暴政式的绑架。世上这么多的人都想要为另一个人奉献自我，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有没有可能在奉献的同时不绑架他者？[34]

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波伏瓦并不赞同萨特对于自由的定义，她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理解。萨特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但波伏瓦

认为我们和他人的选择是相互制约的。因此，光是追求自由还不够，如果想要真正地尊重自己的自由，那么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以道德的方式去行使自由。[35]

波伏瓦希望读者看完她的作品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行动塑造了生活里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们所能行动的境况。波伏瓦很后悔自己之前漠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当然，我们不清楚这个改变是因为波伏瓦自己的境况，还是因为“二战”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她个人生活的波折。即使是在和萨特的“本质的”恋爱关系里，波伏瓦也感到痛苦。渐渐地，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和萨特的关系伤害了他们“偶然的”恋人们。之前萨特给比安卡写了一封过分的分手信，波伏瓦狠狠斥责了萨特。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如今比安卡也嫁给了伯纳德·朗布兰，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比安卡的情绪非常不好，因此会常常来找波伏瓦。

1945年，波伏瓦曾写信给萨特说他们俩应该为比安卡的痛苦负责。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比安卡聊到深夜，她的内心充满了懊悔：“比安卡现在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这是我们造成的。这显然是比安卡与我们分手的后遗症，我们对她的影响很深也很直接……我们伤害了她。”[36]（后来，比安卡的心理分析师雅克·拉康也赞同波伏瓦的看法。[37]）

波伏瓦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出版后大受好评。在《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里，波伏瓦回顾了这段时期，她认为这是因为法国当时“鼓励回归哲学”。[38]波伏瓦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谈到了邦雅曼·贡斯当、黑格尔、斯宾诺莎、福楼拜、卡夫卡、康德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哲学观点，同时也否定了这些人的观点。波伏瓦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法国民众在被攻占时期之后渴望哲学阅读的心态，大大淡化了她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波伏瓦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吗？我们很幸运能够从波伏瓦1945年的一次访谈中看到事情的真相。在《法语字母》（*Les Lettres Françaises*）里，波伏瓦没有谈及公众在攻占期间没法读到哲学作品，而是聚焦于萨特哲学体系的缺陷。用波伏瓦自己的话说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并没有暗示道德观，而我想要提炼出一套道德观。后来，我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里进一步阐发了这种道德观，在小说和戏剧当中我也试图提出具体的方案，虽然是用一种更具体但也更模糊的方式。”^[39]那为什么波伏瓦要在自传当中抹掉自己如此重要的哲学贡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波伏瓦选择在公众面前呈现一个不一样自我的原因。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双偶咖啡馆工作，1944年。

[1] WD 320, 21 January 1941.

[2] PL 434.

[3] SCTS 343.

[4] PL 340.

[5] SCTS 6–7.

[6] Angela Carter, 'Colett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9) 2 October 1980:15–17.

[7] 主奴辩证法 (master-slave dialectic) 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在自我意识的阶段提出的关系辩证法。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个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为主人，后者是奴隶。

[8] Edward Fullbrook and Kate Fullbrook, *Sex and Philosophy*, London:Continuum, 2008, 79 & passim.

[9] PL 434.

[10] 见VED 68.

[11] 译文中“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是由英文中的“feminism (feminist)”译出。对于较激进的女权运动基本采用“女权”的译法，并考虑到波伏瓦在1972年采访中公开声明立场（见P374），译文对于1972年之后的场景更多采用“女权主义（者）”。

[12] SCTS 108.

[13] SCTS 17.

[14] SCTS 16.

[15] SCTS 158.

[16] SCTS 159.

[17] 见SCTS 124, 207, 297, 337.

[18] SCTS 244.

[19] Claude Francis and Fernande Gontier,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Gallimard, 1979, p.16. 见SCTS 371.

[20] SdB to Sartre, LS 21.

[21] SCTS, chapter 8.

[22] ‘Introduction’, MPI: xii.

[23]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 984.

[24] 见LS 381 n. 318.

[25] 学术调查表明，这样的文章共有七篇，但我们不清楚是萨特要求波伏瓦帮助他，还是波伏瓦主动提出这么做的。Ursula Tidd, ‘Some Thoughts on an Interview with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Studies* 12(1995):

22-3.

[26] PL 46.

[27]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Hazel Barnes, London:Routledge, 2003, p. 647.

[28]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627.

[29] PC 90.

[30] PC 92, 翻译有改动。法语原文中“婴儿”这个词是阳性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用的是男他的代词，但是这个故事和1958年《端方淑女》中记载的西蒙娜自己的记忆是吻合的。因此我用的是女她的代词，而不是男他。

[31] PC 93.

[32] PC 107.

[33] 但波伏瓦这里说的是“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PC 116.)

[34] PC 118.

[35] 重要的不是“脱离自我的自由”，正如萨特的“超越自我”所暗示的那样，成为道德自我的自由才是关键。许多波伏瓦研究者对此都已写过一些优秀的文章，包括Karen Vintges, ‘Introduction’ to ‘Jean Paul Sartre’, PW 223-8 and ‘Simone de Beauvoir: A Feminist Thinker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Margaret Simons (ed.) *The Philosophy of Simone de Beauvoi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Sonia Kruks, *Situation and Human Existence: freedom, Subjectivit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Nancy Bauer,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y, and Fem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6] LS 389, SdB to Sartre, 13 December 1945.

[37]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170.

[38] FC 75.

[39] ‘Dominique Aury,’ ‘Qu’est-ce que l’existentialisme? Escarmouches et patrouille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 December 1945, p.4, 引自 Simons, ‘Introduction’, PW 11 n. 14.

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邀请并资助了八位法国反抗派记者去美国，并报道美国在“二战”当中的贡献。加缪邀请了萨特，萨特高兴极了。萨特从小看美国西部片和惊悚片，对美国很感兴趣。去到美国之后，萨特发现，真实的美国有符合他期待的地方，也有让他失望的地方。萨特震惊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以及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纽约广播电台，萨特遇到了一个让他惊为天人的女子，她叫多洛雷斯·瓦内蒂。“二战”前，多洛雷斯在巴黎蒙帕纳斯当过演员，也认识一些出没于多摩咖啡馆和圆顶餐厅的巴黎文人。多洛雷斯的声音低沉迷人，更重要的是，她的母语是法语。^[1]不久之后，多洛雷斯和萨特就从朋友变成了情人。

萨特不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里，波伏瓦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波伏瓦会读《战斗》杂志和《费加罗报》（*Le Figaro*）上萨特写的报道，偶尔也会从加缪那里听到一些萨特的消息。萨特需要寄出稿件时，就会和加缪通电话。1945年2月，波伏瓦去葡萄牙看望已经结婚的埃莱娜和利昂内尔，在那儿待了五周。波伏瓦在里斯本的法国学院开讲座，同时也给《战斗》杂志撰稿。波伏瓦两姐妹已经快五年没有见面了，看到波伏瓦破旧的衣服和鞋子，埃莱娜感到很惊讶。当时葡萄牙的生活水平要比法国高不少，所以波伏瓦离开之前买了很多新衣服以及给“大家族”成员的礼物。^[2]

1945年3月，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自己要在纽约多待一段时

间，5月底再回法国。1945年4月29日，法国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投票权；5月7日，德国在兰斯签署了军事投降协议；5月8日，德国代表凯特尔与苏联代表朱可夫在柏林签订投降条约，战争在欧洲结束了。

1945年6月，萨特40岁，他很讨厌自己变老。萨特决定彻底放弃教书，专心写作。萨特和多洛雷斯·瓦内蒂之间的感情也认真起来，这让萨特情绪有些低迷。虽然多洛雷斯·瓦内蒂已经结婚了，但是她接受不了萨特同时和波伏瓦保持关系。多洛雷斯·瓦内蒂觉得萨特没必要再给波伏瓦写信，说自己与他已经结束了。到了7月，萨特没法忍受自己和多洛雷斯·瓦内蒂不合，于是写信给她。多洛雷斯·瓦内蒂的回信态度很积极，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恋情。

战争之后，到处都能看到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3]1945年是波伏瓦公众形象的重要转折点：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一年都名气大涨，波伏瓦的学术声誉跟萨特以“存在主义”哲学（尽管他们不愿这么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5年夏秋，波伏瓦和萨特都发表了不少作品：小说、演讲稿、剧本和新的杂志。1945年10月的一周，萨特做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讲，这次演讲后来成了他最为著名的演讲之一。波伏瓦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Useless Mouths*）也开演了，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合办的期刊也开始发行了。巴黎的新闻报刊亭发售着萨特和波伏瓦创办的月刊《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但第一期时只有萨特的名字被列在了主编的位置上。

波伏瓦和萨特将杂志命名为“摩登时代”，是受到查理·卓别林1936年的戏剧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的启发。《摩登时代》是一本关于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的杂志，直到2019年还在发行。在当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两种声

音成为主流，《摩登时代》成了这两种声音中间的“第三种声音”的先驱。当时的法国民众迫切地希望看到这样的内容，对于萨特和波伏瓦来说，《摩登时代》成了他们知识分子关心时政、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1944年，法国通过一条法律，禁止所有在维希政府攻占期间出版过的报纸继续发行。这条法律影响了几百家报刊，只有《战斗》杂志、《解放报》（*Liberation*）这类反抗派报纸以及右翼的《费加罗报》、社会主义的《人民报》（*Le Populaire*）、共产主义的《人道报》（*L'Humanite*）这些非攻占区的主流媒体幸免于难。当时的大清洗运动审判了很多通敌派作家，并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有些人称这种清洗运动为让法国恢复“社会健康”而做的手术[4]。波伏瓦在这段时间里担任《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还在上面发表了几篇关于道德观和政治的重要文章。

对于波伏瓦来说，和萨特一起共事也是有负面影响的。波伏瓦1945年的小说《他人的血》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但是企鹅版本的封底宣传文案只提到了其中一个人：

让·布洛马尔，曾经拥有特权的资产阶级，如今变成了反对纳粹的爱国首领。他在漫漫长夜里等待自己的情人埃莱娜死去。闪回的情节和主人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黎明到来，让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

《他人的血》是波伏瓦在巴黎被攻占时期完成的，于1945年出版。这本书描绘了法国反抗派极大的苦痛和内心的压力，展现了一个心里充斥着愤怒以及对家人心怀内疚的男人的觉醒。这本小说是西蒙娜·德·波伏瓦最扣人心弦的戏剧化作品之一，展现了存在主义者试图平衡个人幸福以及对他人责任的探索尝试。[5]

根据封底文案的描述，这本书讲的只是一个男人的觉醒，女主人公埃莱娜的出现只是为了最终的死去，被动地用个人悲剧来加强男主角的选择和行为的戏剧张力。但实际上，这本小说讲的不只是一个男人的觉醒，埃莱娜也意识到了自己对于他人所负的责任，只不过阻挡她和男主角觉醒的障碍不一样。

维克多·布朗伯特认为《他人的血》是被波伏瓦“戏剧化”处理的“一个存在主义信仰的摘要”。但是《他人的血》并不仅仅是应用以及戏剧化了萨特的哲学思想，它表达的是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同时《他人的血》也昭示了波伏瓦之后的作品《第二性》的主题，尤其是女性自处的方式，以及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爱的方式。

在小说开头，埃莱娜想要通过爱来“合理化”自己的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埃莱娜逐渐“成为一个女性”，她发现自己不再仅仅满足于没有回报的爱。^[6]让也意识到埃莱娜对他的爱是脆弱不堪一击的。让不想成为埃莱娜活着的唯一寄托，因为他能给她的只有苍白的温柔。让意识到自己的爱对于埃莱娜来说是一种囚禁。^[7]

这样的爱情对于让和埃莱娜来说都不尽如人意。对于让来说，爱情不是生活里的唯一，而埃莱娜的要求也常常让他感到窒息^[8]。埃莱娜觉醒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所负的责任，她开始重新看待爱情在她生活中的位置。

波伏瓦后来写道，作家的任务是“用戏剧化的形式来描述个体与给予个体自由的世界之间的关系”。^[9]然而，对于女人和男人来说，世界意味着不一样的理想和限制。波伏瓦通过讲述埃莱娜和让的觉醒，以及在故事中交织着讲述女性得不到或者要求得到赋予男性的那种尊重，来展示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举个例子

来说，让的母亲常常找借口，常常向他人道歉，也试着让自己占用更少的空间。^[10]而相比之下，让完全没有对自己占用的空间感到不安。^[11]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谈话中，小说里的女性得到的尊重都少于其男性同伴。埃莱娜注意到，让和他的朋友保罗谈话时，会觉得自己是在进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而她只是一个“任性又肤浅的小女孩”^[12]。她指出保罗的伪善：“你经常跟我说你尊重别人的自由，而你却总是帮我做决定，把我当作一件物品来对待。”^[13]

这部小说也展现了男人对待女性的两种态度：物化与不物化。故事中的让能够把所爱之人搂在怀里，把微笑着的她当作完整的人去看待，并且享受自己的意识和另一个人交融。而相反的，故事中的马塞尔只有在把女性看成是一个绝对的物品时才去触摸她的身体。^[14]

波伏瓦在自传的第二卷中曾用一段话来回顾她的作品。波伏瓦对《女宾》不甚满意，因为她认为“谋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在《他人的血》和《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试图去定义我们和他人真正的关系”：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确是侵犯了他人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对此负起责任。^[15]《他人的血》开篇题记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对世间的人事万物负有责任。”这是波伏瓦献给纳塔莉·索罗金的书。

后来，波伏瓦在为自己的原创性辩解时，回顾了《他人的血》出版之后的反响。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表示《他人的血》的主题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体验和那些物化我的人之间的悖论”。然而，公众并不知道波伏瓦的意图，于是给这本书打上“反抗派小说”和“存在主义小说”的标签。更糟的是，读者们认为她的小说作品只是“哲学小说”，而且挪用了萨特的哲学思

想。

首次提出“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t）一词的，是天主教哲学家和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代萨特的哲学思想，而当时的波伏瓦反对人们给她贴上同样的标签。因为波伏瓦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她的灵感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不是某个哲学体系。^[16]在《战时日记》中，波伏瓦所做的关于《他人的血》的早期笔记也清楚地表明，波伏瓦只是想用这部小说去展现女性如何深受“幻想通过爱情获得意识肯定”的想法的毒害。^[17]

1945年10月29日，波伏瓦唯一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在巴黎开演，并在家乐福剧院（Theatre des Carrefours）举行了一场义演。故事设置在中世纪的弗兰德斯，在一个叫作沃塞勒的虚构城邦里展开。沃塞勒城邦叛乱起义，要脱离勃艮第公爵的统治。整部剧的第一幕是城邦里的居民们在一次围城之后正经历着大饥荒，城邦总督决定为了保护城邦，他们必须驱逐“白吃饭的嘴巴”，也就是女人、小孩和老人。城邦总督分析认为，食物很紧缺，所以只有工人和士兵可以享有食物。这个城市的名字“沃塞勒”在法语里听起来和“vaut-elle”是一样的，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她有价值吗？”。

早在波伏瓦写出《第二性》和《老年》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之前，她的剧作就已经在展现人类粗暴的分类——仅仅因为你是儿童、女性和老人就认为你没有价值。不过就像波伏瓦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爱和承诺都是一种“囚禁”？剧中的一个主人公让-皮埃尔不想成为他妻子的“限制”：“把她给我？你认为我会同意把她锁起来，并且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全世界吗？我可不想做一个狱卒。”在整部剧的最后，让-皮埃尔和克拉丽斯发现爱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向克拉丽

斯求婚，却被她问道：

克拉丽斯：“世上的人啊，到底该如何去爱？”

让-皮埃尔：“我们一起抗争。”^[18]

波伏瓦把这部剧献给她的母亲^[19]，而且首演结束之后，她就马不停蹄地去为那些因为父母被驱逐到德国而成了孤儿的孩子送去食物^[20]。

波伏瓦后来说，《白吃饭的嘴巴》受到了带有敌意的批判：“这些日报几乎像是串通好了一样痛斥我。”^[21]的确不少评论者批判这部剧，尤其是剧的制作；有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想要表达的信息太过牵强，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还不足以拿到剧院里来演^[22]。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其中有评论感慨：“这么好的剧本，在巴黎竟然找不出十个导演来争取它！如果还有一点公正，如果公众能够欣赏到它的价值的话，《白吃饭的嘴巴》应该在拉夏贝尔大道上成功上演。”^[23]

就在《白吃饭的嘴巴》首演的同一天晚上，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后来闻名于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场演讲在一个叫“保持”（Maintenant）的小俱乐部举行，即使场地很小，主办方还是担心会因为来的人不够多、太空旷而显得尴尬。然而，萨特抵达俱乐部时，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连他自己都担心会挤不进去。后来，萨特好不容易挤到了讲台上，他说：“‘存在主义’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汇，但是谁都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基督教徒们认为‘存在主义’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存在主义’是虚无的。但是‘存在主义’两者都不是。”萨特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反对他的观

点，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留在“自欺”的状态里，而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自由。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是你自己的行动造就而成的。”萨特那天晚上的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发表出来，也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最常被引证的章节。

就在萨特演讲之后不久，让·瓦尔做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历史的讲座，还邀请了其他哲学家来回应，然而这个讲座远没有萨特的那么火爆。在这个讲座中，尼古拉·柏多耶夫、乔治·古尔维奇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分别讨论了存在主义是如何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而来。^[24]而在12月11日，西蒙娜·德·波伏瓦举办的关于“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25]

萨特在保持俱乐部所做的演讲成了战后巴黎标志性的文化事件，相比之下，波伏瓦的讲座无人问津，波伏瓦在自己的自传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讲座。当时的波伏瓦在探索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她想用哲学的方法去捍卫她的推理。有人注意到了波伏瓦的探索，有人对波伏瓦的尝试表示赞赏。早在1945年，梅洛-庞蒂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波伏瓦的《女宾》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写作方法。^[26]

尽管《他人的血》一开始收获了好评，但是就像《白吃饭的嘴巴》一样，评论家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哲学牺牲了文学。媒体评论者莫里斯·布朗肖撰文赞美波伏瓦的《女宾》从哲学角度来说非常优秀，同时也保持了道德的模糊性，没有强加结论给读者。但是莫里斯·布朗肖以及其他一些评论者批判《他人的血》只是一部哲学小说。在“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当中，波伏瓦回应了这些批判，分别从个人和哲学两个角度解释了自己想要调和哲学与文学的努力。波伏瓦开始时说道：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大量地阅读。当然，那时我的阅读就和那个年纪的人一样天真，充满激情。每次读小说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有各种性格的人物和事件。一部哲学作品能够带我短暂地离开真实的世界，进入天堂般永恒的宁静里……真理在哪里？在人世间还是在永恒里？我感到分裂。

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写小说，是因为她相信文学能够给予我们“一种想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像真实生活里的体验一样完整，让人不安”[27]。哲学作品常常用抽象的方式展开，会想把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强迫他们去接受，而不是邀请他们到特定的情境中，使其看到其他视角和观点徐徐展开。波伏瓦认为，形而上学的小说是为了让读者拥有这种自由。

波伏瓦知道并非只有自己在哲学小说创作上遭到了指责，早就有其他文学和哲学的前辈尝试过这样做并遭到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指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隐藏了哲学论述。波伏瓦十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观点：一个哲学家越能注重个人体验主观的一面，一个人的内在生活越独特，他们越有可能用文学的形式来描述个体变成自我的独特体验。哪怕是柏拉图也在这两种诱惑中挣扎过：柏拉图在驱逐来自共和国的诗人时，他既担心艺术会腐化城邦的民众，但是也看到了艺术能够有力地鼓励民众去追求上帝。不过，这位西方哲学巨擘最终还是以对话这种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哲思。[28]

1945年后，波伏瓦和萨特都因为存在主义而名声大噪，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关注，波伏瓦称1945年为“存在主义攻势”（existentialist offensive）年。在法国时，人们在咖啡馆里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就会一直盯着他们俩看，大街上也常常有摄影

师明目张胆地拍他们。在美国，波伏瓦和萨特受邀为《时尚》《时尚芭莎》《大西洋月刊》等杂志拍摄封面。萨特俨然成了偶像，而让他这个偶像魅力大增的其实是他身旁这位美丽、神秘、传统的女性。虽然波伏瓦也发表了自己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文章，甚至要比萨特更有深度，更成熟[29]，但是波伏瓦的哲学贡献以及她对萨特的想法的异议，显然都被残酷地无视了。1945年，巴黎战后的小报耸人听闻地称波伏瓦为“伟大的萨特主义者”（la grande Sartreuse）和“萨特的圣母”（Notre Dame de Sartre）。

在公众的眼里，波伏瓦和萨特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儿。但是私下，波伏瓦则在为萨特“偶然的爱”而痛苦不堪。[30]20世纪70年代，在萨特的一个访谈中，谈到他生命中的其他女性时，波伏瓦说她很惧怕多洛雷斯·瓦内蒂，因为萨特十分依恋她。萨特曾把《摩登时代》杂志的第一期献给她，而且在1945年，萨特甚至放弃和波伏瓦共度圣诞。12月12日，他离开巴黎去了美国，陪伴瓦内蒂整整两个月。1982年，戴尔德丽·贝尔向波伏瓦提起了瓦内蒂，她说波伏瓦因此“情绪激动”起来。[31]但是这种描述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很少，什么样的激动，什么样的情绪？是因为嫉妒还是悲伤，这种情绪在30多年后仍然真实可感？还是波伏瓦因为再次被问起这个问题，被评判她和萨特的风流韵事，所以因情绪激动而生气？



1945年，“存在主义攻势”年，波伏瓦在做广播直播。

1945年12月，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存在主义和大众智慧》（*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当时人们仍然指责存在主义，说它是悲观主义哲学，过度地强调人性的阴暗面以及人终有一死。因此波伏瓦故意写了这篇文章来挖苦回应：人类的苦难和必死性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用说，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以及经历苦难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不是存在主义发明创造出来的。[\[32\]](#)人们常常问波伏瓦，做一个存在主义者到底能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着实让波伏瓦感到厌烦，波伏瓦表示，向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怪异的。“康德或者海德格尔也不会自问，相信他们的哲学思想到底能获得什么。哲学家所说的就是他们思考出的真理，别无其他。除了追求真理，哲学家没有别的目标。”[\[33\]](#)

波伏瓦认为真相是，人们在给自己找借口以逃避自由的责

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表达出的悲观主义和法国伦理学家们的道德传统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很多备受拥戴的作家相信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比如帕斯卡和拉罗什福科。其中，帕斯卡认为人性既可以“苦难和卑鄙”也可以“高贵和伟大”，但是人性会倾向于前者，帕斯卡也因此被称为“悲惨主义作家”；后来我们看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延续了这种精神。拉罗什福科在同样悲观的作品《道德箴言录》（*Maximes*）里认为，人类自欺式的自爱，是一种流行的自恋幻想。在他看来，哪怕是慈善行为也只不过是人类伪装起来的利己主义罢了。

熟知法国文化的读者们，没有从萨特笔下的人类境况中看到希望，反倒是看到了他们熟悉的苦难和绝望的哲学。但是波伏瓦很震惊，一个如此陈旧的话题竟然会触犯众怒。人类的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教堂里的神父、帕斯卡、博须埃、马西隆、传道士，甚至整个基督教传统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让教徒们感到痛苦。非宗教的伦理学者们也纷纷攻击了礼数和传统：拉罗什福科、拉封丹、圣西门、坎福特和莫泊桑争相去抨击卑鄙、徒劳和伪善。[34]

波伏瓦认为，基督教和伦理学对于人类存在的模糊性所给出的答案只是一种辩解。如果人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充满罪恶的，本性就是被自私所驱使的，那么人类就会很坦然地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走向苦难，而不是用自由去反抗不公。如果萨特认为人的本性是渴望主导的，那么我们就没法逃脱与压迫者共存的命运。相比较而言，波伏瓦在哲学上拒绝“谎言和放弃所带来的慰藉”。波伏瓦认为想要主导或臣服是人的天性使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借口。[35]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美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

们也毫不费力地放弃自我去相信美德是不可能的。人们不愿去想象美德是可能的、艰难的。[36]

任何一种决定论——不管是基督教的、世俗的、道德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人类在减轻自由所带来的相应的负担。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免除了人们试图以道德的方式使用自由的重担。

波伏瓦声名鹊起之后，也用自己的名气帮助过别人。1945年秋日的一天，波伏瓦和一个朋友在香榭丽舍大道一起排队买电影票，恰好遇到了朋友的旧识。这是一个胸怀抱负的作家，叫作维奥莱特·勒迪克。几天之后，勒迪克把自己的作品手稿拿给波伏瓦看。波伏瓦一口气读完了上半部分，她告诉勒迪克作品有些后劲不足。勒迪克重新修改了手稿，波伏瓦看了之后很喜欢，于是把这本《窒息》（*L'Asphyxie*）推荐给了加缪，加缪欣然接受了她的推荐。[37]在勒迪克后来的生活和事业上，波伏瓦都给了她不少帮助。

萨特不在身边，波伏瓦继续开始创作她的下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同时，波伏瓦也帮助萨特编辑他的演讲稿《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改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版。纳塔莉·索罗金仍然住在波伏瓦所在的路易丝安那酒店，纳塔莉现在怀孕了，正在准备和她的美国大兵男朋友搬到加利福尼亚。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纳塔莉现在很温和，肚子里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纳塔莉散发着母性光辉”。[38]波伏瓦和博斯特仍然是情侣，但是博斯特的记者工作使得他常常出差。尽管萨特几乎从来不在他和波伏瓦的附近，但萨特的名气也让博斯特渐渐感到有些自卑。

1945年圣诞节，波伏瓦和博斯特、奥尔加还有万达一起在赏雪小镇梅杰夫度过。虽然这一年波伏瓦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是她觉得这个滑雪的假期才是她“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当时的波伏瓦已经开始意识到，获得成功并不能使她在个人生活里感到满足，她喜欢这些老朋友所带来的亲密感，旅行中的新鲜空气也让她感到精神振奋。1946年1月中旬，波伏瓦回到巴黎，她突然觉得这种转变很突兀：前一天还在滑雪，“但今天我已经做好了头发，衣着靓丽，光彩照人，旅行中的阳光把我的肤色也晒得恰到好处，这一切都与巴黎格格不入”。[39]在飞往突尼斯之前候机的时候，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出名了，私下里老是被人认出来。有个女士过来问与她同行的科萨两姐妹：“这是不是大名鼎鼎的波伏瓦女士？老是有人跑过来问是不是真的是她。”[40]

那之后，萨特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萨特一直在期盼波伏瓦的来信，还把自己的各种消息寄到突尼斯，但是邮政系统不力，导致他们常常错过彼此的信件。[41]在纽约，波伏瓦的小说给萨特惹了麻烦。多洛雷斯问列维-斯特劳斯怎么看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假装不知道她和萨特的关系，回答说：“你觉得我读完波伏瓦的《女宾》之后还会喜欢萨特？他简直是个肮脏下流的浑蛋。”（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多谢你，把我写成那副模样。”[42]）

与此同时，波伏瓦正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开讲座。她简直不敢相信存在主义在这里“大获成功”：在阿尔及利亚，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听她的讲座。波伏瓦一直没有收到萨特的信件，回到巴黎后才得知博斯特在意大利，纳塔莉已经启程去美国，而萨特仍然在纽约。即使如此，人们已经纷纷开始谈论萨特和瓦内蒂的事情。萨特到处张扬，说瓦内蒂是最美妙的女性。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说她写到这个阶段时，甚至不确定该认为萨特

的行为是“疯狂、变态、愤世嫉俗、投机主义、残忍残酷成性，还是只是单纯的笨拙”。[43]

尽管当时萨特所有的书都没有英文版，但是他在纽约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时代周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报道萨特，把他比作一个来自巴黎、强势进入曼哈顿的“文学雄狮”，并把《存在与虚无》称作存在主义的圣经，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它“最重要的信徒”。[44]

如果波伏瓦知道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她会发现自己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萨特在信里并没有跟波伏瓦说实话，他告诉波伏瓦自己很喜欢纽约，有了一段美国恋情，但是情人瓦内蒂的爱让他感到害怕。萨特甚至告诉波伏瓦自己一直和热情的瓦内蒂保持着距离。[45]但是真相是，当时瓦内蒂已经因为萨特在准备离婚了，而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要和萨特签一个两年的教职合约，萨特也向瓦内蒂求婚了。[46]

后来萨特拒绝了这份教职，瓦内蒂离婚也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俩决定让萨特先回法国，之后再想办法在一起。但是后面的事情，谁知道呢？

1946年2月，波伏瓦回到巴黎，开始写《模糊性的道德》，同时在《摩登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的文章。此时战争已经过去，人们不再隐藏而是公开谈论大屠杀的恐怖，波伏瓦的《以眼还眼》是在讨论惩罚与报复、责任和原谅。波伏瓦认为，人类在本质上都是模糊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意识也是物质。波伏瓦强调，“绝对的恶”是指拒绝承认他者的主体性，把他者看作能被折磨和杀害的物。[47]

3月15日，萨特离开纽约回巴黎。回来之后的萨特总是在对话里绕着多洛雷斯转，这让波伏瓦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几个小

时之后波伏瓦甚至开始感到头疼。[48]1946年4月，波伏瓦情绪低落，她不断问自己：萨特是不是和多洛雷斯产生了和她从未有过的感情？波伏瓦想要摆脱这种不确定性带给她的困扰，她决定不再等待什么合适的时机，直接向萨特提问：“你扪心自问，到底谁对你更重要，是多洛雷斯还是我？”当时波伏瓦和萨特正在去和朋友吃午饭的路上，时间不允许他们长谈。萨特回答：“多洛雷斯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我和你在一起。”[49]午饭席间，波伏瓦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下沉。萨特和自己在一起是为了遵守契约，还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午饭过后，萨特对波伏瓦解释说：“既然我们一直都认为行动比言语更重要，那为什么现在你不这么想了呢？此时此刻，我的人都和你在一起啊。”

波伏瓦觉得自己相信了萨特的辩解。1946年5月，波伏瓦继续写《模糊性的道德》，一想到萨特被瓦内蒂迷得神魂颠倒，就觉得震惊和挣扎。波伏瓦继续阅读哲学，研究黑格尔的冥想概念。波伏瓦也知道自己有时候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她写道，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好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精疲力竭，濒临死亡[50]。但不管是不是真的精疲力竭，波伏瓦还是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5月14日，波伏瓦把四篇稿子交给《摩登时代》，6月1日，《模糊性的道德》的引言出版了。[51]

除了萨特让波伏瓦感到疏远，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她感到不适。现在波伏瓦和萨特都成了名人，他们已经没法像从前那样在咖啡馆里工作、写作了。1945年萨特在美国时，他的继父去世了，萨特的母亲让萨特考虑跟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1946年5月，他搬进了波拿巴大街42号四层的一间公寓，公寓的窗户俯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萨特能够从书房里看到双偶咖啡馆的天台、雷恩街的路口。

萨特重新进入了他母亲的那个资产阶级世界，住进放着伪造

的路易十六家具的家里。不过这间公寓还是很舒适的，萨特也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芒西夫人负责帮萨特置办服装，她的女仆尤金负责清洗衣服。波伏瓦和芒西夫人对彼此都没有太多热情和好感，现在萨特的母亲把这些安排称作“她的第三次婚姻”[52]。

在萨特搬回他母亲的公寓之后不久，传来了一则坏消息。奥尔加本来要出演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但是她突然得了肺结核。29岁的奥尔加在克里希地区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捡回来一条命。博斯特刚刚出版了一本书，但却没空开心；他每天都去医院看望奥尔加，有时候波伏瓦也会陪他一起去。

萨特从美国回来之后，收到巴黎高师的一个热心学生的来信。寄信的是个21岁的年轻人，叫让·科，他觉得萨特可能需要一个秘书，而他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胜任。一开始萨特觉得这很可笑，不过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他叫让·科每天上午来工作三个小时。这一干就是整整11年，让·科帮萨特写那些他不想写的信，后来帮萨特管理财务，这也是萨特无法避免的一项任务。芒西夫人每天早晨10点钟叫让·科进来，之后让打开萨特的信箱。萨特也差不多同时像个骡子一样开始工作。到中午1点钟，萨特会和波伏瓦或者别的女人一起吃午饭，让·科也离开。下午4点半，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回到公寓，波伏瓦会在萨特的书房里架起桥牌桌工作，在那里待到晚上8点。

在1946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四年间，因为有母亲帮他料理家务，还有秘书分担杂事，萨特完成并出版了40部作品。当时波伏瓦也帮萨特编辑和修改他的文章，萨特和波伏瓦仍然会给彼此的作品提意见。波伏瓦给萨特做编辑也不完全是无偿的，一方面波伏瓦自己有写作和编辑工作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从她的信件中也发现萨特的收入是他们的共同收入，尽管他们常常是一有收入就花出去了。[53]由于波伏瓦还要帮衬家人，她没有经济余力

去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和私人助理。

很多读过波伏瓦传记的读者都会忍不住去想象，在萨特和瓦内蒂恋爱的那几年，如果波伏瓦能够结束和萨特的关系，该会有多么轻松。众所周知，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是在15年前制定的，但是大众所不知道的是，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她“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无法言传的联结”，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这种联结就和普通的女性叙事一样：只是通过合法婚姻或者婚外情在一个男性的生命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波伏瓦和萨特的联结是一种智识上的深厚友谊。[\[54\]](#)

这段时间波伏瓦也重新开始和梅洛-庞蒂见面，他将要从萨特那里接手《摩登时代》杂志的日常编辑工作。5月6日，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一起吃了饭，讨论了萨特的哲学。梅洛-庞蒂认为萨特的哲学没有充分分析现实的错综复杂，这让波伏瓦想要继续写完她关于道德模糊性的文章，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太累了[\[55\]](#)。

1946年6月，波伏瓦在《迷宫》（*Labyrinthe*）上发表了《模糊性的道德》的初版引言。在这篇文章里，波伏瓦批判哲学家们常常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抚慰人心的伦理学”来逃避现实。波伏瓦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在经历各种境况里的悲剧式的模糊性，而大部分哲学家的思考都只是在试图掩饰这一点”。[\[56\]](#)波伏瓦认为人类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直面人性模糊性的道德观，而非给人们找借口的道德观。

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她坐着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这一幕被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到了，阿尔贝托说波伏瓦看起

来十分不寻常。波伏瓦解释说当时自己正在思考写点什么，但是毫无头绪。阿尔贝托说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啊。那段时间，波伏瓦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她觉得深受启发，决定写写她自己。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再和萨特一起反复讨论，波伏瓦这次提出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是一种心灵启示的过程。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记载道，她一开始觉得做一个女人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过厌恶，也没有人对她说过“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57]萨特建议波伏瓦要更深入地去思考：波伏瓦没有被当作男孩来养。因此，波伏瓦决定继续探究这个问题，然后她开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男性的世界。波伏瓦童年时曾受到很多谬论的影响，而那些谬论对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所以波伏瓦把写自传的想法放在了一边，一头扎进“女性气质的谬论”的研究中，常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只是专注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而是想要讲述“女性”这个群体的境况。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尽管波伏瓦在1941年的日记里就批判过哲学家们在看待中性和普适性问题上的做作表现，尽管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文章和小说谈及的都是个人问题，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第二性》的灵感来源于很多人认为是萨特启发了波伏瓦创作《第二性》的那段时光。玛格丽特·西

蒙斯指出，如果你真的相信波伏瓦说她在那之前没有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说法和波伏瓦的日记、信件、人生经历，以及她的小说作品都是不相符的。考虑到波伏瓦审慎的性格和深思熟虑的习惯，有一种观点认为，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编造、呈现那样的一个虚假故事。毕竟，波伏瓦在少女时代就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哲学先驱，她甚至为此和父母冷战。波伏瓦也早就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哲人，就意味着要背离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58]少女时代的波伏瓦曾因苦恼于该如何平衡自己的哲学理性和澎湃的情绪，而向自己的老师让娜·梅西耶求助。她的导师鼓励她把情绪看作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27年7月，波伏瓦写道，她想要“继续做一个女性”，但是“想要同时拥有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感性”。[59]

十年之后，在战争年代，即将32岁的波伏瓦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我想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60]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说起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气质”很感兴趣：“我在哪些方面是个女性，又在哪些方面不是个女性，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位我自己，这些仍然需要被定义。”[61]

《时势的力量》中那段描写《第二性》的灵感来源的文字并非表示是萨特构想出了这本书。其实波伏瓦只是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当时的波伏瓦读过了莱里斯的作品，就这个课题做了笔记，在开始写作的同时也和萨特一起讨论。[62]就像以往一样，萨特并非波伏瓦思想的来源，而是其思想上无法替代的伙伴，是谈话中的催化剂。波伏瓦后来创造的“境况”（situation）概念，成了《第二性》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哲学原创性。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者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

建构出来的境况”。[63]

1946年夏，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在日内瓦，波伏瓦和当地的学生交谈，之后在洛桑市做了一场公开演讲。离开日内瓦之后，波伏瓦和萨特又继续前往夏特弗里堡、纳沙泰尔、巴塞尔。波伏瓦当时在为第三本小说《人都是要死的》收尾，而萨特在创作更多的剧本。

这次旅行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分开行动，他去找万达，波伏瓦去意大利东北部白云石山脉徒步。波伏瓦通过徒步来逃离都市生活，在大自然里休憩身心。10月，波伏瓦和萨特会合，然后一起去罗马安安静静地写作。[64]

1946年12月，《人都是要死的》出版了。这部小说和波伏瓦其他的小说不一样，因为其中推动情节的不再是小说主人公的内在，而是变成了历史的发展。这本小说也没有波伏瓦的其他几部小说名气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其他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以萨特为原型的主人公，而这部小说里没有。和《他人的血》类似，叙述者福斯卡伯爵也是男性，故事也是在夜晚开始讲述的。但是不同于《他人的血》的主人公让·布洛马尔，福斯卡伯爵是长生不老的。福斯卡伯爵1279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经历了6个世纪，之后还会一直永生。福斯卡伯爵之所以选择永生，是因为他相信这能够让他为历史编排一些长久的变化。福斯卡伯爵想要通过成为世界主宰的方式，统领一切，消除饥荒和战争，从而让地球上的众生和平繁荣。

波伏瓦在欧洲历史的重要节点穿插着讲述福斯卡的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德国（路德宗教改革正盛，权威衰落，个人意识崛起）。然而，不管是在13世纪还是16世纪，福斯卡都不得不目睹战争的发生。福斯卡想要带领社会改革，想要去帮

助最贫穷的人，但是在每个世纪，他都会遇到各种阻碍。对欧洲失去信心之后，福斯卡以为新世界也许不会被旧世界的传统所带来的野蛮玷污。但是抵达美洲之后，他看到的却是遭到破坏的印加人文明以及被剥削和奴役的南美洲原住民。人们还告诉他：非洲黑人和美洲野蛮人没有灵魂，因此，他们的死亡和苦难不该成为欧洲人实现淘金梦的阻碍。[65]看到这些被合理化的罪恶，福斯卡开始怀疑善良和美德的意义。[66]

福斯卡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一个听众：雷吉娜，一个20世纪的自恋女性。雷吉娜相信通过得到一个永生不朽的男人的爱，她就能够获得不朽。雷吉娜认为被福斯卡爱就能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实际上福斯卡的长生不老只会使她成为他无穷多的情人中的一个而已。道德的真诚在福斯卡和雷吉娜身上都无迹可寻，反倒是另一个角色阿曼德，他满足于自己拥有的有限时间，因而他身上闪烁着道德的光芒。波伏瓦想要通过一种“想象的体验”而不是说教的方式，在《人都是要死的》中再现《皮洛士与息涅阿斯》里面的道德观。[67]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进一步沿用了这种不朽的叙事者以及历史的结构：“男人一直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68]就像伊丽莎白·法雷泽所言，《人都是要死的》里面的女性角色“几乎都表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大多女性历来处于边缘地位”。[69]我们从中读到女性不得不依赖男性，读到包办婚姻，读到女性作为社会的消耗性零件被遗弃乃至死亡。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福斯卡的情人有想要资助科研的，也有想要建立大学的。但对于每个情人，福斯卡都会问同一个问题：爱意味着什么？

自20世纪40年代早期，波伏瓦就开始思考历史的问题。“二战”之后，波伏瓦认真地思考自己该站的立场：究竟是那些预言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虚无主义的先知派”，还是那些“沉浸在岁月静好里的假象派”。波伏瓦在政治上并不认同当代共产主义，在哲学上她也不赞同黑格尔，因此波伏瓦认为人类的未来并非统一而进步的。^[70]对于历史的发展，波伏瓦从来都不持乐观主义态度，她想要通过福斯卡的故事来表达：“愚蠢的战争、混乱的经济、无用的反抗、徒劳的屠杀、并未有任何改善的人类生活。此刻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混乱的，停滞不前的。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了它。”^[71]

《人都是要死的》问的不是“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

^[1] 见Cohen-Solal, Sartre, p.237.

^[2] SdB to S, 26 July 1945, LS 386 n. 321.

^[3] FC 46.

^[4] Jean Lacroix, 'Charité chrétienne et justice politique', *Esprit* 1945(February).

^[5] BO, 封底。

^[6] BO 128.

^[7] BO 129.

^[8] BO 174.

^[9] UM 3.

^[10] 见BO 9.

^[11] BO 17.

^[12] BO 51.

^[13] BO 102.

^[14] 关于让，见BO 106; 关于马塞尔，见BO 126.

^[15] PL 607.

[16] FC 44, 45.

[17] WD 322, 29 January 1941.

[18] UM 66.

[19] SdB to her mother, in Bair, p.267.

[20] A. Collingnon, 'Bouches inutiles aux Carrefours', *Opéra*, 31 October 1944.

[21] FC 59.

[22] Jean-Jacques Gautier, writing in *figaro*, 引自Maragaret A. Simons, 'Introduction'to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PW 263.

[23] 引自UM 25.

[24] Emmanuel Levinas, in Jean Wahl, *Petite histoire de l'existentialisme*, Paris: éditions Club Maintenant, 1946, pp.84–6.

[25] 之后在1946年以“文学和形而上学”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为题出版。

[26] Maurice Merleau-Ponty, 'Metaphysics and the Novel', trans. Hubert Dreyfus and Patricia Allen Dreyfus,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28. First published as 'Le roman et la métaphysique', *Cahiers du sud* 270 (March 1945).

[27]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PW 270.

[28]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PW 274.在《文学和形而上学》中，波伏瓦区分了形而上学的两种哲学家：一种是“系统的”哲学家，一种是“主体性的”哲学家。波伏瓦写道，如果要前者去写小说会很荒诞，比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因为他们对主体性和时间性不感兴趣。但是像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哲学家本来就喜欢用文学的形式去表达独立个体在时间中展开的真理。

[29] 见Jonathan Webber,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

[30] FC 164.

[31] Bair, p.302.

[32]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10.

[33]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14.

[34]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04, 205.

[35]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16.

[36] ‘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 PW 213.

[37] FC 27. 又见LS 390 n. 350.

[38] SdB to JPS, 25 January 1946, LS 400.

[39] SdB to Sartre, 18 January 1946, LS 395.

[40] SdB to Sartre, 18 January 1946, LS 397.

[41] Sartre to SdB, February 1946 (n.d.), QM 274.

[42] Sartre to SdB, February 1946 (n.d.), QM 275.

[43] Cohen-Solal, Sartre, p.279.

[44] TIME (1946) ‘Existentialism’, 28 January, 28–9.

[45] Sartre to SdB January 1946 (n.d.), QM 274. 萨特之后在1946年2月也表达过类似的情绪。

[46] 见Jean-Pierre Boulé, *Sartre, Self-formation and Masculinities*, p.168.

[47] Beauvoir, ‘An Eye for an Eye’, in Margaret Simons, 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245–60, here p.257.

[48] FC 87.

[49] FC 78.

[50] FC 84.

[51] 见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Chronologie’, xc. FC 92.

[52] ASD 105.

[53] 例如，1946年1月25日波伏瓦给萨特的信，“我们刚出了30万法郎”。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信件提到“我们的财务状况”。（见SdB toSartre, 20 August 1950, LS 472).

[54] FC 171.

[55] 见FC 70, 84.

[56] ‘Introduction to an Ethics of Ambiguity’, PW 290.

[57] FC 103.

[58] DPS 259, 19 May 1927.

[59] DPS 284, 19 July 1927.

[60] WD 3 November 1939.

[61] WD 133.

[62] 见SdB, in SdB,Simons and Todd,‘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Hypatia* 3:3 (1989): 17.

[63] *La Force de l’age*, p.417, 引自Simons, 2010, p.921.

[64] Sartre to SdB, QM 277–8.

[65] AMM 187.

[66] FC 72.

[67] FC 75.

[68] SSP 187.

[69] Elizabeth Fallaize, *The novels of Simone de Beauvoir*, p.83.

[70] FC 73.

[71] FC 72.

第十一章

美国困境

1947年1月25日，波伏瓦搭上去纽约的飞机，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月重要的时光。波伏瓦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英美小说，儿时读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和乔治·爱略特，后来也很欣赏海明威、伍尔夫以及很多其他英美作家。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的法国记者、超现实主义诗人菲利普·苏波帮波伏瓦安排了美国巡回讲座，对此，波伏瓦高兴极了。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驻美领事馆的文化部工作，他负责安排承担了波伏瓦美国之行的费用。而在波伏瓦离开法国时，多洛雷斯·瓦内蒂则即将去巴黎，跟萨特待上一段时间。

波伏瓦下了飞机过安检，移民局官员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波伏瓦的签证上写着：讲座。官员问：“关于什么的讲座？”波伏瓦说：“哲学。”来机场接波伏瓦的是法国文化服务中心的一名女士，她带波伏瓦吃了一顿龙虾晚餐，然后前往她在市中心的酒店。正式的接风洗尘结束后，波伏瓦立刻动身去曼哈顿，她一边大步地走在街道上，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虽然此前波伏瓦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真的看到这一切时，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百老汇、时代广场、华尔街、自由女神像。波伏瓦在这里感觉自由极了，没有人会盯着她看。^[1]

波伏瓦对纽约充满了惊奇：人们把信件扔进邮筒里，从机器里面买东西，他们讲起话来就好像她和萨特都喜欢的电影里的人

物一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波伏瓦和萨特就同时对美国 and 苏联产生了一种喜爱：他们喜欢爵士乐、非裔美国人圣歌、蓝调、美国电影和美国小说。不过波伏瓦和萨特也都认同，美国庇护了那些最可恨的资本主义压迫，他们也憎恨美国对穷人的剥削，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虽然苏联的艺术魅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很钦佩苏联的社会实验。[2]

波伏瓦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既好奇又警惕。虽然当地的白人都建议波伏瓦不要独自一人去哈林区，但她还是一个人去哈林区散步，就像她当年无视朋友们不要在马赛搭便车的警告一样。波伏瓦还尝试了苏格兰威士忌，在她看来这是打开美国大门的其中一把钥匙；虽然起初她不喜欢，但很快就适应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3]起初，波伏瓦用英语给酒店前台打电话或者预约时，多少会有点不自在，不过她渐渐克服了这些，变得自如起来。

当时多洛雷斯·瓦内蒂还没有离开纽约，波伏瓦想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瓦内蒂也答应要介绍几个编辑给波伏瓦认识，所以波伏瓦主动约多洛雷斯在第五大道的雪梨荷兰酒店喝一杯。她们一起喝威士忌，尽管一开始双方都有点紧张，不过那天她们一直聊到夜里三点钟。

在头脑里勾画了这个女人几个月之后，波伏瓦现在终于见到了真人，感到很高兴。[4]波伏瓦现在明白了萨特的感受，她在给萨特的信里写道：“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也尊重你的选择。”不久之后，瓦内蒂邀请波伏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帮她和几家美国报纸和杂志牵头联系。当时波伏瓦会写一些关于女性作家和女性气质的文章，赚一些零花钱。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第二性》出版前的两年，波伏瓦就已经开始分析“一战”是如何改变了

女性的境况，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但是女性已经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偿工作。[5]

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和一对异种族结合的夫妻埃伦·赖特和理查德·赖特成了好朋友，之后几十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理查德是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和《黑孩子》（*Black Boy*）的作者；埃伦后来创立了一家文学经纪公司，波伏瓦成了她的终身客户。[6]1940年，波伏瓦第一次读到赖特的作品，当时《摩登时代》的创刊号杂志发表了赖特的一个故事：《火与云》（*Fire and Cloud*）。赖特认为波伏瓦和萨特能敏锐地感受到人类的困境，没有什么能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不久，波伏瓦就把赖特夫妇在查尔斯街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5岁的女儿喜欢她，这让波伏瓦有点吃惊。他们的朋友也很喜欢波伏瓦，赖特夫妇把她介绍给了知识分子伯纳德·沃尔夫，沃尔夫曾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时的秘书，写过关于蓝调音乐的书。知道波伏瓦想听真正的爵士乐之后，沃尔夫给她安排了门票，去卡耐基音乐厅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奏会。[7]

理查德·赖特还向波伏瓦介绍了一本书，这本书改变了她的想法：《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出版于1944年，是当时研究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最著名论著。[195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废除种族隔离审判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也引用了这部作品，到1965年，该书售出10万册。]默达尔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陷入恶性循环，而是由他所谓的“累积原则”导致的。他认为白人一直在压迫有色人种，还指责他们糟糕的表现。除非白人能够消除偏见，或者美国黑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将继续危害整个社

会。美国的政治理想——如平等、精英统治和机会——都没有考虑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黑人都受制于压迫、偏见和排斥。这部作品写于民权运动之前，默达尔提出，很多美国白人并不了解黑人同胞所面临的情况。因此，默达尔认为增强意识是改善种族歧视状况的关键，因为与“恶性循环”不同，累积原则可以是双向的：既可以往“向上的”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往“向下的”人们不希望的方向发展[8]。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乐于接受新思想的国家，波伏瓦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纽约客》采访了波伏瓦，报道了她访问美国的行程，称波伏瓦为“萨特的精神伴侣”以及“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9]

2月中旬，波伏瓦离开纽约，开始了一场为期24天的全美巡回演讲，主题是“战后作家的道德问题”。波伏瓦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法国女性作家的文章：《女性文学的问题》（*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和《文学女性》（*Women of Letters*）。《法国美国》杂志（*France-Amérique*）介绍波伏瓦时，说她是“哲学家、记者、小说家”。女性文学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女性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波伏瓦认为，女性的局限在于她们所处的环境，而不是天生能力的不足：

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且仅仅是男人，创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属于他们。女人虽然立足其中，却从来都是束手束脚的；男人探索自己主宰的领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了解它，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去统治它，甚至通过艺术的方法去重新创造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不过最近几年，女性的境况完全不一样了。[10]

近年来，女性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赢得了选举权（比如在法国），还可以接受教育，拥有了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加深对自我内在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11]但是波伏瓦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女性气质常常被认为是谦逊的象征，女性缺乏胆量，也害怕承担胆量所带来的后果。波伏瓦写道，女性在孩童时代还有一些自主权，但是长大后就被鼓励为了幸福和爱情放弃这种自主权。^[12]

波伏瓦有一场演讲在芝加哥，她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波伏瓦到达芝加哥时，街道上大雪纷飞，风城的绰号名副其实。寒冷的天气让波伏瓦不想一个人探索这个城市，她在纽约的朋友让她去找一个人：纳尔逊·阿尔格伦。阿尔格伦是个表面上十分硬汉的小说家，他描写美国底层人的生活，尤其是瘾君子 and 妓女。

波伏瓦试着给阿尔格伦打了三次电话，但是因为波伏瓦发不准他名字的音节，老是被他挂电话。第三次之后，波伏瓦找了一个美国人帮忙，那天晚上他们在酒店的酒吧见面了。^[13]当时阿尔格伦38岁，比波伏瓦小一岁，人高马大，收拾得很精神。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已经看厌了美国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到目前为止，因为巡回演讲的缘故，波伏瓦总是辗转于一家又一家的高档酒店。做了这么多次演讲，波伏瓦见惯了各种午餐会和龙虾大餐，她问阿尔格伦能不能带她见识一下真正的芝加哥。

阿尔格伦当然能，他确实这么做了。阿尔格伦带波伏瓦去了以“红灯区、廉价劣质酒、下流舞蹈”而闻名的波威里街。^[14]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一起去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之后在一个黑人俱乐部听爵士乐。当时，阿尔格伦几乎不会说法语，而波伏瓦的英语也是马马虎虎凑合用。但是那天晚上，阿尔格伦向波伏瓦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底特律，在芝加哥南部的贫困地区长大。他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犹太人。但是阿尔格伦对这两

种身份都没有什么认同感。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新闻，然后乘火车环游了美国南部。有一次，阿尔格伦在得克萨斯州偷了一台打字机，结果坐了4个月牢。阿尔格伦本来要去在法国的军队服兵役，但是在途经纽约时他改变了主意，又原路返回。除此之外，阿尔格伦几乎没有离开过芝加哥。阿尔格伦很喜欢写作，他觉得波伏瓦应该好好看看美国。

那天晚上分开时，他们约定第二天再见。第二天，波伏瓦在法兰西联盟酒店吃了午饭，吃完午饭后，她要求主办方的接待者把她送到阿尔格伦的住处。显然，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很惊讶波伏瓦想要去拜访那一带街区。他们开着车，经过一片片空地和废弃的仓库，最后来到了西瓦班西亚大道1523号。阿尔格伦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报纸和杂物，厨房里生着火，床上放着一条颜色鲜艳的墨西哥毯子。波伏瓦没有在阿尔格伦的家里逗留，他想带她去周围走走看看。波伏瓦和阿尔格伦在严寒中漫步，然后去喝了点酒暖暖身子，不一会儿波伏瓦就离开了，她得去和法国领事馆那些衣着光鲜的绅士共进晚餐了。

第二天早上，波伏瓦坐上了去往洛杉矶的火车。两天之后，波伏瓦抵达了洛杉矶，来车站接她的是她之前的学生兼情人纳塔莉·索罗金。纳塔莉和她的丈夫伊万·莫法特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住在韦斯特伍德。纳塔莉开车载着波伏瓦来到她家的公寓，莫法特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莫法特是个小有成就的编剧，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很喜欢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甚至把它推荐给自已的制片人朋友乔治·史蒂文斯。他们讨论着若是请葛丽泰·嘉宝和克洛德·瑞恩斯来做主演，应该可以票房大卖。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如果拍电影，能赚3万美金，这难道不让人头晕目眩吗？”^[15]（波伏瓦希望明年自己会因为这件事再来美国，但是很不幸这个电影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形。^[16]）几天

后，纳塔莉和波伏瓦开始了一场美国公路旅行，纳塔莉开着她丈夫的红色帕卡德车一路驶向旧金山，到达了能够看到内华达山脉天际线的孤松镇，在那里和莫法特以及乔治·史蒂文斯会合。

回到洛杉矶后，波伏瓦和纳塔莉搭乘灰狗巴士前往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波伏瓦和纳塔莉一起旅行了三个星期：从圣达菲、休斯敦、新奥尔良、佛罗里达，最后到纽约，一路上波伏瓦同时进行着自己的巡回演讲。虽然行程劳累，但是波伏瓦很享受在旅行中观察和学习。波伏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在酒会和晚宴上与听众、大学教师、学生们聊天。波伏瓦阅读美国书籍，记录自己看到的美国人的生活。在这次巡回演讲访问之后，她出版了一本游记《波伏瓦美国纪行》（*America Day by Day*）。书里有不少热情洋溢的文字，波伏瓦说，在去纽约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会像爱巴黎那样爱另一个城市”。[17]

3月12日，波伏瓦回到纽约，给阿尔格伦寄了一封信——阿尔格伦也给她曾在芝加哥的旅馆寄了一些书，但那时候波伏瓦已经退房了所以没有收到。阿尔格伦还寄信问波伏瓦能否再来芝加哥。波伏瓦说她不确定，因为她在纽约还有很多讲座要做，4月的时候也许可以再去芝加哥。

波伏瓦的美国巡回演讲被各种时尚杂志和大学报纸报道。3月中旬，《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女性气质：陷阱”（*Femininity : The Trap*），称波伏瓦为“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信徒”。这种讽刺的描述还是一直伴随着波伏瓦，也有杂志称她为“像男人一样思考的女人”“一个苗条帅气的38岁法国女人”，不知道当时的波伏瓦有没有厌烦这样的描述。这本杂志同期还刊登了一篇关于安德烈·马尔罗的文章，将他描述为“文学上的强者”“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敌人”。（读者不禁会疑惑安德烈哪里苗条、帅气了。）

波伏瓦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被宣传为一篇关于“法国女性的新角色”的文章，这篇杂志文章有些段落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性》中。不过我们不清楚当时波伏瓦是把书中的内容提前发在了杂志上，还是后来把她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用到了书中。^[18]从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时尚》的编辑琼·康迪特在波伏瓦到达纽约后不久就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2月6日，她同意为他们撰稿，并在2月12日向打字员口授了自己的文章。^[19]

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清楚地陈述了她成熟的女性主义观的核心主张之一：“最让人恼火和虚假的谬论就是在女性的帮助下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女性是凭直觉行事的、迷人的、敏感的。”^[20]波伏瓦指出，这种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常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因而让女性感到分裂。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赋予了女人在男性眼中的价值，但是女人也因此害怕一旦女性气质缺失，自己就失去了价值。尽管女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和事业成就实现自己眼里的价值，然而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21]但为什么获得成功（或者魅力）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

在美国期间，波伏瓦注意到一些事情，想要写进她关于女性的那本书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外国人身份，波伏瓦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她在《波伏瓦美国纪行》中写道，她惊讶地发现美国女性并没有法国女性那么

自由。在访问美国之前，波伏瓦把“美国女性”当作“自由女性”的代名词；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她发现美国的未婚女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颇为震惊。起初，她写道：“美国女性着装的女性化程度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而且往往极尽性感，着实让我震惊。这里的女性杂志，不仅种类比法国的要多出很多，而且有很多关于如何钓到金龟婿的长篇大论。”在波伏瓦眼里，美国的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不喜欢，也因此的关系中互相争斗。波伏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男性往往惜字如金，而对话是友谊的必要条件；另一部分是因为男女之间互相不信任。”^[22]

4月中旬，波伏瓦回到纽约，她下榻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布雷武特酒店。波伏瓦和赖特夫妇以及伯纳德·沃尔夫见了面。波伏瓦原定于5月10日离开美国回巴黎，她写信给萨特，希望他能她的归来好好安排一下——她只想见见萨特和博斯特，还问萨特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度假叙旧。

波伏瓦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和萨特分享，她在纽约周边的很多大学和学院进行了讲座——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梅肯学院、奥柏林学院、米尔斯学院、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和史密斯学院。但是，即使是大学里的校报，都仍在报道中拿波伏瓦的外表和她与萨特的关系做文章。比如，《普林斯顿日报》（*The Daily Princetonian*）这样报道：“优雅迷人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存在主义在美国的女性大使，告诉听众，作家们不能再脱离大众，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23]

在象牙塔外，波伏瓦与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一起看到的美国让她大开眼界。当波伏瓦和赖特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两个白人女性和一个黑人男性一起外出的时候，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载他们。赖特带她去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

(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听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的政治布道[24]，还带她去参观黑人哈林区的一座简陋的教堂[25]。赖特的小说《土生子》讲述了20岁的黑人小伙儿比格·托马斯的故事，引发了詹姆斯·鲍德温和弗朗茨·法农等人讨论身为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赖特夫妇让波伏瓦见识到了美国的种族隔离：“从摇篮到坟墓，工作、吃饭、恋爱、散步、跳舞、祈祷时，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黑人，这让他时时刻刻都意识到‘黑人’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之相对的整个白人世界。”[26]

对于波伏瓦来说，白天和赖特夫妇在一起，在大街上受到出租车司机和行人的冷落，晚上却受到名流们的款待，这种落差着实有些怪异。有一次，波伏瓦在新学院（New School，一个新成立的激进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波伏瓦与达达主义画家马塞尔·杜尚共进晚餐，然后去参加埃尔温·皮斯卡托为她举办的大型派对。参加这个派对的还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作曲家库尔特·魏尔，甚至还有查理·卓别林。波伏瓦和卓别林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但是当另一位客人提议波伏瓦应当承认卓别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时，场面变得有点尴尬，波伏瓦称这一幕“简直荒唐可笑”[27]。

《波伏瓦美国纪行》很快被译成英语，1952年首先在英国出版，被讽刺为“格列佛小姐美国游记”。1953年，美版面世，但是删掉了波伏瓦对于美国种族隔离的讨论。波伏瓦的作品不止一次遭遇到删改：英文版的《第二性》也删掉了大量波伏瓦对于压迫的分析。1953年，人们认为美国公众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波伏瓦关于种族问题的看法。不过，近期一些学者认为，波伏瓦的分析是“20世纪对美国最透彻的两种分析之一”。[28]

4月24日，波伏瓦写信给萨特，说她回巴黎后想先见博斯特一面，然后和他一起去度假。因为还有几天空闲时间，于是她给

纳尔逊·阿尔格伦打了个电话，问是否可以去看他。波伏瓦飞去了芝加哥，和纳尔逊度过了三天的亲密时光。三天之后，波伏瓦回到纽约，她收到了萨特的回信。萨特已经在路易丝安那酒店帮她订好了“粉色房间”，并答应她会去机场大巴那里接她。

5月1日，伯纳德·沃尔夫带波伏瓦去了一个抽大麻的派对。波伏瓦也想试试，纽约人告诉她一支就能让她飘飘欲仙，但是波伏瓦抽了六支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波伏瓦对于自己没有因为大麻香烟而飘飘欲仙感到恼火，于是她一个人喝了半瓶威士忌。但是半瓶威士忌下肚之后，波伏瓦也只是微醺而已，在场的美国人都震惊不已。[29]

5月3日，波伏瓦收到萨特的来信。瓦内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她希望波伏瓦能在纽约多待一个星期。收到信那天是周六，阴雨绵绵的，读完信之后，波伏瓦有些崩溃，像过去那样痛苦流泪。五天过后，波伏瓦才给萨特回信，在信中她说，这个消息让自己伤透了心，但是想到比萨特希望的早回国，她又感到无法接受。虽然有些棘手，但波伏瓦最终还是改签了机票，5月6日的时候一切都安排好了：波伏瓦将会在5月18日周日那天上午10点半抵达巴黎。波伏瓦不想在回去之后的几天里与别人分享萨特，所以她让萨特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他们能好好地待一段时间。波伏瓦还在信末附上了写给博斯特的话，说自己对他甚是想念，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30]

5月10日，波伏瓦登上了飞往芝加哥的飞机，10点左右抵达。波伏瓦和纳尔逊之后把这一天称为他们的“纪念日”。第二天，纳尔逊送给波伏瓦一枚廉价的墨西哥戒指，波伏瓦说她要一辈子都戴着它。

波伏瓦和纳尔逊度过了一周的时间，5月17日波伏瓦登上了

回巴黎的飞机。在纽芬兰转机时，波伏瓦给纳尔逊写了第一封信。波伏瓦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就哭了，但是泪水是甜的。波伏瓦写道：“我们永远不需要醒来，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精彩而又真实的故事。”^[31]波伏瓦在这封信里称呼纳尔逊为“我珍爱的芝加哥男人”。^[32]不久之后，纳尔逊会成为波伏瓦“最亲爱的美国难题”。^[33]

波伏瓦希望巴黎的美能冲淡她的悲伤。波伏瓦抵达巴黎那天，她很高兴，但是第二天，巴黎的天灰蒙蒙的，不见一丝生气。波伏瓦在给纳尔逊的信里写道：“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死了。”瓦内蒂还在巴黎，但是纳尔逊却不在。波伏瓦写信给纳尔逊，说只要他们中的一人手头宽裕就让他来巴黎。波伏瓦身在巴黎，但是心却在大西洋彼岸的某个地方，她感到既痛苦又茫然。

5月21日，波伏瓦带着书籍和笔记本离开巴黎去到切瓦雷里山谷中的圣兰伯特村。一英里外有一座修道院废墟，曾经是皇家香槟港，哲学家帕斯卡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诗人拉辛也在那里求过学。在巴黎，波伏瓦身边既没有阿尔格伦，还得跟瓦内蒂分享萨特。她需要独处来找回自己的宁静。萨特之前答应过要和波伏瓦在一起待两周，毕竟他也想见她，于是萨特把时间拆分给巴黎和圣兰伯特两地。瓦内蒂对于波伏瓦的归来感到十分不满，两周之后萨特又回到巴黎，回到瓦内蒂身边。波伏瓦还留在圣兰伯特村，偶尔她会因为《摩登时代》杂志的工作需要，以及看朋友回一趟巴黎。

这段时间，波伏瓦疲惫不堪，甚至有些抑郁。波伏瓦比平常要睡得更久，有时候她会沿着小路走到皇家港，那里有一首拉辛的诗歌，写得不怎么样，赞美了大自然的自由、清澈和真实，还有这片乡村的“充裕的孤独”。波伏瓦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用他送给她的红色自来水笔写信给他。波伏瓦告诉阿尔格

伦，她平日里从来都不戴戒指，这次从美国回来，她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了她手指上的戒指：“巴黎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34]

5月底，在圣兰伯特，波伏瓦重读了自己在1946年底写的关于女性的文字，也就是《第二性》的早期素材。有一段时间，波伏瓦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写作。[35]6月6日，波伏瓦决定在写完她的旅行游记之前不再动笔写“关于女人的书”，她开始全神贯注地写《波伏瓦美国纪行》，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我们从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能看到很多她日常生活的细节：她写了什么，她在出版商的鸡尾酒会上见了谁，等等。波伏瓦想让阿尔格伦学习法语，于是在信里附上一些法语散文段落让阿尔格伦翻译。她告诉阿尔格伦这些是绝佳的法文，应该会让他有学习的动力。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默达尔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以及和理查德·赖特的对话都对她那本女性之书深有启发[36]，让她重新开始思考书写女性境况。“我想写一本重要性可以媲美这本黑人著作的书。”[37]默达尔为非裔美国人所做的事情，波伏瓦也想要为女性做，她想要展示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在面对女性议题时，人们是如何寻找托词的。



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纳尔逊·阿尔格伦在芝加哥。

波伏瓦在信里鲜少谈到萨特，就更别提瓦内蒂了。到了7

月，瓦内蒂乘船从勒哈弗尔离开法国，并再次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波伏瓦再出现在她和萨特之间，她就要分手。萨特感到十分痛苦，波伏瓦也同样痛苦。波伏瓦回到法国已经两个月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7月，阿尔格伦写信给波伏瓦说希望她下一次来芝加哥就不要再离开了。7月23日，波伏瓦回信说她做不到。她爱着阿尔格伦，但是她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给他。波伏瓦不想对阿尔格伦撒谎，她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在没有准备好付出一切的情况下，自己只付出一部分是对的吗？”^[38]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尽管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和焦虑，她还是希望向阿尔格伦坦白她的真实想法。

阿尔格伦在回信中向波伏瓦求婚了。他本来打算当面向波伏瓦求婚的，但是波伏瓦的信使得他不得不在信里就提出来。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想要在一起，但是两个人都知道有一个问题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不想离开芝加哥，而她也不想离开巴黎。阿尔格伦以前结过婚，和波伏瓦刚见面不久，他就觉得比起跟他有过七年婚姻的前妻，波伏瓦更像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一种不那么传统的方法来处理未来的关系：她将会来芝加哥和他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巴黎；之后他会去法国看她。

8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了哥本哈根和瑞典。9月6日，她登上飞往芝加哥的飞机。萨特鼓励她去，甚至提出要出钱让她去。到芝加哥以后，阿尔格伦带波伏瓦游览了这座城市：

我想让她知道，美国不完全是由富裕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朝着拥有郊区住宅和乡村俱乐部会员的目标前进。我想让她看看那些头也不回地走向监狱的人。我带她认识了一些抢劫犯、皮条客、偷行李的贼、妓女

和癮君子。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堕落，一直都是如此。那时候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带她参观了县监狱，给她看了电椅。[39]

波伏瓦为自己的书做了笔记，他们坐在芝加哥的比萨店里，喝着基安蒂酒。这次相聚接近尾声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约定在1948年春天再次见面，一起旅行四个月。但即便如此，在离开阿尔格伦之后，波伏瓦还是用蹩脚的英语写信给他，告诉他们在他们分别时，她的心都碎了。阿尔格伦仍然想娶波伏瓦，但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尽管为了和他在一起她愿意放弃很多，但她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而活，我不能放弃在巴黎写作和工作，因为只有在这里，我的写作和工作才有意义。”[40]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将境况概念置于首要地位：她认为个人生活和个人作品的文化背景很重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波伏瓦才看不到她的洞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发法国以外的地方。

1947年9月底，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又有了新的恋情，瓦内蒂对其掌控已经渐渐松懈。萨特的新宠儿是23岁的美国记者萨莉·斯温·谢利，她是来巴黎报道伊丽莎白公主来访的。当这段恋情结束时，斯温会明白萨特对待女人就像对待梳妆台的抽屉一样，想打开哪一个就打开哪一个，但在那时候，萨莉·斯温疯狂地迷恋着萨特。[41]

1947年11月，波伏瓦发表了她的第二篇哲学论文《模糊性的道德》，进一步阐发了她的自由哲学观点。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提出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波伏瓦重新回到萨特坚不可摧的、自主的自由概念，以及她的《以眼还眼》的主题上。战争让波伏瓦了解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暴行，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

她也无法理解人类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波伏瓦认为，纳粹是有计划地贬损那些他们想要消灭的人，这样他们的同胞就不会再把他们看作人类以及有自主意识的主体。[42]

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需要他人的自由，因为只有他人的自由才能阻止我们一步步陷入把自己看作物体或者客体的状态。[43]波伏瓦认为，否定自由是邪恶的，无论否定的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因此，为了与邪恶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肯定个人自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影响当下和未来，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

然而，这并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赖状态存在，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这种方式要舒服得多。作为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孩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有规律的、令人安心的特征，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特征，更不用说去质疑了：女孩要穿裙子，8点钟就得上床睡觉。但有些成年人对世界仍然有着相同的被动接受态度：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晚上9点就要实行宵禁。

波伏瓦认为，被动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种自欺行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做出她所说的（和萨特一样的）“原创的选择”。我们必须去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都做出这种选择。[44]波伏瓦再次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自由概念（到此时，在她的影响下，萨特已经开始改变自己曾经的想法了）。在波伏瓦看来，没有人能独自获得自由：“一个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在对抗他人，最终会失去自我。”[45]对于萨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回应说，我们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出现在

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46]

1948年，英文版《模糊性的道德》出版，当时还没有英文版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而《第二性》也只是被选择性地翻译成了英文。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这部作品如何推动了波伏瓦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为她之后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波伏瓦仍然在思考“境况”的概念，以及他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在《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波伏瓦指出，为了在道德上获得自由，你必须用你的自由去拥抱将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波伏瓦称这是对他人自由的“呼吁”或者“召唤”。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真正地看到，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生命，而且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想要成为“合理化”的存在，想要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顾及自己，而不去理会他人对于自由的呼唤，这就是唯我论，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一种阻碍自身成长的拒绝行为。只有与他人一起，我们才能实现某项事业、某个价值观，甚至改变世界。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的脚注中，萨特写道，他将写一部关于“解脱与救赎”的伦理学著作，以此作为《存在与虚无》中黯淡无望、遍布冲突的人类世界的解药。尽管萨特为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写过笔记，但他在世时并未将其出版，而萨特绝不是一个不乐于出版作品的人（《经济学人》杂志统计过萨特的出版量，在他创作期间，相当于平均每天出版20页）。如今，有人认为波伏瓦的伦理学著作是在完成“萨特未兑现的诺言”。^[47]但是在1947年，弗朗西斯·让松的《萨特和道德问题》（*Sartr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问世了。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读者“第一次”能够在书中一窥自由伦理——“如果忽略波伏瓦那有趣的《模糊性的道德》的话”。^[48]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忽略波伏瓦的

作品，我们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怎样，很明确的是，直到1948年，波伏瓦仍然不被哲学评论家们重视，同时她也厌烦了大众对于她没能把哲学大众化而做出的“无能”“不专业”的指责——他们怎么能指望波伏瓦用一句话就解释清楚存在主义呢？所以现在的波伏瓦，一边被哲学精英圈子排斥，一边被大众指责有哲学精英的做派。波伏瓦想成为一名联结社会和大众的作家，这就是她除了写哲学还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原因。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读区区一句口号就理解康德或者黑格尔，但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可以做到这一点？[49]在波伏瓦看来，理解存在主义需要理解它所依据的悠久的哲学传统。在这个阶段，波伏瓦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并不适合每个人；相比之下，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向读者展示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吸引读者。

1948年1月，波伏瓦将《波伏瓦美国纪行》提交给了出版社，同时她给这本书题词献给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之后波伏瓦开始专注于她那部女性作品了。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计划从5月到9月一起旅行，所以她想旅行开始之前尽可能多地写作。当波伏瓦离开去找阿尔格伦的时候，萨特计划让瓦内蒂来巴黎住一段时间（不过萨特得暂时不去见萨莉了，因为瓦内蒂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波伏瓦也渐渐开始犹豫自己是否应该离开巴黎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萨特，另一方面是因为波伏瓦计划在5月至7月出版一部分《第二性》。她和萨特谈了谈，决定把旅行时间缩短到两个月，但她不忍心写信告诉阿尔格伦，觉得还是当面说出来比较好。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新奥尔良，再向南到

达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维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她和阿尔格伦乘着一艘河船顺流而下，在甲板上喝着威士忌。波伏瓦喜欢危地马拉布料的颜色和质地，买了毯子、窗帘和布料准备带回到巴黎的裁缝那里。[50]波伏瓦一直找理由不告诉阿尔格伦她要提前离开，直到有一天，在从墨西哥城到莫雷利亚的旅途中，波伏瓦磕磕绊绊地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必须在7月14日回巴黎。“哦，好吧。”他说。但是第二天阿尔格伦就不想和波伏瓦一起去探索莫雷利亚了。切卢拉、普埃布拉和塔斯科，阿尔格伦也没有去。波伏瓦问阿尔格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墨西哥让他如此心烦意乱。

最终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感觉他们之间和以前不一样了。回到纽约之后，一天晚上，波伏瓦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明天就可以离开。”但阿尔格伦不想让波伏瓦离开，他说：“我现在就准备好了和你结婚。”[51]当时的情况着实让人痛苦：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为了爱而跨越大西洋的准备，但同时也都为对方不情愿迈出这一步而感到遗憾。1948年7月14日，波伏瓦动身返回巴黎，那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阿尔格伦了。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波伏瓦还没有宽裕到能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所以她经常在萨特家或者双偶咖啡店写作。波伏瓦《第二性》的节选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第一部分是“女人与神话”，波伏瓦在书中讨论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如亨利·德·蒙特朗、保罗·克洛代尔和安德烈·布雷顿——在作品中表现女人的方式。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这本书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得“很好”。但与此同时，“令她高兴的是”，她“听说在《摩登时代》上发表的那部分内容激怒了一些男人”。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了男人所珍视的那些关于女人的愚蠢谬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荒谬而庸俗的诗歌。“（这些人）显然被戳中了

痛处。”[52]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有各自的心事要解决：阿尔格伦仍然想要更多地和波伏瓦在一起。1948年8月，波伏瓦写信和阿尔格伦解释说自己不可能一直只属于他。波伏瓦知道萨特在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让阿尔格伦很烦恼。“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多么在乎他。”她写道：

萨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友谊，而不是爱情。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萨特不太在乎性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但在床上他不是。虽然当年的我没有经验，但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渐渐地，继续做情人似乎是无用的，甚至是不体面的。在坚持了八年、十年之后，我和萨特就彻底放弃了。[53]

最终，阿尔格伦的信又变暖了，他把装着书和威士忌的包裹（威士忌藏在面粉里）寄给波伏瓦。5月，阿尔格伦将会来巴黎看波伏瓦。

阿尔格伦读了《他人的血》，寄了一封长信，附了一封来自美国出版商的便条：这本小说里没有希望，里面写满了“无可救药”的人物。波伏瓦回复说，法国出版社也希望存在主义小说是“英雄主义式的和充满微笑的”。但对于波伏瓦来说，她喜欢书中的阴影，因为生活中总是存在着灰暗面，但也许在作品中她投下了太多的阴影。阿尔格伦对此不予置评，但他确实说这部小说富有哲思。波伏瓦想，也许他是对的，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回复阿尔格伦说：“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总是在心里推理……情感、事件和哲学，如果我把这些都撇在一边，那对我来说是相当不自然的。”[54]波伏瓦这段时间正埋首

于那本女性之书，没有精力考虑写另一本小说，但她知道她想试一试。

波伏瓦勤奋地工作，白天连续阅读和写作八个小时，晚上吃得少，喝得多。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也许她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太疯狂了”，无论是工作、旅行还是爱情，“但那是我的方式。我宁愿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愿意温和地做事”。^[55]波伏瓦有种特别的方式，能够把自己的记忆编织进信件里，将过去的时刻延续到当下。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她在兴奋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新衣服到来，这些衣服是用他们在危地马拉买的布料做的：

我用在危地马拉买的绣花布料做了件漂亮的衣服：一件上衣，用来搭配黑色裙子。我站了整整两个小时，周围有五个裁缝帮我制作它。我等得都发疯了，但我想把这件衣服做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我去找了一个手艺特别好的裁缝。（还记得你在克萨尔特南戈为了那块蓝色的布料聪明地讨价还价吗？）^[56]

1948年10月，波伏瓦不再长住于酒店，搬进了布切里街五楼的一套小公寓。它靠近塞纳河，在拉丁区，离萨特家步行15分钟。波伏瓦用红窗帘装饰房间，还买了白色的扶手椅；贾科梅蒂送给她一些自己设计的青铜灯。波伏瓦在屋顶的椽子上挂了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买的彩色装饰物。现在波伏瓦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上午她可以在家工作了，她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且有地方招待阿尔格伦了。12月，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自己正在阅读《金赛报告：男性性行为》（*Kinsey Report: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她希望也能有一本写女性性行为

的书。[57]

按照传统情爱关系的标准，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个阶段对彼此来说似乎不是很“必要”。波伏瓦和萨特各自对于性关系结束的确切时间存在分歧，萨特含糊其词地说他们的关系比波伏瓦所说的要长十年——1970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1946年，还是1947年、1948年，我不记得了。”[58]波伏瓦和萨特从来没有住在一起，除非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而且他们总是用正式的第二人称“vous”来称呼对方。但是波伏瓦和萨特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在一起工作，编辑彼此的作品，管理《摩登时代》杂志。这就是瓦尔基里女神和花花公子梦想的生活吗？

后来，波伏瓦家楼下一层的一套公寓空了出来，博斯特搬了进去。在那之后，朋友们常常在一起吃晚饭。但自从阿尔格伦进入波伏瓦的生活之后，她就不再和博斯特有身体关系了。博斯特身边从来不缺女朋友，但即便如此，一开始，博斯特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波伏瓦的下一本书《第二性》是献给博斯特的，他是波伏瓦眼中最不屑于摆男性气质那一套的男人。

[1] SdB to Sartre, 26 January 1947, LS 412.

[2] PL 138–41.

[3] ADD 15.

[4] SdB to Sartre, 30 January 1947, LS 415.

[5] 见Margaret Simons, ‘Introduction’ to FW 2.

[6] 见Bair, p.389.

[7] SdB to Sartre, 11 February 1947, LS 425.

[8] Gunnar Myrdal, with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Appendix 3.

[9] ‘The Talk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er*, 22 February 1947.

[10] Beauvoir, ‘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 23 February 1947, *France-Amérique* 14. Translated by Véronique Zaytzeff and Frederick Morrison, in FW 24.

[11] Beauvoir ‘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 FW.25.

[12] ‘Women of Letters’, in FW 30.

[13] SdB to Sartre, 28 February 1947, LS 433.

[14] ‘Chicago’s Bowery’, *The Chicago Tribune*, 13 November 1910.

[15] SdB to Sartre, 28 February 1947, LS 433.

[16] 见SdB to NA, 12 March 1947, TALA 13.

[17] ADD 72.

[18] 见Nancy Bauer, ‘Introduction’ to ‘Femininity: The Trap’, in FW 39.

[19] 见ADD 40; and LS 419, 423, 427, 430.

[20] ‘Femininity: The Trap’, FW 43.

[21] ‘Femininity: The Trap’, FW 46.

[22] ADD 330–34.

[23] *Daily Princetonian*, 22–24 April 1947, 引自Francis and Gontier,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 Textes inédits ou retrouvés*, Paris: Gallimard, 1979, p. 147.

[24] ADD 57.

[25] ADD 272.

[26] ADD 58.

[27] SdB to Sartre, 24 April 1947, LS 451.

[28] Simons 182. 见Diane Rubenstein, “‘I hope I am not fated to live in Rochester’: America in the Work of Beauvoir”, *Theory & Event* 15:2 (2012).

[29] SdB to Sartre, 8 May 1947, LS 454.

[30] SdB to S, 8 May 1947, *Lettres à Sartre*, p.355.

[31] SdB to NA, 17 May 1947, TALA.15.

[32] SdB to NA, 18 May 1947, TALA 16.

[33] SdB to NA, 17 January 1954, TALA 490.

[34] 见SdB to NA, 23 May 1947, TALA 18.

[35] SdB to NA, 24 May 1947, TALA 19.

[36] 见ADD 236–48; 又见Margaret Simons,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Feminism,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177.

[37] SdB to NA, 1 December 1947, TALA 113.

[38] SdB to NA 23 July 1947, TALA 51.

[39] Nelson Algren, 'Last Rounds in Small Cafés: Remembrances of Jean-Paul Sartre and Simone de Beauvoir', *Chicago*, December 1980, p. 213, 引自Bair, pp. 335–6.

[40] SdB to NA, 26 September 1947, TALA 66.

[41] 见Isabelle Grell,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de Sartre: genèse et écriture (1938–1952)*, Bern: Peter Lang, 2005, p.155. 关于斯温后来的回忆, 见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p.187. 罗利在2002年采访了斯温。纽约摩根图书馆收藏着萨特给斯温的62封信。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件中称斯温为“小家伙”; 见QM 282.

[42] EA 101.

[43] EA 71.

[44] EA 40.

[45] EA 66.

[46] EA 71.

[47] 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 Lecarme-Tabone, 'Introduction', MPI xl. In English, 见Webber,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48] A. de Waelhens, compte-rendu de Francis Jeanson, *Le problème moral et la pensée de Sartr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1948 (10): 229.

[49] 见Beauvoir, 'What is Existentialism?', PW.

[50]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3.

[51] FC 170.

[52] SdB to NA, 3 August 1948, TALA 206.

[53] SdB to NA, 8 August 1948, TALA 208.

[54]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0, 212.

[55] 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4.

[56] SdB to NA, 26 August 1948, TALA 216.

[57] SdB to NA, 31 December 1948, TALA 254.

[58] Sartre , 引自约翰·杰拉西的采访 , *Talking with Sartre: Conversations and Deb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

第十二章

备受诽谤的《第二性》

波伏瓦在《盛年》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和“性别战争”对她来说毫无意义。[\[1\]](#)那么，波伏瓦为何写出所谓的“女性主义圣经”呢？

《第二性》出版那年，波伏瓦41岁。波伏瓦见证过她父母之间完全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个女孩，当波伏瓦知道在上帝眼中男孩和女孩是平等的时候，她反对被当作“女孩”来对待。自从被露阴癖书店职员骚扰之后，波伏瓦在不认识的男性面前常常感到局促不安。波伏瓦失去了好友扎扎，扎扎死于嫁妆、礼仪和爱情的争论。波伏瓦也见证过自己的朋友在非法堕胎手术之后感染住院。波伏瓦也和那些对自己身体的功能和乐趣一无所知的女人交谈过。国外旅行的经历让波伏瓦意识到，公序良俗之所以看起来是必要的，也许只是因为大众都在遵守而已。波伏瓦读过朋友维奥莱特·勒迪克的小说《蹂躏》（*Ravages*），开篇对女性性行为的坦率论述让她感到震惊：书中以“从未有过的女性视角、真实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女性的性行为”[\[2\]](#)。

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人类的处境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客体，你的世界被他人施加的约束所限制。作为主体，你的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人自由，还在世界上为他人创造了新的条件。18岁时，波

伏瓦在日记中写道：“爱情中有许多让人讨厌的东西。”^[3]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打破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以“爱”之名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是爱。这次，波伏瓦模糊了个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界限，因而毁誉参半。几十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公认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既能激起时人的强烈厌恶，又能在几十年后被奉为经典？

在《第二性》的第一行，波伏瓦毫不掩饰她对“女人”这个话题的犹豫和恼怒。波伏瓦写道：“在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出版，它们哀悼女性气质的丧失，告诉女性必须“当一个女人，保持女人的状态，成为一个女人”——因此她再也不愿意被动接受、袖手旁观了。

如果看一下波伏瓦所处的时代，我们就更能理解波伏瓦之前的沉默。1863年，儒勒·凡尔纳写了一本名为“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小说。凡尔纳在这本书中大胆预测，将来女人会穿裤子，她们会像男人一样接受教育。凡尔纳的其他小说描述了人类的奇幻成就，比如潜水艇，比如80天内环游地球，甚至到月球旅行！尽管凡尔纳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成功科幻作家，但当时的人却认为这部作品越界了。凡尔纳的文学经纪人认为《20世纪的巴黎》太过牵强。在波伏瓦所处的年代，可可·香奈儿穿着长裤和飘逸的时尚服装，使中性风格变成一种潮流。女性进入工作场所的人数空前高涨，同时她们也刚刚赢得了选举权。一些女性甚至在竞争激烈的全国考试中排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仍然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直到1965年《拿破仑法典》被修改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4]但20世纪40年代末，“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和女性要求选举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5]在美国和法国，女性都成功地获得了选举权，那么她们还想要什么呢？

当波伏瓦审视历史时，她发现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在种族问题上，大家也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波伏瓦提出疑问：那么在性别问题上是怎样的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波伏瓦在美国旅行途中，与美国女权主义者对过话，她知道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这个词早已是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但波伏瓦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欺”行为。多萝西·帕克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将女性定义为“人类”而不是“女性”来解决。但波伏瓦说，“我们都是人类”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女人并不是男人。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所享有的平等是抽象的，而且男女所拥有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境况，具体来说，男女所处的境况是不平等的。但是为什么会是不平等的呢？波伏瓦指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人类根据性别被分为两类，还拥有不同的身体、面孔、衣着、兴趣和职业。但即便如此，仅仅拥有某种生殖器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被认为是“女性”，因为一些拥有这种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责“不够女人”。当小说家乔治·桑蔑视传统的女性气质时，古斯塔夫·福楼拜讽刺她为“第三性别”。[6]

因此，波伏瓦问道：如果身为女性还不是成为一个女人的充分条件，那么女人又是什么呢？

波伏瓦对“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正如普罗塔哥拉所说，“男人是衡量人性的尺度”，即男人是评判“人”的标准。纵观历史，男性都认为女人是劣等的，她

们的观点与“人类”无关。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仍然发现她的观点会因为她的女性身份遭到粗暴的否定：

我过去常常在抽象问题的讨论中听到男人们对我说：“你这样或那样想，是因为你是女性。”我知道我唯一的辩护是回答“我这样想是因为它是真的”，借此来消除我的主观性；我不可能对这些人回应：“你之所以想法与我相反，是因为你是男人。”因为大众都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并不特殊；一个男人仅仅因为自己是男人就拥有权利。[7]

波伏瓦在提出“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借用了黑格尔的“他者”理论。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因此男人把自己视为自由的“主体”，而把女人定义为客体。但波伏瓦想弄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如此普遍持久。波伏瓦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对男性贬低她们呢？

波伏瓦非常熟悉人们反对女性主义的常见理由：女性主义会毁了家庭价值观！女性主义会降低工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男性和女性是“独立而平等的”！波伏瓦本以为这些都是人们“自欺”的借口，就好像《吉姆·克劳法》一样。[8]萧伯纳曾批评，美国白人让黑人给他们擦鞋，然后得出结论：黑人所能做的就是把鞋擦亮。波伏瓦认为，人们对女性的能力也做出了同样无效的推论——人们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较低，但波伏瓦指出这是因为女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境况中，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天生就低人一等。波伏瓦写道：“我们必须理解动词‘是’（to be）的范畴，‘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成为’（have become）什么样的人。”[9]

“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10]

在长达972页的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中，波伏瓦在前言中只论述了这一小部分，但这部分并不是波伏瓦的第一批读者首先会读到的。《第二性》于1949年6月和11月以图书的形式分两册出版。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波伏瓦在前几期《摩登时代》杂志上连载发表了《第二性》的部分内容，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她也因此受到了公众的谴责。1963年，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公开回顾自己的作品，她写道，《第二性》使自己成了“讽刺的靶子”，而且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攻击。^[11]此外，讽刺还不是最糟糕的，针对波伏瓦的人身攻击也接踵而至。

1949年春，阿尔格伦要来巴黎，波伏瓦努力完成书中的部分内容。幸运的是，波伏瓦发现这本书写起来比小说要容易得多。在写小说时，波伏瓦必须精心构思观点，塑造人物形象，注意情节、对话和铺垫。而写《第二性》，她只需要研究问题、组织材料、落在笔头就可以了。波伏瓦希望女性获得自由。女性没有获得自由似乎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她们受到压迫，或者是因为女性选择不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但究竟是谁的道德问题呢？

阿尔格伦刚抵达巴黎时，波伏瓦有些紧张，因为他们上次分别时状态很不好。波伏瓦穿着两年前在芝加哥时穿的白色外套去见他。阿尔格伦在波伏瓦身边的时候，“大家族”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波伏瓦身上看到的变化——她变得温柔而快乐。此前，阿尔格伦一直对与萨特见面感到紧张，但没想到他们的初次见面很愉快，阿尔格伦也放松下来。他喜欢与奥尔加以及萨特的新情人米歇尔·维安交谈，因为她们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听他讲美国人的

罪恶故事。

那年夏天，波伏瓦决定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分几期发表《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内容——关于“生活经验”。在第二部分中，波伏瓦以第一人称视角，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对女性生活的不同阶段或可能性进行了历史梳理：童年、成为女孩、青春期、性启蒙、女同性恋、婚姻、母亲、社会期望、妓女、老年。

1949年5月，波伏瓦发表了《女性的性启蒙》（*The Sexual Initiation of Woman*）一章，内容发人深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书中，波伏瓦描绘了一种自愿的、相互回馈的性行为的愿景，在这种性行为中，女性能够把自己视为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去享受性行为。波伏瓦提出，女性应当拒绝被动顺从地接受非对等和互惠的男性欲望，而是应当在“爱、温柔和情欲”中与伴侣建立一种“对等互惠的关系”。只要存在性别之争，男性和女性的情欲不对称就会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若女人既能从男人那里满足欲望又能获得尊重，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2\]](#)不过后来，波伏瓦觉得先出版那一章可能是个错误。[\[13\]](#)

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讽刺波伏瓦的写作“简直达到了下贱的极限”。他甚至评论道：“在一个正经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士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14\]](#)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是波伏瓦在学生时代去看望扎扎的路上，跟梅洛-庞蒂一起去朝圣过的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波伏瓦仰慕的语言大师，而现在他却用这样的言语批判波伏瓦。

6月和7月的《摩登时代》杂志在报摊上销售一空。波伏瓦在这两期里发表过有关女同性恋和母性的章节，许多读者对此感到愤怒。当时，波伏瓦已经因为和萨特的关系而名声有损，但现在

波伏瓦却招来了另一波侮辱：“饥渴、冷淡、淫荡、女色情狂、女同性恋、流产过一百次，各种各样的骂名，甚至是未婚母亲。”[15]波伏瓦被“性狂热者”和“第一性别的活跃分子”轮番抨击。共产党称波伏瓦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她的作品与工人阶级毫无关系。这次，令人尊敬的保守派支柱人物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信给《摩登时代》的一位赞助者：“你员工的阴道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16]这些话被公开后，莫里亚克感到十分震惊。此后不久，他开始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éraire*）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谴责色情文学，尤其是西蒙娜·德·波伏瓦。

6月，波伏瓦《第二性》的第一卷正式成书出版，销量惊人，第一周就卖出了22000本。[17]波伏瓦宣称“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证明了，并非“女性的天生劣等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没有成就”。但是，不管地位高低，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波伏瓦写道：“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没法结束。”[18]

波伏瓦认为，如果女性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有确定的命运，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同时，那就会有一种普世的“女性气质”，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就是“女性”。在《第二性》第一部分中，波伏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女人”。但是关于女性的次要地位，波伏瓦并没有在科学、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那里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伏瓦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从没有过女性经验的弗洛伊德，凭什

么认为可以基于自己男性的经验来论述女性的经验？

共产主义记者珍妮特·普南特批判波伏瓦阻止了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玛丽-路易丝·巴龙称《第二性》第一卷是“冗繁而难解的天书”，并预言第二卷只会给读者提供“鸡毛蒜皮的东西”。^[19]阿尔芒·胡格写道，波伏瓦真正想要解放的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屈辱，但“她生来就是个女人，我真的看不出她能改变什么……命运几乎不允许被否定”。

^[20]

波伏瓦因为《第二性》招致的骂名使得她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巴黎变得有点尴尬。波伏瓦希望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她的世界，对此她已经期盼了整整两年。她迫不及待地带着阿尔格伦去她喜欢的餐馆和咖啡馆，但人们一看到她就开始窃窃私语，盯着他们一直看，这让她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在巴士底日之后，波伏瓦松了一口气，她和阿尔格伦一起去罗马、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庞贝旅行了两个月，然后又去了突尼斯、阿尔及尔、菲斯、马拉喀什。在从北非回来的路上，他们去了普罗旺斯看望奥尔加和博斯特，奥尔加和博斯特戏称他为“硬汉阿尔格伦”^[21]。

9月中旬，波伏瓦送阿尔格伦去奥利机场，她觉得他们度过了最好的时光。波伏瓦计划明年去芝加哥看阿尔格伦，阿尔格伦也感到很高兴。在转机期间，阿尔格伦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他的小说《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刚刚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的事业登上顶峰。10月，海明威给他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赞阿尔格伦是“当今50岁以下仍然在写作的最优秀的作家”。^[22]

10月，波伏瓦回到普罗旺斯，和萨特在一起写作。波伏瓦考虑写一部新小说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她需要把《第二性》的事情

先处理完。波伏瓦想在新小说中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一个角色，但她却再次对着面前的白纸，不知从何写起。在这本书里，会有一个和波伏瓦差不多的角色：安娜。波伏瓦和萨特一起散步、读书、见朋友。有一天，他们去拜访索斯佩尔和佩拉-卡瓦，到了下一周的周日，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那天下午的全部经历竟然都上报了。波伏瓦觉得这种没完没了的关注实在是令人厌烦；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波伏瓦决定翻译阿尔格伦的一部小说——当她不写小说时，她去翻译图书了[23]。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了。其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24]波伏瓦认为每个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成为（becoming）的过程，而不是一本紧紧合上的书。所以波伏瓦想要在书里展示女性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述，展示她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他者”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开放的人，波伏瓦也仍然处在成为自己、试图理解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她面临的一些阻碍对其他女性的成长也构成了宏观的威胁。尽管时间流逝，波伏瓦仍然受到阿尔弗雷德·富耶的影响。富耶认为“人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变得自由的”。波伏瓦认为，使得男女性生活迥异、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并不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文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显然，“文明”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波伏瓦对女性性行为的坦诚态度使她遭受了各种绯闻和攻击，但她受到的最持久的抨击则源自她对母职的分析。波伏瓦认为社会沉浸在一种表里不一的集体自欺当中：整个社会蔑视女性，却同时尊重母亲。“整个社会不让女性参与所有的公共活动，不让她们从事男性的职业，声称女性在所有领域都没有能力，但是社会却把最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养育人类——托付给

女性，这简直是一种充满罪恶的悖论。”[25]

战争导致法国人口急剧减少，法国需要公民，因此波伏瓦被指控背叛了她的性别和国家。战后，法国工业需要复兴，所以除了更多的新生儿，他们也需要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26]在过去和当时，波伏瓦的文章都有很多令人震惊的地方，而且事后回看，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那些不觉得自己为人母是“奴隶”的女性来说，波伏瓦的有些文字似乎是判断失当的。波伏瓦把孕妇称为“寄生虫”的宿主和人类物种的奴隶。（实际上，叔本华也提出过类似的言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应。）波伏瓦对怀孕很感兴趣，因为怀孕是女性“从内向外审视自己”的主观体验——她们失去了身体自主权，并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感到焦虑。波伏瓦声称女性不应该沦为生育的工具，她还说（虽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并不代表完全拒绝做母亲。波伏瓦想要证明，即使同样是怀孕、分娩和照顾孩子——这些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身体体验——也会因女性的境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体验。

显然，波伏瓦自己并不是一位母亲，她也承认这一点，她在作品中借鉴了其他女性的论述，包括从各种信件、日记和小说，来证明“怀孕和做母亲的经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它们是发生在反抗、顺从、满足还是热情之中”[27]。波伏瓦想要厘清人们关于做母亲的两个错误观念，一是“成为母亲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让一个女人感到满足”，二是孩子“一定能在母亲的怀抱中找到幸福”。[28]波伏瓦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很多女性享受做母亲的乐趣，但她们并不希望这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事业。波伏瓦认为，如果母亲感到沮丧和不满足，她们的孩子也不太可能会感到快乐。因此波伏瓦得出结论：显然，对于母亲来说，做一个完整的人要比做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对孩子更好。[29]很多男性读者对波

伏瓦的论点提出异议：波伏瓦自己都不是母亲，怎么敢谈论这个神圣的话题？波伏瓦回应说，不是母亲这一点从来没有阻止男人们来谈论母亲这个话题。

除了批判社会对母亲这个话题的自欺之外，波伏瓦也在《第二性》中探讨了困扰她几十年的主题：爱与奉献的伦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爱”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含义，而这些不同导致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许多分歧。

波伏瓦认为，男人在爱情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主体”——他们追求心爱的女人，同时也追求其他的事物，爱情是他们一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相比之下，对女性而言，爱情被视为生命本身，爱情理想则鼓励女性为了所爱的人去自我牺牲甚至是完全忘却自我。男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积极主动地去爱，但同时也要有雄心壮志，并在其他领域有所作为。女人则被教导她们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她们必须被男人爱才有价值。

通往真爱的障碍之一是，女性被物化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她们物化自己，试图认同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断地追求他眼中的魅力。恋爱中的女人试着透过她所爱的人的眼睛去看，围绕着他去塑造她的世界和她自己：她读他喜欢的书，对他的艺术趣味、音乐、思想、朋友、政治观念等感兴趣。波伏瓦也反对性方面的不平等，她指出许多女人被当作男性享乐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和快感从来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在波伏瓦看来，爱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是相互的。男人希望女人用不求回报的方式给予自己爱。因此，爱情对女人来说是危险的，而对男人来说则不是。波伏瓦没有把这件事完全归咎于男人。女人在这里面也有一定的责任，她们通过参与其中而使不

平等的爱的压迫性结构永久化。但波伏瓦写道，要女人不参与其中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界诱使女性应允了这种压迫。

尽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异性恋的框架构建了这场讨论，但她自己也曾在与女性的关系中面临这种关系带来的紧张感。1940年，波伏瓦与比安卡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比安卡表示自己想要在波伏瓦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谈话结束后，比安卡写信给波伏瓦：

你不给予，你只索取。

你说我是你的生命，这并不是真的——你的生命是一个拼贴出来的马赛克。

但是对我来说，你是我的生命，我完全属于你。[30]

波伏瓦认为，真正的爱是可能存在于相互的关系中的，她希望在未来这种形式的爱能更加普遍。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女性就能在爱里展露自己的强势而不是弱势，就不用再在爱里逃避自己，而是找到自我，无须再为爱放弃自我，而是肯定自我。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爱就不再是致命的危险，而成为他们生命的源泉。[31]在波伏瓦的愿景里，女性能够作为一个主体去爱她们所爱的人，也能够被爱，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关于单向的爱的谬论不断地巩固着女性的从属地位，这种谬论承诺女性爱能救赎她们，但实则把她们活活送进地狱。

就像波伏瓦的小说一样，《第二性》也让人们不禁去想：波伏瓦的哲学中有多少内容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除了波伏瓦早年与比安卡的邂逅外，在波伏瓦写给后来情人的一封信中，她坦白自己和萨特的关系中真正缺乏的并非性，而是“真正的相互回馈”。

这就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1949年，当波伏瓦描述“相互的爱”时，她自己是否经历过这种爱？《第二性》中还有一些文字与波伏瓦自己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包括一个讨厌参与“家务杂事”的“姐姐”，以及“毫不掩饰”他们更喜欢孙子而不是孙女的祖父母。波伏瓦是取材于她对“女性”的研究，还是她和埃莱娜幼年的生活经历？[32]波伏瓦关于女同性恋的那一章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在她去世之后才出版，在那之前人们从她的小说中捕风捉影地猜测她的同性恋情。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曾写到自己对女性有一种“模糊的渴望”[33]，人们不禁去猜测这些是不是来自她自己的经历，甚至是她压抑的欲望。波伏瓦对自己的性取向是不是也处在“自欺”当中？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声称“性的命运不能支配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同性恋是“一个根据复杂的整体做出的选择，取决于一个自由的决定”。[34]

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被出版社退稿了，当时的编辑亨利·米勒对波伏瓦写道：“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能给出任何提示。”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瓦完成了当年她没有完成的部分。[35]

因此，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

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

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不能随意塑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

[36]几个世纪以来，男人获益于关于女性气质的这个谬论，我们也不难理解，男性害怕失去这个谬论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应的好处。因此，男性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告诉女性，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她们的天性；只要成功地做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就能“幸福”，直至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波伏瓦指出，男性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人们总是轻易地把自己想要强加给别人的境况称为幸福”。[37]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评论家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抨击——波伏瓦后来形容自己当时受到的抨击简直是骇人听闻。《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安德烈·卢梭觉得波伏瓦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追随者”，他觉得波伏瓦所写的关于“性启蒙”的文章让他感到汗颜，安德烈批判波伏瓦为了追求自由而毁掉爱情，而女性已经解放了！[38]安德烈花了大量篇幅去嘲讽和攻击波伏瓦个人：“这个女人之所以是他者，是因为她恼怒于自己的自卑者情结。”安德烈还讽刺波伏瓦既然这么坚韧，应该需要存在主义来把她从执念中解救出来。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在《论灵魂》（*L'Esprit*）中说自己很遗憾地发现波伏瓦的《第二性》全书充满了“怨恨的语气”。埃马纽埃尔说，如果作者能更

好地控制一下情绪，也许“就不会如此妨碍她思路清晰地表达自己了”。[39]这些评论家说波伏瓦的生活是悲惨的、神经质的、沮丧的。加缪指责波伏瓦“让法国男人看起来很可笑”。[40]哲学家让·吉东说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到波伏瓦“悲惨的生活”让她痛苦不堪。法国《时代》杂志（*L'Epoque*）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十年后将没有人会谈论“这部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41]

梵蒂冈教会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列为禁书。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就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哲学探讨，她从女性（包括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得出结论：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改变许多女性的处境。波伏瓦认为女人的欲望应该影响她们的性；女性的事业应该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波伏瓦受到的攻击大部分都是完全针对她个人的。在许多地方，波伏瓦遭到讽刺、嘲笑和奚落。但这不是全部——下一代人欢迎和拥抱波伏瓦的这部作品。下一代读者发现这部书前无古人，开诚布公地谈论女性经验这个曾经的禁忌话题：有些读者迫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把《第二性》当作性手册来读。《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在8月刊发了《第二性》的部分节选，把作者波伏瓦介绍为让-保罗·萨特的副手和存在主义专家，以及无疑是出现在男性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哲学家。波伏瓦有责任从人类的伟大冒险中提炼出一种女性哲学。[42]

自出版以来，波伏瓦的“性别哲学”经常被总结为区分了“性”（sex）和“性别”（gender）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里，前者是生物性的（比如说，性别男性和性别女性），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积累习得的（比如男性化、女性化的）。但是，简单地认

为《第二性》只是区分了“性”和“性别”的说法存在着重大问题。首先，“性别”这个词从未在这本书中出现过。其次，即便在1949年，像“女性”这个概念分别具有生物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以及女性受压迫的情况长期存在的观点都不是波伏瓦原创的。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正如她在《第二性》中讨论的那样，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声称，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弱势地位是由于她们缺乏具体的教育、经济和职业机会，而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劣势。举个例子，在18世纪狄德罗就已经写道，女性的低人一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造成的”。[\[43\]](#)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把《第二性》概括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会让人们更加忽视里面一个不受欢迎但却更重要的观点：女性长期受压迫的很大原因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在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中，波伏瓦研究了“女性气质”被建构成女性命运的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理想化的女性必须是男性欲望的客体。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经验”要比第一卷在篇幅上长得多。在这里，波伏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自身的角度以及女性所处的人生阶段来探讨“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波伏瓦这样做颠覆了哲学的权力视角。波伏瓦没有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角度来分析“女人”，而是转向了那些被期望要服从的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波伏瓦必须讨论一些哲学精英们认为不值得称为“哲学”的话题：家务如何分配，经理们如何评价工作，女性如何经历性启蒙和性实践。这些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现实的本质或知识的可能性。[\[44\]](#)相反，这些问题事关谁有权力来决定现实中的哪一部分更重要，以及谁更有发言权来决定知识。

波伏瓦很清楚，要让女性为自己说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特点之一是，她们没有办法像男人那样记录自己的生

活。女性的声音很少被公开，即使她们的证词被公开了，也往往被斥为是片面或虚假的、恶意或不道德的。为了分析女性的服从，波伏瓦列举了特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经历，以及女性如何在结构和系统上都被禁止发声。[\[45\]](#)

波伏瓦的童年灵感之一，乔治·爱略特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在平凡的人类世界中曾经视物深刻，感受敏锐，我们会听到草儿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会发现那寂静对岸的巨响，那隆隆之声震耳欲聋。”[\[46\]](#)对于波伏瓦来说，在寂静对岸，她听到了疑惑、顺从和绝望的不安回响，那是失语的女性集体的吟唱：“我究竟变成了什么？”

为《第二性》做研究搜集资料的时候，波伏瓦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沮丧，但她也找到了希望的理由。是的，在1949年，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这是因为她们的处境为她们提供的可能性要少很多”。但是如果男人和女人不再躲在各自的借口后面，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二性》常常被描述为一本将萨特的哲学“应用”于“女性问题”的书。在这一阶段，波伏瓦确实在某些事情上与萨特意见一致，例如，自由的重要性。但她所做的和哲学家们一样——赞同她认为正确的东西，摒弃她认为错误的、前后矛盾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即使是她所爱的人的观点。波伏瓦拒绝了萨特的“情境”概念，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类被“扔进”一个世界的描述，这个世界总是有人类自己没法创造的意义。波伏瓦全力以赴地去解答她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过萨特的问題：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实现怎样的超越？

现在波伏瓦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女人并非一定要被关在闺房里，并非一定要被告知她们的价值来自放大男人的伟大或满足

他们的快乐。即便是在1949年，在美国或法国，女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声称自己是人类，来逃避性别差异给她的可能性带来的限制。胡塞尔、萨特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已经开始书写关于身体的哲学（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身体这个主题，倾向于书写心灵的哲学）。对此，波伏瓦指出男性哲学家们未能考虑到女性的身体，特别是女人在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贬低成某种男性凝视的客体时所感受到的异化，这种男性凝视把女性的身体当作猎杀和拥有的“猎物”，而不把女性看作一个处在成为过程中的人。

波伏瓦并不满足于通过这个扭曲的视角看到的关于女性的哲学思考。因此，波伏瓦采用了一种独创的哲学方法，用多种第一人称视角去呈现，她称之为“从女性的角度描述社会向女性所提议的世界”。如果女人真的天生就屈从于男人，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了。但是，如果这种等级制度是由文化延续和巩固下来的，以及女性的顺从被她们视为自由的“退化”，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其中涉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有责任去纠正这个问题。在《第二性》的第二卷中，波伏瓦用各种女性的声音来展示，她们是如何在男性制造出来的谬论的霸权之下成为女性的，波伏瓦用这些论述来呈现女性从少女时代就面临的学徒一般的境况，不断地准备着放弃自己的自主权，以期成为一个服务于女性的女性。^[47]

因为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提前在杂志中刊登了，早期的一些读者无法从头到尾整体地去理解波伏瓦的观点。但并非这些零碎的解读导致了波伏瓦受到那么多人身攻击。许多读者强烈地希望波伏瓦是错误的，希望他们从未读过波伏瓦，或者波伏瓦被误读才好。毕竟找借口是人们摆脱困境的一个捷径。如果波伏瓦的读者们都把她斥为一个缺乏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个失败的女人或一

个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被波伏瓦在“女性的处境”中所描述的人类苦难所困扰，就可以再次让那些沉默中呐喊的女性闭嘴。

1949年，在一次关于《第二性》的电台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这本书出版后她受到的攻击。波伏瓦说，这不是她的错，在法国，一提到女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性”。波伏瓦也注意到，尽管在1000多页的《第二性》中，有关性的内容相对较少，但受到评论最多的却是这些内容。波伏瓦认为，性问题没有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是有问题的，因为性问题本就应该得到哲学上的审视。人们似乎认为哲学不可以是有生命的东西，也不会照亮人类生活的这个层面。[48]

《第二性》在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第二性》超越了它所在的时代，坦率地说，对许多人来说，《第二性》让他们胆战心惊。波伏瓦所接受的大量经典的哲学和文学教育都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引用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罗马哲学家的作品、《圣经》和《古兰经》，还有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哲学和神学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信件日记以及精神分析的记录。此外，波伏瓦还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内容。马里内·鲁什研究发现，波伏瓦的许多读者来信责备她把《第二性》写得如此艰深晦涩。一位读者坦率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让那些上百人（或上千人）的文学俱乐部去研究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的深奥术语吗？还是为了让拥有常识和理解力的公众来解决这类问题？就不能放弃所谓的专业“哲学家”们的迂腐专业伎俩，用生活中的语言来表达吗？[49]

在波伏瓦作品的鼓励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将去对抗那些“拥有最杰出的头脑的人对女性说出的真正蠢话”[50]。但是在1949年，波伏瓦并不知道《第二性》之后会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作品，并能激起政治运动。时机成熟之后，女权主义者批评波伏瓦有一种“无意识的厌女症”，批判波伏瓦在描写女性时把自己与她们分开。[51]也有人认为波伏瓦对阶级、种族和教育的特权视而不见；另一些人认为波伏瓦了解这些特权，但却错误地把女性经验普遍化。波伏瓦被指控将个人的体验当作普遍的经验来写作；但同时波伏瓦也因将个人的经验转换成一种“充沛的愤怒”来写这本书而受到赞扬。[52]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波伏瓦，指责她排斥有色女性，把她们的苦难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以维护白人女权主义的利益。[53]《第二性》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波伏瓦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在阅读这些读者来信之后，波伏瓦承认自己对男性以及她个人经验的有些态度太过天真。波伏瓦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她的个人生活被免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性别压迫。[54]但是，就在《第二性》出版后不久，波伏瓦就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本书使得波伏瓦从萨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却使她置身于另一种丑闻中——波伏瓦成为各种嘲笑、怨恨和羞辱的对象。

托莉·莫伊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知识女性的形成》（*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一书中写道，1949年底，“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真正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个人和事业而言，她都是‘被造就的’”。[55]托莉·莫伊认为波伏瓦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大多是“回顾性的”，在那之后波伏瓦“几乎都在写自传”。但是，从职业角度来说，那时的波伏瓦还没有写出她日后的获奖小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另外两卷小说和她的生命写作，还有关于晚年的

书——之后的波伏瓦会为法国立法的重大变革提供支持材料。日后，《第二性》会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扛鼎之作；那时的波伏瓦作为女权主义活动家的生涯甚至还没有开始。从个人角度而言，波伏瓦还会迎来相互的爱情关系，还有很多“成为”的可能性在前路等着她。

[1] PL 62.

[2] TALA 184. 小说的原名是“蹂躏”（Ravages），但波伏瓦读到的早期部分太不堪入目，无法在1954年与书中其他部分一起出版，直到2000年才以《特蕾莎和伊莎贝拉》（*Thérèse et Isabelle*）的名字出版了法语版。

[3] DPS 77, 21 August 1926.

[4] Gisela Kapla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Feminism*, London: UCL Press, 1992, p.163.

[5] Rosie Germain, ‘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4): 2013: 1041–62, p.1045.

[6] Gustave Flaubert, 引自Allison Guidette-Georis, ‘Georges Sand et le troisième sexe’,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Studies* 25 (1/2): 41–9, p.41.

[7] SS 25.

[8] SS 32.

[9] SS 13.

[10] SS 37.

[11] FC 199.

[12] SS 475, 476.

[13]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71.

[14] François Mauriac, ‘Demande d’enquête’, *Le figaro*, (1949), 30 May. 见 Ingrid Galster,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Paris-Sorbonne, 2004, p.21.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讨论了本章出版后的反馈，FC 197.

[15] FC 197.

[16] 完整笔记参见Ingrid Galster,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45 n. 33.

[17] FC 196.

[18] SS 46.

[19] Marie-Louise Barron, 'De Simone de Beauvoir à Amour Digest. Les croisés de l'émancipation par le sexe',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949), 23 June. Ibid. p.128.

[20] Armand Hoog, 'Madame de Beauvoir et son sexe', *La Nef* (1949), August. Ibid. p.161.

[21] FC 192 f.

[22] 引自Brooke Horvath, *Understanding nelson Algre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5, p.7.

[23] FC 207.

[24] SS 330.

[25] SS 644.

[26] Claire Laubier (e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france, 1945–Present: A documentary An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1.

[27] SS 607.

[28] SS 641, 644.

[29] SS 645.

[30] 引自SdB to Sartre, 19 January 1940, LS 262.

[31] SS 724–5.

[32] SS 310, 311.

[33] MDD 148.

[34] SS 442.

[35] 引自PL 327.

[36] SS 816.

[37] SS 37. 波伏瓦不否认女性会发自内心地爱自己的单偶制伴侣和自己的孩

子，但是让女性这样做的必要条件并非单偶制或母职本身，而是女性处于这样的角色上的境况。但是，很多早期的读者认为波伏瓦无视她们的感受，并因此感到震惊。

[38] André Rousseaux, 'Le Deuxième Sexe', *Le Figaro littéraire* (1949), 12 November. Ibid. p.210.

[39] Emmanuel Mounier, *L'Esprit*, December 1949.

[40] FC 200.

[41] 见Ingrid Galster, "The limits of the abj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Second Sex in 1949', in *A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ed. Laura Hengehold and Nancy Bauer, Oxford: Wiley, 2017, p.40.

[42] 引自Galster, "The limits of the abject", p.39.

[43] SS 127.

[44] 这个部分要感谢玛农·加西亚在《第二性》中对波伏瓦方法的精彩讨论。*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Paris: Flammarion, 2018, p.93.

[45] 见Garcia, *on ne naît pas femme*, p.109.

[46]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59.

[47] 关于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现象学方法，见Garcia, *On ne naît pas femme*, p.124 f.

[48] '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actualité du livre,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audio/PH806055647/simone-de-beauvoir-le-deuxieme-sexe-audio.html>.

[49] 这封信是1958年1月29日写的，引自Marine 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une appropriation collective des Mémoi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ses lectrices (1958–1964)' *Littérature* 191 (September 2018): 72.

[50] Michèle Le Doeuf, *Hipparchia's Choice: An Essay Concerning Women and Philosophy*, trans. Trista Selo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4.

[51] 比如，伊娃·隆格伦 - 戈特林认为波伏瓦大量依赖黑格尔，导致她的作品“以男性为中心”，甚至有时候到了濒临“厌女症”的程度。*Sex and Existence: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trans. Linda Schenck,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2] C. B. Radford, 'Simone de Beauvoir: Feminism's Friend or Foe?' Part II, *Nottingham French Studies* 7 (May 1968): 44. On 'energetic anger' 见 Margaret Crosland, *Simone de Beauvoir: The Woman and Her Work*, London: Heinemann, 1992, p.359.

[53] Kathryn T. Gin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ng Frameworks of Oppression in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35 (1-2) (2014): 251-73.

[54] Beauvoir, 'Introduction to women Insist',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in FW 250.

[55]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28.

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1950年初，波伏瓦重新回到让人安心的平静日常：写作与《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接受有关《第二性》的采访。但就在那年2月的一天，波伏瓦偶然遇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人——她青梅竹马的表哥雅克。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往日风采不再。现在的雅克倾家荡产、酗酒、一贫如洗，甚至连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知是看在当年的情分上，还是仅仅出于对他的慷慨，波伏瓦与雅克再次见面，并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1]

波伏瓦想去看看撒哈拉沙漠，于是在3月，她和萨特一起离开巴黎去往非洲。他们在四天里乘坐卡车穿越沙漠，途经塔曼拉塞特，再坐着大篷车前往埃尔戈利亚，最后飞越撒哈拉沙漠前往马里。

除了写作大部头的作品之外，波伏瓦也在写短文。1950年，波伏瓦在美式风格的《天才杂志》（*Flai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才杂志》并没有持续发行太长时间，只发行了一年，但在那段时间里，它收录了让·科克托、田纳西·威廉姆斯、埃莉诺·罗斯福、萨尔瓦多·达利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作品。在这篇题为“是时候让女人重新面对爱情了”^[2]的文章中，波伏瓦讨论了性欲，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并以不同的肉体形式存在。波伏瓦写道，性吸引力正是因为差异而旺盛，“另一种性别

的魅力就好像是异国的魅力”。

在波伏瓦看来，问题在于，男人认为爱情就是不平等和顺从的，而许多女人抗拒爱情，是因为“爱情让人想起古代的奴隶制度”。在波伏瓦看来，男女之间的差别常常是优等与劣等、主体与客体、剥削的索取者与给予者之间的差别，但支配和奉献都不是爱。如今女性在社会上越来越活跃，她们变得独立自主，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看到女性进入了公众生活，一些人对此感到沮丧，他们甚至发问：爱情会因此被毁掉吗？它会失去原本的诗意和幸福吗？波伏瓦不这么认为：“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出一种男女平等、谁都不用屈服于谁的新式爱情吗？”[3]

在一些著名作家身上，波伏瓦已经瞥见了这种新式爱情的模样。尼采、托尔斯泰和D. H.劳伦斯认识到，“真正且富有成果的爱”既包括所爱之人的身体存在，也包括其生活目标。但是他们是向女人提出了这个关于爱情理想的要求，因为爱是女性唯一的目的和意义。相比之下，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

（在这种新式爱情中，）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4]

如果男女双方都能“同时想到对方和自己”，那么双方都会受

益。

有一点很有趣，考虑到波伏瓦与萨特的无性关系，她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示，这种新式爱情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尽管她承认性吸引“通常是爱情的仪式之一”）。正如波伏瓦在《女性气质：陷阱》中提到的，她在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即害怕失去“女性气质”，害怕失去在男性眼中的吸引力。波伏瓦知道女人想要被男人渴望，但她不认为她们的吸引力会如此轻易地被消除：“两性之间的生理需求将维持其对彼此的吸引力。”^[5]

6月，波伏瓦去芝加哥看望阿尔格伦。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在6月，是因为萨特打算看瓦内蒂最后一次——他想和瓦内蒂和平分手。波伏瓦和萨特希望他们能同时离开巴黎，这样行程结束之后他们就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安排见面的时候，丝毫没说她是按照萨特的行程来安排自己的计划的。

阿尔格伦表示同意。但是他的信越来越少了。波伏瓦开始思考：她应该去看阿尔格伦吗？萨特鼓励她试试。

在飞机上，波伏瓦看到她旁边的人在读《第二性》，这种感觉让她觉得超现实。1951年9月，波伏瓦在纽约拜访了斯捷帕和费尔南多·杰拉西之后飞往芝加哥。24个小时还不到，波伏瓦就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她问阿尔格伦出了什么事。阿尔格伦说，他很高兴见到她，但他不喜欢她来了又要走。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阿尔格伦从起初的若即若离变成了现在的漠不关心。^[6]阿尔格伦的前妻想和他复婚，但是在遇到波伏瓦之后，阿尔格伦已经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爱上别的女人了。

即便如此，阿尔格伦还是告诉波伏瓦，他们之间回不到从前了。第二天晚上，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试图做爱，但双方的身体都不配合。8月初，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搬到密歇根湖畔的一间小

屋，他们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波伏瓦开始担心她再也体会不到激情了。萨特一直服用大剂量的安非他命来维持他在写作上的持续高产，波伏瓦现在也开始服用安非他命来专心写小说——她将献给阿尔格伦的那本。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生活变得平静，没有激情，但产出颇丰：他们早上写作，下午游泳和阅读。有一次，波伏瓦差点淹死在湖里——她从来都不是个游泳好手。后来，纳塔莉·索罗金来拜访，事情就变糟了。阿尔格伦非常不喜欢纳塔莉，并且告诉波伏瓦说纳塔莉用她“女同性恋的一面”震惊了他的朋友们。^[7]波伏瓦在这两个人之间感到左右为难——纳塔莉的确不太好相处，但阿尔格伦这次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波伏瓦有点期待着回到萨特身边，她“亲爱的小绝对”^[8]。

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写到那次拜访时这么说道，绝望主导了她所有的情感。她没有详述故事的结尾，而是转而叙说萨特在巴黎受到的大量侮辱。^[9]但是波伏瓦的信表明，在10月底，就在她离开芝加哥去纽约之前，她和阿尔格伦的关系重新燃起了希望。离开之前，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很高兴他们能维持友谊。阿尔格伦回答：“这不是友谊。我给你的永远都不会低于爱情。”

那天晚上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信，她说自己在去机场的路上和飞机上一直泪流不止：“你昨天让我读的那篇文章里，托马斯·曼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几秒钟的幸福，这种幸福抵得上十年的普通生活。当然，你也有这种能力，给我几分钟的狂热，这种狂热抵得上十年的健康。”

波伏瓦说，她能够理解阿尔格伦想把她从他心里赶走的做法，因为这是公平的。但是，正如波伏瓦用不太流利的英语所说：“认为这公平并不妨碍它变得困难。”^[10]波伏瓦说她爱阿尔格伦，“因为你给我的爱”，“因为你在我身上新唤起的强烈的情

欲和幸福”。但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她仍然爱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而爱他”。[11]

波伏瓦回到巴黎时，萨特正在写剧本，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波伏瓦眼里，现在的萨特看起来很遥远，波伏瓦把这归咎于萨特已经成了公众人物。如今的萨特不再想坐在咖啡馆里，也不想再在巴黎闲逛，或者和波伏瓦一起去滑雪。萨特邀请波伏瓦读他正在读的东西，追随他的学术道路，但是她有自己的小说要完成——尽管她对政治感兴趣——她不想花时间追随他。萨特想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波伏瓦没有这种野心。在有些日子里，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仿佛隔着一层忧伤的薄纱；有些时候，绝望像腐蚀剂一样折磨着波伏瓦。[12]

《第二性》给波伏瓦带来了财富和她不想要的名声。为了缓解自己的心情，波伏瓦买了一台电唱机和一些唱片。萨特每周有几个晚上会到布切里街来听爵士乐或古典音乐。1951年11月，波伏瓦激动地写信给阿尔格伦，告诉他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激情：“既然爱情是被禁止的，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轿车。”[13]波伏瓦每周上三次驾驶课。

战后，巴黎发展成为欧洲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迈尔斯·戴维斯在左岸俱乐部演奏，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包括反殖民活动人士——在一起集会和举行活动。1950年，诗人艾梅·塞泽尔发表了《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他把欧洲的纳粹主义比作殖民主义，因为这两者都追求统治和控制。1947年，印度从英国人手中赢得了独立，反殖民主义也开始兴盛。1952年，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出版，这本书充分描述了种族主义对被压迫人民

的影响。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壮大，但许多法国人仍然不愿放弃法兰西帝国。

在此期间，波伏瓦的作品成为法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1951年，《第二性》的首个译本在西德问世，书名为*Das andere Geschlecht*，意为“另一个性别”。这本书卖得很非常好，再版3次，5年内整整卖出了1.4万册。[\[14\]](#)

与此同时，波伏瓦与阿尔格伦的通信也充满了忧郁的味道。波伏瓦开始称呼阿尔格伦为她“痛苦的收藏家”。阿尔格伦不仅想跟波伏瓦在一起，还想让她跟他一起住在芝加哥。他们现在一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如果他能多去巴黎，一年也许可以共度三四个月。阿尔格伦对波伏瓦在纽约的那封信还耿耿于怀。但是波伏瓦应该怎么做呢？阿尔格伦指责波伏瓦只想着自己的生活，而不愿意为他做出牺牲，波伏瓦觉得这不公平。波伏瓦写道：“你不能指望我像一台顺从的机器那样做出反应。”[\[15\]](#)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人们认为女人就应当视爱情为生命，并为之牺牲一切。现在的波伏瓦，正因此痛苦不堪。对波伏瓦来说，爱情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即使萨特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我也不可能去芝加哥永久居住。”[\[16\]](#)

1952年以后，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之间的书信往来减少了；他们从几乎每天写信，减少到每周，再到每月才有通信。这一年波伏瓦44岁了，她担心自己“被放逐到阴影之地”[\[17\]](#)。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女性在失去性欲之前先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成为“没有价值的物品”，因此波伏瓦将女性性欲的丧失描述为一场悲剧。波伏瓦认为女性在30多岁时性欲最旺盛，但不久之后就被衰老困扰。波伏瓦作品中的虚构女性，尤其是她后来小说中的女性，常常表现出因欲望而感到疲倦，以及因孤独而感到不

满。

1952年初，由于萨特的公众声望越来越大，以及他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现在他们的关系中有了第三个人：波伏瓦、萨特和大名鼎鼎的“让-保罗·萨特”。波伏瓦告诉萨特，她甚至希望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虽然到这时，萨特采纳了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文化价值观重要性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之间不匹配的日程和各不相同的兴趣，加剧了波伏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写道，自己的悲伤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绝望”，“潜入我的内心，我甚至开始渴望世界末日”。[\[18\]](#)

1952年1月，波伏瓦的打字员卢西安死于乳腺癌，不久之后，波伏瓦发现自己的一个乳房有肿块。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萨特，萨特鼓励她如果担心就去看医生。到1952年3月，疼痛加剧，于是波伏瓦预约了医生，并于4月去看了专科医生。医生让波伏瓦别担心，她还年轻，情况应该不会太糟，但即便如此，医生还是建议她应该做一个活组织检查。最糟糕的情况是必须切除一个乳房，波伏瓦会同意吗？

波伏瓦最终还是做了检查。她从医生那里出来后，感到很震惊。波伏瓦见过卢西安的候诊室，她也见过因为乳腺癌失去一个乳房的女性在十年后又回来切掉另一个，或者死于感染。当波伏瓦把医生所说的话告诉萨特时，他以冷战时的讽刺口吻回答道：“最坏的情况是，她只能活12年，因为那时，原子弹就会把所有人都炸死。”[\[19\]](#)手术前一天，她和博斯特一起参观了一座美丽的修道院。

1952年5月，在罗马，萨特听说法国政府暴力镇压了法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萨特没有加入党派，当时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

都开始疏远斯大林，而萨特公开为共产党员发声。不管萨特在政治上有什么想法，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给波伏瓦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星期日下午，《摩登时代》杂志在波拿巴街开例会。萨特希望这本杂志能反映他新的政治热情，所以他邀请了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编辑委员会。其中一位名叫克洛德·朗兹曼的是萨特秘书的朋友，人很机智。朗兹曼当时27岁，幽默风趣，一双蓝眼睛尤其迷人。

有一天，萨特的秘书让·科告诉波伏瓦，朗兹曼觉得她很迷人。波伏瓦耸了耸肩：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衰老感到焦虑，并且相信她的性生活也快到头了。^[20]但有时波伏瓦注意到朗兹曼在开会时老是盯着她看。7月的一个派对后，波伏瓦的电话响了，朗兹曼邀请她去看电影。波伏瓦问：“哪一部电影？”朗兹曼说：“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波伏瓦和朗兹曼便约了个时间，放下电话后，波伏瓦忍不住哭了起来。^[21]

波伏瓦后来在《老年》（在波伏瓦62岁时出版）中给出的叙述要比在《时势的力量》（在波伏瓦55岁时出版）中的自传体描述更清楚。年轻时的波伏瓦对成熟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那时候的波伏瓦“厌恶”她口中“年龄大的荡妇”，这些女人厚颜无耻地染发，穿比基尼，用波伏瓦的话说，她们本应“待在架子上”，却跑下来卖弄风骚。波伏瓦认为自己老了之后，就会“乖乖地退避到架子上”。44岁那年，波伏瓦就已经认为自己该去架子上待着了，但显然这一切还为时尚早。^[22]

第一次见面，朗兹曼和波伏瓦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最后他们意犹未尽，决定第二天共进晚餐。朗兹曼向波伏瓦表示爱意，波伏瓦接受不了——她比他大16岁。朗兹曼说：“我不在乎。”在他眼里，她并不老。那天晚上，朗兹曼没有离开波伏瓦在布切里街的公寓，第二天也没有离开。

几天后，波伏瓦离开巴黎去了米兰——她开着她的西姆卡牌小车，萨特坐火车去了——他们约好在斯卡拉广场见面。波伏瓦想参观博物馆、教堂和艺术；而萨特只想工作。于是他们彼此做出妥协：上午观光，下午工作。萨特正在写《共产党人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波伏瓦觉得自己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似乎永远也写不完。萨特在1952年秋天读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十分赞赏，但不满意这本书的结尾。波伏瓦受够了，想要放弃这本书。但后来博斯特和朗兹曼读了这本书，都鼓励波伏瓦继续完成它。当这部作品最终完成时，萨特引用它作为他停止写小说的理由，甚至都放弃了他的“自由之路”系列。萨特说，完成自己的小说系列已经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波伏瓦在《名士风流》里已经“比我更好地探索了这个时代的问题”，而且整部作品“始终保持自由、不确定性和模糊性”。[23]

波伏瓦从意大利写信给朗兹曼。事实上，在他回信之前，波伏瓦写了五封信。她答应回到巴黎后仍然爱他。朗兹曼问，只爱到那个时候吗？他对此更有信心。[24]

波伏瓦在去巴黎的途中看望了妹妹，但她等了两个星期，直到朗兹曼从以色列旅行回来，“他们的身体才又愉快地相遇”[25]。波伏瓦和朗兹曼开始分享他们过去的故事：朗兹曼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帮助波伏瓦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理解犹太人。[在后来的生活中，许多人也会这样评价朗兹曼；后来，在波伏瓦的持续支持下，朗兹曼还成功执导了广受好评的纪录片《浩劫》（*Shoah*）。]

波伏瓦和朗兹曼从过去谈到未来。旅行之后，朗兹曼几乎没有钱了，所以波伏瓦邀请他搬去和她一起住。这是波伏瓦人生中第一次和她的情人住在一起，她对放弃自己的孤独感到紧张，不过之后他们这样生活了七年。他也是波伏瓦唯一一个用亲密的第

二人称“tu”去称呼的情人。萨特在后来的采访中对此发表了评论，声称他与任何女人的亲密程度都不及他和波伏瓦之间的亲密程度，但即便如此，波伏瓦和萨特也从来没有用亲昵的“tu”称呼过彼此。[26]2018年，波伏瓦写给朗兹曼的信被公开，研究者们终于接触到了这部分材料。当波伏瓦不在朗兹曼身边的时候，她在信里记录和讨论自己的写作、阅读和所见所闻，穿插着她对朗兹曼的温柔表白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对于一个像波伏瓦这样渴望独处的人来说，她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朗兹曼分享她的生活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约瑟·达扬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电影刻画中，波伏瓦问朗兹曼他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朗兹曼说：我觉得你很漂亮，有一张光滑的脸，我想看看你无动于衷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波伏瓦：然后你会发现我没有看上去那么冷漠。

朗兹曼：哦，绝对是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谈论那件事……从一开始你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生活品位，而且你不断地追求和进取。你总是想做些事情，去旅行，去看事物的细节……和你一起去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过程，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27]

对波伏瓦来说，她的爱情在过去两年里痛苦地终结了，似乎标志着她的性时代的终结。但和朗兹曼在一起，波伏瓦说：“我欣喜若狂地跳了回去。”[28]

波伏瓦继续和萨特见面，但他们的习惯改变了。[29]波伏瓦和萨特通常每年都要休假两个月，但现在波伏瓦不想离开朗兹曼

两个月，所以他们决定让朗兹曼也来一起度至少十天假。朗兹曼这段时间在写关于刚刚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他很高兴犹太人并不是局外人。因此，朗兹曼和波伏瓦早晨在一起写作，到了下午，波伏瓦按照往常一样去和萨特一起工作。

尽管波伏瓦和朗兹曼同住一套公寓，同睡一张床，但他们的关系和波伏瓦与其他人的关系一样，都是非排他性的。波伏瓦希望朗兹曼也有别的情人，并且把一切都告诉她；波伏瓦仍然期待着见到萨特，并告诉他一切。朗兹曼成了“大家族”中的一员：他们与奥尔加、博斯特、万达和米歇尔一起度过了新年前夜。随着时间推移，波伏瓦越来越欣赏他们这些人共享的漫长时光：“我们之间互相理解，有时候一个微笑就像一整场演讲一样能传达很多意思。”^[30]

朗兹曼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会很自然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在波伏瓦和朗兹曼刚开始恋爱的那段时间，他很感激波伏瓦能够不顾他的“疯狂”而爱他。他有一段狂暴的过去，但那并不是塑造他性格的唯一因素。战后，朗兹曼发现法国在犹太种族的灭绝这件事上和德国沆瀣一气，悲痛欲绝。虽然朗兹曼在路易丝学校和让·科、吉勒·德勒兹都是好朋友，但是他父亲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以至于他母亲不得不抛下三个孩子离开他，不知所终。

但朗兹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要面对黑暗的人，而朗兹曼——波伏瓦唯一同居过的情人——也近距离亲眼看见了波伏瓦的暴风雨。朗兹曼认为，波伏瓦与萨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使得他们处于抑郁或绝望的边缘。在萨特身上表现为“忧郁和消沉”，他用安非他命、写作和调情诱惑来对抗这些情绪。在波伏瓦身上，这表现为朗兹曼所说的“爆发”：

坐着、站着或躺着，在车里或步行，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里，波伏瓦会突然猛烈地抽泣起来，全身上下因为喘气而颤抖，心碎不已的哭声不时被无法表达的绝望打断。我不记得第一次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七年里，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从来没有与她做过的什么错事或不幸联系在一起。相反，她似乎是撞在了幸福的岩石上，被幸福撞碎了。

朗兹曼曾经试图安抚波伏瓦，但面对波伏瓦“痛苦地意识到人类幸福的脆弱”，他“完全无能为力”。^[31]但就像学生时代的“波伏瓦小姐”一样，爆炸总会过去；波伏瓦和朗兹曼在谢尔街一起生活和工作，有时候一天里他们俩能够平静地写上五个小时，彼此不说话。^[32]

2018年，克洛德·朗兹曼将波伏瓦写给自己的部分信件卖给了耶鲁大学。^[33]在宣布这笔交易时，《世界报》发表了一封1953年的信，波伏瓦在信中写道，虽然她“肯定”爱过萨特，但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等，而我们的身体也没有达到和谐”。^[34]从波伏瓦的坦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到1953年，波伏瓦显然没有把萨特作为自己爱情生活的中心，而且，她对两人关系的批评不仅有性方面的，还有伦理方面的。如果历史重演，这些信件的读者还是只会关注性的那一方面。他们会反复表演自己的惊讶：原来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但波伏瓦发现，性并不是她唯一欠缺的东西。她反对的是缺乏互惠和对等——她认为这是浪漫爱情真实的必要条件。波伏瓦的几代读者都怀疑是否她与萨特的关系也处在一种“自欺”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到波伏瓦（向自己亲密的人）承认她和萨特关系的严重缺陷。是的，波伏瓦爱过萨特，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从

波伏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关系并不成功。

波伏瓦告诉公众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而且因为公众对她的评价，故事也变得复杂。1953年春，《第二性》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了。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诺夫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在巴黎的时候听到人们谈论这本书，但她的法语不够好，无法对这本书做出评价。她以为这是某种知识分子的性手册，所以请了一位动物学教授写份读者报告。H. M.帕什利回信称赞这本书“聪明、博学、平衡”，它“在任何传统意义上都不是女性主义的”。

克诺夫夫妇回信问帕什利愿不愿意翻译，能不能删减一下篇幅（克诺夫夫妇认为该书的作者患有“言语的腹泻”）。[35]法语版《第二性》长达972页。帕什利在与克诺夫出版社的通信中表示，他将删减145页，占全书的15%。帕什利是一个动物学家，他既没有哲学背景，也没有法国文学背景，帕什利完全没有理解波伏瓦法语原著中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学典故，这使得他觉得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并没有那么严谨。因此，帕什利带着自己的偏见去删减和翻译波伏瓦的作品，删改最严重的就是讲女性历史的部分，他删除了78个女性的名字和几乎所有涉及社会主义形式的女性主义内容。帕什利删去了涉及女性的愤怒和受到的压迫的内容，但保留了对男子情感的描写。此外，帕什利还删减了波伏瓦对家务劳动的分析。[36]

看到帕什利删减后的英译本后，波伏瓦回信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帕什利回信说，如果他不删减的话，这本书会“太长”，所以波伏瓦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对原作进行了删减。但帕什利并没有像波伏瓦所希望的那样直率。

在美国，这本书没有被贴上“存在主义”作品的标签，因为布

兰奇·克诺夫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波伏瓦曾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弱化这一点。[37]帕什利在译者序中说，因为“波伏瓦小姐的书毕竟是关于女人的，而不是关于哲学的”。[38]“为了简洁，他稍稍做了一些删减”，帕什利写道，实际上所有这些修改都是在作者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做出的。[39]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说她对帕什利的所作所为仍然耿耿于怀。[40]重新增补缺失部分的英译本直到2009年才在英国出版，2010年才在美国出版。

《第二性》在美国上市销售后，一下子就成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宠儿。一些早期的评价对波伏瓦的风格和独创性都非常赞许，也同时指出她错误地将女性面对的挑战普遍化，而这些挑战实际上只适用于艺术圈子或知识女性。[41]其他一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显然具有“极端的女权主义人格类型”。[42]《纽约客》的一位评论家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分别称其为“一件艺术品”和“一部虚构作品”。[43]《第二性》自出版以来销量很好，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超过了百万册。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是少数几本女性在想要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时可以求助的书籍之一。[44]

由于《第二性》，波伏瓦被称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母亲”。然而，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些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直到后来才承认她的影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性》的启发，这也促使波伏瓦评论道，米利特的书虽然“非常好”，但从她自己那里“借鉴了很多，形式、思想、一切”。[45]

在美国，波伏瓦关于性、“独立女性”和母性的观点吸引了读者们最持久的关注。[46]虽然人们的反应不像法国人那样尖酸刻薄，但在某些方面，波伏瓦还是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愤怒。

195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朗兹曼从圣特罗佩回到巴黎，在巴黎的双偶咖啡馆，波伏瓦收到了一个包裹。信上盖着芝加哥的邮戳，波伏瓦以为是阿尔格伦寄来的，便兴奋地拆开包裹。打开之后波伏瓦发现，那是一份匿名的礼物，上面写着：“帮助胆汁排出的泻药。”^[47]

波伏瓦仍然每月给阿尔格伦写信，定期向他介绍《名士风流》的最新情况。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时，她称这本书为“他的”书——尽管书名是朗兹曼给起的（朗兹曼说，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既理智又肉体的”^[48]）。《名士风流》慢慢成形，比波伏瓦希望的要慢，所以到1953年8月，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称这本书为“他那该死的书”。到了12月，它成了她的“该死的下流小说”。

1953年6月，波伏瓦、朗兹曼、萨特和米歇尔一起去旅行，先后去了瑞士、南斯拉夫、威尼斯。朗兹曼开着波伏瓦的车，而波伏瓦则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进行8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在里雅斯特，他们发现他们可以获得进入南斯拉夫的签证。波伏瓦从来没有去过铁幕后面：他们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补给，进入共产党的领地。

那年8月，波伏瓦在阿姆斯特丹继续写小说。她和萨特一起在那里工作，享受着这种工作的节奏。这时，她从朗兹曼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她原计划在巴塞尔和朗兹曼见面，但他在卡霍尔出了车祸，现在住院了。波伏瓦听闻之后立即上车，一路开车到朗兹曼身边。^[49]

与此同时，萨特回到了巴黎。他决定之后去卡霍尔与波伏瓦和朗兹曼见面，但他有几件事要在巴黎处理，主要是为波伏瓦办事，还有去追求自己的新情人。萨特爱上了朗兹曼的妹妹埃弗利

娜。米歇尔对此一无所知，埃弗利娜也爱上了萨特。因此，萨特现在有了三个“情妇”：万达、米歇尔和埃弗利娜，她们对萨特的了解程度不一，但萨特都在经济上给她们支持，并慷慨地给予各种文学的礼物。

1954年2月，波伏瓦收到了阿尔格伦的一封信，询问她的生活中是否还有“魔力”。尽管现在波伏瓦有朗兹曼，但是她还是跟阿尔格伦说她永远不会像爱他那样再爱上别人。她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开始抱怨自己的年龄；现在她过着“没有魔力的生活”。[\[50\]](#)但是到了4月底，她怀着美好的心情给阿尔格伦写了一封信，因为她终于完成了《名士风流》，足足有1200页。萨特、博斯特和奥尔加都认为这是波伏瓦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是一个美国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尽管波伏瓦还没有把这部长篇巨著的“怪物”交给伽利玛出版社，但她感到如释重负。

波伏瓦很担心萨特的健康：多年来，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服用着几倍于推荐剂量的安非他命。萨特有高血压，所以医生建议他休息。但是他没有听医生的话，每次觉得自己迟钝时他还增加了兴奋剂的摄入量。波伏瓦和朗兹曼都告诉他，他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但他不想停下来。

1954年5月，萨特启程前往苏联。他的访问被法国的报纸各种报道，波伏瓦也在媒体上关注着这些报道。萨特一直没有给波伏瓦回信。同月，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来到巴黎办画展，6月，波伏瓦和朗兹曼去了英国（在那里，她显然对英国的“夏天”并不着迷）。他们回来后，在公寓门下发现了一张博斯特的便条，请她马上来见他。他们下了楼（博斯特和奥尔加还住在楼下），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博斯特告诉他们萨特在莫斯科住院了。让·科说，一切只是因为萨特的高血压，情况并不严重。

波伏瓦给莫斯科那边打了个电话，直至听到萨特的声音，她才放心下来。萨特花了十天时间康复，然后飞回法国。但是，除了他的健康之外，波伏瓦也开始为萨特的政治立场感到不安。在这次旅行中，他为《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在苏联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萨特到底在想什么？萨特对此很固执，直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他才公开批评苏联。

萨特从苏联回来后，前往罗马休养。米歇尔陪着他一起去，但萨特只想睡觉。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前往德国和奥地利旅行。波伏瓦对萨特的低落情绪和身体状况感到惊讶，波伏瓦认为他身体上的疲劳已经带来了精神上的低谷。萨特性情急躁、不屑一顾，甚至称文学为“胡扯”^[51]——这可是他们两人都想献身的事业啊！萨特焦虑不安，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了怀疑。再多情人也没法把他从这种绝望中解救出来。

1954年10月，波伏瓦的《名士风流》终于出版。有了《第二性》的经历之后，波伏瓦这次显得有些不安：“我仿佛已经能听到那些让人不快的风言风语了。”让波伏瓦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作品很受欢迎，而且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很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觉得这部作品十分优秀。《名士风流》初版印刷了1.1万册都不够卖，到了第一个月的结尾时，已经卖出了4万册^[52]；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关于他的书是她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作品。它甚至入围了龚古尔奖（Prix Goncourt）——龚古尔奖是在法国享有盛誉的一个奖项，每年11月颁发。很多人说这本小说应该获奖，但波伏瓦不确定《第二性》作者的身份是否会对自己不利。

龚古尔奖每年都会为被提名的作家举行一场特别的午宴，席间宣布获奖者的名字，然后——如果你幸运的话——要当场感谢陪审团。在那之后，出版商将会举办一场鸡尾酒会，记者可以在

会上提问和拍照。许多作家喜欢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公众的关注，并希望这样做。西蒙娜·德·波伏瓦对此完全不屑一顾。

她不喜欢报纸上写的关于她和萨特的“丑事”，也不喜欢最近关于她的《第二性》的报道。波伏瓦也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在她看来，“媒体报道只会抹黑被报道的人”^[53]，所以波伏瓦决定用她自己的方式玩这个游戏，并且远离它的控制——她决定躲起来。

在宣布获奖的两天前，记者们开始从街对面的一个酒吧监视波伏瓦公寓的门。但是波伏瓦悄悄地从后门溜去了别的地方。在宣布奖项那天，波伏瓦、萨特、奥尔加和博斯特举行了一个小型派对，听广播上宣布谁获奖了，而记者们则在布切里街白白等了一整天。记者们失去了耐心，尝试了几招，包括给她的公寓打电话，甚至模仿萨特。

最终，波伏瓦获奖了。

文学圈的大佬们很生气，因为波伏瓦成功地传达了她的态度：没有他们她完全能活下去。一家报纸恶意刊登了一张加工后的波伏瓦照片，他们故意在她的眼睛下画上阴影让她看起来很老。电视节目播放了她缺席龚古尔文学奖的画面——白色亚麻桌旁的座位空空的，不见波伏瓦本人，然后是雷诺多奖

（Renaudot prize）“不那么害羞”的获奖者让·勒韦齐在书上签名（用播音员的话说，是在履行“荣耀的小义务”^[54]）。尽管波伏瓦拒绝按规矩办事，她的书却卖得很好，甚至比龚古尔奖以往的得主们还要好，而且她收到了更多的信件。这些信件的语气比

《第二性》那些充满讽刺和轻蔑意味的读者来信要柔和得多。波伏瓦也收到了老朋友和曾经的学生的来信。但是波伏瓦最想知道阿尔格伦的想法。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这个美国爱情故事并非

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们的故事，她只把他们的一部分故事写进了《名士风流》里。[55]

波伏瓦是龚古尔文学奖自1903年成立以来的第三位女性获得者。获奖一个月后，她的朋友科莱特·奥德里评论说，波伏瓦“为自己选择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她的小说展现了“个人成长的创伤和集体体验的沉重”。奥德里写道，波伏瓦的作品“要求读者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处境”。[56]波伏瓦作为作家的目标仍然是激发读者的自由，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对一些读者坚持认为《名士风流》是自传体小说表示失望：“实际上，这是一部真正的虚构小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环境，来自战后的时代，来自我认识的人，来自我自己的生活的，等等，但它真正地跨越到了一个完全虚构的平面上，与现实相去甚远。”[57]

尽管遭到波伏瓦的反对，这本书至今仍被当作一本讲述左岸派著名知识分子生活圈的自传体小说售卖。2005年出版的《哈伯年鉴》（*Harper Perennial Edition*）称这本书为“史诗般的爱情故事和哲学宣言”，它将让读者深入了解名人的生活：

在战时的巴黎，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庆祝德国占领的结束，并计划他们的未来。……中间穿插着对萨特、加缪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的细致入微的描述，这是一个让你永生难忘的爱情故事。

尽管《名士风流》获了奖，十分受欢迎，但也让更多人认为波伏瓦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的文学缺乏想象力，只取材于她自己的生活。按照这个思路去读《名士风流》的话，故事的女主人公安娜·迪布勒伊就是波伏瓦，她的丈夫罗贝尔是萨特，亨利·佩隆是加缪，他的情人波尔有时被认为是维奥莱特·勒迪克

（尽管波伏瓦指出，有好几个女人都认为自己是波尔[58]）。还有一个叫刘易斯·布洛甘的美国人，安娜和他有过一段。

虽然波伏瓦承认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她的生活，但从波伏瓦的角度来看，《名士风流》既不是自传，也不是论文小说，既然人们指责它两者兼而有之，她决定在《时势的力量》中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名士风流》的主题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重复”，波伏瓦将其理解为“真正拥有的东西，一定是失而复得，失去了之后重新找回的”。[59]波伏瓦不想给小说强加一个主题，她想要的是展示“冲突观点的永恒舞蹈”。

在这里，波伏瓦也解释了两个令人震惊的事情：首先，她故意选用哲学上被称为“间接沟通”的方法，即给读者提供的不是一个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选择。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这一技巧——有时用假名出版，有时在假名中创造假名，以引起读者对什么是真实的思考，以及他们应该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作品在克尔凯郭尔笔下被称为哲学，那么为什么在波伏瓦那里就不是呢？答案仅仅是因为克尔凯郭尔是个男人，而波伏瓦是个女人吗？波伏瓦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认为是一个肤浅的、缺乏想象力的思想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当她为自己哲学的深度和独创性辩护时，很少有人相信她。

第二，波伏瓦直接说，《名士风流》这本小说探究的问题来源于她遇到萨特之前就在日记里提出的问题：“存在与虚无的基本冲突，这是20岁的我曾经在日记里勾勒的问题，而后我在所有的书籍中都没有解决，即使在这本书里我仍然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我展示了一些人如何在怀疑和希望中挣扎，在黑暗中摸索、寻找出路；但是我想我证明不了什么。”[60]

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直率而坚定地捍卫她作品的哲学本质和独创性。到20世纪60年代初，波伏瓦的哲学在过去的20年间都被误解成是“应用存在主义”，人们认为她的智识和创造都依附于萨特。波伏瓦现在很清楚，除了作家所说的话本身，说话的人也会带来紧张和压力。因此，波伏瓦毫不含糊但很平静地说，她的想法来源于她自己。

后来一种说法渐渐流传开来，认为波伏瓦“写了一部准确而忠实的编年史”^[61]：

《习作》（*Études*，1955）

“是的，我们被告知这是萨特‘大家族’的故事。”^[62]

《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ales*，1957）

“《名士风流》售出18.5万册，这不仅仅是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还因为圣日耳曼-德-普雷周边的传说。波伏瓦被认作让-保罗·萨特的缪斯女神、存在主义的象征，很多读者都希望通过阅读这本小说，对这个似乎充满神秘的运动拥有全新的认识。”^[63]

美国对于这本书也这样宣传：“正如我们所料，我们在小说中找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本人的影子。”^[64]对于波伏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应，还让她很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65]

多丽丝·莱辛赞赏波伏瓦的《名士风流》，认为她展示了一幅“杰出的女性画像”。^[66]这本书里的女性被告知，女性都是一样的。^[67]然而，我们看到一些女性因为没有回馈的爱而经受着痛苦折磨^[68]；另一些女性因为男性不把她们当作可以谈论事情

的对象而感到沮丧。故事主人公之一安娜的女儿纳迪娜将代际的维度带入了故事中，她向自己的情人抗议：“你和其他人讨论事情……但你永远都不会跟我讨论这些事情。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只适合与男人上床。”^[69]

间接交流的一个问题是，它会留下很多解释的空间和可能。尽管波伏瓦声称，主人公亨利和安娜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在，但从波伏瓦死后出版的《给阿尔格伦的信》来看，《名士风流》的一部分内容与波伏瓦的真实生活非常相似：

《名士风流》

“哦！你已经在床上了！”布洛甘说。他拿着干净的床单，疑惑地看着我：“我想换床单。”“没必要……”“安娜！”布洛甘说话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他扑到我身上，我第一次叫出了他的名字：“刘易斯！”

信件（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

“我来睡觉的时候别忘了换床单。”我将永远记得，第一个夜晚，你抱着被单，看着躺在床上的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在我看来，从那一刻起，我就真正地爱上了你，从未停止过。

在波伏瓦的信件出版后，读者们发现了书里栩栩如生的情节可以在她的信件中找到原型。读者们忍不住猜测这本书里还包含了哪些这样的例子，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能划在哪里。

1955年1月9日，波伏瓦47岁了，她觉得自己“真的到了中年”。^[70]过生日总是使波伏瓦想起死亡，她仍然不能平静地去想它。

那年，波伏瓦用龚古尔奖的奖金买了一套单间公寓，位于维克多·舍尔歇大道上，这条路与蒙帕纳斯公墓东南侧的拉斯帕尔纳斯林荫大道相距不远。从她出生的公寓到圆顶酒店和库波勒酒店（Coupole）只有9分钟的路程。1955年8月，波伏瓦和朗兹曼搬进这个公寓。朗兹曼记得他们一起跨过门槛，用做爱来庆祝乔迁之喜。^[71]但波伏瓦几乎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就在9月初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国。他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然后周游全国，波伏瓦和萨特都对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在这次旅行中，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外国身份和特权：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最后波伏瓦和萨特经由苏联返回法国。

到了春天，维奥莱特·勒迪克的小说《蹂躏》出版了。在早期的手稿中，勒迪克所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冒犯了伽利玛出版社的读者，结果，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小说被“截肢”^[72]了。因为出版社想要删减小说，因此勒迪克非常沮丧，甚至身体不适。在她康复期间，波伏瓦陪着她，同时给萨特写信讲述她们在一起的“艰难日子”。^[73]当这本书出版时，那些缺失的场景并没有被修复。但即便如此，波伏瓦和勒迪克还是漫步在风信子和郁金香丛中，讨论她们心里的希望。在文学圈子里，波伏瓦仍和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和她的美国出版商一起拿波伏瓦开玩笑。他们当时正在着手翻译《名士风流》，但可能要删减一些性内容，因为“在美国，在书中谈论性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性变态”。^[74]

6月，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评论家们宣称，这是对萨特哲学的致命一击。波伏瓦认为并非如此，所以她写了一封回信，反驳梅洛-庞蒂对萨特的逐点解读。很多人批评波伏瓦：她为什么要为萨特辩护？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讨论了她的回答是如何引起攻击

的。一些人说她应该让萨特自己去回应，因为是他的哲学思想受到谴责，其他人说她太“恶毒”了。对于前者的批评，她说任何人看到有缺陷的哲学论证都可以反驳它。至于后者，她和梅洛-庞蒂的友谊“非常深厚”：“我们在观点上的差异非常大，我会坚持到底，而梅洛-庞蒂会微笑面对。”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波伏瓦所流露出的尖刻和风趣。有人说，她的哲学论文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在那个时代，男性哲学家很少受到这样的指责），对此，波伏瓦回应：“我不这么认为。要使一袋热气爆炸，最好的办法不是轻拍它，而是把钉子一头扎进去。”^[75]

1955年秋，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在种族和殖民主义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洛哥和突尼斯即将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也想要独立。但是那年5月，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政府蒙羞。法兰西帝国——法国的骄傲——必须得到保卫，而保卫它的方法就是保留阿尔及利亚。波伏瓦深感不安，甚至感到厌恶；她认为法国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她晚上难以入眠，为自己国家对无辜者的折磨感到羞耻。她和萨特一起办的《摩登时代》杂志很早就站出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波伏瓦也因此再次被指控为法国的叛国者。

1955年，波伏瓦以“特权”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特权阶层如何思考他们的处境？古代贵族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享受着自己的权利，而不考虑这些权利是否合法。因此，第一篇论文里波伏瓦对萨德侯爵进行了分析，她说，因为萨德侯爵阐明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想要对抗不公正的等级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对这些制度一无所知。萨德没有做波伏瓦认为作家应该做的事：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相反，萨德投身于虚构的世界，并为残忍和堕落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萨德所谓的情欲忽略了

情欲的真相，只有那些让自己沉溺于所爱之人的脆弱和情感陶醉的人，才能发现真的情欲。尽管如此，波伏瓦认为萨德还是有优点的，他“聪明地展示出特权只是利己的渴望，无法在所有人眼中都合法”。[\[76\]](#)

在第二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保守派是如何为不平等辩护的：他们通常是将“普遍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混为一谈。波伏瓦说，从哲学角度为特权辩护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的人要么是“健忘”（对世界缺乏关注），要么就是“自欺”。在第三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文化。她在书中写道，文化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像其他特权阶级一样，都忘记了其他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拥有特权。

八年前，波伏瓦写过一篇文章，说非专业人士不应该妄想自己能理解存在主义，不可能用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就把存在主义总结清楚：

没有人会要求用两三句话讲清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普及存在主义并不容易。哲学理论就像物理或数学理论一样，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透彻地理解。的确，如果一个人想要掌握新学说的基础和原创性，就必须熟悉它所依赖的悠久传统。[\[77\]](#)

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意识到，大量公众之所以对存在主义感兴趣，是因为它有“对待现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务实态度”。存在主义回应了人们的需求。但是在美国，这使得一些批评家质疑存在主义是不是哲学。在法国，哲学并没有如此狭隘的定义。[\[78\]](#)但即便如此，波伏瓦一定也在想：她是否忘记了需要答案的不只是知识分子。

写完关于特权的文章之后，波伏瓦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想暂停小说创作，同时也想挑战西方读者对共产主义的偏见。《长征》（*The Long March*）取材于波伏瓦对1955年去中国旅行的反思；这次旅行让她重新思考，不再把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作为自己的准则。“我眼中的中国广大群众打破了我对西方世界的整体看法；那时，远东、印度、非洲长期缺乏食物，这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西方人的舒适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79]波伏瓦希望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话能让其他人看到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世界”。

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从“民主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文章，因为她不想只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定义上，而是想去体现“所有真理中最具体的真理：当下只不过是进程，是一种变化”。波伏瓦告诉读者，她在中国期间看到的一切，“既是过去的一种留存”，也是“走向新生所伴随的痛苦”。^[80]波伏瓦在她所看到的東西中发现了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1956年，《名士风流》和《第二性》一起被天主教堂列为禁书。波伏瓦加入了萨特，一起去意大利度过秋天，他们后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在“永恒之城”的中心地带，波伏瓦和萨特的旅馆房间紧挨着，他们的日子遵循着一种和谐的节奏：孤独、陪伴、工作、威士忌和冰激凌。波伏瓦现在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节奏，她特别喜欢从面对着空白页构思时的“迷乱”到完成最终稿的“细枝末节”之间的这段时期；在萨特、博斯特和朗兹曼发表评论后，她称这一过程为她“删减、放大、纠正、撕碎、重新开始、思考、做出决定”的过程^[81]。

那一年，波伏瓦重新开始了她十年前，也就是在1946年时搁置的项目：回忆录。这十年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她写了《第二性》，遇见了阿尔格伦，与怪物一样的长篇小说做斗争，

最终这个怪物成了《名士风流》，并赢得了龚古尔奖。波伏瓦去过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地方，并形成了一种信念——正如她在《特权》（*Privileges*）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文化是一种特权，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那年秋天在意大利，波伏瓦让萨特读了她写的有关她表哥雅克的段落，这些段落后来成为《端方淑女》的一部分。波伏瓦定期给朗兹曼写信，讲述她的生活以及她觉得有趣的书，包括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书的开篇描述了“普通人的权力受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限制，但即便是在这些工作、家庭和社区中，他们似乎也经常受到自己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力量的驱使”。米尔斯认为，大众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个他们没有目标的时代，同时他们也没有权力”。[82]波伏瓦思考着，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力呢？

值得注意的是，波伏瓦转向自传的同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特权和政治参与的批评也越来越多。[83]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波伏瓦的生命写作是她将政治付诸行动的方式之一。玛格丽特·西蒙斯认为，波伏瓦的中国之行，更具体地说，是她与巴金的畅销书《家》的邂逅激发了她的灵感，让她以一种可能将读者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巴金的《家》里记述了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兄弟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一个接受，另一个反抗；它被数以万计的人阅读，波伏瓦认为它“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怨恨和希望”。[84]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批判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她对女性解放的向往。但波伏瓦写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到普通女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篇幅是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巴黎哲学精英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普通人不甚了解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概念：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到了20

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意识到许多人并没有同时购买《第二性》的上下两卷，更不必说阅读了。到1956年5月，《第二性》第一卷的法文版本已经印了116次。第二卷的销售速度较慢（到1958年才达到104次），然而正是在第二卷中，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她们成为女性的经历；在那里，波伏瓦写下了爱、独立和拥有自己的梦想[85]。波伏瓦很疑惑为什么第二卷卖得不如第一卷，她甚至对谈论爱和解放的第二卷拥有更少的读者而感到失望。波伏瓦也考虑过自己是否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与其他女性分享她的特权，她分享的方式是否是最好的。

1957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新年问候时，告诉他自己快要完成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她又妄自菲薄地说这本书“不太好”），以及现在她开始着手于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关于童年和青春的回忆录，不仅要讲述故事，还要试图解释清楚我是谁，我是如何成为我自己的，我与我生活的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86]

像《第二性》一样，波伏瓦流畅地写出了《端方淑女》，前后一共花了18个月。波伏瓦翻阅自己的旧日记，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她思考着该如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处理其他人。波伏瓦很乐意与公众分享她的生活，或者至少她的个人形象；但是，波伏瓦所写的其他人会欣然接受她分享他们的故事吗？她给梅洛-庞蒂（在书中，他是扎扎的情夫或哲学家伙伴）、马厄和扎扎的家人都取了假名。但是波伏瓦还是担心她母亲的想法。

1958年1月，波伏瓦步入50岁，她对这一切深恶痛绝，比平时想到生命即将结束而感到的不安还要强烈得多。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愈演愈烈，波伏瓦对这件事很放不下，对自己是法国人感到厌恶，她睡不着觉，甚至觉得文学都变得“无足轻重”；波伏瓦曾为《摩登时代》杂志工作，出版阿尔及利亚人和士兵的证词。萨特也对政治深感不安，尽管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1956年11月4

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杀死4000多名匈牙利人。萨特此前对苏联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现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容忽视。萨特在接受《快报》（*L'Express*）采访时谴责了苏联的行为，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局势日益恶化的这段时间，萨特服用了很多安非他命，以至于他晚上讲话都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喝酒放松。波伏瓦希望萨特停止损害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时她会气得摔碎杯子，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坚定立场。^[87]在文学方面，萨特几乎总是听从波伏瓦的劝告，但在政治上显然波伏瓦拿萨特没辙，因为他完全不想听。

5月，皮埃尔·普莱姆林成为法国总理。他是一名基督教民主党人，众所周知，他支持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协商解决方案。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暴动，由雅克·埃米勒·马叙将军领导的法国右翼军队夺取了政权，目的是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第二天，马叙将军要求夏尔·戴高乐重新掌权，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攻击巴黎。政府重组，由戴高乐领导，戴高乐制定了新宪法。一些中左翼政治家和共产党人反对这次政变（包括萨特），但宪法将在9月进行投票。

5月25日，克洛德·朗兹曼在朝鲜，波伏瓦再次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对波伏瓦来说是一种“能够回归自我的解药”——同时波伏瓦也开始对她的生活进行另一种“评估”。波伏瓦已经完成了童年回忆录；她现在该写些什么呢？更多的小说吗？和《特权》与《长征》一脉相承的文章吗？波伏瓦想写一本书，这本书将“比她的其他作品更重要”，将“她童年时困惑的‘天命感召’与她在50岁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88]

1958年6月，波伏瓦和萨特比往常更早地去了意大利。《端方淑女》将于10月出版，波伏瓦已经开始紧张人们的反应了。^[89]在这本波伏瓦人生写作的第一卷中，她就明确表示，她并不

是在与读者订立通常的自传“协定”[90]。在《端方淑女》的宣传简介中，波伏瓦写道：“也许可以说，我根据自己现在的样子重塑了自己的过去；我的过去造就了我，所以今天通过对它的解释，我见证了它。”[91]1958年6月4日，她在《法国观察周刊》（*France Observateur*）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她使用叙事或故事的手法来写回忆录是为了避免使用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术语。波伏瓦想以成为一个女人为主题（这是《第二性》的核心），写她是如何成为她自己的。尽管她没有在《法国观察周刊》杂志上公开说，但到1956年，波伏瓦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生活对很多读者来说是有趣的（不管他们是否赞同她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波伏瓦过去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写哲学文本和“想象的经历”，我们不难推测，波伏瓦很可能是要用另一种文学形式把《第二性》的哲学呈现出来，也就是用这种哲学来写她自己的人生。

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一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尚未命名的下一卷在她的脑海里抗拒着一个明确的轮廓。波伏瓦知道，她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将需要一种不同于《端方淑女》的文学形式和处理方式。这个阶段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智识和个人方面都难解决。理智上，波伏瓦意识到她总是把小说看得比其他文学形式重要。她在日记中写道：“但现在，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事后看来，我还必须谈谈哲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就个人而言，波伏瓦想写关于变老、孤独和萨特。关于萨特，或者博斯特、奥尔加、比安卡和纳塔莉，她应该说多少？在整个5月和6月，波伏瓦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到底是用小说的形式还是延续自传的形式？后者将采取“关于作者的文章”的形式。在《法国观察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称之为“关于自己的随笔”。[92]

波伏瓦于8月中旬回到巴黎，与萨特一道前往比萨，然后独

自驾车返回。波伏瓦发现跟萨特说再见更难了，不知道是不是年龄惹的祸，分离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快，波伏瓦又回到了国家图书馆，埋头写回忆录，但她的思绪已经转到另一个项目上去了。她在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她越来越想“写写晚年”。[93]

当波伏瓦与朗兹曼共度时光时，在意大利的萨特发现，他的情人米歇尔·维安十年来一直与安德烈·鲁里奥蒂有染；现在她要为了他离开萨特。尽管萨特自己也有过两三次出轨的经历，但他还是为此感到心烦意乱。萨特宁愿扮演说谎者，也不愿被人欺骗。此外，朗兹曼也有了外遇，并试图掩饰：她是一个贵族女人，比波伏瓦年轻。一天晚上，朗兹曼回到谢尔大街的时间比平时要晚。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发现波伏瓦正端坐在床上，脸色阴沉。“我想知道。”她说。[94]

朗兹曼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波伏瓦立刻松了一口气，他对她的接受感到惊讶。波伏瓦提议：一个星期和她住三晚，和那个女人住四晚，每隔一周交换一下。朗兹曼认为他的贵族情人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他就无须再偷偷摸摸，半夜溜走了。但是这位贵族情人却不同意，她想要朗兹曼完全属于她一个人。[95]

9月14日晚上，朗兹曼带波伏瓦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她去车站接萨特。他们聊了一整天，波伏瓦已经知道萨特很疲惫，因为她看过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显然毫无灵感的文章。通过或否决戴高乐的宪法改革的全民公投即将到来，萨特渴望重返工作岗位，但没过几天，他的肝脏发生了感染。即便如此，他还是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9月25日周四，萨特向《快报》承诺要写一篇文章，他不想错过截稿日期。

萨特身体垮掉了，波伏瓦编辑了他的作品，重写了部分内容，准备发表。在选举的准备阶段，警察和北非人经常在巴黎街

头互射机关枪。在阿尔及利亚，“一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赶进了一处集中营，就像以前在德兰西的犹太人一样”。波伏瓦疲惫不堪，她的脖子总是紧绷着，难以入睡，难以集中精神。一天晚上，她突然感觉到了“曾经困扰她的恐惧”和绝望，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邪恶是无底的”。但是她一直在努力与它抗争。[96]

9月27日，全民公投的前一晚，波伏瓦在索邦大学向2400人发表讲话。但是第二天，9月28日，新宪法以79.25%的票数获得通过，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新宪法扩大了总统的行政权，法国继续统治阿尔及利亚，但是赋予了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承诺的一些政治权利。阿尔及利亚工人也有了宵禁。

这是对他们所信仰的一切的否定，但正是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这也是对萨特健康的严重打击。当波伏瓦最终说服萨特去看医生时，医生说萨特刚刚险些要心脏病发作。在罗马时，萨特不间断地服用安非他命，因为他正为一出戏剧做准备。尽管他的身体发出了多种警告信号——眩晕、头痛、语言障碍，但现在萨特仍然想要继续工作。

医生开了一些药，禁止萨特饮酒和吸烟，并让他休息。波伏瓦坐在波拿巴街她的桌子对面，望着他，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她叫他休息，萨特偶尔也会同意。但是他抗议说，他已经答应要在10月前完成这出戏，这是必须完成的。因此，波伏瓦又去看医生，她担心萨特就在她眼前自杀。医生坦率地对波伏瓦说，萨特是个情绪化的人，需要冷静下来，如果他不慢下来，他撑不过6个月。

冷静！在第五共和国？波伏瓦离开医生，径直去找了请萨特写这个剧本的女人，她同意把剧本《阿尔托纳的谴责》（*The Condemned of Altona*）推迟到来年。然后波伏瓦回到家，把医生

和剧本延期的事情告诉了萨特，因为萨特不能过度劳累。波伏瓦以为萨特会因为她没有和他商量就做了这一切而生气；相反，萨特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被动态度接受了这个消息。波伏瓦开始意识到，她不得不目睹萨特的衰老，最艰难的事情是她正在失去她思想的“无与伦比的朋友”；她不能和萨特讨论她的担忧，因为他现在就是波伏瓦的担忧。

萨特一脱离险境，波伏瓦就开始享受10月6日出版的《端方淑女》受到的好评。这本书对波伏瓦个人的影响比她之前的书更大。一些评论家抱怨说，她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包含了太多乏味的细枝末节（谁想听沉默的另一面？），还有人把她比作卢梭和乔治·桑，和她一样，这两位也是50多岁开始写自传的作家。以前作品出版后，波伏瓦会收到一些信件，但这次不同。马里内·鲁什的研究表明，基于波伏瓦收到的2万多封信件的档案，回忆录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波伏瓦的读者群和她的关系。从此以后，波伏瓦将收到更多来自普通法国女人的信件，有的热情洋溢，有的很亲密，因为她们觉得回忆录里的波伏瓦距离她们很近：“你走下神坛……变得更加人性化，你的知识和文化优势不再使你拒人于千里之外。”^[97]

从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波伏瓦的读者很惊讶地发现波伏瓦也做饭，也有挨饿受冻的时候，她的书比同时代男性作家的书更贵，而且尽管以廉价平装书的形式出版，却比萨特的书的出版花的时间更长。^[98]无数读者写信给她，说尽管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过着舒适的“成功”生活，她们也渴望有一个存在的“理由”，有时候她们感到生活空虚。一位读者甚至写了她企图自杀的心路历程。

波伏瓦的回忆录也促使女性阅读《第二性》以及写信告诉波伏瓦她们阅读和推荐《第二性》给别人的经历：

读《第二性》的有两种女人，借出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有点害怕：有些人读完觉醒了，感到害怕，但接着回去睡觉了；有些人读完觉醒了，感到害怕，就没法回去接着睡觉了！后面这种读者会把你所有的书都找来读，并试图理解。

[99]

随着时间推移，从波伏瓦的读者来信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对女性的关心延伸到了给个别读者的回信上。在某些情况下，波伏瓦与个别读者的通信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鼓励她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些信件中，波伏瓦有时会支持女性从事文学事业，并与她们见面。她的日常安排和以往一样严格，其中包括每天与读者通信的一个小时时间。

波伏瓦在《端方淑女》一书中以扎扎的死作为结尾，写她们一起与等待她们的“令人作呕的命运”做斗争，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波伏瓦认为“我用她的死换取了自己的自由”。[100]现在——直到现在，波伏瓦才知道梅洛-庞蒂不被拉库万家族接受的真正原因。[101]

《端方淑女》出版后，扎扎的姐妹之一弗朗西斯·博比雄写信给波伏瓦解释拉库万家族拒绝梅洛-庞蒂的原因。波伏瓦和弗朗西斯在11月见了面，弗朗西斯给波伏瓦看了一些她从扎扎那里收到的信。事情的真相是，拉库万家当时雇了侦探来调查他们未来的女婿——毕竟，除了他们女儿的人生之外，还牵涉一笔25万法郎的嫁妆，结果发现梅洛-庞蒂是个私生子。拉库万家族笃信天主教，在天主教里，通奸是一桩致命的罪恶，因此他们的女儿和梅洛-庞蒂之间的任何结合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梅洛-庞蒂答应，如果拉库万夫妇保守秘密，他就不再追求

扎扎——梅洛-庞蒂的妹妹当时已经订婚，他不希望丑闻妨碍妹妹的婚事。然而，扎扎不知道调查的事情及其后果。直到梅洛-庞蒂突然态度冷却，扎扎心灰意冷时，她母亲才终于把原因告诉了她。扎扎曾试图顺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他们的女儿来说有多么糟糕时，已经太晚了。

没有什么能改写扎扎的故事并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最终波伏瓦知道了真相。她希望她的作品能够激励读者们去追求自由，为他们的想象力和生活道路开辟新的可能性。谁会想到，读者也能靠自己释放出自由的光芒呢？

[1] 见‘Chronologie’, MPI xcvi.

[2] ‘It’s About Time Women Put a New Face on Love’, *Flair* 1(3), April 1950:76–7. Included in FW.

[3] ‘It’s About Time’, FW 76.

[4] ‘It’s About Time’, FW 78.

[5] ‘It’s About Time’, FW 79.

[6] SdB to Sartre, early July 1950, *Lettres à Sartre*, p.370.

[7] SdB to Sartre, 2 September 1950.

[8] SdB to Sartre, 20 August 1950, LS 474.

[9] FC 245. TALA 434.

[10] SdB to NA, 30 October 1951 TALA 434, 435.

[11] SdB to NA, 30 October 1951, TALA 436.

[12] FC 267–8.

[13] SdB to NA, 9 November 1951, TALA 440.

[14] Sylvie Chaperon, ‘The reception of The Second Sex in Europe’, *Encyclopédie pour une histoire nouvelle de l’Europe*, 2016.

[15] SdB to NA, 3 December 1951, TALA 446.

[16] FC 170.

[17] FC 291.

[18] FC 268. 关于萨特在1952年出版《圣热内》时采纳波伏瓦的一些观点，见Webber,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19] FC 269.

[20] FC 296–7.

[21] FC 291.

[22] FC 291.

[23] Sartre, in ‘Sartre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 Conversation with Redmond O’Hanlon’, *The crane Bag* 7(1), *Socialism and culture* (1983): 83.

[24] Claude Lanzmann to SdB;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rchives, 引自Rowley, *Tête-à-tête*, p.214.

[25] FC 294.

[26] 1971年3月12日杰拉西与萨特的访谈。

[27] 见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于1978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纪录片文本于197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28] FC 297.

[29] FC 297–8.

[30] FC 298.又见ClaudeLanzmann, *The Patagonian Hare: A Memoir*, trans.Frank Wynne,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2, p. 244 on becoming part of the family’.

[31] Lanzmann, *Patagonian*, p.265.

[32] Lanzmann, *Patagonian*, p.259.

[33] 卖给耶鲁大学的信件有112封，但是朗兹曼在2008年声称有300封。见Claude Lanzmann, ‘Le Sherpa du 11bis’, in Julia Kristeva, Pascale Fautrier, Pierre-Louis Fort, Anne Strasser (eds)(*Re*)*découvrir l’oeuvre de Simone de Beauvoir: du duxième Sexe à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aris:Le Bord de L’eau, 2008, p. 20.

[34] 引自Franck Nouchi, ‘L’exil américain des lettres d’amour de Simone de

Beauvoir à Claude Lanzmann', *Le Monde*, 19 January 2018.

[35] 见Introduction to SS 12.

[36] 见Toril Moi, 'While We Wai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 *Signs* 27(4): 1005–35 (2002).

[37] Blanche Knopf to Harold Parshley, 2 November 1951, 引自Rosie Germain, '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4) 2013: 1041–62.

[38] Parshley, 'Introduction', SSP vi.

[39] Parshley, 'Introduction', SSP x.

[40] Beauvoir, in SdB, Simons and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0.

[41] Clyde Kluckholm, 'The Female of our Spec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2 February 1953, 3, 33.

[42] Charles J. Rolo, 'Cherchez la femme', *The Atlantic*, April 1953, 86.

[43] Margaret Mead, in 'A SR Panel Takes Aim at *The Second Sex*', *Saturday Review*, 21 February 1953.

[44] 在美国，波伏瓦的书和其他一批关于“女性”的当代书籍同时面世。《金赛性学报告（男人篇）》（*Sex and the Human Male*）出版于1946年，而正如波伏瓦在写给阿尔格伦的信中所希望的，关于女性的性学报告也开始出现。阿什利·蒙塔古的《女性天生的优势》（*The Natural Superiority of Women*）于1952年出版，《金赛性学报告（女人篇）》（*Sex and the Human female*）和米拉·科马罗夫斯基的《现代女性》（*Women in the Modern World*）在1953年出版。

[45] Carol Giardina, *freedom for women: forging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1953–1979*,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79.

[46] 更多关于《第二性》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接受情况，参见Rosie Germain's excellent article '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47] SdB to NA, April 1953, TALA 479.

[48] Lanzmann, *Patagonian*, p.235.

[49] SdB to Sartre, summer 1953 (n.d.), LS 493.

[50] SdB to NA, 15 February 1954, p.492.

[51] FC 323.

[52] FC 326.

[53] FC 328.

[54] 'Les prix Goncourt et Renaudot', *Journal les actualités françaises*, 10 December 1954,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video/AFE85007180/les-prix-goncourt-et-renaudot-video.html>

[55] SdB to NA, 9 January 1955, p.512.

[56] Colette Audry, 'Notes pour un portrait de Simone de Beauvoir',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7–24 December, 1954, p.5.

[57] Beauvoir, 'A Story I Used to Tell Myself' [1963], UM 159.

[58] FC 328.

[59] FC 282.

[60] FC 283.

[61] FC 328.

[62] A. Blanchet, 'Les Prix littéraires', *Études* 284 (1955): 96–100, here p.98.

[63] G. Charensol, 'Quels enseignements peut-on tirer des chiffres de tirage de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actuelle?', *Informations sociales* (1957): 36–45.

[64] G. J. Joyaux, 'Les problèmes de la gauche intellectuelle et Les Mandarins de Simone de Beauvoir', *Kentucky foreign Language Quarterly* 3 (1956): 121.

[65] FC 328.

[66] Doris Lessing, 'Introduction' to M 9.

[67] M 48

[68] M 107.

[69] M 203.

[70] TALA 511.

[71] Lanzmann, *Patagonian*, p.257.

[72] FC 336.

[73] SdB to S, late May 1954 (具体日期不详) , LS 505.

[74] FC 361.

[75] FC 332.

[76] PW 7.

[77] ‘What is Existentialism?’ PW 324.

[78] ‘What is Existentialism?’ PW 324.

[79] FC 358–9.

[80] LM 32.

[81] FC 487.

[82] 我无法直接引用朗兹曼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1956年8月和9月，可以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找到。引文来自C.Wright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83] 见Sandrine Sanos, *Simone de Beauvoir*, p. 117. Margaret Simons, ‘Beauvoir’s Ironic Sacrifice; or Why Philosophy Is Missing from her Memoirs’, 即将出版。

[84] TLM 130.

[85] This information is taken from 1956 (tome I) and 1958 (tome II) NRF editions of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Gallimard).

[86] TALA 526, 1 January 1957.

[87] FC 398.

[88] Unpublished journal, 25 May 1958,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rchives, 引自the ‘Introduction’ to MPI ix.

[89] FC 443.

[90] 见‘Notice’ to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in MPI 1226, 缺乏菲利普·勒热纳所谓的“自传性约定”，根据该约定，作者承诺向读者讲述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见*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91] ‘Texte de Présentation de l’édition Originale’, *Simone de Beauvoir,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MPI 352.

[92] ‘essai sur l’écrivain’, 引自MPI, ‘Introduction’, xv.

[93] FC 448.

[94] Lanzmann, *Patagonian*, p.329.

[95] Lanzmann, *Patagonian*, p.330.

[96] FC 614.

[97] 1959年6月20日一位读者的来信；引自Marine 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une appropriation collective des Mémoi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ses lectrices (1958–1964)’*Littérature* 191 (September 2018): 68.

[98] 见Marine 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72.

[99] 1959年11月15日一位读者的来信；引自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71.

[100] MDD 360.

[101] FC 456.

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1958年底，波伏瓦60岁，克洛德·朗兹曼离开了她。关于这段感情的结束，波伏瓦没有太多记录。在《给萨特的信》（*Letters to Sartre*）中，以1958年为界，之后只在1963年有一封信；萨特出版的信件也有一段空白——我们知道，他们直到1963年才开始用电话交流。^[1]在这段时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只提到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回归单身生活”。^[2]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的叙述也很简短，她说，他们“渐渐疏远”，“分离是件困难的事”。^[3]我们从朗兹曼那里了解到，他们在分开后给了彼此一些空间，开始重建一种不同的友谊。朗兹曼回忆道：“我和海狸（波伏瓦的昵称）之间从未有过一丝痛苦和怨恨，我们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这份刊物，一起工作，一起做宣传。”^[4]

波伏瓦和朗兹曼一起去见约瑟芬·贝克，之后，她再次被年龄困扰：她能从贝克的脸上看到她自己皱纹的影子。那年，波伏瓦在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的文章。^[5]波伏瓦当时读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她被碧姬·芭铎在美国和法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所震撼。芭铎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在法国票房收入甚微，而在大西洋彼岸却赚得盆满钵盈。波伏瓦认为，法国人之所以对碧姬

·芭铎不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法国人假正经（因为，“把肉体等同于罪恶”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

波伏瓦说，重要的不是真实的碧姬·芭铎，而是银幕上那个虚构的她。波伏瓦认为导演罗杰·瓦迪姆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情色，让对女性的谬论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生存下来，重新创造了“永恒的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减少了。成年女性和男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可以工作，拥有投票权。所以拍电影的“梦想商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夏娃，把“诱人的果实”和“蛇蝎美人”结合在一起。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波伏瓦认为整个社会对于性的态度都很做作，人们喜欢瓦迪姆试图“把性爱拍得很接地气”。但瓦迪姆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性物化了。^[6]瓦迪姆把身体降低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定义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有历史，我们的情爱生活在情境中展开——这些情境包括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波伏瓦写道，出于某种原因，“如果男人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偶，而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有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不舒服”。^[7]

波伏瓦的《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批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也批判了男性仍然追求对女性的“主宰和控制”而不是平等互惠地相爱。尽管波伏瓦在这篇文章里做出这

些批评，然而这篇文章却还是常常被误读。甚至在2013年，《纽约时报》还在引用波伏瓦的这篇文章，并认为她是在宣扬年轻人的性解放，在为追求“洛丽塔”的人辩护，可以和吉米·萨维尔和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亨伯特同日而语。任何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波伏瓦被这样误解的事实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波伏瓦塑造成一个对消费“洛丽塔”既无保留也无悔意的性放荡者，这对谁有利呢？

被一个有意识的人打量和审视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自我打量、自我审视也会让人不自在——波伏瓦仍然在犹豫如何处理她自传的第二卷。1959年1月，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不想在“这样的法国”写作。^[8]1958年，波伏瓦因为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感到不安——1946年之后她就没有再写过日记，现在她要重新拾起这个习惯。^[9]

1959年5月，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从20多岁到30多岁，再到现在的50多岁，她一直“对5岁的那个女孩心怀感激，并要求宽恕”。波伏瓦想，她的生活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和谐”。波伏瓦在做另一个“评价”，在“本质”的标题下，她问了一个困扰她几十年的问题：爱意味着什么？让她感到困惑的是，有时她更喜欢萨特，“他的幸福，他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

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爱变得很容易？对我来说，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去爱是最容易的吗？……这是真正的关键，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问题和关键之处。正是因为我

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也没有质疑过自己。如果有人对我感兴趣，我会视他为天意：这是唯一的问题。[10]

即使是先驱者也要走很多弯路才能发现原来尽头是死胡同。在波伏瓦写给情人的信中，她使用过一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用来描述他们与上帝结合的感情洋溢的语言来形容她与情人关系：“完全的结合”（与朗兹曼）、“我的绝对”（与萨特）。但是，没有人能填补这个被上帝空出来的地方：波伏瓦希望有人用纯洁的爱的凝视来彻底地看她——从出生到死亡，或者从第一眼到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51岁的波伏瓦已经多次做出当年21岁的自己做过的选择，她再次决定：“萨特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11]

波伏瓦和萨特又在罗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萨特现在好多了，他完成了一年前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剧本。一天晚上，他让波伏瓦读最后一幕。他们俩从不避讳讨论彼此的工作，波伏瓦确实不喜欢萨特的这部作品。每当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感到失望时，她首先试图说服自己不喜欢它是错误的。这使波伏瓦感到恼怒，使她更加坚信自己是对的。那天晚上在桑塔斯乔广场，萨特来找波伏瓦时，她的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很失望。萨特修改了剧本，把最后一幕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对话——波伏瓦认为这是剧中最好的一幕了。[12]（该剧上演之后，人们对该剧的反应比萨特预想的要积极得多；收到评论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非常感谢，我亲爱的，非常感谢。”[13]）

现在米歇尔·维安已经不在，萨特把米歇尔的时间重新分配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阿莱特·埃尔凯姆。阿莱特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从周日的两个小时增加为每周两个晚上。阿莱特和萨特之间有过短暂的性关系，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她的感情与其说

是激情，不如说是父亲般的感情。不久之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假日伴侣。1959年9月，萨特离开波伏瓦来到米兰，与阿莱特一起旅行，但萨特与波伏瓦保持着书信联系，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喝太多酒。[14]

一个星期后，朗兹曼以朋友的身份来见波伏瓦。他们在曼顿待了十天，朗兹曼在那里阅读波伏瓦的作品并发表评论。第一次见到朗兹曼时，波伏瓦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进入“老年”的准备，她觉得朗兹曼的存在让她能够躲避衰老。但不管怎么样，波伏瓦的确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她不愿意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还有力气憎恨它，但不再绝望了。”[15]在波伏瓦把她回忆录的第二卷交给出版商之后，她回到国家图书馆开始写下一部分。她已经在《名士风流》里写了很多，但她觉得小说不像自传那样能够表现出生活的偶然性。小说被雕琢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而人生在世，风云变幻，没有任何规律可言[16]。

1959年秋，波伏瓦继续写她自己的书，并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17]波伏瓦为计划生育和节育方面的书写序言——她开始成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发言人。波伏瓦为一本名为“爱的巨大恐惧”（*The Great Fear of Loving*）的书写序，她在开篇问：“其他女人是怎么做到它的？”这里的“它”指的是避孕。波伏瓦的序言挑战了乐观派的主张，即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可能性。但实际上女性仍然不能合法和安全地控制生育。波伏瓦问道：“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怀孕带来的沉重负担随时袭来，你怎么能事业有成、建立幸福的家庭、快乐地养育孩子、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呢？”[18]在这个冬天里，波伏瓦重新发现了音乐：白天写够了之后，她晚上就在长沙发上喝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听交响乐。波伏瓦和萨特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一起哀叹因年龄增长而减弱

的好奇心。波伏瓦和萨特现在收到很多周游世界的邀请。萨特一想到要屈从于任何事情就退缩了，所以为了让自己安心，他接受了去古巴的邀请。1960年2月中旬，他们离开法国去古巴；巴蒂斯塔一年前被驱逐，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紧张。萨特和波伏瓦想知道革命为古巴人民带去了什么。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并在哈瓦那的国家剧院观看了萨特的戏剧《恭敬的妓女》（*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19]卡斯特罗带波伏瓦和萨特去哈瓦那观看欢乐的人群、甘蔗和棕榈叶。那里的气氛充满希望，甚至是欢快的，萨特称之为“革命的蜜月期”。[20]

当波伏瓦2月20日从古巴回来时，纳尔逊·阿尔格伦正在她的公寓里。波伏瓦害怕见到阿尔格伦，1956年5月，《名士风流》在美国出版，与此同时，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也出版了，媒体一直在纠缠他。阿尔格伦在公开场合和《时代》杂志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他很生气，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有足够的东西要写，无须拿自己的私生活来作为材料。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例行公事的关系，而她却把它搞砸了”。[21]然而，在私下里，阿尔格伦为自己说了这些话而向波伏瓦道歉——他想再来巴黎见波伏瓦。[22]阿尔格伦这次来情绪低落：他和前妻再婚了，但他们的婚姻再次陷入了低谷。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但他还是不愿离开芝加哥来到巴黎，波伏瓦也不愿离开巴黎去到芝加哥。阿尔格伦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些赋予他写作能力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因为阿尔格伦之前同情共产党而拒绝给他护照，所以他不能去巴黎。但是波伏瓦鼓励阿尔格伦不要放弃写作，他是对自己太苛刻了。她说：“你内心的微光不会消逝，永远不会。”[23]在那之后的几年中，他们按照美国和法国的节日习俗交流——阿尔格伦寄圣诞卡给波伏瓦，波伏瓦寄新年祝

福给阿尔格伦。

1959年7月，阿尔格伦终于拿到了护照。他给波伏瓦写了更多的信，给她寄去了一包又一包的书，并计划着去看她，在巴黎住上6个月。所以，1960年3月，当波伏瓦从古巴回来敲响自己家的门铃时，阿尔格伦开了门。波伏瓦的目光落在了阿尔格伦的脸上，她没有看到时间流逝的痕迹，只看到了阿尔格伦。年龄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亲密的感觉，“就像回到了1949年最美好的那段日子”。^[24]

阿尔格伦刚从都柏林来，他和波伏瓦分享自己在爱尔兰迷雾中的旅行，以及他对美国政治希望的幻灭。阿尔格伦最后一次来访是在《第二性》出版时。波伏瓦的生活现在更安静了，所以他们一起在维克多·舍尔歇大道和“大家族”一起度过时光：奥尔加和博斯特，萨特和米歇尔（他们又在一起了），还有朗兹曼。

在巴黎，阿尔格伦和波伏瓦早上在她的公寓里一起工作，而到了下午，波伏瓦会像往常一样去萨特家。他们走到布赫里街，重温过去，晚上在疯马酒吧和脱衣舞夜总会度过，在那里，阿尔格伦对男女脱衣舞者的出现感到困惑。他们一起旅行，去了马赛、塞维利亚、伊斯坦布尔、希腊、克里特岛。

1960年春，波伏瓦收到了一封来自雷恩的毕业学生的信。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勒·邦。西尔维1941年出生于雷恩，她喜欢哲学，也很欣赏波伏瓦的作品，所以她写信来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波伏瓦回信了，几个月后西尔维·勒·邦来巴黎时，波伏瓦带她出去吃饭。西尔维想去巴黎高师学习，后来她在那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哲学专业的一名优秀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尔维·勒·邦逐渐占据了波伏瓦生活的中心位置。

8月，波伏瓦和萨特飞往巴西，阿尔格伦留在她的公寓里，

一直待到9月。波伏瓦从里约热内卢给阿尔格伦写信，并且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定期给他写信。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称呼回到了他们最初的亲密：他是她心中“颠覆性的野兽”。波伏瓦和萨特获得了荣誉，并受邀做了几次演讲和采访。8月25日，她在国家哲学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谈女性的状况”。9月初，她接受了两次采访，采访内容都发表在《圣保罗报》（*O Estado de Sao Paulo*）上。10月，波伏瓦和萨特花了一些时间进行私人旅行。波伏瓦在亚马孙河畔的马瑙斯生病了，后来因疑似伤寒在累西腓的一家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即使他们不在法国，波伏瓦和萨特的行为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8月和9月，波伏瓦和萨特都签署了《121人宣言》（*Manifesto of the 121*），要求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并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公开发表。^[25]在波伏瓦和萨特离开巴西回法国之前，朗兹曼打电话告诉他们萨特飞到巴黎可能会不安全。除了签署宣言，萨特还提供了一封为弗朗西斯·让松辩护的信，后者正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而受审。^[26]他被控叛国罪，5000名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喊“射杀萨特”；宣言的签署者中有30人被控叛国罪，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还有人被威胁要坐牢。



1960年9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场签售会。

萨特和波伏瓦立即改签了航班，博斯特在巴塞罗那接应。他们驱车前往巴黎，朗兹曼在城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僻静的小路进入巴黎。[\[27\]](#)波伏瓦在11月回到巴黎后，并

没有收到阿尔格伦的来信。

萨特收到了死亡威胁，朋友们担心他和波伏瓦待在家里会有危险。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萨特和波伏瓦分别住在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布提里耶的大公寓的两个房间里。^[28]这是波伏瓦和萨特唯一一次这样共同生活。在11月16日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波伏瓦半开玩笑地说：“我竟然为他做饭。”也没有什么食材，只有一些火腿、香肠等罐头食品。有时候，博斯特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和饭菜。^[29]

波伏瓦没有在对弗朗西斯·让松的审判中作证，但是她很快就为另一个案件提供了支持：对贾米拉·布帕查的审判。贾米拉·布帕查是阿尔及利亚人，“解放阵线”的一员，曾被法国士兵残忍地折磨，包括性虐待。许多阿尔及利亚女性也像她这样被强奸和折磨。但是布帕查愿意作证——她得到了突尼斯裔律师吉塞勒·哈利米的支持，哈利米曾参与到了对“解放阵线”许多战士的审判案件中。哈利米要求见波伏瓦，并告诉了她布帕查的故事。像她的许多同胞一样，布帕查加入了独立运动，并利用法国人对北非女性“传统”和“被动”的刻板印象掩护自己，帮助地下网络。阿尔及利亚女性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布帕查在阿尔及尔放置了炸弹。她被发现遭遇了逮捕、拷打和审判，这些遭遇让她质疑法庭的合法性。

哈利米说服布帕查起诉法国当局，因为她遭受了酷刑。波伏瓦会公开支持她吗？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布帕查可能被判处死刑。波伏瓦同意以她力所能及的最有力的方式支持布帕查——用文字。波伏瓦为布帕查写了一篇辩护文章，并帮助成立了为她辩护的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公开这件事，并借此揭露法国人在战争中的可耻行为。波伏瓦的文章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她写道，关于这桩丑闻最令人反感的是，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

人们对别人的痛苦如此漠不关心，对此我们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1946年，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罗贝尔·布拉齐亚克审判的文章；然后法国人要求为这个背叛了法国价值观的通敌者伸张正义。1960年，波伏瓦描述了同一国家的行动：“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在突袭中被枪杀，在他们自己的村庄被焚烧、枪杀、割喉、剖开内脏；在拘留营中，整个部落都在挨饿、受冻、挨打、感染流行病。”波伏瓦说，每个法国人都参与了这种酷刑，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吗？很多人对此表示否定，这让波伏瓦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比安卡·朗布兰也加入波伏瓦的宣传中，她们的友谊也因此加深了。[30]

1960年10月25日，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二卷《盛年》出版了。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评论家认为，波伏瓦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卡洛·莱维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在这篇文章中，评论家称赞波伏瓦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萨特：“你揭示了一个没有被正确理解的萨特，一个与传奇的萨特截然不同的人。”波伏瓦回答说，这正是她想做的。起初，萨特不想让波伏瓦写他。但是，“当他看到我真实地谈论他时，他就放手让我写了”。[31]

我们从现在回看过去，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波伏瓦会在这部自传里“简化”她和萨特的传奇故事。[32]奥尔加似乎仍然不知道波伏瓦与博斯特长达九年的恋情，但波伏瓦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保护奥尔加、博斯特还是她自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波伏瓦与女性的关系，除了考虑到自己和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的隐私之外，《第二性》受到的非议也让波伏瓦明白了坦白一切是不明智的。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原因需要考虑——尽管在几年之后的1970年法国才通过关于私人生活的法律，但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仍然有效：“任何人的隐私、家庭、

住宅或通信不得受到任何干涉，他的荣誉和声誉不得受到攻击。人人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奥尔加、纳塔莉和比安卡都过着各自的生活：她们仍然是波伏瓦的朋友，至少比安卡是这样，我们知道波伏瓦承诺过永远不会透露比安卡的身份。

考虑到波伏瓦经常被指责为假正经或者不诚实，我们应当记住波伏瓦从来没有向她的读者承诺过自己要坦白一切。波伏瓦隐瞒一些事情可能是出于谦虚、隐私或恐惧，或者仅仅是为了遵守法律。但也有可能，她以这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她想要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想因为故事的主人公而让大家误解了她要表达的意思。

评论家称赞波伏瓦的自传是她最好的作品，但女权主义者则因此怀疑：是不是因为波伏瓦写的东西更传统、更女性化？是不是因为它让读者前所未有地接触到让-保罗·萨特隐藏的一面？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名士风流》是波伏瓦最成功的小说，也被认为是她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但是波伏瓦被称赞是否是因为写了更女性化的作品呢？考虑到波伏瓦已经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是不太可能的：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形式来写作，是因为一个女人写她与“一个伟人”的生活要比表达她的政治和哲学观更合适。毕竟，这一结论与波伏瓦的政治和哲学观背道而驰。

波伏瓦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文化的人。这意味着写一些他们能读懂的东西——通过故事给他们的大脑输入新的可能性。不管波伏瓦是否有这样的想法，这本回忆录吸引了一批新的读者。《盛年》还没上架就卖出了4.5万册，上架第一周又卖出了2.5万册。[\[33\]](#)太不可思议了！12月，她给阿尔格伦写信时，这本书已经卖出了13万册。[\[34\]](#)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写道，她“不是一个哲学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创造者，她不像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或萨特那样。这句话被翻译成英文时，将波伏瓦对哲学体系的拒绝描述为“精神错乱”，因为这些哲学体系做出了对生活不公的普世主张，而“女性天生就不倾向于这种迷恋”。^[35]这些说法让波伏瓦的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是她，对女性做出了如此大的概括呢？事实是，不是波伏瓦，而是她的英文翻译导致了这种误解。波伏瓦用法语写的是，哲学体系源于人们的固执，他们希望在自己粗略的判断中找到“万能钥匙”。波伏瓦说，“女性的境况”不会使人倾向于这种固执。英文翻译体现出了波伏瓦的质疑，但漏掉了原文中微妙的讽刺意味。^[36]

到目前为止，波伏瓦几乎从未想过她是如何被当作萨特的衍生替身而遭到摒弃，以及被那些不理解她的既得利益者所误解的。所以波伏瓦直截了当地说：她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门徒，她不满足于发展、整理或批评别人的观点，只想要进行自己的思考。在《盛年》里，波伏瓦直言不讳地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容忍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波伏瓦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生活中有时确实“默许”了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波伏瓦并没有放弃在学生日记中所说的“思考生活”，她决定用文学来思考生活，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在她自己的经历中传达“原创性元素”的最好工具。^[37]

由于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经常被解释为波伏瓦内化了性别歧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不被冠以“哲学家”头衔的原因并非只有身为女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阅读波伏瓦的故事使我们无法看到她否认自己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层面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否认哲学家这个头衔，包括阿尔贝·加缪，他批评哲学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还有雅克·德里达。因此，重要的是

不要把波伏瓦硬塞进“女人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单一维度中，哲学能成为什么和不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也很重要。

对波伏瓦来说，无论她是19岁还是50多岁，哲学都必须用生活去实践。现在波伏瓦的观点是，致力于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参与具体的解放计划。随着对简森的审判的冲突加剧，萨特决定利用他的职位来抗议《121人宣言》的签署人的遭遇。萨特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被控叛国罪的30名签署人辩护，他说，如果他们被判有罪，那么全部121人都有罪。如果没有，那么应该撤回这个案子。政府撤销了指控。萨特的名声使他们所有人都幸免于难，因为，用戴高乐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监禁伏尔泰。”

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1961年7月，萨特位于波拿巴街的公寓被一枚塑料炸药炸毁。损失并不大，但即便如此，萨特还是让母亲搬了出去，住到了波伏瓦家。1961年10月，3万阿尔及利亚人示威反对巴黎对他们实施的宵禁；这是一场目标明确的和平游行，他们希望晚上8点半以后仍然可以自由出行。但法国警察的反应很激烈，他们拿着枪和棍棒，甚至把一些阿尔及利亚人推进了塞纳河。目击者报告说，有阿尔及利亚人被警察勒死，当天至少有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

法国媒体掩盖了此事，但是《摩登时代》杂志却没有。

1961年7月，波伏瓦遇到了《白领与权力精英》（*White Collar and the Power Elite*）的作者C.赖特·米尔斯；波伏瓦对他的作品及其在古巴的受欢迎程度很感兴趣。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意大利度夏，他们在特拉斯特维莱的圣玛丽亚广场过夜，波伏瓦试着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三卷。但当她感到“被当下所纠缠”时，就很难去回想过去。最近，朗兹曼给萨特带来了一份弗朗茨·法农《地

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手稿，并转达他希望萨特能为其作序，萨特同意了，当法农说他将去意大利拜访他们时，他们三个都很高兴。1954年阿尔及利亚革命爆发后，法农加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7年，他被阿尔及利亚驱逐出境，但仍在继续战斗，甚至在1961年初被诊断为白血病之后也没有停下来。

朗兹曼和波伏瓦到机场去接法农。波伏瓦在法农看见他们之前就看见了他：法农的动作紧张而突兀，他不停地四下张望，似乎很激动。两年前，他在摩洛哥边境受伤后，抵达罗马接受治疗，一名刺客找到了他的病房里。波伏瓦说，飞机降落时，他脑子里肯定一直在想这段经历。[38]

在这次访问中，法农以一种不寻常的坦率态度谈论了自己，促使他的传记作家达维德·马塞评论说，波伏瓦和萨特一定是“既技巧娴熟又富有同情心的提问者”。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其他记录表明，法农有像这样对人敞开心扉过。[39]法农告诉波伏瓦和萨特，他年轻时在马提尼克岛，他认为教育和个人价值足以打破“肤色障碍”。他想成为法国人，在法国军队服役，然后在法国学医。但无论他受到了多好的教育，有多么优秀，在法国人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黑人”。[40]即使法农当了医生，人们也叫他“男孩”，甚至还有更糟的称呼。法农的生平引发了人们对法国性、黑人和殖民化的讨论。

波伏瓦认为法农知道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比他告诉他们的要更深刻。他们谈论哲学的时候，法农是开放和放松的，但是后来波伏瓦和萨特带他去参观亚壁古道，法农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当波伏瓦讲述故事的时候，法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在他眼里，欧洲传统没有任何价值。”萨特试图把话题转到法农的精神病学经历上。但法农追问萨特：“你怎么能继续正常生活，继续

写作？”在法农看来，萨特在谴责法国方面做得还不够。法农给波伏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别很久之后依然记忆犹新。跟法农握手时，波伏瓦“似乎触碰到了吞噬着他的激情”，一种他与他人交流的“火焰般的激情”。[41]

那年秋天，萨特为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写了序，波伏瓦为吉塞勒·哈利米的一本书写了序，书中讲述了布帕查审判背后的女人的故事。正如波伏瓦批评萨德侯爵逃避现实的恐怖，追求想象的虚幻安全一样，波伏瓦也想让法国政府正视他们自己丑陋的行为。这本书的出版给波伏瓦带来了死亡威胁。

1962年1月7日，在波拿巴街又发生了炸药袭击。这次炸药被误放在五楼——萨特的公寓实际上在四楼——但波伏瓦第二天去看时，发现公寓的门已被毁掉。一个大橱柜消失了，萨特和波伏瓦装在手稿和笔记本被偷了。[42]为了萨特的安全，她的母亲一直住在一家旅馆里。到了1月18日，萨特被圣日耳曼公寓的房东赶了出来，于是他搬到了第14区布莱里奥特码头110号。[43]

到了2月，波伏瓦对贾米拉·布帕查的立场引起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公寓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大学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些学生留在波伏瓦身边守护她。那年春天，波伏瓦参加了反法西斯会议，并参加了抗议国家暴力的游行。在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决议后，戴高乐开始与解放党谈判，1962年3月，他们签署了《依云协议》（*Évian Accords*）——该协议于1962年在法国举行公投并通过。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全民投票：99.72%的人投票赞成独立。但在6月1日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时，波伏瓦和萨特对法国拼命坚持殖民主义的做法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这是国家

层面上的“自欺”。萨特在1956年写了关于匈牙利文章后，惊讶地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但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下，苏联正在解冻。斯大林的暴行受到谴责。厚重的西墙在逐渐变薄吗？

萨特和波伏瓦到达莫斯科之后，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苏联人在听爵士乐，读美国小说。赫鲁晓夫甚至允许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出版。苏联作家联盟为萨特和波伏瓦提供了一名导游，列娜·佐妮娜^[44]，她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事实上，她希望翻译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没过多久，萨特就遵循了他的传记作家所总结的不成文的规律：“萨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陷入爱情。”果不其然，萨特爱上了佐妮娜，而且是深深地爱上了她。^[45]

萨特在见到佐妮娜后又活过来了。他每天给她写信，她也回信，但由于苏联的审查，他们不能使用邮政系统。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靠信使来传递信件，忍受长时间的等待无法沟通。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求爱方式，萨特告诉了佐妮娜他的“巡回生活”（他现在称之为他生命中的女性轮换），对此，佐妮娜并不在意。他仍然每周见万达两次，还有埃弗利娜、阿莱特·埃尔凯姆和米歇尔。佐妮娜为什么要相信萨特会有时间和注意力在她身上呢？那年12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到莫斯科和佐妮娜一起过圣诞节，还去列宁格勒看了极昼。作为作家联盟国际委员会的一名雇员，佐妮娜是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萨特和波伏瓦9次前往苏联。

20世纪60年代早期，萨特开始远离存在主义，它开始被视为一种时代下的哲学产物。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写道，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在20世纪60年代，他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人批评过于关注意识主

体，而对无意识关注不够。[46]萨特的哲学光芒正在衰落，而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兴趣却在上升。在波伏瓦60岁的时候，她很擅长使用颠覆性的文字，并熟练地创造虚构的经历来唤醒读者的自由。但是，波伏瓦想要的不仅仅是颠覆性的言论和想象中的自由，她想要的是能够在真实的女性生活中带来具体改变的立法。

在这十年中，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直到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还是一种禁忌，立法也限制了避孕药的销售。1960年，避孕药获准在美国销售；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于1961年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但只对已婚女性开放。直到1967年，它才在法国被合法化（当时英国的未婚女性也获得了合法的购买途径），波伏瓦在倡导这一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波伏瓦的《第二性》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权主义作家。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开端，深受《第二性》的影响。[47]

1963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与佐妮娜一起访问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此前萨特和波伏瓦对“解冻”的所有希望都变成了失望。食物短缺，赫鲁晓夫又开始为斯大林辩护，攻击西方。萨特问波伏瓦：他应该向佐妮娜求婚吗？他们能不能见面还尚不确定。如果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知识分子要求娶她，苏联政府可能会答应，她和她的女儿就会获准去法国。但是佐妮娜不想离开她的母亲，也不想成为萨特的依赖者，成为他“巡视”的其中一站。佐妮娜拒绝了萨特。但不管接受与否，萨特能向另一个女人求婚，就表明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已经不再浪漫了。

苏联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又去了罗马。他们住在市中心密涅瓦广场上的密涅瓦酒店。当时波伏瓦正在写作，正在享受阅读和

游览意大利的乐趣——他们开车去了西耶纳、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罗马时，萨特收到了一封来自佐妮娜的信。佐妮娜说，她阅读波伏瓦的回忆录越多，就越意识到她无法改变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她不想成为波伏瓦生活中的一个二流女人。她把波伏瓦当作朋友，并尊敬她。“但是你和海狸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对接近你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48]

1948年10月底，就在波伏瓦和萨特打算返回巴黎之前，博斯特打电话告诉给波伏瓦，她母亲弗朗索瓦丝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了。次月，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弗朗索瓦丝撑不了多久了。秋天过后，弗朗索瓦丝被带到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们发现她已经处于癌症晚期。波伏瓦听到这个消息后，萨特乘出租车陪她去了养老院，她一个人进去了。^[49]医生们把诊断结果告诉了波伏瓦和埃莱娜，但没有告诉弗朗索瓦丝。姐妹俩认为不告诉弗朗索瓦丝是最明智的。手术后的两个星期里，波伏瓦和埃莱娜平静地陪在她的房间里，一切都很乐观。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让她留下的不是爱，而是“一种深切而痛苦的同情”。^[50]母亲动手术的那天晚上，波伏瓦回到家，和萨特交谈，听了巴托克的讲话，她流着眼泪，“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51]波伏瓦的强烈反应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父亲去世时，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手术几周后，弗朗索瓦丝感到越发痛苦，而且精疲力竭。所以他们要求医生加大吗啡的剂量，减轻她的痛苦，尽管这样会缩短她的生命。从那以后，弗朗索瓦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从不请牧师或任何波伏瓦所谓的“虔诚的朋友”。那年11月，波伏瓦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比她孩提时代更亲密了。手术后的那个晚上，波伏瓦被一股情感的浪潮所征服：她感到悲伤，为母亲的死

亡，也为她的人生——母亲为那令人窒息的传统牺牲了那么多。

母亲去世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一书的写作中，记录了母亲生命的最后6周，以及她自己对爱的痛苦体验、矛盾心理和丧亲之痛。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写点东西，用文字来思考生活。波伏瓦将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妹妹埃莱娜。在母亲病危的那几个月里，波伏瓦一直在写日记（当时她给日记起了个名字，叫“母亲的病”，她不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本日记记录了博斯特、奥尔加和朗兹曼的陪伴，这是《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里面所没有记载的。波伏瓦每天都试图忍住泪水，但却没有成功。有几次，她提到在见萨特之前都得服用镇静剂，这样她才能“不会因为哭泣而惹恼萨特”。[52]

波伏瓦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记录了她母亲说的话：“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现在我将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女人，只为自己而活。”[53]1953年，波伏瓦描述了失去意识的弗朗索瓦丝，看到母亲在医院里的裸体时，波伏瓦的内心是多么震撼——这是一个让她在孩童时期充满爱，在青少年时期极力排斥的身体。[54]

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垂死的女人。我们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交谈，这缓和了旧日的不快。我重新开始了在青春期中断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让我们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早期的柔情，我曾以为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因为它又出现在我们简单的语言和行动中。[55]

文章发表后，一些记者指责波伏瓦利用了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悲伤；他们甚至找到一名外科医生做证，说波伏瓦坐在母亲床边无情地记着笔记，只顾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写作“素材”。外人的

看法再次使波伏瓦看起来十恶不赦。波伏瓦说，从内心来说，写作给她以慰藉，就好像“祈祷给信徒以安慰”。[56]在波伏瓦看来，没有所谓的“自然”死亡。

自1960年11月与西尔维·勒·邦见面以来，波伏瓦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到1964年，她们的会面变得越发频繁；西尔维在弗朗索瓦丝去世期间给了波伏瓦很大的支持。波伏瓦写道，她欣赏她们之间对等互惠的关系；西尔维的智识水平很高，和波伏瓦也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波伏瓦和她有一种联系，波伏瓦越了解她，就越觉得自己像她。西尔维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她体贴、大方、深情。[57]波伏瓦自传的最后一卷《归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就是献给西尔维的。

波伏瓦形容她自己和西尔维的生活是相互交织的，她很感激生活给她带来了这个新伴侣。波伏瓦曾在1962年说，她已经有了人生中最重要 的感情，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当年说错了。尽管波伏瓦和西尔维都否认这段关系涉及性，但她们有肉体上的亲密接触——西尔维在法语中将其称为“charnel”，因此被很多人翻译为“carnal”（肉体上的，性欲的）。它也可以指“embodied”（身体的），包括无性的身体爱抚。

1963年10月30日，《时势的力量》在法国出版，这离波伏瓦向出版商提交该书才刚刚过去5个月。[58]在这本书中，波伏瓦审视自己的人生，试着去评价自己能留给世人什么，对于很多人暗示她在智识上依赖于萨特这一点，波伏瓦明确地表示了否认，说她拥有自己的哲学兴趣和见解。在这本自传中，波伏瓦讨论了她在《第二性》出版后所经历的转变：“我此前从来没有被当作讽刺的对象，直到《第二性》出版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我要么冷漠，要么友好。”[59]她很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性》的出版，招致了很多人对她个人的抨击，波伏瓦希望她的读者也能看

到这一点。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第二性》“可能是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一部作品”。^[60]当然，事后看来，有些事情如果重新回到过去，波伏瓦是想要有所改变的。从收到的信件中，波伏瓦发现她帮助了很多女性“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己的处境”。^[61]波伏瓦现在55岁了，她意识到（尽管她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模范）她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的榜样，其他人会从她那里寻求灵感。即便过了12年，波伏瓦仍会收到感谢信，感谢她写了《第二性》，告诉她，是她帮助广大女性克服了那些几乎压垮她们的谬论。在《第二性》出版后的十年里，其他女权主义者也出版了一些在波伏瓦眼中更大胆的作品。其中有太多的人过于关注性，但波伏瓦说，至少现在女性可以“把自己作为观看的眼睛，一种主体，一种意识，一种自由”。^[62]

然而，也正是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著名声明：她避免让自己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63]三年前，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解释说，她想要读者知道她不反对男性，因为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她的观点，她就会被误解，“我想让大家知道，写《第二性》的女人并不是为了报复曾经让她痛苦的生活。如果有人这样理解这本书，那就否定了这部作品。”^[64]

在《时势的力量》的最后，波伏瓦写到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她人生中“毋庸置疑的成功”。但是书的结尾让读者感到困惑——一开始波伏瓦就宣称她和萨特的成功，庆祝他们对彼此谈话的无限兴趣，但她以一句有趣的话结尾：“所有的承诺都得到了遵守。然而，当我用怀疑的目光回看当年那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年轻女孩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欺骗了。”^[65]

这是什么意思？评论家推测，“萨特的伟大情人”后悔她和萨特的“世纪浪漫”了？“端方淑女”后悔成为无神论者了吗？波伏瓦是在对一个声称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感到失望吗？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乎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读者们也在震惊中写信给波伏瓦：波伏瓦曾是他们生命中希望的灯塔；波伏瓦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情人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觉得被欺骗了呢？弗朗索瓦丝·德奥邦写道，当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波伏瓦的这句“我被欺骗了”，就连戴高乐最著名的一句话也难以与之媲美，她记得人们会“翻字典去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试图弄清楚这是作者的自嘲还是真实的幻灭”。[66]

波伏瓦知道这样结束这本书是一种挑衅。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说，这些词引发的“误解”“有一部分是故意的”，“是关于文学的本质的”。[67]在1964年马德莱娜·戈贝伊的一次采访中（发表在1965年的《巴黎评论》上），波伏瓦被问及她的自传计划以及促使她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波伏瓦的回答是，她希望自己的书能“触动读者”。波伏瓦想要创作能够打动读者的人物，在读者的想象中描绘出改变他们生活可能性的道路，就像影响了波伏瓦的乔·马奇和麦琪·塔利弗一样。[68]

波伏瓦触动了她的读者，但许多人并不喜欢这种触动。在读过波伏瓦声称自己被“欺骗”的文章后，一些人甚至写信安慰波伏瓦：“你对你不公平，你认为你的经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点燃了“数百万女性心中光明的希望”[69]的女性，她怎么能这样想呢？她与女性的谬论斗争，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谬论吗？

波伏瓦淡化了博斯特和朗兹曼在她生命中的作用。因为萨特

的情人是苏联人，她把萨特生活中一段看似严肃的恋情也排除在外。显然，对隐私的担忧影响了他们两个人。在波伏瓦的生活中，年龄似乎开始迫使她选择独身；但在萨特的生活中，年龄没有影响他继续到处留情。

波伏瓦知道人们对她和萨特的关系着迷：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多卷自传来说明，成为一名女性可以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重视不同的东西呢？或者你在事后可以对自己的处境有不同的理解？或者，实际上，如果你勇敢地说出许多人都不敢说出的话，可能会遭到那些不希望你被听到的人的攻击？

在《时势的力量》中有一段，波伏瓦重新提到了纳尔逊·阿尔格伦以及她和萨特的协议面临的挑战，年轻时的波伏瓦认为如下问题很容易解决：“忠诚和自由有可能达成和解吗？”如果是这样，代价是什么？[\[70\]](#)

经常被宣扬，却很少实践，完全的忠诚通常是那些将其加诸己身、自我伤害的人所经历的。传统上，婚姻通常允许男人在没有互惠和对等地爱护伴侣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冒险”；如今，许多女性已经意识到她们的权利和幸福所必需的条件：如果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男性的反复无常，她们就会成为嫉妒和厌倦的牺牲品。

回看自己的过去，波伏瓦告诉她的读者，他们的做法有很多风险。一方可能会喜新厌旧，导致另一方感到被背叛；“一开始的两个自由人，就会变成相互对峙的受害者和施虐者”。在波伏瓦看来，有些夫妇是坚不可摧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她和萨特刻意回避的：“第三者对我们的安排会有什么看法？”在这一点上，波伏瓦写道：

在《盛年》里我不可避免地修改了一些内容，所以书里所呈现的并不是现实真相的全部。尽管我和萨特之间的互相理解持续了30年以上，但是这其中有很多其他人的损失和痛苦。我们的协议体系本身的缺陷在我谈到的这段关系里尤为明显。[71]

波伏瓦的这本书问世后，它得到了不好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恶毒的评论。这本书卖得很好，但波伏瓦再次反对媒体对待她的方式。他们称波伏瓦“自满”“不顾一切”[72]，是女性世界“突变”的化身。他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寻求关注，“为了无端无用地让人震惊，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表达她自己去进行各种破坏”。[73]

《埃斯普利特》（*Esprit*）杂志刊登了弗朗辛·迪马撰写的书评，题为“一个悲剧性的反应”。文章指出对于选择了传统生活，选择了信仰、母性和婚姻的女性来说，发现信仰、母性和婚姻的缺失是导致波伏瓦“内心煎熬”的原因：

波伏瓦命运的伟大之处正是她故意放弃了这些传统的羁绊（这些东西在她眼里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愿意用不断改变选择的危险方式将它们取而代之。这条绳子太硬了，随时都可能会断，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拒绝任何安全网。[74]

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地翻译了纳尔逊·阿尔格伦的《谁失去了一个美国人》（*Who Lost an American*）的部分内容，使其看起来像是阿尔格伦对萨特和波伏瓦满肚子的不满：波伏瓦很不高兴文章里的所有幽默都被拿掉了，那些“小小的友好的词语”都被删掉了。此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还在通信，所以波伏瓦给他写

信表达了自己的沮丧：“这些肮脏的人什么都不懂，尤其是在友谊和爱情方面。”^[75]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自传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传奇印象。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认为波伏瓦出自传有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是想让自己掌控她和萨特的公众形象。萨特对波伏瓦的描绘很满意，但其他女性却感到不安，或者更糟。万达憎恨波伏瓦的回忆录，她认为波伏瓦描绘的萨特与波伏瓦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也让万达忧心忡忡：这么多年后，萨特在万达面前仍然否认他与波伏瓦的浪漫关系。

在后来的生活中，萨特继续同时处理多个情人关系，他没有转变观点，他不认为坦诚是每个人都应得的。相比之下，波伏瓦公开了她与萨特的关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更诚实，但诚实并不意味着不伤人。

1965年春，《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这使得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友谊戛然而止。波伏瓦已经用《名士风流》讲述了他们的浪漫故事，但她在《时势的力量》中所写的东西激起了他的愤怒。当被《新闻周刊》（*Newsweek*）问及回忆录中叙述的准确性时，阿尔格伦说，“亚克-亚克夫人”写的是一个中年老处女的幻想。^[76]阿尔格伦带着讽刺和怨恨在《壁垒》（*Ramparts*）和《哈珀斯杂志》（*Harper's*）两家杂志上评论了这本书。第二年夏天，阿尔格伦在《时代精神》（*Zeitgeist*）上发表了一首献给波伏瓦的诗：诗的主题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他想把这个人驱逐到潮湿的地下室。1964年11月和12月，波伏瓦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时势的力量》的摘录，题目是分别为“忠诚的问题”和“美国约会”。阿尔格伦在5月的回应中写道：

任何能够体验偶然的爱情的人，都是最近脑子抽风了。爱情怎么会是偶然的呢？什么是偶然的呢？这个女人表达的意思好像是，维持男人基本关系的能力——男人和女人的肉体之爱——是一种残害；而自由则是“在所有背离中保持一定的忠诚”！当然，除掉所有的哲学术语，她的意思其实是她和萨特创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在这背后她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女性气质。而萨特离开小镇时在想什么我肯定是不知道了。[77]

1964年11月，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了最后一封信。波伏瓦希望在1965年去看他，但她的美国之行因越南战争而取消。然而，在阿尔格伦对《时势的力量》的反应之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否还能挽回就不得而知了。[78]1981年，阿尔格伦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在一次关于该奖的采访中，一名记者向阿尔格伦问起波伏瓦的事情；这个记者描述了阿尔格伦当时的反应，说他情绪非常激动。阿尔格伦有心脏病，所以采访者见状立马转移了话题。第二天，阿尔格伦本来打算在他的别墅里举行庆祝派对，但是第一位客人到达时发现阿尔格伦已经去世了。

1997年，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出版，她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了轩然大波。波伏瓦的长信表明，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热情虽然是内敛的，但是却很炽热。回忆录成功地编造了萨特与波伏瓦的神话，但向公众提供了惊人的错误信息。现在看来，阿尔格伦才是波伏瓦一生中爱得最热烈的爱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波伏瓦在与萨特的关系中一直在“自欺”。[79]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关系会有一个奇幻的文学来生：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Fates Worse than Death*）中写了一大段关于阿尔格伦的文章，书中“波伏瓦小姐”被称为“亚克-亚克夫人”，阿尔格伦“帮助她获得了第一次高潮”。[80]

在《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的前一年，波伏瓦为《女人的性反应》（*The Sexually Responsive Woman*）写了一篇很短的序言，研究另一种被误解的现象：女性的性行为。波伏瓦写道：“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男性偏执地认为女性处于依赖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生理和心理自主权。”这篇评论既有趣又感人，波伏瓦说她“没有资格对菲利斯博士和埃伯哈德·克罗豪森博士的所有主张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它“读来引人入胜，精彩绝伦”。[81]

有趣的是，《时势的力量》出版之后，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波伏瓦被指责没有幽默感。[82]女性主义者经常被指责为扫兴者，波伏瓦生活中的许多插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波伏瓦表达她的不满时，人们总把矛头指向她有不满，而几乎不会去关注她不满的原因。[83]几十年来，波伏瓦对女性、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感到不满，人们却质问波伏瓦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看开一点。现在波伏瓦对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

1964年5月，在写完《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之后，波伏瓦决定与自传保持一些距离，重新写一部小说。这次波伏瓦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她不一样，除了她们是女人——上了年纪的女人。[84]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继续用写作来支持她认为可以改善女性处境的项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像《爱是什么，不是什么》（*What Love Is-And Isn't*）这样的杂志文章。波伏瓦写道，爱只出现在“那些公开或秘密希望改变的人”身上。因为就在那时，你期待爱以及爱带来的东西——另一个人将会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给你。[85]

1965年，萨特接近60岁生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孩子，并

且生命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需要一个继承人和文学执行人。萨特想着，把这个任务交给波伏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几乎和他一样老了。所以萨特在阿莱特·埃尔凯姆满30岁的那年，也就是1965年3月18日合法收养了她，见证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法国晚报》（*France Soir*）报道了这件事，萨特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万达、埃弗利娜和米歇尔为此都很生气和激动。

1965年2月美国轰炸北越后，波伏瓦拒绝了在康奈尔大学演讲的邀请。她接受了几个关于衰老、写作、文学和自传的采访。萨特也接受过关于波伏瓦的采访，1965年7月，美国《时尚》杂志发表了这篇对萨特的采访，标题为“萨特谈论波伏瓦”。萨特认为波伏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名士风流》之后。这在她的回忆录和她的书《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很明显，我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作品。她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公众的即时沟通。这么说吧，她和我是有区别的。我不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我和那些懂得思考、懂得反省、愿意对我展开心扉的人交流。这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能立刻与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人们总是因为她说的话而和她在一起。[86]

在1965年到1966年为《归根到底》写的笔记中，波伏瓦写道，关于她生活出版的“故事”只是传达了一个“残缺的真相”，因为它并不详尽；这是一个“扭曲的真理，因为时间没法倒流恢复原状”，但它传递了一个“文学真理”。[87]波伏瓦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个例子，说明了存在主义选择意味着什么：没有上天来给出

她应该是谁的“命令”，没有既定的道路或伊壁鸠鲁式的教条让她偏离什么。相反，这是一个毫无蓝图的变化过程（becoming）——一个波伏瓦一生都在追求的项目，有时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次要的项目。[88]

有时，过去的选择会给波伏瓦带来沉重的负担。波伏瓦仍然后悔自己对待“莉丝”（纳塔莉·索罗金）的方式，她觉得自己被“囚禁”了，因为她的作品被“石化”了，在她身后堆积着“不可避免的过去”。[89]但是，另一方面，波伏瓦不可避免的过去是她“成为自己”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和责任。出于良心，波伏瓦不可能在写了她关于世界的那些东西之后，不采取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行动。那么，波伏瓦怎么能拒绝回复信函和签署请愿书呢？波伏瓦的处境有能力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所以她必须充分利用它。

1965年8月，西尔维和波伏瓦去了科西嘉岛。此后，波伏瓦和萨特开始了他们每年一次的罗马之旅。萨特于10月12日乘火车离开意大利前往巴黎；波伏瓦开车回法国。他们计划在14日晚上7点在她的住处见面会合。但在那天的午餐时间，电话响了，新闻上说波伏瓦在扬纳河附近出了车祸，住进了乔尼的医院治疗。朗兹曼和萨特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找她。波伏瓦断了四根肋骨。她的脸肿了，缝了针，眼睛也青了。车祸是因为波伏瓦拐弯时车速太快了。

萨特在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然后用救护车护送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萨特把波伏瓦扶到公寓，说他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她能走路；波伏瓦太痛苦了，甚至连脱衣服都成了一种挑战。在波伏瓦卧床不起的那三个星期，萨特、朗兹曼和西尔维·勒·邦轮流照顾她，每天都有一名护士来看望她。

波伏瓦恢复得很好，1966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9月，他们飞往东京。他们此前从未去过日本，波伏瓦和萨特知道那里有他们的读者——这是萨特作品最畅销的市场之一，而《第二性》刚刚被翻译成日语。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下飞机时会被记者的闪光灯闪得睁不开眼。翻译人员把波伏瓦和萨特带到一个房间接受记者提问；当他们经过时，热情的年轻粉丝试图触摸他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波伏瓦记述了萨特的行程，以及她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贪婪阅读，却略去了她自己的讲座内容。[\[90\]](#)但是日本之行，波伏瓦并不是萨特的陪衬，她做了三场关于“当今女性状况”的讲座。不过，我们仍然不清楚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略去这些内容是出于自嘲、谦虚的传统，还是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她的生活太过遥远。

知道了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波伏瓦在9月20日的讲座中说，女性主义“远未过时”，而且不仅仅对女性来说有价值：这是一项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意义的事业，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公正、更体面的地位，男性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公正，组织更有效的体面世界中。追求两性平等是男女双方的事。[\[91\]](#)波伏瓦希望《第二性》会有过时的那一天，因为一旦女性获得平等，《第二性》对女性异化的分析就会变得多余。波伏瓦认为可以在不消除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停止对女性的剥削。但波伏瓦对自己和其他文化中反女性主义的“倒退”感到担忧。在法国，女性声称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做妻子和母亲：家庭主妇。

波伏瓦的部分担忧是被“限制”在私人生活中的不稳定的女性生活，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于一个随时都可能不再爱她们的人，会因为爱的消失失去经济来源，以及赖以建立生活的意义。但是波伏瓦并没有掩饰她的真实想法：这种生活不如“真正参与社会生

活”，不如“帮助建立我们生活的世界”。[92]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回归家庭成为主妇这一做法的“受害者”，部分原因是女性因与其他女性攀比而痛苦，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期望职业女性在下班回家后成为家庭主妇。结果就是她们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内疚和疲惫，“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在家再多工作五六个小时，到了周末她会发现自己极度疲惫”，社会上还没有形成男人真正帮助女人的习俗和风气。[93]

波伏瓦发现，在那些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的国家，她们“自我和谐”，她们与自己的关系很有价值；波伏瓦认为这种自我理解来源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波伏瓦一直对成为自我意味着什么很感兴趣，在《第二性》中她发现了一个所有女性面对的共同挑战：成为“被分裂的主体”的可能性，女性作为爱人和母亲的自我和她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想成为的自我之间的撕裂和挣扎。波伏瓦在日本的第二场演讲回到了“女性境况的分裂特征”，由于职业女性想要幸福的生活、爱情和家庭，许多人选择牺牲自己的抱负：“她发现在职业上低调一点才是明智的做法。”[94]

三年后的1969年，《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它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从东京回来的路上，波伏瓦和萨特在莫斯科停留。这是萨特第11次访问苏联，但他现在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重返苏联的理由：因为他与列娜·佐妮娜的关系结束了。

1966年11月，波伏瓦重新开始写小说，不久后她出版了《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都市报》（*La Cité*）的一篇评论称其为一部“浸透了存在主义道德观的关于当代道德的短篇小说”，再次强调了波伏瓦和萨特属于同一知识分子的范畴，并没有注意到波伏瓦对女性的描写是如何质疑社会的不公对待的。这篇评论轻蔑地说波伏瓦的这本小说是失败的讽刺；一个“以拼贴的形式呈现周刊上的所有陈词滥调”的列表。[95]但是

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出人意料地好——迅速卖出了12万册。[96]

波伏瓦后来形容书中的主人公劳伦斯“厌恶生活，到了厌食症的地步”。[97]主人公劳伦斯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代理商，同时也是个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母亲。她喜欢工作时发生婚外性行为，然后回家照顾孩子，和她成功的建筑师丈夫共度夜晚。她喝酒，但不怎么吃东西。

劳伦斯的平衡（如果可以称之为平衡的话）被她孩子的问题所打破：“人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你会为不快乐的人做什么？”孩子的这些问题促使劳伦斯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她从事的工作是推销美丽的形象，书写时髦的口号；她已经磨炼出了展现美丽自我的技能。但是维持美丽生活的外表——漂亮的汽车、漂亮的家、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食物、漂亮的假期——让她对现状不满。1945年时劳伦斯10岁，她已经对大屠杀有了记忆。她开始纳闷，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她开始注意到美国民权抗议者的形象一旦从电视屏幕上消失，就会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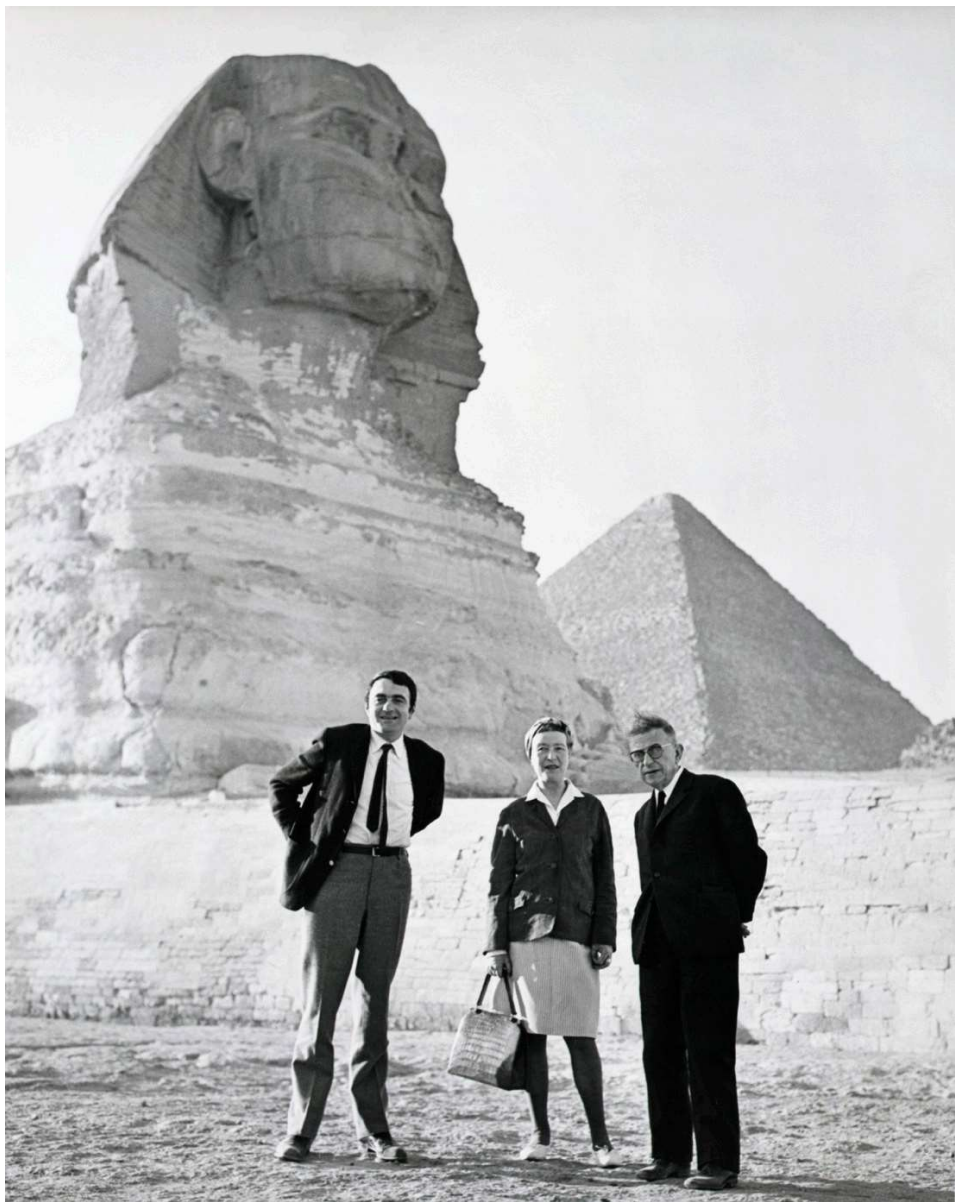
波伏瓦的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地质问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98]同时这本书也是在隐晦地回应女性主义和女性处境的转变，以及把金钱与独立画上等号的做法。它还讽刺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声称福柯的作品和《原样》杂志（*Tel Quel*）为“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托词”。然而，《美丽的形象》所传达的信息是，进步“必须立即是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否则就根本不是进步”，在波伏瓦看来，福柯的思想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承诺。[99]

波伏瓦的小说以劳伦斯对孩子的反思作为结尾：“抚养孩子并非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过，抚

养孩子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人类自由的形成，而对女性和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教育。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劳伦斯看着镜子，心想对她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的孩子们将有他们自己的机会。但是是什么机会呢？[\[100\]](#)

1966年2月，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去了中东、埃及和以色列。《摩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期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特刊。在埃及，他们受到了《金字塔报》（*Al-Ahram*）主编穆罕默德·哈桑内因·海卡尔的欢迎。他也是埃及第二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朋友。《金字塔报》对波伏瓦进行了一次采访，题为“写出《第二性》的哲学家在开罗”。[\[101\]](#)在埃及之后，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于3月10日访问了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3月11日波伏瓦在开罗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演讲。

由于巴以冲突，没有从埃及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所以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必须经过雅典。[\[102\]](#)到达以色列之后，他们去了雅法、特拉维夫和一些集体农场。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待了两周，波伏瓦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做了一次讲座，主题是“当代世界作家的角色”。波伏瓦对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很感兴趣，想要了解年轻人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对立主张的感受。1966年6月，“六日战争”重新划定了领土，并使世界以及“大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了政治分歧。波伏瓦支持以色列，萨特则支持巴勒斯坦。波伏瓦公开支持以色列后，她的作品在伊拉克被禁——就在“六日战争”的两天前。回到家，朗兹曼觉得自己被萨特出卖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读过萨特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书，觉得非常鼓舞人心，难道它的作者萨特现在反倒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吗？



克洛德·朗兹曼、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在吉萨。

之前一个月，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罗素集会。当时94岁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领导了一个组织，旨在唤起公众对美国人

在越南犯下的暴行的关注和谴责（当时罗素年事已高，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他本人一直在英国）。1966年5月，该组织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讨论；11月，他们又在哥本哈根开会。[\[103\]](#)他们听取了目击者的报告，这使参与者筋疲力尽。“大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那里——朗兹曼、博斯特[《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报道]、西尔维·勒·邦和阿莱特·埃尔凯姆。

在《美丽的形象》之后，波伏瓦开始着手创作三部短篇小说，后来于1967年结集成册出版，名为“被摧毁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很长一段时间，波伏瓦和埃莱娜都想一起做一本书，由波伏瓦来写，埃莱娜画插图。这个短篇集是完美的，埃莱娜给标题故事配了画，为了宣传这本书，波伏瓦安排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杂志上做了连载[\[104\]](#)，但是反响不太好，甚至一些人问埃莱娜为什么会同意为她姐姐最糟糕的书画插图。

波伏瓦早期的小说中既有男主人公也有女主人公，但《被摧毁的女人》中的每一篇中篇小说都只是从一个单身女人的意识角度来写的——每一篇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意识——并且都讨论了孤独和失败的主题。波伏瓦写道，在她的作品中，她试图“描绘女性存在的三个关键时刻：与衰老的相遇，对孤独的愤怒，以及一段恋情的残酷结束”。[\[105\]](#)

《谨慎的年龄》（*The Age of Discretion*）讲述了一位作家、妻子和一个成年儿子的母亲的心碎经历。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变老，带着厌恶和放弃的心情感受着自己的身体。[\[106\]](#)她刚出版了一本书，担心自己永远不能达到以前作品的高度，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她的儿子做出了一个她强烈反对的选择，所以她威胁儿子，若是不同意她的意愿，她就永远不再和他说话。她的

丈夫不顾她的反对，继续和他们的儿子说话，这加深了他们婚姻的裂痕——她正在为失去亲密的身体接触而悲伤。这部短篇小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和解：主人公和她的丈夫一起面对他们日渐幻灭的未来，学着过“短期的生活”。[107]

第二个故事的文体不同于波伏瓦的其他作品——它是一股徘徊在疯狂边缘的意识之流。主人公的孩子被夺走了，她被孤立、被遗弃，这个故事是一面丑陋的镜子，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人们也会变得“可鄙”。[108]

标题故事《被摧毁的女人》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这是一部一个女人陷入抑郁的毁灭性编年史。莫妮可迫切地想挽回自己正在衰退的婚姻。她认为幸福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但是她的孩子们最近都成年了，她现在想要稍微“为自己而活一点儿”。[109]奉献和无私——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主题——对她来说是自我实现、自由选择的体验。但随后她的丈夫莫里斯开始了一段婚外情。没有了他的忠诚，他们共同建造的一切轰然倒塌，她也被埋在了令人麻痹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下。

莫妮可的故事讨论的是大家熟悉的主题：被别人指手画脚和被丈夫背叛的痛苦——女性什么也不做，就和孩子们待在家里，她们会因此被别人指手画脚；女性的伴侣承诺她要共同生活，对方接受了女性无私的奉献，然而却为了更年轻的第三者抛弃她，让她无比痛苦。莫妮可质疑丈夫，但他却指责她“大吵大闹”，试图让她为制造了一个不舒服的局面而感到内疚，而这不舒服与她自己的痛苦相比实则相形见绌。莫妮可的丈夫成功地将道德的聚光灯转走，蒙蔽了她的良知，而不是灼烧他自己的良心。有几次莫妮可觉得自己跌到了谷底，但没想到后面竟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被摧毁的女人》出版后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从人们对波伏瓦其他作品的反应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文学评论家亨利·克卢阿尔写道，波伏瓦以前从未“如此肆意地将她的才华用于打击士气的宣传上”。这个讨厌的女人现在是不是在暗示所有围绕男人生活的女人都会失败？克卢阿尔说，波伏瓦又在给公众上课了。[\[110\]](#)克卢阿尔认为主人公莫里斯的性格也塑造得不够好。事实上，他指出，人们希望波伏瓦的艺术能“更清晰、更自由”。他说：“真的，波伏瓦已经过时了……波伏瓦女士正在继续她的女性解放运动，就好像我们同时代的人仍然需要它一样。”[\[111\]](#)

波伏瓦自己也不会如此匆忙地根据一个特定的案例（或者更确切地说，三个特定的短篇小说）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波伏瓦小心翼翼地把莫妮可的处境写得模棱两可，波伏瓦的创作意图是把这本书写成一个侦探故事，对一桩婚姻进行尸检，请读者确定谁或什么是罪魁祸首。但杰奎琳·皮亚捷在《世界报》上写道：“无论波伏瓦怎么说，居高临下的训导无处不在。”[\[112\]](#)总的来说，波伏瓦对人们读这本书的方式感到遗憾；她一如既往地被告控为在写自传，把波伏瓦和萨特的声音放在作品里，仿佛他们能代表全人类说话。有人问波伏瓦萨特是否离开了她。[\[1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有人反对这本书不是“真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小说并非基于他们眼中的波伏瓦的生活。萨特在哪里？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关于妻子和母亲的？

波伏瓦在《归根到底》中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激起了那么多仇恨。他们的屈就态度并没有让波伏瓦感到惊讶，她在《世界时装之苑》杂志上连载过这本书，所以《费加罗文学报》声称这是一本给女店员看的小说。但波伏瓦却遭遇了恶毒的性别和年龄歧视：

自从我在雷恩街瞥见西蒙娜·波伏瓦以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写了那篇文章感到后悔：她蹑手蹑脚地走着，看上去憔悴不堪。一个人应该同情老人。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玛继续出版她的作品。哦，是的，夫人，变老是可悲的！[114]

波伏瓦知道她老了，而且她很诚实地承认她不喜欢变老。而且波伏瓦觉得没有理由躲起来，相反，她直面这个缺乏哲学分析、需要政治行动的主题。波伏瓦已经想了好几年准备写老年的书了；后来，她称其为《第二性》的姊妹篇。但当波伏瓦开始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寻找关于老年的书籍时，她惊讶地发现她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室里，波伏瓦发现了爱默生和法盖的文章，然后慢慢地编了一个参考书目列表。波伏瓦阅读法国的老年学期刊，从芝加哥订了很多英语期刊和书籍。[115]波伏瓦以前的同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帮助波伏瓦查阅法国学院的比较人类学资料，这样她就可以研究探讨几个社会中老年人地位的专题论文。

波伏瓦日复一日地做她的研究。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展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大罢工使得法国经济陷入停顿——萨特和波伏瓦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今年的政治动荡促使萨特重新考虑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们每两周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开例会。每周三上午10点半，他们到了之后就开始工作。西尔维·勒邦是编辑部的新成员，博斯特和朗兹曼也参与了进来（当时朗兹曼还没有开始拍摄他的史诗纪录片《浩劫》。但是萨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20世纪40年代，《摩登时代》杂志具有开创性，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落满灰尘的老旧读物。

萨特想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和一些毛派分子变得很友好，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皮埃尔·维克托的年轻人。维克托问萨特是否愿意担任法国毛派报纸《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的编辑，因为如果萨特是编辑，这份报纸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政府指责。1970年4月，萨特被任命为总编辑。那年6月，他和波伏瓦在蒙帕纳斯大街上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这次逮捕给了萨特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大声疾呼批判政府的双重标准，要求真正的新闻自由。

波伏瓦没有萨特那么高涨的政治热情。事实上，近年来，他们的政治斗争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分歧。萨特的毛主义使他从知识分子的主流中被边缘化，而波伏瓦的女性主义使她在国际女性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仅在1969年，平装版的《第二性》就卖出了75万册。^[116]到1970年，它在北美获得了“经典”的地位；加拿大活动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用她1970年出版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向波伏瓦致敬，并与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后的“丑闻”发生了有趣的逆转——费尔斯通和许多其他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一生以及她的作品表示赞赏，《性的辩证法》的扉页写着“献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保持了自己的品格”。在1971年伊丽莎白·詹韦出版的《男人的世界，女性的地方》（*Man's World, Woman's Place*）中，她将波伏瓦的女性“他者”理论与从属群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在法国，1971年一家著名的文化杂志把波伏瓦的《第二性》与卡夫卡的《审判》和第一本（男性）金赛报告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书。^[117]

在过去一年里，法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势头不断增强。1970年春，在文森斯大学发生了女性示威活动。而在8月假期无人居住的巴黎，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凯旋门下面放置着纪念无名战士妻子的花环，她们的横幅上写着“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女

人”“比无名士兵更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妻子”。

10月，《游击队员》（*Partisans*）特刊以“女性解放，第一年”为题出版。^[118]此后不久，波伏瓦会见了发起该活动的激进分子——尽管在报纸上，波伏瓦和他们都不承认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19]安妮·泽林斯基、克里斯蒂娜·德尔菲和其他人想发起一场严肃的运动来解除对堕胎的限制。1967年，法国已将避孕合法化，但堕胎仍然是非法的。《新观察家》同意发表一份宣言，但条件是要有知名人士支持这份宣言。西蒙娜·德·波伏瓦当时名声很大，她同意借用自己的力量。他们也需要见面的地方，所以波伏瓦提供了自己的公寓。

接下来几个月的星期天，运动都是在波伏瓦家里的沙发上进行的。他们获得了343个签名，并于1971年4月5日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343宣言》（*Manifesto of the 343*）。这份宣言传递的信息很简单：

法国每年有100万女性在危险的条件下堕胎。虽然这只是个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女性会因此而面临谴责，所以她们都是悄悄做这件事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不得不沉默。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宣布我堕胎了。

签署者声称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堕过胎（尽管我们不确定波伏瓦以及其他很多签署者是否堕过胎）^[120]；她们签字是因为她们希望女性有权自由安全地进行堕胎手术。

“堕胎”这个词以前从未在法国的广播或电视上出现过。但现在，科莱特·奥德里、多米尼克·德桑蒂、玛格丽特·杜拉斯、吉赛

勒·哈利米、凯瑟琳·德纳芙和让娜·莫罗都声称自己做了这种不可言说的事。除波伏瓦以外，“大家族”的许多成员也签名了：奥尔加、阿莱特、米歇尔和埃莱娜都支持这项事业。不出所料，这次签名的人被有些媒体含糊地讽刺为“343荡妇”。

[1] 在波伏瓦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信中，1963年7月25日的是最后一封，在那之后他们开始用电话取代了信件。QM 304.

[2] SdB to NA, September 1959, TALA 530.

[3] FC 466.

[4] Lanzmann, *Patagonian*, p.330.

[5] *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London:Four Square, 1962. First published in *Esquire* in August 1959.

[6] BB 36.

[7] BB 30.

[8] TALA 528, SdB to NA, 2 January 1959.

[9] ‘Chronologie’, MPII xiv; xvi. 我们从西尔维的大事年表中知道有几本波伏瓦的日记留存了下来，但是没有完全发表，其中有一些选段分别于2018年发表在《回忆录：第一卷》（*Mémoires , tome I*）和《回忆录：第二卷》（*Mémoires , tome II*）里。

[10]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 349.

[11]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 349.

[12] FC 479–80.

[13] October 1959, QM 295.

[14] Sartre to SdB, October 1959（具体日期不详），QM 297.

[15] FC 480.

[16] FC 511.

[17] FC 487.

[18] ‘Preface to The Great fear of Loving’, FW 84.

[19] SLBdB, 'Chronologie', MPlI xvii.

[20] FC 503.

[21] Nelson Algren, 'People', *Time*, 2 July 1956, p.33.

[22] SLBdB, 'Chronologie', MPlI xvii.

[23] SdB to NA, 1 January 1957, p.526.

[24] FC 506.

[25] 见SdB to S, August 1958 (n.d.), LS 514.

[26] Cohen-Solal, *Sartre*, p.419 f.

[27] Cohen-Solal, *Sartre*, p.428.

[28] SLBdB, 'Chronologie', MPlI xx.

[29] SdB to NA, 16 November 1960, TALA 538.

[30]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p.148.

[31] SdB, 与马德莱娜·戈贝伊的采访, 'The Art of Fiction No..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32] 见'Introduction' to MPI xxxviii.

[33] SdB to NA, 16 November 1960, TALA 538.

[34] SdB to NA, December 1960, TALA 539.

[35] PL 220.

[36] The French text reads: 'il faudrait plutôt expliquer comment certains individus sont capables de mener à bien ce délire concerté qu'est un système et d'où leur vient l'entêtement qui donne à leurs aperçus la valeur des clés universelles. J'ai dit déjà qu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ne dispose pas à ce genre d'obstination'.

[37] PL 221.

[38] SLBdB, 'Chronologie', MPlI xxii.

[39] David Macey, *Frantz Fanon: A Biography*, London: Verso Books, 2012, pp.455-6.

[40] FC 606-7.

[41] FC 611.

[42] SLdB, 'Chronologie', MII xxiii. 一些被盗材料后来又出现在私人买卖中。

[43] 由于不愿在那里常住，萨特于12月搬到了拉斯帕伊大道222号。

[44] ASD 306.

[45] Cohen-Solal, Sartre, p.406.

[46] 见Gary Gutting, *Thinking the Impossible: French Philosophy Since 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4.

[47] 尽管弗里丹后来才承认这一点，见Sandra Dijkstra, 'Simone de Beauvoir and Betty Friedan: The Politics of Omission', *feminist Studies* 6(2) (Summer 1980): 293–4.

[48] 引自Gonzague de Saint-Bris and Vladimir Fedorovski, *Les Egéries Russes*, Paris: Lattès, 1994, p.282.

[49] VED 29.

[50] SdB to NA, December 1963, p.555.

[51] VED 31.

[52] 'Maladie de ma mère', f. 254, 287, 311. 引自'Notice' MII 1276.

[53] VED 24.

[54] VED 19–20.

[55] VED 76.

[56] ASD 135.

[57] ASD 75.

[58] SLdB, 'Chronologie', 稿件提交日期为1963年5月7日。

[59] FC 199.

[60] FC 202.

[61] FC 202.

[62] FC 203.

[63] FC 202.

[64] Simone de Beauvoir, 'Une interview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Madeleine Chapsal', in *Les écrivains en personne* (Paris: Julliard, 1960, pp. 17–37), reprinted in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 ed. Claude Francis and Fernand Gontier, Paris: Gallimard, 1979, p. 396.

[65] FC 674.

[66] Françoise d'Eaubonne, *Une femme nommée castor*, Paris: Harmattan, 2008, p. 253. 见also MPII 1017 f on 'j'ai été flouée'.

[67] SLdB, 'Chronologie', MPII xxvi.

[68] Simone de Beauvoir, 与马德莱娜·戈贝伊的采访, 'The Art of Fiction No. 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又见SLdB 'Chronologie', MPII xxviii以获得日期信息。

[69] 信件日期是1964年10月29日, 引自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 81.

[70] FC 133.

[71] FC 133–4.

[72] Jacques Ehrmann, 'The French Review', *The French Review* 37(6) 1964: 698–9, 699.

[73] G. Ménie, 'Le Prix d'une révolte', *Esprit* 326(3) 1964 (March): 488–96, 493.

[74] Francine Dumas, 'Une réponse tragique', *Esprit* 326(3) 1964 (March): 496–502.

[75] SdB to NA, December 1963, TALA 556.

[76] Nelson Algren, 'I ain't Abelard', *Newsweek*, 28 December 1964, 58–9.

[77] Nelson Algren, 'The Question of Simone de Beauvoir', *Harper's*, May 1965, 136.

[78] 见《越洋情书》第559页的注释。

[79]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8/simone-de-beauvoir-ces-lettres-qui-ebranlent-un-mythe/1038/0/45316>

[80] Kurt Vonnegut, *Fates Worse than Death: An Autobiographical Collage of the 1980s*, New York: 2013, 60. 冯内古特的说法是基于贝尔的波伏瓦传记。

[81] ‘Preface to The Sexually Responsive woma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4; no surviving French version; FW 97.

[82] 见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 Lecarme-Tabone, ‘Introduction’, MPI xlv.

[83] Sara Ahmed, ‘Feminist Killjoys (and Other Wilful Subjects)’, Scholar and feminist online 8(3), Summer 2010: 4.

[84] SLBdB ‘Chronologie’, MPII xxvi.

[85] ‘What Love Is – And Isn’t’, *Mccall’s* 71, August 1965, 133. (In FW 100.)

[86] ‘Sartre Talks of Beauvoir’, *Vogue*, July 1965, p.73.

[87]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73.

[88]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78.

[89]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97–8.

[90] ASD 275.

[91]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45.

[92]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33, 134

[93]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39.

[94] ‘Women and Creativity’, FW 158.

[95] ‘Les Belles Images (par Simone de Beauvoir, Gallimard)’, *La cité*, May 1967, p.14.

[96] SLBdB, ‘Chronologie’, MPII xxxi.

[97] ASD 144.

[98] BI 151.

[99] 杰奎琳·皮亚捷对波伏瓦的采访, *Le Monde*, 23 December 1966.

[100] BI 183.

[101] SLBdB, ‘Chronologie’, MPII xxxi.

[102] ASD 414.

[103] 波伏瓦的讨论见ASD 369.

[104] ASD 142.

[105] ‘Preface to Through women’s Eyes’,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FW 253.

[106] TWD 13.

[107] TWD 70.

[108] TWD 80.

[109] TWD 107.

[110] Henri Clouard, ‘La Revue littéraire’, *Revue des deux mondes*, March 1968: 115–24, p.118.

[111] Clouard ‘La Revue littéraire’, pp.118–19.

[112] Jacqueline Piatier, ‘Le Démon du bien: “La Femme rompue” de Simone de Beauvoir’,*Le Monde*, 1968.

[113] ASD 144.

[114] ASD 143.

[115] ASD 147.

[116] ASD 490.

[117] Bruno Vercier,‘Les livres qui ont marqué la pensée de notre époque,’*Réalités*, August 1971.

[118] ‘Libération des femmes, année zéro’, *Partisans* 54–55: 1970, Maspero.

[119] 波伏瓦在《归根到底》中声称是她们在接近她；而安妮·泽林斯基则说是波伏瓦在接近她们（*Le cinquantenaire du ‘Deuxième Sexe’*,310–13）。

[120] 据西尔维回忆，波伏瓦从未做过流产手术。她认为流产手术应该被合法化，但是如果有足够充分的避孕措施，流产的概率应该很低。（Schwarzer, p. 30）。

第十五章

老年

1970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从罗马回巴黎，那时她正等待着《老年》的出版，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萨特的健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让她担心了，但在10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萨特和西尔维在波伏瓦的公寓里——星期六晚上萨特都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他喝了很多伏特加，然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萨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但当西尔维和波伏瓦带他去吃周日午餐时（在拉库波尔每周一次的约会），他居然撞到了家具上。那时候萨特几乎没喝多少酒，他为什么会走不稳呢？

回到住处时，波伏瓦感到绝望：自从1954年莫斯科的那次事件以来，她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而萨特仍然每天抽两包波雅尔香烟，一直酗酒。第二天，萨特似乎恢复了平衡，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他做些检查。脑电图显示正常。但萨特得服用治疗眩晕的药物，这种药物的副作用是会让他嗜睡。波伏瓦试着不去担心最坏的情况，但万一就是这样呢？

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时，55岁的波伏瓦没有避而不谈自己的晚年不适，这让许多读者感到愤怒。波伏瓦自己明白其中的原因：人们赋予了她一个形象，而且他们想与他们想象中的偶像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样，不必担心衰老、死亡。他们宁愿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现实；作为偶像的波伏瓦怎么可以承认她害怕衰老和死亡呢？[\[1\]](#)



1970年8月，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还有萨特在罗马的纳沃纳广场。

作为一个女人，波伏瓦有过“他者”的感觉，这也有助于她在《第二性》中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在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感受“他者”：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再次让她对别人的经历感到好奇。但谈论衰老和老年在当时是禁忌。小说家安德烈·纪德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他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拉·白鲁斯问，为什么书籍里对老年人的描写那么少。他回答：“这是因为老年人不再能写了，而人们年轻时不愿费心谈论老年。”^[2]

因此，波伏瓦决定趁她还来得及的时候要谈论这个话题。波伏瓦从1967年年中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她回到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波伏瓦在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在后半部分，就像她在《第二性》中所做的那样，她想把生活经历包裹进去。波伏瓦去了养老院，读了老人写的回忆

录，像往常一样，她还读描写老年的文学作品。最终的成书取材从阿兰的哲学到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包括路易·阿拉贡、塞缪尔·贝克特、查尔斯·波德莱尔、孔子、温斯顿·丘吉尔、狄更斯、狄德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格丽特·迪朗、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伊拉斯谟、詹姆斯·弗雷泽、朱迪特·戈蒂埃、纪德、黑格尔、康德、居里夫人、尼采、普鲁斯特、乔治·桑、叔本华、萧伯纳、瓦莱里、伏尔泰，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58岁时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我厌恶老年的冷酷。我感觉它就要来了。我吱吱作响，充满怨恨。

脚步没法那么轻快地踏在露珠上了

心脏没法感知新的情感了

没法那么快地重燃被熄灭的希望了

我刚打开马修·阿诺德的书，抄写了这几行字。[\[3\]](#)

在《老年》一书中，波伏瓦认为，并非所有的衰老都艰难而痛苦，因为“老年”并非指某一种普遍的经历。和成为女人一样，衰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和家庭环境。衰老的境况极大地影响了它的体验。

就像成为女性或怀孕一样，“衰老”有着明显的生物学成分。但波伏瓦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她对于社会对年龄的忽视感到困惑。波伏瓦说，确实只有一半的女性不得不面临性别歧视所带来的次要地位。只要活得长久，年龄增长——作为一个生物学事实——是人类普遍的命运，但年龄变化带来的边缘化和孤独感

却不是普遍的。

波伏瓦用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就像她的《第二性》那样。波伏瓦还展示了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何经常同时起作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经常被禁止参加新的项目和拥有新的可能性。但对于男性来说，年龄似乎并没有对性的前景产生同样的影响。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的分析与《第二性》不同，因为这本书比《第二性》更关注经济匮乏。波伏瓦说，人们在谈及小孩子和老人时，都会认为他们在年龄上是与众不同的，这并非偶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还不是人或者已经不是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或仍像人一样。”然而，孩子代表着未来，而老人“只不过是一具被判缓刑的尸体”[4]。

从外向内看，衰老就像被囚禁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波伏瓦想要向读者展示，人的经历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变得“沉重”起来；从过去的选择中解脱出来并践行新的计划变得更加困难。年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可能性；波伏瓦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我们做过的一些梦“与实现的梦想相去甚远”[5]。但我们也意识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是“对等而互惠的关系”——即使在生命走到苦乐参半的结局时也是如此[6]。

1970年1月，《老年》出版，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波伏瓦再次触及了一个禁忌话题：“老年”可能带来的各种体验。波伏瓦在写作中引用了那些经历过和反思过变老的人，这意味着她的研究主要来自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变老经历。但波伏瓦认为她把文学资源包括进来是合理的，因为在把年龄放到社会和政治范畴中讨论时，她能够强调主观经验的作用。从外部来看，年龄

就是这样一个范畴。但不管是在可能变好还是可能变坏的情况下，它必须从内心出发去生活和体验。

波伏瓦再次被指责为缺乏独创性，写了一本“二手”书，一本“合集”[7]，毫无新意，“试图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设计出一种看似复杂的老年人哲学”[8]。一位评论家甚至声称：“波伏瓦没有精细的或原创的头脑。显然，她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整个图书馆，但消化得不完全。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三个男人（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的作品。”[9]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波伏瓦就一直在对这三个思想者的哲学进行批评和评论。在波伏瓦回忆录的第四卷《归根到底》中，她为《老年》的原创性辩驳：“在第一部分，各种材料的分析、它所引起的反思和我所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10]此外，第二部分是“完全私人的作品”，是由波伏瓦她自己的问题所引出的：“老人和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过去和他的事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波伏瓦的确是通过阅读信件、日记和回忆录来取材了，但是她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原创的。[11]

波伏瓦再次让人们注意到她眼中的不道德行为，但也再次被人说成是萨特的跟班，没有独创性，无法理解伟人。所以波伏瓦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并决定尝试通过其他媒介提出她的想法。1974年，波伏瓦同意参与一部关于衰老问题的纪录片的拍摄。在此之前，波伏瓦很少同意在广播或电视上做任何事情，却在讨论社会对老年人的待遇和她自己的衰老经历时破例了。在疗养院的场景中，波伏瓦让观众确信，她认为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是不人道的。枯燥乏味的机构背景和波伏瓦在巴黎公寓里的场景并列在一起——在那里，波伏瓦被她辉煌灿烂人生中的物品包围着，有书籍、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工制品和朋友的照片。波伏瓦说，死

亡最糟糕的一点是，未来在眼前消失。在最后一幕中，波伏瓦在墓地里漫步，她说，她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恐惧死亡了。30岁时，她无法平静地想象自己从地球上消失；将近80岁时，波伏瓦发现比起生命结束，自己更恐惧和厌恶未知的生活。[12]

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伏瓦吸引了外界的大量关注，招致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说她“执着于萨特”，还为一家男性期刊《摩登时代》杂志写作。[13]波伏瓦觉得这些结论太草率，太令人气愤，个中原因不难想象。在专业上，尽管波伏瓦的作品与萨特的哲学立场不同，但她仍然被看作萨特的傀儡、影子或帮凶。就个人而言，公众对波伏瓦与博斯特的关系只知一二，对她与阿尔格伦的故事知之甚少，对她与朗兹曼和西尔维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她在战争期间与女性的关系了）。波伏瓦对人们轻率地下结论感到沮丧。考虑到波伏瓦叙述自己生活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觉得她不真诚，但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波伏瓦的定义和排斥，简直讨厌到像一种惩罚。当波伏瓦指责社会虚伪时，人们说她可悲、缺乏独创性，甚至是其他更难听的话。



波伏瓦在家里。

1971年，萨特不得不戴上假牙，这既是一场真实的挣扎，也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挣扎：他还能继续他的公开演讲吗，还是今后因为牙口不好就再也无法演讲了？[\[14\]](#)对波伏瓦来说，这不可避免地提醒着她萨特的衰老。到了5月，萨特和波伏瓦住在一起的时间比平时多了，因为波伏瓦的公寓在一楼，而萨特那栋楼的电梯又坏了——他觉得爬10层楼梯太累了。5月18日星期二晚上，萨特觉得自己双腿都要软了。他话讲不清楚，嘴也哆哆嗦嗦的。这显然是中风，但波伏瓦尽量让自己不惊慌，提醒自己见过有朋友中风之后能完全康复。萨特同意周三早上去看医生，但坚持要喝他的夜间威士忌。到了午夜，他挣扎着上床睡觉；波伏瓦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当他们最后去看医生时，医生说情况比10月更糟，而且他担

心很快就会再次出现这些症状。当晚，西尔维开车送波伏瓦和萨特回波伏瓦的公寓，萨特没有喝威士忌，而是喝了果汁。他处于震惊的状态，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波雅德香烟不停地从嘴里滚出来。西尔维帮他捡起来，但是他又把它弄掉了。于是整个晚上，同样的循环一直出现，痛苦地重复着。第二天萨特换了处方，医生建议他休息，还要有人陪伴，不能独自待着。他们说，如果他能遵从医嘱，用不了三周就可以康复。

到接下来的那个周三，萨特已经能正常走路和说话了，但仍然不能弹钢琴和写字。波伏瓦的任务是让他远离酒精、咖啡因和兴奋剂。他对自己身体机能的衰退表现出超然的冷漠，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认为病情不会持续那么久。波伏瓦并没有因此得到安慰。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也许减轻了，但她对萨特死亡的恐惧却没有减轻。

那年夏天，他计划花五周的时间去旅行——三周和阿莱特在一起，两周和万达在一起——而波伏瓦和西尔维在一起。波伏瓦很喜欢和西尔维一起旅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萨特是很困难的。在意大利，波伏瓦每天晚上都哭着入睡。波伏瓦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她继续着她的女性主义主张，在1971年7月成为“选择”（choose）运动的主席。她与吉塞勒·哈利米、学者让·罗斯丹、小说家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和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共同发起了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有三个目标：对女性进行关于性和避孕的教育；修改自1920年起生效的《法国堕胎法》；为堕胎的女性提供免费的法律辩护。

同月，在瑞士的萨特旧病复发，但他不让阿莱特告诉波伏瓦。当波伏瓦在罗马终点站遇见萨特时，他的脸因为牙龈上的脓肿而肿了起来，但他似乎充满了活力；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萨特又恢复了精力，享受着罗马的生活。萨特在服药，并限制自

己的酒精摄入量，午餐时喝一杯葡萄酒，晚餐时喝啤酒，还有两杯威士忌。萨特正在写福楼拜传记《家庭白痴》（*The Family Idiot*），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仿佛还有几十年可以活。回到巴黎后，萨特重新对人和世界大事产生了兴趣。萨特读了波伏瓦第四卷回忆录的手稿，并提了一些意见。到了11月中旬，波伏瓦几乎不再担心了。从波伏瓦行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好时机——女性解放运动正在快速发展，1971年11月11日，波伏瓦与数千名女性游行穿过巴黎，要求获得堕胎的合法权利。

1972年，萨特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段罗曼史：与20多岁的埃莱娜·拉西蒂奥塔基斯恋爱了。这也证明了波伏瓦在《老年》中提出的观点：年龄对男人和女人的情爱可能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同年，英文版《老年》出版了，《洛杉矶时报》对它进行了严厉的评论，认为波伏瓦粗心大意，作品过于笼统——评论者是纳尔逊·阿尔格伦。

那时波伏瓦正在为堕胎权利奔走，她开始收到女性来信，她们声称做母亲和做家务使她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有些来信是用挑衅的语气写的；还有一些人责备波伏瓦不应把母亲只看成是一种劳役。所以在1972年3月6日，波伏瓦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些女人和男人的回应”的文章，波伏瓦写道，她意识到母亲的身份是可以刻意选择的，她“意识到当人们需要孩子时孩子能带来的快乐”。她说，她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女性，因为她是在“积极为她们争取自由：选择孕产、避孕或堕胎的自由”。^[15]

但波伏瓦也认为，对母性的尊重是可疑的，现实仍然被伤害女性和儿童的谬论所困扰。波伏瓦指出，在1972年的法国，做一个未婚妈妈是很困难的。许多女性选择结婚是因为她们认为结婚是安全的选择，但“没有父亲的孩子往往比父母不和的孩子更

快乐”。[16]

波伏瓦大胆地宣称，她支持把母职与婚姻分离开来：“我支持废除家庭。”这句话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很好地迎合了反对波伏瓦的保守派和热衷人身攻击的读者，他们认为波伏瓦反母性，不女性化，甚至不女性主义了。但在同一段中，波伏瓦对“家庭”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是这个男权世界剥削女性的中介，每年从她们那里勒索数十亿个小时的‘隐形工作’。”1955年，法国人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30亿个小时，相比之下，在家里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50亿个小时。[17]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在外界影响下接受这项工作的，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因为谁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波伏瓦说，女性必须找到更好的价值所在：

人们之所以歌颂母亲，是因为母性能够让女人毫无怨言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他们没有告诉一个两岁、三岁或四岁的小女孩“你注定要去洗碗”，而是告诉她“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妈妈”。人们给她布娃娃，歌颂母亲，所以当她长大后，她就会想到一件事：结婚生子。她坚信，如果没有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但是对于男人却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人会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说“他不是一个人”。[18]

堕胎法惩罚了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计划怀孕，那么她就能适应包括学习和工作在内的生活。波伏瓦认为男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源于恐惧——“害怕女性会发现并通过掌握自己的命运来重新获得她们在所有领域的自主权”。[19]

在此背景下，1965年以前，法国已婚女性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没有合法工作的渠道，也无权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1970年，法国法律确立了“父母权威”来代替“父权”。1972年，新的立法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平等的地位。

波伏瓦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官方授权的避孕方法，让堕胎变得无关紧要”，但当时法国只有7%的女性在使用避孕措施；波伏瓦相信，实现这一改革的同时还能实现更大的超越。^[20]波伏瓦对堕胎的辩护提出了权力、责任和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选择”。1972年10月，波伏瓦写道：“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一个人怎么会不帮助自己的孩子在世界上找到自处的位置呢？”^[21]由于缺乏避孕和安全堕胎的途径，最贫穷的女性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女性被控违法，而富有的资产阶级女性则想办法逃避这些后果。

1972年秋，波伏瓦出版了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回忆录，书名故意取了不吉利的《归根到底》。这本书不像前三本书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汇集了波伏瓦对她所重视的事物的想法：写作、阅读、电影、政治、音乐、艺术、参与到世界中。自从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以来，波伏瓦发现读者们想把《时势的力量》的结论当作“对失败的承认和对自己生活的否定，尽管波伏瓦所有的声明从根本上否认了任何这样的解释”。^[22]《归根到底》出版时，《埃斯普利特》上有一篇评论问道：“波伏瓦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波伏瓦想告诉我们什么？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说”，而是“萨特思想的应用练习（有人在学校说），有点烦人”。看到波伏瓦“对充满失败的过去完全缺乏反思”，众人感到失望。^[23]

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并不是萨特哲学的应用——尽管她没有向世界展示，但波伏瓦确实是一个会反思自己失败的女性。在这

部作品中，波伏瓦捍卫她的原创性、描述《老年》的方法论以及写作在她生活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从1963年到1970年，波伏瓦写了一本关于她母亲去世的回忆录、两部小说、两篇序和《老年》。但波伏瓦也经历过一想到要拿起笔就恶心的时候。波伏瓦觉得自己一生的公共事业已经完成了：“我的事业已经完成了，尽管我还会继续下去。”^[24]

在书的开头，波伏瓦也记录了她身边的人的死亡和疾病：贾科梅蒂生病了，他的母亲去世了。她还重新讲述了萨特母亲的死。

波伏瓦纪念维奥莱特·勒迪克。自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时与这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相识之后，波伏瓦密切关注着维奥莱特，尤其是在1972年5月维奥莱特突然死于癌症之前的那段日子里。^[25]勒迪克总是把波伏瓦当作她的文学导师，并授权波伏瓦来打理她未出版的作品。波伏瓦还负责了勒迪克的作品《寻找爱》（*La chasse à l'amour*）在1973年的出版事宜。^[26]

波伏瓦继续以读书为乐，读书使她能够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波伏瓦的《归根到底》记录了一些她自己的兴趣，包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阿图尔·伦敦的《审判》（*On Trial*）、民族学研究、贝特尔海姆的《空堡垒》（*The Empty Fortress*）和人物传记等。波伏瓦读奥斯卡·王尔德、乔治·桑、阿内丝·尼恩、汉娜·阿伦特、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重读了《圣经》。^[27]她也做填字游戏——时间不再是她想囤积的商品。

波伏瓦仍然对“一个女人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她的女性状态、她的女性处境”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波伏瓦的观点已经发生

了变化，她想告诉读者，生活的过程是如何让她看到新的视角的。波伏瓦说，如果要重写《第二性》，她会采取一种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把她的分析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对立上。事后看来，波伏瓦并没有足够重视稀缺经济学和男人是如何变成男人的情形。波伏瓦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补充一句“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男人，而是成为男人”。[28]

波伏瓦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第二性》出版以来，很多鼓励女性接受传统女性“使命”的书籍出现反弹，一些虚假的先知宣称女权主义已经过时。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米勒、费尔斯通、摩根、格里尔）所要求的是“女性的去殖民化”，因为女性已经被“从内部殖民”，把家庭中无报酬的工作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和剥削视为理所当然。[29]在《归根到底》的结尾处波伏瓦写道：“这次我不给这本书下结论了。我让读者自由地得出他们的结论。”[30]和以往一样，作家的使命是呼吁读者追求自由——即使是写自己的生活。

1972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采访时，公开接受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考虑到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的作品和政治活动，很难相信她会破天荒地承认这一点。这已经是个大新闻了，足以让一家报纸买下这条消息。尽管1949年波伏瓦宣布，自己就像要求女性拥有投票权的人一样，是一个女性主义者[31]，甚至在1965年称自己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摩登时代》杂志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的）[32]，但在更广为人知的《时势的力量》中，她声称自己在写《第二性》时“避免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33]。

随着政治势头的增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的辩论已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以至于需要

对女权主义联盟进行精确定义。波伏瓦和施瓦策尔做这次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想让公众知道波伏瓦已经“转变”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女权主义者；二是她们需要为女权主义“集会”筹集资金，该集会将于1972年2月在巴黎互助会举行。她们认为这样的采访会很有看点，最后《新观察家》买下了它的独播权。

施瓦策尔称这次采访是“历史性的”；波伏瓦在采访中大声而清晰地宣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34]施瓦策尔问了波伏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第二性》出版23年后她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回答是，在这些年里，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7%的女性在服用避孕药，而且女性仍然被禁止从事有趣的职业并得到晋升。波伏瓦声称，在女性解放阵线之前，她并不认同她在法国看到的改革和法律主义的女权主义，她更喜欢当下女权主义的激进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似乎更有利于解决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是在以解放所有人目标的政团中，波伏瓦仍然看到女性从事着乏味、无信誉、无权力的工作，而男性则被赋予了有意义的公共责任角色。波伏瓦明确表示，她并没有否定男人——她拒绝将女权主义和厌男症混为一谈，并承认她那个时代的男人并没有建立起男权社会结构。但这些男人仍然从中获利，因此波伏瓦认为保持“谨慎态度”很重要。

^[35]

有些女权主义者曾批评《第二性》是一部中产阶级的作品，由一位对自己的特权视而不见的精英女性撰写。在这次采访中，波伏瓦承认她在早期的作品中忽略了很多关于阶级的问题。但她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解放女性，因为男女的区别不在于不同阶级，而是不同的种姓。人们可以上升或下降到不同的阶级。但一旦你出生在一个种姓，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里。波伏瓦说，女人不能变成男人，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视为低级种姓。

[36]

在采访中，波伏瓦没有承认自己从非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女权主义者，而是公开批判了她自己之前的信念，即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将带来解放女性所需的变革。相反，波伏瓦支持女性运动，支持让“匿名”的女性，而非男性“专家”发出声音。

女性解放联盟有一股同性恋的暗流，波伏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地位，因为这延续了她们“歇斯底里的悍妇和女同性恋”的形象。[37]波伏瓦的文字让现代读者震惊，尤其是在知道波伏瓦自己是性别侮辱的目标以及她拥有同性恋关系之后。波伏瓦的恋情那时还不为人所知，但在她的采访中，施瓦策尔问波伏瓦女同性恋是否可以成为“政治武器”。波伏瓦的回复以及她接下来的谈话，表明她把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性教条”联系在一起。波伏瓦认为同性恋可以在政治上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当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偏见时，会有使异性恋者远离运动的风险”：

阿莉塞·施瓦策尔：她们的第一个论点是，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和男人的性关系都是压迫性的。因此女权主义者拒绝和男人有性关系。对此，你怎么看？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任何性关系真的是压迫性的吗？为什么不接受这种关系，努力使其往非压迫性的方向发展呢？认为所有性交都是强奸的说法让我震惊。我不相信这个看法。当她们说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时，她们又拿起了男性的谬论。这意味着男人的性器官是一把剑、一件武器。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创造一种不带有压迫的新型性关系。[38]

1972年5月，波伏瓦前往格勒诺布尔为她参与的竞选做演

讲，11月8日，博比尼法庭上的一场审判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6岁的少女玛丽-克莱尔在母亲的帮助下做了流产手术，因此违反了法律，她和另外三个女人一起受审。吉塞勒·哈利米利用几个著名的科学和文化权威（包括波伏瓦）来为自己辩护。她认为这些女性是在另一个时代受审的。1920年的法律尤其擅长惩罚穷人。每年都有无数女性因为不了解避孕方法而选择流产。在流产时，她们面临着生命危险和不可逆转的残害。

审判改变了公众舆论的导向——1970年，只有22%的法国人赞成取消对堕胎的限制；一年后支持率已升至55%。[\[39\]](#)1974年，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通过新的立法，在1974年12月使人们更容易获得避孕措施，同时拥护《韦伊法》（*The Veil Law*），从1975年1月将堕胎合法化。

与此同时，1973年3月，萨特再次中风。这次更糟，萨特什么都记不住了，也认不出人来。医生说他是大脑窒息，并再次建议不要喝酒或抽烟。萨特现在67岁了，他“半心半意”地试图放弃他的恶习，后来又全心全意接纳了它们。

除了写作和女权主义工作，波伏瓦继续致力于她在《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为萨特病了，所以波伏瓦来主持周三上午的编辑会议。朗兹曼在20世纪60年代末介绍给波伏瓦认识的小说家克莱尔·埃切列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1点，波伏瓦坐在她的黄色长沙发上欢迎每一个人。在她旁边有一堆文章……都是她认真读过和注释过的。组成委员会的那一小群人在长沙发边上坐成半圆形。[\[40\]](#)

埃切列利描述了目睹波伏瓦给那些有抱负的作家打拒绝电话

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在批判时“坦率而粗暴”。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利用她的主编身份在没有委员会支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东西。[41]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法国南部旅行，然后和萨特一起去威尼斯旅行。（他已经和阿莱特过了暑假，正在去和万达度假的路上。）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威尼斯待了几天后就离开了。波伏瓦不想让西尔维在威尼斯感到无聊，这两个女人都喜欢游览新地方。但是波伏瓦开始感受到一种“双重内疚”——如果她离开萨特，她会感到内疚，如果她留下，她也会感到内疚，因为这样会让西尔维失望。[42]

波伏瓦、萨特和西尔维三人于8月中旬在罗马重新会合。萨特的视力恶化了；他的左眼里面出血，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在家里，他们总是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办事，而现在，为了适应萨特的新需求，他们改变了日常工作习惯：波伏瓦早上给他念书，中午三人一起吃午餐，然后萨特午休，波伏瓦和西尔维去散步或安静地读书。萨特醒来后，波伏瓦给他读法语或意大利语的报纸，然后三人一起去吃晚饭。饮食显示了萨特的衰老程度。萨特处于糖尿病早期，波伏瓦担心他不小心吃了太多意大利面和意大利冰激凌。由于戴假牙和中风的缘故，萨特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嘴唇，所以吃东西会弄得到处都是。[43]那年奥尔加和博斯特在罗马见到他们时，看到萨特衰老的模样，甚是惊讶。

回到巴黎后不久，萨特决定雇用一名新秘书，不是处理信件（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而是为他朗读和与他交谈。最终雇用的秘书是皮埃尔·维克托，那个希望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人。一开始，阿莱特对此充满怀疑。她给波伏瓦打了电话，说她不想让他们陷入“舍恩曼”的境地。（拉尔夫·舍恩曼是罗素的法庭秘书，他声称代表伯特兰·罗素发言，因为罗素年事已高，身体

不便，无法出席会议，因此他的秘书舍恩曼便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代表罗素发言。）但萨特希望这样，波伏瓦也不想把他当小孩子对待。这也意味着波伏瓦会在早晨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因为皮埃尔会给萨特大声朗读。[\[44\]](#)但这是一个会令波伏瓦后悔的决定。

萨特不再和他的女人调情了，她们现在轮流照顾他。萨特已经68岁了，完全依赖别人。1973年10月，萨特搬到了蒙帕纳斯大厦附近的埃德加基内大街22号的一栋现代建筑的10层公寓里。它就在波伏瓦的公寓对面。1974年夏，波伏瓦在罗马录下了与萨特的一系列对话，她说这将是萨特自传《词语》（*Words*）的口头续篇。到那年夏天结束时，萨特意识到自己的视力无法变好：他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但萨特仍在努力工作，计划和皮埃尔·维克托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权力与自由》（*Power and Liberty*）。维克托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思想很感兴趣，他告诉萨特，他们的合作是一种辩证关系，他们的思想是对立的。即使在事件发生后，波伏瓦也确信，维克托接下这份工作是出于对萨特的真诚照顾。这并不容易——维克托经常想放弃。维克托到达萨特的公寓里时，常常见萨特坐着打盹儿或听音乐。维克托写道，这是一场“与死亡的持续斗争”，他受雇与“睡眠、兴趣索然，或者更简单地说——麻木，做斗争”。他说自己真正参与的可以算是一种康复治疗。[\[45\]](#)

在1973年至1974年的冬天，法国的女权运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随着堕胎之战接近胜利，运动中出现了不同倾向和策略上的分歧。西蒙娜·德·波伏瓦想要一部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就像现存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一样。性别歧视不可能像种族主义一样被立法废除，但波伏瓦认为，针对它的法律将是一个有用的工

具。因此，她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女性权利联盟”（League of Women's Rights），这是一个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组织。

该联盟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她们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和男权法律体系框架的让步，甚至要与之合作。联盟认为，颠覆社会已不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他们追求在现有的结构上改革。波伏瓦是该联盟的主席，但她也利用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表达了反对意见。1973年，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为那些想要谴责性别歧视的人设立了一个永久专栏。这个专栏被称为“日常的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作者运用生活经历和反思，幽默地揭露和挑战性别歧视，而不是寻求法律赔偿。这个专栏的序言非常直接：

将他人称为“肮脏的黑鬼”，或翻印侮辱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言论，都可能被送上法庭，并被判“种族歧视罪”。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公开对一个女人大喊大叫，称她为“妓女”，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指责女人背叛、愚昧、反复无常、愚蠢或歇斯底里，他绝对不会有风险。我们（女权联盟）要求将“性别歧视”也视为一种犯罪。[46]

第二年，波伏瓦为一本书写了序，热切地呼吁进行离婚改革。同样，波伏瓦的分析包含了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很容易被忽视。关于离婚对孩子有害的反对意见，波伏瓦回答说：“孩子可能会被貌合神离在一起的父母‘迫害’。”波伏瓦认为，离婚“不是万灵药”，“只有当女性知道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她们的自由，她们才会获得解放。”但为了发现自己的可能性，离婚往往是一个必要条件。[47]

20世纪70年代，波伏瓦越来越多地用她的影响力帮助别人发声。在《摩登时代》的特刊《女性坚持》（*Women Insist*）的序言中，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它质疑我们的欲望，质疑我们快乐的形式。^[48]女权主义者让人不舒服；但如果她们的话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她们也不会受到嘲笑，不会被当作泼妇和“煤气灯”。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承认在过去，她“或多或少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的角色”，她曾经认为克服性别障碍的最好方法就是忽略其存在。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帮助波伏瓦认识到，这种立场使她成为不平等的帮凶，所以现在波伏瓦要把它和她自己表达出来。

波伏瓦承认自己曾经是同谋者，这是令人钦佩的：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看到自己以前失败的女人。但是她能看到全部的失败吗？当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时，是怎样的限制和欲望让波伏瓦无法完整地讲述她对哲学的热爱以及她对萨特以外的情人的爱？波伏瓦的动机是自我保护，是关心“大家族”中的其他人，还是妄想？还是像波伏瓦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动机是赋予她的生活一种“艺术的必要性”，使其具有解放读者的潜力，向他们展示新的可能性，就像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乔和乔治·爱略特的麦琪对年少时的她产生的影响一样？^[49]（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这就是她在做的事情。《归根到底》也暗示波伏瓦是认真的。）

考虑到萨特是一个名过其实的花花公子，以及他对他“偶然的情人们”持续不断的谎言，人们不免会有点惊讶：在讲述他和波伏瓦的故事时，萨特首先强调了波伏瓦在他生命中和思想上的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接受采访时，萨特确实是这么做的。

他表示，人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看到是波伏瓦的版本，但“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最初是在智力上发展起来的”[50]。采访他的约翰·杰拉斯——波伏瓦朋友斯捷帕的儿子——坦率地问道：“难道当时你们俩不相爱吗？”

萨特的回答是，他们彼此相爱，但不是以一般人所理解的方式相爱：

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但是就像一个人不能主导（当然，除非通过恐吓）另一个人的思想那样，一个人也不能主宰另一个人的品位、梦想、希望，等等。有些事情海狸（波伏瓦）更擅长，有些事情我更擅长。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海狸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51]

萨特一直很关心自己留给后世的名声，他决心以一个伟大作家的身份来实现不朽。1975年6月，为了纪念萨特的70岁生日，《新观察家》委托进行了一次采访。除此之外，萨特的采访者米歇尔·孔塔询问了他有多少个情人。萨特承认有好几个。但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的一个。萨特提到了另外两个人的名字——米歇尔和阿莱特。但是萨特说，波伏瓦扮演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角色：

萨特：在我的想法真正成形之前，我都先把它讲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听。在我的想法形成的过程中，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米歇尔·孔塔：因为她和你哲学上处于同一个层次？

萨特：不仅如此，还因为她是唯一了解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正因为如此，她是一个很适合交谈的人，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人。这是我独特的幸运……

米歇尔·孔塔：不过，你还得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判面前为自己辩护，不是吗？

萨特：常有的事！事实上，我们甚至互相批判。但我知道她最终会是对的那个人。这并不是说我接受了她所有的批评，但我确实接受了大部分。

米歇尔·孔塔：你对她和她对你一样严厉吗？

萨特：当然了，尽可能地严厉。如果你很幸运地爱上了你所批评的人，那么不严厉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52\]](#)

同一年，波伏瓦决定为《摩登时代》杂志采访萨特本人（尽管他们发表时不把它叫作采访，他们称之为“审问”）。波伏瓦开门见山地说：“萨特，我想问你关于女人的问题。”波伏瓦问道，为什么萨特声称自己站在受压迫者一边，这些受压迫者可以是工人、黑人、犹太人，却不能是女性，他对此怎么解释？

萨特说，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

“可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波伏瓦追问他，是不是很多男人在女性问题上都有一个盲点（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她自己一样）。他们对女性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好像古代雅典人那样，当奴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做饭时，他们却大谈正义和民主之类的理想。萨特的冷漠不是像雅典人的冷漠一样让后人感到震惊吗？[\[53\]](#)

波伏瓦继续参与到了女权主义作家活动和运动中，也接受了许多采访。1976年，当波伏瓦与阿莉塞·施瓦策尔交谈，回顾自

己的生活时，她评论说，她摆脱了女性的“奴隶劳动”，因为她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家庭主妇。但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收到世界各地女性的来信，诉说她们的挣扎，这让她意识到沉默的另一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许多写信给她的女性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已经结婚。为了爱情，她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当时也很高兴这样做，但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死胡同：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她们，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也没有自己的追求。

1976年，波伏瓦认为结婚和做母亲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陷阱。波伏瓦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孩子，她应该认真考虑抚养孩子的条件，因为她必须放弃工作，孩子生病时在家照顾孩子。如果女性做不到这些，她将受到责备。[\[54\]](#)波伏瓦说，问题不在于家务和护理工作本身，因为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每个人——不仅仅是女性——都应该去做维持生命所需的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她们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赋予生命的事情。波伏瓦称自己为主张“自愿做母亲”的活动家。[\[55\]](#)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阿德里安娜·里奇出版了《女人的诞生》（*Woman Born*），这本书以波伏瓦《第二性》中对母性的讨论为开端，阐述了母性的力量。1976年3月，一个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针对女性犯罪问题的国际法庭把波伏瓦的一封信作为诉讼的一部分。波伏瓦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那年正好是在“女性之年”之后，显然，这又是一个由男性社会为了神秘化女性而组织的活动。[\[56\]](#)

1977年3月，萨特的腿开始疼，医生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戒烟，他们可能不得不切除他的脚趾，甚至让他截肢。两天后，萨特把他的香烟和打火机交给了西尔维·勒·邦。但是酒更难戒掉，萨特为了获得一杯酒，开始在生活中和女人玩骗人的小把戏。萨

特告诉波伏瓦他每晚只喝一杯威士忌。但他让米歇尔偷偷把瓶子藏在他书架里的书后面。他说，海狸不必什么都知道。

一天，波伏瓦发现萨特宿醉不醒，她很生气。当她发现他还在米歇尔家喝威士忌时，便一怒之下给米歇尔打电话，不让她在周六晚上陪伴萨特了。^[57]阿莱特对此很高兴——她一直嫉妒萨特的其他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克服了对皮埃尔·维克托的厌恶。皮埃尔和她一样，是北非犹太人。1978年，维克托对犹太神学和弥赛亚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一起学习希伯来语。1978年2月，波伏瓦担心他们利用了萨特的弱点——利用他的名声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为萨特、维克托和埃尔凯姆要去耶路撒冷。萨特坐着轮椅上了飞机，住在一家豪华酒店里；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当他们回来后，维克托试图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一篇关于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文章，他要萨特作为共同作者署名。波伏瓦接到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博斯特打来的电话，博斯特告诉她这篇文章不好，萨特不应该署名。波伏瓦读了之后表示赞同，并说服萨特不要出版它。

此时，波伏瓦显然是萨特的守护者之一。但有几个人觊觎这个位置，想成为萨特在智识方面的监护人，但他们对于萨特本人的想法却说法不一。萨特从来没有告诉维克托这篇文章没发表的原因。但在《摩登时代》杂志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维克托在萨特的住处参加了会议），波伏瓦提到了这件事，波伏瓦以为他知道。维克托怒火中烧，跺着脚走出会场，称他的同事们是“腐朽的尸体”。^[58]维克托自此不再参加《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会议，轻蔑地把老一代卫道士称为“萨特人”。这次阿莱特站在维克托一边。

与此同时，萨特接受了更多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在出版前，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他从不让任何人读他的手稿，甚至

在1978年7月，他仍声明波伏瓦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独特角色”。[59]据西尔维·勒·邦所说，萨特生命的最后五年对波伏瓦来说特别艰难。波伏瓦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失明，发现对他隐忍要比对自己隐忍更难。波伏瓦喝了酒，吃了安定，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经常流泪。波伏瓦尽可能从其他朋友那里获得安慰。克洛德·朗兹曼住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博拉尔街，他在巴黎时，每周会和波伏瓦见两次面。但他当时正在执导《浩劫》——波伏瓦借给他钱以启动电影的拍摄——经常需要外出旅行。

1978年，一部改编自《被摧毁的女人》的电影在法国上映，影评刊登在《世界报》上，该片再次宣布波伏瓦的作品已经过时，说她的女权主义低劣：“如今，这本书的论点和基调似乎特别具有考古价值。它们使得衡量女权主义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因为这类问题与其说是关于‘流动中的女性’的问题，不如说是《世界时装之苑》或《嘉人》（*Marie-Claire*）的问题。”[60]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波伏瓦因萨特的衰老而筋疲力尽，没有心力再去写长篇作品，但在1979年，波伏瓦出版了《精神至上》（这是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当时被伽利玛和格拉塞出版社退稿了）。这部作品以扎扎和梅洛-庞蒂为原型虚构了一对情侣，即安妮和帕斯卡，写于波伏瓦发现梅洛-庞蒂求爱的真相之前。安妮的母亲迫害她的女儿，批评她的想法、读书习惯，以及她与西蒙娜的友谊，“好像一切都是罪恶”[61]。这本书并不像波伏瓦后期的作品那样圆满，但它揭示了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问题，包括爱、自我牺牲、幸福以及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这也表明，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不害怕在她的文章中加入哲学元素，她笔下的人物会讨论邓斯、司各脱、柏格森、莱布尼茨、霍布斯、拉辛、波德莱尔、克洛代尔和贝矶。

那年秋天，波伏瓦参演了由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拍

摄的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的电影《西蒙娜·德·波伏瓦》，片头称其为“我们唯一的女哲学家的纪录片”。[62]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她已经围绕着自己写了那么多作品之后，为什么还要同意拍这部片子。波伏瓦回答说，她想“纠正”某些事情，说实话，想给自己一个“更公正的形象”。[63]

1979年，波伏瓦成了杂志《女权主义者问题》（*Questions feministes*）的出版总监，该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她监督重启，并获得了奥地利欧洲文学奖。《费加罗报》以“完美的资产阶级：西蒙娜·德·波伏瓦”为标题宣布了这项荣誉，并解释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一位获得奥地利欧洲文学奖的女性，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男人”。[64]这也难怪，当被问及为何继续倡导女权主义时，波伏瓦回答说，这是因为即使到了1980年，女性还是被赋予了一种假象：“今天的女性可以成就任何事，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她自己的错。”[65]

1980年3月，波伏瓦听说《新观察家》将刊登皮埃尔·维克托对萨特的采访，分三期在星期日出版。萨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了（至少以萨特的标准来看）；这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近年来，波伏瓦曾数次要求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可谁都没有告知她具体是什么——萨特和埃尔凯姆都回避了波伏瓦的问题。当萨特给波伏瓦看他们为出版挑选的摘录时，她吓坏了。

皮埃尔·维克托打算在发表时使用他的真名——本尼·莱维（在萨特雇用他之前，他在法国没有合法的居留权）。这篇文章的语气对萨特所主张的很多东西都不屑一顾，拒绝接受萨特毕生致力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意义。在最后一次采访中，莱维甚至让萨特——萨特一直是世俗犹太人的朋友——声称唯一“真正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萨特甚至对救世主主义做出了让步。波伏瓦恳求萨特不要发表，但他不听波伏瓦的劝阻。难道这位波伏瓦

无与伦比的朋友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吗？

波伏瓦非常难过，都急哭了。朗兹曼和博斯特都打电话给《新观察家》的编辑，试图阻止该文章的发表。但编辑让·丹尼尔接到了萨特本人打来的电话，说他希望这篇采访能发表，如果《新观察家》不接受，其他报纸也会接受。访谈最终于1980年3月10日、17日和24日发表。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星期日之间的星期三，也就是3月19日，当波伏瓦来到萨特的公寓轮值时，他们之间的气氛仍然紧张。第二天早上9点，波伏瓦走进萨特的房间叫他起床时，他正坐在床上喘着气。他已经这样好几个小时了，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呼救。波伏瓦去给医生打电话，但是没有拨号音——秘书忘了交电话费。

于是波伏瓦跑下楼去打门房的电话，医生很快就来了，叫了救护车。波伏瓦焦急地看着他们对萨特进行了紧急治疗，然后把他送到布鲁萨斯医院。波伏瓦回到楼上的公寓，穿好衣服，按照计划和让·普永一起去吃午饭。波伏瓦问他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医院，因为她不想一个人去。起初，萨特的情况看起来充满希望。他们又安排了一个读者和访客轮班来陪伴萨特，有几个星期，波伏瓦需要按计划参加下午的活动。4月13日，星期天，萨特握着她的手腕，说他非常爱她。4月15日，萨特进入昏迷状态。波伏瓦在他旁边待了一整天，听着他的呼吸，然后回到自己的公寓开始喝酒。晚上9点，电话响了。是阿莱特·埃尔凯姆打来的——萨特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1] ASD 131.

[2] 引自纪德笔下人物白鲁斯，OA 237.

[3] Woolf, 29 December 1940, 引自OA 514.

[4] OA 244.

[5] OA 410.

[6] OA 547.

[7] Revue des livres, Vie Sociale, March 1970, pp.157–160.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2832097/f34.item.r=beauvoir>

[8] Henry Walter Brann, review of ‘La Vieillesse by Simone de Beauvoir’, *The French Review* 44(2), December 1970: 396–7.

[9] Edward Grossman, ‘Beauvoir’s Last Revolt’, *Commentary* 54(2), 1 August 1972: 56–9, here 56.

[10] ASD 147.

[11] OA 148.

[12] Simone de Beauvoir, *A walk Through the Land of old Age*, in PolW 363.

[13] Schwarzer, Introduction, p.13.

[14] 见A 10–11.

[15] ‘Response to Some Women and a Man’, FW 209.

[16] ‘Response’, FW 210.

[17] ‘Response’, FW 210.

[18]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0.

[19]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6.

[20]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6.

[21] ‘Abortion and the Poor’, FW 217.

[22] ASD 134.

[23] Jean-Marie Domenach, ‘Simone de Beauvoir: Tout compte fait’, *Esprit* 1972 (December): 979–80.

[24] ASD 154.

[25] 见ASD 57 f, 163.

[26] Carlo Jansiti, *Violette Leduc*, Paris: Grasset, 1999, 447–8.

[27] ASD 193.

[28] ASD 484.

[29] ASD 489.

[30] ASD 500.

[31] 1949年11月对克洛丁·肖内的采访，由“世纪之光”（Les jours du siècle）广播节目转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999年2月17日。

[32] Francis Jeanson, *Simone de Beauvoir ou l'entreprise de vivre, suivie d'entretiens avec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Seuil, 1966, p.258.

[33] FC 202.

[34] Alice Schwarzer, 'I am a feminist',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conversations 1972–198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4, p. 16. 又见pp.29 f. 关于1949年和20世纪70年代波伏瓦女权主义的延续性的精彩讨论，见Sonia Kruks, 'Beauvoir and the Marxism Question', in Laura Hengehold and Nancy Bauer(eds), *A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7.

[35] Schwarzer, p.34.

[36] Schwarzer, pp.37–8.

[37] 'Preface to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60.

[38] Alice Schwarzer, 'The Rebellious Woman –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Schwarzer',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197.

[39] Sylvie Chaperon, 'Introduction' to 'The MLF and the Bobigny Affair', FW 189.

[40] Claire Etcherelli, '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Les Temps Modernes* 63(647–8), January–March 2008: 6. 朗兹曼把埃切列利的书《埃利丝的真实生活》（*Élise ou la vraie vie*）介绍给波伏瓦，它讲述了独立战争期间一个阿尔及利亚男人和一个工厂女工之间的禁忌之爱。这本书后来还赢得了一些奖项。20世纪70年代，埃切列利加入波伏瓦和朗兹曼，成为《摩登时代》的编辑。

[41] Etcherelli, '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p.61.

[42] Bair, p.676 n. 13.

[43] A 54.

[44] A 63.

[45] Cohen-Solal, Sartre, p.500.

[46] Preface to 'Everyday Sexism', *Les Temps Modernes* 329 (December 1973),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in FW 240.

[47] Simone de Beauvoir, 'Preface to divorce in France',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FW 248. First published in Claire Cayron, *Divorce en France*, Paris: Denoël-Gonthier, 1974.

[48] 'Introduction to women Insist',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FW 250.

[49] 见ASD 499.

[50] Gerassi, p.30. December 1970 interview.

[51] Gerassi, p.32. December 1970 interview.

[52] 这篇访谈发表在1975年6月23日、6月30日和7月7日的《新观察家》周刊上。引自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p.333.

[53] 'Simone de Beauvoir interroge Jean-Paul Sartre', in *Situations X*, 'Politique et autobiographie', Paris: Gallimard, 1976, pp.116–17.

[54] Schwarzer, p.73.

[55] 'My Point of View: An Outrageous Affair', trans. Debbie Mann and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58.

[56] 'When All the Women of the World ...',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56.

[57] A 100.

[58] A 110–11.

[59] 'D'abord, je ne donnais pas à lire mesmanuscrits – à personnesauf à Simone de Beauvoir – avantqu'ilssontimprimés: par consequent, elleavait un r.leessentiel et unique.' (Michel Sicard, 'Interférences: entretien avec Simone de Beauvoir et Jean-Paul Sartre', *Obliques* 18–19 (1979): 326.)

[60] Xavier Delacourt, 'Simone de Beauvoir adaptée: Une fidélité plate', *Le Monde*, 1978. http://www.lemonde.fr/archives/article/1978/01/30/simone-de-beauvoir-adaptee-une-fidelite-plate_3131878_1819218.html#YOXP2bX45I01dulu.99

[61] WT, pp.74–5.

[62] 见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于1978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蒙娜·德·波伏瓦》，纪录片文本于197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http://www.ina.fr/video/CAB7900140801>

[63] Video: ‘Film “Simone de Beauvoir”’ sur Samedi et demi,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video/CAB7900140801/film-simone-de-beauvoir-video.html>

[64] Julien Cheverny, ‘Une bourgeoise modèle: Simone de Beauvoir’, *Figaro Magazine*, 17 February 1979, p. 57.

[65] Schwarzer, p.103.

第十六章

风烛残年

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一起回到了医院。她给博斯特、朗兹曼、让·普永和安德烈·戈尔兹打了电话，他们立即赶到了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凌晨5点之前他们可以一直陪着萨特的遗体，之后“它”就得被送走了。

他们怎么能用“它”来指代萨特呢？

阿莱特回家了，而“大家族”里的人们则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直到凌晨。记者把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但博斯特和朗兹曼告诉他们不要一直留在这里。波伏瓦想单独和萨特待一会儿——其他人走后，波伏瓦爬上萨特的床。她正要钻进萨特的被单时护士拦住了她，因为他的褥疮已经坏疽了。于是波伏瓦爬上被单，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凌晨5点，医院里的人来取遗体。波伏瓦去朗兹曼家睡觉，星期三一整天一直待在那里。波伏瓦无法忍受公寓里的电话，更别提那些记者，所以在朗兹曼离开后，波伏瓦去了西尔维·勒·邦那里。埃莱娜从阿尔萨斯赶来，她收到了大量的卡片、信件和电报。朗兹曼、博斯特和西尔维负责安排葬礼。葬礼定于4月19日，星期六。

葬礼那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埃莱娜、阿莱特一起上了灵车。成千上万的人跟在她们身后，向萨特致敬。但是波伏瓦什么

也看不见，再多的安定和威士忌也抑制不住她的眼泪。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波伏瓦要了一把椅子。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波伏瓦夫人”站在棺材前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两个朋友扶着”。^[1]波伏瓦周围有一大群人，但她的脑子却一片空白。波伏瓦不记得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去了朗兹曼家，然后他们在一个包间里吃了晚饭，但她喝得太多了，不得不由人搀扶着下楼。西尔维试图阻止她喝酒，但根本无济于事。^[2]

此后波伏瓦住在西尔维家。接下来的星期三，火葬仪式在拉雪兹公墓举行，但波伏瓦太累了，无法前往。西尔维和朗兹曼回来时，发现波伏瓦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波伏瓦患上了肺炎，她在科钦医院住了一个月——一开始，医生们认为波伏瓦永远都不会康复，因为在大量服用安定和威士忌之后，她患上了肝硬化并有一些运动神经元损伤。当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时，肺炎痊愈了，但抑郁情绪却消散不了。整个6月和7月，西尔维每星期都尽可能和波伏瓦待在一起。当西尔维上课时，朗兹曼和博斯特来陪她。波伏瓦总是说，她的生命将在萨特的生命结束时也结束；他们担心波伏瓦会真的这么做。周末，西尔维开车带她离开巴黎。1980年8月，波伏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罗马旅行了。波伏瓦对西尔维说她们必须离开巴黎，因为“我想要活下去，我需要远远地离开此地才能做得到”。^[3]

波伏瓦和西尔维去了挪威，进行了一次峡湾巡游。慢慢地，波伏瓦想起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值得为之而活的、有意义的关系，渐渐地走出来。但波伏瓦也开始意识到，有些关系永远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在萨特火化三天后，阿莱特清空了他的公寓。实际上这不被法律允许，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进行税务评估之前任何人不得接触萨特的财产。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阿莱特有

自己的一套说辞：在遗嘱认证期结束之前，她无法支付租金，担心有人会闯入。但波伏瓦确信她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波伏瓦拿走理应属于她的东西。这是一场不愉快的争执，其他朋友也想要萨特的纪念品，而当朗兹曼要求阿莱特给博斯特一些东西时——尽管他们已经是40年的朋友了——她却只把萨特的旧拖鞋给了他。

西尔维从来都不喜欢阿莱特，因此非常生气。萨特把波伏瓦父亲的书放在自己的公寓里，这些书不是萨特留给阿莱特继承的。萨特还有一幅毕加索送给他和波伏瓦的画，以及一幅来里贝罗的画。西尔维和朗兹曼都向阿莱特索要波伏瓦的礼物，但阿莱特说如果她真的很想要的话，她应该自己开口。

西尔维要回了波伏瓦的父亲乔治·伯特兰·德·波伏瓦的书。但波伏瓦自己只要一件东西：萨特《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的手稿。萨特写完《存在与虚无》后，手稿一出版就交给了波伏瓦，这是她最珍贵的财产。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曾承诺要出版一部伦理学作品，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创作，大约在同一时间，波伏瓦写了《模糊性的道德》。阿莱特知道波伏瓦想要这份手稿，因为波伏瓦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声下气地”向阿莱特要这份手稿。但是阿莱特不肯给波伏瓦，而且在1983年，阿莱特还出版了这本手稿。

1980年5月波伏瓦出院时，医生让她停止服用安定、戒酒，并进行按摩和治疗以帮助她的身体恢复。除了没能放弃威士忌和伏特加，波伏瓦听从了医生的大部分建议。在这几个星期里，波伏瓦意识到她希望她的医生能够和西尔维讨论她的情况。可根据法国法律，波伏瓦最近的血亲埃莱娜是她的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没有埃莱娜的允许，西尔维甚至不能开车送波伏瓦去治疗。

波伏瓦不想搬到阿尔萨斯去跟埃莱娜和利昂内尔一起生活，

而让他们搬到巴黎来照顾她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波伏瓦决定问西尔维自己是否可以合法收养她，波伏瓦先告诉了朗兹曼和博斯特，两人都赞成。他们从阿莱特的事情中了解到，如果各方不赞成新的安排，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波伏瓦先向西尔维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再向埃莱娜提出。一开始，埃莱娜对此感到不适，但她意识到她不会比她姐姐活得更久，而且自己的人生已经够充实的了。

另一方面，西尔维有点不情愿，她一直讨厌阿莱特依附于萨特的做法。西尔维·勒·邦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职业生活——她是一名教哲学的老师，她不希望人们认为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就像阿莱特和萨特那样。西尔维也知道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波伏瓦作品中母亲和女儿的角色了，她如果被波伏瓦收养势必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猜测的“盛宴”。

但几十年来，波伏瓦已经习惯了人们随意地揣测她的生活。波伏瓦鼓励西尔维只管用心去看她们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受年龄和传统角色的限制。波伏瓦向西尔维透露，在她的一生中，她曾多次尝试寻找另一段像她和扎扎那样的友谊。但在西尔维之前，一直都没有成功。波伏瓦说，西尔维让她仿佛找到了扎扎的转世。西尔维接受了，后来她写道，她和波伏瓦的关系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4]波伏瓦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贝尔，她很幸运“能分别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拥有一段完美的关系”。^[5]

萨特去世那年，波伏瓦承受着悲伤带来的所有伤痛：眼泪、沮丧，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波伏瓦再次求助于文学来宣泄：她决定写一部关于萨特之死的作品。《告别的仪式》

(*Adieux : A Farewell to Sartre*) 出版于1981年，记录了萨特的衰老和死亡，聚焦于年龄和疾病如何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他生活

的变化情况。书中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罗马对萨特的采访，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思想友谊和不断的交谈。朋友们都对波伏瓦这本书有些担心，但这是她唯一能接受他死亡的方式。扎扎去世的时候，波伏瓦就是靠写作走出来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写作同样也是波伏瓦宣泄情绪的方式，所以她坚持写作。她的开场白是：

这是我的第一本——毫无疑问是唯一一本——在出版前你没读过的书。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你，你不受它的影响。我说的你，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修辞手段。因为我只能对着空气说话了。[6]

一些读者把《告别的仪式》称为波伏瓦的第五部回忆录。但这本书比其他的书更加隐晦，描述了萨特的衰老，很少关注波伏瓦自己的生活，它是回忆录和对话的混合体。波伏瓦认为《告别的仪式》是对萨特的一种致敬，也是《老年》的延续。1970年，《老年》描述了老年人被边缘化，被一些人视为次等人。在最后一段中，读者们看到，甚至让-保罗·萨特也不得不经历这种命运。[7]

波伏瓦已经预感到人们会严厉地批评这部作品。她是对的，她再次被指责轻率，或者是在萨特无法为自己说话的时候替他说话。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观点》杂志（*Le Point*）上形容这本书是“敬意与复仇”[8]的结合。（波伏瓦问过萨特，为什么他认为男人从童年起就有“某种自豪感”，他是否一直感到自由。[9]）波伏瓦的捍卫者主要是说英语的女性，其中，《存在与虚无》的译者黑兹尔·巴恩斯谴责了那些将《告别的仪式》说成波伏瓦“因为不得不忍受萨特的不忠而做出的报复”，这完全是诽谤。《告别

的仪式》中的叙述既是基于事实，也是一种敬意。^[10]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认为，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对这对神秘夫妇的惯常反应：“要么完全尊重，要么全盘否定。”^[11]

当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是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攻击波伏瓦的公开信，贬低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讽刺波伏瓦声称自己是萨特生活的中心，以及波伏瓦在本尼·莱维事件中的行为。这两个女人都认为对方贬低了萨特的地位，并声称自己是萨特一生中最杰出的见证人。波伏瓦拒绝以书面形式回复，因为她不想用回复来美化阿莱特的说法，也不想成为公众的笑料；她私下里十分轻蔑阿莱特。

1981年，波伏瓦开始与她的第一个传记作家戴尔德丽·贝尔交谈——波伏瓦喜欢美国女性，她和贝尔常常在下午4点一边喝着纯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进行访谈。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在思考自己将留给后人的形象，因为她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公众形象若落入他人之手，会让人变丑”^[12]。波伏瓦不想让阿莱特左右她和萨特的关系，因此她决定出版萨特写给她的信，并公开宣布这一意图，以便让世人能够亲眼看到让-保罗·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看法。但当时波伏瓦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在法国，文学执行人对萨特写的任何文字都有权利，不管他写给谁，也不管这些文字是谁持有的。于是波伏瓦咨询了她的出版商罗贝尔·伽利玛，伽利玛建议波伏瓦让他出面去说服阿莱特。

这比萨特的两个女人争论他更爱谁更危险。这不是一个浪漫的问题。对于波伏瓦来说：她一生都被那些否认她作为思想家的独立性的人所困扰，这些人甚至声称波伏瓦的书是萨特写的。波伏瓦认为这些信会显示出“我们对彼此的重要影响”^[13]。

萨特死后，巴黎的有些讣告没有提到一次波伏瓦。《世界

报》提到了萨特的葬礼上有数千人，但是没有提到波伏瓦。^[14]

《快报》上的一篇长文包含了一条时间线，其中提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相遇的日期，波伏瓦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二，但是对他们的其他关系却只字未提。^[15]

《伦敦时报》在宣布萨特死亡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波伏瓦^[16]，完整的讣告将她介绍为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成为他的情妇和一生的政治、哲学和文学盟友”^[17]。《卫报》的讣告中也没有提到波伏瓦，只是说“在朋友和门徒的帮助下，萨特独自在巴黎度过了晚年”^[18]。在全部讣告中，波伏瓦并不在他学习的“天才知识分子群体”中，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终身结合”而被提及。在这段关系中，她“帮助他事业的方方面面”^[19]。

《纽约时报》的报道更多地谈及了波伏瓦：“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名声比其多年密友和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更大。他们的关系经历了无数个阶段，但他们对彼此的依恋，对彼此的坚定，从未受到严重怀疑。”^[20]但《华盛顿邮报》把波伏瓦介绍为“情妇”^[21]——难道没人能把波伏瓦看作一个有智慧的对话者、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萨特思想发展的灵感来源吗？

这种“女人是男人的贤内助”的惯用说法对波伏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波伏瓦仍然定期与比安卡·朗布兰共进午餐。当以色列这个问题一出现，她们的讨论就变得很激烈。朗布兰批评波伏瓦“无条件地亲以色列”，甚至没有试着去看巴勒斯坦的观点。朗布兰被她们的谈话弄得心烦意乱，于是在谈话结束后写信给波伏瓦，进一步说明她的立场。就像波伏瓦对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的评论一样，波伏瓦对朗布兰的回复显示出波伏瓦自己的矛盾以及挫败——人们总是认为她的观点是萨特或者其他男人的附属：

我给你回信，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不是不在乎。既然情况是“模糊的”，就像你说的，我为什么要怨恨或蔑视不赞同我观点的人呢？至于朗兹曼……我很遗憾你赞同大男子主义的偏见，认为女人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思想。[22]

波伏瓦出版她与萨特的书信时，她失去了一些朋友——奥尔加和万达第一次看到了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博斯特夫妇近年来已经分开过几次，波伏瓦很少见到奥尔加。波伏瓦和博斯特走得比较近，他们仍然一起为《摩登时代》工作。据戴尔德丽·贝尔描述，波伏瓦曾警告奥尔加说她会出版这些信件，并无视奥尔加要求排除任何有关她们姐妹信息的要求，导致她们的关系出现永久性裂痕。[23]但是，在波伏瓦看来，即使这会打破人们的幻想，向世界展示其真相也是值得的。波伏瓦重新开始做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和宣传，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就连她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萨特的天才。整理他们大量的信件花了很长时间。在1982年11月，波伏瓦把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题词是“献给克洛德·朗兹曼，带着我全部的爱”[24]。

出版的道路并不容易：在出版之前，阿莱特想要确立自己作为萨特哲学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她不仅出版了《伦理学笔记》（她拒绝给波伏瓦的手稿），还出版了萨特的《战争日记》（*War Diaries*）。

当信终于被公开时，读者们可以看到萨特对波伏瓦说了什么。但他们又问：波伏瓦为什么不发表自己的那部分呢？在1974年的采访中，萨特说他希望自己的信件能在他死后出版，所以波伏瓦说她遵从了他的遗愿。至于她自己的信，波伏瓦告诉贝尔，那是她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25]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玛格丽特·西蒙斯问波伏瓦她是否读过米歇尔·勒·德夫对萨特

书信的评论，是否知道勒·德夫声称萨特是他们关系中“唯一说话的人”[26]吗？波伏瓦回答：“这些信是萨特写给我的信，自然是萨特在信中说话。如果我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就是那个说话的人，但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发表我的信件。”[27]

在萨特的书信出版后，波伏瓦把她的时间花在两件让她快乐的事情上：为女性的解放而工作，与西尔维和其他朋友在一起。阿莉塞·施瓦策尔在一次采访中说，女性之间“如此伟大的友谊”并不多见。但波伏瓦回答说她“不那么肯定”：“女人之间的友谊往往会长久，而爱情却会消逝。以及，男女之间真正的友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28]

1980年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在法国的终结，不仅在日历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十年，而且一个新的协会在这一年成立了，自称为“女性解放运动”——这个名字也在国家工业产权研究所正式注册了商标。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有三个简单的归属标准：女性，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致力于抗争。这个新的女性解放阵线声称要为女性说话，而不是让她们为自己说话。在波伏瓦看来，这不再是女权主义，而是“暴政”[29]。

但也有好消息：198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个内阁级别的女性事务部。它的第一位女性部长伊薇特·鲁迪请求波伏瓦支持密特朗的竞选活动。

1981年，波伏瓦接受了一次采访，宣传《新女权主义者问题》（*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的重新出版，她在采访中讨论了新的反性别歧视法对她的意义。伊薇特·鲁迪是当时的女权部长，她正致力于有关职业平等的立法，她想通过一项反对性别歧视的法案来补充这一点。这将把反种族主义立法扩大到反性

别歧视，并使打击侵犯女性尊严的公共广告成为可能。

波伏瓦希望侮辱女性是违法的，尽管她意识到法律“不会阻止女性自己领导反抗性别歧视的斗争”。在她的一生中，波伏瓦在信件和编辑工作中看到，女性遭受了大量的男性暴力。尽管事实就是如此，但她相信没有“天生既定”的东西会让男人变得暴力。相反，她声称“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在容忍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暴力根植于每个男人身上。

波伏瓦不喜欢“我们身体的部分被展示在城市街道上，为了这个逐利社会的荣耀”。女性权利联盟的宣言声称，女性的身体不应该被用作商品；身体上的愉悦和性的主动性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她们将为女性已经获得的权利而奋斗，并追求新的权利。宣称自己是自由先驱的广告商们轻蔑地谴责波伏瓦的提议：她既是清教徒又是伪君子。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果她的规则付诸实施，包括她自己的作品在内的文学本身就会被禁止吗？

波伏瓦的合理回应被忽视了：她不是在攻击文学。她认为攻击广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广告不提供（个人）自由”，它们“强加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的眼睛上，无论愿意与否”。^[30]一些人声称反性别歧视法是对男性的报复，但波伏瓦认为，它的动机是为了改变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文化环境，这样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不会被合理化了。波伏瓦想通过禁止在广告、色情和文学中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反性别歧视的法律将允许她们公开谴责每一起性别歧视案件。^[31]波伏瓦认为，这还将帮助女性应对性别歧视，帮助她们站起来反对不公和虐待，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命。

波伏瓦和女权主义者被指控为“不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但

她们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母亲——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在公众的强烈抗议背后，波伏瓦看到了两个动机：金钱和操纵。在资本主义晚期，有关金钱的争论再熟悉不过，无须重述。在波伏瓦看来，许多男人仍然“深信女人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人是操纵的主人”[32]。波伏瓦希望女性成为“看世界的眼睛”，希望她们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得到倾听和尊重。

当鲁迪创立“女性与文化委员会”时，波伏瓦被任命为名誉主席。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个组织私下里称自己为“波伏瓦委员会”。波伏瓦每月都参加会议，研究社会结构，以便向政府提出改善女性状况的具体建议。1982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波伏瓦荣誉军团勋章，但她拒绝了。波伏瓦是一个勤奋的知识分子，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

12年后，克洛德·朗兹曼的电影《浩劫》终于迎来了尾声。这是一部艰难的电影，他非常依赖波伏瓦的陪伴和支持：“我需要和她交谈，告诉她我的不确定、我的恐惧和我的失望。我从谈话中变得强大，因为波伏瓦独特而强烈的倾听方式，严肃，庄重，开放，完全信任。”[33]在萨特死后的最初几年里，朗兹曼看到了波伏瓦对生活的厌倦。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他多次邀请波伏瓦来剪辑工作室——波伏瓦仍然喜欢参与他的项目，观看电影的各个部分。

1982年，密特朗总统邀请朗兹曼私下放映影片的前三个小时。波伏瓦和他一起去了爱丽舍宫，看还没有字幕的电影，而朗兹曼在过道上大声翻译。第二天，她写信给朗兹曼：“我不知道你的电影上映时我是否还活着。”当时，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头版文章，后来又为《浩劫》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在总统首映后的第二天，她把自己的想法写给了朗兹曼，以防她活不到电影上映那天：

我从来没有读到或看到过任何东西能如此感人、如此扣人心弦地传达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恐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如此多的证据证明它的可怕机制。朗兹曼把自己置于受害者、刽子手、证人和同谋的角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无辜，也更有罪。朗兹曼让我们体验了一种经历的无数方面，我相信，直到现在，这种经历似乎都是无法言传的。这是一座纪念碑，它将使世代代的人类能够了解他们历史上最邪恶、最神秘的时刻之一。[34]

除了像这篇这样的笔记（写的时候半是为后代考虑的），我们几乎找不到波伏瓦临终时的私人资料。但在20世纪80年代，波伏瓦参加了几次采访。在其中一次采访中，阿莉塞·施瓦策尔问她，在与萨特保持关系的同时，她是如何成功地保持独立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她一直想要自己的事业：“我有梦想，不是幻想，是非常大胆的梦想，在我遇见萨特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为了幸福，我必须完成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满足就意味着工作。”[35]在这些采访中，波伏瓦透露，在萨特与多洛雷斯·瓦内蒂有婚外情时，她确实对自己与萨特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她后悔他们的关系给他们生活中的第三方造成了如此多的痛苦。在一次公开采访中，波伏瓦已经欣然承认萨特没有善待女性。萨特使她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子，一个象征——就像她年轻时一样。但萨特鼓励波伏瓦——从来没有别人这样鼓励过她——相信自己的潜力，即使是在她自己挣扎着去发现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他们两人的行动，他们都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波伏瓦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致力于写作：她为自己支持的书写序言和介绍，写终身教职推荐信，鼓励积极分子，回复信函。波伏瓦为女权主义出版商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女性庇护所捐款。波伏瓦说，有时她觉得自己的公众声誉已经变成了“神圣的圣物”，

她的话语是对年轻一代女性的命令，让这些女性有精力采取下一步的改革措施。[36]

在萨特去世两年后，波伏瓦对自己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很满意，她旅行的愿望重新点燃。波伏瓦还在康复的时候，西尔维就鼓动她去纽约旅行，这个建议奏效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波伏瓦就对美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崇拜又厌恶。1983年，她获得了桑宁欧洲文化奖（Sonning Prize for European Culture），奖金是2.3万美元，她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冒险。于是，那年7月，波伏瓦和西尔维登上协和飞机前往纽约。她不想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所以美国万神殿图书公司的编辑为她做了谨慎的安排。波伏瓦见到了斯捷帕·杰拉西和她的儿子约翰，还有一些最近的朋友，比如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但她希望这次旅行能是安静的、私人的。波伏瓦此行不做演讲也不接受访谈。

尽管他们做了很多保密工作，但当波伏瓦入住纽约阿尔冈昆酒店时，几乎立刻就被《纽约客》的记者认出来了。那位记者打电话到波伏瓦的房间，她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她不接受电话采访，记者只好作罢。波伏瓦和西尔维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她最喜欢的弗里克博物馆，没有受到骚扰，还登上了世贸中心的顶端。一天晚上她们在晚餐时经介绍认识了同桌的伍迪·艾伦和米亚·法罗。之后，她们在新英格兰旅行了六个星期，波伏瓦参观了凯特·米利特在波基普西的圣诞树农场，米利特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全女性艺术家的公社。在这个农场里，波伏瓦进行了这次旅行中唯一的工作：为一部关于《第二性》的电视连续剧拍摄与凯特·米利特的对话。波伏瓦和西尔维回到法国，正好赶上西尔维回去教书。波伏瓦带回了许多书。

1983年12月，波伏瓦摔了一跤，西尔维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她在那里待了太久，得了肺炎。波伏瓦在医院里度过了圣诞节和1月的大部分时间，但在复活节时，她已经康复，可以去比亚里茨了。到了夏天，波伏瓦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旅行了。于是，波伏瓦和西尔维飞往布达佩斯，开车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转了一圈。

1985年，尽管克洛德·朗兹曼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波伏瓦仍然是《摩登时代》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她的公寓里见面，波伏瓦像往常一样阅读投稿，挑选文章，编辑和校对——她继续参加会议，直到去世前几周。克莱尔·埃切列利记得波伏瓦的“存在、力量和权威，激励着他们让这本杂志保持活力”[37]。

波伏瓦还从事女权主义活动并接受采访，她希望能出一个新的《第二性》英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从哲学维度还原那些帕什利先生认为毫无意义，但我认为有道理的部分”[38]。在与玛格丽特·西蒙斯的谈话中，波伏瓦澄清了自己在《盛年》里声称“自己不是哲学家”这一令人困惑的说法：

我不是哲学家，指的是我不是系统的创造者。我又是一个哲学家，我研究了很多哲学，我有一个哲学学位，我教授哲学，思考哲学，把哲学写进书里，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我不允许他们消除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39]

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像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这样的思想家也表示抵触像笛卡尔和黑格尔这样“系统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忘记了人类的一部分意义，即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生活——追寻一种无法提前知道答案的意义。波伏瓦也信奉

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生活无法提前预知，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感到焦虑。[\[40\]](#)但是对于波伏瓦同时代的法国人来说，甚至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也被认为是“次等哲学家”，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女性，而是因为他们笃信宗教。波伏瓦早期的哲学洞见以及她对避免陷入自我主义和献身主义两个极端的关注，都是在与许多思想家的对话中写成的，这些思想家在今天可能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称为“哲学家”[\[41\]](#)。

1985年，波伏瓦的健康状况恶化。她将其归因于1986年3月即将到来的选举，但每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波伏瓦喝了太多威士忌。肝硬化使波伏瓦的腹部膨胀无法站直。波伏瓦走路会很疼痛，朋友们在旁边痛苦地站着，而她却假装没有注意到。西尔维试图稀释波伏瓦的威士忌，但现在的波伏瓦是一个拒绝节制的病人，她只是不断地倒威士忌。博斯特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好的影响，所以西尔维求助于朗兹曼，朗兹曼认为给《浩劫》写序可能会分散波伏瓦的注意力。波伏瓦欣然同意了，还为另一本书也写了序言，但她没有停止饮酒。

1986年初，波伏瓦仍在与朋友、学者和作家会面。年事已高的她此时唯一的让步是穿着红色浴衣去见他们。

1986年2月，波伏瓦见到了埃莱娜；波伏瓦走路不方便，但她们一起逛了画廊。她一如既往地鼓励妹妹的艺术创作——那一年，埃莱娜正在期待在斯坦福大学举办她的艺术展览，该展览由法国女性权利部资助。但是，3月16日的立法选举却另有规定：女性事务部长的资金已不再可用。波伏瓦不赞成妹妹缺席她自己的展览，坚持要为她付钱。[\[42\]](#)

3月20日晚，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生了胃痉挛。她以为是因为她晚餐吃了火腿，但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尔维坚持要送她去

医院。几天后，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一次探索性手术。除了糖尿病和动脉损伤，波伏瓦经历了萨特之前遭受的所有问题：肝硬化损伤、体液滞留和肺水肿。手术后，波伏瓦患上了肺炎，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她在那里待了两周，期间她试图说服女按摩师不要投票给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让-玛丽·勒邦。

当埃莱娜和朗兹曼收到这个消息时，两人都在加州——埃莱娜在她的展览上，朗兹曼在领奖。波伏瓦去世了，享年78岁。

[43]当时是4月14日下午4点，距离萨特逝世的周年纪念日还有8个小时。第二天，《世界报》宣布了她去世的消息，标题是：“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44]

[1] Charles Hargrove, ‘Thousands escort Sartre’s coffin’, *The Times* [London,England] 21 April 1980: 4.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2] Bair, p.587.

[3] Bair, p.588.

[4]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与玛格达·瓜达卢佩的访谈, ‘Interview avec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apere Aude*, Belo Horizonte, v. 3, n. 6, pp.357–65, 2 semestre 2012, p.364.

[5] Bair, p.512.

[6] A 3.

[7] Bair, p.595.

[8] ‘La fin d’un philosophe’, *Le Point*, 23–29 November 1981.

[9] A 254, 353.

[10] Hazel E. Barnes, ‘Beauvoir and Sartre: The Forms of Farewell’,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9(1): 28–9.

[11] Cohen-Solal, *Sartre*, p.518.

[12] FC 328.

[13] Beauvoir , 引自与阿莉塞·施瓦策尔的访谈 , p.107.

[14] http://www.lemonde.fr/archives/article/1980/05/12/la-mort-de-jean-paul-sartre_2822210_1819218.html?xtmc=jean_paul_sartre_deces&xtcr=11

[15] https://www.lexpress.fr/culture/livre/sartre-face-a-son-epoque_486893.html

[16] ‘Jean-Paul Sartre dies in Paris hospital,’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6 April 1980: 1.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17] ‘Obituary,’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6 April 1980: 16.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18] Schwarz, W. (1980, 16 April). ‘Sartre, sage of left, dies,’ *The Guardian* (1959–2003).

[19] J-P Sartre: As influential as Rousseau (1980, 16 April), *The Guardian* (1959–2003).

[20]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621.html>

[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local/1980/04/16/jean-paul-sartre-existential-author-dramatist-dies/120a0b98-9774-4248-a123-1efab2d68520/?utm_term=.2cad98e8c74e

[22] Simone de Beauvoir to Bianca Lamblin, autumn 1982 , 引自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23] Bair, p.598.

[24] 见Lanzmann, *Patagonian*, p.352.

[25] Bair, p.601.

[26] Michèle le Doeuff, ‘Sartre; l’unique sujet parlant’, *Esprit – changer la culture et la politique*, 5: 181–91.

[27] SdB in Beauvoir, Simons and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4.

[28] SdB in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210.

[29] ‘Foreword to Deception Chronicles’, FW 272.

[30] ‘Women, Ads, and Hate’, FW.

[31] ‘The Urgency of an Anti-Sexist Law’,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66. First published in *Le Monde* as ‘De l’urgenced’uneloi anti-sexiste’, March 18–19, 1979.

[32] ‘Women, Ads, and Hate’, FW 275.

[33] Lanzmann, *Patagonian*, p.257.

[34] 引自Lanzmann, *Patagonian*, pp.258–9.

[35] Schwarzer, p.110.

[36] Bair, p.604.

[37] Etcherelli, ‘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p.61.

[38] Beauvoir, in SdB, Simons and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0.

[39] Beauvoir, *ibid.*

[40] 《模糊性的道德》的开头和《归根到底》的结尾，以及波伏瓦的学生日记都参考了帕斯卡的思想。帕斯卡也认为人的一生是模糊的。

[41] 萨特也淡化了这些思想家对他作品的影响，转而强调当时更时髦的现象学（以及之后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见Kate Kirkpatrick, *Sartre on S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Mystical Sources of Existentialist Thought*,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42] HdB, *Souvenirs*, p.8.

[43] HdB, *Souvenirs*, p.12; Lanzmann, *Patagonian*, p.525.

[44] Claude Jannoud, ‘L’uvre: Une vulgarisation plus qu’unecréation’, *Le Monde*, 15 April 1986.

后记：西蒙娜·德·波伏瓦将会成为什么？

对于生者，我们应给予尊重。对于逝者，我们应还他们真相。[1]

——伏尔泰

《世界报》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性别歧视、蔑视、虚假的措辞和口吻宣布波伏瓦去世的媒体，他们再次给波伏瓦这个人定了调子。全球报纸和文学评论的讣告都指出，即使是在临终前，波伏瓦也在追随萨特，尽职尽责地占据她应有的位置：第二位。尽管萨特的一些讣告完全没有提到波伏瓦，但波伏瓦的讣告却一直都在提萨特——有时甚至篇幅很长，把写波伏瓦作品的篇幅压缩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萨特是“她的导师”——作为一名哲学学生，波伏瓦“名义上是布伦施维克的学生，但实际上是由她的两个同学指导的：勒内·马厄和萨特”。[2]但是事实上，波伏瓦就是布伦施维克的学生，在哲学上获得的成功与另外两人并无因果关系。倒是波伏瓦在马厄和萨特口试前辅导他们学习莱布尼茨，并对萨特的几乎所有作品给予了批判性的意见。

在《纽约时报》上，我们读到：“萨特鼓励了波伏瓦的文学抱负，并鼓励她深入调查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这启发波伏瓦创作了充满愤怒和指责的*Le Seconde Sexe*。”萨特确实鼓励了波伏瓦的文学抱负，毫无疑问，波伏瓦也珍视这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之

友”。但事实上，她的书叫作 *Le Deuxième Sexe*（即《第二性》），而且在写这本书之前，波伏瓦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哲学和对女性压迫的分析。《华盛顿邮报》倒是正确地肯定了波伏瓦的哲学家身份，但也称她是萨特的“护士”“传记作家”，以及“充满嫉妒”的情妇。[3]

我们可能希望在专业文学评论中得到更公正的评价，但这样的希望也落空了。1986年《文学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arbook*）年鉴中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收录了整整7页的条目，都是为了纪念萨特和波伏瓦的一生。萨特这段叙述的主体，是萨特使她感觉自己是“智力上的主宰”，并提出了《第二性》的概念。[4]

在《两个世界的回顾》（*Revue de Deuxmondes*）中，我们读到，即使在死亡中，“等级制度也受到尊重：她是第二，仅次于萨特”；“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波伏瓦仍然是她所爱的男人的追随者”。她是一个追随者，一个空的、没有想象力的容器：“波伏瓦和她的墨水池一样没有想象力。”这并不是她唯一的缺点。通过她在“大家族”中扮演的角色，波伏瓦限制并削弱了一个伟大的男人：“如果没有这堵围绕着他们这对情侣一点一滴建造起来的不可渗透的墙，如果没有这种精心维护的复仇，萨特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5]

1991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以英文出版，其中包括波伏瓦叙述她与比安卡和索罗金的性接触的内容，她被称为“一个报复心重、操纵欲强的女人”，同时“令人反感、乏味、以自我为中心”[6]。克洛德·朗兹曼当时反对这些信件的出版，他写道，波伏瓦和萨特年轻写信时都是“傲慢又好强的”：

虽然波伏瓦有时会对她亲近的人不甚友好，但伤害他们的想法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从未见过她错过与她母亲、妹妹的约会，也从未见过她错过与闯入者的约会（如果她同意与他们见面的话），也从未见过她因为囿于某些过去的想法而错过与很久以前认识的学生的约会。[\[7\]](#)

事实证明，朗兹曼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波伏瓦的话很伤人。在戴尔德丽·贝尔的传记公开了比安卡的身份后，比安卡·朗布兰写了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一件不光彩的情事》（*A Disgraceful Affair*），指责波伏瓦一生都在撒谎。用朗布兰的话来说，波伏瓦是“她自己过去虚伪的囚徒”[\[8\]](#)。

但是，用最糟糕的时刻，以及让波伏瓦深感遗憾的如木乃伊般逝去的自我来代表波伏瓦的一生，这样做肯定是有失偏颇的。波伏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人质，但她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波伏瓦的生活证明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双重标准的存在，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当她们批判男性的行为并实话实说时，她们就会受到惩罚。

就个人而言，在哲学和政治上，萨特都没有逃脱波伏瓦的批判。波伏瓦认为萨特的哲学有盲点，并出版了一些她的批判给世界看[\[9\]](#)。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选择了爱萨特。

波伏瓦跟萨特一样，也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下葬时波伏瓦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浴袍，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波伏瓦受到世界各地团体的致敬，从蒙帕纳斯的社会党到美国、澳大利亚、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学生。在她的葬礼上，人群高呼着伊

丽莎白·巴丹泰的话：“女人，你们欠她一切！”

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波伏瓦是第一个承认有些女性觉得她的想法“令人沮丧”^[10]的人。在波伏瓦去世后的几天里，波伏瓦的最后一篇序言——这篇序是为小说《米路》（*Mihloud*）而写——出版了。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引发了关于性和权力的问题。波伏瓦用自己的名声去推荐这本书，它讲述了一个很难被公开的故事：关于大屠杀、阿尔及利亚被虐待和强奸的女性、女权主义的斗争，或者一个天才女同性恋的异化。这些都是人性里许多人难以直视的方面。

去世时，波伏瓦已经成名40年了，一生经历了各种爱与恨，诋毁与崇拜。^[11]成名以后，人们会拿波伏瓦早年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来抨击她的道德操守，以及她的作品在哲学、个人和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第二性》。波伏瓦声称，如果男性想要变得有道德，他们需要承认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世界上其他人的恶劣状况，并且他们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波伏瓦还向女性发出了挑战——停止服从“做女人就得为了男人而存在”的谬论。作为一个人，当你被如此无情地从外部定义时，你是很难茁壮成长的。

从内心来说，波伏瓦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偶像”。波伏瓦在接受阿莉塞的采访时说：“我是为别人做西蒙娜·德·波伏瓦，不是为了我自己。”^[12]波伏瓦知道女性都渴望去效仿积极的榜样，人们经常问波伏瓦，为什么她要自己的小说中书写那些没有实现她的女权主义理想的女性，而不是创造更多积极的人物角色。读者们指出在她的女性角色中看到了波伏瓦的影子^[13]，他们想知道：这些女性角色之所以辜负了她的女权主义理想，是因为波伏瓦自己也没有实现吗？

波伏瓦回应说，她觉得正面的英雄“令人心生恐惧”，有正面

角色的书没有意思。她说，一部小说“就应该是有问题的”。用波伏瓦自己的话来说，她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人们也没有权利等待我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的我的名气——简而言之，人们的关注——偶尔会让我烦恼。有一种要求让我觉得有点愚蠢，因为它禁锢着我，把我完全固定在女权主义的混凝土块里。[14]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读者们因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绝她的思想，因为她爱了太多的男人，爱了错误的男人，或者以错误的方式爱了正确的男人（读者还不知道波伏瓦也爱了女人）。他们指责波伏瓦付出的太少或太多，过于女权主义或不够女权主义。波伏瓦承认，她对待别人的方式并不总是无可非议的。波伏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和萨特的关系给其他人造成了痛苦。

施瓦策尔提到波伏瓦曾声称自己与萨特的关系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事，她问波伏瓦他们是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关系。波伏瓦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因为萨特“完全不是一个压迫者”。[15]奇怪的是，波伏瓦也说过，如果（她）爱的不是萨特，她自己就不会受到压迫。有些人将这一评论归因于她逃脱了萨特的控制并有了职业自主性；女权主义者怀疑波伏瓦是否处在“自欺”中，是否将萨特置于“她生命中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在这里连她自己的批判眼光也不适用”[16]。

现在，毫无疑问，波伏瓦是批判过萨特的——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她批判得还不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美国哲学家告诉波伏瓦学者玛格丽特·西蒙斯，她对波伏瓦感到愤怒，因为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们，我们，我们”。她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完全消失了。但波伏瓦并没有消失。她确实在用她的声音说话。她说“我们”，也说“我”，因为她相信“一个人可以既接近一个男人，同时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7]。事实上，一个人可以接近很多人——男人们和女人们，同时还能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波伏瓦认为她最重要的是她的思想，萨特是她思想上无与伦比的朋友。波伏瓦的评论家称她是一种衍生品，缺乏想象力；甚至连波伏瓦自己的情人们都曾告诉她，她的书要么枯燥乏味，要么过于哲学^[18]。但萨特在波伏瓦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她“主要的鼓励来源”^[19]，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思想交流的对话者。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波伏瓦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光靠叙述无法完全还原真实活过的人生。但从外部来看，我们不能忘记波伏瓦努力成为自己的样子。在某些情况下，波伏瓦会选择写一些“我”这个词被忽略的例子。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波伏瓦声称自己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有了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萨特后来因写作《存在与虚无》而出名，波伏瓦曾说：“20岁时，我在我的私人日记中写到过存在与虚无的基本对抗，在我所有的书中探索过，但从未解决。”^[20]波伏瓦还说，在《女宾》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总是‘有话要说’。”^[21]

《归根到底》中有一段波伏瓦明确表示，她更喜欢与“对她很重要的人——通常是与萨特，有时是与西尔维”——共享生活。波伏瓦直率地说，她不会区分“我”和“我们”，因为“事实上，除了几段短暂的时间外，总是有人陪着我”。^[22]在晚年，波伏瓦把孤独描述为一种“死亡的形式”，而她自己则感觉到了“人类接触的温暖”^[23]，因而又回到了生活中。

波伏瓦热爱哲学，但她想用它来表达“可感知的现实”，撕裂“传统的自我所巧妙编织的网”。[24]在许多情况下，波伏瓦选择文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因为她笔下的人物在相互接触时可以变得栩栩如生。尼采认为爱是没法教授的[25]，但是波伏瓦认为她可以把爱表现出来。在她的小说中，波伏瓦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女性和男性遭受了缺乏对等互惠的爱的痛苦。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明确地提出了哲学主张：有伦理的爱情必须是对等而互惠的，爱人与被爱的人都必须有意识，是自由的，努力拥抱彼此生活中的价值所在。而且，当他们的爱涉及性时，他们都必须是性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卢梭出于政治目的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中审视“文明”的历史，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勾勒出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尼采转向过去，在《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阐明现在的道德，认为“价值重估”在“上帝之死”之后是必要的。波伏瓦认为，对女人进行哲学上的重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所谓的“文明”之爱的重估，女性真正的自由就不会实现。

当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时，这就是哲学。当他讨论爱时，这是哲学——即使它来自于一个鸡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规范的语境，甚至会讨论一些荒诞的事情比如认为所有的人类曾经都是四足动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分开并一直寻找丢失的另一半[26]。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生成了一代又一代不再满足于“通过男人的梦想来实现梦想”[27]的女性成功的象征。波伏瓦是20世纪女权主义的代表声音[28]，她的思想很明显地改变了立法进程和许多人的生活。然而，在2008年她的百岁诞辰之际，《新观察

家》决定出版一张波伏瓦的裸照来纪念她——即使波伏瓦曾经发起运动将翻印女性的裸照定为非法行为。

从内心来看，波伏瓦将自己视为一种永不停止的蜕变。波伏瓦认为她生活中的单一瞬间无法显示出完整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生命中没有那种与一切都和解的瞬间”。^[29]所有的行动都有失败的可能，而有些失败只是在事后才显现出来。时间在流逝，梦想在变化，而自我总是遥不可及。“波伏瓦成为波伏瓦”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极其多样化的。但如果说我们能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活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没有人孤独地成为她自己。

[1] Voltaire, 'Première Lettre sur Oedipe' in *Oeuvres* (1785) vol. 1.

[2] 'Simone De Beauvoir',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5 April 1986: 18.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4 March 2018.

[3] Appreciation, Michael Dobbs, 15 April 1986,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lifestyle/1986/04/15/appreciation/39084b0c-a652-4661-b226-3ad12385b4d3/?utm_term=.55d325922220

[4] Liliane Lazar, 'Simone de Beauvoir (9 January 1908–14 April 1986)',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arbook: 1986*, edited by J. M. Brook, Gale, 1987, pp. 199–206, here pp. 200, 201.

[5] P. de Boisdefre, 'LA REVUE LITTERAIRE: Deux mortsexemplaires, un même refus: Jean Genet et Simone de Beauvoir',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86): 414–28, here pp. 416, 419, 420.

[6] Richard Heller, 'The Self-centered Love of Madame Yak-Yak', *Mail on Sunday*, 1 December 1991, p. 35.

[7] Lanzmann, *Patagonian* p. 351. 1990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被西尔维出版。朗兹曼写道：“我知道海狸绝对不会发表这些信件，就算发表也不会允许以这样的方式。因为她之前告诉过我这件事，在1983年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信的那本书的前言中也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而且我和她一起生活过，我了解这一点。”而西

尔维将之出版的理由见 Ursula Tidd, 'Some Thoughts on an Interview with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Current issues in Beauvoir studies', *Simone de Beauvoir Studies* 12 (1995): 17–26.

[8] Lamblin, p.137.

[9] 'Simone de Beauvoir interroges Jean-Paul Sartre', in *Situations X*, 'Politique et autobiographie', Paris: Gallimard, 1976, pp.116–17.

[10] ASD 143.

[11] 见 Cohen-Solal, *Sartre*, p.261. 又见 Marine Rouch 2018 关于波伏瓦的读者把她当作偶像的方式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une appropriation collective des Mémoi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ses lectrices (1958–1964), *Littérature* 191 (September 2018)].

[12] SdB in Alice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93.

[13] ASD 144.

[14] *Simone de Beauvoir*, film by Josée Dayan and Malka Ribowska, text published by Gallimard: Paris, 1979; film made in 1978.

[15]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37.

[16] Moi, 2008, p.39.

[17] Beauvoir in SdB, Simons and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4.

[18] 索罗金认为《他人的血》(*The Blood of Others*)很无聊(见 SdB to Sartre, 27 January 1944, LS 384)。阿尔格伦说它“哲学意味太重”(SdB to NA, Friday, 20 August 1948, TALA 210, 212)。

[19] SdB to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110.

[20] FC 283. 强调为笔者所加。

[21] PL 606. 最近几十年来, 学者们重新思考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相互影响, 其中对波伏瓦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前几代研究者。根据西尔维的说法, 波伏瓦把她和萨特的关系描述为“一对双星”, 声称这是绝对的友谊和相互支持。2008年, 西尔维以法语出版了波伏瓦的回忆录, 因为她相信这些书能让我们无论是在智识还是个人生活上, 更公正地看待波伏瓦, 以及波伏瓦的所思、所想、所计划, 还有她在遇到萨特之前的自己和在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波伏瓦之前的自己。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in Magda Guadalupe dos Santos 'Interview avec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apere Aude*, Belo Horizonte, 3(6), 357–65, 2 semestre 2012, p. 359.

[22] ASD 235.

[23] ASD 619.

[24] 见DPS 58–61, 66 especially 16 August 1926.

[25] Nietzsche, '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3.

[26] 见Plato's *Symposium*.

[27] SS 166.

[28] Elizabeth Fallaize, The novels of Simone de Beauvoir, 'Introduction', p.1.

[29] PC 120.

参考文献

Algren, Nelson, 'Last Rounds in Small Cafés: Remembrances of Jean-Paul Sartre and Simone de Beauvoir', *Chicago*, December 1980.

Algren, Nelson, 'People', *Time*, 2 July 1956.

Altman, Meryl, 'Beauvoir, Hegel, War', *Hypatia* 22(3) (2007): 66–91.

Anon. 'Views and Reviews', *New Age* 1914 (15/17).

Arp, Kristana, *The Bonds of Freedom: Simone de Beauvoir's Existential Ethics*, Chicago: Open Court, 2001.

Audry, Colette, 'Portrait de l'écrivain jeune femme', *Biblio* 30:9 (November 1962).

Audry, Colette, 'Notes pour un portrait de Simone de Beauvoir',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7–24 December 1954.

Aury, Dominique, 'Qu'est-ce que l'existentialisme? Escarmouches et patrouille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 December 1945.

Bair, Deirdre, *Simone de Beauvoir: A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0.

Barrett, William,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Barron, Marie-Louise, 'De Simone de Beauvoir à Amour Digest. Les croisés de l'émancipation par le sexe', *Les lettresfrançaises*, 23 June 1949.

Baruzi, Jean, Leibniz: *Avec de nombreux textes inédits*, Paris: Bloud et cie, 1909.

Battersby, Christine, 'Beauvoir's Early Passion for Schopenhauer: On Becoming a Self ', forthcoming.

Bauer, Nancy,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y, and Fem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Bauer, Nancy, 'Introduction' to 'Femininity: The Trap', in Simone de Beauvoir, *Feminist Writings*, ed. Margaret A. Simons and Marybeth Timmerma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Beauvoir, Hélène de, *Souvenirs*, Paris: Séguier, 1987.

Beauvoir, Simone de – see *Abbreviations* on pp. xii–xiv for all primary sources cited.

Beauvoir, Simone de, in discussion with Claudine Chonez, '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actualité du livre), 30 November 1949,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audio/PH806055647/simone-de-beauvoir-le-deuxieme-sexe-audio.html>

Beauvoir, Simone de, in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Gobeil, 'The Art of Fiction No. 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Beauvoir, Simone de, i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A. Simons and Jane Marie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Hypatia* 3:3 (1989).

Bergson, Henri,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trans. F. L. Pogson, New York: Dover, 2001.

Bergson, Henri, *The Creativ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Mabelle L. Anderson,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92.

Blanchet, A., 'Les Prix littéraires', *Études* 284 (1955): 96–100.

Boisdefre, P. de 'LA REVUE LITTERAIRE: Deux mortsexemplaires, un même refus: Jean Genet et Simone de Beauvoir',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86): 414–28.

Boulé, Jean-Pierre, Sartre, *Self-formation, and Masculinities*, Oxford: Berghahn, 2005.

Carter, Angela, 'Colett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9, 2 October 1980.

Challaye, Félicien, letter to Amélie Gayraud, in *Les Jeunes filles d'aujourd'hui*, Paris: G.Oudin, 1914.

Chaperon, Sylvie, 'The reception of The Second Sex in Europe', *Encyclopédie pour une histoire nouvelle de l'Europe*, 2016.

Charensol, G. 'Quels enseignements peut-on tirer des chiffres de tirage de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actuelle?', *Informations sociales* (1957): 36–45.

Churchwell, Sarah, *The Many Lives of Marilyn Monroe*, New York: Picador, 2005.

Cleary, Skye, *Existentialism and Romantic Lov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Cohen-Solal, Annie, *Sartre: A Life*, London: Heinemann, 1987.

Collingnon, A. 'Bouchesinutiles aux Carrefours', Opéra, 31 October 1944.

Conant, James, 'Philosophy and Biography', lecture given at 'Philosophy and Biography'symposium, 18 May 1999, published online by the Wittgenstein Initiative: <http://wittgenstein-initiative.com/philosophy-and-biography/Cottrell>, Robert D., *Simone de Beauvoi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5.

Crosland, Margaret, *Simone de Beauvoir: The Woman and Her Work*, London: Heinemann, 1992.

Dayan, Josée and Malka Ribowska, *Simone de Beauvoir*, Gallimard: Paris, 1979.

Deguy, Jacques and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Ecrire la liberté*, Paris: Gallimard, 2008.

Delacourt, Xavier, 'Simone de Beauvoir adaptée: Une fidélité plate', *Le Monde*, 1978.

Descartes, René, *Oeuvres de Descartes*, ed. 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 volume I, Paris: Cerf, 1897.

Dijkstra, Sandra, 'Simone de Beauvoir and Betty Friedan: The Politics of Omission', *Feminist Studies* 6:2 (Summer 1980).

d'Eaubonne, Françoise, *Une femme nommée Castor*, Paris: Harmattan, 2008.

Eliot, George, *Middlem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merson, Ralph Waldo, 'Considerations by the Way', from *Complete Works*, vol. 6, 'The Conduct of Life', 1904.

Fallaize, Elizabeth, *The Novels of 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 Routledge, 1990.

Fallaize, Elizabeth, (ed.) *Simone de Beauvoir: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Fouillée, Alfred, *La Liberté et le déterminisme*, 3rd edn, Paris: Alcan, 1890.

Francis, Claude and Fernande Gontier,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Gallimard, 1979.

Fullbrook, Edward and Kate Fullbrook, *Sex and Philosophy: Rethinking de Beauvoir and Sartre*, London: Continuum, 2008.

Galster, Ingrid,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Paris Sorbonne, 2004.

Galster, Ingrid, *Beauvoir dans tous ses états*, Paris: Tallandier, 2007.

Galster, Ingrid, 'Simone de Beauvoir et Radio-Vichy: A propos de quelques scénarios retrouvé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8. Bd. H. 1/2 (1996).

Galster, Ingrid, ‘ “*The limits of the abj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Second Sex* in 1949’, in Laura Hengehold and Nancy Bauer (eds), *A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7.

Garcia, Manon, *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Paris: Flammarion, 2018.

Gayraud, Amélie, *Les Jeunes filles d’aujourd’hui*, Paris: G. Oudin, 1914.

Germain, Rosie, ‘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4)(2013): 1041–62.

Gerassi, John, Jean-Paul Sartre: *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 vol. 1,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Gerassi, John, *Talking with Sartre: Conversations and Deb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Gheerbrant, Jacqueline and Ingrid Galster, ‘Nous sentions un petit parfum de soufre ...’ *Lendemain* 94 (1999).

Giardina, Carol, *Freedom for Women: Forging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1953–1979*,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Gide, André, *The Journals of André Gide*,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 Knopf, 1948, vol. II: 1914–27.

Gines, Kathryn T., ‘Comparative and Competing Frameworks of Oppression in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35 (1–2) (2014).

Grell, Isabelle,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de Sartre: genèse et écriture* (1938–1952), Bern: Peter Lang, 2005.

Guidette-Georis, Allison, 'Georges Sand et le troisièmesexe',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Studies* 25:1/2 (1996): 41–9.

Gutting, Gary, *Thinking the Impossible: French Philosophy Since 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ilbrun, Carolyn, *Writing a Woman's Lif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8.

Heller, Richard, 'The Self-centred Love of Madame Yak-yak', *The Mail on Sunday*, 1 December 1991.

Hengehold, Laura and Nancy Bauer (eds), *A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7.

Hirschman, Sarah, 'Simone de Beauvoir: professeur de lycée', *Yale French Studies* 22 (1958–9). Hoog, Armand, 'Madame de Beauvoir et son sexe', *La Nef*, August 1949.

hooks, bell, 'True Philosophers: Beauvoir and bell', in Shannon M. Mussett and William S. Wilkerson (eds), *Beauvoir and Western Thought from Plato to Butler*,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2.

Horvath, Brooke, *Understanding Nelson Algre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5.

Jannoud, Claude, 'L'OEuvre: Une vulgarisation plus qu'une création', *Le Monde*, 15 April 1986.

Jansiti, Carlo, *Violette Leduc*. Paris: Grasset, 1999.

Jeannelle, Jean-Louis and ElianeLecarme-Tabone, 'Introduction', in Simone de Beauvoir, *Mémoires*, tome I, ed. 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Lecarme-Tabon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2018.

Jeanson, Francis, *Simone de Beauvoir ou l'entreprise de vivre*, Paris: Seuil, 1966.

Joyaux, G. J. 'Les problèmes de la gauche intellectuelle et Les Mandarins de Simone de Beauvoir', *Kentucky Foreign Language Quarterly* 3 (1956).

Kaplan, Gisela,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Feminism*, London: UCL Press, 1992.

Kluckholm, Clyde, 'The Female of our Spec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2 February 1953.

Kristeva, Julia and Philippe Sollers, *Marriage as a Fine Art*, trans. Lorna Scott Fo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Kristeva, Julia, Pascale Fautrier, Pierre-Louis Fort and Anne Strasser (eds), *(Re) Découvrir l'oeuvre de Simone de Beauvoir: Du Deuxième Sexe à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aris: Le Bord de L'eau, 2008.

Kruks, Sonia, *Situation and Human Existence: Freedom, Subjectivity, and Society*, London:Unwin Hyman, 1990.

Kunda, Z. and R. Sanitioso, 'Motivated Changes in the Self-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1989): 272–85.

Lacoin, Elisabeth, *Zaza: Correspondence et carnets d'Elisabeth Lacoin (1914–29)*, Paris:Seuil, 1991.

Lacroix, Jean, Maurice Blondel: *Sa vie, son oeuvre, avec un exposé de sa philosophi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Lacroix, Jean, 'Charitéchrétienne et justice politique', *Esprit* 1945 (February).

Lagneau, Jules, *De l'existence de Dieu*, Paris: Alcan, 1925.

Lamblin, Bianca, *A Disgraceful Affair*, trans. Julie Plovnick,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 1993].

Lanzmann, Claude, *The Patagonian Hare: A Memoir*, trans. Frank Wynne,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2.

Lanzmann, Claude, 'Le Sherpa du 11bis', in Julia Kristeva, Pascale Fautrier, Pierre Louis Fort, Anne Strasser (eds), *(Re)Découvrir l'oeuvre de Simone de Beauvoir: Du Deuxième Sexe à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aris: Le Bord de L'eau, 2008.

Laubier, Claire (e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France, 1945–Present: A Documentary An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0.

Le Bon de Beauvoir, Sylvie, 'Chronologie', in Simone de Beauvoir, *Mémoires*, tome I, ed. 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 Lecarme-Tabon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Gallimard, 2018.

Le Bon de Beauvoir, Sylvie, 'Avant-propos', Simone de Beauvoir et Jacques-Laurent Bost, *Correspondence croisée*, Paris: Gallimard, 2004.

Le Bon de Beauvoir, Sylvie, interview with Magda Guadalupe dos Santos, 'Interview avec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apere Aude*, Belo Horizonte, 3(6), 357–65, 2 semestre 2012.

Lecarme-Tabone, Eliane, 'Simone de Beauvoir's "Marguerite"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Jean-Paul Sartre's "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 ', trans. Kevin W. Gray, in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eauvoir & Sartre: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Le Doeuf, Michèle, *Hipparchia's Choice: An Essay Concerning Women and Philosophy*, trans. Trista Selo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Lee, Hermione, *Virginia Woolf*, London: Vintage, 1997.

Lejeune, Philipp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Lennon, Kathleen, *Imagination and the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Lessing, Doris, 'Introduction' to *The Mandarins*, trans. Leonard Friedman,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5.

Lundgren-Gothlin, Eva, *Sex and Existence: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trans. Linda Schenck,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cey, David, *Frantz Fanon: A Biography*, London: Verso Books, 2012.

Martin, Andy, 'The Persistence of "The Lolita Syndrome" ', *The New York Times*, 19 May 2013.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05/19/savile-beauvoir-and-the-charms-of-the-nymph/>

Martin Golay, Annabelle, *Beauvoir intime et politique: La fabrique des Mémoires*,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13.

Mauriac, François, 'Demanded'enquête', *Le Figaro*, 30 May 1949.

Maza, Sarah, *Violette Nozière: A Story of Murder in 1930s Pari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Mead, Margaret, 'A SR Panel Takes Aim at *The Second Sex*' ,*Saturday Review*, 21 February 1953.

Merleau-Ponty, Maurice, 'Metaphysics and the Novel', trans. Hubert Dreyfus and Patricia Allen Dreyfus,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Moi, Toril,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i, Toril, 'While We Wai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 *Signs* 27:4 (2002):1005–35.

Mussett, Shannon M. and William S. Wilkerson (eds), *Beauvoir and Western Thought from Plato to Butl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Myrdal, Gunnar, with Richard Sterner and Arnold Rose,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Nouchi, Franck, 'L'exilaméricain des lettres d'amour de Simone de Beauvoir à Claude

Lanzmann', *Le Monde*, 19 January 2018.

Parshley, How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1970.

Pattison, George and Kate Kirkpatrick, *The Mystical Sources of Existentialist Thought*,Abingdon: Routledge, 2018.

Radford, C. B., 'Simone de Beauvoir: Feminism's Friend or Foe?' Part II, *Nottingham French Studies* 7 (May 1968).

Rolo, Charles J., 'Cherchez la femme', *The Atlantic*, April 1953.

Rouch, Marine, ' "Vousêtes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une appropriation collective des Mémoi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ses lectrices (1958–1964)' *Littérature* 191(September 2018).

Rousseaux, André, 'Le DeuxièmeSexe', *Le Figaro littéraire*, 12 November 1949.

Rowbotham, Sheila, 'Foreword' to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and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London: Vintage, 2009.

Rowley, Hazel, *Tête-à-tête: The Lives and Loves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 London: Vintage, 2007.

Rubenstein, Diane, ‘ “I hope I am not fated to live in Rochester”: America in the Work of Beauvoir’, *Theory & Event* 15:2 (2012).

Rudman, Laurie A., Corinne A. Moss-Racusin, Julie E. Phelan and SanneNauts, ‘Status Incongruity and Backlash Effects: Defending the Gender Hierarchy Motivates Prejudice against Female Lead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165–79.

Saint-Bris, Gonzague de and Vladimir Fedorovski, *Les Egéries Russes*, Paris: Lattès, 1994.

Sanitioso, R., Z. Kunda and G. T. Fong, ‘Motivated Recruit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990): 229–41.

Sanitioso, R. and R. Wlordingarski, ‘In Search of Information that Confirms a Desired Self perception:Motivated Processing of Social Feedback and Choice of Social Interaction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004): 412–22.

Sanos, Sandrine, *Simone de Beauvoir: Creating a Feminist Existence in the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artre, Jean-Paul, *Écrits de jeunesse*, Paris: Gallimard,

1990.

Sartre, Jean-Paul,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Paris: Gallimard, 1995.

Sartre, Jean-Paul, *War Diaries*,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Verso, 1984.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 Hazel Barn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Sartre, Jean-Paul, with Michel Contat and Alexandre Astruc, *Sartre by Himself*,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Schwarzer, Alice, *After the Second Sex: Conversation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trans. Marianne Howar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Schwarzer, Alice,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Conversations 1972–198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4.

Sevel, Geneviève, 'Je considère comme une grande chance d'avoir pure et simple son enseignement', *Lendemain* 94 (1999).

Simons, Margaret A.,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Feminism,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Simons, Margaret A., 'Introduct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argaret Simons with Marybeth Timmerman and Mary Beth M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Simons, Margaret A., 'Introduct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Feminist Writings*, ed. Margaret A. Simons and Marybeth Timmerma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Simons, Margaret A.,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Beauvoi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argaret Simons with Marybeth Timmerman and Mary Beth M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Simons, Margaret A., 'Beauvoir's Ironic Sacrifice; or Why Philosophy is Missing from her Memoirs', forthcoming.

Simons, Margaret A. (ed.) *The Philosophy of Simone de Beauvoir: Critical Essay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Simons, Margaret A. and Hélène N. Peters,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Bernard's Introduction', Beauvoi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argaret Simons with Marybeth Timmerman and Mary Beth M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Spiegelberg, Herbert,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volume 2, The Hague: Springer, 2013.

Tidd, Ursula, *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 Reaktion, 2009.

Tidd, Ursula, 'Some Thoughts on an Interview with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Studies* 12 (1995).

TIME, 'Existentialism', 28 January 1946, pp. 28–9.

Times, The [London], 'Simone de Beauvoir', 15 April 1986, p. 18.

Viellard-Baron, Jean-Louis, 'Présentation' to Jean Baruzi, *L'Intelligence Mystique*, Paris:Berg, 1985.

Vintges, Karen, 'Introduction' to 'Jean Paul Sartre',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argaret Simons with Marybeth Timmerman and Mary Beth M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Vintges, Karen, 'Simone de Beauvoir: A Feminist Thinker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Margaret Simons (ed.), *The Philosophy of Simone de Beauvoir*, Bloomington, 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Voltaire, 'Première Lettre sur Oedipe', in *OEuvrescomplètes*, tome I, Kehl: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littérairetypographique, 1785.

Waelhens, A. de, compte-rendude Francis Jeanson, *Le problème moral et la pensée de Sartr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10 (1948).

Wahl, Jean, *Petite histoire de 'l'existentialisme'*, Paris: Éditions Club Maintenant, 1947.

Webber, Jonathan,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Three Guinea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0.

Wright Mills, C.,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致谢

很难准确地说这本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这一路以来给予我鼓励和启发的人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弗朗索瓦·贝里斯、兰德尔·莫里斯、梅格·沃纳、帕梅拉·苏·安德森、珍妮·特洛特、米歇尔·勒·德夫、乔治·帕蒂森和马塞勒·德尔沃-阿博特以及我的家人，是你们点燃了我对哲学和法国文学的热爱。

在这本书里我描绘了我所知道的波伏瓦，但这建立在许多学者对波伏瓦的开拓性研究之上。我要特别感谢玛格丽特·西蒙斯和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波伏瓦研究系列的所有译者、编辑和前言作者。此外，我还要感谢米歇尔·勒·德夫、伊丽莎白·法蕾丝、索尼娅·克鲁科斯、贝尔·胡克斯，南希·鲍尔、斯特拉·桑福德、梅丽尔·奥特曼、托莉·莫伊、托弗·佩特森以及芭芭拉·克劳。我非常感谢西蒙娜·德·波伏瓦国际协会成员与我进行的热情而慷慨的讨论，他们让我一瞥他们心中的波伏瓦，也丰富了我自己对波伏瓦的认知。

我要感谢亚伦·加布里埃尔·休斯，感谢他出色的研究帮助我追踪晦涩的法国评论；感谢艾米丽·赫宁，她将亨利·柏格森的狂热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感谢马里内·鲁什慷慨地与我分享了她对波伏瓦读者来信的研究；感谢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感谢伽利玛出版社档案馆的埃里克·勒让德；感谢让·路易·让内勒分享给我报纸文章；尤其感谢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感谢她花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也感谢她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莉莎·汤普森最初的热情，《成为波伏瓦》这本书不会存在。如果没有她富有洞察力的批评，这本书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我非常感谢她的热情和批评。我还要感谢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黛西·爱德华兹、露西·罗素和凯莉·里格登为这个项目所做的工作。感谢布鲁姆斯伯里的匿名审稿人，也感谢克莱尔·卡莱尔和苏珊娜·利普斯科姆。

在项目进展的各个阶段，有很多人给予我兴趣和鼓励，对此我要感谢我在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哲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和同事。

每个作家都知道，成就一本书需要一整个村庄，我很感激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村庄，有朋友和家人——尤其要感谢索菲·戴维斯-琼斯、梅兰妮·古德温、菲利斯·古德温、苏西和汤姆、内奥米和约瑟夫、玛丽和阿德、安吉拉和西蒙。

最后，感谢我充满创意和启发的孩子们——他们开玩笑的问题：“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谁？”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箴言。以及，感谢我的丈夫——独一无二的你。

图片来源

封面照片 Elliott Erwitt / IC Photo.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Photo: Frédéric Hanoteau/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Diffusion Gallimard.

Photo: Frédéric Hanoteau/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Diffusion Gallimard.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Robert Doisneau/Gamma-Legend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Robert Doisneau/Gamma-Legend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Bettmann/Bettmann Collection/Getty Images.

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 Diffusion
Gallimard.

Jacques Pavlovsky/Sygma Collection/Getty Images.

波伏瓦重要作品简称表

A 《告别的仪式》(*Adieux : A Farewell to Sartre*), London: Penguin, 1984.

ADD 《波伏瓦美国纪行》(*America Day by 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MM 《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 London: Virago, 2003.

ASD 《归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 London: Penguin, 1977.

BB 《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 London: Four Square, 1962.

BI 《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 Paris: Gallimard, 1972.

BO 《他人的血》(*The Blood of Others*), London: Penguin, 1964.

CC 《往来通信》(*Correspondance Croisée*), Paris: Gallimard, 2004.

CJ 《青年笔记》(*Cahiers de jeunesse*), Paris: Gallimard, 2008.

DPS 《一个哲学学生的日记：第一卷，（1926—1927）》

(*Diary of a Philosophy Student: Volume I, 1926 - 1927*)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EA 《模糊性的道德》 (*Ethics of Ambiguity*) ,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76.

FC 《时势的力量》 (*Force of Circumstance*) , London:
Penguin, 1987.

FW 《女性主义书写》 (*Feminist Writings*)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LM 《长征》 (*The Long March*) , London: Andre Deutsch
and Weidenfeld& Nicholson, 1958.

LS 《给萨特的信》 (*Letters to Sartre*) , New York: Arcade,
1991.

M 《名士风流》 (*The Mandarins*) , London : Harper
Perennial, 2005.

MDD 《端方淑女》 (*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
London: Penguin, 2001.

MPI 《回忆录：第一卷》 (*Mémoires , tome I*) , Paris:
Gallimard, 2018.

MPII 《回忆录：第二卷》 (*Mémoires , tome II*) , Paris:
Gallimard, 2018.

OA 《老年》 (*Old Age*)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C 《皮洛士与息涅阿斯》 (*Pyrrhus et Cinéas*) , Paris:
Gallimard, 1974.

PL 《盛年》 (*The Prime of Life*) , London: Penguin, 1965.

PW 《哲学写作》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olW 《政治写作》 (*Political Writing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QM 《战争里的安静时分：让 - 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通信 (1940—1963) 》 (*Quiet Moments in a War: The Letters of Jean Paul Sartre and Simone de Beauvoir 1940 - 1963*) ,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3.

SCTS 《女宾》 (*She Came to Stay*) ,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6.

SS 《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 London : Vintage, 2009.

SSP 《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Vintage, 1970.

TALA 《越洋情书》 (*A Transatlantic Love Affair: Letters to Nelson Algren*) , New York : New Press, 1998.

TWD 《被摧毁的女人》 (*The Woman Destroyed*) , London : Harper Perennial, 2006.

UM 《“白吃饭的嘴巴”和其他文学写作》 (*'The Useless Mouths' and Other Literary Writings*)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VED 《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 (*A Very Easy Death*) , New York: Pantheon, 1965.

WD 《战时日记》 (*Wartime Dia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WML 《我生命的见证者：让 - 保罗·萨特给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信件 (1926—1939) 》 (*Witness to My Life: The Letters of Jean-Paul Sartre to Simone de Beauvoir, 1926 - 1939*),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WT 《精神至上：早期故事五则》 (*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 Five Early Tales*), London: Flamingo, 1982.

人名索引

译名

原名

阿道夫·希特勒

Hitler, Adolf

阿德里安娜·里奇

Rich, Adrienne

阿尔贝·加缪

Camus, Albert

阿尔弗雷德·富耶

Fouillée, Alfred

阿尔弗雷德·金赛

Kinsey, Alfred

阿方斯·都德

Daudet, Alphonse

阿加莎·克里斯蒂

Christie, Agatha

阿莱特·埃尔凯姆

Elkaïm, Arlette

阿兰

Alain

阿莉塞·施瓦策尔

Schwarzer, Alice

阿内丝·尼恩

Nin, Anais

阿瑟·柯南·道尔

Doyle, Arthur Conan

阿什利·蒙塔古

Montagu, Ashley

阿图尔·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埃德蒙·胡塞尔

Husserl, Edmund

埃尔温·皮斯卡托

Piscator, Erwinl

埃弗利娜·雷伊	Rey, Evelyne
埃莱娜·贝特朗·德·波伏瓦	Beauvoir, Hélène Bertrand de
埃莱娜·拉西蒂奥塔基斯	Lassithiotakis, Hélène
埃伦·赖特	Wright, Ellen
埃马纽埃尔·穆尼耶	Mounier, Emmanuel
埃米尔·法盖	Faguet, Émile
埃丝特·赫林	Herring, Esther
艾梅·塞泽尔	Césaire, Aimé
安德烈·布雷顿	Breton, André
安德烈·戈尔兹	Gorz, André
安德烈·纪德	Gide, André
安德烈·卢梭	Rousseaux, André
安吉拉·卡特	Carter, Angela

安妮·科恩－索拉尔	Cohen-Solal, Annie
安妮·泽林斯基	Zelinsky, Anne
奥尔加·科萨基维奇	Kosakiewicz, Olga
奥斯卡·王尔德	Wilde, Oscar
奥维德	Ovid
柏拉图	Plato
邦雅曼·贡斯当	Constant, Benjamin
保罗·布尔热	Bourget
保罗·克洛代尔	Claudé, Paul
保罗·尼藏	Nizan, Paul
保罗·瓦莱里	Valéry, Paul
贝当	Pétain
贝蒂·弗里丹	Friedan, Betty
贝尔·胡克斯	Hooks, Bell

比安卡·比嫩费尔德	Bienenfeld, Bianca
(比安卡·朗布兰)	(Lamblin, Bianca)
毕加索	Picasso
碧姬·芭铎	Bardot, Brigitte
波德莱尔	Baudelaire
伯纳德·沃尔夫	Wolfe, Bernard
伯特兰·罗素	Russell, Bertrand
布兰奇·克诺夫	Knopf, Blanche
C. 赖特·米尔斯	Mills, C. Wright
查尔斯·巴尔比耶	Barbier,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迪兰	Dullin, Charles
查理·卓别林	Chaplin, Charlie
D.H. 劳伦斯	Lawrence, D.H.
达维德·马塞	Macey, David
戴尔德丽·贝尔	Bair, Deirdre
丹尼尔·拉加什	Lagache, Daniel
德尼·狄德罗	Diderot, Denis
多丽丝·莱辛	Lessing, Doris
多萝西·帕克	Parker, Dorothy

多洛雷斯·瓦内蒂	Vanetti, Dolores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 Fyodor
费尔南德·贡捷	Gontier, Fernande
菲利普·勒热纳	Lejeune, Philippe
弗吉尼亚·伍尔夫	Woolf, Virginia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	Nabokov, Vladimir
弗朗茨·法农	Fanon, Frantz
弗朗茨·卡夫卡	Kafka, Franz
弗朗索瓦·密特朗	Mitter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iac, François
弗朗索瓦丝·贝特朗·德·	Beauvoir, Françoise Bertrand
波伏瓦（婚前姓布拉瑟尔）	de (e Brasseur)
弗朗西斯·让松	Jeanson, Francis
弗朗辛·迪马	Dumas, Francine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Holderli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弗洛伊德	Freud
伏尔泰	Voltaire
G.W.F. 黑格尔	Hegel, G.W.F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Leibniz, Gottfried
龚古尔兄弟	Goncourt, Jules and Edmond de
贡纳尔·默达尔	Myrdal, Gunnar
古斯塔夫·布拉瑟尔	Brasseur, Gustave
古斯塔夫·福楼拜	Flaubert, Gustave
果戈理	Gogol
H.M. 帕什利	Parshley, H.M.
汉娜·阿伦特	Arendt, Hannah
黑兹尔·罗利	Rowley, Hazel
亨丽埃特·尼藏	Nizan, Henriette
亨利·柏格森	Bergson, Henri

贝尔纳·亨利·莱维	Lévy, Bernard Henri
(皮埃尔·维克托, 本尼·莱维)	(Victor, Pierre ; Benny)
亨利·德·蒙特朗	Montherlant, Henri de
亨利·德拉克鲁瓦	Delacroix, Henri
亨利·克卢阿尔	Clouard, Henri
亨利·米勒	Müller, Henry
J.M. 辛格	Synge, J.M.
吉勒·德勒兹	Deleuze, Gilles
吉塞勒·哈利米	Halimi, Gisèle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Marcel, Gabriel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Nasser, Gamal Abdel
贾米拉·布帕查	Boupacha, Djamila
杰杰(杰拉拉丁·帕尔多, 费尔南多·杰拉西)	Gégé (Pardo, Geraldine ; Gerassi, Fernando)
杰奎琳·皮亚捷	Piatier, Jacqueline
居伊·德·莫泊桑	Maupassant, Guy de
卡尔·雅斯贝斯	Jaspers, Karl
卡罗琳·埃尔布兰	Heilbrun, Carolyn
卡洛·莱维	Levi, Carlo
凯瑟琳·埃梅里希	Catherine Emmerich
凯瑟琳·德纳芙	Deneuve, Catherine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Kirkpatrick, Kate

凯特·米利特	Millett, Kate
科莱特·奥德里	Audry, Colette
可可·香奈儿	Chanel, Coco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Søren
克莱尔·埃切列利	Etcherelli, Claire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Claude
克洛德·贝尔纳	Bernard, Claude
克洛德·弗朗西斯	Francis, Claude
克洛德·朗兹曼	Lanzmann, Claude
克洛丁·肖内	Chonez, Clodine
库尔特·冯内古特	Vonnegut, Kurt
库尔特·魏尔	Weill, Kurt
拉尔夫·舍恩曼	Schoenman, Ralph

拉格里耶尔	La Grillère
拉罗什富科	La Rochefoucauld
莱昂·布卢姆	Blum, Leon
莱奥教皇十三世	Pope Leo XIII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勒内·马厄	Maheu, René
雷蒙·阿隆	Aron, Raymond
雷蒙·格诺	Queneau, Raymond
里昂·布兰斯维克	Brunschvicg, Léon
理查德·赫勒	Heller, Richard
理查德·赖特	Wright, Richard
丽贝卡·韦斯特	West, Rebecca
利昂内尔·鲁莱	Roulet, Lionel
列奥塔尼·赞塔	Zanta, Léontine
列夫·托尔斯泰	Tolstoy, Leo
列娜·佐妮娜	Zonina, Lena
卢尔德	Lourdes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Alcott, Louisa May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Louis

罗贝尔·布拉齐亚克	Brasillach, Robert
罗贝尔·伽利玛	Gallimard, Robert
罗杰·瓦迪姆	Vadim, Roger
罗曼·罗兰	Rolland, Roman
马德莱娜（西蒙娜的表 姐，马德莱娜·德·毕 晓普）	Madeleine (Bisschop, Madeleine de)
马德莱娜·毕晓普	Bisschop, Madeleine de
马德莱娜·戈贝伊	Gobeil, Madeleine
马丁·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玛格达·瓜达卢佩	Guadalupe, Magda
马基·萨德	Sade, Marquis de
马克思	Marx
马里内·鲁什	Rouch, Marine
马塞尔·杜尚	Duchamp, Marcel
马塞尔·普雷沃	Prévo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马尔卡·里博斯卡	Ribowska, Malka
玛格丽特·杜拉斯	Duras, Marguerite
玛格丽特·米德	Mead, Margaret

玛格丽特·西蒙斯	Simons, Margaret
玛丽·维尔（玛丽·吉拉尔）	Ville, Marie (Girard, Marie)
迈尔斯·戴维斯	Davis, Miles
梅里尼亚克	Meyrignac
米拉·科马罗夫斯基	Komarovsky, Mirra
米歇尔·福柯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孔塔	Contat, Michel
米歇尔·莱里斯	Leiris, Michel
米歇尔·勒·德夫	Le Doeuff, Michèle
米歇尔·维安	Vian, Michelle
莫里斯·布朗肖	Blanchot, Maurice
莫里斯·布隆代尔	Blondel, Maurice
莫里斯·德·冈迪拉克	Gandillac, Maurice de
莫里斯·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Maurice
穆罕默德·哈桑内因·	Heikal, Mohamed Hassanein
海卡尔	
纳尔逊·阿尔格伦	Algren, Nelson

纳塔莉·索罗金	Sorokine, Nathalie
南希·鲍尔	Bauer, Nancy
尼古拉·柏多耶夫	Berdyayev, Nikolai
尼基塔·赫鲁晓夫	Kruschev, Nikita
帕斯卡	Pascal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Bruckner, Pascal
佩吉	Péguy
皮埃尔·吉耶	Guille, Pierre
皮埃尔·普莱姆林	Pfimlin, Pierre
皮埃尔·维克托	Victor, Pierre
(贝尔纳·亨利·莱维)	(Bernard Henri Levy)
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乔治·爱略特	Eliot, George
乔治·巴塔耶	Bataille, Georges
乔治·贝特朗·德·波伏瓦	Beauvoir, Georges Bertrand de

乔治·古尔维奇	Gurvitch, Georges
乔治·帕蒂森	Pattison, George
乔治·桑	Sand, George
乔治·史蒂文斯	Stevens, George
乔治·贝尔纳诺斯	Bernanos, Georges
琼·康迪特	Condit, Jean
让·巴吕齐	Baruzi, Jean
让·吉东	Guittton, Jean
让·季奥诺	Giono, Jean
让·科	Cau, Jean
让·拉克鲁瓦	Lacroix, Jean
让·拉辛	Racine, Jean
让·路易·让内勒	Jeanelle, Jean-Louis
让－路易·韦亚尔－巴龙	Veillard-Baron, Jean-Louis
让·普永	Pouillon, Jean
让·瓦尔	Wahl, Jean
让－保罗·萨特	Sartre, Jean-Paul
让娜·梅西耶	Mercier, Jeanne
让－皮埃尔·布拉	Bourla, Jean-Pierre
让－皮埃尔·布莱	Boulé, Jean-Pierre

让－雅克·卢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热尔曼·格里尔	Greer, Germaine
热纳维耶芙·塞维尔	Sevel, Geneviève
儒勒·凡尔纳	Verne, Jules
萨莉·斯温·谢利	Shelley, Sally Swing
(萨莉·斯温)	(Sally Swing)
赛珍珠	Buck, Pearl S
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	Firestone, Shulamith
司汤达	Stendahl
斯宾诺莎	Spinoza
斯大林	Stalin
斯捷帕·杰拉西	Gerassi, Stépha
苏格拉底	Socrates
索菲娅·托尔斯泰	Tolstoy, Sophia
索尼娅·克鲁科斯	Kruks, Sonia
托莉·莫伊	Moi, Toril
万达·科萨基维奇	Kosakiewicz, Wanda
威廉·巴雷特	Barrett, William

威廉·福克纳	Faulkner,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James, William
维奥莱特·勒迪克	Leduc, Violette
维奥莱特·诺齐埃	Nozière, Violette
维克多·雨果	Hugo, Victor
沃尔特·惠特曼	Whitman, Walt
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	Le Bon de Beauvoir, Sylvie,
希拉·罗博特姆	Rowbotham, Sheila
西蒙娜·若利韦	Jollivet, Simone
西蒙娜·薇伊	Weil, Simone
西蒙娜·韦伊	Veil, Simone
夏尔·戴高乐	de Gaulle, Charles
萧伯纳	Shaw, George Bernard
雅克·埃米勒·马叙	Massu, Jacques Émile
雅克·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
雅克·拉康	Lacan, Jacques
雅克·马里坦	Maritain, Jacques
雅克·尚皮涅勒	Champigneulle, Jacques
雅克－洛朗·博斯特	Bost, Jacques-Laurent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	Clayton Powell, Adam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Aleksandr
伊丽莎白·巴丹泰	Badinter, Elisabeth
伊丽莎白·拉库万（扎扎）	Lacoin, Elisabeth see Zaza

伊丽莎白·詹韦 Janeway, Elizabeth

伊丽莎白·法雷泽 Farner, Elizabeth

伊丽莎白·詹韦	Janeway, Elizabeth
伊丽莎白·法雷泽	Fallaize, Elizabeth
伊曼努尔·康德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Levinas, Emmanuel
伊娃·隆格伦－戈特琳	Lundgren-Gothlin, Eva
伊万·莫法特	Moffat, Ivan
伊薇特·鲁迪	Roudy, Yvette
英格丽德·加尔斯特	Galster, Ingrid
于勒·拉尼奥	Lagneau, Jules
约翰·杰拉西	Gerassi, John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Mill, John Stuart
约瑟·达扬	Dayan, Josée
约瑟芬·贝克	Baker, Josephine
约瑟夫·芒西	Mancy, Joseph
詹姆斯·乔伊斯	Joyce, James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Kristeva, Juli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为波伏瓦 / (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著 ; 刘海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1.3

书名原文: Becoming Beauvoir: A Life

ISBN 978-7-5217-2342-7

I. ①成... II. ①凯... ②刘... III. ①波伏瓦(Beauvoir, Simone de 1908-1986) - 传记 IV.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96376号

Becoming Beauvoir: A Life by Kate Kirkpatrick

Copyright © Kate Kirkpatrick, 2019

This translation of Becoming Beauvoir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成为波伏瓦

著者 : [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译者 : 刘海平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 : 285千字

版次 : 2021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 : 01-2019-7335

书号 : ISBN 978-7-5217-2342-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从宇宙的深奥谜题，到科技的发明创造，再到日常的衣食住行，
微积分的力量无处不在

微积分的力量

[美] 史蒂夫·斯托加茨 著 任烨 译
(Steven Strogatz)

infinite
powers

How Calculus Reveals the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中信出版集团

微积分的力量

[美] 史蒂夫·斯托加茨 著
任烨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引言

写给每个人的微积分读物

由微积分主宰的世界

微积分不只是一种语言

不合理的有效性

无穷原则

石巨人与无穷

曲线、运动和变化

第1章 无穷的故事

作为桥梁的无穷

比萨证明

极限与墙之谜

0.333...的故事

无穷多边形的故事

无穷的魅力和危险

除数为0的禁忌

实无穷之罪

芝诺悖论

芝诺悖论走向数字化

当芝诺悖论遇上量子力学

第2章 驾驭无穷的勇士

夹逼法与圆周率

圆周率之道

立体主义与微积分

奶酪论证

阿基米德方法

从计算机动画到面部手术

探索运动之谜

第3章 运动定律的探索之旅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

伽利略出场

下落、滚动与奇数定律

科学极简主义的艺术

从摆动的吊灯到GPS

开普勒与行星运动之谜

开普勒第一定律：椭圆轨道

开普勒第二定律：相等的时间，相等的面积

开普勒第三定律：行星的公转周期

开普勒与伽利略的异同点

阴云密布

第4章 微分学的黎明

代数在东方的崛起

代数的兴起与几何学的衰落

代数与几何学的邂逅

方程与曲线

在一起，会更好

费马vs笛卡儿

寻找失传已久的发现方法——分析

行李箱的优化问题

费马如何帮助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最短时间原理

关于切线的争论

近在眼前的应许之地

第5章 微积分的十字路口

函数的作用

幂函数

指数函数

10的次方

对数

自然对数及其指数函数

指数增长与指数式衰减的机制

第6章 变化率和导数

微积分的三大核心问题

线性函数及其恒定的变化率

非线性函数及其不断变化的变化率

作为昼长变化率的导数

作为瞬时速度的导数

第7章 隐秘的源泉

面积、积分和基本定理

运动使基本定理更直观

恒定的加速度

用油漆滚筒证明基本定理

基本定理的意义

积分学的圣杯

局部vs整体

一个孤寂的男孩

玩转幂级数

混搭大师

私密的微积分

第8章 思维的虚构产物

眨眼之间

无穷小量

2.001的立方

微分

微分求导法

通过微分推导出基本定理

莱布尼茨是如何发现微分和基本定理的？

在微积分的帮助下对抗HIV

第9章 宇宙的逻辑

自然的逻辑

二体问题

牛顿力学与《隐藏人物》

牛顿微积分与《独立宣言》

连续体与离散集

常微分方程与偏微分方程

偏微分方程与波音787客机

无处不在的偏微分方程

第10章 波、微波炉和脑成像

弦理论

为什么是正弦波？

振动模态的可视化：克拉德尼图形

最值得尊崇的勇气

微波炉

为什么微波炉最初被称作雷达灶？

CT与脑成像

第11章 微积分的未来

DNA的缠绕数

决定论及其局限性

非线性

混沌

庞加莱图

走上战场的非线性

微积分与计算机联盟

复杂系统与高维诅咒

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洞察力之谜

结语

小数点后8位

发现正电子

可以理解的宇宙

致谢

引言

没有微积分，我们就不会拥有手机、计算机和微波炉，也不会拥有收音机、电视、为孕妇做的超声检查，以及为迷路的旅行者导航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我们更无法分裂原子、破解人类基因组或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甚至有可能无缘于《独立宣言》。

有一种罕见而有趣的历史观点认为，世界被一个神秘的数学分支彻底改变了。一个最初与形状相关的理论，最终又如何重塑了文明？

我们可以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一句妙语中洞见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句话是他在与小说家赫尔曼·沃克讨论曼哈顿计划时说的。当时沃克正在为他计划写作的一部关于“二战”的长篇小说做调研，他去加州理工学院采访了参与过原子弹研发的物理学家，费曼就是其中之一。采访结束临别之际，费曼问沃克是否了解微积分。沃克坦承他并不了解，于是费曼说道：“你最好学学微积分，它是上帝的语言。”^[1]

宇宙是高度数学化的，^[2]但原因尚无人知晓。这或许是包含我们在内的宇宙的唯一可行的存在方式，因为非数学化的宇宙无法庇护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智慧生命。无论如何，一个神秘且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我们的宇宙遵循的自然律最终总能用微积分的语言和微分方程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类方程能描述某个事物在这一刻和在下一刻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个事物在这一点和在与该点无限接近的下一个点之间的差异。尽管细节会随着我们探讨的具体内容而有所不同，但自然律的结构总是相同的。这个令人惊叹的说法也可以表述为，似乎存在着某种类似宇宙密码的东西，即一个能让万物时时处处不断变化的操作系统。微积分利用了这种规则，并将其表述出来。

艾萨克·牛顿是最早瞥见这一宇宙奥秘的人。他发现行星的轨道、潮汐的韵律和炮弹的弹道都可以用一组微分方程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如今，我们把这些方程称为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自牛顿以来，每当有新的宇宙奥秘被揭开，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模式一直有效。从古老的土、空气、火和水元素到新近的电子、夸克、黑洞和超弦，宇宙中所有无生命的东西都遵从微分方程的规则。我敢打赌，这就是费曼说“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东西称得上宇宙的奥秘，那么非微积分莫属。

人类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这种奇怪的语言（先是在几何学的隐秘角落里，后来是在宇宙密码中），然后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并破译了它的习语和微妙

之处，最终利用它的预测能力去重构世界。

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

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意味着关于生命、宇宙和万物的终极问题的答案^[3]并不是42，为此我要向道格拉斯·亚当斯和《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粉丝致歉。但“深思”（《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一台超级计算机）的解题思路是正确的，因为宇宙的奥秘确实是一系列数学问题。

[1] “It’s the language God talks”: Wouk, The Language God Talks, 5.

[2] universe is deeply mathematical: For physics perspectives, see Barrow and Tipler,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Rees, Just Six Numbers; Davies, The Goldilocks Enigma; Livio, Is God a Mathematician?; Tegmark, 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 and Carroll, The Big Picture. For a philosophy perspective, see Simon Friederich, “Fine-Tuning,”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8/entries/fine-tuning/>.

[3] answer to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Adams, Hitchhiker’s Guide, and Gill, Douglas Adams’ Amazingly Accurate Answer.

写给每个人的微积分读物

费曼的那句妙语“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引出了许多深奥的问题。什么是微积分？人类如何断定它是上帝的语言（或者说，宇宙基于这种语言在运转）？什么是微分方程？在牛顿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微分方程为世界带来了什么？最后，这些故事和观点如何能被有趣且清楚易懂地传达给像赫尔曼·沃克那样的友善读者呢，他们勤于思考、充满好奇心、知识渊博但几乎没有学过高等数学？

沃克在他与费曼邂逅故事的结尾部分写道，他在14年里始终没有抽出时间学习微积分。他的关于“二战”的长篇小说从原计划的一部变成了两部——《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每部都长达1 000页左右。在完成这两部小说后，他试图通过阅读像《微积分一点通》这样的书自学微积分，但效果并不好。他翻阅了几本教科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希望“遇到一本合适的书，它可以帮助像我这样对数学几乎一窍不通的人。”^[1]我在青少年时期产生了探寻存在之意义的渴求，大学期间就只学习了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所以我并不知道别人口中艰涩、无趣、毫无用处的微积分竟然是上帝的语言”。在发现自己看不懂教科书之后，他聘请了一位以色列的数学家教，希望能跟着他学点儿微积分，顺便提升一下希伯来语口语水平，但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最后，绝望的他旁听了高中的微积分课程，但因为进度落后太多，几个月后他不得不放弃。在他走出教室时，孩子们一起为他鼓掌，他说这就像对一场可怜的表演报以同情的掌声。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了解关于微积分的最精彩思想和故事。我们没必要采用赫尔曼·沃克的方法去学习人类历史上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科，尽管微积分是人类最具启迪性的集体成就之一。我们不必为了理解微积分的重要性而学习如何做运算，就像我们不必为了享用美食而学习如何做佳肴一样。我将借助图片、隐喻和趣闻逸事等，尝试解释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我也会给你们介绍有史以来最精致的一些方程和证明，就像我们在参观画廊的时候不会错过其中的代表作一样。至于赫尔曼·沃克，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他已经103岁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会微积分，如果还没有，这本书就很适合沃克先生。

[1] “a mathematical ignoramus like me”: Wouk, *The Language God Talks*,

由微积分主宰的世界

现在你应该很清楚，我将从应用数学家的角度讲述微积分的故事和重要性。而数学史家则会选择不同的角度，^[1]纯粹数学家亦然。作为一名应用数学家，真正吸引我的是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理想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外界的现象引导着我们提出数学问题；反过来，我们的数学想象有时也会预言现实世界中的事情。当这一切真正发生时，将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

要想成为一位应用数学家，^[2]既要有外向型思维，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对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数学并不是一个由自我附和的定理和证明构成的原始、封闭的世界。^[3]我们会欣然接受各种各样的学科：哲学，政治学，科学，历史，医学，等等。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述的故事是：由微积分主宰的世界。

这是一种比以往更宽泛的微积分观，包含了数学和相邻学科中的许多分支，它们要么是微积分的“表兄弟”，要么是微积分的“副产品”。因为这种“大帐篷”观是非常规的，所以我要确保它不会造成任何混淆。比如，我在前文中说过，如果没有微积分，我们就不会拥有电脑和手机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微积分本身创造了所有这些奇迹。事实远非如此，科学和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搭档，或者可以说是这出大戏的主角。我只想说，尽管微积分往往扮演的是配角，但也为塑造我们今天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无线通信的发展史为例。它开始于迈克尔·法拉第和安德烈·玛丽·安培等科学家发现的电磁定律^[4]，如果没有他们的观察和反复修正，那些关于磁体、电流及其不可见力场的重要事实将仍不为人所知，无线通信的可能性也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实验物理学在这里显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微积分同样很重要。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苏格兰数学物理学家，将电磁场的基本实验定律改写为一种可进行微积分运算的符号形式。经过一番变换，他得到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方程，显然有某种东西缺失了。麦克斯韦怀疑安培定律是罪魁祸首，并尝试修正它，于是他在自己的方程中加入了一个新项——可以化解矛盾的假想电流，然后又利用微积分做了一番运算。这次他得到了一个合理的结果——一个简洁的波动方程^[5]，它与描述池塘中涟漪扩散的方程很像。只不过麦克斯韦方程还预言了一种新波的存在，这种波是由相互作用的电场和磁场产生的。一个变化的电场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磁场，一个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场，以此类推，每个场都会引导另一个场向前运动，一起以行波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当麦克斯韦计算这种波的速度时，他发现它

是以光速运动的，这绝对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喜的时刻之一。因此，他不仅利用微积分预测出电磁波的存在，还解开了一个古老的谜题：光的性质是什么？他意识到，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麦克斯韦的电磁波预测促使海因里希·赫兹在1887年做了一项实验，从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10年后，尼古拉·特斯拉建造了第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又过了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发送了第一份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接下来，电视、手机和其他设备也陆续出现了。

显然，微积分不可能独立做到这一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微积分，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即时有可能，也要很久之后才会实现。

[1] tell it differently: For historical treatments, see Boyer, *The History of the Calculus*, and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Dunham, *The Calculus Gallery*;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immons, *Calculus Gems*, tell the story of calculus by walking us through some of its most beautifu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2] To be an applied mathematician: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convey the spirit, breadth, and vitalit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3] pristine, hermetically sealed world: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and Newma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connect math to the wider culture. I spent many hours in high school reading these two masterpieces.

[4]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For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ee Maxwell, “On Physical Lines of Force,” and Purcell,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For concepts and history, see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304–21; Schafer, “The Laird of Physics”; and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11. For a biography of Maxwell and Faraday, see Forbes and Mahon, *Faraday*, Maxwell.

[5] wave equation: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8.

微积分不只是一种语言

麦克斯韦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我们将会反复看到的主题。人们常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电磁波的例子中，对麦克斯韦而言，将他在实验中发现的定律转化为用微积分语言表述的方程，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用语言来类比微积分的做法并不全面。微积分和其他数学形式一样，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推理系统。依据某些规则进行各种符号运算，微积分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方程之间的转换。这些规则有扎实的逻辑根基，尽管看上去我们只是在随机变换符号的位置，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构建逻辑推理的长链。随机变换符号的位置是有效的简化手段，也是构建人脑无法处理的复杂论证过程的简便方式。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和娴熟，能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方程变换，就可以揭示这些方程的隐藏含义。对数学家来说，这个过程几乎是易于察觉的，就好像我们在操控着方程，给它们做按摩，竭力让它们放松下来，最后洞悉它们的秘密。我们希望它们能敞开心扉，跟我们交谈。

这个过程离不开创造力，因为我们通常不清楚应该进行哪些操作。在麦克斯韦的例子中，他可以选择的方程变换方式有无数种，尽管所有方式都合乎逻辑，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能揭示出科学真相。因为麦克斯韦根本不知道自己寻找什么，除了毫无逻辑的语言（或者符号）之外，他从方程中很可能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但幸运的是，这些方程的确含有待揭示的秘密。在适当的刺激下，它们“吐露出”波动方程。

此时，微积分的语言功能再次掌控了主导权。当麦克斯韦将他的抽象符号转换回现实时，它们做出了预测：作为一种不可见的行波，电和磁能一起以光速传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发现改变了世界。

不合理的有效性

微积分竟然能如此出色地模拟大自然，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毕竟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微积分是一个由符号和逻辑构成的想象领域，大自然则是一个由力和现象构成的现实领域。但不知为何，如果从现实到符号的转换足够巧妙，微积分的逻辑就可以利用现实世界的一个真理生成另一个真理，即输入一个真理，然后输出另一个真理。我们先要有一个被经验证明为真和用符号表述（就像麦克斯韦对电磁定律的改写一样）的真理，然后进行正确的逻辑操作，最后得出另一个经验真理，这个真理有可能是新的，是从没有人知道的关于宇宙的事实（比如电磁波的存在）。就这样，微积分让我们放眼未来，预测未知。正因为如此，它成了强大的科技工具。

但是，为什么宇宙要遵循各种逻辑，甚至包括渺小的人类也能发现的那种逻辑呢？当爱因斯坦写下“世界的永恒之谜^[1]在于它的可理解性”时，让他惊叹不已的正是这个问题；当尤金·维格纳在论文《论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不合理的有效性》^[2]中写下“数学语言在表述物理定律方面的适当性是一个奇迹，是一份我们既不理解也不配拥有的奇妙礼物”时，他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敬畏感可追溯至数学形成时期。相传公元前550年左右，当毕达哥拉斯^[3]及其信徒发现音乐由整数比支配时，他就产生了这种感觉。想象一下，你在弹拨一根吉他弦，当弦振动时，它会发出某个音调。现在，把你的手指放在恰好位于弦中间的品格上，再拨一次弦。这时弦的振动部分只有最初长度的一半，即 $1/2$ ，而它发出的音调恰好比最初的音调高八度（指在do-re-mi-fa-sol-la-ti-do的音阶中，从一个do到下一个do的音程）。如果弦的振动部分是最初长度的 $2/3$ ，那么它发出的音调会比最初的音调高五度（从do到sol的音程，比如《星球大战》主题曲的前两个音调）。如果弦的振动部分是最初长度的 $3/4$ ，那么它发出的音调会比最初的音调高四度（《婚礼进行曲》的前两个音调之间的音程）。古希腊音乐家了解八度、四度和五度的旋律概念，并且认为它们很美妙。音乐（现实世界的和谐）与数字（想象世界的和谐）之间的这种出人意料的联系，引领毕达哥拉斯学派^[4]形成了“万物皆数”的神秘信念。据说他们始终认为，即使是在轨道上运行的行星也会演奏音乐——天体之音。

此后，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染上了“毕达哥拉斯热”。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尤为严重，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亦然。我们将会看到，“万物皆数”的信念驱使他们去探寻、想象和追求宇宙的和谐，并最终推动他们取得了改变世界的发现。

[1] “The eternal mystery of the world”: Einstein, *Physics and Reality*, 51. This aphorism is often rephrased as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comprehensible.” For further examples of Einstein quotes both real and imaginary, see Calaprice, *The 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 and Robinson, “Einstein Said That.”

[2]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Wigner,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Hamming,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and Livio, *Is God a Mathematician?*

[3] Pythagoras: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4–5; Burkert, *Lore and Science*; Guthrie, *Pythagorean Sourcebook*; and C. Huffman, “Pythagoras,”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4/entries/pythagoras/>. Martínez, in *Cult of Pythagoras and Science Secrets*, debunks many of the myths about Pythagoras with a light touch and devastating humor.

[4] the Pythagorean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8–51,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3.2, discuss Pythagorean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无穷原则

为了帮助你理解我们讨论的方向，我先说一下什么是微积分，它想要什么，以及它与其他数学学科的区别。幸运的是，有一个宏大而美丽的理念将贯穿这个话题的始终。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理念，微积分的结构就可以被看作统一主题之下的变体。

遗憾的是，大多数微积分课程都将这个主题埋藏在大量的公式、步骤和计算技巧之中。仔细想来，尽管它是微积分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每位专家都知道它，但我从未见过它在哪里被阐明。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无穷原则”，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历史上，它都会像引导微积分本身的发展那样指引我们的讨论过程。虽然此时此刻它听起来好像胡言乱语，但通过我们一步步地探索微积分想要什么及其如何实现所想，理解无穷原则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简言之，微积分就是想让复杂的难题简单化，它十分痴迷于简单性。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微积分向来以复杂性著称。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权威的微积分教科书的篇幅都超过1 000页，重得像砖头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急着做判断或下结论。微积分无法改变自己的样子，它的庞大笨重是不可避免的。它看起来复杂，是因为它要设法解决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它已经处理和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一些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

微积分成功的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更简单的部分。当然，这种策略并不是微积分独有的。所有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知道，当难题被分解后，就会变得更容易解决。微积分真正不同凡响和标新立异的做法在于，它把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无穷的程度。它不是把一个大问题切分成有限的几小块，而是无休无止地切分下去，直到这个问题被切分成无穷多个最微小并且可以想象的部分。之后，它会逐一解决所有微小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要比那个庞大的原始问题更容易解决。此时剩下的挑战就是把所有微小问题的答案重新组合起来，这一步的难度往往会大一些，但至少不会像原始问题那么难。

因此，微积分可分为两个步骤：切分和重组。用数学术语来说，切分过程总是涉及无限精细的减法运算，用于量化各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个部分叫作微分学。重组过程则总是涉及无限的加法运算，将各个部分整合成原来的整体，这个部分叫作积分学。

这种策略可用于我们能够想象的做无尽切分的所有事物，这类事物被称作

连续体，据说它们是连续的。比如，正圆的边缘，悬索桥上的钢梁，餐桌上逐渐冷却的一碗汤，飞行中标枪的抛物线轨迹，或者你活着的时光。形状、物体、液体、运动和时间间隔等都是微积分的应用对象，它们全部或者几乎都是连续的。

请注意这个创造性假设背后的真相。汤和钢铁实际上并不连续，尽管在日常生活的尺度上它们看起来是连续的，但在原子或超弦尺度上并非如此。微积分忽略了原子和其他不可切分实体造成的不便，这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假装它们不存在会大有帮助。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那样，微积分偏好有用的虚构。

更广泛地说，被微积分建模为连续体的实体类型，包含了我们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东西。微积分可以描述球如何不间断地滚下斜坡，光束如何在水中连续地传播，蜂鸟的翅膀或飞机机翼周围的连续气流如何使它们在空中飞行，以及患者开始采取药物联合疗法后，他血液中的HIV（人体免疫缺陷病毒）颗粒浓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何持续下降。在每种情况下，微积分采取的策略都一样：先把一个复杂而连续的问题切分成无穷多个简单的部分，然后分别求解，最后把结果组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阐明这个伟大的理念了。

无穷原则

为了探究任意一个连续的形状、物体、运动、过程或现象（不管它看起来有多么狂野和复杂），把它重新想象成由无穷多个简单部分组成的事物，分析这些部分，然后把结果加在一起，就能理解最初的那个整体。

石巨人与无穷

这一切的难点就在于，我们需要和无穷打交道，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谨慎而有限制地利用无穷是微积分的秘诀和它强大的预测能力的来源，但无穷也是微积分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就像《科学怪人》中的怪物或者犹太民间传说中的石巨人一样，无穷往往会挣脱主人的控制。就像所有表现人类狂妄自大的故事一样，怪物不可避免地会攻击创造出它们的人。

微积分的创造者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仍然发现无穷的魅力不可抗拒。当然，它偶尔也会发狂，带来悖论、困惑和哲学灾难。不过，数学家每次都能成功地征服无穷怪物，理顺它的行为，让它重回正轨。最终，一切总会变好；微积分给出了正确答案，有时候就连它的创造者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驾驭无穷并利用它的力量，这种欲望是一条贯穿微积分的2 500年历史的叙事线索。

由于人们常常把数学刻画成精确和绝对理性的学科，所以这些关于欲望和困惑的讨论似乎不太恰当。数学是理性的，但它一开始并非如此。创造力是直觉的产物，而理性则姗姗来迟。相比其他数学学科，在微积分的故事中，逻辑落后于直觉的情况更多。这让微积分显得尤其平易近人，那些研究微积分的天才看起来也和常人差不多。

曲线、运动和变化

无穷原则围绕着方法论主题构建了微积分的故事。但微积分既与方法论有关，也与谜题有关。最重要的是，有三个谜题促进了微积分的发展，它们分别是曲线之谜、运动之谜和变化之谜。

围绕这些谜题的丰硕研究成果，证明了纯粹好奇心的价值。关于曲线、运动和变化的谜题乍看上去可能并不重要，甚至还深奥到令人绝望；但因为它们涉及丰富多彩的概念性问题，再加上数学与宇宙的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这些谜题的解决方案对文明的进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无论是在手机上听音乐，在超市激光扫描仪的帮助下轻松结账走人，还是利用GPS设备找到回家的路，我们都是在收获这些研究带来的好处。

一切都始于曲线之谜。在这里，曲线的含义非常宽泛，指任何形式的曲线、曲面或曲面体，比如橡皮筋、结婚戒指、漂浮的气泡、花瓶的轮廓或者一根意大利香肠。为了让物体尽可能地简单，早期的几何学家通常只专注于探究它们的抽象、理想的曲线形状，而忽略它们的厚度、粗糙度和结构。比如，数学中的球面被想象成一张无限薄且光滑的正圆形膜，而不是像椰子壳那样有厚度、凹凸不平 and 毛茸茸的形状。即使在这些理想化的假设条件下，曲线形状也会带来令人困惑的概念性难题，因为它们并非由平直的部件构成。三角形和正方形很容易理解，立方体也一样，它们都是由直线、平面和几个角连接在一起构成的。计算它们的周长、表面积或体积，也不是一件难事。不管是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还是在古希腊和古代日本，全世界的几何学家都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圆形物体则很棘手。没有人能算出一个球体的表面积或体积有多大，即使是求圆的周长和面积，在古代也是一个难题。人们既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也找不到便于理解的平直部件。总之，所有弯曲的东西都难以捉摸。

微积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萌生于几何学家对圆度的好奇心和挫败感。圆、球体和其他曲线形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喜马拉雅山脉”，这并不是说它们造成了什么重大的实际问题（至少一开始不是），而是说它们激发了人类的冒险精神。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家一样，几何学家之所以想解决曲线问题，是因为它们就在那里。

有些几何学家坚持认为“曲线事实上是由平直部件构成的”，这种观点带来了突破性进展。尽管这不是事实，但我们可以假装它是真的。那么，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这些部件必须无穷小，而且数量无穷多。通过这个巧妙的

构思，积分学诞生了，这是人们对无穷原则的最早应用。我们会用几个章节的篇幅来介绍无穷原则的发展历程，不过它的本质早在萌芽期就简单直观地展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让显微镜的镜头不断接近圆（或其他任何弯曲且光滑的物体），可观测到的那部分曲线看上去就会变得平直。所以，通过加总所有平直的小部件来计算我们想要的曲线形状的相关信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多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都在努力探究这个难题的解决办法。不过，通过共同的努力（有时还伴有激烈的竞争），他们终于在破解曲线之谜上取得了进展。我们将会在第2章中看到，今天与其相关的副产品包括：电脑动画电影中用来绘制逼真的人物头发、服装和面部的数学工具，以及医生在给真正的患者做面部手术之前，先给虚拟患者做手术时用到的计算工具。

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曲线不只是几何变换的结果时，对曲线之谜的探索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曲线是破解大自然奥秘的钥匙，它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飞行球的抛物线轨迹中，也出现在火星围绕太阳旋转的椭圆轨道中。此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显微镜和望远镜蓬勃发展之时，曲线还出现在可根据需要弯曲和聚焦光线的凸透镜中。

于是，人们开始解决第二大谜题，也就是地球上和太阳系中的运动之谜。通过观察和巧妙的实验，科学家在最简单的运动物体中发现了迷人的数值模式。他们测量了钟摆的摆动，记录了球滚下斜坡的加速下降过程，还绘制了行星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这些模式之所以让发现者欣喜若狂（这是真的，当约翰尼斯·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时，他自称陷入了“神明附体的狂热”状态），是因为它们似乎表明一切都出自上帝之手。从更世俗的角度看，这些模式强化了大自然具有深厚的数学根基的主张，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一直坚称的那样。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能解释这些不可思议的新模式，或者至少无法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来解释它们，即使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用算术和几何来完成这项任务。

问题在于，运动是不稳定的。在滚下斜坡的过程中，球的运动速度一直在变；在围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行星的运动方向也一直在变。更糟糕的是，当靠近太阳时行星的运动速度更快，而当远离太阳时它们的运动速度减慢。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以不断变化的方式不停改变的运动。早期的数学家已经得出了描述最简单运动——匀速运动——的数学公式，即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但是，当速度改变而且是持续不断地改变时，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事实证明，运动跟曲线一样，也是一座概念上的珠穆朗玛峰。

我们将在本书的中间章节里看到，微积分的下一次重大进步源于对运动之谜的探索。就像在破解曲线之谜时一样，无穷原则再次挺身而出。这一次，我们的创造性假设是，速度不停变化的运动是由无穷多个无限短暂的

匀速运动组成的。为了直观地说明这句话的意思，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一辆由新手司机驾驶的汽车里，车速忽快忽慢。你紧张地盯着车速里程表，它的指针随着汽车的每一次颠簸而上下移动。但在1毫秒（0.001秒）内，即便是驾车技术最差的人也无法让车速里程表的指针大幅移动。那么，在比1毫秒短得多的时间间隔（无穷小的时间间隔）内，指针根本不会移动，因为没人能那么快地踩油门。

这些想法共同构成了微积分的前半部分——微分学。它不仅是在研究不断变化的运动时处理无穷小的时间和距离变化所需的理论，也是在解析几何（主要研究由代数方程定义的曲线，在17世纪上半叶风靡一时）中处理无穷小的曲线平直部件所需的理论。的确，代数曾一度令人疯狂。它的普及及对包括几何学在内的所有数学领域来说都是一大福祉，但它也创造出诸多难以驾驭的新曲线，有待人们去探索。17世纪中期，位于微积分舞台中央的曲线之谜和运动之谜相互撞击，在数学界引发了混乱和困惑。走出喧嚣之后，微分学渐趋成熟，但仍有争议。有些数学家因为草率地利用无穷而受到批评，有些数学家则嘲笑代数就是一堆符号的拼接。在这样的争吵声中，微积分的发展时断时续，非常缓慢。

之后，有一个孩子在圣诞节那天出生了。这个微积分的拯救者年幼时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英雄：他是一名早产儿，没有父亲，3岁时又被母亲遗弃了。想法消沉的孤寂男孩就这样长成了沉默寡言、猜疑心重的年轻人，不过，名叫艾萨克·牛顿的他日后会在世界上留下空前绝后的印记。

他先是解决了微积分的“圣杯”问题，发现了将曲线的各个部件重新组合起来的方法，而且是简单、快速和系统性的方法。通过把代数的符号与无穷的力量结合起来，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任何曲线都表示成无穷多条简单曲线（用变量 x 的幂来描述，比如 x^2 、 x^3 、 x^4 等）的和。仅用这些“食材”，通过加一点儿 x 、少许 x^2 和满满一汤匙 x^3 ，他就可以“烹饪”出他想要的任何曲线。它好像一个主配方，使调味品、肉和菜合而为一。有了它，牛顿就能解决关于形状或运动的任何问题。

之后，他破解了宇宙密码。牛顿发现，任何类型的运动都可以分解为每次移动一个无穷小步，而且每个时刻的变化都遵循用微积分语言表述的数学定律。他仅用几个微分方程（他的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就能解释包括炮弹的飞行轨迹和行星的运行轨道在内的所有现象。牛顿的惊人的“世界体系”统一了天和地，掀起了启蒙运动，改变了西方文化，对欧洲的哲学家和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和《独立宣言》的起草。在我们的时代，当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非裔美国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及其同事（小说和热门电影《隐藏人物》中的女主人公）设计宇宙飞船的飞行轨道时，牛顿的思想为她们提供了必要的数学计算方法，从而巩固了太空计划的基础。

在破解了曲线之谜和运动之谜后，微积分转向了它的第三个由来已久的谜题——变化之谜。永恒不变的唯有改变，尽管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但它依然是真理。比如，今天是雨天，明天是晴天；今天股票市场上涨，明天股票市场下跌。受到牛顿范式的鼓励，后来的微积分研究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否存在类似于牛顿运动定律的变化规律？有没有适用于人口增长、流行病传播和动脉中血液流动的定律？微积分可用于描述电信号沿神经纤维传导的方式，或者预测公路上的交通流量吗？

在执行这项宏大计划的过程中，微积分一直在与其他科技领域合作，为实现世界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通过观察和实验，科学家得出了变化定律，然后利用微积分求解并做出预测。比如，1917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将微积分应用于一个简单的原子跃迁模型，从而预测出一种被称为受激发射^[1]的神奇效应。他对这种效应进行了理论阐述：在某些情况下，穿过物质的光能激发出更多波长相同和传播方向相同的光，并通过一种连锁反应产生大量的光，形成强烈的相干光束。几十年后，这个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一台可运行的激光器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成，从那时起，光盘播放机、激光制导武器、超市的条形码扫描仪和医用激光器等设备都离不开激光。

变化定律在医学领域并不像在物理学领域那样为人熟知。然而，即便被应用于基本模型，微积分也能对挽救生命做出贡献。比如，我们在第8章会看到一个由免疫学家和艾滋病研究者建立的微分方程模型，在针对HIV感染者的现代三联疗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模型提供的见解推翻了“病毒在人体内处于休眠状态”的主流观点；事实上，病毒每时每刻都在与人体免疫系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微积分提供的这种新认识的帮助下，至少对那些有机会采取联合疗法的人来说，HIV感染已经从几乎被判了死刑的疾病转变为可控制的慢性疾病。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身处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它的某些方面超出了无穷原则固有的近似性和出自主观愿望的想法。比如，在亚原子领域，物理学家不能再把电子想象成像行星或炮弹那样沿光滑路径运动的经典粒子。根据量子力学，在微观尺度上，电子的运动轨迹会发生抖动，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确定，所以我们需要将电子的行为描述成概率波，它不再遵循牛顿运动定律。然而，在我们做了这样的处理后，微积分又一次胜利归来，它通过薛定谔方程描述了概率波的演化过程。

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却是事实：即使在牛顿的物理学行不通的亚原子领域，他的微积分也依然有效。事实上，它的表现相当出色。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微积分与量子力学共同预测出医学成像的显著效果，为MRI（磁共振成像）、CT（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和更加神奇的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奠定了基础。

现在是时候去更深入地了解宇宙的语言了，当然，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是“无穷”站。

[1] stimulated emission: Ball, “A Century Ago Einstein Sparked,” and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original paper is Einstein, “Zur Quantentheorie der Strahlung.”

第1章 无穷的故事

数学的诞生^[1]建立在日常事务的基础之上：牧羊人需要记录羊群的数量，农夫需要给收获的粮食称重，税吏需要确定每个农民应向国王上缴多少牛或鸡，等等。出于这样的实际需求，数字被发明出来。一开始人们用手指和脚趾计数，后来他们用动物骨头上的划痕计数。随着数字的表现形式从划痕演变成符号，不管是税收和贸易，还是会计工作和人口普查，都便利了许多。在有5 000多年历史的美索不达米亚泥板文书上，一排排用楔形文字记录的账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数字演化历程的证据。

除了数字，形状也很重要。在古埃及，线和角的测量是最重要的事。每年夏季，在尼罗河的洪水泛滥过后，土地测量员必须重新划定农田的边界线。后来，人们基于这项活动给研究形状的领域起了个名字：几何学。

起初，几何学研究的都是棱角分明的形状。它对直线、平面和角的偏爱反映出它的实用主义起源，比如，斜坡多为三角形，纪念碑和坟墓多为棱锥体，桌面、圣坛和田地则多为矩形。建造者和木匠使用铅垂线时要依靠直角。对水手、建筑师和神父来说，无论是勘测、航海、遵循历法、预测日食或月食，还是建造庙宇和神殿，关于直线的几何知识都必不可少。

尽管几何学执着于平直性，但有一种曲线总是十分引人注目，它就是最完美的曲线——圆。在树木的年轮、池塘的涟漪、太阳和月亮的形状中，我们都能看到圆。圆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当我们凝视圆的时候，圆实际上也在注视着我们，因为它们就在我们所爱之人的眼睛里，在他们的瞳孔和虹膜的圆形轮廓中。圆不仅涵盖了实用物品和情感信物（比如车轮和婚戒），还很神秘。它们的永恒轮回让人联想到季节的循环、转世、永生和无尽的爱，难怪从人类研究形状开始，圆就一直备受关注。

在数学上，圆体现的是没有变化的变化。一个点绕圆周运动，尽管它的方向一直在变，但它到圆心的距离始终不变。这是一种微小的变化，也是一种得到曲线的最微不足道的方式。当然，圆还具有对称性。如果你让一个圆绕它的圆心旋转，那么它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旋转对称性可能就是圆无处不在的原因，每当大自然的某个方面不在意方向时，圆就一定会出现。想想雨滴落进水坑里会发生什么：微小的涟漪从落点向外扩展。因为涟漪朝各个方向扩散的速度都一样，而且它们都从同一个点出发，所以它们必定是圆形的。这是对称性的要求。

圆也可以产生其他曲线形状。如图1-1所示，假如我们把一个圆沿其直径串在一根竹签上，然后在三维空间中绕着那根竹签旋转这个圆，就会形成

一个球体，即地球仪或者球的形状。当一个圆沿着与其所在平面成直角的直线垂直移动并进入第三维度时，就会形成一个圆柱体，即罐头或者帽盒的形状。如果这个圆在垂直移动的过程中逐渐变小，就会形成一个圆锥体；如果它在垂直移动的过程中逐渐变大，就会形成一个截锥体，即灯罩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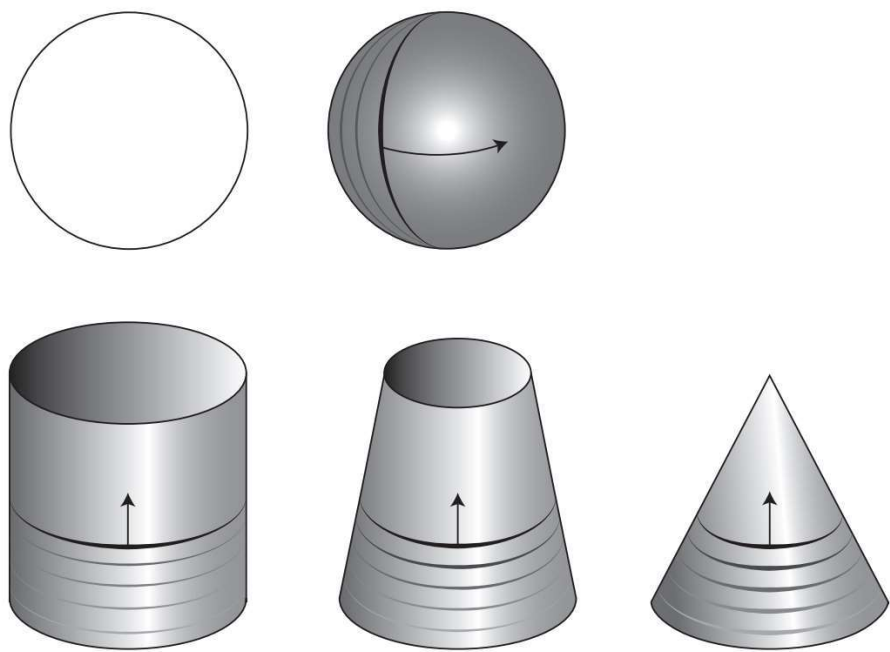


图1-1

尽管早期的几何学家对圆、球体、圆柱体和圆锥体很感兴趣，但他们发现，相比三角形、矩形、正方形、立方体及其他由直线和平面构成的直线形状，曲线形状分析起来要困难得多。他们想知道曲面的面积和曲面体的体积，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简言之，圆度难住了他们。

[1] beginnings of mathematics: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Katz,History of Mathematics, provide gentle yet authoritative introductions to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wentieth cen tury.At a more advanced mathematical level,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is excellent.For a wide-ranging humanistic treatment with a healthy dose of crotchety opinion thrown in,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is

delightful.

作为桥梁的无穷

微积分最初是几何学的产物^[1]。在公元前250年左右的古希腊，掀起了一小股解决曲线之谜的数学热潮。这些爱好者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利用无穷在曲线形状和直线形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他们希望当这种联系建立起来的时候，直线几何学的方法和技巧可以跨越这座桥梁，为破解曲线之谜贡献力量。在无穷的帮助下，所有古老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至少，他们设定的目标是这样的。

当时，这个计划看起来一定相当牵强。无穷的名声备受质疑，除了可怕得要命以外，人们觉得它一无是处。更糟糕的是，它模糊不清，令人困惑。它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数字，一个地方，还是一个概念？

不过，我们很快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无穷其实是一件天赐之物。考虑到最终来源于微积分的所有发现和技术，利用无穷解决复杂的几何问题一定是自古以来最棒的想法之一。

当然，公元前250年的人们根本无法预见到这一点。然而，无穷很快就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其中第一次和最好的一次是，它解决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谜题：如何求圆的面积。

[1] an outgrowth of geometry: See section 4.5 of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chapters 2 and 3 in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chapter 4 in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比萨证明

在开始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前，我先简述一下论证过程。它的策略是，把圆想象成一个比萨，然后把比萨切分成无穷多块，最后神奇地将比萨块排布成一个矩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算出圆的面积了，因为移动比萨块显然不会改变它们原来的面积，而且我们知道如何求矩形的面积：长乘以宽。其结果就是圆的面积[\[1\]](#)公式。

为了便于论证，这个比萨必须是数学意义上的理想比萨，它完全平坦，为正圆形，而且饼皮无限薄。它的周长（用字母 C 表示）是饼皮外缘的长度，可以通过绕饼皮一周来测量。周长通常不是比萨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想知道，可以用卷尺测量出 C 的值（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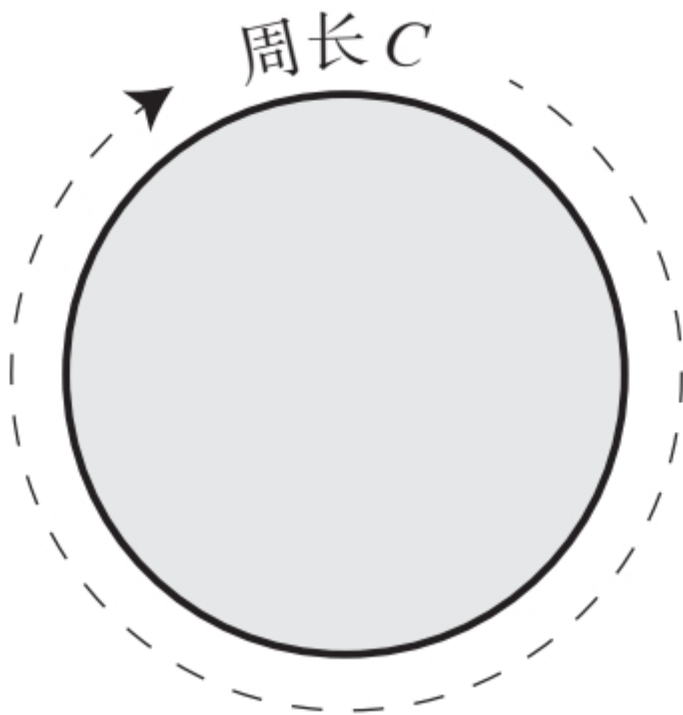


图1-2

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量是比萨的半径 r ，它的定义是从比萨的中心到其外

缘上的任意一点的距离。特别要说明的是，如果所有比萨块都是等大的，而且是从中心切到外缘，那么 r 也是每个比萨块的直边长度（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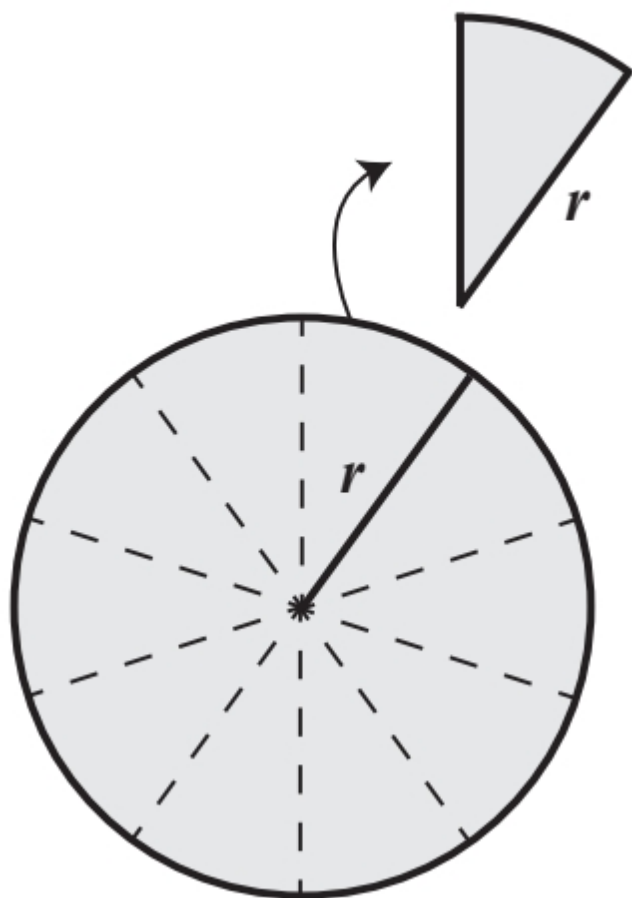


图1-3

假设我们把比萨切成4等份。尽管我们可以用图1-4所示的方法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但看上去不太可能计算出它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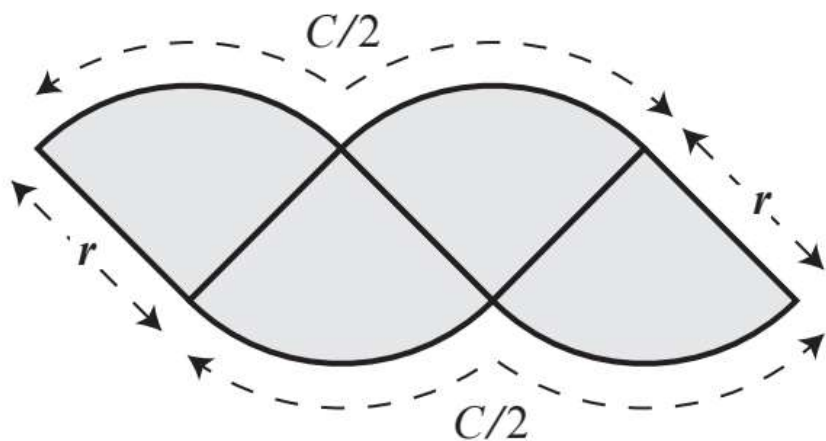


图1-4

这个新形状看起来像球根，它的顶边和底边都呈奇怪的荷叶边状。它当然不是一个矩形，所以我们很难猜出它的面积。我们似乎在倒退，但就像所有戏剧惯用的套路那样，在获胜之前英雄都免不了身陷困境。戏剧张力正在积累当中。

不过，即使被困于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两件事，因为它们在整个论证过程中都成立，而且最终会给出我们要找的那个矩形的尺寸。第一件需要注意的是，比萨饼皮外缘的 $1/2$ 变成了新形状的弯曲顶边，另外 $1/2$ 则变成了底边。所以，新形状的顶边和底边的长度都等于比萨周长的 $1/2$ ，即 $C/2$ （图1-4）。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长度最终会变成矩形的长。第二件需要注意的是，球根形状的斜直边正是原始比萨块的直边，所以它们的长度依然是 r 。这个长度最终会变成矩形的宽。

我们之所以还没看到关于期望矩形的任何迹象，是因为我们切分的比萨块不够多。如果我们把比萨切成8等份，然后按照图1-5所示的方式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得到的图形看上去就会更接近于矩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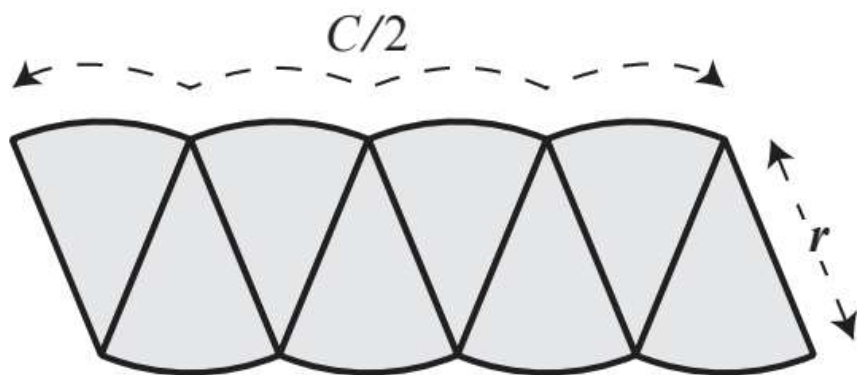


图1-5

事实上，这个比萨开始有点儿像平行四边形了。结果还不错，至少它正在逼近一个由直线围成的图形。新形状的顶边和底边也不像之前那样弯弯曲曲了，我们切分的比萨块的数量越多，它们就会变得越扁平。和之前一样，顶边和底边的长度还是 $C/2$ ，斜边长度为 r 。

为了使整个图形更加规整，我们可以把最左侧的比萨块纵向切成等大的两部分，然后把其中一部分移到最右侧（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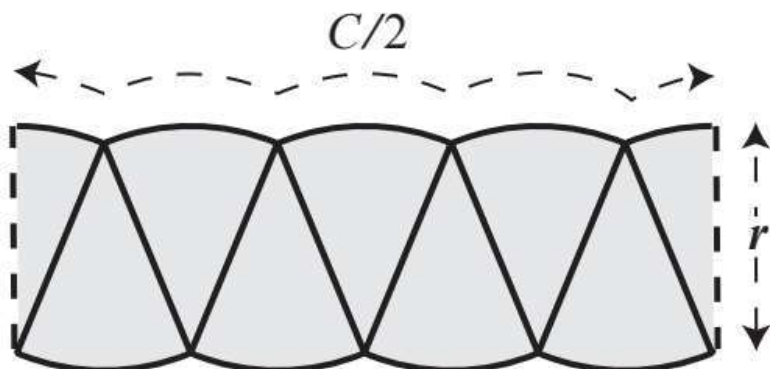


图1-6

现在这个形状看起来就很像矩形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不够完美，因

为饼皮的曲率导致该形状的顶边和底边呈荷叶边状，但至少我们在进步。

既然切分出更多比萨块似乎有所帮助，我们就继续切吧。在我们把比萨分成16等份，并像之前一样对最左侧的那块进行处理后，就会得到图1-7所示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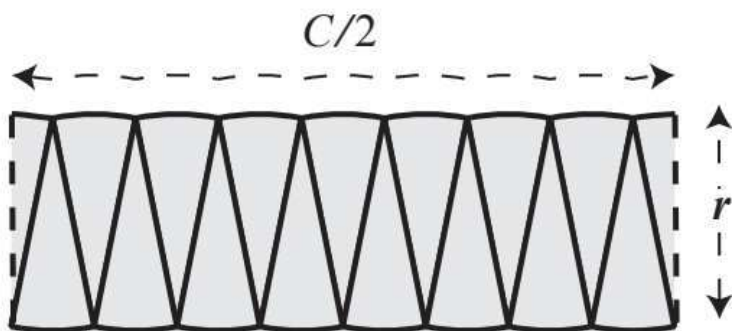


图1-7

我们切的份数越多，由比萨饼皮外缘产生的荷叶边状的顶边和底边就会变得越扁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到一系列形状，它们都魔法般地趋近某个矩形，我们称该矩形为极限矩形（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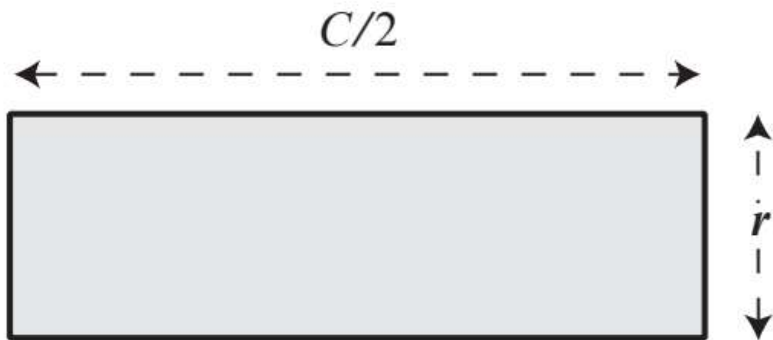


图1-8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算出这个极限矩形的面积，即让它的长和宽相乘。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根据圆的尺寸找出矩形的长和宽了。由于比萨块都是竖直排列的，所以矩形的宽就是比萨的半径 r 。矩形的长等于比萨周长的 $1/2$ ，这是因为在处理新形状的每个中间阶段，比萨饼皮外缘的 $1/2$ 变成了矩形的顶边，另外 $1/2$ 则变成了底边。因此，矩形的长等于比萨周长的 $1/2$ ，即 $C/2$ 。综上所述，极限矩形的面积可以用它的长乘以宽得出，即 $A = r \times C/2 = rC/2$ 。而且，由于移动比萨块不会改变它们的面积，所以极限矩形的面积也一定是原始比萨的面积！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圆的度量》中首次证明了圆的面积为 $A = rC/2$ ，他的论证过程与上文讲述的方法类似，但更加严谨。

就这个论证过程而言，最具创新性的方面在于无穷发挥作用的方式。当我们只把比萨分成4等份、8等份或16等份时，最好的情况不过是把比萨重新排布成一个有荷叶边的不完美形状。在经历了不太乐观的开端之后，我们切分的比萨块的数量越多，得到的新形状就越接近于矩形。但只有在我们把比萨切分成无穷多块的极限情况下，它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矩形。这就是微积分背后的伟大思想，在无穷远处，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

[1] area of a circle: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1.5, discusses ancient estimates of the area of a circle made by various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The first proof of the formula was given by Archimedes using the method of exhaustion; see Dunham, Journey Through Genius, chapter 4, and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91–93.

极限与墙之谜

极限就像一个达成不了的目标，你可以离它越来越近，但你永远无法实现它。

比如，在比萨证明中，通过切分出足够多的比萨块并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布，我们可以使有荷叶边的新形状越来越接近于矩形。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的矩形，而只能接近那种完美状态。幸运的是，在微积分中，极限的不可到达性往往无关紧要。通过想象我们能到达极限，然后看看这种想象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可以解决手头的问题。事实上，微积分领域的许多最伟大的先驱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伟大的发现。他们并不是依靠逻辑，而是依靠想象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极限是一个微妙的概念，它也是微积分的核心概念。它之所以难以解释，是因为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最贴切的类比可能是墙之谜：如果你走过了你和墙之间距离的 $1/2$ ，再走剩下距离的 $1/2$ ，接着走剩下距离的 $1/2$，你最终能到达墙根吗？（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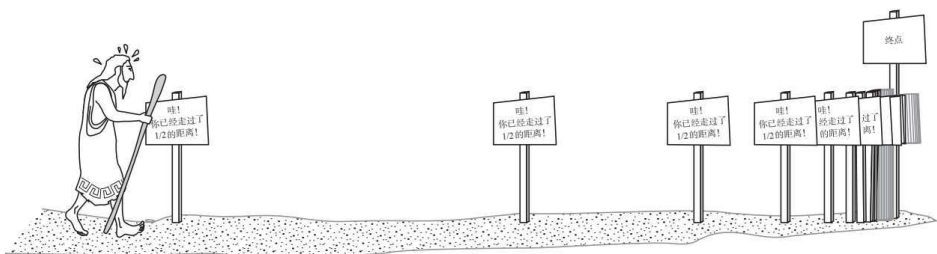


图1-9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墙之谜明确规定，你每次只能走你和墙之间距离的 $1/2$ ，而不是全部。不管你走了10次、100万次还是多少次，你和墙之间总会有间隙。但同样明显的是，你可以任意地接近这堵墙。也就是说，通过足够多次的努力，你可以走到离墙1厘米、1毫米、1纳米（ 10^{-9} 米），或者其他更小但不为0的距离范围内，但你永远无法真正走到墙根处。在这里，墙扮演的就是极限的角色。人们花费了大约2 000年的时间，才给极限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而在此之前，微积分领域的先驱只能依靠直觉。所以，即使你现在对极限的感觉还很模糊，也无须担心。通过分析一些实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从现代的角度看，极限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整个微积分领域的基石。

如果墙的比喻显得太过冷酷无情（谁会愿意去接近一堵墙呢？），不妨试试这个类比：任何接近极限的过程都像一位英雄在进行无止境的探索。它和西西弗斯面对的毫无希望的任务（他因触犯众神而受到惩罚，要把一块巨石滚上山顶，再眼睁睁地看着它滚下去，如此反反复复、无休无止）不同，这并非徒劳无功之举。当某个数学过程朝着某个极限逼近（比如，有荷叶边的形状趋近极限矩形）时，就好像故事的主人公正在为一个他明知道不可能实现但仍抱持着成功希望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种希望是由他在竭力接近目标的过程中取得的稳步进展激发产生的。

0.333...的故事

为了强化“在无穷远处，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和“极限就像无法实现的目标”之类的伟大思想，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算术实例。这是一个将分数（比如 $1/3$ ）转换为等值小数（在本例中， $1/3 = 0.333\dots$ ）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我八年级的数学老师斯坦顿女士教过我们这类问题的计算方法。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是因为她突然讲到了无穷。

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个成年人提及无穷。我的父母当然用不到它，它似乎是一个只有孩子才知道的秘密。在操场上，它总是以嘲弄和抬杠的方式出现。

“你是个混蛋！”

“是啊，好吧，你是两倍的混蛋！”

“你是无穷倍的混蛋！”

“你是无穷加一倍的混蛋！”

“那和无穷倍是一样的，你这个笨蛋！”

这些有启发意义的对话让我确信，无穷的行为和普通数字不一样。当你给它加上1的时候，它不会变大，即使给它加上无穷也是这样。它的这种所向披靡的属性极其适用于终结校园内的争论，谁抢先使用它，谁就赢了。

但在斯坦顿女士提到无穷之前，没有其他老师跟我们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已经知道有限小数了，因为它们常被用来表示金额，比如10.28美元的小数点后就有两位数。相比之下，无穷小数的小数点后有无穷位数，尽管它们乍看上去很奇怪，但和分数结合起来讨论就显得很自然了。

我们知道分数 $1/3$ 也可以写成 $0.333\dots$ ，最后的三个点表示无限重复的“3”。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当我试着用长除法计算 $1/3$ 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1不够被3除，所以假设1是10，那么10除以3等于3余1；现在我回到了起点，又要拿1去除以3。我无法跳出这个循环，这就是在 $0.333\dots$ 中“3”不断重复的原因。

关于 $0.333\dots$ 末尾的三个点，有两种解释。其中，朴素的解释是，在小数点右边确实肩并肩地排列着无穷多个“3”。当然，正因为有无穷多个“3”，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写下来，而改用三个点表示它们都在那里，或者至少在我们的脑海中。我把这种解释称为实无穷解释，在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思考无穷含义的情况下，它的优点是看上去简单明了、符合常理。

复杂的解释是， $0.333\dots$ 代表极限，就像在比萨证明中极限矩形是有荷叶边形状的极限，或者墙是倒霉步行者的极限一样。只不过，这里的 $0.333\dots$ 代表对分数 $1/3$ 进行除法运算后得到的连续小数的极限。随着除法运算的不断进行，在 $1/3$ 的小数展开式中会产生越来越多的“3”。通过努力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尽可能接近 $1/3$ 的近似值。如果对 $1/3 \approx 0.3$ 的结果不满意，那么我们可以再算一步得到 $1/3 \approx 0.33$ ，以此类推。我把这种解释称为潜无穷解释，其中的“潜”意味着近似值的小数位数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增多。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进行100万次、10亿次或者更多次数的除法运算。这种解释的优点是，我们永远不必引入像无穷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概念，而可以继续利用有限的概念。

在处理像 $1/3 = 0.333\dots$ 这样的等式时，我们采取哪种观点其实并不重要。它们同样站得住脚，而且在我们想进行的任何计算中都能得出相同的数学结果。但在数学领域，还存在实无穷解释可能会导致逻辑混乱的其他情况，这就是我在引言中提及无穷像怪物一样恐怖时所表达的意思。对于某个过程产生的不断接近极限的结果，无穷有时候确实会让我们形成不同的看法。但假装这个过程已经结束，并且以某种方式到达了无穷境界，我们偶尔也会因此陷入麻烦。

无穷多边形的故事

举一个烧脑的例子。假设我们在一个圆上画一定数量的点，并使其均匀分布，然后用直线将它们相互连接起来。如果画3个点，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等边三角形；如果画4个点，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正方形；如果画5个点，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五边形；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画出一连串的直线形状，它们被称为正多边形（图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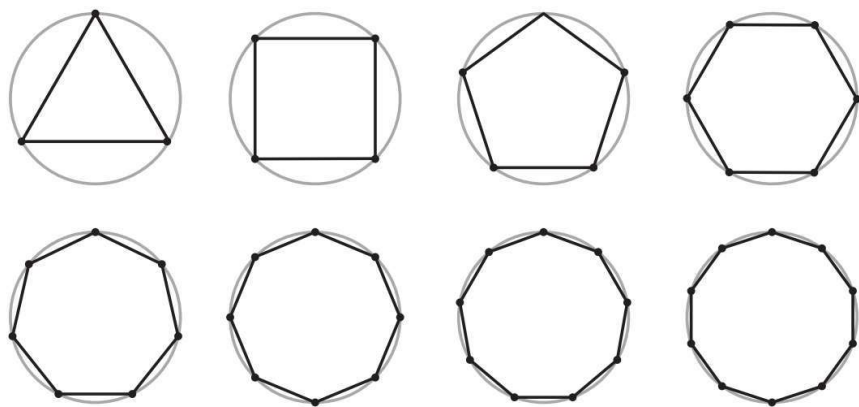


图1-10

请注意，我们画的点越多，得到的多边形就会越接近于圆形。与此同时，它们的边越来越短，数量越来越多。当我们按照边数从少到多的次序逐步推进时，多边形就会越来越接近于作为极限的原始圆。

于是，无穷再次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这一次，它把我们从直线的世界带到了圆的世界，将棱角分明的多边形变成了如丝般光滑的圆形。而在比萨证明中，无穷则把我们从圆的世界带到了直线的世界，因为它把圆变成了矩形。

当然，在任何有限的阶段，多边形仍然只是多边形，它们还不是圆，也永远不会变成圆。尽管它们越来越接近于圆，但它们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潜无穷，而不是实无穷。所以，从逻辑严密性的角度看，一切都无懈可击。

但如果多边形的边数不断逼近实无穷，会怎么样？最终得到的边长无限短

的无穷多边形真的是一个圆吗？这种想法颇具吸引力，因为到那时多边形会变得光滑，它的所有角都被磨平了，看上去一切皆完美。

无穷的魅力和危险

有这样一个普遍经验：极限通常比逼近它们的近似值简单。圆比所有接近它的多边形（有很多突起）都更简单，也更优美。同样地，在比萨证明中，极限矩形比有荷叶边的形状（有难看的隆起和尖点）更简单，也更优雅。对分数 $1/3$ 来说亦如此，它比所有逼近它的笨拙分数都更简单，也更悦目，因为后者的分子和分母大而丑陋，比如 $3/10$ 、 $33/100$ 和 $333/1000$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极限形状或极限数字都比其有限的近似物更简单，也更具对称性。

这就是无穷的魅力，在无穷远处，一切都变得更好了。

知道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无穷多边形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孤注一掷地说，圆就是一个有无穷多条无穷短边的多边形呢？不，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也绝对不能屈服于这种诱惑，否则就会犯下实无穷的错误，并被推入逻辑的地狱。

为了说明原因，假设我们暂时接受了这个想法，即圆确实是一个边长无限短的无穷多边形。那么，这些边究竟有多长呢？长度为0吗？如果是这样，无穷乘以0（所有边的长度之和）就一定等于圆的周长。但假设现在又出现一个周长加倍的圆，那么无穷乘以0也必定等于这个更大的周长。于是，无穷乘以0既等于前一个圆的周长，又等于后一个圆的周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我们找不到定义无穷乘以0的一致性方法，将圆视为无穷多边形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尽管如此，这种直觉还是有些许吸引力的。就像《圣经》中的原罪一样，微积分的原罪——把圆看作边长无穷短的无穷多边形的诱惑——也让人无法抗拒，它利用禁忌知识的前景和借助一般手段无法获得的洞见诱惑着我们。几千年来，几何学家一直在努力计算圆的周长。如果圆可以被由许多条微小直边构成的多边形替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数学家一边听着巨蛇的嘶嘶声，一边努力克制着原罪的诱惑，通过利用潜无穷而不是更吸引人的实无穷，找到了解决圆的周长问题和其他曲线之谜的方法。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更深刻地了解实无穷究竟有多危险。它会引发许多其他错误，包括老师常常告诫我们不要犯的一个错误。

除数为0的禁忌

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学过，0绝对不能做除数。他们可能会对这样一种禁忌的存在感到震惊，毕竟数字应该是井然有序、处处通用的，数学课也是一个充斥着逻辑和推理的场合。然而，对于数字，我们仍有可能提出一些无用或无意义的简单问题，除数为0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无穷。除数为0会召唤出无穷，据说这和用通灵板从另一个世界召唤出灵魂的方式差不多。真是太危险了，千万别去尝试。

那些忍不住想知道为什么无穷会潜伏在阴影中的人，可以尝试用6去除以一个接近0但不完全等于0的数字，比如0.1。这样做毫无问题，6除以0.1等于60，商是一个较大的数字。我们再用6去除以一个更小的数字，比如0.01，商会变得更大，等于600。如果我们敢用6去除以一个更加接近0的数字，比如0.000 000 1，商就会变大很多，不再是60或600，而是60 000 000。趋势很明显：除数越小，商越大；当除数逼近0时，商趋于无穷大。这就是我们不能用0做除数的真正原因。胆小之人会说答案是“未定义”，但事实上答案是“无穷”。

整个计算过程可以用图1-11表示出来。假设我们要把一条6厘米长的线段切分成长度为0.1厘米的小线段，这60条小线段首尾相接就组成了那条原始线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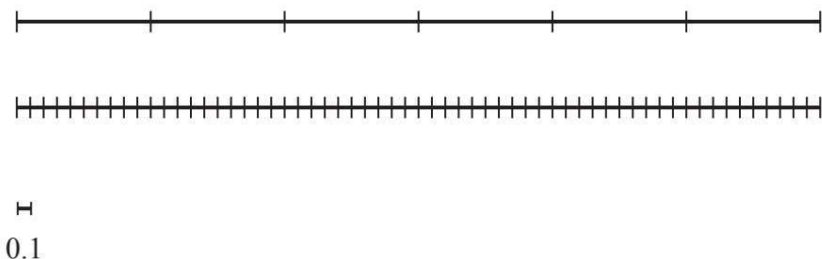


图1-11

同样地（但我不打算在图上把它们画出来），同一条线段还可以被分成600段，每段长0.01厘米，或者被分成60 000 000段，每段长0.000 000 1厘米。

如果我们像这样疯狂地继续分下去直到极限，就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这条6厘米长的线段是由无穷多条长度为0的线段组成的。这听起来可能合情合理，毕竟线是由无穷多个点组成的，而且每个点的长度为0。

但从哲学上看，令人紧张不安的一点是，同样的论证过程适用于任意长度的线段。的确，数字6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可以宣称，一条长3厘米、49.57厘米或者2 000 000 000厘米的线段是由无穷多个长度为0的点组成的。显而易见，0乘以无穷可以得出任意结果：6，3，49.57或者2 000 000 000。从数学上讲，这太可怕了。

实无穷之罪

致使我们陷入这种混乱局面的“罪行”是，假装我们真能到达极限，并把无穷当作一个可达到的数字。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1]就警告说，在无穷的问题上犯这样的错误可能会招致各种逻辑悖论。他强烈反对实无穷^[2]，并认为只有潜无穷才有意义。

在切分线段的例子中，潜无穷意味着，尽管这条线段可以被分成任意多段，但数量总是有限的，每小段的长度也都不为0。这种做法是完全允许的，不会带来任何逻辑问题。

而禁忌的做法是，继续切分下去，直到这条线段被分成实无穷段，并且每小段的长度为0。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会招致谬论，比如在切分线段的例子中，我们得出了0乘以无穷可以等于任意数的结论。所以，他不允许在数学和哲学中使用实无穷。在接下来的2 200年里，他的这条“法令”得到了数学家的支持。

在史前时期的黑暗角落里，有人意识到数字是无尽的。伴随着这样的想法，无穷诞生了，它是我们心灵深处、无底噩梦和永生愿望中的某些东西的数字对应物。无穷也是我们的很多梦想、恐惧和未解之谜的核心：宇宙有多大？永远是多久？上帝有多强大？几千年来，在人类思想的每一个分支，从宗教、哲学、科学到数学，无穷一直困扰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它被放逐和取缔，人们都对它避之不及，始终把它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在宗教裁判所，乔尔丹诺·布鲁诺^[3]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他认为上帝以其无穷的力量创造了不计其数的世界。

[1] Aristotle: Henry Mendell, “Aristotle and Mathematic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7/entries/aristotle-mathematics/>.

[2] completed infinity: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56, and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54, discuss Aristotle’s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leted (or actual) infinity and potential infinity.

[3] Giordano Bruno: Drawing on new evidence, Martínez, Burned Alive, argues that Bruno was executed for his cosmology, not his theology. Also see A.A. Martínez, “Was Giordano Bruno Burned at the Stake for Believing in Exoplanets?,” Scientific American (2018),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

observations/was-giordano-bruno-burned-at-the-stake-for-believing-in-exoplanets/.See also D.Knox, "Giordano Bruno,"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runo/>.

芝诺悖论

早在布鲁诺被烧死的大约2 000年前，有一位勇敢的哲学家就开始思考无穷问题了。芝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悖论，无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这些难题预示了微积分的核心思想，至今仍备受关注。伯特兰·罗素认为，它们无比巧妙和深奥。^[1]

我们并不确定芝诺试图用他的悖论证明些什么，因为他什么记录都没有留下。芝诺悖论是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流传至今的，而这两位哲学家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它们。根据他们的讲述，芝诺试图证明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芝诺看来，尽管感官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但它实际上欺骗了我们；改变是一种错觉。

在芝诺悖论^[2]中，有三个尤其知名和有影响力。第一个是二分法悖论，它与墙之谜类似，但更加令人沮丧。该悖论认为你根本无法移动，因为在你走一步之前，你需要先走 $1/2$ 步；在你走 $1/2$ 步之前，你需要先走 $1/4$ 步，以此类推。所以，你非但走不到墙根处，甚至没办法出发。

这是一个绝妙的悖论。谁能想到，走一步竟然需要完成无穷多项子任务呢？更糟糕的是，我们找不到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第一项任务不可能是走 $1/2$ 步，因为在那之前你必须先走 $1/4$ 步，而在你走 $1/4$ 步之前你必须先走 $1/8$ 步，以此类推。如果你认为自己在做早餐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可以想象成你必须完成无穷多项任务之后才能到达厨房。

第二个是阿喀琉斯与乌龟悖论。它认为，在跑步比赛中，如果跑得慢的乌龟的起跑点更靠前，那么跑得快的阿喀琉斯就追不上乌龟（图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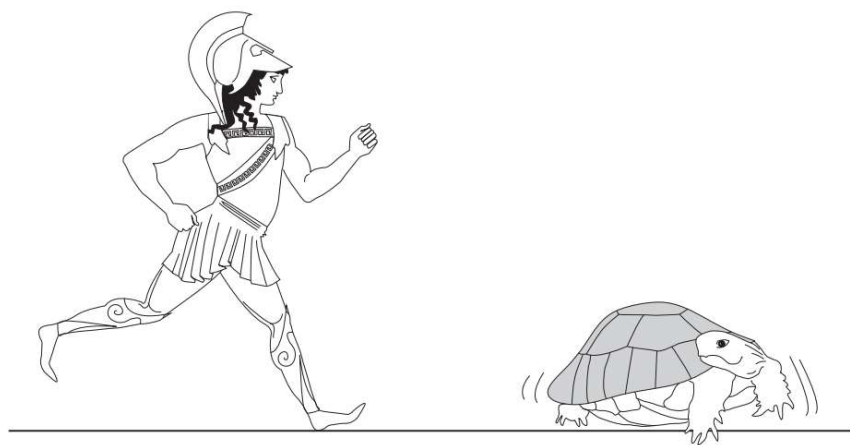


图1-12

原因在于，当阿喀琉斯到达乌龟的起跑点时，乌龟会沿着跑道向前移动一点儿；当阿喀琉斯到达那个新位置时，乌龟又会往前爬一点儿。然而，我们却认为跑得快的选手能赶超跑得慢的选手，这要么是因为感官在欺骗我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关于运动、空间和时间的推断有误。

在这两个悖论中，芝诺似乎驳斥了“空间和时间从根本上说是连续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无休止地分割）这一观点。他巧妙地利用了反证法（有人说这是他发明的），律师和逻辑学家把这种修辞策略称为“归谬法”。芝诺先假设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然后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一个悖论，进而推断出连续性假设一定是错误的。而微积分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所以这场斗争至关重要。通过指出他的推理过程中的错误，微积分对芝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以下是微积分应对阿喀琉斯与乌龟悖论的方法。假设乌龟的起跑点在阿喀琉斯前方10米处，但阿喀琉斯的跑步速度是乌龟的10倍（比如他的速度是每秒10米，而乌龟的速度是每秒1米）。然后，阿喀琉斯花1秒的时间追平了起跑时乌龟领先他10米的优势。与此同时，乌龟会向前移动1米。阿喀琉斯需要再花0.1秒来追平这个差距，到那时乌龟会再向前移动0.1米。继续这个推理过程，我们将会看到阿喀琉斯连续追赶乌龟所花的时间加起来是一个无穷级数：

$$1 + 0.1 + 0.01 + 0.001 + \dots = 1.111\dots \text{秒}$$

把这个时间量换算成一个等值分数—— $10/9$ 秒，它就是阿喀琉斯赶超乌龟需要花的时间。虽然芝诺对于阿喀琉斯要完成无穷多项任务的判断是对

的，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就像计算结果表明的那样，阿喀琉斯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任务。

这个推理思路可以作为微积分的论证过程。就像我们在前文中讨论为什么 $0.333... = 1/3$ 的做法一样，我们只是对一个无穷级数求和并计算出一个极限。但凡涉及无穷小数，我们就是在做微积分运算（尽管大多数人都会贬低它是中学算术）。

顺便说一下，微积分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我们还可以运用代数方法。为了解题，我们需要先确定在比赛开始后的任意时刻 t 秒，每个参赛者在跑道上的位置。由于阿喀琉斯的速度是每秒10米，而且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所以他跑过的距离是 $10t$ 。对乌龟来说，它在起跑时领先阿喀琉斯10米，而且它的速度是每秒1米，所以它与阿喀琉斯的起跑点之间的距离是 $10 + t$ 。要用代数方法求解阿喀琉斯和乌龟同时到达同一位置所需的时间，就必须让这两个表达式相等，由此得到的方程是：

$$10t = 10 + t$$

为了求解这个方程，我们先在等式两边同时减去 t ，得到 $9t = 10$ 。然后，等式两边同时除以9，得到 $t = 10/9$ 秒，这与我们用无穷小数换算得出的结果相同。

所以从微积分的角度看，阿喀琉斯与乌龟问题中确实不存在悖论。如果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1] immeasurably subtle and profound: Russell's essay on Zeno and infinity is "Mathematics and the Metaphysicians," reprinted in Newma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vol.3, 1576–90.

[2] Zeno's paradoxes: Mazur, *Zeno's Paradox*. See also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01–2;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2.3.3;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54; John Palmer, "Zeno of Elea,"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7/entries/zeno-elea/>; and Nick Huggett, "Zeno's Paradoxe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radox-zeno/>.

芝诺悖论走向数字化

第三个是飞矢不动悖论，芝诺用它来驳斥另一种可能性，即空间和时间从根本上说是离散的，这意味着它们由不可分割的微小单元（类似于空间像素和时间像素）组成。这个悖论的内容是：如果空间和时间是离散的，飞矢就未曾移动，因为在每一个瞬间（一个时间像素），飞矢都在某个确定的位置（一组特定的空间像素）上。由此可以推断，在任何给定的瞬间，飞矢都是静止不动的。它也不会两个瞬间之间移动，因为根据假设，两个瞬间之间是没有时间的。所以，飞矢从未移动。

在我看来，这是芝诺悖论中最微妙和最有意思的一个。哲学家仍然在争论它所描述的状态，不过我认为芝诺似乎说对了2/3。在一个空间和时间离散化的世界里，飞矢的行为确实如芝诺所言。当时间以离散化的方式嘀嗒前行时，飞矢会在一个接一个地方突然出现。他还说对了一点，那就是感官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感知到的那样。

而芝诺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在这样的世界里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在数字设备上观看电影和视频的经验，我们就能知道这一点。我们的手机、数字录像设备和电脑屏幕将所有图像切分成离散的像素，但和芝诺的主张相反，即使在这些离散化的场景下，运动也可以完美地发生。只要所有图像都被切分得足够细致，我们就无法分辨出光滑的运动与其数字表示之间的不同。如果观看飞矢的高分辨率视频，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支像素化的箭在一帧接一帧的离散画面中出现。但由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有限，它看上去就像一条光滑的轨迹。有时候，我们的感官真的会欺骗我们。

当然，如果切分得太粗糙，我们就能分辨出连续与离散之间的区别，而且常常会发现它有些烦人。想想老式的指针式时钟和现代的数字/机械时钟有什么不同。在指针式时钟上，秒针会以匀速运动的方式扫过表盘，让人感觉时间在流动。而在数字时钟上，秒针会一下一下地向前跳动，并发出“噼噼噼”的声音，让人感觉时间在跳动。

无穷可以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想象一下，如果数字时钟每秒钟一次的“噼”声被几万亿次小的“嘀嗒”声代替，那么我们将无法分辨出数字时钟和真正的指针式时钟之间的区别。电影和视频也是这样，只要画面闪现得足够快，比如每秒30帧，就会给人一种无缝流动的感觉。如果每秒闪过无穷多帧，就真可谓天衣无缝了。

再想想我们录制和回放音乐的情景。我的小女儿在她15岁生日时收到了一台老式的维克多牌唱机，可以用它来听艾拉·费兹杰拉的黑胶唱片。这是一

种典型的模拟体验：从唱机中传出的所有歌曲的音调和拟声唱法，都跟艾拉演唱它们的时候一样流畅；不管是在轻柔的部分、高亢的部分还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部分，她的音量都是连续不断的，从低音到高音的爬升也很优美。然而，当你在数字设备上听她的歌曲时，音乐的方方面面都被切分成微小而离散的音级，并被转化成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差别巨大，但我们的耳朵却分辨不出来。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离散与连续之间的鸿沟往往是可弥合的，至少可以取得良好的逼近效果。在很多实际应用中，只要我们把事物切分得足够细致，离散就可以替代连续。在微积分的理想世界里，我们还可以更上一层楼。任何连续的事物都可以被精确地（而不只是近似地）切分成无穷多个无穷小的部分，这就是无穷原则。在极限和无穷的帮助下，离散和连续融为了一体。

当芝诺悖论遇上量子力学

无穷原则要求我们假装一切都可以被无穷尽地切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概念非常有用。通过想象比萨可被切分成任意小的块，我们准确地求出了圆的面积。那么，问题随之而来：无穷小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量子力学^[1]有一定的发言权。它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描述的是大自然在其最小尺度上的行为方式。它是有史以来人类建立的最精确的物理学理论，并以怪诞性闻名。它的术语，以及包含轻子、夸克和中微子的粒子园，听起来就像刘易斯·卡罗尔^[2]作品里的东西。量子力学描述的行为通常也很怪诞，在原子尺度上发生的事情，在宏观世界中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

比如，我们可以从量子角度思考墙之谜。如果步行者是一个电子，那么它可能会穿墙而过。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隧穿效应，它的确确实会发生。经典物理学很难解释这种效应，而量子力学对它做出的解释是，电子可以用概率波来描述。概率波遵循薛定谔方程^[3]，该方程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1925年建立的。薛定谔方程的解表明，一小部分电子概率波会出现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另一边。这意味着在障碍的另一边探测到这个电子的概率尽管很小，但不为0，就像它穿过了那堵墙一样。在微积分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计算出这种隧穿效应的发生率，实验也已经证实了这种预测。隧穿效应是真实存在的，比如 α 粒子会以预测的发生率穿透铀核，产生放射性效应。隧穿效应也在使太阳发光的核聚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地球上的生命部分依赖于隧穿效应。此外，它还有许多技术用途，比如，科学家用来观测和操纵单个原子的扫描隧穿显微镜，正是建立在隧穿效应的基础之上。

我们对这类发生在原子尺度上的事件没有直观认识，因为我们是由几万个原子组成的庞大生物。幸运的是，微积分可以代替直观认识。通过应用微积分和量子力学，物理学家打开了微观世界的理论之窗，他们的洞见产生的成果包括激光、晶体管、计算机芯片和平板电视中的发光二极管（LED）。

尽管量子力学的许多概念都很激进，但在薛定谔方程中，它保留了空间和时间具有连续性的传统假设。麦克斯韦在他的电磁理论中做出了相同的假设，牛顿的引力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亦如此。因此，从微积分到理论物理学，它们都建立在空间和时间具有连续性的假设基础之上。到目前为止，这种假设一直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宇宙的极小尺度（远小于原子尺度）上，空间和时间最终可能会失去它们的连续性。尽管我们不确定那里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猜测一下。空间和时间可能会像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设想的那样完全像素化，不过由于量子不确定性，它们更有可能退化为无序的混沌状态。在如此小的尺度上，空间和时间也可能会随机地涌动和翻腾，像泡沫一样起伏。

在这些极限尺度上应该如何设想空间和时间，尽管人们还未就此达成共识，但对于这些尺度可能会有多小，人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极限尺度是由自然界的三大基本常量决定的，我们无法左右。第一个是引力常量 G ，它衡量的是宇宙中的引力强度。它最早出现在牛顿的引力理论中，之后又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未来也必定会出现在取代这两者的任何理论中。第二个常量 $\hbar$ 反映了量子效应的强度，它出现在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和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波动方程中。第三个常量是光速 c ，它是宇宙的极限速度，任何一种信号的传播速度都无法超过 c 。这个速度必然会出现所有的时空理论中，因为它通过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的原理把空间与时间联系在一起， c 就是其中的速度。

1899年，量子理论之父、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意识到，将这些基本常量组合起来得到长度尺度的方式有且仅有一种。普朗克推断出这个独一无二的长度就是宇宙的自然尺度，为了纪念他，我们现在称此长度为普朗克长度^[4]。它的公式是：

$$\text{普朗克长度} = \sqrt{\frac{\hbar G}{c^3}}$$

我们把 G 、 $\hbar$ 和 c 的测量值代入这个公式，可以算出普朗克长度约为 10^{-35} 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距离，相当于质子直径的 10^{22} 分之一。普朗克时间是光经过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大约是 10^{-43} 秒。这两个尺度就是极限尺度，在它们之下空间和时间将不再有意义。

这些数字限定了我们切分空间或时间的精细程度。为了感受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精密程度有多高，可以想一想，如果进行一次你能想象到的最极端的比较，需要使用多少位数。用最大的可能距离（已知宇宙的估测直径）除以

最小的可能距离（普朗克长度），这个异常极端的距离之比虽然只是一个60位数，但它是我们需要用到的距离之比中最大的一个。使用更多位数（比如100位数，更不用说无穷位数了）则会过犹不及，因为它们超出了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描述任何真实距离所需的上限。

然而，在微积分中，我们一直在使用无穷位数。早在中学时期，学生们就要开始思考像0.333...这样的无穷小数。尽管我们把这类数字称为实数，但它们一点儿也不真实。至少就我们今天通过物理学了解到的现实而言，依据小数点后的无穷位数来认定实数的要求恰恰意味着实数并不是真实的。

如果实数是不真实的，数学家为什么会如此喜爱它们呢？小学生又为什么必须学习它们呢？因为微积分需要实数。从一开始，微积分就固执地认为万物——空间和时间、物质和能量，以及已经存在或将要出现的所有事物——都应该被视为连续的。因此，万物都可以并且应该用实数来量化。在这个理想化的假想世界里，我们假装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无限地切分。整个微积分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计算极限；如果没有极限，微积分将会停滞不前。如果我们使用的都是精密度只有60位的小数，那么数轴上将会布满麻点和坑洼。而在这些坑洞处，原本应该放置着圆周率、2的平方根和小数点后有无穷位数的数字。即使像 $1/3$ 这样的简单分数也会消失不见，因为它也需要用无穷位数（0.333...）来确定它在数轴上的位置。如果我们想把全体数字视为一条连续的线，这些数字就必须是实数。尽管它们可能只是现实的近似值，但却行之有效。我们很难用其他方式为现实建模。和微积分的其他部分一样，在无穷小数的助力下，无穷让一切事物都变得更简单了。

[1] Quantum mechanics: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chapters 4 and 5.

[2] 刘易斯·卡罗尔是英国童话作家，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编者注

[3] Schrödinger's equation: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14.

[4] Planck length: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127–31, explains why physicists believe that space dissolves into quantum foam at the ultramicroscopic scale of the Planck length. For philosophy, see S. Weinstein and D. Rickles, "Quantum Gravit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quantum-gravity/>.

第2章 驾驭无穷的勇士

在芝诺思考了空间、时间、运动和无穷的本质之后，过了大约200年，又有一位思想家发现无穷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这个人就是阿基米德^[1]，在讨论圆的面积时，我们已经“见”过他了。不过，他之所以会成为传奇人物，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关于他，有许多有趣的故事。^[2]有些人把他刻画成最早的数学怪才，比如，历史学家普鲁塔克^[3]告诉我们，阿基米德十分痴迷几何学，以至于“忘记了吃饭，^[4]蓬头垢面”。（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对许多数学家来说，吃饭和个人卫生并不是头等大事。）普鲁塔克接着提到，当阿基米德沉迷于数学时，必须有人“强行拽着他去洗澡”^[5]。他竟然这么不愿意洗澡，而有趣的是，关于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却恰恰跟洗澡有关。据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6]说，阿基米德在洗澡时突然产生了灵感，他兴奋得从浴盆里跳出来，赤身裸体地跑到街上大喊：“我发现了！”

其他故事则把他塑造成军事魔术师、勇士科学家或者一人敢死队。根据这些传说，当叙拉古于公元前212年被罗马人围攻时，已是七旬老者的阿基米德利用他的滑轮和杠杆知识，制造出奇炫的武器，为保卫他的家乡做出了贡献。他发明的抓钩和巨型起重机之类的“战争机器”可以把罗马战船从海里吊起来，然后像抖落鞋里的沙子一样把水手们从船上甩出去。普鲁塔克对这个可怕的场景进行了描述，“罗马战船常常被吊到半空中（看上去很可怕），^[7]然后被不停地来回摇晃，直到水手们都被甩出去，最终船被扔到岩石上或者海里。”

更严肃地说，所有理工科学生之所以记得阿基米德，是因为他提出的浮力原理（浸在流体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与被该物体排开的流体重量大小相等）和杠杆定律（当且仅当杠杆两端重物的重量与它们到支点的距离成反比时，杠杆才会平衡），这两个理论都在实践中得到了无数次应用。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物体能浮起来，而有些不能；它还为造船工程、船舶稳定性理论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设计奠定了基础。每当你使用指甲刀或者撬棍时，你都在不知不觉地运用阿基米德的杠杆定律。

尽管阿基米德算得上令人敬畏的战争机器制造者，他无疑也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真正让他永垂不朽的是他在数学上的贡献。阿基米德为积分学铺平了道路，这门学科的最深刻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清晰可见，只不过它们在将近2 000年后才再次被人们看到。所以，即使我们说他的思想超前于他的时代也毫不过分，难道还有人能比他更超前吗？

有两种策略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一种策略是他对无穷原则的狂热运用。为了探究圆、球体和其他曲线形状的奥秘，他总是把它们近似成由许多平直部分组成的直线形状，就像切割过的宝石一样。通过想象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小的组成部分，他使得近似值越来越接近事实，并在组成部分无穷的极限条件下趋近正确答案。这种策略要求他必须精通求和和解谜，因为他最终只有把很多数字或组成部分重新整合在一起，才能得出结论。

他的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策略是，把数学与物理学融为一体，把理想与现实合而为一。具体来说，他把几何学（研究形状）与力学（研究运动和力）结合在一起。有时他用几何学来阐释力学，有时则用力学理论来理解几何学。阿基米德正是通过娴熟地运用这两种策略，才解开了曲线之谜。

[1] Archimedes: For his life, see Netz and Noel, *The Archimedes Codex*, and C.Rorres, “Archimedes,” <https://www.math.nyu.edu/~crrorres/Archimedes/contents.html>. For a scholarly biography, see M.Clagett, “Archimedes,” in Gillispie, *Complete Dictionary*, vol.1, with amendments by F.Acerbi in vol.19. For Archimedes’s mathematics, Stein, *Archimedes*, and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pter 2, are both outstanding, but see also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s 3.1–3.3,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4.5. A scholarly collection of Archimedes’s work is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2] stories about him: Martínez, *Cult of Pythagoras*, chapter 4,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y legends about Archimedes, including the comical Eureka tale and the tragic story of Archimedes’s death at the hands of a Roman soldier during the siege of Syracuse in 212 bce. While it seems likely that Archimedes was killed during the siege,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his final words were “Don’t disturb my circles!”

[3] Plutarch: The Plutarch quotes are from John Dryden’s translation of Plutarch’s *Marcellu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lassics.mit.edu/Plutarch/marcellu.html>. The specific passages about Archimedes and the siege of Syracuse are also available at <https://www.math.nyu.edu/~crrorres/Archimedes/Siege/Plutarch.html>.

[4] “made him forget his food”: <http://classics.mit.edu/Plutarch/marcellu.html>.

[5] “carried by absolute violence to bathe”: Ibid.

[6] Vitruvius: The Eureka story, as first told by Vitruvius, is available in Latin and English at <https://www.math.nyu.edu/~corres/Archimedes/Crown/Vitruvius.html>. That site also includes a children's version of the story by the acclaimed writer James Baldwin, taken from *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5). Unfortunately, Baldwin and Vitruvius oversimplify Archimedes'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king's golden crown. Corres offers a more plausible account at <https://www.math.nyu.edu/~corres/Archimedes/Crown/CrownIntro.html>, along with Galileo's guess regarding how Archimedes might have solved it (<https://www.math.nyu.edu/~corres/Archimedes/Crown/bilancetta.html>).

[7] "A ship was frequently lifted up": <http://classics.mit.edu/Plutarch/marcellu.html>.

夹逼法与圆周率

当我步行去上班或者晚上出门遛狗时，我苹果手机上的计步器会记录下我走过的距离。计算方法很简单：应用程序根据我的身高估算出我的步长，并计数我走的步数，然后将这两个数字相乘。那么，我走过的距离就等于步长乘以步数。

阿基米德在计算圆的周长和估算圆周率^[1]时，利用的也是类似的思路。假设圆是一条路径，需要走很多步才能走完全程，如图2-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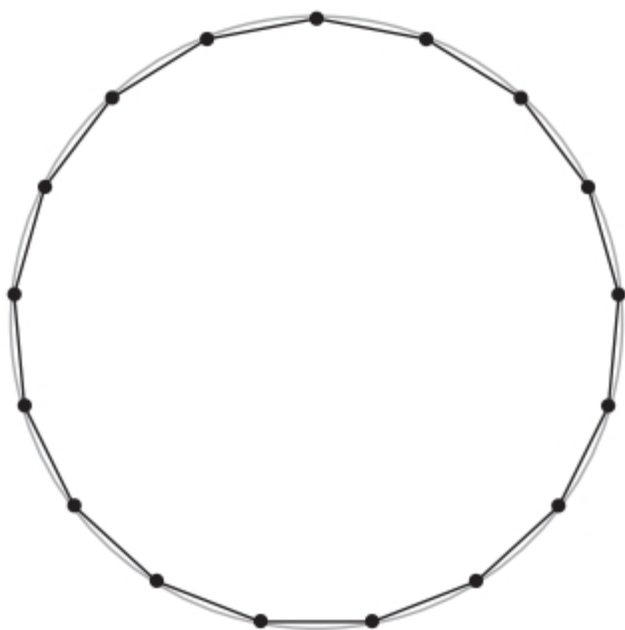


图2-1

每一步都用一条微小的直线来表示。用步数乘以每一步的长度，我们就可以估算出这条路径的长度。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量，因为圆实际上并不是由直线组成的，而是由弯曲的弧组成的。当我们用直线来代替每一段弧时，就相当于走了点儿捷径。因此，近似值肯定小于圆形路径的实际长度。但至少在理论上，通过走足够多的步数，并且每一步的步长足够短，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精确地估算出圆形路径的长度。

阿基米德从由6条直线组成的路径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这样的计算。他之所以选择从六边形入手，是因为它是一个便利的“大本营”，适合作为这段艰难的计算之旅的起点。六边形的优点在于，阿基米德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它的周长，即绕六边形一周的总长度。图2-2中六边形的周长是圆的半径的6倍，为什么是6倍呢？因为六边形包含6个等边三角形，它们每条边的长度都等于圆的半径（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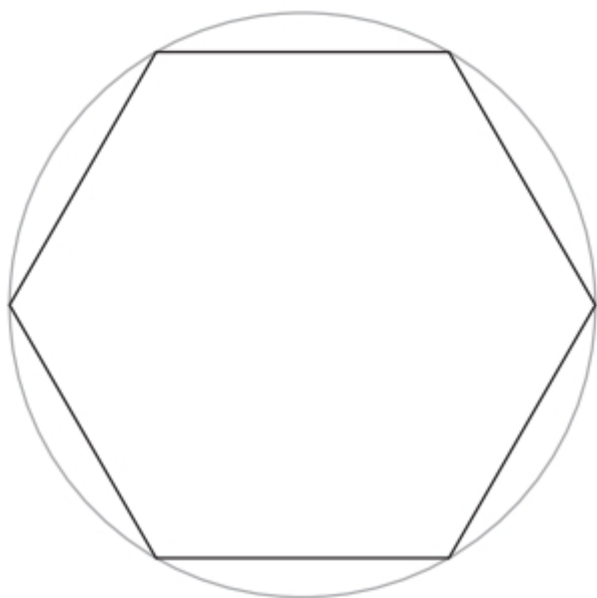


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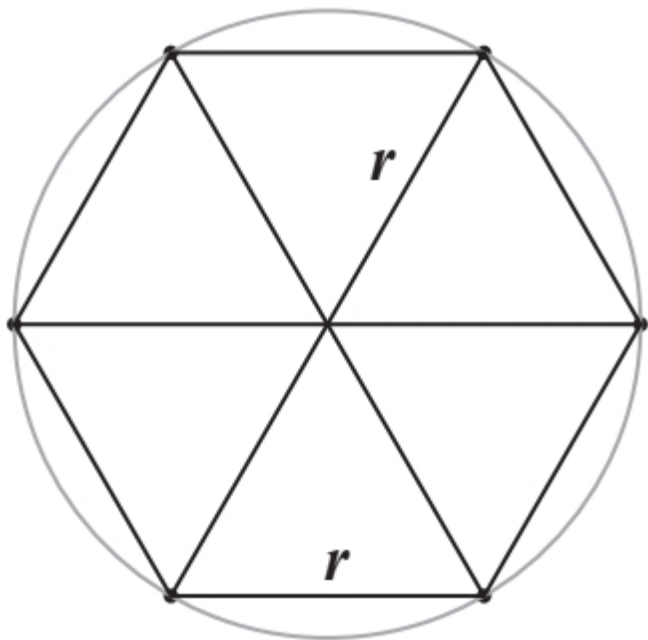


图2-3

其中，有6条三角形边构成了六边形的周长。

六边形的周长等于圆的半径的6倍，用符号可表示为 $p = 6r$ 。由于圆的周长 C 大于六边形的周长 p ，我们必定可以得出 $C > 6r$ 的结论。

这个论证给了阿基米德一个圆周率下限，圆周率用希腊字母 π 表示，其定义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因为直径 $d = 2r$ ，不等式 $C > 6r$ 意味着：

$$\pi = \frac{C}{d} = \frac{C}{2r} = \frac{6r}{2r} = 3$$

因此，该论证过程证明 $\pi > 3$ 。

当然，6是一个非常小的步数，六边形显然也不太像一个圆，但对阿基米

德来说一切才刚开始。当从六边形中得出结论之后，他缩短了步长，并将步数翻倍。他的做法是，绕路到每段弧的中点处，用两小步取代之前的横跨弧的一大步（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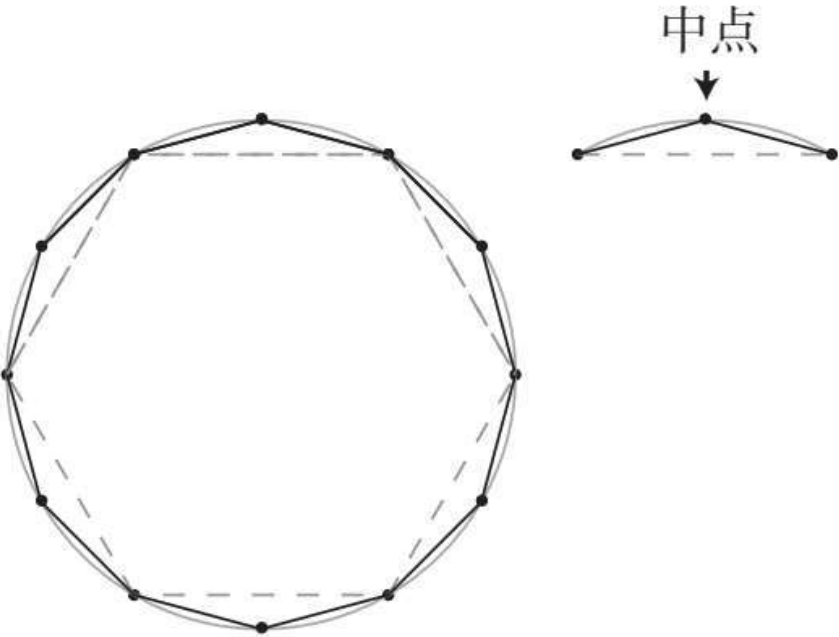


图2-4

之后，阿基米德不断重复这一做法。沉迷其中的他从6步到12步，然后是24步、48步、96步（图2-5），并以令人头痛不已的精密度算出了这些不断缩小的步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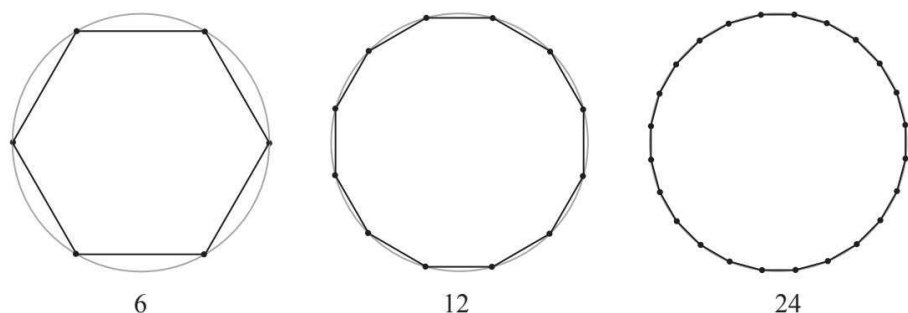


图2-5

遗憾的是，随着步长不断缩小，计算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他不得不借助勾股定理来确定步长。这就需要他用纸笔计算平方根，非常麻烦。此外，为了确保他算出的周长总是小于圆的周长，他必须保证当他需要近似分数被低估的时候，该值要取平方根的下限；而当他需要近似分数被高估的时候，该值则要取平方根的上限。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算术上，阿基米德计算 π 值的行为都堪称壮举。借助圆内接96边形和圆外接96边形，他最终证明 π 大于 $3 + 10/71$ 而小于 $3 + 10/70$ 。

让我们暂时忘掉数学，直观地欣赏一下这个结果：

$$3 + \frac{10}{71} < \pi < 3 + \frac{10}{70}$$

未知且永远不可知的 π 值被一个数值“虎钳”夹住了，挤在两个看起来几乎相同的数之间，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前一个数的分母是71，而后一个数的分母是70。不等式右边的 $3 + 10/70$ 可以化简为 $22/7$ ，它是今天所有学生仍在学习的那个著名的 π 的近似值，遗憾的是，也有些人误以为它就是 π 本身。

阿基米德使用的夹逼法建立在希腊数学家欧多克索斯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它被称作穷竭法，因为它将未知数 π 夹在两个已知数之间。随着步数不断加倍，界限将会越收越紧， π 的取值范围也会越来越小。

圆是几何学中最简单的曲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圆的测量——用数字量化其属性——却超出了几何学的范畴。比如，欧几里得生活的年代比阿基米德早几十年，他的著作《几何原本》根本没有提到 π 。尽管你可以通过在这本书中找到运用穷竭法证明所有圆的面积与其半径平方之比都相等的证据，但它并未提到这个通用比率接近3.14。欧几里得的疏漏就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还需要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也就是说，求解 π 值需要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它能有效地处理曲线形状。如何测量曲线的长度、曲面的面积或者曲面体的体积，是让阿基米德深深着迷，并且引领他朝着积分学迈出第一步的前沿问题。求解出圆周率 π 的值，是积分学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1] estimate pi: Stein, Archimedes, chapter 11, shows in detail how Archimedes did it. Be prepared for some hairy arithmetic.

圆周率之道

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奇怪的是，圆周率并未出现在阿基米德的圆面积公式 $A = rC/2$ 中，他也没有写下一个类似于 $C = \pi d$ 的方程，从而将圆的周长与直径联系起来。他避免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圆周率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数，而只是两个长度之比，即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换言之，它是一个量值，而不是一个数。

虽然我们现在不再区分量值和数了，但这一点在古希腊数学中却很重要，它似乎是由离散（以整数为代表）和连续（以形状为代表）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尽管历史细节还很模糊，但应该是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也就是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和欧多克索斯时代之间的某个时候，有人证明了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边长不可公度，这意味着它们的长度之比无法用两个整数之比来表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人发现了无理数的存在^[1]。这一发现很可能让古希腊人感到震惊和失望，因为它证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是错误的。如果整数及其比率就连像正方形对角线这样基本的东西也无法衡量，“万物皆数”的理念就不成立了。这种低落和失望的情绪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希腊数学家总是认为几何学比算术重要。数不再可信，也就不足以作为数学的基础。

为了描述连续量并对其进行推理，古希腊数学家意识到他们需要发明比整数更强大的东西。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基于形状及其比例的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几何对象的度量：线的长度、正方形的面积和立方体的体积。他们把这些称为量值，并认为它们有别于数且优于数。

我认为，这就是阿基米德对圆周率敬而远之的原因。他不知道如何理解它，它是一种陌生、超凡的存在，比任何数都奇异。

今天我们都认同圆周率是一个数（一个实数和一个无穷小数），而且是一个奇妙有趣的数。我的孩子们也为它深深着迷，他们常常目不转睛地看着悬挂在厨房里的一个馅饼盘，上面的圆周率数字沿边缘向中心呈螺旋形排列，越靠近旋涡中心，数字的大小就越小。对孩子们来说，吸引他们的是这些数字看似随机的排列顺序，它们从不重复，也没有任何规律，就这样在馅饼盘上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圆周率的无穷小数展开式的前几十位数字是：

3.141 592 653 589 793 238 462 643 383 279 502 884 197 169 399 375
105 820 974 9...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圆周率的所有数字。然而，那些数字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在撰写本书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已经算出了圆周率的22万亿个数字。不过与真正的圆周率对应的无穷多位数相比，22万亿不值一提。想一想，这在哲学上会多么令人不安。尽管我说过圆周率的数字就在那里，但它们到底在哪里呢？它们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中，而是和真理、正义之类的抽象概念一起存在于某个柏拉图式的领域中。

圆周率具有某些相互矛盾的属性。一方面，它代表秩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圆的形状上，长久以来圆都被视为完美和永恒的象征。另一方面，圆周率又是无序的，看上去零落散乱，数字排列也没有明显的规律，或者至少我们尚未发现其中的规律。圆周率难以捉摸，神秘莫测，而且永远遥不可及。这种有序与无序的混合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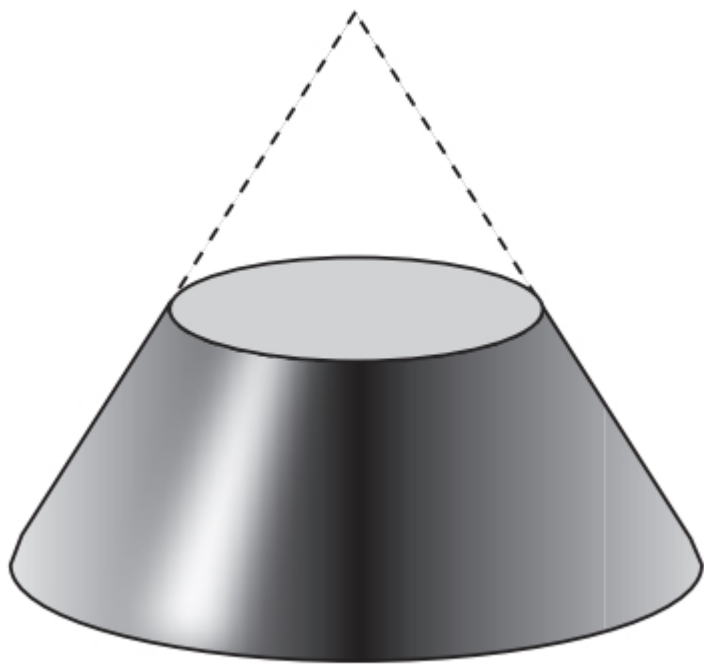
从根本上说，圆周率是微积分的产物，它被定义为无尽过程的难以达到的极限。但是，与一系列坚定地逼近圆的多边形或者每次朝着墙前进一半距离的倒霉步行者不同，圆周率既没有可见的终点，也没有可知的极限。然而，圆周率确实存在。它就在那里，它的定义也很清晰，即我们能看见的两个长度（圆的周长和直径）之比。尽管这个比率定义了圆周率，描述得也非常清晰，但数本身却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了。

有着阴阳二元性的圆周率就像整个微积分的缩影。圆周率是圆与直线之间的一扇门，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数，也是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平衡。就其本身而言，微积分是用无穷来研究有穷，用无限来研究有限，用直线来研究曲线。无穷原则是解锁曲线之谜的钥匙，而且它最早出现在圆周率之谜中。

[1] existence of irrational numbers: No one really knows who first proved that the square root of 2 is irrational or, equivalently, that the diagonal of a square is incommensurable with its side. There's an irresistible old yarn that a Pythagorean named Hippasus was drowned at sea for it. Martínez, Cult of Pythagoras, chapter 2, tracks down the origin of this myth and debunks it. So does the American filmmaker Errol Morris in a long and wonderfully quirky essay in the New York Times; see Errol Morris, "The Ashtray: Hippasus of Metapontum (Part 3),"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01,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1/03/08/the-ashtray-hippasus-of-metapontum-part-3/>.

立体主义与微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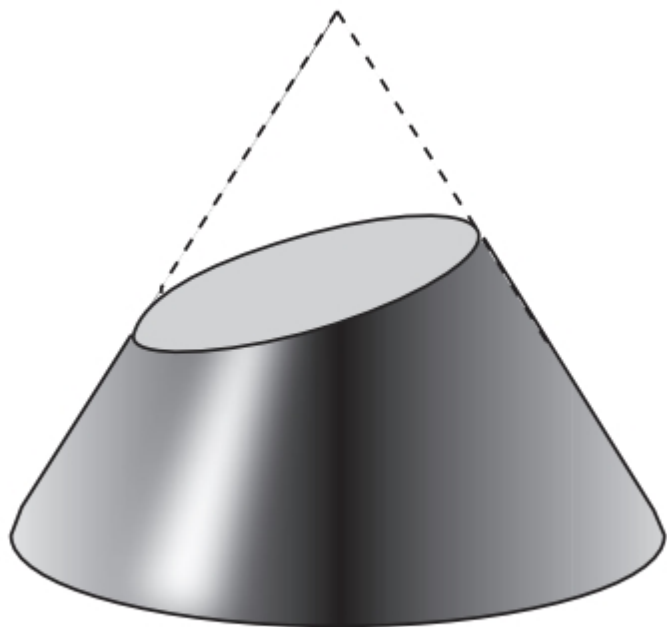
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抛物线求积法》^[1]中，再次借助无穷原则深入探讨了曲线之谜。抛物线描绘的是人们熟悉的篮球三分球或饮水喷头喷出的水所形成的弧。实际上，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弧都只是近似于抛物线。对阿基米德来说，真正的抛物线应该用平面截切锥体得到的曲线。想象一下，用一把切肉刀截切一顶锥形纸帽或者一个锥形纸杯，根据切肉刀截切锥体的陡度，它可以切出不同类型的曲线。如果它平行于锥体底面截切，就会得到一个圆（图2-6）。



圆

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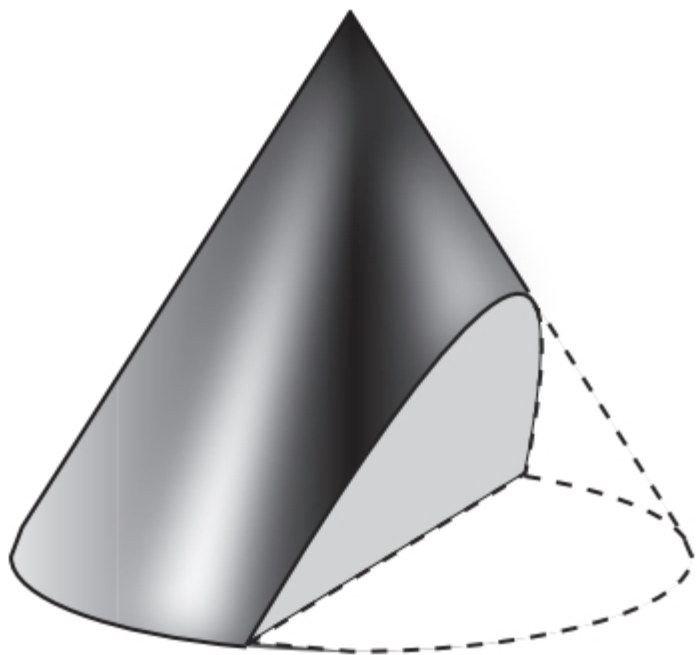
如果它截切的角度略微倾斜，就会得到一个椭圆（图2-7）。



椭圆

图2-7

如果它截切的角度与锥体的斜率相同，就会得到一条抛物线（图2-8）。



抛物线

图2-8

从切面看，抛物线是一条优美的对称曲线，它的正中间有一条对称线，被称为轴（图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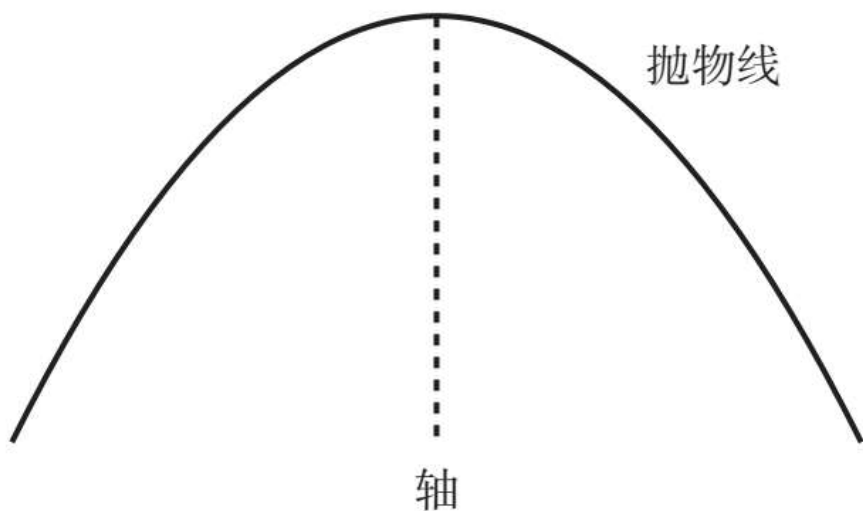


图2-9

在《抛物线求积法》中，阿基米德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挑战：求解抛物线弓形的面积。用现在的话说，抛物线弓形指的是抛物线和一条斜截抛物线的直线围成的曲线形状（图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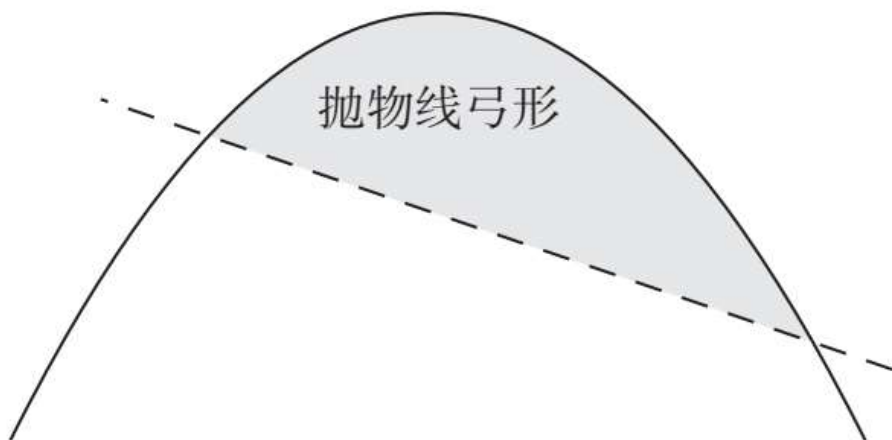


图2-10

求解抛物线弓形的面积意味着，利用较简单形状（比如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或其他直线图形）的已知面积，表示出未知的弓形面积。

阿基米德采取了令人吃惊的策略，他把抛物线弓形重新想象成由无穷多个三角形碎片（像碎陶片一样）粘在一起形成的图形，如图2-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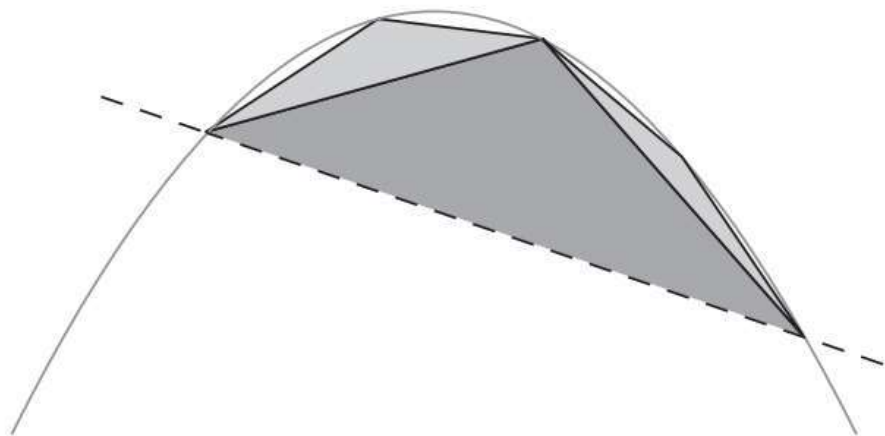


图2-11

碎片的大小层级是没有尽头的：一个大三角形，两个小三角形，4个更小的三角形，以此类推。他的计划是先算出所有三角形的面积，再把它们加起来，得出他想知道的曲线形状的面积。这需要经历一次艺术想象上的千变万化的飞跃，才能把光滑的抛物线弓形看成是由参差不齐的形状拼凑而成的镶嵌图形。如果阿基米德是一位画家，那么他或许是第一位立体主义者。

为了实施他的策略，阿基米德必须先算出所有碎片的面积。但是，该如何精准地确定这些碎片呢？毕竟，就像把一个盘子摔成碎片的方法有无数种一样，把三角形碎片拼成抛物线弓形的方法也有无数种。如图2-12所示，其中最大的三角形碎片可能是第一种，或者是第二种，也可能是第三种。



图2-12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妙就妙在它建立了一个规则，即从一个层级到下一个层级都保持着一致性模式。他想象将弓形底部的斜线向上滑动，同时与它自身保持平行，直到它刚好触碰到抛物线顶部附近的某个点（图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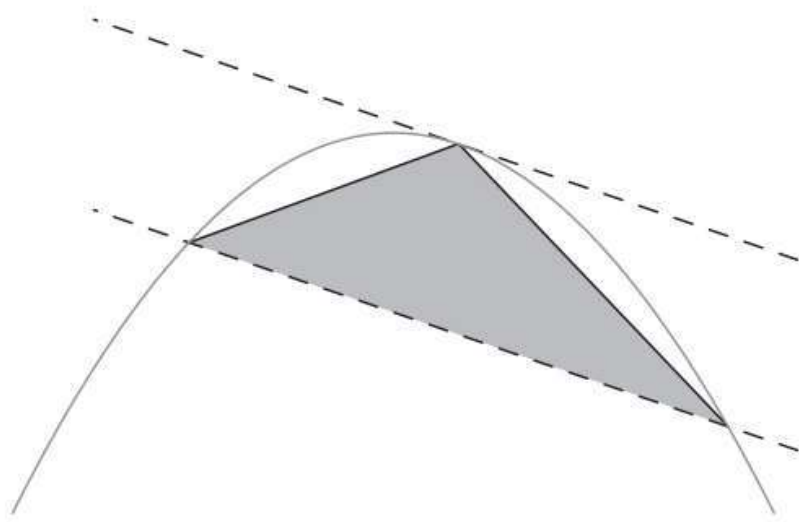


图2-13

这个特殊的接触点被称为切点，它确定了大三三角形的第三个角的位置，另外两个角的顶点就是斜线与抛物线的交点。

阿基米德运用同样的规则来确定每个层级的三角形。比如，第二层级的三角形如图2-14所示。

注意，大三角形的边现在扮演着第一层级中斜线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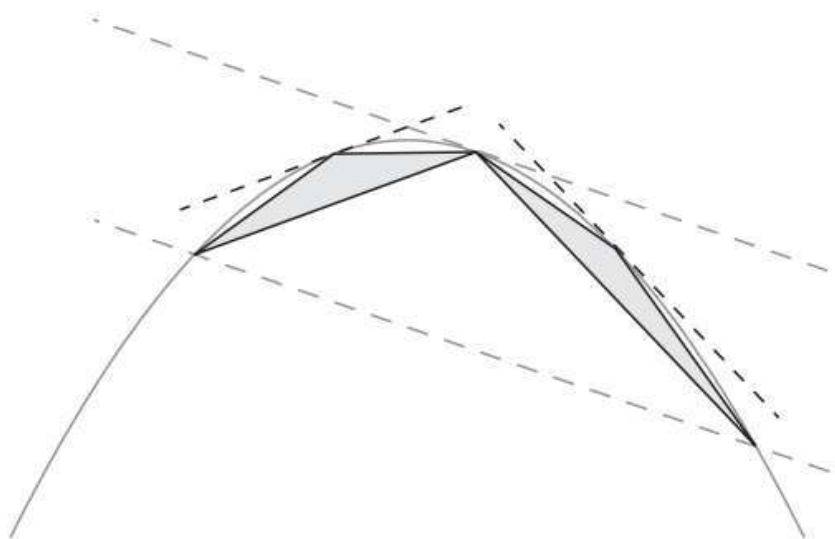


图2-14

接下来，阿基米德调用关于抛物线和三角形的已知几何事实，将相邻的层级联系起来。他证明了每个新构建三角形的面积都是上一层级三角形面积的 $\frac{1}{8}$ ，因此，如果我们说第一层级的三角形占据了一个面积单位（这个三角形将充当我们的面积标准），那么第二层级的两个三角形一共占据了 $\frac{1}{8} + \frac{1}{8} = \frac{1}{4}$ 个面积单位（图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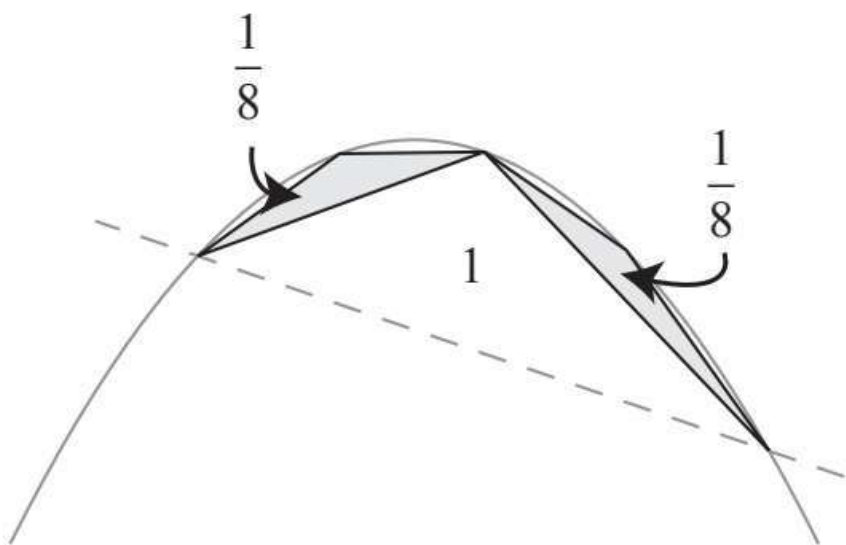


图2-15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之后的每个层级：某一层级三角形的总面积总是其上一层级三角形总面积的 $1/4$ 。所以，将无穷个层级的三角形碎片重新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抛物线弓形的面积 S ：

$$S = 1 + \frac{1}{4} + \frac{1}{16} + \frac{1}{64} + \dots$$

这是一个无穷级数，其中每一项都是它前一项的 $1/4$ 。

求这类无穷级数（几何级数）的和有一条捷径可走，技巧就是先将方程两边同时乘以4，再对无穷级数中除一项之外的所有项进行约分，然后方程两边同时减去所要求的和。注意，将上述无穷级数中的每一项都乘以4，就会得到：

$$\begin{aligned}
4 \times S &= 4 \left(1 + \frac{1}{4} + \frac{1}{16} + \frac{1}{64} + \cdots \right) \\
&= 4 + \frac{4}{4} + \frac{4}{16} + \frac{4}{64} + \cdots \\
&= 4 + 1 + \frac{1}{4} + \frac{1}{16} + \cdots \\
&= 4 + S
\end{aligned}$$

神奇的事情发生在倒数第二行和最后一行之间。最后一行的右边等于 $4 + S$ ，因为所要求的和 $S = 1 + 1/4 + 1/16 + \dots$ 就像涅槃的凤凰一样在倒数第二行的4后面重生了。

$$4 \times S = 4 + S$$

左右两边同时减去一个 S ，得到 $3 \times S = 4$ 。那么，

$$S = \frac{4}{3}$$

换句话说，抛物线弓形的面积是大三角形面积的 $4/3$ 。

[1] Quadrature of the Parabola: A translation of Archimedes's original text

is in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233–52. For the details I glossed over in the triangular-shard argument, see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35–39; Stein, *Archimedes*, chapter 7; Laubenbacher and Pengelley, *Mathematical Expeditions*, section 3.2; and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section 4.4. There are also many treatment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One of the clearest is by Mark Reeder at <https://www2.bc.edu/mark-reeder/1103quadparab.pdf>. Another is by R.A.G. Seely at <http://www.math.mcgill.ca/rags/JAC/NYB/exhaustion2.pdf>. As an alternative, Simmons, *Calculus Gems*, section B.3, uses an analytic geometry approach that you may find easier to follow.

奶酪论证

阿基米德不会认同上面的这套戏法，而是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诉诸于一种微妙的论证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被称为双重归谬法或双重反证法。他证明了抛物线弓形的面积不可能小于 $4/3$ 或者大于 $4/3$ ，因此必然等于 $4/3$ 。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说的那样：“在你排除了不可能的情况之后，[\[1\]](#)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一定是真相。”

在这里，从概念上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阿基米德排除不可能情况的论证过程建立在有限数量碎片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只要碎片的数量足够多，它们的总面积就会尽可能地接近 $4/3$ ，而且差值比任何规定的公差都要小。因为阿基米德从未使用无穷的概念，所以他的证明无懈可击。时至今日，它仍然符合最严苛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他的论证过程放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要点了。假设有3个人想要分享4片完全相同的奶酪（图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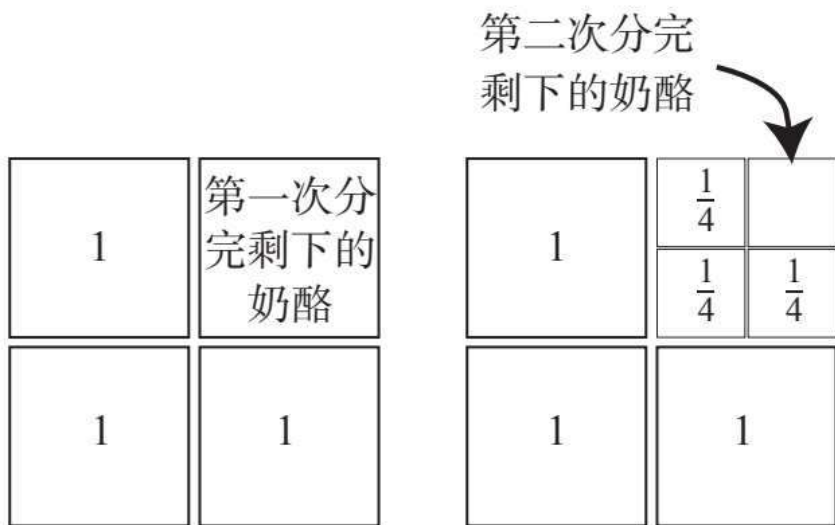


图2-16

常识性的解决方案是：先给每个人分1片奶酪，再把剩下的那片平均分成3份，然后分发给他们。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方案，总的来说，每个人都可

以得到 $1 + 1/3 = 4/3$ 片奶酪。

但是，假设这三个人恰好都是数学家，他们在研讨会开始前绕着餐桌走来走去，并盯上了最后4片奶酪。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碰巧叫阿基米德，他可能会给出这样的解决方案：“我吃1片奶酪，你们俩也各吃1片，剩下的1片我们分着吃。欧几里得，你把剩下的那片切成4等份而不是3等份，然后我们每人取走其中的 $1/4$ 。我们不断重复这种做法，每次都把剩下的奶酪切成4等份，直到没人再对剩下的碎屑感兴趣。可以吗？欧多克索斯，别再发牢骚了。”（图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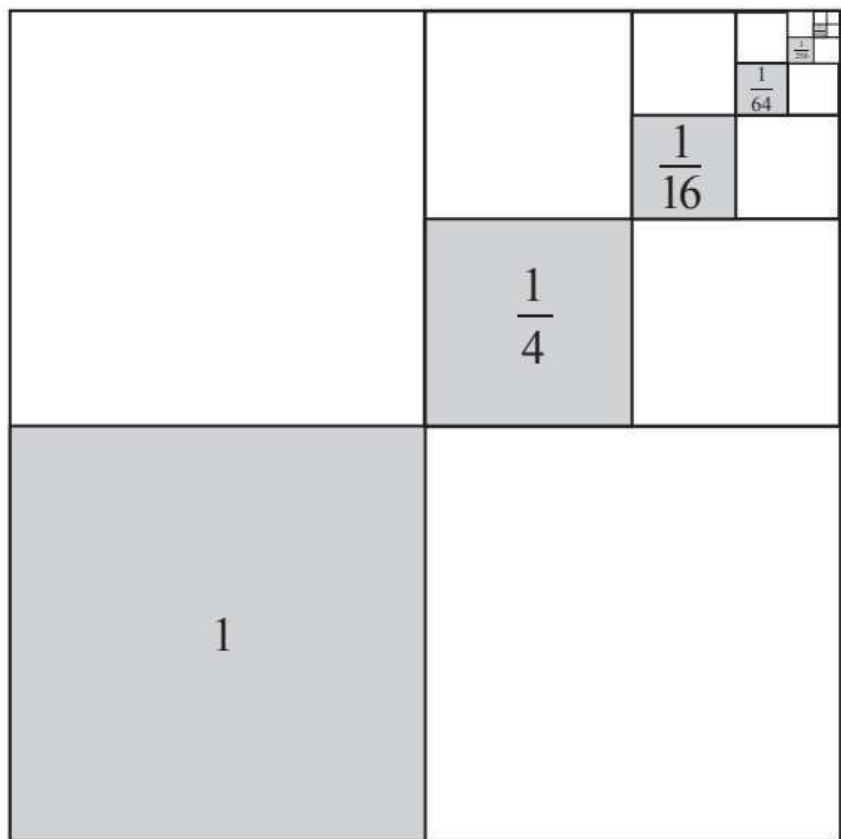


图2-17

如果照这样一直分下去，他们每个人总共可以吃到多少片奶酪呢？一种方法是用流水账记录每个人得到的奶酪片数。第一轮之后，每个人都得到1

片奶酪。在第二轮，也就是又分到 $1/4$ 片之后，每个人总共得到 $1 + 1/4$ 片奶酪。在第三轮之后， $1/4$ 被等分成4个 $1/16$ ，每个人总共得到 $1 + 1/4 + 1/16$ 片奶酪，以此类推。笼统地讲，如果不停地切分下去，那么每个人最终总共得到 $1 + 1/4 + 1/16 + \dots$ 片奶酪。而且，由于这个无穷级数和一定等于最初4片奶酪的 $1/3$ ，所以 $1 + 1/4 + 1/16 + \dots$ 必然等于4的 $1/3$ ，也就是 $4/3$ 。

在《抛物线求积法》中，阿基米德给出了非常类似的论证过程，以及一张画有不同大小正方形的图表，但他从未使用无穷或者上文中与之对应的三个点 (...) 来表示无穷级数和。更确切地说，他是从有限和的角度进行论证的，从而在严谨性上达到了无可指摘的程度。他的重要洞见是，通过将有限的轮数考虑得足够大，就可以让右上角的小正方形（余下待分配的部分）变得比任何给定的尺寸都小。通过类似的推理过程可以得出，只要 n 足够大，就能让有限和 $1 + 1/4 + 1/16 + \dots + (1/4)^n$ （每个人得到的奶酪总量）尽量接近 $4/3$ 。所以，答案只能是 $4/3$ 。

[1]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Arthur Conan Doyle, The Sign of the Four (London: Spencer Blackett, 1890),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097/2097-h/2097-h.htm>.

阿基米德方法

我真正开始崇拜阿基米德，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做了鲜有天才才会做的事情：邀请我们参与其中，向我们展示他是如何思考的。他冒着受到攻击的风险，分享了自己的直觉，还说他希望未来的数学家也能够用它去解决他不理解的问题。今天，这个秘诀被称为阿基米德方法^[1]，但我在微积分课上从未听人提到它。学生们已经不再学习这种方法了，不过我发现它的故事和它背后的思想都十分迷人，而且令人震惊。

他在给他的朋友埃拉托色尼的信中提及了这种方法，埃拉托色尼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也是那个时代唯一能理解阿基米德方法的数学家。阿基米德坦承，尽管他的方法“并没有真正证明”^[2]他感兴趣的结果，但却赋予了他一种直觉，可以帮助他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正如他说的那样：“相比没有任何知识基础，如果我们之前已经利用这种方法获得了与问题相关的某些知识，那么论证起来就会更容易。”换句话说，通过对这种方法的探索和运用，他对这个领域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完成了一次无懈可击的论证。

这是对创造性数学研究的诚实描述。数学家不会一下子想到证明方法，而是先产生直觉，再考虑严谨性的问题。高中的几何课程常常忽略直觉和想象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对所有创造性数学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阿基米德最后提出了他的希望：“在现在和未来的几个世代中，某些人会利用这种方法，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3]。”这句话几乎让我热泪盈眶。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在数学的无限性面前感到了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他认识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即“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所有数学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研究课题永无止境，就连阿基米德本人也要俯首称臣。

在用碎片做立体主义证明之前，阿基米德在《抛物线求积法》的开头部分第一次提到了这个方法。他坦承，正是这个方法指引他完成了证明，并且第一次得到了 $\frac{4}{3}$ 这个数。

阿基米德方法是什么，它有何独特、精妙和离经叛道之处呢？这个方法与力学有关，阿基米德在他的头脑中通过称量法找到了抛物线弓形的面积。他把弯曲的弓形区域想象成一个物质对象（我把它想象成一块被精心裁剪成抛物线弓形的薄金属片），然后把它放在一架假想天平的一端。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想象它被放在一架假想跷跷板的一端。接下来，他要弄清楚如何用三角形（一种他已经知道如何称量的形状）让这架天平达到平衡状

态，从而推导出原来的抛物线弓形的面积。

相比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阿基米德的立体主义（三角形碎片）技巧，这是一种更富想象力的方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把一架假想跷跷板引入计算过程，并且保证它的设计与抛物线的尺寸相称。最终，它们将一起产生他要找寻的答案。

他从抛物线弓形着手，通过使其倾斜来确保抛物线的对称轴是垂直的（图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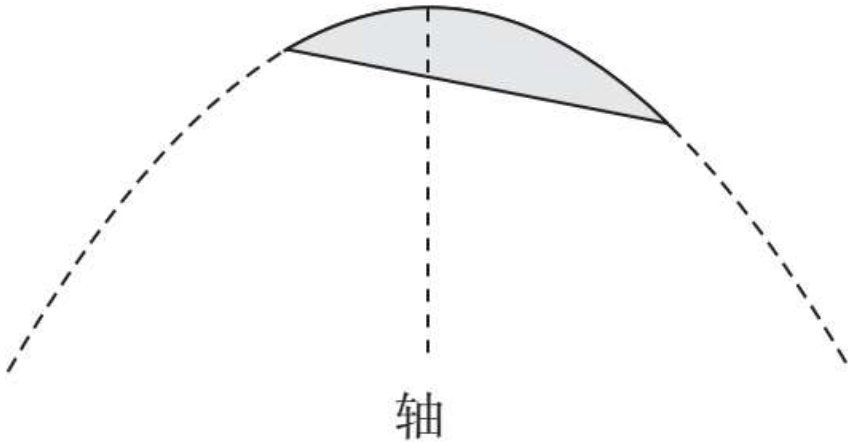


图2-18

然后，他要开始围绕弓形构建跷跷板了。具体方法如下：就像前文中介绍的那样，在抛物线弓形内部画出一个大三角形，并标上 ABC ，如图2-19所示。和在立体主义证明中一样，这个三角形将再次充当面积标准。抛物线弓形会被拿来与这个三角形做比较，并得出结果：前者的面积是后者面积的 $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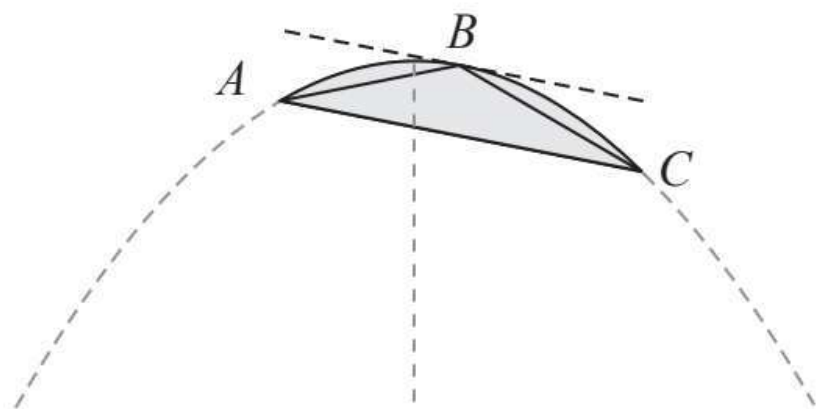


图2-19

接下来，将抛物线弓形围在一个大得多的三角形ACD中（图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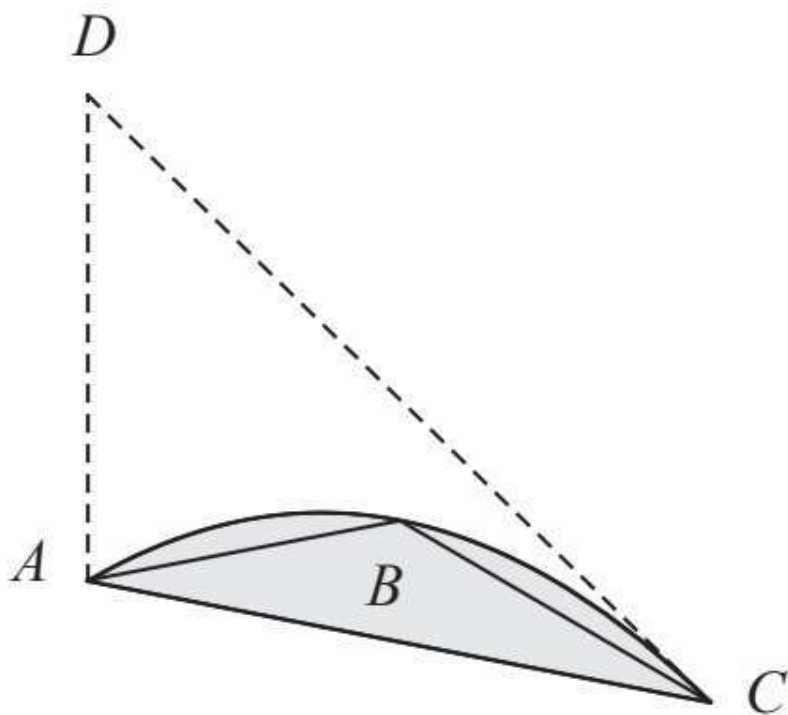


图2-20

三角形 ACD 的顶边被选定为在 C 点与抛物线相切的一条线，底边是线段 AC ，左侧的边是一条从 A 点向上延伸的垂直线，与顶边交于 D 点。利用标准的欧几里得几何，阿基米德证明了外接三角形 ACD 的面积是内接三角形 ABC 面积的4倍（这个结论在后文中将变得很重要，我们现在暂且把它放在一边）。

之后，阿基米德构建了跷跷板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它的杠杆、两个座位和支点。如图2-21所示，杠杆是连接两个座位的线段，这条线段始于 C 点，经过 B 点，从外接三角形 ACD 上的 F 点（支点）穿出，然后继续向左延伸至 S 点（座位）。确定 S 点的条件是，它到 F 点的距离与 C 点到 F 点的距离相等。换句话说， F 点是线段 SC 的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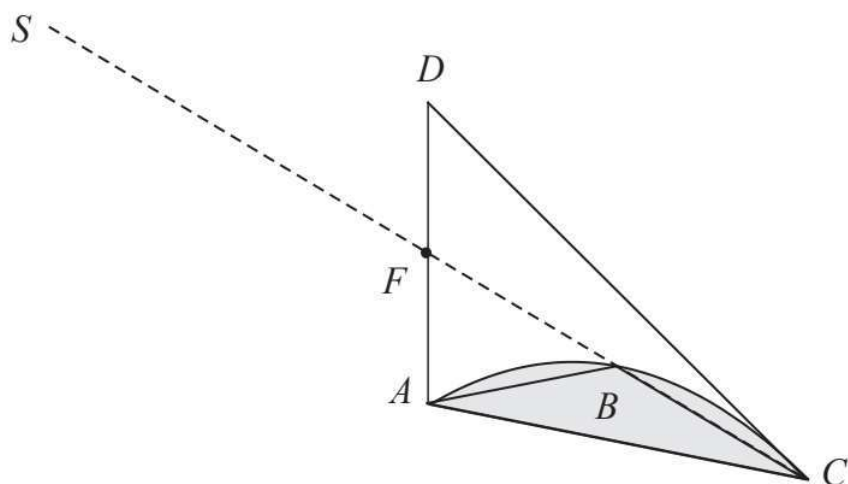


图2-21

现在要讲到为整个构思奠定基础的绝妙洞见了。利用关于抛物线和三角形的已知事实，阿基米德证明了只要把外接三角形 ACD 和抛物线弓形都想象成一条垂直线，就可以使二者平衡。他把它们都看作由无穷多条平行线组成的形状，这些直线就像无限细的板条或肋条。下面要说的是其中一对典型的肋条，它们的位置由一条穿过两个形状的垂直线来确定。在这条线上，一个短肋条将外接三角形 ACD 的底边和抛物线连接起来，如图2-2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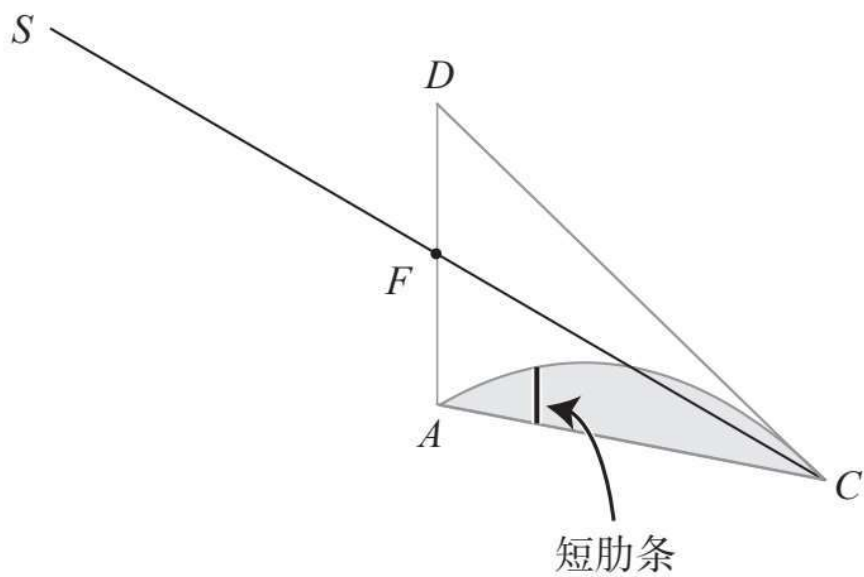


图2-22

此外，还有一个长肋条将外接三角形 ACD 的底边与顶边连接起来，如图2-2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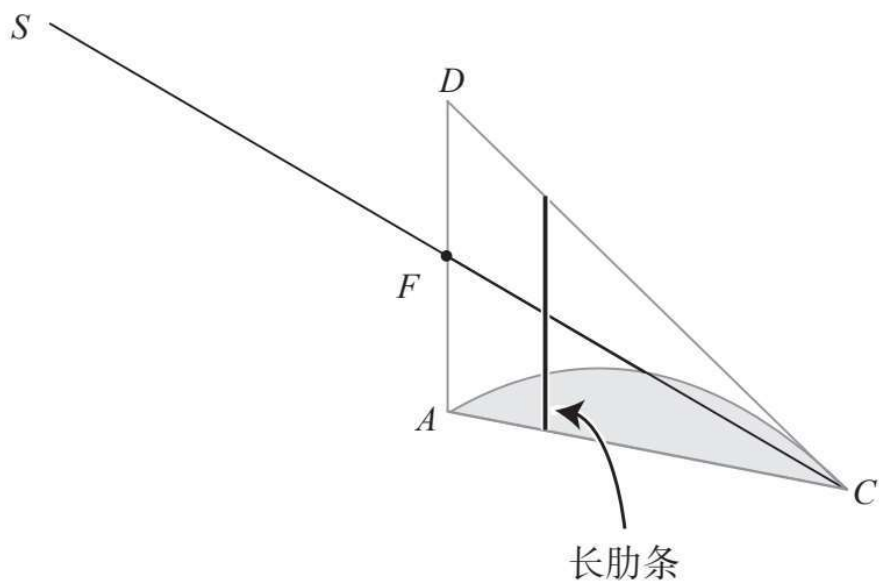


图2-23

阿基米德的惊人洞见是，就像孩子们玩跷跷板一样，只要这些肋条处在适当的位置上，它们就会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他证明了如果把短肋条滑动到S点，而长肋条的位置保持不变，两者就会达到平衡状态，如图2-2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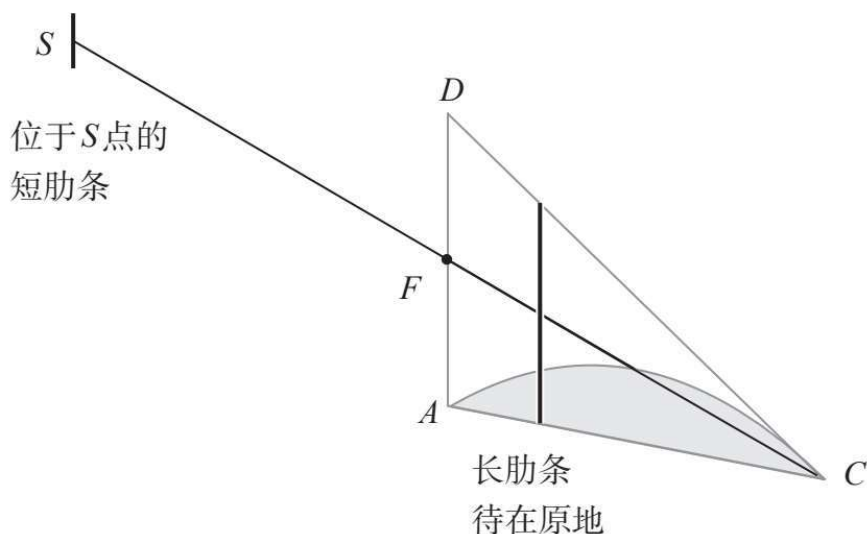


图2-24

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的垂直线。无论你选取的是哪条垂直线，当你将短肋条滑动到S点而让长肋条待在原地时，两者总能达到平衡状态。

由于每一对肋条都处于平衡状态，所以这两个形状也互相平衡。抛物线弓形的所有肋条最终都被移至S点，它们和外接三角形ACD的所有肋条均达到了平衡状态。由于那些长肋条并没有移动，这意味着全部移至S点的抛物线弓形的质量与待在原地的外接三角形ACD的质量达到了平衡状态。

接下来，阿基米德用一个等效点取代了外接三角形ACD的无穷多个肋条，这个点就是三角形的重心，它扮演了代替物的角色。对跷跷板来说，这就好比外接三角形ACD的全部质量都集中在单一的重心上。阿基米德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证明，这个点就在线段FC上，而且它到支点F的距离恰好是线段SF长度的1/3。

由于外接三角形ACD的质量到支点的距离是抛物线弓形的质量到支点距离的1/3，为了使两边达到平衡状态，抛物线弓形的质量必须是外接三角形ACD质量的1/3，这就是杠杆定律。因此，抛物线弓形的面积也必定是外接三角形ACD面积的1/3。外接三角形ACD的面积又是内接三角形ABC面积的4倍，阿基米德由此推导出，抛物线弓形的面积必定是内接三角形ABC面积的4/3，这和我们之前通过对三角形碎片的无穷级数求和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

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让大家见识了这个论证过程的神奇程度。在这里，阿基米德并不是一个拼接瓷器碎片的陶工，而更像一个屠夫。他把抛物线弓形的组织切分开，每次垂直地切下一条，然后把所有无限细的肉条挂在S点的钩子上。所有肉条的总重量和它们还是一块完整的抛物线弓形肉时相同，只不过阿基米德把原来的那块抛物线弓形肉切分成很多垂直的肉条，然后全部挂在同一个肉钩上（这个画面有点儿怪异，或许我们应该继续用跷跷板来举例）。

我为什么说这种论证方法离经叛道呢？因为它和实无穷“勾连”在一起。在论证过程的其中一步，阿基米德公然地把外接三角形描述为由其内部的“所有平行线组成的形状”^[4]。这些平行线或者垂直肋条的无穷性是连续的，毋庸置疑，这犯了希腊数学的大忌。他公然地将三角形看作肋条的实无穷形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将怪物放出了笼子。

同样地，他把抛物线弓形描述为“由曲线内的所有平行线组成的形状”^[5]。根据他的估计，贸然使用实无穷会使这个推理过程沦为一种寻找答案的启发式方法，而不是关于其正确性的证明。在给埃拉托色尼的信中，他低调地称自己的方法只是表明结论正确的“某种迹象”^[6]。

无论阿基米德方法的逻辑地位如何，它都具有一种“合众为一”的特性。无穷多条直线组成了有面积的抛物线弓形，阿基米德把这个面积看作质量，并逐一地把这些直线移至跷跷板最左侧的座位上。就这样，直线的无穷性由集中在单一点上的单一质量表示出来，“一”取代了“多”，并且完美如实地代表了“多”。

在跷跷板右侧起平衡作用的外接三角形也是一样。阿基米德从它的垂直线连续体中选出一个点——重心来代表整体。无穷坍缩成一体，这就是所谓的“合众为一”。只不过这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政治，而是积分学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阿基米德无法进行十分严谨的论证）上说，三角形和抛物线弓形显然不可思议地等同于无穷多条垂直线。

尽管阿基米德因为轻率地使用了无穷而略感尴尬，但他勇敢地承认了这一点。任何想要测量曲线形状（边界长度、面积或者体积）的人，都必须尽力应对无穷小部分的无穷级数和的极限问题。谨慎的人可能会试图回避这种必然性，而利用穷竭法进行细致的处理，但其实也摆脱不了无穷。研究曲线形状就意味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应对无穷，阿基米德对此持开放态度。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证明过程好好装扮一番，故意展示出有限和与穷竭法。但私下里，他百无禁忌。他承认在自己的脑海中称量形状，想象出杠杆和重心，每次取一个无限小的部分——一条垂直线，逐一地实现形状和质量的平衡。

阿基米德还用这种方法解决了与曲线形状有关的其他许多问题，比如，他发现了实心半球、抛物面及部分椭球面和双曲面的重心。他非常喜欢一个与球体表面积和体积^[7]有关的结论，以至于他要求将其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假设一个球体被严丝合缝地放在一个圆柱形帽盒里，如图2-2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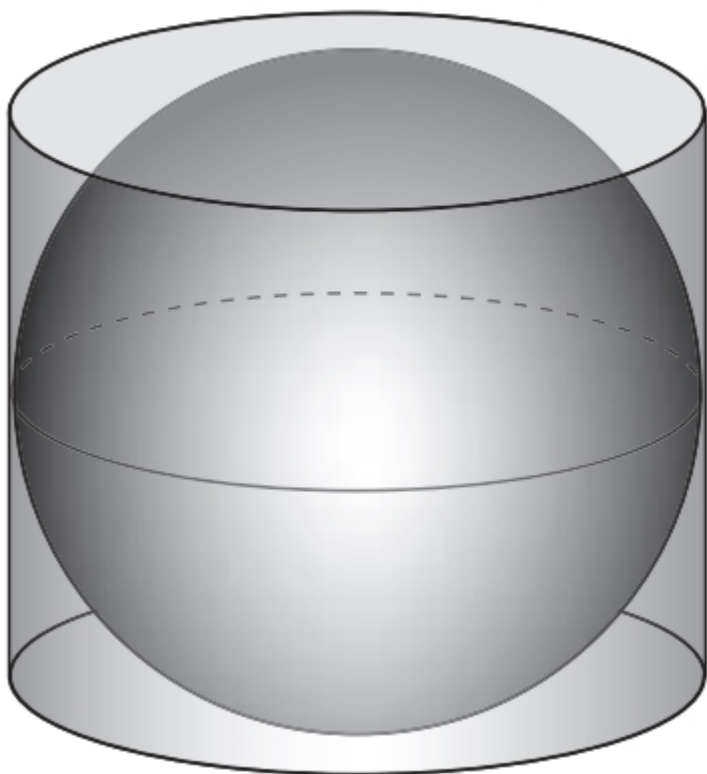


图2-25

阿基米德发现，球体占据了封闭帽盒容积的 $\frac{2}{3}$ ，它的表面积也是帽盒的 $\frac{2}{3}$ （假设帽盒的上下盖子也被计入表面积）。注意，他并没有给出球体的体积或表面积公式，而是用比例来表述他的结论。这是典型的希腊风格，即一切都可以用比例来表达。用一个面积同另一个面积做比较，用一个个体积同另一个体积做比较。而且，当它们的比率涉及小的整数时，比如

本例中的3和2，以及抛物线弓形面积中的4和3，阿基米德就一定会欣喜不已。毕竟，3:2和4:3之类的比率对古希腊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在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和谐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回想一下，有两根除长度之比为3:2以外其他地方完全相同的琴弦，当我们弹拨它们时，两者的音高相差五度，听起来十分和谐。同样地，如果两根琴弦的长度之比为4:3，它们的音高就会相差四度。和声与几何学之间的这些数值巧合，必定会让阿基米德十分欢喜。

我们从阿基米德的论著《论球与圆柱》中就能感受到他的高兴程度，“这些一直是图形与生俱来的特性，^[8]只是那些在我之前从事几何研究的人还不知道罢了。”让我们抛开他的自负语气，而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主张上，即“这些一直是图形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人们还不知道罢了”。在这里，他表达的是所有数学工作者都非常珍视的一种独特的数学哲学。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发现数学，结果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它们自始至终都是图形的固有属性，而非我们的发明创造。与鲍勃·迪伦或托妮·莫里森创作出前所未有的音乐或小说不同，我们不过是在发现已然存在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固有属性。虽然我们也拥有创造研究对象的自由，可以构建理想化的形状（比如完美的球体、圆和圆柱体），但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当我读到阿基米德在揭开球体表面积和体积之谜后表达他的喜悦之情的语句时，我仿佛产生了他一样的感受。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产生了跟所有数学工作者（包括我和我的同行）一样的感受。虽然有人告诉我们过去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它并非完全不同于现在。我们在《荷马史诗》和《圣经》中读到的人物就和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古代的数学家似乎亦如此，至少唯一允许我们进入他内心深处的阿基米德是这样的。

22个世纪之前，阿基米德给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写信，其实是想传递一则装在瓶中的数学信息，尽管当时几乎无人能理解这则信息，但阿基米德还是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安然地穿越时间之海。阿基米德分享了他的方法，希望未来的几代数学家能利用它“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但是，天不遂人愿，时间的破坏力一如既往地残酷。帝国衰落，图书馆付之一炬，手稿也化为灰烬。据说，关于阿基米德方法的所有手抄本都未能挨过中世纪。尽管列奥纳多·达·芬奇、伽利略、牛顿和文艺复兴及科学革命时期的其他天才，都认真钻研过留存下来的阿基米德论著，但他们从未见过阿基米德方法。因此，人们认为它永远地失落了。

但是，它又奇迹般地被发现了。

1998年10月，一本破旧的中世纪祈祷书在佳士得拍卖行参与竞拍，最终被一位匿名的私人收藏家以22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在它的拉丁祈祷文之

下，依稀可见模糊的几何图形和用10世纪的希腊文写下的数学文本。这本书是重写本：在13世纪，它的羊皮纸手卷被清洗过，擦去原先的希腊文，并重写上拉丁语的礼拜式文本。幸运的是，它上面的希腊文并未被完全清除，残留的文本中就包含了阿基米德方法的仅存手抄本。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阿基米德重写本^[9]最早发现于1899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希腊东正教会图书馆里。在伯利恒附近的圣撒巴修道院的一本祈祷书里，它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它现在被保存在巴尔的摩的沃尔特艺术博物馆里，人们利用最新的成像技术对它进行了精心的修复和检查。

[1] The Method: For the original text, see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326 and following.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o the quadrature of the parabola, see Laubenbacher and Pengelley, *Mathematical Expeditions*, section 3.3, and Netz and Noel, *The Archimedes Codex*, 150–57.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o several other problems about areas, volumes, and centers of gravity, see Stein, *Archimedes*, chapter 5, and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68–74.

[2] “does not furnish an actual demonstration”: Quoted in Stein, *Archimedes*, 33.

[3] “theorems which have not yet fallen to our share”: Quoted in Netz and Noel, *The Archimedes Codex*, 66–67.

[4] “made up of all the parallel lines”: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17.

[5] “drawn inside the curve”: Dijksterhuis, *Archimedes*, 317. Dijksterhuis argues, as I have here, that the Method aired some dirty laundry. It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completed infinity “had only been banished from the published treatises,” but that didn’t stop Archimedes from using it in private. As Dijksterhuis put it, “In the workshop of the producing mathematician,” arguments based on completed infinity “held undiminished sway.”

[6] “a sort of indication”: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17.

[7] volume of a sphere: Stein, *Archimedes*, 39–41.

[8] “inherent in the figures”: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1.

[9] *Archimedes Palimpsest*: See Netz and Noel, *The Archimedes Codex*; the authors tell the story of the lost manuscript and its rediscovery with great

panache. There was also a terrific Nova episode about it, and the accompanying website offers timelines, interviews, and interactive tools; see <http://www.pbs.org/wgbh/nova/archimedes/>. See also Stein, Archimedes, chapter 4.

从计算机动画到面部手术

阿基米德的遗产^[1]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想想孩子们爱看的计算机动画电影^[2]，《怪物史莱克》、《海底总动员》和《玩具总动员》中的角色之所以看起来栩栩如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体现了阿基米德的一个洞见：任何平滑表面都可以令人信服地用三角形来逼近。

我们使用的三角形越小和越多，逼近效果就越好。正如阿基米德用无穷多个三角形碎片来代表光滑的抛物线弓形，今天梦工厂的动画师用几万个多边形创造出史莱克^[3]圆滚滚的肚子和可爱的喇叭状小耳朵。在创作史莱克与当地暴徒搏斗的场景时，每一帧都要用到不少于4 500万个多边形^[4]。但在成片中，它们又毫无踪迹可寻。正如无穷原则教给我们的那样，有直边和尖角的形状可以模拟光滑的曲线形状。

近10年后，也就是2009年《阿凡达》^[5]上映时，它使用的多边形层级甚至多到了“奢侈”的程度。在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坚持下，对于虚构的潘多拉星球上的每一株植物，动画师都使用了大约100万个多边形。考虑到影片发生在一片草木茂盛的虚拟丛林中，这意味着有许许多多的植物，以及需要使用海量的多边形。难怪《阿凡达》的制作成本高达3亿美元，它是第一部使用了数十亿个多边形的电影。^[6]

相比《阿凡达》，最早用计算机制作的电影使用的多边形则少得多。尽管如此，计算量在当时看来也是十分惊人的。以1995年上映的《玩具总动员》^[7]为例。那时候，一位动画师要花一周的时间来同步一个8秒的镜头。整部电影花了4年的时间才全部制作完成，其中计算机制作的时间长达80万个小时。正如皮克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对《连线》杂志说的那样：“在电影史上，参与制作这部电影的博士人数比其他任何一部电影都多。”^[8]

《玩具总动员》上映后不久，《棋逢敌手》^[9]就接踵而至，这是第一部以人类为主角的计算机动画电影。这部有趣而悲伤的影片讲述了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公园里跟自己下棋的故事，它获得了1998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和计算机制作的其他角色一样，《棋逢敌手》的主人公格里也是由有角的形状构成的。皮克斯公司的动画师用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来塑造格里的头部，这个多面体是三维宝石状的，包含大约4 500个角，角与角之间是平面。动画师通过反复分割这些平面，进行越来越多的细节刻画。与以前的方法相比，这种细分过程^[10]占用的计算机内存要少得多，从而大大提升

了动画制作的效率。当时，这是计算机动画的一次革命性进步，但实质上，它继承了阿基米德思想和方法。回想一下，为了估算圆周率，阿基米德先从一个六边形着手，然后分割它的每一条边，并将这些边的中点外推到圆上，形成一个12边形。经过又一次分割，12边形变成了24边形，然后是48边形，最后是96边形，每一次都越来越接近目标——极限圆。同样地，创造格里的动画师也是通过反复分割一个多面体，去逼真地模拟他那布满皱纹的额头、隆起的大鼻子和颈部的皮肤褶皱。通过足够多次地重复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使格里的样子符合他的角色设定，即一个能够传递各种人类情感的木偶般的形象。

几年后，皮克斯的竞争对手梦工厂在现实主义和情感表达方面又向前迈出了好几步，讲述了一个关于臭烘烘、脾气暴躁但很英勇的怪物史莱克的故事。

虽然史莱克并不存在于计算机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但它似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部分原因在于动画师非常用心地再现了人体解剖结构。在史莱克的虚拟皮肤之下，他们建构了虚拟的肌肉、脂肪、骨骼和关节。一切都如此地忠于事实，以至于当史莱克开口说话时，它脖子上的皮肤会形成一个双下巴^[11]。

还有一个领域能证明阿基米德的多边形逼近理念的有效性，那就是为有严重覆骀、下颌骨错位或其他先天性畸形的患者施行的面部手术。2006年，德国应用数学家彼得·杜夫哈德、马丁·维泽尔和斯特凡·扎豪，报告了他们利用微积分和计算机建模来预测复杂的面部手术效果的相关研究结果。

这个团队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绘制患者面部骨骼结构的精确示意图。为此，他们通过CT或MRI扫描得到患者面颅骨的三维结构信息，并据此建立起患者面部的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在几何学上是精确的，在生物力学上也是精准的，它包含了对皮肤和软组织（比如脂肪、肌肉、肌腱、韧带和血管）的材料特性的合理估计。在计算机模型的帮助下，外科医生可以给虚拟病人做手术，就像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模拟器中强化飞行技能一样。面部、下颌和头颅的虚拟骨骼都可以被切割、置换、加强或者完全移除，而计算机可以算出为应对新的骨骼结构产生的压力，面部背后的虚拟软组织应该如何移动和重构。

这类模拟结果在很多方面都大有帮助。它们会提醒外科医生注意手术有可能对脆弱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比如神经、血管和牙根等。它们也会展示出患者术后的样子，因为这个模型可以对患者痊愈后软组织的情况做出预测。它们还有一个优点：外科医生可以根据模拟结果为实际的手术做

更充分的准备，患者也可以更理智地决定是否接受手术。

当研究人员用大量的三角形为颅骨的平滑二维表面建模时，阿基米德方法就开始起作用了。然而，软组织的几何结构非常复杂。和颅骨不同，软组织形成了全三维体积，它填充了颅骨之前和面部皮肤之后的复杂空间。于是，研究团队使用了几十万个四面体（三角形的三维对应体）来代表软组织。在图2-26中，颅骨表面使用了25万个三角形（它们太小了，根本看不清），而软组织则使用了65万个四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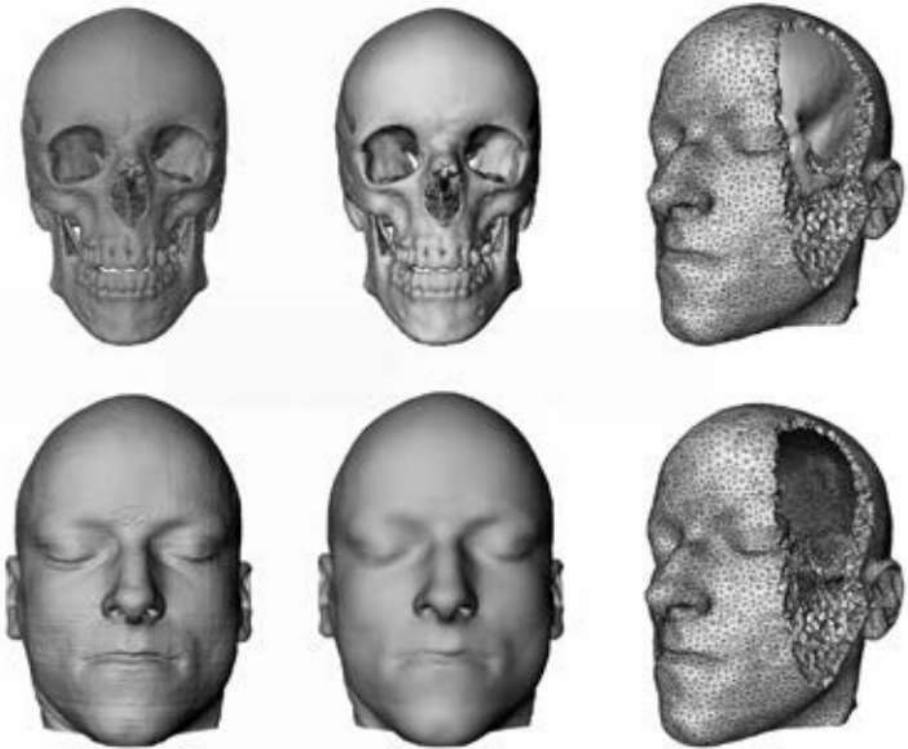


图2-26

这些四面体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预测出患者的软组织在术后会如何变形。粗略地讲，软组织是一种可变形但有弹力的材料，有点儿像橡胶或弹力纤维。如果你捏自己的脸颊，它会变形；而当你松开手时，它又会恢复正常。自19世纪起，数学家和工程师就开始利用微积分为不同材料建模，研究当这些材料以各种方式被推挤、拉拽或剪切时，它们会如何伸展、弯曲和扭曲。这种理论在工程学的一些更传统的领域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被

用于分析桥梁、建筑物、飞机机翼和很多其他由钢、混凝土、铝等硬质材料构建的结构中的应力与应变。三位德国的研究人员将这种传统方法应用于软组织，并且发现它的效果很好，对外科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有价值。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把软组织想象成由四面体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状物，这些四面体就像用弹性线串起来的珠子，每个珠子都代表很小的一部分软组织。它们的连接之所以有弹性，是因为软组织中的原子和分子其实是由化学键连接在一起的。化学键要抵抗拉伸和压缩，这种功能赋予了它们弹性。在虚拟手术中，外科医生切割虚拟面部中的骨头，并将一些骨段移到别处。当一块骨头被移至一个新位置时，它会拉拽与它相连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又会拉拽它们的邻近组织。由于级联效应，网状物会自我重构。当某些组织移动时，通过拉伸或压缩与邻近组织间的化学键，它们会改变对邻近组织施加的力。那些受影响的邻近组织也会自行重新调整，以此类推。记录所有的合力和移位是一项庞大的计算任务，只有计算机才能胜任。算法会逐步更新关于力的大量数据，并据此移动那些微小的四面体。最终，所有力都实现了平衡，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平衡状态。这就是模型预测出的患者面部的新形状。

2006年，杜夫哈德、维泽尔和扎豪利用大约30个手术病例的临床结果，对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检验，并发现它相当有效。作为其成功的标志之一，模型准确地（误差范围在1毫米以内）预测出患者70%的面部皮肤的位置，只有5%~10%的皮肤与它预测的术后位置的偏差超过3毫米。换句话说，这个模型是可信的，而且它显然比盲目猜测好得多。

图2-27展示的是一个患者手术前后的样貌。4幅小图分别是他在手术前的侧面轮廓（左1）、他在手术前的面部计算机模型（左2）、预测的手术结果（右2）和实际结果（右1）。看看手术前后他的下颌位，结果不言而喻。



图2-27

[1] Archimedes's legacy: Rorres, Archimed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 computer-animated movies: For the math behind computer-generated movies and video, see McAdams et al., "Crashing Waves."

[3] Shrek: DreamWorks, "Why Computer Animation Looks So Darn Real," July 9, 2012, <https://mashable.com/2012/07/09/animation-history-tech/#uYHyf6hO.Zq3>.

[4] forty-five million polygons: Shrek, production information, <http://cinema.com/articles/463/shrek-production-information.phtml>.

[5] Avatar: "NVIDIA Collaborates with Weta to Accelerate Visual Effects for Avatar," http://www.nvidia.com/object/wetadigital_avatar.html, and Barbara Robertson, "How Weta Digital Handled Avatar," Studio Daily, January 5, 2010, <http://www.studiodaily.com/2010/01/how-weta-digital-handled-avatar/>.

[6] first movie to use polygons by the billions: "NVIDIA Collaborates with Weta."

[7] Toy Story: Burr Snider, "The Toy Story Story," Wired, December 1, 1995, <https://www.wired.com/1995/12/toy-story/>.

[8] "more PhDs working on this film": Ibid.

[9] Geri's Game: Ian Failes, "'Geri's Game' Turns 20: Director Jan Pinkava Reflects on the Game-Changing Pixar Short," November 25, 2017, <https://www.cartoonbrew.com/cgi/geris-game-turns-20-director-jan-pinkava-reflects-game-changing-pixar-short-154646.html>. The movie is on YouTub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QG3sORAJQ> (original soundtrack) 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IYRC7g2ICg> (modified soundtrack).

[10] subdivision process: DeRose et al., "Subdivision Surfaces." Explore subdivision surfaces for computer animation interactively at Khan Academy in collaboration with Pixar at <https://www.khanacademy.org/partner-content/pixar/modeling-character>.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might also enjoy trying the other lessons offered in "Pixar in a Box," a "behind-the-scenes look at how Pixar artists do their jobs," at <https://www.khanacademy.org/partner-content/pixar>. It's a great way to see how math is being used to make movies these days.

[11] double chin: DreamWorks, "Why Computer Animation Looks So Darn Real." facial surgery: Deuffhard et al., "Mathematics in Facial Surgery"; Zachow

et al., “Computer-Assisted Planning”; and Zachow, “Computational Planning.”

探索运动之谜

在我写下这部分文字的前一天（3月14日，也是圆周率日），伊萨卡下了一场暴风雪，积雪超过1英尺^[1]厚。今天（3月15日）早上，当我第4次去铲除门前车道上的雪时，我羡慕地看着一辆装有前置除雪机的小型拖拉机，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轻松地铲出了一条路。它先用旋转的螺旋桨叶把雪卷入机器，再把雪投射到我邻居的院子里。

这种用旋转螺旋装置来驱动物体的方法据说也源自阿基米德，为了纪念他，今天我们称该装置为阿基米德螺旋泵^[2]。他在埃及游历期间想到了这个发明（尽管亚述人可能早就开始使用这种装置了），它的作用是将低洼地区的水抽到灌溉渠里。今天的心脏辅助装置就是在患者的左心室受损时，利用阿基米德螺旋泵来维持循环的。

但显然，阿基米德并不想因为他的螺旋泵、战争机器或其他实用性发明而被后人记住，所以他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相关文字记录。他在数学领域的发明才是最让他自豪的事，也让我觉得在圆周率日深刻思考他的理论和方法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自阿基米德限定圆周率范围以来的2 200年里，尽管 π 的数值近似程度已经被提升了很多次，但人们使用的始终是阿基米德发明的数学技巧：利用多边形或无穷级数进行逼近。更广泛地讲，他的杰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有原则地利用无穷过程去量化曲线形状的几何特性。在这一点上，他是无可匹敌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然而，在这趟微积分的探索之旅中，曲线形状的几何特性只能带我们走到这里了。而我们还需要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如何移动的，比如，手术后人体组织会如何变化，血液如何流经动脉，球如何在空中飞行。对于这类问题，阿基米德只字未提。^[3]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物体在杠杆上如何达到平衡状态和在水中如何稳定漂浮的静力学，他是平衡方面的大师。而我们的探索之旅的下一站是：运动之谜。

^[1]1英尺 ≈ 0.305 米。——编者注

^[2] Archimedean screw: Rorres, Archimed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pter 6, and <https://www.math.nyu.edu/~crrorres/Archimedes/Screw/Applications.html>.

^[3] Archimedes was silent: In fairness, Archimedes did do one study related to motion, though it was an artificial form of motion motivated by mathematics rather than physics. See his essay “On Spirals,” reproduced in Heath,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151–88. Here Archimedes anticipated the modern ideas of polar coordinates and parametric equations for a point moving in a plane. Specifically, he considered a point moving uniformly in the radial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origi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adial ray rotated uniformly, and he showed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moving point is the curve now known as an Archimedean spiral. Then, by summing $1^2 + 2^2 + \dots + n^2$ and applying the method of exhaustion, he found the area bounded by one loop of the spiral and the radial ray. See Stein, Archimedes, chapter 9;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54–62;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14–15.

第3章 运动定律的探索之旅

阿基米德去世后，关于自然的数学研究也几乎随之消逝，直到1800年后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登上历史舞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位名叫伽利略·伽利雷的年轻数学家重拾阿基米德的未竟之业。他观察了物体在空中飞行或者落到地上的运动过程，并从中寻找数字规律。他进行了细致的实验，并且做出了巧妙的分析。他测量了钟摆来回摆动的时间，又让球滚下平缓的斜坡，由此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规律性。与此同时，年轻的德国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研究了行星是如何在天空中运行的。他们俩都被各自数据中的模式深深吸引，并意识到存在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发现了某种东西，但却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思。运动定律是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就的，当时人们并不知道那种语言就是微分学。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它的踪迹。

在伽利略和开普勒之前，人们很少从数学角度去理解自然现象。虽然阿基米德在他的杠杆定律和流体静力学平衡定律中分别揭示了平衡和浮力的数学原理，但这些定律都仅限于静止状态。伽利略和开普勒冒险冲出了阿基米德的静态世界，去探索物体是如何运动的。他们努力理解自己看到的现象，还为此发明了一种可以处理变速运动的新数学工具。这种工具可以处理那种不断变化的变化，比如从斜坡上滚下时不断加速的球，或者靠近太阳时加速而远离太阳时减速的行星。

1623年，伽利略把宇宙描述为“一部伟大的著作^[1]……始终摊开在我们眼前”。但他也告诫人们，“一个人必须先学会理解这本书的语言，会读其中的字母，否则就不可能看懂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字符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形状。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可能一个词语也理解不了；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就只能在黑暗的迷宫中徘徊。”开普勒对几何学表达了更加强烈的敬意，他形容它将“与神的思想永远同在”^[2]，并认为它“为上帝提供了创造世界的模式”^[3]。

伽利略、开普勒和17世纪早期的其他志趣相投的数学家面临的挑战是，将他们深爱且非常适合静态世界的几何学，延展到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去。他们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数学问题，还要克服来自哲学、科学和神学领域的阻力。

[1] “this grand book”: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Selections translated by Stillman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237–38, <https://www.princeton.edu/~hos/h291/>

assayer.htm.

[2] “coeternal with the divine mind”: Johannes Kepler, *The Harmony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E.J.Aiton, A.M.Duncan, and J.V.Field,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9 (1997): 304.

[3] “supplied God with patterns”: *Ibid.*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

17世纪以前，人们对运动和变化知之甚少。因为它们不仅研究难度很大，而且极其不受欢迎。柏拉图曾教导学生说，^[1]几何学的目标是了解“永恒存在的事物，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他对转瞬即逝事物的藐视态度，在他最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学说^[2]主宰西方思想近2 000年（在托马斯·阿奎那删去了其中涉及异教徒的内容后，天主教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它认为天空永恒不变且完美无缺，地球静止不动地处于神创世界的中心，太阳、月亮、恒星和行星等天体伴随着天球的自转，沿正圆形轨道绕地球旋转。根据这种宇宙论，在地球上被月光照到的地方，万物都会腐烂、死亡和衰败。生命的变幻莫测就像落叶一样，本质上是转瞬即逝、反复无常和混乱无序的。

虽然地心说看似令人安心且合乎常识，但行星的运动却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行星的英文单词“planet”的原意是“流浪者”（wanderer）。在古代，行星被称为流浪的恒星，因为它们会在天空中缓慢移动，而不像猎户座和北斗星中的那些恒星一样，在天空中的位置保持不变。每过几周或者几个月，它们就会从一个星座行进至另一个星座。相对于恒星，尽管行星大多数时候都是向东移动，但似乎偶尔也会减速、停下，然后向西倒退，天文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逆行^[3]。

以火星为例，人们观测到它在接近两年的公转周期里，有大约11周的时间在逆行。今天，我们可以用摄影的方式来捕捉它的逆行轨迹。2005年，天体摄影师唐克·特泽尔拍摄了一组火星快照，共35张，前后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均间隔一周左右。他将这些照片背景中的恒星对齐后进行了图像合成，最终生成图片上的中间11个点表明火星在逆行（图3-1）。



图3-1

今天，我们知道逆行是一种错觉。当经过移动速度相对缓慢的火星时，我们在地球上所处的有利观测位置使我们产生了这种错觉（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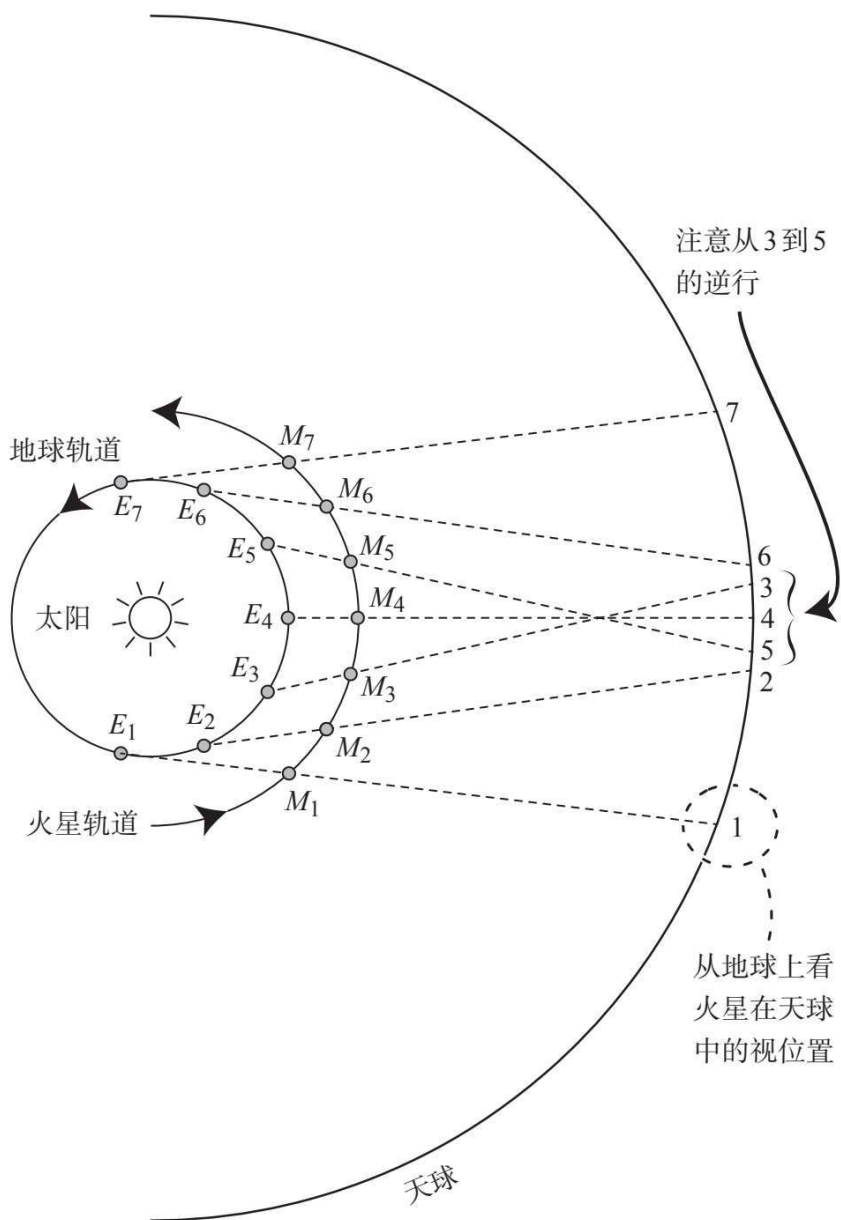


图3-2

这就像你在公路上超车一样。想象你驾车行驶在沙漠中的一条长长的公路

上，远处群山起伏。当你从后面接近一辆速度较慢的车时，在群山背景的衬托下，它看起来正在向前移动。但当你驾车追上并超过它时，它似乎会短暂地相对于群山向后移动。而一旦你超过那辆慢车的距离足够远，它看起来又在向前移动了。

这种观测结果引导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4]提出了最早的日心说，比哥白尼早了大约2 000年。它巧妙地解开了逆行之谜，但日心说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如果地球在移动，为什么我们没有掉下去呢？为什么恒星看起来是固定不动的呢？这不应该啊，当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时，远处恒星的位置看起来应该稍有改变才对呀。经验表明，如果你看着远处的某个物体，然后换个地方再看一次，那么在一个更远背景的衬托下，这个物体的位置看上去似乎有所改变，这种效应被称为视差。想要体验它，你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你脸前方的尽量远处。闭上一只眼，然后睁开，再闭上另一只眼。当你换眼睛的时候，你的手指似乎在背景的衬托下向旁边移动了。同样地，当地球在轨道上围绕太阳旋转时，在更遥远恒星的衬托下，较近处恒星的视位置应该会发生改变。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方法（阿基米德在回应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5]）是，假设所有恒星都极其遥远，与地球的距离达到了有效的无穷远，那么行星的运动将产生不可探测（因为视差太小而无法测量）的位移。这个结论在当时很难被人们接受。没有人能想象出宇宙会如此巨大，恒星会如此遥远，甚至比行星还要远得多。尽管今天的我们知道事实的确如此，但在那个时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尽管地心说存在各种缺陷，但它似乎是一种更加合理的图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用本轮、偏心匀速圆和其他经验系数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适当的修正，使它能相当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并让历法与季节周期保持一致。尽管托勒密体系^[6]笨拙而复杂，但直到中世纪晚期它都行之有效。

1543年出版的两本书成为一个转折点，并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开始。在那一年，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报告了他对人类尸体进行解剖的结果，而这种做法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被禁止了。他的发现驳斥了14个世纪以来关于人体解剖学的公认观点。同一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终于准许公开出版他的激进理论，即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他之所以一直等到濒死之际才做这件事（就在这本书即将出版时他去世了），是因为他担心天主教会被他否定地球处于神创世界中心的言论激怒。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乔尔丹诺·布鲁诺^[7]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布鲁诺在提出宇宙无限大且包含无穷多个世界等“异端邪说”之后，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于1600年在罗马被处以火刑。

[1] Plato had taught: Plato, Republic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7),

[2] Aristotelian teaching: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17–20.

[3] retrograde motion: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06.

[4] Aristarchus: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24–25, and James Evans, “Aristarchus of Samo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Aristarchus-of-Samos>.

[5] Archimedes himself realized: Evans, “Aristarchus of Samos.”

[6] Ptolemaic system: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45–57.

[7] Giordano Bruno: Martínez, *Burned Alive*.

伽利略出场

在天主教的权威和教义受到“危险”思想挑战的氛围下，1564年2月15日，伽利略^[1]出生在意大利比萨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身为家中长子，他在父亲的强迫之下走上了行医之路，因为这是一个比他父亲从事的音乐理论研究赚钱多得多的职业。但是，伽利略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是数学。他研究并掌握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数学思想。尽管他没有取得学位（他的家庭负担不起学费），但他继续自学数学和科学，还幸运地在比萨当上了一名临时教师。随着学术职称的逐步提升，他成了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伽利略是一位出色的讲师，思路清晰、桀骜不驯、机智诙谐，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来听他的课。

他遇到了一名年轻活泼的女子玛丽娜·冈巴^[2]，他们非常相爱，生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因为玛丽娜很年轻，而且社会地位很低，和她结婚对伽利略来说是件有损名誉的事情。做数学老师的薪水微薄，既要抚养三个孩子，还要负担未婚妹妹的生活费，这让伽利略的经济压力倍增，不得不忍痛把女儿们送进修道院。大女儿维吉尼亚是伽利略的最爱^[3]，也是他一生的快乐源泉，他后来形容维吉尼亚是“一个心思细腻、特别善良和最温柔地依恋我的女人”。当维吉尼亚宣誓成为一名修女时，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和她父亲对天文学的痴迷，她选择用“修女玛丽亚·塞莱斯特（celeste，天蓝色）”作为自己的教名。

关于伽利略，我们记忆最深刻的可能是他利用望远镜开展的研究，以及他支持跟亚里士多德和天主教会观点相悖的哥白尼学说，即地球绕着太阳转。尽管望远镜并不是伽利略发明的，但他对望远镜做出了改进，并且是第一个利用它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人。1610-1611年，他观测到月球上有山，太阳上有斑点，以及木星有4颗卫星（从那时起，人们又陆续发现了其他卫星）。

所有这些观测结果都是对当时主流教条的公然违抗。月球上有山意味着它并不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完美天体，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悖。同样地，太阳上有斑点意味着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天体，而是有瑕疵的。由于木星及其卫星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行星系，4颗小卫星围绕着一个更大的中央行星运行，所以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天体都围绕着地球转动。而且，即使这些卫星在天空中移动，它们也总会伴随在木星旁边。而当时，反对日心说的一个标准论点是，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就会把月亮抛在后面，但木星及其卫星证明这个推论肯定是错误的。

这并不是说伽利略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不信仰宗教的人。他是一个虔诚的

天主教徒，认为通过如实的记录而不是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的公认见解，也可以凸显出上帝创造一切的荣耀。然而，天主教会不这样认为，他们谴责伽利略的著作是异端邪说。1633年，在宗教裁判所里，伽利略被勒令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他照做了。于是，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改判为软禁在他位于佛罗伦萨山区阿尔切特里的别墅中。他渴望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但他回来后不久，玛丽亚·塞莱斯特就病逝了，年仅33岁。失去亲人的伽利略一度对工作和生活失去了全部兴趣。

这位老人双目失明，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但他仍在与时间赛跑。不知何故，在女儿去世后的两年时间里，伽利略找回了勇气，对他几十年来所做的关于运动的研究成果（未发表）进行了总结。由此诞生的图书《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4]是他毕生的巅峰之作，也是现代物理学的第一部杰作。他写作这本书用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懂它。他安排人把书稿偷偷带去荷兰，并于1638年在那里出版。书中的激进见解引发了科学革命，并把人类推上了发现宇宙秘密的风口浪尖：自然这部伟大的著作是用微积分语言写就的。

[1] Galileo Galilei: The Galileo Project, <http://galileo.rice.edu/galileo.html>, is an excellent online resource for Galileo's life and work. Fermi and Bernardini, *Galileo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is a delightful biography of Galileo for general readers.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91–96, is a good quick introduction to Galileo, and so is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82–95. For a scholarly treatment, see Drake, *Galileo at Work*, and Michele Camerota, "Galilei, Galileo," in Gillispie, *Complete Dictionary*, 96–103.

[2] Marina Gamba: <http://galileo.rice.edu/fam/marina.html>.

[3] was his favorite: Sobel, *Galileo's Daughter*. Sister Maria Celeste's letters to her father are at <http://galileo.rice.edu/fam/daughter.html#letters>.

[4] *Two New Sciences*: The book is available free online at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galilei-dialogues-concerning-two-new-sciences>.

下落、滚动与奇数定律

伽利略是科学方法的第一位实践者。他没有引用权威观点或者进行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而是通过一丝不苟的观测、巧妙独特的实验和优雅的数学模型来探索自然。这种方法引领他取得了很多不同寻常的发现，其中最简单和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是：奇数1, 3, 5, 7...隐藏在物体的下落过程中。

在伽利略之前，亚里士多德提出，重物之所以会下落，^[1]是因为它们要寻找自身在宇宙中心的天然位置。伽利略认为这些都是空话，他想要量化物体是如何下落的，而不是猜测它们为什么会下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找到一种方法，用于在下降过程中测量落体并时刻记录它们的位置。

这并不容易做到。所有从桥上扔过石头的人都知道，石头的下落速度很快。要想时刻追踪一块正在快速下降的落石，需要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钟和几台十分先进的摄像机，而这些工具在伽利略生活的17世纪初都不存在。

伽利略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减慢运动速度。他没有从桥上扔石头，而是让一个球缓慢地滚下斜坡。在物理学中，这种斜坡被称为斜面。不过，在伽利略最初的实验中，他用的是一块长而薄的木板，然后沿纵向模切出一个凹槽作为球的通道。通过减小斜坡的斜率直到它接近水平状态，他可以使球的下降速度变得尽可能缓慢，即使运用那时可用的仪器，也能测量出球在每一时刻的位置。

伽利略利用水钟记录球下降的时间，它的工作原理和秒表类似。开始计时的时候，他会打开阀门。然后，水会以恒定的速率通过细管稳定地流入容器。停止计时的时候，他会关闭阀门。通过对球下降过程中容器里积累的水进行称重，伽利略可以将流逝的时间精确到“1/10次脉搏跳动”^[2]以内。

他将这个实验反复做了许多次，有时是改变斜坡的倾角，有时是改变球滚过的距离。用伽利略自己的话说，他发现“一个物体从静止开始下落，在相等的时间间隔内，它依次经过的距离之比与从1开始的奇数之比相同”^[3]。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个奇数定律，我们假设球在第一个单位时间内滚动了一定的距离。然后，在第二个单位时间内，它滚动的距离是第一次的3倍；在第三个单位时间内，它滚动的距离是第一次的5倍。这太令人吃惊了，奇数1, 3, 5, 7...竟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物体向下滚动的过程中。如果下落只是滚动在倾角接近垂直时的极限情况，那么下落也一定遵循同样的定律。

我们只能想象当伽利略发现该定律时，他一定非常高兴。但也要注意他是怎么表述的，他用了单词、数字和比例，而不是字母、公式和方程。相较于口语，我们现在更偏爱代数表达式，但这在伽利略的时代是一种前沿、前卫、新奇的思考和说话方式。所以，伽利略不会用这种方式思考或表达他的观点，如果他这样做了，他的读者就几乎无法理解他。

为了领会伽利略奇数定律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如果把连续的奇数相加会发生什么。在第一个单位时间之后，球移动了1个单位距离；在第二个单位时间之后，球又移动了3个单位距离。那么，从开始运动起，球一共移动了 $1+3=4$ 个单位距离。在第三个单位时间之后，球一共移动了 $1+3+5=9$ 个单位距离。请注意这样一个规律：数字1、4和9是连续整数的平方，即 $1^2=1$ ， $2^2=4$ ， $3^2=9$ 。所以，伽利略的奇数定律似乎暗示了物体下落的总距离与所经过时间的平方成正比。

奇数与平方之间的这种迷人的关系可以从视觉上得到证明，如图3-3所示，我们将奇数想象成L形的点阵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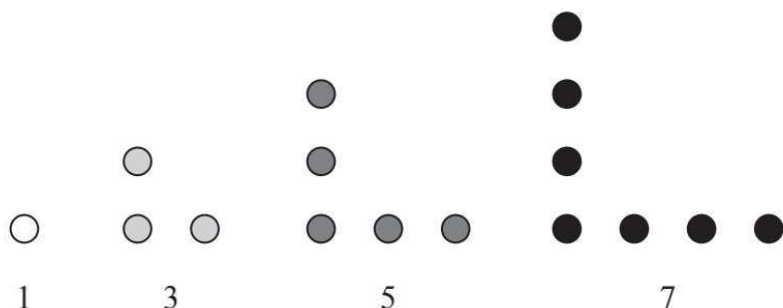


图3-3

然后，我们把它们拼在一起形成一个正方形。比如， $1+3+5+7=16=4\times 4$ ，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将1、3、5、7这4个奇数组合成一个 4×4 的正方形（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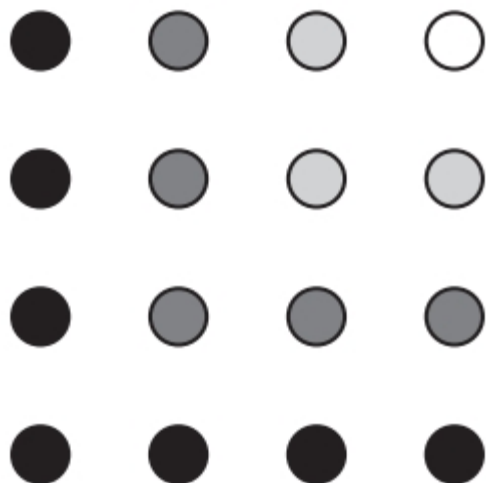


图3-4

除了关于落体运动距离的定律之外，伽利略还发现了关于落体速度的定律。正如他说的那样，速度的增加与下落的时间成正比。有趣的是，他指的是物体的瞬时速度，而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伽利略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煞费苦心地解释说，当一个物体从静止开始下落时，它不会像他的同时代人想的那样，从零速度突然跃升至较高的速度。准确地说，它会从零速度开始下落，在有限的时间内平稳地经过每个中间速度（有无穷多个），并不断加速。

所以，在这个落体定律中，伽利略本能地想到了瞬时速度，我们将在第6章详细介绍这个微分学概念。尽管当时他无法精准地把它表述出来，但他在直觉上清楚它的意思。

[1] proposed that heavy objects fall: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88–90.

[2] “one-tenth of a pulse-beat” :Galileo, *Discourses*, 179,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607.

[3] “same ratio as the odd numbers beginning with unity”: Ibid., 190,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516.

科学极简主义的艺术

在结束关于伽利略斜面实验的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它背后的艺术性。通过提出一个美丽的^[1]问题，伽利略从大自然那里“哄骗”出一个美丽的答案。他就像一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突出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把其他东西抛在一边。

比如，在描述实验装置时，伽利略说他把“凹槽雕刻得非常平直，打磨得十分光滑”，而且“沿凹槽滚动的是一个坚硬光滑的铜球，非常圆”^[1]。他为什么如此关注光滑度、平直度、硬度和圆度呢？因为伽利略想让球在他能设法实现的最简单、最理想的条件下滚下斜坡。他竭尽所能地减少潜在的问题，包括：摩擦，球与凹槽侧壁发生碰撞（如果凹槽不直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球的柔软性（如果球变形太严重，就会造成能量损失），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实验偏离理想状态的因素。这些都是正确的审美选择：简单、简洁和最小化。

相较之下，亚里士多德被复杂的因素引入歧途，以致得出了错误的落体定律。他声称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快，而且速度与它们的重量成正比。这个结论适用于在非常黏稠的介质（比如糖浆或蜂蜜）中下沉的细小颗粒，而不适用于在空气中下落的炮弹或火枪子弹。亚里士多德似乎太过关注空气阻力产生的曳引力（诚然，这会对下落的羽毛、树叶、雪花和其他轻的物体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们为空气提供了很大的施力表面积），以至于忘记用更具代表性的物体（比如紧凑沉重的石头或砖块）来测试他的理论。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过于关注噪声（空气阻力），而不够重视信号（惯性和引力）。

伽利略没把他的注意力分散到这些因素上。他知道，尽管空气阻力和摩擦力在现实世界和他的实验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伽利略预见到他会因为在分析中忽略这些因素而受到批评，于是他承认一粒鸟枪子弹的下落速度不如炮弹快；但他也指出，他的实验误差将远远小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给出的结果。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代表伽利略的人物力劝头脑简单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提问者，不要“偏离讨论的主题，而紧抓着我的某些和真相只有毫发之差的陈述不放，殊不知在这根头发之下，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像船舶缆绳一样显眼^[2]的错误”。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科学中，毫发之差是可以接受的，但像船舶缆绳那样显眼的误差就不行了。

伽利略继续研究抛体运动，比如火枪子弹或炮弹的飞行过程。它们会遵循

哪类弧呢？伽利略的想法是，抛体运动由两种不同的运动构成，可以分别处理。一种是平行于地面的水平运动，引力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另一种是向上或向下的垂直运动，引力在其中发挥作用，并且可以利用他的落体定律。伽利略把这两种运动结合起来，发现抛体会沿抛物线路径运动。每当你玩接球游戏或者从饮水喷头喝水时，就会看到这样的抛物线路径。

这是大自然与数学之间的另一个惊人联系，进一步表明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当发现他的偶像阿基米德研究过的抽象曲线——抛物线——竟然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时，伽利略兴奋不已。大自然果真在利用几何学。

不过，为了得出这个洞见，伽利略必须再一次弄清楚他需要忽略什么因素。跟之前一样，他需要忽略空气阻力，也就是抛体在空气中运动时受到的曳引力，这种摩擦效应会减慢抛体的运动速度。对某些种类的抛体（比如被扔出去的石头）来说，摩擦力相较于引力可以忽略不计；而对其他种类的抛体（比如沙滩球或乒乓球）来说，摩擦力则不能忽略。所有形式的摩擦力，包括空气阻力产生的曳引力在内，都是十分微妙的，研究难度也很大。直到今天，摩擦力之谜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为了得到简单的抛物线，伽利略需要假设水平运动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且速度永远不会减慢。这是他的惯性定律的一个实例，该定律认为，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否则运动物体的运动速度和方向将保持不变。对于一个真实的抛体，空气阻力就是外力。但在伽利略看来，最好还是先忽略它，这样才能尽力捕捉到关于物体运动的真相与美。

[1] “very straight, smooth, and polished”: Ibid.,178,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607.

[2] “as big as a ship’s cable”: Ibid., 109,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242.

从摆动的吊灯到GPS

传说在伽利略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医科学生时，他就取得了第一个科学发现。一天在比萨大教堂参加弥撒仪式时，他注意到头顶上方的一盏吊灯在来回摆动，^[1]就像钟摆一样。伽利略通过观察发现，在气流的不断推挤下，无论吊灯的摆动幅度是大还是小，它每完成一次摆动的用时都相同。这让他吃惊不已，完成一次大幅度摆动的用时和完成一次小幅度摆动的用时怎么会相同呢？但他越思考，就越觉得有道理。当吊灯的摆动幅度大时，尽管它经过的距离更远，但运动速度也更快。也许，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了。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伽利略用他的脉搏测量了吊灯摆动的时间。果真不然，每次摆动的用时（心跳数）都是相同的。

尽管这个传说很奇妙，我也愿意相信它，但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个传说来自伽利略的第一位也是最忠诚的传记作家温琴佐·维维亚尼，他年轻时是伽利略的助手和学生，那时伽利略被软禁在家，完全失明，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众所周知，在伽利略去世数年之后，维维亚尼开始为他的老师写作传记，出于对伽利略的尊敬，他渲染其中的一两则故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算这个故事是杜撰的（可能并不是！），我们也确切地知道伽利略早在1602年就进行了仔细的钟摆实验，并在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提到了这些实验。在这本以苏格拉底式对话为结构的书中，其中一个角色听起来似乎和年轻、爱幻想的伽利略一起置身于大教堂，“我曾几千次观察到振动现象，^[2]特别是在教堂内，那里的灯都用长绳子悬挂着，不经意间就开始运动了。”余下的对话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钟摆经过任意长度弧的用时都相同。因此，我们知道伽利略对维维亚尼故事中描述的现象非常熟悉；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在十几岁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谁也不说不准。

无论如何，伽利略的“钟摆摆动的用时总是相同”的论断并不完全正确；摆动幅度越大，用时就会越长。但如果弧足够小，比如不到20度，他的说法几乎就是对的。今天，我们把这种小幅度摆动的节奏不变性称为钟摆的等时性，它构成了节拍器和摆钟（从普通的落地式大摆钟到像伦敦大本钟那样的塔钟）的理论基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伽利略设计了世界上的第一座摆钟，但还未建造好他就去世了。15年后，荷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发明了第一座实用摆钟。

对他自己发现的一个关于钟摆的奇怪事实，即它的长度与周期（钟摆来回摆动一次的用时）之间的优雅关系，伽利略特别感兴趣，却又备感沮丧。

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如果某人想让一个钟摆的摆动时间是另一个钟摆的2倍，那么他必须使前者的长度达到后者的4倍。”他还用比例的语言陈述了一个一般性规律，“对于悬吊在长度不同的线上的物体，这些线的长度之比等于时间的平方之比。”^[3]遗憾的是，伽利略未能成功地从数学上推导出这个规律，所以它是一个迫切需要理论解释的经验性规律。他为此努力多年，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想想，我们会发现他不可能成功，因为解释这个规律需要用到一种超出他和他同时代人的知识范畴的新数学工具。直到艾萨克·牛顿发现上帝的语言——微分方程，这个规律的数学推导才得以完成。

伽利略坦承，钟摆实验“在许多人看来可能是极其枯燥乏味的”^[4]，但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数学领域，钟摆摆动带来的谜题刺激了微积分的发展。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钟摆摆动变成了振动的范式。就像威廉·布莱克写下的诗句“从一颗沙子看世界”一样，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学会了“从钟摆的摆动看世界”。这种数学工具适用于所有发生振动的地方：人行天桥的令人不安的振动，减振器偏软导致的汽车颠簸，负荷不平衡使洗衣机发出的巨大异响，百叶窗在微风中的振抖，余震中大地的隆隆声，荧光灯60个周期/秒的嗡嗡声……今天，每个科技领域都有各自的往复式运动或节律性回位。钟摆摆动是所有这些振动现象的“始祖”，它的规律具有普适性，用“枯燥”一词来形容这个规律并不恰当。

在某些情况下，钟摆和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非常精确，以至于同样的方程无须改变就可以反复利用。只有符号需要重新解释，而句法保持不变，这就好像大自然一再地回到同一个模体，不断重复着钟摆型主题。比如，旋转的发电机可以产生交流电并把它输送到我们的家中和办公室里，而描述钟摆摆动的方程也可以不加改变地用于描述发电机的旋转。为了纪念这一渊源，电气工程师将他们的发电机方程称为摆动方程。

有一种高科技设备的运行速度比所有发电机或落地式大摆钟都要快几十亿倍，而它的体积只有后者的几百万分之一，在这种设备的量子振动中，同样的方程像变色龙一样再次出现。1962年，22岁的剑桥大学研究生布赖恩·约瑟夫森做出了这样一个预测：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条件下，成对的超导电子可以来回隧穿一道难以穿透的绝缘屏障。根据经典物理学，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不过，微积分和量子力学把这种钟摆样振动召唤到现实中，或者换一种不那么神秘的说法就是，它们揭示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在约瑟夫森预言这些幽灵般的振动现象的两年之后，实验室具备了实现它们所需的条件，并证实了这一预言。由此诞生的器件现在被称为约瑟夫森结^[5]，它的实际用途有很多。它能探测到只有地球磁场强度的1 000亿分之一的超弱磁场，有助于地球物理学家在地下深处寻找石油。神经外科医生利用由数百个约瑟夫森结组成的阵列，可以准确地找到脑瘤的位

置，并定位癫痫患者的致病病变。与探查术不同，这种手术是完全无创的，其原理是绘制出大脑中的异常电通路所产生磁场的微妙变化图。约瑟夫森结也可以为下一代计算机中的极速芯片奠定基础，甚至有可能在量子计算中发挥作用。一旦量子计算成为现实，将会给计算机科学带来革命性变化。

钟摆还赋予了人类第一种准确计时的方法。在摆钟出现之前，最好的时钟即使在理想条件下，每天的走时也会快或慢15分钟，让人不甚满意。而摆钟的走时比时钟准确100倍，它为解决伽利略时代的最大技术挑战——找到在海上确定经度的方法——带来了第一个真正的希望。纬度可以通过观察太阳或恒星来确定，而经度在自然环境中没有对应物。尽管它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对它的测量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在大航海时代，水手们虽然长时间地出海作战或者开展贸易，但他们常常因为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而迷路或者触礁。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政府都曾悬赏巨资寻找能解决经度问题的人，这是当时关注度最高的挑战之一。

在伽利略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尝试设计摆钟时，经度问题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他心里了。自16世纪以来科学家就知道，如果有一台非常精确的时钟，经度问题便可以解决，伽利略也清楚这一点。航海家在始发港设置好时钟，把家乡时间带出海。为了在船只向东或向西航行时确定经度，航海家可以在当地的正午时分，也就是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查看时钟。地球在一天的24个小时里自转了360度，所以当地时间与家乡时间的每一小时时间间隔都对应着15度的经度。就距离而言，15度可以转换为赤道上的1 000英里^[6]。为了让这个方案有望引导船只只到达目的地，并且使误差范围达到几英里以内，时钟运行一天只允许快或慢几秒钟。此外，波涛汹涌的大海及气压、温度、盐度和湿度的剧烈波动，都会造成时钟的齿轮生锈、弹簧变松、润滑剂变黏稠，面对这些可能导致走时变快、变慢或停止的因素，时钟必须始终保持其精确度。

在建造出摆钟并利用它解决经度问题之前，伽利略就去世了。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把他的摆钟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提交给伦敦皇家学会，但并没有得到学会的认可，因为这些摆钟对外界干扰过于敏感。惠更斯后来发明了一种航海天文钟，它的走时不是由钟摆而是由平衡摆轮和平面涡卷弹簧控制的，这种创新性设计为怀表和现代腕表的发明铺平了道路。不过一种新型时钟最终解决了经度问题，它是由英国人约翰·哈里森在18世纪中期发明的，尽管哈里森并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在18世纪60年代的海上测试中，他的H4航海钟追踪经度的精确度达到了10英里，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英国议会的两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奖励。

在我们的时代，地球上的导航问题仍然依赖于对时间的精确测量。以GPS^[7]为例。就像机械时钟是解决经度问题的关键一样，原子钟是将地球

上所有事物的定位精确到几米之内的关键。原子钟是伽利略摆钟的现代版本，尽管它和摆钟一样，也是通过计数振动次数来计时，但它追踪的并不是摆锤的来回摆动，而是计数铯原子在其两种能态间来回转换时的振动次数，这种能态转换每秒钟要进行9 192 631 770次。虽然原子钟和摆钟的运行机制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即重复性的往复运动可以用来计时。

反过来，时间也可以确定你的位置。GPS的24颗卫星在12 000英里的高空绕轨运行，当你使用汽车上的GPS导航仪时，你的设备至少会从其中的4颗卫星那里接收无线信号。每颗卫星都搭载着4台原子钟，它们的时间精密程度均可达到纳秒（十亿分之一秒）级。你的接收器会收到多个可见卫星发出的一连串信号，其中每个信号的时间戳都可精确到纳秒。这正是需要用到原子钟的地方，它们惊人的时间精密度被转化成我们期望GPS具有的空间精密度。

相关计算过程则依赖于三角测量，它是一种基于几何学的古代地理定位方法。对GPS而言，它的工作原理是：当接收器收到来自4颗卫星的信号时，你的GPS设备会比较信号的发送时间和接收时间。这4组时间略有不同，因为这4颗卫星和你之间的距离并不一样。你的GPS设备将这4个微小的时间差乘以光速，就可以计算出你和这4颗卫星之间的距离。由于卫星的位置已知，并且受到极其精确的控制，因此你的GPS接收器可以对这4个距离做三角测量，从而确定它自己在地球表面的位置。此外，它还可以计算出自己的海拔和速度。本质上，GPS是将非常精确的时间测量值转换为非常精确的距离测量值，然后进一步转化为非常精确的位置和运动测量值。

GPS是由美军在冷战期间开发的，它的初衷是追踪携带核导弹的美国潜艇，并为它们提供当前位置的精密估计值，以便在需要发动核打击的时候，能使它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十分精确地瞄准目标。如今，GPS在和平时期的应用包括：精细农业，飞机在大雾中的仪表着陆，以及可以自动为救护车和消防车计算最快路线的增强型911系统。

然而，GPS不只是一个定位和导航系统。它使时间同步的精密程度达到100纳秒以内，有助于协调银行转账和其他金融交易。GPS还让无线电话和数据网络保持同步，使它们能更高效地共享电磁波谱中的频率。

我之所以做出这么详细的说明，是因为GPS是展现微积分的隐藏用途的典型例子。通常情况下，微积分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背后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就GPS而言，这个系统的几乎所有功能都取决于微积分。想想卫星和接收器之间的无线通信，通过麦克斯韦所做的研究，微积分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使无线通信成为可能。所以，没有微积分，就不会有无线通信和GPS。同样地，GPS卫星上的原子钟利用的是铯原子的量子力学振动，而微积分是量子力学方程及其求解方法的基础。所以，没有微积分，

就不会有原子钟。虽然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比如，微积分是计算卫星轨道和控制卫星位置的数学方法的基础，当原子钟高速运动或在弱引力场中运动时，微积分也是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正与原子钟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数学方法的基础，但我希望把重点说清楚。微积分为很多使GPS成为可能的技术研发创造了条件，当然，微积分并不能独立做到这一切。尽管它是一个配角，却是一个重要的配角。和电气工程学、量子物理学、航空航天工程学等学科一样，微积分也是这个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坐在比萨大教堂里，思索着吊灯摆动问题的青年伽利略。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他对钟摆及其摆动的等时性所做的思考看似无用，但实际上对文明的进程——不仅对他的时代，也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chandelier swaying overhead: Fermi and Bernardini, Galileo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7–20, and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82.

[2] “Thousands of times I have observed”: Galileo, Discourses, 140,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338.

[3] “the lengths are to each other as the squares”: Ibid., 139,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335.

[4] “may appear to many exceedingly arid”: Ibid., 138,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753#Galileo_0416_329.

[5] Josephson junction: Strogatz, Sync, chapter 5, and Richard Newrock, “What Are Josephson Junctions? How Do They Work?,”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at-are-josephson-juncti/>. longitude problem: Sobel, Longitude.

[6] 1英里 $\approx$ 1.609千米。——编者注

[7]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hompson,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d 2768. Johannes Kepler: For Kepler’s life and work, see Owen Gingerich, “Johannes <https://www.gps.gov>.”

开普勒与行星运动之谜

伽利略研究的是地球上物体的运动，而约翰尼斯·开普勒^[1]研究的是天空中行星的运动。开普勒解开了古老的行星运动之谜，并通过证明太阳系受到一种“天体和谐性”的支配，实现了毕达哥拉斯的梦想。就像弹拨琴弦的毕达哥拉斯和研究钟摆、抛体及落体的伽利略一样，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也遵循某些数学规律。而且，他既为自己瞥见的规律而深深着迷，也为无法解释它们而备感沮丧。

无独有偶，开普勒也出生在一个没落之家，不过他的处境更加糟糕。据开普勒回忆，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佣兵，“有犯罪倾向”^[2]，他的母亲“脾气暴躁”^[3]（也许可以理解）。除此之外，开普勒小时候染上了天花，差点儿没命。他的手和视力因此遭受了永久性损伤，这意味着他成年后完全无法从事体力工作。

幸运的是，开普勒很聪明。青年时期，他在图宾根大学学习了数学和哥白尼天文学，并被公认为拥有“卓越和非凡的头脑，^[4]未来必定有一番成就”。159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开普勒开始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神学，打算做一名路德教會的牧师。然而，格拉茨的路德教會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去世了，教會当局招募新的数学老师，开普勒被选中，他只好不情愿地放弃了做一辈子神职人员的想法。

如今，所有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会学习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但他为揭示这些定律而遭受的痛苦和付出的近乎狂热的努力却常常被人忽视。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辛苦工作，寻找规律，因为神秘主义驱使他相信，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每晚的位置中一定隐藏着某种神圣的秩序。

在格拉茨待了一年以后，开普勒认为他发现了宇宙的秘密。一天上课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关于行星该如何围绕太阳分布的构想。他认为，行星是由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相互嵌套的天球带动运行的，天球之间的距离由5种柏拉图立体决定，分别是立方体、四面体、八面体、十二面体和二十面体。除此之外，柏拉图发现不存在其他由相同的正多边形构成的三维形状，欧几里得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开普勒来说，柏拉图立体的独特性和对称性看上去就适合作为永恒的存在。

他紧张而狂热地进行着计算。“我夜以继日地计算，^[5]想看看这个想法能否与哥白尼轨道相契合，或者我的喜悦是否会随风而逝。几天之内，一切进展顺利，我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柏拉图立体与它们在行星之间的位置精确

地吻合在一起。”

他在水星的天球周围画了一个外接八面体，并且让金星的天球内接这个八面体；然后，他在金星的天球周围画了一个外接二十面体，并且让地球的天球内接这个二十面体；其他行星以此类推，从而把天球和柏拉图立体像三维拼图一样连锁在一起。他在1596年出版的《宇宙的奥秘》中，以剖视图的形式描绘了这个系统，如图3-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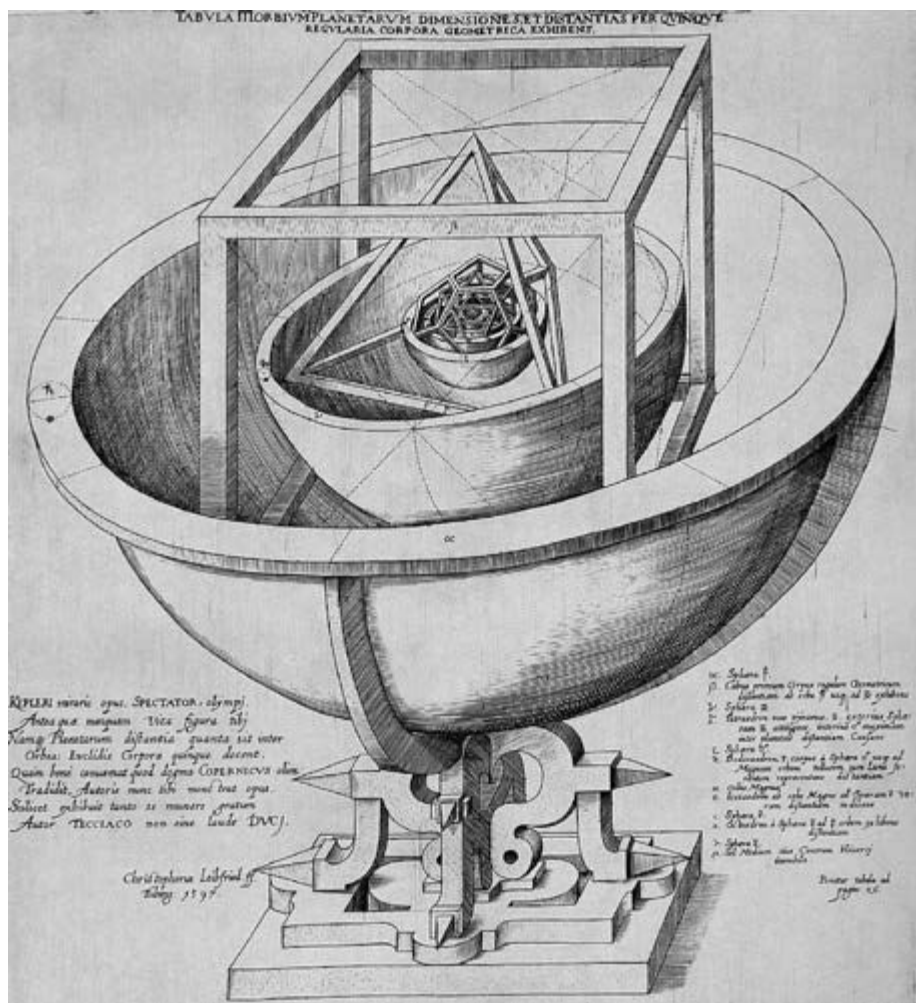


图3-5

开普勒的顿悟解释了很多东西。就像仅有5个柏拉图立体一样，这个系统

中只存在6颗行星（包括地球），因此它们之间有5个空位。一切都顺理成章，几何学的确统治着宇宙。他本就打算成为一名神学家，现在他终于可以称心如意地给他的导师写信说：“看啊，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颂扬上帝的天文学造诣的。”^[6]

事实上，这个理论与数据并不完全匹配，特别是水星和木星的位置。这种失配意味着某个地方出错了，但到底错在哪里呢，是他的理论、数据还是两者兼有？尽管开普勒怀疑数据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也没有坚称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回头想想，这种做法很明智，因为他的理论不可能成立；我们现在知道，行星远不止6颗）。

然而，开普勒并没有放弃。他继续思考关于行星的问题，并且在第谷·布拉赫邀请他做助手之后很快就取得了突破。第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观测天文学家之一，他的数据准确度是以前获得的所有数据的10倍。早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他就设计了可用肉眼分辨行星的角度位置的特殊仪器，并且能精确到2弧分，即 $1/30$ 度。

为了了解这是一个多么小的角度，想象一下，在一个晴朗的夜晚，你抬头仰望天空中的一轮满月，同时把你的小指放到你脸前方的尽可能远处。你的小指约有60弧分宽，而月亮只有它的 $1/2$ 左右。所以，当我们说第谷可以分辨2弧分的时候，这意味着如果你沿小指的宽度方向在它上面画30个等距点（或者在月亮上画15个等距点），那么第谷能看出相邻两个点之间的位置差异。

在第谷于1601年去世后，他的关于火星和其他行星的珍贵数据被开普勒继承下来。为了解释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比如，行星沿本轮运动，行星沿各种卵形轨道运动，以及行星沿太阳略微偏离中心的偏心圆轨道运行等。但是，相比第谷的数据，所有这些理论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在进行了一次计算后，开普勒哀叹道：“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对这些单调乏味的计算步骤^[7]感到厌倦，就请可怜一下我吧，因为我至少做了70次这样的计算了。”

[1] Johannes Kepler: For Kepler's life and work, see Owen Gingerich, "Johannes Kepler," in Gillispie, Complete Dictionary, vol.7, online at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eople/science-and-technology/astronomy-biographies/johannes-kepler#kjen14>, with amendments by J.R.Voelkel in vol.22. See also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10–25;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99–103;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96–99; Simmons, Calculus Gems, 69–83;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2] “criminally inclined”: Quoted in Gingerich, “Johannes Kepler,”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eople/science-and-technology/astronomy-biographies/johannes-kepler#kjen14>.

[3] “bad-tempered”: Ibid.

[4] “such a superior and magnificent mind”: Ibid.

[5] “Day and night I was consumed by the computing”: Ibid.

[6] “God is being celebrated in astronomy”: Ibid.

[7] “this tedious procedure”: Kepler in *Astronomia Nova*, quoted by Owen Gingerich, *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3834*. “sacred frenzy”: Quoted in Gingerich, “Johannes Kepler,”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eople/science-and-technology/astronomy-biographies/johannes-kepler#kjen14>. Copernicus (New York: Penguin, 2005), 48.

开普勒第一定律：椭圆轨道

在探索关于行星运动的科学性解释的过程中，开普勒最终尝试了一种著名的曲线——椭圆。就像伽利略的抛物线一样，椭圆在古代也被研究过。我们在第2章看到，古希腊人将椭圆定义为用倾斜的平面切割圆锥体所产生的曲线，而且平面的倾斜度要小于圆锥面本身的斜率。如果平面的倾斜度很小，得到的椭圆几乎就是圆形的。而如果平面的倾斜度只略小于圆锥面的斜率，得到的椭圆就会像雪茄烟的形状一样又长又细。如果你不断调整平面的倾斜度，椭圆就会从非常圆变得非常扁，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另一种定义椭圆的方法在措辞上很务实，而且要借助几样日常生活用品。

如图3-6所示，拿一支铅笔、一块软木板、一张纸、两个图钉和一根绳子。把纸放在软木板上，用图钉把绳子的两端固定在纸上，一定要让绳子松弛一些。然后，用铅笔拉紧绳子画一条曲线，注意当你移动铅笔时要让绳子处于紧绷状态。在铅笔绕过两个图钉并回到起点后，得到的闭合曲线就是一个椭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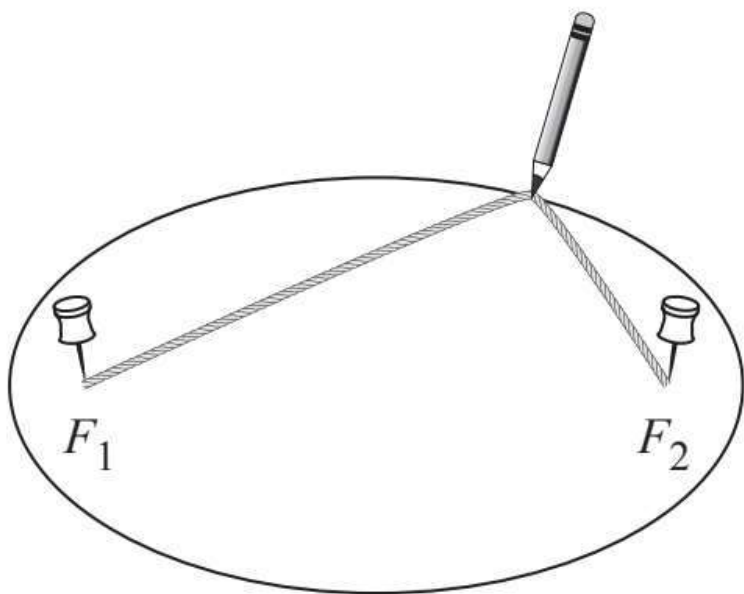


图3-6

在这里，图钉的位置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开普勒把它们命名为椭圆的焦点，它们之于椭圆的意义就像圆心之于圆的意义。圆被定义为到一个定点（圆心）的距离等于定长的所有点组成的图形，同样地，椭圆是指到两个定点（焦点）的距离之和等于定长的所有点组成的图形。在绳子-图钉的结构中，这个恒定的距离之和恰好是两个图钉之间的绳子长度。

开普勒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所有行星都在椭圆轨道上运行，这一次他的看法确实是正确的，而且无须修正。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和伽利略认为，行星是在圆形轨道或者圆形与圆形本轮的混合轨道上运行的。他们的想法通通不对，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此外，开普勒还发现，对每颗行星来说，太阳都位于其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

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正是开普勒一直渴求的那种神圣的线索：行星是按照几何学原理运行的。虽然事实不像他最初猜想的那样与5种柏拉图立体有关，但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几何学的确统治着天空。

开普勒第二定律：相等的时间，相等的面积

开普勒从数据中发现了另一个定律。他的第一定律与行星的路径有关，而这个定律则与它们的速度有关。今天它被称为开普勒第二定律，说的是当行星沿轨道运行时，从这颗行星到太阳的假想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

为了阐释这条定律的意思，假设我们能看见今晚火星在其椭圆轨道上的位置，并用一条直线把这一点与太阳连接起来（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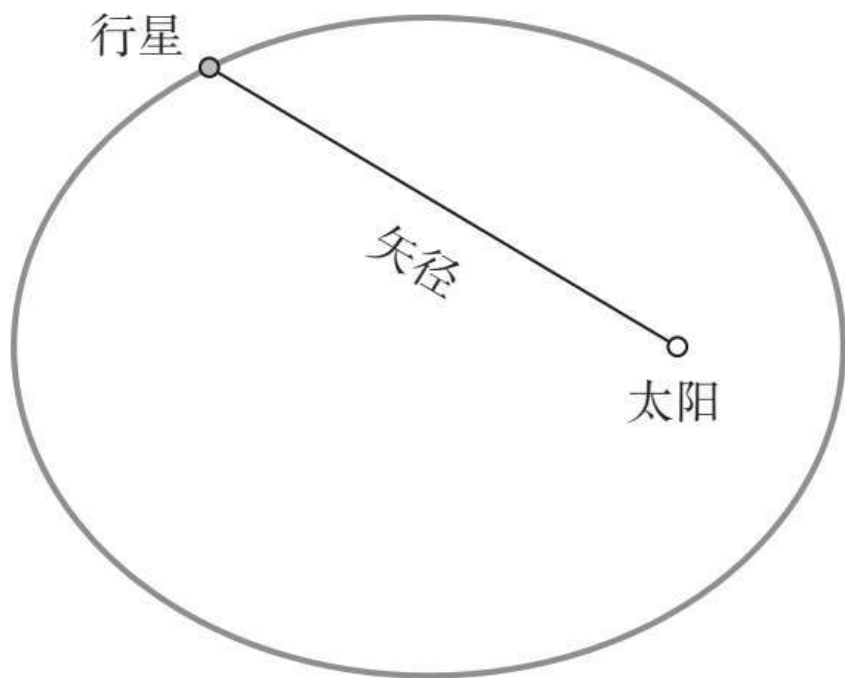


图3-7

现在，我们把这条线想象成一个类似于刮雨器的东西，太阳位于其枢轴点，火星则位于其顶端（只不过这个刮雨器不会像真正的刮雨器那样来回振动，它总是向前运动，而且速度非常缓慢）。当火星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沿轨道前行时，刮雨器也随之移动，并在椭圆内部扫过一片区域。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比如3个星期）再观察一次火星，就会发现缓慢移动的

刮雨器已经扫出了一个扇形（图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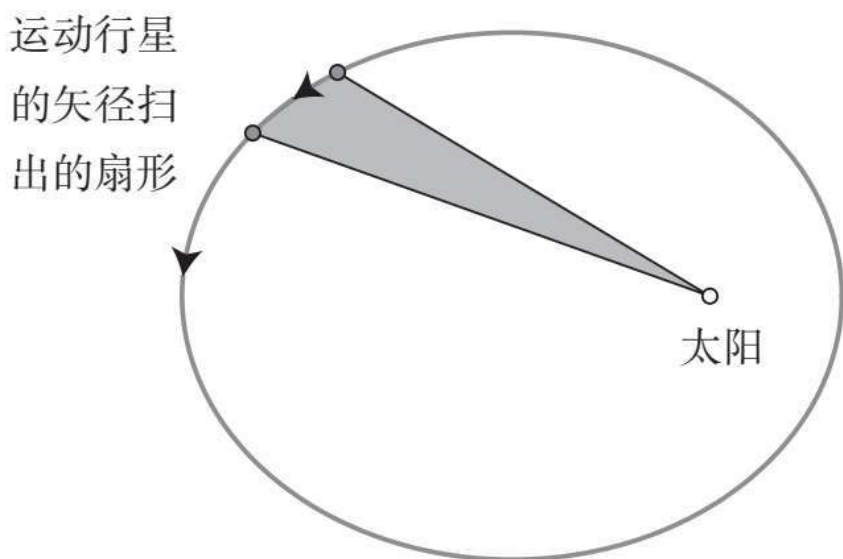


图3-8

开普勒发现，无论火星在其绕日轨道的哪个位置上，矢径在3个星期内扫过的扇形面积总是相等。而且，3个星期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我们在火星轨道上任意取两个时间间隔相等的点，不管它们在轨道的什么位置上，矢径扫过的扇形面积总是相等（图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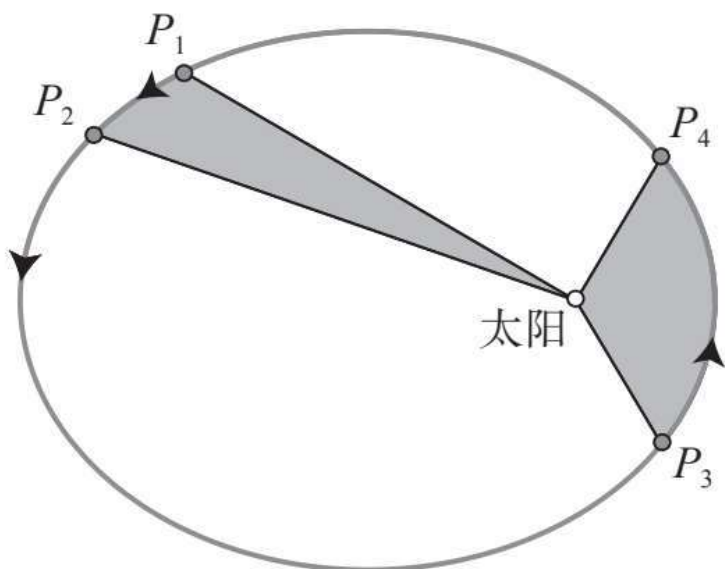


图3-9 如果时间 ($P_1 \rightarrow P_2$) 等于时间 ($P_3 \rightarrow P_4$)，那么两个扇形的面积相等

简言之，第二定律说明，行星并不以恒定的速度运行。相反，离太阳越近，它们的运行速度就越快。“在相等的时间内矢径扫过的面积相等”的陈述，可以使这个结论更加精确。

考虑到椭圆轨道内的扇形有一条弯曲的边，开普勒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测量出它的面积的？他采用了阿基米德的方法：先把扇形切割成许多小碎片，并把它们近似成三角形；然后算出这些三角形的面积（这很简单，因为它们的所有边都是直的），最后把结果加在一起，估算出原来的扇形面积。实际上，他利用了阿基米德版本的积分学，并将其应用于真实数据。

开普勒第三定律：行星的公转周期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定律（每颗行星都在一个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上运行，每颗行星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都是关于个体行星的。开普勒在1609年发现了第一和第二定律，相比之下，他花了10年时间才发现关于所有行星的第三定律，从而把整个太阳系与单一的数字规律绑定在一起。

经过几个月高强度的重新计算，开普勒终于发现了这个定律，此时距离他提出柏拉图立体宇宙模型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在1619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的序言中欣然写道，他终于看到了上帝计划中的规律：“现在，从8个月前的黎明、3个月前的白昼和几天前开始，当充足的阳光照亮我奇妙的猜想时，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我心甘情愿地陷入这种神圣的狂热状态^[1]。”

令开普勒欣喜若狂的数字规律是，他发现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该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对所有行星而言， T^2/a^3 的值都是相同的。在这里， T 表示行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地球是1年，火星是1.9年，木星是11.9年，等等）， a 表示该行星到太阳的距离。 a 的值不太好确定，因为随着行星在其椭圆轨道上运行，它到太阳的实际距离每周都在变化；有时它离太阳较近，有时则离太阳较远。考虑到这种影响，开普勒将 a 定义为行星到太阳的最近距离和最远距离的平均数。

第三定律的要点很简单：一颗行星距离太阳越远，它的运行速度就越慢，公转一周所需的时间也越长。但这个定律有趣而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轨道周期并不是简单地与轨道距离成正比。比如，我们最近的邻居金星的轨道周期占一个地球年的61.5%，但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占日地平均距离的72.3%（而不是61.5%）。这是因为周期的平方与距离的立方（而不是平方）成正比，所以周期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比正比关系更复杂。

当我们用上述的地球年和日地距离的百分率来表示 T 和 a 时，开普勒第三定律就可以简化为 $T^2=a^3$ 。它变成了一个方程，而不只是一个比例。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不妨把金星的数据代入其中： $T^2=(0.615)^2\approx 0.378$ ， $a^3=(0.723)^3\approx 0.378$ 。所以，这个定律在保留三位有效数字的情况下仍然成立，这就是令开普勒兴奋不已的原因。当把它应用于其他行星时，得出的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1] “sacred frenzy”: Quoted in Gingerich, “Johannes Kepler,”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eople/science-and-technology/astronomy-biographies/>

johannes-kepler#kjen14.

开普勒与伽利略的异同点

尽管开普勒与伽利略素未谋面，但他们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流彼此的哥白尼式观点和天文学发现。当一些人由于担心伽利略的望远镜是魔鬼的把戏而拒绝使用时，伽利略在给开普勒的信中，以一种既觉得好笑又无可奈何的口吻说：“亲爱的开普勒，我希望我们能嘲笑这些极其愚蠢的人。^[1]你会如何评价这所大学里那群著名的哲学家呢？他们像吃饱了的蛇一样固执己见，尽管我无数次地尝试邀请他们，但他们还是拒绝看行星、月亮，还有我的望远镜。”

在某些方面，开普勒和伽利略很相似。他们都对运动着迷，也都研究过积分学，开普勒研究的是曲线形状（比如葡萄酒桶）的体积，而伽利略研究的是抛物面的重心。在这个方面，他们都继承了阿基米德的方法，在头脑中将物体切分成很多像意大利香肠片一样的假想薄片。

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们又互为补充。很显然，他们各自做出的伟大科学贡献是互补的，伽利略提出了地球上的运动定律，而开普勒提出了太阳系中的运动定律。除此之外，这种互补关系还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科学风格和性情上，伽利略是理性主义者，而开普勒是神秘主义者。

伽利略是阿基米德思想和方法的继承者，对力学非常着迷。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通过证明阿基米德如何利用天平和浴缸判定希罗王的王冠不是由纯金制成的，并计算出金匠掺入银子的精确数量，第一次对阿基米德的那个“我找到了！”的传说做出了合理解释。伽利略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不断地详细阐述阿基米德的研究成果，他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将阿基米德的力学理论从杠杆平衡延伸到物体运动上。

然而，开普勒更像毕达哥拉斯思想和方法的继承者。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拥有数字思维，在哪里都能发现规律。开普勒是第一个给我们解释雪花为什么是六角形的人。他思考过堆积炮弹的最有效方法，并猜测（而且猜对了）最优堆积方式与大自然排列石榴子及杂货店堆叠橘子的方式一样。无论从神圣的角度还是世俗的角度看，开普勒对几何学的痴迷都近乎非理性。但他的热情成就了他，作家亚瑟·库斯勒机敏地观察到，“约翰尼斯·开普勒迷恋上了毕达哥拉斯的梦想，^[2]并且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通过同样不可靠的推理方法，构建起现代天文学的坚固大厦。这是思想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片段之一，也是摒除‘科学进步由逻辑主宰’这个道貌岸然的信念的方法。”

^[1] “My dear Kepler, I wish we could laugh”: Quoted in Martínez, Science

Secrets, 34.

[2] “Johannes Kepler became enamored”: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33.

阴云密布

就像所有伟大的发现一样，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和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引发的问题比它们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从科学的角度看，刨根问底是很自然的事。这些定律从何而来？是否有更深层次的真理支撑着它们？太阳在所有行星的椭圆轨道内占据如此特殊的位置——总位于一个焦点之上，这似乎太过巧合了。这是否意味着太阳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这些行星呢，比如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开普勒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想知道，英国的威廉·吉尔伯特当时正在研究的磁现象是否会影响行星。无论如何，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未知力量在遥远的太空中发挥着作用。

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研究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数学问题，特别是曲线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伽利略已经证明抛体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亚里士多德的圆形轨道论也被开普勒的椭圆轨道论取代。此外，17世纪早期的其他科技进步不过是增加了人们对曲线的兴趣。在光学领域，曲面透镜的形状决定了图像的放大、扭曲或模糊程度，就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两种热门的新仪器分别给天文学和生物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的设计而言，这些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法国博学家勒内·笛卡尔曾经问道，能设计出一点儿也不模糊的透镜吗？这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曲线的问题：透镜需要具有什么样的曲线形状，才能保证从一点发出或者相互平行的所有光线，在穿过透镜之后都汇聚到另一点上？

反过来，曲线又引出了关于运动的问题。开普勒第二定律暗示了行星沿其椭圆轨道进行着非匀速运动，有时踌躇不前，有时加速前进。同样地，伽利略的抛体也以不断变化的速度沿其抛物线轨迹运动。它们在上升时减速，在最高点暂停运动，然后在落回地面的过程中加速。钟摆亦然，当上升到弧的一个端点时，它们会减速，然后朝相反方向加速通过最低点，接着在弧的另一个端点再次减速。如何能量化这种速度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运动呢？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源自伊斯兰和印度数学界的大量思想为欧洲数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及一个超越阿基米德去开辟新天地的机会。这些思想将带来关于运动和曲线的新的思考方式，然后伴随着一声惊雷，微分学诞生了。

第4章 微分学的黎明

从现代的角度看，微积分包含两个方面。微分学把复杂的问题分割成无穷多个简单的部分，而积分学则把这些部分重新组合到一起，去解决原本那个更复杂的问题。

考虑到分割理应在重建之前，所以对初学者来说，先学习微分学似乎合理。而且，今天所有的微积分课程确实都是这样设置的：从相对容易的导数（切割方法）入门，然后一路学到难度较大的积分（将各部分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方法）。按照这种顺序学习微积分，学生们会觉得轻松一些，因为入门的知识相对简单。老师们也喜欢这种教学顺序，因为它让课程看起来更合乎逻辑。

但非常奇怪的是，历史是以相反的顺序展开的。从阿基米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积分学早在公元前250年的古希腊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然而直到17世纪，人们才对导数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什么相对简单的微分学却比积分学滞后了那么久才开始发展呢？这是因为微分学起源于代数，而代数的成熟、迁移和衍变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1]原始的代数完全是文字形式的。未知数是单词（而不是今天的 x 和 y ），方程是句子，问题是段落。但在1200年前后传入欧洲后不久，代数就演化为一门符号化学科，变得越发抽象和强有力。之后，符号化的代数与几何学相结合，产生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混合体——解析几何。解析几何引出了一系列新曲线，对这些曲线的研究又带来了微分学。本章接下来将探索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1] China, India, and the Islamic world: Katz, “Ideas of Calculu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chapters 6 and 7;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238–85.

代数在东方的崛起

到目前为止，本书可能给大家留下了微积分的诞生主要与欧洲有关的印象，那么我在这里谈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希望可以对这种误解予以纠正。虽然微积分的发展在欧洲达到巅峰，但其根源却在别处。特别要说明的是，代数源自亚洲和中东地区。它的英文名字algebra衍生于阿拉伯语单词al-jabr，意思是“恢复”或者“破碎部分的重新结合”。这些都是方程配平和求解所需的运算步骤，比如，从方程的一边减去一个数字，并把它加到方程的另一边，实际上就是在恢复被破坏的部分。同样地，几何学诞生于古埃及，据说希腊几何学之父泰勒斯就是在那里学习了这门学科。而且，最伟大的几何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并不是毕达哥拉斯最早发现的，巴比伦人至少比他早知道了1 000年，公元前18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泥板文书上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大家也应该记住，当谈到古希腊时，我们指的是远远超出雅典和斯巴达的广袤版图。在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西延伸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向东跨过地中海海岸延伸到土耳其、中东、中亚，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岛，它是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西海岸外的一个岛屿。阿基米德生活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上的叙拉古。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港工作，它地处埃及尼罗河的入海口，是重要的港口和学术中心。

罗马人征服希腊人之后，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和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数学中心又回到了东方。阿基米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学者和抄写员在让古老的知识保持生机的同时，还添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

代数的兴起与几何学的衰落

在代数出现之前的十几个世纪里，几何学的发展非常缓慢。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去世之后，似乎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能在几何学上超越他。250年前后，中国几何学家刘徽改进了阿基米德计算圆周率的方法。两个世纪后，祖冲之将刘徽的方法应用于24 576边形，并通过绝对称得上壮举的计算，把圆周率的虎钳收紧到8位数：

$$3.141\ 592\ 6 < \pi < 3.141\ 592\ 7$$

又过了5个世纪，几何学才取得了新的进展，相关成就来自智者海什木^[1]，欧洲人都称他为阿尔哈曾。965年前后，海什木出生于伊拉克巴士拉。在伊斯兰黄金时代，他在开罗从事过神学、哲学、天文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工作。在几何学方面，海什木对阿基米德从未考虑过的固体体积进行了计算。尽管这些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在长达12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对几何学来说只是罕见的活跃迹象。

而在同样长的时间跨度内，代数和算术则取得了迅速和实质性的进步。印度数学家发明了零的概念和十进制计数法。解方程的代数方法在埃及、伊拉克、波斯和中国纷纷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继承法、纳税评估、商业、记账、利息计算，以及其他适合用数字和方程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驱动。正如花刺子模在著名的教科书《代数学》中阐释的那样，当时代数仍然全部是文字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则像食谱，只能一步一步地得出答案。最终，贸易商、零售商和探险家将这种文字形式的代数和印度-阿拉伯数字向西带入欧洲。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将阿拉伯语文本翻译成拉丁语。

将代数本身从其实际应用中剥离出来，并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加以研究，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进行的。16世纪，代数的发展达到了巅峰，看上去跟它今天的样子有些许相似之处，即用字母来表示数字。1591年，法国的弗朗索瓦·韦达^[2]用元音字母来表示未知量，比如A和E；用辅音字母来表示常量，比如B和G。（今天我们用x、y和z表示未知量，以及用a、b和c表示常量的方法，大约是在17世纪40年代由勒内·笛卡儿率先开始使用的）。用字母和符号代替单词，这使得方程的变换和求解变得容易许多。

算术领域中的一个同等重大的进步来自荷兰的西蒙·斯蒂文，他将印度-阿拉伯的十进制数加以扩展，发明了十进制分数^[3]。在这个过程中，他摒弃了过去亚里士多德学派用于区分分数（由不可分割的单位构成的整数）和量值（可被无限分割成任意小部分的连续量）的方法。在斯蒂文之前，十进制数只被用来表示一个量的整数部分，任何小于一个单位的部分则用分数

来表示。而在斯蒂文的新方法中，即使一个单位也可以被切分，并且通过在小数点后摆放正确的数字，就可以把它表示成十进制形式。尽管它现在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是一个让微积分成为可能的革命性想法。一旦这个单位不再是神圣而不可分割的，所有量（整数、分数和无理数）就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并汇聚成一个大的数族。在描述空间、时间、运动和变化的连续性时，这种方法为微积分提供了它所需的无限精确的实数。

就在几何学与代数结合之前，古老的阿基米德几何法迎来了它的最后一次狂欢。17世纪初，开普勒算出了葡萄酒桶和环形固体等曲线形状的体积，他采取的方法是在头脑中把这些形状切割成无穷多个无穷小的薄片。与此同时，伽利略和他的学生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4]也算出了各种形状的面积、体积和重心，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这些形状当作无穷多的线和面来处理。由于这些人都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无穷和无穷小，所以他们的方法并不严谨，但却直观有效。和穷竭法相比，这些方法能更容易和更快速地得出答案，似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进步（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阿基米德已经抢先一步了；同样的想法就隐藏在他的著作《抛物线求积法》中，但它那时还被尘封在修道院的祈祷书中，直到1899年才重见天日）。

无论如何，尽管阿基米德方法的继承者取得的进展在当时看似前景光明，但沿用老方法注定是不会成功的。符号化代数才是此刻的行动方向，而且在它的帮助下，它最活跃的两个分支——解析几何和微分学——也终于到了播种的时候。

[1] Al-Hasan Ibn al-Haytham: Katz, “Ideas of Calculus,” and J.J.O’Connor and E.F.Robertson, “Abu 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 <http://www-history.mcs.st-andrews.ac.uk/Biographies/Al-Haytham.html>.

[2] François Viète: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369–75.

[3] decimal fractions: Ibid., 375–78.

[4] Evangelista Torricelli and Bonaventura Cavalieri: Alexander, *Infinitesimal*, discusses their battles with the Jesuits over infinitesimals, which were seen as dangerous religiously, not just mathematically.

代数与几何学的邂逅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1630年前后，两位（即将成为竞争对手的）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和勒内·笛卡儿分别将代数与几何学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数学学科——解析几何，它的中央舞台就是让方程变得生动和具体的 xy 平面。

今天，我们用 xy 平面来描绘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看看我那偶尔不太像话的饮食习惯产生的热量影响。我有时早餐会吃几片肉桂葡萄干面包，包装袋上写着每片的热量高达200卡路里（如果想吃得健康些，我会勉强接受妻子买来的七谷面包，每片的热量为130卡路里。但在这个例子中，我更喜欢吃肉桂葡萄干面包，因为不考虑营养问题而只从数学角度看，200是一个比130更合适的数字）。

图4-1展示了我在吃掉1片、2片和3片肉桂葡萄干面包后摄入的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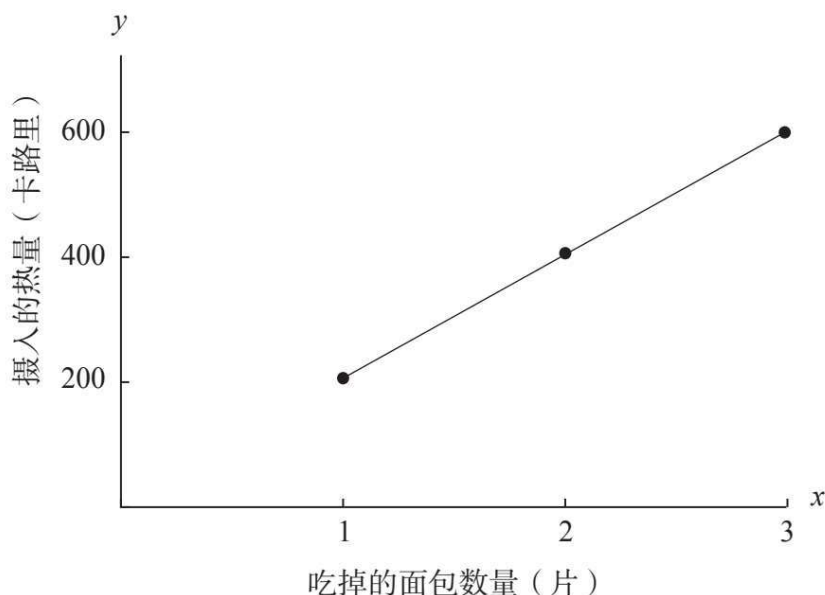


图4-1

因为每片面包的热量是200卡路里，所以2片的热量是400卡路里，3片是600卡路里。当它们作为数据点被标示在图表上时，三个点都落在同一条

直线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入的热量和吃掉的面包数量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如果我们用字母 x 表示吃掉的面包数量，用 y 表示摄入的热量，那么这种线性关系可以概括为 $y = 200x$ 。这种关系同样适用于数据点之间的情况，比如，1.5片面包的热量是300卡路里，其对应的数据点也会落在这条直线上。所以，在这样的图表中，把点连接起来是有意义的。

尽管我知道这一切似乎都显而易见，但我想说明的是，情况并不总是这么明显。不仅在过去不明显（有人不得不想办法去描绘抽象的可视化图表上的关系），在今天仍然不明显，至少对刚开始学习这种图表的孩子们来说是这样的。

这里涉及几次想象力的跳跃。其中一次跳跃是用图表示食物摄入量，这需要思维的灵活性，因为热量本身并不具有形象化的性质。我们看到的图表并不是展示嵌在面包中的葡萄干和棕色螺旋形肉桂的写实图画，它是抽象的，并且能使不同的数学域相互作用和合作：数域，比如热量或面包数量；符号关系域，比如 $y = 200x$ ；形状域，比如在有两条垂直轴的图表上，落在一条直线上的点，等等。通过这种思想的汇聚，不起眼的图表将数、关系和形状混合在一起，实现了算术、代数与几何学的融合。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不同的数学分支此时聚集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回想一下，古希腊人在让几何学凌驾于算术和代数之上后，不让或者很少让它们相互结合。）

另一次跳跃涉及水平轴和垂直轴，我们常用变量来为它们命名，即 x 轴和 y 轴。这些轴是数轴，顾名思义，数被表示成直线上的点。就这样，算术与几何学结合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标示任何数据的时候，它们就已经结合起来了！

对于这种违背规则的做法，古希腊人一定会厉声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数只表示离散量，比如整数和分数。相比之下，那种可以用一条线的长度来衡量的连续量则被视为量值，它的概念分类与数截然不同。因此，从阿基米德生活的时代到17世纪初的接近2 000年的时间里，数都绝对不会被视同于一条直线上所有点的连续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数轴的概念无异于离经叛道的存在。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想了，而且我们希望小学生都能明白数可以用这种方式直观地表示出来。

从古希腊人的角度看，这种图表亵渎上帝之处还在于，它完全无视同类之间的比较，比如，苹果跟苹果比，热量跟热量比。相反，它的一个轴是热量，另一个轴是面包数量，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做比较。然而，今天的我们在画这类图表时，会毫不迟疑地进行这样的比较。因为我们把热量和面包数量都转换成数，也就是实数、无穷小数等连续数学中的“通用货币”。尽管希腊人对长度、面积和体积做出了严格的区分，但对我们来说，它们都

是实数。

方程与曲线

可以肯定的是，费马和笛卡儿从未利用 xy 平面去研究像肉桂葡萄干面包这样的有形事物。对他们来说， xy 平面是研究纯粹几何学的工具。

在他们各自的研究过程中，两个人都发现，任意一个线性方程（ x 和 y 只以一次幂形式出现的方程）在 xy 平面上都可以表示成一条直线。线性方程和直线之间的这种联系，会让人联想到有可能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系，即非线性方程与曲线之间的联系。在像 $y=200x$ 这样的线性方程中，变量 x 和 y 均独自出现，而没有平方、立方或者更高次方的形式。费马和笛卡儿意识到，他们可以构建他们想要的任何方程，对 x 和 y 进行他们想要的任何变换——将其中一个平方，将另一个立方，再将它们相乘或者相加——然后把结果诠释成一条曲线。幸运的话，它会是一条有趣的曲线，或许还是人们从未想象过或者阿基米德从未研究过的曲线。任何含有 x 和 y 的方程都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一种格式塔转换。你不是从一条曲线开始，而是从一个方程开始，看看它能描绘出什么样的曲线。这就好比让代数来驾车，而把几何学安置在后座上一样。

费马和笛卡儿从二次方程入手，在这类方程中，除了普通的常量（比如200）和线性项（比如 x 和 y ）之外，变量还可以平方或者相乘，产生像 x^2 、 y^2 和 xy 这样的二次项。传统上，平方量一直被解读为正方形区域的面积，因此， x^2 表示边长为 x 的正方形的面积。过去，人们认为面积是一个与长度或者体积完全不同的量；但对费马和笛卡儿来说，就像 x 、 x^3 或者 x 的其他任意次方一样， x^2 只是另一个实数，这意味着它也可以被绘制在数轴上。

今天，学习高中代数的学生应该都能画出 $y=x^2$ （对应的曲线是一条抛物线）之类方程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含有 x 和 y 的二次项但不含有它们的更高次方的其他所有方程，只对应着4类曲线，即抛物线、椭圆、双曲线或者圆（图4-2）。比如，二次方程 $xy=1$ 的图像是双曲线， $x^2+y^2=4$ 的图像是圆， $x^2+2y^2=4$ 的图像是椭圆。即使像 $x^2+2xy+y^2+x+3y=2$ 这样令人头疼的二次方程，也只对应着上述4类曲线中的一种，事实上它的图像是抛物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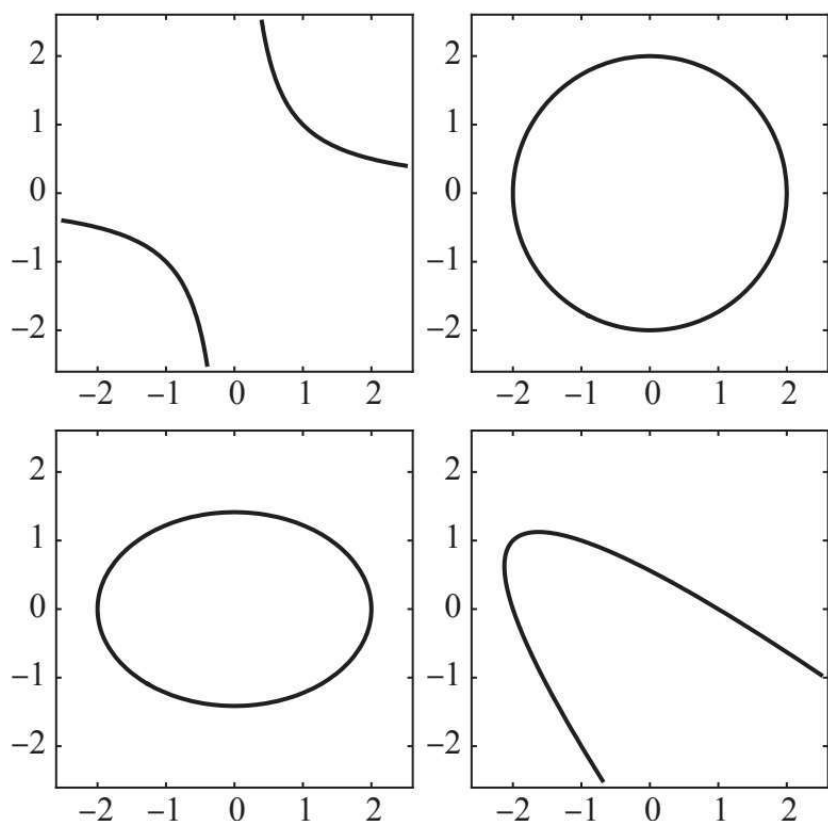


图4-2

费马和笛卡儿最先发现了这种奇妙的巧合：含有 x 和 y 的二次方程是希腊人研究的圆锥截面的代数对应物，这4类曲线是以不同角度切割圆锥体得到的。在费马和笛卡儿搭建的这个新舞台上，经典曲线像幽灵一样从迷雾中再次现身。

在一起，会更好

费马和笛卡儿发现的代数和几何学之间的新联系，对这两个学科来说都大有裨益，可以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之处。几何学诉诸人的右脑，它直观而具象，命题的真实性往往一目了然。但它也需要某种创造力，因为人们常常不知道几何证明该从哪里入手，这时候就要依靠“神来一笔”的帮助了。

然而，代数是系统性的，我们可以近乎随心所欲地“揉捏”方程：在方程两边添加相同的项，消去共同的项，求出未知量，或者按照标准方法去执行多个其他步骤和算法。代数过程具有抚慰人心的重复性，就像织毛衣一样令人愉悦。但代数也饱受空虚之苦，它的符号是空洞的，在被赋予意义之前它们什么也不是。代数中没有任何形象化的东西，它是左脑型和机械式的。

不过，如果代数和几何学联合起来，它们将势不可当。代数给了几何学一个体系，此时几何学需要的就不再是创造力，而是韧性了。它会把需要洞察力的难题转化为虽然耗时费力但却简单直接的计算，符号的使用解放了头脑，也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对几何学来说，它赋予代数以意义。此时方程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化身为弯曲有致的几何形状。当从几何学的角度去看方程时，一个曲线和曲面的全新“大陆”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无穷无尽的几何“动植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编目、分类和仔细研究。

费马vs笛卡儿

学过一些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人，应该都知道费马和笛卡儿。但是，我的老师和教科书从未提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或者笛卡儿有多么邪恶。想要知道他们竞争中的利害关系，就必须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生平、个性，以及他们希望达成的目标。

勒内·笛卡儿^[1]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学术上无所畏惧、蔑视权威，自我的程度之强不亚于他过人的天赋。比如，对于2 000年来所有其他数学家都尊崇的希腊几何方法，他不屑一顾地写道：“古人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了，^[2]而且绝大多数都缺乏可信度，除非避开他们走过的所有路，否则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真理之路。”在个人层面上，他偏执而敏感。从笛卡儿的那幅最著名的画像中可以看出，他的面容瘦削憔悴，眼神傲慢，留着两撇颇具讽刺意味的胡子，看起来就像动画片里的反面人物。

笛卡儿致力于在理性、科学和怀疑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知识。他最广为人知的哲学著作，因为他的名句“我思故我在”而名垂千古。换句话说，当一切都拿不准的时候，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怀疑精神的存在。他的分析方法似乎受到了严谨的数学逻辑的启发，在今天被公认为现代哲学的开端。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方法论》中，尽管笛卡儿介绍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思考哲学问题的新方式，但他还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了三篇独立的附录：第一篇是关于几何学的，他在其中提出了他的解析几何方法；第二篇是关于光学的，在望远镜、显微镜和透镜还是当时的最新技术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显得至关重要；第三篇是关于天气的，但除了对彩虹的正确解释之外，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被遗忘了。他博学多识，涉猎广泛。他把生命体看作机械装置系统，认为灵魂位于大脑的松果体中。他提出了一个庞大（但错误）的宇宙系统，认为空间中遍布着看不见的漩涡，行星就像漩涡中的树叶一样被裹挟着运动。

笛卡儿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中，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家人允许他卧床读书和思考，于是这成了他一辈子的习惯，每天直到中午才起床。笛卡儿的母亲在他一岁时就去世了，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并因此过上安逸和冒险的生活，成了一位四处游历的绅士。他自愿加入荷兰军队，但从未参加战斗，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哲学。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荷兰度过的，研究他自己的观点，并与其他伟大的思想家通信和辩论。1650年，他不情愿地去了瑞典（他嘲笑那里是“被岩石和冰包围的熊之国”^[3]），担任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私人哲学导师。年轻的女王精力充沛，喜欢早起，并坚持在早晨5点上课，这对任何人尤其是习惯于中

午起床的笛卡儿来说，是一个极不合适的时间。而且，斯德哥尔摩那一年的冬天是几十年来最冷的，几周之后笛卡儿就患上了肺炎，最终不治离世。

皮埃尔·德·费马^[4]比笛卡儿小5岁，过着宁静、平淡的中上阶层生活。在远离喧嚣巴黎的图卢兹，他白天是一位律师和地方法官，晚上则是一名丈夫和父亲。他下班回家后和妻子及5个孩子共进晚餐，然后花几个小时做他真正热爱的事：研究数学。笛卡儿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大思想家，而费马是一个腼腆、安静、随和、天真的人。费马的目标不像笛卡儿那么远大，他也没把自己看成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数学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追逐着它。他认为没有公开出版研究成果的必要，也就没有这样做。在阅读丢番图和阿基米德撰写的经典巨著时，费马会在书上写下少量笔记，偶尔还会把他的想法通过信件传递给他认为可能会欣赏它们的学者。尽管他通过方济各会修士、数学家马林·梅森与当时的重要数学家有过书信往来，但他从未离家远游，也没有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见过面。

费马和笛卡儿之间的激烈争执^[5]正是因梅森而起。在数学家当中，梅森是巴黎的一个关键联络人。在那个没有脸书的年代，梅森能让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保持联系，是一个非常爱管闲事但又缺乏些许机智和谨慎的人。他总有办法惹出麻烦，比如，向人们展示他收到的私人信件，并在保密的手稿出版前公之于众。在梅森身边有一群顶尖的数学家，他们虽然不像费马和笛卡儿那么优秀，但也颇具影响力，而且他们显然跟笛卡儿过不去，总在抨击他和他那本华而不实的《方法论》。

所以，当笛卡儿从梅森那里听说图卢兹有个无名小卒（费马）声称早于他10年发明了解析几何，而且这个业余爱好者还对他的光学理论提出了质疑时，他认为又有人想让他难堪。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与费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试图毁掉后者的声誉^[6]。最后，笛卡儿也失去了很多。在《方法论》中，笛卡儿声称他的分析方法是通往知识的必由之路；如果费马不用他的方法就能超越他，费马的整个研究就站不住脚了。

笛卡儿毫不留情地诋毁费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打压了费马，致使费马的著作延迟到1679年才正式出版。尽管费马的研究成果通过口口相传或信件副本的形式流传开来，但直到他去世很久之后才得到真正的欣赏。相比之下，笛卡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方法论》名声大噪，下一代人还从中学到了解析几何。即使到了今天，学生们仍然在学习笛卡儿坐标，尽管它是费马率先提出来的^[7]。

^[1] René Descartes: For his life, see Clarke, Descartes; Simmons, Calculus Gems, 84–92; and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106–8. For

summaries of his math and physics intended for general readers, see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59–81;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s 11.1 and 12.1;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8.2. For a scholarly historical treatment of his work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ee Michael S. Mahoney, “Descartes: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Gillispie, *Complete Dictionary*, also online a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encyclopedia.com/science/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descartes-mathematics-and-physics>.

[2] “What the ancients have taught us is so scanty”: René Descartes, *Les Passions de l’Ame* (1649), quoted in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31.

[3] “the country of bears, amid rocks and ice”: Henry Woodhead, *Memoirs of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3), 285.

[4] Pierre de Fermat: Mahoney, *Mathematical Career*, is the definitive treatment. Simmons, *Calculus Gems*, 96–105, is brisk and entertaining about Fermat (just as the author was with everything he wrote; if you haven’t read Simmons, you must).

[5] Fermat and Descartes locked horns: Mahoney, *Mathematical Career*, chapter 4.

[6] tried to ruin his reputation: *Ibid.*, 171.

[7] Fermat came up with them first: I agree with the assessment in Simmons, *Calculus Gems*, 98, about how the credit for analytic geometry should be apportioned: “Superficially Descartes’s essay looks as if it might be analytic geometry, but isn’t; while Fermat’s doesn’t look it, but is.” For more even-handed views, see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32–42, and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95–97.

寻找失传已久的发现方法——分析

笛卡儿和费马之间的竞争发生在17世纪初，那时的数学家都梦想着找到一种几何学的分析方法^[1]。这里所说的分析，指的是发现结果而不是证明结果的方法。当时人们普遍怀疑古人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发现方法，但却故意将它藏匿起来。比如，笛卡儿就曾断言古希腊人“掌握了一种数学知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通用的数学知识截然不同……但我的看法是，那时的卑鄙和令人愤慨^[2]的作者隐瞒了这种知识”。

符号代数似乎就是这种失传已久的发现方法。但在较为守旧的地方，代数遭到了保守派的怀疑。当艾萨克·牛顿说“代数是数学笨蛋的分析方法”^[3]时，他其实是在不加掩饰地侮辱笛卡儿，因为笛卡儿是一个典型的依赖代数并通过逆向推理来解决问题的“笨蛋”。

在发动对代数的攻击时，牛顿坚持主张分析法与综合法之间的传统区别。在分析法中，人们从结尾入手解决问题，就好像已经得到了答案一样，然后满怀期望地朝着开头倒推，希望找到一条通往给定假设的路径。这就是学生们眼中的从答案开始倒推，然后搞清楚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方法。

而综合法的方向正相反，即从给定的条件着手，然后通过黑暗中摸索和尝试，按部就班地找到解决方案，最终得出期望的结果。综合法往往比分析法难得多，因为在你找到解决方案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古希腊人认为，综合法比分析法更具逻辑力和说服力。综合法被视为证明结果的唯一有效方法，而分析法是发现结果的可行方法。如果你想要严谨的论证过程，就必须使用综合法。这也是阿基米德用在跷跷板上使形状达到平衡状态的分析法发现定理，但随后又改用综合的穷竭法来证明定理的原因。

尽管牛顿对代数分析法嗤之以鼻，但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他本人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过，牛顿并不是运用代数分析法的第一人，费马才是。费马的思维方式很有趣，因为它不仅简洁易懂，而且独特新奇。今天，他的曲线研究方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并被教科书中更复杂巧妙的技巧所取代。

^[1] finding a method of analysis: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368–69.

^[2] “low cunning, deplorable indeed”: Descartes, rule 4 in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1629), as quoted in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368–69.

[3] “analysis of the bunglers in mathematics”: Quoted in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77.

行李箱的优化问题

费马微分学定理的雏形产生于他运用代数分析法解决优化问题^[1]的过程中，优化问题研究的是如何以最佳方式做事情。根据具体情境，最佳可能意味着最快、最便宜、最大、最有利可图和最有效等。为了用最简单的方式阐明他的想法，费马设计了几问题，它们听上去很像今天的数学老师给学生布置的练习题。所以，孩子们要怪就怪费马吧。

在根据我们的时代特点进行更新后，其中一个问题大致是：假设你想设计一个矩形的箱子来存放尽可能多的物品，但要满足两个约束条件。第一，这个箱子必须有一个正方形的横截面，宽 x 英寸^[2]，深 x 英寸。第二，它必须能放进某家航空公司的机舱行李架。根据航空公司对随身携带行李的规定，箱子的宽度、深度和高度之和不能超过45英寸。那么，当 x 是多少英寸时，箱子的容积最大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运用常识。尝试几种可能性，比如，宽度和深度各为10英寸，那么高度可以是25英寸，因为 $10 + 10 + 25 = 45$ ，这种尺寸的箱子的容积为 $10 \times 10 \times 25 = 2\,500$ 立方英寸^[3]。立方体形状的箱子容积会不会更大呢？由于立方体的高度、宽度和深度必须相等，因此它的尺寸为 $15 \times 15 \times 15$ ，容积是3 375立方英寸。在尝试了其他几种可能性之后，我们会发现立方体似乎是箱子形状的最佳选择。而且，事实的确如此。

所以，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我主要想用它来展示费马对于这类问题的推理方法，因为他的方法带来了更加了不起的成果。

和解决大多数代数问题一样，我们先要把所有给定的信息转化成符号。由于箱子的宽度和深度都是 x ，加起来就是 $2x$ 。而且，箱子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之和不能超过45英寸，所以它的高度是 $45 - 2x$ 。那么，箱子的容积是 $x \times x \times (45 - 2x) = 45x^2 - 2x^3$ ，我们将其表示成 $V(x)$ ：

$$V(x) = 45x^2 - 2x^3$$

如果我们以 x 为横轴、 $V(x)$ 为纵轴，用计算机或绘图计算器画出图像，就会看到这条曲线先上升，并像预期的那样在 $x = 15$ 英寸时达到最大值，然后下降直至0（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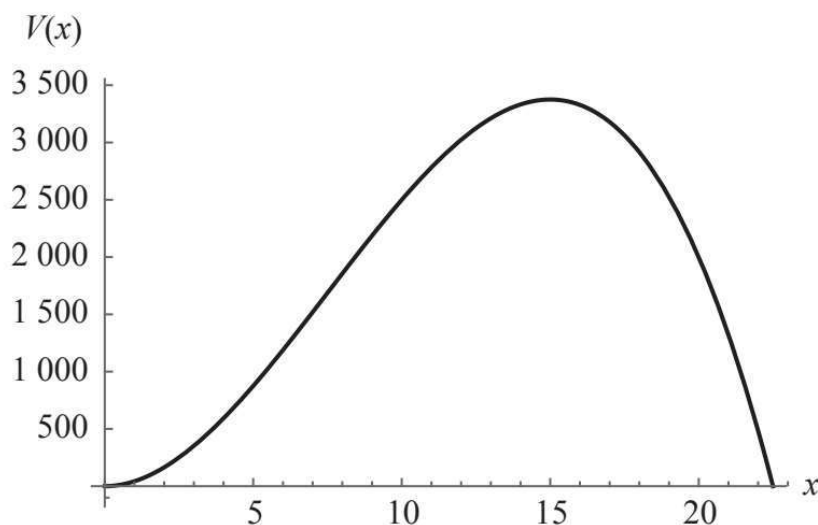


图4-3

我们也可以用学生们现在熟悉的微分学方法找出最大值，即求 $V(x)$ 的导数并使其等于0。这种方法的思路是：曲线顶端的斜率为0，它在这里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由于斜率是用导数来衡量的，所以最大值处的导数必定为0。经过代数运算和对各种导数规则的运用，这个推理过程也会得出 $x=15$ 的答案。

但是，费马没有绘图计算器或计算机，也没有导数的概念。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利用了最大值的一个特性，即低于最大值的水平线都和曲线相交于两个点，如图4-4所示。

而高于最大值的水平线与曲线没有交点，如图4-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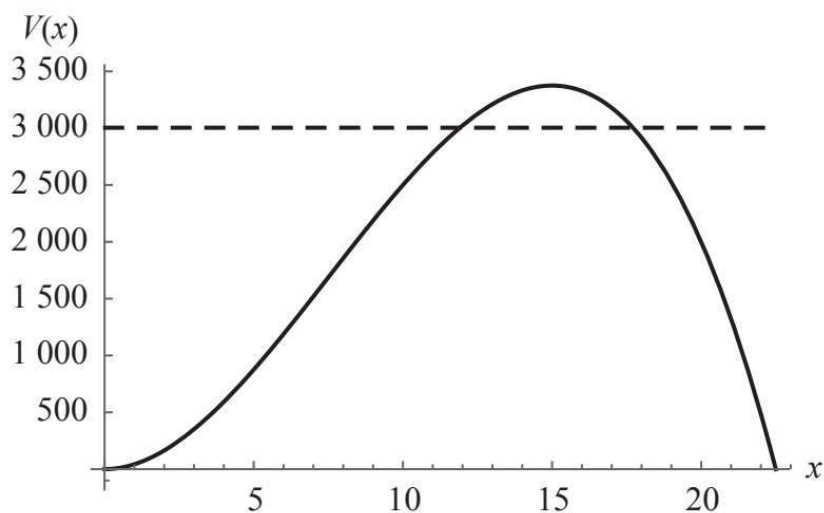


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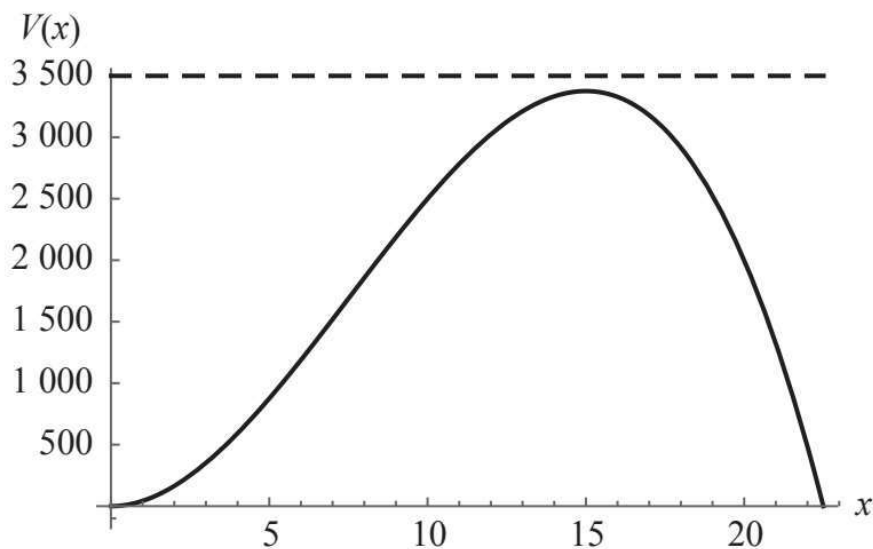


图4-5

这揭示了一种直观的解题策略。假设我们缓慢地抬升一条低于最大值的水

平线，随着这条线逐渐上移，它的两个交点就像项链上的珠子一样沿着曲线向对方滑动（图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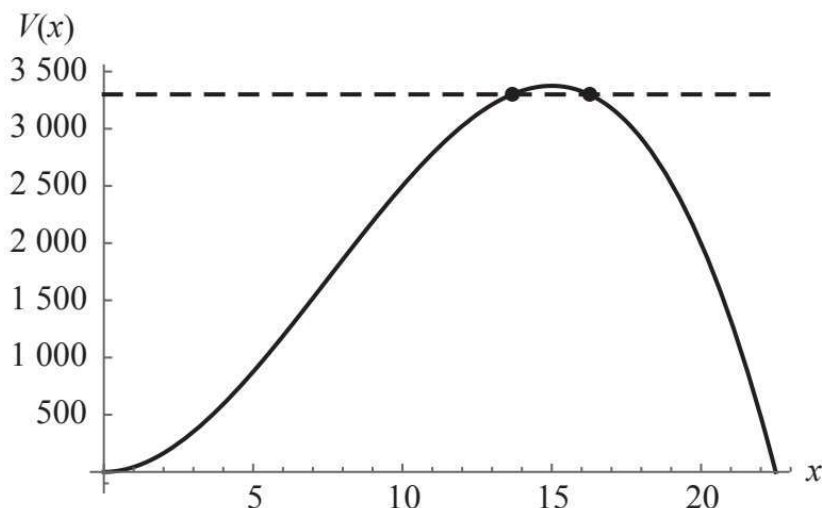


图4-6

在最大值处，这两个点发生碰撞。寻找碰撞点就是费马确定最大值的方法，换言之，他需要推导出两点合并为一点（形成“重交点”）的条件。有了正确的思路，余下的就是代数运算（符号处理）了。具体过程如下：

假设两个交点处的 x 分别为 a 和 b ，它们位于同一条水平线上，所以 $V(a) = V(b)$ ，即

$$45a^2 - 2a^3 = 45b^2 - 2b^3$$

为了做进一步运算，我们需要重新整理一下这个方程。如果我们把平方项放在一边，而把立方项放在另一边，可得：

$$45a^2 - 45b^2 = 2a^3 - 2b^3$$

运用高中代数的一些技巧，我们可以在方程两边进行因式分解，可得：

$$45(a-b)(a+b) = 2(a-b)(a^2 + ab + b^2)$$

然后，方程两边同时除以公因子 $(a-b)$ ，这是合乎规则的，因为 a 和 b 并不相

等。[如果它们相等，方程两边同时除以 $(a-b)$ 就相当于同时除以0，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消去 $(a-b)$ 后得到的方程为：

$$45(a+b) = 2(a^2 + ab + b^2)$$

现在，请注意一个难以理解的逻辑点。费马先是假设 a 和 b 不相等，但他又假设当 a 和 b 在最大值处合并且相等时，他之前推导出的方程仍然成立。为了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费马引入了一个被他称为“准等式”^[4]的模糊概念。它是指在最大值处， a 和 b 在某种程度上相等，但并不是真正相等（今天，我们用极限或者重交点的概念来表述它）。总之，他令 $a \approx b$ ，并大胆地用 a 替换上述方程中的 b 得到：

$$45(2a) = 2(a^2 + a^2 + a^2)$$

上式进一步化简为 $90a = 6a^2$ ，它的解是 $a = 0$ 和 $a = 15$ 。第一个解 $a = 0$ 对应的是容积最小的箱子，它的宽度和深度都为0，体积也为0，我们对此毫无兴趣。第二个解 $a = 15$ 对应的是容积最大的箱子，它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的答案，即15英寸是箱子的最佳宽度和深度。

从我们的角度看，费马的推理过程似乎有些奇怪，他不用导数就找到了最大值。今天，老师在讲优化问题之前会先教学生如何求导数，而费马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1] optimization problems: Mahoney, Mathematical Career, 199–201, discusses Fermat's work on the maximization problem considered in the main text.

[2] 1英寸 = 2.54厘米。——编者注

[3] 1立方英寸 $\approx$ 16.39立方厘米。——编者注

[4] adequality: Ibid., 162–65,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70–72.

费马如何帮助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今天，费马关于优化问题的早期研究成果依然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那些解决优化问题的算法，而这些算法又依赖于重交点概念和用导数表示的等价条件。尽管现在的优化问题往往比费马时代的优化问题复杂得多，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有一项重要的应用与大数据集有关，它通常有助于尽可能紧凑地编码数据。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数百万份指纹记录。为了高效地存储、搜索和检索记录，以便进行背景调查，他们使用了基于微积分的数据压缩方法。精妙的算法可以在不牺牲任何重要细节的情况下，减小数字化指纹档案的大小。当你在手机上储存音乐和图片时，也是这样的。MP3（一种音频压缩技术）和JPEG（一种图像压缩技术）^[1]等压缩算法并没有保留所有音符和像素，而是通过提取更有效信息的方式来节约空间。它们还能让我们快速下载歌曲和照片，并发送给我们喜爱的人，而且不会占据他们收件箱的过多空间。

为了了解微积分、优化与数据压缩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曲线拟合的相关统计问题，这是一个包括气候科学和商业预测在内的所有领域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数据集展示了昼长随季节的变化情况。^[2]虽然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昼长较长而冬天的昼长较短，但整体模式是什么呢？我绘制了纽约市2018年的数据图，如图4-7所示。其中，横轴表示时间，从最左边的1月1日一直到最右边的12月31日；纵轴表示一年中的不同日期从日出到日落的分钟数。为避免图表混乱不堪，我从1月1日起每两周采样一次，所以图上只标示了27天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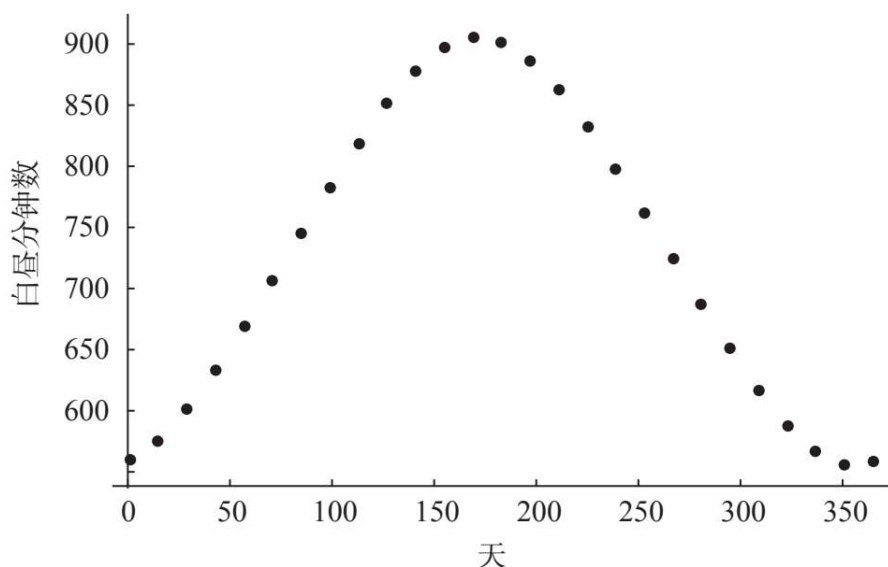


图4-7

这幅图显示出一年中的昼长变化情况和我们的预期一样。夏至（6月21日，对应于图中中间部分的第172天的峰值）前后的昼长最长，而冬至前后的昼长最短。总体上，这些数据似乎都位于一条光滑的波形曲线上。

在高中的三角学课程上，老师们会讲到一种特定的波——正弦波。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会详细地介绍正弦波是什么，以及从微积分的角度看它们为什么很特别。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重点是，正弦波与圆周运动有关。为了说明这种联系，我们假设有一个点以恒定的速度沿圆周运动。如果我们把这个点上下起伏的位置视为时间函数，就能绘制出一条正弦曲线，如图4-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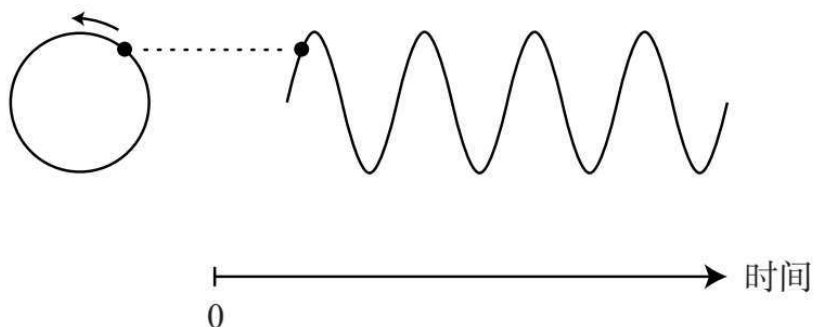


图4-8

由于圆与周期密切相关，所以不管是季节循环、音叉振动，还是荧光灯和电力线发出的60个周期/秒的嗡嗡声，只要循环现象发生，正弦波就会出现。那烦人的嗡嗡声恰恰是正弦波每秒上下起伏60次发出的声音，这表明电网中的发电机也在以相同的频率旋转，并产生交流电。哪里有圆周运动，哪里就有正弦波。

如图4-9所示，所有正弦波都可以用4个重要的统计数据来定义：周期、平均数、振幅和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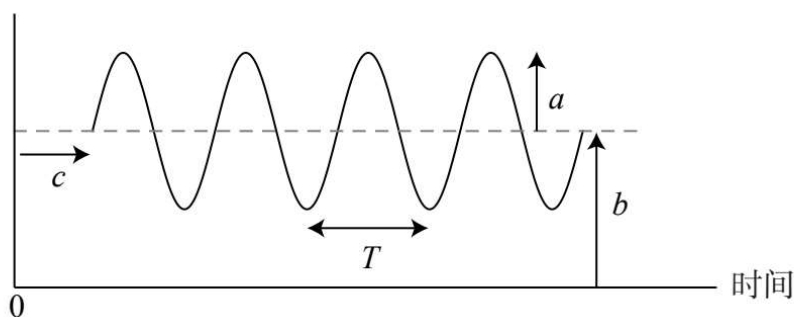


图4-9

这4个参数都很容易解释。周期 T 表示正弦波完成一个周期所需的时间。对我们正在研究的昼长数据来说， T 大约是1年，或者更精确地说是365.25天（多出来的1/4天就是我们每4年需要有一个闰年的原因，是为了让日历与自然周期保持同步）。正弦波的平均数是它的基线值 b 。对我们的数据来说，它是纽约市2018年所有日子的平均白昼分钟数。波的振幅 a 可以告诉

我们，一年中最长的昼长会比平均数多出多少分钟。波的相位 c 可以告诉我们，波在春分前后会向上穿过平均数。

为便于讨论，我们把参数 a 、 b 、 c 、 T 想象成4个旋钮，这样就可以通过转动它们来调整正弦波的形状和位置的各种特征。 b 旋钮可以让正弦波上下移动， c 旋钮可以让它左右移动， T 旋钮可以控制它的振动速度， a 旋钮可以决定它的振动程度。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设置旋钮，使正弦波通过我们之前绘制的所有数据点，就相当于对信息进行了显著压缩。这意味着我们只用正弦波的4个参数就捕获了27个数据点，因此数据的压缩系数是 $27/4$ 或6.75。实际上，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参数是1年，所以真正可以调整的只有3个参数，压缩系数变为 $27/3$ 或9。此外，这些数据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的，所以这种尺度的压缩是可以接受的。正弦波体现了这种规律，并为我们所用。

唯一的难题在于，并不存在能完美拟合数据的正弦波。当用一个理想化模型去拟合现实世界的的数据时，就会出现这种意料之中的情况，因为必定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希望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为了使它们最小化，我们需要找到尽可能“紧密地拥抱”数据点的正弦波。此时，该微积分一展身手了。

图4-10展示的是一种由优化算法确定的拟合效果最好的正弦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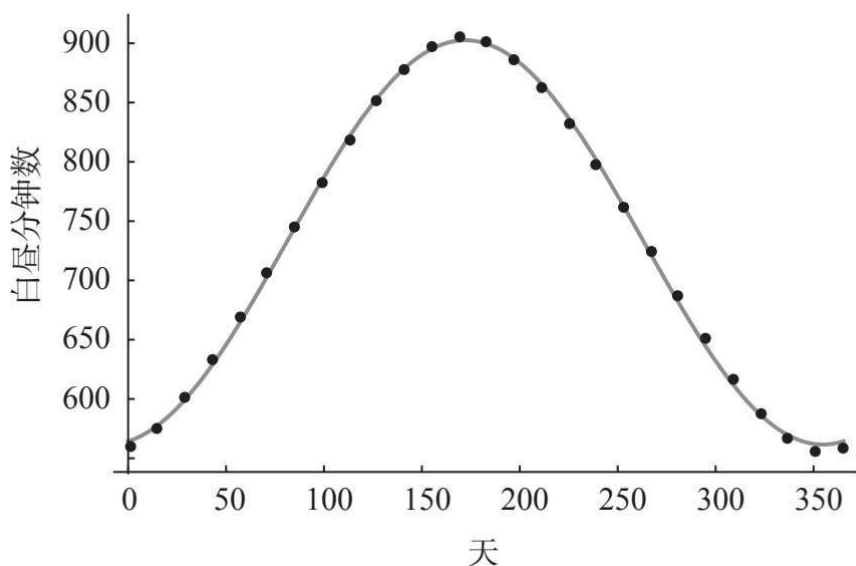


图4-10

但要注意的是，图4-10的拟合效果并不完美。比如在12月份，昼长很短，但波形并没有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所以数据点位于曲线下方。尽管如此，简单的正弦波无疑可以捕捉到所发生之事的本质。对于我们的目标，这种程度的拟合可能就足够了。

那么，微积分会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呢？它能帮助我们选出4个最优参数。假设通过转动4个旋钮可以得到拟合效果最好的正弦波，就像转动收音机上的调谐旋钮来获得最强信号一样。这基本上也是费马在解决行李箱优化问题时所做的事情。在那个例子中，他调整的是单一参数 x ，并寻找箱子容积的最大值对应的重交点。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有4个参数需要调整。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我们也要寻找一个重交点，它会给出这4个参数的最优选择。

更详细的过程是：对于4个参数的任何一种选择，我们要计算每个数据点（全年有记录的共计27个数据点）的正弦波拟合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或者误差）。选择最佳拟合的一个自然标准是，所有27个数据点的总误差应该尽可能地小。但总误差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概念，因为我们不希望正负误差相抵，并形成拟合误差比实际情况小的错误印象。下冲和过冲同样糟糕，两者都应该“受到惩处”，而不应该相互抵消。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数学家将每一点的误差进行平方，使负误差变为正误差。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出现虚假的抵消情况（这表明负负得正的乘法运算法则在实践中是有用的，它使负误差的平方变成了正误差）。因此，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用这样一种方法选出正弦波的4个参数，它们可以使正弦波拟合与数据的误差平方之和最小。这种方法被称为最小二乘法，当数据像在本例中一样遵循某种模式时，该方法的效果最好。

所有这一切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一般性观点：模式是让数据压缩成为可能的首要条件。只有模式化的数据才能被压缩，而随机数据则不行。幸运的是，人们感兴趣的许多事物，比如歌曲、面孔和指纹，都是高度结构化和模式化的。就像昼长遵循简单的波模式一样，一张面部照片包含眉毛、斑点、颧骨和其他特征模式；歌曲有旋律、和声、节奏和力度；指纹包含脊线、箕纹和斗纹。人类可以立刻识别出这些模式，计算机经过学习也能识别出它们。重要的是，要找到恰当的数学对象来编码特定模式。正弦波是表示周期性模式的理想选择，但它们不太适合表现鲜明的局部特征，比如鼻孔边缘或者美人痣。

为此，几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广义化的正弦波——子波^[3]。子波比正弦波更加局部化，它们并不是在两个方向上周期性地无限延伸，

而是在时间或空间上急剧集中。

如图4-11所示，子波会突然启动，振动一段时间后停止。它们看起来很像心电监护仪上的信号，或者地震期间地震仪上记录的爆发情况。子波非常适用于表示脑电波记录中突然出现的棘波、凡·高画作中的大胆笔触或者面部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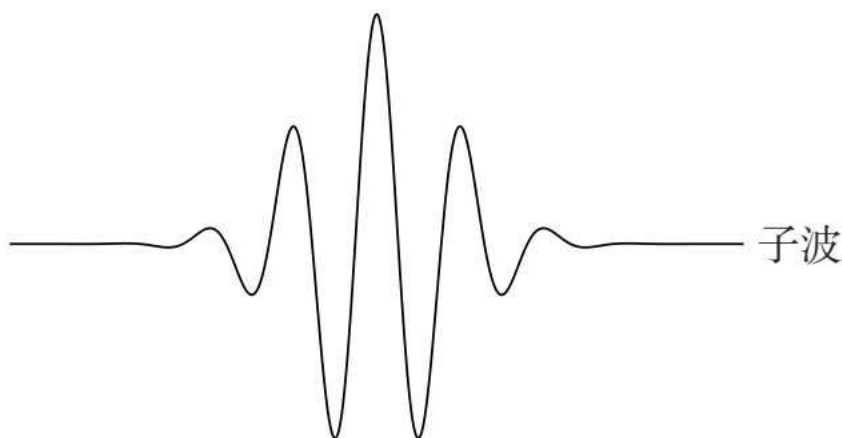


图4-11

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子波^[4]使他们的指纹档案走向现代化。从20世纪初引入指纹以来，指纹记录就一直以油墨捺印的形式被储存在纸质卡片上，很难进行快速搜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档的指纹卡片数量已经增加到2亿张左右，并占据了1英亩^[5]的办公空间。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把这些档案数字化时，他们将其转换成有256个不同灰度级的灰度图像，分辨率为每英寸500点，足以捕捉到所有细微的斗纹、箕纹、脊线末端、分叉和指纹的其他可识别性细节。

但问题在于，那时的一张数字化指纹卡片包含大约10 MB（兆字节）的数据，致使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本无法快速地给地方警察发送数字指纹档案。别忘了，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当时最先进的电话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传输10MB的文件也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当时的首选介质是1.5MB的软盘，要交换这么大的文件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每天都有3万张用于紧急背景调查的新指纹卡片涌入，加快周转速度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迫切需要让指纹档案走向现代化。美国联邦调查局必须找到一种在不使指纹失真的前提下压缩指纹档案的方法。

子波最能胜任这项工作。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数学家与美国联邦调

查局合作，[6]把指纹表示成许多个子波的组合，并利用微积分使它们最优化，从而将指纹档案缩小了20倍以上。这是法医学领域的一次革命。得益于现代形式的费马思想（以及子波分析、计算机科学和信号处理等的作用），一个10MB的文件能被压缩到只有500KB（千字节），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而且，这是在不牺牲保真度的情况下做到的，得到了人类指纹专家的高度认同。计算机也一样，压缩后的档案顺利地通过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自动识别系统。这对微积分来说是个好消息，而对罪犯来说则是个坏消息。

[1] JPEG: Austin, “What Is...JPEG?,” and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813–16.

[2] how day length varies: Timeanddate.com will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for any location of interest.

[3] sine waves called wavelets: For a clear introduction to wavelets and their many applications, see Dana Mackenzie, “Wavelets: Seeing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in *Beyond Discovery: The Path from Research to Human Benefit*, a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go to <http://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eyond-discovery/wavelets.pdf>. Then try Kaiser, *Friendly Guide*, Cipra, “Parlez-Vous Wavelets?,” or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chapter 6. Daubechies, *Ten Lectures*, was a landmark series of lectures on wavelet mathematics by a pioneer in the field.

[4]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sed wavelets: Bradley et al., “FBI Wavelet/Scalar Quantization.”

[5] 1英亩 $\approx$ 4 046.86平方米。——编者注

[6] mathematicians from th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 teamed up with the FBI: Bradley and Brislawn, “The Wavelet/Scalar Quantization”; Brislawn, “Fingerprints Go Digital”; and <https://www.nist.gov/itl/iad/image-group/wsqa-bibliography>.

最短时间原理

我想知道，如果费马看到我们这样运用他的理念，他会怎么想。费马对将数学应用于现实世界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致力于数学研究纯粹是因为他喜欢数学。但是，他确实为应用数学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贡献。费马是第一个用微积分作为逻辑引擎，从更深层次的法则中推导出自然律的人。就像两个世纪后麦克斯韦所做的电磁研究一样，费马先将一个假设的自然律翻译成微积分语言，然后发动引擎，输入这个定律，最后输出另一个定律（第一个定律的推论）。就这样，不经意间成为科学家的费马，开创了一种自此以后一直支配着理论科学的推理方式。

这个故事要从1637年讲起，当时巴黎的一群数学家询问费马对笛卡儿新近出版的光学论著的看法。笛卡儿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光从空气进入水或者玻璃时会如何弯曲的理论，即折射效应。

所有玩过放大镜的人都知道，光可以弯曲和聚焦。小时候，我喜欢手持放大镜对准机动车道上的树叶，然后上下移动放大镜，直到太阳光线聚焦成一个耀眼的小白点，它会让树叶阴燃，最终着起火来。对我们的眼镜而言，光的折射效应则没有这么明显。眼镜镜片会将光线弯曲和聚焦到视网膜的恰当位置上，起到矫正视力的作用。

晴天里当你漫步在游泳池旁时，光的弯曲也可以解释你可能会注意到的一种错觉。假设在游泳池底碰巧有一个不小心被遗失的闪闪发光的東西，比如一件珠宝（图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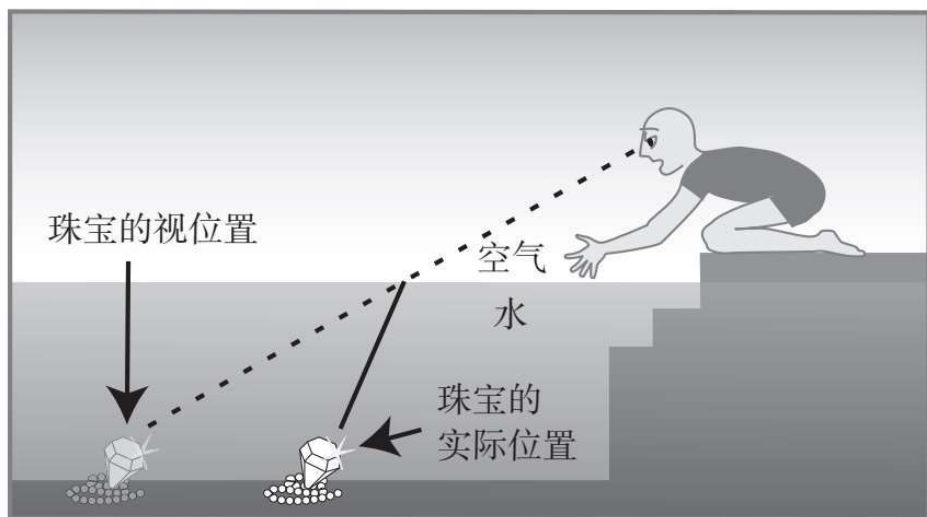


图4-12

尽管你透过水看见了这个闪闪发光的物体，但它并不在视位置上，因为它那里反射回来的光线在从水进入空气时发生了弯曲。出于同样的原因，拿着鱼叉的渔民需要瞄准一条鱼的视位置下方，才有机会叉中它。

像这样的折射现象都会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当光线从光疏介质（比如空气）进入光密介质（比如水或者玻璃）时，它会朝着两种介质界面的垂线弯曲；当光线从光密介质进入光疏介质时，它会朝着远离垂线的方向弯曲，如图4-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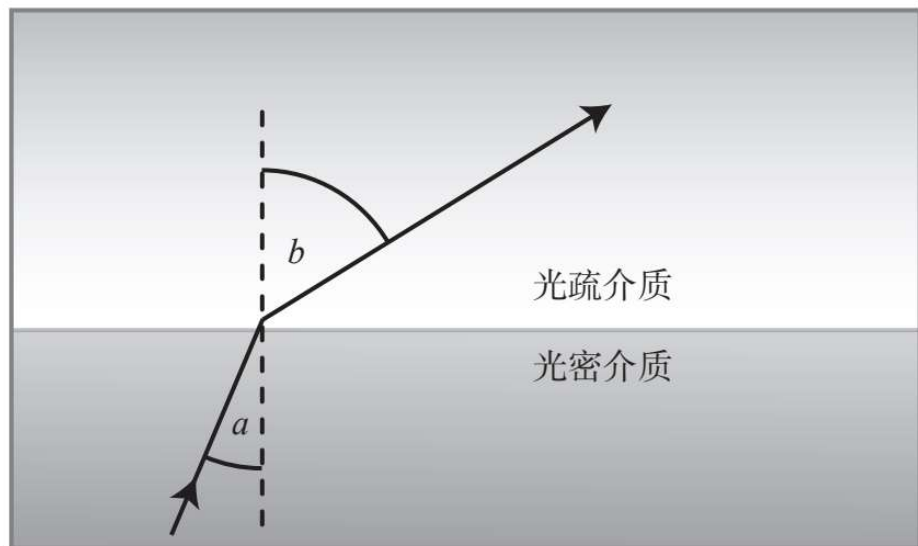


图4-13

1621年，荷兰科学家威里布里德·斯涅耳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加强和量化了这条规则。通过系统地改变入射角 a ，并观察折射角 b 如何随之变化，他发现对于两种给定的介质， $\sin a / \sin b$ 的比率始终保持不变（这里的 $\sin$ 指三角学中的正弦函数）。

不过，斯涅耳也发现， $\sin a / \sin b$ 的值确实取决于这两种介质是什么。空气和水会产生一个恒定的比率，而空气和玻璃会产生另一个恒定的比率。他不知道为什么正弦定律会行之有效，但它是关于光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

笛卡儿重新发现了斯涅耳的正弦定律^[1]，并在1637年发表的论文《屈光学》中公布了这一定律。但笛卡儿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前至少有两个人已经发现了它：斯涅耳是在1621年，英国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是在1602年，波斯数学家阿布·萨德-阿拉·伊本·萨尔则是在984年。

笛卡儿对正弦定律做出了力学解释，他（错误地）认为光在光密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更快。在费马看来，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而且有悖常识。本着提供帮助的目的，费马对笛卡儿的理论提出了他自认为温和的一点儿批评意见，并邮寄给向他征询看法的巴黎数学家。

费马并不知道那些数学家都是笛卡儿的死敌，他们只是想利用费马达到其险恶的目的。即使十几岁的孩子也能想到，当笛卡儿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费马的评论时，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攻击。他从未听说这个图卢兹的律师，对

笛卡儿来说，费马只是一个在偏远乡村工作的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爱好者，就像在他耳边嗡嗡叫的一只无须理会的小虫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笛卡儿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费马，并声称他不小心搞错了结论。

20年后，也就是1657年（笛卡儿已离世），一位名叫马林·库雷奥·德拉夏布里的同行请求费马再次讨论折射问题。这促使费马利用他对优化的认识，着手研究了这个问题。

费马预感到光被优化了，更准确地说，他猜测光总是沿任意两点之间阻力最小的路径传播，换言之，光会沿着最快的路线行进。他明白，最短时间原理^[2]可以解释光为什么会在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以及当它从镜子上反射出去时，为什么它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但是，最短时间原理也能准确地预测当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它的弯曲程度吗？最短时间原理能解释正弦折射定律吗？

费马对此并不确定，计算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无穷多条直线路径都在界面处像手肘一样弯曲，将光从一种介质中的源点带到另一种介质中的目标点（图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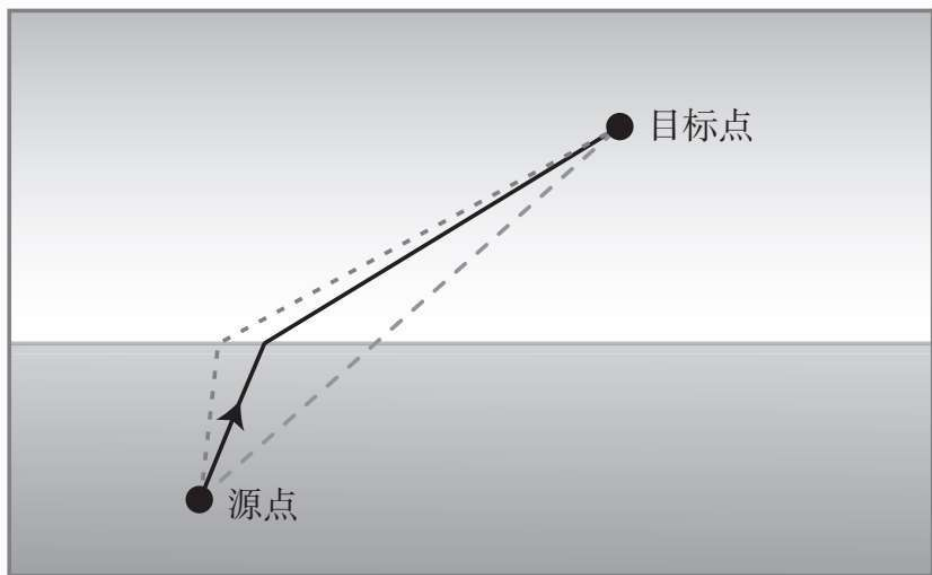


图4-14

计算光沿所有路径传播的最短时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在微积分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的时候。除了重交点这个老方法之外，没有其他可

用的工具。而且，费马担心得出错误的结果。就像他在给库雷奥的信中写的那样：“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计算，却发现了某个不规则和大得惊人的比例，这种担忧加上我懒惰的天性^[3]，致使这件事一直没有进展。”

在之后的5年里，费马都在研究其他问题，但最终他的好奇心战胜了他。1662年，他强迫自己开始动手做计算。这项任务既艰巨又令人不快，但随着错综复杂的符号被清除，他看到了某种东西。代数开始发挥作用，有些项被消掉了，然后他得到了正弦定律。在写给库雷奥的信中，费马称这是他做过的“最不同寻常、最无法预料但也是最开心的一次计算。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无比惊讶，以至于我久久无法回过神来”^[4]。

就这样，费马把他的尚处于萌芽期的微积分理论应用到了物理学领域。这种做法前所未有，而且他由此证明了光会以最有效的方式传播——不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而是以最快的方式。在光可以采取的所有可能的传播路径中，它知道（或者表现得好像它知道一样）如何尽可能快地从这里到达那里。这是表明微积分以某种方式深植于宇宙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早期线索。

最短时间原理后来被广义化为最小作用量原理^[5]，其中的作用量具有我们在这里不必探究的学术意义。人们发现，这种最优性原理（从某种精确的意义上说，指大自然会以最经济的方式运行）能准确地预测出力学定律。20世纪，最小作用量原理又延伸到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其他领域。它甚至在17世纪给哲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认为，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一个，它的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后来，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还仿拟过这个乐观主义的观点。用最优性原理来解释物理现象和用微积分推导其结果的思想，正是源于费马的这次计算。

[1] Snell's sine law: Kwan et al., "Who Really Discovered Snell's Law?," and Sabra, *Theories of Light*, 99–105.

[2] principle of least time: Mahoney, *Mathematical Career*, 387–402.

[3] "my natural inclination to laziness": Ibid., 398.

[4] "I can scarcely recover from my astonishment": Ibid., 400 (my translation of Fermat's French).

[5]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 Fermat's principle of least time anticipated the more general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 For entertaining and deeply enlightening discussions of this principle, including its basis in quantum mechanics, see

R.P.Feynman, R.B.Leighton, and M.Sands, “The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vol.2, chapter 19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64), and Feynman, QED.

关于切线的争论

费马的优化方法也使他明白了曲线的切线是怎么回事，这是真正让笛卡儿火冒三丈的问题。

切线的英文单词“tangent”源于“touching”（触碰）的拉丁词根，这个术语用得很恰当，因为切线并不是从曲线中间穿过并与曲线交于两个点，而是在一个点上与曲线发生触碰，仅算得上擦肩而过（图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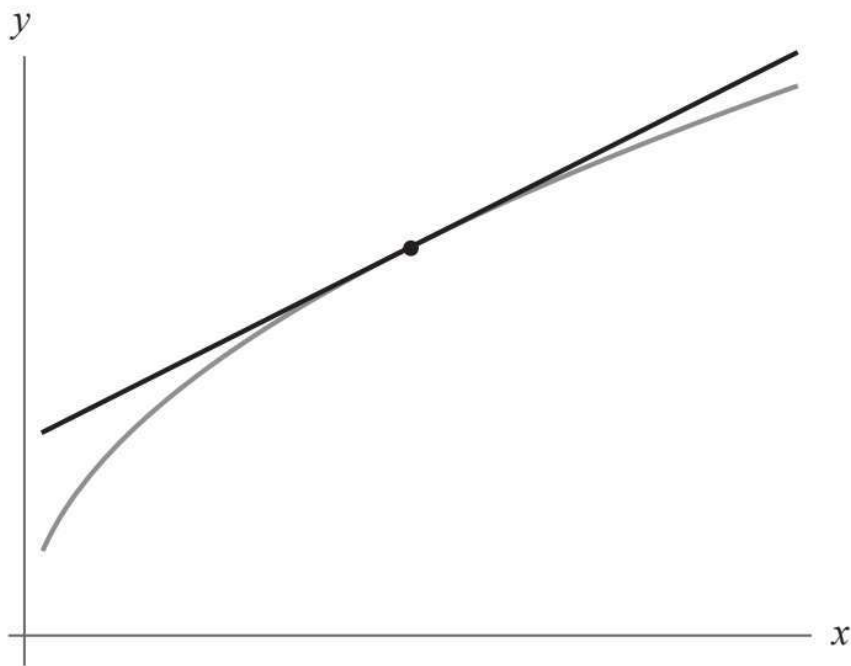


图4-15

确定切线的条件类似于求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条件。如果我们让一条曲线与一条直线相交，然后不断地向上或向下滑动直线，当两个交点合而为一时，直线与曲线就相切了。

到17世纪2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费马已经找到了几乎所有代数曲线（只能用 x 和 y 的整数次幂来表示，而不含任何对数、正弦函数或其他超越函数的

曲线)的切线。借助伟大的重交点概念,费马能用他的方法找出我们用求导法找到的所有切线。

笛卡儿有他自己的寻找切线的方法^[1]。在1637年出版的《几何学》中,他自豪地向世人公布了他的方法。在不知道费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尽管笛卡儿也独立地想出了重交点的概念,但他用的是圆而不是直线去横穿曲线(图4-16)。在切点附近,一个标准的圆要么与曲线有两个交点,要么一个交点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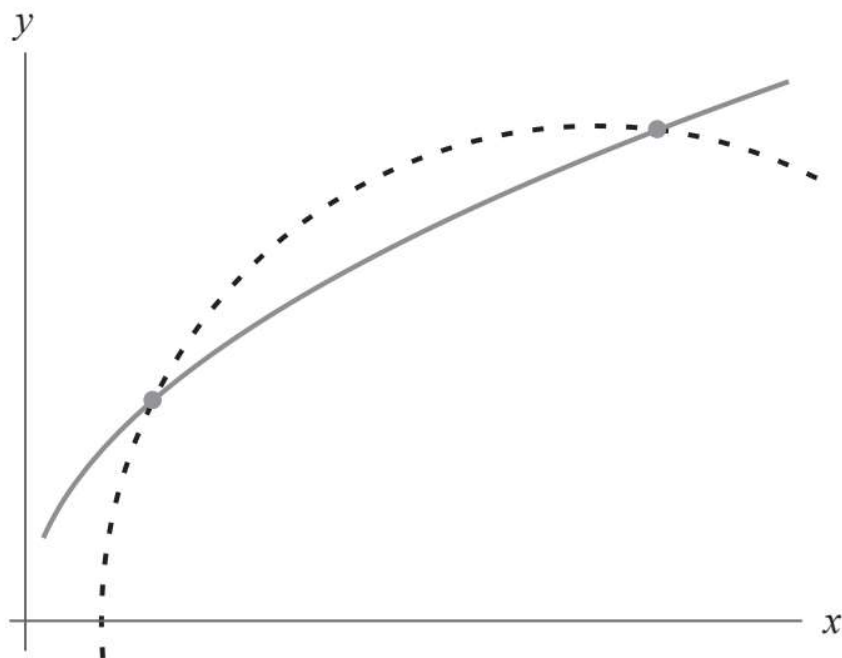


图4-16

通过调整圆的位置和半径,笛卡儿可以使两个交点合而为一。在那个重交点的位置上,圆与曲线恰好相切(图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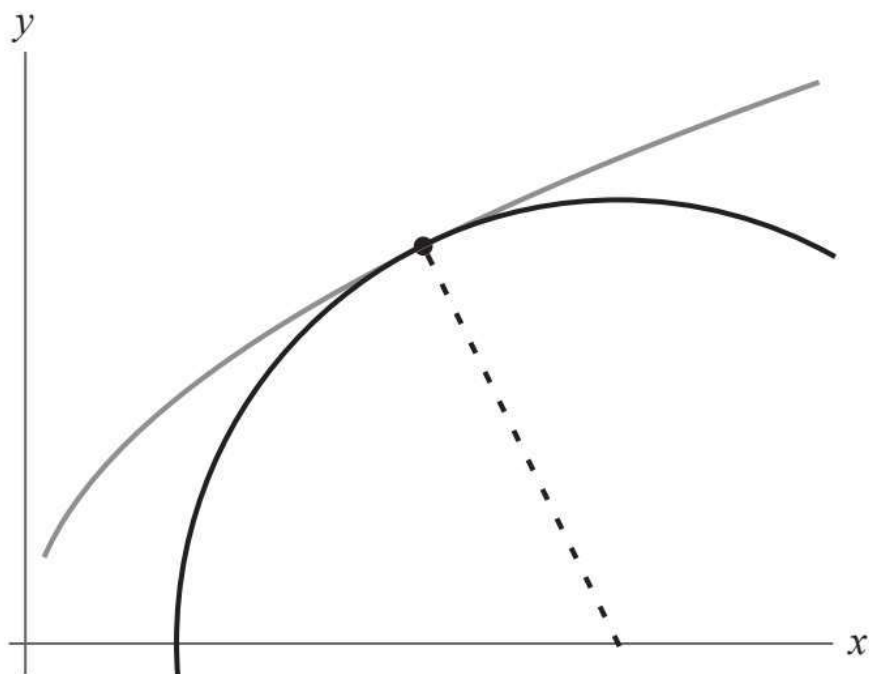


图4-17

这样一来，笛卡儿就得到了找出曲线切线所需的一切条件，他也找到了曲线的法线，它位于圆的半径方向上，与切线成直角。

笛卡儿的方法虽然正确却很笨拙，它涉及的代数运算量远超费马的方法。但是，笛卡儿尚未听说过费马，所以他以一贯的傲慢姿态自认为超越了所有人。他在《几何学》中得意扬扬地说：“关于如何在曲线上的任意一点处画出与其成直角的直线，我给出了一般性方法。^[2]而且，我敢说这不仅是我所知道的几何学中最有用和最普遍的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渴望了解的问题。”

1637年年末，当笛卡儿从巴黎的通信者那里得知，费马早在大约10年前就解决了切线问题但却一直未公之于众时，他感到很沮丧。1638年，他研究了费马的方法，试图寻找其中的漏洞。简直太多了！他通过一个中间人写信说：“我甚至不想提他的名字，^[3]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我发现的错误而感到十分羞耻。”笛卡儿对费马的逻辑提出了质疑，公平地说，费马的逻辑比较粗略，解释得也不详细。但最终，经过几次信件往来，费马从容地阐明了他的观点，笛卡儿也不得不承认费马的推理是有理有据的。

但在承认自己的失败之前，笛卡儿仍试图为难费马，要求他找出三次方程 $x^3 + y^3 = 3axy$ 的曲线切线，其中 a 是一个常数。笛卡儿知道用他自己的那种笨拙的方法无法找到这条切线（代数运算会变得无法处理），所以他相信费马也找不到。不过，费马是一个水平更高的数学家，方法也更好，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画出了那条切线，令笛卡儿懊恼不已。

[1] Descartes had his own metho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72–73.

[2] “I have given a general method”: Quoted in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16.

[3] “I do not even want to name him”: Quoted in Mahoney, *Mathematical Career*, 177.

近在眼前的应许之地

费马为现代形式的微积分铺平了道路，他的最短时间原理揭示出最优化深深地嵌在大自然的结构之中。他在解析几何和切线方面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往微分学之路，其他人将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他高超的代数技巧让他能够求出某些曲线下方的面积^[1]，而这类问题曾让许多杰出的前辈数学家一筹莫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徒手算出了曲线 $y=x^n$ 下方的面积，其中 n 为任意正整数（其他人已经解决了前9种情况，即 $n=1, 2, 3\dots 9$ ，但没有找到一种对所有 n 均可行的方法）。费马的研究成果使积分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为接下来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他的成果仍然比不上牛顿和莱布尼茨即将发现的那个秘密，^[2]后者彻底改变并统一了微积分的两个部分。费马已经很接近这个秘密了，但遗憾的是，他错过了它。缺少的一环与他创造的某个东西有关，这个东西就隐含在他求最大值和切线的方法中，但他从未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后来被人们称为导数，它的应用将远远超出曲线及其切线的范畴，能够涵盖任何种类的变化。

^[1] fou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Simmons, *Calculus Gems*, 240–41;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81–84.

^[2] his studies still fell short: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85, explains why he feels Fermat does not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an inventor of calculus, and he makes a good case.

第5章 微积分的十字路口

我们的故事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微积分将从这里开始变得现代化，并且从研究曲线之谜进展到研究运动和变化之谜。微积分也将从这里开始探索宇宙的节律，包括它的涨落起伏和不可言喻的时间模式。微积分不再满足于静态的几何世界，而是痴迷于动态变化。它想解决的问题是：运动和变化的规则是什么？我们能对未来做出哪些确定性预测呢？

从微积分到达十字路口的4个世纪以来，它已经从代数和几何学扩展到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学、技术学，以及其他所有不断变化的领域。而且，微积分将时间数学化了。尽管我们的世界存在着种种不公、苦难和混乱，但微积分给了我们这样的希望：世界本质上可能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它遵循的是数学定律。有时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找到这些定律，有时我们可以通过微积分理解它们，有时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改善生活，匡扶社会，以及推动历史进程朝好的方向发展。

微积分故事中的关键时刻出现在17世纪中叶，曲线之谜、运动之谜和变化之谜在二维网格——费马和笛卡儿的 xy 平面——上发生了碰撞。而那时，费马和笛卡尔并不知道他们创造出的这个工具有多么强大。他们的初衷是把 xy 平面用作纯粹数学的工具。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堪称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方程与曲线、代数与几何学、东方数学与西方数学都是在这里相遇的。到了下一代，牛顿在费马、笛卡尔、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几何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牛顿的思想火花点燃了启蒙运动之火，引发了西方的科学和数学革命。

但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必须从它发生的舞台，也就是 xy 平面说起。今天的学生从上第一节微积分课开始，将要在这个平面上花整整一年的时间。这门课的专业名称是一元函数微积分，接下来我们会用几个章节的篇幅去讨论它。在这里，我们先说说函数。

从曲线之谜与运动之谜、变化之谜发生碰撞的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枢纽的 xy 平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天，所有的定量领域都用它来绘制数据图表和揭示隐藏的关系。通过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一个变量如何取决于另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x 和 y 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可以用一元函数来建模，并用符号表示为 $y=f(x)$ 。在这里， f 是一个描述变量 y （因变量）如何随变量 x （自变量）变化的函数，它的前提是其他所有条件都确定不变。这类函数模拟了世界在最有序状态下的行为，一个原因会产生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剂药会激发一种可预测的反应。更正式地

讲，函数 f 是为每个 x 指定唯一的 y 时需要遵循的规则。它就像一台输入-输出机器：输入 x ，输出 y ，整个过程既可靠又可以预测。

伽利略知道这种有意简化现实的方法的力量，而且比费马和笛卡儿早了几十年。在实验中，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只改变一个条件，而让其他所有条件保持不变。他让一个球滚下斜坡，然后测量它在一定时间内滚动的距离。这样一来，距离就是时间的函数，非常简单。同样地，开普勒研究了行星绕太阳公转的时间，并将这个周期与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联系起来；一个变量比另一个变量，即周期比距离。这就是取得进步的方法，也是阅读大自然这部伟大著作的方法。

我们在前文中举过函数的例子。在肉桂葡萄干面包的例子中， x 是吃掉的面包数量， y 是摄入的热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式为 $y = 200x$ ，在 xy 平面上形成的图像是一条直线。在2018年纽约市昼长如何随季节变化的例子中，变量 x 表示一年中的某一天， y 表示当天的白昼分钟数，也就是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长。我们发现，由于夏季的昼长最长而冬季的昼长最短，所以这个例子中的图像会像正弦波一样振动。

函数的作用

有些函数非常重要，以至于在科学计算器上拥有它们的专属按键。它们是数学领域的“名人”，包括 x^2 、 $\log x$ 和 10^x 等。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常用到它们，在找零钱或者决定给多少小费时函数根本派不上用场。在日常生活中，有数字通常就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应用程序时，在默认情况下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基本的计算器，上面有从0到9的数字，还有4个基本的算术运算符（加、减、乘、除）和一个百分比按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能用到的就是这些。

但对技术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数字只是开始。科学家、工程师、数量金融分析师和医学研究人员需要弄清楚数字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一件事会如何影响另一件事。想要描述这样的关系，函数就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提供了为运动和变化建模所需的工具。

一般来说，事物的变化方式有三种：上升、下降或上下起伏。换句话说，就是成长、衰退或波动。不同的函数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因为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各种函数，先回顾几种有用的函数将会对我们大有帮助。

幂函数

为了以渐进的方式量化增长，我们经常使用像 x^2 或 x^3 这样的幂函数，在这类函数中变量 x 会自乘若干次。

其中最简单的是线性函数，其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成正比。比如，如果 y 是你吃掉1片、2片或3片肉桂葡萄干面包后摄入的热量，那么 y 会按照方程 $y = 200x$ 增长； x 是你吃掉的面包数量，200卡路里是每片面包的热量。不过，计算器上不需要设置单独的 x 按键，因为乘法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在这里，200卡路里乘以你吃掉的面包数量就等于你摄入的热量。

但是，对二次增长来说，在计算器上设置 x^2 按键则非常有用。二次增长不像线性增长那样直观，它不仅仅是乘法运算。比如，如果我们让 x 分别等于1、2和3，然后看看 $y = x^2$ 对应的值会如何变化，我们将会发现 y 分别为 $1^2 = 1$ ， $2^2 = 4$ ， $3^2 = 9$ 。 y 值的增长幅度不断变大，一开始是 $\Delta y = 4 - 1 = 3$ ，然后是 $\Delta y = 9 - 4 = 5$ 。如果我们继续算下去， y 值的增量将依次为7, 9, 11...，它们遵循奇数模式。因此，对二次增长来说，改变量本身会随着 x 的增长而增大，这表明越往后函数值的增长越快。

我们已经在伽利略斜面实验中看到了这种奇怪的奇数模式，他利用该实验测量了球缓慢地滚下斜坡所需的时间。他观察到，当一个球从静止状态开始滚下斜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滚越快，以至于在每个连续的时间增量内，它移动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连续的距离增量与连续奇数1, 3, 5...成正比。伽利略意识到了这个隐秘规则背后的含义，它意味着球滚过的总距离并不是与时间成正比，而是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在关于运动的研究中，很自然地出现了平方函数 x^2 。

指数函数

相较于 x 或 x^2 等温和的幂函数，诸如 $2x$ 或 $10x$ 之类的指数函数则描述了一种爆炸式增长，犹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指数增长不像线性增长那样每次增加一个常量，而是要乘上一个常数因子。

比如，培养皿中的细菌种群每过20分钟就会增加一倍。如果最初有1 000个细菌细胞，过20分钟就会有2 000个细胞，再过20分钟就会有4 000个细胞，又过20分钟就会有8 000个，然后是16 000个、32 000个，以此类推。在这个例子中，指数函数 $2x$ 发挥了作用。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以20分钟为单位来计量时间，那么在 x 个时间单位之后，细菌数量将会达到 $1\,000 \times 2x$ 个。从真正的病毒增殖到社交网络中信息的病毒式传播，类似的指数增长都与各种滚雪球式的过程有关。

指数增长也与金钱的增长有关。假设银行账户中有一笔100美元的存款，年利率是恒定的1%。1年后，这笔钱将增至101美元；2年后，它将变成101美元乘以1.01，也就是102.01美元； x 年后，银行账户中的金额将是 $100 \times (1.01)x$ 。

在像 $2x$ 和 $(1.01)x$ 这样的指数函数中，数字2和1.01被称为函数的底数。在微积分预备课程中，最常用的底数是10。相比其他底数，人们更偏爱10，但这并不是出于数学上的原因，而只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喜好。因为生物学进化上的一个意外，人类碰巧有10根手指，所以我们的算术系统十进制就是以10的次方为基础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的新生代科学家最初（通常是在高中时期）遇到的指数函数都是 $10x$ ，这里的 x 被称作指数。当 x 取1、2、3或其他任意正整数时，它表示在 $10x$ 中有多少个10彼此相乘。但我们也会看到，当 x 取0、负数或者两个整数之间的数时， $10x$ 的意义就有些微妙了。

10的次方

在科学领域，有很多我们用10的次方来简化计算的情况。特别是在数很大或很小的时候，用科学记数法来改写它们是一个好办法，即用10的次方尽可能简洁地表示这些数。

以21万亿为例，这是近来人们在谈论美国国债时常会提到的数字。21万亿可以用十进制记数法写成21 000 000 000 000，也可以用科学记数法写成 $21 \times 10^{12} = 2.1 \times 10^{13}$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需要将这个很大的数乘以10亿，那么写成 $(2.1 \times 10^{13}) \times 10^9 = 2.1 \times 10^{22}$ 会比用十进制记数法写出所有0要容易得多。

10的次方中的前三个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数：

$$1 \ 10^1 = 10$$

$$2 \ 10^2 = 100$$

$$3 \ 10^3 = 1\ 000$$

请注意它们的变化趋势：左边一列(x)呈可加性增长，而右边一列($10x$)呈可乘性增长，也就是我们预期的指数增长。因此，在左边一列中，每次都要在前一个数的基础上加1，而在右边一列中，每次都要在前一个数的基础上乘以10。加法和乘法之间这种有趣的对应关系，是指数函数（尤其是10的次方）具备的一个典型性特征。

根据这两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将左边一列中的两个数字相加，就相当于让它们在右边一列中的搭档相乘。比如，左边的 $1 + 2 = 3$ 会转换为右边的 $10 \times 100 = 1\ 000$ 。这种从加法到乘法的转换是有意义的，原因是：

$$10^{1+2} = 10^3 = 10^1 \times 10^2$$

因此，当我们将10的次方相乘时，就可以让它们的指数像这里的1和2一样相加。一般性规则是：

$$10^a \times 10^b = 10^{a+b}$$

一个相关趋势是，左边一列中的减法对应于右边一列中的除法。

$$3-2=1 \text{ 对应于 } \frac{1\ 000}{100} = 10$$

这些实用的模式表明，如何能让两列数字持续地变小。原则是，每当我们在左边一列中减去1，就应该让右边一列除以10。现在再看一下第一行：

$$1\ 10^1 = 10$$

$$2\ 10^2 = 100$$

$$3\ 10^3 = 1\ 000$$

由于左边一列减去1相当于右边一列除以10，因此这种对应关系在新的第一行（左边 $1-1=0$ ，右边 $10/10=1$ ）也成立。

$$0\ 10^0 = 1$$

$$1\ 10^1 = 10$$

$$2\ 10^2 = 100$$

$$3\ 10^3 = 1\ 000$$

这个推理过程解释了 10^0 为什么会被定义成1（并且只能这样定义），而它曾令许多人困惑不已。任何其他选择都会打破这种模式，这个定义是能延续左右两列数字的既定趋势的唯一选择。

同理，我们可以继续拓展这种对应关系。当左边一列是负数时，右边一列对应的数字就会变成分数，相当于 $1/10$ 的次方：

$$-2\ \frac{1}{100}$$

$$-1\ \frac{1}{10}$$

$$0\ 1$$

$$1\ 10$$

$$2\ 100$$

$$3\ 1\ 000$$

请注意，即使左边一列中的数字变成0或负数，右边一列中的数字也始终是正数。

在使用10的次方时，一个潜在的认知陷阱是，它们可以使截然不同的数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相似。为了避免这个陷阱，我们可以假装10的不同次方形成了概念上的不同类别。有时为了做到这一点，人类语言会给10的不同次方指定不同的名字，就好像它们是毫不相关的“物种”一样。在英语中，我们用三个互不相关的词语来指代10、100和1 000，分别是：ten, a hundred和a thousand。这种做法很棒，因为它传递了一个正确的理念，那就是尽管这些数字都是10的相邻次方，但它们却有质的不同。任何了解5位数和6位数工资之间差别的人都知道，多一个0可是意义非凡。

当表示10的次方的词语听起来太过相像时，我们就会被引入歧途。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频频谴责“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享受了过高的税收减免福利。遗憾的是，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政治观点，他的这句话听上去都会让人觉得，就财富而言，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似乎可以相提并论。事实上，亿万富翁可比百万富翁富有得多。要知道100万和10亿有多么不同，我们可以这样比较：100万秒还不到2个星期，而10亿秒大约是32年。前者只是一个假期的时间，而后者则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例子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必须谨慎使用10的次方。它们是十分强大的压缩机，能把巨大的数字缩减到更易于我们理解的程度，这也是它们如此受科学家欢迎的原因。在某个量的变化涉及许多数量级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用10的次方来定义一个适当的测量尺度，这样的例子包括酸碱性的pH标度、地震的里氏震级和响度的分贝标度。比如，如果溶液的pH值从7（中性，比如纯水）变为2（酸性，比如柠檬汁），氢离子浓度就会增加5个数量级，即 10^5 或10万倍。尽管氢离子浓度的确变化了10万倍，但pH值从7降到2的量度方法让这个过程看似只走了5小步，根本没发生多大的变化。

对数

在上文我们讨论过的例子中，右边一列中的数字（比如100和1 000）一直是约整数（round number）。既然10的次方这么方便，要是我们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示非约整数的话就太好了。我们以90为例，考虑到90略小于100，而100等于 10^2 ，那么90对应的以10为底的函数的指数应该略小于2。但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呢？

对数就是为了回答这类问题而被发明出来的。[\[1\]](#)在计算器上，如果你输入90，然后按下log键，就会得到：

$$\log 90 = 1.954\ 2\dots$$

所以，答案是： $10^{1.954\ 2\dots} = 90$ 。

有了对数，我们就能够将所有正数都写成10的次方的形式。这既可以让很多计算变得更简单，也揭示了数与数之间的惊人联系。看一看，如果我们先将90乘以10或100，再求对数，会怎么样。

$$\log 900 = 2.954\ 2\dots$$

$$\log 9\ 000 = 3.954\ 2\dots$$

在这里，有两个事实引人注目：

第一，所有对数的小数部分都相同，即0.954 2...；

第二，将原来的数字90乘以10，其对数增加1。将90乘以100，其对数增加2，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用对数法则（积的对数等于对数的和）来解释这两个事实：

$$\log 90 = \log (9 \times 10)$$

$$= \log 9 + \log 10$$

$$= 0.954\ 2\dots + 1$$

$$\log 900 = \log (9 \times 100)$$

$$= \log 9 + \log 100$$

$$= 0.954\ 2... + 2$$

.....

这解释了为什么90、900和9 000的对数都有相同的小数部分0.954 2...，它是9的对数，而9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所有数的一个共同因数。10的不同次方则以对数中不同的整数部分出现，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小数部分前面的1、2或3。因此，如果我们对其他数的对数感兴趣，只要求出数字1~10的对数，即小数部分的值，那么其他所有正数的对数都可以用这些对数来表示。10的次方也有它们自己的任务，就是负责给出整数部分的值。

这个一般性规则可用符号表示为：

$$\log(a \times b) = \log a + \log b$$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两个数相乘，然后取积的对数，结果就等于它们各自对数的和（而不是积！）。在这个意义上，对数用简单得多的加法问题取代了乘法问题。这就是人们发明对数的原因，它们极大地加快了计算速度。这类计算可以把艰巨的乘法问题、平方根和立方根等转化为加法问题，然后在对数表的帮助下得出答案。对数的概念在17世纪早期就已经流行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格兰数学家约翰·纳皮尔，他在1614年出版了《关于奇妙的对数法则的说明》一书。10年后，开普勒在编制关于行星和其他天体位置的天文表时，兴致勃勃地使用了这种新颖的计算工具，对数堪称他们那个时代的超级计算机。

很多人都觉得对数难以理解，但如果你用木工活儿进行类比，就会发现它们非常有意义。对数和其他函数好比工具，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用途。锤子是用来钉钉子的，钻子是用来钻孔的，锯子是用来切割的。同样地，指数函数可用于为越来越快的增长过程建模，而幂函数可用于为不太剧烈的增长方式建模。对数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起到了跟起钉器一样的作用：撤销另一种工具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对数撤销了指数函数的作用，反之亦然。

比如，将 $x=3$ 代入指数函数 10^x ，结果是1 000。想要撤销这步操作，你可以按下 $\log x$ 键，再将 $x=1\ 000$ 代入，就会返回到一开始的数字3。以10为底的对数函数 $\log x$ 撤销了指数函数 10^x 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反函数。

除了起到反函数的作用之外，对数还描述了许多自然现象。比如，我们对音高的知觉就近似于对数函数。当音高逐次升高八度，即从一个do到下一个do时，相应地，关联声波的频率会逐次加倍。然而，尽管音高每升高一

个八度，声波振动的速度就会加快一倍，但我们却把这种加倍效应（频率的乘性变化）听成了音高在等距升高（加性变化）。这太奇怪了。我们的大脑愚弄我们相信从1到2的距离和从2到4的距离一样，和从4到8的距离也一样，以此类推。由此可见，我们在用对数的方式感知频率。

[1] Logarithms were invented: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2,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10.4.

自然对数及其指数函数

尽管底数10在它的全盛时期曾大展拳脚，但在现代微积分中却很少用到，因为10已经被另一个看似深奥但其实远比它自然的底数取代了。这个底数被称作 e ，尽管它是一个接近2.718的数（我稍后会解释它从何而来），但它的数值无关紧要。关于 e 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它为底的指数函数的增长速率恰好等于这个函数本身。

我再说一遍。

e^x 的增长率就是 e^x 本身。

当指数函数被表示成以 e 为底数的形式时，这个不可思议的性质就可以简化所有计算。其他底数则享受不到这种简单性，无论我们用的是导数、积分、微分方程还是其他微积分工具，以 e 为底数的指数函数总是最简洁、最优雅和最美丽的。

除了它在微积分中起到的简化作用之外，底数 e 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金融和银行业中。下面这个例子将揭示数字 e 来自哪里，以及它是如何定义的。

假设你把100美元存入一家银行，它承诺支付的100%的年利率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无法拒绝。这意味着一年以后，你的100美元将变成200美元。现在重新开始考虑一种对你更加有利的方案：假设你可以说服这家银行每年分两次为你账户里的钱计息，随着你的存款增加，你就可以从利息中获得利息。按照这个方案，你可以多赚多少钱呢？由于你要求银行分两次计息，只有每6个月的利率减半为50%才算公平。因此，6个月后，你将拥有 $100 \times 1.50 = 150$ 美元。再过6个月，也就是年末，你的存款金额将再次增加50%，变成 $150 \times 1.50 = 225$ 美元。这比你按照原来的计息方案得到的200美元多，因为你从这一年的利息中又获得了利息。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让银行越发频繁地为你账户里的钱计息（相应地，每个复利期内的利率都会降低），会怎么样呢？你会获得惊人的财富吗？很遗憾，并不能。按季度计息的话，年末你将拥有 $100 \times (1.25)^4 \approx 244.14$ 美元，这比225美元多不了多少。如果以更快的频率计息，比如一年365天每天计算一次，那么年末你只能得到：

$$100 \times \left(1 + \frac{1}{365}\right)^{365} \approx 271.46 \text{ 美元}$$

其中，分母和指数中的365指一年中的复利期数，1/365中的分子1指100%的利率。

最后，假设我们要让计息频率增加至极限。如果银行每年为你的钱计息 n 次，其中 n 是一个大得吓人的数字，相应地，在每个亚纳秒的复利期内利率也会变得极低。那么，与365个日复利期的结果相比，年末你的账户里会有：

$$100 \times \left(1 + \frac{1}{n}\right)^n \text{ 美元}$$

当 n 趋于无穷时，你的存款金额将趋于100与 $(1 + 1/n)^n$ 的乘积的极限，这个极限被定义为数字 e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该极限值是多少，但事实证明它大约为2.718 28...

在银行界，这种金融方案被称作连续复利。不过，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它没那么令人兴奋。就上面的问题而言，年末你的账户余额是：

$$100 \times e \approx 271.83 \text{ 美元}$$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交易，但也只比每日计息多37美分。

我们刚刚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定义 e ，结果证明它是一个复杂的极限。无穷是 e 的固有属性，就像数字 π 是圆的固有属性一样。你应该还记得，在确定 π 时需要计算一个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当边数 n 趋于无穷而边长趋于0时，这个多边形就会趋近圆。数字 e 的定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极限类似，只不过它是在连续复合增长这一不同的背景下产生的。

就像底数为10的指数函数写作 10^x 一样，与 e 相关的指数函数写作 x^e 。它乍

看上去很怪异，但在结构层面上它和底数10是一样的，所有的原则和模式也都一样。比如，已知 e^x 的值为90，要求出 x 的话，我们可以像之前那样使用对数，只不过我们现在求解的是以 e 为底的对数，即自然对数，用 $\ln x$ 来表示。要求出未知的 x ，使 $e^x = 90$ ，我们可以打开科学计算器，先输入90，再按下 $\ln x$ 键，答案是：

$$\ln 90 \approx 4.4498$$

想要检验它的话，就把这个数留在屏幕上，然后按下 e^x 键，你应该会得到90这个答案。如前所述，对数和指数就像订书机和起钉器一样，可以撤销彼此的作用。

尽管这些内容听起来深奥难懂，而且常常难以察觉，但自然对数却非常实用。比如，它是投资者和银行家熟知的72法则的基础。想要估算在年回报率已知的情况下，你银行账户里的钱增加一倍所需的时间，就可以用72除以回报率。因此，如果年增长率为6%，那么你的钱将在12（ $72/6$ ）年后增加一倍。这个经验法则遵从自然对数和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利率足够低，就会行之有效。再比如，在古树或骨头的碳定年法和艺术鉴定争议的背后，自然对数也在发挥作用。在一个著名的案件中，几幅据称出自维米尔之手的画作最终被证明为赝品；^[1]人们通过分析颜料中铅和镭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情况揭露了真相。这些例子表明，自然对数普遍存在于有指数增长和指数式衰减的领域。

^[1] paintings allegedly by Vermeer: Brau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ection 1.3.

指数增长与指数式衰减的机制

有一个要点我必须重申一下，即 e 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e^x 的变化率是 e^x 。因此，随着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像不断飙升，它的斜率总会与它当前的高度相匹配，越高的地方就越陡峭。用微积分术语可表述为， e^x 是它自身的导数。除 e^x 之外，没有其他函数能做到这一点。因此， e^x 是所有函数中最美妙的，至少在微积分领域如此。

虽然底数 e 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指数函数也遵循类似的增长原则。唯一的区别在于，指数增长率与函数的当前水平成正比，而不是严格地等于后者。不过，这种正比关系足以让我们联想到爆炸性的指数增长。

关于正比关系的解释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细菌增殖来说，越大的种群增殖越快，因为细菌越多，其中可以分裂并产生后代的细胞就越多。账户中以复利率增值的存款也是同样的道理，钱越多意味着利息越多，账户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就越快。

这种效应也可以解释当接收到从它自己的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时，麦克风为什么会发出啸叫声。扬声器包含一个能使声音变大的扩音器，实际上，它是将声音的音量乘以一个常数。如果这个放大的声音被麦克风接收到，并再次通过扩音器，它的音量将在一个正反馈回路中被反复放大。这会导致音量突然失控，以与当前音量成正比的速度增加，从而产生刺耳的啸叫声。

出于同样的原因，核链式反应也受到指数增长的支配。当一个铀原子分裂时，它会释放出中子，这些中子可能会撞击其他原子并导致它们分裂，从而释放出更多中子，以此类推。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子数量的指数增长就会引发核爆炸。

除了增长过程之外，衰减过程也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指数式衰减是指某个事物以与当前水平成正比的速度减少或者消耗。比如，在一个孤立的铀块中，不管一开始有多少个原子，总有半数原子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生放射性衰变。它们的衰变时间被称作半衰期，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在第8章，我们将会探讨当医生发现HIV感染者在使用了一种叫作蛋白酶抑制剂的神奇药物后，其血流中的病毒颗粒数量呈指数下降，而且半衰期只有两天时，他们对艾滋病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从连锁反应的动态过程、麦克风的啸叫声到银行账户金额的积累，这些不同的例子让我们觉得，指数函数及其对数似乎与微积分中处理时间变化的

那一部分密切相关。尽管指数增长和指数式衰减是微积分十字路口上靠现代一边的重要课题，但对数最早却出现在另一边，那时候微积分的研究重点还是曲线几何学。的确，早在人们研究双曲线 $y=1/x$ 下方的面积时，自然对数就出现了。17世纪40年代，当人们发现双曲线下方的面积定义了一个像对数一样神秘的函数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事实上，它就是对数。它遵循同样的结构性规则，并且像其他所有对数一样，能把乘法问题转变成加法问题，只不过它的底数是未知的。

关于曲线下方的面积，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这是微积分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另一个挑战是，发明一种寻找曲线切线和斜率的更加系统性的方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它们之间的惊人联系，将很快带领微积分和整个世界果断地步入现代化。

第6章 变化率和导数

21世纪，微积分常被视为关于变化的数学，它运用了两大概念来量化变化：导数和积分。本章的主题是为变化率建模的导数，第7章和第8章则会讨论为变化的累积量建模的积分。

导数可以回答“多快？”“多陡？”“多敏感？”之类的问题，这些都是关于某种形式的变化率问题。变化率等于因变量的变化量除以自变量的变化量，通常用符号 $\Delta y/\Delta x$ 表示，意指 y 的变化量除以 x 的变化量。尽管有时人们也会使用其他字母，但结构都是相同的。比如，当自变量是时间时，为了更清楚一些，通常会把变化率写作 $\Delta y/\Delta t$ ，其中 t 表示时间。

最常见的一个变化率是速度。当我们说一辆汽车每小时行驶100千米时，这个数就可被视为一个变化率，因为当描述汽车在已知时间（ $\Delta t=1$ 小时）内行驶的距离（ $\Delta y=100$ 千米）时，它把速度定义为 $\Delta y/\Delta t$ 。

同样地，加速度也是一个变化率。它被定义为速度的变化率，通常写作 $\Delta v/\Delta t$ ，其中 v 代表速度。美国汽车制造商雪佛兰声称，它的科迈罗SS车型可以在4秒钟内从0加速到60英里/小时，以此把加速度描述成一个变化率，即用速度的变化量（从0到60英里/小时）除以时间的变化量（4秒）。

斜坡的坡度是变化率的第三个例子，它被定义为斜坡的垂直高度 Δy 除以斜坡的水平距离 Δx 。越陡的斜坡坡度越大，美国法律规定无障碍轮椅坡道的坡度必须小于1/12，平地的坡度为0。

在已有的各种变化率中， xy 平面上的曲线斜率是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一种，因为它可以代替其他所有变化率。根据 x 和 y 的具体所指，曲线的斜率可以表示速度、加速度、报酬率、汇率、投资的边际收益或其他类型的变化率。比如，当我们绘制 x 片肉桂葡萄干面包所含热量 y 的图表时，会得到一条斜率为200卡路里/片的直线。这个斜率（几何特征）可以告诉我们面包提供热量的速率（营养特征）。同样地，在反映车辆行驶距离与时间关系的图表上，斜率表示车辆的速度。因此，斜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变化率。由于任何一元函数都可以表示成 xy 平面上的一条曲线，我们可以通过读取图像的斜率来找到函数的变化率。

问题是，在现实世界或数学领域中，变化率几乎不可能是恒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定义变化率变得问题重重。微分学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在变化率不断改变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定义。速度表和GPS设备已经解决了这

个问题，即使在汽车加速和减速的时候，它们也知道应该报告什么速度。这些装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它们做了哪些计算呢？在微积分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速度一样，斜率也不必是恒定的。在圆、抛物线等曲线或者其他光滑的路径（只要不是一条笔直的线）上，有些地方的斜率必定会大一点儿，而有些地方的斜率会小一点儿。在现实世界中亦如此。山间小径既有凶险陡峭的路段，也有闲适平坦的路段。所以，问题依旧是：当斜率不断变化时，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呢？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必须扩展自己对变化率的理解。在涉及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的代数问题中，变化率总是恒定的。而在微积分中，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速度、斜率和其他变化率会随自变量 x 或 t 而变化，所以它们本身必须被视为函数。变化率不再只是数，而需要变成函数。

这就是导数概念的作用，它将变化率定义为一个函数。即使变化率是多变的，导数也会给出某个点或某个时刻的变化率。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导数是如何定义的，它们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重要。

要想揭开大自然的秘密，导数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无处不在。在最深层次上，自然律是用导数表示的，宇宙似乎在我们之前就知道了变化率的概念。在更平常的层次上，只要我们想量化某个事物的变化与另一个事物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会用到导数。提高一款应用程序的价格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它的需求？增加一种他汀类药物的剂量会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其降低患者胆固醇水平的能力，或者增加其引发肝损伤等副作用的风险？无论研究的是哪种关系，我们都想知道：如果一个变量改变了，与它相关的变量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后者会朝着哪个方向变化，上升还是下降？这些都是与导数有关的问题。火箭的加速度、人口的增长率、投资的边际收益和一碗汤的温度梯度等，皆为导数。

在微积分中，导数的符号是 dy/dx 。它应该会让你想起普通的变化率 $\Delta y/\Delta x$ ，只不过我们现在要假设 dy 和 dx 这两个变化量无穷小。这种温和而缓慢的推进方式虽然是一个疯狂的新想法，但它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根据无穷原则，在复杂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方法是，先把问题切分成无穷小的碎块，然后分析这些碎块，最后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找到答案。在微分学的背景下， dx 和 dy 就是那些无穷小的碎块，而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则是积分学的工作。

微积分的三大核心问题

为了给后面的讨论做好准备，从一开始我们的头脑中就必须有一幅大图景。如图6-1所示，微积分有三大核心问题：

- 1.正向问题：已知一条曲线，求它各处的斜率。
- 2.反向问题：已知一条曲线各处的斜率，求这条曲线。
- 3.面积问题：已知一条曲线，求曲线下方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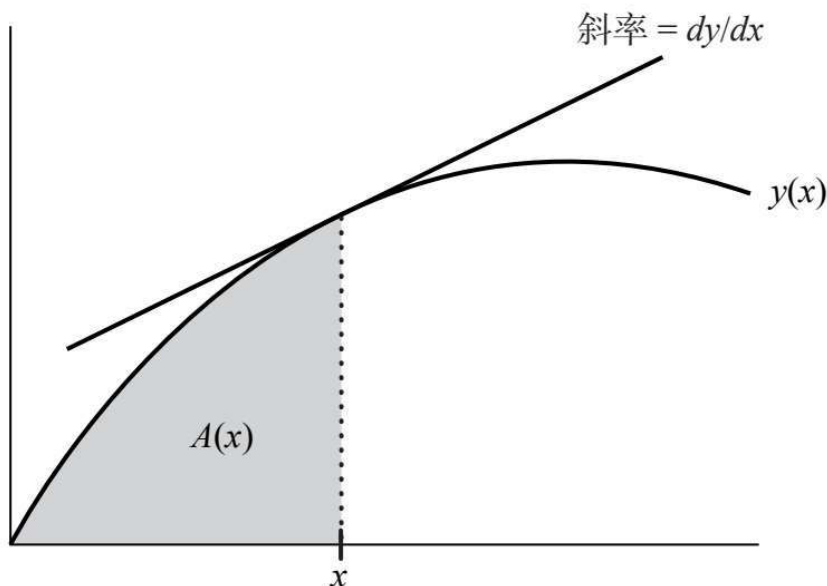


图6-1

图6-1展示了泛型函数 $y(x)$ 的图像，我没有说 x 和 y 代表什么，是因为这无关紧要。图中平面上的那条曲线能代表任意的一元函数，因此它可应用于涉及这类函数的任何数学或科学分支（基本上是所有地方）。至于它的斜率和面积的重要性，后文会做出解释。现在，我们把它们当作只有几何学家才会觉得伤脑筋的斜率和面积即可。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这条曲线，一种是老方式，一种是新方式。在

17世纪早期微积分出现之前，这类曲线都被视为几何对象。它们本身就令人着迷，所以数学家试图量化它们的几何性质。已知一条曲线，他们想要算出曲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斜率、曲线的弧长和曲线下方的面积，等等。到了21世纪，我们对产生曲线的函数更感兴趣，它能为通过曲线展示出来的某个自然现象或工艺流程建模。尽管曲线是数据，但支撑它的却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今天我们会把曲线看作沙滩上的脚印或者其形成过程的线索，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函数建模的过程，而不是它留下的踪迹。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既是曲线之谜和运动之谜、变化之谜的碰撞，也是古代几何学与现代科学的碰撞。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由于对 xy 平面太熟悉了，所以我选择用更古老的视角去看待曲线问题。 xy 平面为我们理解微积分的三大核心问题提供了最清晰的方法，当我们用几何术语提出这3个问题，它们马上就会变得直观起来。（在运动和变化方面，同样的理念也可以换种方式来表述，即用速度和距离等动态概念取代曲线和斜率。不过，要等到我们更好地掌握了几何学之后，才能这样做。）

这些问题应该从函数的角度去阐释。换句话说，当我谈到曲线的斜率时，我指的不是一个特定点的斜率，而是任意一点 x 的斜率。不同点的斜率不同，我们的目标就是了解斜率作为 x 的函数是如何变化的。同样地，曲线下方的面积也取决于 x 。在图6-1中我用灰色阴影来表示它，并将其标记为 $A(x)$ 。这个面积也应该被看作 x 的函数，当 x 增加时，垂直的虚线向右滑动，面积随之扩大。

以上就是微积分的三大核心问题。那么，如何算出曲线的不断变化的斜率呢？如何根据斜率重建曲线呢？如何算出曲线下不断变化的面积呢？

在几何学背景下，这些问题听起来可能相当枯燥无味。然而，一旦我们用21世纪的视角去看待运动问题和变化问题，在现实世界中重新诠释它们，它们的影响就会变得非常广泛和深远。斜率衡量的是变化率，而面积衡量的是变化的累积量。如前所述，斜率和面积会出现在物理学、工程学、金融学、医学等长期关注变化的所有领域。理解这些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可以开启现代定量思维（至少是关于一元函数）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应当指出微积分的相关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多元函数和微分方程等。等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再对这些内容进行讨论。

本章主要介绍一元函数及其导数（变化率），从以恒定速率变化的函数讲起，再转换到以不断变化的速率变化的复杂函数。理解不断变化的变化，才是微积分真正的闪光之处。

在习惯了变化率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处理变化的累积量问题，这个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将放在下一章探讨。到那时我们会发现，尽管正向问题和反

向问题看起来不一样，但它们是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被称为微积分基本定理。它揭示了变化率和变化的累积量之间的关系比所有人认为的更密切，这一发现使微积分的两个部分成为有机的统一体。

不过，我们要先从变化率说起。

线性函数及其恒定的变化率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情形都是用线性关系——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成正比——来描述的，比如：

1. 去年夏天，我的大女儿莉亚在商场的一间服装店找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她的薪水是10美元/小时，工作2小时后她可以赚到20美元。一般而言，工作 t 小时后她可以赚到 y 美元，即 $y = 10t$ 。

2. 一辆汽车以60英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那么，1小时后它行驶了60英里，2小时后它行驶了120英里， t 小时后它行驶了 $60t$ 英里。这里的关系式是 $y = 60t$ ，其中 y 是汽车在 t 小时后行驶的英里数。

3. 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无障碍轮椅坡道每12英寸的水平距离对应的垂直高度不得超过1英寸。对一个达到最大允许坡度的坡道来说，垂直高度与水平距离之间的关系式是 $y = x/12$ ，其中 y 是垂直高度， x 是水平距离（图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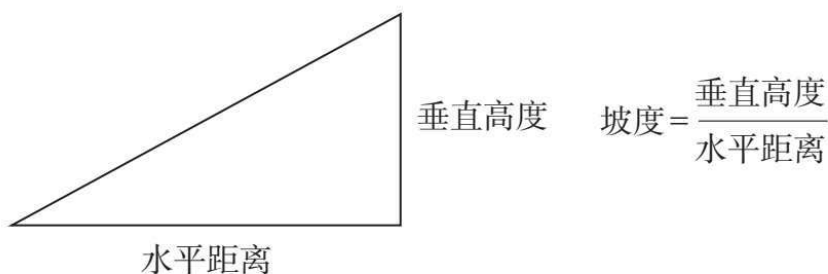


图6-2

在上述的每一种线性关系中，因变量相对于自变量的变化率都是恒定的。我女儿的报酬率是恒定的10美元/小时；汽车的速度是恒定的60英里/小时；无障碍轮椅坡道的坡度被定义为其垂直高度与水平距离之比，等于恒定的1/12。我喜欢吃的肉桂葡萄干面包也是这样，它提供热量的速率是恒定的200卡路里/片。

在微积分的专业术语中，变化率指两个变化量的商，也就是 y 的变化量除以 x 的变化量，写作 $\Delta y / \Delta x$ 。如果我再吃掉两片面包，就又摄入了400卡路里的热量，对应的变化率是：

$$\frac{\Delta y}{\Delta x} = \frac{400 \text{ 卡路里}}{2 \text{ 片}}$$

它可以化简为200卡路里/片。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这个变化率是恒定的。也就是说，不管我吃掉多少片面包，变化率都一样（图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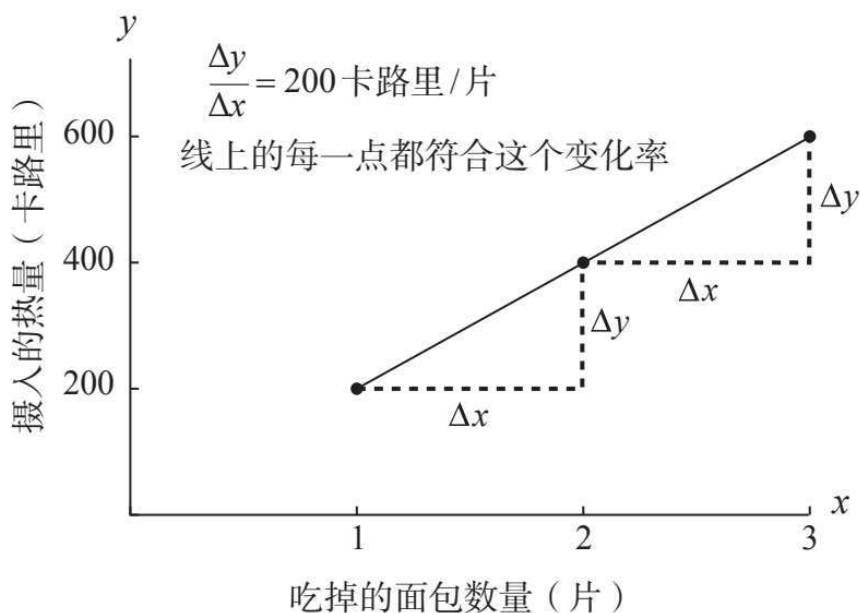


图6-3

当变化率恒定时，我们很容易把它们简单地看成是一个数字，比如200卡路里/片、10美元/小时或者1/12的坡度。尽管目前这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之后却会让我们陷入麻烦。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变化率并不是恒定的。假设我们行走一段高低起伏的路上，有些路段陡峭，而有些路段平坦。对这段路来说，坡度是位置的函数，但把坡度仅看作一个数字就大错特错

了。同样地，当汽车加速或者行星绕太阳旋转时，它们的速度也在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把速度看作时间的函数显得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养成一种习惯：不再把变化率看作数字，而将其视为函数。

这种概念混淆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对我们一直在思考的线性关系来说，变化率函数是恒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线性关系中把变化率当作数字是没有好处的，它们不会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改变。我的女儿不管工作多长时间，她的报酬率都是10美元/小时，无障碍轮椅坡道上任意一处的坡度也都是1/12。但是，千万别被这些变化率蒙蔽了，它们仍然是函数，只不过碰巧是常函数。常函数的图像是一条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如图6-4所示，肉桂葡萄干面包的有效负载是恒定的，为200卡路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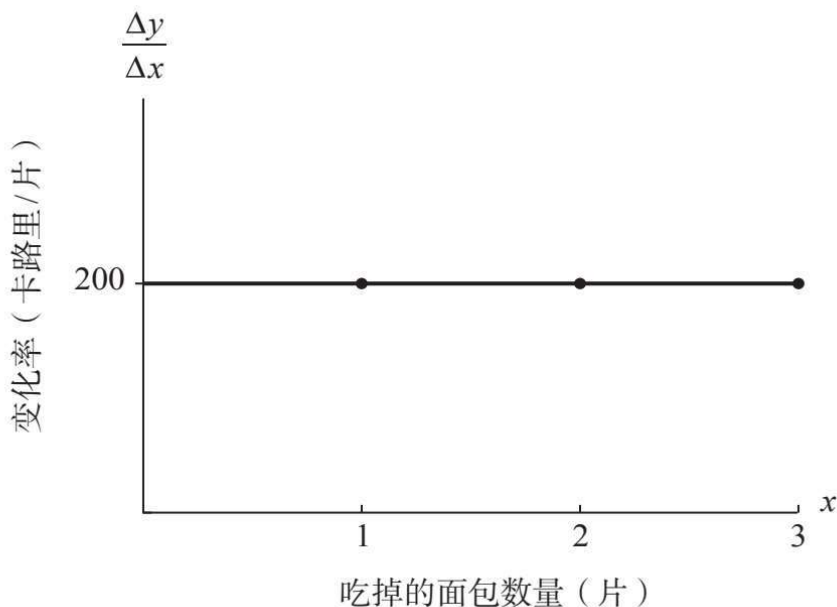


图6-4

在下一节讨论非线性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在xy平面上生成的图像是一条曲线而非直线。不管怎样，直线或曲线总能显示出很多关于变量之间关系的信息，它们就像照片或签名一样，是揭示图像形成原因的重要线索。

请注意函数与函数图像之间的区别。函数是一种无实体的规则，代入 x ，

得到 y ，而且每个 x 分别对应一个 y 。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是无形的。当你看一个函数的时候，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是一种抽象的规则。比如，这种规则可能是“给我输入一个数字，我将输出一个10倍于它的数字”。相比之下，函数图像是一种可见的、有形的事物，是一个你能看见的形状。具体来说，我刚才描述的函数图像是由方程 $y=10x$ 定义的一条直线，它经过原点且斜率为10。但是，这个函数本身并不是直线，而是产生直线的规则。为了展示这个函数，你需要代入一个 x ，让它得出一个 y ，然后对所有 x 重复这一操作并将结果绘制成图像。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函数本身依然是不可见的，你看到的只是它的图像。

非线性函数及其不断变化的变化率

如果一个函数是非线性的，它的变化率 $\Delta y/\Delta x$ 就不是常数。用几何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函数图像是一条各点斜率均不相同的曲线。我们以图6-5中的抛物线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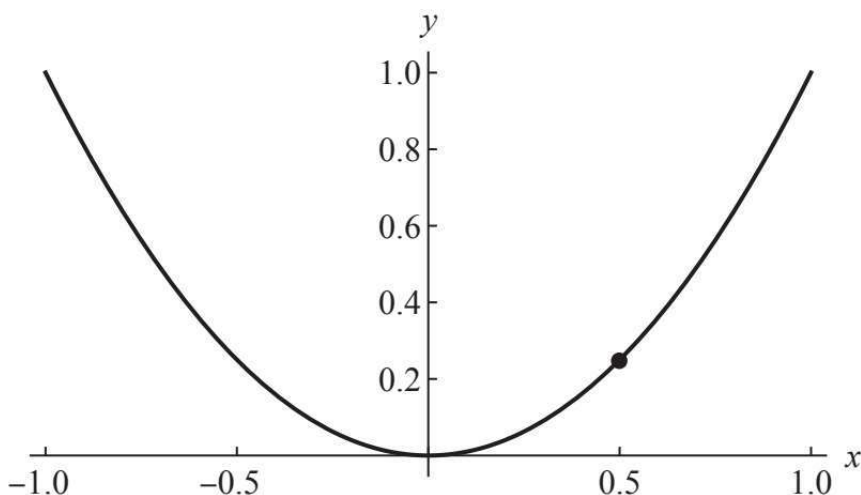


图6-5

图中是曲线 $y=x^2$ ，它对应于计算器上最简单的非线性按键——平方函数 x^2 。这个例子将告诉我们导数作为切线斜率的定义的一些实际应用，也将阐明这个定义中为什么要用到极限。

检视这条抛物线，我们看到它的有些部分陡峭，而有些部分相对平坦。其中最平坦的部分出现在抛物线底部，即 $x=0$ 的那一点。无须做计算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点的导数必定是0。它也只能是0，因为底部的切线显然是 x 轴。如果把这条切线看作一个斜坡，它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升，因此它的斜率为0。

但在抛物线的其他点上，切线斜率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事实上根本不明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个爱因斯坦式的思想实验。假设我们可以像扩洗照片那样放大抛物线上的任意一点 (x, y) ，并让这个点始终处于视野的中心，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像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曲线中的一段，并且逐渐增加放大率一样。随着镜头越来越靠近，这段抛物线看起来会

越来越直。在放大无穷倍的极限情况下（相当于放大了我们感兴趣的那一点周围的一段无穷小的曲线），被放大的那一段曲线应该接近于一条直线。如果是这样，这条极限直线就会被定义为曲线上那一点的切线，它的斜率也会被定义为那一点的导数。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利用的是无穷原则，即通过把一条复杂的曲线切分成无穷小的线段来简化它。在微积分领域，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曲线形状很难对付，而直线形状即使无穷小且有无穷多个，处理起来也会容易得多。利用这种方法计算导数是微积分的一种典型操作，也是无穷原则最基本的应用之一。

为了进行思想实验，我们需要在曲线上选择一个点并放大它。尽管任意一点都可以，但为了数值上的便利，我们选择的是抛物线上 $x=1/2$ 对应的那个点。在图6-5中，我用一个小圆点将它标示出来。在 xy 平面上，这个点位于 $(x, y)=(1/2, 1/4)$ ，或者可以用十进制表示为 $(x, y)=(0.5, 0.25)$ 。在该点上 y 等于 $1/4$ 的原因在于，为了成为这条抛物线上的一个点，它必须像抛物线上的所有点那样遵从 $y=x^2$ 。毕竟，这是判定一个点是否在这条抛物线上的标准。因此，当 $x=1/2$ 时，这个点的 y 值必须为：

$$y = x^2 = \left(\frac{1}{2}\right)^2 = \frac{1}{4}$$

现在，我们准备放大这个点。先把点 $(x, y)=(0.5, 0.25)$ 放置于显微镜的视野中心，再借助计算机图形学放大该点附近的一小段曲线，第一次放大的结果如图6-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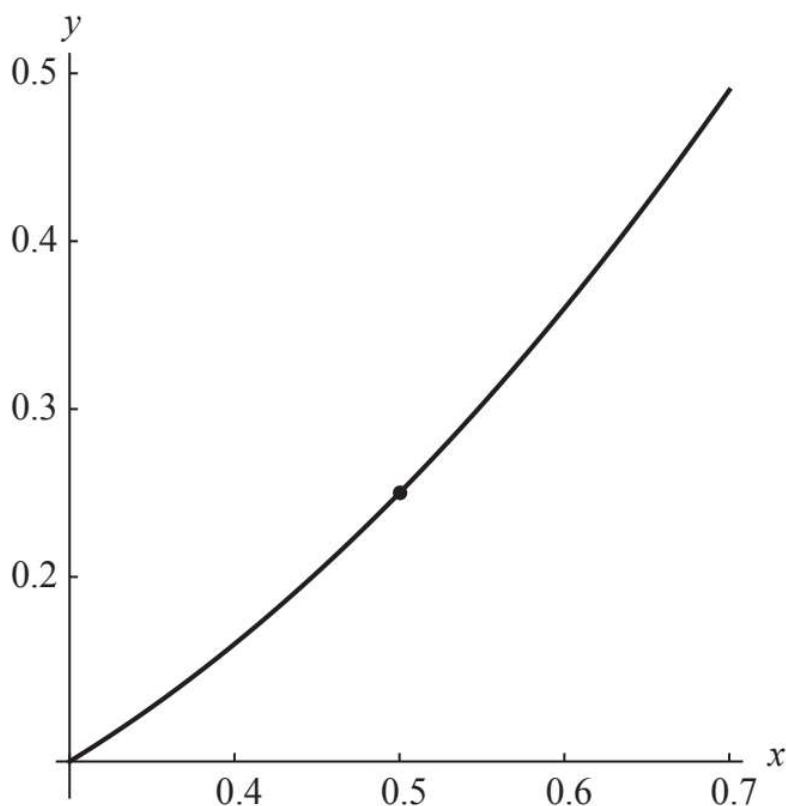


图6-6

抛物线的整体形状在这个放大的视图中消失了，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段略微弯曲的弧。这一小段抛物线位于 $x=0.3$ 和 $x=0.7$ 之间，它的弯曲程度看起来要比整条抛物线小很多。

我们进一步放大 $x=0.49$ 和 $x=0.51$ 之间的那段抛物线，如图6-7所示。尽管这幅新的放大图像看起来比上一幅更直，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直线，而仍为抛物线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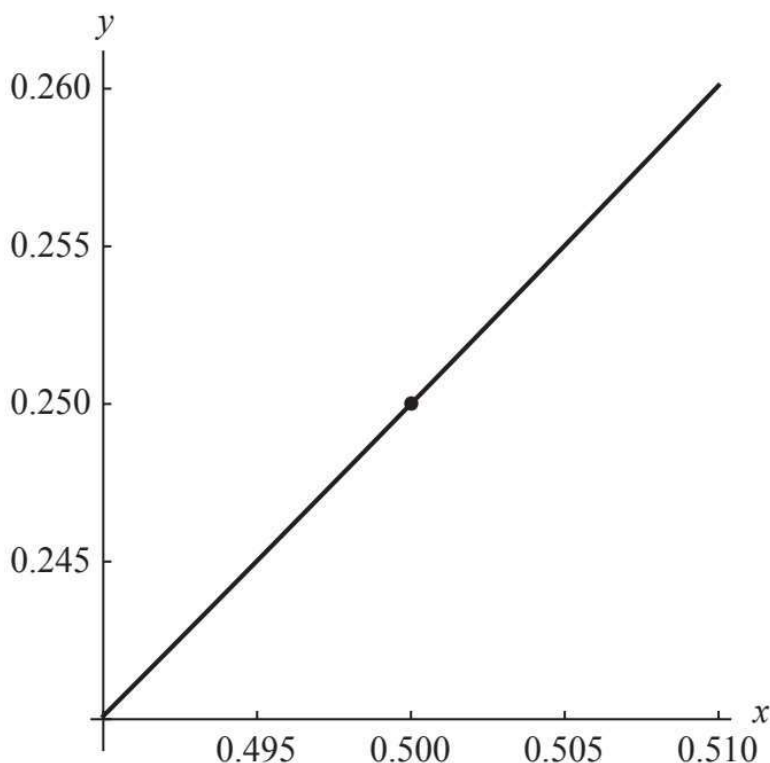


图6-7

其中的趋势显而易见。随着我们继续放大图像，视野中的那段抛物线看起来越来越直。对这个几乎变成直线的部分来说，我们计算它的垂直高度与水平距离之比 $\Delta y/\Delta x$ ，实际上就是在求解当 Δx 趋于0时这段抛物线斜率（ $\Delta y/\Delta x$ ）的极限值。计算机图形学有力地表明，这个部分的斜率越来越接近1，相当于一一条45度角的直线。

借助一点儿代数知识，我们可以证明这里的极限斜率就是1（在第8章，我们将会看到具体的计算过程）。此外，不仅是在 $x=1/2$ 处，在 x 取任意值时执行相同的计算，都可以得出抛物线上任意一点 (x, y) 的极限斜率或切线斜率等于 $2x$ 。用微积分术语来说， x^2 的导数是 $2x$ 。

尽管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很想证明一下这个求导法则，但让我们先接受它，看看它是什么意思。首先，它说在 $x=1/2$ 处，斜率应该是 $2x=2 \times (1/2)=1$ ，这正是我们在图像中看到的。其次，它预测在抛物线底部（ $x=0$ 处）斜率应该是 $2 \times 0=0$ ，我们已经看到这也是正确的。最

后， $2x$ 这个公式意味着，当我们向右延伸抛物线时斜率应该会增加。因为当 x 变大时，斜率（ $2x$ ）也应该变大，抛物线应该变得更陡峭，而且事实的确如此。

这个抛物线实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导数的一些注意事项。只有当被放大的曲线逼近极限直线时，我们才能定义导数。而对某些病态曲线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如果有一条曲线呈V形，即在某个点上有一个尖角，那么当我们放大这个点时，它看起来仍然像一个角。无论放大多少倍，这个角都不会消失，曲线看上去也永远不会像直线。因此，V形曲线在拐角处没有明确的切线或斜率，在这一点上也就没有导数。

然而，如果一条曲线在任何一点处被充分放大之后，它看起来越来越直，我们就说这条曲线是光滑的。在本书中，我一直像先驱那样，假设微积分的曲线和过程都是光滑的。但在现代微积分领域，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非光滑曲线。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物理系统的突跳或其他不连续性行为，非光滑曲线的不便性和反常性时常会凸显出来。比如，当我们打开电路中的一个开关时，电流就会从完全不流动变为突然大幅度地流动。随着电流的接通，电流-时间图像会显示出一个几乎垂直的突然上升趋势，近似于不连续跳跃。有时我们将这种突然转变当作真正的不连续跳跃会更省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时间函数的电流在开关被打开的瞬间是没有导数的。

在高中或大学期间，微积分的第一堂课大多讲的都是求导法则，比如， x^2 的导数是 $2x$ ， $\sin x$ 的导数是 $\cos x$ ， $\ln x$ 的导数是 $1/x$ ，等等。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目的，理解导数的概念并了解如何将它的抽象定义应用于实践，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事。因此，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作为昼长变化率的导数

在第4章，我们分析了昼长随季节变化的数据。当时我们的目的是阐明正弦波、曲线拟合和数据压缩的概念，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些数据解释多变的变化率，并将导数引入另一个情境。

之前的数据涉及纽约市2018年每一天的白昼分钟数（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长）。在这个背景下，相关的导数就是昼长从这一天到下一天的加长或缩短速率。比如，1月1日，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是9小时19分23秒；1月2日，昼长加长了一点儿，为9小时20分5秒。1月2日比1月1日多出来的42秒（相当于0.7分钟）就是衡量一年中这一天的昼长变化率的指标，即昼长正在以大约0.7分钟/天的速率加长。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看看两周后（1月15日）的昼长变化率。从这一天到下一天，昼长增加了90秒，相当于以1.5分钟/天的速率在加长，是两周前测量的昼长变化率（0.7分钟/天）的两倍多。因此，昼长不仅在1月份不断加长，而且加长速率越来越快。

这种令人愉快的趋势将持续几个星期。随着春天的到来，昼长越来越长，加长速率也越来越快。在3月20日春分这一天，加长速率达到峰值，每天的加长量是前所未有的2.72分钟。你可以在第4章的图4-7中找到这一天，它是2018年的第79天，离左侧大约有1/4的距离，从中可以看出昼长波形图在这里的上升幅度最大。不难理解，图像最陡峭的地方就是加长速率最快的地方，这意味着此处的导数最大，而且昼长在尽可能快地加长。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春季的第一天。

为了进行足够鲜明的对比，想想一年中昼长最短的那些日子，它们可谓是祸不单行。在冬天那些阴沉沉的日子里，昼长不仅短得令人沮丧，每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越发地死气沉沉。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昼长最短的日子出现在昼长波形图的底部，那里的波形是平坦的（否则它就不是底部，而会上升或下降），即导数为0，这意味着它的变化率会慢慢地变成0（至少是暂时的）。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们感觉春天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尽管我强调了一年之中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情感意义的两个时间，即春分和冬至前后，但把一年的昼长情况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会更具启发性。为了跟踪昼长变化率随季节的变化趋势，我从1月1日开始，每两个星期计算一次昼长变化率，直至12月31日，结果如图6-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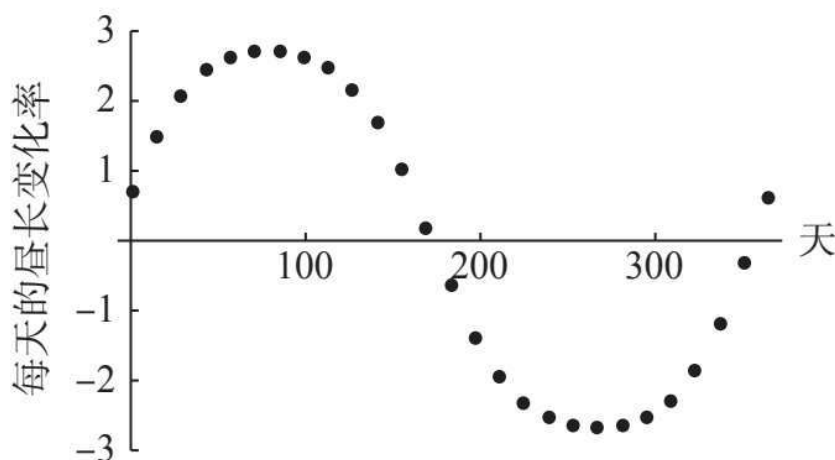


图6-8

纵轴表示每天的昼长变化率，即从这一天到下一天增加的白昼分钟数。横轴表示哪一天，用从1（1月1日）到365（12月31日）的数字来表示。

昼长变化率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它一开始在冬末和初春是正值，那时昼长正在加长，并在第79天（3月20日，春分）前后达到峰值。我们已经知道，那是昼长变化率最快的时候，大约为每天加长2.72分钟。但此后昼长变化率开始下降，并在第172天（6月21日，夏至）之后变为负值。这是因为昼长从那时开始缩短，也就是下一天的昼长会比这一天短。昼长变化率在9月22日前后触底，此时昼长缩短得最快，之后一直到第355天（12月21日，冬至）昼长变化率都是负值（但缩短速率越来越慢），此后昼长会在不知不觉中再次加长。

把这个波形图与第4章的波形图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当把它们绘制在一个图表中并重新调整至振幅具有可比性后，就会得到图6-9。（为了强调波的重复性，我在这里展示了两年的数据。而且，为了强化它们之间的对比，我把所有点都连接起来，并移除了纵轴上的数字，以便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波的形状和时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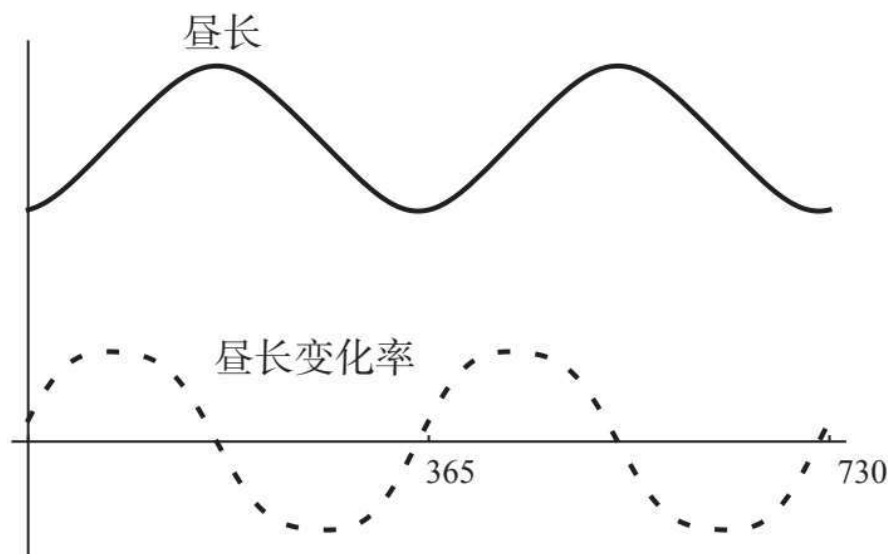


图6-9

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这两个波是不同步的，它们不会同时达到峰值。表示昼长的波会在年中前后达到峰值，而表示昼长变化率的波会比前者早3个月达到峰值。这相当于提前了 $1/4$ 个周期，因为每个波完成一次起伏运动需要花12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是，这两个波彼此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尽管它们展现出明显的亲缘关系，但虚线波的对称性不如实线波，它的波峰和波谷也更平坦。

我之所以做上述分析，是因为这些现实世界中的波能让我们瞥见正弦波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性质：如果一个变量遵循完美的正弦波模式，那么它的变化率也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并且在时间上提前了 $1/4$ 个周期。这种自我再生性质是正弦波特有的，而其他类型的波并不具备，它甚至可以当作正弦波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数据暗示了完美正弦波固有的神奇再生现象（等介绍傅里叶分析时我们会详细地介绍这一点，傅里叶分析是微积分的一个强大分支，今天它已经催生出微积分的一些十分振奋人心的应用。）

关于那 $1/4$ 个周期的位移源自何处，接下来我会试着给你一些启发。同样的概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弦波的变化率还是正弦波。关键在于，正弦波

与匀速圆周运动有关。你应该还记得，当一个点以恒定的速度做圆周运动时，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垂直运动是一个正弦波（就此而言，它的水平运动也是一个正弦波）。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看图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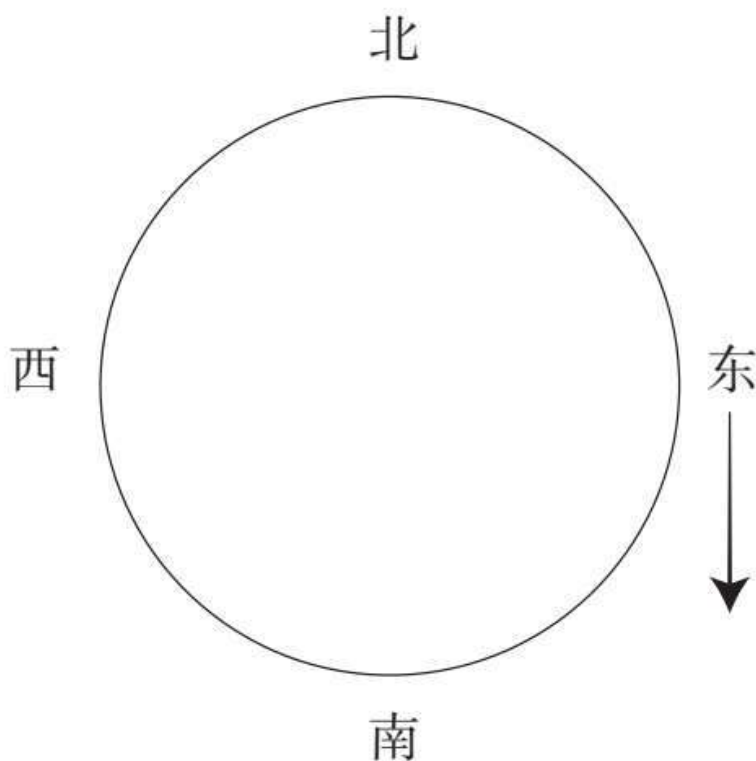


图6-10

上图展示了一个点正在绕圆周做顺时针运动，这个点不代表任何物理学或天文学对象。它既不是绕着太阳转的地球，与季节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一个做圆周运动的抽象点。它向东的位移会像正弦波一样增加和减少，当这个点向东的位移达到最大值时，它就类似于正弦波的峰值或者一年中昼长最长的一天。于是，问题出现了：当这个点在最东边，并且正弦波处于其向东位移的峰值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图中箭头所示，最东边那一点是朝南的。南在罗盘上与东成90度角，而90度正好是一个周期的 $\frac{1}{4}$ 。啊哈！这就是那 $\frac{1}{4}$ 个周期的位移的来源。由于圆的几何结构，任何正弦波及其导数（变化率）的波之间总有 $\frac{1}{4}$ 个周期的位移。在这个类比中，点的移动方向就像它的变化率，决定了这个点下一步的走向和位置。

而且，在这个点做圆周运动的同时，箭头本身的罗航向也在以环形方式匀速旋转，因此它随时间发生的变化遵循正弦波模式。既然罗航向类似于变化率，那么变化率也遵循正弦波模式。这就是我们试图理解的自我再生性质，即正弦波会产生有90度位移的正弦波。（专业人士将会意识到我正在尝试抛开公式，去解释正弦函数的导数为什么是余弦函数，而余弦函数本身就是位移了1/4个周期的正弦函数。）

类似的90度相位滞后现象也出现在其他振动系统中。对一个来回摆动的钟摆而言，当通过底部时它的速度达到最大值，而它的摆角却要在1/4个周期之后，也就是在钟摆摆动到最右边时才会达到最大值。摆角-时间图像和速度-时间图像表明，它们是两个相似的正弦波，振动相位差为90度。

另一个例子是生物学领域的捕食者-被捕食者相互作用模型的简化版。假设有一群鲨鱼在捕食一群鱼，当这群鱼处于种群数量的最大值时，鲨鱼数量的增长速率最快，因为有很多鱼可以吃。鲨鱼数量会继续增加，并在1/4个周期后达到最大值，而此时鱼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因为在1/4个周期之前，它们遭到了大肆捕食。对这个模型的分析表明，两个种群的振动相位差为90度。在自然界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类似的捕食者-被捕食者振动现象，比如，19世纪皮货贸易公司记录的加拿大野兔和山猫种群的每年波动情况（就像生物学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振动现象的真正原因无疑更加复杂）。

再次回到昼长数据，我们会看到它们并不是完美的正弦波。事实上，它们是一组离散的点，每天只有一个，两点之间也不存在其他数据。因此，它们不能提供微积分坚决要求的那种连续的点。在最后一个关于导数的例子中，我们要研究一种能以尽可能高的分辨率（精确至毫秒）来收集数据的情况。

作为瞬时速度的导数

2008年8月16日晚，北京，晴朗无风。22点30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8个人站在了奥运会100米短跑决赛的起跑线上。其中一位是21岁的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1]，对这个比赛项目而言，他算得上一位新人。作为知名的200米短跑选手，他几年来一直恳求教练让他尝试更短距离的比赛，在过去的一年中，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博尔特看起来和其他短跑运动员不太一样。他身材瘦长，有6英尺5英寸（1.96米）高，步幅很大。小时候，他一直在练习足球和板球，直到他的板球教练注意到他的速度，并建议他去尝试田径项目。十几岁时，尽管他的跑步成绩不断提升，但他从未把这项运动或者自己太当回事儿。他滑稽又淘气，还喜欢开玩笑。

决赛的那个晚上，^[2]在8名运动员被逐一介绍了一番，并在镜头面前做过鬼脸之后，整个体育场安静下来。选手们把脚放在起跑器上，做好预备姿势。一位裁判员喊道“各就各位，预备”，接着鸣响了发令枪。

尽管博尔特从起跑器上冲了出去，但他的爆发力不如其他选手。较慢的反应时间导致起跑后他在8个人中排名第7。他不断加速，在30米处跑到了中间位置。然后，他像高速列车一样继续加速，很快就把其他选手远远地甩在身后。

在80米处，博尔特朝右边瞥了一眼，想看看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哪里。当意识到自己明显领先时，他减慢了速度，双臂垂放于身体两侧，冲过终点线时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有些评论员认为他是在炫耀，有些评论员则认为他是在庆祝。无论如何，博尔特显然觉得他没必要在即将到达终点时拼命奔跑，这促使人们纷纷猜测他到底能跑多快。事实上，尽管他提前庆祝了胜利（鞋带也开了），但他还是以9.69秒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有位官员批评他缺乏体育精神，但博尔特并没有冒犯他人的意思。正如他后来告诉记者的那样：“这就是我。^[3]我想玩得开心，一切放轻松。”

他跑得有多快呢？由9.69秒跑100米可以算出他的速度为： $100/9.69 = 10.32$ 米/秒。换算成我们更熟悉的单位，约为37千米/小时。但这是博尔特整场比赛的平均速度，他在比赛刚开始和快结束时的速度都比平均速度慢，而比赛过程中的速度比平均速度快。

我们可以从赛道上每隔10米记录下的分段时间中获得更详细的信息。他用1.83秒跑完了前10米，平均速度为5.46米/秒。他的最短分段时间出现在

50米到60米、60米到70米和70米到80米，其中每个10米的用时都是0.82秒，平均速度为12.2米/秒。在最后10米，他放松下来，平均速度降至11.1米/秒。

人类已经进化出发现规律的能力，与其像我们刚才那样细心地研究数字，不如把它们形象化，这样往往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图6-11展示了博尔特跑完10米、20米、30米等的用时情况，一直到他在9.69秒时冲过百米终点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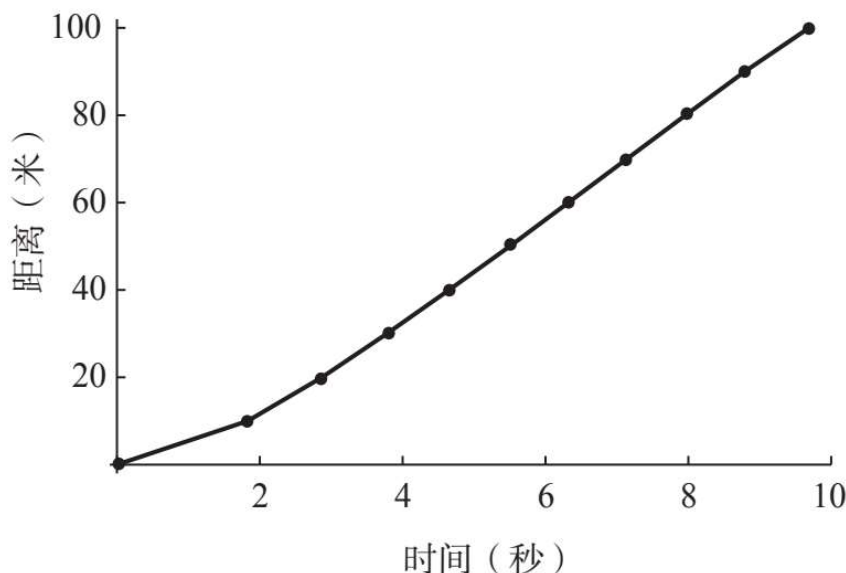


图6-11

为便于观察，我把图上的点都用直线连接起来，但要记住只有这些点才是真正的数据。点和它们之间的线段构成了一条多边形曲线。最左边线段的斜率最小，对应于博尔特起跑后的较慢速度。越往右的线段越向上弯折，这意味着他在加速。之后的几条线段共同形成了一条近乎笔直线，表明他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飞快且稳定的速度。

我们自然很好奇，他到底在何时和何处跑得最快。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10米区间内的最快平均速度出现在50米到80米，但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他的平均速度，而是他的最快速度。假设博尔特戴着一个速度计，那么他在哪一刻跑得最快？他的最快速度究竟是多少？

在这里，我们寻找的是一种测量他的瞬时速度的方法。但是，这个概念看起来几乎是自相矛盾的。在任何时刻，博尔特都恰好身处某个地方，就像在快照里一样纹丝不动。既然如此，讨论他在一瞬间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速度只能出现在一个时间间隔内，而非一个瞬间。

瞬时速度之谜与数学及哲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50年前后，那时芝诺提出了几个令人敬畏的悖论。回想一下，在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悖论中，芝诺声称跑得快的人永远追不上跑得慢的人，而这和博尔特那一晚在北京的出色表现完全不同。在飞矢不动悖论中，芝诺认为飞矢永远不会移动。尽管数学家仍然不确定他想用这些悖论来阐述什么观点，但我的猜测是，瞬间速度这个概念内在的微妙之处困扰着芝诺、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他们的不安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希腊数学很少谈及运动和变化。跟无穷一样，这些令人讨厌的话题已被从彬彬有礼的交谈中“驱逐”出去了。

在芝诺提出那些知名悖论的2 000年后，微分学的创立者解开了瞬时速度之谜。他们直观的解决方案是，将瞬时速度定义为一个极限，具体来说，就是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内平均速度的极限。

这类似于我们放大抛物线时所做的事情：先让一段越来越短的光滑曲线逼近直线，然后探究在放大无穷倍的极限情况下会发生什么。通过研究直线斜率的极限值，我们就可以定义光滑抛物线上某一点的导数。

在这里，通过类比的方法，我们对某种随时间发生平稳变化的对象进行近似推理，即博尔特在赛道上跑过的距离。我们的想法是，用一条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以恒定的平均速度变化的多边形曲线，去取代他的距离-时间图像。随着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如果每个时间间隔的平均速度趋于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值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正如某一点的斜率那样，瞬间速度也是一个导数。

要想成功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假设博尔特在赛道上跑过的距离是平稳变化的，否则我们研究的极限和导数就都不存在了。因为随着时间间隔的缩短，结果不会趋于任何合理的极限值。那么，他跑过的距离是否会随时间平稳地变化呢？我们对此并不确定。我们唯一拥有的数据是，博尔特经过赛道上的每个10米标记处的时间所构成的离散样本。想要估算他的瞬时速度，我们必须跳出这些数据，有根据地推测他在相邻两点之间的某个时间身处的位置。

这种系统化的推测方法被称为插值法，其目的是在可用数据之间绘制一条光滑曲线。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像之前那样用线段，而是用最合理的光滑曲线来连接这些点，^[4]或者至少要非常靠近这些点。对于这条曲线，我们

设定的限制条件是：它应该是绷紧的，起伏不能太大；它应该尽可能地靠近所有点；它应该展示出博尔特的初始速度为0，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做预备姿势的时候是静止不动的。有许多不同的曲线都符合这些标准；统计学家想出了很多用光滑曲线去拟合数据的方法，它们也都给出了类似的结果。而且，这些方法都包含些许推测的成分，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该选择哪一种。

图6-12展示的就是其中一条能满足上述所有要求的光滑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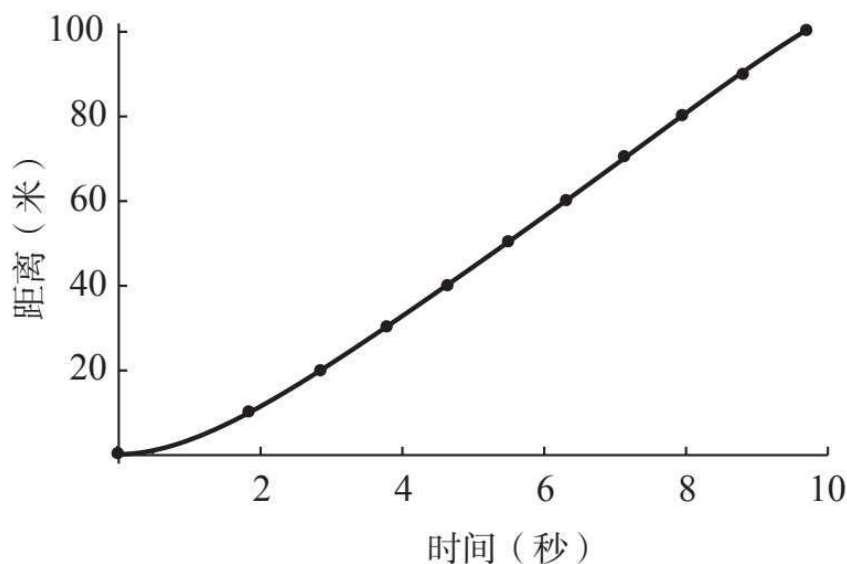


图6-12

由于曲线被设计成光滑的，我们可以计算出它上面的每一点的导数，最终生成的图像给出了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的那场创造世界纪录的比赛中每个瞬时速度的估计值，如图6-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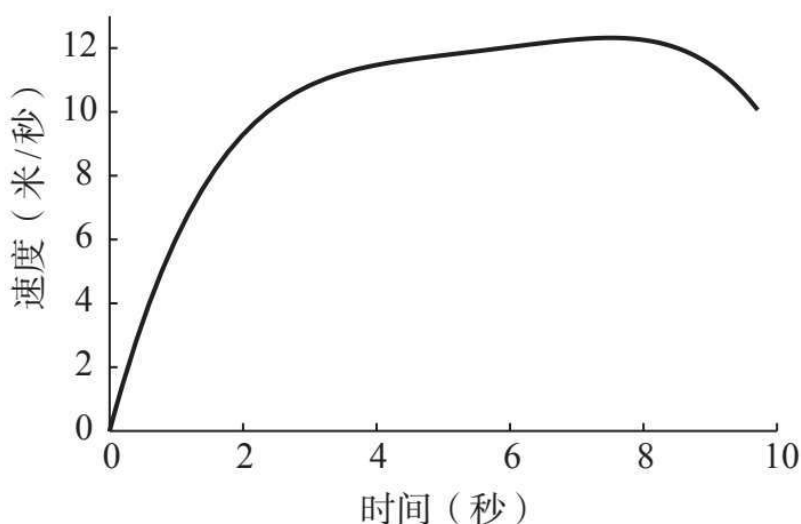


图6-13

从图6-13中可以看到，博尔特在比赛进行到大约3/4的时候达到了12.3米/秒的最高速度。在此之前，他每时每刻都在加速。而在此之后，他开始减速，以至于当他冲过终点线时速度降到了10.1米/秒。这幅图证实了所有人看到的情况：博尔特在接近终点时速度骤减，特别是在最后的20米，他放松下来并提前庆祝自己的胜利。

在2009年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博尔特结束了人们对于他能跑多快的猜测。这一次他没有提前拍胸脯庆祝胜利，而是努力跑到终点，并以更加惊人的9.58秒的成绩打破了他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9.69秒的世界纪录。由于人们对这次比赛怀有巨大的期待，所以生物力学研究人员启用了激光枪^[5]（类似于警察用来抓超速驾驶者的雷达枪），这种高科技仪器使得研究人员能以100次/秒的频率测量短跑运动员的位置。在计算了博尔特的瞬时速度后，他们的发现如图6-1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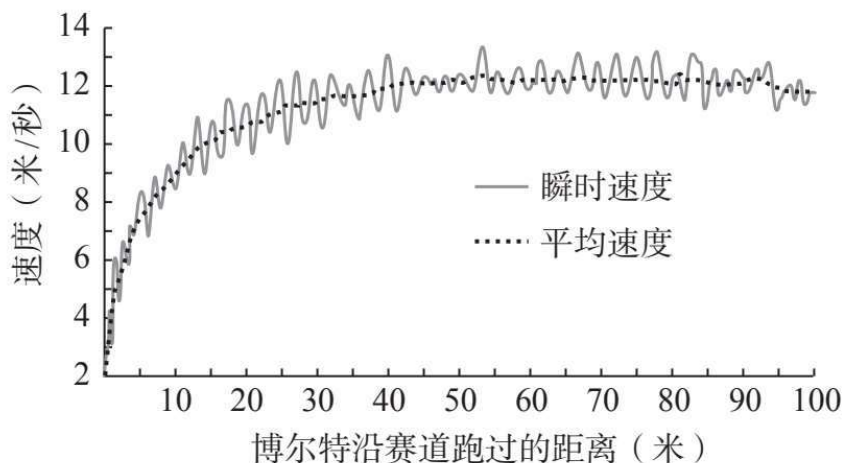


图6-14

总体趋势上的那些小波动，代表了他在大步奔跑期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速度起伏。毕竟，跑步涉及一系列的腾空和落地动作。每当博尔特的一只脚在落地的瞬间“急刹车”，随即再次驱动身体向前和腾空，他的速度就会发生一点儿变化。

虽然这些小波动很有趣，但对数据分析师来说，它们既讨厌又烦人。我们真正想看到的是趋势，而不是波动，因此，早期用光滑曲线拟合数据的方法就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更佳。在收集了所有的高分辨率数据并注意到这些波动之后，研究人员无论如何都要把它们清理干净。他们过滤掉这些波动，是为了揭示更有意义的趋势。

对我来说，这些波动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训。我把它视为隐喻或寓言，反映了用微积分为真实现象建模的本质。如果我们设法把测量的分辨率推升得过高，在时空中极其细微地观察任何现象，就会看到光滑度的崩解。在博尔特的速度数据中，小波动取代了平稳的趋势，让图像看起来就像管道清洁剂一样有许多分叉。如果我们可以在分子尺度上进行测量，那么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这个级别上，运动变成了一点儿也不平稳的抖动，所以微积分无法再（至少不能直接）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然而，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总体趋势，消除这些小波动可能就足够了。微积分给予我们的关于宇宙中运动和变化本质的巨大洞见，尽管有可能是近似的，但却证明了光滑度的力量。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教训：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在建立数学模型时，我们总要对强调什么和忽略什么做出选择。抽象的艺术在于，知道什

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细枝末节的；知道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知道什么是趋势，什么是波动。这是一门艺术，因为诸如此类的选择总是存在着风险，它们与痴心妄想或学术欺诈只有一线之隔。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曾想方设法行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

毕加索说：“艺术是让我们认识真理的谎言。”^[6]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作为自然模型的微积分。17世纪上半叶，微积分开始成为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抽象工具。17世纪下半叶，同样的艺术选择——揭示真理的谎言——为了一场革命铺平了道路。

[1] Usain Bolt: Bolt, Faster than Lightning.

[2] On that night in Beijing: Jonathan Snowden, “Remembering Usain Bolt’s 100m Gold in 2008,” Bleacherreport.com (August 19, 2016), <https://bleacherreport.com/articles/2657464-remembering-usain-bolts-100m-gold-in-2008-the-day-he-became-a-legend>, and Eriksen et al., “How Fast.” For live video of his astonishing performance, se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1bf8L9nl0> and <http://www.nbcolympics.com/video/gold-medal-rewind-usain-bolt-wins-100m-beijing>.

[3] “That’s just me”: Snowden, “Remembering Usain Bolt’s.”

[4] we want to connect the dots: My analysis is based on that in A.Oldknow, “Analysing Men’s 100m Sprint Times with TI-Nspire,” <https://rcuikiportscience.wikispaces.com/file/view/Analysing+men+100m+Nspire.pdf>. The details may differ slightly between the two studies because we used different curve-fitting procedures, but our qualitative conclusions are the same.

[5] researchers were on hand with laser guns: Graubner and Nixdorf, “Biomechanical Analysis.”

[6] “Art,” said Picasso: The quote is from “Picasso Speaks,” The Arts (May 1923), excerpted in http://www.gallerywalk.org/PM_Picasso.html from Alfred H. Barr Jr., Picasso: Fifty Years of His Art (New York: Arno Press, 1980).

第7章 隐秘的源泉

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牛顿^[1]和德国的莱布尼茨彻底改变了数学的进程。他们把关于运动和曲线的思想松散地拼凑在一起，创立了微积分。

1673年，当莱布尼茨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微积分”一词时，他的原话是“a calculus”（一个微积分），有时还会更亲切地称它为“my calculus”（我的微积分）。他取的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即一种用于执行计算的规则和算法体系。后来，在莱布尼茨的微积分体系得到高度完善之后，与之相伴的冠词升级为定冠词，这个领域也被正式称为“the calculus”（微积分）。遗憾的是，现在它的冠词和所有格全都消失了，只剩下单调苍白的“calculus”。

撇开冠词不谈，calculus这个词本身就有很多故事。它源自拉丁词根 $calx$ ，意指一块小石头，这不禁让我想起很久以前人们用鹅卵石来计数和计算的情景。相同词根的英语单词还有calucium（钙）、chalk（粉笔）和caulk（密封剂）等。你的牙医可能会用calculus指代你的牙垢，也就是当你洗牙时口腔治疗师从你的牙齿上刮掉的那些小块的固化牙菌斑。医生也会用这个词来指代胆结石、肾结石和膀胱结石。讽刺的是，牛顿和莱布尼茨这两位微积分先驱都死于给他们造成极大痛苦的结石：牛顿患有膀胱结石，而莱布尼茨患有肾结石。

[1] Isaac Newton: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e Gleick, Isaac Newton. See also Westfall, *Never at Rest*, and I.B. Cohen, “Isaac Newton,” in vol.10 of Gillispie, *Complete Dictionary*, with amendments by G.E. Smith and W. Newman in vol.23. For Newton’s mathematics, see Whiteside, *The Mathematical Papers*, vols.1 and 2;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Rickey, “Isaac Newton”; Dunham, *Journey Through Geniu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Dunham, *The Calculus Gallery*; Simmons, *Calculus Gems*;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面积、积分和基本定理

尽管微积分曾与用石头计数有关，但到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时代，它已经通过代数应用于曲线和他们所做的新奇分析。早在30年前（17世纪40年代），费马和笛卡儿就发现了利用代数找到曲线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切线的方法。而曲线的面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曲线所围区域的面积，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传统上，这个面积问题被称作曲线求积，它困扰和折磨数学家达2 000年之久。人们想出了很多解决特定问题的巧妙技巧，比如，阿基米德在圆的面积和抛物线求积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费马计算曲线 $y = x^n$ 下方面积的方法。但因为缺少一个系统，各个面积问题只能在特别的基础上解决，并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意味着数学家每次都不得从头开始。

曲面体体积问题和弧长问题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事实上，笛卡儿认为弧长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他在自己的几何著作中写道：“直线和曲线之间的比率^[1]是未知的，在我看来，它甚至是人类无法知道的。”所有这些问题——面积、弧长和体积——都需要对无穷多个无穷小的部分进行求和运算，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它们都涉及积分。没有人能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问题的万能系统。

在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各自发现并证明了一个基本定理，它能使这类问题常规化。该定理将面积与斜率联系起来，进而将积分与导数联系在一起，这着实令人惊讶。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情节转折一样，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竟然是最亲近的家人，积分和导数之间也存在着“血缘关系”。

这个基本定理的影响力惊人，几乎一夜之间，面积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曾让早期学者一筹莫展的难题，现在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正如牛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并非所有方程都可以用曲线来表示^[2]……但我能在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内判断出它是否可以求积。”当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他的同时代人觉得不可思议时，他继续说道，“这看似一个冒失的断言……但凭借着赋予我灵感的源泉，^[3]它对我而言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不会向他人证明这一点。”

牛顿的隐密源泉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尽管他和莱布尼茨都不是最早注意到这个定理的人，^[4]但他们却由此获得赞誉，因为总的来说，他们率先证明了这个定理，认识到它巨大的效用和重要性，并围绕它构建起算法体系。他们创立的方法现在已经普及开来，积分这头怪兽“被拔除了尖牙”，

变成了青少年的家庭作业。

目前，世界各地数百万的高中生和大学生都在刻苦认真地完成他们的微积分习题集，在基本定理的帮助下解决一个又一个积分问题。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对自己得到的这份礼物视而不见。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那个古老的笑话一样。鱼问它的朋友：“你难道不感激水吗？”另一条鱼反问道：“水是什么？”学习微积分的学生一直浸淫在基本定理中，所以他们视其为理所当然。

[1] “between straight and curved lines”: René Descartes, *The Geometry of René Descartes: With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E. Smith and Marcia L. Latham (Mineola, NY: Dover, 1954), 91. Within twenty years, Descartes was proved wrong ab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finding arc lengths exactly for curves; see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96–98.

[2] “There is no curved line”: I’ve updated Newton’s spelling here for easier reading. The original was “There is no curve line exprest by any æqua tion...but I can in less then half a quarter of an hower tell whether it may be squared.” Letter 193 from Newton to Collins, November 8, 1676, in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179. The omitted material involves technical caveats about the class of trinomial equations to which his claim applied. See “A Manuscript by Newton on Quadratures,” manuscript 192, in *ibid.*, 178.

[3] “the fountain I draw it from”: Letter 193 from Newton to Collins, November 8, 1676, in *ibid.*, 180. Again, I’ve updated the spelling; Newton wrote “ye fountain.”

[4] weren’t the first to notice this theorem: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98–503, shows that James Gregory and Isaac Barrow had both related the area problem to the tangent problem and so had anticipated the fundamental theorem but concludes that “neither of these men in 1670 could mold these methods into a true computational and problem-solving tool.” Five years before that, however, Newton already had. In a sidebar on page 521, Katz makes a convincing case that Newton and Leibniz (as opposed to “Fermat or Barrow or someone else”) deserve credit for the invention of calculus.

运动使基本定理更直观

通过思考运动物体（比如跑步者或者汽车）行进的距离，我们可以直观地理解微积分基本定理：它讲了些什么，它为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它为什么很重要。基本定理不只是一个求解面积的技巧，也是预测我们关心之事的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及解开宇宙中的运动和变化之谜的关键。

当牛顿动态地看待面积问题时，他发现了基本定理。他的想法是在这幅图景中引入时间和运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让面积流动起来，并不断扩大。

体现他这种想法的最简单例子是一辆以恒定速度行驶的汽车，其中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尽管这个例子可能很简单，但它仍然抓住了基本定理的本质，算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假设有一辆汽车以60英里/小时的速度沿公路行驶，我们分别绘制出它的距离-时间图像和速度-时间图像，如图7-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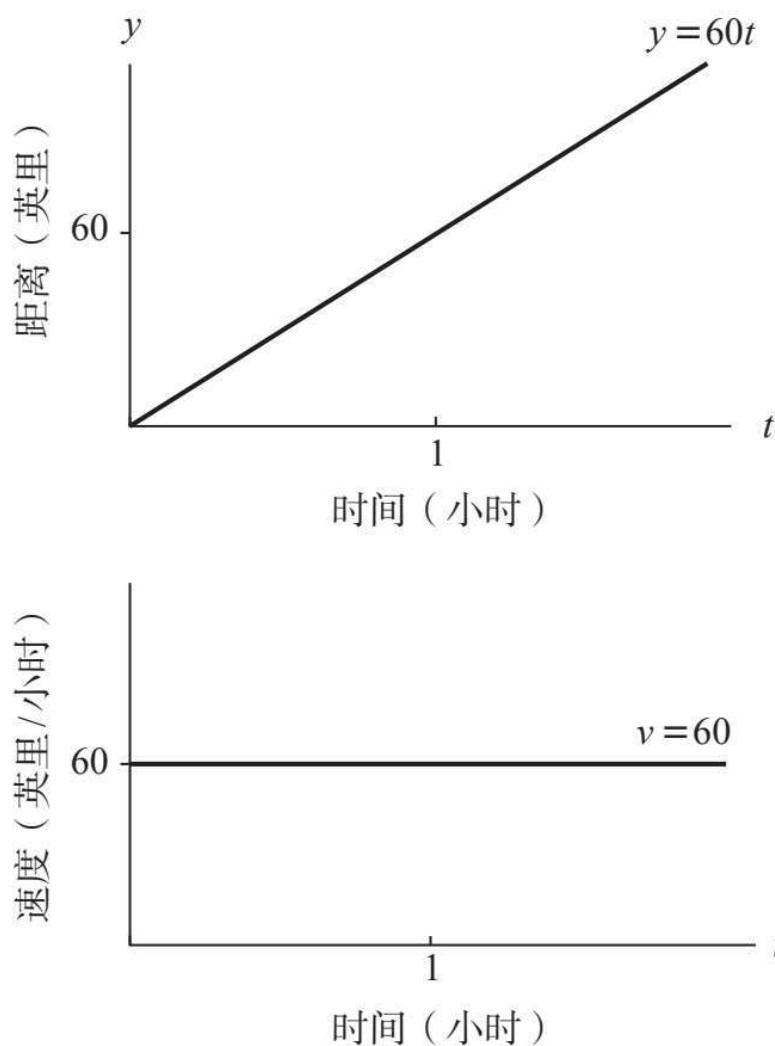


图7-1

我们先来看距离-时间图像（图7-1上图）。1小时后汽车行驶了60英里，2小时后汽车行驶了120英里，以此类推。总的来说，距离与时间的关系式为 $y = 60t$ ，其中 y 表示汽车在 t 小时后行驶的距离。我把 $y(t) = 60t$ 称为距离函数，它的图像是一条斜率为60英里/小时的直线。在我们还不知道速度的情况下，这个斜率可以告诉我们汽车的瞬时速度。在难度较大的问题中，速度可能会波动，不过在这里它是一个简单的常函数，即不管 t 是多少，都有 $v(t) = 60$ ，它的图像是一条平线（图7-1下图）。

我们已经看到速度在距离图像上是如何呈现的（作为直线的斜率），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距离在速度图像上是如何呈现的？换句话说，速度图像是否具有某种视觉或几何特征，能让我们推断出汽车在 t 小时后行驶的距离呢？当然有，汽车行驶的距离是速度曲线（平线）下方累积到时间 t 的面积。

为了说明原因，我们假设汽车行驶了一段时间，比如 $1/2$ 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汽车行驶的距离为30英里，因为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即 $60 \times 1/2 = 30$ 。重点在于，我们通过平线下方 $t=0$ 和 $t=1/2$ 小时之间的灰色矩形的面积，也能算出汽车行驶的距离（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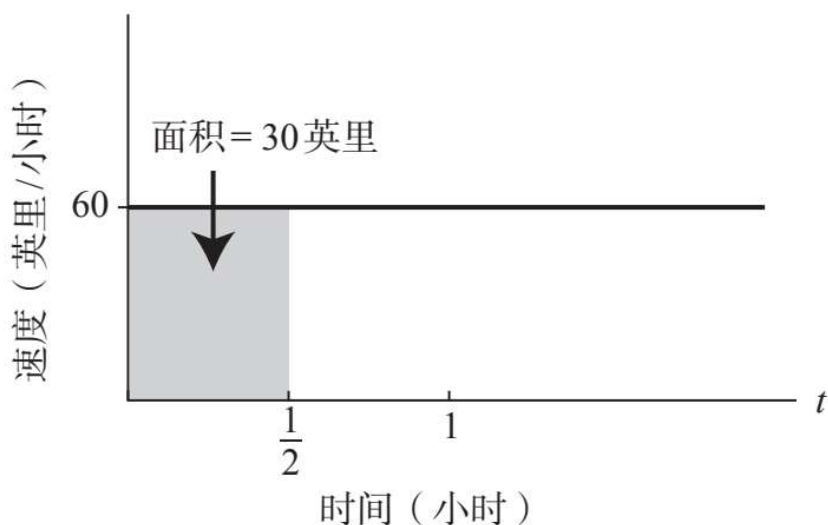


图7-2

用矩形的高（60英里/小时）乘以它的底（ $1/2$ 小时），得出它的面积为30英里，这就是汽车行驶的距离。

同样的推理过程适用于任意时间 t ，这样一来，矩形的底就变为 t ，它的高仍然是60，它的面积是 $60t$ 。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想求解的距离，即 $y = 60t$ 。

所以，至少在这个速度完全恒定且速度曲线是一条平线的例子中，根据速度推断出距离的关键在于计算速度曲线下方的面积。牛顿的见解是，即使速度不是恒定的，面积和距离之间的这个等式也会一直成立。不管物体的

运动有多么不规律，它的速度曲线下方累积到时间 t 的面积总会等于它在 t 小时后行驶的距离。这是基本定理的版本之一，它似乎容易得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牛顿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见解，是因为他把面积看作一个流动或移动的量，而不是按照当时几何学的惯例，把面积视为对形状的一种静态度量。他把时间引入几何学，并用物理学的眼光去看待它。如果牛顿现在还活着，他可能会把图7-2想象成动画，而且相较于快照，它更像翻页书。为了做到这一点，请再看一次图7-2，不过现在我们要把它想象成电影中的一帧或者翻页书中的一页。当动画在我们的脑海中播放时，我们会看到灰色矩形在做什么呢？它正在向一侧扩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底（ t ）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如果我们可以为每个时刻都制作一帧画面，并像翻动翻页书那样按顺序重新播放它们，动画版的灰色矩形看起来就在向右延伸。它类似于一个正在伸出的活塞，或者一支横放的注射器，正在将灰色液体吸入针筒。

灰色液体代表矩形不断扩大的面积，所以我们认为速度曲线 $v(t)$ 下方的面积是“不断累积”的。在这个例子中，累积到时间 t 的面积是 $A(t) = 60t$ ，这与汽车行驶的距离 $y(t) = 60t$ 一致。因此，速度曲线下方的累积面积会给出距离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这是运动版的基本定理。

恒定的加速度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找到牛顿基本定理的通用几何版本，它是用抽象曲线 $y(x)$ 及其下方的累积面积 $A(x)$ 表示的。尽管累积面积的概念是解释这个定理的关键，但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个概念，所以在用它来处理抽象的几何实例之前，我们先将它应用于一个更加具体的运动问题。

假设有一个以恒定加速度运动的物体，这意味着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并且以恒定的速率增加，和汽车起步时踩油门的情况差不多。1秒钟后，汽车可能以10英里/小时的速度行驶；2秒钟后，速度变为20英里/小时；3秒钟后，速度变为30英里/小时，以此类推。在这个假设性的例子中，汽车的速度每过1秒就会增加10英里/小时，这个速度变化率被定义为汽车的加速度。（为简单起见，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一辆真实的汽车会有一个它无法超越的最高速度，当你踩下油门时，它的加速度可能也不是严格恒定的。）

在这个理想化的例子中，汽车每个时刻的速度都由线性函数 $v(t) = 10t$ 给出，其中数字10表示汽车的加速度。如果加速度是其他常数，比如 a ，那么这个公式可以泛化为：

$$v(t) = at$$

我们想知道，对这样一辆车来说，它从时间0至 t 行驶的距离是多少？换句话说，它从起点开始行驶的距离是如何随时间增加的？如果你使用中学学过的“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的公式来解这道题，结果将会大错特错，因为这个公式只在速度恒定的情况下才有效，但这个例子中的速度并不是恒定的，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们已经告别了死气沉沉的匀速世界，来到了令人兴奋的加速度恒定的世界。

中世纪的学者^[1]已经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了。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威廉·海特斯伯里早在1335年前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国的牧师和数学家尼科尔·奥雷斯姆在1350年前后进一步形象地分析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他们的成果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很快就被遗忘了。大约250年后，伽利略通过实验证明了恒定加速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假设。实际上，它是铁球之类的重物在地表附近自由下落或者滚下缓坡时的运动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球的速度 v 确实与时间 t 成正比，即 $v = at$ ，这与加速度恒定的运动过程一样。

接下来，已知速度按照 $v = at$ 呈线性增长，那么距离会如何增长呢？基本定

理认为，行驶的距离等于速度曲线下方累积到时间 t 的面积。而且，这里的速度曲线是斜线 $v=at$ ，所以相关的面积很容易计算，它等于图7-3中灰色三角形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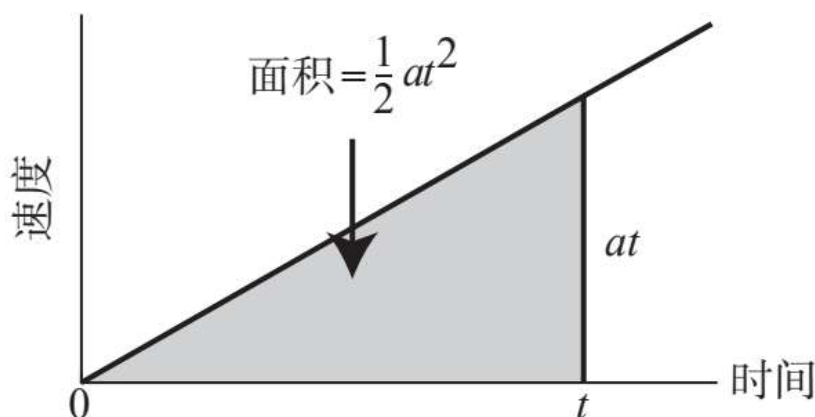


图7-3

和前一个问题中的灰色矩形一样，这里的灰色三角形的面积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不同之处在于，矩形只在水平方向上延伸，而三角形则在两个方向上延伸。为了计算灰色三角形面积扩大的速度，我们观察到在任意时刻 t 它的底都是 t ，而它的高是物体当前的速度，即 $v=at$ 。由于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与高乘积的 $1/2$ ，因此累积面积等于 $1/2 \times t \times at = (1/2)at^2$ 。根据基本定理，速度曲线下方的面积就是物体运动的距离，即

$$y(t) = \frac{1}{2} at^2$$

因此，对一个从静止状态开始均匀加速的物体来说，它运动的距离与所花费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正是我们在第3章看到的伽利略的实验发现，他还用迷人的奇数定律将其表达出来。中世纪的学者也知道这一点。

但在中世纪甚至是伽利略生活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当加速度不恒定时，速度会如何变化。换句话说，假设有一个以任意加速度 $a(t)$ 运动的物体，它的速度 $v(t)$ 会如何变化呢？

就像我在上一章提及的反向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十分棘手。想要正确地理解它，关键是弄清楚已知和未知信息。

加速度的定义是速度的变化率。所以，如果速度函数 $v(t)$ 已知，就很容易找到相应的加速度 $a(t)$ ，这被称作“解决正向问题”。就像我们运用放大抛物线的方法来计算它的斜率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计算速度函数的变化率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求解已知函数的变化率只需要利用导数的定义，以及不同函数的多种求导法则。

但反向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速度函数是未知的。假设速度函数的变化率（它的加速度）已知，我们要尝试计算什么样的速度函数才能满足这个变化率。如何从已知的变化率反向推导出未知的速度函数呢？这就像一个儿童游戏：“我想的是一个速度函数，它的变化率是这样那样的，那么我想的速度函数是什么呢？”

当我们试图依据速度推导距离时，也会出现需要进行反向推理的谜题。就像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率一样，速度是距离的变化率。正向推理很容易，如果我们知道一个运动物体行进的距离是时间的函数，就不难算出物体的瞬时速度，我们在上一章也做过这样的计算（博尔特参加北京奥运会短跑比赛的例子）。反向推理则很难，如果我告诉你博尔特在比赛中的瞬时速度，你能据此推导出每个时刻他在赛道上的位置吗？一般而言，已知任意一个速度函数 $v(t)$ ，你能推导出相应的距离函数 $y(t)$ 吗？

牛顿的微积分基本定理为这类非常棘手的反向问题——从已知的变化率推断出未知的函数——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能将其彻底解决。其中的关键在于，把这类问题重构为一个关于可流动的和不断扩大的面积问题。

[1]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ge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8.4.

用油漆滚筒证明基本定理

微积分基本定理是18世纪数学思想的巅峰。它通过动态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静态的几何问题，从公元前250年古希腊的阿基米德、250年中国的刘徽、1000年开罗的海什木到1600年布拉格的开普勒，可能都问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图7-4中灰色区域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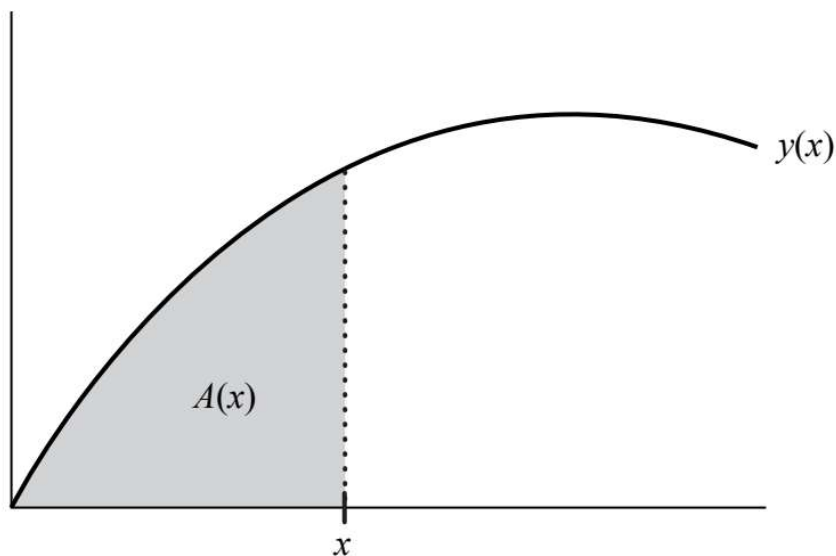


图7-4

假设该形状的顶部曲线可以是几乎所有形状，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算出像它这样的任意形状的确切面积呢？尤其要注意，它不必是经典曲线，它有可能是某个方程在 xy 平面上定义的一条新奇的曲线。或者，如果这条曲线是由物理学感兴趣的事物来定义的，比如一个粒子的运动轨迹或者一道光线的传播路径，那么我们是否有办法系统地算出它下方的面积呢？这就是面积问题，也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微积分的第三个核心问题，还是17世纪中期最紧迫的数学挑战和曲线之谜中的最后一个未解难题。牛顿利用在运动和变化之谜中获得的启发，从一个新的方向走近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头脑够聪明。你必须找到某种

巧妙的方法把一个曲边区域切分成条块，或者把它打成碎片，然后在你的脑海中重新组合这些条块或碎片，或者像阿基米德那样在假想的跷跷板上称出它们的重量。但在1665年前后，牛顿给这个面积问题带来了近2 000年里从未有过的重大进展。尽管他吸收了伊斯兰代数和法国解析几何的见解，但却远远超越了它们。

根据牛顿的新体系，第一步是将这个面积放在 xy 平面上，并确定其顶部曲线的方程。这需要计算曲线在 x 轴上方的高度，也就是每次取一个垂直切片（如图7-4中虚线所示）以获得相应的 y 。这个计算过程可以把曲线转换成一个将 y 和 x 联系在一起的方程，以使用代数工具进行处理。早在30年前（17世纪40年代），费马和笛卡儿就充分了解了这一点，并运用这些技巧找到了曲线的切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切线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切线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斜率，因为正是斜率引出了导数的概念。就像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作为曲线斜率的导数非常自然地出现在几何学中。在物理学中，导数也是作为其他变化率出现的，比如速度。因此，导数表明了斜率与速度之间的联系，更广泛地讲，是几何学和运动之间的联系。一旦导数的概念深深地扎根在牛顿的头脑中，它桥接几何学和运动的能力就会使最后的突破成为可能。而且，最终解决面积问题的正是导数。

当牛顿动态地看待面积问题时，所有这些概念——斜率与面积、曲线与函数、速率与导数——之间深藏的联系就从阴影中显现出来。秉持着我们在前两节内容中的研究精神，请你观察图7-4，并想象 x 以恒定的速度向右滑动。你甚至可以把 x 看作时间，牛顿经常这样做。然后，随着 x 的移动，灰色区域的面积会不断变化。这个面积取决于 x ，它应该被视为 x 的函数，所以我们把它写作 $A(x)$ 。当我们想强调这个面积是 x 的函数（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时，我们就称它为面积累积函数，有时简称为面积函数。

对于这个流动的场景（滑动的 x 和变化的面积），我高中的微积分老师乔夫雷先生打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方。他让我们想象有一个神奇的油漆滚筒，当它平稳地向右滚动时，就会将曲线下方的区域涂成灰色（图7-5）。

$$\frac{dA}{dx} = y$$

这个整洁的公式表明，曲线下方涂刷的总面积会以油漆滚筒当前的长度 y 的速率增大。这是有道理的：滚筒当前的长度越长，它在下一个瞬间刷的油漆就越多，面积累积的速率也越快。

只要稍加努力，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个定理的几何版等价于我们之前用过的运动版，即速度曲线下方的累积面积等于运动物体行进的距离。但是，还有更急迫的任务在等着我们。我们需要理解这个定理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重要，以及它最终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基本定理的意义

图7-6概括了我们前面学过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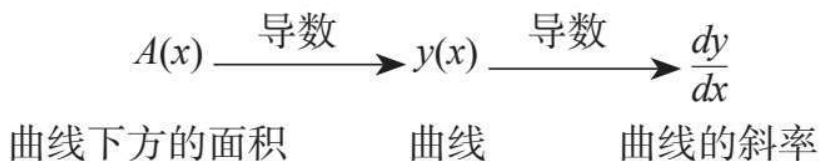


图7-6

图7-6展示了我们感兴趣的三个函数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知的曲线在中间，未知的斜率在右边，未知的面积在左边。正如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那样，它们都是出现在微积分三大核心问题中的函数。已知曲线 y ，我们尝试计算它的斜率和面积。

现在，我希望图7-6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我要把求曲线斜率的问题称为“正向问题”。为了根据已知的曲线求出未知的斜率，我们沿着向右的箭头前进即可。只要我们计算 y 的导数，就能求出曲线的斜率，这是我们在上一章讨论的正向问题。

我们之前不知道但刚刚从基本定理中了解到，面积 A 和曲线 y 也是通过导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基本定理揭示了 A 的导数就是 y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计算任意曲线下方面积的方法，而这个古老的谜题在近2 000年的时间里曾让那些最伟大的人头疼不已。现在，这幅图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答案的路径。但在开香槟庆祝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基本定理并未完全给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面积是多少，而是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方法。

积分学的圣杯

我想明确的一点是，基本定理不能完全解决面积问题。尽管它提供了关于面积变化率的信息，但我们仍要对面积本身进行推导。

用符号表示的话，基本定理告诉我们 $dA/dx=y$ ，其中 $y(x)$ 是已知函数。我们还需要找到能满足这个方程的 $A(x)$ ，等一下，这意味着我们突然又遇到了反向问题！事情发生了不同寻常的转变，我们本想解决第6章列出的第三个核心问题——面积问题，却遭遇了第二个核心问题——反向问题。我之所以称它为反向问题，是因为如图7-6所示，根据 y 推导出 A 意味着我们要沿箭头的反方向，去做函数求导的逆运算。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儿童游戏可能会变成：“我想的是一个面积函数 $A(x)$ ，它的导数是 $12x+x^{10}-\sin x$ ，那么我想的面积函数是什么呢？”

于是，构建能解决 $12x+x^{10}-\sin x$ 等任意曲线 $y(x)$ 的反向问题的方法，就变成了微积分的圣杯。更准确地说，它是积分学的圣杯。一旦解决了反向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面积问题。换言之，已知任意曲线 $y(x)$ ，我们可以算出曲线下方的面积 $A(x)$ ；而通过解决反向问题，我们也可以解决面积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两个问题是一出生即被分开的双胞胎，或者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反向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原因如下：根据阿基米德的观点，面积是无穷多个无穷小的矩形条之和。因此，面积是一个积分，它是所有碎片重新拼凑起来的整体，是无穷小变化的累积。就像导数比斜率重要一样，积分也比面积重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面积对几何学而言至关重要，而积分对一切来说都至关重要。

处理棘手的反向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无视它，把它搁在一边，并用更简单的正向问题（已知 A ，计算它的变化率 dA/dx ；根据基本定理，我们知道这个变化率一定等于我们正在寻找的 y ）取代它。相比反向问题，正向问题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去解决它。我们可以从已知的面积函数 $A(x)$ 入手，然后运用标准导数公式计算它的变化率。由此得出的变化率 dA/dx 一定扮演着函数 y 的角色，因为基本定理向我们保证 $dA/dx=y$ 。至此，我们就有了一对搭档函数 $A(x)$ 和 $y(x)$ ，它们分别代表面积函数及其关联曲线。我们希望，如果有幸遇到需要我们计算特定曲线 $y(x)$ 下方面积的问题，它对应的面积函数就是它的搭档 $A(x)$ 。尽管这不是一种系统性方法，而且只在我们运气好的时候起作用，但它至少是一个容易的开端。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制作一张大查询表，以 $[A(x), y(x)]$ 对的形式列出几百个面积函数及其关联曲线。那么，基于这张

表的规模和多样性，我们找到解决真正的面积问题所需的搭档函数的概率将大幅增加。一旦找到那对必需的函数，我们就无须做进一步的工作了，因为答案就在那张表里。

比如，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 x^3 的导数是 $3x^2$ ，这个结果是我们通过解决正向问题，即进行简单的求导得出来的。然而，其中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 x^3 可以扮演 $A(x)$ 的角色，而 $3x^2$ 可以扮演 $y(x)$ 的角色。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了 $3x^2$ 的面积问题。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将 x 的其他幂函数填到表中。如表7-1所示， x^4 的导数是 $4x^3$ ， x^5 的导数是 $5x^4$ ……一般而言， x^n 的导数是 nx^{n-1} 。对幂函数来说，这些都是很容易得到的正向问题的答案。

表7-1

曲线 $y(x)$	它的面积函数 $A(x)$
$3x^2$	x^3
$4x^3$	x^4
$5x^4$	x^5
$6x^5$	x^6
$7x^6$	x^7
...	...

大学期间，22岁的牛顿在他的笔记本^[1]里绘制过类似的表格，如图7-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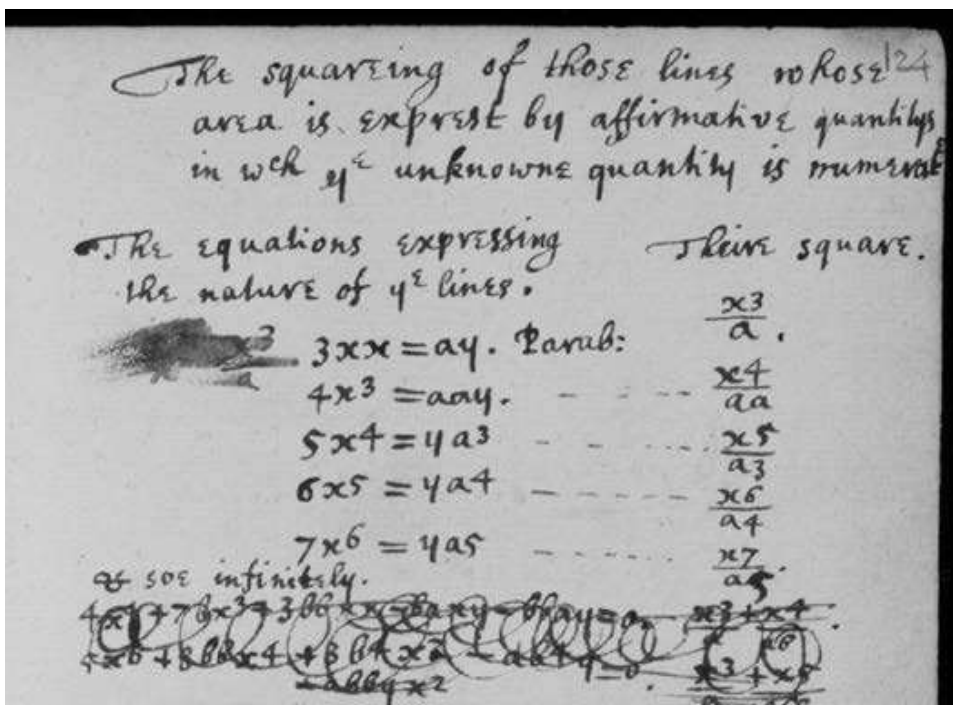


图7-7

请注意，牛顿的表述方式与我们有些许不同之处。上图中左边一系列的曲线是“表达 y 线性质的方程”，其面积函数是“它们的求积法”（因为他把面积问题视为“曲线的求积问题”）。为了确保所有量都具有恰当的维数，他觉得有必要插入任意长度单位 a 的不同次方，比如，从列表顶部向下数第5行，位于右下角的 $A(x)$ 是 x^7/a^5 （而不是更简单的 x^7 ）。在牛顿看来， $A(x)$ 代表面积，因此对长度单位求积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内容都出现在“一种对那些可求积的曲线进行求积的方法”（宣告了微积分基本定理的诞生）之后的几页里，利用这个定理，牛顿花了更多页的篇幅列出了“曲线”及其“求积术”。在牛顿的操控下，微积分的机器运转起来了。

我们的第二项任务是，找到一种求任意曲线而不只是幂函数面积的方法。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但它听起来太平常了，完全不像一个妙趣横生的幻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包含了积分学之所以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精髓。如果曲线求积问题得到解决，它将引发连锁反应，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且，我们可以用它来回答笛卡儿眼中的那个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问题，即算出任意曲线的弧长。有了它，人们也有可能算出平面上任意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面积，还可以计算球面、抛物面、瓮、桶及其他通过绕轴旋转曲线所得到的曲面（就像陶钧

上的花瓶一样)的表面积、体积和重心。阿基米德和一位18世纪的数学天才思考过的关于曲线形状的经典问题,一下子就变得容易解决了。

不仅如此,某些预测问题也将得到解决。只要解决了曲线求积问题,我们就可以预测出运动物体在遥远未来的位置,比如,即使一颗行星受到的引力与我们宇宙中的引力不同,我们也能预测出某一时刻它在轨道上的位置。我之所以称曲线求积问题为积分学的圣杯,是因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都可归结为这个问题,如果它被解决了,其他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这就是算出任意曲线下方的面积如此重要的原因。由于面积问题与反向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不只是与面积有关。面积问题也不只是关于形状,或者关于距离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或者关于其他狭义事物的问题,而是完全通用的。从现代的角度看,面积问题旨在预测以不断变化的速率变化的事物与它随时间的累积程度之间的关系。它与银行账户的波动性流入和累计余额有关;它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和地球上的净人口数有关;它与化疗药物在患者血液中不断变化的浓度和随时间的累积暴露剂量有关,因为总暴露量会影响化疗药物的效果和毒性。面积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未来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牛顿的新数学方法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完美契合,因此,他把它命名为“流数术”(fluxion)。他谈到了流量(我们现在认为流量是时间的函数)及其流数(流量的导数或随时间的变化率),并明确了两个核心问题:

问题1:已知流量,如何求出它们的流数?(这相当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正向问题,也就是求已知曲线的斜率,或者一般来说,求已知函数的变化率或导数的简单问题。这个过程在今天被称为微分。)

问题2:已知流数,如何求出它们的流量?(这相当于反向问题,也是面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是根据斜率推导曲线,或者一般来说,根据变化率推导未知函数的困难问题。这个过程在今天被称为积分。)

问题2比问题1难得多,对预测和破解宇宙密码来说也更加重要。正式讨论牛顿在问题2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之前,请允许我先阐明它为什么这么难。

[1] college notebook: You can explore Newton's handwritten college notebook online. The page shown in the main text is <http://cudl.lib.cam.ac.uk/view/MS-ADD-04000/260>.

局部vs整体

积分之所以比微分难得多，原因在于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区别。局部问题很容易，而整体问题则很难。

微分是一种局部操作。正如前文所说，我们在计算导数的时候，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事物一样。随着我们反复放大视野中的曲线，曲线的弯曲度看上去越来越小。我们看到了曲线的放大版，它是一段微小的斜坡，几乎完全笔直，垂直高度是 Δy ，水平距离是 Δx 。在放大倍数为无穷的极限情况下，它趋近某条直线，即显微镜中心点的切线，这条极限线的斜率就是该点的导数。显微镜的作用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关心的那段曲线上，而其他一切都会被忽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求导是一种局部操作，它舍弃了唯一关注点的无穷小邻域以外的所有细节。

而积分是一种整体操作。我们现在用的不是显微镜，而是望远镜。我们试图眺望远方或者预测未来（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占卜用的水晶球），这自然要难得多。所有干预事件都很重要，而且不能被舍弃，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

我会用类比的方式阐明局部和整体、微分与积分之间的这些区别，以及积分如此困难但在科学上却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个类比把我们带回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博尔特打破100米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回想一下，为了求出他的瞬时速度，我们先用一条光滑曲线去拟合显示他在赛道上的位置随时间变化的数据。然后，为了求出他在某个时刻（比如比赛进行到7.2秒时）的速度，我们利用拟合曲线来估计他在一小段时间后（比如7.25秒时）的位置，再用距离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估算出他在那一时刻的速度。这些都是局部计算，它们利用的唯一信息就是他在那个给定时刻前后的几百分之一秒内的运动情况，而他在比赛其余部分的所作所为则无关紧要。这就是我所说的局部的含义。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拿到一份展示博尔特在比赛中的所有瞬时速度的无限长的电子表格，并且要重建他在比赛开始后7.2秒时的位置，那么请你想一想我们需要用到哪些信息。当博尔特离开起跑器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初始速度和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的公式，去估算某一时刻（比如0.01秒后）他在跑道上的位置。从那个新的位置起，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0.01秒内，让他以相应的速度再在赛道上向前跑相应的距离。像这样一点一点地在赛道上不断前进，每次累积0.01秒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更新他在整场比赛中的位置。在计算方面，这是一件费力的苦差事，也是整体计算如此困难的原因。我们需要计算每一步，才能得到一个关于遥远未来（在这个例

子中是发令枪响后7.2秒时)的期望答案。

但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快进，直达我们关注的那个瞬间，那么这种方法将大有帮助。而且，这正是反向积分问题的解决方案所要实现的效果。它将为我们提供一条穿越时间的捷径或者一个虫洞，从而把整体问题转化成局部问题。这就是解决反向问题好似找到了微积分圣杯的原因。

和许多事情一样，这个问题也是由一个学生率先解决的。

一个孤寂的男孩

1642年的圣诞节，艾萨克·牛顿出生^[1]在一间石头农舍里。除了这个日期之外，他的降生再无值得庆祝的理由。据说他是个早产儿，瘦小到能被装进1夸脱（1.136升）的杯子里。牛顿没有父亲，在他出生的3个月前，自耕农老艾萨克·牛顿就去世了，只留下了大麦、家具和一些绵羊。

牛顿3岁时，他的母亲汉娜再婚，把他留给外祖父母照顾。（汉娜的新丈夫巴纳巴斯·史密斯牧师坚持做这样的安排，他是个年龄比汉娜大一倍的有钱人，想要一个年轻的妻子，但不想要一个年幼的儿子。）牛顿憎恨他的继父，并且觉得自己被母亲抛弃了。后来，在他列出的19岁前犯下的罪行清单中，有这样一条：“13.威胁我的父母（史密斯夫妇）要把他们和他们的房子一起烧掉。”下一条更邪恶：“14.希望死亡降临到某些人身上。”然后是：“15.经常打架。16.有不洁的想法、言行和愿望。”

他是一个烦恼和孤独的小男孩，没有伙伴，只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他独自开展学术调查，在农舍里建造日晷，测量墙上的光影变化。在牛顿10岁的时候，再次成为寡妇的汉娜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回来了。她把牛顿送到8英里外格兰瑟姆的一所学校，因为距离太远，他无法每天步行往返。于是，牛顿寄宿在药剂师、化学家威廉·克拉克先生家里，并从克拉克那里学习了药物和疗法、沸腾和混合，以及如何用臼和杵研磨。校长亨利·斯托克斯先生给牛顿教授了拉丁语、一点儿神学理论、希腊语、希伯来语、一些农民在勘测耕地时会用到的实用数学方法，还有更深奥的知识，比如阿基米德如何估算圆周率的值。尽管牛顿的学业报告评价他是个懒散、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但当他晚上独自待在房间里时，他会在墙上画阿基米德画过的圆和多边形。

牛顿16岁时，母亲让他离开学校，并强迫他经营家庭农场。他憎恨做农活，便放纵他家的猪闯入邻居的田地，任由篱笆东倒西歪，并被庄园法庭处以罚款。他和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妹妹们关系都很糟糕。他常常一个人躺在田地里看书，还在溪流中搭建了水车，研究它们产生的旋涡。

最终，他的母亲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在她的哥哥和斯托克斯校长的劝说下，汉娜允许牛顿重返学校。由于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1661年，牛顿作为一名公费生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不过，公费生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不得不依靠做服务员并为有钱的学生服务来赚取生活费，有时他还会吃他们的残羹剩饭。（汉娜可以负担牛顿的生活费，但她没有这样做。）牛顿在大学里几乎没有朋友，在之后的人生中也一直如此。据我们所知，他从未谈恋爱和结婚，也很少开怀大笑。

在大学的头两年，他忙于学习当时仍具有权威性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但后来他的思维活跃起来。在读了一本关于占星术的书后，他对数学产生了好奇心。牛顿发现，如果不知道一些三角学知识，他就无法理解占星术；而如果不知道一些几何知识，他就无法理解三角学。于是，他读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起初书中的所有结论对他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读到毕达哥拉斯定理时，他不再这样认为了。

1664年，牛顿获得了奖学金，并潜心钻研数学。他自学了那个时代6本权威的教科书，快速掌握了十进制算术、符号代数、毕达哥拉斯三元组、排列、三次方程、圆锥曲线和无穷小等基础知识。其中有两位作者特别令他着迷，即研究解析几何和切线的笛卡儿，以及研究无穷和求积法的约翰·沃利斯。

[1] Isaac Newton was born: My account of Newton's early life is based on Gleick, Isaac Newton.

玩转幂级数

1664-1665年的冬天，牛顿在认真阅读沃利斯的《无穷算术》一书时，偶然发现了某个神奇的东西^[1]。它是一种求解曲线下方面积的新方法，既简单又具有系统性。

实质上，沃利斯把无穷原则变成了一种算法。传统的无穷原则说的是，为了计算一个复杂的面积，人们可以把它重新想象成较简单面积的无穷级数。尽管牛顿遵循了这个策略，但他对其进行了升级，用符号而不是形状作为基本单元。他没有使用常见的碎片、条块或多边形，而是使用了符号 x 的次方，比如 x^2 和 x^3 。今天我们把他的策略称作幂级数法。

牛顿把幂级数视为无穷小数的一种自然推广形式。毕竟，一个无穷小数不过是10和1/10的幂级数。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会告诉我们，它们分别包含多少个10或1/10的次方。比如， $\pi = 3.14\dots$ 对应下面这个特定的组合：

$$3.14\dots = 3 \times 10^0 + 1 \times \left(\frac{1}{10}\right)^1 + 4 \times \left(\frac{1}{10}\right)^1 + \dots$$

当然，根据无穷小数的要求，想以这种方式表示任何数，就需要使用无穷多个数字。通过类比，牛顿觉得他可以用无穷多个 x 的次方“配置”出任何曲线或函数。关键是要弄清楚其中包含多少个 x 的不同次方，在研究过程中，他想出了几种找到正确组合的方法。

牛顿是在思考圆的面积问题时偶然想到了幂级数法。通过让这个古老的问题变得更具一般性，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结构。他并没有把注意力局限在标准形状上，比如整圆或者1/4圆，而是专注于一种奇异的形状——“圆弓形”的面积，它的宽度为 x ，其中 x 是0到1之间的任意数字，1是圆的半径（图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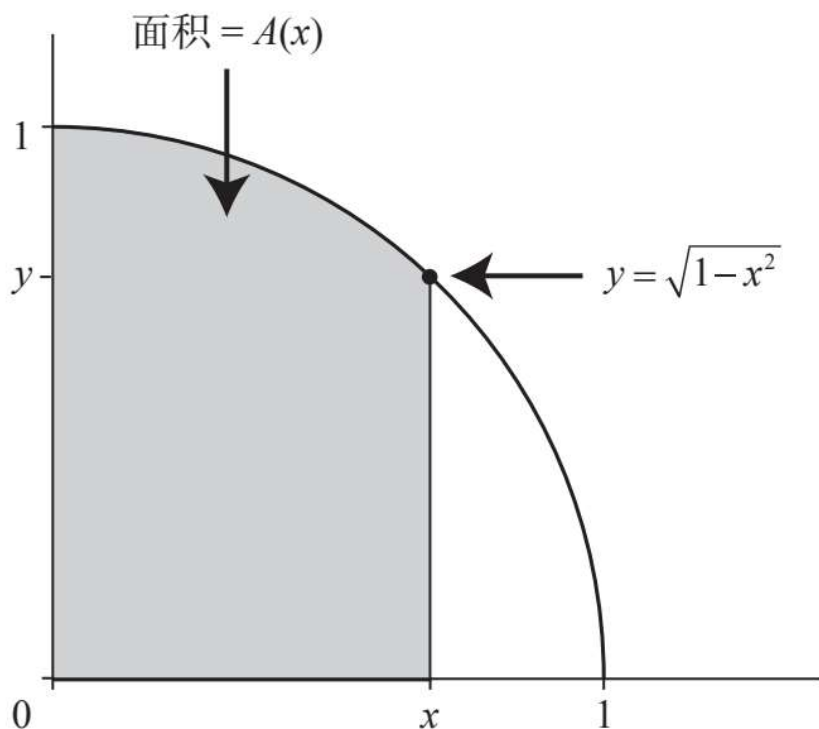


图7-8

这是牛顿的第一个创举。使用变量 x 的好处在于，就像转动一个旋钮一样，他可以不断调整这个区域的形状。当 x 的值很小且接近于0时，就会产生一个细而竖直的圆弓形，看上去好像立在边缘处的细条；增大 x 会使这个圆弓形变宽为一个块状区域；当 x 的值为1时，则会得到他熟悉的形状——1/4圆。所以，通过上下转动旋钮，牛顿可以得到介于0和1之间的任意大小的 x 。

借助实验、模式识别和启发性猜测这个随心所欲的过程（他从沃利斯的书中学到的一种思考方式），牛顿发现圆弓形的面积可以用下面的幂级数来表示：

$$A(x) = x - \frac{1}{6}x^3 - \frac{1}{40}x^5 - \frac{1}{112}x^7 - \frac{5}{1152}x^9 - \dots$$

至于这些奇怪的分数来自哪里，或者算式中为什么只有 x 的奇数次方，这些都是牛顿的“独家秘方”。他构建这个幂级数的论证过程可以概括如下（如果你对他的论证过程不太感兴趣，可以跳过这一段的余下部分）：[\[2\]](#) 牛顿在研究圆弓形之初，运用了解析几何的方法。他将圆表示为

$x^2 + y^2 = 1$ ，然后求解 y ，得到 $y = \sqrt{1 - x^2}$ 。接着，他认为平方根等价于 $1/2$ 次方，因此 $y = (1 - x^2)^{1/2}$ ，请注意括号右边的 $1/2$ 次方。由于牛顿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如何求解对应于 $1/2$ 次方的圆弓形面积，所以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第二个创举），转而去求解对应于整数次方的圆弓形面积，后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牛顿从沃利斯的书中习得了相关方法。于是，牛顿算出了 $y = (1 - x^2)^1, (1 - x^2)^2, (1 - x^2)^3 \dots$ （它们的括号外都是像1、2和3这样的整数）对应的圆弓形面积。他运用二项式定理将表达式展开后，发现它们都变成了简单幂函数的和，而这些幂函数正是我们在图7-7中看到的那些被他编制成表格的面积函数。之后，他开始寻找圆弓形面积随 x 变化的模式。根据对应于整数次方的圆弓形面积，牛顿猜出了对应于 $1/2$ 次方的圆弓形面积（这是他的第三个创举），并用各种方法检验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引领他建立了 $A(x)$ 的公式，也就是前文中展示的那个由奇异分数构成的令人惊叹的幂级数。

随后，圆弓形对应的幂级数的导数，引领他得到了圆对应的一个同样令人惊叹的级数：

$$y = \sqrt{1 - x^2} = 1 - \frac{1}{2}x^2 - \frac{1}{8}x^4 - \frac{1}{16}x^6 - \frac{5}{128}x^8 - \dots$$

尽管他还会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但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用无穷多个更简单的部分构建出一个圆，这里的“更简单”是从积分和微分的角度说的。它的所有要素都是 x^n 形式的幂函数，其中 n 是整数。而且，每个幂函数都有易于求解的导数和积分（面积函数）。同样地， x^n 的数值可以用简单的算数方法（重复的乘法运算）来计算，再用加、减、乘、除运算就可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级数。不需要取平方根，也无须担心会有其他难以处理的函数。如果牛顿能找到除圆之外的其他曲线对应的这类幂级数，那么它们的积分运算也会变得毫不费力。

就这样，年仅22岁的牛顿找到了通往圣杯的路径。通过将曲线转换成幂级数，他系统性地求解出它们的面积。考虑到他罗列在表格里的那些函数对，反向问题对幂函数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因此，能用幂级数表示的任何曲线都是易于求解的。牛顿的算法可谓无比强大。

接着，他尝试了另一条曲线，即双曲线 $y=1/(1+x)$ ，并且发现它也可以表示成幂级数的形式：

$$\frac{1}{1+x} = 1 - x + x^2 - x^3 + x^4 - x^5 + \dots$$

这个级数又让牛顿得出了双曲线下方从0到x的弓形（圆弓形的双曲线对应物）面积对应的幂级数。它定义的函数被他称为双曲线对数，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对数。

$$\ln(1+x) = x - \frac{1}{2}x^2 + \frac{1}{3}x^3 - \frac{1}{4}x^4 + \frac{1}{5}x^5 - \frac{1}{6}x^6 + \dots$$

对数令牛顿兴奋不已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它们可以极大地提高计算速度。第二，它们与牛顿当时正在研究的音乐理论中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有关：如何在不牺牲传统音阶最令人愉悦的和声的前提下，将一个八度音程划分成完全相等的音步。（用音乐理论的术语来说，牛顿利用对数来评估八度音程的平均律划分与传统的纯律调音的效果有多么接近。）

得益于互联网创造的奇迹和“牛顿项目”历史学家的努力，你现在可以回到1665年，看看年轻的牛顿在做什么。（想免费翻看牛顿大学时期的笔记本，可以登录如下网址：http://cudl.lib.cam.ac.uk/view/MS_ADD-04000/。）让我们越过他的肩膀看一下第223页（原稿第105页的背面），你会发现他正在比较音乐数列和几何数列。放大这一页的底部，你可以看到牛顿是如何把他的计算过程与对数联系起来的。然后翻到第43页（原稿第20页的正面），看看他如何“对双曲线求积”，以及利用幂级数计算1.1的自然对数值并将其精确到50位。

什么样的人能手工计算出50位的对数值呢？他似乎陶醉在幂级数赋予他的

全新力量之中。当后来回忆起这种过度计算的行为时，他有点儿难为情地说：“我羞于告诉别人我算到了多少位，那时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我实在太喜欢幂级数了。”^[3]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人无完人。当牛顿第一次做这样的计算时，他犯了一个小小的算术错误。他的计算结果中只有前28位数是正确的，但他后来发现并修正了这个错误。

在自然对数方面小试牛刀之后，牛顿又把他的幂级数延伸至三角函数，因为在天文学、测量学和航海中，每当出现圆、周期或三角形时，就会用到三角函数。不过，牛顿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印度喀拉拉邦的数学家^[4]就发现了正弦、余弦和反正切函数的幂级数。16世纪早期，加斯特德维和尼拉坎撒·萨马亚吉在他们的著作中，将这些公式归功于喀拉拉邦数学与天文学院的创立者马德哈瓦。马德哈瓦推导出这些公式并以韵文的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比牛顿早了大约250年。所以，我们说印度人应该预见到了幂级数的存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小数也发明于印度，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牛顿认为他为曲线所做的一切就类似于无穷小数对算术的贡献。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牛顿的幂级数给了他一把对付微积分的瑞士军刀。有了它们，他可以求积分、解代数方程的根和计算非代数函数（比如正弦、余弦和对数）的值。正如他所说，“在它们的帮助下，^[5]几乎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 Newton chanced upon something magical: Whiteside, The Mathematical Papers, vol.1, 96–142,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12.5. Edwards gives a fascinating treatment of Wallis's work on interpolation and infinite products and shows how Newton's work on power series arose from his attempt to generalize it; see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pter 7. We know when Newton made these discoveries because he dated them in an entry on page 14v of his college notebook (online at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ADD-04000/32>). Newton wrote, "I find that in ye year 1664 a little before Christmas I...borrowed Wallis' works & by consequence made these Annotations...in winter between the years 1664 & 1665. At wch time I found the method of Infinite se ries. And in summer 1665 being forced from Cambridge by the Plague I computed ye area of ye Hyperbola...to two & fifty figures by the same method."

[2] He cooked it up by an argument: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178–87, and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506–59, show the steps in Newton’s thinking as he derived his results for power series.

[3] “really too much delight in these inventions”: Letter 188 from Newton to Oldenburg, October 24, 1676, in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133.

[4] mathematicians in Kerala, India: Katz, “Ideas of Calculu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494–96.

[5] “By their help analysis reaches”: This line appears in the famous epistola prior, Newton’s reply to Leibniz’s first inquiry, sent via Henry Oldenburg as intermediary; see letter 165 from Newton to Oldenburg, June 13, 1676, in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39.

混搭大师

在幂级数的相关研究中，牛顿表现得就像一位数学混搭大师，但我并不认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利用古希腊人的无穷原则来解决几何学中的面积问题，并把印度人的小数、伊斯兰人的代数和法国人的解析几何融入其中。

我们可以从他的方程结构中看出一些“数学舶来品”的痕迹。比如，比较一下阿基米德在抛物线求积法中使用的数字无穷级数

$4/3 = 1 + 1/4 + 1/16 + 1/64 + \dots$ 和牛顿在双曲线求积法中使用的符号无穷级数 $1/(1+x) = 1 - x + x^2 - x^3 + x^4 - x^5 + \dots$ ，如果把 $x = -1/4$ 代入牛顿的级数，它就会变成阿基米德的级数。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级数将阿基米德的级数作为一个特例包括在内。

他们研究成果的相似性还延伸到他们思考的几何问题上。他们都喜欢弓形，阿基米德用他的数字级数求解出抛物线弓形的面积，牛顿则用他的升级版幂级数 $A_{\text{圆}}(x) = x - x^3/6 - x^5/40 - x^7/112 - 5x^9/1152 - \dots$ 求解出圆弓形的面积，并用另一个幂级数 $A_{\text{双曲线}}(x) = x - x^2/2 + x^3/3 - x^4/4 + x^5/5 - x^6/6 + \dots$ 求解出双曲线弓形的面积。

实际上，牛顿的级数要比阿基米德的级数强大无穷倍，因为前者可用于求解不止一个而是无穷多个圆弓形和双曲线弓形的面积。这要归功于抽象符号 x ，让牛顿可以毫不费力地不停变换问题。他能够通过左右滑动 x 来调整弓形的形状，其结果看上去是一个无穷级数，但其实是无穷多个无穷级数，因为每个 x 都分别对应一个无穷级数。这就是幂级数的力量，它们帮助牛顿解决了无穷多个问题。

但我还要说，如果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统一、综合和归纳了伟大前辈的思想：他继承了阿基米德的无穷原则，他的切线知识来自费马，他使用的小数和变量分别来自印度数学和阿拉伯代数，他用方程表示 xy 平面上曲线的做法来自笛卡儿的著作，他对无穷的随心所欲的玩法、他的实验精神及他对猜想和归纳的开放性态度都来自沃利斯。他把所有这一切混搭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事物——通用的幂级数法，直到今天我们在解决微积分问题时仍会用到它。

私密的微积分

1664-1665年冬天，也就是牛顿研究幂级数期间，一场可怕的瘟疫正在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它如同海浪般从地中海一直蔓延到荷兰。黑死病（腺鼠疫）传入伦敦后，一周之内就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之后又杀死了数千人。1665年夏天，剑桥大学出于防护的目的暂时关闭了校园，牛顿因此回到了他在林肯郡的家庭农舍。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变成了世界上最棒的数学家。但是，发明现代微积分还不足以占据他的整个大脑。他发现了引力平方反比律并将其应用于月球，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通过实验证明白光是由彩虹的7种颜色组成的。那时牛顿还不到25岁，他后来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我处于发明的全盛期，^[1]对数学和哲学的关注程度超过此后的任何时间。”

1667年，在瘟疫渐渐平息后，牛顿回到剑桥大学继续他一个人的研究。到1671年，他已经把微积分的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无缝整体。他建立了幂级数法，他利用关于运动的思想极大地改进了既有的切线理论，他发现和证明了解决面积问题的基本定理，他编制了曲线及其面积函数的表格，并将所有这些成果“焊接”成一台精细调谐的系统性计算机器。

但在三一学院之外，牛顿名不见经传。而这正是他想要的，他独自保守着隐秘源泉的秘密。他深居简出，猜疑心重，对批评意见极为敏感，讨厌和他人争论，尤其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他不喜欢被“那些对数学一无所知的人激怒”^[2]。

牛顿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知道自己研究可能会在逻辑方面遭到攻击。他利用的是代数方法，而不是几何学工具，他对无穷（微积分的原罪）也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约翰·沃利斯的著作对学生时代的牛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也曾因为触犯同样的禁忌而遭到残酷的批评。政治哲学家和二流数学家托马斯·霍布斯^[3]曾严厉抨击沃利斯的《无穷算术》是“符号的疥疮”^[4]（因为对代数的依赖）和“无耻的著作”^[5]（因为对无穷的使用）。牛顿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只是分析，而不是综合；它的用处只在于发现，而不是证明。他贬称自己的无穷法“不值得公开发表”^[6]，多年后又说“尽管似是而非的代数^[7]非常适用于取得新的发现，但却完全不适合编撰成书，并留传给后代”。

出于这些及其他原因，牛顿隐藏了他的研究成果，但他仍渴望因此获得认可。尼古拉斯·墨卡托在166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对数的小书，这让牛顿感到既痛苦又烦恼，因为这本书中讲到的自然对数的无穷级数，他早在3年

前就发现了。被人抢先一步的震惊和失望，促使牛顿在1669年写了一本关于幂级数的小册子，并在少数几位值得信赖的追随者中间私下传阅。这本小册子的完整标题是《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On Analysis by Equations Unlimited in Their Number of Terms*），它的内容远不只是对数。1671年，牛顿将它扩充为关于微积分的重要论著《流数术与无穷级数》（*A Treatise of the Methods of Series and Fluxions*），不过这本著作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未公开发表，牛顿对它严加保管，仅供他自己使用。《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于1711年出版，《流数术与无穷级数》则一直拖到1736年（那时牛顿已经去世）才出版，牛顿的遗产还包括5 000页未发表的数学手稿。

所以，世人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艾萨克·牛顿这个人物的。然而，在剑桥大学的院墙之内，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天才。1669年，剑桥大学的首位卢卡斯教授、牛顿的导师之一伊萨克·巴罗主动让贤，力荐牛顿接任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

这对牛顿来说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他生平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职位几乎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他没有研究生可带，他给本科生讲授的课程也少有人来上。学生们根本听不懂牛顿的课，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穿着红袍、银发齐肩、面色阴郁、身形瘦削、如僧侣般的怪人是怎么回事。

牛顿在完成《流数术与无穷级数》的写作后，尽管他的思维依旧十分活跃，但微积分不再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开始深入研究《圣经》中的预言、年代学、光学和炼金术，用棱镜把光分解成各种颜色，用水银做实验，嗅闻和偶尔品尝化学物质，并夜以继日地尝试用锡炉把铅变成黄金。就像阿基米德一样，他为此废寝忘食。他正在寻找宇宙的秘密，没有耐心去做那些让他分心的事情。

然而，1676年的一天，一封来自巴黎的信让牛顿无法再心无旁骛。寄信者名叫莱布尼茨，他在信中提出了几个关于幂级数的问题。

[1] “prime of my age for invention”: Draft letter from Newton to Pierre des Maizeaux, written in 1718, when Newton was seeking to establish his priority over Leibniz in the invention of calculu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ADD-03968/1349> in the collect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full quote is breathtak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1665 I found the Method of approximating series & the Rule for reducing any dignity of any Binomial into such a series. The same year in May I found the method of Tangents of Gregory & Slusius, & in November had the direct

method of fluxions & the next year in January had the Theory of Colours & in May following I had entrance into ye inverse method of fluxions. And the same year I began to think of gravity extending to ye orb of the Moon & (having found out how to estimate the force with which a globe revolving within a sphere presses the surface of the sphere) from Kepler's rule of the periodical times of the Planets being in sesquialterate [three-half power] proportion of their distances from the centers of their Orbs, I deduced that the forces which keep the Planets in their Orbs must be reciprocally as the squares of their distances from the centers about which they revolve: & thereby compared the force requisite to keep the Moon in her Orb with the force of gravity at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 found them answer pretty nearly. All this was in the two plague years of 1665 and 1666. For in those days I was in the prime of my age for invention & minded Mathematicks & Philosophy more than at any time since."

[2] "baited by little smatterers in mathematics": Quoted in Whiteside,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reference in his ref.2.

[3] Thomas Hobbes: Alexander, *Infinitesimal*, tells the story of Hobbes's furious battles with Wallis, which were as political as they were mathematical. 11976.a "scab of symbols": Quoted in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164. Chapter 7 focuses on Hobbes as would-be geometer.

[4] a "scab of symbols": Quoted in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164.

[5] "scurvy book": Ibid.

[6] not "worthy of public utterance": Quoted in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343.

[7] "Our specious algebra": Ibid.

第8章 思维的虚构产物

莱布尼茨怎么会听闻牛顿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这并不难，关于牛顿取得的种种发现的消息已经传播好几年了。1669年，伊萨克·巴罗为了提拔他的年轻门生，曾给一位名叫约翰·柯林斯的数学爱好者和剧院经理，寄去了一份未署名的《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副本，柯林斯一直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数学家通信网络中的关键联络人。他被这份文稿中的结论惊呆了，便询问巴罗它的作者是谁。得到牛顿的允许后，巴罗揭开了谜底：“我很高兴我朋友的论文能让你如此满意。他名叫牛顿，^[1]在我们学院工作，尽管他很年轻……但他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凡的天赋和能力。”

柯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他用《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中的片段取笑他的通信对象，用牛顿的研究成果博得对方的称赞，却从不解释它们来自哪里。1675年，他向一位名叫格奥尔格·玻尔的丹麦数学家展示了牛顿的反正弦函数和正弦函数的幂级数，随后玻尔又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莱布尼茨。于是，莱布尼茨向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出生于德国，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颇具交际能力）提出了一项请求：“在我看来，他（玻尔）给我们带来了颇具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后一个级数更是具备某种罕见的优雅性。尊敬的阁下，如果你能把证明过程寄给我，^[2]我将感激不尽。”

亨利·奥登伯格把莱布尼茨的请求转达给牛顿，这引起了牛顿的不快。寄证明过程？！牛顿通过奥登伯格回复了莱布尼茨，并且把《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中的所有“武器装备”——一页又一页晦涩难懂、令人生畏的公式——都拿了出来。在牛顿的核心圈子之外，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数学。此外，牛顿还强调这些材料已经过时了，“我写得相当简短，是因为我早就开始反感这些理论了，^[3]近5年来唯恐避之不及。”

莱布尼茨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回信向牛顿打探，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他在这个领域还是个新手，身为外交官、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他，直到最近才对高等数学产生了兴趣。他花时间向欧洲数学界的领军人物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学习，以便快速掌握最新的发展动态。仅用了3年时间，莱布尼茨的数学造诣就超过了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人。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楚牛顿知道什么，以及隐瞒了什么。

为了从牛顿那里探听到信息，莱布尼茨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有意犯一些能给牛顿留下深刻印象的错误。他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让他引以为傲的无穷级数——呈送给牛顿，这表面上是一份礼物，但其实是

一个信号，暗示他有资格分享牛顿的秘密。

两个月后，1676年10月24日，牛顿通过奥登伯格回复了莱布尼茨。他以恭维话作为开场白，声称莱布尼茨“非常出色”^[4]，并夸赞了莱布尼茨的无穷级数，说它“让我们对你取得的伟大成就充满期待”^[5]。这些溢美之词是出自牛顿的真心吗？显然不是，因为他的下一句话就充满了尖酸的讽刺：“实现同一目标的不同方法^[6]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快乐，我知道有3种方法可以得出那样的级数，所以我对新方法的出现几乎不抱任何期望。”牛顿的言外之意是，“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而我已经知道如何用3种方法做到它了。”

在这封信的余下部分，牛顿戏弄了莱布尼茨。他展示了自己求解无穷级数的一些方法，并以适用于小学生的教学方式来解释它们。不过，这对后人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牛顿在信里把这些方法描述得非常清晰，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

但当谈到他最宝贵的“财产”（他的第二本关于微积分的小册子《流数术与无穷级数》中的革命性方法，其中包括基本定理，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时，牛顿温和的解释戛然而止。“事实上，这些运算的基础显而易见；但由于我现在不能继续做解释了，所以我宁愿把它们像这样隐藏起来^[7]：6accdae13eff7i3l9n4o4qrr4s8t12vx。在此基础上，我也尽力简化了与曲线求积相关的理论，并得出了某些一般性定理。”

牛顿利用这串加密代码把他最珍视的秘密摆在莱布尼茨面前，实际上是要告诉莱布尼茨，“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即使你后来发现了它，这串密码文也能证明我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人。”

然而，牛顿没有意识到的是，莱布尼茨已经独立地发现了这个秘密。

[1] “His name is Mr.Newton”: Letter from Isaac Barrow to John Collins, August 20, 1669, quoted in Gleick, Isaac Newton, 68.

[2] “send me the proof ”: Letter 158, from Leibniz to Oldenburg, May 2, 1676, in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4. For more on the Newton-Leibniz correspondence, see Mackinnon, “Newton’s Teaser.”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354–61, offers a particularly clear and helpful analysis of the mathematical cat-and-mouse game taking place between Newton and Leibniz in the letters. The original letters appear in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see especially letters 158 (Leibniz’s initial inquiry to Newton via Oldenburg), 165 (Newton’s epistola prior, terse and intimidating), 172 (Leibniz’s

request for clarification), 188 (Newton's epistola posterior, gentler and clearer but still intended to show Leibniz who was boss), and 209 (Leibniz fighting back, though graciously,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he knew calculus too).

[3] "distasteful to me": One of the best zingers in the epistola prior, letter 165 from Newton to Oldenburg, June 13, 1676. See Turnbull, *Correspondence of Isaac Newton*, 39.

[4] "ver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pistola posterior, letter 188 from Newton to Oldenburg, October 24, 1676, in *ibid.*, 130.

[5] "hope for very great things from him": *Ibid.*

[6] "the same goal is approached": *Ibid.*

[7] "I have preferred to conceal it thus": *Ibid.*, 134. The encryption encodes Newt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em and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calculus: "given any equation involving any number of fluent quantities, to find the fluxions, and conversely." See also page 153, note 25.

眨眼之间

1672-1676年，莱布尼茨创立了他自己的微积分。和牛顿一样，他发现并证明了基本定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围绕它建立了一个算法体系。莱布尼茨写道，在基本定理的帮助下，他能够在“眨眼之间”^[1]推导出当时已知的关于求积法和切线的几乎所有定理，除了牛顿仍在隐藏的那些。

1676年，莱布尼茨给牛顿写了两封信，想打探和询问证明过程，尽管他知道自己有些死缠烂打，但还是忍不住这样做。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觉得自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缺点，^[2]那就是缺乏优雅的举止，以至于经常毁掉他人对我的第一印象。”

莱布尼茨身形瘦削，弯腰驼背，面色苍白，^[3]尽管他外表平平，但智力超群。在包括笛卡儿、伽利略、牛顿和巴赫在内的世纪天才中，他是最全能的一位^[4]。

虽然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的时间比牛顿晚了10年，但人们通常认为他是微积分的共同发明者，原因有以下几点。莱布尼茨率先以一种优美和易于理解的形式公布了微积分，并用一种精心设计的简洁符号来表达它，我们至今仍在使用这种符号。而且，他吸引了一些热衷于传播微积分的追随者，他们写出了有影响力的教科书，并在诸多细节上发展了这门学科。后来，当莱布尼茨被指控从牛顿那里剽窃了微积分时，他的追随者极力为他辩护，并以同样的热情还击牛顿。

在发现微积分方面，莱布尼茨使用的方法^[5]比牛顿的方法更基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更直观。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关于导数的研究一直被称作微分学，为什么求导运算被称作微分。这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的方法中，微分的概念是微积分真正的核心；而导数是次要的，是事后添加的东西，或者说是后来的一种改进。

但今天，我们常常忘记微分的重要性。现代教科书会贬低、重新定义或者粉饰它们，只因为它们是无穷小量。这样一来，它们就被视为自相矛盾、离经叛道和恐怖骇人的东西，所以很多书为了万无一失，便把无穷小量像电影《惊魂记》里诺曼·贝茨的母亲那样“锁在阁楼里”。但它们其实没什么可怕的，真的。

让我们去看看“阁楼里的母亲”吧。

[1]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lid”: Letter from Leibniz to Marquis de

L'Hospital, 1694, excerpted in Child, *Early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221. Also quoted in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44.

[2] “burdened with a deficiency”: Mates, *Philosophy of Leibniz*, 32.

[3] Skinny, stooped, and pale: *Ibid.*

[4] the most versatile genius: For Leibniz's life, see Hofmann, *Leibniz in Paris*;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and Mates, *Philosophy of Leibniz*. For Leibniz's philosophy, see Mates, *Philosophy of Leibniz*. For Leibniz's mathematics, see Child, *Early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Dunham, *Journey Through Geniu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Dunham, *The Calculus Gallery*; Simmons, *Calculus Gems*; Guicciardini, *Isaac Newton*;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and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5] Leibniz's approach to calculus: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apter 9, is especially good. See also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ection 12.6, and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chapter 2.

无穷小量

无穷小量是一种模糊的东西，它应该是你能想到的最小却不为0的数。更简洁地说，无穷小量小于一切，但又大于0。

更加矛盾的是，无穷小量的大小不同。一个无穷小量的无穷小部分还要小得多，我们称之为二阶无穷小量。

正如存在无穷小的数一样，也存在无穷小的长度和无穷小的时间。无穷小的长度尽管不是一个点（它比点大），但却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长度都小。同样，无穷小的时间间隔尽管不是一瞬间，也不是一个时间点，但却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持续时间都短。

无穷小量的概念是作为一种讨论极限的方式出现的。还记得在第1章的例子中，我们观察了一系列正多边形，先是等边三角形和正方形，然后是五边形、六边形和其他边数越来越多的正多边形。我们注意到，边的数量越多，边长就越短，多边形看上去也越像圆。尽管我们很想说圆就是边长无穷小的无穷多边形，但还是忍住了，因为这种想法似乎会变成无稽之谈。

我们也发现，如果选择圆周上的任意一点并在显微镜下观察它，那么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加，包含该点在内的任意微小的弧看起来都会越来越直。在放大无穷倍的极限情况下，那段微小的弧看上去就是笔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圆看作由无穷多条线段组成的形状，进而把它视为边长无穷小的无穷多边形，似乎大有帮助。

虽然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利用了无穷小量，但牛顿后来又否认了它们，改为支持流数（一阶无穷小量的比率，它们像导数一样是有限的和可接受的）。莱布尼茨则对无穷小量持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1]，他并不在意它们是否真实存在，而只将其视为重构关于极限的论证过程的有效方式。莱布尼茨还把无穷小量当作解放想象力的有效簿记工具，从而使研究工作更富成效。就像他向一位同行解释的那样：“从哲学角度讲，我对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一视同仁。我认为它们都是思维的虚构产物^[2]，以及适用于微积分的简洁讲述方式。”

今天的数学家是怎么想的呢？无穷小量确实存在吗？这取决于你对“确实”一词的理解。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无穷小量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但话说回来，无穷小量也不存在于其他数学领域中）。在理想的数学世界里，尽管无穷小量在实数系中不存在，但它们的确存在于某些扩充了实数系的非标准数系中。对莱布尼茨及其追随者来说，无穷小量是以迟早会

派上用场的思维虚构产物的形式存在的，这也将成为我们看待无穷小量的方式。

[1] more pragmatic view: For example, Leibniz wrote: “We have to make an effort in order to keep pure mathematics chaste from metaphysical controversies. This we will achieve if, without worrying whether the infinites and infinitely smalls in quantities, numbers, and lines are real, we use infinites and infinitely smalls as an appropriate expression for abbreviating reasonings.” Quoted in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160.

[2] “fictions of the mind”: Leibniz in a letter to Des Bosses in 1706, quoted in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159.

2.001的立方

为了理解无穷小量是多么富有启发性，我们不妨从非常具体的例子入手。思考一下这个算术问题：2的立方（ $2 \times 2 \times 2$ ）是多少？答案当然是8。那么， $2.001 \times 2.001 \times 2.001$ 是多少？其结果肯定略大于8，但到底大多少呢？

在这里，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个数值解。一般性的问题是，当我们改变一个问题的输入（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把2变为2.001）时，输出会改变多少呢？（在这里，答案从8变为8加上某个我们想要了解其结构的东西）。

既然很难忍住不偷看，那么干脆看看计算器会告诉我们什么吧。输入2.001，然后按下 x^3 键，得到：

$$(2.001)^3 = 8.012\ 006\ 001$$

我们需要注意的结构是这个数的小数部分，它实际上是由3个大小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0.012\ 006\ 001 = 0.012 + 0.000\ 006 + 0.000\ 000\ 00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小”的部分加上“超小”的部分再加上“超超小”的部分，并运用代数方法来理解这个结构。假设一个量 x （在这个例子中是2）略微变化为 $x + \Delta x$ （在这个例子中是2.001）。符号 Δx 表示 x 的差分，指 x 的微小变化量（在这个例子中 $\Delta x = 0.001$ ）。当我们问 $(2.001)^3$ 是多少时，我们实际上问的是 $(x + \Delta x)^3$ 等于多少。经过乘法运算（或者运用杨辉三角形和二项式定理），我们发现：

$$(x + \Delta x)^3 = x^3 + 3x^2\Delta x + 3x(\Delta x)^2 + (\Delta x)^3$$

把 $x=2$ 代入后，这个方程变为：

$$\begin{aligned}(2 + \Delta x)^3 &= 2^3 + 3(2)^2(\Delta x) + 3(2)(\Delta x)^2 + (\Delta x)^3 \\ &= 8 + 12\Delta x + 6(\Delta x)^2 + (\Delta x)^3\end{aligned}$$

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除了8以外的数位是由3个大小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小但却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是 $12\Delta x = 12 \times 0.001 = 0.012$ ，而 $6(\Delta x)^2$ 和 $(\Delta x)^3$ 则分别对应超小部分0.000 006和超超小部分0.000 000 001。某

个部分中 Δx 的指数越大，其数值就越小。每多乘以一次微小的因子 Δx ，都会让一个小的部分变得更小，这就是各个部分大小不同的原因。

这个例子虽然不起眼，却恰恰展示出微积分背后的核心观点。在很多关于原因与结果、剂量与反应、输入与输出，或者其他类型的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之间关系的问题中，输入的一个小的变化量（ Δx ）都会使输出产生一个小的变化量（ Δy ）。这个小变化量通常是以我们可利用的结构化方式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输出的变化量包含不同层级的部分。按照大小，它们可以被分级成小的、超小的甚至更小的部分。这种分级方式会让我们专注于小但却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量，而忽略超小甚至更小的其他变化量。虽然这个变化量很小，但和其他变化量相比却是巨大的（比如，与0.000 006和0.000 000 01相比，0.012是巨大的）。这就是微积分背后的核心观点。

微分

除了对正确答案贡献最大的那一部分，其他部分全部忽略不计，这种思维方式似乎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如果输入的变化量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在前文中给2加上的0.001），那么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输入的变化量是无穷小的，这种思维方式反而会使结果变得精确；我们不会犯丝毫的差错，因为最大的那个部分变成了全部。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里看到的那样，无穷小的变化量恰恰是我们理解斜率、瞬时速度和曲线下方面积所需要的东西。

为了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实际效果，让我们回到前文的例子中，计算一个略大于2的数的立方。只不过我们现在要把2变为 $2 + dx$ ，其中 dx 表示无穷小的差分 Δx ，这个概念本质上没什么意义，所以不用想太多，关键是学会如何利用它使微积分运算变得轻而易举。

特别是前文中将 $(2 + \Delta x)^3$ 展开为 $8 + 12\Delta x + 6(\Delta x)^2 + (\Delta x)^3$ 的计算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缩减得更简单：

$$(2 + dx)^3 = 8 + 12 dx$$

那么，像 $6(dx)^2 + (dx)^3$ 这样的其他项去哪里了？答案是：我们舍弃了它们。作为超小和超超小的无穷小量，它们与 $12dx$ 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保留 $12dx$ 呢，它和8相比不也是微不足道的吗？尽管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我们把它也舍弃了，就无法考虑任何变化量了，答案将一直是8。所以秘诀在于，想要研究无穷小的变化量，就必须保留涉及 dx 的一次方的项，而忽略其他项。

对于这种利用 dx 之类的无穷小量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极限的角度重新加以表述，使其变得十分合理和严密，这就是现代教科书的处理方式。但是，使用无穷小量的方法更简单也更快，在这种背景下，它们对应的术语是微分。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把它们看作 Δx 和 Δy 的差，这些差趋于极限值0。就像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抛物线时看到的那样，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加，曲线变得越来越直。

微分求导法

让我向你们展示一下，如果改用微分来表达，某些概念会变得多么简单。比如，当一条曲线被视为 xy 平面内的图像时，它的斜率是多少？我们从抛物线的相关研究（第6章）中了解到，曲线的斜率是 y 的导数，即当 Δx 趋于0时 $\Delta y/\Delta x$ 的极限。但从微分的角度看，斜率又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 dy/dx ，这就好像曲线是由很短的线段组成的一样（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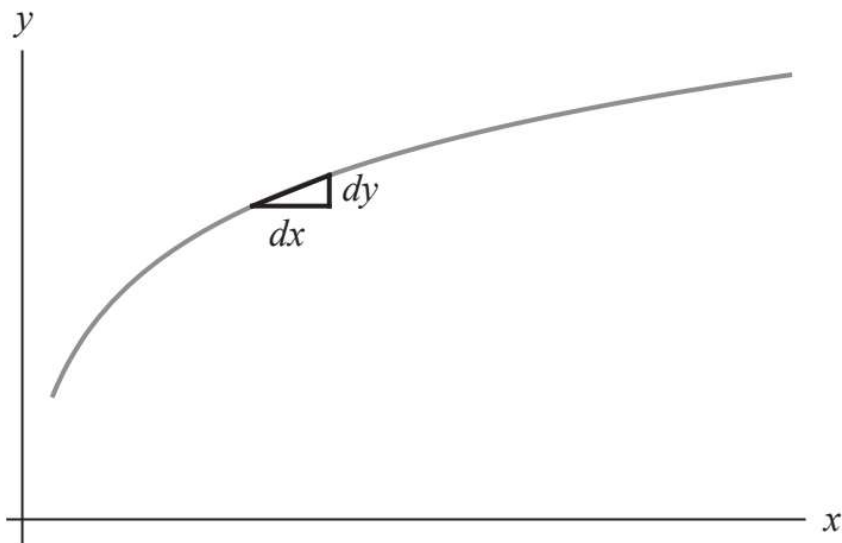


图8-1

如果我们把 dy 看作一个无穷小的垂直高度，把 dx 看作一个无穷小的水平距离，那么斜率一如既往地等于垂直高度除以水平距离，即 dy/dx 。

为了将其应用于一条特定的曲线（比如 $y=x^3$ ，也就是我们在计算略大于2的数的立方时思考过的例子），我们用以下方法计算 dy ：

$$y + dy = (x + dx)^3$$

和前文中一样，我们将方程右边展开为：

$$(x + dx)^3 = x^3 + 3x^2dx + 3x(dx)^2 + (dx)^3$$

不过，按照秘诀，我们现在要舍弃 $(dx)^2$ 项和 $(dx)^3$ 项，因为它们并不是最大的部分。这样就有：

$$y + dy = (x + dx)^3 = x^3 + 3x^2dx$$

又因为 $y = x^3$ ，我们简化上面的方程得到：

$$dy = 3x^2dx$$

两边同时除以 dx ，得出相应的斜率：

$$\frac{dy}{dx} = 3x^2$$

当 $x = 2$ 时，斜率为 $3 \times (2)^2 = 12$ ，跟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结果一样。这也是我们把2变为2.001后得到 $(2.001)^3 \approx 8.012$ 的原因，它意味着， x 相较于2的无穷小变化量（被称作 dx ）被转化为 y 相较于8的无穷小变化量（被称作 dy ），而且后者是前者的12倍（ $dy = 12dx$ ）。

顺便说一下，类似的推理过程表明，对于任意正整数 n ， $y = x^n$ 的导数都是我们在前文中提过的 $dy/dx = nx^{n-1}$ 。稍做研究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推广至 n 为负数、小数和无理数的情况。

无穷小量和微分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提供了捷径，使计算变得更加简单。就像早些时候代数对几何学的影响一样，它们解放了人们的头脑，激发出更具创造性的想法。这也是莱布尼茨喜欢微分的原因，他在写给导师惠更斯的信中说，“我的微积分^[1]几乎毫不犹豫地到目前关于这个学科的大部分发现都给了我。其中最令我欢喜的一点是，它在阿基米德几何方面赋予我们超越古人的优势，就像韦达和笛卡儿在欧几里得或阿波罗尼奥斯几何方面赋予我们的优势一样，使我们无须仅凭想象力去做研究。”

无穷小量唯一的缺陷在于，它们并不存在，至少在实数系中如此。哦，还有一件事：它们是自相矛盾的，即使真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莱布尼茨的追随者之一约翰·伯努利意识到，尽管 dx 不为0，但无穷小量也必须满足 $x + dx = x$ 这样无意义的方程。好吧，你不可能拥有一切。一旦我们会如何利用无穷小量，它们就会给出正确的答案。对我们而言，它们带来

的好处可以大大弥补它们可能会造成的精神痛苦。就像毕加索眼中的艺术一样，它们也是能让我们了悟真相的“谎言”。

为了进一步证明无穷小量的力量，莱布尼茨又利用它们推导出斯涅尔的光折射正弦定律。第4章介绍过，当光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中（比如从空气进入水）时，它会发生弯折，其遵循的数学定律在几个世纪里被多次发现。尽管费马运用他的最短时间原理解释了这个问题，但他的核心目的其实是解决这个原理暗含的优化问题。莱布尼茨利用他的微分学轻松地推导出正弦定律，^[2]并且自豪地指出：“其他学识渊博的人^[3]大费周章得出的结论，精通微积分的人却好像拥有魔法一样只做了几步推导就搞定了。”

^[1] “My calculus”: Quoted in *ibid.*, 166.

^[2] Leibniz deduced the sine law with ease: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59.

^[3] “other very learned men”: Quoted in *ibid.*

通过微分推导出基本定理

莱布尼茨微分学的另一项成就在于，它让基本定理变得一目了然。回想一下，基本定理与面积累积函数 $A(x)$ 有关，这个函数给出了曲线 $y=f(x)$ 下方从0到 x 区间内的面积。基本定理认为，当我们向右滑动 x 时，曲线下方的面积会以 $f(x)$ 的速率增大。因此， $f(x)$ 是 $A(x)$ 的导数（图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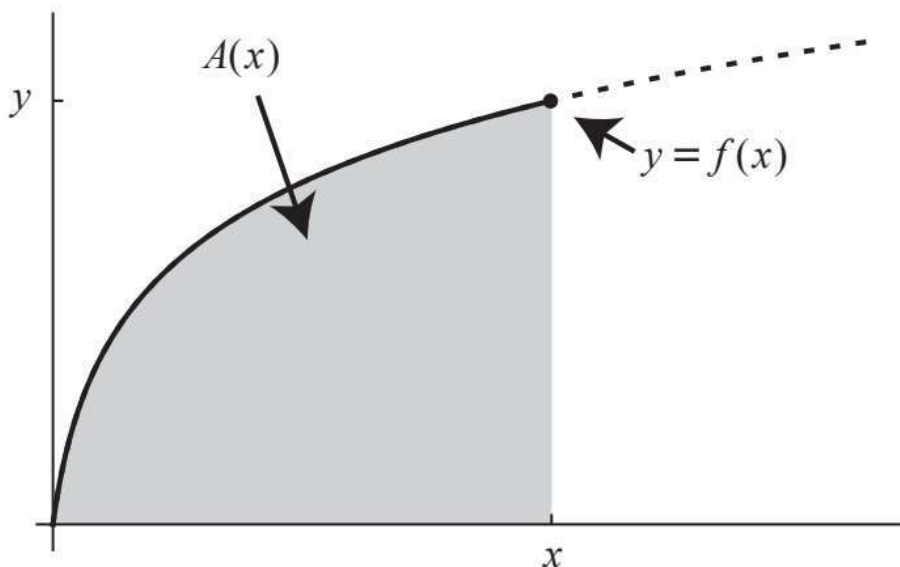


图8-2

为了弄清楚这个结果从何而来，假设我们给 x 增加一个无穷小量使它变为 $x + dx$ ，那么面积 $A(x)$ 会改变多少呢？根据定义，它的变化量应该是 dA 。因此，新的面积等于原来的面积加上面积的变化量，即 $A + dA$ 。

一旦我们直观地展示出 dA ，基本定理就会立刻不证自明。如图8-3所示，无穷小的面积变化量 dA 是 x 和 $x + dx$ 之间的无限细长的竖条面积。这个竖条是一个高为 y 、底为 dx 的矩形，所以它的面积等于高乘以底，即 ydx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写成 $f(x)d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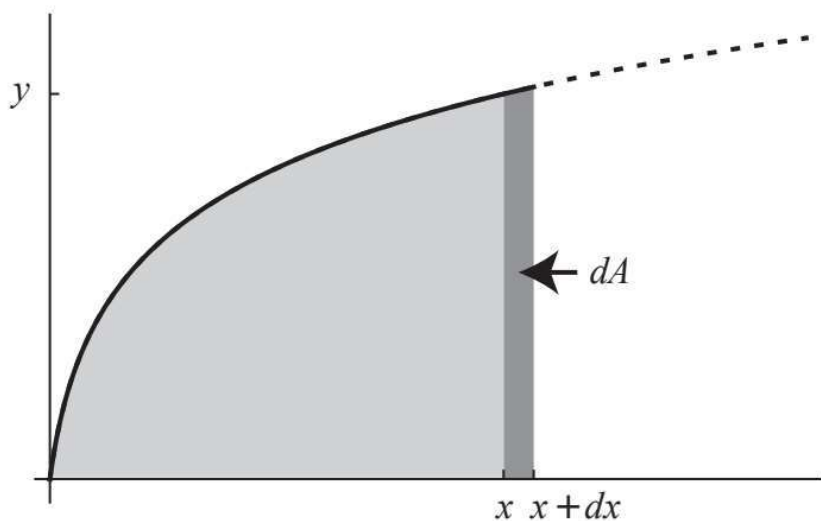


图8-3

实际上，只有在放大无穷倍的情况下，这个竖条才会是一个矩形。在现实中，对宽度为任意有限值 Δx 的竖条来说，面积的变化量 ΔA 由两个部分组成。占主导地位的部分是一个面积为 $y\Delta x$ 的矩形，还有一个小得多的部分是矩形上方的类似三角形的微小的曲边“帽子”（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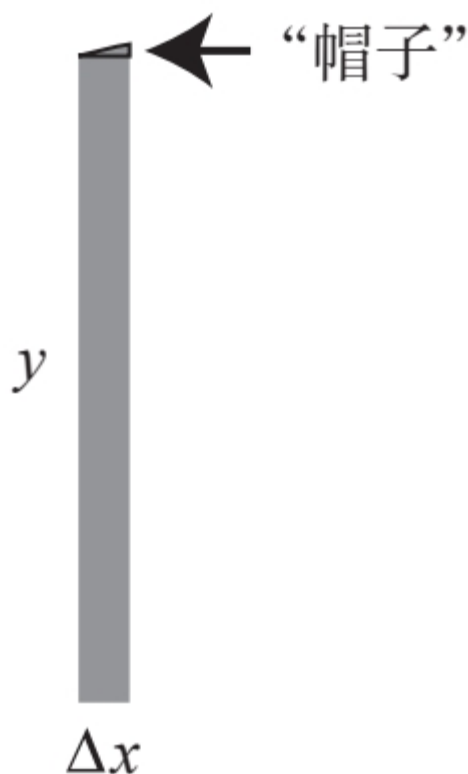


图8-4

这是另一个体现无穷小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美好的例子。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帽子”的面积，但它估算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取决于“帽子”顶部曲线的具体情况。但当矩形的宽度趋于0并且“变成” dx 时，相较于矩形的面积，“帽子”的面积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前者是小的部分，而后者是超小的部分。

所以，结果是： $dA = ydx = f(x)dx$ 。嘭！这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今天更受欢迎的形式（在这个被误导的时代，微分已经被导数取代了）：

$$\frac{dA}{dx} = y = f(x)$$

这正是我们在第7章利用油漆滚筒证明的结论。

还有最后一件事，当曲线下方的面积被视为无穷多个无穷小的矩形条的面积之和时，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A(x) = \int_0^x f(x)dx$$

其中，那个像天鹅颈一样的符号实际上是一个拉伸的“S”，它提醒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求和运算。它是积分学特有的一种求和运算，通过求无穷多个无穷小的矩形条面积之和，把它们整合成单一的连贯区域。这个表示整合的符号被称为积分号，莱布尼茨在1677年的一篇手稿中引入该符号，并在1686年进行了公开发表。积分号是微积分中最容易辨识的标志，它底部的0和顶部的x表示矩形在x轴上所处区间的端点，这些端点被称作积分限。

莱布尼茨是如何发现微分和基本定理的？

牛顿和莱布尼茨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各自得出了微积分基本定理。牛顿的方法是思考运动与流动问题，也就是数学连续性的一面。而莱布尼茨的方法正相反，尽管他是一个未受过正规训练的数学家，但他年轻时花了些时间思考离散数学问题，比如整数与计数、组合与排列，以及分数与特定类型的和。

在遇到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后，莱布尼茨开始涉足更深的领域。当时，他正在巴黎执行一项外交任务，但他被惠更斯讲述的那些最新的数学成果迷住了，并且渴望了解得更多。凭借在教学方面惊人的先见之明（或者说是运气），惠更斯提出了一个将引领他的学生（莱布尼茨）发现基本定理的问题，^[1]即如何求解下面这个无穷级数的和。

$$\frac{1}{1 \times 2} + \frac{1}{2 \times 3} + \frac{1}{3 \times 4} + \frac{1}{n(n+1)} + \dots = ?$$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我们先从它的热身版算起。假设要求和的不是无穷多项而是99项，那么算式变为：

$$S = \frac{1}{1 \times 2} + \frac{1}{2 \times 3} + \frac{1}{3 \times 4} + \frac{1}{n(n+1)} + \dots + \frac{1}{99 \times 100}$$

如果你看不出其中的技巧，它就是一个冗长而直接的计算过程。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或者一台计算机），我们就可以逐一地加总这99项。但这样做是抓不住重点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简洁的解法。简洁的解法在数学中颇具价值，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美观，还在于它们强大有力，常常被用来阐明其他问题。在这个例子中，莱布尼茨发现的简洁解法很快就指引他得出了基本定理。

莱布尼茨利用一个绝妙的技巧解决了惠更斯的问题。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位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如果你想获得同样的体验，那么你可以跳过我接下来做的类比分析；但如果你想

了解魔术背后的奥秘，下面就是揭秘时刻了。

假设一个人正在爬一段很长且不太规则的楼梯，如图8-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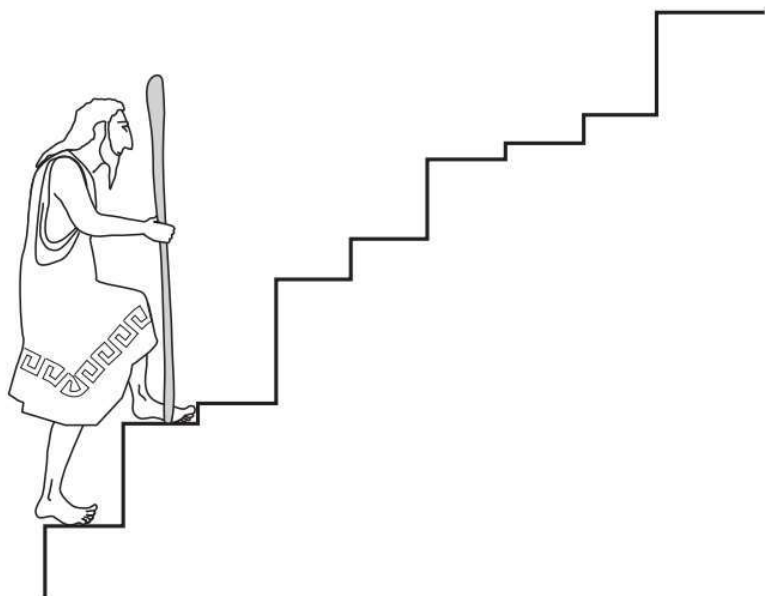


图8-5

如果攀登者想测量从楼梯底部到顶部的垂直高度，他如何才能做到呢？当然，他可以把每个台阶的垂直高度全部加起来，这种毫无创意的方法和前文中提到的把99项逐一加起来求 S 的做法是一样的。这样做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楼梯太不规则了，所以算起来会很麻烦。而且，如果这段楼梯有数百万个台阶，那么把它们垂直高度全部加起来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一定还有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就是使用高度计，高度计是测量海拔高度的装置。如果图8-5中的攀登者有一个高度计，他就可以用楼梯顶部的高度减去楼梯底部的高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总的垂直高度等于这两个高度之差。不管楼梯有多么不规则，这个方法都行之有效。

这个技巧的成功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度计的读数与台阶的垂直高度密切相关。任何一个台阶的垂直高度都是高度计的连续两次读数之差，换句话说，单一台阶的高度等于它的顶部高度减去它的底部高度。

现在你可能会想，高度计和那个把一长串复杂且不规则的数字加起来的数学题有什么关系呢？好吧，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找到高度计的类似物，并用它来解决复杂且不规则的求和问题，那么事情将会变得像用高度计的最高读数减去最低读数一样简单。这基本上就是莱布尼茨所做的事情，他找到了适用于 S 的“高度计”，并把求和算式中的每一项都改写成高度计的连续两次读数之差的形式，从而算出了 S 。之后，莱布尼茨又把高度计推广到其他问题上，最终在它的引领下发现了微积分基本定理。

记住这个类比，我们再来检视一下 S ：

$$S = \frac{1}{1 \times 2} + \frac{1}{2 \times 3} + \frac{1}{3 \times 4} + \frac{1}{n(n+1)} + \cdots + \frac{1}{99 \times 100}$$

我们要把这个算式的每一项都改写成两个数字之差的形式，这就好比每个台阶的垂直高度等于它的顶部高度减去底部高度。第一个“台阶”可改写为：

$$\frac{1}{1 \times 2} = \frac{2 - 1}{1 \times 2} = \frac{1}{1} - \frac{1}{2}$$

诚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请耐心等待。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将分数 $1/(1 \times 2)$ 改写成两个连续单位分数 $1/1$ 和 $1/2$ 之差的形式，是多么有用。（单位分数指分子为1的分数，这些连续的单位分数将发挥高度计的连续两次读数的作用。）而且，如果上面的算法不够清晰，你可以尝试按从右到左的顺序来简化方程。在最右边，我们用一个单位分数（ $1/1$ ）减去另一个单位分数（ $1/2$ ）；在中间，我们对它们进行通分；在最左边，我们简化了分子。

同样地，我们可以把 S 中的其他项都改写成连续单位分数之差的形式：

$$\frac{1}{2 \times 3} = \frac{3 - 2}{2 \times 3} = \frac{1}{2} - \frac{1}{3}$$

$$\frac{1}{3 \times 4} = \frac{4 - 3}{3 \times 4} = \frac{1}{3} - \frac{1}{4}$$

...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连续单位分数之差加总时， S 就会变为：

$$S = \left(\frac{1}{1} - \frac{1}{2}\right) + \left(\frac{1}{2} - \frac{1}{3}\right) + \left(\frac{1}{3} - \frac{1}{4}\right) + \cdots + \left(\frac{1}{98} - \frac{1}{99}\right) + \left(\frac{1}{99} - \frac{1}{100}\right)$$

现在，仔细观察这个求和算式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单位分数都出现了两次，一次带负号，一次带正号。比如， $1/2$ 先被减去，随后又被加上，净效应是含有 $1/2$ 的项相互抵消。 $1/3$ 亦如此，它出现了两次，并且相互抵消。事实上，包括 $1/99$ 在内的几乎所有其他单位分数都是这样，除了第一个单位分数（ $1/1$ ）和最后一个单位分数（ $1/100$ ）。由于它们处在求和算式的两端，没有可相互抵消的搭档。在烟雾消散后，它们是仅存的单位分数。所以，结果是：

$$S = \frac{1}{1} - \frac{1}{100}$$

从楼梯类比的角度看，这个结果完全讲得通，因为所有台阶的垂直高度之和就等于楼梯的顶部高度减去它的底部高度。

顺便说一下， S 可以简化为 $99/100$ ，这正是99项分数求和问题的答案。莱布尼茨意识到，他可以用同样的技巧计算任意多项分数的和。如果求和算式包含 N 项而不是99项，那么结果将是：

$$S = \frac{1}{1} - \frac{1}{N+1}$$

这样一来，惠更斯的无穷级数求和问题的答案就变得很清楚了：当 N 趋于无穷时， $1/(N+1)$ 会趋于0， S 则会趋于1。所以，极限值1就是惠更斯谜题的答案。

莱布尼茨能求出这个无穷级数和的关键在于，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可以改写成连续差（在这个例子中是连续单位分数差）之和的形式。这种差结构引发了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大规模抵消现象，具有这种性质的和现在被称作“伸缩和”，因为它们会让人想起海盗电影中老式的可折叠望远镜，也就是那种可随意伸缩的小型望远镜。原始的求和算式好比拉伸的望远镜，但由于它的差结构，该算式可以缩短成一个紧凑得多的结果。而仅剩的未压缩项在“望远镜”的两端，因为它们没有可相互抵消的搭档。

莱布尼茨自然想知道，他能否在其他问题上使用这种伸缩技巧。考虑到该技巧的强大力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想法。面对一长串待求和的数，如果他能把每个数都改写成连续数（待定）之差的形式，这种伸缩技巧将再次行之有效。

这让莱布尼茨想到了面积。毕竟，估算 xy 平面上的一条曲线下方的面积，就相当于对一长串的数（很多竖直的细矩形条的面积）求和。

我们可以从图8-6中看出他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虽然该图中只有8个矩形，但你应该试着去想象一幅类似的图，其中有数百万乃至几十亿个细矩形条，或者更好的是，有无穷多个无限细的矩形条。遗憾的是，这种图很难绘制或者直观地展现出来。所以，我暂且以8个短粗的矩形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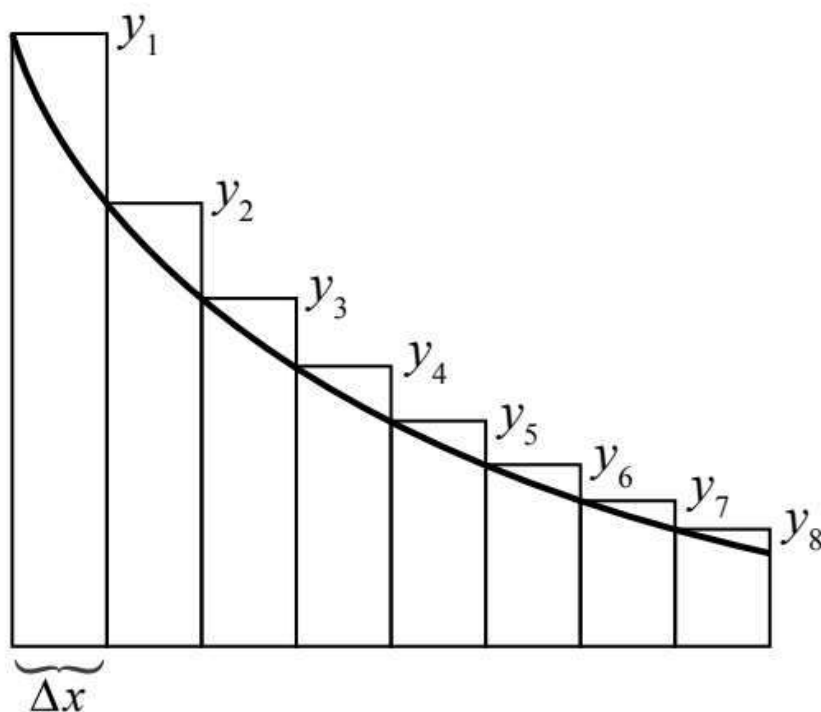


图8-6

为简单起见，假设这8个矩形的底均为 Δx ，高分别是 $y_1, y_2, \dots, y_8$ 。那么，这些近似矩形的总面积是：

$$y_1\Delta x + y_2\Delta x + \dots + y_8\Delta x$$

如果我们想让这8个数字顺利地伸缩，就要通过某种方式找到神奇的数字 $A_0, A_1, A_2, \dots, A_8$ ，并使它们的差分别等于这8个矩形的面积。

$$y_1\Delta x = A_1 - A_0$$

$$y_2\Delta x = A_2 - A_1$$

$$y_3\Delta x = A_3 - A_2$$

...

$$y_8\Delta x = A_8 - A_7$$

于是，8个矩形的总面积就会伸缩为：

$$y_1\Delta x + y_2\Delta x + \dots + y_8\Delta x = (A_1 - A_0) + (A_2 - A_1) + \dots + (A_8 - A_7)$$

$$= A_8 - A_0$$

现在考虑一下无限细的矩形条的极限情况：它们的底 Δx 变为微分 dx ；它们各不相同的高度 $y_1, y_2, \dots, y_8$ 变为函数 $y(x)$ ，这个函数将给出位于变量 x 处的矩形高度；无穷多个矩形的面积之和变为积分 $y(x)dx$ ；伸缩和由之前的 $A_8 - A_0$ 变为现在的 $A(b) - A(a)$ ，其中 a 和 b 是所要计算面积左右两端的 x 值。那么，这个无穷小版的伸缩过程可以得出曲线下方的精确面积为：

$$\int_a^b y(x)dx = A(b) - A(a)$$

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神奇函数 $A(x)$ 呢？可以看看像 $y_1\Delta x = A_1 - A_0$ 这样的方程，随着矩形变得无限细，它们就会变成：

$$y(x)dx = dA$$

为了用导数而不是微分的形式来表示相同的结果，我们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 dx ，得到：

$$\frac{dA}{dx} = y(x)$$

这就是我们寻找可使伸缩过程发生的神奇数字 $A_0, A_1, A_2, \dots, A_8$ 的类似物的方法。在矩形条无限细的极限情况下，它们由未知函数 $A(x)$ 给出，而 $A(x)$ 的导数是已知曲线 $y(x)$ 。

这一切就是莱布尼茨版本的反向问题和微积分基本定理。正如他说的那样，“求图形面积的运算过程^[2]可以简化为：已知一个级数，去求和；或者已知一个级数，去找另一个级数，后者的连续数之差与前者的各项一致。”就这样，差与伸缩和引导莱布尼茨创立了微分和积分，并得出了基本定理，正如流数术与扩张的面积引领牛顿到达同一个隐秘源泉一样。

[1] problem that led him to the fundamental theorem: Ibid., 236–38. Actually, the sum that concerned Leibniz was the sum of the reciprocals of the triangular numbers, which is twice as large as the sum considered in the main text. See also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60–62.

[2] “Finding the areas of figures”: From a letter to 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 in 1679, quoted in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145. 218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For HIV and AIDS statistics, see <https://ourworldindata.org/hiv-aid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virus and attempts to combat it, see <https://www.avert.org/professionals/history-hiv-aids/overview>.

在微积分的帮助下对抗HIV

尽管微分是思维的虚构产物，但自从莱布尼茨发明微分以来，它们就以非虚构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社会和生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代的例子，看看微分在帮助人们理解和防治HIV方面起到的支持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神秘的疾病每年在美国导致几万人死亡，在全世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尽管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来自哪里或者由什么引发，但它的影响却显而易见。它会严重削弱患者的免疫系统，使他们变得易受罕见癌症、肺炎和机会性感染的侵害。这种疾病的致死过程缓慢、痛苦，还会损毁患者的容貌。医生称其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或者艾滋病（AIDS），它让患者和医生都备感绝望，因为根本看不到治愈的希望。

基础研究表明，引发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反转录病毒。它的致病机制非常阴险：病毒攻击并感染被称作辅助性T细胞的白细胞，这类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一旦进入T细胞，病毒就会操纵细胞的遗传机制，并利用它们制造更多的病毒。然后，这些新的病毒颗粒从细胞中逃脱，“免费搭乘”血流及其他体液，去寻找和感染更多的T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对这种侵袭做出的反应是，试图将血液中的病毒颗粒清除出去，并尽可能地消灭感染了病毒的T细胞。在这个过程中，免疫系统也杀死了自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种获批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出现于1987年。尽管它们通过干扰操纵过程减慢了HIV的感染速度，但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而且病毒常会对它们产生抗性。1994年出现了另一类药物——蛋白酶抑制剂，这类药物通过干扰新产生的病毒颗粒，阻止它们成熟和使它们不具备传染性来抑制HIV。虽然蛋白酶抑制剂也无法治愈艾滋病，但对患者而言它们已经是天赐之物了。

蛋白酶抑制剂问世后不久，由何大一博士（曾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专业，应该对微积分很熟悉）领导的研究团队和数学免疫学家艾伦·佩雷尔森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改变了医生对HIV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治疗方式。在何大一与佩雷尔森的这项研究之前，人们认为未经治疗的HIV感染通常会经历3个阶段：[\[1\]](#)历时几周的急性初期，最长可达10年的慢性和无症状期，艾滋病末期。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一个人感染HIV后不久，他会表现出发烧、皮疹和头痛等流感样症状，血流中的辅助性T细胞（也被称为CD4细胞）的数量骤降。T细胞的正常数量是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1 000个，而在HIV感染初

期T细胞数量会降至几百个。由于T细胞能帮助身体对抗感染，所以它们的损耗会严重削弱免疫系统。与此同时，血液中的病毒颗粒数量（病毒载量）猛增，之后随着免疫系统开始对抗HIV感染而下降。于是，流感样症状消失，患者感觉好多了。

在第一阶段结束后，病毒载量令人疑惑不解地稳定在一个可以维持多年的水平上，医生将这个水平称为“调定点”。一个未经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存活10年，除了持续性的病毒载量和缓慢下降的低T细胞数量外，没有任何HIV相关症状和实验室结果。但最终无症状期结束，艾滋病发病，这一阶段的特征是T细胞数量进一步减少而病毒载量激增。未经治疗的患者一旦病情发展成完全型艾滋病，机会性感染、癌症和其他并发症通常会导致他们在两三年内死亡。

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于HIV感染长达10年的无症状期。这是怎么回事呢？HIV是潜伏在人体内吗？我们已经知道有些病毒会在人体内潜伏，比如，生殖器疱疹病毒能潜伏在神经节中以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水痘病毒能在神经细胞中潜藏多年，有时还会引发带状疱疹。而对于HIV感染，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潜伏期，但何大一和佩雷尔森的研究^[2]让这个问题的答案浮出了水面。

在1995年的一项研究中，出于探测而非治疗的目的，他们给患者服用了蛋白酶抑制剂。这推动患者的身体偏离了调定点，也让何大一和佩雷尔森有史以来第一次跟踪到免疫系统对抗HIV的动态过程。他们发现，在服用蛋白酶抑制剂后，所有患者血流中的病毒颗粒数量都呈指数下降。血流中的病毒颗粒每两天就会被免疫系统清除掉一半，这样的衰减率令人难以置信。

佩雷尔森和何大一利用微分学为这种指数式衰减建模，并从中提取出其惊人的效果。他们用未知函数 $V(t)$ 表示血液中不断变化的病毒浓度，其中 t 表示施用蛋白酶抑制剂后经过的时间。然后，他们假设在无穷小的时间间隔（ dt ）内，病毒浓度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dV ）。他们的数据表明，每天血液中有恒定比例的病毒被清除，当据此外推无穷小的时间间隔（ dt ）内的情况时，这个比例也许会保持不变。由于 dV/V 是病毒浓度的比例变化，所以他们的模型可以表示成下面的方程：

$$\frac{dV}{V} = -c dt$$

其中，比例常数 c 是清除率，它衡量的是身体清除病毒的速度有多快。

上面的方程是一个典型的微分方程，它把微分 dV 与 V 及经过时间的微分 dt 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基本定理对方程两边积分，佩雷尔森和何大一解出了 $V(t)$ ，并发现它满足：

$$\ln[V(t)/V_0] = -ct$$

其中， V_0 是初始病毒载量， $\ln$ 表示自然对数（牛顿和墨卡托在17世纪60年代研究过这种对数函数）。求这个函数的反函数可得：

$$V(t) = V_0 e^{-ct}$$

其中， e 是自然对数的底，这证明了模型中的病毒载量的确呈指数式衰减。最终，通过用指数式衰减曲线去拟合他们的实验数据，何大一和佩雷尔森估算出之前未知的清除率 c 的值。

而对那些喜欢导数胜过微分的人来说，该模型的方程可以改写为：

$$\frac{dV}{dt} = -cV$$

在这里， dV/dt 是 V 的导数，它衡量的是病毒浓度增长或下降的速度有多快。导数为正值表示增长，导数为负值则表示下降。由于浓度 V 是正值，所以 $-cV$ 必定为负值，导数也必定为负值，这意味着病毒浓度必然下降，就像我们在实验中看到的一样。此外， dV/dt 与 V 之间的正比关系意味着， V 越接近0，病毒浓度的下降速度就越慢。直观地说， V 缓慢下降的情况就好比你先往水槽里灌满水再向外排水，水槽里剩下的水越少，水的排出速

度就越慢，因为将水向下推的压力越来越小。在这个类比中，病毒数量就像水一样，而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过程则像水槽向外排水一样。

在为蛋白酶抑制剂的效果建模后，何大一和佩雷尔森对他们的方程进行了修正，以便描述在施用药物前病毒载量的情况。他们认为方程会变成：

$$\frac{dV}{dt} = P - cV$$

在这个方程中， P 指在未受抑制的情况下新病毒颗粒的产生速度，它是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的未知量。何大一和佩雷尔森设想在施用蛋白酶抑制剂之前，被感染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释放新的感染性病毒颗粒，然后它们又会感染其他细胞，以此类推。这种燎原之势正是HIV具有巨大毁灭性的原因。

但在无症状期，病毒的产生和它们被免疫系统清除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平衡状态。在调定点，病毒的产生速度和被清除速度同样快，这为病毒载量为何能多年保持不变提供了新的见解。用水槽里的水来类比的话，这种情况就像你同时打开水龙头和排水口一样。当流出量等于流入量时，水槽里的水将会达到稳态水平。

在调定点，病毒浓度不变，所以它的导数必定为0，即 $dV/dt=0$ 。于是，稳态病毒载量 V_0 满足：

$$P = cV_0$$

何大一和佩雷尔森利用上面这个简单的方程，估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那就是免疫系统每天清除的病毒颗粒数量为10亿个，而在此之前人们没有办法测量它。

这个数字出人意料，也着实惊人。它表明，在看似平静的10年无症状期内，患者体内持续发生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每一天，免疫系统都会清除10亿个病毒颗粒，而被感染的细胞则会释放出10亿个新的病毒颗粒。免疫系统全力以赴地和病毒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战争似乎进入了胶着状态。

1996年，何大一、佩雷尔森和他们的同事展开了一项后续研究，旨在更好

地处理他们在1995年发现却未能解决的问题。这次他们收集了在施用蛋白酶抑制剂后的更短时间间隔内的病毒载量数据，因为他们想获得更多关于药物吸收、分布和渗透进入靶细胞时发生的初始滞后现象的信息。在用药后，研究团队每两小时测量一次患者的病毒载量，直到第6个小时；然后每6小时测量一次，直到第2天；之后每天测量一次，直到第7天。在数学方面，佩雷尔森对微分方程模型进行了改进，将滞后现象纳入其中，并追踪了另一个重要变量——被感染的T细胞数量——的动态变化过程。

当研究人员重新做了实验，用数据去拟合模型的预测结果，并再次估算模型参数时，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加令人震惊的结果：每天产生而后又从血流中被清除的病毒颗粒多达100亿个。而且，他们发现被感染的T细胞的生命只有两天左右。虽然T细胞损耗是HIV感染和艾滋病的主要特征，但它们短得惊人的寿命却使这个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有关HIV的惊人复制速度的发现，改变了医生治疗HIV阳性患者的方式。在何大一和佩雷尔森开展相关研究之前，内科医生要等到HIV结束所谓的休眠后，才会给患者开抗病毒药物。他们的想法是，在患者的免疫系统真正需要帮助之前保存实力，因为病毒常会对药物产生抗性，到那时就无计可施了。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等到患者的病情发展后再进行治疗是更明智的做法。

然而，何大一和佩雷尔森的研究完全颠覆了这种观念：HIV并不存在休眠状态，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和人体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因此从关键的感染初期起，免疫系统就需要尽快得到它能获得的一切帮助。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没有一种药物能长期起效，因为病毒的复制和突变速度都十分迅速，以至于它们总能找到逃避几乎所有治疗药物的方法。

必须联合使用多少种药物才能打垮和抑制HIV，佩雷尔森运用数学工具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定量估计。通过将HIV的测定突变率、基因组大小，以及最新估算出的每天产生的病毒颗粒数量等因素考虑在内，他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在其基因组内的所有碱基上，HIV每天会多次发生各种可能的突变。即使是单一的突变也有可能产生抗药性，因此单一药物治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尽管同时使用两种药物的起效概率较高，但佩雷尔森的计算显示，在所有可能的双重突变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会每天发生。不过，联合使用三种药物的话，HIV就很难取胜了。计算结果表明，HIV能够同时发生必要的三重突变以逃避三联疗法^[3]的概率大约是千万分之一。

何大一及其同事在临床研究中对HIV感染者进行了三联鸡尾酒疗法测试，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在两周内，患者血液中的病毒水平下降为原来的1%左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则检测不到病毒了。

这并不是说HIV被根除了。不久后的研究显示，如果患者暂停治疗，病毒就会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问题在于，HIV可以隐藏在人体各处。它能藏匿于药物无法轻易渗透的庇护所，或者藏身于HIV潜伏感染的细胞中并停止复制，这是一种躲避治疗的狡猾方法。在任何时候，这些休眠细胞都有可能苏醒并开始制造新病毒。这就是为什么对HIV阳性患者来说坚持服用药物很重要，即使他们的病毒载量很低或检测不到。

尽管三联疗法不能治愈HIV，但却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病，至少对那些有条件治疗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它给这种令人绝望的疾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1996年，何大一博士被评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4]。2017年，艾伦·佩雷尔森因为“给理论免疫学带来了真知灼见并挽救了生命的深远贡献”，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的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奖^[5]。目前，他仍在利用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进行病毒动态分析。佩雷尔森最新的研究与丙型肝炎^[6]有关，这种病毒在全世界影响了约1.7亿人，是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每年导致35万人死亡。2014年，在佩雷尔森的数学方法的帮助下，丙型肝炎的新疗法被研发出来，就像每天服用一次药片一样安全简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疗法治愈了几乎所有的丙型肝炎患者。

[1] HIV infection typically progressed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Stages of HIV Infection,” AIDInfo, <https://aidsinfo.nih.gov/understanding-hiv-aids/fact-sheets/19/46/the-stages-of-hiv-infection>.

[2] Ho and Perelson’s work: Ho et al., “Rapid Turnover”; Perelson et al., “HIV-1 Dynamics”; Perelson, “Modelling Viral and Immune System”; and Murray, *Mathematical Biology* 1.

[3] triple-combination therapy: The results of the probability calculation first appeared in Perelson et al., “Dynamics of HIV-1.”

[4] Man of the Year: Gorman, “Dr.David Ho.”

[5] Perelson received a major priz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2017 Max Delbruck Prize in Biological Physics Recipient, https://www.aps.org/programs/honors/prizes/prizerecipient.cfm?first_nm=Alan&last_nm=Perelson&year=2017.

[6] hepatitis C: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ids Understanding of Hepatitis C Virus and Possible Cur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March 2013, <http://www.lanl.gov/discover/publications/connections/2013-03/understanding-hep->

c.php.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hepatitis C, see Perelson and Guedj, “Modelling Hepatitis C.”

第9章 宇宙的逻辑

微积分在17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一场蜕变，变得如此系统、深刻和强大，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都说微积分是在那时候“发明”的。根据这个观点，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前的是“原始微积分”，在他们之后的才是微积分。我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对我而言，自阿基米德利用无穷开始，就一直是微积分。

不管叫它什么，微积分在1664-1676年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世界。在科学领域，它促使人类开始阅读伽利略梦寐以求的自然之书。在技术领域，它发动了工业革命，并开启了信息时代。在哲学和政治领域，它在现代的人权、社会和法律概念上留下了印记。

我不会说微积分是在17世纪后期被发明的，而会把那个时期的变化描述为一种进化上的突破，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某个关键事件。在生命进化的早期阶段，生物都比较简单。它们是单细胞生物，类似于今天的细菌。那个单细胞生物时代持续了大约35亿年，占据地球历史的绝大部分。但在大约5亿年前，多样性惊人的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生物学家称之为寒武纪大爆发。在仅仅几千万年的时间（进化历程的一瞬间）里，很多主要的动物门类突然涌现出来。同样，微积分是数学领域的“寒武纪大爆发”^[1]。它一旦到来，数学领域的惊人多样性就开始“进化”产生。它们的“谱系”可以从以微积分为基础的名称中识别出来，比如微分几何、积分方程和解析数论。这些高级的数学分支就像多细胞生物的众多分支和物种一样，在这个类比中，数学领域的“微生物”指的是最早的课题：数字、形状和字问题（word problem）。和单细胞生物一样，它们也占据着数学历史的绝大部分。但在350年前微积分的“寒武纪大爆发”之后，新的数学“生命形式”开始繁荣兴盛，并且改变了它们周围的“景观”。

在很大程度上，生命的进化是一个在前体的基础上朝着更高级和更复杂的方向前进的故事，微积分也是这样。但是，这个故事的**方向**是什么？微积分的进化有方向吗？或者，就像有些人对生物进化的描述那样，它也是无方向和随机的吗？

在纯粹数学领域，微积分的进化是一个关于“杂交”和获益的故事。数学中较为古老的部分在与微积分“杂交”后变得活跃，比如，在引入以微积分为基础的工具（积分、无穷级数和、幂级数等）后，关于数字及其模式的古老研究重新焕发出活力，由此产生的混合领域被称为解析数论。同样，微分几何利用微积分阐明了平滑表面的结构，并揭示出它们拥有“近亲”的事实（尽管它们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那些存在于四维及更高维空间里的

难以想象的曲线形状。就这样，微积分的“寒武纪大爆发”使数学变得更抽象和更强大，也让它变得更像一个家族。微积分揭开了将数学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隐藏关系网。

在应用数学领域，微积分的进化是一个关于我们对变化的理解不断扩展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微积分始于对曲线（方向的变化）的研究，继而是对运动（位置的变化）的研究。在“寒武纪大爆发”特别是微分方程兴起之后，微积分更广泛地应用于对变化的研究。如今，微分方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流行病将如何传播，飓风将在哪里登陆，以及购买股票期权需要付多少钱。在人类努力探索的每个领域，微分方程已经成为描述我们周围和内部事物（从亚原子域到宇宙最远端）如何变化的通用框架了。

[1] Cambrian explosion for mathematics: For the many offshoots of calculus in the years from 1700 to the present, see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Boyer, *The History of the Calculus*; Edwa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Dunham, *The Calculus Gallery*;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自然的逻辑

微分方程的早期成就改变了西方文化的进程。1687年，牛顿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1]，展示了理性的力量并引发了启蒙运动^[2]。他发现了一个小的方程组（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它们可以解释伽利略、开普勒在地球上的落体和太阳系的行星轨道中发现的神秘规律。这样一来，他就消除了地球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区别。在牛顿之后，只存在一个宇宙，同样的定律总是适用于所有地方。

在他的三卷本权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常简称为《原理》）中，牛顿将他的理论应用于更多地方：地球的形状（自转的离心力导致它的腰部略微隆起），潮汐的节律，彗星的偏心轨道，以及月亮的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以至于牛顿向他的朋友埃德蒙·哈雷抱怨道，它“令我头痛，^[3]常常让我夜不能寐，我不会再去想它了”）。

今天，大学生在学习物理学时，他们会先接触经典力学（牛顿力学），然后了解到它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量子理论取代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新理论推翻了关于空间与时间、质量与能量以及决定论本身的牛顿式概念，就量子理论而言，它对自然的描述更具概率论和统计学的特征。

但是，微积分所起的作用并未改变。和在量子力学中一样，自然律在相对论中仍然以微积分的语言写就，并以微分方程的形式表述。对我来说，这是牛顿最伟大的遗产，他证明了自然是合乎逻辑的。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和几何学中的证明一样，都是利用逻辑推理的方式由一个真理得出另一个真理，只不过前者是世界上的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后者则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产生另一个想法。

自然与数学之间的这种神秘联系可回溯至毕达哥拉斯的梦想。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音乐和谐性与数之间的联系，并由此宣称“万物皆数”。对宇宙的运行而言，数很重要，形状也很重要，在伽利略梦寐以求的自然之书，字词就是几何图形。尽管数和形状可能同等重要，但它们并不是这出戏剧的真正驱动者。在宇宙大戏中，数和形状好像演员，它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存在——微分方程的逻辑——默默操控着。

牛顿是利用这个宇宙逻辑并围绕它建立体系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必要的概念还未诞生。阿基米德对微分方程一无所知，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和费马也不了解它。莱布尼茨虽然知道微分方程，但他的理解却不如牛顿那般科学，对数学的精通程度也比不上牛顿。所

以，宇宙的神秘逻辑只被赐予了牛顿一人。

他的理论核心就是他的运动微分方程：

$$F = ma$$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方程之一。它描述的是，作用于一个运动物体的力 F 等于该物体的质量 m 与它的加速度 a 的乘积。它之所以是一个微分方程，是因为加速度是一个导数（物体速度的变化率），或者用莱布尼茨的话说，它是两个微分之比：

$$a = \frac{dv}{dt}$$

在这里， dv 表示物体的速度 v 在无穷小的时间间隔 dt 内的无穷小的变化量。所以，如果已知作用于物体的力 F 和它的质量 m ，我们就可以利用方程 $F = ma$ 并通过 $a = F/m$ 算出它的加速度。加速度决定了物体的运动方式，它可以告诉我们物体的速度在下一个瞬间将会如何变化，物体的速度又可以告诉我们物体的位置将会如何变化。就这样， $F = ma$ 成了先知，它能预测物体未来的行为。

思考一下你能想到的最简单也是最荒凉的情景：一个孤立的物体独处于一个空空如也的宇宙中。它会如何移动呢？好吧，由于周围没有东西推动或者拉动它，作用于该物体的力 $F = 0$ 。又由于 m 不为0（假设物体是有质量的），根据牛顿定律可得 $F/m = a = 0$ ，这意味着 dv/dt 也等于0。但是， $dv/dt = 0$ 意味着在无穷小的时间间隔 dt 内，这个孤立物体的速度没有改变，在下一个或之后的时间间隔内也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是，当 $F = 0$ 时物体的速度永远保持不变。这就是伽利略的惯性定律：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静止的物体会一直保持静止状态，运动的物体则会一直保持运动状态，而且速度和方向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刚刚推导出的惯性定律，就是牛顿运动定律 $F = ma$ 的更深层次的逻辑结论。

早在上大学期间，牛顿似乎就知道了加速度与力成正比。他从伽利略的研究中了解到，如果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它要么保持静止，要么继续做匀速直线运动。他由此意识到，力并不是产生运动的必要条件，而是在运动中产生变化的必要条件，正是力使得物体加速、减速或者偏离直线

路径。

比起更早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这个见解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亚里士多德并不理解惯性，他认为只有力才能让物体保持运动。公平地说，在由摩擦力支配的情况下确实如此。如果你试图让桌子在地板上滑动，你就必须一直推它；一旦你不推了，桌子就会停止移动。但对划过太空的行星或者掉到地上的苹果来说，摩擦力的影响要小得多。在这些情况下，摩擦力微乎其微，在不遗失现象本质的情况下它可以忽略不计。

在牛顿的宇宙图景中，占支配地位的力是引力，而不是摩擦力。考虑到牛顿和引力在大众心目中的密切联系，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绝大多数人在想到牛顿时，都会立刻记起他们儿时学过的知识，即牛顿是在被苹果砸到头的时候^[4]发现引力的。剧透警告：事实并非如此。发现引力的人不是牛顿，人们早已知道重物会下落。但没人知道引力的作用范围有多大，它的尽头是天空吗？

牛顿预感到引力可能会延伸到月球或更远的地方。他认为月球的运行轨迹是一个永不停歇地向着地球下落的过程，但与下落的苹果不同，下落的月球不会掉到地上，因为它同时也在惯性的作用下进行着侧向运动。就像伽利略从塔顶上扔下的铁球那样，月球在下落的同时向侧面滑动，形成一条弯曲的路径，只不过它向侧面滑动的速度很快，以至于月球永远无法到达在它的下方沿曲线轨道运行的地球表面。随着月球的轨道偏离直线，它开始加速（这并不是说它的速度改变了，而是它的运动方向改变了）。拉动它偏离直线路径的是地球引力持续不断的拖拽，由此产生的加速度被称为向心加速度，它倾向于将物体拉向中心（在这个例子中是地心）。

牛顿从开普勒第三定律推断出，引力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弱，这解释了为什么越遥远的行星绕太阳旋转一周的时间越长。他的计算表明，如果太阳拉动行星的力与让苹果落到地上及让月球保持轨道运动的力是同一种，这个力的大小就会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如果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能以某种方式加倍，它们之间的引力就会减弱为原来的 $1/4$ （ $1/2$ 的平方），而不是 $1/2$ 。如果它们之间的距离变为原来的3倍，引力就会减弱为原来的 $1/9$ ，而不是 $1/3$ 。不可否认的是，牛顿的计算中包含一些可疑的假设，尤其是引力在相距遥远的情况下也能即时起作用（超距作用与即时性）的假设，就像浩瀚的太空无关紧要一样。尽管他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但平方反比定律仍然让他着迷不已。

为了对它进行定量检验，他根据已知的月球到地球的距离（约为地球半径的60倍）和已知的月球公转周期（约27天），估算出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向心加速度。然后，他对月球的加速度与伽利略通过斜面实验测得的地球上落体的加速度进行了比较。牛顿发现这两个加速度相差一个因子，而且令

人兴奋的是，这个因子接近3 600，即60的平方。这正是他的平方反比定律的预测结果：月球到地心的距离大约是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距离的60倍，因此月球的加速度应该是苹果加速度的1/3 600左右。后来牛顿回忆说，他“比较过使月球保持轨道运动[5]所需的力与地球表面的引力，并发现两者非常接近”。

那时，认为引力的拉动作用可能会延伸到月球的想法是疯狂的。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月亮之下的一切都被视为易腐朽和不完美的，而在月亮照不到的地方，一切则是完美、不朽和永恒的。牛顿打破了这种范式，他把天和地统一起来，并且证明描述它们的物理学定律是一样的。

在发现平方反比定律的大约20年后，牛顿从对炼金术和圣经年代学的兴趣中暂时抽身出来，重新审视引力作用下的运动问题。他遭到了来自伦敦皇家学会的同事和竞争对手的挑衅，他们要求牛顿解决一个比他以前考虑过的问题难得多，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如果来自太阳的吸引力按照平方反比定律减弱，那么行星会如何运动呢？据说，当他的朋友埃德蒙·哈雷提出这个问题时，牛顿立刻回答说“沿椭圆轨道运动”[6]。“但是，”大吃一惊的哈雷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已经算过了。”牛顿说。当哈雷催促他解释推理过程时，牛顿开始重建他以前的相关研究。活力猛烈迸发，创造力也几乎和他在黑死病肆虐期间同样旺盛，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牛顿写作了《原理》一书。

通过将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假设成公理，并以微积分作为演绎工具，牛顿证明了开普勒的三大定律都符合逻辑必然性[7]。伽利略的惯性定律、单摆的等时性、球滚下斜坡的奇数规则 and 抛体的抛物线拱也一样，它们都是平方反比定律和 $F=ma$ 的推论。这种诉诸演绎推理的做法让牛顿的同事大为震惊，也在哲学基础上撼动了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经验主义者，认为逻辑只适用于数学本身，而自然必须通过实验和观察来研究。“自然拥有数学内核，自然现象可以从引力和运动定律等经验性公理通过逻辑推导出”，牛顿的这些想法让他们目瞪口呆。

[1] system of the world: Peterson, Newton's Clock;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and Stewart, Calculating the Cosmos.

[2] ushered in the Enlightenment: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234–86, chronicles the profound impact that Newton's work had on the course of Western philosophy, religion,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o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See also W. Bristow, "Enlightenment,"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nlightenment/>.

[3] “made his head ache”: D.Brewster, *Memoirs of the Lif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of Sir Isaac Newton*, vol.2 (Edinburgh: Thomas Constable, 1855), 158.

[4] when an apple fell: For the surprising history of the apple story, see Gleick, *Isaac Newton*, 55–57, and note 18 on 207. See also Martínez, *Science Secrets*, chapter 3.

[5] “force requisite to keep the Moon in her Orb”: Draft letter from Newton to Pierre des Maizeaux, written in 171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ADD-03968/1349> in the collect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6] “In ellipses”: Asimov, *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138, gives one version of this oft-told story.

[7] followed as logical necessitie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516–19, outlines Newton’s geometric arguments. Guicciardini, *Reading the Principia*, discusses how Newton’s contemporaries reacted to the *Principia* and what their criticisms of it were (some of their objections were cogent). A modern derivation of Kepler’s laws from the inverse-square law is given by Simmons, *Calculus Gems*, 326–35.

二体问题

哈雷向牛顿提出的问题难度极大，需要将局部信息转化为整体信息，这正是我们在第7章讨论过的积分学与预测的核心难点。

想一想，在预测两个天体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时会涉及什么。为了简化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太阳——质量无穷大且静止不动，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行星——绕太阳运动。最初，行星与太阳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它位于一个给定的位置上，并以给定的速度沿着给定的方向运动。在下一个瞬间，行星的速度把它带到下一个位置上，这里与它前一刻所在的位置之间只有无穷小的距离。由于行星现在的位置略有不同，所以它感受到的来自太阳的引力在方向和量值上也略有不同。这个新的力（可利用平方反比定律算出）又会拉动行星，使它的运行速度和方向在下一个无穷小的时间增量里发生无穷小的改变（可利用 $F=ma$ 算出）。以此类推，这个过程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最终，所有这些无穷小的局部步骤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这颗行星的整体运行轨道。

因此，用积分的方法求解二体问题就是一次利用无穷原则的练习。阿基米德和其他人把无穷原则应用于曲线之谜，而牛顿是第一个将它应用于运动之谜的人。尽管二体问题看似解决无望，但牛顿在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帮助下搞定了它。他并没有在头脑中逐一推算行星在每个瞬间的位置，而是像施展魔法一般用微积分推动它快速跃进。牛顿的公式可以预测出行星在未来任意时刻的位置和运动速度。

无穷原则和微积分基本定理在牛顿的研究中还发挥了另一种新颖的作用。在第一次向二体问题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把行星和太阳都理想化为点状粒子。他能否按照真实的情况将它们建模为巨大的球体，同时解决二体问题呢？如果他能做到，他的计算结果会有所改变吗？

这是当时微积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另一类异常困难的计算。想想看，要计算太阳（一个巨大的球体）对地球（虽然比太阳小但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球体）的净拉力，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太阳的每个原子都牵拉着地球的每个原子，难点在于，所有这些原子彼此间的距离不同。太阳背面的原子比正面的原子距离地球更远，因此前者对地球原子施加的引力更弱。此外，太阳左右两侧的原子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拉动地球，其引力的强度取决于它们各自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影响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就这个问题而言，把各个部分重新整合在一起的难度比所有人做过的积分计算都大。如今在解决该问题时，我们运用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法——三重积分。

牛顿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发现了十分优美、简洁以至于到了今天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假设球形太阳的所有质量都集中在它的中心，地球也是一样。他的计算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地球的轨道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他可以在不产生任何误差的情况下，用无穷小的点来代替巨大的球体。谎言居然揭露了真相！

不过，牛顿的计算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近似处理，它们的影响更严重，带来的问题也更多。为简单起见，他完全忽略了其他所有行星施加的引力。此外，他继续假设引力作用是即时的。尽管他知道这两种近似处理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但不这样做的话他就无法取得进展。牛顿还坦承他无法解释引力到底是什么，或者它为什么会遵循他给出的数学描述，他知道批评者会因此质疑他的整个研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结果尽可能地令人信服，牛顿用可靠的几何语言（当时被视为严谨性和确定性的黄金标准）来表述它们。但这种几何语言不是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而是古典几何和微积分的一种奇特的结合体——披着几何学外衣的微积分。

无论如何，牛顿还是尽最大努力给了它一个古典的外表。《原理》是老式的欧几里得风格。他循着古典几何的格式，从公理和假设（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出发，并把它们当作毋庸置疑的基石。在公理和假设的基础上，他通过逻辑推理构建起一个包含引理、命题、定理和证明的体系，它们犹如一根可回溯至公理的完整链条环环相扣。就像欧几里得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13卷本著作《几何原本》一样，牛顿给世人留下了他的三卷本著作《原理》，而且没有故作谦虚地把第三卷命名为《论宇宙的体系》。

他的体系将自然描述为一种机制。在之后的几年里，它常被比作钟表装置：它的齿轮在旋转，它的弹簧在伸缩，它的所有部件都在有序运转，创造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奇迹。牛顿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并借助幂级数、创造力和运气，往往能准确地解出他的微分方程。就像在解决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二体问题时所做的那样，他并未逐一计算每个瞬间的数据，而是快速跃进，明确预测出他的钟表装置在无限远的未来所处的状态。

在牛顿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对他的体系进行了改进。该体系的可信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当某颗行星的运动与它的预测不一致时，天文学家便会认为他们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海王星^[1]就是这样在1846年被发现的。天王星的不规则轨道表明，在它之外存在着了一颗未知行星，那个看不见的“邻居”正在通过引力扰动天王星。微积分预测出这颗缺失行星的位置，当天文学家进行观测时，它的的确确就在那里。

[1] Neptune: Jones, John Couch Adams, and Sheehan and Thurber, “John

Couch Adams’s Asperger Syndrome.”

牛顿力学与《隐藏人物》

到20世纪中叶，物理学似乎终于从牛顿力学中走了出来，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淘汰了这头老黄牛。尽管如此，得益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竞赛，它仍然享受了最后的欢呼。

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隐藏人物》中的女英雄、非裔美国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1]利用二体问题，让第一位绕地球飞行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安全返航。约翰逊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在她的分析中，两个引力体分别是宇宙飞船和地球，而不是牛顿研究的行星和太阳。她利用微积分预测了宇宙飞船围绕在其下方自转的地球飞行时所处的位置，并算出了可使它成功重返大气层的轨道。要做到这一切，约翰逊必须考虑牛顿略去的复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地球并不是完美的球体，它在赤道处略微隆起，两极则呈扁平状。把控好细节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太空舱必须以正确的角度重返大气层，否则就会起火燃烧。它也必须降落在海上的正确地点，如果它的降落位置距离指定地点太远，在人们找到格伦之前他可能已经淹死在太空舱里了。

1962年2月20日，约翰·格伦上校完成了绕地球飞行三周的任务后，在约翰逊的精确计算的指导下重返大气层，并安全降落在北大西洋。他是美国的英雄，几年后当选参议员。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格伦创造历史的那一天，直到凯瑟琳·约翰逊本人检查了所有攸关生死的计算之后，他才同意执行这次飞行任务。换言之，格伦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约翰逊。

凯瑟琳·约翰逊是NASA的一名计算人员，当时的计算工作都是由女性而非机器完成的。当她帮助艾伦·谢泼德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时，她见证了美国航天事业的起步；而当她计算第一次登月的轨道时，她也见证了美国航天事业的衰落。几十年来，她的工作一直不为公众所知。但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开创性贡献（和她的鼓舞人心的人生故事）如今已得到广泛认可。2015年，97岁高龄的她获得了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一年后，NASA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楼。在落成典礼上，NASA官员提醒观众说：“尽管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谢泼德的太空飞行，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让他进入太空并安全返航的那些计算是由我们今天的贵宾凯瑟琳·约翰逊完成的。”^[2]

[1] Katherine Johnson: Shetterly, Hidden Figures, gave Katherine Johnson the recognition she so long deserved. For more about her life, see <https://www.nasa.gov/content/katherine-johnson-biography>. For her mathematics, see

Skopinski and Johnson, "Determination of Azimuth Angle." See also http://www-groups.dcs.st-and.ac.uk/history/Biographies/Johnson_Katherine.html and <https://ima.org.uk/5580/hidden-figures-impact-mathematics/>.

[2] NASA official reminded the audience: Sarah Lewin, "NASA Facility Dedicated to Mathematician Katherine Johnson," Space.com, May 5, 2016, <https://www.space.com/32805-katherine-johnson-langley-building-dedication.html>.

牛顿微积分与《独立宣言》

牛顿绘制了世界由数学主宰的图景，它产生的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在人文领域，它在威廉·布莱克、约翰·济慈和威廉·华兹华斯等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中起到了陪衬作用。1817年，在一次喧闹的晚宴上，华兹华斯和济慈等人一致认为牛顿破坏了彩虹的诗意，因为牛顿把彩虹还原为棱镜光谱。他们兴高采烈地^[1]举杯祝酒：“为了牛顿的健康和对数学的困惑。”

牛顿在哲学界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他的思想影响了伏尔泰、大卫·休谟、约翰·洛克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他们被理性的力量和牛顿的钟表宇宙体系（受因果关系驱动）的解释性成功所吸引。牛顿的经验演绎法以事实为基础，以微积分为动力，扫除了早期哲学家（我正在看着你呢，亚里士多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方法。在科学领域之外，牛顿的思想还在从决定论和自由到自然律和人权等所有启蒙观念上留下了印记。

以牛顿对托马斯·杰斐逊^[2]的影响为例，杰斐逊是建筑师、发明家、农场主、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牛顿思想的回声贯穿《独立宣言》的始终，它开头的句子“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就表明了这种修辞结构。杰斐逊效仿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和牛顿在《原理》中的做法，也从公理（与他的主题相关的不证自明的真理）着手。然后，凭借逻辑的力量，他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一系列不可回避的命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殖民地有权脱离英国的统治。《独立宣言》通过诉诸“自然律和自然之神”来证明美国独立的正当性。（顺便说一句，请注意杰斐逊的排序中隐含的后牛顿自然神论：神排在自然律之后，仅作为“自然之神”扮演一个配角。）这个论点以“促使（殖民地）脱离英国王室统治的原因”作为支撑，这些原因起到牛顿力学中力的作用，促使钟表运动，并决定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如果这一切看起来有些牵强，那么请记住杰斐逊尊崇牛顿。在一次以死亡为主题的宗教敬拜活动中，他得到了一件牛顿死亡面具的复制品。总统任期届满后，杰斐逊在1812年1月21日写信给老朋友约翰·亚当斯，讲述了他远离政治的愉悦感：“我不再看报纸，^[3]而改为阅读塔西佗、修昔底德、牛顿和欧几里得的著作，我发现自己更快乐了。”

杰斐逊把对牛顿原理的迷恋带到了他感兴趣的农业上，他想弄清楚犁壁^[4]的最佳形状。（犁壁是耕犁的弯曲部分，作用是将犁铧耕开的土壤翻转过来。）杰斐逊把这个问题界定为一个效率问题：犁壁应该如何弯曲，才能使它受到的来自土层的阻力最小？犁壁表面的前部必须是水平的，只有这

样它才能去到被耕开的地下面并抬升土壤；然后它应该逐渐弯曲，直到它的后部变得垂直于地面，这样它就可以把土壤翻过来并推到旁边。

杰斐逊请他的一位数学家朋友来解决这个优化问题。在许多方面，它都会让人联想到牛顿在《原理》中提出的“什么形状的固体在水中运动时受到的阻力最小”的问题。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杰斐逊在一台耕犁上安装了他自己设计的木质犁壁。

1798年，杰斐逊评价道：“5年的经验让我有资格说，它在实践中的表现验证了它在理论上的承诺^[5]。”这里的“它”指的是造福农业的牛顿微积分。

[1] boisterous toast: Quoted in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282. The account of the dinner party comes from the diary of the party's host, the painter Benjamin Haydon, excerpted in Ainger, Charles Lamb, 84–86.

[2] Thomas Jefferson: Cohen, *Scienc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makes a persuasive case for Newton's influence on Jefferson and the “Newtonian echoes”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lso se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math.virginia.edu/history/Jefferson/jeff_r\(4\).htm](http://math.virginia.edu/history/Jefferson/jeff_r(4).htm). For more on Jefferson and mathematics, see the lecture by John Fauvel, “‘When I Was Young, Mathematics Was the Passion of My Life’: Mathematics and Passion in 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online at http://math.virginia.edu/history/Jefferson/jeff_r.htm.

[3] “I have given up newspapers”: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anuary 21, 1812, online at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3-04-02-0334>.

[4] moldboard of a plow: Cohen, *Scienc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101. See also “Moldboard Plow,” Thomas Jefferson Encyclopedia, <https://www.Deeper-Agricultural-Innovations.org>, <https://www.monticello.org/site/monticello.org/site/plantation-and-slavery/moldboard-plow>, and “Dig/jefferson/dig-deeper-agricultural-innovations.”

[5] “what it promises in theory”: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Sir John Sinclair, March 23, 1798,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1-30-02-0135>.

连续体与离散集

在大多数情况下，牛顿只是将微积分应用于一个或两个物体，比如一个摇摆的钟摆、一枚飞行的炮弹和一颗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他从过去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求解三个或更多物体的微分方程是一场噩梦。太阳、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问题，已经让他头痛不已了。所以，分析整个太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远远超出牛顿运用微积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畴。正如他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说的那样：“除非我弄错了，^[1]否则同时考虑运动的众多原因将超出人类的智力范围。”

但令人惊讶的是，随着物体数量的增加，一直到无穷多个粒子，微分方程又变得易于求解了……只要这些粒子形成连续介质，而不是离散集。我们来回顾一下两者的区别：一组粒子的离散集就像一堆散落在地板各处的弹珠。它们的离散性体现在，你可以触碰到一颗弹珠，然后在空间中移动你的手指，才能触碰到另一颗弹珠，以此类推。简言之，弹珠之间是有空隙的。相比之下，对于连续介质，比如一根吉他弦，当沿着弦长的方向移动时你的手指无须抬离它。吉他弦上的所有粒子似乎都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不是真的。因为吉他弦和其他所有实物一样，在原子尺度上也是离散的、颗粒状的。但在我们头脑中，吉他弦更应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这个有用的假想把我们从考虑数万亿个粒子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

正是通过解决连续介质如何移动和变化的谜题（比如，吉他弦如何振动从而演奏出温暖人心的音乐，或者热量如何从温暖的区域流动到寒冷的区域），微积分才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微积分必须先改变自身，它需要扩充微分方程是什么和微分方程可以描述什么的概念。

^[1] “Unless I am much mistaken”: Hall and Hall, Unpublished Scientific Papers, 281.

常微分方程与偏微分方程

当艾萨克·牛顿解释行星的椭圆轨道时，当凯瑟琳·约翰逊计算约翰·格伦的太空舱轨道时，他们求解的都是常微分方程^[1]，这类微分方程只取决于一个自变量。

比如，在牛顿解决二体问题的方程中，行星的位置是一个时间函数。根据 $F=ma$ ，它的位置每时每刻都在改变。这个常微分方程决定了在下一个无穷小的时间增量中，行星位置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在这个例子中，行星的位置是因变量，因为它取决于时间（自变量）。同样，在艾伦·佩雷尔森的HIV动态模型中，时间也是自变量。该模型模拟的是在施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后，患者血液中的病毒颗粒浓度下降的过程。这个问题也涉及时间带来的变化，即病毒颗粒浓度每时每刻是如何变化的。在这里，病毒颗粒浓度扮演着因变量的角色，而自变量仍然是时间。

更一般地说，常微分方程描述的是，某个因素的无穷小的变化（比如无穷小的时间增量）如何引起其他因素（比如行星的位置和病毒颗粒的浓度）的无穷小的变化。这样的方程之所以被称为“常”微分方程，是因为它们只有一个自变量。

奇怪的是，因变量的数量无关紧要。只要有且仅有一个自变量，这个微分方程就可以被视为常微分方程。比如，想要确定一艘在三维空间中移动的宇宙飞船的位置，就需要有3个数字： x 、 y 和 z 。它们通过在左右、上下和前后方向上定位宇宙飞船，标示出它在某一时刻的位置，进而告诉我们它离任意参考点（被称为原点）有多远。随着宇宙飞船的移动，它的 x 、 y 和 z 坐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此它们都是时间函数。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依赖性，我们可以把它们写作 $x(t)$ 、 $y(t)$ 和 $z(t)$ 。

常微分方程完全适用于包含一个或更多物体的离散系统，它们可以描述一艘宇宙飞船重返大气层的运动，一个钟摆来回摇摆的运动，或者一颗行星绕太阳旋转的运动。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每个物体都理想化为一个点状对象，或者一个没有空间范围的无穷小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存在于坐标是 x 、 y 、 z 的点上。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有许多点状颗粒的情况，比如，一大群微型宇宙飞船，一串由弹簧连接起来的钟摆，一个由8颗行星和无数颗小行星组成的太阳系。所有这些系统都可以用常微分方程来描述。

在牛顿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发出很多求解常微分方程的巧妙方法，以便对它们描述的现实世界系统的未来做出预测。这些数学

方法包括：牛顿的幂级数概念的扩展，莱布尼茨的微分概念，为调用微积分基本定理进行的巧妙变换，等等。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并且延续至今。

但所有系统不都是离散的，或至少不都适合被视为离散系统，就像我们在吉他弦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因此，并非所有系统都可以用常微分方程来描述。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来看看餐桌上的一碗汤的冷却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一碗汤是一堆离散的分子，它们都在杂乱无章地四处跳跃。但我们不可能看见、测量或量化它们的运动，所以没有人会考虑用常微分方程为一碗汤的冷却过程建模。这不仅是因为有太多的粒子需要处理，还因为它们的运动过于不规则、随意和不可知。

一种更实际的描述汤冷却过程的方法是，把汤看作连续体。尽管这不符合真实情况，但却很有效。在连续体近似方法中，我们假设汤存在于汤碗的三维体积内的每一点。某个给定点 (x, y, z) 的温度 T 取决于时间 t ，这个信息可以用函数 $T(x, y, z, t)$ 来表达。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有些微分方程可以描述这个函数的空间和时间变化。但这类微分方程不是常微分方程，因为它们取决于不止一个自变量。事实上，它们取决于4个自变量： x, y, z 和 t 。这是一种新的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2]，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的每个自变量在引发变化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偏微分方程比常微分方程丰富得多，它们描述了连续系统的运动同时随空间和时间发生的变化，或者连续系统在两个或更多维度的空间中运动的变化情况。除了一碗逐渐冷却的汤之外，吊床下垂的形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程来描述，污染物在湖泊中的扩散或者战斗机机翼上方的气流亦如此。

偏微分方程极其难解，在它们面前，已经很难解的常微分方程看起来简直是小儿科。不过，偏微分方程也极其重要。每当我们飞上天空时，我们的生死就取决于它们。

[1]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Fo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see Simmon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ee also Brau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trogatz, *Nonlinear Dynamics*;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2]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see Farlow,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Haberman, *Applie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ee also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偏微分方程与波音787客机

现代飞机翱翔在天空中，这是微积分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航空业发展初期那个相对落后的年代，第一批飞行器是通过模仿鸟类和风筝，以及凭借工程学知识和坚持不懈的试错发明出来的。比如，莱特兄弟利用他们的自行车知识，设计出既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控制飞机，又能克服它们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三轴系统。

然而，随着航空器变得越来越先进，运用更精湛的手段去设计它们也变得越发必要。风洞让工程师可以在航空器不离开地面的情况下测试它们的空气动力学性能。设计者建造的真机缩比模型，可以使工程师在无须建造昂贵的全尺寸模型的情况下，对航空器的适航性进行测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工程师将计算机添加到他们的设计“武器库”中。这种曾用于密码破译、炮位计算和天气预报的真空管“巨兽”，被航空工程师用来辅助建造现代喷气式飞机，求解在设计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复杂偏微分方程。

其中涉及的数学计算可能难度极大，部分原因在于飞机的几何结构十分复杂。飞机不像球体、风筝或轻木滑翔机，它的形状要复杂得多，包含机翼、机身、发动机、尾翼、襟翼和起落装置，这些组成部分都能使高速掠过飞机的气流发生偏转。而且，高速气流一旦发生偏转，就会对使它偏转的物体施加一个力（曾坐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并把手伸出车窗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一架飞机的机翼形状适当，高速气流就会把它抬升起来。如果这架飞机在跑道上以足够快的速度运动，向上的力就会把飞机抬离地面并使其保持在空中。升力是一种垂直于气流运动方向的力，而另一种力——阻力的作用方向则平行于气流的运动方向。阻力类似于摩擦力，它会阻碍飞机运动并使其减速，导致飞机发动机的运转更费力并消耗更多燃料。计算升力和阻力的大小属于极其困难的微积分问题，远超人类解决实际飞机形状问题的能力范围。然而，这类问题必须解决，它们对于飞机的设计至关重要。

以波音787梦想客机^[1]为例。2011年，波音公司（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推出了可运载200~300人进行长途飞行的新一代中型喷气式飞机——787梦想客机，它是为取代767客机而设计的。波音公司宣称，相比767客机，787客机的噪声水平降低了60%，而燃油效率提高了20%。787客机最具创新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机身和机翼都使用了碳纤维增强聚合物。这些太空时代的复合材料比喷气式飞机的传统制造材料铝、钢和钛更轻，强度也更大。由于它们比金属轻，所以既有助于节省燃料，也能让飞机飞得

更快。

不过，787客机最具创新性的地方或许体现在，它的设计中凝聚的数学与计算方面的远见卓识远超以往的任何机型。微积分和计算机为波音公司节省了大量时间，因为模拟一架新样机比制造一架新样机快得多。它们也为波音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因为相比在过去几十年里价格不断飙升的风洞试验，计算机模拟要便宜得多。波音公司的首席使能技术与研究工程师道格拉斯·鲍尔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767客机的设计过程中，波音公司建造并测试了77种样机机翼。25年后，通过运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787客机的机翼，他们只需要建造和测试其中的7种。

偏微分方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诸多方面的作用。比如，除了计算升力和阻力之外，波音公司的应用数学家还用微积分预测了飞机以600英里的时速飞行时机翼会如何弯曲。当机翼受到升力时，升力会导致机翼向上弯曲和扭曲。工程师试图避免的一种现象是被称为气动弹性颤振^[2]的危险效应，它类似于微风吹过百叶窗帘时发生的颤振，但情况更加棘手。在最好的情况下，机翼的这种不受欢迎的振动会造成旅途的颠簸和不适。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振动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当机翼颤振时，它们会改变周围的气流，并使自身颤振得更厉害。众所周知，气动弹性颤振会损坏试验飞机的机翼，导致结构失效和坠毁（洛克希德公司的F-117夜鹰隐形战斗机在一次飞行表演期间就发生了这种事故）。如果严重的颤振现象发生在商业航班上，可能会置数百名乘客的生命于危险之中。

控制气动弹性颤振的方程与我们在前文中讨论面部手术时提及的方程密切相关。在那里，塑形师秉承阿基米德的思想，将患者的软组织和颅骨近似分解为几十万个宝石形状的多面体和多边形。本着同样的理念，波音公司的数学家将机翼近似分解为几十万个微型立方体、棱柱体和四面体，这些较为简单的形状扮演着基本构建单元的角色。就像在面部手术的建模阶段一样，他们先要为每个构建单元的刚度和弹性赋值，然后这些构建单元会受到邻近构建单元施加的推力和拉力。弹性理论的偏微分方程可以预测出每个构建单元会对这些力做出怎样的反应，最终在超级计算机的帮助下，所有这些反应被组合起来，用于预测机翼的总体振动情况。

同样，偏微分方程也可用于优化飞机发动机内的燃烧过程，这是一个尤为复杂的建模问题。它涉及三个不同学科的相互作用：化学（燃料在高温下会经历数百次化学反应），热流（当化学能被转化为使涡轮叶片快速旋转的机械能时，热量会在发动机内进行重新分配），流体流动（热气会在燃烧室内形成涡流，考虑到湍流的存在，预测热气的行为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波音公司的研发团队一如既往地采用了阿基米德方法：先把大问题切分成若干小问题，解决所有小问题后再把它们拼合在一起。这是实践版的无穷原则，也是微积分所依赖的分治策略。尽管无穷原则在这里得到

了超级计算机和一种被称为有限元分析的数值方法的帮助，但它的核心仍然是内置于微分方程的微积分。

[1] Boeing 787 Dreamliner: Norris and Wagner, Boeing 787, and <http://www.boeing.com/commercial/787/by-design/#/featured>.

[2] aeroelastic flutter: Jason Paur, “Why ‘Flutter’ Is a 4-Letter Word for Pilots,” Wired (March 25, 2010), <https://www.wired.com/2010/03/flutter-testing-aircraft/>.

无处不在的偏微分方程

微积分在现代科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偏微分方程的建立、求解和解释上。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偏微分方程，关于弹性、声学、热流、流体流动和气体动力学的定律也是偏微分方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用于为金融期权定价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1]，以及用于描述电脉冲沿神经纤维的传导过程的霍奇金-赫胥黎模型^[2]，它们都是偏微分方程。

即使在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偏微分方程依然为其提供了数学基础架构。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3]为例，它将引力重新设想为四维时空弯曲的表现。经典的隐喻让我们把时空想象成一个好似蹦床表面的有弹性、可变形的结构，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个结构是紧绷的，但如果放上去某个重物（比如把一个大而重的保龄球放在它的中心），它就会在重量的作用下发生弯曲。同理，太阳等大质量天体也会使其周围的时空结构发生弯曲。现在想象某个更小的东西，比如一个小弹珠（代表一颗行星），在蹦床的弯曲表面上滚动。因为蹦床表面在保龄球的重量作用下产生凹陷，它会使弹珠的运动轨迹发生偏移。弹珠不再做直线运动，而是沿着弯曲表面的轮廓反复绕保龄球旋转。爱因斯坦说，这就是行星绕太阳运行的原因。它们并未感受到力，而只是在弯曲时空中沿阻力最小的路径运动。

尽管这个理论令人难以理解，但它的数学核心就是偏微分方程。微观世界的理论——量子力学——同样如此，它的控制方程——薛定谔方程^[4]——也是一个偏微分方程。我们在下一章将更深入地研究这类方程，了解它们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以及它们为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将会看到，偏微分方程不仅可以描述餐桌上那碗汤的冷却过程，还能解释微波炉加热它的过程。

^[1] Black-Scholes model for pricing financial options: Szpiro, Pricing the Future, and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17.

^[2] Hodgkin-Huxley model: Ermentrout and Terman,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and Rinzel, “Discussion.”

^[3] Einstein’s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13, and Ferreira, Perfect Theory. See also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and Isaacson, Einstein.

^[4] Schrödinger equation: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chapter 14.

第10章 波、微波炉和脑成像

在19世纪初之前，热量一直是个谜。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像水一样的液体吗？它看起来确实在流动，但你却不能把它握在手里或者看见它。尽管你可以通过跟踪某个高温物体冷却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来间接测量它，却没人知道在该物体内部发生了什么。

热量的秘密是由一个经常感到寒冷的人揭开的。傅里叶^[1]10岁时就成了孤儿，十几岁时体弱多病，患有消化不良和哮喘。成年之后，他认为热量对健康来说至关重要。即使在夏天，他也会待在过热的房间里，并裹上一件厚大衣。在他的科学生涯的各个方面，傅里叶都专注和痴迷于热。他发明了全球变暖的概念，也是第一个解释温室效应会如何调节地球平均温度的人。

1807年，傅里叶利用微积分解开了热流^[2]之谜。他提出了一个偏微分方程，可用于预测物体（比如一根炽热的铁棒）在冷却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情况。傅里叶吃惊地发现，无论冷却过程开始时铁棒各处的温度有多么不均匀，这个偏微分方程都能轻松搞定。

想象一下，有一根又长又细的圆柱形铁棒在铁匠的锻炉里被不均匀地加热，它的周身散布着一些热点和冷点。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铁棒外面有一个完全隔热的套筒，这样热量就不会散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热流动的唯一途径是沿着铁棒的长度方向从热点扩散到冷点。傅里叶假定（并通过实验证实），铁棒上某一点的温度变化率正比于该点的温度与其两侧相邻点的平均温度之间的失配。我所说的相邻点是指，位于我们关注的那一点两侧的无限接近的两个点。

在这些理想化的条件下，热流的物理过程变得简单了。如果一个点比其相邻点冷，它就会升温；如果一个点比其相邻点热，它就会降温。失配越大，温度平衡的速度就越快。如果一个点的温度恰好等于其相邻点的平均温度，一切就平衡了，热量不再流动，这个点的温度在下一个瞬间也会保持不变。

通过比较一个点的瞬时温度与其相邻点的瞬时温度，傅里叶建立了一个偏微分方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热传导方程。它包含两个自变量的导数：一个是时间（ t ）的无穷小变化量，另一个是铁棒上位置（ x ）的无穷小变化量。

傅里叶为自己设置的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热点和冷点的初始排布有可能

是杂乱无章的。为了解决这个一般性问题，傅里叶提出了一个看上去过度乐观，甚至有些鲁莽的方案。他声称可以用一个等效的简单正弦波之和来代替任何一种初始温度分布模式。

正弦波是他的构建单元，他之所以选择正弦波，是因为它们能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单。他知道，如果温度分布一开始是正弦波模式，那么随着铁棒的冷却，它仍会保持这种模式（图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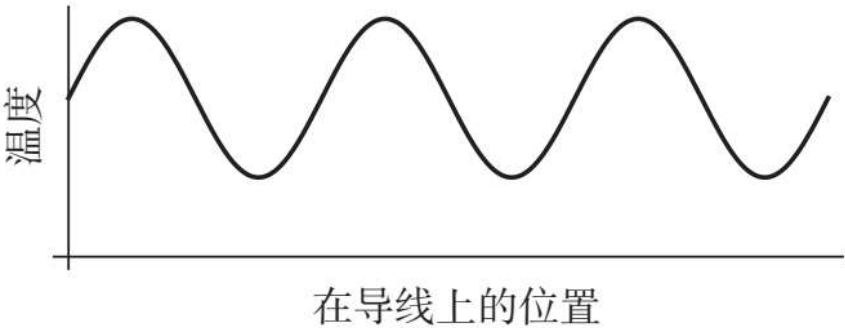


图10-1

关键在于，正弦波不会四处移动，它们就待在那里。的确，当它们的热点降温而冷点升温时，正弦波会减弱。但这种衰减很容易处理，它仅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变化趋于平缓。如图10-2所示，初始温度分布模式（虚线正弦波）会逐渐减弱，看起来就像实线正弦波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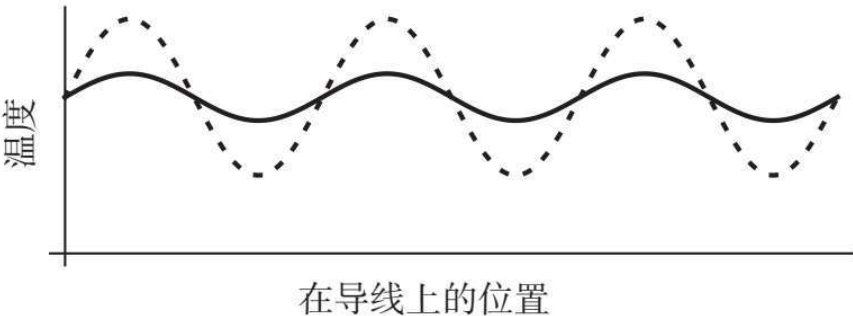


图10-2

重要的是，当正弦波减弱时，它们是静止不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驻

波。

如果傅里叶能找到将原始温度模式分解成正弦波的方法，他就能分别解决每个正弦波的热流问题。他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每个正弦波都会发生指数式衰减，其衰减速度取决于它有多少个波峰和波谷。波峰越多的正弦波衰减得越快，因为它们的热点和冷点更紧致地挤在一起，这使得它们之间的热交换更迅速，从而更快地达到热平衡。在了解了每个正弦波的衰减情况后，傅里叶要做的就是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去解决原始问题。

这一切的难点在于，傅里叶不经意间调用了正弦波的无穷级数。他又一次把无穷这个“石巨人”召唤到微积分中，而且傅里叶的做法比他的前辈更加不顾一切。他没有使用三角形碎片或三角形数的无穷级数和，而是漫不经心地采用了波的无穷级数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牛顿对幂函数 x^n 的无穷级数和处理方式，只不过牛顿从未声称他可以描述包括不连续跳跃或急转弯等可怕特征的任意复杂的曲线。而傅里叶偏偏宣称，包含转弯和跳跃的曲线并不能吓倒他。此外，傅里叶的正弦波是从微分方程本身自然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微分方程的固有振动模式或固有驻波模式，是为热流量身打造的。牛顿并未将幂函数当作构建单元，而傅里叶将正弦波视作构建单元，认为它们与热流问题有机地匹配在一起。

尽管傅里叶大胆使用正弦波作为构建单元的做法引发了争议，并且带来了棘手的严密性问题（数学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解决它），但在我们的时代，傅里叶的伟大思想在计算机语音合成器和用于医疗成像的MRI扫描等技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Fourier: Körner, Fourier Analysis, and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chapter 19. For his life and work, see Dirk J. Struik, “Joseph Fourier,”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Joseph-Baron-Fourier>. See also Grattan-Guinness, From the Calculus;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2] heat flow: The mathematics of Fourier’s heat equation is discussed in Farlow,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Haberman, Applie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弦理论

正弦波也出现在音乐中，它们是吉他、小提琴和钢琴琴弦的固有振动模式。通过将牛顿力学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应用于一根绷紧的弦的理想模型，我们可以推导出这种振动的偏微分方程。在这个模型中，弦被视为无穷小粒子的连续阵列，这些粒子并肩码放，相邻粒子通过弹力连接在一起。在任意时刻 t ，弦内的每个粒子都会根据它受到的力做相应的运动，这些力是在相邻粒子彼此拉拽的过程中由弦的张力产生的。在这些力已知的前提条件下，每个粒子都会根据牛顿定律 $F=ma$ 做运动，而且这个过程发生在弦的每一点 x 上。由此建立的微分方程同时取决于 x 和 t ，它是偏微分方程的又一个例子。该方程被称为波动方程^[1]，果不其然，它预测出振动弦的典型运动是波。

就像在热流问题中一样，某些正弦波被证明有效，这是因为它们在振动时能自我再生。如果弦的两端被固定住，这些正弦波就无法传播，而只是待在原地进行振动。如果一根理想的弦受到的空气阻力和内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以正弦波模式开始振动，那么它将一直这样振动下去，振动频率也永远不会改变（图10-3）。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正弦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构建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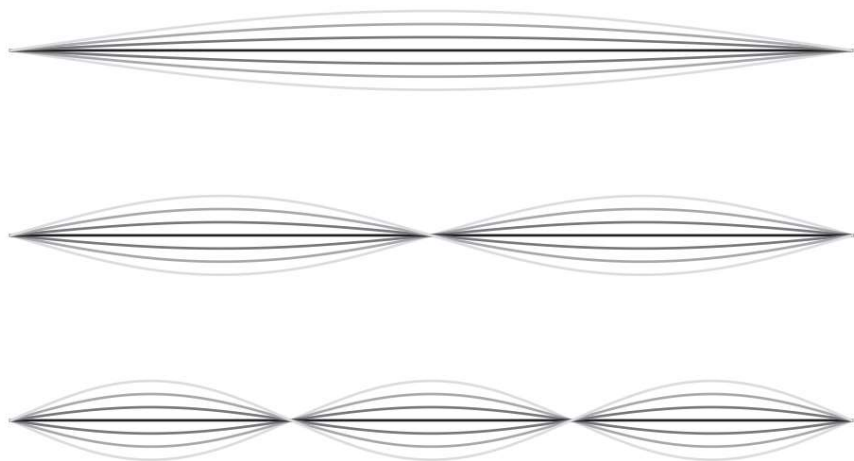


图10-3

其他振型同样可以由无穷多个正弦波加总而成。比如，在18世纪使用的羽

管键琴中，一根弦在被松开前，往往会被用作琴拨的羽毛管拉成一个三角形（图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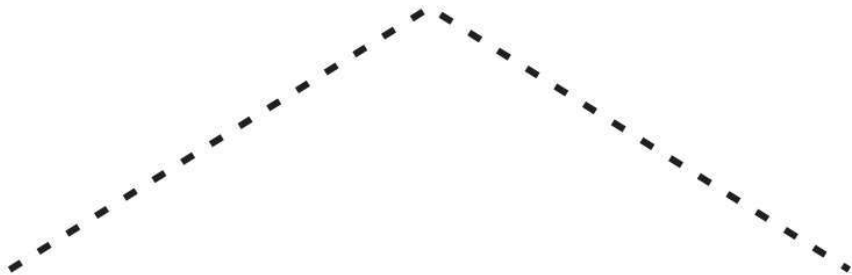


图10-4

尽管三角波有一个尖角，但它也可以表示成完全光滑的正弦波的无穷级数和形式。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尖角也能制造出尖角。在图10-5中，我通过3次越来越如实的逼近，用正弦波构建出一个近似三角波，如图中最下面的虚线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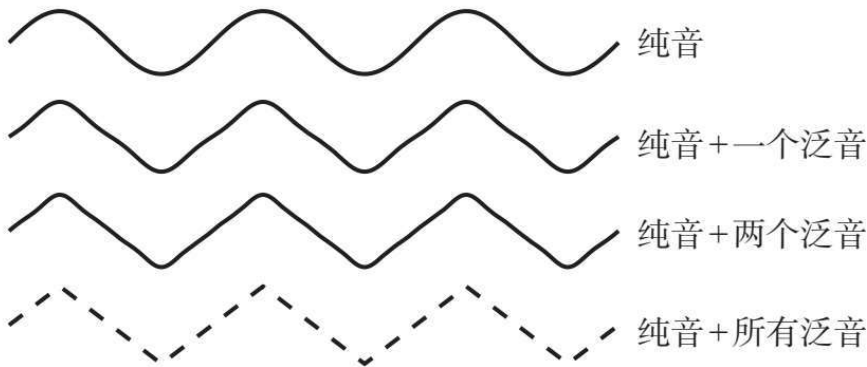


图10-5

第一次逼近的结果是一个具有最优可能振幅的正弦波（“最优”的意思是，它能让三角波的总平方误差最小化）。第二次逼近的结果是两个正弦波的最优和。第三次逼近的结果是三个正弦波的最优和。最优正弦波的振幅遵循傅里叶发现的一个公式：

$$\text{三角波} = \sin x - \frac{1}{9}\sin 3x + \frac{1}{25}\sin 5x - \frac{1}{49}\sin 7x + \dots$$

这个无穷级数和被称为三角波的傅里叶级数。请注意其中独特的数值模式：在正弦波中只出现了奇数频率，比如1, 3, 5, 7...，而且它们对应的振幅是正负号交替的奇数平方的倒数。遗憾的是，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这个公式为何有效；我们必须刻苦研究很多具体的微积分，才能弄明白公式中的那些神奇的振幅从何而来。但关键在于，傅里叶知道如何把它们计算出来。有了这个公式，他就能用简单得多的正弦波合成三角波或者其他任意复杂的曲线。

傅里叶的伟大思想是音乐合成器的基础，我们以一个音符（比如中央C上方的A）为例说明其中的原因。为了发出准确的音高，我们可以敲击一个振动频率被设定为440个周期/秒的音叉。音叉由一个把手和两个金属叉组成，当用橡胶锤敲击音叉时，金属叉每秒钟会来回振动440次。金属叉的振动会扰动附近的空气：向外振动时，它们会压缩空气；而向内振动时，它们会使周围的空气变得稀薄。空气分子的来回晃动又会产生正弦压力扰动，我们的耳朵将其当作一个纯音——单调沉闷的A音，它缺乏音乐家所说的音色。然而，我们可以用小提琴或钢琴弹奏出同样的A音，它听起来却生动又温暖。尽管小提琴或钢琴也在以440个周期/秒的基本频率振动，但由于搭配了不同的泛音，它们发出的声音与音叉（及其他乐器）不同。泛音就是三角波公式中像 $\sin 3x$ 和 $\sin 5x$ 这样的波对应的音乐术语，它通过加入多倍的基本频率为音符增色。除了频率为440个周期/秒的正弦波外，合成三角波中还包括一个正弦波泛音，它的频率是正弦波的3倍（ $3 \times 440 = 1\,320$ 个周期/秒）。这个泛音不像基本的 $\sin x$ 模态那么强，它的相对振幅只是基本模态的 $1/9$ ，其他奇数模态则更弱。从音乐角度说，振幅决定了泛音的响度，小提琴声音的丰富度与它的柔和泛音和响亮泛音的特定组合方式有关。

傅里叶思想的统一力量在于，任何乐器的声音都可以用无穷多个音叉合成。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恰当的时间用恰当的力度去敲击音叉，尽管我们只用了单调沉闷的正弦波，却不可思议地演奏出小提琴、钢琴乃至小号或双簧管的声音。这就是第一批电子合成器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组合大量的正弦波，它们可以再现任何乐器的声音。

高中时期我上过一节电子音乐课，从中感受到了正弦波的作用。那是在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电子音乐是在一个看似老式交换机的大盒子产生的。我的同学和我先把电缆插入各种插口，再来回转动旋钮，就会听到

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的声音。我还记得，正弦波的声音干净而宽广，就像长笛一样；方波的声音听起来尖利刺耳，就像火警警报一样；三角波的声音听起来则喧闹嘈杂。转动其中一个旋钮，我们可以改变波的频率，升降它的音高。转动另一个旋钮，我们可以改变波的振幅，使它听起来更响亮或更柔和。同时插入几根电缆，我们可以把波及其泛音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对抽象的傅里叶理论的感官体验。我们在示波器上看到波的形状的同时，也能听到它们的声音。如今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尝试这一切，搜索“三角波的声音”之类的内容，就能找到交互式演示程序。它们会让你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1974年，正坐在我的教室里享受着玩转波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在利用微积分预测粒子连续介质的运动和变化方式上，傅里叶迈出了第一步。除牛顿对离散粒子运动的研究之外，这是又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科学家继续用傅里叶的方法去预测其他连续介质的行为，比如波音787客机机翼的颤振、患者接受面部手术后的外貌、流经动脉的血流或者地震后大地发出的隆隆声。如今，这些技术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无处不在，它们被用来分析各种波现象，包括：热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通信的无线电波，在肠内促使营养物质吸收并推动废物朝着正确方向移动的消化波；大脑中与癫痫和帕金森震颤相关的病理性电波，公路上的交通拥挤波（就像令人恼火的幽灵堵塞现象一样，交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整体减速）。傅里叶思想及其分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有这些波现象，对它们做出解释和预测（有时要借助公式，有时则要通过大规模的计算机模拟），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控制或消除它们。

[1] wave equation: For the mathematics of vibrating strings, Fourier series, and the wave equation, see Farlow,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Katz, *History of Mathematics*; Haberman, *Applie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tillwell,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y*; Burt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and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为什么是正弦波？

在结束关于正弦波的讨论并转向其二维和三维对应物之前，我们有必要阐明它们的特别之处。毕竟，其他类型的曲线也可以用作构建单元，有时它们的效果甚至比正弦波还要好。比如，为了捕捉指纹脊线之类的局部特征，子波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认可。在地震分析、艺术品修复与鉴别、面部识别等领域，子波在诸多图像处理与信号处理任务中的表现常常优于正弦波。

为什么正弦波非常适合做波动方程、热传导方程和其他偏微分方程的解呢？因为正弦波的优点在于，它们可以与导数“相处得十分融洽”。具体来说，一个正弦波的导数是另一个正弦波，两者之间存在 $1/4$ 个周期的位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特性，而其他类型的波并不具备。通常，当我们求任意一条曲线的导数时，它会因为微分而变得扭曲，所以求导前后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对大多数曲线来说，求导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对正弦波来说则不然。在求导之后，正弦波会抖落身上的灰尘，表现得泰然自若，和求导之前没什么两样。它遭受的唯一伤害（其实根本算不上伤害）是时间上的变化，即它会比求导之前提早 $1/4$ 个周期达到峰值。

我们在第4章研究过一个不太完美的此类案例——2018年纽约市昼长的每天变化情况，并将其与昼长变化率的每天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我们看到这两条曲线都近似于正弦曲线，只不过表示昼长变化率的正弦波比表示昼长的正弦波提早了3个月。简言之，2018年昼长最长的一天是6月21日，而昼长加长率最快的一天是3个月前的3月20日，这就是我们期望从正弦曲线中看到的情况。如果昼长数据是完美的正弦波，而且我们观察的不是每天的变化而是每个瞬间的变化，那么它的瞬时变化率（“导数”波）本身就是完美的正弦波，并且正好提早了 $1/4$ 个周期。在第4章我们也看到了这 $1/4$ 个周期的位移为何会发生，它源于正弦波与匀速圆周运动之间的深层联系。

$1/4$ 个周期的位移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结果。它表明，如果我们对正弦波求导两次，它就会提早 $1/4$ 个周期再加上 $1/4$ 个周期，所以它总共提早了 $1/2$ 个周期。这意味着之前的波峰现在变成了波谷，反之亦然；正弦波完全颠倒了。在数学上，这个过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达：

$$\frac{d}{dx} \left(\frac{d}{dx} \sin x \right) = -\sin x$$

其中，莱布尼茨的微分符号 d/dx 表示“对右边的表达式求导”。这个公式表明，对 $\sin x$ 求导两次就相当于让它乘以 -1 。用一次简单的乘法运算代替两次求导，是一种神奇的简化方式。求导两次是十分烦琐的微积分运算，而乘以 -1 是中学水平的算术。

不过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有人要对某个东西求导两次呢？因为自然一直是这样做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自然模型一直是这样做的。比如，在牛顿的运动定律 $F=ma$ 中，加速度 a 就涉及两次求导。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你需要记住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而速度又是距离的导数。因此，加速度是距离的导数的导数，或者更简单地说，加速度是距离的二阶导数。二阶导数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随处可见，除牛顿方程之外，它们还在热传导方程和波动方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就是正弦波非常适合于这些方程的原因。对正弦波来说，两次求导的结果仅相当于乘以 -1 。实际上，当我们只关注正弦波时，让热传导方程和波动方程变得难以分析的微积分就不再是问题了。微积分会被剔除并代之以乘法，这让与正弦波有关的振动弦问题和热流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如果一条曲线可以由正弦波构成，那么它将继承正弦波的优点。唯一的困难在于，构建一条曲线需要将无穷多个正弦波叠加在一起，但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

这就是从微积分的角度看正弦波之所以特别的原因。物理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同样值得我们了解。对物理学家来说，正弦波（在振动和热流问题的语境中）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们会形成驻波。驻波不会沿着弦或铁棒移动，而会待在原地；尽管它们会上下振动，但从不传播。更引人注目的是，驻波会以单一频率振动，这在波的世界里非常少见。大多数波都是诸多频率的组合，比如，白光是由彩虹的所有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从这个方面看，驻波是纯粹的波，而不是混合波。

振动模态的可视化：克拉德尼图形

无论是吉他温暖的声音还是小提琴忧伤的声音，都与乐器的面板和主体的振动有关，声波会在这些部位的木材及空腔中产生振动和共鸣。这些振动模式决定了乐器的品质和声音。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之所以如此特别，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的木材和空气的振动模式独一无二，并且能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某些小提琴的声音听起来比其他小提琴要好，尽管我们尚未完全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答案一定也与它们的振动模式有关。

1787年，德国物理学家和乐器制造商恩斯特·克拉德尼发表了一篇文章，展示了一种能让这些振动模式可视化的巧妙方法。不过，他没有使用像吉他或小提琴那样复杂形状的乐器，而是选择了一种简单得多的乐器——一块薄金属板，通过拉动小提琴弓摩擦金属板的边缘来演奏。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金属板振动并发声（这类似于你用手指摩擦一个半满酒杯的边缘让它发声）。为了让振动可视化，演奏前克拉德尼在金属板上撒了一层薄沙。当他在金属板边缘拉动琴弓时，沙子会从振动最强烈的地方弹开，并落在完全不振动的地方，由此得到的曲线现在被称为克拉德尼图形^[1]（图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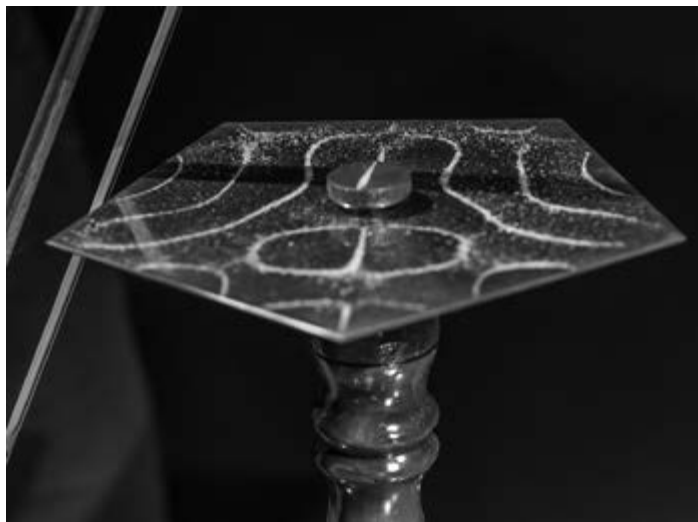


图10-6

你可能在科学博物馆里见过关于克拉德尼图形形成过程的动态演示。一块表面覆盖着沙子的金属板被放置在扬声器之上，然后在电子信号发生器的

驱动下产生振动。随着你对扬声器的声音频率做出调整，金属板会被激发出不同的共振模式。每当扬声器被调至一个新的共振频率，沙子就会重新排列成一种不同的驻波图样。金属板将自身划分成振动方向相反的相邻区域，分界线是金属板上保持不动的节点曲线。

金属板的某些部分没有发生振动，这种现象看似很奇怪，但它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我们在弦的正弦波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弦上不动的那些点就是振动的节点，金属板上也有类似的节点，只不过它们不是孤立的点。相反，它们会连接在一起形成节点线和节点曲线，克拉德尼的实验中呈现出来的正是这些曲线。当时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以至于克拉德尼被叫去当着拿破仑皇帝本人的面展示这些曲线。接受过些许数学和工程学教育的拿破仑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发起了一场竞赛，鼓励欧洲那些伟大的数学家去尝试解释克拉德尼图形的原理。

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数学知识还不存在，欧洲的杰出数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觉得它是一个“超纲问题”，没人能解决它。事实上，只有一个人尝试过，她就是索菲-热尔曼^[2]。

[1] Chladni patterns: The original images are reproduced at <https://publicdomainreview.org/collections/chladni-figures-1787/> and <http://www.sites.hps.cam.ac.uk/whipple/explore/acoustics/ernstchladni/chladniplates/>. For a modern demo, see the video by Steve Mould called “Random Couscous Snaps into Beautiful Patter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R_XL192wXw & feature=youtu.be and the video by Physics Girl called “Singing Plates-Standing Waves on Chladni Plat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oxOJDrZzw>.

[2] Sophie Germain: Her theory of Chladni patterns is discussed in Bucciarelli and Dworsky, Sophie Germain. For biographies, see: <https://www.agnesscott.edu/lriddle/women/germain.htm> and <http://www.pbs.org/wgbh/nova/physics/sophie-germain.html> and <http://www.groups.dcs.st-and.ac.uk/~history/Biographies/Germain.html>.

最值得尊崇的勇气

索菲·热尔曼年少时自学了微积分。她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自从在父亲的书房里读了一本关于阿基米德的书起，热尔曼就对数学痴迷不已。当父母发现她酷爱数学并且熬夜研究数学时，他们拿走了她的蜡烛，熄灭了她的炉火，还没收了她的睡袍。但热尔曼并未就此放弃，她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点着偷来的蜡烛学习数学。最后，她的家人让步了，支持她继续学下去。

跟她那个时代的所有女性一样，热尔曼不被允许上大学，所以她只能自学。有些时候她会以一位离校生“安东尼-奥古斯特·勒布朗先生”的名义，从附近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获取课程讲义。由于不知道勒布朗先生已经离校，学校管理人员继续为他印刷讲义和习题集。热尔曼还以勒布朗先生的名义交作业，直到学校的一位老师——伟大的拉格朗日——注意到以往学业表现糟糕的勒布朗先生的成绩有了显著进步。拉格朗日要求和勒布朗见面，由此发现了热尔曼的真实身份，又惊又喜的拉格朗日收下了这个女学生。

热尔曼的早期成就与数论有关，她为该领域尚未解决的最难问题之一——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她觉得自己取得了突破时，热尔曼再次用安东尼·勒布朗这个化名给世界上最伟大的数论家（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写了一封信。高斯很欣赏这位神秘通信者的才华，此后的三年间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切友好的书信交流。但1806年的一天，形势恶化，高斯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拿破仑军队侵入普鲁士，高斯的家乡不伦瑞克被占领。热尔曼利用家庭关系网，给她在法国军队担任将军的朋友寄去了一封信，请求他保护高斯的安全。当高斯得知是在索菲·热尔曼小姐的帮助下，他的生命才受到了保护时，他既心怀感激又困惑不解，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位女性。在随后的一封信中，热尔曼坦承了她的真实身份。当高斯知道自己一直在和一位女性通信时，他大吃一惊。鉴于她的见解之深刻，以及她必须忍受的所有偏见和障碍，高斯告诉热尔曼，“毫无疑问，你拥有最值得尊崇的勇气^[1]、卓越的才智和出类拔萃的天赋。”

在听说了旨在解开克拉德尼图形之谜的竞赛之后，热尔曼勇敢地接受了这项挑战。而且，她是唯一敢于尝试从零开始建立必要理论的人。她的解决方案涉及创建一个新的力学分支，也就是针对薄而扁平的二维金属板的弹性理论，它超越了早期的针对一维弦和波束的简单理论。她将这个理论建立在力、位移和曲率的原理之上，并用微积分方法构思和解决奇妙的克拉德尼图形的相关偏微分方程。但由于热尔曼的受教育程度不足，并且缺乏

正规的训练，评审人员发现她的方案存在缺陷。他们认为克拉德尼图形之谜尚未被完全解开，于是把这项竞赛延长了两年，之后又延长了两年。经过第三次尝试，热尔曼终于赢得了巴黎科学院的大奖，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1] “the noblest courage”: Quoted in Newma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vol.1, 333.

微波炉

克拉德尼图形实现了二维平面上的驻波可视化。在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使用微波炉^[1]的时候，都要依赖于克拉德尼图形的三维对应物。微波炉内部是一个三维空间，在你按下启动按钮后，炉内会充满驻波模式的微波。虽然你用肉眼看不到这些电磁振动，但你可以通过模仿克拉德尼的做法，使它们间接实现可视化。

取一个微波炉用的盘子，在上面铺薄薄的一层加工奶酪丝（或者其他易于平放和融化的东西，比如薄薄的一层巧克力或者迷你棉花糖）。在把这个盘子放进微波炉之前，你一定要先取出里面的转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让这盘奶酪（或者你使用的任何东西）保持静止，你才能发现热点。取出转盘，把盘子放进去，关上门，打开微波炉。让它运行大约30秒（时间不能再长了），然后取出盘子。这时你会看到盘中有些地方的奶酪已经完全融化了，它们就是热点。这些热点对应着微波模式的腹点，也就是振动最剧烈的地方。它们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峰和波谷，或者克拉德尼图形中那些没有沙子的地方（因为剧烈的振动已经把沙子甩开了）。

对于一台运行频率为2.45千兆赫（波每秒钟来回振动24.5亿次）的标准微波炉，你会发现两个相邻融化点之间的距离大约是6厘米。请记住，这只是从波峰到波谷的距离，即半波长。想得出整波长，就要将这个距离乘以2。因此，微波炉内驻波模式的波长约为12厘米。

顺便说一下，你还可以用你的微波炉计算光速。将微波炉的振动频率（通常标示在微波炉的门框上）乘以你在实验中测得的波长，应该就可以得出光速或者非常接近光速的结果。以我刚才给出的数字为例：频率为24.5亿个周期/秒，波长为12厘米（每个周期）。将它们相乘，得到294亿厘米/秒，这个数值与公认的300亿厘米/秒的光速非常接近。对如此粗略的测量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1] microwave oven: For a very clear explanation of how a microwave oven works as well a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I suggested, see “How a Microwave Oven Wor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33ZprO0Ck>. To measure the speed of light with a microwave oven, you can also use chocolate, as shown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5W6xEeY5U>. For the backstory of microwave ovens and the gooey, sticky mess that Percy Spencer felt in his pocket, see Matt Blitz,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How the Microwave Was Invented by Accident,” Popular Mechanics

(February 23, 2016),<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technology/gadgets/a19567/how-the-microwave-was-invented-by-accident/>.

为什么微波炉最初被称作雷达灶？

“二战”快结束时，美国雷神公司试图为它的磁控管（用于雷达的大功率真空管）寻找新的“用武之地”。磁控管是哨子的电子类似物，就像哨子发出声波一样，磁控管会发出电磁波。这些波在空中遇到飞机后会发生反射，我们可以据此探测飞机的飞行距离和速度。如今，雷达被用来追踪一切事物的运动，从轮船、飞驰的汽车到快速球、网球发球和天气模式等。

战争结束后，到了1946年，雷神公司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制造出来的所有磁控管。一天，一位名叫珀西·斯宾塞的工程师在使用磁控管时，发现他口袋里的一个花生巧克力棒变成了一团黏糊糊的东西，他由此意识到磁控管发出的微波可以高效地加热食物。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个想法，斯宾塞尝试让磁控管指向一个鸡蛋，鸡蛋变得很热并发生爆炸；他还证明了磁控管可用于制作爆米花。雷达和微波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是最早的微波炉被称为雷达灶的原因，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它们才成为热卖商品。最早的微波炉尺寸很大，约有6英尺高，价格也极其昂贵，相当于今天的几万美元。不过，微波炉的尺寸最终变得足够小，价格也足够便宜，普通家庭完全负担得起。如今，在工业化国家，至少有90%的家庭拥有微波炉。

雷达与微波炉的故事是证明科学内联性的一个证据，它涉及的学科包括：物理学、电气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和古老的偶发性发明。微积分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描述波的语言和分析波的工具。波动方程最初是作为音乐与振动弦的关联产物被发现的，最终被麦克斯韦用来预测电磁波的存在。自此，真空管、晶体管、计算机、雷达和微波炉相继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傅里叶方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该方法在寻找高能电磁波的新用途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种波是在20世纪初被偶然发现的，由于无法确定它们是什么，人们便遵循数学上表示未知数的惯例，把它们命名为X射线。

CT与脑成像

微波擅长烹饪，而X射线擅长“看透”我们的身体，使骨折、颅骨骨折和脊柱弯曲的非侵入性诊断成为可能。遗憾的是，传统的黑白胶片捕捉的X射线对组织密度的细微变化不太敏感，这限制了它们在软组织和器官检查方面的有效性。CT扫描^[1]是一种更先进的医学成像技术，它的灵敏度是传统X射线胶片的数百倍，使医学精密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CT扫描中的C代表computerized（电子计算机化的），T代表tomography（断层成像），指的是通过把某个物体切成薄片，使其实现可视化的过程。CT扫描利用X射线，一次一个切片地为某个器官或组织成像。当一位患者置身于CT扫描仪中时，X射线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穿过他的身体，另一侧的探测器则负责做记录。从所有信息（所有不同角度的视图）中，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重构X射线穿过地方的图像。换句话说，CT不只是“看见”的问题，它还是关于推理、演绎和计算的问题。事实上，CT的最出色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就是它对复杂数学的运用。在微积分、傅里叶分析、信号处理和计算机的帮助下，CT软件可以推断出X射线穿过的组织、器官或骨骼的性质，并生成这些身体部位的详细图像。

想知道微积分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先要了解CT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它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想象一下，发射一束X射线，让它穿过一个脑组织切片。X射线在行进过程中会遇到灰质、白质，可能还有脑肿瘤、血块等。根据类型的不同，这些组织会或多或少地吸收X射线的能量。CT的目标就是绘制出整个切片的吸收图样，并在其中显示出肿瘤或血块的可能位置。CT不能直接看见大脑，它看见的只是大脑中的X射线吸收图样。

数学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当X射线穿过大脑切片中的一个给定点时，它们的强度会损失一些，就像普通光穿过太阳镜后变得不那么明亮一样。这里的复杂之处在于，在X射线的行进路径上有一系列不同的脑组织，它们好像一连串太阳镜，一个排在另一个前面，不透明度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不知道各种脑组织的不透明度，这正是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因为不同脑组织的吸收性质各异，当X射线穿过大脑并击中另一侧的X射线探测器时，它们的强度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减。为了计算所有这些减小量的净效应，我们必须弄清楚X射线在穿过脑组织的过程中，每行进无穷小的一步，它们的强度减小了多少，然后把所有结果恰当地组合起来。换言之，这个计算过程相当于积分。

积分学出现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它是让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的最优方式。像往常一样，我们求助于无穷原则：先想象将X射线的行进路径切分成无穷多个无穷小步，然后弄清楚每走一步它们的强度衰减了多少，最后将所有答案重新组合在一起，计算出X射线沿特定路径行进的净衰减量。

遗憾的是，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后，我们只获得了一条信息，即X射线沿特定路径行进的总衰减量。它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大脑切片的整体情况，甚至不能告诉我们关于X射线的特定行进路径的情况。它告诉我们的只是X射线沿这条路径行进的净衰减量，而不是点对点的衰减模式。

让我尝试用类比法来阐明这个难题：想一想，两个数字相加等于6的所有不同方法。正如数字6可以由1+5或2+4或3+3得到一样，相同的X射线净衰减量也可以由许多不同序列的局部衰减得到。比如，行进路径起点的衰减量大，而终点的衰减量小；或者情况正相反；或者自始至终衰减量都是恒定的中等水平。仅凭一次测量，我们无法区分出这些可能性。

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难题，立即就会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我们需要沿许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射X射线，这是CT扫描技术的核心。从多个方向发射X射线，让它们经同一个点穿入组织，并在很多个不同的点上重复这个测量过程，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原则上可以绘制出大脑各处的衰减因子的图像。尽管这与直接查看大脑不是一回事，但效果几乎同样好，因为它提供了大脑的哪个区域出现了哪类组织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面临的数学方面的挑战是，将所有测量结果重组成一幅关于大脑切片的连贯的二维图像。这正是需要用到傅里叶分析的地方，它帮助一位名叫阿兰·科马克^[2]的南非物理学家解决了重组问题。之所以要用傅里叶分析，是因为这个问题中隐藏着一个圆，即所有路径（X射线从侧面被射入二维切片可能采取的所有方向）形成的圆。

记住，圆总是与正弦波有关，而正弦波又是傅里叶级数的构建单元。通过用傅里叶级数表示重组问题，科马克把二维的重组问题归结成更简单的一维问题，无须再考虑0~360度范围内的所有可能角度。然后，他凭借高超的积分技巧，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一维重组问题。最后，他根据一整圈路径的测量结果，推断出内部组织的性质，并推导出吸收图谱。这简直就像看到了大脑本身一样。

1979年，由于在计算机辅助断层成像方面做出的贡献，科马克与高弗雷·豪斯费尔德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他们俩都不是医生。20世纪50年代末，科马克建立了基于傅里叶分析的CT扫描数学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电气工程师豪斯费尔德与放射科医生合作发明

了CT扫描仪。

CT扫描仪的发明再次证明了数学的不合常理的有效性。在这个例子中，使CT扫描成为可能的思想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并且与医学毫无关联。

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豪斯费尔德已经在猪脑上测试了他发明的扫描仪样机。他不顾一切地想找一位临床放射科医生，帮他把这项成果应用于人类患者，但医生们纷纷拒绝与他见面。他们都认为豪斯费尔德是个疯子，因为他们知道X射线不可能让软组织可视化。比如，尽管传统的头部X射线片能清晰地显示出头骨，但大脑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特点的云。不管豪斯费尔德说什么，这些医生都固执地认为肿瘤、出血和血块是不可见的。

最终，有一位放射科医生同意听他把话说完。然而，这场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会面结束时，那位疑虑重重的放射科医生递给豪斯费尔德一个玻璃罐子，里面装着一个长有肿瘤的人脑，要求豪斯费尔德用他的扫描仪给它拍张X射线片。豪斯费尔德很快就带回了这个大脑的图像，上面不仅准确指出了肿瘤的位置，还确定了出血区域。

这位放射科医生惊呆了，消息一经传开，很快其他放射科医生也认可了豪斯费尔德的发明。1972年，豪斯费尔德发表了他的第一批CT扫描图像，震惊了医学界。忽然之间，放射科医生就可以用X射线看见肿瘤、囊肿、灰质、白质和充满液体的脑室了。

讽刺的是，由于波理论和傅里叶分析都源于对音乐的研究，所以在CT技术发展的关键时刻，音乐再次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之物。豪斯费尔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这个突破性的想法，当时他在一家名叫EMI（“电子与音乐工业”，今天叫作“百代唱片”）的公司任职。他最早从事的是雷达和制导武器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研发英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上。在他大获成功之后，EMI公司决定支持豪斯费尔德去做他想做的任何项目。那时，EMI公司资金充裕，有冒险的经济实力。签下来自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3]之后，EMI公司的利润增长了一倍。

豪斯费尔德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了用X射线为器官成像的想法，EMI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帮助他迈出了第一步。他自己想出了用于解决重组问题的数学方法，却浑然不知科马克早在1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地，科马克也不知道一位名叫约翰·拉东的纯粹数学家先于他40年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后者没考虑过它有何应用。对纯粹数学理解的追求给予了CT扫描所需的工具，并且比它的发明提早了半个世纪。

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科马克提到他和他的同事托德·昆图研究过拉东的成果，并试图将它们推广到三维乃至四维区域。这对他的听众来说一定很难理解，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研究四维大脑呢？科马克解释说：[4]

这些成果有什么用呢？答案是：我不知道。它们几乎肯定会在偏微分方程理论中产生一些定理，而且有的定理可能会在MRI或超声成像中得到应用。但这尚不确定，也无关紧要。昆图和我正在研究这些课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有趣的数学问题，这才是科学的真谛。

[1] CT scanning: Kevles, *Naked to the Bone*, 145–72;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85–89; and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79/. The original paper that solv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with calculus and Fourier series is Cormack, “Representation of a Function.”

[2] Allan Cormack: The original paper that solv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for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by using calculus, Fourier series, and integral equations is Cormack, “Representation of a Function.” His Nobel Prize lecture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79/cormack-lecture.pdf.

[3] the Beatles: For the story of Godfrey Hounsfield, the Beatle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CT scanner, see Goodman, “The Beatles,” and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79/perspectives.html.

[4] Cormack explained: The quote appears on page 563 of his Nobel lecture: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79/cormack-lecture.pdf.

第11章 微积分的未来

本章的标题可能会让那些认为微积分是明日黄花的人感到惊讶。它怎么会有未来呢？它现在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在数学圈，你常会吃惊地听到类似的话。根据这种说法，得益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取得的突破，微积分轰轰烈烈地开始发展。他们的发现在18世纪激发了人们淘金热般的心态，有趣且近乎疯狂的探索活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无穷这个“石巨人”也像脱缰的野马般肆意狂奔。数学家由此收获了惊人的成果，但谬论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所以，19世纪的那几代数学家表现得更加严谨。他们把“石巨人”赶回了笼中，消除了微积分中的无穷大和无穷小，巩固了这个学科的基础，最终阐明了极限、导数、积分和实数的真正含义。到20世纪前后，他们的清理工作画上了句号。

在我看来，这种关于微积分的看法太狭隘了。微积分不只是牛顿、莱布尼茨及其继任者的研究成果，它开始的时间还要早得多，如今依然在壮大。对我来说，微积分可以由它的信条来定义：在解决关于任意连续体的难题时，先把它切分成无穷多个部分，然后一一求解，最后通过把各个部分的答案组合起来去解决原始的难题。我把这个信条称作无穷原则。

无穷原则从一开始就存在：它在阿基米德关于曲线形状的著作中，它在科学革命中，它在牛顿的世界体系中，如今它在我们的家中、工作中和汽车里。它让GPS、手机、激光和微波炉的发明成为可能。美国联邦调查局用它压缩了数百万份指纹文件，阿兰·科马克用它创建了CT扫描理论，他们都通过重组简单部分（子波之于指纹文件，正弦波之于CT理论）的方法解决了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微积分是用于研究任何事物——任何模式，任何曲线，任何运动，任何自然过程、系统或现象——的想法与方法的庞杂集合，这些事物的变化平稳而连续，符合无穷原则。该定义的范畴远远超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并囊括了它的子孙后代：多变量微积分，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傅里叶分析，复分析，以及高等数学中涉及极限、导数和积分的所有其他分支。由此可见，微积分还没有完结，它和以前一样求知若渴。

但我属于少数派，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我数学系的同事并不认为上述一切都是微积分，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这太荒谬了。课程体系中的一半的课不得不重新命名，除了微积分1、微积分2和微积分3以外，还有微积分4直到微积分38，让人不明所以。于是，我们给微积分的每个分支都取了不同的名字，并模糊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把微积分切分成可供使用的最小部分，这种做法虽然有些讽刺，但或许很恰当，因为微

积分本身的信条就是把连续的事物切分成多个部分，使它们变得更易于理解。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并不反对所有不同的课程名称。我想说的是，这种切分可能会误导我们，让我们忘记那些课程本就是微积分的一部分。我写作本书的目标是，将微积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你们面前，让你们感受它的美、统一和壮观。

那么，微积分会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呢？就像人们说的那样，预测总是很难，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未来几年围绕微积分可能有几个重要趋势，包括：

- 微积分在社会科学、音乐、艺术和人文领域的新应用；
- 微积分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持续应用；
- 应对金融、经济和天气固有的随机性；
- 微积分为大数据服务，反之亦然；
- 非线性、混沌和复杂系统的持续挑战；
- 微积分与计算机（包括人工智能）之间不断演化的合作关系；
- 将微积分推广至量子领域。

我们需要探讨的内容有很多，与其对这里提到的每个主题都说上几句，不如专注于其中几个问题。在简要地介绍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微分几何（曲线之谜与生命的奥秘在此相遇）之后，我们将研究一些能让你获得哲学启发的案例，其中包括混沌、复杂性理论，以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带来的洞察力及预测方面的挑战。然而，为了弄明白这些案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非线性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将要面临的挑战。

DNA的缠绕数

传统上，微积分一直应用于像物理学、天文学和化学这样的“硬”科学。但近几十年来，它进入了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在流行病学、种群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医学成像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数学生物学的例子，比如，利用微积分预测面部手术的结果，为HIV与免疫系统的战斗过程建模，等等。但所有这些例子都与变化之谜（关于微积分的最新困扰）的某个方面有关。相比之下，下面这个例子来自古老的曲线之谜，一个关于DNA的三维路径的谜题为它赋予了新的生命。

这个谜题与DNA在细胞中的“打包”方式有关，DNA是一种超长分子，包含了一个人成长发育所需的全部遗传信息。在你的大约10万亿个细胞中，每个都含有约2米长的DNA。如果将它们首尾相连，那么DNA可以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往返几十次。不过，怀疑论者可能会辩称，这种比较并不像听上去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它只是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细胞。而与DNA所在细胞的细胞核比大小，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典型的细胞核的直径约为5微米^[1]，它是细胞内DNA长度的40万分之一，这个压缩系数相当于把20英里长的绳子塞到一个网球里。

此外，DNA也不能被随意地塞入细胞核。它绝对不能缠绕在一起，而必须以有序的方式打包，这样DNA才能被酶读取，并被翻译成细胞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蛋白质。有序的打包方式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当细胞分裂时DNA可以被整齐地复制。

进化用线轴解决了打包问题，当我们需要存放一根很长的线时也会采取相同的方法。细胞中的DNA缠绕在分子线轴上，这些线轴由一种叫作组蛋白的特殊蛋白质组成。为了实现进一步压缩，线轴会像项链上的珠子一样首尾相连，然后这条“项链”会盘绕成绳索状纤维，这些纤维本身又会盘绕成染色体。最终，通过重重盘绕，DNA被压缩成足以放入狭窄细胞核的大小。

但线轴并不是大自然解决打包问题的原始解决方案。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是没有细胞核和染色体的单细胞生物，就像今天的细菌和病毒一样，它们也没有线轴。在这种情况下，遗传物质是通过一种基于几何学和弹性的机制来压缩的。想象一下，你拉紧一条橡皮筋，用手指夹住它的一端，并从另一端扭转它。刚开始，橡皮筋的每次转动都会产生一个扭结。扭结不断增加，当累积的扭转超过临界值时，橡皮筋不再保持绷直状态，而会突然弯曲并盘绕在自己身上，仿佛在痛苦地扭动。最终，橡皮筋聚成一团，实现了压缩。DNA也是这样做的。

这种现象被称为超螺旋化，它普遍存在于DNA的环状结构中。尽管我们倾向于把DNA描绘成两端开放的直螺旋，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会自我闭合成一个环。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就好比解开你的安全带，把它扭曲几圈再扣上一样。此后安全带的扭曲次数就不变了——它被锁定了。在不解开安全带的前提下，如果你试图在某一处扭曲它，其他地方就会形成反向扭曲来抵消这种操作。其中，有某个守恒定律在起作用。当你把花园用的软管盘绕成好几圈堆在地上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而当你试图把软管直直地拉出来时，它会在你的手里扭曲。就这样，盘绕转变成扭曲。这种转换也可以反向进行，即从扭曲变为缠绕，就像橡皮筋在扭曲时发生了缠绕一样。原始生物的DNA正是利用了这种缠绕作用，某些酶可以切割DNA，扭曲它，再把它闭合起来。当DNA为了降低其能量而放松扭曲时，守恒定律就会迫使它的超螺旋化程度增强，让它变得更紧凑。这样一来，DNA分子的最终路径不再位于一个平面内，而是在三维空间中缠绕。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数学家布洛克·富勒率先做出了关于DNA的三维缠绕现象的数学描述。他发明了一个叫作DNA缠绕数^[2]的量，用积分和导数推导出它的公式，证明了关于它的某些定理，从而明确了针对螺旋和缠绕的守恒定律。此后，关于DNA的几何学和拓扑学^[3]研究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数学家已经利用纽结理论和缠结微积分^[4]阐明了某些酶的作用机制，这些酶可以扭曲或切割DNA，或者将结与链引入DNA。由于这些酶改变了DNA的拓扑结构，因此被称为拓扑异构酶。它们可以弄断和再连接DNA链，对细胞的分裂和生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证实，它们是癌症化学治疗药物的有效靶点。^[5]尽管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但人们认为，这些药物（被称为拓扑异构酶抑制剂）通过阻断拓扑异构酶的作用，可以选择性地损坏癌细胞的DNA，导致癌细胞自杀。这对患者来说是好消息，对肿瘤来说则是坏消息。

在将微积分应用于超螺旋DNA时，双螺旋被建模为一条连续曲线。微积分一如既往地喜欢处理连续对象，但事实上，DNA是一群离散的原子，它没有什么地方是真正连续的。但是，为了得到好的逼近，DNA可被看作像理想的橡皮筋一样的连续曲线。这样做的好处是，微积分的两个副产品——弹性理论和微分几何学——可用于计算当DNA受到来自蛋白质、环境及与自身相互作用的力时，它会如何变形。

更重要的一点是，微积分延续了它一贯的创造性，将离散对象当作连续体来处理，从而揭示它们的行为。这种模拟尽管是近似的，但却很有用。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没有连续性假设，就无法使用无穷原则。没有无穷原则，就不会有微积分，也不会有微分几何和弹性理论。

我希望，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将微积分和连续数学应用于天生离散的生物学“角色”的例子，比如基因、细胞、蛋白质和生物学“大戏”中的其他“演

员”。我们能从连续体近似方法中获取的洞见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能不用它。除非我们开发出一种新的微积分形式，它可以像传统微积分适用于连续系统那样适用于离散系统，否则无穷原则将在生物的数学建模方面继续指导我们。

[1] 1微米 = 10^{-6} 米。——编者注

[2] writhing number: Fuller, “The Writhing Number.” See also Pohl, “DNA and Differential Geometry.”

[3] geometry and topology of DNA: Bates and Maxwell, DNA Topology, and Wasserman and Cozzarelli, “Biochemical Topology.”

[4] knot theory and tangle calculus: Ernst and Sumners, “Calculus for Rational Tangles.”

[5] targets for cancer-chemotherapy drugs: Liu, “DNA Topoisomerase Poisons.”

决定论及其局限性

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两个话题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对微积分的影响。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的哲学内涵十分有趣。它们可能会永远地改变预测的本质，并开启微积分（更一般地说是科学）的新时代，到那个时候，人类的洞察力或许会开始衰退，但科学本身仍将继续前行。为了阐明我的这句有些许末日警告意味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理解预测到底为什么可行，它的经典含义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经典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如何被非线性、混沌和复杂系统研究所取得的发现修正的。

19世纪早期，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把牛顿的机械宇宙决定论推至它的逻辑极限。拉普拉斯设想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生物——拉普拉斯妖，它可以追踪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所有位置，还有作用于它们的所有力。“如果这个智慧生物也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他写道，“那就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了，^[2]未来也会像过去一样呈现在它眼前。”

随着20世纪的临近，这种对机械宇宙的极端表述在科学和哲学上似乎都开始站不住脚了。其中一个原因来自微积分，为此我们要感谢索菲·柯瓦列夫斯卡娅^[3]。柯瓦列夫斯卡娅出生于1850年，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长大。11岁时她发现自己被微积分包围了，她卧室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她父亲年少时记下的微积分课程笔记。柯瓦列夫斯卡娅后来写道，她“在那面神秘的墙旁度过了童年时光，尝试通过理解其中的每一句话，找出页与页之间的正确顺序”。后来，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尽管柯瓦列夫斯卡娅很早就表现出数学方面的天赋，但俄罗斯的法律不准许她上大学。她选择了一段形式婚姻，尽管这在随后的几年里令她心痛，但至少允准她去德国，她卓越的天分给那里的几位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即使在德国，柯瓦列夫斯卡娅也无法光明正大地去上课，只能私下跟着分析家卡尔·魏尔斯特拉斯学习。在魏尔斯特拉斯的推荐下，柯瓦列夫斯卡娅因为解决了分析学、动力学和偏微分方程方面的几个突出问题而被授予博士学位。她最终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名教授，执教8年后死于流感，终年41岁。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发表了一篇关于柯瓦列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

柯瓦列夫斯卡娅的关于决定论局限性的见解，源于她对刚体动力学的研究。刚体是针对不能弯曲或变形的物体的一种数学抽象，它的所有点都刚性地连接在一起。陀螺就是一种刚体，它非常坚固，由无穷多个点组成，

所以陀螺是比牛顿研究的单点状粒子更复杂的机械对象。在天文学和空间科学中，刚体的运动对于描述从土卫七（土星的一个土豆状的小卫星）的混沌翻滚^[4]到太空舱或卫星的规律旋转等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刚体动力学时，柯瓦列夫斯卡娅得出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她全面分析和解决了陀螺的运动问题，这与牛顿解决二体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尽管另外两个这样的“可积陀螺”早已为人所知，但她研究的这个更加精妙和令人吃惊。

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她证明了不可能存在其他可解陀螺。她发现的正是最后一个，而余下的陀螺都是不可解的，这意味着它们的动力学问题也不可能用牛顿式公式来解决。这不是一个智力不足的问题，而只是证明了根本没有能描述所有陀螺运动的特定类型的公式（时间的亚纯函数）。就这样，她限定了微积分的适用范围。一个陀螺即可挑战拉普拉斯妖，从原则上说，找到关于宇宙命运的公式也无望了。

[1] Pierre Simon Laplace: Kline,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C.Hoefer, “Causal Determinis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terminism-causal/>.

[2] “nothing would be uncertain”: Laplace,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4.

[3] Sofia Kovalevskaya: Cooke, *Mathematics of Sonya Kovalevskaya*, and Goriely, *Applied Mathematics*, 54–57. She is often referred to by other names; Sonia Kovalevsky is a common variant. For online biographies, see Becky Wilson, “Sofia Kovalevskaya,” *Biographies of Women Mathematicians*, <https://www.agnesscott.edu/lriddle/women/kova.htm>, and J.J.O’Connor and E.F.Robertson, “Sofia Vasilyevna Kovalevskaya,” <http://www-groups.dcs.st-and.ac.uk/history/Biographies/Kovalevskaya.html>.

[4] chaotic tumbling of Hyperion: Wisdom et al., “Chaotic Rotation.”

非线性

索菲·柯瓦列夫斯卡娅发现的不可解性与陀螺方程的一个结构特性有关，即该方程是非线性的。我们在这里无须关注非线性的技术意义，就目的而言，我们只需要感受线性系统与非线性系统之间的区别，这一点通过思考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即可实现。

为了说明线性系统是什么样子，我们假设有两个人纯粹出于玩乐的目的，同时上秤称他们的体重。两个人的总重量是他们各自的体重之和，这是因为秤是一种线性装置。他们的体重既不会相互影响，也不会导致任何需要注意的棘手情况。比如，他们的身体不会以某种方式互相串通，使总重量变轻，或者互相妨碍，使总重量变重。所以，它们只是相加。在像秤这样的线性系统中，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线性的第一个关键特性。线性的第二个特性是，原因与结果成正比。想象一下弓箭手拉弓弦的情景。如果把弓弦向后拉一定的距离需要花一定大小的力，那么将弓弦向后拉两倍的距离就需要花两倍大小的力。所以，原因和结果成正比。这两个特性（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原因和结果成正比）就是线性含义的本质。

然而，自然界中的许多事情都比拉弓弦复杂得多。当系统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扰、合作或竞争时，就会发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大部分日常活动显然都是非线性的，如果同时听你最喜欢的两首歌，你不会得到双倍的快乐。如果同时喝酒和吸毒，两者相互作用甚至会产生致命的结果。相比之下，花生酱和果冻搭配起来吃效果更佳，它们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协同增效。

非线性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美妙而复杂，还常常是不可预测的。比如，生物学的方方面面都是非线性的，社会学亦如此。这就是软科学很难也是最后才被数学化的原因。由于非线性的特性，它们一点儿也不“柔软”。

线性和非线性之间的区别同样适用于微分方程，但没有那么直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微分方程是非线性的，就像柯瓦列夫斯卡娅的陀螺那样，分析起来就会极其困难。从牛顿开始，数学家都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非线性微分方程，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类方程既令人不悦，又难以掌控。

相反，线性微分方程既令人愉悦，又容易驯服。数学家喜欢它们，就是因为它们简单。所以，解决这类方程的相关理论有很多。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应用数学家受到的传统教育几乎完全集中在线性方法的运用上，其中有好几年都在学习傅里叶级数和其他求解线性方程的技巧。

线性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为还原论思维的运用创造了条件。要解决一个线性问题，我们可以先把它分解成几个最简单的部分，再分别求解每个部分，最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得到答案。傅里叶正是利用这种还原论策略解出了他的热传导（线性）方程。他先把复杂的温度分布分解成多个正弦波，再算出所有正弦波各自的变化，最后将这些正弦波重新组合起来，去预测加热金属棒的整体温度变化情况。这个策略之所以可行，就是因为热传导方程是线性的，它可以在不失去其本质的情况下被切分成小段。

索菲·柯瓦列夫斯卡娅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最终勇敢地面对非线性时，这个世界看上去会有多么不同。她意识到，非线性能限制人类的狂妄自大。如果一个系统是非线性的，它的行为就不可能用公式来预测，即使该行为是完全确定的。换句话说，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可预测性。虽然陀螺只是一种小孩子的玩意，但它的运动能让我们在求知时怀有一颗谦逊之心。

混沌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牛顿在尝试解决三体问题时会头疼了。三体问题和二体问题不同，前者无疑是非线性的，而后者可以被改造成线性的。非线性并不是由二体骤变为三体导致的，而是由方程本身的结构引发的。对两个而非三个或更多的引力体来说，非线性可以通过在微分方程中恰当地选择新变量来消除。

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充分认识到非线性有让人变得谦逊的作用。数学家为解决三体问题苦苦挣扎了几个世纪，尽管取得了些许进展，却没有人能彻底破解它。19世纪末，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1]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在修正了错误之后，尽管仍然无法解决三体问题，但他发现了更重要的现象，我们现在称之为混沌。

混沌系统^[2]是非常讲究细节的，即使是开始方式的小小改变，也会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这是因为初始条件的小变化会以指数方式放大。任何微小的误差或扰动都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大，以至于从长远看，这个系统会变得不可预测。混沌系统不是随机的，而是确定的，因此短期来看它们是可预测的。但长期来看，它们对微小的扰动十分敏感，以至于在许多方面实际上都是随机的。

混沌系统在某个时间之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这个时间被称为可预测性时界^[3]。在此之前，系统的确定性使其具有可预测性。根据计算，整个太阳系的可预测性时界^[4]约为400万年。对于比这短得多的时间，比如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的时间（一年），一切都会像时钟一样有规律地运转。然而，一旦过了几百万年，一切就会变得无法预测。太阳系中所有天体之间微妙的引力摄动不断累积，直至我们再也无法准确地预测这个系统的行为。

庞加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预测性时界的存在。在他之前，人们认为误差只会随着时间呈线性增长，而非指数增长；如果时间翻倍，误差也会翻倍。随着误差的线性增长，改进测量方法总能满足人们做出长期预测的需求。但是，当误差以指数方式迅速增长时，系统对其初始条件就会产生敏感依赖性，长期预测也会变得不再可行。这就是混沌系统在哲学上令人不安的地方。

理解混沌系统的上述特性至关重要。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像天气这样的大型复杂系统是很难预测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像陀螺或三体这样的简单事物同样不可预测。这对天真地想把决定论与可预测性合并起来的拉普拉斯

来说，是又一次打击。

从积极的方面看，混沌系统中之所以存在秩序的痕迹，是因为它们的确定性特征。庞加莱开发出分析非线性系统（包括混沌系统）的新方法，并找到了提取出隐藏其中的某些秩序的方法。他使用的是图像和几何学，而不是公式和代数；他的定性方法为拓扑学和动力系统是现代数学领域播下了种子。得益于他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秩序和混沌都有了更好的理解。

[1] Poincaré thought he'd solved it: Diacu and Holmes, *Celestial Encounters*.

[2] Chaotic systems: Gleick, *Chaos*; Stewart, *Does God Play Dice?*; and Strogatz, *Nonlinear Dynamics*.

[3] predictability horizon: Lighthill, "The Recently Recognized Failure."

[4] horizon of predictability for the entire solar system: Sussman and Wisdom, "Chaotic Evolution."

庞加莱图

我们不妨以伽利略研究过的钟摆摆动问题为例，说明庞加莱的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利用牛顿运动定律并关注钟摆摆动时受到的力，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展示钟摆每时每刻的角度和速度变化情况的抽象示意图。这幅图基本上是对牛顿定律的一种视觉化翻译，除了微分方程中的已有要素外，图中没有任何其他新内容。简言之，它只是查看相同信息的另一种方式。

这幅图好像一幅展示乡村天气模式的示意图。在这样的图上，我们会看到表示局部传播方向，也就是天气锋面每时每刻的移动方式的箭头。这和微分方程提供的信息一样，和舞蹈指令给出的信息（比如，左脚放在这里，右脚放在那里）也一样。这样的图被称为矢量场图，上面的小箭头是矢量，表明如果单摆的角度和速度是现在这种情况，那么它们在片刻之后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钟摆的矢量场图如图1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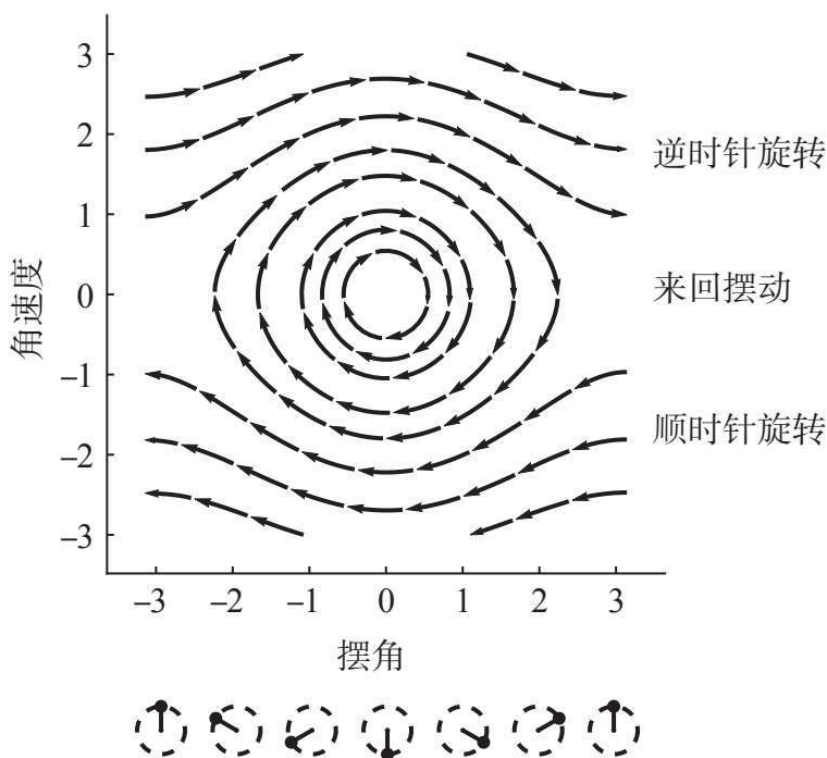


图11-1

在我们解释这幅图之前，请记住它是抽象的，因为它并没有展示出钟摆的实际形象。旋涡状的箭头图样不像一个挂在绳子上的重物，钟摆的照片可不是这样的。（矢量场图下方有钟摆摆动的草图，你可以从中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矢量场图并不是对钟摆的现实描绘，而是展示钟摆状态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的变化情况的抽象图示。图上的每个点都代表钟摆的角度与速度在某个瞬间的可能组合，横轴代表钟摆的角度，纵轴代表它的速度。在任意时刻，如果知道了角度和速度，我们就可以定义钟摆的动态。当我们预测钟摆在下一时刻和此后各个时刻的角度和速度时，箭头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信息，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跟着它们走。

箭头在中心附近的旋涡状排列方式，对应着几乎垂直向下的钟摆的简单往复运动；而顶部和底部箭头的波浪状排列方式，则对应着钟摆像螺旋桨一样有力地转过最高点的运动。牛顿和伽利略从未考虑过这种涡旋状运动，它们已经超出了经典方法的计算范围。然而，我们在庞加莱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涡旋状运动。现在，这种研究微分方程的定性方法是非线性动力学的有关所有相关领域——从激光物理学到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Poincaré's Visual Approach: Gleick, Chaos; Stewart, Does God Play Dice?; Strogatz, Nonlinear Dynamics; and Diacu and Holmes, Celestial Encounters.

走上战场的非线性

非线性动力学非常实用。在英国数学家玛丽·卡特赖特^[1]和约翰·李特尔伍德的努力下，庞加莱的方法为英国在战时对抗纳粹的空袭做出了贡献。1938年，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恳请伦敦数学学会帮助解决一个问题，该问题与英国政府秘密研发的无线电探测和测距（现在叫作“雷达”）技术有关。项目工程师对在放大器中观测到的嘈杂和不规则的振动现象备感困惑，当这些装置由高功率的高频无线电波驱动时，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担心可能是设备出了问题。

政府的求助引起了卡特赖特的注意，她一直在研究由类似的“看起来令人厌恶的微分方程”^[2]支配的振动系统模型。她和李特尔伍德后来发现了雷达电子设备中不规则振动的来源：放大器是非线性的，如果被驱动得太快和太厉害，它们就会产生不规则的反应。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追忆了1942年他聆听卡特赖特演讲时的情形。他写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的全面发展依赖于高功率的放大器，所以拥有有效的放大器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士兵们饱受失效放大器的折磨，并为此谴责制造商的无良行为。然而，卡特赖特和李特尔伍德发现，该受责备的不是制造商，而是方程本身。^[3]

卡特赖特和李特尔伍德的洞见促使雷达工程师在放大器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的情况下操作它们，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卡特赖特一直表现得很谦逊。当读到戴森撰写的关于她的研究成果的文章时，她还责备他言过其实。

玛丽·卡特赖特女爵士于1998年去世，享年97岁。她是第一位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女性数学家。她留下了严格的指示，绝对不要在她的追悼会上致颂词。

^[1] Mary Cartwright: McMurran and Tattersall, “Mathematical Collaboration,” and L.Jardine, “Mary, Queen of Maths,” BBC News Magazine,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21713163>. For biographies, see <http://www.ams.org/notices/199902/mem-cartwright.pdf> and <http://www-history.mcs.st-and.ac.uk/Biographies/Cartwright.html>.

^[2] “very objectionable-looking differential equations”: Quoted in

L.Jardine, “Mary, Queen of Maths.”

[3] “equation itself was to blame”: Dyson, “Review of Nature’s Numbers.”

微积分与计算机联盟

战时求解微分方程的需要，推动了计算机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机械电子大脑的计算机，通过考虑空气阻力和风向等复杂情况，可以计算出实际条件下火箭和炮弹的飞行轨迹。战场上的炮兵军官需要利用这些信息去命中目标，所有必需的弹道数据都要提前算出来，并编制成标准的表格和图表。因此，高速计算机对完成这项任务而言至关重要。在数学模拟中，计算机利用恰当的微分方程和一个个小增量来更新炮弹的位置和速度，然后通过海量的加法运算（蛮力算法）得出答案，从而使一枚理想的炮弹沿它的飞行轨迹小步前进。只有机器才能不停歇地运转，并且快速、准确和不知疲倦地执行所有必要的加法和乘法运算。

从一些最早期计算机的名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微积分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其中一种是名为微分分析仪的机械装置，它的工作是求解用于计算火炮射表的微分方程。另一种名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它建造于1945年，是第一批可重复编程的通用计算机之一。除了计算火炮射表以外，它也能用于评估氢弹的技术可行性。

尽管微积分和非线性动力学的军事应用促进了计算机的发展，但在和平时期，计算机在数学和机器方面同样大有可为。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开始使用计算机去解决他们各自学科（除物理学以外）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英国生物学家艾伦·霍奇金和安德鲁·赫胥黎需要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理解神经细胞是如何相互交流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电信号如何沿神经纤维传导。他们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实验，计算钠离子和钾离子流经一种很大且便于实验的神经纤维（鱿鱼的巨大轴突）膜的情况，并根据经验推断出这些离子流如何受到膜电位的影响，而膜电位又如何被离子流改变。但如果没有计算机，他们就无法计算神经脉冲沿轴突传导时的速度和形状。想计算神经脉冲的动态，就要求解一个膜电位作为时间和空间函数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安德鲁·赫胥黎花了三周时间，终于在一台手摇机械计算器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3年，霍奇金和赫胥黎^[1]因为发现了神经细胞工作原理的离子基础，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所有有意将数学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人来说，他们的方法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这无疑扩展了微积分的应用领域，数学生物学^[2]是对非线性微分方程的一次不受限的运用。在牛顿式分析方法和庞加莱式几何方法的帮助下，以及对计算机的泰然自若的依赖下，数学生物学家正在寻找支配心律、传染病传播、免疫系统运转、基因编辑、癌症发展和其他许多生命奥秘的微分方程，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如果没有微积分，他们可能根本做不到。

[1] Hodgkin and Huxley: Ermentrout and Terman,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Rinzel, “Discussion”; and Edelstein-Keshet, Mathematical Models.

[2] Mathematical biology: For introductions to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epidemics, heart rhythms, cancer, and brain tumors, see Edelstein-Keshet, Mathematical Models; Murray, Mathematical Biology 1; and Murray, Mathematical Biology 2.

复杂系统与高维诅咒

庞加莱方法最严重的局限性与无法想象三维以上空间的人类大脑有关。自然选择使我们的神经系统能够感知普通空间的三个方向，即上下、前后和左右。但不管怎么努力，我们都无法想象出第四个维度，或者说无法在脑海中“看见”它。然而，有了抽象符号，我们就可以尝试处理任意数量的维度。费马和笛卡儿向我们展示了相关做法，他们的 xy 平面使我们了解到数字可以依附于维度。左右对应于数字 x ，上下对应于数字 y ；通过涵盖更多的数字，我们还可以涵盖更多的维度。对三维空间来说， x 、 y 和 z 就足够了。为什么不能有四维或者五维空间呢？还剩下很多字母呢。

你可能听说过，时间是第四个维度。的确，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被融合成单一的实体——时空，并被表示成一个四维的数学领域。粗略地说，普通空间被绘制在前三个轴上，时间被绘制在第四个轴上。这种结构可被看作对费马和笛卡儿的二维 xy 平面的拓展。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时空。庞加莱方法的固有局限性涉及一个更加抽象的领域，它是对我们在研究钟摆的矢量场时遇到的抽象状态空间的拓展。在那个例子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抽象空间，其中的一个轴代表钟摆的角度，另一个轴代表钟摆的速度。在每个时刻，钟摆的角度和速度都有特定的值。因此，在那个时刻，它们对应于角-速度平面上的一个点。这个平面上的箭头（看似舞蹈指令的那些箭头）就像钟摆的牛顿微分方程那样，决定了每时每刻的状态变化情况。循着箭头，我们就可以预测出钟摆将如何移动。钟摆有可能来回摆动，也有可能转过最高点，这取决于它的起点位置。所有信息都包含在这幅矢量场图中。

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钟摆的状态空间之所以是二维的，是因为它的角度和速度对预测它的未来状态而言是充要条件。这两个变量给了我们预测钟摆下一刻、再下一刻直到未来的角度与速度所需的全部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钟摆是一个天生的二维系统，它有一个二维状态空间。

当我们考虑比钟摆更复杂的系统时，高维诅咒就会出现。比如，我们来看看让牛顿头疼的三体问题。它的状态空间有18个维度，为了弄清楚原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一个引力体上。在任何时刻，该引力体都位于普通三维物理空间中的某个地方。因此，它的位置可以由3个数字 x 、 y 、 z 指定。它也可以沿这3个方向中的任意一个移动，从而对应于3个速度。简言之，一个引力体需要具备6条信息：表示它所在位置的3个坐标，以及它在3个方向上的速度。这6个数字指定了它的位置和运动方式，让它们分别和这个问题中的3个引力体相乘，就可以得到状态空间中的 $6 \times 3 = 18$ 个维

度。因此，在庞加莱的方法中，系统（由3个引力体组成）的不断变化的状态，可以用一个在18维空间中四处移动的抽象点来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抽象点会描绘出一条轨迹——类似于真正的彗星或者炮弹的运动轨迹——只不过这条抽象的轨迹存在于庞加莱的幻想世界（三体问题的18维状态空间）中。

当我们将非线性动力学应用于生物学领域时，常常发现有必要想象更高维度的空间。比如，在神经科学中，我们需要追踪霍奇金和赫胥黎的神经膜方程涉及的所有钠、钾、钙、氯和其他离子浓度的变化。这些方程的现代版本可能涉及数百个变量，它们代表了神经细胞中离子浓度的变化、膜电位的变化，以及细胞膜传导各种离子并允许它们进出细胞能力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状态空间有数百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对应一个变量：第一个对应钾离子浓度，第二个对应钠离子浓度，第三个对应膜电位，第四个对应钠电导，第五个对应钾电导，等等。在任何时刻，所有这些变量都会取一定的值。霍奇金-赫胥黎方程（及其推广形式）向这些变量发出了舞蹈指令，告诉它们如何沿轨迹运动。这样一来，利用计算机描绘状态空间中的轨迹，就可以预测出神经细胞、脑细胞和心脏细胞的动态，其准确度有时甚至会高得惊人。人们正在利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进行神经病理学和心律失常方面的研究，旨在设计出更好的除颤器。

如今，数学家常常思考任意维度的抽象空间，即 n 维空间，而且我们已经开发出任意维度的几何学和微积分。正如我们在第10章看到的那样，CT扫描背后理论的发明者阿兰·科马克纯粹是出于好奇心，他想知道CT在四维空间中会如何运行。伟大的成果往往来自这种纯粹的冒险精神。当爱因斯坦需要适用于广义相对论的弯曲时空的四维几何时，他欣喜地得知它已然存在。这要归功于波恩哈德·黎曼，他在几十年前出于最纯粹的数学原因创建了四维几何。

因此，追随自己对数学的好奇心，可以给我们带来无法预见的科学回报和实际回报。它本身也给数学家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且揭示了不同数学分支之间的隐秘联系。出于这些原因，在过去200年里，对高维空间的探索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数学分支。

然而，尽管我们有一个可在高维空间中做数学运算的抽象系统，但数学家仍然很难让这些空间可视化。事实上，更坦白地讲，我们无法让它们可视化。我们的大脑根本做不到，我们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这种认知局限性对庞加莱的计划造成了严重打击，至少在3个以上维度的空间中如此。他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方法依赖于视觉上的直观感受，如果我们无法想象在4维、18维或者100维空间中会发生什么，他的方法就不能为我们提供太多帮助。这已经成为复杂系统领域^[1]进步的一大障碍，如

果我们想搞清楚一个健康的活细胞中发生的数千种生化反应，或者解释它们如何出错进而引发癌症，就必须理解高维空间。如果我们想利用微分方程理解细胞生物学，就得用公式解开这些方程（索菲·柯瓦列夫斯卡娅证明我们做不到）或者想象出它们的样子（我们有限的大脑也做不到）。

因此，关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数学研究令人沮丧。不管是经济、社会和细胞的行为，还是免疫系统、基因、大脑和意识的运转，对任何想在我们时代的这些最棘手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人来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似乎也总是很困难。

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我们甚至不知道其中一些系统是否包含类似于开普勒和伽利略发现的那些模式。神经细胞显然有，但经济或者社会呢？在许多领域，人类的理解仍然处于前伽利略或者前开普勒阶段。我们尚未找到模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洞见这些模式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呢？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不是牛顿式的，它们甚至也不是伽利略式和开普勒式的。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complex systems: Mitchell, Complexity.

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洞察力之谜

在这一点上，计算机必胜主义者有话要说。他们认为，有了计算机，有了人工智能，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而且，这很有可能是真的。长期以来，计算机一直在帮助我们研究微分方程、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系统。当霍奇金和赫胥黎在20世纪50年代打开了理解神经细胞工作原理的大门时，他们在一台手摇机器上解出了他们的偏微分方程。当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在2011年设计787梦想客机时，他们利用超级计算机计算飞机受到的升力和阻力，从而找出防止机翼发生颤振的方法。

尽管计算机刚开始只是作为计算机器，但它们现在的功能远不只是计算，并且已经获得了某种人工智能。比如，谷歌翻译如今在地道翻译方面表现出色，有的医学人工智能系统诊断疾病的准确度比最优秀的人类专家还高。

但我认为，没有人会说谷歌翻译了解语言的真谛，或者医学人工智能系统理解疾病的原理。计算机有可能变得富有洞察力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们能和我们分享有关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比如复杂系统（大多数重大的未解科学问题的核心）——的见解吗？

为了探究支持或反对计算机具有洞察力这种可能性的理由，我们来看看计算机国际象棋^[1]是如何逐步发展的。1997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国际象棋博弈程序“深蓝”，在一场6局的比赛中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尽管这个结果在当时出人意料，但这一成就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台机器每秒钟可以评估2亿种棋局，虽然它没有洞察力，但它有惊人的速度，而且从不知疲倦，从不会在计算中出错，也从不会忘记一分钟前它在想什么。尽管如此，从机械和物质方面看，它的表现仍然像一台计算机。它可以凭借计算击败卡斯帕罗夫，却无法靠智慧取胜。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象棋程序虽然有令人生畏的名字，比如“鳕鱼”和“科莫多巨蜥”，但它们仍然以异于人类的方式下棋。它们喜欢吃掉对方的棋子，并进行钢铁般的防守。虽然它们比所有人类棋手都强大得多，但它们没有创造力或洞察力。

然而，随着机器学习的兴起，一切都变了。2017年12月5日，谷歌旗下的深度思维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阿尔法零”的深度学习程序，震惊世界棋坛。通过与自己对弈数百万次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个程序自学了国际象棋。在短短的几小时之内，它就变成了历史上的最佳棋手。它不仅能轻易击败所有最优秀的人类象棋大师（它甚至懒得去试），还击败了当时的计算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在与强大的“鳕鱼”程序进行的一场100局的比

赛中，“阿尔法零”取得了28胜72平的战绩，一局未输。

最可怕的一点是，“阿尔法零”展示了它的洞察力。和计算机的一贯表现不同，它的行棋方式直观而优美，进攻风格也富有激情。它会冒险采取开局让棋法，在一些棋局中，“阿尔法零”使“鳕鱼”失去了招架之力，并使得“鳕鱼”团团转，手段看起来既恶毒又残暴。它的创造性溢于言表，能走出任何国际象棋大师或者计算机做梦也想不到的招式。它兼具人类的精神和机器的力量，这是人类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可怕的新型智能。

假设我们可以利用“阿尔法零”或类似的东西（不妨称之为“阿尔法无穷”），去解决理论科学中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免疫学、癌症生物学和意识的相关问题。为了继续这个幻想，我们又假设伽利略模式和开普勒模式存在于这些现象中，并且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只能由一种远胜于我们的智能来完成。如果这类定律确实存在，那么超人智能可以找到它们吗？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毫无意义，因为这类定律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但如果这类定律存在，而且“阿尔法无穷”能找到它们，那么对我们来说它就好比一个先知。我们将追随它，听从它。虽然我们不明白它为何总是正确的，甚至听不懂它在说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或者观测去检验它的计算结果，并且发现它似乎无所不知。我们将变成既惊讶又困惑的旁观者。即使“阿尔法无穷”能自圆其说，我们也无法理解它的推理过程。在那一刻，至少对人类来说，始于牛顿的洞察力时代将会结束，而一个新的洞察力时代将会开启。

这是科幻小说中的情景吗？也许吧。但我认为像这样的情景并非不可能成真。在数学和科学的某些分支领域，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人类洞察力的黯然失色^[2]。有些定理尽管已被计算机证实，但没有人能理解相关证明过程。也就是说，定理是正确的，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而这时候，机器也无法向人类做出解释。

我们以一个由来已久的著名数学问题——四色定理为例。该定理指出，在某些合理的约束条件下，在任何一幅包含接壤国家的地图上，要使相邻两国的涂色不同，仅需4种颜色即可做到。1977年，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四色定理得到证实，但没有人能检验论证过程的所有步骤。此后，尽管这个证明过程不断被验证和简化，但其中的某些部分仍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蛮力计算，就像在“阿尔法零”出现之前计算机下国际象棋的方法一样。这个证明过程的出现，令许多数学家抓狂不已。他们已经确信四色定理是真的，并且只想知道它为什么是真的，而这个证明过程却毫无帮助。

我们再来看约翰尼斯·开普勒在400年前提出的一个几何问题。该问题要求

找出在三维空间中堆放等大球体的最致密方法，类似于杂货店用板条箱装橙子时遇到的问题。将球体码成多个相同的层，然后一层一层直接堆积起来，这种方法是最高效的吗？或者像杂货店往板条箱里装橙子那样，让层与层之间错开，使每个球体都位于它下方的4个其他球体形成的凹陷处，这种方法是不是更佳？如果是这样，还有其他不规则但更致密的堆积方法吗？开普勒认为杂货店的堆积方式是最好的，但这个猜想直到1998年才被证明。在他的学生塞缪尔·弗格森和18万行计算机代码的帮助下，托马斯·黑尔斯将计算过程简化为数量虽大但却有限的情况。然后，在蛮力计算和巧妙算法的帮助下，他的程序验证了开普勒猜想。不过，数学界对此反应冷淡。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开普勒猜想是正确的，却仍然不明白它为什么正确，黑尔斯的电脑也无法为我们做出解释。

但如果我们用“阿尔法无穷”来解决这些问题，会怎么样呢？这台机器可以给出优美的证明，就像“阿尔法零”和“鳕鱼”的对弈一样，直观而优雅。用匈牙利数学家保罗·厄尔多斯^[3]的话说，这些证明直接来自“那本书”。（厄尔多斯想象上帝有一本书，里面收录了所有最好的证明。）评价某个证明直接来自“那本书”，是对它的最大褒奖。这意味着该证明揭示了某个定理为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用一些可怕、难懂的论证迫使读者接受它。我能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给我们提供来自“那本书”的证明。到那时，微积分会是什么样子，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又会是什么样子？

[1] computer chess: For background on AlphaZero and computer chess, see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9736/alpha-zeros-alien-chess-shows-the-power-and-the-peculiarity-of-ai/>. The original preprint describing AlphaZero is at <https://arxiv.org/abs/1712.01815>. For video analyses of the games between AlphaZero and Stockfish, start wi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8F-cNsa-k> 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1o48Sgrck>.

[2] the dusk of insight: Davies, “Whither Mathematics?,” <https://www.ams.org/notices/200511/comm-davies.pdf>.

[3] Paul Erdős: Hofman, The Man Who Loved Only Numbers.

结语

通过正确地运用无穷，微积分可以解开宇宙的奥秘。尽管我们一再地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却仍然感觉不可思议。不知何故，人类发明的推理体系竟然与自然的步调一致。微积分的可靠性不仅体现在它诞生的尺度（日常生活的尺度，比如陀螺和几碗汤）上，还体现在最微小的原子尺度和最宏大的宇宙尺度上。所以，它不只是一种循环推理的把戏。它不是指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塞入微积分，然后微积分再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微积分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没见过，现在见不到，将来也无法看见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从未存在过但有可能存在的事物，前提是我们拥有使它们魔法般出现的智慧。

对我来说，最大的谜题是：为什么宇宙是可理解的，以及为什么微积分会与其步调一致？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希望你也认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本着这种精神，让我带你去往晨昏蒙影地带，通过最后3个例子来阐释微积分那可怕的有效性吧。

小数点后8位

第一个例子将带我们回到本书开头处援引的理查德·费曼的那句妙语——“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这个例子与费曼在量子电动力学（QED）^[1]方面的研究有关。量子电动力学是关于光与物质如何相互作用的量子理论，它把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海森伯和薛定谔的量子理论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融合在一起。费曼是量子电动力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了解了他的理论结构之后，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推崇微积分。他的理论无论在策略上还是样式上，都充斥着微积分的元素，包含幂级数、积分和微分方程，还有大量的无穷概念。

更重要的是，量子电动力学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理论。^[2]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物理学家仍在忙着利用费曼图对量子电动力学中出现的级数求和，以预测电子和其他粒子的性质。通过对这些预测和极其精确的实验测量结果进行比较，他们已经证明这个理论与现实的吻合程度达到了小数点后8位，优于亿分之一。

这是一种说明该理论基本正确的奇特方式。我们通常很难找到有效的类比来解释这么大的数字，但我尝试着打这样一个比方：1亿秒等于3.17年，要把某个结果精确到亿分之一，就像从此时此刻起，不借助时钟或闹钟，恰好在3.17年后的那一秒，精确地打出一个响指。

从哲学上讲，这样的结果令人吃惊，毕竟量子电动力学的微分方程和积分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当然，它们也建立在实验和观测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深植于其中。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是想象力的产物。它们不是对现实的毫无创见的模仿，而是发明创造。通过在纸上写下几个方程，然后用21世纪加强版的牛顿和莱布尼茨方法做一些计算，我们就能预测出自然最深层的性质，而且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这实在令人惊讶。人类曾经做出的任何预测都不如量子电动力学的预测准确。

我之所以认为这个例子值得一提，是因为它揭穿了你有时会听到的谎言：就像宗教信仰和其他信仰体系一样，科学对真理并无特别的要求。然而，任何可精确到亿分之一的理论都不再是宗教信仰或上帝观点的问题，否则它就没必要满足小数点后8位的精确度要求了。在物理学领域，大量理论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量子电动力学至少现在还未被推翻。毫无疑问，它和其他所有理论一样有偏差，但它也一定十分接近真理。

^[1]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Feynman, QED, and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2] the most accurate theory: Peskin and Schroeder,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Field Theory, 196–98. For background, see <http://scienceblogs.com/principles/2011/05/05/the-most-precisely-tested-theo/>.

发现正电子

表明微积分的奇特有效性的第二个例子，与量子力学的一次更早的扩展有关。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1]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旨在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指导原理融合起来，并应用于速度接近光速的电子。狄拉克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美的理论，他选择它也主要是基于审美原因。他用来支撑这一理论的不是特定的实验证据，而只是一种艺术感，即它的美就是其正确性的标志。然而，单单是那些约束条件——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相容性还有数学简洁性——就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狄拉克的手脚。在与各种理论进行了一番斗争之后，他找到了一种能够满足他的所有审美需求的理论。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是以对和谐的追求为导向的。像所有优秀的科学家一样，狄拉克也试图用预测结果来检验他的理论正确性。对他来说，理论物理学家的身份就意味着要使用微积分。

狄拉克解出了他的微分方程——狄拉克方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分析它，在此过程中他的方程做出了几项惊人的预测。其中之一是反物质应该存在，也就是说，应该存在一种与电子电量相等但电性相反的粒子。一开始，他认为这种粒子可能是质子，但质子的质量对它而言又太大了；狄拉克预测它的大小约为质子的 $1/2\,000$ 。从没有人见过如此微小的带正电粒子，狄拉克方程却预测出它的存在。狄拉克称之为反电子，1931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2]并在文中做出预测：当这个尚未被观测到的粒子与电子相撞时，它们会相互湮灭。他写道：“当用抽象符号表示这个新进展时，不需要做任何形式上的改变。”然后，他简练地补充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自然还没有利用它，人们将会感到十分惊讶^[3]。”

1932年，一位名叫卡尔·安德森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研究宇宙射线时，在他的云室里看到了一条怪异的轨迹。某类粒子像电子一样盘绕，却朝相反的方向弯曲，仿佛携带着正电荷。他不知道狄拉克的预言，但他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安德森在193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粒子的论文，他的编辑建议把它叫作正电子，这个名称就此沿用下来。1933年，狄拉克因为狄拉克方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36年，安德森因为发现正电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后，正电子一直被用于拯救生命。它们是PET扫描^[4]的基础，这种医学成像技术可以让医生看见大脑或其他器官的软组织中代谢活动异常的区域。PET扫描以非侵入性方式（无须借助手术或其他侵入颅骨的危险操作），帮助确定脑肿瘤的位置或探测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淀粉样斑。

这是体现微积分作为某些极其实用且重要事物之基础的又一个绝佳案例。

正因为微积分是宇宙的语言，也是破解宇宙奥秘的逻辑引擎，狄拉克才能够写下一个关于电子的微分方程，并从中了解到自然的一些新奇、真实和美丽之事。这个方程引导他想象出一种新粒子，并且意识到它应该存在。逻辑和美都需要这种粒子，但仅靠逻辑和美还不够，它也必须与已知事实相一致，与已知理论相吻合。当把所有这些都混合起来时，就好像符号本身创造了正电子一样。

[1] Paul Dirac: For Dirac's life and work, see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The 1928 paper that introduced the Dirac equation is Dirac, "The Quantum Theory."

[2] In 1931 he published a paper: Dirac, "Quantised Singularities."

[3] "one would be surprised": Ibid., 71.

[4] PET scans: Kevles, *Naked to the Bone*, 201–27, and Higham et al.,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816–23. For positrons in PET scanning, see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and Rich, "Brief History."

可以理解的宇宙

随着体现微积分的奇特有效性的第三个例子登场，我们似乎应该在爱因斯坦[1]的陪伴下结束这段旅程了。他的身上集中了我们谈论过的诸多主题：对大自然的和谐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坚信数学是想象力的胜利果实，对宇宙的可理解性始终存有求知欲，等等。

这些主题在他的广义相对论[2]中展现得最为清晰明了。在他的这个代表性理论中，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的时空概念，并重新定义了物质与引力的关系。对爱因斯坦来说，引力不再是即时性的超距作用。相反，它是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是宇宙结构的弯曲，是时空曲率的体现。曲率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微积分诞生之日，那时人们对曲线和曲面十分着迷。曲率在爱因斯坦手中不仅变成了形状的性质，也变成了空间本身的性质。就像费马和笛卡儿的xy平面有它自己的生命一样，太空也不再是戏剧舞台，而是变身成演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物质告诉时空该如何弯曲，曲率则告诉物质该如何移动。它们的共舞使广义相对论变成了非线性理论。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理解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含义，必定会面临重重困难。直到今天，广义相对论的非线性方程中仍然隐藏着许多秘密。爱因斯坦凭借他的数学技巧和顽强的精神，从中挖掘出一部分。比如，他预测当星光经过太阳身旁到达我们的星球时会发生弯曲，这个预言在1919年的一次日食期间得到了证实，爱因斯坦因此蜚声国际，并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

这个理论也预测引力可能会对时间产生一种奇怪的效应[3]：当一个物体穿过引力场时，时间的流逝可能会加快或者减慢。这听起来很怪异，但它确实发生了。GPS卫星就需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它们在地球上空运行，那里的引力场较弱，会使时空曲率减小，并导致钟表比在地面上走时快。如果不对这种效应进行修正，GPS卫星上的钟表就无法保持走时的准确性，每天都会比地面上的时钟快45微秒。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多，但别忘了GPS需要纳秒级的准确度才能正常运转，而45微秒是45 000纳秒。如果没有广义相对论的修正，GPS的误差将以每天10千米的速度不断累积，整个系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导航价值。

广义相对论的微分方程还做出了其他几个预测，比如宇宙的膨胀和黑洞的存在。这些预言在被提出之时看似稀奇古怪，但最终都得到了证实。

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为引力波[4]探测做出重大贡献的3个人，引力波是广义相对论预测到的又一种惊人效应。这个理论指出，一对

互相绕转的黑洞会在它们周围的时空中形成旋涡，并有节奏地拉伸和挤压时空，由此产生的时空扰动会像涟漪一样以光速向外扩散。爱因斯坦曾经怀疑我们不可能测量到这种波，并担心它可能只是一种数学错觉。而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关键成就在于，他们设计并制造出有史以来最灵敏的探测器。2015年9月14日，他们的装置探测到一个时空震颤，仅相当于质子直径的千分之一。作为对照，这就好比将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微调了相当于人的一根头发直径的长度。

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冬夜写下这篇结语的。走出家门抬头仰望，遥远的星星和漆黑的太空让我不由地心生敬畏。

作为飘浮在一个中量级星系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物种，智人是如何成功预测出，在距离地球10亿光年之遥的浩瀚宇宙中的两个黑洞相撞后，时空会发生怎样的震颤呢？我们早在引力波到达地球之前就知道它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多亏有微积分、计算机和爱因斯坦，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引力波是人类有史以来听过的最微弱的耳语。在我们成为灵长类动物之前，在我们成为哺乳动物之前，甚至在我们还是微生物的时候，这种轻柔而微小的波就已经开始朝我们漾来。当它在2015年的那一天抵达地球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在倾听，也因为我们通晓微积分，所以我们才能听懂这轻柔的耳语意味着什么。

[1] Albert Einstein: Isaacson, Einstein, and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2] general relativity: Ferreira, *Perfect Theory*, and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3] strange effect on time: For more on GPS and relativistic effects on timekeeping, see Stewart, *In Pursuit of the Unknown*, and <http://www.astronomy.ohio-state.edu/~pogge/Ast162/Unit5/gps.html>.

[4] gravitational waves: Levin, *Black Hole Blues*, is a lyrical book about the search for gravitational waves. For more background, see <https://brilliant.org/wiki/gravitational-waves/> and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17/press.html. For the role of calculus, computers, and numerical methods in the discovery, see R.A. Eisenstein, “Numerical Relativity and the Discovery of Gravitational Waves,” <https://arxiv.org/pdf/1804.07415.pdf>.

致谢

撰写一本关于微积分的大众读物，是一项奇妙的挑战，也充满了乐趣。我从高中时期初次学习微积分开始就爱上了它，并且梦想着能跟广大读者分享这份爱，但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绊住我：写研究论文，指导研究生，备课，抚养孩子，遛狗……大约两年前（2017年），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年龄（我敢打赌你的年龄也一样）正以每年一岁的速度增长，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尝试跟所有人分享微积分乐趣的最佳时机。因此，我首先要感谢你们，亲爱的读者，谢谢你们的到来。

事实证明，写作这本我计划已久的书比我预期的难度要大得多。这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事实的确如此。我沉浸在微积分中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很难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去看待它。幸运的是，一些非常聪明、慷慨和有耐心的人愿意帮助我，他们根本不知道微积分是什么，或者微积分为什么重要，当然他们也不像我和我的同事那样，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数学问题。

谢谢我的作品经纪人卡廷卡·马特森。很久以前，当我不经意间提到微积分是人类拥有的最伟大思想之一时，他说他很想读一本关于微积分的书。好吧，我把这本书送给他，非常感谢他对我和这个项目的信任。

我很幸运能跟两位出色的编辑——埃蒙·多兰和亚历克斯·利特菲尔德一起工作。我怎么感谢埃蒙都不为过，和他一起工作的感觉棒极了。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读者：聪明睿智，有点儿将信将疑，充满好奇心，渴望刺激。最重要的是，埃蒙先于我找到了整本书的叙事结构，并用坚定而温柔的手引导着我。我原谅他让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书稿，因为每一遍修改都让这本书变得更好了。说实话，没有他我根本做不到。感谢亚历克斯一路护送书稿抵达终点，与他共事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

说到愉快，像特蕾西·罗这样的审稿编辑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她让我总想再写一本书，就只是为了每次我们一起工作时她给予我的善意教导。

感谢编辑助理罗斯玛丽·麦吉尼斯的开朗、高效和注重细节。感谢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所有人，感谢他们辛勤的工作和出色的团队合作。能与他们共事，让我觉得非常幸运。

玛吉·尼尔森为这本书制作了图表，我们已经合作过多次。在这里，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她的奇思妙想和协作精神。

感谢我的同事迈克尔·巴拉尼、比尔·邓纳姆、保罗·金斯帕格和马尼尔·苏里，他们友善地阅读了部分或全部书稿，润色了我的措辞，纠正了我的错误（谁知道有两个墨卡托？），并且以所有学者都渴望的那种愉快而挑剔的方式为我提供了有用的建议。我从迈克尔的评论中学到很多东西，要是我再早点儿把书稿拿给他看就好了。比尔是个英雄。保罗一直都在做他自己（而且是最棒的）。谢谢马尼尔十分认真地阅读我的初稿，并祝他的新书好运。

谢谢我的好朋友汤姆·季洛维奇、赫伯特·许和琳达·伍达德。在本书的酝酿阶段，他们不仅容忍我喋喋不休地说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还总是坚定地鼓励着我，关注着我。我非常欣赏艾伦·佩雷尔森和约翰·史迪威的研究，也很荣幸他们能跟我分享对这本书的看法。我还要感谢罗德里戈·特索·阿根廷、托尼·德娄斯、彼得·施罗德、尼克·特泽尔和斯特凡·查豪，他们允许我评论他们的研究并且复制他们已发表的图表。

有句话我已经对默里说过无数次了，虽然它听不懂，但我知道它能领会我的意思。“谁是好孩子呢？你。”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卡罗尔，还有我的女儿乔和利娅，感谢她们的爱与支持，感谢她们容忍我比平时更惹人厌的那副心烦意乱的样子。芝诺悖论在我们家有了新的含义，因为有一段时间这本书似乎就要完成了，但却一直抵达不了终点。非常感谢她们的耐心，我非常爱她们。

史蒂文·斯托加茨

于纽约伊萨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积分的力量 / (美) 史蒂夫·斯托加茨著 ; 任烨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21.1

书名原文 : Infinite Powers: How Calculus Reveals the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ISBN 978-7-5217-2329-8

I. ①微... II. ①史... ②任... III. ①微积分 - 普及读物 IV. ①O17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95920号

微积分的力量

著者 : [美] 史蒂夫·斯托加茨

译者 : 任烨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23.75

字数 : 260千字

版次 : 2021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20-6710

书号 : ISBN 978-7-5217-2329-8

定价 : 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赵冬梅 著

帝制时期
人与制度
的互动

法度 与 人心

我们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
绝不只有金元明清一个面相
还有宋朝那种最好的状态
尽管脆弱，但毕竟曾经存在

中信出版集团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 互动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导读 历史中国的空间、时间与中国人

历史中国的空间

传统中国的时间

中国人——我们都是“混血儿”

上篇 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引言 游戏与规则

制度存在的真实状态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皇帝的权力与矛盾

帝制的宿命

皇帝也有怕的？

最高权力如何交接

皇帝的“岗前实习”

从家天下到公天下

帝王的礼制与情感

至卑贱者至跋扈

如何决策？如何纠错？

皇权哺育下的相权特点

此消彼长还是共同扩张？

缺宰相的政府靠什么运转？

御前会议解决啥问题

朝堂上的一股清流

君臣关系也有软肋

帝制国家的地方治理

封建与郡县的是是非非
央地关系的错喻
中央巡视制度的兴与衰
如何解决边疆问题
上级集权下的地方狼狈
盗贼之患与解决办法

选官与用官的那些事儿

当官儿的观念与实践
小圈子政治的人才困境
唐后期的升迁高速路
科举时代的中华梦
开放式政府的三大难题
选任集权的利与弊

利益配置的矮化与隔离

如何对待功臣？
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危险的兵权该怎么管？
刺青后是否有回头路？
进退两难的狄青
官吏分途的等级差别
被歧视与被矮化者

结语 陛下与谁“共天下”？

东、西方帝国的差异
雇主伙计到合伙共利
滕子京谪守背后的反思

下篇 王朝政治省思

引言 文化与历史的交错塑造

观念隔膜下的古今代沟

天命观——理解与共情
天人感应的纠错功能

孝的尺度与边界
愚忠是个死胡同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

主流政治文化的变迁

迂阔下的稳健
从高效到失效
儒与法的艰难融合
礼治与德化的合奏
兴亡反思下的帝制梦魇

帝政兴衰的北宋故事

这是最好的时代？
养子即位的大转折
立场差异下的大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成是败？
宽容政治为何会终结？
司马相公是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传统政治文化何去何从？

金：政治的残暴化
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明：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明：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清：盛世的狭隘

结语 历史并不永远向前

外篇 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

写作缘起与延伸阅读

“帝制时期中国史”私房推荐书目

八部论著解读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考》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前言



学史三十年，同行学友之外，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因为不

掺杂诸如发表压力、职称追求一类的功利杂念，他们的兴趣更显真诚，立场更显超脱，或者说更为纯粹，更加接近以史学为志业者对于历史原初的冲动与热爱，因而也是严肃的。业余爱好者真诚严肃的兴趣，应该获得职业研究者诚挚的回应。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传统的写史方式，是循沿时间线索以朝代为主体讲述兴亡故事，中间穿插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关键制度。自先秦以降，秦开帝制，汉固一统；魏晋以降四百年，“五胡乱华”，朝分南北、国裂西东，战乱纷扰，复统于隋；李唐雄张，赵宋文弱；元朝以蒙古而治“中国”，虽国土广大，然汉化浅而治力弱；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明太祖，明朝政治，废宰相、下西洋、迁都北京、抵御蒙古、特务政治、宦官专权，张居正改革之志未遂，满洲之兵锋已起，李自成入京，崇祯帝吊死，吴三桂开门，多尔衮入关；清朝虽异族统治，汉化诚深，知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专制加剧，国家机器日益僵化，应变无能。而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又岂能容忍老大帝国之画地为牢、抱残守缺？洋枪洋炮硝烟散去，幸存之中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此后，国人之历史记忆被一断为二，前此之中国遂为“古代中国”“传统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史”。既有之通史，虽内容之丰俭有不同，而结构之方式概出一辙。

重复无趣。回到初心：人们为什么喜欢历史？

细审其故，大致有二：其一，喜欢历史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懂得反思的力量，时常会停下奔忙向前的脚步，回望走过的路。在明净澄澈的反思中，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历史机遇与个体命运之间的交织互动。今天之所以为如是之今天，乃由无数之昨日渐变累积而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接纳，事实就是，历史塑造了现在，并将影响未来。

其二，喜欢历史的人，是看过了世界或者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好奇与融入欲望的人。我们从外面的世界所获得的所有刺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体的、个体的，自觉的、不自觉的，主动的、被动的，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在这里最初所获得的浸润、教养、知识和体验，指向一个有着深厚过往的不一样的中国。了解世界越多，人们就越想回过头来看中国，越想深入了解中国的过去，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我决定换一个思路，集中关注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对当今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要素，并以这些要素为线索，换一种方式讲故事。

我所关注的第一大要素是政治制度。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它规定人的活动范围，影响人的选择，注定其结局。

我对制度最初的敏感起于户籍。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抱一个、牵一个，带着我们姐妹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河北到广东去投奔在海军服役的父亲。第二年我进入学龄，可是没有户口，邻居吴老师说情，班主任王老师接纳了我，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我一直努力学习，这句话是第一推动力。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本，幸好父亲管理部队农场时跟附近的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我们家才能吃上以平价买到的新米。1981年，父亲为国服役期满，母亲和我们姐妹随军，农转非，获得城市户口，母亲也有了正式工作。1988年，我考上大学，户口迁入北京，上的是北京大学的集体户。1990年暑假，我因选修中国现代史课，要回老家的村庄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其中一项是“女性的择偶标准”。母亲说：“还问别人干吗，我就能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军二干三工人’。干部、工人有工资，只有军人能带家属，随军吃商品粮。”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短短几千字的条例，把城市和农村隔成了两个世界，让“到城里去”成为农村人长期以来最大的心愿。



制度的根本性特征还在于它的延续性或者说继承性。对此，宋元之际的史

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非常敏锐的观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理乱兴衰”“不相因”，唐朝有唐朝的故事，宋朝有宋朝的遭遇，彼此独立，互不相干，“无以参稽互察”。“典章经制”“实相因”，自秦汉以降，无论礼仪、音乐、军事、司法、赋税，还是国家机构的组织运作、官僚的选拔任用以及地方的管理，虽然各朝有各朝的发展演变，不会与前朝完全相同，但是每一个朝代在创立之初，都不得不沿用前朝制度治理国家，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都是大实话。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传统时期，这些问题往往被“理乱兴衰”所消解，同时被消解的，还有有关这些问题的宝贵思考——人们习惯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来解释衰亡，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新朝代。即便是现代的历史书写，也习惯了在“朝代末期”大做文章。

是时候换个视角，从“典章经制”的视角来审视“理乱兴衰”了，这就是本书的第一条叙事线索。我要讲的，是帝制国家解决上述共性问题的努力，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纠缠互动。

我所关注的第二大要素是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以历史文化为线索，讲述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

在这片土地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如花开花落，发生、结束，了无痕迹；有的影响巨大，就像板块对撞隆起成山峦、洪水改变河道；更多的介于二者之间，譬如人之气质转移，一日两日，一年两年，似乎毫无变化，然而，年深日久，终有一日，“鸾镜朱颜惊暗换”^[1]，变化早已发生，并且不可逆转。那些曾经发生、造成影响的因素累积沉淀下来，塑造了我们民族集体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就像是民族的基因，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管你是否承认，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它们就在那里，如影随形。倘若我们积极地

了解它，理性地认识它，择善而从，趋利避害，善自保养，历史文化就是我们的财富；倘若我们对它视而不见，那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乃至梦魇。

从制度演变看政治得失，说的是国家的故事；从历史文化看民族性格，说的是群体的故事。这就是我要讲的两个故事。

未来会怎样，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和认知，而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帮助群体理解和认知过去。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过去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让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自我认识之旅吧。

[1] [宋]钱惟演：《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见唐圭璋编：《全宋词·钱惟演》，中华书局965年版，第4页。

导读 历史中国的空间、时间与中国人

历史中国的空间

先来看历史中国的空间。历史是时间的故事，为什么先说空间而不是时间？因为文明早期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越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就越大，而这些影响会深深地烙印在群体的记忆当中。

简而言之，中华文明的生长环境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的这片土地，高原、大海、大漠和草原就像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怀抱，紧紧包围着它。

毫无疑问，地理中国是相对独立、自成一格的；但这绝不是封闭、孤立的，不管是远古时期的中原还是后来的中华帝国，都绝非如此。相反，中国是开放的——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认识空间中国的前提。



图一：高冠凤鸟佩（妇好墓出土）

高冠凤鸟佩是商朝武丁时的玉器，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出土，9.9厘米×2.7厘米×0.3厘米，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凤鸟呈站立状，头顶有高冠，冠上刻有简单的纹理，冠边呈齿状，凤尾分开呈双叉状，体型颇为粗壮。凤首长羽冠的形态较为独特，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味。在当时，凤被商人作为神鸟崇拜，玉凤鸟佩形样别致，多为商代贵族佩戴，以此物向神灵祈佑。

197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女将军妇好的墓，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玉器。为研究这些玉器，请来了不少专家。结果，考古专家还没说话，玉雕场的老师傅眼睛先亮了：“这不就是和田玉吗？”

是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和田玉。妇好墓在河南安阳，和田在遥远的新疆，两地相距四千千米。以今天的交通水平，从安阳到和田自驾大概需要五十个小时。妇好的时代距今已有三千两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除了人的腿只有马车，我们按照每小时五千米的行进速度算，跨越四千千米需要八百个小时。可是那个时候的路哪有今天这么好，两地之间的实际道路里程绝对远超四千千米。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和田玉抵达了安阳，成为殷商王室的珍宝。

中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输入与输出。输入的例子，除了妇好墓中的和田玉，还有：葡萄是汉武帝的时候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面食来自中亚，东汉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菠菜在唐朝传入中国；玉米、白薯、花生、辣椒、西红柿都来自美洲，明朝开始进入中国。输出的例子，更是尽人皆知，不胜枚举。沿着陆地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全世界热销。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英国人还是更喜欢买中国瓷，商人们甚至抱怨英国人不拥护“国货”。



图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壁画初唐《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为莫高窟第三二三窟一幅初唐时期的壁画。壁画右上方是汉武帝与众臣来甘泉宫瞻仰“祭天金人”的场景；下方为汉武帝在群臣簇拥下，骑马送张骞前往西域，张骞手持笏板，在汉武帝面前跪拜辞别；左边介绍张骞一行前往西域的情况：一位僧人模样的人在前引路，两个持旌节的人紧随其后，其中之一为张骞。左上方是崇山峻岭掩映下的方城大夏国，张骞历尽险阻，最终抵达目的地。壁画中有五个榜题，多已模糊不清。敦煌壁画常会在一个画面中展现出一个完整故事，如同连环画，从故事的来龙到去脉皆有体现。张骞的此次出使成为历史上的“凿空”之行，此行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间的深入交流。

明白了中国在空间上的开放性，再回看这片土地，便可以发现，原来这片相对独立的土地，存在着那么多通向外部世界的门户与道路：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新疆，可以通向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向南，从四川再向西南，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可以进入南亚次大陆；东面的大海也从来没有挡住过中国人，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朝廷会实行海禁政策，但是，自宋元至今，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海船还是扬帆往来于大海之上，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有的学者因此认为闭关锁国根本是一个伪命题。

有创造的能力，也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这才是空间中国的真正形象，是空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本来面貌。

回到内部，空间中国也是在不断成长中的。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概念，而是指历史上中国人繁衍生息的土地。就其大体而言，空间中国的成长经历了黄河流域的整合、长城以南的统一，以及长城南北的大统一三个阶段。

大约在四千年前，黄河中游的各个原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并建立了国家，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就是“中原”。空间中国的成长故事从中原开始，然后向四周延伸，速度缓慢，但从未停歇。

中原之外，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北到内蒙古、辽宁，东到山东，东南到长江流域，西南到四川盆地，南到珠江三角洲，都有活跃的人类活动。所以，考古学上有所谓“六大区系”（六大文化圈）的划分。这些早期的人类文明，原本是各自繁荣、自成一家的。随着中原文化的拓展，它与各地原有文化开始碰撞、融合，空间中国也由此成长壮大。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建立之后，周人分封各方，建立了诸多诸侯国。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向南也抵达了淮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的江北地区。这些诸侯国就是中原文化的扩展者，它们驱动着空间中国的生长。

时间向前推进到公元前8世纪，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继续向南与楚文化，向东南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中国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区域的整合。而包含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则要等到13世纪元朝的建立才能实现。

现在，让我们稍稍停留，来看一看长城以南的中国的空间。在秦统一之后的地图上，“中国”的边界向东、向南都到了大海。当然，帝国在南方的统治主要集中于交通干线附近，江南和岭南的丘陵、山地仍然是越人控制区。向西南，秦朝修筑了栈道，已将四川盆地纳入版图。向北，中原的农业文明抵达了其北部界线——长城。长城以北就是骑马民族匈奴人的地盘了。

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域已经非常辽阔。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流淌着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给华夏文明以充足的给养。

作为农耕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一线。北方与南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北方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又直接经受着长城以北游牧民族的打击。由于战争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3世纪之后，北方的

自然环境逐渐恶化，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都在慢慢下降。当然，此时北方的整体水平仍然高于南方，只是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与此同时，南方却享受着“后发优势”，开始走上坡路。南方的自然环境本就优于北方。在游牧民族的打击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又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先进技术与优越的自然条件结合，使南方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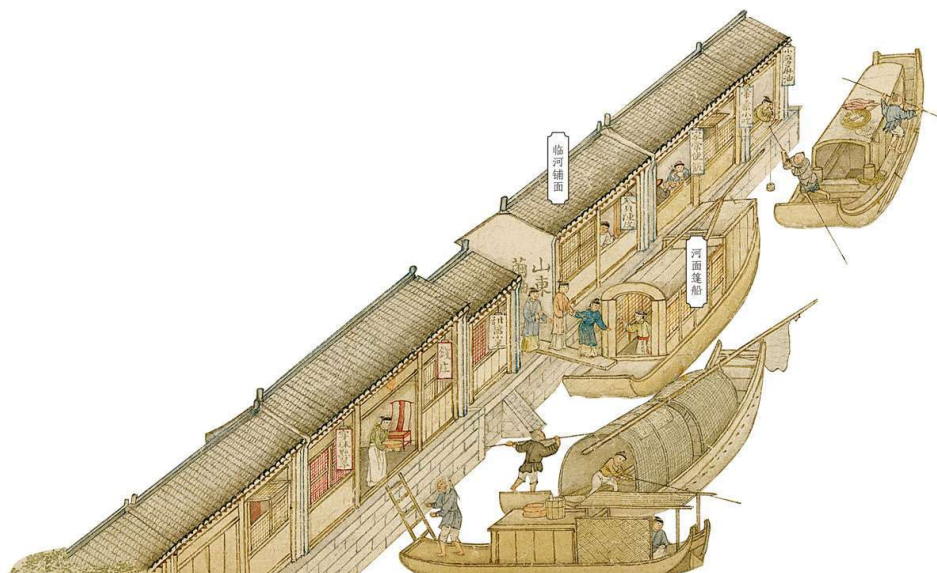
北方向下，南方向上，这一上一下在6世纪时完成交替，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从此之后，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北方。南宋时已经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清时期，江南的太湖流域成为经济最发达地区。甚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人看来，苏州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仍然是世界一流的。

然而，当我们把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帝国的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隋唐的都城在今天的西安，北宋的都城在今天的开封。为什么？因为敌人在北方，帝国的传统根基在北方。元明清三代，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明代要抵御蒙古，元、清要靠近统治民族的发祥地，首都反而转移到更靠北的北京。



图三：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之市井风貌

《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绘，1225厘米×35.8厘米，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该画创作历时24年，比宋代《清明上河图》（528.7厘米×24.8厘米）还要长。作品以散点透视法，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商贾云集，络绎辐辏的苏州市井景象。图中展现了渔民收获后，满载稻米来苏州进行交易的盛况。江南鱼米之乡的富足与交易时的热闹场景在画面中一览无余，仿佛都能听到交易时的交流与喧闹声，很好地印证了“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民谚。



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南北分离，凸显了运河的地位。在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发明之前，最便宜的大宗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淌，缺乏具有较高运力的南北向的天然水道。所以，开凿运河、沟通南北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轻信隋炀帝开凿运河只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他其实是一位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长城以北，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即使是最耐旱的小米也种不活，只能放牧牛羊。换句话说，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区的北极限就是长城，所以，中原王朝要在这里的崇山峻岭上修筑防御工事，保卫农业文明的果实。

分享一个小插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来到中国，留下了一部《马可·波罗行纪》（*Les voyages de Marco Polo*），它是西方人了解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哥伦布远洋航行时曾经把它带在身边，北京的卢沟桥在英文中的名字就是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但是，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根本就没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没有提到过长城——那么宏伟的长城竟然被马可·波罗遗漏了，那他肯定没到过中国。这是怀疑论者的说法。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能否认为行纪没有提到长城，就能证明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恐怕不能。何以言之？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此雄伟的长城，是明朝才出现的。换句话说，马可·波罗经过的时候，长

城并不像现在这样醒目。第二，更重要的是，在元朝，长城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因为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在政治上的统一，是一个跨越长城南北的大中国。长城失去了其保卫农业文明的传统防卫功能，而现代旅游业尚未展开，所以长城年久失修、无人维护，被暂时“遗弃”了。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历史中国的空间发展史做了简单的梳理：首先是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整合，然后从黄河出发向长江、向大海、向珠江不断拓展，到秦汉时期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统一，最后是长城南北、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区的大统一。就空间而言，中国是缓慢成长的，它的地域相对独立，但从不封闭。空间中国的成长过程，也是华夏汉人与周边各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像大雪球一样的中华民族的过程。



图四：《马可·波罗行纪》手抄本书影及内文

这部制作于约1350年的手抄本是现存最古老的抄本之一。《马可·波罗行纪》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于13世纪下半叶在中亚和远东的旅行经历记述。在父亲尼可罗和叔叔马飞阿的陪伴下，马可·波罗于1275年经陆路到了中国。行纪的译者序中提到，他在中国待了17年，曾担任枢密副使，并做了3年扬州都督，其间得到元世祖极大信任。而后他于1295年经海路回故乡，后因遭遇战争被俘收监。在坐牢时，他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口述给了同牢房一个名为拉斯提新（Rusticin）的书记员，该人将口述内容记录在了羊皮纸上。译者序还提及，该书近2/5在描写元朝，被认为是一部绝好的元代初期社会状况写真，也是一部珍贵的社会史料，更是一份旅行报告和实用信息的汇总，因此被称为《寰宇记》或《东方见闻录》。该书是欧

洲人了解中亚及中国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入门书籍。

传统中国的时间

所有历史都是有关时间的故事。历史中的时间，可以是客观存在，可以是主观塑造，还可以是制度规定。关于时间，我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第二个是传统中国的计时方式，它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

我读《史记》，印象最深刻的是司马迁为统一时间所做的努力。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空间统一已经完成，这就是汉帝国的版图。在这个广大的空间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历史文化的，各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自然消除，相反，当统一由暴力达成，就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制造仇恨，加剧分裂。秦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忽略了它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汉帝国在开国之初实行分封制，给诸王以相对独立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这种差异。到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压倒分封，大一统逐渐巩固，但它还需要一个说法，一个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历史记忆的大整合。司马迁的《史记》所做的，就是这项文化整合工作。

在《史记》中，司马迁给生活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各个地区的人民构建了一套祖先谱系。这个祖先谱系是从五帝开始的，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颡顼高阳，第三是帝啻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司马迁说，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都是同姓的，只是国号不同，“以章明德”，国号是为了标明他们的德属不同。同姓也就是同族，五帝同姓，天下一家。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各个族群。比如大禹的苗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去祀奉看守大禹的祭庙，他的后代就成为越的王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把汉帝国疆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的统一将成为汉帝国大一统大厦的文化混凝土。这是一项伟大的创造，至今仍然发挥着凝聚华夏的作用。

以上便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的故事，这里所说的“时间”指的是“过去”。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传统中国的计时方式与时间观念，看看古人是如何处理“现在”的。传统的计时方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政治，一部分属于社会。

属于社会的计时方式，是干支计时法，也就是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组合，构成六十个数位，干支的一个循环叫六十甲子。它可以用来纪年，也可以用来纪日。甲子纪年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举例来说一下甲子纪日：1199年，有一个叫孙应时的人，担任常熟知县即将届满，他非常担心自己不能安全通过离任审计，顺利提级。在距离任期届满还有六十天的时候，孙应时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诉说忧虑，这位老师就是朱熹。孙应时在信里说，从现在开始算，我还有一个甲子的时间就要卸任了，要是能踏踏实实地离开，那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1]孙应时所说的“一个甲子”就是六十天。

在一日之内，则用地支划分十二时辰，每个时辰两小时。古代照明设施差，所以要充分利用白天时间。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宫城的大门也是天蒙蒙亮就打开，此时，皇帝已经穿戴整齐，准备接见百官了。

皇帝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首都中高级官员得几点起床呢？冬天四点之前，夏天大概两点半之前。在没有暖气的冬夜，朝臣得爬出温暖的被窝，穿衣上马，投身寒冷的街道。李商隐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夫婿能佩戴金龟，级别够高了，只可惜要上朝，起得太早，醒来都不见个人影儿。当然，做了地方官就没这个麻烦了，尤其是一把手，完全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欧阳修回到首都当了大官，每逢雨天路滑，还不得不早起上朝的日子，总是会一边听着十里长街的鼓点，一边怀念滁州知州任上的美好时光。

属于政治的计时方式，是皇帝的年号和“颁历授时”。

用君主在位的年头来标记时间，起源很早。司马迁记西周历史，表示时间的方式就是君主的名号加上年份顺序。比如周厉王（君主）三十七年（厉王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西周发生国人暴动，周厉王逃跑，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号称“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可以推知确切年份的历史事件。当然，周厉王这个“厉”字是谥号，王死了以后才出现，所以，周厉王三十七年是后人的说法。当时人的说法应该是：当今的周王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这种用君主在位年头来标记时间的方式，在帝制时期继承下来。

到汉武帝的时候，又有了一项新发明——年号。给时间取一个新名字，不喜欢还可以换，就像今天的人换QQ签名、微信昵称一样。武则天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换年号的皇帝。她在位二十一年，一共使用过十七个年号，光宅（一年）、垂拱（四年）、永昌（一年）、天授（二年）、长寿（二年）、延载（一年）、天册万岁（一年）、万岁通天（一年）、神功（一年）、圣历（二年）、久视（一年）、长安（四年），此外还有五个

为时更短的年号，且每个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可惜用的时间都不长。

皇帝取年号，最怕跟前人重了。武则天的年号这么多，个个吉利又响亮，而且没跟人重过。宋太祖就不一样。他有个年号叫乾德。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把四川纳入版图，后蜀的后宫佳丽也成为战利品，进了开封宫城。一日，宋太祖闲来无事，拿起一把后蜀美人的镜子把玩，先对镜理髭须，又翻过来看后边的花纹，看着看着忽然傻眼了。这面铜镜是精品，所以上面有确切的铸造年份——乾德四年。当时是哪一年呢？才乾德三年！怎么可能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镜子？是时空错乱了，还是有什么不祥之兆？宋太祖越想越紧张，第二天上朝见到宰相，赶紧问，为什么乾德三年会出现乾德四年的镜子？几个宰相大眼瞪小眼，谁也说不上来，只好请来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陶谷学问也不行，窦仪倒还有点真才实学。他判断，这肯定是蜀国来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用过这个年号，这镜子应该是在王衍的乾德四年（922年）铸的。这样一来，就比宋太祖的乾德三年早了四十三年。

闻听此言，宋太祖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觉得不读书真可怕，说了一句让后来的历史学者视若珍宝的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



图五：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此图俗称《四美图》，明代唐寅作，绢本设色，124.7厘米×63.6厘米。画面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后宫里的故事。画中四位宫妓头戴金莲凤鸟花冠，身着云纹装点的道衣，端庄而不失娇媚。身着蓝色衣裙的宫妓，正给左边穿褐色衣裙的宫妓劝酒，右边身着绿色长裙的宫妓，身体略微前倾在斟酒，中间背对我们的这位，左手托盘里盛放着酒壶和点心。从画面看出，左边这位宫妓已然不胜酒力，似在挥手婉拒不能再喝了，而蓝衣女子依旧在不住地劝她更尽一杯。四人相向而立，通过婀娜的姿态和推让的手臂，画面的生动感与丰富性跃然而出。唐寅以“三白法”在宫妓的额、鼻、颌三处涂上白粉，恰似如今的高光妆容，使得人物面部更加饱满立体。

有意思的是，宋太祖的乾德年号并没有立即停用，一直用到了乾德五年，直至乾德六年才把年号改成开宝。宋太祖的不信邪，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新皇帝即位的当年是不改元的，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用新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不逾年改元”者，若非改朝换代，则难免落人口实。比如，公元220年曾出现了三个年号——建安、延康和黄初。这一年本来是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曹丕嗣魏王，二月，改年号为延康（献帝年号）；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又比如，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太祖暴崩，其弟即位，是为太宗。太祖自有子，且已成年，兄终弟及，“斧声烛影”，固已启人疑窦。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复下令改元，太平兴国元年只得八日。“不逾年改元”，八日都不肯等，吃相未免难看，更令人疑其皇位来路不正。

同一个皇帝换年号，有的是为了向上天祈福，比如武则天，有的是要宣誓政治路线。最喜欢在年号上标榜政治路线的，是宋朝。比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导致官僚集团分裂，新旧两党对立。神宗用过两个年号——熙宁、元丰。神宗之子赵煦（后来的哲宗）幼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一反神宗之政。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重返神宗路线，遂用绍圣做年号，“绍”者继承，“圣”者神宗，“绍圣”的意思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神宗的另一个儿子赵佶，即徽宗，用过一个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熙宁，宣誓重回熙宁政治路线。崇宁是宋徽宗的第二个年号，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意思是采用中间路线，调和新旧两党，以期重建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十九岁的宋徽宗刚上台时的政治诉求——这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看问题很准，知道国家的麻烦在于官僚集团的分裂，只可惜有心无力，好大喜功，最终还是倒向了新党一边，“崇宁”去也。

明清两代，画风大变，皇帝不再拿年号玩文字游戏了，基本上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用到寿终。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是可以用车年来称呼的，比如“洪武爷”“朱洪武”，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王

朝鼎盛时期的三位皇帝。

与年号等政治时间相关联的行为，有颁历授时。“颁”是颁发之意，“授”是授予之意，“历”就是历书，是有关年、月、日、节日、节气等的时间表。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因此，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理想就是，取缔一切民间私自制定的历书，由官方制定历书，并颁发到全国各地，让全国各级政府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工作，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生产生活。换句话说，历书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时间秩序。

传统史书把颁历授时的传统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圣王尧的时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用一本历书统一全国其实是很困难的。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历书就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终归有限，在很多地方，老百姓还在用民间学者制定的私历。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在新疆的吐鲁番，也能严格按照唐中央颁布的历书行事。按照现在的道路里程，新疆吐鲁番距离唐代长安是两千多千米，唐代的路况跟今天是没法比的，所以会更慢。长安十一月颁历，次年的二月，这份新颁的历书才能抵达吐鲁番。可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地方政府的粮料是按月发放的，每月按天数计算，大月小月差一天。在接到中央政府的历书之前，吐鲁番地方政府有两个月无历可依，那么，这两个月应当怎样发放粮料呢？一概按小月发放，待日历到时再做更正。倘若这两个月都是大月，那么就在那两天的口粮补回来。唐朝律令制政府行政的严谨性，以及唐中央无远弗届的行政覆盖能力，令人惊叹。

干支计时与颁历授时这两种传统的时间标记方式所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间观念？意义的产生需要外物的参照，我们的参照物是西方的公元纪年法。

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为界线，把时间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两部分。不管“公元前”还是“公元后”，时间都是连续的，这是西式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不管是干支，还是皇帝的年号，都处在不断的“重启”当中。六十一甲子是不断更新、重启的，每一个甲子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朝代的建立、每个皇帝的即位，甚至每个年号的开端，也都是一个重启。相较之下，中国的时间其实比较缺乏连贯性。正因如此，那些通史的写作者，比如司马迁、司马光才显得尤其伟大，因为他们让“我

们的时间”连续起来了。

[1]孙应时的故事，请见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8年版。

中国人——我们都是“混血儿”

华夏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就是中原，但中原并不为华夏族所独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曾有许多其他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比如来自北方草原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从东北深山密林里走出来的乌桓、鲜卑、女真，来自西北的羌、羯、回鹘和党项。这些曾经称雄中国北方，甚至统治过整个中国的民族，有的西迁进入欧洲，比如匈奴、突厥；有的仍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比如蒙古族和满族；还有一些，却仿佛沙漠中的河流一样消失不见，比如契丹。





辨状马尾与红绳捆扎的马尾，
清洁整齐，便于奔跑

图六：五代 胡瓌（传）《卓歇图》

《卓歇图》，传为五代胡瓌作，长卷，绢本设色，256厘米×33.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以前，画家一般不会在画作上题款，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相关资料来推测画作的作者。胡瓌为五代后唐画家，善画北方边疆牧马与驰猎的生活，如部族迁徙、游骑出猎等情景，尤工画马，笔法遒劲细密，马匹体型健硕，姿态矫健，颇为生动。《卓歇图》展示的是契丹可汗率部下在狩猎后歇脚宴饮的场景，画卷前半部分是出猎场景，后半部分是宴饮场景。“卓歇”意指牧人搭帐篷驻扎歇脚，此处呈现的正是歇息的场景。从画作中人物髡顶辮发、圆领长袍及革带等的装扮特点，我们足以感受到浓厚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的生活气息。

10世纪初，契丹人一度成为东亚霸主，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辽，领土扩张到长城以南。1125年，辽为金所灭，共存在了二百一十九年。辽亡之后，部分契丹贵族逃亡到中亚，建立了西辽政权。问题是，那些留在中国的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从史书记载能够看到，辽的皇族耶律氏中有一支留在金朝继续做官。到13世纪蒙古人崛起之后，耶律氏的这一支里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耶律楚材，他的一席话曾救下华北千千万万汉人的性命。当时，有蒙古贵族认为汉人没有用，想要把汉人杀了，把汉人的土地变成牧场，放牧牛羊。幸好耶律楚材向窝阔台汗进言，才阻止了屠杀。耶律楚材的祠堂就在颐和园内。

那么，后来呢？契丹人究竟到了哪里？答案很明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所有那些曾经活跃一时的民族，如果后来没有西迁或者北归，而是留在中国，最后都融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

哲学家梁漱溟先生，看姓氏当为汉族无疑。然而，梁先生自述是蒙古人后裔，而且是蒙古皇帝的同宗。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逃回北方的时候，梁先生的祖先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了河南汝阳，把姓氏从一看即知为蒙古人的“也先帖木儿”改成了“梁”。五百年后，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梁家的蒙古族血统。梁家人则是靠着家谱的记载传承祖先记忆。梁先生说，几百年来，他家和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的气质”的。这个“中间的气质”，就是混血气质。

若置之历史长河做纵深观察，则何止梁漱溟先生，所有中国人皆为混血儿。相信不少人都学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翦先生是湖南桃源人，同时也是维吾尔族人，不是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而是元朝时从中亚过来的色目人的后裔。翦先生高鼻深目，的确带有几分异族特征。



图七：莫高窟第二九〇窟壁画 北周 《胡人驯马图》

这幅《胡人驯马图》是敦煌莫高窟第二九〇窟的壁画。马性情刚烈，通常要经过驯服才便于驾驭。图中一位高鼻深目的马夫，身穿圆领窄袖胡服，脚蹬长靴，左手牵缰绳，右手举马鞭，双膝略弯，正在专注地驯马。被驯之马高抬右前腿，两后腿压低弯曲，俯首后坐，呈踢蹬状，似正要躲避挨打，又略显出些许不驯服。画工通过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纯熟高超的画技，对胡人驯马的形象进行了精炼准确的表达。画中胡人高鼻深目的面部轮廓及异域服饰亦清晰可见。

回溯历史，来自北、西两个方向的其他民族陆陆续续进入中原，与中原的原住民——华夏族交往、通婚，为华夏文明注入新鲜精悍的血液，丰富了中国人的生物学基因，也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第一次是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也就是从2世纪末到6世纪末，四百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民族在中原的北部先后建立政权。最终，鲜卑人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其间，不仅有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

有汉人的鲜卑化。那个时代的中国北方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隋、唐的皇室都融合了汉与鲜卑两股血脉。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拥有胡族血统的有三十六人，占到近十分之一。唐代在民族问题上呈现出空前的包容性，许多异族人在长安做官，而唐代后期基本上是靠所谓的蕃将在守边。如陈寅恪先生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让唐王朝一度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第二次是从10世纪到14世纪，也就是从契丹崛起到元朝退守塞外，差不多四个世纪。这一时期，先是契丹在北方建立了广阔的草原帝国，统治区域扩大到长城以南，宋辽定盟，双方皇帝约为兄弟，两国平等交往，为南北北朝。此后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朝，灭辽驱宋，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之后蒙古崛起，统一草原各部，首先向西把势力扩展到中亚，接着回师中国，灭西夏、金、大理，包围夹击，终灭南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在战争与和平的变奏中，首先是契丹、女真与北方汉人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汉人；然后是大批色目人，包括西夏人，中亚、西亚各族人跟随蒙古大军进入中国，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穆斯林，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成为回族的祖先；最后，是大理和南宋被征服，大理人和宋人被纳入了元朝的统治范围，而蒙古人、色目人也进入了南方的广大地域。



图八：莫高窟第二九六窟壁画 北周 《福田经变图》

这幅《福田经变图》是莫高窟第二九六窟的一幅北周壁画。该窟从北顶中段开始，画面分上下两层。本文图中上层展现的是在一座果园里，有三人在树下歇息；另外还有一辆卸辘的骆驼车，人和骆驼都在水井旁休息，水井另一侧有人正在饮骡马和骆驼。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在干旱的西北古道上，商旅行人路遇水井时的欣喜场景。下层左边有两人扶着一位半卧的病人，在给他喂药，旁边有人正在捣药；中间部分画了“设桥”，两个商人押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过桥；桥对面走来一个西域商人，牵着两头驮着货物的骆驼，领着商队正准备过桥。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

方交往的概貌。



半卧喝药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形象地比喻成“滚雪球”。

[1]这个大雪球滚了四千年，最早是黄河下游的不同部落之间碰撞融合，汇聚成雪球的核心；然后长江流域的部族加入进来；到秦汉时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基本融为一体，汉人出现；东汉至隋四百年，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入华；两宋三百年间，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以战争促融合；清朝满洲的入主、对新疆的开拓、对西南统治的加强，又为雪球增添了新元素。其他民族的加入，在数量上壮大了华夏人口，在文化上则让华夏趋于多元。

在“大雪球”形成的过程中，很多曾经称雄一时的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名称，完全融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华夏，即为历史上通常所说的汉族，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不同民族的血液，当然是混血的。生物学上有“杂交优势”的说法，指两种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只不过这种杂交优势往往只能保持一代。华夏民族的“杂交优势”却是长期性的——不需要其他证据，华夏民族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证据。

那么，这个吸收了诸多异质因素的“大雪球”怎样才能保证它仍然是“中国”而非其他呢？尤其是当中国被“异族”统治时，比如，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女真人所建立的金，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满族人所建立的清。有些外国学者称这些朝代为“征服王朝”，这是普通中国人很难接受的说法。在中国人的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之中，异族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中国，辽、金、元、清都是传统中国王朝兴替链环上的组成部分，缺了其中任何一环，传统中国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在我们看来，“征服王朝”所象征的黑暗与断裂是不存在的，“中国”一直在延续，辽、金、元、清四代虽然是“异族”统治，华夏仍然是华夏。那么，果真如此吗？

辽、金、元、清四代，统治者来自北方，文化与血缘都与华夏有异，异族征服，战争中的血腥残酷、统治中的歧视压迫、文化上的野蛮倒退，都是事实，无可否认。同样不容否认的，还有其统治者对于华夏文明的学习与接纳——华夏民族之文化长期领先于东亚其他民族，而向往、追求先进文化是人类本性，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只要开始接受华夏文化，早晚都会被它同化。辽、金、元、清四朝，虽然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有深有浅，但国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有国号，有年号；国家机构是中国的，可以远溯周礼，近追唐宋；虽然统治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仍然在延续，弦歌不绝；即便统治者为异族，史官们仍然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为胜朝编修纪传体的正史，以明“天命”之转移、国祚之在我；科举在举行，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士大夫仍然怀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中国”从未中断。

“政治上的中国之道，就像是水田里的稻作经济一样，看起来比朝代或者种族更具根本性。”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这样总结道：

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比民族主义更具根本性。确定无疑的一个原因，是早期的中国皇帝总是宣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种族或者语言。继起的异族统治者发现，延续并加强这一传统是最方便的。无论夷夏，儒家的统治者所重视的，是官僚的忠诚及其合乎儒家礼法的行为。肤色和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儒家）经典并身体力行。成功的异族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因此成为刻苦的儒家学者、书法家和鉴赏家。他们引用子曰诗云、举行礼典、发布大赦、开科取士、任命官吏，像前朝天子那样颁布诏敕，由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2]

费正清的表述，与唐代韩愈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遥相呼应，当异族统治者“进于中国”，又有什么理由不“中国之”呢？华夏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而非生物血缘，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无论肤色、种族，都可以成为“华夏”。而就生物学事实来看，华夏民族人口规模巨大，远超进入中原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在群体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以此压倒性优势之人口规模，携相对先进之文明成就，纵然遭遇军事征服，然其人在，文化在，一番动荡扰攘之后，归于和平安宁之时，华夏文明又是草长莺飞了。当然，影响是相互的，经历“征服”与“同化”之后的华夏民族“大雪球”，也必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加以梳理。



图九：莫高窟第四五窟壁画 唐 《胡商遇盗图》

《胡商遇盗图》是莫高窟第四五窟的唐代壁画。图中有一队西域来的商人，他们留着浓密的胡须，戴着高高的毡帽，个个高鼻深目。他们牵着驮有货物的驴子前往中原进行交易，但刚转过山头，就遇上了身着唐装的持刀抢劫的强盗。这些强盗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长衫，还打着绑腿。他们自山谷中举着长刀冲出，拦住胡商们的去路，似乎在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这些胡商胆战心惊，双手合十，露出惶恐乞求的神色。他们将钱财丢在强盗面前，似乎表示只要不伤及性命，钱财任由强盗取去。壁画生动写实，极为传神，是唐代敦煌地区胡人与中原之间商贸活动的生动写照。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海纳百川而不失自我。在海纳百川的过程中，中华的“自我”也在不断蜕变中获得新生。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9页。

[2] John King Fairbank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r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88-89. (本段引文为作者译)

上篇 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

引言 游戏与规则

近年来，“穿越”成为一时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愿意选择哪个朝代？”采访者以为我会选择宋朝，然而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现代。”

我之所以如此作答，是深思熟虑、认真权衡过的。无他，我是女性，且对传统中国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因此不做玫瑰色的梦。按照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安排，如果穿越回去，我就不能反对丈夫纳妾，不能出来工作，不能单独旅行，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能之事太多，我不愿意。其实我也不劝各位男士穿越，假如穿越到东晋王羲之时代的寻常庶族家庭，你再聪明、再勤奋，也不会有机会跟王羲之对坐，挥麈谈玄；即便运气好，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被王谢子弟嗤之以鼻——风流潇洒都是高门士族的，你连喝彩的资格也未必有。万一运气再差点儿，你穿越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成了一个士兵的儿子，那除了当兵，你是一点儿别的指望也没有的。论普遍的自由度，还得看今朝。而这种自由度是现代社会制度赋予我们的。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1]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

大部分人说喜欢历史，其实是喜欢看大起大落的英雄故事，看帝王将相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权谋秘计，甚至想要学个一招半式的。那些浮于表面的故事当然有趣，然而，若只关心那些，这样的历史观察就显得不够高级了。这就像看《西游记》里孙悟空和各路神仙、妖精打架，云来雾去，极为热闹，可是有谁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制度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它规定了游戏规则，万变不离其宗。吃透了制度，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明白为什么是那样，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想真正了解过去，我们必须要看制度。

当然，了解古代的制度，不仅是为了正确穿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改造现代制度。古代制度的特点是它“已经完成”，从形成到结束，我们能够看到得失成败的全部轨迹，可以细细琢磨制度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古代的制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完善今天的制度。

换个角度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制度的考察，实际上是要以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为个案，对制度做一番具有普遍性的思考。那么，中国古代的制度演变究竟存在哪些特点呢？

[1] [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制度存在的真实状态

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国家性质）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中国进入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

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2]，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两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3]。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图十：《王安石肖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我国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历任淮南判官、舒州通判、群牧判官，任上政绩显著。于熙宁二年（1069年）迁参知政事，拜相，开始积极推行改革。后因遭到保守派反对，被两次罢免，出知江宁府。随着后期保守派的崛起，新法废除殆尽。虽然新法被废，但从变法的真正目的来看，王安石变法为神宗朝聚敛了丰厚的财富，增加了不少收入。而这些新生的财利，便由北宋“路”的四种机构之一的提举常平仓司专门掌管。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就皇权的安全来说，唐代以前，在中枢权力的分配上，宰相对军事、行政和财政实行一揽子管理，便于大权独揽。宋则不然，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历史发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宰相、枢密院、三司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分别向皇帝报告，这就让皇帝越来越像个“政府首脑”了。喜欢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后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极了高参和秘书。明太祖能够直接废除宰相，由皇帝亲自充当政府首脑，尽管不是宋朝制度的直接延续，但的确可以从宋朝这里获得某种解释。

关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具体设置，关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各项制度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

[1] 这是以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为代表的大秦群臣为始皇帝议定帝号时的总结。[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36页。

[2]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页。

[3] 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9—10页。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群雄竞逐，故多大刀阔斧的主动改革；两千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直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

无论是水滴石穿的渐变，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制度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因应变化”。“因应变化”一词，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1]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制度也。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以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既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应了时代要求的。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

^[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56页。

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总体而言，传统时期中国制度创新的力量来自中国内部。帝制时期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点：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为依托，托古改制。究其原因，一则古人相信夏、商、周三代是黄金时代，而周集三代之大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二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传统时期，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确都相对发达。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享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正是这种自信，赋予了传统中国开放的心态，可以放心吸收周边制度，为我所用。比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西北诸番为唐太宗共上尊号曰“天可汗”。从此之后，在唐王朝给西北诸番的命令文书当中，唐太宗的头衔是大唐皇帝与天可汗并列的。^[2]这两个名号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皇帝是中国的主宰，可汗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唐朝的皇帝也可以是北方草原的首领。再比如，北朝隋唐的官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号——

萨保。单看这两个字，很难想出它的含义，因为这是个音译的外来语，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对商队首领的称呼，后来发展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中国接纳了粟特商人，并将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用胡人首领来管理胡人。^[3]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帝国。那么，怎样评估这些北族政权对中国制度的影响？大体上说，他们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没有改变中国制度的总体和核心。比如沿用至今的大行政区——省的设置，就始于元朝。另外，一些落后的东西也随着北族成为统治者而进入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这一点，我将在“历史文化”篇中进行专文辨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制度上看，中国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必须有效回应时代变迁，并顺应制度发展的内在惯性。

^[1] [梁] 皇侃撰，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卷二《八佾第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4页。

^[2] 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40页。

^[3] 参见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载《文物》200年

第4期，第84—89页。

皇帝的权力与矛盾

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是其他一切制度的背景和边界。皇权笼罩一切，它是其他一切权力体的权力来源，可以赋予、增强、削弱、剥夺其他一切机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传统时期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1]，无边的权力背后是无边的责任。“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重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重是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帝制国家，抽象的象征性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2]“抽象的皇帝”的所作所为应当符合朝廷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的意愿、能力和经验却未必能保证他可以做到这一切。“抽象的皇帝”属于朝廷国家，具有“公”的属性；“具体的皇帝”身边还有一个庞大的“私属”利益群体，包括后妃、宗室、外戚、宦官。“具体的皇帝”与“抽象的皇帝”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皇帝制度的最大矛盾。

[1]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7—608页。

[2]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写在前面的话》，生活书店204年版，第4页（略有修改）。

帝制的宿命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拥护共和：“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虽然后来袁世凯曾短暂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但他说的是对的。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统治中国2133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中国迈入共和时代，君主政体将“永不再行于中国”。

那么，帝制的终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走向终结之外，帝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在共和之前，帝制和清王朝曾经有过通过改良继续存在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一次是1905年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但凡抓住其中一次机会立宪成功，那么，中国也许就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皇帝从专制君主变成立宪君主，清朝统治得以继续。然而，那两次机会都从清王朝的手掌心里溜走了。政治改革失败，君主立宪流产，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帝制终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先说1898年的维新运动。如果光绪皇帝本人和康有为稍微有一些政治经验，懂得稳中求进，平衡各方利益，改革措施推出得不是那么急迫激进，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样一个浅陋自私、唯利是图的老太太，她的势力没那么小，手腕没那么强硬，如果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能够“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此后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再说立宪运动。如果满洲贵族的私心不是那么畸形膨胀，略微懂得一点“同舟共济”的道理，让渡一些权力给汉人精英，比如“皇族内阁”十三个阁员不是八个满人（五个皇族）、一个蒙古旗人、四个汉人，而是相对均衡，那么，民族矛盾就不会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孙中山的反满宣传就不会那么有效。退一步说，如果最后一个帝制王朝不是满洲人建立的，那么，也许共和未必能够取代帝制。

慈禧太后阵营与光绪—康有为组合实力悬殊的对阵，袁世凯的叛变，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凑巧是非汉人统治，而满人在最后关头恰好表现出了最最狭隘的一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偶然。

然而，所有偶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悲伤的必然，这就是皇帝制度的权力特点。慈禧太后那个自私蛮横的老太太，她的权力几近一手遮天，如此大的权力怎么来的？皇太后是摄政——皇权的代理人，慈禧的权力来源就是皇权。帝制发展到清朝，皇帝的权力是空前强大的。

就其权力本质而言，在帝制时期，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2]。换言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当一个皇帝决心要做昏君的时候，除非将其废黜、囚禁，或干脆杀了他，没有别的办法；而废立既需要实力，又需要突破道德束缚的勇气，其实并不容易发生。

就朝廷国家具体的治国理政而言，明代以前，皇帝之下有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宰相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皇帝跑偏，让大政方针基本符合王朝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清两代不设宰相，明有内阁，清有军机处。然而无论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只是秘书咨询机构，在制度上不享有决策权；比之宰相，内阁和军机处的权力是不稳定的，更加依赖于皇帝的信任。没有了宰相，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一身而兼二任。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向皇帝集中。而权力就是责任，皇帝个人在军国大政和政府行政中所承担的责任变得空前巨大。

朕即国家。这样的权力结构对皇帝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好皇帝，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呢？他应该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公正无私，高瞻远瞩，有大局观，富有政治智慧，并且要熟悉政府运作的得失利弊。这是最高标准下的理想状态。

问题是在实际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皇帝的宝座？

在皇帝制度下，同一王朝之中历代皇帝的能力水平通常是“递减”的——越到后面越平庸。雄才大略的皇帝基本上只存在于王朝初期，清朝算是很不错的，康熙、雍正、乾隆连续三代基本合乎最高标准，但是，嘉庆以后就“一蟹不如一蟹”了。通常情况下，开国之君能力水平较高，后来的守成之主能做到“中主”，稍微克制个人私欲，遵守祖宗法度，每天按时上朝处理政务，就很不错了。雄才大略？可以不必期待。何以至此？

制度使然。帝制时期最高权力的承递实行世袭制，通常而言，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顺理成章做皇帝，选择余地因此有限，此其一；皇帝的成长空间狭窄，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曾经风雨见世面，除了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他的政治历练基本阙如，此其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皇位继承人能够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都是以“宅心仁厚”之类的品质取胜的——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他人教导的。比如，两位年幼的皇位候选人在一块儿玩，凑巧过来一只猫，胖男孩过去踢了那只猫一脚，瘦男孩乖乖地没动，皇帝看见了，就觉得还是那个乖的好——仁厚。最终，瘦男孩被选中，成了皇帝，这就是宋孝宗。欺负猫咪当然不好，可是用这一类的纯道德（甚至是性格）标准来选择治理国家的人，实在是文不对题。

因此，以正常手段登上皇位的，基本上是一些“老实孩子”，能力、精力这些都是不论的。但是朕即国家，不管你能力有没有，精力够不够，只要坐到那个宝座上，就被赋予了无边无际的权力。

把这样一些平庸的、缺乏因应能力的人，放到至高无上的皇位上，朝廷政治难免越来越僵化腐朽。周围环境没有大的变化，马马虎虎，做个守成之主倒也可以；若要他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晚清即使没有慈禧这个自私浅陋的老太太，即使光绪皇帝自己当家，他的能力、意志力和领导力也靠不住。看他选的“队友”是康有为团队，便可知其大概。而死到临头还要整出一个“皇族内阁”的摄政王大人，就显得更加愚昧无知了。

如此说来，清王朝的灭亡与帝制的终结，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皇帝终身制，皇位世袭制，骨子里是“家天下”。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四海为家。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吊儿郎当，不好好种田经营家业，老被父亲数落，说他“不如仲（老二）力”。后来刘邦当了皇帝，得意扬扬地对老爹说：“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这全天下，都是他的家业。

那么，皇帝拥有天下的自信和治理天下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上天。中国的皇帝是人间的君主，但同时兼具神的品格，秉天命治理人间，直接沟通天地，所以又称“天子”。“皇帝”这个名号当中也包含着神性。这个秘密就藏在“帝”字当中。秦始皇以四十虚龄混一天下，成就了“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功业，下令群臣制定新名号。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和博士们商量之后，提交的新名号方案是“泰皇”。为什么是泰皇？因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皇”是上古时期最尊贵的人间君主称号。秦始皇并没有接纳“泰皇”，他自作主张“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4]。秦始皇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帝”字？因为“帝”本是神的尊称，秦始皇看重的就是“帝”字的神性。

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秦的玉玺上就有“受命于天”四个字。后代的皇帝也都强调皇帝的统治权来自“天命”。比如，刘邦就觉得：“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5]后世皇帝为了证明“天命”的存在，最喜欢编造皇帝的出生神话，最普通的是其母“梦日入怀”。

中国的皇帝以人君为天子，自己来充当世界秩序的核心和枢轴，协调贯通人与宇宙。比如，皇帝祭天，就是要亲自与天沟通。我每次去天坛，站到最上面一层的时候都会想，这就是皇帝和上天进行“电话连线”的地方。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因此无远弗届，无所不包。这一点，在元朝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元朝皇帝诏书的开头是这样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句话是从蒙古语中硬译过来的，诸位可能觉得

陌生，那下面这个明朝的圣旨开头大家就都不陌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随时随地把天、运挂在嘴上，声称天命，这就是中国的皇帝。



图十一：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周颂·清庙之什图》（局部）

《周颂·清庙之什图》由被誉为“小吴生”的南宋宫廷画家马和之所绘。绢本，973厘米×32.6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全图字画各有10段，右书左画，书画相间，其中文字部分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笔书法。画作包括《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等篇。本文呈现的是《昊天有成命》篇，反映了周王率领诸侯群臣在祭台上祭告上苍的场景，以此来表达对周人先祖功德的感谢，并祈盼德业永续。画面中，人物相貌、衣饰器物皆以细笔线条勾勒。构图整饬严谨，笔法细腻精纯。



祭祀时的礼器与乐器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的皇帝，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虽然在英文里都译作“emperor”，但区别是极大的。举一个小例子，哈德良皇帝在旅途中被一个女人拦住，说有事需要跟他请愿。哈德良跟她说没空，这女人说，那么你就不要当皇帝了。闻听此言，哈德良就赶紧停下来听她说了。罗马的皇帝是第一公民。虽是第一，但也是公民。罗马的主权属于元老院和全体公民。罗马皇帝在形式上需要元老院任命，一年一次。权力是被授予的，看得到他权力扩大的过程。罗马皇帝要接近人民，与民同乐。这样的故事断然不会发生在中国皇帝身上。中国的皇帝虽然也有与民同乐的仪式，但骨子里是高高在上、与民隔离的。紫禁城的高墙，宫殿建筑的高台，皇帝身边环绕的仪仗、宦官、宫女，都把皇帝打扮成神秘崇高的样子，像神一样。

中国皇帝受天命统治人间，以天下为家，皇帝终身，皇位世袭，天下所有的权力向皇帝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注定了清朝帝国无法灵活转身，走上现代化道路，也注定了帝制必然终结的历史宿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帝制毕竟统治了中国2133年，可以说是影响中国最大的制度因素。那么，帝制为何能够延续如此之久？简而言之，第一，这两千多年不是一姓统治的万世一系，帝制与改朝换代相配合，改朝换代是帝制的存在方式；第二，两千多年之中，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东亚世界，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帝制自有其存在价值。在制度当中的皇帝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谁能约束皇帝呢？

[1]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东方出版社016年版，第04页。

[2]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载《北京大学学报》988年第2期。

[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982年，第387页。

[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年，第36页。

[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1页。

皇帝也有怕的？

是否有人可以约束中国古代的皇帝？诚实的答案是：没有人。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不怕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子。鹞子是体型最小、杀伤力最强的猛禽，是猎人的宝贝。唐太宗是好猎之人，而这只鹞子，俊异绝伦，太宗喜欢得不得了，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细细把玩。正在欢喜处，远远望见魏徵来了，就赶紧把鹞子藏进了怀里。魏徵明明看见了，却假装不知，一本正经地跟太宗聊起古代帝王喜欢打猎耽误政事的教训，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太宗担心鹞子会被闷死，可是又素来敬畏魏徵，只好听他说完。结果魏徵说了大半天，那只鹞子果然闷死在了太宗怀里。^[1]这个故事试图告诉我们，太宗怕魏徵，怕到连心爱的鹞子都被闷死了。

可是，唐太宗真的“怕”魏徵吗？魏徵死后，唐太宗发现魏徵推荐过的两个宰相之才都出了问题，而且，魏徵竟然把自己劝谏皇帝的言辞往复都记录下来，并且给史官褚遂良看了。太宗很不愉快。他原来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对魏徵家人的眷顾也消退了。^[2]魏徵再善谏，说得再有道理，唐太宗也是不怕“他这个人”的。然而，那只鹞子终归是被闷死了，唐太宗也不是无所畏惧的。那他畏的究竟是什么？

再讲一个故事。某一天，宋太祖在盛怒之下，祭起手中玉斧，砸掉了一位官员的两颗门牙。这位倒霉的官员忍着剧痛，把门牙捡起来，用手绢包好，装进袖袋里。这一举动把宋太祖看傻了，不禁问道，你收拾这牙齿，难道还打算去告我不成？这官员说，我当然没办法告陛下。可是，史官自然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史载，宋太祖闻言，“悦，赐金帛慰劳之”^[3]，不但顿息雷霆之怒，而且还很高兴，赏赐了这个耿直的倒霉蛋。宋太祖当然不怕这个倒霉蛋，但他显然还是有所畏惧的。宋太祖畏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皇帝的第一畏是历史。他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的大人物，对自身的历史形象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权势可以掩人耳目于一时，却无法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

皇帝的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周公的榜样、孔子的教诲、“五经”当中的名言警句，到任何一朝都是有利的思想武器。

唐朝有《贞观政要》，宋朝有《宝训》《圣政》，明朝有《皇明祖训》，传承着本朝的“祖宗之法”。当然，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今皇帝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当今皇帝的创造性。当周围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死守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显然会限制因应能力。

皇帝的第三畏是天。对于上天降下的灾异，皇帝必须认真对待。“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对统治者予以警告，这就是所谓的“灾异示警”。天不会说话，它的示警方式就是降下灾异，比如地震、水灾、旱灾、日食等等。而人间统治者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悔过姿态包括：其一，皇帝本人的检讨，从最基本的减膳撤乐，到最高级的下诏罪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灾异罪己的皇帝是汉文帝。其二，行政首长宰相的检讨，汉代曾经出现过因为灾异罢免三公的做法。其三，面向百官甚至全民开放言路，鼓励臣民上书批评政治。今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见古人在自然现象与人间统治之间生造因果，胡乱联系，初见之下，便欲嘲其愚昧迷信。殊不知，古人之保守“灾异示警”学说的目的，却是要皇帝心生畏惧。宋神宗的宰相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4]皇帝不畏天，国家就离混乱甚至灭亡不远了。“灾异示警”学说，实为帝制时期兴亡攸关的政治理论。斥“畏天”为“迷信”而“弃天弗征”者，不免堕入新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人类能力的盲目自大。

如上所言，皇帝是有所畏惧的。他畏惧自己的历史形象，畏惧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畏天。皇帝的“三畏”，是“抽象的皇帝”向“具体的皇帝”所悬示的道德高标。而负责对“具体的皇帝”时时提醒的，是士大夫。

在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当中，论现实权势，皇帝最大；论观念秩序，“道理最大”^[5]。而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的，是官僚士大夫。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了帝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士大夫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代言人。引经据典、解释天命，阐扬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为天下人请命，让皇帝和王朝统治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责任。

然而，“儒家经典”“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严密。不管是儒家经典记载的古圣先贤，还是本朝列祖列宗的光辉事迹，其中都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想要向东走的人，可以从中找到“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理由，想要向西走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江潭落月复西斜”的道理。质言之，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来约束皇帝，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

而士大夫的说理方式，以及隐藏在此种说理方式背后的思想方法，也普遍存在问题。他们规劝皇帝的文章通常是这样写的：以一两个漂亮的句子开头，接下来引用几个同样类型的史实。比如，论证“红颜祸水必然导致亡国”，就先讲夏桀宠妹喜、商纣爱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三个故事；然后再引用几个前人警句，要来历不凡、铿锵有力；最后，再来两个漂亮的句子，呜呼一叹，结束了。这种说理方式与思想方法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举例言之。在历史教科书上，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是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其标志性话语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这话司马光真的说过，是在给宋神宗上课的时候。那堂课的核心史事是汉初的“萧规曹随”，前宰相萧何创制立法，后宰相曹参亦步亦趋。讲完之后，司马光总结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吕太后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神宗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问道：汉朝一直固守萧何的法度不变，行得通吗？

司马光回答说：何止是汉朝，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汤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后，说“乃反商政，政由旧”，所以，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书》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采用了张汤的建议，对汉高祖的法度进行了大肆改造，结果盗贼半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做法，汉朝由此走向衰弱。因此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就是司马光的论述方式，他选取了正反两类例子：一类是不变祖宗之法，天下安乐的；另一类是变了祖宗之法，统治衰亡的。除正反两类例子之外，还引用了儒家经典《尚书》的警句进行加持，最后得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论。这个论述是不是很有力？似乎很有力。有没有问题呢？仔细想想，太有问题了——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一个全称否定判断，因此，反驳者只要从历史中找到一个“祖宗之法变了反而更好”的例子，司马光的论证顿时就会摇摇欲坠。

吕惠卿就是这样反驳司马光的，他给神宗举例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比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巡狩考制度”^[6]；有三十年一变的，比如“刑罚世轻世重”；还有百年不变的，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吕惠卿所举的这三个“变法”的例子，“正月始和，布法象魏”^[7]，是说每年正月，太宰都要把国家的重大法令悬挂在象魏（阙），公开展览十日，以供万民学习遵守。“巡狩考制度”，指的是圣王每五年巡行一次天下，考察改革制度。“刑罚世轻世重”^[8]，按吕惠卿的理解，三十年为一世，所

谓“世轻世重”，就是三十年一变。



图十二：明 佚名《耆英胜会图》（局部）

《耆英胜会图》由明代画家所绘，姓名不详。这幅人物长卷反映的是宋代的司马光、富弼、赵丙、张焘等众耆老在洛阳富弼家聚会的情景。画面中司马光正襟危坐，在为此次雅集作序，桌旁的富弼凝神看着正在构思中的司马光，一旁的赵丙与张焘也在尽兴交谈，身后两位童子，一个抱琴，一个持砚，随时等着几位耆老的召唤。左侧是忙着碾茶、烹茶、清洗茶盏并交谈的数个童子。画中人物面部轮廓流畅自然，表情生动，放大细看，可以看到年迈的赵丙脸上的老年斑和富弼黑白相间的花胡须。本文虽然只呈现了《耆英胜会图》的局部，却依旧能够感受到悠游的雅集之乐。

能够进入经筵给皇帝讲书的，都是博学之士。吕惠卿的论述似乎打动了神宗。神宗于是转过头问司马光，你觉得吕惠卿说得怎么样？

论学问，司马光比吕惠卿要扎实得多。吕惠卿所举的三个“变法”的例子，被司马光逐一破解。第一，“布法象魏”，布的是旧法，谈不上变法。第二，圣王的“巡狩考制度”，目的就是看看诸侯有没有“变礼易乐”的，一经发现，查处不贷，“王不自变也”。第三，“刑罚世轻世重”指的是“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根据统治区域的具体状况来决定采取何种控制力度，“非变也”。^[9]

我认为司马光对吕惠卿的反驳是可以接受的。但吕惠卿仍然可以纠缠下去，比如“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如果一个统治区域从“平国”转变成了“乱国”，控制力度自然也要从“中典”转为“重典”，这是不是“变法”？这个问题，司马光是没有能力回答的。而吕惠卿说不定倒有能力发问，因为他在给神宗的解释中区分了“每年一变”、“五年一变”、“三十年一变”与“百年不变”，他的思想方法比司马光更具分析力——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司马光的说理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特点是，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不做进一步分析；然后举正面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举之例以一种非常浅表的方式出现，不做深入探讨；对于反例，则想办法否定它，而不是把它作为另外一种可能进行分析。然而，司马光绝非例外，因为他极其传统、极其主流，非常能代表大多数。王安石的说理方式也与此差不多。这一对政治冤家的故事我们后面会细讲。

那么，司马光真的主张一切“祖宗之法不可变”吗？绝非如此。细读司马光的奏议，便可清楚地了解，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司马光对本朝的政治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同样认为必须对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革。司马光坚持认为不可变的，是祖宗留下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所共有的、本朝列祖列宗所秉持的宽容异见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是长治久安的秘诀，司马光并没有说错。然而，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才是正确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处于永远的变化调整之中。

以上是我们的分析，我们的思想武器是现代教育所赋予的，它来自西方。司马光没有我们今天的思想武器，他没有能力将“祖宗之法”区分成“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策措施”两个层面。所以，他才会被政敌怼到墙角无路可逃；所以，他才会被蛮横地贴上“顽固守旧”的标签。

说回皇帝，在此做一个简单小结，传统时期的士大夫以“三畏”为武器，劝谏、约束“具体的皇帝”，希望他尽量符合“抽象的皇帝”的要求。但是，这三条约束都是软的，没有强制性。如果“具体的皇帝”两眼一闭，决心做个昏君，那是谁也拦不住的。

[1] 参见[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2] 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页。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0—1页。

[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中华书局985年版，第0255页。

[5]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续笔谈》，中华书局015年版，第37页。

[6] [清]王先谦撰，何晋整理：《尚书孔传参正》卷二《虞书·舜典》，中华书局20年版，第99页。

[7] [清]孙诒让撰，汪少华点校：《周礼正义》卷四，中华书局015年版，第143页。

[8] [清]王先谦撰，何晋整理：《尚书孔传参正》卷三一《周书·吕刑》，中华书局20年版，第955页。

[9] 参见[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5页。

最高权力如何交接

相声里边有一类很传统的包袱叫“占大辈儿”。郭德纲、于谦、高峰说过一个群口相声，郭德纲说，他要是当了皇上，就把于谦封为大太子，高峰封为二太子。按道理讲，这仨人本来是师兄弟，平辈论交，郭德纲是在占于谦、高峰的大辈儿。于谦、高峰应该生气才对。但是，于谦却表现得很开心，只有高峰一个人在抗议：“凭什么他是大太子，我是二太子？”因为当了“太子”，所以对“占大辈儿”这件事便可以全不计较。于谦排行老大，扬扬得意；高峰排名靠后，心下不快。这一小段相声很能体现中国人对于“当太子”的热衷，哪怕只是过过嘴瘾。

按照华夏传统，太子只有一个，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多个太子同时并存，是金朝以后北方民族兴起的叫法——太子头衔矜贵，有势力的王子干脆一人来一个，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一路排下去。金朝最有名的是四太子金兀朮，准确地说，我们应该叫他完颜兀朮或者完颜宗弼。当然，即便有多个太子，真正能够继承皇位的也只有一个。那么，谁来？

最高权力的交接直接关系到高层的稳定，搞不好会引发战争，甚至把整个国家拖入混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人性是贪婪的，所以必须有制度去对抗人性的贪婪。从本质上说，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

华夏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简言之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它有两原则：第一，有嫡立嫡，嫡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无嫡立长，没有嫡子，庶子即位，年长者优先。

有嫡立嫡，嫡在长先。为什么首选嫡子？因为妻和妾的遴选标准不同。正常情况下，妻出身于与夫家地位相当的贵族，而妾往往出身于贱族，所以妻子的家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联盟。换句话说，嫡子是有强大的母家做后盾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宗想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王皇后跟李唐宗室一样，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王皇后与唐高宗的结合是关陇贵族集团和皇室的结合，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都是支持王皇后的。相比之下，武则天之父只是山西太原的木材商人，虽然也及时投入李渊建唐的事业当中，但是跟王皇后的家族相比，只能算是边缘人物。传统婚姻的本质，是联结两个甚至更多利益相关家族的关系。妻子高贵，所以妻子所生的儿子也高贵；妻子母家厉害，有外公、舅舅、姨父等支持，妻子所生的儿子就更可能把江山稳稳当当地守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外公野心膨胀，把皇位从外孙手里夺过来。比如隋文帝杨坚的皇位就是从北周的小皇帝手里夺来的（虽然北周小皇帝不是杨坚女儿亲生的，但论关系也是杨坚的外孙）。宋、明两代，皇后的家族势力已经

没有那么强硬了，但是嫡长子优先的继承原则还在。这就是皇位继承的第一原则——有嫡立嫡。

皇位继承的第二原则是无嫡立长。在庶子中实行年长者优先原则，所有庶子，无论生母是谁，一律按出生顺序排队，先到先得。

宋徽宗的即位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原则。宋神宗的向皇后没有生儿子，神宗死后，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哲宗即位。哲宗比他爹还短命，而且没有子嗣。哲宗死后，继承人只能从他的兄弟，也就是神宗的其他儿子中选。神宗之子，当时还健在的，最年长的是申王赵佖，可是这位王爷“有目疾”，身体残疾，不堪大任。接下来就排到端王赵佶了。赵佶为哲宗的异母弟，哲宗生母朱氏还生有一子简王赵似，比赵佶小。哲宗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他驾崩后，当务之急就是选择继承人。哲宗嫡母（神宗正妻）向太后主张按长幼之序立端王。而宰相章惇却主张立简王赵似，理由是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所以比端王高贵。同样是庶子，还分什么高贵不高贵？这下可惹恼了向太后，向太后说，都是神宗的儿子，怕是不能这样分别。按长幼顺序，应当立端王。^[1]就这样，端王赵佶成了宋徽宗。



图十三：北宋 赵佶（款）《听琴图》

《听琴图》，147.2厘米×51.3厘米，绢本设色工笔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据传是宋徽宗赵佶所作，而历代书画鉴赏家认为此图并非出自徽宗之手，有人认为是南宋画院画家孙必达作。此图表现的是松下抚琴与听琴的情景。图中，宋徽宗正襟危坐，头戴黄冠，身着缁衣，作道士打扮，身后左侧有一株苍松，枝叶繁茂，凌霄花攀缘其上，树旁有稀朗的翠竹数竿，右侧立有一木几香炉。徽宗轻抹慢挑，略微垂首，显得沉静安宁。全图中另有二人（传为童贯和蔡京）坐于下方倾听，显得谦卑而恭谨。画面构图简洁干净，人物神形刻绘细腻，似有清幽的琴韵流淌在疏朗的松竹间，意境高雅淡远。

无嫡立长原则在明朝得到了稳固的保守。比如，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常洛是宫女王氏所生。对于王氏，万历别说感情了，连感觉都没有，所以万历对长子常洛也毫不在意。万历喜欢的，是他的真爱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按礼法制度，应当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万历的生母皇太后也站在常

洛一边，可是万历真正想立的是爱子常洵。一个著名的桥段说，皇太后责问万历为什么拖着不立常洛，万历小声说他是宫女生的。结果此言一出，皇太后大怒，愤然喝骂：“汝亦都人之子！”^[2]意思是你也是宫女生的。一边是礼法制度，一边是心头至爱；一边是皇太后和群臣，一边是万历和郑贵妃。双方拉锯十五年，到最后，权力仍然拗不过制度，还是按照“立长”原则立了常洛，可是国家大事都被磨叽坏了。

不管是立嫡还是立长，采取的都是“先赋”原则，也就是说让老天来做决定，关键看投胎水平，谁能从皇后肚子里降生，或者比别的兄弟先到，谁就具有皇位继承的优先权。只要嫡长子身体没残疾，精神没障碍，哪怕有兄弟比他更聪明、更能干，也不能动摇他的继承地位。先赋原则最简单，也最稳定，大智若愚。

在皇位继承当中，华夏的文化传统是反对竞争，鼓励谦让。《史记》记载了两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是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3]另一个是吴国的开创者太伯。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其弟季历人更能干，还有一个好儿子名叫昌。周太王一心想把王位传给季历，进而传给姬昌。为了让父亲放心，太伯和另一个弟弟仲雍干脆跑到了南方荆蛮之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4]。结局是两全其美的，季历之子昌就是周文王，而太伯开创了吴。

有趣的是，这一类谦让故事主要发生在传说中的圣王时代。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不知道是因为史料丰富了，还是人心变坏了，兄友弟恭的谦让故事基本绝迹，人们在史书中常常看到的，是围绕皇位争夺展开的骨肉相残。最典型的一幕，发生在唐初的玄武门前，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发现了秦王李世民的伏兵，拨马便逃。李世民大喝一声，紧追不放。李元吉想要射杀李世民，却因为慌乱，怎么也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却沉稳得多，他挽雕弓，出利箭，一箭射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射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皆窦皇后所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从人伦角度来说，玄武门前的这一幕无疑是人间惨剧。传统的历史叙事和民间故事却只把这一幕放在了皇位争夺的大背景之中，忽略人伦，只论胜负。李世民手刃亲兄弟事实俱在，不容抵赖，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解释了。事实固然凶残，毕竟属于过去，而解释是关乎未来的。

那么，古人是怎样解释“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夺位的呢？一种是“情有可原论”，认为唐朝的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建成一无是处，只因生得早，得为太子，他若当皇帝，必然会容不下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情有可原。这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观点。^[5]这种观点已经背离

了皇位继承的原则，强调的是李世民的功劳，而不是先赋的继承顺序。若按这套理论解释，那些有功劳、有势力的人抢夺皇位就是合理合法的，至少可以被原谅。而事实上，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已经证明，大唐创业并非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李渊的作用更大，李建成也绝非草包，他反而可能更有天下胸怀。后来辅佐李世民成就贞观之治的魏徵、王珪，都是李建成的旧僚。

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解释更为高明。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建成、元吉并非“得罪于天下”者，李世民为一己之私，弑兄杀弟，不孝不悌，“悖天理，灭人伦”，是不义之人。范祖禹强调，“立子以长不以功”^[6]，皇位继承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严格按照长幼顺序进行，功劳或其他因素一律靠后。范祖禹的说法虽然不会改变历史事实，但是他没有因为历史事实的凶残而扭曲道德原则，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史学的价值判断不会改变过去，但是会影响将来。即便有再多的阴谋和血腥，华夏的皇位继承原则不变，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超越长幼顺序，就是违背道德，是应当受指责的。

也有域外学者认为，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明争暗斗得到了其父李渊的默许甚至鼓励。而李渊之所以鼓励竞争、容忍残杀，乃是受了突厥文化的影响。这种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不过，北方民族对待皇位竞争的问题，的确和华夏传统不太一样。比如，清朝在入关之后，也开始学习汉法立太子，但是，康熙皇帝最终还是废掉了太子，让阿哥们各显其能，明争暗斗，临驾崩前才以遗诏的形式“传位于四阿哥”。民间传说“于”本为“十”，四阿哥夺了十四阿哥的位，致使四阿哥声誉受损，甚至搞出个《大义觉迷录》来亲自撰文自证清白，对此康熙是要负点儿责任的。而四阿哥则创造了秘密立储制度。生前并不公开皇太子人选，而是将传位诏书藏在“正大光明”匾后，死后开拆，方知花落谁家。

不管是华夏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清朝的秘密立储，前提都是皇帝有儿子，儿子还挺多。若皇帝没有儿子，要过继宗室，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最高权力交接完成。但是，你以为新皇帝从那一刻起就能够大权独揽、管理天下了吗？还早着呢！当皇帝，是要学习的。

^[1] 参见〔宋〕曾布撰，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6年版，第74页。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孝定李太后传》，中华书

局974年版，第3535页。

[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年版，第13页。

[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5页。

[5] 参见[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中华书局956年版，第602页。

[6] [宋]范祖禹：《唐鉴》卷二，基本古籍库收明弘治刻本。

皇帝的“岗前实习”

现代专业历史学的一大进步，是我们终于开始认真地注意到“历史是有过程的”。从封建到郡县，这是过程；楚国八百年，这是过程；唐朝的兴衰，这也是过程。这些过程都是大过程，我所说的“过程”，指的是那些相对于宏大过程而言的细微的过程。比如，一个历史人物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持续不断地和周围世界进行信息交流，他经历、体会、反思、进步、倒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在变化，阅历在增长，地位有浮有沉，他所处的环境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山重水复，有时山穷水尽。跟我们一样，在不同的境地中，他会有不同的心态，会写出不同的文字，说出不同的话，这些话可能前后一致，也可能互相矛盾。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变化中的人，而变化中的人是有他的过程的。从前的历史学并不真正尊重过程。比如写一个英雄，从一开始就是奔着神坛去的，可以缓缓登顶，但是路径明确，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发表特别励志的讲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英雄；写一个政治家，基本上从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是一副气宇轩昂、领袖群伦的样子。而现在的历史学开始尊重过程，尊重过程中那些偶然事件对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影响。

现代历史学重视过程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承认皇帝从登上帝位到能够熟练地操控皇权是有过程的。当上帝位不容易，但是戴上皇冠、登上宝座不等于就会当皇帝、能当皇帝、当得好皇帝。当皇帝是门复杂的技艺，必须勤学苦练。

今天很多人对皇权有着极大误解。他们总是喜欢从权力的角度来认识皇帝，认为当了皇帝就有了为所欲为的特权。如果这么看，那么当皇帝的确是很简单的。我们不否认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伴随这种最高权力的还有最大的责任——治理国家，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个责任过于重大，所以，古人说起当皇帝时的态度很少是喜形于色的，更多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怀畏惧的。《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孔子曾经说过，贤明的君主有三大恐惧：第一是处在尊贵的位子上，就听不到批评的声音；第二是志得意满自我膨胀，变得骄傲起来；第三是明知真理所在，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图十四：明 刘俊 《宋太祖雪夜访普图》

《宋太祖雪夜访普图》，明代刘俊绘，绢本图轴，淡设色，143.2厘米×7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的是宋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据《宋史·赵普传》载：“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设重褥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在枢密副史府前厅，君臣二人围炉而坐话国事。正中端坐的太祖头扎巾帽，身穿窄袖袍服，气度非凡；其侧首聆听的神态生动逼真，表现出深夜访贤、共商国是的仪态。赵普侧坐于帝旁，其诚恳献策的姿态亦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大门外立四侍卫，似恭候御驾已久。该图极尽精微地刻画了雪夜访贤的主题。



恭候御驾的侍卫



火盆、酒壶、烤肉、食盒与蘸料

政治是一项实操性极强的行当，位置越高，能够调度的资源越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也会越复杂。皇帝处最高之位，拥天下之大，需要管理最庞大的复杂体系，内政与外交，高层的政争，人才的选拔，地方的控制，边疆的稳定，黄河的治理，灾民的赈济，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问题之多，不胜枚举，所以皇帝必须不断学习。

说到皇帝的政治实习，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守成之君，其实开国之君同样需要学习。开国之君学习的难点在于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角色转型。取天下与坐天下是很不一样的，取天下是推翻别人，坐天下是做好自己。推翻别人面对的是别人的错，做好自己则要面对纷繁复杂的事。这个转型其实并不容易。即便成功转型如唐太宗、宋太祖，也会遇到很多麻烦。宋太祖某日退朝之后，闷闷不乐，独自坐了半天不说话。等他脸色和缓的时候，旁边的人就问他不高兴，宋太祖说：你以为皇帝是好当的吗？顺着性子处置了一件事情，结果发现错了。想起来真是不舒服！^[1]

开国之君责任重大。他是奠定一个朝代的格局和调性的皇帝，他的说法、做法会被本朝后世的皇帝奉为祖宗之法。开国之君格局宏大、态度包容，这个朝代也就格局宏大、态度包容；开国之君狭隘自私、没有格局，这个朝代也就格局褊小。那么，开国之君怎样才能做到格局宏大？单凭个人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善于向历史学习，了解既往朝代的兴亡教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过于自负的皇帝往往浅陋，而越是浅陋，就越会任性胡为。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负面典型是明太祖朱元璋，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说废除就废除，这推倒一切的胆力令人惊叹。何为无知者无畏？这就是。

开国之君需要政治实习，守成之主更需要学习。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怎么跟大臣打交道，怎么处理文件，怎么签字画押，怎么树立权威，怎么运用权力，事无巨细都要学。宋英宗刚即位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小事。先皇是病死的，没能治好先皇的病，医疗小组责无旁贷，于是英宗就跟宰相们一起商量怎么处置那十二位倒霉的大夫。有宰相提出，其中两位很晚才加入医疗小组，应当轻责。没想到英宗忽然变了脸说，听说这两位大夫是宰相推荐的，对吗？宰相们只好承认。英宗依然板着脸说，那我就不敢说了，还是各位大人来裁决吧。最终，在十二位受到处分的大夫中，这两位是被修理得最狠的。老皇帝得了要命的病，大夫有什么办法？况且这两位倒霉蛋还是最后加入医疗小组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英宗严惩两位大夫，目的就是要向宰相们宣示权力——虽然朕是你们辅佐上来的，但朕既已是皇帝，那朕的意志就至高无上，必须得到尊重。这就是宋英宗最初的权力操练。

从登上帝位到宣示权力，再到树立权威，乃至熟练地运用权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突发和重大事件，成为一个至少不坏的最高决策者，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而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余地又是那么有限，基本上能上来的也就是一般人，所以，为了保证皇帝能够正确地操控皇权、管理国家，就必须对皇帝和皇太子进行教育。

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西欧的贵族是军事贵族，相对野蛮，没文化，文化掌握在教会手里。我们的贵族——官僚是文武双全的，但是基本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文轻武，甚至忽视了军事素质的培养。中国的皇帝，即便像刘邦这样出身平民，作风粗鲁到会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尚且重视文化。到了宋代，出现了皇帝的读书会，叫作“经筵”。“经”指儒家经典，“筵”就是席子，可以坐在上面读书。在经筵中，老师是最优秀的儒者，教材是儒家经典、本朝列祖列宗的语录和光荣事迹汇编，以及历史书——《资治通鉴》就是经筵教材。通过经筵学习与政治实习，慢慢地，理论结合实际，历史映照现实，皇帝就知道规则是什么，边界在哪里，该怎么当皇帝了。

没受过教育或者毫无准备就登上帝位的皇帝，往往会成为国家的灾难。明朝这类皇帝比较多，比如明世宗嘉靖皇帝。他的堂兄武宗正德皇帝溺水而亡，十五岁的嘉靖被选中，当了皇帝。皇位从天而降，嘉靖毫无准备。他文化水平低下，甚至连像样的话都写不出来。他知道权力是个好东西，却不知道权力意味着责任，因此恣意妄为，一意孤行。嘉靖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大多荒唐透顶，比如为父亲争面子的“大礼议”——他祖父是皇帝（宪宗），伯父是皇帝（孝宗），父亲却不是。嘉靖坚持尊生父为“皇考”，同时否定伯父的“皇考”地位，只肯称呼孝宗为“皇伯”。两百多名官员以死抗争，嘉靖挥舞权杖，四品以上的褫夺俸禄，五品以下处以廷杖之刑，一共

打了一百三十四个，死了十六个。中年以后，嘉靖的荒唐变本加厉，一年到头躲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炼丹，把朝政丢给奸臣严嵩。结果导致政治腐败，内忧外患，蒙古人在北方骚扰，倭寇在东南肆虐，老百姓叫苦不迭。作为一个任性的人，嘉靖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作为一个无能的皇帝，嘉靖应该做的事情基本都没做。

而这样的荒唐皇帝，在明朝绝非个例。嘉靖之后是隆庆，隆庆之后是万历，万历之后是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泰昌皇帝，接下来就是天启皇帝。这位天启皇帝木工活出众，却不会当皇帝，因为他连字都不识。天启是泰昌皇帝的亲儿子，堂堂帝子，怎么会不识字？岂止是他，其父泰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因为泰昌的父亲万历压根儿不想让泰昌即位。明朝皇室连这样荒唐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根子还是要往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去寻。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气量、格局都太小了。

开国皇帝气量褊小，继任之君又多荒唐，宰相也没有了，明朝为什么还能存续277年？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中国帝制政治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我非明史专家，谨陈陋见，与读者共思。首先，明朝的长期存续得益于异族压力所造成的内部团结，朱明继元朝而立，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功；退出中原的蒙古各部又对明朝的北边构成了持续性的军事压力，华夏大地要避免再度沦陷于异族之手，就必须团结在朱明朝廷国家的旗帜之下。其次，明朝的长期存续还得益于思想控制的成功。朱元璋以政权暴力为依托，对儒家的伦理关系进行了修正，片面强调子对父、妇对夫、臣对君的单方面服从；这套新的伦理秩序通过司法、旌表、科举教育和通俗文化，深刻改造了明朝的士大夫和老百姓，让他们成为心悦诚服的顺臣、顺民。最后，明朝的长期存续复得益于制度自身的惯性。皇帝可以不才，可以懒政，但是政府靠其自身惯性，可以运行不辍；而这套政府组织系统，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成长发育，在关系朝廷国家核心利益的“皇权的安全”和“地方的控制”两方面，都有完善的设施。这套制度，在“正常”情况下维持国家的一般运转，毫无问题。但是，一旦出现巨大的天灾或者外来的竞争压力，就应变无能，只有灭亡了。明末如此，清末亦复如此。

[1]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页。

从家天下到公天下

以上四节所说的“皇帝”，主要是作为朝廷国家首脑的“抽象的皇帝”，皇帝的这一角色定位有其发展过程。华夏帝制国家的早期，经历过家国一体、家国难分的初级阶段。在秦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或者说皇帝家务）和国家事务占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占据了大量崇高职位。比如秦汉的九卿，“除‘廷尉’‘大司农’‘大鸿胪’所掌为国家政务外，其‘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宗正’‘少府’六卿皆天子家臣”^[1]。此后的发展趋势，是家国分离，皇帝家族仍然享有崇高地位，但是，皇帝家务与国家事务的界限日益分明，处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在中央机构中的占比逐渐降低，地位逐渐衰退，而皇帝作为朝廷国家首脑的角色定位也日益突出。

按照家国分离的程度不同，帝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结构方式可以分为“东汉式”与“宋式”两种。从皇后的选择和外戚的地位出发，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两种最高权力结构方式的差异。

先来看东汉式的权力结构方式。东汉故事的开端是一段堪称美好的帝后爱情。西汉末年，年轻英俊的贵族儒生刘秀去新野走亲戚——南阳刘氏和新野的很多大家族都是亲戚。在新野，刘秀听说当地阴家的女儿阴丽华貌美出众，心里很是欢喜爱慕——爱情的种子就算是埋下了。后来刘秀去首都长安，看见执金吾出行，后面跟着大队随从，都是鲜衣怒马的英俊少年，心中煞是羡慕，脱口而出：“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人虽到了长安，心里却还没有放下阴丽华。再后来，刘秀果然娶了阴丽华，自己做了皇帝之后，又立她做了皇后。





图十五：唐 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之汉光武帝刘秀

《历代帝王图》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作，手卷，绢本设色，531厘米×51.3厘米，宋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历代帝王图》是早期中国画的代表作，表现的是中国古代部分统治者的群像，主要以黑、红、白三色绘就。我们知道唐以前的画多是以线条为核心的绘画形式，画面人物造型多以线条勾勒轮廓，然后进行填色。本文展现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肖像。作为开国皇帝的刘秀，同时作为“光武中兴”盛世的缔造者，从他炯炯有神的眼光、根根分明的须发、意气风发的气度及魁梧高大的身形，我们可看出他是一位勇谋双全、有作为的帝王。

这看似圆满的故事背后，还是有些不为众人所知的波折——阴丽华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立为皇后的。刘秀第一年娶了阴丽华，次年就去河北打仗，在那里娶了郭圣通。过了一年，郭圣通生下儿子刘强，第四年，刘秀立郭圣通为皇后，立刘强为皇太子。此时的阴丽华还是贵人，刘秀还是很爱她。七年后，刘秀忽然下诏，高调表白阴丽华：我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就娶了阴丽华……我认为她有母仪天下的德行，应当立为皇后，可是她坚决推辞，不肯承当，甘愿侧身于妃妾之列，我欣赏她的谦让。

刘秀这样爱阴丽华，为何还要娶郭圣通并立她为后？因为郭家在河北势力很大，娶了郭圣通就得到了河北；而要稳定河北，就必须让跟郭家有关的势力安心。那么，刘秀后来全然不顾郭圣通的感受，对阴丽华高调示爱，又当如何解释？因为此时河北稳定了，郭家势力已没那么重要了。

八年之后，刘秀废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皇后，夙愿得偿。郭圣通被废之后，跟着另一个儿子中山王刘辅回到河北老家，去做她的中山王太后了。太子刘强眼见母亲被废，情知太子之位难保，主动请求让贤。阴丽华的儿子刘庄成了太子，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汉明帝。

在刘秀和阴丽华这对模范夫妻之后，东汉的帝后关系似乎也都算美满。《后汉书·后妃传》中最常出现的字眼是“有殊宠”。这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其他朝代的皇后通常是以母仪天下的贤德“正室范儿”著称，基本上跟“宠”不沾边。

那么，东汉皇后的殊宠真的是现代人想象中的爱情或者说夫妻恩爱吗？事实上，这个“宠”跟感情关系不大，甚至没有，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东汉政权的权力结构。在东汉，皇族刘氏与几大外戚家族分享政权。外戚之中有所谓“四大家族”，他们的子弟被称为“四姓小侯”（指东汉明帝外戚樊、郭、阴、马四姓的子弟），享受的基本上是宗室待遇。刘家出皇帝，四大家族出皇后——皇后必须从这四大家族或者是他们亲戚的女儿当中选取。这就是东汉的政治原则，是东汉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所以，东汉皇后的“殊宠”与男欢女爱没什么关系，其深层含义是指皇帝对外戚势力的尊崇和依靠。

这是一种家天下的政权构成方式，“私”的色彩浓郁——外戚家族同时也是开国功臣家族，他们把握实权，左右朝政。皇帝的家事与国事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西汉到唐前期，乃至辽、金、元、清，都有类似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这种最高权力的结构方式称为“东汉式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最容易出现的政治现象就是外戚专权。而外戚素养高明的不多，或者说因为圈子太小、人才有限，又缺乏竞争，很难长期保持高明，故政治多腐败。

下面看宋式的最高权力结构方式。宋、明两朝改变了东汉式的权力结构方式，开国功臣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变得无足轻重，根本无法与皇权抗衡。当然，宋、明两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谓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宋太祖的做法，是跟老战友们把酒言欢，诉说当皇帝的苦恼。而老战友们心领神会，交出兵权，消除了太祖的心病。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而明太祖解决功臣问题的办法，粗暴而血腥，一言以蔽之，“杀”。明朝的皇后基本上来自普通人家，很多国丈、国舅都是攀着女儿的裙带才得以加官晋爵，外戚势力等于乌有，完全是皇家的附庸。

宋朝皇后的家庭出身比明朝高贵得多。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际，承诺与老战友们结为儿女亲家，世代代做亲戚。这个一揽子结亲计划，后代的宋朝皇帝基本上是坚持了的。这些武将家族出身的皇后，基本上没有弄权记录。只有一个宋仁宗的郭皇后，脾气火爆，曾经误掴仁宗，旋即遭废。宋人对此津津乐道，自夸“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中之一便是“百年无内乱”，没有因宗室、外戚篡权而自乱阵脚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能做到“百年无内乱”？因为顶层设计合理。用丰厚的俸禄、崇高的头衔养着外戚、宗室，但不允许他们染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政职位。作为国初勋贵后裔，外戚在禁军的最高管理层保持着一定比例，但是，任职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北宋的勋戚，原则上不许任要职，不许干预政事。到了南宋，制度崩坏，才出现了大权在握的外戚，比如韩侂胄和贾似道。宋朝对外戚、宗室的防范机制堪称设计精美。如果说对外戚勋贵是画地为牢、限制使用，对宗室则是锦衣玉食、集中圈养。“圈养”一词虽然刻薄，却是写实——北宋的宗室集中居住在有围墙的院子里，除非去洛阳祭祖，其他时间不许随便外出。宗室获得分散居住、自由旅行、参加科考和当官的自由，都是很晚的事情——繁殖太快，群体数量过大，实在养不起了，只好放出来，许其“自谋生路”。^[2]

作为默认的政治原则，宋朝的皇后虽然可以拥有高贵的母家，但这并不代表其母家可以作为外戚与皇家分享政权。宋朝的确出了不少非常能干的摄政皇太后，比如真宗刘后、英宗高后都曾长期摄政，治理水平也都还不错，特别是高皇后，甚至赢得了“女中尧舜”的美誉。但是，必须明确，这些皇太后的摄政权力与母家无关。宋朝皇太后摄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先帝遗

诏，来源于她作为“先帝之妻”和“今上之母”的角色定位。

同东汉式的权力结构相比，宋式权力结构是皇权独大的；或者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宋朝国家政权的发育水平比唐代以前有了极大提高，皇帝的家事与朝廷国家的国事有了进一步、更为明确的区分，宋朝的皇帝更多的是作为江山社稷的代表在行使治权。“私”的色彩淡化，“公”的意味转浓。



图十六：清 焦秉贞 《历朝贤后故事图》之“女中尧舜”

《历朝贤后故事图》，清代焦秉贞绘，绢本设色，12开，每开37.4厘米×30.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套图册画的是历代贤良淑德的皇后、太后的故事，如周文王之母太任、周武王之母太姒、东汉明帝明德马皇后和北宋英宗宣仁高皇后等。她们或勤俭宽厚、贤良淑德，或不干政事、规约外戚。北宋英宗宣仁高皇后，勇谋过人，崇尚节俭，从不中饱私囊，懂得约束外戚，理政九年，“朝廷清明……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她摄政期间，政通人和，让与宋为敌的契丹也颇敬畏，是北宋社会最和平、安定的时期，史称“元祐之治”。此画面展现的正是高皇后将贡奉的财物及酒食拒之门外的情景。



宦官奉上的酒食

皇权可以独大，皇帝却不可以独治。在东汉式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家族与包括外戚在内的大家族共享政权。那么，在宋式权力结构之下，皇帝与谁“共天下”呢？在宋朝，协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是以士大夫（科举文官）为主体的官僚集团。

比如那个不小心甩了仁宗皇帝一记耳光的郭皇后，很快就被废了。废后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东汉式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是必须要跟各大家族的代表商量的。比如，唐高宗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一千关陇贵族坚决反对，因为王皇后有着关陇集团的高贵血统。但是打耳光的事情既然发生在宋朝，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就不需要理睬外戚，而是要跟宰相商量。年轻的皇帝涨红了脸，指着自己脸上的巴掌印说：你看，她敢打我，她敢打我的脸！而宰相吕夷简本来就对皇后有意见，乐得顺水推舟，支持废后。当然，士大夫中的谏官御史是强烈反对的，他们集体抗议，摆出了死磕的姿态。最终，在宰相的强力支持下，皇帝关闭了批评通道，郭后被废。

宰相、谏官御史皆为士大夫。在整个废后过程中，郭皇后的母家及其母家所属的开国勋贵集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没声音是因为没实力。时移世易，在宋式权力结构之下，皇帝作为江山社稷的代表与士大夫共同“治国平天下”，宗室、外戚撤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朝廷国家因而呈现出更多的“公器”性质。这应当被视为一个伟大的进步。

当然，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式权力结构之下，帝后之间就很少能产生像样的爱情传奇了，这多少也是令人遗憾的。

[1]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7年版，第66页。

[2] 参见[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帝王的礼制与情感

作为朝廷国家代表的“抽象的皇帝”，与作为其个人或者家族代表的“具体的皇帝”，始终是一对矛盾。礼制——礼法制度表达前者，高标准严要求，与后者的情感私欲缠斗不休。娶妻如此，奉母亦然。

历史记载当中有很大篇幅是有关礼法制度的，《史记》八书，第一就是“礼书”。后代纪传体正史只要有“志书”，通常都有“礼志”，专记礼法制度。唐代的杜佑创造了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专门记录、讨论古今制度之变。杜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家当中最有出息的。大部分杰出史家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或者“发愤”著书（比如司马迁），或者“闲居”著书（比如司马光）。而杜佑成功地活跃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他当过岭南和淮南的节度使，还当过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既是理财专家，又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这部《通典》贯穿着积极的进取精神，目的就是“经邦致用”，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很有意思的是，《通典》二百卷，其中讨论礼法制度的《礼典》就占了二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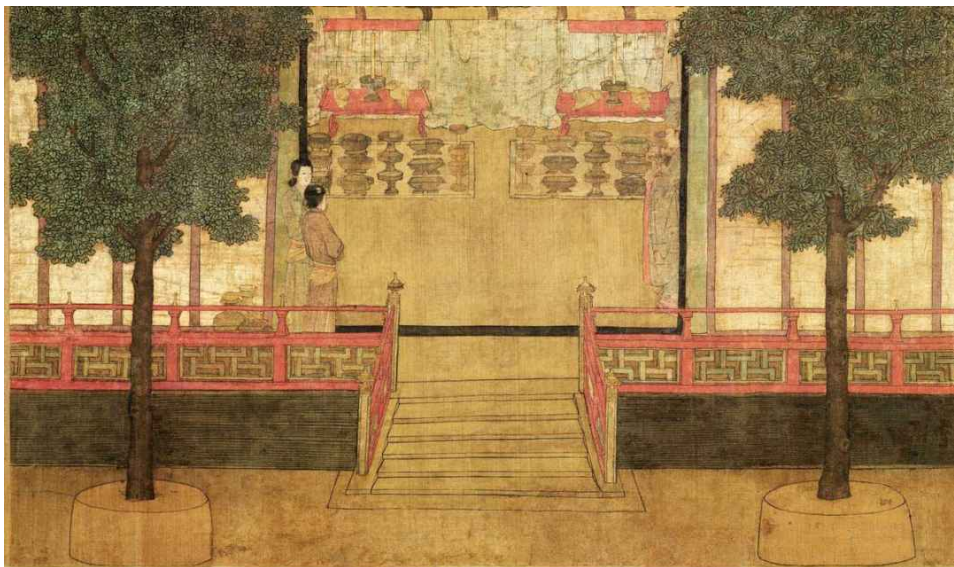
礼制对今天的读者——哪怕是专业历史学者——而言，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不仅生词众多，意思也不容易弄明白。而现代历史研究大多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不通礼法制度，似乎也无大碍。我年轻时读史，遇到礼制讨论，一概跳过，以为无趣。父亲健在，应该为母亲服何种等级的丧服？妾之子是否要为生母服丧？从宗室入继大统的皇帝应当怎样称呼其生父，能不能称之为“父”，又是否可以为其生父加上“皇帝”的尊称？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何趣味？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古人无趣，是因为自己无知；一旦懂得，就会明白礼制讨论不仅有趣，而且意义重大。那么，礼制的意义何在？按照孔子的说法，礼的制定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它最核心的功能是理顺、规范人的情感，让情感的表达符合天道，从而达到“正风俗”的目的，也就是端正社会风气，建立秩序。因此，“礼”之有无关系国家存亡，“失之者死，得之者生”^[1]。那么，礼制是怎样建立秩序、端正风俗的呢？

我们以杜佑的《通典》为例。《通典》把“礼”分为五大类：第一“吉礼”，第二“嘉礼”，第三“宾礼”，第四“军礼”，第五“凶礼”。这五大类的礼就是五种最重要的关系与秩序。“吉礼”简单地说就是各种祭祀礼，它规范的是皇帝—国家和各方神祇、列祖列宗及国家的精神偶像——孔子之间的关系。“嘉礼”的内容上至皇帝的成年礼、纳后礼，日常行政中的朝会礼仪，下至地方社会举行的“乡饮酒礼”^[2]。它的功能是在日常中建立秩序。比如，朝会礼仪规定了每一个臣子的站位，从而彰示了每一个臣子相对于其他臣子的位序先后。“嘉礼”是对国内秩序的规定。而“宾礼”则是对天下秩

序的规定，具体而言，是四夷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军礼”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礼仪，比如登坛拜将、宣布胜利的消息等等。“凶礼”围绕死亡展开：从天子到庶民，在遭遇亲属死亡的时候，都要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不同等级的哀悼。每一桩死亡，都是一次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大展示。在哀悼中，每一个人都再次确认了自己是谁，与谁有关。把“嘉礼”、“凶礼”和“吉礼”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日常运作规则，从皇帝到平民，从出生到死亡，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子子孙孙，都在礼的规范之中。“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绝非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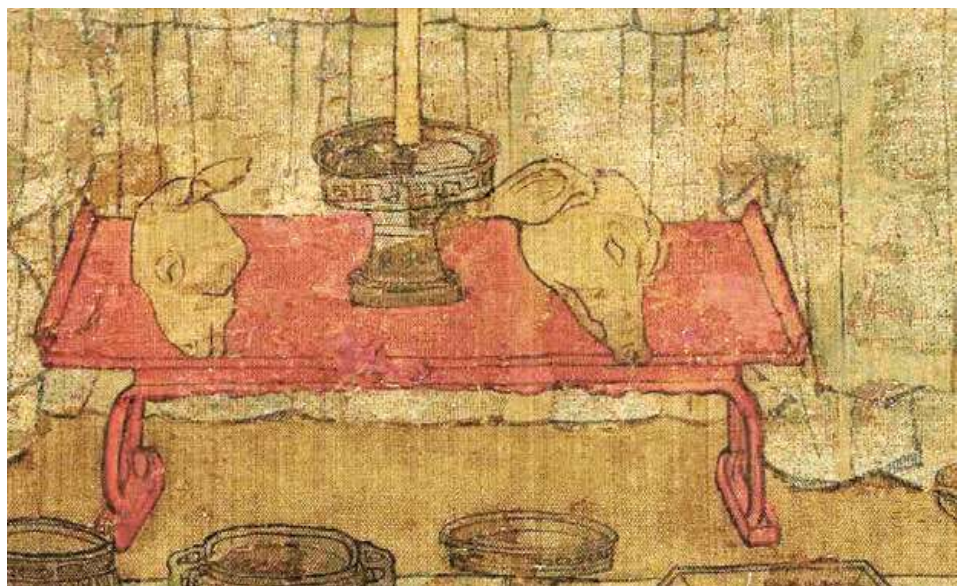
“礼”的核心要义是要以“天之道”来规范“人之情”。谁的人情最容易泛滥，最需要规范呢？当然是皇帝。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是最需要礼法制度规范的。而礼法制度能对皇帝产生多大的规范作用，或者说皇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遵从礼法制度的规范，克制私人情感，会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对礼法秩序的尊重程度，从而塑造一个社会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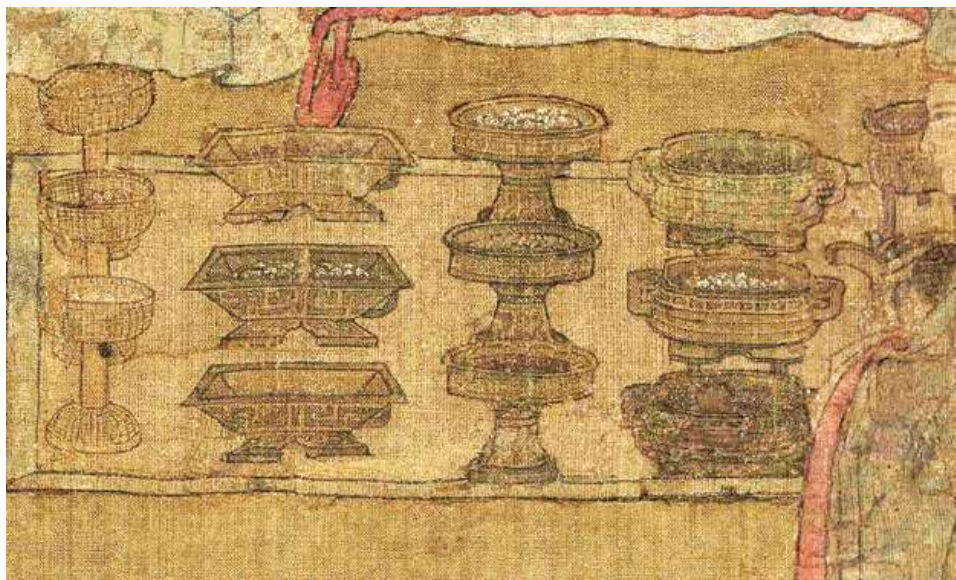
图十七：宋 佚名《女孝经图卷》之卷六《邦君章》

《女孝经图卷》无作者款印，为南宋画院画家所绘，绢本设色，823.7厘米×43.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书展示的是第六章《邦君章》，画面是祭祀列祖列宗的情景。我们虽看不清牌位，但能看到供桌及其上的烛台与祭品，再下面是盂、鼎、樽、爵等食器与酒器。这些本用作吃饭的器具，在此处已升格为供奉祖先的礼器。画作左边墨迹为：“非礼教之法，眼不敢眼；非诗书之法，言不敢道；非信义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

闻，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为；欲人不传，勿若勿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祭祀……”从文中倡导的一言一行皆应遵从礼教、信义的规约，从祭祀时摆放的井然有序的各種禮器，我們可以看出，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都在禮的規範之中運行。



供桌上的獻祭品豬頭



祭祀的酒器与食器

我对礼制的认识，正是从一个有关皇帝礼制与情感的小问题开始的：在帝制时期，庶子继承皇位之后，他的生母是否“自动升格”为皇太后？

皇太后“以天下养”，是帝制时期全天下最尊贵的母亲。母子之爱乃人之常情，皇帝尊生母为皇太后，在“今上”为孝道，毫无问题；然而，若以“先帝”为伦理关系之主轴，则是以妾为妻，儿子改动了父亲的家庭秩序，问题大了。质言之，“今上”能否尊其生母为皇太后的问题，其实是现实权势与礼法秩序孰轻孰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礼制存亡的原则性问题。

在帝制时期，庶子即位并不罕见，许多朝代都曾面临“今上生母”的尊崇问题。各个朝代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选择“今上生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的，包括汉、唐、明、清。众所周知，清朝自孝庄始，至慈禧终，先帝驾崩之后，“今上生母”不仅升格为皇太后，而且是摄政主力。唐朝自玄宗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皇帝都没有立过皇后。这就等于说，唐后期大部分皇帝其实生前只有妾，没有妻。后人批评唐朝不讲礼法，的确是有道理的。没有皇后，也就无所谓嫡子。当皇帝驾崩之后，取得皇位的庶子之母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皇位与皇太后之位都需要“竞争上岗”，母子同心，其利断金。然而，竞争尚未结束。下一步的竞争发生在宗庙领域——谁来做先帝的配享皇后？先帝生前虽然无妻，但是驾崩之后，神主进入太庙，还是需

要一个妻子的，这个妻子就是配享皇后。那么，配享皇后由谁来做？继续拼实力，拼运气！谁做了皇帝，谁就可以将自己死去的生母配给先帝做配享皇后。荒唐剧情就此展开：唐穆宗有三个儿子先后当了皇帝——敬宗、文宗和武宗。这三位各有生母，自然就产生了三位皇太后，而最终进入太庙，成为穆宗“在太庙中的妻子”的，是谁呢？武宗的生母韦氏。原因很简单，只有韦氏很幸运地死在了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时候。

唐后期的宫廷在“今上生母”的尊崇问题上，通行的其实是一套权势至上的潜规则，无所谓秩序，无所谓规矩。这样的潜规则，与“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礼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种，庶子即位，“今上生母”并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这是宋朝的做法。若生母早亡，庶子即位之后是可以追封为皇太后的，但是顺序一定要排在先帝皇后的尊崇之后。宋哲宗的生母朱氏有幸看到了亲生儿子登基，又不幸经历了亲生儿子的病亡，然而一直到哲宗驾崩，朱氏的名号都是皇太妃。皇太后则另有其人——先帝神宗的向皇后。只有先帝皇后才有资格成为皇太后；其他嫔妃，哪怕是今上的亲生母亲，也无法获得皇太后这一崇高名位。

宋朝的做法最看重的是礼法秩序。传统中国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与丈夫齐平，“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3]。皇后作为皇帝的妻子，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动摇，她是皇帝所有儿女的母亲，哪怕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而庶子出身的皇帝哪怕再热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逾越礼法的界限，给她皇太后的尊衔。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今上生母”尊崇问题的两种做法？

庶子即位，“今上生母”能否自然升格为皇太后？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选择。庶子即位，今上生母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现实权势主导型”；皇太后的名号只能属于先帝皇后，今上生母不能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礼法秩序主导型”。现实权势主导，还是礼法秩序主导，反映在政治实践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现实权势主导，等于变相鼓励后妃与亲生儿子结成联盟，争夺皇位，因为这对母亲和儿子都有好处。汉代可以说是极端的典型，后妃的命运牢牢地和儿子捆绑在一起。比如，东汉光武帝废了郭皇后之后，封郭皇后的一个儿子去河北做中山王，郭皇后也被封为“中山王太后”——中山王的母亲，中山国的太后跟着儿子去了中山国；后来，这个儿子改封沛王，郭皇后的封号也变成了“沛太后”。母亲与儿子捆绑、联动，结成命运共同体，

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皇帝反而成了外人。这样的结构其实并不安全。

相比之下，礼法秩序主导型才是更安全的选择：皇帝再爱自己的生母，也只能尊父亲的妻子为皇太后。现实权势受到限制约束，尽管不免压抑了皇帝对生母的私人感情，但是对皇室大家族的稳定大有好处，可以避免由于争夺权位而带来的内乱。

同一个问题，不同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礼制与情感之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做出的是最为“克己复礼”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是一个对礼法秩序有着真正尊重的国家与社会。汉、唐、明、清的最高层所做的，其实都是势利至上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官僚和社会会对礼法制度产生深刻的尊重。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运第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63页。

[2]据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乡饮为古礼，《周礼》有记载，同乡老少聚饮，有选举、尊贤、敬老、运动、祭祀等功能。转引自王春瑜：《明朝酒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75页。

[3] [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十《嫁娶·论妻妾》，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0页。

至卑贱者至跋扈

说完了皇后、皇太后与外戚，我们来看看皇权的另一个附属群体——宦官。

宦官是什么？他们是皇帝的阉人家奴，因为阉割而失去了性和生育的功能，成为刑余之人。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正常男性还是能够参与宫廷服务的；全部用阉人服务后宫，始于东汉。东汉以后，宦官是除了皇帝和未成年皇子之外，唯一可以自由进出后宫和在后宫活动的非女性群体。皇帝使用宦官为宫中后妃服务，等于在皇帝的女人和其他正常的男人之间设置了一道人身隔离带，主要目的是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换句话说，宦官的存在，就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残缺的群体，用来维护皇帝的至尊地位。

中国文化中的宦官形象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外形怪异”“内心阴狠”。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把宦官称为“贱奴”“丑奴”。在谈到宦官外形的时候，唐甄说：“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总之就是非男非女，不像人样。今天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的宦官，基本上都是这种高度异化的形象：“其声似童，不颖；似女，不媚；似哑，成声；似狸，成语；不似人声也。”他们的声音像孩子的，但是不聪慧；像女人的，但又不柔媚；听上去是哑的，却又能出声；像是狐狸叫，可又能说话。

金庸的武侠小说又创造了一路阴毒奇绝的高超武功，由宦官所创，“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身体的特殊残缺反而可以成就高超武功，这其实是相当不合情理的。这种不合情理的想象却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对宦官和一切卑贱的异类，人类通常会抱持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恶意，缺乏基本的同情。当然，宦官也确实有着令人厌恶的历史。宦官在史书上的记录，基本上都和专权、乱政有关系，相反，那些曾经对历史做出积极贡献的宦官，当人们谈起他们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们卑贱的宦官身份，比如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史家司马迁、航海家郑和；同时被回避掉的，还有宦官身份带给蔡伦、司马迁与郑和等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屈辱。



图十八：礼泉县韦贵妃墓壁画唐《躬身拱手执笏给使图》

《躬身拱手执笏给使图》是1990年在陕西省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的唐代壁画。壁画作于唐乾封元年（666年），画中给使高104厘米。“给使”是指被阉割了的男侍，我们将其称作“宦官”。从画面中看出，作者用较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给使因被阉割而造成的形体变化和奴颜媚骨的体态。正如唐甄所描绘的：“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

古代的埃及、希腊、罗马、奥斯曼帝国，都曾经有过阉人奴隶。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阉人奴隶像中国的宦官一样，曾经在政治舞台上如此显赫，又如此臭名昭著。

帝制王朝当中，在东汉、唐和明三朝，宦官干政的现象是最突出的，但是这三个朝代造成宦官干政的具体原因和权力格局，却是不一样的。

东汉宦官干政的起因，是小皇帝要争取独立。东汉的皇帝，除了开国的光武帝和明帝，以及在傀儡状态下顽强存在的献帝，中间诸帝大多短命。皇帝夭折，幼主即位，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权，对小皇帝实行关系封锁，让他没有机会跟群臣接近。小皇帝成年之后想要夺回皇权，四顾茫然，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身边的宦官。皇帝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便与宦官结盟，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而宦官因此得到皇权哺育，获得朝政的主宰权，狐假虎威，逐渐凌驾于一切之上，甚至对皇帝个人形成威胁。伴随着小皇帝的即位、成年或夭亡，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循环往复，像是一场无休止的闹剧，在洛阳的宫廷中不断重演。饱读诗书的官僚和普通豪强大族则被排斥在高层权力之外。归根结底，这是由东汉特殊的权力结构——皇帝与几大外戚家族分享政权所决定的。

唐朝的宦官有一张内外呼应的权力网络：在外，各个藩镇只要还服从唐中央的领导，没有明目张胆的反叛，则都设有监军使。而这个监军使是由宦官担任的，权力极大，甚至可以在节度使之上，代表中央监控藩镇军队。在内，也就是首都，出现了以“四贵”为核心的宦官机构。“四贵”指两位枢密使和两位神策军中尉。枢密使掌握着皇帝的信息渠道，参与决策；神策军中尉掌握着唐中央的禁军主力。除了“四贵”以外，首都与宫廷的保卫、马政都由宦官掌握。大家可别小瞧了马政，古代的马是骑兵战斗力的来源，属于战略武器。唐后期，藩镇割据，唐中央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域逐渐缩小。但在缩小了的唐帝国当中，皇帝控制力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加强。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些控制呢？宦官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从制度上看，唐朝的宦官早已不再是扫地洒水、伺候宫廷贵妇的了。宦官机构内外配合，织成一张大网，加强了皇权对各种资源的控制。

明朝的宦官专权同样也有制度保障。明朝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机构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这些机构权力广泛，简直无

所不包，各衙门的主管宦官叫作“太监”，“太监”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真正让明朝宦官势力大长的，是两项关键权力，这两项权力都是明朝政治水平低下、用心黑暗的表现。第一项是司礼监太监所享有的批红权。什么叫“批红”呢？就是用红笔在文件上做批示。批红本来是皇帝的责任，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的批红都由司礼监太监来执笔，所以真正指挥这个国家的，其实是宦官。从根儿上说，明朝的宦官干政是名正言顺、制度允许的，一旦皇帝犯懒或者没能力批红，宦官的意志就成了国家意志。宦官的第二项关键权力，是他们掌握着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特务政治在很多朝代都有，但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或者政治斗争激烈之时，唯独明朝奇怪，自开国就有。明太祖朱元璋搞锦衣卫，明成祖朱棣搞东厂，明宪宗搞西厂。厂卫横行，告密成风。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观点，宦官专权意味着政治腐败，通常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关于宦官的祸国殃民，学者们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东汉的大宦官侯览先后抢夺民宅381所，民田118顷，为自己盖了16处深宅大院。又比如，东汉的官员选拔靠的是征辟和察举（推荐加考试），而在宦官的把持之下，能当上官的都是有关系的，根本没人理会他们的德行和学问，所以民间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说法。这是更深层次的腐败，它败坏了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

史书记载，唐朝的大宦官仇士良告老还乡，临别之际，全体宦官都来送他。仇士良发表临别感言，告诫同类说：千万不能让皇帝有闲空儿，皇帝闲了一定会读书，接见儒臣，听取不同意见，那就会变得有智慧、有远见，不爱玩，减少出游打猎，到那个时候，他对我们就没这么好了，我们的权势也就轻了。所以，为各位考虑，那就不如搜刮财富，选雄鹰宝马，天天领着皇帝打马球、狩猎，用音乐和美色来蛊惑他的心灵，让他享尽奢靡，身心愉悦，不愿意停下来，那他必然会排斥儒家经典，懒得理外面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天下的事就都握在我们的手里了，恩泽权力还能跑到哪儿去呢？^[1]仇士良的这番话，简直可以充当宦官包藏祸心、败坏政治风气、意欲祸国殃民的自白书。



图十九：章怀太子墓壁画 唐《马球图》（局部）

于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的《马球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马球兴起于唐初，后在皇帝的倡导下很快盛行起来。史书载，大宦官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告诫同类：别让皇帝有闲空儿，皇帝闲了一定会读书，那就会变得有智慧和远见，会减少出游打猎，那时对我们就没这么好了。所以不如天天领着皇帝打马球、狩猎……让他身心愉悦，便会懒得理会儒家经典和外面的事儿了。这幅《马球图》便展现了骑手击球的精彩场面。图中人物虽不多，但竞争颇为激烈，骑手服饰颜色有别，有的双手持杆反身击球，有的扬起球杆正要击球，有的手扯缰绳直奔马球，有

的驰骋腾空……画面有动有静，布局有张有弛，呈现出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艺术效果。

不过，我对宦官专权导致王朝灭亡的说法表示怀疑，它可能还是带有士大夫集团的偏见。比如，唐后期的宦官的确拥有左右政局的庞大势力。从唐宪宗到唐末帝，九个皇帝之中有八个是宦官拥立的，两个被宦官谋杀。但是，我们从现存的唐代宦官传记中，其实找不到太多宦官影响政策，从而导致国家败亡的实例。宦官有腐败行为，士大夫官僚在腐败方面也是不遑多让的。宦官有派系，士大夫官僚也有派系，而且官僚之间的倾轧更为激烈。所以，很难说宦官专权就一定指向王朝的灭亡。相反，如果我们看历史事实的话，东汉与唐的灭亡都是在诛灭宦官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有学者指出：“到了唐朝灭亡前夕，唯一能够给昭宗皇帝带来安全的就是宦官集团了。……宦官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被翦除之后，唐皇室也就完全失去了最后的可以依赖的资源。”^[2]

为什么会出现“宦官之局始结，而国亦随之亡矣”^[3]的局面？因为宦官本来就是皇权的寄生物，宦官这个特殊人群是一种纯粹孤立的存在，尽管有势力的宦官也会娶老婆、收养子女，有些宦官夫人的墓志铭，同样也会写得热热闹闹，说她如何贤惠地相夫教子，敦睦亲族，但是，宦官毕竟无法结成真正的婚姻关系，也无法有自己亲生的儿女。他们的生命是畸零的，既不能成为丈夫，也不能成为父亲。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标准衡量，宦官更无法成为孝子。所以，在正常的社会文化当中，根本就没有宦官的生存空间。宦官可以权倾一时，却始终被视为下贱的群体。人们既畏惧宦官，又鄙视宦官。最简单的道理，人们再怎么巴结宦官，也没有人想变成宦官，更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儿子做宦官。这种畸零让宦官只能依附于皇权，成为皇权最忠实的奴仆。《汉书》云“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4]，一语道破宦官群体的存在价值。宦官本身无权力，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因此，不管宦官的权力看上去有多么大，都只是皇权的“机甲”。同样，打击宦官就等于打击皇权。

[1] 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上·仇士良传》，中华书局975年版，第5874—5875页。

[2] 孙英刚：《灿烂辉煌的开放世界——隋唐五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3]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0页。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三《佞幸·石显传》，中华书局962年版，第3726页。

如何决策？如何纠错？

皇帝是朝廷国家的代表，拥有天赋治权，然“明君不能独治”^[1]，“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谏上蔽，不亡何待！”君主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是取亡之道。朝廷国家的治理，必须通过群臣的积极配合才能实现，“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2]古人所谓“群臣”，既可以指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机构，又可以指活动于其中的官员。群臣的权力来自皇权的赋予。宰相为群臣之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在能力和经验上对“具体的皇帝”构成有益补充，使之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然而，授出的权力如何防止其坐大、反噬？皇帝与宰相之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真相如何？信任就像是一堵若隐若现的墙，始终横亘在君臣之间，特别是君相之间。比争权故事更为真实的，是国家的治理。皇帝和以宰相为首脑的中央政府怎样采集信息？怎样决策？其纠错机制如何？帝制国家中央政府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其核心目标是维护一姓皇权的安全。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二《文苑·袁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页。

[2]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27—6028页。

皇权哺育下的相权特点

有些问题是看上去都知道，深究起来谁也不清楚的。比如，什么是宰相？

提到对宰相权力地位的印象，大家都可以说得出来。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在群臣中地位最高，但论名分则属于臣子。在任何一个时代，宰相都是最尊贵的，是当官的人可以合法追求的最高目标。俗话中有“将相和则国家兴”的说法，又有成语“出将入相”。“相”与“将”相对，将帅是武官，宰相是文官，“相”的地位通常在“将”之上，这是由传统中国以文统武、文官治国的大格局决定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有辽代有以“宰相”为正式官名的宰相，其他朝代的“宰相”都是俗称，不同朝代的宰相，头衔各不相同。故今人学史，需要下一番功夫确认，哪个朝代带什么官衔的是宰相。当然，当时的人绝对不会错认宰相。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宣布“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所以通常认为，明清两代没有宰相。可是，也有很多人把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万历皇帝曾经称呼大学士叶向高为“宰相”，而叶向高则一再否认。那么，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什么不是宰相？

什么是宰相？我们需要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具体的标准。但是很难找，制度史的记载往往是非常笼统的一句话：“佐天子而理大政。”对吗？对。说明白了吗？模糊。

关于宰相的职责，古人最喜欢讲的是汉文帝与周勃、陈平的故事：汉文帝有两个宰相，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文帝上朝，先问周勃，天下一年判决的刑狱案件有多少起？周勃惭愧地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天下一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各是多少？周勃又不知道，惭愧得后背冒汗，沾湿了上衣。这时候，文帝转向了陈平，问同样的两个问题。陈平也不知道，但是他很从容地回答说，这两件事情都有主管。文帝问谁是主管，陈平说，陛下问司法刑狱，要找廷尉，问财政情况，要找治粟内史。

这时候文帝不太高兴了，他说，这些事都有主管，那你管什么呢？陈平说，我管官员。陛下不嫌我愚笨，让我当宰相。宰相的职责，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理顺四时，下让万物各得其所，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内亲附百姓，让各级官员都能尽职尽责。^[2]陈平的回答虽然很漂亮，但对宰相概念的界定依旧模糊不清，还是无法解释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的问题。皇帝的秘书不也是干这些的吗？

关于宰相职权的确切定义，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祝总斌先生给出的。这个定义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按照祝先生的说法，宰相必须握有两大权力，缺一不可。那么，这两大权力是什么呢？第一，宰相必须握有议政权，宰相是可以进宫面见皇帝，共议军国大政，协助皇帝做最高决策的。这叫“入则参对而议政事”。除了这种直接的议政权以外，宰相还有间接的议政权。日常政务由宰相以书面的形式向皇帝提出建议，皇帝批准，形成命令。这是在决策环节，宰相所有的制度化的重要权力。第二，宰相还必须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命令形成之后，由宰相负责发布，监督检查执行过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且根据实施情况和制度对官员进行考核，这叫“出则监察而董是非”，“董”就是监督的意思。宰相府有通过文书处理一般政务的权力。这是在政府运作中的宰相权力，宰相是政府首脑。^[3]

同时具有这两项权力的，才是宰相。皇帝身边的各种人，比如高级秘书、受宠的妃嫔，甚至宦官，也可能会获得稳定或者临时性的议政权，但是仅有议政权，是不能称为宰相的。宰相还必须同时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宰相的议政权和监督百官的执行权，受到传统和制度的保护，也就是说，皇帝如果不是昏君，是不能任意剥夺和侵占宰相权力的。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朝的军机大臣所拥有的议政权，几乎等同于前代宰相的议政权，但是他们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明朝人说内阁大学士只是文墨、议论之官，毫无事权，一切政务，都由（皇帝领导）六部尚书负责，所以，（内阁大学士）跟前代的宰相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从未有一则法规明确规定宰相的职责，但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宰相的职责有高度的共识：第一，宰相应当不亲细事，不要被具体烦琐的事务耗费了心神，他的精力应当放在大事上，“但总大纲，于庶政或有所不必问也”。比如，唐太宗曾经批评他的两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您做宰相，就应当广求贤人，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以合适的官职，这才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两位亲自受理诉讼，一天到晚忙不过来，还怎么能协助我求贤才呢？^[4]第二，宰相分内的大事，首先是为国家选拔和任用贤才。第三，宰相是皇帝的第一批评人，他有责任向皇帝进忠言。汉顺帝让尚书周举指出官僚队伍的败类，周举说，刘崎当了六年宰相，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忠言，有什么重要谋略，我觉得这才是最糟糕的。后来顺帝就免了刘崎。^[5]按照制度，宰相可以经常与皇帝会面，商讨国家大事。皇帝是最高决策者，而宰相是决策参与者，可以在决策形成之前对皇帝进谏，匡正缺失。宰相的批评是其他官员无法比拟的，因此，宰相缄默不语不可以被原谅。当然，也有宰相说了，但外人不知道的情况，这种时候，就需要皇帝为宰相辩护了。



图二〇：南宋 刘松年（款）《十八学士图》（局部）

《十八学士图》，南宋刘松年款，绢本，182.3厘米×44.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品描绘的是“十八学士”们的雅集生活。“十八学士”是指十八个文采出众的臣子。唐太宗尚为秦王时，在首都长安建立了文学馆，网罗了一众人才，史上称他们为“十八学士”。其中有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虞世南、姚思廉等人。他们既与唐太宗谈古论今，又以谋臣身份协助太宗处理政务。其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唐初名相。《新唐书·杜如晦传》载：“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历史上也有“房谋杜断”之说。据说图中两位对弈者就是房、杜二人，他们的杀伐决断通过弈棋也能有所体现。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宰相是皇帝的绝配。帝制的特点是皇帝世袭，官僚选任。皇帝世袭，就意味着选择余地是极小的。开国皇帝经历战争或者政治斗争的考验，政治和行政的经验还可以。守成之主则多平庸之辈，还有未成年的皇帝、垂帘的太后，普遍缺乏政治和行政经验，这就需要宰相来“佐天子而理大政”。宰相通常是有经验的成熟的政治家，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而且经历过长期的行政历练。皇帝可以没经验，但宰相必须是政坛老手。皇帝可以糊涂，但宰相必须智慧。所以，宰相对帝制国家的治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以太子身份即位的三十岁的皇帝，在位二十六年，会跟他的宰相产生怎样的关系？

首先，在最高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宰相充当了重要的稳定器，阻止了可能发生的阴谋。

其次，宰相要充当皇帝的政治导师角色。一位年长的宰相甚至会将奏报皇帝的信息进行筛查，专门将各地的灾荒困难奏报给他，“报忧不报喜”，让年轻皇帝愁眉苦脸。而这位宰相深感欣慰，因为这会让皇帝知道治理天下的艰难，避免其胡作非为。

当国家遭遇强敌入侵的危急时刻，皇帝决定起用一位能力超群、作风硬朗的大臣。为了协调与这位“硬派”的关系，皇帝做了周密的人事安排，先任命自己更为信任的大臣做首相，然后再任命“硬派”为次相。大敌当前，皇帝心生畏缩。首相与次相通力合作，打消了皇帝的逃跑倾向，将国家带向了和平。危机结束，形势平稳之后，作风硬朗的次相被解职，温和识大体的首相过世，新一拨宰相上台，其中有温和谦恭的行政高手，还有善于揣摩皇帝心理的国家形象包装专家，以及理财能臣。皇帝信任行政高手，把日常政务交给他；他自己则与国家形象包装专家一起大搞神圣崇拜运动，封禅泰山，试图把本朝包装成太平盛世；理财能臣则为朝廷提供财政支持。

到了皇帝晚年，国库空虚，连年饥荒，官僚队伍腐败，太子年幼，皇后权重。出于对女性的不信任，皇帝召回作风硬朗的前任宰相，试图与皇后形成势力抗衡。最终，得天子者得天下，皇后战胜了前任宰相，辅佐太子即位。皇太后摄政，也并没有让国家坏到哪里去。

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宰相的作用。从头到尾，国家的日常行政都是宰相在打理。当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也是宰相协助皇帝，稳定国家的方向——而宰相由皇帝选择任命。宰相的选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由过去个案积累而成的惯例是重要因素，它决定了有哪些经历的哪些官员可能成为宰相；而最终选择谁，则要看皇帝的决定。宰相可以是皇帝的政治导师，是皇帝的最高参谋，在关键时刻矫正皇帝的行为。宰相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皇帝的信任。当皇帝决定一意孤行的时候，宰相也只能无奈地追随。比如，当故事里的皇帝开始大搞神圣崇拜运动，消耗国家的时候，那位温和谦恭的行政高手也束手无策。他跟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临终遗言，剃发僧袍以葬。^[6]宰相对皇帝只能批评匡正，无法强行改造。尽管如此，皇帝身边还能有宰相的存在，也是弥足珍贵的了。正因如此，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实在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损失。

帝制时期的宰相制度有一条非常鲜明的变化线索，那就是：皇帝身边的内

廷官员（主要是秘书咨询人员）不断成长壮大，生发出新的机构。这个新机构最终会走出内廷，走向外朝，取代旧的宰相机构，成为新的宰相机构。宰相名称的难记就是由这种变化引起的。秦汉的宰相是丞相；晋朝的尚书台从宫里走出来，成为新宰相；进入隋朝，内廷又走出来中书、门下两省，与尚书省构成三省宰相；宋代的枢密院也是从内廷走出来的。这条变化线索透露出帝制时期的权力秘密——皇帝是权力的生发器，受到皇权哺育的群体就有可能获得成长壮大的机会。通常，学者们会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来解释这种变化。的确，是皇权哺育出来的新机构取代了旧宰相。但是，这是不是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呢？

[1] [明] 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卷六《庚申·洪武十三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0页。

[2] 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06—2062页。

[3]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4] 参见[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三《论择官第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9页。

[5] 参见[南朝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06页。

[6] 故事里的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硬派”宰相寇准、温和识大体的首相毕士安、温和谦恭的行政高手王旦、国家形象包装专家王钦若、理财能臣丁谓。参见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2年版。

此消彼长还是共同扩张？

讲古代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皇权与相权的关系问题是绕不开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是“斗争消长说”：斗争是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斗争引发权力的此消彼长；消长的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大转折发生在宋朝——宋朝设枢密院掌军政，宰相不得干预军政，权力“已去其半”；又设三司专掌财政，拿掉了宰相的财权，宰相权力所剩无几，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大结局发生在明朝，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明清两代没有了宰相，政治走向专制，皇帝走向独裁。

“斗争消长说”逻辑清晰，通俗易懂。它所描述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在明清两代所发生的严重倒退，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相呼应，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它能够被广泛接纳，自有其道理。

但是，若结合迄今为止的研究积累，认真追究，仔细推敲，“斗争消长说”当中其实包含了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

首先，它假定中国的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在帝制的开端，皇权与相权就已经截然分立。比如，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又说：“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表。事情管得好与坏，责任在宰相，皇帝可以不负责任。”^[1]

认为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领袖，就抽象原则而言基本正确。但是，它显然并非事实，而只是学者想象中的理想形态。事实上，皇帝与政府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权力划分。如果皇帝愿意，精力也允许，他当然可以管一切事。比如，秦始皇就是这样管理一切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七十博士都只是“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2]什么叫“受成事”？就是接受已经形成的命令。这命令当然是皇帝本人的，所以说是“倚办于上”，办事全靠皇上。

其次，这个关系中有关宋代相权大转折的说法也大有问题。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3]这句话顺着读不容易读出毛病来。但倒着反推它的叙述前提就会发现有问题：难道说宋代以前的皇帝在最高政令的制定中是没有“参加意见之权”的吗？这当然不可能。比如在唐太宗的记忆中，隋文帝就是个什么都自己来决断的皇帝，他不肯信任百司，每件事都自己拿主意……宰相以下，只能他说什么是什么。而唐朝最高政务的裁决，就是由皇帝做出的。不管在宋代以前还是宋

代以后，在军国大政的决策上面，从来都是宰相协助皇帝做出决策。

再次，论述方法有问题，只关注表面现象，从结果反推原因，完全忽略政治运作的细节与过程。比如汉武帝常常在内廷裁决政务，他所依靠的不是外朝的宰相，而是内廷官员，主要是尚书台的官员。后来，尚书台就逐渐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丞相的职权被它占去了很多。这种做法最终导致尚书令取代丞相，成为新的宰相机构。





图二一：唐 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之隋文帝像

这幅隋文帝的肖像也出自《历代帝王图》。画家在作画之前，必然要翻阅所绘帝王的大量史料及后世评价，通过史料对他们的记载和描述，才能将皇帝的相貌、性情及其历史地位形象地刻画出来。此处的隋文帝虽不失帝王气质，但较之前文一身雄才大略之气的汉光武帝刘秀，他的面部则多了几分苦与忧，因为历经数百年分裂局面，隋朝江山初定，很多棘手问题亟待解决，而隋文帝又是一位事必躬亲、劳心劳力的勤勉君王。画作刻画的文帝样貌与其形象气质非常贴合。中国画讲究“以貌识人，以形传神”，因阎立本并未见过汉光武帝和隋文帝，故画面未必写实，而其经由文字记载能将每位帝王的特点准确地传递出来，足见其画技的高超与非凡。

汉武帝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现象。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消长关系里，这种做法就是皇权削弱相权的努力：汉武帝认为他的皇权受到了相权的威胁，因而有意识地引用资历更浅、更容易控制的内廷官员来分割相权。

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补充了细节和过程之后，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武帝在位，前前后后用了十三任丞相，但没有哪一任的才干和威望足以与武帝对抗，或者与武帝在政治上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是说，并未出现相权威胁皇权的状况。那么，既然相权没有威胁到皇权，汉武帝为什么还要另外搞出一套内廷班子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讲究清静无为，政务简单，事儿特别少，皇帝和丞相五天才开一次办公会。而汉武帝雄才大略，积极有为，“朝廷多事”，再用那套简轻省的旧制度显然就不行了，必须做出改变。而直接改造旧制度，牵扯的东西多，压力大，成本高，远不如另起炉灶来得方便。内廷诸臣，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干，还没有资历限制，想用谁用谁，不触动旧体制，又能解决新问题，何乐而不为。而武帝到了晚年，精力下降，更需要依靠身边的秘书班底。提高效率，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这才是武帝时期建立内廷的真实原因。而这个原因，是我们在引入了细节和过程才能看得到的。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斗争消长说”的论述前提错了。“斗争消长说”的立论前提有两个：第一，它认为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是斗争而非合作；第二，它认为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假定皇权加相权等于100，那么当皇权是50，相权也是50；如果皇权涨到80，相权就降到了20。

挑完了“皇权与相权斗争消长”这个关系的错，我们讲一个有关皇权与相权共治关系的故事，它也有两个立论前提：第一，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不是相互斗争，而是互相配合，其目的是同舟共济治理国家。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君相矛盾和权力斗争。但是，这些矛盾与斗争并不能改变关系的实质。不然的话，帝制国家也就无所谓长治久安

了。第二，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在皇权与相权之外，还有普通官员的权力。无论皇权的独大还是相权的独专，都会对普通官员的权力构成挤压。所以，传统的政治理论一向是主张兼听共治，反对专权，不管是皇帝的专权还是宰相的专权。

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相权对皇权的约束是在不断加强的。这种约束实际上是传统积累、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的合力。汉武帝时，杜周为掌管司法的廷尉，办案不遵国法，专门迎合皇帝的心意。有人指责他，杜周不以为然，反问对方，法令从哪儿来的？“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前面的皇帝认为是对的，记下来就是律条；后面的皇帝认为是对的，记下来就是法令。这句话要两说：一方面，它说明君主的意志可以转化为法律，君权至高无上；另一方面，随着律令的积累、制度的完善，以及儒家思想的教育，后世君主需要遵循恪守、不得任意侵犯的制度和教条也越来越多了。

比如，诏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国家政令，但是，这绝不是说，皇帝就可以自己随随便便地颁发诏令。在唐代的三省制下，一道诏敕的形成，必须经过皇帝与宰相的御前会议，然后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复核，才能发布。有个著名的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宰相刘祎之遭人诬告，武则天派人去审他。来人宣读敕书，而刘祎之拒绝承认这则敕书的合法性，他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凤阁、鸾台就是中书、门下两省，这是武则天改的名字。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手续不全不合制度，就不能称为敕书——这就是制度赋予宰相约束皇帝的权力。纵观中国政治史，这类约束其实在不断增加。

当然，皇帝也可以完全不理睬这一套，他可以撇开政府，用“手诏”“内批”“御笔”（批条子）来指挥政事。而这么做就违反了制度传统，要受到道德谴责，有沦为昏君的可能。可是，如果皇帝不在乎呢？也就为所欲为了。比如，那位敢于质疑武则天敕令合法性的宰相刘祎之，还是被武则天赐死了。武则天不敢公然否定刘祎之所捍卫的制度原则，但是，从肉体上消灭刘祎之这个人是可以办到的。所以，在帝制时期，皇权才是第一位的，宰相个人或者制度对皇帝的约束都是第二位的，没有强制性。

儒家政治的理想形态是“明君贤臣”“君逸臣劳”。皇帝不要管得太多太细，要努力做到“垂拱拱手而天下治”。而能够“垂拱治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找到合适的宰相，充分信任他，尊重他，依靠他；当然，也要派人看着他，监督他。皇帝需要宰相，帝制国家需要宰相级的政治家为皇帝保驾护航，但是宰相制度，朱元璋说废也就废了。那么，没有宰相的政府是如何持续运转的呢？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年版，第3页。

[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年版，第58页。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缺宰相的政府靠什么运转？

中国的皇帝制度存在了2133年，但宰相制度只存在了1601年，帝制最后的532年是没有宰相的帝制。有宰相之时，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为政府首脑，皇帝世袭，宰相选任，宰相以其政治经验对皇帝构成有效补充。废除宰相之后，皇帝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大权独揽。宰相制度的废除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是偶然，为什么会延续532年？废除宰相之后的帝制国家的权力结构、政治决策和行政运作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废相的导火索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案”。这个案子前后绵延十年，牵连杀害三万余人。朱元璋给胡惟庸定的罪名是谋反——十恶不赦的大罪。胡惟庸的政治作风的确有专权跋扈的问题，但还不至于谋反，谋反是朱元璋铲除功臣所需要的理由。朱元璋对他的功臣集团很不放心，解决办法就是肉体清除一切可能威胁朱家天下的势力。太子朱标不忍，抗议父亲杀人过滥。朱元璋拿出一条长满了刺的棒子，让太子用手去握，太子畏难。朱元璋说，我现在杀人就是在给你拔刺！刺拔掉了，你才握得住。罗织罪名杀戮功臣，暴露了朱元璋骨子里的残忍、狭隘和缺乏安全感。这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我们隔着七百多年历史可以给他一点理解，但是就此废除宰相制度，却是任性了得、无知了得、愚昧了得。朱元璋与大明王朝的没格局，在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一个宰相的谋反，就废除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绝对是因噎废食。根据朱元璋的自陈，他废除宰相制度还有更充足的理由——对胡惟庸案的反思。我们把朱元璋关于废相必要性的言论综合起来看，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意为，宰相制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利于帝国统治。丞相制是秦朝制度，而设置丞相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

第二，“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意思是从秦朝以后的历史实践看，宰相好的时候少，专权乱政的时候多。而元朝的灭亡正是由于“委任权臣，上下蒙蔽”。

这两条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看起来朱元璋倒真是历史的好学生。但是，读历史就是要拨开语言的伪装，直达本质。上面这些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是完全反历史的，充满了蒙蔽与误解。秦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不是设丞相。故事“指鹿为马”中专权乱政的，不是丞相李斯，而是宦官赵高。在那

个历史关头，丞相李斯所犯的错误恰恰是私心泛滥，屈从于秦二世和赵高的淫威。秦以后各朝，专权乱政的宰相其实并不多。西汉末年有王莽，东汉末年有曹操，曹魏末年有司马氏，都篡夺了皇位，这是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南宋的权臣也多，比如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但是这三位其实并没有威胁皇权。关于元朝，朱元璋说的倒是真的。元朝后期的确出现了宰相专权，甚至至于废立皇帝现象，但是，朱元璋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元朝的宰相专权，本质上是由于蒙古人对华夏政治传统认识不足、吸收有限，制度漏洞百出，皇帝既懒得管事，对担任宰相的蒙古色目贵族又缺乏戒心。元朝的宰相实在不能成为华夏宰相制度的标杆。然而，朱元璋耳闻目睹的却偏偏只有元朝的宰相，他就把元朝宰相制度的问题当作了宰相制度的通病。

所以，朱元璋的说法只是拉历史的虎皮，遮掩高度膨胀的私心，做废相的大旗。他的思维方式简单而粗暴，将个人感受甚至私心欲望直接上升为一般性规律，然后用这把狭隘的尺子去丈量世界。东汉朱浮写过个“辽东白豕”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思想方法。辽东那边的猪都是纯黑的。有一次，有个人家的老母猪生了一只白头的小猪，主人如获至宝，视为祥瑞，要献给皇帝。抱着小猪辛辛苦苦走到山西，却发现山西的猪都是白的，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辽东人所见皆黑猪，这是眼见为实，但是从而推论出天下猪皆黑，白猪为异宝，就狭隘了——明显是没见过世面。还好他走到山西就看见大批白猪了，不然要走到洛阳，多冤啊。

一个人通过亲身经历与见闻获得的信息实在有限。肉眼人身只能从特定角度看到部分事实，看不到全局，也看不到长时段的变化。因此，个体经验可以绝对真实，若要推而广之，尊为规律，则多半靠不住。今天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可以靠大数据纠偏，在古代只能靠读书。治国理政的人特别重视读史，鉴往而知来就是这个道理。读史之人的第一要务，是要舍得开放自己。“千江有水千江月”，个人的经历体验贯穿在整个阅读思考过程中不会丢失，但是，不能用“小我”的一叶遮住了眼睛，更不能对历史予取予求，只看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朱元璋的拉虎皮做大旗则完全相反。他先有要废宰相的固执之心，然后再把历史拆开打散误植乱用，装饰自己狭隘的私心。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这么一个偏执狭隘的人，偏偏成为开国皇帝，所以，朱元璋极端错误的思想方法所导致的错误的价值判断——宰相制度有害于帝制国家，必须废除，不但需要立即落地，还被有明一朝奉为了祖宗之法，坚持二百多年不动摇。

宰相制度的废除，无疑是帝制政治的一大损失。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为什么这样说？“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

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那么，没有宰相的帝制为什么能够延续下去呢？第一，制度本身有惯性，要改变制度，必须有大见识、大力气，而明朝的继统之君既没这个见识，也没这个能力。清朝统治者从东北来，本身文化相对落后，开国之君也缺乏这种贯通古今的见识。第二，没有宰相的帝制对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来说，是愉快的。因为它便于皇帝的集权。当然，对国家来说，如果皇帝不够勤快或者能力太弱，那就大有问题了。清朝的皇帝自顺治以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多半都是劳模型的，所以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明朝，没了宰相，皇帝又常常懒政，屡屡刷新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的纪录。但是明朝的国祚竟也绵延达277年。那么，明朝政府持续运作的奥秘何在呢？

废除宰相之后的明朝国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现象，由国家元首皇帝亲自担当政府首脑，直接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通政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等机构。所有这些机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统属关系，“事皆朝廷总之”。所有上奏信息原则上直达皇帝，由皇帝直接做出决策，百官的任免也是由皇帝决定的，“政事一从皇帝出”。朝廷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朝廷。政治结构的扁平化，一方面导致权力向皇帝集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皇帝工作量的巨大增加。

皇帝有把握一切权力的心，却没有管理一切事务的力。忙不过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废相的始作俑者朱元璋本人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有人统计过朱元璋的工作量。1380年，他废宰相；四年之后的1384年9月14—21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共计收到1666份文件，其中需要批复的事情3391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份文件，批复400件事。皇帝忙不过来，又不愿意设置宰相，光明正大地在制度上将一部分权力和责任托付出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

这条路就是充分开发、利用皇帝周边的附属群体，这也是传统做法。皇帝的附属群体主要指秘书和家奴，具体地说就是内阁和宦官。

内阁是皇帝秘书，因为它只有议政权而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内阁通过帮助皇帝阅读文件、起草批示，对政治产生影响。按照制度，内阁是皇帝影子里的存在，没有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力，更谈不上指挥六部、改革政治。所以，在没有宰相的皇帝制度下，皇帝是唯一合法的政治改革者。然而，皇帝的产生方式却让他很难产生改革政治的认识和主张。当然，我们在明朝也看到了有作为的政治家，比如嘉靖初年的杨廷和、万历初期的张居正。他们都是以首席内阁大学士的身份主持改革，但是，这个身份其实并没有赋予他们指挥政府运作的合法性。那么，内阁大学士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包装成皇帝的旨意。也就是说，明朝有理想和作为的政治家往往

在打擦边球，所作所为明明出于公心正义，但推行公心正义的手段却可能不合制度传统，这就让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从时间段上来看，明朝的政治调整往往发生在皇帝政治实习的懵懂期。一旦皇帝反应过来，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或者大学士遭到了政敌攻击，那么大学士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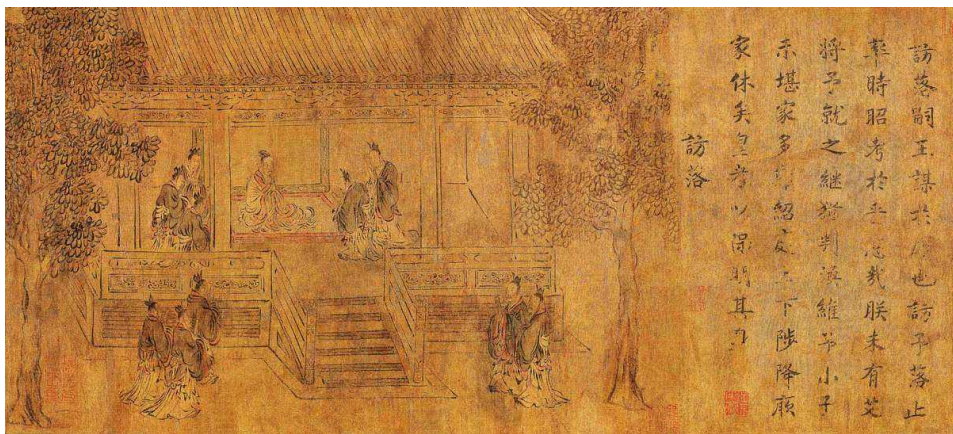
内阁大学士是官僚群体的代表，官僚群体好歹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有政治追求的。宦官则是纯粹的皇帝家奴，它完全依附于皇权，也正因如此，皇帝才最信任宦官。明朝中叶以后，一百六十七年间，只有很少的几年，皇帝能够正常上朝，其余时间都是“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官僚见不到皇帝，而宦官能见到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大权独揽的皇帝靠什么展示他的存在？皇帝就像一只千手千脚的怪物蜘蛛，宦官就是他的千手和千脚，宦官所掌握的特务机构就像是蜘蛛吐出的丝，黏腻地缠绕着这个国家。

皇帝可以不见群臣，政府的职位空缺了可以不补，但是明朝政府仍然存在并运作着。靠什么？靠制度，靠惯性，靠高压，靠特务。问题是，这个政府将不再有创造的能力，也不再追求，它存在，但不作为，损失了应对突发事件、对抗内外打击的能力。

御前会议解决啥问题

帝制国家权力中枢的核心是皇帝，皇帝的周边有秘书帮助他处理信息，出谋划策。皇帝之下是中央政府，帝制2133年，前1601年，宰相群体享有稳定的议政权，与皇帝一道构成权力中枢；后532年，废除宰相，皇帝就是权力中枢，朕即朝廷。不管有没有宰相，皇帝原则上都掌握着所有决策的最终决定权。所以，谁能够稳定而频繁地接触到皇帝，谁就有可能在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唐后期，陆贽做翰林学士，也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他深得唐德宗的信任，对决策影响极大，被认为是“内相”[唐、宋翰林学士的别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起草任免将相等机密诏令。德宗后，其地位日益重要，虽朝廷有宰相主政，而翰林学士常值宿内廷，向皇帝提出建议，参裁可否，故号称“内相”]。明朝没有宰相，皇帝一旦躲进深宫不上朝，那只能是宦官说了算。唐后期的枢密使曾是最尊贵的宦官职位，也是宦官得以干政的关键。枢密使本来只是在皇帝和宰相之间跑腿儿、传信儿的，传着传着就把自己的意见加了进去，传着传着就可以在中间插话，进而影响最高决策。

要保障中枢决策的安全，就要建立适当的会议机制，让皇帝能够及时听取宰相及其他大臣的意见，还要建设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在这些方面，帝制中国都曾经有过值得称道的成就。



图二二：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图卷》（局部）

由宋高宗赵构楷书、马和之设色绘制的《闵予小子之什图卷》，绢本设色，713厘米×2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所反映的是周成王

即位之初，与臣子共商国是并树立权威的情景。左边墨迹出自《诗经·访落》：“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认为，自己继位不久，国家发展还遵从的是父王定的路线方针，而先王之政博大精深，自己阅历尚浅，内心多有惶恐。唯有谨遵先王庭训，选贤任能，整肃朝纲。也希望英明的父王在天之灵护佑自己明察是非，转危为安。



君臣议政

我们先看会议机制。最高端的会议当然是御前会议。帝制两千年，总的来说御前会议是越来越频繁的，皇帝也是越来越忙了。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在不断地向中央、向皇帝集中，二是国家事务的增多。

历史研究中什么最难做？日常。历史书写有点像现代的新闻报道，倾向于记录重大、非常事件，越是日常越难被记录下来。比如秦汉的皇帝究竟多久跟群臣见一次面，并无明确记载。学者们常常引用的材料，是汉宣帝亲政之后，“五日一听事，以下各奉职奏事”。这条材料被用来证明宣帝的勤政，那么，之前皇帝的听事频率应该到不了五天一次。

唐宋以后材料多，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从这个时候起，正常情况下，皇帝就是隔天或者天天打卡上班的了。宋朝的第一位劳模皇帝宋太宗的日程表是这样的：凌晨三点到五点起床，六点左右，他已经穿戴整齐，到达前殿，接受朝见——这种朝见重在仪式，目的是展示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七点钟，太宗开始在前殿接见宰相等大臣，举行办公会，商讨政务，一直到九点，然后回宫吃早饭。饭后，换上稍微舒服一点的衣服，进入相对来

说更随意一点的后殿继续处理政务，一直到中午十一点。下午的时间，宋太宗用来读文件（处理时政信息）和看书（进行理论学习），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深夜。

这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的勤奋状态，宋太宗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当天旬假（中国古代官员每十天放一天假，叫旬假），皇帝是不放的。这一天，太宗仍然接见了宰相。当天晚上，他就驾崩了^[1]，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的宋朝皇帝基本延续了这个时间表，而且还有新增项目，比如夜里召见值班的学士讨论政事。

帝制两千年，不仅御前会议的频率增加，而且原则上由皇帝直接处理的事务、直接接触的机构和官员也在增加。汉代的皇帝通过丞相府管理国家，小事遵循制度、按部就班，大事由丞相向皇帝报告。讲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汉惠帝上台后，曹参做丞相，“无所请事”，总也不找他报告，惠帝心里就有点儿发毛，又不好意思直接质问老丞相，就让曹参的儿子去问。结果曹参大怒，用竹板把儿子狠狠抽了一顿。惠帝只好承认是自己派曹公子去的，曹参就解释说，您不如高祖，我不如萧何。高祖和萧何把天下的法令都制定得很清楚了，陛下垂衣拱手，群臣遵守制度，不加违犯，不是挺好的吗？当时政治风气崇尚无为，国家事务相对简单，所以，宰相府都没什么事，就更不用找皇帝汇报了。

唐代的皇帝每天举行常朝，接见包括宰相在内的五品以上官员和一些关键部门的干部，先行礼后议事，一大群人七嘴八舌，效率低下。为了提高效率，就发展出一种新的御前办公会。等仪仗和大队人马都撤下去以后，宰相等重要官员再来跟皇帝开小会，说正事。御前办公会讨论的主要是军国大政，一般性的政务交给宰相办公会，由宰相办公会拿出处理意见报皇帝批准。

到了宋代，皇帝直接处理的事务量大大增加。前面说过，宋朝皇帝的日常听政活动分为两段，一段在前殿，一段在后殿，这两段的性质不太一样。前殿这段是高层办公会，按照顺序，皇帝要分别接见宰相、枢密院（国防部）、三司（财政部）、开封府（首都市长）、审刑院（司法部）。这个接见序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分别接见，各自谈话，因此真正接收到各方信息、掌握全局的是皇帝；当然，处理得好不好，得看他的处理器是否过硬。第二，能够参加办公会的，是一些机构的长官，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在御前办公会出现的资格，来自他所代表的机构，而不是他本人。因此，如果你不想让某人见到皇帝，那就把他调离上述岗位。这个办法王安石用过。开封知府冯獬反对他的司法新条，扬言要跟皇帝当面讨论。王安石就利用职权把这位仁兄的开封知府一职给免了——没了开封知府的位置，冯獬个人想要见到皇帝，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就是宋朝前殿听政的功

能——高层办公会，皇帝直接处理日常政务。后殿这段的内容则具体得有点儿琐细了，包括接见一些级别不是很高的新任官员。

帝制时期的会议，除了皇帝亲自主持的御前办公会，还有很多皇帝并不出席的办公会和政策讨论会。比如，公元前81年举行的西汉盐铁会议，就是一次有关国家政策转折的大讨论。它由御史大夫杜延年建议发起，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实际主持。辩论双方，一方是御史大夫、武帝的老臣、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桑弘羊，另一方是各地代表贤良文学六十余人，是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草野新进。曾经有人批评这种对阵格局不对称，有失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对称恰恰表明当时的帝制国家还在少年时期，政治体制充满活力。随着帝制政治体制不断成熟，这种情况便不再出现了。皇帝可以缺席宰相办公会和各种政策讨论会，但是皇帝的威权却笼罩着所有会议，影响的方式包括宣布召开会议、设定参会资格、批准或者不批准会议决议。帝制政体控制是无所不在的。

开会皇帝获得信息的一种方式。在会议上，皇帝接见群臣，接受汇报，进行质询，可能还同时伴随着书面报告的进呈。在会议之外，帝制国家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信息。儒家的政治思想一贯重视信息的搜集，主张掌握权力的人，特别是掌握大权的皇帝、宰相，一定要兼听博采，防范信息的壅蔽。为保障信息渠道的畅通，帝制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制度。在各级地方政府常规的汇报之外，中央派出巡视组是一种常用的信息搜集办法。巡视组有临时的，也有制度化的。临时的巡视有专使，比如公元前62年，汉宣帝派十二使者巡行天下，慰问鳏寡孤独，视察吏治得失，荐举人才；也有不带使者之名，但有使者之实的，比如皇帝身边的宦官、近臣到外地出差，回来肯定都是要汇报所见所闻的。制度性的巡视，汉代有州部刺史、六条问事。明朝的巡按御史，至今仍活跃在民间记忆中。这一类故事的背后，是明朝监察御史实实在在的威风。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位卑权重，代表天子巡视地方，品阶虽然不过六七品，但是四品官、三品官见了他们都要屏住呼吸，毕恭毕敬。

信息渠道常常会出问题。一般我们能想到的，是下面的人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隐瞒信息，隐藏真相，蒙蔽上峰；而想不到的是，上面的人有时候也未必想知道真相。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淤田法，是用人工制造的洪水泛滥把河里的淤泥带到岸边贫瘠的土地上，去改良土壤。但是洪水的方向和淤肥的力度都很难掌控，所以毁坏老百姓的田园和坟墓是常有的事。有人告状，证据确凿，宋神宗大怒。但是王安石只给了一个理由，宋神宗立刻就撇开老百姓的损失不管了。王安石告诉皇帝，这个淤田法最终为朝廷增加了收入——能够被蒙蔽的皇帝，一定是自己先遮住了眼睛。而遮住他们眼睛的不是别的，是利益。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而对信息的理解判断则决定决策的走向。所以，有宰

相的制度性参与，必要时引入更多的脑力资源，集思广益，对中枢决策来说十分必要。宋朝政治家司马光设想的理想的中枢决策方式是，宰相大臣各抒己见，不同意见之间互相争锋、充分讨论，皇帝权衡利弊，拍板定案。司马光的设想虽然很美好，可是要实现它，难度极大。这既需要皇帝虚怀大度，有判断力，又需要官僚队伍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争状态。何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争状态”？官僚队伍必须能够独立思考，因为独立思考，所以必然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然而，不同意见的争论绝不涉及人身攻击和利益之争，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清楚地了解并遵守和衷共济的原则。

[1] 参见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

朝堂上的一股清流

“台”是御史台，“谏”是谏院，御史台的官和谏官合起来叫作“台谏官”。他们专门负责批评监督和提意见。讲台谏官，必须把重点放在宋朝。在宋朝，“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台谏官被认为是皇帝与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而台谏官群体的崛起，则是帝制国家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成就。它让帝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纠错机制，而纠错机制的存在让这个国家有可能避免矛盾激化，从而实现长治久安，跳出朝代更替的窠臼。

欧阳修曾经说过，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做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何以言之？欧阳修有一番令人血脉偾张的精彩论述：

……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耳。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耶！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1]

谏官的身上维系着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个时代的公平正义——这是其他任何职能部门都管不了的，因为他们的职责都有具体规定，除此之外，皆非所掌。唯独谏官，以“言事”（批评）为职，无所掌，故无所不掌。这与宰相“佐天子理大政”“典调和阴阳”的职务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宰相与谏官这两种职位的职责设定，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责”，着眼于整个朝廷国家的运行状况；所不同者，宰相负有协助皇帝决策、监督指导百官执行的责任，而谏官负责提出批评，纠正违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小的谏官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平等的。宰相位高权重，得以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真理和正义；谏官地位卑微，通过批判性的言论维护真理和正义。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欧阳修给他的忘年挚友、新任谏官范仲淹的信。欧阳修

给范仲淹写信，如此高调地赞美谏官，并非只是为了祝贺范仲淹升官，更重要的是敦促范仲淹发出正义的声音。类似的话，欧阳修的后辈司马光也对他的挚友谏官范镇说过：“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万一有失职而吟叹者，景仁之责也。朝廷之政，万一有违理而伤道者，景仁之责也。”^[2]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尚，朋友之间用道义、职责来互相激励。范仲淹做谏官的时候正赶上大旱，旱灾导致蝗灾，粮食减产，从山东到江南都是重灾区。范仲淹打报告请求皇帝派使者去察访灾情。宋仁宗没有理他。范仲淹找了个机会对仁宗说，如果宫里半天没有饭吃，会怎么样？宋仁宗无言以对，于是派范仲淹去江淮地区视察，开仓赈济，免除苛捐杂税。后来，范仲淹因激烈反对仁宗废郭皇后而遭贬谪——作为谏官，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3]，当之无愧。像范仲淹这样的台谏官员，在当时已成一时风气。他们或者单独上疏，或者共同行动，针对朝廷的问题缺失，及时纠正错误。

台谏官的权力从哪里来？来自职务规定，来自包容的政治传统，来自君臣上下接纳、鼓励、批评的良好政治风气。宋朝制度规定，凡诏令不恰当、官员谋私利、政策措施有问题、刑罚和赏赐超过制度、税费征收无节制、冤情滥刑未得伸张，谏官、御史都要积极揭露、批评，对相关人员提出弹劾。对于谏官、御史在行使职务中出现的“失当言论”，皇帝承诺“一定会曲意周全”，采取包容态度。这一点，宋朝皇帝基本做到了。相传，在宋朝政治传统中，太祖誓碑中就有“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祖宗家法。“不杀”是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之中蕴含着对士大夫的尊重，也蕴含着宋朝皇权的清醒与克制。手握生杀大权，面对激烈指责、坚决反对自己的台谏官，宋朝皇帝如何守得住“不杀”的底线？他们有两个办法：一是关起门来不见，也不接收书面批评；二是实在没辙就把这个人调离台谏官岗位，调到地方工作。这也是贬谪的一种做法，但是经过这种贬谪的台谏官会在整个官僚队伍中身价倍增，成为未来的领袖。皇帝与台谏官之间只有暂时的意见相左，没有永久的互相怨恨。





图二三：北宋 范仲淹《范仲淹道服赞》（局部）

《范仲淹道服赞》，纸本，手卷，47.9厘米×34.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帖是范仲淹为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作的一篇赞文，称赞友人制道服之举“清其意而洁其身”。宋代文人士大夫喜欢和道士交往，“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于是穿道服便成了一时风气。而“着君子之服”“洁其身”也与范仲淹本人的高洁品性相吻合。这篇《范仲淹道服赞》行笔遒劲，结体严谨，被时人称赞：“文醇笔劲，既美且箴。”宋代留于后世的墨迹本就不多，范仲淹的这篇真迹便显得弥足珍贵。

那么，宰相呢？宋朝台谏官的很多批评会针对宰相，因为宰相是政府首脑，事儿是在他的领导下办的，有了错误，他难辞其咎。有时候，台谏官力谏皇帝依旧无果，也会把批评的矛头转向宰相——这是有认知依据的，宰相负有与皇帝论是非的第一责任，不能及时阻止皇帝做出荒唐决定，当然是宰相的错。台谏官批皇帝，毫不留情，批评宰相更是如此。

举一个例子，宋仁宗时期的御史唐介批评仁宗，仁宗让步，但是唐介觉得

让步力度不够，于是将矛头转向宰相文彦博。仁宗大怒，把唐介的奏疏丢在一边不看，扬言要贬谪唐介。唐介把奏疏拿起来，不慌不忙地读了一遍说，我为忠义所激愤，下油锅都不怕，更别说贬谪了。仁宗心里冒火，当场召集大臣开会，给他们看唐介的奏疏，说，唐介说别的事没问题，他说文彦博是靠后宫妃嫔的关系当上宰相的，这是什么话！任命宰相的大事，后宫怎么可能参与呢？文彦博就在对面站着听。仁宗说完，文彦博还没表态，唐介说，文彦博应当自省，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就不要隐瞒。文彦博什么反应呢？拜谢不已。仁宗气恼，派人把唐介架出去。唐介走了以后，文彦博对仁宗说，御史台官批评政事是职责所系，希望陛下不要治唐介的罪。仁宗怒气未消，狠狠地贬了唐介。谏官、御史继续为唐介辩护，仁宗后悔，怕引起众人恐慌，在朝堂贴出告示来，把唐介的贬谪地点改到条件好一点儿的地方。又生怕唐介半路上死了，引发群臣愤怒，便派宦官护送唐介前往，加以保全。

这样的台谏官，这样的宰相，这样的皇帝，换一个朝代哪里有？民间戏曲和业余史学爱好者，特别喜欢赞美明朝那些冒死直言的官员，比如要去劝谏皇帝之前先预备好棺材的海瑞。我们在此讲个明英宗时期的故事：大臣刘球和钟复相约共同上疏批评宦官专权，钟复被妻子拦住，刘球上疏遇害，钟复不久病死。钟复的妻子感到极度懊悔，一想到丈夫就哭着说，早知道是这样，不如让你和刘大人一起死。钟复的儿子后来做官，也因为直言极谏死在了廷杖之下。这些故事听起来的确感人，但是如果官员的不怕死只是导向了个人的惨死，而这死亡对国事又毫无改善，那么它除了让皇权更嚣张，意义何在？魏徵对唐太宗说，请你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明朝的政治文化出产的就是忠臣，将生命献祭给无所顾忌的皇权；而宋朝出产的则是良臣，他们的聪明智慧、直言极谏，会让国家机器运行得更好。

为了让台谏官能够尽职，宋朝赋予了台谏官一些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台谏官提交的书面批评报告，是密封直达皇帝的，中间环节既不能打开看，也不能要求台谏官提炼报告中的内容；二是“风闻言事”。“风闻”就是听说，台谏官进行批评弹劾，可以用“臣风闻”打头，而不必透露信息来源。台谏官的奏疏在直达皇帝之后，如果皇帝觉得事情实在是难以推行，可以“留中”，即留在宫里，那么外界就只知道某台谏官给皇帝上疏了，至于上疏内容是什么，只有皇帝和台谏官本人知道。如果皇帝觉得台谏官所说的事情可以讨论，那他就会把台谏官的报告下发到宰相府、枢密院或者其他有关政府部门。这个时候，政府方面才知道哪一位台谏官说了什么。这些特权对台谏官来说是有效的保护政策，在这种保护之下，台谏官才能有效批评。

在制度和文化保护下的宋朝台谏官，到了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时代，终于成

长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势力，所以欧阳修才能对范仲淹说出“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的话来。任何一个群体，当它被赋予了特殊权力的时候，都有可能走向反面。那么，如何防止台谏官膨胀呢？宋朝有精心的制度设计。第一，台谏官级别低，人数不多，独立于政府之外，直属皇帝。第二，台谏官是由高级官员推荐，然后由皇帝亲自选定；皇帝代表着国家，是帝制政治体制当中公正无私的天然存在。第三，台谏官的人选要避开所有大臣的亲戚。第四，台谏官任职期间，不得与大臣们交往，这叫“谒禁”。司马光做谏官，自律极严，跟老同年范镇是隔着一堵墙的邻居，也不交往，恩师庞籍退休在京，双方也只是书信往来。

可惜的是，到王安石做宰相，这些制度就开始纷纷遭到破坏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的大舅哥谢景温被任命为御史台的副长官。王安石推荐李定做谏官，遭到抵制之后，李定最终还是做了御史。负责批评政府的御史台从此布满了王安石的爪牙，这对王安石推行阻力重重的新法当然很有效。但是，台谏官成了宰相的人，宋朝的台谏制度自此崩坏。急功近利的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合力，阉割了宋朝政治中最伟大的成就——台谏纠错机制。

由此以降，以至南宋，台谏制度的元气再也没能恢复到范仲淹、欧阳修时代的样子，倒是越来越像明朝。当然比明朝还是好得多，起码宋朝“不杀”。

[1] [宋]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居士外集》卷一七《上范司谏书》，中华书局200年版，第973—974页。

[2] [宋] 司马光：《与范景仁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一〇，巴蜀书社992年版，第28册，第355页。

[3] [宋] 范仲淹：《灵乌赋》，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六七，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006年版，第18册，第7页。

君臣关系也有软肋

一段关系之中，什么最重要？信任。不管是君臣、父子、夫妻，还是兄弟、朋友、合作伙伴，彼此信任则内部关系简单无耗损，可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同舟共济；一旦信任动摇或缺失，仅仅对付彼此就已经身心俱疲，哪还有力气应对外界的人和事？而在帝制时期，信任恰恰是君臣关系的软肋。举一个著名的案例，汉高祖刘邦和宰相萧何。这对君臣之间曾出现过三次信任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汉三年（前204年）。刘邦还在同项羽胶着，萧何替他守关内。刘邦多次派使者来慰问萧何，萧何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个鲍生提醒他，大王在前线枕戈待旦，竟然还派人回来慰问丞相，这是在疑心你呀，你赶紧送人质过去吧。把萧家能打仗的子孙兄弟都派到前线去追随大王，大王一定会更加信任你的。萧何就把家里能上战场的男丁都派去了前线，刘邦大悦，这才踏实了。第一次危机解除。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汉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反，高祖亲自带兵去邯郸讨伐。萧何协助吕后守长安，帮助吕后杀了韩信。高祖得知，对萧何大行封赏。有一个明白人对萧何说，你就要大祸临头了。皇帝在外边带兵打仗，阁下留守都城，寸功未立就得到封赏，还给你弄个卫队，因为淮阴侯谋反陛下怀疑你了。你不仅要坚辞不受，还要把家里的财产都拿出来补助军需，这样才能让皇帝高兴。萧何从其计，刘邦乃大喜。第二次危机解除。

萧何气儿还没喘匀，第三次危机又来了。次年秋天，黥布反，刘邦又亲自带兵上前线，同时不断派人回来询问萧何在干什么。照去年的老办法可不行，为什么呢？你现在位居相国，功劳第一。而且你在关中十多年，深得民心。那怎么办？自污，要破坏自己在关中百姓心中的形象。萧何依计而行，“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刘邦“乃大悦”。第三次危机解除。

上述三次危机的故事，司马迁记载得很详细。显然，司马迁赞赏这种臣子生存智慧。回头细想也无可厚非，那些怀赤子之心、真诚勇敢的臣子在中国古代才真是异数，而且是要遭到批评的。比如著名的“天子之镜”魏徵，曾经有人批评他结党营私，唐太宗派人去调查，结果查无实据，纯属诬告。但是调查组长温彦博说：“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魏徵身为臣子，应当“存形迹”，都是因为他不能避开嫌疑，才招来这波诽谤。尽管他没有任何徇私情节，但还是要批评的。太宗觉得温彦博说得对，就派他去跟魏徵谈心，并且让温彦博带去一句话：“自今宜存形迹。”从今往后，还是要“存形迹”的。

什么叫“存形迹”？简单说就是要避嫌疑。比如说，臣子可以推荐人才，但是臣子推荐人才最合适的做法，是不能让被推荐者和其他人知道这是自己推荐的，要让人们觉得这都是皇帝陛下的恩典。

这番道理，年轻的范仲淹是不明白的。他很佩服宰相王曾，但是王曾好像从来不推荐人才。范仲淹的政治品格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又很敬重王曾，因此本着对王曾负责任的态度，范仲淹说，宰相的责任就是要推荐人才，大人什么都好，唯独在这一点上却不肯作为。王曾对范仲淹还是很看重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底牌亮给范仲淹看了：老夫哪里是不推荐，只是没让你们知道我在推荐人才。我都是悄悄地把人才推荐给皇帝，再由皇帝来亲自提拔，那些人就会对皇帝感激涕零。当宰相的若都希望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那么谁来承担怨恨呢？范仲淹这才明白，王曾是隐藏了自己的推荐，把被荐者的感戴之情归于皇帝，这就叫“存形迹”。

魏徵不服这一套，他认为存形迹、避嫌疑，就表明君臣都有私心，顾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所以他跟太宗说，如果君臣上下的心里都没有了公道，一心一意只想着存形迹，那么国家恐怕就要完了。《旧唐书·魏徵传》记载，太宗一听这话，登时就明白还是魏徵说得对，赶忙说，其实我已经后悔劝你存形迹了。太宗真的接受魏徵这一套了？魏徵生前，太宗把一个公主许配给了魏徵的儿子叔玉，可是魏叔玉最终未能做成驸马，因为魏徵死后，太宗悔了婚——他还是怀疑魏徵，因为魏徵大力推荐过的侯君集竟然谋大逆了，那么魏徵是不是当初就跟侯君集勾结了？太宗觉得自己太有理由怀疑了，这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当初也是看走了眼的。

皇帝的疑心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臣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存形迹、避嫌疑。否则信任缺失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毁在了皇帝的疑心病上。

比如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还有一次发生在仁宗朝的改革运动，由范仲淹领导，叫作“庆历新政”。跟王安石变法相比，我认为庆历新政才真正号准了宋朝政治的脉，抓住了病因，即官僚队伍膨胀、效率低下，官僚特权侵害了国家利益。所以，范仲淹等人开出的药方也是对的：削减官僚特权，对官僚队伍进行淘汰，正本清源。可是，庆历新政最终流产。流产的原因很复杂，但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因为皇帝的疑心病。

随着改革的推进，大批昏庸无能的官僚被撤职或者调离，这批人很快聚集起来，猛烈攻击范仲淹排斥异己，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个时候，范仲淹怎样才能证明他派出去的中央巡视组罢免的都是无能之辈，换上去的都是干练之才呢？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而赢得时间的方法只有皇帝继续保持信任。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皇帝不再信任范仲淹，因为有太多人攻击范仲淹结党营私，由此触发了皇帝的疑心病。一场方向正确、路径正义的改革

最终失败。

中国皇帝的疑心病和帝制建立的方式，以及改朝换代的模式紧密相关。秦始皇建立帝业靠的是武力征服。后世的朝代更替基本上还是靠武力，“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而英国人的做法则截然不同。读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新教徒控制的议会推翻并赶跑了詹姆士二世，竟然会请他的大女婿尼德兰执政威廉来当英国国王，因为英国人相信并尊重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所以虽然推翻了国王，但还是得请跟国王有相同血统的人来当国王。当然，新来的国王既然是议会请回来的，他就必须好好地跟议会合作，承认国家的主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英国从此进入君主立宪制。就这样，通过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家族拥有永久统治的权力。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之后，每个人都有做皇帝的可能。那么，已经手握皇权的人自然心中惴惴，随时看着有没有人来抢。所以，皇帝的疑心病与生俱来，可以消退，但不能治愈。

如此一来，信任就成了帝制时期臣子的最大软肋。“得君”方可“行道”，在这个体制框架内，任何有想法、有能力的政治家都必须获得皇帝的信任与支持，否则将寸步难行。

正因如此，帝制时期的有识之士便明确主张“一切荣耀归于皇帝”“所有功劳皆归君主”。从前的学者看到这句话就会批评说话的人软骨头，其实这才是最聪明的理论，它的目的就是替皇帝疏肝解郁，帮助皇帝摆正心态，处理好跟能臣之间的关系。帝制时期的最大特色是皇帝是世袭的，选择面很小，或者根本没有选择。正常情况下，登上皇帝宝座的人也就是中等智力与能力，而任何一位能攀上高位的文臣武将，则都是一流人物。没有过人的本领，不经过数十年的摸爬滚打，哪里到得了那个位置？如果能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得到合适的地位和权力，很多人足以成就大事。二流皇帝领导一流臣子，如果皇帝不把臣子的功劳当成朝廷荣耀，心生妒忌，那么功臣的命运可想而知；反之，如果臣子居功自傲，缺乏一颗谦卑的心，不把所有功劳归于君主，那么降级丢官乃至家破人亡也在所难免；若谋朝篡位搞得好，却由此给百姓带来灾难，也必将遗臭万年，遭人唾弃。由此可见，所有功劳皆归君主是君臣和睦相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帝制国家的地方治理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长城以南广阔的农业经济区的统一，“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以选任制的官僚取代世袭制的封建贵族控制地方，力行中央集权。秦虽二世而亡，但它所开创的官僚制、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却成为此后两千年间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普遍规则。两千年间，哪怕是在分裂时期，各政权所施行的仍然是郡县制、官僚制，所追求的仍然是中央集权。放眼全世界，在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之内，实现统一如此之早，统一的时间如此之长，统一的追求如此一贯，帝制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常常令后世惊诧。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这样描述电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电报的发明，“在大组织内由一个中心进行细密的控制，就比以往的情形变得更加可能得多。信息可以跑得比人更快这一事实，首先是对警察有用”，“电报的作用是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并削减遥远的附庸的主动性”。在肯定了电报对中央集权的促进作用之后，罗素反观古代，说：“而在电报发明以前，大帝国总是倾向于分裂，因为它们不能有效地由一个中心来加以控制。迄今为止，交通始终是限制各个帝国大小的主要因素。在古代，波斯人和罗马人依恃道路，但是既然没有比马跑得更快的东西，所以当首都到边疆的距离太远的时候，帝国就无法管理了。”^[1]在帝制中国，也“没有比马跑得更快的东西”，而首都到边疆的距离也并不比罗马和波斯更近。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帝制中国的中央真的能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对地方实现有效治理吗？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引导学者将帝制国家地方治理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处，让我们有可能看到更多面向——封建与郡县讨论中的理论思考，中央集权的制度创新与思想建设，集权于中央与维护边境安全、保持地方治安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1] [英] 罗素：《科学技术的一般作用》，见罗素著，王雨、陈基发编译：《走向幸福：罗素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8、59—520页。

封建与郡县的是是非非

“封建”是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的一个词，但是古人所说的“封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封建”不一样。封建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在中国和西欧都出现过，但是，它们出现的绝对时间和相对时间差别极大。“相对时间”指的是阶段性的社会发展序列。一般认为，西欧的封建制出现在公元8世纪，到17、18世纪逐渐被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它的时间序列是“封建”然后“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论的指引，封建社会的后期应当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封建”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封建”。再往前走一步，按照社会进化论的指引，“封建”就意味着落后、腐朽、堕落。

但是，这个“封建”的背后其实充满了误读，用“封建”去对译西欧的“feudal society”，这个大致没错；然而非要把中国的帝制时期当作“封建社会”，去挖掘其中的封建落后元素，那就是削足适履、南辕北辙了。这个“封建”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封建”。

古人所说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这是西周所开创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把天下分为七十一国，大封诸侯。这些诸侯大部分是周王室的同姓，也有周王室的异姓亲戚。分封之后，西周国家的治理方式就是这样的：周天子直接管理王畿之内的土地；王畿之外，诸侯是自己封国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因此，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虽然在观念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是天下共主，但是周天子对各地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权力是分散的。诸侯与周天子之间靠宗法关系维系，诸侯为周天子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在封国之内，诸侯是国家的主人，统治权世代相传。诸侯也可以把土地赏赐给下一级的臣子，彼此形成封建等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封建”。它有三个关键词：第一，“西周”，这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开创封建制度的周公更是孔子的偶像；第二，“贵族政治”，权力世袭；第三，“地方分权”，诸侯是封国的主人，周天子不干预封国事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为郡县”，中国的封建制结束。所以，中国“封建”的时间序列是“封建”然后“帝制”加“郡县”。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为“郡县制”总结出三个关键词来：第一，“秦朝”，郡县制是和短命而亡的暴秦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官僚政治”，官僚的权力不能世袭；第三，“中央集权”。



图二四：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诗经·周颂·执竞》（局部）

《周颂·执竞》是《诗经·周颂》中的第九篇。该画作是宋高宗赵构和马和之书画合璧的作品之一，画面中左右两侧的乐器与正前方品类齐全的礼器摆放有序，昭王率臣子正在祭拜先祖。这是昭王时代祭祀武王（一说武王、成王、康王）的乐歌，主要追述前王功业，赞颂其开国拓疆的功绩。文中描写了当时的乐器声音，以此烘托祭祀时的庄重氛围，以礼制进一步强化宗法封建的礼乐秩序。画面左侧墨迹为：“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诗音调顿挫铿锵，语气舒缓绵长，庄严肃穆，体现了封建庙堂文化的深厚底蕴。



左侧的磬、琴、笙、箫



右侧的钟、鼓

秦汉之后，郡县制成为帝制国家地方治理的主流方式，封建制偶尔露头，但基本上都是作为负面因素出现，比如汉代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明朝有燕王朱棣的篡位。就政治实践而言，帝制两千年，封建制基

本上是全面溃退。但是在理论上，有关郡县与封建哪一个更好的讨论却是两千年不停歇，有人主张恢复封建，也有人主张维持郡县。

关于这些讨论，教科书上基本不提。教科书上的历史叙述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不由分说。那些曾经存在的可能性，那些为追求更美好社会所做出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努力，假如后来并无回响，则会被无情舍弃。比如封建与郡县的大讨论。我们在此选择有关于此的一场规格最高的讨论，来看看辩论双方都说了什么。

为何说规格最高？因为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封建论的主辩是宰相萧瑀。对方辩友则包括礼部侍郎李百药和名扬后世的直臣魏徵。

唐太宗作为中国历史上对理论最为关注的皇帝之一，他想要解决的是帝制时期的终极问题：我希望本朝的统治能世代延续下去，江山社稷坚如磐石，长治久安，应当怎么办？

萧瑀给他的答案是恢复封建制。萧瑀的论证方式是以史为鉴。他说，历史上那些做到了长治久安的国家，都是因为实行了封建制。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废除封建，改行郡县。汉代郡国并行，两汉加起来享国超过四百年。魏晋以后又废封建，结果都不能长久。综上所述，封建之法实在是可以遵照执行的。

这番话打动了唐太宗。史料载：“上然之。”皇帝觉得萧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封建制的可行性问题。

以今天的历史认识来比对衡量，萧瑀所说的有很多并不真实。所以，唐太宗和萧瑀的历史认识是笼统的，这种历史认识方式持续至今，依旧有很大的市场。

当然，萧瑀能够打动唐太宗，靠的绝不止这么简单的一席话，而是他们有着共同的认识前提，即在封建制下，同姓为诸侯，镇守各地，可以实现对中央的拱卫，这叫“宗子维城”。这种观点在封建论者当中非常主流。封建论者认为，郡县制一切权力归中央，皇帝什么权都揽，什么事都管，把全天下的据为己有太过自私。且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反而是不安全的，奸臣从内部搞破坏，敌国从外部进攻，皇帝和中央若打不过，国家就完了。而在封建制下，皇帝怀着一颗公心，把天下分给弟兄子侄，封他们做诸侯，给予诸侯一定的自治权。这样权力分散，资源也是分散的，一旦中央遭到破坏性打击，“同姓之亲”可以起来勤王，从而帮助整个国家渡过危机。权力的分散，反而可以促成整体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手握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出于公心，要舍得放权。“宗子维城”，靠血缘建立安全

网络，这应该是唐太宗愿意接受封建制的最核心理由。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郡县制与暴虐的秦朝相关联，体现了统治者的自私；封建制与圣王的西周相关联，体现了统治者的公心。因此，接受封建制就意味着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这是太宗乐见其成的。

最终，唐太宗还是被李百药和魏徵说服，不搞封建制了。魏徵的理由主要是强调实施困难，特别是制度转变可能带来的财政困难。而李百药说服唐太宗的理由更复杂，也更具有代表性，可以归纳为四条：

第一，不能简单地拿历史说事儿。周的国运长久和秦的短命而亡，都是上天决定的，跟封建、郡县没太大关系。这一点，李百药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他把这一切全推给天就不对了。明末的顾炎武就指出：“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郡县制的产生比秦帝国的统一要早得多，它是诸侯国对新占领区所实施的新的统治方式。

第二，“宗子维城”靠不住。李百药说得比较委婉，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亲戚关系就远了，原本指望可以保卫中央的力量，反而会变成仇敌，各个诸侯国之间也会发生战争。这一点，从春秋战国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第三，李百药认为，诸侯权力世袭，会一代比一代荒淫暴虐、骄奢淫逸，靠他们治理地方是靠不住的。相反，官僚是选拔上来的，可以选贤举能。而且，正因为地方官是有任期的，所以，他们和当地老百姓之间不会结成稳固的利益关系，威胁到中央。

第四，陛下的英明“生民以来，一人而已”，有陛下在，移风易俗，感化天下，何愁江山不永固？李百药对太宗的德行进行了一大长段夹叙夹议的赞美，我把它简化到这么短，基本上也表达了意思。

想必这第四条理由，太宗一定很受用。前面三条也句句在理。所以，最终太宗没有采纳封建制。有趣的是，他后来又试图实行刺史世袭制，用亲王和功臣做刺史，然后“子孙世世承袭”。当然，最终也因遭到反对没有搞成。

封建制最终不能战胜郡县制，原因何在？封建制与郡县制争论的实质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和地方的治理方式，而隐藏其后的，就是唐太宗提出的那个终极问题：如何实现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地方治理的核心矛盾，是分权与集权的问题。郡县制的倾向是中央集权，集权会导致地方听话，但是空虚无力。封建制的倾向是地方分权，高度自治，这样的地方是有力量的，但也可能走向割据。当郡县制与封建制是一道二选一的题目时，所有皇帝当然都选郡县制。

央地关系的错喻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同意周振鹤教授的说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自古就有的”^[1]。西周封建，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然后周天子与诸侯就“各自为政”了。诸侯管好自己的封国，按时朝贡周天子，看见烽火信号能够带兵来勤王，履行封建义务，就是合格的封臣。封建制之下，最核心的关系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封建宗法关系，诸侯之国及国中之人民土地，和周天子没有关系，既无所谓中央，也无所谓地方，更谈不上所谓央地关系了。

央地关系是何时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郡县制的推行零星出现，到秦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全国范围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此全面铺开。也就是说，央地关系是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在新占领区实施郡县制，用任命的官僚而非世袭的贵族去统治，力图贯彻君主意志，这就是最初的央地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已经包含了央地关系的一些本质特征：统治权归于中央，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是主动的、第一位的，地方是被动的、第二位的；地方服从、服务于中央，地方利益从属于中央朝廷的利益；官僚是维系央地关系的纽带。

讲中国古代史，央地关系这条线索绕不开：时间推移，朝代更替。新王朝用武力征服群雄，消灭割据，重开一统之后，有鉴于前朝分裂之覆辙，改革制度，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秦实行的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两汉魏晋南北朝，间有变通，终成割据；隋唐重建中央集权；唐后期藩镇林立，割据再起，北宋统一之后，建设精致的中央集权制度，彻底消除分裂隐患；元明清顺着宋朝所开辟的路径继续向前，中央控制不断加强，臻于顶峰。如果画一幅卡通漫画版的央地关系，可以是这样的：中央追求集权，地方渴望自由，一个追一个跑，最终中央抓住地方，牢牢地建立了控制。这条央地关系发展线，就像其他任何一条简单抽象的历史线索一样，从结果去反推过程，显得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十足，总体看上去似乎没大错，可以帮助理解，但是绝不能过于迷信。

把地方简单抽象成一个追求自由，进而具有潜在分裂倾向的主体，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多数时候、多数地方并不符合这一想象。地方合在一起构成国家，但国家并不是简单的地方集合，帝制国家自有其组织伦理。关于帝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责任，我还没有看到古代思想家做过明确阐释。从历史实践中归纳，大致而言，“中央”这个概念包括皇帝和中央政府，代表着朝廷国家，它的首要责任是保卫领土安全，防止内乱，以维护帝国的稳定与延续；其次，它要维护人民生活的稳定，“不夺农时”，保护

农业生产，建立粮食储备和灾荒救济制度，以备饥荒；最后，建立并维护人间秩序，这一秩序包括君臣、父子、夫妇的社会秩序，也包括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地方官接受中央的任命来掌管地方事务，他的首要责任就是贯彻中央的意图，包括宣布中央政令，征收赋税，发展生产，安集流民，增加人口，等等。但地方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一个积极的地方官会主动承担起发展教育、兴修水利等责任。当然，他所做的一切也会成为政绩，成为晋升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地方和地方官的利益达成一致，中央的精神、地方的福祉在地方官的德政中得到实现，三方皆大欢喜。可惜，这种皆大欢喜的状态并不常有。

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矛盾，在很多时候，这个矛盾不是中央要集权、地方要分权的问题，而是利益不统一的问题。古代的思想家喜欢用人来比喻国家，他们想象中理想的央地关系是头脑与四肢之间的关系，中央如头脑，地方如肢体。头脑调动四肢，要它伸直就伸直，要它弯曲就弯曲，伸缩自如。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头脑与四肢，共同构成“人”这个整体，无所谓利益区分。比如，一个登山家在征服雪山的过程中，可能会冻掉手指。伤害虽然发生在手指，但痛苦是由整个身体来承担的；登山家可以自豪地举起残手，说这是他为实现自我做出的牺牲，而不必对他的残肢感到抱歉，因为这都是“他”的。

这种同一性，中央（朝廷国家）与地方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中央代表国家，但并不等于国家。中央可以把整个国家设想成一个整体，采取某些行动。在这些行动中，中央为了达成某些高远目标，局部的牺牲不可避免，也无足轻重。但是，那些遭到牺牲的地方和老百姓就很难认同这种想法。当朝廷国家采取激进的对外扩张政策，比如秦始皇攻打匈奴，汉武帝开拓西域，隋炀帝东征高丽，宋神宗西北拓边，边境地区老百姓的利益不免要首当其冲。即便朝廷的开疆拓土取得了成就，老百姓在战争中失去的家园、土地和亲人也无法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再用“人”来比喻国家，用头脑来比喻中央，用四肢来比喻地方，显然欠妥。正确的做法是抛开简单类比，深入事件过程，具体分析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提出更符合实际、更具实践性的理论。可惜的是，古代思想家走到这一步，往往就拐向道德，去谴责暴君之暴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通病，善于捕捉特殊的历史现象，却不善于从特殊中抽象一般，缺乏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

当中央意志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是考验地方官和整个国家治理水平的时候。是仗义执言，甘冒获罪危险，维护地方利益，还是闭目塞听，置百姓利益于不顾，埋头执行中央政令？——地方官面临严峻考验。当地方官勇敢发出不同的声音，中央该如何应对？这也是一种考验，是对整个国家治理水平和治国理念的大考验。中央由地方构成，从长远上看，

地方受损，中央也不会得利。那些拒绝执行中央政令的官员，表面上看是违抗中央，实质上却是在维护整体的利益。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地方官发出不同声音，把地方的实际困难汇报上来寻求解决，绝对可以反映一个朝代的治理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宋朝就表现得相对开明。比如，北宋仁宗朝，宋和西夏在陕西开战，宋朝屡战屡败，朝野震动。中央下令各地都要增加民兵力量，而杭州知州司马池认为杭州离战场那么远，增加民兵不仅对西北形势毫无帮助，而且会给东南地区制造不安定因素，因此上疏表示反对。司马池反对的结果，没有看到具体史料，但是他并未因此遭到处分是可以肯定的。在举国为西北形势感到担忧的情形之下，一个州长敢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虽千万人，吾往矣”，值得敬重。可惜，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太少了。

中央集权的理念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技术性，也经历了不断的探索革新。

第一是制度建设。帝制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称道的。帝制两千年，地方行政层级经历了从两级到三级的摇摆，只有县作为最基础的政区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县以上的统县政区和更上一级的高级政区，都发生过复杂的变化，最终固定为三级制。这要感谢宋朝的制度创新。宋以前政府层级的演变，不论两级制还是三级制，各级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都是一揽子管，所以，政区一旦过大，就有形成割据的可能。而宋朝发展出一种新的地方管理体制，最高级政区同时设置功能不同的平级机构，各管一摊，分别对应中央的主管部门，分权制衡，既保证了效率，又防止了割据。宋朝的制度创新对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是官僚任免。秦朝高度集权，所有地方官由中央任免。汉代以后，实行地方长官的中央任免制，中央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极其有限，而且实行避籍制度，不能在本地任官。一个外地人孤身来到当地，除了中央的权威，靠什么来治理地方？当地人才。地方政府中的其他办事人员均来自本地，由地方长官奏举任命。在这种形势下，地方豪强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隋朝开始把地方佐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从此之后，不管多么卑微的官员，都必须在中央的吏部获得官员认证，而他此后官僚生涯的每一次升迁，都必须由中央的人事部门审核完成。换句话说，隋朝以后，所有的官都是中央官。根据“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官员最关心的是什么？中央政令。

第三是文化认同，即所谓教化的作用。秦代靠法令，汉以后靠教化。地方官政绩中最令人瞩目的内容往往是兴办学校。宋代以后，科举成为文官选拔的主流途径。“学而优则仕”，即便走不上仕途，也学习传播了文化。同样的文字，以及由文字所承载的文化，逐渐在各地培养起一个有着相似文化血缘、互相认同的精英阶层。教化虽然跑得没有电报快，但是它的影响

力比电报持久。这可以算是我们对“罗素之疑”的一个回答。

[1]周振鹤：《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上、下），载《复旦学报》995年第3、4期，第5—57、53—56页。

中央巡视制度的兴与衰

所有在地方政府之外，由中央派出、以搜集地方政情民意、端肃官场风气为目的的活动，都可以称为“中央巡视”。巡视使有为一时一事临时派出的，也有制度性的。制度性的巡视，又可以分为定期出巡和常驻地方两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巡视使不是地方官，对地方事务不负管理责任，因此也就没有利益纠葛；理论上，他们应当超然独立于地方政治之外。第二，巡视使的责任是对地方官员的施政情况（而非地方事务本身）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弹劾；他们不是管事儿的，而是管人的，通过对人的监督达到让事情办好的目的。第三，巡视使通常具有“以卑临尊”的特点，自身品秩卑微，但是权力巨大，因为他们是“代天子巡狩”，代表着皇帝和中央的权威。中央巡视制度，就像顾炎武所说的，“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法宝。

中国的中央巡视制度出奇地早熟。秦代就有御史监郡的制度，由中央的御史府派御史常驻郡中，监郡御史直接受御史大夫的领导，是在地方工作的中央官，负责监督太守和郡政府的行政，每年十月回中央汇报，十二月返回地方，每两年一轮换。汉初延续了这项制度，但是后来就发生了监郡与被监者同流合污，互相包庇的现象。于是，汉文帝又开创了一项新的中央巡视制度——刺史制度。从丞相府派属员下去，按照九州岛的划分，共设置了九名刺史，“并督监察御史”，连监郡御史一起监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正式废除了御史监郡制度，御史监郡与刺史制并存了五十七年。汉武帝还重新划分了刺史的监察区，由九个增加到十三个，这就是有名的“十三州部刺史”。

如果说监郡御史是1.0版的中央巡视使，那么，州部刺史就是2.0版的，监察功能有了巨大的提升。首先，州部刺史比监郡御史的巡查范围要大得多。监郡御史是一个御史监一个郡，州部刺史是一个刺史监若干郡。其次，二者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大不相同。监郡御史是一个御史对应一个郡，御史的工作地点就在本郡。在两年任期之内，除了定期回首都向中央汇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本郡活动，因此，对本郡事务不可能完全不介入，很容易与地方官和地方利益产生紧密联系。监郡御史制度的失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个情况——监郡御史地方官化了。而州部刺史的巡视范围是若干郡，他在地方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居无常治”，他的工作方式就是巡行，在巡视中采察政情民情。每年八月，刺史作为中央巡视使从京城出发，“巡行所部郡国”，“初岁尽诣京师奏事”，到年底回首都向中央汇报郡国吏治。

最后，同监郡御史相比，州部刺史的权力更大，他负责“考察地方的政情民意，对郡一级地方长官的行政能力进行赏罚，纠正冤狱”。关于刺史的职责，有明确的六条规定，叫“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在六条之外的是不管的。这六条，只有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势力的，重点纠察这帮人有没有严重的违规占有土地田宅、恃强凌弱、鱼肉乡里的行为，其余五条的目标都是针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守，查他们有没有违背中央命令，以权谋私、侵占百姓利益的行为；有没有滥用公权，滥用刑罚，随意杀人，引发民愤的；有没有选任不公，任人唯亲，压制贤才的；有没有放纵子弟以权谋私的；有没有与地方恶势力勾结，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的。州部刺史主要针对郡守，因为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基本上是以一人而治一地。

刺史的监察权力是非常大的。比如，汉宣帝时，扬州刺史何武发现部下郡守有问题，他不是秘密报告中央，而是“露章”——公开表示我要弹劾谁的什么问题。接下来就要看郡守的表现了，表示认罪的可以减免，只要免职就可以了；如果一味抵赖不肯认罪，那就“极法奏之，抵罪或至于死”。也就是说，何武的一封奏章，是可以决定郡守命运的。郡守两千石，一方长官；何武刺史，只是六百石的小官。“以卑临尊”的秘诀就在于中央的权威。首先，中央得保有这种雷霆之威；其次，中央愿意把这种权威赋予刺史。因为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刺史独立于地方利益之外，资历又相对较浅，正处在官僚生涯的上升期，因而勇于弹劾，敢于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要保证刺史制的有效，就必须保持它“以卑临尊”、独立于地方利益之外的特点。

进入东汉之后，刺史制发生了质变。首先，它开始有了固定在地方的办公地点，这就迈出了地方官化的第一步；其次，刺史的品阶出现了极大提升，从六百石上升到了两千石，跟地方大员平起平坐了；最后，刺史开始统兵、领郡，全面介入地方行政，逐渐演变为既成事实上的地方官员，成为郡守之上的最高一级行政长官。中央巡视制度2.0版也破产了，原因同样是地方官化。

可以说，秦汉时期的两版中央巡视制度当中已经包含了帝制时期中央巡视制度的两种可能形态：1.0版，也就是秦代的监郡御史，特点是一对一，与监督对象同地办公；2.0版的典型形态，也就是西汉的刺史，特点是一对多，从中央派出定期巡视地方。这两种形态，加上一时一事的特派专使，基本上构成了中央巡视制度的全部可能。如果我们抛开各不相同的机构职位名称，直击制度本质，就会发现，后来朝代的中央巡视制度的演变，其实就是这三种制度形态不同组合的反复出现。比如，唐代有监察御史定期出巡地方的制度，这就是刺史制的变体，而唐后期给每一个仍然忠诚于中央的藩镇配备由中央任命、由宦官担任的监军使，这就是监郡御史

的翻版。而宋代则更为复杂，担任中央巡视使的官员有宦官、武官（非军人）、文官，驻在地方、同一级别中负有巡视职责的官员不止一位，大家各有分工，互相监督，总之，就是要尽可能让皇帝和中央得到更丰富的地方信息。

我们已经假定帝制时期中央巡视制度的可能形态大致如此，类似的制度在不同朝代及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有时成功高效，有时失败低效。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中央巡视制度的成败？

明初有提刑按察司（后文简称“按察司”），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常驻地方，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但是效率令人遗憾。“河南数年灾害频仍，而按察司官未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中央启动了巡按御史机制，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定期出巡，以加强地方监察。巡按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每年一轮换。起初，这项制度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出现了一批铁面御史，比如：黄润玉出按湖广，罢免不合格官员一百二十人；江西巡按，“前有韩雍，后有陈选”，韩雍罢黜贪官五十七人，陈选罢免人数不知，史称“尽黜贪残吏”，扫干净了。巡按御史的制度形态是2.0版的，从中央派出，定期出巡，以卑临尊。但是，这项制度没过多久就开始变质了。这次变质倒不是因为地方官化，而是因为权力的膨胀。

首先，巡按御史获得对省级大员（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考察弹劾大权，也就是说巡按扼住了这些大官儿官僚生涯的命脉。这样一来，在地方上还有谁敢跟他叫板？接下来，巡按御史的权力开始介入地方的行政事务，甚至获得了部分军事指挥权。就这样，巡按集地方的行政、监察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权力膨胀，失去约束限制，开始走上腐败之路。人还没离开首都，私信里已经写满了走后门讲情者的姓名，到了地方上，各种请托的条子塞满了办公室。按照祖制，御史巡按，行李不能超过八十斤，骑驴以代步，吃饭不能有鹅肉。可是到了后来，驴换成了马，所到之处地方官“跪拜频仍，迎送逾境”，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本来是为整肃吏治而设置的中央巡视使，反而成了地方政治定期服用的毒药。以至于穆宗朝，谭纶和戚继光整顿北边防务，要特别向朝廷提出条件，不许巡按和巡关御史来捣乱。幸好有张居正支持，谭纶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才能看到戚继光在金山岭、古北口修筑长城、整顿防务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的取得是由谭纶、戚继光和张居正的私人关系保驾护航的，制度本身已经是治国理政的绊脚石。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代表着皇帝和中央，而整个帝制时期的官僚集团都是对上负责的。金元以后，官僚集团集体奴化，能够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就能匍匐在皇帝的代表脚下。

如何解决边疆问题

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所以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

讨论边疆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帝制中国的边疆究竟在哪里？帝制中国的边疆有两种：一种存在于与异族政权接壤的领土边缘地带，帝制中国与异族政权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现代国家边界的分界线；还有一种可能在领土边缘，也可能在领土内部的空洞地带。比如西南和江南地区的深山穷谷，那里生活着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还未建立政权，对帝制中国“叛服无常”，有时候会发生武装冲突，有时候和平共处。相应地，帝制中国的边疆问题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怎样控制与异族政权接壤的边疆领土的问题，还有一种是怎样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华夏传统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假托蜀地父老，反对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意思是天子对待夷狄的正确方针，应当是羁縻，不断绝朝贡就可以了。“羁”是马笼头，“縻”是拴牛鼻子的绳子，“羁縻”的意思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怀之以恩信，警之以威武”，恩威并用，把周边少数民族纳入华夏的朝贡体系中来。羁縻政策的核心是“因俗而治”，就是在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进行有限度的自治。这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一国两制”。

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用羁縻政策，是帝制中国处理边疆问题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当中包含着古老的华夏智慧。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血缘种族，也不在地域，而在于文化。春秋之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中国之人为夷狄文化所化，我们就要把他当夷狄来看；夷狄之人若为中国文化所化，我们就要把他当中国人来看。夷狄与华夏之间是可以转化的，界限就是文化。用羁縻以待夷狄，具有一种承认现状、寄望将来的朴素的发展观，为未来预留了同化的空间。空间中国也在“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过程中得到成长，这种成长道路就是汉化。这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所特有的发展道路。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边疆问题：如何管理与敌国接壤的边疆地区。边疆地区往往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国防前线，直接承受边防压力，遇有战争警报，需要及时应对。第二，它往往远离中央，在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单靠快马加鞭，哪怕是“八百里加急”“金牌不入递”的接力快跑，靠中央指挥边境战事，也有鞭长莫及之患。第三，边疆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战争破坏是重要原因。特别是中国的北方，长期受

战乱影响，经济水平持续下滑。



图二五：唐 阎立本（传）《职贡图卷》（局部）

《职贡图卷》，传为唐阎立本作，绢本设色，191.5厘米×61.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强大的中原王朝多通过羁縻政策将周边少数民族纳入华夏的朝贡体系中来，而这幅《职贡图卷》就生动地描绘了唐太宗时，数十位异域使臣与仆从前往长安朝贡的场景。他们浩浩荡荡前往长安，有的使臣骑着白马，身后仆从撑着伞盖；有的手捧奇石，有的牵着花斑羊、抬着鸟笼，有的手持象牙、珊瑚等异域奇珍……从画中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使者，他们都有着恭谨与喜悦的神态。画中人物异域特征显著，铁线描遒劲有力，体现了绘者卓越的创作功底与极高的艺术修养。



两个使者抬着进贡的异域飞禽的笼子



使者进贡的象牙

以上种种因素，都要求中央对待边疆地区的政策，应当与中央对待内地的政策有所区别。在普遍性的央地关系当中，中央追求的是控制，为了实现

有效控制，在地方实行分权是最常见的做法。分权便于控制，但是可能会导致地方的无力，这种无力在内地无关紧要，到了边疆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可能会导致边疆地区无法及时有力地应对外来打击。在边防压力较大的情形下，帝国对边疆地区采取放权政策，给边疆地区较大的自主权，对于及时应对外来入侵是有效的，但是，边疆地区地方权力的集中，却有可能让边防大帅从帝国的长城变成帝国的敌人。从唐到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



图二六：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画像砖《驿使图》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绘于公元3世纪前后，34厘米×17厘米。画砖底为淡米色，马的轮廓以黑色线条勾勒，马身上还有几笔红色斑块。该画客观地记录了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这一地区的邮驿情形。画面中，一个身着宽袖衣、足蹬长靴的邮驿使骑在飞奔的驿马上，手举邮递文书，疾驰而行。据说图中所绘驿使少了嘴巴，意在说明古代驿传制度的保密性。《驿使图》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西北地区驿使“八百里加急”传递文书的情景，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图像资料。此画曾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物，在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上亮相。

第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但是随着边防压力的长期存在，节度使不得不常驻地方，在原有的兵权之外，又逐渐获得了辖区的财权、人事权和司法权。节度使的辖区成了一揽

子统管的军政大区，节度使势力膨胀。其结果，首先是河北藩镇在安禄山的领导下发动叛乱，给唐王朝带来八年内战。内战平息之后，唐朝由盛转衰，而藩镇的分裂倾向终于无法遏制，最终导致了唐帝国的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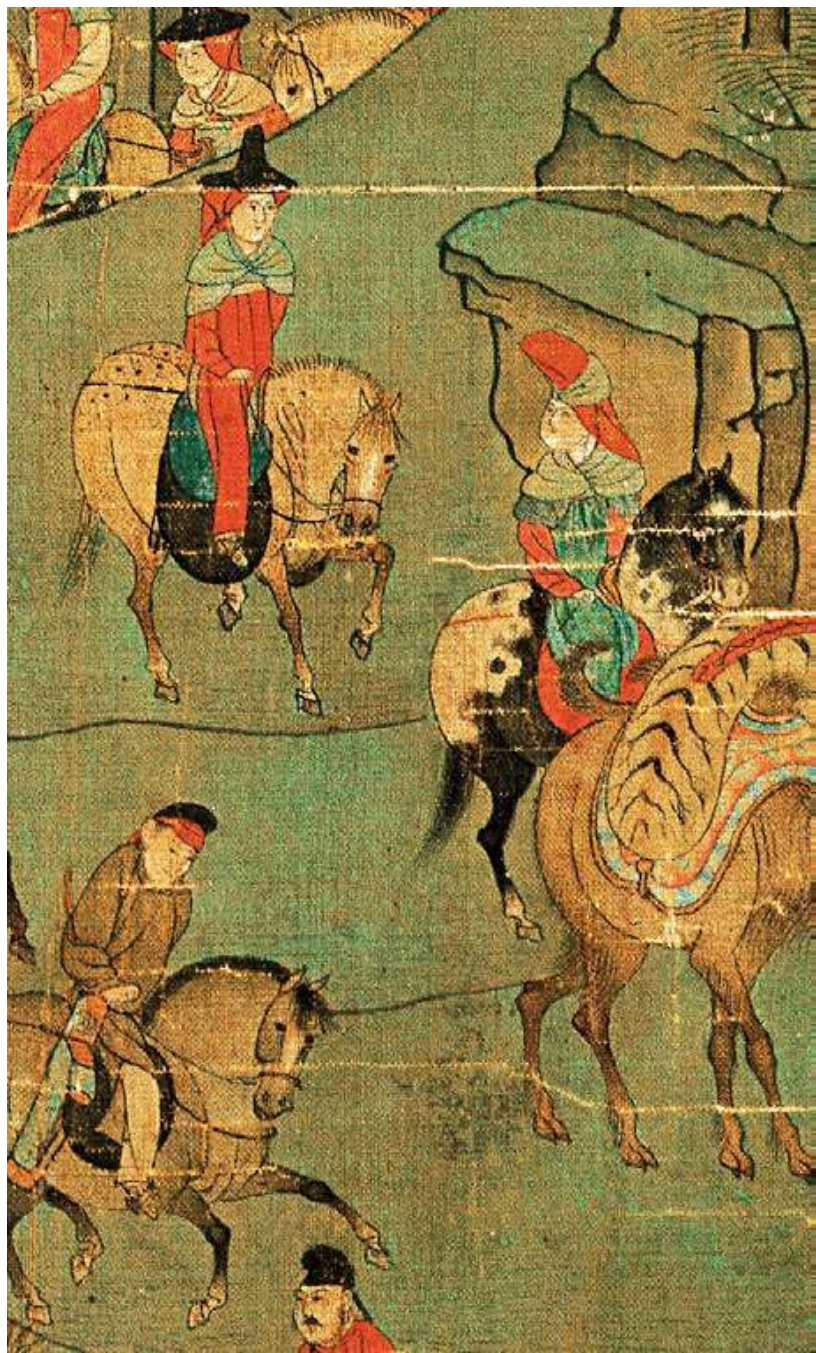
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灭亡的三大因素之一。作为一种边疆问题解决方案，藩镇模式宣告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目前的分析集中在三点：第一，前面已经讲过，在藩镇体制下，节度使的权力高度集中，军队、财政、人事、司法一把抓，俨然一方诸侯，因此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第二，随着藩镇制度的确立，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大逆转。唐前期的兵力布防是内重外轻，中央有足够的兵力制衡地方。而节度使崛起之后，就变成了外重内轻，中央根本不敌强藩。比如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其统辖下的兵力是十八万多，而唐中央的兵力只有九万。兵力悬殊，难以对抗。第三，文化差异，具体来说就是河北地区的胡化。胡化与汉化相对立，胡化意味着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与习惯。举个河北胡化的极端例子，某人活到三四十岁，还不知道何为周公、孔子。河北的胡化是和边防军队的民族构成直接相关的。藩镇军队由胡人领导，异族军人产生了取唐朝而代之的野心；而整个地区由于胡化，对唐王朝也缺乏文化上的认同。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离心力量。



图二七：唐 李昭道（传）《明皇幸蜀图》（局部）

《明皇幸蜀图》传为唐代李昭道绘。绢本，青绿设色，81厘米×55.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携杨贵妃、太子李亨及诸皇亲国戚跋山涉水往蜀地避难。该图描绘的正是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入蜀的历史故事。在崇山峻岭中，一行人马自山后而来，向远处的栈道驰行。图上近处的桥前缓缓而来的人马中，走在最前的骑手身着红衣、乘三花马正要过桥，此人即唐明皇李隆基。紧随其后者是贴身护卫及诸王、妃嫔等十数骑。其中妃嫔着胡服、戴帷帽，显示出当时女性的骑马形象。图中群峰高耸，山石交错，栈道危悬，准确地绘出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的地理环境。作者将画面处理为游春踏青场面，从而回避了帝王逃难的史实，颇为用心。



着胡服、戴帷帽的妃嫔骑马装

真正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从来都不是作为结局的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分析集中在前两条。所以，北宋人所建立的边疆问题解决方案就是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北宋的分权模式是一切都跟藩镇模式反着来。首先，收兵权，所有精兵收归中央，编入“禁军”，成为天子卫兵，营盘扎在首都及京畿地区，兵力布防呈现内重外轻局面。其次，在军事力量的管理上，高度贯彻“兵权宜分”的理念：将资深的禁军将领换作资浅的；边防州县需要军队戍守的，从中央派兵，并定期轮换；在边疆地区，负责组织、训练、指挥边防军的，不是禁军原有的指挥体系，而是另外一套指挥体系、另外一拨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官，官和兵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制度设计之精美令人咂舌。可惜的是，万事都考虑周全了，唯独忘记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保障？不得而知。军权拿出去，州县两级地方政府就只管老百姓了，这是军民分离。基本上，边防军的将领和边防军之间、边防军和地方政府之间，都很难勾结起来形成利益集团，威胁到中央的权力。

北宋模式很安全，但对国家财政能力挑战极大，而宋朝政府的财政能力虽然叫苦不迭，也撑住了。北宋模式安全的前提是不要打仗，一旦打仗将无以为继。最终女真人打来，北宋模式宣告破产。因此，当时主战派宰相李纲曾经主张恢复唐代方镇，建立军政合一的大区，以集中力量抗击金军。南宋末期，文天祥也提出过全面恢复方镇的主张。北宋模式不灵光，就要回到唐朝的藩镇模式去，这不对吗？

显然不对。北宋模式与北宋灭亡之间真正的关联，并不在于分权本身和地方的无权，而是分权之后忘记了初衷的统兵体系。兵民分离其实是一种先进的理念，如果善用，是可以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可惜的是，在宋朝政府内部，从未有人对北宋模式和藩镇模式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他们的态度简单蛮横，不加分析，非此即彼——平时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危难之际就缩回旧制，临时抱佛脚。

为什么平时没人研究？因为皇帝不需要。这不禁让我想起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所提及的那杆一百六十六岁仍然在军中服役的枪。西方来的火器，在明清之际的战争中曾经起到影响战局的作用。清朝人从明朝的东北驻军那里学会了使用火器，取得了胜利，定鼎中原之后就把那些武器束之高阁，不再允许人们研究相关技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说的就是这种缺乏战备意识的思想。可是这种思想在传统中国是经常性的。到用时方恨少，恨无，恨不知，恨无备。诚可叹惜。

帝制时期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羁縻政策显示出了智慧。而对待边疆问题，帝制中国却始终没有发展出特别优质的办法。归根结底，是对制度的优劣

[illegible]

《兵技指掌图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讷尔经额绘。该图是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训练绿营兵的兵技而绘的图解教材。它以简明扼要的兵谱形式介绍了清军演习的十四类要目：步箭练法、马箭练法、马枪练法、弩弓练法，以及抬枪练法和一百三十斤小铜炮等练法。上图所展示的，是清军在学习如何使用抬枪和铜炮的情形，图中不仅有动作演示，旁边还配有

相应的解说性文字。清军曾从明朝东北驻军那里学到了火器，取得了胜利，但定鼎中原后就把那些武器束之高阁，不再允许人们研究先进的技术了，实为可惜。

上级集权下的地方狼狈

什么是更好的地方治理方式？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就是要适当地放权给地方行政机构，“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来自中央的监督检查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做到有度，抓大放小必须有明确规定，而且不要太频繁，以免对地方行政造成干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得言简意赅：“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什么叫作“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地方行政仍然实行郡县制，但是要给地方充分的自治权力，县一级甚至可以实行县长终身制，以及县级官员的本土化。

这两位思想家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先进思想的表达）应该怎么理解？首先，我们得承认思想的美好；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说明那个时代的地方被管得确实太死了。帝制时期是等级社会，人分等级，“官儿大一级压死人”“宰相家奴七品官”。国家机构也分等级，就像一个金字塔，皇帝在塔尖，县级政府在塔底。在这个等级结构当中，普遍存在着上级的集权。上级为达成某种目的，可以视下级的牺牲为当然；上级以下级为资源，予取予求，以便满足更上一级的要求。而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县官，正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最底层，有何自主权可言？顾炎武想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建设县级自治，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但是，集权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效率呢？一时容易，持续下去却很难，混乱几乎不可避免。我们以宋朝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财政为例来说明。

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的确是全国一盘棋。按照功能，各地可以分为四个大区：首都核心区、东南财赋供应区、北部边境区和南方区。各个大区之间有分工，有合作，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财政。南方区很大，包括四川、两广和福建，它在整个财政体系中处于次级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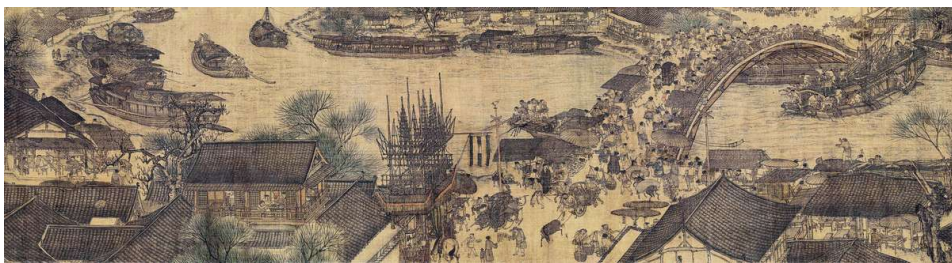
首都及其附近地区无疑是核心区，这里是政治文化中心，人口密集，消耗巨大。首都核心区的人口除了皇室大家族和官僚集团之外，主要是驻军，军人和军属甚至一度占到首都人口的一半左右；更重要的是，宋朝的军人是职业兵，一旦当兵就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靠国家财政养活本人和家属。因此，首都核心区需要外来物资的大量注入。北部边境区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这个区域本身经济不够发达，又承担着国防责任，有庞大的驻军。驻军的日常开销和战争都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北部边境区也需要外来的物资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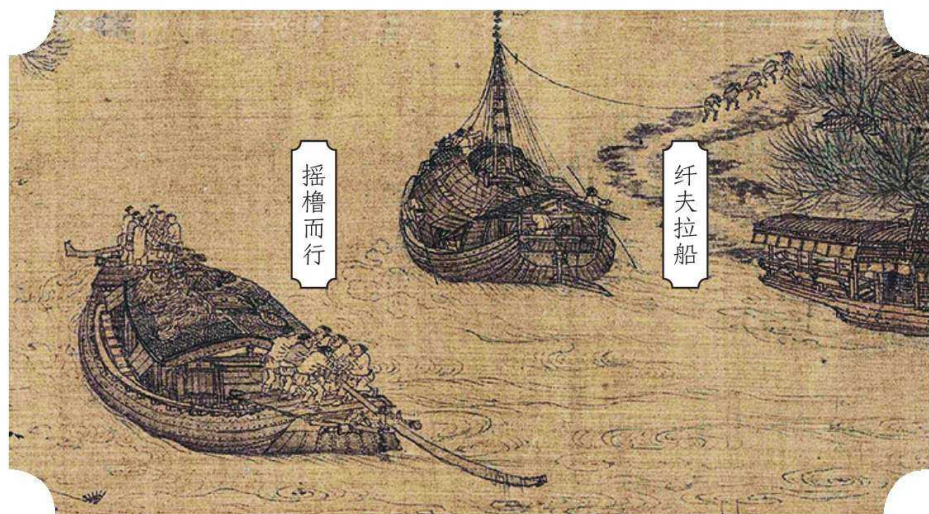
物资从哪里来？主要来自东南财赋供应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浙江等

省。南北朝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东南地区，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沟通南北，建设东都洛阳，唐高宗与武则天常驻洛阳，宋朝定都开封，都是为了让政治中心离经济重心近一点儿，至少离运河近一点儿。当时有个词就叫作“就食”（接近粮食来源）。

通过运河，东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开封，又从开封运往北部边境区支援国防。这个集权体制运行正常的时候，中央的三司（也就是财政部）运筹帷幄，在各个地区之间实现物资的收集、转运和调拨，满足国家在各个方面的需要。这当中，也包括地方的需要。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湖南的武冈军（一个州级单位）财政收入微薄，交完给中央的上供税额，剩下的根本不够本地开销，需要从临近的永州和邵州调拨。后来，永州、邵州也无力支援。武冈军办公经费不足，政府无法支撑，怎么办？还是中央出面，把永州、邵州原本给武冈军的补贴改成替武冈军缴纳给中央的上供税额，同时允许武冈军把原本向中央缴纳的上供税额截留自用。整体思路就是，武冈军虽然穷困，但是给中央的上供不能免，不管以何种名义，中央也绝不会眼看着武冈军喝西北风。永州、邵州既然离得近，那就应当替中央分忧，为武冈解难。中央是集权的，但是集权的中央会照顾到地方的利益。这才是全国一盘棋，兼顾整体利益，关照地方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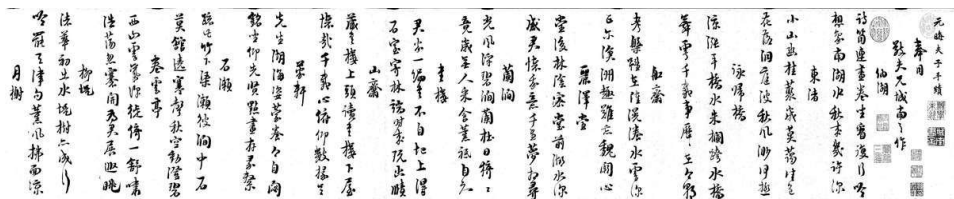




图二九：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由北宋张择端绘，绢本设色，528.7厘米×24.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的构图法，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该画作不仅展现了北宋汴京当年的繁华景象，也生动地反映了这座城市当时的经济情况。上图展现的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汴河上，繁忙的客运与漕运景象。该河道也成为江浙等东南财赋供往汴京都城的主要渠道。

“全国一盘棋”要能真正灵活地运作起来，需要有一个前提，即中央的财政能力足够强大。一旦中央财政陷入困境，首先需要牺牲的就是地方。11世纪30年代末，宋夏开战，中央财政困难加剧，自顾不暇，当时就有人提出，各地如果财政紧张，用度不足，“须管自擘画支贍”，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本地实在没办法解决的，可以从临近宽裕的地方借支，总之就是不能像从前一样，请求从京城“般请钱银之类”。这项提议，既减轻了中央的负担，也解放了地方。提议的人建议中央发文，严禁地方再向上伸手。



图三〇：南宋 朱熹《城南倡和诗卷》（局部）

《城南倡和诗卷》为南宋朱熹书，纸本，手卷，275.5厘米×31.5厘米，行书，共65行，464字。倡和诗是朱熹“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此处的敬夫兄即张拭。全图引首处有李东阳篆书“晦翁手泽”，前隔水孙承泽题有“元晦夫子手泽”字样。此卷为朱熹早年的书法作品，虽行笔迅疾，但点与画都能合于书家之规矩，是朱熹书法的代表作。

倘若这样发文下去会如何？——下边的财政大员肯定不敢违抗，实在没钱花，只好“惟民是取”，从老百姓身上压榨！表面上是地方官在压榨老百姓，实际上是中央放弃了它的财政集权责任。而地方官的压榨一旦过度，可能会引发老百姓的反抗，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许多政治家会主张节流，通过减少中央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压力。战时无法节流，一旦战争结束，则必须亡羊补牢，比如对官僚队伍进行精简。节流才能缓解财政压力，中央的财政压力减轻，老百姓才能少受剥削，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到了南宋，在强大的边防压力之下，国家财政以国防为第一保障对象，皇帝和高官的生活水准继续走高。所以，中央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对地方的搜刮力度不断加大。名义上，国家财政仍然是全国一盘棋，但是中央财政却失去了融通均济的能力和功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变成了单向的地方竭力供应中央。地方财政陷入了普遍性的困窘之境。

比如，北宋时，广西是个穷路，中央财政每年补贴广西110万贯，这样广西的日子也还是不错的。到了南宋，中央自顾不暇，不但补贴没有了，每年还要从广西调出50万贯。较之北宋时，广西地方财政损失了160万贯，每年亏空8万多贯。亏了这么多，地方政府也不能关门，日子还得过下去，于是“只得敛之于民”，压榨老百姓。

路一级不好过，州一级更不好过。朱熹守的南康军是个州级单位，全军每年收入租米四万六千石，其中三万九千石交中央，剩余归本军支配的七千石只够发三个月的工资，赤字是预算收入的三倍。剩下的九个月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

州长难当，县长更难当。县一级位于帝制国家地方行政机构的最底层，直接负责从老百姓手里把税费收上来，然后再交上去供应中央。根据“上级的集权”原则，最底下的日子最不好过，最没有自主权。曾巩说：“州负其强以取威，县忧其弱以求免。”意思是州凭借权势对县实行强制，县担心自己是弱势，只能唯命是从，以求免过。县长是小官，想升迁需要上级推荐，对于州里来的命令，不管是否合适，都不敢违抗造次。朱熹的学生黄干做新淦县（今江西吉安新干县）的知县时，本县实际收入六万石，上缴六万三千石，这就已经入不敷出了。但是还没完，此外，本县还要支出当地驻军的费用五千石，本县人员办公费用六千石，其他五万石，加起来一共需要支出十二万四千石，是本县收入的两倍多。

面对入不敷出的境况，解决办法只有乱收费，“则不免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朱熹知漳州，发现下属的漳浦县“最狼狈”，有多项非法收费项目。朱熹大儒，有爱人之心，想要改革，“坐视半年，未有可下手处”，因为这些收入是维持地方政府运转所必需的。

在这种大形势之下，被压力压得变了形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哪还有力气去理会民间疾苦。本来宋朝有报灾、检灾制度，遇有大的灾荒，老百姓可以向县政府报告，县政府受理属实，上报州政府，州上报中央，根据情况减免赋税。报灾和检灾的最终结果是减免赋税，全收上来都不够中央开支，何谈减免？结果就是老百姓“上报旱涝，县不受理，州不接纳”。

那么，地方上这些开支都是哪里来的？大半来自中央，包括上缴给中央的赋税，还有中央下放到地方、要地方财政养起来的军人和官员。聪明反被聪明误，宋朝政府给自己挖了两个坑：一个养兵政策，一个养官政策。它们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但是毫无疑问增加了财政压力。说到底，宋朝中央政府其实是没有意愿制止地方乱收费的。上级的集权导致了下级的狼狈，中央的集权导致了全国的混乱。

盗贼之患与解决办法

这个“盗贼”指的不是小偷小摸、拦路抢劫，而是有组织的武装反政府行为。尽管当代史学界在某一阶段曾经把大规模的武装反政府行为看作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目前史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那些大规模的武装反政府行为毕竟破坏多建设少，尤其不具备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哪怕是改朝换代，也需要和其他势力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当然，多数时候盗贼规模还到不了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地步。可是它会带来区域性的不安，破坏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因此，总体而言，尽管事出有因，官逼民反，但是盗贼终归还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少年时看《水浒传》，很容易把自己代入梁山好汉，看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看到那种脱出规矩礼法的舒展自在，便觉得真痛快！人到中年，再看《水浒传》，仔细想想，不寒而栗——那些酒啊，肉啊，金啊，哪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有人得必有人失。好汉们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号称是“替天行道”；可是富裕者未必无道，普通人家辛苦劳作、积攒下一点财富，也白白地被好汉掳去，那天道又何在呢？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有两种：一种在上层，是蔡京、高俅的贪赃枉法、任意胡为；一种在下层，包括宋江这样不守规矩的吏，还有镇关西这样恃强凌弱的恶霸。林冲虽好，最终却被逼上梁山，只能令人扼腕叹息。可是梁山上这一群跟东京城里的那一群比，也只是位置不同、掌控资源的能力不同罢了；他们看上去跟东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们行为差异极大，骨子里却是一样贪婪，他们反权势，反富贵，只因那权势和富贵不在自己身上。既然盗贼是破坏性的力量，所以政府从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角度出发，就必须想办法消弭他们。

盗贼的发生在地域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多活动于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比如两省或三省交界处。因为这些地方够不着，太远了——除部分历史时期之外（比如元朝的行省曾经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人为制造犬牙交错、以北制南格局），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基本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在传统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行政中心对行政区域的控制力就像水的波纹，以行政中心为圆心，呈现为一个同心圆结构，控制力向外不断减弱，边缘区域控制力最弱。因此，越是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越容易滋生盗贼，产生治安问题。

宋代以前，解决行政区划边缘地带盗贼滋生问题的传统思路，基本是在这些地方增设新的地方行政机构。比如唐初，四川刚刚开发，梓、剑、阆三州交界之地，“四境遥遥，人多草寇”，皇甫无逸就把梓州盐亭县、剑州普

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交界处的一片村庄单独划出来，奏请朝廷，设置了一个新县——永泰县。这是设县来消弭盗贼的，还有“置州镇压者”，比如汝、许、唐、蔡四州交界处的叶县一带，土地肥沃，人口稀疏，又远离州政府所在地，慢慢就变成了逃亡者聚居的地方，土匪横行。为了解决叶县一带的治安问题，唐朝政府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仙州，希望能起到“镇压”盗贼的作用。

但是，增设地方行政机构镇压盗贼的做法往往不太牢靠。比如在叶县一带设置的仙州，就是屡置屡废的。因为州县自有其成规，不管是州还是县，都有一整套的机构设置和官员配置，而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特点就是它是完整制的，什么都管。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而人口数量的多少也意味着经济规模的大小。这些边缘地带之所以边缘化，就是因为它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都十分有限。当人口和经济的规模都不够大时，专门为了维护安定而设置州、县，把一整套衙门建起来，养那么多官，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事实上，当地经济也根本养不起一个政府。所以，为了解决盗贼问题，在行政区划边缘地带“硬设”州、县，其实靠不住。边缘地带需要解决的是盗贼问题，其实设置单一的治安巡逻机构就够了。这个解决办法，我们今天看似简单，但是在历史现场，却得煞费一番周折。

这种新式的治安巡逻机构，叫作“巡检”。用巡检这种单一功能的治安巡逻机构，去解决行政区划边缘地带的盗贼问题，这个新思路出现在五代。乱世反而会出现新的治理思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乱世的特点就是秩序崩解、百无禁忌。因此，乱世也是探索新方法的好时机。五代乱世，中央与藩镇都在争夺地方，虽然原有州县的那套还在，可是在有的地方已经不大起作用了，地方治安无法维持。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当然也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与藩镇各逞其能。大家采取的策略都一样——派自己的人一查到底，越过地方行政机构，直接插手地方治安。藩镇派出的是镇将，中央派出的是巡检。镇将跋扈，巡检也会乱杀人，这两套班子在骨子里是一伙人，精神气质也都偏军人。巡检乱杀平民，皇帝虽恼火，但是巡检仍旧不撤，因为这是自己派出去的人，是中央跟藩镇争夺地方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央集权的重建，巡检逐渐遍及地方，成为网络。

到了宋朝，地方治安的维护就变成了双轨制，一边是州县，一边是巡检。州县地方政府仍然负有传统的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但是在那些地方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广大乡村的密林山冈之中，则有巡检往来巡逻，专门负责捕盗捉贼。巡检的设置是不跟随州县的，巡检也不归州县管。宋代巡检的辖区有大有小，大的可以跨若干州，小的就在某一个镇上。特别是到南宋以后，随着东南经济的发展，县以下出现了不少新的商业市镇，镇一级

巡检变得密集起来。

巡检的分布看上去杂乱无章，实际上有序可循。它的设置规律非常简单——哪里盗贼高发，就在哪里设巡检。一般来说，巡检寨都设在远离中心城市要害之处。比如，福州最北边的长溪县，北邻两浙路的温州和处州，离哪儿都远，距离福州州城有七八百里，山川险隘，这里滋生的盗贼常常会向北窜入温州、处州，而北边的盗贼也会跨路跨州进入长溪县界——盗贼才不管这地方归谁管，他们要的就是这地方谁也管不到。宋仁宗时期，就在长溪县设置了沿海六县巡检，自北向南，把福州的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合为一个巡检区，领“兵级三百人……仍造刀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盗。

宋代的巡检作为专业治安巡逻机构，是非常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在于它的专业性。而专业性的维持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巡检必须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机构；第二，巡检寨不能进城，必须安扎在盗贼出没的地方。这两个条件，随着岁月的推移都遭到了破坏。巡检的独立性毁于官僚等级文化。虽然说巡检不受州县约束，但是巡检也是官，是官就得在官僚等级文化的约束之下。州县长官大于巡检，按照小官必须拜大官的原则，长官到任或者离任，巡检就得带着手下的兵迎来送往。按照制度，巡检的工作需要地方官的支持，粮食补给要从地方上支领，巡检的工作情况需要地方官签字证明。于公于私，巡检都得伺候好地方长官。而一个巡检上面，地方长官不止一个。时日渐久，巡检就被非正式地纳入了地方官序列。到南宋后期，地方长官派巡检下乡催收赋税，变成了常见现象。本来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机构，变成了恫吓乡民的打手。

伴随着巡检地方官化的，还有巡检寨的进城。宋代诗人杨万里做过广东的提刑，这是广东一路巡检的最高长官。杨万里经过实地勘察，发现惠州城外的巡检寨都已经荒芜，办公室成了瓦砾场，兵营长满了荒草，将士们都早已住进了城里。这样的巡检怎么可能发挥“坐镇荒林”“扼守险要”的功能？杨万里曾两次上书皇帝，情况却无丝毫改观——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五代时期出现的巡检，作为单一功能的治安巡逻机构，开创了一条地方治理的新路。这条新路在北宋成熟，到南宋就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地方行政机构与巡检的双规制，又的确为元明清的地方治理开辟了一条新路。明清两代接续南宋的路径，在县以下的市镇出现了大量巡检，适应了地方治理的需要。

选官与用官的那些事儿

官僚治国是皇帝制度的共生物。帝制时期的官僚是与封建时期的贵族相对而言的，原则上，贵族世袭，官僚选任；就基本的游戏规则而言，贵族是“家族决定个人”，官僚是“个人决定家族”。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官僚也获得了某种类似于贵族的特质。这种贵族化的官僚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官僚的贵族化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结束的？

帝制国家选拔、任用官僚是为了治理国家，然而，作为群体的官僚一旦拥有权力，便忍不住为个人及其家族谋福利，官僚群体的利益可能会走向朝廷国家利益的反面。在唐代后期，我们看到了高级官员为自家子弟营造的“升迁高速路”，此举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

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时代，力图通过自由报名的公平考试选拔官员，政府向几乎一切人开放。但是，“开放式政府”却又面临着新的难题。

通常认为，“选任集权”是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手段，而帝制中国的选任集权制度建设到隋朝才真正实现。那么，“选任集权”的缺席是否意味着有效控制的不足？“选任集权”入场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又是否得到了真正加强？

当官儿的观念与实践

做官好像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敬而远之的事情。抗战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应蒋介石的召请，离开清华园“做了官”。1938年10月底，大片国土失陷之后，蒋廷黻写过一份遗嘱，以备可能的牺牲。中间有这么几句话很有意思：

我虽作了几年官，我未曾直接或间接求官作。作官以解决私人的生活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一个人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而必须靠政府位置或社会救济，我觉得是可耻的。作官以求贯澈主张，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有些主张不一定要作官始可以贯澈。^[1]

这段话所流露的情绪，可以代表现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做官的一般态度：第一，“求官作”是可耻的；第二，靠做官谋私利，“升官以图发财”，是不对的；第三，做官应当与更崇高的追求相关联，比如“贯澈主张”，服务国家。

今人叫“做官”，古人叫“出仕”。蒋廷黻的“做官说”可以上溯至儒家的“出仕观”。孔子所赞成的原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出仕是为了“行道”。孟子云：“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3]当然，传统时期，社会分工不发达，“士”的出路狭窄，而孝道又是儒家大伦，因此，孟子为乱世风尘中的儒者做了周全的考虑——作为个人，当然向颜回学习，“一簞食，一瓢饮，居于陋巷……不改其乐”；但是，倘若有父母要赡养，那么，即便君主无道，不能实现理想，也是可以出来做官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谋求高官厚禄，但求有个看门打更的小差使，能养活父母，就够了。

这种“出仕观”固然崇高，却也不必过度吹嘘——如果在乱世之中，有理想有操守的人都“卷而怀之”，那么谁来拯救老百姓，谁来拨乱反正，恢复秩序，重建文明？总得有人放下姿态，投身浊流，又能在浊流之中保持清白与清醒，将手中的权力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做力所能及之事，一点一滴，为乱世寻求重归治安的路。这样的人更难得，也更加令人钦佩。

五代时期有个宰相叫冯道，历仕四朝，侍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北宋史家欧阳修对他无情讽刺，不惜断章取义，改动史实，夸大其词，就是要把冯道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4]。直到今天，仍有说法诟病冯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何谓没有节操？就因冯道没有把忠诚跟某个朝代、某个皇帝绑定？欧阳修这样做可以理解，因为欧阳修的时代需要重建对一姓王朝的忠诚。现代人再这么想、这么说，未免滑稽。冯道的节操就是忠诚于

自己的良知。冯道为官清廉，忠于职守，爱护百姓，努力提拔后进人才。出使契丹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没人愿意去，为了国家，冯道去了。冯道有一首诗，文字浅显，道理高尚：“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5]意思是说，不管乱世还是治世，天地之间始终都是有道理在的，就像是车在路上走，船在水里行。只要一个人心里干净，即使在虎狼丛中，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冯道说的虎狼丛，指的是野蛮落后的统治，比如契丹。乱世之中的冯道心中有道德，方寸未乱，灵台清明，直道而行，尽力而为，绝对值得赞美，是一种更高级的做官典范。

谈完做官的原则，我们该谈谈“实在”的了——怎样才能取得官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自从帝制以来，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一次荣华富贵的大洗牌，新王朝的开国功臣通常会获得显赫的权势地位。当然，这种权势地位能否延续，要看开国皇帝的心胸，看本朝的制度设计，看后世子孙的成色造化。这种因朝代更替带来的泼天富贵，后文中再细说，此处只说普通的——在一个朝代内部，怎样才能当官。

篇幅有限，我们用家族与个人这一最简单的标准来看“当官儿”这回事——在家族地位的浮沉和个人地位的升降中，看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曲线：

从战国到秦汉，是个人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时期。西周的封建制，当然是家族决定个人的。春秋时期，变化开始了——孔子开创平民教育，给普通士人开辟靠个人努力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游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谋取富贵，个人奋斗的权重在不断增加。比如战国末年的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小吏，先跟随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荀子学习，后来西去入秦，成为秦国的客卿，地位不断提升，最终辅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成为帝国第一相。李斯的家族富贵也达到了顶点，儿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儿嫁的都是公子。长子李由官至郡太守，回咸阳探亲，李斯大宴宾客，整个咸阳的达官贵人都来凑趣捧场，那是李斯人生的顶点。而这一切，都是靠李斯个人奋斗得来的。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家族地位也随之上升；一旦个人失势，家族荣耀也将灰飞烟灭。

李斯的上升方式具有鲜明的战国特色，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投奔名师，学得一身本领；然后东奔西走寻找明主，以主张获得青睐，以忠诚建立信任，以能力获得升迁。这是战国时期多国竞争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统一的帝国建立之后，多国竞争的背景没有了。平民想要做官，一般是在本地先从小吏做起，通过工作表现获得上级的认可和推荐，步步升迁。比如秦朝沛郡丰县人萧何，因为“文无害”，意思是通晓法令，无人能比，做

到了本郡的主吏掾。如果没有后来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就会在这条路上慢慢升上去。

汉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上级对下级的人才推荐制度，在选人标准上最重视儒家所推崇的“德”。当然，也并不忽略秦代以来就强调的“能力”和对法律条文的熟悉，这就是察举制。察举制之中最有名的是察举孝廉，但不止于察举孝廉。在很多环节上，都存在上级对下级的察举。我们来看两个相关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庐江人文翁是怎么当官的：文翁从小就好学，通《春秋》，从郡县的吏做起，通过察举一步步升迁，在景帝末年做到了蜀郡的太守。第二个例子是文翁到了四川以后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当时四川还比较落后，文翁决心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就从郡县的小吏当中选拔了十几个聪明能干的，把他们送到首都长安去，有的跟着博士学儒学，有的学习律令。文翁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钱都买了礼物送给博士（让他们好好教四川学生）。几年之后，这些四川学生学成归来，文翁对他们委以重任，又通过察举不断提拔他们，这些四川学生有的官至郡太守，有的当了州刺史。

这就是汉代的当官路。第一，要读书，在家里学习律令、儒学，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同时人品要过硬；第二，进入地方政府做小吏，获得基层政府的工作经验；第三，通过察举进入中央，先是做郎官，郎是官职，但没有特别具体固定的职务，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实习生的状态。在逐渐熟悉了朝廷的行政过程之后，郎官被放出去，就可以做县长，继而升郡太守了。

上边这两个例子当中都忽略了做郎官的过程。察举制度给汉代“先富起来的人”提供了参政的可能性，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是双赢的。

从东汉末年到唐前期，对崇尚个人奋斗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暗淡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在家族地位的浮沉和个人地位的升降中，家族变成了决定性因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诸先生认为这个时期是贵族制的，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世家大族主导的时期。田余庆先生更是指出，东晋形成了几大士族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形态——门阀政治。就我们所说的“当官儿”来讲，规则虽简单，却也令人沮丧。如果你运气好，出生在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的一流高门，那么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出身好的“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出身差的就只能捡他们不愿意做的苦累差事或危险职务。个人命运的大致轨迹、人生奋斗所能达到的上限，在出生以前就已经写定。



图三一：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的《姑苏繁华图》长卷，不仅反映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貌，也可让我们从中看到金榜题名后的喜庆场景。图中有三艘船，前一艘船的灯笼上写着“翰林院”“状元及第”的字样，右边这艘船上敲锣打鼓，一派热闹非凡的情景，后面跟着的大船上则是及第的状元和花轿。再看河岸边、桥头、店铺里、酒楼上，所有人都向船上张望，被围观的新科状元，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成为政府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念得好，个人富贵唾手可得，家族地位随之提升。画面中便是对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状元乘坐的船只



前面张灯结彩喜迎状元的船只

到了宋朝，中国社会再度进入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科举制成为当官的最主流途径。科举最实质性的创新点还不是通过考试当官，而是“自由投考”，几乎任何一个男性，只要他肯读书，就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书念得好，不仅个人富贵唾手可得，家族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反过来，家族中三代出不了读书的好儿郎，就难免要没落。想当官吗？“三更灯火五更鸡”“五经勤向窗前读”，到了开科的年份就去报名参加考试，一级一级考上去，从州府考进京，最后考到皇帝殿前，一举得中，金榜题名天下闻。中国读书人的状元梦，从宋朝一直做到了1905年。科举耽误了挺多的事，但就保持社会的流动与开放而言，自有其历史功绩。

[1] 据哈佛大学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教授访问北大时所赠之复印件录文。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卷一五《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68页。

[3]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一《万章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9页。

[4] [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页。

[5]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小圈子政治的人才困境

什么叫“小圈子政治”？就是政权由若干家族构成的小圈子把持，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均由这些家族的子弟担任，他人基本不能染指。换句话说，这些家族的子弟构成了小圈子政治的核心人才库。小圈子具有垄断性、封闭性和文化基因的同质性——这些家族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骨子里都很像。生物学上有一个重要名词，叫作“多样性”，是说一个物种所包含的基因越丰富，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因此，当种群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这个物种就濒危了。生物多样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由此可见，小圈子政治自然也长久不了，只不过人类的故事更复杂。

中国历史上最具“小圈子政治”色彩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当时社会的主要人口被分为士族和庶族两大类，士族又分为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士族享有免役特权，庶族则需要为国家服徭役，这两种人在户口登记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界限森严，不通婚，不交往。哪怕庶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皇帝的宠臣，也很难被士族的社交圈子接纳。比如宋文帝非常欣赏中书舍人徐爱。徐爱庶族出身，宋文帝想提升徐爱的社会地位，就让吏部尚书王球跟他交往。王球出身于琅琊王氏，属于士族中的一流高门。结果王球直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他说，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制度，陛下的命令我不敢听从。而宋文帝被拒之后什么反应呢？“改容谢焉”，顿时严肃起来，给王球道了歉。这就是当时人说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1]，士族与庶族之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士族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是他们的家族门第可以“兑换”成相应的人品。最高的是“门第二品”，而它则意味着有资格担任那些三品以上的重要职位。比如陈郡谢氏的谢方明、济阳蔡氏的蔡廓两人，既出身高门，又有才干，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两人单凭门阀就有资格做到一品官，更何况还有才干呢！高门士族家的男孩子，无论是否有德有才，甚至无论是傻是呆，满二十岁就可以直接做官，而且起家就是清闲高贵、升迁前景极好的官职。例如，著名诗人谢灵运之父谢焕，“生而不慧”，智力有问题，但是也能做秘书郎，靠的是什么呢？陈郡谢氏的门第。相比之下，低级士族出身的人想做官，就要等到三十岁了。用今天的世俗眼光来看，这些高门士族出身的人，才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上，一出生就甩开别人十年，而且此后的锦绣前程也早已铺就。

在官僚选任方面，门阀制度的特点就是家族门第决定个人前途，高门士族单凭门第就能飞黄腾达。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个人的营私行为，而是国家选任制度的明确规定。当时，谱牒之学十分兴盛，就因为搞清楚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孙子，是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点，也是终点。

南宋学者叶适说：“东晋权归王谢庾桓四族，而四族亦人才所自出。”东晋的建立是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氏合作的结果，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后来的东晋政权继续保持了这种高门士族与皇族合作的“小圈子政治”格局。那么，这个小圈子的人才发育状况如何？

举例来说。琅琊王氏的王徽之，字子猷，读书很多，说话喜欢引经据典，讨论言语的风度韵致。其父就是“书圣”王羲之。王徽之给车骑将军桓冲做骑兵参军，是专管骑兵的参谋。有一天桓冲就问他，你管哪个部门啊？看这上司已经够糊涂的了。那么下属王徽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不知道是什么部门，常常看人牵马来，应当是管马的吧。桓冲接着问，有多少匹马呢？王徽之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桓冲继续问，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回答其实很有水平。后边两个回答，用的都是孔子的典故。马厩着火，孔子回家问，伤着人没有？不问马。这是“不问马”的出典。子路问孔子死亡是什么，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有个关于王徽之的小故事：夜里下大雪，王徽之醒了，推门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忽然很想念友人戴安道，于是连夜乘小船出发了。天蒙蒙亮，王徽之到了戴家门口，却忽然折返。别人问，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里的王徽之具有一种任性洒脱的潇洒之美，算得上中国人物画廊中俊逸的一笔，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但是，这样一个王徽之，做着管马的官儿，却不知道管着几匹马、损耗多少，靠他治理天下，岂不是要坏事吗？



图三二：元 张渥《雪夜访戴图》

《雪夜访戴图》是元代张渥所绘，纸本，水墨，91.8厘米×39.8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图描写的是东晋王徽之雪夜乘扁舟拜访挚友戴逵的故事。据说某个雪夜，王徽之突然想去拜访朋友戴逵，于是就让仆从划船前往，好不容易在天明时分到了戴逵家门前，但他突然就不想进去了。仆从就好奇地说，深夜出发天明方至，为何不进去了呢？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故事反映出魏晋时期高门士族那种洒脱不羁、随性而为的性情。作者以简练的线条，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画中王徽之坐在船舱，袖手观书，神态生动。岸边苍老遒劲的古树，充分地衬托了冬夜萧瑟寒冷的意味。



王徽之袖手观书，夜幕下观书不太可能，或借了月光

王徽之做官的糊涂任性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高门士族的风气。这种好为玄虚、不务实事的风气，在北方就已经兴起；仓皇南渡之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成了高门士族的一种文化标志。玄风扫荡之下，衡量人物的标准发生了强烈变形，精明强干会办事、不怕麻烦、有责任感、遵守规矩礼法带上了负面色彩，不懂、不会、不知道、不守规矩，反而成了高级范儿。跟个别人的放荡相比，标准的异化才是最可怕的，它意味着底线的撤退，是非的倒置。后世的政治观察家，看到本朝风气滑坡，常常会大声警告，说现在有西晋的模样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

标准的异化导致高门士族整体素质大滑坡。琅琊王氏的王敬弘当了四十年官，一直当到宰相，竟然看不懂审案文书，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更荒唐的：会稽虞氏的虞啸父做门下侍中，皇帝问他，你在门下省，怎么一直没见你有什么献替呢？“献替”就是提意见，是门下侍中最基本的职掌。可是，虞啸父只听懂了个“献”，以为皇帝要让他进贡家乡的海产品，就回答说，现在天气还比较热，鱼干和虾干都还没晒好，等过些日子我肯定会献给陛下的。

高门士族人才凋零，最终导致皇权与门阀共天下的小圈子政治的破局。破局的过程一波三折：权力先向皇族回归，高门势力受到排斥；接着在高门士族的鼎力支持下，谯国桓氏的桓玄篡位，建立楚国，试图恢复小圈子往日荣光；最后刘裕推翻桓玄，建立刘宋，政权落入低级士族之手，高门彻底靠边站了。

在这个过程中，士族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他们不重视军事，鄙薄武将和军人。武将在他们眼中就是当兵的，是可以利用的小人，绝不会去尊重。至于高门自己，也可以充当军事长官，但是必须表现出一种武事虽贱，为了效力君主，不得不暂时屈尊为之的状态。比如淝水之战，宰相谢安在建康下棋，坐待“小儿辈破贼”。在前方指挥破贼的谢家儿郎谢琰，也算是有军事才干的了，可淝水之战后，便长期做文官，对军事越来越生疏，后来受命征讨，就再也没有像样的功绩了。事实上，淝水之战的胜利包含了诸多偶然因素，本来前秦内部已矛盾重重，秦兵从淝水岸边后撤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给了晋兵可乘之机。所以淝水之战，与其说是谢家子弟打得漂亮，不如说是苻坚乱了方寸。而陈郡谢氏还是东晋几大高门之中比较重视军事的。

高门士族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格局不够大，缺乏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而他们本来是注定要领导国家的。东晋末年被高门推出来重振小圈子荣光的桓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大格局的领袖。第一，他“制作纷纭，志无一定，变更回复，卒无所施行”。就是什么都想做，但又没个准主意，老是翻来覆去，最终什么都没干成。第二，此人处事，分不清轻重缓急，为人苛刻小气，喜欢自夸……芝麻大点儿的小官小吏也要自己任命，诏令一道接一道发出去，底下管事儿的部门应接不暇，可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不知道在哪里，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案卷文书都堆在那儿不管，他却浑然不觉。第三，这个人的原则是以小我为中心，贪婪自私，都得了天下了，听说谁有好书法作品、好画，谁家的园林美、宅子漂亮，一定要假装跟人家赌博，把它赢过来，尤其对珍珠美玉爱不释手。最后还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引发朝野骚动。余嘉锡先生对桓玄的评价最精当：“盖是杨广、赵佶一流人物”，聪明风流有才华，但桓玄跟这两位角色差太远了，“但彼皆帝王家儿，适承末运”，但是杨广、赵佶都是皇帝的儿子，正

好赶上了亡国之运，折腾折腾很正常，“而玄乃欲为开国之太祖，为可笑耳”，可是桓玄竟然（以如此之资质）想要做开国的太祖皇帝，实在是可笑。最终，桓玄给低级士族开了道。

桓玄的可笑就是那个高门士族小圈子的可笑。东晋104年，一百年四代人，到桓玄代晋才三代，就已经堕落至此。因为种群规模太小，基因单调，自我封闭，缺乏竞争，衡量人才的标准失衡，重玄谈不重实干，又享特权，默认每个男孩生下来注定要飞黄腾达，谁会努力？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小圈子政治。“门阀”的“阀”本来指功劳，“阀”与“阅”连用，指功劳和资历。一个人凭借功劳和资历得到升迁，这本来是官僚制度的规定。后来“阀”与“门”相连，变成了“门阀”，“门”就是门第，祖先的阀阅变成了子孙后代做官的凭据。门阀政治，因缘时会，可兴于一时，却不能长久，只是帝制时期官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插曲。^[2]

[1] [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四二《王弘传》，中华书局974年版，第38页。

[2] 祝总斌：《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见《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230、257—282页。

唐后期的升迁高速路

我们从一个王朝后期的历史里，常常会读到当时人对制度弊端的种种批评。同样的制度，在王朝的前中期运行良好，到了王朝后期忽然就“不灵”了。这种不灵，有的是因为世异时移，形势变了，制度没有跟上；有的是因为制度本身已坏——背离了它的设计意图或者初衷。比如，初衷是要防止权力跑偏的批评纠错机制，到后来却变成了权力的爪牙；又比如，初衷是要为国家遴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到后来却变成了按门第出身任用官员。很多时候，搞坏制度的，正是那些处在制度上层，在制度中已经享尽好处、贪得无厌的高级官僚。

这样说的前提，是我对帝制国家利益结构的基本认识。第一，在帝制中国，皇帝、官僚和老百姓构成一个朝廷国家，古人说的“江山社稷”就是这个朝廷国家。朝廷国家有它的整体利益，这个利益就是长治久安。长治久安最上层的内容是皇帝延续统治，最下层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它具有上下兼顾的整体性。第二，朝廷国家具体体现为一家一姓的统治，因此，皇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就本质而言，皇帝没有私利。当然，这绝不是说皇帝大公无私，而是说皇帝以天下为家，大私为公。第三，官僚集团的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官僚本应服务于皇帝和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传统社会的忠臣首先是孝子，官僚虽然不会公开宣称家族利益高于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家族利益在他们的选择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官僚的家族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官僚会利用手中的权势改造制度，让制度服务于家族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从而对朝廷国家的利益构成实际上的侵蚀。当然，能够这么做的，首先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官员。

下面，我们来看看官僚利益如何改造制度，让它服务于家族和小群体的私利。以我做过的一个研究为例，来看看唐朝中后期的高官是怎样“因地制宜”地为自家儿孙打造一条“升迁高速路”的。

唐朝中期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新旧两套职位体系。一套是原来就有的，在中央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在地方是州县两级地方政府。还有一套是新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军事和财政两个领域，也是中央和地方都有，它们构成了唐朝国家机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体系机构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节度使，那是唐代中期以后统帅边防军、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力量。新体系机构提供了大量新职位，比如节度使的幕府班子，人数众多。

唐后期这两大职位体系的并立，对官员个人的发展和朝廷的人事管理都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新体系用人制度相对灵活、俸禄待遇优厚，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官员个人的职业选择。朝廷与藩镇之间出现了人才争夺战。有一个时期，京城里的各个衙门甚至找不到合适人选，位子空出来也无人可补，那些有才能的人都去了地方与藩镇。某人从正四品上阶的尚书左丞贬到外地去做正四品下阶的歙州刺史，明明降了一级，可是全家都很开心，只恨降级降晚了。还有幕府僚佐得罪了节度使，节度使不开心，怎么办？干脆推荐这人进京当官。出现这一奇怪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官员的工资待遇是这样分布的：最高的是藩镇系统，地方官系统次之，京官的俸禄水平最低。那么，政府该怎么办？

唐朝政府一方面要鼓励优秀人才“出得去”，进入新体系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这些优秀人才能够“回得来”，在新旧体系之间根据朝廷国家的需要自由流转。“回得来”的问题比较好解决，通过政策调整，提高京官俸禄，大大提升了旧体系的吸引力。只要俸禄丰厚，谁不愿意在辇毂繁华的都城工作和生活？更何况，官僚集团中的最高职位都在旧体系中。

在解决“出得去”的问题上，唐政府的做法是：给每一个进入新体系的官员一个旧体系之下的职位头衔作为级别标志。这个职位的品级要高于官员原有的职务级别，比如原本是从七品上的官员，出去的时候可以带上从六品上的头衔。这个头衔不白带，等到此人在新体系中的工作结束，奉调还朝的时候，他那个从六品上的头衔可以从优兑换成旧体系下的新职位。而且，唐王朝还给这些曾经下去锻炼的官员建立了特殊的荐举提拔制度。这项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挂职锻炼”。

“挂职锻炼”成了官员升迁的加速器。在旧体系之下，官僚升迁的常规是论资排辈熬年头。新体系则不管这些，比如节度使的幕府，只要具备了基本的官员资格，节度使推荐，报中央备案就可以了。因此，一个官员通过荐举进入藩镇幕府，在服务藩镇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级别，实际上就摆脱了论资排辈，把一大票同辈甩在了身后；而当他从藩镇回归中央之时，较高的级别又可以兑换成相应级别的实际职位，等于是更上层楼。经过“挂职锻炼”的官员可以相对容易地升迁到中央政府的中层乃至高层职位。

“挂职锻炼，加速升迁”，既出得去，又回得来，实现了人才在新旧体系之间的流动，满足了国防、财政等新兴部门对人才的渴求，同时，又将新体系下人才的迁转纳入整个官僚体制运行轨道中，保证了国家用人制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制度虽好，但是很快就被高级官员玩坏了。朝廷规定的是中央官挂职地方，服务满两年才可以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可是那些高级官员子弟从中央领了任命，到地方虚晃一枪，没过几个月就脚底抹油走了，到时候照样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又比如，朝廷规定，新科进士授州县佐官，任职不满两年不得入节度使幕府。但是，高级官员子弟带着州县佐官的头衔

进入幕府，“两请俸料”，一个人占两个位子，领两份薪水，还要享受“挂职锻炼”的升迁便利。

高级官员集团为子弟所做的安排不止“挂职锻炼”这一条，它是一整套的，从科举就开始了。唐朝科举的录取是允许人为操纵的，还没考试，第一、第二就已经排好了。不是高官子弟或者得不到达官显贵的推荐，根本不可能考中。接下来就是“挂职锻炼”，考中科举之后，这些新进士就或真或假地下去“挂职锻炼”，镀金镀银，不走寻常拥挤路，回来就可以很快升上去，占据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直到宰相。

于是，在唐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条高官为自家子弟所开辟的“升迁高速路”。通过这条高速路，高官子弟仍然保持了较高官位。这些家族的权力、地位和唐中央绑在一起，更准确地说，唐中央被他们绑定了。但是，“挂职锻炼”的制度却被他们破坏了。唐中央开辟“挂职锻炼”通道的初衷，是要在新旧职位体系之间实现人才的沟通与共享，让新旧体系成为一个整体。但是，高级官员对家族利益的追求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那些有办法通过“挂职锻炼”通道获得快速升迁的官员，其实多半没有“挂职锻炼”的经历，他们是假挂职，真升迁。

而那些真正在地方，特别是在藩镇老老实实服务的基层官员，却很少能获得进入中央工作的机会，完全变成了地方性的官员。比如，柳宗元提到过一位马君，做了超过四十年的官。在这四十年中，他辗转于广西、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的都是新体系下的节度使幕府僚佐，一辈子没能进入中央。马君七十岁告老还乡，深感怀才不遇，感叹说，当官当了四十年，也没混上个像样的官。这位马君的遭遇绝非个例，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进入中央获得升迁的道路已经被高官占据，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如果没有出众的文名和有力的奥援，就只能采取地方性的个人发展策略，把自己的前途和节度使绑在一起。

“挂职锻炼”制度本来是一座桥，把新旧职位体系联成一个整体，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作用。“升迁高速路”的营造，让高级官员集团垄断了中央职位，断绝了新体系中下层官员回到旧体系的希望。归来无望的新体系官员于是紧密地团结在藩镇势力的周围。以高官集团为核心的“中央官”与以藩镇为核心的“地方官”分裂成了两个群体。这种分裂，加剧了藩镇的割据，削弱了唐中央的统治基础。这个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就是高官集团的私心。私心凭借权势改造了制度，也为自身的灭亡挖好了坟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图三三：莫高窟第一五六窟壁画 晚唐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位于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六窟，属于晚唐壁画，描绘的是唐代敦煌地区最高统治者张议潮统军出行的盛大场面。该壁画具有颇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整幅画绘有两百余人，出行队伍旌旗招展，声势浩荡，显示出节度使统辖下的部队严整的军仪和威武的士气。鸟瞰全图，中间穿插了乐队与舞伎，更显画面的浩大与生动。

当唐中央走向灭亡，那些为家族利益算计得无比清楚的高官集团也随之失去了权势。取代他们的，正是那些追随藩镇的地方官。

科举时代的中华梦

我对“中华梦”的粗浅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家庭出身多么平凡，只要他足够努力（运气也不能太坏），就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从宋朝开始，帝制中国是真有“中华梦”的，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制度通道就是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科举时代“中华梦”夸张而生动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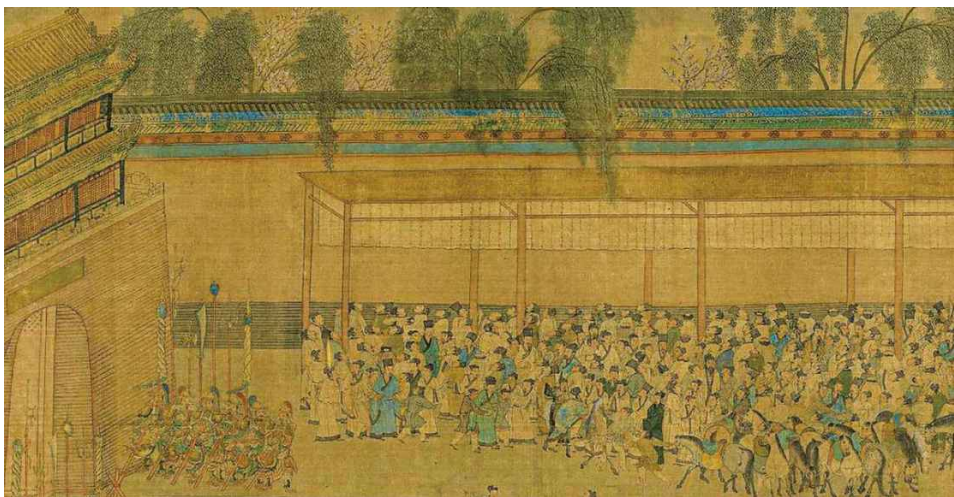
我说的是科举时代（而不是科举制度）始于宋朝，作为新型选官制度的科举始于唐朝。有人会讲，不对啊，科举不是从隋朝开始的吗？当然，认为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的说法也有，只是衡量的标准不同。说始于隋朝的是把“分科取士”，特别是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所用的指标虽然没错，但相对表面化，没有抓住科举制度的精髓。认为科举始于唐朝，则是把“允许自由投考而不是全靠地方政府举荐”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才真正抓住了科举制度的精髓。用考试的方法选官，汉代的察举也有。科举真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启了自由报名，在影响人才选拔的诸多因素中，家族门第开始后撤，个人的才学能力得以前进。

科举创立于唐朝，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因为从宋朝开始，科举才有了影响、塑造甚至定义时代的意义。

首先，不论家世背景、标榜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变成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较之于唐朝，科举的录取规模在宋代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唐代平均每年录取70人，宋代年均录取360人。数量增长带来的是官僚集团结构的变化。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数量，虽然不能在整个官僚集团中占到绝对多数，但是他们占据着最为重要的文官职位，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官僚集团的整体面貌由此得到改观。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北宋有宰相71人，科举出身者65人，占92%；副宰相153人，科举出身者139人，占91%。曾经有文官得意扬扬地总结说，当今用人基本上都是靠文章：宰相大臣，文士也；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文士也；为国家理财的，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各州的州长，文士也。这里的文士，可以简单理解为进士出身、文章写得漂亮的文官。

其次，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以司马光的家族为例，虽然他们家号称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之后，但是，堂堂西晋皇族后裔，在宋朝以前六七百年的时光里，却再也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物，完全成了普通富裕农家。进入宋朝以后，有了开放的科举制度，司马氏才获得了新生。司马光的爷爷司马炫是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可能因为去世较早，只做到了县令。接着，司马

光的父亲司马池继续努力，再中进士，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为司马光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到司马光这一代，本来已经靠父亲的恩荫得到了一个官位，但是司马光坚持读书，考中进士，这才有了宰相司马光。如果司马光不中进士，基本上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个人通过科举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家族地位也随之提高。



图三四：明 仇英《放榜图》（局部）

《观榜图》为明代仇英绘，卷轴，638厘米×34.4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了殿试后举子们争相观榜的场景和皇宫内举行庆典的盛况。画中人物刻画细致，对观榜者的心理描绘入木三分：观榜者中有急迫地寻找自己的排名者，有名落孙山面露失落者，有不堪打击被人搀扶而出者，有金榜题名后按捺不住喜悦飞奔报喜者，还有只为看热闹的路人……场景刻画甚为逼真。仇英擅于观察与捕捉生活，能准确描绘出生活中生动细腻且能反映心理与精神层面的细节。全卷绘有10多座宫殿、房屋，500多人，30多匹马，1头象。从人物着装、神情到屋梁、窗棂，画者都进行了细致描绘，把应试的文人期望中举的迫切心态刻画得极为生动。

再次，高度开放的科举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样，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在同一个年份，有人刚刚开蒙读书，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有人在赶考的路上，有人已经进入官场，正在春风得意处。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读书人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帝国更广阔的统治基础。考得上的当官，更多考不上的当老师，其余的只能在农闲时节教教村子里的顽童识字。然而，不管个人境遇如何，在这些科举相关人士有意无意的集体努力下，整个社会的识

字率提高了，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广大的人群中，文化中国的同一性得到了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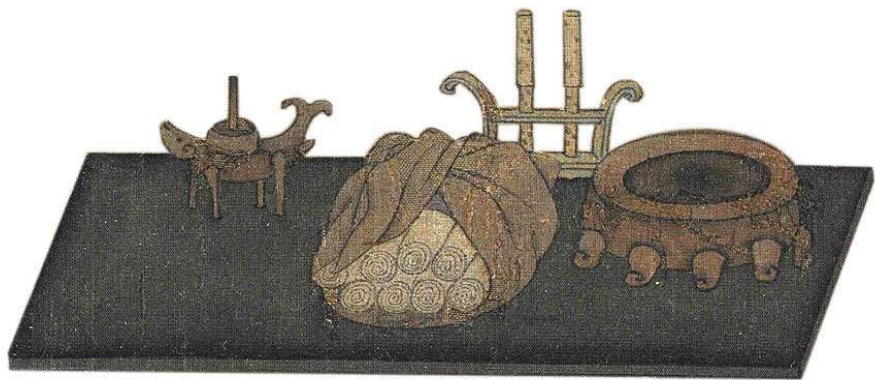
最后，科举还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择偶。在士族门阀政治的时代，选女婿看重的是门第。王羲之做了太傅郗鉴的女婿，传说是因为他潇洒豁达、满不在乎的态度——太傅派人来挑女婿，别人都打扮得风流倜傥，紧张得手心冒汗，唯独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在东床上躺着，露着肚子，就好像没听到这个消息一样。“坦腹东床”一说也对，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前提，郗太傅挑女婿是直接到琅琊王氏家里去挑的。王羲之再潇洒，若不是王家儿郎，也没机会雀屏中选。

科举时代选女婿，最看重的是科举成功。有权有势的人家从刚刚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当中选女婿，这叫“榜下择婿”。“榜下择婿”走到极端是不管不顾的。有个笑话说，某新进士长得颇体面，稀里糊涂就被拉到某个高门大户人家。进了门，见一大官模样的人端坐堂上，问他，我有个女儿到了出嫁年纪，想要许配给郎君，不知意下如何？新进士作了一个揖，不慌不忙地说，多谢您的美意，但请容我回家跟妻子商量商量。选女婿竟然选到了已婚人士，这样的故事只有科举时代才会发生。书生赶考的奇遇，也成了中国传统故事里流传至今的非常重要的题材。



图三五：宋 佚名《槐荫消夏图》

《槐荫消夏图》，南宋佚名绘，绢本设色，28.8厘米×2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槐荫消夏”所展现的情景与“东床坦腹”有异曲同工之妙。画中高士双目微闭，一边掏着耳朵，一边将脚架在凭几上，好不惬意。旁边几案上摆放着香炉、卷轴、砚台等文房清玩，人物及背景的呈现勾勒细致。此图虽在书房里完成，却已传达出人在山水间的意境，既能让人感受到槐荫下消夏的悠然闲适，又能看出画家颇为深厚的画功。



香炉、卷轴、笔架和砚台

从宋代起，科举不仅选拔官员，巩固政权，而且渗透性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由此进入科举时代。在元朝，由于蒙古统治者认识水平的限制，科举曾被暂停，但最终恢复。经元入明清，科举取士绵绵不绝，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尽管近代以来，人们常常会责备科举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承认科举曾经起过的种种正面作用。自宋代以来，“科举至少造就了一个无论从个人德行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相对优秀的管理阶层，个人不是通过他的血统、财富或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他的文史才能获得首次升迁”。

跟唐代相比，宋代在科举方面究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

唐朝的科举其实是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达官贵人的推荐、考生的名气和和社会关系，在科举的录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考中之后，也只是获得了一个做官资格，还不能直接做官，要想获得一个职位，不仅要等，还要求人。所以，唐代考生的必修课之一，就是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权贵，这叫作“干谒”。杜甫那么骄傲，在屡考不中之后，也不得不加入干谒者的行列，他还求过杨国忠。“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的就是求官者的辛酸，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干谒诗。在唐朝的制度文化中，干谒是必需的，因此并不丢人。到了宋朝，考生就完全不必拍达官贵人的马屁了，考不考得中，全靠自己一支笔。清朝人钱谦益特别同情杜甫，认为不能拿宋朝人的标准来要求唐朝人。读书人在权贵面前能够昂起头来，要靠科举的制度创新。

宋朝人在考试技术上的进步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大家今天能够想到的防止作弊的技术，宋朝就已发明出来了。第一，锁院。考官人选临时确定，任

命一旦发布，立即把考官隔离起来，出题、阅卷都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录取名单出来，考官才得自由。第二，糊名弥封。也就是密封试卷，考卷的卷头写着考生个人信息的部分，用纸糊起来，然后编上号。若是高级别的考试，还有第三项技术誊录，糊名弥封的试卷编上号以后，交给专门的抄书手用统一的纸墨、统一的字体抄一遍，考官看到的不是原卷，而是誊抄本，所以想通过笔迹作弊，或者在卷子上做个记号，门儿都没有。阅卷完毕，确定排名，然后根据编号回到原卷，打开卷头，这才知道谁独占鳌头，谁金榜题名，谁名落孙山。欧阳修做主考官，看到一份卷子极为赏识，以为是自己的高足曾巩所作，为避嫌，特地放在了第二名，后来打开密封才知道不是曾巩，是苏轼。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宋朝；唐朝还没开考，名次就已经定了。

制度创新使得科举摆脱人情因素的干扰，实现了择优录取。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但是归根结底，科举毕竟是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单纯追求卷面成绩，实现了考场中的公平，却带来了新问题，比如考试是没有办法考德行的。那么科举时代，该怎样克服科举的弊病？

开放式政府的三大难题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帝制时期两种不同取向的人才选拔模式。一种是在士族门阀制度下，门第至上，家族决定个人；一种是在科举制度下，不论出身，考场能力至上，个人决定家族。

这两种人才选拔模式所形成的官场生态大不相同。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是“小圈子政府”，熟人官场。官场之中，每一个人的家世渊源、家族风范，以及个人的脾气秉性，大家互相清楚，彼此知根知底。在这样的官场之中，道德约束的力量是强大的，祖先荣光、家族门楣、熟人朋友的评价，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有个特别好玩的例子，东晋初年，刚刚南渡，高门士族的日子也有不好过的。太原王氏的王述家里很穷，就自告奋勇出来当了个县令，上任之后大肆收受贿赂，改善生活条件，被上级纪检部门查出来一千三百多条问题。宰相王导就派人去跟他说：以你这么高贵的出身，还怕没钱吗？如今屈尊管理一个小县，实在是不合适啊。王导的劝说堪称委婉的典范，给王述留足了面子。王述回答说：“足自当止。”等我拿够了，就不贪了。当时人都不信。可是后来，王述做了多任地方长官，都无比廉洁，而且还把所得俸禄分发给亲朋故旧，自己家的房子家具也没有再换，都还是当县令时用收受贿赂的钱置办的。综合王述这一生来看，他最初的贪污受贿，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贪污，并非贪得无厌。都已查出一千三百多条问题了，王导也没有公事公办撤了王述。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小圈子政府”的熟人社会当中。圈子里的人在人格上彼此平等，所以要给对方留面子；列祖列宗在前，子孙后代在后，家族是要延续的，来路可知，去处分明，所以要对自己有节制。

相比之下，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是“开放式政府”。它以客观公正、择优录取为最高原则，不论家族门第，全凭卷面定终身，根本不讲情面。考生之父、祖父是谁，填表时要填，但是原则上不影响录取。科举考试为官场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鲜血液，若换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新鲜血液，其实就是“陌生人”。“君子不欺暗室”，只有至诚君子才能做到表里如一。对一般人在陌生环境中的道德水平，不能期望过高。

“开放式政府”“陌生人官场”，催生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宋到清，贯穿整个科举时代。北宋是科举时代的开端，当时，华夏的政治文明仍然充满活力，精英阶层普遍相信制度创新的力量。在北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陌生人官场”的弊端，也能够看到“开放式政府”为了改善人才状况所做的种种努力。

“陌生人官场”的弊端可以说是科举时代的先天不足。宋朝的科举考试，防弊技术之发达，基本上做到了“至公”与“无情”。但是，“至公”与“无情”的

背面就是“不能核名实”，也就是说没办法知道这些考生的人品和其他方面的情况。考试能够考出来的只有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但是作为官员，仅仅有知识、会写文章显然不够。“不能核名实”，道德人品没着落，这是科举时代人才选拔的首要问题。

科举时代人才选拔的第二大问题，是考试内容带来的——你考什么，我学什么。考试是读书的指挥棒，功名利禄高悬的地方就是前进的方向，人性使然，古今皆未能免俗。宋初科举的进士科主要考诗赋，阅卷重点看是否合辙押韵，有没有技术性瑕疵；明经诸科主要考墨义，就是基于儒经原文和注释的问答题。两家都考贴经，就是大填空。这样一来，“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读书人的复习重点就是背诵儒家经典和练习写作诗赋。这些知识和写作技能当然是有价值的，也的确能考察出一个人的智商和学习能力，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原则；但是，仅凭死记硬背与文辞华美是当不了好官的。所以，科举选出来的人，“虽济济盈庭，求才有识者十无一二”。“不能尽人才之用”，考试所追求的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这是科举时代人才选拔的第二大问题。

科举时代人才选拔的第三大问题，是由“开放式政府”带来的。科举打破了小圈子对官僚职位的垄断，向更广大的人群敞开了做官的机会。以开放的心胸广泛吸纳人才是科举时代的本质追求。除了自由报名政策，科举时代还对偏远地区、教育落后的边疆地区实行录取名额的优惠政策，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向心力。但是，科举的录取规模一旦放开，是不能回缩的。因此，“开放式政府”必然会产生人才供过于求的问题，进入官场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国家机构所能提供的职位数量，出现一个工作机会两三个有资格的人排队的现象。

针对上述三大人才问题，北宋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第一个问题的对策是兴建学校，以学校辅助科举。按照1041年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改革思路，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州一级地方普遍设立官学，县一级具备条件的也可以设立官学；第二，学籍与考试资格挂钩，规定所有考生在官学学满一定期限，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改革之前就已经投考的旧举人要学满一百天，新举人要学满三百天；第三，学籍与户籍挂钩，所有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的官学学习。在这些规定之中，蕴含着重建熟人社会的努力。兴建学校的努力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到北宋灭亡之前，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宋朝建立了一整套教育体系，从地方州县学一直到首都的太学。北宋甚至一度取消科举，直接用系统化的学校内部分级考试来选拔官员。而这套系统的完善，要归功于著名的荒唐皇帝宋徽宗和著名的奸臣蔡京。

针对考试所追求的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这一问题，北宋在考试内容上进行

了不断调整。比如最重要的进士科，先前重在诗赋，兼考背诵。庆历新政取消了背诵内容，降低了诗赋在录取中的权重，把重点放在了“策”和“论”，鼓励考生扩大阅读面，增加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把书读活，以文章经纶天下。虽然仍然是用笔墨文章取士，但是考试内容变得更灵活、更关注现实了。所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经济”的意思就是经邦济世、管理国家。

1040年到1050年，也就是宋仁宗朝的中后期，出现了一批既有创新思想又有非凡行动力的教育改革家。比如胡瑗，他在湖州州学任教官，把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研习儒家经典，应当是所有学生的基础必修课。治事斋是专业课，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算历（天文历法）等科目。每个学生都要选一个主要专业方向和一个次要专业方向。胡瑗的教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他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去接触大自然和社会。他曾经亲率学生出游，登潼关，望黄河，远眺华山、中条山。他说，这才可以说是山川形势啊，学者怎么能不来看看呢。胡瑗的做法，千载之后仍然令人神往。

前两大人才问题主要与科举考试有关，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第三大人才问题是供过于求，既不能直接裁人，也不能轻易降低录取规模，这是“开放式政府”所必需的。所有官员由中央管理，人多带来的第一个麻烦就是怎么管，管不过来怎么办。宋朝的解决办法自唐朝后期延续而来，很简单，论资排辈，大家一起熬年头。可是这样一来，人事管理就背离了官员选任的初衷。选任的初衷是行政效率，论资排辈的着眼点是管理上的便利，至于选出来的人是否符合职位的需要，是否合格，论资排辈管不着。论资排辈解决了人多带来的选任困难，却牺牲了行政效率。于是以荐举制来解决——所有关键性的级别升迁、重要职位的人选，必须有人推荐。

推荐信成了官僚生涯的助推器，荐举的重要又带来了新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官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就是幕职州县官升京官，这两个作为级别标志的名词都是宋朝特有的，跟在哪儿工作没关系，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低层升入中层。升上去，待遇、前途都能更上层楼。可是要过这一关，五封推荐信是必需的。对那些家世背景强大的官僚子弟来说，这五封推荐信简直易如反掌。但是，对那些草根出身的第一代官员来说，就比登天还难了。苏轼曾经不无夸张地开玩笑说：如今这人，为了得到一封推荐信，杀人都敢干！杀人未必敢，可是低声下气地求人是一定要的。当时人讽刺说，低级官员求人写推荐信，跟乞讨的人要钱如出一辙。要钱的人说，大爷行行好，我这孩子看病就差五个钱了！你给了他，过十日再去看，还是差那五个钱。低级官员求人写推荐信也如此：我这五封推荐信，就差一封了，还请大人成全！

倘若出于公心，推荐制度可以弥补论资排辈的不足。但是，即便出于公心，推荐制还是对有背景的人更为有利，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不能苛责。应当追求的是制度的公平和执行的公开透明。

选任集权的利与弊

央地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地方政府人事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究竟由谁来掌握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力。当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力主要由中央掌控，这就构成了选任集权；反之，则构不成选任集权。就历史事实来看，帝制中国的选任集权其实是到了隋朝才实现的。也就是说，以隋朝为界，帝制中国地方官的选任可以分为两大阶段：隋之前的八百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政府基本上享有本地官员的人事任免权，选任集权缺席；隋之后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央基本独占了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免权，选任集权在场。

通常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是帝制中国一以贯之的统治目标，而选任集权则是实现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所以，历史课本致力于挖掘和描述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线索。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央集权只是帝制国家的外在目标或者说治理手段，中央控制（防止分裂，保持统一）和地方有效治理才是帝制国家的内在目标或者说永恒追求。这样一来，在讨论选任集权的问题上，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有实际意义的观察角度——中央控制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那么，前八百年，选任集权的缺席是否意味着中央有效控制的不足？后一千三百年，在选任集权的背景之下，是否意味着中央控制与地方治理的有效增强？

先看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前八百年。以汉代为例，这一时期典型的人事制度模式是：中央任命郡、县两级的地方长官和佐官；地方政府的其他官员均由地方长官从本地人当中选拔任用，这叫作“辟除”。1993年，江苏连云港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郡一级行政文书档案——西汉东海郡的吏员考绩簿。24方木牍、133只竹简上所承载的40 000余字，呈现了有关东海郡政府组织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学者研究发现，西汉东海郡郡一级政府的两大机构——太守府和都尉府加起来，正式编制39人，实际在职人员107人，超编68人。其中，由中央任命的职位只有4个，占总编制的10.2%、实际在职人员的3.7%。这4个职位就是太守府的长官太守和佐官太守丞，都尉府的长官都尉和佐官都尉丞。

东海郡的例子代表了这八百年间地方政府的人员和权力结构：由中央任命的外地人官员居于领导地位，但数量极其有限，属于绝对少数；由地方长官辟除的本地人官员居于从属地位，但占据绝对多数。在这种人员和权力结构之下，地方行政实际上实行的是长官的“元首负责制”，“无论是县令长还是郡守，都有专任一方之权，对一地事务负有全权之责”。由于越来越严格的避籍制度，长官往往是外地人，单车赴任，除了朝廷的权威，别无仗势，必须依靠“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下属进行统治。在史料当中，我

们偶尔能够看到本地人下属给外地人长官下马威的例子。比如，京兆（今陕西西安）杜陵人朱博被派到山东担任琅琊郡太守。到任之后，他发现几位最高级别的属官都没有来拜见，问为什么，说是病了；再问，说是本地习俗，每当新太守到职，都要先派专人去慰问，然后这几位德高望重的才有面子出来做事。朱博闻言大怒，胡子都立起来了，拍着桌子说，我看你们齐国人还真想把这样的不正之风变成习俗吗？然后立即下令全郡属官集合，当场选拔可用之才，下状委任。那几个没病找病的高级属官统统罢免，被轰出了府门。“郡中大惊。”

朱博遇到的应当属于特殊情况。总体而言，中央委派的地方长官与本地官员之间是能够互相配合的。朱博能及时罢免装病属官，也表明了汉朝中央的权威和郡太守的权力。郡太守承担着承上启下、联结中央与地方的功能。作为中央向地方派出的最高代表，他负责传达、推行中央政令，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利益。作为本郡的最高长官，太守负责选拔官员，组织政府；因地制宜，颁布地方性法规；管理司法刑狱，拥有包括死刑核准权在内的司法权；打击豪强，维护地方稳定；监督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每到春天，太守都要亲自循行所辖各县，考察县政优劣，这叫作“行春”；到了年底，自县长以下的全体县官聚集郡守府，“课校其功”，进行面对面的业绩考评，成绩优异的上报中央予以嘉奖，成绩太差的，“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由本郡的相关部门进行申斥。西汉后期，丞相萧望之之子萧育担任扶风郡茂陵县的县令，年终考核排第六，漆县县令郭舜排倒数第一，应当受到申斥。萧育为郭舜辩护，扶风太守怒，说，你才排第六，勉强不受责罚，有什么脸面为别人说话？散会之后，太守下令，萧育接受申斥。萧育挥一挥衣袖，扬长而去。当然，像萧育这样有恃无恐的属于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郡太守可以决定本地官员的命运，包括通过察举制向中央推荐本地人才。而这种推荐制度，开辟了地方人才进入中央的通道，实现了帝国范围之内在高层人才上的互通。

如果为汉代简单勾画一幅人才流通示意图，大致如下：在较低的郡县属官层级，人才在本郡范围内流通，本地人治本地事；在较高层级，包括中央官和州郡长官、佐官层级，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汉朝人治汉朝事。沟通上下两个层级的，就是察举制度。

在汉代这样的人员和权力结构下，当然无所谓中央的选任集权。由于地方长官拥有极高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又由本地精英构成，因此可以因地制宜，在不违反中央规定的前提下，制定符合本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实现高效的地方治理。那么，这种人员和权力结构，是否意味着中央有效控制的不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于汉代中央控制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有学者这样描述汉代郡的功能：“它虔诚地接受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又忠实而迅速地将其传达到县乃至乡里基层，使皇帝的旨意、帝国

的政治信息，顺畅地由通都大邑传布于穷乡僻壤，从而将远离京师乃至数千里之遥的一个个乡里、一个个臣民联结起来，形成步伐整齐、完整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这种说法可能会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它符合人们对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总体印象。也就是说，在选任集权缺席的情况下，中央控制同样有效。

从隋朝起，帝制中国地方官的选任进入第二大阶段——选任集权时代。地方长官失去了辟除属官的权力，地方官一概由中央任免，实行任期制、避籍制，本地人原则上不得任官本地。我们以唐代为例，跟汉代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选任集权是怎么回事了。唐代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都属于统县政区。在郡一级，汉代的东海郡政府正式编制39人，由中央任命的官员4人，占总编制的10.2%。唐代最高级别的上州州政府的正式官员编制是76人，全部由中央任命，这就是绝对的选任集权。选任集权的出现，“乃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

选任集权出现于隋，通常的解释是两个：一是从必然的角度说，中央要打击世族豪强对地方政权的垄断，必然要把地方官的选任权抓过来；一是从偶然的角度的说，隋朝以前的北齐有个荒唐皇帝，因国库空虚就开始卖官，卖无可卖的时候，就把原本由地方长官辟除的职位也拿过来一起卖。皇帝的一时荒唐被固定成为惯例，到隋朝再用制度加以固定，就变成地方佐官的中央选任制度。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隋王朝的性格当中具有强烈的制度建设倾向。这个短命的王朝创造了那么多的制度，比如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省六部制、官吏分途制，以及地方佐官中央任免制。这种创造力简直可以媲美秦朝——同样短命，同样活力四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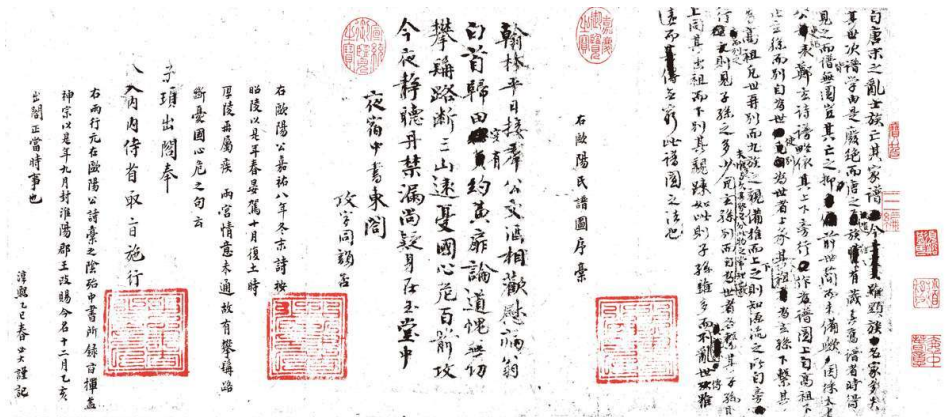
选任集权的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选任集权导致了选任制度的变质。选任集权为中央的人事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由吏部的吏部司负责选任；芝麻粒大小的业绩，也要由吏部的考功司核查。吏部成了唐代中央事务最多最繁忙的单位之一（另一个是管理财政的户部），不仅负责处理文书的胥吏数量巨大，而且整个机构都处在一种终年“笔头不倒”的状态。但是即便如此，以帝国幅员之广大，官员数量之巨大，吏部所能依靠的除了简单的面试，也只能是对文书档案的核实，很难胜任为官择人、优选劣汰的责任。为了实现选任集权的目标，维护官僚集团的稳定，选任制度逐渐发生了变质，从强调绩效、能力到强调学历、资历，论资排辈成了最稳妥、安全的选任标准。选任背离了初衷。

另一方面，选任集权导致了地方治理的日趋疲软。选任集权是和官员的任

期制、避籍制联动的。官员队伍不断膨胀，职位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扩大职位的供应量，就不得不缩短任期，官员在地方上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哪怕是一个有理想的官员，也根本没办法熟悉地方情况，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决定。比如宋朝的王安石，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雄心、能力最出众的政治家了。他做常州知州，刚一到任就搞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结果怎么样？十个月之后，王安石奉调高升，工程烂尾，工地上出现了人员伤亡，老百姓怨声载道。王安石后来总结教训，抱怨天公不作美，抱怨上级、下级不配合，却不肯做一点自我检讨。实际上，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正是王安石自己，情况完全不熟悉就忙着开工。王安石有个好朋友，就曾经写信批评王安石是“初不能无意”。这句话王安石是非常在乎的，专门回信去辩白。“初不能无意”就是“有意”，“有意”什么？“有意”创造政绩。

选任集权制度下，地方官忽视地方利益，片面畸形追求政绩，成了一种新病症。原因很简单，选任集权制度下，地方官中央化了——不管工作地点怎样僻处一隅、远离首都，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中央派出的官，他们的升降浮沉都是由中央所决定的。因此，在中央化了的地方官的心中，皇帝、中央、朝廷的意愿永远是第一位的，本地的利益则是第二位的。像欧阳修这样走到哪里都安静踏实地做事，不一味地追求政绩，只管当地老百姓需求的官员，简直凤毛麟角。



图三六：北宋 欧阳修 《行书自书诗文稿卷》（局部）

《行书自书诗文稿卷》，欧阳修书，纸本，66.2厘米×30.5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卷诗文稿包括《欧氏谱图序》和《夜宿中书东阁》七律一首。从跋文可知前者作于作者四十九岁，后者作于作者五十七岁。《欧氏谱图序》载：“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

次，谱学由是废绝。而唐之遗族往往有藏其旧谱者时得见之，而谱皆无图。岂其亡之？抑前世简而未备欤？因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上自高祖，下止玄孙，而别自为世……此谱图之法也。”后附《夜宿中书东阁》：“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欢慰病翁。白首归田徒有约，黄扉论道愧无功。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今夜静听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稿卷行笔轻快，笔韵流畅，虽出现多处涂改，却更显朴素自然，无丝毫雕琢之痕。

当地方利益遭到了忽视甚至践踏，其实就很难说这样的地方治理是有效的了。选任集权对于地方治理的影响，恐怕还是消极面多一些。如果我们反观汉朝，在没有选任集权的时候，也能实现中央的有效控制，那么选任集权的价值就值得推敲了。但是，选任集权却持续了一千三百年。那么，追求选任集权的帝制中国是陷在了制度自身发展的惯性之中无法自拔，还是迷失了作为政权应当追求的目标？

利益配置的矮化与隔离

分类是管理制度的进步，然而，在传统中国，每一次大分类的产生都伴随着对某一群体的矮化和隔离，制度中所透露出的文化，耐人寻味。

如何对待功臣？

《史记》记载，陆贾常常在汉高祖面前赞美诗书。高祖觉得聒噪，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乃公”就是“你老子”。司马迁叙事生动，意思是：你老子我骑在马上打下来的天下，要《诗》

《书》有个屁用！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汉高祖虽然没文化，但是有见识，“不悻，而有惭色”，终于还是俯下身来，倾听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1]“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也因此成为后世天下初定之后、文治转型之际必然要引用的典故。帝制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模式是朝代更替，朝代更替多数靠武力达成。靠武力打下来的天下，不能靠武力治理；要想实现长治久安，新王朝必须迅速实现文治转型，用文官，兴教化，修制度。问题在于，当武力集团的首领顺利登上皇帝宝座，想要“下马”治天下的时候，那些曾经为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军人该怎么安排？这是一个有关利益配置的顶层设计问题，也是一个超越断代乃至国界的共性问题。

中国人看历史，特别重视“兴亡之际”。“际”指时间的交界。“兴亡之际”也就是新旧两个朝代、两种政治力量交替之时，是旧的灭亡、新的兴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接连上演，亡国之君的荒淫残暴，开国君臣的文韬武略、励精图治，你来我往的斗智斗勇，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起伏。

所有这些，既是官修史书的叙述重点，也是民间记忆的主要内容。凡有井水饮处，谁没有看过《三国演义》《隋唐英雄》，听过《水浒传》《说岳全传》？

然而，如果仔细追究，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对“兴亡之际”的关注，其兴奋点基本都是在“兴亡之迹”上。中国人关注“兴亡之际”的历史，主要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人物和事迹，极少深入观察那些隐藏在表面事迹之下具有共性的东西，从中思考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原则。

我这样说，定然会有人不服：谁说传统趣味不关注共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难道不是具有共性的政治原则吗？没错，把民心、天命与统治的合法性、王朝的兴亡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逻辑的王朝兴衰法则，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共性的总结。事实上，传统中国对“兴亡之际”的关注角度和描述方式，也多半是从这个法则生发而来。问题在于，这个总结太简单了。它用道德笼罩了一切，也遮蔽了思想，让传统的思想者很难去触及那些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极具价值的、具有共性的真问题。比如，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王朝文治转型当中军功集团的处置问题。

凭借功劳分享权力，这是军功集团的必然诉求。军功集团又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开国功臣，比如明朝的徐达、常遇春、蓝玉等，人数不多，但是势力强大，在军队和国家中具有较大的权威和影响力。他们在战争岁月积累下来的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具有抗衡皇权的力量，是皇帝格外忌惮的。这些人想要分享政权，想要世世代代的荣华富贵。军功集团的下层是广大的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这一大群人通常被视而不见，但是他们存在，也希望从新政权中得到好处。

军功集团是新王朝的缔造者和核心支持力量。通常情况下，新王朝当然希望给他们一些利益，以此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持续支持。新政权所能给予的，大概有这四样：第一，物质奖励，比如金钱、绢帛、土地的赐予；第二，各种荣誉称号，这在古人看来非常重要，“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2]，荣誉关系教化，具有振作社会风气的功能；第三，特权，比如减免刑罚的特权、占有土地的特权；第四，官职，即允许立功者把功劳“折合”成职位，进入政府服务。

上述四样赏功利器中，官职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官职之中可以隐含物质、荣誉和特权，名实兼备。而军功集团最想要的，也是新政权最不能够大大方方给的，恰恰是官职。马上得天下，下马安天下，新政权已经扩大成为整个国家利益的代表，它必须建立高效的统治机构，吸收高素质的行政官员，才能快速实现文治转型。但是，大部分立功的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行政历练和才干，显然并不符合文治转型的需要。而且政府的职位数目有限，也无法容纳所有的立功者。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新政权的手中。当然，军功集团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是军人，是武力集团，就像评书里常说的“胯下马掌中枪”“都不是吃素的”。武力可以用来保卫政权，也可以用来捍卫自身的利益。文治转型中军功集团的处置问题，说白了就是军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那么，在王朝文治转型的过程当中，究竟怎样做，才能在国家利益与军功集团的利益之间获得平衡？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文治转型期，事实上，它与王朝统治相始终，只不过在王朝初期和战争频繁的时期更为突出。所以，我们的问题也可以上升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朝廷怎样对待军功集团分享政权的诉求。简言之：立功军人想做官，朝廷该如何应对？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魏式方案”，第二种是“隋式方案”，第三种是“宋式方案”。三种解决方案分别来自北魏、隋和北宋，代表了三种思路，这三种思路在其他朝代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说到“魏式方案”，就必须提到一场轰动朝野的恶性事件。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近千名军人明火执仗，闯入征西将军张彝的府第，把张彝一把推倒在地，狠命地殴打，又放火焚烧了张府。张

彝之子左民郎中张始均本来已经跳墙跑了，又回来为父亲请命，结果被“生投之火中”，活活烧死。张彝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又过了一宿，便死了。张始均的弟弟张仲瑀则被殴致重伤。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军人们如此对待张氏父子？

这起恶性事件的起因，就是立功军人的做官问题。按照当时的制度，军人凭借在战争中斩获首级的数量建立功勋，积累做官资格。经过多次战争，大量立功军人拥堵在吏部的门槛之外。如何安置他们，成了国家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大多数立功军人“不解书计”（不识字，不会算术），不具备起码的官员素质；另一方面，职位数量有限，根本没办法满足军人的做官需求，“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朝廷出现了限制立功军人做官的主张，开始严格审查立功证书，借机刷掉了一些人，而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则正面提出了“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3]的建议，即改革选任制度，排斥武人，不让他们进入官员队伍。张仲瑀的建议等于要斩断军人分享政权之路，于是，愤怒的军人直接要了张氏父子的性命。

张家父子遇害后，为息事宁人，北魏朝廷不敢再改革，退回了原地。军人积累功劳当官的制度保留了下来。职位供应不足，大家就一起排队，先到先得——即便某个人就是那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来得晚也不能上。这就是“魏式方案”一味求稳的思路，国家利益屈从于军人利益，牺牲整体和长远来满足部分的需求。这样的方案当然不能持久。事实上，“魏式方案”的出台就已经暴露了北魏统治的混乱与孱弱。

“隋式方案”在制度上表现出了很好的创新能力。“隋式方案”的核心是给功臣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但是不允许他们任实职，掌实权。比如，曾经因为参与平陈战役立下大功的麦铁杖就因为不识字，被“放还乡里”，没有获得一官半职。“隋式方案”始于文帝，炀帝又专门颁布诏书，反思用军人当官给国家治理带来的困扰，重申：从今以后，军人所立的功勋，都不能再“转换”成政府职位，文职武职都不行……若吏部擅自拟用，则由御史提出弹劾。“隋式方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有功劳、没文化的军人排斥在政府机构之外。

结果，“隋式方案”导致军功集团对隋杨政权离心离德，把军人推向了己方的对立面。隋末李密数说隋炀帝的“十大罪状”，其中第十罪就是炀帝对军功集团的背信弃义：“既立功勋，须酬官爵”，按照本来的约定，军人立功就应当用官爵来酬谢；可是隋炀帝不守信用，“志怀翻覆，言行浮诡，危急则勋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4]，危急时刻赏格高悬，用官爵来激励军人为他卖命，等到天下太平，却不肯兑现承诺。李渊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说：“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5]李渊、李密都是从隋朝统治集团高层里分裂出来的反隋力量，他们对隋朝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

“隋式方案”对问题抓得很准，给出的药方也很对症——军人当官对国家行政造成了损害，我们就干脆不要军人当官；但这个方案有失厚道，有欠公平，彻底忽略了军人的历史贡献和利益诉求。就本质而言，“隋式方案”有理性而无感情，有现实而无历史，简单傲慢，唯我独尊，充分体现了隋朝聪明、激进、简单、粗暴的政治性格。所以，它也不可能长久。

关于王朝在文治转型中如何对待军功集团的问题，我们已经谈到了“魏式”和“隋式”两种方案。“魏式方案”的特点就是不分优劣，一概允许军人做官，让国家利益屈从于军人利益；“隋式方案”则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试图把军人彻底排除出行政官僚群体。向右的“魏式方案”与向左的“隋式方案”都没能有效解决军功集团的处置问题，最后上场的是“宋式方案”。

“宋式方案”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两部分。宋朝对待军功集团上层的典范是“杯酒释兵权”。话说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忽一日把老战友们召进宫来，把酒言欢。半酣之际，太祖从容坦言，担心诸位可能在下属的邪恶引导之下被迫篡权。功臣宿将慌忙请示该怎么办。太祖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6]功臣如蒙大赦，双方成交，皆大欢喜。这种欢喜融洽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北宋灭亡。“杯酒释兵权”应当是有事实基础的，但它后来被附加的意义绝对超越了事实本身。它代表着宋朝国家与军功集团上层达成的双赢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功臣交出禁军兵权，承诺不干预国家治理，以此来换取带有世袭性质的特权，包括优先与皇族结亲、子孙通过特殊途径做官等特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优先向功臣（基本上也是外戚）子孙开放的职位，都不在掌握实权、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以特权换政权求双赢，这就是宋朝对待军功集团上层的政策。

对军功集团的下层，宋朝也有巧妙的制度安排，通过军队的专业化和军人职业化，用国家财政把军人养起来。宋朝的军人是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具有一个最显著的外在特征，那就是脸上或者手背上有刺青。从士兵到军官，位阶可以随资历、军功增长，但是身上这个特殊的标记一直都在，一日刺面，终身为兵，全靠国家财政养活，做到衣食无忧是没有问题的。前代军人必须进入官场才能实现的分享政权的诉求，宋朝军人在军队系统内部就可以实现了。

在“宋式方案”中，军人的利益、功臣的诉求都得到了基本满足，同时功臣后裔和军人在政府中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宋朝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北魏和隋朝是完全相反的。北魏和隋的思路是怎样阻止军人进入政府，宋朝

的思路是怎样在政府之外解决军人的利益诉求。军人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解决，也就没有进入政府的问题了。“宋式方案”既充分照顾了军功集团分享政权的利益诉求，又有效地防止了功臣干政、军人拉低行政水准问题的发生。与“魏式方案”“隋式方案”相比，“宋式方案”更为务实，能在妥协中求共赢。这种妥协的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基本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参见 [汉] 司马迁撰，[南朝宋] 裴骃集解，[唐] 司马贞索隐，[唐] 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七《酈食其陆贾列传》，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699页。

[2] [唐] 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一四《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9页。

[3] [北齐] 魏收撰：《魏书》卷六四《张彝传》，中华书局974年版，第432页。

[4]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中华书局975年版，第225页。

[5] [宋] 司马光著，[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49页。

[6]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页。

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在传统京剧舞台上，演员上下场的门上各写着两个字，上场门上写“出将”，下场门上写“入相”。“出将入相”这个词的最早出处，可能是唐初李百药在《北齐书·清河王岳传》结尾所发的议论，“清河属经纶之会，自致青云，出将入相，翊成鸿业”。出将入相，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文武资质兼备：出可为大将，统大兵，平寇乱，保家卫国；入可为良相，领百官，理庶政，经天纬地。出将入相的故事到宋朝基本上就演不下去了，因为制度已经不允许。出将入相制度的前提是，官员可以在文武职位之间自由穿梭。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文武分途，文官和武官各有各的品位和职位体系，文武之间泾渭分明，各自流淌，不相掺杂。

欲明从“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的变化之流，必溯其源。先从一出“将相和”来看先秦时期的文与武。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这是对廉颇的介绍，典型的武将形象，靠军功赢得地位、荣誉和信任。“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蔺相如的人生起点不高，但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凭借超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外交才干，蔺相如出使强秦，维护赵国利益，在著名的渑池会后，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于是，廉颇的内心失衡了，他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廉颇扬言要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则主动躲避廉颇。人问其故，蔺相如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言大惭，负荆请罪，二人和好，结成刎颈之交。在这个故事里，通常认为，廉颇是“将”——武官代表，蔺相如是“相”——文官代表，“将相和”意指文臣与武将的团结。

这是后来人的看法。那么，当时人如何看廉颇和蔺相如的身份？蔺相如其实也可以是将军，比如廉颇负荆请罪的时候，嘴里说的是：“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这个“将军”指的是蔺相如。而且，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就会发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记载：“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可见，蔺相如也能统兵打仗。而廉颇这个我们认为是武将代表，后来也做过相国。

蔺相如可以为“将”，廉颇可以为“相”，这才是先秦时期文武关系的真面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在一般的认识中应该是文官形象，但是他曾多次统兵出战。公元前347年左右，他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即“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楚国公子春申君黄歇做过最高行政长官

——令尹，看起来似乎也是颇具宰相风度的文官，但是他也有“将兵”救赵的事迹。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文武区分跟我们今天所想并不一样。为了获得清晰的认识，我们把“文武之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个人的才能、气质方面，存在文武差异。文人通常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长于治国安民；武人长于战斗，从事军旅之事，适于平祸乱，安边境。第二，在政府职位设置上的文武区分，有些职位主要为应对军事问题而设，我们叫作“武职”，有些职位则重在治民，与军事关系不大，我们叫作“文职”。第三，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文武分途，文官与武官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官僚群体，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治理功能。这三个层面的文武差异也是三套不同的文武区分标准。

用上述标准衡量，在廉颇、蔺相如的时代，人事管理方面的文武分途尚未展开，将相之间并无制度阻隔，可以出入无阻。才能、气质方面的文武差异，在廉颇与蔺相如身上是很明显的，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人才培养的新趋势。春秋战国以前，封建贵族的特征是文武兼修并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官僚制的萌芽兴起，文武兼修的贵族教育日渐没落，文、武两方面的知识技能开始分化，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的知识技能训练产生了才能、气质各有偏重的人才。蔺相如、商鞅、苏秦、张仪所受的多是文士的训练，廉颇的训练则偏“武”。

就职位而言，在廉颇、蔺相如的时代，文武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廉颇为上卿，蔺相如也为上卿，二人之间应当会存在职务分工，但头衔是一样的。在上卿当中，蔺相如位居廉颇之上，因为赵王认为蔺相如的功劳比廉颇大，而蔺相如立功的场域是外交。后来廉颇被任命为相国，则应当是因为他对赵国的军功。由此可见，当时，“上卿”“相国”这一类的头衔，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是高级文职，相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用来显示任职者的地位和权势”，“往往是君主对有功之臣或亲信贵戚的一种酬谢，任何高官都有可能担任其职”。^[1]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文武职位界限的模糊状态？

文武职位界限模糊，军事与民政合一，政府组织的分工不发达，正是国家政权发育早期的普遍特征。我们讲中国史，谈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发育，比如女真人的猛安谋克、蒙古人的千户百户、清代的八旗，往往特别强调这一特征。但是，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华夏国家的政权发育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过程。事实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华夏国家政权正处于发育的早期。

秦汉至隋唐，华夏国家政权发育日渐成熟，文武职位之间从界限分明发展

到序列严整。秦汉职位的文武界限已经相当鲜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百官朝贺，分成文武两个方阵，东西对立：“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2]这是职位的文武分立在朝堂上的具体表现。还有更具体而细微的立春赏赐，“武官倍于文官”“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3]不仅中央官分文武，地方官也分文武。汉成帝时，长安恶少年团伙谋杀官员，事先抓阄分工，“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空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4]。隋唐政府组织的文武分工越发细密严整。《旧唐书·职官志》云：“近代已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员，各理所掌。”唐代的职事官明确区分为文职事官和武职事官两类。三省六部及其下属机构的职位均属于文职事官；诸卫大将军以下，诸卫、率、府的统兵官属于武职事官；卫府长史等文职僚佐仍然被归类为文职事官。

到唐代为止，人事管理方面的文武分途仍然没有出现。隋唐统治集团的上层保留着“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能文能武的传统，所以在平陈战役中立下大功的贺若弼才会“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5]。不仅上层出将入相，普通官员的选任也不分文武，“随才录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台省军卫，文武参掌”。^[6]

宋朝“文武分途”出现之后，这种情况就彻底改变了。在宋朝，就人事管理制度而言，文官与武官是完全分立的，各有各的品位标志、入职方式、升迁路径和任职范围，“其迁次任使，皆不相参涉”^[7]，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文官”与“相”所代表的文职，“武官”与“将”所代表的武职，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

范仲淹身上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文武分途”。宋仁宗时期，宋和西夏爆发战争。战争初期，宋朝屡战屡败，最终是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等文官坐镇，才扭转了战局。这几位都是进士出身，典型的文官，临危受命，也不辱使命。仁宗于是决定把这几位的官衔从文官换成武官。一方面，大概是想做到名实相符；另一方面，武官的俸禄要高很多，这也算是对功臣的嘉奖。但是，范仲淹连上三表坚决抵制，冠冕堂皇的话都说完了，只好在最后一表中拿身体说事儿，硬生生把自己抹黑成一个头晕目眩流鼻血的病人。范仲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他如果被换成武官，就几乎不可能再往上走，最终只能做到副宰相。在实际中，范仲淹可以统兵，但他只能是“羽扇纶巾”的儒将，永远不会戴上武将的帽子。“出将入相”的佳话到此宣告终结。

文武分途之后，国家权力的分配不是均衡的，而是“一边倒”地倒向了文官。自宰相府以下，中央最高级别的职位，最重要的权力，比如参与最高

决策的权力、军事指挥权、财政权、司法权、行政监督权均由文官掌控，武官不得染指，地方权力也基本掌握在文官手里。北宋名臣蔡襄曾经宣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8]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文士包打天下的时代。武官的职责和权力被规范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比如参与军队的管理，还有基层的经济事务的管理。

因此，就本质而言，文武分途不是平等的职责划分，还带有价值分等的意义。从此之后，文官的身份地位集体居于武官之上。文官可以参与边防事务的管理，比如组织战争防御。这些功绩对文官积累资历，升到宰相高位是非常有帮助的，范仲淹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武官却没有这个便利。武官地位遭到集体矮化。

从“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从华夏国家的政权发育角度来看，是一个进步，但它带来了武人群体地位的下降，从而导致华夏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弱化。鱼与熊掌，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不能得兼，令人扼腕。

^[1] 参见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年版，第74页。

^[3]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二卷》卷下，中华书局990年版，第8页。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〇《酷吏·尹赏传》，中华书局196年版，第3673页。

^[5]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中华书局197年版，第145页。

^[6]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五〇八《邦计部·俸禄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8页。

^[7]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七五《苏骥驥墓碣铭序》，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78页。

^[8] [宋]蔡襄：《国论要目十二事疏·任材》，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〇〇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册，第378页。

危险的兵权该怎么管？

兵权，就是拥有、组织、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力。武力、兵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保障政权和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为建设保驾护航；也可以毁灭生命、破坏秩序、颠覆政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兵”与“国”的关系，也就是武装力量与朝廷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传统政治理论认识兵权的出发点。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力量，必须重视，这是《孙子兵法》对“兵国关系”开宗明义地简单概括。在简单概括之后，《孙子兵法》随即转向了围绕军事力量建设的技术探讨。此兵家谈兵，其核心关注是“术”而非“道”。

严格说来，“兵国关系”是政治家的课题。政治家谈兵，能谈得既有历史感又有政治学思考，既能具体又能深入的，当属唐代的杜佑。杜佑其人，绝对是中国传统史家中的一个异数，我们在《帝王的礼制与情感》中已经提到过，这里再进一步介绍下。杜佑生于公元73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他二十一岁，亲历了八年战乱，目睹了唐朝统治所遭遇的猛烈撞击及秩序的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平定三年之后，他开始写作《通典》，同时积极地投身于唐王朝的复兴大业。杜佑长期供职于唐王朝经济最发达的浙西、淮南地区，做过十四年的淮南节度使。淮南是东南财赋集中转运、供应首都的枢纽和关键，扼守着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就是在这里，杜佑完成了不朽巨著《通典》。《通典》成书两年之后，杜佑入朝为相，一直到死，一共做了十年宰相。这位伟大的时代弄潮儿耗时三十六年完成的巨著《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现代学者评论说：“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邦致用思想，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通典》的写作与杜佑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它既体现了一位优秀史家的广阔视野和理性态度，又体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迎难而上的雄浑气魄和担当精神。因此，杜佑对“兵国关系”的分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从大的原则上讲，杜佑延续了《孙子兵法》的说法，承认“兵”之于“国”的重要性。杜佑比《孙子兵法》更进一步，他强调兵权的处置一定要得法，“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如果兵权处置得当，那么国家就可以治安；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危乱。那么，怎样才是“制得其宜”？杜佑认为，在郡县制之下，西汉的做法是最好的。它分为日常兵力布防与战争动员机制两部分：在和平状态下，日常的兵力布防，采取“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策略，“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以确保中央对地方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防止地方产生割据倾向，威胁王朝的统一和皇

帝的统治。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启动战争动员机制，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帅，临时发动军队（包括为数不多的常备兵和民兵），将帅与军队之间根据皇帝的命令临时结成统属关系。这种统属关系“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即伴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虽卫、霍之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即使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功勋卓著的将领，一旦还朝，手下的兵也要解散回归原地。战争动员机制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能够集中力量抵御外侮，确保国防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将领对军队的指挥权依靠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和解除，避免了统帅与军队之间结成利益集团，威胁到皇帝和朝廷的统治。

日常的兵力布防讲究“内重外轻”“强干弱枝”。战争动员机制强调将领与军队之间的临时结合，一切以皇帝命令为重，以中央朝廷的利益为重，这就是杜佑理想的兵权处置方案。用这套标准来衡量唐朝前期，无论是兵力布防，还是战争动员机制，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就已经被打破。首先，边境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依靠皇帝诏令生成和解散的临时关系，而是长期统属，边防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变成了职业化的常备军。军人之间，军人与将领之间，特别是与节度使之间形成了长期互相依赖的关系，进而胶结成为军事利益集团。其次，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玄宗天宝年间，十个节度使的兵力总和为四十九万，其中安禄山所掌握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总兵力超过十八万，而驻扎在首都附近、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九万，不及安禄山兵力的一半，又拿什么来震慑藩镇呢？“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最终，安史之乱爆发，藩镇走向了唐中央的反面，演变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杜佑的时代，首要的政治课题就是调整“兵国关系”，重建唐中央对兵权的有效控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不是在唐朝，而是在宋朝，中间经历了晚唐五代漫长的调整。就像人的身体具有自愈的力量，人类社会也自带拨乱反正的属性，物极必反，乱世的表象之下往往蕴藏着调整改造、重归秩序的巨大潜流。经过五代乱世，进入宋朝之后，出现了帝制时期最精密的兵权分割机制。

这套兵权分割机制由禁军更戍、边防军的“双层不黏合结构”及中央的兵权分掌三部分组成。

先说禁军更戍。宋朝建立之后，将地方精兵全部筛选一遍，把个儿高的、身强体壮、武艺高强的都调到中央，编入禁军队伍。禁军就是中央军，是皇帝卫兵。这样一来，地方上就只剩下了次等兵。这些次等兵被叫作“厢军”，他们没有训练和作战任务，只管打杂，比如修城墙，挖护城河，看守草料场。宋朝禁军的军营全部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也就是说，他们的

随军家属都是在开封地区集中居住的。那么，地方没有了兵，边防只能靠禁军来守。禁军戍边，通常以“指挥”（军事单位，步军定额五百人）为单位调动，每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回首都来与家人团聚，这就叫“更戍”。更戍的士兵，家属都在首都，必然心向朝廷。正常情况下，士兵更戍在边疆最多待一年，根本不可能跟当地势力发生密切联系。

再说边防军的“双层不黏合结构”。禁军更戍是以“指挥”为单位的，原有的禁军组织系统因而被打破。来自不同组织系统的各个“指挥”到了防区之后，被重新组织起来，编入边防军的统兵体系。而这套边防专属的统兵体系，另有一套人马来担纲。这套人马不是脸上刺着字的军人，而是武选官。总体来看，宋朝的边防军是一个“双层结构”，下面是军人，上面是武选官，而武选官和军人之间是壁垒森严的，武选官是官，军人是兵，二者“不黏合”，武选官管理、约束军人，从而保证军队对朝廷的忠诚。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宋朝的边防军则不仅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之上还有“流水的官”，而这“流水的兵”与“流水的官”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他们永远分流。这样一种“双层不黏合结构”之下的边防军，基本上不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

最后来看中央的兵权分掌。宋朝的宰相不统兵，另外设有比宰相低半级的枢密院专门协助皇帝统兵。枢密院有发令权，但是军队的日常训练管理不掌握在枢密院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三衙的手里。三衙就是禁军的三个最高司令部：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任何跨越统属关系调动军队的行为，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哪怕救火也不行。灭火虽有功，但调动了不该调动的军队，照样是犯错误。三衙的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军官的选拔每三年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1]，真验真看，实为辛苦，有的年份一折腾就是十一天。



图三七：明 彩绘本《出像杨文广征蛮传》

明代彩绘本《出像杨文广征蛮传》是根据《杨家将演义》所绘的故事绘本。此套绘本共两册，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它对北宋杨业、杨延昭等人保家卫国的事迹进行演义，讲述杨家四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事迹。北宋抗辽的杨家将、南宋抗金的岳家军，以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可谓典型的“铁打的营盘”。文中图片展示的是在闽、粤、赣、浙流传甚广的杨文广征蛮故事。右图中杨文广与敌方在城下作战，敌方将领中计落入陷阱被俘；左图中是杨文广正在劝降被束后的敌方将领。画面着色饱满，人物表情生动。出像类小说多为单色的木刻版，此为不多见的彩绘本。

“兵权宜分”的理念被宋朝人用制度设计表达得淋漓尽致，远远超过了杜佑所赞美的西汉。但是，这只是管控的有效，是防止威胁皇权、威胁中央控

制的有效，却不是军事力量管理组织建设的有效。中国人看历史，之所以不待见宋朝，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宋朝军事上不行。其实宋朝的军事也不算太弱，关键是它遇到的敌人都太强大——当北方游牧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全副武装要征服世界的时候，农耕民族其实很难招架；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抵御蒙古人时间最长的，就是宋朝了。把北方因素考虑在内，宋朝在军事上不算太差。但是，它的制度内在的消耗性太强了。这种内在的消耗性，归根结底来自中国人对武装力量危险性的认知角度。中国人从“兵权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兵权，把兵权当作一种可以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因此，当然要费尽心机去分化兵权，以策皇权的安全。

相比之下，英国人看兵权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一个有趣的巧合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常备军在中国与欧洲出现的时间相差不远，中国是在晚唐五代，也就是10世纪，欧洲是在13世纪，略晚一点。但是，两方面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在帝制发展一千多年之后，而欧洲则是在封建社会贵族制度下。在贵族势力强大的英国，常备军规模很小，但还是让贵族们感到不安。而他们的担心，与杜佑的担心完全不同。英国人担心的是，国王有了常备军的武力做后盾，会走向专制，忽视国会的意愿。由于这一担忧，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通过《兵变法》，规定“除非得到议会同意，否则和平时期在王国领土内维持（或招募）常备军队，是违法的”，军队置于国会的控制之下，军费需每年由国会签署法案通过。^[2]也就是说，从此之后，英国军队的合法性是通过每年一度的国会法案续约的，合同一年一签，至今如此。对于兵权，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了不同的担忧，从而催生出不同的制度。

^[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 迁补之制》，中华书局985年版，第4878页。

^[2] 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珍藏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7年版，第85页。[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24—625页。

刺青后是否有回头路？

募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武人群体，它出现于晚唐，经五代入宋，成为宋朝武装力量的主体成分。全面的募兵制是宋代所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从今天留下来的文字看，宋朝人对募兵制几乎没什么好感，从头到尾都在批评，批评它效率低下不能打，批评它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包袱。但是批评归批评，从头到尾，宋朝人并没有放弃募兵制。那么，什么样的兵是募兵？募兵跟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兵有什么不同？募兵制的出现，对于宋朝国家和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宋朝人批评了那么多，却仍然不能放弃募兵制？

我们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从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看，募兵就是职业兵，一日为兵，终身是兵。募兵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靠当兵为生，养活自己和妻子、儿女。募兵制之下的军人很容易分辨，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外在特征，那就是刺字，有时候在手背上，通常是在脸上，刺字的内容是军队番号。根据史料判断，军人调动升迁，从一个番号调到另一个番号，或者军队番号调整，军人脸上的字也是要随着修改的。宋仁宗的时候，提高了京东（现在的山东）地方厢军（地方部队）的训练等级，从普通厢军提升为“教阅”厢军。京东地方军政首长提出的方案是要在士兵的脸上“加刺‘教阅’字”，还好皇帝没有允许，只是在番号上加了这两个字。^[1]

为什么要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呢？刺字又叫“涅字”，“凡兵，非涅不为兵，贵其辨于民也”^[2]。脸上刺的字，遮不住，抹不掉，让士兵再也不能混同于普通农民。刺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3]。士兵刺青为记，是五代乱世的发明，宋朝继续沿用，招兵就叫作“招刺”。

在中国文化中，对身体发肤的有意损毁，若来自外部，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或者羞辱，比如刺面，古称“黥”；如果是自己有意为之，那便是对正常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背弃。募兵在面部显著位置进行无法修复的破坏，这就等于是弃绝了平民社会的正常生活。就传统观念而言，募兵这种脸上刺着字的兵，从一开始出现便具有隔离、矮化的意味。后汉时，大将郭威发展势头极猛，篡权之意呼之欲出。竞争对手派人来试探，郭威笑呵呵地指着自己的脸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4]意思是说，我行伍出身，一个刺了青的兵，怎么可能当皇帝？可是，郭威最终成了后周太祖。五代乱世通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募兵集团凭借武力攫取资源，虽然是刀头上舔血，险中求生，但是日子还是过得比普通老百姓要滋润。在他们险象环生的军旅生涯中，蕴藏着飞黄腾达的机会，所以，乱世之中，当兵对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泼辣生命来说，还是极具吸引力的。

宋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募兵集团的生存状态。宋朝开始于公元960年正月的那场兵变。募兵为自己的领袖“黄袍加身”，类似的戏码在五代乱世并不新鲜。按照常规，“黄袍加身”之后还会有个“保留节目”——作为回报，领袖要允许募兵洗掠首都。这是一场事先约定的抢劫，时间可以是三天，也可以是五天。三天之内，整个城市都是募兵的战利品，任意抢，随便烧；三天之后，新政府出面恢复秩序。这就好比说，在那三天之内，新皇帝是募兵的领袖——强盗头儿，拥立他的军人是强盗，首都都是强盗们的战利品；三天之后，皇帝变脸去做全体臣民的君主。然而，在公元960年正月，这一套彻底行不通了。进城之前，赵匡胤就跟士兵们约法三章，必须保持首都的秩序，安静地进城，烧杀抢掠一概不许；你们想要的，朕会赏赐给你们，保证丰厚，但必须由朕赏赐。然后，这支大军就纪律严明地回了开封城，“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5]。这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奠定了宋朝皇帝、朝廷国家与募兵之间关系的基础，从此之后，募兵只是朝廷国家豢养的工具。募兵仍然是朝廷国家依靠的力量，但是，朝廷国家绝不受制于募兵。

募兵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社会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大类，而募兵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单纯靠武力为生，由国家豢养，是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阶级群体。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募兵是四民之外的“第五民”。大致上，每十户宋朝人就要养活一户军人家庭。老百姓交税给国家，国家拿着这个税来养活军人，军人保卫国家安全。所以，原则上除非遭遇战争，宋朝的老百姓对国家没有直接的军事义务。对于这一点，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有着清楚的认识。1064年，宋朝政府要在陕西建设民兵队伍，老百姓每户三丁选一，编入民兵。司马光六次上书极力反对，理由是：我们已经从农民那里收了租赋来养活正式的军队，现在又要征发农民本身让他们来当兵，那就等于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6]，让老百姓承担双倍负担，实在是违背情理的做法。今之兵非古之兵，今之民非古之民，“名与同而实异”。政府做事要逻辑贯通，不能为所欲为。司马光的这个批评充分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政治家的担当。

募兵不事生产，完全靠政府养活，因此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挑战，宋朝人只要说到财政困难，就肯定会提到“冗兵”的问题。陈襄《古灵集·论冗兵札子》中曾记载，1065年，宋朝禁军总数70万，平均每人每年钱粮赏赐共计支出50贯，总计支出3500万贯；厢军总数50万，平均每人每年共计支出30贯，总计支出1500万贯。禁军、厢军总数120万，总计支出5000万贯。那么，宋朝政府这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6000万贯。财政收入6000万贯，养兵费用5000万贯，国家财政的六分之五都用来养兵了。剩下的1000万贯，要应付“国家百用之费”。这么算下来，募兵集团简直要把政府吃穷拖垮。

那么，募兵集团的效率如何呢？进入长期和平时期的募兵变得越来越像官僚，军人也靠积累年资获得升迁。每隔三年，皇帝按照花名册亲自检阅提拔军官，军官提拔完了就提拔士兵。不同番号的军队被划分为下军、中军、上军三个等级，从下军到上军，薪俸依次提高。同样是普通兵，上军士兵高于中军士兵，中军士兵高于下军士兵。由士兵往上的各级军官同样如此。天恩普照，利益均沾，人人都有机会，机会主要靠排队。靠这样的官僚制度培养、提拔起来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不追问战斗力，而是追问这支军队对皇帝的忠诚，那么答案绝对是肯定的。这就是宋朝对武力和兵权的态度。

消耗巨大且效率低下，是宋朝人对募兵的总体印象。当然，今天的人回头看历史，逆向思维，也可以说，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募兵队伍，足见当时国家财政能力之强大。然而，有趣的是，批评募兵消耗国家财政的声音那么大，募兵的规模却只增不减。不断有人提出“回到兵民合一”，用民兵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募兵。王安石变法则不但这么想了，而且努力去做，这就是保甲法。保甲法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短期目标是希望保甲农民逐渐承担起一定的军事义务，长期目标则是以保甲（至少是部分）取代募兵。但是，所有这些用民兵取代募兵的努力，除了边境地区短时间、小规模实验，基本都不成功。

“兵民合一”呼声虽高，却回不去，除了制度的惰性，应该还有如下原因：第一，募兵制解放了老百姓，让他们可以免于兵役之苦，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募兵制创造了一支更加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应对持续存在的边防压力和更加强大的敌人。宋朝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那种缺乏组织的游牧部落，而是团结统一的强大的草原帝国，辽、金、蒙古、西夏，每个都不好惹。宋朝的北部边境是从五代继承下来的，自从后晋石敬瑭割弃幽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便失去了大半边长城防线，防御难度极大，因此不得不长期且大规模地在边境驻兵。靠传统的兵民合一体制，根本无法胜任。第三，宋朝的募兵制不仅仅是一种兵员补充制度，还被赋予了政治任务。每逢荒年饥岁，收成不好的时候，朝廷就要征兵，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招刺为兵，由国家财政养起来，剩下的老弱病残，再折腾也不会威胁到朝廷的稳定了。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管用。宋朝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反政府行为，统治基本稳定。这个办法也被看作宋朝政府维持稳定的政治法宝之一，当然不能放弃。所以，抱怨归抱怨，募兵制是不能放弃的。



图三八：辽 李赞华（耶律倍）《获鹿图》

《获鹿图》为五代后唐李赞华绘，78厘米×24.6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李赞华（899—937），本名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契丹灭渤海国之后，耶律倍被册封为东丹王，统辖渤海国旧地。因在弟耶律德光即位后遭猜忌，于931年投奔后唐明宗，赐姓名李赞华。他熟谙汉文化，长于著文，擅画契丹人物，精通音律、医药，所绘《东丹王出行图》最是有名。此幅《获鹿图》卷前有乾隆题诗并书“获鹿图”三字，图中一骑马飞驰的猎手正追杀一头飞奔的野鹿。猎手身体前倾，左手持弓，右手似引满而发，骏马绷直后腿全力奔驰，画面充满了动感，极为传神。我们知道，鹿的奔跑速度极快，而画面中的鹿已然中箭，由此可见马背上的契丹族纵横草原、极善骑射的剽悍战斗力。

总体上看，尽管募兵制对财政构成了巨大挑战，募兵制下的军队常常被诟病不能打仗（和平时军队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不能单纯责怪募兵制度），但是，它基本上维持了边境安全和国内稳定，保障了农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职业分工的角度看，职业兵的出现是一种进步。而宋朝能够养活这样一支庞大的职业兵队伍，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宋朝国家的治理水平，特别是它强大的税收和物资转运能力。所以，在金元明清，我们再没有看到募兵制。

[1]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33页。

[2] [宋]王质：《兴国四营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八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8册，第319页。

[3] [元]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兵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47页。

[4]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〇《东汉世家·刘旻》，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6页。

[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6]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三二《乞罢陕西义勇第五札子》，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374页。

进退两难的狄青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初六，翰林学士欧阳修向皇帝提交了一封弹劾报告。弹劾报告的读者对象是唯一的，就是皇帝本人。像这样直接打给皇帝的报告，是属于绝密级的，只有在皇帝认为有必要下发之后，才会根据需要扩大读者对象。这篇弹疏堪称同类文章的典范。文章一开头，欧阳修就牢牢地抓住了皇帝的防范心理：我听说能够尽忠的臣子，不敢回避难言之事；善于驭下的人主，常常想听到难言之言。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上下之间信息通畅，阴谋诡计无法得逞，灾祸混乱不能产生。……什么事情，如果全天下的人知道了，唯独人主不知道，这才是莫大的隐患。我今天要说的，正是天下尽人皆知，唯独陛下不知的事情。如今士大夫不分贵贱，跟亲戚朋友们谈的，普通老百姓街谈巷议的，都是这件事。可是却没有人告诉陛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事属隐患，危害还没有暴露，所以人们也很难明说。

欧阳修说的这件莫大之隐患，究竟指什么？欧阳修的弹劾对象，这桩隐患的核心危险，是当时的枢密使狄青。枢密使专管军事，比宰相矮半级，跟宰相一样属于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狄青究竟犯了什么错？——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称武勇，自从十多年前朝廷在陕西跟西夏人打仗，就建立了特别能作战的名声；四年以前，广西侬智高叛乱，狄青奉命讨贼，又立下了一些功劳。同样是在四年以前，狄青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初掌机密，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行列，当时就有批评者认为不妥。如今四年过去，当然，我们也没发现狄青犯过什么显著的错误，然而这个人却不幸有深受军人爱戴的名声。

也就是说，这个莫大的隐患，就是宋朝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狄青深受军人爱戴。管理军队的人深受军人爱戴，按常理说，没什么不对。而狄青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综合素质，欧阳修也是非常推崇的，他如此说道：从前国家难得将帅之才，常常用文臣来担任经略招讨，可是有的不了解军队，有的不懂得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以来，既能凭借自身的勇敢武力让众人佩服，又懂得训练的方法，很知道怎么用恩信来安抚士兵。

作为军事指挥官，狄青了解军人，懂军事，能带兵，有军功。而欧阳修担心的，正是狄青的如此靠谱。所有这些优点都是缺点，确切地说都是危险。狄青，山西人，少年时就喜欢骑马射箭，二十岁上下游荡到首都开封，刺面为兵，成为殿前司的一名骑兵，慢慢升到了皇帝的近卫军。1038年，宋夏战争爆发，朝廷优选禁军派往前线，狄青中选。在陕西，狄青立功最多，又得到庞籍、范仲淹等人的赏识、培养和提拔。十年之间，他迅速成长为宋王朝最负盛名的军事人才。1052年6月，狄青奉命入朝担任枢

密副使，三个月后主动请缨前往广西前线。别人都搞不定的侬智高，狄青带领西北军出马，一举荡平。1053年5月，狄青得胜还朝，被任命为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枢密使。“出兵伍为执政”“起兵伍，登帷幄”，一个行伍出身、脸上刺字的大兵，竟然能有这样的成就，狄青破了天荒。然而，让欧阳修忧心忡忡、坐卧难安的，就是“狄青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这一事实本身。

同样的一句话，欧阳修在这封弹劾报告里说了两遍，一遍是：“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武臣掌管枢密院又能得到军人爱戴，不仅对国家来说不方便，即使是对他本人来说也有可能造成伤害。一遍是：“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武臣掌管枢密院而为军人所喜爱，当然是不合事体的，不管狄青本人的用心如何。^[1]

为什么？不为其他，就因为他是行伍出身，是脸上有字的士兵。因为他脸上有字，所以那些同样脸上有字的士兵会爱戴他，以他为荣，团结在他的周围。而这种爱戴与团结，很可能会形成某种危害政权稳定的力量，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弹劾报告的最后，欧阳修建议宋仁宗罢免狄青的枢密使，把他调到外地去做一个州长。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保全狄青的忠诚。欧阳修的这封弹劾报告，因为是直接给皇帝看的，所以剖肝沥胆，言辞直白。仁宗拿到这份报告，看完就默默地收起来了，并没有“降出”。

欧阳修如此对狄青，他们两个有什么私仇吗？至少从目前留下的文字资料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而且欧阳修也算是一个心胸豁达、顾大局的人。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相信，欧阳修弹劾狄青恰恰是为了狄青好，为了宋朝国家好。欧阳修并没有夸张，关于狄青，开封城里早已谣言四起。

这一年阴雨连绵，开封城里发了大水。狄青家的房屋也受了灾，于是狄青就搬到了大相国寺去借住。佛寺和宫殿都是高台建筑，不怕水。于是，人们就看到狄青坐在大相国寺的高台之上、飞檐之下，指挥士兵做这做那。狄青高大威猛，有大将风度，远远望去煞有气势，像是一幅画。但是，在这幅画里，有个颜色却颇为刺目，那就是狄青身上的浅黄色袜子。“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2]自唐后期至北宋，黄色逐渐成为皇帝专用的服色。在大相国寺如同宫殿一般巍峨的殿宇之下，狄青竟然穿着浅黄袜子出现了，这就让某些人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按照欧阳修给皇帝的报告，近日以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了。有人说狄青这个人是在图谶里有预言的，有人说夜里能看到狄青私宅上空有火光。总之，狄青不是一般人，让他继续掌管枢密院是危险的，恐怕要出事。当然，这不是因为狄青曾经有任何违背忠诚的行为，只是因为他的行伍出身，他脸上的刺青。

刺青一直是狄青最醒目的标志。他在河北担任军区司令，当地军政首脑联欢，席间有个妓女白牡丹给狄青劝酒，竟然说：“劝班儿一杯酒。”这位脸上有字的哥哥，来一杯。当着众多文官，狄青敢怒不敢言，忍到第二天才去打了白牡丹一顿。白牡丹的嚣张从哪儿来？全体文官都给她撑腰。依照宋代制度，边防最高军政首长是文官，军区司令要受他的管辖。当时狄青的长官是韩琦。韩琦要处分一个军官，狄青讲情说，这是一个有军功的好儿郎。韩琦说，东华门外，中了状元骑马游街的才是好儿郎，这人也配？说完，当着狄青的面处决了这个军官。据说，吓得狄青站在那儿，半天都没挪一下。^[3]

故事真伪无从考证，但故事所反映的宋朝文官，以及在文官影响控制之下的社会观念对武人，特别是军人的态度，是真实存在的。行伍作为一种出身，就像士兵脸上刺的字，永远都除不掉。史料记载，狄青当上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的刺青还在，宋仁宗特地下令让狄青敷药去除刺青。估计去除也只是去掉颜色，疤痕是去不掉的。狄青拒绝，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因为功劳提拔我，没有顾虑我的出身。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脸上的字，因为我是一个兵。我想留着它，来激励士兵为国效力。

狄青拒绝敷药，是他的透彻，也是他的无奈。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军人出身就意味着低人一等。狄青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之一就是，用一个大头兵当国家领导人，恐怕外国和周边少数民族会笑话我们。武人被挤到了边缘，军人被压到了鄙视链的最底层。后来，英宗曾想用一个叫郝质的军人入主枢密院，反对的人说，这个人还行，只是枢密院和宰相府是经邦论道、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地方，让一个“黥卒”（脸上刺着字的士兵）来主持工作，恐怕反而会让他不得安生。比如狄青当年，朝廷上下都服气，可是一进枢密院，就谣言四起，最终不得不离职，朝廷的器重与提拔反而害了他。话说得有理，郝质被挡在了枢密院外面。

说到这儿，顺便交代一下狄青的结局。欧阳修那篇骇人听闻的弹劾报告打上去没过多久，仁宗还是罢免了狄青的枢密使，派他到陈州去做知州。第二年春天，狄青在陈州“疽发髭，卒”，胡子里长了一个疮，病死了。在中国史书上，凡是“疽发”而死的，不是抑郁就是投毒。倔强地不肯洗去面涅的狄青，最终还是因为面涅遭到猜忌排挤，落下心病，才五十岁就郁郁而终。狄青死后八年，宋神宗有意对外用兵，因为狄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4]，向狄家索取狄青画像，亲制祭文缅怀狄青，把他树立为宋朝武人的典范。然而，即便到了“欲战思良将”的时候，朝廷给狄青的定调也没有忘记一分为二，还是要强调狄青“能以畏慎保全终始”。狄青在宋代政治文化的压抑之下郁郁而终的事实，也被涂了金，做了最后的消费。





图三九：《狄青像》

此《狄青像》出自《中国历代名将图典》。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北宋时期名将。他自少入伍，善骑射，面刺字，被称为“面涅将军”。仁宗时，因战功迁延州指挥使。勇谋兼备，在宋夏之战中临敌披发、戴铜面具，所向披靡，无人敢挡。与名臣尹洙、韩琦、范仲淹等人过从甚密。范仲淹授以《春秋左传》，折节读书，通古今名将兵法，声名益显。一生历二十五战，曾八次中流矢，以夜袭昆仑关一战最著名，被拜为枢密副使、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狄青赞称其：“天产英雄操大任，劳其筋骨益其能。乘时有待风云会，兰台阁上姓名登。”

狄青之死，欧阳修、韩琦都逃不了间接的责任。但是，这两个人若扪心自问，一定不会有丝毫歉意。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当时社会观念中最正确的事情——防范武人，特别是军人。“面涅”就意味着危害政权的潜在可能，必须压制，以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防范，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官士大夫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它正当而正义，是军人职业化与文武分途造成的必然后果。

[1] 参见〔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〇九《奏议·翰苑进札状七首·论狄青札子》，中华书局200年版，第655—656页。

[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天子之服》，中华书局985年版，第3530页。

[3] 参见〔宋〕王铨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卷上，中华书局98年版，第5—6页。

[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中华书局985年版，第972页。

官吏分途的等级差别

在帝制中国的顶层设计中，除了文武分途，还有官吏分途。什么叫“官吏分途”呢？我们仍然以西汉的郡和唐代的州做比较。西汉郡一级政府的正式编制是39人，东海郡实际在职人员107人。唐代的一个上州，总编制是216人。单从人数来看，从西汉到唐七八百年间，统县政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很正常。

然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西汉东海郡的107人和唐代上州的216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差别。西汉东海郡的这107人，除了4名由中央任命的官员之外，其余103人均由本地人担任。他们凭借个人的学识、能力和家族地位建立名声，脱颖而出，接受长官的辟署，成为官吏，在本地服务，勤勉工作。比如东海郡的功曹师饶，一年354天，能够在衙门安安静静坐着办公的只有87天，剩下的时间，除了每10天一次的休假，基本上都在外奔波，接受太守的差遣，处理本郡事务。^[1]这些人是本地人官员中的佼佼者，会因太守推荐而进入中央，成为由中央任免的中高级官员。由太守辟署的地方基层官员与由中央任免的中高级官员之间存在上升通道，是上下一体的。

但是到了唐代，就完全不同了。唐代州政府的216名工作人员是明确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的。上层是“官”，共计76名，下层是“吏”，共计140名。^[2]“官”与“吏”之间有一道“石头天花板”，界限清晰可见，鸿沟不可逾越，上升或者下降的通道基本不存在。

简单地说，官和吏的区分就是“有官品”和“无官品”，“流内”和“流外”。官员属于流内，无论高低皆有官品，统一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官的“认证权力”把握在中央手里，官员实行避籍制、任期制和俸禄制，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吏员属于流外，没有官品，由地方政府选拔任用，吏实行终身制，通常没有俸禄。官与吏之间存在严格的身份区隔，这就叫作“官吏分途”。当然，吏也可以积累资历，通过特殊渠道上升为官，这叫作“流外入流”。但是，流外入流的官仍然会被人瞧不起，能够获得的职位及任数都严格受限。社会学家周雪光对官吏分途有着非常精到的总结：“官与吏在同一官僚机构并存共生，有着上下级关系，但同时又是互为隔绝的群体，从录用、流动、晋升到监察、俸禄诸多方面，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3]

与选任的中央集权一样，官吏分途也出现在隋朝，那个充满了制度创新精神的短命朝代。官吏分途伴随着吏的污名化。^[4]隋朝平陈之后，为了羞辱陈后主，曾经有人建议让陈后主去做一个负责处理文书的中央小吏。隋文帝说，陈叔宝那么糊涂的一个人，又整天醉醺醺的，恐怕不好使唤吧。可

以想象，这场谈话自然是以胜利者君臣的开怀大笑结束的。吏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低贱的，供人驱使的。官吏分途之初，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吏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然而即便上去了，“当过吏”这件事也会成为一个人的黑历史，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才能笑对，一般人则讳莫如深。比如唐太宗时的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在隋朝担任过刑部令史，他自己“甚以惭耻”。有一天，唐太宗问张玄素在隋朝的任职情况，先问在隋朝做什么官，张答“县尉”；又问“未为县尉以前”，张答“流外”；再问“在何曹司”，张玄素勉强作答。等到要出去的时候，张玄素“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5]张玄素何许人也？他批评唐太宗大兴土木，敢拿唐太宗跟隋炀帝比。唐太宗不服，反问他，你觉得我不如隋炀帝，那么跟桀与纣比呢？张玄素毫不示弱，说你这宫殿要是真的修了，那就会“同归于乱”^[6]。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说到自己的流外出身，还是会面如死灰，腿软心虚。

在唐宋以降的观念世界中，官的基本面是“君子”，吏则是“小人”群体，“类多小人，年久长奸”“文簿繁杂，吏多奸计”。“机智官员的故事”之中，特有一类，专门津津乐道官如何与吏的恶行、恶习做斗争。比如，北宋真宗朝的浮梁县令胡顺之。州里派了个小吏下来，胡顺之听说了，就悄悄派了个人跟着，偷偷记录这个小吏的吃和住。等到这个小吏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对面时，胡顺之这才不慌不忙地开始发问：你一个小吏应该住公家的驿站吗？应该接受驿站的免费供给吗？应该跟朝廷命官平起平坐吗？这三个问题就像是三枚冷箭，一枚一枚都打在死穴上。到最后一枚冷箭抛出，小吏已经从椅子上滚到地上，打躬作揖地求饶谢罪了。胡顺之也不恼，只把小吏关在牢里，又让人在周围摆了十个粪缸，生生地馊了他十天才提审，最终打了小吏二十大板了事。从此之后，州里的吏再也不敢骚扰县政了。^[7]

这种故事，笔记小说里不少。然而，只能是其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胡顺之辣手治州吏”的事迹应当是有的；“州吏从此不敢骚扰县政”的结论，恐怕不可当真。相反，欧阳修讲过他的老师杜衍的故事，倒更能反映真实情况。杜衍受命接掌审官院，这是负责人事任免的部门，权力很大。当时，有甲、乙、丙三人竞争同一个职位，杜衍问吏应当给谁。吏受了丙的贿赂，却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争不过甲，就接受了另外一个职位。过了几天，在吏的教唆下，丙出面告发甲曾经犯过某个错误，不应当得到这个职位。甲不应得，按顺序应当轮到乙。可是乙已经得到了其他职位，不愿意再争了。杜衍不得已，只好把这个职位给了丙。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制度，实质上却是吏贪赃枉法的结果。作为长官的杜衍也成了吏的工具，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杜衍认真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铨法尔。”“铨法”就是有关人事任免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繁多，法令条文复杂，可是

官员调动频繁，“居职者类以不久迁去”，而吏却长期服务于同一单位，因此，官虽然地位高于吏，但在相关信息的掌握上却远不如吏。面对吏的欺瞒，一般官员只好装聋作哑，而杜衍一笑之后，随即痛下决心，以对制度的熟悉掌握成功地摆脱了吏的干扰。杜衍任内，审官院的吏完全变成了辅助性的，人事任免的最终决定权终于掌握在了主管官员的手里。

但是，像杜衍这样个别人的努力，其实不可能改变官无法约束吏的普遍事实。杜衍在审官院的时候，有人找到小吏，奉上贿赂，请求照顾，小吏不肯接受，说，我们现在这位上司管得太严，名声在外，他不久就会被提拔上调，你先等等吧，用不了多久的。^[8]在杜衍和吏的斗争中，杜衍所取得的只是暂时性的、偶然性的胜利，最终的、必然的胜利属于吏。因为按照制度，官员受到任期制与避籍制的约束，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都待不长。官员和机构的关系，就像是飞鸟和池塘，浮光掠影，无法深入；而吏是当地人，终身甚至世代为吏，他们谙熟一切规章制度、关系和潜规则。如果把机构比作池塘，那他们就是鱼鳖虾蟹，是池塘真正的主人。所以南宋人公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9]。

官吏分途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它简直是有意制造麻烦的制度。吏虽然服务于朝廷国家，却没有官员身份；名义上不拥有权力，实际上却操控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各级政府的实际运作。“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10]待遇低下，上进无门，除了瞅准机会捞点钱，吏还能有什么指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吏在道德上的“集体卑劣”得到了体制的默许，官通过对吏的批评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同时成功地把造成政府腐败、低效的黑锅推给了吏。通过对吏的揭露、惩罚，官向上对朝廷、向下对百姓都有了交代。这仿佛是一个“黑锅推转机制”——皇帝把“锅”推给臣下，官僚把“锅”推给吏——皇帝是好的，都是奸臣惹的祸；官员还是不错的，都是污吏惹的祸。推无可推，吏只得背锅。

当然，吏的存在价值不止于“背锅”。官吏分途与选任的中央集权在隋朝同时出现，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选任集权的一种补充。隋朝把所有地方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力图建立选任的中央集权。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之内，全体官员由同一个机构，以相同的标准，进行选拔和任用，当然困难重重，但是在中央的强大意志和发达的文书行政传统之下，还是可以实现。然而，地方在地理、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却无法靠中央意志消除，中央可以统一任命官员，也可以统一制定、下发政策命令，却很难实现地方治理的一刀切。官吏分途为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官是正式的，吏是非正式的。“各地官员代皇帝执政，遵循正式制度的规范准则，而胥吏常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加以变通，以非正式形式落实之，导致正式制度被束之高阁或歪曲执行，甚至为非正

式制度所排斥。”官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吏的存在与活动则“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11]这变通是好是坏，可以两说，但好歹它是一条出路。

[1] 参见王俊梅：《秦汉郡县属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2] 唐代州吏的计算，得益于叶炜教授的越洋知识援助。

[3] 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载《社会》第6卷，2016年第1期。

[4] 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43页。

[6]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40页。

[7] 参见〔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0页。

[8] 参见〔宋〕欧阳修：《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见《欧阳修全集》卷三一《居士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68页。赵冬梅：《睢阳五老中的杜衍》，见上海博物馆编：《再读睢阳五老：艺术史的维度》，2007年版，第4—39页。

[9] 这句话出自南宋叶适的文章，但并非叶适原创，而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见〔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一四《外稿·吏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08页。明末清初顾炎武高度认同此说，但他错误地认为此语为叶适原创。见〔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10]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95页。

[11] 参见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载《社会》第36卷，2006年第期。

被歧视与被矮化者

把一部分人标志出来，隔离出去，这是帝制中国制度发展中的一个常见现象。贯穿帝制时期最大的隔离，莫过于宦官与普通官员之间的隔离。人为制造的生理差异，将宦官群体贱民化、工具化，彻底沦为皇权的寄生物。在宦官的簇拥、装饰、隔离之下，皇帝将自己营造为高高在上的神秘而高贵的存在。屈辱却自始至终伴随着宦官群体。不管曾经出现过多少宦官专权的极端事例，都无法改变这个群体被正常社会隔离、歧视的事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庶族之间、高门士族与低级士族之间建立了基于家庭出身的身份隔离，“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婚姻与仕途均界限分明，判若云泥。“小圈子政治”的垄断性、封闭性，以及文化基因的同质性最终导致人才匮乏，门阀政治解体，士族消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明历史真相的后来人，却把“王谢风流”错认为是那一段历史的全部。

从隋朝开始，全体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实行选任的中央集权。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官吏分途。倘若只是按照职务特点把政府工作人员分为官和吏两个层级——官参与决策，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吏只需遵循规章制度处理技术性的事务——这就是合理的分工，它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的官吏分途却在官与吏之间建立起严格的身份壁垒，切断了吏上升为官的可能性，进而将吏隔离成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上升希望，也不需要廉耻的次等群体。

宋代大开科举之门，毫无家庭背景的有志青年，可以凭借自身努力，靠读书、科举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中国由此进入科举时代。中外学者们无不感叹，那是一个自由辉煌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职业军人（募兵）集团却被正常社会隔离出去，文官、武选官和职业军官之间也被分成了三条轨道，基本上互不相通。倘若只是简单而平等的分工，这一切的确令人赞美：文官处理国家的政治、外交、财政、司法等事务，武选官参与军事管理，分任财政税收，职业军官专心练兵保家卫国，各司其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财政、司法等专业性极强的部门还可以继续细分，政府的工作效率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但这毕竟是传统中国，分类一定伴随着隔离。在整个社会的鄙视链上，文官居于顶层，武选官夹在中间，职业军官被踩在最底层，他们甚至没有完全的官员身份。与职业军官共荣辱的是募兵集团——他们都带着抹不去的面涅。文官与武选官之间、武选官与职业军官之间都存在着隔离带，下面一层的人纵然历尽艰辛爬了上来，他卑微的出身也会像青蛙在蝌蚪时代的尾巴一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挡住他的去路，让他颜

面尽失。

青蛙尾巴的故事是这样的。艾子泊船于海岛，听到水里有人哭。一个声音说：“昨日龙王有令，水族有尾巴的都要砍头。我是条鳄鱼，害怕被杀，所以哭。你一只青蛙，又没有尾巴，哭个什么劲儿呢？”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我如今看着是幸而没有尾巴了，可是，就怕大王要追究我做蝌蚪时候的事儿啊！”

这个故事是否让你想起了“狄青之死”？一个忠诚可靠、能征善战、功勋卓著的武人，竟然会因为他的功勋卓著、能征善战而遭到危言耸听的弹劾，尽管发起弹劾的人也不否认狄青“迄今为止”的忠诚可靠，可就因为他是一个脸上刺着字的军人，即便后来他已经不再是军人，可是他的军人出身永远都在。一只伟大的青蛙，因为蝌蚪时期的尾巴，被他所忠诚于、服务于的朝廷鄙弃，抑郁而终。

分工值得赞美，隔离令人叹息。我们以文武分途为例，来看看传统中国的隔离之痛。

南宋大儒叶适有一个学生，名叫厉仲方，三十二岁考中武状元，还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提拔，进入武选官序列，看起来前途无量。但是，他做官之后却屡次参加进士考试，希望能改换门庭，重归文官的行列。厉仲方五十四岁过世，距离他考中武状元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叶适去祭祀学生，祭文里耿耿于怀的，仍然是厉仲方当年放弃进士，改考武举之事。叶适说，想君当年，三场文字十分工整，考中一个进士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没想到你竟然脚踩两只船，要去读兵书；即便是考中了状元又如何呢，你已经失去了文人的身份啊！^[1]文人的身份比武状元和官位都重要，所以厉仲方考中武状元之后，还要想办法回去；而叶适在厉仲方的灵前，仍然要责备他二十二年前的改弦易辙。原因很简单，文官的仕途发展和社会地位都大大高于武选官。一旦进入了武选官的行列，就失去了太多的机会，比如宰相、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

叶适说厉仲方进入武选官序列，是因为当初意志不够坚定，考进士没考中就改考武举，“失路误入”。这样的人很多，当时，武举基本上是落第文人的备胎之选，落第之后立即转头去看兵书，顺带拉拉弓，骑骑马。国家甚至要特别调整考试时间，防止这帮对军事根本就没兴趣的文人把武举当作垫脚石。武选官好歹还是官员身份，却已经被鄙视至此。

至于脸上刺字当了兵的，那就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宋仁宗初年，皇太后摄政，丁谓和王曾同在相府，按制度是应该一起朝见皇帝、皇太后，一起退下的。王曾要告丁谓的黑状，需要一个跟摄政皇太后单独面谈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竟然是丁谓“主动”给他的。南宋王铎的《默记》里记载了王曾见

丁谓的一段心机故事：

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讫又涕下。谓亦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生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尔。”自后谓数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閤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2]

文中晋公即为丁谓封号，沂公为王曾封号。丁谓在皇帝的传达室——閤门等着王曾，等啊等，终于灵光一现，悔之莫及，跌足扼腕，然而大势已去！听取了王曾的报告之后，皇太后大怒，立即决定拿下丁谓。丁谓一时惻隐，给自己挖了坑。王曾的理由也的确找得太“漂亮”了，合情合理——副宰相的外甥当兵，这可是关系门户荣辱、朝廷体面的大事，当着众人又不便启齿，当然得跟皇太后单独唠唠。

文官—武选官—职业军官的三途分立给宋朝国家的军事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最糟糕的是，它造成了军事人才的畸形培养模式。

北宋中期以后，文官包打天下，甚至边防大帅也是由文士来担任的。各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经略安抚使由文官担任，底下是实际统兵的武选官，最底下才是职业军人，这就叫“以文统武”。宋人对此津津乐道。然而，从军事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个历史的误会。开创这种模式的文臣的确能干，文武双全，范仲淹、韩琦是最杰出的代表，得到了军人的敬重和敌人的畏惧，“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3]。可是宋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几位文士出身的“边防大帅”的成功带有强烈的偶然色彩。宋夏开战以后，宋朝先派武官上去，打不赢；又派文官上去，照样损兵折将；最后韩、范等人上去，打赢了。为什么能打赢呢？韩、范的胆识、能力固然高人一筹，之前的试错过程也是不容忽略的——宋朝军队屡败屡战，好歹也练出来了。因此，韩、范的成功是真实的，但是把韩、范的成功上升为统兵制度，用文士为边防大帅，以文统武，则实在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因循之制，是朝廷的懒政。试想，那些靠读儒家经典、写锦绣文章上来的人，如果不像韩、范那样拉到战场上真刀真枪地试炼，拿什么来统兵呢？

在文官之下参与统兵的，是武选官。宋朝有一项从唐朝继承而来并且发扬光大的伟大制度发明——武举，就是通过军事理论和武艺的双重考察，来

选拔未来的统兵官。通常的观点认为，武举的出现，为人类在和平时期培养、选拔军事人才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是一项伟大的发明。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可以这么说。但如果深入制度内部去观察，就会对这项发明的伟大程度打一个大大的折扣。武举虽有武名，却乏武道。武举出身的人做的是武选官，武选官虽然被文官瞧不起，但他们脸上好歹是干净的，是正经的官员，不是军人，所以这帮人骨子里极不屑于与军人为伍。按照宋朝国家的制度安排，武选官参与军队的管理，但不属于军官序列。这样一来，武选官对军队的了解程度，其实跟文官也差不多；武进士的录取规模又小得可怜，一年十几二十个人，丢到几万武选官的汪洋大海里，一点儿声息都不见。所以，指望武举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只能是痴人说梦，还不如指望文官来得可靠。

南宋有一个人不服气，想要改造制度，让武进士从军，真刀真枪地练起来。此人便是宋孝宗——南宋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皇帝。1180年，武举从军制度果真建立起来了，孝宗承诺从军的武进士“他日可备擢用”，干得好将来一定提拔。这一年录取44名武进士，其中，从军者18人，而且这18个人中，包括武状元江伯虎。但是，这18个人请求把档案资历都保留在军队系统以外，宁可不要军人的高工资。后来政策屡经调整，一切都顺着武进士的心意来。武进士担心像军人一样遭到体罚，朝廷就明令禁止体罚从军的武进士，规定必须要“待以士礼”。最终，武进士愿意从军了，可是军队里也搁不下武进士了——谁愿意请个祖宗来供着呢？宋孝宗开创武举从军制度的同时，还禁止武进士参加进士考试，不许他们改换门庭。结果几年之后，从军等于不从，武进士改换文官的禁令也只得不了了之。前文提到的叶适的好学生厉仲方，就是在武状元及第之后频频去考进士的。在文官、武选官和职业军官三途分立的制度隔离之下，宋孝宗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努力化为乌有。

隔离的本质就是制造不平等，生产卑贱，生产歧视。隔离的文化基础是不承认平等与缺乏尊重。隔离造成与实际事务无关的等级差异，创造、强化了人际矛盾。那么，究竟是谁在制造隔离？不同的隔离有不同的原因，就宋朝文官、武选官和职业军官的三途分立而言，应当说是皇权与士大夫的合谋。皇权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要求对危险的权力——兵权进行尽可能的分割；而士大夫出于不自知的集体自利倾向，迎合了皇帝的需求。职业军人被框定，武选官被限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成了国家栋梁，包打天下。可是，怎样才是军事指挥人才的做成之道？怎样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平既久，初心已忘。可叹，可叹！

[1] 参见〔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二十二《厉领卫墓志铭》，中华书局200年版，第422页。

[2] [宋]王铨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卷上，中华书局98年版，第9—0页。

[3] [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五《仁宗皇帝下·仁宗庆历三年》，中华书局986年版，第245页。

结语 陛下与谁“共天下”？

在这个简单的小结里，我们谈三个问题：第一，帝制中国的“帝国”与西方的“帝国”不是一个概念；第二，君臣关系中的三种共治模式；第三，制度的破与立，应当怎样应对出了问题的制度。

东、西方帝国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辨析一下东、西方“帝国”的概念。上文中我一直在说“帝制中国”，偶尔也用到“帝国”这个词，但是我所说的“帝国”与西方的“帝国”（empire）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方的“帝国”概念，更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帝国”。比如下面这个社会学的定义：帝国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其中的中央政权当局……对从属的社会、民族或区域的政治（以及实质上的社会政治）进行施加、行使不平等的影响与权力”^[1]。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帝国”靠军事征服建立，靠军事力量维持，帝国的秉性就是军事扩张和经济压榨。帝国的核心或者说主体与边缘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双方在种族、制度和文化上差异极大。帝国对边缘往往实行间接统治，主体无意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教育改造、同化边缘，它只是想继续占领、剥削，而边缘则想要恢复自由，逃离控制，二者处在持续不断的对抗与斗争当中。最终，边缘逃离了主体的控制，帝国分裂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帝国”的前世今生。古代的罗马和近代的英帝国是西式“帝国”的典型代表。

东、西方的“帝国”差异往往会引发双向误解。当我们用emperor来翻译“皇帝”，用empire来翻译“帝制中国”的时候，拥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会想当然地把Chinese empire和军事占领、异族征服联系在一起，提出他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让习惯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人感到不适，觉得遭到了冒犯。

“帝制中国”与西方观念中的“帝国”显然不同。帝制中国有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法律，以及由统一的文字所承载的主流文化。帝制中国也有核心与边缘的差别，但总体而言，核心与边缘之间关系的主流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秦帝国与原属六国的东方领土之间，曾经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及巨大的文化差异，秦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六国”反抗的结果。但是，从汉代起，帝制中国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彻底转化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汉代，低级官员是本地人在本地服务，中高级官员则是汉朝人在汉朝范围内服务。隋朝实现了所有官员的中央任免制，人事任免全国一盘棋。从宋朝起，科举更成为选拔文官的正途与主流；金榜题名者源源不断地加入帝国的统治集团中去，实现个人与家族地位的提升；名落孙山者与退归乡里者，则把相同背景的教育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地方与基层。两千年间，以强大的中央集权为后盾，以汉字为依托，帝制中国的文化整合不断推进。

“帝制中国”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皇帝”名号，开创皇帝制度，终

于公元1912年2月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存在时间2133年，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因此也被界定为“帝制时期”，以便区别于之前的“封建时期”和之后的“共和国时期”。

[1] [美] 理查德·拉赫曼著，赵莉妍译：《历史社会学概论》第四章《帝国》，商务印书馆207年版，第55页。

雇主伙计到合伙共利

帝制中国的推进方式是朝代更替。“朝代”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时间性的，而非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这是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思想，基本上每一个朝代都相信，本朝就是“天下国家”（或者说整个文明世界）的全部。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当中，“本朝”只在“继往开来”的时间线上出现，“本朝”与同时并存的其他政权之间的竞争会被有意忽略和掩盖。帝制中国体现为不同的朝代，不同朝代的地理疆域、人口构成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会符合以下三项制度特征：第一是皇帝制度；第二是官僚政治，皇帝世袭而官无封建；第三是以集权于中央和皇帝为最高追求的各项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

如果说制度的本质是对关系的界定，那么，帝制时期最重要的关系无疑是君臣关系。官僚制度与皇帝制度共生。皇帝应当独断，但是不能独治天下，所以要选拔官员来共治。这种共治观念开始得很早，但是它的内涵曾发生过深刻的变化，大致上，“从汉唐到宋初，所谓‘共治’‘共理’，无论自帝王口中居高临下地说出，还是在官员著述奏疏中谨慎地表达，都不是强调士大夫作为决策施政的主体力量，而多是指通过士大夫，借助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亦即原则上将士大夫的作用定位为听命于帝王，替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1]。这种共治，我称之为“雇主—伙计型共治”，汉高祖刘邦的求贤诏书就反映了典型的雇主心态：

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2]

这篇诏书可以粗暴地翻译为：天下是我家的。有能耐的人，谁来跟我混，我就能让他获得尊贵的地位、显赫的名声。来吧，功名利禄在这里！

宋朝出现了第二种“共治”形态，我称之为“同道共治”。“‘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文官队伍的“价值追求”“崇奉的理念”，“也较此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尊王’的同时，他们亦以天下自任”。^[3]“共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观念，更成为官僚政治中不容置疑的共识。“同道共治”的核心在于“同道”二字，儒家“修齐治平”的崇高政治理想受到尊崇，君臣之间在伦理道德、治理原则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比如，他们都在原则上同意，法度为天下公器，而非天子所独有。宋朝的臣子可以对皇帝说出：“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4]而宋朝的皇帝绝不会因此勃然大怒，把这人拖出去打一顿板子。

“同道共治”破产之后，还有一种“合伙同利型共治”，这是第三种共治类型。所谓“合伙同利”指的是皇帝与官僚把政权当作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因此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天下国家的长远利益，忘记了底线在哪里。在“合伙同利型共治”之下，维系皇帝与群臣关系的，只有功名利禄。“合伙同利型共治”发生在“同道共治”破产之后，君臣关系又无法回到“雇主—伙计型”，所以，皇帝往往会借助特务政治、告密等卑劣手段来控制群臣。但是，根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般规律，群臣总是有办法来让皇帝的努力烟消云散。孔飞力的《叫魂》中所呈现的共治形态就是“合伙同利型共治”的生动典范。它让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的领袖和精英放弃了理想、原则这些崇高的东西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雇主—伙计型”“同道型”“合伙同利型”三种共治模式，帝制中国曾出现过最好的，最终沦落成了最坏的。这一点，我们在“政治文化篇”中会有进一步的阐述。

[1]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7页。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下《高祖本纪》，中华书局962年版，第7页。邢义田先生对这则诏书及其所体现的“雇主—伙计型”君臣关系有着精到的分析，见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载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年版，第8、65页。

[3]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9页。

[4] [宋]许翰：《论御笔手诏不由三省而下者取旨方行札子》，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一〇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册，第291页。

滕子京谪守背后的反思

最后，我要谈谈制度的破与立。“所谓好制度，是符合公共道德伦理的制度。好的制度都有伦理建设性。”^[1]但是，没有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制度。制度与政治、文化交相为用，好制度也会变质。当一个制度变坏了，或者当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制度不合理的时候，应当怎样对待它？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最优秀的古人也没有给我们做出好榜样。

举一个例子。范仲淹做副宰相，主持朝政，他的同年挚友滕宗谅遭到了挪用公务接待费的弹劾。宋朝的公务接待费使用制度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存在很大的问题——制度本身不合理，或者说这项制度背后本身就隐藏着“非正式制度”。所以，大部分负责任的边州军政首长都会挪用这笔公款。滕宗谅挪用公款，的确违反了正式制度。那么，被挪用的公款，滕宗谅用来做什么了呢？犒赏士兵，笼络军心，无一钱入于私囊。滕宗谅被审查之后，范仲淹极力为他辩护，而这种辩护也成了反对派攻击范仲淹朋党的口实之一。最终，“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新政流产，黯然离开政治中心。

在传统中国，滕宗谅和范仲淹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典型性，他们用道德、功劳来取代规则。从骨子里说，这两个人都太灵活了，他们不尊重规则。规则构建秩序，而秩序给大多数人以安全，让社会平稳运行。如果规则有问题，就像宋朝的公务接待费使用办法出了问题，滕宗谅应该做的，不是随波逐流钻制度的空子，而是明确抗议，提出问题。滕宗谅遭到审查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范仲淹最理性的做法，应当是按照既有制度处分滕宗谅，同时寻求制度的改造之道。可惜，这样“死板的智慧”，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存在。



[1]张静：《制度的品德》，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第75页。

下篇 王朝政治省思

引言 文化与历史的交错塑造

历史的影响积淀成为文化，文化影响群体的选择，最终决定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塑造现在，并影响未来。历史中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的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中国文化，有两种特别常见的错误说法。一种是认为我们什么都好，五千年文明辉煌灿烂，各种领先，各种发达，直到工业革命或鸦片战争。这种错误说法常常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的经历。她在二十多年前远嫁德国。“昭君出塞”去“和番”，责任重大——临别之际，老父谆谆教诲，嘱咐她一定要发扬我们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要勤劳，要贤惠。女友到了德国，慢慢发现，她的德国婆婆，德国大姑子、小姑子都比她要勤劳得多，能干得多。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表情夸张地说，我婆婆干净得连一块抹布都要熨。女友还大笑着爽利地做了总结：哪有什么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啊，我比人家差远了！这话是她的经验之谈，有道理，但不够准确。准确地说，中华妇女的确有这些传统美德，但是这些传统美德并非中华妇女所独有，勤劳、勇敢、贤惠、节俭、朴素、积极进取等美德是人类所共有的，存在于任何族群的优秀分子身上。就像我在牛津的房东女士所说的“People are people”（人就是人），中国文化绝不是灿然无瑕疵的。

另外一种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说法，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的过去漆黑一片，落后保守，专制强横，摧残人性，是腐朽堕落的“封建”社会。这当然也不对。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可能会从同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当需要对抗外来文化的时候，五千年就开始光辉灿烂、熠熠生辉了；当需要跟过去决裂、谱新曲唱新歌的时候，漫长的古代就一无是处了。同一个人，上午一个会，讲五千年文明光辉灿烂；下午一个会，谴责古代社会黑暗落后。他本人似乎也不会觉得违和，我们假定他的听众是同一批人，也很少会有人质问：你上午讲的和下午讲的，难道不是同一个过去吗？

两种说法之自相矛盾很明显，这种明显的矛盾却会被说话人和听众同时忽略。明明就在那里，可是没有人会在意，更不会有人提起警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上午要抵制外来的东西，当然得说中华传统就是好。下午要另谱新曲，当然就要抛弃过去——不破旧怎么立新？所以，上午讲五千年灿烂是对的，

因为它符合那个场合的需要；下午讲古代保守落后也是对的，同样因为它符合这个场合的需要。至于“灿烂的五千年”与“落后保守的古代”是不是同一个过去，过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通常无人在意。

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其中的一个痼疾。我们喜欢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这其实是法家态度。儒家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孟子·公孙丑上》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能杀一个无辜的人、做一件不义的事。做同一件事情，实现同一个目标，如果追求路径与目标的双重正义，不愿意偷奸取巧抄近道儿，那么必然是要绕远的，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古人说儒家“迂远”，孔子迂，孟子迂，所有纯粹的儒家都迂。

在传统中国，迂远的纯粹儒家一直都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很少能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是由中国历史的推进方式所决定的。从封建到帝制，靠的是武力攘夺；帝制时期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基本上也是靠武力攘夺。靠武力打下来的天下，政权稳定之后会随即推行儒家伦理秩序，宣传忠孝仁义。一个有能力存续百年以上的朝代会慢慢消除“马上得天下”的影响，逐渐建立起本朝统治的合法性，培养出官员百姓对一家一姓的忠诚。而那些比较短命的王朝，没有时间推行教化，只能放任弱肉强食的逻辑畅行。比如唐宋之间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1]，被欧阳修称为极乱之世。五代的人便敢于公开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中国历史的这种推进方式，从积极意义上说，让华夏民族具有一种永不服输、力争上游的性格，人们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信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消极意义上说，它也让我们在骨子里崇尚势利。

中国历史的这种推进方式，也限制了中国人对“真实”的追求。新朝代“马上得天下”之后，运用天命论对前朝的灭亡进行道德解释。在由胜利者书写的史书之中，亡国之君的荒淫无道令人发指。然而，现代历史学在对史料进行层层剖析，拂去“历史书写”蒙在“历史事实”之上的层层尘灰之后，却常常会发现，亡国之君有时候不但没那么坏，反而可能是更为雄才大略的。当道德解释被戳穿，尴尬随即出现。这种尴尬，对传统时期的历史学来说是致命的——倘若亡国之君并非昏庸无道，那么，本朝该怎样宣称“天命”？在今天，现代中国已经跳出了朝代更替的循环宿命，当代史学也无须再为任何一个朝代代言。这种尴尬就是可以接受的真实存在了，它应当成为我们深入历史、剖析民族性格的开端。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讲的是家、国、天下；进入帝制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皇帝依靠官僚统治编户齐民，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家与国之间，静止在一时一地看，国比家大，比家重要；若置于时间的长河中做长程观察，却是家比国大。传统的国是以朝代为单位的朝廷国家，改朝

换代家仍在，家才是永恒的、第一位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转折发生在近代，草根阶层的民族主义觉醒，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出现。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里有这样一幕：日本人要打进北平，四世同堂的大家长祁老人嘱咐孙媳妇韵梅准备好粮食、咸菜和“顶大门的破缸”，躲进小院成一统，“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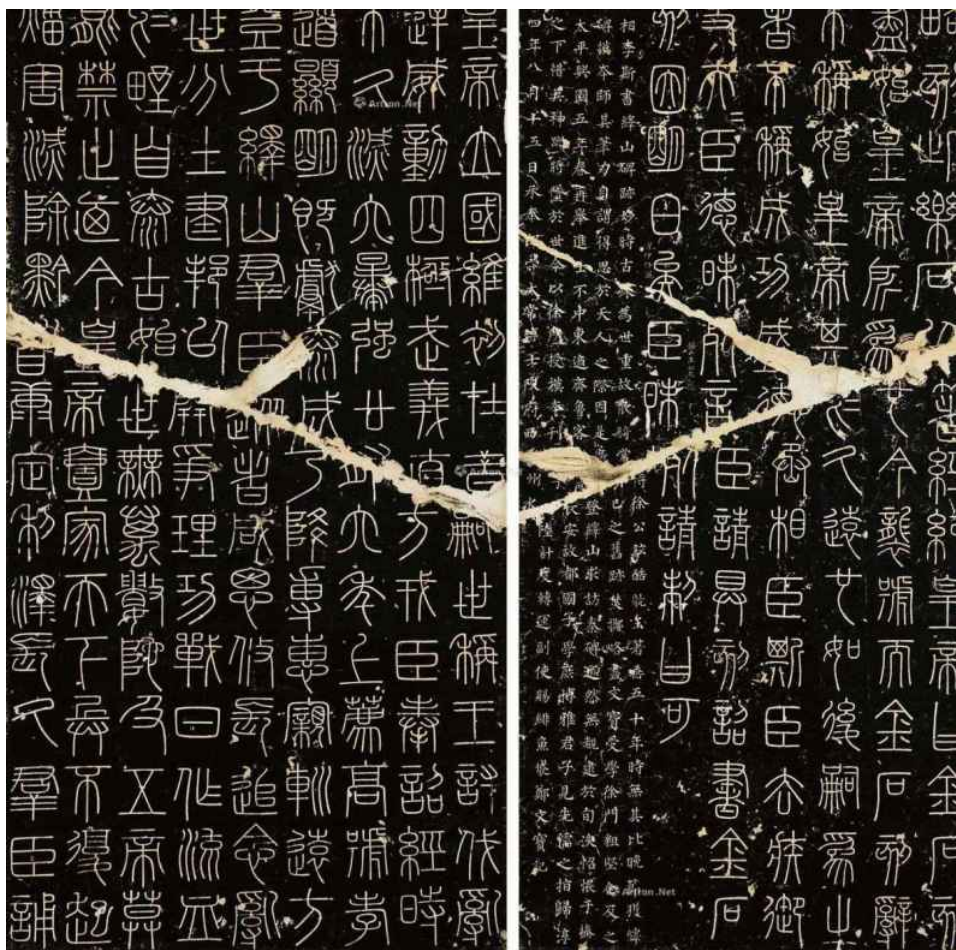
[3]只要挨过改朝换代的乱，生活就会继续，这是祁老人从个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国家观”，也是传统中国曾经反复发生的事实。在小说中，日本人占了北平，饿死了祁老人的曾孙女，破坏了北平人的生活方式，祁老人和他的邻居们这才彻底觉醒，明白日本人来了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有亡国灭种危险的民族入侵。

传统的家国观念是由中国大历史造成的。中国与欧洲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中国的统一——地理区域内的政治整合——不仅完成得早，而且持续的时间长。公元前221年，秦朝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帝制国家，此后虽然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然而就像《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一次“分”，最终都促成了一次更大地理范围内、更充分的“合”。

中国的政治统一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伴随着政治统一的，还有不断深入的文化整合。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奠定了文化整合的基础。汉字承载着文化，汉字所到之处，文化随之展开。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即是中国人，中国人所居之地即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极强的文书行政能力，统一的文字可以相对精确地把中央的指令、精神传达到各个地方，从而建立高度的文化认同。秦朝南郡安陆（今湖北）的一个小吏，墓中随葬的个人编年史，最后一笔是：“廿八，今过安陆。”[4]“今”指秦始皇，“廿八”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二十八个年头。这个小吏的宇（空间）和宙（时间）都是由皇帝国家所主宰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皇帝国家一直都占据着不言自明的主导地位。

法家为统一贡献了法令制度和文书行政系统，儒家对统一的主要贡献则是教化观念。教化，最简单的理解是自上而下移风易俗，让老百姓不令而从，不靠强制，靠以身作则，潜移默化。教化的推行、文化的下移是逐步展开的：春秋战国是第一次浪潮，由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文化冲破了贵族的垄断，开始为普通人所享有；第二次浪潮发生在宋朝，雕版印刷让书籍变得更容易获得，政府推行重文政策，科举向所有人开放，富裕平民得以“全民投入”科举，就像今天全民投入高考一样。

文化的整合巩固了政治的统一，政治统一又滋养培育出一套特殊的文化。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历史在文化中塑造。文化与历史是血肉相连的整体，难舍难分，故谓之“历史文化”。



图四〇：秦 李斯《峰山刻石》（局部）

秦统六国之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一方，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形状和声音各异的局面。秦始皇于是下令“书同文”，即使用标准的字体取代各地的异体字，并且将此任务交给了丞相李斯。于是李斯删芜就简，整理了一套简洁而齐整的文字，名为“秦篆”（也称“小篆”）。小篆笔意舒展，遒劲有力，秦始皇看了颇感满意，便定小篆为通行字体，下令全国使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颇具影响的飞跃，对后世汉字的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上图展示的《峰山刻石》传为李斯所书，其书写的刻石除《峰山刻石》，还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等。

[1] [宋]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六〇《居士外集》卷一〇《论辩九首本

论上》，中华书局200年版，第862页。

[2]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九八《晋书·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0页。

[3]老舍：《四世同堂》，鹭江出版社207年版，第5—6页。

[4]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撰：《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第辑《睡虎地秦墓简牍》，武汉大学出版社206年版，第页。

观念隔膜下的古今代沟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人。然而，诚如西谚所云：“过去犹如异邦，其人行事异于本土。”若无深入研究，“我们”已经很难准确理解传统时期的人与事。

“我们”和古人之间最大的隔膜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古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种隔膜或者说障碍是观念。简言之，观念就是一个时代普遍相信什么，不信什么。阎步克先生在《服周之冕》的绪论里说：“今人不信不等于古人不信。”我觉得这句话对极了。观念不同，没有真交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句绝对贬义的话；倒过来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同样也会是南辕北辙，不能达其意。撇开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分野暂且不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从自己的观念、见识出发去猜度别人、认识未知，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则。观念是我们丈量世界、分辨对错、权衡利弊的尺子。观念不同，看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了解古代，最难过的一关其实是观念关。你要了解古人信什么，然后才能理解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做出的选择。不然的话，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实际上却是向壁虚构，与古代、古人毫无关系，说得越热闹，离真实越远。而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承认观念的时代差异性，并且力求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之中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

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中，最具笼罩性与贯穿性的，不外乎以下数端，一曰“天人之际”，二曰“孝”，三曰“忠”，四曰“真实观”。“天人之际”主要包括“天命观”与“天人感应论”两部分。表面上说的是“天”作为冥冥中的主宰与人间统治的关系，常被骄傲的现代人斥为“迷信”，殊不知，其中却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孝”规定父子，是家庭秩序的观念内核；“忠”规范君臣，是国家秩序的观念内核；传统中国标榜“以孝治天下”“忠臣出孝子之家”。父子君臣家国天下，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这一点贯穿了整个帝制时期，两千年不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孝”与“忠”的内涵却发生过极大的变化，“愚忠愚孝”只是明清故事，以此来想象、衡量、解读明清以前之中国，必然会错误百出——此点亦不容不知。“真实观”，简单地说，就是有关“真实表达”的观念。今人默认为“真实”是“尽可能追求客观”；而这样一种“真实观”，在传统中国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司马迁的“实录”也不是要追求客观真实。“真实观”决定了传统时期人们对“真实”的追求与表达。

天命观——理解与共情

欲求“天人之际”，必须从西周的“天命观”说起；而要谈西周的“天命观”，则必须从“文王受命”说起。

“文王受命”是商周之际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按照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当时还是臣属于商朝的一个西方小国的诸侯，称为“西伯”。西伯为人公正，诸侯有争端都找他来讲理。虞人和芮人打官司纠缠不清，于是就跑到周来。进入周界，发现周人农夫耕田会谦让田界，普通人走在路上都会让长者先行。虞、芮之人还没有见到西伯，就已经感到惭愧，相视而言说，我们争的，正是周人感到羞耻的，还去找西伯干吗呢，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争执，各回各家了。诸侯知道了这件事情，说，看来西伯就是受命之君啊！诗人都赞美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并且“改法度，制正朔矣”。

上文故事的核心是文王得到天命，并且称王。按照文本，“文王受命”是诸侯的判断，而诸侯做此判断的原因是虞、芮之人受到感化、不令而从的事实。“文王受命”，意味着文王得到了天的授权，有了取代商纣拥有天下的合法权利。当然，真正实现了商周革命，取商纣而代之的是文王的儿子武王。而文王则因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德行，被孔子认为是最高尚的人，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

孔子并没有觉得“文王受命”有什么不妥。然而，在后世儒家越来越严格的君臣父子观念中，“文王受命”中的“称王”、改正朔等情节却构成了对文王“至德”的损害。唐代的张守节便不相信文王曾经称王，他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怎么可能“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呢？第二，如果文王已经称王改正朔，那就是说周的功业已经完成，武王后来又怎么会说“大勋未集，欲卒父业”呢？第三，《礼记·大传》记载：“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由此可见，“文王”是武王给父亲追封的名号，“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2]沿着同一思路走下去，北宋最讲究义理的史家欧阳修一连抛出四组证据，证明“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3]欧阳修的结论是，《史记·周本纪》中的相关记载是不可靠的，必须抛弃。清朝的梁玉绳做学术史，历数了自东汉应劭以下对“文王受命称王说”的批驳，认为自从欧阳修的《泰誓论》出来，“而文王之事方畅白”^[4]，文王的千古奇冤才得到了洗雪。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在这样的君臣大节上，“至德”如文王，怎么可能犯错误？殷商既在，文王就绝不会称王，即便他已经得到了天命——天越是眷顾文王，文王就越是应该谨守臣子的本分。这就是张守节、欧阳修的“政治正确”。而司马迁竟然记载文王受命称王，那就是给文王抹黑；让

这样的文字继续遗毒后人，就是对文王的栽赃陷害。

那么，文王究竟有没有称王呢？传世文献里白纸黑字写了的，欧阳修可以否认，说是写错了。可是，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却有文王称王的铁证，比如这一条：“衣王田，至于帛，王佳田。”前面这个“衣王”就是“殷王”，后面这个“王”显然只能是文王本人。整句的意思是在问，殷王打猎到了帛地，周王要不要跟他一起呢？^[5]

关于文王受命称王这件事，东汉以下至于清，人们纠结的是“称王”的部分。随着中国进入共和国时代，君臣关系解体，旧的“政治正确”终结，再也没有人会介意“称王”是否有损文王清誉。然而，时移世易，随着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盛行，一种新的解读出现了，那就是认为“文王受命”是“装神弄鬼”“政治造势”。

比如，文王在位五十年，附近许多国家被他灭的灭了，降的降了，势力渐大的文王成了西伯。他很有政治才能，又有一众辅佐，国势日隆。为笼络人心，他装神弄鬼，说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将来能得天下。这是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说的。时隔一甲子，一篇发表于2018年的有关“文王受命”的文章说：“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本来所谓受天命不过是天命论宣传的一种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在古代王朝更替中，天命转移对新兴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说明。”^[6]

“装神弄鬼”“政治造势运动”“宣传”这些词语表明，说话人（顾颉刚先生、《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的作者李忠林）认为，“文王受命”只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表演，表演的目的是要让其他人（方国、部族）相信（文王已获得天命），而表演者自己（以文王为代表的周人）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必要的作假”。这样的叙述在现代读者这里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因为关于“造势”，关于“宣传”中的包装技巧、营销策略，我们不知道看过、听过多少了。“必要的作假”，其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但是，在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之下，让“我们”看见什么，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换言之，纵然本来有真的东西，但“他们”展示的方式和动机却永远都是虚伪的，以利己为唯一目的。但问题是，“文王受命”的时代是否存在以“装神弄鬼”进行“政治造势运动”和“宣传”的观念背景呢？

并不存在。在“文王受命”的时代，的确存在让现代人看上去觉得是“装神弄鬼”的行为，但是那些行为在当时人的心里却是与神明沟通、祈求超自然力量保佑的真诚行为。文王不懂什么是“政治造势”，也不懂什么是“宣传”，尽管他的行为在习惯了“造势”与“宣传”的现代人看来就是“造势”和“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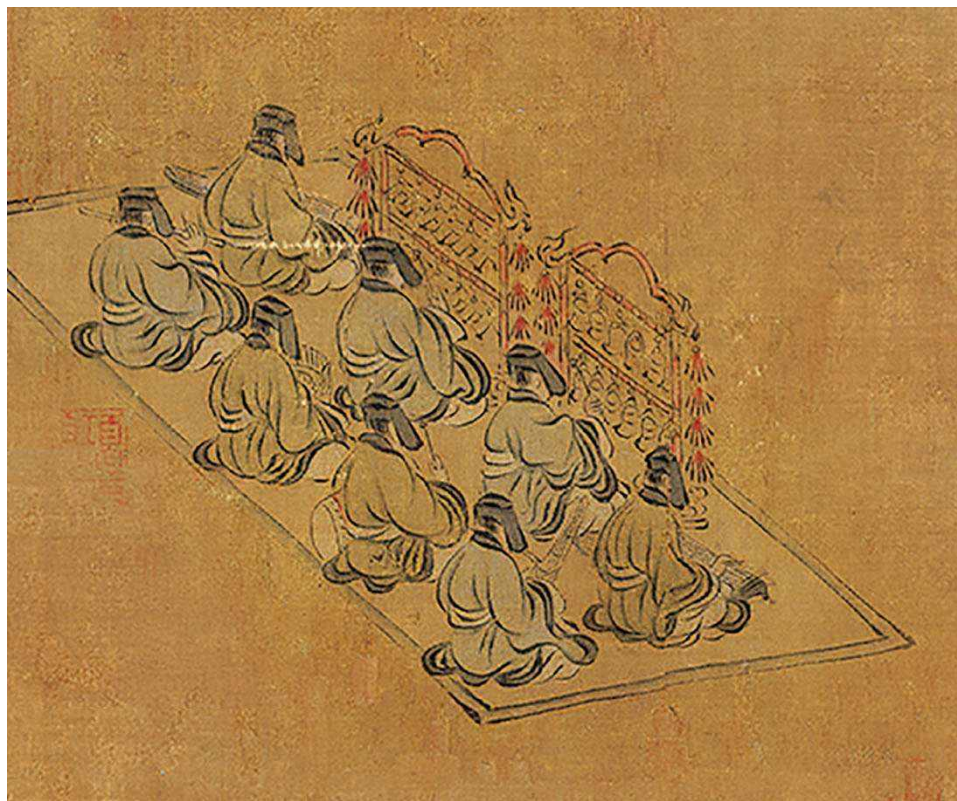
“天命观”是西周留给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但西周的“天命观”显然不是后世所误解的那样。综合各家说法，西周的“天命观”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天命”又称“大命”“骏命”，指统治人间的权力，由至上神“皇天上帝”（简称“天”）赋予其代理人，其代理人因而成为合法的人间统治者。第二，“骏命不易”“天命难谌”，天是能动的，当旧的代理人违背了天意，天就会放弃他，去寻找新的代理人。比如，商纣王迷信自己享有天命，“酣身，厥命罔显于民”（《尚书·酒诰》），耽于饮酒享乐，不善待人民；于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天厌弃了纣王，转而另寻“元子”——新的代理人，这就是周。第三，天命系于人间统治者的德，修德可以致天命，失德者失天命。这里的“德”应当理解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而不仅仅指私德。“上帝给予君主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所谓‘历数’）并不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于君主自己。”^[7]就像上古圣王尧对天为他选定的继承人舜所说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第四，“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在“天命”与“人间统治者”之间，是“四海”，即被统治者或者说整个社会，“四海”的困穷或富足决定了天命的走向和历数的长短。在整个“天命观”当中，“四海”虽处下位，却可以上达“天”之听，动摇“天”之意，进而决定“天命”。

这种“天命观”是周人的伟大创造。它的最伟大之处是将“皇天上帝”塑造成一个公正无私的至上神。相比之下，殷商的至上神“上帝”或者说“帝”是商人私属的，商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帝立子生商”，上帝立其子契为商的始祖，所以，上帝会永远保佑商王。而周人所创造的“皇天上帝”或者“天”却是公正无私的，只保佑有德者，而不论族属。周人的“天命观”来自这个西方小国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从现实中，他们看到了殷商由强变弱、本族以弱胜强的过程；从商代的典册记载和传说中，他们又了解了殷革夏命的历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而所有这些知识，让他们感到的不是“我幸得之”的沾沾自喜，而是上天的公正，以及德行与天命之间的正关联。于是，每次祭祀祖先时，周人都会吟诵《大雅·文王》之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对周人来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些“过去的历史”因为真实可信地证明了“天命靡常”的真理而显示出其价值，“过去”价值永恒，昭示未来。作为“历史”真正忠实的学生，周人虽得天下，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中充满了戒惧。



图四一：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诗经·周颂·维清》

《周颂·维清》是《诗经·周颂》中的第三篇。该篇为周成王歌颂周文王之德的祭祀乐舞的歌词。诗句虽短小精悍，却在《周颂》中占有重要地位。文中说：“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禎。”我大周朝政教清明，天下太平，皆得益于文王征伐有道，治乱有方。而正因文王有德，才受到了皇天上苍的护佑，最终开创了周朝基业，这是我们周朝吉祥的征兆。德行所在即为天命与众望所归，“文王受命”发生在西周天命观形成初期，而文王也确是得到了神明眷顾的新的人间领袖。此诗虽短小，意旨却颇为深远。画中表现的正是成王带领臣子祭祀文王的情景，笙箫钟磬齐鸣，众人上前拜谒。人物表情肃穆庄严，衣褶线条清晰，步履井然有序。



以礼乐奏鸣歌颂周文王的德行与能力

“文王受命”就发生在西周“天命观”形成初期，商人的上帝正在向周人的上帝转化。作为商朝统治下一个小邦的首领，文王尊奉商人的上帝和祖先，虔诚地向他们祈祷，卜问吉凶；同时，他相信上帝是公平公正的，人的努力会得到上帝的回应。他为人公正，妥善处理本族与他族的各种纠纷，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当时的人们相信，人间统治者的美德一定会得到神祇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表现为任何美好的事与物，包括人的行为，这就叫“格致天命”。而虞、芮来访受到感化的事例，则向诸侯证明文王确实是得到了神明眷顾的新的人间领袖。文王本人受到鼓舞称王，更加信心十足地扩大周人的势力。^[8]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接近真实的对“文王受命”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我们透过观念的隔膜才能得到的。

在本节末尾，想跟大家分享一篇趣文——美国学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对《尚书》伪古文《泰誓》和《独立宣言》的比较研究。^[9]伪古文《泰誓》是汉人拟作的武王伐纣大会于孟津之时进行的战前动员讲话，《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谋求独立之时宣示权利、与乔治三

世国王决裂的文书，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篇文章，有什么可比性呢？施珊珊认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应当读过并且借鉴了《泰誓》。何以言之？因为《独立宣言》的说理方式模仿了《泰誓》，即借助更高一级的秩序，去打破一个存在已久的政治关系。这个更高一级的秩序，在《独立宣言》中是天赋人权，在《泰誓》中是天命。当然，施珊珊也指出，与《独立宣言》比，《泰誓》还是有思想差距的。《独立宣言》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而《泰誓》只是要推翻商纣王。文章的说法是否成立，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实在不敢妄言。但是，说周人只是要推翻商纣王，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周人的心胸没那么狭隘。

[1] 《论语注疏》卷八《泰伯第八》，第5402—5403页。

[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年版，第119页。

[3]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八《居士集》卷一八《泰誓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页。

[4]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卷三《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0页。

[5] 参见高明：《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见《高明学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3年版，第92页。

[6] 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载《史学月刊》018年第一期，第34—43页。

[7] 徐刚：《以殷周之际天命观释读〈尚书〉例》，见《语言学论丛》第25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页。

[8] 参见徐刚：《以殷周之际天命观释读〈尚书〉例》，见《语言学论丛》第25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页。

[9] Schneewind, "Sarah, Thomas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King Wu's First Great Pronouncement,"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01, Vol. 19(1), pp. 75-91.

天人感应的纠错功能

关于“天人之际”，第二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灾异论”。“灾异论”是传统中国“天人感应”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它是汉代儒家的创造，以“六经”中的《春秋》《尚书·洪范》《周易》为基础，又吸收了民间的阴阳灾变思想。“灾异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灾异示警。“灾”和“异”是两个词。“灾”指洪水、大旱、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异”指异常的自然现象，比如日食、彗星、超新星爆发。“异”的属性有正面的，像超新星爆发就是瑞星——“所见之国大昌”；当然，古人不知道什么是超新星爆发，他们管这叫“周伯星见”。但是，当“异”与“灾”连在一起用的时候，指的就是那些负面的东西。“灾异论”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秩序失调的警示，皇天上帝已经感知到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因此特地降下“灾异”，对人间的统治者进行警告，这就是灾异示警。

第二，对警告信息的解读。“灾异论”认为，不同的灾异现象对应着不同的问题，这叫作“事应”。比如京城下冰雹，就表明“大臣任政，一姓擅势”，君权受到了威胁。最早试图对警告信息进行分类解读的，一个是夏侯始昌，他述作《洪范五行传》，建立了严整的灾异分类和解释体系；另一个是刘向，他作《洪范五行传记》，“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刘向的儿子刘歆对刘向的解释进行了修订和理论上的提高，班固的《汉书·五行志》收录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成果。^[1]

第三，认错悔改。人间统治者接到上天的警告，必须严肃对待，认错悔改。首先，在态度上一定要诚恳，要摆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向老天表明“朕知道错了”，必要的时候要勇于下诏公开认错。其次，为了了解错误的根源和程度，必须开放言路，广泛征求批评意见。最后，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纠正之前的错误，重新获得上天的欢心。

简言之，“灾异论”就是一个纠错机制。它的成立有赖于两个思想基础：第一是“天人感应”，承认上天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感应关系，上天能感知人间疾苦。第二是“天命论”，承认人间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上天。因此，当上天感知到人间疾苦时，就会对人间统治者提出警告，勒令改正，否则将褫夺其天命。一言以蔽之，“灾异论”是儒生套在皇权头上的一个“若无实有”的笼子。

用“灾异论”来限制皇权，有两大麻烦。第一，事应理论自身的瑕疵。事应理论很容易找到反例，而最大的反例其实来自儒家经典本身。大家都知道

大禹治水的故事，那么这场大水灾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圣王舜统治时期。舜的统治肯定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严重的水灾？还有商汤，也是著名的圣王，然而商汤治下竟然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禹水汤旱”是儒家典籍明确记载了的；可是圣王统治，什么错都没犯，上天竟然降下如此灾异，那它在警告什么呢？可以说“禹水汤旱”是对“天人感应”理论最大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释。

董仲舒解释说，这是因为特殊情况打破了阴阳平衡。按照董仲舒的说法，舜管理天下二十八年之后，老圣王尧去世。尧死之日，百姓如丧考妣，有三年的时间，四海之内的人陷入了深深的哀悼而不能自拔，这种悲伤的心情是属于“阴”的。哀悼导致阴气压倒了阳气，阴阳失衡，“此禹之所以有水之名也”，这是“禹水”。那么，“汤旱”呢？董仲舒认为同样也是阴阳失衡所致。商汤推倒夏桀，夏桀是“天下之残贼”，无比暴虐的统治者，商汤正好相反，是“天下之盛德”。天下除残贼，这是阳盛；得盛德大善，这是双重的阳盛，所以“汤有旱之名”。

董仲舒的解释绕的弯子实在太多了，他甚至不敢或者不愿意使用“禹遭大水”“汤遭大旱”这样的说法，而是说“禹有水之名”“汤有旱之名”，试图误导读者相信禹的水、汤的旱只是后人的错觉，不是真实的旱涝。董仲舒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最终也只说出一句：这是例外。而这个例外，恰恰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圣王事迹，实在是太扎眼了，充分暴露了“灾异论事应说”在理论上的不能自治。

“灾异论”的第二大麻烦，仍然与事应有关，那就是，灾异信息的解读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拿自然现象去对应现实政治，这种关联本来就是人为搭建的，没有一定之规。当然，汉代儒生在搭建对应关系的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依靠的是“六经”和其他儒家记载。但麻烦就在于儒家的书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诗经》是诗歌总集，《尚书》是古圣先贤演讲录，《春秋》是历史记录，《易经》是占卜之书，《周礼》《仪礼》是制度之书。这些书虽然被统称为“五经”，但是“经”与“经”之间没有一贯到底的逻辑，其中不乏互相矛盾的东西。靠这样一个复杂而多义的“资料包”来建立灾异与人事的关联，本身就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余地——这样说对，那样说也不错。而对灾异信息进行事应解读的，又是挣扎在现实政治当中、有着各种各样利益诉求的个人与群体，其结果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建立具有超越性的世人公认的事应原则。

那么，抛弃灾异说，直指德行，用德行来承接天命是否可行？唐代的柳宗元便主张：“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2]人间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天，而是人；统治合法性的标志不是祥瑞，而是仁德，“德”才是“受命之符”。柳宗元直接扔掉“天命”和“灾异”，主张以“其人”——被统治者的意愿来决定统治的合法性，以“其仁”——统治者的德行

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事情似乎变得更简单，也更接近现代观念了。这是否可行？

坚决不行！对于柳宗元的说法，宋仁宗时的年轻思想者苏舜钦予以迎头痛击。苏舜钦担心后世之人听信柳宗元的说法，“弃天弗征，背大道以自任，颠迷无从，靡所法则，有瑞弗恭，见妖弗警”^[3]，特地写作《符瑞》一文，重申“灾异示警”学说。苏舜钦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活了四十岁，没当过大官。但他出身高贵，祖父当过副宰相，外祖父、岳父都当过宰相。对于政治，苏舜钦自幼浸润濡染，有着近水楼台的观察便利；他本人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下笔成章。他的各方面条件都太好，所以一直很狂傲，但是其思想的深刻和锐利程度也是当世一流、睥睨古今的。苏舜钦一眼就看穿柳宗元抛弃“天人感应说”的恶劣后果——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能够约束皇帝呢？苏舜钦坚持统治者必须“逢凶而惧，反躬自敕”^[4]。

“天人感应说”“灾异论”是约束皇权的武器，当然不能抛弃；应当抛弃的，是“灾异论”中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事应说”。欧阳修严厉批评了那些专门说灾异的人，认为他们违背了“君子之畏天”的本意。欧阳修说，那些人一定要给每一桩灾异找个具体的对应事件。万一对不上，就会歪曲事实、裁剪资料来迁就自己的说法，“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而这样的做法，“失圣人之本意”，破坏了“灾异论”的严肃性，必将导致对天命的彻底懈怠。“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5]

基于以上思考，宋朝士大夫发展出一种不同于汉儒的新的“灾异论”：

第一，他们反对柳宗元抛弃天命的激进说法，坚持天与人之间存在感应关系，而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统治的警告信号。

第二，他们反对汉儒那种对灾异信息进行过度解读的做法，否定“事应说”，主张“君子之畏天”。欧阳修说：“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已。”^[6]也就是说，君子对天永远保持敬畏，因此，他们看到反常的事物，迷失了本性的变化，就要去思考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且感到戒惧，即使这种反常是很微小的，君子也不会忽视它。君子之畏天，最关键的是态度，是敬畏。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宋朝人成功地解决了董仲舒一直绕不出去的“禹水汤旱”难题。“灾异论”说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缺政的警告，可是圣王时代竟然也发大水，遭大旱。那么，宋朝人是怎么解决这一“千年难题”的呢？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政治家文彦博整合儒家经典的记载，重新描述了“禹水汤旱”：禹遇大水，汤遭大旱，两位圣王都遭遇了大灾，但是，“灾不为患”，

大灾之后，远远近近的老百姓面无人色，上上下下没有离心离德，天下秩序井然，仍然是一片太平景象。由此，文彦博成功地将“灾”与“患”分解为两部分：“用‘灾’来指自然灾害，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的；用‘患’来指天灾作用于人类社会引起的后果，圣王在上，人事修举，‘备之有素’，粮食充足，老百姓心气旺盛，整个社会才能呈现出向上的势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纵然有天灾，又能怎么样呢？‘灾’‘患’分离，不仅解决了‘禹水汤旱’这样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把灾异论从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造升华成了国家建设的思想武器。”^[7]

这就是宋人的“新灾异论”。它以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抛弃了机械事应说，保留了对上天的敬畏，从而维护了士大夫通过天规劝、约束统治者的能力，同时把更多注意力转向了救荒之政，寻求让天灾不为人患的知识和方法。宋代名臣主政地方，多能体察民间疾苦，如实检灾报灾，积极救灾。比如，范仲淹在苏州实行“以工代赈”，由政府和地方富裕阶层出资，饥民出力，修桥修庙，救荒与建设并举。黄河决口，河北灾民拥向山东，富弼事先集合山东的赋闲官员、闲置房屋、公私粮食储备，分区分片，定点到人，有条不紊地接纳、收容、照料了三十万河北灾民，写下了中国救荒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宋的董煟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荒政著作《救荒活民书》。

宋朝人抛弃机械事应说，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那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加强了。当日食可以预测，地震变得与人事无关，这些有关大自然的奥秘，被人类探知之后，人是否就可以放弃对天的敬畏了呢？宋人说不可以，不然就没什么东西可以约束皇权了。时至今日，科学昌明，上天入地，人类几乎无所不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放弃对大自然的敬畏呢？我认为不可以。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自然是一个整体，复杂系统的复杂联系从来都不是加减乘除这么简单。知识让我们勇敢，但同时也应该让我们对大自然更生敬畏，抱有更为普遍的善意。



图四二：明 佚名《富弼像》（出自《耆英胜会图》）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北宋名相、文学家，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出使辽国，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曾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败后，到郢州、青州等地任知州，任内救三十万灾民。至和二年（1055年）被拜为宰相，曾劝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二年（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拒不执行青苗法，被调往亳州任通判。辞官退居洛阳后，仍在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年）逝，年八十，谥“文忠”。他曾多次出使辽，并对西夏动态持续关注，以智谋瓦解了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得以稳定。



富弼

[1] 参见陈侃理：《刘向、刘歆的灾异论》，载《中国史研究》204年第4期。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六八《柳宗元传》，引《贞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9页。

[3] [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一三《符瑞》，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七八，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6页。

[4] [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一三《符瑞》，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七八，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5]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2—873页。

[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873页。

[7] 赵冬梅：《试论北宋前期士大夫对灾害信息的态度》，见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孝的尺度与边界

当今社会认同度最高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孝道。但是，今天中国人对于传统孝道的认识，充满了误解。

在说孝道是什么之前，我们先说说孝道不是什么。《二十四孝》绝不能代表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二十四孝》里讲的是什么事？故事里都是什么人呢？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无心肝，反人性。比如“郭巨埋儿”，两夫妇为了奉养母亲，要把亲生的儿子埋了。老婆负责杀，老公负责埋，一边挖坑一边问“死了吧”，老婆不忍下手，说“死了”。老公继续挖，掘地一尺，挖出来一锅金子，上面竟然还留一张字条，写着：“天赐孝子之金。郭巨杀子存母食，遂赐黄金一釜，官不得夺，私不得取。”^[1]鲁迅先生谈到自己少年时的阅读感受，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2]可是这样的孝子故事，至今还画在某些地方的墙壁上，每每看到，我便觉得荒唐。后来在网上翻到一篇发表于2008年的论文，其摘要如下：

《二十四孝》辑选了从远古到宋代民间流传的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作为传播儒家孝文化的启蒙读物，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所传递的传统美德至今仍值得继承和发扬。

这样的腔调，不免让我感到周身一阵发凉。

《二十四孝》的故事，最缺乏的就是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别说今天看起来荒唐之极，就是用传统儒家的孝道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可理喻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也说“父慈子孝”，郭巨竟然要亲自动手把儿子杀掉。杀子之人有何颜面被称作“孝子”？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把二十四个孝子编成一组，作为典范群体进行宣传，最早出现在晚唐五代的佛教宣传品当中。孝子人选在不同的时代略有调整，最终固定下来是在元代。其实《二十四孝》所体现的，主要是佛家（而非儒家）的孝道观念。这二十四个孝子，是经过佛教改造之后的本土孝子典型，也有来自印度的洋孝子改装成的本土故事。虽然《二十四孝》的“孝”字来自儒家，但是它所传递的精神却更接近佛家，比如故事的神异色彩，以及主人公的苦行自虐。孝子王祥在最初的故事里是“剖冰求鲤”的，就是冬天在冰上凿个窟窿钓鱼。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行为，后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卧冰求鲤”，要用三十七摄氏度左右的基础体温来融化冰层，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苦行。我们今天来看“郭巨埋儿”，无疑属于蓄意杀人。从当时讲故事人的立场上来说，应当也属于自虐行为，因为那个

婴儿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父亲的附属物，所以郭巨牺牲婴儿也可算是自我牺牲。

《二十四孝》的故事属于一种极端病态的宣传。它不合逻辑，拒绝思考，以怪相异行博取眼球，哄骗毫无价值的眼泪。《二十四孝》的确是传统中国孝文化的一部分，却是其中最为黑暗的那一部分。如果认为《二十四孝》就是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未免厚诬古人了。

说完了孝道不是什么，我们再说说儒家孝道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儒家所讲的“孝”，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孝不是单向的，孝要求互动，要有唱有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在要求“子孝”的同时也要求“父慈”。朱熹说：“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第二，根据儒家伦理，“孝”绝不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子对父，还负有批评劝导的责任。这一条，本来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睬，不管是鼓吹孝道的，还是批评孝道的。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几乎尽人皆知，赞同或者批评的重点都在“无后”这件事上。那么，另外那两个“不孝”是什么呢？好像很少有人去追究。关于“不孝有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是这样解释的：“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意思是，按照礼，下列三种行为是很不孝的：父母说什么是什么，不顾是非，一味顺从，让父母陷于不义，这是第一大不孝；父母都老了，家里很穷，可是不出去谋生活（一言以蔽之：“啃老”），这是第二大不孝；不肯结婚，不能留下子嗣，断绝了祖先的祭祀，这是第三大不孝。这三大不孝之中，无后最大。

汉儒解经，谨守家法与师法，是非常老实的。关于孝子对父母的帮扶义务，《孝经·谏诤章》中有明确论述。曾子问孔子，儿子什么都听老子的，就是孝道了吗？闻听此言，孔子接连说了两句：“是何言与？”这是什么话？又说：“言之不通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啊。孔子的指示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是单向的情感，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儒家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与“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父亲应当慈爱，儿子应当孝敬。“父”与“子”之间与其说存在着人格上的不平等，不如说存在着行为规范上的差异。孝的内涵包括生命的延续、家族物质生活与社会声望的维系，以及“父”与“子”之间在道义上的守望相

助。儿子可以越过父亲直接分辨是非，用正确的东西规谏、引导父亲，这就表明，儿子与父亲在道义面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在父子君臣的社会伦理之上，还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在道义面前，“君”与“臣”，“父”与“子”都是平等的。唯其如此，当“君”与“父”背离了道义的时候，“臣”与“子”才有批评规谏的正当性与可能性。这才是原始儒家的孝道。这样的伦理关系定位，即使放到今天，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说完了孝道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孝道的应用范围。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所规范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关系，而是贯穿于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和国家的制度、法律当中。帝制国家运行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官员的选任管理上面，而在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针对官员本人，而是针对他的家族。简单概括，这些制度包括：

第一，恩荫制度。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凭借官位为子孙弟侄获得做官的资格。

第二，封赠制度。官员已故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可以获得荣誉性官衔和封号，仍然在世的母亲和妻子可以获得命妇的头衔，官员甚至可以把自已应得的品阶转赠给已故的父祖以示感激。

第三，近地荣亲。帝制中国的官僚任命，讲究的是避籍原则，一般而言，不允许在本地做官。因此，容许官员担任原籍的一把手就成了莫大的恩典。比如包拯曾经两次担任老家庐州的知州，韩琦也曾担任老家相州的知州。韩琦还为此修建了昼锦堂，以表衣锦还乡之荣耀。韩琦的老乡岳飞就做过昼锦堂的保安。

第四，解官侍养。“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父母活到八十岁，家里必须留一个儿子，不能全出去做官；老寿星活到九十，所有儿子都得待在家里。这本来是《礼记·王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到晋代已经上升到国家法令，成了强制性规定。父母年纪还不到八十的，儿子如果愿意在家里服侍，也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制度鼓励的。比如宋代的包拯，考中进士之后，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离开老家跟他去外地工作，就在老家又待了十多年，直到两位老人家都入土为安，他服完丧服，才出去做官。

第五，三年之丧，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父母过世，解官服三年丧。西汉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并未实际推行，东汉曾经短期实行。晋代以后，三年丧制才开始稳定实行，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恩荫、封赠、荣亲、侍养、服丧，帝制国家对官员孝思的照顾是无比周到

的。但是，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在制度规范之内的，公开透明，有章可循。在表面的特权之下，是儒家伦理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官员在服务朝廷国家的时候，他的身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的孝子。基于这一认识，朝廷国家就必须照顾官员的家族利益。而且，特权的背后还有对官员行为的严格约束。必须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不然就是不孝，纵然一时权位得保，也未免身败名裂，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和平时期，当行孝与履职发生矛盾时，行孝才是第一位的。唐代的皇甫无逸在四川做官，老母亲留守长安，不幸病逝，皇甫无逸因过度悲伤而死在了奔丧路上。可是，竟然还有人批评他入蜀不带着老太太：“子道未足，何得为孝？”

从孝道可以推演出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举一个宋朝的例子，节度使在唐代为藩镇，在宋朝是地位尊崇、待遇优厚的荣誉头衔。大宦官王守忠自恃恩宠，向宋仁宗祈求节度使的头衔。宋仁宗这个人耳朵根子软，就去跟大臣商量。大臣庞籍一席话就给怼回来了：从本朝建立以来，就没有宦官当节度使的先例。陛下是最孝顺的了，凡是事关祭祀文物跟宗庙，没有不战兢兢、敬畏而慎重的，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典制法令，又怎么能破例呢？庞籍用来劝说仁宗的逻辑是：整个国家，包括法令制度，都是本朝列祖列宗的遗产；而陛下是孝子，谨守孝道，那么必须克制私欲，尽力维护法令制度。“朝廷的职位是祖宗的职位，不可以任非其人；国库钱物是祖宗之国库，不可以赏非其功；法令是祖宗的法令，不可以罚非其罪。”作为列祖列宗的孝子贤孙，当今皇帝必须谨守祖宗基业，“慎之重之，益自儆戒”，任人唯贤，不私自赏罚，尊重法令。这就是从孝道中推演出的政治原则，皇帝必须遵守。

在传统中国，孝从来都不只是私人德行，而是关系到伦理秩序、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原则。汉代察举举孝廉，以孝道的履行程度来选拔官员。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没道理，要反问一句：孝道和行政能力之间有关系吗？但是在传统中国，“忠臣出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基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融会贯通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人看古代，往往只见现象，不见现象之下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规范。这就好像看池塘里的荷花，只见水面之上的亭亭玉立、映日红白，却不见水下的纵横交错。批评与赞美都停留于表面，又哪里谈得上继承发扬呢？传统如此，外来文明亦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伦理剧烈冲突的时代，冲突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但是，冲突本身并不直接导向进步，导向进步的是冲突之后的反思。

[1] 此版本故事的出处是东晋时期干宝所编的《搜神记》。

[2] 鲁迅：《二十四孝图》，载氏著：《朝花夕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愚忠是个死胡同

一说到“忠”，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忠君”“忠臣”这样的词语，接下来可能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有毒的陈腐观念了。明朝有个叫沈炼的锦衣卫，七品小官。他喜欢喝一口，“少饮辄醉”，醉了之后会用筷子敲着碗沿打拍子吟诵《出师表》《赤壁赋》，吟罢几声长啸，以抒胸中郁气。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炼越职上书，弹劾权臣严嵩，被贬到西北戍边，又调查、揭发当地驻军劫杀平民谎报军功之事。最终，严嵩父子与边防将领合谋，捏造罪名，对沈炼处以极刑。

沈炼作有《臣事君以忠论》，其中写道：“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不义，妇不可以不贞；朋友不孚，吾不可以不诚；而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此儒者之误也。”意思是：父亲可以不慈爱，儿子却不能不孝顺；丈夫可以不仁义，妻子却不可以不贞洁；朋友可以不讲信誉，我却不可以不诚实。可是竟然有人为臣对君的忠设置了条件，说什么“只有君主遵循礼义来使用臣子的时候，臣才需要用忠诚来侍奉君主”，这就是儒者的不对了。他认为，子对父的孝，妻对夫的贞，自己对朋友的诚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臣对君的忠也理应如此。

这就是沈炼所理解、信奉并且用生命践行的绝对的“忠君”观念。即便是身处贬谪之中，他仍然一面“思亲太行道”，一面“忆主敬亭山”；一面“骂贼心偏壮”，一面“思君意未灰”。那个天天躲在西苑炼丹，偏听偏信，不理国政的嘉靖皇帝，从来没有上过沈炼心中的黑名单。沈炼只恨奸臣，不怨昏君，忠君之心，日月可鉴。这位“有明忠臣”沈炼，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传统中国愚忠的认识。

朱元璋曾经创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用严刑峻法打击那些拒绝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剥夺了中国读书人隐居的自由，试图把他们都变成驯服的工具。朱元璋以强权暴力求而不得的，在一百八十年之后的沈炼这里，竟然内化成了一种信仰。只可惜，像沈炼这样真信的人不多。忠君绝对化到了这样一种完全“无我”的地步，已经背离了人性，除了一二忠臣烈士，大多数人就只能嘴上说说了，说得越响的越是不信。远离人性的，只能走向虚假，越严格越孱弱。

沈炼在那段话的最后，批评了一种“异端邪说”——竟然有人说“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忠君竟然敢谈条件，这是哪里来的儒者，竟然混沌至此？沈炼很气愤。那么，这位儒者究竟是谁？

《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没错，沈炼反对的这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是孔子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没那么多曲折：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是要讲条件的，君主以礼待臣下，才配获得臣子的忠诚；反过来，就像南朝梁代的皇侃所推论的：“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义换忠诚，这就是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说。这里的“忠”指的是在君臣关系中居于“臣”位置的一方的行为方式。但是，这还不是“忠”的本意。“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晚，甲骨文、金文当中都没有“忠”，可以确定为西周作品的《尚书》各篇以及《诗经》《春秋》中也没有“忠”。最早出现“忠”这个字的，是春秋时期的私人著述：在《论语》中，“忠”出现了十八次；其后，《左传》中有七十二处“忠”。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忠”都是它最初的含义。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忠”最初的意思？南朝梁代的皇侃解释说“忠者，中心也”，把忠解释成内心所秉持的。宋朝的陈祥道在皇侃的解释上加了一个动词，说“忠谓尽中心也”，也就是说，“忠”就是按照内心所秉持的原则行事，尽力而为。换句话说，“忠”所强调的，不是一个人在“关系”或者说“名分”中的外在的行为规定，而是“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正是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之中，这个人才由内而外地生发出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这是新生的儒者在那个礼坏乐崩、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自身提出的最高要求。旧秩序在崩塌，人欲横流，儒者没有权势可以依凭，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过去所遗留的知识与智慧。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儒者自以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钥匙，他们以道自任，身体力行，试图通过对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影响感化他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

“行道”是儒者的人生理想。“行道”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得君行道”，得到君主的信任，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推行道德理想。“得君行道”让“儒者”与“君”之间发生了关系。从儒者的角度来看，“道”和“我”，或者说“我心中的道”是第一位的，“君”是第二位的。“我”以“忠”的态度“行道”，若“君”能行我之道，我则“以道事君”“事君以忠”；如若不然，我可以弃权位如敝屣，退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所谓“君臣义合”。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不稳定的，可以随时解除，而决定是否解除的权力在臣，而不在君。这样的主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打了来问”，本人凌迟，满门抄斩的。所以明朝有清洁版的《孟子》，删掉了上面那些扎心之论，阉割了儒家残存的锐气与风骨，也消除了实现政治改良的最后一点可能。

当然，明朝会如此，我们不能只责备朱元璋气量褊小，他虽是汉人，可受的是元朝蒙古人的教育，所继承的也是金元落后文化改造之后的文化中国。

传统的君臣关系走到明朝这里，就进了死胡同，它的后果必然是皇权无限膨胀，走向专制，臣子失去尊严，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这样的君与臣，如果彼此都认同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倒也可以相安无事。麻烦就在于，由这样的君臣所运行的国家机器，基本是不可能有什么生机与活力的，它缺乏自我修正、应对内外变局的能力。

当然，原始儒家所说的那种自由结合的君臣关系，其实在秦汉以后已经难以为继了。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同时并立，他们彼此认为华夏，但同时又互相竞争。所以，周游列国寻求可以合作的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既有可能性，又不违反大的族群认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舍此之外皆异族荒蛮，“找工作”已经没得选了。秦汉以后国家制度的巨大变革彻底改变了君臣关系，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意思是，士人的地位下降，君主越来越张扬，臣子变得像仆人一样，得到官位就欢喜得不得了。功名利禄，趋之若鹜，哪管什么是非毁誉。

但是，即便如此，在宋朝，原始儒家那一套“君臣关系论说”在原则上仍然是有效的。朱熹曾经跟他的学生讨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朱熹说，从人臣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可以不尽忠。但是，君主又怎么能不遵循礼义来驱使臣子呢？如果我们只强调臣下要尽忠，却不提人主应当怎么样，那么那些无道之君听了就会说，人臣就应当尽忠，就算我无礼，他们也得尽忠。这样一来，在上位的人就会肆无忌惮了。后来的人要避君主的忌讳，大多不肯把这一层明说。却不知这样做会让君主不遵循礼义，最终导致君臣双方都不能善终，这分明是害君主啊！

在宋朝的名臣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介于原始儒家和明朝那种绝对忠诚之间的“忠”。这种“忠”，又分为“大忠”和“小忠”（后者是我在《百家讲坛》讲寇准时所造之词，下文会细说）。“大忠”这个词，是范仲淹在颂扬他的前辈名臣寇准的时候说的：“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这句话的背景就是澶渊之盟，辽朝大军打过来，有人主张逃跑避敌，宋真宗略有摇摆，宰相寇准坚持皇帝亲征，最终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前线，扭转战局，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赢得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在整个亲征过程中，寇准比皇帝立场更坚定、态度更坚决，最终把皇帝和国家都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大忠”寇准忠诚的对象，是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而不是皇帝个人。在人格

上，“大忠”与皇帝平等，在见识上，“大忠”可以高于皇帝；因此，他可以纠正皇帝的错误，从而保证国家的利益。寇准的政敌王钦若、丁谓的选择与寇准是相反的，他们忠诚的对象是皇帝本人。因此，当皇帝害怕的时候，他们会为他寻找逃跑的名义和路线；当皇帝因为跟“夷狄”签订合约觉得没面子的时候，他们也能敏感地捕捉到皇帝的情绪，为他寻找纾解的药方。然而，皇帝的心情舒展了，天下苍生却遭了殃。

或许有人认为王若钦、丁谓之流是奸臣，而我以“小忠”一词来概括他们。因为从学理上讲，奸臣应当有里通外国、损害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王钦若、丁谓之流，主观上并没有直接损害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皇帝本人，他们仍然是忠诚的，只是这种忠诚最终伤害了国家——这就好像皇帝本人也可能伤害国家一样。“小忠”忠于君主，也是一种忠诚。而且，如果按照明朝的统治思想来看，这才是最纯粹的忠诚。“大忠”忠于国家，对君主有要求，这样的忠诚，宋朝可以有，到了明朝就要“打了来问”——先拖出去打板子。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

真实观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怎样才算是“说实话”，什么样的记录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记录”。人们眼里的“真实”，不管是“实话”还是“实录”，都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反映和表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真实的标准不尽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真实标准的话，那就是“不造假”。在此底线以上，“说实话”其实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政治实践中的真实观。宋真宗三十岁即位，副宰相王旦四十一岁，宰相李沆五十一岁，老中青三代结合。李沆主政，报忧不报喜，每天都向真宗报告各种坏消息，哪儿发大水了，哪儿干旱了，哪里又出现小股“盗贼”了，搞得真宗忧心忡忡，愁眉苦脸。王旦不理解。李沆解释说，皇帝还很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知道天下事是很艰难的。不然的话，他要么沉溺女色，要么大兴土木，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去打仗，去求神拜佛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了。李沆的解释，王旦当时并不完全服气。李沆过世之后，宋朝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北部和西北边境问题，天下太平，真宗果然就做了李沆最担心的事情，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修宫观，还认了一个道教天神做祖宗。这期间的宰相正是王旦。他想要劝阻，可是势所难为，力不能及；想要隐退，真宗待他又是天高地厚。王旦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愧疚，至死都无法安顿。这个时候，王旦想起李沆当年的话来，不禁由衷地佩服。

从真实观的角度来看，李沆的报忧不报喜，就是选择性地提供事实。换句话说，他报告了一些事实，但同时隐藏了另外一些事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当中，这种有选择性的真实报告，是会受到嘉许的，比如李沆就被宋人称为“圣相”，因为他的目标是高尚的——约束皇帝。为了高尚的目的选择性地披露和隐藏事实，并不违背真实，这就是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真实观。因为这种选择性的事实披露是与“动机之善”和“德行之美”相关联的。反之，如果这种选择性的事实披露是出于恶的动机，那么，它就不再为人所接受，而变成了“欺上瞒下”“蒙蔽圣聪”。可是，谁来判断动机的善恶与德行的美丑呢？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传统历史记载中有不小的篇幅就是在纠缠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种真实观，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至上的真实观”。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不仅存在于政治实践当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历史书写当中。我这里所说的“历史书写”指一切有关过去的有目的的记录，包括墓碑墓志等私人传记的书写。宋朝最高军事指挥官冯守信一生当中最光辉的事迹就是指挥修复黄河决口。冯守信的《神道碑》出自王安石之手，文字写得漂亮极了，翻译过来就是：当此之时，黄河在滑州决了口，皇帝忧心忡

仲，问谁可以领导抗洪抢险的工作。冯守信挺身而出，毛遂自荐说，我从小就生活在黄河边上，熟悉黄河的性情。于是冯守信就临危受命，担任了抗洪总指挥。在抗洪现场，“河怒动埽，埽且陷”，黄河怒吼着冲向堤坝，堤坝好像就要塌陷了。而冯守信安坐堤上，临危不乱，指挥自若。一天工夫，决口就堵上了。

这形象是不是很伟岸？这就是我们在冯守信的《神道碑》里看到的。但事实是，冯守信治河的第二年夏天，修好的河堤又被冲垮了。而冯守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他是把皇帝让他堵的口子堵上了，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就有很多人建议综合治理，可是冯守信说，皇上给我的命令就是修西南河堤，别的我管不着。

冯守信的《神道碑》作于冯守信死后三十九年。冯守信修河的不负责任及其灾难性后果，王安石肯定是知道的，可是他在作《神道碑》的时候却选择性地展现了冯守信一生中最辉煌的瞬间，给了一个大特写，然后定格于此。至于第二年发生的事情，《神道碑》绝口不提。那么，王安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肯定会觉得《神道碑》的记载是不真实的。然而，王安石所遵循的，恰恰是宋代社会文化中碑志书写的真实观。有学者总结说，碑志只能书写“部分的真实”，选择性地记录善行，忽略恶行。因为墓碑墓志的功能就是表彰死者的善行，为的是让后世子孙记得他的好，它遵循的就是“死者为大”“孝思优先”的原则。

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会损害真实，而这种损害在当时社会思想背景下是受到默许和鼓励的。这样的损害，绝不仅仅发生在私人记载当中，官方的历史书写可以走得更远。

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宣布独立，试图摆脱宋朝的控制，宋夏开战。开战之后，契丹又趁火打劫，派使者来重启边界争端，勒索财物。这两件事情对宋朝来说，都是关系存亡的大事。然而，到了1051年，年轻的史官司马光却赫然发现，当时的《时政记》和《起居注》都没有记载这两件事。《时政记》是宰相亲记的君相政务会谈纪要，《起居注》是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档案。这两种记载，是未来写作本朝史的基础。可是这样的大事，竟然漏记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他请求调阅档案，想要补全历史，还原真相，结果却遭到史馆负责人的怒拒，理由是“国恶不可书”——为了塑造本朝的光辉形象，给未来的人一个正面的教育，只能赞美讴歌，那些政治家脑子里进的水、战场上士兵和百姓流的血，那些屈辱的和谈，都必须回避。在这种真实观的观照之下，大段事实的漏略在所难免。

归根结底，这样一种真实观，是功利主义的真实观，它追求有道德的“用”，并不追求客观、全面的“真实”。这样一种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如果再向前推的话，会演变到制造事实的地步——用书写来制造

事实。

还有一个故事，主要人物有四位：一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官至副宰相，主持中央工作；二是宰相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是更老一辈的政治家；三是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同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同辈政治家，官至副宰相；四是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后来也官至宰相。

故事梗概如下：范仲淹年轻的时候，与宰相吕夷简有过激烈冲突，并为此受到了贬官的处分。宋夏战争爆发之后，吕夷简把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还，派去西北守边。范仲淹等人上前线之后，慢慢地稳住了局势，也积攒了入朝的资本。范仲淹去世之后，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写到吕夷简起用范仲淹时说：“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也就是说，这两位胸怀宽广的政治家为大局放弃了个人恩怨。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情节，范纯仁坚决否认：“‘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而欧阳修则坚持说这是他亲眼所见：“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最后，范纯仁擅自修改了《神道碑》的碑文，“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删除了二十多个字，才刻到石头上，又拿了拓片送给欧阳修。而欧阳修大怒，说这不是我的文章：“非吾文也！”所以，范仲淹的《神道碑》是有同一作者的两个版本的，区别就在“二公欢然”这个情节上。



图四三：《范仲淹神道碑》（局部）

《范仲淹神道碑》，又称《褒贤碑》。碑文由欧阳修撰写，碑额由宋仁宗亲题“褒贤之碑”四字，碑文由王洙书丹。此碑碑额与碑身由一块石料制成，尺寸为40厘米×408厘米×141厘米。出土于河南省伊川县彭婆乡。碑文共有隶书30行，满行为72个字，现在尚存1511字。北宋后留存下来的隶书碑文已不多，而王洙的隶书作品除此外更难寻觅。《宋史》本传载王洙“篆隶之学，无所不通”。欧阳修也曾评其写的《范仲淹神道碑》“峭劲，多带篆体，真出唐人隶书之上”，故更为珍贵。

“欢然”情节究竟是真是假？这桩公案，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到今天，纷纷扰扰讨论了一千多年。我个人觉得，这种感受性的东西，孝子之说应当更加真实。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坚持“此吾所目击”呢？

因为他希望传递政治和解的信息。年轻的时候，欧阳修和范仲淹一起，参与了对吕夷简的攻击，也一起承受了被贬的挫折。他们不满老一代的作风，急于获得权力，渴望改造政府，所以攻击政敌不遗余力，疾恶如仇，完全不在乎是否会激化矛盾，引起分裂。中年之后，随着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流产和对从政经验的反思积累，欧阳修领教了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开始

认识到保持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明白了“欢然”和解的重要性，而分裂则更容易把群臣变成皇权的工具和奴隶。所以，他坚持认为范仲淹和吕夷简应当和解，必须和解。这是基于政治反思所产生的智慧，经历了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按我的理解，欧阳修的行为，更准确地说，是在“制造事实”。他希望把吕、范之间的政治和解通过他的书写固定下来，传播出去，用文字来矫正政治风气。

这样一种用书写制造真实的努力，其实在中国传统当中一直存在。最典型的是“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晚唐罗隐的《馋书重序》里面有一句话：“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这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希望他的书写能干预政治风气。这番道理，年轻的范纯仁不懂。然而，到了晚年，范纯仁眼睁睁看着宋朝的政治走向进一步的分裂，甚至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回忆起欧阳修书写“欢然”时的良苦用心。

用书写来制造事实，就本质而言，已经背离了客观真实。但是，在道德至上的真实观之下，则是受到默许和鼓励的，只要它是出于善的目的。而我们从现代看过去，以客观真实（是否真实发生过）为标准来衡量的话，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真实观并不追求客观真实，它讲究的是道德至上，主张说话人或者记录者可以通过自以为道德的目的选择或者（通过解释）制造事实，因此是功利主义的。真实的历史川流不息，过去、现在、未来从未间断，每个人驻足的瞬间都在成为历史。大到民族国家，小到个人，群体和个体都是带着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书写将流动的历史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加以记录，主观性在所难免，我们要了解真实的过去，就必须接受它并不追求客观真实的客观。

主流政治文化的变迁

关的作用是隔离，防止有害、危险因素进入，以保护核心地带，“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也”^[1]。要想进入核心地带，必须渡关。“观念”就是我们进入传统时期思想文化的关。

渡过了“观念关”，自外而内，由夷而华，可以来谈谈帝制时期的政治思想了。这里所说的“政治思想”是“政治”中的“思想”，特指那些对政治运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思想因素。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儒家对法家的改造过程和儒家的自我改造过程。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被皇权“认证”为政治思想的“正宗”。曾经为帝制贡献了思想模板的法家失去了上台资格，退居幕后，其影响则时隐时现。

^[1] [唐] 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中华书局992年版，第96页。

迂阔下的稳健

“迂”字的本义是绕远。在现代汉语当中，“迂”是一个偏贬义的词，比如说“迂腐”“迂阔”“迂远”。在古代汉语当中，“迂”通常也不是褒义词，但是，一些纯粹的儒者却会被人批评为“迂”，而儒者也常常会以“迂儒”自嘲。那么，“迂”究竟是来自外界的嫌弃，还是儒家自带的品质？

我注意到“迂”这个概念，是在写作《大宋之变，1063—1086》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宋神宗最终选择王安石来主持政局，这才有了“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被大众认识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众所不知的，是王安石并非宋神宗的第一人选，而司马光也曾经是神宗看好的人物之一。当然，神宗很快就看清了司马光，他相信司马光的忠诚和正直，但同时也明白，这不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实现理想的人。神宗对司马光的总体评价就是：“光方直，如迂阔何？”司马光这个人端方正直，只是迂阔，可怎么好啊？“方直而迂阔”，这就是神宗对司马光的总评价。迂阔，迂者远，阔者疏，迂阔就是迂远不切实际的意思。宋神宗是对吕公著吐槽司马光的。吕公著的政治倾向和司马光接近，他替司马光辩护说：孔子是圣人，可是子路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也说他迂，司马光又怎么能免得了迂呢？“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1]，请陛下深思。

吕公著没有瞎说。孔子之“迂”，见于《论语》。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君主请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会做什么？孔子回答他“正名”——端正名义。子路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可真够迂的，正名能干什么呢？孟子之迂，见于《史记》和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孟子学成之后，“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他先拜访了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前往大梁，“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便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转了一圈，“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2]

子路是孔子的学生，爱真理也爱老师的那种，他说孔子“迂”，孔子就很生气地骂了回去，说子路“野”，学养不够。齐宣王、梁惠王嫌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3]，不肯用他，孟子就只好退回来跟学生们一起写书了。

那么，孔子、孟子是否“迂”呢？站在当时君主的角度来看，的确够“迂”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们翘首期盼的，是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富国强兵、战胜弱敌，你却去跟对方谈什么遥远的“正名”“仁义”“唐、虞、三代之德”，不是“迂”是什么？

然而，绕远就一定是浪费时间、徒劳无益的吗？司马光在《迂书·释迂》中以种树为喻，证明“迂”之功效，所谓“收功愈远”“为利愈大”：一年生的树

木砍下来只能当柴烧；长两年再砍，就可以当椽子使；长到五年，能够当堂屋的柱子；长足十年，可为栋梁。^[4]时间是培育栋梁之材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是自然法则，没有近路可抄。在人事之中，同样也存在着必须绕的远路、通过急功近利无法实现的长远目标。质言之，儒家的“迂”所强调的，是遵循自然法则，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不是快速得到结果。

面对同一个问题，法家的办法是不择手段、直奔结果；道家的做法是由他去，顺其自然；而儒家的做法是摆正位置，理顺关系，以便让关系在未来的运作中自然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兄弟俩为争玩具打架，法家的父母是压制，厉声喝止，不听者打屁股，打服为止；道家的父母是不干预；而儒家的父母肯定要先讲道理，“兄友弟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让兄弟俩认识到兄弟关系的本质，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对团结友爱的好兄弟。

摆正位置、理顺关系，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而“正名”的基础是孟子所说的“仁义”。“名”是名称、名义，比如我是老师，也是母亲。“名”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没有“关系”则无所谓名义。比如，“母亲”一定是在“母子关系”中存在的，“老师”一定是在“师生关系”中存在的。“名”以“仁义”为法则，规定了“角色”（名义所有者）在“关系”中的“应然”之态。“母亲”应当慈爱，她因此获得儿女的孝顺与尊敬；“老师”应当传道授业解惑，才能获得学生的尊敬和追随。

真正的儒者勇于坚持原则，不会屈从于权势利益，他们是缺乏灵活性的，因而显得迂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说到“利”字，梁惠王必是目光灼灼的。处身战国时代，君主们想要什么，孟子不是不知道，然而他还是坚持要讲仁义。这就是儒者的迂阔固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而是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给你什么。对儒家来讲，是非高于父亲的权威，真理高于皇帝的权威。《孝经》有“谏诤章”，强调“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子孝于父、臣忠于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能够批评、纠正父与君的错误。

这种迂阔的儒者，在现实政治当中其实很难存活。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在野”状态，没有纠缠到现实政治中去，不承担实际工作，只在思考中构筑理想的政治宏图。帝制的制度框架，包括抽象原则和具体制度，基本上是由法家搭建起来的。即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帝国的政治治理原则仍然是“霸王道杂之”的。法家的宫殿庭园、黄老的运行规则，儒者借助皇权进入其中，虽然自以为怀挟真理，却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



图四四：北宋 李公麟《孝经图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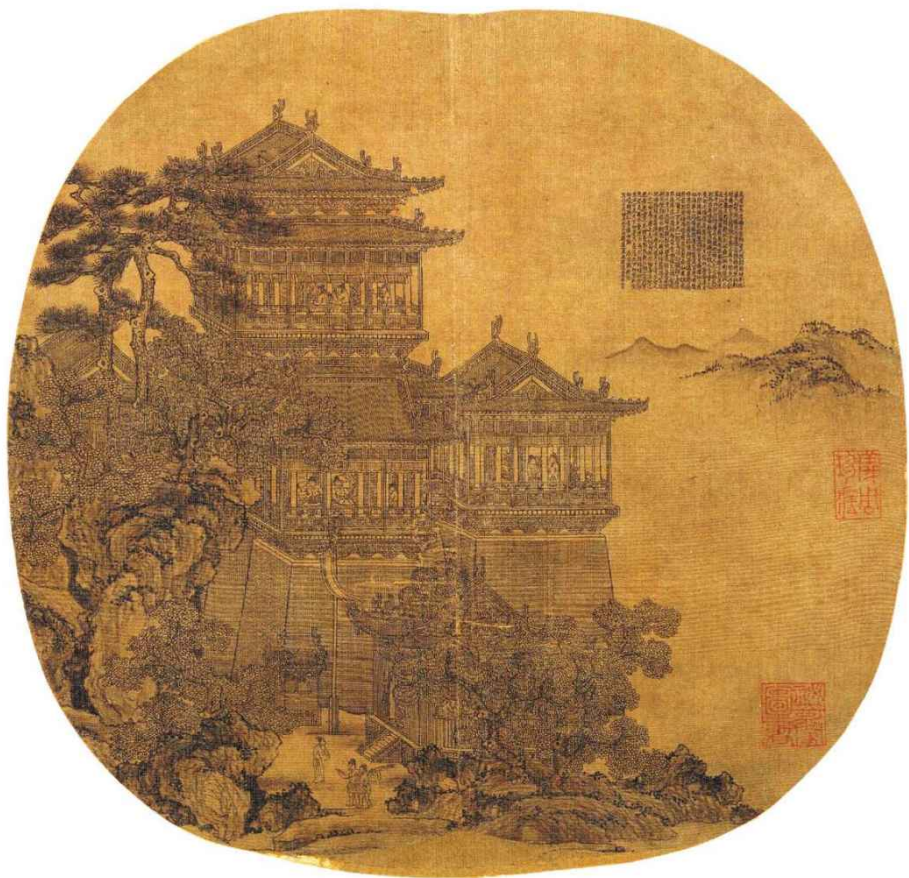
《孝经图卷》，北宋李公麟绘，绢本，墨笔，459.9厘米×21.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最擅长白描，只以线条勾勒，不施颜料，不加晕染。上图即以白描方式阐释了《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的含义：曾子问孔子，事亲是不是遵从父亲的命令而不违逆，才能称之为孝？孔子连连说，……如果有不义之事……作为人子，至情不能自己，必更加恭敬孝顺，积攒诚意以感动之……如果多次劝说还不听，就哭着跟着他，直到他听从为止。……作为人臣，必批陈利害，及时劝止君主。如果他不听从，就要极谏，或借古喻今，或委婉地提出中肯的建议，直到他接纳为止。父亲、君主做事违背了义理，儿子、臣子要直言相劝，这才是真正的孝和忠。由此反映出古代移孝于忠与儒家迂阔耿介的性情。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狄山的博士，匈奴来请求和亲，狄山认为经过连年战争，“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不如接受和亲，休兵养民。御史大夫张汤（以深刻著称的酷吏）批评狄山是“愚儒，无知”。狄山反批张汤“诈忠”，只关心皇帝的倾向，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一句话惹恼了汉武帝。汉武帝逼问狄山：我让你去管理一个郡，能不能保证匈奴不入寇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么一个县呢？狄山还是说：不能。武帝再逼问：给你一个亭障，怎么样？狄山估计再说“不能”就要被隔离审查了，只好咬着牙说“能”。结果狄山就真的被派去守边，过了一个多月，这个可怜的迂儒的脑袋就被匈奴人砍掉了——皇帝和野蛮人联手，杀死了一个说真话的人。司马迁是在《张汤传》里讲到这个故事的。故事讲完之后，他淡淡地总结了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还有人敢反对皇帝吗？没有了。对于博士狄山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命运，司马迁没有发一句议论。然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狄山呢？

狄山是博士，读书人，带兵打仗非其所长。汉武帝逼着他去戍边抵御匈

奴，他说“不能”无可厚非。在这个特定情境之下，汉武帝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我们把狄山的故事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去，就会发现儒者集体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尴尬。当儒生们被允许进入现实政治的战场，参与国家管理的时候，他们该拿什么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现实问题呢？比如匈奴入寇，比如连年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他们从孔孟那里得来的原则是对的、好的，但是，只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儒生们必须学习，必须转变，必须向下沉潜，向法家学习制度和法律。只是，如何在与现实的碰撞之中，在权势的压迫之中，仍然保持身姿的挺拔、态度的坚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历朝历代，皆不乏直道立朝、敢言能谏之士，然鹤立鸡群者，很难推广至一般。儒者与现实结合，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在宋朝。进入11世纪以后，宋朝士大夫集体，一方面，儒学修养日益精进，出现了反思历史，审读经典，以儒家学说为核心重建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他们活跃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办事能力一流，足为国家之栋梁。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这气势，简直是文士包打天下。这种气势哪里来？以本朝政治传统为底色，以制度做保障。正是这种包打天下的气势，给了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担当，那种襟怀，是何等开阔！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允许和鼓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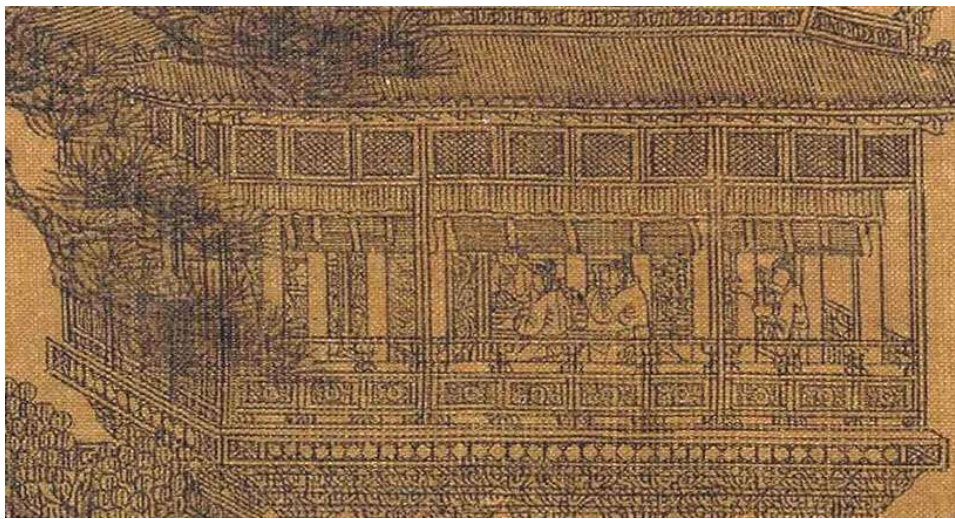


图四五：元 夏永《岳阳楼图》

《岳阳楼图》，元代夏永绘，绢本墨笔，界画，扇面，25.8厘米×25.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永精于界画，尤擅长宫殿阁楼的界画。所谓“界画”，是指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画家用细如发丝的线条描绘，行笔细腻而整体气势宏伟，将巍峨的岳阳楼融绘于浩渺的自然当中。左侧为岳阳楼，右侧为留白，将“衔远山，吞长江”的气势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诗意融合得颇为自然。画面右上方以蝇头小楷题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文，通过描绘岳阳楼的丽景与文人骚客登楼观览后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与达观态度。



楼下行人及正要上楼者



楼上畅谈饮酒者

一流的办事能力，日益精进的儒学修养，给了宋朝儒者足够的底气。他们上承孔孟，以个人对儒家经典的修习直接体认真理，明辨是非，然后投身现实政治，以“大忠”之义侍奉君主，把华夏政治文化的水平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人敢对皇帝说：“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这样理直气壮地要求最高统治者尊重制度原则，纵观帝制中国，舍宋朝外，哪朝还有？

宋朝士大夫说天下国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努力践行的。宋神宗最初的理财施政人选不是王安石，而是当时公认度最高的理财专家——张方平。张方平能力超群，但是曾经受贿，犯过错误。司马光时任御史中丞，是台谏官的领袖，专司批评。这个迂腐的儒者坚持道德至上，一票否决，坚决反对张方平的参知政事任命。为了避免矛盾，宋神宗试图把司马光从御史中丞调任翰林学士。司马光的调令要经过一个叫作银台司的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再送到閤门司，閤门司负责将调令送达司马光。按照行政程序，閤门司只是传达室，而银台司作为审核机构，则拥有一项特殊权力——“知门下封驳事”，有权驳回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行政命令。银台司的负责人吕公著认为，皇帝把司马光调离御史台是错误决定，就真的驳回了。神宗不愿意硬碰，就把司马光的官诰（调令）越过银台司，直接放到了閤门司，然后写小纸条约谈司马光，让他自己去取。

宋神宗自以为这一做法既聪明又体面，干得漂亮。结果怎样？吕公著坚决抗议，抗议不果，愤然辞职，曰：“诰不由封驳而出，则是职因臣而废，乞正臣之罪，以正纪纲。”^[5]神宗绕过银台司，通过閤门司把官诰直接塞

给司马光，这种做法破坏了银台司的封驳制度。被绕过的银台司失去了审核诏令的功能，名存实亡，国家的纲纪秩序因此遭到破坏。而在吕公著看来，这种破坏是因他而起的，他必须承担这莫大的罪责。在他的观念中，个人职位得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制度所维系的朝廷秩序——唯有受到尊重的制度和传统，方能约束皇帝。

“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吕公著为司马光的“迂”^[6]辩护，他自己又何尝不“迂”？迂者远，不近于利，“眼前亏”肯定是要吃的。不迂的，闪转腾挪，上蹿下跳，能得一时之利，然而规则破坏之后，又果真能够长治久安吗？纵然过得了一代人生命的长度，就不怕“其无后乎”吗？

[1]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页。

[2]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梁惠王章句上·一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页。

[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年版，第344页。

[4] 参见[宋]司马光：《迂书·释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二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册，第199页。

[5]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八《吕公著传》，基本古籍库转录文渊阁四库本。

[6] 受篇幅所限，对司马光更为透彻的解读在此不便展开。若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另请参见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年版。

从高效到失效

梁惠王是一个很善于“错过”的君主。他先是错过了孟子。孟子以“仁义”游说梁惠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丰碑之作《孟子》。梁惠王的错过“成就”了孟子。

在孟子之前，梁惠王还以同样的“错过”成就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当时魏国的主政大臣是公叔座。公叔座临终，对梁惠王说，我手底下有个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等一的人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用他来主政。梁惠王心想，给我推荐一个毛头小伙子，这老头怕是糊涂了。公叔座见梁惠王不说话，就屏退了所有人，说，大王如若不能用公孙鞅，就把他杀了吧。梁惠王还是不说话。梁惠王走了之后，公叔座叫来公孙鞅，掏心掏肺地对他说，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向大王推荐了你，他不肯用你，必然会杀了你的。公孙鞅不为所动，说，大王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肯听你的话杀我？公叔座死后，公孙鞅闻听秦孝公招贤纳士，于是离魏入秦，最终主政秦国，辅助秦孝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公孙鞅被秦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跟儒家的迂阔相比，法家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灵活善变，为达目的可以随时调整姿态，变换主张。《史记》所描述的商鞅见秦孝公，充分体现了法家的灵活。商鞅与秦孝公不是“一见钟情”的，他们一共谈了四次，才彼此接纳。司马迁是一个很善于营造戏剧性场面的作者，他通过寥寥数笔，以典型细节勾画人物形象的手艺，今天的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学到过，并且非常傲慢地予以“扬弃”。以下是司马迁所描述的四次“鞅孝会”：第一次，商鞅“语事良久”，秦孝公“时时睡，弗听”；商鞅离开之后，秦孝公大骂推荐人：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第二次，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秦孝公还是没听进去；第三次，秦孝公觉得这个人有点儿意思，“可与语矣”，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到了第四次，高潮来了，秦孝公跪坐在席子上听商鞅说话，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地就往前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1]接下来，商鞅开始一对一地给秦孝公上小课。讲了好几天，秦孝公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

在这四次“鞅孝会”中，商鞅所讲的内容、所主张的理论是在不断变换的。他先讲的是“帝道”，然后是“王道”。这个“帝道”跟帝制没有关系，是比“王道”还高级的社会理想。“王道”是儒家常常讲的。由此可见，商鞅也懂这些高远的东西；但从后来的表现看，对于“帝道”和“王道”，商鞅虽懂而不信，之所以讲，是因为要试探对面的君主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帝道”“王道”都没能进入秦孝公的心田，因为太迂远了。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脉，便开始大讲“强国之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讲得秦孝公几乎忘掉了肉

味。

商鞅由魏入秦，他需要一个国家作为舞台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取得君主的信任，获得授权，这就是商鞅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商鞅不是不知道更高明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能够根据对方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对强权势力的投其所好，以及对被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是法家的一体两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现代概念，从来都不是法家的主张。同儒家一样，法家要建设的也是一个贵贱有别、亲疏有分、尊卑有序、长幼有差的等级秩序。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于，儒家在承认并维护现实的尊卑等级秩序的同时，还相信人在知识与精神层面上的平等，相信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获得明辨是非、通达道义的能力。而法家则以现实之秩序为终极之秩序，以权力地位之不平等为人际关系之全部。在儒家这里，所有的关系都应当是相互的，比如父子之间，父须慈，子须孝；又比如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遇换忠诚。在儒家的人间秩序中，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比如儿子和臣下，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以及在一定规范之内进行表达的自由，儿子可以批评父亲，臣下可以匡正君主。而在法家这里，关系是单向的，法家强调君主至上，强调臣子单方面的效忠、单方面的服从、单方面的牺牲，坚决反对下对上的任何批评论论。

商鞅相秦，法令已经制定，但还没有推行，首先“徙木立信”。“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下令“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秦人怪讶，无人响应。赏金提高到五十，有人照办，果然得到五十金。法令推行一年，秦民跑到首都来告状投诉法令不便的人数以千计，太子也犯法。商鞅惩罚了太子的师和傅以儆效尤，法令继续推行。法令推行十年，“秦民大悦”，从前那些说法令不便的人又有一些跑到首都来赞美法令是如何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都是破坏分子，把他们全部强制迁移到边城。从此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2]说坏不行，说好也不行——老百姓放弃思考，“不敢议令”，唯知服从，这就是商鞅想要的结果。我要你把这块木头搬到北门去，你就搬到北门去，搬了就有赏，这是我的命令，你只要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什么要在都市南门竖一块木头？又为什么要搬到北门去，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什么这么个活计竟然值五十金？敢于提出质疑的，都是“乱化之民”，必须惩罚！

跟儒家相比，战国时期的法家实在是太成功了，几乎无往而不利。因为他们以君主之目标为目标，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同时又拥四种知识，能使国富兵强而霸业得成。这四种知识就是法度、农学、兵学和纵横术。今人通常以法家为一家，以农、兵、纵横各为一家。这种分类方式来自《汉书·艺文志》。殊不知，农、兵、纵横三家，“皆法家之工具也”。“农以致富，

兵以致强，而纵横则为外交术，皆法家之所宜有事者。”^[3]比如商鞅相秦，就是兼四种知识而用之：“内立法度”，进行法令制度建设；“务耕织”，大搞农业经济建设，提振国家经济实力；“修守战”，建设坚固的国防、强大的军队；“外连衡而斗诸侯”，通过外交改善国际环境，谋求大国地位。

相比儒家，法家的功夫更扎实，跟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而也获得了更多接触、解决现实问题的历练，这是个良性循环。战国以后的华夏国家制度主要是法家打下的基础。然而，“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4]。法令制度是中性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是看隐藏在法令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那些制定法令的人，他们相信什么，畏惧什么。在法家这里，是君主至上、国家第一的，无所谓“人民的福祉”，人民只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所以，法家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把人民变成驯服的工具。

法家三宝——法、术、势，“夫法刚而术柔，法显而术隐，法以齐百姓而术以驭群臣”，百姓、群臣皆工具。势为施行法、术的基础，“法、术、势三者备而法家之义尽于是也”^[5]。李斯上《行督责书》，为秦二世胡亥讲“督责之术”，也就是让臣下听话的办法。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深督轻罪”就是轻罪重罚。“明主圣王”凭什么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非有异道也”，实在没什么稀奇的办法，关键就是“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用严苛的法律施行恐怖统治，“故天下不敢犯也”。^[6]人人畏惧而“不敢犯”，统治者就能安安稳稳地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这就是李斯的“督责之术”。这样丧心病狂的异端邪说，李斯敢当真理宣扬，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他被赵高排挤，“乃阿二世意，欲求容”^[7]；二世竟觉受用，可见是被赵高洗脑到了了无人性的地步——极端法家的精神世界，实在疯狂。二世的法律老师赵高玩过一场“指鹿为马”的游戏，看起来荒唐，对极端的法家来说，也算正常。

这样的统治能否长久呢？很难，因为人不是机器，百姓不是，官员也不是。人需要法律的约束，也需要道德、荣誉的滋养。法家的治理往往高效，比如汉代的酷吏，常能出奇招，下狠手，打击豪强兼并，毫不手软。但是，这种治理方式的长期有效性却并不乐观。对此，司马迁有着敏锐的观察：

随着王温舒等酷吏的出现，“以恶为治”变成了普遍的政治风气；法网严密，轻罪重罚，官员百姓动辄得咎，索性豁出去了，“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转而依靠中央派出的特使，“于

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之”指地方政府。事情仍然由地方来办，中央大员的责任只是坐镇监督，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一次提升。

可惜，此举并不奏效。于是，汉武帝派出了第二批特使。“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绣衣直指御史”是由皇帝亲自抽调得力官员、调发正规军临时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它绕开地方政府，以重兵兴击志在灭贼，又以连坐之法孤立盗贼，来势汹汹，杀气腾腾，果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岁，乃颇得其渠率”。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二次提升。

结果怎么样呢？可以迅速起效，然而不能持久。散兵游勇往往再度聚集，形成反政府武装，“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按照法家的思路，当然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沈命法”规定，凡境内爆发盗贼未能察觉者，发觉而不能如数抓获者，郡太守以下至相关小吏，全部处死。督责之严，达于极致。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三次提升。

“沈命法”果然奏效，只是效果适得其反。“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8]小吏担心被杀头，即使发现了盗贼也不敢举报，担心万一抓不着，自己倒霉不算，还要连累上级；上级也默许这种做法。盗贼越来越多，上上下下都不说，互相包庇，一起瞒着皇帝，在文书里营造了一个太平世界。在捕盗这件事情上，大汉王朝的治理体系彻底失效了。

汉武帝的酷吏政治，从高效到失效，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司马迁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法家的灵活高效，可以兴于一时，不能行之长久。远不如迂阔的儒家，把关系理顺，然后自然运行出善的结果。当然，在汉代以前，纯粹的儒家其实很少得到主政的机会，那么，一旦得到机会，理想可以落地生根，儒家又将怎样迂远地建设他们美好的世界呢？

[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228页。

[2] 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23页。

[3]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页。

[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页。

[5]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9页。

[6] 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6页。

[7]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

[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

儒与法的艰难融合

秦帝国的建立，让法家的建设成就达到了巅峰；而秦的速亡，又漫画般直观地展示了法家统治的缺陷。汉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秦对六国以武力征服所造成的创伤尚未平复，秦末农民大起义又添新创，社会疲惫，经济凋敝，禁不起乱折腾。所以汉初的政治风气是属于黄老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尽量不干预社会，与民休息；然而在法令制度层面，汉帝国仍然是法家的。汉朝建立六十年之后，汉武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儒家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那么，这一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春秋战国以至于秦，儒者一直是现实政治的边缘人物。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志向不得伸张，“累累如丧家之狗”（《孔子家语》）。孔门弟子的就业状况也令人不愉快。《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听起来还是有“有出息的”，那么，究竟哪些人做了“师傅卿相”呢？唐代的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替司马迁掰着指头数了一遍：“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未闻也。”^[1]数来数去，只有三个，比晨星还寥落。儒家以治平天下为理想，应当不排斥服务君主，就业状况如此凄惨，原因何在？同法家相比，儒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本领的确略逊一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儒家谋求的是根本的解决，而非表面的解决。但总体上说，在高大上的理论和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儒家缺乏贯通之术。而儒家对于超越性的高洁人格的追求，则让他们与急功近利的时代之间始终存在隔膜，难以真正融为一体。当法家指引着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儒家的博士们参与了有关帝制初建的制度研讨，比如皇帝名号的拟议，封建与郡县的优劣，等等；可是，每一次，他们提出的建议都不能贴合统治者的心意——儒家的学者与法家的君主始终还是有隔膜的。

到了汉朝，儒家终于有了一次贴合皇帝心意的举动。“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在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上，“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皇帝尊贵的存在。刘邦满心愤怒，一脸落寞。就在这个时候，儒者叔孙通找到了刘邦，告诉他，陛下需要的是礼仪。叔孙通说，我们“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打天下我们不行，但是守天下，我们是有一套的，让我来广泛征求鲁地的诸生，让他们和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起草朝会礼仪吧。刘邦犹豫了一下，问：“得无难乎？”你所说的礼仪不会太复杂难搞吧？叔孙通拍着胸脯做了保证。刘邦又嘱咐他，你做做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得让它简单易行，是我所能做到的。两年之后，长乐宫落成，汉王朝又一次举行了

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礼仪的规范、指引之下，整个朝见活动井然有序，“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又举行了宴会，从头到尾，“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心满意足，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到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是何等尊贵。

儒家初登汉朝政治舞台的身份，是礼仪专家，这一点并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西周封建礼制的传人。想当初，陈胜起义，鲁国的儒生去投奔他，就是带着“孔氏之礼器”的。而刘邦跟项羽争霸，打到孔子的老家，“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3]。但是，没有一个儒者会满足于“礼仪专家”这样单调肤浅的身份。他们的自我期许，是治国安邦、整顿天下秩序的人。对儒家来说，仪式、音乐、器具这些，都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4]。“礼”涉及国家统治、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而“仪”只是它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仪”可以脱离“礼”而存在。刘邦对朝会礼仪的接纳，是实用主义的、浅薄的。能够往儒生帽子里撒尿、张口闭口“尔公”（你老子）的刘家老三，还能怎样呢？当然，刘季本人也从没想过要装斯文，人家不是说了吗——不要搞得太复杂，得让我能懂。

儒者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尽管如此，随着统治的日渐稳定，帝国的统治者也开始关心一些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了，比如本朝的历史定位、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及其表现形式。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就是“天命”的问题、“正朔”的问题、礼仪制度的问题。儒家的机会在一点一点地展现。汉文帝时，贾谊提出汉家应当为土德（而不是水德），需要改正朔，要“以礼为治”，未获实现。贾谊之后，另一位儒生公孙臣旧事重提。这一次，儒生的运气很好，“后三岁，黄龙见成纪”，黄龙是土德的标志符号。文帝于是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让他“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文帝还命令博士诸生讨论封禅礼仪。看起来老天有意兴儒，然而好事多磨。儒起源于东方的鲁，同样来自东方的，还有方术之士。儒生在西方的活动，往往与方士有关。而“天命”这一类的事情，本来就是超自然而非理性的，怎么可能少了方士的参与？最终，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玩儿大了，文帝发现被骗之后，兴味索然，“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5]，连儒家也一起冷落了。而景帝，似乎从来都不喜欢搞这一套。

汉武帝即位之后，皇帝对礼的需求才再次勃发。武帝即位第一年，他的两位丞相魏其侯和武安侯“俱好儒术”，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又从鲁地请来了王臧、赵绾的老师大儒申培公，打算按照儒家思想改造国家，“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结果遭到了列侯的强烈抵制，“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于是天天跑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诋毁儒家。窦太后本来就喜好黄老之言，不喜欢儒家。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提出“无奏事东宫”^[6]，

想把太后从权力中枢踢出去。窦太后大怒，抓住赵绾、王臧的小辫子立案审查。最终，赵绾、王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7]，拟议中轰轰烈烈的改革全部作废。六年之后，窦太后去世，武帝才开始了和儒家的进一步接触。董仲舒贤良对策、公孙弘打破列侯为丞相的惯例，以丞相封侯，都是这以后的事情。

儒家学说与政治的结合，是通过儒生个人与政权的结合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权势的诱惑与压迫相伴，个人在欲望与操守中挣扎。

有人拒绝。叔孙通自告奋勇为汉高祖制定朝会礼仪时，邀请了鲁地的三十余名儒生进京。有两个人不肯去，他们不太瞧得起叔孙通的为人，觉得他是个马屁精。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关键的是，他们觉得制礼作乐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积德百年然后才可以做。而汉家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根本就没有制礼作乐的资格。面对皇权的诱惑，这两位固执的儒者简直要捂着鼻子逃开。“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8]快走开，不要玷污了我们！

有人迟疑。汉武帝刚即位就“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召请大儒申培公。什么叫“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派专使带着尊贵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车，车轮上绑着草以降低震动，取得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申培公来了，态度却是不冷不热的。汉武帝问他“治乱之事”，申培公只简单地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关键是看做不做得好。搞得武帝很无语。申培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他是老糊涂了吗？我以为不是。这位老人家，曾经与楚王刘郢同学，后来就做了刘郢的太子刘戊的家教，师生相处得很不愉快。刘戊即位之后，竟然把老师阉割了。“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9]申培公与汉家权势和楚地遗风的接触是如此惨烈，怎能不让他心生畏惧、厌恶与隔膜？这一次，他那两个一心要干大事、以为要开创未来的学生最终也被逼自杀。申培公与汉家权势的接触再次宣告失败。

有人担忧。汉武帝征召的大儒之中，还有一位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倒是愿意合作的，可是“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当时还有一位六十岁的儒生公孙弘也在被征儒者之列。辕固生既征而复罢，道路相遇，公孙弘“侧目而视固”。辕固生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10]公孙先生，请你一定要秉承学术的良心说话，不要歪曲学术来迎合世事！

世事与学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学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独立于现实的思考，超越世俗权势，追求和谐美好的新秩序。法家的世界权势至上，弱肉强食、急功近利、刑罚严苛。儒者迂阔，志存高远，理想宏大，却涉世未深。选择拒绝的，停留在现实之外保存了自身的高洁；态度迟疑

的，身体在现实中出现，心灵却漠然不动。辕固生应召而不得行，喊话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表明了他心中深刻的忧惧。那些携带着儒家理想进入严酷现实的儒者，终于可以用学术来引导皇帝，服务天下国家，获取功名利禄。服务天下国家与获取功名利禄两者不一定矛盾，关键是皇帝的态度、权势的取向，以及现实的统治国家的需要。妥协是必需的，然而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是“允执其中”的？

在美国不长的历史当中，妥协（compromise）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

《独立宣言》要不要谴责英国国王对奴隶制的态度？杰斐逊的初稿里是有的，可是在最终的定稿中被拿掉了。因为这会伤害到蓄奴州的感情，从而破坏团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谋求独立，这是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妥协。真正有理想而善实践的人，都懂得妥协的艺术，他们不回避矛盾，善于讨论，积极调整，让各方利益达于平衡，最终获得同意，向前推进。他们也从从不梦想一蹴而就，而是心中目标明确，脚下步伐稳健。这种人才是推动变革的真正力量。

这些善于妥协的人，多半都有被后人耻笑的黑历史。第一个儒生宰相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每次上朝议事，都只是把问题和解决方案摆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从来不肯对皇帝直言相谏，或与皇帝当面抗辩。这种态度，无比自信的汉武帝当然是喜欢的。公孙弘的从政风格，司马迁总结，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11]。法家的规章制度、办事方法，公孙弘都熟悉，但是他又比他们高明，能够用儒术来装饰这些东西，让它显得高大上。汉武帝当然喜欢。官至御史大夫，同样得汉武帝欣赏的兒宽，“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兒宽是靠着法家张汤的推荐上去的，张汤之所以欣赏他，是因为他能够“以古法议决疑大狱”，同样也是法家的馅料，儒家的包子皮。汉武帝重启封禅计划，“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兒宽说，这种大事，只有圣主才能裁定，还得陛下自己来。“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12]关于大儒董仲舒，后世也有负面评价。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说：“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此处的“帝”意指汉武帝。董仲舒“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13]。

所言皆是；然而，也正是这样一批人开启了以儒家学说改造中国政治思想的先河。“驭下以深刻为明”，“决狱以惨酷为忠”，汉代的政治伦理是简单粗暴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妥协是不可能“进入”的，而只有“进入”才有改变的可能。司马迁没有回避对叔孙通的批评，但他同时也承认：“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诘，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4]而公孙弘则建立学官，开始更为系统地培养、选拔儒家人才。兒宽在皇帝身边虽然没有“面折廷争”的傲骨，但是，他治理地方

的状态，却真真切切地展现出儒者官僚的新气象：“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他允许老百姓拖欠租赋，后来遇到军事征发，兒宽因为不能完成任务，评比落后，应当被罢免。属下的老百姓听说之后，“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15]，争先恐后地主动交租。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6]法家认为，仁义是没用的东西，只能害自己，不能改造别人。而兒宽的做法则昭示了“仁义”的治理功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举行了儒家最高级别的祭天仪式。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法家思想深重的皇帝，但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像兒宽这样的最初的儒臣。

[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儒林列传·索隐》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页。

[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2—2723页。

[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16、3117页。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七《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三《昭公五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页。

[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383页。

[6]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3页。

[7]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

[8]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2页。

[9]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1页。

[10]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

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124页。

[1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50页。

[12]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华书局196年版，第630—631页。

[13] [元]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九·春秋决事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页。

[1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6页。

[15]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0页。

[16] [清]孙诒让著，祝鸿杰点校：《商子校本》卷四《画策第十八》，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6页。

礼治与德化的合奏

这是儒家内部的故事。“礼治”就是“以礼为治”，用规矩礼法治理天下。“礼治”所强调的是规矩礼法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汉代儒法合流之后，儒家的规矩礼法之中，也包含了源自法家的法令制度，只不过，这里的法令制度被赋予了儒家的仁义初衷。“德化”就是“以德化民”，君主、官僚，一切在上位的人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带动社会风气向良好的方向转化，从而臻于和谐美好的状态。“德化”所强调的是道德对人心、上对下的示范教育作用。

“礼治”与“德化”同出儒家，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荀子·王霸》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君主没有不爱老百姓的，所以要用礼来约束他们。“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鰥寡必不加焉。”国家的法令制度，只要是跟老百姓有关的，哪怕让他们有一丁点儿不舒服的，也不要；即使是最下层、最无助的鰥寡孤独，也不能用这样的法令制度来欺负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和谐美好。“以礼为治”，重视法令制度的建设与维护，始终以仁义之心审视法令制度，让法令制度体现公平公正；“以德化民”，重视君主与官僚的思想教育，加强社会风气建设，引导人民追求高尚而有德行的生活。“德”“礼”并重，允执其中，“小康”可致，“大同”不远。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而已。



图四六：南宋 宋高宗赵构书 马和之绘《鲁颂三篇》（局部）

《鲁颂三篇·有駉》由宋高宗书、马和之绘，绢本设色，397厘米×26.2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诗应作于鲁僖公与齐桓公、宋桓公伐楚后。史书载，鲁国饥荒多年，到僖公时采取了一些重农措施，并与民休息，克服了自然灾害，取得了好收成。《毛诗序》：“《有駉》，颂僖公君臣之有

道也。”鲁僖公举行郊祭后按礼制举办宴饮活动，祈求福泽绵长，希望以后也能有好收成，并将福泽传于后代，享祚长久。画面中僖公端坐正中，两侧为鲁国臣子，他们前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食器与酒器。殿前乐队奏乐助兴，钟鼓、管弦、笙箫齐奏，一派热闹祥和的情景。



郊祭时钟鼓、管弦、笙箫齐奏的画面



陆续赶来参加宴饮的臣子的坐骑

政治是一个极端强调实操性的行当，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权力斗争波谲云诡，对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实践经验要求很高。当我们回到历史事实本身，就会发现，把政治理想诉诸实践实在是一项太过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对长期滞留在政治舞台边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儒家来说。

最早一批成功进入政治舞台中央的儒家官僚，都给人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人是进去了，混得也不错，但就是让人觉得还是像外人，骨子里没有“融”进去。比如兒宽，官至御史大夫，同时代人司马迁批评他“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1]。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皇帝，兒宽态度温和良顺，善于逢迎，相处得融洽，官也当得牢靠，但是对皇帝的错误、朝政的缺失，没有起到应有的批评作用。上纲上线的话，可以说兒宽丧失了儒者的操守。第二，在本单位，兒宽的下属都不太看得起他，不为他尽力。对皇帝的“和良承意”，可以理解为生存策略——在汉武帝这样自以为是的皇帝手下办事，若不如此，恐怕连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推行理想？“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则真实揭示了儒者官僚兒宽在现实政治中的尴尬——兒宽是儒者，是儒家经典方面的专家，有学问，有理想；可在当时，治理国家实际依靠的制度规范都来自法家；兒宽肯定是努力学习的，但是他再努力也不如那些长期战斗在法治一线的下屬。外行领导内行，内行瞧不起外行，也属正常。类似的事情，在官吏分途之后不断上演。兒宽只能接纳，

只能忍耐。

当然，也许兒宽的心中憋着一股更为崇高的劲头——我就是不用权势来压制你们，我要用我的学养来“德化”你们这些无知的文法吏，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儒者气象！

这是我的猜想，司马迁没这么写——他对这些同时代的儒者政治家的感情要更为复杂。我这样想的依据是班固的记载。班固在《汉书·兒宽传》中记载了兒宽治理地方的状态：兒宽担任地方长官，鼓励农业，放宽刑罚，清理监狱，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下属，努力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敬服；他选拔任用仁厚之士，有功劳都推给下属，不求名声，于是官吏和老百姓都信服他、爱戴他。这些都是儒者气象，所以说，兒宽要展现的，是比法家更高级的“以德化民”。那么，“德化”的效果如何呢？按时按量地缴纳租税，是老百姓对帝制国家的重要义务，收租也是帝制时期地方长官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在兒宽之前，老百姓按照法令的约束交租，无论收成如何。兒宽放松了约束，“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结果怎么样了呢？“租多不入”，收不上来了。

后来，遇到国家要打仗，调集军需物资，刻不容缓。可是兒宽拿不出来，他仍然不忍心用法家那一套去压迫老百姓。那没办法，就只好自己“下课”了。而老百姓唯恐失去这样一位好官，于是大户人家赶着牛车，小户人家担着担子，排着长队去交租，结果当地的交租水平顿时从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班固说“上由此愈奇宽”，汉武帝因此越发注意到了兒宽的本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东汉的儒者官僚班固看到了兒宽的本事，这就是儒家所珍视的“以德化民”，用德行来感化老百姓。

在兒宽“以德化民”的背后，是骨子里对制度法令缺乏认同。从仁义出发，他可以用自己的官僚生涯为代价，来换取对老百姓租税的缓征，牺牲小我一时之利，以利百姓。这很高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假定租税额度过高，规定不合理，那么一旦兒宽离开，之前欠的租税就要追缴，短时间内，老百姓的日子会比兒宽到任之前还难过。而这个故事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也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第一种是班固想要的，老百姓主动超额交租，是因为被兒宽感化了——兒宽“德化”成功。第二种是我能想到的，老百姓一想到兒宽走了之后会来一个狠角色，连本带利地追租讨税，那样，大家就都没有好日子过了——想明白了这一点，当然得留着兒宽。其实，兒宽本来可以有更“仁义”的做法，比如，调整本地的赋税承担方案，又比如向中央申请减租，总之，就是从制度层面去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但是兒宽没有，他选择“德化”，忽视“礼治”。

弘扬“德化”，反对“礼治”，正是班固的时代所需要的。班固是东汉人。在东汉与西汉之间，帝制中国经历了王莽改制的政治动乱；而那场政治动

乱，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恰恰表明了“以礼为治”的失败。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托古改制”运动，最终招致豪杰并起，天下大乱。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当中，王莽的形象一直是伪君子、阴谋家，白居易就作有脍炙人口的诗句云“王莽谦恭未篡时”。近代以来，开始有人从“勇于改革”的角度赞美王莽，比如胡适说王莽“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2]。翦伯赞说王莽的改革“正是对症下药”，“可惜用非其人”，招致“商人地主之激烈反对”，终于惜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思想启蒙之功，翦伯赞以史学名家；然而两位对王莽的判断，都有点儿不顾史实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令人苟同。吕思勉说，“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3]，倒是贴近王莽时代的真知灼见。^[4]

王莽的改制措施，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就像是文字游戏，在名义上做文章，完全是凌空虚构，与政治实际毫无关系。比如，他改汉代为火德，新朝以土德承火德，又把古代圣王的后代找出来，让他们来奉祀先王，这就好比是在人间把想象中的天命传承搞了一个火炬接力，日常上演。王莽改制的依据是他和身边儒生所理解的儒家经典的文本记载：“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5]

王莽的出发点，不是直面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是从儒家经典出发，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制定礼乐制度，“治礼作乐”。胡适、翦伯赞称王莽为政治家、改革家，实在是一个误会。王莽是一个儒生，支持他的人也是儒生，王莽改制的思想逻辑是（礼乐）“制定则天下自平”。他们所追求的，正是“以礼为治”，或者更直白些说，是“以礼代治”。

汉初，叔孙通自告奋勇为刘邦制定朝会礼仪，征求鲁地儒生进京。有两位儒生明确拒绝前往，核心理由是：“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也就是说，“制礼作乐”这种高尚的行为，需要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积德百年才能胜任。这是先秦儒家的原始逻辑：先有天下太平的成绩，然后才能制定礼乐制度。对于这两位的选择，叔孙通嗤之以鼻：“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6]叔孙通不鄙，自己做了太常。王莽就更不鄙了，他竟然能将想象中的西周那一套落地成为现实，可是这有用吗？“以礼为治”真的能改变现实吗？当然不能。所以，到了东汉，开始强调“德化”。

但是，王莽那一套真的是“以礼为治”吗？显然不是，他只是在偷换概念。传统儒家说，天下太平然后可以制礼作乐；王莽说，我来制礼作乐，然后，你们看，天下是不是就太平了？这是“营销”，不是建设。可是这样的政治营销行为却是史不绝书，比如历朝历代的封禅泰山。

不管怎么说，王莽的失败被东汉官方定性为“礼治”的失败，于是东汉倒向了“德化”，成绩斐然。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面对宦官外戚的迫害，儒士们表现出来的凛凛气节，令人肃然动容。然而强调德行强调得过了头，培养出来的人才则难免有才能不足的缺陷。曹操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就是这个道理。倘若让“礼治”回到荀子时代，重视制度以实际问题，“礼治”与“德化”并重，岂不美哉！可惜，人类智识的进步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

[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5页。

[2]胡适：《胡适品人录·王莽》，华文出版社204年版，第8页。原文发表于《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1922年9月第期，题为《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3]吕思勉：《秦汉史》第七章《新室始末》，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85页。

[4]有关王莽的评价，参见刘小萌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之《如何看待王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年版。

[5]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年版，第418页。

[6]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2—272页。

兴亡反思下的帝制梦魇

我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高中历史教育，有两个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是内容之丰富——课本已经相当厚了，因为在课文之外还附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而教师在讲述的过程中，又会补充丰富的阅读材料。第二是内容选择缺乏“为亲者讳”的自觉——哪一国的课本都有“教化”功能，要培养民族认同，美国的中学课本当然也不排除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它并不回避美国历史上那些“不光彩的瞬间”，比如1692年至1693年间萨勒姆村的猎巫事件。

1692年2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萨勒姆村，三个小姑娘突发怪病，医生诊治无效，于是疑心有人施行巫术。喜欢给孩子们讲鬼怪故事的印第安女奴蒂图巴第一个遭到怀疑，为了解脱，蒂图巴编造了魔鬼撒旦来访的故事。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为加快审理，总督下令设立特别法庭。整个村庄陷入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猎巫狂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小村庄，有两百人遭到巫术指控入狱，十九人被绞死，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因为拒绝接受审判，被用石头砸死。

阅读材料完整叙述了猎巫事件的全过程，简单介绍了信仰与知识背景。之后，引用学者研究指出，在萨勒姆村的猎巫狂热之下还隐藏着非常现实的原因，比如精英们要推卸对印第安人战争失利的责任，村庄两大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商业竞争，以及普通人之间的妒忌与仇恨。所有这些普通社会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恶”，借助猎巫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集中爆发，抵于顶点。这样的一堂课，肯定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史学同行，通过美国高中生对萨勒姆村猎巫事件的学习，我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关系链，这就是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公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通过学者的研究，部分历史事实得以凸显，被赋予意义，抵达公众视野；公众因而获得了有关过去的知识，以及在此知识基础上进行反思的可能，而这种知识和反思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同类事件。在教师所发的阅读材料中，所有涉事人员，不管是指控者、被判决杀害的人，还是总督、法官、神父，都有名有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们作为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个狂热运动中的一部分接受了历史的审判。这会提醒读者，个人虽小，不可作恶，个人虽卑，生命可贵。这是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叙述中不容易看到的東西。

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和写作让历史事实“被看见”。仅仅“发生”而没有“被看见”，没有得到历史反思的历史事实，是很难对现实产生任何积极意义的。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历史事实没有价值。纵然不“被看

见”，那些造成危害的因素仍然潜伏在那里，就像病毒一样，一旦条件合适，就会跳出来，导致瘟疫爆发。可以说，是严肃的研究和反思赋予了历史事实照亮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过去已经发生，历史事实客观存在，却不一定被看见。人们能够看见什么，习惯性地看不见什么，取决于历史观，也就是看历史的方式。传统史学强调“以史为鉴，以知兴亡”，为治国理政提供教训；又以史学为经学之羽翼，经学直接表述真理，史学用生动的事例来证明经学的正确性。传统史学用力最勤的主题就是盛衰之迹，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秦始皇贡献给传统中国的，除了皇帝制度，还有一个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的梦，“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这是秦始皇的梦。按道理说，这个梦至少比长生不老的梦容易实现。但是，直到1912年帝制终结为止，这个梦却是在不断地破灭，没有一个王朝实现了万世一系，朝代更替因而成为帝制中国最为显见的历史演进特征。为什么帝制中国没能走出朝代更替的循环？这个问题，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此处我想试着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谈一谈。对前朝灭亡教训的思考往往会奠定新王朝的基调。在传统的兴亡反思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漏掉了什么？

大致而言，兴亡反思做得比较好的是以下这三组王朝——汉对秦、唐对隋、宋对唐五代。

从秦到汉是帝制中国的第一次兴亡易代。秦以华夏边缘的落后小国吸收法家智力，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富国强兵，迅速成长，吞并六国，混一天下，建立帝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创造了华夏文明史上的空前成就，其影响历两千年而不衰。然而秦帝国作为政治体的存在只延续了二世，短短十五年。覆亡之速，与成就之大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汉人的基本看法，用贾谊的话来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法家统治严苛，一味压制，用来对外扩张是可以的，用来保守天下就不行了。所以，汉初的做法基本上是反着来的，大的法令制度框架保持不变，但整体作风趋向放松，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减轻人民负担，让老百姓得到休息，自由发展，“文景之治”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文帝、景帝的朝廷国家是极其克制的，很少折腾。除了对秦亡教训的吸取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力不行，折腾不起。

武帝上台以后，经过七十年的积蓄，国力恢复，武帝就开始折腾了，打匈奴，开拓西域，通西南夷。针对这种状况，有识之士开始重温秦亡教训，试图让历史照亮现实。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乐提出的“土崩/瓦解理论”。徐乐把威胁帝国统治的危机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土崩”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危机——国家对社会过度压榨，导致双方矛盾加剧，“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老百姓生

活困苦而君主不加体恤，人民怨恨而君上不知，社会风气已经败坏而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民众对君主和政府失去信心。“瓦解”指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属于上层的权力之争。

徐乐举例说，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谓瓦解？七国之乱是也。土崩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七国之乱却最终被平定，并未威胁到汉帝国的统治。基于以上事实，徐乐得出了如下推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1]“天下诚有土崩之势”，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徐乐指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搞好内政，不要穷兵黩武，让皇帝—国家的扩张欲望破坏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土崩之势。正在用兵兴头上的汉武帝当然听不进去徐乐的意见，然而武帝晚年发布轮台诏，罪己改辙，也未必没有徐乐的功劳。

汉对秦的兴亡反思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今天的历史学所提供的解释要比这复杂深刻得多，比如西方的秦和东方的六国旧地之间的东西文化差异。但是总体而言，汉人的反思仍然有效。

唐对隋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唐太宗和他手下的名臣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身上。唐初最高级别的政治思想论坛——“贞观君臣论治”几乎是不间断召开的，其间金句迭出。唐玄宗时，吴兢将论坛成果编成了一部“太宗治国理政思想精粹”——《贞观政要》。唐太宗君臣的历史反思，激活了华夏传统中很多优秀的因素，比如“民本”“节欲爱人”的思想。即位之初，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平息盗贼，“或请重法以禁之”，主张严刑峻法以弭盗。这正是李斯教导秦二世的“督责之术”，也是司马迁目睹汉武帝犯过的错误。“太宗哂之”，不以为然，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2]进而，唐太宗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省思，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这些真诚的历史反思，直接催生了“贞观之治”。当然，相对于隋朝的经济水平来说，贞观之治仍然处于大病后的休养恢复阶段，唐朝真正超过隋朝，要到“开元盛世”。然而“盛世”之中，却已经在酝酿着忧患，距离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已经不远。

就帝制时期的兴亡反思来说，“贞观君臣论治”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就会发现，唐太宗的兴亡反思，基本上围绕亡国之君隋炀帝展开，总让人觉得有一点树立反面典型以抬高自己的意思。



图四七：清 姚文翰《唐太宗真像》

《唐太宗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绢本。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高祖李渊次子，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战功显赫。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又对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省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真诚的历史反思直接催生了“贞观之治”，也成就了唐太宗知人善用、虚怀纳谏的一代英明君王的形象。

宋对唐五代的兴亡反思，逻辑上其实很简单，确定唐五代的兴亡教训，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宋太祖是黄袍加身，以禁军将领的身份被军人拥立篡位

的。那么，宋太祖就要把有可能被黄袍加身的老伙计们招来，逼问一句“一旦以黄袍加汝身”，你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先把兵权交出去啊。唐朝亡于藩镇割据，藩镇之所以能成为抗衡中央的分裂势力，是因为它控制着数州之地，集兵刑钱谷（军队、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怎么办？分权制衡，各州之间不相统属，军队与地方分离，在州以上层级，分别增设专门机构，分管财政、司法，各管一摊，条条对块块形成制衡。若论分权制衡，宋朝制度称第二，就没有其他朝代敢称第一了，地方与部门各种分权与制衡，一切权力向皇帝和中央集中。宋人对此无比得意，捋着胡子点头赞美：“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4]

宋对唐五代、唐对隋、汉对秦，这三对历史反思，应当说都是积极有效的。其中又有区别，大致而言，汉对秦、唐对隋，制度上基本继承，改变的主要是思想方法和政治作风；宋对唐五代，主要的转变似乎是在制度方面。但就思想方法而言，总体上说，传统的兴亡反思是一种时间线上的纵向对比，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朝代”，反思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事和制度。因此，他们得到的教训往往集中于帝王的道德操守、朝代的政治作风这一类现象。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衡量，那么，传统的兴亡反思所采取的多半是历史学的思考方式，相对而言，缺乏抽象功夫，不能从兴亡起落的朝代故事中抽象出“国家”政权的概念，然后从这个概念出发去思考一些所有国家政权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内政、外交、军事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兴亡反思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它本身是朝代更替的产物，同时又甘心做朝代更替的注脚。

就思想根源而言，兴亡更替本身就是“朝代”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说“朝代”就必然有“兴亡”。“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5]天道轮回，天命转移；天命转移，朝代更替。这是儒家内心深处所信仰的。蜀汉的后主刘禅降魏，乐不思蜀，至今被传为笑柄。其实，当时蜀汉政权的很多人都主张投降，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天的安排，劝降主力大儒谯周说：先帝刘备，意思是完全，后主名禅，意思是禅让；就好比是说刘家的天下到先主这里已经完备了，到后主这里就应当让给别家了。^[6]这样的内容，历史课是不会讲的，因为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是彻头彻尾的迷信。的确是迷信，但是古人信。古人既然信，自然就很容易接受改朝换代。

[1]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956页。

[2]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中华书局956年版，第6025—6026页。

[3] [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一《君道第一》，中华

书局009年版，第11页。

[4]范祖禹：《转对条上四事状》，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一三七《范祖禹二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8册，第45页。

[5]〔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982年版，第393—394页。

[6]参见〔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八二，《闰位部·名讳》，凤凰出版社006年版，第04页。

帝政兴衰的北宋故事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是宋朝诗人陈与义在南渡之后作的一首《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上片写北宋末年清平世界里古都洛阳的风雅闲适，下片从仓皇南渡后战乱子余之人的悲凉心境写起，末句“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则将视野从两宋之际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兴亡故事？既然如此，开封、洛阳的陷落，朝廷的南渡，个人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遭际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想来，胸中所有的悲伤、惆怅就都释然了，但觉江风拂面，渔歌悠扬。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是传统时期中国人在朝代更替的尘埃落定之后的典型态度。朝代更替是帝制时期最鲜明的历史演进模式，帝制时期的中国政治是王朝政治，以朝代为单位向前推进。在这种演进模式当中，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国家体制——前朝后代皆中央集权之帝制国家，不同朝代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共性；而任何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其政治兴衰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生命”过程；远观概貌，每个朝代的兴衰轨迹基本类似，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不断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若要深入了解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内在逻辑，把一个朝代的故事讲透，比一遍一遍模棱两可地重复各个朝代的故事，更能揭示本质。

然而，贴近观察，朝代更替又绝非同一个故事的简单重复。不同朝代的政治文化倾向与治理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大一统的较早实现与长期维持，让帝制中国基本上失去了产生“国际竞争”的环境；相反，王朝政治的优劣是以“朝代竞赛”的形式展开的。若论王朝政治之水平，我以为，北宋中期曾经出现“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南宋转向内在，金、元以降，北方落后观念进入，与华夏政治文明旧有之负面因素相结合，近代之前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

北宋在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在“皇帝制度”和“儒家思想”这两大前提规定之下，北宋抵达了王朝政治的巅峰。其政治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基本从制度上消除了威胁皇权稳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因素。从内政角度来看，皇权、政权趋向安全稳定。第二，以皇帝和大臣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概念，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比较尊重社会的利益诉求。第三，士大夫集团有能力约束皇权，批评风气盛行，纠错

机制运行有效；这就意味着问题、矛盾有可能在萌芽状态就被解决、消灭或缓解，而不会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出现“土崩”之势。这种“王朝政治的最好状态”出现在北宋中期。

最好状态的出现，让帝制国家似乎出现了走出朝代更替的曙光，然其结果，却如彗星划过天际，没有带来持久光明。北宋后期，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就走了下坡路。时间不回头，大河向东流，但历史回环曲折，并不总是勇往直前。

白居易诗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帝制时期的政治好景为什么会成为易碎品？在这一小节，我们聚焦北宋，讲了帝政兴衰的北宋故事，接下来则要说说金元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近年以来，有不少人对宋朝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开始成为热门的穿越目的地。在二十年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20世纪以来，中国人所热爱的朝代是汉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汉武帝前期的汉和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因为那是华夏民族最具扩张力的时候。“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2]这样的句子，激荡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读来令人血脉偾张。在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穿越者给自己所设定的角色其实多半是皇帝，至少也是将军，是“一将功成万骨枯”^[3]中的那“一将”。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看不见“万骨”，更看不见“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4]的蚀骨悲情。穿越的热门目的地从汉唐转向宋，表明中国人看历史的心态开始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之气，趋向平和，开始关心个体的命运，欣赏优雅、沉静、细密的和平之美。

愿意选择宋朝作为穿越目的地的朋友，不再执着于“万国来朝”的天朝想象，而是接纳“天有二子”的事实，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宋辽、宋夏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事实。宋朝穿越者的自我角色设定多半是读书人，可以是寇准、范仲淹、韩琦、包拯，可以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可以是“二程”，可以是“三苏”，可以是苏黄米蔡，也可以是柳永、晏几道。宋朝的疆域不能与汉唐媲美，但是宋朝士大夫的天地与心胸并不因此而坍塌。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朝仗义，可执国柄、却强敌，“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5]，当仁不让君与师。他们治民有道亦有术，修渠凿井以便民，以工代赈以救荒，兴建学校，推广教育，以利民为政绩。公务之暇，退闲之后，贬谪之中，他们诗词唱和，书画怡情，以茶以酒，或阐释经义，或著作史传。东京梦华，令人神往。

当代青年的穿越梦想与民国学者陈寅恪的宋朝观遥相呼应。陈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6]而陈寅恪先生的宋朝观则可以上溯至元代学者欧阳玄对宋朝的赞美：“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7]关于欧阳玄的话，余英时先生有精到的解读，他说：“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余先生所说的“政治史”，指的是传统政治史中最看重的“国力强盛、疆域开拓之类”^[8]，而他所说的“文化史”正与本书所标举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若论个人的读史感受，我以为，11世纪中期，北宋东京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言：“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

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压过良好的风气。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纳了人性的复杂，因而是真实的，按道理讲，应该也是可以长久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不仅是我的读史感受，也是宋朝人的感受。华夏第一政治通史《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把截至宋朝的华夏历史分为“王政”和“霸政”两个时代，他观察到，自从平王东迁进入“霸政时代”以来，“上下一千七百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动乱，并不太平；唯独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通过历史比较，司马光得出如下结论：“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9]差不多同时，大儒程颐表达了同样的“本朝自豪感”，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10]

在北宋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超越古今，在帝制时期的“朝代竞赛”中独占鳌头，“三代而后”属第一。但是，北宋人对本朝政治的批评，却可能是华夏政治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淳化五年（994年）上元节，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端拱楼举行盛大的上元招待会，发表了题为“理乱在人”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追忆了五代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创伤，特别是四十四年前周太祖郭威篡汉纵兵掳掠开封那悲惨的一幕，“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追昔”当然是为了“抚今”，太宗最后总结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赋，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天下的治理和混乱都取决于人的努力。宋太宗的话，虽然有自我吹嘘的嫌疑，终究还是有感而发、情真意挚的。皇帝讲完，按理就该轮到群臣山呼万岁，高喊“陛下圣明”了。然而，宰相吕蒙正却是这样回应的，他“避席曰”——从充满了喜庆气氛的丰盛筵席间走出来，严肃地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京城集中了全国的精华，才会有眼前的繁盛。城门之外，不出数里，就有冻饿而死的人。愿陛下把目光伸向远方，看到广袤土地上的芸芸众生，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运。上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样普天同庆的喜庆场合，宰相却拒绝配合演出、粉饰太平，皇帝虽然一时尴尬，“变色不言”^[11]，却也得听

纳。这就是宋朝政治。

1040年初，由于宋夏在陕西开战，百姓负担加剧，南方的一些州军出现了小股盗贼，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是，盗贼白昼入城公然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庆历三年（1043年），朝堂之上，有人指责朝廷墨守成规，“只守弊法，不肯更张”，为照顾官僚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义愤所激，此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12]这样激烈的批评之词，出于何人之口？枢密副使富弼。他的听众是谁？仁宗皇帝。接下来的庆历新政，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地方长官进行甄别裁汰。有问题就要面对，唯有直面才能解决。这是宋朝政治。

嘉祐六年（1061年），又有人这样尖锐地批评皇帝与朝政。他首先批评皇帝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皇帝的施政与个人作风对国家财政、政治风气和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他质问皇帝：“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那么，陛下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官吏俸禄、军费开支、外交开支这三样，是不当省也省不下的，“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宫中宠姬上千人，国家财政困难，老百姓日子愁苦，宫中赏赐却从无节制，财政主管不敢争辩，宰相等臣子不敢劝阻，底下人奉宫里的条子办事，比处理军机要务还要麻利。“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13]这简直是在诅咒皇帝了，是谁发出了这样尖锐刺骨的批评？年轻官员苏辙，批评的对象包括仁宗皇帝、宰相府和三司（财政部）。苏辙的文章其实是考试答卷，命题作文，言辞慷慨，但是严重跑题，说得也不全对——他太年轻，无法理解皇帝人生的无奈。然而，被他批评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认，这个年轻人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苏辙还是被录取了，因为这一场考试要寻找的，正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14]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批评会损害本朝的伟大。司马光以历史学者的严谨，论证了本朝是“三代以来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最称

职的批评者。司马光做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谏官，共上谏书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个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奋的谏官。被他批评过的人，首先是“今上”，然后是后宫的宠妃、傲娇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然后是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在司马光的眼里，朝廷的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须予以纠正。批评错误与赞美成就，是司马光忠诚于宋朝的方式，这是“大忠”之爱，他忠于江山社稷而非皇帝个人。

南宋赵汝愚编有《国朝诸臣奏议》，专收批评文字，几乎所有宋朝官员的现存文集之中都有对朝政的批评文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专司批评的官员——台谏官。而台谏官绝非唯一的意见群体。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各级各类官员人等的意见都有可能“上达天听”。“防范壅蔽”，保持皇帝和朝廷的信息通达，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目标。在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批评被认为是保持政治机体健康的法宝，他们相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15]。

御史台和谏官并非宋朝的创造，也非宋朝所独有，然而纵观中国历史，监督与批评如此成功地发挥着帝国政治纠错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东京。原因何在？

帝制时期，大的政治结构都是君—臣—民。让朝代与朝代拉开距离、时代与时代发生变奏的，第一是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本朝传统，从这里开端。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与教育——皇权本质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守成之主是否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性格如何，心理状况怎样，会深刻影响王朝的政治走向。第三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是是否出现分裂。选拔的方式决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质，杰出人物的标杆作用塑造官场风气，而官场风气会决定大多数平庸之辈的精神面貌。皇帝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杰出人物。但是，官僚对于皇帝并非不能制约。先儒的教导赋予他们引导皇帝的精神特权，然而在现实之中，要想对皇帝进行教导，官僚集团必须在大面上保持团结，不能出现恶性分裂。一旦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陷入小群体的利益之争，官僚集团便会跌下道德制高点，失去教育引导皇帝的资格，沦为皇权顺从而谄媚的奴仆。而皇权在得到奴仆的同时，却失去了“同道共治”的助力，愈专制，愈危险。

以上述标准衡量，北宋政治得天独厚。用程颐的话来说，本朝立国百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三代而后”的治绩，必须归功于开国皇帝的智慧，“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只有三十五岁，身体强健，心态平和豁达。他军人出身，经历过生死考验，对生命和“人心”都有一种特别的珍惜。就像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说的，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继任

皇帝太宗，在宋朝历史上具有“第二开国皇帝”的意味。他大开科举之门，提拔新进士，开创了宋朝“以文官包打天下”的政治格局。再接下来，真宗保守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起用了自己有所忌惮的能臣寇准，以务实的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之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后来大搞神圣崇拜运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消耗，功过相抵，不算败家。第四位皇帝仁宗性格温和，敬畏天道人心，克制私欲，坚持和平的对外原则，没有滥用民力；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

从开国之君太祖到守成之主仁宗，就像程颐所说的，“四圣百年”，皇帝的人选基本靠谱。所以，才有了司马光所说的“三代以来数第一”的成就。当然，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说，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大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改变良好的风气。这四个句子，句式特点相同，都用“而”（但是）将两个小句子联系起来。“但是”之前是委婉的负面意思，“但是”之后是直接的正面。把负面意思联起来，就是百年统治之后宋朝的主要（并非全部）问题了：官僚队伍效率不高，刑法松弛，朝政存在种种弊端，大臣良莠不齐，君子小人杂用。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两者并不矛盾。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人们的选择。

[1]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页。

[2] [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81页。

[3] [晚唐]曹松：《己亥岁二首》其一：“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一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7—828页。己亥岁，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

[4] [唐]陈陶：《陇西行四首》之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四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92页。

[5] [宋]欧阳修：《镇阳读书》，见《欧阳修全集》卷二《居士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5页。

[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文末自署“一九四三年岁次壬午一月二十七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原载194年月《读书通讯》第62期。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7—278页。

[7] [元]脱脱等著：《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三·赞》，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9页。余先生的“政治史”指向，请见该书18页。

[9] [宋]司马光：《进五规状·保业》，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一七八《司马光七》，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册，第28页。

[10]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遗书》卷一五《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录》，中华书局004年版，第159页。

[1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5—766页。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3452页。

[13]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一二《策一道·御试制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49、135—1353页。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页。

[15]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一一《欧阳守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4页。

养子即位的大转折

如前所述，帝制时期，决定王朝政治走向的，是三大因素，一是开国之君，二是守成之主，三是官僚集团。开国之君是一次性因素，发生之后就on不再变化；守成之主和官僚集团都可能出现变化。其中，皇帝更容易出现变化，最高权力的交接风险重重。北宋政治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个皇帝宋英宗的上台，给北宋政治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因素。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秩序，“大宗无子，取于小宗以为子”，皇帝没有儿子，过继一个侄儿继承皇位，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样正常的，是仁宗强烈的不甘心。他四十岁以后，后继无人就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四十七岁时，仁宗中风，侥幸活命；此后六年，他搏命生子，可惜宫中所诞皆为女孩；五十四岁，仁宗含恨离世。在距离过世七个月的时候，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但是直到英宗即位，仁宗的后宫之中还有一个待产的龙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胎只是乌龙，那里面除了欲望什么都没有。仁宗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有皇位要继承却没有儿子的男人，内心是多么地荒凉凄惨。

仁宗最终亲自选定英宗为继承人，为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可能的混乱。从这一点上说，仁宗的确是把仁义坚持到底了，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皇帝。但是，他的不甘心和挣扎却直接导致了英宗心理的压抑扭曲。英宗四岁时曾经以“招弟”的名义进宫生活，是被皇帝抚养过的男孩，因而在众宗室之中脱颖而出，身份矜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仁宗始终没能诞下子嗣，英宗更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视为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为了不辜负可能的重托，英宗一直过着严格自律的生活。然而，获得认定的过程却是如此漫长曲折，其中还不乏凶险。三十一岁，英宗被正式收养为皇子，而不是皇太子——他的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仁宗的后宫丝毫没有掩饰她们的忌恨，对新皇子态度冷漠，英宗一家入宫之后甚至出现过衣食不周的状况。三十二岁，英宗正式即位，但是后宫仍然掌握在仁宗一系的手中。



图四八：清 姚文翰《宋英宗真像》

《宋英宗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绢本。宋英宗赵曙（1032—1067），原名宗实，宋仁宗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宋仁宗晚年膝下无子，遂将赵宗实过继为嗣。宗实幼年既被接入宫中抚养，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曙。次年，即帝位。即位初，体弱多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治平元年（1064年）赵曙开始亲政，而后任用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保守派人物，不求改革，与辽、西夏没有发生过战争。英宗在位四年，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生病，其二认爹。前一件他是被动因应，后一件却是他偏执于恪守孝道的主动折腾。治平四年（1067年），赵曙驾崩，享年36岁。赵曙谥号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葬于永厚陵。

漫长的即位过程，让仁宗与英宗成为一对在内心深处“抵死互不相认”的非

亲父子。英宗即位的第四天，就突发怪病，不能临朝。仁宗的皇后曹氏因而暂时取得了垂帘听政的权力，她甚至表达过皇位易主的想法。幸好，以宰相韩琦为首的官僚集团坚定地站在英宗这边，最终以近乎强制的手段迫使曹太后撤帘归政，让宋王朝顺利渡过继承危机。但是，渡过了即位危机的英宗却始终没有走出即位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英宗在位四年，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生病，第二件是认爹。前一件他可能是被动因应，后一件却是他主动折腾。英宗的诉求很简单，他要在公开场合叫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一声“父亲”。按照礼制，英宗既然已经出继大宗，做了仁宗的儿子，他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名义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公开称“亲”，于礼不合。这番道理，英宗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把这个议题抛出来，骨子里还是出于对仁宗的怨恨——仁宗的这个儿子，他做得太憋屈了。

英宗的“称亲”诉求，在开封政坛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讨论。官僚集团分为两大阵营，“皇父派”和反对派。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大阵营基本上是按照代际和职位来划分的：以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为首的老一辈官员支持“称亲”，给予了皇帝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以台谏官为主的中生代官员，则从礼制出发，坚决反对“称亲”。皇帝生父的名义争夺战演变成了台谏官与宰相之间，或者说两代政治人之间的对峙。台谏官弹劾宰相奸邪，以辞职为要挟，表示“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要求皇帝罢免宰相。宰相针锋相对，毫不退让。欧阳修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应当挽留御史，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么，请陛下自行决定。英宗当然选择站在宰相这一边。最终，英宗为他的生父赢得了父亲的称呼。

这场胜利实在是得不偿失，它败坏了英宗的形象。假定英宗得享天年，像他的养父仁宗一样做了四十年皇帝，后来又有许多英明的作为，那么，“称亲”事件就只不过是一桩小事，并且会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可惜的是，英宗的生命过于短促，只做了四年皇帝，根本没有时间展现他的抱负和心胸。英宗的历史形象就这样定格在那里，不了解他内心委屈的人，会把他看作一个任性妄为的人——仁宗给了他继承皇位的权力，他却拒绝出席仁宗的祭祀典礼，反而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哭着喊着为自己的父母争取本不属于他们的荣誉，这一切对英宗乃至他的血统的影响是恶劣的。须知，英宗原本只是普通宗室，按照血缘，跟他拥有同等继承权力的宗室可是一抓一大把。仁宗选择了他，肯定是觉得他有过人之处，没想到却是这样——人们有理由质疑英宗的即位。

英宗的统治时间很短，但是影响很长远。北宋政治转向的根源，就是在这四年里埋下的。在英宗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不服气的少年，那便是他的长子，后来的神宗。神宗聪明、勤奋、有气性。父亲即位之前在宫中所遭受的冷遇，让他不平；父亲即位之后所表现的不堪，又让他尴尬。而神宗从

来都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屈服、向命运低头的人。父亲与（名义上的）祖母——仁宗皇后曹氏之间明争暗斗，关系恶劣，神宗就懂得行动起来，去讨好老人家，修补裂痕。他十九岁即位，获得了主宰天下的大权。这个少年怎么可能容忍外界对他血缘的质疑？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证明自己，进而为父亲洗雪荒唐的形象，是神宗所认定的使命。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怀抱着特殊使命的年轻皇帝上台，宋王朝这艘大船必须转向，开足马力向前。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历史——守成之主英宗和神宗即位的故事。这段故事常常被忽略，而我恰恰觉得，是它真正改变了宋朝的政治走向——这是帝制时期——撇开皇帝，无所谓王朝政治。

立场差异下的大变法

作为英宗之子，神宗必须为父正名。他要向宋朝的列祖列宗、全体宗室和子孙后代证明，他和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宋天子；他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面，开疆拓土，建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他还要制礼作乐，以兴太平。

年轻皇帝的欲望，像咳嗽和爱情一样遮掩不住。他第一次接见老臣富弼，就“问北边事，条目甚悉”。而富弼当即告诫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1]皇帝的欲望要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变成政策，推动国家机器的齿轮高速运转，最大的障碍倒不是一两位老臣的反对，而是现实的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是老生常谈了，造成财政困难的因素可以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种。长期因素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养兵政策造成的巨额常规军费开支，宋朝的兵是职业兵，全靠国家财政养活，而且数量巨大；第二是官僚的俸禄支出，宋朝的高级官员待遇之优厚，空前绝后，中下层官员虽然收入不算高，但也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官僚和军人一样，数量众多，开支巨大；第三是给辽和西夏的“和平维护费”，给辽的叫“岁币”，给夏的叫“岁赐”，名目不同，代表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等级，但在本质上，都是宋朝政府为了维护和平向其他政权支付的保护费。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神圣崇拜运动、仁宗对西夏作战的军费开支，以及皇帝的葬礼。到神宗上台的时候，宋朝国家“四年之中，连遭大丧”，连续为仁宗和英宗两个皇帝操办丧事，雪上加霜，“公私困竭”。^[2]

财政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如何缓解？当时主流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节流”。比如说，关于英宗的葬礼，财政部门的建议是：“至于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吝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3]一言以蔽之，能省就省！对于财政的困境，以及“节流”的方针，神宗是了解和接受的。他下令削减了英宗的皇陵预算规模和对遗爱的赏赐额度，甚至还替父亲当年的浪费做了解释，说：“仁宗之丧，先帝远嫌，不敢裁减，今则无嫌。”^[4]先帝是仁宗的过继之子，要避嫌疑，不敢裁减葬礼规模，如今朕为先帝亲生之子，就没那些顾虑了——该裁的裁，该省的省！

葬礼开支可以省，理想怎么办？必须找到那个善于理财的人。谁呢？神宗的第一人选是张方平。张方平其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财政专家，有着一流的行政执行力。他做过两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张方平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顿漕运，卸任之时，为京城积攒了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以及足够六年使用的马料。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粮食只够一年半的，马料才够一年使用。而张方平就任之后，不

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张方平不但有行政执行力，而且对国家的理财大计有通盘考虑。仁宗朝，他上有《漕运十四策》，主要阐述改善漕运的十四项方针。宰相富弼为仁宗朗读这“十四策”，读了足足十刻钟，也就是一百五十分钟。旁边的侍卫站都站不稳了，而富弼读得投入，仁宗听得入迷，“太息称善”。富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根本。这“十四策”后来全部得到了落实，京城的粮食供应因而得到根本性改善。张方平的奏札甚至成为仁宗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指导性文件，“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为议本”^[5]。



图四九：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上图反映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小局部。我们看到，在十千脚店门口，有一辆独轮车，车上摆放着一串一串的钱串，一旁有两个人正往车上放脚店当天的流水，也就是营业所赚的钱。他们通过这辆独轮“运钞车”将收益运往钱庄去存放。由此可见脚店的生意不错，也可侧面反映出北宋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一面。朝廷通过行之有效的理财措施，而非一味地靠增收税费来压榨老百姓，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的繁荣街景。

张方平的理财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保守主义的改革，张方平有能力在不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的情况下提高旧有机构的效率，让它高效运转，因为他了解宋朝财政组织的运行状况，而且有改善的良方。第二，他是儒家的，和当时的主流一样，张方平同样主张“节流”，反对一味地靠增收税费来压榨老百姓。

神宗给了张方平参知政事的头衔——王安石后来就是用这个头衔来主持政府工作，推行新法的。张方平是王安石的前辈政治家，他对王安石印象极差。如果张方平能够主持神宗朝的政府工作，那么，也许就没有王安石变法了。偶然因素改变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张方平刚刚就任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丁忧守制，暂时退出政坛，后来也没能再回到舞台中央——因为王安石已经在那里了。

王安石的理财思路完全不同，他走的是法家的路线。王安石宣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6]。如司马光所言，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民间的反抗。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政策的常见误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发展生产。伴随这一误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鄙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7]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现代人以今度古，鄙视司马光，可以理解，但并不公平，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革开放以来之中国”。用过去四十年来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判断数千年前的历史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过去四十年来，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因素，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革命性的因素，又

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事实上，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有：“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8]大自然对财富的生产受制于日夜季节，人力所能做的也同样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受到时间限制的财富和有限的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倘若不加节制，则积累如细流涓涓，泄散如大水浩浩，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王安石此说，与司马光“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当“必欲大有为”的皇帝表现出对财政困乏的焦虑时，王安石却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必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达光明盛大之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如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当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责备宰相曾公亮不能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9]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底色。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老师孙永知道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韩非子》“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年轻的颍王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10]这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充实藏书，何必要手自抄录？

自从即位以来，人人都喊“节流”，神宗的伟大理想藏在心里，不得伸张。唯有王安石告诉他，财政困难“非方今之急务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开疆拓土的理想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干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两全其美，得其所哉！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从此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发生转移。变法的初衷就是这样，那么，变法的结果如何呢？

[1] 宋元之际佚名编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一《宋神宗一》，中华书局206年版，第638页。

[2] 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75页。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中华书局004年版，第5075页。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76页。

[5]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四《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华书局986年版，第450—45页。

[6] 宋元之际佚名编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一《宋神宗一》，中华书局016年版，第64页。

[7] [宋]司马光：《八月十一日迺英对问河北灾变》，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二三《司马光五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册，第227页。

[8] [宋]王安石：《风俗》，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四〇五《王安石四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006年版，第65册，第11页。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38页。

[10] 参见[宋]苏颂：《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孙公神道碑铭》，见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严中其等点校：《苏魏公集》卷五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9—800页。

王安石变法是成是败？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知之甚少，却无比笃定地相信，自己所知道的都是真理；一旦谁说出不同意见，或者提醒他们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他们便会气得脸色发青、指节咔咔作响，在键盘上敲出一连串血腥的语句，像连珠箭一样射向假想的敌人。而“王安石变法”正是这样一个有可能引发无名之火的题目。他们相信，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等于进步，等于正义；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是死硬的顽固派。因此，任何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性说法，以及对司马光除史学成就之外的任何肯定，都是应当被唾弃、被打倒的，包括说话的那个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衡量标准不同、观察立场不同，观感当然不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衡量标准与观察立场。

第一，“评价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依据言论，还是依据行动，是依据动机，还是依据效果，这应是个根本的原则问题”。^[1]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经学造诣、思辨水平和知识广度皆高出一筹，文章更是写得漂亮。但是，王安石变法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国家政策，是政策就必然要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所以，看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动机怎样，而是看他和他的政府做了什么，对国家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我们站在哪里看历史？看历史当然要看长远、看大轮廓，但是，也要看当时，关心那些生活在当时的、受到王安石政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没有“人”的历史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第三，还要修正一个传统观点。传统观点关注对立，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上层指官僚、地主和商人，下层指普通农民，所以，传统观点赞美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上层利益的削减，好像这样社会下层就会得到好处。其实不然，损有余未必补不足。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有矛盾，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社会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与皇帝的诉求、朝廷国家的利益之间未必能保持一致。破坏这种一致的，往往是皇帝和朝廷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标准和立场如下，第一看实施，第二看当时，第三考虑社会整体。

这里需要做一个简单说明，神宗朝十九年，王安石前后两次主政，共计七年，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神宗本人亲自掌舵十年。我认为，“王安石的

七年”与“神宗的十年”之间在政策路线层面并无本质差别。“后十年”之中，虽然王安石离开了朝廷，但他所开创的政治模式和各项政策都在继续主导着开封政坛。因此，我倾向于把“神宗的十年”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延伸，作一体观。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役法改革、青苗贷款、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很大的一片园地，专家众多，著述如林。在这里，我无意也无力介入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通过一个例子，管中窥豹，来看一看新法的精神实质。

这个例子就是程昉淤田破坏民田案。淤田属于农田水利法，简单地说，就是把河堤打开一个口子，人工制造洪水，借水力把河底淤泥输送到岸边洼地，以期改良土壤，制造良田。可是，洪水哪能那么听话？宦官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被人告发“堤坏水溢，广害民稼”。官司打到中央，惊动了神宗皇帝。程昉解释说，淤田是老百姓自愿请求的。怎么证明呢？程昉说，他在淤田之前，先派出官员征求当地意见，拿到了淤田“知情同意书”。那么，程昉拿到的究竟是由谁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呢？逼问之下，程昉承认，他拿到的是“诸县乞淤田状”，也就是各县的县政府请求淤田的状子。换句话说，程昉并没有挨家挨户去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属于强制性淤田，并且确实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程昉淤田违反了新法所标榜的自愿原则与利民主张，所告属实。神宗因羞耻而愤怒。王安石说：“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也就是说淤田这个事情得到中央淤田专员和各县官员的请愿书就够了，哪儿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呢？这句话干脆利落地否定了淤田行动的实施前提——百姓自愿，从而间接否定了新法所宣称的目标——利民。紧接着，王安石又说，程昉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额达到了四千多顷，因此，“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就算是在“知情同意”这个问题上说了谎，也没有怪罪理由啊！

神宗随即转怒为喜，然而尚存犹疑，说：“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实利”指朝廷国家通过淤田所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比，老百姓的无辜受损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差失”了。一言以蔽之，王安石和神宗真正在意的是“实利”，而非“利民”。



图五〇：清 周洽、李含溪《黄河图》（局部）

《黄河图》由周洽、李含渼绘于清康熙年间，绢本彩绘，1260厘米×80厘米。黄河被中华民族称为“母亲河”，它从古至今灌溉滋养着华夏民族，但也常会泛滥成灾，为害周边的良田村落。黄河曾在东汉、北宋年间改道入渤海，袭夺了滹沱河。滹沱河深受黄河影响，随着黄河摆动，下游河道不断变化。王安石变法中的淤田法，是在河堤上开个口子，使河水倾泻而出，借水力把河底淤泥冲到岸边洼地，以此法改良土壤。可洪水不会那么听话。最终，宦官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造成“堤坏水溢，广害民稼”。从上图也可看到，黄河水气势汹汹奔涌而前，两旁皆是良田与村落，一旦决堤，洪水必然不会按人们的设想流淌，后果必为害于民。



紧邻河道的村落

关于淤田，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一说。郑州原武县有一拨老百姓，对淤田不满，结伙到开封告状。老百姓前脚出发，后脚就被县政府给追回来了。追回之后，要打板子。这帮人也的确是“刁民”，一看要挨打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我们不是去告状的，我们是想要到首都去，向皇帝表达我们对朝廷、对淤田使者大人的感激之情。淤田使者听了，很愉快地说，好啊，既然你们要感谢我，那干脆搞一个书面的感谢状吧。感谢状很快出炉，两百多个老百姓在上面签了名，各回各家。淤田使者派两个公差把感谢状送到了中央。“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2]“喜”自然是真喜，“不知”是不是真“不知”，就不得而知了。上面提到的那个程昉，也有一封来自漳河流域老百姓的感谢状，来历如何，我亦不知。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才是王安石新法的追求，至少是它的短期目标。比如受到批评最多的青苗法，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发放的季节性小额借贷，打着救荒济贫和限制高利贷的旗号，号称“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3]。实际上怎么样呢？首先是利率其实并不低。青苗钱一年两次发放和回收：春天贷的夏天还，夏天贷的秋天还。政府规定利率20%。听起来不高是吧？然而这只是半年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

是40%，甚至更高。贫苦农民借了还不起怎么办？好办，拉上富户一起借，互相担保，穷人还不起，富人帮帮忙。青苗法最初宣称是自愿借贷，结果在地方官的执行中却变成了强制贷款，等于是新增税费。

再比如免役法。役是老百姓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通常以无偿劳动的方式进行，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宋代军人职业化，老百姓免除了兵役负担，只服劳役，比前代自由了不少。免役法规定，老百姓不再身体力行亲身服役，而是出钱来换取自由，政府拿这个钱向市场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役分很多种，穷人有穷人的役，富人有富人的役，富人愿意花钱买自由，穷人没钱可是也要出钱免役。正式的免役钱之外，还有“免役宽剩钱”，这个钱干什么用？多收出来以备政府不时之需。而且，按照原来的役法（差役法），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太困难的群众是彻底不服役的，现在也要交助役钱。总而言之，只要能增收，名义可以创造。王安石新法所创造的这些敛财方式，听起来非常“先进”，处处流露着创新气息。但是，你要深入进去，看看当时人的感受，就并非如此了。

过去权威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根本就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神宗驾崩以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在神宗对西夏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王安石和他的团队的确是理财的天才。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二十七年，宋朝还进行过一次改革，那就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确实对症下药。宋朝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官僚集团的高消耗和低效能，因此，庆历改革的核心次序是首先整顿吏治，然后发展生产，富民，最后才是强国。二十七年间，宋朝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都没有体现。王安石不关心这些东西，他关心的是理财。他的理财是为了满足神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成为伟大皇帝的梦想。当然，王安石的理想比理财要大得多。但是，他实现得最好的还是理财。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他自己的平生所学，而且害民祸国，对宋朝政治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1]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3页。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74

页。

[3]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神宗熙宁二年》，中华书局004年版，第35页。

宽容政治为何会终结？

从理财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理财的成功为神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但是，由神宗亲自主导，也是他最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西北拓边事业，却一败再败，损兵折将，消耗国力、民心，看不到希望的终点在哪里。最终，骄傲的皇帝在心力交瘁中抑郁而终，只活到三十八岁。

神宗朝过后的北宋政治，就像是被暴风雨洗劫过的果园，红色的果实稀稀朗朗，损伤已经造成，而且很难逆转——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前期两项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第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原则。国家治理，包括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要综合考虑朝廷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也就是说，中央发出的每一条政令，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使老百姓得安定，得利益。这条原则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国家政策以理财增收为第一目标，“安利元元”就只能是虚伪的幌子了。

第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相处原则。要允许并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容忍“异论相搅”，让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充分表达，互相激荡，形成思想的竞争。皇帝兼听而独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符合朝廷国家整体利益的决定，这就是宽容政治原则。宽容政治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得以维持的基础。利益平衡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单独来看的话，打破之后似乎不难修复，只要调整政策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宽容政治原则却是破坏容易修复难。因为在皇帝制度之下，皇权至高无上，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宽容政治的实现，归根结底靠的是皇帝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自律，而要把皇帝的思想和道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则需要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高层对宽容政治的高度共识。说白了，宽容政治原则就是一个由理性编织的无形的笼子，其目的就是防止皇权的野马脱缰。而王安石变法则把皇权从这个无形的笼子里放了出来。

关于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有著名的“三不足”之说。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可能并非出自王安石之口，但很难说是对手的诬陷之词，因为它的确反映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也与我们所能看到的王安石的言行一致。“三不足”的意思，可以进一步解释如下：第一，“天变不足畏”，是说天地和人不相关，日食、月食、地震这些，都有规律，不值得畏惧。第二，“祖宗不足法”，是说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

不一定都好，能改就改，不值得遵循守护。第三，“人言不足恤”，是说平庸的人喜欢墨守成规、畏惧改变，跟他们只能分享成果，不能共同谋划创造；他们的议论，不足采纳。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然而一旦诉诸政治实践，将会创造一个无所畏惧、恣意妄为、张牙舞爪的权力怪物。在皇帝制度之下，士大夫能够用来约束皇帝的，只有天意人心、祖宗法度和儒家思想这三样无形武器。而不管是天意人心、祖宗法度还是儒家思想，都要靠“人言”表达，靠批评发声。让皇帝摆脱对天意人心和祖宗法度的敬畏，再给所有批评意见都贴上“流俗”的标签，嗤之以鼻，那么，还有什么能够约束大权在握的皇帝呢？

我们来看王安石是怎样引导神宗打消畏惧，一步一步走向无所畏惧的。青苗法是遭到批评最多的新法。神宗私底下向王安石表达了犹豫，他问王安石这样做是不是会丧失人心，也曾希望王安石对青苗法加以调整，“以合众论”。王安石的反应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神宗，所谓得人心，是因为合乎天理公义……所以，只要我们的做法合乎天理公义，就算招致四国叛乱，那也不能叫作丧失人心；相反，那些不符合天理公义的做法，哪怕有全天下的人歌功颂德，也不能算是得人心。一句话，只要我们做的是对的，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又有何妨？王安石又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道，就是真理、正义，是正确的路线。陛下正在用道与流俗决胜，这就跟打仗一样。今天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那立刻就会坐以待毙、被流俗打败了。真理与流俗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怎么可以退缩呢？一步都退不得。

对王安石和神宗的作风，司马光痛心疾首，他在给王安石的信里、给神宗的言事书里，反复讲过一个故事，这就是“子产不毁乡校”。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主持国政，改革的力度极大，郑国人很反感他，聚集在乡学校里批评他。有人给子产建议：拆了乡校得了，省得一帮人叽叽喳喳天天在那儿挑毛病。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意思是他们所赞成的，咱们就继续推行；他们都反对的，咱们就修订改正。乡校里的人是咱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拆了学校呢？子产明白，“作威以防怨”，诉诸暴力来拆毁学校，制止批评，肯定是会立竿见影的。但是子产更明白，老百姓的怨气就像是洪水，一直堵着它，不让它释放，早晚会出现大规模的溃堤，而大规模的溃堤造成的伤亡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不如小决使道”，平时就开出口子来疏导它。乡校的批评议论，子产是“闻而药之”，把它当作治病的药来服用的，良药苦口利于病。

“子产不毁乡校”是宽容政治的典范。以王安石之博学，这个故事他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就在王安石执政前六年写就的《虔州学记》中，也曾经用到这个典故，批评那些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他这样说：周道衰微，秦朝君

臣不懂得屈己以学的道理，而乐于自以为是。厌恨批评者，于是烧诗书、杀学士，扫除天下的学校，可是反对者越来越多，秦终于不能取胜。这是为什么？王安石又自问自答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对这句话，我们做最简单的理解：《诗》《书》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所记载的是真理，而真理来自人心，儒家经典既是真理的载体，又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秦烧了诗书，背弃了真理，可是人心对真理的渴求还在，所以，秦最终被人心抛弃。王安石又说，有这样想法的，不止秦朝君臣，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想要拆毁乡校的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这样出现在了王安石笔下，他关注的正是那些建议拆毁乡校来压制批评的人。而他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却对神宗说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流俗，并告诉神宗，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陛下要拿出战士的勇气来，坚决反击一切反对派。

有一个问题，神宗没有问王安石，但是我们可以帮他问一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真理呢？从王安石的文章中，我们大致能够推断出他的逻辑。圣人用心体悟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圣人的思想被忠实地记录在经书之中。通过经书，王安石体悟圣人的思想，获得真理，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王安石思想和政策都来自经书，因而是无比正确的，应当用它来统一整个国家的思想。后来，神宗也的确把王安石主持制定的儒家经典新解释——《三经新义》统一下发到官学，作为科举考试的考试标准，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既然王安石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反对王安石思想的人就都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理会的“流俗”。那么为什么秦朝的时候烧诗书、杀学士、刚愎自用，就错了呢？因为他们烧的是诗书啊，背离了诗书，就背离了真理，背离真理还不肯听纳批评，当然是自取灭亡。而我们，既然真理在握，又何惧流俗，虽万万人，吾往矣。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新政治迅速培养了一批“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王安石和神宗是把官僚们当作纯粹的工具来对待的，只要他们听话，能够忠实地执行中央政令。曾经有人建议神宗谨慎地选择州县长官。神宗回答说：天下州长县令一千多人，怎么选得过来啊。只有我们在朝廷立法，让他们下去遵照执行。符合法令的就算对，违背法令的就算错。用这个法子，才算有准儿。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神宗显然忽略了一点，各地的情况差别那么大，怎么可能什么都靠朝廷立法呢？官员，特别是地方长官，是应当有他自己的施政空间的。神宗特别指示，反对地方官员的主动施政。汉代有一个著名的儒者官员黄霸，非常善于治民，能够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黄霸为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神宗却说，像汉代的黄霸这样的官员，妄为条教，以干名誉，这是应当治罪的，汉代反而给他提级赏赐，这是不对的。“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黄霸在颍川的做法，跟王安石当初在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当县令时的做法，是多么相似！王安石兴修水利，发放低息信贷，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规定的了呢？又有哪一项是中央政令能够规定得了的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中，王安石却能够受到上级的褒奖，得到提拔。北宋前期的宽容政治成就了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却联手神宗破坏了宽容政治。

司马光对新法最为痛心疾首的，除了害民，还有害政。害政这一条，在司马光的心里是更为深刻的痛，然而却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神宗驾崩之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当政，司马光还朝主政，获得了修复宽容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司马光主政十八个月，不但没有扭转政局，反而加剧了矛盾，宽容政治终于不可挽回。为什么会这样？

司马相公是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就像河流不能决定自己的流向，历史也无法决定前进的方向，就算它知道什么是更好。在很多时候，是大大小小的“偶然”决定了历史河流的走向。比如神宗最初选择的理财人选是张方平，张方平应该会走一条更为平衡的路线，可是其父在张方平刚当上副宰相的时候驾鹤西游了。又比如，在王安石之后，被选中出来收拾局面的人偏偏是司马光。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军人、百姓的热烈欢迎。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几千名开封百姓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给百姓寻一条活路！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神宗政策之苦的人们盼望他，希望他能够把宋朝国家和社会带到一条不同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王安石—神宗路线的支持者虽然不愿意，但是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应当是当时的朝野共识。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那个合适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不仅如此，司马光还丢失了他一向所珍视的宽容政治作风。苏轼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调整，两人当面对峙，争执不下，苏轼大喊：从前您做谏官，宰相有错误，您据理力争。“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难道说你今天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苏轼给司马光取的外号“司马牛”更是尽人皆知。在司马光执政的十八个月当中，官僚集团的分裂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分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司马光对于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面的复杂性认识严重不足。司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废除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废除市易法，政府从经济领域后退，恢复工商业的活力。斥退聚敛之臣，

表彰爱民之官。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宦官，不让宦官统兵，以免引发祸乱。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希望和缓，重返多元宽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事调整是必须进行的。

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然而这谈何容易？司马光远离开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宽容走向了专制。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专制政治模式。所谓“国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难题：他需要论证变革的思想基础，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统一思想，避免官僚队伍的动摇和分裂。为了统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舆论队伍，掌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是能发出尽可能一致的声音来的。新法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广大官僚队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要改变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队伍的稳定，该怎么做？新法推行之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政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持，需要对国家财政运行状况充分了解，还需要足够的耐心。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这是司马光作为思想和政治领袖必须解决的问题。请注意，这是在皇帝制度之下。司马光作为宰相，可以是政治变革实际的主导人，但是在理论上，只有小皇帝哲宗才是唯一有资格主导政治方向的人。因此，改变先帝法度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今圣上”和“先帝”父子之间的问题，它关系到“今上”对“先帝”的孝道，也关系到“今上”与打着他的名义实施变革的臣子之间的关系。当哲宗成年之后，他如果不能接受司马光的说法和做法，是很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案。最聪明简便、不易引发混乱的做法，是从先帝的言辞中找寻“悔咎”“欲改”的蛛丝马迹，从而把政策调整转换成“继承先帝遗志”的孝道行为。这个解决方案最滑头，也不是没有隐患。而司马光所采取的，却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先帝犯了错误，而“今上”作为先帝的孝子，发挥“天子之孝”，有责任改变父亲的错误，把国家重新引上正确的道路。这

符合孝道的规定和儒家经典的教导，叫作“干父之蛊”。司马光引经据典，充分论述了“干父之蛊”的合理性，最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如今是太皇太后实际当家，儿子有错，母亲改正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却被广泛引用，司马光的理论因而被称为“以母改子”。老实说，“以母改子”的说法是非常荒唐的，儒家经典并未赋予母亲这样的权力。这不是司马光的论述重点。但是，不管“以母改子”还是“干父之蛊”，都严重地伤害了小皇帝宋哲宗的感情，为哲宗亲政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苦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除了“以母改子”这段蛇足，从理论上讲，司马光没有错，但是他太方正，不肯折中。这也正是司马光的人格特质所决定的。

关于财政的问题。司马光显然也想得太简单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政本来就困难，司马光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增收。在王安石—神宗路线指引下，政府规模、官僚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突出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司马光上来之后，废除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政府怎么支持？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司马光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听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却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为什么？钱不够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还是很丰富的，应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通盘考虑国家的财政安排。可惜，这样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家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认识。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队伍。爱戴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边，第一缺乏财政、行政专家。财政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神宗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定细则，曾布回答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忙，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一定在行政机构里，财政专家在户部。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追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台谏官是可以批评他的，所以，苏轼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苏轼能喊，就说明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追随者揪出来斗，赶出政府。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面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作为政治领袖，司马光干净而无力。

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他真的了解司马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梦想靠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凝聚开封军人、百姓期待的“司马相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历史却选择由他来解决神宗死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就注定了结果的悲剧性。在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儿子对父亲的私人之爱压倒了皇帝对江山社稷的责任，皇帝私欲的魔鬼从瓶子里冉冉放出，无限膨胀，奢侈腐败、任人唯亲，无节制的战争与好大喜功的政治表演交叉上演。王安石的追随者重掌大权，仇恨爆发，赤膊上阵对付反对派的政治迫害，文字审查、政治黑名单一一上场，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道德破产，北宋政治耗尽了它残余的理性，彻底偏航。幸好，开国以来所形成的精致细密的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仍在，内部的问题虽然大，但还不至于形成颠覆势力，从内部推翻赵宋统治。社会以其自身的韧性在国家的剥削压榨下顽强生长，国家凭借强大的搜刮能力积聚了海量财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在首都建造了天堂般的艮岳。大晟钟——徽宗亲制的乐器，现代学者认为是音准器，统一了标准音高，与世界现行标准音高相同——把悦耳的音乐从开封传向整个宋朝社会。太学“三舍法”试图以学校分级教育取代科举，穷人公墓“漏泽园”让孤独的亡魂得到安顿，“居养院”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愿景，这一项项具有创造力的新事物营造出一个“大同新世界”。然而，这个花团锦簇的“大同新世界”背后，却是越发无耻的政治与越发无序的统治。这就是北宋末年的总体图景。虚弱的东京梦华，禁不起风吹雨打，更何况是女真兵马。这应当就是北宋灭亡的真相，也是北宋政治的结局。怎能不让人叹息！

传统政治文化何去何从？

北宋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政策追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批评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种政治生态，在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之后逐渐消失，国家挤占社会，专制取代宽容，批评纠错制度犹在，却已经沦为权势的利爪尖牙。建炎南渡之后，宋朝国家在北方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艰难图存，生存与安全成了南宋政权的第一追求。尽管宋高宗亲自定调，把北宋灭亡的原因一直上溯到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南宋政治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原因很简单——王安石能解决问题，在理财方面特别有一套，而南宋比北宋更需要钱。

南宋政治表面上与王安石决裂，骨子里却是王安石—神宗政治的延续。皇帝与权相结合，把普通官僚的参议朝政空间挤压到近乎无的地步。皇权的专制加强，理财之臣得到重用，官僚的工具性继续增强，更加理想主义和讲究道德的士大夫，比如朱熹和他的弟子，在政府中找不到位置，无可奈何地转向了思想的沉潜与社会的改造，由此造成了一个“因祸得福”的连带结果——高雅文化进一步下移，向民间社会推广。这一过程发生在南方。

与此同时，北方则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女真人所建立的新政权接受了华夏传统的王朝政治模式，却使它从文质彬彬走向了野蛮残暴。一百年之后，蒙古崛起，以“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明的古老躯体，实现了帝制中国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张，合南北东西为一国。政治上的北方征服南方，让华夏政治文明继续向着北方落后民族的方向倾斜——在对朝廷国家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出现了两大倒退。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视“天下”为整体，名之曰“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元朝则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华夏传统之君臣关系，在地位的不平等之上承认某种抽象的平等，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元朝的臣子则自称奴婢，并以之为荣耀。明初君臣终究是蒙古治下的臣民，虽然号称是华夏的复归，然而在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上则上承元朝。“不为君用”一度成为罪名，廷杖之下倒也出了几个“不怕死”的英雄，然而士大夫集体在精神上的自尊与独立却遭到了彻底阉割。明朝之后，清朝入主中原，以少数统治多数，以落后统治先进，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及其文化的心态复杂，防范之心始终不减，政治中的专制与猜疑继续加强，直至近代。这就是金元以降，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致走向。

金：政治的残暴化

来自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落后民族女真建立的大金政权，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整个中国北方，消灭北方草原霸主辽，又把北宋赶出开封，赶到了秦岭—淮河以南。女真人这种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力量，大约只有一个世纪以后的蒙古人才堪媲美。按照文明发展水平，金既落后于辽，更远远地落后于宋。金对辽、对宋，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我学宋史，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宋打不过金。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便是，在冷兵器时代，倘若游牧民族是组织良好的、团结一致的，尤其是当游牧民族旭日初升的时候，那么，农耕民族几乎无胜算——拿锄头的打不过骑马的。

当然，宋朝自有其问题。比如，它的兵权分割设置太精美，以至于丧失了初衷，忘了军队本来的作用是打仗；它的武力集团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地位始终低于文官集团，这就限制了优秀人才向军事领域的流动。又比如，宋朝其实是一个缺乏长期战略规划的国家，北宋置身于多政权并存、互相竞争的国际态势之中，但在诸如国际关系、武装力量建设等问题上却并未予以持续性的深入研究。宋朝人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一方面是得过且过的被动应付，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穷兵黩武会伤害国家和社会，然而一个国家在战略上只有眼前的苟且，没有远方和未来，才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居安思危，在和平时期尊重武力，保持对敌国外患的警惕，加强国防建设，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可惜的是，不止宋朝，传统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其中原因，我认为，可能与我们民族传统中不善分析的思想方式有关，传统的中国人不太能区分国防力量的建设与穷兵黩武这两件事情，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在实践上则体现为两个极端，要么谈兵色变，要么穷兵黩武。





图五一：金 杨微《二骏图》

《二骏图》由金代画家杨微所绘，绢本设色，81厘米×25.2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该画作描绘了一位女真族牧马人驯马的情景。画中的女真骑士和两匹骏马刻画得流畅生动，重点突出了人和马的紧张气氛，刻画形象，动感逼人。从牧马人打补丁的坐垫这一细节也可看出，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民族经济相对落后，但其建立的大金政权，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整个中国北方，消灭了北方草原霸主辽，又把北宋赶到了秦岭—淮河以南。女真人这种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力量，大概只有一个世纪后的蒙古人才堪媲美。从画面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他们在马背上骁勇剽悍、纵横驰骋的气势。

金把宋朝赶到南方，占领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其中包括汉唐宋的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还有孔子的故乡山东。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南北朝时期，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也曾统一

北部中国。但是，“这一次”还是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大多长期生活在华夏边缘甚至内地，受华夏文明影响较深，对华夏文明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所以才有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汉姓、易汉服、娶汉女。而女真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原本臣服于辽，生活地域与宋并不直接接壤，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人对华夏文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辽，而辽本身是一个汉化程度比较低的王朝。所以，女真人对华夏文明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理解和接受的能力都相当有限。而女真文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是非常落后的。女真人以武力定天下建立统治，又凭借政权的力量按照自己的理解改造了北方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北方所经历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来观察女真人对华夏政治的改造过程。

第一个历史瞬间发生在1122年，女真人打下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刚刚进入燕京皇宫的时候，金朝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与其臣数人皆以次坐于燕之内殿上，受燕人之降。且上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赐功臣皆张之”^[1]。“上”指阿骨打，他问有多少把黄罗伞盖，打算跟几位功臣一人来一把。这个段子让宋朝人笑了很久。这是一个老文明对一个新文明的嘲笑。倘若从夏朝建立开始算，到宋朝为止，华夏的政治文明已经三千多岁了。而女真人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他们落后而淳朴，贵族之间还是相对平等的。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那么，大家可知道阿骨打最初的政治中心怎么称呼？上京会宁府？正确答案是皇帝寨。除了皇帝寨，金朝初期还有国相寨和太子庄。皇帝寨一直到1123年才升为会宁府，建为上京。

“山寨版”的女真皇帝对华夏政治文明中的君臣等级，明显缺乏认识。金朝的贵族们曾经对第二任皇帝完颜吴乞买实施杖刑——打屁股。这个段子也是宋朝人讲的。金国设置仓库收集储存财物，誓约“惟发兵用之”。可是，皇帝本人却“私用过度”，诸勋贵大臣决定惩罚“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各位大臣又向皇帝“谢罪”。^[2]在宋人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瞬间：群臣把皇帝从宝座上扶下来，打了二十板子，又扶回殿上，赔礼谢罪。完颜吴乞买就是灭亡了北宋的金朝皇帝。这个段子不知道宋人是否还笑得出来。此时的女真皇帝仍然是贵族群体中平等的一员。政治的原始状态与国家版图的扩张，已经严重脱节。原始的平等适用于规模较小的政治体，要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女真人必须引进先进的国家制度。

挨了打的完颜吴乞买开始吸收辽制和宋制，建设集权于皇帝和中央的国家制度。到了第三代皇帝金熙宗，“出则清道警蹕，入则端居九重”^[3]，已经具备中原皇帝的一切威仪。当然，在宋朝士大夫洪皓看来，金朝对中原文

明的吸收是徒有其表的。“在‘中朝制度’的门面之下不改野蛮贪残的风气，而腐化堕落却随着文明的进程日甚一日。”^[4]1129年，洪皓奉命出使金国，遭到扣留，直到1143才获释归宋。洪皓在金居留十五年，亲身经历了金朝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变，他感受到的主要是野蛮、落后。

金熙宗所颁布的《皇统新律》，“大抵依仿中朝法律，间有创立者”，比如“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殴打正妻至死，只要没有用兵器就可以免于处罚。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因为女真贵族小妾众多，唯恐正室妒忌。这一条，与华夏传统“妻者，齐也”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当时汉人莫不唾骂，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做人人家老婆连个奴隶都不如了！1139年，金朝主要仿照唐制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首建官于台省”。洪皓发现，在金朝新建的国家机器中，谏官、御史都是“备员”，徒有虚名，“不弹击，鲜有论事者”，很少有讨论政事的。地方上也没有监督监察机制，所以，官吏贪赃枉法毫无忌憚，有权有势的女真贵族更是横行霸道，民不堪命。华夏民族以三千年政治智慧创造出来的批评纠错机制，还处在文明幼年的女真人根本无法完全领会，只学得皮毛，不能得其真髓。

崇尚暴力与野蛮的民族，仍然习惯用野蛮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題，女真统治者对待官僚的态度如同对待奴仆，动辄施以鞭杖之刑。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曾经对大臣宣称：“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5]1169年，南宋的楼钥出使金国，到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附近），听说临淮县尉被鞭八十；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又有一位校尉向他诉苦说：“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捶楚，成甚活路。”^[6]官虽甚高，与奴隶一等，这是华夏文明中前所未有的。1169年是金世宗大定九年，金世宗是金朝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号称“小尧舜”。小尧舜治下，尚且如此——在女真的政治思想中，野蛮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就像开国之初，诸位勋贵大臣可以打完颜吴乞买皇帝的屁股，如今皇权独尊，皇帝当然可以打大臣的屁股，长官自然也可以打下属的屁股。官员失去了完整独立的人格，又怎么可能行使对皇帝、对上级的批评谏诤之权？

金朝治下的北方政治，崇尚暴力，强调服从，走向了野蛮化、残暴化。相比之下，南宋的皇权虽然专制，但是文明的风骨还在。通常情况下，如果硬打，文明是打不过野蛮，而一旦进入和平交往状态，文明对野蛮还是会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但是，南宋似乎并未很好地发挥华夏文明的榜样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就国家地位而言，南宋长期处于下风。宋朝习惯于用财物换和平。北宋给辽的叫“岁币”，这是完全对等的关系。给西夏的叫“岁赐”，这是不平等的关系。宋在上，夏在下，宋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给夏赏赐。根据1141年签订的宋金绍兴和议，南宋给金的叫作“岁贡”，这是

另外一种不平等，宋在下，金在上，宋是附属国，金是宗主国。这种关系通过1164年的隆兴和议得到了改善。总体而言，宋对金，虽然文明程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先进得太多，但是，在文化竞争中，宋对金影响有限。金朝逐渐发展出一种本朝认同，认为我们大金所拥有的才是华夏正统，你看，就连孔子的故乡不也在我们的治下吗？而蒙古人的崛起、元朝的建立则彻底实现了北方文化对华夏文明的统一和重新定义。

[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校勘本，1987年版，第86页。

[2] 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五引赵子砥《燕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校勘本，1987年版，第1194页。

[3]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一〇《纪年·熙宗孝成皇帝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

[4] 江湄：《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载207年4月《文汇报》。

[5] [元]脱脱：《金史》卷七六《萧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5页。

[6]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九七三《楼钥七四·北行日录中》，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册，第88页。

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我先介绍一幅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博韦制毯厂（Beauvais Manufactory）制作的挂毯，如今珍藏在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画面描绘的是：在花园的大树下，有一宝顶凉亭，凉亭里摆着一张不大的圆桌，一男一女围着圆桌相对而坐，周遭环绕着跳舞的侏儒、弹奏七弦琴的侍女，以及服侍酒食的仆人。男主人身材微胖、鼻梁高耸，头戴红色毡帽，帽子下缘以皮毛装饰，脑后则是一大坨孔雀翎，耳垂上还挂着水滴形的耳坠。他坐在金色的靠背高椅上，手举高脚金杯，似乎在向对面的女主人祝酒。同样，大眼高鼻且身形丰腴的女主人则凝视着男主人，右手前举，左手低垂在裙侧，手上握着一把精致的折扇，金色的披纱从头顶一直垂到腰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画面上的这一对，究竟画的是谁呢？——大清的顺治皇帝和皇后。很显然，法国人想象中的大清帝后，是以法国的王室贵族为原型，加了一点异域元素制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描述未知世界的时候，所能用的尺子一定是自己所熟知的一切。类似的故事，还有晋惠帝近乎痴人说梦般的“何不食肉糜”，以及鲁迅笔下20世纪初农村妇女想象中的皇后娘娘。农村妇女认为柿饼是难得的美味，以己度人，推想皇后娘娘那么尊贵，一定是想吃多少柿饼，就可以吃多少柿饼，所以在村妇的想象中，当皇后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一天劳累之后，倒卧于竹床之上，懒洋洋地说：太监，拿个柿饼来！晋惠帝的脑子可能是不太灵光的，但他有一种本能的善良，他想象着老百姓没饭吃一定很苦，所以，他很自然地说，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对于一个在深宫里长大、娇生惯养、没见识过人世艰难的皇帝来说，吃肉糜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熟悉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有舒适感；未知的陌生世界则让人感到危险，产生恐惧感，越陌生越恐惧。因此，成年人的常见做法，就是用已知来丈量、判断未知，尽可能把有关未知世界的新知识修修剪剪，想办法塞进已知的框架里。首先是“以己度人”，然后是“削足适履”，把陌生改头换面，强行变成熟悉来认识，这样会大大降低对未知的恐惧，获得心理安慰。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丧失认识未知的能力——如果你都不承认这是不一样的新东西，又怎么可能真正认识它？

传统史学对于像元朝这样的北方民族政权的认识，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削足适履”，以华夏为尺度去度量和评判异族统治，单方面地强调“汉化”，选择性地忽视统治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其他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很难厘清北族政权对华夏文化的实际影响——完全不同的因素不但进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彻底改变了华夏——变化实实在

在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连北族政权是不同的都不愿意承认，那又怎么可能认识到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承认不同，看到差异，然后才能明了变化。

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自有其思想、文化和制度基础。“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相反，对蒙古人来说，汉文化的接受难度可能是更大的，原因有二：第一，蒙古是游牧民族，而汉文化是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游牧与农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配型不同，必生排异。第二，元朝统治的核心是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他们所坚持的是草原本位政策，对汉文化的接受意愿本来就不高。比如选定今天的北京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与北方草原保持联系。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蒙古人最终还是从大都退归了大漠草原，没有重蹈之前女真、契丹、鲜卑等民族彻底消融于华夏的宿命。不管在当时的汉人、南人看来蒙古文化多么落后，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仍然构成了元朝统治的核心，并且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图五二：元 赵雍《蒙古马戏卷》（局部）

《蒙古马戏卷》为元代赵雍所绘，绢本设色，172.7厘米×26.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赵雍为赵孟頫之子，书画继承了家学。从画面中可看到，在骏马飞驰的过程中，骑者或独脚立于马背上，或侧身飞出马背，或斜倚在马背上，或倒挂在马背上，骑姿百变，惊心动魄，令观者大开眼界。由此也表现出蒙古草原民族极为精湛与娴熟的马技。他们游牧迁徙，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粗犷剽悍的性情，构成了元朝统治的核心文化。



倒挂于奔驰的马背一侧



巾幗不让须眉



手牵缰绳，单脚立于疾驰的马背上

有学者认为，元代文化包容有度、气象宏大，重视技术型知识，假以时日，必将大成。只可惜，蒙古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百余年，这样的文化“大成”，并未出现。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清楚的，来自元朝的影响还是负面居多。就华夏政治文明的发展而言，元朝时期发生了两项重大倒退，影响恶劣，必须清算。

第一是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大幅倒退。蒙古人信奉的是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想得到多少”^[1]。这种认识与华夏的天下国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是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构成了“江山社稷”，

而“江山社稷”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老百姓的感受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国家必须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在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对待王朝统一过程中的新占领区，按照华夏传统，新疆与旧土之间可能会存在政策差异，但是这种政策差异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理论上，华夏的政治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疆与旧土之间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等对待。

这些东西，蒙古人哪里懂得？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之时，曾经有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汗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除了打仗以外，畜牧是蒙古人最熟悉的经济方式；汉人的生命在蒙古贵族眼里是一文不值的，既然没用，统统杀掉也是可以的。最终，是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阻止了这场大杀戮。那么，耶律楚材是怎样劝说窝阔台汗的呢？他一句儒家的大道理都没有讲，而是直接给窝阔台汗算了一笔账，告诉他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以收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和四十万石的小米”。这笔账算下来，果然就打动了窝阔台，窝阔台说：“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2]耶律楚材劝说窝阔台的方式，充分表明他对蒙古文化及蒙古上层认识水平的熟悉程度。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腐败。之前曾经有著名作家声称：宋朝最腐败，影响巨大。我因学宋史，故常被追问：宋朝真的最腐败吗？我没做过比较研究，不敢确指哪个朝代最腐败，只能回答说，从逻辑上推断，帝制中国最腐败的王朝绝不可能是宋朝——政治文化在那儿摆着，底线是有的。后来读到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的说法，深合我心。李先生认为，元朝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腐败，从地方到中央，“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3]。元朝的腐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特色：第一，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朝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第二，前代宰相级别的高官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朝的宰相不但贪腐成风，而且涉及金额巨大。1303年，元成宗因为一起腐败案，惩处了八名正副宰相，占到宰相人数的82%，几乎全烂了。^[4]

元朝之空前腐败，原因何在？俸禄微薄、官员素质低下、最高统治者的徇私，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蒙古人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存在问题。他们没有华夏传统“江山社稷”的概念，不懂得皇帝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有着共同的整体利益需要维护。在宋朝，台谏官批评、监督、弹劾是受到鼓励和包容的，皇帝、宰相就算心里不愿意，大面儿上也过得去，因为批评对江山社稷有好处，这是共识。而在元朝，御史台弹

劾皇帝信任的高官，皇帝会说：以后谁再说这事，朕肯定饶不了他。高官出了问题，皇帝所想的，不是要核查问题、处置高官，而是处理揭发问题的人。这脑回路，实在是清奇无比。何以至此？因为这国家是朕的家产，而大臣是朕的家奴。朕愿意抬举他，与外人何干？

元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另一个全面倒退发生在君臣关系上——从前是君臣，从此变主奴。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当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人格上，君臣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利。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蒙古人更看重的是做皇帝的奴仆。草原旧俗，大汗最信任的人是他的斡脱古·孛鲁（世袭奴隶）。成吉思汗初兴，木华黎的父亲把木华黎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说：“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们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代世代高官，但是他们“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根脚’”。在元朝文化当中，世袭奴隶是最高贵的出身。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世代相传为大汗服务，才可以接受大汗的指派去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当到宰相，地位显赫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5]。对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者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

家国不分的状况，在华夏国家政权的发育早期，以及后世王朝的政权发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比如从晚唐五代到宋初，也曾经出现过皇帝用家臣来伸张皇权、加强中央控制的情况，但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成熟度足以让当时的皇帝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一旦国家长治久安，家臣——不管是宦官还是其他——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而这种意识，显然是蒙古人所缺乏的。他们走了相反的路，在统治中原之后，草原上的世袭奴隶制度扩大到一般的君臣关系当中。而当臣子的地位下降到奴隶的地步，哪还有批评与纠错的余地呢？

我们接纳元帝国在华夏版图上的开拓之功，但也不应忘记元朝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的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退到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在君臣关系上退到以奴婢为荣耀。

^[1]这是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观察。1245年，加宾尼奉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派遣出使蒙古汗庭。〔法〕加宾尼：《蒙古史》，见〔英〕道森编，吕普中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参见屈文军：《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见汤开建、马明达主编：《中国古代史论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80页。

[2]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八，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吴澄：《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四七六，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此序作于“至顺庚午”，即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上距元朝灭宋五十一年，下距元朝灭亡三十八年。

[4]参见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载《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2—41页。

[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24页。

明：朱元璋的无知与恐惧

传世的朱元璋画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红袍、马脸的异人相，一个是黄袍、方面大耳的标准帝王相。历史学者对于朱元璋的评价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朱元璋是个伟大的皇帝，他的伟大体现在两点：第一，“得国最正”，取得政权的方式最正当，“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苦孩子、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江山是靠自己打下来的，而且投身革命的本意是为民除暴，当皇帝只是上天的安排。第二，朱元璋有“拨乱反正”再造华夏制度之功，“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元朝把中国法度搞得乱七八糟，全靠朱元璋清理再造。^[1]另一派则认为“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重建，然而恶化了。……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会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2]。



图五三：清 姚文翰《明太祖真像》

《明太祖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绢本。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开国皇帝，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幼时家贫，曾以为地主放牛为生。及成年，参加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定集庆（今南京），而后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实力逐日壮大。1368年，朱元璋击败各路农民起义军，于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其后，明军进逼北京，结束了元朝统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宰相，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贪官污吏；垦荒屯田，减轻赋税，使明初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传世的朱元璋像有两个版本，一是身穿黄袍、阔面大耳的帝王相，一是身着红袍、面部呈马脸的异人相，文中展示的即为第二幅。画像中，朱元璋双目有神，耳朵肥厚，长脸圆颌。史学考证，较之其实际相貌，此画像略为夸张。

我属于后一派。朱元璋所建立的朝代的确存在了277年，堪称长治久安，然而明朝政治文化的水平实在谈不上高明。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明朝在元朝的延长线上，华夏制度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元朝政治文化的野蛮基因却在明朝统治者的血脉里倔强流淌。不高明而能长久的原因，有待思考。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明太祖一人的私意”是怎样“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的。

朱元璋嗜杀。他解决功臣问题的方案就是“杀”，他解决贪腐问题的方案也是“杀”。肉体上消灭，解决得很彻底。中国人口基数大，成千上万地杀人，在历史书上一点儿不罕见。读多了会让人麻木，只见数字不见人，感觉不到痛。从前学唐史，学到武则天杀李唐宗室和忠臣。老实说，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因为上层的杀戮与老百姓无关。朱元璋杀人，老百姓看，杀的是官；小官看，杀的是大官。总之，杀的是别人，与我无伤。不仅如此，官比我大的，比我富贵的，也都有今天，我虽得不着实际的好处，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有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岂不快哉！然而，这样任性的杀戮真与普通官员和百姓无关吗？

还是有关系的。朱元璋的杀人，多半属于法外酷刑。皇帝一人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独裁专制，任意用刑，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比如说“空印案”。地方政府派官吏到户部核准钱粮军需事宜，因为道路遥远，往返不便，所以事先会准备好盖了印的空白文书，遇到吏部驳回，便就地修改，换新文书交上去。严格按规定抠，这样做肯定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空印文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地方上做，户部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忽一日，“帝疑有奸，大怒”，万钧雷霆之下，数百名地方官员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有人抗议，说：“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今一

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3]先立定罪名，昭示天下，然后才可以追究那些犯法的人，这是自有成文法以来的治国通例。可是到了朱元璋这里，想讲道理，门儿都没有！当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令制度之上，其他人是否有罪、何时得罪、怎样判罚，都要看此人的心情了。



图五四：明 张居正编《帝鉴图说·纵酒妄杀》

《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所编，供幼年的明神宗阅读的教科书。为了让年幼的万历皇帝快速掌握治国理政的方要，张居正以历代经典的正反面治国案例为素材，编撰了这套类似绘本版《资治通鉴》的图书。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圣哲芳规”讲的是历代帝王励精图治的故事，下篇“狂愚覆辙”讲述历代帝王逆施倒行终招致亡国之祸。文内插图为线条简明的明代木刻版画彩绘。《资治通鉴》卷一六六载，北齐文宣帝高洋统治末期嗜酒滥杀，“尝作大钁、长锯、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杀人以为戏乐”。宰相杨愔不忍无辜者被杀，就将死囚犯列庭帐内，称“供御囚”，备高洋纵酒戏杀。由此反映出帝王嗜杀、滥杀的暴行，以此劝勉幼年的明神宗。



杨愔正劝醉酒的齐宣帝以死囚替代无辜者

朱元璋杀得最多的，除了功臣，就是读书人。他最恨的就是读书人不合作。改朝换代之际，读书人忠于前朝，不愿出仕新朝，在华夏政治文明中是得到默许的。蒙古人统治中原一百零九年，对文化虽然不重视，但是干预也少，自由空间留得大。所以，还是有人愿做元朝的“遗民”。对于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零容忍。苏州有姚叔闰、王谔两个书生，朱元璋“欲擢用，分理庶务，共造民福”，可是这俩人识抬举，竟然买通官府编造理由，死活不肯进京。事发之后，砍头，抄家！朱元璋仍然觉得不解

恨，亲自撰文鞭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寰宇之中士大夫胆敢不接受君王的任用，分明是自外于教化，砍他的头，抄他的家，一点都不过分！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是朱元璋新创的罪名，史无前例。华夏传统从来都是允许士大夫不合作的。皇帝拥有政统，凭借政治权力统治国家；道统则靠孔门弟子一脉相承。读书人在政权之外传承、探求修齐治平之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来去自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这都是被允许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没有了多国竞争，读书人只能服务于唯一的政府，不合作的自由成了传统读书人最后的独立空间。到朱元璋这里，“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成了重罪，这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这条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入律，但是作为“皇明祖训”——开国皇帝的教诲，它就像是紧箍咒一样，一直都在，任何时候念起来都会让人瑟瑟发抖。一百多年以后，朱元璋的后嗣中格外荒唐活泼的正德皇帝在位，宦官刘瑾专权。王云凤为母服丧完毕，升任国子监祭酒，接到任命，想要坚决推辞。友人写信告诉他，当政的人可是正在念叨太祖爷那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呢，你要小心啊。王云凤的爹一听就吓软了，说，我老了，你打算让我怎么着啊？王云凤无可奈何，收拾平生诗文付门生周朝著藏之，“于是乃泣而就道”。当个国子祭酒竟然要哭着上路，如赴死一般。这样的景象，哪一朝有？

朱元璋要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说他有多重视知识，而是他不能容忍读书人不合作。相反，那些合作了的读书人官员，在朱元璋的眼里，都是德行可疑、随时会作奸犯科的贪婪之徒。比如说，对于地方官，朱元璋制定了一项无比奇葩的规定，禁止官吏下乡。按道理讲，地方官下乡是了解政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所描述的就是苏轼做徐州知州时下乡的情景。可是，朱元璋却认为地方官吏下乡，就是去“扰吾良民”了，因此，他屡屡下诏，加以禁止。洪武十七年（1384年），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因下乡扰民，“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朱元璋趁机再次重申不许下乡的禁令，并且宣布，如果还有“贪婪之徒”“不畏死罪，违旨下乡”，那便允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4]

在朱元璋的眼里，好官凤毛麟角，贪官比比皆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提拔了很多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忠诚廉洁。用久了就发现，俱系奸贪。朕于是明白地向他们展示法令制度和刑责的不可饶恕。可是内外官僚，守职唯难，能得善终的少，杀头抄家的多。已经杀了那么多人，惩罚不可谓不严，然而还是“能得善终的少”，为什么呢？难道朱元璋赶上的就真是一个官僚“俱系奸贪”的坏时代吗？

朱元璋鼓励老百姓揪斗官员。他把自己亲自抓的大案、要案精选成集，亲自加上批示，印发全国，这就是《大诰》，犯罪者会背《大诰》可以减刑。洪武十九年（1386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农民手持《大诰》进京告状，遭到了途中镇寨巡检、弓兵的刁难和勒索。朱元璋下令将涉事弓兵枭首示众，巡检剥去双足枷号示众。但是，如果你以为朱元璋就相信老百姓，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朱元璋看来，这些来告状的，还有地方上有势力的耆老，都是刁民。他的做法，只不过是让刁民看着奸官。

朱元璋唯一相信的是他自己，他有一种奇特的“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偏执。朱元璋操心的事情，亲自制定的法令，绝对超过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皇帝。比如，他竟然亲自制定了地方官的《到任须知》，一共三十一条，事无巨细，一一规定；并且在前言中以一种传播邪教的口吻，威胁加诱惑，要求官员勤读此纲领：“若人懒于观是纲领，虽是聪敏过人，官为之事，亦不能成。若能喜读勤观，则永保禄位，事不劳而疾办。此书所载，学生及野人辈，皆可预先讲读，以待任用。”^[5]朱元璋的这个《到任须知》，实在是太细了。相比之下，宋真宗御制的文臣七条，才真正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从根本上下功夫：“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责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课，七曰革弊。”^[6]第五条“明察”要求勘察民情，第七条“革弊”涉及对地方政治的纠错改良，都需要地方官亲自下乡，考察民间疾苦——这样的自主权，朱元璋怎么可能交给那些“贪婪之徒”呢？他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做工具，亦步亦趋，按照他的指令行事。

朱元璋的《到任须知》和宋真宗的《御制七条》，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是否相信人是有道德、可以自律的。宋真宗信，朱元璋彻底不信。朱元璋是一个安全感极度缺乏的人，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这是朱元璋批示中的话。“有能者或面从志异，有德者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这是朱元璋御制策问中的原话。总之，普天之下除了“予一人”，就没有德才兼备、讲究廉耻的人。这样的皇帝，外表有多膨胀，内心就有多荒凉。

朱元璋“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涂炭”，可以说“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得国之正”赋予了朱元璋肆无忌惮地伸张君权的合法性。然而，这种“以一人而治天下”的荒唐，恐怕只说“得国之正”是不能解释的。朱元璋缺乏政治家的见识和学识，他从下层崛起，在坎坷中成长，历尽人间险恶。他在成长中所经历的官员也好，耆老、读书人也罢，可能真的是坏人居多，这让他怀疑一切。他又自认是高尚的人，所以特重私德，过于强调生活细节。他对待外部的人和外部世界的方法就是用暴力压服，而凑巧，作为皇帝，他拥有最强大的暴力。朱元璋的暴力统治，“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就颁行《大诰》本身的社会效果而论，由于朱元璋所倡导的是无视正常法制的、无区

别的和无节制的大行诛戮，因而人心不服，收效有限，流弊很大，难以持久实行。也就是说，未能达到朱元璋的预期目的。”^[7]

[1] 参见孟森著，何孝荣、张慧导读：《明史讲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5、669页。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九《郑士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97页。

[4] 参见[明]朱元璋：《大诰续编》，“官吏下乡第十七”“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

[5] 赵毅、马冲：《明太祖的皇权专制与“皇权下县”——以地方官员〈到任须知〉为中心》，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81—85页。

[6]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一《政事四十四·诚饬二·文臣七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0页。

[7] 杨一凡：《明〈大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明：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廷杖。清人所修《明史·刑法志》云：“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1]这几样创造，实际上并无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可是明朝人“踵而行之，竟于末造”，甚至到南明小朝廷风雨飘摇了，还舍不得放弃，的确令人叹息。然而我不打算叹息，我想分析。

首先，为什么说廷杖是明朝的创造？吴晗说：“廷杖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言简意赅，不是很准。比如“大官”就不太准，实际上六、七品官最多。因此，我们需要给廷杖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

明朝的廷杖有四个特点：第一，行刑的对象主要是中央官员，特别是中级官员和言官。有学者从明朝史料中搜集到姓名、事迹相对清楚的廷杖受刑官员157人，进行了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占比最高的是专司批评弹劾的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占43%；占比名列第三的是翰林院官员，占10%。翰林院官员同样以言责自负，科道官与翰林院官两项合计占到了53%。也就是说，超半数的受刑官员是言论官，因言获罪。占比名列第二的是六部官员，占24%。^[2]六部负责具体政务运行，六部官员遭受廷杖，应当主要是在具体政务运作中不能顺承君命，逆了龙鳞。中央官因为得罪皇帝直接受责，这是廷杖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行刑的地点在壮丽的宫城殿宇之间。学者考证，廷杖最常用的地点是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虽然《明史·刑法志》说廷杖“不丽于法”，但廷杖其实是有一套特定规矩的，并不是“拖出去就打”。通常，廷杖的程序包括：皇帝下令，司礼监出文，厂卫拿人，锦衣卫行杖。各位以后再去故宫，路过午门，可以驻足几分钟，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日“盛况”。

第三，廷杖的行刑具有强烈的仪式性。“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褰衣，执木棍。”大珰就是宦官，众官就是受刑者的同类。首先要宣读圣旨，“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也就是将受刑人从肩膀到后背捆结实了，另外有一人把受刑者的脚捆起来，这样就不会乱动了。就这样，受刑者从上到下，都被捆好，只露出大腿接受杖刑。行刑者用绳子从四面牵拽固定受刑者。每打之前，必先呼“打”，“每喝，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廷杖的行刑规模，大多数是一两个人，“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这个纪录很快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很多人被

当场打死，打不死的，非得把坏肉剥下来，躺几个月才能痊愈。^[3]政治中的仪式是权力的表达。有学者专门从仪式的角度讨论廷杖，认为它是一种有关“控制”的仪式，其目的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4]我则认为，这种说法真是太客气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只能认为，明朝的皇权太脆弱了。

第四，在当时以皇权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中，廷杖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已经成为明朝的政治传统，不容置疑。

以上是我们粗略总结的明朝廷杖的四大特点：第一，打的是中央官，特别是言论官；第二，行刑地点在辉煌的殿廷；第三，廷杖具有强烈的摄人心魄的仪式感；第四，它是当时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存在。

按照这四个标准衡量，“廷杖之法”的确是明朝的独创。金元皇帝打杀过官员，也不觉得打杀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这么制度化、仪式化。华夏皇帝，东汉明帝、北周宣帝、隋文帝、唐玄宗也打过，唐玄宗甚至有“决杖朝堂”的行为。但是，他们的相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都是被否定的不正当行为。

比如说，隋文帝“……每于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有一次，因为负责打人的人棒子挥舞得不够有力，隋文帝大为光火，“即命斩之”。宰相高颎等人劝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文帝不纳，高颎等以辞职相威胁。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改了，“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5]被唐玄宗宣布“决杖朝堂”的臣子，按记载有三例：洛阳主簿王均，是宰相张嘉贞为了灭口，直接让人将其打死的；秘书监姜皎，三品高官，死在了流放途中；监察御史蒋挺，“决杖朝堂”的诏旨已经下达，遭到了宰相张廷珪的抵制，理由是“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广州都督裴旻犯罪，张嘉贞援用姜皎的例子，劝玄宗对裴旻“决杖朝堂”，张说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刑不上大夫”，因为他们靠近君主；“士可杀不可辱”。从前姜皎得罪，官至三品，而且有功劳，如果犯罪当死就应该直接判死刑，唯独不该当廷羞辱，用对待大兵的态度来对待大臣。按照唐律，勋贵入“八议”之列，普通罪行可以获得刑罚减免。往事不可追，姜皎的事儿也就算了，但是裴旻绝不能再这样羞辱，那就滥了！玄宗本来就对姜皎感到抱歉，于是表示同意。张嘉贞很生气，于是张说对他说了下面的话：“宰相时来则为，非可长保。若贵臣尽杖，正恐吾辈及之渠不为天下士君子地乎？”^[6]意思是说，宰相这高位，运气到了才能当，倘若高级官员都被皇帝打了板子，只怕有一天会打到你我头上啊，为什么不为天下的士大夫考虑考虑呢？



图五五：明 张居正编《帝鉴图说·览图禁杖》

《览图禁杖》与上文的《纵酒妄杀》皆出自明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据《新唐书·刑法志》载，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览《明堂针灸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一天，唐太宗看《明堂针灸图》，内有一图形，说人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系统，皆附贴于脊背，太宗顾虑到打人脊背，则五脏震动，有可能致命，于是下诏，令自即日起不许仗责囚犯脊背。上图呈现了两幅画面：上半部分描绘的或为唐太宗览《明堂针灸图》后，命臣子传旨下去禁止仗背；右下角画面衔接官员在接到皇帝命令后，摆手禁止行刑者仗背的情景；画面中

间以大片云朵在场景上做了隔离。张居正通过《览图禁杖》规劝明神宗向先贤学习为明君之道，既要体恤百姓，又要适当减少杖责，可见其良苦用心。



『不可仗其背』

“刑不上大夫”语出《礼记》，东汉郑玄注曰：“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按照唐代孔颖达的解释，“不与贤者犯法”就是“不许贤者犯法”。士大夫之所以有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资格，是因为他们是贤者，是有道德操守的一群人，尽管士大夫同样会犯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君主要承认并尊重他们集体人格的高尚。因此，即便其中的某些成员发生了犯罪行为，也要本着尊重其集体人格的精神，予以特殊关照，不能像对待普通老百姓那样直接适用普通法律。“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7]张说劝说张嘉贞“为天下士君子地”，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强大的君权面前，“天下士君子”是一个整体，保护“天下士君子”的尊严，为“天下士君子”存体面，就是保留劝谏皇帝、维护江山社稷稳定的力量。

类似于“为天下士君子地”的话，宋朝名臣范仲淹也说过。范仲淹、富弼主持庆历新政，阻力巨大。碰巧高邮知军晁仲约严重违纪，以错误的方式做了一件对辖区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他组织人去慰问了土匪，然后那拨土匪就绕过高邮军去祸害别的地方了。富弼坚决要求杀了晁仲约。范仲淹坚决反对，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8]争论的结果是，范仲淹说服了仁宗皇帝，保住了晁仲约的项上人头，以及宋朝不杀大臣、不杀言事

官的厚道风气。

追寻明朝以前廷杖来源的学者，常常会有人提到宋朝也有“杖”或者“杖杀”的事情。举的四个例子，有一个是北宋太宗朝，“中书令史李知古”受贿，擅自修改刑部所制定的法条，“杖杀之”^[9]，被杖杀的“中书令史”不是官员，是吏，官、吏地位天差地别，做不得数。一个是南宋孝宗朝，“参知政事龚茂良以曾觐从骑不避道，杖之”^[10]，曾觐是孝宗身边的红人，地位不高但是很嚣张，龚茂良是副宰相，按照规矩，龚茂良的仪仗队在大街上走，曾觐的人得让道，可是曾觐的随从竟然不让，于是龚茂良让人打了他（们），龚茂良“杖之”的是官员家仆而非官员本人。这两个都可以排除，跟明朝的廷杖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还有两个，太宗朝“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11]。詹事丞是级别很低的小官，犯了贪污罪，被杖杀。太祖朝，“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12]。宗正卿的级别比詹事丞高，但也不是什么高级官员，赵砺犯的也是贪污罪，在杖刑之后被开除出官僚队伍。这两个例子跟明朝的廷杖也没什么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地说，宋朝没有类似于廷杖的行为，宋朝对大臣最不地道的行为是杀害岳飞。但总体而言，宋朝为士大夫存了体面。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某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必须承认，这跟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人人平等”，正是从某个特权阶层的权利伸张开始的。13世纪初，通过《大宪章》，英国的贵族伸张了自己的权利；17世纪，约翰·洛克宣布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而独立的，拥有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18世纪，洛克的思想被写进美国《独立宣言》，然而《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一开始只是白人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种和女人。黑人的平等权利要到19世纪美国内战以后才用文字写了下来，而跨越性别政治平等观念则要到1920年才出现。

尽管并不同步，传统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化、观念的下移和扩散。从西周的贵族到秦汉的官僚；从东汉的世家大族、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宋朝的科举士大夫；从北宋的精英在中央在政府，到南宋的精英回乡建设地方社会。掌握文化的群体在扩大，文化也随之下移、扩散。中国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出现得格外早，而且稳固，其下没有可与之抗衡的贵族。在这样的专制皇权面前，士大夫这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是格外重要的。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元朝是北狄统治，水平有限，元朝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特殊，不正常，随着蒙古人的离去，他们的影响理应消退。但是明朝不一样，这是一个汉人所建立的“得国之正”远远超过唐宋的王朝，根红苗正。按道理说，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影响都会被视为华夏传统，包括廷杖这样野蛮的东西。

第一个被打的人叫茹太素。洪武九年（1376年）闰九月，“五星紊度，日

月相刑”^[13]，发生了星变，也就是天相的异常，这属于“灾异”。按照华夏传统，灾异发生，乃是上天示警，人间统治出现了缺失，当此之际，应当广开言路。朱元璋于是顺应天心，下诏求直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万言书，指责朱元璋用人不明。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斥责，“杖于朝，以其书示廷臣”。几乎所有人都说茹太素“大不敬”“诽谤圣上”。只有宋濂说了一句实话：“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朱元璋竟然肯听纳，第二天晚上又让人给他读茹太素的万言书，竟然发现了四件可行的事情，于是他愤愤地说，我求直言，是想让他谈现状，这家伙写这么一大篇，把我都弄糊涂了。茹太素说的事情，五百个字不就搞定了吗！于是，朱元璋下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朱元璋怎么会犯错误呢？这个茹太素后来当御史，又犯了错误，跟十二名同事“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14]

廷杖摧毁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廷杖淫威之下，出现了“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15]的大多数，以及不怕死、讲气节的极少数。可即便是后者，对于江山社稷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他们……敢于慷慨陈词；……对于其时之政局并无深入之了解，亦缺乏政治运作之能力，……而且由于他们持道德理想以衡量一切，往往也就混同道德之是非与事理之是非，并无助于问题之正确解决。”^[16]贾宝玉就说：“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17]可惜，这些“须眉浊物”，至今还有很多人把他们当英雄。

孟森先生以清朝与明朝相对照，却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我是学宋史出身，读明史到“廷杖”一节，深为华夏政治文明的堕落而痛惜。孟森先生是前辈大家，执清以观明，竟然看到了“美俗”，我只有徒呼奈何了……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页。

[2]张靖胤：《明代廷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3]参见[清]魏禧：《魏叔子集》，见[清]胡承谱：《续只尘谈》卷上《廷杖故事》。

[4]参见李为香：《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载《求是学刊》01年第3

期，第137—14页。

[5]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二五《刑法志》，中华书局973年版，第73页。

[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传》，中华书局975年版，第4442—4443页。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年版，第54页。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8—499页。

[9]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中华书局985年版，第59页。

[10]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3页。

[1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1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13] [明]薛应旂撰，展龙、耿勇校注：《宪章录校注》卷五《洪武九年丙辰至十年丁巳》，凤凰出版社204年版，第65页。

[14] 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第3787页；卷一三九《茹太素传》，第3987页。

[15] [美]牟复礼著，[英]崔瑞德主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年版，第590页。

[16]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1页。

[17]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1页。

[18] 孟森：《明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

清：盛世的狭隘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清朝的历史是割裂的：1840年以前，按照王朝史的脉络讲“清史”；1840年以后，讲的是中国近代史——清王朝还在，但历史的叙述线索却从一姓统治的盛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兴亡。1840年以前的清史，有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说法。那么，究竟何为“盛世”？谁的“盛世”？又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何种情感在说“盛世”？



图五六：清 魏源《海国图志》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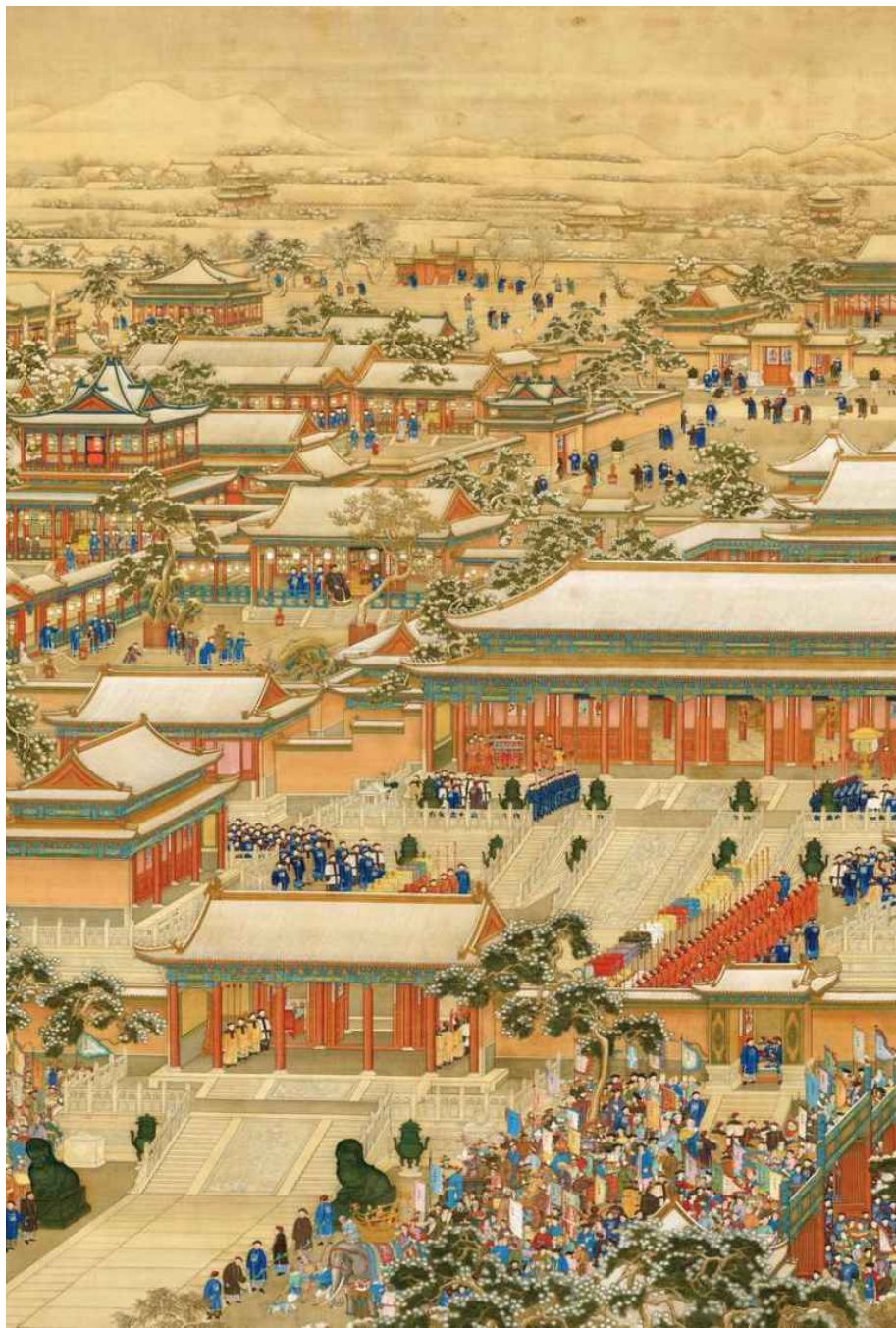
《海国图志》是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于1842年编写的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技和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1841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整理编定了《海国图志》。全书共50卷，系统且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风土人情和科技知识。序言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的技术。《海国图志》的出版开阔了国人眼界，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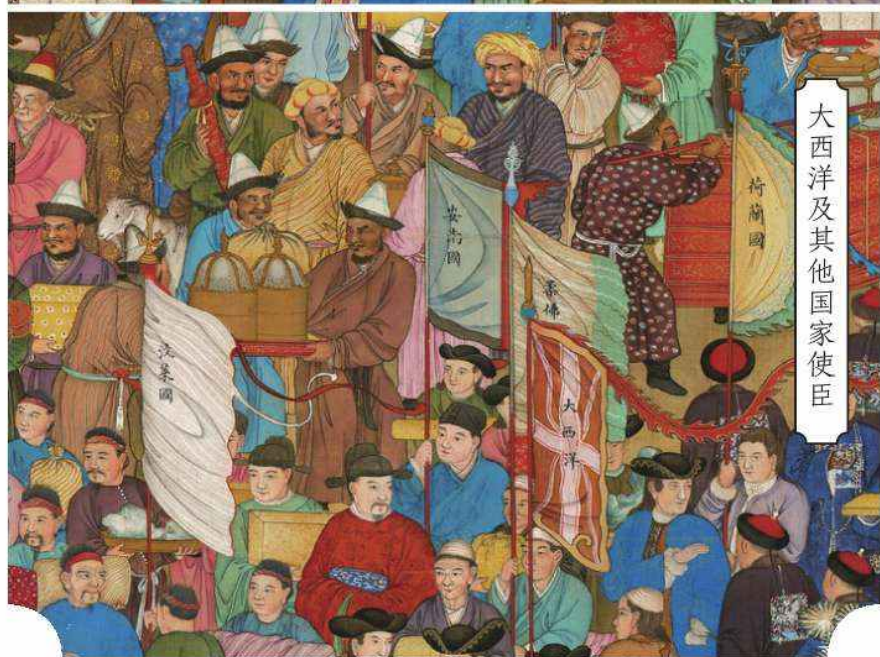
康熙、乾隆两朝都有盛世的自我认知，这两位皇帝的自吹和当时臣下的颂歌，我们就不提了。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开眼向洋第一人”、林则徐的好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魏源特别感慨的是，康、雍、乾三朝“府藏之盛”，也就是国家财政的充盈。魏源说：“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

余年，版輿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魏源的盛世指标包括“府藏”“版輿”“生齿”“四夷宾服”，也就是国家的财力、版图、人口和国家地位四项。后来说“康（雍）乾盛世”者，也基本上是围绕这四项做文章，特别强调康雍乾时期开疆拓土的成绩，强调清朝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之功。这些当然值得肯定。

魏源和大多数“康（雍）乾盛世”论者所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比如魏源所处的时代，清朝刚刚经过鸦片战争，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败于远方夷狄、蕞尔小国。在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之中，魏源所抒发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许。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社会经济是否有活力，士大夫是否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思想文化是否仍具创造力，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下，这些都无关紧要。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把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考虑在内，那么，所谓的“盛世”，不过是满洲统治者的独自狂欢。

放到帝制中国朝代更替的漫长历史中去看，所谓“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一个新的王朝进入稳定统治之后，倘若没有大灾，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繁荣——人口增殖，土地垦辟，国家积累大量财富，皇帝得以开疆拓土，治礼作乐，四夷来朝——“盛世”于是乎在焉。在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之中，所谓“盛世”，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结，是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的一个环节。在地理中国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人们所认可的时间演进的合理方式。因为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见过其他方式。





图五七：清 佚名《万国来朝图》

《万国来朝图》由清代宫廷佚名画家所绘，绢本设色，299厘米×20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描绘的是清乾隆时期，国外使臣与藩属国使者在新年伊始，身着华丽服装，携带奇珍异品，云集在太和门外，等候乾隆皇帝召见的情景。作者以鸟瞰视角，将紫禁城中主要建筑依次呈现，整个画面层次丰富，主次有别，宏伟壮丽。我们看到，画中包含了西方诸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以及众多远道而来的小邦的使臣。为展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乾隆授意宫廷画家绘制了多幅为大清国讴歌颂德的画作。由此，我们对清朝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以傲慢自居的心态可见一斑。

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命运显然不同，在这一段百年盛世的尾声，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伯爵出使清朝，带来了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的结晶，以及希望中国开放市场、改善贸易的请求。乾隆皇帝接受了所有礼物，拒绝了所有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个时候，距离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只隔了不到五十年。鸦片战争让中国成为“中国”，而不再仅仅是清朝，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模式终结，中国被迫加入由西方所开创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切重新开始。

面对历史，后来的人曾经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主发展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旧问题，它的前提是现代文明必然发生。但如果现代文明是偶然的呢？如果它以偶然的方式发生，然后被证明是一种更具竞争力的人类生存方式，从而被其他民族主动或被动地接纳，那么，更现实的提问方式恐怕应该是，当现代文明来到面前时，大清王朝的统治精英为什么没能认出并接纳它？

我们的机会来得真心不晚。1793年，在英国使团赠予乾隆的礼物中，甚至还有英国最大军舰“君主号”的模型，这艘军舰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但是，乾隆说：“天朝抚有四海……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你们的东西，我们不稀罕。这是清朝第一次拒绝现代文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打败俄国，清朝朝野上下莫不以为，日本的胜利“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清政府也承认唯有立宪可以保皇位永固，然而却死活都不肯交出权力，最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进入共和时代。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拒绝现代文明——它贪恋权力，结果丢了天下。

正确的路在哪里，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最终，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那一条，因为他们贪图当下的容易，总是心存侥幸，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规则的无情一无所知，还因为他们自私、贪婪，对人民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如果说明朝政治的坏，坏在朱元璋的偏执，他梦想“以一人而治天下”，最终造成了明朝政治的野蛮和死气沉沉，那么清朝政治的坏，则坏在清朝统治

者的自私和被迫害妄想上，他们总是在担心会遭到颠覆。

同样是外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与元朝统治者对华夏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华夏的历史文化，蒙古人不懂，也不太关心；满洲人懂一点儿，只懂一点儿，却自以为很懂，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了自以为正确的立场。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对统治中国心怀忧惧。随着清朝国力的增强，明朝的防线在不断退缩，“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而皇太极始终持保留态度。他的保留，一方面来自现实，如何统治明朝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清朝完全没有经验。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文化让他们望而生畏；另一方面则来自历史，皇太极是懂一点儿历史的，他知道，五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建立大金，入主中原，可是最终入主中原的那一支女真人，却消失在了华夏的茫茫人海之中。在给明军统帅袁崇焕的信里，皇太极这样说过：我的父亲努尔哈齐认为，当初辽、金、元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非要进入汉地，经过几代之后，都沾染了汉人习俗，（结果都亡了）。因此，我父亲的理想是，让汉人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那个时候皇太极想要的，仍然是明朝对满洲政权的承认，他愿意做辽东的王。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朝的入关、统一中国已经如箭在弦上，然而皇太极还是一刻都没有忘记，“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他曾经对满洲贵族集体训示：朕看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只可惜，熙宗和海陵王完颜亮把这些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全废了，耽于酒色，享乐无度，效法汉人的陋习……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松懈，忘记了骑射，到了哀宗的时候，社稷倾危，国家因此灭亡……我说这番话，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我这儿，怎么可能会变更满洲习俗呢？就怕后世子孙遗忘旧制，荒废骑射，以效汉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会感到担忧。

如果我们从满洲人角度来看，则不得不承认，皇太极有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他认为，满洲政权的存亡系于满洲人的存亡，而满洲人的存亡系于满洲文化的存亡——只有说满语、着满洲衣冠、保持满洲骑射习俗者，方能称其为满洲人。按照皇太极的逻辑，满洲人彻底汉化之时，即满洲国家灭亡之日。皇太极的这套逻辑是从他所认为的金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简单推导出来的，并不反映历史真实，却指导了他自己和此后的清朝政治。皇太极曾经把当时后金政权沿用的汉语官名一律改为满洲话，比如，沈阳改称“盛京”，总兵改称“昂邦章京”，并且规定，“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

殊不知，用这种思想去统治中国，是狭隘而危险的。皇太极对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相较于统治者的族属，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实是政策本身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明

朝的统治已经烂透了，大失民心，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清朝人进来先为崇祯发丧，其实是很得民心的。清军入南京，南明的弘光皇帝被清军抓了当成俘虏，从街上过，“百姓唾骂”。明末江南百姓，饱受重税之苦。清兵一入苏州，苏州士民即相约“具呈本府及总督军门，请减吴郡重赋”。这都是接纳清朝统治的姿态。然而，清朝统治者却颁布剃发令，强行挑战汉族的文化习俗，逼迫江南百姓在个体生命与文化习俗之间做出抉择，瓜熟蒂落的“改朝换代”瞬间转换成野蛮的民族征服，激起了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剃发令大大延缓了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时间。“清兵从入关到进入北京才二十余日，从进入北京后西征打败李自成转而南下取南京，前后时仅一年，但在下南京以后到征服东南、西南统一全国，却历时二十年，而且战争进行得极端残酷，对江南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站在统一战争的角度看，剃发令可以说是“清初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错误”。^[1]但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剃发令却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成为满洲的臣民，而不是满洲被中国淹没。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清朝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清朝。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举一个例子，电影《敦刻尔克》生动地展现了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情景。九天之中，三十四万盟军被撤回了英国本土，保存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民间的船只，包括渔船、客轮、游艇和救生艇。民船在战时可以成为海军力量的补充，这就是正常的逻辑。这种逻辑，中国古代也是承认的，比如说南宋就用民船来协助水师捍御海面。可是清朝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清初统一台湾、重开海禁之后，海疆大臣担心的是什么呢？“水师战船按制度，每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战斗力根本无法保障。“而沿海新造贸易之船，皆轻快牢固，炮械全备，倍于水师战舰。”民船战斗力超过了水师战船，这是由于落后的海军舰只维护制度。那么怎么办呢？改善海军舰船维护制度？怎么可能！清朝的选择是限制民船的吨位、武器装备，甚至食物、淡水的携带量，总之就是要把民船的航海水平往下拉，而不是把战舰的制造维护水平往上提。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政府的头脑中，这些民船都是潜在的反政府力量。清政府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但是明白而敢说话的人太少了，因为皇帝就是那么想的，“欲弥海盗，先严渔船”。

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六百箱礼物来了，为磕头与不磕头的事折腾了一番，又走了。他带来的有关现代文明的消息，“盛世之主”乾隆不屑一顾。英国人从欧洲历史中得到的印象是，“政府应当促进商业”，但在清朝这里，这些一文不值。

[1] 参见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结语 历史并不永远向前

按照时间顺序把本篇内容连缀起来，你会发现，我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

我所采用的衡量帝制时期王朝政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来自秦始皇那个万世一系的梦——凡是有利于本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第二，是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权的稳定与安全。为实现上述目标，王朝政治应当追求：第一，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上，要尽可能防止地方专权，对其他一切机构、群体和个人实行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在政策制定上，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以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第三，在政治运作中，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地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与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

最初的破坏发生在宋朝本身。王安石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政治，增收成了朝廷国家的第一政策诉求。雄才大略的宰相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对于这种变化，司马光痛心疾首，却没有能力改变。在司马光身后，士大夫集团走向恶性分裂，皇权膨胀，腐败加剧。到了南宋，朝廷国家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财

政支出持续走高，理财之臣得到重用，皇帝与权相结合，继续挤压普通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官僚的工具性不断增强。

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尽管那一段历史转折通常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真正的转折动力其实来自神宗皇帝——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以证明他本人及其血统的光荣与正确。当皇帝决心冲破制度与传统的约束，唯一能够阻挡他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然而，总会有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我不否认王安石有属于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当他把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就已经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当然，哪怕到了南宋，华夏政治文化中一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实践上不断背离，但是在理论上，这些原则性共识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底线。

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包括三点。第一，“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共同构成“江山社稷”，皇帝与朝廷国家承认并尊重“江山社稷”的整体性，承认朝廷国家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二，“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认并尊重士大夫的集体人格，承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力，不以“政统”而灭“道统”。第三，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

金元以来，北方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开始遭到破坏。金朝皇帝挥舞鞭杖，对待官僚如同对待奴仆。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大中国的统一，对帝制中国的版图，以及境内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有开拓之功；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却发生了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

元太祖真像



图五八：清 姚文翰《元太祖真像》

《元太祖真像》出自清代画家姚文翰奉敕所绘的《历代帝王真像》，该画集共44帧，绘就于乾隆五十三年，绢本。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蒙古帝国可汗，号称“成吉思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大聚会，建立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统率下，蒙古先后攻金灭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持续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打通了亚洲和欧洲的陆路交通，为元朝的建立做好了奠基工作。他虽然军事才能极为卓越，但其征战带有野蛮与残暴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征服地的居民和毁灭征服的城镇，具有极大破坏性。元朝建立，成吉思汗被追加庙号为太祖。

从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等于否定了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之间存在整体利益，天下苍生彻底沦为蒙古贵族奴役、剥削、压榨的对象。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元朝国家不可能再费心寻找和维持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宋朝的君臣关系之中，君臣人格平等，臣子依靠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可以获得引导、劝谏皇帝的权力；在元朝的主奴关系中，奴婢对主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侍的责任，绝无批评的可能。传统君臣关系从“君臣”到“主奴”的变异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通过批评约束皇权的基础。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

接下来，明太祖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政治。这个安全感极度匮乏的皇帝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他用野蛮的廷杖击碎了士大夫的集体尊严，又剥夺了他们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禄相诱惑，最终把士大夫变成了驯服的工具，“忠君”变成了单方面的绝对服从。皇权无限膨胀，继而走向专制，臣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无用”与“下流无耻”交相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专事私利，道德虚伪化，政治空心化。

到最后，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与臣子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来强化忠诚。朝廷国家看老百姓永远像在看可能的反贼，当他们意识到民船的运力和武器装备可能会超过水师战船，第一反应是拆毁民船，限制其发展。而在南宋，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对民船运力的合理利用。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华夏政治传统中的原则性共识荡然无存，或者说名存实亡。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更为虚伪、更为野蛮的政治文化。而这就是中国在迈入近代门槛之时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慈禧太后会用海军经费来修颐和园，在这个政治文化当中，是一点儿都不稀奇的，因为这个老妇人缺乏“江山社稷”的基本概念。

以上就是我讲的有关倒退的故事。讲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感到沮丧。在沮丧中，我列出了一些有待思考的问题，比如：明、清的长期稳定统治究竟是靠什么延续的？是专制的效率，还是制度的作用？又或者说当一定疆域内的文化整合完成之后，它自身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比如：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幼稚病，对异议缺乏包容，对抗争缺乏耐受？这些问题我暂无答案，请大家一起思考。

当然，在这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当中，还是存在积极成分的，那便是我们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绝不只有金元明清一个面相，还有宋朝那种最好的状态，尽管脆弱，但毕竟曾经存在。

外篇 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

写作缘起与延伸阅读

本书的写作，始于我为喜马拉雅FM所做的音频讲座“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后文简称“冬梅讲国史”）。2018年6月开讲，7月，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我平生最得意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不追趋，不攀附。一本书写七八年，一篇论文写完了搁在电脑里两三年，这是我的风格。而喜马拉雅的节目节奏太快了，而且我在后台还能看见“今天卖了几份”——“结庐在人境”的五柳先生在集市上摆摊卖菊花，也难免患得患失。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然而，停又停不得。“欢然酌春酒”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它当作“我的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就当读者是老师与同学，我读书，做笔记，跟老师与同学分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岂不快哉！说服自己后，我便愉快地做完了喜马拉雅的节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即为本书草稿。

不到一年成四十万字，速度的背后是学史三十年、教书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北大中国古代史“分邦建国”的方式是按断代来的。比如我，专业领域是宋史，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一路写下来，始终在960年至1279年之间打转。当然，教书就不能只教宋史了，我校的“中国古代史”课，以隋朝为界，分上、下两段，宋史方向的老师教后半段，从隋一直到1840年以前；“中国史学史”则是由一个老师从先秦教到清。我留校的时候，“只有博士才能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为硬性规定。教书需要“通人”，知识面应当宽；而“博士”其实是小领域专家。博士教书，这才开始“读书”——之前只是“作论文”。相较于“作论文”，读书是散漫而快乐的，像是林中漫步；唯一的毛病是没效率，除了增加讲课的自由度和自信度，几乎没有任何产出。我就这样读了十几年，直到遇到“冬梅讲国史”，有了外在约束，才开始写起来。

读书人挟问题向他人的研究寻求答案，在阅读中实现与其他研究者的知识和思想交流，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形诸笔端，就是我所说的读书笔记。如果说“作论文”的要义是与史料直接对话，那么，读书笔记的要义则是广泛求教于他人。毫无疑问，读书笔记一定带有读书人的主观性。主观性在任何写作都无法避开的，因为是人在写。我唯一能做的，是诚实分享所见，期待平等讨论，和更多的读书人一起探寻有关过去的真理。我始终相信，一本好书，应该启发而不是终结思考。

此外，我已在内文脚注部分提供了文内引文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缘

溪行”，说不定会误入哪个桃源新世界。当然，脚注中所提到的论文和著作只是我所读过的很小的一部分。为方便外行读者继续深入，我将提供一个“私房推荐书目”和“八部论著解读”。“私房书目”和“八部解读”的选择，都出自主观。该书目的选取，力图覆盖所有断代，以便读者自行补给，建立自己的通史观；但不求面面俱到，只选我读过的“好的历史著作”。其标准，可以参照杨奎松先生的说法：“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帝制时期中国史”私房推荐书目

我提供的这个书目，其特点是“私房”，且无意声称任何权威性。我参考了张帆、叶炜、党宝海三位同事给历史初学者的书目，并根据所筛选书目的特点，对部分书籍做了简单介绍。对三位学者的慷慨，我不胜感激。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7年插图版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

中华书局，2011年版

此书为作者的秦汉史论文集。书中围绕皇帝的内容，包括三篇综论：《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秦汉皇帝与“圣人”》《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东汉光武帝与封禅》三篇具体研究。作者自述：“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是我长久关注的主要课题。”而这本书有关社会的内容，则颇为生动有趣。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中华书局，1993年版、2004年版、2011年版

此书为作者的秦汉魏晋政治史论文集。作者聚焦于重大转折、重要人物和主要政治势力，主要议题有《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论轮台诏》《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北府兵始末》《论东晋门阀政治》等。胜义纷呈，精彩连连。比如《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深刻揭示了秦末历史的复杂性——武装反秦势力以楚为最，故陈涉首义，必以“张楚”为号。“张楚”引发诸侯竞起，战国之势重现，“帝业回归于王业”，又有倒车之虞。如何“再造帝业”，化秦为汉，遂成新的历史课题。通常被一带而过的秦汉之际由此展现出“历史关头”的真实意义。马王堆帛书、《史记》和《汉书》对“张楚”地位的不同处理，仕秦的楚公子昌平君、昌文君的易帜反秦，在田先生笔下，豁然得显。前辈史家的钩沉索隐之力、烛微察远之

功，令人赞叹。

李开元：《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如作者所声明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常规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大胆的历史推理作品”。作者主张“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推想”二字，以及“说十分话”的主张，我都不敢苟同，怕给后来者错误的引导。当然，像李老师这样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功底扎实的成熟学者，“推想”一下，多说几分话，文字又写得漂亮，我则乐见。“谁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有始皇后吗？”这样的问题，问一问，想一想，蛛丝马迹，雪泥鸿爪，颇为有趣。

顺便推荐李老师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这是一本“规范内”的著作。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中华书局，2011年版

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两汉政治史，线索清晰，观点明确，内容翔实。这本书的主题是围绕两汉时期巩固帝业所展开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战国以至秦末，东西发展不平衡，秦的核心区域——关中占据政治、军事优势，关东占据文化优势。汉初“承秦”，“再建帝业”，同时承认差异，清静无为，“东西异制”。武帝尊儒更化，采纳《春秋公羊传》的“以德化民”说，援儒入法，以关东文化改造关中制度，开启了文化整合的伟大事业，东西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这一过程被武帝的开拓战争所打断，“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制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抬头。宣帝以后，朝廷政策重心重归内政，《春秋穀梁传》之学大盛，主张“以礼为治”，出现托古改制运动。其后，以《左氏春秋》为核心的古文学兴起，壮大了改制运动的理论基础。王莽托古改制，遭遇惨败，证明“以礼为治”之路不通。东汉定都洛阳，跳出西汉格局，进一步摆脱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束缚，公羊家“以德化民”的主张悄然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一套以“太平”为理想、以“礼法”为手段的教化理论。书名中的“汉道”指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春秋》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亦是“汉道”的重要理论依据。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魏晋至唐五代这七百多年间社会经济（人口分布、土地占有、商品经济、赋役制度）、阶级结构（士族门阀、科举官僚）、武装力量的补充方式（士家制、府兵制、募兵制）和学术思想（玄学、经学）的变化，最核心的观点是“唐朝的南朝化”——东晋南北分裂，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南方直接继承汉末魏晋传统，北方受到少数民族影响，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和对东晋南朝的衔接，即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绝非偶然，乃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

解题：“封建制的实质就是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对佃农进行地租剥削，和地主对佃农具有一定的人身占有关系，这些就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形态特征。”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该书主要讲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前，以平城为政治中心的北魏政治史。是一部创见迭出的精心结撰之作，以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上海书店，2004年版

这本书讲述的是北齐至中唐（截至宪宗朝）时期的政治史。按照作者所认同的历史分期理论，此期为“从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此后唐、宋两朝可以说是进入了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此种封建地主制社会在世界上似为我国所独有”，宋代的文明成就是“封建地主制”的产物。具体而言，唐代政治史是该书主体，北齐是唐代在发展方向上的前驱。作者以“中央权力争夺”和“如何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作为唐代政治史的两条线索，按照时间顺序对重要事件、人物和制度做了梳理和解释，对包括陈寅恪等前辈学者在内的不同说法做了辨析。作者所持之“对有学问的人是既尊重而又不迷信”的态度，值得学习。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本书就宋哲宗、宋徽宗两朝政治进行研究，围绕“士大夫政治”主题，探寻政治理想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

[美] 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这本书揭示了南宋异于北宋的特殊性，以及南宋在后世中国的延续性，试图从文化视角解释中国未曾走向现代的原因。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中华书局，2014年版

这是一本让宋代城市研究超越《东京梦华录》的作品。书中更加真实地展示了宋代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挑战与应对。书名虽略显平庸，但内容扎实，富于创见。

朱刚：《苏轼十讲》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到目前为止，了解苏轼最好的书，即为《苏轼十讲》。学历史的人看文学史研究，最尴尬的是看不到历史。该书既有历史场景的人物与事件，又有相关作品的分析，内容充实而好看。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中华书局，2007年版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本书分为七章，主要包括《皇权之不受制约与谏臣之传统心态》《思想家之拯世情怀》《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的士人》《改革者之拯世情怀》《心学另类之人生悲剧》《自我回归之适意与迷惘》《末世拯救者希望之失落》。各章选取代表性士人，做个案分析，比如，“谏臣”章讲述韩邦奇、杨爵、杨继盛、沈炼的故事，“入仕与世俗之间”说文徵明、唐寅、祝

枝山，“改革者”说高拱、张居正。失去制约的皇权傲慢专制，肆意践踏士人尊严，构成时代的底色；谏臣、思想家、改革者仍然保留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然而世道已变，终归是一场空。

这本书故事生动，分析鞭辟入里，“史家常以一种极崇敬之心情，论晚明士人之气节。……末世气象，意气易于发泄，士之内心，亦往往易于显露。气节之士固有之，而宵小之徒亦所在多有……且人数之多，足可令人惊心，而叹有士之无耻如是！此一时段实为了解士人传统性格优点与弱点之最佳研究样本”。末世拯世者“对于其时之政局并无深入之了解，亦缺乏政治运作之能力，因之他们之种种努力，并无切实之收效。而且由于他们持道德理想以衡量一切，往往也就混同道德之是非与事理之是非，并无助于问题之正确解决。……毕竟是书生！……”

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这本书也是论文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论蒙元王朝的皇权》一篇，揭示蒙古人主奴关系对华夏政治伦理的影响，充满了思想的创造力。后来的很多有关帝制时期君臣关系变迁的论述，都多多少少地受到这一篇的影响，包括这本书。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此书为作者的论文集。内容聚焦明清易代前后的东北战局、清兵入关、蒙清关系、陈圆圆本事、李岩存没、李自成下落、毛文龙之死、剃发令等问题，论从史出，实事求是，新见迭出，正如作者所言：“书中偶与前贤所见相同者并非苟同，而大异者亦非矜奇立异，均为笔者经过一番苦心研究所得之独立见解。”

曹雨：《中国食辣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

这是一部历史社会学科普著作。作者以翔实材料揭示了自明后期以至当下，辣椒在中国人味觉世界里攻城略地的过程。小册子，大文章，文字生动有趣，观点鲜明动人。

八部论著解读

下面这八部作品在学术界有着相当的公认度，但此处为什么选择这八部，而不是其他？这只是我的读书的一个主观选择。这其中有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巨大的，有我认为堪为某一方面楷模的，有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下列各篇按照所研究朝代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布并不均匀，本书下篇中用力较少的清朝有三篇，或可补其不足。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8年重印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是首次正面定义了“宰相”，从而使得“宰相制度”成为一个有着清晰边界、可以进行严肃学术讨论的现代史学议题。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个人人都“大概”知道，但从来没有谁加以定义的概念。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这样说：“自魏晋以来，宰相……无有常官。”怎么可能呢？正史职官志提到宰相的时候，通常会说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体的任职规定就没有了。而祝先生则明确提出，宰相必须同时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祝先生引用《后汉书·陈忠传》的记载，说“议政权”就是“入则参对而议政事”，按制度享有进宫谒见皇帝，共议国家大事的权利；而“监督百官执行权”则是“出则监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说“经过皇帝与宰相商议，形成决定之后，还得由宰相监督百官执行。这里包括百官执行后的考课，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赏罚等”（第5页）。祝先生对“宰相”的定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我讲宰相制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因为内阁和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没有稳定地获得监督百官的执行权，只有议政权。

这本书学术贡献的第二点是根据“宰相”的定义明确指出，两汉的宰相“始终是三公”，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始终是尚书令、仆射或录尚书事”。（第6页）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但在这里恰恰是不便展开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

这本书的第三点学术贡献，论述了皇帝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发展壮大，是逐步转化成新宰相机构并取代旧宰相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第364页）汉代的尚书，本来设于宫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询，参与议政；到魏晋南北朝，便演变成宰相，取代了原来的宰相——三公。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一次取代宰相。尚书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边又出现了新的秘书咨询机构，这就是门下和中书，“到隋唐，门下、中书长官也演变成为宰相，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取代尚书省，而是‘并相’”。（第364页）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二次取代宰相。

这本书的研究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换代的过程仍在继续。唐五代新出现的两套秘书咨询机构，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枢密院。翰林院以起草文书为主，实用性较强，因而在入宋之后继续保留了秘书咨询的功能；枢密院参掌机务，是五代皇帝赖以处理军机要务的主要帮手，入宋之后演变成为外朝军政首长，与原有的宰相机构——中书

——对掌文武大政。中书和枢密院合称“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务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机构群。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种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机构“迭代”的历史现象？或者说，宰相机构“迭代”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认为）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第13页）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是片面强调对立冲突的历史观，它倾向于把君和相看作利益冲突、信任缺乏、恒处于权力竞争之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历史观基本上主宰了我们的历史书写，也高度影响了受此历史书写教育的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说很少看到关系中双方互相依存、利益与共、和谐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认为，这种片面强调君相对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变化发展的本质”。（第13页）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底，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既有的宰相制度）。”（第17页）相对于传统的“君相矛盾对立说”，祝先生的解释更强调君相配合谋求有效统治的一面，可以称为“君相协调合作说”。“君相协调合作说”抓住了君相关系的本质，提供了认识君相关系和宰相制度发展动力的新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更为符合真实的温和而理性的历史观。这是祝先生这本书的第四个学术贡献。

这种历史观的掉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祝先生这本书，是从他老人家所讲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扩充而来的。（第367页）我大概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上初次听到这些观点的，当时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原来君主和宰相之间关系的主调竟然是协调统一的，这怎么可以呢？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仔细想一想，好像这才是事情应有的真实面貌——保障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统治机器的运行平稳，是包括帝制国家在内的任何正常国家的要求。倘若国家机器之中，两个最高级别的权力主体——皇帝和宰相之间关系的常态是相互冲突和斗争的，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平稳运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国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衡各方利益，对一切政事做出最后决断；而帝位世袭，选择余地极小，因此，绝大多数皇帝都是中才、下才。这样一来，宰相的设置就成为必需的。宰相通过“尚贤使能”的选拔制度产生，是资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弥补、调剂、平衡”君主世袭的缺陷，“从而保证整个统治的质量和效率”。（第14

页)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为皇帝的臣子、国家的官员、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获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当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宰相都是积极辅佐皇帝的,尽管有的力有不逮,有的(跟皇帝一起)走错了方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基本面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

既然如此,皇帝不断提高自己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的作用,并且最终造成了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取代旧宰相成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我的历史学的解题思路。比如说,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作为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就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战争不断,各地(特别是边地)统治不很稳定,形势迫使皇帝‘政自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决定”。(第16页)曹操雄才大略,做决定是没有问题的,秘书只负责起草文书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儿子和孙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会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边人。中书的作用就从单纯起草文书的秘书开始向提供咨询谋议发展,权力不断伸张。简单地说,“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胜任,正是中书监、令(中书机构的长官)权力得以膨胀的最基本原因”。(第319页)

祝先生的书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朴实的道理,比如中书的来源是汉武帝时期的中尚书,顾名思义,是用中人(宦官)来充当尚书往来奏事。汉武帝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为汉武帝的活动范围更多地转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宫区域,这个区域,虽然在当时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权,只能老实地跑腿传信。这样的论述非常平实,就是大白话,人之常情,可是像这样常识性的东西,在现在的学术性文字中却变得越来越稀罕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希望这个新时代是一个进一步回归常识的时代。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91年版、1996年版、2005年版

这是一部以特殊线索贯穿起来的东晋政治史。它起于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称帝，重建司马氏政权，止于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立刘宋政权，基本囊括了这一百零四年间中国南方政权东晋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兴衰沉浮。这段历史的核心线索就是“门阀政治”。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于此的孙吴不是，后来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自序第1页）也就是说，门阀政治与东晋政权相始终，自东晋始，在东晋终。

那么，什么叫作“士族”呢？士族出现在魏晋时期，“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第324页）属于这一阶层的家族，其子弟天生享有按家族门第高下以不同的起家官职进入仕途的特权。当然，家族门第赋予个人的只是一张入场券，它所决定的是一个人仕途发展的起点，至于这个人能发展成什么样，还要看能力，看运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族不同于封建贵族，他们仍然是皇帝的官僚。士族是皇帝赖以统治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士族掌握着思想文化。士族之外的普通良民称为“庶族”，士族与庶族之间不通婚。这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阶层，进入隋唐以后又“历史地消亡”了——首先失去的是政治权力，然后是进入仕途的特权，最后剩下一点承自祖先的惨淡荣光，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虚弱骄傲。到唐代后期，经过黄巢大起义的涤荡，这一阶层基本上烟消云散。当然，这都是后话。

东晋时期的士族正处于其巅峰期，以五大家族为首的士族中的高门和司马氏的皇帝，共同掌握着东晋的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在司马氏皇族与高门士族的相爱相杀之中，在高门士族内部各大家族的竞争之中，东晋政权抵御了北方胡族政权的军事压力，跌跌撞撞、摇摇摆摆地度过了艰难的一百年。决定东晋政治走向的，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司马氏皇权，第二是高门士族，第三是流民武装。流民指的是那些避乱南来的低级士族和普通老百姓，他们被迫滞留于长江以北，身负国仇家恨，又处于最前线，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流民的首领被称为“流民帅”。大家都熟悉的“闻鸡起舞”的祖逖就是一个流民帅。他率领“亲党数百家”南奔，曾经一度过江，居于京口，但最终还是被东晋政府赶回了淮北。祖逖中流击楫，发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情节，就发生在受命北归的路上。东晋政府给了他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头衔，但是一兵一卒、一杆枪、一副铠甲都没给他。像祖逖这样的流民帅和他们所率领的流民武

装，是东晋政权的外围，当高门大族和皇权发生争斗时，他们是东晋政权“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第47页）正常情况下，三者的关系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第343页）司马氏皇权虚弱，不绝如线；士族门阀居于舞台中央，是最耀目的一群，虽内争不断，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掌握着政权的方向；流民帅在舞台边缘，像工具一样为人所用，没有自己的方向。然而事态演变的最终结果却是：士族近亲繁殖、人才凋零，渐见衰朽；流民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发现自我，踢开司马氏皇帝，取而代之。东晋结束，历史进入南朝；门阀政治终结，皇权政治恢复。

这就是田先生所描述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大致轮廓。

风流水转，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先后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琅琊、颍川等，指的是这些家族的籍贯。琅琊王氏就是出身琅琊郡的王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包括女性都清清楚楚地录在家谱之中。家谱的用途，一方面是政府在录用和选拔官员的时候用它来辨别出身，另一方面是士族之间结婚的时候来判定门户是否相当。在这个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家谱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东晋门阀政治以琅琊王氏开端，以太原王氏收尾，简直把“王与马，共天下”的奥义发挥到了极致。（第254页）而“王与马，共天下”的本意，说的是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皇权的相维共生关系。“王”指琅琊王氏，“马”指的是司马氏。西晋灭亡之后，在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的辅助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在江南延续了西晋的皇统。王导居中辅政为丞相，王敦统兵在外为都督。六百年之后，宋太祖说：“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帝的独尊地位不容挑战。然而，在正月初一的大朝会上，司马睿以皇帝之尊，竟然“引王丞相登御床”，要跟王导共享至尊宝座，“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第3页）司马睿这种反常的“大方”表明，司马氏皇帝与琅琊王氏之间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关系不同。司马氏皇权已沦为“门阀士族政治的装饰品”，“皇帝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第26页）当然，士族之中，哪一家、哪一个人想要推翻司马氏的皇权，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牵制，由此维持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态平衡。琅琊王氏在外掌兵的王敦发兵谋逆，正是借助流民武装的力量才得以平定。而流民帅代表出身的郗鉴也因此立了大功，实现了地位的提升，跻身江左门阀政治之中，他的家族高平郗氏也逐步上升为第一流士族。（第52页）郗鉴所采取的发展策略，是谋求大局的稳定——一方面固守京口，固守流民武装势力；一方面积极支持王导，其表现之一就是与王家结成儿女亲家。成语“东床快婿”说的就是郗鉴要在王家儿郎中选女婿，王导让他“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选中的就是那个袒腹坐东床，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的王羲之。（第61页）

士族门阀家族地位的维系，需要人才辈出，出将入相都得有自家儿郎。王敦死后，王导地位如日中天，然而王家兄弟子侄死丧殆尽，已无力支撑家族门户。在这种背景下，颍川庾氏的庾亮对王导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幸赖郗鉴维护，琅琊王氏才得以保全。不久，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过世。

（第72页）在颍川庾氏之后进入舞台中央的是谯国桓氏的桓温，桓温势力的发展遭遇了来自其他士族的阻力，并不顺利。换句话说，各大家族之间力量的对比出现了短暂的均势。这种均势带来了二十几年难得的安定局面。永和九年（353年）春，王羲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写下了一段风流佳话。但是，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永和名士，在书法以外的历史评价并不高。同样是谈玄，他们跟玄学前辈相比，在学理上没有创造，而且多半言行不符，嘴里说的是归隐，心里想的却是做官敛财。（第174页）玄谈是获得士族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这也是门阀政治的一个特点。尽管当时人有名教与玄学“将无同”的说法，但是，只讲儒学是不受欢迎的。儒学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它的主旨是尊君的，这与士族门阀追求家族利益的目标不相吻合。在这一阶段，儒学是皇权和士族门阀争斗的工具。

另一个斗争工具是北伐。掌握军政大权的士族门阀北伐或者声称北伐的真实目的，往往是争夺军事重地，实现势力范围的调整与整合，以及打击政敌。桓温三次北伐，前两次获胜，声望大增，地盘未改。第三次北伐败于枋头，望实俱损，（第183页）然而却趁机取得了徐州和豫州，扫清了进入首都建康的障碍，得以控制中枢政局，但是也没力气实现改朝换代了。桓温废了东晋的海西公，另立简文帝；简文帝死，孝武帝立。这本来是桓温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却被几家士族作梗，不得如意，郁郁而终。（第192页）桓温死后，陈郡谢氏接棒与司马家共天下。谢安执掌中枢政局，又利用抵御前秦入侵的机会，任命侄子谢玄出镇广陵。谢玄在广陵重组流民武装北府兵。淝水之战中，谢安在石头城下棋，故作悠闲，知“小儿辈已破贼”，激动得把木屐的齿都撞掉了。这时候，谢家的势力、声望、功业都如日中天。然而，随着敌情的解除，皇室和士族对谢家的猜忌也越加明显。谢安功高不赏，不久去世，谢玄也因北伐失利和身体原因离开广陵，第二年去世。谢氏门户由盛转衰。

太原王氏最后一个登场，但是，太原王氏既无兵权，也“没有足为时局所重的人物”，所以，“只能是依附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不合，各自支持太原王氏的一支，分据荆州和广陵，昏君、乱臣两位司马氏的斗争演变为两位太原王氏的军事势力争夺，占据广陵的王恭被杀之后，流民武装北府兵落入将门出身的下等士族刘牢之之手。谯国桓氏桓温的儿子桓玄趁乱起兵，消灭了一切对手，篡晋立楚。最终，桓玄又被刘裕击败，这一仗“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胜

利”。“终于要导致朝代异姓和易制。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企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现。”（第286页）刘裕造宋，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当然，此时距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士族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消失，还需要很长时间。这就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内容简介。田先生还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了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的理论，辨析了南北战争在不同阶段的性质判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检读。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2014年修订版

这部书的书名是主副结构，副书名“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表明“北宋前期政治”是这本书的研究和叙述对象，而主书名“祖宗之法”则是作者对“北宋前期政治”核心内容的提炼。北宋前期指的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和仁宗朝的前期，具体的时间起点是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改周为宋，结点是1033年刘太后辞世，宋仁宗亲政。作者认为，这七十三年间的北宋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祖宗之法”的确立。“祖宗之法”从此成为贯穿两宋历史的“纽结”，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宋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离开对‘祖宗之法’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难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

（第9页）

那么，什么是“祖宗之法”呢？“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一动态积累而成、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第9页）“核心精神明确稳定”与“涉及面宽泛”是“祖宗之法”的两大特点。“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聚焦内政，一切制度设施服务于政权的稳定和皇权的安全。“祖宗之法”包括限制宗室、外戚、宦官权力，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言事臣僚，提倡“忠义”气节，后宫皇族谐睦俭约等令宋人自豪、后人称赞的正面内容，以及相当多的负面内容，比如过度重视内政、防范武装力量危害政权稳定造成的国势不振，过度强调制约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等等，负面内容的丰富程度丝毫不亚于正面内容。“在宋代，信守‘祖宗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第13页）而“涉及面宽泛”则使得政治立场完全对立的双方都可以高举“祖宗之法”的大旗，在特定的问题上，可以出现“一个祖宗，各自界说”的现象。但是，总体而言，“祖宗之法”有其公认的精神内核，它是务实应变的，稳定至上是“祖宗之法”的中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开国之初宋廷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政治的基调相对稳定宽容。“宋朝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拘谨内缩。”（各项具体的制度建设）“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第521页）“立纲纪”与“召和气”是“祖宗之法”的一体两面。“‘立纲纪’强调实施王朝的规矩、法度；‘召和气’则是指顺应天地阴阳之交感，展布万物发生、和睦融洽的氛围。”（第525页）其中，既包括君臣之间的“和气”，也包括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和气”。通俗地说，就是朝廷国家致力于建设一个上下尊卑秩序井然而又和谐安宁的宋朝社会。“祖宗之法”强调的是赵宋列

祖列宗的所作所为可为本朝后世之轨范，然而列祖列宗不是时时事事都足以子孙后代效法的。负责对列祖列宗的事迹进行选择、阐释，塑造祖宗形象的，是宋朝新崛起的士大夫群体，也就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学者官僚，因此，“祖宗之法”其实是新兴的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开启了一种新的更为理性的儒家施政方式，或者说，“祖宗之法”使得北宋登上了儒家政治的新高峰。

那么，“祖宗之法”是怎样形成的呢？“祖宗之法”“动态积累而成”的过程，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讲宋初故事，必须从五代说起。

从高处逆流而上鸟瞰完成时的历史，则宋初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朝代的开端，五代是极乱之世，二者可以截然分开；然而，如果沿着时间的河流顺流而下观察的话，那么，就如同作者所说，“自唐朝末年终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时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北宋的政治局面，正是从五代‘走出’来的”。（第78页）五代既是“礼坏乐崩”，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也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第79页）这一时期，首先是民族关系的整合，在北方新崛起的强大的契丹族政权的压迫之下，五代境内，胡汉之间畛域消融，曾经困扰唐王朝的番兵番将不再成为问题。

从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后梁开始，便开启了一种“从军阀到君主”的上升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中央建立了相对于地方的绝对兵力优势。凭借这种兵力优势，五代中央开始了收兵权的举动，并且进一步建设更为强大的禁军；于是又出现了禁军将领“黄袍加身”篡夺帝位的改朝换代新模式。宋朝的建立就是这种模式的再度成功。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是解除老将对禁军的管理权，这才是“杯酒释兵权”的核心内容。那些被解除了禁军军权的老将很多都是到地方上去做了节度使的。收藩镇兵权是第二步的举措，派出文官担任知州，再派个人去当通判看着知州，这都是宋朝的制度创造。在武装力量的管理上，宋朝延续了五代收兵权的大趋势，并且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把兵权这把双刃剑牢牢地用剑鞘收好，妥妥地管理起来。晚唐五代曾经飞扬跋扈的武人就这样被纳入了宋朝“祖宗之法”的管束之中。

文臣群体则在五代时期经历了一场“再造”。唐末，讲究“士家流品”与科举出身的旧文臣以清流自诩，实际上却百无一用——对典章制度知之甚少，不是称职的文化遗产者；又没有行政能力，对变迁的时代毫无贡献，“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905年，军阀朱温在白马驿杀害宰相裴枢、独孤损等七名唐朝高官，“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第110页）此后这一类出身高贵的文官仍然可以担任宰相，但是这乱世宰相府在政治

中却已经靠边站。五代时期，一种新型的文臣崛起，这种新文臣的特点是能干，或者善于起草通俗而不失体面的文书政令，或者善于使用筹算调度军需。总之，他们有符合时代需要的实际才干，因而受到军阀和军阀出身的君主的重用，可是这些人的儒学修养不行。新旧两种文臣的“角色素质在碰撞中融通”，“其边际不断模糊化”。（第143页）总体而言，“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同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第147页）“这一阶段又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动乱之中，斯文不绝如缕”，（第140页）为宋朝的文治打下了基础。

宋太祖所依靠的文臣群体就这样从五代走来，正如朱熹所说，“国初人才，是五代时已生得了”。（第148页）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为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首先全盘留用了后周的宰相班底，后来才慢慢换上自己的亲信赵普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中书（宰相机构）被重新赋予了总领行政事务的职责，宰相成为政务领导，而不是决策的主导。（第214页）原本由皇帝亲信掌管的枢密院交出了一部分权力，成为专职国家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中书与枢密院构成宋朝国家的中枢机构，合称“二府”。二府按照职能分工，各自对皇帝负责。一般情况下，皇帝先后分别与中书、枢密院举行工作会议，中书不管军事，枢密院不管民政，二府互不相干，各自对皇帝负责，只有皇帝掌握全部的信息和权柄。宋朝的财政机构三司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宋朝的三权分立，民政、军事与财政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掌管，各自向皇帝负责。皇帝的责任更重，权力更大。

宋太祖时期，出现了“废坐论之礼”事件。之前，宰相跟皇帝开办公会的时候，是坐下来慢慢聊的。宋太祖把宰相的座位撤了，改成皇帝坐着，宰相站着说事。为什么？之前的解释通常强调这是君臣关系的一次大调整，君更尊，臣更卑。作者则指出，“有宋一代，文臣地位并非卑微。作为文臣政治领袖的宰相，在殿廷进对时不再命坐、赐茶，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得从容’（没办法悠闲聊天）。这种状况，显然与其职责重心的演变直接相关……”（第221页）宋朝的宰相“是皇帝推行政令的组织首脑”，（第222页）宰相面见皇帝时，要讨论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喝着茶慢慢聊。

宋太祖说过“欲武人读书”，又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宋太祖就已经把“事业付之书生”了呢？作者细致考察了宋太祖说话的具体情景，并指出，一方面，北宋初年确实承接五代以来的风气流转，越来越重视文臣，但是另一方面，“宋太祖对文臣的宽和，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源于他对控御‘书生’的自信，源于他相对于‘书生’们的居高临下感觉”。（第167页）

“最终将宋代的立国之法明确引导归结至‘防弊’二字之上的，应该说是宋太

宗。”关于宋太宗的即位，我是倾向于认定是他谋杀太祖的。邓老师没有正面理会这桩谋杀案，她的关注点在宋太祖死后“突然空出的帝位之上”，从而看到了太宗对宋朝政治传统确立的独特贡献。跟太祖的儿子相比，他更有政治经验，太宗“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后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他……继承了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使得整个王朝的命运趋于明朗，赵宋的政治局面有了稳定发展的更为切实的保证”。（第258页）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论断。太宗将施政的重心彻底转向了内政，他更加重视官员操检和社会风尚。（第275页）

第三个皇帝真宗时期，首次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总结概括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并将其奉为治国理事的圭臬。而提出这一政治创意的，是杰出的士大夫们。真宗在位二十四年，前十年小心翼翼，恪守祖宗基业；自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封禅泰山、崇奉天书，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劳民伤财，举动越轨。“将‘祖宗典故’作为国家政事的效仿原则，正是从真宗中期以后愈益突出的。”而“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则是在仁宗朝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请各位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吧。

邓老师强调，“书中所讨论的，主要是宋朝前期政治史的一些片段，所反应的，不过是笔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于宋朝史事及政治生态的些许理解，是‘个性化’的解说，而非系统全面的阐论。笔者希望与读者共同进入一个内容相对充实丰盈的‘学术角’，而不是重构整个宋代的政治通史”。（第17页）然而，我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样子。每一个学者，假如其严肃，其学问一定是个性化的。而“系统全面的阐释论述”必须建立在个性化的研究基础上，充分容纳了个性化所带来的差异，在个性和差异之上，才能建立共性，否则就是瞎掰。

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这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中的最后一种（2018年2月），其他三种是《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2017年10月）、《刘基事迹考》（2017年6月）和《元代白莲教研究》（2017年6月）。2019年1月，杨讷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杨讷史学著作四种”也便成为绝响。这四本书当中，《世界征服者》和《刘基事迹考》都是很“有群众基础”的题目。杨先生的书写靠谱、流畅又有趣，值得一读。看过《倚天屠龙记》的小说或者电视剧，且对朱元璋和明教的恩怨纠葛感兴趣的朋友，绝对不应该错过《元代白莲教研究》一书。

四种之中，为什么我单单选了《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来做特别介绍呢？因为杨先生在这本书里做了一件我一直以来在做，但是又没有做得这么好的工作——辨谎。

戏曲、小说、影视、游戏等文化载体之中，存在着不少对历史事实的错误叙述；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类的错误叙述往往比严肃的历史叙述更有市场，流传更广；由此形成了一种建立在错误叙述基础之上的“民间记忆”。民间记忆的存在本身是真实的。但是，民间记忆所记的所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多是逻辑混乱、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简单地说，多是谎言。因此，历史学者走出象牙塔，与莽莽红尘正面接触的第一件事，其实就是“辨谎”，告诉各位读者所信的东西是假的。这就是我说的历史学者的“辨谎”。

“辨谎”这个词，是从《红楼梦》里借来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里说道，元宵节贾府请了女先生到家里来说书，说的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春风暗度的故事，才说了个开头，就被贾母打断。老太太明确指出，这类故事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前言不搭后语”——“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像个佳人？……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就是告老还家，自然奶妈子丫头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老太太的这篇“辨谎记”，是知世之言，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

历史学者辨谎跟贾母辨谎，道理是一样的，逻辑第一。最简单的逻辑是时间的先后，后发之事不可以为先发之事的诱因，先出之书比后出之书可

靠。先出之书不记之事，后出之书增补而润色，故事越讲越精彩，却多半是说谎。说谎必有缘由，缘由无非是利益，给先人涂脂抹粉是为了后人脸上好看。当然，历史学者要掰的谎，可比贾母要掰的谎复杂多了。历史学者的掰谎是和严肃的文本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就是一出精彩的历史学者掰谎记。

杨先生要掰的，是一个弥天大谎。1222年，长春真人丘道长（丘处机）应召往西域觐见成吉思汗，这件事是真的。但接下来的则是假的，全真教徒相信，丘道长在谒见之时，当面向成吉思汗建言停止杀戮，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停止或减少了杀戮。这则假信息被全真教徒奉为丘祖功绩，本教光荣。他们信，这个“信”是真的。相信丘处机曾经建言制止杀戮的，还不止全真教徒，甚至包括皇帝，乾隆皇帝为北京白云观丘祖殿题词：“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皇帝的御笔题词，今天仍然在，“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通过白云观的导览词，通过相关的道教书籍，继续在民间记忆中传播扩散，简直就跟真的一样了。但是，杨先生说，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那么，杨先生是怎样证明“丘处机一言止杀”是假的呢？

首先，杨先生证明，记述丘处机西行事迹的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没有“一言止杀”的记载。《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1228年农历七月丘处机下葬之后不久，由他的弟子李志常执笔。倘若真有其事，那么，“一言止杀”应当是丘道长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了，值得大书而特书，而《长春真人西游记》不着一字，是何道理？关于这一点，晚清的全真教徒陈铭珪就已经注意到了，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陈铭珪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这是因为李志常的谨慎；第二，这是因为丘处机固守老子的教诲，成功而不居功，对宫闱之事，更是严守秘密。对于陈铭珪的这两点解释，杨先生一一击破：第一，《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集体的游历记录，总共约两万三千字，李志常只是执笔人，随同丘处机西行的十八弟子，李志常是第一个被留在途中的，他再次与丘处机会合之时，时间已过去了一年零十个月。这一年零十个月，恰恰是丘处机西行的活动重点，其间所发生的事件就包括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谈。这一年零十个月的活动，并未因李志常的缺席而失于记载，相反，在两万三千字的篇幅之中，有近万字是关于这一年零十个月的。换言之，李志常肯定是“根据丘处机本人和当时在丘处机身边的几个弟子提供的笔记或口述撰写的。其书完稿前后，必定经掌教尹志平等西行弟子看过”。因此，杨先生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如实地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看作集体的制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第9页）第二，说丘处机严守秘密，不言宫闱之事，也是靠不住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分

明讲了1222年4月至1223年3月间，丘处机多次觐见成吉思汗的情景与对话，“一言止杀”是大好事，如果真有其事，弟子实在没有必要忍着不说。

除了丘处机事迹的第一手资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只字未提“一言止杀”一事外，杨先生提出了第二个证据：成书于1228年10月的《长春真人本行碑》全文引用了李志常为丘处机所作的行状，然而关于西行之事，只有寥寥几行，除了丘处机抵达与离开成吉思汗行营的时间地点之外，关于二人之间的对话，只记载了两件事，一是成吉思汗问“长生药”，丘处机“但举卫生之经以对”，一是丘处机又多次谈到仁孝之道，成吉思汗觉得不错，“以其实，嘉之”。“一言止杀”？没有。

杨先生否定“一言止杀”真实性的第三个证据是耶律楚材的《西游录》。耶律楚材从1219年起便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要求丘处机前往西征行营觐见的诏书就出自耶律楚材之笔，耶律楚材还是成吉思汗会见丘处机的目击证人。《西游录》同样作于1228年，共计六千多字，有四千字都是批评丘处机的。作为一名信奉佛教的儒者，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私交不错，但他极不赞成丘处机的信仰和主张。《西游录》列举“不许丘公之事”十件，并无一丝进言止杀的痕迹。与《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长春真人本行碑》相互对照，可以证明，直到丘处机去世的1228年，“根本没有丘处机进言止杀的说法”。

三个例子举出来，“丘处机一言止杀”为后人编造，基本可以落实。但杨先生的论述还不至于此，接下来，他又举出了第四个证据——《玄风庆会录》。这份资料的状况更为复杂。《玄风庆会录》是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的实录，正文三千多字，前面有一篇近二百字的序，没有署名。它成书于1228年以前，比前面三份资料都早，但是，它长期“秘藏宫禁，鲜为人知”。关于《玄风庆会录》的成书时间、作者等，众说纷纭，有人干脆断言它是一本伪书。杨先生发现，早在1241年以前，丘处机的再传弟子秦志安就已经提到了这部书，并且明确指出，它的记录者就是耶律楚材。那么，秦志安有没有可能记错？换句话说，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的时候，耶律楚材是否在座呢？关于这一点，杨先生在耶律楚材本人的《西游录》里找到了直接证据。比如这一条：

客问：丘公进奏谈道之语，可得闻与？

居士曰：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问长生之道。所对皆平平之语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絮宋徽宗游神霄宫等语。此丘公传道之极致也。

《西游录》采取的是设问自答的形式，就像是一场假想的采访。采访者问：能不能请您谈谈丘公觐见大汗时对话的情况呢？耶律楚材居士（耶律楚材自称谥然居士）回答说：1222年冬十月，大汗召见丘处机，问长生不

老之道，丘处机回答得很一般，就是道教那些普通的精神气之类的。他竟然还提到了林灵素梦中带宋徽宗游神霄宫这样荒诞的亡国之事。这就是丘公传道的极致了。“心非而窃笑之”——我心里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意思破，就一直偷偷在心里笑他。杨先生认为，这句话里也有夸大的成分，因为“那时成吉思汗安排的就是专听丘处机讲道，楚材只是以近臣的身份旁听并进行笔录，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第22页）

《玄风庆会录》是耶律楚材当时亲笔所记，这一点可以无疑。那么，按照《玄风庆会录》的记载，丘处机有进言止杀的内容吗？不但没有，“相反的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第28页）丘处机政治理念低下，宗教追求卑劣，竟然能“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神奇来夸说”。这样崇尚人间富贵、崇尚权势的道士，怎么可能对成吉思汗进言止杀？“丘处机真正关心的”是蒙古人能够“给教门带来的发展机会”，民众的苦难，不是这“老神仙”关注的事情。（第54页）

如此说来，从1222年的会谈记录《玄风庆会录》到成书于1228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和《西游录》，都没有“一言止杀”的内容。丘处机从未向成吉思汗进言止杀，可为定论。但是，杨先生的辨谎记并未到此结束，他更进一步找出了“一言止杀”故事的出处。简单地说，这个故事应当是窝阔台汗时期，全真教徒为了吹捧丘处机、弘扬本教而编造出来的，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添油加醋，变得更加丰满，最终堂而皇之地成了全真教教史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辨谎记”。辨谎记最初是一篇八千字的短文，发表于2002年，而且是在一个纪念文集里；这样的发表状态通常很少被人读到，但是，杨先生很幸运，这篇文章竟然被道教史的研究者看见并且注意了。2003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全真道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到了杨先生的文章，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杨先生的看法成立，“则一系列全真史料的真实性都要受到怀疑，丘祖的历史评价也要重新改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全真道研究者加以解答，而且必须由史料的考辨入手”。这话说得非常对。杨先生做的是史料考辨，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但也必须从史料考辨入手，与杨先生一分高下正误。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历史学者的辨谎记被看见了，然后又被忽略了，道教史家继续歌颂他们的“丘祖”，赞美“一言止杀”的故事。杨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又写了一篇三万字的辨谎记，也就是我上面转述的内容。能不能被接纳或者严肃对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严肃的历史学者常常是砸场子的，我们努力传递真实，因为真实本身值得赞美。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1982年版

2018年6月25日是黄仁宇一百周年诞辰，这一天，我的朋友圈被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刷屏。各路名家、各大人文公众号皆有文章，讲述黄仁宇生平和《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以及他的“大历史”。在这些文章之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黄仁宇。他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成长为一个历史学者，以中国明朝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他一生坎坷，生命之中最大的耻辱是中年失去教职，最大的光荣是出版了《万历十五年》。第二，“大历史”。这是黄仁宇本人所推崇的历史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第三，《万历十五年》。这是黄仁宇最重要的著作，英文原著出版于1979年，出版之前曾经被质疑非驴非马——既不像纯学术，也不像通俗读物，但出版之后相当畅销，而且最终还是得到了美国学界的承认，中文版则由作者本人译写，相当于二次创作。中文版为黄仁宇带来了一个历史学者的荣耀。可以说，如果没有《万历十五年》，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知道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所以在这三个关键词当中，关键的关键，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绝对是中文历史著作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1982年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不仅在专业历史圈得到好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吸引了众多普通读者，各种版本的《万历十五年》一共售出三百万册。用句时髦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现象级的书。那么，《万历十五年》究竟写了什么？它为什么会那么火？

我们先来看内容。

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年号，它的英文书名直译就是《1587，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明朝在崩溃》（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从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年号出发，黄仁宇向前追溯、向后延展，详细描述了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这一年，二十四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当了十五年皇帝了，他曾经努力学习，信任、尊重并支持首辅张居正，但是，张居正死后被揭露出来的两面性格，让他感到彻底的失望。作为一个人，他爱郑贵妃和郑贵妃所生的老三常洵；可是作为皇帝，礼法制度却要求他立庶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立储问题引发了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对抗，最终，心灰意冷的万历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对策，搁置了立储，也搁置了朝政。

三年以前，曾经显赫一时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已经被抄了家。张居正遭到攻击的真正原因，是他得罪了文官集团。文官集团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张居正虽有心清除积弊，但是他的做法却是高压加权术，因此，他遭到反对和清算都是必然的。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试图充当和事佬，与全体文官协调合作，并希望皇帝以身作则，重建诚信。可是，申时行推广诚意的方式却是不断地举行礼仪和讲书，万历当然不肯配合。申时行也是两头不讨好，难免下台的命运。

在万历十五年的年尾，有两个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去世，一个是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另一个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两个人死得都很惨。海瑞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连自己的葬礼都无法应付。尽管海瑞在民间记忆中成为敢于对抗权势的英雄，但在皇帝和同僚眼里，海瑞却像是一个笑话，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道德符号。戚继光的墓志铭里写到他的死时说：“腊日（十二月十二日），鸡三号，将星陨矣。”仿佛那是举国哀悼的大事件。可是事实上，皇帝和朝廷压根儿没有理会戚继光的死。三年之前，他已经被革职。皇帝再也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同样在万历十五年过世的，还有一个被丈夫遗弃在老家的可怜女人——思想家李贽的夫人。第二年，六十一岁的李贽剃度为僧，决心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四年之后，他被告“邪说惑众，罪大恶极”，下锦衣卫狱，自刎而死。

这六个人中，万历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张居正、申时行曾任首席内阁大学士，是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首脑；海瑞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清官；戚继光曾经是最成功的武将；李贽则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构成了“万历年间支撑帝国社会大厦的基石”。可是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委屈，没有一个人的结局不失败。

以上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大致内容。黄仁宇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这本书的开端，他首先讲了一场礼仪乌龙的故事：万历十五年三月初二，忽然传来消息说，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慌忙狂奔皇城，却发现原来只是虚惊一场。皇帝龙颜不悦，下令所有在京供职的官员集体罚俸。

这场礼仪乌龙，只是无关紧要的“末端小节”。那么，黄仁宇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件小事来开始这本书的叙事呢？黄仁宇给出的解释是：“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纵观全书，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场礼仪乌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礼

仪本应是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表现形式，追求的是内外一致；但是，堂堂帝国的午朝大典竟然可以演变成一场笑话，哪还有什么内容实质可言？这说明什么？帝国的礼仪已经彻底虚伪化，完全丧失内容，违背了人性，变得假大空，却又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人们头上。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套假大空的东西牢牢地罩着。总体来说，在黄仁宇的笔下，明帝国的政治就是假大空的礼仪加上人事斗争。

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正常状态。人就是这样，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私人利益。自以为掌握着儒家真理的文官集团，“名义上任职于各部各寺，各有其官方组织，但是背后又各有各的私人派系”。国家制度也是这样，什么都是两张皮，比如关系重大的税收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税额分配与现实的土地占有状况严重脱节，根本执行不下去，必须依靠“惯例”。制度规定是阳，实际做法是阴。

当虚伪变成了正常，那么，正常就不再正常。而教育当然是积极正面、只谈仁义道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一旦接触到世界的阴面，那就离崩溃不远了。万历皇帝的崩塌应当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九岁即位，在严厉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的内外教导下成长。他很尊重张居正，称他为“张先生”。1578年，张居正的父亲过世，按礼仪应当丁忧守制，可是，万历离不开张先生，朝廷离不开张先生。所以，最终由万历下旨，让张居正夺情，化孝道为忠诚，继续为朝廷服务。这一明显违背礼仪的行为，遭到了文官集团的猛烈攻击，而万历则坚定地站在了张居正这边，严厉地处罚了那些攻击张居正的官员。在那个时候，万历肯定是相信张居正的一切美德的。然而，就在1582年张居正去世半年之后，万历就发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万历发现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他开始对一切都取怀疑态度。所以，当虚伪的官员们要求万历做出符合礼法制度的选择，舍弃所爱，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的时候，他干脆撒手什么都不管了，政府的职位空出来也不补，就让它那么空着——这个政府竟然也能继续运转，只是，它不再有能力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在这个虚伪的体制当中，即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正义之事，也需要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进行。比如戚继光整顿北部边防的工作，就需要他跟内阁首辅张居正之间的私人关系来支持；而张居正支持戚继光的很多做法，严格追究起来，也逃不掉“结党营私”的指责。李贽看透了体制和文官的虚伪，转而倡导和实践一种表里如一的生活方式。海瑞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要把别人挂在嘴边的教条变成现实。最终，他们殊途同归，被时代抛弃。

在万历十五年，哪一条路都是死路。“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和明朝的其他年份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时代。正如黄仁宇所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而这场大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史学界还无法贡献出如此细节丰富、思想自由的作品，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是那样地如饥似渴，希望了解过去，了解来自外面的信息，倾听不同的声音。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一名粉丝、黄仁宇的后辈历史学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80年代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历史学界已经可以为大家提供比《万历十五年》更丰富的知识面向。我们知道，金元以后，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的水平都走了下坡路，而明朝水平特别低。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万历十五年》的总体叙述，带有强烈的先入和情感代入色彩，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也不是很清楚，他的一些叙述流于模糊的印象，缺乏严肃的论证。毫无疑问，我们比《万历十五年》进步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万历十五年》曾经的历史荣光。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2016年版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包含五篇论文，分别是：《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这五篇论文，每一篇都很长，加起来共四十五万字。通常情况下，论文比著作的问题更集中、信息更致密，而姚念慈先生的论述又以严谨绵密见长。所以，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比较具有挑战性。如果你愿意用一两个周末的时间，沉下心来，把自己交给这本书，那么，你一定会被深深吸引，欲罢不能——这是我的阅读感受。

那么，这本书吸引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它所揭示的内容是新的，跟传统说法不一样：一个不一样的但是让人感觉更真实的康熙皇帝，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更为真实的康熙朝政治史，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更为真实的满汉关系。姚先生自述“本书主题只有一个，即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自序第3页）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说法出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也就是玄烨辞世前五年）的长篇《面谕》。这篇《面谕》是玄烨的“手书谕旨”，曾经“召入群臣面谕”，也就是当着群臣进行宣读，后来又全文颁布，是玄烨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皇太子被废之后经历十年深思熟虑的产物。全文共两千多字。姚先生把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并论证“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也就是说清朝开国得天下是“最正”，其论证如下：“我朝”“初无取天下之心”，清兵入关乃是“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之后，明朝臣民期盼欢迎的结果，上“应天”意，下“顺人”心。（第73页）第二部分，玄烨自述继位以来的人生经历与感受，结论是“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这句话常常被学者忽略，而姚先生认为，这恰恰是玄烨要强调的他所认为的真理。也就是说，皇帝的“享寿考”与“享太平”都出自天命，皇帝的个人寿命、统治时间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而当时玄烨在位已经五十六年了，“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因此，在玄烨看来，他本人的长寿和在位时间之久，都是天命所钟，也是“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又一明证。（第75页）第三部分回应群臣所关注的立储问题，态度明确，

意思模糊，“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我胸有成竹，你们都闭嘴。但是，按照姚先生的分析，玄烨把自己亲手培养的皇太子废了两次之后，其实在立储问题上矛盾的，没有定见，他只是表面上嘴硬而已。（第77页）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实质就是“为大清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自序第4页）而隐藏在“争正统”问题背后的则是清初严重的满汉对立心理，以及玄烨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他有能力认识到汉文明的优越性，而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却让他感到强烈的不甘和不安，唯恐满族被汉族同化，丧失其民族特质，进而威胁到满族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玄烨高扬起从汉文化中获得的正统大旗，以天子之尊，“亲自披挂口诛笔伐”，试图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观念植入清人头脑，以“保证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竭尽全力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接纳、承认满族“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康熙朝的一切大政方针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而展开。”宣扬满族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和本民族的优越性，正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这本书的结构方式，分开来看，五篇论文各有各的主题，合起来基本上把康熙朝自从三藩之乱之后的重大史事重新梳理了一遍，从而让康熙朝政治呈现出线索清晰的崭新面貌。按照姚先生的梳理，“三藩之乱及各地反清势力的时伏时起，暴露出清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导致满汉之间的深刻对立，这对清廷统治者是一场严峻挑战，给玄烨的心理蒙上浓厚的阴影。……为使广大汉人接受清廷的统治，并驱除自身的心理压力，重拾满洲统治集团的信心，玄烨必须证明大清政权的最大合法性。为证明大清立国即正，玄烨就不能不干预《明史》（的编纂），证明天命所归在清，明朝之亡始于万历，清太祖、太宗有可取天下而不取之仁；清之代明，既非‘征诛’，亦非‘禅让’，而是明朝官民的急切‘迎请’。欲令天下臣民信服大清得天下之正为自古之最，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以本朝成就为证，为此玄烨势必要维持高额赋税，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借此演出种种活剧，然后不断施行蠲免的‘德政’；为证明大清王朝的正朔所承，玄烨就必须厘正历代各朝的统绪，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为使汉人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清朝统治超越往古，玄烨又必须兼道统与治统于一身，成为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牢牢控制话语权；而对皇太子出阁读书的设计，非但要超过明朝，亦应垂之久远……”（自序第5页）

这就是姚先生笔下的康熙朝政治。姚先生笔下玄烨本人的形象，也与清朝官方所宣称的、学术界主流所描画的和影视作品中所赞颂的“千古一帝”“盛世明君”差别极大。姚先生笔下的玄烨，骄傲敏感，多疑暴躁，同时“思维富于理性”，性格之中又有善于克制的一面，（第62页）始终抱持着“最原

始狭隘的种族仇恨和复仇心理”，（第61页）对汉人不得不使用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猜疑，对满人常恨其不争，但骨子里爱惜信任，倚为腹心股肱，相信“真正与满人同心同德的，是蒙古而不是汉人，尽管玄烨内心对蒙古充满鄙夷”。（第61页）他言辞高调，行事虚伪，喜欢自吹和被吹。比如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在南京明孝陵亲祭明太祖，题词“治隆唐宋”，推崇得无以复加，并且宣布“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四十六年（1707年），他再次亲祭明孝陵。但是，第二年，他就把正宗的“明代后裔”——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全家杀了。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头，还能做什么呢？玄烨为什么要杀朱慈焕？因为他的太子被他自己废了。亲自教育的太子竟然为鬼物所魅，发疯了，这说明什么？难道是上天不再保佑大清了吗？相反，明朝已经灭亡了七十五年，崇祯竟然还有儿子活在人世，“玄烨岂能不怀疑天不绝明？唯有将朱慈焕一家连根诛灭，或许才能挽回天意”。杀就杀了，也没啥好说的。玄烨的问题就在于，他后来偏偏又翻来覆去地说，“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第133页）类似的细节，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康熙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样的康熙朝政治，这样的康熙大帝，显然不符合主流印象。所以，姚先生在自序中说：“清史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本书的观点很可能不合时宜，然而我探索的目的，在于清理自己的思想，所需要负责的，是个人的理性与良知。”姚先生还以悲壮的语调为这本书的命运做了预言，他说：“本书犹如被清史主流冲刷到岸边的一粒微弱的水滴，其命运将是干涸直至被挥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失掉了水珠的光润，水分子却未消亡，或升腾汇入云雾，或渗入地下滋养土壤，仍将尽其绵薄。”（自序第9页）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史料出发，以审慎之态度挖掘真实，赋予历史以意义，以我良知，尽其绵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所能给时代的唯一献祭。知我罪我，我尽心矣！

其次，这本书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来建构康熙的帝王心术。心理分析如此大面积地应用，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中是比较罕见的。姚先生认为，“将玄烨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冲突之中，并透过其上谕的表面细细体察，发现其真实含义及其心理动机，才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玄烨”。姚先生运用了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原生家庭理论，分析幼年经历对玄烨性格、人格的影响。玄烨的生母不受宠，他两岁就因为避痘由乳母抱往宫外抚养，“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因为缺乏关爱，他在八岁即位以前就染上过吸烟的恶习。即位之后，他又长期处于孝庄强大的身影之下，鳌拜等辅政大臣骄横跋扈，而孝庄却并未进行有力干预。到十六岁的时候，他最终忍无可忍，亲自出手结束了辅政。“也就是说，玄烨的幼年、童年及少年阶段，一直处在某种威胁之中，缺乏亲情，这让他很难信任他人，更难友善真诚地待人。而长期的威胁感，孤立无助，必然加重他内心胆怯却

又亟思报复的矛盾心理。”他容易夸大危机，易于冲动，“缺乏与危险和平共处的勇气”，因此“往往采取心理学上所说的防御性攻击，即常言所谓先发制人”。（第118—119页）对包括废太子在内的一切其他人，玄烨的态度莫不如此。他的决策也具有夸大危机、先发制人的特点，比如最终导致了三藩之乱的撤藩，就是他先发制人的产物。

再次，作为一个细节控的历史学者，我欣赏并佩服姚先生处理史料、排比史事的细腻。比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玄烨对大学士等发布上谕，说已经过世七年之久的前任刑部尚书魏象枢是“假道学”，而且后来又于四十五年（1706年）、五十六年两次公开批评魏象枢。康熙说魏象枢“假道学”是有依据的，他的依据是互为因果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谋反，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发兵征讨，魏象枢反对，与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争论，产生矛盾——这是因。第二件事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地震，魏象枢独对，挟私报复，秘密奏请杀索额图以应天变，幸好玄烨本人明白事理，没有听信魏象枢的谗言——这是果。康熙十三年魏象枢与索额图争论成仇的因，在康熙十八年结出了魏象枢密奏诛杀索额图的果。玄烨由此得出了结论——你们“道学之人”竟然如此“挟仇怀恨”。那么，康熙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姚先生先排比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朝廷会议及魏象枢在当时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会议，魏象枢作为一个汉官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会，而且在此期间，魏象枢一直封闭在御史台衙署之中审理案件，也无从分身参与朝廷议事。（第7—8页）索额图倒是有可能参会，但是索额图对于出兵的态度与魏象枢一致，这俩人根本就不可能打起来。（第15页）因此，康熙所谓魏象枢挟私报复的“因”是不成立的。而康熙十八年魏象枢独对密奏，现场只有君臣二人，康熙在独对发生十五年、魏象枢过世七年之后硬要这么讲，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因为康熙十八年，魏象枢在独对中代表汉官和汉族人民表达了对满族官员、贵族的强烈不满，而康熙在当时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惩办满族封疆大吏，但是，三藩之乱中，汉官和汉族人民的表现却让康熙对汉人的忠诚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不得已而惩办满族官员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不甘。于是，半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对汉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强烈发难，并且对遭受八年战争蹂躏的百姓表达了强烈的不屑，简直就等于直接说汉人老百姓活该了。（第46页）在坚实的考证支持之下，姚先生对玄烨帝王心术的推理极为可信，至少他说服了我。

最后，是我读《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的私人体会。在像康熙这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笑点低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玄烨因为对满族官员的学问感到不服气，把满官德格勒、汉官徐元梦和熊赐瓚三人叫来考作文，汉官汤斌阅卷，“汤斌见德格勒之文，大笑，至口鼻涎涕交流，将所持文章坠失于地。奏云：‘臣因彼所写词语毫无文气，不禁大笑，甚属失礼。’”（第102页）汤斌这一笑，给自己带来了无

穷的麻烦。他被派去给皇太子讲课，原来的规矩是坐着讲，皇太子对老师客客气气的。这下怎么讲呢？六月初九，三位老师进入课堂，对皇太子叩头行礼毕，侍立于东。汤斌要跪着讲新课，讲完了“乃捧书跪听皇太子背诵”。作为老师，汤斌要说：每天聆听皇太子的讲解，我的学问也有所长进。能够躬亲圣人，实在是我的极大幸运啊！（第106页）自从孔子以来，中国老师之屈辱，汤斌算是空前的了，绝后吗？好像也不。汤斌给皇太子上课的地方在哪儿？畅春园无逸斋。离我的办公室就几步路远，而已。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这实在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值得一读再读。在历史学家当中，孔飞力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在书的开头，他这样写道：“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寥寥几笔，定调子，造气氛，解释主题，全都有了。接下来，孔飞力讲了四个具体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石匠的故事。仁和县吴石匠受雇为德清县重修城墙上的水门，有个姓沈的农夫请求他作法，把写着自己侄儿姓名的纸片贴到木桩顶上，让大锤捶打撞击，以泄私愤。吴石匠拒绝，并且告了官，沈农夫被打了板子。德清有人叫魂的谣言不胫而走。不久，德清人计兆美流落到杭州，因为口音被辨认出来，扭打送官，杭州人认定这个德清人一定是来叫魂的。计兆美屈打成招，牵连到吴石匠再度受审。浙江巡抚组织两县会审，结论是查无实据，然而，却无法阻止叫魂恐慌的蔓延。

第二个是四个和尚的故事。这四个游方的和尚在浙江萧山被抓，这一次，叫魂案跟头发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四个和尚被指控剪下男人的发辫。请注意，这是满人治下的朝廷，辫子是汉人驯服于清朝统治的标志，而剪辫子，哪怕只是剪下辫梢，也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政治联想的——后来乾隆皇帝果然就把叫魂做了这样可怕的意义提升。而当时浙江官府的调查则表明和尚们是被冤枉的。

第三个是三个乞丐的故事，第四个仍然是和尚的故事。案件内容都差不多，被指控用叫魂妖术害人的往往是和尚、乞丐和外来打工者，而官府的调查结果无一例外是查无实据。这是官府立案了的叫魂案。此外还有许多来历不明、疑似叫魂作法的陌生人，未经官府知晓，就被恐慌的当地人活活打死了。显然，这是一场针对下层外来流动人口的驱魔运动。人们的恐慌和恶意需要一个发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弱者中的弱者——外来人口。

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正当“乾隆盛世”，中国社会内部为什么会

产生如此深刻而冰冷的敌意？按照孔飞力的解释，这盛世本来就是外强中干、败絮其中、徒有其表，“江南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有这一切，让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冤冤相报的戾气。故事说到这里，所揭示的还只是社会的病态，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之痛”。

接下来，乾隆皇帝出场，叫魂恐慌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凡是跟辫子有关的，都是关系到清王朝统治安全的政治问题；而叫魂不仅关系到辫子，还关系到江南，更是格外敏感。想当年，清兵入关之后，抵抗剃发最激烈的就是江南。清朝统治者的一大优点就是懂历史，有记性，只可惜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自私又简单。接获有关叫魂恐惧的密报之后，乾隆发布上谕，严令各省督抚“密行体察”，平息舆情。而山东巡抚富尼汉的报告，则把叫魂描述成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团伙犯罪。于是，乾隆下令各省严厉追查。

随着追查的展开，在孔飞力的笔下，叫魂又演变成了一场皇帝与地方大员之间的较劲儿。两江总督高晋报告说本省没有割辫事件，乾隆大怒，“江苏岂能独无此事？”此等“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在乾隆的严厉督责之下，江南各省按照山东提供的名单奋力追捕，无中生有，屈打成招，一千人犯被押送到承德，由皇帝亲信的军机大臣复审。复审的结果，当然是漏洞百出。最终，正直的老臣刘统勋出面，乾隆宣布停止清剿。

然而，皇帝怎么会犯错误呢？皇帝永远正确，结束叫魂案，乾隆明发上谕严厉斥责江南地方官“养痍遗患”导致叫魂危机蔓延数省，“隐瞒于前，塞责于后”，因此，必须严厉惩处，以正纲纪。而英明睿智的皇帝陛下正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这才下令将人犯移送中央重审。如今冤情大白，人犯尽数释放还籍，正见皇恩浩荡。至于那位靠刑讯逼供把叫魂案编造成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忠心可嘉，只受到了轻微责罚。这就是叫魂案的结局。

作为一个事件，叫魂大恐慌就发生在1768年，三月开始，十一月结束。围绕这一事件，孔飞力花费了八章的篇幅。这八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包括对乾隆朝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总结，对满族统治者心理的剖析，对巫术导致恐惧的文化分析，对清朝有关巫术法令的介绍。

第八章的标题是“终结”，叫魂案的确到此终结。但是，孔飞力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这本书一共十章，“终结”之后还有两章。我觉得，这两章，特别是第九章，才是孔飞力真正想要讨论的大问题，前面八章都是铺垫。孔飞力是把叫魂大恐慌这个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延长线上来观察的，他要讲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是清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那么，最后两章讲了些什么？

第九章的标题是“政治罪与君主官僚制”。按照孔飞力的定义，“政治罪”包括各种形式的谋反，它危及王朝统治的基础，具有颠覆性。“叫魂”（妖术危机）就是政治罪。可是，从叫魂案的过程来看，“官僚们却并不像君主那样对政治罪感到忧心”，皇帝忧心忡忡，官僚消极怠惰，君主和官僚对政治罪的不同态度引出了本章的主题——皇帝与官僚的关系问题。

皇帝拥有专制权力，但是日常行政必须依靠常规制度，常规制度赋予官僚常规权力，而这种常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构成了制约。皇帝本人（作为政府首脑）也在常规制度的规范之中，靠文书行政指挥政务，“繁忙的君主会发现他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皇帝被官僚局限，那么，“如何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这是皇帝的难题。

孔飞力对清朝官僚制度的评价是“大破产”。监察制度失效，“皇帝的耳目在京城以外是又聋又瞎的”；考核制度也没什么用，它主要依靠上级对下级进行考评，“人们需要回避风险，话越少越安全”，评语呆板固定，拘谨浮面，根本就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对于这种状况，乾隆极其不满，他发现，一个被前任长官定义为“年老体衰”的官员，却被现任长官评价为“老成持重”，分明是文字游戏。乾隆感觉自己被架空，总督和巡抚对考核官僚敷衍了事，“朕将何所依赖？”三年一次的大考，没有部门肯负责任。“考评官员推诿给吏部，吏部推诿给九卿，九卿和吏部交相推诿，实际上最后都是推给朕。”满朝朱紫，各省封疆，竟无一人值得依靠，皇帝真成了孤家寡人。孤独的乾隆对官僚集团产生了极度的道德鄙视，予以了无情揭露：“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于自私自利之念。”

乾隆试图利用秘密奏折制度冲破自私自利的官官相护之网，但是，机密渠道也能送上来敷衍了事的公文，现场的勾结共谋还是有办法把他蒙在鼓里的。皇帝利用专制权力，亲自挑选、任命各省督抚，跟他们热线直达，极力强化个人纽带。但是，这些地方大员在叫魂案中的表现却让乾隆大失所望。叫魂案于是成为乾隆挥舞专制权力，整饬官场陋习，对抗常规权力的一个契机。

多年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但是，乾隆的手法还是简单粗糙，比如，他会这样骂一个官员：你在刑部的时候，表现出色，然而一到外省去当官，就沾染了模棱腐败的坏习气，实在可恨！……你白白浪费时间，奏报没有一个是真的。你实在有负朕的信任，不知道什么是恩泽啊！这是江苏按察使吴坛承认错误的时候，乾隆亲笔朱批的文字。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小脚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数落她不成器的孙子：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打死你都不多呀！——皇帝对大臣用的，还是私人关系和个人控制这一套，一点高尚的理想和追求都没有，而个人控制这东西本身就是没有底线的——清朝皇帝武库里的兵器实在是太

低级了。中国统治水平和治理水平在金元之后的下降，那是千真万确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皇帝急了眼，底下人也是有办法的。有人拖，有人阳奉阴违，有人偷换概念转移重点，把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把自己搞得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皇帝急了，我在忙着。这多么忠诚，其实什么也不会改变。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是全书的结论。首先，孔飞力对第九章进行了总结和重申：在乾隆时期，“任何一个君主想要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定、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乾隆的父亲雍正还是做过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但是到了乾隆这里，官僚体制盘根错节，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经捉襟见肘，政治罪便可能为皇帝提供一种恰当的替代性手段。其次，孔飞力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民间的仇外情绪，他说：“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存在于幻觉之中。……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去迫害跟自己不同、比自己更弱的人。这是一个相害的社会。最后，孔飞力总结全书，回应开篇：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大清朝彻底丧失了希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度反而成了应急的锚锭，让清王朝这艘破船不至于偏离旧有的航道，直到进入它悲剧的近代。

这就是孔飞力讲的那个大故事。我也许不能同意他所有的叙述，但是这个故事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孔飞力，大才；《叫魂》二十年磨一剑，不朽。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442页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一本集中之书——论文集里的书，作者是把它当作长论文收录在论文集里的，但我觉得这篇论文的体量完全当得起一部书。所以，我把它当作一部书来介绍。它的作者是专研明清至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教授。收录了这部书的论文集的大标题也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副标题“清代的思想、学术和心态”，共计十二章，关注的时段从清初一直到“道光咸丰以降”，关注的题目包括思想学术的起落兴衰、学术群体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社会心态，以及重要思想家的事迹钩沉。这篇我当作书来介绍的大论文是论文集的第八章，共计九十八页。同论著相比，论文是一种信息密度更大的学术写作方式，通常要有非常集中的议题、致密的论述和鲜明的创见。所以，这九十八页的信息承载量是极大的，完全可以当作一本书来读。一般的论文，因为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要求介绍背景知识，但是这一篇，是以新视角去发掘旧题目的未尽之意，所以有一大部分是对于既有研究的概括总结，这也让它像一本书，让外行读者不至于茫茫然手足无措。

这旧题目就是中学课本里都会提到的“清初的文字狱”。但是，我们之前所学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事件——谁，因为什么书或文字，触犯了满人的忌讳，从而遭到了怎样严苛的惩处。而这本书想要探讨的，是事件对事件边缘及事件之外的更广大人群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是人身体中的毛细血管，深入肢端，无所不到。它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影响了当时和一定时期以后的几乎所有读书人，进入他们的潜意识，让他们随时随地，哪怕独处于暗室空谷之中，都不自觉地进行自我检察和自我压抑，以逃避那无所不在的网罗。这种影响比文字狱本身要深刻得多，恐惧流淌在人们的血管里，这就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毛细管作用”是一个比喻，用作者的话来说：“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第345页）“……清初以来的大小文字狱犹如龚自珍所说的‘万形而无形’的‘风’，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

作者用“涟漪效应”和“暴风圈”来比喻事件与影响之间的关系。文字狱事件“形成一个又一个暴风圈，形成一种看似模糊而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每个事件像投石进入池塘产生‘涟漪效应’，所以许多不曾出现在禁书

目录中的书物，人们为了防患未然，也对它们做了庞大的禁抑工作。至于任何牵扯到禁忌的物事，自然成为无所不在的自我禁抑的对象。正因如此，自我禁抑的活动有时候无涯无边，有时候却完全出人意料，而这些都是各种文字狱案或禁毁目录中所从未提到的，是一种无法捕捉到的、属于‘万形而无形’的世界”。（第347页）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请注意，作者所关注的，是过程和作用方式。另一方面是“权力在极小的范围，尤其是在无名的文人心中”的实况。……在私密的空间中（比如在排版房中，或在个人的小书斋中），权力如何渗入文化活动，左右它的运作方式与发展”。这就是“自我禁制”。作者试图揭示的是，“人们在得到各种政治禁制的讯息之后，如何在心中揣度、发酵、酝酿出一套检制约束自己的标准，然后在别人发现他逾轨之前，自己先偷偷抑制、删改，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遮掩得无影无踪”。那“悄悄地、主动地，在私密空间中进行的禁抑，是一部全民大合唱”。（第348页）

从集中而首尾清晰的事件叙述，走向“万形而无形”的影响叙述，作者的视角转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怎样才能赋予那“万形而无形”的东西以具体的形象呢？况且，作者想要探讨的，恰恰是当事人试图极力掩盖的，那“是事情发生之前的压抑，是在紧张心情下，写作时种种压抑、闪避，是尚未被发现之前的遮掩或销毁”。（第348页）“这是一个沉默的内心世界。”那么，该怎样让沉默的世界说出真相呢？作者采取的探案思路是“从文献的空白、删窜的痕迹来进入这一个沉默的世界”。（第348页）“以‘书籍’的生命历程为主，从作者写作的紧张压力，到刻书者的手下，到出版发行，到藏书家，到读者自己的秘密删窜，到书商的偷偷销毁，去勾勒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的这一个重要面相。”（第349页）

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清代文字狱概况”，介绍康雍乾盛世的文字狱“盛况”。第一，数量居历史之最，起于顺治四年（1647年），康熙年间大约10起（第345页），雍正朝25起，乾隆朝135起，其中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查缴禁书的文字狱有48起。（第346页）嘉庆以后，就不怎么再出现了。（第349页）第二，涉案人员从上层向下层扩展：康熙、雍正朝触犯者多为官僚、乡绅及有名文人，乾隆朝则波及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其中诸生有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几起。（第349页）第三，各朝查办重点不同。康熙朝的重点是明清易代史料，及所谓“谰言邪说，语既不经”的著作。雍正朝的文字狱有三个查办重点，一是与政争有关的人士的相关著作（比如年羹尧、隆科多门下士人的作品），二是阐扬汉族民族意识的著作，三是违背帝王旨意的著作。（第350页）乾隆朝则可以分为七大类：一、未避庙讳，谤议国君；二、涉及清代前期史事；三、反清志士

之著作；

四、眷怀故国，语涉怨望；五、有亏臣节者之著作；六、幸进大臣之著作；七、议论圣贤之著作。（第351页）

“乾隆爷”是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他的思想更为深刻和成熟。就乾隆个人的文化倾向而言，他“很早就表现出牢守儒家正统的纲常文化的思想特质，他似乎也了解这是他合理化异族统治的最大资本”。（第352页）同时，“乾隆又颇富考证批判的精神”，他对理学有兴趣，有自己的理解。关于皇权，乾隆继承了他的祖父康熙“以天子兼统治者与教主”的思想，“一方面想做千古帝王，为千古文化订下标准，一方面想巩固满族统治，他要结合这两者，在汉文化的营养皿中培养满族政权的正当性”。（第353页）乾隆“认为国家可以垄断知识与文化”，认为皇帝是现实世界、伦理秩序和一切知识智慧的中心，他说“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第354页）“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春秋，天子之事”，历史的书写和古今的联结，也要靠天子。（第355页）

“清代文字狱概况”这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综合前人研究所做的叙述，即便如此，作者的叙述仍然是创造性的，在基本史事业已清晰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乾隆与他的群臣之间在对《四库全书》的征集、搜剿过程中是怎样“合谋”编织了一张禁网，将搜书发展成为一场查禁运动。起初只是简单地以“稽古右文”为标榜搜书，当乾隆当面对浙江总督钟音密语“寓禁于征”的想法之后，方面大员们赶紧将错就错，转变思路，变本加厉地推行，网罗愈缩愈紧，愈来愈下，几乎实现了全民动员，各种奇思妙想纷纷出台，审查对象不断扩大，起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及一张确定的书单，而是不断查缴，不断透过想象、牵连，逐步形成一张大网”，（第368页）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心理紧张。“它造成一种风，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检点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窜的现象。”（第375页）

以上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自我压抑现象”的具体表现了。这一部分分为八个小节：

（一）删窜者的身份，究竟是谁在动笔删窜那些令人恐惧的内容。

（二）自我删窜内容之转变。朝廷的忌讳在变，删窜的内容也要随之转变。比如雍正皇帝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到了乾隆朝就成了禁书，与之相关的内容就要删除。乾隆朝的空气比前三朝都紧张，“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第379页）

（三）写作时的自我禁抑。官定《明史》之中，凡有关女真之事皆不见，“甚至明代名臣，其事功，史应为之立传的，但因与当时建州女真事有关，《明史》便削其人而不为传”。（第381页）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对剃发令的禁忌，《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第385页）顾炎武的诗，采用了一套特殊的“密码系统”，用《广韵》的韵目来代替正字，比如“正朔虽未同，变支有一人”根本就读不通，倘若你了解韵目代字的秘密，知道“支”其实是“夷”，那么，“正朔虽未同，变夷有一人”则是何等地豪气干云。现代学者潘重规的《亭林诗考索》甚至还制作了一张顾炎武诗中常见韵目代字表，帮读者解惑。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这套密码呢？王汎森先生推测，“这些工作最可能是他的编刊者所进行的”。（第385页）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生长在康熙乾盛世的诗人陈梓给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删后诗存》，并且作序自白说：我把那些合心意的诗都烧了，剩下不值得烧的应酬之作，编成这部《删后诗存》，留给学生后辈，精华去而渣滓仅存，可怜我的诗啊！近代学者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了陈梓诗集的另一个版本《井心集》，人们这才知道他删的、痛的是什么。（第386页）

（四）紧张压力下的出版与编辑工作。有些书很多年不会再版，比如文天祥的集子从雍正到道光，一百二十年没有刊本。（第388页）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因为他的抗清立场，被他同时代的出版家朋友有意排在了三大家的最后，雍正、乾隆朝，屈大均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压力增大，他的名字干脆从嘉庆时期的《广东文献》中消失，不被记忆了。（第389页）《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见一部康熙年间刊刻的屈大均文集，“翁山文钞”的书名以及“番禺屈大均撰”六字在印书的时候都被删掉了。“使人读之，完全不知道是谁写的。”（第392页）南明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后来降清，晚年又参与抗清斗争，历史极其“不干净”。他的名字要么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字，要么变成了墨钉。

（五）读者的自我禁抑。一边读书一边把清朝统治者不喜欢的字样涂抹或者写个“删”字上去，以示态度，“使得收藏该书不为罪过”，应当是常见做法。藏书家会建立阴阳两部书目，把那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书故意漏掉。宁波天一阁的藏书，道光年间的书目可以比嘉庆年间的书目多出463种来。（第397页）

（六）民间的焚书运动。作者推测“清初到中叶，有一个暗暗进行的民间焚书运动，其规模无法估计，但可以推测它一定比官方收缴焚毁的规模要大得多”。（第401页）庄廷鑑的“明史案”发生之时，“闻风心栗者，取其家有之书，稍涉疑似，无论兔园册子，悉举而畀之爨烬”，连乡下教书先生粗糙的识字课本，也拿来烧成灰了。（第401页）“尺度是在人们心中的。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无限猜测、扩张，也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删

焚，不管它们是不是在禁书目录上”。（第403页）

以上种种是自我压抑之表现。这一部分的最后两个小节：（七）强调“自我删窜的现象不能泛滥解释”；（八）谈自我压抑现象的影响。作者认为，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评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历史记忆常被彻底扭曲或抹除而不自知。”比如，生于清末的钱穆回忆说，他是上小学才被告知“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的。（第407页）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自我压抑现象”是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我觉得最值得学习的部分。怎样把“万形而无形”的东西写实，这本书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样板。最后是第三部分“结论”，将清朝的个案做延伸的概括性思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

ISBN 978-7-5217-2398-4

I. ①法... II. ①赵... ②刘... III. ①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社会生活 - 历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D691.2 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1791号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著者：赵冬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印次：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398-4

定价：1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